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全集
（套装36册）

李 新 主编

中 华 书 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全集
（套装36册）

李 新 主编

中 华 书 局

总目录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1894-1912）上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1894-1912）下
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上
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
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
中华民国史：第四卷（1920-1924）
中华民国史：第五卷（1924-1926）
中华民国史：第六卷（1926-1928）
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
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上
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下
中华民国史：第九卷（1937-1941）上
中华民国史：第九卷（1937-1941）下
中华民国史：第十卷（1941-1945）
中华民国史：第十一卷（1945-1947）
中华民国史：第十二卷（1947-1949）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卷（1905-1915）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二卷（1916-1921）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三卷（1922-1924）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四卷（1925-1927）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五卷（1928-1930）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1931-1933）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七卷（1934-1936）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八卷（1937-1939）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九卷（1940-1942）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卷（1943-1944）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一卷（1945-1946）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二卷（1947-1949）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一卷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二卷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三卷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四卷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五卷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六卷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七卷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八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
(1894—1912)
上

李 新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

（1894-1912）

上

李新　主编

中华书局

出版前言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完成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中华民国史》编撰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其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先生和吴玉章先生，始终关注民国史研究的计划，并曾在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重提纂修民国史事。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及研究条件的不够周全，这时的民国史研究还停留在科研计划的层面，未及进入实际写作。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将民国史的撰写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为此，近代史研究所在1972年组建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先生负责，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尤其是对民国史研究这个过去并无研究基础、而又存在着相当政治敏感性的新兴学科而言，其研究起步之难，非亲历其事者恐未必能够体认。但是，民国史研究组的全体同仁，在李新先生的主持下，迎难而上，集思广益，拟出了民国史研究的基本方案，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唯物史观出发，以民国时期的统治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等等。以

此为开端，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民国史组的同仁开始了最初的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研究的成果。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民国史研究也因此而焕发活力，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经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和努力，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民国史，并以其史料丰富、立论平实而引起了海内外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作为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及奠基之作，其所确立的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大体沿用，从而引领了民国史研究的潮流，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前沿地位，于此亦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前辈当年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求实立场，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并已为民国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

以《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为契机，民国史研究事业由蹒跚起步而迅速发展而繁荣兴盛，并已在今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断代史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历史学中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科之一。抚今追昔，我们对前辈学者当年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及其远见卓识，实当铭感于心，永志不忘！并对在《中华民国史》编撰过程中卓有贡献但已故去的前辈学者李新、孙思白、李宗一、彭明、周天度、朱宗震诸位先生，致以我们由衷的敬意！

自1981年起，《中华民国史》各卷接续出版，1987年出版第二编第一、第二卷，1996年出版第二编第五卷，2000年出版第三编第五、第六卷，2002年出版第三编第二卷。但是，因为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华民国史》的撰写工作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原先拟订的十二卷本编撰计划迟迟未能完成，以至我们不断接到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催询。在此，我们向那些多年来始终关注着民国史研究计划的各方

学者和读者表示诚恳的歉意，让你们久等了！

自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对民国史研究计划作了调整，努力督促民国史未出各卷的写作，终在2010年底全部完成，交付中华书局。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全部出齐，这是民国史研究室老中青几代学者多年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民国史学科多年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我们亦以此而可告慰于所有为民国史研究计划作出贡献的前辈学者、后辈学人和各界读者！

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出版之际，需要说明的是：一、考虑到全书命名的简洁统一，此次统一以“卷”命名，而不再使用以前“编”的定名，各卷大体以其研究时段为分隔，不再使用已出各卷的主题性标题。二、全书十二卷所涉方面和问题甚多，作者不一，写作时间也不一，故有些问题的叙述可能在书中出现时有所重叠、强调或有所缺失、精简，时限衔接也未必严格按前后顺序。三、以前出过的七卷，此次付印前订正了书中的史实讹误之处，修改了个别的文字，但因为原书作者有些已故，有些离退，再加时间有限，我们对原书并未有大的改动，仍然保留了当年出版时的基本面貌。四、以前未出的五卷为新撰，但因各卷作者的学术经历与学术风格有别，其中某些卷的某些章或与其他卷章的写作风格有异，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我们尊重作者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作者写作的原貌。五、各卷的人名、地名及注释的版本和体例，因其史料来源不一，外文译法不一，旧今地名不一，等等原因，可能间有参差，我们已经尽量将其统一，但因全书篇幅较大，或仍可能有漏网之鱼，有待今后再版时订正。六、原先已出各卷的图片，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再用，此次十二卷的图片全部重新选取、制作；也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各卷卷首均未附地图，读者可参考各类已出地图集。七、各卷所附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全部以汉语拼音为序统一重新编制。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提纲由各卷作者拟定，经研究室内外

同仁讨论，再由李新先生审定；第一至三卷文稿由李新、李宗一先生审定；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卷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卷的部分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各卷作者及写作的具体情况，详见各卷前言。此次十二卷本出版的组织、联络工作由汪朝光负责，已出各卷订正责任人：第一、第三、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二卷曾业英，第六卷杨天石，第八卷黄道炫，第十二卷陶文钊。全书清样由汪朝光通读订正，金以林、李在全参加部分工作。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图片统一编排制作，其中参考文献及人名索引编纂者：第一、第三卷李在全，第二、第六卷吕迅，第四、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五卷杨天宏，第七、第八卷黄道炫，第九卷吴景平、徐昂，第十卷曹玮、印超，第十二卷马晓娟；图片选取人：第一至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卷李在全、邬逸飞，第五卷杨天宏、李在全、邬逸飞，第七、八卷黄道炫、邬逸飞，第九卷吴景平、宋青红，第十卷马建标。

我们深知，《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虽然全部出齐，但囿于我们的水平及种种主客观因素，全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则基本未涉及；有些评价或仍有苛求之处，还可以发见时代局限所留下的痕迹；历史资料的运用尤其是海外藏民国史料的运用还有不及；全书在技术方面还有不协调之处；等等。所有这些不足，正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发展的历程，也是其从一株幼苗发育、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中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才激励着我们和代代学人继续努力，在未来撰写涵盖面更广、评价更公允、史料运用更丰富、总体更成熟的民国史，将民国史研究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中华民国史》的作者队伍，并不限于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还包括了不少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正是他们对于本书撰写的热心支持，才使本书最终得以完成，并保证了本书撰写的学

术质量。对于所外各单位的学者为《中华民国史》撰写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都对《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完成出版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负责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中华书局，从已故的前总编辑李侃先生、副总编辑何双生先生，到书局历任领导以及近代史室、历史室的刘德麟先生、陈铮先生及编辑诸君，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编辑出版始终如一，无论出版市场和内外环境如何变化，总是为《中华民国史》的出版提供方便，倾尽其力，充分体现了出版人的坚守与责任。在此次《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总编辑徐俊，历史编辑室李静、欧阳红等，对于全书的编辑成稿贡献良多。在此，我们谨对中华书局及与《中华民国史》编辑出版相关的人士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编纂工作虽已告成，但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工作却远未结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我们有志在未来的民国史研究中推出更多的成果，培养更多的新人，与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界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2011年5月28日

序言

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了解前天是必要的，了解昨天则尤其必要。中华民国（1911—1949）是中国剥削制度旧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它就是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昨天。因此，研究和编写中华民国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编写中华民国的历史要由它的兴起一直写到灭亡。中华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个长时期的人民大革命的过程中把它推翻的，这个过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民国覆灭的过程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任务。《中华民国史》主要地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构成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但这些都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为前提的。写民国史离不开革命史，正如写革命史离不开民国史一样。中华民国之亡以中国人民革命之兴为前提，中国人民革命之兴则以中华民国之亡为背景。民国史与革命史二者密不可分，但又各有其侧重点。也可以说，它们研究的对象有联系，但还是可以区别、而且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中华民国有它的创立时期（1905—1911），民国成立以后又可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北洋政府时

期（1912—1928）和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1949）。我们编写的《中华民国史》，把中华民国创立时期的历史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合在一起，作为第一编；把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二编；把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三编。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华民国史》的第一卷，共十二章。开卷两章写的是中华民国产生的背景，写了“清朝统治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从清朝统治的衰落写起呢？因为中华民国是通过由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的兴起和清朝统治的灭亡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华民国创立的过程也就是清朝统治覆灭的过程。清朝统治是由兴而衰、最后才走向灭亡的。详细地阐述清朝兴亡的全过程是清史的任务。简要地说明清朝统治衰落的过程，则是编写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所必需的。而且，不仅写反清革命史需要，就是写全部中华民国史也需要。因为前一朝代的历史和后一朝代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民国时期1917年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1932年以后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都和有清一代的历史分不开。树有根，水有源，从根源上写起，脉络清楚。粗看起来，似乎扯得太远；从全局看来，却最省笔墨。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是反清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必须从它的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它被中国人民赶走，它在中国的势力灭亡为止。要实写，不能虚写，虚写容易概念化。当然，作为民国史，开头可以简要些，后面要写得详细些。即便这样，也会与中国近代史有所重复。但这种重复是不可避免的，是完全必要的。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产生的前提条件。没有民族资本主义，连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不

会发生。只是因为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才产生了由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并于1911（辛亥）年取得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胜利。也正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因而它在政治上表现软弱，这就导致了辛亥革命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写反清革命，写中华民国的创立，必须把这个问题写清楚。人民的自发斗争，对于瓦解清政府的统治有很大的作用。但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穿军衣的农民），都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终归失败，义和团的斗争形式之所以很原始和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到二十世纪初年，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自发斗争的历史作用，已逐渐让位于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了。因此凡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关的（如某些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活动以及保路斗争等），我们都写得较为详细；凡与革命派无关的，我们就写得较为简略，并指出它如何向资产阶级革命潮流汇合的趋势。

在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有进步意义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不属于资产阶级运动的范畴，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了一笔。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没有真正兴起、资产阶级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前，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进步的政治运动。在九十年代，不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进步的力量，就是光绪皇帝也是进步势力的代表，因为他于戊戌（1898）年下诏变法，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到二十世纪初，当改良主义的道路已经证明在中国行不通之后，康、梁等人仍然反对革命，成为保皇派。其后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与康、梁虽有相同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他们反对革命，但又与清廷斗争，最后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甚至与清政府分裂。他们虽不是进步力量的代表，但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政府的倒台，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根据他们与中华民国创立过程的关系，对他们写得有详有略。大体说来，对改良派写得简略，对立宪派写得比较详细。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1905年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是二十世纪初年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写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自然要以它为主体。对它的酝酿和成立，我们尽可能详细地写了；对它成立后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我们也尽量搜集材料，详细地写了；尤其是对辛亥年的革命运动（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以至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我们写得更为详细。凡是与后来整个民国时期关系较多的人物和史实，我们都尽力不使遗漏；反之则略而不详。由于材料和篇幅的限制，所谓的详细，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仅仅是中华民国史的开篇，它只能占相应的比例，而不能像写辛亥革命专史那样的详尽。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按理写到中华民国成立就可以打住，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应该另写一编。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时间短，内容少，不足单独成编，所以我们把它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合写在一起。不过，由于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还是为它专门列了一章。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农民斗争和起义，这些农民斗争和起义是正义的反压迫斗争，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但却不能革故鼎新，改变封建社会形态，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因此，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革命。只有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用武装斗争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算得上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指导的错误，让袁世凯这样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理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资产阶级革命家想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经过这场革命，资本主义还是向前发展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还是提高了。从此以后，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制度，想穿龙

袍、当皇帝，没有不遭到彻底失败的。我们在这卷书里，根据客观事实，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成就和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弱点和错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和编写历史，就要绝对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不容作任何歪曲。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搜集和利用了国内收藏的大量书籍报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其他地方档案馆的档案、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有关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尽可能地参考了台湾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文章和资料。但限于人力、物力和我们的水平，因此，在资料和立论上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教！这一卷书，还只是初稿，我们将博采一切好的意见，尽快加以修订。

继第一编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撰写第二、第三编。第二编的主要内容是：一、袁世凯的窃国和败亡（1912—1916）；二、皖系军阀的兴衰（1916—1920）；三、直系军阀的兴衰（1920—1924）；四、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覆灭（1924—1928）。第三编的主要内容是：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1927—1930）；二、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1931—1936）；三、国民党走上抗战的道路（1937—1938）；四、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1939—1944）；五、国民党窃夺抗战果实和玩弄和平阴谋（1945—1946）；六、国民党军攻守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覆亡（1946—1949）。

编写《中华民国史》，是编写整个一代的历史，既要求内容翔实，又要求立论公允，我们虽全力以赴，但兹事体大，非合众力不能成功。我们热烈地希望各方面的同志们和海内外的专家们来共襄盛举！

李新

1980年10月

前言

本书是集体编写的。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有下列诸同志：提供初稿的有彭明、孙健、孙思白、李宗一、耿云志、王学庄、杨天石、夏良才、包子衍、钟沛璋、张振鹤等同志；参加整理和修改的有李新、李宗一、王学庄、杨天石、耿云志等同志；最后由李新、李宗一两同志定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一、二历史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广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李侃同志审阅了部分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改进意见；何双生同志负责本书的编辑事项，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1980年10月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出版前言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第一节　清朝统治的衰落
　　一　清朝初年立国的各项政策
　　二　清朝中叶的开始衰落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一　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二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初期的特点
　　三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第三节　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
　　二　洋务派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三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
　　二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
　　三　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一　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活动
　　二　兴中会的成立
　　三　广州起义

第二节　兴中会与保皇党的合作
一　合作的探索
二　自立军起义
第三节　惠州起义与洪全福起义
一　惠州起义
二　洪全福起义
第四节　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一　留学生和流亡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二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
第五节　相互激荡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
一　拒法、拒俄运动
二　《苏报》的改革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改组
三　“《苏报》案”
四　孙中山创办军事学校和反对保皇党的斗争
第六节　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
一　日益蓬勃的宣传活动
二　革命排满，建立共和——革命宣传的中心口号
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一节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
一　“新政”的实施
二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
三　“预备立宪”的酝酿
第二节　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一　反赔款、反教会压迫
二　抗捐抗税和武装起义
第三节　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一　抵制美货运动
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第五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一节　国内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一　华兴会
二　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
三　光复会
四　其他革命小团体
第二节　同盟会的成立
一　逐渐增长起来的联合因素
二　留日学生的政治动向
三　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
四　同盟会的成立
第三节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
一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
二　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三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第四节　同盟会的分支机构
一　国内各地分会
二　国外各地分会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一　《民报》的创办和论战的展开
二　论战的基本内容
三　论战的结局和影响
第二节　萍、浏、醴起义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的南部起义
一　黄冈之役
二　惠州七女湖之役
三　防城之役
四　镇南关之役
五　钦、廉、上思之役
六　河口之役
第四节　东北、安徽、浙江、四川各地的起义

一　运动东北“马侠”之役
二　秋瑾、徐锡麟之役
三　四川泸州、成都、叙府之役
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城乡人民的广泛斗争
一　抗捐抗税和莱阳民变
二　抢米骚动和长沙饥民暴动
三　工人的罢工斗争
四　反教会压迫的斗争
第二节　收回利权运动的普遍高涨
一　各省收回矿权的斗争
二　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三　收回路权斗争的日益激化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第一节　清朝统治的衰落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一个王朝。

从1644年七岁小儿福临（顺治）在吉特太后的怀抱中入关登极，至1911年又一个七岁小儿溥仪（宣统）在隆裕太后的携提下退位，清王朝经历了二百六十八年[(1)]。这二百六十八年，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区分为两种社会形态：前一百九十六年，中国仍是一个封建社会；后七十二年，中国开始丧失独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九十六年中，虽然仍和前一代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一样，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但是，满洲贵族入主关内所造成的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清朝开国初年，这一矛盾甚至掩盖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后的七十二年，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外采取妥协政策并逐步与帝国主义

合作，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使曾经一度缓和的满、汉矛盾，在清朝末年又显得尖锐起来。

一　清朝初年立国的各项政策

满族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之一。他们的祖先长期在祖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和斗争着。明朝中央政府曾在女真族（满族前身）聚居地区设有行政机构，其长官都由女真族首领担任。努尔哈赤在世袭建州卫长官后，由于“忠于大明”和“保塞有功”，曾多次被明朝晋级加封。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成为主宰全国的皇帝，并不是鲜见的。因此把已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排斥于中国各民族之外，把满汉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外国和中国的斗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也是十分错误的。满族入关，只是说明了中国内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由被统治地位转化为统治地位而已。

但是，入关前的满族是比较落后的。明初置建州卫时，建州女真人数很少。他们过着渔猎生活，在汉族和朝鲜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才逐步转向定居，经营农牧业。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特别是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满族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也有了急剧的增加。康熙称颂他的祖父皇太极“务农桑，广渔猎，以丰民食，皆可为万世法”[(2)]。大约这时满族社会正处于从奴隶制的向封建制的过渡中。

由落后性而带来的野蛮性，是毋庸讳言的。努尔哈赤晚年在进入辽沈地区后，曾大肆屠戮，甚至把大批降人也杀掉。皇太极时期，清兵曾三次入关，每次入关都攻掠城市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屠杀了大批民众。

顺治入关之初，这种落后性和野蛮性仍然是很严重的。征服者对

被征服者强制推行自己的制度，遇到抵抗，就格杀勿论。最突出的即以剃发与否作为判断顺逆的标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无数不堪忍受屈辱的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或自杀，或被迫逃亡。清军进入大江南北，遭遇抵抗愈烈，其屠掠亦愈加惨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死者几达百万。江阴人民在“头可断，发决不可薙”的口号下，守城八十一日。城破之日，无一降者，表现了汉族人民不畏强暴、反抗奴役的光荣传统。

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3)]。“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4)]。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斗争和融合，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社会制度比较落后的民族，在军事上征服了社会制度比较先进的民族之后，必须逐步改变自己的落后制度，而采纳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不如此，征服者便无法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

满族的统治，也有类似情况。以圈地为例，顺治入关之初，曾大量圈占土地。但是，“旗人不习耕种”，所圈占的土地，有的则作为“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所”[(5)]。结果，“满洲兵丁虽分给土地，而历年并未收成”[(6)]。这样，清朝圈占的土地既无钱粮可收，满洲兵丁仍须由清政府供给口粮，而原来的汉族人民也流离失所，无法从事生产。因此，清朝入关以后不久，就停止了大规模圈地，到了康熙亲政以后，便决定完全停止圈占。1669年，康熙给户部的“上谕”中说：“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7)] 此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陆续停止圈占，清理旗田，以至“回赎旗地，仍归原佃”[(8)]，等等。这样，汉族原有的一套土地制度就逐步恢复了。

清朝统治者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接受了汉族历代统治者的经

验，相继采取了“蠲减田赋”、“地丁合一”、“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整理漕运”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也很注意推广新的生产方法。例如康熙本人就曾积极在江南推广双季稻[9]。

这样，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一百多年的恢复阶段，满洲贵族控制的清政府就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暂时稳固起来。顺治初年，全国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据清政府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土地仅有二百九十多万顷，人丁仅有一千零六十三万多口[10]。而到了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已达七百三十五万顷，人丁已达一万八千三百多万口[11]。从这个统计数字可以大致看出恢复增长的总趋势。随着人口、土地的增加和生产的恢复、发展，清朝国库收入也显著增加了。1651年“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有奇，米、麦、豆五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四斗有奇”[12]。1753年“各省通共存仓米、谷二千九百二万八百二十四石三斗六升九合三勺”[13]。而到了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全国人口已增加到三亿以上，“各省通共存仓米、谷四千五百万三千三百九十七石二斗三升五合四勺”[14]。

在政治制度方面，满洲贵族也吸取了汉族统治者的经验，“一切职官，悉仿明制”。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其下设内阁、六部（吏、户、礼、兵、工、刑）[15]、诸院（都察、理藩、翰林）[16]、诸寺（大理、太常、光禄、太仆、鸿胪）[17]，掌管中央大权。

清政治制度虽然沿袭明制，但为了加强满族的统治，也有所变通。例如：内阁大学士，其名额虽说是满汉各二员，而实权则操在品级较高的满族大学士手中。参预决定军国要务的议政王大臣数员，则全部由满人充任。1730年（雍正八年），清廷设立军机处，在皇帝直接掌握下，综揽全国军政大权。内阁虽仍存在，但已形同虚设。在军制方面，清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基本武装——八旗，一部分驻防禁城，

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京城附近和各省重要城市，称“驻防”八旗。此外，也因袭明军建制，收编汉族武装组成“绿营”。当时八旗兵定额二十二万人，而“绿营”兵则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为了防范“绿营”，清政府特定“绿营”中的重要官职为满缺，以便控制。在法制方面，1646年（顺治三年），清政府沿袭明律修成《大清律例》，规定了刺字、鞭打、监禁、充军、绞杀、砍头、凌迟、灭族、戮尸等酷刑。但这也主要是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因为满人在法律上享有许多特权，如：“凡重囚应刺字者，旗人刺臂，奴仆刺面，民人（汉人）徒罪以上刺面”；“凡私行买赎……旗人枷两月，鞭一百；民人杖一百，流三千里”[18]。

在文化思想方面，满洲贵族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以防范和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科举等办法，对汉族知识分子加以笼络。

清初的文字狱，是很惊人的。仅据现有材料的约略统计，康、雍、乾三朝，著名文字狱即达一百余起。1663年（康熙二年），庄廷钺因撰《明史》，被人告讦，时庄已死，亦被剖棺戮尸，并株连其兄弟及作序、参校、刻板、卖书、买书者，达二百二十一人。1726年（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廷，因到江西主考，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人告讦“维止”是砍掉“雍正”之首，“应照大逆罪凌迟处死”。查虽病死狱中，但也要戮尸枭首；并株连其兄弟子侄，或被杀害，或被流放。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东台举人徐述夔，著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被人告讦为借朝夕之朝射朝代之朝，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系复明灭清之意。时徐已死，亦被剖棺戮尸，株连子孙及校对诸人俱坐死。礼部尚书沈某曾为作传称其文章品行可法，亦被一并革职。其他事例，不胜枚举。总之，诗文中一字一句被认为讽刺当朝者，本人及家属即被处刑。

1645年（顺治二年），清代开始科举。其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即以《四书》、《五经》的内容出题，写一种空洞无物的“八股文”。

在不同等级考中的可以得到相应的“功名”：初级的（院试，在县、府举行）称“秀才”；中级的（乡试，在省城举行）称“举人”；高级的（会试、殿试，在京城举行）可以得到“进士”以至“状元”、“榜眼”、“探花”等称号。有了功名的人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特权，并可以此作为猎取官位的阶梯。清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办法来束缚、麻痹汉人的思想，防止他们反抗，以功名利禄诱使他们为统治者服务。

清政府还用大规模编修《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办法，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种办法不仅可以达到开科取士的同样目的，而且可以借此篡改，甚至销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聚集了三百多名知识分子，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包括不少知名学者。《全书》历时十载，至1782年完成，分经、史、子、集四部，名曰“四库”。《全书》总计选录书籍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仅存书目者尚不在内），使明朝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等大类书，均望尘莫及。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清政府大规模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所谓禁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

在清政府的文化统治下，汉族知识分子，大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有些颇具天才的学者，也只是注力于繁琐的考据，虽然对于整理古代典籍作出相当的贡献，但却窒息了反抗的思想和进取的精神。

清政权既然在本质上仍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满洲贵族在入关前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因此，满洲贵族在成为新的统治者后，只有利用前朝统治者的精神资料，来作为自己的精神统治工具。所以，清政权对于佛、道、儒等三教九流，各种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只要能利用的都加以利用。

清朝历代皇帝，从顺治起，都是佛教的皈依者，康熙曾亲临佛教胜地五台山朝拜；雍正登位后，把自己住过的王府改为雍和宫，作为供奉和宣扬喇嘛教（佛教的一支）的场所。道教张天师的后裔和儒家孔子的后裔，都受到清政府的诰封隆遇；江西上清的天师府和山东曲阜的孔府一样，成为信众朝拜之地。

清初统治者对在历史上有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表示出特殊的兴趣。1645年（顺治二年），孔子就有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封号。顺治说：“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19] 1684年，康熙亲到曲阜谒孔庙行三跪九叩礼，并亲笔为大成殿题了“万世师表”的匾额[20]。1712年，他又极力表彰程朱理学，说孔孟之后，“朱子（熹）之功，最为宏巨”，并把朱熹的偶像从孔庙的两庑抬入大成殿内，列为“十哲”之次。

清政府在采取了经济、政治、文化一系列的统治措施，并在各方面取得相对安定的基础上，积极用兵，对内镇压了叛乱，对外抵抗了侵略，使中国出现了再一次的统一局面。1681年，康熙平定了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1683年，统一了孤悬海中、时刻为殖民主义国家觊觎的台湾。1685年、1686年，先后两次进行雅克萨战争，击败了沙俄侵略军。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1690年、1695年、1696年，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转战漠北，击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乾隆时又完全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使全国在宏伟的版图上实现了统一。

康熙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表面的暂时的缓和，形成了所谓“盛世”规模。但清政府凶残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在汉族人民心里留下了巨大的伤痕。当包括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等上层势力在内的公开的反抗运动被镇压之后，民族反抗的意识便主要在下层群众中保存着、滋蔓着，并逐渐与阶级反抗的意识混合起来，产生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党。其中主要有：三合会[21]，即天地

会，又称三点会，大约产生于乾隆年间，初发源于福建、台湾一带，后逐渐扩展至浙江、江西、两广、两湖、云南、贵州、四川以及河南等省，并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发展。还有哥老会，实际上也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又称哥弟会，其势力主要在长江沿岸一带，如浙江、两湖、四川等省，后来也扩展到云南、贵州、两广、山西、陕西等地。另外在北部和中部各省则有白莲会，即白莲教[22]，也是汉人为反抗清朝统治而起的。清中叶以后，南方的会党和北方的白莲教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组织者。

二　清朝中叶的开始衰落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统一了中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康熙年代被称为“盛世”。但是，这种“盛世”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

中国封建社会每一朝代建立之初，统治者所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都只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虽然这些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即使在所谓“盛世”，农民的生活较战乱时期略为改善，但仍然是很痛苦的。这一点，连康熙本人也多少道出了一些真实情况：“小民生计，最多苦辛。今人动称耕九余三，谈何容易？农家终岁勤动，幸遇有秋，而谷价又贱，欲办八口衣食与来岁耕种之资，犹恐不足，安得宽然有一余。一遇歉岁，不免颠连困苦矣。惟富饶业户，陈陈相因，贱买贵卖，每获厚利。”[23]

康熙晚年，在其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很大危机。围绕着皇位的继承问题，他的二十三个儿子，特别是次子、长子、四子、八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所谓皇太子（次子）党、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连年不息。康熙曾不得不公开承认，朝廷内外诸臣及皇亲贵戚，各树朋党，把持朝政，“自大学士以下，各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三五成群，

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对于其皇子，康熙也亲自下令一并指参，他在给吏部、都察院的“上谕”中说：“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24]

1722年，康熙死去，其第四子胤禛（雍正）夺得政权。雍正上台以后，立即把他的皇位争夺者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消灭，就是他们的子孙、亲戚以及追随者，亦通通受到禁锢、充军、革职等各种惩罚。这场残酷的斗争持续了很久。

雍正在位十三年死去，由其第四子弘历（乾隆）继承皇位。乾隆在位六十年，后人把他治理下的年代和康熙年代并称为“康乾盛世”，某些史学家也称乾隆年代为“鼎盛时期”。其实，乾隆年代是不能同康熙年代相提并论的，它已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清代前四朝的土地占有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清初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即康熙的中期），是地主兼并土地趋势暂时缓和的阶段。而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促进土地集中的因素又恢复了作用，从而掀起了新的土地兼并浪潮，使得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使得中小地主的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里。

乾隆年间，全国各地占有良田千顷以至万顷的地主，比比皆是。清皇族昭槤在《啸亭杂录》里记载：“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

最大的官僚往往即是最大的地主。乾隆末年，当了二十年宰相的和珅，竟占有土地八千余顷，其两名家人也各占有土地六百余顷[25]。乾隆死后，和珅被抄家，有人对其家产约略估计，可抵清政府十年

的收入[26]。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苦农民用自己的工具长期附着在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上进行艰苦的劳动，而要将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广大农民除受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兼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此外，农民还要向清政府缴纳各种贡税和从事各种名目的无偿劳役。加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州王伦以清水教名义，聚众数千人，连陷堂邑、阳谷等县。连清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吏讳灾不报，反加征激变，非尽邪教。"[27]

乾隆在位六十年，当他传位于第十五个儿子颙琰（嘉庆）的时候[28]，各地的群众起义已经是接连不断了。

1796年（嘉庆元年），四川、湖北地区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近十年之久，有数百万群众参加，波及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1813年（嘉庆十八年），北方又爆发了天理教（白莲教的支派）的起义，起义首领为河南省滑县的李文成（木匠）和顺天府大兴的林清（药铺学徒）。李文成起义军曾攻占滑县城。林清则率众二百人潜入北京城内，分别由东西华门攻入皇宫，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至今，隆宗门匾额上，还保存着起义军当年射中的箭头。这次斗争虽被扑灭下去，但它给予清王朝的震动是巨大的，以至嘉庆不得不下诏"罪己"，惊呼此次事件为"亘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在天理教起义的同年，又有陕西三才峡伐木工人的起义。次年，河南的捻军起义也开始了。除内地各省外，清王朝在边疆的统治也不是那么稳固了。甘肃、新疆地区的回民起义，旋起旋落。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开始的新疆回民起义，延续达十年之久。

各地的起义，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秋冬之交，嘉庆曾多次召见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其中有些对

话，很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恐慌状态。现节录几段如下[29]：

嘉庆：我想到曲阜去，山东的民情到底安静不？……你那里有邪教么？你好生与我严拿邪教！

孔：臣世受国恩，应报效。此等事不是臣衙门所管，容臣回去寄信山东抚臣程国仁严拿。

嘉庆：好生教地方与我严拿邪教。你回去好生读书，林庙树木吩咐该官巡查，不可教人盗伐一枝一叶。你好生保护，祭祀都要虔诚行礼。

（又一次谈话）

嘉庆：我赏你的书籍等，早已发在军机处，你领了去么？

孔：臣领了去了。

嘉庆：曲阜的庙里圣像是牌位？是像？

孔：是像。

嘉庆：庙内有黄伞么？

孔：蒙圣祖（康熙）赐过一把，高宗（乾隆）赐过一把。

嘉庆：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是个大缺点。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你看河水这样大，山东民情亦不好。一路行宫也都破坏了。到底怎么好？弄的真没法，了不得！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嘉庆到曲阜去乞灵于孔子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可是他在位二十五年却始终未能去成。所以没去成，原因有两个，一是天灾，即大水；二是“人祸”，即农民起义，就是嘉庆所说

的“邪教”。封建皇帝有着无上的尊严，但这时的嘉庆却向下属诉苦，露出了一副可怜相。

就在上述对话的第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便死去了。继位的皇次子旻宁（道光），虽然因镇压起义、守卫宫门有功，曾被嘉庆誉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但这时他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道光年间，土地集中比以前更加严重，大官僚琦善占有土地竟达二百五十六万多亩[30]，比乾隆时和珅的土地还多三倍。由于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致使财政收入减少。1837年（道光十七年），户部说：“查明积年欠解银数，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分别展缓者外，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之多。”拖欠愈多，说明造反者的范围愈来愈广。

龚自珍（1792—1841），这位当过二十年京官（礼部主事）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当时清朝的统治是“履霜之屑，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31]。他甚至预感到人民的反抗运动已经临近，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的地步了。他说：“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32]

龚自珍是有志于改革的，但是面对着清王朝衰落的总形势，他也不得不发出“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的浩叹。

综观清王朝从1644年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将近二百年的统治，如果说前一百年还能称为“盛世”的话，而到后一百年的开始，当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就已感到这个“盛世”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又过了七八十年，在龚自珍的笔下，这个“盛世”就完全成了一个“四海皆秋气”的“衰世”，“内囊”已将兜底翻了出来。

屋漏又遭连阴雨。清朝统治阶级除面临着严重的“内乱”之外，还

遇到了空前的“外患”。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一　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在清朝以前，中国就已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1516年（明朝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到达广东，占据东莞县的屯门、南头等处，五年以后被中国政府用武力赶走。后来，葡萄牙人又和“倭寇”（日本海盗）相勾结，骚扰中国的浙、闽沿海一带达二十年之久，直到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才被赶跑。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又用欺诈和贿赂的方法，窃取了澳门。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人也来到中国，先派传教士，后进行“商品贸易”。

十七世纪荷兰人排挤了葡萄牙人在东方海上的势力，于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来到中国，1622年（天启二年）以武力谋夺澳门，并一度侵占澎湖列岛。不久，澎湖列岛被中国用武力收回，它又于1624年（天启四年）占据中国的台湾，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驱逐出去。

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处于迅速上升阶段，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必然要加强对外掠夺和扩大海外贸易以寻找殖民地市场。当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落后的中国，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最好对象。

清朝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清政府最初确定这种政策，是和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消除“内乱”相联系的。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所怀抱的不满情绪。”[33]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持了这种闭关政策成为可能。1789年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上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34]

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窒息了生机，并助长了清朝统治者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这种政策，虽然抵制了正常的商品贸易，却抗不住外国的鸦片和大炮。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5]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侵略军打败之后，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1843年7月10日，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江宁条约》的补充。接着，美、法侵略者也趁火打劫，于1844年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除英、美、法外，许多资本主义小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荷兰、西班牙等也纷纷要求和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条约，清政府一概应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而且，它还加剧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终于在1851年—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曾席卷大半个中国，并以南京为中心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清政府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组织的湘、淮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武力相勾结，共同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变得更加虚弱了。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又在五十年代败于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迫和英法侵略者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此前后，俄国和美国也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俄国还和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通过上述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不仅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各种特权。这些特权的范围极其广泛。从这些特权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现将各种特权分述如下：

（一）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

《江宁条约》中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一规定使中国的海关丧失了自主权，成为一种“协定关税”。第一次“协定关税”是1843年3月签订的。在1843年7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将中国关税税率极力压低，规定进口货物率，大体上在百分之六上下，比鸦片战争前大大降低了[36]。这自然有利于外国侵略者。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订立后，明文规定了值百抽五原则，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又比1843年降低了13％到65％不等。

外国侵略者为了逃避中国的内地税，还用一次交纳“子口税”的办法，以代替交纳厘金。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对中国内地税作了严格的限制：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交纳一次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不必像中国商品一样，必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了。从此以后，外商可以“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则仍须受各关卡的层层苛敛。

外国侵略者还进一步攫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和中国关税收入的支配权。1853年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

也占领了上海海关。上海英领事阿礼国（R．Alcock）于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乘机提出外国人参与管理海关的主张，美、法领事表示赞同。三国领事遂与上海道台吴健彰议定，于同年7月成立了有英、美、法各派一人组成的税务司。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就这样落到了外人手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等事”。由于英国势力较大，英人李泰国（H．N．Lay）于1859年被委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当年他就按照上海海关的一套办法，在广州组织关税务司。1860年至1863年，又设潮州、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烟台（东海）等关。1863年英人赫德（Robert Hart）继任总税务司。从1863年到1907年的期间里，赫德又设海关三十余处。

至此，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完全落到外国侵略者的手里。

（二）沿海贸易权。

任何独立的国家，外国商船只能在限定的口岸进行贸易，而不能在沿海口岸之间转口贸易。

《江宁条约》订立后，我国沿海贸易权开始丧失。《江宁条约》中规定，英人可在五口“贸易通商无碍”。这含有应允英国商船可自由航行于五口之间的意思。后在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中正式承认了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重复课税。1861年上海税务司制定的《沿海贸易法》中，更明文规定，外商在一口纳税后，即可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而中国商船，反不能享受此种权利。

（三）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

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也是一切独立国家不容侵犯的主权。

这种主权的丧失，由《中英天津条约》开其端。《天津条约》中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自汉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这种规定，名义上自汉口以下只开三口，实际上沿江各处城镇均可上下客货，并且可以从议定口岸前往各地各处游历通商。这些条款订立后，根据“利益均沾”原则，未订条约国家，也可享受此种权利。

（四）开放商埠和领事裁判权。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国开辟了许多商埠。沿海沿江有：广州、汕头、琼州、福州、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烟台、天津、营口、镇江、九江、汉口等十四个商埠，陆路上新为俄国开辟的有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张家口等五埠。根据《中英天津条约》，外人可以在开辟的商埠内，租地盖房，设立栈房，修建礼拜堂，开设医院，购买坟基等。这些外人居留区，后来发展成为“租界”，这不但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根据地。

领事裁判权开始于《虎门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凡中国人与英国侨民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权“听诉”，“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是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领事裁判权的开端。后来《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又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如有不协争执事件，均归佛兰西官办理。”《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

领事裁判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是一种政治性的侵略。

（五）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条款，完全是对外国侵略者的一种片面的优惠，首先开其端的是《虎门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

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有类似的规定。

“最惠国待遇”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只要一个国家取得这种特权，其他国家皆可沿用。六十年代后，这项条款适用范围又扩大了，竟荒谬地规定，中国政府如对本国商民有何优待时，外国人也一体均沾。这种情况实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现象。

总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将其侵略势力伸进中国，使中国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二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初期的特点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是和它本身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把中国市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以便大量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因此，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鸦片输入继续增加。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由非法的秘密活动变为公开活动。因此，鸦片输入数量大大增加。英、美来中国的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机会进行贩运活动，从事贩运和销售鸦片的外国洋行，有名可查的就有五十几家。鸦片输入量，四十年代末，每年达四万余箱；五十年代，增至六万多箱；七十年代，增至七万四千多箱；九十年代初，又增至八万六七千箱。

（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洋货输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数量不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

货输入大增。如以棉纱为例：1871年—1873年，进口棉纱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一公担，1881年—1883年增加为十一万八千另二十公担；到1891年—1893年，更增长为七十万另四千八百七十七公担[37]。在进口洋货中，除大宗的鸦片、棉制品、棉花外，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和钢等。

在出口贸易方面，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是农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期，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38]。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丝、茶出口不断增加。茶叶出口，在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五千多万磅，1845年超过了八千万磅，1853年增至一亿磅以上。丝的出口，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几千包，最多不超过一万包；1847年达二万二千多包，1853年增至五六万包[39]。从七十年代以后，到甲午战争前，中国茶的出口，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出口数量没有增长，还有所下降。1871年—1873年，茶出口一百零二万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一百二十三万公担，1891年—1893年为一百零五万公担。丝出口增加：1871年—1873年为三万七千多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三万九千多公担，1891年—1893年增至五万九千九百多公担[40]。

丝、茶出口的增加，刺激了国内养蚕缫丝业及植茶业的发展。广州、上海等地缫丝厂不断增加。

这时中国的丝、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都操纵在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手中。无论在贸易数量方面或价格方面，皆受其左右。一部分中国商人也开始为外国洋行服务，帮助外国洋行收购丝、茶等商品。中国丝、茶贸易开始走上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被迫服从外国资本的需要。

（三）建立租界和初期的资本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变为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基地。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许

多地方开设商埠后，外国人就在这些商埠中建立起租界或居留地。他们在那里开设商行、银行，经营商业，贩运鸦片，以及从事其他罪恶活动。这些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基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占有大量土地，如上海的英、法、美所划租界，占地面积在一千亩以上，租界中外国商行的数目不断增加，如上海的外国商行数，在四十年代初，只有十一家，到五十年代初，即增加为一百二十多家。

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又叫英国东方银行。1854年，英国的有利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英国的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7年），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都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此外，1896年沙俄在中国设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中国。这些外国银行，控制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在189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外国在中国的银行操纵了中国的金融。

以英国的银行来说，它在中国的支行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其中汇丰银行的势力最为雄厚。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也是外国贸易商行的庇护人。在甲午战争以前，从1875年—1886年间，英国对华投资绝大部分由汇丰银行经手。而这些投资主要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最重要的是1877年五百万两贷款。这笔贷款指定由广州、上海、汉口三地的海关税收作为担保。从此开了把中国关税作为外债担保品的先例。

此外，外国银行还利用中国旧式金融业为其服务。特别是利用钱庄来为他们推销洋货、收购土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服务。

为了便于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先后开设了一些轮船公司，比较大的有：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1861年）、英国的太古洋行（1867年）和怡和洋行（1877年）等。这些轮船公司

垄断了中国的远洋和内河的航运。如1877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63.3%，1892年则占到77.8%[41]。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侵略者不顾中国的主权，擅自在中国投资设厂。这些工厂，绝大部分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厂和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料，土特产品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厂、缫丝厂、制糖厂、制蛋粉厂、轧花厂、打包厂等。此外，还有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便就地制造、就近销售而经营的一些轻工业，如火柴、肥皂、制药、玻璃、造纸、纸烟、铁器等工厂。在1895年外国侵略者正式取得在中国设厂权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非法设立的工厂已有一百多家。不过，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尚以商品输出与掠夺原料为主要侵略方式，因此，这时的资本输出（投资设厂），也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商品输入和一些资本输入，结果促使中国旧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经济日益带有殖民地性质，使中国的农工商业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对中国原来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促使中国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四）中国买办阶级的出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当外国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时，在一些通商口岸就已经出现了买办。这时的买办，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当时的买办是由中国的公行（如广州十三行）所雇用的人形成的。这些人是官厅特许的，他们在公行中做管事。这些管事，除代理外国商人居间买卖货物之外，还管理外人商馆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事务，包括贸易账目、现银存款、文件与信件保管等等。广州的中国公行也雇用一些人看视进口货样，议定价格，开舱起货，并代洋商购办土货。所有这些为洋商服务的人，因为主要是替洋商购办物品，所以通称为买办。

鸦片战争后，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公行制度废除了，外国侵略者可

以自由地选择代理人，因而买办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买办是受公行商人控制的，战后则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在外国侵略者的豢养下，中国买办阶级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中国各地经济情况十分复杂，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也很不统一，外国侵略者要在中国推销商品、购买货物，创办企业，特别是要深入到中国内地，都不能不借助于中国的“买办”。于是他们就在中国培养了这样一批人，作为他们的附庸，为他们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服务。

买办的势力很大，如当时的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都是大买办商人。唐廷枢是怡和洋行总买办。他帮助英国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收购茶、丝等产品。此外，如宁波籍的穆炳元、杨坊，钱塘人吴煦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有人曾说过，在上海的买办商人，“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42)]。徐宝亭就是一个“致富巨万”的买办。

中国的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外国侵略者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他们在政治上也是与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合作的。如大买办、上海道台吴健彰，1853年就拱手把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送给了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帮助清政府设法购买军火，雇用外国舰船运兵，镇压太平军。他还联合买办商人粤董李少卿、闽董李仙云等筹饷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买办商人徐宝亭，由于“毁家助饷”，“积功擢游击赏花翎”[(43)]。1860年苏松太道买办商人吴煦与苏松粮道买办商人杨坊和美国侵略分子华尔合作，招募外人组织洋枪队（1862年改名“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军，华尔、杨坊任管带，其军

费大部分由吴煦、杨坊筹给[44]。1860年太平军围攻上海时，吴煦邀请士绅开会向曾国藩乞援。李鸿章到上海时，淮军的军饷大部分也是吴煦筹给的。徐润还因为助饷有功，特“保加四品衔”[45]。

三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时垄断已经代替了自由竞争，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原来作为中介人的银行资本已经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垄断的银行资本与垄断的工业资本融合为一，形成了金融资本。国内市场和投资场所也已经被垄断完了，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过剩”的资本。资本输出有了特殊意义。殖民地有了新作用（作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来源地）。正如列宁所说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46]但是，世界殖民地早已被瓜分完了，因此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剧烈。

十九世纪末叶，世界上只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少数国家，还没有被帝国主义独占或瓜分。特别是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富，而在政治、经济上又极其落后，因此，就特别为帝国主义所垂涎。鸦片战争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在中国沿海攫得种种特权外，还逐渐把它们的势力伸到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如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1881年由清政府出价九百万卢布赎回）；英国把长江流域各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76年又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取得了派员驻云南、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权利。但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们还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权益。

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除英、德、法、俄以外，日本和美国是两个后起的国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

起来。在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资本主义是与残余的封建经济以及天皇制这样的国家机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一开始走上近代国际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而其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在明治时代，日本就规定了征服中国和全世界的“大陆政策”。其基本内容是：首先征服台湾，然后征服朝鲜，征服满蒙，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按照这个计划，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进犯我国的台湾，虽然没有达到侵占的目的，但不久却吞并了琉球。接着，它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朝鲜，以便夺取这个通向“满洲的桥梁”，然后侵入我国的东北。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但十九世纪后期发展很快，工业产值在八十年代已经超过了英国。美国并且先英国而走上垄断阶段。但是美国对殖民地的掠夺，特别是对远东殖民地的掠夺，却落后了一步。所以它急起直追，向远东和中国伸展势力，也想获得一个新的市场。

沙俄企图把满洲放在自己势力控制之下，并且也想插足朝鲜，在朝鲜占领一个港湾，作为向太平洋的出口。英国要阻止沙俄南下。这样，远东的国际矛盾，就集中到朝鲜半岛上了。为了共同对付沙俄，英美的利益是一致的。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还相当落后，一时还不足以威胁英美的势力。于是，英美决定利用日本来排除俄国的势力，而日本也乐得利用英美的支持来实现它的侵略政策。在这样一种国际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开始，8月1日正式宣战，到1895年3月结束，中国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于同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承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朝鲜原为中国藩属，这一条实际上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

四、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年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马关条约》是继《江宁条约》以来又一个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从此更加深了。

《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等大片领土给日本，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偿付大量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过去战败赔款最多不超过二千万两，这次赔款数竟高达二亿两之多。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超过七八千万两，这次赔款数目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的数字。这样就迫使清政府因财政困难而不得不举借外债，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通过贷款进一步对清政府实行控制。《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制造，并给予种种特权，这样，帝国主义就可以把大量“过剩”资本输出到中国来，使中国不仅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也成为它们的投资场所，严重地阻碍中国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另外，《马关条约》的订立，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对中国进行投资和划分“势力范围”，于是，《马关条约》订立后，投资竞争和割地狂潮接踵而来。沙俄对中国东北素有野心，《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得知割辽东半岛给日本后，立即

正式邀请法、德两国，共同对日进行干涉。法国是俄国的盟国。德国也想在远东伸展势力，攫得一个军港。因此三国在干涉日本占据辽东半岛的立场上一致。

日本对三国的干涉，不甘接受，极力开展外交活动，企图争取英、美支持，以牵制三国。但英、美支持不力，日本被迫妥协。

4月30日，日本通知三国，表示愿意“放弃永远占有辽东半岛”，惟须“作偿金之担保”。三国议定，清政府交付“偿金”三千万两后，三个月内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11月8日，中日两国签订《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规定：清政府在11月16日前交付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作为退还辽东半岛的“报酬”；款项交清后三个月，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还辽”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中日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妄图瓜分中国。

沙俄首先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急需举借外债。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向中国贷款。经过相互斗争，沙俄联合法国，合借银一亿两，年息四厘，以海关收入作担保。1896年，沙俄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在必要时俄国军队可以开往中国任何港口；并允许它在东北修筑东清铁路。沙俄取得修筑东清铁路特权后，又把势力伸进辽东半岛，企图夺取旅顺和大连。1897年11月，沙俄乘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占领旅顺和大连。沙俄对清政府进行欺骗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大，系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之侵略。德国军队撤退后，俄国亦立即撤退。”[47] 1898年初，清政府被迫接受德国租借胶州湾等要求后，沙俄则提出租借旅顺、大连湾以及自东清铁路筑一支线“通至黄海”[48] 等无理要求。沙俄为了达到以上目的，除采取威胁恫吓手段外，还使用巨款贿赂李鸿章等。结果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政府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接着，莫拉维诺

夫和许景澄又续订《旅大租地续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将旅顺租给俄国为军港，大连为商港，租借期二十五年。允许东清铁路修一支线通到大连。此外，沙俄还向清政府提出，俄国在满洲和蒙古有铁路和工业的独占权。这样，整个满洲和蒙古就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也以干涉还辽有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法国逼迫清政府订立《中法续议商务条款》和《中法续议界务条款》，要求划云南、广东、广西为势力范围。并规定这三省开矿时必须先向法国商人或矿师商办。云南、广西开放通商、减税。法国还不满足，又提出要求：一、中国政府声明海南岛不割与别国；二、延长龙州铁路，开采两广和云南的矿山，修筑滇越间通商铁路；三、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等等。清政府完全应允。

德国也于1895年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当时未得结果。1897年，便借口山东曹州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派海军强占胶州湾。在德国的武力压迫下，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德国强占胶州湾为租借地，租期九十九年；并取得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利，沿铁路三十里内的矿藏允许任便开采。这样，整个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与俄、法、德掠夺中国同时，英、日等帝国主义也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如：1897年英国强占山东的威海卫为租界地。日本从1896年到1898年，陆续在杭州、苏州、重庆、沙市、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租界。1898年4月，日本政府又以福建省接近台湾，要求清政府总理衙门应允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总理衙门表示接受。于是，福建省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各国除胁迫清政府外，它们之间的争夺，经妥协后达成各种协定。1896年订立英法协定，规定云南、四川两省一切权利由英，法两国共同享受；1898年订立英德协定，规定天津到山东省南部的铁路由德国修建，而山东省南部到镇江的铁路，由英国修

建；1899年又订立英俄协定，规定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这种分割势力范围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瓜分中国。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49)

1900年，在华北广大土地上，中国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次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次运动，虽然被清政府所利用和出卖，最后被帝国主义联军（所谓"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但是，它给予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打击是沉重的，以致使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50)。

帝国主义既然无法直接瓜分中国，只好继续扶植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作为奴役中国和扩大侵略的工具。

第三节　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使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曾经给了清王朝挽救自己衰落的一个机会。这就是：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得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道光已失去了康熙当年的那种锐气，道光以后，咸丰、西太后更等而下之，一代不如一代。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王朝也是由盛而衰，愈衰愈朽，而且愈是衰朽，愈是怯于对外，狠于对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还没有完全结合起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以为

自己的统治将被推翻，非常恐慌。但是，当《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出了北京，他们的统治仍然照旧维持下去，这时才知道外国人是以兵“胁和”，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并非取而代之。1861年1月，清政府在北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桂良等人主持。外国侵略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控制清政府的好办法。总理衙门确实按照外国人的意图办事。在总理衙门成立后不久，就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李不久回国，总税务司由赫德继任，赫德在中国任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多年。

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到西太后专政时，进入新的阶段。西太后是在咸丰死后，经过一次宫廷政变上台的。

西太后（1835—1908），叶赫那拉氏，本是咸丰的宠妃，常代批阅奏章。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及怡亲王载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一同逃往热河。在英法联军撤走后，咸丰并没有立刻回京，当时清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在热河，一个在北京（北京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实权在热河。奕□一派竭力奏请咸丰回京，肃顺一派则力劝暂缓回京，两派斗争十分激烈。1861年8月咸丰病死热河，年仅六岁的载淳（同治）继帝位，根据咸丰遗嘱，由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掌管朝政。恭亲王奕□被排斥在外。同治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于咸丰死后称慈禧太后，也称西太后，即西宫皇太后。咸丰的另一个皇后称慈安太后，也称东宫皇太后。西太后权力欲望极重，她与奕□勾结一起，又得到外国使臣的支持，于1861年11月免除载垣、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大臣职务，并将载垣、肃顺等人逮捕处死。两宫太后（实际上只是西太后）垂帘听政。

西太后夺取政权后，决心投靠外国侵略者，她给肃顺等人所定罪名之一，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51]。什么叫“尽心和议”，就是尽力取得洋人的欢心。对西太后等人的这种姿态，外国侵略者十分满意。当时英国在中国的报纸就这样说道：“在这个特别的关头，我们要比同中国发生联系的其他任何时

期，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52]

由西太后、奕□当权的清政府，也争取到了汉族湘、淮军阀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支持。这不仅因为汉族大地主阶级在镇压太平天国方面与满洲贵族的利害完全一致，而且还因为这些湘、淮军阀首领又是主张用西洋武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这与西太后一派的基本政治方针也非常契合。从此以后，在清朝统治者中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所谓“自强”运动即时兴起来。

西太后及其当政群体力图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外国侵略者也乐得有西太后这样的当政者来供其驱使，受其控制。于是，从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就勾结起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勾结下被镇压下去的。

1873年，当同治（载淳）已经十八岁的时候，西太后虽然不得不宣布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然一手控制朝政，同治形同傀儡。“归政”不到两年，当同治病死的时候（1875年1月12日），她又施展阴谋，首先将自己的只有四岁的姨外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迎进宫去，继承帝位（载淳无子），改元光绪，自己再度垂帘听政，把大权掌握在手中。

1889年光绪十九岁了，西太后又假惺惺地再度撤帘归政，退居颐和园“颐养冲和”，但实际上仍掌握着最后裁决的大权。

光绪是个比较有头脑，愿意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他不愿充当西太后的傀儡。光绪的志向得到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支持，这些人便是所谓帝党，他们同追随西太后的所谓后党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但后党已经营有年，实力要比帝党大得多。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两个侵略集团：以沙俄为首的俄、德、法集团；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集团。前者支持后党，后者倾向帝党。由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是

激烈的，后党和帝党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这种激烈斗争，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西太后依靠荣禄掌握的武力和袁世凯的告密，把维新运动镇压下去，囚禁光绪于南海瀛台，屠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则逃亡海外。

1900年爆发的势如燎原的义和团运动，使清政府惊慌得不知所措。狡猾的西太后在“洋人”要逼其“归政”的传言下，曾一度企图利用这个运动，来保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惜对外“宣战”。但是，就在正式“宣战”之后，西太后仍然通过驻外使节向各国政府作了如下解释：“朝廷非不欲将此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并且立下保证说：“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53)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远逃西安。在西安，她日夜思虑的就是赶快求和。当她得知公使团已提出《议和大纲》，而且在惩办“祸首”一节中将她的名字删掉时，她立即表示全部接受。

1901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西太后以光绪的名义下达了批准《议和大纲》的电令。在这个电令中，西太后极尽媚敌之能事，竟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和“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54) 这样的话。

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和约》十二条，其主要内容为(55)：

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

二、惩办祸首，斩决或革去清政府一批官员的职务；抚恤被害的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派大臣分赴德、日两国谢罪。

三、虐杀外人的城市，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四、下令永禁组织或加入排外团体，违者处死。

五、各省督抚及文武官吏均须切实保护外人，遇有伤害外人事件，不能立时弹压惩办者，革职永不叙用。

六、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

七、划定各国使馆界，不准中国人民居住。使馆区域内，由各国公使管理，并得常驻卫兵保护使馆。

八、将大沽炮台及有碍北京城至海滨间交通的各炮台，一律平毁。

九、由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由外国派兵驻守。

从以上各项内容来看，前三项是对清政府的惩罚；第四、五、六项是要清政府强制中国人民永远俯顺帝国主义；第七、八、九项，允许帝国主义铁蹄纵横，甚至中国的首都亦允外兵驻守，其丧权辱国之甚真是无以复加了。

《和约》签字，列强完全满意，西太后也大为欢喜。她从西安回京途中在开封办了一次“万寿庆典”；回京后，更“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两，歌舞无休日”。

西太后的统治地位由于《和约》而“保全”下来了。由此，她更懂得了卖国的妙用。

1902年1月28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太后第一次公开接待外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2月1日，她又接待“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

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56]。此后，她“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

上述情况，充分地说明了清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正如同盟会著名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做谋反叛逆的杀了。”[57]

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既受到义和团坚决抵抗的教训，又得到清政府对其矢忠矢信的保证，因此它的侵华政策由大规模地直接武装干涉，改变为通过清政府进行间接的统治。

帝国主义这种方针的转变，在许多国家的舆论中都有所阐述，而以英国人赫德说的最为清楚。这个长期窃据清政府总税务司的“中国通”，在分析如何才能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时，毫无掩饰地说：“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58]

这种方针当时被一些人称作“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即保全清朝政府，维持中国形式上的独立，帝国主义可以通过清政府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和渗透，而不必再进行领土的分割，1900年10月16日签订的《英德协定》，大体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这一意图。《协定》认为各国在中国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均应遵循“自由开放，毫无差别”的原则，规定“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

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这一《协定》中的原则，先后得到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赞同。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妥协，只能是暂时的。即使在这暂时的妥协期间，它们对中国的争夺仍然是很激烈的。例如，1904年—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便反映了日、英、美和俄国矛盾的尖锐化。

日俄战争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一度尖锐化的矛盾又缓和下来。接着，1907年6月至8月，日法、日俄、英俄诸协定先后订立。这样，帝国主义各国在“保全主义”的幌子下所造成的侵占中国的格局，就基本上定了下来。

帝国主义推行“保全主义”的结果，使它在中国攫得了巨大的侵略权益。清王朝最后的十年，铁路交通、航海贸易、财政金融、工矿企业，几乎全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至于政治上的控制，文化上的渗透，就更不待言了。对此，有人十分沉痛地分析说：“二十世纪以来，灭国政策，愈出愈奇。土地不必占领，人民不必杀戮，官吏不必驱逐，职业不必侵扰，及其结果，则不占领土地，而吸取土地之精华；不杀戮人民，而灭绝人民之种族；不驱逐官吏，而利用官吏之贪横；不侵扰职业，而暗攫职业之权利。迟之则数十寒暑，早之则十余春秋，万里河山皆他人之殖民地、游牧场矣！”(59)

由于帝国主义推行“保全主义”，而清政府又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间，便主要地表现为国内革命的形式，即革清朝政府的命（反清革命），当然，这一斗争的最后结果，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

(1) 二百六十八年中，在北京紫禁城的皇位上，前后轮换了十个皇帝：

福临（顺治）1644年—1661年，在位十八年。

玄烨（康熙）1662年—1722年，在位六十一年。

胤禛（雍正）1723年—1735年，在位十三年。

弘历（乾隆）1736年—1795年，在位六十年。

颙琰（嘉庆）1796年—1820年，在位二十五年。

旻宁（道光）1821年—1850年，在位三十年。

奕詝（咸丰）1851年—1861年，在位十一年。

载淳（同治）1862年—1874年，在位十三年。

载湉（光绪）1875年—1908年，在位三十四年。

溥仪（宣统）1909年—1911年，在位三年。

(2)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38，第11页。

(3)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

(5)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53，第27页。

(6)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80，第10页。

(7)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30，第8页。

(8) 《清史稿》卷127，志101，食货1，田制。

(9)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苏州织造李煦奏散发御种稻谷情形并进新谷新米折》云："臣蒙赐谷之后，凡苏州官绅人等，咸知御种谷子，一年可收两次，无不欢欣羡慕。今臣煦既种有新谷，则此后凡有求种者，俱可遍给。而江南地方，从前止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于是南方万万生民，无不家给人足，群沐圣天子教养之弘恩，永永无极也。"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3页。

(10)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61，第16页。

(11)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453，第31页。

(12)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61，第16页。

(13)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1467，第23页。

(14)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453，第31页。

(15) 吏部管人事，户部管财政，礼部管教育，兵部管军事，工部管建设，刑部管司法。

(16) 都察院管监察，理藩院管边疆藩属，翰林院管制诰文史。

(17) 大理寺近似最高法院，太常寺管祭祀礼乐，光禄寺管飨祭酒宴，太仆寺管马政，鸿胪寺管赞礼。

(18) 《清朝通典》卷80，刑1。

(19) 《孔府档案》卷79。

(20) 《孔府档案》卷4914。

(21) 三合会有许多分支，如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小刀会、小红旗会等都是。三合会与哥老会对内又统称“洪门”。

(22) 白莲教有许多分支：如天理教、八卦教、小刀会等等。

(23)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42，第4—5页。

(24)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80，第4115页。

(25)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页。

(26) 和珅家产共一百零九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计银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以此推算，不下八万万两。当时清政府岁入七千万两。

(27) 给事中李漱芳奏言。

(28) 乾隆在位六十年，传位于嘉庆，表示不敢超越他的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之数。1799年（嘉庆四年），乾隆方死去。

(29) 《孔府档案》卷6312。

(30)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页。

(31)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页。

(32) 《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8页。

(33)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

页。

(34) 《熙朝纪政》卷6，“纪英夷入贡”。

(35)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36) 如粤海关实征税率，1843年以前，本色洋布每匹税率为货价的20.74%，1843年新税率是货价的5.56%，新税率较旧税率减少73.19%。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37)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页，表16。

(38)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6页，表19。

(3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13页，附表：茶和丝的出口。

(40)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页，表16。

(41) 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第221页，表1。

(42) 王韬：《瀛壖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4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3页。

(44) 《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第1—2页。

(45)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3页。

(4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页。

(4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13页。

(48) 《清季外交史料》卷129，第13页。

(49)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5—336页。

(50)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3册，第244页。

(51) 清《穆宗（同治）实录》卷5，第26页。

(52) 《北华捷报》，1861年12月21日。

(53)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203页。

(5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

946页。

(55) 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2—1008页。

(5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88页。

(57)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151—152页。

(5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54页。

(59) 义侠：《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云南杂志选辑》，第575页。

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

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的时间并不晚。早在明朝中叶（十六世纪中叶），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若干手工业部门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萌芽。到清朝中叶以后，这种萌芽还有所发展。不过，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只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一个胚胎。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制造业，只是少量地、稀疏地存在于沿江、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手工业部门中。就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看，封建性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在手工业中，大量的仍然是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和城乡个体手工业，封建的官办手工业也占不小比重，而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为数极少。所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它距离产生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距离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常遥远的。

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当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时，欧美一些国家，早已完成产业革命而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当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在初步发展时，就已经开始向外侵略，寻找和占领海外市场；在它们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后，更加积极向外扩张。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自然成为它们侵略的对象。

于是它们纷纷来到中国，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推销工业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遇到了中国方面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在政治上，是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在经济上就是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而闭关政策又是以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被打破了。但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商品输入，却没有取得进展。

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密切尔（Mitchell）曾对英国商品不能畅销的原因，专门做过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描述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说："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至于自用而有余，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福建农民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1)

密切尔认为就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阻碍着外来商品的销售。要使外来商品能够畅销无阻，就必须打破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为了打破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彻底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外国侵略者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又签订了许多新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这时通商口岸已由五口增加到二十余口（不只沿海，内地的许多重要商埠也为外国开放了）；海关行政管理权落到了外国侵略者手中，进口关税税率再次降低，内河航行、沿海贸易以及内地通商等权利也为外国侵略者所攫得。特别是《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并且逐渐成为它们

的侵略工具。在这种形势下，外货、外资大量地输进中国，一直顽强抵抗外国商品侵入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体，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扩大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的产生，首先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因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不少农民已经不再亲手制造工业品，而到市场上去购买；很多手工业者也不再为市场提供手工业品，反而是变成了外国工业品的消费者。以手工棉纺织业来看，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手纺业与手织业相分离，手织业又与农业相分离，许多原来能自给衣料，或者有剩余出卖的人，现在则成了洋纱、洋布的消费者。这样，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售量大大增加。如1880年—1890年十年间，进口棉纱值从三百六十四万五千一百十二关两，增加为一千九百三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六关两；棉布进口值始则为一千六百万关两，继而超过二千万关两，最高达三千另九十四万关两[(2)]。洋纱洋布销售量的大量增加，标志着棉布市场的扩大。

棉布市场的扩大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他如煤油、火柴、五金等商品市场的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看到，中国商品市场的扩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扩大了的国内市场主要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所霸占，中国资本主义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占据的一些市场空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劳动力市场的扩大。鸦片战

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城乡手工业，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变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劳动市场在不断扩大。1893年薛福成曾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3] 有人估计，家庭手工纺织业每十小时劳动日只能纺纱四两，1890年进口洋纱共一百零八万二千担，合一亿四千三百九十万六千斤，相当于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纺车产量。1880年进口洋布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四千匹（每匹长四十码，宽一码），则相当于两亿两千四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织机产量（按每十小时劳动日能织宽一呎的土布十码计）[4]。这是就棉纱布而论，其他各种进口洋货无不造成大量的破产失业者。

此外，由于农产品商品化，很多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往往遭到破产。外国侵略者向清政府勒索大量赔款，这些赔款的负担大部分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同时，大量的鸦片输入引起了白银外流，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一切都加剧了农民的破产过程。还有，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也往往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变为劳动力的出卖者。

总之，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失去了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需要有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外，还必须有充足的货币积累，作为建设厂房、购买机器设备、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资金。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主要是掌握在官僚、地主和商人手中。他们通过贪污、勒索、兼并土地以及从事商业、高

利贷等活动，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这些货币财富，主要是用于奢侈消费，或者用来继续兼并土地和从事商业高利贷等活动，并没有投入产业，没有转化为兴办近代企业的货币资本。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这时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仍然掌握在地主、官僚和商人手中。官僚们除了继续使用贪污、勒索等手段搜刮钱财外，还有了新的发财之道。这就是办洋务、办外交、购买军火、借洋债等。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商人，特别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他们获得了优厚的利润。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买办们，在帮助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过程中，得了大量的佣金。此外，地主通过收取地租、经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也积累了大量货币。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上的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等，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这些财富中，就有一部分会被投入产业，转化为兴办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此外，还有一些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致富，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具备时，也将资金带回国内，投资兴办近代企业。

二　洋务派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人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是清政府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并和他们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期间，清政府中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官僚，如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认为要维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于是开始了以所谓“求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建立起新式军队并创办起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又在苏州设立制炮局（上海制炮局移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继续创办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水雷、火药等，这是清政府所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年，李鸿章又将苏州制炮局移至南京，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李鸿章又设天津机器局。以后，在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汉阳等地陆续设置十几个中小局厂，制造枪炮军械。

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封建性的，它是历代封建政府所设制造军械的官办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其企业经费由官款拨充，制造出来的产品如枪炮、弹药、轮船等，由政府调拨各军使用，并不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企业经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镇压人民以维护封建统治。在经营管理方面，完全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由清政府派员经办，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这种军事工业基本是封建性的官办工业。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员又开始了以“求富”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原料和燃料问题。军事工业的兴办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料和煤炭燃料，“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5)]。其次是交通运输问题。新式的军事工业必须有新式运输工具与之相配合。再次是经费问题，由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经费，清政府在财政上发生了支绌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洋务派官僚深切地感到，只靠发展军事工业还不能达到“求强”的目的，必须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发展民用工业

以“求富”，“必先富而后能强”[6]。这样他们就又开始兴办起近代民用工业来了。当时，国内已经具备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而外资在华投资设厂，获得优厚利润，也刺激了洋务派官僚创设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兴趣。

洋务派官僚主张兴办近代工业，曾经遇到了政府中守旧势力的阻挠。但洋务派是政府中的实力派，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因而取得了兴办工业的某些特权。

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除依旧采取“官办”形式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商人出资，政府派官管理。郑观应说过：“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7] 郑观应的话，只不过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不可能办到。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乃是为了招收商股，吸收和利用商人股本，实际上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稍晚些时候，在洋务派经办的民用企业中，还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政府出一部分股本，商人出一部分股本。“官商合办”企业，名义上是“合办”，实际上多半是“合而商不办”，还是由官方操纵。

洋务派所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前，一共约有二十个。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部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的轮船招商局。设立的目的是，“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8]。轮船招商局总局设上海，在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地设分局。招商局是洋务派官僚所办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资本最多时达二百几十万两。原为官商合办，中法战争后（1885

年），因亏折甚巨，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又改为商办。还有1874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创办基隆煤矿，1881年煤的产量达五万四千吨。还有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1882年该矿资本达一百二十万两，1884年起年产量达二十万吨以上，1894年日产量一千五百吨，为洋务派所办采矿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一个。此矿于1900年为英人夺去。还有1878年，李鸿章批准候补道彭汝琮倡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派人经办，1889年正式开工生产，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还奏请给予该厂减税和十年专利权，以垄断棉纺织工业。1893年，该厂被火焚毁。李鸿章又令盛宣怀负责规复，改名华盛纺织总厂。还有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筹设兰州织呢局，1880年开工，投资官款二十万两。此外有张之洞于1889年筹设汉阳铁厂，1890年又设湖北织布局和湖北纺纱官局，1891年又设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1894年又设湖北缫丝局和湖北制麻局。

以上这些企业在创办时，主要着眼于军事目的。如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就是为了“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开平矿务局的创设是为了“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等。这些企业名义上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上企业管理大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这些企业形同衙门，洋务派任意安插私人担任总办、帮办、坐办、提调等职务。他们把持一切，贪污中饱，无所不为，商人根本无权过问。洋务派还利用官督商办形式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由于洋务派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他们所经办的民用企业享有减税、专利等特权，借此限制和排挤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许多重要职务，任用洋人，信赖洋人，甚至由洋人左右一切，表现了它的买办性。

总之，洋务派所经办的近代民用企业，虽然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并非一般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一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当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后，它限制和排

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方面是起了阻碍的作用。

三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七十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一共创办了约一百多个。有些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所以，到甲午战争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大约只有七八十家[(9)]。

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早以来，手工缫丝业就比较发达。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生丝原料的需要，中国生丝出口数量大增，经营缫丝业十分有利。陈启源“岁甲寅（1854年）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壬申岁（1872年）返粤，在简村乡（属南海县）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10)]。继昌隆创设后，“南（南海）、顺（顺德）各属，群相仿效。今（1910年）则全省缫丝均用机器，多至百数家”[(11)]。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资本二十万元。后来又陆续创办了几个厂。江苏、浙江本来是我国传统的丝织业中心，上海又是重要的生丝出口口岸，条件本来优于广州，但是由于上海的几家丝厂经常受到外资丝厂的压迫和竞争，经营困难较多，所以缫丝业的发展，反而不如广州。

棉纺织业中近代工业出现的时间，比缫丝业晚几年。1893年，官商合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火焚毁后，盛宣怀负责规复，于1894年，成立华盛纺织总厂。后来，盛通过招收新股，排挤和顶替原有的投资者，将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辛亥革命后，盛在香港英政府注册，将该厂完全侵吞。最后由无锡荣家购去，成为申新九厂。

此外，1891年，上海道台唐松岩还开办了华新纺织新局，官商合办，资本二十九万两。后因经营不善，改组时为大股东聂缉槼收买，改名恒丰纱厂。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武昌四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和制麻局），原为官办企业，因“官款支出不易维持”，1902年改为招商承办，1907年由韦尚文接办，改名应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上几厂，都是由官僚资本企业转化为商办企业的。

棉纺织业中，最初真正商办的企业为朱鸿度于1894年在上海所办的裕源纱厂，和严信厚在宁波所办的通久源纱厂（1896年正式开车）。除此之外，在福州、重庆、天津、镇江、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人酝酿兴办纺纱厂，但在甲午战争前，均未实现。

在轧花业方面，1886年，在宁波出现了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在上海也开设了几家机器轧花厂，每家机器数十台至百余台不等。

在面粉业方面，1878年，朱其昂（知府）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后来上海、福州、北京等地，都有机器面粉公司出现。

火柴业方面，从八十年代起，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都办起火柴厂，其中较大的是上海的燮昌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后改为中外合办）和重庆的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

造纸方面，1882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机器造纸厂；1891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开办了伦章纸厂，集股开办，但因与外国纸竞争不过，停歇了。在印刷方面，1882年，徐润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影印古版书籍，规模较大，营业尚好。

此外，在制茶、制糖、制冰、制药等方面都有近代工厂设立，但因规模较小，有的经营不久就停业了。

在轮船修造和机器制造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经营了一些船舶修造厂。上海有两家规模较大，能够造

小型汽船。其他都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和装配工作，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造船工业。在机器制造方面，上海也有几家机器厂，但规模都很小，只能进行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也没有出现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

在采矿业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也经营了一些使用机器的小矿（在个别程序上使用机器，基本上还是土法开采）。采煤业开办较早，如徐州煤矿、贵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枣庄煤矿、广西富川及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都是在1880年前后创办的。金属采矿业开办较晚，八十年代以后，约有十个左右。其中热河承德三山银矿、福建石竹山铅矿、直隶顺德铜矿和广东香山天体银矿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办。湖北长乐、鹤峰和施宜铜矿，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吉林三姓金矿等，维持的时间较长。不过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只使用少量机器，主要依靠人工开采。金属矿中规模最大的是1883年广东富商李宗岱等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这个企业开采区域达好几个县，前后投资总额达八十万两，其中除官款、商款、借款外，还有不少华侨资本。但因经营不善及地方政府不肯支持，最后完全失败。

从上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创办过程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不是在手工业工场的基础上产生，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由手工业工场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或是在手工工场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机器生产的为数极少。

其次，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从轻工业开始创办的，而且一直以轻工业为主。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投资少、规模小的，大型的很少。如外资祥生船厂有资本八十万两，耶松船厂七十五万两，香港船坞公司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二百元，宝昌丝行八十万两，而这时中国商办企业中，最大的资本也只有二十万两。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规模，不仅比外资企业小，而且也比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小。1894年以前，

包括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制造业在内的五十三个商办企业，一共只有资本四百七十万四千余元，平均每个企业只有八万八千余元。而同一时期，十九个“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却有资本一千六百二十万三千多元，平均每个企业有资本八十五万二千余元，为商办企业的九倍以上[(12)]。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分布非常集中，主要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以上海为最多，广州次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出口便利，如缫丝、制茶和轧花等厂，实际上是为了原料出口加工而创设的。其次是为了运输的便利，原料的获得和技术依赖的便利，以及地方市场特殊的需要等。如棉纺织、火柴、造纸、印刷、面粉各业都是如此。此外，有些企业建立在上海、天津的外国租界内，目的是为了依靠洋人势力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些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则只是依附于各口岸的航运和工厂而存在。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投资人，多为官僚、买办和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官府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要兴办新式企业，没有官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官僚有政治上的特权，他们兴办近代企业，是有政治保障的。当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他们看到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企业颇能获利，于是就把自己搜刮来的货币财富，投资兴办近代企业。

买办投资创办近代企业，是因为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有联系。他们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不但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同时也学会了一套经营管理近代化企业的方法和经验。因此，当经营新式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将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拿来投资创办新式企业（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投资招商局、开平煤矿，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办同文书局，等等）。

商人投资兴办近代企业，主要是因为有利可图。不过，一般商人因为没有政治势力作后盾，投资的并不多。他们积累的财富，主要还是用来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开设钱庄进行高利贷，再就是到农村购买土地。只有一些与官府有关系的大商人（捐有官衔或亦官亦商者），才投资创办一些新式企业。

在商人中，有一部分华侨商人比较积极地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早已接触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手中又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当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出现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尽管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力量十分微弱，但毕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有了初步发展。其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可以从下面的两个统计图表中看出，

下面统计表中的数字和设立厂矿趋势图表明，1895年—1911年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十分明显的。1895年设厂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则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比1895年增长了330.9%。1895年—1911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总的趋势是：1895年—1898年是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是在甲午战争后，创设新式企业有利可图以及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激励下出现的。1900年以后由于外资和外货的压迫，设厂出现低落现象。到1905年左右，由于日俄战争的关系，某些工业（如面粉

工业）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特别是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在1904年—1908年间，又出现一个新的更大的高潮。但时间不长，又开始退落。

1895年—1911年历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及其指数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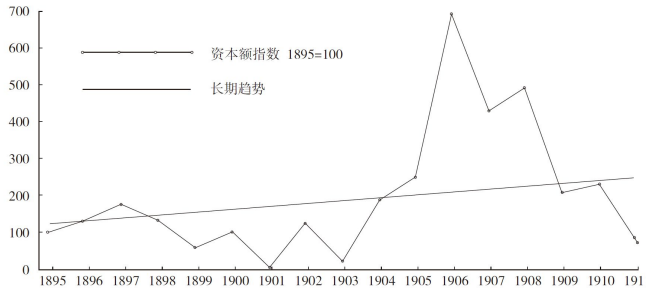
年度	资本（本年度投资）（万元）	指数 1895＝100	资本总额（万元）	指数 1895＝100
1895	330. 7	100	2421. 4	100
1896	434. 8	131. 1		
1897	577. 6	174. 7		
1898	438. 4	132. 6		
1899	491. 0	57. 8		
1900	330. 4	100		
1901	14. 5	4. 4		
1902	405. 9	122. 7		
1903	62. 2	18. 8		
1904	612. 1	185. 1		
1905	813. 8	246. 1		
1906	2290. 1	692. 5		
1907	1405. 8	425. 1		
1908	1612. 2	487. 5		
1909	663. 8	200. 7		
1910	739. 8	223. 7		
1911	203. 7	63. 1	10434	430. 9

由上可见，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伏不定的，波浪式前进的。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

以上统计表中所反映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既包括民族资本企业，也包括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下面我们再把民族资本企业（即商办企业）和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分开，并和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较，由此来看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情况。见下表：

历年设厂数和资本额表 [14]

年代	合计		商办企业				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	
	设厂数	资本（万元）	设厂数	资本（万元）	资本所占比重	投厂数	资本（万元）	资本所占比重
1872—1894	72	2090.7	53	470.4	22%强	19	1620.3	78%
1895—1911	491	10855.6	416	8277.7	77%弱	75	2577.9	23%强



历年设立的厂矿趋势图 (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首先，甲午战争后，各类企业设厂数和资本额都增加了。甲午战争前共设厂七十二家，资本额为二千零九十万七千元。甲午战争后，新设厂四百九十一家，资本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

其次，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无论在设厂数或资本额方面，增加都比较快，而且占据了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共设厂矿五十三家，资本额共四百七十万四千元，占资本总额的22%。甲午战争后，新设厂矿四百十六家，资本额为八千二百七十七万七千元，占资本总额的77%。

在上表中，我们是把官商合办的企业和官办企业合在一起计算的，官商合办企业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形式：即官办招商集股、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三种形式的企业，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与官办企业等同。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商办性质。根据这种情况，将1895年—1911年所设厂矿企业的构成，列表如下：

历年所设厂矿企业统计[16]

1895年—1911年

企业形式	设厂数	资本（万元）	资本所占比重
官办	37	1007.8	9.2%
官办招商集股	6	356.4	3.2%
官督商办	2	73.8	0.7%
官商合办	30	1139.9	10.5%
商办	416	8277.7	76.4%
合　计	491	10855.6	

从上表中可见，官办企业只有三十七家，官办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与纯商办企业合计则为四百五十四家。资本额：官办企业为一千零七万八千元，占资本总额9.2%，商办及其他三种企业则为九千八百四十七万八千元，占90.8%，可见商办及带有商办性质的企业已占绝对优势。

此外，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可以从个别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中得到一些反映。以买办出身的祝大椿为例，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他所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八个[17]，资本共达二百八十七万五千元，投资范围包括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工厂有六个在上海，苏州、无锡各一个，雇佣工人共达四千余人。

再如，士绅出身的张謇，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时，所办企业更多，资本积累更快。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早年中秀才，后出外谋生，在淮军统领吴长庆幕府办理公文。1885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中法战争后，鉴于“国势日蹙”，产生“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18]。1894年赴京会试，中进士，又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

午战争后，张目睹国事日非，虽科举成名，但不愿为官，认为应兴办教育与振兴实业，“为士今日，固宜如此”[19]。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张謇兴办实业，得力于封建政府的支持，取得经营垄断特权，再加上其他优越条件，因此企业发展很快。从1899年开办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十余年间，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工、农、垦牧、航运等企业，共二十七个单位（其中自己创办的十八个，参加投资的九个）[20]。资本额达九百多万元，企业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以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为例，最初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到1911年资本积累为二百七十九万一千元，纱锭数由二万零三百五十锭，增加为六万六千七百锭；公积金累计六十三万五千元，账面盈利累计为三百五十三万三千元，这两项相当于大生纱厂最初创办时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的600%。张謇所办的其他企业，大部分都是在大生纱厂丰厚利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自己就说过，“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21]。

此外，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官办企业在向商办企业方面转化。如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员开办的中路久通矿务公司（即西村锑矿，在湖南益阳），试办数年，由梁端甫承顶，改为商办；1897年开办的木李坪锑矿（官办，湖南安化），后由华昌公司接办；1908年吉林盘石嘴铜矿，1910年由商人唐鉴章承办；1909年开办的湖北针钉厂，1911年因亏折，由侨商梁柄农承办等。

下面我们再从工业部门的分类考察一下这一时期（1895年—1911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在四百一十六家商办企业中，纺织部门（包括轧花、纺织、织染、缫丝、呢绒、织麻等）占一百五十五家，资本额为二千七百三十三万六千元；其次是面粉工业三十九家，资本额七百零三万一千元；

再次是榨油、火柴、卷烟等部门。重工业很少。燃料采掘、金属开采冶炼和金属加工三个部门一共只有三十九家，资本额九百六十三万六千元。这种情况说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这一时期中，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发展的主要是一些轻工业，所以经济力量仍然是很薄弱的[(22)]。

另外，从设厂地区看，这一时期的商办企业，主要集中在江浙、两广和两湖三个地区。江浙地区共新设厂一百四十八家；两广地区七十一家；两湖地区三十二家，三地区共设厂二百五十一家。占商办企业总数四百十六家的一半以上[(23)]。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生的经济基础。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心之所以在江浙、两广和两湖地区，就是与这三个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有密切的关系。

二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弱点。这些弱点是：资力薄弱、规模较小以及技术落后等等。造成这些弱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因而同它们有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同它们存在着不少的联系，对它们有依赖性。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地、充分地得到发展，它的发展始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它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样，就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首先，民族工业在资本力量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数量不大，总额不过二三亿美元。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投资数量大为增加。1902年外国在华投资额增加到十五亿美元，1914年更增加为二十二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九倍[24]。

帝国主义在华所设厂矿，一般规模较大，资力雄厚，而华人厂矿则一般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如1895年—1911年间，外资在华设厂共一百二十家，资本总额为九千八百二十三万三千元，同期华厂共设四百九十一家，资本总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华厂虽然设立数目较多，但每家资本额却很小。外厂平均每家资本额为八十一万八千元；而华厂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二十二万一千元。（以上华厂乃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在内，如单以商办企业计算，则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十九万四千元，且资本在一万元以下者未计在内。）[25] 1895年—1911年间，华资厂矿中，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金属加工工厂共十三家，资本总额为二百七十八万七千元；而同期，外国一家机器厂——耶松船厂，其资本额即为五百五十七万两。中国两家最大的机器厂是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和汉口扬子机器厂，这两个厂的资本额共为八十五万两，仅为耶松厂资本额的七分之一[26]。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本力量上与外资企业相比，相差如此悬殊，自然很难与它们竞争，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压力。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的压力。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侵夺中国市场，主要是通过本国的商品输出进行的。甲午战争后，外资在华设厂增加，民族资本企业在商品市场上所受的压力，除了外国输进的商品外，还有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因此所受的压力就更大。以棉纱市场为例，1891年—1893年间，洋纱输入量为七十多万公担，到1909年—1911年间，增加为一

百三十二万公担[27]。大量的进口洋纱再加上外国在华纱厂所生产的棉纱，于是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洋纱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地位。如1903年，外国棉纱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为88.69%，而中国棉纱只占11.31%[28]。

从市场价格上看民族工业产品也处于劣势地位。再以棉纱为例，1904年上海市场上，华纱与印纱（印度棉纱）相比较，华纱（十四支）每包价规银九十二两四钱，印纱（十六支）每包只规银八十八两。十四支纱在制造成本上本来应低于十六支纱二两，现在却比十六支纱的价格高四两四钱[29]。在这种情况下，华纱自然难以与洋纱相竞争。

此外，在金融方面，中国民族工业的流动资金，主要靠钱庄、银号或外国银行的贷款来周转。而中国的钱庄、银号，其资金又大多来自外国银行的拆款，因此，外国银行一旦压缩金融，便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业。所以中国民族工业往往要受外国银行的控制。

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工业难以抗衡，因此，不少企业由于竞争不过而倒闭。如卷烟业，英美烟公司自1900年在中国各地普遍设立销售机构以来，销烟数量大量增加，华商烟厂无法与之竞争，“计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华商制烟公司大小约有三十余家，现在（1909年）能幸存者寥寥无几……均断送于此英美公司”[30]。又如火柴业，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各地陆续兴办了一些半机械化的工厂，但在日本火柴的倾销下，沿海各埠的火柴厂多因竞争不过，被迫倒闭[31]。此外，棉纺织业、缫丝业、水泥业以及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也是同样情况，不少华资企业都被外资企业所吞并[32]。

华商使用机器的工厂尚且不能与外资厂商相抗衡，至于一些小手工场，自然更经不住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打击。如扬州地方，在1905年全国抵制美货高潮中，机器手工织布厂纷纷建立，1906年已有四十

多处。1907年抵制美货高潮过去，这些工厂大多不能支持，剩下的只有十四、五家，其余一概停工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机器手工毛巾厂增设不少，但都不能与外资匹敌。如广东三水，1910年，在“西南市镇又增开织造毛巾工厂二间，但因外洋棉纺价格昂贵，该厂所出之货，究不足与日本运赴中国毛巾销路相敌，盖彼货取值更廉也”[33]。

由上可见，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只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受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虽然也颁布过一些“鼓励”发展工业的所谓奖励条例，但实际上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压迫和束缚并没有放松。这表现在：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封建性高额借贷利率的长期存在；清政府和清朝封建大官僚对发展工矿业的垄断，以及他们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公开掠夺等方面。

在苛捐杂税中为害最大的是厘金。厘金本来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捐税之一。太平天国失败后，厘金制度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清政府举办洋务、偿付外债而不断增加。因此自同治以后，“卡若栉比……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罚”[34]。后来虽然不断有人主张裁撤，但事实上已不可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困难，已陷于不能维持的地步，当然更不能裁撤了。

厘金的税率原为1%，但实际上许多地区都高达5%—10%。许多省份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即每经一卡须完纳厘金一次。在江西，除正式厘金外，还有“补抽”。“如由赣州府运货至江省（南昌），须经十卡，应完二十九分有奇”。即税率高达29%以上。且计货时往往加多计算，“故定章名为取十，其实乃取三十、四十”。“又况查验不时，羁滞留难，无卡无之”[35]。

由于厘金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一般资产阶级都对厘金深恶痛绝。1906年张謇为此曾致书张之洞说："士大夫习闻人言厘捐病民也，时而相语，亦曰厘捐病民也，而不若民之病于厘捐者怨毒之深也。故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36]

厘金如此之重，对民族工业是个很大的负担，如中国纱厂到内地收购棉花，有人估计需要缴纳大约相当于棉花价格的5%—20%的厘金[37]。而外商企业在华销售货物则不纳厘金。这样，民族工业产品的成本自然要比洋货为高。又如"洋煤……进中国口岸，每吨止完税五分……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完纳……所以缴费多而价值贵，不及洋产之廉也"[38]。

外国在华所设厂矿不纳厘金，只纳关税一项，而华商则负担重重，因此许多华商纷纷要求清政府对华商与洋商一律对待，取消厘金等苛捐杂税。后来也确实曾有过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对华商机制货物出厂时也只完一次正税（即值百抽五的关税），运往外地，概免重征。但这种规定并未通行，各省地方政府仍然照旧征收厘金。

中国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关系并没有消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39]。

在封建剥削关系大量存在的基础上，高利贷资本非常活跃，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当时土地、典当业、商业和高利贷是社会上流动资本的主要投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业中提供的利润不能超过（或者至少相等于）地租或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收入，要使

社会上的资本投向工业是很困难的。

据上海等二十三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10年银行放款的年利率平均大约在12.5%—14.8%之间，见下表[40]：

各地银行放款利率

（1910年）

主要地区	放款利率（年利，厘）	主要地区	放款利率（年利，厘）
		湘潭	6.0—7.2
营口	9.6	沙市	12.0
北京	6.6—12.0	宜昌	12.0—18.0
天津	8.4—9.6	重庆	10.0—12.0
芝罘	10.0—20.0	南昌	11.0
上海	7.2—9.6	宁波	6.0—8.4
汉口	9.6	福州	8.0—20.0
镇江	8.4—9.6	厦门	10.0—25.0
南京	12.0	汕头	12.0
芜湖	12.0	温州	15.0—30.0
九江	9.6—18.0	广州	18.0—36.0
长沙	9.6—11.0	梧州	12.0—15.0

中国城市中放款利率之高，确实惊人。1910年，有的城市年利率竟高达36%。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利率一般只在3%—4%之间。两相比较，更加证明中国经济的封建落后性。

中国金融市场上，放款利率如此之高，以及各城市间的放款利率相差又如此之大，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是不存在的，产业资本在资本市场上没有取得独立的优势地位，而商业高利贷资本却在统治着利息水平。

在这样落后的金融市场上，工业资金的筹措十分困难。工业资金短缺，自然会影响到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此外，民族工业还受到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公开掠夺。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清政府历来对民间发展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甲午战争后，在举国上下要求设厂自救的浪潮中，清政府被迫允许民间可以设厂制造，但仍然采用各种手段来打击民族资本的发展。其手段之一就是对商办的一些获利较大的厂矿任意收归官办。如1905年直隶省永平府卢龙县城东有一山，名骆驼营，“金矿大发，经本山地主用土法开挖”，地方官即往查封，改为官办[41]。同年，广东曲江东硬岭地方煤矿向产煤斤，“曾由冯姓等集股采取，获利甚厚，旋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42]。又如湖南湘乡乌云山“产煤极旺，向由民间自行开采，窿口数十，历办无异”。湖南南路矿务公司，看到利润丰厚，“亦于其间另开一窿”，后来就禁止其他各矿开采[43]。

以上事例说明，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何等的困难。

总之，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一些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却又使它的发展遇到极大的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矛盾，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初步发展过程中，除了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的一方面之外，还和它们存在着不少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对它们，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方面。

首先是在资金上依赖于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都是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借款。如1900年武昌织布局，“因经费支绌，工作久停，现向某国借得洋款若干，足资

周转”[44]。又1901年汉口纺纱厂，“创设以来，因销路欠佳，积亏甚巨。现……向某洋商筹借银四十万两，以资周转”[45]。张謇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912年也曾向日本大仑洋行借款二十万两。又1911年创办的上海闸北水电公司，“民国元年（1912年），将全部厂房机器，向日商大仑抵押四十万元，以备扩充业务”[46]。1907年广州电灯公司筹建以来，“未能成功，征集的资本太小了……听说公司已经在私下清理，并且在求助于日本的资本来加以复兴”[47]。

以上只是略举几例，便足以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金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机器设备和技术方面也要依赖帝国主义。中国原来根本没有新式工业，自然也就没有“工业之母”的机器制造业。中国新式工业建立后，始终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更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新式工业，只是一些轻工业，机器设备等基本上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甲午战争后，虽然也有少数机器工厂设立，但那只是一些机器零件的修配厂，称不上真正的机器制造厂。中国许多工厂在购买机器设备时，往往都是一面购买“洋机”，一面雇用随机的“洋匠”。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与封建势力之间也存在不少的联系。中国民族工业产生时，投资者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这些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海织布局最初的六个投资人的情况来看，据记载说，“戴子辉（恒）太史为京口望族，其尊甫富而好善；龚君（寿图）系蔼仁（易图）廉访之介弟，亦八闽殷宦；李君（培松）久业淮鹺；蔡君（鸿仪）业宏沪甬，均当今之巨室；香山郑君陶斋（官应）；上虞经君莲珊（元善）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48]。可见上海织布局乃是现任的封建官僚、官宦世家和大盐商、大买办的结合体。

封建官僚创办新式企业，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他们或者是当权的

统治者，或者是有势力的“士绅”，不论哪一种，都与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取得一般商人所得不到的特殊权利和便利条件，如在某一地区进行垄断经营，获得减免捐税的特权以及取得某项专利等。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为例，它是山东盐运使张莲芬所创办，与封建官府关系密切，取得了该矿区周围百里之内的开采垄断权。在该公司添招新股章程中就明确写着：“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本公司矿界于光绪二十五年奏明，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斤，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49]

再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也是这样。张謇所办企业，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取得了南通地区的经营垄断权和免除捐税的特权。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时，就提出仿照李鸿章创办华盛纱厂的办法，要对通州地区的纺纱业进行垄断。他的要求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即“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50]。后来他又提出如果有人在通州新设纱厂，则必须在出厂的每包棉纱中，向大生厂交纳贴费一两（以十年为限）。这一请求也得到批准[51]。张謇取得的经营垄断权实际上并不限于通州。1904年上海棉纱业资本家朱畴拟在崇明设立大有纺织公司，清政府的商部便出来助张加以制止。后来朱畴改在海门设立裕泰纺织分厂，也因张的反对而未办成[52]。张謇实际上垄断了通州、崇明、海门一带的棉纺业经营[53]。

张謇的大生纱厂还享有免除捐税的特权。一般纱厂到外地采购棉花，远道运输，都要缴纳不少厘金，约当货价的5%—20%。至于棉纱运输外地，一律须完关税5%。大生厂则一概不负担厘金和关税。后来张謇在崇明创办大生二厂，也和大生一厂享有同样权利。

大生纱厂既进行垄断经营又享有免税的特权，自然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张謇和许鼎霖创办的耀徐玻璃厂（1907年），也取得了“在徐州境内专办十年”[54]的专利权。又如华侨商人张振勋在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也获得“专利十五年”[55]。

张謇和张振勋等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优惠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们和封建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张謇和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官僚的关系十分密切。张謇在筹办通州纱厂时，张之洞（当时任两江总督）就曾为他申请免税。张振勋原是南洋华侨商人，因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清政府特授予“太仆寺正卿侍郎衔，头品顶戴，南洋商务大臣”，他和清朝封建政府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还表现在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和封建高利贷资本的联系方面。一些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官僚、地主或士绅之类人物，他们一方面投资经营新式企业，一方面又在农村拥有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如恒丰纱厂主聂缉槼，是曾国藩的女婿，大官僚，1890年为上海道道台，1899年署理江苏巡抚，1903年调补浙江巡抚，1905年因浙省铜元局舞弊案被撤职。1909年春，他曾以三十二万五千两的代价，以他儿子的名义收买了华新纺织新局，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56]。而他自己却在“领垦湖田”的名义下，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领得湖南省洞庭湖旁的圩田四万多亩。圩田不能马上利用，必须整理，聂缉槼又积极筑堤、排涝，并收买邻近的刘公垸等土地，建立了种福垸。种福垸总面积有五万多亩，东滨大通湖（洞庭湖的内湖），筑堤高二十二至二十四市尺，长约十六华里。种福垸南北宽十华里。聂缉槼完成种福垸的经营，成了湖南的大地主[57]。

再如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他们的父亲做过肥城县官，在做官期间“置田二百亩”。杨宗濂做过长芦盐运史，杨宗瀚曾总办台北商务，都做过官。他们兄弟二人于1896年集股二十四万两创办业勤纱厂。然而他们又以其母亲的名义，在其父死后三十年间，置田“足成千亩”，并“庄屋一区”[58]。再如创办启新洋灰厂（官商合办，1906年）及京师自来水厂（1908年）的周学熙，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其母死后“乃就芜湖万顷圩购田二千亩为义庄”[59]。

中国民族资本和封建高利贷资本也有密切的联系。如创办申新纺

织公司和茂新、福新面粉公司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经营钱庄出身的。1896年他们兄弟二人开办了广生钱庄。1900年荣氏兄弟利用从经营钱庄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一个“从事政界数十年”的老官僚合伙在无锡开办了保兴面粉厂[60]。五年后，荣氏兄弟又开始筹建其第一个纺纱厂——振兴纱厂。荣氏兄弟的资本，主要来自钱庄的积累[61]。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式工业与封建高利贷资本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有不少民族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往往主动去依赖和投靠清政府，并和它相勾结。有的资本家自己就做了清政府的大官。如上述侨商张振勋便是一例。还有些民族资本家，竟千方百计地企图弄到一个官爵头衔，用以显示自己和封建势力的紧密关系。如祝大椿就是用虚报资本的办法取得了清政府特赏四品卿衔、二品顶戴。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薄弱，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许多的联系，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并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两面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又可能随时和它们妥协。

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产生。甲午战争后又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发展起来。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为社会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遭到失败，具体原因很多，但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过于弱小，因而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则是主要的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次旨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其经济根源就是因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曾经领导了这次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人物，对待革命的态度却是不相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一部分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敢使用暴力进行反抗；对清朝封建专制政府也不敢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它；而希望清政府能进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良，以利于自己的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部分人是清末维新派和立宪派的社会基础。例如张謇就是这个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他们的企业规模较小，资力较弱，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系也较少。如辛亥革命前夕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即可以作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企业只是在帝国主义压力减少的空隙中，在人民抵制外货的斗争中，才得到一些发展。如前面讲到的，荣氏兄弟创办保兴面粉厂，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经营面粉业有利可图时，才在1902年与人合伙办起来的。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对面粉需要增加，特别是1905年因国内抵制美货，美国面粉进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办的面粉工业才得到发展。但当1908年美货又返回中国市场进行倾销时，他的面粉厂就遭到了亏损[(62)]。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人物，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这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矛盾，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他们还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也害怕人民，所以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很大的妥协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一般都是些小资本家。他们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革命的要求比较强烈。有的还亲身参加革命，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烈士禹之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禹之谟（1867—1907），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即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多次在长江沿岸各地从事开矿事业，

但都没有成功。1900年他参加了唐才常等人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事后逃往日本学习应用化学和纺织工艺。1902年回到湖南湘潭，开了一个小小的毛巾厂，艺徒不到十人，因产品价廉物美，很受欢迎。1903年，他把工厂迁到长沙，稍加扩大，并附设工艺传习所，制造竹木家具，职工共约四十人。他虽然和职工生徒们一起昼夜辛勤劳动，但终敌不过洋货的倾销，工厂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1904年他参加了华兴会，1906年参加了同盟会，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主要是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广大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三　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

华侨在二十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孙中山说过：“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63)] 华侨之所以积极地参加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华侨出国的历史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

我国人民移居海外，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与南洋一带有所来往。到唐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南洋一带已经有华人在那里定居了。宋、明两代，出国侨居的人更多。在清代以前，华侨出国谋生是比较自由的，既没有受到什么限制，也没有受到任何强制。但到清代就不同了。

清初，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对人民出国，采取严厉禁止的政策。大清律中规定，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者，处以严刑[(64)]。清政府并且把出国华侨视为“不安本分之人”，规定他们必须限期回到国内，逾期不回者，即不得再回。这样，实际上将华侨摈弃于祖国之外[(65)]。清政府对海外侨民，根本不予保护，对华侨在国外受歧视，甚

至受屠杀，也不过问。如乾隆六年（1741年），荷印总督伐根年（Adriam Valekenier）发动对荷印华侨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死难者达数万人（即爪哇红河之役）。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在上奏此案时说："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数万人……实则孽由自作。"乾隆对此案也认为："天朝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可见在清朝统治下，华侨在海外处于毫无保护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华侨出国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中国人民往往被当作华工掠卖出去。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洋和美洲等地进行殖民开发，亟需大量劳力，于是纷纷来到中国，招募和掠买华工。

外国侵略者来中国招募和掠买华工，遇到了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的阻挡。不过，他们很快就把清政府的这种政策打破了。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订立了《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务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66] 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明令废除海禁。1866年，英、法又与清政府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67]。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规定，华人出洋，清廷不得禁阻[68]。所有这些，都为外人在中国招募，掠买华工提供了条约依据。

当时华工是被当作"猪仔"贩运而去。所谓猪仔贩运，原来是指十七、十八世纪的黑奴买卖。后来非洲的黑奴贩卖被禁止了，便转来中国掠买华工，继续干贩运"猪仔"的勾当。

“猪仔”贩运在道光三年（1823年）已经出现，到同治初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最为盛行。当时，葡、西、英等国的移民公司，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地设立“猪仔馆”（即招收华工的地方），与国内汕头、厦门、澳门、香港等地的客馆（即贩卖华工的地方）相勾结，从事这种肮脏的活动。

客馆或用武力胁迫，或以小利相诱，在国内招收华工。得手后，即引入客馆暂住，待船出国。华工在船上受尽非人的待遇，有人称这种贩运“猪仔”的船为“浮动地狱”[(69)]。华工在船上死亡率很高，如1850年运往秘鲁的华工740人，在船中死亡者即达240人。又如1856年运往古巴的华工598人，在船中死亡者亦达132人。

华工被送到目的地后，即被卖与“猪仔馆”，或者直接卖与买主。一个华工的售价，一般为20—24元，而客贩所费不过十三四元，利润很高[(70)]。因此“猪仔”贩运制度盛行，被掠华工人数大为增加。华侨出国，除被掠卖以外，还有因国内生活无着，外出谋生的；也有一部分人是出外经商或做其他事情；少数人是因在国内遭受政治迫害而逃往国外的。到辛亥革命前的1907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六七百万人[(71)]。

华侨主要分布在南洋一带，即印尼、泰国、马来亚、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其次是美洲，欧洲、非洲也有，但数量较少。

华侨的籍贯主要是福建和广东。成分绝大部分是工人[(72)]，其次是小商人[(73)]，再次是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师、医生等。带买办性的大资本家为数很少。

华侨出国后，在侨居地从事劳动生产，经营商业等，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殖民主义者进入南洋时，当地还是草莱初辟，一切甚为荒凉。华侨去后，披荆斩棘，艰苦劳动，对当地的开发起了很大作用。前马来半岛海峡殖民

地总督瑞天咸（Frank Suretenham）对华侨的功绩，曾经这样评价："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路，投身蛮荒，冒万死，清森林，辟道路，每有牺牲其生命者。此外，为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尚多……英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华侨之手。"[74]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说："微华侨，吾人将一无能为。"[75]十六世纪末，西班牙人莫牙，在谈到华侨开发菲律宾的作用时说："凡一市镇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彼等既系各种事业之经营者，且工作勤苦，而工资低廉。"[76]美国学者莱丹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加里佛尼亚的迅速发展，没有中国劳工是不可能的"[77]。

华侨对祖国也做出了贡献。华侨对祖国的汇款，是清政府财政上的一项重要收入。据马士（H．B．Morse）估计，海外华侨寄回中国的汇款，1903年为一亿一千三百七十万元，占中国国际收入总额（六亿六千一百七十万元）的17.8％[78]。此外，华侨还回国投资兴办企业和建设铁路等[79]。

华侨对侨居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那里却受到残酷的虐待和迫害。特别是华侨工人，流血流汗，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南洋荷兰属地的华侨工人在"日里承种烟叶者，往往系由奸贩诱惑拐骗出洋……立据三年为期，入园后不准自由出入，虽父兄子弟不能晤面。加以克扣工资，盘剥重利，华人忍气吞声，呼吁无门"[80]。在非洲，"华工麕聚矿所，劳筋苦骨……稽查经管之人，重重剥削，几于每食不饱"[81]。华工劳动时间，一般每天都在十四小时以上，有时夜间也要继续工作，稍有抗拒，即遭工头毒打。

华侨在侨居地，还处处受到歧视。"华民侨居英属新加坡各岛者约计一二十万人……赤体检疫独施之华人"。在澳洲，"凡属有利可图

之事，皆禁遏华民营业”。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华侨“只能与驴马同履车道，西人之行人行道者，可以牵犬随行，不能与华民偕行”[82]。

华侨在法律上也受到不平等待遇。“和（荷兰）属，于司法行政上分设三种裁判所，有本邦人裁判所，则受和之诉讼，而欧美日本人之诉讼附焉。有地方裁判所，有地方高等裁判所，则受土人巫来由人之诉讼，而华人回教人之诉讼附焉。……又欧美日本人入境之始，给予护照，厥后在境内商贩游历无地不可。而华人则限以区域，域以外住一宿者，有罚；域以外逾一步者，有罚，非别请专照不可。此专照又非易得……又按律输税……欧美日本人于所得税例纳百分之二，而华人所得税则例纳百分之四。又如欧美日本人车马无税，华人则车马有税，其他彼此厚薄之殊，不遑胪举”[83]。

华侨在侨居国还不断遭受排华袭击。当殖民主义者急需劳动力时，不惜使用种种卑鄙手段拐骗华工。但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劳动力相对过剩时，则又采取限制华侨入境政策，甚至煽动排华暴行，使华侨遭受极大涂炭。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首先采取此项政策。据寓美华侨司徒芳等上清政府书中说，美国对待华侨，是“苛例百出，令人骇绝。无端诬以疫疠，而有围埠之举，无端目以不洁，而有洗埠之事”。而且，“华人到埠之时，不问其合例与否即囚之于码头木屋中，寝食于斯，内外隔绝。亲友不得一见，律师不得一问。……黑暗秽臭，过于监狱，压制苛暴，甚于犯人。幽囚常数百人，羁留常数阅月，而护照束阁，关吏无一过问。因此之故，有悬梁自缢，投海自尽，失医致毙之惨者”。至于“埠中华人，辄遇痛殴，亦无如何。巡差任意拿人，良歹不分，即遭重罚。华人以常病致死，亦须戮尸”[84]。

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迫害下，华侨地位与日俱下。华侨工人自不必说，就连华侨资产阶级也受到很大影响。如“1897年中国企业家李清河（译音）曾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建立一家炼锡厂。1907年，该厂即转移进英国的‘东方冶炼公司’手中”[85]。同年，荷属殖民地“华

货进口，新例加税，瓜米出口，新例限数。彼行政之条例愈增，即我华人之生计愈绌”[86]。

华侨在国外遭受如此残酷的压迫和摧残，清政府不仅从不加以保护和关怀，反而对回国华侨进行种种迫害。1893年，清出使英、法、美、比大臣薛福成曾经指出过：清政府对华侨“凡挟赀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87]。1895年，清会典馆详校官陈璧说：“闽粤商民，出洋谋生，若积有厚资，言归乡井，于汕头、厦门等埠舍轮登陆之时，该处地棍居为奇货，辄串通海关厘卡书役，妄指偷漏，任意拘留，及议罚放行，所费已不赀矣。而到籍后，复有蠹吏劣绅朋比讹诈，既捏为匿税，又捏为抗钱粮，鱼肉百端，必罄其余囊而后已。以致贸易海外者，视家邦为畏途，而藏富于外洋。”[88]

由上可见，华侨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和奴役，他们不但得不到祖国的任何保护和关怀，相反，清政府还对他们进行种种迫害和打击。这种情况，就使得广大华侨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怀有极大的愤恨，他们热切地希望能有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祖国。这也是广大华侨之所以积极参加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原因。

当然，华侨中各个阶级和阶层，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广大华侨工人，在殖民主义者的皮鞭下劳动，他们流血流汗，受尽了虐待和迫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怀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华侨中的中小工商业者，即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地位比工人

好，但也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和压迫。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受到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在税率和其他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侨居国要比欧、美、日本人低一等，在有些国家，还要遭到排华暴行的袭击，使自己的财产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甚至生命不保。在国内，他们携资回国，受到清朝政府和官吏的盘剥、敲诈、勒索和诬陷。这一切使得他们具有反对国外殖民主义和国内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要求。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来保护自己在海外的权益，同时也希望在国内能有一个良好的投资条件，以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和参加者，是这次革命在海外的主要社会基础。孙中山发动革命最早成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其主要参加者就是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89)]。

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相当于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但也不完全相同。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因为侨居海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与国内封建主义联系较少；同时由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比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更早些更广泛些。因此，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比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其革命性更为坚决和彻底；其政治觉悟也更早些和更高些。由于以上特点，所以，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激进，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如南洋华侨资本家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乃裳、萧竹漪、许雪湫、陈文褒，檀香山华侨资本家孙眉、邓荫南，越南华侨资本家李卓峰，缅甸华侨资本家张文光等，他们积极赞成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捐助大量款项，而且许多人还亲身参加革命起义，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华侨中的大资本家，即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人数较少，有的人或与当地殖民统治者，或与清朝封建政府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一般对革命采取不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如南洋华侨资本家姚东生，开锡矿

发了大财；但让他拿出一点钱来资助革命时，却坚决不肯。又如南洋英国属地大资本家陆祐，死时财产达四五千万元，但请他捐款时，也是一钱不舍。再如顾维钧的岳丈，南洋有名的大财主黄仲涵，他对革命虽不敢明显反对，但也怕拿出钱来。

还有一件事，可以明显地看出与清朝封建政府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与一般革命的资产阶级，态度迥然不同。清末，美洲、南洋华侨革命思潮磅礴，清廷乃派其大臣杨士琦假名抚慰，巡视南洋各地，实则欲侦察革命党人行动以为防范，且欲攫华侨金银以供内府。当杨士琦“甫至马来半岛，闽籍富商胡某，广集所知，开欢迎大会”。这是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可是一般资本家却不欢迎杨，他们邀陈文褒与会，“座甫定，烈士（即陈文褒，后回国参加1911年广州起义死难）昂然直入，趋座前，怒目斥杨曰：‘满奴来何为？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而必及此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虐，何有华侨？华侨回国，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满奴来何为？速返，勿污乃公刃！’全座失色股栗……各人如鸟兽散。杨即乘军舰当夜回国”[90]。陈文褒的正义言行代表了广大华侨和华侨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

(1)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2)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页。

(3) 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海外文编》卷2，第9页。

(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页。

(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9页。

(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7)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开矿。

(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页。

(9) 1872年—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数目，在现在出版的几种书中各不相同。如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为54家（据该书第93页表计算）；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为75家（据该书第一辑，上册，第1166—1169页表计算）；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为77家（据该书第一辑第38页计算）。这三种书中在统计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数目时，有以下不足：（一）都将“源昌机器五金厂”列入在内。按此厂现已查明为一“虚构材料”（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72、102—110页）。（二）重复计算。如将上海机器织布局与华盛纺织总厂都列入在内，而实际上只能按一厂计算，因华盛系上海织布局火焚后规复建成。（三）在1872—1894年期间，不少厂是投资筹建并未建成，或开工后不久即停歇，但书中皆列入在内。（四）三书皆为工业统计，未将民族资本所办矿业计入。（五）有些新材料未补入，如《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一书中的材料。现经查对、订正和补充，得出此一时期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为76家（包括矿业在内）。

(10) 桂坫等：《宣统南海县志》卷21。

(11) 桂坫等：《宣统南海县志》卷21。

(12) 见本书第51页《历年设厂数和资本额表》。

(13) 本表系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49页表（一）改制而成。其中“资本”栏，是指本年度新投资的资本额。“资本总额”栏内，1895年的数字，系1872年—1894年所设厂矿资本额2090.7万元加上1895年设厂资本额330.7万元所得；1911年的数字，系从1896年—1911年历年设厂投资额累计所得。

(14) 本表制作说明：1．表中1872年—1894年数字，系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3页表1制作。删除了原表商办厂矿数中祝大椿所办源昌机器五金厂一家，资本额10万元。因该厂乃系虚报，并未设立。2.1895年—1911年数字，系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919页，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录（1895年—1913年）计算制作的。表中厂数均系资本在一万元以上者。3.1895年—1911年数字，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年—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15) 根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50页，表（二）改制。

(16) 本表系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附录一“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录”（1895年—1913年）计算制作。设厂数与资本额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年—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17) 详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91页，附录。

(18)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年谱，第54页。

(1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年谱，第54页。

(20)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69页。

(21) 《张謇致两江总督端方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第10—11页。

(22)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附录1，“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单”（1895年—1913年）计算。厂矿数及资本额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23)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附录1，“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单”（1895年—1913年）计算。厂矿数及资本额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24)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5、56页。

(25)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99页，表2。下册，第870—919页，附录1，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录（1895—1913年）。

(2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商埠志》，第456—458页。

(27)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75页，表16。

(28)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57、1164页。

(29)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57、1164页。

(30) 《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99—200页。

(31) 1902年九江、胶州两火柴厂倒闭，1908年琼州某火柴厂倒闭，此

外，上海荣昌、燧昌二厂亦为日本火柴压倒。

(32) 如十九世纪末，上海华商缫丝厂，因外资丝厂争夺丝茧，遭受亏损，二十几家丝厂，能“经年开业者寥寥无几”。1913年以前，中国商办纱厂共18家，被外国纱厂或金融机构通过货款关系加以兼并的就有4家，即裕晋、兴泰、大纯、九成。1913年，湖北大冶水泥厂因无力偿还债款，为日本三菱公司所封闭。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后来转到法国金融资本手中，汉口扬子公司因摆脱不了日本资本的关系，最后被迫停工。

(33) 《关册》（中文本），1910年，三水口，第130页。

(34) 《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考21，厘金。

(35) 《江西商务说略》，第18页。

(36)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

(37) 高柳松一著：《中国关税制度论》，第13页。

(38)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开矿。

(39)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

(40) 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16页。

(41) 《时报》，1905年9月9日。

(42) 《各省矿务汇志》，《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

(43) 《时报》，1906年1月31日。

(44) 《中外日报》，1900年11月17日。

(45) 《中外日报》，1901年7月2日。

(4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52、1055页。

(47)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58页。

(48) 《申报》，1880年10月16日。《书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后》，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2页。

(49)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8，第16页。

(50)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6，第7—8页。

(51)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下册，第1—2页。

(52)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第19—21页。

(53) 南通盛产棉花，而且质量很好，可以就地取材（后来他还自设垦殖公司为大生厂提供一部分棉花），同时工人工资低，棉花价格也便宜，上海就高得多。因上海中外纱厂很多，“花价因争买而益涨，工资因争雇而益昂”（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5，第42页），南通纱厂只此一家，张謇既可压低工资，又可取得廉价棉花。

(54) 《各省矿务汇志》，《东方杂志》，1904年第10期。

(55) 《各省工艺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12期。

(56)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57)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亦见《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第26—29页。

(58) 《侯太夫人行述》，第15—16页。

(59) 《周悫慎公全集》卷首，行状，第49页。

(60) “荣熙泰与两个儿子（指荣宗敬、荣德生），以积蓄创办了一个广生钱庄……荣宗敬为经理，德生管正账……庚子年间（1900年）洋兵入京，天津帮到上海办面粉，卖给外人有暴利，于是面粉业大发其财。失了业的朱仲甫说：我从政数十年（为厘差，相当于后来县税务局长）乏味得很，要做实业。……于是商定集股三万元，朱认一半，荣认一半，在产麦地无锡开厂。那年钱庄为办麦汇款多而赚钱五千两，也加入投资。那个粉厂叫保兴”（见万林：《中国的“棉纱大王”“面粉大王”无锡荣氏家族暴发史》，《经济导报周刊》第50期，1947年12月14日，第1—2页）。

(61)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62) 详见《中国的“棉纱大王”“面粉大王”无锡荣氏家族暴发史》。

(63)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

(64) 《大清律例全纂》卷20，兵律关津载：“凡官员民兵私自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但以通贼论斩。又州县同谋或知情隐匿，亦将处斩。”

(65) 雍正五年上谕：“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指华侨），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后应定限制，若逾期不还……不许令其复回内地。”（《皇朝通典》卷80，刑制。）

(66)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5页。《续增条约》第5款。本条约系在北京签订，通常称为《北京条约》。

(6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42—246页，《续定招工章程条约》。

(6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42—246页，《续定招工章程条约》。第262页，《续增条约》。

(69) 参见葛兹拉夫：《一八三一、一八三二及一八三三年三次航行中国沿岸日记，涉及暹罗、朝鲜、琉球群岛等地》，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1期。

(70) 布莱司：《马来亚华侨劳工简史》，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2期。

(71) 《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又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海外华侨的人数，有许多学者曾经加以估计1902年以来的数字，通常在700万至900万之间。"（该书第133页）

(72) "像马来半岛的树胶园，荷属东印度的锡矿，以及苏门答腊东岸的烟草田，都有华侨在做工"。（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132页）

(73) "据估计所得，菲律宾的零售商业，华侨占90%"。（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134页）

(74)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48页。

(75)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65页。

(76)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70页。

(77) 莱丹：《美国外交政策史》（王造时译），第487页。

(78) 转引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86—87页。

(79) 华侨最早回国投资兴办的企业，是秘鲁华侨黎某在广州开设的进出口商店。以后1872年南洋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90年美洲侨商在广州投资创办电灯公司。1892年印尼华侨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辛亥革命前华侨还回国投资兴办铁路事业。如爪哇著名华侨张煜南投资302万元创办潮汕铁路。该路1904年动工，1906年完成。1910年通车的漳厦铁路，开办时资本242万元，后增至330万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华侨投资。

(80) 《清史稿》，邦交志7。

(81) 《清季外交史料》卷202，第9页。

(82) 《清季外交史料》卷202，第10、8、9页。

(83) 《清季外交史料》卷204，第23页。

(84) 胡绳：《美国“教育”中国学生的“友谊”》，《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85) 西莫尼西：《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居民》，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

(86) 《清季外交史料》卷204，第21页。

(87) 薛福成：《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庸庵全集·出使奏疏》卷下。

(88) 陈璧：《保护回华商民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望岩堂奏稿》卷1，第4页。

(89) 1894年在檀香山参加兴中会的人数共126人，其中最多的是商人（73人），再加上畜牧家、农业家、银行家，共79人，这是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其次是工人（36人）；再次是公务人员（8人）和自由职业者（3人）。（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5—37页。）

(90)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列传，陈文褒传。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一　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活动

十九世纪末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起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中去探寻挽救民族危亡的良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传播日广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新学），很快成为他们主要的思想武器。在英才辈出的志士仁人当中，孙中山最早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流亡时，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1)]。

1866年11月12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中。

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翠亨村离县治石岐约三十公里，坐落于自石岐至澳门的大路的西侧，西偎犁头山，东面金槟榔山。登上金槟榔山，珠江口形势一望而收；海天之际，香港一点，依稀可见。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在这带地方引起了比内地更为显著的变化。在城镇出现了洋货和从事输入输出的商业。读书人中出现了通达洋务的人士。下层民众，或者为谋生更多地流往外洋做苦工，或者参加三合会，以反抗官府和侵略者。但是，建立在这片肥美的土地上的农村，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统治，依旧贫穷和

落后。

孙中山出世前后，家境窘迫。他父亲孙林（德成）是一个缺少土地的农民，两位叔父都出外当华工，胞兄孙眉曾在地主家打长工。他的童年和所有贫苦农家的孩子一样，备尝艰苦，很小就参加农业辅助劳动，熟睹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村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幼年的遭遇使孙中山始终对中国农民怀抱着深刻的同情，他“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期这样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2)]。十岁，孙中山开始入村塾读书，按照传统的方式接受文化教育。十二岁，读完四书五经。

孙眉（1854—1915）于1871年去檀香山（当时华侨对夏威夷群岛的泛称）谋生。开始当雇工，后去茂宜岛垦荒，由自耕进而雇佣工人，开办起商店和牧场，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成为华侨资本家。随着孙眉经济地位的变化，翠亨孙家的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1878年5月，孙中山离开故乡赴檀香山依孙眉生活。去国远行开阔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界，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3)]。他开始在与故乡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成长。

1879年秋，孙中山被送进英国教会学校卑涉书馆读书，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1882年秋，他又入美国教会学校奥阿厚书院肄业。通过对中学课程的努力，孙中山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檀香山是华侨萃集之区。孙中山生活在这些爱国情绪浓郁的人们之中。当时，美国正在极力吞并夏威夷这个弱小的君主制国家，当地土著人民进行了激烈的反美斗争。孙中山在这里，“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4)]。檀香山的厄运，勾起了孙中山对祖国前途的关注，“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5)]。孙中山憎恶清朝专制统治的腐败和黑暗，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满族人掌权的缘故，如果由汉族人管理，情况就会改变。他极为注意外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历史，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

1883年秋，孙中山返回香山。他按照国外所见，在家乡尝试改良乡政。同年11月，入香港拔萃书室读书，年底加入了基督教。1884年4月，改入香港中央书院攻读。1884年到1885年，发生了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孙中山。他一方面为广大军民的英勇抗敌所鼓舞，另一方面更加痛恨腐败投降的清政府。他说："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6)] 孙中山加紧了挽救危亡之法的探求。不过，到他鲜明地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还有着曲折的历程。

1886年夏，孙中山毕业于中央书院，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学医。他在校经常发表改革中国政治的言论，并因此结识了同学郑士良。郑士良（1863—1901）号弼臣，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三合会成员，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忠实同志。为了受到更严格的教育，并能自由地发表政治言论，孙中山于1887年10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何启（1859—1914）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是香港议政局议员，同时又是律师和医生。孙中山在校深得英国教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的器重。在必修课程之外，他还贪婪地研读西方的历史、政治、军事及物理、农学等方面的著作。

香港歌赋街有一家杨耀记商号，是孙中山同村好友杨鹤龄家开设的，孙中山课余常来此同杨鹤龄、陈少白、尤列聚会。杨鹤龄（1868—1934），名仕年，字礼遐。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后易名白，字夔石，新会人，是西医书院的同学。尤列（1865—1936）字令季，号少纨，顺德人，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读书时与他结识。他们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人们称之为"四大寇"。与"四大寇"过从密切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等人。陆皓东（1867—1895）名中桂，字献香，也是孙中山的同村好友。孙中山在幼年时曾听到村中老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起义反清的业绩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这时，他不断谈起对洪秀全事业的向往，称洪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朋友们戏呼他做“洪秀全第二”，他也欣然自命。这批青年人的言谈虽然肆无忌惮，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在知友圈子之外，孙中山的言行就要审慎得多，还明显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原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表达出来。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这些人虽然经历和思想各有不同，一般说都要求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企望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他们既然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清政府，遂纷纷著书立说，上书当道，游说公卿，极力主张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封建弊政，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同腐朽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进步作用，因此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孙中山公诸社会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按这些人的思想路线进行的，他希望用和平手段，即改良的方法来改造中国。

还在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返乡，就试办过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等乡政。以后又利用假期返乡，不断加以改进。他想把这种试验推广到更广大的范围。1890年，他上书在乡的清朝官僚郑藻如，提出效法西方兴农桑、禁鸦片和普及教育的建议，请求这位曾任驻外使臣的人支持。孙中山表示：“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交世。”他认为这种改革是“吾国之大幸也”[(7)]。同年，又呈请香山知县李征庸，在县内推行乡政改良。以后，他又从香山去广州，向各级衙门层层上书[(8)]，提出改革的建议。孙中山的上书活动都没有得到结果。他从与官府的接触中更加洞察清朝政治的腐败，但是仍没有轻易地抛弃和平改革的手段。他时常在香港，澳门

和上海的报刊上投稿，宣传改革，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等通信往还。1891年前后，他发表《农功》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改造中国农业的问题，要求采用并推广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组织，因地制宜地改进农业生产。在《农功》中，孙中山谴责了统治者漠视民间疾苦。他说："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这篇文章后来被郑观应加以修改，收入自己编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中，广为流传。

孙中山后来把"四大寇"相处的历史称为"革命的言论时期"。实际上，孙中山这段时期的言行存在着重大矛盾，他一方面倡言造反覆满，一方面又上书当道请求改革。这种矛盾产生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不成熟状态。他从以农民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反抗传统中吸取营养，希望从事洪秀全那样的事业，推翻满洲贵族支配的清朝，但是却没有告诉人们将建立什么性质的新政府。他循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道路，要求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但是也没有告诉人们这种科学技术将受怎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支配。在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当时已经由要求发展新式生产力、采用西方经济制度、进而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的时候，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思想还是较为贫弱的，甚至没有同洋务派的主张严格地区别开来。总之，孙中山还没有把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还徘徊于采用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手段之间。

1892年7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同年在澳门行医，并开设中西药局。次年，改赴广州行医，同时开设东西药局，并在香山石岐镇设立支店。其时，康有为正在广州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孙中山听说康有为崇信西学，有志于政治改革，便试图与他结交，托人致意。康有为却要孙中山具门生帖子下拜。孙中山不愿接受这种条件，结交的事只好作罢。这是孙中山和康有为发生关系的开始。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76年，从学于朱次琦

（九江），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同年冬，初游香港，耳闻目睹，观感颇多，产生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印象，自此悉心钻研西学。1888年赴京应试，上书提出“变法”的主张。1891年开始在广州授徒讲学，同时写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以建立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后来，他和弟子梁启超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

孙中山和康有为结交虽未成功，却在广州得到了更多的朋友。他经常与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程璧光、程奎光、区凤墀等议论时事。这样密切地同身居下层的朋友探讨革命救国的途径，使孙中山与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日趋显著。1893年冬，孙中山与友人聚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他提议创设一个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得到大家的赞同。这个以反清为宗旨的团体并没有组织起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也还没有放弃和平改革的希望。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到翠亨故里，闭门草拟上李鸿章书稿，表达他要求改革的思想，“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9)]。他的密友们也支持他的做法。陆皓东参与其事，陈少白对原稿作了修改。

李鸿章是当时清廷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余年。他虽然忠于反动朝廷，却因讲求洋务被目为“识时务之大员”，不少改良主义思想家都与他有关系，并寄予主持改革的幻想。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他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这四事，其纲目是：“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

益以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孙中山认为：“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这封书信中反映的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思想，较写作《致郑藻如书》、《农功》时有所发展，涉及了工农业生产、商业发展和教育制度、用人行政等方面的改革问题。但是就其内容的深度来说，却进展不大，它没有提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对政治的改革更是淡漠。书中仅仅要求“野无郁抑之士”、“朝无幸进之徒”，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早已司空见惯。为了投合李鸿章的心理，书中对李有溢美之词，并表示了进身的愿望，甚至表示对“伏莽时闻”“岂能无忧”。可是，孙中山和他的伙伴们竟未想到，就是这样微末的改革要求，也不能为当权者所接受。

1894年2月，孙中山与陆皓东北上投书，并借机观察清朝统治腹心地区的局势。他们在上海通过郑观应、盛宣怀等觅得进见李鸿章的门路，于6月抵达天津投书。这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军务，没有接见。书呈递上去也如石沉大海。孙中山的希望落空了。上书的失败给予孙中山严重的教训，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0)]。于是，他们由天津去北京等地游历，然后返回上海。在京津所看到的政治上的腐败和地方上一样。当时，中日战事激烈，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实地考察加强了他革命的决心。自此以后，孙中山坚定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

二　兴中会的成立

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在该地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酝酿成立革命团体。

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埠成立。

是日，孙中山召集赞成其主张的侨胞二十余人在何宽住宅中集会，成立团体。孙中山提议将团体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所起草的章程九条，获得与会者的赞同。与会者推举刘祥（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何宽（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商人）、许直臣（经商，兼任教师）为正副文案，黄华恢（永和泰号司事）为管库，李昌（当地政府译员）、郑金（移民局译员）、邓荫南（农场主）等八人为值理。随后，孙中山让会员们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孙眉等陆续加入。

兴中会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小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开始。

兴中会在它的章程中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严厉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兴中会章程》痛切地说：

>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它进一步说明建立兴中会的目的说：

>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

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兴中会章程》将“国”与“朝代”、“政府”加以区分，谴责“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号召振兴“中华”、“中国”，显示了反清的意识，也包含有民主主义的因素。但严格地说，它还只是一篇激烈的救国宣言，并没有正面提出明确的革命纲领。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者们政治思想不成熟，对于改造中国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达到怎样的目标，他们自己也不明确。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朝政府的极端无能，迫使他们不待将这些问题考虑成熟，就不得不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至于宣言连明确的反清或“排满”字样也没有写入，则是为照顾檀香山华侨的处境而不得不如此的。清朝严酷的专制统治对华侨也有着无形的震慑力。许多华侨把孙中山的革命行动视为“作乱造反”，生怕被连累得破家灭族。所以孙中山虽多方游说，奔走逾月，所得同志仍是极少数；即使这些人，他们也不能不顾虑故乡的亲眷。考虑到这种情况，兴中会公开的文件都表现得较为温和，它的起义筹饷捐款便是以“集股举办公家事业”名义入簿的。不过，兴中会的章程中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并不妨碍它是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活动都是为准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而进行的。

孙中山为准备起义引导会员进行了两项活动：教练兵操和筹饷募捐。他借用当地一所学校，聘请外国军事教习教授兵操，每周操练两次，参加者有二十余人。会员们还踊跃交纳会费并捐款助饷。由于多数会员产业很小，起初只收到一千余元。孙眉的产业此时已经很大，富甲一岛，号称“茂宜王”。他听说弟弟因起义经费不足而焦急异常，便贱价售出一部分牛牲，将所得的钱交给孙中山。在会员们的支持下，孙中山总共募得一万三千美元，便于1894年底归国筹备起义。

兴中会成立不久，在檀香山的会员总数即达一百三十余人。其中以小商人和小农牧场主为主的华侨资产阶级占多数，其次是工人、职员、教师、记者。会员中有一多半是孙中山的香山县同乡，相互间沾亲带故。这时追随他先后归国从事革命运动的有邓荫南、宋居仁等二

十余人。邓荫南（1848—1924）名松盛，行三，因为年长，人呼邓三伯。广东开平人。三合会会员。他原是一个贫苦的孤儿，随哥哥去海外谋生，后来经商，兼营农业，成为较富的华侨资本家。为了表示一去不复返的决心，他变卖了全部财产。后来，这些钱都在反清起义中用尽，重陷贫困，但他仍坚毅地从事革命活动。他的行为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连政敌也为之惊服。梁启超对康有为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中山，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11)] 小店主宋居仁等离开檀岛时，也都变卖了产业或辞去工作。他们慷慨赴义的行动反映了华侨革命情绪的高涨。

孙中山归途中经过日本横滨，托人散发大量传单，声明"准九月起旗作反，杀满洲佬，复明之江山"[(12)]，并嘱华侨组织会所，以作后援。

1895年1月底，孙中山抵达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兴中会在香港活动的政治基础较檀香山要好。孙中山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黄咏商、杨鹤龄等，拟议扩大兴中会组织。杨衢云（1861—1901）名兆春，号飞鸿，福建澄海人，幼年随父至香港读书，后来在英商企业中当职员，1892年结识孙中山。杨衢云是辅仁文社的首领。辅仁文社成立于1890年，是香港一些公私职员的俱乐部式组织，他们借此讨论政治，提倡爱国。这些人大都生长在殖民地，受过较完备的西方教育，习惯于欧美的政治生活。他们憎恶封建君主专制，但对中国内部的事情了解得很少。杨衢云与谢缵泰等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决定取消辅仁文社名义，加入兴中会。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部成立。黄咏商被推举为会长，他是香港地方议会的议员。兴中会总部设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路十三号，按照黄咏商的建议，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为掩护。

香港兴中会增订了《兴中会章程》。这个章程提出了"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的发

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它还强调发动更广泛的群众，要求将救国主张“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不过，香港兴中会的重要成就还在于它的誓词。从香港兴中会成立时起，会员入会时必须朗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誓词尖锐地提出了“反满”问题，把革命锋芒明白指向由满洲贵族当皇帝的清朝政府。“恢复中国”的口号，较之从过去民间反抗斗争中因袭而来的“反清复明”口号，无疑要先进得多。最明显地表现了誓词的历史特点的，是“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关于“合众政府”的概念，在兴中会的文献中没有作过正式的解释。按照普通政治常识，它应当指的是美国式的合众政府，即联邦政府，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形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鲜明地表现了兴中会反清斗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这个誓词就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三　广州起义

兴中会在香港建立组织后，便以此为基地，将其全部精力都集中于准备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前往广州建立兴中会组织，专任军事准备；杨衢云驻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送枪械。

孙中山在广州行过医，与各方面都结有良好的关系，方便了这次行动。他偕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抵穗后，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踊跃立誓约入会，会员总数有数百人。孙中山还发起了一个公开团体，叫农学会，借以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得到广州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数十人署名赞助，因此外人都不怀疑来往于云冈别墅的人会有什么“不轨”行动。

1895年3月，孙中山到香港与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会商起义的策略，他们计划用三千精兵突然袭取广州城。于是，孙中山再回广

州，广泛联络可利用的武装力量。兴中会会员程奎光任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负责联络水师官兵响应。郑士良被派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首领梁大炮，约定在起义发动后即率大队赴城接应。归国的檀香山华侨会员李杞、侯艾泉被派往石歧，届时率绿林占领香山、顺德等县以为声援。其他如广州的巡防营，三元里的乡团，潮汕、惠州的会党，都联络上了。孙中山又设立了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两处机关和多处接待站，以容纳往来之人，贮藏文件、武器。在广州河南头咀，设了炸弹制造处，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制造。孙中山还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起义的骨干队伍由兴中会自行组织。杨衢云在新安招到一批散勇，并招募了在香港做工的人，准备届时派往广州担任突袭任务。为了接济用款，黄咏商捐出了自己的一所房屋变卖。何启支持兴中会，愿意为起义担负起草英文宣言的任务。中文的《讨满檄文》，则由在广州的朱淇起草。香港两家英国民营报纸的编辑黎德、邓勒也支持兴中会反清起义，愿意在报上进行宣传。兴中会企望帝国主义国家能支持起义，它取得了日本驻港领事的诺言，并请黎德去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到8月底，预定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兴中会决定在重阳节（夏历九月初九）举事。重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节日，广州的风俗，到那天要郊游登高，街头熙熙攘攘，便于起义行动。

10月10日，兴中会为在起义后成立临时政府，选举总统——伯理玺天德（President）。谢缵泰提名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则推举孙中山，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说服了自己的支持者，将伯理玺天德职位让与杨衢云，使兴中会避免了分裂。

重阳节前夕，各路队伍准备就绪，候命发动。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口号，以红带缠臂为暗号。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陈清率领炸弹队，预备到时往各军事要点投掷炸弹，壮大声势。万事俱备，只等杨衢云从香港派突击队来。10月26日，重阳节到，各部都派人到指挥部请令。孙中山突然收到杨衢云来电，用暗语

报告“货不能来”。孙中山知道，失误了日期，必然走漏风声，便命各路的人回去候命，并即发电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当晚，陈少白撤离广州。27日，孙中山也离开广州，经香山、澳门赴港。果不出孙中山所料，形势突然变化了。会员朱淇的哥哥知道兴中会在准备起义，到期见没能发动，怕事泄被株连，便以朱淇名义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李急忙飞报两广总督谭钟麟。此前，李曾向谭报告孙中山等行动可疑，英香港总督也电告有人运械入粤，谭钟麟都没重视。这次得报后大为惊恐，急忙调兵加强广州防卫，并派兵搜查王家祠、咸虾栏兴中会机关，陆皓东等五人被捕。杨衢云仍在香港积极布置。接到孙中山停止行动的电报后，因为军械已上船，无法搬回，照旧派朱贵全、丘四等随轮到广州。当28日船抵广州时，清兵已在岸边把守，朱、丘等四十余人被捕。至此，起义计划全遭破坏。

陆皓东在敌人的刑庭上表现极为英勇，他痛斥清朝腐败，对从事革命排满，直认不讳。因拒绝供出同谋，他受到钉手足、凿齿等残酷刑罚，始终坚贞不屈。陆皓东在供词中说：“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杀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他慷慨地指出，“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13)]。11月7日，他与会党领袖丘四、朱贵全同被杀害。程奎光也在军营中被告密，经同事营救，被长期监禁，后病死狱中。陆皓东等是最早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牺牲的烈士。

事泄后，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魏友琴、侯艾泉等十六人被清朝官府悬赏通缉，清方给缉拿孙、杨二人开出的赏格是花红银一千元。

广州起义未及爆发就遭到了镇压，但仍然有其重要意义。这次起义是此后革命党人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开始就采取武装起义的方法来反对封建统治者，这是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优点。革命党人在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献身的精神，但是，他们在

相对强大的反动统治者面前企图用军事冒险的办法来取得胜利却是不可能的。起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党人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准备发动的。革命党人没有深入地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暗中联络会党、绿林和军队。这些力量与革命党的联系是很松懈的，革命党人只能与其上层人物发生关系。革命党人自行组织群众时，也不用革命主张去教育他们。杨衢云在香港招兵，就诡称是省城“招勇”，以十块洋钱鼓励人们前往。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虽多方努力，却没有组成可靠的战斗力量，没有建成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因此经受不住重大的打击，以致广州起义终不免于失败。

清政府的镇压使兴中会受到严重摧残。它在广州和香港的机关瓦解了。骨干星散，部分人从此脱离了革命运动，兴中会暂时无力再举行起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受到国内外的注视。在日本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孙中山从此成了著名人物。

第二节　兴中会与保皇党的合作

一　合作的探索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广东当局下令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等，香港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等的驱逐令，五年内不得入境。1895年11月，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他们到横滨后，结识侨商冯紫珊、冯镜如等，设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2月中旬，孙中山即断发变装，经檀香山赴美、欧游历。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电各驻外使节，相机缉拿孙中山。他沿途的行踪均受到侦视。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英国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被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绑架，囚于馆内。公使龚照瑗租定轮船，预备将这个“钦犯”解送回国邀功。孙中山千方百计摆脱危境，最后恳得使馆英国仆人柯尔的帮助，暗中递信给康德黎求救。康德黎和其他英国友人奔走营救，

公布了清使馆无耻绑架本国革命党领袖的消息。英国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强制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孙中山继续在伦敦逗留，考察政治，并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读书。1897年，他经加拿大重到日本。

孙中山于1895年离日前，曾将过去在檀香山认识的日本牧师菅原传介绍给陈少白，陈因菅原认识了退役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又因曾根认识宫崎弥藏、寅藏兄弟。宫崎寅藏（1870—1922），日本肥后玉名郡人。他的哥哥弥藏有志于中国革命，受哥哥影响，寅藏曾于1891年单身到过上海。1897年5月，经犬养毅推荐，并经首相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批准，接受了调查中国秘密结社的任务，曾和同学平山周到过澳门、广州等地。孙中山重抵日本，宫崎寅藏便偕平山周来访。经他们介绍，孙中山随后又认识了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不少日本知名人士。这些人政治面目各不相同。有的后台是日本军阀，如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内田良平；有的本身是工业资产阶级，如平冈浩太郎。他们当时都表示同情孙中山，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则是真诚地援助中国革命的，孙中山也一直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忠实朋友。依靠上述日本人士的帮助和掩护，孙中山得以居住下来，时在横滨，时在东京。

1897年冬，横滨侨商冯镜如等发起创办中国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孙中山替它取名“中西学校”。因兴中会里找不出合适的教师，陈少白想起他见过康有为、梁启超，便写信请梁启超代聘教员。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受教于康有为，自此即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康、梁把赴日任教看作扩展维新派势力的良机，派徐勤等前往，康有为并亲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徐到日本后，按照康有为的意思改了校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经常到校和徐等谈论时事。

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6月11日，应康有为等请求，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维新旨意。从这一天起，

至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这段期间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和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提出许多新政建议，大部分都经光绪帝诏准，其中主要的有：

政治方面：命大小臣工直抒谠论，准许士民上书；命各督抚保荐人才，诏选宗室王公游历外国；裁撤詹事府等闲散衙门。经济方面：令各省设商务局和农务局，振兴商业和农业，京师设矿务和铁路总局，着手筹办铁路；奖励制作新法，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京师及通商口岸设邮政局，等等。军事方面：用新法练兵，陆军改练洋操；筹款设海军，造兵轮；命各省举办保甲、团练。文化教育方面：废八股取士，京师设大学堂，各省设中小学堂，筹办矿务、铁路，海军等专门学堂；奖励创办学堂，命各地方改书院，废淫祠，设学堂；设译书局，开报馆；命各督抚劝禁妇女缠足；等等。

当康有为得到光绪帝信任的时候，觉得维新有望，不愿再和孙中山等发生关系，便写信要徐勤等与革命派断绝来往。徐等遵命惟谨，暗中制作了“不得招待孙逸仙”的匿名揭贴，拒绝孙中山再进大同学校。教师、校董事、横滨侨商等风闻康有为有做宰相的希望，纷纷倒向徐勤一边。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和他的兄弟冯紫珊等也逐渐挪动了脚跟。

横滨办学是和改良派合作的一次小尝试，其结果是革命派吃亏上当。

在大同学校创办之前，两派还在香港联系过。1896年2月，谢缵泰应友人之邀，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会见。10月，又会见了康有为。谢缵泰建议“在伟大的维新工作中必须联合与合作”。康有为提出了他的维新计划大纲。次年，谢缵泰、康广仁之间又进行过多次谈判，双方同意合作。但是，维新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扩张势力，排斥孙中山，改变兴中会的性质。谈判中，康广仁表示：“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像孙逸仙那样一些人使

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14] 谢、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898年7月，康广仁从北京致函谢缵泰，表示“急欲知道杨衢云的消息”。然而，9月21日西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通缉康、梁，重新临朝听政。康有为因事先得到光绪帝紧急催促离京的密诏，于政变前一日南下，故得脱险。梁启超也因得到日本使馆相助，经塘沽浮海东渡。清廷逮捕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维新志士，不经审讯即予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或遭囚禁，或被革职，尽予剪除。已经发布的新政诏令，陆续宣布撤废。维新运动完全失败了。

政变的发生为两派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前此，兴中会的活动已有所恢复和发展。除原有的檀香山、横滨分会外，1897年，陈少白、杨心如在台湾组织了台北分会。杨衢云在广州起义后，远走南非，沿途也建立了兴中会的分会。他于1898年春到达日本，找到孙中山，继续协力革命。孙中山还和日本友人一起积极支持菲律宾的反美独立运动。1898年10月，平山、宫崎分别将因政变而逃亡的梁启超、康有为护送至日本。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两派的合作，孙中山也燃起了争取他们转向革命的新希望。康有为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准备亲往慰问，托宫崎、平山致意。康有为自称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还，拒而不见。其后，经犬养毅斡旋，约孙、陈、康、梁等四人会谈。届期，康有为不到，梁启超自称为康的代表。这次会谈，详细地讨论了合作方法。数日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平山去拜会康有为。陈少白痛言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并说：“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15] 康有为则大谈其“今上”如何“圣明”，自己“受恩深重”，“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陈少白反复劝导：不应该受了一人的私恩，便死心塌地地向着他。但这时，康有为已经酝酿了一个以武力使光绪“复辟”的计划，陈少白的话完全听不进，只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末了则说：“我

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完全关上了谈判之门[16]。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一直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光绪帝的知遇之感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支持康有为的大隈内阁倒台，清政府又提出交涉，1899年春，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作欧美之游。到英国时，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他的“复辟”计划，未获议院多数票通过。7月20日，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英文译名则为“维新会”）。8月4日（六月二十八日），他带着当地华侨多人到域多利中华会馆庆祝“圣寿”，在龙旗摇飏中叩首如仪，遥祝光绪皇帝康健[17]。其后，保皇会遍及加拿大各处，又陆续发展到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等地，共建立总会十一个，支会一百零三个。康有为任正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成立，标志着康有为政治活动中反动性的一面开始日趋增长。

和康有为略有不同，梁启超一度表现了同情革命的倾向。

1898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横滨发刊《清议报》，以激烈的言词攻击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后党，同时吹捧光绪皇帝。据梁启超说，中国秦汉以来的君主都把百姓看成奴隶，“真能以子弟视其民者，则惟我皇上一人而已”[18]。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大体上仍以康有为作指针。1899年6月6日，经冯镜如介绍，梁启超和杨衢云在横滨进行会谈。梁启超表示，现在还不愿意合作，建议双方各自做好自党的工作。杨衢云把他对梁启超的印象写信告诉了谢缵泰，认为康党太骄慢，“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19]。谢缵泰接信后，宛如一盆凉水浇下来，自此打消了合作的念头。但是，戊戌政变毕竟增加了梁启超对清政府的愤懑，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少了一个牵制者，思想逐渐发生某些变化。这年夏秋间，他和孙中山往来日密，在信中说：“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

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20] 他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从国内召来林圭、范源濂、蔡艮寅（锷）、周宏业、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时务学堂旧生，又召来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梁启超自任校长，教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说。于是，校中诸生畅言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敦、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诸人自期。同时，经过多次协商，两派形成了一个合并的初步方案，拟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并起草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署名者为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等十三人[21]。为了实现两派联合，梁启超还赶到香港，和陈少白商量，推陈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不料徐当面赞成，背后却与麦孟华一起写信向康有为告变，称梁“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接到梁启超等人的劝退书，本已大怒，接到徐、麦信件后，立即派人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不许稽延。梁慑于严师之命，于12月20日登程赴檀。

行前，梁启超托孙中山介绍同志，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相信梁启超，写信将他介绍给孙眉和该地兴中会其他会员。抵檀后，梁加入了三合会，被举为“智多星”。他利用这一身份活动，声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包括孙眉在内的许多兴中会员都因此加入了保皇会，钟木贤还担任了该会副总理。梁启超自诩道：“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22] 何宽等少数人虽不为所动，但檀香山兴中会至此已不能成一团体。兴中会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之区。在和保皇派的合作中，兴中会又一次吃亏上当。

初时，梁启超还敷衍孙中山，告以他在檀香山所为，不过是“从权办理”，希望孙中山体谅他的境遇，保证“必有调停之善法”[23]。但事隔一月，他就向康有为献策：“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24]他积极动员华侨捐款，拟筹资百万，派人在两广运动会党，想抢在孙中山的前头，“借勤王以兴民政”[25]。不过，保皇派的军事活动，很少进展，在自立军失败之后，就全无下文了。

兴中会被破坏并不限于檀香山一地。在横滨，当保皇分会成立之后，冯紫珊、冯镜如都成了活动分子，兴中会只剩下十几个会员。尤列虽还掌握着由华侨下层群众组织的中和堂，但它并不能从事重大的政治行动。

兴中会主要建立在爱国华侨之中。华侨对国内情况了解不够，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而投身兴中会，但是对于革命和救国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却无深刻的认识。孙中山虽然坚定地主张走革命的道路，但他这时尚未认清改良派的本质，对梁启超“流质易变”的特性更缺乏警惕。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还在形成之中，它必然要为自己的年轻幼稚而付出代价。革命派和保皇党之间的严正斗争，还有待历史的发展。

二　自立军起义

除对梁启超之外，兴中会还通过毕永年和唐才常取得了联系。

毕永年（1870—1902），号松甫，湖南长沙人。维新运动时期，成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他与湖南、湖北一带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祐等关系密切，被封为龙头。戊戌政变前夕，他看到维新无法成功，跑到日本求见孙中山，加入了兴中会。

唐才常（1867—1900），号佛尘，湖南浏阳人。长沙岳麓书院

学生。与谭嗣同一起受教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因而成为好友。1894年，肄业两湖书院。中日战争失败，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强。1897年回湖南，参与维新活动。次年9月，他应谭嗣同电召，动身赴京，刚到汉口，政变就发生了。他哀悼死友，发愤举兵除奸，匆匆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日本。

在日本，唐才常会见康有为、梁启超，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同时又经毕永年介绍，和孙中山商谈合作，陈述了在湘、鄂、长江一带发动的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中山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26] 唐才常很高兴，表示愿约梁启超一起向康有为进言。

1899年春，孙中山派毕永年偕平山周赴湖南、湖北联络哥老会。毕永年化装成和尚，首先到汉口会见林圭。林圭（1875—1900），字述唐，别号悟庵，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他欣然接受了毕永年的邀请，三人一起入湘[27]，跑遍了长沙、浏阳、衡州等地哥老会山头，介绍兴中会宗旨与孙中山生平，劝说哥老会领袖与兴中会合作。孙中山听了他们的报告，便主张在湘、鄂、粤同时大举。同年秋，命陈少白去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并要他和郑士良等在港设立机关，专事联络广东三合会。香港方面稍有眉目，毕永年等便再入两湖联络。11月，他带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七名哥老会龙头到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宫崎及三合会大佬集议，商定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一个大的反清团体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为此，杨衢云应孙中山之请，辞去了兴中会总办职务[28]。其后，毕永年带着李、杨、张等哥老会头目往日本见孙中山，受到诚挚的招待。孙中山让他们回国候命。12月他们路过香港，经济上感到拮据。当时，康有为也正在香港停留，企图拉拢这几个哥老会头目，便送给他们一笔钱。李云彪、杨鸿钧等本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经常以会众为资本，与各方面拉扯。他们接受了康有为的赠款，随即投到保

皇党门下。这件事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写了一封信给平山周，声言“支那久成奴才世界”，“实不耐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决意“皈命牟尼”，真正当和尚去了[29]。兴中会和湘、鄂哥老会的关系因此受到削弱。

在与孙中山商谈合作之后，唐才常也于1899年春回到国内。3月，他到上海编辑《亚东时报》。同年秋，再赴日本。他周旋于两派之间，“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30]，企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当时，林圭已应梁启超之召，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唐才常便邀请他和湘籍同学秦力山、田邦璿、蔡钟浩等回国相助。湖北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等也都表示愿意参加。1899年11月，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东京红叶馆为唐才常、林圭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等出席。双方把酒畅谈，举杯共祝，两派谈判合作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融洽的气氛。席后，林圭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把在汉口的关系——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了他。

唐才常到上海后，参加了士商各界反对西太后“建储”的活动。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召集王公、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集议，准备废光绪，改立端王长子溥儁为帝。同日，光绪发布上谕，自称“痼疾在躬”，经“叩恳圣慈”，决定封溥儁为皇子，“以为将来大统之归”[31]。这一行动遭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汉族大官僚及以资产阶级上层为主的各界人士的反对。1月27日，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32]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33]。这是上海上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一次联合行动，它成为后来许多类似行动的先导。

就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唐才常利用日人田野桔次名义，组织东文

学社，以此为掩护，秘密筹组正气会。他亲自起草序文，一方面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又说："夫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34] 既要排满，又要"忠君"，既不愿意"低首腥羶"，又割舍不下光绪皇帝。唐才常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企图调和革命、保皇两派的关系，而他本人的思想也确是非常模棱和矛盾的。

唐才常的态度首先遭到了毕永年的反对。毕在哥老会头目变节之后虽然愤而为僧，但他终不能忘情现实，又跑到上海，力劝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唐不从，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失望而去，便南下广州，联络广东各地会党[35]。

唐才常等人当时的政治口号是"自立"。为了确切地表现这一意义，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称自立会。6月，中国局势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府对外"宣战"。唐才常觉得时机已到，便又将自立会改称国会，以便公开活动，号召全国。7月26日，他邀请上海名流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吴葆初、叶瀚、宋恕、沈荩、张通典、龙泽厚等八十余人，集会于愚园。会议由叶瀚主持，宣布会议宗旨为：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合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会议并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29日，第二次集会于愚园，出席者六十余人，选举叶瀚等三人为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汪康年、丁惠康、吴葆初、孙宝瑄等十人为干事[36]。

国会由容闳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大意谓："中国自立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37] 义和团运动有其落后性，但它本质上是中国人民的一次

反侵略运动。唐才常的“国会”呱呱坠地时就宣布自己站在这个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获得下层群众的支持。

国会内部也并不统一。成立刚三天，章炳麟与唐才常之间就争执起来。章向唐指出：“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38] 他毅然割掉辫子，改穿西服，宣布脱离“国会”，“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他随即写下了《解辫发》等文，寄交香港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旬报》发表。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原在杭州诂经精舍随经学家俞樾读书。1895年受维新运动影响加入强学会。1897年任上海《时务报》撰述。1898年又任上海《昌言报》主笔。戊戌政变后亡命台湾。1899年至日本，经梁启超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同年秋归国，结识唐才常，参预《亚东时报》编务。割辫之举是他转化为革命派的标志。

当唐才常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政治活动的时候，林圭则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军事准备。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多，毕等在香港推孙中山为兴汉会总会长，他是拥护的；孙中山委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他也表示“甚善甚善”[39]。1900年1月26日，他致函去港联系的容星桥，催促容与孙中山早订起义计划。信中说：“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此我辈实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40] 他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机关部，模仿会党散发票布的办法，广泛散发“富有票”；又在汉口、襄阳、沙市、岳州、长沙等地设立旅馆，招待往来会友。经过一段时期经营，联系了湘、鄂、皖、赣各省的哥老会头目，形成了一支以会党和张之洞所辖驻汉各军下级官佐和士兵为基干的军事队伍，称为自立军，共分七路：

前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大通，统领秦力山、吴禄贞。

后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安庆，统领田邦璿。

左军，起义地点为湖南常德，统领陈犹龙。

右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新堤，统领沈荩。

中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汉口，统领傅慈祥、林圭[41]。

另两路为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

按原约，起义所需款项由康有为，梁启超接济，但实际上仅华侨富商邱炜萲汇到若干，不足以应付各路催款者的需要。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投到保皇党名下就是为了钱，这时因所索不遂，带头离去；辜鸿恩、李和生则改发贵为票和回天票，另开山头。起义还未开始，唐才常所依靠的会党队伍就已经四分五裂。

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后局势变化急剧，林圭敦促唐才常到汉口发动。8月初，唐才常到达汉口，通过日本人运动张之洞，告以自立军将拥护他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当时无表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和刘坤一等虽然一起抗拒了清朝政府的“宣战”上谕，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东南互保”，但他本质上对清政府仍然是忠驯的。唐才常把起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洋务派官僚身上，自立军的前途不问可知。

起义日期原订在8月9日，因康、梁的汇款未到延期，但这一消息未能及时通知远在安徽的秦力山。8月7日，桐城地区的会党宰牲祭旗，准备起义，被清吏发觉，急忙向安徽巡抚王之春告警。两天后，秦力山下令起事，宣布“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同时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请光绪帝复辟”等宗旨四条；“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等法律九条[42]。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大通，并击沉王之春派来剿办的炮艇八艘。8月11日，清军援兵继至，秦力山挥兵力战，因寡不敌众，败退九龙

山。不久，探悉汉口方面失事，便解散所部，辗转逃往国外。

8月21日，张之洞照会汉口各国领事。次日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等处，先后逮捕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傅慈祥、黎科、蔡成煜等二十人。审讯时，唐才常供称："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43] 其他人也齐呼速杀。当夜，唐才常、林圭等均被害。其后，张之洞又大兴党狱，残杀百余人。

汉口方面失事之后，沈荩急率新堤右军发动。湖北崇阳、监利等县纷起响应，但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结果全师溃败。湖南方面，汪镕等原与唐才常、林圭等有约，计划同时发动。湖南巡抚俞廉三从张之洞处获得消息，大肆逮捕，被杀者有唐才中、蔡钟浩等百余人。

自立军以"勤王"为号召，但它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准备建立"新造自立之国"，这就使得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勤王，而是维新派以武力开辟政治道路的一次尝试，也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

血的教训能洗清人们的眼睛，振奋人们的斗志，使柔者变刚，弱者变强。自立军的参加者在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后，大都踏上了革命的途程，成了坚决的革命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立军起义是革命和保皇之间的一个转折点。

第三节　惠州起义与洪全福起义

一　惠州起义

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全部活动，仍然是为着准备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

孙中山同唐才常商议过联合举义，但他估计康有为性情固执，必多掣肘，并未寄予过多希望，而把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广东方面，依靠兴中会及其所联系的力量。

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成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陈少白任总编辑。同月，杨衢云自横滨到香港参加起义筹备。总机关就设在报社三楼。其间，郑士良已经联络了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梁慕光等，正在等待命令。4月，杨衢云返日，向孙中山报告准备情况，请示方略。随后，郑士良也接着赶来，拟和孙中山面商。

自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孙中山就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北方的局势，待机发动。约在5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认为中国局势危急，应使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告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N．A．Blake）同意后，向陈少白献策，请港督出面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的幕僚刘学询也为此在孙、李之间拉关系。刘和孙中山同乡，在给孙中山的信中，他声称："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44] 孙中山虽对李鸿章能否有此"魄力"持怀疑态度，但认为不妨一试，同时，也不放松起义的准备。在这期间，孙中山会见了法国驻日本公使哈蒙特（J．Harmond），向他说明了推翻满清政府的计划，要求法国能给予军械和军事顾问方面的援助。孙中山允诺，一旦革命成功，将容许法国在华设立租界和租借地。哈蒙特向孙中山表示，法国政府深盼能扩大在华南的利益，但是，清政府是得到法国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法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原有政府的地位和秩序。倘若孙的革命一旦成功，法国政府当乐于承认。他写了一封信，介绍孙中山与法国驻安南总督韬美（P．Doumet）相见[45]。6月11日，孙中山偕郑士良、杨衢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自横滨启程。舟中，宫崎自荐愿去新加坡说服康有为，使他"复建共和之旗帜，握手协力"，得到众人赞同[46]。17日，舟抵香港海面，李鸿

章派兵舰来迎。因传闻李的僚属有借机逮捕孙中山、杨衢云的计划，孙中山便派宫崎、清藤、内田三人前去谈判，自己乘船迳赴西贡。过港时，在一只小舟中和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议定由郑士良率会党领袖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

宫崎等过船后，被接到广州刘学询私宅，当夜就进行了谈判。刘学询称，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李鸿章不便有所表示，但同意借款六万元，先付一半，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谈判结束，宫崎等即转往香港，接受了刘学询之子交来的三万元现金。随后赶赴新加坡，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是行刺，避不见面，并向殖民当局控告。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

孙中山于6月21日抵达西贡。但是，韬美并没有和他会面，只让随从人员表示：法国殖民当局乐于见到中国内政有所改善，但以不引起革命和骚乱为原则[47]。孙中山在西贡停留期间，得到宫崎被捕的消息。7月9日，赶赴新加坡营救。12日，宫崎等出狱。英国殖民当局规定，孙中山、宫崎等五年之内均不准入境，孙中山等重返西贡。16日，孙中山等一行自西贡抵达香港，对登轮来访的香港官员说："我们同党现正努力以颠覆北京政府，我们将在中国南部建立一新政府。"并称："我已放弃与康有为协力商讨当前局势的想法。"[48] 宫崎入狱事件使孙中山与康有为合作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在孙中山一行抵港之前，香港总督卜力曾将孙中山、李鸿章的合作打算报告英国首相，要求允许孙中山在香港登陆。但英国首相坚持香港政府以前对孙中山宣布的驱逐令仍应有效。这样，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他将惠州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命毕永年掌握哥老会[49]。派日本人远藤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

准备去台湾筹备饷械，待适当时机潜入内地指挥。

当孙中山等滞留香港舟中的时候，李鸿章也正在香港停留。7月8日，清政府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7日，李鸿章抵港，拜会卜力。卜力重申前议，要李鸿章留下来实行所谓“两广独立”计划，并拟安排孙、李见面。李鸿章坚决不允，只表示“视时局趋势徐徐解决”[50]，次日离港北上。

两广独立计划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半殖民地中国的独特产物。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都企图利用当时的复杂局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局势又仍在急遽发展，老奸巨猾的李鸿章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

7月20日，孙中山偕宫崎返日。次日，何启通知谢缵泰等人说：卜力支持在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51]。这以后，曾由孙中山领衔，杨衢云、郑士良等署名，致书卜力，要求英国政府“助力”，“改造中国”，内附《平治章程》六则，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设想。其内容有迁都于适中之地，于都内设中央政府，各省设自治政府，立议会，公权利于天下，增添文武官俸，平其政刑，变科举为专门之学等[52]。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出亡。同月25日，孙中山偕平山周、内田良平登轮离日，潜赴上海。他企图利用这一特定时机，以容闳为首领，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康有为等，以江苏及两广等省为根据，宣布独立，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中国北方发展，推倒清朝统治[53]。28日，孙中山抵上海，和刘学询在船上举行了会谈，没有结果。当时，正值唐才常等被捕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命令各地严缉新党，孙中山无法在上海活动，于9月1日与容闳同轮离沪。

上海之行虽然无成，孙中山仍不愿失去时机。9月25日，偕内田良平、山田良政等赶赴台湾。抵台后，托平山周带交刘学询一函，要他筹款百万，资助起义。函中写道：“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

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54] 表现了满腔的忧时爱国之情。当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根据日本政府指示，企图乘列强瓜分中国之机，霸占福建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因此他表示“赞成”中国革命，命民政长官与孙中山接洽，许以起义后设法相助，企图借中国革命者达到自己的目的。孙中山不了解儿玉的阴谋，他将购得的军械储存在台湾，准备内运；答应前往助战的日本退役军人，也集中于此。

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

郑士良入惠州后，就选择了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作为根据地。三洲田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于周围农村之中。他集中了六百名精壮，但武器弹药不足，军粮又日渐匮缺，只好将所部分散，仅留八十人守大寨。可是起义风声已渐传出，粤督德寿命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部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部驻淡水、镇隆，对三洲田取包围态势。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速接济。孙中山复电称，筹备未竣，暂时解散。起义将领认为敌军不足惧，续电孙中山表示，将沿海岸东上，仍请设法迅速接济弹药。孙中山再次复电称：“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55]

在孙中山的复电还未到达三洲田军中的时候，清军何长清部二百人已经进驻新安县沙湾，哨骑达黄冈，逼近三洲田。起义军迫于形势，只能发动攻击。6日晚[56]，黄福率八十人夜袭清军，阵斩四十人，生擒三十余，初战告捷。黄福并拟于天明时乘胜追击，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人会攻新安。正在这个时候，郑士良自香港携孙中山第二次复电至，于是全军改道，往厦门方向前进。江恭喜部不及集合，迅速涣散。

其后，郑士良接替黄福的指挥职务，率六百义军避开何部主力向镇隆前进，清军邓万林部千余人扼险而守。起义军在平山、龙冈间召

得千余群众，于10月15日奋勇攻山，诛守备严某，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某，夺得大批枪支弹药，革命军再次告捷。同时，梁慕光等也在博罗集中起义军响应，千余人直扑博罗城，另以小部攻惠州府城。因惠州坚守，援敌迅集，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散入乡间。

至此，江恭喜部未能发动，梁慕光部又没有取胜，郑士良部已经成了孤军。清军集众万余，全力进攻。但郑军一路秋毫无犯，受到乡民欢迎，投军者数千人。10月17日，在永湖与清军五六千人遭遇。义军仅洋枪千余，以少胜多，提督邓万林中枪堕马，狼狈逃命，革命军第三次告捷。10月20日，又在崩冈墟第四次告捷。次日，军次三多祝，投军者益众，兵员达二万余，宿营白沙。这时，义军枪支弹药已近竭绝。

孙中山于接得起义军将沿海岸东上的电报后，即急速筹集武器弹药。他一面致电宫崎，令将原先向菲律宾独立军借定的枪枝，速送惠州；一面向儿玉接洽，请其协助武器弹药。但是，由于日本政客的贪污混骗，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所存的军械全是废品，无法使用。日本政府这时已发生了更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奉行保全清政府以作其代理人的政策，禁止台督帮助革命党人，并禁止武器出口。这样，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的希望完全没有了。

山田良政奉孙中山之命，由香港潜往白沙大营，告以“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57)]，要郑士良自行决定进退。起义军得到消息后全军激昂，郑士良当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沿海岸退出，渡海返三洲田，设法从香港购取弹药，然后会合新安、虎门义军，以攻广州。于是，起义军解散，仅留洋枪手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回到三洲田。他们想袭击深圳、横冈的清军，但是饷弹殆尽，只好在11月7日解散。山田良政在归途中遇害。郑士良等逃至香港。大批起义将士流亡海外。

惠州方面既失败，广州方面的起义计划也随之流产。

广州方面的发动人是史坚如（1881—1900），他原是官僚家庭子弟，因愤于清廷丧权辱国，拒绝改革而投身革命。为了筹集起义经费，他和哥哥史古愚卖去了各自的一份家产。原订夏历七月某日起事，因军械未至改期。这时三洲田已先期发动。为了解除三洲田起义军受清军夹击的困境，史坚如决定铤而走险。他在督署近旁租定一所房子，由邓荫南运来炸药，想炸毙德寿。10月27日，他连夜挖地，安置好炸药引爆设施，燃香施放，但是药线没有点着。28日晨，他再次燃香，外出观察。果然一声轰响，震坍督署后围墙十余丈，德寿自床上抛出堕地。史坚如于次日前往码头时被捕，11月9日被害。

惠州起义爆发在义和团运动遭到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的时候，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紧张活动，为这次起义添加了丰富的色彩。兴中会勇敢的武装起义表明，在挽救当时祖国危亡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是一支坚定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还不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在孙中山亲自布置的反清武装起义中，惠州起义历时最长。兴中会利用三合会的力量组织起义，使起义获得良好的群众基础。起义的指挥者郑士良既是革命党人，又是会党领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他以这种身份领导起义，保证了起义军指挥的统一。这次起义原定的正军在广州，惠州只是旁军，但是正军像1895年一样没有结果，旁军却很快有所发展。此后，直到1910年春节的广州起义前，孙中山没有再布置夺取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能说与惠州起义的经验没有关系。

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军械问题，而这次的军械问题却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兴中会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轻意地把夺取胜利的重要准备即军械的供给，寄托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上，因而打乱了起义的计划。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还同样反映在争取法国援助和广东独立问题上。兴中会领导人的这种幻想，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的表现。以后，他们在对待诸如此类的具体

问题时，手段虽已老练得多，但这一根本弱点仍然危害着他们的事业。

惠州起义后，1901年1月，杨衢云被广东当局雇人刺死于香港。杨衢云对兴中会的事业有重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在革命成功后保留帝国，首先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并为此而奋斗至死。对于他的功绩，孙中山始终感念不已。8月，郑士良又在港暴卒。1902年1月，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已经受到严重摧残的兴中会又丧失了几位重要的活动家，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澳洲华侨谢缵泰却仍在努力，试图组织一次新的进攻。

二　洪全福起义

在兴中会会员所组织的历次起义中，洪全福起义是一次和总会没有联系的独立行动。

起义的发动人是谢缵泰。谢缵泰（1872—1937），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出生于澳大利亚。父亲谢日昌，是雪梨泰益出口商店的老板，哥老会的前辈。在谢缵泰还是个少年的时候，谢日昌就向他灌输了强烈的反清思想。1892年谢缵泰在香港参加辅仁文社。1895年加入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任英商祺昌洋行买办。1899年结识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洪全福原名春魁，1836年生，随洪秀全转战各地，被封为瑛王。太平天国失败后逃亡香港，在洋船上当厨工多年，后悬壶行医。谢缵泰结识洪全福后，企图借助于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组织力量，第二次攻夺广州，以“执政”的名义建立“联邦”式的政府。他认为，“共和国政体”对中国来说太先进了[58]。1900年初，兴汉会成立，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谢缵泰认为孙中山“篡夺”了杨的职务，拒绝参加孙中山正在日本酝酿的一个革命组织，决定独立行动。同年2月9日，在广州散发“解放、自由与维新”的传单，作为攻夺广州之前的一次试探性行动。

这年3月末，容闳路过香港。谢缵泰、容闳及杨衢云之间进行了几次密谈，讨论联合与合作问题，容闳也认为孙中山“太轻率了”[59]。4月初，容闳乘船赴美，谢缵泰写信劝孙中山在日本会见容闳。其后，他并向杨衢云建议，推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901年9月，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集议。洪全福主张筹款五十万，召集广东、香港的洪门兄弟起义。李纪堂刚接受了父亲的百万巨额遗产，慷慨承担了全部军费。他并提议，事成后推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计划确定，谢缵泰、洪全福分头准备。谢的主要工作为争取国际援助和进行舆论宣传。他先后联系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G．E．Morrison）、《香港日报》编辑肯宁汉（A．Cunningham）、《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H．Reid）、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保证。莫里逊表示：“我的支持就意味着《泰晤士报》的支持，而《泰晤士报》的支持则意味着英国人的支持。”[60] 1902年6月9日，在肯宁汉帮助下，谢缵泰起草了宣言和向列强的呼吁书。

谢缵泰起草的宣言和呼吁书至今尚未发现，但是，流传下来的几个文件却揭示了谢的部分主张和观点。这就是《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檄》、《申明纪律告示》、《安民告示》、《四言安民告示》等。为了发动会党，谢缵泰打出了“大明顺天国”的旗号。文件揭露了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指斥了辛丑和约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赔款交通，民悲避债无台。”[61] 文件也包含着旧式会党所不可能具有的民主主义内容，如《申明纪律告示》称：“本将军宗旨，系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62] 谢缵泰这时的思想介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这一点，使谢缵泰区别于孙中山，而接近维新派，但是，“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这一点，又使他区别于维新派。

洪全福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进行军事准备。他于这年夏天在香港、广州设立了革命机关。香港机关托名和记栈，广州机关则以洋货店、肥料厂、信义公司等名目为掩护。向例，每逢夏历元旦天未明时，广州文武官吏都要齐集万寿宫行礼。洪全福即准备于此时军分五路，纵火为号，炸毁万寿宫，焚烧火药库，占领军械局及各衙署，宣布推翻满清的革命目的。同时，发动惠州会党响应。

10月16日，谢缵泰和父亲讨论了洪全福的起义筹备情况，认为基本就绪。19日，谢缵泰通知《德臣西报》编辑黎德和肯宁汉二人，要他们准备“革命的来临”[(63)]。11月2日，谢缵泰在香港各报发表文章，主张消灭中国的“奴隶制”[(64)]。6日，收到容闳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一方面，我自己作好准备，另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容闳要求将暗号和密码寄给他[(65)]。12月24日，肯宁汉为谢缵泰秘密印刷了“独立宣言”。27日，洪全福和谢缵泰的弟弟谢缵叶进入广州，八个有关的军事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议。随后，洪全福回港报告了拟于除夕（1月28日）发动的具体计划。1901年1月25日，洪全福、谢子修再次进入广州、准备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清政府广东当局勾结香港殖民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

起义所需枪械是由李纪堂出面向广州陶德洋行定购的，预交订款十数万元。洋行方面企图吞灭枪款，便向粤吏告密。洪全福等动身不久，广州方面便派人引导港警搜查和记栈，拘捕留守人员并搜出军械、旗帜、会党册籍多件，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洪全福仍然企图补救，他命在澳门的同志装载枪械，以煤炭掩盖，火速运往广州。驶至香山时，即被拦截。同时，梁慕光向沙面洋行密购的快枪二百杆也被清兵发现。粤吏搜索起义军设在广州的机关，逮捕二十余人。洪全福剪掉胡子，化装逃走。

事后，梁慕信等十余人被害。谢缵泰父子因失去信心，解散了已

经组织起来的国内力量。3月11日，谢日昌因忧愤逝世。4月，谢缵泰决定听任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自由行动”[66]，自己则创办《南华早报》，不再致力于武装斗争。

导致洪全福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还是军械问题。李纪堂等寄希望于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开办的洋行，以为它会恪守贸易原则。他们不懂得，此类洋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据点，是完全不能信赖的。

洪全福起义是兴中会会员组织的最后一次起义。直到同盟会成立后，由于萍、浏、醴之役的带动，才出现新的武装起义高潮。

第四节　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情况，除了根源于此时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外，还明显地同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知识阶层。它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而又服务于上述事业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职员、医生、记者、编辑、著作家、翻译家等类人组成，是中国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政治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因这一社会阶层的兴起而得到发展，但获益最大的，还是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弱小到强大，从海外到国内，并造成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一　留学生和流亡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还在十九世纪末年，日本就已经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和中国政治犯逋逃的渊薮。清朝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较派向欧美各国要晚。其后，逐年增派，人数迅即跃居留学各国学生的首位，

但在1900年以前，也还不满百人。留学生基本集中在日本国都东京。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一派革命志士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维新志士，人数更少，都在旅日华侨最多的横滨活动。

政治思想开放的留学生对孙中山、梁启超都很景仰，优游于二者之间，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梁启超倚仗着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名声，又凭着办有《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俨然是进步学生的盟主。他的一派人对后党“伪政府”的无情揭露和对民主主义的宣传，也确实在启发着青年学生们的觉悟。孙中山一派人则没有积极主动地在留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同学生们的联系面比较狭窄。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与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创办油印刊物《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三人分别改号自立、自由、自强以表明志向。1900年，该刊改为铅印，随《清议报》附送，孙中山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受孙中山的影响，《开智录》中出现了“排满”字样，影响到保皇会的会务，于1901年春被梁启超等强迫停刊。1901年春，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李白重、王宠惠等因传说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朝政府宣告独立，吸引了不少留日华侨入会。孙中山积极支持这一举动，郑等常到横滨前田桥孙宅讨论进行方法。广东独立的主张与梁启超一派人的主张并不冲突。次年，欧榘甲即化名太平洋客，在旧金山《大同日报》上连载《新广东》一文，也主张广东独立。可是，由于郑贯一经常出入孙中山之门，还是被解除了在《清议报》的职务。孙中山将郑介绍到香港《中国日报》去任主笔。少数广东学生虽然接受了孙中山的影响，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政治趋向尚未转移。

当时，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的春天。励志会的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但由于负责人热心政治，会员得以借此交流政见。励志会的活动人物，如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沈云翔等都非常激进，积极主张改革中国政

治，不少人还提出要排满。1900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在此前后，会员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黎科、傅慈祥、蔡成煜、郑葆晟、吴禄贞等还先后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他们都深为此行能同时得到梁启超、孙中山的首肯而自喜。但是，当回国“勤王”而幸存的学生作为新的政治流亡者返回日本时，励志会和留学生的政治状况就不一样了。曹汝霖、章宗祥、吴振麟、王璟芳等变为稳健派，凡遇政府派官员到日考察，都为之翻译、引导，日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分子则鄙视他们的堕落，目为官场走狗，两派势如水火。但是，更为深刻的分化却在于激烈派分子在革命和保皇之间进行了抉择。

1901年5月，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在东京发刊《国民报》月刊。秦力山（1877—1905）名鼎彝，号巩黄、遯公，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他是个秀才，拥护变法运动。1899年赴日入高等大同学校，曾任《清议报》编辑。大通起义失败后，逃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因自立军经费问题，愤然与康绝交。他又到横滨找梁启超，梁已为逃避自立军将士的责难他去，秦便跑到东京办起《国民报》来。戢翼翚也是跑回日本来找梁启超算账的。沈云翔则以返日后写的《复张之洞书》著名，这篇长文反驳了张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对自立军的污蔑，赞颂革命、流血，倡导自由、平等。秦力山自任该报总编辑，参与其事的还有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诸人。《国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独具特色。《国民报》明确地同保皇党划清了政治界限，它指责侨居者中“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它还指责康有为说：“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其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

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67] 该刊第四期还发表了《正仇满论》一文，指名批驳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正仇满论》是革命派最早的一篇正面驳斥保皇谬论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尚在国内的章炳麟。

秦力山等在发刊《国民报》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国民会，《国民报》社则作为其活动机关。国民会以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它宣布：“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68] 国民会预定的活动方针是“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69]，也就是说，在国内外掀起革命运动，因此，它规定要在国内各省、府建立组织。

国民会的一部分人也和孙中山产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刊物上对他加以攻击。譬如说孙中山“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70]。这一派人以戢翼翚为首，他们对孙中山发动革命之用心的攻击是错误的，为此，秦力山经常调护于二者之间。然而，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必须在国内开展并解决问题，却是正确的积极主张。《国民报》于8月份出刊后即停办，大部分人回国重振旗鼓，显然与这种矛盾和这种主张有关。杂志停刊后，国民会也随之解散了。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孙中山横滨寓庐中，学界人士的踪迹日益增多。钮永建拜会了这位“海贼”后，回去对吴稚晖赞叹说：“像一个书生，他的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71] 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的印象正在扭转。经常领着学界人士去见孙中山的，除冯自由、程家柽之外，还有秦力山。1902年2月，秦力山引章炳麟前往拜访。章在自立军失败后也被通缉，避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72]；又因放言高论受到江苏巡抚恩寿的注意，只好再往日本，应梁启超广智书局编译之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军乐声中将两人引入中和

堂，会饮定交。此后，经常一起讨论土地制度等问题。

1902年4月，章炳麟联合秦力山、朱菱溪、马君武、冯自由、王嘉榘、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夏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即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在东京举行。十名发起人中，除章太炎、陈犹龙外，均为学生；除冯自由外，均曾参加过维新运动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他们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声称，明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共同缅怀明末抗清斗争：“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会期前一日，日本政府应清朝公使蔡钧之请，命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警视厅传询了纪念会发起人。章炳麟长衣宽袖，侃侃而谈，回答了日本警长的询问：

“诸君是清国何省人？”

“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

“士族，抑平民？”

“遗民。”

简短的回答表露出强烈的反满情绪。次日，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赴会，均被日警阻止。孙中山是纪念会的赞成人，他率领十多名华侨由横滨赶来，得知情由后回横滨补行了纪念式，章炳麟等发起人均应邀参加。梁启超本来也是赞成人，但他于会前即致函章炳麟表示：只可心照，不必具名。梁此时在办《新民丛报》，仍然和革命党人往来。东京之外，香港《中国日报》先期刊登了宣言书，届期，陈少白、郑贯一等举行了纪念式。

《国民报》、国民会的发轫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都是以抛

弃了改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这一情况说明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事实证明，在摆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错误政治倾向时，从反面得来的惨痛教训，往往比从正面接受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大。正是保皇、改良没有出路的痛苦体验，使秦力山、章炳麟等人成了倡导革命并与保皇党斗争的急先锋。

不过，还应当指出，同样是皈依于革命大纛之下，《国民报》、国民会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前者的民主主义精神是透彻的。它继承了改良派宣传家对民主主义的宣传，而又加以纯净化；花在谴责“民贼”上的功夫，比花在谴责“满酋”上的功夫更多。后者以反满复汉为思想武器，完全缺少近代的民主主义的语言。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却是后者引起的震动较前者要大。许多寻求救亡之路而又主张革命的人们，怵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宁愿去接受那种看来是最简单的口号和最便捷的手段。

《国民报》的创刊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使旅日华人的政治活动中心由横滨转移到了东京。

1902年2月21日（夏历壬寅年正月初三日），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新年恳亲会，到会学生274人。随后，成立了清国留学生会馆，地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这一年在会馆登记的学生人数达到451人。清廷派出学生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但广大青年争往日本，却多数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是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国家，加以离中国近，生活费用低，便成为忧国之士的理想去处。“自庚子以来，凡忧时之士，每伤国势之凌夷，莫不东望祝曰：‘愿留学者之日多而学之速成也。’”[(73)] 革命派在留学生身上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吴禄贞在留学生会馆成立会上把该会馆比喻为美国费城的独立厅。留学生一时被社会舆论称为“新中国之主人翁”。不仅官方派留学生，社会上也动员青年前往，有些地方还为游学者办有招待所、介绍所、补习班、预备科等组织，号召游学的宣传不断见诸报纸、刊物。一股游学热形成

了，大批青年源源东渡。

在留学生学习的学科中，军事是个热门，官方为兴办新军派人去学军事，革命分子为掌握军事技能和谋取军权也想学军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其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者在留学生中比例很大。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1902年夏，江苏等省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蔡钧拒绝保送。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二十六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二人。8月5日，东京警视厅以“妨害治安”罪宣布遣送二人回国。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濠自沉，预先准备好的绝命书说：“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因河水不深，遇救。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江阴南菁书院高材生，举人，拥护变法维新，先后任教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广东大学堂，这时率广东留学生赴日，正在东京。他的绝命书虽然“词气之间，还忘不了忠君爱国”[74]，却得不到蔡钧的谅解。8月12日，学生秦毓鎏、张肇桐等认为蔡钧勾结日警的行为丧权辱国，上书蔡钧并到使馆抗议，也被日警拘留。随后，留学生全体集会，一致决议声讨蔡钧。

成城入学事件的风潮并不算大，但它是留学生集体政治行动的开端。公使的压制激怒了学生们，胡汉民等愤而归国；少数激烈分子则酝酿组织团体。1902年冬，叶澜、董鸿祎、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了一个组织，他们原拟仿照意大利独立前的团体“少年意大利”，取名“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注意，定名为“青年会”，仍旧含有“少年中国”的意思。青年会的会约第一章，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75]，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参加发起者还有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嘉榘、嵇镜、钮瑗、吴绾章、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潘赞化、陈由己、金邦平等。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没有多少政治经历、更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身份。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脱颖而出，说明资产阶级革

命派的队伍开始获得了新鲜血液。

原先的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因为稳健派、激烈派的冲突早已无形解体，青年会在留学生中取代了励志会的地位。1902年11月，湖南留学生杨笃生、梁焕彝、樊锥、黄兴等编的杂志《游学译编》创刊。同月，浙江留学生成立了浙江同乡会。随后，各省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许多省的同乡会都准备发刊杂志，不少青年会会员被选为干事、编辑员，在各同乡会及其刊物中起着骨干作用。

1903年1月29日（夏历癸卯年正月初一日），东京中国留学生照例举行新年恳亲会。清贝勒载振、驻日公使蔡钧与会。会上，马君武、刘成禺先后发表“排满”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76]。两人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赢得了热烈掌声。清宗室长福起来辩驳，被学生们呵止。当初未能在支那亡国纪念会上喊出的声音，而今意外地在满族亲贵和官吏的耳边响起来了。马、刘二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他们这一行动，曾受到孙的启发[77]。事后，刘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不准入士官学校，马君武也被迫返国。但是，他们演说的影响却不是任何处分可以消除的。

新年演说之后，东京留学界愈形活跃。

1903年1月至3月，又先后出现了《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留学生主办）、《浙江潮》、《江苏》等几种刊物。它们毫无掩饰地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用激烈的语言，激励留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

远处异国的留学生，对祖国遭受列强的欺凌痛心疾首。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都会刺激这群充满强烈的爱国心和自尊心的人们起来抗争。

2月10日、11日，日本报纸《日本新闻》、《国民新闻》分别揭载关于大阪博览会人类馆的消息，说该馆已雇定支那等七种人表演风

俗习惯，以供观览。学生们闻讯后，认为将中国人同未开化的种族、已亡国的种族并列，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于是，留学生会馆干事集议，起草《呜呼支那人！呜呼支那人！》一文，报告各处，激起各处旅日华人抗争，大阪侨商也进行抗议，终于迫使博览会主持者撤销此举。

3月12日，秦毓鎏、蔡文森等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中。台湾省当时为日本所霸占，他们认为："此必日人狡诡，以吾福建为彼势力范围地，故以出品置此"："此而不争，则日本谓吾国人可欺，真欲实行其志不难矣！"[(78)] 经过激烈交涉，终将这些产品迁出。

3月26日至4月14日，弘文学院发生退校事件。该校发布新规则，在经济上对学生无理苛索，学生交涉无效，有五十二人出院。几经交涉，校长嘉纳被迫让步，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的干事才举行会议，决定复课。

4月13日，成城学校学生刘鸿逵受到日军大尉西乡的侮辱，队中长官拒绝处分西乡，在校中国学生愤而停课，终于迫使西乡向刘鸿逵和清国留学生总监督谢罪。

4月23日，成城学校举行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其中独缺中国龙旗。中国学生指出："此虽小事，轻我殊甚。各国皆有，而我独无，是明明不齿我于诸国也。"[(79)] 一致决定抵制运动会，并阻止中国人前往参观。校方无法，终于挂出了中国国旗。

上述事件说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热烈的程度，只要点燃，它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光焰，就会焕然爆发。

二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

1900年前后，兴中会会员曾经在上海和内地有过活动，但除了会

党外，他们同各阶层民众联系甚少，同知识界的关系更浅。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凡是有一点西方文化知识而又主张进步改革的人，都被笼统地目为“新派”（或“新党”）。在戊戌年间崭露头角的维新志士依然是新派人物的带头人，他们虽屡受摧残，但在上海等地仍有立足的地盘和社会影响。当时，除了像章炳麟这样绝无仅有的几个主张“辨夷夏，讲尊攘”的人之外，还没有革命派的名目。

1901年3月15日、24日，为抗议沙皇俄国妄图霸占我国东北，上海士商两次在张园集会抗争。首次参加者二百余人，第二次参加者近千人。汪康年、温宗尧、蒋观云、薛仙舟、孙宝瑄、陈锦涛、黄宗仰、薛锦琴等发表了演说，汪德渊、吴葆初等发表了书面演说。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和地方督抚，请求“力拒俄约”。杭州士商也于3月18日聚议拒俄，上书要求浙江巡抚会同各省督抚电奏力争，具名者有邵章、汪熙、孙翼中、陈汉第（仲恕）、陈敬第（叔通）等人。发动这次拒俄斗争的核心人物是维新派名流汪康年、孙宝瑄等人。汪康年此时所办的《中外日报》，是国内维新派的喉舌，颇敢抨击时政。张之洞指责张园集会“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80)]，是深知汪等的政治背景的。不过，就在此前后，浑一的新派人物在国内政治形势刺激下逐渐发生了分化。革命意识开始在青年学生和一部分原先拥护变法维新的人士中萌发。

1900年下半年，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头、二班学生愤于北京沦陷和自立军失败，组织了励志社[(81)]，传播新书报，讨论时事，秘密开会演说。他们虽然还分不清维新和革命的界限，其激烈程度却已非那些维新派名流所能望尘。励志社社员还轮流给低班学生演讲新学，评阅文课。1901年初夏，社员史久光轮值，请教习孙翼中命题，自己评卷。许多学生在课卷中痛斥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结果被人告发，惊动了巡抚、将军，成为轰动一时的“罪辫文”案。事发，孙、史二人避往日本。“罪辫文”是混沌中的一星火花，它虽没提出革命的口号并形成运动，却反映了知识阶层仇恨清朝统治情绪的增长。随后，

求是的姊妹学校养正书塾（此时，它们已分别更名浙江大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堂）又发生了反对校方专制的学潮，学生汤槱、马叙伦等九人被开除。汤、马等六人赴沪与陈黻宸创办《新世界学报》。在1901年到1902年间，求是、养正两校涌现了叶澜、王嘉榘、董鸿祎、蒋尊簋、蒋方震、许寿裳、汤槱等一批出色的学生，他们在东渡日本之后，都成了留学生政治活动中的骨干分子。

杭州学生中发生的这种变化，在上海、江宁、无锡、嘉兴、常州、苏州等地的学生中也同样地在发生着。

新派人物分化中更为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教育会的成立。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私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书商也竞相印行新书，但适用者不多。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智由）等议定，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编订教科书。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观云、戢翼翚、蒯寿枢等被举为干事。蔡元培字鹤庼，号鹤卿，倾向革命后易号民友、孑民，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中。1892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他在戊戌政变后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南返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冬，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分任撰述。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暑假，偕高梦旦赴日本游历，适成城入学事件发生，吴稚晖、孙揆均被勒令回国。为了防止吴等回国遭受清廷迫害，蔡元培慨然承担护送的责任。8月13日抵沪，教育会发起了欢迎吴等的大会。8月22日，又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支持自费留学生入军事学校的要求。会上，叶瀚提出了教育会自办学堂的建议。陆续加入中国教育会的还有吴稚晖、黄宗仰、钟宪鬯、王季同、汪德渊、林獬、陈竞全、章炳麟、金天翮、屠寄、丁祖荫、龙泽厚、徐敬吾、吴葆初、敖嘉熊、蒋维乔、马君武、马叙伦、陈范、张继、刘师培等

人。他们大都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教育会成立之前，除戢翼翚、章炳麟、马君武、张继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致力反清革命外，其他都不过是比较激进的新派人士。但随着教育会政治活动的开展，除了龙泽厚那样个别的人还坚持保皇主张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中国教育会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82] 这里，除"恢复国权"所指的内容不甚清楚外，意思是很明确的：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给予中国青年以改造祖国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这是一种革命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个目的，会中的激进分子稍后有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说："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83] 明确地说，就是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会。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指出"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84]。中国教育会鲜明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教育会计划认真地从事造就"共和的国民"这一工作。它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创办商店、工厂、公司。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但是，时局的急速变化使它没有来得及从容地进行教育的改造，甚至一本教科书都没有编成，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南洋公学是清朝官吏盛宣怀在1897年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因经费充足，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师资较好，出路优越而颇著声名，实际内幕却十分黑暗。这时，该校有六个普通班和一个培养高材生的特班。其

中，五班文课，学课教习郭镇瀛是一个学识浅陋而又顽固守旧的人，专以欺压学生为能事，长期为学生所不满。11月5日，郭去上课，发现师座上放着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定是有意侮辱他，严词诘问。11月11日，校方应郭之请，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全班大哗，力争无效，14日决定全班退学，举行告别演说会。五班的行动引起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瀛请求收回成命，汪不允，学生们决定全校退学。这时，校方才慌了手脚，急忙请学生们尊敬的教习蔡元培等出来调解。16日一早，全校学生二百余人，检点行装，列队操场，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可是，蔡元培去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要求时，盛尚高卧未起。十点，学生们见没有回音，便高呼："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整队离校。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学堂中封建压迫的结果。正如《苏报》所指责的那样，学堂主办者"摄照老大帝国小影，官场总办局、所之恶习，自尊如帝天，视人如犬马，妄立章程，驰逞臆说。以压制缚束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以苛责细故为讲求实际，以管束学生为门面排场。呜呼，腐败至此，荒谬至此，荼毒暴虐至此，焉得不为世界之公敌也"[85]。另一方面，它又是青年学生中民主主义思想滋长的结果。长期以来，五班学生就不顾郭镇瀛的禁令，偷读《新民丛报》、《国民报》等杂志书刊，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他们模仿梁启超改号"任公"的榜样，也为自己取号叫什么"公"，被开除的伍正钧的别号就叫"特公"。他们在1902年8月31日就成立了一个"演说会"，评论时政。演说会的宗旨是"爱国"，他们强调说："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班上核心分子十三人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任会"，之所以叫任会，就在于其宗旨是"以造新中国为己任"[86]。在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因素已经比较明显。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学生们是不可能起来向黑暗势力斗争的。

南洋公学内部的新与旧的矛盾，在全国学堂中是普遍存在的。学堂是新事物。人们都希望学堂能培育出拯救祖国的英才，他们把学堂学生称为“新中国的主人翁”，认为他们是中国前途的一线希望。但学堂绝大部分把持在封建势力手中，力图按照封建的老规矩去办学，因此进步教育界又将这大部分学堂称为“奴隶制造场”。这样，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就不能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事后，进步舆论普遍支持学生。《选报》指出，这一行动“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吾国学界中当有渐被其影响，以固此学生社会，不使露西亚之学生专美于世界”[(87)]。《新民丛报》也强调此“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88)]。

南洋公学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后，因校方引诱，家长威逼，返回、散走了一些，但退学者仍有145人。大部分退学生无处可依，他们想自办“共和学校”也无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帮助。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生集议张园，学生提出意见书，得到教育会的支持，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当时，教育会也没有钱，蔡元培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到码头时，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病死，蔡挥泪嘱他人代办丧事，毅然登轮。11月下旬，爱国学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教师由教育会选派。

爱国学社把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任务。其章程说：“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89)] 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在维新前后的讲学之所，他们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以不小的影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企图仿效他们的教育活动，以推动中国政治的变革。蔡元培在学社开学祝词中说：希望通过学社的努力，“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90)]。为了达到此目的，学社设置了完备的课程。学

社学制分寻常级、高等级，各二年，后又增设了蒙学班。高等级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心理、论理（逻辑学）、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国文、日文、英文、体操等课程。这些课程中、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心理以及论理等科，都是上海其他学堂所没有的，而学社用以传授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学生们还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前，国内早有学潮发生，但影响不大。著名的南洋公学全校学生退学，并组成自己的学校，这就为各地受压抑的学生树立了榜样，鼓舞了他们的反抗情绪，类似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

1902年11月，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为南洋公学学生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公议登报祝贺，总教杜亚泉横加干涉，随后又解聘学生爱戴的教师，学生二十九人愤而退学。

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学堂学生三十余人也因反对校方专制退学。当时，校方无理斥退学生，引起学生公愤，校方反加以“聚众滋事”的罪名，并以禀明两江总督严加惩办相威胁。学生义无反顾，集体离校。他们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支援，章士钊（此前因他故退学）、林懿均等三十一人加入爱国学社。

4月13日，杭州浙江大学堂学生也因反对总理劳乃宣等无理开除学生，八十余人集体退学。退学生仿照爱国学社的样子，自建了励志学社。励志学社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资助。

5月3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因反对总教习舒高第，倡议集体退学，总办赵滨彦竟欲调兵围校，后见学生不屈，才设法调停。

5月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因反对美国教士甘惠德的欺侮虐待，五十余人退学，组成了改进学社。

一时间，各地退学、罢课、集会等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被社会上称为“学界风潮”，一些学生则自称为“学界革命”。“学界风潮”是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崛起的一种表现，学生们反对专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忧国忧民，表现了民主主义的觉悟，同时也使斗争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性质。这种斗争为进步师生献身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起了动员作用。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始终如一地积极支持各地进步师生的正义斗争。除去人力、物力的支援和行动上的指导外，它们特别注意了政治上的指导。教育会和学社的喉舌《苏报》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它增强了“学界风潮”的政治性质，指出：“官立学堂，政府压制之小影也”；“教会学堂，宗教压制之小影也”[(91)]。因而斗争的内容是“脱奴隶之教育，去专制之范围”；“释宗教之迷信，不受外人之羁绊”[(92)]。这种斗争乃是“政治界反抗力之先声”[(93)]，“国民竞自由权之起点”[(94)]，“新中国独立之起点”[(95)]。《苏报》还指出，“改革政体，无不从学界起点，此东西各国通例也”。中国“学界风潮至今始有萌芽，而其前途之变幻，必波谲云诡，发现于二十世纪大舞台”[(96)]。从这种认识出发，它要求学生们在斗争中注意“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分，“当争之于精神，不当争之于形式”[(97)]，也就是说要坚持“学界风潮”的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廷专制的政治方向。教育会和学社成了“学界风潮”的指导者和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中心。

1902年的冬天，中国教育会还创办了爱国女学校，蒋观云任经理，后亦由蔡元培接任。为响应教育会的主张，江苏一些城乡建立了教育会的分支。殷次伊、丁初我（祖荫）、徐觉我在常熟将他们组织的敦学同盟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设立了塔后小学校；金天翮、杨天骥等在吴江同里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创办了同川学堂（亦名同里自治学社）；同里支部成员柳人权（亚子）、陶亚魂在

吴江黎里又组织了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开会演说。教育会的成员在上海还主办不少事业，如钟宪鬯主持的科学仪器馆、《科学世界》杂志，陈竞全主持的专出进步书刊的镜今书局，林獬主办的《中国白话报》等。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壮大了教育会的实力，保证了它在政治斗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在新型知识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礼赞。《新湖南》一书说：“吾湖南而为埃及，必有人为亚拉飞；吾湖南而为非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为杜兰斯哇，必有人为古鲁家。若而人者，必出于中等社会无疑也。”《教育界之风潮》一书说：面对祖国危亡，“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该书还说：“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这种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推崇，是新型知识阶层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它在近代革命中所处地位的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不再像古代的“士”那样自居为“上等社会”；相反，他们视“上等社会”为仇敌，指责“挟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98)]。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自己与“下等社会”——农、工、商的不同。他们承认“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99)]，但认为其没有创造新国家的能力。有人说：“下流社会，如长发、大刀等，亦尝有之矣，亦曾见于国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纵使前此之建社会者，竟能改革旧政府，有所建设，吾恐其速亡国之祸也。”[(100)] 这种对劳动民众反抗斗争的蔑视无疑是荒谬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真理：古代类型的人民起义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寄希望于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阶级或阶层，而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正是新型知识阶层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人们正是抱着对新的社会力量的期待来赞美“中等社会”或“学生社会”的。《苏报》指出：“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101)] 根据以上对自身地位的认识，这些“中

等社会”的人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也就是说，他们自觉地把领导近代革命的责任承担下来了。为什么在新型知识阶层投入之后，步履艰难的反清革命迅即生动活泼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阶层具有这种觉悟性。新型知识阶层的这种觉悟性，究其根本，是中国资产阶级觉醒的一种表现。但他们不是阶级论者，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甚至把自己所附着的，包括在农、工、商中的资本家阶级，也视若等闲。

还可以指出这样的现象：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愈益活跃，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这种现象固然是这个幼稚、软弱的社会阶层免不了要经受的，但这决不是它对自己的历史责任畏怯的表现，而是一个痛苦的加深认识的过程。经过一番回味之后得出的认识，毕竟要比此前高明。他们指出：“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102)] 他们还说：“其游说煽动也……自学生与农民为伍而继之以学生与军人为伍。主义掞扬，徒党充实，而后能挫折政府之锋芒而无所于衄。支那之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103)] 这里，对于新型知识阶层以及各个可能投入革命的阶级、阶层的估量，比过去要客观、准确得多。辛亥革命的整个进程都没有脱离这种估量。但是，人们不能要求新型知识阶层在其开始活跃的阶段就导演出惊天动地的活剧来。

第五节　相互激荡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

1903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充满了惊心动魄而又瑰奇壮观的事件。以留

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和国内的“学界风潮”作为开端，迎来了规模宏大的爱国运动——拒法和拒俄。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和上海三位一体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成为运动的指导中心，它们努力推动运动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为了使人们认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宣传家们疾呼呐喊，写出了《革命军》这等动人心弦的作品。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也提出于这一年，至此，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已经具备。这一切都表明，反清革命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已经在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清朝统治者虽然发动了像“《苏报》案”这样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已无法扭转这种局面。

一　拒法、拒俄运动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刊载消息说：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还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答应在事平之后，用全省路矿等权作酬劳。这一消息震动了留日学生和国内士商。

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和各省同乡会干事齐集会馆商讨对策。干事们手持报纸，相对流泪。他们决定电争，分别致电政务处、两广总督德寿、尚未到任的新粤督岑春煊，指出“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国从此生心，大局立可动摇”[(104)]，请他们立即代奏，要求清廷拒绝法人，将王之春撤职治罪。同时，电告上海中国教育会，请求响应；并用外文写稿寄登欧洲各大报，揭露这一事件。这一天，在上海的广西、广东绅商也举行了集会，决定发电力争。

4月25日，留学生会馆召集全体留学生在锦辉馆开会，报告对付此事办法。与会者五百余人，一致拥护干事们的措施。会后，又向政务处发出详函，说明借兵借款的利害关系。同日，龙泽厚（广西人）等发起在上海张园开拒法会，中国教育会在沪会员、爱国学社全体学生参加，与会绅商四百人。马君武发言说：“必须合成一有势力之自

立会，能与外人及顽固者争衡。”[105] 吴稚晖建议：“无论工商人等，均宜罢市。”[106] 蔡元培提出：“就今日起，立一团体，专为阻法兵干涉而设。”[107] 会议决定发电阻止借兵借款。当天，签名愿入阻法会者三百余人。同日，爱国商董二人为阻法会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愿意召开商会，一同拒法，结果被广帮一些商董阻止。

4月26日，在沪两广人士再次集议于广肇公所。顽固士绅拒绝与会，公所首事还贴出告白，说什么“公所当议商务，不当谈国是”[108]。当即遭到众人痛斥，“无不欲赠以老拳”[109]。这次会议展开了爱国募捐活动，顷刻间就募得一千余元。

拒法的抗争还得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响应。例如杭州的杭州府学堂、钱塘县学堂、励志学社、安定学堂等九校联名电争；广州时敏学堂也发电力争。

拒法运动掀起来了，拒俄运动又接踵发生。拒法成为与拒俄并列的要求，两个运动汇合为一股潮流。不久，确实消息证明所谓向法国借兵贷款是误传，人们才不再提拒法。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居然引起如此大波，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但是，与其去谴责爱国者们在政治上不慎重，不如去赞扬他们对祖国危亡的高度责任心和对局势变化的高度警觉性。二十世纪初年，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中国人民，其激昂的爱国情绪就是这样的一触即发。拒俄运动也是这样迅即普及全国的。

按照1902年签订的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退在金州、牛庄等地的侵略军。但是，它不仅不撤军，反而于18日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4月27日，上海群众千余人在张园集会，这些群众包括了十八个省籍的人。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110]。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111]。会上还有数十人即席演说。同样是张园拒俄会，这次和1901年的会议不同，显示出一种

不顾清政府的傲岸独立的态度。这次会议是由汪康年发起并主持的，电争也是由他提出的。汪在教育会中的友人参加了集会。

留日学生的行动与上海群众声声相应。4月29日上午，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四十余人集会。汤槱建议先致电南北洋大臣。请他们主战。钮永建指出："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为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112] 大家都赞成。下午，在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五百人，推汤槱为临时议长。汤槱、钮永建、王璟芳、叶澜、蒯寿枢、周宏业、张肇桐、汪荣宝、程家柽、李书城、翁浩、张允斌等相继演说。汤槱的演说慷慨激昂。他说：

> 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皆已知之，此真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辈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么？到那时候，想一战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国民流血的好机会么？（众皆拍掌）

他还批评那种空谈爱国的倾向说："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咄！待尔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瞒混，待骗谁来！"他提议"今日有不怕死的，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有人反驳说："以学生之力，何能担当此任，虽举全体学生驱而死之，亦不足当俄人之铁骑。故轻举妄动，固宜切戒，孤注一掷，尤所不取。"汤槱回答说：

> 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

讲到这里，他厉声大呼：

> 死生一发之际，犹想层层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椁

么？！[113]

这篇演讲代表了当时留学生们沸腾的爱国主义热情。言毕，“众皆愤发，多涕不能抑者”[114]。汤槱（尔和）后来在三十年代末当了汉奸，背弃了他此时喧呼的气节，但广大学生却一直保持和发扬了爱国主义，并使它成为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这次会上，决定了几项办法：一、愿加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二日内签名，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二、致电上海各团体，请求协助；三、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并补发详函，说明愿将义勇队隶属其麾下；四、举特派员往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五、派人到国内各殷富地方及南洋各埠、欧美各国从事运动。

会上，留学生即纷纷签名加入义勇队。会后，各省同乡会也分别开会，一致赞成成立义勇队。福建同乡开会时，十五岁的方声煊要求签名入队，翁浩抱着他哭道：“方君，我北征且歼，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吾辈日日言报国，今予为势所迫，仅一死以塞责，罪且不可逭，汝复轻身殉此，胡为者？”[115] 满座闻言皆哭。浙江同乡会上，十六岁的矮小少年潘国寿也要求入队。同乡劝他留下，又劝他改归本部或往内地游说。潘都不肯，大哭说：“国亡无日，欲求死所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116] 女学生的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决定加入赤十字社，随同义勇队北征。日本女界名流下田歌子急来劝止，她们回答说：“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117] 加入者，胡彬夏、林宗素等十人。其中，方君笄就是方声煊的妹妹，当时只不过是十二岁的小姑娘。他们的堂兄方声涛、方声洞（十七岁）也入了义勇队。不少人都是兄弟姐妹一同加入的。留学生会馆干事曹汝霖不同意组织义勇队，但他的妹妹曹汝锦却毅然加入了赤十字社。至次日止，自愿签名入军队者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留日学生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5月2日，签名入义勇队，本部者集会于锦辉馆，改义勇队为学生

军。次日，在留学生会馆编队，将121名队员编为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辖四个分队。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5月11日，再度在锦辉馆开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蓝天蔚等士官生被强令退出。但会员仍达208人之多。会上，公推叶澜、林长民、蔡文森为书记，陈福颐、张肇桐、蹇念益为会计，王璟芳、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为经理，秦毓鎏、蒯寿枢、董鸿祎为执法，叶澜被职员们推为职员长。黄兴、杨毓麟等被推为运动员。此前一日，汤槱、钮永建被推为特派员，归国去与袁世凯谈判。5月14日，二人出发。五六月间，运动员除程家柽、陈天华外，陆续首途。黄兴于5月31日成行。5月中旬起，军国民教育会的射击班、讲习科、体操科陆续开始活动。

上海方面，4月30日再次在张园开拒俄会，讨论设立四民公会事。与会者一千二百余人。爱国学社学生戎装整队赴会，爱国女学、务本女学、育才学堂学生也同时出席。蔡元培首先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马君武演说后，领导在座者同唱《爱国歌》：

> 吁嗟美哉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茶桑满园郁相植，青青芬芬烂其色。纠结恰是同气脉，夏禹域兮我祖国。
>
> 吁嗟美兮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小川悦流不肯逆，大川似骄势滃渚。大川小川争相怿，大支那兮我祖国。

“一时爱国之忱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118)]。会议决定改四民公会为中国国民总会，当场签名入会者六百人，会后签名者千余人。

正在会议高潮期间，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的急电，龙泽厚率全体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留学生的敬意。随后，入场商议签名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并复电东京。会后，教育会派汪德渊为代表赴日。当时，正值义勇队受到干涉，汪向留学生表

示："无论俄事如何，军队暂不可解散，务望同志竭力维持。"[119]后来，上海义勇队也相应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也在上海设立了通信机关。爱国学社入会者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早晚操演。

东京留学生和上海各界的拒俄呼号得到了国内各地爱国者的热烈响应。

4月30日，清朝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集会，筹商对策，助教范源濂及学生数十人演说。演说者痛哭流涕，听讲者齐声应和，与会的教习、职员也都长叹太息。当时，只有仕学馆学生靳志一人未到会，躲起来练习八股，好应殿试，被人们斥为"至死不悟"。会上，决定联名上书管学大臣，请其代奏拒俄。同时，电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并运动京官，请他们一同力争。在上管学大臣书上签名的有谷钟秀、张耀曾、王德涵、丁作霖、朱锡麟、冯祖荀、何育杰、华南圭、朱深、李思浩等七十三人。次日，副总教习张鹤龄奉令悬挂牌示，禁止集会议论国事，被学生们愤而扯碎。

消息传到武昌，5月13日，各学堂停课，二百余学生集会于曾公祠、三佛阁等处，决定上禀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请其代奏。朱和中、吕大森等人在曾公祠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刚成立的私立江南旅学学生在《汉报》上登告白表示："虽我学初立，亦难坐视，愿全国学堂合力奋争，刀俎斧钺，仆等必受一分。"[120]

5月17日，由陈由己、潘缙华等发起，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及其他群众三百人，冒雨赴藏书楼集会。会议决定成立爱国会，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121]他们计划在办有基础之后，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122]。由于演说中出现了革命流血

的呼号，安徽当局即行查禁，并下令捕人，陈由己逃走。

此外，南昌、广州、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的学生和其他群众也进行了拒俄斗争。江西大学堂学生二十余人组织起来，筹集川资，准备附入上海学生军。直隶举人贾恩绂等四百余人联名上书外务部，请其代奏。拒俄的斗争广泛地展开了。斗争虽然还局限于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但毕竟形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运动主要是由新型知识阶层掀起的，学生、教师以及其他从事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208名会员，除少数由国内来游历者外，全部是留学生。国内不少城市的拒俄，可以说纯粹是学生运动。在资产阶级势力较大的上海，资本家、商人参加了运动，但这一阶层的态度是极不一致的，其中有一些人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团结在爱国旗帜下的还有少数清朝中小官吏和满族人士。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中，就有宜桂、长福等满族学生。在北京，八旗生员续彪、敦本、宝书等八人上书奕劻等，要其顺应民情，说："此次寓沪各省绅士、商民又来电力争，且有全国不认此约之语，大义凛然，可格天地。王爷大人与俄人会晤时，即可引此为竞胜之券，竭力磋磨，事未有不成者。……民为邦本，苟我国民联结团体，何畏彼俄？何畏彼日？何畏彼英、美？是在王爷大人善鼓民气耳。"(123) 这一书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各民族的团结。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进步的建议。由于清朝多数大吏对俄约及亲俄派也持反对态度，所以其中有人对学生的拒俄表示同情。两江总督魏光焘对拒俄义勇队"深为赞美，以为中国国民犹有生气也"(124)。湖南巡抚赵尔巽更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态度，他"曾亲在明德（学堂）及师范馆演说，令两堂学生之明达者，分至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演述中俄之状况，以激士人之爱国心。于是学生益奋起"(125)。拒俄运动之所以能影响比较广泛的社会面，是由于它是爱国的运动，而这种爱国运动的正义性，在处于危亡的中国，是没有人敢于公开不承认的。

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活跃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以上海尤为突出），但整个运动基本上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学生军规定自己的体制是“在政府统治之下”[126]。军国民教育会规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127]。各地爱国者把实现拒俄仍寄托在政府拒绝签约之上。所以除集会演说之外，几乎一律地是向政务处、外务部上书，或请各省督抚代奏。即使一些地方自行组织起来了，也没有把清廷视为寇仇。相反，上海义勇队成员林懿均、章士钊等激烈分子也表示：“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128]。安庆爱国会还有人强调：“一切办法务要妥帖，不要那些大官说我们造反，是康党。不生枝节，于事方能有济。”[129]最能表现这种合法性质的，莫过于军国民教育会派特派员向袁世凯请愿一事。叶澜在送别汤槱、钮永建时指出：“二君之行，其或不获致死于敌人，转冤于其所忠者。”[130]但明知有危险，特派员还是去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叶澜解释说：“之所以设特派员，本为军队出发起见。若不疏通政府，则军队先不能出发，更有何目的之可达？……事原出于万不得已，而非好为运动政府也。”[131]为了达到捍卫祖国的目的，爱国者们如此委曲求全。只是清朝统治者肆意镇压，才将自己放到了爱国者的敌人的地位上去。

清政府在4月22日就拒绝了俄国新提出的七项无理要求。此后，沙俄虽一再施加压力，但清政府迫于国内的反对及日、英、美等国的干预，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两国谈判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拒俄运动没有进一步扩展。但是，由于清廷镇压拒俄运动，爱国志士们的炽热情绪便转而指向清朝反动统治了。

二　《苏报》的改革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改组

上海爱国学社开办后，延至1903年春节后才正式上课。学社内革命空气弥漫。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就已经在提倡民权、女权，这时更“公言革命无所忌”[132]。他把从日本返乡闭门著书的章炳麟

请来教国文。章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作本人的《本纪》一篇。“本纪”是中国古代正史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裁，章炳麟竟让学生娃娃们自书《本纪》，分明是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蔑视和反抗。当他看到有学生述及由保皇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时，便用自己摆脱“纪孔保皇”束缚的体验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吴稚晖在教国文时，则用严译《天演论》作为课本。

爱国学社的师生还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政治宣传。经学社职员徐敬吾联系妥当，师生们自春节后每月到张园安垲第演说一次，与会演说者都是极力主张革命的人，其中以吴稚晖风头最足。章炳麟有时并不演说，只是大叫：“革命，革命，只有革命！”更博得情绪激昂的听众们的欢迎。到拒法、拒俄运动开始，学社在张园共开了三期演说会。

这时，《苏报》也和教育会、学社关系日益密切。《苏报》原是一家以日本政府为背景的日侨报纸，1896年发刊于上海，至1898年秋，转售与中国人陈范。陈范（1860—1913）字叔柔，号梦坡，后易名蜕，号蜕盦，湖南衡山人，寄籍江苏阳湖（今属常州），清举人，官江西铅山知县，因报效欠丰，被贪赃的市巡抚德馨劾罢。他愤于清朝政治腐败，想主持清议以挽救时局，便买下了《苏报》，鼓吹维新、保皇。1902年冬，《苏报》首先报道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随后受新型知识阶层政治情绪的影响，言论日趋激烈。1903年春节后，报馆聘爱国学社师生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撰写论说，并每月拿一百元补助学社经费。2月，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推动学堂师生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很快，“革命排满”的呼号也出现于报端。3月间发表的蔡元培所作《释仇满》一文，就旨在赋予“排满”以正确的社会内容。这样，《苏报》实际上成了教育会和学社的机关报。

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三位一体，与国内，首先是东南地区的进步政治力量的联系日加广泛、紧密。“各处教育会及各学堂皆步尘而兴，咸奉海上诸志士为全部之中心”[(133)]。它们不仅是“学界风潮”的政治指导者，在拒法、拒俄开始后，又成为这场爱国

运动的政治指导者，极力促使爱国的人们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4月26日，中国教育会召开徐园大会，评议会提议修改章程。修改后的章程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用“教育中国国民”代替了“教育中国男女青年”的规定。章程还规定设立“社会教育部”，其任务是“主提倡政论，改良风俗，凡书报，演说等事隶之”[134]。章程的修改，表明中国教育会已经抛弃了原先单纯办进步教育事业的想法，决心在社会上进行政治斗争。

当时，上海地方的拒法、拒俄斗争是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发动的。历次张园集会，演说自己的主张的有维新派、保皇党的汪康年、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135]，也有革命派的蔡元培、吴稚晖、马君武、邹容；参加会的群众，有改良派办的务本女学学生，也有革命派的爱国学社学生；支持会议的，有改良派的《中外日报》，也有革命派的《苏报》。两派旗鼓相当，某些场合，改良派还占着主要地位。但是，要说到对群众的吸引力，当然以革命派为大；至于同东京留学生的联系，改良派更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教育会一派人积极支持了改良派的爱国要求，但对改良派把这场爱国运动变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的企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4月25日的拒法会上，龙泽厚等提议向清政府发电阻止法人，教育会人士没有反对，但他们不愿向自己的敌人请愿，拒绝担负发电的任务。4月27日的拒俄会上，又发生了主张革命者与主张改良者“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136]。这样，两派的冲突就很难避免了。5月12日，《中外日报》首先公开了这一矛盾，它在论说《存诚篇》中，攻击革命派“创非常之论，挟骇众之言，遂欲首发大难，以号召徒众，假义声以风动天下”，实则“不足以要其成”，“不能实有所联结”。5月13日，《苏报》发表来稿《敬告守旧诸君子》，揭示革命救国的旗号，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该文还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者宁愿流血，是为救四万万同胞。5月14日，《中外日报》又发表论说《乘时篇》，攻击革命主张是“时之所必不能为”。为

此，《苏报》于5月18日发表论说《读〈中外日报〉》，公开应战。这篇论说指出，群众幼稚的改革要求，“要不可谓非国家思想之萌芽者也，吾固将引而进之，而不知彼主笔之一切用消极手段者何为也”。论说还指出，汪康年是听到了清朝要镇压拒俄运动的风声，“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保皇党人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等比汪康年要倔强，不甘心退缩保守。与革命派共同发起的国民公会掌握在他们手中，冯等便动议将它改组为国民议政会，以“救亡”、“归政”为目的，发起在7月间举行“归政”请愿。所谓“归政”，就是要西太后将戊戌政变时夺去的权力还给光绪帝载湉。这一主张在当时同“革命排满”一样，虽然被当权者西太后一派视为大逆不道，但是对于革命来说，它却在制造对清朝统治的幻想，阻止革命的发生。冯等在邀请人们参加国民议政会的成立时没有预先说明其宗旨，革命派人士也应约而来，等到冯镜如登台演说，才知道事情真相。邹容愤怒地起来驳斥冯。因为冯入了英国籍，邹巧妙地问他：“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民议政会耶？英国民议政会耶？”(137) 吴稚晖等也予以反对，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一派的人士都没有参加。至此，从戊戌以来逐渐汇聚在一起的上海新党人士，终于因革命与改良如水火之不相容而最后结束了政治上相互携手的局面。从此中国教育会一派的革命者更加放手地从事其革命活动。他们这时的革命活动，由于环境的限制，主要还是出版书报，发表政论，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在这方面的活动中，《苏报》充当了先锋。

6月1日，《苏报》在陈范新聘的主笔章士钊主持下开始“大改良”。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文章、消息重要之处夹印大号字，突出《学界风潮》栏，增设《舆论商榷》栏，减少一般新闻等等。而改革的中心则在于“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138)，也就是说，用革命的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局的变化。《苏报》宣言：“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139) 6月1日，它发表了论说《康有为》一文，借外报传播清廷将召康有为返国消息事详加发挥，指出“革命”已是人心所向，无法阻拦。

该文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该文还断言，"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因此，即使清廷百般设法阻止，包括抬出康有为，也"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兹后，《苏报》又刊出《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论报界》、《祝山西崞阳学堂万岁》、《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驳〈革命驳议〉》等文，谠论源源而来。从6月1日开始改良，到7月7日报馆被封，三十七天时间，《苏报》共刊出论说、来稿四十篇（其中有五篇曾经连载），几乎没有一篇不谈革命。文中，对清朝反动统治及保皇党人的激烈谴责，往往一转而变成行动的号召。"时乎，时乎，机不再失！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荡清胡氛，强我种类。虽千万圆颅乱掷于血雨肉泥中，而万世钦仰此光明磊落之手段，岂不大快乐事"[140]！"路易死，法乃强；英靰去，美乃昌。毋馁尔气，毋韬尔芒；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自由钟撞，率我四百兆共和国民，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141]。这完全是明朝即发的武装起义的檄文！读之令人心砰。《苏报》就是这样地呼唤着革命的降临。

在《苏报》改革的前后，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和章炳麟的名著《驳康有为书》也先后问世。用《苏报》的话来说，《革命军》"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捋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142]。"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143]。《驳康有为书》则"持矛刺盾，义正辞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144]。《苏报》发表了章炳麟为《革命军》写的序文，并著文介绍二书。《革命军》、《驳康有为书》与《苏报》相互辉映，使革命鼓吹的声调更加强烈。尽管它们所进行的"革命"还仅仅是口诛

笔伐，但已经给万马齐喑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莘莘学子更是如醉如狂，成天侈谈“革命排满”。

清朝统治者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在4月底张园演说开始后不久，驻沪的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就要求上海道袁树勋进行镇压。袁不敢轻举妄动，吕又向江苏巡抚恩寿报告，说是“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145]。吕先后开了两次捕人名单，第一次为蔡元培、吴稚晖、汤槱、钮永建四人，第二次为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稚晖、黄宗仰等六人，要恩、袁按此捉拿。恩寿得悉，急命袁树勋设法对付。他们镇压的主要目标是爱国学社，但学社和主要负责人住处都在租界里，清方不能直接捕人，袁不得不向各国领事交涉。5月8日，袁出告示悬赏捉人。13日，领袖领事、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签字应准，但租界工部局却以不合租界章程为名，勒令收回。为此，工部局于5、6月间先后六次传讯清方要捉拿的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章炳麟等人。工部局方面表示，只要学社是在讲学，不藏武器弹药，如官厅来捕人，工部局将予保护。蔡等都留下了自己的住址，以示心地坦然。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革命活动暂时没有受到影响。

对于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中国教育会派的革命分子早已料其必然，他们只是将这种反动行径用作教育人们起来反抗清朝统治的良好教材。但是，对于东京的爱国留学生来说，清政府的无理镇压，却是促使他们决心革命的关键因素。

东京留学生的拒俄义勇队是在革命派推动下组成的。钮永建最初向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提出组织义勇队的建议，章、曹二人都反对。但青年会领袖叶澜却支持此事，他对秦毓鎏等说：“青年会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我们何不赞成惕生（钮永建号）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146] 于是，他们与钮联名为发起人，争得了留学生的一

致赞成。在成立义勇队时，留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已经有所显示，叶澜演说时问道："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答道："为国民！"大众鼓掌表示赞同。但是，为爱国情绪所支配的留学生急于献身沙场，幻想清朝政府和官吏同情他们的主张，派了汤槱、钮永建为特派员归国去说服袁世凯。这种请愿行动，当时被人们称作"运动官场"，上海教育会一派人很不满意留学生的这一举动。汤、钮二人到达上海后，去爱国学社演说拒俄的前途和方针，当即受到吴稚晖等的反对。《苏报》也告诫他们："'不识人头，吃煞苦头。'诸君其鉴诸！"[147] 果然不出所料，五六月间，社会上传出了特派员在天津被杀害的消息，并流传着一份严拿留学生的《密谕》，命令"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148]。虽然，后来消息证明特派员被害是讹传，清廷也否认有严拿留学生《密谕》，但清政府蓄意镇压拒俄运动却是事实。在拒俄义勇队成立后，清公使蔡钧即密电北京外务部，说留学生们"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阴谋并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一带之地，分派会党煽惑，纠合同志，以便起事，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149]。5月27日，兼署湖广总督端方也以留学生"欲入长江勾引票匪为乱"作理由，密电沿江海各省"严防密拿"[150]。特派员到达天津后，袁世凯拒绝接见，他们能见到的，是捉拿留学生的密电，只好悻悻然而返。清廷对拒俄运动的镇压和特派员请愿的失败，无异给被《苏报》称作头脑"热昏"的留学生们泼了一盆凉水，使他们清醒起来。"我以热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151]！他们激怒起来了。

6月6日，叶澜在寄往上海的信中就已表示"今日情形则又不同"，要改变方针。他说："吴、蔡两公既为政府所深忌，则本会诸人亦同一辙。若与彼昏辩论，不但无益，而反触其忌，惟有坚忍不挠，始终与彼相持耳。"[152] 等到清政府镇压拒俄的各种密电传来，留学生们更加愤怒。《浙江潮》说："钩党结狱，缇骑四出，若欲尽杀我中国国民而后止。"[153]《江苏》说："以求媚联俄的异族政府之无术，

乃不惜反唇肆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对外之扞御，则异日虽百变其术，百变其言，苟有可以为取媚异族之具者，即概以‘名为如何，实则革命’一语冠之无不可也。”[154] 《游学译编》说：“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155] 最能代表此时留学生心情的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陈去病的话。陈去病说：

> 呜呼！兹马八再之留学生，洵亦可谓伈伈俔俔，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满洲朝廷乃斥为党徒，目为悖逆，指为不轨，怒为对敌，且又重诬之以为孙文之党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传电畿疆，罗织搜索，防若寇贼。观其儆戒之情与张皇之态，盖几较俄事有过之无不及者。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怃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156]

“革命其可免乎”，这就是结论。于是，军国民教育会中的激进分子开始酝酿进行改组，青年会成员在各省同乡会中极力宣传“革命排满”主张。

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全体会员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欢迎特派员汤槱、钮永建归来。会上，秦毓鎏、萨端、叶澜、张肇桐、董鸿祎、翁浩、胡景伊、程家柽、王嘉榘、郑宪成等十五人提出意见书，要求表明宗旨。意见书指出：“今吾会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贻人以口实，在清廷早洞见吾肺肝，于国民反助长其奴性，必至两无所得，而本会之基础，终无以自固，本会之发达，亦终无可望。借令发达矣，此会之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也？”他们要求以“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代替

原定的“实行爱国主义”。意见书指出：“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157] 秦毓鎏等的意见得到过半数会员的赞成，从而通过。该会书记王璟芳反对意见书，起来大呼不可忘记大清恩泽，宣布要退会。王在义勇队成立时表面很积极，暗地里却向蔡钧告密，说学生们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至此真面目完全暴露。事后，他得到清廷的嘉奖，恩赏举人，但留学生却视彼为无耻之尤。当时，因各种原因退会者，不过十余人。

军国民教育会在由爱国团体改组为革命团体之后，活动逐渐转向秘密。它决定通过鼓吹（宣传）、暗杀、起义三种方法来实行革命排满。其总部设于东京，在上海等地设有分部，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吸收会员，概取严密。当年，会员叶澜、张肇桐、秦毓鎏、黄铎等在上海设立国学社，出版教科书和东西名籍，会员谢晓石、苏子谷等也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次年，会员秦毓鎏、刘三、费公直等在上海创办了丽泽学院，秦毓鎏、翁巩、叶澜等还应会员黄兴等邀约，赴长沙任教，在那里参加了华兴会的创立。会员杨笃生则在日本组成了极为秘密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暗杀团后来在上海也设立了据点，它是光复会的前身。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的活动逐渐都转到了国内，但该会的组织一直保持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在此期间，它始终没有用自己的名义进行重大的政治行动。

《苏报》的改革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改组是新型知识阶层革命化的重要标志，这个阶层掀起的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和爱国运动至此已经发展为反清革命。由于新型知识阶层的这种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在先进的中国人中间取代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盟主地位，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　“《苏报》案”

清朝上下对拒法、拒俄斗争的镇压，随着爱国运动向革命转化而日益加紧，六七月间，终于在上海制造了中外注目的“《苏报》案”。上海捉拿新党的交涉失败后，清朝当局不肯就此罢休；袁树勋在恩寿督促下，靠美国人福开森牵线，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出主意，不断与各领事谈判。为加强袁在谈判中的地位，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饬查禁密拿。”[158] 次日，清廷据魏电下旨说：“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拏，随时惩办。”[159] 这道“圣旨”是镇压革命的动员令。于是，袁即以“奉旨查办”名义继续办理交涉。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十分仇视革命，他接旨后，6月23日电魏，强调指出，《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160]。端方比较懂得报纸的功用，《汉口日报》经常批评官府，端就花钱把它买下。端要魏学湖北的做法，魏干脆命令袁将查封《苏报》事一并交涉。这样，镇压之网就张得更大了。

交涉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可是，革命队伍中却闹起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之间的纠纷。爱国学社成立后，影响日大，一些年青人便骄傲起来。5月24日，教育会在张园开会，有人提到“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学生大哗，他们在自办的刊物《童子世界》上刊出《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针锋相对地说：“爱国学社之主人翁谁乎？爱国学社者，爱国学社之爱国学社也。”事情越闹越僵。6月13日晚，在学社开评议会，讨论会与社谁为主体。会上，双方言语冲突，不欢而散。蔡元培气得不愿再管事，两三天后便去了青岛。当时，蔡虽将教育会会长位置让给了黄宗仰，但仍然是上海革命人士中最有威望的人物，他一走，裂缝更无法弥补。6月19日，爱国学社社员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布独立。这种兄弟阋于墙的情况，严重削弱了应付迫在眉睫的事变的能力。

督办沪案的魏光焘，原来对镇压拒俄运动无所作为，清廷狠狠斥责他“形同聋聩”，他才热心起来。接到电旨后，加派候补道俞明震赴沪，会同袁树勋办理此案。俞抵沪后，即于6月25日亲往苏报馆拜会馆主陈范，陈未出见。次日，俞又用儿子的名义召见吴稚晖，婉劝《苏报》改变声调，还出示捉人的命令，示意吴等暂时避避风。俞的这种做法，是腐败官场办案的一种惯见手段，表面上大张旗鼓，一丝不苟；背地里暗走风声，放跑首要；这样不了了之，既可应付上司，又不使自己为难。俞敢于这样做，也反映了魏的态度。岂知，革命党人根本不买这本帐。《苏报》照旧倡言无忌，连续发表《杀人主义》等文。6月28日，又以《是何言欤》为题，揭露清廷镇压革命的电旨。6月29日，更摘刊章炳麟《驳康有为书》的精彩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直刺“载湉小丑”。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租界当局开始捕人。原来，袁、俞办的交涉已告成功。起先，他们拿着“圣旨”去请求领事们签字捉拿“钦犯”，各领事不答应。后来，袁纠缠不已，有的领事便泛泛表示，如作为租界之案，在租界审理，还可以考虑。袁表示愿照此办理，领事们便同意了。英、美领事在签字时明白告诉袁，清方必须恪守这一定约：“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161)]。但工部局仍不同意会同捕人，魏光焘等便采用法律顾问英国人担文的主意，命袁、俞向英界会审公廨控告这些“钦犯”，工部局这才不得不出票拘人待讯。

6月29日上午，侦探、巡捕多人闯进三马路苏报馆，出示查禁“爱国会社”和《苏报》，捉拿“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陈范七人”的牌告，当场将账房程吉甫锁去。陈范当天也在馆内，巡捕两次到馆都没有捉他，陈连夜走避。6月30日上午，探捕又往爱国学社捕人。章炳麟仍住在社内。头一天晚上，他与吴稚晖等去苏报馆向陈范打听捕人情况，知道自己也在列。这天清早，叶瀚又来到学社劝章等“留此身以有待”，他人纷纷散去，章独岿然不动。巡捕拿着拘票，一一指名查问。章答道：“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遂被铐走。同日，陈范的儿子仲歧、钱宝仁（允

生）在女学报馆被捕。四人均被押在巡捕房。章写信劝邹容、龙泽厚自动投案。龙当夜自首。邹容藏在日租界一个英国教士家中，于7月1日自投捕房。巡捕见他年轻个子小，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跑来干什么？"邹容指着牌告说："我就是清朝要捉的，写《革命军》的邹容！"此前，章等五人已由巡捕房移送会审公廨到案。公廨审判官系英界会审委员孙士鐄，陪审官为英领署翻译迪理斯。清方聘担文的助手古柏为律师，后又加聘了哈华托。博易由租界当局聘为章等的律师，后又加聘了琼斯。

章炳麟、邹容就捕是英勇的。由于捕房和上海当局暗中做有文章，诸如错开人名、见人不捕、分日行动等，他们完全可以像陈范一样从容逃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表现了高尚的献身精神。章炳麟深明这场斗争的意义，立下了牺牲的决心。他进捕房不久，就写了一篇《狱中答新闻报》，反驳政敌的污蔑。他指出，此案乃是"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的"大讼"，"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他坚定地表示："逆胡挑衅，兴此大狱，盗憎主人，固亦其所。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他们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向社会宣示反清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这正是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革命手段登上历史舞台所需要的英雄行为。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革命者还必须善于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把不愿束手就缚的人笼统地通通斥为胆怯或动摇，是不切实际的。

《苏报》也不屈服，继续疾呼"革命排满"。《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便揭载于7月6日的报上。清朝当局一心要拔掉这眼中钉。7月6日，古柏向公廨要求封报，这本是串通好的事，审官当即允准，英领事签字。但工部局拒不执行，清方便用不派人会审他案相抵制，这样，苏报馆才于7月7日被封。名震一世的革命报纸就这样被扼杀了。

章、邹一案，若按袁树勋与领事的协定，很快可决，不外禁监数年，但这样做达不到清廷置革命党人于死地的目的。7月2日，端方飞

电魏光焘、恩寿、袁树勋，主张以“设法解宁为第一义”[162]，要将章炳麟等人弄到清朝政府手里杀掉。端对张之洞说：“此事关系太巨，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163]他还指责“宁沪办法似嫌太松，仅予监禁，终当出而作乱”[164]。端方心狠手辣，他的办法很合清廷意旨，经过张之洞的活动，军机处于7月4日、8日两次责令魏等按此“尽法惩办，勿稍疏纵”[165]。7月8日的电令还命魏“仍随时电商端署督”[166]，正式给予端方干预此案的权力。端随即派湖北巡警局总办金鼎赴沪。

魏光焘并不以端方的主意和军机处的命令为然，他相信要改变洋人的主意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和袁树勋、福开森提出了一个拖延的办法，美其名曰“步步紧逼”。他要求北京外务部出面同各国公使交涉，让他们先去碰钉子，而在上海则只催会讯，绝口不提解宁问题。魏、袁以操之过急会促使工部局放人相要挟，福开森、金鼎也跟着帮腔，逼得端方只好承认“以速行会讯，俾早定案为要义”[167]。

7月15日，在租界会审公廨进行第一次会讯。章炳麟、邹容等在森严的戒备下被提上公堂。古柏代表清朝政府指控《苏报》和章、邹“故意污蔑今上，诽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他摘引了《康有为》等八篇文章和《革命军》一书中激烈的词句作为“罪证”。章炳麟非常藐视这种审讯，他说：“噫嘻！彼自称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168]面对审官，他坦然承认：《序革命军》是我所作，同时，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清朝，便作书驳斥。律师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章答：我只知道载湉是满清人，不知所谓“圣讳”。邹容也自认：“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因为章等的律师来不及准备辩护词，公廨宣布7月21日续讯。当章炳麟、邹容等被用马车送回巡捕房时，观者填巷。章炳麟在车上看到这种情景，即将两句古诗改了几个字，风趣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169)

会讯之前，7月11日，魏光焘、端方、恩寿会奏办案情况，申明“拟俟会讯后，设法解宁审办”[170]。7月13日，清廷电旨：“仍著严饬速筹解宁惩办，勿任狡脱，以儆狂悖。”[171] 这道“圣旨”否定了“步步紧逼”办法，魏光焘不得不改弦易辙，认真地从事解宁交涉。当时，第一次会讯日期已定，只好照常。讯后，魏撤回俞明震，并给袁树勋一道命令，如果袁不能将章等交涉引渡，押往苏州惩办，便要降职问罪。7月20日，袁与美领事古纳约定次日同各领事会商。7月21日的会讯因此已无必要，所以第二次会讯一开堂，古柏即以案外另有交涉为由，请求改期会讯。会讯因此中断。

法庭上的胜利者是章炳麟、邹容。他们毫无畏惧之心，对簿归来，吟哦唱和，赋诗见志。7月22日，章炳麟赠诗邹容：

>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答曰：

>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两诗豪情横溢，表示出他们在囹圄之中，梦寐以求的，仍然是兴革命之军以扫“妖氛”。对于早已准备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的革命者，敌人的一切迫害阴谋，只能是枉然的。

7月21日，袁树勋持南洋大臣魏光焘照会同各国驻沪领事谈判。英领事康格滑头地告诉他，这件事本可商量，但你们既找了公使，我还得向公使请示。与此同时，英、日、美三国公使也向清外务部推托说，得等待驻沪领事报告。京、沪两地的谈判都陷于扯皮。

为了说服洋人交出“钦犯”，金鼎想了一条理由，说“革命”“是明明欲在租界外犯叛逆之罪，租界内无命可革，则此案与租界内何涉”[172]？这种拙笨的理由当然难不住洋人。张之洞比他的亲信要高明得多，他指责租界当局侵犯中国主权，要求收回这些权利。7月21日，张之洞电端方，指示谈判要领。他说：“在中国境内，虽系租界，其中国人民仍应归中国管辖，故遍查条约并无租界交犯章程。……而工部局硬欲干预此案，竟欲以上海租界作为外国之地，显系有意占权，万难迁就。”[173] 在张的启发下，魏、袁也寻章摘句予以补充。他们企图居高临下，靠提出主权要求摆脱洋人的刁难，一举达到引渡的目的。

张之洞指责租界当局占权是符合事实的，只是说得不全面。各国使领、工部局干预“《苏报》案”，无论是参与镇压，或是拒绝引渡，都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帝国主义者这样做，为的是维护他们靠侵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得来的权益。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帝国主义者在这一案件中，与封建统治者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局面。为了维持其走狗的统治，使自身利益不因这种统治被推翻而遭受损失，他们同意清朝政府镇压在租界内活动的革命党人，并直接参预镇压。同时，为了不使清朝走狗染指自己的既得权益，他们又要求把这种镇压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拒绝引渡，主要是从后一目的出发的。张之洞指责的，也仅仅这一点。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帝国主义者拒绝交人“系争界内之权，非实惜各犯之命”[174]，所以他们想争一争。因为所需维护的政益不同，也产生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美国在中国势力较小，为便于今后扩大在华利益，它乐于示好于清朝政府。其驻沪总领事古纳秉承本国侵华方针，就利用领袖领事地位积极支持清朝对革命的镇压，极力赞成引渡。英国领事康格的态度就和古纳不一样，他始终反对引渡。康格的态度则是由于英国有其在长江中下游和上海租界的权益需加保护而产生的。工部局直接控制着租界，所以它处处与清朝当局为难，不让清朝当局插手界内之事。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了哪种态度，侵占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一

样的。

张之洞摆出一副力争主权的“爱国者”的架势，则完全是自欺欺人。他所争的，不过是镇压中国人民的便利，“将来再有缉拿匪犯之事，便易措手”[175]。如此而已。他忘记了，租界的一切权力都是清朝统治者出卖的。现在，爱国者起来反对卖国贼，卖国贼才急于向主子乞求镇压爱国者的“治权”，更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卖国嘴脸。

中国革命者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在此案中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不过，由于这场斗争主要是同封建统治者进行的，革命者面临的议题是怎样制止清朝政府加剧其镇压行动，这一方面的问题没有被摆在主要地位。反之，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客观上有利于革命，租界当局某些抵制清朝当局的行为还曾经受到赞扬。这种情况不足为怪，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的革命党人长期在租界活动，就是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和帝国主义者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但是，利用这种矛盾并不等于承认帝国主义者的行为是合理的。章炳麟在谈到租界当局对此案的态度时明白指出：“此自各行其志，与吾辈宗旨不同”[176]。这种估计是清醒的。

清朝政府与各国使领的谈判迄无成效。在北京，法、俄、德、美等国公使赞成引渡，但意大利公使反对。英国代办对引渡模棱两可，其驻沪领事却坚决反对。正当交涉紧张之际，在北京发生了政治犯沈荩被害的事。沈荩当过自立军右军统领，7月19日在京被捕，因西太后授意，7月31日在刑部被杖毙。8月间，消息传出，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各国使领便以此为借口，拒绝引渡。为挽回局面，张之洞又出主意，用“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177]的条件同使领们交涉，但已毫无用途。英、美政府先后训令其驻华使节不得同意交人。清廷迫于形势，只好放弃引渡的要求，于11月间由外务部与英使萨道义约定，将章、邹“免除”死罪，仍在租界会讯定判。

为此，会审公廨设立额外公堂，魏光焘派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为主审官，于12月3日、4日、5日连续会审。为了集中迫害章炳麟和邹容，额外公堂于3日当堂释放了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岐、龙泽厚则于17日分别交保、具结释放。12月24日宣判，汪声称应判章、邹永远监禁。但是，英方不同意，判决不生效。后来，舆论纷纷指责将章、邹长期关押而不判刑有违法律和道德，工部局也放出风来，说再不宣判就要将人放掉。清廷外务部怕前功尽弃，这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1904年5月21日，汪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清政府兴师动众镇压新兴的革命运动，制造了“《苏报》案”。可是，比较起它为制造此案而付出的政治代价来说，囚禁章、邹的“胜利”简直微不足道。封建统治者为此案竟一连发了两道“圣旨”，还以政府名义去控告几个普通百姓，一开始就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178) 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为反清革命做了义务宣传。《苏报》的主张通过清方的控状公布于全国，章炳麟、邹容成了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作品不胫而走。政治上敏锐的人们都由此感到，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经是难以阻遏的潮流，镇压只会产生和锻炼更多的革命者。

清朝统治的腐朽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它为镇压革命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也就须按帝国主义者的意旨办事，否则就行不通。它的官吏们对“圣旨”可以阳奉阴违，对“钦犯”可以私纵暗放，相互间明枪暗箭，但在洋人面前却都望而生畏。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又怎么能长期统治中国呢？

章炳麟、邹容在判决之后被囚在提篮桥租界监狱里，分居斗室，每天做工八小时，缝衣、烧饭，吃着恶劣的饭食。他们抽空吟诗、写

作，还读些旧籍、佛典，但最关心的还是狱外的政治动向。每逢探监时间，蔡元培等轮流给他们带来新的消息，许多不相识的革命志士，如禹之谟、卞鼐、吴樾等也前来探望或寄信慰问。章炳麟在狱中还参预了光复会的创立。统治者的监狱关住了一些革命者，却无法关住革命。

1905年4月3日，邹容因不堪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年仅二十岁，离出狱之期仅七十余日。他的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敛暂厝。人们都怀疑他的死是中外反动派下的毒手，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为此特派张继回沪调查。4月5日，中国教育会为邹容开了追悼会。其后，革命志士刘三、刘东海冒着危险将灵柩运到上海县华泾乡，葬在自己的地里，人们称誉刘为“义士”。1906年7月3日，在邹容墓前建成了一座纪念碑，以表达人们对他的怀念。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刑满出狱。在沪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纷纷候门欢迎，东京同盟会总部也派人来迎接他东渡。香港《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报馆都发电慰问、致敬。当晚，章炳麟登轮赴日。

四　孙中山创办军事学校和反对保皇党的斗争

1903年春拒俄运动在东京展开时，孙中山不在日本，他于头年12月离日，到安南（今越南）去了。

孙中山1900年6月的西贡之行没有任何成果。事后，韬美作了一个礼节性的表示，邀请孙中山参观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在河内举行的博览会。到期，孙中山赴安南，而韬美已经离任。孙中山会见了继任总督鲍何（P．Beau）的秘书长哈德安（M．Hardouin），继续提出要求：希望法方援助军械，派人训练革命军，以便在中国南方建立革命政权。鲍何认为对孙中山的支持，会造成法国在华南商业的危机，影响滇越铁路的利益，因此通过哈德安表示，无意改变现行政

府，谈判仍然没有成果[179]。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河内华侨中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当他7月末回到日本时，拒俄运动的高潮已过，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也转入秘密状态。孙中山失去了同这群学生一道进行这场斗争的机会。然而，孙中山和知识界的接触毕竟因新兴知识阶层的活跃而增加了。到横滨山下町寓庐来请教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初交，其中以军国民教育会的积极分子为多。因“《苏报》案”流亡的陈范、黄宗仰等也在横滨，黄与孙同居一楼，他们经常聚议时事和革命方针。

留学生胡毅生、黎勇锡、翁浩、郑宪成、刘维焘等九人，悦服孙中山的主张，愿意参加革命组织。孙中山到东京约见了他们。他们认为，要从事革命，必须通晓军事，但是清朝公使正取缔自费生学陆军，欲学无门。孙中山答应为他们设法，要他们先填写盟书，表示决心。盟书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第一次用这样内容的誓词，取代了兴中会原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这一誓词后来一直沿用到1910年美国旧金山同盟会组织建立之前。

孙中山训练革命军的计划在法国人那里碰了钉子，却得到犬养毅的帮助。他决心建立一所军事学校，通过犬养，聘日人小室友次郎少佐、日野熊藏大尉为教官。日野以研究南非德兰斯瓦波尔人的散兵战术著名。此时，孙中山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专心研究军事，也很重视这一战术，认为它最适用于揭竿而起的中国革命军。他读了大批英波战史和图册，并与日野悉心探讨。关于学校，各方商定，学生自赁一屋同住，白天自习普通课程和日语，晚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以八个月为一期。日野是现役军人，不便公开活动，学生每晚轮流派二人到他家中听授讲义，回来再向大家转述。学校最初赁居东京牛込区，后迁至郊区青山练兵场附近。这里既能避日警耳目，又便于每天观摩日军近卫师团各兵种的操练。

这所学校，后来记载中称它为“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本名已

不可考。它的学生，先后共计十四人，都是来日游学者，其中八人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孙中山第一次在游学生中组织这样一个革命军事团体，它的范围很窄，人数不多，除二人外，其余都是广东人，还没有深入到广大学生中去。

军事学校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本去檀香山，而将同留日学生的联系委托给冯自由、廖仲恺、马君武、胡毅生等人。当时，在拒俄运动高潮和“《苏报》案”之后，东京和国内革命运动暂时低伏，看不出有发动武装起义的形势。而孙中山的活动经费也很匮乏，他便向黄宗仰借了旅费，去他熟悉的华侨聚居之区一行，希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孙中山离日后，革命军事学校发生了变故，因为内部一些纠纷，全体决议解散。它前后一共维持了将近六个月时间。

10月5日，孙中山抵檀香山。此来，距1896年离檀，已过七年，夏威夷群岛已成美国领土。檀岛兴中会在1899年梁启超来此组织保皇会之后，受到严重破坏。仅余的十多个会员慑于保皇党的势力，不敢活动。相反，保皇党却有自己的组织和报纸。这时，檀岛华侨达二万五千余人，仅学生就有一千六百余人，但许多人都被“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所迷惑。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下决心“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180]。

自11月13日起，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几个戏院中连续演说三天。他批驳保皇谬论，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81]演说时，座无虚席，听者动容。随后，又应邀到奥华湖岛的希炉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孙中山见华侨迅速转变，人心归向，就着手恢复和发展革命组织。建立起来的团体，不再叫兴中会，而取名“中华革命军”。取这个名字，为的是“记邹容之功也”[182]。原来，孙中山来檀时，带了一批《革命军》，将它推荐给侨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说：“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

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183] 随着革命组织的恢复，孙中山发行革命债券，向华侨募款，“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184] 的预言实现了。

保皇党人当然不甘心失去檀香山的地盘。康有为弟子陈仪侃这时在檀任《新中国报》主笔，迅即对革命党进行攻击，并诋诬孙中山本人。革命党人对此异常激愤。恰好，老兴中会会员程蔚南主办着一份商业报纸《檀山新报》（俗名《隆记报》），孙中山便让程将它改组为党报。因为没有合适的主笔，孙中山便亲自撰文，同《新中国报》激烈论战。他看准了保皇党的欺骗手法，“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因此决定自己在论战时“所持以为战具者，即用康之政见书以证其名实之离”[185]。这场论战的代表作《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便是按这一方针揭露保皇党人的。

《敬告同乡书》专门揭露“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它告诉人们：康梁“创立保皇会者，所以报知己也”，“故保皇无毫厘之假借”，“如其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塌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实情？”梁启超如真心革命，为何不与康有为决裂？陈仪侃如真心革命，为什么攻击革命演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敬告同乡书》截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它号召人们“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敬告同乡书》一出，《新中国报》惊慌失措，于12月29日也抛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攻。为此，孙中山又在1904年

1月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这篇文章一条一条地将陈仪侃文章中自相矛盾、立论荒谬、逻辑混乱、常识错误之处揭露无遗，通过这种揭露，宣传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孙中山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必先驱逐'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他把希望放在人民身上，说中国"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奋发耳"！他还指出，君主立宪并非中国必经的政治阶段，中国应取法先进，实行民主立宪。他说："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檀香山华侨之所以受保皇党的欺骗，是因为他们虽有强烈的救国愿望，却不懂得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不懂得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孙中山廓清了这个问题，华侨耳目为之一新。以前投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声明脱离，加入中华革命军者源源而来，很快就有近千人之众。革命派的势力压倒了保皇派，檀香山又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一个重要的据点。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离檀香山赴美国大陆，那里也是保皇党气焰嚣张的地方。旅美华侨，十之八九都是洪门，为了易于得到洪门支持，孙中山行前加入了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元帅）。同时，还向茂宜岛当局取得了一份夏威夷土生证书，这一证书为他后来进出各国提供了方便。

4月6日，船抵旧金山。美海关当局得到清朝领事的通知，把孙中山当作乱党，阻止入境。经移民局讯问，拘留于候审木屋多日，竟被判令出境。侨胞伍盘照、黄三德、唐琼昌等极力奔走设法，聘律师那文，向美工商部上诉，才获准入境。

美国大陆华侨没有像檀香山华侨那样受过革命的影响，风气极为闭塞，孙中山活动很困难。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觉悟，孙中山又想到

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在伍、黄二人的帮助下，将这本书翻印了一万一千册，广为散发，很快就在侨胞中流传开去。

孙中山看到华侨中基督教徒较具新思想，便先从此入手。他利用教徒身份，邀集教友开救国会议，推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为主席。孙中山在会上说明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并请与会者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每券美金十元，将来革命成功后，各还本息一百元。孙中山说明："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利权。"(186) 华侨们对于购券都很赞成，但不愿加入兴中会，怕因此危害在家乡的亲友。孙中山同意他们不入会。会后，孙中山共募得美金四千多元。

然而，在美国华侨中势力最大的还是洪门致公堂。孙中山要在美国打开局面，主要还得做洪门的工作。洪门是天地会在美洲分支的名称。当初，它从国内传来时，还保持着"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年代一久，就变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狭隘的侨民福利团体和社会联系纽带。洪门致公堂在美国公开活动，总堂在旧金山，凡有华侨的城市，差不多都有分堂。在中小城市，华侨如不加入洪门，即会受到排挤，无谋生的可能。但是，致公堂的组织却很涣散，总堂、分堂，各自为政，不可能进行一致的行动。保皇会势力几年前即进入美国，梁启田、徐勤、欧榘甲等都加入洪门，利用致公堂扩展组织，各地致公堂职员里较开通者，几乎都兼充保皇会干事。因此，孙中山要做致公堂的工作，就必须使它联络一气，并摆脱保皇党的影响。

孙中山很快同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书记唐琼昌及朱三进、邓斡隆等结为友好，使他们成为反清革命的拥护者，从而推动了致公堂的改革。致公堂在旧金山有一份《大同日报》，总理为唐琼昌，主笔却是保皇党骨干欧榘甲。欧对孙中山来美很反感，在报上加以攻击。黄、唐等竭力劝欧与孙合作，欧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地污蔑孙中山，惹得致公堂职员们很气愤，便迫使欧辞退，请孙中山荐人主持。孙中山推荐留日学生刘成禺为该报主笔，刘于当年夏到职。革命

派在美国夺得一块宣传阵地。5月，孙中山由黄三德陪同，在旧金山丹桂、升平等戏院演说“爱国要义”。清朝总领事在唐人街张贴布告对华侨大加恫吓，但每次去听者还是上千人，而且“听者津津有味”[187]。随后，又赴附近城市演说。孙中山“扫灭在美国之保党”的“苦战”[188]，取得了初步战果。

孙中山建议致公堂进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以便将该堂各分支统一起来。他受致公堂职员们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将反清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新章把“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列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新章还把反对保皇党的斗争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规定“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也是“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又明确规定，对于各种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孙中山希望致公堂能统一在革命的宗旨之下。

5月24日，孙中山、黄三德受致公堂推举，自旧金山出发往各城市鼓励注册进行。行前，致公堂大佬刘学泽等二十余人发公启将二人介绍给各地洪门。公启宣称：“今欲排满革命，舍我其谁！”他们沿南方铁路，经过弗雷斯诺、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匹兹堡、圣路易斯、亚特兰大、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等数十城市，历时数月，于9月28日抵纽约。每到一地，孙中山便发表演说，驳斥保皇谬论，黄三德则招收会员。这一长途旅行宣传使保皇党大为震动，他们也派欧榘甲、康同璧赴各地演说，进行抵制。由于致公堂过分涣散，许多地方被保皇党把持，总注册最后并未完成，但孙中山的游说对美国华侨倾向反清革命，却起了启蒙作用。

孙中山在纽约逗留数月，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会见了不少政界人士。他还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时相过从，讨论后来发展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一整套革命思想，以及革命后的外交、财政等问题。九十月间，他将8月间写成的英文告

欧美人士书《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在纽约出版，印行万册，分赠各国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以及它的国际意义。这本书在纽约、横滨、香港很快被译为中文，成为一种有名的革命宣传品。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结束了美国之行，离开纽约前往英国。

孙中山1903年和1904年在日本、美国的活动对中国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他的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尝试。他为反清革命提出了社会内容更为明确、广泛的主张，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誓词，它包括了正在酝酿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同保皇派的斗争，尤其是廓清革命与保皇之界限的思想斗争，以致使原来解决“经济困难”的“退守”[189]，变成了横扫保皇毒焰的进攻，成功地完成了后来同盟会和保皇派论战的演习。他还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革命团体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表现在名称的改变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纲领、成员成分和活动方式的变化上。这些创新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促成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创新的因素，有孙中山对十年革命生涯的反省，更主要地则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由新型知识阶层的活跃带来的国内（包括赴日留学生）革命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兴中会孤处海外的局面，在孙中山面前顿时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前景。孙中山这时在海外的活动虽然还没有同东京和国内的革命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几股潮流的相互激荡。孙中山努力从国内的斗争中吸取营养。在他批驳保皇党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章炳麟、邹容的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被他当作启发华侨觉悟的利器。他盼望得到国内的支援，诚恳地呼吁说：“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190]。他开始重视新型知识阶层的作用，注意国内、东京革命的

动向。在美洲，他就关心“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东京留学生又如何”，他要处于困境中的“在东国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191]。除了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通报给东京、国内外，他还将自己的经验、成果介绍给他们，希望促进那里的活动。他介绍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同时介绍了十六字誓词和发展“中华革命军”成员的仪式。他说：“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则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192]他还希望上海、东京同志“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193]。孙中山同国内、东京革命力量的关系越来越近。这种情况，预示着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更加壮观的局面来临。

第六节　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

一　日益蓬勃的宣传活动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里，要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从而消灭君主专制政体，建立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件艰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革命启蒙运动。事实上，反清革命运动正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启蒙运动而兴起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反清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先导地位。“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呼号震动全国，首先依赖于革命宣传家们的劳绩。

文字宣传是革命宣传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孙中山领导兴中会独自活动的年代，宣传活动是开展得不够充分的。兴中会只在香港有一份《中国日报》，附带刊出《中国旬报》。兴中会员还办过《开智录》。除此之外，他们只能翻印一些如《扬州十日记》、《原君》那样的旧籍，作为自己的宣传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种沉闷局面被打破了。《国民报》首先以崭新的面目在东京出现，它关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深刻地影响了像邹容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行列，宣传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了。在1903年和1904年，《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出版；《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大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发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反清革命宣传的高潮。宣传活动（包括口头宣传）几乎构成某些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一些革命家名震全国，也首先是由于他们在宣传方面的功绩。这种情况是革命运动刚刚兴起时必有的现象。

革命宣传活动的日益蓬勃发展，可以从革命书报的风行、宣传队伍的壮大和多种多样宣传手段的采用几个方面看出来。至于宣传家们集中宣传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口号，则将在后文专门予以介绍。

一、革命书报的风行：

迄至1905年夏季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夕，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创办或主持的革命报刊，主要的如下表，

报纸：

报名	刊行时间	出版地	备注
中国日报	1900—1913	香港	1911年冬迁广州出版。
苏报	1903	上海	创刊于1896年。
国民日日报	1903	上海	
俄事警闻	1903—1904	上海	
檀山新报	1903—1907	檀香山	俗名《隆记报》，创刊于1905年前后。
俚语日报	1903—1904	长沙	
世界公益报	1903—1904	香港	

警钟日报	1904—1905	上海	
大同日报	1904—1912	旧金山	
图南日报	1904—1906	星加坡	
广东日报	1904—1905	香港	
有所谓报	1905—1906	香港	又名《唯一趣报》。

期刊：

刊名	刊行时间	出版地	备注
中国旬报	1900—1901	香港	
开智录	1900—1901	横滨	附刊于《清议报》。
国民报	1901	东京	
政艺通报	1902—1906	上海	
游学译编	1902—1903	东京	
大陆	1902—1905	上海	
女报	1902—1903	上海	1903年易名《女学报》。
湖北学生界	1903	东京	后易名《汉声》。
直说	1903	东京	
浙江潮	1903	东京	
江苏	1903—1904	东京	
童子世界	1903	上海	
觉民	1903—1904	金山	印刷于上海。
中国白话报	1903—1904	上海	
女子世界	1904—1906	上海	
萃新报	1904	金华	
安徽俗话报	1904—1905	芜湖	

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4	上海
国粹学报	1905—1911	上海
二十世纪之支那	1905	东京

革命书籍的出版更为普遍。在这些书籍中，以政论和介绍反清革命运动者影响最大，最受人们欢迎。此类书中较著名的有：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地	编撰者	备　　注
新湖南	1903	东京	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	
教育界之风潮	1903	上海	爱国青年	
革命军	1903	上海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翻印本甚多，题名不一。
驳康有为书	1903	上海	章炳麟	即《驳康有为政见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地	编撰者	备　　注
辨康有为政见书	1903	香港	黄世仲	
中国民族志	1903	上海	光汉子（刘光汉）	
黄帝魂	1903	上海	黄藻（章士钊）	编者自署：黄帝子孙之一个人。
苏报案纪事	1903	上海	章士钊	
孙逸仙	1903	上海	黄中黄（章士钊）	译述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
沈荩	1903	上海	黄中黄（章士钊）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	1903	东京	新智社	
訄书（修改本）	1904	东京	章炳麟	
猛回头	1904	上海	陈天华	
警世钟	1904	上海	陈天华	
死法	1904	东京	铁汉（蔡汇东）	
攘书	1904	上海	刘光汉	
中国民约精义	1904	上海	刘光汉、林獬	
最近政见之评决	1904	东京	陈天华	
中国问题之真解决	1904	纽约	孙中山	原作系英文，有中译本。

除政论性书籍之外，革命分子还编译了大量有助于革命思想传播的图书，其中包括：

（一）揭露清朝入关暴行和黑暗统治的旧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这类书还被汇编成丛书，如《陆沉丛书》、《明季实录》等。有人还搜集有关这方面史料，编写成书出版，如陈去病的《清秘史》、刘光汉的《光汉室丛谭》等。

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被翻印出版。

（二）宣传革命、反满的史著。如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匪石《郑成功传》、佚名《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

英、美、法、俄等国的革命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衰亡史、独立史，以及外国名人传记，也大批翻译出版。

（三）揭露列强侵略的著译。如《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西力东侵史》、《哥萨克东侵史》、《中俄交涉史》、《俄罗斯对华策》、《俄前皇并吞世界遗策》、《明耻图》、《闽警》等。

（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名著的译本。如《民约论》、《自由原论》、《万法精意》、《物竞篇》、《天择篇》、《社会学原理》、《国体政体概论》、《代议政体》等，以及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的译本。

（五）介绍当时各国社会思潮的译著。如《社会主义神髓》、《世界进步之大势》、《无政府主义》、《虚无党》、《自由血》、《俄罗斯大风潮》等。

（六）各种文艺作品。

革命书报的出版地也就是革命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集中于上海、东京、香港。但书报所传播的地区却非常广泛。上海出版的《苏报》，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昌、汉口、寿州、安庆、芜湖、南昌、福州、南京、镇江、扬州、如皋、杭州、绍兴、宁波、苏州、无锡、松江、常熟、日本横滨等23个地方设有33个分售处。言论稍为温和的《大陆》杂志传布就更广，1903年，它在外地有66个代派处，北至北京、太原，东至蓬莱，西至成都，南至广州，都有人代售。《政艺通报》更超过《大陆》，它的代派处达八十余个。像潍县、天门、常德、泸州、浔州、宁国、锦州这样较小的地方都有出售。连《觉民》这样在小城镇出版的刊物，也有23个代派处，并且深入乡村。革命书报的流传之广，于此可见。

革命报刊的发行量也是可观的。1903年，《苏报》在东南地区各省城中最为闭塞的南昌，发行200份。1904年，《警钟日报》在武昌

发行300份，杭州二百余份，南京四十余份，没有代售处的泰州、泰兴、衢州也各发行3份。其他一些革命期刊，在武昌共发行260份，南京65份。杭州则自有《杭州白话报》，发行约一千份。1903年，《浙江潮》第一、二、三期第三版，第四、五、六期第二版，第七、八期初版，均印行五千册。《湖北学生界》发行量开始很小，后因当局查禁，反而猛增至每期数千册。革命报刊在各地发行的数字虽比不上一些历史长的大报和改良派报刊，但在受到清朝统治者压制的情况下，能达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如果从这些零散的统计数字去估计革命报刊总的印行量，其总数应当是很庞大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是印行数量巨大的典型。《革命军》第一版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各地纷纷翻印。为避免国内外当局注意，翻印时多半将书名改掉，例如1903年在新加坡翻印，改名《图存篇》，同年在香港翻印叫《革命先锋》，在上海翻印叫《救世真言》，在横滨翻印时与《驳康有为政见书》合刊，叫《章邹合刻》。据估计，这本书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共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

革命书报品类繁多，印数庞大，流传广泛，说明革命思想深受群众的欢迎。

二、革命宣传队伍的壮大：

与革命书报的风行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宣传队伍人才辈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和蔡元培都曾以大量精力研究革命理论和推动革命宣传。但反清革命运动初期最著名的宣传家，还应当推《革命军》作者邹容，《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天华和《驳康有为书》作者章炳麟。他们的这几本书都是鼓吹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奠基之作。

邹容（1885—1905）字威丹，四川巴县人。他是富商的儿子，自幼熟读经史，却不肯应科举，常“薄尧舜，非周孔”[194]。1901年

出川，入上海广方言馆。次年9月赴日，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他很快被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所吸引。1903年2月，刘成禺等借新年团拜发表排满演说，邹容起而响应。不久，因愤于一个清朝官员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去强行剪了此人的辫子，被迫回国，住在上海爱国学社。拒法、拒俄运动开始，他异常积极。5月，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想“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195]。当冯镜如成立国民议政会企图将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轨道时，他又在该会成立会上予以怒斥。这时，他与章炳麟、章士钊、张继结为兄弟，他年纪最轻，被视为小弟。

《革命军》是邹容在日本时写成的书，回沪后重加增润，由章炳麟作序，于1903年5月间出版。在自序中，邹容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这本书约二万言，它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大声疾呼革命，要求推翻合专制、卖国与种族压迫为一体的清政府，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由于这本小书系统地阐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主张，加以文笔浅近、犀利，说理明澈，情感丰富，它很快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称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196]。吴樾说，他得到这本书后“三读不置”[197]。人们都以先睹为快。在偏远地区，竟卖到十两银子一本，许多青年还竞相传抄。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极为忌恨。端方说：“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198] 清朝政府制造“《苏报》案”，镇压的对象之一，就是邹容和《革命军》。正反两方的强烈反应，显示了这部作品的威力。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署思黄，湖南新化人。他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塾师家中，幼年曾放牛、当小贩，十五岁才入塾读书。后得人资助，入资江书院、求实学堂。1903年3月，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弘文书院、法政大学。他在拒俄运动中加入了拒俄义勇

队、军国民教育会，并自认为归国运动员。同年10月，俄军强占奉天，他又啮指作书，呼吁湖南同胞救亡，连巡抚赵尔巽也为之感动。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革命救亡的宣传品上，经常闭门疾书，写到痛心之处，往往独自泣不成声。1903年夏至1904年初，他先后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这两本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而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立即行动，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猛回头》、《警世钟》反帝爱国思想的强烈程度超过了当时的同类作品。这两本书还以通俗易解见长。前者以弹词，后者以白话写作，所以很快就深入到农村、军营和工人、平民中去。浙江金华的会党成员曹阿狗得到《猛回头》一书后，“日夜讽诵不辍，又到各处演说”，结果被官厅杀害[199]。武昌街头一个摊贩，将《猛回头》背得烂熟，逢人便为演说。为了阻止《警世钟》的流传，清朝上海当局在1904年制造了“《警世钟》案”，迫害出版和代售该书的书商。清方的禁止，反倒促使这两种书更加广泛地风行起来。

《驳康有为书》的作者章炳麟则是早著声名的学者。1899年，他就将此前要求改革中国政俗的文字汇刻成《訄书》。由于他此时还在“与尊清者游”，这本书未能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1900年，他与改良派决裂后，开始对书中内容“匡谬”。1902年从日本回乡，又着手大加“删革”，排除改良主义观点，增加革命内容。增订的《訄书》在1904年、1905年接连印了两版。新版本增加了《客帝匡谬》、《订孔》、《序种姓》、《解辫发》、《定版籍》、《地治》等重要文章。《訄书》是章炳麟对中外政治、学术进行深刻研究后写成的，包括许多积极的革命的观点，但它学理艰深，文辞古奥，很难广泛流传。章炳麟此时作品中最受民众欢迎的还是《驳康有为书》。

1902年，华侨中的革命倾向增强，康门弟子中也发生了某种离心倾向。为了稳住阵脚，同年6月，康有为写了一封《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又写了一篇《与同学诸子论印

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有为以革命会造成流血破坏、招致外国干涉等为理由，要人们等待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保皇会除将这两封信登诸报刊外，还印成小册子到处散发。为此，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书》这封公开信。它严正指出，满清为了维持其种族压迫，决不会放弃政权，实行立宪；只有用革命推翻满清，实行合众共和，才能使中国免为欧美之奴隶。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初版印行三千册，顿时销售一空。

邹容、陈天华、章炳麟之外，郑贯一、杨笃生、章士钊、刘光汉、等都是卓有贡献的宣传家。郑贯一（1881—1906）名道，号贯公，广东香山人。他是《开智录》的创办人，1901年出任《中国日报》记者，将新的思想和文风带到香港，大受读者欢迎。后来，又创办过《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他善于结合民众切身问题，并通过各种通俗形式，宣传革命的政治主张。杨笃生（1871—1911）名毓麐，后易名守仁，湖南长沙人。清拔贡，1898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1902年5月赴日留学。同年，他与同乡同学创办了《游学译编》，并写了《新湖南》一书，较全面地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邹容、陈天华的一些重要观点，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秋桐，湖南长沙人。1903年由江南陆师学堂退学入爱国学社，被聘为《苏报》主笔，继主持《国民日日报》。他编著的《黄帝魂》、《孙逸仙》、《沈荩》、《苏报案纪事》，都是非常流行的革命宣传品。他的文章慷慨激烈，又善于析理，富有感染力。刘光汉（1885—1919）原名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出身于经学世家，本人又是清举人。1903年春到沪，结识章太炎等，开始发表革命文章，曾任《警钟日报》主笔。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了一些新思潮。作品中经常将陈旧的儒家说教和激进的社会思想掺杂在一起，尤其喜欢引经据典地说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早已萌发于中国前哲的学说之中。

在革命宣传活动中崭露头角的宣传家还有秦力山、戢翼翚、张

继、马君武、孙翼中、陈诗仲、汪德渊、吴稚晖、林獬、蔡汇东、郑权、黄世仲、金天翮、陈由己、陈去病、邓实、高旭（天梅）、柳亚卢（亚子）、陈撷芬、林宗素、吴弱男等。革命宣传活动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正是这支庞大的宣传队伍积极努力的结果。

三、多种多样的宣传手段：

革命宣传家们认为，反清革命依靠“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因此，“言革命教育者，必在两等社会”[200]。“中等社会”指的是知识阶层及其他有文化的人，“下等社会”指的是没有文化的农、工、商。这样，宣传家们就必须讲求为这两类人易于接受的手段，特别是为“下等社会”所易于接受的通俗手段。

文字宣传的主要体裁是政论文。一篇政论能否广为流传，除了看它的思想内容外，还得看它的文字是否通俗易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它们浅近通俗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革命政论大多自“新民体”变通而来，正有雅俗共赏的效用。所谓“新民体”，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种文体，是比较浅近流畅的文言文。值得称赞的，是革命宣传家们所自觉地倡导的通俗形式，突破了脱离口语的文言，而直接采用民间的歌谣和白话。章太炎是以文词古奥著称的，但他也写了通俗唱词《逐满歌》。这样的通俗歌谣，当时为数颇多。赵声写的唱词《歌保国》，印行数十万张，散布民间，“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纸，习其词若流”[201]。宣传家们还极力推广白话文。他们认为，“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并且预言“就文字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还，必经白话盛行之一阶级”[202]。1902年，汪曼锋、孙翼中、杭慎修等创办了《杭州白话报》。次年12月，林獬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主张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203]。林獬（1874—1926）字少泉，后易名万里，福建侯官人。他就是后来的著名记者林白水，当时自署“白话道人”。陈乾生（由己、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也是一份有名的革命刊

物，很重视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中国日报》、《俄事警闻》也都用一定篇幅发表白话文章。1903年至1904年，东南地区白话报竞相创刊，著名的有浙江的《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州白话报》、《衢州白话报》，江苏的《苏州白话报》、《江苏白话报》（常熟），江西的《新白话报》、《青年爱》，上海的《智群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福建的《福建白话报》和留日学生演说会的刊物《白话》等，这些白话报的政治主张并不一样，但对传播进步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定的功劳。

社会影响广泛的戏剧形式也受到宣传家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各处的戏剧，就是各种普通学堂”，戏剧的感染力比文字，绘画“功效大得几十倍”[204]，因此主张“要倡出一班文明新戏来”[205]。1903年，革命派刊物上就常登出一些短小的传奇，不过这些剧本只是文字创作，不便演出。1904年秋，陈去病在上海和京剧大师汪笑侬合作，联合著名演员时慧宝、孙菊仙、夏月润、冯子和等演出新剧。汪笑侬期望戏剧“隐掺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亲自编演了《党人碑》、《瓜种兰茵》、《桃花扇》等戏，以演说历史来教育观众。同年，他们还出版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新剧，发表剧本。这份杂志宣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206]。由于宣传家们的提倡，演出借古说今的历史剧蔚为风气，渐渐发展到演出现代题材。有的学校学生编演了张文祥刺马、叶廷琛被拘、张廷标被俄兵杀害等戏。林獬写作了剧本《玫瑰花》，在沪演出。昆剧也受到重视，吴梅创作了《风洞山传奇》。

小说也是宣传家们经常利用的形式，他们不断在报刊上刊载小说。著名小说《孽海花》的头几回，就是由金天翮开始写作的，发表于《江苏》杂志，后来才由曾朴赓续成书。《警钟日报》连载了小说《孽海镜》，描写革命青年朱光复的故事。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自由结婚》，当时也颇流行。革命宣传家们这时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少，但由于政治说教过多，缺乏艺术形象，没有留下什么传世

之作。他们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小说，最著名的是苏曼殊、陈由己译的《惨世界》（雨果《悲惨世界》）。他们在译文中掺进了宣传革命的话，这是宣传家们翻译小说时的一种风尚。

宣传家们还利用了漫画这种形式。他们认为“这真是开通下等社会的利器”[207]，本轻、价贱、易卖、易懂、耐久、便于流传。上海《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都刊载“时事漫画”。有人在租界里编印了漫画集《明耻图》，并将漫画制成“国耻月份牌”，广为流传。为此，清方还派人同领事谈判，要求查禁。

音乐也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宣传家们利用各学堂的教学、集会和社会上的集会，教唱革命歌曲。1905年初，出版了爱自由者（金天翮）的《国民唱歌》，包括作者创作、改制的歌曲《祝自由神》、《招国魂》、《哀印度》、《吊埃及》、《娘子军》、《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思祖国》等四十多支歌曲，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赞美革命。

在革命宣传家们利用的文艺形式中，传统的中国诗词是最发达的部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娴熟这一体裁，他们利用它来传播革命思潮。自1902年《大陆》、《政艺丛编》创刊后，许多著名的报刊都辟有刊载诗词的专栏。当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诗人有章炳麟、马君武、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于右任、黄节、高燮、刘光汉、金天翮、邓实、黄宗仰、谢无量等。高旭（1877—1925）是当时创作量最大的诗人。他与叔父高燮等创办诗社，“欲以韵语力鼓动一世”[208]。早年受维新派影响，在《清议报》上发表新体诗，响应“诗界革命”。1903年，梁启超于美洲之行后，政治思想急剧倒退，发表文章，宣称与“共和”诀别：“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与汝长别矣！”[209] 高旭幽默地写诗赠梁：“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表示了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热烈向往。这一年，近代著名

诗人柳亚子刚十六岁，就开始发表革命诗文，显示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同年，陕西举人于右任痛心“可怜好山河，葬送奴才手”，写诗抨击清朝统治的黑暗，刻成《半哭半笑楼诗集》。1904年，被当局通缉，他从考进士的试场上逃往上海，参加了革命宣传队伍。这一时期，革命诗人辈出，激昂慷慨的革命诗歌，奏出了反清革命的最强音。

由于革命宣传家们利用了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切宣传手段，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仅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倾心革命，广大的劳动群众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后来，士兵、会党、农民、商人纷纷加入革命，与革命宣传家们的多方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革命宣传家们广泛地利用各种手段宣传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

二　革命排满，建立共和——革命宣传的中心口号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所进行的革命启蒙教育是多方面的，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前途问题。他们指出，只有“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才能免中国于危亡，致中国于独立富强之境。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是革命宣传的中心口号。

革命宣传家们向人民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中国已经成了列强竞争角逐的焦点，“瓜分之祸”、“亡国灭种，就在眼前”(210)。陈天华在《猛回头》里触目惊心地揭示：“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庭原是个名存实亡。”在《警世钟》里，他进一步指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在说明列强的侵略政策时，他们已经采用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试图对这个新出现的“大怪物”进行分析。杨笃生指出，帝国主义不是一两个大人物意志的表现，而是“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

也”[211]。他还指出，列强“耀兵力以索取商权”的政策已经变化，改变成以掠夺租界、铁道、矿产、传教、工商等权为主的“殖民政略”。他们向被侵略国家进行“资本灌入”[212]，“凡资本所在之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213]，“以工商势力圈限为其名，而以政治圈限为其实”[214]。这种分析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揭示其某些特征上，却也入木三分。这说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重大提高。宣传家们还着重分析了当时列强侵华手法的变化。《国民报》指出：列强灭亡中国，“用无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215]。杨笃生指出，列强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放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216]，“外示交亲，阴图攫夺，美其名曰‘领土保全’，婉其词曰‘门户开放’，而主权寖失，名存实亡”[217]。陈天华指出：“留住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218]他们还指出，列强之所以改变手法，重要原因是“以为强暴举动，恐激怒中国人民”[219]。但是，为了防止侵占的权益被收回，列强又必将反对和阻遏中国的一切进步改革。革命宣传家们尖锐地警醒人们：由于主权大量丧失，中国实际已经亡国，或者濒临灭亡的边缘。他们说，中国已“为白人所公有”、“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220]，中国人民已沦为“两层奴隶”、“三层奴隶”、“数重奴隶”。他们大声疾呼，处在这种形势下，“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221]。陈天华正告人们：“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222]

挽救中华民族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发点。

为什么中国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的反帝热情得不到伸张呢？为什么“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呢？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这个反动政府卖国、专制，并实行种族压迫。他们勇敢地对清

王朝进行揭露和批判：

一、宣传家们揭穿了清朝政府卖国贼的嘴脸。许多革命宣传品都抓住清廷典型的卖国谰言——“宁赠友邦，勿与家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无情地加以揭露。他们历数六十多年中清廷丧师辱国、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历史，特别强调地指出，清廷连“发祥之地都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宣传家们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听命于洋人的走狗。他们说：“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具”[223]，“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为外人效奴隶之用者也”[224]。最鲜明地揭露这一点的，莫过于陈天华“洋人的朝庭”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其作用仅在“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清朝政府既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处于这样特殊的地位，那末，要抵抗列强，就绝对不能依赖这样的政府，要抵抗列强，“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末由”[225]。

二、宣传家们不遗余力地揭露了满洲贵族实行的种族压迫。这一内容在所有的宣传品中，占的比重最大，语言也最激烈。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都认为，中国在发生亡于洋人的危险之前，早已亡于满人了。邹容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满洲人为君。”[226]他们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的种族压迫，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到镇压洪、杨，杀害谭（嗣同）、唐（才常），从垄断政权说到俯首洋人，从宫廷淫侈说到士农工商的被钤制压榨，从衣服辫发说到各省驻防。清朝的一切政策几乎都在清算之列，如有人所说：“二百年来之历史，皆爱新觉罗氏之罪状。”[227]他们认为，清廷“割让支那之土地，挥霍支那之权利而不之惜者，以种族不同之故；葅醢支那之志士，禁锢支那之学界而不之悔者，以种族不同之故”[228]。种族压迫既成了各种祸患的原因，也就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陈天华说：“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得这步田地。”

[229] 因此，他们指出满人是同胞之“公敌”、“公仇”，必须“驱逐”。很显然，这些议论是正义的，但也是偏激的。

三、宣传家们还控诉了清朝的封建专制，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这是《革命军》开宗明义的话。宣传家们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作为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将“国家”同“一家之谓”的“朝代”、“举土地为一己之私产，举人民为一己之私奴”的“政府”区别开来，指出国家“人人有之”，“苟以一人而用其专制之权，是一国之所不容也”[230]。他们还坚持将“国民”同“奴隶”区别开来，指出国民应当有权利、责任，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他们说，国可以无君，不可无民，“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231]。根据这种理论，封建君主专制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宣传家们指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说：“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学术者，所以开民智也，而民贼愚之”；“政治者，国民公共之机关也，而民贼专之”；“法律者，国家之公器”，“而民贼私之。”[232] 他们指出，清朝也不例外，不过是“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其“历世相传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贼者乎？”[233] “凡可以遏民气、抑民权、破坏国民之团体者无不为”[234]。所有这一切，都与天赋之权“大相反对”，因此，必须推翻这种统治，“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235]。

以上从三个不同角度所作的揭露说明，清朝统治是当时中国一切落后、腐朽的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三个方面的揭露都导向一个结论：中国人民要挽救民族危亡，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关于这一结论，革命宣传家们是异口同声！

邹容说：“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

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236]

陈天华说：“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呢？”[237]

章炳麟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238]

杨笃生说：“今日欲拔出于欧洲之坎窞，则不得不拔出于胡族之坎窞；欧洲之坎窞，借胡族以为入阱之隧。”[239]

张继说：“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主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以驱逐之也何难！”[240]

革命宣传家们这种坚定明确的回答来之非易。此前，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也都是把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们只有昙花一现的机会。它们都维护清王朝，而结果是：一个失败于封建顽固派的反扑；一个失败于中外反动派的绞杀。和维新派、义和团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担负起民族兴亡之责时，不再是维护清王朝，而是举起革命的大旗推翻它。也就是说，他们懂得了在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于是，革命宣传家们共同的答案汇成了“革命排满”的口号。这个口号响彻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整个历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献之中，处处是“排满”二字。对待“排满”的态度，被革命党人作为划分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界线。

“排满”口号和“排外”口号一样，都不是科学的语言，会引起消极的反应。第一，有人因此放松了和帝国主义的正面斗争。革命宣传家

们最早提出“民族主义”时，包括“外拒白种，内覆满洲”[241]两个方面。但在强调“排满”时，有人就强调“自今以后，莫言排外”[242]，或者说，“排外之心不可无，排外之暴动必不可行”[243]。这种一般地否定“排外”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它违背了为抵抗列强而“排满”的初衷。第二，汉族的种族主义情绪因此滋长。在革命宣传品中用侮辱性的词汇攻击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把满族发源的东北视为化外之区。同时，又无分析地宣传了汉族封建时代的光荣历史。这样就忽视了中国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反对封建统治却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任务。第三，它妨碍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要求放在重要的地位，降低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水准，等等。

不过，“排满”之所以叫做“排满”，而不叫“排清”或其他，并且口号一出，一呼百应，却是中国既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满汉矛盾是客观存在。蔡元培即曾指出，清朝采取汉化政策后，满族仍然保留着特权，“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这三种特权，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压迫民族的象征。它除了形成满洲贵族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还形成了满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不同于一般民族差别的隔阂。加以，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满洲统治者的种族主义情绪在迅速增长，它又加深了这一过去曾经趋于缓和的矛盾。这是“排满”口号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于，“排满”口号所凝聚的社会内容远远超出了满汉矛盾的范围。如前所述，它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要求和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对于不受人们注意的、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一些宣传家曾特别予以强调。蔡元培指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244]章士钊也指出：“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地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

[245] 蒋方震指出："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者也。""既言自由，而民族主义之根蒂生也。""民权之进一步，即为民族主义，而民权未发达，则民族主义必不能行。" [246] 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指出："排满"不应"专其祸以贻少数人之满洲人"，而应针对满族中那些"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者。"汉人之所抵抗者，在朝之满洲民贼" [247] 。蔡、章等人的解释实际上是说：满洲贵族在封建政权中占的特殊地位并实行种族压迫，乃是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革命党人提出"排满"口号时，抓住了这一特殊存在形式易见易闻的便利，将革命的对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但究其根本，仍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这一点出发的。在观察"排满"这一口号时，不能忽视隐伏在它背后的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的社会内容。

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还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贡献给中国人民，提出了"建立共和"的口号。

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提出，革命独立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他的著作是在"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欢呼中结束的。

建立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诞生，也是对清朝政府卖国、专制和实行种族压迫揭露的结果，特别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揭露和批判的直接产物。革命宣传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时，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对立的、权力为国民共有、人人自由平等的国家，要求建立"新中国"、"新国家"、"新政府"，共和国的影象呼之欲出。但是，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方案的，还是邹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自《革命军》一出，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遂成定论。有人断言，在中国，"二十世纪中，必须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 [248] 。除去个别人曾在诗文中含糊地使用过"帝国"、"中华大帝国"这种词汇外，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队伍中从来没有人著论怀疑或反对过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应当具备哪些内容呢？邹容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二、“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

三、“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四、“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五、“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六、“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七、“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八、“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九、“各人权利，必需保护，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十、“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十一、“‘中华共和国’为独立自由之国”。

十二、“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在提出这些纲领时，邹容说明是“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上引各条内容，有八条是因袭当时所译的《美国独立檄文》[249]的原文。邹容还要求，共和国的宪法、自治法、民法、政府组织等方面都

参照美国的办法。

这份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浸透着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邹容曾经强调，革命有“野蛮”与“文明”之别。“野蛮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带有盲目性的群众自发斗争。他认为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因此，他要求“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争自由平等独立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这种“文明革命”，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将革命加以“野蛮”和“文明”的区分，是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历史使命的表现。邹容规定中国“文明”革命的基本内容说：“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廓之中。”条分缕析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就是这一基本内容的扩展，它的核心是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权利。从这个核心出发，要求建立维护这种权利的民族的、民主的共和国。这种国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建立共和”的口号和“革命排满”的口号，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后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打击对象问题，前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问题。可以看到，“共和”的目标正是从“排满”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排满”口号所诉说的社会要求，都在邹容提出的“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得到了满足。“建立共和”又发展了“革命排满”口号，它把隐伏在“排满”口号背后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普遍性社会内容放到了突出地位，指示了建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目标，这就克服了单纯“排满”的弱点。章士钊指出：“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输灌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正（政）、朱元璋之志，而徼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次革命不止。”[250]“建立共和”的口号弥补和矫正了“排满”口号可能带来的弱点，它表现出革命宣传家们没有忽视反对封建政治制度问题。

“革命排满”和“建立共和”二大口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资

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反清革命的根本主张。当时，就有人将它们概括为“民族主义”（“对将来之欧美人而言，自立主义是也；对现在之满洲人而言，逐满主义是也”[251]。）和“民权主义”，这两大主义构成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宣传的主旋律。

革命派的宣传家们对“革命排满”、“建立共和”两大口号的威力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以之启发群众，以之揭露清朝，还以之和保皇党、立宪派作斗争。

康有为拿“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来吓唬革命派。革命派则强调列国文明皆从流血得来。他们呼唤：“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252]

康有为拿“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昭，旧俗俱在”来动摇革命派。章炳麟针锋相对地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公理未昭，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253]

保皇党拿“外人干涉”来威胁革命派，革命派回答他们：“夫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254]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自认为，他们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旗号是无往而不胜的。

在革命宣传丰富的内容中，值得重视的还有宣传家们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和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

1901年，《国民报》就指出，英美“国内之政治，未造自由平等之极者伙矣”，我国不能只希望“与欧美等”，而应“造乎极域”，“转令欧美之人，自我而享自由平等之实福”[255]，首先表现出探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愿望。1903年，章炳麟等指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256]。章炳麟、秦力山还记载了他们和孙中山讨论土地制度问题的内容，秦主张将全国土地作为无主地分给耕者，“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257]。这年，邹容宣称，他正在考虑“均贫富”的问题[258]。而《俄事警闻》说，在一定时候“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259]。1904年初，蔡元培在《新年梦》一文中设想了“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的未来极乐世界，在那时“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260]。不久，刘师培作《论中国阶级制度》一文，要将“阶级制度消灭无存，而中国之民悉享自由之幸福”[261]。革命派人物的这种探索明显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很早就有人在中国作过介绍。1903年前后，革命派的书报也对它产生了兴趣，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等派学说。但无论是介绍者或读者，对这些思想学说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许多人从其中得到的，仅仅是对被压迫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和对激烈制裁反动统治者的兴趣。例如，对于俄国虚无党，中国革命者反复称道他们暗杀手段的激烈、勇敢，对其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却未遑深论。中国革命者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无法脱离中国的社会环境，他们往往只能提出一些含糊的愿望，然其本质还是发展资本主义。如刘师培主张“泯主仆之称，使世之乏资财者悉行作工自由之制（原注：作工自由即雇工之制也），以争存于社会之中”。这一主张实质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他们有时也直接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譬如有人说：“兴利之策，以开源为主。时至今日，惟有广开工厂，振兴实业耳。”“复合各地之绅商，经营路矿，使兴利之权在下而不在上。”[262] 郑贯一指出，铁路、矿山等主要经济部门在清政府下应当争归民有，等新政府成立再归国有，因为新政府也是民有的。但是，总的说来，宣传家们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说得很

少，他们都被迫切的政治问题吸引住了。

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也是《国民报》发端的。它指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所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于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乃所谓自由之精神也。"这些话无疑是精彩的。革命宣传家们用自由平等观念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所谓名教者，教猱升木，便利盗贼夷狄之利器也"，"以吾国民之性命，供白人之葅醢，亦孰非名教者邪？"[263] "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264]。"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牢固益牢固"，"由是以君权之无限"[265]。"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266]。"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束缚思想，拙塞灵明"[267]。举凡名分、礼法、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礼乐、道统、正统、汉学、宋学，都受到指责。邹容给封建说教一个名称："造奴隶之教科书。"批判的矛头还指向"至圣先师"孔子，指出"孔子是个顶喜欢依赖皇帝的东西"[268]，"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269]。随着这种批判兴起的还有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要求，它日益发展为群众性的运动。但是，必须指出，革命派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极不充分的，相反，许多革命者不能摆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迷信封建说教。孔子依然是个偶像，连邹容也称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尧舜禹汤周孔"遗教"更是许多人所念叨的。一部分宣传家附合儒家学说以宣传"革命排满"，讲究夷夏之辨、九世复仇，还有人把孟子的"民为贵"说成民权思想，主张尊孟抑孔。这种附会的办法给政治宣传带来一定的便利，但和封建思想妥协也反映出革命派的局限性。1902年，邓实主编的《政艺丛书》中出现"保存国粹"主张。1904年冬，他又与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组织国学保存会，发刊《国粹学报》，形成一股思潮。章炳麟被他们奉为大师。这些人当时并没有独立于革命派之外的政治

主张，也讲求西学，但他们认为“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先；金阪六弢，作五洲文明之祖”[270]，忧心“国学之呃，未有甚于今日者”，在文化思想上趋于保守。他们夸大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历史地位，后来有些人还成了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与革命渐行渐远。

反清革命的民主主义要求使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揭开了对社会经济制度变革问题的探讨和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发挥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显然没有认真进行到底。他们不懂得，忽视了这些，必然会影响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就。

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其革命活动时，他们把自己的行动叫做“造反”，后来在外国人启发下，才改称为“革命”。但是，“革命”在当时并不像后来这样被认为是正义、崇高、美好、神圣的事业，相反，它是一个可怕的专用词，清廷就直呼革命党人为“革命匪党”，谁要是“附从革命”，那就等于自绝于社会。这种局面的扭转，人们视听的矫正，主要是革命宣传的功劳。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271]这种跳踯迭荡的呼喊，不能不振聋惊聩，激荡人心，吸引广大的人群投身这神圣的事业。革命的反对者记载了这样的情况：“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此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272]革命宣传的效果于此可见！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革命宣传活动正是这样为反清革命队伍的发展和武装起义的举行开辟着道路。

(1) 孙中山用过的名字很多。他幼名帝象。1876年，塾师为他取名文，稍长取号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号逸仙（日新的粤语谐音）。在日本时，除中山樵一名外，后又曾化名高野长雄，信函签名常简称中山、高野或长雄。此外，曾自署载之、公武。在多次赴欧美及南洋各地时，曾化名陈文、陈载之、高达生、杜嘉偌等。

(2)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页。

(3) 《答翟理斯教授书》，黄季陆编（以下简称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6页。

(4)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5页。

(5) 《非学问无以建设》，黄编：《总理全集·演讲·庚》，第1页。

(6)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0页。

(7) 《致郑藻如书》，《濠头月刊》第14、15期合刊，原载于1892年澳门报上。

(8) 《革命思想的产生》，《总理全书》，台北版，第921—922页。

(9) 《伦敦蒙难记》，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页。

(10) 《伦敦蒙难记》，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页。

(1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24页。

(12) 冯紫珊：《致冯自由函》，《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28年版，第31页。

(1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0页。

(14)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1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参见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

(16)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参见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

(17) 《南海诗集》卷4。

(18) 《爱国论》（二），《清议报》第7期。

(1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20)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89页。

(21) 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1—32页。

(22) 《致南海先生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24页。

(23) 《致孙中山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90页。

(24) 《与夫子大人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03页。

(25) 《致孙中山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40页。

(26)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27)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安兄（毕永年）会中峰（孙中山）于东而议定，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林受祜藏。

(28) 关于此事，杨衢云对谢缵泰说："有一天，孙逸仙博士告诉我，扬子江各省的哥老会已经推选他为会长，并且暗示说，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新职位，那我就必须独立工作。"见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29) 关于毕永年愤而为僧的时间地点，冯自由《革命逸史》及以后不少著作都错。此据平山周说，见《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35之10，又见《中国秘密社会史》和林圭的《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

(30) 冯自由：《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6页。

(31) 《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

(32) 《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

(33) 《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

(34) 《亚东时报》第19号，1900年2月28日。

(35)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35之10。

(36)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31页。

(3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5页。

(38)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18页。

(39)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林受祜藏。

(40)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林受祜藏。

(41) 《庚子革命先烈公墓碑》拓片。

(4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1页。

(4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7页。

(44)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22页。

(45) 《法国驻东京公使致印度支那总督》，1900年6月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印支，Bll（36）。

(46)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

(47)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0年10月7日、2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印支，Bll（36）。

(48) 英国外务部档案，F．O．N．类第1718号：《英国自治领中之中国革命党》。

(49)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48页。

(50) 《孙逸仙谈话》，1900年7月25日兵库县知事报告，发兵秘字第410号，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

(51)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52) 关于上书卜力，提出平治章程的时间，说法不一，但上卜力书有“竟因忠谏，惨杀无辜，是谓戮忠臣”等语，显指清政府杀许景澄、袁昶事；许、袁被杀在1900年7月28日，则此书定稿当在事后不久。

(53) 《神奈川知事报告》，外务省机密受第1532号；《福冈县知事报告》，外务省机密受第5932号、第994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

(54)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79页。

(55) 黄中黄译录：《孙逸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128页。

(56) 关于惠州起义爆发时间，一般史书均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10月8日，此据粤督德寿奏折〔《辛亥革命》（一），第242页〕及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台北《传记文学》第214期，第20页）订正。

(57) 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41页。

(58)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5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0)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1)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22页。

(6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24页。

(63)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4)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5)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7) 《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3期，1901年7月。

(68) 《苏报》，1903年5月31日。

(69) 《苏报》，1903年6月4日。

(70) 《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3期，1901年7月。

(71) 吴稚晖：《我亦一讲中山先生》，《吴稚晖全集》，1927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版。

(72) 时在1901年。其间，章炳麟见到其师俞樾，俞虽已衰老不堪，仍肝火十足地教训这个不安分的学生，责其“不孝不忠，非人类也”，要“小子”们“鸣鼓而攻之”（《谢本师》，《民报》第9号）。俞樾希望章能回到书斋治经，但章却举顾炎武为榜样，答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

浩期后生也？”（《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从此，断绝了同俞樾的关系。这就是章炳麟“谢本师”的故事。

(73)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书·序文》，1904年11月，东京。

(74)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05页。

(75) 秦毓鎏：《青年会会员合影题跋》，《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

(7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6页。

(77)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说：孙中山“召成禺及马君武赴横滨曰：‘吾朋侪中有勇气毅力，莫如二子；余非依违两可，即临阵脱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满，舍排满而言民族，其能唤起国内人民之清醒乎？今有一机会，元旦留学生团拜，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开演说会。禺生与君武，能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大放其辞，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第46页）按，孙中山于1902年12月即离日赴河内，能否在事前就对二人作如此具体的安排，是可疑的。但孙中山希望有人能在公众场合倡言“排满”，却是可信的。

(78) 《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79) 《江苏》第2期，1903年5月。

(80)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卷45。

(81) 这一团体，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钱家治《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作励志社，陶成章《浙案纪略》作浙会，沈祖绵《光复会二三事》作浙学会，兹从前者。

(82) 《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

(83)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1902年12月。

(84) 《中国教育会募捐启事》，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7页。

(85) 《南洋公学学生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教育界之风潮》卷11。

(86)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4。

(87) 《破坏之教督》，《教育界之风潮》卷11。

(88) 《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教育界之风潮》卷11。

(89)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1902年12月。

(90)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1902年12月。

(91) 《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

(92) 《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

(93) 《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

(94) 《论江西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苏报》，1903年6月1日。

(95) 《敬告杭州学界中人》按语，《苏报》，1903年6月19日。

(96) 《续志俄国学生大冲突》按语，《苏报》，1903年5月6日。

(97) 《无锡竢实学堂冲突之忠告》，《苏报》，1903年6月9日。

(98)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99)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100)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2。

(101) 《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苏报》，1903年6月20日。

(102)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103)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104) 《记电争广西事》，《江苏》第2期，1903年6月。

(105) 《张园演说摘录》，《苏报》，1903年4月27日。

(106) 《张园演说摘录》，《苏报》，1903年4月27日。

(107) 《张园演说摘录》，《苏报》，1903年4月27日。

(108) 《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

(109) 《记两广绅商在广肇公所会议事》，《苏报》，1903年4月27日。

(110) 《呈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111) 《寄各国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112)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

(113)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

(114)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

(115)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16)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17)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18) 《苏报》，1903年5月8日。

(119)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20) 《湖北学生议阻俄谋》，《苏报》，1903年5月18日。

(121) 《安徽爱国会拟章》，《苏报》，1903年6月7日。

(122)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123) 《八旗生员公上外务部王大臣书》，《大公报》，1903年5月13日。

(124) 《苏报》，1903年5月14日。

(125) 《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30日。

(126) 《学生军规则》，《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

(127)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大公报》，1903年5月30日。

(128) 《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苏报》，1903年5月3日。

(129) 《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7日。

(130)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903年日本印。

(131) 《致费善机函》，《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15页。

(13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5期，1937年12月。

(133) 《上海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之冲突》，《浙江潮》第6期，1903年7月。

(134) 《中国教育会第二年改良章程》，《苏报》，1903年5月15日。

(135) 易季服当时是保皇党人，后来转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36) 《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

(137) 章炳麟：《邹容传》，《革命评论》第10号，明治四十年3月。

(138) 《苏报》，1903年6月3日。

(139) 《论报界》，《苏报》，1903年6月4日。

(140) 无名氏：《杂感》，《苏报》，1903年6月11日。

(141) 《杀人主义》，《苏报》，1903年6月22日。

(142) 爱读革命军者（章士钊）：《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143) 《新书介绍·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144) 《新书介绍·驳康有为书》，《苏报》，1903年6月20日。

(145) 《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72页。

(146) 冯自由：《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

(147) 《读〈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苏报》，1903年6月6日。

(148) 《密谕严拿留学生》，《苏报》，1903年6月5日。

(149) 《大公报》，1903年6月28日。

(150)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3页。

(151) 《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年6月9日。

(152) 《致费善机函》，《拒俄运动》，第115页。

(153) 《端方与梁鼎芬》，《浙江潮》第6期，1903年7月。

(154) 《吕海寰与蔡钧》，《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155) 《满洲问题》，《游学译编》第9期，1903年7月。

(156) 《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157) 转引自冯自由：《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2页。

(158)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08页。

(159)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08页。

(160)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4页。

(161)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11页。

(162)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3)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4)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5)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6)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7)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8) 《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甲寅》第1卷，第43号。

(169) 《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甲寅》第1卷，第43号。

(170)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21、423页。

(171)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21、423页。

(172)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

（一），第425、427、428页。

(173)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25、427、428页。

(174)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33、428页。

(175)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33、428页。

(176) 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苏报》，1903年7月6日。

(177)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32页。

(178)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一》，第65、66页。

(179)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3年2月26日，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印支，B11（36）。

(180) 《致黄宗仰书》，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22页。

(181) 《孙公中山在檀香山史略》，《檀山华侨》，自由新报社1929年版。

(182) 《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183) 《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229页。

(184)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0页。

(185) 《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229页。

(186) 冯自由：《孙总理癸卯游美补述》，《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5页。

(187) 《警钟日报》1904年6月19日，转录《大同日报》消息。

(188) 《致黄宗仰书》（1904年6月10日），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23页。

(189) 《致平山周书》，1903年11月6日，黄编：《总理全集·函札》，

第19页。

(190)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1)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2)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3)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4) 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容墓表》，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65页。

(195)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

(196)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6页。

(197) 《吴樾遗书·自序》，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374页。

(198)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46页。

(199)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12页。

(200)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201) 章士钊：《赵伯先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12页。

(202) 《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203) 《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2月。

(204) 《告优》，《俄事警闻》，1904年1月17日。

(205) 《北京的知耻会》，《警钟日报》，1904年3月10日。

(206)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12月。

(207) 《北京的知耻会》，《警钟日报》，1904年3月10日。

(208) 黄天（高燮）：《答邓秋枚书》，《觉民》第9、10期，1904年。

(209)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刊，第48—49页。

(210) 陈天华：《警世钟》。

(211) 《新湖南》。

(212) 《新湖南》。

(213) 共和生（杨笃生）：《论列强中国殖民政策》，《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3日。

(214) 《新湖南》。

(215)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16) 《新湖南》。

(217) 共和生（杨笃生）：《论列强中国殖民政策》，《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3日。

(218) 《警世钟》。

(219) 《论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警钟日报》，1904年9月26日。

(220) 《原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21)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22) 《警世钟》。

(223)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24) 《论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警钟日报》，1904年9月26日。

(225)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6期，1903年11月。

(226) 《革命军》。

(227) 《新湖南》。

(228)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229) 《警世钟》。

(230) 《原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31) 《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

(232)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33) 《新湖南》。

(234) 书楼（朱孔文）：《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235) 《革命军》。

(236) 《革命军》。

(237) 《警世钟》。

(238) 《驳康有为书》，别见《客帝匡谬》、《正仇满论》。

(239) 《新湖南》。

(240) 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年6月16日。

(241) 《为外人之奴隶与满洲之奴隶无别》，《童子世界》第25期，1903年5月。

(242) 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

(243) 卫种（何天瀚）：《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244) 《释仇满》，《苏报案纪事》，又见《黄帝魂》，均1904年上海东大陆图书局刊本。

(245) 《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246) 《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

(247) 《贺满洲人》，《苏报》，1903年6月。

(248) 竞盦：《政体进化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249) 《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50) 《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9月。

(251) 愿云（蒋观云）：《四客政论》，《浙江潮》第7期，1903年9

月。

(252) 《革命军》。

(253) 《驳康有为书》。

(254) 《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13日。

(255)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56) 《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13日。

(257) 遯公（秦力山）：《〈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258) 《中外日报》，1903年12月5日。

(259) 《告农》，《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3日。

(260)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

(261) 《警钟日报》，1904年5月12日。

(262) 《论汉族不振之由》，《警钟日报》，1904年8月29日。

(263) 《新湖南》。

(264) 《权利篇》，《直说》第2期，1903年3月。

(265) 《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266) 《道统辨》，《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267) 云窝（侯鸿鉴）：《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268) 《国民意见书》，《中国白话报》第18期，1904年7月。

(269) 《陈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2期，1903年5月27日。

(270)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序》，《乙巳政艺丛书》。

(271) 《革命军》。

(272) 《革命驳议》，《中外日报》，1903年6月8日。

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一节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

一　“新政”的实施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本来是反对一切改革的，曾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然而，事隔两年，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他们迫于内外形势变化的压力，也不得不“改弦更张”，侈谈起变法来。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还在西安的时候，就下变法诏说：“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在这个上谕中，西太后还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壹意振兴”，谋求富强[(1)]。并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参照中西政治”，对有关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军制、财政等各抒所见，详尽议论，在两个月内提出意见，以便次第兴革。

同年4月21日，清政府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来还有袁世凯等）为参予政务处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政务处并无实权，只不过是军机处的骈枝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

参酌中外的政治情况，列成条文，汇编成“政典”供西太后参考。在举办“新政”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还是各省督抚，主要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这三个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于1901年5月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要点是充实武备力量，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留学生，等等[(2)]。七八月间，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著名的变法奏议三折。第一折兴学四端，讲设立各类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等；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端，讲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实官，取消书吏，改进刑狱，裁撤屯卫、绿营等；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端，讲怎样吸收西法来补充中法的不足，如广派官员出洋考察，编练新军，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和货币制度，多译外国书籍等[(3)]。这些提议，并没有超出戊戌维新派的变革主张。9月，清政府下诏批准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奏议，命各省督抚“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同时，重申实行新政的决心说：“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4)]

从上述新政奏折的表面内容看，清政府似乎是要完成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实质上这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自强”的老调重弹。新政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洋务派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太后的变法诏中公然说维新派“妄分新旧”，“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而她的新政是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并特别强调要在“三纲五常”之下实行改革[(5)]。由此可见，新政与洋务运动一脉相承，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当时就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6)]。

从1901至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连串的上谕，陆续推行“新政”。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7)]，停止捐纳实官，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废弃旧式武科，建立武备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开经济特科，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考，广设学堂，奖励工商业，准满汉通婚，以至酝酿实

行立宪，等等。

在所有各项“新政”中，筹饷练兵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从1901年起，清政府屡次颁发上谕，命令各省督抚严行裁汰旧军，挑选精壮，创建新军。在清政府的催促下，各省相继筹饷练兵。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练兵处，作为全国编练新军的参谋部，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接着，练兵处制定了一系列练兵规章和法令，在各省设立了督练公所，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编练新军[8]。

清政府把筹饷练兵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那拉氏本人对“练兵一事非常着急”，曾“因筹款事，几至寝食皆废”[9]。经她批准，练兵处成立后，立即向各省摊派了九百余万两的练兵费。1904年8月她又派铁良视察江南防务，乘机从各省搜括大量财富充作练兵经费[10]。又饬令各省无论报效巨细各款，均归户部另存，作为练兵费。1906年11月，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以铁良为尚书。次年8月，清政府制定了全国编练陆军三十六个镇的庞大计划，并限期建成，不得延误。实际上，到清廷灭亡前夕仅编练新军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另一支禁卫军（两协）[11]，兵力共达十五六万[12]。分述如下：

北洋六镇，1905年已编成，后划为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1907年以后六镇陆续改归陆军部直辖。直隶又重新编成一混成协。

山东一镇，名义上编成一协（第四十七协），实际仅成一标（第九十三标）。

江苏两镇，编成第九镇及第二十三混成协一协。

江北一镇，编成第十三混成协一协。

江西一镇，编成第二十七混成协一协。

安徽一镇，编成第三十一混成协一协。

河南一镇，编成第二十九混成协一协。

湖南一镇，编成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

湖北两镇，编成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一协。

浙江一镇，编成第二十一镇。

福建一镇，编成第十镇。

广东两镇，名义上成立了第二十五镇，实际仅编成第四十九混成协一协。

广西一镇，仅编成两标，另桂林一标。

云南两镇，仅编成第十九镇一镇。

贵州一镇，仅成步队一标，炮队一队。

四川三镇，仅成第十七镇一镇。

山西一镇，仅成第四十三混成协一协。

陕西一镇，仅成一混成协。

甘肃两镇，名为练成一协，实际只成一标。

新疆一镇，编成第三十五协一协及伊犁一协。

热河一镇，只编成步队一标及炮队一队。

奉天一镇，编成第二十镇。

吉林一镇，编成第二十三镇。

黑龙江一镇，名义上成立混成协一协。实际仅步马各三营，炮队一队。

上述新军表面上是为“巩固国防”而建立的，实际上它并不真正用于防御外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为了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奕劻曾说：“北洋练军，为拱卫畿疆，弹压余匪，更无他意。”[13] 1903年，户部在练兵筹饷折中也说：当前“各直省伏莽未靖，蠢动堪虞，非练兵无以卫国，非练兵无以保民”[14]。那拉氏曾密谕军机处：整顿练兵“以防内乱是为主要”[15]。事实上，在新军编练和成军过程中，从没有与外敌打仗的纪录；相反，全国几次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都是被新军残酷镇压下去的。

同时，由于新军中留洋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革命组织的宣传鼓动，对封建专制统治日益不满，他们组织了各种秘密团体，形成了一股反对清廷的革命力量。这种情况在南方各省尤为严重。江西巡抚吴重熹致军机处电中报告说：常备、巡防各军中，“多有哥老会及排满革命党匪匿于其中”，“军营官兵数逾七成”[16]。当南方各镇被派去镇压会党起义时，出现过“不击同胞”的反抗。这使统治者感到惊慌，不禁发出新军“不可用”的哀叹[17]。越到后来，在新军中反戈相向的“兵叛”事件越多。这说明专制统治的柱石已经不稳。清政府搬起“编练新军”这块石头，结果是砸了自己的脚。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还创办了巡警。1902年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袁世凯将保定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其中著名的头目就是赵秉钧和杨以德，他们“广购眼线，多派探访”，极力破坏反清的秘密组织，屠杀无辜，得到清政府的赏识[18]。这两人在民国以后仍盘踞警务部门，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鹰犬。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制订了各

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各省中，直隶、四川、江苏、云南等省办警务成效“显著”。江苏巡抚陈夔龙在1907年的一份奏折中承认，江苏创办警政三年，“形式虽存，精神未具”，“卫民之政，转以扰民”[19]，说明了举办警务的真相。四川在岑春煊、锡良任内，委派留日学生周善培为巡警总办，因使用侦探手法强化治安，还得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赞扬。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各县设立巡警教练所，加紧推行保甲和户籍措施。

清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于1903年9月设立商部，所有铁路矿务诸要政皆归其办理。商部的政策主要是倡导官商创办企业。该部成立后，陆续颁行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钦定大清商法、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及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掖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等等。因此，国内工商企业一时均呈现发展的气象。以矿业为例，1904年向商部呈请办矿务的仅五宗，次年增至三十余宗。同时，商会迅速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如，1903年仅上海、天津、开封、芜湖等几个城市组织了商会，1904年1月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城镇商会纷纷成立，次年就发展到六十多个，1908年更增至近三百个，全国重要城镇几乎都有了商会。商会对推动资产阶级的实业和政治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政府推行鼓励工商业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微弱的发展，获利较多的是资产阶级上层。清政府对张謇、祝大椿、庞元济、许鼎霖、张振勋等大资本家和买办商人，给予各种特权，使他们取得了发展实业的有利条件。1904年，以张謇等倡办工商实业卓著成效，奏准赏给商部头等顾问官。张振勋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但是，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给他们政治实权，掌握商部大权的都是封建大官僚，如尚书载振，左右侍郎伍廷芳、陈

璧，左右丞徐世昌、唐文治等。

为了推行“新政”，清政府需要军事、警务、政法及教育等各方面的人材，陈腐的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培养新式人材的需要。因此，改革教育成为“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清政府就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又批准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都以此为依据。这个学制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如蒙养院四年不计在内，修业期限还长达二十五年。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种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

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其中以赴日本者为最多，1901年二百八十人，至1905年已达八千人。次年更增至二万三千。其后因学生风潮迭起，数目略减，但在这一年底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尚有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这些学生当中，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他们或为官费，或为自费，以前者为多。

当时科举考试已经改八股为策论（1901年），但尚未宣布废除。由于科举是利禄所在，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因此学校的发展遇到很大阻力。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除。同年12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

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学堂，另一方面又接连颁布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学堂管理通则》、《钦定教育宗旨》等，企

图把学生束缚在对封建统治有利的范围内。《奏定学堂章程》明文规定："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这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兴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科举的废除和学校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据学部奏报教育图表：至1907年全国各类学校共三万七千八百余所，在校学生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余人，教员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人，职员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九人；次年学校激增至四万七千九百余所，学生达一百三十万零七百余人。这些学生和留学生以及教职员的大多数是与封建士大夫大不相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大加强了新型知识阶层的政治力量。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措施，虽然含有缓和民族矛盾和整顿自强的意思，但不过是巩固其专制统治的权宜之计。而且，有些措施根本就未认真实行。如裁汰官缺，裁革冗吏，"多以人言或格或缓"[20]。该淘汰的旧衙门不仅没有裁撤，新的机构又不断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如军机处和督办政务处并存，兵部和练兵处并存，户部和财政处并存，礼部和学务处并存，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和工巡局并存等等。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承认："今官署公所日苦重迭，必致旧者安于废弛，新者亦多观望。"[21] 1905年，在颁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军机大臣鹿传霖竟支持一些士大夫在京师倡议修复贡院，引起列强对清廷实行新政的诚意表示怀疑[22]。这年7月的一份上谕也承认，"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但"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23]。

清政府推行"新政"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由于办"新政"而增加的负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斗争；由于办"新政"，也就必然加强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由于办"新政"的目的和这种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从而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对新

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样就不仅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使统治阶级中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

二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

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定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河南省项城县人，出身于大官僚世家，他的叔祖袁甲三（1806—1863）以在安徽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曾任漕运总督。其嗣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立“功”，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年青时嗜酒，好骑马，不喜欢读书。1876年、1879年，他两次乡试落第，就把诗文付之一炬，自诩“大丈夫当效命疆埸，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24)]。1881年，他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前往登州，投靠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受到不次之擢，充当庆军营务处会办。以后又随同赴朝鲜，在“甲申政变”中，因能随机应变，受到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被推荐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身居交涉的关键岗位，却避祸回国。战后，他投靠西太后的宠臣荣禄[(25)]，继胡燏芬之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即“新建陆军”）。这支军队共七千余人，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编成步兵五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营，另外还有一支后勤部队。全军一律使用近代枪炮，装备精良，并延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官，练德国操。各级军官大部分出身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末陆军近代化的序幕，同时也奠定了他一生反动事业的基础。接着，在戊戌政变中，他以出卖维新派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

位。在山东，又以镇压义和团和参与“东南互保”博得了帝国主义者的青睐；并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将山东防练各军改编了二十营，共九千余人，名武卫右军先锋队。加上他原有的武卫右军一万人，总计一万九千余人，成为华北平原上最重要的一股武装力量。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他最早解送京饷十万两银子，向西太后效忠。在清政府筹划庚子赔款的时候，各省苦于无款可筹，有十一省督抚联名上奏，拟请在摊派数中裁减三成，唯独这个山东巡抚不仅能筹足赔款，还在加征烟酒各税中提取练兵经费，因此最得清廷的赏识。李鸿章又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李鸿章一死，袁世凯就继承其衣钵，于1901年11月7日署理清政府中最显赫的职务之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8日实授）。自此以后，他先后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务大臣，督办津镇路、京汉路大臣以及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清末权倾一时的重臣。

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是北洋六镇新军。在他升任直隶总督后，与铁良一起挑选八旗兵丁三千人，另派王英楷、王士珍在正定一带招募壮丁六千人，并改编保阳练军和裁汰淮军归并成步队、炮队等十六营，马队一标，先后成立京旗常备军和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两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以“保卫疆畿”为名，奏请扩充新军三万。先募一万，成立了第三镇。以后又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先后并入由江南调防来的自强军和扩大武卫右军先锋队，新编成第四、五两镇常备军。到1905年春，清政府统一陆军番号，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常备军也改称为陆军：即京旗常备军编为陆军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称陆军第二镇，驻迁安；北洋常备军第二镇改称陆军第四镇，驻马厂；北洋常备军第三镇仍称陆军第三镇，驻保定；新编的第四镇改称陆军第六镇，驻南苑；新编的第五镇仍称陆军第五镇，驻山东济南、潍县。到此，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正式编成，共约七万余人。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1902年6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省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进行训练。同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次年10月，又创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来这所学堂由练兵处接办，每年招收各省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六百名，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此外，1903年至1906年间，还先后开办了保定陆军小学堂、姚村陆军小学堂、陆军军医学堂、陆军马医学堂、陆军军械学堂、陆军经理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北洋讲武堂以及著名的保定军官学堂等。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培养了一大批沾染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建军的骨干力量。

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大都是他在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和追随者。如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六镇新军虽都用洋枪，练洋操，并抄袭西方的营制，但内部组织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李鸿章淮军的旧传统，固守“兵为将有”的旧习。北洋集团自成一个封建的派系。其中武人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田中玉、姜桂题、孟恩远、王占元、雷震春等；文人有徐世昌、唐绍仪、杨士琦、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梁士诒等。这些人物在清廷灭亡以后，又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他们篡夺政权长达十六年之久。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特别与英、德、日、美等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义和团运动中，由于袁世凯着力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始受到洋人的重视。美国人在1902年初就称许说：袁是未经科举而跻入高位的“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26]。

继李鸿章之后，列强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个拥有实力的野心家身上。英国驻华使节萨道义（E．M．Satow）、朱尔典（J．N．Jordan），德使穆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zenstein）等人，都与他过从甚密。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曾透露："袁世凯与我们的关系，比过去几年中任何官员还要密切，我们采用了骚乱（指义和团运动）前未有的办法进行磋商。"[27] 自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它也企盼袁世凯做其利益的赞助者。因此，往北洋地区派出大批顾问、教习，支持袁世凯的"新政"。如1904年，在直隶一省的日本顾问、教习有八十五人，1908年增至一百七十五人[28]。在北洋军中，日本的军事顾问和教习占有重要地位。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都先后在北洋督练公所和北洋各学堂任过顾问或教官，控制了参谋和训练大权。

北洋系的另一个重要后台是庆亲王奕劻。奕劻（1838—1917），是清朝获得世袭罔替封号的少数亲王之一，享有特殊的恩宠。他从1884年（光绪十年）起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辛丑和约后，外务部成立，他是管部大臣，1903年3月又入值军机处，继荣禄以后成为最有实权的领班军机大臣。在这期间，他还身兼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练兵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等要职。奕劻的昏庸和贪婪是中外闻名的，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29]。而他却自诩为"澹如斋主人"，意思是说他为人澹泊如水；又取名"乐有余堂"，说是"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30]。袁世凯正是利用他爱财如命这一点，极力向他行贿，并和他结成一伙，把持朝政。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袁世凯无论是扩大军事实力，还是夺取路矿和财政权力，都得到了奕劻的支持和默许。对一切重大问题，奕劻总是"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31]。梁鼎芬在弹劾奕劻袁世凯的奏折上说，当今朝廷"皆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32]，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袁世凯在办“新政”过程中，不仅扩大军事实力，而且极力插手路矿、通商事务，以便获得扩大军力所需要的财源。这使他与另一个买办官僚盛宣怀之间发生日益严重的权力之争。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与袁世凯一样，都以投靠李鸿章起家。1886年，他在山东登莱青道任内，主持李鸿章淮军的粮饷供应，靠经办李鸿章的洋务企业而发迹，控制了全国最大的近代企业招商局和电报局，并在以后发展成为拥有轮船、矿业、棉纺等庞大企业体系的盛氏官僚资本集团。1896年，他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不惜出卖权益，一手经办了大量的铁路借款。在矿务上，他主张“以开为守”，于1902年10月，成立上海勘矿总公司，独揽各省矿藏普查，以备日后招徕华洋商人进行开发。

袁世凯早就对盛宣怀独揽路矿财源表示不满。他任直隶总督后不久，首先接管了关内外铁路，并兼任督办大臣。1902年底，他借口招商局和电报局附属北洋，首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1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接管了电报局，派杨士琦为帮办电政大臣兼招商局总办，使盛宣怀顿时失掉了两大企业的控制权。盛宣怀的失败，与英国的反对有直接关系。英国中英银公司总办濮兰德与盛宣怀打过多次交道。他认为：“盛是公开的亲比派（也就是亲俄法派——引者），是反英的。”据他的观察，盛宣怀“唯一有力的支持者是王文韶”[33]。显然，在袁、盛的斗争中，还包含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俄法与英德的矛盾。1903年商部成立时，铁路和矿务统归商部经办。这个部的尚书载振是奕劻的儿子，侍郎胡燏芬、伍廷芳，陈璧等，都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濮兰德听到成立商部的消息后很高兴，认为“这将把盛宣怀和他的同伙，排斥于该部之外”[34]。事实也是这样，原督办路矿大臣王文韶、瞿鸿禨，铁路总公司总办盛宣怀，都没有参与商部事务。英国对袁世凯的支持，是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1905年11月，清政府再派袁的亲信唐绍仪接办沪宁路，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完全成了空架子，不得不奏请辞职。不久，盛宣怀又自动奏请撤销上海勘矿总公司，到此，盛的势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

1906年11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燏芬为左右侍郎，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民国以后他能自成一交通系，实发轫于此。同时，袁世凯还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官督商办，共集资本银约三百万两。至1912年滦州矿与英国商人控制的开平煤矿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由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任董事长，成为中国著名的煤矿之一。此外，袁世凯派毛庆藩创办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民国后改称中国银行），派周学熙、王锡彤、孙多森等人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银元局、铜元局、北京自来水公司等。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官府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

总之，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北洋集团得以形成并迅速扩张，不仅在军事、外交、路矿、财政、教育各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势，而且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苏北等一大片地盘，连京师也在他的势力笼罩之下。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三　“预备立宪”的酝酿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是欺骗性的。黄遵宪批评清廷时说：“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骗吾民也。”[35] 梁启超表示了更大的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36] 资产阶级改良派看出“新政”只是统治集团的弥缝之计，不能挽救严重的危机。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认为“专制政体之不能存于今世界”是“理势所必至”[37]；“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

宪政体”[38]；“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39]。这种议论，从1902年就开始出现，不但有梁启超等人在《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鼓吹，而且还有人上书提出要求。比如美洲华侨叶恩，1902年曾向清政府的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同年，侍讲学士朱福洗曾上书朝廷，也提出立宪的建议。

因为以要求立宪为主要政治目标，所以此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被称为立宪派。

这种立宪要求真正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为争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把东三省的土地人民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蹂躏，宣布严守“局外中立”。这种耻辱给人民以很大的刺激，而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更给资产阶级和士大夫以极大的震动。俄国是个非常凶横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曾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而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集团却因畏惧而长期屈膝投靠于它。可是在这次战争中，它被小小的日本打得惨败。这一事实成了一种启示。立宪派便利用这一事实大力宣扬：日本不过“蕞尔岛国”，它所以能战胜俄国，是因为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一向被视为强大的俄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立宪派因而断言，立宪则强胜，专制则败亡。这成了他们要求立宪的最根本的理由。《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40]《大公报》也载文宣称，立宪问题“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41]。

立宪运动开始兴起了。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舆论的鼓吹，这年，有两家重要的立宪派报刊在上海出版，一个是《时报》，是梁启超协助狄楚青创办的；一个是《东方杂志》，是由出版业资本家、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创办的。夏也是立宪派，后来加入预备立

宪公会。这两家报刊成了立宪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东方杂志》除了本身发表鼓吹立宪的言论外，还经常汇登其他报刊，如《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大公报》等宣传宪政的文章。当时立宪派控制的报刊几乎都以鼓吹立宪为中心。要求立宪的呼声遍于国中。《时报》评论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起而为之所也。"(42) 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舆论的趋向。

立宪派一面大力制造舆论，一面展开实际活动。最著名的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在这年5月亲自出面劝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他们上折奏请立宪，并替他们草拟折稿。但一向以圆滑稳重著称的张之洞，要他探询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向。于是，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43) 劝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等人，促成立宪，以救危局。但当时袁世凯还没有看准风向，回信答称："尚须缓以竢时。"(44) 是年7月，张謇与赵凤昌合刻《日本宪法》送达朝廷；9月，又刊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书，送给满族权贵铁良等。

在日本的梁启超，自从1903年游美归来，完全放弃了他的所谓"革命"、"破坏"之说。他和其他立宪派一样，感受到日俄战争的震动，认为"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45)。因而更集中致力于立宪的鼓吹。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讨论俄国立宪问题的文章。1905年，国内政界某些官员开始注意立宪问题。这时，梁启超极力加以联络，先后"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46)。这年夏天，侍讲学士朱福洗曾连次上书清政府，要求早决大计，宣布立宪。

立宪派急切要求立宪，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他们不相信革命能够成功，以为革命会遭致无休止的破坏和动乱，那就不但

争不到新的利益，连现有的利益也难保住了。所以他们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并认为，只要实行立宪，革命自然可以消灭于无形。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立宪派同统治集团有一致性，所以他们奔走呼号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春，驻外使臣孙宝琦等上折奏请立宪。这一举动受到立宪派的普遍赞誉，许多报纸专门发了社评。至1905年，官吏奏请立宪的便渐渐多起来。重要督臣张之洞、周馥、岑春煊都曾以立宪的建议奏闻朝廷。一年前还持观望态度的袁世凯，这时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实行立宪的准备。朝廷居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这时连满族亲贵中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做些较大的改革，来挽救内外危机。西太后本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思想，她最关心的是紧紧掌握最高的权力。而她周围的一些较倾向于变革的大臣，都以日本为例说服西太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而且可保“君权永固”。立宪派虽然渴望通过立宪分享政权，但起初也着重于立宪有利于皇室的一面加以鼓吹。因为这个缘故，一向顽固的西太后，这时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大权，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觉得不妨再作一次改革的尝试。

1905年7月16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在火车站遇炸，载泽、绍英受伤，未能成行。革命党人吴樾则以身殉。嗣后，朝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随同载泽、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迟至12月2日才得以成行。

立宪派对派遣五大臣出洋一举，感到非常振奋，以为这是“朝廷以实心变法之意宣布天下”[47]。其实这时清政府仍未定下准备立宪的决心，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总的内外形势所决定，清政府既已迈出了这第一步，它也很难半途停止或翻然改辙。

第二节　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是暂时处于低潮的阶段。但是，由于引起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激化，所以整个社会仍然动荡不安。这一时期，广大农民的自发斗争之所以广泛、激烈，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勒索赔款和清政府推行“新政”，征收苛捐杂税而直接引起的。

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向中国勒索了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赔款，这笔赔款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银总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从1902年起，平均每年要交赔款二千余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包括地丁、盐课、关税等，总计才八千余万两，赔款竟占四分之一。这笔赔款当时一般称为大赔款。大赔款之外，还有各州县地方官和传教士议定的地方赔款。这种由地方自筹的赔款，据估计至少有两千万两。为了筹集这笔巨额赔款，清政府每年要向各省摊派二千三百万两。自1901年8月起，户部为筹划各省应摊的赔款，指令各省推广粮捐、房捐，盐斤加价，重征茶糖烟酒各税。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反赔款和反教会压迫便结合在一起，成为农民群众爆发反帝斗争最经常的原因和直接的导火线。

与此同时，各省奉命举办“新政”，清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筹款，这样，对外赔款和新政费用，便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如山西省，从1902年起除钱粮附加而外，又增加货厘、斗银、畜税、牙税、盐税、油酒缸税、煤厘等十余种，以致物价上涨一倍多，大批手工业者破产。直隶省专门设立了筹款局，开办印花税、渔船捐、硝捐、妓捐、车捐等。从1903年起加征烟酒税和长芦盐引加价，只此两项每年即搜刮银一百五十万两。又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如定县每亩地附加税增长指数1899年为100，至1903年增至137.78，至1907年竟达355.59。各州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相差无几。因此，“民间负担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湖南省

由于筹集赔款和办“新政”，一再增添新税，加重旧捐。如田赋，额外规定每正银一两加耗羡一钱，但不少州县层层加码，有的征至三四钱。从1901年起，盐每斤加价四文。田房契税每银一两加收二分，以后逐年增加，到1909年增至四倍。此外，又创办了铺捐、粮捐、落地税、销场税。名目繁多，不可缕述。

由于各省巧立名目而征收的苛捐杂税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官吏差役借机勒索敲诈，一些地区竟形成“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的局面[48]。更加甚者，农民“一身而七八捐”，商民“一物而经六七税”；因此农民“弃田潜逃”，商民闭门歇业[49]。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50]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清政府的税收制度已极端混乱，税种和税率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各级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恣意掠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危及了人民最低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许多地区出现了“一有首倡发难之人，即成星火燎原之势”的局面。

一　反赔款、反教会压迫

反抗教会压迫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反帝斗争的重要形式。

帝国主义列强借《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清政府秉承列强的旨意，也多次颁发“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是，由于产生反帝斗争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不管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是清政府的三令五申，都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事实上，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民针对摊派赔款和传教士的不法活动，于1902

年就掀起了一连串的反抗斗争，给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个时期的反教会压迫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前比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各地群众不仅把反对教会压迫和抗捐抗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往往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有些地方更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一类的战斗口号。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直隶省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起义。

直隶省惨遭八国联军蹂躏，人民的苦难特别深重。1902年，全省除摊派大赔款银八十万两外，还缴纳上百万两的地方赔款。广宗县知县和法国传教士议定广宗地方赔款为京钱两万串，折合纹银万余两，强迫各村农户按地亩摊派，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每亩地要缴纳“赔款捐”京钱四十文。这种做法不仅使广大贫苦农民极为愤慨，就是中小地主也怨声载道。广宗一带各村庄本来有联庄会的组织。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遂传帖聚众，联络各村联庄会，首先倡议抗捐，声明“中国人不拿洋差”。景廷宾（1861—1902），是一个有百余亩土地的小地主，武举人，为人慷慨好义，喜打抱不平。他的抗捐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邻近各县如邢台、钜鹿、南宫、内丘、平乡的人民，纷纷响应。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立即命令大名镇总兵何永盛与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统率练军前往广宗县镇压。3月3日清军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领群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自从清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卖国残民的狰狞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东召村被血洗之后，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就促使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在这个客观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鼓舞下，义军迅速扩大，“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51]。基本群众是广宗及其附近一带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以泄愤，随后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广宗数万农民揭竿而起，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慌。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设法尽快扑灭起义。袁世凯一面宣布将广宗及其附近各县“所摊捐款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安分之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52]。一面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改派自己的心腹段祺瑞、倪嗣冲指挥新编成的北洋军（当时称新练军）马步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统率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两股清军大张旗鼓地合围广宗。各村庄农民沿村筑垒，英勇抵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使用刀矛土炮和持有快枪利炮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战，遭到重大伤亡。景廷宾见势不敌，遂率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乘机焚烧抢掠，惨杀村民数百人，附近村庄俱遭劫难。景廷宾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不幸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众四散，起义终于失败。

与广宗起义的同时，在直隶北部朝阳县也爆发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驱逐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霸占田产，村民纷纷逃难。当地民团团长邓莱峰挺身而出，以“保卫乡民”为己任，在花子沟地方聚集难民万余人。花子沟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沟内有百余村落。邓莱峰捉拿天主教徒二人为人质，提出“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始可了事”。但是，地方官认为这是“百姓聚众抗官”，并禀报直隶总督袁世凯。1902年10月，袁命令直隶提督马玉昆率兵前往镇压。群众沿沟“设卡二百余座”，节节抵抗[53]。11月初，清军攻占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村民逃散。邓莱峰避往义州，不久被捕，惨遭杀害。

河南省摊派的大赔款是每年九十万两银子，加上“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或侵蚀入己，而劣绅胥吏，需索中饱”，广大人民负担之沉重，就可以想见了。因此，群众性的抗摊派赔款的斗争时有发生。1902年3月，泌阳县农民首先掀起了风潮，并很快波及唐县、桐柏等地。南阳天主教主教安西满（法国人）向泌阳县勒索了一万一千元

的“地方赔款”。当地知县百般搜刮，至1902年初已交大半，只欠二千元。安西满催逼不已，知县以“拖延赔款”被撤职。继任知县为博取安西满欢心，一到泌阳就召集四乡“诸绅至署，勒限催收”，并威胁说：“逾期不交，即当下狱。”因而激起四乡绅民的义愤。泌阳一带本来有“大刀会”活动，高店等地农民便与“大刀会”结合，成立“齐心会”，公开抗交摊派赔款，聚众痛殴下乡催交摊款的差役。知县前往弹压，肩舆被群众打碎，狼狈逃回县城。愤怒的群众二千多人在张云卿的率领下，乘势攻泌阳城，将西关教堂夷为平地，又攻打桐柏县乌金沟和唐县乔庄等地教堂，痛击教会侵略势力。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对泌阳人民抱同情态度，上海《中外日报》的社论说：“泌阳之乱，非泌民之有意仇教也，非泌民之有意抗官也。实由教士自取之祸，地方官与疆臣自酿之患也。”(54) 5月间，河南巡抚锡良派南阳镇总兵率领清军至高店镇压。乡民英勇抗击清军，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清政府又向教堂赔款二万六千两，以屈辱的条件了结“泌阳教案”。

当北方各省反抗怒潮汹涌的时候，南方各省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1902年，浙江桐庐县农民自立乡团，抵抗当地教堂压迫。当地方官派兵镇压时，农民聚众二千余人，奋起反抗。宁海县焚毁天主教堂两处，影响及于奉化、象山、嵊县各地。广东南雄群众杀死天主教教士。同年9月，湖南邵阳爆发了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旗帜，发布《奉劝各国揭帖》，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义正词严地警告传教士“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同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分遣多人前往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纷纷前来投效，数日之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率领群众进驻邵阳城，要求知县交出传教士；又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要求他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狡诈的俞廉三派人将贺金声诱至省城，加以杀害；以后又将灭洋军的骨干粟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

这次反教会压迫斗争遂致失败。

四川省人民反教会压迫的斗争尤为炽烈。1902年，四川分摊大赔款二百二十万两，仅次于江苏省，居全国第二位。为筹集这笔赔款，川督奎俊下令广辟财源，增征商税和亩捐，使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不法教民又“恃势寻衅，肆意欺凌，遇有词讼，地方官不敢持平，十九屈抑”[55]。再加上当年全省遭受旱灾，南充等二十四州县和简州等三十七州县春粮歉收，以至米价腾贵，人民痛苦不堪。因此红灯教、顺天教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秘密结社继承了义和团的传统，练习“神拳”，进一步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1902年初，安岳、永川、金堂、华阳等县“均有烧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情事”[56]。5月，资阳著名首领李冈中在胡家沟聚众八百余人，进攻资阳城。川督奎俊派兵前往镇压，激战竟日，李冈中不幸被杀，余众退至龙头寨附近，不久复聚千余人，于6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同时，资州（今资中）、安岳、仁寿、潼川、简阳等地都有拳民“灭洋仇教”，“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57]。仁寿县拳民捣毁杨柳场、黄公场等地教堂，其首领李永洪、唐大通等率领群众，屡次打败清军。成都附近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分别自称是罗汉和观音的化身，于7月在龙潭寺、石板滩聚众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并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嗣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活动，甚至持械潜入城内，袭击督署。地方官吏惊恐万状，在督署架巨炮，如临大敌。同时，彭山、眉山、射洪、新都、灌县、温江各县都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事件。

8月间，清政府见事态严重，撤换了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一面派兵屠杀拳民，命令各州县办保甲团练，推行残酷的连坐法；一面暂时停止征收一部分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至1902年底，各州县拳民先后被镇压下去。但是红灯教仍然秘密活动，在此后数年间，于邛州、嘉定、隆昌、富顺、彭县、犍为等地不时起事。直到1911年夏

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红灯教纷纷响应，有的加入同志军，汇入革命的洪流中。

1903年各地群众仍不断掀起反教会斗争。浙江桐庐一带“白布会”“仇教灭洋”[58]，推濮振声为首，于桐庐、建德交界地方起事。富阳、龙游等地白布会准备响应。但濮振声不幸被捕，被关押在仁和监狱，部众瓦解。1905年初，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从事联络会党，曾至监狱访濮，“相谈颇洽”[59]。宁海县附生王锡彤，为台州会党——“伏虎会”首领，曾率领北乡农民千余人，攻入县城，将天主教堂焚毁。直隶玉田县农民聚众抗官，“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60]。江西新喻和清江会党号召群众拆教堂，官吏派兵镇压，会党“愈聚愈众，势不可遏”[61]。

次年6月，在会党的鼓动下，江西新昌县棠浦地方教堂被拆毁。8月高安县金塘、塘头两处教堂又被捣毁。直隶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活动，“以仇教灭洋为宗旨”[62]。同时，湖北省利川、宜城，河南省武安、怀庆、彰德，山东省东阿，浙江省龙泉等地闹教事件纷起。1905年4月，四川巴塘藏族人民反抗教会压迫，焚毁教堂，驻藏大臣凤全率军前往镇压，群众英勇抵抗，击毙凤全及天主教司铎二人。同年7月，山西绛州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霸占农民产业，官吏又偏袒教民，激起民愤。农民聚众闯入绛州城，不久被清军镇压而失败。

二　抗捐抗税和武装起义

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广大人民，不仅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且也不断地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各地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和武装起义，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次数最为频繁、普遍，影响比较大的就有数十起。斗争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旋起旋落；有的坚持数月以至一年以上。参加的群众有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许多地方的中小商人也积极投入了斗争。这种情况表

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的自发斗争中增加了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的发展，使群众自发斗争的涓涓细流，逐渐汇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1902年5月，江西德化县行商反对苛征厘金，聚众百余人捣毁卡局。7月，安福县爆发农民抗粮斗争。入冬，赣州商人掀起砸厘卡的风潮。

安徽省从1902年起加征酒捐、米捐、房捐和肉捐。全境人情汹汹，怨声载道。芜湖、铜陵大通镇等地接连发生商人抗捐罢市。

同年，福建开办新捐税，有粮捐、酒捐、赌捐等十余种，一些地方还让商人设局承包，层层盘剥，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海澄县群众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捐，不得允许，即将县署捣毁。同安县土药捐局派巡勇骚扰地方，苛抽膏捐，群众忍无可忍，遂捣毁捐局。漳州砖瓦窑业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数千人，反抗砖瓦捐。仙游县设局抽捐，激起商人罢市。知县王某威胁说："如不交捐，将罚款一倍。"群众义愤填膺，聚集千余人将捐局和办捐官绅的房屋付之一炬。

进入1903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普遍推行和捐税的增加，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激烈。

这一年，河南省改地丁征银为征钱，扩大浮收至一倍多。激起黄河北岸孟、温、武陟、河内等县民变。温县一带农民本来有"大刀会"的组织。在"大刀会"的鼓动下，温县农民首先聚众要求减免浮收钱粮。3月间，孟县东乡桑坡农民闻风响应，散发揭帖，结伙闯进县城，火烧衙署。温县西乡"大刀会"也活跃起来，砸抢大地主宅院，劫富济贫。4月，河内知县苗燮至城东泰山庙催逼钱粮，极其凶横。千余农民同声奋起，砖石齐飞，痛殴苗燮，苗抱头鼠窜。农民跟踪追击，直至城下，放火焚烧城门。

云南周云祥起义，也是1903年的一件大事。这一年5月上旬，为

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周云祥召集会党矿工数千人于个旧起义。周云祥是临安人，著名的会党首领，在个旧锡矿做工。他率领起义军击败蒙自县知县孙家祥和分统魏荣斌所率的清军，占领个旧。由于他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召号，不仅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即富绅亦从而附合，甚且助械捐资”[(63)]。因此，起义军半月之内占领临安、石屏两城，发展至万余人。同时，阿迷、河西、江川、宁州、弥勒、元江各州县会党游民纷纷响应。云贵总督丁振铎急忙调集各地清军，派按察使刘春霖统率，由省城出发前往镇压，于6月底攻陷临安、石屏。义军首领不幸被捕牺牲，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

同年9月，山西省永济县爆发了反对柿酒税的斗争。永济县以产柿闻名，农民以柿酿酒，从不纳税。1903年知县强令开征柿酒税，乡民数千人涌进县城，捣毁衙署，迫使知县停止收税。

此外，在吉林伯都纳，直隶省玉田、宝坻、三河、通县、房山，山东省日照、济南等地，1903年都发生过群众抗捐或抢粮事件。

1904年，山东省济宁州、郓城县农民暴动，反对屯田升科。原来，清政府沿南北运河设立卫所，以屯田的办法养兵，守卫运河交通线。这种制度早已破坏。至清末，土地多被官吏盗卖，屯丁也变为贫苦农民。清政府为搜刮民脂民膏，公然规定屯田每亩交价五千文，按田之上下酌量增减，这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起民变。3月2日，济宁屯户聚众冲入城内，将衙署付之一炬，迫使知州重定屯价，每亩减至千文左右，并缓至五至七年缴纳，事才平息。4月22日，郓城屯户二千余人在任青合领导下，反对屯田交价，围攻县城，东平、范县、汶上各地屯户纷纷前来助战。后来，任青合被捕杀，屯户遭到残酷镇压。同年，山东潍县农民聚众反对烟叶捐，潍县为烟叶产地。城内设烟叶捐总局，各镇遍设分局，规定卖烟一斤缴制钱三文。税吏又借端敲诈，使烟农忍无可忍，遂将凤凰山庄和辛东社两处捐局捣毁。

这一年4月，直隶省兴隆知县李国枫强迫乡民缴学堂和巡警捐，

每亩地制钱四十文。乡民恳求免捐，未得允许。4月初，群众数千人企图进城，再次提出免捐要求。知县关闭城门，巡警开枪打死乡民九人，伤六人，激起民愤。乡民闯进城内，捣毁巡警局，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后来，不幸被清军镇压下去。

11月，河南省农民掀起反对丈量土地的风潮。清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决定丈量黄河泛区垦熟荒田，按亩升科。从而引起祥符、陈留、考城等县农民的骚动。在祥符县李庆元的率领下，三四万农民包围开封，断绝交通。不久，被河南巡抚陈夔龙派兵镇压。

和北方各省农民反抗同时，南方各省的反抗斗争也普遍展开。江苏省镇江农民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漕粮，占据衙署，痛殴官吏。湖北宜城农民反对军户税契，“聚众揭竿，抵抗官军”。广东省香山、潮州，福建省云霄厅等地都发生农民捣毁税卡的骚动。

南方各省由于会党往往加入反抗斗争，成为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所以斗争比北方更为激烈、持久。1904年《东方杂志》在“时评”中说：“广西会党近已入湘赣边界，江西东平会党又窜入皖，湖北恩施教案频仍，而蠢蠢欲动者所在多有。长江会党如青帮，如红帮，到处隐伏。要而计之，扬子江流域数省，如江苏，如江西，如安徽，如湖北，如湖南，如广东，如云南，如四川，皆不能免于乱事者也。”[(64)] 其中尤以江西乐平反对靛捐和广西农民起义最为突出。

江西乐平是靛青的重要产地，农民多以种植靛青为业。洋靛未输入前，乐平土靛畅销省内外，获利甚厚。自洋靛输入后，土靛市场渐渐缩小，价格日跌。再加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靛农的生活日益困难，民怨日深。1904年，乐平知县杜磷光串通劣绅以筹集学堂经费为借口，抽收靛捐，规定每售土靛二元，缴捐三文。因此激起靛农的强烈不满。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义遂乘机鼓动抗捐。广大靛农积愤已久，乃决心毁学堂，“以鸣其积不能平之心”[(65)]。群众捣毁学堂，表现了落后性，但他们反对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却是正义的。7月21

日，数百群众在夏廷义率领下冲进县城，捣毁小学堂；又至保甲局，夺取该局所存洋枪四十枝。两天后，县城内聚集抗捐群众三千多人，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及教民房屋，统捐局和缉私各卡委员也遭到群众惩办。江西巡抚夏时闻讯，非常惊慌，一面将杜璘光撤职，委冯用霖接任知县，冯未到任前，仍准杜留任，“戴罪立功”；一面委饶州候补道朱子春带兵前往乐平，借“查办”之名，布置镇压抗捐人民。

8月26日，朱子春命杜璘光下乡会晤夏廷义，企图利诱夏廷义自动投案。然而，杜一出城便被抗捐群众拘留。同一天，夏廷义率领三千多人再次冲进县城，杀伤官军六十余人，其余二百多人亦作鸟兽散。朱子春化装逃跑。抗捐群众将县署烧毁，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一时控制了乐平县城。西乡、南乡的地主团练武装也卷入抗捐斗争。邻县也频传警报，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夏时急速调派九江道瑞澂，带兵千余人，向乐平进攻。官军沿途掳掠，人民纷纷逃避，当瑞澂进入乐平城时，“居民铺户，十空其五”[66]，凄凉惨淡，不堪言状。各乡参加抗捐的地主武装见大队清军压境，都先后退出斗争，只有夏廷义领导千余人仍在上下睦两村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抵抗。但是，由于寡不敌众，于10月被清军击败。瑞澂对抗捐农民实行残酷镇压，又勒索了二万八千两银子，作为对所毁衙署，学堂和教堂的赔偿。从此乐平人民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负担。

在乐平抗捐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广西农民起义也达到高潮。广西地瘠民贫，官吏滥杂而贪酷。1901年以后，捐税猛增，苛派多如牛毛，加上左右江一带连年天灾瘟疫，死亡枕藉。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兵勇无以为生，天地会遂活跃起来。天地会是南方各省民间的秘密结社，源远流长，在广西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曾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被镇压下去。1902年，在广西省西南部的左右江各县又酝酿大规模的起义。上思县天地会首领谢三首先发难，各地被裁游勇纷纷聚众响应。接着，百色、凌云、田阳、田东、西林、西隆、邕宁、柳州、郁林各州县的会党游勇纷纷起义，到处燃遍了农民反抗的烽

火，“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仅左右江一带就有起义队伍数十股，约五六万人。

至1904年，起义队伍在广西腹地逐渐形成两大支，以陆亚发为首的一支最为著名。

陆亚发是游勇出身，曾一度被招安，隶属于驻柳州清军统领祖绳武部下。由于同时被招安的游勇被清军杀害，又值各地民变蜂起，陆亚发遂于1904年5月发动柳州兵变，攻占衙署，劫取藩库饷银二十万两和大批枪械，转移至四十八峒。从柳州撤出后，陆亚发联合黄九姑、侯五、覃老发等，先后攻占柳城、罗城及中渡等地，转战于迁江、上林、融安、永宁各县，影响达到贵州和湖南边境。几个月里发展至万余人。曾大败广西提督丁槐率领的清军，逼进桂林省城。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督率龙济光、陆荣廷各部清军，以优势兵力，经过多次激烈战斗，至1904年底才把这支队伍镇压下去，陆亚发、覃老发等先后被俘遇害。

另一支队伍以黄五肥、王和顺、关云培为首，他们以南宁附近为中心，活动于隆安、武鸣、上林、宁明、上思、宾州、扶绥等地，屡败清军。1904年春，丁槐督率清军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终于使起义军内部分化，被各个击破，黄五肥、关云培先后战死，其部众多被丁槐“招抚”。王和顺所部三千余人也不幸战败，退入十万大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王和顺逃往南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多次潜回两广云南发动武装起义。

广西农民起义虽然被岑春煊指挥的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是，它对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是重大的打击。1902至1904年三年之中，广西督抚数易其人。巡抚王之春因“漫无觉察”，“酿成祸患”，于1903年被撤职。广西提督苏元春以纵“匪”罪被参革，充军新疆。清政府调动广东、湖南、贵州等数省十余万兵力，耗饷三百八十余万两，历时数载，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这段时期内，由于全国厘卡林立和商业捐税的猛增，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被扰不堪，接连掀起抗捐罢市。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斗争尤为激烈，仅1903至1904年就发生较大规模的斗争二十余起：

1903年，广东省佛山镇、三水西南埠、清远县、新会县等地商人，相继罢市抗屠捐。广州酒商反对收酒税罢市。增城群众数千人反对猪捐，并要求开仓平粜。江苏省扬州税吏勒索太甚，商人运米，农民卖菜都不能逃过其手，因而激成商人罢市。同时淮安县商人罢市，反对抽房捐。江西省各县设立统捐局以后，遭到群众激烈反对，全境骚然。景德镇和瑞昌、新城、宜春等地群众群起捣毁捐局。南昌蔬菜商罢市，抗议征收捐税。

1904年，广东省惠阳商人反对征收房捐和兵勇骚扰，举行罢市。潮州、从化、阳山、英德等州县都发生群众反抗屠捐的斗争，阳山和英德参加抗捐的群众都多达数千人。广州税吏抽收船捐，勒索船户，激起公愤，货船、米船、渡船一律停运抗议，坚持六天。广西省梧州商人罢市，拒绝缴纳统捐。江苏省镇江菜贩、摊贩等万余人到县署示威请愿，抗议巡警局新订规章，强迫摊贩每日交捐四十文。由于巡警鸣枪杀人，群众遂将巡警局捣毁，全城商店罢市。无锡米行罢市，抗议抽收米厘充学堂经费，并将学堂和学董住宅几乎夷为平地。南京下关二千多人砸毁税局。四川省成都由于抽收厘捐，发生罢市。10月初，重庆商号皆闭门歇业，抗议厘局差役在各城门盘查商人，敲诈勒索。地方官慑于群众的威力，只得答应此后厘捐按章抽收，不许额外勒索，如有违章，准赴局控告。

1905年，抗捐罢市仍然此伏彼起。江苏省清江浦商人罢市，抗议兵勇抢劫商店，要求惩办肇事首犯。扬州酒店罢市，反对加抽酒捐。如皋县石庄镇群众反对抽学堂捐，焚毁办捐绅士住宅。泰兴县群众反对抽牙帖捐修建学堂，聚众二千多人将小学堂捣毁。盱眙旧县镇商人罢市，抗议厘卡差役勒索。上海租界货栈业罢市，抗议巡捕骚扰货

场。南市商贩结队至捐局，要求减捐。安徽省潜山县向屠宰商强征巡警捐，激成罢市。广西省梧州白马卡苛征过往船税，商人罢市抗议。梧州戌圩商人罢市，反对抽学堂捐。广东省南海县皮窑圩和花县商人罢市，反对征学堂捐。福建厦门群众二千余人捣毁税关，商人罢市声援。浙江省因大量鼓铸铜元，造成铜元贬值，仁和、宁波、余杭、桐庐等地商人罢市，居民骚动。

综观上述，1902年至1905年间，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抗捐罢市此伏彼起，日趋激烈，形成反对封建压迫的一条新战线，与广大农村中的骚动和起义互相呼应。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在“扫清灭洋”等口号鼓舞下，仍然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然而，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农民无法克服自身的落后性。他们所提出的“扫清”，缺乏建立共和国的目标，“灭洋”则更带有笼统的排外色彩。事实证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完成革故鼎新的艰巨任务。

但是，广大农民的英勇反抗，震撼了旧秩序，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显示出农民中孕育着无穷的潜力。这对于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计划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义和团运动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在农民的正义斗争中蕴藏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力量。而今，他们的认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3年，正当广西烽火连天的时刻，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中说：“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又说：“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而尤胜，可豫言也。”(67) 次年秋，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文中写道：“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腐败了。”他以广西人民起义为例证进一步说：“从最近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装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唯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于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的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68)

这些事实表明，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潮流，正在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向前进。

第三节　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一　抵制美货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新的觉醒，极力为自己政治经济的发展开拓道路。继拒俄运动之后，1905年又掀起了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美国资产阶级就大量诱致或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事垦荒、采矿和筑铁路等项劳动。中国寓美华侨艰苦卓绝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西部的铁路也无法完成。”(69)然而，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兴起。美国资产阶级为转移本国工人的斗争目标，不断制造排华事件。美国政府颁布的排华法案，层出不穷，公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限制华工入境。1894年3月31日，美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把美国的排华合法化，使到美国去的华工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种种非人的侮辱。这个条约明明是限禁中国人赴美，却假仁假义地以保护寓美华侨作为幌子。其实，寓美华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1900年，美国政府以验疫为名，把纽约华人住区烧光，使不少华人丧命，损失财产达二百六十多万元。

因此，当1904年条约期满的时候，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上都不断有要求废约和揭露美国虐待华侨的文字出现。檀香山《新中国报》刊登《拟抵制禁例》一文，首先倡议抵制美货。同时，美国有一百几十个地方的十多万华侨联名打电报给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除迫害华侨的苛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修改原条约。修改的原则是：可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能禁；可禁受美人雇佣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能禁；可禁未入美之工，而已经在美之工不能禁。尽管清朝政府的改约条件很低，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交涉几个月，毫无结果。1905年春，美国政府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aim W．Rockhill）与清政府直接谈判，威胁清政府签订续约。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严厉斥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他提出以两个月为期，如果美国仍不允许改订条约而强迫续约，则将抵制美货。这个倡议得到全体商董一致赞成。随后公议电稿，以曾铸的名义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70)]。并遍电各省商会或商务局，要求协力拒约，相戒不用美货。

会后，上海总商会与美国驻沪领事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结果。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然蛮横拒绝改约。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要求各界一致行动。当场，铁业、机器业、洋布业、洋广五金业、面粉业、火油业、木业七个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允认不进美货，不卖美货。会后签押者又有钟表、航运、裁缝、印刷、磁器、纸张等七十多个行业。与此同时，各省会馆、学生、工人、戏剧艺人、妇女界等也纷纷集会演说，声讨美国虐待华工，并结成各种抵制美货团体，制定措施，采取行动。工人不装卸美国货，学生不到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中国人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各界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不买美货。

各学堂学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上海“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相约严守：所有文具衣物概不用美货，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学生和教员纷纷离校。清心书院、中西书院因此被迫停课。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抵制美货还召开了特别大会。会长李登辉愤怒指出：原华工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否则抵制美货到底。广东何剑吾、吴趼人、李毅轩，福建魏万侯、林森等相继登台演说。会后，吴趼人、李毅轩游历杭州、宁波等地，计划联合各地拒约会，结成一个大团体。戏剧艺人汪笑侬演出《苦旅行》一剧，取波兰亡国故事，说明不爱国与无主权国民之痛苦，借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接到上海商会通电，大动公愤，立即联合各学堂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声明学生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爱国为“应尽之义务”。因此应首先实行不购美货，以示“人心之固”，而“寒妄进美货者之心”。天津各帮行商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挠，于6月18日在商务总会公所开会，到二百余人，均画押从此不买美国面粉、煤油及机器等物，并约定如有违者，罚款五万银元。同日，天津府立中学堂和私立敬业中学堂邀请二十六所学堂代表共六百余人集会，议决每学堂公举一二人，分别召开演讲会，展开宣传，使抵制美货家喻户晓。

湖南人民也积极支持上海商会的倡议。华兴会会员禹之谟通过长沙商会发起召开全省绅商学界抵制美货禁约会，到会数千人，一致以爱国为同胞应尽之义务。会后，正式成立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

广东省寓美华侨最多，人们对华工受虐待感受尤深，因此反美斗争比较其他省更为激烈，坚持时间最久。从5月中旬起，广东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连日集会，讨论抵制办法。至7月23日，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数万人。会议决定印发章程及美货图表，推举专员，分赴各行业商店盖章签押，拒绝销售美货。接着，南海、新宁（今台山）、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歧、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也积极投入

斗争，相戒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相约不用美国面粉，如店主不从，则实行罢工，以示抵制。南海、东莞、广州等地的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美货。知识分子创作了《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文学作品，暴露旅美华侨所受的种种虐待，激发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广州、香港等地报纸积极从事宣传鼓动。《有所谓报》、《拒约报》持论尤为激烈。《有所谓报》为革命党人郑贯一所创办。该报不仅报道了中国各地拒约的许多消息，而且刊载了大量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惧外媚外的特性”，鼓动人民在抵制美货的过程中组织团体，增强实力，使“民权发达，专制堕落”[71]。对于推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拒约运动迅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规模。南京、苏州、扬州、镇江、芜湖、汉口、桂林、成都、重庆、杭州、南昌、西安、牛庄、青岛、沙市、济南等一百六十多个城市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一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极为广泛，除商人、学生、工人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积极参加了斗争。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更是函电交驰，遥为声援。

各地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宣传抵制美货有五利：可鼓民气；可结民力；可兴商业；可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可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已失利权。他们公开声明抵制美货“亦一无形之战也”，“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并竭力鼓动“不必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以国民“自力抵制之”[72]。《东方杂志》所刊《抵制美约余论》一文，甚至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73]。这些言论表明，资产阶级正在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独立展开政治经济活动。

反美爱国运动展开后，美国政府屡次要求清政府加以镇压。运动一开始，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奔走于京、津、沪各地，指挥美国领事，阴谋直接干涉破坏。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大肆宣传美国只禁华工入

境，并非禁止商人、学生和游客，企图借以分化参加运动的群众。同时，柔克义又一再要挟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一面对柔克义解释说："各处中国商人反抗贵国之举，实系该商人等自由行动"，"非出自政府之诱掖"，"政府虽曾谆谆训戒，毫无效验"。一面于8月21日发布上谕，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各级地方官应"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省督抚遂竭力压制反美运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不允许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使北方各省抵制美货运动受到很大挫折。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人，以破坏广东省的运动。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动摇、退缩。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于8月退出运动。原来卖美货商人和不卖美货商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发生意见分歧。张謇、汤寿潜等出面"调解"，主张8月以前进口美货可以贴印花出售，得到卖美货商人的支持。这就使运动发生了分化。广州运动一开始就有人以争取合法化为借口，主张取消"拒约会"名称，以避"禁"、"拒"等字。后来，运动全面展开，一些大商人由于害怕群众扰乱了他们的"文明抵制"，对外妥协的倾向越来越为明显，甚至公然同意美国禁工不禁商。这些事实表明，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反帝的勇气。这种情形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

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主张，立即遭到中小工商业者、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激烈反对。许多地方开展了反"奸商"的斗争。在上海，以戈忠为首的"公忠演说团"，联络学、商、工各界，坚决反对张謇等"疏通"。9月1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均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上海工界和平社于10月26日在豫园开大会，五百多人出席，一致表示继续坚持斗争，"此禁约一日不废，彼美货一日不用"。

广大群众的斗争尽管如此坚决，但是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严重

地削弱了抵制美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到1905年底就渐渐消沉了。广东坚持较久，至次年底也不能继续维持。

这次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坚持半年之久，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通过这次斗争，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一批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如李自重、李是男于1905年曾在广东台山组织“台山联志社”，鼓动抵制美货，后来他们都成为同盟会会员。广州拒约会员夏重民被释放后，立即加入同盟会，变成革命的积极分子。有些地方的拒约会经过改组变成了革命的团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时候，一系列的收回利权运动也开始发动起来，而且持续数年之久。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以合法手段收回列强所攫取的各种利权，特别是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

现代化的铁路是国家的交通命脉。甲午战前，清政府当权的顽固派愚昧无知，盲目坚持闭关政策，甚至有视铁路为“弊政病国病民者”[(74)]。因此，筑路速度极慢，从1866年（同治五年）在中国土地上修筑第一条铁路开始，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止，总共仅筑成三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变了从前的顽固态度，于1896年设立了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铁路公司虽然成立了，但是清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缺乏筑路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列强遂争先恐后地输出其过剩资本，攫取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以便榨取巨额利润。从1896年至1903年，盛宣怀以铁路总公司督办的资格，与列强订立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和草约，其中包括芦汉、正太、沪宁、汴洛、粤汉、津镇、道清等路借款合同，和苏杭甬、浦信、广九各路的借款草约。这些合同和草约不仅使中国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而且还都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使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进一

步深入到中国更多的地区。

铁路利权的不断丧失，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安。从廿世纪初年起要求自办铁路的呼声便越来越高。清政府为了缓和内外矛盾，于1903年由商部颁布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建筑铁路，为中国人自办铁路开了绿灯。因此，不数年间，集股自办的铁路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办的铁路公司作为列强夺取路权和清政府卖路政策的对立物出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对利润丰盈的铁路事业的投资日益增多，他们同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铁路和清政府卖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此，由他们倡议的收回既失路权的运动便在全国普遍展开。这个运动肇端于1904年至1905年收回粤汉路的斗争。

粤汉路是1898年由盛宣怀出卖给美商合兴公司的，经初步勘测，1900年借款四千万美元，规定粤汉路由合兴公司承造。可是该公司资本有限，三年之中才修了粤汉路南端广（州）三（水）线九十里铁路。1904年初，该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了比利时人。此后公司董事改由比人担任，粤汉北段也由比人建造。当时人们都清楚，比利时人用法国款，“权即属法，芦汉铁路即已如此。若此路再归比、法，法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75)]。因此，美商转售股票的消息传开后，粤汉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舆论大哗，绅商官吏纷纷上书，要求赎回粤汉路自办。留日学生也大力声援，组成“三省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并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当时，英国和法、俄矛盾很尖锐，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支持下，也坚决主张收回粤汉路自办。经过一年多的交涉，美商被迫同意赎路，由张之洞出面向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借款一百万镑作为赎金，于1905年将粤汉路赎回。所借英款由粤、湘、鄂三省分十年摊还。同时，清政府允许三省绅商分别集资，设立铁路公司。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各阶层人民大都踊跃认购股票。广东粤汉路有限公司，仅商股股本至1911年6月已筹集银一千四百多万两。这

次斗争的胜利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对各省人民收回路权起了鼓舞的作用。继之而起的是直、鲁、苏三省绅民要求废除津镇路借款合同的斗争。

原来，在英、德两国的威胁和利诱下，清政府于1899年被迫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议定由德华银行和汇丰银行合借英金七百四十万镑，以山东峄县为界，由英、德分别承筑南北段。1903年英德勘路完成，便催逼清政府改订正约。1905年督办津镇铁路大臣袁世凯派唐绍仪和梁如浩与英德驻天津领事谈判。消息传出后，直、鲁、苏三省留日学生连续上书清政府和三省督抚，要求收回津镇路权。他们指出，原有津镇借款合同仅为“预约，而非正约”，我有撤回之权，英德不得干涉[76]。在学生的推动下，三省京官恽毓鼎等一百五十余人联名上书，请废借款筑路草约，照粤汉路成案收回自办。三省绅商也函电纷驰，指出“外人假铁路实行殖民政策”，谋夺三省主权，即谋夺三省人民之生命财产。

这场斗争，持续近两年，仅迫使帝国主义作了某些表面的让步。到清政府与两国签订借款正约时，规定不拿路权作抵押，改以三省厘金作担保；不称“外国代办”，改称“中国自办”。但筑路与经营之权，仍操于英德工程师之手。

1905年还发生了江苏人民揭发盛宣怀在签订沪宁路正约时渎职卖路罪行的斗争。1903年盛宣怀与中英银公司签订沪宁路正合同。这条路长570里，借英金三百五十万镑。“每中里合四万两上下，比常价每里需要银万两者浮逾四倍”[77]。而且借款期五十年。同时还把以前官款修成的淞沪路作了抵押。1905年合同一公布，江苏绅民大为惊骇。苏省留日学生和京师学生纷纷上书，称“糜款太巨，赎路难期”，要求速谋补救。武进绅士刘翊宸上书抗议说：“五十年赎回”，“河清之俟，其讹欺哉！”[78] 另外还有人揭露了盛宣怀用行贿手段诱使外务部覆核签押正约的事。在各方呼吁下，清政府被迫责成盛宣怀重新与英方谈判。而盛以“无词可措，碍难悔约”回覆。这场斗争的结果，后

来仅勉强做到了“少借一百万镑”，即借二百五十万镑了事。但由于工程的靡费，不久又续借四十万镑，才修成了这条路。这场斗争的效果虽然不大，但却使盛宣怀的卖国嘴脸暴露于众。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掠夺中国的路权，同时也纷纷染指中国的矿权。据统计：在1895至1912年间，列强掠夺中国矿权的主要条款、协定及合同等达四十余项。根据这些项目来看，中国的富饶矿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大都为列强所染指。其中如山西的盂、平、泽、潞及平阳府属矿地，直隶的开平、临城、井陉诸矿，东北三省中东铁路沿线各矿，山东胶济路沿线及沂、蒙、登、潍各矿区，安徽铜官山矿区，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矿地，河南黄河以北怀庆府地区各矿，云南云南府等七府矿地，蒙古鄂尔河等处矿地，福建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区及四川省各矿区等。这些矿区，除少数矿地已经开采外，绝大部分却只是被霸占着，地下矿藏仍然未动。这种情况给中国民族矿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因此，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独立思潮的高涨，各省人民不断掀起收回矿权的斗争。

衢州、严州、温州及处州四府是浙江省的重要矿区。1898年，浙绅候选道高尔伊组成宝昌公司，经英国福公司华人经理刘鹗（字铁云，即《老残游记》的作者）介绍，向意大利商人开办的惠工公司借款五百万两，承办衢州等四府煤铁各矿。实际上，宝昌公司没有资本，高尔伊不过是惠工公司的买办。这项卖矿活动竟于1903年2月由外务部奏准，从而激起浙江人民的义愤。浙籍全体留日学生于10月3日在东京召开了特别同乡会，议决致书国内，要求浙绅责问高尔伊，令其废约。同时，《浙江潮》接连发表了《致高尔伊书》、《浙江人听者！卖我浙江矿产者听者》等文，谴责高尔伊“举亿万年无穷之宝藏以为献媚外人之贽见礼，图博他日之高等奴隶地位，真是狗彘不食之徒”。文章号召浙江人民奋起保卫矿权。同时，浙江绅商陈叔通、孙翼中等在杭州西湖集会，与高尔伊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各学堂学生闻风响应，风潮大起。上海的浙籍绅商联名发表了《为杭绅高尔伊

盗卖四府矿产事敬告全浙绅民启》，坚决要求收回矿权。

斗争一直延续到1905年。这一年1月，高尔伊居然不顾浙江人民的抗议，与英国和意大利商人合办的惠工公司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这就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浙江绅商在上海斜桥商务局开会，讨论自办全浙铁路，会上异口同声斥责高尔伊卖矿，并将其驱逐出会场。上海、杭州等地报纸一致声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外务部和浙江当局以高尔伊所订借款合同为“英义惠工公司”，与前奏准案“义惠工公司”字句不符，而且办矿限期已逾两年，宣布撤销原奏准办矿合同，收回四府矿权。以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及驻上海总领事支持英商无理纠缠。但外务部坚持原议，所据理由十分充足，使英方无词反驳，只好默认了中国收回浙江矿权的事实。

与浙江人民展开收回矿权运动同时，福建人民收回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权的斗争也方兴未艾。1902年，经清政府外务部奏准，法国大东公司和华商华裕公司取得福建建、邵、汀三府矿权。合同规定所勘各矿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准其他公司接办。表面上，华洋两公司各集资本，权利平等。实际上华裕资本甚少，所有利权均归大东独揽。对于这种利权外溢的情况，福建绅商甚为不满，遂于1905年发布揭帖，揭露华裕公司林蕃、龚铭义卖矿，指出外人办矿对“吾闽之绅民，则利无一毫，而害有万端”[(79)]。呼吁全省人民“力逼政府废约”，募集资本自行开矿。接着，“闽省各界，迭开会研究此问题。而旅沪及外埠同乡，亦纷纷开会，函电交驰”[(80)]。福州各学堂学生上外务部禀称：“杜外人之觊觎，辟闽省之利源，维系人心，全在此举。”要求“迅予照会法使，宣言照约注销合同”[(81)]。闽省京官林灏深（学部左参议）、陈宝琛（礼部侍郎）等联名向外务部呈文，要求收回三府矿权，由“商任经营，官为保护”；并举荐在南洋办矿起家的胡国廉总理全闽矿务。法商见人民反抗日益激烈，便企图勒索一笔“赔偿费”，放弃矿权。外务部亦不敢犯众怒，断然拒绝了法商的赔偿要求，并于1907年展限开矿届满时，宣布不再延期，而将三府矿权

收回。

1904至1905年间，是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初期阶段，除上述各省进行了斗争，并取得成绩外，其他各省也相继展开活动。如：为收回苏杭甬路权，江浙人民分别组成铁路公司，掀起拒款风潮。山西绅商展开了收回盂县等地开矿权的斗争。同时，反对英商霸占铜官山矿区的斗争也开始发动起来。此外，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直隶、黑龙江等省都争先恐后地展开收回本省利权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在以后的几年里达到了高潮。

收回利权运动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力图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枷锁，扩大自己经济权益的要求，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行动。因此，卷入运动的群众相当广泛，有工商业者、绅士，有学生，也有广大劳动者，甚至还有少数清朝的官吏。当时，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对这个运动也曾给予密切的注意。每当国内掀起斗争时，他们或以各省留学生的身份上书，大声疾呼，不遗余力；或利用留学生办的刊物，登载文章，遥为声援。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刊物，都对本省收回利权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革命党人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缺乏紧密的联系，他们对这个运动的实际影响并不大，自然更谈不上进行领导。

收回利权运动和反美拒约运动的蓬勃发展，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比过去更为活跃了。同时，这一系列的运动吸引了各阶层人民参加，充分表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国内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高涨起来。

(1)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01页。

(2)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第13页。

(3)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3册，卷27，第19—67页。

(4)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5)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01页。

(6) 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1902年。

(7)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下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外务部是一个重要的衙门，它管辖的范围极广，负责一切对外交涉的事务，除签订条约、划定疆界、派遣使节外，更多的是有关通商、海防、路矿、关税、邮电、华工、传教、游历等事务。以后随着商部、邮传部的成立，才有所改变。

(8)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考3。

(9) 《陶湘致盛宣怀“录闻四纸”》，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二日，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2页。

(10)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3页。

(11) 新军的编制顺序为镇、协、标、营、队、排、棚，每棚十四人，一镇官兵夫役一万两千五百十二名。

(12) 官兵数主要依《清史稿》光绪三十三年统计。

(13) 《政艺丛书·内政通记》卷1，第8页。

(14)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39页。

(15) 《鹭江报》第71期，1904年7月14日。

(1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502页。

(17) 《清史稿·陆润庠传》。

(18) 《宫中档清光绪朝奏折》卷24，第62页。

(19) 《宫中档清光绪朝奏折》卷23，第171页。

(2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54页。

(21)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54页。

(22) 《张之洞未刊电稿》，《致鹿传霖书》乙巳年（1905年）三月初八

日，国家图书馆藏。

(23)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64页。

(24)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4页。

(25) 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咸丰死后，他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历任户部侍郎、步军统领、工部尚书、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大臣等要职。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直隶地盘，北洋军权便落入荣禄手中。

(26) 《北京来信》（英文版），第215页。

(27) 《莫里逊致濮兰德函》，1902年2月1日，《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177页。

(28) 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29) 叶恭绰：《清季军机处》，文史资料未刊稿。

(30) 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文史资料未刊稿。

(31) 《陶湘致盛宣怀信》，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

(32) 柴萼：《梵天庐丛录》第4册卷8，第25页。

(33) 《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229页。

(34) 《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229页。

(35) 黄遵宪：《驳革命书》，《新民丛报》第24期。

(36)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新民丛报》第21期。

(37)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新民丛报》第21期。

(38) 黄遵宪：《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4期。

(39)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

(40)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中外日报》，1904年5月5日。

(41) 《论中国立宪之要义》，《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42) 《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时报》，光绪三十年八月七日。

(43)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3，第18页。

(44) 张謇：《嗇翁自订年谱》，甲辰年五月条。

(45) 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新民丛报》，第62期。

(46)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05页。

(47) 《读十四日上谕书后》，《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48) 《天讨》，第49页。

(49) 《御史胡思敬奏折》，《宣统政纪》卷11，第25页。

(5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251页。

(51) 《中外日报》，1902年5月28日。

(52) 袁世凯：《覆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6，第9页。

(53)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54)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七日。

(55) 《川督岑春煊奏折》，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56) 清《德宗（光绪）实录》卷498，第10页。

(57) 《续修资州志》，《兵燹》。

(58) “白布会”原是反清的秘密会党，为咸丰年间瑞安绅士孙依言所组织。

(5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51页。

(60) 《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

(61)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62) 《大公报》，1904年10月10日。

(63)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大兵收复临安府城折》，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南京第二档案馆档案。

(64) 《内忧外患相因并起》，《东方杂志》1904年，第4卷第10期。

(65) 《内忧外患相因并起》，《东方杂志》1904年，第4卷第11期。

(66) 《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九月一日。

(6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60页。

(68)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63页。

(69) 《美国参议院档案报告》第680号，第48页；转引自古丽芝：《中国移民》，第63页。

(70)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7页。

(71) 《有所谓报》，乙巳（1905年）五月二十五日。

(72)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73) 《东方杂志》1906年，第2期。

(74) 匀士：《论中国近日权利思想之发达》，《东方杂志》1906年第9期。

(75) 《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等致外部粤汉铁路北段美售于比请照合同作废电》，光绪三十年四月二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82。

(76)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77) 《江苏京官内阁中书尹克昌等参奏沪宁路事呈文》，《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78)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

(79) 《矿务档》第3035页（第1764号文件附）。

(80) 《建邵汀问题意见书》，《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8日。

(81) 《闽人力争矿产三志》，《中兴日报》，1907年12月7日。

第五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一节　国内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从1894年开端，到1903年发展成为比较广泛的社会运动。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用暴力手段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中国教育会在会内革命分子的推动下，为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它并未脱离群众性社会团体的规模，没有将暴力行动列入议程。改组后的军国民教育会虽然将“起义”、“暗杀”列为进行方法，并派有归国运动员，但它还是一个成员流动性很大的松散的组织，并且设在国外。两会都不能完全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从1903年末到1904年初，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自然发展，国内出现了一批新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分布于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这些革命小团体中的一部分把发动武装起义或组织暗杀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如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它们的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各种不同类型的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反映了反清革命运动的普及和深入。

一　华兴会

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是两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东乡凉塘人。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

富足的地主家庭中。黄兴九岁入塾，十五岁入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岁补县学生员，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这一年，光绪下诏变法，他极为关心政治的改革，同情维新运动。1900年，在武昌参与了自立军起义的密谋。1901年夏，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6月，被派赴日本，官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黄兴爱好军事，课余聘请日本军官教授军事学，努力学习各种军事技能，准备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运用。1902年11月，他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笃生）、梁焕彝、樊锥等发刊《游学译编》杂志，开始宣传反满和建立民主政治。不久，又设立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译介西方名著。黄兴热心社会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同志，是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和军校学生的领袖。1903年，他在拒俄运动中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自告奋勇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归国运动员，预备往湖南、湖北和南京一带活动。

1903年5月，黄兴毕业于弘文学院，月底，离日归国。他先到上海和当地的革命分子计议革命运动的开展。这时，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在沪招聘教师，黄兴应邀回乡任教。途经武昌，他返回母校两湖书院演说，号召以改革政体来维护国家生存。知府梁鼎芬闻讯大怒，悬牌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坦然地将随身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等宣传品散发给当地军学两界，然后从容登舟。

在戊戌变法时非常活跃的湖南新学界，政变后受到湖南当局和劣绅王先谦等人的摧残。1903年，赵尔巽抚湘，倡导兴实业、办学堂，比较开明。湖南新学界得以逐渐恢复。胡元倓（1872—1940）是新学界的领袖，字子靖，湘潭人，1902年官费赴日，同年毕业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湘后即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黄兴抵长沙后，主持了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同时又协助胡创办了经正学堂，白天在学堂授课，晚间筹划革命。他与杨度、陈天华、杨昌济成为胡元倓的忠实同志，刘揆一、钱维骥等也为胡积极奔走。新学界另一领袖人物周震鳞则与胡相互提携。周震鳞（1874—1964）字道腴，宁乡

人，两湖书院毕业，办有修业、敬业学堂，宁乡中、小学堂等校和《俚语日报》。1904年中，长沙共有学堂三十四所，而民立学堂即达十九所。支持他们办学的，除赵尔巽外，还有湘籍大吏龙湛霖、袁树勋、谭钟麟等。胡元倓倾向反清革命，他与黄兴刊刻了数千册《猛回头》、《警世钟》，传布民间。但是，由于王先谦等极端守旧，顽固地排斥一切讲新学的人，胡等不得不与政治色彩不同的各方人士优游往还。官僚家庭的开明子弟龙绂瑞、谭延闿等同情和支持胡、黄等人，中间派俞诰庆、张祖同等也依附于胡。湖南新学界的活跃，给革命运动的进行提供了方便条件。通过胡、黄等的邀聘，留学生和外省的革命分子叶澜、秦毓鎏、翁巩、华鸿、苏子谷、张继、曹亚伯等都先后来到长沙任教。

1903年11月4日（夏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友人刘揆一、章士钊、彭渊洵、翁巩、柳聘农、周震鳞、胡宗畹等设觞为他祝寿。在宴席上，他们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华兴会在长沙联升街设立了机关。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加入华兴会的，还有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刘道一、叶澜、吴禄贞、李书城、易本羲、陈方度、李燮和等人。华兴会的骨干几乎全部都是在长沙及湖南、湖北一些地方的新式学堂的师生。胡元倓、龙璋等都支持华兴会的活动。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的文件。

华兴会的著名人物大半都是革命实干家，他们的注意力侧重于研究夺取胜利的策略。黄兴根据他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不赞成模仿英法资产阶级从首都发难的办法——他称之为“中央革命”。他主张从一省首先发动，各省响应，最后推翻满清。他对华兴会成员们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

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合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1)] 黄兴提出的这种策略，革命党人称之为“地方革命”，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情势，以后革命党人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实际上都是采取的这种策略，只是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能够“直捣幽燕”。

在黄兴提出的策略中，会党受到充分的重视，被视作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早在日本时，刘揆一就向黄兴强调过会党的作用。他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听取法。”[(2)] 会党自成组织，和下层群众有较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团结力和号召力，革命党人想收速效，不准备耐心地去民间直接组织自己的战斗力量，当然首先只能看中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势力最强大的，是马福益做龙头的哥老会回轮山佛祖堂。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原是湖南省醴陵县的佃农，早年曾在江南当营勇，参加哥老会，因事被斥革。回乡后，得地方势力许可，在醴陵渌口（今属株洲市）地方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逐渐遍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徒众达万人之多。刘揆一的父亲在湘潭当衙役，救过马，两家相识，华兴会便推刘前去联络。刘揆一携带黄兴的亲笔信往会马福益，用反满的民族思想劝说其反清，马福益欣然同意和华兴会合作。华兴会成员多是知识分子，怕会党成员复杂，难于共处，便专门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构。1904年初春，黄兴由刘揆一陪同，短衣钉鞋，头顶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到湘潭荼园铺矿山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相会，在熊熊的柴火之旁，共商起义大计。他们决定于夏历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生日

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义。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马福益用煨鸡好酒盛情款待了二人。归途中，黄兴兴奋长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热烈期待起义的胜利。

华兴会的成员为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胡宗畹、宋教仁在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推动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活动。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乃是华兴会起义准备的一部分。陈天华化名去江西游说巡防营。当时，邹永成在江西联络会党、军队，组织"黄自强公司"，也和华兴会相联络。谭人凤、李燮和在宝庆一带联络学界、会党，等待响应。刘揆一应聘任醴陵中学堂监督，协调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和东南革命党人联络，作为外援。此外，安庆、九江、南京、杭州的革命党人也设有响应起义的联络机构。黄兴亲自往返于湘鄂间布置，统筹全局。因经费困窘，黄兴等售产借贷，供给各种费用。黄兴、龙璋，杨笃生等另筹二万三千金，购买枪械。

马福益将其部众配置为东、南、西、北、中五路，由谢寿祺、游德胜、萧贵生等为正副总办，负责组织队伍。邀集两湖会党参加起义。安源矿工中的洪仁会领袖萧克昌也作了响应准备。各路会党队伍都静候华兴会派出指挥和监军前往领导。华兴会为加强约束，仿效日本军阶将会党编成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八月，浏阳普集市牛马交易大会期届，黄兴派刘揆一、陈天华等前去会晤马福益，举行授予少将仪式，并赠与长短枪、马匹，用以巩固同会党的团结。

但是，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不十分扎实。临时的协议和虚张的声势经不起严重的斗争，甚至也经不起偶然的过失。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斗争训练。会党为维护内部的统一，有森严的会规，但他们在社会上的散漫行为却不适应重大的政治行动。偶然的过失总是难免的。

号称湖南“土皇帝”的王先谦一直窥伺着新学界的动向，他利用其门徒、新学界败类刘佐楫同胡元倓一派人对抗。1904年5月，赵尔巽离任，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即与这个腐朽无能的官僚勾结，公开摧残学堂。王、刘十分注意华兴公司，扬言这是革命党。迫于形势险恶，黄兴等加速起义准备。但是一个华兴会员却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被刘佐楫侦知，报告王先谦。王急向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陆因有人劝阻，没有立即捕人，命巡防营严加侦缉。官厅的侦探结识了会党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伪装要好，赚得实情，在醴陵车站将二人捕送省会。10月24日，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这时正在侍郎龙湛霖家中议事，龙的儿子绂瑞慨然藏宾，并亲往长沙中学堂将华兴公司的文件取出销毁。刘揆一等纷纷走避，会党首领游德胜、萧贵生被捕。游、萧在严刑之下招供出内情，官方搜捕更加紧急，但因没有证据，华兴会的人员没受到损失。黄兴在龙家躲了三天，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由教士黄吉亭等加以掩护。11月4日，游德胜、萧贵生遇害。待风声稍缓，黄兴便化装出走，由黄吉亭、张继等护送，经汉口转赴上海。长沙起义流产。

此前，黄兴一直用着本名“轸”，黄吉亭在汉口船上分别时，暗地嘱咐他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于是，黄兴的名字从此用开了。

当起义还在准备之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与蔡元培、陈由己、杭辛斋等成立爱国协会，联络各地人士响应，杨、章分任正副会长。苏鹏还奉命赴日本招回一批留学生准备参加起义。他们以兴学会的名义在新闸路余庆里租屋招待来往同志，黄兴和其他一些逃亡的华兴会成员抵沪后就住在这里。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章士钊等曾参与密谋。次日，章前往捕房探望万福华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搜查该地，黄兴、张继、周来苏、苏鹏、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人被作为嫌疑犯拘捕，杨笃生逃出。郭人漳是清朝候补道，在江西统兵，与华兴会有联系，因为

他来沪是奉江西巡抚之命，旋被保释。黄兴化名李寿芝，伪称是随郭来沪公干的教员，瞒过会审公廨，一同被释放。黄兴出狱后，随即与刘揆一再次去日本。袁树勋不想兴大狱，经蔡元培、龙璋等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后来也相继出狱。华兴会成员陈天华、宋教仁、柳聘农、彭渊洵、刘道一等都先后流亡日本，他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长沙的新学界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大批进步教师纷纷离湘他适，外省旅湘教师的俱乐部被迫停止活动，旅湘安徽公学也迁往芜湖。钱维骥创设讲艺公司，想以此再行聚集同志，也被陆元鼎阻止。胡元倓、周震鳞受到王先谦、刘作楫的恶毒攻击，靠着一些官绅的维护，侥幸将所办的学堂保存下来了。整个新学界的政治色彩，大为暗淡。

会党领袖马福益在长沙起义泄密后，逃往广西。他又联络了广西会党和湖南旧部，准备再次发动起义。1905年春，他自桂返湘，徒众派人前往迎接，由于马福益临时改变路线而未遇。4月12日，马福益在途中被清军截捕，他英勇拒敌，在被缚时还踢死了两名清兵。马福益是参加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优秀会党领袖。他的徒众坚持追随华兴会革命，与他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关系。会党采取的是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首领有着极大的权威，在革命党人没有直接向会党群众进行教育的情况下，首领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品质往往对徒众起着决定的影响。马福益被解往长沙后，受到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4月20日遇害。

二　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

以胡宗畹（瑛）为经理的科学补习所是湖北地区的反清革命小团体。

湖北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开展较早的地区。著名洋务派官僚张之

洞长期任湖广总督，在鄂办工厂、练新军、设学堂、派游学，造成了庞大的洋务系统。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活动刺激了当地民族资本的发展。官办学堂里的部分青年蔑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纷纷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最初，他们拥护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在自立军失败后，其中许多人迅速地倾向革命。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武汉的爱国活动在国内处于醒目地位，1903年，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时功璧、时功玖、张荣楣、吴柄桫、李书城等经常在花园山李步青宅和水陆街吴禄贞宅集会，宣传排满，并介绍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还与会党有了联系。他们实际上成了一个革命团体，但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官方采取了巧妙的对付办法，派他们出国游学以分散他们的力量，激烈者派往欧洲，纯谨者派往日本。1904年初，朱和中等相继离鄂，吴禄贞被调往北京，他们那无形的革命团体便解体了。不过，就在这时，由于华兴会的影响，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发生了转机。

1904年3月，华兴会会员胡宗畹因组织助日学生军为官方所忌，由黄兴介绍到吴禄贞处避难，因此结识了当地的革命分子。他和张难先等谈论革命的方法，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非亲自加入行伍不可”[(3)]。于是，胡、张二人便投入新军工兵营当士兵。胡宗畹（1884—1932）字经武，后改名瑛，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破落的小吏家庭，原在长沙经正学堂读书，是黄兴的学生。以后加入同盟会时，与同乡宋教仁、覃振齐名，号称“桃源三杰”。胡、张两人结识了在军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宣传，散发《革命军》、《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等书，还利用饭后在操场上讲历史故事，启发士兵觉悟，收效很好。

这年5月，吕大森从家乡再到武昌。吕大森（1881—1930）字槐庭，湖北建始人。湖北武高等学堂第三班班长，1903年春曾在武昌曾公祠发表拒俄演说。花园山的无形团体离散后，他因病回乡休养。返武昌后，经同乡康建唐介绍，认识了胡宗畹。他们三人同从黄州来的

何自新一齐商量，都认为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朱子龙、刘静庵、冯特民等的支持。于是，由吕捐款五十元，租定阅马厂东厂口某屋为会所，准备建立革命组织。胡退伍，吕退学，专任组织工作。7月3日（夏历五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到会者三十余人，其中“以各学堂及各军营中人为最多”[(4)]。稍后，所址移至魏家巷。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科学补习所的章程标明其宗旨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5)]，但在内里，它是革命党人赖以聚集同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机构。胡宗畹被推为该所经理，吕大森为干事，分任干事者，尚有曹亚伯、时功璧、宋教仁、张难先、康建唐等人。参加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活动者，还有朱子淘、陈从新、雷天壮、毛复旦、李胜美、欧阳瑞骅、王汉、易本羲、田桐、余诚、季雨霖、孙武等人。其中有些人同时还是华兴会的会员。由于科学补习所表面是一所补习学校，它的师生并非全部都是革命党人，但不少人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的。

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6)]。当时，刘静庵在新军马队营管带黎元洪处当书记，了解招兵情况。科学补习所便大量介绍知识分子从军。胡宗畹还招来会党分子，介绍入伍。会党分子入伍前，必须接受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7)] 密约中的排满革命说教，虽然简单狭隘，但它体现了联络会党的一种新方式。革命党人突破会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直接进行初步教育和约束，并送至新军中去接受训练。

胡宗畹派易本羲回湘筹措经费，因而得知黄兴正在组织起义，胡、吕赴长沙联络。洞庭舟中，吕大森赋诗曰：“此行好借春风便，

鼓起人间革命潮。”[8] 他们住在黄兴家中，商量起义大计。胡宗畹被推为华兴会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施南及四川分部总理，负责组织响应。当时，已经是7月，离长沙起义时间不远，吕便偕康建唐赴施南。胡负责武汉方面的指挥，派何自新赴荆宜，周维桢、张荣楣赴四川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络；武汉的军队和学堂都派有专人负责运动。华兴会购买的枪械弹药，也由胡宗畹、王汉去江西湖口运来。胡与刘静庵等集议：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汉任刺张之洞，易本羲任刺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

响应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长沙华兴会机关被查抄，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系暴露。科学补习所得到长沙方面的密电，急忙布置隐蔽。胡宗畹、王汉将枪械埋藏在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文件，张难先通知成员躲避。10月28日，张之洞得湘抚电报，连夜派兵搜查魏家巷所址，结果一无所获，仅探听到租房人是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骅。当时，梁鼎芬仍然主持学务处，由于补习所师生大多是学堂师生，他怕案情扩大与己不利，便向张之洞说情，仅将欧阳和已离校的宋教仁二人开除了事。

科学补习所作为革命团体只存在了短短数月，并且是在华兴会直接影响下活动的，但它还是鲜明地显示了自己的特点。和华兴会一样，补习所的骨干也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主动投身于新军的行伍。新军不同于八旗、绿营和练勇，它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资产阶级军队的编练方法和军事技术，官佐和士兵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湖北地方的革命知识分子面对着张之洞庞大的洋务集团，这个集团不仅对当地民族资本处于压倒的优势，而且严密地控制着当地的新兴文化事业——学堂、报纸、书局等等，洋务事业吸收了不少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使得这批革命知识分子无法通过自己熟悉的手段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迫使他们扩大革命的通道，把目光转向下层社会。科学补习所并没有偏废会党，但将注意力投向新军营伍

却是他们的创举。此前，革命党人也是非常重视运动军队的，不过他们或者只依靠会党在旧军中活动，或者只联络上层军官，和投身军校以图谋取要职，只有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亲身入营当兵，奋力将反动统治者培养的社稷干城改变成反动统治的掘墓人，这样，就打开了一条新的获取革命力量的通路。这一创举虽然因补习所活动短暂未见效果，但在往后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却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

科学补习所遭受破坏后，多数成员还留在当地，并不愿就此罢休。1904年冬，清廷兵部侍郎铁良南下巡查军事财政，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张学济从日本回国组织行刺。他邀请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苏鹏同到武汉，胡宗畹、王汉参加了他们的行动。他们企图在铁良出入必经的路上埋置炸弹，没有成功。王汉、胡宗畹誓达目的，1905年夏历元旦后，他们得知铁良由京汉路返京的消息，便跟踪北上。王汉（1883—1905）字怒涛，又名潮，圻水人，年方二十二岁，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他下定了一去不复返的决心，赋诗向新婚方一月的妻子诀别："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9)] 2月中旬，他们在河南彰德等候由开封回京的铁良，可是铁良没有下车，行刺计划落空。王汉激愤之余，在安阳一家客店中留下遗书和手枪，投井自杀。武汉的革命党人十分崇敬王汉的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没有再采取王汉的暗杀手段，而是按照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

在王汉等谋刺铁良之时，另一湖北青年梁耀汉自日本返鄂。梁耀汉（1883—1912）字瀛洲，汉川人，留学东京振武学校，曾加入拒俄义勇队。像科学补习所的骨干们一样，梁耀汉也认为要进行革命排满，非亲身投入兵营运动军队不可，回鄂不久即入营当兵，后又由士兵被选拔进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他的行动，影响了不少有志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梁耀汉轻财重义，结识了不少军界、学界人士，他们志同道合，于1905年春夏间发起成立了革命团体群学社。

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少数加入了群学社，多数仍散处社会。群学社成立之际，刘静庵应武昌美国教堂中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的聘

请，任该教堂附设的日知会司理。刘静庵（1875—1911）名贞一，湖北潜江人。科学补习所被破坏时，他避入圣公会，事后照旧回马队营供职，因受黎元洪怀疑辞去，曹亚伯便把他介绍到圣公会。中华圣公会设于1901年，日知会是其阅报室的名称，同年开设。室中陈列新书、报纸，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学生常来阅览，刘也是读者之一。刘静庵接事后，添置书报，热情招待读者，大受欢迎，补习所的成员因此渐渐都重新取得联系。他与胡兰亭洽商，要借日知会名义办补习班，开讲演会，“谋革命以救国”，得到胡的许诺。于是，刘静庵拟定规约，建立秘密团体，吸收成员，但仍用日知会之名；成员入会，没有严格形式，着重灌输宗旨，使其倾心革命。日知会利用教会阅报室的特殊条件，公开陈列革命书报，每星期日开会演说，宣传革命宗旨。这种宣传活动促使许多读者听众转向革命。1906年2月，日知会开正式成立会，与会者达百余人。日知会设有干事会和评议会，刘静庵任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潘善伯、李胜美、徐祝平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各学堂、兵营均设有代表，以资联络。

日知会出现后，武昌同时有了两个规模相当的革命团体，互争雄长。刘静庵创办江汉公学和东游预备科，梁耀汉也创办明新公学，双方都利用学校宣传革命，培育青年，但相互间门户森严。很快，双方都感到这种局面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于是公推既是日知会员又是梁耀汉好友的李亚东作为调解人，调处两会关系。李向梁耀汉陈说了门户之见的害处，梁欣然表示愿意撤销群学社，全体加入日知会。日知会与群学社合并，加强了武汉的革命力量。

二十世纪初年，武汉三镇是革命小团体最发达的地方。

三　光复会

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是东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因受“《苏报》案”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革命运

动，暂时无法继续向群众性斗争的方向发展，但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苏报》被封仅月余，另一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即于1903年8月7日发刊。该报由谢晓石、章士钊、陈由己、张继、何枚士、陈去病、苏子谷（曼殊）等主持，号称“苏报第二”。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10)]，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作秘密联络机关。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础是良好的，但当地的革命党人，一时还没有考虑到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

1904年暑假，日本东京的几个留学生秘密地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这个组织成了不久以后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的前身。暗杀团的组织极为严密，最初成员仅杨笃生、苏鹏（凤初）、周咏曾（来苏）、何士准（海樵）、胡镇超（晴崖）、汤重希（仲祚）等六人，以杨笃生为首。他们跑到横滨乡间，专心钻研化学，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梁、李都是兴中会里制造炸药的行家。暗杀团决心刺杀清廷首要，选中西太后为第一个目标。杨笃生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捞到一笔钱，便和苏鹏、周来苏将炸弹运到天津，设立据点，何海樵则先到上海，把张继从湖南邀来，一同赴津。他们潜入北京，探测形势，制订计划；蛰伏月余，没有找到下手机会，经费告匮，扫兴返沪。

何海樵经过上海时，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请他为暗杀团来沪

作准备。暗杀团抵沪后，即住入新闸余庆里。在上海，暗杀团又发展了钟宪鬯、章士钊、刘光汉（师培）、陈由己等加入，分别在几个地点学习制造炸弹。当时，华兴会正准备起义，张继返湘，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协会，联络东南志士作响应准备。暗杀团、爱国协会、争存会和吴春阳办的青年学社等机构都设在余庆里，这里一时成了革命党人在沪活动的要地。不久，长沙起义流产，爱国协会解体，但暗杀团仍在继续活动。

1904年11月，《警钟日报》揭载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言论的消息，惹起社会公愤。11月19日，发生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清候补知县，曾为粤闽大吏董理钱财，日俄战争爆发，他激于爱国心而辞职。万得知王之春的卖国言行后，即与同乡吴春阳、高荫藻等商量行刺，经刘光汉、林獬设计，布置了一个诱王上钩的圈套。他们伪造吴葆初的亲笔信，请王到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馆赴宴。王至时登楼，见情景不对，急忙退出。万在店门口持枪迎击，可是他没有打开保险栓，弹不出膛，当即被扭送捕房。万福华被会审公厅判处十年徒刑，至上海光复后方才出狱。

“万福华案”造成的局部破坏，并未严重妨碍上海地方革命活动的开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被华兴会、暗杀团引入了暴力革命的轨道，但是暗杀团的狭小圈子无法独立领导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斗争。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11)]。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争存会、暗杀团等组织都归并于光复会，但暗杀团名义并没有立即取消。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除前列者外，还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龚宝铨、蔡谷清、陶成章、孙毓筠、林獬、黄韧之（炎培）、俞子夷、秋瑾、陈去病、柳人权（亚子）、陈伯平、马宗汉等。尚在狱中的章炳麟，曾与闻光复会的创立。光复会和东南各地的革命小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流亡的华兴会员，也和他们声气相通。

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光复会的成员却发表了大量的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劳绩，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里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包括章炳麟）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族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其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12)]。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光复会继续着华兴会和暗杀团未完成的实践。

蔡元培一流书生，除了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外，不善于接触更广泛的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他们习惯于文字宣传和利用科学技术专长。蔡元培等把革命热情主要倾注于暗杀活动，暗杀团的事业被继承下来了。他们在报刊上介绍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宣传暗杀的功用。制造炸弹的秘密小组因之扩大。蔡元培另在爱国女学讲授外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增设理化课，挑选女生加入小组。此外，还开办了速成训

练班，招收社会青年学习理化和催眠术，引导他们参加暗杀活动。不过，这批人始终没有进行过一次暗杀。与光复会有关的一次著名的暗杀活动，是一位安徽青年吴樾干的，地点则在远离上海的北京。

杨笃生在万福华事件后避往日本，1905年回沪，继续与蔡元培等研制炸弹。为了搞所谓“中央革命”，他于同年去北京活动，以译学馆教习身份作掩护。杨笃生在京得到赵声的信，催他去保定，原来，赵声在保定与安徽人吴樾等相结纳，因故离保，便要杨去从事组织。杨笃生为吴樾等主盟，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一作北方暗杀团）。这个组织，被光复会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之后，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认为铁良是将来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等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等喜出望外。1905年8月，吴樾赴京，恰逢清廷实行立宪骗局，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的发展，想以刺杀五大臣来阻止这一行动。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吴樾在没有引爆器材的情况下，身携炸弹前往车站行刺。在挤入车厢时，炸弹受震爆炸，吴樾当即牺牲，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轻伤。刺五大臣一案，震动全国。

暗杀活动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并不罕见的现象。因对反动统治者极端仇恨而产生的这种暴烈行动，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根本弱点。由于中国历史上把仗义的刺客看作英雄人物，因此把暗杀作为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用以惩凶除顽，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是可以起到与战场杀伤不同的政治作用的。但是革命党人夸大了它的作用，甚至认为暗杀可以阻止和改变

敌人的政策。他们无法认识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的对立，而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是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策，只有用革命消灭满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去组织群众性的斗争，过于相信个人英雄的作用。由于这种弱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经常不表现为革命进攻中的辅助手段，而是孤立的行动，甚至是绝望的拼命。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赞成这种办法，孙中山就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13]。不过，光复会始终坚持这一办法。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封后，刘师培逃往芜湖公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黄氏学校，专门准备暗杀，吸引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

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举行革命暴动的准备。要暴动就需要联络会党，他找到三个人来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是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人。父亲要他帮助经营石灰店，他不愿意，说是要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1903年他留学日本，正逢拒俄运动高潮，他的密友龚宝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可是，陶并不关心龚的活动，龚也不告诉他。1904年初，他偕魏兰返国运动会党。他们在杭州探访了关在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介绍他们去见各地会党头目。他们经富阳、建德、龙游、建昌等地，到达魏兰家乡云和，了解了白布等会情况。随后，魏兰留在内地活动，陶成章由温州返沪，再去嘉兴联络敖嘉熊。蔡元培此时正在沪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邀陶运动浙江会党参加。魏兰在处州、金华认识了龙华会首领沈英、张恭等人后，又赴沪找陶成章。10月，他们同去金华布置龙华会响应起义。由于长沙起义事泄，响应事只好作罢，但龙华会从此成了与陶成章关系最密的会党组织。随后，陶又入永康、天台、黄岩等地，完成了对金、衢、严、处、温、台六府会党的联络。

陶成章等调查了会党、兵营、贫富户、钱粮等情况，传布革命书

报进行宣传，并组织会党响应革命。但是，陶的浙江之行还与保皇党有密切关系。当时，梁启超也积极在国内从事军事活动，通过蒋观云派陶回浙。事后，陶通过蒋向梁作了汇报，并亲自写信给梁，梁夸他“坚固刻厉，今之墨子也”，邀他到日详谈。1904年冬，陶成章在上海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了光复会，次年初，赴日。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是商人的儿子。1901年，他在绍兴府学堂任教。不久升为副监督，掌握该校实权。当时，学堂初兴，新旧斗争激烈，他依靠官府办学设施保守，受到进步人士的指责。1903年，他游历日本，适逢拒俄运动高涨，与革命分子接触后，深受感动，转向革命，回乡开设学堂、书局，宣传新思潮。1904年冬，到上海，应蔡元培邀加入光复会。陶成章这时也在蔡处，便将自己联络会党的情况告诉了徐。1905年春，徐率弟子数人，漫游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缙云等县，结纳当地会党。

敖嘉熊（1874—1908）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出身地主家庭。戊戌变法后，关心时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1903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参加中国教育会，旋回嘉兴倡设爱国女学社、演说会、教育会，被清吏解散。1904年7月，他倡议组织温、处、台会馆，计划倡办团练以掌握地方兵权，又准备代当地客民缴纳租税，保护客民，以掌握财权。这时，龚宝铨介绍陶成章同他认识，三人一同商议了召集会党在浙江起义的计划。同年秋，会馆成立，陶成章荐魏兰为总理，派人至江浙一些地方调查。敖嘉熊还创立了一个“祖宗教”。蔡元培邀请敖嘉熊加入光复会，敖不愿，但答应有事相助；实则，敖以后的活动与光复会难于分割。

通过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的关系，光复会与浙江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05年夏，温处台会馆因敖嘉熊家庭变故，经费不支而停办。这时，徐锡麟又开始筹办学校，陶成章、龚宝铨参与其事。9月23日，大通学校开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以训练兵操、倡办团练为名，训练革命人材。他们招来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入学。陶

成章厘定规约数条，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他们想通过这种办法，加强对会党的教育和约束。可是，大通学校成立时，陶成章又倡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14]。徐锡麟赞成这个主意，于是徐、陶、龚等五人很快就离校捐官去了。陶成章、徐锡麟等虽然进行了许多联络会党的活动，但是不耐烦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急于寻找捷径。体操班修业期满时，陶成章主张停办，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等将它继续办了下去，广招会党入校训练。大通学校的活动为后日秋瑾在浙江密谋起义，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光复会组织较为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规章严密，不过它也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光复会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统筹全局。它的领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进、品质优秀的革命家，可是在政治斗争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亲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书生，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从事于实际行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号召力不够。由于个人经历和活动的地域、历史不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不够，有些人甚至表示出瞧不起蔡元培。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的组织比较松散，行动不够一致，它始终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进行统一的重大行动。辛亥革命时期，光复会成员领导的起义和斗争，几乎都是区域性的。

光复会独立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

四　其他革命小团体

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成立的前后，国内还活动着另外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江苏：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

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日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由于旧势力的攻击，杨无法立足，不久再次赴日，学会也就中断了。1902年至1903年间，在爱国潮流影响下，南京水师学堂学生赵声、秦毓鎏、郑权、杨韵珂等，组织知耻学社，畅谈革命。1903年，清廷镇压拒俄运动，学社的成员离散。1904年前后，杨卓林、张通典、赵声、柏文蔚等又在南京组织强国会。他们联合当地会党，密谋推翻清廷，以抗外侮。不久，因事泄而停顿。

四川：公强会。

1902年，四川重庆的一批学生杨庶堪、梅际郇、朱之洪、童宪章、陈崇功等，秘密组织公强会，讨论时政，主张反清革命。公强会的成员在当地参加过创办学堂和其他公益事业，也参与社会运动，但没有公开从事反满宣传。公强会一直存在到1906年，成为重庆同盟会组织的基础。

在成都，1903年至1904年间出现了吴鼎昌、孔庆叡组织的华阳阅书报社，刘汉柏组织的公德社等团体。

上海：旅沪福建学生会。

1903年春，闽籍学生何枚士、萨端在上海发起旅沪福建学生会。该会对外宗旨是挽回福建利权，实际主张反清革命，来往信函均不用光绪年号，只书黄帝纪年。福建学生会发起时，响应者即达一百余人，其骨干有郑权、林森、潘训初、陈子范、史家麟、林述庆、蔡人奇、郑垂等。他们一方面与上海地方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声气相通，同光复会有一定联系，另一方面又与福建本省的爱国运动、革命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福建学生会曾公开鼓动保护福建领土、权益的斗争，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1906年，成立福建学生会支会于福州，由林斯琛、郑祖荫、刘元栋等负责。它的成员还在江西、安徽、江苏

等地活动。

福建：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

1903年，江南水师学堂学生郑权回闽，在福州与郑祖荫、蔡人奇、王蔼庐等组织益闻社，设阅报所、益闻学堂，宣传革命。他们公开领导了当地的争回权益运动。同时，另一革命分子林斯琛加入会党以联络军人，于1903年春创立新的会党山堂——共和山堂，除了军官、士兵外，学堂师生林觉民等二百余人加入，工商界也有许多人参加。林斯琛鉴于人员复杂，又和郑权、郑祖荫等创立了文明社，作为共和山堂的秘密机关。1904年春，又发起学生联合会，以利于从事公开的社会活动。师生们与会党首领聚会一堂，受到官厅注意，缇骑四出，林等只好解散文明社，避走他方。1905年春，他们回福州，组织了秘密团体汉族独立会。这个团体改进了组织方式，会员必须先加入共和山堂，有所表现后，再吸收入会。

1906年，福州成立福建学生会支部。上海和福州的福建学生会，都公开地活动到辛亥革命爆发。

江西：易知社、我群社。

1904年4月，江西一些学堂的学生在南昌发起组织易知社，推张惟圣、虞维煦为正副社长。易知社社员达六十余人，在外地的江西籍学生也有人加入，其骨干有李儒修、丁立中、蔡突灵等人。易知社发起时是一个诗文结社，成立后从事革命宣传。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他们编印了宣传品，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为了准备反清起义，它的许多成员都投身于军事学校。在易知社组成之时，蔡突灵、蔡锐霆兄弟、熊公福等在家乡宜丰组织了我群社，蔡锐霆联络会党，在家中打造兵器，准备“造反”，后因外出游学而未继续。南丰也有我群社的团体。

安徽：岳王会。

在1903年1904年间，安徽的革命分子就非常活跃，他们借办学堂、结会社而展开反满宣传，在这些活动中，安庆、寿州、合肥、阜阳、芜湖处于显著地位。1905年，原设在长沙的旅湘安徽公学迁至芜湖，仍名安徽公学。公学的创办人李德膏（光炯）及其助手卢光诰（仲农）都赞成排满革命，聘请了许多进步教师，公学便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据点。当时，陈由己在该校任教，他和柏文蔚、常恒芳等发起组织岳王会，推陈由己为会长。岳王会认为“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15)]。它的中心活动在于运动军队，绝对保守秘密，不作对外宣传。岳王会在安庆、南京先后设立了分会，安庆由常恒芳主持，南京由柏文蔚主持，都在新军中活动，其骨干有宋玉琳、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熊成基、倪映典等。岳王会在安庆还成立了外围组织维新会。1905年至1906年间，芜湖是光复会活动的一个中心，光复会在这里发展了大批会员，岳王会和光复会的活动打成了一片。光复会把岳王会看作自己的一部分。

在以上所述革命小团体之外，1903年至1905年间，广州有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古应芬等组成的群智社，贵阳有贵州武备学堂学生组织的自治会，等等。当时，南中国的各个省几乎都有革命小团体出现。

此外，分散的革命志士还利用办学堂、报馆、书局、阅书报社、诗文社、公众团体等方法，以及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进行串连和聚集，在一起倡言排满。这一类没有既定政治组织形式的小集团，分布很广，数目极多，难以精确统计。

这许多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广泛地撒下了反清革命的火种。

第二节　同盟会的成立

一　逐渐增长起来的联合因素

分散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的出现，是反清革命力量走向联合的基础，它们各自汇聚着一部分社会上反清的力量。当时有远见的革命党人都清楚，要推翻清朝政府，需要民众的广泛动员，需要革命党人联合一体，需要有指导革命的中心。他们不断地发出呼吁，总企图以自己的团体作为中心来联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但是，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并不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它只能是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发展的产物。

每个革命小团体的发展都是有限的。兴中会诞生于华侨之中，与国内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关系很浅。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包括了近十个省的人士，但实际上只是东京一隅留学生的联合。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组织植根于国内反清革命力量之中，但它们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团体，活动范围限于一省或数省，有些小团体仅在某一个城市活动。它们之间联系薄弱，一些偏远地区的团体，差不多是在孤立地活动。其次，它们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都保留着很大的原始性，或者明显地受到民间会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影响，没有达到完全的政治团体的规模。再次，它们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些弱点使得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成为革命派的中心。

不过，革命小团体的涌现，是革命运动必经的发展阶段。革命小团体的弱点是由于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而其深刻的背景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达状态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就在这些具有重大弱点的小团体及其活动中，逐渐产生了革命力量进一步联合的因素。这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小团体之间或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因革命活动的展开而加强。

华兴会的活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兴会的某些骨干也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华兴会为发动长沙起义，组织了联络会党的同仇

会，推动了武昌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成立，它在长江沿岸还建立了几个联络点。特别是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协会，协会的成员包括了中国教育会、争存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人们，这实际上是随后成立的光复会的班底。光复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去同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华兴会、福建学生会、岳王会等团体的联系外，光复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活动区域较广，涉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已不局限于一城一省。鉴于革命力量分散的弱点，小团体的领导者还产生了联合的愿望，武昌群学社和日知会的合并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事实表明，反清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不仅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在革命运动中已经产生出来的实际趋势。

第二，各革命小团体在其活动中，同国内社会各阶层发生了比较广泛的联系。

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团体的建立，突破了兴中会以华侨为主要成分的局限。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分虽然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并且具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加强了各革命团体与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联系，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的成员都包括有相当数量的新军官兵。多数小团体都与会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革命派与农民、工人、士兵、游民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会党间接实现的。除此之外，各个小团体还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区内将大批社会人士直接间接地纳入革命活动之中，这些人士中有官吏、幕僚、军官、资本家、商人、职员、艺人、医生、教士等，至于受革命宣传影响的人们，则更为广泛。可以说，通过革命小团体的活动，一切可能参加反清革命的社会阶级、阶层都已经与革命发生了深浅不同的联系。这种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建立，造成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和联合的可能，同时，也突出了建立能以调动这些力量的指导中心的需要。

第三，由于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展，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以推翻满清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以建立民主国家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思想，在1903年至1904年间，通过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以及其他革命宣传家们独创的发挥，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宣传使得革命党人、爱国志士的前进方向日益明确，思想逐渐趋于一致。“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万喙一辞，众声同应，莫不曰民族主义哉！民权主义哉”[16]！这段时期革命党人思想演进的最大成就，是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组织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提出，标志着后来定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内容已基本具备。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通过发表孙中山的一封信，首先在国内公开介绍了这一誓词。尽管这十六字誓词未能概括当时革命宣传家们的全部成就，但它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可以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

第四，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创者孙中山被革命党人公认为这场革命的领袖。

当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在国内人士包括进步人士心目中，他“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但是，一旦孙中山所开创的反清革命被认为是挽救祖国危亡的根本之路，孙中山也随之被国内的革命志士普遍认为是自己的领袖。1902年，宫崎寅藏写成了记载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三十三年之梦》。很快，这本书就被译为中文。几种译本中，以黄中黄（章士钊）所译的《孙逸仙》影响为最大。章士钊在序言中指出，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民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章太炎、秦力山、刘光汉等都为该书题词作序。章太炎的题辞说：“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万兆人视兹册。”他把孙中山比作刘邦那样的创业者和郑成功、洪秀全的后继者。《警钟日报》则指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17] 孙中山首倡革命的威望使人们自然地拥护

他为领袖。梁耀汉在群学社、日知会酝酿联合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应以孙中山为“共主”。而章太炎在狱中给孙中山的信中，也尊之为“总统”。有了共同拥护的领袖，互不相属的小团体才有走向联合的可能。

以上这些因素，为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中心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联合并没有迅速和直接地在国内实现，联合的活动是在日本进行的。海外给革命党人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活动条件，可以免去清政府的直接干涉和镇压；而对于革命派自身，又可以避免由于分散活动和落后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因此，东京这个1903年各省留学生联合建立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的地方，又成了各省革命党人和留学生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地方。

二　留日学生的政治动向

从1904年夏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体，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归国，直到1905年夏孙中山返日，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和留学生中，并没有发生振聋发聩的大事，革命力量在默默地经历着重要的变化。

在此期间，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是惊人的。据留学生会馆统计，1904年5月为1189人，至次年8月，则已激增至五千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在留学生中，革命情绪有了显著的增长。

1905年初，留学生中主张革命者和主张保皇立宪者作了一次有力的较量。当时，日本报纸有消息说：各国商业统计表在中国领土中没有列入长城以北，意即承认该地已为俄国属地。留学生闻讯大为震动。四川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授意下，发起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夏历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一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等并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当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时，

受到了多数人的反对。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会议，反对者占十分之九。广东、广西、直隶、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山东、贵州十省学生宣布反对，湖南学生中仅有二人赞成。留学生会馆的参议簿上，留下了连篇累帙的反对意见。两广学生的态度最为激烈，他们在清风亭集会讨论，发表演说，驳斥意见书。二百名与会学生一致同意，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反对意见书的学生并不都是革命分子，多数人的反对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这种情绪使革命派占了上风。梁启超、邓孝可等将保皇立宪主张强加于全体留学生的计划终于破产。

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始终是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源泉。主张革命的学生们，少部分组成了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多数人则以同乡等关系，结成为一个个不十分固定的政治小集团。比较活跃的政治小集团有这样一些：

1．广东学生胡衍鸿、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张树枏、李文范等，是一个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小集团。胡汉民（1879—1939）名衍鸿，字展堂，番禺人，幕僚的儿子。1902年留学日本，因风潮归国，曾任《岭海报》主笔、梧州府中学堂教习、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重行东渡。胡后来在《民报》上用“汉民”的笔名发表政论，影响颇大，于是便以“汉民”为名。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番禺人，也是幕僚家庭出身，1904年留学日本。“精卫”这个名字，也是从《民报》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来的。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番禺人，幕僚子弟，1904年留学日本。这些人几乎都是大家子弟，过去在广州同学，在东京又同学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有些人之间还有亲戚、世交关系，部分人在广州时就有过益智社的结合，因此关系较深。他们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和兴中会的成员有着联系。

2．广东人廖仲恺、何香凝、胡毅生、黎勇锡、朱少穆、萧友梅、饶景华、刘维焘等也维持着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廖仲恺（1877—

1925）名恩煦，归善（今惠阳）人，出身侨商家庭。1903年初从香港赴日留学。何香凝（1879—1972）名谏，南海人，是廖的妻子，1903年春赴日。胡毅生（1883—1957）名毅，幕僚家庭子弟，1903年春赴日，这时，在横滨华侨学校任教。他们到达日本稍早，与孙中山有过直接的接触，有的人还参加过青山军事学校等团体。他们与广东学生联系比较广泛，但团体内部很松散。

此外，香山来的林君复、刘思复等弘文学院学生也自成一个集团。

3．湖北学生大都来自武昌各学堂，以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白逾桓、居正、田桐、余仲勉（诚）、吴昆、但焘等为核心，联系比较紧密。李书城（1882—1965）字小垣，潜江人，父亲是塾师。本人卒业于两湖书院，1903年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与吴禄贞、黄兴都是好友，参加过武昌花园山的革命活动，也加入过华兴会。居正（1876—1951）当时名毓崧，字觉生，广济人，出身地主家庭，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弘文书院。田桐（1879—1930）字梓琴，蕲春人，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塾师。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时与居正同入弘文书院。他俩与白逾桓、吴昆后来在同盟会中被联称为居田白吴，是湖北会员中的骨干。这个集团中的人大都有点革命活动的经历，他们同湖南学生串连一气，都围绕在流亡的华兴会周围。

4．安徽学生吴春阳、蒯寿枢、王天培、孙棨、潘赞化等也维持着一个政治小集团。他们人数不多，却善于活动。吴春阳（1883—1911），合肥人，出身地主家庭，光复会成员。早年在皖创办强国会，后在沪办青年学社。学社因万福华案被封，流亡日本。因历史渊源，他们与国内外主要革命小团体都有联系。程家柽则因同乡关系，成为他们的指导者。程家柽（1874—1914）字韵荪，安徽休宁人，出身地主家庭。1899年由武昌两湖书院被选赴日本留学，1904年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很早就是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

5．四川学生邓家彦、黄树中、吴鼎昌、康宝忠（陕西城固籍）、陈道循、林启一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但没有名称，只叫做革命团体。这些学生主要来自成都的学堂。邓家彦（1884一1966）字孟硕，广西临桂人，出身幕僚家庭。他随父在成都读书，因而成为来自成都学生的中坚。至于从重庆来的童宪章、陈崇功、杨霖等，他们另有自己的小集团。

6．留日女生不多，革命分子更少，但她们却很活跃。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等数人，友谊很深。秋瑾于1904年夏来到日本后，和陈等一同组织了共爱会、女子雄辩学会等公开团体。秋瑾年纪稍长，并且极为活跃，凡有团体，无不参加，因此在陈撷芬赴美后，她就成了这个妇女小集团的头领。

这许多政治小集团通过同学和公开团体等关系互通声气，同时还通过同乡关系联络了更多的学生。在1904年至1905年间，在留学生会馆的干事、评议员、各省同乡会会长中，保皇立宪分子的数目虽超过革命分子，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由于革命小集团活动积极，理直气壮，保皇立宪分子无法控制留学生的动向。

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很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但当时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惟一在日本积极活动的会员是程家柽。他主张革命力量实行联合，但孤掌难鸣。

兴中会在日本的组织也早已涣散。在横滨的寥寥几名会员，除冯自由以外，都很少活动。而中和堂这样的团体，又对政治毫无兴趣。冯自由（1882—1958）名懋龙，广东南海人。他是横滨侨商冯镜如的儿子。十四岁即加入兴中会，毕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冯镜如倒向梁启超之后，他仍然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冯自由是一个热心于革命活动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胡毅生、李自重、朱少穆等原革命军事学

校的成员同广东学生保持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留学生中的老资格程家柽、张继、马君武等和各省留学生保持着联系。冯自由极力想发展革命的组织，1904年春，他与梁慕光在横滨组织三点会，受洗礼者冯自由、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陈撷芬等五人，胡被封为洪棍，李为纸扇，冯为草鞋。李自平是冯的妻子，她与秋瑾友善，秋听到组织三点会的消息，自愿加入。于是又由李自平约定第二次拜盟，加入者秋瑾、刘道一、刘复权、仇亮、王时泽、曾贞等十人，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为纸扇，刘道一为草鞋。但三点会的组织以后未再得到发展。当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时，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因此，冯自由当时的重要作用，仅在于他是在日本的留学生、革命党人与孙中山、其他各地党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人们都乐于从他那里了解孙中山的动向。

因苏报案流亡横滨的东南革命人士黄宗仰、陈范等与兴中会的成员联系密切。陈范通过其女撷芬和侍妾在外面活动。孙中山赴美后，陈范想组织一个会馆接纳各方志士，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不过，他的声望、才能和财力都不能胜任，结果一无所成。因为经济困窘，黄、陈先后归国，东南革命党人未能在日本造成什么势力。

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依然非常关心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联系了不少革命分子。不过，他也只能充当革命党人之间互通声气的桥梁。

比较而言，在留学生中影响最大的革命小团体是华兴会。华兴会的主要骨干多数流亡到了日本，他们推动革命运动和筹划武装起义的功绩受到留学生们的崇敬。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主要是湖南、湖北学生和学习军事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也有落后因素的影响，湘鄂学生中有府属、县属的界限，军校学生中有省界的差别。但因为有华兴会的骨干们作为联系的中心，这界限就不像其他学生中那么明显。

华兴会在日本并没有扩大组织，没有将它周围的许多学生纳入自

己的团体，而是更多地利用个人影响进行活动。这些学生中也有秘密的革命组织。新华会是1904年春间为响应长沙起义组织起来的，成员有仇鳌、罗杰、余焕东，赵缭、仇亮、葛谦、覃振等两湖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曾回国准备参加起义。革命同志会是在1904年12月组成的，成员主要是军校学生，有湖南程子楷、曾继梧、陈强、仇亮、欧阳振声、程潜，云南杨振鸿、罗佩金、殷承瓛、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河南曾昭文等，黄兴也是该会成员。1905年，两湖学生还组织了大湖南北同盟会。华兴会没有将这些团体统一起来，没有组织他们从事具体的反清活动，甚至连文字宣传也没有积极开展。

总而言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在增长，但是革命党人却未能因势利导，将这股力量组织起来。比起1903年来，反清革命运动此时在日本的局面是停滞的、沉闷的。这种局面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最明显的问题是无法有力地抵御保皇、立宪派对留学生的争夺。当时，立宪运动萌芽不久，它的主张比保皇更有诱惑力，主张立宪的人也积极在留学生中吸取力量。留学生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初至日本时倡言革命，等到快要毕业时却极力主张保皇或立宪。旧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一部分已埋首学业，不问政治；另一部分人，如汤尔和、谢晓石、林长民、胡镇超、汪荣宝、陈福颐等则明显地倒向立宪或保皇一边去了。流亡而来的革命分子的队伍也不稳定。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华兴会。到日本后，华兴会骨干彭渊恂、徐佛苏、薛大可等日渐向立宪派靠拢。在革命宣传中崭露头角的章士钊，1905年到达日本后，借口想多读些书以待革命后用，也不愿再从事革命工作。更使革命党人痛心的是，名震一世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竟然也动摇了。1905年1月，正当留学生群起反对邓孝可的六条意见时，陈天华却受梁启超引诱，暗自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清廷归政，实行立宪，并准备亲自到北京去呈递。幸亏被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及时劝止了。陈天华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激流之中不会吝惜热血和头颅，却容易被崎岖的道路和腻人的琐务消磨掉意志。他

的动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所产生的危机。

宋教仁想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他联合田桐、白逾桓、鲁鱼等人发起组织杂志社，定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别署桃源渔父，湖南桃源人。出身地主家庭。在武昌文高等学堂读书时，加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流亡日本后，非常活跃，在留学生中声誉日大，因此由他出头办杂志。但是，黄兴、刘揆一、陈天华都不太重视这一行动，仅得到程家柽的大力帮助。6月，《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在留学生中反响并不十分大。

国内革命小团体的发展和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的增长，为革命力量的联合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关键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能否发现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推进这一发展过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雄伟魄力。这个历史任务的解决，终于落在了孙中山的肩上。

三　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

1904年初，署湖广总督端方等为瓦解武昌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将主张激烈的学生派去游学，其中一部分人被派往欧洲。武昌进步学生不愿这些中坚人物离开，朱和中安慰他们说："事已至此，岂能自由？然如此伟大革命，我辈群龙无首，岂等夷所能领导？正好借此机会，往西洋觅孙逸仙耳！"[18] 他们抱着寻找真理的愿望离开了故乡。当年春天，湖北以及四川、两江派出的学生都到达欧洲，分往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入学。

清政府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数人赴法国学船政。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青年军官数人赴德国学军事。第三年，李鸿章又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十余人赴英国学驾驶。此后，中国游学生即源源西行，但

是总人数不多，在九十年代即落于留日学生人数之后。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他们远离祖国，对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动，远不如留日学生关切。在1904年，当受过国内革命风气熏陶的湖北等地学生到达后，留欧学生中的政治状态才有所转变。

湖北赴欧学生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在戢翼翚处遇到了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刘因为在癸卯新年学生会上发表革命排满演说而被取消了官费。孙中山抵美后，推荐他出任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这时正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他们向刘成禺打听了孙中山的情况，并请他向孙中山转达敬意，刘和他们约定经常联系。190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到达英国伦敦。刘成禺自美国写信把孙中山赴英的消息告诉在比利时的湖北学生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要他们直接与孙中山联系。贺之才等立刻写信到伦敦，邀请孙中山来游欧陆。孙中山此时经济极为困窘，他们又凑集了旅费汇去。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

孙中山在比利时俄斯敦港受到湖北、四川学生代表的欢迎，随后抵达布鲁塞尔同当地中国留学生会见。孙中山同贺之才、史青、朱和中等人连续进行了几天几夜的长谈，他向学生们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政治主张、实行方法和对未来的理想。他们对反清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争论得最激烈的，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孙中山问学生们革命应用何种方法进行，朱和中等答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朱等详细介绍了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经过，孙中山很高兴，但还是认为利用会党暴动最为可靠。朱等却认为“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早成功，反为所制”。他们指出：“革命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他们还指出，过去虽然有陆皓东、史坚如等追随孙中山，但“人数甚少，无济于事，必大多数智识分子均赞成我辈，则事半功

倍矣。”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学生的意见，他开始认为可以会党、知识分子双方并进；在听取了进一步的申述后，得出结论说：“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19)]

在距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布鲁塞尔所进行的这场辩论，是密切关系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前途的历史性辩论；这场辩论是反清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此以前，孙中山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运动会党方面，会党是兴中会举行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是当时国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孙中山回忆说，在1895年到1900年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入耳”[(20)]。但是，在1900年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地倾向革命排满，并在日本和国内形成了以这些人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朱和中等的意见正反映着这股刚刚崛起的政治力量的自信心。在1900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同留学生、政治流亡者的接触日益增加，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革命运动，不完全的历史经验还局限着他。1904年在美期间，介绍孙中山赴各埠演说的《致公堂公启》在谈到新型知识阶层的革命活动时说：“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事实尚未能举而措之。”[(21)] 这段话和辩论中的说法，反映出孙中山对革命知识阶层的保留态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当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时，这位旗手却不完全理解这股政治力量。通过这次辩论，这个矛盾解决了。朱和中等人是有辩才的，但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是国内以新型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新型知识阶层中发展革命势力的结论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这不仅因为新型知识阶层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对这次革命的领导作

用，差不多完全体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活动上。这一结论促进了新的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并且促进了革命运动在国内更广泛的发展。

但是，这次辩论也有着根本性的弱点，孙中山等人关于革命依靠力量的讨论实际上只进行了半截，即只讨论了领导力量的问题，而没有全面讨论革命的动力问题。朱和中等关于会党的看法具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后来也影响了孙中山。对于新军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会党和新军的主要成分都是农民，孙中山等人除了考虑要利用这种已经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暴动外，并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如何直接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

在连续数日的辩论结束后，孙中山提议举行宣誓，组织革命团体。于是留学生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誓词进行了宣誓。孙中山在美改造洪门成绩甚微，经济上又十分拮据，他在困境之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异常高兴。宣誓完毕，即席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在目前者”[(22)]。孙中山在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中共发展了三十多人加入革命组织。这个团体当时叫什么名称，已无可查考。

5月，在贺之才陪同下，孙中山访问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同第二国际负责人王德威尔德的秘书进行了长谈。孙中山表示了自己和中国革命党人对西方工人运动的关切和同情，同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民生主义。

在比利时会见孙中山的朱和中是留德学生，他代表留德学生坚决邀请孙中山去柏林。于是，孙中山又在德国引导了刘家佺、周泽春、宾步程等二十余人加盟。接着，他又到法国巴黎，发展了王鸿猷、唐豸、刘光谦等十余人。至此，在留欧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在欧洲了解到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决计东归。他在巴黎逗留时，遇到了一起革命组织破坏事件。加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等意志不坚定，害怕因革命断送了升官发财的前途，跑到巴黎和那里的动摇分子汤芗铭等勾结在一起，设计叛卖。他们到旅馆去见孙中山，伪装殷勤，邀孙中山外出，然后偷偷回到旅馆，将留学生们加盟的盟书窃去，送交清朝驻法使馆。但是，公使孙宝琦不愿惹麻烦，没有接受。因为这一变故，比、德、法的革命组织都进行了改组，清除了不坚定的人。改组后的革命组织，成员减少，但却巩固了。他们为孙中山筹集了路费，孙中山便很快于6月间离开了法国，前往日本。

四　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自法国马赛登舟东返。他一路经过新加坡、西贡、香港，略事停留，于7月19日抵横滨。行前，孙中山将归讯告诉了冯自由等。湖北、四川等省留欧学生也将此讯转告留日的同乡。孙中山即将前来的消息在留学生中不胫而走。他在横滨上岸时，受到了程家柽等一百余名留学生代表以及兴中会员、广东同乡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这次重回日本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组织一个新的联合的革命团体。他很快前往东京，紧张地和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

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黄兴两位反清革命的著名领袖会面了。孙、黄的会晤是极富情趣的。宫崎寅藏回忆说：“我当时住在新宿，孙来到我的住处说：‘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非同一般的留学生，有否我党之士？’我说：‘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他听了名字便要马上去找。我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他不允许这样，说道：‘这样的事

没有什么前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应该我前去拜访他。’当时黄兴在神乐阪的边上租房住着。我带着孙到了那里，打开窗子往里一看，见地上有一大堆拖鞋，一大帮学生围坐成一圈。我看到人太多了，便让孙在外边等着。我向里边喊道：‘小黄，小黄。’黄兴急忙跑了出来。我手指着孙让他看，他一看便认出了是谁。” (23)
黄兴与张继、宋教仁请孙中山在神乐阪凤乐园饭馆入宴，畅谈革命的形势和办法。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致力革命，得到黄兴的赞同。

随后，程家柽又邀集黄兴、陈天华、张继、宋教仁、吴春阳、但焘等在北辰社自己的住所里与孙中山会商组织革命团体问题。

在此前后，湖北留学生李书城、耿觐文、田桐、时功玖等，四川留学生邓家彦、康宝忠、吴鼎昌等，广东留学生何天炯、胡毅生、汪精卫等，以及其他一些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了孙中山。他们都拥护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孙中山所接触到的革命分子，多数是没有参加过革命小团体的青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各个革命小团体的成员。当时，只有华兴会在留学生中影响较大。因此，革命的力量能否顺利联合，华兴会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黄兴同意联合，但会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7月28日，孙中山偕同宫崎亲往二十世纪支那社，与陈天华、宋教仁晤谈。孙中山在谈话中指出了过去各省的反清起义“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的缺点，强调说明：“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24)

次日，华兴会成员在神乐阪黄兴处集会，讨论关于同孙中山联合的问题。会上，陈天华主张以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保持独立，刘揆一则不主张加入。最后，作出了加入与否个人自由的结论。

华兴会的合作态度保证了统一的革命团体得以迅速建成，并且提供了一批经过锻炼的骨干。

7月30日下午，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吴春阳、宋教仁、田桐、黎勇锡、朱少穆、马君武、邓家彦、但焘、时功玖、何天炯、康宝忠、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古应芬、李仲揆（四光）等七十余人，除孙中山、黄兴等已经成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都还是在校的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国内的十个省。其中，曾经参加过小团体者：兴中会二人，军国民教育会八人，青山军事学校三人，华兴会九人，科学补习所四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二人，光复会一人。此外，日本人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参加了会议。

孙中山首先向大家作了长篇讲话，演说革命形势和实行方法。他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成。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有人提议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以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好。人们认为，使用“革命”字样，对未来这个秘密组织的活动不利，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大家还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于是，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孙中山起草了盟书，内容如下：

联盟人　××省××府××县×××　当天

发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

主盟人　×××

介绍人　×××

与会者纷纷缮写签署盟书，再进入另一小房间内，由孙中山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然后教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孙中山向会员们祝贺道："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大家又推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程家柽、汪兆铭、蒋尊簋等起草会章，待成立会时提出讨论。人们正要离开会场时，室内后部的木板忽然坍倒，声如裂帛。孙中山诙谐地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大家兴奋地鼓掌欢呼。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就出现了。

孙中山到东京后，广大留学生都想一瞻这位革命伟人的丰采。在黄兴的推动下，留学生决定召开大会欢迎孙中山。8月11日，清国留学生会馆门前贴出开会告示，学生们争相传告，相约与会。此前，横滨保皇党听说孙中山在东京顺利组党的消息，派了徐勤到东京，发起组织"青年同学会"，企图以此抵制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影响。但是，经过几个党徒千方百计的活动，一无成就。这时，徐见到学生们的情绪已无法挽回，只好在8月12日下午悄悄地跑回横滨。

8月13日下午二时，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麴町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孙中山。当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留学生他游或回国，可是到会的竟达一千八百余人。会场挤满了人，后到者进不去，却不忍离开，佇立街边仰望楼上者，有六七百人之多。孙中山身穿洁白的西装，从容步入会场，满场立即鼓掌欢迎。站在后面的人，被前面的人遮住视线，跂足以望，挤得更加厉害，但整个会场仍肃静异常。自东京留学生有集会以来，从没有这样的盛况。

宋教仁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登台作了近两小时的演说。孙中山以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向学生们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他号召用革命的方法，建立共和国，改变积弱的国势，跃居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他说："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呼吁人们在改造中国时取法乎上，抛弃不合于中国的君主立宪，而"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25]。孙中山的演说并不十分激烈，娓娓说来，打动了所有企图挽救祖国危亡的青年的心弦，博得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陈天华欢呼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26]！之后，程家柽、蒯寿枢、张继、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发表了演说。富士见楼欢迎会实际上是建立中国同盟会的动员大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示威大会，它的盛况标志着反清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临近。这次大会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清朝驻日公使馆非常注意孙中山的动向，派人混入会场探听情况，扬言要取消演说者和与会者的官费。但是大家却说"要取消就让他取消好了"。有的人还说："我无论如何要革命，要参加孙黄一派的革命党。大不了把官费退还回去。"[27] 同盟会在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8月20日，同盟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一百余人，包括了十四个省籍的人士。这天，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了成立会。会上通过了黄兴等起草的会章。会章共三十余条，以后（1906年5月6日）经过修改，成为二十四条，这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总章对会名、会址、宗旨、会员、本部机构和职员、分支机构、会费、会章的修改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都在总章中得到了反映。当天，还选举了总部的主要干部。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本部的组织系统如下：

- 总理
  - 执行部
    - 庶务科
    - 书记科
    - 会计科
    - 内务科
    - 外务科
    - 调查科
  - 评议部　评议长　　评议员
  - 司法部
    - 判事长
    - 检事长

总理是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依照会章规定："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名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总理由本部所在地的会员选举产生。同盟会的总理一职始终由孙中山担任。

执行部是本部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它的职员由总理指定，调查科职员则由总理及该科科长指定。执行部庶务实际是该部负责人，相当于协理。总理他适时，可代行总理职权。先后担任庶务一职的有：黄兴、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

执行部所属的机构有过多次变动，其名称也说法不同。先曾设过输送部、教育（编纂）部、经理部、参谋部，后来又增设联合部、谍报部、暗杀部。暗杀部实际上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就建立了，由黄兴亲自负责。著名的女会员方君瑛曾担任过暗杀部长。

评议部又称议事部，其议员也由本部所在地会员选举，议员"以三十人为限，每年公举一次"。评议会的议长是汪精卫。曾经担任过评议员的有田桐、曹亚伯、梁慕光、张树枏、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执信、胡瑛、吴永珊（玉章）、康宝忠、吴鼎昌等。

司法部的职员亦由选举产生。该部判事长为邓家彦，检事长为宋教仁。

同盟会的本部是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它采取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机构，并使用选举的办法推定自己的最高领导和评议员、司法部职员。

在1905年至1906年间，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机构逐渐健全起来。当时，为便利起见，三部联合开会多，分别开会少。三部的机构也时有兴革。1906年修改的同盟会总章没有设立司法部的条文，显然这个部被取消了。

同盟会正式成立的第二天，二十世纪支那社移交与同盟会总部。不久，改组为民报社，出版《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社是同盟会的唯一公开机关，它不仅担负着宣传革命宗旨的任务，在孙中山、黄兴离日以后，留在东京的同盟会干部经常把它当作集会议事的地点。

同盟会总部建立以后，便积极地活动起来。从此，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这使孙中山感到无比的高兴。他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28] 他兴奋地向在南洋的同志报告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将来总可待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29]

第三节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

同盟会成立时会员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总章中被明确地规定为同盟会的宗旨，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随即被同盟会的宣传家们简括地称为“三民主义”，这一名称很快就普及了。

在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的政治纲领。后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着重大的发展。由于有这样一个发展，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三民主义，后来便被区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30)]。

一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31)]。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熟悉程度，还是对祖国的落后、民众的无权与苦难的痛切感受，孙中山都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强烈对比，使孙中山很早就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32)]。正是这种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真诚愿望和对广大受压迫民众苦难的真挚同情，驱使着孙中山不断前进，努力地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基本路线。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是西方思想的简单翻版。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3)] 支配着所有这些思想资料融汇推演的，是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政治实践。

当孙中山上书“为生民请命”[34]时，其学习西方的要求是明显的，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还很模糊，更谈不上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种浅薄的改良主张一旦受挫，便被反满的“造反”主张所代替。在香港读书时，孙中山就探讨过“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糟”？他认为：“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35]这种朴素的认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也是他的革命思想的起点。1893年的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便是以这种思想作基础的。“驱除鞑虏，恢复华夏”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用以反对蒙古族统治者的口号。孙中山袭用它当然不是为使历史简单重演，反满被提上日程是因为清朝统治者腐败得不能抵御外侮。但是，这一口号却说明，孙中山的革命，最初只是反满思想与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王朝或官府斗争的历史传统之结合，还没有把革命与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孙中山那时就认为，只要赶走满洲人，汉人当皇帝也可以。直到1895年香港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

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提出这一口号的主动者虽然不是孙中山，但以此为起点，不断加以丰富完善，终至形成民权主义思想，却完全是孙中山的功劳。这个口号以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某一特定形式的追求，表达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孙中山在此稍后的作品里都反映了这一点。1897年3月，在英国《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任何改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该文还说：“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很显然，孙中山所要求的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是封建专制的对立物。1898年，他在与宫崎寅藏等的谈话中又明确地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且适合于中国国民，而又有

革命上之便利者也。”[36] 他在谈话中使用了“联邦共和”和“共和宪法”的概念。1900年，由孙中山领衔的《致香港总督书》所附《平治章程》中所规定的正是这样的政权形式：设立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各省设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省议会之代议士，正常情况下“由民间选定”[37]。这些事实说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在“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下，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赋予反满斗争以近代的意义，它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这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才开始和传统的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区别开来，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1903年，孙中山又将革命组织的誓词增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改变，是孙中山政治思想更为重要的发展，它是比兴中会誓词更完全的革命纲领。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活动着。他游历了资本主义的故乡欧美各国，领导了新的武装起义，同国内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人士进行了接触，特别是同新型知识阶层开始了日益密切的接触。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改良主义学说和国内先进知识分子探讨革命的论著，引起了孙中山极大的重视。十六字纲领，就是在长期酝酿后，适应国内以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的。这段时期，他先后写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敬告同乡书》、《致□□函》（以上1903年）、《驳保皇报》、《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以上1904年）等重要作品，将这个纲领的内容展示在人们面前。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字面上看，与先前没有什么变化，实

际上，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孙中山已经赋予它越来越充实的近代社会内容。

首先，孙中山明确地把反对清朝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阴谋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扩大了民族斗争的意义。他深刻指出："曾亦知瓜分之原因否？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外人不敢侧目也。"[38] 他举出俄国军队占领东北的例子说："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39] 因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40]。

同时，孙中山把"驱除鞑虏"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使民族主义思想深化和丰富了，同民主主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列举了清朝政府的罪状，用以证明它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结论是只有推翻它，人们才能平等自由，才能真正获得生存、自主、财产权，保障人们在智力和物质方面的发展，才能使国家不再仅仅服务于一些人的私利，而能认真地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在这里，排满与反对君主专制，已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了。

"建立民国"替代"创立合众政府"，使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得到了更完满的表述。它摆脱了以某种政体来表述的局限，而突出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叫做"民国"？孙中山后来解释说："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41] 孙中山理想的民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截然否定。他揭示封建王朝中"国"与"民"的对立说，君主"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

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42]。革命党人之所以要从事革命，推翻清朝，正是要改变这种“国”与“民”的关系。

这一时期，孙中山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发展，乃是提出了“平均地权”这一新的纲领。

孙中山漫游欧美各国时，注意考察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尤其热衷于研究社会问题。当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寄生性、腐朽性进一步暴露。经济危机的爆发，罢工运动的浪潮，动摇了孙中山原先对资本主义全盘肯定的信念。他发现：“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43] 怎样认识和解救这些问题呢？正当他急于寻求答案的时候，他读到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编辑和报馆老板。在美国，随着资本王义经济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逐渐增加，城市地价迅速地上涨，由于可耕的生荒地减少，农村耕地的可租地价也有上涨的趋势。亨利·乔治断言，这种情况就是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总根源。他认为，上帝是把土地当作共同的占有物赐给人民的，把土地、地租和地价据为私人所有，违反了自然公理。据此，他号召把土地从非法占有者的手里夺回来。他所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由国家每年向每块土地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赋税，使地租归国家所有。在亨利·乔治看来，劳动和资本都是土地垄断者的牺牲品，而经济地租一旦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国家就不必再征收其他赋税。这就是著名的“单一税”的理论。

亨利·乔治的理论给了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冯自由说，孙中山“对于欧洲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乔治之单税论，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总理以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故

倡导惟恐不力。……所提议‘平均地权’一项，即斟酌采用亨利·乔治学说而自成一家者也。”[44]

为了制订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孙中山在欧游归来之后，曾经反复地进行研究与探讨。

1899年，他和梁启超在横滨作过讨论。孙中山说：“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他还主张：“大乱之后人民离散，田荒不治，举而夺之。”[45] 他和梁启超都认为世界必难免经济革命。

1901年至1902年，他又曾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多次讨论“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46]。孙中山对章太炎说，“兼并不塞而言定赋”，是舍本而治末。因为“兼并”必定导致贫富不断分化，而“贫富斗绝者，革命之媒”。怎样才能遏止“兼并”呢？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会引起激烈的竞争与兼并，但是孙中山认为，这是不应当阻止的，因为“工商贫富之不可均，材也”。人们的才能不同，应当容许他们在这方面彼此竞争，有所差别。他认为，防止“贫富斗绝”，主要应致力于消灭地主强占大片土地的现象。因为“方土者，自然者也，非材力。席六幕之余壤，而富斗绝于类丑！故法以均人”。他主张：“后王之法，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场圃池沼可以买卖，其价格只能相当于花费于其上的“劳力”“因为“买鬻者庚偿其劳力而已，非能买其壤地也”。章太炎很赞赏孙中山的意见，根据他们的讨论草拟了一个《均田法》。《均田法》在耕地问题之外还有一特殊规定，不得以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平均来限制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发展，“凡诸坑冶，非躬能开浚砦采者，其多寡阔陋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园池为比”[47]。秦力山也贡献了意见。他要求使“今日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主张“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以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以为“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

者，何愁而不平等”。他并认为：“盖东西各国之资本家，其所以保护其财产之法，今日已达极点，无术可以破坏之，独吾国为能耳。”[48]

当时，孙中山还曾与日本的土地复权同志会的人物有过来往。该会主要发起人宫崎民藏是宫崎寅藏的哥哥，也是孙中山的友人。该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回复人类之土地平等享有权，确认各个人独立之基础为目的”，“本会以人工造成者归劳力者所有，天然力生产者归人类平等均有为原则。”根据这一理论，该会主张“各个人之土地享有额，以人口与面积较计均分定之”[49]。该会的观点与孙中山极为相近，保留有相互影响的痕迹。

孙中山与其友人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涉及了这样一些基本内容：（一）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土地问题；（二）主张土地国有；土地国有的途径有：国家收买、没收无主地、没收佃主土地；（三）主张土地只能分给耕者，采取定额分配或平均分配的办法；（四）反对侵犯工商业，并且要求在土地的分配和使用上给它们以方便；（五）把土地国有，均等分配作为消灭贫富分化、防止社会革命的根本办法，并认为中国较欧美易行。这些讨论是提出“平均地权”主张的重要准备。孙中山一直关心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的发展，他早年从事乡政改良就反映了这种心情。但是，乡政改良和他关于发展农业的要求都只注意到农业技术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时，孙中山想从所有制的变更方面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此前，在发展实业方面，孙中山最关心的是农业，这时，他将土地问题的解决与工商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了，并考虑在土地分配中给工商业的发展以便利，这也使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阶段。

在这段时间的讨论中，孙中山“尚无成算”。1903年，他终于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这年12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兴奋地将这一救世方案加以推荐。他说：“欧美演此（贫富）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适剂于平”，“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

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平均地权”是“吾国可以切实施行之事”，“欲于革命一齐做起”[50]。

由于“平均地权”的提出，与孙中山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内容已经基本具备。1903年至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美国和欧洲，都曾与革命党人细致地讨论三民主义的内容和名称。孙中山认为，建立革命团体“必先有主义，主义定固，乃能成功”，而“主义愈简单明了，愈生效力”[51]，于是，便借鉴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定下了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名称。

二　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概念之后，1906年，主持制定了同盟会《革命方略》，其首篇《军政府宣言》集中地诠释了同盟会的纲领。同年12月，他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这些作品，都是了解三民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文献。

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军政府宣言》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来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逼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者，杀无赦。汉人有为满洲作汉奸者，亦如之。
>
>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

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就是要求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有关问题还作了进一步的申述。首先，他指出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的自然差别产生的，“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他当作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其次，他强调指出了民族主义“最紧要的一层”，即“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他把政权问题放在民族主义的首位。根据这一基本点，他紧接着批驳了尽灭满人的错误观点。他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断然指出，清兵入关时进行的大屠杀“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52)]。这样，孙中山就将他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复仇主义区别开来了，而将民族革命的目标集中在少数满洲当权者的身上。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民国”。

孙中山指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在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的同时，还必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

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他说：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孙中山举出三条理由说明中国必须“去专制、行民主”。他说：

> 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病，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53)

基于这样的理由，他指出了仅有民族革命的不足。他说，民族革命仅能将“现在恶劣政治”一扫而尽，而不能去“那恶劣政治的根本”，要做到这一点，“不是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孙中山明确表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孙中山进一步强调指出，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推翻清朝统治即担负着这两重任务。他说：

> 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
>
> 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孙中山明确指出了民权主义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军政府宣言》对“建立民国”的内容作了如下简明的概括：

>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

什么叫做“平均地权”？《军政府宣言》解释说：

>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孙中山解释说：

> 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

根据以上解释，可以看出，“平均地权”是这样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对于地主所有的土地，核定其现在的地价，将来地价因经济发展而上涨时，其现价仍属地主所有，超出现价的部分则收归国有，从而为国民所共享。

“平均地权”所包含的内容，前后曾有过变化，“定地价”是最后公开宣布的办法。马君武回忆说，同盟会初成立时只有十六字誓词，三民主义的名词还没有提出来，“不过总理（指孙中山）很坚决主张‘土地公有’，他说：‘土地就等于空气一样，应该为大家公共享受，所以土地不能归诸私人，而应归之国家所有才对。’但过后经过好几次的讨论与修改，才由主张即刻公有改为限制办法，再由限制办法改为报价办法。即无论什么田地，都由地主自己估价报告政府，政府照价收税。同时，为防止‘以多报少’的流弊，政府可以照价收买；防止‘以少报多’的流弊，政府照报价抽一种地价税。总理认这种办法是最妥的”(54)。

孙中山还倾向于“单一税”的政策，他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不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为什么要实行民生主义呢？孙中山说：这是由于“文明越发达，

社会问题越着紧”的缘故。孙中山所说的“文明发达”，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问题”，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他把欧美的境况引为前车之鉴，企图在中国预防祸患的产生。孙中山说：“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万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这真是前车可鉴。”他主张“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以免在中国发生社会革命。他说：“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以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期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文明进步，地价日涨”，“贫民无田可耕”，地主“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认为“平均地权”在中国则易于实行，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无大增加”，易于定地价。

孙中山排除了夺取地主土地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他说：“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是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管他。”

他对自己的办法是非常自信的，认为定地价之后，“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肇建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军政府宣言》声明：“敢有垄断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正表现了孙中山实现民生主义的信心。

以上就是孙中山所阐述的同盟会时代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阐述三民主义基本内容的同时，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的讲演中还首次提出了“五权宪法”的理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是欧美资产阶级建立政权时普遍遵循的理论。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仍然有重大缺陷，主张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应增加考选（考试）、纠察（弹劾、监察）二权，成为“五权宪法”。

孙中山在对负有盛誉的第一部成文的三权宪法——美国宪法的批评中展开了自己的理论。首先，他指出美国从前没有考试制度，官吏盲从滥选、任用私人，致使政治腐败散漫；后来所行考试制度仅适用于下级官吏，并且权属行政部，仍是不完全的。因此，他建议：“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立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他提出，共和政体的官吏“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其次，他指出各国监督的权限为立法机关所兼有，弊病很多，并且裁判人民的机关是独立的，裁判官吏的机关却隶于别的机关，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专管监督弹劾的事”。在提出考试，纠察权的时候，孙中山曾受到中国古代考试、御史制度的启发，但他指出后者是封建专制的从属品，与前者有本质的不同。

早在1903年，孙中山在与友人讨论三民主义的同时，就讨论过五权宪法，但他将之公开提倡，却在1906年。此后，孙中山一直将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并称。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相互补充的。民权主义讲的是主权论，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政权”，讨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五权宪法讲的是职能论，从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治权”，讨论政府权能的划分。西方政治学家们对“政权”、“治权”的关系争论不休，孙中山主张将“政权”和“治权”分开。

孙中山还探讨了同盟会纲领实施的程序。《军政府宣言》在“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的原则下，规定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递进的时期。

“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反清起义爆发后，“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每县以三年为期限，“皆解军法，布约法”。

“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吏，皆由人民选举。凡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相互遵守。

“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在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宪法以行之”。

上述程序各时期的名称和内容，孙中山后来作过变动和修正。他始终认为，三民主义的实施必须按程序有步骤地进行。

三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

孙中山以非凡的气概将三民主义宣诸于世时，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全民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他强调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三大主义皆基于民”[(55)]。他主观地但却真诚地将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广大民众方面，以“谋四万万人之福祉”[(56)]为目的。他指出：

> 我们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他认为，中国只有真正成为所谓“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并且得到“完美无缺的治理”，才能达到“我中国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他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概念，以与古代的“英雄革命”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他指出：

> 前代革命，如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57)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一以贯之。他以为，民族主义、民族革命、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国民的国家，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社会的国家，正顺次地体现着自由、平等和博爱。他真诚地愿为实现这些在西方已被化为空言的口号而奋斗。孙中山特别强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提出“社会革命”的课题，以弥补欧美革命之不足。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58)

他不仅强调革命在社会利益上和民众一致，而且强调革命党在其

行动上和民众一致。他说："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自今日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59] 孙中山从民众的觉醒中看到胜利的希望。他说："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卒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且人群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事功倍，良非夸谩。"[60] 因此，他强调了领导者"策其群而进之"的责任。他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洽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世职。"[61] 在这些言论中反映了孙中山主张由先知先觉唤起民众的愿望。

以上关于三民主义的特征的阐述，反映了孙中山对其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我意识。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成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中国人民杰出的代表。不仅孙中山坚信自己的这种身份，几乎所有拥护这一革命的人们都公认他的这种身份。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使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这种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使得当时中国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尚未强大的无产阶级把自身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才得以把自身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从而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但客观的事实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还是从其特殊的阶级地位出发去谋求解放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仅仅来自这样一种需要，即资产阶级如果不把其他阶级也从封建关系下解放出来，它自身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便如此，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也是很模糊的。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卓越代表，伟大的孙中山的眼界要比本阶级的一般成员广阔高远得多，可是他的纲领仍然不可避免地浸润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三民主义显示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显示着它高尚、勇敢的一面，也显示着它平庸、怯

懦的一面。

清末的革命运动几乎是伴随着单一的反满（“排满”、“仇满”、“逐满”、“驱除鞑虏”）呼号兴起的。一切正义的不满和大量进步的要求都被凝聚于反满的口号之中。人们在革命实践当中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列强侵略、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这些要求都远远超出了反满的狭隘意义，但终了还是作为反满的充足理由放在这个单一的口号之下。孙中山逐渐把单一的反满口号分解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利于革命内容的丰富和明确，这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进步。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反满口号的直接延续和发展。同样是反满口号，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并不一致。对于从狭隘意义出发的反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中没有包含进步的因素。事实上，在封建政权主要由满洲皇帝、贵族掌握的环境下，反满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种难以排除的表现形式。孙中山则努力将反满从它原有的狭隘内容中解放出来，而赋予民主主义的内容。他将反满与抵制列强瓜分联系在一起。他还坚决地排除民族复仇主义，而将斗争的目标集中在少数满洲当权者身上，强调反满的中心问题是将政权由满族当权者手中夺过来。他公开表示欢迎满族人参加“革命排满”。

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使民族主义或民族革命的政纲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列举了清朝政府的十一条罪状，这些就是孙中山认为应由民族革命一扫而尽的“现时恶劣政治”。其中几条指出：“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孙中山用这些事实证明，满族统治同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贫穷及国家的灾

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全部政策妨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把中国引向贫困、落后并遭受列强欺侮的深渊。孙中山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和汉族取得政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

列宁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62]"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63]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会出现这样的趋向，即：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64]。在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和列宁论述的西方情况有所不同，但近代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还是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分不开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展示了新的发展前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中国出现的这一进步历史趋向的产物。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许多弱点。他把民族矛盾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于民族的自然差别，因袭着中国古代"种姓"和西方的"种族"的说法。他没有提出民族平等的原则，而在中华诸民族之中，孤立地突出汉民族的历史地位。这就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残留着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但是，它的最根本的弱点却在于它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并且是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阻碍着中国国家独立的主要危险来自帝国主义列强。中国要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必须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孙中山在把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部分提出时，恰恰没有把这一最重要的内容概括进去。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集中反对的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同盟者。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宣传家们曾反复说明过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中国人民之所以要推翻清政府，就因为它是列强的走狗，“洋人的朝廷”，不推翻它，不能使祖国避免瓜分之祸。对清王朝的打击，也无疑是对其主子帝国主义的打击。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没有正面地提出明确的反帝主张，这说明它的觉悟程度和斗争水平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孙中山的反帝思想萌发得并不晚，他不仅指出过只有推翻清朝才能免去瓜分之祸，而且直接谴责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孙中山论证过帝国主义者主张瓜分中国的“分割论”和主张支持清政府的“保全论”的虚妄，批驳了他们的侵略理论“黄祸论”。他还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不屈信念。孙中山指出，帝国主义若要瓜分中国，“实大拂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65)]？他在对义和团笼统仇洋的批判中产生了“文明排外”的思想。但是，孙中山的反帝思想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弱点。他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仅仅看成少数好侵略的武人的错误政策。他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来解释世界形势。在谈到中国遭受外侮的民族危机时，更多地强调清朝统治造成的国势衰弱，而不是首先揭露列强的侵略。孙中山以为，只要推翻满清，自己振作起来，列强就不会前来侵略而与中国平等相处了。他以为，他学习的是西方，他自己所走的正是西方老师所走过的路，理应得到老师的支持。因此，他不断呼吁欧美政府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或保持善意的中立。虽然客观事实并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但他仍然对帝国主义抱着难舍的幻想。这些弱点阻碍了孙中山反帝思想的健康发展，使它无法升华为明确的反帝纲领。在提出三民主义的时候，孙中山对反帝问题采取了明显的回避态度。除了在说明国势时，提到“异种（满清）残之”、“外邦逼之”[(66)]外，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整个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到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67)]。

孙中山在其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十分重视政权的转移问题。他认为，君主专制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仅仅将政权从满族人手中夺取到汉族人手中，还不能除掉君主专制这个“恶劣政治的根本”。因而提出了民权主义，号召推翻君主专制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建立“国民的国家”。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最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迫切政治要求。所谓“平等革命”、“国民皆平等”所包含的现实社会内容，就是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孙中山尽量突出民权主义立足于人民的思想。在“国民的国家”中，国民享有选举、罢免、复决、创制四权。这种民权因政权和治权的分立而得到保证。民众将按照军法、约法、宪法三个循序递进的阶梯，摆脱君主专制而步入完全的民主。所有这些设想都反映了孙中山主观上对人民权利的关切，闪耀出民主主义的光彩。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为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长足发展，必须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自身的政治统治。民主共和就是适应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最发达的政权形式。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提出民权主义，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成就。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民主主义要求，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主主义要求区别开来了。它向人们宣示，它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比较

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由“建立民国”的政纲作为主要标志的。

和民族主义一样，民权主义也有其弱点。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分立并没有改变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性质。它否定了君主专制，却无法防止官吏为资本所收买，假“国民公仆”之名而高踞于人民头上。“政权”、“治权”区分的理论，更导致人民空负拥有主权的虚名，而统治集团则很容易利用执掌“治权”之便把民主变为实际上的专制。实行立宪的三个时期的划分，实质上是要人民接受先知先觉们的恩赐。这种“民权”与人民脱离的弱点，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孙中山无法克服这种弱点。

对于民权主义来说，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也无从保证中国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纲领，实际上表达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地主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但孙中山长期间内讨论得最多的“国体”问题，实际上是“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对于真正的“国体”问题，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却没有明确地讨论过。这样，他就无法自觉地建立起对待革命所反对的社会阶级的政策。孙中山真诚期待的“国民的国家”，不仅迷惑了人民，也迷惑了孙中山和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由于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革命没有触动附庸于国际资产阶级的买办阶级。

对于地主阶级，孙中山也只在反满的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将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满洲皇帝、贵族排除在政权参与者的行列之外，比满洲贵族更为强大的汉族地主，则被轻易地放过了。革命并非完全不触动汉族地主阶级，但这种触动乃是在反满名义下进行的，仅以“汉奸”的身份提到汉族地主中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说，只把他们作为满洲贵族的仆从而加以反对。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还强调，革命党与这些“汉奸”，“论情谊则为兄弟”，如果

这些人能“变仇雠之地位，即复为兄弟”。民族（种族）的界限泯没了一切。

因为忽略了“国体”问题，必然缺乏对待敌对阶级的政策，会使资产阶级在各阶级争夺政权时，处于无防备状态，并缺乏斗争的武器。忽略了“国体”问题的民权主义，使民主共和国变成徒有其表的躯壳。

民生主义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的经济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采取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表达方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提出的一切政治要求，本质上都根源于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

孙中山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信念始终是坚定的。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的讲演中，他强调指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他这里所说的文明进步，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进步。他认为在中国，这种文明进步必然会到来。面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他并没有改变这种信念。他反对那种因此而产生的“复古”主张，认为“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他主张以改良社会经济组织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不过，他没有采用“废资本家”的各种方案，而是提出了平均地权、核定地价的方案。他认为：“行了此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在这里，丝毫没有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畏惧。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提到的“地价”，其实就是资本化的地租。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现代的地租，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向租地资本家索取工资雇佣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工资雇佣劳动者、产业资本家、地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土地所有权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但“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即使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看，土地所有权也显见是一个无用而

且有害的东西”[68]。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核定地价”的实质内容，就是以征收单一土地税的办法把地租或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其实质就是实现土地国有化。列宁在评价民生主义的意义时明白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列宁还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69]。无论“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在中国是否可行，它显而易见是一个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明确的经济纲领和土地纲领。

不过，孙中山的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呼喊，而是通过为资本主义开列治病良方的曲折形式表达出来的。民生主义的英文对译就是社会主义——Socialism。孙中山随后也明白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把民生主义的实现叫做“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达成的理想是“社会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在申诉民生主义必行的理由时，孙中山首先揭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对立，并且把自己的同情全部寄诸贫苦民众。他对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进行了谴责。他指出：欧美“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之地了”。关于这些话，除了可以指谪它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解的肤浅混乱外，无法否认它是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同调。但是，孙中山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却无法消灭他所谴责的不平等现象。他把“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贫民无田可耕”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源是错误的。工人阶级之所以受剥削而日趋贫困，是因为它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因此，要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必须把一切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而不仅仅是土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地主并不直接剥削劳动者，而诸如“平均地权”等土地国有的办法，并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之，却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土地国有主张的阶级实质，正如马克思所

指出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恨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70)]。孙中山就是这样曲折婉转地表达了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孙中山采取这种表达方式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列宁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向欧美汲取谋求解放的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71)]。

和民生主义的提出紧密联系的，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这种思想，企图在中国防止像欧美那样因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以及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他不明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是无法避免的。资产阶级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就能以“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无产阶级因为没有生产资料，也就无法逃避文明的“恶果”。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乃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只有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剥夺剥削者，消灭私有制，使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才能使文明只有善果，没有恶果。但这些都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孙中山为了避免将来会发生的革命，想利用中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来预防这种革命，自然只能是空想。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不是要防止资本主义，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空想不但有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好在孙中山虽然说了些空想的话，他的实际主张，却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孙中山是一个主观的社会主义者，实际的民主主义者，他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经济纲领，民生主义表达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孙中山为了要防止欧美那样的社会问题，他十分强调“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时欧美和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欧美，土地的封建所有权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庸，而在中国，它却在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占着统治地位。中国的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直接占有无地、少地农民的剩余劳动，使广大农民实际上处于依附地位。因此，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发展清除障碍，首务之急就是要废除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平均地权”的办法却无力消灭它。当孙中山在日本与章太炎等讨论土地问题时，曾经把中国的土地问题作为主要对象，并且讨论了与取消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有关的内容，但是在提出“平均地权”之时，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却被抛弃或搁置了。由于没有正确的土地纲领，保留了封建地主所有制，也就无法最终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也就无法动员广大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投身革命。这一缺点，同样影响了革命的结局。

综上观之，孙中山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体现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在同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和思想家中，没有谁能够像孙中山那样将这些社会要求比较完整地、明确地概括出来，使之成为指导整个斗争的纲领。因此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但是三民主义根本性的缺点，就是没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没有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特别是没有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纲领。

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行动纲领和指导思想，对推动资产阶级反清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盟会是一个由许多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派别组成的革命政党，这些政治属性不尽相同的人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并不一致。在以后的篇幅里，可以看到

这样的趋向：各派在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上，比较一致，“一言反满，举国同声”。但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就有重大分歧；在民权主义方面，分歧也不少；而在民生主义方面，分歧就更为突出了。这一切，埋下了后来同盟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走向分裂的种子。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就不可能把各个革命阶级、阶层、集团、派别真正地团结起来，将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

第四节　同盟会的分支机构

一　国内各地分会

要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土地上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自己建成庞大的有系统的组织。同盟会本部成立后，首先在加盟的留学生中按省区组织分会，管理本省留学生的入会主盟事务，并负责派遣人员，归国活动。同盟会总章规定：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南部、东部、中部、西部、北部五个支部。

南部支部：设于香港，下辖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分会。

东部支部：设于上海，下辖浙江、江苏、安徽等分会。

中部支部：设于汉口，下辖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分会。

西部支部：设于重庆，下辖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等分会。

北部支部：设于烟台，下辖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山东等分会。

1906年，同盟会本部曾任命黄树中为西部支部长、胡瑛为中部支部长、于右任为东部支部长[(72)]，但都没有能成立起来。除1909年建

于香港的南方支部外，其他称为支部的大多是分会性的组织。

至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前，国内约建立分会组织二十余个。

南部地区：

1．香港分会与南方支部。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香港兴中会和《中国日报》均由陈少白一人主持。不久，陈少白、郑贯一间发生矛盾，郑离开《中国日报》，另办《世界公益报》。二人间的意见影响了会务的发展，多年不曾接纳一个会员。

香港是革命派对内活动的策源地。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决定首先整顿这里的会务。9月8日，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到香港、广州、澳门一带组织同盟会分会。冯抵港后，与陈少白商议，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一律重新填写誓书。加盟者有陈少白、李纪堂、容星桥、邓荫南、郑贯一、黄世仲、邓警亚、卢信、温少雄等多人，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一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会所设于《中国日报》社。1906年9月，《中国日报》改组，陈少白辞去分会会长职务，由冯自由继任。为了加强对香港分会的工作，1907年，孙中山又先后派胡汉民、汪精卫二人驻港。

改组后的香港分会大力开展对华南各地的工作。1907、1908两年，曾派出代理主盟员和军事联络员多名，分赴各地发展会员，筹划起义。至1908年底，约发展会员千余人。

1907年—1908年多次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孙中山被迫再次停止军事活动。1909年3月，香港分会开辟新会所，改取“开放主义”，大量接纳会员；同时在广州、河南设立分机关，由高剑父、潘达微、徐宗汉等主持。这一年，发展会员二千余人。其中，以倪映

典所联系的新军士兵占大多数。同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划分职权，南方支部主管华南各省会务和起义，香港分会专门管理香港一地会务。1910年春，冯自由去加拿大温哥华编辑《大汉日报》，谢英伯继任分会长。1911年夏，谢英伯赴檀香山，以陈逸川代。

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司库，下设筹款、军事、民军、宣传各组。它领导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

2．广西支部。

1904年，郭人漳在江西巡防营统领任内，为准备改练新军，办过一个随营学堂，由蔡锷任监督，学生中的陈方度、黄牧等都是革命分子。1905年春，郭人漳调任广西巡防营统领，负责编练新军，仍然邀蔡锷办随营学堂，并聘请谭人凤为文案。学堂内气氛热烈，“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73)]。同年12月，黄兴由日本经香港到达桂林，在随营学堂内组织同盟会分会，加盟者有郭人漳、林虎、邹永成、葛谦、曾传范、谭道源等八十余人。黄兴原拟策动郭人漳相机起义，因郭与蔡锷不睦，调解无效，不得已于次年春离桂。同年，郭人漳及其所练一营新兵调驻广东钦州、廉州地区，桂林分会会务因之停顿。

在桂林分会之后成立的是南宁支部。

1907年，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要求由南宁到北海的铁路建筑权，激起广西人民反对。南宁商人雷在汉（鲲池）、周仲岐、周君实、潘赋西等组织邕北铁路局，主张自行招股筑路。在这一斗争中，雷在汉等逐渐认识到保护民族权益必须和反清斗争结合起来。1909年，雷在汉加入同盟会，任南宁支部长，周仲岐等也同时加盟。同年，南方支部派施正甫回广西发展会务，雷、施等共同开设“同盛号经纪行”，作为秘密机关[(74)]。

1910年，耿毅等成立广西支部。

张鸣岐任广西巡抚期间，为了办新军，于1908年至1909年，罗致了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李书城、孔庚、尹昌衡和内地革命党人耿毅、吕公望等。1910年8月，同盟会员二十余人集会，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下设学兵营、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谘议局等分部，各举分部长[75]。

广西支部出版《南报》半月刊，赵正平任主笔。后因巡警道王秉必干涉，改名《南风报》。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刘崛回广西活动，又在梧州建立同盟会广西分会，但不久，刘崛即转往浔州[76]。

3．福建分会。

1906年春，孙中山任命汉族独立会代会长郑祖荫（兰荪）为同盟会福建分会长，派人由东京专程送给委任状及各种文件。同年夏，汉族独立会取消，全体会员依同盟会誓词宣誓加盟。

4．云南分会。

云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加入同盟会的是吕志伊、杨振鸿等人。1906年，杨振鸿奉派回国建立分会机构，任主盟人。7月，在昆明创设体操专修科，遴选志士，教授军事，同时发展李伯东、杨大铸、刘九畴等为同盟会员。11月，杨振鸿被清政府任命为腾越防营管带，即与张文光及干崖土司刀安仁等计划，拟于次年6月在该地起义。因为人告密，出走缅甸，转返日本。

同年冬，李伯东邀集同志二十人组成兴汉会。次年，为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侵略云南，李伯东又联络自越南归国的同盟会员徐濂等组织“死绝会”，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实行革命”[77]。1910年，马骧等在大理组织同盟会分会。

东部地区：

1．上海分会。

同盟会成立时，吴春阳即推荐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1905年9月，黄兴亲自赴沪主盟，接纳蔡元培加入同盟会。蔡用个别介绍的办法使不少光复会员成为同盟会员，但仍然保持了光复会的独立系统，并继续发展光复会员。1906年春，因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同盟会总部指示将上海分会与江苏分会合并，以高旭为会长。

蔡元培任上海分会会长时，曾积极支持中国公学的创办。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有所限制。12月初，中国留学生发动罢课斗争，成立联合会，以胡瑛为会长、宋教仁为外交长、孙武为纠察长，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自办学堂，先后返国者约达二千人左右[(78)]。1906年1月，十三省留学生代表在沪公议，决定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校址设于吴淞。不久，因经费困难，公学干事、同盟会员姚洪业蹈海殉校，引起各界同情，纷纷捐助，学校规模扩大。因学校为学生自办，实行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校中弥漫革命空气。学生自办《竞业旬报》，宣传革命。同盟会在校中设立了机关，由梁乔山、谭心休、马君武等主持。1907年，马君武因躲避端方逮捕，去欧洲留学，但同盟会仍坚持利用该校进行活动。

2．江苏分会。

高旭在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中归国。1906年2月，与朱少屏等在上海老西门宁康里创办健行公学。随后，又由夏允麐在宁康里租屋设立分会机关，号“夏寓”。

健行公学继承爱国学社的传统，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为教材，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夏，高旭、柳亚子等编辑《复报》，“发挥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

[79] 。同年秋，“夏寓”迁至法租界鼎吉里。1907年初，曾在“夏寓”住过的革命党人杨卓林等被捕。杨英勇不屈，其同伴供出“夏寓”是机关部，朱、高是办事人。这样，分会机关部处境岌岌可危。秋瑾、徐锡麟事起，端方照会租界当局：“革命党人多匿迹租界，嗣后有剿捕事宜，不得干涉。”[80] 高旭不得已，解散公学，取消鼎吉里机关。

3．江淮别部。

1905年冬，吴春阳归国，所至发展会员，仅在芜湖的安徽公学，就发展常恒芳等八十多人。因担心事泄后牵连总会，定名为“江淮别部”[81] 。1906年，吴春阳到江宁，联合新军第九镇军官柏文蔚、倪映典、赵声、林述庆及陆师、将备、师范各校革命分子，密会于鸡鸣寺，加盟者数十人。同年冬，安徽创办新军，春阳投身三十一混成协，与熊成基、范传甲等结交，逐渐展开活动，相继加盟者百数十人。不久，被巡抚恩铭发觉，春阳偕范传甲返回故乡合肥，组织合肥学会，创办城西小学、模范小学及速成师范班，以教育为掩护，宣传革命，发展会员，一时颇有进展。后因清提学告发及当地巨绅的排挤，吴春阳离乡赴沪。

4．信义会。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张汇滔、程恩普、管曙东等被同盟会本部派遣回国。到安徽后，张汇滔等在寿州、颍州各处进行。为避免清吏注意，所建立的组织定名为信义会。但入会誓词与同盟会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82] 。

寿州北郊四顶山有古庙，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香客云集。1907年3月，张汇滔与吴樾之弟吴楚密谋，拟乘机起义。后因风声泄露，临期停止。

5．浙江分会。

1905年8月，秋瑾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省主盟人。同年冬归国，仍然沿用光复会的名义发展会员。关于此，后来陶成章解释说："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光复会）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83] 1907年初，萍、浏、醴起义失败，秋瑾、徐锡麟相约至杭，发展浙军将校俞炜、周凤歧、夏超、朱瑞、周亚卫等加入光复会。同时，孙中山亦派黄郛、赵正平、吴思豫到浙，在新军中活动，先后发展顾乃斌、冯炽中、葛敬恩等加入同盟会。不久，双方联络一气，在西湖周庄集会，推夏超为会长，顾乃斌为副[84]。

中部地区：

1．湖南分会。

通过抵制美货等运动，禹之谟成了长沙商、学界中负有重望的人物。1906年4月，由易本羲主盟，禹之谟加入同盟会[85]。大约即在此时，他受黄兴密函委托，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自任会长。会址设于湘乡会馆内惟一学堂。

同年5月，陈天华、姚洪业灵柩到湘。23日，禹之谟组织长沙学生万余人到岳麓山参加葬礼，引起清吏及顽固派侧目。其后，长沙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挟嫌向当局告密，称禹之谟为"革命党魁首"，"专派送《民报》邪说，勾结军学两界谋起事"[86]。7月，湘乡学界抗议食盐加税和盐商浮收，禹之谟积极参预并领导了这一斗争。8月10日，湖南巡抚庞鸿书以"率众塞署"的罪名下令逮捕禹之谟。9月，移禁靖州。为了从禹之谟身上找到革命党人的活动线索，清吏用遍了各种酷刑。但禹之谟坚毅不屈。他自度必死，写下遗书说："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87] 1907年1月5日，被清政府绞决。

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同盟会总部派宁调元归国，除领导起义

外，还要他组织同盟会湖南支部。1907年1月，宁调元在岳州被捕，囚禁长沙。狱中，他总结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经验，认为支部的成立刻不容缓，便委托刘谦、李隆建等代为联系。同年4月，刘谦、黎尚雯、李剑农等集会于长沙妙高峰，成立同盟会湖南支部[88]。1910年冬，曾杰、文斐等陆续加入，规模扩大；重开成立会，推文斐、龙毓峻为正副会长[89]。

2．湖北分会。

同盟会成立后，各省分会长相继回国组织机构，时功玖、张昉、陈镇藩等迟疑不行，余诚愤然说："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90] 慷慨自请归国，于是同盟会总部便改派余诚回鄂。1906年春，余诚到达武汉，刘静庵率日知会会员多人加盟。二人通力合作，两会逐渐融合，"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91]。6月6日，孙中山派乔义生偕法国军官欧极乐（C．Ozil）到鄂，日知会开会欢迎。欧极乐等在大操场上面对千余听众发表了激烈演说[92]。这种场面自然没有任何保密可能，清朝政府的侦探混迹其间，日知会的秘密由此暴露，萍、浏、醴起义爆发之后即被破坏。

3．江西支部。

1906年，孙中山派黄格鸥、魏会英回江西建立同盟会组织。黄到南昌后，成立江西支部，任支部长[93]，易知社的成员大部分加入了同盟会，其中，蔡突灵全家刺血加盟。他和弟弟锐霆奔走于瑞州、袁州、临江、吉安各地。所至建立分部[94]。同年，江西成立新军，不少会员投入军队。

魏会英是赣州人，他在赣州成立了同盟会组织。

4．河南总分会。

河南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约三十余人。1907年出版《河南》杂志。同年派李炯斋、罗殿卿、刘醒吾三人回国。李等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出售革命书报，招待往来同志，后被清吏查封，李炯斋被通缉。次年，杜潜等归国，召集学界同志杨源懋等二十余人集会于开封中州公学，议决以该校为河南同盟会总分会会所。先后加盟者二百余人，中州公学学生几乎全部成为会员。不久，新蔡等县陆续成立分会[(95)]。

西部地区：

1．四川分会。

当各省分会会长纷纷归国时，黄树中正入迷地在横滨学习制造炸弹。他要陈道循、林启一等先行回川，发展会员[(96)]。临行前，陈道循邀同盟会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到四川工作，得到同意。邓留日前是四川高等学堂学生。他到川后，以教书为掩护，暗中组织同盟会四川分会，任会长。后因被川督锡良察觉，离职他去。1906年冬。同盟会派黄树中为成都分会长，又派荣县人谢奉琦回川从事宣传工作。1907年春，黄树中到达成都，在华阳中学任职，秘密组织同盟会，发展学界会员数百人。军队中，则通过十三混成协督队官龙绍伯活动。短时间，武备学堂毕业生、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和下级军官，大半参加了同盟会[(97)]。

除成都外，重庆也设有分会。

在四川留日学生中，重庆人陈崇功、童宪章都是率先加盟者。陈回国后，立即发展公强会会员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等加盟。1906年初，组成重庆分会，决定先从学校方面着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对象，向楚等纷纷加盟[(98)]。1907年秋，杨庶堪、向楚、朱之洪等先后奔赴叙永，以叙永中学为据点，展开革命宣传。1908年，清吏在重庆菜园坝举行工商赛会，部分同盟会员建议乘机起义。经反复讨

论，否定了这一意见，仍以积蓄力量为方针。1909至1910年间，杨庶堪、张培爵等又聚集重庆，通过各种关系，掌握了重庆府中学、巴县中学等教育机关，同时也联络工商界人士和袍哥中的知识分子。

2．贵州自治学社。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立宪团体。1907年10月，贵州法政学堂学生张百麟企图建立一个合法组织，以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首先公开发表《意见书》，申述合群救亡宗旨，征集同志，然后向清政府呈请立案。同年12月，在贵阳镜秋轩照像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推法政学堂教员张鸿藻为社长。因为“地方自治”是一个为清朝统治者所许可的口号，便定名为“自治学社”。社章声称：“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知识，养成善良品行，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99)] 1908年，经社员彭述文和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平刚函商，得到同盟会本部同意，承认自治学社为同盟会贵州分会[(100)]。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平刚字少璜，贵筑人，1878年生。他是贵州倡导革命最早的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并被举为贵州分会长。

自治学社发刊《自治学社杂志》，每月一册，并经常举行演讲。为了夺取议席，控制谘议局，自治学社先后派出干部多人到各县活动，建立分社四十七个，发展社员约一万四千余人[(101)]。

学社初期由张鸿藻、张百麟、周培艺三人共同领导。1909年，张鸿藻辞职，推留日归国的钟昌祚继任。同年6月，创办公立法政专门学堂。7月，发刊《西南日报》，以为言论机关。从此社务得到迅速的发展。

北部地区：

1．山东分会。

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山东分会首任会长徐镜心偕谢鸿焘等归国，在烟台设立同盟会机关部[102]。谢鸿焘出资创办东牟公学，王学锦等创设师范专修班，以“唤醒民众，倡导革命”为务。其后，徐镜心秘密奔走各地，广事联络，发展会员数十人。1906年，去奉天活动。

继徐镜心之后任山东分会长的是丁惟汾。但他没有回国，委托山左公学创办人刘冠三在济南主持一切。1907年9月，刘冠三发展会员十余人。同年冬，山左公学被清吏破坏，公学中的同盟会员转入青岛震旦公学[103]。青岛当时为德国租界地，震旦公学名为学校，实为革命机关，创办人为同盟会员陈幹，在校者商震、刘冠三等三十余人。1908年，教员景定成等运动青岛船坞工人，成功地发动过一次罢工[104]。1909年，清廷出卖山东矿权，陈幹联络全省学界，组织保矿会，遭到德国殖民当局嫉视。不久，震旦公学被封。

至1911年，丁维汾才到济南重设同盟会山东分会。

2．辽东支部。

到达东北最早的同盟会员是徐镜心、张继和日人末永节。1906年，他们结伴漫游东北各地。结纳“马贼”头目杨二虎等。“马贼”是一种绿林武装，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张继告以“打天下”，才明白所以。他们先后共发展同盟会员三百余人[105]。1907年春，宋教仁、白逾桓等抵达东北，组织辽东支部。

此后，黑龙江分会也在哈尔滨建立，会长为匡一。

3．河北支部。

1906年，弘文学院毕业生陈兆雯归国，任保定北关崇实中学教员，先后发展郝濯等为同盟会员。1907年冬，创办保定育德中学，该

校即成为同盟会在保定秘密集会的场所。1909年陈兆雯病故，由郝濯继任主盟人[106]。

河北支部在保定学生中建立了外围组织实行会，1910年改名共和会，参加者有高等农业学堂学生胡新三（鄂公）等。

4．陕西分会。

在同盟会中，景定成极力主张在北方地区起事。1908年春，他和井勿幕等在山西太原集议，认为陕西民性强悍，地势雄峻，可以作为西北各省革命的根据地。会后，井勿幕介绍景定成到西安高等学堂任教，和同盟会本部派回陕西的邹子良联络，共同发展会务。为了培养干部，井勿幕又创办了健本学堂。1908年冬，井勿幕等在西安开元寺内集会，成立陕西分会，推李仲特为会长[107]。

5．大同支部。

同盟会成立后，即在日本东京成立山西分会，王荫藩、荣福桐等先后任会长，发展会员百余人。其后，赵戴文、荣炳、荣福桐、阎锡山、王用宾、谷思慎、续桐溪陆续归国，但没有在省内建立分会组织。1906年，续桐溪派人在绥包一带活动，发展李德懋、刘干臣等为会员。李是大同人，决定在该地建立革命机关。1910年，成立大同支部。

上述同盟会组织除香港分会及南方支部外，都处于清政府的严酷统治下，因此，经常遭到破坏，存在不易。它们大多数克服了困难，潜滋暗长，动员和组织了革命力量。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各地立刻动作，其中不少组织起了重大作用。不过，由于它们都还很弱小，并未扎根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因此，革命爆发后就无力左右局面，应付各种事变。此外，许多分支机构长期各自为战，许多活动还是个人自发搞起来的，步调很难一致。

二　国外各地分会

华侨是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同盟会总章规定，国外应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

南洋支部：设于新加坡，下辖英、荷属地以及缅甸、安南、暹罗各分会。

欧洲支部：设于布鲁塞尔，下辖欧洲各国分会。

美洲支部：设于旧金山，下辖南北美洲各分会。

檀岛支部：设于檀香山，下辖檀香山群岛各分会。

孙中山一直非常重视同盟会在国外的发展，许多组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建立的。

南洋地区：

1．西贡、堤岸分会。

孙中山和西贡侨商很早就有联系。1900年，孙中山初次到达西贡，即与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及侨商李竹痴等结识。1905年10月，孙中山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自日本再到西贡，曾锡周等热烈欢迎。停一二日，孙中山即赶赴堤岸，出席华侨欢迎会，受到闽粤籍商人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颜太恨等人的殷勤招待，随即成立同盟会。刘易初任会长，李卓峰为副。在同盟会发动的历次军事起义中，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等均曾捐助巨款。黄景南是个卖豆芽的小商人，他将半生辛勤积蓄数千元全部献作起义经费，又每日将营业所得收益投入扑满中，贮作革命之需。另有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钱不过一文，但他也将长期积蓄的三千余元全部捐献[108]。

2．新加坡分会。

南洋群岛曾经是保皇党的一统天下，新加坡更是它的重要据点。1900年初，康有为到新加坡，依靠当地华侨富商丘炜萲，组织保皇会，并通过《天南新报》做宣传，影响了不少华侨。同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逃亡新加坡，该地开始有了革命党人的足迹。1901年以后，尤列的中和堂在下层农工两界中做过一些工作，但基本上不脱旧式会党的规模。直到1903年，革命浪潮才逐渐冲击到了这里。华侨木厂主陈楚楠和布店老板张永福读了《革命军》和《苏报》，受到教育。二人为被捕的章炳麟、邹容担忧，曾联合打电报给英国驻沪领事，请他援引保护国事犯的条例，勿将章、邹引渡给清政府。此后，二人就到处宣传革命，并通过尤列聘请《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为编辑，出资创办《图南日报》。1904年春，报纸出版，在新加坡地区喊出了革命排满的第一声。乙巳（1905）春节，报社印发一种有反满词句和革命图案的月份牌，孙中山见到后非常高兴，写信向尤列查询，表示希望合作[109]。

1905年6月，孙中山从欧洲赴日本，途经新加坡，尤列引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登舟相见。孙中山告知他们：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后，将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110]。

1906年2月，孙中山自西贡重到新加坡。由于殖民当局于1900年规定的五年不准入境的限期已过，陈楚楠等遂欢迎孙中山登陆。4月，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111]。首次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尤列、邓子瑜、张华丹、吴悟叟、林干廷、张秉庚等十二人。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以晚晴园为会所。孙中山满怀激情地鼓励加盟者英勇奋斗，“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112]。其后，陆续加盟者达四百余人，并曾派员分赴英荷两属及缅甸各地设立分会。

同年6月，孙中山离日本再到新加坡，命胡汉民起草会章，扩充

组织，改选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1907年8月，创办《中兴日报》。

新加坡分会是同盟会在南洋的活动基地，也是和改良派斗争的前哨之一。

3．槟榔屿分会与马来亚各地的同盟会组织。

槟榔屿又名庇能，是马来亚的著名商埠和采锡工业中心。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后，孙中山即偕陈楚楠、林义顺、李竹痴等到达该地，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先后加盟者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陈民情等。在有材料可考的三十五人中，计店主二十八人、店员二人、医生三人、学生一人[113]。会长吴世荣是店主。副会长黄金庆是矿商。

槟榔屿分会设有槟城书报社。1910年，缅甸分会主办的《光华日报》在当地不能立足，移至槟榔屿，成为革命派在南洋的又一重要宣传阵地。

马来亚半岛建立同盟会分会机构的城市尚有：

吉隆坡，加盟者有王清江、陈占梅、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等，以王清江为会长。

怡保，加盟者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郑螺生等。

芙蓉，加盟者有黄心持等。

瓜𦉢卑那，加盟者有邓泽如等。

此外，金宝、林明、太平、式叻、麻坡、砂𦉢越、麻六甲、关丹等地也都陆续建立了同盟会通讯处或书报社。其中，书报社达百数十处[114]。

4．荷属各地分会。

革命派对荷属各埠华侨的工作开始于教育界。1903年，当地某校向日本早稻田大学要求介绍教员，该校推荐了董鸿祎。董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他又介绍了王嘉榘等一批革命分子。1905年—1906年间，陈楚楠通过冯自由，又介绍了易本羲、张继、李燮和、时功璧、田桐、陈方度等二十余人赴各埠任教。他们在当地宣传革命，为同盟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06年—1907年期间，同盟会本部委派谢良牧、李燮和、李天邻、陈方度、曾连庆、梁墨庵等人在各地建立分会。为了避免荷兰殖民者干涉，多以书报社或学堂的名义作掩护。先后建立同盟会组织的有泗水、巴城、八打咸甲、文岛、槟港、双溪烈、勿里洋、勿里洞吗吃、武陵、流石、日里棉兰、坤甸、三宝垄等地[(115)]。

5．河内、海防分会。

孙中山与河内华侨的联系始于1902年。当时，他应安南总督韬美的邀请，参观河内博览会，曾在该地停留数月。首先结识粤籍洋服商人黄隆生。黄平时喜读《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孙中山通过他又结识杨寿彭、甄吉庭、吴梓生等一批华侨，随即组织河内兴中会。

1907年3月，为了就近领导粤、桂、滇三省的起义活动，孙中山自日本到达河内，在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机关部，同时将原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先后加盟者有杨寿彭、黄隆生、吴梓生、张奂池等数百人[(116)]。

海防是华侨在安南的另一个集中地区。1905年反美运动中，由某商号账房陈耿夫发起，组织拒约会，支援国内人民斗争。侨商刘岐山、甄璧、林焕廷等纷纷参加，办事处设于台湾街万新楼。1907年，在同址成立同盟会海防分会，刘岐山任会长，甄璧、林焕廷、陈耿夫

任干事。

河内、海防地处北越，与广东钦州地区邻近，在1907、1908两年的武装起义中，它们成为同盟会的集结地与补给站。刘岐山招待往来同志，异常周到，被称为“小孟尝”。其他侨商会员或筹措经费，或参加义师，或输送武器，或接济粮食，曾有十余人被法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11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中，越南华侨即达十五人(117)。

6．暹罗分会。

最早在暹罗华侨中宣传革命的是《华暹日报》，该报由华侨萧佛成和逃亡清吏陈景华创办。1908年，新加坡陈载之在暹罗开设德记栈，与萧佛成创立中华会所，邀请孙中山前来主盟。1908年11月，孙中山偕胡汉民到达曼谷，发展萧佛成、陈载之、陈景华等二十余人加入同盟会。孙中山离暹后，盟务交萧佛成主持。

7．缅甸分会。

革命党人对缅甸华侨的工作开展得较晚。1905年6月，秦力山因李竹痴介绍，抵达仰光，以自身体验劝说保皇会会长、侨商庄银安参加革命。庄豁然醒悟，宣布和保皇会脱离关系。随后，秦力山在《仰光新报》上发表长达六万余字的《革命箴言》，风动一时。1906年秋，《仰光新报》为顽固派掌握。8月，庄银安等别创《商务调查会月报》，在“振兴实业”的名义下“发挥民族主义”，但影响不大。同年11月，秦力山在云南干崖病逝，缅甸的革命活动失去指导者，陷于停顿。

1908年4月，四川人王群携带同盟会本部委任证书自日本到缅，瑞隆公司股东徐赞周、陈仲赫、陈钟灵等十余人加盟。不久，于仰光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8月21日，得到当地华侨富商陈玉著等人的资助，出版《光华报》，以孙中山推荐的杨振鸿、居正二人为主笔。报

纸出版后，会务大振，会员由三十余人迅速增至四百余人。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吴应培二人到缅，改订分会章程。同年12月13日，选举庄银安为会长，卢喜福为副。其后，又派居正、陈仲赫二人赴缅甸各地发展会务，在二十五个城市的华侨中建立了分会，至1911年止，共发展会员二千二百四十三人[(118)]。

8．南洋支部。

河口起义失败后，胡汉民移居新加坡。当时，南洋各埠纷纷成立同盟会分会或通讯处。为了加强联系，统一领导，孙中山于1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规定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以胡汉民为支部长。1909年5月，孙中山起程赴欧。行前，派胡汉民赴香港就近领导国内运动。南洋支部迁至槟榔屿，交邓泽如、吴世荣主持。

邓、吴主持南洋支部后，工作长期陷于停顿。1910年7月，孙中山自檀香山经日本，重到南洋，支部的工作才逐渐恢复旧观。

9．菲律宾分会。

抵制美货运动中，马尼拉侨商欧阳鸿钧与留日学生杨豪侣组织拒约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借拒约鼓吹革命。1911年春，南方支部派李箕到马尼拉，欧阳鸿钧等六人加盟，以郑汉淇为会长。不久，发刊《公理日报》。

欧洲地区：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留欧学界得到孙中山通告，先后设立同盟会通讯处。计有：

法国巴黎通讯处：魏宸组、胡秉柯、王鸿猷。

比国布鲁塞尔通讯处：史青、贺之才。

德国柏林通讯处：朱和中、宾步程、冯承钧。

比国列日城通讯处：孔伟虎、刘文贞。

英国伦敦通讯处：曹亚伯、吴稚晖、杨笃生。

瑞士洛桑通讯处：李仲南。

其中，布鲁塞尔组织了执行小组，由胡秉柯、史青、贺之才等九人负责执行会务[119]。由于当时留欧学生中，有部分人反对“平均地权”这一纲领，也有人反对书写誓词，因此贺之才、史青另组公民党，宗旨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三项，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凡入会者，须先入公民党，经过一段训练，才转为同盟会员[120]。

欧洲中国留学生不多，华侨也少，因此，同盟会的组织始终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美洲地区：

1．美洲同盟总会。

同盟会本部曾多次准备派人去美国建立组织，因受移民律限制，领不到入境护照而止。1907年冬，出生于美国的同盟会员李是男自香港返回旧金山，冯自由便将发展会务的责任交给了他。1909年夏秋间，李是男联络温雄飞等组织少年学社，出版《美洲少年》，但社员人数不多，规模很小。直到这年11月，孙中山自伦敦到达美国，才逐渐打开局面。12月25日，孙中山在纽约召集热心革命的侨商集议，成立同盟会纽约分会，加盟者赵公璧等七人。1910年1月21日，孙中山由纽约赴旧金山，途经芝加哥时，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会后，热心革命的华侨环坐请教，随即成立芝加哥分会。加盟者十二人，推萧雨滋、梅乔林为会长。2月10日，抵旧金山，16日，改组少年学社为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加盟者十五人，推刘成禺、黄魂苏、李

是男为会长。宣誓时，孙中山将原来的十六字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等十八字，“中国同盟会会员”则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这是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后的一次改革尝试，以后曾通知南洋支部照行。3月，鉴于美国西部葛仑、屋仑、洛杉矶等城市相继建立分会，因此孙中山于旧金山成立美洲同盟总会。8月18日，出版《少年中国晨报》。

1911年1月，孙中山再到美国。6月，在旧金山建议美洲同盟总会与致公堂联合。经多次会商，双方于6月18日发表联合布告。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这一措施扩大了同盟会的社会基础，大大加速了筹饷的进程。

2．加拿大支部。

加拿大是保皇会的策源地。1899年至1909年十年间，改良主义在加拿大华侨中占有绝对优势。维多利亚虽有吴子垣等七八个年轻人组织击楫社，提倡革命排满，但影响不大。1907年，康有为弟子崔通约主编《华英日报》，因事与保皇会发生讼案，转而鼓吹革命，不久亦因经费不足停刊。1909年冬，温哥华致公堂大佬陈文锡等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创办《大汉日报》，邀冯自由任主笔。1910年6月，冯自由抵埠就任，使报纸面目一新。但加拿大洪门势力深厚，为避免疑忌，冯自由没有公开组织同盟会。1911年2月，孙中山自旧金山抵达温哥华，展开募捐活动，“连日在致公堂及戏院演说，听者二三千人，虽大雨淋漓，亦极踊跃”[121]。会后，组织洪门筹饷局。3月，孙中山离加赴美，冯自由着手组织同盟会。温哥华加盟者百数十人，维多利亚加盟者数十人。5月，召开成立会，以冯自由为支部长。9月中旬，冯自由赴美，以黄希纯继。

檀香山地区：

1．檀香山分会。

1904年孙中山离檀香山后，中华革命军很少活动。1907年卢信到檀香山创办《自由新报》，会务仍然没有进展。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自旧金山抵檀香山。4月4日，在戏院发表演说。引广州新军起义为证，说明全国军人多已趋向革命，如军饷充足，可以随时大举。到会二千余人，情绪热烈。当晚，在《自由新报》楼上召集会议，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按在旧金山改订的誓词宣誓，加盟者二十余人。公推梁海为会长，曾长福为司库，卢信为书记。此后，每晚邀请百余人，“到者皆乐于联盟”[(122)]。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简化手续，将亲笔书写盟书的规定改为印表填写。鉴于清政府驻檀香山领事曾移文粤督，查抄兴中会会员家产，因此，在侨商中另设同盟会秘密团。

2．茂宜及希炉两岛分会。

成立于檀香山正埠分会之后，由原兴中会改组而成。

此外，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也建有分会。1908年，华侨吕杰因阅读《中国日报》，致书报社，要求参加同盟会。经冯自由特许，以通讯方式加盟。其后，发展会员十余人。

比起国内组织来，同盟会的国外组织要稳固得多。在以后的历次起义中，它们提供了大量经费，南洋地区并有不少会员归国参加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国内斗争。

---

(1)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2)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76页。

(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5

页。

(4) 《警钟日报》，1904年7月8日。

(5) 《补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

(6) 《补习所章程》。

(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4页。

(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湖北省博物馆藏。

(9)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10) 《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1日。

(11)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16页。

(12) 《论大同平等之说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警钟日报》，1904年11月6日。

(13) 田桐：《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1945年11月。

(14)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28页。

(15)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6) 《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0日。

(17) 《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0日。

(18)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

(19)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6页。

(20)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第64页。

(21) 《警钟日报》，1904年7月2日。

(22) 贺之才：《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第385页。

(23)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原载《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日本平凡社出版），魏育邻译。

(24) 《宋教仁日记》，第90页。

(25) 孙中山：《中国应建设共和国》。

(26) 陈天华：《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

(27) 《宫崎寅藏谈孙中山》。

(28)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6页。

(29) 《致陈楚楠函》，1905年9月30日，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26页。

(30)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4页。

(31) 《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0页。

(32) 《非学问无以建设》，黄编：《总理全集·演讲·庚》，第1页。

(33) 《中国革命史》，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5页。

(34) 《上李鸿章书》，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0页。

(3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6页。

(36) 《戊戌见犬养毅与宫崎寅藏之谈话》，黄编：《总理全集·谈话》，第1页。

(37)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文本，第90—91页。

(38) 《驳保皇报》，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120—124页。

(39)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转引自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151页。

(40) 《驳保皇报》，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120—124页。

(41) 《民权初步自序》，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三》，第1页。

(42) 《支那保全分割合沦》，《江苏》第6期，1903年11月。

(43)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3页。

(4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3页。

(45)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11月。

(4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3页。

(47) 章炳麟：《訄书·定版籍》。

(48) 遯公（秦力山）：《〈上海之黑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49) 《土地复权同志会意见书》。

(50) 《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51)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1号，1948年1月。

(52) 《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黄编：《总理全集·演讲·甲》，第1—8页。本节内下凡引自该文者，皆不再注明。

(53) 《中国革命史》，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6页。

(54) 《孙总理》，《逸史》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

(55)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56) 《军政府宣言》，黄编：《总理全集·方略》，第1页。

(57) 《军政府宣言》，黄编：《总理全集·方略》，第1页。

(58)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59) 《军政府宣言》，黄编：《总理全集·方略》，第1页。

(60)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61)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62)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600页。

(63)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

(64)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

(65)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江苏》第6期。

(66)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67)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6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31页。

(69)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7页。

(70)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7页。

(71)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72) 《同盟会之回顾》，《民立报》，1912年9月29日。

(73)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84页。

(74) 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梁烈亚：《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75)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76) 曾树栋：《同盟会在梧州的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77) 《报告第二百六号》，《宗方小太郎文书》，昭和五十年版，第184页；参见《死绝会宣言》，《云南杂志选辑》，第355页。

(78) 与“联合会”并峙的还有“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当时，孙中山担心同盟会员大批归国，有可能被清政府一网打尽，打电报给汪精卫，要他出面劝阻。12月24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随后，浙江同乡会评议会议决复学。1906年初，程家柽发起组织学界调停会，两派获得协议，“联合会”解散，电告返国学生回日上课。

(79) 《复报社广告》，《民报》第7号。

(80) 《神州日报》，1907年8月2日。

(81) 《吴烈士旸谷革命事略》。

(82) 《淮上军革命实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17页。

(83) 《浙江同盟会分会募款简章》，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

(84) 顾乃斌：《浙江革命记》第三章。

(85) 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1册，第188页。

(86) 冯自由：《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84页。

(87) 《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第119页。

(88) 刘谦：《宁调元革命纪略》，《南社湘集》第6期。

(89) 《醴陵文斐革命事略》，《革命人物志》第2集，第52页。

(90) 《余诚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39页。

(91) 《余诚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21页。

(92) 张难先：《知之录征料来鸿集》，抄件。

(93) 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28页。

(94) 蔡突灵：《同盟会江西支部史略》，《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2册，第193页。

(95) 冯自由：《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81—284页。

(96) 林启一（冰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成立及四川分会之发轫》，手稿，四川文史馆藏。

(97) 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29页。

(98) 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一），第22—25页。

(99) 胡刚、吴雪俦：《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84、90页。

(100) 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76页。

(101) 胡刚、吴雪俦：《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84、90页。

(102) 《山东党史稿》，《革命人物志》第3集，第426页。

(103) 《钟孝先回忆录》，《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2册，第385—386页。

(104) 景定成：《罪案》，《国风日报》刊本。

(105) 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2号，第58页；参见

《山东党史稿》，《革命人物志》第3集，第426页。

(106) 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74—376页。

(107) 《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

(108) 《越南华侨志》，1958年10月版。

(109) 陈楚楠：《晚晴园与革命史略》，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版。

(110)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09页。

(111) 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陈楚楠等的入会时间为1906年4月6日，分会的成立时间当与此相近。

(112)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第10页。

(113) 据《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统计，1920年1月版。

(114)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89页。

(115)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93—94页。

(116)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51页。

(117) 《越南华侨志》，1958年10版。

(118) 冯自由：《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55页。

(119) 史青：《留比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2页。

(120) 冯自由：《留欧学界与同盟会》，《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4—135页。

(121) 孙中山：《致大埠致公总堂函》，司徒丙鹤藏。

(122) 孙中山：《在檀香山致纽约同志各函》，《总理全集·函札》第120页。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的成立是一件划时期的大事。团结在反满旗帜下的各派革命者终于有了统一的组织，有条件整齐步伐，一致号令，向着清政府冲锋陷阵了。

同盟会成立后，迅速展开了和改良派的大论战。经过论战，改良派丧失了在思想和舆论界的领导地位，必须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近代中国出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　《民报》的创办和论战的展开

经过了1903年至1904年的初次辩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冲击。但是，在海外华侨和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特别是在舆论界、思想界，改良派及其宣传工具《新民丛报》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销售量达一万四千余份之多。为了进一步廓清保皇毒焰，传播革命思想，迫切需要创办刊物，继续展开论战。

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即提议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报，得到一致赞同。不久，因第二期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日本政府禁止该刊发卖。为避免干涉，同盟会决定另办《民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表示希望通

过《民报》，使之“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在《简章》中，规定了“本杂志之主义”六条，为：颠复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要求世界列国赞助中国之革新事业等。

《民报》最初的编辑人为胡汉民，主要撰稿人有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发行人为张继，经理为陈天华。《民报》创刊不久，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进入高潮，部分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冷嘲热讽，12月7日，《朝日新闻》甚至以“放纵卑劣”四字相攻击[(1)]。8日，陈天华愤而投大森海湾自杀。死前遗书说：“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2)] 陈天华的性格有激情奔放的一面，也有其脆弱而不耐磨炼的一面，跳海之举正是这两方面性格交织的表现。他的死使《民报》丧失了一个出色的宣传家。

1906年6月，同盟会派龚炼百、时功玖等迎章炳麟出狱东渡。7月7日，经孙毓筠介绍，由孙中山主盟，章炳麟加入同盟会[(3)]。15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欢迎。到会两千人。这天下雨，来晚了的人挤不进会场，就站在雨中。会上，章炳麟发表了长篇演说，认为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而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孔教、基督教都不可用，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杂质，必须设法改良。华严宗主张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法相宗主张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相，并非实在真有，这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又说：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

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中国人晓得了这三项，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而不可遏抑[(4)]。章炳麟是在佛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有精深研究的思想家，他力图从这两者中找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精神武器。但是，它们毕竟都太陈旧了。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造就不出勇猛无畏的革命军，而那种对“汉种历史”的笼统推崇也容易流为对封建主义的鼓吹。自第七号起，《民报》由章炳麟主编，上述观点即成为他的编辑思想，也部分地影响了革命派的文化宣传活动。当时，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一类组织纷纷建立，讲“国学”成为一种时髦。此后，章炳麟一方面发表一系列源本经史、渊雅古朴的排满文章，在士大夫阶层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发表不少阐扬佛学之作，被人讥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5)]。

《民报》一创刊就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至第四号。即销行至万份，至第七号，又销行至一万七千份。它被以各种巧妙而隐蔽的形式运向国内，散发各地。不少号一版、再版、三版仍然不能满足要求，第一号发行六版，第二、三号各发行四版，得到一本的人“如获拱璧”[(6)]。1906年12月2日，《民报》在东京召开周年纪念会，盛况空前，会场内外水泄不通。宋教仁和宫崎寅藏因为晚到，是从窗口爬进去的，宋教仁挤到主席台时，连鞋子都丢了。会议由黄兴主席，章炳麟读祝词，孙中山、章炳麟、日人池亨吉、北一辉、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先后演说。会议一直在如雷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中进行。其间，有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7)]。会后散发《民报》临时增刊《天讨》赠书券，共发出五千枚。这次会议反映出《民报》的巨大影响，也反映出东京中国留学生日益革命化的趋向。

1907年3月，胡汉民、汪精卫随孙中山离日，《民报》主要撰稿人改为刘师培、黄侃、汪东、陈去病等。同年12月，章炳麟因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脑病为理由辞职，第十九号由张继编辑。1908

年1月，张继因参加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金曜讲演会，被日警追捕，辗转逃往法国，自第二十号改由陶成章编辑。陶对理论不感兴趣，声明“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8]。至第二十三号，再归章炳麟编辑，以汤增璧为副。

1908年10月，由于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汤增璧转而鼓吹暗杀，在《民报》第二十四号上发表《革命之心理》一文，赞扬“虚无党”，“欲以陈师鞠旅，化而为潜屠暗刺，并以组合莅盟，转而为径情孤往”。适值日本政府由反动的桂太郎组阁，加紧镇压日本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又值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中美联盟赴美，道经日本，章太炎在《民报》发表《清美同盟之利病》予以抨击。于是，唐绍仪便嗾使驻日公使出面交涉，要求封禁《民报》。同月19日，日本政府以发表《革命之心理》，激扬暗杀为理由，下令禁止第二十四号《民报》发行。20日，章炳麟向警署提出诘问。次日，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退还命令书。23日、26日，又连续致书平田东助，指责日本政府的错误政策，声称，“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封禁驱逐，惟命是听”[9]。在宫崎寅藏等支持下，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延聘律师向日本法庭提出诉讼。11月22日开庭时，东京地方裁判厅门前集中了约两千名激动的中国留学生，“人声骚乱，势甚汹汹”，迫使法庭悬牌延期[10]。26日第二次开庭时，章炳麟以雄辩家的气概驳斥了日方所加的罪名。他说：“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又说：“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11] 驳得日方哑口无言，竟悍然宣布禁止出版。其后，黄兴等决定将《民报》社迁往美国，主张“中美两国之国民联合”[12]，因故未果。

1909年10月，汪精卫由南洋到日本复刊《民报》，伪称在法国巴黎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仅刊行两期。

1911年7月，南洋华侨在五十一个城市募捐，计划在槟榔屿重刊《民报》，聘宋教仁、戴季陶为编辑，因武昌起义爆发而止[13]。

《民报》与《新民丛报》是论战的主要对手，在南洋，则在《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之间展开。《总汇报》原是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报纸，1905年冬发刊，由陈楚楠、张永福主持。1906年春，转入改良派之手，改名《南洋总汇新报》。为了与之对抗，革命派于1907年8月20日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主持。这一时期，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锣鼓已经敲响，潦倒在海外的改良派感到了希望，国内新出现的立宪派更加兴致冲冲，于是，海内外呼应，共同掀起国会请愿运动。1908年6月，《总汇新报》发表《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一文，以向清政府要求召开国会为最高目的。同月，田桐向《总汇新报》发出进行“文战”的通知，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纷纷赶来参加，改良派则从美洲请来了其地位仅次于康、梁的徐勤，双方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论战。这次论战内容的许多部分和东京相同，不同点是：关于民生主义的争辩沉寂了，而“国会”、“立宪”则成为引人注意的新论题。

在其他地区展开论战，形成对垒的报纸为：

《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檀香山）

《华暹新报》与《启南新报》（曼谷）

《光华报》与《商务报》（仰光）

《大汉日报》与《日新报》（温哥华）

《美洲少年报》与《世界报》（旧金山）

上述地区论战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东京和南洋。据有关记载，由1907年至1911年的四五年内，檀香山的《自由新报》几乎无日不与《新中国报》展开辩论，往往因报上一字一句之微涉讼法庭；《大汉

日报》和《日新报》之间的驳论竟发展至二百余续，形成马拉松式的笔战。

论战主要环绕着三民主义进行。《民报》期间，孙中山曾口授而由汪精卫执笔写成《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中兴日报》期间，孙中山又亲自撰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三篇文章。他领导了对改良派的论战，取得了胜利，是这一斗争的旗帜。

二　论战的基本内容

《民报》于出版第三号后曾发行号外，列述《〈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共十二条，声明自第四号以下，分类辩驳。实际论战内容与《纲领》相近，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关于所谓“种族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否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康有为狂热地歌颂清朝统治者的“功德”，称颂康熙的“薄税”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14)]。梁启超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15)]。他要革命派“多从政治上立论，而少从种族上立论”[(16)]。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问道：“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17)] 他一再声称，汉人满人都有好有坏，例如对“立宪”，汉人有赞成的，作梗的，满人也有赞成的，作梗的，赞成、作梗，都与种族毫无关系。又说：满洲是中国国土，不是异国；满族二百多年来早已同化于汉人，满清入关是中国统治者的更迭，是爱新觉罗氏取代了朱氏，建州卫人取代了安徽人，不是中国的灭亡。梁启超批评革命派的排满论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愚不可及！

梁启超主张“多从政治上立论”，他所提出的某些具体论点也并不

错，如满洲是中国国土，满清入关只是中国统治者的更迭等，都是正确的，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满洲政府明明是我“四万万人之政府”[18]，不应该推翻，只应该监督改良。什么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呢？据说：那是“个人主义”——当大局之利害与己身之利害相反时，宁牺牲大局而顾自身的“个人主义”。他说：“夫此次为改革之梗者，固不独铁（良）、荣（庆）二人矣，即汉员之大僚，亦居大多数焉。若彼者，宁得谓其认改革为利满不利汉而因以梗之耶？毋亦认改革为不利于己一身之富贵权力而因以梗之耳。质而言之，则个人主义者，今日中国膏肓之病也。”梁启超号召人们，以“此病为国之大敌，合全力以征讨之”！[19] 在这里，不仅满洲贵族被梁启超开脱了，汉族官僚也被开脱了，所不能开脱的只是满、汉人人有份的一种思想上的病症。

改良派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欢呼。梁启超吹捧光绪皇帝说：“天相中国，诞牖我德宗景皇帝，滂沛德音，布立宪之政，以垂诸无穷。”在他看来，清朝统治者做到了这一步，就克服了任何种族或阶级的偏私，“若夫公天下之盛心，与夫规模措施之宏远，则未闻有圣圣相继如今日者也”[20]。徐佛苏保证，只要有了一部宪法，满汉之间的不平等事实，都可以根据法律条文“消化”掉[21]。《总汇新报》也连连许愿，立宪之后，就满汉平等，不会有什么“种族之嫌贰”了[22]。

与改良派相反，革命派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清政府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他们说：二百六十年来的政治是不平等的贵族政治，满清政府对汉族的压制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不至。“虐我则仇”，既然“满洲之对于汉民也，无一而非虐，则汉民之对满洲也，亦无一而非仇”[23]。

革命派又揭露了清政府的媚外卖国政策，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洋人”所订大小条约，“无一非损己以益人者”，“大者为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则为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使吾国

民触处伤心，穷于无告”。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他们表示，必须坚决推翻“蔑弃我国家权利之异族专制政府”[24]，“满洲去，则中国强”[25]。

革命派还揭露了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骗局，他们指出：满洲贵族的排汉宗旨并未略改，只不过出现了两派：强悍派主张专门练兵以镇压汉人，如铁良；阴柔派主张变更政体以愚弄汉人，如端方。“预备立宪”的一整套做法是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阳收汉人之虚望，阴殖满人之实权”[26]，目的在“冀保觉罗氏须臾之残祚”[27]。

当时，革命派中确有不少人具有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复仇情绪，他们自视为“神明之胄”，谩骂满族为“贱种”[28]，宣扬满洲在“前明时代于中国为敌国”[29]，甚至否认满族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念念不忘满洲贵族入关时在扬州等地实行的大屠杀，认为满汉之间“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30]，仇满是汉人的天职。和上述思想不同，革命派中也有人指出，“种族革命”并不是要杀光满族五百万人，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握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31]。他们提出“仇一姓不仇一族”的理论，认为在满族中“据隆崇之地位，握高尚之特权”者是少数。汉族的敌人只是满族中的爱新觉罗一姓，广大满族人民在革命胜利后会愉快地“与我汉族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32]，对其贫穷无告者，还要为之谋求生活的保障。这些言论，正确地区分了满洲贵族和一般成员，体现了民族团结的精神。

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关于所谓“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认为，中国万不能建立共和政体。理由是：国家是平衡正义、调和利害冲突的团体。若在君主国，君主超然于人民利害之外，所以能调和人民的利害冲突。若在共和国，人民之上没有超然于利害关系以外的人，因此，除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富于自治性质，可以采取这一制度外，长期处于专政体下的人民一旦采取这种制度，必然导

致“下等社会”猖獗，各持“个人主义”以营其私，形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最后，人民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专制制度因而复活。梁启超把这种情况叫做“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33]。

梁启超的这一套理论并非出于自创，而是对德国波伦哈克思想的鹦鹉学舌。波伦哈克是19世纪末年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写过一本《国家论》，狂热地鼓吹君主立宪。1903年，该书由日本早稻大学译出，梁启超如获至宝，认为它壁垒森严、佐证确凿，纵有苏秦、张仪之舌而不能难[34]，立即以之作为和革命派论战的思想武器。

革命派认为，在进行“种族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这就是彻底改造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府，建立实行民权立宪制度的共和政体。他们认为这种政体没有等差，没有阶级，人人平等，“最美、最宜”[35]。建立了它，国家就“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36]！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不是什么“平衡正义，调和利害冲突”的团体，关于这一点，革命派并未能揭穿波伦哈克——梁启超理论的虚伪，相反，倒是跟着跑的。革命派说，共和国以国民为最高机关，但是，在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里，国民并不自行统治权，而是以议会为代表机关实行统治权，议会就是最高机关，因此，可以“调和人民之利益冲突”[37]。

梁启超说：共和立宪制的根本精神是卢梭的“国民总意”说。只有一切立法，行政都原本于全体国民的总意，才能叫纯粹共和。他认为，在实行代议制度的国家里，代议士的意见与代议士选举者之间的意见常常不同。小国可以实行全民的直接投票，大国则不可能；即使实行直接投票，又会出现威逼、愚弄等舞弊现象。而且，国民意见不可能没有歧异，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叫“总意”，他的结论是“国民总意”说根本不能实现，最多只能实现“国民多数”说。但是，他又表示，多数之所在，不一定是国利民福之所在。例如，让数百个儿童按

自由意志投票，是好游戏，还是好学习，结果必然是好游戏的占大多数[38]。

革命派说：卢梭的“国民总意”说对共和立宪有影响，但共和立宪并非全以“国民总意”说为根本精神。如北美合众国诸州的权利章典，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1791年的宪法等，都是如此。革命派指出，卢梭的理论分纯理和实用两方面。从纯理方面说，国民全部直接行使主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从实际方面看，则只能实行代议制度，国民通过代议士行使其权利，革命派表示，选举过程中会产生种种舞弊现象，但这是可以采取措施加以防止的，不能因此就废除选举制度[39]。

资产阶级议会一般具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组织与工作等权力，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可以有效地反映资产阶级各个阶层、派别、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它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它毕竟是在“全民”或“国民”的“民主”旗帜掩盖下的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说来，还是一种欺骗。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议会会成为“国民思想的反映”[40]。

梁启超又说：共和立宪制的统治形式必然采取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但是，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结果不仅“机关倾轧而缺调和”，“施政牵制而欠圆活”，而且，对于新造之国说来，还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危险，使国家没有最高主权。他说：“凡一国家，必有其最高主权，最高主权者，唯一而不可分者也。今三权既分矣，所谓最高主权者，三机关靡一焉得占之。然则竟无最高主权乎？苟无之，斯不成国矣！”[41]

革命派说：如果国家权力总握于唯一机关，专断一切，必然造成为善为恶都无限制的情况，国家秩序、国民自由都没有保证，因此，必须如孟德斯鸠所鼓吹的那样，实行三权分立主义，使国家权力分寓

于三机关。它们互相独立于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而不立于他机关的命令之下。这是摧毁专制政体而为立宪制度必不可无的精神。革命派表示：孟氏之说并非完全无缺。国家的机能复杂相连，所谓分立，不是纯然没有关系，各自孤立，而是不相抵触，各自独立。这样做，对于国家的统一，决无所损[42]。

三权分立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分工在国家机构上的运用。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目的在于防止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关。比起封建专制政体来，它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它也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普遍的“国民自由”的维护者。

根据波伦哈克思想，梁启超宣扬民族自卑观念，大肆诬蔑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不是顽固的老辈，就是一知半解的新进，“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43]，要想追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难矣哉！结论是：中国国民没有实行议院政治的能力，中国政治不能采用共和立宪制。不仅如此，他甚至表示，当时中国人民连实行君主立宪的程度也没有，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即赋予一个拿破仑式的“开明”圣君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辅以管子、商君或俾斯麦、加富尔式的贤相，用专断的方式规定国家机关的行动。他说：“专制而为开明，开明而能专制，则其国家机关之行动，极自由，极迅速，而影响于国利民福者极大。”[44]

革命派坚决驳斥了梁启超的民族自卑观念。他们指出：中国民族的聪明才智不比其他民族差，中国人很早就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虽然由于历代暴君污吏的压制，中国民族的能力受到限制，但潜在力量仍然存在，短期内即可恢复。革命派以日本为例说明：日本以四十年的经营，一跃而为头等强国，中国土地、人民十倍于日本，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革命派反问道：如果谈能力，难道（满洲）政府的能力优于国民

吗？今日的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今日的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廉耻丧尽。这些至不才、至无耻的人，你们希望他们做拿破伦、加富尔式的圣君贤相；相反，对于全国之人，一概目为顽固老辈、幼稚新进，认为不足以言共和，只宜受专制，“何重视政府，轻视国民，至于如此也”？革命派指出：改良派的主张貌似持重，实际上是在打击中国人民的进取心。他们鲜明地表示：“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45]

改良派敌视人民，反对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认为“家无担石，目不识丁”的“贫民”，不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向革命派问道：你们是准备实行普通选举呢，还是制限选举呢？在改良派看来，如果穷光蛋、大老粗们进了议会或政府，就“不知议会果复成何议会而政府果复成何政府也”[46]？

革命派直爽地回答：当然是实行普通选举。他们说：“各国制限选举之法虽不同，要以财产之制限为主；而普通选举之特色，即在于不以财产资格为选举之要件。”[47] 他们反问改良派道：“试问贫无担石储者，何以无为议员之资格乎？议员一用贫民羼入，则秩序立乱乎？犹是横目两足，犹是耳聪目明，独以缺此区区阿堵故，不得有此权利，吾不知其何理也？”[48] 革命派当时正处在上升阶段，感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准备给人民以民主权利。

对人民的不同态度衍化出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革命派总结道：“《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以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49]

改良派的最高要求是君主立宪。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立即收了起来，改良派开始酝酿请开国会的运动。他们说：欲谋政体之改革，不可不从根本上着手。“吾人所宜奔走呼号，与吾国民相将致力者，惟在开设国会而已”[50]。他们声称：国会为富强之基础，治安之本原，“国会立，则宪政可成，

宪政成则百废具举”，就可以“转弱为强，由贫致富，拨乱反治，举危措安”了[51]。

革命派认为，国会和富强没有必然联系：“一国之国民，有实力则强，无实力则弱，非与于国会之有无也。”他们举例说：俄罗斯在未开国会之前就是强国，开了国会之后并没有更强；意大利、西班牙原来也是强国，开了国会之后，却日渐陵夷[52]。革命派认为：真正的立宪政体必须“以民权为母”，“由国民大革命而得之”。民权进则君权退。宪法发达，宪政成立，都是民权战胜的结果。如果人民“无毫末之实力”，“万事出于钦定”，那末，“专制之毒，又何能改”[53]？当改良派被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暖风”吹晕糊了的时候，革命派是清醒的。他们懂得，如果没有“民权”作基础，一切宪法、宪政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革命派比较了国会在民主立宪国和君主立宪国中的不同地位。他们说：“在民主立宪国，则其宪法对于国会宽，故国会之势力能得政治上之活动；在君主立宪国，对于国会刻，故国会之势力难得政治上之活动。”[54] 他们豪迈地宣称，要扫除中国四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实行民主立宪，“不惟革其政体，并革其国体（即由君主国体变为民主国体）”，“是诚可谓革数千年之命也”[55]。这里，革命派所讲的国体、政体都还是政权的构成形式，并未接触到统治谁和由谁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们意识到要“革数千年之命”，这是一种对本阶级历史使命的自觉。

还在《民报》创办初期，革命派就宣布，处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创设新政体，“必思涤除专制惟恐不尽”[56]。要求民主立宪，反对任何一点君主专制的余毒，这正是列宁所称颂的“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封建要求有其软弱和不彻底的方面，但又有其可贵的、值得称道的一面，虽然它以后的实践远远未能做到。

三、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关于所谓“社会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必实行“社会革命”。梁启超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欧美不同。欧美贫富悬隔，已经陷于不能不革命的穷境，中国则中产之家多，特别豪富之家少，自古以来就没有贵族制度，行平均相续法，赋税极轻，因此，只须实行社会改良主义，“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57]。

革命派说：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58]。19世纪以来，欧美君主专制虽除，但贫富两极分化，富者资产骤增，贫者日填沟壑，出现了富豪的“无形专制”[59]。他们认为，中国虽然不像欧美那样贫富悬隔，但贫富之分仍然存在，埋藏着第二次革命的伏线，绝不能使吾民受资本家之惨害，绝不能使大多数人民蜷伏于少数资本家羁制之下，因此，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朱执信说：“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60]

改良派又认为中国不可实行社会革命。梁启超以热烈的语言赞颂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认为他们“结合自然、资本、劳力之三生产要素”，“冒险以求利润”，是“国民经济之中坚”[61]。他忧心忡忡地说：中国如果没有大资本家出现，外国的资本家就要侵入我国市场，使我无以自存。他指责革命派道：你们倡导社会革命，“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将来有人煽惑劳动者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庸率，否则同盟罢工，这样闹下去，中国的资本家只能“倒毙”、完蛋，怎么得了！因之，他主张，必须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他坚决反对外资输入，声言“吾之经济政策，以奖励、保护资本家并力外竞为主，而其余为辅”，即使在作始数年间，须要“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也在所不辞[62]。

革命派认为改良派的忧心全无必要。他们主张不必奖励资本家，尤其不必希望中国有绝大资本家出现。革命派斥责资本主义的托辣斯为中国未来之大毒物，反对国民经济命脉“为一二私人所垄断”[63]，

要求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使邮政、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诸事业均归国家所有，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革命派认为，在中国国家成为大资本家的情况下，外资输入“有利无损”，可补我国资本之不足，并使我国资本增殖。革命派表示，不能置“他部分人之利益”于不顾，必须郑重研究社会产品的“分配问题”，避免欧美贫富阶级悬绝不平，劳动者如在地狱的情况[64]。

改良派还认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革命。梁启超说：要实行社会革命，必须“体段圆满”，否则不能收到功效，而要“体段圆满”，就必须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一切生产事业都由国家独占，国民皆为劳动者，分配极均。但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许多麻烦：“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将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等等。他说：这些问题欧美学者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当然更谈不上。如果政府将全国人的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都统统包下来，“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这样的政府能够适于存在吗？可以保证不会滥用职权，不“专制以为民病”吗？[65]梁启超是狡猾的，他把革命派的社会革命论导向了“体段圆满”的极端化的错路，但是，他又是细致的，确实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革命派回答道：我们并不要求绝对的圆满，而只要求相对的圆满，即土地国有、大资本国有，对于某些“可竞争的事业”，则听任私人经营，“不为过度之干涉”，因而，不会发生“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绝”、“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等问题[66]。

在当时，革命派把土地问题看作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尖锐地抨击地主阶级，指出其“为害社会”，“使贫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是“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67]。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问题，必先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按“定价收买”的方法，实行“土地国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废除土地买卖，使国家成为唯一的地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国家租用土地[68]。这里，革命派坚决摒弃了小生产者

的绝对平均主义，特别声明，他们所说的平等是“心理”上的平等，而不是“数理”上的平等。“国内人人皆为租地者”，在这个意义上，大家一律平等。但是，租用的土地面积却允许有差异，“用机者，得租可以用机之地；能耕者，得租可以躬耕之地”[69]。你能租多少，就租给你多少；谁出的租价最高就租给谁。他们说：“数理的者，以十人而分百，则人各得一十，无有多寡参差之不齐也；心理的者，以人各起于平等之地位，而其所付与，则各视其材力聪明者也。”[70] 革命派设想，国家向土地租用者征收地租，然后用这笔收入经营各项事业，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使地主强权“绝迹于支那”[71]，保证“劳动者有田可耕”[72]，又可以保证社会财富聚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中国就不会陷于欧美今日的困境了。

“定价收买”触及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它使革命派的“土地国有”方针具体化了，较之“划定地价”、“涨价归公”等政策说来，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收买土地需要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呢？如果完全废除土地买卖，“涨价归公”又从何说起呢？因此，朱执信又设想，在划定地价的开始阶段，可以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以原价归卖主，增价归国家，然后国家逐渐用公债券或增价收买土地，在事实上实现国家的土地所有权[73]。

单纯解决土地问题并不能消除社会问题的根源。对此，梁启超曾经大体正确地指出：“夫欧美现社会所以机陘不可终日者，曰惟资本家专横故，使徒解决土地问题而不解决资本问题，则其有以愈于今日之现象者几何也？”[74] 革命派以为一实行“土地国有”，伊甸式的乐园就会出现在尘世，未免过于天真了。他们并不了解，按他们所设想的“土地国有”那一套做起来，恰好最便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所说的“心理”上的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面前的平等。

在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上，梁启超虽然比革命派老练，但是，他却既不愿意解决“资本”问题，也不愿意解决土地问题。梁启超声言：私有制度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如果将“所有权”这一观念除去，

必将消减人类的“勤勉赴功之心”，大不利于国民经济[75]，他猛烈地攻击革命派的“土地国有”政策，指责其为“掠夺”[76]，骂革命派提出这一政策是为了博得一般下等社会的同情，冀赌徒、光棍、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为我用。梁启超说：这样就要煽动赤眉、黄巾，“屠上流社会之族，赭上流社会之室”[77]。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中，他曾列举三十九条理由，以证明革命派的主义不能成立。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他又痛心疾首地表示，即使把匕首插在他胸膛上，也要大声疾呼：“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78] 梁启超的言论表明，改良派既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力图维护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

革命派为土地单税法的虚幻美景所陶醉，认为实行之后，国家立刻可以获得巨额财源，足够国家各方面的经费开支。他们不了解，近代城市地价或地租的飞速上涨是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而广大农村地价或地租的变动则是极其缓慢的。因此，改良派对土地单税法嗤之以鼻。梁启超举英国田租不敷国用为例，说明中国的地租也决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他认为，土地单税法决非租税制度之良策。

革命派中有些人是“主观社会主义者”。他们虽然如梁启超所批评的那样，并不懂得“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但却企图在民主革命中解决社会问题，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生活状态的关心和同情，反映出西方和日本正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正在上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这一点，在朱执信身上尤为明显。他曾写作《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按计划，他还准备介绍拉萨尔和必卑尔（倍倍尔），但未能实现。他称颂马克思的“资本基于掠夺”的思想：“至于近今，则资本家益恣肆，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巨万”，“虽欲不谓之掠夺盗贼，乌可得哉！”[79] 他并粗浅地了解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

别，在回答梁启超的质难时曾说："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论者独未之知耳。"[80] 他认为"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动力是"细民"，对象是"豪右"[81]。

改良派则对社会主义运动持反对态度。梁启超表示："麦喀、比比尔辈"所倡导的"社会革命主义"必不可行，即行，也一定在千数百年之后[82]。他攻击《民报》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是"一二野心家，思假为煽动之具"[83]，表现出敌视劳动人民利益的立场。

四、关于革命利弊问题的论战。

革命派认为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改良派则认为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必然要导致亡国；只有请愿、要求、劝告才是正当的手段。

改良派说：民气如火，善用之可以克敌，不善用之可以自焚，一暴动起来，不管发动者如何文明，各地难免没有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列强就会以之为借口，假定乱之名，行瓜分之实。

革命派说：这完全是杞人之忧。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列强是有借口的，但是并没有实行瓜分。其原因在于列强之间形成了一种"均势"，"互相牵制而莫或敢先发"，正如投骨于地，众犬相争一样，"其究必至于相嗥相扑而反置所争之骨于不顾"[84]。

革命派又说：倘若革命像义和团那样"高揭扶清灭洋之帜"[85]，搞"野蛮排外"、"不正当之排外"，使用"国际法"所不许可的手段[86]，那列强是会干涉的；但是，如果革命仅限于单纯的国内问题，排满而不排外，或者是一种"正当之排外"[87]，与各国政策无妨，于外人物业无扰，"又善守国际法"[88]，那么，列强是会保持局外中立的。他们甚至表示，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都可以根据国际法承担下来；革命"以维持世界平和为义务"，黜专制、申民权是

各国通则，列强怎么会干涉呢[89]？

改良派是软骨头，他们被帝国主义的武力吓住了。康有为说：法国1789年革命时，欧洲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白人纷纷，虎视逐逐”，“兵舰炮队，皆经百练”，中国人怎么可能打得赢帝国主义呢？其结果必然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使有人幸存，也要成为白人的奴隶牛马，“此则吾国革命后之效果矣，然则呶呶言革命何为哉”[90]！

革命派感到背后有人民支持，因此有些胆量，说是：“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91] 他们认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人秉政，因此，只有排满，只有革命，才能免除瓜分之祸。

改良派又说，革命还会引起内乱。他们竭力丑化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革命，认为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短则十余年，长则数十年，蒙革命之害者动辄百数十年。康有为并以法国革命为例，说当时人们都如同野兽，结果是流血百二十九万，大乱八十余年。他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92] 康有为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改良派仇视人民、害怕人民，竭力反对人民起来革命。

革命派则认为，革命决不会引起内乱。他们自信可以掌握局势，天真地说：现在革命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不再是帝制自为，而是为了建设民族的国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和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因此，可以尽除历史上群雄相争、相夺、相戕的陈迹，可以尽力于“民党内部之调和”而避其轧轹，为中国革命史开一新纪元[93]。

改良派竭力渲染革命过程中的流血现象，说是将会出现“杀人盈

野”、“以血为渠”、“全国糜烂”的局面，甚至造谣说：孙中山讲过，大革命后，四万万人会死掉一半，至少也要死掉三分之一[94]。

革命派说：没有那么严重。革命的目的在保国而存种，这是“至仁之事，何嗜于杀”[95]？他们指出，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也在数百万以上，其他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等原因者更不可胜计。据此，他们有力地质问改良派道：“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96]

改良派说：最正当的斗争武器是请愿、劝告，要求不纳税，顶多不得已时采用暗杀。梁启超声言：“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而俄人虚无党故事，抑亦济变之手段，最后之武器也。”[97]

革命派说：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不纳税与暗杀不过是革命实力的一端，革命必须有全副事业[98]。他们指出：革命必然要遭到统治者极其残暴的压抑，因而，就必须以“相当之能力”反抗。急病不能缓治，英国立宪，日本维新，都免不了要杀人流血，免不了有“恐怖时期”。离开了“黑铁”和“赤血”，就不会有革命的成果[99]。

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主要方面和内容大体如上。可以看出，改良派顽固地反对革命，而革命派则坚持一个朴素的真理，这就是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若干重大问题上的认识错误。

在论战中，改良派曾经宣扬过一种中国封建早已废除的谬论。康有为说：“经秦、汉大革之后”，中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100]。对此，革命派未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却表示，“吾国之贵族阶级自秦汉而来久已绝灭，此诚政治史上一大特色。今惟扑满而一

切之阶级无不平”[101]。他们指斥清政府为“异族政府”，认识不到自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对汉族地主阶级虽仍有猜忌和防范，但清政府已逐渐发展为代表满汉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府。革命派过分地注意了种族问题，不了解汉族地主阶级同样是革命凶恶而危险的敌人，宣扬“种族为急，政治次之”[102]，“复仇其首，而暴政其次”[103]，甚至说什么政体“微论良恶，要之汉族之设施，非满虏之践踏，心愿毕矣”[104]！在“社会革命”的论战中，革命派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地主阶级，但是，他们竭力声明，“社会革命，固欲富者有益无损也，决非夺富民之产以散诸贫民”。他们幻想有一种“善良之制”，以“至合理之方法”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105]。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也不想发动人民群众去打击中国封建社会的支柱——地主阶级。

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彼此之间的斗争加剧，革命派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列强不会轻易出兵瓜分中国，这一认识，证以武昌起义后的情况，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革命派不了解干涉决不限于军队入境，而军队入境也决不是干涉的主要特点。在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许多抗议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常常采取比较圆滑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他们幻想帝国主义会同情和支援中国革命，甚至企图以让步来换取这种同情和支持。

改良派百般丑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人民斗争，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未能作出正确的批判和分析。他们看不到或很少看到农民起义、人民自发斗争的积极作用，相反，却较多地看到了消极的一面。例如对义和团运动，就被其笼统的排外主义吓住了。他们向改良派表示：“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106]他们认为，当时的“急务”是：通过普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的宣传，唤醒国民之责任，“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之革命”[107]。使人民群众的斗争脱离自发的水平，这是必要的，但是，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力图将人民群众的行动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秩序”内则是错误的。革命派中还有人

说："革命之主动皆中等社会而无乱民"[108]，这就将人民群众排斥在革命动力之外了。

由于革命派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错误，这就使它无法正确地指导革命取得胜利。

三　论战的结局和影响

经过论战，改良派惨败，革命派大胜。

最初，梁启超并不把《民报》作者们放在眼里，认为都是浮薄少年，理论上不堪一击，及至辩论起来，才感到不是对手。不仅为清政府辩护的许多论点站不住脚，连援引的法律条文、译述资料也出现了无数纰漏。1906年5月，他写信给徐佛苏求援，告以要和《民报》"争舆论之动力"，不能不辩，但对《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尚未得所以驳之之道"，要徐帮他"思索"，"并速见复"[109]。徐原是华兴会会员，后投入改良派。他担心继续辩论会有利于革命派，建议梁启超停止辩论。梁虽然认为"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110]，但为摆脱窘境，不得不表示赞同。此后，徐一面拉拢汪精卫，一面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攻击《民报》"秽恶狠毒"，表示希望在归章炳麟编辑后能"回复秩序"[111]。1907年1月，徐又找到宋教仁，声言梁启超愿与宋一见，说辩驳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不愿如是也"。他要求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112]。次日，宋教仁和章炳麟商量，章觉得《民报》"辞近诟谇"[113]，同意调和；宋又和孙中山、胡汉民商量，孙、胡及黄兴均表示反对。

在论战中，《民报》方面士气旺盛，《新民丛报》方面则愈益困难。《丛报》实际上成了梁启超一个人的"独夫"杂志，经常愆期，亏累越来越大。1907年5月，梁启超写信给蒋智由、徐佛苏，恳求助以一期之稿，说是"总须有一两篇为论著者，若全属译述，未免太难看了"[114]。反映出孤身应战，陷于绝境的惶急心理。7月，为筹备在

武汉创办《江汉公报》，梁启超将《新民丛报》收歇。

在其他地区，改良派也都纷纷溃败。

南洋方面，徐勤就任《南洋总汇新报》主笔后，气焰嚣张，开战第一篇就是《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但色厉内荏，遭到革命派驳斥后文不终篇而逃。曾经被孙中山批评过的记者“平实”不愿就主笔之职，一些自署为“勇”、为“耡”的文战者也都销声匿迹，连当地一家极守旧的《叻报》也认为革命党理长，改良派理短。

仰光方面，改良派的《商务报》编辑张石朋表示愿皈依革命真理，脱离该报；另一编辑李牙聪则缄口无声。时人戏撰一联曰：“生公（居正笔名）说法，顽石（指张石朋）点头；天民（吕志伊）示威，聋子（李牙聪绰号）投地。”不久，《商务报》宣告歇业。

真理是无敌的。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良派没有真理，巧言强辩，违背历史潮流，一经交锋，当然只能弃甲曳兵而走。

在论战的带动下，各种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出现了革命宣传活动的新高潮。

以期刊为例，自1899年的《开智录》至同盟会成立前的《二十世纪之支那》，革命派创办的期刊不足三十种，而在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则创办了四十种以上。著名者有《醒狮》、《复报》、《鹃声》、《云南》、《洞庭波》、《汉帜》、《中国新女界》、《大江七日报》、《豫报》、《粤西》、《河南》、《晋乘》、《四川》、《国报》、《夏声》、《关陇》、《江西》、《支那革命丛报》、《安徽白话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南社丛刻》、《民声丛报》、《越报》、《学林》、《民心》、《克复学报》等。

又如报纸，同盟会成立前仅创办十余种，而同盟会成立后则创办了六十五种以上。其分布地区及名称为：

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中国公报》、《天铎报》。

奉天：《大中公报》。

哈尔滨：《东陲公报》。

长春：《长春日报》、《长春时报》、《长春公报》、《国民新报》。

广州：《南越报》、《国民日报》、《平民报》、《军国民报》、《齐民报》、《中原报》、《人权报》、《天民报》、《可报》。

汕头：《中华新报》。

福州：《建言日报》。

贵阳：《黔报》、《西南日报》。

开封：《国是日报》。

北京：《帝国日报》、《国光新闻》、《国风日报》、《国维日报》。

武汉：《武昌白话报》、《商务报》、《雄风报》、《大江报》、《政学日报》。

西安：《兴平星期报》、《帝州报》。

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阳明

报》。

槟榔屿：《光华日报》。

缅甸：《光华报》、《进化报》、《缅甸公报》。

曼谷：《华暹日报》。

菲律宾：《公理报》。

日里：《苏门答腊报》。

泗水：《民铎报》、《泗滨日报》。

旧金山：《美洲少年报》、《大同报》、《少年中国晨报》。

温哥华：《华英日报》、《大汉日报》。

利马：《民醒报》。

檀香山：《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大声报》。

雪黎：《民国报》。

墨尔本：《警东新报》。

东京：《日华新报》。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革命派的报纸不再集中于少数沿海城市，而是逐渐向边远地方和海外，同时也向清朝的腹心地区发展，《国光新闻》、《国风日报》等甚至就办在清政府的鼻子下边。其中不少报纸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上海《民呼报》于1909年7月27日被封后，10月3日改名《民吁报》出版；四十八天后再被封禁，1910年10月11日又改名《民立报》出版。其他如《长春日报》、《长春公报》、《国民新报》，以及缅甸《光华报》、《进化报》、槟榔屿《光华日报》之

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1909年11月13日成立的南社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的集结，也是资产阶级宣传队伍的集结。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它“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115]。“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116]。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发展至二百二十八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报刊宣传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伴随着报刊宣传活动新高潮的是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南社的成立和发展，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之一。

论战暴露了改良派保皇立场的反动和理论观点的荒谬，“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117]，许多人转而看《民报》。感到革命派的观点“切实”、“透彻”，站到革命派的旗帜下来。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人前谈革命，理直气壮，谈保皇，就口怯气虚。如1907年10月17日东京政闻社开场时，梁启超登台演说：“今日之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今我们政府立宪，我们大家都欢迎的。”鼓掌附和者仅二十余人，其余虽同党亦不敢鼓掌[118]。正在此时，张继突然起立，指着梁启超说：“你胡说八道，东京是什么地方？岂容你这妖怪来出卖风云雷雨！”接着大喊：“打！打！打！”于是，棉垫、草鞋一齐向台上飞去。四百余人蜂拥而上，梁启超等狼狈逃窜[119]。徐勤在新加坡也有类似的遭遇。上述情况，反映了改良派已失去人心，处于劣势。又如美洲，这是康有为等经营多年的一块基地，但经论战之后，华侨纷纷登报脱离保皇会，改良派势力一落千丈，而革命派的力量则与日俱增。到1911年黄花岗之役，美洲华侨所捐款项竟达募捐总数的一半。对于这种情况，《新民丛报》撰述人黄与之有一段描述，他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120]论战的胜利鼓舞了革命党人，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

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

伴随着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节节胜利，就出现了以萍、浏、醴起义为开端的武装起义高潮。

第二节　萍、浏、醴起义

历史上的反动派大都迷信自己的屠刀，而其效果总是适得其反。马福益被害后，湖南哥老会的革命倾向更为强烈。

1906年春，长江流域洪水成灾，米价大涨，不少地区处于饥馑状态。因之，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作起义的准备。到长沙后，刘道一等数十人在水陆洲畔的船上集议。刘传达了黄兴的意见，主张“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发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为响应之”[121]。他建议首先到萍乡、安源等地利用矿场组织机关，集合会党，同时，运动新军和巡防营。会后，与会者分头进行：刘道一留驻长沙，负责和总部联系，蔡绍南则前往江西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到达目的地后，蔡绍南得到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很快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头目龚春台等取得了联系。龚春台，浏阳西北乡百家山人，农民成分，爆竹工人出身。“少不学，能以死生许人”[122]。在清军中当过兵，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浏阳帮零工为生。经过龚春台、蔡绍南等的联系奔走，哥老会与另一个会党——武教师会决定联合，成立洪江会，公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123] 在“大哥命令”之上，冠以“中华民国宗旨”，表明哥老会这一传统的帮会组织被灌输进了新的内容。忠孝仁义堂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等，称为内八堂，又设一至八路码头官，负责发展会员、联络、侦察等事，称外八堂。

洪江会成立后，贫苦农民和附近的安源矿工纷纷加入，组织迅速壮大。于是，龚春台、蔡绍南等开始策划起义。

7月，蔡绍南在桐木、上栗市一带发表演说，动员革命，得到群众热烈响应。清朝官吏惊呼："民心被惑，蚁附甚众。"[124] 同月，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码头官在距上栗市二十里的慧历寺密议，决定一面密造军火，一面联络洪福会的姜守旦，同时派蔡绍南、魏宗铨往日本，请示孙中山，要求接济军械，确定起义日期。

由于会员日众，人言庞杂，10月2日（八月中秋），麻石酬神演戏，聚众万人，传说洪江会即将起义，引起清朝官吏警觉。10月7日，清军突袭麻石，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追踪，投水而死。这时，蔡、魏二人行至上海，正拟东渡，听说麻石之变，立即赶回，决议于年底清吏封印时分三路起事。21日，深受安源矿工拥戴的会党头目张折卿被捕，不久被杀。此后，萍乡东北萍实里，浏阳上东张陈坊一带，先后有会党聚集，准备开山祭旗，约期起义，均被清军驱散，首领被捕。12月3日，当醴陵会众正在板杉铺、邓家渡赶制旗帜、号衣、刀矛的时候，清兵又前往捕拿了一人。

形势紧迫，当晚，龚春台、蔡绍南等在萍乡高家台集会，讨论起义问题。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认为军械不足，主张稍缓，码头官廖淑保等则认为会党有十余万人，完全可以和清军一决胜负。双方争论了一夜，没有结果，廖淑保便独自跑到麻石，召集二、三千人，举起"汉"字白旗，宣布起义。这样，就迫使龚春台、蔡绍南不得不通知各路同时发动。12月4日，起义全面爆发。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随即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檄文列举了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宣称要"破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

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声言：未来社会的“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125] 这一檄文表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全部纲领，使起义具有和旧式农民起义截然不同的新色彩。

洪江会的义旗一举，群众如潮水般涌来，迅速发展至三万余人。在醴陵，主要为农民、巡防营士兵、沩山一带的碗厂工人；在浏阳，主要为会党；在萍乡，主要为恂及、萱溪一带的矿工。“浏阳揭竿，咸往附从”[126]。12月6日，龚春台部攻克上栗市，每天有数以百计的矿工投入义军。但是，由于清朝官吏的严密控制，安源矿工未能按计划起事，使得起义一开始就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安源是工人近万的大矿。领班萧克昌，外号老龙王，“能左右窿工”[127]。11月27日，醴陵义军头领曾派袁南亭持函赴安源约萧克昌带一千人，夹攻醴陵，时间为12月7日。萧当时觉得条件尚未成熟，“未允轻动”[128]。至期，清军到安源逮捕萧克昌，要袁侦查萧的动向，袁不允，被捕，并被解往醴陵。萧克昌随即发动矿工斗争，于是矿工“大哗噪”[129]，“其情形言语与平日大异”[130]，迫使萍乡矿务局不得不电醴陵将袁索回。此后，清朝官吏对安源矿工和萧克昌的防范日益加紧。

在洪江会之后，浏阳洪福会的姜守旦也宣布起义，起义军定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在《布告天下檄文》中，姜守旦等宣称，不要拘泥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只要汉族中有人能首倡大义，推翻满清政府，就可以拥戴他为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131]。这篇檄文充满了种族复仇思想和封建观念，反映出旧式会党的落后一面。姜守旦等并表示，不受洪江会的约束。

起义军一开始就和平时热心办团、镇压人民的地主绅士处于尖锐

对立地位，“专烧杀向来办匪出力绅士人家”[132]。在浏阳三口地方，有黄姓团总等多人被杀。在萍乡，官僚地主欧阳煦“向办团练，捕匪得力”，因此，群众起事之后，“将其家属八人概行杀毙，宗族祠屋焚毁无遗”[133]。义军所过之处，“正绅”们一逃而光[134]。

清政府得到消息后，极为震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蓂、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派出精锐军队镇压。

12月9日，张之洞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说：“萍矿及路已值银数百万。若成燎原，为患更大，不止矿路而已。”[135]次日，军机处电饬张之洞、岑春蓂、吴重熹等，“赶紧分头剿捕”，“迅速扑灭，毋任蔓延，致贻后患”[136]。13日，端方派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步、炮、马、辎重各队新军二千余人赴赣。前后，清政府共派出五万余人。

起义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惶惧。德国、日本政府先后向清政府“问讯”[137]，并派出军舰上驶岳州。据有关资料，当时在长江流域观察“动静”的英、美、俄、法、德、意各国军舰在二十三艘以上[138]。

面对全副新式武装的敌人，起义军英勇奋战。他们除从团防局夺获二、三千支枪以外，大多数用鸟枪、抬炮、木竿及旧式刀枪为武器。12月9日，起义军数十人手持扁担击败了清军百余人，夺获枪械多支。有个青年妇女名秀姑娘，甚至以空拳迎敌清兵。但是，由于仓促起事，缺乏统一领导，枪械又少，又始终困守萍、浏、醴三县，被清军四面围攻，有生力量逐渐消耗。12月8日、11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扑浏阳，均未得胜。12月10日，清军进攻上栗。起义军多以徒手肉搏，或以土枪射击。沈益古左手执锅盖，右手执大刀，在锋镝丛中出入冲杀，连斩清军十余名，终因没有应援，鏖战半日后不支，上栗失守。12日，醴陵方面西路总统谭石基部被清军巡防营击败。同日，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往投普迹市哥老会

大头目冯乃古请援。中途，蔡绍南被捕，旋遇害。龚春台到达普迹市，冯乃古已被清军诱杀，龚春台不得已潜往长沙。14日之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不利，进入江西义宁。25日，清朝官吏捕杀了安源矿工首领萧克昌，在矿区设立巡警局，实行清查和连环保。1907年1月，姜守旦部被堵击，姜守旦逃亡。

萍、浏、醴起义失败了。

在开赴江西镇压起义的徐绍桢新军中，赵声、熊成基、倪映典都是革命党人。从江宁出发前，赵声曾派人通报萍、浏、醴起义军。12月25日，徐部到达江西，起义已经失败，因此，赵声等均无所作为。

起义失败后，清军大举“清乡”，搜捕革命群众，一直进行了三个月。12月下旬，刘道一在长沙被捕。31日，被杀于浏阳门外。1907年3月7日，魏宗铨也被捕杀。总计，起义军前后被杀者一万余人，群众被杀者二万余人。

当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时，东京中国同盟会会员纷纷请命，要求身临前敌；孙中山也认为“时不可失”[139]，先后派宁调元、龚国煌、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孙毓筠、段云、权道涵等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策应，先期归国的杨卓林等也积极活动，准备起事。

宁调元回国后，先在上海与陈其美、杨卓林、秋瑾等密谋，发动长江一带会党响应。定议后回长沙，得悉萍、浏、醴义军已经失败，便去醴陵寻访龚春台，没有见到，乘船至岳州时被捕。

龚国煌回湖北襄阳、樊城，准备发动当地会党，事败仍返日本。

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回武昌，正值张之洞悬赏通缉起义人员。计开姜守旦、刘家运、黄庆武、刘林生、李燮和、朱子龙、萧克昌等十五名。1906年12月26日。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员与胡瑛、朱子龙、

梁钟汉等会议于汉阳伯牙台。与会诸人担心财政困难，日知会员、留日学生郭尧阶声称六合锑矿经理刘小林愿出资十万元，骗得众人信任。事后，郭向巡警道告密，诬指刘静庵即刘家运。1907年1月7日、8日，清政府缇骑四出，搜查日知会，先后逮捕朱子龙、刘静庵、胡瑛、梁钟汉、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等九人。审讯中，清吏必欲刘静庵自承为刘家运，静庵抵死不承，只自认为革命党。他在堂上慷慨演说，痛斥承审官梁鼎芬，受到残酷的笞刑，被鞭一千四百，自头至脚，体无完肤，仍然劲挺不屈，被称为铁汉。其他人也个个坚贞无畏。李亚东对着清吏笑骂："干天下事，是我们的天职，难道有怕死的革命党吗？！"清吏想用推出去斩首来威胁朱子龙，朱却厉声回答："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更难。不杀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则革命不成。革命党人的血是灌溉自由的肥料！"殷子衡被绷住左右手，跪在铁链上，用藤鞭抽打，他毫无怯容，大骂清吏想用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1907年5月，朱子龙瘐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保释。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吴贡三、殷子衡、李亚东、梁钟汉被分别判处十五年、十年、五年、三年各种徒刑。其中，吴贡三和梁钟汉被解回原籍监禁。刘静庵本已判处死刑，经圣公会主教吴德施等营救，改判永远监禁。他在狱中饱受折磨，三十多岁的人就须发尽白。后于1911年6月病故。

孙毓筠归国后在南京新军中活动，不久即被跟踪拿获。他原是清朝军机大臣孙家鼐的侄孙，被捕后受到端方的"优待"。他在供词中向端方乞怜，竟无耻地说："午帅怜才，有意保全，身非木石，宁不知感。"(140) 被判监禁五年。和他同时被捕的权道涵、段云则被判永远监禁。

杨卓林原是湖南革命党人。1906年与李发根、廖子良先后回沪。萍、浏、醴起事时拟乘机谋刺端方，在南京一带起事。因误识端方密探萧亮、刘炎，被诱至扬州逮捕。供词中，自称是"孙文之副将军"，并引卢梭"不自由，毋宁死"和佛家"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

地狱”等语以明志。1907年3月20日被杀。

对于萍，浏、醴之役的失败和刘道一的死，孙中山、黄兴等极为沉痛，各有诗志哀。孙中山诗云：

>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萍、浏、醴起义爆发于中国腹心地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参加人数之多，为历次起义所无，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的南部起义

在领导论战的同时，孙中山即着手筹备新的武装起义。他懂得，处于清政府的暴力统治之下，要想夺取政权，建立民国，不可能依靠别的斗争形式。广东是他早就选定的“起点之地”[141]，在筹备新的武装起义时，孙中山的目光仍然注视在这里。

1906年4月，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分会。6月，吸收华侨富商许雪湫为会员，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在广东潮州、嘉应一带发动起义。10月，自西贡返日，和黄兴、章炳麟一起制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地民军关系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文件，供起义时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指导对外关系之用。次年3月，日本西园寺内阁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便于同月4日与胡汉民、汪精卫离日赴安南（今越南），在西贡，会见了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吸收他加入同盟会，并一起经海防到达河内，在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机关。孙中山的设想是：先取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七省，然后

北出长江。

4月，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一带人民抗捐起事，孙中山决定乘机在该地举义并和东部的潮州、惠州一起发动。他派胡汉民往香港策应，并函招在东京的黄兴南来。5月，黄兴到达河内。其时钦、廉人民抗捐起事已被镇压，孙中山毫不气馁，即派黄兴、胡毅生二人分赴清军郭人漳、赵声军中活动，并委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关仁甫为西军都督。

正在积极筹备之际，黄冈地区因故提前发动。

一　黄冈之役

黄冈是广东潮州府饶平县的一个大镇，地处岭东，市况繁荣，为闽、粤两省交通孔道。当地三合会势力很盛，其重要头目为许雪湫。

许雪湫[142]（1875—1912），潮州海阳县人，华侨富商，喜击剑舞拳，与江湖会党广有联系，有“小孟尝”之称。1903年受到福建人黄乃裳的影响，立志革命。1904年邀同志陈宏生、黄乃裳等归国，立坛歃血，宣誓推翻清朝。其后，经营数月，联络黄冈、丰顺、饶平、揭阳、惠来、澄海各地会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波等数十人，于1905年2月15日集会，计划于4月19日起义，许被推为司令。旋因事泄未成，重赴南洋。1906年，被孙中山委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后，立即归国，以汕头为基地，运动会党，散发票布。票布正面绘一鹰一龙，并写“地道光明”四字，背盖一印，书炎兴堂字样[143]。愿入会者，每人给银四元。

萍、浏、醴事起，许雪湫跃跃欲试。他到香港见冯自由，介绍余丑、余通加入同盟会，要求电告孙中山，起义条件已渐次成熟，请派人协助。孙中山接电后，派出了廖仲恺、方瑞麟、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起义订于1907年2月19日（正月初七）分头大

举，聚集饶平、揭阳等处会党合攻潮州。届期，浮山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144]，其他各路也因之未能发动。数日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金福等被清吏捕杀。许雪湫到香港，通过冯自由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复电：此后起事，必须与惠州及钦、廉等地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许雪湫便留驻香港，等候消息。

此后，许雪湫得到新加坡张永福、陈楚楠等人所捐巨资，孙中山又计划派萱野长知运械至黄冈附近的洄洲港，便订于5月25日再次起事。不久，风声渐露，清黄冈都司隆启发现会党数十人形迹可疑，要求潮州镇总兵黄金福派兵缉捕。5月初，清吏捕去会党二名，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要求举事，为胡汉民、冯自由劝阻。同月21日，黄金福派守备蔡河宗带防兵二十名进驻黄冈，适值当晚商民演戏，防兵在台前调戏妇女，捕去出面干涉的党人二名，并拟搜查余通所开设的泰兴杂货店总机关。因此，矛盾激化，余丑、陈涌波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主张先发制人。

5月22日晚，余丑聚集七百余人于黄冈城外，誓师起义。陈涌波为前锋，由北门攻入，围攻都司衙门。战斗中，忽降阵雨，义军所用多为旧式鸟枪，弹药尽湿，陈涌波便改用火攻。在熊熊烈焰中，陈涌波叱咤冲突，冒着枪弹指挥，血战一夜，攻克黄冈，生擒都司隆启等。次日，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以陈涌波、余丑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大明都督府孙”或“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文告，宣称“为官府苛税，民甚难堪，专欲除暴安良”，并颁发纪律十余款，大体仿照《革命方略》。内有“私藏口粮者罚”一款[145]，显然是下层贫民极端平均思想的反映。军政府通令各商店照常营业，无须惊扰。由于当地米价昂贵，每升售钱八十文，军政府限令以五十文出粜，不得多取，因此，“附近贫民从之者甚众”[146]，并有滨海渔民乘船前来参加，起义军迅速发展至五、六千人。此外，军政府并要求地方殷富交献银米，据报道，“富室均被勒提军费，为数甚巨”，“一廖

姓者二次被勒，至有三四千元之多”[147]。

由于余丑等并不了解通盘计划，攻克黄冈后，革命党人或主速攻潮城，或主进攻诏安，久未决定，这就给了清军以从容备战的机会。粤督周馥一面电责黄金福，令其立功自赎；一面派水师提督李准率水陆队伍继进；同时要求闽浙总督松寿拨队防堵。25日，许雪湫的助手陈宏生赶到，被推为临时司令长。当夜，陈涌波出击进驻洪洲港的黄金福军。黄军据垒顽抗。起义军所用土炮，威力不大，至第二日午，死伤数十，命人向黄冈乞援。于是，余丑披发痛哭，动员群众，义军大受感动，身带双刀，背着湿被棉胎，准备肉搏。战斗中，人人奋勇争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清军援兵赶到，起义军腹背受敌，加以弹药告罄，不得不下令退却。

5月27日晨，经陈涌波、余丑等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解散义军。余丑等由海道逃往香港。

当起义军发动之际，许雪湫于25日赶到汕头，与萱野长知等计议发动丰顺、揭阳、惠来、澄海各地会党响应。27日，得悉起义失败，便计议炸毁李准所乘运兵轮船，以图再举。因防范严密，未能得手。

5月28日，清军进入黄冈，搜获余丑等遗落的党人名册，按名逮捕，惨杀二百余人。东灶乡民因曾为起义军煮粥，被黄金福用炮轰击，“惨毙多命”，事后，黄竟以“攻破匪乡，击毙匪党，尽获全胜”上报[148]。29日，李准率军赶到黄冈，下令“追剿”，又捕杀起义军多人。

为了了解黄冈起义的经过及其失败情况，孙中山命许雪湫和萱野长知同赴河内汇报。许雪湫认为，黄冈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土炮不敌洋枪。他表示，倘能从外国购买新式军械，可在海陆丰沿海一带再次发难。孙中山同意这一意见，派萱野长知回日购械租船。10月12日，萱野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支，乘幸运丸驶抵汕尾海面。由于许雪

湫没有做好接运准备，轮船停泊时间较久，引起清军兵轮注意，驶近侦察。在此情况下，幸运丸开赴香港，粤督周馥又通知港吏扣留。日领事得讯，令其开返日本。许雪湫在海陆丰起事的计划因而成为泡影。

战争中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须要细致地加以分析。此次事败，许雪湫受到各方责备，胡汉民曾将当时布置计划详情写了一份万余言的报告书，指责许雪湫“妄言无实，不负责任”[149]。从此以后，许雪湫对同盟会就逐渐离心离德了。

二　惠州七女湖之役

为了分散清军注意，孙中山派出许雪湫筹划潮州起义之后，又派邓子瑜等在惠州地区发动。

邓子瑜，惠州归善人，在香港、新加坡经营旅馆业，惠州会党逃到南洋时大都投靠于他。1907年4月，邓子瑜从南洋到香港，委派陈纯、林旺、孙稳等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处分三路起事。6月2日，陈纯等在距惠州二十里的七女湖集众竖旗，劫夺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檄文云：“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150]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封建意识都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显然，这一支会党队伍还不曾受到同盟会多少革命思想的影响。5日，起义军进攻泰尾。7日，克杨村。8日至柏塘，计划攻取博罗县城。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吓得归善、博罗的清朝官吏只能紧闭城门。义军来去飘忽，所向披靡，多次击败清军，“如入无人之境”[151]。后因接济军械不到，李准又率领进攻黄冈的清军来攻，不得已埋枪解散。

一支无后方的军队是不能持久作战的。惠州地区的会党以强悍著称，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派在该地发动起义，每次都取得相当的胜

利，但结果都不得不以“散伙”告终。

除归善一路外，其他两路因为清吏发觉，戒备严密，未能发动。

陈纯于失败后逃亡香港，转赴南洋；邓子瑜则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孙稳于1909年被香港当局引渡给清政府广东当局杀害。

三　防城之役

当许雪湫、邓子瑜在潮、惠一带起义的时候，广东西部钦州地区人民的抗捐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1907年4月下旬，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要求减免糖捐，推派代表十余人见钦州府吏，被囚。三墟人民大愤，组织万人会，聚众抗捐，推豪富刘思裕为首，入城抢出代表。同时，“乡民停耕，钦商罢市”[152]。钦廉道王秉恩派兵镇压，周馥也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新军标统赵声率兵驰往围剿。孙中山认为，郭、赵都是自己的同志，便派同盟会员邝敬川潜入钦州，游说刘思裕，同时派胡毅生进入赵声营中，约郭、赵同时起义。

邝敬川到钦州后，与刘思裕接谈，刘等欣然同意。当即推举刘思裕为元帅，黄世钦为副元帅，邝敬川为参军，择期举事。孙中山随即派人带信给胡毅生，要胡转告郭、赵，抗捐民团已与吾党联合，勿加攻剿。因带信人延误，此信郭人漳等未收到。5月12日，郭部攻下那思。14日，以炮队猛攻那彭、那黎，击毙刘思裕及乡民无数，血洗村庄。同时，清军进犯良屋村，黄世钦、梁少廷、邝敬川率兵迎拒，鏖战多日，因缺乏弹药，退入山中。其后，邝敬川、胡毅生先后返回安南，向孙中山汇报了有关情况，孙即派萱野长知赴日购械，同时派黄兴、王和顺随胡毅生归国，准备再次发动。

王和顺（1869—1934），字德馨，号寿山，广西邕宁人。壮族，行伍出身。曾在刘永福部为哨官，后弃职参加三合会。1903年至

1904年之间，曾和陆亚发一起在广西起义，与清军相持两年，陆亚发牺牲。1905年，王和顺逃亡香港，转赴安南。1907年3月加入同盟会。接受归国发动起义的任务后改名张德馨，直至那桑。其时，梁少廷等已组织起一支军队，有枪百杆。王出示了孙中山的委任状，任命梁瑞阳、梁少廷为革命军副都督。此后，王和顺即率领着这一支队伍来往于三那一带。当地人民热烈欢迎革命军，“沿途供给粮食，惟恐不力”[153]。但王一直寄希望于运动清军，久无动作，以致刘思裕之侄刘显明又率部离去。后来，王得知驻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决计在该地发动。孙中山因防城近海，接济饷械较易，也表示同意。

8月13日，为了配合王和顺，关仁甫奉孙中山之命围攻广西上思，未能得手[154]。9月1日，王和顺率领二百余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3日，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王”的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其中，王和顺叙述了自己从“奋入洪门”，“以反清复明为职”到接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过程。他说：“及从孙先生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155]。他号召粤省同胞“共矢忠贞，以图大业”[156]。4日，攻防城。次日，得到清军刘辉廷、李耀堂的内应，入城，擒杀知县宋鼎元等，发布《告海外同胞文》，宣称“誓使五岭以南，无复胡马之迹，进而与长江之中军，燕蓟之北军会合”[157]。

起义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当地群众用烧猪、爆竹来欢迎义军。

攻克防城的当日，王和顺率部五百人进攻钦州。9日晨四时，起义军抵达城下，但郭人漳已经变卦。起义军不得入城，改攻灵山，取道入桂。沿途地方民团投入者三、四千人。9月8日，起义军在通向灵山的云秀桥与清军发生战斗。至第二日，仍不能下。其后，又在狮子口与清军宋安枢部激战一日夜。至9月13日、14日，饷械均缺。王和顺声称向孙中山请示，率二十人退回安南。团民也渐渐散去。余众一

部由刘瑞阳、梁少廷率领，另行屯扎；一部由刘辉廷、李耀堂率领，退入那琴、大绿，在十万大山中隐蔽起来。

郭人漳原是华兴会会员，1905年12月任桂林巡防营统领时，黄兴曾专程自日本赶来动员他起事，并发展其为同盟会员，但郭一直首鼠两端，存心投机。这次起义，革命党人寄希望于他，一开始就走错了棋子。

四　镇南关之役

广东方面失败了，孙中山的活动重点逐渐转向广西和云南。

对广西的军事经营开始于1907年夏历五、六月间。其时，关仁甫已与清军驻镇南关（今友谊关）营长黄瑞兴、边防统领总教练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联系好，计议定期大举。不料，事为广西巡抚张鸣岐侦悉，易、陈被害，关仁甫于7月15日返回安南，被法兵拘押。经孙中山运动华侨保释[158]。

9月，孙中山命王和顺负责镇南关军事。10月26日，王和顺致书清广东水师提督秦炳直，要他“立功赎罪”。11月6日，又致书清广西边防统领陆荣廷，劝其反正。其后，王和顺前赴那模与凭祥土司李祐卿联系，订于11月18日率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届期，因广西绿林、游勇本分两派，王出身绿林，李祐卿所部游勇与王发生意见分歧，不听调动。王和顺无奈，折返河内。孙中山改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以李祐卿为副。

黄明堂（1870—1938），广东钦州人，壮族，排行第八，人称为八哥。因愤于清政府腐败，投身会党，曾聚游勇数百人，呼啸山林，多次击败清兵，八哥之名不胫而走。被委任为镇南关都督后，进行顺利，迅速与镇南关炮台守兵联络成熟。12月2日，黄明堂、关仁甫率乡勇八十人，携带快枪四十二杆，潜袭镇南关。起义军披蒙茸，

拨钩藤，跨越断涧危崖，直进右辅山第三炮台，呐喊而入。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接着，第二炮台、第一炮台相继夺得。

12月3日，孙中山亲率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等至关，登上炮台，全军鼓舞，黄明堂奏乐欢迎。

次日，清军援兵开到，发起攻击，起义军发炮反击。经试发后，击中敌方阵地。孙中山也发了炮，并且打得很准[159]。他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160]其时，有一炮台尚未攻克，清兵恃险向起义军炮位射击，击中一人。孙中山亲自为之裹伤，并命人抬他下山。

当日，孙中山又和黄兴一起来到山下的弄尧村，访问壮族同胞。据当时人回忆，孙中山非常和蔼可亲，对人们说："炮台现在是我们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们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那时大家就可以自由自由，不受压迫欺负了。"[161]

同日下午，清军参将陆荣廷派一樵妇持函登台，表示愿以所率六百余人投入麾下，并告以次日有清军五百自凭祥来，后日有清军二千自龙州来，事急万分。祈自重。孙中山读函后和黄明堂等讨论，认为山上大炮虽多，但只有一个炮可以打，枪只有七十多支，都已老旧，难于进取，决定回河内筹款筹械，命黄明堂坚守五日，一俟饷械运到，即便进取龙州。决定后即复函陆荣廷，使为内应。当晚，孙中山、黄兴等下山回安南。

12月7日，清政府军机处指责张鸣岐失去重隘，"交部议处"，责令他督饬各路将官，"优悬赏格，严申纪律，协力进攻，即日克复"[162]。其时，清军丁槐、龙济光等各路援军齐集，以四千人的优势兵力四面围攻。当夜，陆荣廷等在大炮配合下向北台猛扑，黄明堂等悉力抵拒，由于枪弹告罄，不得已于8日夜弃台，退至安南燕子大山。

孙中山回安南后，曾与一法国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国代募军

债二千万元，于占领龙州之日交付第一批款项。正在协商条件时，9日晚，得悉炮台失守，谈判遂即停顿。

五　钦、廉、上思之役

防城之役中，郭人漳的投机面目已经暴露，但是，黄兴对他仍有幻想。回安南后，再次归国进入郭营，郭人漳阳为应酬，阴怀歹意，被黄兴察觉，借故脱身。其后，谭人凤赶到，黄兴正为缺少弹药焦灼，因谭与郭有旧，便派谭于1908年1月28日往郭处求接济，几经反复，郭人漳表示应允，但以后并未践约。

同年3月，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为了向华南地区扩张势力，安南法国殖民当局曾经和孙中山拉过关系，但是，他们决不允许这种关系危及法帝国主义的利益。1908年春，安南中部发生大规模抗税运动。法国殖民当局担心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会促进越南人民的斗争，因此，方针逐渐发生变化。2月12日，鲍何向法国殖民部报告说："革命党人在我们的领地里进进出出，在中国境内彼伏此起的起义，会激起不幸的趋向，同样会在我们治下的人们中引起骚乱。"[(163)] 驱逐孙中山出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孙中山临行前，命胡汉民留守河内机关部，同时命黄兴为总司令，再次在钦廉地区发动，并命黄明堂规划进取云南河口。

黄兴奉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炮百数十杆，组织云南旅越青年二百余人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于3月27日向钦州进发。

29日至小峰，清军管带杨某以为郭人漳至，派兵出迎，黄兴发动攻击，毙五人，逃三人，其余均降。杨某得报，倾营而出，依山布阵。黄兴乃率部佯退，诱清军离山，然后分一路兵从正面攻击，一路埋伏田间，一路兵出清军背后暗袭。清军只顾正面迎敌，没有顾及身后。猝不及防，顷刻大溃，杨某仅以身免。30日、31日，又先后击溃

清军三营。4月2日，黄兴列阵于马笃山。郭人漳派最骁勇的管带龙某率三营兵来攻，黄兴发枪遥射，龙中弹落马，起义军欢声雷动，黄兴挥军进攻，清军营官带头逃跑，三营全溃。

由于连战皆捷，起义军发展至六百余人。正准备取道那楼、大绿，向广西边境移动的时候，郭人漳合兵尾追，以数千人包围起义军。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黄兴募敢死队夜袭清营，清兵自相惊扰，不战而溃。黄兴率部追击，清军几乎全部覆没，郭人漳的军旗和战马均被起义军缴获。自此，起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迫使敌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不得不频电告急。

由于转战四十余日，缺乏后援，弹药告罄；广西边防营勇虽允投降，但未行动；龙济光所部分统黎天才亦曾准备归顺，但因起义军方面无力交付奖赏花红，事亦未成。因此，黄兴下令解散起义军，除率少数人回安南外，其余退入十万大山。

此次起义，黄兴率数百人转战月余，所向皆捷，但因是一支游离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孤军，最后还是失败了。

六　河口之役

在镇南关之役以前，河口起义的准备工作即着手进行。

河口地处中越边界，有滇越铁路经过，北可达昆明，清政府在此建有炮台四座，重兵防守。孙中山的机关部设在河内，计划在云南发动起义，河口是必争之地。

1908年4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筹划云南起义事宜，以王和顺、关仁甫为辅。事先，关仁甫潜入境内，与清军防营约定，凡携械投降者，给银一元。29日夜二时，黄明堂等率所部二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五百人，向河口进攻。四时，占领河口。城内警兵相率反正，清军管带岑得贵等逃入半山炮台，与防务

处督办王镇邦合力死守。4月30日，起义军奋力攻山，管带黄元桢投降，王镇邦也诈称愿降，暗命亲随射杀上山说降的党人黄华廷。起义军大愤，全力进攻。清军守备熊通用枪押着王镇邦，率部反正，清军全部投降，河口四座炮台均为起义军占领，得枪千余，子弹七万发。革命军处死了王镇邦，成立云贵都督府。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示安民，声称："本军政府因义讨暴，为民请命"[164]，宣布军律若干条，同时向各国发表宣言，声称"本军政府今起国民军，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165]。其条文主要有：

军政府占领地内之外国人民财产一体保护；

军政府占领地内，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皆得继续有效力；

外国人若直接援助清政府妨害国民军者，国民军即将其认作敌国；

外国人若以战争用品接济清政府，则国民军立即没收之[166]。

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河口于1895年后辟为通商口岸，法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副领事署。革命军所颁布的条文注意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勾结，是正确的。但是，完全承认"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则是对帝国主义过分的让步。

义军得到了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河口商人资助一千七百余元，越南华侨资助四千余元，并运来大米四百余包[167]。5月2日，关仁甫率军四百人左趋曼耗，准备进兵个旧，攻取蒙自。一路连克巴沙、田防、安定、新街、万河等地。4日，王和顺率兵沿铁路北攻，清军纷纷来降，王部占领南溪。

河口起义的主力是变兵，哗变的原因是欠饷与禁赌。对这支队伍，胡汉民不放心，建议孙中山派黄兴节制各军。5月3日，孙中山在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7日，黄兴进抵河口，力催黄明堂沿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担心粮食不继，犹豫迟疑。黄兴焦急，准备亲率各军前进，黄明堂仅派兵百人。由于缺乏思想基础，行军不到一里，士兵便向天开枪，齐呼疲倦；再行半里，便一齐哄散。黄兴无法，只好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敌找王和顺商量。王也以兵疲弹缺为虑。在此情况下，黄兴仍拟率军先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命，并要求再发一个月的饷。不得已，黄兴于5月9日返回河内，准备多买一点驳壳枪，成立一个司令部或敢死队，强制士兵服从命令。住一日，复乘车北上，过老街时，被法警截留，解送出境。

河口起义过程中，清政府曾多次向法国外务部交涉。5月6日，法国政府表示，“自当竭力相助”[168]。21日，法国驻蒙自代领事罗何（R．Reau）声称：“尽快结束目前的骚乱实为至要，否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祥的后果。”[169]这一时期，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封锁边界，禁阻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26日，在清军白金柱部进攻下，河口失守，黄明堂率六百余名战士突围撤入安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在此期间，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传闻清政府电驻法公使，将借法兵平滇乱，便电告东京《云南》杂志社。5月24日，杨振鸿、赵伸、吕志伊等以云南留日同乡会名义，邀请全体留日中国学生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宣称“云南人绝对的不受清廷之支配，亦绝对的不受他国之干涉”[170]。会后，杨振鸿邀同志数十人秘密返国，拟入滇援助义军。行至香港时，得悉起义失败，南行至仰光。

至此，孙中山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的六次起义全部失败。

1908年11月，光绪帝及西太后二人相继死去，杨振鸿曾联络土司刁春园，计划于12月23日在永昌起义，也未成事。

两广和云南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地区，会党势力深厚，人民富于反抗精神。1903年的云南周云祥起义、1904年的广西陆亚发起义，都曾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鼓舞。这一地区距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遥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国境线，便于从国外输入饷械和人员。因此，孙中山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起点之地”。但是，他没有看到，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形势到1907年前后已经转为低潮。加上革命派又不善于发动群众，未能把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和当地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起义就只可能在个别地方突破而不可能有大片区域的发展，必然无力抵御清军的四面围攻，也应付不了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

孙中山在南部地区发动的多次起义，既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清政府的生存，也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政治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加深了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节　东北、安徽、浙江、四川各地的起义

一　运动东北“马侠”之役

和孙中山、黄兴注意经营南方不同，宋教仁注意经营东北。

还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时，宋教仁就曾特撰《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一文，鼓励东北绿林武装——“马贼”抗俄反满。为了与“马贼”这一轻蔑性的旧称相区别，宋教仁称之为“马侠”。1906年9月，黄兴自广西、南洋、香港等地活动后回到东京，宋教仁担心他“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特别提出了经营东北的设想[171]。1907年2月，日人末永节、古河（古川清）访问宋教仁，详细

谈到了“马侠”的有关情况。宋教仁认为，如能约得“马侠”共同起事，则易于摇撼清廷根基，便和孙中山商量，孙中山表示赞同[172]。当时正值萍、浏、醴新败之余，黄兴也希望能开辟出一个新地区来，便邀约宋教仁、张继、末永节、古河等商谈，决定派人赴东北运动。

3月23日，宋教仁与古河自东京启程，至门司与白逾桓会合，渡过鸭绿江，于4月1日抵达安东。3日，以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名义致书大孤山马侠李逢春等[173]，肯定其“扶弱抑强、抗官济民”的志气，鼓励他们集合辽河东西、黑水南北的义军合为一团。信中着重分析了“西渡山海关则永乎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的有利战略位置，表示说：

> 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174]

“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这里，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4月8日，李逢春邀宋教仁上山面谈，表示赞成同盟会宗旨，愿一致行动。于是，宋教仁即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主要负责人为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张榕等。其后，宋教仁曾至北满联络著名的绿林首领刘单子，又曾深入长白山延吉地区联络当地武装首领韩登举。

6月，得到惠州起义消息，宋教仁即拟发兵响应，先占辽沈，再逼榆关，进窥北京。不料，清政府早已得悉有关情况，电令东北各省防范[175]。白逾桓在碱厂招兵，被清督赵尔巽击败；潜入沈阳举事，又被徐世昌所捕[176]。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见形势不利，又因同盟会内部矛盾爆发，张继打电报要宋教仁返日，于是，宋教仁便改装回到东京[177]。

在北方或首都发动是宋教仁战略思想中的所谓上策，运动“马侠”之役失败后，仍然有一些革命党人在北方地区活动，但宋教仁等的注意力则逐渐转向中部地区。

二　秋瑾、徐锡麟之役

萍、浏、醴起义也鼓舞了在长江下游活动的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光复会员和归国的胡瑛、宁调元、杨卓林等同盟会员集会，计议协同动作，秋瑾承担了在浙江方面发动起义的任务。

秋瑾，字璿卿，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77年生[178]。出身小官僚家庭。工诗文，好骑马击剑。八国联军入侵后，忧愤时事，即以身许国。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到日本东京留学，先后参加“共爱会”、“横滨三合会”等组织，并倡办《白话》杂志。年底归国，在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次年，再去日本。过黄海时，有诗明志：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全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省主盟人。她每会必赴，每赴必演讲。同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奋起斗争，秋瑾力主全体归国革命。她曾于讲演激昂时拔出倭刀，插在讲台上，声言：“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179]

1906年春，秋瑾回到上海，协助创办中国公学。9月，与公学教员陈伯平租屋于虹口祥庆里，秘密制造炸药。次年1月，创办《中国

女报》，宣称“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180]。共刊行两期。

其后，秋瑾回到绍兴，住大通学堂，和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约定，在湖南革命党人起事后即出为应援。2月1日，秋瑾亲至金华，联络会党首领。不久，回到绍兴，获悉刘道一及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先后失败的消息，决计独力行事。

3月（正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开学之际，为了表示自己开明，绍兴知府贵福及山阴、会稽两邑县令均到堂祝贺，贵福并赠“竞争世界、雄冠地球”一联。以此为掩护，秋瑾畅所欲为。她往来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军队和浙江武备、陆师、弁目等学堂学生，介绍朱瑞等参加了光复会。4月间，再次游历金华、处州。回绍兴后，函招金华、处州一带会党首领到体育会学习兵操，前后到者约百余人。她将职员分为十六级，用七绝诗“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作标志，黄字为首领，徐锡麟等五人担任：祸字为协领，秋瑾自任；源字为分统，会党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分任；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5月中旬，秋瑾编各地会党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号。她和大家商定，7月6日金华首先起义，然后处州响应，趁杭州清军出攻之际，以绍兴义军奔袭杭州，军、学界中的同志为内应；如果杭州不能拿下，就返军绍兴，由金华、处州进入江西以通安庆，和徐锡麟呼应。未几，秋瑾将起义日期更改为7月19日。

6月中旬，绍兴会党裘文高不待命令，突然召集台州义军，于嵊县西乡集合，树起革命军旗帜，杀死清军数十名。这一过早的行动打乱了起义计划。22、24日，陈伯平、马宗汉先后自安庆到沪，秋瑾自绍兴来会，告以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再次约定于7月6日同时起义。7月1日，上海侦探捕获光复会员叶仰高，叶供出了部分党员的别名或

暗号。端方将这一材料电告恩铭，恩铭转示徐锡麟，徐发现自己的别名赫然在内，感到形势紧张。5日，陈伯平、马宗汉抵达安庆，与徐锡麟密议后定于次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起事。当夜，陈伯平起草了《光复军告示》[181]，以“光复汉族，翦灭满夷”相号召。《告示》指斥清朝政府种种罪由，宣称欲“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徐锡麟所拟“杀律”则提出“遇满人者杀”；“遇汉奸者杀”，“不杀汉官”等条，表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182]。徐锡麟始终不肯参加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思想分歧是原因之一。

7月6日晨，徐锡麟召集巡警学堂学生训话，声言来安庆“专为救国”，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183]，但学生并不明白徐锡麟的意旨。随后，巡抚恩铭、藩司冯煦、臬司联裕等到堂。九时，典礼开始。恩铭等刚就座，收支委员顾松急步趋前，意欲告密。徐锡麟见事急，向前行举手礼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正惊愕间，徐锡麟已从靴筒内拔出手枪两支，以左右手同时向恩铭施放。因为近视，不知道是否命中，便连续发枪。恩铭身中七弹，被侍从匆匆背走。徐锡麟等处死了顾松，拔刀而出，走到礼堂，拍案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抓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不知所为。徐、陈、马三人执刀、持枪，挟持着学生进至军械所，取出枪炮，多不能使用。这时，清兵已将军械所包围，冯煦等悬赏七千金捕拿徐锡麟。自十二点钟激战至下午四时，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俘。

审讯中，徐锡麟抗对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说：“你还在洋洋的，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继而徐锡麟问：“恩铭如何？”联裕等骗以仅受微伤，徐气泄，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听到这句话，徐锡麟忽然领悟，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

下。接着，徐锡麟执笔自书供词，指斥清政府立宪其名，而集权、专制其实，声言“专为排满而来”，“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供词中，徐锡麟也暴露了他和孙中山的矛盾，声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184)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行前，先拍小影，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死后，清吏竟把徐锡麟的心挖出来，祭祀恩铭，肝则被恩铭卫队炒食，表现了无比的野蛮。

8月24日，马宗汉被杀。

徐锡麟事前几乎没有做任何发动和组织工作。“一士披猖海岳惊”(185)，徐锡麟个人的英雄行为使清政府不少官僚惶惶不可终日，端方声称：“令人防不胜防，时局如斯，惟守死生有命一语，坐卧庶可稍安。”(186) 但是，这种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冒险，根本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安庆方面既失败，秋瑾就岌岌可危了。

还在徐锡麟被捕之际，绍兴知府贵福就得到劣绅胡道南的告密，于7月7日赶赴杭州，面告浙江巡抚张曾敭。由于秋瑾社会影响大，张曾敭下不了决心，征询了巨绅汤寿潜等人的意见，才决计逮捕秋瑾。

7月10日，秋瑾从报上看到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忧泣内室。校中诸生计议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城，而后再图其余，秋瑾坚主须待王金发嵊县兵到。此后，秋瑾分遣学生二十余人往杭州城埋伏。7月12日，秋瑾得到杭州密信，知清兵将到，就指挥大家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次日，王金发从嵊县来，和秋瑾商量，定于7月18日统军入绍兴。午后，杭州清兵进入绍兴，有人劝秋瑾离校暂避。秋瑾决心殉难，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187) 她遣散了最后一批同志，毅然留守大通。不久，贵福率领清军，

包围大通，秋瑾等被捕。当贵福提审时，秋瑾百问不答，仅云：你也常到大通，并送过对联。贵福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秋瑾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贵福又改派幕客余某严刑逼供，秋瑾只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7月15日清晨四时，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牺牲后，舆论哗然。浙江进步人士筹议上控，江苏进步人士和留日浙江同乡会通电抗议，上海《神州日报》发表《论吾侪对于浙江省黑案应有之办法》等论说。8月15日（七月七日）陈去病拟在上海召开秋瑾追悼会未成，组织神交社，成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前身。1908年2月25日，徐寄尘、吴芝瑛、陈去病为秋瑾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并组织秋社。

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一位杰出的女英雄，中国人民永远地尊敬和纪念她。

三　四川泸州、成都、叙府之役

孙中山虽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中国南部边疆地区，但是，也没有忽视四川。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即指示四川主盟人黄树中：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并说：应以新旧同志与民间会党并力举事。此后，黄树中等即邀请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来日本与孙中山会谈。佘英（1874—1910），贫民出身，“家务农”[188]。自幼参加袍哥组织，青年时撑船为生。后考中武秀才，任泸州团练局队长。在革命风潮影响下，读到《革命军》、《警世钟》二书，深受感动，“拿在泸州茶馆酒店讲演，想唤醒汉人起来革命”，受到禁止后，又持书到乡场讲演[189]。1906年7月，佘英到达东京，加入同盟会，会见孙中山、宋教仁等。他表示：“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举事时，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连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190]孙中山委任其为西南大都督，并嘱谢奉琦、熊克武等协

助。

同年9月，同盟会员李实谋在江油起义，事泄未成。李实为四川绵州人，到上海经商时加入同盟会，不久弃商回川，遍历龙安、绵竹、保宁、顺庆等地，宣传排满革命，散财募集数百人。江油事泄后率众退至剑州小燕山，旬日之间，发展至千人以上。清四川总督锡良闻讯，调巡防营围攻。李实率部拒战数日，不幸牺牲。

江油、剑州之役是和同盟会组织没有联系的孤立起义。之后，佘英、谢奉琦、熊克武等先后回到四川，在成都草堂寺集会，议决分头发动：黄树中、张培爵、谢持等联络学界，秦炳、饶国樑、程德藩、伍安全等联络新军武备学堂及弁目队，佘英、曾省斋、黎靖瀛、余切等联络会党。

佘英、熊克武等确定的第一个发难地点是泸州。该地为川南重镇，交通便利，又是佘英的家乡，会党实力雄厚。为了活动方便，熊克武经佘英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初时计议乘端午赛龙舟时起事，后因成都党人要求，改于1907年11月14日（十月初九）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时同时并举。

准备过程中，熊克武、黄树中等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树中重伤，经医治得活，自此改名黄复生。兴隆场的爆炸事件引起了清吏注意。同时会党以为革命就是做皇帝，上自叙府，下至宜昌的船夫中纷纷传言："佘大哥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191)] 仅泸州一地旅馆中就挤满了乔装商贩的数千会党，风声日大。泸州知州杨兆龙闻讯，在衙内密布持械堂勇，邀佘英议事，阴谋擒捕。在单人赴会时，佘英得堂勇密语："水涨了！"乘机逃出。起义因之提前到11月6日，首在泸州近城江安发动。

先一日夜半，江安县署刑房典吏戴皮举火为号，不料县令事先已有戒备，一面扑火，一面闭城搜捕，并用站笼绞死戴皮父女。同时，

泸州也闭城戒严，大索党人。佘英等放舟江中聚议。因外援已失，敌人又已有备，佘英主张放弃原订计划。但有人主张立即举事，并讥笑佘英怕死。佘英是个热血汉子，受不得这种讥笑，立即跳江自明，旋被救出。

泸州起义夭折，熊克武等即奔赴成都。按清例，11月14日夜，总督以下大员都将于会府集合，庆贺慈禧太后生日。革命党人计议于此时炸毙全部与会官员，同时四门放火，一举占领成都，传檄而定各府州县。余切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数万会党立刻可以招致。他的话给了众人以勇气。

至期，新军、巡防营、督署卫队中的同盟会员做好了战斗准备，余切招致的会党四千余人也分别在各旅馆整装待命，起义号火已经泼油升发。但清吏突然改变了朝贺地点，并于附近戒严，断绝交通。谢持闻讯，奔到革命党人住处，下令扑灭号火，并召开紧急会议。黄方坚主按原约发动，如失败，就率队南下，和佘英等会合。多数与会者认为官府已有戒备，不必作无谓牺牲，决定改期。当即通知各路停止发动，并千方百计筹措银两，遣散会党。

事后，熊克武、谢持等被通缉，伍安全被杀，黄方、杨维、黎靖瀛、张治祥、江永成、王秉璋六人被捕，时称“六君子”。

成都起义失败，四川革命党人又决定在叙府举事。以1908年1月26日为期。推谢奉琦入叙主持，推佘英、熊克武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发动会党。并由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等，希望得到二百余名堂勇的助力。预定起义的这一天傍晚，谢奉琦通知熊克武，刘绍峰等已被知府逮捕，起义无成功希望，只好停止。其后，谢奉琦回到家乡自流井，被清吏收买叛徒诱捕，英勇牺牲。

一连串的失败使四川革命党人冷静了下来。同年2月，佘英、熊克武等集会隆昌，总结失败教训，决定赴日购械，建立同盟会自己的

武装，以便起义时作为先锋和主力军。

自萍、浏、醴起义开始，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达十余次，遍及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就其规模、声势和发展的速度而论，它远远比不上太平天国一类旧式农民起义；但和兴中会时期相较，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它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清朝统治者的宝座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这一时期，同盟会发动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仍然是会党。会党具有较强烈的反满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小生产者以至流氓无产者的弱点。革命党人对会党利用多，教育和改造少，往往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他们起义，因此，经常出现盲动冒险、自由散漫、不能坚持乃至贪利忘义等现象。这样，就使得革命党人日益对会党感到失望，片面地认为他们“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192)]，而不能正确地、恰当地认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后，革命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新军。

---

(1) 见明治三十八年12月7日该报，中云：“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令，此亦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他们的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

(2)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民报》第2号。

(3)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1册，台北版，第169页。

(4) 《演说录》，《民报》第6号，1—10页。

(5) 转引自章太炎：《答梦庵》，《民报》第21号，第127页。

(6) 恨海：《来函》，《民报》第5号，第133页。

(7) 《宋教仁日记》，第303—304页。

(8) 《本社特别广告》，《民报》第19号广告栏。

(9) 《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新世纪》第79号。

(10) 《东京〈民报〉之诉讼》，《神州日报》，1908年12月4日。

(11) 《太炎最近文录》第110、111页。

(12) 《东京通信》，《神州日报》，1908年11月5日。

(13) 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7月18、29日、9月21日、10月31日。

(14)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第20页。

(15)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58页。

(16)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第21页。

(17) 《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第30页。

(18)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第13页。

(19)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5号，第3页。

(20) 《叙例》，《国风报》第1年第1期。

(21) 佛公：《答精卫书》，《新民丛报》第85号，第103页。

(22) 耡：《论国会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3日。

(23) 豕韦之裔：《普告汉人》，《民报》临时增刊《天讨》，第28—29页。

(24)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10号，第20、32页。

(25)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6页。

(26) 去非（胡汉民）：《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中兴日报》，1908年9月21日。

(27) 嗣轩：《〈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复报》第3期。

(28)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第19页。

(29) 思古：《论满洲当明末时代于中国为敌国》，《民报》第20号，第6页。

(30)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第32页。

(31) 去非（胡汉民）：《纪十一月四日东京满学生大会》，《民报》第9号，第96页。

(32) 《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第19号，第108页。

(33)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11—12页。

(34)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14页。

(35) 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第41页。

(36) 孙中山语，转引自《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第22页。

(37)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89页。

(38)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7—9页。

(39)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91—96页。

(40)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91—96页。

(41)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22页。

(42)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34—36页。

(43)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第23页。

(44)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4号，第1页。

(45)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7页。

(46)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

(47)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57页。

(48)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61页。

(49)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民报》第3号号外。

(50) 熊范舆：《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新报》第5期。

(51) 耡：《论国会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10日。

(52) 宅仁：《正〈总汇报·定期开设国会为中国自强之基础〉》，《中兴日报》，1908年9月16日。

(53) 去非：《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中兴日报》，1908年8月10日。

(54) 宅仁：《正〈总汇报·定期开设国会为中国自强之基础〉》，《中兴日报》，1908年9月16日。

(55) 辨奸：《驳〈总汇报·论国会与君主之关系〉》，《中兴日报》，1908年10月22日。

(56)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9页。

(57) 《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58)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47页。

(59)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00、109页。

(60) 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5号，第57页。

(61)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1号，第52页。

(62)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17—19页。

(63)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09页。

(64)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85、86页。

(65)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23、24页。

(66)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1、102页。

(67)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13页。

(68)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23—126页。

(69)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1页。

(70)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页。

(71)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3页。

(72)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页。

(73) 《土地国有与财政》，《民报》第16号，第35、45页。

(74)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34页。

(75)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1号，第5页。

(76)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0号，第22页。

(77)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

(78)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46页。

(79) 《民报》第2号。

(80)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2、45页。

(81)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2、45页。

(82)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48页。

(83) 饮冰（梁启超）：《仲遥〈社会主义论〉前言》，《新民丛报》第89号，第36页。

(84)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第4—5页。

(85) 汉民：《与〈国民新闻〉论支那革命党书》，《民报》第11号，第132页。

(86)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9号，第80页。

(87)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4号，第58页。

(88) 辨奸（胡汉民）：《斥保皇党欲借外患防内变之毒计》，《中兴日报》，1908年11月15日。

(89)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44页。

(90)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号，第25页。

(91) 精卫：《驳革命可以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3页。

(92)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号，第31页。

(93)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35页。

(94)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95) 孙中山语，转引自辨奸（胡汉民）：《斥〈新民丛报〉之谬妄》，《民报》第5号，第71页。

(96)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46页。

(9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61、62页。

(98)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民报》第3号号外。

(99)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

(100)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第34页。

(101)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0页。

(102)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报》第24号，第35页。

(103)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第32页。

(104)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报》第24号，第35页。

(105)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9—60页；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一103页。

(106)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5—36页。

(107)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5—36页。

(108)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第71页。

(109) 《与佛苏我兄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1

页。

(110) 《致蒋观云、徐佛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11) 《新民丛报》第83号，第76、79页。

(112) 《宋教仁日记》，第322页。

(11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0页。

(114) 《致蒋观云、徐佛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41页。

(115) 高旭：《无尽庵遗集序》，见周实：《无尽庵遗集》卷首。

(116) 陈去病：《南社长沙雅集纪事》，《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

(117) 恨海（田桐）：《来函》，《民报》第5号，第140页。

(118) 《保皇党演说大失败详志》，《中国日报》，1907年11月4日。

(119) 但懋辛：《同盟会会员与保皇党分子在日本的几场战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4页。

(120)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92号，第23—24页。

(121)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85页。

(122) 《龚春台传》，萧作霖：《浏阳烈士传》。

(123) 《魏宗铨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

(124) 《萍乡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营管带胡应龙禀赣抚文》，《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2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49页。

(126) 《萍乡知县张之锐和团防局绅李有如会禀电》，《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127)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九日。

(128)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129)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130) 《萍厂林道电赣抚》，《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13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54页。

(132) 《萍乡县上赣抚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82页。

(133)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134)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35) 《湖广总督张之洞致军机处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99页。

(136) 《军机处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电旨》，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502页。

(137) 《午帅电湘、赣抚》，《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38)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39) 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140) 《孙毓筠供》，《神州日报》，1907年5月1日。

(141) 《笔谈残稿》，《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172页。

(142) 湫，一作秋。

(143)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144) 关于浮山一路未能集合的原因，说法不一。刘士辉等《潮州黄冈革命事实》认为是由于“丘松、薛金福等机谋不密”；冯自由《革命逸史》认为是由于“风雨大作”，此据许雪湫《致孙中山电》，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145) 《神州日报》，1907年6月5日。

(146) 《京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147) 《神州日报》，1907年6月16日。

(148) 《论黄冈剿匪之办理不善》，《神州日报》，1907年7月30日。

(149)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8页。

(150) 《华侨与中国革命》，台北，1963年9月版，第117页。

(151) 《惠州大骚动续纪》，《神州日报》，1907年6月28日。

(152) 《寄军机处电》，《周慤慎公全集·电稿》，第16页。

(153)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19页。

(154) 关仁甫述：《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2号。

(155)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156)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157)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13日。

(158) 关仁甫：《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2号。

(159) 宫崎滔天：《孙逸仙其仁如天》，日本《中央公论》1911年11月号。

(160)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总395页。

(161) 郑惠琪等口述：《镇南关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35页。

(162) 《寄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电旨》，军机处电寄档。

(163)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8年2月12日，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印支，B11（37）。

(164) 《神州日报》，1908年5月13日。

(165) 《中兴日报》，1908年6月6日。

(166) 《中兴日报》，1908年6月6日。

(167) 关仁甫述：《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3号。

(168) 《驻法公使刘式训致外交部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电报档。

(169) 《蒙自法国代领事致法国驻香港领事》，1908年5月21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n．s．238。

(170) 《云南留日革命党之宣言》，《中兴日报》，1908年6月22日。

(171) 《宋教仁日记》，第248页。

(172)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73)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74) 《宋教仁日记》，第356页。

(175) 《京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176) 白逾桓：《程家柽革命大事记跋》。

(177) 《雪生年录》卷1。

(178) 关于秋瑾生年，有1875、1877、1879三说，此据《秋瑾自书兰谱》，《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65页。

(179)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10页。

(180) 《发刊词》，《中国女报》第1期。

(181) 《马宗汉供》，《神州日报》，1907年7月17日。

(182) 《革命党首领徐锡麟示》，《神州日报》，1907年7月29日。

(183) 《丁未安庆徐锡麟之役》，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40页。

(184) 《徐锡麟供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46页。

(185) 景墨：《皖警》，《神州日报》，1907年8月8日。

(186) 《大事记要》，《云南》第9号。

(187) 王璧华：《秋瑾成仁经过》，《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188) 《佘俊英传》，《革命人物志》第2集，台北版，第377页。

(189) 《佘竟成自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190) 《宋教仁日记》，第211页。

(191)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31页。

(192)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五

集，第229页。

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城乡人民的广泛斗争

伴随着同盟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广大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普遍高涨起来，达到了空前广泛的程度。在这期间，群众斗争的次数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上升为266次。斗争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抗捐抗税和抢米骚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甚至掀起了武装暴动；罢工、罢市层出不穷；反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时有发生。这些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预示着民主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的重视程度，与同盟会成立之前比较，有一定的提高。他们不仅曾利用群众斗争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过几次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钦廉防起义以及饶平黄冈起义等，而且一些革命党人还多次试图将群众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对群众斗争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尤其漠视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重大意义。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深厚巨大的革命潜力，他们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力军。而革命党人过多地注意了农民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因而忽视了在农民群众中展开长期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当然更谈不到从组织上进行强有力的领导。由于上述原因，这个时期的群众斗争仍然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历史证明，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只有在先进阶级的

领导下，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担负不起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尽管自发的群众斗争和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交错迭出，互相激荡，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但是，两股力量始终未能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冲锋陷阵。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无力战胜强大反革命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抗捐抗税和莱阳民变

清末的最后几年，民族灾难日趋深重，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腐败的清政府为了偿还外债和举办“新政”，不断增加捐税，大大地加重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除了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茶、烟、酒、糖等税和中央施行的八省土膏统捐、印花税等外，各省举办的新税、附加税的名目之多，不胜枚举。以江苏苏州牙厘局为例，单是它所经办的各种捐税名目就有：百货捐、茶业捐、茧捐、丝经捐、用丝捐、黄丝捐、米粮捐、花布捐、烟酒捐、皮毛捐、牲畜捐、竹木捐、磁货捐、药材捐、厂纱捐、加抽二成茶糖捐、加抽二成烟酒捐、烟酒坐贾捐、续加二成烟酒捐、续加烟酒坐贾捐、烧酒灶捐、新加烟酒坐贾捐、船捐、随丝带抽塘工捐、随丝带抽工帐捐、随丝带抽饷捐、茧行分庄印照捐、机捐，计达二十八种[(1)]。其中单是烟酒捐就有六种之多，可见诛求何等苛酷。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工商业者。至于对农民更是不能放过。在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项下，多次加抽附加税，而附加税总是没有限制的。例如盐斤一项，清政府规定盐斤加价不过两次，每次加价四文，这个负担已经不轻。但各省在盐斤项下，另外又有许多加征和复征。如直隶就有豫引加价二文，本省加价一文，抵补药税加价四文，新增加价四文，津浦路加价四文等名目。粮捐也是这样，各省都可随意征收铁路粮捐加价，自治经费粮捐加价，学务、警务粮捐加价等，超过明文规定不知多少倍。

统治者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横征暴敛，其大小官吏也就借机贪污中饱，充实宦囊，所以捐税名目便越来越多，越来越奇，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如广西梧州实行“遇物加抽”，江苏甚至鸡鸭鱼虾猪肉茶栈，“几乎无物不捐”。赵尔巽在东北巧立名目，有斗秤捐、厘捐、河口粮税、河防税、营口八厘捐，东边粮货、山货各税，各边门门捐，沿铁路火车税，等等。总之，在清末几年中，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造成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经常面临破产的威胁，因而不断激起他们的反抗。抗捐抗税斗争几乎无地不有，无时不有，成为群众自发斗争最普遍的形式。斗争的次数与日俱增，规模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卷入斗争的群众极为广泛，社会成分也相当复杂。基本群众是负担捐税最重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正是这些阶层的生活状况显著恶化，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反抗情绪。一些中小地主由于苛捐杂税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某些地区，斗争是在受地主绅士控制的联庄会之类的合法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种情况，深刻地反映出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相当薄弱了。

在清政府统治比较严密的北方各省，由于滥征捐税，人民普遍郁积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1906年，山东省“细民无以餬口，思乱者十室而九”[(2)]。山西省各地流传着一首民谣说：“三月四月旱，五月六月乱，七月八月烂（时事糜烂），九月十月换（换朝代也）。”[(3)] 民谣的内容明显地反映出广大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就在这一年，直隶省元氏县会党散发揭贴，号召抗税暴动。同时，东北三省各地也不时发生抗缴捐税的斗争。奉天岫岩县农民反对加征盐税，聚众打死督销委员。营口附近农民要求减捐，“沿河七十八屯村民往往自缚请命，如是者约有半年之久”[(4)]。虽然这是一种和平请愿，但反映出当地农民对苛捐杂税的深恶痛绝。凤凰厅、安东一带，官吏借清查地亩敲诈勒索，农民先是聚众向官府恳求，后来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参加者达数千人。吉林酒商全体“歇业”，抗议烟酒税加征。

同年，在南方各省也掀起一系列的抗捐斗争。江西瑞昌县乡民聚

众数千人将厘税分卡捣毁，当知县领兵前往弹压时，乡民揭竿而起，与兵勇格斗。安义县农民抗议地方官征收钱粮附加税，千余人将县署拆毁。贵州都匀府苗民结伙闯入府衙门，抗议征收杂税。浙江武义县会党率领乡民反对加税，进城大闹县署，将兵勇和差役赶走，并释放了囚犯。后被清军镇压。

浙江余姚县北乡农民于1907年拆毁捐局。同年，萧山、嘉兴一带农民抗缴丝捐，殴巡丁，砸厘卡。定海厅农民反对加征捐税，四千余人冲进城内，毁官署、学堂及教堂。黄岩县农民将土捐局夷为平地。平湖县商人罢市，反对加征茶捐。淳安县农民抗学捐，围县署。海宁州官吏借漕折勒索农民，激成民变，万余人进城捣毁厘卡、警局，并抢店铺及富绅住宅。附近桐乡农民闻风而起，二千余人闯入县城，将县署捣毁。奉天辽阳地方由于课税过重，“人民愤激，聚众三万余人，起而反抗”[(5)]。全省因之震动。1908年，福建建阳县农民在五谷会（又称神农会）的领导下，聚集二千人，要求蠲免各项苛捐，“袭近城郊”，被守城清军击退[(6)]。

为了创办巡警，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各省大都开办了警捐。直隶省办巡警比较有“成效”，警捐十分繁重。因而反对征收警捐的斗争也非常激烈。1907年，先是蔚县巡警传习所被群众捣毁。接着，平山、灵寿等县农民抗缴警捐，痛殴下乡催捐的差役。有些州县地主控制的联庄会也卷入斗争，如冀州联庄会拒绝纳捐，掀起轩然大波。这次抗警捐风潮，此伏彼起，延续数年之久，直到1910年，青县、遵化等地还屡有发生，其中遵化县农民万余人一度包围县城，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这一连串的反抗斗争，充分表明广大人民对清政府创办巡警、强化统治机构的深刻不满和仇恨。

同时，由于清政府搞立宪骗局，各省相继举办所谓“地方自治”，借调查户口、钉门牌等，按户敛钱，骚扰群众。因此激起普遍反抗。据不完全统计，仅1909年至1910年就有三十余起。主要发生在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其中规模较大的

有：江苏吴县各村镇农民反对调查户口，将自治分局及办事员房屋捣毁，殴伤调查员。如皋县乡民聚众数千人索取调查户口册，拆毁调查员房屋。该县县丞前往弹压，官轿被砸烂，县丞仅以身免。安徽南陵县警察局被群众捣毁，被迫停办户口调查。因反对钉门牌和查户口，广西归顺、镇边、天保各县农民“骚动”，“扰及城厢”。广东连州乡民在李观海的领导下，聚众数千人，与清军对抗。江西丰城商人罢市，抵制调查户口。直隶迁安自治局董事借调查户口为名，向乡民勒索规费不遂，无理拘押乡民，因而激起民愤，数千乡民围城“滋闹”。这一系列的斗争说明，清政府所搞的“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注意到这一斗争，曾计划乘机发动起义。1910年，他由日本抵新加坡后，致邓泽如函中说：“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时图大举。”(7)

这个时期，各地砸学堂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浙江、江苏、直隶等省尤为严重。如1910年，浙江上虞县农民反对征收学捐，聚集两千余人将城内学堂、劝学所、教育会等机构全部捣毁，办学绅董房屋亦被焚。江苏盐城县劝学所及附设小学堂多所均被群众拆毁。直隶易州农民四五千人冲进县城，将自治局、中学堂付之一炬，并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敛派钱文”等八项条件，迫使知州应允。此外，发生捣毁学堂的地方还有：浙江会稽、奉化、慈溪、处州，江苏太仓、宜兴、扬州等州县。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客观上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本来是应得民心的好事。但是清政府官吏和劣绅往往借口办学，抽收学捐，徇私枉法，因而激起群众的不满。群众反抗苛捐杂税完全是正义的，但捣毁学堂的做法，则反映了群众斗争中的自发性和落后性。

各省人民的抗捐抗税越来越激烈，至1910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较大规模的斗争就有109起，其中以山东莱阳人民的斗争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久。

自清政府推行新政以来，莱阳地区除缴纳正赋之外，还附加地亩捐，农民种麻一亩，缴大钱五千文，花生一亩缴四千文，瓜芋蔬果之地均加税有差。此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自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8]。加上1910年春又遇荒歉，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9]。更为严重的是县令朱槐之与该县号称“四魔”的大劣绅王圻、王景岳、于赞扬、张相谟等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赴四乡催缴捐税，敲诈勒索，额外多收，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求生不得。各乡农民议提历年积谷救急。这些积谷摊自农民，各村社自行存储，以备荒歉时取用。但发现积谷已为劣绅王圻等贪污盗卖，亏损甚多，于是乡民哗然。这件事便成为抗捐风潮的直接导火线。

这次斗争是在联庄会领导下展开的。这年春天，城北柏林庄社长曲士文首先组织联庄会抗捐。曲士文曾当过塾师，是一个素负众望的人物。他对劣绅王圻等人早已不满，便挺身而出，联合城北永庄社长于祝三等，在唐家庵地方聚众五十余人，拜盟立会，宣布反对“新政”，抗不交捐，形成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核心。村民闻风响应。5月21日，五六千人在城西关帝庙集会，群情激忿，纷纷要求清算积谷，追回各项捐款。群众集会后，便在曲士文的率领下，冲进县城，将县署团团围住，提出悉免杂捐，清查积谷，征收钱粮铜元不折扣，革除劣绅及不许巡警出城鱼肉乡里等项要求。朱槐之见众怒难犯，吓得藏匿起来，不敢露面，派一名绅士代表他答应了农民提出的各项要求。农民各自散去。但是，这只是朱槐之的缓兵之计，暗中他却“飞禀请兵”[10]。乡民闻讯，怒不可遏，万余人于6月12日又冲进城内，包围县署。朱槐之见农民的声势浩大，便将过去的一切扰民苛政都推到劣绅身上。于是，农民一齐拥到巡警局董王景岳的家中，将其住宅付之一炬。

不久，朱槐之因“弹压不力”被革职。继任知县奎保到任后，将朱

槐之答应农民的各项要求一律取消，下令照收各项捐税。同时出示缉拿曲士文等，并致电山东巡抚孙宝琦，说“莱民抗拒新政倡乱，勾结匪党滋事”。孙宝琦立即派候补道杨耀琳督率巡防军两营和常备军两营到莱阳镇压。巡防营分驻各村庄，奸淫抢掠，大肆骚扰。各乡农民在联庄会的领导下，“执耰锄以为抵御”，城北十三社乡民“闻兵至，益愤”，曾聚众围城[11]。此后，为防清军报复，乡民数万人自带食物，聚于九里河一带。6月初，杨耀琳率清军血洗九里河、柏林庄、马山埠等村，屠杀乡民千余人，焚毁房屋八百余间，将抗捐斗争镇压下去。侥幸生存的农民“露宿风餐，靡所栖止”，“老幼男女，嗷嗷如鸿，饿殍蔽野”。清军的残暴达到了极点。

曲士文被迫逃离家乡，长期流亡在外，直到辛亥革命后1914年日本军队占领胶东半岛，他才潜回莱阳，准备聚众抗日，不幸被捕遇难。

清军血洗莱阳人民的暴行，使全国各阶层震动。山东省谘议局为此开会讨论，议员王志勋、丁世峄、周树标、张介礼、尚庆翰等五人，以同情莱阳人民，被议长指为“曲党”，愤而辞议员职。山东旅京官绅柯劭忞等也联名递公呈给都察院，指出莱阳“酿成祸乱，当归咎于贪官劣绅”，并要求将有关官吏“分别撤职严办”[12]。孙宝琦被迫自请罢黜，清政府未予批准。但是，清政府不得不于11月7日颁发上谕，承认“官绅办理不善”，“激成变端”，将候补道杨耀琳、知县奎保等“即行革职”，以平息各方的愤怒。

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莱阳人民的抗捐斗争，却无法扑灭全国各地的抗捐烈火。正如当时报纸所论述的：“二十二省之中，乱机遍伏，是以半岁以来，变乱四起，长沙之事，举国震动。乃者，莱阳民变之事又见告矣。夫区区一县之乱，何损于天下之大势？顾不能不懔懔过虑者，盖察事变所由起，验今日之民心，近征之道光之末年，远鉴之秦、隋之季世，则土崩之势，今已见端。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窃恐踵莱阳而起者，祸变相寻而未有已也。”[13]就在莱阳民变期

间，与莱阳连界的海阳县农民因不堪贪官“私行加赋，纵役骚扰”，同时掀起了反抗斗争。起事农民七百余人自乳山口登岸，“潜入莱阳，分赴各村，自愿相助曲士文起事”[14]。荣城农民骚动，与莱阳“连成一气，互相援助消息”[15]。福山、潍县一带贫民四出抢地主囤粮。曹州府濮阳县城东王家店一带农民千余人“骚动”，声称“为曲士文等复仇”[16]。与此同时，直隶易州，云南昭通，广东香山、连州，河南永宁、密县、长葛，广西南宁府，湖北汉阳，浙江武康、嵊县、黄岩，以及江苏北部各州县，到处燃起熊熊的抗捐烈火。如火如荼的抗捐抗税斗争，与遍及全国各地的饥民“抢米骚动”互相激荡，有力地震撼着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二　抢米骚动和长沙饥民暴动

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饥民抢米骚动又席卷了全国。

自1905年以后，全国许多地区灾荒频仍，如1906年春夏间，长江中下游淫雨连绵。湖南各地堤岸溃决，洪水横流，仅衡州、永州、长沙、常德四府死者三四万人，被灾者三四十万人。由于灾荒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变为所谓“饥民”、“游民”，成群结队，流入城镇，以乞讨为生。同时，城镇米价暴涨，贫民求生无路。岌岌不可终日的景象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饥民人数的迅猛增加，是清末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的突出反映。各地饥民，为了从绝路中谋求生存，聚众抢米和吃大户的事件迅速蔓延开来，遍及全国各地。斗争的规模小则数百人，大至数千人或数万人不等，而且次数也愈来愈多。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09年每年不过十余起，至1910年骤然增至五十余起。其中尤以灾荒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各省最为激烈。在这些省里，引起“骚动”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地主粮商囤积居奇或外运粮食。

1906年5月间，杭州城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砸米店风潮。5月22日，数以千计的贫民徘徊于杭州街头，等待购米为炊。米商为抬高物价，拒绝售米。贫民忍无可忍，遂以搜查为名，抢砸米店，全城立即

陷入混乱，并波及到萧山县临浦镇等地。后来，官吏被迫出示平价，禁止米商囤积，抢风才平息下来。6月初，安徽米商赴江北采购漕米三十船，在靖江六圩港被抢。南陵县饥民聚众拦抢运粮船，当官吏镇压时，群起捣毁衙署。江西奉新县饥民强行阻止米谷外运，并抢富户及当铺。江苏宝应县富绅囤米居奇，贫民恨之入骨，于7月间聚众捣毁其住宅，又围攻县署，痛殴官吏。8月，震泽县（今吴江县震泽镇）饥民捣毁平粜局，抢米店。在这一年里，扬州、苏州、无锡、金坛等地普遍出现粮荒和“饥民骚动”。

此外，佃农的抗租斗争也时有发生。据报载：苏北丰、沛及砀山等县，佃农“聚众滋闹”，拒不纳租[17]。长州知县贴出告示，命令佃农按时交租，并威胁说：“如敢聚众造谣，定必访拿严办。”但广大佃农“借口荒歉”，仍然恃众“抗不完租”[18]。昭文县也发生所谓“愚佃抗租”事件[19]。松江县佃农联合起来，拟定抗租章程，约定粒米不交，如有违章者，“众必碎其舟，火其庐”[20]。类似的抗租斗争，在此后数年间全国各地农村屡有发生，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激烈。这表明在广大农村中（特别是地租剥削最重的江浙地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1907年春，江苏、安徽及浙江的灾情更趋严重。苏北淮海一带，因上年秋季颗粒无收，灾民以树叶和草根充饥，甚至发生“食婴之惨闻”[21]。饥民求生不得，四处流动。3月初，饥民万余人哄抢高邮大地主杨某家所藏粮米，捣毁其宅院。扬州、南通一带饥民结伙吃大户成风。上海及其附近各县饥民成群结队，抢富户，拦截米船。在号称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饥民张贴匿名揭帖说：“年岁饥荒，米价高昂，官富无状，贫苦难当，约期已定，砻坊供粮，若有阻隔，拚命抵偿。”[22]

此外，在1907年至1909年间，发生抢米风潮的地方还有：浙江余杭、绍兴、萧山、奉化、长兴、仁和、富阳，江苏江阴、阜宁、丹徒、丹阳、镇江，安徽霍山、六安、寿州、繁昌、当涂，以及广东东

莞等地。其中有的地方由抢米发展成为暴动。如1909年丹阳灾民数千人冲进县城，捣毁县署，焚烧盐栈和豪绅房屋，后来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

1910年夏秋之际，南北各省又遭水灾，灾区广袤达数百州县，灾情极其严重。东三省水灾遍地，黑龙江省被淹地共三十余万垧，难民达十五万余人。奉天省安东、宽甸、凤凰厅、庄河厅一带灾民流离失所，饥寒煎逼，纷纷铤而走险，四出抢粮。官府弹压无效，只好“任贫民盘查照分，一般粮户只有忍气吞声以听之而已”[23]。长江中下游各省淫雨连绵，河水陡涨，漫堤决口，致成巨灾。因此灾民数量猛增，抢米抢粮风潮不断扩大。在江苏省，这一年最突出的是苏北一带饥民抢面粉公司的事件。

由于灾荒和投机商人的操纵，苏北各地粮价暴涨。小麦每石光绪初年售钱两千数百文，而今涨至八千余文。加以传言面粉公司将粮食“尽行运往外洋”[24]，各地饥民遂蠭起围抢面粉公司。首先，海州、安东、沭阳等地饥民四万余人流入海州城内，将海丰面粉公司包围，“求食滋闹”。厂勇开枪打死饥民九人，伤二十余人。饥民怒不可遏，截夺该公司运麻袋车，放火焚毁，并将赣丰饼油公司豆船八艘，“爬抢净尽”[25]，全城秩序大乱。海州知州一面急忙请求调拨马步营队弹压；一面广设粥厂，分批资遣饥民出境。与此同时，清江浦附近饥民万余人流入城内，向大丰面粉厂索麦，遭厂方拒绝后，遂冲入工厂抢夺，并将厂房机器捣毁。江北提督王士珍一面派兵驱逐饥民，保护工厂；一面命令该厂将存麦制成粗面，尽数平粜，事始平息。接着，宿迁城内贫民和附近饥民万余人聚集永丰面粉厂门前，要求借麦，厂方不允，饥民遂纵火焚毁厂房机器，抢取存麦。护厂巡兵见饥民来势汹汹，均不敢放枪弹压。地方官亲往现场劝谕，“饬令该厂司事将存麦交县平粜，群情始服”[26]。

与江苏比邻的安徽更是“饥民遍野”。皖北一带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饿死者不计其数，而官绅竟不闻不问。因此，和州、当涂、铜

陵、南陵等地抢米、吃大户成风。在皖北还发生大规模的饥民暴动，饥民首领李大志于1910年9月在蒙城起事，开始“仅百余人，逾二日，聚众数千”[27]。同时，涡阳、怀远、凤阳及宿州等地饥民纷纷响应。他们分路抢粮，劫富济贫。安徽巡抚急忙咨调河南常备军防堵。各地饥民英勇抗击清军。至10月，李大志不幸被团练捕杀，饥民星散。

长江下游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中游两湖地区。在这里出现了更为激烈的群众斗争场面。

1909年，湖北省洪水泛滥，灾区广达三十余县，灾民近三百万。各地灾民流入城镇，踯躅街头，以乞讨为生，靠赈济过活。仅流落汉口的饥民就有二十万，“均栖息于沿途墙屋之下，遇风雪日，多遭冻毙”[28]。清政府害怕饥民与革命党人结合，急忙在各属设立粥厂，进行赈济。但所施放的赈米，又多被贪官污吏“浮冒侵蚀”。因此，饥民抢米夺食事件层出不穷。如：枣阳饥民群起“抢劫富户”，三四千人聚集县署门前要求赈济。天门、潜江一带饥民约三千人流入沔阳新堤镇，向商店“勒索米粮，恶讨盘费”[29]。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分驻各州县弹压，仍然不能制止抢风。有些参加革命党的新军士兵，便趁机联络饥民，播下了革命火种。如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于1911年春被派赴沔阳州，该标所属士兵即往潜江一带，“日与饥民联络，鼓吹革命”[30]。1910年初至1911年春，先后发生饥民抢米索食的地方有：汉阳、石首、京山、潜江、天门、武穴、广济、光化、随州等州县。

湖南省的灾情虽然不如湖北严重，但受灾面积也有二十多县。长沙、宝庆、衡阳等地闹旱灾，常德、岳州、澧州一带遭水灾。全省饥民十余万人，冻饿疾疫而死者，指不胜数。官吏借赈济之名，加紧搜括，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如安乡县令赵延泰以救济为名，将五千石平粜粮全部按高利贷放出，每石收息二斗。湖南巡抚岑春蓂利用职权，支持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挪用公款，搜购各乡米谷，勾结帝

国主义洋行运往外地，以牟暴利。藩司庄赓良和岑春蓂有权力之争，遂利用本地绅商的不满情绪，迫使岑春蓂下令禁止米谷出境。但洋行、米商又哄抬米价，平时每石米一二千文，至1910年4月涨至八九千文。不必说饥民无力购买，一般城镇居民都有断炊之虞。因此常德、宝庆、岳州、湘潭、安化、宁乡、益阳、祁县、武陵、澧州、安福、郴州、湘阴、巴陵、芷江、武冈、新化、永顺、桑植、晃州等数十州县都不时发生吃大户或抢米事件。有些地方饥民与会党结合，聚众起事，“竖旗倡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4月间长沙发生的抢米暴动。

1910年4月上旬，长沙米价一日数涨，“各粮店皆悬‘早晚市价不同’”的牌子，惹起人心惶惶，社会更加动荡。4月12日，长沙南城鳌山庙附近贫民聚集在本地巡警分局门前，要求开粜场，减价售米救命。岑春蓂闻讯，认为是“痞徒闹事”，立即派消防所长龚培林带巡勇前往缉拿。次日，把木匠刘永福逮捕，押往内城巡警厅。这件事激起群众的极大义愤。于是，泥木匠工人立刻联络铁路工人与饥民千余人奔赴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释放刘木匠和降低米价。群众越聚越多，有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营勇等数千人，“势甚汹汹”。长沙协统杨明远、善化县令郭中广、长沙县令余屏垣及巡警道赖承裕等相继赶至，威胁群众说：“如不解散，即照乱民严惩！”并指令差役殴打，企图将群众驱散。群众遂与之搏斗，秩序大乱。各官吏见势不妙，急忙逃走。群众乘势追赶进城。当时长沙城里两湖饥民甚多，均以乞讨为生。群众进城后，便与饥民和城市贫民汇合，为数在一万以上，声势迅速扩大。他们聚集巡抚衙门周围，要求释放被捕诸人和减价粜米。面对这一意外的情况，岑春蓂十分惊恐，遂采取欺骗手段，先出牌示五日内开仓平粜，价六十文一升。群众不答应。于是又改牌示明日平粜，五十文一升，当即被群众将牌示砸毁。群众见要求得不到满足，乃“拥入头门，并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岑春蓂见欺骗无效，便公然调派常备军镇压，打死数十人，伤者甚多。

军队镇压的枪声，立即变为群众暴动的信号。当晚，愤怒的群众揭竿而起，捣毁城厢碓房、米店一百余家，“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尽，并分别派人至各街道鸣锣，勒令各铺户每家悬灯门首，以便往来，次日不准开市……”[31]。14日，全城果然罢市。起事群众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岑春蓂被迫逃往臬司衙门躲避。同时，群众到处搜查囤积米谷，将教堂、洋行、学堂以及洋货商店等都捣毁或付之一炬。一些大官僚和富绅的住宅也被抢一空。各国传教士、洋商都逃上轮船，或避住武汉。

岑春蓂见风潮扩大，束手无策，被迫自请免职。布政使庄赓良署理巡抚后，立即派出巡防队四出巡逻，对所谓“放火拆屋者”，“格杀勿论”。同时，湖广总督瑞澂调遣湖北巡防营两营于十七日来长沙，镇压群众；另外又续调新军第八镇二十九标及炮队两队，在次日赶来相助。长江水师营也调来军舰二十余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炮示威。英、美、法、日、德各国纷纷从汉口、上海调来军舰十余艘，协助镇压。在中外反动军队的武力攻击之下，起事群众被杀害或被拘捕者不下数百人。缺乏组织领导的群众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长沙饥民暴动由要求减价平粜米谷开始，逐步扩大深化，最后发展到烧抚署、洋行、教堂等等，它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与坚决反抗的决心。这次暴动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4月26日，清政府被迫发上谕说：沿江各省米价腾贵，人心浮动，命张人骏、瑞澂等采办米粮，设局平粜。同时，将“肇衅酿患”的地方官吏作了惩处：岑春蓂、庄赓良革职，有关道府县官吏及劣绅也都分别给予处分，或降级调用，或革去功名。继任署理湖南巡抚杨文鼎接印后，一面奉令“严拿倡乱之徒，尽法惩治”[32]；一面为了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成立善后总局，赶办平粜，凑集银约百万两，从外地采购粮食数十万石，会同长沙总商会设平粜坊八处，平价发售，定价每升四十文，仅准贫民按日携带执照购买。平价米谷，终于在人民英勇斗争流血牺牲下得到了。

这次暴动规模比较大，影响比较广。当饥民焚烧抚署时，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二营统带陈强、三排排长陈作新奉命到省城担任警戒，二陈均为同盟会会员。陈作新曾要求陈强乘机起义，但陈强对当时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担心起事不成功，累及身家，不但不表赞成，反借故将陈作新革职。当时，焦达峰等也准备趁机发动起义，并约湖北革命党人同时发动。因群众暴动迅速被镇压下去，未能实现。各地立宪派官绅控制的报刊，也屡次以长沙事件警告清政府，要求尽快实现立宪政治。同时长沙饥民的斗争也影响到国外。如伦敦社会党机关报社论，对长沙人民深表同情，曾说："黑铁已伤中国黄汉之心，赤血将洒神州白日之下。"[(33)] 说明人们已注意到长沙的饥民暴动，预示着中国将有更大的风暴来临。

三　工人的罢工斗争

在这一时期，群众的自发斗争仍以农民为主力军。可是，城市各阶层人民也日益增多地参加进来，积极地展开活动，除资产阶级的活动之外，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日渐频繁。

中国产业工人诞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最早出现在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里。六十年代以后，在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里，产生了另一批产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而且，由于近代工人的前身主要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工人与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中国各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渐成长壮大。到1912年，现代产业工人已有五六十万，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城市，特别是江苏、上海一带。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资水平很低，工作时间长，一般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二至十六小时，而且在雇佣剥削里，保持着浓厚的封建残余，所受压迫极其沉重。

由于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切身痛苦，所以他们从出现之日起就不断地展开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资产阶级倡导的爱国运动和武装起义。如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工人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906年萍浏醴起义时安源煤矿工人也曾参加战斗。同时，他们为自己的生存不得不经常展开罢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规模较大的罢工次数：1905年9次，1906年11次，1907年6次，1908年3次，1909年9次，1910年5次，1911年12次。在这七年间共爆发55次，主要集中在上海。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散漫的，斗争往往失败，无所得或所得甚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905年，上海杨树浦集成纱厂四千余工人罢工，反抗工头的压迫和剥削，并要求发足工资。厂方拒绝开除工头。在“骚动”过程中，工人捣毁了机器，用一些原始的行动来泄忿。厂方叫来大批巡捕镇压，将为首的两个工人拘捕，斗争被镇压下去。同时，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为反对盛宣怀将该厂卖给日本资本家，发动罢工，遭到虹口捕房的镇压。汉口铜货业三千多手工业工人联合罢工，反对资本家减发工资。1906年，上海虹口德商开办的瑞纶丝厂无理扣发工人工资，全厂女工近千人举行罢工，终于迫使厂方照付工资。1907年山东坊子煤矿发生爆炸，一百一十名工人死亡，引起工人罢工，坚持数星期之久。上海元丰、长纶、新大、协祥、勤昌、裕慎、瑞纶各丝厂工人于1909年先后都发生罢工，要求清偿积欠工资或反对增加工时。1911年8月，上海晋昌、长锦、伦华、协和等四厂共两千余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厂方发生冲突，被巡警镇压。

综观上述，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多和生活苦难的加重，罢工斗争日趋频繁。不过，这时的工人群众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或者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或者仅仅是为了改善难于忍受的待遇，进行一些自发的斗争而已。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逐渐成长壮大，它必然要觉悟起

来，组织起来，变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

四　反教会压迫的斗争

这个时期，反教会斗争仍然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人民，所以反教会斗争和反清起义常常交织在一起。许多地方从反教会斗争开始，很快就发展到攻打州县衙门，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媚外的清朝官吏。

1906年2月，福建漳浦县天主教堂借故拘留农民，引起公愤。四乡农民聚众拆毁教堂，知县前往弹压。“乡民乃迁怒县令，挟之入城，并破县狱，囚犯走散一空，城内之耶稣教堂亦被攻毁”[(34)]，全城大乱。闽浙总督崇善急忙派兵前往镇压，捕杀乡民十五人，赔教堂款三万两。同月，河南淮宁县“仁义会”首领吴太山率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捕杀仗势欺人的教民多人。“仁义会”又称“大刀会”，是淮宁、西平、遂平、泌阳等地的民间秘密结社。参加的成员以农民为主，另外还有贫苦知识分子和小商贩等。据《西平县志》记载，“仁义会”“以扫清灭洋为帜”。吴太山是山东人，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创立“仁义会”。当河南巡抚派兵前往淮宁镇压“仁义会”时，吴太山等见寡不敌众，乃避往西平县，后又投奔遂平县“仁义会”首领苗金声。苗金声是遂平八里铺人，家有七八亩地，当过兵，拉过戏班。他和吴太山决定于3月29日在西平县金刚寺起义，部众“千余人，马七八十匹”。后来，转移到遂平县嶲岈山，凭据石寨，抗击清军，并推举张廷得为“开国大元帅”，苗金声为副元帅。不久，南阳总兵率领清军进攻嶲岈山。义军在苗金声指挥下，奋勇迎战。最后因寡不敌众，不幸失败。苗金声逃至鹿邑，被清军捕杀。与此同时，湖北罗田人张正金聚众焚毁安徽霍山教堂。当清军前往镇压时，群众高擎“官逼民变”、“辅清灭洋”旗帜，英勇抵抗，曾一度围攻县城。安徽巡抚咨调河南、湖北两省军队“会剿”，才将群众镇压下去。

这一年，在江西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因办理荏港民教械斗一案赴教堂交涉，法籍传教士王安之逼迫江在他事先拟好的条款上签字，由于江严词拒绝，被王刺伤，因流血过多致死。血案发生后，激起南昌各界人民的愤慨，前往痛哭吊祭者达数万人。一幅哀挽写道：“会垣重地而敢戕官，目中尚有人哉！吁！同僚之耻也，同宗之慼也，同乡之疚也，同种之忧也。”[35] 学界代表散发传单，揭露惨案真相，号召各界人民于2月25日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特别大会，讨论对策。南昌革命团体易知社人士积极宣传鼓动，投身斗争。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前往沈公祠。一时百花洲畔人山人海，所谓“下流社会”的劳动群众占了绝大多数。主持会议的绅士害怕引起暴乱，临时宣布改期集会。江西巡抚胡廷幹又派兵监视会场，不准伸张正义，深恐得罪洋人。这样，已经到会的各界群众便更加愤怒。于是，群众一哄而起，捣毁了沈公祠。随后，便举火烧教堂，城内外英法四所教堂一日之间尽成废墟。杀人凶手王安之被击毙。英法传教士及其家属八人亦被杀。

此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大肆咆哮，说中国人排外。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示威。清政府急忙宣布将胡廷幹撤职，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偕同法国使馆人员往江西查办。经过近三个月的磋商，签订了《南昌教案合同》，清政府被迫把江召棠的被害说是“情急自刎”，竟杀害六名中国人抵命，将地方官吏多人撤职，赔偿教堂银二十五万两。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中国留日学生非常愤慨。同盟会员宋教仁从日本报纸上翻译了《痛诋法人之无道》的论文一篇，名《南昌事件概论》，寄回国内“报馆登之，以壮国人之气”[36]。

1906年以后的三四年间，“焚教堂，戕教士”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1907年5月，浙江象山县乡民捣毁教堂，掀起反教会压迫斗争。6月，四川开县谭汝霖率众“打教堂”，将城内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拆毁。知县率兵镇压，被群众击退。群众很快转向抗捐斗争，将酒捐肉厘各局一概捣毁。9月，江西南康天主教民因勒买攘抢耕牛起衅。

农民黄太盛等为了报仇，设坛学习神拳，并将教堂付之一炬，杀死法籍传教士一人，教民数十人。反教会斗争很快波及赣州、崇义等地。清军前往镇压，群众被捕杀十余人。于是，各乡习神拳群众迅速结成队伍，“黄衣执祯”，围攻赣州城。不久，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1908年，安徽英山县乡民烧毁教堂。此外，先后发生反教会压迫斗争的地方还有：湖北随州、蕲春，山西左云等州县。

综上所述，1906年以后，全国反教会斗争的次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社会影响也不如以前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南昌教案发生后，清政府颁发上谕，再次严命各省文武官吏，切实保护外国人财产及教堂，又命张之洞会同外务部“妥筹民教相安之法”，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内各省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纷纷卷入了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农民自发的反教会斗争，已开始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节　收回利权运动的普遍高涨

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展起来的收回利权运动，一直持续发展，到1906年至1911年间达到高潮。在这几年里，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省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严重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纷纷成立路矿公会或协会，奔走呼号，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本省利权为本省人民所有，不允许帝国主义列强染指的呼声响彻全国。其斗争的锋芒既指向掠夺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指向出卖利权的清政府。在斗争中，各省路矿协会互相支援，试图“联合二十二省组织一国民路矿团体”[(37)]，以便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这表明收回利权运动已由各省分散的、自发的斗争，有逐渐联合的趋势。在斗争激烈的省份，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卷入，形成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运动。

与初期一样，运动的领导权仍然在以绅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手中，他们对内要求实行宪政，对外主张收回利权。这些人与各该省路矿利权的存亡利害攸关。他们不仅往往是收回利权的倡议者，而且在整个运动中居于代表一省人民的重要地位，直接影响清政府和地方督抚的决策。当交涉陷入僵局时，他们又常常借助广大下层群众的力量对帝国主义或清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废除旧约的目的。可是，他们又十分害怕群众斗争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他们始终坚持合法手段，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函电请求、据法交涉的范围之内，即所谓“文明抵制”。他们宁愿忍痛付给帝国主义者以“赎款”，也不愿脱出和平请愿的轨道。资产阶级上层的这种软弱性、妥协性，在斗争尖锐的时刻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则与这些上层人物大不相同。许多同盟会员投身于收回利权运动，他们不满足于合法斗争，在江浙铁路风潮中，甚至企图取得领导权，将斗争引向革命排满的轨道。因此各地斗争比以前更趋激烈。革命党人对斗争的影响不断扩大，是这一时期收回利权运动的显著特点之一。

一　各省收回矿权的斗争

山西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

在全国各地收回矿权的斗争中，山西人民收回盂、平、泽、潞各属矿权的交涉时间最久，影响深远。

自同治年间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德国人）的勘矿报告发表后，山西省的丰富矿藏便为列强所垂涎。英、意、商人于1897年合股成立了福公司[38]，专门揽办中国路矿企业。次年它通过山西商务局签订了承办晋矿合同，获得在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六十年。合同订立后，福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勘查开采。义和团运动后，山西绅商发现与福公司原定合同有碍华人生计，成为山西人民自办矿业的巨大障碍，曾多次与福公司谈判，试图挽回已失利权，但均遭拒绝。于是，在山西巡抚张曾敭等支持下，绅

商即于1905年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借以抵制福公司。然而，福公司依靠英国公使萨道义的支持，公然不准中国人自己开矿，说它在盂县等地有“专办”矿务的权利，无理要求山西商务局封闭各地已开土窑，并径自到处插旗开矿。萨道义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明非经福公司允许，“无论华洋何人何公司皆不准在该处开采煤矿”[39]。

帝国主义分子的蛮横态度，激起山西人民的愤慨，商务局也不敢答应福公司的要求。平定州各界于1905年组织“矿山会”，约定矿地不售给外人。同年12月，晋绅解荣辂、梁善济等三百余人联名上书，痛陈丧失矿权的严重性，要求废除与福公司签订的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等学堂学生共千余人联名具禀，声明山西主权属于山西人民所有，福公司采矿合同未经山西人民同意，不能发生效力，并主张筹款赎回矿权。太原商会通电痛斥福公司垄断矿权，指出山西人民有优先开采之权。留日学生创刊《晋乘》杂志，以收回矿权为杂志的“六大主义”之一。同盟会员景梅九以山西籍留学生代表的名义回国，积极参加斗争，借争矿问题“做了许多文章，暗地鼓吹革命”[40]。《民报》第四期曾刊载他写的《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一文，揭露清政府卖矿的罪行，号召人们把收回利权同反满革命结合起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对清政府卖矿深感恚愤，竟于1906年10月13日蹈海自杀，在绝命书中他悲愤地说：“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力也。”[41] 此后，东京留日学生和太原、平定州等地群众先后为李培仁召开追悼会，出现了一个群众争矿的热潮。

在此期间，山西绅商一面举派代表前往北京，与福公司直接谈判废约；一面将原有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改组，筹备创设保晋矿务公司。

保晋公司于1907年正式成立，推举著名富商渠本翘为经理。渠本翘，祁县人，山西票号大股东。1892年中进士，曾为内阁中书。1902年在太原创办双福火柴公司，以后又陆续投资于新式工业。保晋公司成立后，立即在平定州、盂县、潞安各地开煤井数十处，又按照

太原矿业公会的办法，规定矿地不准售予外人。

在谈判过程中，福公司迫于形势，为缓和山西人民的反抗情绪，提出中外合办矿务的方案，表示可以容纳华股并选晋绅一名担任福公司董事。绅商代表坚持废约自办，可是由于担心下层群众“排外”，引起“国际交涉”，遂表示愿付“赔偿费”，以便尽快达到“赎矿自办”的目的。尽管如此，福公司仍不肯答应。嗣后，竟然又提出只许中国人用土法开采，不许使用机器的无理主张。这种殖民主义者的逻辑，充分暴露出福公司妄图扼杀中国民族矿业的野心，理所当然地遭到山西代表的驳拒。因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山西绅商学生各界闻讯，于1907年11月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万余人，各界代表演说，一致主张抵制福公司开矿。会议决定，如福公司执迷不悟，强行开采，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作工，不得与之贸易。有违背此决议者，开除其山西籍。同时，平定州等地绅民大会也相继通过决议，禁止出售矿地给福公司。山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福公司无技司施，见势难开采，遂被迫接受了赎矿的原则，转而凭一纸合同，进行讹诈。经过长期交涉，1908年1月20日，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以银二百七十五万两作赎款，将盂、平、泽、潞各属矿权全部收回。

安徽、山东收回矿权

英商华伦公司与安徽商务局于1902年5月签订勘查歙县、铜陵、潜山等处煤铁各矿的合同，规定以八个月为限，逾期不办，原合同作废。以后展期四次，直到1904年1月又届满期，华伦公司仍未进行勘矿，而且再次要求展期。安徽各界人民遂提出收回矿区，自行勘矿。留日学生也派代表回国力争。全省人民爱国情绪极为高涨。安徽巡抚诚勋害怕舆论指责，不敢再议展期，遂让华伦公司代表凯约翰（John L．Kaye）赴京直接与外务部交涉。同年6月5日，外务部与凯约翰签订开采铜官山矿的合同，期限一年。

当1905年5月开矿限期已满时，安徽各界人士再次掀起收回矿权的热潮，纷纷致电外务部，要求废约。革命党人房宗岳、陈独秀创办的《俗话报》，以口语式的文字，揭露英商掠夺安徽矿山土地的罪行，鼓动群众奋起反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务部与凯约翰谈判过程中，凯约翰故意拖延时间。至1907年，他又拉中国驻英公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担任公司华董，妄图以中英合办为名，长期霸占。李经方主张用款赎回，凯约翰要价四十万，多次谈判，均未达成协议。后来，安徽各界人士反对李经方插手，声明“铜官山矿合同逾期应废，已成铁案”，断难更改[(42)]，并要求直接参加谈判，以便尽快争回矿权。凯约翰为了达到要挟中国官绅的目的，于1908年又玩弄新花招，竟然私招日本三井洋行商股，并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分别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外务部迫于舆论的压力，据理反驳英、日公使。两江总督端方因见案情有扩大的趋势，便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建议中英合办该矿。

端方的建议传出后，安徽绅商各界一致反对，全省再度出现要求收回矿权的高潮。安庆、芜湖等地报纸，广泛展开了反帝爱国宣传，大大促进了各界人民的觉悟。革命党人韩衍在安庆创办《通俗报》，支持铜陵人民驱逐英国工程师麦奎的斗争，持论尤为激烈。因此得罪于买办，韩衍竟被歹徒刺伤。同时，安庆绅商集会，决定一面派代表入京与英商直接谈判，坚持无条件废约，并要求外务部“抵死力争”；一面筹组全省路矿公会。1909年4月30日，路矿公会在安庆召开大会，由会长兼津浦铁路公司协理洪思亮主持，全省绅商学界代表和上海、南京、南昌等地代表均来参加。会上各代表演说，一致表示坚持“废约自办”的宗旨。接着，芜湖商会、皖南教育会及各学堂联合于5月8日召开大会，群情激昂，大会决议，如凯约翰拒绝废约，则“必当联合沿江各省实行文明抵制之策”[(43)]。与此同时，上海安徽路矿公会邀集各省旅沪团体，举行特别大会，筹组“铜官山矿共济会”，拟定自办矿山方案。留日学生也电呈外务部，支援安徽人民的斗争。

这时，清政府外务部不顾安徽各界人士的反对，坚持赎矿方案，与英商谈判六个月，至1911年春议定以五万英镑赎回，由安徽绅商筹资组成“泾铜矿务公司”，自行开采。

德国于1898年强占胶州湾之后，立即成立德华煤矿公司，取得了胶济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采煤权，开采沿线坊子、马庄、博山等处煤矿。1899年又组成德华山东采矿公司，将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等五处共十余万方里地区内的勘矿权攫为己有。茅山矿在烟台境内，最为著名，因此，当时人们称上述五地为茅山五矿矿权。至1907年，原定勘矿期限已逾多年，该公司借口“实未探竣”，要求延期。于是，这年8月山东巡抚杨士骧派矿政调查局道员朱锺琪与该公司代表郭思曼谈判，签订新合同。合同虽然规定缩小矿地范围，但却“加展探矿期限两年”[44]，这样，该公司就得以继续霸占。

山东各界人民对德国霸占矿权的侵略活动早已不满。当山东省地方当局与德华采矿公司签订新合同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纷纷设立保矿会。保矿会不仅提出收回茅山等五矿，而且大声疾呼保卫津浦路沿线各矿区，因为当时德国正觊觎津浦铁路沿线矿权。1908年，同盟会员陈幹、周树标等联络各界人士递上公呈，声明签订茅山五矿合同时，“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并表示如不废约，“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45]。同时，山东籍旅京官商范之杰、柯劭忞等也屡次集会，发起成立路矿研究所，联络各省路矿协会、上海路矿共济会及山东省商会等团体，以便协力抵制德商开矿，还吁恳清政府借绅士之力与德商作强硬交涉，勿稍退让。

德商迫于山东省各界反对，又发现各地矿苗不足，恐开采亏损，遂转而要求中国赎矿，“赔偿银八十万两”[46]。对于德商的讹诈，本来应当据理驳斥，但是，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害怕引起外交纠葛，便答应了德商的要求，与其进行谈判。1909年12月以三十四万两银子将五矿赎回。合同签订之后，孙宝琦立即向省谘议局提出加税案，企图将赎款直接加到全省人民的头上。谘议局绅商一致反对加

税，散发“抵制加赋，反对赎回废矿”的传单，指出“种种失败”，都是由于“孙抚一味迁延媚外”[47]。最后，孙宝琦只得奏准由山东省库分期拨付赎款，了结此案。

四川、云南及河南等省收回矿权

帝国主义列强早在十九世纪末年就觊觎四川的矿产。它们组成各种矿务公司，与四川矿务总局所属的“保富公司”、“华益公司”等签订“合办”合同，巧取豪夺，攫取了许多重要矿权。利权的不断丧失，给四川人民以极大的刺激。于是，绅商各界一边筹资自办矿业，以求抵制；一边则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斗争，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因洋商未能按原采矿合同如期开办，1906年首先收回了法商利华公司揽办的巴县和万县的煤油矿权。同年，法商福安公司所取得的重庆等六府矿权，法商福成公司开办天全、懋功两县五金的矿权，以及英国矿业资本家摩赓（Pritchard Morgan）所组织的开东公司勘办四川煤油各矿的权利，都因逾期而被迫放弃。其中尤以收回江北厅矿权的交涉最为曲折。

江北厅盛产煤，矿脉绵延数百里至合州。早在嘉庆年间，当地商人就竞相开采，创建五窑六厂。1904年，英商立德乐见采煤的利润很厚，遂与四川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取得了江北厅属龙王洞矿区的采矿权和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接着又兼并了五窑六厂，成立了“华英煤铁公司”。公司成立后，任意划范围，广插标竿，越界侵占了不少田地。因而激起群众公愤。“全川绅士、海外留学生拍电争执，政府畏葸，不敢谁何，人情汹汹，将酿交涉”[48]。为了抵制华英公司，当地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城壁等乃于1908年创办江合矿务公司。英商立德乐企图挤垮江合公司，公然捏造伪证，强指江合公司所购石牛沟矿权在其龙王洞矿区之内。重庆英国领事也照会川东道，责令江北厅将石牛沟矿交立德乐开采。江合公司股东忍无可忍，四出奔走呼号，要求官府强力制止，其上江北厅禀说：“外人之据我矿地，夺我利权，违约狡谋，祸患日迫，厅境民穷财困，力难与之抗衡，灾受剥

肤，无门呼吁，一旦群情激动，终恐酿出衅端。”[49] 后来，在川东道陈遹声和重庆英领事的监督下，江合与华英两公司代表在重庆直接交涉，时断时续，拖延一年之久。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华英公司代表理屈词穷；立德乐又看到四川民气旺盛，不敢漠视，遂于1909年7月以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代价，将其所占的江北厅各矿转卖给江合公司。江合公司作为民族资本企业，一直经营到民国期间。

云南人民同样展开了收回矿权的斗争。1902年，法商兴隆公司攫取了云南昆明、澂江、临安等七府厅的开矿权，合同经清政府外务部核准。由于合同规定，如遇矿产不佳，准允该公司更换矿地。所以，实际上云南全省矿权都落入法商之手。云南留日学生鉴于矿权的丧失，首先通电揭露地方官吏颟顸昏聩、出卖利权的劣迹。云南绅商各界屡次集会演说，表示“非将滇人杀尽，不能任外人开矿”[50]。兴隆公司不顾人民反对，于1910年准备开矿，从而激起人民的愤怒。归国留日学生胡源、李德沛等组织“保矿会”，于7月10日、17日在昆明召开两次大会，到会数千人，一致力主废约。7月17日大会后，陆军小学堂学生二百人整队赴谘议局请愿，议长拒不支持争矿，学生赵永昌当场断指，表示废约争矿的决心。个旧厅锡矿工人也积极参加斗争，“椎牛饮血，誓以身命争之”。云贵总督李经羲一面压制群众争矿，一面不得不组成“矿务调查会”，并与法商交涉。至1911年9月，清政府外务部与法国公使交涉议定，用银一百五十万两赎回七府矿权。

在各省收回矿权斗争中，河南是比较激烈的省份之一。英商福公司早在1898年就和官办的豫丰公司签订合同，取得了黄河以北怀庆等府的开矿权。义和团运动后，福公司首先在修武县焦作地区开采，1909年开始出煤。当时，“豫省民窑林立，河北尤多”，“依煤矿为生者不下数百万人”[51]。福公司用机器大规模开采的煤比较民窑以人力挖出来的煤价格低廉，若福公司在当地售煤，势必影响民窑业主和工人的生计。因此，河南巡抚吴重熹派交涉委员杨敬宸等与福公司交

涉，于1909年2月议定福公司不在内地设行栈卖煤。但是，福公司不久就推翻前议，与杨敬宸重开交涉，于原议定书外附加二条，主旨是允许福公司在当地售煤。

消息传出后，全省舆论哗然。开封各界人士纷纷集会，筹商抵制之策。在同盟会员杨源懋等鼓动之下，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的学生、教习尤为激烈。他们联络绅商各界，发起组织保矿公会，一面派出代表入京请愿，一面以学生为“宣传员”，派往黄河以北各州县，劝说人民不购买福公司煤炭，作为实际抵制[52]。与此同时，“黄河以北三府人民无可如何，遍发传单，希图肇事”。焦作一带民窑业主和工人聚众数千人，“声势汹汹，欲与公司为难”[53]。河南巡抚深恐引起“国际交涉”，不得不同意与福公司重新谈判关于禁止内地售煤问题。同时，又派出代表入京，要求外务部废去原议定书附加二条，并说否则“恐豫中商学绅民别有要求，更难措手”。但是，外务部在福公司的压力下，不敢答应河南代表的要求，而于8月9日上奏清廷，批准百吨以上之煤准福公司在本地销售。实际上满足了福公司的要求。参加争矿斗争的广大群众，由于缺乏组织领导，也没有坚持原来的斗争目标，后来便不了了之。

此外，在1911年以前，各省人民经过激烈的斗争，还收回了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黑龙江都鲁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矿，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以及山东中兴煤矿等处矿权。另外，还有一些矿区排除了外商的股份，促进了民族矿业的发展。

二　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当各地收回矿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全国收回路权的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如苏杭甬铁路废约自办，滇越铁路、广九铁路争议废约，津镇铁路速筹还款，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坚持商办原则，京汉铁路又议价收买，等等。其中江、浙两省人民要求废除苏杭甬路借款合同的斗争，是一次激烈的争路浪潮，四川保路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

的。

甲午战后，江、浙两省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这里的铁路干线都被英国所控制。1898年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签订代筑苏杭甬铁路草约，英公司并未照规定期限勘测路线。到1903年，盛向英公司催促过一次，并声明如六个月之内再不勘路估价，过去所议即作罢论。至1905年，已超过六年，英方仍毫无动作，亦未签正约，照理草约早成废纸。在商办铁路高潮中，浙江绅商1905年7月24日集会于上海，议决组织“浙江铁路公司”，公举道台衔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候补京堂、南浔富商刘锦藻为正副总理，奏请自办全浙铁路。汤寿潜（1857—1916），学名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人，1892年中进士，早年鼓吹改良主义，著有《危言》行世，曾署两淮盐运使。辞官后，投资近代工商企业，专力鼓吹实业救国。他担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后，立即筹备集股筑路。当年，经清政府核准后，浙江铁路公司决定先筑苏杭段。这时英方闻讯，由驻华公使萨道义急忙照会外务部，凭已经无效的草合同，要求商订正约，企图借款夺路。这当然引起浙省绅民的同声反对，作为浙江铁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就自然成为这一斗争的领导人。清廷责令盛宣怀与英方赶紧磋商撤废旧约事宜。但盛宣怀推诿延宕，同时又布置障碍，从中阻挠。当年11月全浙绅商控诉盛宣怀“视废议如割肉”，提出盛宣怀如收不回草约，当重治其罪[54]。为抗拒英国夺路，浙江绅民一面继续抗争，一面加紧集股，即时开工筑路，先修杭州至嘉兴段。

与此同时，江苏绅商于1905年11月集会讨论筹建全省铁路。次年5月组成江苏铁路公司，公举苏南巨绅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并决定先修沪嘉线与浙公司的杭嘉线相衔接。这时，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接连向清廷施加压力，妄图迫使清廷收回商办成命，停止苏浙路工。清政府害怕影响东南漕运，不敢遽然答应，遂电令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与英“磋磨”两全之策。汪大燮把借款与筑路“分为两事”：筑路的事，不列入合同，算是“中国自办”。但向英国借款一百五

十万镑，存入邮传部，再由邮传部转拨给苏浙两公司，并由两公司负担各项折扣利息。同时筑路仍选用英总工程师并由英方代购器材。英方欢迎汪大燮的方案，于1907年10月，双方定议。清政府于10月20日谕令江、浙两路公司接受这种拨款，“以昭大信，而全邦交”[55]。清政府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把两省的爱国者更加刺激起来。江浙两省留日学生首先起来反对，绅、商、学各界纷纷集会演说，斥责清政府：“宁令国人死，勿触外人怒”[56]，“拂舆情，玷国体”。人们大声疾呼：“路权之去不去，吾浙之亡不亡，其权不在外部，不在政府，亦不在外人，在吾国民。”[57]各地相继成立拒款会。浙江全省“国民拒款会”，拟“联合全省国民公禀大吏，将主持借款之京官汪大燮、吴士鉴、章梫、许宝衡四人削去浙籍，永不认为浙江人”[58]。

同时，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抗议清政府接受英国借款，绝食呕血而死。其绝命书悲痛地说：“款成而路去，浙江片土，已为国贼断送……此身将与浙路同尽。呜呼！吾身即死，吾心不死，吾愿吾浙人勉为其后，倘此事得有挽回，则鄙人虽死犹生。”[59]这件事轰动了两省，杭州铁路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高等学堂师生纷纷集会，电请清政府拒款。接着，浙路副工程师汤绪也绝食殉路。各地集会追悼邬、汤两烈士，群情激愤，风潮更加扩大。北京、湖南、直隶、福建等地学生都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江浙保路斗争。

江、浙两省铁路股东公推代表团入京请愿，抱定“遵旨商办，不认借款”的八字宗旨。与此同时，江、浙人士连续举行筹款筑路的集会，每次都有千百人参加，纷纷认款，形成群众性的爱国热潮。两省各妇女学堂及团体，如家政会、天足会等联合成立“女国民拒款公会”，也参加了斗争，发布公启说：“可恨！可恨！这个英国银公司居然看得我们铁路生意好，又眼热起来了。……该英国人想了一个法子，叫做借款，那晓得英国人的款比砒霜还毒，向来英国人灭人家的国度，都是从借款起的……所以我们国民已经起了一个拒款公会，一定不承认借款的事！一定要请皇帝收回成命！一定要把这个卖国贼明

正典刑。”[60] 表现了妇女界高度的爱国热情。11月9日，江苏铁路协会在上海张园召开大会，到会两千余人。李平书为主席。马相伯讲演说：“国民对于此问题非争路也，争人权也。人家卖奴婢亦当问其愿否，今不问我江浙人而卖江浙人身家性命所关之路，直卖鸡狗耳。”[61] 闻者无不落泪。同时，浙江各学堂学生不仅积极展开宣传，而且认购路股共达二十六万元。苏州、杭州等地挑夫、轿夫、小贩也踊跃认股。上海、杭州、嘉兴、松江、苏州等地商会、同乡会相继召开集股大会。浙江旅沪同乡会于11月10日在西门外浙绍公所召开集股大会，到会绅商有张元济、周金箴、何阆仙、杨信之等。周金箴为议长。会上，杭州拒款会代表何阆仙曾提出“如强迫借债，则不纳练兵费及各项杂税”，并举行“同盟罢工”。张元济反对罢工的主张，他说应“力请朝廷收回成命”[62]。绅商当场认股二千二百余万元。浙江各地股东一致通电表示：“路之存亡，即浙之存亡，亦国之存亡！”“宁死不借外债”[63]。13日，江苏铁路公司股东在上海愚园开特别大会，会上共认股一千三百余万元，并一致推举王文韶、许鼎霖为代表入京，要求不借款。又推举杨廷栋、雷奋为随员。此后，王文韶向清政府报告江浙人民集股的情形说：不到一个月，“苏得一千五百余万，浙得两千七百余万，较之部议借款，数且逾倍。佣贩妇竖，苦力贱役，亦皆激于公愤，节衣缩食，争先认购”，“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64]。

两省的争路拒款斗争，得到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声援。革命党人也曾试图对运动加以领导。1907年11月3日，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东京锦辉馆召开苏杭甬路事研究会，到会者除浙江籍人士外，还有江苏及其他各省人士，共八百余人。章炳麟演讲说：目前苏杭甬路事非口舌舆论所能挽回，只有派代表回国鼓动人民摆脱立宪派绅士的控制，举行全体罢市，“罢市以后，要占据电报局，打破抚台衙门”，宣布“江浙两省，同时自主”[65]。11月17日，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豫晋秦陇路矿协会发起召开留学生大会，锦辉馆内外聚集四千余人。章炳麟再次提出罢工罢市。还有人主张“欲救中国之路矿

皆不亡，非组织暗杀不可”[66]。但与会大多数人不主张采取非常手段，而主张组织拒款会，支援江浙拒款，以便将来“组织全国共同拒款会”[67]。接着，浙江全省于25日召开国民拒款大会，同盟会总部寄来两千份宣传品，由同盟会浙江分会副会长顾乃斌在会场散发，提出了“不完粮，不纳税，谋江浙独立”的口号。可是，会场全为立宪派绅商所控制，所以罢市暴动的倡议没有被接受。

尽管立宪派绅商极力主张“文明争路”，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函电请求，据法争辩，但是中下层人民的行动越来越激烈，“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商市动摇，人心震骇”[68]。正在这时候，江浙两省饥民抢米风潮迭起，会党乘机活动，一时城乡情况都相当紧张。两江总督端方赶紧向清廷奏报说，“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合，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69]。这些，都是清廷发布谕令后两个月内的事。运动再向前发展就有可能发生暴动了。

历史的发展证明，广大人民从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路权，发展到反对清政府卖路，最后起而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这是收回利权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不满意于合法斗争形式，在斗争中及时地提出了罢工、罢市、不纳税以至“谋江浙独立”等口号，反映了中下层群众的动向，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下层群众在斗争中的作用，更不善于在总的革命进程中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认识，而在由绅商控制的群众大会上，仅仅一般地号召群众暴动，这样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他们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到1908年3月，由于一部分绅商代表怕重演“庚子之乱”的怯懦心理，承认了在一定条件下的部拨借款[70]，并由邮传部奏定了一项“章程”，作为存借清还的依据。但是，按“章程”第一批“部拨存款”领到后，两省公司相约，存入银行，不用分文，准备随时缴还；

同时不让英总工程师过问路事。这样，英国就不肯如期交付借款，邮传部也无法如期拨款。“章程”规定：到期不拨或拨付不全，“章程”就作废。于是两公司于1909年上半年向邮传部提出退款废约，邮传部只能搪塞支吾，不加理会。1910年8月17日，清廷令盛宣怀回邮传部右侍郎本任[71]，这是准备对外借债和官夺商路的危险信号。汤寿潜于22日致电军机处直斥盛为浙路风潮的“罪魁祸首”，要求把盛“调离路事，以谢天下”[72]。这一下激怒了甘心与民为敌的清廷当权派，汤寿潜立即遭到“革职”的处分。

汤寿潜被革消息，又一次把浙省人民激荡起来。杭州“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三两成群切切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73]。宁波“有数万人齐拥至道署，要求电禀抚宪，代奏留汤，保全商办”。“声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74]。这是小股东和下层群众的情绪。大股东们怕“汤去路危”，又怕人民闹起来，“后患不堪设想”。他们要求资政院按照商律和公司律任免总理的规定向邮传部力争。交涉半年，邮传部不予理睬。1911年2月18日，苏路公司突然呈报邮传部称：“存款章程，久失时效”，即行作废；“所雇英总工程司，亦尽月内辞退”；同时声明因邮传部强迫借款影响集股，以致停工待料，使公司蒙受损失，以前所领部拨存款，“作为赔偿苏路损害之费”[75]，不再退还。七天后，浙路公司也以同样决定报部，清政府万没料到两路公司会来“先斩后奏”的一著，同时英公使朱尔典，又亲到外务部抗议威胁，声称“不能再事容忍”[76]。清廷官员一时非常狼狈。最后，还是盛宣怀与英方协议，将苏杭甬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路借款，才使持续六七年之久的苏杭甬路权风潮平息下去。这场斗争赢得了维持商办的胜利。

三　收回路权斗争的日益激化

当全国收回路权的风潮正在澎湃进行的时候，清政府一方面筹备立宪，借以拉拢资产阶级上层绅商；一方面为解决财政困难，以官办

铁路的名义，加紧推行“借债筑路”的政策。当时，一部分绅商鉴于商办铁路弊病丛生，“成路之期终无望”[77]，便附合清政府的主张，认为只要清政府立宪，接受议会监督，借款筑路并非不可。但是，大多数绅商和广大中下层群众都看到了清政府假立宪、真卖路的阴谋，社会舆论对借债筑路莫不深恶痛绝，视“如鸩毒蛇蝎”。《大公报》刊载《论官办铁路之恶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一文指出：“综观已往，默计将来，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即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呜呼！官办铁路欤？官卖铁路欤？吾敢质之当局。”[78]一语道破了清政府“官办铁路”的真相。

由于各地人民坚决抵制官办铁路，因此发生了一连串的官商争路事件，诸如江苏、河南两省的徐开路、山东的胶沂路和烟潍路，云南的滇桂路和滇蜀路，以及最为突出的川汉路和粤汉路，等等。

如本书第四章收回粤汉路所述，1905年粤汉路赎回时所借英款，是由鄂、湘、粤三省摊还；在这一情况下，清政府允许三省自行筹款办路。当年12月，三省代表会议：关于修筑粤汉路，三省“各筹各款，各从本境修起”，同时并举[79]。第二年8月，当三省绅民正集议招股进行时，清政府改变了主意，忽然谕令湘路公司说“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并“着张之洞查明办理”[80]。当时三省情况是：湖南绅商最积极，铁路公司成立最早；广东有侨商资本，集资最快；湖北在张之洞的直接控制下，他一贯主张铁路官办，只许商人搭股。因此，三省中只有广东争得商办，两湖则由张之洞禀复清廷，遵旨“以官督商办法行之”，而湖北境内的铁路实际是官办。湖北人民一直反对官办，但扭不过张之洞，直到张之洞调入军机处，湖北的商办集股，仍受其影响，未得开展。

1908年7月，清政府忽然任命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充粤汉路督办大臣，立即引起两湖人民的疑虑。10月，清廷特颁谕令，命张之洞通筹粤汉路全局，专其事权，12月又命张之洞兼督鄂境川汉路。这步步紧逼的谕旨背后，实际是清廷在国际银行团的唆使下，准备借外债，

夺商路。清政府越来越和人民站在对立的方面。在1905年赎回粤汉路的斗争中，表面上是“官民合作”，人民推动张之洞等官吏向列强收回路权，而今清政府公然勾结列强向人民夺路了。

张之洞受命之后，立即向外商洽谈借款。1909年6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达成借款协议，后来又加入美国，成为四国银行团，议借六百万镑。在达成借款草约后，张为迷惑人民视听，宣称“由官借款，而预定分其事，准商民买股”[(81)]。但是人民是根本反对借款的。消息传出，湖广人民一片反对之声。两湖留日学生通电上书，出版《湘路警钟》，宣传拒款保路。湖南谘议局议员八百二十人联名呼吁“铁路借款，湘人决不承认”[(82)]。龙璋、谭延闿等组织“湘路集股会”，加紧募股，抵制借款。此后，革命党人文斐、文经纬、王猷、吴作霖等联合部分绅士在长沙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争路为名，暗中进行革命工作。

湖北方面发动较迟，至1909年10月初张之洞病死后，民气突然高涨。这时适逢谘议局成立，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到武昌，于是拒款运动顿时沸腾起来。11月5日、14日，连续召开绅商军学各界大会，从社会名流到医卜星士、工农士兵，都踊跃与会，登台演说，探囊捐钱。会后公举张伯烈、刘心源为入京请愿代表。送行时，军人陶勋臣拔刀断指，以示决心。刘、张等到京联合两湖京官向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进行说理斗争。1910年1月底，大清银行副监督黎大钧等也上书要求鄂路准归商办。3月19日，徐世昌在私宅召见黎大钧、刘心源、张伯烈等，声称湖北集款不足，必须借款。代表据实驳辩，遭到徐的责骂。代表被逐出大门，张伯烈等不肯退去，一连几天几夜，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83)]。与张伯烈的“哭廷”同时，“湖北有可能酿成大乱”的消息，不断传到北京，而且传说有陆军将校参加。清政府这才着了慌，3月24日，邮传部批准设立商办鄂路公司。略早于湖北，清政府也被迫同意了湖南粤汉路商办。

两湖人民的斗争似乎胜利了，但清廷与四国借款协定并未废除，“批准商办”不过是缓兵之计；不久，就又施展出扼杀“商办”的手段来了。邮传部限令湖北铁路协会于六个月内筹足路款，成立公司，到期无成则仍借款官办。这样苛刻的条件当然很难做到。到9月时，湖北商办铁路公司才勉强组成，路款也没有筹足。不久，股东间又因故发生纷争，公司宣告解散。这样就给清政府造成了取消商办原案的借口。这期间，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催逼就前成草约正式签押。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正式宣布“干路均归国有”的政策，撤销了全国所有商办铁路干线的成案，从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保路风潮。

---

(1) 《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2) 《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为山东盗贼益炽关系大局安危恳请代奏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故宫军机处档，卷72—73。

(3) 《汇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4) 《盛京时报》，1907年2月23日。

(5) 《申报》，1907年6月18日。

(6) 《福州邮政司李蔚良致北京邮政总局帛黎函》，1908年9月15日，清政府邮政总局档案。

(7) 《革命倡导与发展》，第63页。

(8) 《御史王宝田奏莱阳、海阳二县相继煽变请简派大臣驰往妥筹折》，《大公报》，宣统二年八月十三、十四日。

(9) 《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0) 《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1) 《柯劭忞等沥陈莱阳官激民变后复纵兵焚掠戕毙无辜实在情形恳请代奏呈文》，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

(12) 《柯劭忞等沥陈莱阳官激民变后复纵兵焚掠戕毙无辜实在情形恳请代奏呈文》，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

(13) 《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第1年第18期。

(14) 《申报》，宣统二年七月十六日。

(15) 《汇报》，宣统二年七月一日。

(16) 《申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7)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18)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一、十六日。

(19) 杜元穆：《海岳轩丛刻》，《寄螺行馆》卷1，第13页。

(20) 佚名：《杞人之言》，《皇朝经济文编》卷21，第39页。

(21) 《汇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三、六日。

(22)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六、二十一日。

(23) 《中国时事汇录》，《东方杂志》1910年，第6期。

(24) 《黎经诰复两江总督张人骏禀》，宣统二年三月，清政府农工商部档。

(25)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报面粉公司专利病民迭滋事端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农工商部档。

(26)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报面粉公司专利病民迭滋事端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农工商部档。

(27) 《清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马福增防堵皖北涡、蒙、怀、凤一带饥民抢米致陆军部申文》，宣统二年九月十日，清政府陆军部档。

(28) 《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29) 《时报》，宣统元年六月九日。

(30)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3页。

(31) 《湖南省城乱事余记》，《东方杂志》1911年，第5期。

(32) 《宣统政纪》卷33，第16页。

(3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55页。

(34) 《各省教务汇志》，《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

(35)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

(36)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179页。

(37) 《江苏铁路协会开会纪事》，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开会认股汇记”，第12页。

(38) 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 Ltd．）又译北京银公司，开办资本二万英镑，至1900年增至一百五十万镑。该公司名义上是由英国和意大利资本家共同组织，但在英国伦敦注册，并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婿罗翁侯爵担任总董，所以它实际上是一家英国企业。它在中国所进行的投资活功，构成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一环。

(39) 《矿务档》，第1470—1471页。

(40) 景梅九：《罪案》，第56页。

(41) 李庆芳等编：《山西矿务档案》，第90页。

(42) 《京外近事述要》，《东方杂志》1909年，第3期。

(43) 《记皖绅力争铜官山矿案事》，《东方杂志》1909年，第5期。

(44) 《议定华德采矿公司勘办山东五处矿务合同照缮清单》，见《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2页。

(45) 《矿务档》，第1201页。

(46) 《中外近事述要》，《东方杂志》1909年，第7期。

(47) 《记山东士绅对路矿之计议》，《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

(48) 《江合公司总理赵城壁呈覆减免重属矿商加征煤铁费归结库款办法要录》，《巴县志》1931年刊，卷16。

(49) 《清末江北厅人民从英商手中收回矿山主权的胜利斗争》，《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年8月。

(50) 《国风报》第2年，第7号。

(51) 《河南交涉局委员杨敬宸擅与福公司订约案》，《东方杂志》1909年，第5期。

(52) 王敬芳：《福公司矿案述略》（稿本），河南省档案馆存。

(53) 《汇录外部与督抚往来电文》，《东方杂志》1909年第9期。

(54)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55) 《清德宗实录》卷579，第15页。

(56) 《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二十二日。

(57)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两省拒款函电，第2页。

(58)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杂录，第2页。

(59)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杂录，第2页。

(60) “女国民拒款会公启”，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61)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开会认股汇记”第12页。

(62)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开会认股汇记”第17页。

(63) 《汇报》，1907年11月9日。

(64) 《政艺通报》，光绪丁未年（1907）卷5，第4、5页。

(65) 《中兴日报》，1908年2月20日。

(66) 《神州日报》，1907年12月4日。

(67) 《神州日报》，1907年12月4日。

(68) 《政艺通报》，光绪丁未年（1907）卷5，第4、5页。

(69)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外务部档案》。

(70) 承认部拨借款的条件是：借款不用江浙厘税作抵押，销除英方查账名目；选用英工程师须两公司认可等项。

(71) 盛宣怀于1908年3月被任为邮传部右侍郎，但未到任，到1910年8月，召回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是要用他出面向外国大规模借债。

(72) 《申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73) 支南玉一郎：《汤寿潜》第八章。

(74) 支南玉一郎：《汤寿潜》第八章。

(75) 清政府外务部档案。

(76) 清政府外务部档案。

(77) 《借款筑路问题》，《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

(78) 《东方杂志》1908年，第8期。

(79) 三省会议议定：赎路款湘、粤各认三分，鄂认一分。各修各境，但湘省路线较长，自宜章以下至郴州永兴县，湘省让与广东代修。

(80) 《清德宗实录》卷561，第6页。

(81) 《张之洞致陈夔龙电》，詹文琮编：《川汉路过去及将来》，第47—48页。

(82) 《湘路纪闻》。

(8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07页。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
(1894—1912)
下

李 新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

（1894-1912）

下

李新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一节　立宪团体及其活动
一　预备立宪公会
二　政闻社
三　宪政讲习会及其他立宪团体
第二节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国会请愿的发动
一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批评
二　1907年—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
第三节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和财政危机的加深
一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
二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第四节　谘议局与资政院
一　谘议局的设立及其与督抚的矛盾
二　资政院与弹劾军机案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及其失败
一　1910年的三次请愿运动
二　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分化和镇压
三　立宪派对清政府态度的改变
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共进会和后期光复会的建立
一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
二　共进会
三　后期光复会
第二节　革命党人在安徽、广东、四川再次发动的起义
一　安庆熊成基之役
二　广州保亚会之役

三　四川广安、嘉定、黔江之役
四　广州新军之役
五　广州“三二九”之役
第三节　暗杀活动
第四节　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一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
二　湖北共进会
三　同盟会中部总会
第十章　保路风潮
第一节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和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一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
二　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第二节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和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一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
二　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第三节　四川立宪派的“文明争路”和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一　四川立宪派和清政府矛盾的加深
二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三　“文明争路”及其破产
第四节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和成都血案
一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
二　成都血案
第五节　轰轰烈烈的四川人民武装反清斗争
一　同盟会、哥老会的起义准备
二　各路同志军猛扑成都
三　荣县独立和东路军战况
四　南路军、西路军战况
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第一节　起义的筹备与发动

一　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
二　起义秘密的暴露
三　十月十日之夜
四　汉阳、汉口的克复
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一　黎元洪被逼任都督
二　军政府的组织及其内部斗争
三　军政府的初期活动
四　革命向武汉周围地区发展
第三节　保卫武汉的奋战
一　最初的胜利
二　汉口失陷
三　袁世凯的“和平”试探
四　汉阳失陷
五　停战议和
第四节　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独立
一　湖南
二　江西
三　安徽
第五节　西南各省独立
一　云南
二　贵州
三　四川
四　广西
第六节　东南沿海各省独立
一　上海
二　浙江
三　江苏
四　广东
五　福建

第七节　北方各省响应
一　陕西
二　山西
三　直隶
四　山东、河南
五　新疆、甘肃
六　东北三省
第十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第一节　各省代表会议筹建临时政府及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一　建立临时政府的酝酿
二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三　临时政府的组成
第二节　临时参议院和临时约法的产生
一　临时参议院
二　临时约法
第三节　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
第四节　临时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一　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二　财政危机和内外债
第五节　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和新闻政策
一　教育改革
二　新闻政策
第六节　临时政府的根本弱点和北伐的夭折
一　同盟会的涣散
二　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三　不敢明确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四　北伐的夭折
第七节　南北议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
一　帝国主义的干涉
二　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

三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一节　立宪团体及其活动

清政府的“新政”，虽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但为了维护其垂危的统治，它还是不断地改变花样，继续推行。经过“新政”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新抬头，他们把斗争逐渐明确地集中到争取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目标上来，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作立宪派。立宪派惧怕革命，反对革命；但认为消弭革命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集中对付革命势力，决定拉拢立宪派，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借以欺骗人民。

1906年七八月间，考察政治大臣相继回国，载泽、端方等多次被召见。他们向西太后力陈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他们指出，天下人心思变，如果拒不实行任何改革，就不能安定人心；而人心不安，革命党就容易得到群众，革命的“祸乱”就难以避免。他们还献策说，立宪究竟何时实行，怎样实行，可以从容计议；只要先定下立宪的“国是”，就能安抚立宪派，稳定人心。如果因顾忌“实行”的种种困难，而继续犹疑，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失望，甚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1)]。西太后反复考虑了他们的建议，终于拿定主意，在召集了大臣会议之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这篇上谕承

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所以“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宣称要“仿行宪政”。其根本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2)]。但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

立宪派非常欢迎清政府的这项决定，因为它给立宪运动提供了充分的合法依据，为他们更大规模地开展活动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立宪团体纷纷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在东京成立而后回国活动的政闻社、宪政讲习会等。

一　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立宪团体。

该会于1906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是在郑孝胥、张謇等人于9月开始组织的宪政研究公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该会宣称“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3)]。其政治态度相当温和。该会从酝酿成立的时候起，就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资助，单是开办费，岑就捐出一万元，还表示愿负担常年费每年一千元[(4)]。

预备立宪公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入会的，有许多著名的大绅士和大资本家。如：

会长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早年曾入沈葆桢、李鸿章幕。1891年任驻日本使馆的秘书，后升为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归国入张之洞幕，曾任江南制造局督办。1903年到广西助岑春煊镇压当地人民反抗，1905年辞归上海。郑家资丰厚，在许多企业有投资，曾创办日辉呢厂；又颇有文名，其诗文称于一时。他在官场、商界、知识界都有很多交往。

副会长张謇是一个有极大影响的绅士和实业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变法致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即在朋友中酝酿讨论有关宪政的问题。1904年受日俄战争的震动，开始从事立宪活动，积极推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敦请朝廷立宪。

张謇是江浙立宪派最主要的领袖，他虽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但实际却是该会的灵魂。该会成立之初，曾有所谓“主急主缓”之争，张謇是主缓派的渠魁。这一派一直在会内占统治地位。张謇十分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他说：“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5)] 他把革命派归作盗贼一类，表现出反动的绅贵意识；他希望立宪能安上全下，则反映了有地位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共同心理。1911年2月，张謇继朱福洗之后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

副会长汤寿潜，则是收回路权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一般会员中，也有很多有名的大绅士、大资本家。上面提到的朱福洗，字桂卿，浙江海盐人，曾作过侍讲学士。他从1902年起就要求实行立宪。一度任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1910年1月—1911年2月）。此外如：

王清穆（1860—1941）字丹揆，江苏崇明人。曾任直隶按察使、商部右丞等职，在张謇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均有投资，并创办富安、大通两纱厂。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周廷弼（1852—1923）字舜卿，江苏无锡人。曾任商部顾问，是无锡裕昌丝厂的主人。该厂在各地有分号六处，总资本五十万元以上。周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许鼎霖（1857—1914）字久香，江苏赣榆人。曾任驻秘鲁领事、浙江洋务局总办等职；经营海州赣州豆油公司、海丰面粉公司，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徐润（1838—1911）字雨之，广东香山人。曾任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景纶衫袜厂等企业，并经营房地产。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安徽寿州人。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孙家鼐的儿子。曾任直隶劝业道、井陉矿局总办；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厂。

荣铨（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江苏无锡人。学徒出身，发迹后创办多种企业，如保兴面粉厂、振兴纱厂等。

此外，在预备立宪公会会员中，还有少数现任官吏。如江苏布政使瑞澂（1863—1915），后升任江苏巡抚，1911年调任湖广总督。监察御史谢远涵，江西兴国人，离任后回籍任江西谘议局议长。

据1909年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所列会员共358人。据不很准确的统计，在这358人之中，有77人曾经做过知县以上的职官，约占会员总数21.5%，反映出这个立宪团体同统治集团有相当的联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会员中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各种工商企业中任职的，有84人，约占会员总数的23%[(6)]。这些人是直接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人数虽不甚多，但他们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主导力量。因为会员中的官绅多半有投资在这些人经营的企业里，这些人能够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预备立宪公会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预备立宪公会是组织得最健全的。它有董事会，每月例会两次，下设职员常会，由正副会长、驻办员、编辑员等组成，执行日常会务。董事会成员最多时有27人，一般重要事项均

经董事会议决，会长、副会长也由董事会选举。该会每年召集全体会员举行年会一次，由会长及有关职员报告工作，选举新的董事会。在该会内部活动中，有着相当完善的民主程序。这在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确是一种进步。

预备立宪公会在政界、实业界、文化教育界均有根基，实力雄厚。所以它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很大。

在实际活动中，该会有一批精明强干的少壮人物，比如孟森、孟昭常兄弟，雷奋、杨廷栋、秦瑞玠等。据黄炎培回忆，这些人“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中负盛名的。开讲习会必请这几位先生为讲师；修订章则，非请这几位先生起草不办”[(7)]。

孟昭常，字庸生，江苏武进人，一直任该会驻办员（可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秘书长）。预备立宪公会于1910年开始在北京设事务所，以他为主要负责人。他还兼为编辑员，主管会报、会刊及其他编辑事务，后被推任资政院议员。

孟森，字莼生（后改字心史），是孟昭常的哥哥，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与郑孝胥交厚，曾随郑至广西龙州边防，1908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大力从事立宪的宣传。

雷奋，字继兴，江苏华亭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政，与梁启超有交。政闻社成立时，雷为该社交际科干事。但他在1908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后，便成了该会最重要的骨干之一。他主管该会所办讲习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成为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后被选入资政院为议员。

杨廷栋是该会联络工作的骨干，秦瑞玠则是主要的编辑员之一，在会报、会刊上发表过许多鼓吹宪政的文章。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1908年开始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至1910年1月停刊。同年5月，在北京出刊《宪志日刊》。这两个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半是讨论国会问题、宪法问题，也有批评时政的言论，还登载谘议局、资政院有关文件，及本会会务进展情况的报道等。

该会设有出版部，陆续编辑出版了多种宪政书籍。据1910年7月6日《宪志日刊》所载，已出版的书籍有《公民必读初编》（孟昭常）；《公民必读二编》（孟昭常）；《地方自治制纲要》（钱润）；《地方行政制度》（张家镇）；《日本宪法详解》（邵羲）；《选举法要论》（汤一鹗）；《谘议局章程讲义》（孟森）；《议员要览》（沈其昌）；《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孟昭常）；《城镇乡自治章程表》（沈尔昌、孟森）等十余种。其中《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曾一版再版，广销各省。《公民必读初编》、《二编》，单是广西一省即订购十万部，其销路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2．办讲习所：1908年5月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该会创办国会问题研究所，由会员自愿加入，定期讨论，编纂草案，提供会员与当道者参考。是年底，接办原由江苏教育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这是为培养训练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而设的轮训班，有一年结业和半年结业的两种。除江、浙两省外，其他外省也有入所学习的。

3．编纂法律：该会曾聚集人才，从事调查并编辑商法，为清政府提供参考。

4．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政治态度偏于保守，其实际活动，一般是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在各省发动的时候，会中有人提议参加。但在常会和董事会讨论，未能通过。声称“本会向以开通智识，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为主义，较之空言请求者尤为切实，似不必居请求之名”[(8)]。后来见各省纷纷签名派代表入京，该会才转而对请愿取积极态度，曾以正副会长名义两次致电清政府，请速开国会。1909年谘议局成立时，当上江苏谘议

局议长的张謇，出面邀约各省谘议局派代表联合请愿，而雷奋、杨廷栋、孟昭常等且成为请愿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但到1910年11月，当清廷以缩期三年召开国会来搪塞请愿代表时，全国大多数立宪派均不满意，而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却与清廷妥协。它的保守性、妥协性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5．该会头头的社交活动：郑孝胥、张謇等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们常常以个人的身份与督抚大吏们联络。或为其出谋画策，或代为草拟奏折，这是他们发挥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这种活动，客观上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最早，活动时间也最长。其他较大的立宪团体如政闻社于1908年8月即被查禁；宪政讲习会，因杨度与熊范舆等1908年后相继入了政界，其组织很快也就涣散了。而预备立宪公会则一直维持到1911年。因此它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　政闻社

政闻社是梁启超等人于1907年在日本组织起来的。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很兴奋，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康有为说“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9)]。梁启超则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10)] 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急切整顿组织，大力展开活动，以便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是年秋，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但康有为在宣布更改会名的“公启”里，没有提出足以号召会众的纲领。对此梁启超很不满意。他写信要求康有为采用帝国宪政会的名称，并劝他不要仍以个人名义，而应以适合时势的新纲领来号召会众。梁启超预计到保皇会虽改名，仍难在国内展开活动。所以，他以很大的力量筹备另立新的组织。

1906年12月，梁启超同他戊戌变法时代的老朋友熊希龄以及当

时在日本的杨度一起，开始筹商建立新的政治团体。他们曾预拟新的组织名为宪政会，主要致力于在国内开展活动；暂时不设会长，待条件成熟时与原有的海外组织（即康有为直接领导的帝国宪政会）合并，共戴康有为为会长；新组织在东京正式成立后，即移总部于上海，拟由杨度任总干事，主持会务。他们曾设想由熊希龄回国运动，拥戴醇亲王载沣出任宪政会总裁，载泽为副总裁；还准备联络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请其赞助；并想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名流加入。显然，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组党计划，然而却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熊希龄不久回国。梁启超又约请蒋智由、徐佛苏等加入筹备。但到1907年春天，杨度与梁启超、蒋智由发生矛盾，最后竟脱离梁启超另立团体去了。对于这件事，梁启超解释说，杨度原来就存心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财力图谋个人的发展。实际上，杨度分裂出去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杨度同梁启超、蒋智由等存在领导权的冲突；第二是政见上也有分歧，当时杨度自居民间势力的代表，认为梁启超有些言论是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

在杨度分离出去以后，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又经过再三磋商，终于组织了政闻社。

在政闻社成立前，1907年6月，梁启超曾秘密回上海一次，打算联络岑春煊及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当时，岑春煊因发生有名的“丁未政潮”被奕劻、袁世凯等排挤出京。在这种情况下，岑不愿见梁启超。而张謇、郑孝胥等人也不愿与梁启超接近。结果梁启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复返日本。这时组党事已筹商就绪，并开始着手筹备出版《政论》杂志。7月17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报告政闻社已经组成，并略述杨度终于分离出去的原因。但政闻社正式成立是在10月17日。那一天，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消息为革命党人所知，张继等率众直捣会场，使梁启超等人感到大杀风景。

政闻社宣布的政纲是：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

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合法地位，还特别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11)

为避清政府的忌讳，政闻社成立时，康、梁都没有出名。当时宣布的发起人有徐佛苏、蒋智由、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徐佛苏（1879—1943）原名公勉，湖南人，曾参加创立华兴会。倒向立宪派以后，仍不时吐露同情革命的情绪。蒋智由（1865—1929）字观云，浙江绍兴人，早年也曾倾向革命，颇有诗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他完全转向立宪派。黄可权字与之，湖南人，长期助梁启超办报。吴渊民是戊戌时期维新志士吴铁樵之弟，一直追随康、梁。邓孝可字慕鲁，四川人，家资颇富，当时正在国内谋划创办实业，对立宪运动很热心。梁启超潜返上海，曾与他约见。王广龄、陈高第都是广东人，梁启超认为他们在广东很有影响，所以也列为发起人。

为给康、梁预留地位，政闻社不设正副会（社）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马良担任。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幼受教会教育，通拉丁文，曾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曾从他学习拉丁文，因而相结识。马良同情改良运动，对立宪派的活动乐予赞助，所以欣然接受政闻社的举聘，以近七十的高龄东渡日本受任。梁启超想利用马的德望，以扩大政闻社的影响。另外设两个常务员实际负责社务，一个是徐佛苏，一个是麦孟华。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早在学海堂时便与梁启超同学，后皆入万木草堂为康门弟子。戊戌政变后他逃到日本，助梁启超编《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在常务员之下设庶务、书记、会计、交际、编纂、调查等六科，分别由侯延爽、黄可权、徐勤、雷奋、蒋智由、陈介等任干事。在六科之外，设评议员若干人。

政闻社成立时，号称数百人，以后并无多大发展，实际活动分子

不过数十人[12]。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迁上海，马良、徐佛苏、麦孟华、侯延爽、汤觉顿等都回国活动。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其他重要省份也都派人从事活动：在北京有汤觉顿、潘若海；在两湖有侯延爽；在四川有邓孝可；在福建有徐碧泉；在广西有孔希伯等。

然而政闻社开展活动并不顺利，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以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关系最紧张，斗争最激烈。这不仅是因为其政治方向不同，而且还因为两者都以海外为基地，主要依靠华侨资助来开展活动，所以在人力、财力、活动地盘等方面都存在着直接的冲突。梁启超提到当时的形势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彼传播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13] 政闻社要求得发展，必须同革命党进行争夺，而为了同革命党争夺，它又不得不同清政府作斗争，否则不能争得同情，不能扩充势力。于是就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梁启超承认，"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14]。他提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15]。同革命党的争夺，牵制了政闻社很大一部分力量，革命党人极力揭露其政治投机性，大大打击了它的政治声誉。

其次，政闻社还受到其他立宪团体的排斥。比如，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在两湖和长江一带有很大势力。既然杨度在日本不能与梁合作，在国内当然更要互相冲突。政闻社曾拟在武汉开一报馆，设一法政学堂，经过再三努力，终无所成，这同宪政讲习会的排斥有很大关系[16]。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对康、梁始终戒备，因而朝野许多人士都不愿公开与他们联系；而作为康、梁宿敌的袁世凯，更竭力阻挠他们重返政治舞台。梁启超原采设想拉拢袁、端（方）、赵（尔巽）的计划均无结果。熊希龄曾拟向大员募捐十五万，竟未得一文。

至于想拥戴载沣、载泽出任正副总裁，更如痴人说梦，根本无从谈起。就是在野人士，一般也大都宁愿对康、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名流，梁启超曾竭力联络，但毫无结果。预备立宪公会是得到岑春煊的大力支持的。而岑春煊被谴的罪名之一便是暗结康、梁，这一点对郑、张、汤等人不能不发生相当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康、梁怀有戒心和采取回避态度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主持《时报》的狄楚青也不愿与梁启超拉得太紧。《时报》创办时，康、梁助以巨款，所以康、梁认为《时报》理应成为他们的喉舌。但实际并不如此。1908年初，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狄氏十分不满，说："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17)] 梁启超看透了狄氏的心理是唯恐康、梁的政治背景会"累及《时报》"。这一事实更可以反映出政闻社在国内的窘况。

政闻社在国内的活动首先是参与国会请愿运动。还在1907年11月间，黄可权、张嘉森（张君劢）便到上海联络发动请愿，酝酿组织国会期成会。1908年7月，在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18)]。不久，有一个社员叫陈景仁（法部主事）的，独自电奏朝廷，要求确定三年召集国会，并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这一行动触怒了西太后等顽固派。7月25日，朝廷下令将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随后，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8月13日又下令查禁政闻社。在查禁政闻社的上谕发布之前，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他一面准备向路过日本的赴美专使唐绍仪说项，指望他向袁世凯疏通；一面发布公告，说明陈景仁电奏纯属个人行动，与政闻社团体无关。但当查禁的上谕发布后，他只好放弃一切努力，顺从地解散了政闻社。这对康、梁等人无疑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不过，西太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镇压请愿运动；当政闻社遵旨解散和请愿代表纷纷离京之后，也就没有对政闻社的人员深加追究。所以过了一些时候，原政闻社的一

些骨干分子又在国内展开活动了。

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排袁；一是争取开放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还康、梁。显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不排除袁世凯，康、梁自然无法重返国内政坛。而同样明显的是，这两者都只有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才能办到。所以历来最富投机性的康、梁党徒，从此便拚命向上层钻营。

袁世凯本来是他们想要争取的对象，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到，反而成为政闻社的大敌，旧仇新怨，使得康、梁必欲除袁而后快。当西太后死时，康、梁认为这是除袁的极好时机，曾分别上书张之洞，企图借张的力量打击袁世凯。

梁启超联络满族权贵的活动，曾有相当的进展。还在政闻社解散前，便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善耆（1866—1927）戊戌时倾向帝党，对西太后守旧专权不满；对预备立宪较为热心，因而同情立宪派。担任向上层联络的汤觉顿曾面见善耆，事后写信给康有为说："吾党今日得此人以联络之，天所赐也！"[19] 康、梁等人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指望他在宫廷做好布置，一旦西太后死去，立即保光绪复辟。这是他们又一个不曾实现的美妙计划。梁启超等人还曾极力联络庆亲王奕劻。奕劻是军机首辅，向以贪图贿赂闻名，梁启超打算贿以重金，讨好奕劻。此外，对度支部尚书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等也都加意联络，但都未取得预期效果。

康、梁这种投机性的钻营活动，已经离开了他们自己原定的政治宗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大多数的立宪派。比如1910年第三次请愿高潮中，全国舆论都集注于请开国会一事，而梁启超所派的代表，这时却以开放党禁为目标。担当这一任务的汤觉顿，在京频频奔走，到处请安磕头，却无结果。他写信给梁启超说："今通观京河上下，无一人反对此事者。然皆应付国会问题，不暇及此。"他不禁叹道："仆对于此事，只得尽人事而听天命，无如何也。"[20]

由于脱离了运动的中心目标，脱离了群众，康、梁一派人，对立宪运动便不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但梁启超个人在舆论界所发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民丛报》于1907年8月停刊后，梁启超又办过《政论》、《国风报》。《政论》出版时间不长。《国风报》发生的影响较大，该报系旬刊，1910年2月出版，至1911年7月停刊，共出五十二期。梁启超发表的直接有关立宪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其中既有对清政府的批评甚至抨击，也有向朝廷上的条陈，对立宪派和政府官吏都有一定影响。此外，梁启超还直接为中央和地方大吏草拟过许多奏折和说帖等类文件。又通过徐佛苏同国内立宪派的著名领袖如汤化龙、林长民、籍忠寅、孙洪伊等密切联系。由于这些活动，梁启超同国内立宪派领袖和政府官吏保有相当密切的个人关系，使他在清朝灭亡前直到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能够发生相当的影响。

三　宪政讲习会及其他立宪团体

宪政讲习会，又称宪政公会，是杨度与熊范舆等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创立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王闿运的门生。1902年起曾数次赴日，先后就学于宏文速成师范及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一度担任过中国留学生会馆总干事，1907年秋回国。杨早年也曾倾向革命，后崇拜日相伊藤博文，并结识梁启超，遂转向改良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杨度积极投入立宪运动，1906年冬创办《中国新报》，从事鼓吹。同时又与梁启超拟议合组立宪团体，后因发生矛盾，与熊范舆另立宪政讲习会。熊本是贵州苗族人，得湖南即用知县后，去日游历，热心于立宪运动。宪政讲习会成立，杨度为预留将来与梁合作的地步，未便出任会长，遂推熊为会长。

宪政讲习会《总章》宣称，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21]。态度相当平和。但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却反映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态度。《意见书》激烈抨击清朝专制政

府“冥顽不灵，贪饕无耻”，是“亡我中国”的祸根。并进一步指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民选议院进行监督的缘故。它指出，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22]。一开始就把民选议院的问题提出来，作为运动的中心目标，这是宪政讲习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不但这样宣言，而且也这样行动。1907年9月，由熊范舆领衔写呈清朝廷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请愿书，实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

宪政讲习会很快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冬，首先在湖南展开活动。那时犬养毅曾到中国活动，在湖南应宪政讲习会之邀发表宪政演说。至次年春，该会在北京、上海等地都建立了分会，主要从事国会请愿的联络活动。这时，杨度已被召入京，以候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他利用这一地位，在上层统治集团间广为游说，鼓吹尽速召集国会。但此后他便失去了立宪派领袖的地位，而变成官方赞助立宪的人物了。熊范舆后来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宪政讲习会从此涣散。

除了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之外，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地方性立宪团体。

如粤商自治会，其活动基本局限于广东一省。

广东地处南陲，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人民受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粤商自治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较为积极，如力争西江捕盗权[23]，为英国轮船执役人员无故打死中国乘客而积极展开抗议活动等。又如1909年，中国与澳门葡萄牙当局议行勘界，该会曾屡次开会并通电全国，要求政府维护领土完整，抨击两广总督袁树勋交涉不力，误国失权。

粤商自治会积极参加了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是年3月，该会议决发函各省及海外华商，建议实行联合请愿。这一行动受到宪政讲

习会等团体的赞扬。在1910年三次请愿高潮中，广东省表现相当活跃，这是同粤商自治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但是，粤商自治会受康、梁影响较多，对革命党抱敌视的态度。

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成立较晚。据《时报》记载，1909年5月20日该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起初附属于教育会，会长姚晋圻是一个绅士，书记为汤化龙、余德元，编辑员为张国溶。实际上，汤、张两人掌握着该会的全部活动。汤化龙（1874—1918）字踑武，湖北蕲水人，曾肄业黄州经古书院，1904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后来赴日本留学，习法政，1909年回国。谘议局成立时，初被选为副议长，继被选为议长，成为湖北立宪派的主要领袖。张国溶字海若，湖北蒲圻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参加立宪运动非常积极，是湖北请愿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联络人。1910年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成立，推张为干事长。宪政筹备会虽成立较晚，但由于汤化龙、张国溶等活动积极，尤其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突出，所以使立宪派在湖北取得相当有力的地位。

贵州省的宪政预备会成立于1909年，也是在教育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会长为任可澄（1879—1945），但会务仍受教育会长唐尔庸的控制。任是安顺人，唐是贵阳人，两人都以举人考中内阁中书，因不满于政治腐败的状况，遂回黔办教育。宪政预备会办有法政学堂，还出版《黔报》与《贵州日报》，鼓吹立宪。该会与比它早两年成立的自治学社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自治学社政治态度激进，其主要骨干多半是革命党；而宪政预备会则多为富绅，与官场联系较多，对自治社采取敌视态度。在办教育方面，两派各树势力，也互有竞争。谘议局成立时，自治学社派占了优势。1910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两派都曾参加。但在省内的政治舞台上，两派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它们的斗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立宪运动中还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小，如一个城市，一府或一县

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所组织的立宪团体。有的是标榜研究宪政，但更多的是以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这类小团体在京、津、沪等地及沿海各省特别多。其中上海的宪政研究会成立最早，还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就已开始活动，1906年12月创办了《宪政杂志》，宣布它的宗旨是“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24]。这个团体的政治倾向颇为保守。参加者全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袁希涛、沈恩孚都是龙门师范学校教员，黄炎培是广明师范学堂教员，狄楚青是《时报》总理，陈冷和雷奋当时都是《时报》主笔，史家修（即史量才）是女子蚕桑学堂教员，等等。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

还有一些团体是在立宪运动过程中专为推动某一项宪政目标而结成的。如最普遍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几乎各省都有。又如谘议局研究会，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谘议局议案协赞会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原政闻社骨干徐尔音、吴冠英、张嘉森等在东京成立的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规模和影响较大。它曾得到国内著名立宪派领袖张謇等的赞助，以及清官吏载振、胡惟德等人的捐款。它于1909年9月开始出版《宪政新志》，发表有关宪政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汇登各省谘议局重要文件；曾增刊一种《第一次各省谘议局通览》。1910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谘议局联合会，集中了各省立宪派的领袖和骨干分子，为后来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党——宪友会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中，在北京的八旗士民也陆续成立了八旗宪政会、八旗维持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等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各地（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八十个[25]。通过这些团体把各地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松散地组织起来，而在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各省立宪派又逐渐实现了全国性的联合。这是戊戌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再度高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力量获得重要发展的标志，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立宪派上层分子在政界拥有很大势力，还有很多人直接在经济界、文化教育界任职，所以具有极广泛的社会联系。立宪派领袖通过持续数年的立宪运动，获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这些条件，使立宪派在清末政治舞台上构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反对革命，给革命党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使革命遭到失败；同时它又在政治上给腐败的清政府以相当的打击，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它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

第二节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国会请愿的发动

一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批评

清廷于发布预备立宪诏书的第二天，就下令进行官制改革。表面看来，似乎对改革的态度相当积极。实际上，它是基于加强集权的考虑，才这样做的。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略给予清朝的统治机器以很大的打击，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削弱了；相对地，各省督抚的权力却有所增长。当西太后与光绪帝西逃的时候，东南两个最重要的督臣刘坤一与张之洞，还有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所谓“东南互保”，俨然以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外国人打交道。此后，他们又以源源不绝的供应，维持西安小朝廷的一切费用，这样他们便取得了对内政外交的极大的发言权。“辛丑条约”订立后，巨额赔款全靠各省分担，从而造成了没有各省督抚的支持，朝廷就无所作为的局面。清朝统治者深深感到了这种对它不利的处境，想利用预备立宪的机会，收回它失去的权力，加强中央专制的力量。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是清朝统治者焦思苦虑的，即庚子之后，某些汉族官吏的实力增长了。比如袁世凯，他手握兵柄，控制京畿，威慑数省，很遭满人的疑

忌。清朝统治者希望借预备立宪之机，削弱汉官权力，加强满人的优势。除此之外，为了保证预备立宪按照“纳民于轨”的路线进行，朝廷需要有自己信得过的得心应手的一套行政机构。在建立这样一套行政机构时，还可以添几个新名目，借以欺饰中外耳目，这是一举数得的事。

本来，官制改革并不能给立宪派带来直接的好处。但因清末吏治实在太腐败了，他们希望通过官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吏治，以便促进宪政的实行。但这已与清廷改革官制的动机大相径庭了。

1906年9月2日，清廷下诏委派载泽、世续、那桐、铁良等八名满族大臣，及张百熙、袁世凯、徐世昌等六名汉族大臣会同编纂新官制。同时另委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个军机大臣担任总司核定之责。又命张之洞、岑春煊等总督，派员来京协助。

9月6日，在朗润园设立新官制编制馆，以杨士琦、孙宝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课员有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陆宗舆、钱能训等共十三人，其中大部分是学习法政的留学生。而杨士琦、金邦平、张一麐等都曾是袁世凯的幕僚，所以，在这次官制改革中，袁世凯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在最初几次编纂大臣会议上，袁世凯是发言最多、提议最多的一个。他主张取消军机处，设立内阁，目的是扩张北洋集团一派的势力，因而引起满族亲贵的极大不满。以排汉著名的铁良[26]，忍不住当面与袁争执起来。载泽为此上折奏劾铁良有意阻挠。碍于舆论，铁良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矛盾并没有解决。满族亲贵要夺汉官的权力，汉官不能不有所抵制；赞助立宪的人主张大力裁汰重叠机构和冗员，以省靡费，抵制立宪的人则不愿多所更张。这种斗争不但在参加编纂新官制的大臣中间进行着，而且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官员中间同样展开着。在公布新官制案之前，一直有人为此上书，其中赞助立宪的，提出自己的

改革建议；抵制立宪的，则极力维护旧制，劝诫朝廷不要轻易改变。在内外议论纷纭的情况下，编纂大臣们决定，凡直接涉及皇室利害的问题，均置而不议。

11月6日，公布了西太后最后裁定的新官制案。其内容主要是：

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则照旧。令各部尚书均充参予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

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

将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

将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预定设立海军部与军咨府，未设以前均归陆军部办理。

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

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司法。

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

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

设邮传部，掌管轮船、铁路、电线、邮政。

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都察院改设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一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御史各员缺均照旧。

旧有的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等均照旧。

预定要设立的资政院、审计院等只是准备“依次成立”。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次官制改革，除了更换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门，新增一个邮传部以外，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立宪派所期望的责任内阁，连提都不曾提到。而预定设立的资政院则不知究竟何时才能实现。对于涉及皇室大权及满族亲贵利害的各衙门，则明确声明不予更动。

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布新官制案的第二天，重新任命的各部院大臣的名单：

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原任）

吏部尚书鹿传霖（原任）

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原任巡警部尚书）

度支部尚书溥颋（宗室）

礼部尚书溥良（宗室）

学部尚书荣庆（蒙族）

陆军部尚书铁良（满族）

法部尚书戴鸿慈

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皇族）

邮传部尚书张百熙

理藩部尚书寿耆（宗室）

按清朝旧制，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现在号称满汉不分，结果在十一个部之中，汉官只有五人，满蒙贵族则有六人。而且其中外

务部尚书虽是汉人，但上有管部大臣奕劻和会办大臣那桐，实际上瞿鸿禨不能算该部的主管官员。这样一来十一部之中便是汉四、满六、蒙一，满汉比例是六比四。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掌握在满人手里。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并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一、三、五、六等四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明显地反映出满人集权的趋向。

不消说，官制改革的结果使立宪派大为失望。还在官制案公布之前，有些立宪派已得知改革的某些内幕情况。如张謇在是年10月23日（旧历九月六日）日记中写道："瑞观察来谈时事，义愤见于词色。都中方扰扰也。"瑞观察即是瑞澂，他是同情立宪的，后来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所谓"都中方扰扰"即指在改革官制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这段日记明显地反映了张謇的不满情绪。

新官制案和新任各部尚书、侍郎发布后，所有的立宪派都表示极大的不满。上谕发布的第三天，11月8日，《时报》即著文抨击说："此次之改制，止系添出几个新名目，汰去几个无权力之大员，绝无他影响也。"以后该报又发表社论，更进一步指出，所谓中央官制的改革，"唯汲汲以中央集权为秘计，且各部集权皆可从缓，独兵政与财政两部一若惟恐稍纵即逝者"[27]。

当时在海外活动的立宪派也纷纷批评这次官制改革的虚伪。徐佛苏在日本的报纸上见到消息后即写信给梁启超说："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28] 信中还说到他所熟识的革命派领袖黄兴乘机劝导他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他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徐氏的态度反映出立宪派中一部分有心救国的青年对清政府不满而彷徨苦闷的情绪。梁启超对这次改革自然也不满，但他劝其同党不要因此过于失望。

在杨度等人办的《中国新报》上，对官制改革进行了相当激烈的

批评。熊范舆指出，官制改革暴露了清政府想“借此愈使专制运用之灵活”。他并且指出，“编制委员中意见冲突，互相反对者，不过各欲借此为政界角逐竞争之具，因以增殖自己之势力而已”[29]。熊范舆的剖析是正确的。在朝廷大员中，虽有人赞助立宪，但多半是利用名义提高自己的声望，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实质是争权夺利。

中央官制的改革已使立宪派大不满意，而外官制的改革则更是虎头蛇尾。在公布中央官制案的同时，朝廷曾指示编纂官制大臣继续拟订各直省官制。直省官制直接涉及督抚权力问题，没有他们的赞助是不行的。编制馆曾拟定两种方案征求各督抚意见。第一种方案主要是建立以督抚为首长的行省衙门，合布政使、按察使两使署于同一衙门内，由督抚直接部划，实行同署办公，而另外设立高等审判厅，专司审理案件。这比较接近立宪国地方官制。第二种方案基本沿袭现制，只是强调分工，以明责任。结果各督抚复电，明确赞同第一种方案的只有岑春煊、赵尔巽两人，其余有六个督抚表示有条件的赞成；而明确反对第一种方案的则有八人，另有四人意见折衷。鄂督张之洞、甘督升允则对两个方案都不以为然，实际是反对改革。张之洞曾两次复电编制馆。其第一电主要强调民情浮嚣，物力匮乏，官制“不宜多有纷更”，只可“就现有各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30]。其第二电专驳司法独立。他说，如果司法独立，督抚不能过问案情，就会有人强行西法，对革命党“曲贷故纵”，结果“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31]。这显然是吓唬朝廷，意在维护督抚权力。

由于多数督抚反对和抵制，外官制改革迟迟不能进行。直到1907年7月，才发下一道上谕，规定：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两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如此而已。完全放弃了原拟方案，仅改添几个新名目以为敷衍。但即使这样一个极不足道的改革，还要东三省“先行开办”，直

隶、江苏“择地试办”。

官制改革是清政府标榜预备立宪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结果弄得内部矛盾加剧，又引起立宪派强烈不满。本来对宣布预备立宪一举，立宪派曾报以热烈欢呼，至官制改革一场闹剧过后，他们开始不信任清政府了。杨度说：“政府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32] 对立宪派来说，最重要的利益是参与政权。所谓“争实事”主要就是争参政权。于是，从1907年秋天起，立宪派便开始发动国会请愿运动。

二　1907年—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

在官制改革中，清朝统治者完全回避了国会与责任内阁的问题，毫无开放政权的意思，这是立宪派最感失望的。他们指出：“国会乃立宪之真精神所在”，“政府靳而不与”，这是无意实行立宪的表示[33]。某些立宪派分子不但懂得开国会是实行立宪的关键，而且认识到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会自愿实行立宪，自愿开设国会，给人民以参政权。要实行立宪，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他们说：“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恃吾民自任之。”[34]“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因此，不能“坐待他人之以政权授我”[35]。从这种认识出发，立宪派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

最早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会的领袖杨度。他在1906年冬写的《中国新报叙》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07年春，在给梁启超的信里他更明确地提出，应把国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一个目标上来。当时，梁启超表示赞同他的意见[36]。杨的这一主张还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宪政讲习会成立时所发布的《意见书》中。宪政讲习会是国会请愿运动的首倡者。

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和沈钧儒、雷光宇、恒钧（满人）等人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其中已经

把立宪派关于开国会的理由、国会应有的职能等基本主张都明确提出来了。

请愿书宣称，专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政府与人民隔绝，“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37]，因而不能有力地抵御侵略。立宪国因有国会把人民同政府联系起来，上下同负责任，使国家独立而强大。请愿书还认为，在专制制度下，由于人民的要求总得不到反映，久而积成怨愤，有一部分人就会铤而走险。革命都是由专制制度本身造成的，所以要防止革命“祸乱”，只有开设国会，真正实行立宪；靠镇压和杀戮是无济于事的。请愿书指出，中国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强环逼，内部革命蠭起，如不赶紧实行立宪，“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它要求一两年内就开设国会。

解救“内忧外患”，这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最根本的理由。以后历次请愿书都是反复强调这一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熊范舆等在请愿书中，用了最多的篇幅来说明他们关于国会职能的主张。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一、国会是监督政府行政的机关。专制制度下因没有国会监督政府，所以腐败放任；有国会监督，“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宜，质问之声即起”，可保“官无尸位，责有专归”，使政府对国会负责任。二、国会监督全国的财政。捐税经国会认可，便不致有横征暴敛；财政由国会监督，才不致有贪污中饱。三、国会是立法机关。经国会制定民刑各法，使司法渐次独立，并逐步收回治外法权。立宪派显然是把国会制度理想化了。但却充分地反映了他们参与政权的渴望，这是国会请愿运动的基本精神所在。

这份请愿书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发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就有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等相继上书和致电朝廷，要求速开国会。

熊范舆及宪政讲习会的一些活动分子，首先在湖南、上海等地展

开活动[38]。他们在湖南的活动，很快取得了进展，这个省最早派出请愿代表入京上请愿书。由此带动各省立宪派陆续发起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为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1908年3月，河南省立宪派在省教育会召集许多府县代表集会，讨论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当时路过河南的熊范舆，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便在省内掀起请愿签名运动，并很快推出代表赶赴北京呈递请愿书。继河南之后，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也陆续有代表入京上请愿书，有的要求二三年内召集国会，有的更提出一年以内即开国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如河南有四千余人，安徽五千余人；有的更多，如江苏为一万三千人，而山西省据称达两万余人，显示运动带有相当的群众性。有些省未及选派代表入京，但也展开了请愿签名运动，如江西、福建、贵州等省。在请愿运动高潮时，湖南省女界单独上了一道请愿书，一时传为美谈。在上海，成立了国会期成会。这是由宪政讲习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发起组织的，专门从事请愿联络活动。北京八旗士民也有一千五百人签名上书请开国会。郑孝胥、张謇等人，在请愿发动初期，一度表现迟疑。后来，在运动进入高潮时，也领衔发了请愿电。这一情况既反映了郑、张等人的保守，同时也反映出请愿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它终于推动这些谨慎、懦怯的上层分子也下决心投入运动。当时的报刊（革命派直接控制的报刊除外）舆论是一片请开国会的呼声，连某些官员也为形势所推动，表示赞助请愿运动。从1907年冬到1908年夏，先后有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等上折奏清速开国会。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电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以请开国会为时髦，给顽固守旧势力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宪政编查馆馆员们有一次讨论国会期限问题，有一个福建人叫高种，他主张二十年后开国会。消息传出，人人争骂高种“愚顽”，福建同乡会宣布不认高种为福建人。可见当时舆论的声势。

清廷对这场请愿运动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运动发展的形势超出他们的预料，感到难于应付。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陆续交到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员曾多次声言拟于某日某日代奏，结果却总没有代奏，可以反映出统治阶层的彷徨无策。

当时正在德国“考察宪政”的顽固派于式枚，给朝廷上一道奏折，攻击请愿运动是“胥动浮言，几同乱党”，要求朝廷“遇事弹压”[39]。其实朝廷也正打着同样的主意，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当上海国会期成会成立时，清政府特电江督端方，要他查清该组织的内幕，如稍有可资借口之处，就准备予以取缔，从而达到压抑请愿运动的目的。但端方是一向标榜赞助立宪的，他与立宪派，特别是张謇等人关系很密切，自然不肯说坏话。稍后，便发生了政闻社员陈景仁电奏激怒朝廷的事件。清廷不但下令将陈景仁革职，而且下令查禁了政闻社。这次上谕中说：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40] 但奇怪的是，把政闻社的案情说得如此严重，而令下之后，却并没有抓任何一个政闻社员，足见处分政闻社的目的全在于镇慑立宪派，遏止请愿运动。当时《字林西报》有一段议论说得很明白，它说：“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员，不过借端而已。”[41] 在查禁政闻社的第三天，又以刊登康有为为海外华侨写的请愿书为罪名，将《江汉日报》（武汉）封禁。这一连串的打击，出乎康、梁及所有立宪派的意料，政闻社遵命解散了，其他请愿代表也偃旗息鼓，各回本省去了。

西太后之流不愿居镇压请愿运动的恶名。当宪政编查馆拟就了“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纲要”时，她立即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定下九年后开设国会的期限。遂于8月27日——查禁政闻社后两个星期，将“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同时公布，算是对请愿运动的一

种答复。

这个宪法大纲，根据赴日考察宪政大臣达寿的建议，照搬日本天皇钦定宪法的模式，逐条详列君主大权。其中包括君主对行政、立法、司法有最后裁定的权力；对议院有决定开会、停会、展会以及宣告解散的权力；统帅陆海军的权力；更动宪法的权力；宣战、媾和与实行非常法的权力以及任免官吏的权力等等。同时明文规定，议院不得干预君主的这些权力。这是一部典型的君权宪法。清廷急于炮制和公布这样一个宪法大纲，不啻是预先警告资产阶级立宪派，不要存分享政权的打算！自然，软弱的立宪派不敢直接攻击钦定的宪法大纲。但他们也不肯放弃自己分享政权的要求。以后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九年筹备清单规定明年各省谘议局就要开会，他们随即把注意力放到谘议局的筹备活动上去了，所以国会请愿运动暂时沉寂下来。

第三节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和财政危机的加深

一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

清朝统治者假借“预备立宪”的名义，谋求中央集权，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这种反动方针不但遭到立宪派的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在“新政”时期势力大为膨胀的袁世凯，对立宪表现了相当积极的姿态。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即是采纳他的建议。他还为此筹集了一大笔款项，予以资助。端方等出国前，曾多次到天津与袁筹商；回国后，在向朝廷复命之前，又先与袁磋商促请朝廷宣布立宪以及筹计推动宪政有关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了设立责任内阁的问题。从这时起，袁世凯便确定以阁揆为目标，谋夺清政府大权。袁世凯的政

治野心早就引起过一些人的怀疑，还在1903年，就有人奏劾他有司马昭之心。他对立宪的格外热衷，更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在官制改革的大臣会议上，他与铁良的冲突，是这种矛盾的初次爆发。

袁世凯是西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极谙官场权诈，善观风色，会博取上峰的欢心；昏庸贪鄙的军机首辅奕劻，早被他以大量金钱所买动，对他言听计从。这就使他在上面有了靠山。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中，袁世凯确有出众的能力，无论练兵、敛财、行政、外交，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并取得相当的成绩。这又使他在军政界博得了很大的声望，于是钻营仕途的人争相投效，官场名流也乐与交往。“预备立宪”以后，他最早在天津创办自治研究所、宪法研究所等新政机构，聚集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人不分满汉，只求其为我所用。因此有些汉族官吏对袁也深怀不满。这就使统治集团的斗争有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1907年春夏间爆发的所谓“丁未政潮”就是一例。

这次政潮是上层统治集团的一次短兵相接的斗争。发难者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与新任邮传部尚书岑春煊。瞿鸿禨（1846—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庚子事变过程中，以处理外交、起草诏旨能称西太后之意，受到拔擢，进入军机处，授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906年授协办大学士，是颇得信任的汉族大臣。他对立宪并无热情，但也不公开反对。对奕劻、袁世凯互相勾结、招权纳贿很不满。由于学问、地位和威望的关系，言官与报界对瞿氏较为礼敬；对奕、袁之流却时常加以攻击。为此，奕、袁对瞿氏已怀疑忌，而瞿氏圆滑的政治手段，更增加了奕劻、袁世凯等人的嫉视。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原是甘肃布政使，以庚子护驾有功，被西太后一再重用，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署两广总督。在粤督任三年，以奏劾属官太多，有“官屠”之称。1906年9月调云贵总督，1907年3月又调任四川总督，均未赴任，得瞿鸿禨援引，从上海北上入京觐见，5月3日授

为邮传部尚书。瞿鸿禨打算与岑春煊等联合，打击奕劻、袁世凯。先是，瞿在西太后面前表示对奕劻不满，而岑刚一上任便参劾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说他“声名狼藉，操守平常”，诏准革职。朱是奕劻、袁世凯所任用的。于是斗争便从此引发。紧接着，5月7日，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夤缘无耻，买天津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并曾以十万金为奕劻祝寿，因而得署黑龙江巡抚之职。事情一揭穿，舆论哗然，段芝贵、载振都感到十分狼狈。不数日，宣布撤去段的布政使衔，撤销署理黑抚的任命。载振自请辞去农工商部尚书，亦诏准。这是对奕、袁的一次严重打击，权势和声名都受到相当的损失。他们当然不会默然忍受，当即开始部署反击。他们首先借口两广不宁，建议把岑春煊外放两广总督。岑氏郁郁出京，滞留上海。而当他决定往粤赴任时，又以暗结康、梁的嫌疑将其开缺，被逐出政治舞台。岑春煊出京后，瞿鸿禨已渐孤立，奕劻奏请把与瞿有联结的林绍年罢出军机处。经瞿再三力争得以留任。接着，奕劻与袁世凯直接向瞿鸿禨开刀。他们收买瞿氏家奴，搜得瞿与某报馆的信函，然后便贿买善于摇笔弄舌的恽毓鼎，立上弹章，攻击瞿氏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怀私挟诈，请予罢斥。奕劻还密奏瞿图谋推翻戊戌成案，要求“归政”，这是最触西太后忌讳的。西太后不等彻查复勘，便于6月17日下令将瞿鸿禨开缺。这次政潮既包含了汉族官吏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显然满汉矛盾起着支配作用。瞿鸿禨、岑春煊两人是汉族官吏中较有能力和影响的人物，去掉他们，保住奕劻，稳定了满族权贵的统治。袁世凯因为紧紧拉住奕劻，所以不曾受到直接的打击。但政潮结束还不到两个月，清廷便把袁世凯和另一个声望素著、做了湖广总督近二十年的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处。对于汉族官吏来说，由拥有实权的重要督臣内调中央，通常是明升暗降的办法，在庚子以后更是如此。在清末，重要的督抚，尤其是直督、江督、鄂督等，不但握有一方军、政、财权，而且办理相当一部分对外交涉，可得外人的奥援，他们对朝廷的政策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军机大臣的地位，基本上是承旨办事，其影响决策的力量，有时反不如有势力的督臣。

袁世凯离开他经营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当上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段时间无所建树。但这个政治野心家是不肯寂寞的，他企图在外交上谋发展，借帝国主义的撑腰加强自己的地位。当时日、美两国在侵略中国的竞争中，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离中国很近，对中国威胁最大，所以不少士大夫有联美对日的想法。美国为其自己的侵略利益打算，自然很愿与中国的权势人物拉关系。袁世凯鉴于这种形势，于1908年7月，奏派他的心腹唐绍仪，以感谢退还庚子赔款专使的名义赴美商谈，企图联美抵制日本。但是，情报灵通的日本政府，在唐绍仪出发时，已经探悉袁世凯的意图。唐绍仪路经日本时，日本政府热情招待，设法款留，同时却指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谈判妥协办法。等唐绍仪抵美时，日美已达成“罗托—高平协定”，双方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暂时妥协。唐绍仪真正成了“感谢专使”，此外别无所事。袁世凯的外交失败，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寻常的挫折。

正在这时，震动清朝整个政局的大变故发生了。1908年11月15日，掌政近五十年的西太后死了，受她压抑、禁锢的光绪帝先她一天死去。这就造成了一时无法填补的权力真空。光绪无子，入承帝位的是醇亲王载沣（1883—1952）的三岁幼子溥仪，而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亲王，既无经验，又无魄力，但头脑中却牢记一条祖训，即不能重用汉人。而且，他是光绪帝载湉的胞弟，对袁世凯久怀疑忌，一旦大权在握，再也不能容忍袁世凯盘踞要津。但究竟如何处分袁世凯，载沣等人还是颇费踌躇。按他本来的愿望，是要重惩袁世凯及其党羽的。但以袁在北洋经营有年，根株四布，背后又有外国人，处治不当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可能引起问题。后经张之洞等人婉说，载沣以大局利害攸关，不得不改为从轻发落，于1909年1月2日，以足疾为借口，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随后，他的几个重要党羽如唐绍仪、赵秉钧、陈璧等也相继受到贬斥。

袁世凯被罢斥之后，军机处只剩下张之洞与鹿传霖两个资格较老

的汉族大吏。汉族官员的势力被削弱了。鹿传霖年老志衰，无所主张。张之洞面对褊狭、忌刻的载沣等一小撮满洲贵族，也毫无办法。他在用人行政方面曾有所建议，但屡遭拒绝，以致这个对清朝“公忠体国、夙著勤劳”的忠实臣仆，也不禁感到寒心，于1909年10月以忧病死。其遗诗有“君民末世自乖离”之句，反映出清朝末年统治集团中尖锐的矛盾。张之洞死后，戴鸿慈补入军机处，但仅半年就死了。1910年8月，鹿传霖也病死。袁世凯开缺后军机处是满三汉二，鹿传霖死后变成满三汉一了。这样就更加突出了满汉矛盾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当西太后在世时，主要靠她“驾驭群僚”的手段来保持满洲贵族的统治权，但她也还要照顾到满汉官员的一定比例。到载沣当政，他竟想用赤裸裸的皇族集权的办法，来确保满洲贵族的地位，结果只是更孤立了自己。

在排挤和斥逐汉族官吏的同时，载沣特别致力把军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庚子事变后，他曾作为“谢罪专使”前往德国[(42)]。德皇威廉在召见时，曾向载沣介绍德国立宪的经验。威廉特别向他强调，最重要的是皇室必须掌握军权。这一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一上台，立即着手训练一支由他亲自统帅的一万二千人的禁卫军。派他的弟弟载涛和皇族成员毓朗充当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2月，又着手兴复海军，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完全由皇族成员主持其事。是年7月15日，特发上谕，明定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在溥仪亲政前，由摄政王代行大元帅职权。同一天，任命他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决定增设军咨处（后改称军咨府）作为赞助大元帅的最高军事参谋机构，以载涛和毓朗为管理军咨处事务大臣。依据章程，该处是“赞助皇上通筹全国陆海军事宜之所，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均由该处“拟案奏请钦裁后，饬下陆海军部钦遵办理”[(43)]。而且军咨处还对各镇新军的指挥、参谋、训练人员的任免拥有审定权。可见其权力还在陆军部、海军部之上。通过这一系列步骤，载沣把最高军事权力通通集中到皇室手里。但是，这只不过是在法律手续上把军权集中到皇室手里；在实际上，这个皇室一统军权的计

划，遇到了地方督抚的顽强抵抗。

1910年春，军咨处通咨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督抚们明白这是谋夺他们的军权，纷纷表示反对。当时海军处也曾下令，要各兵舰未得海军处命令，不准擅离原驻地。这当然也是针对督抚而发。自甲午战败海军崩溃后，海军系统不复存在，所剩少许小型舰船多在内河，由当地督抚调度、指挥。海军处企图剥夺督抚的这项权力，不能不遇到强烈抗议。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致电质问海军处：督抚不能命令管下的兵舰，何以绥靖地方？当时各地民变蠭起，有名的长沙暴动、莱阳民变都发生在这一年，朝廷和督抚都有日夕不安之感。督抚以绥靖责任相要挟，载洵不敢肆行无忌。但是既然争夺军权的矛盾已经暴露，再想掩盖也掩盖不了。载沣等不会改变皇室集中军权的宗旨，各督抚也不肯放弃固有的军权。所以斗争继续发展。1910年12月，朝廷发渝将相沿已久的督抚所兼陆军部（前兵部）尚书或侍郎衔，均予撤销。1911年1月8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各督抚联奏，除要求维护督抚固有的用人行政等项权力外，特别提出，在各省警察完备之前，所有各省防营从缓裁撤，明确归督抚调用，以别于陆军。皇族内阁成立后，军咨府再次提出要派员到各省管理督练公所。河南巡抚宝棻致电各省督抚，提议联衔电驳。云贵总督李经羲单衔致电军咨府，声称：如果实行军咨使监视各省军务，不受督抚节制，则督抚可一律裁撤。不然，则李某先不承认，态度十分强硬。接着，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及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西、贵州等巡抚联衔电驳，使军咨府的计划又一次被挫败。载沣等人不能不顾忌到，全国人心不稳，倘各督抚对中央消极反抗，则形势必更加危险。所以他指示毓朗等要本着“内外和衷共济”的精神妥议办法，不可操切。实际上，载沣将全部军权集中于皇室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载沣一意孤行的皇室集权政策，不但激起了督抚的不满，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矛盾，而且使上层满族权贵内部也发生了利害冲突。

载沣虽然既无政治思想，又无政治经验，但由于揽权心切，用人行政往往不与大臣商量，独断独行，致使奕劻颇为不满。他们两人素来关系就不和谐。奕劻秉政多年，声名狼藉，又过于依信袁世凯，西太后在世时对他已有不满。1907年让载沣进入军机处，就有牵制他的意思。西太后死后，载沣把袁世凯罢斥，等于砍掉了奕劻的臂膀。奕劻虽对载沣兄弟不满，但也无力反抗。1910年2月，御史江春霖奏劾奕劻，列举了很多劣迹，并涉及奕劻所援引的许多官吏。载沣一面以“莠言乱政”的罪名，命江春霖回原衙门行走；一面却破例将“乱政”的劾折发抄，使奕劻的劣迹公布于世。对此，奕劻忿忿不已。这样，在清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由载沣一家兄弟，再加上一个毓朗，构成最高统治权力的中心，由此形成一个极端反动的所谓“少壮亲贵集团”。载沣之流的集权和独裁，激起多数督抚的反对，和大批满汉官员的不满。在革命危机愈来愈迫近的情况下，有些封疆大吏竟屡次要求辞职；许多朝廷大员也敷衍公事，不肯负责。清朝廷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二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政治上日益孤立的清政府，又遇到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这就更加深了它的统治危机。

清政府陷入财政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签订《辛丑条约》，担负巨额的赔款。另一个原因则是偿付外债。为了筹集甲午战败所承担的战争赔款和赎还辽东半岛的赎款（两项计银二亿三千万两），以及为筹集军饷和装备等，清政府曾先后向英、法、德等国借款达三亿四千万两，加上利息共六亿两，每年须清偿本息二千四百九十万两，除海关承担一部分外，其余悉数由各省分担。

除了赔款、还债以外，练兵经费也是一项巨大的财政开支。据统计，每年单是饷杂开支即达二千三百余万两。此外向外国采购军火装备及各项军需物资，又需巨额开销。据1910年海关的不完全统计，这

年进口的各种军火用款即达三百三十六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军需物资在内。另外，1909年决定着手重建海军，海军部尚书载洵奏请筹集海军经费，计开办费二百八十三万五千两，常年经费一百六十八万两，共四百五十一万五千两，由度支部通咨各省分担。同年，为集中军权而增设的军咨处，也奏报需开办费六十万两，常年费一百余万两。

其他各项增加费用，不胜枚举。有人估计，清末每年军费开支可能达到六千万两之多[44]。

在支出繁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仍极奢靡挥霍。据当时报刊载录，各国皇室经费比较：欧洲各国中以英国的皇室经费最多，为一千五百余万；俄国其次，一千二百余万。但英国皇室经费仅占其总岁入的0．8%；俄国所占比重最高，也只占2．4%。可是中国的皇室经费，以光绪三十四年为例，竟达一千八百余万，约占总岁入的6．6%[45]。

除以上几项大宗开支外，在预备立宪名义下，举办新政所需的开支，也是非常庞大的。御史赵炳麟在1909年夏所上请定行政经费的奏折中，列举了各省举办新政约需的费用：司法一项约费百万，教育一项约费百万，而巡警一项，大省需费三百万，小省需费二百万，单只这三项合计起来，各省每年即平添四五百万的开支[46]。赵炳麟的奏折使朝廷甚为踌躇，直到次年5月才将原折发抄。不久，又有湖北布政使王乃澂上折奏请依据现有财力，变通宪政筹备的次序。载沣决定要各省督抚针对赵、王两折奏复本省情形。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复奏中称，预计到宣统八年，顺直全省开设各级审判厅、检察厅，需银七百九十余万两；开办和扩充学堂又需二千二百二十五万两；继续推广巡警又需银一千二百七十余万两。如再加上筹办地方自治等费，平均每年新政经费约需六百万两。陈夔龙哀叹“民生雕敝，深恐难支”[47]。其他各省督抚的复奏，无不叫苦连天。

载沣等要各省督抚复奏，本意是要他们针对赵、王两折提出的问

题妥拟筹款和节省政费的办法，而结果是一片叫苦声。梁启超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节省政费问题》。其中揭露虚糜政费的情形，他写道："国家设官之原则，以人奉职，而今也则以职豢人。故国家本可以不办此事，因有人欲办以自豢，斯办之矣。办此事本有一机关而已足，因欲豢之人太多，则分之为数机关矣。一机关本以若干员当之而已足，而待豢之人不能遍，则多为其员额矣。犹不能遍，则别立名目以位置之矣。"所以"凡今日财政所支出者，其什之八九则有劳费而无效果者也。所余一二亦以最大之劳费得最小之效果者也"[48]。梁的揭露是符合事实的。由于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毫无行政效率，造成极大的财政上的浪费。度支部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并沥陈财政危迫情形折》中也承认"冗事冗费，触处皆是"。它的亏空达七千八百万两的预算案，就是在这种财政困窘而又制度窳败的情形下编制出来的。

财政危机加剧了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既然载沣等人要集权于中央和皇室，如果不把财权集中到手，那么行政、军事等方面的集权就没有物质的保障。所以载沣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由中央控制全部财政大权。

清朝的户部（后改度支部）按规定有"制天下经费"的权力，是统一全国财政的管理机构。在各省的布政使司或称藩司，代表朝廷管理地方民政和财政事务，与各省督抚虽是隶属关系，却有职权的分工。但自经历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省督抚的权力扩大了，原来为应付战争饷需而临时征收的厘金，成了地方经常性的重要财政收入，地方上的财权逐渐集中到督抚个人手中。户部原有的通过各省藩司监督地方财政的职能，已越来越小。到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以后，由于赔款、外债、军饷、新政等各项开支急剧增加，户部既不掌握各省财政收支情况，也没有可筹集大宗款项的财源，只能悉数摊派到地方，由各省筹集。于是各省任意增加捐税、滥铸铜元、发行钱票、截留解款，各行其是。后来各省向度支部报销的制度也逐渐变成虚应故事。除传统的收支项目，如地丁、常关税、盐课（以上

为收入）及俸禄、驿站、廪膳、赏恤、采办、织造、修缮、杂支（以上为支出）等项一般尚能详确报解外，其他如厘金、劝捐、铸钱等项收入，以及善后、筹防、新政、军械、偿债、各关局等开支，往往有冒混隐漏等情弊。这些财务项目，一般都归各省督抚一手包办，由专设的局、所和另派委员经办，中央无法一一督察。举江苏为例，除藩库外，另有粮道库、苏州牙厘总局、淞沪厘捐总局、金陵厘捐总局、善后局、沙洲公所、膏捐局、房捐局、宝苏铜元局、商务局等，这些都是经管银钱的地方。而这些局、所的收入和支出，只凭督抚直接向皇帝奏请的一纸公文，就算报销凭据，各省藩司无法干预，度支部也只能从咨文或皇帝的朱批中知道个大概。

急图集权的载沣上台后，立即着手改变这种状况。首先由度支部尚书载泽上一道奏折，奏请清理各省财政。1909年1月11日，诏准公布《清理财政章程》。该章程规定，清理的目的是“截清旧案，编订新章，调查出入确数，为全国预算、决算之预备。”[(49)] 度支部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另由部派专任财政监理官到各省督同清理。依清理章程的要求，从宣统元年起，各省财政清理局，必须按季详报本省财政收支确数。这样便把各省财政完全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排除了督抚不经部准自行安排收支或隐匿收支项目的机会。显然，这是对督抚权益的极大侵犯，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纷纷上书，婉言抵制。当时报纸曾发表一条消息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指载泽——引者）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50)] 当度支部请旨任命的各省财政监理官赴任后，更是屡起纷争：地方官控告监理官如何骄横；监理官控告地方官如何阻挠。度支部频频接到这种互相攻讦的文电。它只好发电给各省财政监理官称：“外间虽纷纷诋毁，各该员有则速改，无则专心办公，务须以清理财政为要。”[(51)] 1909年9月，湖南财政正监理官陈惟彦，以牵涉命案被御史严参，旨准“交部议处”。但为了推动清理财政，朝廷又于12月将阻挠清理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藩革职。这

两起处分事件充分表现了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的尖锐性。是年底，朝廷为直接控制大宗税款，又决定设立督办盐政处，派度支部尚书载泽兼任督办大臣，并颁发盐政新章，将原来有盐务各省督抚的权力，大部分收归督办大臣独揽。这引起了有关督抚的严重抗议。盐政一向为官吏敛财的主要门径，一旦全归中央，地方大吏财源被夺，岂肯甘心？所以当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致长电给盐政处，力争用人、用款及奏事等权力。电中且谓“督抚之权皆系中央之权，未有可专制自为者也。若至督抚无权，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时方多故，独奈何去其手足而自危头目乎？”[52] 督抚对财政集权如此怨愤，使朝廷的各种如意算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此外，度支部还迭次通咨各省，禁止自铸铜元和印行钱票，以统一币制的名义控制全国金融。为实行统一币制，1911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商订币制借款。但直到清政府垮台，始终未能实行统一币制。

载沣、载泽等向督抚开刀，自然无助于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还是不得不与各督抚一起设法向人民群众搜刮，从而使封建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腐败的清政府还企图靠“厚集洋债”的办法来摆脱危机，可是这实际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前已指出，清政府每年赔款还债的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如果再举新债，势必更加重偿付负担。而且清政府所借外债都是担保借款，即每借一笔外债，都要以一定的税赋或其他东西作担保，这就会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新的问题，更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财政权的控制。据不很精确的统计，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到武昌起义前夕，清政府历年向英、日、法、德、美等国借款共达二亿四千六百余万（库平两）[53]，一般最低年息是5%（极个别的为4%），而最高竟达12%。这些借款多半是以修铁路和赎回铁路权的名义借的，都附有许多特权，所以不但不足以缓解财政危机，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为侵略中国而展开的角逐。其结果只能是中国的利权遭到进

一步的侵夺。比如1909年10月，美国在与中国谈判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之后，紧接着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计划。其内容是：东北各条铁路由美、英、日、俄等国共同承购股票，共同参加管理，并同享雇员、购料等项利益；再由各国借款给中国以赎回这些铁路的路权。这实质是在“铁路中立化”的名义下逐步使东三省国际化。美国提出这一计划，自然是实行它的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以与在攫取东北利权方面抢先一步的日、俄帝国主义展开争夺。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日、俄帝国主义，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的计划，并分别根据自己的侵略需要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互相角逐的过程中，都是拿中国的利益作为交易的筹码的。清政府“厚集洋债”的政策，不仅没有能使财政危机得到缓和，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政治危机。

第四节　谘议局与资政院

要实行立宪就必须设议会，昏聩的清朝统治者无法回避这一点。所以早在1906年11月宣布中央官制时，曾预先答应要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但并不准备积极去办。1907年6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上折奏称“立宪之预备不应托诸空言，而应见诸实事；不必设为理想，而可得之模范”。他说，中央设立资政院就是“实事”，各省设谘议局则是“可得之模范”[54]。岑折发抄后，有不少官员表示附和，立宪派更极表赞赏。这一年夏天在镇压徐锡麟、秋瑾起义之后，清廷为收拾人心，安抚立宪派，曾有一段时间对“预备立宪”颇为“积极”，先后发了数次有关立宪的上谕。9月20日的上谕宣布设立资政院，任命溥伦、孙家鼐为该院总裁，主持筹备。10月19日的上谕则命令各省督抚准备在省会设立谘议局。1908年7月，在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谕准公布了《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同时还颁布了《资政院章程》的前两章（总纲与选举两章）。8月，又颁发“宪法大纲”与“九

年筹备立宪清单”，清单规定：各省谘议局应于1909年开设，资政院应于1910年召开。此后，各省立宪派便完全投入筹建谘议局和竞选议员的活动中去了。

一　谘议局的设立及其与督抚的矛盾

从1909年3月起，各省陆续开始选举谘议局议员。谘议局的全部筹备及选举活动都在督抚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朝廷曾再三下令，严防革命党人进入谘议局。尽管如此，在有些省还是有少数革命党人被选进了谘议局。在贵州省，革命党人及其同情者甚至还在谘议局中占了多数。但其他各省谘议局都是立宪派占据优势。许多著名的立宪派领袖被选为谘议局议长。如张謇为江苏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湖北谘议局议长[(55)]，蒲殿俊为四川谘议局议长，等等。

谘议局章程明确规定了各省议员的名额，其中最多的如顺直，一百四十名；最少的如吉林、黑龙江等省，仅三十名。此外，京旗在顺直设专额十名，各省驻防旗营，分别在各本省设专额一至三名。章程规定，凡是有本省籍贯年满二十五岁的男子，合于下述任何一种条件的，得有选举资格。1．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或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著有成绩者；2．在中外中等以上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3．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4．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5．在本省拥有五千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据当时报纸记载，各省登记的合格选举人，最多的如直隶、江苏两省，不过十六万余人，各占其本省人口总数的0．62％和0．5％；最少的如黑龙江省，选举人只有四千六百余人，占该省人口总数的0．23％；甘肃省为九千余人，只占其人口总数的0．19％，其比例之低，恐怕是各国选举史上所少见的。选民人数如此之少，不单是因为选举资格的限制，很大程度上还由于风气不开，群众对选举冷淡，而官僚机构又不能认真办理的缘故。这样少的选民，到了选举时还有一些人不曾参加

投票。可以想见，所选出的议员与广大人民群众很少相干。

谘议局章程第一条说，谘议局“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56]。章程中对于谘议局的职任权限虽作了一些规定，但因谘议局要受督抚的监督，督抚不满意谘议局的行动时，可以给予“劝告”，令其停会，直至解散。这样，就使谘议局的职任权限很难得到保障。谘议局不能过问官吏的任免，遇有贪官污吏，只能呈请督抚核办。宪政编查馆在答复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的奏折中，明确指出：监督全省一切行政皆在督抚而不在谘议局。凡一切关系君上大权、国家行政及国家政费，谘议局均不得参议。又指出，在国家税、地方税未划分之前，谘议局不得议减现行税率，等等。所以，有不少督抚，实际上把谘议局看作不过是地方大吏的一种咨询机构。

但是，对谘议局的性质，立宪派和顽固派从对立的立场出发，却产生了相同的误解。立宪派根据自己的愿望，把谘议局当成他们参与政权的一步阶梯，以为可以通过谘议局监督地方行政，并实现他们本阶级的一些立法要求。所以他们极力宣传“谘议局之设，为直省政治监督之机关，亦为直省立法之机关”[57]。顽固派从其反对立宪的偏见出发，以为既然在官吏衙署之外，另立民选机构，则必对地方行政有所监督和牵制。于式枚声称：“谘议局立于一省行政唯一监督之地”，表示不能容忍，要求改定谘议局章程。这显然是出于偏见。

立宪派与顽固派对谘议局的性质的这种误解，预示着谘议局开议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斗争。

各省谘议局第一届常会于1909年10月14日（旧历九月一日）同时开幕。（唯新疆以“地处偏僻，知识未开”为理由暂缓成立。）根据宪政编查馆的规定，谘议局必须先讨论督抚交议案。由于会期有限，结果许多议员提议案和人民请议案，未及开议就闭会了。如江苏谘议局第一届常会共收到议案184件，其中：

已经议决案：	督抚交议案15件，
	议员提议案72件，
	人民请议案22件。
议而未决案：	议员提议案16件，
	人民请议案4件。
未及提议案：	议员提议案10件，
	人民请议案3件。
毋庸提议案：	人民请议案37件。
未及审查案：	人民请议案5件。

这个统计说明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作为专制制度下一种改良产物的谘议局，因受到督抚的牵制，不能完全独立议事。但另一方面，议员自动提议案达九十八件之多，说明谘议局也并非完全遵命议事，反映了立宪派议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另外，有来自人民中各阶级各阶层请议案件七十一件，则说明人们对谘议局也并非抱着毫不关心的态度。也正因此，谘议局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发生一定的民主的教育作用。

各省督抚对于谘议局的议决案，多半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议案呈报后，往往久延不予公布施行。有的督抚甚至对于本省重大事项根本不交谘议局付议。如四川省扩充军备增加军费二百万两，总督赵尔巽电询宪政编查馆，应否交谘议局付议。该馆复称，此事与谘议局无关，督抚可自行核定。还有某省谘议局，因议案中涉及外交事件，巡抚当即严加驳斥，声称谘议局无权议外交事项。嗣后，特电宪政编查馆，该馆复电，极赞赏该抚的处置。行政当局如此蔑视谘议局，引起立宪派议员的强烈不满。

谘议局与督抚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反映了立宪派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由于立宪派软弱畏葸，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矛盾冲突的结果，往往以折衷了事。从江苏省的实例，可以看出其矛盾冲突的一般情况及其意义。

江苏是立宪派力量最雄厚的省份，这里有以张謇为代表的一大批很有影响的立宪派活动分子，他们早在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书之前，即已开始立宪的鼓吹。诏书颁布后，他们很快发起组织了拥有数百人的预备立宪公会，从事宣传和请愿等活动，对全国颇有影响。然而，从1909年6月接任江督的张人骏，却是一个顽固派。早在1907年，岑春煊奏设谘议局时，他就表示反对。对于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他更一贯持反对态度。他曾与苏抚程德全辩论，声称“国会与责任内阁二者终不解为何事”[58]。其顽固无知可见一斑。

在江苏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期间，张人骏对其议决案多有不满。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一日），张札复谘议局所议十一案，其中有两件交令复议，有五件予以驳回。驳回的议案中，有一件是关于学务公所的议长、议绅产生方法问题。议员们鉴于过去由官厅委派的议长、议绅不能经常到所履行职责，因而决定采取前宁属提学使所定的照额选举的办法，选举议长和议绅，以期推动地方学务的发展。但张人骏竟借口此法不合学部旧有定章，坚持仍由督抚学司遴委。在他札复谘议局的行文中，竟用了“劝告”的字样。于是舆论哗然。按谘议局章程的规定，谘议局有逾越权限情形时，督抚才可予以“劝告”，“劝告”无效，则以停会或解散处分之。当时传出江督行文谘议局有“劝告”字样时，人们都认为张人骏一贯反对立宪，反对谘议局，这次“劝告”之后，将必继之以停会或解散。舆论界对此事极为关注。《时报》曾发表专文加以评论。对江苏谘议局表示声援，抨击张人骏等人“以排斥谘议局为保持禄位之第一妙诀”，骂他们是“肉食者鄙”[59]。

由于谘议局刚刚成立，虽其权力很小，但毕竟是皇皇谕旨再三明示为预备立宪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即使一贯反对立宪的顽固派，一般也不敢无故加以破坏。当时刚上台不很久的摄政王载沣，为了笼络人心，确立自己的地位，正竭力伪装促进立宪。是年6月，他曾将奏阻立宪的陕甘总督升允开缺，一时颇产生一点震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人骏考虑舆论对他大为不利，迟迟不敢走下一步。而江苏谘议局议

长张謇则力求息事宁人，特在《时报》上发表致编者的一封信，尽力上下折衷，但也含蓄地批评了张人骏的颟顸。张人骏见有人为他铺了台阶，遂声言“劝告”字样实是幕僚拟稿疏忽所致。就这样，一场冲突才告了结。

实际上第一届谘议局会议期间，各省立宪派都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即使这样，仍遭到督抚嫉视。清末官吏大多数都很狭陋，根本不知宪政为何物。加以官场积习太深，惯于专横武断。谘议局议案直接干预本省日常行政，督抚嫌其掣肘。所以第一届谘议局闭会后，就有若干督抚声言谘议局权限太大，妨碍行政，要求重新核定局章。

1910年第二届常会时，正当全国请愿速开国会的高潮，又逢资政院开院；虽然资政院的地位不见得比谘议局来得优越，但立宪派感到能得到一点上下呼应之妙。所以在这届会期中，他们似乎胆壮了一些，与督抚的冲突更频频发生。

第二届谘议局会议普遍碰到的问题，是各省督抚拒不交议预算案。为此，各省谘议局协同力争，有的提出以停会或辞职相要挟。拖到后来，各省特召集谘议局临时会，来讨论督抚迟迟交出的预算案。这些预算案，都是些临时凑成的，既未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也没有收入支出的细目。但议员们却只得满足于这种不成体统的东西。事后证明，各督抚根本不重视谘议局讨论的结果。他们或者根本不承认议案；或者实际上仍照自己的一套执行。因此发生了江苏谘议局为争预算案而全体辞职的事。

江苏谘议局于1911年3月开临时会讨论预算案，对原案颇有增减。江督张人骏甚为不满，不予公布施行。谘议局议长张謇以下全体常驻议员辞职抗议。各省谘议局得悉后，纷纷表示声援。军机处根据江督的报告，复电要张人骏劝告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复职；倘不听劝告，再请旨定夺。暗示将以解散相威胁。江苏谘议局议

员们闻信，十分愤慨，也纷纷宣告辞职，不数日便有一百多议员宣告辞职。当时江苏绅商还组织了预算维持会，声援谘议局，反对江督的专横，提出“预算案不成立，将不纳捐税”的口号以示抗议。在京的江苏籍官吏纷纷集议，拟上折严劾江督上任以来匿灾殃民、截留京饷、仇视宪政等罪状。舆论对张人骏很不利。那时，湘、川等省铁路风潮已渐兴起。清政府见势不妙，才改变主意，想以安抚办法解决。6月间，资政院江苏议员提出公呈，要求总裁副总裁转咨内阁：对江苏预算案，如以谘议局为是，则立饬江督公布局议预算案；如以江督为是，请立即解散江苏谘议局。资政院把有关此案文书转咨内阁。内阁大臣有的主张立饬江督公布预算案，有的主张交由江督苏抚会同核办。正当此时，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为筹组商界代表团赴美访问事来京请命。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接见张謇，并征询他的意见。张答称：预算案不公布，就只好解散谘议局，别无转圜办法。这时，奕劻才拿定主意，电令张人骏公布了预算案。随后，江苏谘议局议员，于9月12日宣布全体复职。

谘议局与地方官吏的冲突，多半属于名分之争，还没有充分显示出立宪派议员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进行斗争的原则精神。正因如此，尽管督抚如何专横蔑法，只要给谘议局一点面子，事情即可草草收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如何的虚伪，立宪派又是如何的软弱。然而，谘议局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即以江苏谘议局为例，它虽然几次在与江督冲突时，都做了某种程度的妥协；然而，从它的议案可以看出，它还是力求解决一些关系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关于裁厘认捐问题，漕粮改折问题，导淮问题，币制问题，确定地方经费问题等等，在谘议局开会期间都曾做过较深入的讨论。对于裁厘认捐问题，谘议局曾委派议员黄炎培等到各地商会做了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表现了谘议局与历来官场不同的办事精神和作风。所以应该看到，谘议局终究是与清朝固有的专制机构不同的东西。它对专制制度和官吏横暴多少起了一些牵制的作用。而且，由民选议员组织机关集议行政案件，毕竟是数千年专制史

上没有前例的事，它在一定意义上总算为社会增添了民主成分。

二　资政院与弹劾军机案

1909年8月，清廷公布了《资政院章程》全案，对前订的选举一章做了很大的修改。原订院章规定钦选议员共一百二十五人，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推的所谓民选议员，其名额为谘议局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当有一百六十人以上。这样，在资政院中民选议员将占多数。修订的院章规定，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各一百人[(60)]，但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不由议员中推选，而由朝廷另行任命，由此便造成钦选议员略占多数的事实。对于钦选议员，按原订院章规定，各部院衙门官（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占一百人，王公世爵、宗室觉罗总共不超过十五人。而修订的院章规定，各部院衙门官只有三十二人，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却增为四十八人。可见，修订院章已经暴露了清廷利用资政院欺骗舆论，力谋巩固其专制统治的用心。

清廷曾多次申明，设资政院是“预立议院基础”。资产阶级立宪派因一时不能争得即开国会，所以对资政院也寄予相当的希望，指望这个机构能够给他们提供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权的机会。1907年冬，资政院总裁溥伦访日，梁启超赶写了长达万余言的《资政院权限说帖》，以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的名义呈给溥伦。这个说帖的中心意思是“欲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梁对这篇文章“得意已极”，以为“其巧言如簧，易于动听”，会使清廷“堕我玄中”[(61)]。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清廷绝不肯使资政院成为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地方，它早为资政院的性质、使命做了相反的安排。1906年奕劻奏进资政院官制草案时就说明，设资政院是为了使全国舆论汇归一处，不经资政院，人民的要求便不得上奏。这样，一则可以化散为整，化嚣为靖；二则限制资政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使政府施行之力，从而使资政院自身当全国舆论之冲，而政府反得安行既定政策。也就是说资政院代政府集矢于自身，掩护政府逃避批评和监督。

从资政院章程所规定的职能可以看出，资政院与一般立宪国家的议院性质是不同的。章程规定：资政院不得参议宪法，只能参议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新定法律及其修改事项等。而对其议决案，政府可持异议，提交资政院复议。如仍持原案，则资政院总裁与军机大臣或部院大臣同时分别具奏，请旨裁夺。这样就会使资政院议而不能决，决而不能行，等于政府对资政院拥有相当的否决权。章程还规定，资政院的议决案必须由总裁会同有关行政大臣具奏请旨，不能单独具奏。这样，资政院就没有一般议院所具有的独立的立法权。事实上，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过程中，绝大部分立法，都归军机大臣领导的宪政编查馆担任，甚至在资政院开设后，也仍然如此。所以资政院并不具备立法机关的性质。这一点，立宪派也看到了。资政院章程一公布，就有人批评它“非驴非马”。但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立宪派还是竭力把它当作议会来对待，想从中多得一些好处。他们在资政院的讲坛上，一再宣称资政院是立法机关和监督行政的机关，要求军机大臣上对君主负责，下对资政院负责，要他们接受资政院议员的质问。清廷及其大臣们当然绝不肯受制于资政院。于是资政院开院后，便同政府发生了冲突。

资政院内虽然民选议员与钦选议员各半，但其活动能力却相差很悬殊。钦选议员中，除少数从各部院推选的较年青的官吏，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活动能力外，其余的或者是昏庸老朽的贵族，或者是只知持禄保身的官僚。他们对宪政毫无了解，因此无所主张，在议场中不是沉默不语便是随声附和。另有少数顽固派，虽有主张，但自知势孤力单，碍于院内外的舆论，不敢多所表露。而在民选议员方面，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都是来自各省谘议局的佼佼者，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已显露过锋芒。其中不少人学习过法政，颇有些宪政知识，并且能言善辩。比如江苏的雷奋、孟昭常，直隶的刘春霖、于邦华，湖南的易宗夔、罗杰，浙江的邵羲，江西的汪龙光，广西的吴赐龄等，都是早已著名的立宪派骨干分子。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民选议员完全控制了资政院的舆论趋向。这一点颇出乎朝廷的意料。

资政院于1910年10月3日（旧历九月初一）开院。开院后第一件重大的议案是要求速开国会[62]，另一件重大案件是引起很大轰动的弹劾军机案。

资政院开院不久，湖南谘议局控告巡抚杨文鼎不经谘议局议决即在本省发行公债，侵夺谘议局的正当权力，要求资政院核办。资政院经审议，认为根据谘议局章程规定，议决本省公债事项，纯属谘议局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杨文鼎不交谘议局议决擅发公债，是违背法律侵夺谘议局权力的严重事件。遂决议据实上奏。但清廷对这一事件却做了极不正当的处置。11月8日发布的上谕只说，杨文鼎未先交谘议局议决，“系属疏漏”，不承认是违法侵权事件。而且还说，公债现已经度支部核准，仍可照发。这样，既不追究杨文鼎违法侵权的责任，也不命令杨文鼎将公债案补交谘议局议决，这是对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极大轻蔑。立宪派议员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宣称：过去，一个御史弹劾大臣只要罪情属实，也要实行处分。资政院作为代表全国舆论的机关，据实奏劾一个巡抚，朝廷竟以“疏漏”二字轻轻放过，这是蔑视资政院的表现。议员们认为，应当追究副署谕旨的军机大臣的责任。于是纷纷提议要军机大臣，特别指名要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到院接受质问。奕劻等人当然不肯到院。这时，议员们决定以咨文的形式质问军机大臣，问他们对内外行政是否完全负责？军机大臣复文称：“此种问题须俟内阁成立以后方可解决，现在无从答复。”[63]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更使议员们愤慨。当时，云贵总督不经谘议局议决，实行盐斤加价；广西巡抚无视谘议局意见，反对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为此，云南、广西两省谘议局分别呈文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当然支持两省谘议局的立场，遂将两案分别议决上奏。结果，朝廷竟命令将两案分别交盐政处和民政部审议。这等于否定资政院对两案有议决权，并且俨然把盐政处、民政部视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议员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们感到不能容忍。在对拟旨的军机大臣们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之后，决定上折弹劾。这时，奕劻等人见舆论反应强烈，耍了个花招，利用上谕的形式声明，云南、广西两案均准如资政院所议。这

个上谕一发表，有的议员态度变软，主张取消弹劾案。但多数议员反对。他们强调，两次上谕出尔反尔，互相矛盾，是由拟旨的军机大臣不负责任造成的；而且数年来内政外交危机日益严重，也都是由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所造成的。“军机大臣不负责任，就不可不弹劾”[64]，“若是不弹劾军机大臣，就是资政院不负责任”[65]。当时，钦选议员陆宗舆发言说，军机大臣是乾隆以来旧制相沿下来的，非责任内阁可比。所以，不应以国会对内阁的关系来比例资政院与军机大臣的关系。他主张“还是不要轻用这个弹劾权的好”[66]。他的发言遭到民选议员的强烈反驳。最后，仍决议上折弹劾军机大臣。劾折于12月18日奏上。该折首先批评军机大臣在资政院开院以后始终不到院宣布行政方针；而当询问其对内外行政是否完全负责时，竟回称“无从答复”。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示。然后谴责这些大臣“受禄则唯恐其或后，受责则唯恐其独先”，只知“持禄保位，背公营私”；“徒有参予政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劾折还着重强调，在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军机大臣如此不负责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必应担负责任之处宣示天下”[67]。最后并提出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资政院敢于如此严厉地谴责朝廷所信任的大臣，并提出以责任内阁代替军机处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看来，未免过于放肆！当即降谕训斥资政院，宣称：“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68] 这篇上谕的词气与其说是严厉，还不如说是轻薄。它完全不顾体面，把自己放在与资政院互相争权的地位上。而且“非……所得擅预”云云，是把资政院章程明文规定的建言的权力都否定了。这次谕旨破例地没有军机大臣副署，由摄政王一人独署，而摄政王是代表皇帝的，这无异是以皇帝直接与资政院相对待，暴露出清朝统治者在设法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方面，已到了没有回旋余地的窘境。同日，军机大臣全体提请辞职，载沣温语慰留。这样就更增加了议员们的愤懑。在第二天的资政院会议上，立宪派强烈地谴责军机大臣，说他们“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

人一句话也不能说”[69]。如此下去只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积极的专制，甚么资政院、甚么国会、甚么立宪，都可以不要”；另一个就是逼得“人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动的手段出来”[70]。立宪派于愤慨之中，看出了清廷假立宪的用心，也感到了革命危机来临的征兆。但是，基于立宪派的软弱天性，尽管感到屈辱、愤懑，却仍不敢超越合法斗争的范围，甚至连多次提出的请旨解散资政院这一提议，也不敢付诸实施。

当资政院行将闭会时，通过两项重要议案：一是宣统三年的预算案，一是新刑律。这两项决议案的命运也很不佳。新刑律，资政院没有来得及全部审议完毕，只议决了总则部分。但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奏请，以“不可缓行”为词，降谕将新刑律总则、分则全部予以公布。对于预算案，1911年1月28日上谕竟称“若实有窒碍难行之处，准由京外各衙门将实用不敷各款缮呈详细表册，叙明确当理由，径行具奏，候旨办理”[71]。这样，各种官僚机构，就可以完全无视资政院议决的预算案，而随意自行请旨增加经费。

既然资政院议决的预算案，督抚部臣可以请旨更改；而资政院没有完全议决的刑律又可以径予公布，资政院便成了毫无作用的一件装饰品。梁启超说：“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72]，这倒是不容置疑的确论。

可是，尽管资政院被贬到如此地步，守旧大臣仍视为可憎的障碍物，必欲去之而后快。有的满洲贵族，只是看了民选议员们在会场上那样高谈阔论，就感到不可容忍，说他们跟“拳匪”一样。有人极力鼓吹资政院妨碍行政，必须改定院章。在这种气氛下，资政院闭会不久，权臣即以溥伦、沈家本[73]不能威慑议员，奏请撤换。改以世续、李家驹为资政院正副总裁。

1911年三四月间，随着国内外紧张情况的出现，立宪派议员提出召开资政院临时会的要求。但世续、李家驹秉承摄政王载沣及奕劻等

人的意旨，再三阻拦。后来在一百多议员签名要求之下，不得不代为上奏。清廷于5月17日拒绝了资政院议员召集临时会的要求。清廷不但不允许召集临时会，而且迫不及待地命令资政院正副总裁会同内阁总理大臣，着手修改院章，对本已微小得可怜的资政院权力还要再加削夺。在修改院章过程中，完全不许议员参与，而且仅以七日之期即匆匆改定出奏。从所修订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内阁大臣与各省督抚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如，原院章规定，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或此省与彼省谘议局争议事件，均由资政院复议。议决后，由总裁、副总裁具奏，请旨裁夺。修订的院章把这一条改为，上述异议或争议事件，其属于行政问题者，须呈送内阁核办。其他由资政院核办者，议决后，总裁、副总裁必须咨会国务大臣共同具奏，请旨裁夺。显然是大大削弱了资政院的地位和权力，相反地，却加强了内阁的地位和权力。尤其明显的是，原院章还有一条规定：各省督抚如有侵权违法事件，谘议局可呈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可据情奏陈，请旨裁夺。在这次修改中，竟把这一条干脆删掉了。另一个重要修改是关于资政院召集临时会议的规定。原院章规定：在资政院常会闭会时期，“遇有紧要事件，由行政各衙门或总裁副总裁之协议，或议员过半数之陈请，均得奏明恭候特旨召集”[(74)] 临时会。经修改把这一条中的“或议员过半数之陈请”一句删掉，这就取消了议员自行要求召集临时会的权力。

清廷一再压抑资政院，并通过修改院章进一步削夺其本来已极有限的权力，终于使立宪派看到，他们想通过资政院分享统治权的愿望是完全落空了。但是，立宪派议员利用资政院的讲坛尖锐地批评了朝廷失政，并且弹劾了军机大臣，甚至还公然发泄了对朝廷谕旨的不满，这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清朝专制政府的威信。资政院会议也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欺骗性和立宪派的软弱性，对革命派和各阶层人民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及其失败

一　1910年的三次请愿运动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新疆除外）。立宪派的活动分子差不多都成了谘议局议员，他们觉得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发言资格。那时，执掌朝政的摄政王载沣，为稳固自己的地位，正极力标榜开明，多次重申坚持立宪的宗旨。立宪派认为这是个很有利的时机。于是，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再度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

这一次是江苏谘议局带头发起。当选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同江苏巡抚瑞澂商议：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张謇派出孟昭常、方还、杨廷栋三人分途到各省与谘议局联络，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请愿进行办法。这时，张謇还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以为鼓吹。12月间，奉天、吉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代表陆续抵沪。加上江苏省共十六省五十多名代表，经过多次会议，组成了请愿代表团，公推直隶的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此后三次请愿高潮中，孙都是请愿团的主持者。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直隶天津人，家豪富，八国联军入侵时，家业大部分被毁。他很有爱国思想，曾大力捐资兴办教育，颇受地方人士推重。1906年参与创办自治研究所，从此积极进行立宪活动。1909年被选为谘议局议员。请愿代表团北上前夕，代表们情绪十分热烈，有人声言“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锓死阙下”[75]。张謇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发表欢送演说，提出“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并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76] 这是张謇的保守的政治态度的明显反映。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到北京，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这次请愿书是由福建谘议局书记长林长民属稿，经张謇修改定稿的。书中主要强调内外危机严重，要求朝廷定“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代表

团推孙洪伊、刘崇佑（福建谘议局副议长）、方还等分头拜访王公大臣，呈交请愿书副本，请求他们予以赞助。那些老于世故的官僚，对这些议员先生颇为客气。但当朝廷召集大臣会议，研究如何应付请愿运动时，却大都沉默不语。其中多数是不赞成开国会，但不愿明白说出，怕招致舆论的攻击；还有一部分只知持禄保身，更不愿明确表态；极少数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出于维系清朝的统治命运，倾向于赞同立宪派的主张。但明知朝廷及权臣反对，也不敢力争。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议员代表们说了一些慰勉的话之后宣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77] 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请愿失败了。

代表们对这次请愿失败有思想准备，他们遵循张謇的"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决定继续进行请愿。

孙洪伊等依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在各省设立分会。该会所定的《简章》，明确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并宣称，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78]。这时，在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国会期成会，声援请愿运动。其发起人黎宗岳曾先后主办《国报》和《中国报》，思想较为激进。为发动第二次请愿，江苏、直隶、广东三省谘议局分别派人到邻近各省和海外华侨聚居地进行联络，力图扩大请愿的规模。随着各省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和国会期成会分会，第二次请愿便开始发动。直隶于4月15日在天津召开大会，选出第二次赴京请愿的代表。山东谘议局于5月中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声称全省签名请愿的已有六万人。与此同时，广东电称：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成立之日，"到者数万人，座满途塞，收捐款一万四千余元"[79]。这些说法很可能有夸张，但终究可以反映出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的热烈情绪。

各省请愿代表于5月间开始陆续赴京。这次请愿代表多半在省内经各界大会推举，突破了谘议局议员的限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同时南洋华侨派出了请愿代表陆乃翔专程回国参加请愿。（陆回国后，接受澳洲华侨委托兼充澳洲华侨请愿代表。）

孙洪伊等人同各省代表商定，由各省捐款，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为速开国会大造舆论，公推徐佛苏为主编。经过紧张的筹备，该报于6月间出版。当时，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宪志日刊》也在北京出版。由徐佛苏主稿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先后在立宪派各大报刊登出。这篇一万多字的洋洋大文，系统地论述了立宪派关于国会问题的主张。梁启超这时也在《国风报》上发表了《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所谓请愿政府是指请设责任政府）等文，为请愿运动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指导。请愿代表团还将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血书印刷传布，以增加鼓动的力量。

这一次请愿运动无论从参加人数、活动规模，还是组织方式上，都比前一次大进一步。入京的请愿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达三十万。6月16日，请愿代表八十余人前往都察院，按不同的社会团体，共递上十份请愿书[80]。另外还向摄政王载沣上了一道请愿书。这次请愿书的词气明显地比上次来得激切。如孙洪伊领衔的以各省谘议局名义上的请愿书，就明白指斥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81]。在上载沣的请愿书中更痛切陈词说：“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书中斥责阻挠国会的大臣“阳为老诚持重之言，而阴以遂其阻挠国会之私者，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惧不利于身家者也”[82]。运动的声势和请愿书词气的变化，使载沣及其左右权臣颇生疑惧。据当时报纸透露，有人提出对请愿要“严旨震吓”。但另有一些人生怕这样反会“酿生意外枝节”[83]。载沣折衷众论，乃于6月27日发布了一道词旨较上次更为严厉的上谕，称：由于“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原因，无法提前召开国会。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请”[84]，企图堵塞进一步请愿的

途径。但这时朝廷的一纸空文已吓不倒立宪派。在上谕发表的第二天，各省即有电到京，要求代表团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85]

清政府不准"再行渎请"的诏令使立宪派感到愤懑。梁启超说："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五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86] 反映出立宪派共同的恐栗与忧愤交加的心情。

第三次请愿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驻京请愿代表团为适应新的形势，做了适当的改组。因为原有的代表团是在第一次请愿前各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会议时成立的，代表团成员只限于谘议局议员。经改组，吸收了各省各团体的代表加入，规模扩大了。他们选出孙洪伊、方还、吴赐龄、邓孝可等十人为干事员；推雷奋、孟昭常、徐佛苏、汪龙光等为编辑员。此外由各省代表中推一人充当评议员。这些代表团的职员，同时即为国会请愿同志会的职员。这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已正式报请民政部立案，作为请愿运动的合法机构。

各地请愿运动比以往历次都来得更加活跃。7月12日，湖北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数百人集会，提出了"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这本来是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很有力的口号。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行动上远比他们的宣传来得软弱，这一口号在实践上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有的省还提出，如果清政府仍迁延不开国会，各省谘议局便宣告同时解散。这个口号固然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激动情绪，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四川、山东、陕西等省较快地派出第三次请愿代表入京活动。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北京请愿团，表示热烈赞助。美洲华侨和日本华侨这一次也分别派有代表参加请愿。美洲代表伍宪子（庄），属于康有为控制下的帝国宪政会，日本代表汤觉顿（叡）则是梁启超的心腹。当时在北京参加考试的举贡生员及留学生数百人也参加了请愿活动。然

而，对请愿代表团说来，更大的支持力量是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该会于8月9日在北京开第一次会议，许多省的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到京参加了会议，如直隶议长阎凤阁，副议长王振尧，浙江副议长沈钧儒，福建副议长刘崇佑，四川议长蒲殿俊，湖北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奉天副议长张百斛，黑龙江副议长战殿臣等。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苏的孟昭常、雷奋、杨廷栋、方还；江西的汪龙光；广西的吴赐龄；湖南的罗杰；山东的周树标；等等，都是各该省谘议局中有影响的活动分子。会议选举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推选孙洪伊、杨廷栋、刘崇佑、雷奋、周树标、汪龙光、孟森、吴赐龄、王法勤等为审查员。会议讨论了各省谘议局共同关心的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速开国会案。

一向比较保守的张謇，这时估量了形势，打算亲自出马，组织并率领一个“议长请愿团”赴京，“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87]。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山西议长梁善济致函批评说，组织所谓“议长请愿团”仍是少数人的活动。他认为“请愿之举，当以少数而扩充至于多数，未便由多数而归纳至于少数”。他主张“联络资政院互选议员，并联合各省谘议局，此案（指请速开国会）如仍无效，互选议员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同时解散，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使政府无所遁饰……”[88]。显然，梁善济的态度要比张謇积极得多。张謇的打算没有实现。

请愿代表团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发动第三次请愿高潮。资政院于10月3日开院。10月7日，请愿团的孙洪伊等六人加上刚刚从天津赶来的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霖等十七人，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在半路上遇到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正在迎候代表团。赵、牛两青年当场分别割臂割股写血书，表示强烈要求国会的决心。但代表们到王府时，载沣外出，孙洪伊等决定留下六人准备日夜守候，必面交请愿书并转达东三省青年的热诚。王府的警卫劝令六人散归，六代表坚持不去。警卫电告民政部尚书善耆。善耆带随员亲到现

场劝慰，说摄政王数日内不能回邸，他本人保证将代表们的上书当日呈交。这时代表们才将请愿书交与善耆后退去。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前往资政院递交请愿书。以后又遍访王公大臣，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

第三次请愿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各省出现了异常热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如直隶各界于10月5日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参加者二千数百人，大会举定入京请愿代表后，列队前往督署，要求直隶总督陈夔龙向朝廷代奏直隶人民的国会请愿书。陈夔龙迫于压力，接见了请愿代表，辩论多时才答应代奏。10月16日，河南开封各界绅民三千余人会集游梁祠，开请愿大会。会后游行到抚院，巡抚宝棻接见了代表，答应代奏请愿书。然后队伍又游行至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89)]。民气高昂可见一斑。在前两次请愿中表现不甚突出的四川省，这时也出现了群众性请愿高潮。10月29日，在省城成都，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召集三千人的大会，通过请愿书后，也列队游行至督署，请总督赵尔巽代奏。奉天省各城绅商士民等互相联络，拟每城派出一万人，齐集省城要求总督代奏请愿书。谘议局得知消息，忙加劝阻，害怕规模过大，会发生意外。但表示一定说服总督代奏，如不得结果，再考虑齐集省城请愿。10月30日，福建省九府二州各界代表三四千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会后也举行了游行请愿，迫使总督松寿答应代奏请愿书。

群众性的请愿运动推动了立宪派的上层分子，各省谘议局频频致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其中许多省表示了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如果政府“始终坚持不开（国会）主义，资政院民选议员宜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可同时解散，以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但孙洪伊等人受了奕劻等王公大臣表面“同情”态度的迷惑，对统治集团心存幻想，以为这次请愿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回电劝慰各省“宜暂静候勿躁”[(90)]。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在这次请愿运动中，资政院的活动也颇引人注意。开院之初，依照事先定好的议事日表，每次会议讨论的都是政府交议案。孙洪伊等的请愿书，谘议局联合会请速开国会的提案，于10月9日便递交资政院，却一直未予讨论，甚至也没有列入议事日表。对此，立宪派议员极为不满。10月17日，正当讨论理藩部交议的提案时，湖南议员易宗夔突然起立发言说：资政院开院已有半月，但所讨论的都是些枝叶问题，不是根本上的问题，“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91]。他要求议长改定议事日表，立即开始讨论速开国会的问题。他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副总裁沈家本，坚持按既定日表进行，结果一直延迟到10月22日，才把请速开国会案正式列入日表。那一天日表上共有四项议程，而国会问题列在最后。议员们对前三项议案毫无兴趣，发言者寥寥无几。当开始讨论国会问题时，会场立即活跃起来。立宪派议员争先发言，而且个个慷慨激昂。湖南议员罗杰发言说：“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挖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他要求：1．本院议员应全体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2．议长应从速上奏；3．摄政王应即允速开[92]。发言者全部赞成奏请朝廷速开国会。当此案付表决时，担任副议长的沈家本坚持用投票表决；而立宪派议员则坚决主张用起立表决法，意在对守旧的钦选议员施加压力，争取全院一致通过。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广西议员吴赐龄大声说道：议长不赞成起立表决法，是先存袒护反对者的意思，则议长本人是第一个反对速开国会者。逼得沈家本无法招架，只好同意起立表决。当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这一议案时，立宪派议员们高兴得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把议场上的胜利当成了事实上的胜利。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请速开国会的奏稿。这是由立宪派议员和钦选议员联合起草的，主要执笔者是标榜积极赞助立宪而实际忠心为朝廷效劳的钦选议员汪荣宝。奏稿的词气相当温和，而且没有提出提前召开国会的具体期限。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奏稿连同三个附件（即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提案，孙洪伊等所上请愿书，汤觉顿代表海外华侨所上请愿书），一并上奏朝廷。当时曾有议员提议，如果奏案

不得允准，资政院应停议或议员辞职。但江、浙议员雷奋等人不赞成这一激进的主张，仍遵信张謇的那一套“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

第三次请愿运动还得到了许多督抚大吏的赞助。这些地方官员一方面受了立宪派的游说和群众运动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指望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可使中央集权受到限制，从而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军、政、财权。10月25日，十七省督抚将军[93]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94]。这一举动对最高统治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载沣等人对于掌握地方实权的督抚大吏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这时，直隶总督陈夔龙揣摩朝廷意旨，上了一道奏折，主张先设内阁，缓开国会，酌量缩短期限。他的意见遭到参与联奏的一些督抚的批驳。但昏瞶的满清朝廷最后还是大体采纳了陈夔龙等人的意见。

以载沣为首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洲贵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会请愿运动威胁着他们的统治权。所以就连原来赞助立宪、赢得立宪派赞誉的度支部尚书载泽，这时也公开表示否定的态度。孙洪伊等曾特访载泽，询问其对国会问题的意向，说：“泽公昔为立宪政体首倡者，今据外间传说，于国会问题颇有反对意见，岂非自相矛盾？”[95] 载泽在为自己辩解之后，仍然声明，对于国会请愿，朝廷不能“遽然轻许”。他的态度突出地反映了满族权贵对于失去统治权的忧惧。但是载沣等人又不能无视立宪派和督抚们的动向，害怕他们因失望而离心。所以在经过了紧张的筹画之后，作出了先设内阁，和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决定，企图缓和一下形势。

10月28日，载沣决定将请愿折稿交王大臣阅看。11月3日，召见王大臣会商。次日即发上谕，决定“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预即组织内阁”。但同时宣称：“此次缩定期限……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96] 同

日另发谕旨，要“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97]。这一谕旨表明了朝廷将不惜以镇压手段对付请愿运动。

二　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分化和镇压

清朝统治者估计到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很难靠一纸上谕平息下去。它一面确定对以后的请愿实行镇压，一面立即着手对立宪派实行分化瓦解。

当时在民政部任左参议的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是个既受朝臣信任又与立宪派有联系的人[98]。在上谕发表的前一天，资政院总裁溥伦即以朝廷意旨告诉他，要他在民选议员中做分化工作。汪当即找到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议员，如雷奋、罗杰、易宗夔、籍忠寅等密谈，雷奋等答应与之合作。他们在资政院民选议员及常驻北京的请愿团中展开活动，动摇了他们继续请愿的决心，使资政院在得旨后，未能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应。请愿代表团也遵旨解散了。只有已正式立案的国会请愿同志会仍然存在。

统治者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强令北京商民悬灯“欢祝”国会缩期召开；乐于为清廷捧场的外国使馆也悬旗“致贺”。

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于11月6日在上海得知京中消息。第二天，江、浙两省谘议局便发电给资政院，祝贺国会缩期召开。这一叛卖性的举动使全国联合的请愿运动陷于瓦解。

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是立宪派中保守的一翼，与上层统治集团有较多的联系。他们认为，既然朝廷已经作出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让步，请愿运动就算有了具体结果。如不顾谕旨，继续请愿，就可能弄到与朝廷决裂的地步。而这是他们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首先妥协了。

与张謇等人相反，其他各省立宪派的绝大多数都对清廷上谕表示不满。直隶、奉天、吉林、江西、河南、福建、湖北、陕西、山西、四川、湖南、黑龙江等省的立宪派都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主张。他们有的致电资政院，有的致电请愿团或请愿同志会，有的分电各省，有的更组织大规模集会，继续进行请愿活动。江西省城南昌，在上谕发表后，曾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稍后，湖北省谘议局等联合三十九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澂代奏，再请朝廷提前开设国会。四川省城成都，有六千人集会，也要求总督赵尔巽代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奉天省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显示出相当悲壮的气氛。奉天省人民深受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对于救亡图存格外具有紧迫感。他们历次所上的请愿书都以救亡为唯一的理由。当第三次请愿未能达到目的时，奉天的立宪派特别是青年学生异常忧愤，必欲拼死力争。谘议局连次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但未获具体结果。12月2日，省城有一群学生到谘议局面见副议长袁金铠、张百斛，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代表进京。袁、张略有难色，当即有两个学生割指刺股写血书，以表继续请愿的决心。12月4日，有三千余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12月6日，谘议局出面组织省城八个团体及四十六州县的代表，聚众万余人，列队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的大旗。当时报纸载称，请愿群众情绪异常悲愤，齐声痛哭，锡良不得不答应代奏。这一天群众集会请愿的场面，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注意。第二天，锡良代奏折上，其中扼要摘引人民请愿书的内容说："大意则以东省大势……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其情词迫切，出于至诚。万余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颡流血、声嘶力竭不能自已者。"要求朝廷"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说："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纾边祸。"(99)　清廷一方面申斥他"不应再奏"，一方面又不得不挽留他"力任其难，毋许藉词诿卸"(100)。

12月11日，奉天终于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各界群众集会送行，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有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做国会请愿的宣传。

当董之威（一作董之盛）等代表路过天津时，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第四次请愿，出现了“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他们分电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倡议学生罢课请愿。有些外省籍学生自动回省活动。12月20日，天津学界联合谘议局、商会、县董会，聚集三千余人开大会，决请直督再次代奏请愿书。当群众队伍往督署行进途中，遇督署调查局总办的马车直冲队伍。学生一时激愤，将其马车打毁。至督署，陈夔龙一再推托不得，只好召见代表，勉强答应代奏。奏上，得旨要该督“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101]。陈夔龙立即派人到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同时密电各省，称直隶学生要联络外省学生罢课请愿，请各省严加防范。有名的顽固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得电后，严加布置，在明孝陵、鸡鸣寺、北极阁、扫叶楼等处加派军警专伺侦探，严防军、学界聚众开会。

天津学生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决定停课请愿，并要求各学堂监督予以赞助。各监督惧“祸”，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立即召集会议，派总兵张怀芝率队以武力驱散学生。有些绅士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抢先跑到现场将学生劝散。次日，清廷又谕令陈夔龙“严饬各员”，对请愿运动“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查拏严办”[102]。清朝统治者看到再三严令，仍无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24日，悍然下令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那天，代表正在前往军机大臣徐世昌（曾任过东三省总督）官邸，准备请徐赞助请愿。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厅，宣布当日刚刚发下的上谕，迫令代表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有几名代表坐到地下不动，他们不饮不食，僵持到第二天清晨，军警把他们像罪犯一样强押上车，解送回籍。押解东三省

代表离京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刺激了立宪派。这时，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明知人心怨愤，却仍一意孤行。在把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之后，又召见学部尚书唐景崇、民政部尚书善耆，要他们立即部署严密防范和镇压学生请愿运动。唐景崇遂即下令各地学堂监督、管理员等，要他们负责剀切晓谕："如有教员从中煽惑，或有不逞之学生抗拒不服，应即分别开除斥退。"[103] 步军统领衙门则在京城加派军警巡逻街市，分赴各学堂侦察，"如有不稳之学生，即请校长指名交出，带归衙门"[104]。1911年1月2日，清廷发布镇压学生请愿的命令，其中说到各地学生"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要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而且宣称：如再有学生"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是问"[105]。

陈夔龙是清末紧紧追随朝廷意旨的少数几个顽固督臣之一。他在镇压天津学生请愿运动的同时，还派兵包围过保定师范学堂，禁止学生出入，搜查来往信件，造成了相当紧张而又恐怖的气氛。得到1月2日的谕旨后，他更进一步策划镇压行动，决定严办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在历次请愿运动中都很积极，在第三次请愿失败后，更不避风险，组织学生罢课请愿。陈夔龙等官僚极端嫉视。1月2日谕旨发布后，天津即出现匿名揭帖，影射攻击温世霖。不数日，陈夔龙即将温世霖逮捕，捏造了所谓"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上奏朝廷要求将其发戍新疆[106]。清廷迅即准其所请，于1月9日明谕发布全国。陈夔龙的卑鄙和清廷的乖张，引起全国舆论的愤怒。《时报》指出，这是"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107]。至此，请愿运动完全失败了。

请愿运动的失败固然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分化瓦解和严厉镇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宪派本身的怯懦。以张謇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的立宪派，一开始就抱定"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不肯对反动统治集团作更有力的斗争。所以，当清廷将开国会的期限稍为提

前，而同时准备对请愿实行镇压的时候，他们就先自妥协了，造成了立宪派的分裂和削弱。其他各省较为激进的立宪派，虽然对清政府的反动性有一定的认识，对其反动政策表示相当的愤慨，也曾比较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提出过一些较激进的斗争口号，但他们在本质上也是脆弱的。一当需要把他们的斗争口号付诸实行的时候，他们瞻顾徘徊，畏首畏尾，表现非常怯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然而却不愿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们对群众运动总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激烈行动，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只能在各省发动群众性的请愿活动，而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却始终未能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

国会请愿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但是这种主动性最终还是被其软弱性所窒息了。他们本来知道“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所以才发动请愿运动。但多次请愿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敢去强迫政府，而最后终于在政府强迫的暴力面前退却了。这是改良主义路线必然导致的可悲结局。

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立宪派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带有争民主的性质。立宪派对腐朽的清朝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攻击，从政治上打击了统治集团，使其更加陷于孤立。国会请愿运动是在御侮救亡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以开国会为救亡手段，诚然是幻想。但许多立宪派分子特别是受他们影响的群众，确是抱着救国的真诚愿望参加运动的。正是这种爱国性，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

国会请愿运动也是立宪派上层分子用来抵制革命的手段。他们极力宣传，只要开国会就能救亡图强，散布对统治者的幻想，并且诋毁革命，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样，国会请愿运动吸引的群众越

多，对革命活动所造成的困难也就越大。因此它本身不是革命的运动。但清朝统治者最后以暴力镇压请愿运动，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而且把一部分立宪派也逼上了赞助革命的道路。

三　立宪派对清政府态度的改变

清政府搞预备立宪的直接目的是要安抚和笼络立宪派，借以稳定国内的政治形势，以便集中力量镇压和防范革命党。所以立宪派的态度如何对清政府至关重要。而立宪派对清政府原本抱有很大的希望。当预备立宪诏书发布的时候，立宪派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说，这是“本朝二百余年未有之盛举”，甚至是“我国历史以来五千余年未有之盛举”[(108)]。他们好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突然看到绿洲的幻景一样，一下子振奋起来，以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乐土就在眼前了。1906年这一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额达到二千二百九十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比1900年到1905年这六年的累计投资总和还多五十余万元，这是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开明士绅对立宪前途充满希望的最生动的表示。但是，好景不长。官制改革暴露了清政府无意真正实行立宪，于是立宪派的希望逐渐暗淡下来，以后再也不曾恢复起这种投资的热情。

可是，立宪派还没有绝望。他们以为，既然清政府被迫走出了第一步——做出准备实行立宪的表示，那么，只要继续施加压力，或许会迫使它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一步一步地终于走上立宪的轨道。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国会请愿运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清政府对立宪派的力量并没有足够的估计。它以为可以像对付小孩子一样，哄一哄就会安静下来。结果并非如此。自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逐步形成为一个有一致的目标，有相当的组织，与政府相对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而这个政治力量的主要意图是要削夺朝廷的大权。对此，清政府又恐惧，又嫉恨。专制统治者当然不肯把权力

让给立宪派；但又怕立宪派叛离自己，使预备立宪无法进行，造成国内政治混乱。经过苦心筹谋，才弄出一套应付立宪派的策略。第一是拖延。即尽力推迟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时间。起初，清政府根本不提何时开国会、实行宪政；到1908年为了平息国会请愿运动，不得已预定下九年筹备的期限。但立宪派仍不满足。最后在出现了大规模群众请愿高潮的情况下，清廷又被迫将召开国会的期限提前三年。其实，这仍是应付手段，并非真的打算在宣统五年就把大权赋予国会。它只不过是拚命争取时间，以便采取步骤来确立和巩固皇室集权。第二是敷衍。为了欺骗舆论，清政府不能不多少做一点“预备立宪”的表示。成立谘议局，开设资政院，都是应付和安抚立宪派的手段。清政府想以这种手段，象征性地给立宪派一点“参政权”，使他们有所满足。然而，立宪派却利用谘议局、资政院同统治者展开了斗争。第三是限制，即限制立宪派的活动。1908年3月，清政府公布的“集会结社律”规定，“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者，均在取缔之例。按照这一笼统的条文，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一切自己所不喜欢的结社和集会，同时炮制的“报律”，更为专横。规定报纸出版前夕要将内容全部送审，企图把舆论完全控制起来。在整个“预备立宪”期间，清政府和某些地方督抚，曾多次封禁报馆。1910年天津的《北方日报》创办伊始，只因其先期所发广告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字样，即被禁止出版 (109) 。此外，清廷还多次特发谕旨，禁止士庶学生干政。如1907年12月接连发布两次上谕，严禁绅商士庶借口立宪，干预朝政，严禁学生干预政事。立宪派对这些反动政策和措施，非常不满。他们指责道：“言论、出版、集会，非立宪国所谓三自由乎！各国之立宪也，付三自由于民者也，今中国之立宪，乃先收此三自由于民！” (110)

通过实践，立宪派越来越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到1910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之后，清政府竟以赤裸裸的暴力来对付他们，从此立宪派中许多人开始产生绝望情绪。《时报》发表社论说：靠和平请愿的办法，再也得不到什么了；“苟犹有

以为不足者，势非另易一办法不为功。然今日国民之实力，恐亦未易语此也”[111]。想要另外寻求一条道路，但又感到没有力量。北京的请愿代表团在奉命宣布解散时，曾向各省立宪派发出一份《通告书》，也表现了这种情绪。书中说：“朝命即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112]向全国的立宪派表明，请愿已毫无希望，以后如何行动，由大家自行抉择。谘议局联合会也发出了与这个意思相同的《宣告全国书》[113]。

在绝望和愤慨之下，一些较激进的立宪派骨干表现出赞助革命的倾向[114]。这种倾向无疑地加强了立宪派与清政府间在政治上的对抗，并影响到他们在武昌起义后所采取的政治态度。

在镇压了国会请愿运动之后，清廷于1911年5月建立起皇族内阁。这几乎使所有的立宪派都愤怒了。宪政编查馆与会议政务处在会奏内阁官制及办事暂行章程的奏折中，强调“国务大臣责任所负，自当用对于君上主义，任免进退皆在朝廷”；“议院有弹劾之权，而不得干黜陟之柄”[115]。立宪派在请愿国会时，明确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必须接受议院的监督，对议院负责任。而清廷所任命的内阁，只对君主负责任，则议院便无从监督内阁，所谓“弹劾之权”，便同旧日御史的弹劾权没有多大区别了。尤其使立宪派愤慨的是朝廷所任命的内阁名单。总理大臣是曾经一再被弹劾的、除招权纳贿之外一无本事的庆亲王奕劻，以下有两个协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其余各部大臣是：外务部梁敦彦，民政部善耆（皇族），度支部载泽（皇族），学部唐景崇，陆军部荫昌（满），海军部载洵（皇族），法部绍昌（满），农工商部溥伦（皇族），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寿耆（宗室）。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汉族大臣只有四人，满族大臣则有九人，占绝对优势。而且这九人之中皇族竟占了五个，所以一开始人们就叫它“皇族内阁”。立宪派舌敝唇焦，奔走呼号，要求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到头来，国会被拒绝，却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来。这对立宪派

的宪政理想简直是极大的污辱。当时在北京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的各省立宪派领袖和骨干分子，连续两次上折，抨击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国的通例，宣称“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116]。并指出皇族内阁的出现，表明“朝廷于立宪之宗旨有根本取消之意”[117]。所以强烈要求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但是，皇族集权是载沣等人的既定政策，在这个涉及统治大权的问题上，一小撮满洲贵族是绝不肯让步的。7月5日发布的谕旨，严厉训斥各省谘议局议员，声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该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伸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118] 载沣等人已不顾朝廷体面，与议员互相指责。议员们指责朝廷违背立宪公例，朝廷则指责议员们违背钦定宪法大纲；议员们指责朝廷有根本取消立宪之意，朝廷指责议员们“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这表明，朝廷与立宪派已经离心离德，清廷笼络立宪派的政策已经破产，预备立宪的骗局已经揭穿了。这时，连思想一贯保守的张謇也批评朝廷，“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119]。

张謇对皇族内阁既已不抱希望，所以他在那年赴京[120]，特地绕道从武汉北上，到彰德下车去拜访谪居中的袁世凯于洹上村。他与袁谈话之后，认为袁的意度“远在录录（碌碌）诸公之上”[121]。在日本的梁启超也认为“国势机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已到了“阳九否极之运”[122]。所以他暗中加紧活动，联络个别亲贵，联络军人[123]，准备伺机发动政变。而在京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常会的各省立宪派头头，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这时则积极着手组织全国性的政党，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立宪派组党的意向是早就存在的，而且可以说，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都多少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只是规模相当小，受到地域的限

制。国会请愿运动为立宪派造成了全国性的联合，给组建全国性的政党准备了客观条件。当清政府下令驱散请愿代表，接着以暴力镇压请愿运动时，立宪派看到，他们已没有进行政治斗争的适当的组织形式，组党的需要就显得更迫切了。于是从1911年春起，立宪派便加紧进行组党活动。3月间，孙洪伊以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邀请各省谘议局负责人进京会议。公开说的是筹商国是，实际则以组党为最主要的动机。他们预定会议的目标为："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124) 明显地透露出立宪派努力确立其独立政治地位的企图。各省谘议局的议长或副议长大部分应邀到京参加了会议，使会议显出很大的重要性。组党会议是紧接着谘议局联合会会议之后进行的。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确定党名为宪友会，于6月4日宣告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为常务干事；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在各省设支会，并推定了各省支会发起人。宪友会的基本政纲是"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有六条：1．尊重君主立宪政体；2．督促联责内阁；3．厘理行省政务；4．开发社会经济；5．讲求国民外交；6．提倡尚武教育 (125) 。这个政纲只不过更为明确地表明了立宪派的主张，其中列入"国民外交"，"尚武教育"，则与外交形势有关，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当时报刊披露，在组党过程中，立宪派对于谘议局、资政院的议案并不注意，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 (126) 。《时报》并且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所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之所难言者，则留待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 (127) 这种隐晦的说法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立宪派过去是立足于要求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了对朝廷的依赖和眷恋；组织宪友会时的立宪派是立足于扩大自己的实力，对朝廷已没有多少倚赖和眷恋之意。其中有些人甚至已准备遇有机会就要叛离清廷。武昌起义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这固然表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但也正是他们对清廷改变态度的结果。

(1)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9页。

(2)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563页。

(3) 《预备立宪公会报》所刊《会员题名录》。

(4) 《郑孝胥日记》，丙午年七月二十二日、十月十日。

(5)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乙巳年八月条。

(6) 实际数字要比统计所表明的大。因当时的社会风气，仍以当官为贵，所以绝大部分亦官亦商的人或先官后商的人都只登记当官的身份，而不登记经商的身份。统计中自然要漏掉一部分。

(7) 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宪政》创刊号，1944年1月出版。

(8) 《预备立宪公会报》第5期。

(9) 康有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民报》第13号转载。

(10)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2—213页。

(11) 《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号。

(1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3页。

(13)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4)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6)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8—279页。

(17)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60页。

(1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五日。

(19)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0页。

(20) 《汤觉顿致梁启超信》（原件），国家图书馆藏。

(21)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日。

(22) 《东京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23) 帝国主义为便利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西江地区竟自行武装捕盗，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粤商自治会于1907年特发起争回西江捕盗权的运动。

(24) 《宪政杂志》第1卷第1期。

(25) 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0—143页《清季结社表》。

(26) 铁良（1863—1938），字宝臣，隶镶白旗，监生出身，其排汉思想极为强烈，时人以刚毅相比。从练兵处任职开始，他便与袁世凯互不相容。

(27) 《改革官制愤言》，《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28)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4页。

(29) 熊范舆：《新官制评论》，《中国新报》第1号。

(30) 《鄂督张议复外官改制电》，《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

(31) 转引自白衣：《驳鄂督论司法独立之害》，《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32) 《中国新报》第4号，《致〈新民丛报〉记者》。

(33) 侯延爽：《留别山东同乡会词》，《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4) 杨度：《中国新报叙》，《中国新报》第1号。

(35) 《东京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36) 杨度的信不曾见。但从1907年5月梁启超的回信中可看出杨信的内容。梁在信中说："至专提倡国会一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34—235页。

(37) 《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等请速设民选议院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10页。

(38) 据郑孝胥日记，宪政讲习会会员方表于1907年11月便在上海联络发动国会请愿。

(39) 《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

(4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67页。

(41)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42)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辛丑条约”规定要清政府派专使赴德“谢罪”，并在北京修建克林德纪念碑。

(43)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3。

(44) 薛大可：《财政改革与国会》，载《中国新报》第8号。这个估计数字反映着1907年前的情况。以后军费不断增加，据沈鉴：《辛亥革命前我国之陆军及其经费》一文说，宣统三年的预算，各项军费开支计达一亿零九百五十三万库平两。占当年预算支出的36%。

(45) 《宪志日刊》，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46) 《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初六、初七，初八日。

(47) 《直督陈夔龙奏复并案详议赵、王各条陈折》，《时报》，宣统二年八月初三日。

(48) 《国风报》第1年，第20号。

(49) 《时报》，宣统元年正月十七日。

(50) 《时报》，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

(51) 《时报》，宣统元年七月十七日。

(52) 《各督抚为盐务致盐政处电》，《国风报》第1年，第11号。

(53)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8—52页，《从甲午中日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所借外债表》。

(54) 《岑制军奏陈预备立宪阶级折》，《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55) 湖北谘议局议长最初是吴庆焘，是个绅士。第一届会议刚开过即辞职，由汤化龙（原为副议长）接任议长。

(56) 《各省谘议局章程》，《东方杂志》1908年，第7期。

(57) 《各省之谘议局议案预备会》，《宪政新志》第1号，第155页。

(58) 《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七日。

(59) 《与客谈江苏谘议局》，《时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60) 资政院开院时，新疆谘议局仍未成立，所以民选议员有两个缺额。

为保持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对等，钦选议员也暂留两个缺额，所以实际上钦选、民选议员各为九十八人。

(6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57、258页。

(62) 关于国会请愿案的辩论见下节。

(63) 《资政院奏参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64) 陶峻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5) 于邦华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6) 于邦华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7) 《资政院奏参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68)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69) 吴赐龄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

(70) 易宗夔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

(71)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0。

(72) 梁启超：《评资政院》，《国风报》第1年，第35号。

(73) 1907年任命的资政院两总裁之一孙家鼐于1909年11月死，1910年9月，任命沈家本为副总裁。

(74)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3。

(75)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76)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77)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8。

(78) 《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简章》，《时报》，宣统二年正月十四日。

(79) 《时报》，宣统二年四月九日。

(80) 这十份请愿书及其领衔人分别为：

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等；

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等；

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等；

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等；

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文耀等；

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等；

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等；

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柟等；

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陆乃翔；

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

见《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二日。

(81) 《直省谘议局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时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82) 《国会请愿代表上摄政王书》，《时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五日。

(83) 《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十二日。

(84)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3。

(85) 《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86) 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年，第17号。

(87) 《时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88)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89)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

(90)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

(91)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7号。

(92)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9号。

(93) 这些督抚将军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以下有：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

书。

(94) 《各省督抚合词请设内阁国会奏稿》，《国风报》第1年第26号。

(95) 《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96)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8。

(97)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8。

(98) 汪是江苏元和人，曾留学日本，习法政，归国后即在民政部任职，屡得迁升。民政部尚书善耆、资政院总裁溥伦对他都很倚重，许多重要文件都请他起草。

(99)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48—649页。

(100)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1)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2)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3) 见《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八日。

(104) 见《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八日。

(105)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0。

(106) 《直督拿办温世霖原电》，《时报》，宣统三年正月初四日。

(107) 《论降旨发谴温世霖事》，《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08) 《七月十三日上谕与日本明治元年、明治十四年两次诏敕之比较》，《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09) 《东方杂志》1910年，第5期。

(110)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11) 《读初三日上谕感言》，《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七日。

(112) 《国会请愿代表团通问各省同志书》，《时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

(113) 见《国风报》第2年，第14号。

(114) 当时参加请愿代表团并在京主办《国民公报》的徐佛苏曾回忆说，在清廷发布解散请愿代表的上谕时，“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

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见《梁任公逸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14—315页）。徐氏当时写给梁启超的信可以证明他的回忆，是大体不错的（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33—334页）。另外参加第三次请愿的美洲华侨代表伍宪子，后来在他所著《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中也说到这种情况。他说：“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

(11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59页。

(116) 《谘议局联合会呈都察院代奏皇族不宜充内阁总理大臣折》，《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

(117) 《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呈请代奏皇族不宜总理内阁折》，《时报》，宣统三年六月三日。

(118)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6。

(119)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120) 1911年6月，张謇为组织商界赴美访问团而到京请训。实际上张謇去京目的是为了窥测动静。但为了避嫌疑，他故意不参加在京举行的谘议局联合会，而以赴美报聘为名，入京活动。

(121) 《张謇日记》，辛亥年五月十一日。

(12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45页。

(123) 联络亲贵主要指载涛。载涛掌握相当一部分军权，特别是直接掌握禁卫军。梁启超拉拢他，一是为开党禁，二是为发动宫廷政变。武昌起义后，梁启超致徐勤一封信曾追述到这方面的筹画：其中说“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涛问计于安仁，安仁劝其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联络军人，主要是指吴禄贞。武昌起义前，8月17日梁启超致信吴禄贞，极力与他联结，其中说“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玮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梁将此书交给在国内政界特别有活动能力的潘若海去面递吴禄贞，并委潘与吴面详一切（以上引文分别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39—340页，

第345—346页）。

(124) 《申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25) 《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

(126) 《中国政党小史》，《时报》，宣统三年四月十六日。

(127) 《与宪友会论进行之方法》，《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

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共进会和后期光复会的建立

如前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改良派的论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它却无力克服自身所存在的严重思想分歧。

并不是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的人热衷排满，认为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1)]。他们自号为“逐鞑”、“扑清”、“吞虏氏”、“灭胡第一人”、“纯粹汉种”、“复汉”、“朱复明”、“单纯复仇主义者”等等，是所谓“一民主义者”。有的人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醉心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对“平均地权”不感兴趣，是所谓“二民主义者”。1906年，在章炳麟出狱到达东京后，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复古社一类组织，鼓吹“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是所谓国粹主义者。与此同时，巴黎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通过《新世纪》，东京刘师培、何震等通过《天义报》，鼓吹反对种界、国界、政府、军备、法律、强权、战争、秩序、财产、金钱、宗教、家族、婚姻，是所谓无政府主义者。

也并不是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以武装起义为主的方针，特别是当起义连遭挫折之际，孤注一掷的暗杀主义之风就会抬头。

在革命的策略上，有的主张到清王朝的腹心北京去发动，即所谓“中央革命”；有的主张在沿海、边疆发动，即所谓“边地革命”；有的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即所谓“中部革命”。

自1907年夏起，同盟会上层发生分裂。张继、章炳麟、陶成章等两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孙中山愤而弃东京本部于不顾，酝酿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1907年8月，张百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创立共进会。1910年2月，陶成章、章炳麟在东京重建光复会。1911年7月，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同盟会的分歧和分裂使改良派欣喜若狂。1907年7月，梁启超向康有为报告说：“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以往，决不复能为患也”[(2)]。梁启超的这段话有着明显的夸张，但是，事情确是严重的。

一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因国旗图式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为烈士陆皓东设计，无数先烈曾为此流血。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他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须毁弃。黄兴这一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3)] 黄兴的激动也不下于孙中山，他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在这一争执中，宋教仁同情黄兴。他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

炭党人之讥”[4]。3月1日，他向孙中山要求，辞去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国旗图案的分歧不是什么原则问题，黄兴很快就冷静下来，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虽然还不无勉强。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问题。萍、浏、醴起义后，清政府即通过公使杨枢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5]。日本政府经过研究，采取了既适当满足清政府要求而又能讨好中国革命党人的方针：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和孙中山商量，劝其自动离日。日本政府并赠孙路费五千元，同时，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一万元。孙中山当时正需要一笔军事活动的经费，便接受了这批款子。2月25日，内田良平在东京赤坂区红叶馆设宴为孙中山送行。赴宴者有黄兴、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刘师培、宋教仁、田桐、张继、汪东以及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等。3月4日，孙中山携胡汉民、汪精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离日赴港，转往南洋，同盟会会务交由黄兴主持。

3月23日，宋教仁偕白逾桓、日人古川清离开东京赴辽东运动“马贼”，企图在东北起事。4月，黄兴应孙中山召，赴香港，准备潜入广东肇庆，运动清军郭人漳部反正，同盟会庶务一职交刘揆一代理。

由于民报社经费困难，孙中山离日前从铃木久五郎赠送的一万元中提出两千元来存放于民报社，章炳麟嫌少，认为一万元应全部留下。孙中山离日后，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传出。参加同盟会的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首先和中介人宫崎寅藏等吵了起来。章炳麟、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也议论纷纷，张继说：“说走就走，要他钱干什么！”[6]章炳麟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寄到香港。他认为孙中山临行前应该向日本政府示威，而不应该像“丧家犬”一般灰溜溜地离去[7]。刚

到日本不久的刘师培叫得最厉害，说是孙中山“受贿”了。一时满城风雨，不可开交。宫崎寅藏虽曾进行调解，但效果不大。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先后失败的消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大闹民报社，扬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8]。章炳麟等催逼刘揆一召集大会，革去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刘师培自己想掌权，并企图援引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盟会干事。刘揆一抵制了章炳麟等人的要求。他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起义军需，出于不得已；当时又在筹备钦、廉起义，革除总理将会使起义军陷入极大困境；因此，力排众议，并和张继扭打起来。

6月17日，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回日和宫崎寅藏、三上丰夷等秘密购买枪械并租船运输。经过和厂商洽谈，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支，每支带弹六百发。村田式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落后，但在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事为平山周、和田三郎、北一辉等得知，转告章炳麟和被张继从辽东叫回来的宋教仁，立即又激起了一场风波。章炳麟吵吵嚷嚷地说：“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9]于是章炳麟便用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由于用的是明码，孙中山等认为泄露了军事机密，非常恼火，便由胡汉民写信至本部谴责，声言要执行纪律。不久，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不让他们再干预军事问题[10]。9月1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关于运动日本方面的工作，要宫崎一人“力任其难”，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11]。

在东京同盟会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刘揆一写信告知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要求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孙中山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12]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

职，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炳麟承认不是之时[13]。黄兴复函则谓："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4]，表现了维护团结的正确态度。

经过这次风潮之后，孙中山就不大愿意过问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了。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虽然爆发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分歧，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当时，在俄国1905年革命影响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活跃阶段。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1907年，罢工斗争进入高潮。同年2月，日本社会党分裂为两派。片山潜、田添铁二提出议会政策论，主张通过争取普通选举权和议会斗争来实现革命，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则提出直接行动论，完全反对议会斗争，主张以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行革命，成立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孙中山离日风潮中闹得最欢的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接受了幸德秋水等一派的影响。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激烈地批判议会制度，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佛教虚无主义，逐渐表现出和孙中山等不同的政治倾向。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张继、刘师培赞同幸德秋水的意见，联络流亡在日本的印度革命党人，共同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推章炳麟起草宣言书[15]。宣言书用中英两种文字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其主要内容为：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

立。

会员：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

义务：1．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2．亚洲诸国，如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约章》规定会员每月聚会一次。由于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亲会”不设会长、干事一类职务，声明“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16)]。

1907年7月，亚洲和亲会正式成立，参加者有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安南诸国的革命者。中国方面入会者有章炳麟、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吕复、樊光、陶铸（冶公）等数十人；日本方面入会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堺利彦、竹内善朔等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章炳麟反对孙中山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行为，斥之为“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17)]。对《民报》六大主义中的“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一条，章炳麟表示：“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18)]

在成立亚洲和亲会的同时，张继和刘师培又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民报》第15号刊出的广告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他们表示要“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19)]。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

成立，幸德秋水等到会并演说。

张继和刘师培标榜研究社会主义，实为提倡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声称于颠覆满洲之后就要实行无政府，决不让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

“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集会一次。除幸德秋水外，宫崎寅藏以及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都参加了活动。

讲习会的机关刊物是《天义报》。该刊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和第一章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片断。它称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20]，是“不易”之说[21]，但又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求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刘师培等不仅不要政府，而且不要团体，不要任何“在上之人”，不要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在《戒学政法歌》中甚至破口大骂：“侈说合群真放屁。”[22]

对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刘师培等完全否认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民族主义，被斥为“不合公理之最甚者”[23]；共和政体，被斥为“不共不和”[24]；平均地权，被斥为和王莽改制一样的愚民政策[25]。

“社会主义讲习会”附设农民疾苦调查会。刘师培等斥责田主为“大盗”，主张通过完全自发的无组织、无领导的“农人革命”以没收豪富的土地，使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份额[26]。但是，刘师培等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最相近，因此，“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27]。一个筋斗，刘师培从“左”的极端翻到了右的极端。

章炳麟和张继、刘师培关系密切，积极参预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他曾在会上“痛斥国家学说之荒谬”，认为“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28]，“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29]；又曾大力

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主张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30]。

章炳麟受过深刻的佛学影响。他将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论”，以之作为圆满的最高理想。

章炳麟认为，这个最高理想不可以“飞跃”而至，“还以随顺有边为初阶”，开始时，必须设立共和政府。为了减轻政府的祸害，同时制订四项办法：一、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解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章炳麟表示，如果没有这四项，君主立宪、民主立宪都不如实行专制[31]。他有时觉得，中国的专制制度也还不坏，“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32]；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33]，“所恶于满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与所令异”[34]。

二十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孙中山企图以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来免除资本主义的经济祸害，这固然虚妄；但是，他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满怀信心地为之奋斗。章炳麟、刘师培等则对这一理想也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由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五无”转而歌颂封建专制主义。这样，他们自然就格格不入了。

由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佛教虚无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重，章炳麟对中国革命一度感到失望，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为了解决路费等问题，他曾通过张之洞的女婿、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绫昌和张之洞联系[35]。1907年底至1908年初，又先后给短期回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若干封信，托他们通过佛教居士杨仁山向端方运动[36]。章炳麟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刘到上海后，即向端方写信自首，自称“大恨往日革命之非”，愿献“弭乱”之策，保证设

法使《民报》停刊，在三年之内毙杀孙中山、黄兴[37]。1908年2月，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一面作暗探，经常向端方密报党人情况，同时通过北一辉等策动同盟会员程家柽，“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38]；一面以更为“左”倾的姿态创办《衡报》，提出纲领四条：颠覆人治，实行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39]。同年4月，章炳麟、刘师培之间也吵翻了。11月，《衡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一面继续以革命党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一面将章炳麟六封信的“真迹照片”寄给黄兴等人，以在革命党内部制造猜疑和纠纷。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因而更加复杂化了。

二　共进会

共进会是为联络会党而建立的组织。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建立专门的联络会党的机构。1906年，孙毓筠任庶务，对同盟会本部进行过一次改组，于执行部内特设调查科，“多设调查员，以结纳豪杰”[40]，由谢奉琦任书记。1907年4月，黄兴离日，刘揆一继任庶务，约集各省同志谈话，计议对同盟会本部再一次进行改组。特设联络部，专门联络各省会党。以吕志伊为部长，张百祥为副部长，焦达峰为调查部（科）长。约定五天后开会。及期，吕志伊不到，会议因而流产。散会途中，张百祥与邓文辉、彭汉遗等商量，决定另行结合。他们认为，会党脑筋简单，必须在同盟会之外另设小团体，委用熟悉会党情形的人，否则不易收效。

这以后，由于内部矛盾加剧，东京同盟会本部日益涣散。四川同盟会员吴永珊等邀集各省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负责人员，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其时，国内许多会党分子逃亡来日，吴永珊、焦达峰等研究，建议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会党通通联合起来。焦达峰（1886—1911），字鞠荪，号大鹏，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即精于技击，后入浏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回乡，由姜守旦介

绍，加入哥老会。1904年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游学预备科。1905年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亚铁道学校。1906年回国，萍、浏、醴起义时在李金奇部下当联络参谋。1907年再次留学日本，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他和同学张百祥等都对孙中山一意在南方边境地区发动起义、放松会党工作不满，因此，便和吴永珊等发起联合会党的工作。

经过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吴永珊等两个多月的奔走，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在日本的首领及部分同盟会员于1907年8月在东京集议，成立共进会。到会近百人，推张百祥为总理。张百祥（1879—1914），四川广安人，喜拳棒，好结客任侠，打抱不平，是川陕一带会党组织孝义会的头目，被称为双刀子张邕。1905年东渡日本，次年入东斌学校。他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资格最高，各地码头最熟，因此受到大家的推举。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各部。会址初设于居正、罗杰寓所，后设于青山麻布区，署名华群舍。

最初，共进会的活动不多，和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趋势也并不明显。1908年5月，同盟会在云南河口起义，共进会的居正、孙武都曾赶去参加；起义失败之后，分道扬镳的趋势就明朗化了。这一年夏天，黄兴、谭人凤自安南回到东京。黄兴曾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回答："同盟会举止舒缓，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又问："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着回答说："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41] 谭人凤则以为共进会模仿会党，"反文明而野蛮"，尤力持不可。但焦等意志坚决，"卒印刷章程条例，奋励进行"[42]。

共进会草拟过两份宣言，一文言，一白话。文言宣言偏重于宣扬反对满清贵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号召"四万万黄帝子孙"奋起为祖宗雪仇。它说："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今日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不问士农工商，以迄

江湖卖技之流，军旅荷戈之士，皆宜负弩前驱，灭此朝食。”[43] 白话宣言专为针对会党宣传需要而作，除上述思想外，还阐述了挽救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它尖锐地指斥清政府投降洋人：“况且他到如今，朝纲紊乱，只有奉承洋人，作洋人的奴隶，拿我们给洋人做三层奴隶，又把我们的土地，今天割一块来送这个，明天割一块来送那个。老百姓和洋人闹起事来，他不但不替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要替洋人杀些百姓出气，动不动又讲要赔款多少，铁路也送给洋人，矿山也送给洋人，税关也送给洋人。你看近来各项东西，都越过越贵，过活又一天难似一天，不是一些财产都被洋人搬穷了吗？这满人他只顾请洋人来保住他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

宣言表示，“若不早点把满人打开”，“满人”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托给洋人。它号召人们，“拚命去杀那满鞑子”，至于洋人的事，待下一步再办。宣言认为，只要中国整顿好了，洋人也就不敢欺凌我们了[44]。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各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满族统治者执行媚外卖国政策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宣言所表现的思想正反映了这一点。

同盟会的纲领是三民主义。在这两个宣言里，恰恰既没有民权主义，又没有民生主义。不仅如此，共进会还把同盟会誓约里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这一改动的倡议者主要是孙武。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字尧卿，湖北夏口人。祖父曾任清军提督，父亲曾任清水师营管带。1897年，孙武肄业于湖北武备学堂。自立军起事时，被举为岳州司令。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后又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后逃亡东北，继又转赴东京，参加共进会，任军务部长。他在辛亥革命后曾自述：“同盟会是平均地权，兄弟恐吾国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一时做不到，特改为平均人权，共进

一切。”[45] 除孙武之外，其他人也曾有过解释。一种说法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46]；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人除视官僚为上品外，士农工商都有地位，独视会党为下品，主张革命成功后，各界一律平等相待[47]。人权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口号，共进会领导人在使用这一口号时所赋予的内容仅仅是反对满族压迫和提高会党的社会地位，这显然是过于狭隘也过于肤浅了。

共进会的发起人不少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孙武自称“家富巨万”[48]。刘公家号称刘百万[49]，是襄阳三大富室之一。这种变动，显然也反映了阶级的局限。关于这个问题，田桐曾说：“盖当时社会主义，会员中有怀疑者。”[50] 田桐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模仿会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共进会订立“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报国香”等名目，每字各系一诗。其中，共进会的单纯种族主义思想又有所发展。如《光复堂诗》：“堂上家家气象新，敬宗养老勉为人，维新守旧原无二，要把恩仇认得真。”[51] 就是说，只要你反清，管你维新也好，守旧也好，都可以不加区分。

共进会突出反满问题，它企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中国南方的不少会党，有利于革命运动的高涨。但是，它抛弃“平均地权”的纲领，导致了革命水平的降低；忽视“维新”、“守旧”的区别，则隐伏着后来和守旧派合流的危机。

共进会第一任总理张百祥任职不久，就匆匆回国。继任者为邓文辉。在此期间，孙武等制订三等九级军制，确定了旗式：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表示黄帝子孙、十八省人民铁血主义的精神。同时共同推定各省都督：广东为聂荆，广西为刘玉山，江西为邓文辉，湖南为焦达峰，湖北为刘公，四川为何其义，安徽为孙竹丹，江

苏为傅亦僧，河南为罗杰。同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共进会在东京开会讨论，决定加强运动会党和军队的工作。会后，孙武、焦达峰等陆续回国，共进会的活动舞台逐渐移向国内。

三　后期光复会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因陶成章去南洋募捐而进一步加剧。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宣称“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52]，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下辖南洋各分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本部并峙的中心。

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遭遇到极大困难。在南洋，因参加河口起义被逐出的人员达六七百，要安排他们的生计。南洋革命党人为此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在东京，《民报》经费支绌，章炳麟穷得并日而食，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和筹措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的经费，同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带着章炳麟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中兴日报》馆，撰文参加和《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同时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孙中山和章炳麟不和，对章把《民报》办成“佛报”不感兴趣；陶成章支持章炳麟，孙中山对他南来活动也有戒心。因而，没有积极支持。最初，孙中山曾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陶成章变卖，其后，陶成章要求为他筹款五万元，孙中山即“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53]。陶要求孙中山写信介绍他到各地筹款，孙中山应允了。

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过程中，陶成章的行动本来就是迟缓的。直到1907年1月4日，他才成为同盟会员。这时，更对孙中山产生了

疑忌，便决计“独自经营”。他和在槟港当教员的原华兴会会员李燮和计议，印刷光复会盟书，准备在南洋大量发展会员。11月，陶成章至缅甸仰光，在《光华日报》发表记述秋瑾、徐锡麟起义的《浙案纪略》，以为宣传，同时，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筹饷。发票正面加盖的是“浙江同盟分会”印；背面，陶成章声明：“光复会由来已久”，内地“更改为难”[54]，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埋下了伏笔。

12月6日，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函到槟榔屿筹款，不很顺利，该地华侨仅认捐三百元；到坝罗，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其后，陶成章准备向各地收款，再次向孙中山索取介绍函，孙中山没有给。因此，陶成章便去到爪哇泗水，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成立光复会，和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立。

泗水光复会成立后，各地分会陆续成立。新加坡参加者有许雪湫，文岛有李燮和及侨商曾连庆等。由于许雪湫等在黄冈起义失败后群居南洋，对孙中山及其左右采取的善后措施颇多非议，便大力支持陶成章，因此，南洋光复会中以潮州、嘉应人为多。

1909年5月，陶成章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去到槟港，纠合李燮和等五六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三种十二项，并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同时要求废除南洋支部章程，另订新章，使南洋各同盟会分会直属东京总会。《民报》已于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罪状》要求重开《民报》机关，附设旬报，凡《中兴报》发行的地方，该报都要“踪寻之而往”。《罪状》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孙眉在九龙起造屋宇，孙中山汇款

助建云云。陶成章还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孙文罪状》纯系不实之词。它得到了章炳麟和江、浙少数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黄兴等的坚决拒绝。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辩解。因此，黄兴也遭到陶成章的攻击。随后，在爪哇的陈威涛将《孙文罪状》印刷百余份，邮寄中外各报，将对孙中山的攻击公之于世。

当时，黄兴、汪精卫正在东京筹备续出《民报》。陶成章认为它只能为孙中山“虚张声势”[55]，非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报。这一要求也遭到了黄兴的拒绝。陶成章便运动章炳麟刊印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传单说：“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苦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11月6日，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发表了这份传单。11日、27日、29日，又分三天连载了《孙文罪状》，借机攻击说：“自革命邪说流毒南洋以来，一般之劳动社会，几于尽为所惑，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兹特将此传单录出，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浼。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资财。”[56]与陶成章、章炳麟相呼应，在法国的张继则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57]。

当陶成章、章炳麟大肆攻击之际，孙中山正在伦敦。10月22日，他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会员王子匡，指出这是革命前途的大不幸，对于联络华侨“大有阻碍”[58]。同时，又致函主办《新世纪》的吴稚晖，要求吴为长文一篇，为公道之评判。

陶、章对孙中山的无理攻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东京方面，黄兴等决定不和章炳麟计较，只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宣布章为“神经症”之人。他要孙中山“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59]。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发函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毒，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共谋团体进步[60]。安南方面，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云南、广西起义的情况，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一一予以驳斥。南洋方面，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并派人调查，发现孙中山在九龙的家除几间旧房外，别无所有；孙眉自己盖了草房子在那里种地。于是，将调查实情公布，真相大白。

由于双方日益对立，加上刘师培通敌叛变所造成的复杂情况，东京的革命党人未经冷静分析即公布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六函，指责章炳麟为端方的侦探。11月下旬，《中国日报》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及《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二文，指责章炳麟为“两截人物”，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东京《民报》之罪人”。12月，孙中山得悉保皇派报纸发表了章炳麟的《伪〈民报〉检举状》，认为章炳麟“破坏党事，已不留余地”，要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61]。同月21日，吴稚晖在信中向孙中山表示，要将章炳麟的“行为心术，详为发覆”[62]。在此前后，新加坡《中兴日报》、香港《公益报》、巴黎《新世纪》、美国《少年中国晨报》先后发表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的几封信和其他答辩文章。这样，关系就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陶成章初到东京时就对章炳麟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63] 章炳麟表示同意。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东京。章炳麟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办事人员。3月10日，章炳麟、陶成章在东京发刊《教育今语

杂志》，宣称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为宗旨”[64]。

后期光复会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讥为“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说是“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65]。它提倡经商以积聚款项，又提倡教育和暗杀，声称“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66]，“实事求是，以图渐进”[67]。陶成章甚至想入非非，计划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一网打尽。这一时期，他虽然还怀着“排满”的总目的，但在进行方针上，却已经和改良派相差无几了。

1911年初，陶成章因感到在东京“实在难以过日”[68]，写信给李燮和，表示愿到南洋找一个寺院寄居，多著几部历史、地理教科书。4月，陶成章重到爪哇泗水。

与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的同时，孙中山也在着手改组同盟会。1909年冬，他在到达美国后复函张继，声称：“所云重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又说：“（东京）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69] 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改十六字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也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同年秋，孙中山抵达槟榔屿，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70]。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中华革命党三民主义》一文，将这一变动公之于世，声称：“中华革命党总机关虽设在外洋，而党事之发达尤以内地各省为最盛。”[71] 但是，同盟会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始终没有传播开来。

光复、同盟两会之间的矛盾纠缠最久，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它严重地损害了革命党人的威信，分散和瓦解了革命的力量。

第二节　革命党人在安徽、广东、四川再次发动的起义

一　安庆熊成基之役

浙江各会党在秋瑾、徐锡麟之役后受到严重的破坏，其中，尤以张恭的龙华会为甚。

1907年冬，陶成章、张恭等企图重新组织龙华会[72]，将“各教务会”联合起来。次年春、夏间，陶成章、张恭、沈英等倡议，在杭州集会，将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五省会党打成一团，定名为革命协会。

拟就的革命协会章程保留了传统的会党色彩。山，定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定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岳爷爷”为崇拜的偶像，宣称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设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干方面，它又表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它不仅指斥清政府“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一切立宪。章程说：“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陶成章、张恭等设想，革命成功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在经济上，它要求“土地公有”，“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73]。

在革命协会筹备过程中，清政府调集沿江各省新军于安徽太湖县境举行秋操，江苏、安徽的革命党人即准备乘机起义。11月14、15（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两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张恭邀约安徽熊成基、浙江陈其美，褚辅成等协同大举[74]。

首先发难的是熊成基。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扬州人，光复会员。青年时期即仰慕岳飞、史可法的为人。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结识倪映典、范传甲、柏文蔚等，参加岳王会。次年，去南京入新军某营为副目，后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任第九镇炮兵排长。1907年调回安庆，先在马营，后在炮营左队任队官。同年，倪映典策划于夏历除夕起义，被端方发觉，潜逃南下，熊成基被继推为岳王会的主持人。

熊成基提倡“政治革命”，他曾在士兵中鼓吹过“彰人道、均贫富”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欢迎，“故乐从者多”[75]。

11月19日（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范传甲、薛哲等聚会于杨氏试馆，决定以熊成基掌握的炮营、马营攻城，而以驻扎城内的薛哲的步营和范传甲的辎重队为内应，于当晚十时发动。熊成基被推为总司令。预定于破城之后，“再行推举总统”[76]，要求各国承认。然后赶赴太湖，控制秋操清军，攻夺南京，以为根据地，进军北京。

届时，炮队按计划发动，管带陈昌镛出面阻拦，被砍毙；马营亦于发动时砍伤管带李玉春。两营同时举火为号。会合后，驰赴菱湖嘴子弹库，范传甲胞弟范传国开门迎接。起义军取得了弹药后，即合力攻城。

安徽巡抚朱家宝本已前往太湖，听到安庆不稳的消息后，于19日午匆匆驰归。当晚，协统余大鸿拿获陆兵两名，获悉起义计划。朱家宝一面发电向端方乞援，一面调兵防城。这样，在城内准备响应的薛哲、范传甲的处境就困难了。

薛哲的任务是打开北门，迎接义军。当他率领百余人向北门冲突时，发现有巡防营防守，临事畏惧，不敢发动。范传甲则因被官长监视，所部辎重队有枪无弹，无法冲出。

城内接应失败，城外起义军围攻一日夜，不能得手。原已表示归附的江上兵舰又受朱家宝胁迫，炮击起义军。起义军不得已，于20日下午四时向集贤关方向退却。

同日下午，范传甲听说城外战死七十余人，大哭不止，不愿独生。当即谋刺清军协统余大鸿，不幸被捕。虽受到酷刑，仍痛骂不屈。21日午临刑前，且走且呼："我是汉族无用的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愿我同胞共同杀贼，勿因我之未成而气馁也！"直到刀砍到脖颈的时候，呼声才停，而身子还挺直地站着。

此后，薛哲亦遇害。各标牺牲者三百人以上。

熊成基撤离安庆后，率军经集贤关、桐城，向庐州进军，拟联络皖北凤阳、颍州一带会党，进窥中原。途中，曾力战击溃清军追兵。抵达庐州时，所剩已不满百人，只得宣告解散。

安庆之役失败后，张恭等继续进行。当时，浙江各地会党代表竺绍康、王金发等均已齐集上海开会，拟在衢州、嘉兴等地发动。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并变卖家产以充军费。但不料内奸刘师培这时自东京回到上海，探得了起义计划，密报端方。12月17日，张恭被捕[77]。浙江起义计划因之流产，原拟组织的革命协会也因之未能成立。

1909年初，熊成基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化名张建勋，回到东北长春，寄住臧冠三家，企图将所获日本秘密图籍售与俄国，以充革命经费。后移居哈尔滨。1910年1月，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过哈，臧冠三贪利告密，诬指熊成基谋炸载洵。同月30日，熊成基被捕。次日，解赴长春。狱中，熊自书供词，声言："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78] 2月27日，慷慨就义。临刑前，发表演说称："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矣。"[79]

二　广州保亚会之役

光绪帝和西太后之死也使南方的革命党人感到振奋，赵声、朱执信、邹鲁等在广州计议乘机起义。因赵声已受粤督张人骏怀疑，标统职务被解除，无法发动新军；朱执信所联络的农村会党又一时难以集合；议定以邹鲁所掌握的巡防营为主举事。

当时，在巡防营中，有谭馥组织的保亚会。

谭馥，字文炳，湖南湘乡人，会党分子，曾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粤，入巡防营。营中士兵多哥老会员，谭馥仿照唐才常富有票办法，散发保亚会票以资联络。规定散票五十张作为排长，月薪四十两；散票一百五十张，作为队官，月薪八十两；散票五百张，作为管带，月薪五百两以上。1908年12月7日，先锋卫队伙伕严国丰所持保亚票遗失一张，被李准亲兵所获。严讯后知为谭馥所发，连夜派兵捕拿。结果，同志葛谦被捕，谭馥由后门逃出，立即至清源巷总机关报告，邹鲁因之脱险。

葛谦被捕后，始终拒绝透露起义部署。清吏再三刑讯，只说："我的同党，我断不供。我已拼一死，愿快死为乐。"李准见他年轻，想诱引他，问道："生汝何以自处？"葛谦答道："革命！"1909年1月4日，葛谦就义。谭馥逃至湖南郴州，次年被捕解粤，被刑讯数十次，不供一人一事，在1910年新军起义前夕被害。

三　四川广安、嘉定、黔江之役

通过隆昌会议，四川革命党人总结了经验教训。会后，佘英、熊克武启程赴日，向同盟会本部报告四川起义经过和购械计划，总部派吴永珊、李肇甫等负责经办，通过宫崎寅藏买到大小手枪三十余枝，子弹两千余发。

枪械到手，四川革命党人考虑到川北广安一带同志多，孝义会势

力大，决定于1909年3月12日在该地发动。一路由佘英召集会党四百人，先期在东门外河街集合；另派数十人潜伏城内，合攻保安营，夺取枪弹；另一路由熊克武指挥，攻打知州衙门。

革命党人重视利用会党力量，但对他们缺乏教育。届时，会党多人围住佘英，索要每天应发的四百文饷钱，引起警察注意，未能行动。熊克武率队直扑州署，无人，转攻保安营，也无人。正在此时，清吏击鼓传集救兵，熊克武因人少力薄，冲杀出城，经南充转往成都。

1910年，再次在川南发动嘉定之役。2月2日，税钟麟、秦炳、程德藩等数百人分路夺取嘉定童家场等处团练局枪弹，在新场集合起义。次日，因嘉定清兵已有戒备，改赴屏山，企图进攻叙府。进至嘉定宋家村时，为清兵追及，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英勇厮杀，但因腹背受敌，乃向屏山撤退。中途又和清军发生战斗，至天黑时突围四散。此役是四川历次起义中最壮烈的一次，起义军死难二百余人，程德藩、佘英等被俘，并被分别解送犍为、宜宾等地杀害。

临刑前，程德藩演说救国大义和革命道理，并朗吟诗句："满腔热血归黄土，化作啼鹃唤国魂"，从容就义。

佘英在受审时，指着同时被捕的战友刘慎终说，"他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抓他来干什么？"刘则抗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搞革命的，怎么说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80) 为了救出佘英，同盟会员廖宗纶等曾率众在黑夜中攻入刑场，抢到"佘英"，疾负出城，但所救出的并非真是佘英。清兵随即追到，廖宗纶亦被擒杀。佘英刻苦耐劳，忠于革命，和劳动群众拥有广泛联系。他的牺牲，是四川革命党人的重大损失。

其后，又有黔江之役。

黔江地处川东，与湖北接壤。同盟会员程昌祺曾在该县八面山组

织铁血英雄会，邀集温朝钟等参加，邻邑彭水、咸丰等地入会者万余人。1910年12月，温朝钟等二百人于彭水凤凰山割辫起义。次年初，准备进攻黔江，清县令弃城请援。1911年1月7日，起义军入城。不久，酉阳知州杨兆霖率兵来攻，起义军战败，转入湖北咸丰县境。清政府派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四省军队围剿。当时，起义军仅余三十人。温朝钟登阜向清军演说，中弹牺牲。清军争功，肢解了温朝钟的遗体。

革命党人在其他省份的起义大多局限于个别地区，而四川革命党人的起义则辗转于川中、川北、川南、川东各地，它显示了四川会党反清势力的深厚，预示四川人民的斗争将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四　广州新军之役

保亚会之役失败后，倪映典、朱执信等人继续在新军中做艰苦的发动工作。

倪映典（1885—1910）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岳王会会员。与熊成基先后同学于安徽武备学堂和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后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1908年在安徽任炮兵管带，曾与熊成基计划在安庆运动军队起义，旋因避端方购捕，南下广州，任新军炮兵排长。当时，广州新军中有一种演说历史故事的集会，名为“讲古仔”。倪映典就利用这一形式讲述岳飞、韩世忠、满清入关、扬州十日等史事。倪刻苦耐劳而又长于鼓动，“言至愤际，拍案几烂”[81]。同时，朱执信也常只身潜入新军串连。他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穿着父亲遗留下来的服装，宽袍大袖，招摇过市，无人怀疑其为革命党。他便以此为掩护，通过张醁村、姚雨平等在广东陆军中学、小学、讲武堂等处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

1909年5月，孙中山离开南洋赴欧洲，将南洋党务委托给胡汉民，将军事策划委托给黄兴。其后，胡汉民赴港，嘱邹鲁等在广州军

界中策动起事。同年夏，倪映典、朱执信等在白云山集会，举定干事，分头运动，并于天官里寄园五号设立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广州新军加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

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倪映典为运动新军总主任。同时派姚雨平、张醁村运动广州附近的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番禺、南海、顺德一带的会党。1909年1月，倪映典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已经成熟，要求订于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发难。南方支部电告远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筹汇二万元应急，同时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等来港主持。不久，孙中山复电，表示款可筹足，并嘱进行勿馁。黄兴、赵声等亦相继抵港。当时，孙武亦来港。孙表示，湖北已有共进会，如广东起义，湖北一定响应。此后，同盟会员、香港商人李海云捐献存款二万元，经费问题顺利解决。

正在弦满待发之际，一标三营队官罗嗣广查获士兵参加同盟会的证书，粤督袁树勋下令于2月8日将协司令部及各标、营子弹十五万发暗运入城。次日，又发生了意外事件。

2月9日为夏历除夕。下午五时，二标士兵吴英元等因取订刻名戳，与城隍庙绣文斋书店发生争执。警察出面干涉，士兵不服。于是发生互殴。警察逮捕士兵一人，另一人逃回报讯。新军百数十人持械入城，包围巡警一局，索回被捕士兵。当日夜，倪映典急至香港报告。黄兴、赵声、胡汉民等计议终宵，决定提前至2月15日（正月初六）起义。

次日元旦，二标士兵数百人又执械入城，遇警兵即打，捣毁警局数处。袁树勋闻变，下令弹压。同日，协统张哲培等率宪兵到二标。一面召集士兵训话；一面命令队官卸去枪机，连同子弹一起运入城内。并传令各标，初二不准放假，初三阅操。同日夜，倪映典赶回广州，见到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决定起事。11日（初二）晨，一标士

兵得悉不准放假，全体大哗，夺门而出。后又传言宪兵攻营，纷纷闯入军械房，取械出防。下午，新军学兵营管带黄士龙在入城时被守城旗兵射伤，新军更为愤激。倪映典、谭瀛、黄洪昆等乘机鼓动士兵争往协司令部、讲武堂及各营夺取枪械子弹[82]。倪映典并表示："此等机会，虽有钱亦买不来"，"只管放心放手做事，香港即时就有接济"[83]。12日（初三）晨，倪映典进入炮、工、辎营，全军欢呼。八时，管带齐汝汉演说，要士兵勿受诱惑。倪映典连击三枪，齐倒地。另一队长也被倪击毙。其他两个队长惊惧自杀。于是，倪映典宣布起义，被推为司令，率军进至沙河，共约千余人。

同日晨，李准、吴宗禹率防营二千余人向起义军进攻，在牛王庙一带布防。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红旗，驰骤往来。进至横枝冈，被吴部管带李景濂以磋商反正条件为名诱入营中。李为同盟会员，倪映典不疑有他，在出营时被乱枪击毙[84]。倪映典牺牲后，起义军勇猛前进，激战一时许，牺牲百余人。因子弹年前即已被缴，起义时每人只分得七粒，迅速打光，不得已向燕塘退却。当夜，一标步营起火。起义军以声东击西之法向吴军直扑，但被击败。

13日（初四），新军退守白云山一带，清军四出搜剿，起义军被俘百余人。另百余人在乡民掩护下，逃亡香港。

当新军起事时，城内宜安里等机关曾纵火响应，旋被扑灭。附城大塘、乐从各乡会党原拟同时发动，因事起仓卒，新军已败，不得不暂停进行。此后，广州新军即处于清吏的严密监视和不断摧残中。

五　广州"三二九"之役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时，孙中山正在美国。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认为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85]。同年3月，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于洛杉矶长堤城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布斯（C．B．

Boothe）进行会谈，委托布斯为海外财务代办，企图通过他向美东财团接洽，拟借款三百五十万美元。与此同时，他连续函电黄兴，提议在广东再次筹备起义。5月13日，黄兴复函孙中山，主张“俟大款得手，先刺杀李准一人”，然后发动军队，占领广州[86]。

同月末，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准备东返，就近领导国内起义。6月10日，行经日本时，曾秘密潜往东京，会见黄兴、赵声和各省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告以和荷马李、布斯商谈的结果。孙中山认为时机未熟，建议暂缓举行全面起义，推迟到本年冬天。孙中山此次到日本，一上岸就被警察发现，随后，清政府驻日公使又提出交涉，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离开东京经香港前往南洋。

抵达南洋后，孙中山多次致函荷马李和布斯，声言在广州的革命力量比以往更为壮大，决定首先攻取该地。他要求布斯先垫付五万美元，并说：“我们全部的希望均集中于美国计划。”但是，布斯迟迟没有回音。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致函南洋各地党人，说明“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87]。他要求各地党人募集十万元作为经费。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庇能）召开秘密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出席。会前，黄兴主动致电光复会的李燮和、王文庆、陈方度等人，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88]，伸出了合作之手。在槟港的光复会员们也逐渐感到了分裂的危害，因此，接受邀请，推李燮和参加会议。长期矛盾的两会关系出现了转机。

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革命党人中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槟榔屿会议还没有正式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即以自己的经历鼓舞他们，说明失败不足馁，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并且表示，“如果众志不衰，则财

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89]。会上，孙中山又继续为大家鼓劲，必须“为破釜沉舟之谋”，“举全力以经营”[90]。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以新军为主干，同时联络防营和会党。先定款项十万元，即席捐得八千元。由于广州新军当时有械无弹，会议又决定选择青年革命志士五百人为选锋（后增加至八百人），先于城内发难，然后打开城门迎接新军。会议设想占领广州后，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会师长江。

会后，孙中山派赵声往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由于孙中山被各地殖民当局禁止入境，他自己只能在槟榔屿活动。12月，南洋英殖民当局又以“恐于地方治安有碍”为名限令他出境，孙中山便于当月6日离开槟榔屿。1月19日，孙中山抵达美国。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华侨积极认捐，维多利、都朗度、满地可各致公堂甚至将楼房向银行抵押，借款相助。

按槟榔屿会议计划，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各募捐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但英属殖民地方面，进展缓慢，华侨巨商大都表现吝啬。经过黄兴、邓泽如等多方奔走，首先得到了华侨工人、店伙、小商人的积极支持，随即出现了踊跃认捐的局面。郑螺生并向黄兴保证，旧历年前一定如数汇到香港，决不愆期。

其后，南洋荷属殖民地捐得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殖民地捐得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捐得七万七千余元。以美洲成绩最好。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月底，成立统筹部，统揽一切计划，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下设：

调度处，运动新旧军界，以姚雨平为长。

储备课，购买和运送枪械，以胡毅生为长。

交通课，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省，以赵声为长。

秘书课，掌管文件，以胡汉民为长。

编辑课，草定制度，以陈炯明为长。

出纳课，掌管财政收支，以李海云为长。

总务课，司理一切杂务，以洪承点为长。

调查课，调查敌方情形，以罗织扬为长。

统筹部设于跑马地三十五号，另于百花街设实行部，专门制造起义时所用炸弹，并准备暗杀用具，由方声洞等负责。

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邀至香港。他认为两湖地处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提醒黄兴注意两湖。次日，谭人凤带着黄兴拨付的两千元乘轮北行，由上海而武昌，而长沙，一路联系宋教仁、郑赞丞、居正、孙武等，要求各地届时响应。黄兴又通过方君瑛等联络了在广西的同盟会员方声涛等人。李燮和、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光复会员也陆续到港，向统筹部报到。

总机关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三十八处。4月3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开发难会议于总机关部。议决以4月13日为期，分十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入旗界要地，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同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孚琦事件；吴镜自香港运炸弹至广州时，又不幸被捕。清吏因之加强了警戒，侦探四出，防范严密。同时，在日本启运的一批枪械，又被周来苏惊惶失措地丢在海里。因此，不得不改变起义计划。

这以后，广州街头有时出现一些喜庆花轿和搬运嫁妆、礼品的人们；有时又出现一些抬着沉重头发包和颜料罐头的“苦力”行列；革命党人的枪械就密藏在里边，以各种巧妙的办法从香港运到广州，又分散到各个机关。

23日，黄兴离港赴广州。行前，分别写信给邓泽如和李源水，向捐款的爱国侨胞们报告：“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两书均盖用“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及“灭此朝食”二印[91]，表现了坚强的决心。

到广州后，黄兴住小东营五号机关部。其时，广州同志原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公议延缓一日，订于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起义。

由于在南洋筹款时早已走漏了风声，清政府电令粤吏严防。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驻守观音山高地。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使胡毅生、陈炯明产生疑惧，提议改期。赵声在广州的代表宋玉琳也赞同他们的意见。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五百枝以上。黄兴见各部如此，非常痛心，认为改期无异解散，决心个人去死拼李准，以此答谢海外捐款侨胞。他命令各部迅速解散退港，以避搜捕；同时保存已到枪支，以便后来举事。喻培伦、林文反对黄兴这些应变主张，他们认为清方巡警局的命令已下，即将按户搜索，不但不能缓期，而且必须速发，方可自救。喻培伦尤为激烈，主张非干不可，即使一个人也干。他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激愤地说：“你们四体俱全，难道还不如我这残废人吗？”[92] 在喻、林二人激励下，黄兴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冒险攻击督署。

临战的日子近了，不少革命党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了遗书。林觉民在到广州前曾回家一行，本拟将有关情况告诉妻子，但因妻子已

有身孕，怕她悲伤，终于没有启口。他在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93] 方声洞是个极其热情的革命者，他和他的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姊两嫂都是同盟会员，又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到广州前，他在日本预先写好十几封家信，嘱咐妻子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发回家，以免双亲悬念。25日，他写了给父亲的绝笔书。书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他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94] 这些信件，对亲属、家人娓娓而谈，发自肺腑，从至情中表现了革命党人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而勇于捐躯的崇高精神，不仅流传一时，也将流传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

4月26日，李准自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统巡防营三营进城。但其中有哨官温带雄等热心革命。陈炯明因而又改变了主意，他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陈述：李准新调三营内多革命同志，起义有成功把握。随后，黄兴等于小东营集议。林文称："余辈求杀敌耳，革命党之血，可以灌溉于无穷，事之成败无足深计。"[95] 黄兴也表示："展期则须避出，重入险地，乃至不易，谋之期年，全党属望，迁延退却，实无以对天下人。"[96] 他觉得既有这三营反正，外有新军，内有巡警教

练所学生二百余人，起义可以成功。于是，决定按期进行。下午，黄兴电告赵声："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要香港同志赶来起义。

当夜，研究了进行方法。由于情况变化，黄兴将原订七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部由小东营进攻督署；姚雨平率部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巡防营和新军入城；陈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预订27日下午五时半同时发动。

夜十时，香港方面接获黄兴密电。因三百余人不能于早班船同时赶到，发电要求推迟一天。陈炯明据此通知胡毅生，声称已经改期，但黄兴因部署已定，决定不再更改。

次日，小东营五号布置得好像办喜事的样子，广西、广东、湖南、四川以及华侨各部分同志打扮成贺喜的客人，陆续到来[97]。下午四时，黄兴聚众演说。大意谓：鸦片战争以来，满洲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老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翻，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他认为，革命一定会成功，革命一成功，就要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人人有田种，就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和满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自由幸福地生活了[98]。在黄兴演说的激励下，群情鼓舞。当即发放枪械。正发放间，朱执信赶到，立即剪掉长衫下截加入。随后，谭人凤也自香港赶到，传达香港党人的意见，要求延缓一日。黄兴急得顿脚道："老先生，毋乱我军心，我不拿人，人将拿我矣！"谭人凤要求加入作战，因他年已半百，华发满头，被黄兴所阻。

五时三十分，黄兴等乘坐肩舆，余人打扮成侍从[99]，臂缠白巾为记，直扑督署。见到卫队，就说："我辈为中国人吐气，汝等亦中国人，若赞成，请举手！"卫队不应，于是枪弹大发，黄兴手持两枪，连续射击。司号者吹起螺号。在螺号声中，数十人大噪而进。当即击毙卫队管带金振邦，冲入二门，和卫队互相对射。南洋机器工人杜凤书、黄鹤鸣等六人牺牲。不久，卫队弃枪请降。黄兴等冲入内

进，分头搜索。与此同时，喻培伦等也从督署后门炸墙而入。

当黄兴等发起攻击之际，张鸣岐正在署中与司、道各员计议。听到警报后，匆忙穿后壁，转入李准的水师行台。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出署。迎头碰上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突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一弹中脑，立刻倒地牺牲。刘元栋、林尹民等五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四十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大南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当先，所向披靡，一直战到弹尽被捕。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就遭遇清军。徐维扬急将所部分为两队迎敌。一队由徐满凌率领，且战且走，和攻督署退下的李德山等相遇。最后退入源盛米店，以米袋作垒，顽强作战一日夜，击毙清军多名。张鸣岐无法，下令放火烧街。一时熊熊大火升起，徐满凌等跳墙突围。李德山以枪刀连杀数敌，不幸胸部中弹。他负伤力战，后与徐满凌等一起被捕。其他人由于被火网封住，大部牺牲。另一队徐维扬自率，在司后街与清军奋战。敌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绕路环攻。眼看即将胜利，敌部援军开到，不得已突围退却。其后，与李文甫等相遇。计划会攻飞来庙，夺取弹库，没有成功。徐维扬越山至三元里，后在高唐火车站被捕。

黄兴所率一路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台的巡防营相遇。为入城行动方便，温部当时没有缠白巾做记号。方声洞见无记号，又举械相向，便首发一枪，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丛射，方声洞牺牲。黄兴且战且前，用肩撞开一家洋货店的门板，从门隙内出双枪，左右射击，中七八人，防营退去。在混乱中，黄兴

周围的人也都冲散。靠了店中伙计的帮助，黄兴易服改装，走出大南门，进入女同志徐宗汉所在的河南机关。第二天早晨，指血不断，派人出去购买止血药，路上遇到赵声，急忙引到徐处。黄、赵二人相见，抱头大哭，黄兴要渡河去与清吏拼命，被赵、徐等力劝而止。当夜，赵声发病，由人护送返港。4月30日，黄兴也在徐宗汉陪伴下易服返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及附省各路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期，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起事，夺占乐从团练分局。4月30日，攻入佛山。次日，李准率军进逼，会党不敌，退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计划发难外，其他各部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前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未出；赵声、宋教仁、胡汉民、吴永珊等乘轮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

起义失败后，清吏大肆搜索。李准并照会各国领事，以所部水师巡警搜检港澳各轮。同时，下令捉拿无辫者。沿江一带，行人有穿西装或无辫者，即遭逮捕。在审讯和被害过程中，革命党人大义凛然，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林觉民：被捕后，张鸣岐、李准亲自审讯。林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大势，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为了套取口供，张、李命人去掉他的镣铐，延坐堂上，送上笔墨。林提笔就写。写毕，又在堂上捶胸顿足地演说。在被囚系的数日中，一勺水也不喝。就义时，举动自如，神色不变。

陈可钧：审讯时，清吏问他，你是白面书生，何苦为逆自残？陈愤然叱责说：“尔以此举为壮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尔等利禄薰心，血液已冷，乌能知此！”

李雁南：就义时，自赴营内空地，对警兵说：“请弹从口下！”张口饮弹而死。

喻培伦：审讯时，自称为王光明。四川话的意思是“无是公”。他对问官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陈更新：清吏对他说：“子年尚少，何故倡乱，自贻伊戚！”陈厉声说：“同胞梦梦，起义所以醒之也，奚谓倡乱！杀身成仁，古有明训，尔曹鼠耳，奚知大义！”

程良：审讯时，李准诱他招供。程骂道：“余与满奴，无可言者。”问他事情不答。问他姓氏里居，也不答。

总计此次起义，被捕后就义者二十九人。其他战死者无法知道确数。检收遗骸，得七十二具，由党人潘达微营葬于白云山麓。因其地原名红花岗，潘为之易名黄花岗，所以后来人们把这次起义称为黄花岗之役。又因为起义那天是夏历三月二十九日，所以也叫“三二九”之役。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七十二烈士墓亲题“浩气长存”四字，镌于石上。黄兴也写了一副挽联道：“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对烈士们表示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

七十二烈士是：喻培伦、林文、宋玉琳、方声洞、饶国樑、林觉民、李文甫、林尹民、陈文褒、李德山、陈与燊、罗仲霍、庞雄、陈可钧、饶辅廷、陈更新、冯超骧、李雁南、刘元栋、刘六符、李炳辉、李文楷、李晚、郭继枚、余东雄、黄鹤鸣、杜凤书、徐培添、徐进炤、徐广滔、徐临端、徐礼明、曾日全、江继复、徐熠成、徐日培、徐容九、徐满凌、徐茂燎、徐佩旒、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应安、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秦炳、周华、陈春、马侣、劳培、游寿、石德宽、程良、林修明、周增、罗坤、陈潮、黄忠炳、王灿登、卓秋元、胡应升、魏金龙、陈清畴、陈发炎、罗乃琳、林西惠、张学龄。

其后，经陆续调查，发现牺牲于此役的尚有：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韦云卿、罗进、罗干、罗联、罗遇坤、张潮、陈才、陈福、李祖恩等十四人。

赵声回港后，感愤丛集，病势日益加重，经常狂歌大呼。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忽然腹中剧痛。赵怀疑中毒，延医诊治后知为盲肠炎，但他急于远行，不愿割治。拖延了一段时候，炎症加剧。再开刀时，流血过多，在同志的痛哭声中张目说："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于5月18日逝世。

赵声先参加光复会，后又在南京参加同盟会，是在两会群众中都有威望的革命家。赵死后，陶成章仍疑为毒毙，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本已出现转机的两会关系，又笼罩上重重的阴云。

自1895年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起，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已经进行了十七年的武装斗争。他们屡仆屡起，历经多次失败而志不衰，屡受攻击、责难而信心不摇，一直坚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这些起义也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弱点，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冒险主义。

还在从事武装起义活动的初期，孙中山就曾说过："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他并正确地指出："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100)] 但是，在实际上，他把筹饷、筹械放到了第一位。认为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稳操胜算。而且，他长期居留国外，钱，依靠向华侨募捐；枪，依靠向帝国主义国家购买。这样，起义地点只能选择在边境或近海一带。广州地区的起义虽屡遭失败而仍然不肯作战略改变，其原因即在此。

二十世纪初年，各地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继续发展，其中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更是方兴未艾。但是，很可惜，这些斗争大都未能

引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充分注意。他们一心一意地抓起义，不懂得军事斗争要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群众斗争结合的道理；更不懂得要去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从依靠会党转而依靠新军，又从依靠新军转而依靠少数“选锋”，脱离群众的倾向不是克服了，而是发展了。这样，他们虽然勇敢地到处点起了革命之火，却不能和广大群众的斗争之火连成一片燎原的烈焰。

“三二九”之役对同盟会说来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孙中山所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但它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01]。清政府虽然还能镇压局部起义，但在全国性的革命高潮面前，它就技穷力绌了。

第三节　暗杀活动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关于刺客的美谈，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入，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逐渐趋于活跃。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手段是暗杀。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之后，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排挤和压迫加强，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单独斗争相号召，在许多国家内多次进行暗杀。其中，尤以俄国民粹党人为最著，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也最大。

同盟会成立后，沿袭军国民教育会的做法，建立了专门的暗杀团体，聘流亡在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黄兴、秋瑾、黄树中、汪精卫等均曾加入学习。1907年4月，《民报》在《天讨》增刊中全文发表了吴樾的《暗杀时代》。同年，东京出现《天义报》，巴黎出现《新世纪》，二者均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同时鼓吹“以暗杀为首务”[102]。这以后，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起来了。

暗杀活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们热心革命，但轻视群众

力量，缺乏韧性，不愿意长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想找个“最快最捷”的“速成法子”[103]，企图以炸弹吓倒敌人。此外，在革命遭遇挫折时，由于丧失信心，他们也常常倾向于实行暗杀，一拼了事。

1．刘思复炸李准

刘思复（1884—191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8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至香港主编《东方报》。当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革命党人视之为大敌，决议除去。刘思复在日本时曾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药，便以炸李事自荐，得到冯自由、汪精卫的赞同。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并派朱执信、胡毅生等人协助。

1907年6月初，李准镇压黄冈、七女湖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冯自由、胡汉民等计议乘机诛杀立威。同月，刘思复赶赴广州，准备于李准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11日晨，刘思复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104]，面部受伤，左手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审讯时，刘思复自称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吏虽怀疑为革命党，但得不到确切证据，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1909年经陈景华营救出狱。

2．汪精卫等炸载沣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经不住失败的考验。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员中滋长了沮丧情绪，日渐消沉。为了振作精神，黄树中、汪精卫等企图“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105]。

1909年8月，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拟经汉口由京汉铁路北上。黄树中、喻培伦等即赶赴汉口，密谋暗杀。因端方改由海道赴津，便将炸药留给了孙武。

其后，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汪精卫极为灰心。他不听孙中山等人的劝阻，邀约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

10月，黄树中首途入京建立机关。11月，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及南洋革命党人，表示其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决心，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06]。1910年1月，汪精卫、喻培伦等先后抵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

最初，拟炸庆王奕劻，因戒备很严未行；准备改炸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也未得手。最后，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自3月21日夜起，黄树中、喻培伦即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23日夜被人发觉，黄树中等匆匆返回。经连夜集议，推喻培伦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洋筹款，再谋进行。

清政府得报后，以"铁西瓜"为线索追查。4月5日，北京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107]。

载沣本拟处死汪、黄，因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也因为清政府正在标榜立宪，为收买人心，以从轻处治为有利。便劝说载沣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狱中，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表现很慷慨，有杀身成仁的样子。实际上，他享受着较一般犯人远为优厚的待遇，肃王善耆、贝子溥伦都

曾到狱中去探视他。随后，汪精卫就逐渐被软化了。

3．邝佐治刺载洵

1910年11月，满族亲王载洵赴美，考察军政，经三藩市（旧金山）登陆，华侨厨工邝佐治怀枪行刺，被美国政府逮捕。

邝佐治，广东新宁（今台山）人。1879年生，原名霖，抵美后，因仰慕华盛顿，改名佐治。劳动余暇，喜阅新学书报。1909年在旧金山加入李是男等组织的少年学社。次年加入同盟会。当载洵乘车抵达屋伦站时，邝佐治混身人丛中，正拟从裤袋取枪，被侦探逮捕。

按美国法律，怀枪无罪。邝佐治并未拔出手枪，如本人否认，罪案可以不成。当时，旅美同盟会员也已聘请了律师，准备为邝辩护。但邝直认谋刺不讳，声言："此次满洲皇族载洵来游美国，并非为中国谋公益，实欲兴建海军，以压制革命党，使汉人受满酋束缚。我闻其来，早已密购手枪，立意杀之，以除国家大害。"并称："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我料我死后必有无数之我继续进行。"[108] 结果，被判徒刑十四年。入狱之际，数千人送行，甚至有人高呼佐治万岁。1912年被释放出狱。

4．温生才刺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嘉应人。1870年生。自幼家贫，长期投身行伍当兵，后卖身往南洋霹雳埠作工。因阅读《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勃发，参加同盟会。后来又听到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非常信服，立意为排满献出生命。1909年，参加南洋华侨所组织的暗杀团[109]。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立意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作罢。1911年3月底，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广州将军孚琦。在给怡保同盟会李孝章、李源水、郑螺生等人的信中，他说："看满

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110)

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机，广州将军孚琦等以下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在东门外一茶馆伺候至傍晚，见有卫队前后护拥，呵道而来，知是孚琦到，便突然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出枪。卫队、轿夫惊逃四散。温生才连击四枪，于孚琦毙命后缓步向东校场走去。途中，被尾随的巡警等人所捕。

审讯中，温生才谈笑自若。清吏要他招供，温云：“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温随吃随谈：“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申气。”清吏讯以同党，答云：“此系一人所作之事，并无同党。”清吏吓以刑法厉害，温轻蔑地答道：“何不将来试呀？”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问及同党及主谋姓名，不供；施以严刑，仍不供。

4月15日在赴刑场途中，温生才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随即被害。

5．林冠慈、陈敬岳再炸李准

1909年冬，刘思复自香山狱中获释，来到香港。次年，汪精卫、黄树中谋刺载沣被捕，刘思复大愤，与朱述堂、谢英伯、高剑父等组织支那暗杀团。该团初次宣誓时，厅堂四周围以黑布，中间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放一骷髅头，旁边燃着一支白蜡烛，宣誓者须在烛影摇红中独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111)。

团员分执行员、辅助员两种，入团者最少须经一个月以上的考察。陈炯明、李熙斌、李应生、徐宗汉、林冠慈等陆续加入。

林冠慈，原名冠戎，广东归善人。农民出身。少年时在田间目睹催租官吏欺压乡民，非常气愤，便买了一把快刀，准备为老乡报仇。后来听人谈起俄国虚无党人用炸弹暗杀官僚贵族的情况，非常羡慕。这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创立了革命党，便只身走香港，多方寻访，加入支那暗杀团。

“三二九”之役失败，暗杀团决议先除去粤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林冠慈自动申请任执行员。临行前，同志们为他饯行，他慷慨陈词说：“我以身许国，早视死如归。此行无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为憾耳！”1911年7月末，抵达广州，为纪念母亲，易名冠慈。

当时，除林之外，陈敬岳和商人出身的同盟会员潘赋西等也担负着暗杀张、李的任务。8月13日午后，侦悉李准由城外水师公所入城，三人便分头出发。林冠慈将炸弹藏在茶箩里，在双门底一货摊旁假装购物，当李准乘轿经过时，林连掷两弹，李准被炸倒，折断两根肋骨，未死。不幸，林冠慈本人却牺牲了。

在李准由公所入城时，陈敬岳自天字码头尾随至大南门。林冠慈掷出炸弹后，陈乘人群纷乱之际行至育贤坊，岗警见他西装剪发，手持沉重的吕宋烟箱，发生怀疑，上前盘问。陈正拟抛掷炸弹，巡警纷纷赶到，陈被捕，至11月7日被杀。

6．李沛基炸凤山

“三二九”之役后，拚命主义情绪也感染了黄兴。他在港多次表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112)]“此时党人惟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113)]他闭门谢客，专事准备，拟一死拚李准。消息为同志得知。孙中山、冯自由、美洲致公堂、《少年中国晨报》等纷纷函电劝阻，并有人愿代行暗杀之职。

其后，黄兴得到孙中山资助，组织东方暗杀团，派李应生、李沛基、周之贞、黄悲汉等至广州，于李准必经之地南关仓前街开设成记洋货店，贮弹以备。但李准自被炸后，深居简出，一时无从下手。适逢清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南来，黄兴决定改以凤山为对象。为万无一失，改用重型炸弹，其中并配置毒药。因配药时李应生晕倒，由其弟李沛基代。又因炸弹过重，特制一斜板将炸弹置于屋檐下，系以长绳。布置就绪，“洋货店”择日开张。10月25日，黄兴电告：“凤山即日到省。”店中人陆续离去，仅留李沛基。当凤山乘肩舆经过店前时，李沛基割绳，炸弹下落。轰然一声，凤山立即毙命。李沛基也被震仆，见事成，从灰砾中爬出来，从容离开。

暗杀活动是十分危险的事业。二十世纪初年的爆炸技术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暗杀者从制药起就必须把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在上述事例中不少人确实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但是，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基于个人恐怖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推翻反动政权，更不可能摧毁反动的社会基础。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社论说：“革命党者，必当以大起国民军，组织军队为唯一之方针。”“吾党之所求者，在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事业伟大，断非区区暗杀一二元凶大恶所能有济者。”(114) 这一段比较正确的言论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第四节　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一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

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因素存在，革命总是扑灭不了的。日知会被破坏后，清政府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侦刺，武汉地区一时寒流滚滚。但是，革命力量吸取了教训，大喊大叫的公开活动转变为深入隐蔽的串联，更加坚实地成长起来了。

自1907年起，武汉地区先后出现一批革命小团体。计有：

同兴俱乐部：孙武等。

集贤学社：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方孝纯等。

湖北军队同盟会：四十一标士兵任重远等。

种族研究会：三十二标士兵黄申芗等。

中华铁血军：在狱革命党人刘静庵等。

群治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自治团：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贺公侠等。

军队同盟：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等。

将校研究团：蔡济民及三十标士兵吴醒汉等。

武德自治社：士兵董天人等。

湖北共进会：孙武等。

兰友社：四十二标士兵胡祖舜等。

钟祥学社（内附安郡公益社）：彭临久、赵鹏飞等。

忠汉团：炮八标士兵陈国桢等。

辅仁会：三十标士兵陈佐黄等。

蕲春学社：查光佛等。

振武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德育会：谢石钦等。

文学社：四十一标士兵蒋翊武等。

数学研究会：两湖总师范学生李作栋等。

群英会：三十二标士兵向海潜等。

黄汉光复党：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易正柏等。

竞存社：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孙毅等。

神州学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等。

义谱社：四十一标士兵张融等。

振武尊心社：军商各界聂豫、龚霞初等。

柳营诗社：二十九标士兵谢超武等。

益智社：四十二标士兵邱文彬等。

文学研究社：贺公侠等。

自新文学研究会：曾省三等。

在上述革命小团体中，以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湖北共进会等为重要。

1．湖北军队同盟会

1908年3月，原日知会联络员任重远自四川归来，经李长龄介绍，投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当兵。当时，黄兴正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发动起义。任、李二人认为：钦、廉僻远，不能击中清廷要害；武昌地处腹心，在这里发动才能振奋人心，有所作为。二人经常

密谈，计议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另组新社。经任重远与新军士兵黄申芗、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秦炳钧、郭抚宸等多人商量，并征得在狱的李亚东、梁钟汉的同意，决定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任重远等分头联络，两月之间，征集到同志四百余人。

7月26日，在大雷雨中于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以秦炳钧为主席。对会议宗旨，与会者一致赞同；但对军队同盟会这一革命色彩浓重的名称，则意见不一。为了长期隐蔽活动的需要，会议决定不制定章程。会后，李亚东在狱中通过陈少武创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积极撰文鼓吹革命。

尽管军队同盟会小心翼翼，但是，李亚东的活动仍然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由于经常有新军士兵到狱中探望李亚东，清吏严令禁止他见客。不久，《通俗白话报》停刊。任重远也因梁耀汉和四川革命党人的联系有进展，再度赴蜀。会务无人负责，军队同盟会的活动因而停顿。

在日知会之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115)]。军队同盟会第一个冲破了这种沉闷窒息的局面。它虽然只存在了五个多月，但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却因之再度活跃起来。

2．群治学社

1908年11月，湖北新军第八镇与南洋第九镇在安徽太湖会操。正待举行阅兵典礼之际，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不久，又传来了熊成基起义的消息。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等即于猫儿岭宿营地左近的荒冢间秘密会商。杨王鹏认为这是革命的好机会，但可惜没有组织，不能动作。他建议从当时起，全力进行[(116)]。杨王鹏（1878—1916），字子鬯，湖南湘乡人。原为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士兵，因在军中宣传革命，被开除；改投武昌新军四十一标，和任重远同营。回到

湖北的当晚，杨王鹏即邀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钟琦、章裕昆等十余人讨论。决定成立群治学社，专门联络军中士兵。推钟琦为起草员，以杨王鹏、钟琦等十人为发起人。

12月13日，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钟琦为庶务。会议通过的宣言突出了爱国救亡这一最能激动人心的主题，声称中国已经到了“积弱无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117]。《简章》规定了既积极又慎重的发展方针：社员每人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入社，但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并须派员考查。鉴于日知会时代以发展军官为主，一旦发生变故，大多不能坚持到底，因此，会议决定不得介绍官佐入社。《简章》还规定，社员须以所得薪金十分之一交充本社经费。

成立会后，群治学社社务稳步开展。1909年7月，杨王鹏应下士团考试，取列第一，拔升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结识队官潘康时，发现潘热心革命，破格发展其为社员。在潘的掩护下，该队成为学社的大本营。其后，因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选调军官和士兵去当骨干。群治学社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钟琦等分赴苏、皖、奉天、上海等地，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庶务一职，改推新近入队当兵的李六如继任。李继任后，利用乡谊关系在炮队第八标、步兵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等单位活动。逐渐，湖北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群治学社的社员。

这一年，湖北天门等县大水，饥民麕集。为了防止暴动，清政府于11月派四十一标驻防各灾区。1910年2月，同盟会员刘复基偕蒋翊武到鄂，协助詹大悲、何海鸣创办《商务报》。刘复基（1884—1911）字尧澂，湖南常德人，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学生。曾参加华兴会在湖南组织的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12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蒋翊武（1885—1913），湖南醴州人，常德师范学

生。1906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经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詹大悲（1889—1928），湖北蕲春人，黄州府中学堂学生。曾与同学宛思演创立证人学会。后宛出资创办《商务报》，詹大悲被聘为总主笔。他们三人听说新军中有群治学社这一组织，便一起以报馆访员名义前往四十一标防地探访。在这一过程中，结识社员蔡大辅，获悉学社情况。蒋翊武兴奋地报名投军，在该标三营左队当兵。詹、刘二人回到武汉，持蔡大辅函去见李六如，备述《商务报》宗旨。当时，报社经费支绌，李六如即以社中积款资助。自此，《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喉舌。随后，刘复基也报名当了兵。

1910年4月，杨度路过汉口。在川、粤、汉铁路风潮中，他赞同清政府主张，力主借外债筑路，激动两湖人民公愤。11日，刘复基、李六如邀集数百人集会，推举代表八人去请杨度，想骗他到会场上来痛揍一顿。杨度觉察，拒绝出席。刘复基、李六如便拖着杨的辫子，拉出大门。行至英租界时，刘、李二人被巡捕房拘押[118]。《商务报》因登载有关消息，于15日被封。群治学社的名称也被侦悉。

同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数千人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焦达峰在浏阳准备乘机举事，打电报约湖北方面响应。于是，李六如、杨王鹏与共进会的黄申芗、查光佛等密议。决定于24日夜十二时发动，先夺子药库，继则各标响应，攻占楚望台。同时，约京山刘英拆毁武胜关铁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镇，运动夺取炮台。这是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第一个起义计划。准备过程中，长沙饥民暴动已被镇压。黄申芗的行动也被清吏侦知，派宪警逮捕，黄翻墙逃脱。其他人也纷纷逃离。风声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由于李六如已将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学社的实力得以保全，但活动已极感困难，不得不筹划改组。

经过军队同盟会的恢复，又经过群治学社的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入全盛时期。

3．振武学社

群治学社的败露使有些人泄气，但大多数人仍坚持再干。杨王鹏表示："失败为成功之母，请毋自馁！"[119]

1910年8月，四十一标调回武昌防地，李六如随即于该标一营召开会议，报告反对铁路借债和准备响应长沙抢米风潮经过，以及社务停顿的原因。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沿用群治学社的名义，经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黄驾白、单道康、廖湘芸、祝制六、李慕尧、孙昌福、李鑫等议决，改名振武学社。会后，杨王鹏起草简章，声言"专为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起见，故定名为振武学社"[120]。群治学社简章中爱国救亡的主题不见了，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又变得谨慎起来。

9月18日为夏历中秋节，振武学社于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会议制订了较群治学社更为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加；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知彼此的情况。10月11日为夏历重九，振武学社于黄鹤楼边的风渡楼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据会上各标代表报告，社员已发展至二百四十余人。会议要求社员每月每人必须介绍社员一人，但不得滥收。

杨王鹏的活动逐渐为黎元洪察觉。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1888年毕业，派赴北洋水师见习。1891年供职于广甲舰。中日甲午战争中，广甲舰中弹，他飘流海上，死里逃生。战后，投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被委派修建江宁、江阴炮台，得到赏识。1896年1月，随张之洞到湖北，任管带，协助德国教练训练新军。曾三次被派赴日考察，从护军马队长、前锋统带一直升到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得悉情况后，将队官潘康时传到协司令部，严厉地责问："你队有人组织会党，为何置

而不问？”[121] 即将潘撤职，遗缺由施化龙接任。施到职后，伪作谦和，实则暗中布置密探。不久，查知有振武学社这一组织，就密告黎元洪。黎当时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便表示：“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122] 即将杨王鹏及四十一标二营司书郑士杰撤差，同时将李六如及一营营代表钟倬宾打了一百军棍，开除军职。

杨王鹏撤差后，将社务交蒋翊武主持。当时，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老成持重的蒋翊武决心静观一段时期。他安抚各标、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123]

4．文学社

蒋翊武的静观策略只维持了两个多月。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于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多数人主张仍称振武学社，詹大悲却建议取一个不易惹人注意的名字。詹的意见得到了大家赞同，遂决议改名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124]

1月30日为夏历元旦，文学社以新军团拜为名于黄鹤楼畔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孙昌福、章裕昆、邹毓霖等十余人出席，推蒋翊武为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会议认为必须扩大组织，要求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

在新方针指导下，文学社发展迅速。成立仅月余，除马队八标外，湖北全军都有了社员；在士兵中，社员并占多数。这种局面，反映了革命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3月15日，文学社召集代表会议于黄土坡招鹤酒楼，增选新近合并入社的将校团负责人、三十标正目王宪章为副社长。会议决定取消

关于社员月捐和入社捐的规定；派章裕昆赴马队八标发展会员；同时提议社员采访的新闻及言论交《大江报》登载，各营队送报一份。《大江报》创刊于1910年1月1日，由詹大悲主办。该报标榜“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它以对不法军官的无情抨击获得了新军士兵的热烈拥护。

根据代表会议决议，章裕昆往马队第八标当兵。十天之内，发展社员四十余人。不久，四十二标胡玉珍、丘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也全体加入。这样，文学社的势力就伸展到了学界和商界。不过，由于军队同盟会以来革命党人主要在新军中活动，它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中止[125]。这以后，清吏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文学社的活动感到困难。为了保持各标营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刘复基勇于任事，请假出营，居住在阅马场文昌阁，逐日轮流往各标问讯。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会，决定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机关；推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住社办公；增设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6月1日（端午节），文学社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胡玉珍提议：四十二标分驻阳夏两镇及河南信阳，相距数百里，建议成立阳夏支部。会议肯定了胡的建议，决定以胡为支部长，以郑兆兰任交通，在汉口郑寓设立交通处。至此，文学社在湖北各军中的组织均已臻于健全。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中间发生过不少波折，但湖北革命党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懈。这一年2月，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他从詹大悲处得知有文学社这一组织，便邀同蒋翊武、李长龄、王守愚等在武昌府狱胡瑛处聚会。见面时，谭人凤发现蒋、王二人像乡下佬，李像冬烘先生，心里不大满意。胡瑛悄悄地对

他说："你别搞错了，湖北党人自成风气，大都埋头苦干，不靠外观相夸耀。"[126] 胡瑛的评价是正确的。正是靠了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湖北革命党人才能在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组织和积聚力量，为武昌起义做好了准备。

二　湖北共进会

湖北共进会是武汉地区的又一重要革命团体。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就隔绝了和海外的关系。因此，孙武的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李白贞等群来问讯。黄申芗，大冶人。先世为明朝武官，以抗清战死。他年轻时即具有排满思想。1906年投三十二标当兵，曾与林兆栋等发起种族研究会。孙武回汉时，传言为孙文之弟。他和郭抚宸往访。孙武出示共进会章程，并大谈孙文、黄兴的才识和同盟会的情形。黄申芗非常高兴，愿将种族研究会并入。次年初，焦达峰抵汉，和孙武协商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办法。决定在湖北成立共进会组织，以"中华山"的名目统一长江各地纷繁的会党。随后，在武汉、岳州、长沙、宜昌等地设立了秘密机关[127]。

当时，黄申芗与兴国、大冶一带会党关系密切，刘英、宋镇华在安陆、德安，彭汉一在黄州，袁菊山在襄樊一带活动，另有刘玉堂在汉口开设新大方栈，他在长江一带会党中很有势力，被人称为"刘大爷"。孙武因将上述五部会党编为五镇军队，以刘公为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黄申芗等分任统制。6月中旬，焦达峰的同乡周海珊、刘贤构等到汉经商，自愿将全部布款捐献，解决了共进会的经费需要。7月，潘鼎新所属焦逸仙部在湖南暴动，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一月，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奇部在襄河流域暴动，也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久，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部又暴动失败。连续发生的事件使清吏提高了警觉，汉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等

人。于是，孙武下令五镇军队停止活动，同时遣散部分骨干，湖北共进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大挫折。

9月15日，孙武应共进会广东都督聂荆之召赴粤。10月初，自广东转往广西，参加共进会广西都督刘玉山等计划发动的起义。行抵南宁时起义事泄，孙武逃往香港，与冯自由、赵声、胡汉民等相见。11月，加入同盟会。

自孙武离鄂后，湖北方面的活动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黄申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能诗善文，富于组织能力，因此，被选入陆军小学当学兵。他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调查同志人数，共得八百十五人，编为指挥团，共进会的会务又逐渐发展起来。1910年4月，响应长沙抢米风潮事败，黄申芗赴沪，共进会的会务再次受到挫折。

1910年6月，孙武自广东潮州归汉。同年7月，共进会第三任总理刘公毕业于明治大学，带着十八星旗、革命文告等与杨时杰由东京返国。刘因病回襄阳原籍。杨时杰与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等密议，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128)]。当时，共进会会务已停滞多时，杨时杰鼓励孙武重整旗鼓。1911年2月，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设立秘密机关。同月，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托人致书同盟会员居正，要他联络武昌新军响应。居正（1876—1951），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共进会的内政部长。后在新加坡、仰光等地任《中兴日报》、《光华日报》主笔。1910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议，旋回乡。他接到黄兴密信后到武昌，访问了孙武、杨时杰等人。23日，谭人凤也受黄兴委派，携款八百元到汉，和孙武、居正密谋。

湖北共进会一直独立活动。居正、谭人凤的到来架起了它和同盟会之间联系的桥梁。为了响应广州起义，孙武决定加强对新军的工作。3月31日，由邓玉麟出面，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专门联络士兵。由于误传孙武为孙文之弟，加入共进会的人逐日增多。一个

月之后，风声渐紧，资金也已用光，邓玉麟便将伺兴酒楼迁到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设立分机关，由离营士兵、原属兰友社的胡祖舜主持。其时，刘公已自襄阳到武昌，赁居雄楚楼街十号杨玉如家中，任共进会入会主盟人。

广州方面的失败促使孙武等决心在湖北挑起首义的担子。5月3日，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在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孙武称："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129)与会者一致同意孙武的意见。会议决定，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反之亦同。

武汉位居中国心腹要冲，被称为九省通衢。从自立军起事之后，这里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坚实的工作。这里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业中心，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力量。清政府在这里存有大量饷银，汉阳有全国首屈一指的钢铁和军火工厂。因此，在湖北地区首义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决策是作出了，但是经费却毫无着落。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没有联系，不可能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焦达峰等去蕲州达成庙盗取金佛，没有得手；邹永成暗暗地在酒中放进闷药，企图麻倒伯母，偷出钱财，也没有成功。直到刘公拿出了他父亲要他报捐道台的五千元钱，革命党人才有了一笔款子，得以从事必要的起事准备。

除湖北外，湖南、江西也先后建立了共进会组织。

1909年8月，焦达峰回到故乡浏阳，在普迹市以"中华山"、"光复堂"的名义召集会党头目，开山立堂，到浏阳、长沙、湘阴、醴陵、平江以及江西萍乡、万载等县的"龙头大哥"三十多人，全体加入共进

会。不久，在长沙设立机关部。1909年10月，邓文辉回到江西，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

长期以来，同盟会放松了长江流域的工作。湖北等省共进会的成立，这一带就多了一支活跃的革命力量。

三　同盟会中部总会

孙中山一意在南方三省发动起义，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相当普遍的不满，说是“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130]。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谭人凤回到东京。这时，东京同盟会员不少已灰心失望，无人过问会事。宋教仁自1907年辽东归来后，经常郁郁不乐，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后来更准备遁迹隐居。6月10日，孙中山自檀香山秘密前来日本。不久，赵声、黄兴继至。谭人凤要求孙中山改良会务，孙中山表示同意。其后，宋教仁往谈，孙中山因对宋一度支持章炳麟、陶成章不满，愤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故，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131]次日，宋、谭同往，谭人凤反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表示，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132]。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匆匆离去，没有通知谭人凤等。由是，谭人凤也对孙中山不满，便和赵声等商量改组，主张以长江流域为进行地点。赵声非常赞同，便约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会议。

会上，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他说：“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经公议，

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133]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

方针既定，但缺乏经费。宋教仁采纳邹代藩的建议，准备把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公推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同时，谭人凤南下香港和黄兴等协商。黄兴别无意见，只说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表示反对。谭人凤怒极，几乎要给胡一拳，愤然说：“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134] 其时，赵声已先期返港，劝谭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次日，谭人凤邀请赵声、胡汉民共饮，以一杯敬赵声说：“愿为国自爱，毋过激过郁。”以一杯敬胡汉民说：“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135] 当夜谭人凤即离港返日。

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既有充分的民主，又有正确的集中，才能有战斗力。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区上的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既缺乏民主，又缺乏集中，不能有效地统一意见，因此，分歧愈来愈大。

谭人凤返日后，日夜奔走，经费仍无着落，改组事因而搁浅，仅每周组织谈话会一次。同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编辑工作。

“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很不景气。赵声病死，黄兴专意准备暗杀，闭门谢客，没有人出面处理善后，引导大家前进。谭人凤目睹这些情况，心灰意冷，决志归家。6月初，路过汉口，焦达峰、孙武等正在会商，拟乘湖南铁路风潮暴动。焦达峰劝谭说：“事在人为，何可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的意见。次日，孙武邀蔡济民、邓玉麟等共进会干部和谭人凤见面。谭劝孙武等和文学社和

衷共济，相辅而行。过了几天，谭人凤东下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计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人凤、章梓、陈勒生等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成立会。到会二十九人。计湖南籍七人，浙江籍七人，四川籍四人，福建籍五人，江苏籍三人，安徽籍二人，云南籍一人。会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章程》表现了对原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倾向。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它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此外，它并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136)] 《宣言》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它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待贤。同时它也看出了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病，表示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它批评同盟会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慕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137)]。8月2日，开第二次会，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不久，各省分会相继成立。南京由郑赞丞、章梓主持，安徽由范光启主持，湖北由居正主持，湖南由曾杰、焦达峰主持。

为了使各地革命党人不致急躁从事，中部总会定"宣统五年"（1913）为大举时期。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中部总会的成立，客观上适合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中部总会确定在这一地区发动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它并没有看到革命大风

暴已经近在眼前。

---

(1) 鹤卷町某君来函，转引自《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6期。

(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45页。

(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1页。

(4)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

(5)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6) 樊光：《章太炎、陶成章合传补充》，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7) 《革命党觉醒之时期》，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8) 《革命党觉醒之时期》，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9) 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革命》。

(10)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9页。

(11) 《为防城起义望筹画接济饷械致宫崎寅藏》，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91页。

(12)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13) 《复张继函》，孙中山佚稿，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原件照片。

(14)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15) 竹内善朔：《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日本评论社《中国研究》（五），1948年9月。

(16) 《亚洲和亲会约章》，陶铸（冶公）藏。

(17) 《答祐民》，《民报》第22号，第130—131页。

(18) 《答祐民》，《民报》第22号，第130—131页。

(19) 《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民报》第15号。

(20)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序中译案语》，《天义报》第15期。

(21) 刘师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

(22) 《天义报》第8—10期合刊。

(23) 志达：《保满与排满》，《天义报》第3期。

(24) 汪公权：《法国女杰露伊斯传》，《天义报》第2期。

(25) 刘师培：《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天义报》第5期。

(26) 刘师培：《悲佃篇》，《民报》第15期。

(27)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报》第8—10期。

(28)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天义报》第8—10期合刊。

(29) 《国家论》，《民报》第17号，第1页。

(30) 《朱希祖日记》（稿本），1908年3月20日。

(31) 《五无论》，《民报》第16号，第1—22页。

(32) 《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同上第17号，该文第5页。

(33) 《与马良书》，同上第19号，第110页。

(34) 《满洲总督侵吞赈款状》，《民报》第22号，第38页。

(35) 《章太炎电复统一党》，《越铎日报》，1912年6月6日。

(36) 《党人》，《新世纪》第117号，第6—9页。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37) 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

(38)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

(39) 《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

(40) 《谢奉琦之惨死》，《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4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2页。

(42) 谭人凤：《石叟牌词序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9页。

(43) 邓文辉：《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3页。

(44) 《共进会宣言书》，《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第96—98页。

(45) 《孙武演说》，《亚细亚报》，1913年2月27日。

(46)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页。

(47)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38页。

(48) 《孙武宣言书》，《民立报》，1912年3月13日。

(49)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页。

(50) 《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第33页。

(51) 邓文辉：《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7页。

(52) 《在星架波成立南洋支部之通告》，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第173页。

(53) 《致王子匡函》，《国父全书》，第417页。

(54)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第三节。

(55)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版，第116页。

(56) 《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27日。

(57) 转引自《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

(58) 《国父全书》，第417页。

(59)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7页。

(60) 《为孙中山受谤致各同志望同心协助函》，《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6页。

(61)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11页。

(62)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12页。

(6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2页。

(64) 《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65)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6)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7) 《致柱哥》，《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71页。

(68)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9) 孙中山佚稿。

(70)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6—67页。

(71) 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3月8日。

(72)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明治四十四年11月版，第51页。

(73)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第67—70页。原名《龙华会章程》，据山口升《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此章程应即为《革命协会章程》，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09。《章程》指斥清朝统治者“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这里所说的“狗屁的上谕”指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907年9月27日）颁布的《旗丁改筹生计谕》，见《德宗实录》卷578。据此，《章程》的拟订应在1907年冬或1908年初，原署“甲辰（1904）正月朔日”云云，是有意倒填。

(74) 陈去病：《张恭传》，《革命人物志》第4集；《尹家双女豪事略》，《民立报》，1913年5月3日。

(75) 《熊成基被逮始末记》，《神州日报》，1910年2月13日。

(76) 《薛哲供词》，《神州日报》，1908年12月11日。

(77) 《是否革命党》，《神州日报》，1908年12月18日。

(78) 《熊烈士供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241页。

(79) 《熊成基临刑记闻》，《申报》，1910年3月12日。

(80) 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4页。

(81) 《黄洪昆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2) 《江运春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3) 《黄洪昆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4) 陈景吕：《庚戌之役倪映典遇害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300页。

(85) 新加坡《星洲晨报》，1910年4月18、19日。

(86) 《黄克强先生上孙总理述革命计划书真迹》。

(87)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76—77页。

(88) 冯自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

(89) 黄编：《总理全集·自传》。

(90)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58、259页。

(91) 《革命文献丛刊》第5期，第2页。

(92) 《喻培伦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17页。

(93) 《林觉民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98页。

(94) 《方声洞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89—190页。

(95)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0页。

(96)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0页。

(97) 施正甫口述：《“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在广西》（上），第17页。

(98) 韦能宝口述：《“三二九”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在广西》（上），第23页。

(99) 《民立报》，1911年5月6日。

(100) 《笔谈残稿》，《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172页。

(101)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黄编：《总理全集·杂文》，第10页。

(102) 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报》第6期。

(103) 白话道人（林獬）：《国民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12页。

(104) 关于爆炸细节，各书记载不一，此据刘思复自述，见《驳江亢虎》，《师复文存》第225页。

(105) 《黄但喻陈诸同志谋炸端方之经过》，《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版，第649页。

(106) 《留别南洋同志书》，《汪精卫文存》第372—373页。

(107) 《汪精卫供词》，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243页。

(108) 《邝佐治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

(109) 《李佐汉传》，《革命人物志》第1集。

(110) 《温生才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111) 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29页。

(112) 《致美洲同志书》，《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79页。

(113)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2页。

(114) 《光华日报》，1911年3月8日。

(115) 李长龄：《民元致日知会调查纪录所书》，张难先：《鄂党史料杂抄》，稿本。

(116) 《杨王鹏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6页。

(117)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55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第6页。

(118) 《杨度狼狈之近状》，《神州日报》，1910年4月20日。

(119) 《杨王鹏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6页。

(120)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起义纪实》，第14页。

(12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3—154页。

(12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3—154页。

(123)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6页。

(124)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8页。

(125) 《蒋翊武事略》，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67页。

(126) 《胡瑛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63页。

(127) 《孙武传》，武汉《强国报》，武汉市图书馆藏剪报。

(12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

(129)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130)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131)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2页。

(132)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2页。

(133)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13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3页。

(135)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3页。

(136)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页。

(137)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页。

第十章　保路风潮

第一节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和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一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

四川在收回利权运动的前期，从前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比江、浙、山西等省并不突出。但是当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政府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时，四川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斗争，进而发展为全民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早在1903年7月（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受全国各省自办铁路呼声的影响，在从北京往成都履新的途中，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物产殷富，且高踞长江上游，形势险要，帝国主义各国，一直企图揽办该省铁路。锡良到任后，法、英、德、美各国使臣“均以借款造路为请”[(2)]。锡良面临着列强争夺川路的漩涡，害怕“因此稍起争端，转多饶舌”[(3)]，不利于自己的前程，所以提出“非速筹自办铁路不可”的主张[(4)]。

这个奏折经外务部复议，原则上同意自办，但当时商部尚未成立，须等商部成立后，由商部大臣妥订章程，招商办理。

锡良认为四川这个地方的“民情骚动，士习浮嚣”，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伏莽滋多，动辄借端思逞”，使他深怀戒心，如果路权让外人抢去，可能激起人民反对，导致外事争端[(5)]。因此他加速筹议自办铁路公司。当年9月商部衙门成立，发布了《铁路简明章程》，于

是，锡良在1904年1月依照商部《章程》集股设立川汉铁路公司，委任布政使冯煦为督办。公司一切事情皆秉承川督命令办理。

计划中的川汉铁路，从四川省会成都起，经重庆、万县，到达湖北省的宜昌，再由宜昌经当阳、荆门、襄阳，在应山县的广水与京汉铁路相衔接，全程四千多华里。但当时宜渝轮航未通，如从成都开始筑起，器械、材料运输困难，故考虑川属路段由湖北宜昌向西修筑。从宜昌到成都三千多里的铁路，估计需银五千万两。按当时四川全省岁入不过一千六七百万两[6]，又值灾荒之年，如何筹措这笔筑路资金，确是煞费踌躇。为此，锡良就与川省在京、在籍诸绅熟商集股办法。起初，他拟增加田赋，但加赋为“祖制”所不许，不仅将遭到言官参劾，更恐惹起民间反抗。末后决定仿照历届办理积谷办法，按租抽谷，百分取三，凡实收租谷在十石以上者，约按所收谷数提出三成，照市价折银，名曰“租股”。估计每年全省约可收得二百数十万两。另外，又拟订了“认购之股”（私人投资）、“官本之股”（国库拨款）和“公利之股”（用公司股款开办事业的盈余），并规定以库平银五十两为一股，无论官股、民股“均按周年四厘行息”[7]。这个集股办法于1905年1月上奏，获准施行。以后又在鸦片商中征收“土药股”和在盐茶商中征收“盐茶股”。

按抽收租股与茶盐股的规定，是对广大农民强制实行的，是一种原始积累的资本形式，而川路资本实际上是以“租股为大宗”。到1906年初，所谓“认购之股”，“殆寥寥焉”；“官本之股”，除“由藩库拨归公司之宝川局鼓铸存本银二十八万两”之外，“更未拨入分厘”；“公利之股”非但分文未入，为了开办铜元局反而“挪移路款至三数百万”[8]。据1908年全年集股情况统计，“租股”占78%强，“认购之股”占3%强，“官本之股”还不到2%[9]。

既然路款“十九取贷民财”[10]，而铁路公司一切大权却由官方把持，这显然是个矛盾。官办公司，无不是弊端百出的，故而“民疑滋深”[11]。因此士绅阶层的人们就提出了“路属民办，则事应绅管”的

要求。绅士们是亦官亦民的，但却自认为是“民”的代表，与官府争权。锡良为缓和这种矛盾，改采“官绅均权合议”的办法。他于1905年7月撤去原派委的公司督办，奏用成绵龙戍兵备道孙秉堃为官总办，前刑部郎中乔树枏为绅总办。不久又改任乔树枏为驻京总理，绅总办则由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继任。

这号称“官绅均权合议”的川汉铁路公司，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一座官僚衙门；与纯粹之官局相比，不过“于官之下而附丽以绅”[12]。是豺狼官吏，再加上牛马缙绅的混合体。当时有人揭露与挖苦公司的情况说：“以衙门公案，作店中柜台，而以拷打之鞭笞，作应酬之烟茶具……大柜二柜，制台道台，徒子徒孙，翰林进士，奇奇怪怪，千古未有……”[13] 在这座和官办差不多一样的衙门里，官绅混杂，权限不清，有功相争，有过相诿。他们相互勾结，贪污浪费，滥用资金。如1906年5月中资金已集至五百余万两，而5月底结账，存款仅一百四十三万两。约近四百万两的资金，除由铜元局及兵费挪用大部分外，余皆由公司中的官绅中饱和浪费了（开局请客一次，酒席费竟在三千两以上）。

自咸丰、同治之后，四川人民受各种封建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压榨，日益加重，后来又在“兴学”、“练兵”、“办警察”、“筹赔款”等名义下，负担着种种派款。更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洋货充斥市场，以致“工徒失业，农商亦因此受亏”。所以当时社会上是“疮痍满道，乞丐成群”[14]。现在又加上“租股”的负担，使得小农下户“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15]。公司官绅们借着“抽谷”修路之名，倚恃官威，恣其盘剥，按户勒股，任意苛罚，闹得鸡犬不宁。

但老百姓还能忍饥耐饿，承担“租股”，是希望能够修起一条铁路，既抵抗外来侵略，也对自己有些好处。然而在这伙官绅把持下的川汉路公司，成立数年，“寸线未经勘定，一事未有端倪”[16]。锡良吹嘘了半天的“辟利源”、“保主权”还是一个画饼。于是“道路非议”，要求“商办”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四十多人在东京发表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他们以清政府颁布的《商律》、《公司律》和川督原奏案为根据，首先辩明川汉铁路公司应为“商办之公司”[17]。他们要求订定完全之公司章程，章程中应明确规定股东权利、禁止官吏兼任公司办事人员……要求酌改征收租股之法，预定租股总额、以收租五十石者为征收起点，等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署名“四川人”的《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劝告书》中强烈地提出了“破坏野蛮官立旧公司，建设文明商办之新公司”的口号，要求全川人民“同心协力以实行不买股票、不纳租捐之策”，以为抵制，认为只要这样，“则野蛮官立之公司自倒；而文明商办之公司，可因以徐兴也”[18]。这里充分表达了四川人民痛恨官办、渴望商办的共同心情。这时正是各地路潮迭起的时候，锡良深恐波及四川，乃不得不在1907年3月奏请川汉铁路公司改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撤销官总办，“以顺舆情”。商办川路公司以乔树枏为总理，胡峻为副理，续订《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章程》五十九条。但是这个“商办”公司仍不过是“以商办之形式，杂官办之作用”[19]。当时就有人对这份《章程》加以逐条驳斥。如在公司权限上，《章程》中规定：“至重大事件仍禀承总督办理”；在选任公司总、副理问题上，《章程》中规定仍由四川总督奏派。事实上它仍是“树商办之名，而无商办之实”[20]。

因为川路公司的行政、工程、财务、采购等事分布在成都、重庆、宜昌、汉口、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相距遥远。为便于联系，不久便仿效湖南铁路公司成例，设立三个总理，又改胡峻为驻成都总理，丁忱在籍河南候补道费道纯为驻宜昌总理，乔树枏调为驻北京总理。总公司设于成都，用三总理名义刊发股票，详定租股章程，并在省内各府县筹设股东分会。

1908年，费道纯、胡峻相继病故，于是由钦廉道王秉恩继费道纯驻宜昌；学部郎中曾培继胡峻驻成都。1909年，又以丁忱在籍邮传部左参议李稷勋代王秉恩任驻宜昌总理。先是，锡良已离川，继任总督

是赵尔巽。赵到川后，于1908年11月奏任詹天佑为川省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詹天佑于1909年赴工段勘定路线，同年12月10日举行开工典礼，先修宜昌至秭归一段，计三百里。难产的川汉铁路，自官办公司成立到这时才破土兴工，时间已经过去六年了。随着公司由官办向名义上的商办过渡，四川的立宪派分子开始了夺取公司领导权的活动。立宪派大多是些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他们把实行立宪政治当做救国图存的灵丹，他们一边争夺铁路商办，一边要求实行立宪。他们幻想只要清廷把政权交给内阁，有了国会的监督，在铁路问题上是“商办”还是“国营”，就不必争了。以争路而获得声誉的浙江汤寿潜、江苏张謇等就是这样的人物。四川立宪派首领蒲殿俊、萧湘、罗纶等人也是这样的人物。蒲、萧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很早就参与东京四川学生呼吁自办川汉铁路的活动。他们发表过《上川督锡制军书》和《敬告全蜀父老书》，提出过“官商合办”的建议[21]。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刊发《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时，蒲、萧等人亦署名其上。他们还在东京发起成立过川汉铁路改进会，要求先修成渝段，反对先修宜夔段；揭露过“租股”扰民之害和官办公司的弊端。1909年10月14日，四川谘议局成立，蒲殿俊当选为议长，萧湘和另一个立宪派分子罗纶当选为副议长。他们既有了政治活动的机构，也想在经济方面抓个地盘，因此积极图谋把川汉铁路公司揽到手。

11月15日谘议局第一次会议，议定整理川汉铁路公司办法，呈请川督要求修改公司章程、清查账项、整理财务、增辟股源。其目的是要通过清查整理，把原由官方奏派的驻京总理乔树枏、驻宜总理李稷勋挤掉，另换上接近他们的人物。其实乔树枏等，也是具有立宪派色彩的绅士，不过与蒲殿俊、罗纶不是同一个小集团罢了。

谘议局第一次会议闭幕后，紧接着在11月26日召开川省川汉铁路第一次股东会，出席股东六百余人，推罗纶、郭策勋、吴天成任股东会正副会长，主持会议。在组织董事局选举董事时，十三名董事中，

属于谘议局的有萧湘、江树、汪世荣、沈敏政四人，再加与谘议局接近的铁道学堂监督刘紫骥为“主席董事”。这样，川省川汉铁路公司便在以罗纶为首的立宪派人物的控制下，组成了董事局。

1910年11月举行第二次股东会，董事局改选，彭芬、都永和当选为正副“主席董事”，谘议局议员被选为董事的有沈敏政、王大侯、冉崇根、范涛、杨用楫五人。这一些仍然都是立宪派的人马。自此以后，川省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的领导权便落在这一派人物的手中。

在这伙立宪派人物把持下的商办川汉路公司，其腐败情形，并不稍减。到1911年6月止，股本实收总计1,670万两，其中租股仍占71％，对扰害小民的租股，并无多大改变。在股本总额中用于筑路的只占百分之四十，其余有的挪用，有的倒账或亏损。工程进度迟缓，经詹天佑勘定的宜昌到秭归段工程三百里，到清廷“收归国有”令前，仅完成三十余里。

二　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川汉路是西南的大干线，英、法、美三个帝国主义强国窥伺这条路，要求承办，不是一天了。四川人民都希望以商办来杜绝帝国主义的掠夺，但川汉铁路公司上层的腐败与筑路工程的迟缓，却给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以勾结、插手和掠夺川汉路的机会。

最早企图掠夺四川川汉铁路路权的是19世纪末年一家美国公司，随后是一家英国公司请求承筑，清政府都未同意。到1903年春，英国驻华署理公使汤雷（Townley）又数度请求，仍遭到拒绝。同年，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向清庆亲王奕劻再谈此事，表示美国愿提供借款，奕劻当时予以含混的允诺[22]。英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汤雷即于8月9日会见奕劻时提出：川省英国商务较盛，造路如用外国股本，应以多用英人者为宜。奕劻又表示：俟中国办理此事时，可以考虑多用英人股本[23]。

当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兴办川汉铁路的消息传出后，法帝国主义又一马当先，指使华利公司出面，向清政府外务部要求议订招股勘路代办合同。法国驻重庆领事于9月20日照会川督，提出法人办理勘路工程的要求。锡良没敢应允，法领事就出面吵闹，声势汹汹，后来闹得锡良装病逃避。当法领事正在纠缠不休时，1904年秋，德国公使穆默又致函清政府外务部：川汉路借外款，不应专向英、美、德国亦应“一律同沾利益”[24]。

如前所述，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曾主张借款修路，向英、德、法三国商人谈判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的事。到1909年6月6日，他同德商德华银行、英商汇丰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议订借款草合同，借款总数达五百五十万英镑，其中二百五十万英镑作为建造湘、鄂境内粤汉路资本，二百五十万镑作为建造鄂境川汉路资本；另外五十万英镑则作为赎回前美国合兴公司代清政府所发售、而未赎回之修筑粤汉铁路金元债票之用。谈判的过程中，美帝国主义抓住当年（1903）与奕劻交涉中的片言只语，以当年清政府已经答应过中国修筑川汉铁路“如资金不足时”，“当向英、美两国公司商借”作根据，先后照会英国政府和清朝政府，要求遵守“诺言”，允许美国资本家参加此项即将成立的借款。同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美国驻英、德、法大使发出指令，要他们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组成一强有力的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与完整”。四川境内的川汉路段也包含在借款合同之中[25]。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插手，于是引起了四国间的互相角逐，经过一段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到6月下旬，美国派遣银团代表到伦敦与英、德、法三国银团代表进行会商，要求分借两路借款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三国银团仅允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总数四分之一与之[26]。这次会商未能达成协议。当时张之洞的态度，比较倾向维护英国利益，主张鄂境的川汉路段可借部分美款，粤汉路不应让美国插手。为此，美国总统塔虎脱（Wm．H．Taft）便亲自于7月15日直接致电摄政王载沣，对于张之洞等人“出于成见的反

对”，表示“深为不安”[27]。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训令驻华代办费莱齐（H．P．Fletcher）严肃警告清政府，“若美国政府的合理要求被摒弃，则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28]。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屈服了。7月18日，载沣复电塔虎脱说：“关于借款问题，为答谢盛意，已命外务部与贵国驻京代办会商，期能获致适当决定。”[29]于是外务大臣梁敦彦即与费莱齐进行谈判。梁敦彦提出可把张之洞与三国拟订五百五十万英镑借款增加到六百万英镑，其中三百万英镑供粤汉铁路用，三百万英镑供川汉铁路用，美国可占川汉路借款额之半数，即一百五十万英镑。但美国仍不同意，坚持须与四国平分借款，并在人员与材料上享有与英、法、德三国完全同等的权益。后来，由于英国有意削弱德国在长江流域的权利，转而决定与美国合作，同意了美国的“原则”。但就在这时，张之洞病死（1909年10月），影响到交涉的进行。到1910年5月，四国银团代表聚集巴黎，达成四国向清政府均分借款正式协定。这个协定，是照美国的主张，投资于川汉路的部分，不限于鄂境路段，也包含从宜昌以上至成都的一千六百公里的川汉线。协定还规定了由美、英、法三国分派工程师，分段主持修筑川境路线[30]。

到此，这个由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所达成的分赃《协定》，只等待清政府的承诺了。

当四国银行团达成分赃协定的时候，正是湖北入京拒款代表张伯烈等回到湖北，两湖人民正积极筹设商办粤汉路的时候，也正是清政府冷眼旁观，寻找借口，准备随时扼杀商办铁路的时候。四国《协定》的签订，促使清政府下了撤销“商办”的决心。

第二节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和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一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

干路“收归国有”，清政府是蓄谋已久的。1908年清廷谕令邮传部查验商办各路工程，又令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路，都是官夺商路的准备。当时张之洞直言不讳地承认：“各省商办铁路……将来皆须由官收回。”[31]

国际财团的财阀们是清政府扼杀商办铁路的幕后指挥者，他们煽风点火，制造舆论，批评清政府说：“国家将建筑并设立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真政府之一大错误。”又说川汉铁路“非得外国之专门家与财政之资助，决难望其成就”[32]。从1910年2月起，英、德、法三国公使（后来又加上美公使），几次三番地催促清政府从速签订包括四川境内川汉路段前议的湖广路借款合同。由于中外反动派早已勾结一致，于是，清政府于1911年1月补授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让这个滥借外债和出卖路权的老手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就借款合同的细节，进行最后一轮的磋商。同年四月底，合同细节“皆已妥协议定”[33]，清政府和盛宣怀宿谋取消商路的条件完全成熟，一出商办铁路变“国有”的双簧戏，便上演了。先是：盛宣怀嗾使给事中石长信于5月5日上了一道《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抓住商办铁路的弱点加以攻击，而后提出“明定干路为国有”的办法。清政府当天就下谕：“著邮传部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34]。紧接着，邮传部递上《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认为“原奏各节，皆属详尽。而其要尤在干路收归国有”。因此请求“明降谕旨，晓示天下”[35]。就在这一阵紧锣密鼓中，5月9日清朝政府抛出了“国有”政策的“上谕”。

“上谕”首先肯定石长信“所筹办法，尚属妥协”，接着强调了国家必得掌握诸大干路的重要性，然后从指责商办铁路的缺点开始，转向一举夺取全国商办铁路干线的正题。上谕说：

> ……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分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进无着；湘、

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尘耗。……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36]。

这一道皇皇谕旨，是卖路的清政府向全国商办铁路的宣战书。表面上它好像很关心国家的路政，也好像很看出了某些商办铁路公司的弊害，但是堂皇“理由”不过是掩盖出卖路权秘密的文字游戏，是骗不了人的。就在5月9日这天，邮传部《奏请取消商办铁路前案片》上讲得明白：“英、德、法、美四国驻使，以张之洞系国家代表，草约已画，即成定议，催定正约者，前后咨文，不下十余次。……若不将前案（指商办）先行取消，则借款合同，似难签定。”[37]“干路国有”，不过是为借款合同签字扫清道路而已。

“国有”政策宣布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首先是5月10日由邮传、度支两部致电与粤汉、川汉两路有关的湘、鄂、粤、川督抚，传达5月9日“上谕”，并要他们“遴派大员”查明各省商办铁路公司账目，“迅速电复”，“以凭请旨办理”[38]。

第二是5月18日起用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令他“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湖南巡抚恪遵前旨，妥筹办理”[39]。

第三是5月22日下令“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并“著该督抚迅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40]。

这一些都是为接收商路，实现“国有”服务的。查账，是为接收摸底；任命督办，是确立接收大员，表示令出必行；停收租股，则既是釜底抽薪，制川、湘两公司于死命，又是借“稍纾民困”之名，收买人

心。

就在逐步采取上述措施的过程中，5月20日，清政府代表盛宣怀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代表就《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在北京正式签字[41]。但是，当四国财团和清政府正庆幸他们勾结阴谋成功的时候，立即召来了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反对，爆发了清末保路运动的最后一战。

二　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首先起来反对“干路国有”的是湖南。5月9日的“上谕”发表之前，湖南旅京资政院议员罗杰等人已探听到一些消息，电告长沙方面说“四国借款即日签押，势甚危迫，请速力阻”。湖南商办铁路公司闻讯后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修有成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并电湘籍京官“设法直接挽救”[42]。

5月10日邮传、度支两部给四省督抚的电报传到湖南后，湖南谘议局当天致电有关省份谘议局，要求共同力争取消“国有”政策[43]。此后长沙各界群众连日集会，反对“盛宣怀滥借外债，欺君贼民”[44]。12日，到贾公祠开会的有数千人。次日到教育总会开会的又是数千人[45]。各团体署名刊发传单，说明“湘省粤汉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湘人财产生命均操外人之手，若不极力收回，后果何堪设想”[46]。有一张“四字经”式的传单，说得很透彻：

瓜分中国　今已实行　烟酒新税　钱粮厘金　一概典押
权操外人　硬将铁路　卖与强邻　粤汉川汉　国之命根
收回自办　几历艰辛　煌煌谕旨　远近共闻　邮部盛贼
买卖交情　利归己有　扣头坐分　假传圣旨　恐吓愚民
实利归外　国有虚名　国债借入　千兆万金　我辈担荷
真是不轻　永为牛马　子子孙孙　用告各界　兵商农工

田房抽股　又抽俸薪　募款凑集　血泪纵横　近年赶筑
着着进行　今遭盛贼　拍卖无存　股本丧失　何问红成
嗟嗟此贼　揖盗开门　从此乡土　鸡犬不宁　妻离子散
强掘祖坟　为今之计　万众一心　誓死不二　斩此奸臣
先请大宪　电奏九重　如果不理　动以血忱　大家拚命
与贼力争　保全商办　分段兴工　大家入股　克日告成
以保桑梓　以答圣明

全湘人民公白[47]

5月14日，到教育总会来开会的达数万人，群情激愤。有的演说，有的痛哭，有的断指，表示与盛宣怀不共戴天。会上除决定于16日由各团体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外，还通过决议：商办湘路实力进行；召集正式股东会，分段开工；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对来湘强事修筑的督办或外国人，概行抵制；政府如不同意商办则实行闭市、停课、抗租等十五条办法。有一张题为《铁路苦状告我同胞》[48]的白话文传单明白表示：

> 我们的抵制他法子，一面人人多拿几个钱出来，分途开工，赶紧办路，修一尺是一尺，修一丈是一丈。一面请抚台出奏，要外务部即日把湖南借款的事情一笔勾销。在下的想那班卖路的奸贼，一块肉落在口中，要他吐出来，是难得望的。我们只好拿定一个主意：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我不去管他，也不许他来管我。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人大家闭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完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样办法呢！

在5月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往巡抚衙门请愿的同时，铁路公司长（沙）株（洲）段工人一万多人也停工进城举行请愿游行。他们表示："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

税。”[49] 巡抚杨文鼎在群众的压力面前考虑对策，他一方面答应代奏，另一方面密电瑞澂让清帝对自己下旨申饬，“若辈见抚臣已受申饬，无可藉口，久则势散气涣，不难就范”[50]。他们按照这条“苦肉计”进行部署。6月3日清帝果然对杨文鼎“严旨”申饬一番，但是效果不大，除了在一部分胆小的绅士中间，稍起了些“震慑”作用之外，大多数群众却因此“愈益愤激”。谘议局议员纷纷辞职，各学堂学生相率停课。到6月16日以后，形势越加严重，杨文鼎不得不揭去伪装，出动巡防队、警察队“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手擎枪械，如防匪寇”[51]。同时出示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检查信邮，特别注意学生和军队的信件。在反动统治者的高压和分化政策下，湖南人民反对铁路“国有”斗争的第一个高潮暂时被压下去了。但到9月中旬，长沙各学堂学生听到四川保路风潮扩大，再次奋起斗争，实行罢市停课，抗粮拒税，并且出现了“铁路协赞会”等几个组织，密谋革命。新任巡抚余诚格“深虑激动风潮，妨碍大局”，下令不准民间开会结社，并电告湖广总督瑞澂：“请调常备军两营，驻扎岳州，以备不虞。”[52] 反动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斗争，制造恐怖气氛，使得长沙“居民一夕数惊，大有草木皆兵之象”[53]。这时距武昌起义的发生已经不远了。

湖北的京官哈汉章等多人，也较早地探听到盛宣怀主持铁路借款并奏请取消鄂路商办的消息，曾联名上书抗争，指劾盛宣怀罪状多端。5月9日清帝发布“干路国有”的当天，湖北谘议局刚好在四官殿铁路公司召集军、商、学界会议讨论借款问题。这天到会者一千多人，会上人们纷纷演说路权损失之利害关系，谴责盛宣怀的卖国罪行，表示非认真对付不可。随后武汉商民团体联合会又在小关帝庙集会，反对借款，力争商办。这时汉口《大江报》主笔、革命党人詹大悲，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时评”，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揭露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号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动。

反动统治者对于群众的爱国行动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的两手。湖广总督瑞澂对倡议争路者扬言要“格杀勿论”，对保路积极分子进行侦察

审查，下令查封了《大江报》，逮捕了詹大悲，判处监禁一年。受命为督办的端方，则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他设宴招待鄂省京官，积极联合湘鄂两省人士，“哀求”他们“相助”[54]。

由于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集资不多，股款未齐，而且邮传部拟具的收回办法中，承认用国家铁路股票赎买商股，因此“国有”与否对那些上层绅商利害关系并不大。在端方、瑞澂软硬兼施之下，他们“首先软化”[55]。连过去曾经慷慨一时表示过“路亡与亡”的谘议局议长、立宪派分子汤化龙也“甘心路亡，而不置议”了[56]！还有少数无耻之徒，为了讨好官方，要求武汉各团体列队车站，欢迎端方的到来，与端方有过一定关系的绅士们，更想“乘此时机运动差缺”[57]。湖北人民的爱国斗争被立宪派分子和反动绅商们叛卖了。

广东在京京官得知路归“国有”的消息后，非常激愤。他们联名参奏盛宣怀“朦蔽圣聪，侵权违法”，质问总协理大臣“此事是否应负连带之责任”[58]。在广州方面，也同样激起反对。6月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讨论对策，参加会议的股东一千多人。当董事和大股东们提出几种“转圜”办法，如领回资本，别营其他实业，或更换国家铁路股票时，皆无人同意；当有人提出“仍援原案，坚请商办”的议案时，“众皆起立，哄然嗥应，声震会场”[59]。会上通过了“万众一心力争商办”；“政府如有甘愿违背先朝谕旨，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设立机关部一所”“办理一切事务，以保全商办目的”等决议[60]。大会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依，希予支持”；致电省内外股东，希望他们“向政府致电力争”[61]。

这时的广东刚经过夏历“三二九”的广州起义，总督张鸣岐特别警觉，股东大会开会时，派数百名士兵到场弹压。会后，他向清廷谎报，各股东所争者“只归还股东之办法耳”，而所通过的“反对国有，力争商办”案，是由于“公司议事，惯为少数股东所劫制，多数股东不敢发言”[62]。因此他出示把会议决议案取消，勒令另定期召集会议，

重行讨论。

但是，这种横蛮干预，引起来的是人民更大的愤慨。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有人想出了另一种抵抗方式，办法是不用官发纸币，持票挤兑白银。在这一号召下，群众纷纷持票领银，一日达数十万，以致市场危险，不可终日[(63)]。这一行动逼得张鸣岐赶紧向度支、邮传两部呼吁挽救。清廷除令两部先拨借三百万两外，再准张鸣岐向日、英、法、德四国银行贷款五百万两，周转市场，渡过难关。同时令张鸣岐对于挤兑的人，“认真弹压”，倘有不法行动“立予拿办”，准其“格杀勿论”[(64)]。

由于反动统治者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公司股东们及许多保路团体领导人被迫逃到香港，于9月3日在港成立广东保路会。这天适值狂风大雨，赴会的群众不下万人。大会规定保路会“以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会上通过章程二十八条。并通过派代表进京请愿，遣人赴南洋联络华侨，设立分会和将大会情形，宣告中外等决议[(65)]。

广东反对铁路“国有”的斗争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海外侨胞的支援。尽管这一运动（包括湘、鄂），基本上还约束在合法斗争的方式之内，但它已造成“山雨欲来”的形势，成为革命运动的前奏。当时有旅越侨胞来信，主张“有劫夺商路者”，也应“格杀勿论”[(66)]。又一封海外侨胞来信，“声言现在侨商决意资助党人，另图反对政府”[(67)]。这些都说明了人民对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忍无可忍、渐近于短兵相接的地步。

第三节　四川立宪派的“文明争路”和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一　四川立宪派和清政府矛盾的加深

“干路国有”的消息，同样激怒了四川人民。

粤汉、川汉路股的来源，四省并不一致。如粤省是以商款为主，而川、湘都是以租股、捐股为主。特别是四川，“款靠租捐，专虐农民，且小户零亩，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路款系由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竭小民之脂膏汗血”[68]。因此，“干路国有”受到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群众的普遍反对。当时有一首歌谣[69]曾这样写道：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
最可怜的庄稼汉，一两粮也出这项钱。
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

这首歌谣，把保路运动的群众性和目的性都表达清楚了。

“干路国有”也侵犯了四川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郭沫若曾经回忆说：“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70] 所谓立宪派，主要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因为，资产阶级上层也大多是由这种地主阶级中的人转化而来的，在四川尤其是如此。

四川立宪派人士对“干路国有”虽然表示不满，但开始他们还幻想有弥补的办法，不愿把事态扩大。

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接到有关干线“国有”的“上谕”后，邀请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总理曾培来督署商议办法，一时未得结果。彭芬等复往省谘议局同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讨。蒲殿俊认为：谘议局的职能解决不了铁路股权所有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得铁路公司另行开会不可。因此

他们决定：先号召在成都的各州县人士集众研究，然后再举行临时股东会具体讨论。这时另一立宪派分子、在京任法部主事的邓孝可丁父忧在成都，他向铁路公司建议，由铁路公司出资创办通俗的报刊，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先对问题作些分析。这是要作“法律解决”的张本。结果由他和朱云石主办《蜀风杂志》，池汝谦等主办《西顾报》，江三乘等主办《白话报》[71]。这些报刊在以后的斗争中成为立宪派的喉舌。

5月16日，四川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发出第一封致邮传部的电报，乞求“俯顺民情”，维持商办成案。但是，清政府不予理睬，两天后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随后又下令川、湘两省停收租股。5月下旬，公司董事局渐渐听到一些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以及各方面反对“国有”政策的情况：如湘“拚死力争”，“泣恳收回成命”；“鄂相持最烈；粤亦不肯退让”；各省“会举代表晋京”，“台谏又严劾盛宣怀罪状”等等[72]。于是，四川立宪派腰杆子开始硬朗了些，他们决定于8月4日召集特别股东大会，后又提前于5月28日先举行临时股东总会准备商讨对策。同时，又分别用四川谘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名义呈请川督代奏，要求收回成命，暂缓接收，仍准商办。

四川的立宪派中，邓孝可是开始并不一定反对“国有”的人物。他发表的《川路今后处分议》，可看作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他对“四国借款”和“国有”政策不主张“根本上之反对”，而主张“有条件之要求”。理由是：借款如能通过资政院，不以铁路作抵；借款又有确实的用途，偿还时不波及川路，就不必作“根本”的反对[73]。政府收回铁路如能“剋期速成”、又能扩建为川藏铁路，同时建路时，“用川人、购川材”，就不必争论“国有”、“商有”。他还幻想这样可以免除“租股”的扰累，又可用清政府退还的路款来办几件“至要至善之事”：“以百万金，力扩川航事业”；“以五百万金，充地方殖业银行资本”：以二百万为川省教育基金”；“下存余者办四川矿工各实业”[74]。但是邓孝可幻想的美梦，不久后被事实粉碎了。

5月28日上午，临时股东会准备会在成都川汉铁路公司举行。到会者有谘议局常驻议员、各法团代表及铁路公司在成都的股东等共七百二十二人。署劝业道周善培奉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之命也出席了会议。会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龙鸣剑为代表的同盟会会员，他们主张根本反对“国有”，认为湘、鄂各省，既已力争，四川不能拱手退让。希望今后凡有交涉，由董事会报告各处，集群策群力以为后盾。一是以邓孝可、龚焕辰等为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希望政府退还路款，保住股本，就只作有条件的要求，“无事根本上之反对”[75]。这是同盟会会员和立宪派人士围绕是否承认铁路“国有”问题进行的第一次公开的思想交锋。

临时股东会准备会议以后，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和四川驻省各法团请川督代奏清政府，要求政府暂勿派员收路和缓刊停租股的誊黄，俟按照“公司律”开过股东大会后，再行决定。川督王人文有某种程度的开明倾向，同时也由于他们的要求有限，果然据情代奏了。但5月31日代奏电发出，6月2日就遭到传旨申斥。清廷的谕旨中，不但斥责王人文，而且责骂谘议局难保“不受劣绅之请托，希图蒙混”，川路公司“定有不可告人之处”，所具缘由，都是“强词夺理”，甚至是“殃民误国”[76]。这道严谕，有点刺痛了立宪派人士。但他们不知道在这道严谕的背后，还有使他们更感到痛楚的歌电。

所谓“歌电”，是在清廷申斥王人文的前一天，即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致王人文的两封电文，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办法的大意是：除公司在上海倒折之款，不予承认外，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同时拒绝川人希望提用路款自办支路和矿务的要求。按川省股东要求保本退款，而清政府则只允换发铁路股票，这一争论与湖南省相同；但川省股东，至少希望把现存之款退还；同时川省公司还有一笔在上海各钱庄倒亏之款，合计三百余万

两。这笔倒亏之款是上海管款员施典章企图营私渔利而造成的，由于上海道蔡乃煌处理违法，尽管施典章已被监禁，但倒亏款全无着落。现在歌电处理办法不包认亏耗之款，使川路公司上层绅董无法交账，同时不论已用未用，一律不还，这不但是收路，而且还要夺款了。立宪派原认为“路”可以不争，“款”不能不要；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77]，而事实恰恰相反，到此，他们原有的“希望”完全幻灭。这情况是湘省所无，四川所独有的。

王人文6月2日收到电报，料知此电一经宣布，川人必更愤激，所以他在3日复电盛、端，力言对已用之款，可照部议换给铁路股票，对现余之款则万不可提。“若提换现款，则希望两绝，恐非笔舌所能譬解”，并说明“近日谣言甚多”，“歌电”“未敢宣泄”[78]。但是6月7日盛、端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问他是否见到“歌电”；李于6月9日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又转询督署。王人文知道已无法掩盖了，便在6月11日抄示公司，并说明这不过是部议商榷的意见，嘱不可误解。然而电文一公开，报纸争相刊登，“舆论因以益愤”[79]。

6月12日，铁路公司致电各州县租股办事处，告以“歌电”内容，不料各处电局先已奉有邮传部“元”日电令，不准收发关于铁路问题的电报。“邮部以官厅命令，束尽人民自由”的野蛮专制手段[80]，使四川绅民更加激动。他们散发传单予以揭露。与此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川督王人文根据“歌电”的要求，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摸清底细，以便接收。但在众情激怒之下，查帐员遭到公司各处办事人员的拒绝。各地办事人员表示：在股东大会未召开之前，不能接受查帐。

这一系列的事件，既深刻地激怒了四川人民，也加深了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矛盾。因为清政府收路兼夺款的做法，使立宪派已无回旋的余地。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他们看到借款合同的全部内容，于是就抓住合同中丧权卖国的条款，由罗纶起草，逐条予以

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到这时，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诋“盛大臣卖国奴”。这伙原来赞成“国有”的绅士们，如今被迫转到“保路”的立场上来了。

二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6月16日，铁路公司召集在省股东和谘议局常驻议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认为形势日迫，需要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81]。于是连夜缮发通知，分道联络，同志会第二天就要成立起来。当夜蒲殿俊、罗纶等二十余人又仔细商量，为了要以群众声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除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外，还必须在各县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留有转圜的余地，谘议局议长暂不露面，留作幕后的主持者。同志会内另设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参事会，作为决策的核心，谘议局常驻议员皆作参事，由蒲任会长，罗任副会长。这是内幕机构，对外不宣布。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的铁路公司，人群熙攘，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应邀与会的在省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团体代表外，更多的是闻讯自动赶来的爱国群众，如青年学生郭沫若便是这样的群众之一。

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许多人相继发表了激昂慷慨、声泪俱下的演说。他们讲述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揭露四国借款合同的内容，批评政府的违法乱命。

关于这次大会的群众情绪，无论是官方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都有着十分生动的记载。例如：

6月17日，即开会当日，王人文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说：

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

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最后议决，设立保路同志会，由会选人赴都面谒钧部，请示办法，俟商定后，再请查帐。幸无骚动情形，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82]。

6月19日，王人文又在奏折中陈述17日开会情形说：

本月二十一日（即阳历17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83]。

青年学生郭沫若，是当日亲临会议的目击者，他在后来的著述《反正前后》[84]中，也有一段十分详尽而生动的记载：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锺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85]——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

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

同志会成立后，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

王人文，字采臣，云南太和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原由陕西左迁四川藩台，新简川滇边务大臣，未赴任，被命临时护理总督。前任川督是赵尔巽，调东三省。赵调任前，未践诺保王为川督，而是密荐其弟赵尔丰署四川总督，以王代赵尔丰的川滇边务大臣缺。有人说：王对保路运动比较放任，是有意制造难题留给赵尔丰；但从王在这个阶段的前后言行看，他承担着颇大的风险。如上述，为了给谘议局代奏，他已经受到朝廷的一次申饬，对盛宣怀等拟定的提用路款办法，他也不完全同意。现在这么多的请愿群众涌到他的衙署里来了，他居然破格地走到群众中来，并讲了话。对大家的要求，不但表示同情，而且表示支持：“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86] 王人文说话算数，在接见群众讲话后的第三天——6月19日，即上疏严参盛宣怀签字借款合同，丧失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6月27日，他又把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王人文作为清政府的一员封疆大吏，对保路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其胆识确是难能可贵的。结果，王自然遭到清廷又一次的严厉申饬，最后终于受到革职处分。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发生，他是会被逮入京办罪的。

三　“文明争路”及其破产

自17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要求入会的爱国群众，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流，仅仅四天成都一地就已超过十万人。到7月初的半个月中，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到会群众“激昂悲壮，热血渍涌”，但又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87]。成都各街道的保路同志分会也迅速地组织起来。紧接着，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保路同志协会也相继成立，如女子保路同志会、学界保路同志会、商界保路同志会、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等等。后来在罢市斗争中，还出现了机器工匠同志会、印刷工人同志协会。

成都以外的地区，保路同志协会也陆续成立。如6月28日，重庆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会者一万数千人。7月21日彭山县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声明为“破约保路”，情愿“毁家效命”。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17日至9月7日成立保路协会的共有六十四县。

立宪派虽然组织和领导保路同志会的活动，但他们内心充满了矛盾。为了迫使清廷让步，不得不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声势；但又怕群众的行动超越了他们许可的范围。他们总希望留有余地，以便在达到所悬想的愿望后，与清政府妥协。当时，他们派出大批讲演员分赴各府、厅、州、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怕“好事之徒，藉此煽惑人民，生出意外变端”[88]，所以小心谨慎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89]。并规定“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不要有野蛮抗官府、打教堂的无理的暴动”[90]。他们在《演讲及组织同志会协会办法》中还规定：演讲及成立协会“必先商之地方官，届时必请临场，又必派警兵数人以资弹压”，“指名招请团总、学董、乡约、保正、客长等”参加会议。开会时“宜推监场一人，以便宣布会规及一切防维之法”[91]。这就是立宪派所宣扬的“文明争路”。

但是群众一经发动，就不会听命于立宪派的意志。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会员的革命主

张也陆续渗透到群众中来，影响着群众的行动。随着斗争的深入，爱国群众对立宪派“文明争路”那一套办法日益不满，因此，“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顾前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92]。但是，立宪派的绅士们仍然照“据法力争”的老路办事。8月1日，他们派遣刘声元为代表入京，会同已在北京的谘议局副议长萧湘等人叩阍请愿，准备“效秦廷七日之哭”来打动“天听”。刘声元启程北上的那天，冒雨送行的三万余人。刘声元告别演说，“一字一泪”，表示：此去“若力争不能破约，誓不生还！”[93] 但结果呢，不但不曾敲开皇宫的大门，而刘声元反被“槛车就道”，“递解回籍”。与刘声元入京的同时，他们还派了陈育、白坚、龚焕辰与江潘、周代本、吴炳臣等分道前往湘、粤、鄂等省联络，筹议办法，也都遭到当地警道的防范干涉。

从5月间就开始筹备的特别股东大会，到8月初旬各地股东代表到齐，准备开会。开会前，向以凶悍著闻的赵尔丰已赶到成都履总督任。

赵尔丰，字季和，武弁出身。先前来川任过永宁道道台，又简藩台，代理过四川总督。1908年调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节巴塘。以滥杀著称，四川人叫他“赵屠户”。其兄赵尔巽调离四川前为他活动，他辇金三十万入京行贿，所以清廷于1911年4月命他署四川总督。自路潮扩大，王人文被申饬，清廷迭催他赴成都履新。但由于种种事故，到7月下旬方能成行。待至雅州，遇到河水大泛，又停顿了几天[94]。一路上他接连收到端方、盛宣怀的电报，催他“兼程前进”，务于8月4日以前抵省[95]，指示他“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96]。8月2日，赵尔丰赶到成都，第二天早晨就接印视事。这时特别股东会即将举行了。

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幕，会场设在铁路公司。到会代表共五百余人。赵尔丰率领各司道官员亲临会场监督。会上讨论和通过了股东准备会提出的《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路仍归商办意见书》。《意见

书》提出：（一）质问邮传部，（二）吁恳代奏，（三）提回存款三条争路办法。当会上有人讲“破约保路”时，赵尔丰插话制止，但遭到南充股东代表张澜的当场驳斥。张说明要保路，必先破约，他针对赵尔丰的干涉，更加大声呼喊“保路呀！破约呀！”[97]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这气壮声扬的场面上，貌似强悍的赵尔丰反而“势衰气沮”，不再吭声了[98]。这天会议上，颜楷当选为特别股东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会长的人选是事先精心安排的：颜楷素性平和，其父与赵尔丰同寅，便于联络；张澜有胆识，与蒲、罗交好，这样一软一硬，可以更好地对付赵尔丰。

此后，会议逢一休会，其余时间逐日开会。但是到了8月中旬骤然发生了邮传部札派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实际是强收宜归段路权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斗争。

第四节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和成都血案

一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

在特别股东大会开幕不久，破约保路问题尚无结果的时候，发生了邮传部札委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的问题。这是盛宣怀与端方密谋策划强收川汉路权的一个阴险步骤。

端方号午桥，曾历任巡抚、总督等职，深得慈禧信任。1909年被载沣革职。久蛰思启，以行贿数十万，得到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他奉谕之后，与盛宣怀密议对付争路人民的办法，一是用收买，二是用惩办。在湘鄂路事中，他们收买了不少两湖绅士及报馆主笔[99]。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四川斗争后来居上。盛、端之流就在川人中物色收买对象，他们看中了川汉路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同时还把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多人拉过来，让他们代表川绅上奏，响应“国有”政策和强收路股的办法。

李稷勋，原系邮传部左参议，因丁忧返籍，1909年8月间由前四川总督奏派为川路驻宜昌总理。四川保路同志会蠭起后，6月底，盛宣怀命他进京述职，借机收买他来劫夺川路。盛宣怀、端方内定在“国有”前提下，让李继续总理宜归段工程；李稷勋表示愿以现存租股七百余万两办宜归工程，同时他还答应由彼自行设法运动川路公司。秘密商定之后，他于7月7日先唆使川路宜昌分公司董事局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要求将川路股票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将现有存款交给政府专修宜归一段。继于7月15日用自己名义从北京致电川汉铁路总公司，暗示只应注意争款，不可别生枝节，说：“国家政策”“恐难转圜”[100]，意图诱使成都方面放弃废约保路。与此同时，他竟无视总公司迭次通知他“坚持破约”、“拒绝交待”的指示，于7月16日以个人名义擅自呈文邮传部，同意接受邮传部派往宜昌查勘大员马汝骥清厘款目，以旧历五月初一为界限，在此以前的支出各款妥订归结办法；在此以后的去留事项，统候邮传部裁夺。这是李稷勋自己做主把大家正在争取川汉路的一段，让邮传部劫夺过去了。邮传部根据这一“呈请”，就以铁道工程“最贵迅速”为理由，着李稷勋继续任宜归段总理，主持进行，“勿庸停工”，“所需工项，仍由川款支应”。盛、端用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一转手间，就把宜归段工程和路款改变了性质。就在此时，由于宜昌筑路工人的问题，在武昌的端方、瑞澂急电李稷勋返宜。李离京南返路过武昌时，又与端方密谋。端方为他在原薪五百两之外“提加给夫马五百两”，并嘱咐他“将宜归一段一手办成”[101]。

李稷勋回到宜昌后不久，成都举行的特别股东会开幕了。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始，8月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收到邮传部宜昌工程由李稷勋用川款续办的咨文。这一消息于8月8日在特别股东会上一经宣布，“会众异常愤激”，当天由总公司董事局致电宜昌董事局，请董事们共同质问李稷勋，令其自电阁部，并电会众辞去其总理职务[102]。8月10日特别股东会又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私相授受”，“违旨盗权”之罪[103]。到了8月13日，特别股东会又电告李稷

勋，表示“全体股东不认部咨”，限其“十日内”妥结辞职[104]。盛宣怀知此情况后，急与端方和瑞澂密谋，让端方、瑞澂赶紧会衔上一道奏派李稷勋留管宜昌路局的电文，准备以谕旨压服川人。他们还诬蔑股东会说：“此次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又信口造谣说：“闻自东内渡者，均纷纷回川，恐有受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执路事，实则别有隐谋。”[105] 清廷得奏，于8月19日下旨：钦派李稷勋仍总宜工，并饬川督将所有川款查明，实力奉行[106]。这个谕旨终于把四川人民逼反了。

赵尔丰接到“上谕”后，只告诉给几个立宪派首领，他们都认为此事不能发表，否则“众必大愤”。但是，宜昌方面已得此消息，成都方面也终于无法掩盖了。消息一经传开，群众异常激愤。特别股东会放弃了原定的休息日，8月24日当天上午召开紧急会议。会场上一片哭、喊、叫、骂、捶胸、跌足之声，秩序大乱。也有人提出一些对付办法，但由于主持会议者的犹豫，无结果而散。这天下午，保路同志会又举行大会，几万群众涌进了会场，要求罢市、罢课、罢捐，并要到总督衙门去请愿。当罗纶、邓孝可等犹豫不决，会议还在进行时，街上已在关门罢市了。同时，街头上出现了传单，号召“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107]。

这天晚上，学界保路同志协会决定，各校当即开始罢课。

成都沸腾了。赵尔丰急忙命令营务处总办田征葵调遣巡防军进城，分驻平安桥、四圣祠、丁公祠、子龙塘、通顺桥、双凤桥等处，严加戒备。另一方面，他又召集颜楷、张澜、罗纶、邓孝可、曾培、彭芬等商谈疏导办法。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心情惶惑，一边感到群众起来了，“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但又怕由此而激起群众的暴动；因此，他们与赵尔丰想恢复秩序的要求，有共同的地方。根据赵尔丰的意图，当晚，股东会领导人与各街协会代表共商开市和保守秩序的办法：他们通过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派出巡警监视各街道爱国群众，同时用同志会名义刊发《公启》，规定“勿在街市群聚”，“不得

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等等戒条。另外他们还想出一条办法，用黄纸刊印光绪皇帝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的对联，分发给各街各户张贴门首，让每家居民每日早晚焚香礼拜。立宪派的首领们想用这办法作护符，证明自己不是“犯上作乱”的；但它却起了让人们无须乎害怕“造反”获罪，把更多的群众动员起来的作用。于是各街道中心随即都扎起了“皇位台”，台上都供起了光绪帝的牌位，牌位上几行大字十分令人注目，其形式如下：

庶政公诸舆论

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

川路准归商办

在这个“皇位台”的两侧，还树起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文官下轿”，下联是“武官下马”。

这种供奉光绪皇帝牌位的形式，立宪派原想借以防止群众的行动越轨；结果却起了保护群众的作用，因为这种形式，使保路斗争完全合理合法，剥夺了反动统治官员们一切诬蔑和反对的借口。

8月25日，即成都罢市开始的第一天，赵尔丰派府县官员亲到街上召集商民劝谕开市，但是商民们都“一哄而散”[108]。川督赵尔丰虽以凶悍著名，但当时省城兵力单薄，而且他还顾虑到警察、新军都是本省人，难免有“眷怀桑梓之念”，“欲其捍卫尽力，实难凭信”[109]。在这样群众运动的威力面前，他不敢轻举妄动，只得一面向清廷报告求援，一面封锁消息。

成都一罢市，各县留省人员即“雇快马捷足走告本埠”[110]。温江、华阳、灌县、郫县、简州、汉州、双流、新繁、新津、新都、崇宁、崇庆、金堂、什邡等处，凡是先得到消息的地方都一齐罢了市；接着潼川府、嘉定府、叙州府、资州、重庆府等处也纷纷响应。江上各船户也“俱相率罢工”，使水上交通瘫痪[111]。到9月7日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112]。风潮开展得如此迅速和猛烈，是清政府的反动官僚们预料不到的，也是温和的立宪派绅士们所不敢设想的。

各市县罢市开始后，新繁、崇庆、彭县等地发生捣毁巡警署、经征局的事件，四川人民逐渐挣脱了立宪派的精神桎梏，直接行动起来了。

四川人民的斗争，反映到清政府中，引起内阁意见分歧。度支部大臣载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及端方、瑞澂等人是力主“严拿首要，格杀勿论”的。例如，盛宣怀在8月26日（七月初三）致赵尔丰的电中便说：“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湘粤初亦如此，经告示严禁，有‘格杀勿论’字样，乃能相安无事。……闰六月初六日电旨：‘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以销患于未萌’等因，钦此。罢市、罢课倡首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113]

但是，统治阶级内部有矛盾。内阁奕劻，认为载泽有觊觎自己地位的野心，所以对度支部事事加以掣肘，而铁路借款问题，度支部和邮传部是紧密联在一起的。站在两派争夺权力之间的摄政王载沣，又中心无主。因此，清政府在对付川人罢市问题上，一段时间内，举棋不定。

成都的赵尔丰，面对全省罢市怒潮，焦灼不安而又束手无策。成都将军玉昆原是奕劻的亲信，是附和奕劻，反对载泽、盛宣怀的。他对赵尔丰的行动起着牵制作用。赵尔丰从玉昆身上看出内阁中意见分歧，再看到立宪派掌握下的股东绅士们还能和他合作，并无滋扰情形，罢市罢课的人民，也还没有大举暴动，所以他虽感到局势的危岌，但总不敢立即采取卤莽的镇压行动。反之在罢市开始以后，他还屡次代奏申述股东会及川人意见，要求转圜的办法。8月28日，他又与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会衔代奏，请朝廷将川路“准予暂归商办”，“将借款修路一事，俟资政院开会时提交决议”[114]。因此这期间立宪派对他仍充满着依赖的心理。

罢市后的第五天，即8月29日晚上，赵尔丰派遣官员与蒲殿俊磋商补救办法，蒲殿俊认为省城不会有危险，“所恐者惟外邑耳！”由此，可看出到这时以蒲殿俊为代表的一派绅士们的态度，仍然是在防止暴动，走合法争路的道路。即他们自称的“文明争路”。

8月31日，罢市后的第七天，蒲殿俊、罗纶等人按照赵尔丰的要求，发起成立了以防止暴动为目的的“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会”。罗纶说：“维持者，系维持罢市时间无生他变”，希望官绅之间“化除意见，如同舟共济”。但是维持会刚成立，成都街上出现了“招贴”：“对于维持会不无怀疑”，谴责立宪派“讨好官场”[115]。

从8月30日到9月5日这几天中，以盛宣怀、端方、瑞澂为代表的极端反动势力与为破约保路而起来的四川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阶段。川督赵尔丰和骑虎难下的立宪派首领们在这

股激流中间，时起时落地翻腾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近时远地变化着。端方、盛宣怀等痛恨赵尔丰“庸懦无能”，不能“严行镇压”；他们已计划着派重臣入川查办，“并治赵尔丰以应得处分”。8月28日，端方严参了赵尔丰的“抚驭无术”。瑞澂也跟着参劾了赵尔丰的应付失策。8月30日，赵尔丰受到“倘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该督是问”的申饬[116]。同日，赵尔丰收到载泽、盛宣怀把持下的内阁两封电报，表示查款、收路的政策，决不改变，并决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去讨论。四川人民得知这些消息后，异常激愤，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内，也感到幻想的破灭。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他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9月1日上午举行的股东会，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上项决定除由谘议局呈资政院外，并通告全国。这个决定对清政府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四川的岁入，除供本省政费外，还协济滇、黔、新、甘、藏等省区，四川动摇，西南半壁都要受其影响。在这样危局面前，赵尔丰联合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于9月1日反过来参劾盛宣怀争路酿变，要求罢斥盛宣怀，勿任邮传部操纵路政，以弭祸乱。赵尔丰敢于参劾盛宣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抗粮抗捐的群众声威，玉昆的支持，都是重要的原因，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时英驻成都领事，也以四川人民的“民气固结为虑”，致函赵尔丰愿“代筹转圜之法”[117]，赵尔丰于8月30日专门上了一道奏折报告此事。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把借债卖路作为“续命汤”，结果还是盛宣怀、端方的主张占了优势，赵尔丰与玉昆的参奏，再一次受到“倘听其借端滋事”，“定治该署督之罪”的严厉申饬[118]。

二　成都血案

立宪派为主导的股东会，虽然作出“抗粮抗捐”的决议，但他们对赵尔丰并无太大恶感，并且还计划着在取得某种条件后，相机取消罢市。然而，赵尔丰已接连受到申饬，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他已不想再“为民请命”，而准备采取镇压手段了。再加他周围僚属都与谘议局的议员早有矛盾，拚命地怂恿鼓动，向他输送假情报。赵尔丰相信

了“近省有匪勾结同志会，定于十六（阳历9月8日）起事”的捏造消息，遂下了“拿办首要”的决心[119]。

清廷派端方带兵入川查办的消息传来，立宪派于9月6日举行股东大会，商讨应付办法。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一种题作《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小册子，被赵尔丰抓住作为口实。其实《商榷书》是以“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共挽时局之危，厝皇基于万世之安”作为出发点的，虽然也有刺痛清政府的话，但它要求以练成的地方武装保护官长，镇压“乱民”；要求斟酌时势，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以恢复秩序；要求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扩充军备等等，不过是一种“地方自治”的主张。于是，赵尔丰遂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人头上。7日上午，他诈请那些头面人物来督署议事。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张澜先到，彭芬续至，再后来的是蒲殿俊、颜楷。这些人一入督署就被捆绑起来，刀枪环立，大有立即“正法”之势。但赵尔丰临时想到须征询成都将军玉昆意见或请其作证，分担责任。而玉昆的态度是以庆亲王奕劻为转移的。奕劻因铁路借款回扣的分配上，对盛宣怀不满，兼因与载泽的矛盾，对处置川汉路问题，阴持消极态度。因此，玉昆对处决“诸绅”表示异议。赵的僚属亦多不同意。赵不得已暂将蒲、罗等人软禁于督署中。但后来又续捕了二人，分别羁押于督练公所与警务公所。有一个高等学堂学生阎一士（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用电话告诉赵尔丰，自认是《商榷书》的作者与散发者，不久即为华阳县所捕。省谘议局副议长萧湘出京回川，9月9日也在武汉被捕。此外，赵尔丰还派出军警包围股东会会场，查封了铁路公司、铁道学堂，以及鼓吹保路的报刊。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是全城的人民由此更加激动起来。“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120]，前去请愿。于是，成千的人立即奔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蒲、罗。请愿群众把自家门口的光绪牌位揭下来捧在手

里或顶在头上，有的还手举着一炷香，表示是和平请愿。走在前面的人群像潮水的浪头一样先涌入督署的辕门，最后的人们，还停留在街心。但是赵尔丰早已准备好了。当人们在呼喊着提出质问和要求的时候，忽然枪声四起，子弹向群众扫射过来。附近街上的卫兵，也开起枪来。顿时辕门内外，秩序大乱。可怜一些手无寸铁的人民，倒在血泊中。满街都是丢下的光绪牌位，断碎的线香和挣脱的鞋子。督署的马队来回驰逐，正纷乱着的人们又被踏伤了一些。当场被打死的，经查明登记的有三十二人，伤者无法统计。但有些家属因怕连累虽死而不敢登记的还有很多人。死难者中有机匠、摊贩、裁缝、学徒、医生、店员、手工业者，等等。当屠杀进行时，赵尔丰下令关闭城门，又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锺在靠近督署的联升巷放火，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以掩盖其杀人暴行。但是赵尔丰的几阵枪声并没有吓倒成都群众，入夜各街保路协会又复鸣锣集众，更多的人群冒雨拥入督署。到9月8日凌晨，证实了被捕诸人未死，才陆续散去。

就在当日，赵尔丰又下令搜查一些被捕者家中的信件；封闭省城外各印刷处所；继续逮捕学生；拆毁街道中心的“皇位台”；强逼商家开市；四门紧闭，城内各街加兵防守。这一天，大雨如注，督署门前昨日被屠杀的群众尸首尚未收去，因此造成一片不忍目睹的惨状。据当时记载：“昨日奔赴南院求情之街正、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先皇牌位在手不放。赵帅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先皇牌位本系纸写，经雨冲坏，各尸首内犹执神牌本座，其幼尸仅十三岁云。”(121)

9月8日这天，赵尔丰还纵兵制造了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先是兵备处总办王棪为邀功造假情报，声称侦悉9月7日、8日乱民将在成都举事。赵尔丰所谓“先发制人”，逮捕蒲、罗，就是相信了这一“情报”。但王棪还把这一假情报预先在近郊民团中散播，并与团绅约定，届时城内有变，即请民团迅速入城协剿。9月7日近郊民团突闻城内枪声大作，城门关闭，以为果然发生“匪”情，于是团队数千人驰往

协剿。但苦于不得入内，便分散在附近等候确实消息。谁知天亮以后，大队巡防军突然出城迎击，对准来“援”的民团开枪，先后打散了几支民团队伍，惨杀了许多团丁，然后谎报为“匪党攻城，已被击退”。就这样，王棪的假情报得到“坐实”；蒲、罗等人的“图谋不轨”，也就可以被赵尔丰引此为“佐证”了。然而，也就在这一天，真正要找赵尔丰讨还血债的各路民军直奔成都而来，围城之战开始了。

除上述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外，还有一种记载，说明赵尔丰如何更加凶残地造成了成都城外的大血案。即：9月7日督署门前的大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问其来意，谓如罗、蒲等已死，即来吊香，未死即同来求情。赵帅又命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而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122)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一面向清廷捏报蒲、罗“逆谋”与镇压经过，要求派兵来川，一面逼令商民开市。但各街铺家坚持不屈，闭门如故。事后赵尔丰还出了一份“拿办首要”的告示，说拿办蒲、罗诸绅，不是为他们争路的事；争路是“迫于一片爱国热诚”，“是极正当的事”，连他自己也“极赞成的”。而蒲、罗等人被拿办是因为他们“借争路的名目阴图不轨”。但是，除了从所谓《商榷书》上罗织几句话外，举不出真凭实据，而《商榷书》是漏洞百出的，不易坐实他们的死罪。因此他又指使尹良、路广锺等伪造了“豫州海柳氏”寄给罗纶的一封信，内有“倡举大义，资助快炮一千支，子弹三万发，劲党二千人”等语；还捏造了“血书”、“盟单”、木质“伪印”、龙袍、玉带等物。准备以此为佐证，置蒲、罗等人于死地。

尽管赵尔丰这样的反动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要把立宪派的首领们置于死地，但立宪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却证明自己是“大清的忠臣孝子”(123)。他们“不惟无作乱之事，抑且无作乱之心”(124)。在成都被民军包围期间，他们的一些追随者，散布了一首《哭先皇歌词》，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派人物任人宰割的绵羊性格，证明他们与革命党人的思

想是有显著区别的。歌词写道：

> 如今呼天天无路，只有抱着先皇的灵位哭，哭得转就是先皇暗中保护，哭不转我们的命就该呜呼。[125]

清朝统治者对这样驯服的忠臣孝子也和对人民群众一样举刀相向，他们还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呢？立宪派在反动统治者的屠刀下那样的软弱，人民群众当然要抛弃他们而选择革命的道路。历史正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的。

第五节　轰轰烈烈的四川人民武装反清斗争

一　同盟会、哥老会的起义准备

四川人民的武装起义，是从成都围城之战开始的。

9月8日赶到成都近郊来的武装有两种，一种是为王棪所勾引而上当受骗的地主民团（如前节所讲），另一种就是称为保路同志军的人民起义武装。

保路同志军，是由同盟会和哥老会经过长期酝酿准备，而以成都血案为导火线发动起来的。

哥老会在四川是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社会力量。由日本回川的同盟会员不断地做联络哥老会的工作，也发动过一些起义，但都失败了。保路运动发生之初，四川同盟会组织涣散，处于无人主持的状态，故而运动的领导权为立宪派所控制。有些同盟会员像刘声元、程莹度、江潘等划不清和立宪派之间的界限，附和了立宪派的主张。但是也有一些同盟会员，如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井研陈孔白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立宪派分子的本质和他们争路的“必无结果”[126]，采取加入保路同志会，“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127]。

又如重庆同盟会负责人杨庶堪等也看清了立宪派搞的一套，认为："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128)。他们都在运用保路的形式，暗地积极聚集力量，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7月底重庆同盟会员朱之洪被推选为重庆股东代表去成都参加特别股东大会。重庆机关部派他借机与成都同盟会员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朱到成都后，与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方潮珍、萧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咏闯、曾昭鲁、刘永年等及凤凰山新军中党人多次开会商量办法。大家认为成都防范严密，发动较难，不如在外州县发起，较易成功。于是决定分头出发，进行活动：刘经文取道川南，东下威远、富顺；曹笃、方潮珍、龙鸣剑和王天杰分返自流井、井研、荣县；张颐到青神、井研，各自进行工作。

这时，各地哥老会首领在同盟会的策动下，也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川西著名哥老会首领、郫县张达三和灌县张捷先都是同盟会会员，借保路会的名义，筹划起兵，派灌县"舵把子"姚宝珊去汶川、理番联系藏族五屯土司。他们成立了川西五路同志军和一个学生军，等待着举义的时机。

7月上旬，川西南著名哥老会首领、新津侯宝斋以庆寿为名，邀九府哥老会代表来新津聚会。应召而来的百余人，在侯宅前的王爷庙密商起义计划。与会的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积极主张武装暴动，当即决定：各首领返回原地，做好准备，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攻下成都，就先占据川东南富庶地区，然后再谋进取。会上推举秦载赓、侯宝斋分别主持东路和南路的起义。

不久，龙鸣剑又与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文书传达各地哥老会首领，定于8月4日在资中罗泉井开"攒堂大会"。罗泉井会议是四川由保路同志会发展为同志军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是同盟会把合法的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会

议，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和各路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治国等人都参加了。会上研究了敌情和起义方略，以及枪弹、粮饷和军纪等问题。决定组织同志军，并再次明确秦载赓、侯宝斋主持东路、南路的起义；川西、川北由张达三、侯治国负责主持。

在湖北宜昌的铁路工地上，同盟会员黎怀瑾以“承揽工头事务”的公开身份组织铁路工人的斗争。黎暗地里“以兵法部署厥众”，打算“一旦有势可乘”，就夺取驻防旗军武器举行起义[129]。

地下的烈火正在运行，革命的潮流日趋高涨，成都血案成了地火的喷射口。

二　各路同志军猛扑成都

9月7日，当赵尔丰的大屠杀开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跑到成都南门外的农事试验场内，用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样；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江中。木片顺流而下，人称“水电报”。下游的人迅速知道了省城出事，纷纷揭竿而起。

秦载赓首先闻警，立率所部同志军千余人，于9月8日上午，冒雨赶到了成都东门外，与清军接仗。秦部攻城，清军闭关抵拒，相持不下。侯宝斋率所部也在当天扑向成都与清军战于红牌楼。9日再与清军搏击于南关外，连获胜利。翌日，四方同志军响应而来者万余人，在秦载赓指挥下，与清军大战于东山庙、琉璃厂一带。

张达三、张捷先等统率的西路同志军听到消息后，由郫县出发，学生军五百余人为先锋，行至犀浦附近和巡防军发生遭遇战，短兵相接，血战数小时，督队官、队长及战士八十余人战死。

龙鸣剑、王天杰所部荣县民军五千余人，也急速向成都进军，行

至仁寿附近为清军所阻，发生激战。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八天中间逼近成都附近的起义军，西面来自温江、郫县、崇庆、灌县等地，南面来自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地，共十余州县，“每县数起，每起或至万人”。约一二十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成都汇集。这些起义力量，不管是有计划的或者是自发的，当时均利用保路名义，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民军”。这些围城的起义军队，截断交通，扼守要道，不断与奉命出击的清军交锋。逼得赵尔丰防内攻外，顾此失彼，心情焦灼，通电求援。

警电传至北京，把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一帮贪狠官僚吓得六神无主，以至“主剿主抚不一其说”。罪魁祸首盛宣怀更是“忧惧万状，几废寝食”，一会儿要挂冠请辞，一会儿又要强硬对付[130]。阁议的结果是饬派湘、滇、鄂、粤、黔、陕六省援军赴川，并廷寄端方“催令迅速起程”西上[131]。另外又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四川的燎原之火，也把邻近各省的清廷大吏吓得惴惴不安。湘、黔、陕、滇等省，都调拨军警，严防川乱蔓延，禁止路事演说。

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政府为对付四川人民，电令各该国在长江上的军舰升火西上。英国还打算派印度兵经藏入川。清政府害怕外人卷入，引起更大麻烦，急忙照会各国公使，劝阻各国军舰停泊在重庆。

不管反动派采取什么措施，都阻挡不住清朝灭亡的趋势。到了保路同志军在四川全省兴起的时候，连清朝的军队也已不稳了。例如：9月8日新军统制朱庆澜召集凤凰山的新军训话，“以保路同志军为正当者，立左；否则立右。……右竟无一人焉”[132]。

三　荣县独立和东路军战况

秦载赓所部在成都东关激战数日之后，扼守东路要冲龙泉驿山顶，仍然威胁省垣。赵尔丰为了给成都打开通道，派兵乘夜猛扑上山，占领山顶。秦部苦战一昼夜后，于9月12日退至简阳休整。

龙鸣剑、王天杰领导的荣县同志军自从在仁寿附近受阻后，与清陆军六十八标苦战十五日，终于占领了仁寿县城。不久即与转到仁寿来的秦载赓部会师。为了共同对敌，决定设立东路民军总部。当时各属同志军来投者二十多万。其中包括从井研来的陈孔伯部，从威远来的胡良辅部和荣县组成的范燮、范模兄弟率领的各部。10月4日各属民军举行代表大会，公推秦载赓为东路军统领，王天杰为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东路军经过整顿后，与清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铁庄堰、煎茶溪、秦皇寺等处，为时十余日，经历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虽因装备较差，未能向成都推进，并迭有受挫之时，但士气始终旺盛，有许多首领为革命慷慨捐躯。

当初，龙鸣剑、王天杰率队离荣县往攻成都时，正好同盟会派回四川工作的吴永珊（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嘱请他留荣县筹划一切大计。吴在荣县与各方人士议定用按租捐款的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并训练各乡民团，开办军事训练班，支援前线。其后，龙鸣剑、王天杰攻成都不下，乃改道进攻嘉定，又进兵叙府。龙鸣剑因积劳成疾，离部队休养（后于11月27日在宜宾乡下病故）。王天杰经过转战之后，率部回到荣县。王与吴永珊共同策划，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推举同盟会员、广安人蒲洵主持县政。荣县的首先独立（早于武昌起义半月）是全川独立的先导，为东路民军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由于它一直保持下来，当时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东路民军从成都撤围后，决定先分兵攻打外属州县，凡所收复之地都建立革命政权，并推行了一些新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两月之间，接连攻克仁寿、资阳、简州、井研、江安、宜宾、犍为、威远、富顺、自贡十余州县。其间，虽然也旋得旋失，时有挫折，但各地起义

军风起云涌，革命风声，弥漫全川，是剿不尽、杀不绝的了。不过，也有些反动奸绅与清军勾结，从中破坏，而起义军有些领导人，对他们的面目认识不清，缺乏警惕，以致遭其毒手。11月9日秦载赓轻骑出井研遭奸绅伏兵击杀。11月11日，胡良辅在威远被奸绅郭藩、袁葆初所害。陈孔伯则因援救贡井民军，于11月14日兵败被执，落入清军与奸绅之手，被用煤油烧死。这些值得引为教训的事例，都已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四川民军对武昌发生的事，还不十分了解。

四　南路军、西路军战况

包围成都南关的侯宝斋所部民军于9月16日前后陆续撤离省垣，回师新津途中在双流与清军反正的周鸿勋部会合。周鸿勋，郫县人，同盟会员，原为邛州巡防营书记。9月初周鸿勋杀该营管带，率二百余人起义后，由邛州出动向新津方面活动，在双流县彭家场等处遭遇清军，发生激战。至是，与侯宝斋相遇，侯、周两部于9月下旬合力攻占新津县城，拘囚了县知事彭锡圭，镇压了顽抗的清吏。从此，新津成为南路的重心，各方面向新津汇集的民军号称十万以上，统称南路军，公推侯宝斋为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

赵尔丰派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和提督田振邦分率防军六营、新军一协，进攻南路军。10月1日这两支反革命军队从双流向新津进犯，次日他们在花桥场会合，发动攻势。这时周鸿勋正在邛州镇压反叛，闻讯赶回新津部署抵抗。新津是成都西南的门户，三面环水。南路民军采取了凭江扼守的防御战术，将部队分为三线防守：第一线战士持刀矛，潜伏河边草地；第二线是精锐部队，持快枪，散布于新津城外之保资山；第三线则在山顶安设土炮多座。他们还沿河筑垒，随处设伏。新津河流水势本急，这时又值涨水季节，故水势益猛。清军几次设法过河进攻，都不得逞，而民军则不时出兵袭击，使敌人颇受困扰。相持到10月11日，清军终于夺船过河，逼近新津城边，民军英勇抵抗，昼夜苦战，但城墙被敌炮轰毁，无险可守，次日侯部挟辎重出

走洪雅。接着周鸿勋也带队去邛州。18日侯宝斋在撤退途中被叛徒杨虎臣（军需长）刺杀，周鸿勋先则转战于川南一带，至11月间在贡井为滇军杀害。

10月13日新津沦陷，受到了清军的洗劫，被害群众“多至数万”(133)。

南路民军暂时失败，但他们的英勇奋斗，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清军，有助于其他各县民军斗争的开展，而且就在南路地区，反抗的火焰，也并未完全熄灭。

西路民军的学生军9月初的犀浦之战，因系初次上阵，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其后西路军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推举张达三为总指挥，统一指挥战斗。他们根据情报，得知新军一标和巡防军三营分两路来攻崇宁，张达三就将主力潜伏在崇宁北部天枢桥蒋家大林一带，并令前哨诈败以诱敌。等到巡防军进至设伏区时，引发地雷，十六门土大炮轮番猛轰，敢死队四面突击，短兵相接，取得一举毙伤巡防军二百余人的重大胜利。

西路军又联合温江民军吴庆熙部与崇庆民军孙泽沛部配合南路民军作战，砍断了官方电报线，拦缴了清军武器，破坏了桥梁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新津保卫战。他们还联合藏族人民共同进行反清斗争，一起转战于郫县、崇宁、灌县等地，屡予敌人以重创。

另一支从川南崛起的部队，是罗子舟领导的。罗子舟是同盟会员、雅安哥老会首领。当成都发生罢市时，他在雅安成立保路同志协会，集众千余人，进驻曹家坝建立民军大本营，杀了清军侦察员祭旗起义。成都围城之后，赵尔丰曾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节制统率的边防军、新军等各部一万余人来援成都。傅部集结在清溪县，准备长驱直入省城。为了阻止傅部东进，9月19日罗子舟便率民军数百人往攻荥经。群众纷纷加入，一举占领了荥经。原驻荥经之清防军全

部投降。罗子舟既得降卒，兵力加强；同时来附者日众，遂号称川南同志会水陆全军都督，并派兵扼住了通向成都的要道大相岭上的大关。9月20日起，傅华封出动部队数千，企图夺取大关。屡次仰攻冲锋，均不得逞。自是民军凭高抵御，与清军相持四十日，使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

在大关相持的同时，罗子舟又会合各县民军于10月6日围攻雅安城。清军闭城困守，不敢出战。有新降民军的哨官私率所部前往大关，扬言协防，实则叛变。到达大关后，纵火焚关，攻杀民军，10月29日大关陷落。

围攻雅安的各部民军，闻大关失守，于10月30日解围，分路撤退。罗子舟率军一部转到洪雅，后经嘉定、叙府进至马边一带与犍为胡潭等部会合，仍然牵制着应援成都的部分边防军。

胡潭（原名胡重义）是犍为一带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在成都惨案发生后，他拉起了一支民军，在犍为嘉定地区进行斗争。进入10月以后，川南一带成了民军与清军战斗的主要战场。东路民军王天杰、龙鸣剑、范燮，南路民军周鸿勋，从雅安南下的罗子舟各部都曾先后转战到了川南地区。这是7月上旬新津会议上“进攻川东南，占领富庶地区”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行。端方对各路民军这一行动，是有些认识的。他认为“匪徒若以少数牵制城内官军，而以多数沿江下窜，则全川将为震动”[134]。因此，急速调集叙府巡防营朱登五部、江安巡防营徐甫陈部以及援川黔军新军一营、巡防两营来加强嘉定、眉州、青神等地区的反革命军事力量。

10月2日，朱登五部刚到犍为就受到一支四千余人的民军部队的打击。朱部惊魂未定，第二天嘉定就被胡潭的民军五千人攻占了。胡部武器装备很差，大多数战士用的还是土抬炮、鸟枪、刀矛之类，很少后膛枪。但他们勇敢善战，采用了“军多即避，军过则起，军弱则接仗”[135]的比较灵活的战术，因此屡获胜利。胡潭占领嘉定后，积

极配合兄弟部队进攻在犍为待援之官军，并号召铜（梁）、雅（州）三边民军牵制朱军。这时端方采用“力争上游，即以固下游门户”的办法，命令“朱军由犍（为）规嘉（定），黔军由叙（府）规犍（为），徐军复由泸（州）顾叙（府）”[136]，但到了10月22日，朱登五部反被围困在犍为，叙府也被民军占领。

除上述东、南、西各路的情况外，北路也不平静，那里的革命人民也沸腾起来了。如：共进会员吴从周、张雅南等于10月27日率领起义军数百人攻下垫江县城，至11月21日占领广安县城。

总之，四川各地民军的武装起义，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和摧毁着清政权的腐朽统治。无论是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以及成都平原，各路著名的民军不下于三四十路。“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137]。无论是奉命“查办”的端方也好，还是坐镇省垣的赵尔丰也好，都陷入了四川人民的包围之中。到后来，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地方官吏俯首投降；25日，端方在资州被杀；次日，吴永珊又策动了内江起义。这时，赵尔丰在革命势力打击下，不得不收拾残兵败将，龟缩在成都一处，坐困愁城，苟延残喘了。

四川人民从保路斗争发展起来的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点燃了导火线，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

(1)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2) 《外务部具奏议复四川总督锡奏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3)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4)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5) 《四川总督锡奏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折》，《四川官报》1904年第三册。

(6) 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

(7) 《奏设川汉铁路集股章程》，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8)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5—47页。

(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096页。

(10) 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之碑》，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

(11) 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之碑》，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

(12)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

(13) 《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5页。

(14)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

(15) 《都察院代奏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川汉铁路呈折》，见《川汉铁路改进会第六期报告》。

(16) 《都察院代奏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川汉铁路呈折》，见《川汉铁路改进会第六期报告》。

(17)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9—52页。

(18) 《建设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劝告书》，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4—56页。

(19) 《川汉铁路公司续订草章驳议》，《川汉铁路改进会第五、六期报告》。

(20) 《整理川汉铁路公司》，见《四川谘议局第一次议事录》。

(21) 《留学东京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上川督锡制军书》，《新民丛报》第3年第9号。

(22) 《外务部致康格复照》（1903年8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55—156页。

(23) 《英署使汤雷致外务部函》（1903年8月14日），《清外务部档案》。

(2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072页。

(25) 《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致外务部照会》（1909年6月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55页。

(26) 《宣统元年五月张之洞致外务部电》，《张文襄公全集》卷221，第8—10页。

(27) 《美国总统塔虎脱致摄政醇亲王载沣电》（1909年7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78页。

(28) 《美国国务卿致费莱齐电》（1909年7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79页。

(29) 《载沣致塔虎脱电》（1909年7月18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80页。

(30) 《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的铁路协定》，马慕瑞：《中外条约汇编》卷1，第886—887页。

(31) 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第47页。

(32) 《四川川汉铁路驻宜公司总理李稷勋致〈字林西报〉，论川路各事辨（三）书》，《四川商办铁路驻宜公司第二期报告册》上编。

(33) 《外部咨邮部四国公使照催湖广铁路借款事请速核复文》，《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0。

(34) 见盛宣怀：《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愚斋存稿》卷17。

(35) 见盛宣怀：《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愚斋存稿》卷17。

(36) 《宣统政纪》卷52。

(37)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

(38) 《寄武昌瑞莘儒制军澂、广州张坚伯制军鸣岐、成都王采臣护督人文、长沙杨俊卿抚军文鼎》，《愚斋存稿》卷77。

(39) 《宣统政纪》卷53。

(40) 《宣统政纪》卷53。

(41) 这个《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展时继续贷款修筑的优先权。

(42) 《湘路近事片片》，《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

(43) 邓孝可：《川路今后处分议》，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44)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45)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46) 见《国风报》第2年第9号，第94—95页。

(4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1页。

(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3页。

(49)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50) 宣统三年四月十九日瑞澂致盛宣怀电，《愚斋存稿》卷77，第11页。

(51) 《湘省争路再志》，《国风报》第2年，第12号。

(52)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8、19页。

(53)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8、19页。

(54) 《老四仓皇酒一杯——端方哀求鄂京官》，《民立报》，1911年6月6日。

(55) 《武汉通信·鄂路争路烂污史》，《民立报》，1911年6月9日。

(56) 《武汉通信·呜呼民心鄂路亡矣！》，《民立报》，1911年6月7日。

(57) 《武汉通信·鄂路争路烂污史》，《民立报》，1911年6月9日。

(58) 《四面楚歌之老盛·粤人与盛宣怀》，《民立报》，1911年5月22日。

(59) 《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记》，《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3页。

(60) 《粤路股东大会记》，《民立报》，1911年6月12日。

(61) 《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致外务大臣小村报告》（1911年6月10日），《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

(62) 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张鸣岐折，《交通史路政编》第14册，第129—130页。

(63) 宣统三年八月张鸣岐详陈广东息借洋款情形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65页。

(64) 《宣统政纪》卷54，第23—24页。

(65)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3—14页。

(66) 《海防华商会馆致粤路公司函》（宣统三年五月），《满清野史·铁路国有集》，第3页。

(67) 《粤人争路之暗潮》，《民立报》，1911年9月5日。

(68) 《甘大璋等奏折及清帝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页。

(69) 《来日大难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95页。

(70) 《反正前后》，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71)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72) 《上海分局来电》，《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第5页。

(73) 按：由张之洞议订之草合同，经盛宣怀正式签押，其条款中是以两湖财政收入之款作保证，而无以路权作抵押之明文；邓孝可草此文时，合同尚未公布，只是悬揣，后合同公布，经罗纶等细绎其内容，实质是以铁路作抵押的。

(74)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75) 《川路公司准备会会议速记》，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52—153页。

(76) 《宣统政纪》，卷54。

(77) 《川路公司准备会议速记》，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54页。

(78) 《成都王护院来电》，《愚斋存稿》，卷77。

(79) 《王人文呈内阁并致度支部报清查川汉路帐款困难情形电》，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1页。

(80) 《川汉铁路公司呈川督转电邮传部暂缓查帐并准收发路政电报文》，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6—177页。

(81) 特别股东大会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临时股东会。

(8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02页。

(83) 《护督王奏铁路借款合同丧失国权请治签字大臣误国之罪并提出修改折》，《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

(84) 郭沫若：《少年时代》，第224—226页。

(85) 按：当天开会做主席的是颜楷，一位年轻翰林；公司总理是曾培。

(86) 郭沫若：《反正前后》，《少年时代》，第228页。

(87) 《四川保路同志会招集全体大会广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88) 《致各府厅州县有司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89) 《保路同志会白话告白》，《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90) 《讲演要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

(91) 《演讲及组织同志协会办法》，《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6号。

(92)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93) 《一妍一丑之流血记》，《官民两面之风云》，《民立报》，1911年7月25日、30日。

(94) 《成都特别通信·蜀政界之五光十色》，《民立报》，1911年9月8日。

(95) 宣统三年闰六月六日上谕，《宣统政纪》卷57。

(96) 《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八日），《愚斋存稿》卷79。

(97) 《股东大会志略》（一），《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98) 《成都特别通信·蜀政界之五光十色》。

(99) 《端盛之两大政策》，《武汉通信·端方心中人物表》，《民立报》，1911年5月29、31日。

(100) 《北京来电》，《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第18页。

(101) 《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一日），《愚斋存稿》，卷78。

(102) 《川汉铁路总公司董事局致宜昌董事局请促李稷勋自电否认部派总理电》，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四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25页。

(103) 《股东会呈请赵署督电奏分别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5—257页。

(104) 《电宜昌李总理》（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九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9页。

(105) 《武昌端大臣、瑞制军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79。

(106) 《川人哭路大风潮》，《民立报》，1911年8月29日。盛宣怀《寄瑞制军》（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愚斋存稿》，卷79。

(107) 《成都特别通信二》，《民立报》，1911年9月15日。

(108) 《成都特别通信二》。

(109) 《四川总督赵尔丰陈川人主张路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交资政院决议电》，《文献丛编》第23辑。

(110) 《成都特别通信二》。

(111) 《川路风潮片片》，《民立报》，1911年9月11日。

(112) 《民立报》，1911年9月17日。

(113) 《盛宣怀致赵尔丰电》，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30、131页。

(114) 赵尔丰：《致内阁》（宣统三年七月五日），《赵公季和电稿》卷4。

(115) 《成都特别通信十一》，《民立报》，1911年9月20日。

(116) 《宣统政纪》卷58。

(117) 赵尔丰等：《致内阁》（宣统三年七月九日），《赵公季和电稿》，卷4。

(118) 《宣统政纪》卷58。

(119) 《川路特别股东总会代表张知竟上查办大臣冤状》。

(120)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39页。

(121)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40-141页。

(122)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41页。

(123) 《川人争路大冤狱》（十五），《民立报》，1911年11月3日。

(124) 《静观斋日记》，第27号。

(125) 《成都特别通讯十七》，《民立报》，1911年9月24日。

(126) 吴玉章：《论辛亥革命》，《玉章在六十庆祝大会上之自述》。

(127) 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43页。

(128) 向楚：《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76页。

(129) 邹绍阳：《黎怀瑾事略》，《蜀中先烈备征录》卷2。

(130) 《蜀鹃啼血中之北京》，《民立报》，1911年9月24日、25日。

(131) 《端午桥入蜀记》，《民立报》，1911年9月11日。

(132)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9页。

(133)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故宫档案馆《四川铁路案档案》。

(134) 《夔州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九日），《愚斋存稿》卷

85。

(135) 《万县端大臣寄内阁电》（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86。

(136) 《重庆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87。

(137) 赵尔丰9月19日请内阁代奏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8页。

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第一节　起义的筹备与发动

一　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日益成为迫切的需要。

文学社一直以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共进会初期发展重点在会党，后来也转向新军。初时，两个团体分头进行，各无妨碍，但在发展成员过程中，终于发生摩擦。双方都逐渐感到，这种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5月3日，共进会干部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集会，决定派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和文学社联络[(1)]。随后，双方在武昌孙武宅集会。文学社出席者为蒋翊武、刘复基；共进会出席者为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等。初次的谈判并不融洽，蒋翊武认为应以文学社为主体；孙武则主张共进会应居于领导地位；会谈无结果而罢[(2)]。在小生产占优势的社会里，小团体主义常常是一种顽症，不是轻易可以克服的。对于合作问题，学历不高的蒋翊武心存疑虑，认为“穿长褂的文人难以共事”，“出了洋的人不好惹”[(3)]。刘复基则持积极态度。5月10日，文学社开代表大会，刘复基提出，应与共进会联合，得到会议赞同。次日，双方代表再次集会于武昌长湖西街龚霞初宅。文学社出席者为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共进会出席者为邓玉麟、

杨时杰、杨玉如、李春萱。会上基本达成协议，决定通知两团体在各标、营的代表，不要互争社员。共进会方面表示："我们两团体向系殊途同归，现在正是同归不必殊途的时候了。"文学社方面也表示："两团体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4)] 共同的斗争目标使双方吐出了一致的语言，小团体的畛域开始消除了。

共进会、文学社达成合作协议之后不久，保路风潮掀起，武汉地区人情沸腾。7月17日，《大江报》发表时评——《亡中国者和平》。26日，又发表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该文末节声称："和平已无可望，国危如此，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二文实际上是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的公开号召。清政府为此封闭《大江报》，逮捕了该报主笔詹大悲、何海鸣。清政府的这一措施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

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清政府于9月初命端方率兵前往"查办"。端方指调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营。随后，端方又下令将四十一标调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12日，文学社在小朝街机关开会，决定如武昌起事，调防各处同志应即时响应。

新军的陆续外调加强了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紧迫感。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代表第三次集会于雄楚楼十号刘公宅。首由孙武发言，认为已经到了时候，要向敌人进攻了，希望切实讨论，计策万全。刘复基接着建议：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拚个死活。刘公、蒋翊武、王宪章纷纷表示，愿意取消原来的湖北大都督、文学社社长、副社长等名义。这样，两个团体的合作又进了一步。在推举起义领导人时，出现了互相谦让的现象。于是，居正建议，派人赴上海邀黄兴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宋教仁、谭人凤到汉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了孙武、刘公等人的赞同，当即推居正、杨玉如为代表[(5)]。同月16日，二人乘舟东下。

武汉革命党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当居、杨二人东下之际，囚禁狱中的胡瑛也托人带信给宋教仁，力言湖北准备还不完善，不能冒昧从事。因此，宋教仁、谭人凤等对居、杨二人的陈述疑信参半，犹豫不决。但是，孙武、刘复基等却已经等不及了。

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在胭脂巷十一号机关部召开联合大会，商量首义计划。到会六十余人。因蒋翊武随四十一标调岳州未返，以孙武为临时主席。会议确定10月6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军政府组成人员为：

总理：刘公

军务部：孙武，（副）蒋翊武

参议部：蔡济民，（副）高尚志、徐达明

内务部：杨时杰，（副）杨玉如

外交部：宋教仁，（副）居正

理财部：李作栋，（副）张振武

调查部：邓玉麟，（副）彭楚藩、刘复基

交通部：丁立中，（副）王炳楚 (6)

此外，会议确定刘公、孙武、李作栋、潘善伯等二十人为政治筹备员；刘复基、邓玉麟、蔡济民等二十九人为军事筹备员；总指挥部设于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机关部。其他如秘书、军械、司刑、司勋、司令、司书、会计、庶务各职，也都一一任定。

这次会议的最大事项是确定了总动员计划：

1．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驻扎在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由

总代表李鹏升放火为号，同营炮队总代表余鹏来率队响应，占领凤凰山炮台及青山。

2．临近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由代表熊秉坤负责，届时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中和门，接应城外的炮队、马队和三十二标步队。

3．南湖八镇炮队第八标徐万年、蔡汉卿率领炮队由中和门进城，攻击总督署。

4．南湖八镇马队第八标及混成协第十一营留守部队，由祁国钧等以一部警戒于城外，以一部进城担任传骑队。

5．八镇步队第三十一标及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一标留守部队，由赵士龙、阙龙等率领，进占蛇山，掩护炮队。

6．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之一部，由代表赵承武等率队响应，进占武胜关。

7．汉阳兵工厂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之一部，由代表胡玉珍等率队响应，占领龟山炮台。

8．宪兵队彭楚藩担任侦察官方及各军队情况，邓玉麟、杨宏胜担任各部队联络[(7)]。

会后，武昌、汉口各机关加紧工作，每日赶办布告、符号、致各国领事照会及十八星旗、炸弹等物。革命党人都在紧张而兴奋地准备着，期待着。

地火在运行、奔突，它就要喷薄而出了！

二　起义秘密的暴露

就在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的当天午后，南湖炮队发生了

自发的暴动。八标三营的士兵梅青福、汪锡九请长假离营。同营士兵设宴饯别，席上行令劝酒，慷慨悲歌。排长忽然跑来干涉，怒气冲冲地要打人，激动公愤，当即引起冲突。霍殿臣、孟华臣等率众夺炮。但因大炮既无撞针，又无炮弹，只好弃炮而走。有人建议当晚立即起义，被刘复基制止。这件事在各方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社会上纷纷传说“八月十五杀鞑子”。一时满城风雨，清方非常恐慌。瑞澂召开了有首县、管带等文武官吏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调右路巡防营三营来省助防，派李襄麟为防卫督署指挥官，令楚豫、楚谦、楚材、楚有等兵舰夜间升火待命。同时又下令把各营士兵的子弹全部收缴，各标营提前一日过中秋节，八月十五宣布戒严，不准士兵外出。根据这些情况，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改期于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起事。同时催促蒋翊武、杨玉如、居正等返鄂。9月27日，杨玉如启程，居正因购买枪械，并等待宋教仁决定，暂留上海。

到10月9日，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天正午，孙武在新设的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装配炸弹，在旁边观看的人不小心把纸烟火屑飘入炸药中。霎时爆炸，浓烟弥漫，声震四邻。孙武的手和脸部都被烧伤，被人急忙用被子盖住头部，送走治疗。刘公出门时正好碰上闻声赶来的俄国巡捕，谎称是煤油爆燃，旋即避匿。俄国巡捕进门后，发现是革命机关，就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和印制的钞票等物全部抄走，又把住在附近的共进会总理刘公的妻子和弟弟刘同等也一起抓走了。驻汉俄国领事敖康夫立即把他们引渡给清方。审讯时有人畏刑吐实，于是起义秘密暴露。瑞澂下令紧闭四城，飞调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布街巷。武汉三镇，侦骑四出，大事搜捕。

这天早晨，蒋翊武刚从岳州赶回，正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总指挥部研究杨玉如从上海带回的消息，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十月底，与十一省同时发难。忽然邓玉麟等奔至，报告宝善里机关失事，指挥部立即研究。蒋翊武犹豫不决，刘

复基主张应当机立断，他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失败利钝，非常计也。"[8] 他取出了事先已绘制好的地图和行动计划。蒋翊武就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在当天下午五点发布了起义命令，规定在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一齐动作。所有起义部队一律左臂系白布为记。

命令写好后，就派人分送到各标营。由邓玉麟负责通知南湖炮队，杨宏胜分送子弹、炸弹。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在总指挥部等候发动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刘复基还从外面叫了一个出租留声机的人进来，高声地放着唱片。快到十二点时，他们正装备出发，军警突然破门进来搜捕。刘复基挺身而出，向楼梯下甩去一个炸弹。不幸，刘复基被反射回来的弹片击伤，当场被缚。蒋翊武、彭楚藩等从屋顶逃走。但跳墙下来时，也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牟鸿勋、龚霞初和张廷辅的妻子。由于蒋翊武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像个乡村学究，军警对他不大注意，他就乘间逃逸。

在这以前，杨宏胜在运送炸弹的时候，被军警察觉，也遭逮捕。瑞澂委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等一并会审。

当天晚上，各标营的同志正急切地等待着南湖的炮声，但是却一直沉寂无闻。原来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城内戒备森严，没有及时把命令送到南湖。南湖的炮声没有响，十月九日的起义计划也就没有实现。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党人，却在十月十日黎明之前慷慨就义了。

彭楚藩，原名潭藩，湖北鄂城人。1877年生，1904年投营当兵，师事刘静庵。日知会成立，任评议。日知会失败，改名楚藩，入宪兵学堂。毕业后充当宪兵，利用这一特殊职业掩护革命党人活动。后来加入文学社，为了促进联合，又加入共进会。受审时，主审官铁忠看到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怕牵连自己当宪兵管带的妹婿，故意对彭说："你是宪兵，是捉革命党的，怎么也被错捉来了？"彭正气凛然

地回答："我就是革命党！"铁忠还想开脱他，又说："你不是奉命去抓匪徒的吗？"彭楚藩愤怒地答道："我是黄帝子孙，怎么会接受满虏的命令！"他要来纸笔，振笔疾书，痛斥清朝权贵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等种种罪行。并谓："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9)] 临刑不屈，年仅二十五岁。

刘复基是武汉地区卓越的革命党人。他体质文弱，为了运动新军，以坚毅顽强的精神忍受着军营的繁剧训练，自誓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且不惧，遑恤苦为！"[(10)] 在担任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职务过程中，他有胆有识，顾大局，识大体，对促进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制定起义大计，起了重要的作用，被同志赞为"小诸葛"。危急时刻，他挺身掩护同志；被审时，他痛斥清政府和官僚，骂不绝口；就义时，他连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他的牺牲是革命力量的一个重大损失，受到湖北革命党人最沉痛的悼念。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杨宏胜，湖北容城人，农民出身，1886年生。1903年投营当兵。当革命需要专人负责交通联络时，杨就在兵营附近开设一个小杂货店，专任联络，任劳任怨，生活十分清苦。1911年加入文学社。在受审时，杨不等清吏审问，就昂然地说："老子革命党，杀便杀，胡问为？党羽除汝满奴外悉是。"铁忠大怒，命人狠劲鞭打，杨挺身直受。推出施刑时厉声骂道："贼虏！杀！快杀！恐奴才不久亦随老子来也。"[(11)] 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三位烈士在革命胜利的前夕牺牲了。后来革命党人、文学家胡石庵在《三烈士赞》中写道："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诗词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烈士的沉痛悼念。

同日晨，张廷辅被捕，刘公寓、同兴学社等革命机关相继被抄，被捕总人数达到三十二人。

瑞澂杀害了三位烈士，又陆续抓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破坏了革命机关，以为革命烈火被他扑灭了，立即通告全城说："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12] 又在向清廷邀功的电报中夸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13] 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起义爆发了。

三　十月十日之夜

三烈士的被害，使革命同志悲愤到了极点。就在清吏还在继续按名册大事逮捕，革命力量已失去指挥的万分危急之际，各标营代表自动三两集议，决定按前令的布置，于当晚动手。由于三位烈士在受审时都坚拒吐露实情，起义的行动计划始终没有暴露。

当晚七时左右，在城外西北的塘角，李鹏升、李树芬等到马房纵火，顿时，熊熊烈焰腾起。混成协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随即起义，向城内进发。隆隆的炮车声惊动了乡民，起义士兵安慰说："这是我们的事，驱满兴汉，老百姓不要惊慌！"

在城内，工程第八营响起了第一枪。当时排长陶启胜查棚，发现士兵正目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就吼叫起来："你要造反！"金兆龙回答："老子就造反，你将怎么样！"陶扑上去把金扭住。金大喊："同志们快动手，还等什么？"士兵程定国在旁，用枪托猛击陶的头部。陶负伤外逃，程就举枪射击，击中陶的腰部。适值共进会工程营总代表熊秉坤赶到，见陶对面跑来，也打了一枪。这时全营轰动。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赶来弹压，堵住楼梯门，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觉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闹！"士兵吕中秋向阮发一枪，阮带伤还手，被徐少斌击毙。士兵一拥下楼，程定国又发一枪，把黄、张同时击毙[14]。熊秉坤立即鸣笛，首先集合了四十多人，扑向楚望台军械库。

楚望台是一块高地，逼近中和门，军械库藏有大量枪支弹药，由工程营士兵负责守卫。自从传说革命党人在中秋节起事后，瑞澂即派军官李克果、成炳荣等监守。党人罗炳顺、马荣听到枪声和人声，知道本营已经发难，正准备响应，监守官李克果过来对士兵们说："非抵抗不可！"罗炳顺等说："我们连子弹都未见一粒，怎么能抵抗？"李克果就命令军械所主任叫人把库门打开，搬出两箱子弹，分发给各士兵。士兵们得到子弹后，立即向空中鸣枪响应。李克果见势不妙，同其他官佐一起越墙逃走。军械库就顺利地被革命士兵占领。工程营士兵约四百人，都纷纷到楚望台集合。熊秉坤以总代表名义进行指挥。宣布起义部队为湖北革命军，布置守卫楚望台和进攻总督署的战斗任务。来自各队、各棚的士兵初次集合到一起，秩序显得凌乱，熊秉坤感到指挥有点困难。汪长林等巡哨，发现了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吴原来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镇压后，一度表现消沉。但是他军事知识丰富，在士兵中很有威信。当晚他也负责守卫楚望台，士兵起义时避匿库房附近。这时许多士兵就想推吴兆麟担任指挥。熊秉坤同各队代表商量，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则处于参赞和监督地位。

各标营焦急地等待信号的革命士兵，看到城外的火光，听到城内的枪声，都纷纷起来响应。跟工程八营靠得最近的是二十九标和三十标。二十九标的代表蔡济民是排长，他以出巡为名，率领本排士兵首先冲出营门。他边冲边喊："打旗人！"营内同志于是一齐呐喊："打旗人！"杜武库、高尚志、杨选青、姚金镛等相继冲出。此时，三十标代表彭纪麟也已集合起队伍。第一营管带旗人郜翔宸率旗兵百余人逃走。两标士兵纷纷奔向楚望台。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和三十标统带杨开甲都躲避了。

测绘学堂离楚望台很近，有学生八十名，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听到枪声很紧张。李翊东挺身高呼："同学们，不要怕，今晚是革命党举事，我就是革命党。愿意革命的跟我到楚望台去领取枪

弹。”[15] 测绘学堂学生平时都同情革命，这时就全体集合，向楚望台进发。

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左旗营房，黎元洪的协司令部也设在那里。两标的部队大部分已外调，留守的总共三百多人。黎元洪看得很紧，他命令各营管带严防本营士兵行动。这时正好有一个外营的革命士兵前来送信，黎元洪立即把他杀了。士兵邹玉溪听到枪声，夺门而出，也被黎元洪手刃。这时蛇山响起了炮声，黎元洪沉不住气了，急忙潜逃。三营代表阙龙等齐集操场，大呼站队。四十一标右队队官胡廷佐同情革命，也鸣笛集合士兵，参加起义。

塘角混成协辎重、工程和炮兵三队的起义士兵，一部分由李鹏升率领先行。到武胜门，见城门紧闭，就急行绕了半个城，从中和门到了楚望台。总代表余凤斋率领大部分部队，由辎重队和工程队的革命士兵掩护着炮队，破城进占了高地凤凰山。

南湖炮队八标的发动，是夺取胜利的一个关键。当时有一种说法，炮队是军中之胆。革命党人对炮队下了很大工夫，在炮队八标建立了很好的基础。炮队士兵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半个月前就在这里发生过自发的暴动。头一天（十月九日）深夜，邓玉麟、李作栋赶到炮队来传达命令，因到达时时间已晚，没有来得及发动。他们就留在营里筹划十月十日晚起事。十日上午，孙武又派汪性唐跟炮队二营队官孙文鼎联系，要求当晚发动。炮队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把山炮撞针都换上了正规簧。听到城内枪声，蔡汉卿就赤膊奋起，奔呼集合。队官出面阻拦，蔡飞起一脚，队官被踢得倒退数步。各队士兵一面集合，拖炮实弹，一面派人通知附近的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要求他们响应，掩护炮队进城。

这时工程八营也派金兆龙、马荣等率领一部分队伍出城来迎接炮队。不料到了中和门，发现城门关着，守门人带着钥匙逃跑了。金兆龙心急如火，双手扣住锁的两端，用力向怀中一拨，一把一尺长、两

三斤重的铁锁竟被碎为数段。出城后，遇到三十二标旗人楚英带领的巡查队，双方交了火，楚英不敢恋战，带队逃跑。金兆龙等同炮队会合。炮队的二营管带姜明经同情革命，队官孙文鼎、尚安邦、蔡德懋都参加了起义。因此炮队维持了原来的建制，并拖出了十三门炮，是起义部队中人数最多的，达八百余人。这时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的留守部队，也都响应起义。

革命军的各路人马纷纷汇集，分别在蛇山、凤凰山和中和门城楼等地布置了炮兵阵地。大约在当晚十点半后，一场围攻当地反动统治势力大本营——湖广总督署的激烈战斗就开始了。

武昌城东西五里，南北六里，蛇山横亘其中，北边是山后，南边是山前，山前比山后较广。山前的东南是城内务标营的驻地，西南就是督署和张彪第八镇司令部所在地，督署在前，司令部在后。当时驻武昌城内外的兵力约二十个营，共九千多人。当晚陆续参加起义的达三、四千人。守卫督署的清方兵力有教练队一营，机关枪一队，武装消防队一队，新调来的巡防队一营，督署卫队和部分马队。张彪接到城内外同时举义的报告，又急忙调驻在平湖门外的辎重八营进城防守。辎重八营没有革命党人的力量，结果在起义中完全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再加上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清方的兵力超过五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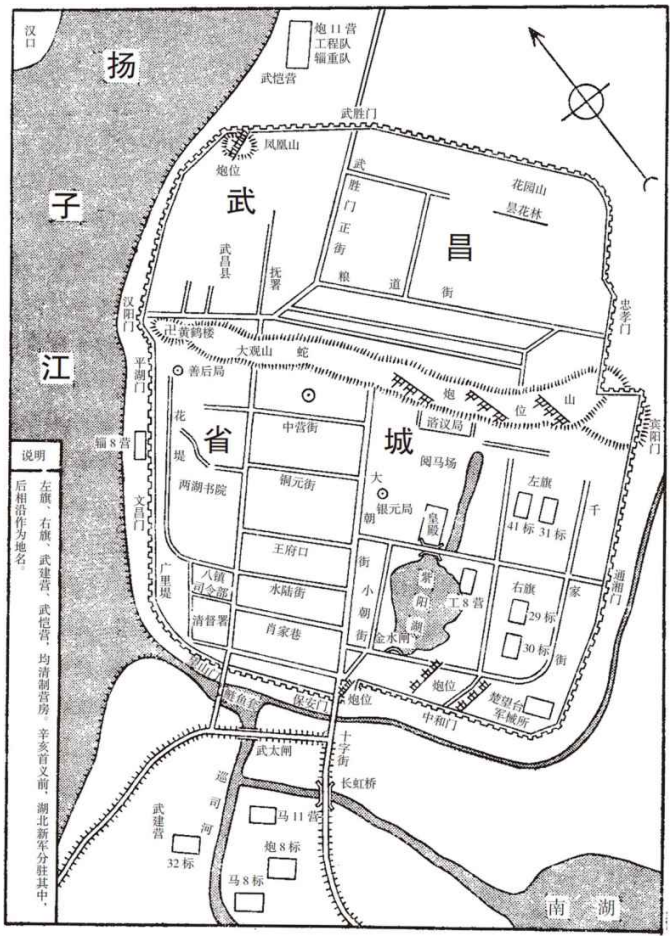
革命军前后向督署发起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进攻在十一时左右，以工程营为主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邝杰率领，经过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参加这一路进攻的，还有蔡济民率领的一排和一些零星队伍。第二路由马荣率领，向水陆街搜索前进，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和督署的背后。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经过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进攻督署的大门。那时各标营的起义部队还没有全部出动，进攻的兵力比较薄弱，对敌人的布防情况也没有探明，因此前进不久就被敌人的火力所阻。其中第一路邝杰的

队伍发生伤亡后一直退回楚望台，受到谴责。蔡济民则率领他的排到达王府口，直逼督署的背后。

到晚十二点时，各标营人马已全部出动，炮兵也在蛇山上稳固了阵地，革命军声势大振，就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第一路蔡济民部得到了三十一标和四十一标的阙龙、王世龙等部支援。第二路马荣得到了三十标吴醒汉部和二十九标高尚志部的支援。第三路熊秉坤得到了二十九标胡效骞、杜武库等部和三十标马明熙、徐达明部的支援。炮队进行轰击，各路部队奋勇进攻，都有进展。但因为当晚阴雨，炮队很难辨认目标，没有发挥威力，敌人还在顽抗。第三路是主攻方向，敌人的抵抗也最为激烈。张彪在白布上大书招降告示，要士兵们“速即归诚”。他亲自指挥，向革命军发动了两次反扑。马荣、熊秉坤等商量，决定组织敢死队，马明熙、彭纪麟、胡效骞、徐少斌、纪鸿钧等二十余人奋勇冲击，才把敌人打退。

接着，第三次进攻开始。革命军为了给炮兵照明轰击目标，决定在靠近督署后面的地方放火烧房。居民知道是为了打清兵，不顾损失，自动找来了引火物。一时火光烛天，炮兵看清了目标，命中率逐渐提高，打得躲在督署里的瑞澂似热锅上的蚂蚁。这时第一路和第二路进攻的部队已经会合，首先向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发起猛攻。镇司令部的守卫部队在巷口用机枪猛烈扫射，挡住了去路。工程营队伍中冲出两名壮士，伏地蛇形前进，猛然跃起大呼，扑向机枪阵地。先立起的为敌人发觉，被刀砍倒；继起的趁敌人举刀之际，迅猛地抢过机枪，倒转枪把，猛射敌人。敌人像墙坍似地倒了下去，革命军在呼喊声中占领了八镇司令部。瑞澂发现督署背后已被包围，文昌门的通路也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就责成张彪固守，同时慌忙命人把靠城墙那边的围墙打开了一个洞，钻出督署，直奔江边楚豫兵舰逃命。



武昌起义形势图

张彪看到瑞澂已经逃跑，自己的司令部也已被攻破，就命令教练队留下死守督署，自己带着辎重营逃往汉口刘家庙。教练队凭着督署墙垣，向外密射。熊秉坤率领敢死队冲到东辕门，与敌人对射。四十一标士兵王世龙冒着密集弹雨，抱着一罐煤油，跃进到门前钟鼓楼纵火。钟鼓楼火起而王世龙却中弹牺牲。火光照亮了署前的旗杆顶，蛇山和凤凰山的炮兵看清了目标，连连发炮。敌兵退守辕内，从大堂用机枪向外扫射，马明熙、彭纪麟、徐少斌等十余人冲进督署，却被敌兵包围。在这危急时刻，工程营士兵纪鸿钧再次抱起煤油箱冲入门房

纵火，不一会延烧到大堂，敌兵慌忙逃散，纪鸿钧也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到东方黎明的时候，革命军占领了督署。经过一夜血战，武昌全城克复。居民推门出来，只见满城都是臂缠白巾的革命军，一面醒目的十八星大旗，在黄鹤楼头迎风招展。

武昌革命志士们用鲜血换来了东方的黎明。为了夺取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许许多多革命士兵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据卫生队长陈雨苍说，他派担架收检各街道遗尸，“紫阳桥一处，即有尸身数百具”[(16)]。他们的姓名留下来的很少，但是他们的功勋是永垂不朽的。

四　汉阳、汉口的克复

汉阳和武昌虽仅一江之隔，却没有及时得到有关的消息。10日晨，文学社四十二标标代表胡玉珍感到情况异常，便乘去汉口采办之机，注意探访。正好遇上逃亡过江的副社长王宪章，才得知小朝街机关被破坏，刘复基等就义等情。当晚胡玉珍回营，将情况通知了书记王缵承。11日午后，第八辎重队管带萧安国率兵三百多人来到汉阳，只见他们形态狼狈，武装凌乱，却不知道原因。萧部声称奉命前来保卫兵工厂，被守厂士兵力拒，便改驻龟山下水师营教场。不久，王缵承派出打听消息的士兵渡江归来，得知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便决定当晚发动。胡玉珍亲自到汉口向二营代表赵承武布置，同时派人赶赴信阳，通知三营代表刘化欧。

晚上八点多钟，胡玉珍自外布置归来，见准备就绪，便取出密藏的三粒子弹，鸣枪为号。士兵们立即集合，胡玉珍宣布说：“武昌已为我革命军占领，我们今天光复阳夏，为祖宗报仇，为民族争光！”随即派人打开子弹库，分发子弹。管带汪炳山见状逃亡。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宋锡全想阻止，士兵用白巾缠在他的臂上，说：“你

不要糊涂！”推他当指挥。士兵们迅速地占领了钢药、兵工两厂，并把三门大炮拖上龟山，辎重八营的清兵不敢抵抗就上了楚材舰。

12日拂晓，起义军在龟山设立指挥部，将山头庙内神帐撕下来作为旗帜，高高地悬挂在山顶上。当时，楚材舰正向龟山方向行驶，邱文彬指挥士兵发炮轰击，双方发生炮战。不久，楚材舰连中数炮，仓皇逃走。汉阳宣告克复。

汉口革命党人的行动大体与汉阳同时。11日上午，二营士兵代表赵承武等得悉武昌党人已经起义，便于下午一时会议，决定当晚与汉阳同时发动，公推排长林翼支及胡光瑞等为特别干事[17]。六时，二营管带陈钟麟传令各队加强警戒，并称，瑞澂电调的河南军即将到汉。这一新的消息在革命士兵中引起不安。赵承武感到不能犹豫，便持枪向天连击数响，大喊：“敌人到了！敌人到了！”于是左队、后队相继出动。标统张永汉及陈钟麟慌忙出逃。赵承武宣布约法三章：挟私报仇者斩，争权夺利者斩，扰害商民者斩。革命军一直追到刘家庙附近。因听说河南军确已到达车站，便退至大智门。

同日，因发生放火抢掠现象，汉口商防保安会等二十二个团体、会员千余人集会，议决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为要义。12日，各团体联合会正干事马中骥同商会协理孙铭新等人到汉阳，要求革命军过江镇抚[18]。宋锡全接受要求，派出了部队，汉口局势得到稳定。至此，汉口全市除刘家庙地区外，均已为革命军占领。

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一　黎元洪被逼任都督

为了夺取起义的胜利，湖北革命党人以长期的努力，作了出色的准备。但是起义胜利后怎么办，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巩固和发展胜利，却准备得很不充分。当胜利来到的时候，这些在武装的

敌人面前猛打猛冲的英雄们，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了。

11日上午，枪声停息之后，革命党人就聚集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机构。参加者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诰、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会上，在讨论都督人选的时候，“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19]。有人提议推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大家表示同意。他们派陈磊等去找议长汤化龙，建议他出任都督。汤有些心动。他在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对清政府已经绝望，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未有绝对拒绝意”[20]。他的儿女亲家、谘议局议员胡瑞霖顾虑到汤“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就“力持不可”[21]。但是，他们还是到谘议局参加了会议。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议员阮毓崧、沈维周等。这些人在隆隆的枪炮声中过了一夜，现在惊魂未定地来到谘议局，却意外地发现革命党人对他们是十分尊重的。汤化龙发表演说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22]于是，有人就改推黎元洪。议员刘赓藻说：“黎元洪现在城中，如果大家认为合适，我愿带人找他。”[23]会议决定派蔡济民随刘前往，但是，这时工程营的士兵已经把黎元洪找出来了。

黎元洪是武昌地区仅次于张彪的清军头领。张彪出身“丫姑老爷”[24]，没有多少文化，经常吞蚀巨额官饷，虐待士兵。黎元洪则出过洋，受过资本主义的军事教育，以善于治军著称；平时，他注意笼络士兵；铁路风潮中，他是湖北铁路协会的军界代表；因此，新军士兵对他普遍存有好感。

10日晚上，他先想用血腥手段镇压革命，后来看到形势不妙就换上便衣，跑到黄土坡他部下一个参谋刘文吉家里躲藏了起来。当革命士兵把他从卧室中搜查出来的时候，他吓得浑身打颤。士兵们要他到

楚望台见吴兆麟，他不肯；士兵们以强硬的口气威胁，他才勉强答应。到了楚望台，他满脸愁苦地对吴说："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25] 正午时，被身不由主地送到了谘议局。

黎元洪到了，与会诸人鼓掌欢呼。这时，继续到会的有吴兆麟、邓玉麟、向讦　谟、李翊东、方兴等。当黎元洪被告知要他出任都督时，面色惨白，急得大喊："我不能胜任，休要害我！"胡瑞霖、吴兆麟等婉劝，张振武、蔡济民等胁迫，但黎仍坚决拒绝，不肯就任[26]。一时满座哗然。有人大声叫骂："黎元洪，太不识抬举了！"这时，有人送来一份预先写好的安民告示，要黎元洪签署。黎瑟缩着用颤抖的声音说："莫害我！莫害我！"拒不肯签。李翊东气得举枪对黎说："我们不杀你，要你作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黎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就拿起笔来签了一个"黎"字，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27]　这样，经过书记缮写后，一张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贴遍了全城。布告的全文如下：

>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这是宣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死亡，号召建立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布告。它强烈地表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深

恶痛绝。布告贴出后，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满城居民，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到处喜气洋洋，欢声雷动。

与安民告示同时发布的还有刑赏令，规定了“买卖不公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掳烧杀者斩”、“邀约罢市者斩”等各项纪律。

都督推举出来了。一个昨天还手刃革命党人的旧军官，一夜之后，突然被推上了革命领导者的宝座。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临时的原因：孙武被炸伤，刘复基等被杀害，蒋翊武和刘公被迫逃离，使革命领导在起义前夕就处于空缺的状态。但更主要的是革命党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首先是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有威望的领导核心。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在起义前半个月才实现联合的。革命的军政领导机构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酝酿的。派别的成见使他们不能选出一个军政首脑。推蒋翊武当总指挥，孙武当参谋长，用意就是由他们两人共掌军权，而且只限于军权。刘公在日本东京时当过共进会的总理，回到湖北后被共进会内定为湖北都督。但是在两团体实现联合的时候，他就声明放弃这个名义。当时大家把希望寄托在由黄兴来任首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双方争夺领导权之嫌。黄兴迟迟没有来，都督的位子也就空缺着。

其次是许多革命党人都是根据种族而不是根据政治态度来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他们认为，满人是革命的敌人，而汉人不论是立宪派也好，清朝的官僚也好，革命胜利后都会赞成革命。既然如此，让那些有资望、有地位的人来当领导，比起普通兵目、低级军官来，不是更足以“号召天下”吗？1911年4月，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就曾提议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理由之一是黎是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理由之二是黎在湖北新军中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28]。

不能说革命党人的考虑毫无道理。黎元洪出任都督有助于稳定局面，可以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问题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处理过于简单了。像黎元洪一流人，有条件地争取他附和以至支持革命是可能的，利用他的影响以助革命的发展也是可以的，但是，要他来领导革命则是不可能的，由他来掌握革命兵权则是万分危险的。

都督推选出来之后，在谘议局开会的人们松了一口气，才发现时间已是下午了。胡瑞霖感慨地说："革命党已经占领了武昌省城，公家有藩库，有官钱局，有粮储善后局，金店钱庄，到处皆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征发，秋毫无犯，市廛不惊，不但宗旨正大，举动文明，党人心理，更是纯洁，实在令人感激佩服。诸同志如需用款项，谘议局可先垫借五万元，以作临时开支。"[29] 会后，他送来了一批银元和银锭[30]。立宪派这时最关心的是社会秩序。革命未起之前，他们希望尽可能避免革命；革命既起之后，他们希望尽可能温和地进行。武昌革命党人的严明纪律使他们满意。推举黎元洪一事使他们放心，觉得可以给予某种支持了。

当天下午还推举了各种职事人员。汤化龙被任命为总参议[31]。其他如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庶务部、书记部、军需部等，也都纷纷成立。其人员或由推举，或由自荐。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大家）不知怎样作才好，又没有组织规程，七嘴八舌，莫衷一是。"[32] 除立宪派外，参加会议的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兵和学生，幼稚和忙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二　军政府的组织及其内部斗争

署名"鄂军都督黎"的布告是贴出去了，但是，这个都督却变成了"泥（黎）菩萨"，像木偶似的呆坐着，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一些革命党人看到黎元洪这样顽固，感到自己不能不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任务挑起来，因此，由蔡济民提议组织谋略处，作为筹划和决定军政大事的机关。大家推选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

尚志、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李作栋、黄元吉、吴兆麟、蔡大辅等任谋略。当时，胡瑛已被从武昌狱中接了出来，也参加了谋略处。谋略处在10月11日晚于谘议局开始办公，作出了如下一些重要决议：（一）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四）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五）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等。

建立谋略处表明了革命党人建立领导核心的企图，但是，这个领导核心一开始就具有临时的性质。革命党人仍在对黎元洪“劝驾”，准备随时把最高权力移交给他。同时，谋略处和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很快，它的作用就被不断成立的其他机构挤掉了。

当晚十时，原三十标一营管带郜翔宸，啸聚旗兵多人，进攻谘议局。李作栋、邓玉麟等带着黎元洪到蛇山脚下躲避，黎要求回私宅一行。甘绩熙、李翊东指挥担任守卫的陆军中小学、测绘学堂学生反击，郜部被击败。李翊东又把黎元洪接了回来。第二天，黎元洪的态度仍然如前。有时，革命党人去看他，黎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然后就一言不发，盘膝闭目[33]。但是，由于武汉三镇全部克复，胜利消息不断传来，黎元洪的心眼终于活动起来。特别是有人用“黄袍加身”的故事来启示他，这就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富于诱惑力的天地[34]。于是，10月13日，沉默不语的“泥菩萨”忽然开口了，他同革命党人聊起天来。有人责问他为什么还留着辫子。黎元洪说：“你们说要去辫子，我也有此意。从前我在军中曾出过‘剪发听便’的通令。你们明天叫理发匠来，将我的剪去就是。”[35] 第二天，黎元洪果然把辫子剪掉了。天真的革命党人一个个因此而兴高采烈，他们哪里想到，不开口的都督开口之后，摆在自己面前的矛盾和难题更多。

和黎元洪不同，汤化龙、胡瑞霖等很忙了一阵子。他们胸前挂着标明职衔的白布条子，在军政府中进进出出，显出很热心的样子。但

是，他们却日益对革命党人鄙视起来。军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忙乱现象也随着发展，出现了“人人都能作主，人人都不能作主”的现象[36]。这自然是汤化龙等所看不惯的。13日，汤化龙留日时的同学黄中恺访问汤和胡瑞霖。汤唯唯诺诺地不表态。胡则谓“秩序棼乱，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37]。显然，胡的态度也就是汤的态度。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是：“正赖我辈文人为之治理。”于是，汤、胡、黄、加上前候补知县舒礼鉴四人一起去见黎元洪。黎声色瘖暗，拱手低语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卒，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而相助。”[38] 14日，四人再次见黎。两次见面，汤化龙、黄中恺等发现了一个事实：“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39] 当夜，汤化龙约黄中恺在家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各部均受命于都督。条例对军事方面的三部作了细致的规定。而政事部，则只笼统地说设内务、外务、财政、交通、司法、文书、编制七局，声明其细则另订。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大权统于都督一人的方案。15日，汤化龙等四人兴冲冲地将《条例》献给黎元洪。黎连呼妙！妙！但是，这个条例却遭到了看守黎元洪的革命党人的冷落，被扔到了字纸篓里[40]。汤化龙等正在意兴索然之际，碰上了新到武昌的居正。他也正为军政府的秩序“棼乱”叹息。经过商谈，居正同意出面劝说革命党人接受《条例》。当即在江汉书院谘议局临时会址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订的，于是，一致通过。

条例通过了，迅速确定了各部职员，名单如下：

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在上述四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孙武一个。政事部各局局氏名单为：

内务局局长：舒礼鉴（谘议局议员）

外务局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局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局局长：马中骥（商人，汉口宪政同志会成员）

司法局局长：徐声金（立宪派，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局长：阮毓崧（谘议局议员）

编制局局长：张国溶（谘议局副议长）

在上述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条例没有谋略处，自然被取消。刘公从12日进入武昌之后，一直主持谋略处。这时无法安排，被任命为总监察。

16日，胡瑞霖劝黎元洪登坛誓师，得到同意[41]。17日，在阅马场的中央搭起一座高耸的帅台，四周军队林立。黎元洪全身军服，腰悬军刀，到台前下马，威武地被拥护登台。台上放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意义，黎元洪宣誓。由舒礼鉴起草的《祭告天地文》公然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能及哉！"[42] 就是说，黎元洪的权力，不是由革命人民流血奋斗得来的，而是由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清朝的旧军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了。阅马场上，"欢声雷动"。"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43]。慷慨激昂的誓师变成了对黎元洪个人的鼓吹。

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他们和黎元洪这样的旧军官结合乃是必然的。

汤化龙等所拟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和人事安排，虽然通过了，终因排斥革命党人的企图过于明显，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不少人声称：汤化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与革命主义不能相容。各种流言也出来了。善于观察时势的汤化龙也就迟迟不肯到职。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改订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规定，军政府设立稽查员，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这显然是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44]。《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都改称为部，直辖于都督。各部人事安排为：

军令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内务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外交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理财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司法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编制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上述安排中，新增加的胡瑛、熊继贞、张知本等都是革命党人，编制部长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革命党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注意保持对立宪派的优势，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政府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订暂行条例》所规定的都督权力仍然很大，“军事参议会”虽具有限制都督个人专权的作用，但并没有组织起来。黎元洪是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军人，革命对他来说终究显得生疏而可怕，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

汉口克复，詹大悲、何海鸣出了狱。他们立即渡江，和湖北军政府联络。军政府派蔡济民率兵二队随同他们返汉，驻扎四官殿。詹、何等对黎元洪、汤化龙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满，但是又觉得当时还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决定成立汉口军政分府。13日自外归来的蒋翊武也支持他们。军政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下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各处，由温楚珩、吴昆、何海鸣等负责。詹大悲等准备以此为基础，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汉口军政分府以文学社为主体，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在武汉保卫战中，它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有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也加深了和武昌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日知会员、系狱多年的李亚东任知府。

三　军政府的初期活动

湖北军政府建立于戎马倥偬中，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围绕这一任务，它进行了下列活动：

（一）发表文电

12日晨，革命党人即用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致电上海，催促居正、黄兴、宋教仁到鄂，并请转电孙中山，要他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陆续发出的文电有：

《布告全国电》。宣布革命目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响应："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45)

《宣布满清罪状檄》。指责清政府"使汉人永远降为满清之奴隶"，"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等罪状八条(46)。

《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劝告清军中的汉族将士反正："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虽立于反对地位，然情谊尚在，心事又未尝不合也。"(47)

《檄各督抚电》。劝告各省督抚反正："幸贵大臣勿拘君臣小节，而贻万世殷忧。"(48)

《免税公告》。宣布豁免湖北境内一切"恶税"：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豁免；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49)。

《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宣布全鄂地方一律改为共和政体，要求各地清吏一律呈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者缴印后听其自由；"人地相宜，民间倚重者"经自治公所推荐，可以留任(50)。

《通告城、镇、乡自治职员电》。要求各城、镇、乡自治团体速筹自保之计："赶办团练，守卫乡里，贫者效力，富者输财，既使游

手无事之民，有谋食用武之地，而富足之家，得因以保全。”[51]

《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要求各地巡警坚守职事：“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赖。”[52]

湖北军政府发表的文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上述文电大体完整地宣示了军政府的对内政策：满清政府是全国的公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和政体；它准备减轻人民所承担的苛重赋税，但是，决不允许“饥寒无告之民”侵扰“富足之家”的利益，也就是要确保一切有产者的财产。

在军政府用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的同时，汤化龙也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暨全体同人的名义致电各省谘议局，指责清政府“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电文表现了对清政府设置皇族内阁的强烈愤懑：“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它宣称：“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电文要求各省谘议局人士：“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53]清政府已经扶不起来了，希冀经过“不血刃”的和平转变取得政权，这是立宪派心理和立场的表现。

当时，各省尚在清吏控制之下，军政府所发电文不能流传公布。胡瑞霖建议，采用反宣传法，假托瑞澂名义发电，夸张武汉革命军势力，借以摇撼各省人心。汤化龙和革命党人李作栋等赞同胡的建议。汤并提出，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处有密码本。于是即由汤起草电文，托人冒充瑞澂委托，请俄领事馆发出。这封电报后来讹传为汤化龙勾结柯逢时等通敌的电报，加深了革命党人对立宪派的猜忌[54]。

（二）对外交涉

汉口设有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和瑞典、比利时等十一国

领事馆。军政府一成立，就在《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照会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各国既得权利和在华外人财产，一体保护。但照会声明：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如有接济清政府战事用品者，一概没收[55]。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17日，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照会军政府，声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同时声称：不准携带军械的武装人员进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内储藏各式军械及炸药等物；勿论任何方面，如将炮火损害租界，当赔偿一亿一千万两[56]。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十分震动。武汉的江面上，帝国土义的军舰一时竟增加到二十艘（英八艘，德五艘，美三艘，日二艘，俄、奥各一艘），瑞澂所坐的兵舰就躲在英国炮船的后面。他曾请求英舰阻止革命军过江。11日，英公使朱尔典应允，"请英水师统帅竭力相助"[57]。13日，他又电示驻汉总领事葛福，除"不得已之事外"，"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58]。但是，为了使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致波及租界，影响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们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革命党人对此十分重视，炫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军政府曾以黎元洪的名义发表文告说："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之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59]但事实上，进攻武汉的清军里有外籍教官，帝国主义者的轮船公司也仍在为清军运送军火、给养。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60]在递送"中立"照会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湖北军政府。11月8日，朱尔典说："至其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61]

湖北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同盟会既定方针的运用。明确地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宣布愿与各国建立睦谊关系，这是正

确的。为了不给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口实，禁止轻率地触动租界和教堂也是必要的。国际舆论因此很快就消除了出现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担心。东京报纸盛赞革命军“深合文明举动”[62]，巴黎报纸认为革命军“明智异常”[63]。比起义和团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来，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确实文明、也高明得多。但是，它并非不得已地宣布赔款和外债等照旧承担，这就和劳动群众那种坚决的反帝精神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劳动群众的反帝精神也应该给以恰当的领导。

（三）清除奸细

当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13日夜间，有一个大汉提着灯笼给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送来一张纸条，方定国阅后慌忙将信撕碎，丢在口中咽了。李翊东发现可疑，赶紧过来责问：“送来的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把它咽掉？你敢通敌！”方定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李翊东喝令将来人拿下审讯，发现他竟是为张彪传递消息的旗兵，当场就被判处死。当李翊东喝令拿问方定国时，方手持快枪，身佩军刀，使卫兵不敢上前。李翊东冲上去一把抓住方的衣领，夺过他的枪刀。在革命党人的凛然正气面前，方定国瑟缩不敢动。经过严厉审讯，方供出混入都督府的有蔡登高、张振标等奸细多人。当即把蔡、张抓住，同方定国一起判罪处决，清除了隐患。

（四）扩军备战

经过10月10日的战斗，部分战士牺牲，部分逃亡，湖北军政府所能掌握的士兵仅存三千余人，远不足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3日，军政府决定募兵，暂编部队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二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海关、租界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苦力、更夫、仆役们也纷纷辞工从军。汉口外侨报纸说：“应募而来的新兵从四乡涌进。募兵的军曹太热心了，他们不了解租界的特殊地位，竟然跑到租界里来。”[64]又说：“武昌显得比以前更活跃，下层人民比前更满足了。募集的新兵成百地在操练

着，这样的军队有两万多人。”[65] 16日，蔡济民、熊秉坤等商量，决定成立第五协，同时成立两个敢死大队。结果，五协兵员，几天工夫就满额了。军政府不得不出示停招。

为了加紧生产武器、军火，汉口军政分府命李亚东转令兵工厂迅速召回工人，开工生产。宋锡全以军政府第一镇分部统领的名义出示，鼓励工人积极生产，革新创造：“倘能于旧式之中，改良翻新，造成便捷利器者，本部定从优奖赏。”[66] 在阳夏战争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工，为保卫革命政权和支援各地起义作出了贡献。

（五）策反清军

张彪逃到汉口刘家庙后，仍拥有一部分兵力，构成对武汉的直接威胁。13日，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写信给张彪，劝他反正，遭到拒绝。同日，军政府又派人运动辎重营清军，也未成功。其后，黎元洪两次写信给他的老师清海军提督萨镇冰。20日信中，黎真实地叙述了自己被逼任都督的经过：“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他以起义以来的进展说明：“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满清抵抗”，事机大有可为。他力劝萨镇冰归顺革命军[67]。这封信反映了形势发展对黎元洪的影响。

（六）安定社会秩序

起义后不久，军政府就组织演说队，派人沿街演说，安定人心。同时，颁布了严格的纪律。继《刑赏令》之后，16日又颁布军令八条，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擅入民家，苛索钱财及私行纵火者斩”[68]。整个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军始终纪律严明。后来有人回忆道：“军队寄寓民家，绝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贷，必按时交还。升米斤油之类，请其勿用交还，亦必坚决偿还。至于买卖，则公平交易，不见强买勒卖的行为。”[69] 为

了维护社会治安，军政府除成立临时警察筹备处外，又支持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等组织保安社。在汉口，则赞助商会组织商团，发给枪支，作为巡逻、保卫之用。

武汉地区的良好秩序使帝国主义分子惊讶，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70] "我们也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71]

（七）稳定金融，保护工商业

起义前，武汉市面通用湖北官钱局所发制钱票、银元票和交通、通商等银行发行的钞票，起义后，纸币信誉下跌，人们纷纷挤兑银元和铜钱，引起银根紧迫，市面恐慌。为此，军政府特别发出照会，声明纸币照常通行，要求各界停止挤兑。照会保证："合当详定办法，竭力帮助金融机关。"[72] 事后，军政府接受武昌商会要求，设立商界兑换处，又拨解铜元十万，交汉口商务总会，接济市面[73]。

革命党人特别注意保护商业。13日，林翼支在汉口就出示宣布，以"保商"为"第一宗旨"[74]。汉阳知府李翊东也宣称："首以保卫治安，恤商爱民为务。凡我良善同胞，殷实商贾，无不极力保护。"[75] 12月，湖北军政府特别颁布了保护矿山的命令："凡银、铜、铁、煤、硝磺各矿场所在地点，皆责成该管知事严加封禁，妥为保护。"[76] 1912年春，专门成立实业部，以同盟会员李四光为部长。

由于革命党人的正确政策，湖北军政府得到了汉口和武昌商会以及汉阳商团的积极支持。汉口各团联合会正干事、回族商人马中骥并参加了军政府，任交通部部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人购办军需，供给粮饷，出力不少。

（八）招纳人才

为了延揽各方面的人才，接待投效人员，军政府于12日晚成立招

纳处。13日下令："无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77]至15日，投效人员即达四百余人。同日改名为集贤馆。总计起义期间，集贤馆共接待各方志士约万余人。其中，有五千人分送各机关办事或资遣回省运动革命。有六千余人在馆外听用。留馆备用人员则经常保持五六百人之数[78]。第一集贤馆容纳不下，又陆续开辟了第二、第三集贤馆。

（九）创办《中华民国公报》

起义后不久，共进会会员牟鸿勋即倡议创办一种报纸，定名为《中华民国公报》，10月16日发刊，由张樾任主笔。出版简章称："即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它是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也是军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以发表军政府的文件、公告为主，也发表部分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11月5日，曾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大汉同胞，群策群力，复仇报国。但是，从全面看来，它对同盟会和孙中山宣传不多。后来更发展为孙武一派的派报。

在汉口，革命党人胡石庵办有《大汉报》，出版第一日即销行三万余份，曾得到军政府奖励。

（十）改革司法制度

10月30日，军政府司法部发表文告，谴责清政府司法机关灭绝人道、冤屈良善等种种罪恶，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以来在司法制度上所作的假改革。文告宣布设立江夏临时审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随后，公布了有关条例。《江夏临时审判所暂行条例》第一条称："本所为图司法独立，特提前办理，以为各属之先导。"第四条称："本所民事、刑事两庭均用合议制组织。"第十三条称：除特别事件外，"诉讼之辩证及判断之宣告均公开法庭行之"[79]。条例的有关规定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特色。

（十一）制订《鄂州约法》

宋教仁随黄兴到鄂后，即埋头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11月9日，由军政府公布，共七章六十条。《总纲》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等部分构成。《人民》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营业、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等自由，有诉讼于法司、陈请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都督》章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议会》章规定：议员由人民中选举产生，议会可以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要求答辩或弹劾，可以受理人民的陈请，送交政务委员。这部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承认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地方共和政权的设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促进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有巨大意义。它是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湖北军政府在革命大风暴中诞生，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过去被视为无上尊严的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了，人人讲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不可阻拦的潮流。革命党人李亚东当了汉阳知府，每逢出衙都要乘坐四人抬的绿呢大轿。有人劝告他说："你是革命党出身，还摆这臭架子，不怕同志们耻笑吗？"他不以为然，说："有威可畏，才好管教百姓。"他乘轿到都督府，被卫兵喝令下轿："官僚派！满清怪物！打！"李亚东又惊又愧，不敢作声，从此再也不敢坐轿了。而且，全武昌城也没有人坐轿了。这种平等思想还反映在薪饷上。有人提议要给军政府的官员定薪俸，革命党人极力反对。结果议决职官薪给自都督以下，每人支津贴二十元。兵士的月饷则有所增加，兵士十元，副目十一元，正目十二元，后来才逐渐改为等差较大的薪饷制。

湖北军政府的活动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严重不足和失败的方面。它注重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却没有把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

量放在第一位。当时，各地城、镇、乡自治公所一类的组织大都把持在上层士绅手里，军政府要求他们赶办团练、巡警，赋予他们推荐官吏，保护“富足之家”等权利，这就捆住了群众的手脚，维护了旧社会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不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造成一个大的社会变动，便不能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这场革命只能半途而废。

四　革命向武汉周围地区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武汉革命党人和周围地区建立了联系。武昌起义、三镇光复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纷纷响应。

汉川起义。汉川是日知会会员梁钟汉的老家。10月13日，梁辉汉、宋振东等在系马口起兵，直捣汉川。革命党人把关在狱中的梁钟汉接出来，推他为司令，组织汉川军政分府。

黄冈清军巡防营兵变。黄冈为黄州府治所在，是个很早就受到革命影响的城市。日知会员吴贡三判刑后就被关押在这里。10月14日，驻防营兵群起向府县衙门索要欠饷，烧毁标统衙门。知县和地方绅士无法控制局面，便把吴贡三迎接出狱，要他全权处理。16日，湖北军政府得到报告，立即派人前往招抚，成立鄂东军政支部。清知府、知县、标统等逃避，黄州府属各县纷纷反正。20日，麻城县议会议长屈开埏召集四乡议员，准备宣布反正。屈是自立军首领，事败逃亡，到1911年春天才回到麻城。当议员们按期集会时，县令在地方劣绅煽动下，命巡防营包围议场，杀死屈开埏[80]。事后，鄂东军政支部向湖北军政府作了报告，军政府迅即派兵到县，将凶手捕杀。

除麻城外，鄂城、蕲春、蕲水、大冶、黄石港、阳新、广济、武穴等县的反正大多是顺利的。

京山刘英起义。刘英是共进会的湖北副都督，出身于大商人家庭。归国后在故乡积极发展会员，并以巨资开设商店，作为秘密机关。他力主在湖北首先举义，曾致书孙武等表示："倘我省毅然发难，英虽不敏，必先树一帜于上游，上拒襄樊之敌，下为武汉声援。"[81] 10月9日，武汉各机关被破坏，他于12日晚接获消息，立即紧急动员，于15日夜率领一千多人，袭击驻在该处的襄阳巡防营，夺得了枪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武昌已经起义，第二天早晨抱着首义的精神，集合在永隆河畔，高竖起革命的旗帜。刘英的号召力很大，很快占领了武汉西边的京山、天门、潜江、监利等县大片地区。11月，季雨霖受军政府委派，任安（陆）、襄（阳）、郧（阳）、荆（门）招讨使，进军湖北中部和西北部各府县，刘英和梁钟汉的队伍都被收编。

武胜关起义。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武胜关，是控扼南北的战略要地。当时信阳以南铁路，全由湖北新军驻守，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就驻在信阳车站。该营文学社营代表为刘化欧。他已联络好部分农民、铁路工人和会党群众，但是一直得不到消息。直到15日，清廷派荫昌率北洋军到达信阳，刘化欧才下令发动。16日晚，农民、铁路装卸工、会党、士兵约千余人集合于武胜关附近，定名为湖北革命军独立第一协。义军随即拆毁关南、关北铁路各二三里。22日，会党群众和清军相遇，战败溃散，士气受到影响。25日，刘化欧将队伍解散，自率少数人回到武汉。这以后，留在铁路沿线的士兵和工人仍然坚持战斗，或破坏路轨、兵车，或焚烧粮库、弹药，但终因人少势单，缺乏领导，不能在阻击清军南下中发挥更大作用。11月7日，工界代表余大猷被捕，壮烈地牺牲于清军皮鞭下。

宜昌新军起义。宜昌是湖北西部重镇，当地有川汉铁路公司所属筑路工人数万。1910年，革命党人胡冠南等在该地秘密建立了公益会。保路风潮中，共进会张百祥也到该地发动。他联络胡冠南等，组成川汉铁路研究会，因聚众数千人演讲，被清吏逮捕。为了防止事

变，瑞澂派三十二标二营和四十一标一营驻防。10月14日，军界、警界、学界的代表在东山寺秘密会商。随后，宜昌商会总理曹启荣等又和新军排长、文学社社员唐牺支等进行会谈，取得一致意见。18日晨，唐牺支将兵力作了适当配置，派代表到川路弹压局向管带索取弹药，管带逃逸。当日，宜昌光复，张百祥等出狱。次日，成立宜昌司令部，各界公举唐牺支为司令。

宜昌司令部鉴于铁路一时无法开工，遣散了大部分工人，挑选了一千多名“自愿效力”的精壮充实队伍。后来进攻荆州的决死队中，这部分工人占多数，表现得也最为勇敢[82]。

施南起义。施南僻处湖北西南，但受到革命影响并不晚。吕大森、朱和中等都是施南人。1904年，为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吕大森即回乡运动。次年，在施南组织日知会分会。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改名天锡会。不久，会员刘汉卿被捕，天锡会解散。

保路风潮掀起之后，武汉革命党人派施南来凤人向炳焜回乡发动。10月13日，向抵达施南府治恩施。当时，施南驻有新军三十二标第三营和施防、宜防两营。最初，向准备利用会党夺城，因会党不愿遵守不得杀人劫财等规约，只好改变计划。26日，向炳焜、品大森等以地方绅民或革命机关特派员的名义向新军管带李汝魁发函，劝他反正。第二天，向又亲见李汝魁进行说服，李及宜防营管带陈金瑞表示同意。28日，宣布反正[83]。

反正后，李汝魁被推为分司令部部长。陈金瑞不服，改名朱扬武，自称明代后裔。11月3日，刺杀李汝魁，自任部长。12月21日，湖北军政府派冯仁铨为施（南）鹤（峰）安抚使，调朱扬武回省，准备将他正法，朱得悉后潜逃。

郧阳起义。郧阳位于湖北西北部群山中，1911年9月，瑞澂调新军二十九标三营驻防该地。武昌起义后，知府伍铨萃和三营管带张楚

材密商，将该营调散，留守郧阳的仅后队队官沈权所率士兵数十人。在地方参事会聂炳基、翁人健等支持下，沈权等积极筹划反正。

11月14日，参事会邀请绅、商、学各界人士六十余人集会，规定只准进，不准出。会上，沈权要大家立即表态。他说："神明贵胄，为人作二百余年之奴隶，有何面目见我黄帝祖宗乎？若再迟延，真非人类矣！"[(84)] 他带头在"兴汉灭满"柬帖上签名，与会诸人一一照办。随后，找来知府伍铨萃等，也一一签名。在组织军政分府时，有人认为：伍铨萃"虽为汉奸，却为六县人民视线所注。现伊既表同情，何必追其既往"[(85)]。因此，伍被推为分府总裁，沈权任司令官。

安陆新军起义。新军二十九标三营张楚材部原驻郧阳，10月下旬，奉襄阳道喜源命调赴襄阳。喜源对这支队伍不放心，不久，又将该部调赴安陆，并命安陆知府满人桂荫会办营务。11月下旬，民间传说武昌革命军将到，张楚材便与原陆军小学堂学生樊松等计划起义。25日，张分兵把守四城要隘，自率一队进攻府署，卫队已事先作了联络，立即响应。桂荫仓皇逃出，在学宫自缢。张楚材随即成立军政府，自称大总裁[(86)]。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报请黎元洪委张为支队司令，张不愿受季节制。1912年1月，季率部到达安陆，二人矛盾加深，季下令攻击，张楚材潜逃。

老河口江湖会起义。老河口是襄阳府光化县属的一个市镇。地当要冲，商业发达。当地早有洪门组织江湖会活动。1911年，瑞澂派第八镇骑兵八标三营出守襄阳，士兵张国荃、李秀昂被派驻老河口。他们积极串联江湖会群众。11月28日，老河口一邢姓绅士办喜事，光化知县黄仁荧等文武官员都前往参加。乘此机会，张国荃率江湖会群众赶来，强迫官员们画押反正。30日，进攻襄阳，士绅开城迎接。清吏襄阳道喜源、巡防营统领刘温玉等先后逃遁。起义人员推黄仁荧主持襄阳军政分府，张国荃为总司令官，李秀昂等为协统。12月1日，军政分府致电黎元洪，要求指示方略，接济军械。次日，出示招兵。后

来有人回忆："生活困难的贫民都踊跃参军"，"不论是什么人，在衣袖上缠上白布，都一律收留。"[87] 地主阶级文人则记载："闾左卖菜奴，未几亦穿军装，挂指挥刀，从者数十人。"[88] 可见下层群众支持革命。

起义迅速波及襄阳府属各县和邻近地带，谷城、均州、南漳、枣阳、宜城先后反正。

义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向富户和商店摊派。按资产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认捐。他们曾向均州大地主、当地首富苏清泉摊款二十万缗，被拒绝，随即抄没了苏家财产。此外，刘公及其亲友在襄阳的财产也都受到触动。义军的这些做法使得它和地主、绅商们的矛盾日益尖锐。1912年2月，季雨霖准备收编张国荃的队伍，首先派人刺杀了李秀昂，迫使张接受改编。几个月后，刘公率军北伐，又进攻张部，迫使张逃亡。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不少人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主张反清，赞同共和，但是，却决不允许侵犯地主阶级的利益。江湖会起义被镇压一事正说明了这一点。

荆州旗兵投降。11月16日，宜昌司令部决定进攻荆州。该地驻有旗兵二千余人。进攻前，司令部首先传檄驻防将军连魁等人，说明"我军革命，不过推翻君主贵族，建设民主共和；普通旗人，原无仇视。且人道主义，世界公认，凡我黄种，尽属同胞"[89]。檄文要求连魁等"效顺来归"。连魁企图拖延观变，请沙市日本领事转请英国驻宜昌领事出面，斡旋"中立"。唐牺支命连魁开具切实办法，得不到答复，决定武力解决。19日夜，革命军向荆州外围阵地发动攻击。25日，占领沙市。28日，唐牺支再次致书连魁等，说明只要对革命持同情态度，"无论为满为汉，皆宽其既往，一视同仁"[90]。连魁仍然不作答复。12月9日，革命军向荆州城发动总攻。在革命军的军事威力的逼迫和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第二天，连魁要求投降。13日，双方达

成协议。革命军方面表示：旗民生命财产，一律保护；生活中极困苦者，给恩饷六个月；民国各种学校，准许旗民报考。16日，革命军入城，成立荆宜司令部。

除荆州外，湖北各地的起义大多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它说明了武昌起义是很得人心的，也说明了清政府的极端腐朽和虚弱。经过起义，湖北各府州县都建立了新政权，到处飘扬着作为革命标志的白旗。但是，革命党人的力量毕竟太小了，对旧制度的触动也太少了。不少地方只是改换了旗号，其他一切照旧。有的清吏当了民国官员，却仍然拖着长长的辫子。

在湖北各地起义、光复的过程中，新军仍是一支活跃的力量。瑞澂将新军调驻各地，本意在防止革命，然而，事与愿违，结果却扩散了革命的火种。

第三节　保卫武汉的奋战

一　最初的胜利

武昌起义成功，武汉三镇的迅速克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上海望平街报馆门前，每天挤得人山人海，都在打听湖北革命胜利发展的消息。广大人民坚信，满清必败，革命必胜。一次报上登了汉口革命军败退的消息，报馆立即遭到了一千多人的围攻，认为是造谣。从上海开出的长江轮船，百分之八十的乘客都是前往汉口参加革命军的工人和学生，其中还有许多是归国华侨。沿途南京等地，不断有人上船。他们一到船上就把辫子剪掉，表示革命的决心。与此同时，革命已似烈火燎原，席卷各地。武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鼓舞着各地人民；各地起义胜利后，又把支援湖北革命作为重要大事。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甚至广东、广西等地，都纷纷派来援军。湖南援军出发时，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到江边热烈欢送。从南昌出发的

援军，在船樯上高悬着“满奴不灭不生还”的大旗，表达了誓夺胜利的昂扬斗志。

武汉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惊恐。它立即感到这是一把插向它心脏的利刃，决定着它的生死。因此，急忙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来镇压湖北革命。当时清王朝有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新式陆军，分布于全国各省，其中在南方的各镇协大都加入革命，它能够依靠而又可以迅速调动的只有北洋六镇。10月12日，清政府宣布将瑞澂革职，命他暂署湖广总督，戴罪图功。同时，令正在永平参加秋操的第四镇统制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赴援，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都归他节制调遣。又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这些舰艇包括甲午战败后保存下来的几艘巡洋舰“海容”、“海琛”、“海筹”（另一艘“海圻”当时在英国观礼，无法赶回），还有许多炮舰和鱼雷艇。清王朝企图用水陆夹攻的办法，把武汉革命力量迅速消灭。14日，经奕劻向载沣力荐，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要他们督办剿抚事宜。上谕说：“该督等世受国恩，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91)] 载沣本不愿将袁世凯这个对头请出来，但已别无他法。同日，清政府编组第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以陆军第五镇等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听候调遣，以禁卫军及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由载涛督率，守卫京畿。在清政府的一再催促下，清军陆续到达汉口附近。13日，豫军张锡元部到达刘家庙。17日，荫昌抵达河南信阳，即驻此作为行营。同日，萨镇冰率楚有、楚泰各舰驶抵汉口。18日，第二协王占元部抵达黄陂县境的滠口。但是，清军并没有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

清政府想利用袁世凯来救它的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却有他自己的打算。在清政府命他回家“养疴”的那些日子里，他表面上在“养寿园”中过着安闲的生活，自题联语说：“心似南湖常淡定”，而实际上无

时无刻不在力图重返政治舞台，攫取更多的权力。清政府起用了他，但给予的权力只是“节制调遣”所有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对荫昌、萨镇冰所统率的北洋军和海军，只能“会同调遣”。这实际上只是荫昌的副手，自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野心。因此，他于15日复奏，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辞，表示不能应命。但最后又说：“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92] 既不坚决拒绝，也不明确提出就职日期，只是借故拖延。袁世凯作势不出，北洋军也就不肯卖力作战，革命党人却获得了休整和发展力量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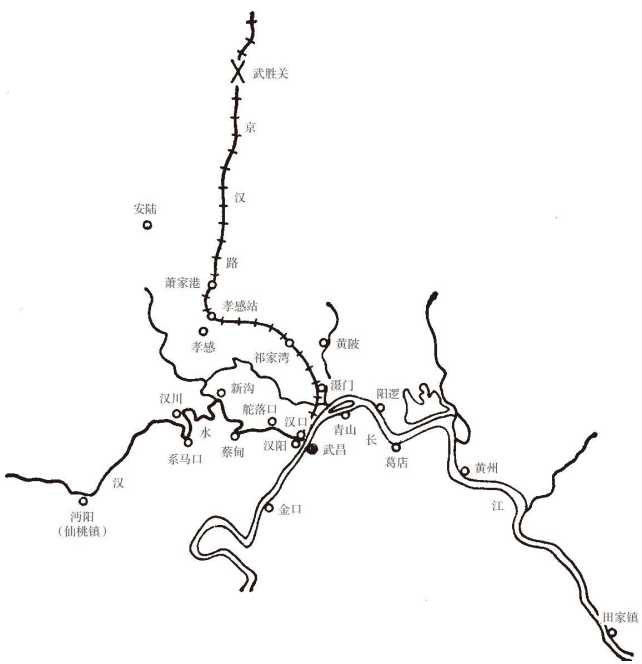
盘踞刘家庙的张彪残部是湖北军政府的肘腋之患。10月14日，谭人凤刚到武昌，就向黎元洪建议，立即驱除张彪残部和新到的河南军，派兵扼守武胜关。黎低头不表态。接连几天，谭人凤都催促黎元洪下令出击，黎均以领事团禁止在距租界十里内开战为理由拒绝[93]。直到17日，领事团送来了“中立”照会，黎元洪的胆子才大了一点。当日，接到荫昌所率先头部队到达汉口附近的消息。晚上开会时，又得悉海军可以支持革命党人。在谭人凤等的坚决要求下，黎元洪勉强下了决心。

18日晨，第二协第三标统带姚金镛等率步队一标，炮队一队渡江，会同驻汉标统林翼支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进击[94]。当时，清军方面有张彪的残部马队一部和河南军一部，共约两千人，在江中军舰的炮火掩护下进行反扑。十时，林部二营管带赵承武率数十人英勇冲锋，清军从火车车窗中向外射击，赵中弹牺牲。同时，清军支队由左侧反攻，革命军死伤较多，退到大智门附近。革命党人毕钟大喊道：“同胞何处去？何处是同胞去路？”林翼支、詹大悲也都出面鼓动，才稳住阵脚。

下午二时，革命军得到汉阳第一标和武昌第四标的支援，再次发动进攻。同时，一列满载清军援兵的火车向刘家庙车站开来，伏在附近稻田里的革命军战士百余人和铁路工人一起，立即奋起拆毁路轨，并且用炮轰击列车。列车应声倾翻，清兵慌忙逃出。革命战士高声喊

杀，周围的农民和铁路工人也纷纷拿着扁担、刀矛、铁镐，在一片呼喊声中冲了上来。清军仓忙向滠口败退。这次战斗歼灭了四百多敌人，缴获的武器军需够装备一标以上。革命军胜利地结束了这一天战斗，还饿着肚子。战场上硝烟未灭，大批老百姓就拥上来，提篮、挑担把馒头、烧饼、饭菜送来了，呈现出军民同仇敌忾打清兵的十分感人的景象。

第二天凌晨四时，何锡蕃率第二协队伍全数渡江，行抵刘家花园。何令三标二营管带刘炳福部为主攻，四标谢元恺部为助攻。八点三十分，在跑马场发生遭遇战。十一点四十五分，清军死伤过众，向刘家庙败退。革命军发炮击毁敌兵增援车辆，清兵溃散不整，狼狈逃逸。由于清军北洋炮队尚未到达，革命军的炮队就充分发挥了威力。下午一点四十分，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一直追击到三道桥附近。



武昌周围形势图

这一天，革命军取得了比18日更大的战绩。敌人丢下了军需火车

十余辆、马百余匹、军米、子弹、背包、雨衣、帐篷等大量物资，向滠口逃跑。革命军把战利品装上列车，车头上插着十八星军旗，气昂昂地开回汉口。刘家庙附近的农民也不召而至，争先恐后喜气洋洋地帮助抬运战利品，并且拒绝付给他们力钱，说："大家都是汉人，你们打仗舍得拚命，我们还舍不得力气吗？"这时武汉三镇都悬灯结彩，庆祝胜利，军政府派出的欢迎乐队高奏凯歌，"沿着歆生路和铁路一带，两旁都挤满了狂欢的群众"[95]。汉口商会还备办酒肉到前线犒军，向战士们身上披挂红彩。《大汉报》胡石庵一个人自采自编，从前线采访了胜利消息，立即回来编印号外。满街满巷的少年儿童，又跳又唱，他们用亲切甜美的声音欢呼："我们的兵打胜了！"[96]

20日，革命军继续取得胜利。瑞澂凄凄惶惶地向清军咨府诉苦道："现在豫、湘、鄂战后余兵，为数不过二千"，"力竭精疲，子药垂罄"，"呼应不灵，智力俱穷"。他呼吁荫昌、袁世凯迅速南下，督兵援助，"俾刘家庙驻守湘、豫各军，不致覆没"[97]。

初战告捷，坚定了武汉军民保卫武汉的信心，也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革命人民纷起响应的斗志。

二　汉口失陷

武汉保卫战应该怎样打法，湖北军政府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年轻的革命党人主张出击北进，而原来新军的一些军官却主张防守。这两种不同意见始终没有得到统一。结果攻既不力，守亦不固。从刘家庙到滠口，有一条窄长的隘路，四面是水，中间有三道铁路桥，京汉线就从桥上穿过。从汉口北上，或从滠口南进，都必须通过这三座桥梁，是军事上必争之地。18、19日的战斗中，革命军虽然两次打过了三道桥，却没有组织兵力乘胜追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巩固的防御工事。何锡蕃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然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守线设在刘家庙附近[98]。这样，一到夜间，清

军就又过了三道桥。革命党人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要求继续进攻。敢死队副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何锡藩就命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于10月22日率队挺进。徐少斌带领着十七个敢死队员冲过二道桥以北，清军没有还击。但到三道桥时，清军在桥北的机枪突然齐放。徐少斌当即中弹，落水阵亡。革命军又退回到原来阵地。

三道桥地区易守难攻。徐少斌牺牲的第二天，谢元恺率队攻击滠口。到三道桥时，遭到桥北清军机枪扫射。队伍在桥上成纵队形，既不能进，又不能展开，先后死二百余人，伤一百多人，第一营几乎全没。两次进攻失利，特别是徐少斌阵亡，使大家非常痛心。许多人对何锡蕃颇多责怪，认为他胆子太小，没有趁刘家庙的胜利继续进攻，贻误了戎机。指挥官何锡蕃也就引咎辞职。军政府于24日改派张景良任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是原新军二十九标的标统，军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参谋部长。几天以前，他曾经装疯卖傻，抱住黎元洪哭闹，公然想劫持黎叛卖革命，当即被革命党人关押起来。这时他忽然伪装积极，表示愿以全家为质，到前线杀敌立功。虽然革命党人李翊东竭力反对，黎元洪还是让他担任了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到达前线后，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而清军南下的兵力却不断增强，汉口的形势日益严重。

当时清军方面，北洋陆军是久经训练的老兵，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号称劲旅，还有海军强大炮火的配合，行动统一，指挥容易，在兵力上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士气却是低落的。与此相反，革命军大多是没有训练的新兵，许多人连射击还没有学会，又只有射程短、爆炸力差的山炮，缺乏机关枪。但是革命士兵斗志昂扬，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特别是各省和湖北各县纷纷起义宣告独立，更是对武汉革命军的极大支持。因此，“虽屡接清军南下之报，一般军民均不畏死，

并存轻视意，以为汉人而作汉奸，来此抗顺，如此贱种，即为全国唾弃，故大有灭此朝食之概”[99]。湖北革命力量就是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的鼓舞下，依靠这种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着源源南下的优势清军。

10月27日黎明，清军以南下的第四镇混成七协、三协为前队，八协为预备队，自滠口向前进攻。行抵洋油厂西方，与革命军千余人相遇，双方展开战斗。

清军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清军的榴弹炮对革命军威胁很大。驻泊在阳逻的清军舰队，在拂晓时趁革命军炮兵疏于警戒，偷入谌家矶。这时从侧面向革命军防御阵地猛烈开炮，使革命军伤亡五百多人。十一时半，战斗进入炽热阶段。清舰发炮击毁革命军粮台。在鏖战中的革命军战士忽见后方粮台起火，更加慌乱，从刘家庙退到大智门附近。

在上午的战斗中，何锡蕃、张廷辅负伤，炮队队长蔡德茂、敢死队长马荣先后阵亡。熊秉坤三次向张景良请援，张均置之不理。下午，张景良已不知去向。退到大智门的革命军凭借坚固的堡垒和巨炮抵御，清军攻势才中止。

当晚，各协统领和汉口军政分府在华洋宾馆楼上开会。公推胡瑛为临时总司令，胡以不熟悉军事为理由推辞。继推六协统领罗洪升，罗也不就。后黎元洪委派同盟会员、炮协统领姜明经为临时总指挥，姜因听说清军即将进攻，借故离去。

10月28日，清军调第六镇混成十一协炮队增援，以山炮猛力轰击，革命军以谢元恺为四协代理统领，指挥各军防御，双方炮队互击达三小时之久。正午，清兵蜂拥而至，谢元恺命令吹起冲锋号，革命军士兵端起刺刀，从掩体中一跃而出。在汉口观战的居正也带着卫兵呐喊向前。慑于革命军的威力，清军纷纷后退。革命军克复大智门车

站，一直追到刘家庙。清军预备队以机枪猛烈射击，谢元恺阵亡。革命军退回至大智门，居正也被流弹击伤。这天参加战斗的还有测绘学堂学生组成的敢死队，一律背枪，手拿大刀，斜挂敢死队红带。出发时，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发现有一个很小的学生，不让他参加，双方争执，至于泪下。有的学生路过家门，只打声招呼："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说完，推开家人，就英勇地冲上了前线。

将士们在壮烈地奋战，却始终不见指挥官张景良的踪迹。汉口军政分府派人在后城马路某旅馆找到了张，发现他竟然在跟清军张彪的正参谋刘锡麒密谈，当即把他们两人逮捕。詹大悲亲自审问，发现张景良早已通敌。詹大悲想把他们的供词报告黎元洪，又怕黎会从宽赦免，就自作决定，把他们枭首示众。

接连两日的恶战，使革命军伤亡了数千名战士，丧失了谢元恺、蔡德懋、马荣、李忠孝等许多优秀的指挥官。革命军退入市区，前线指挥无人，清军重兵入境，形势十分危急。正在这个时候，黄兴偕宋教仁等从上海到达武汉。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黄兴一直是孙中山在中国南部各地起义的组织者。保路运动兴起之后，他还曾准备去云南发动。直到10月2日，他在香港读到了谭人凤、朱敏仁的信件，才改变了主意。他写了一封信给远在加拿大的冯自由，内称："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100) 他要冯筹款援助，并转电孙中山，表示在接到冯的复电后将赶赴长江上游或赴南洋筹款。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五天，武昌起义爆发了。同月24日，黄兴到达上海。次日，和宋教仁、刘揆一、徐宗汉等改服换装，混杂在红十字救护队中，乘轮西上。28日午后到达武昌，和黎元洪会晤，力主坚守汉口、汉阳，等待各省响应。他毅然应承了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

29日，军政府挑选了一千多名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青年学生随黄兴渡江。黎元洪还叫人做了两面一丈二尺的大旗，上书斗大“黄”字，由领队手执前进。黄兴到达汉口后，设司令部于满春茶园，命杨玺章、蔡济民等检点军队，仅得六千余人。

黄兴到汉的消息一传开，给正在苦战中的革命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出山而加强了力量。鉴于袁世凯拖延不出，20日，奕劻派徐世昌亲赴彰德和袁世凯密谈，袁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同日，袁世凯保荐王士珍襄办军务，要求清政府饬令冯国璋赶赴彰德，筹商布置。23日，袁世凯奏请清政府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这样，袁世凯攫取权力的要求便如愿以偿。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这时，清军兵力已达一万多人，而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力量对比上大大地超过了革命军。在30日的战斗中，革命军第二协曾在歆生路一带取得了部分胜利，夺回先前失去的山炮四尊，子弹数十箱。但熊秉坤的第五协则因死伤过多，士兵不敢前进。黄兴挺身向前督战，也没有效果。不得已，下令退至满春茶园。追随熊秉坤的只剩下三四个马弁。这一天，清军开始放火烧城[101]。

31日，革命军继续在市区中阻击敌人。敢死队等到敌人接近时，就骤起冲锋，奋勇杀敌。冯国璋看到革命军这样勇猛，继续下令纵火，火头达十多处。汉口最繁华的市街烟雾蔽天，成了一片火海。在大火中，革命军继续英勇抵抗。冯国璋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说：“匪炮向街市猛击，徒步匪人顽强抵抗，汉镇火愈猛，相持竟日。”“十一日黎明，西北风暴作，汉镇火愈烈，我军接续攻扫，节节巷战，每攻一段，冒火蹈险，又为匪暗击，艰苦不可言状。”[102] 他丧心病狂地宣称：“为了驱逐顽强的敌人”，“不惜将中国市区全部焚毁”[103]。

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湖北革命军的壮士们，就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可歌可泣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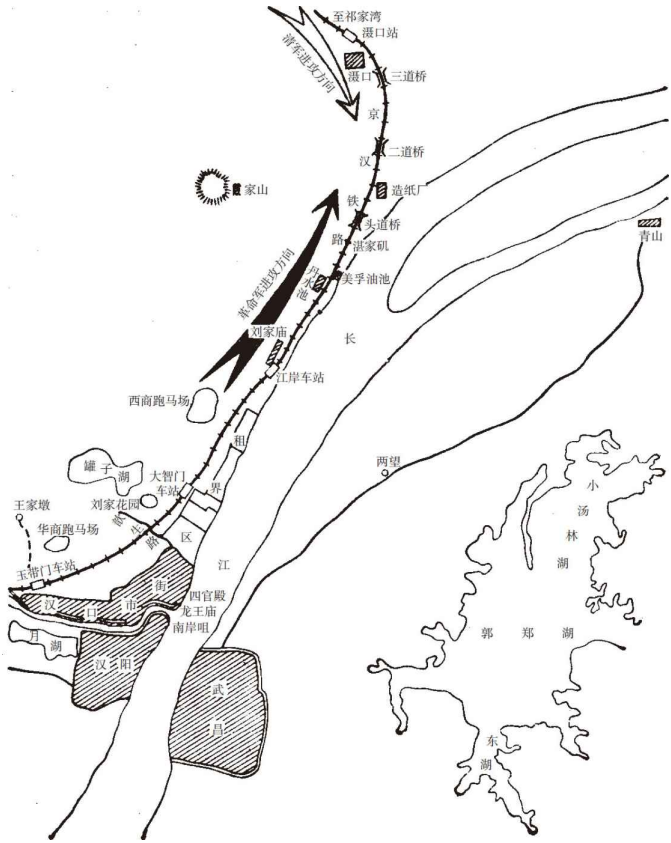
11月1日上午，汉口军政分府撤退。詹大悲、何海鸣等长期和孙武存在矛盾，不愿回武昌，便离汉口东下，企图去争取安徽革命党人吴春阳的支援。

同日，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的大火一直延烧到11月4日，市区五分之一被毁。清军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清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在奏折中说："十三日（11月3日）接南省各团体电称，汉口并附近一带地方，官军恣意残杀，惨及妇孺，焚烧街市，绵亘十余里，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人心愤激，达于极点。"[104] 清王朝在众怒下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要赔偿损失。

当汉口危急的时候，胡瑛利用他和文学社的关系，召开秘密会议，声称汉口不守，应另谋出路。受胡瑛指使，负责守卫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竟在10月30日夜同王宪章等带领部队向湖南方面撤离。黎元洪致电湖南，以临阵脱逃罪将宋锡全逮捕处死，传首武昌；王宪章被关在牢里，经蒋翊武等力保获释。

詹大悲的东下和宋锡全、王宪章的南逃都加深了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的矛盾。



汉口战争形势图

三　袁世凯的“和平”试探

汉口失陷以后，保卫汉阳成为紧急的任务。

为了统一指挥各省赴援民军，同盟会、文学社的部分人员建议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共进会、立宪派和旧军官中的部分人员则主张只用战时总司令头衔，并由黎元洪委任，以免引起内争，影响团结。杨王鹏、吴兆麟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经宋教仁调解，采取了后一种意见。

11月3日上午，在军政府前阅马场筑起了拜将台，各机关长官和

各部队均列队参加。首由黎元洪讲话，次请“黄总司令”登坛，由黎元洪亲授委任状、印信和令箭，再请黄兴讲话，最后由黎元洪请黄兴下坛巡视军队。这一典礼是对于汉代刘邦、韩信故事的模仿。它的主角表面上是黄兴，实际则是黎元洪。经过了这一场典礼，黎元洪已明白无疑地成为革命党人的上级。几天之后，黎元洪就以最高“革命元勋”的身份，通电已经宣告独立的各省，要求他们派人到湖北来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接着，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公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黎元洪的权力和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和提高。

当日下午，黄兴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设立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杨玺章为副。日人萱野长知等十数人远道赶来参加。

当时担负保卫汉阳任务的革命军有：第一协蒋肇鉴一千多人，第四协张廷辅二千多人，第五协熊秉坤二千六百多人，第四标胡效骞一千二百多人，加上炮队和工程队，约一万余人，相当于四协兵力，再加上新到的湖南援军，总共有两万人以上，士气大都极旺盛。广大人民群众对保卫汉阳也极热烈地支持。汉口失守之后，每天都有数千民工冒着清军的炮火，不分昼夜地在襄河沿岸抢修防御工事。但是，汉阳战争并没有马上打起来。

汉口失陷以后，武汉的战事沉寂了两周。在这段时间内，全国形势已发生急剧的变化。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之后，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又纷纷宣告独立。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等，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同盟会员）驻兵石家庄，准备与张绍曾配合，待机起事。北京城有处于被夹攻的严重威胁。

面临灭亡的清王朝还要进行垂死挣扎。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

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未办一利民之事”。诏书表示，要和全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05]。同日，命溥伦等速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讨论；宣布不再以亲贵充任同务大臣，开放党禁，凡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一律“赦其既往”。1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立即来京，组织完全内阁。3日，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4日，命各“有乱事省份”的统兵大员“妥速安抚”。6日，开释前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等人。习惯于延宕拖拉的清政府突然加快了行政速度，几乎一天有一个变化。

清政府的“安抚”政策实际上就是袁世凯的政策。多年的政治经验使袁世凯深知，单靠武力是镇压不了革命党人的。还在10月下旬，他就起用襄阳人刘承恩，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进行“和平”试探。11月1日，又写了第三封信，提出清廷已下罪己之诏，决定实行立宪，要求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保证“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106]。湖北军政府方面讨论了刘承恩的来信，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世凯反戈。7日，黎元洪在接见清方信使时表示：“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并称：“此时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将来更无法子。”[107] 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保证，只要袁做到了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108]。11日，刘承恩、蔡廷幹携袁世凯手书到武昌谈判，黎元洪在军政府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刘、蔡声言，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与会诸人拒绝了这一意见。胡瑞霖称：“吾辈之主张者在民主国体，今除民主国体不议，则此次实无可议之余地。”他表示如袁能承认民主国体，有什么“请求”的话，可以“酌量情形允准”[109]。宋教仁则建议袁世凯“转戈北征，驱逐建虏”，说是：“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会上，有人特别提醒袁世凯，不要当了内阁总理就得意洋洋，忘了数年之前“足疾去官”时的滋味[110]。

袁世凯和以载沣为首的清朝贵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利用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戈”并不错，但是，以“举为大统领”作条件就错了。黄兴、宋教仁等居然忘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想把一个反复无常的封建军阀捧为共和国元首，他们未免太天真，也太幼稚了。12日，黎元洪又复书袁世凯，要他“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关于政体问题，信中说：“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111) 这就是说，只要满清皇帝下台，君主立宪也未尝不可讨论。这封信原件现存，据笔迹判断，可能出于汤化龙之手。它反映了汉口失陷之后黎、汤等人的动摇态度(112)。

刘承恩、蔡廷幹的武昌之行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却摸清了革命党人方面的全部底牌。袁世凯已于12日离开湖北前线进京。13日，蔡廷幹就带着黎元洪的复信火急进京，向袁世凯报告。

四　汉阳失陷

武昌带给袁世凯的消息无疑是相当悦耳的。在清朝的内阁总理和民国的“大统领”之间，他当然愿意选择后者。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懂得，为了使革命党人就范，他还要给予更厉害一点的打击。因此，他在进京之后，迅速布置冯国璋拿下汉阳。

当时袁世凯投入武汉的兵力有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总共有三万多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还占着优势。但是在各地纷纷独立，清王朝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清军的士气很低。由于革命军已有了补充，又控制了江面，一切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方面，清军要继续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汉口虽然失守，武汉保卫战的胜败未定。由于汉阳地势最高，龟山的炮火可以控制整个武汉，因此汉阳的得失是胜败的一个关键。冯国璋在召集清军将领开会时说：“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即龟山）诸山，

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113] 会后，他命令六镇统制李纯将所部分为两队，从侧面进攻。甲队由吴金彪率领，由孝感出发，自新沟渡过襄河；乙队由马继增率领，由汉口大智门出发，自舵落口渡河。同时命王遇甲率队由汉口直渡，从正面进攻。

在军事上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取决于集中统一的指挥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而这在当时却成了革命军方面的致命的弱点。黄兴虽然当了战时总司令，但是既然是黎元洪委任的，就得听命于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孙武的军务部和吴兆麟的参谋部，与黄兴的汉阳司令部是平行的机构，意见不一致，就互相牵制。在部队中，又有主军与客军的分歧。主军很大部分是当地刚招募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纪律也较差。客军有“湘军善战”的名声，月饷却比湖北军低（后者已增为十元，前者是七元）。在客军中也存在着矛盾。先到的第一协王隆中主张立即进攻汉口，后到的第二协甘兴典不同意，并且说：“王部先期到鄂已经休息多日，第二协刚到，须有充分休息，从容准备。”王说：“你是巡防军，只能守城，不能打仗。”甘说：“你我在打仗的时候再见高低”，双方争论得很激烈[114]。

当时最主要的分歧依旧是在进攻还是防守这个战略问题上。孙武、吴兆麟、杨玺章等人认为，部队中新兵太多、炮队缺乏，不利于发动进攻，主张坚守汉阳。他们认为，兵力不应集中于汉阳一个地方，而应把大部分兵力放在汉阳北面六十里的蔡甸，因为那里是敌人从侧面进攻汉阳的必经之路。黄兴则认为，敌人的主力已移向蔡甸方面，汉口兵力较单薄，正是出其不意、反攻汉口的大好时机，因此反对分散兵力，而要全力发动进攻。在矛盾未解决、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黄兴贸然决定反攻汉口。

11月16日夜十时，在凤凰山、大别山炮队的掩护下，革命军在襄河的琴断口架浮桥三座，以湖南第一协王隆中部为右翼进攻队，湖南第二协甘兴典部为左翼进攻队，以湖北第五协熊秉坤部等为预备队，

相继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同时，派四协张廷辅部和六协杨载雄部在南岸咀一带渡河，进攻龙王庙，作为配合；派一支部队由武昌青山潜渡刘家庙，袭击清军后路。最先渡河的湖南军斗志昂扬，进攻勇猛。那天夜里，阴雨寒冷，清兵都躲在屋里烤火，到革命军进入清军防线才仓皇迎战。革命军乘胜推进，到第二天，前线已推进到居仁门歆生路一带。但是，在左翼，后继的湖北军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一听到清军猛烈的机枪声，就慌忙后退。黄兴亲自督战，也无法阻挡。这就立即牵动了全局。湖南第二协甘兴典部首先溃奔。士兵们争渡琴断口，许多人堕河溺死。而原来准备在南岸咀渡江的部队，终因清军机枪封锁没有渡成。潜渡刘家庙下游，抄袭敌后的计划也告失败。到17日下午，左翼已无一人。黄兴看到左翼已溃，就下令右翼的王隆中部撤退。“然湖南兵愤恨湖北兵之无用，皆不肯轻退，直至午后，犹独挡官军，入夜，始渐用船渡过汉水，退回汉阳”[(115)]。18日，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宋炜臣给武昌军政府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作战的情况：“清军于昨日见民军进攻极为勇敢，惶恐异常，业已预备火车，施行退却，忽民军自乱，向汉阳撤退，清军亦不敢前进追击，诚恐民军行诱敌之法，后见民军渡桥拥挤，并浮水而过，仍莫名其妙，于是逐渐前进，复占硚口、玉带门一带。”[(116)]

渡河反攻失败，挫伤了士气，又增加了总司令部与军务部、参谋部和两湖部队之间的矛盾，革命军方面的不利条件增多了。但是，这一期间，由于海军起义并回驶武汉，革命军方面的力量也有了部分增强。

在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进攻武汉的清舰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早就倾向革命。海筹号、海容号和海琛号的正电官何渭生、金琢章、张怿伯三人，编订了英文密码十二种，互通消息，准备待机发动。长江水位在夏历八月以后，下降很快，三个海字号大兵舰不能在武汉久停。11月4日，上海宣布独立。海军的重要物资都在上海。因此海军提督萨镇冰就决定秘密率舰队东下，以便海军集中一隅，不使

力量分散。途中，海琛号的见习士官阳明，把悬挂的龙旗撕下投入江中，而把秘密准备好的白旗挂了上去。这是事先得到舰长黄钟英默许的。其他军舰也都纷纷挂起了白旗。在舰上负责监视的满人吓得不敢出面，海容号满人帮带吉升投江自杀。11日上午舰队到达九江，萨镇冰离舰去上海。舰队迅速与湖北军政府取得联系并分为两队。由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率领第二舰队援鄂，其余组成第一舰队，准备下攻南京。第二舰队于19日驶回武汉，参加对清军作战，使革命军完全掌握了对江面的控制，给了武汉军民很大的鼓舞。

艰苦激烈的汉阳保卫战从21日开始。

11月17日，冯国璋向李纯部下达了进攻命令。次日，清军甲支队吴金彪部进至新沟，陆续渡河。19日，抵达蔡甸。20日，清军乙支队马继增部占领舵落口。两个支队先后完成了从侧面向汉阳发动进攻的准备。

21日，吴金彪部由蔡甸进抵三眼桥。这是通汉阳的门户，由湖南第二协防守。黄兴命新近组成的混成徒步一标祁国钧部增援，同时派去了以金兆龙等为首的敢死队和南京学生军，布设了地雷，隔桥与清军对峙。当日夜，为接应乙支队马继增部渡河，吴金彪部分兵一营进攻襄河南岸的下黄金口。革命军不支退却，清军取得了一块桥头阵地。

22日，清军继续猛攻三眼桥，被驻守桥侧汤家山的革命军炮火击退。同日，清军甲乙两支队在襄河南北两岸的上黄金口和余牙墩之间造桥，准备强渡。当日夜，蔡济民与革命军敢死队方兴等在海军起义舰队护卫下，从武昌青山偷渡，企图突袭清军后方，被发觉，半渡而返。

23日，清军屡日攻三眼桥不下，就将进攻重点转移到乙支队方面。马继增部乘夜色渡过黄金口浮桥，于黎明时进攻美娘山（四平山

第一山头）。革命军和清军之间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祁国钧率领壮士七十多名，冒着清军机枪扫射，奋勇反攻，夺得清军机枪两挺，标旗一面[117]。祁国钧两腿受十一处伤，坚持不退。湘军四十九标二营管带杨万桂，率所部二十四人，冲上山顶，一度将占领山头的清军全部消灭，但因寡不敌众，美娘山终于失去，革命军退守仙女山。

24日，吴金彪部继续列阵于三眼桥，牵制汤家山革命军，借以掩护乙支队进攻。张敬尧率军攻占仙女山，革命军退往锅底山固守。下午，革命军反攻失败，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

军政府为了挽回汉阳的颓势，决定派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步兵两标和山炮一营，由海容、海琛两军舰掩护，在23日午夜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江北五通口登陆。24日九时乘雾进攻谌家矶附近的三道桥。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可以割断清军的交通线，对清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汤芗铭所率海军炮火向清军猛轰，毁火车五辆，美孚油栈起火，使清军造成很大的混乱。冯国璋为此惊呼求救："兵力渐薄，被匪抄我后路，虽分兵抵御，如无援军速来，万难久持。"[118]但是成炳荣徒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协统的职务，实际上是个昏庸的酒徒。当晚他又喝醉了酒，没有同部队一道过江。部队到达三道桥，受清军炮火压迫，前线指挥无人，又折回青山。二十五日，军政府决定二次进攻。革命军进到三道桥时，周围水势虽退，但泥淖仍深，沿桥长达一里的沙滩，徒涉十分艰难。桥头上清军早有准备，加强了机枪和山炮火力，革命军几次进攻，都遭到很大伤亡。三百多壮士奋勇攀桥梁以渡，还是被清军机枪所阻，退到桥畔的苇丛中，相持了三个多小时。清军以火车架机枪扫射，三百壮士全部壮烈牺牲。二次进攻也失败了。

汉阳形势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都非常激愤，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11月25日，参谋部副长杨玺章、稽查部长蔡汉卿、军务部副长张振武率领学生军数百人渡江助战。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出版的《大汉报》主笔胡石庵也亲到阵地探访。参谋甘绩熙带病上阵，他披挂着书

有“临时督阵指挥官”七字的白色布带，选壮士一百零八人，夜袭磨子山，一举冲上山顶，歼灭了全部守敌[119]。26日晨，又在湘军统领刘玉堂等的支援下，攻占扁担山。在前线探访的胡石庵作《甘侯行》一首，歌颂其事。诗中写道：“墨云压天黑风吼，百八健儿衔枚走。雄师一奋万怪逃，笑把芙蓉握两手。”“人生百年一弹指，仗有浩气亘山河。”

清军用重炮轰击磨子山、扁担山，坚持在山顶的刘玉堂壮烈牺牲，两山得而复失。进攻锅底山的张振武也被清军击伤，失足掉在水里，被救起后退往十里铺。

同日，清军甲支队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四镇王遇甲部也渡过襄河，占领黑山。革命军全线溃退。湖南第一协退至武昌，第二协退至鹦鹉洲。革命军参谋部副长杨玺章阵亡。当夜，黄兴悲愤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唯一死耳！”[120]想以死殉职，在同志的力劝下退回武昌。

27日拂晓，清军攻占梅子山。随即分兵三路，一队攻龟山，两队攻汉阳。上午十一点，占领龟山。当时，革命军的精干已伤亡殆尽，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纷纷后退。从远道前来的保定入伍生和留日学生高冠英等许多人组织敢死队，投入战斗。留日士官生萧钟英看到汉阳将要陷落，组织敢死队渡江在汉阳铁厂码头登岸，持枪杀敌，遭清军猛烈扫射，全部英勇牺牲。下午，汉阳终告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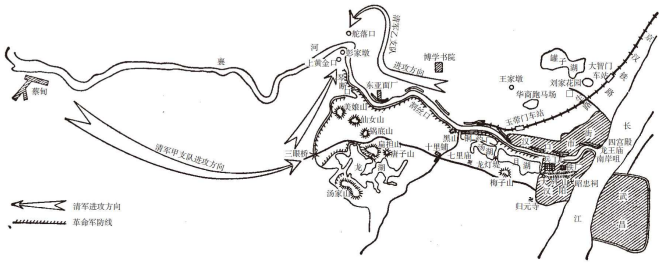
据综合战报，汉阳之战，革命军前后共伤亡了三千三百多人。

在革命军和汉阳人民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又向江中开炮。据当时报纸记载：“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121]形成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

黄兴撤离汉阳回到武昌，军政府在27日召开紧急会议。黄兴当时

悲愤万分，深以汉阳失守为愧，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进攻南京。黎元洪赞同黄兴的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强烈反对。范腾霄、张振武等慷慨陈词，表示武昌是首义之地，决心要与城共存亡。张振武拔刀起立，大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122]，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坚守武昌。革命党人虽败不馁的精神，终于赢得了后来的胜利。

当晚，黄兴乘轮离鄂。



汉阳战争形势图

五　停战议和

武汉广大军民对保卫汉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汉阳失陷，革命党人无不悲痛欲绝。"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123]。当时，武昌城内谣言繁兴，人心惶惶，居民纷纷逃避，秩序相当混乱。孙武、张振武、刘公等人派出稽查队，沿街巡逻，遇有造谣惑众者，即行拿获正法。革命党人不仅要用很大的力量维持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布置坚守武昌。

黄兴既去，黎元洪便下令以万廷献继任战时总司令。万廷献曾任南京陆军中学堂总办，思想守旧，因此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万未敢就职。同时，杨开甲也辞去总参谋长职。11月28日，黎元洪在军政府召集会议，讨论坚守武昌和总司令人选问题，孙武、蒋翊武、吴兆麟、蔡济民、刘公、范腾霄等均出席。当场决定：战时总司令一职由

蒋翊武护理，吴兆麟为总参谋长，姚金镛为副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洪山宝通寺；将沿江划分为三个防区，以窦秉钧、何锡蕃、张廷辅分任司令；海军在阳逻附近游弋，掩护武昌。与此同时，黎元洪于11月27日、28日分电独立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各都督“迅拔老练之兵，携带枪弹”，“星夜来鄂援助”[124]。各省回电均表示希望“坚守待援”，并纷纷派出援军。此后，湖南、江西、广西、江苏、上海的援军相继到达，特别是赵恒惕率领的桂军和李烈钧率领的赣军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武昌的防御力量。但是，当各军到来时，双方业已签订停战协定，开始南北议和。

冯国璋攻陷汉阳后，清廷传谕嘉奖，赏给他二等男爵，本希望他继续进攻，占领武昌。然而，当时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张勋又从南京败退，逃往徐州。北方近畿一带，也是险象环生。而清军兵力却全被吸引在京汉铁路一线，根本无法应付全国的革命形势。袁世凯有见于此，他就继续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对武昌方面又打又拉，重点放在拉的方面。

一方面，袁世凯让清军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继续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早有弃城出逃的打算，因被范腾霄、张振武、甘绩熙等阻止，第一次没有走成。12月1日正午，都督府正厅中弹起火，黎元洪就仓惶出城，逃往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那是一个小镇，能停泊小型兵舰。黎元洪准备效法瑞澂，如果武昌失守，就携带六十万两银子登舰逃走。逃往葛店的途中，黎元洪在王家店还给英、俄领事和袁世凯发信，要范腾霄“幸即送到，以解决局势之倒悬”。事实上是告诉对方，他在等待招抚。

另一方面，袁世凯又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帝国主义看到清王朝难以支撑，就积极扶植袁世凯，把他作为新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为袁世凯绞杀革命创造条件。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告诉他英国出面调停，令新任汉口兵备道黄开文同汉口英国领事商办。

就在黎元洪出逃的当天，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到武昌晤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带来了停战条件，说武昌成日受炮火威胁，百姓恐慌，领事馆已同清军商议，建议停战三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停战条件规定：从12月2日上午八时起至12月5日上午八时止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125]；双方均由各国领事监视。这时黎元洪已经离城，都督印也被他带走。于是就由吴兆麟、孙武接待，照样刻了一个印盖在协定上，停战就这样生效了。从这次停战三日开始，就导致了以后的议和。

停战议和本来是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力量、窃取政权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这一点，革命党人在当时也是有所警觉的。11月间，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给袁世凯的一封复信中就曾揭露他：“佯持中立，于汉满两面，若皆无所为”，实际上是“欲收渔人之利”；“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懈我军心”[126]。但是结果还是钻进了这个圈套。这是因为，汉阳失陷后革命党人已呈涣散状态，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同时，由于缺乏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使许多人对袁世凯抱着很大的幻想，认为只要袁世凯能够接受民国的旗号，革命就能大功告成。这样，他们就从要求袁世凯“反戈”，到接受袁世凯的停战条件，进而谈判议和，一步步迈向妥协的道路。

黎元洪在出逃途中，听到已签订了停战协定，喜出望外，第二天就从王家店动身回到武昌。总监察刘公和军务部副长张振武，因黎元洪事先不同革命同志商量，擅自弃城出走，造成混乱局面，主张通电弹劾他的失职行为，但被其他人所劝阻。通电没有发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却怀恨在心。

停战原定到12月5日期满，期满那天，仍由英领事从中斡旋，继续停战三日。到9日，英领事又转来清军关于停战十五天的条件。黎元洪把停战条件提交当时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讨论，议决停战从12月9日起到12月24日止，停战范围除秦、晋、蜀三省另议

外，扩大到全国各省，由独立各省派代表与袁世凯派的代表进行谈判。若于十五日谈判不决，再延长十五日。同时，黎元洪将停战条件分别电告各省都督，一律遵守。

枪炮声静寂了，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斗争却愈演愈烈。在汉阳失守后，武昌遭到炮击期间，四散逃走的一些反动势力，又纷纷回到武昌，结集在黎元洪的周围，用明枪暗箭、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等种种阴谋手段，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全面地篡夺权力。

这时，经各省代表决议，湖北军政府已被认为是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通过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黎元洪又从中捞到了资本，他俨然以各省民军的首领、未来中央政府的领袖自居，湖北革命党人已完全不在他的眼下了。黎元洪积极培植他的亲信势力。都督府的秘书室，在革命党人任主任的时候，只是盖盖章、收收公文而已。在黎元洪任大都督后，就扩大秘书室组织，任命自己的心腹饶汉祥为秘书主任。规定“主任秘书承都督之命，参赞中央军政府一切政务”，权力大得惊人。秘书室成为黎元洪控制一切的特殊机构。

接着，黎元洪就开始一系列排挤打击革命党人的阴谋活动。被首先开刀的就是护理总司令、文学社首领蒋翊武。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首先鼓动一些人举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并各省援军”[(127)]。而撤销战时总司令一职，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高等顾问。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谭人凤是老革命，又是蒋翊武的湖南同乡，蒋翊武心里虽有意见，也不便反对。谭人凤志大才疏，又不懂军事，遭到许多人反对。于是，黎元洪又改派谭人凤为赴沪参加各省代表会的代表，并下令恢复总司令一职，调他的亲信吴兆麟担任。吴就职后，改组司令部，以吴元泽为参谋长，周定原为副官长，李明为秘书主任，陶俊为军法处长。

在黎元洪等人的操纵和离间之下，革命党人内部的派别矛盾迅速

尖锐起来。有的党人如孙武之流更是恃功自傲、权迷心窍，积极投靠黎元洪。于是，黎元洪利用孙武来约束党人，孙武借黎元洪的权势压制党人。黎元洪派蒋翊武任江汉招抚使，给了他一笔钱作为招抚之用。孙武就诬告说，蒋翊武把钱都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元洪就派稽查队，半夜三更到蒋翊武家进行查抄。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也就表面化了。

黎元洪、孙武一帮人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文学社社员的不满，也激起了共进会下层群众的不满。许多人就酝酿“二次革命”。到1912年2月28日，终于爆发了“群英会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和以前合并于共进会的小团体群英会首领向海潜等人。他们得到文学社社员的支持，就以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武昌教导团、毕血会、将校补充团、义勇团、学生军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由向海潜首先开枪，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暴动者的内部意见很分歧，有的主张推倒黎元洪和军政府，有的主张推倒军务、内务和理财三部，有的主张只推倒孙武。黎元洪对酝酿暴动早有所闻。他与孙武虽然互相利用，但他对孙武的跋扈，也感到似背上芒刺。因此他就借此机会竭力把矛头引向孙武，放出空气说：“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即孙武）做的。”意思是他只是个傀儡而已。结果暴动就成了倒孙武的活动。挂“群英会”、“毕血会”布条的士兵控制了全城，孙武、邓玉麟等人逃奔汉口。

暴动成了革命党内部的斗争，黎元洪就从中渔利。他一面表示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并借名整理机构，改部为司，将所有和孙武接近的部长如苏成章、牟鸿勋、周之翰等全部撤免。另一方面又把暴动诿罪于文学社，斩杀数十人，暴尸示众，进行血腥镇压。

黎元洪两面三刀的战术，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力量。自群英会暴动失败后，湖北军政府就完全控制在以黎元洪为首的反动势力手中。

第四节　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独立

一　湖南

武昌起义的炮声，似阵阵春雷，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十八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而在这十四省中，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湖南。

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两省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28)]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湖南革命党人便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负责西路，焦达峰负责中路，邹永成负责南路。同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绅商学军各界人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湖南体育会，在中太平街贾太傅祠内，主要负责人吴作霖，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经常在此聚会。焦达峰回湖南时，多以此为据点。

定忠客栈，在落星田，主持人袁剑非。此处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所在地，焦达峰指派会计赵缭住此，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和洪江会会党人士。

李培心堂，在寿星街，主持人为李安国、李藩国。革命党人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

作民译社，在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经营，进行推销革命书

刊等活动。

此外，文明绣业女校、富训商业学堂、铁路协赞会、同仁西医诊所、抱真书屋以及明德、修业、广益各学堂都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

革命党人最有成效的工作是联络新军。湖南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部分：巡防营是由旧军改编而成的，分前、后、中、左、右五路，中路驻省城，其余分驻岳州、衡阳、常德各属。中路统领黄忠浩，思想守旧。湖南巡抚余诚格对新军有怀疑，遂依靠黄忠浩“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129]。新军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辖四十九、五十两标，另有炮兵队、马队，都驻扎在长沙城外近郊。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正副兵目大都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刘文锦等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接受了“排满革命”的思想，日益革命化；并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六十余人。

武昌起义后，因交通不便，湖南革命党人直到10月12日才得到正式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于武昌起义的当天就接到了警报。余诚格深恐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当天与黄忠浩密谋应变之策，决定把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四十九标一、三营开赴岳阳、临湘，五十标一、二营开赴宁乡、益阳，以分散革命力量。同时，又把原驻扎各府县的巡防营十余营抽调来长沙布防。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湖北首义的准确消息，于是焦达峰、陈作新乃策动新军代表，向余诚格提出要求说：新军“子弹过少，不能成行，如行，非发子弹三倍不可”[130]。余诚格断然拒绝了新军的要求，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约集新军代表在贾太傅祠开会，议决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届时，炮队营虽然举火，但因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各营未能发动，以致起义不成。

这时，长沙形势非常紧张。对清政府绝望了的立宪派士绅也竞相

附合于革命。这些人以谘议局、自治公所等公开机构为地盘，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极力反对暴烈的革命行动。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是这个派别的首领。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原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依靠自己的门第，年纪轻轻便已成名，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回湖南倡办学堂、实业及各项新政，成为立宪派的首领，并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国会请愿”，继汤化龙之后，于1911年担任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由于武昌起义的成功和长沙形势的突变，谭延闿遂附和革命，但认为“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大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131]。他企图在尽少破坏旧秩序的情况下，取得地方政权。

10月19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会议，再次筹划起义。立宪派士绅黄锳、左学谦亦出席，他们要求革命党人“勿扰乱秩序”，“勿杀官吏、旗人”，甚至公然提出推举黄忠浩为都督。这个意见当即遭到革命党人的驳斥。会议研究了起义计划，议定等浏阳和醴陵一带洪江会会党潜抵长沙，便于24日发难。但是，20日情况突然变化。新军第五十标代表姚运钧被捕，当标统审问他时，他直告以联络各军，准备起义。余诚格获得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限令驻长沙新军于22日一律开赴株洲；同时拟将姚运钧斩首示众。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遂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

10月22日晨，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革命党人安定超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

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

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

最后鸣放信号枪三响，起义队伍便分路出发。

由北门攻城的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展极为顺利。当他们逼近北门时，守门的巡防营全部倒戈，敞开城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因此，不到上午十点钟，他们便先后占领了军装局和谘议局。由小吴门攻城的一路，则稍费周折。当安定超抵达城门口时，发现城门紧闭，安高喊开门，城上却不加理睬，相持到中午，最后义军佯装轰城，守城的巡防营才被迫开了城门。安定超带队直奔谘议局。这时已是下午三点，焦达峰、陈作新等也都来到谘议局。他们立即指挥各路队伍，进攻抚署。深居简出的余诚格，没料到巡防营倒戈和新军不放一枪就进了城，当他听到起义军逼近抚署的消息时，吓得心惊胆落，急忙挂起“大汉”白旗，表示降服，作为缓兵之计，随后即化装潜逃，乘轮船避往上海。黄忠浩没有逃脱，被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同时，起义军还逮捕了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绶、帮办王毓江等。这几个顽固官吏，一向仇视革命，都被处以死刑。

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132]，发布“讨满清檄文”，指出此次革命是要“驱胡虏于关外，定霸图于亚洲。内洗三百年灭国之辱，外当六十国逐鹿之势”。表明革命党人不仅有“排满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企望国家强盛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檄文中还特地告诫群众说：“须知为国复仇，并非许民作乱，守万国公同之约，勿害邦交。”在军政府的告示中又强调“对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倘有不轨之徒，乘间肆行，就地立斩”[133]，等等。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避免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革命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出示维持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被压迫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同时，在上述告示中，又宣布“承认外人关于清政府之借款、赔款”，准许“一切衙署照常治事”等，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的斗争中的软弱态度。

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立宪派士绅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由于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未能得逞。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政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团体纷纷“陈列牺牲，鸣鞭赛兴”，表示庆祝。长沙城里的革命秩序初步稳定下来之后，焦达峰便委刘崧衡为南路招抚使，杨任为西路招抚使，分别赴衡阳、常德等地。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

10月25日，驻岳州新军第四十九标一、三两营起义，光复岳州。

宝庆革命党人谢介僧、邹永成等得到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联络策动驻五峰铺的巡防营管带张贯夫响应。10月30日，革命党人率领张贯夫的军队攻入宝庆城，府县官吏逃避一空，于是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11月1日，邹永成又率领军队光复新化县。

10月31日，衡阳革命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党起义，将知府禄显赶跑，光复衡阳。衡阳府所属各州县会党纷纷举义，“佥谓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134]。

10月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五十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135]。杨任遂在常德设立招抚使署，宣告光复。驻扎在当地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迫于革命党人的声威，不得不表示顺从。

与此同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郴州、桂阳州、永州各属亦先后光复。

湖南起义的胜利发展，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稳定了武汉的后方，使首义之区无后顾之忧[136]，而且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

省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各省的起义。由于长沙起义胜利，正值汉口战事日趋激烈的时刻，所以焦达峰就职之始，便集中全力支援湖北。他连日出示招募军队，会党和青年学生应募者十分踊跃，数日之间即达六万人。首先，他命令以新军四十九标各营为骨干，加上新募之兵和巡防营的部分士兵，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共五营），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10月30日，正当焦达峰、陈作新筹划派出第二批援鄂军时，立宪派策动部分军队，突然发动政变，推翻了以焦、陈为首的革命政权。

原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焦达峰和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心怀不满。当10月22日焦、陈当选正副都督时，他们就登台声明“都督是临时的”[137]，企图否定焦、陈的领导地位。此后更有计划地施展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立宪派便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谭延闿亲自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138]这样都督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立宪派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决定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都督的权力。于是，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辖六司（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外交、交通）、一院（会计检查院）、一处（盐政处），军政部下辖四处（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各司（处）长，多是立宪派。至此，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控制了湖南的政权。为了把革命党人排挤出政府机构，立宪派还从政治上打击焦达峰的威信，挑拨焦与新军的关系。他们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同时，以会党群众纷纷应召加入军队为口实，造谣说焦达峰要用会党代替新军。此外，还煽动黄忠浩所统率的巡防营军官为黄

复仇，企图借军队之手杀害焦、陈。

对于立宪派的一系列进攻，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给以有力的回击，相反，却一直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维持与立宪派的“合作”关系。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因立宪派赞成革命，而模糊了自己和立宪派的界限，天真地以为“排满革命”成功，汉族一家，失去了警惕性。当有人建议挑选可靠的新军担任都督府警卫时，陈作新不以为然，他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宫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139]。在立宪派的逼迫下，焦达峰也曾想辞去都督职务，率兵援鄂，一走了事。这一切都表明革命党人对保持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0月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回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便主张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10月30日，同盟会邀集立宪派士绅在谘议局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因而焦达峰的态度也坚决起来。次日，在全省军、政、商、学各界代表会上，焦达峰宣布了取消参议院和军政部的决定，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焦达峰以为与立宪派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便集中力量筹备派遣第二批援鄂军；然而，他却没料到，立宪派暗中加紧了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而且于第二天就发动了血腥政变。

前此，王隆中率领新军四十九标援鄂，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省城防务由原驻扎在宁乡、益阳的五十标一、二两营接替。这两营军队没有参加过长沙起义，所受革命影响较小。第二营管带梅馨更是一个只知升官发财的人，一到长沙，他就去见焦达峰，要求提升他为旅长，被焦拒绝。因此梅馨怀恨在心，立宪派又乘机挑拨煽动。10月31日，梅馨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附近，一队准备围攻都督府。然后指使一些流氓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140]，作为发动政变的引线。风潮发生后，立宪派绅士请求军政府弹压。陈作新即单骑前往视察，他刚走到北门铁佛寺，便被伏兵乱刀砍死。随后，梅馨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督署。当

时，焦达峰正和革命党人曾杰等人讨论派援鄂军的问题。曾杰力劝焦达峰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后悔自己养痈遗患，愤愤地说："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谘议局绅董，煽动黄忠浩残部叛乱，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141] 说罢，他挺身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突然枪声四起，他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二十五岁。

当晚，梅馨迎接谭延闿至军政府担任都督。谭假惺惺地推辞一番，便欣然接印治事。对于立宪派发动的夺权政变，各阶层人士表现了不同的态度。省内外的立宪派大加喝彩，湖北黎元洪表示："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142] 汤化龙拍贺电给谭说："闻公出，欣喜无量。"[143] 一部分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攻扑督署，锄元恶"[144]。在武汉作战的第四十九标官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145]。洪江、澧州等地会党群众纷纷骚动，誓言为焦、陈复仇。但是，大部分革命党人，尤其是与立宪派接近的上层人物如文斐等，则认为汉口陷落，大敌当前，湖北"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146]，而主张委曲求全。他们四出奔走劝焦，陈部下说：谭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他既革命，就要支持他。黄兴在湖北得到消息，也给湖南革命党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湖南方面不能再乱，否则其他各省就要观望。湖南当务之急是援鄂。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谭延闿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消除革命党人对焦、陈被杀害的义愤，谭延闿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他把这次谋杀案诿罪于"乱兵"，并亲自至焦、陈灵柩前祭奠，下令公署一律下半旗志哀，为焦、陈建祠铸铜像，抚恤家属，等等。同时，他又极力扩张立宪派的势力，瓦解革命力量。首先，他改

组了军政府，立宪派士绅纷纷膺任要职，排挤了革命党人。为了控制军队，他又下令解散了焦、陈招募的国民军，并将新军和巡防营改编为五个师，提拔梅馨为第五师师长。对有革命倾向的各营，则编为援鄂军，派甘兴汉率领开赴湖北前线，借以排除异己力量。经过这种种措施，谭延闿控制了长沙的形势。接着，他又把势力伸向各州县，相继推翻了各地的革命政权。

11月3日，谭延闿勾结驻常德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杀害了西路招抚使杨任，同时被害的还有参谋长余昭常及余化龙、涂鉴衡、锺杰等十余人。不久，谭延闿任命龙璋为西路巡按使，领兵一标驻于常德，将湘西各州县置于立宪派的控制之下。同时，谭延闿借故将焦达峰所委派的南路招抚使刘崧衡调职，而改委立宪派唐维藩为衡永郴桂安抚使，率军巡视南路各属，革命党人纷纷逃避，会党群众遭到残酷镇压。宝庆一带情况也是如此，谭延闿收买革命党人谭心休为“宝靖招抚使”，令其率领梅馨所部一营前往宝庆，取消军政分府，革命党人邹代烈被杀害，邹永成被迫出走。这样，湖南的革命果实便完全被立宪派所攫取了。

二　江西

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与湖北毗连的江西省立即震荡起来。在同盟会员的策动下，九江新军首先于10月23日起义响应。

九江是紧接武汉下游的第一个大商埠，也是军事要地，江防重镇。清政府派江西新军五十三标驻扎在这里。革命党人林森等曾组织了一些进步团体，借以联络新军、商团和会党，准备发动起义。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一夕数惊，全城轰动。恰在这时，革命党人蒋群从武昌抵九江，革命党人遂于10月16日秘密集会，决定分头策动新军、警察、炮台守军和各进步团体，准备起义响应。新军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是一个没有革命思想的人。当蒋群前去劝他起义时，他以实力不足为借口，表示不能发动；及至起义准备就绪时，他也附合了革

命。同时，经新军中的革命党刘世钧（队官）、顾英（排长）、何燮桂（排长）等人联络，五十三标第一、二营管带范增福、黄焕章，炮台司令徐世法，统领戈克安等都表示赞成革命，并约定在一星期内完成准备工作，即行发动。

10月23日晚，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台目陈庭训发炮三响，吹响了起义的号角。五十三标各营立即集合出发，向道府两署发动进攻。九江道保恒和知府璞良，都闻风丧胆，携眷潜逃，起义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九江城。同时，驻瑞昌的五十三标第三营也回到九江，参加革命。于是，按蒋群拟定的九江军政分府组织大纲，在道署成立了军政府，公举马毓宝为都督。蒋群帮办军务兼参谋长，负实际责任，刘世钧为参谋次长，吴铁城为总参议官，徐世法为炮台司令。九江巨绅罗大佺为民政部长，商会会长舒先庚为财政部长。林森仍在九江海关任职，负责对外交涉。不几天，革命党人李烈钧抵九江，蒋群慨然让参谋长一职给他，“一时谦让之风，人多称之”[147]。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江西新军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云南讲武堂教官及陆军小学堂总办等军职。李烈钧担任参谋长后，立即下令严密控制金鸡坡炮台，封锁长江，拦截上行船只，断绝了汉口清军的水路供应，不仅支援了武昌革命军，也使清廷大为震动。

这时，驻泊在武汉江面阳逻的清政府海军正酝酿起义。九江爆发革命和金鸡坡炮台被革命军占领，使海军的供应线受到威胁，舰队统制萨镇冰见人心倾向革命，大势已去，便以赴沪就医为名，离开舰队。海筹、海容、海琛、江贞各舰管带，推举海筹管带黄钟英为总司令，即挂白旗下驶，于11月13日上午抵九江。九江军政府派林森、吴铁城登舰联络，决定组织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以九江招商局客厅为会所。不久，应湖北都督黎元洪要求，海容、海琛各舰驶回武汉青山附近江面停泊，协助革命军作战。海军起义使革命声势大振，有力地推

动了沿江各省起义。

九江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派蒋群和刘世钧率领革命军支援南昌，沿途经鄱阳湖，内河水师闻风归附。11月1日，当革命军到达王家渡时，南昌已于前一日（10月31日）光复了。

南昌的光复，是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进行的，新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末江西编练新军，成立二十七混成协一协，协统吴介璋，下辖步队两标，第五十三标驻九江，五十四标驻南昌。同盟会派了许多会员投入新军，因此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手里。武昌起义前夕，巡抚冯汝骙怀疑五十四标不稳，就命该标移驻袁州。同时改编巡防营为五十五标，由巡防营统领庄守忠担任标统，驻扎南昌。武昌起义后，第五十五标一部分开往九江，至九江光复时，大都逃散，不能成军。因此，在南昌城郊的驻军仅有二十七混成协马、工、炮、辎各营队。武昌、九江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昌后，新军各营队及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的学生均跃跃欲试，酝酿响应。省城《江西民报》等报纸，报导武汉和九江光复的消息，把各界人士都激动起来了。冯汝骙及兵备道总办张季煜等日夜筹商应变之策，企图扼杀革命。他们调上饶巡防营统领刘懋政率所部赶到南昌，监视新军。又收缴陆军小学堂学生的枪械子弹，软禁吴介璋等。这些反动措施更加激起了新军的义愤，加速了起义的到来。这时，湖北革命党人派来的丁立中（笏堂）也到达南昌，要求党人起义，声援武汉。经革命党人蔡公时等策动，各营队官兵多赞成发动起义。骑兵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工程队官蔡杰、排长韦兆熊、米洛宾、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开会商议，决定由方先亮、蔡杰、宋炳炎担任司令，于10月31日发动。

10月31日晚，蔡森首先率队缒城而入。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测绘学堂学生及测量司学员群起响应，驱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各衙门，没有遇到抵抗。各官吏大都事先闻风逃跑，只有冯汝骙未逃脱，仍留在抚署[(148)]。当晚，上饶刘懋政率队赶到南昌，经彭程万等人联络，也归附革命。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光复

了。

第二天，军、民、商、学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一致推举吴介璋为都督，刘凤起为民政部长。吴介璋字复初，江苏无锡人，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教官，新军军官多数是他的学生，都拥护他任都督。但是，他却不肯答应，因为冯汝骙仍在抚署里，他主张请冯担任。后来，几经劝促，他才勉强应允了。于是，军政府就在高等学堂组织起来。吴介璋任命吴宗慈为都督府秘书长，夏之麒为参谋厅长，朱寿同为军务厅长，王之禄为总务厅长。并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龙旗为国旗，下令剪辫，废除作揖、跪拜等封建礼节。又决定组织义勇队，增援湖北，下令查抄反动官吏财产，以充军饷。但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却没有任何变革，而且扩军购械，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九江、南昌光复后，萍乡也接着宣布起义。新军五十五标驻在袁州、萍乡一带，他们得到九江起义的消息后，第三营队官余辉照（革命党人）便召集本标郭懋仁、周维刚等密议响应。不料被标统齐宝善发觉了，密电冯汝骙。冯正自顾不暇，复电说："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149] 新军官兵看到这个电文，兴奋异常，立即全体剃去发辫，于11月3日宣布独立。萍乡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都潜逃无踪。军民遂推第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余辉照为参谋长，在萍乡道署成立瑞临袁都督府。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张周垣（赣州法政学校监督）策动赣州独立，推巡防营统领刘槐森为都督。鄱阳光复，推黄金台为都督。革命党人蔡锐霆在宜丰发动巡防营起义，被推为袁瑞临三路都督。至此，江西省全告光复。

革命党人在推动和领导江西起义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散处各地的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都在当地积极地发动军队和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在全省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同盟会江西支部组织涣散，缺乏统一的领导，加上军队里派系斗争尖锐，致使独立后的江西一度形成了五个都督分立，各不相属的局面；而且在短短的时间

内，南昌就四易都督，政局很不稳定。

吴介璋长期担任新军高级军官，资望很高。他出任都督，得到大多数新军官兵的拥护。但是，由巡防营改编的五十五标标统冯嗣鸿则反对他。在冯嗣鸿的鼓动下，各巡防营统领联合一些新军军官暗中活动倒吴。因此，吴上台仅二月就辞职他去。冯嗣鸿等便拥戴彭程万为都督。彭程万是革命党人，原为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教官。在新旧军的矛盾斗争中，他一直采取调和态度。当上都督后，他立即派冯嗣鸿部开赴武汉援鄂，派刘懋政部开赴南京援宁。因为这两支队伍由旧军改编，纪律废弛，他担心发生兵变，乃设法乘机调开。出发前，他召集两部训话，晓以大义，并从优发给薪饷、弹药及开拔费等。不料因此引起起义新军各营的不满，因为新军原已组成义勇队，由蔡森统率援鄂。于是，新军军官秘密开会，酝酿倒彭。

彭程万本来没有实力，得悉方先亮等去九江欢迎马毓宝来南昌的消息，便自动取消都督名义，并电劝胡谦、蔡锐霆、黄金台三都督一同取消，拥护马毓宝为都督，以统一江西军政。因彭程万以身作则，胡、蔡、黄三氏一致复电赞同。马毓宝遂担任了江西都督。

九江光复后，马毓宝极力扩充自己的嫡系队伍，军事实力日渐雄厚。到南昌后，即行改组军政府，军政要职大都由他的老部下担任。又与洪江会各首领联为一气，实力更为扩大。但是，他的老部下和洪江会首领多是起义有功人员，恃功自傲，骄纵豪奢，目无法纪，他又不能加以约束，以致民怨沸腾。于是，江西省临时议会开会议决，派欧阳武等赴湖北前线请李烈钧回省当都督，并电请南京临时政府任命。前此，海军在九江起义后，李烈钧就率领赣军一部赴安庆援皖，后来武汉告急，他又统率赣皖联军援鄂。一到武汉，黎元洪就委任他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协助保卫武昌。当他接到担任赣督的任命时，正值南北议和成功，他立即统率江西援鄂军回省，接任都督。在同盟会支部长贺国昌、省议会议长刘景烈等人的支持下，他积极罗致人才，改组省政府。又裁编军队、镇压洪江会，使江西的政局迅速稳定

下来。

三　安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安庆，革命党人吴春阳（号旸谷）、韩衍、管鹏等欢欣鼓舞，立即在城内萍萃楼秘密集会，商议响应。当时，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各标营的中下级军官，有不少是革命党人。他们也都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如六十一标代表柏玉田、张保德，六十二标代表阚鼎泰、李乾玉，测绘学堂代表胡万泰、刘松龄，陆军小学堂代表夏斌等。会议推胡万泰为临时总指挥，约定10月30日晚先由六十二标举火为号，六十一标和马炮营、工程营继起响应，先攻标本部，夺取子弹，再合力攻省城。

这时，安徽巡抚朱家宝惊恐万状，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开会，磋商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办法。他感到安庆没有他可依恃的军队，便急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调驻扎在浦口的张勋所部江防营来皖。同时，又想利用新军，特意提前发饷，每人发给七九步枪子弹五十粒。但是，他对新军总不放心，随后又下令将新军各标营的弹药一律收缴存库，并调二十三营（管带桂丹墀）开赴英山驻防，以分散新军的力量。当江防营两营抵达安庆时，朱家宝自认为有恃无恐，又拟下令解散省城新军。革命党人得知这个消息，便加紧筹备起义。正在紧要关头，胡万泰却畏葸潜逃，革命党人被迫改变了原定的起义计划。但是，新军六十二标一营排长李乾玉激于义愤，单独发难，10月31日率领所部新军袭击安庆城，不幸失败。

安庆新军的起义虽然遭受挫折，但是安庆的上游九江已经建立起革命军政府，下游淞沪各地也告光复。省内各州县民军风起云涌，高揭革命旗帜，朱家宝的命令已经不能出安庆城门。

先是，武昌起义之前，寿州革命党人张汇滔、张纶、绅士王庆云等，即以办地方保卫团为名购买武器，以农会为总机关，筹备武装起

义。武昌起义后，张汇滔、王庆云等立即召集邻近各县革命党人开会，筹划响应。当时，驻扎寿州的清军共二千余人，革命的武装力量与清军不相上下，而士气高昂，则远胜清军。会上经过反复研究，确定11月15日发难，首先光复寿州。14日晚，寿州城内外革命军一齐发动，声势浩大，地方文武官吏闻风潜逃，清军慑于革命军声势，不敢出而抵抗，经过劝说，均缴械投降。第二天全城悬挂白旗，商店照常营业，寿州遂告光复。

寿州光复后，立即成立淮上军司令部，着手改编军队，最后编定步兵十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二营。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总司令。淮上军除留一部分守卫寿州外，其余分兵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很快光复六安、怀远、凤阳、蚌埠、霍丘、阜阳、涡阳等地。

与此同时，合肥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合肥是庐州府首邑，文教事业一直比较发达。1906年，吴春阳从日本回到合肥后，创办模范小学和速成师范等学校，并以此为活动基地，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会员，革命工作大有进展。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员孙万乘、王善德等十余人由沪、宁各地纷纷回到合肥，组织秘密机关部，一面联络各地同盟会员，筹组民军，一面策动清军反正。当时驻合肥巡防营管带季光恩和知县李维源，看到清廷大势已去，经几度劝说之后，终于赞成革命。11月9日，孙万乘等在合肥大书院召开群众大会，季光恩、李维源都到会。当场宣布庐州独立，组设军政分府，公推孙万乘为总司令。群众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全城悬旗庆祝军政分府成立。

在合肥独立的同一天，皖南芜湖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公推吴振黄为总司令。此外，田仲扬、田叔扬兄弟发难于临淮。方珌舟等起义于定远。程恩普、卢镜寰则组织民军联合淮上军光复颍州。总之，各州县民军四起，省城安庆“已同孤注”[(150)]。

这时，新到安庆的江防营，自恃镇压新军起义之“功”，到处骚

扰，使人心更加惶恐。谘议局议长窦以珏遂召开谘议局会议，要求朱家宝撤退巡防营，宣布独立，以安人心。朱家宝断然拒绝了谘议局的请求。之后，继任谘议局议长童挹芳、立宪派绅士洪思亮等便联合商会等团体于11月7日在谘议局开会，决定次日由谘议局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见势不妙，遂改变态度，接受立宪派的意见，企图保全地位，以待时局变化。童挹芳等也担心宣布独立后，素无纪律的江防营难于控制，便决定利用朱家宝羁縻之。于是，在谘议局立宪派士绅的支持下，朱家宝于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自为都督。

朱家宝宣布“独立”后，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11月11日，革命党人召集军、学等界代表开会，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员王天培为都督，管鹏为军务部长，吴春阳为全省经略。次日在督练公所成立都督府。王天培号元辅，安徽合肥人，留日士官生，曾任安徽陆军测绘学堂提调。他下令强剪老百姓的发辫，犯众怒。朱家宝又乘机煽动巡防营以反对剪发辫为名哄闹。因而王天培只当了几天都督，旋即离去。安庆遂成群龙无首之局。

革命党人见朱家宝手握军权，难于对付，遂派吴春阳赴江西九江请兵援皖。九江都督马毓宝即派团长黄焕章率领赣军二千抵安庆。前此，江防营闻赣军将至，便撤回浦口。黄焕章部是九江革命后临时招募的军队，军纪不佳。入城后索饷不遂，便围攻都督府，抢劫军械所、藩库以及绅商富户，全城秩序大乱，朱家宝缒城逃跑。黄焕章取得安庆军政大权，俨然成为都督。不几天，吴春阳自武昌赶回安庆，见此状，不胜愤慨，便当面严词谴责黄焕章殃民之罪。黄老羞成怒，竟当场枪杀吴。吴春阳是同盟会安徽支部的领导人，奔走革命，十余年如一日，声望甚高。革命党人闻其被害，义愤填膺，纷纷电请马毓宝惩办黄。管鹏赴集贤关，调集各地新军，拟以武力驱逐黄部。新军六十二标第一营在桂丹墀的率领下开回安庆，原驻安庆的骑兵第一营和胡万泰临时招募的步兵一营，以及青年军等，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在这时，马毓宝派九江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

来皖查办。李统率兵舰两艘及步兵一营抵安庆。安庆各界遂推李为都督。经李调解，黄焕章部撤回九江。不久，李辞去安徽都督，率领赣、皖联军支援武昌。

李烈钧走后，安庆各实力派乃联合组成“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设军政、民政、财政三部，以桂丹墀、洪思亮、黄书霖分别主持，秘书长为韩衍[(151)]，并规定一旦举定都督，此机关即行解散。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1869—1926）字少侯，安徽寿州人，清朝军机大臣孙家鼐的族孙，早年参加革命，风流任侠，曾捐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军经费，在革命党人中颇有声誉。1907年被清政府逮捕后，一直关在监狱里，及至南京光复前方出狱。12月21日，孙毓筠由上海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从此，安徽革命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军政府下设军、民、财、教育四司，以桂丹墀、洪思亮、史推思、邓艺孙分任司长。韩衍为参谋长兼青年军总监。青年军扩充为四大队，成为一支支持孙毓筠的武装力量。军政府成立后，立即誓师北伐，派段志超为北伐军司令，取道合肥抵正阳关，联合各地民军，首战告捷，败清军倪嗣冲部于颍州东乡。与此同时，为了统一全省军政，着手裁撤各地的军政分府。经过近三个月的磋商，庐州、芜湖等地军政分府先后遵令撤销，所有民军编为五个师。只有大通军政府都督黎宗岳拒不撤销，而且不承认孙毓筠的地位，并扬言袭取安庆。于是，南京临时政府遂于1912年3月命令驻浦口的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统率水陆军赴大通，迫使黎宗岳逃走，安徽遂告统一。此后不久，柏文蔚代替孙毓筠，就任都督兼民政长。

第五节　西南各省独立

一　云南

云南于10月30日在省会昆明发动起义成功，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之一，对西南各省有重要影响。

1908年春，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等相继回滇在新军中活动，不断发展势力，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革命党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革命党人李根源是该堂监督，并且是亲手创办该堂的人，以后任该堂总办。云南新军军官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在该堂任教。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至1909年始成暂编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以后编制又略有扩充。新军中陆续集聚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第十九镇参谋官殷承瓛，第七十四标统带罗佩金，第七十三标三营管带李鸿祥，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二营管带刘存厚、三营管带雷飚、炮兵管带谢汝翼、工程营管带韩凤楼、机枪营管带李凤楼等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方面学了军事，另一方面接受了革命党的宣传，走上革命道路。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时期，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政变后，追随他的老师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次年回国，曾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并抱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他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当时，反动营垒也警觉起来。总督李经羲急与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等商量对策。他们打算以赴越运械为名，将罗佩金打发走，派李根源离省城到迤西镇压张文光起义，同时拟将李鸿

祥调职，而将谢汝翼撤职。但这个如意算盘被“重九”起义彻底打碎了。

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革命党人一切准备就绪，打算夜间发动起义。蔡锷命李根源率七十三标起义部队从北校场出发，向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进攻，主要目标是军械局、五华山阵地。命罗佩金率七十四标由巫家坝出发，向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进攻，主要目标是总督署、藩库及巡防营地。命炮队统带韩国饶率炮队在大小东门及小西门与南门城墙附近安放炮位，准备助攻各据点。命讲武堂教官张开儒等率学生在城内接应，按时开放城门。原计划定于夜十二点进城发起攻击，但七十三标在向战士分发子弹时，为一反动军官察觉，一个新军排长当即开枪将其击毙。枪声一响，该标统带丁锦得警，即纠集未附起义的一营，向义军进攻。李根源、李鸿祥马上集合队伍，痛予歼击，放火烧了标本部，丁锦败逃，向督署告急。那时距预定入城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城门未开，但势急万不能等待。他们靠搭人梯翻越城墙入城，开启城门。义军一拥而入，迅即袭占兵工厂等处，以主力攻击军械局及五华山清军阵地。这时钟麟同督率巡防营、辎重营、宪兵营、机枪队及卫兵占据五华山阵地抵抗。由于他们占据有利地势，加之弹药充足，给义军造成很大伤亡。蔡锷、罗佩金直到钟麟同命令进城“平叛”，才得知李根源已先期发动。十二点，他们率七十四标入城，立即投入激战。以主力攻击总督署，另以一部助攻军械局。军械局守军四五百人，里面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是义军必夺之物。起初，李根源试图劝说守军起义，无效，只得集中主力进攻。因墙高且厚，守军火力甚猛，以致久攻不下。至10月31日早九、十点钟，义军用炸药将大墙炸开缺口，突入院内，把大部分守军赶跑并收降一部分。随后加强攻击督署，炮兵发炮轰断署内旗杆，并打中了李经羲的住室。不过那时李已逃至一个巡捕家中躲藏。督署终被义军占领。至中午时分，昆明全城处于义军控制下。与义军顽抗的钟麟同，负伤后被义军抓获处决，王振畿也被处死，只有靳云鹏在混战中伪装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许多官员均就俘。蔡锷、李根源等念

李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其余有的表示拥护革命，继续在新政府中任事，有的被遣归原籍。31日晚上，有部分反动军队的残余发动叛乱，至11月1日上午被平息。城外的马队、工程营等则相继反正。1日晚，城中又发生兵变。第二天，将乱兵正法十余人，城内秩序始趋安定。义军除留一部分担任卫戍任务外，均整队出城，返回营地。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瓛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原谘议局改为省议会，张惟聪为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并出任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

军政府一成立，即电各属，责以大义，命其反正。

云南西部腾越，于10月27日，先于省城三天，在革命党人张文光领导下起义，成立迤西都督府，张任都督，并设立民政机构。10月31日，临近的龙陵军哨官张定甲、李槐杀其管带起义响应，接受张文光节制。张分兵三路分别进占永康、永昌、顺宁、云州、云龙、缅州诸县及沿边各土司。由陈云龙指挥的一路，准备继续进兵大理。大理是云南迤西重镇，当时迤西各属已得省中电报，陆续反正，所以要求腾越方面义军不要再前进，免启兵端。但陈云龙为人凶悍，不识大体，治军无纪，终至发生激烈对抗。省军政府得知情况后，特派李根源前往调处。李根源本是腾冲人，在迤西各属素著声望。经他调处，张文光答应取消迤西都督府，李根源以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的身份，节制迤西各属。

滇南临安府新军于11月1日起义，得地方大绅、民军统领朱朝瑛的赞助。次日，成立南军军政府，推朱朝瑛为统领，新军教练官、革命党人赵复祥为副统领。

滇南重镇蒙自关道龚心湛拒绝省军政府要求反正的电报，暗调开化镇总兵率军并力拒守。同时却佯派人与临安联络，企图诱歼起义新

军，结果被义军打败，逃越南，蒙自于11月6日宣告光复。省军政府命赵复祥署蒙自关道，命朱朝瑛署临元镇，命郡绅王垂书署临安府知府。11月19日，开化镇总兵夏文炳为势所驱，举旗反正，滇南各属自此全部归服军政府。后来蒙自发生兵变，省军政府派罗佩金前往抚绥，迅速平定。

由于革命党人掌握着云南新军的大部指挥权，保证了云南起义迅速成功。

云南独立后，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政，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在这种形势下，云南军政府派兵分别入川、入黔。

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这不但因为地理上互相邻接，更重要的是，滇省财政要靠四川协济。所以四川治乱如何对云南影响甚大。当云南独立时，四川局面正在混乱中。鉴于这种形势，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月中旬组成两个梯团先后开赴川境。其第一梯团长为谢汝翼，第二梯团长为李鸿祥，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第一梯团经昭通入川抵叙府，第二梯团经毕节出泸州，两军拟于成都会师。但滇军入川后，颇露骄悍之气，引起川人不满，以至酿成流血冲突，对以后川滇政局颇有影响。

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贵州立宪派上层分子的要求下，决定要率军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怀有政治野心的唐继尧，以武力推翻贵州军政府，自任贵州都督，扶植立宪派，残酷屠杀、迫害自治学社一派的起义有功人员，使贵州政局发生倒转，这是云南军政府干的一件不够光彩的事。

二　贵州

贵州省于11月4日独立，成立军政府。

自从1906年冬张铭、简书等人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与后来成立的自治学社逐渐合流。自治学社虽是标榜“赞助地方自治”的合法组织，但因社中许多骨干来自会党头目，本有反清意识，又有革命党人加入，所以自治学社成了以革命分子为核心的结合了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东京总部曾正式承认它为同盟会的贵州支部。自治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张百麟（1879—1919）字石麒，祖籍湖南长沙，生在贵阳。青少年时期服膺康、梁；以后结交会党头目，并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逐渐倾向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后，张百麟及自治学社的革命分子，感到十分振奋，积极准备响应。张百麟把自己家里当作筹备起义的机关，频频召集会议，商量起义计划。他们很注意在军队中开展工作。当时贵州新军尚少，主要的军队是巡防营，共二十个营，分驻周围边县，只有中路四营离省城较近。常驻省城的有新军步兵一标（三营），炮兵一队，卫队不足一营，外有征兵一营。自治学社分别派定专人担任与各部联络，而把重点放在新军和陆军小学。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范起义，下令收缴陆校子弹，同时加紧新军操练。云南起义消息对贵州震动极大，沈瑜庆更加惶恐。他接受宪政预备会上层分子的建议，暗中急电兴义豪绅刘显世，要他速集防军入省城镇压革命。张百麟等人见事机紧迫，在谘议局议长谭西庚等人赞助下加紧部署。他们一面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又希望避免流血。为此，他们主动谋求与宪政预备会和解。宪政预备会是由上层士绅和知识分子组织的立宪团体，它同以较贫寒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张百麟等人认为要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和镇定贵州局势，必须取得宪政预备会的合作。自治学社有一位重要的活动分子蔡岳，与宪政预备会乃至官场人物多有私交，他极力从中斡旋。结果宪政预备会的领袖任可澄等人勉强同意协力谋求贵州反正。11月2日，两方面的领袖分子张百麟、杨昌铭、周培艺与任可澄等人会同谘议局议长谭西庚一起见巡抚沈瑜庆，劝其反正。但沈不从，他

企图等待刘显世率兵到省捉拿革命党。因刘显世不能很快到省，次日他又接受宪政预备会的老谋士郭重光的建议，准备于4日开会搞假独立。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这个计划。是日夜间，陆军小学首先举起义旗。沈瑜庆得报后，立即命新军标统袁义保及团防营统领胡锦棠前往弹压。袁义保命新军营长赵德全去执行。赵原是黎元洪部下，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因见革命形势的发展，曾劝赵德全相机响应起义。而自治学社中也早有人与赵通声气。所以，赵得命后率队到陆校，不但不加弹压，且加以慰抚，然后骗过胡锦棠，使其退兵。这时，有新军正目杨树青只身入新军标本部，敦促袁义保起义，袁不从，杨即开枪，袁逃跑了。士兵当即拥教练官、革命党人杨荩诚指挥部队。有人打电话给沈瑜庆，告诉他新军已经起义，袁义保“被杀”。沈得报，惊恐不置，忙叫卫队。卫队管带彭尔堃这时臂缠白布，表示已经反正。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交出关防印信送谘议局。谭西庚、张百麟见沈交来关防印信，立即在谘议局升起汉字大旗，门前挂起大汉贵州军政府的牌子。天明（4日）即正式宣告贵州独立。经会议推举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改谘议局为立法院。同时决定另设枢密院，总揽全省政务，推张百麟为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平刚等为枢密员。周培艺兼任行政总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下设民政、财政、实业、交通等各部，大多由自治学社骨干任部长。所以，初期的贵州军政府，基本上是自治学社掌权。

军政府成立后，即在省城十三府同乡联合会中每府选代表一人，授以委任状，饬其回属会商各界，克期反正。由于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布各地，所以大部分地方顺利反正，仅个别地方发生杀害代表的情况。

但是，在自治学社同宪政预备会勉强妥协的基础上建立的贵州革命政权是不巩固的。宪政预备会分子不甘屈居人下，觊觎全省大权。其中有些仇视革命的分子，伺机进行破坏。而自治学社许多骨干分子以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时不自安。两派貌合神离，从未真正合作。

处于掌权地位的张百麟等人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对政敌采取了过分优容的态度，甚至容纳反对革命的分子。起义前，沈瑜庆电调刘显世入省镇压革命。新政权成立后，本应将刘逮捕治罪。但张百麟未听取正确意见，竟约请刘显世加入枢密院担任军事股长的要职，使其继续掌握一部分军权。同时还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当独立各省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时，任可澄等竟私自盗用枢密院名义，暗中致电云南军政府，以交通不便和财政困难为由，请蔡锷代派在滇的贵州绅士熊范舆、刘显治为代表，资遣赴会。事情暴露后，张百麟等人对这种明显的违法篡权活动，竟未予严厉追究。尤其失策的是，新政权迷醉于结社自由的信条，竟容忍耆老会自由行动，使宪政预备会的夺权活动愈益猖狂起来。耆老会的组织者就是在起义前劝说沈瑜庆搞假独立的那个郭重光。此人原任安徽芜湖道，以贪酷被劾，后以丁忧回籍，为人极其阴险狡猾。耆老会的成员都是退职官僚和守旧大绅。初立时以吃喝聚谈掩人耳目，继而利用张百麟等人的优容，竟擅自刻关防，发布告，办团练，俨然另立政权。其所聘团防统领即旧军官胡锦棠。他们还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新政权。郭重光在立法院公然倡立“公口”（即会党）。此论一出，短时间公口林立，使政府、军队几乎成了会党活动的机关和场所，革命秩序受到极大破坏。与此同时，郭重光等人散布谣言，极力挑拨都督之间，都督府与枢密院、巡防统部之间的矛盾，在革命党人不警觉的情况下，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并使枢密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当时负责省城治安的巡防统部大权掌握在自治学社领袖之一黄泽霖手里，被政敌们视为夺权的一大障碍。郭重光献策，以卑鄙的阴谋手段，于1912年2月初把黄泽霖杀害。那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些被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作为代理都督的赵德全，竟把这次反革命事件当成“私人交涉”，袖手不管。

革命力量大大被削弱了。可是郭重光、任可澄等人自度力量仍感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又是郭重光献策，决定派戴勘

到云南去找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丑诋自治学社，请蔡锷派兵入黔。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省政局。唐继尧（1882—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904年留日学军事，毕业于士官学校。回滇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十九镇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其人颇善谋略，官阶虽不高，但在云南起义过程中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次带兵入黔，他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自治学社一位声望素著的领袖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他得知消息后，亲往军政府向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改令唐仍取川路赴鄂。但怀有野心的唐继尧从贵州宪政预备会、耆老会那里得到推其为都督的许诺之后，向蔡锷报称前队已经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继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了。唐继尧于3月初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地屠杀和迫害自治学社社员。贵州政权完全落入唐继尧及其所扶植的宪政预备会和旧官僚的手中。

三　四川

四川省规模壮阔的保路风潮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然而，四川全省独立，建立统一的新政权却较各省为晚。这同四川省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有关。该省革命党人为数甚多，但却不曾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革命斗争的发展表现了很大的分散性。四川遍地会党这种情况增加了革命斗争的散漫性。因而四川不像其他一些省那样，省会“中心起义”，然后迅即“全省光复”，而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宣告独立的。统一的革命政权的形成，经过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首先获得独立的是重庆地区。重庆是四川境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重镇，与东南各省联系较便。1906年以后，重庆同盟会分会的革命活动一直没有间断。后来重庆府中学堂成了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中心，学堂监督杨庶堪、学监张培爵，还有若干教员都是

同盟会员。

自从同志军起义后，重庆党人因见同志军大多没有明确的革命宗旨，不足以图大事，遂决心另行发动推翻封建政权的斗争。他们曾密约重庆周围州县的党人到一起商量准备起义事宜。10月间，端方过重庆，为镇压保路运动，他要添练防军，任命刚刚由广东回籍的广东巡警道李湛阳为防军统领。李与某些党人有私谊，不少党人参加了防军。朱之洪等人并乘机建议举办团练，以便建立党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张培爵则积极部署各州县发动起义。

11月5日，夏之时在成都东南简阳县的龙泉驿发动新军起义，并率队驰往重庆。夏是同盟会员，曾留学日本，在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回省后在新军中任排长，驻成都。同志军起义时，曾劝说标统周骏起事，周不从。后受命率新军一队调戍龙泉驿。夏军起义后驰抵离重庆很近的黄葛树，重庆商会不明夏的意图，想馈赠饷银，令其带兵去别处。后经党人接洽，共同策划了重庆起义的部署。这时，张培爵派党人石青阳组织敢死队，以备紧急需要；又积极联结会党和争取巡防军，最后巡防军将其手中最重要的火力——开花炮的炮栓卸下交存党人手中。至此，重庆党人已准备成熟，又有夏之时的新军支持，遂于11月22日，会集绅民，通令重庆知府兼警察总监钮传善剪发缴印，宣告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会议推举张培爵为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隆昌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熊克武等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失败，黄方等被捕，熊克武等逃走，张潜留成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应同盟会重庆地区负责人杨庶堪之约，到重庆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从此便成为重庆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军政府的副都督是夏之时。新军教练官林绍泉被任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杨庶堪、朱之洪为军政府顾问，朱兼管由原官银行改立的大汉银行。军政府内所设各部，绝大部分都由革命党人负责。军政府重新编制了军队，设三标：近卫军、警卫军和义勇军，标统均由革命党人充任。另将巡防军改编为四标和一个炮兵

营，直属蜀军总司令之下。此外设亲兵营和九门监察，负责保卫治安。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传檄附近州县，一律建立新政府；还决定裁撤江、巴两县新厘杂捐，旧有厘金也豁免五日。同时，军政府照会各国驻重庆领事，保护外侨安全。从蜀军政府的政纲、对内对外宣言，及其同入川的鄂军、滇军、黔军的关系的处置可以看出，他们较好地反映了同盟会的基本革命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革命党人，在长期的准备和实行起义过程中，始终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并得到重庆商会和新军的有力支持。

在重庆独立前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动起义。荣县早在武昌起义前，9月25日即已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权。随后有文显谟与黄万里、程石溪（又作程世溪）等人于10月11日在隆昌宣布独立。11月7日，同盟会员曹笃、方潮珍及周鸿勋等集合民军近六万人，三路合攻自贡井，以战而不胜，改取政治攻势。因盐防军多是云南人，时刚好云南独立消息传来，曹笃以大义晓谕防军，双方停战谈判，盐防军表示赞助民军起义。这时附近的富顺县也宣布反正。川南重镇泸州，在重庆独立后，同盟会员杨兆蓉等看到时机成熟，一面运动南路防军起义，一面敦促永宁道刘朝望反正。11月26日，泸州宣布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推刘朝望为都督，以地方大绅温翰桢为副都督。革命党人没有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蜀军政府颇为疑虑；刘朝望、温翰桢亦不自安；遂促杨兆蓉回泸召集会议，改推但懋辛为副都督，温翰桢改任枢密院院长，杨兆蓉，邓西林为副院长。但懋辛在重庆，不能马上赴任，又推举刚从成都出狱的同盟会员黄方为川南军总司令。

川北的革命党人在9月间各处同志军纷纷起义时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10月27日，革命党人吴从周（即曾省斋）聚民军攻下垫江县城，取得枪支弹药后，率部奔大寨坪，准备与领导大竹县民军起义的李绍伊联合。后采纳张雅南（即张观风）的建议，召来广安团练传习所师生二百余人，扩大了起义军。11月中旬，义军连连攻下大竹、邻

水、岳池等县以及川北重镇广安。21日，在广安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成立蜀北军政府，推吴从周、张雅南为正副都督，所设各部由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分子分别主持。但蜀北军政府是不巩固的。由于蜀北地区交通闭阻，经济、文化都较落后，到处会党林立，除了传统的哥老会外还有李绍伊组织的孝义会，两者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联结会党而成立的共进会在这里进行过长期活动，却未能统一会党，反而增加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不统一性。而且由于缺少同地方绅商的联系，使革命党人在城镇中的政治基础显得非常薄弱。新政权成立不久，正副都督之间，革命党与立宪派、会党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暴露。吴从周竟离职到重庆不归，其他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采取退避态度，这就便利了与绅商关系较密切的立宪派的夺权活动。最后，在成都军政府所派宣慰使张澜等人的活动之下，川北政权便完全落入立宪派手中。

在川东，还在重庆独立前，涪陵革命党人高亚衡便主动到重庆同盟会机关部请示起义方略。张培爵要他返涪就地组织邻近各县起义。高先组织民军协助长寿县于11月18日独立，然后回师返涪。20日涪陵独立。接着又发兵促忠州、彭水、酉阳等县相继反正。黔江则早于11月13日起义独立。革命党人卢师谛等在下东一带联络防军、会党于11月26日起事，奉节、云阳遂即反正。万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于11月25日起义，当即兵下夔府，27日宣布独立，自称下东蜀军副都督，接受重庆蜀军政府指导。

在重庆独立时，端方和他所带鄂军进至资州。这时他还不知道他已被任为四川总督，见民军遍地蠭起，鄂军也有不稳迹象，所以犹疑不前。鄂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离开湖北时，就有途中伺机杀端方的打算。由于端方扣压武汉来的书信电报，军中党人，很晚才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此党人更恨端方。他们于11月26日在资州发动兵变，将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杀死。鄂军标统曾广大畏惧走避，军兵共推陈镇藩为司令，率队返回湖北。

省会成都本是保路风潮的中心，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同志军从四面云集包围成都。然而一哄而起的民军，毫无训练，武器又差，缺乏统一指挥，所以不能取胜。当时奉命与民军作战的清军将领方声涛、姜登选、程潜等本是同盟会员，但他们都是外籍军人，与本省军官有矛盾，而军队内部没有开展革命工作，未能举义。

民军虽未攻下成都，但在周围各县坚持作战，给予清军以严重打击。雅安、荥经一带的民军阻止了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指挥驰援赵尔丰的清军，对成都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重庆独立后，赵尔丰陷入更加困难的地位。这时大部分立宪派对赵尔丰也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曾计划火烧总督署，发动起义。然而以偶然的意外，未能实现。结果，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与官绅周善培、邵从恩等同赵尔丰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妥协的条件共三十条，主要内容是：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军队统一交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指挥；优待旧有军政人员；各地行政官照常办事，不愿留者听自便；给报馆以言论自由；满、汉、蒙、回一律平等；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边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赵的督边兵饷、行政经费均由川人担任，并协济藏款；保护外人，禁止焚掠；安置旗民生计；等等。协定还规定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以朱庆澜为副都督。11月27日，由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革命党人对蒲、赵协定内容甚为不满，曾在西校场召集民众大会，由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董修武宣讲革命党的斗争经历和宗旨以及各省革命形势，以期提高群众的觉悟。革命党人还将蒲、赵协定内容驰告重庆蜀军政府，重庆党人在报章上逐条予以批驳。

重庆党人认为，赵尔丰仍盘踞成都，川省革命形势不能大定。他们商议组织西征，决定由副都督夏之时任总指挥，以但懋辛为参谋长兼中路支队长，以蜀军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以向寿荫为南路

支队长。林以总司令而充支队长，十分不满，竟对夏大肆咆哮，企图煽动其追随者起而夺权。革命党人窥破其野心，特召集军法会议，拟处林以死刑。经夏之时缓颊，决押送回籍（湖北），于途中把他杀死。其主要的同党均被处死。由于革命党人处理得果断、及时，这次事件，没有动摇革命政权。

成都独立后，军政府一直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在妥协基础上接管政权的蒲殿俊毫无行政经验，又无勇于任事的魄力；副都督朱庆澜是外籍人（浙江），在土客籍军官矛盾很突出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挥如意。城中新军与民军杂处，政府中新旧官吏同署办公，互不融洽，少数革命党人在其中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新政权极其软弱无力。12月8日，蒲殿俊与朱庆澜正在东校场阅兵，突然军队哗变，蒲、朱潜逃[(152)]，城中秩序大乱。这时军政部长尹昌衡急脱身出城，驰往凤凰山找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及营长宋学皋。周、宋即率新军入城平乱，城郊部分民军亦相率入城。乱平后，由军官和士绅共同商定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尹是彭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先在广西新军任职，1910年回川，初任新军教练处编译科长。他自以为不得志，每以本省军人不受重用而愤懑。后升为教练处会办，兼代陆军小学堂总办。由于他肯为川籍军官争地位，很得一批军人的拥戴；这次又平乱有功，更得到士绅和立宪派以及革命党人的好感。罗纶是谘议局副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在绅商学界颇有声望。新都督上任后，立即着手组织军政府，革命党人董修武受命主持总政处，下设秘书、法制、铨叙、统计、印刷、庶务等六处，分管各项行政。杨维被任为军事巡警总监，负责治安；周骏为军政部长。另设民政、财政、学务、司法、实业、交通、盐政、外交等部，由革命党与立宪派分任之。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十七镇为第一师，宋学皋为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二师，彭光烈为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三师，以孙兆鸾为师长。

军政府成立后，秩序较快恢复。但赵尔丰仍盘踞旧督署，擅发告

示，人们极为不满。军政府侦悉，赵暗召边军入省，妄图夺权。尹昌衡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逮捕赵尔丰。12月22日，尹派兵包围旧督署，将赵抓获，拉到明远楼下宣布其罪状，枭首示众。这是新政权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此前不久，赵尔丰屠杀群众的刽子手田征葵在逃跑途中为重庆军政府抓获枭首示众。这时，重庆军政府已停止西征，并开始酝酿全川统一的问题。

但成都的四川军政府不久就发生了新的问题，即会党问题。主要由会党群众组成的同志军，虽未能推翻旧政权，但却是打击旧政权的最主要的力量。它人数众多，功劳卓著，人们不能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尹昌衡等人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迎合会党的方法，公开挂出“大汉公”的招牌，自封为“舵把子”。都督一倡，下属百和，周骏即挂出“大陆公”的招牌。由此“公口”林立，军政秩序遭到破坏。当时重庆军政府内也有个别人主张设立“公口”，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抵制。与四川毗连的云、贵、湘三省通电承认重庆蜀军政府而称成都军政府是哥老会政府。援川的滇军甚至致电本省军政府并通电各省，主张援助重庆蜀军政府征讨成都。这时，重庆革命党人为了顾全大局，复电力予解释劝阻。

成都方面的混乱和滇军的干预，给四川的革命统一造成新的困难。滇军最初是应蜀军政府要求入川援助独立的。初入川时，与蜀军政府订有协定，彼此尚能相安。但后来滇军未能遵守不干预地方行政的规定，在川南叙、泸一带擅委官吏，建立盐政机关。而且因仇视会党而对同志军滥肆杀伐，先后杀害民军著名将领和革命党人周鸿勋、刘礼谦等多人，特别是惨杀川南军总司令黄方一事，尤遭川人愤恨。尹昌衡任都督后，派兵南下，欲以武力驱除滇军。南京临时政府和湖北军政府都大力支持重庆蜀军政府和平调解的立场。经各方协商，决定滇军离川北伐，饷项由蜀军政府担负。1912年2月，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北伐遂作罢论，滇军在索得预定供应其北伐的饷项之后才陆续退出四川。

客军退走后，成、渝两军政府的统一问题便成当务之急了。起初，尹昌衡曾打算以武力统一，经董修武等以大义劝止。蜀军政府自始就主张协商统一。1912年1月双方各派全权代表会商，协定条件十一款，然后经两军政府各自召集特别会议讨论认可，于2月2日签字生效。双方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以成、渝两处副都督之一主领重镇之任。2月中旬，张培爵西上成都，中途通电推尹昌衡为都督，自居副都督。3月9日，张抵成都，12日就副都督职，四川遂告统一。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不久夏辞职出国留学，改以胡景伊为镇抚总长。胡曾在广西任陆军协统，为人颇狡狯。广西起义时潜回四川，过重庆，被委为代表与滇军谈判。事后未向蜀军政府报告，径往成都，受到尹昌衡的重用。全川统一后，尹任命他为全川军团长。以后，尹昌衡亲征藏边，又命胡代理都督，将重庆镇抚府取消，由熊克武的第五师驻扎。四川政权便落入胡景伊手中。

四　广西

广西省于11月7日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

辛亥革命以前，广西各地的农民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孙中山为夺取广西作为革命根据地，曾亲自领导了著名的镇南关起义。此后，省府桂林于1910年8月成立同盟会支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杨明远、梁史、蒙经（民纬）分别担任学兵营、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谘议局分部长。革命组织迅速扩大，至次年八九月间，新军混成协里的中下级军官大都入盟，学兵营有一百多人，陆军小学堂五十多人，干部学堂三十多人，就连谘议局里也有十多人入盟。商会，政法学堂、师范学堂都有了同盟会的分部。与此同时，南宁、柳州、梧州等城市也先后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各地革命志士，一时风起云涌，积极展开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刘崛等立即从香港赶回梧州，策动驻军和

绿林武装于11月1日首先宣布独立，成立梧州临时军政分府，推举原道台沈林一为总长。刘崛等另设征集所，招引绿林武装，编练军队，准备出师北伐。

桂林革命党人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连日秘密集会，筹划响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于10月30日发动起义。广西新军混成协约二千人，大多数是赞成革命的。原计划30日晚由骑兵营管带刘建藩率领混成协由南门入城，陆军小学堂提调冷遹开文昌门，迎陆军小学堂学生入城，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分别由西门、北门入城，会攻抚台、藩台及巡警道各衙门。但是，由于当晚忽然下起大雨来，城内街道成河，城外道路也被淹没，不得不改期发动。当时，桂林的军权掌握在布政使王芝祥手里，武昌起义不久，他就把巡防营八营集中到桂林，防备新军。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出后，他非常恐慌，就通过各种关系与革命党人谈判，希望避免新旧军发生冲突。同时，革命党人中主张争取王芝祥和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的人也占了上风。于是，谘议局副议长黄宏宪（同盟会员）和议员蒙经等人联合立宪派议员陈太龙等，多次找沈、王商谈，分析形势，指出利害，劝其宣布独立。加上广西财政向来入不敷出，要靠湖南、广东协饷补助，湖南既已独立，广西如不独立，财政也很难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沈秉堃、王芝祥就不得不接受独立的主张。他们派人在一夜之间做了几百面黄色三角旗标语，上面写着“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等字样，于11月7日遍插全城，宣布独立。第二天在谘议局召开独立大会，到会千余人，以新军为最多。会上宣布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和当时在南宁的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沈、王都戴着清朝的红顶花翎来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当天，沈秉堃通电广西各府州县说：“桂省军民要求独立，间不容发，稍一迟徊，大乱立见，现已于篠日宣布，城市极安，除改抚院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外，一切机关用人行政均仍旧制。”“务望以保全治安为主，照常办事。”(153) 就这样，他宣告广西革命竣事了。11月10日晚，当人们庆祝独立之际，拒绝剪辫子的巡防营突然叛乱，围攻省议院，大肆抢劫，遇剪发者即

杀害。延至第二天才被镇压下去。

广西独立前夕，汉口被北洋军占领。因此，广西一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就要求沈秉堃、王芝祥派兵援鄂。沈、王即任命赵恒惕为协统，耿毅为参谋长，率领新军混成协取道长沙北上，直出武汉。

桂林宣布独立后的第二天，柳州也宣布独立。武昌起义后，柳州附近民军蠭起。在柳州的同盟会员王冠三、宋新洲、胡岱铭、刘震寰等一面组织民军准备攻城，一面劝说驻防的清军统领陈朝政反正。陈朝政表示拥护革命以后，同盟会就将民军集中于马厂，编为两个支队，以刘震寰、宋新洲分任第一二支队司令，同时在柳州中学堂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推王冠三为司令。11月9日召开各界代表会，宣布独立，改用黄帝纪年，所有军民财政都由右江国民军总机关主持。不久，成立“右江军政分府”，推举同盟会员刘古香为总长。

与此同时，南宁也酝酿独立。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宁后，人心振奋。同盟会领导人苏无涯、李应元、雷沛鸿、雷在汉、谭昌等屡次集会，密谋响应。当时，广西提督陆荣廷统率巡防营驻扎南宁，新旧军都归他节制，权力很大。同盟会领导人都认为争取陆荣廷宣布独立，“这样做的作用很大，首先是陆荣廷是清朝大员，他宣布独立就表明他和清朝决裂，不但使清朝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立境地，同时给武昌的起义军精神上很大的鼓舞，并且给南宁以至广西人民群众很大的鼓舞；其次是陆荣廷手上握有几万军队，宣布独立后，可促请他派兵北上援鄂，给武昌起义军以军事帮助”[(154)]。于是，便决定派苏无涯、李应元等为代表，直接与陆荣廷谈判。

陆荣廷（1859—1928）字幹卿，广西武鸣人。原为绿林武装的首领，长期在中越边界一带活动。1893年被广西提督苏元春招安，所部编为一营，他当上了管带。此后在镇压广西人民起义和革命党人镇南关起义的过程中，渐渐发迹显赫，历任右江镇总兵、广西提督。他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怒潮，原没有思想准备。当同盟会代表与他谈判

时，他还存有戒心，使自己的心腹谭浩明手执大刀在身旁。经苏无涯等分析形势，晓以利害，特别是在桂林宣布独立，并推他为副都督之后，他才见风使舵，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独立，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南宁副都督府。但是，他并没有如革命党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派兵北上援鄂，而是处处排斥革命党人，扩张一己的势力。谭昌等人识破了他假独立的骗局，曾计划率领新军发难，被他发觉，于是，他就下令逮捕谭昌，调兵包围新军驻地，强迫缴械。从而巩固了他在南宁的地位。

沈秉堃、王芝祥虽然当了都督、副都督，但军事实力都不足，又都不是本省人。而陆荣廷不仅重兵在手，又是本省土著，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攫取广西政权。桂林新军北上援鄂后，沈、王都感到在广西很难混下去，就相继以率队北伐为名，离开了广西。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继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率领巡防营进驻桂林就职，并下令自3月1日起裁撤各地军政分府，各府总长一律改称统领，专管军事。同时改组广西军政府，设立四司二局，任陈炳焜为军政司长，陈树勋为民政司长，严端为财政司长，唐锺元为教育司长，卢汝翼为法制局长，苏寿松为铨叙局长。是年，迁省会到南宁。这样，广西的革命果实就完全被陆荣廷这个军阀所窃取。

第六节　东南沿海各省独立

一　上海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应变中心都在上海，因而，上海光复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机关或联络点都设在官方无法直接控制的租界之内。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面最大的分支。武昌胜

利的消息传来，它所掌握的《民立报》立刻成为发布革命起义消息的权威，而望平街的民立报馆则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各方人士往来不绝。中部总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支援武汉、督促各地党人响应上，光复上海的领导责任则委托给了陈其美。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他是商人的儿子，当过学徒，后弃商就学，1906年赴日，先后肄业于警监学校、东斌学校，并加入同盟会。陈于1908年春归国从事革命活动，在这过程中，与江浙一带会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结下了较深的关系。中部同盟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为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陈其美把他主持的民声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变成了联络机关。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建立的同时，光复会陶成章、李燮和等人也在上海平济利路设立了锐进学社，由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主持。陶、李迅即他去，锐进学社因无人统筹全局，只能起到联络作用。武昌起义前夕，李燮和自湘返沪，光复会才活跃起来。李燮和（1874—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1906年离湘东渡，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去南洋爪哇。光复会重建，他任南部执行员，地位仅次于章炳麟、陶成章。李燮和在沪得到泗水华侨的捐款后，也积极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陈其美、李燮和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进行了合作。

立宪派的活动也很紧张，沈恩孚、杨廷栋、雷奋、黄炎培、史量才、狄楚青等经常在息楼（时报馆专室）、惜阴堂（赵凤昌住宅）聚议，张謇也几次到沪决策。他们的主张通过《时报》得到表现，《时报》对革命表示欢迎，丢弃了君主立宪的口号，开始宣传民主共和。但是，投入反清行列的立宪派并没有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他们决定在国内拥袁，在江苏拥程（德全），也就是说，在这政权递嬗之际，他们企图通过支持与自己有渊源关系的旧官僚来独占权力。不过，张謇等人这时的野心很大，远瞻全国，近视江苏，对上海一地的得失还不十分措意。再说，他们离开革命党人，也无法组织群众性的

起义。

然而，拥护立宪的人在武昌起义前就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因看穿清廷的骗局而投身革命党。1910年，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沈缦云（懋昭）被上海总商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奕劻却说此事“非人民所得而请求”。他愤而返沪，即出钱帮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次年又加入同盟会，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同盟会通过这个公开团体和东南地区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较多的联系。像沈缦云这样加入同盟会的，还有叶惠钧（增铭）、王一亭（震）等。

经沈缦云介绍，陈其美与上海城（南市）自治公所绅董李平书、莫锡纶、吴馨、朱葆三、穆湘瑶等拉上了关系。这批地方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自1905年以来，就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争得了部分管理民政、治安和公用事业的权力，为保护和扩大这些权力，他们愿意同革命派合作。自治公所掌握着一批有武装的商团，这些商团大多按行业、按地区组成，成员是工人、店员、学生、教师以及部分业主，总人数达五千余人。由于自治公所与革命党携手，商团就成了陈其美的基本力量。

上海学生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中国敢死团，其成员数百人决心参加起义，愿接受同盟会机关的指挥。为陈其美、李燮和等所联络的，还有刘福彪、李征五等帮会头子和吴淞、闸北的巡警，县城的巡警则掌握在穆湘瑶手中。

起义的最大障碍是上海周围的大量清军。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驻有卫队、巡防、炮兵等营，江面上还有军舰保护。吴淞一隅驻军最多，除炮台守军外，有巡防、盐捕、水师等营。为分化瓦解这些敌军，李燮和、陈其美、李平书等都派人联络士兵、疏通将领，并亲自出面周旋。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巡防统领梁敦焯、济军统带黎天才、海军舰长林建章等都相继表示不反对起义，只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顽固

不化。

11月1日，鉴于武汉战场形势的恶化和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陈其美与李燮和、李平书等商定，将原定在浙江、江苏光复后发动的起义，提前到11月3日晚进行。陈以军政府名义委任李平书为上海民政总长，并请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

11月3日午后，闸北巡警与长官冲突，警官陈汉钦率众占领巡警总局，闸北遂于下午二时首先光复。下午三时，商团、学生、敢死队在沪西九亩地誓师，陈其美率大队前往夺取制造局。县城内外也为商团、巡警所控制，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五时，陈其美率众抵制造局后，只身入内劝说张士珩及兵士投降，被张扣押。起义群众奋起进攻，二百余人冲进局门，抛掷炸弹。守敌凶猛反扑，敢死队被迫退出，一面包围制造局，隔墙对峙，一面呼集援军。各处商团、巡警、反正军队乃至市民，闻讯争先往援。4日凌晨二时，起义军再次大举进攻，在局内工人响应下，攻入局内，张士珩仍负隅顽抗。黎明前，驻局炮兵反正，架炮射击，李燮和调来的军警也投入战斗，终将制造局全部占领。张士珩逃走，陈其美遇救，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驻局办事。

3日下午，吴淞各军反正，推同盟会员黄汉湘为总司令。

占领制造局后，李平书即以民政总长身份布告安民。街头还贴出了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阐发推翻清朝统治的理由，宣布豁免境内一切恶税。宣言书对商界的背向极为关注，它强调指出："凡我江、浙、皖、闽人民商贾，均宜竭力助饷，以裕军实。盖本军政府之成败利钝，系我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汉口满兵屠杀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义师，则我人民商贾，即可同享安宁，不然则思日后之浩祸，亦当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属深明大义，谅能慷慨运输，将来共奠中华民国共和，则自由幸福实无涯既。"(155) 由于革命军的切实保护，上海市面秩序安定，"全体通建白旗，行人照常往来，店铺

照常开市，与平时毫无殊致，若未知有兵事者”[156]。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或称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兼任，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以上部长中，除伍、李二人外，都是同盟会会员。还有许多同盟会员担任着副部长、科长、科员职务。上海（南市）和闸北的市政厅则由该处自治公所改成，吴馨任上海县民政长，黄庆澜为司法长，穆湘瑶为警务长，姚文枏为劝学长，莫锡纶为上海市长，顾馨一为副市长，钱允利为闸北市市长，沈联芳为副市长。可以说，上海的权力几乎全部为革命党人和地方资产阶级所掌握，旧官僚、旧军人和会党的势力都很小。

李燮和没有当上都督，非常不满，去吴淞就任军政分府总司令，黄汉湘改任副司令。李发布宣言，声称吴淞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的军政府，吴淞只管征伐，“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157]，以此否认沪军都督府的地位。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即以主要精力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积极推动东南地区的光复。在促成浙、苏光复后，他们支援了新军在镇江、南京的起义和苏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底定东南以后，他们又推动北伐，外省各军纷纷经沪援鄂、攻徐、援皖、攻鲁。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沪军除抽调洪承点部沪军先锋队、刘基炎部沪军北伐队分赴南京、烟台参战外，还承担了总兵站的责任，供应大批军火和相当数量的军费。“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158]。总之，沪军都督府为稳定和发展革命军的胜利，作了很大的努力。

在军政府和革命党人倡导下，上海的群众运动极为活跃。上海民众为支援革命军事，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参军和募饷的热潮，显示了拥护革命政权、拥护民主共和的巨大政治热情。

起义之前，许多革命党人和青年便自动由上海奔赴武汉或他处投身革命军，起义时，不少手无寸铁的百姓也主动奔往制造局助战，到起义成功，便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参军热潮。沪军都督府成立第二天，出告示募兵，三天后即告满员，布告停募，但群众参军热并未减退，他们自行组织队伍，请缨杀敌。青年学生张雪耻等发起组织学生军，全队四百余人，随沪军赴烟台，攻克黄县。志愿决死团五百人奔赴武昌，被编为近卫宪兵。北伐先锋队一百二十人则开往徐州防备清军南下。值得赞颂的是许多女青年也纷纷编成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等竞赴前敌。她们宣言："一国兴亡，匹妇亦肩责任"[(159)]，"光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160)] 外地的同盟会员也在上海组织军队，回乡驱逐清兵，这些队伍中著名的有熊克武等组织的蜀汉军、杨曾蔚等组织的河南北伐军，河南北伐军曾在皖豫鄂边地的战斗中立下功绩。

募捐运动调动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为了接济军饷，军政府曾多次召集大会号召各界助饷，黄兴、陈其美、程德全、伍廷芳等都亲自登台动员。他们的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资本家周承弼、李云书、孙梅堂、方椒伯等纷纷认捐，并组织募捐团体，推动各行业助饷。旅沪广帮还在广肇公所开会，号召十余万旅沪粤商捐款。经营钱庄的洪念祖、胡稑芗等在沪北钱业保安团解散之际，决定将余款三千二百两银子捐给军政府。文化界的行动比富有的商人更加积极，他们组织了宣讲社、募饷团四出活动。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等发起义演助饷。圣约翰学堂、南洋中学等校的师生踊跃捐款。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邹铨、冯平、陈布雷、胡寄尘等发起书画助饷会，以墨润助饷。民立报馆的全体职工决定每月捐助薪金的五分之一。收入微薄的上海工人也投入了助饷热潮，担负着繁重的军火生产任务的江南制造局工人表现最为突出，船坞、炮厂工匠一次就捐出五百四十元钱。1912年2月，陈其美始通告停募军饷。

上海各阶层民众的热情支援，充分地说明了这场推翻清朝反动统

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是深得人心的。

从光复时起，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联合会、共和国民会、共和建设会、商界共和团、共和统一会、国民协会、女子参政会等政党、政团先后在上海出现，它们都宣言翊赞共和，但实际主张各不相同。这些党派的涌现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因革命的冲激而重新组合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民众民主热情的高涨。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在起义后实际上就公开了，并因领导骨干的聚结而成为国内的中枢，12月下旬，它开始以同盟会本部名义活动。以上这些情况以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北议和会议先后在沪开幕，都表明上海的政治地位日显重要。

上海还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乐园”，他们占据了大面积的租界。为了维护攫获的权益，帝国主义者曾想循清吏之请，将租界周围三十至五十里地方划为“中立”区，还想增派军队，以阻止革命党人夺取上海。于是，起义者不得不一开始就同这帮险恶而狡诈的人物打交道。革命党人在夺取上海时便向外人发出通告，说明革命的目的是“改良政治，使中国列入强国之内，而致世界和平”，要求外人“严守中立，以符万国公法，不得协助满政府”，他们强调指出，正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有为虎作伥的行为，革命军“不得不刻日起义，以杜接济”[161]。起义后，沪军都督府又针对帝国主义者侵占车站、控制铁路、庇护清吏、攫夺会审公廨、劫夺关税等一系列反对革命、继续掠夺中国权益的举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斗争。为了避免在反清起义过程中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斗争是在不在重大问题上让步，暂时维持旧有习惯，以待后来再行采取措施的方针下进行的。为“遏阻外国的侵略与掠夺，并以保证使未来的改革获致结果”[162]，伍廷芳还在1911年年底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身份颁行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表示要争回目下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司法权，并在革命后收回租界的行政、警察等主权。上海革命政权在对外交涉中的所有积极表现都反映了革命党人和广大民众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

立的意愿。

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一个自称“以冒险为天职”[163]的人，集豪放与逼狭于一身，敢作敢为，但又爱玩弄权术，当都督后既立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功绩，也做了些亲痛仇快的事。总的说来，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是同盟会和各种政治势力斗争中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沪军都督府和陈其美都受到政敌们特别是立宪派势力的忌恨。苏州光复后，立宪派名流唐文治、刘树森、雷奋、赵凤昌、庄蕴宽、黄炎培、姚文枏、沈恩孚、杨廷栋等便联名上书沪军都督府，名为划策，实际要陈其美将地方行政权交给程德全，理由是“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管辖，沪军都督府也就站不住脚了，精明的陈其美当然不会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诱惑。随后，程德全又采取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任命上海民政长李平书为江苏民政总长，但李不到苏州视事，反在上海通令各属，程只好赶紧宣布上海以外地方民政归自己受理，上海仍保持独立地位。软的一手不行，硬的一手就来了。陈其美被“正绅”们咒为“无赖”，沪军都督府办事，经常受到掣肘。为对付这种压力，陈其美以退为进，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三次呈请辞去都督，取消沪军都督府。1912年2月，陈又向孙中山呈请“取消”沪军都督府，呈文一出，沪军将领吴绍璘、黄郛、华振基、田应诏、姜国梁、李征五等，地方人士陈作霖、王一亭、朱葆三、沈缦云、叶惠钧、莫锡纶等，分别电请孙中山任命陈为江苏都督，回击当时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和幕后的张謇、程德全。陈的呈文更揭露说：“上海地处交通，人人得而求备，而地居下邑，事事为人阻挠。即如参议员，每省各举三人，而陈陶怡关系在沪，致欲去位；司法界借口动争地点，而姚荣泽抗不解申，几欲漏网。甚至沪上商团之驻扎，沪已批行，苏复咨驳；硝磺专卖公司沪已纳饷，苏令取消。对于沪上各机关人员，委任非专，号令不便。管辖上既无统一之权，事实上乃有冲突之势，牵制如此，无事可为。且凡百收入，均被各方面争之而去；凡百支出，均由各方面诿之而来。纵系巧妇，无米难炊，虽极肝脑涂地之诚，岂能收

戮力同心之效？”[164] 只因为上海方面的强硬态度和孙中山的慰留，搞垮沪军都督府的暗潮才稍为缓和。1912年9月，沪军都督府正式取消。此前，北京政府曾任命陈其美为工商总长，调虎离山，张謇闻讯大快，说：“陈有所归，苏之大幸！”[165]

李燮和则早于1912年1月离吴淞去宁，由杨承溥代总司令。1912年3月底，吴淞军政分府宣布撤销，由江苏接管。

二　浙江

浙江是清朝军事力量较弱而革命党、立宪派很活跃的一个省份。省内清军主力是新建陆军第二十一镇，其第四十一协近两千人驻省会杭州城郊，官兵中有大批同盟会、光复会成员。革命党人还和会党、学界、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上海同盟会机关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首先考虑到的是在浙江组织响应。10月12日，陈其美到杭州；数日后，姚勇忱又来；下旬，陈再来；不断与褚辅成、顾乃斌、俞炜、朱瑞、童保暄等会议，商讨起义的办法。他们计划先占领杭州，再夺取上海，攻占制造局，然后进取苏州，直捣南京。为此，在杭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0月末，陈其美派黄郛等到杭，召集军警学界党人代表开会，推定起义指挥官：临时总司令童保暄、参谋官葛敬恩等，一标司令官朱瑞、参谋官俞炜，二标司令官顾乃斌、参谋官吴思豫，褚辅成则担负起义后组织政府的任务。他们把起义日期定在11月3日至7日之间，到时，上海方面将给以人力、物力的支援。

浙江的立宪派人士在国会请愿和争回路权运动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曾经同反清革命运动有过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后，他们也跃跃欲试，想将政权拿到自己手中。因为同军人、会党关系很少，他们便用办民团的法子搞武装。10月间，谘议局议长陈黻宸等联合地方绅商，以“加强防卫”的名义发起组织省城民团，推汤寿潜为民团局总理，陈为副，汤尔和、楼守光、马叙伦分管上、中、

下城巡守。民团局呈请巡抚发给武器，巡抚增韫感到他们居心叵测，没有批准。这样，他们只有加紧同革命党拉关系，利用革命党的起义来谋取政权。恰好，褚辅成也是谘议局议员，他想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一同组织政府，双方一拍即合。

起义前夕，杭州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11月3日上海先期起义后，形势益加动荡。增韫手中没有足以镇压或反抗革命的亲信军队，只好另谋出路。4日，他轻装简从，步行闹市，佯作镇静，下午即召集官绅会议，商量应变之策。至夜，增韫等决定宣布独立，以避杀身之祸，然而，没等独立告示贴出，起义的枪声就响了。

上海光复的讯息一到，顾乃斌、童保暄等即决定于4日夜间起义，设立了临时司令部，以“独立”二字为口号。晚十时，一标司令官、原八十一标代理统带朱瑞集合在笕桥的队伍，宣布起义。十二点，各队出发。俞炜率前护队五队，沿铁道进艮山门，进攻报国寺军装局。朱瑞、韩绍基率本队六队，入城后占领闹市口至武林门一线，包围旗营。驻南星桥的第八十二标即第二标于十二点发动，统带周承荧经顾乃斌劝导参加起义，任司令官。顾率第一路沿铁道入望江门的铁路门，然后分两支夹攻巡抚衙门。徐卓率第二路防守抚署后卫。徐则恂率第三路占领藩署等衙门及各银行。由于城内军警的响应，各路进展神速。进攻抚署的队伍活捉卫队管带赵春霖，增韫由后院墙洞逃走，很快就被起义士兵擒获。布政使、提法使及新军镇统萧星垣、协统蔡成勋等均潜逃。

上海来的敢死队百余人，由张伯岐、蒋介石、王金发、王文庆、董梦蛟等率领，2日抵杭，分队参加了战斗。光复会女会员尹维峻，手提炸弹，助攻抚署，极为英勇。

5日黎明，杭州城大街小巷，白旗招展，除旗营外均已光复。一、二标各营及巡防队将旗营团团围住，工程营在官巷口埋设地雷，断绝了内外交通，炮队则以城隍山为阵地，用不开花炮弹轰击将军

署。署杭州将军德济，虽经革命军及增韫劝降，仍负隅顽抗，枪炮声隆隆不绝。下午，旗营自知不敌，参领贵林等逼德济投降。革命军答应保护旗民生命财产，派军入营收缴枪械，全城光复。贵林父子投降时隐瞒了一批枪械，不久即为德济告发，父子均被处死。

起义军一入城，童保暄即以浙江临时都督名义出示安民。童起义前是宪兵督队官，资望难以号召，5日晨，各军又推周承荧为浙军总司令。至于都督人选，各方均属意汤寿潜。起义前，朱瑞等推褚辅成任都督，褚说："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166) 得到大家的同意。11月2日，褚即偕谘议局副议长陈时夏赴沪迎汤。5日起义成功，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又急忙打电报催汤归杭掌权。当天下午，汤寿潜抵杭，即在谘议局以都督身份理事。他独自下了一张条子，任命陈黻宸、沈钧儒等为军政府各部部长，其中只有褚辅成一人是革命党。少数革命党人反对汤任都督，6日，起义军领导人会议，王金发提出汤曾参与杀害秋瑾，要求改选，否则就用炸弹对付汤，被褚辅成等竭力劝止，王愤而率部去绍兴。7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汤寿潜被正式推为都督。大会决定在军政府都督之下设立总司令部和政事部。政事部总管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众推褚辅成担任。后，财政部划出与政事部平行，由同盟会员庄崧甫为部长。在都督府内还设立了参议会，革命党人张恭、吴思豫、顾乃斌、黄凤之、陶成章、庄之盘、周淡游都等被举为参议，凡全省的重要政务及一切规章，参议会均有议决权。经过几次改革，革命党人将军政大权大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浙江各府县在杭州光复之后也纷纷独立。

11月5日，宁波独立。在10月下旬，同盟会员陈训正等就策动成立民团，聚集力量。11月1日，他们又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保安会。5日，保安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设立宁波军政分府，推新军第四十二协统领刘询为都督，巡防营统领常荣清为副都督，同盟会员陈训正、

范贤方、赵家艺等均任要职。次日，刘询等布告安民。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杭州已光复，在小校场誓师进取杭州，留民团、商团守城，陆军出发，旋得讯而止。

绍兴也于5日宣布光复，原任知府程赞清被推为民政长，土豪劣绅咸与维新，把持了军政分府。革命党人和群众不满意这种假光复，到杭州请王金发赴绍。王任都督后，起用了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打击豪富，颇有一番新气象。但这位绿林豪杰不懂怎样治理，兼以私德不修，很快同旧势力混到了一起，排斥异己，横征暴敛，军纪败坏，弄得城乡不安，受到舆论的谴责。

嘉兴的同盟会员在杭州光复的同时也行动起来，但巡防营统领沈棋山顽固阻挠，无法宣布独立。杭州光复，军政府即派顾乃斌率新军一营前去支援，沈棋山逃走。7日，嘉兴军政分府成立，同盟会员方于笥任民政长。

革命党人张恭、吕东升（逢樵）等在杭州光复后纷纷回乡组织起义。张恭回到金华，发动龙华会旧部，宣布独立，以朱郁荃为军政分府都督，张恭为民团团长。吕东升发动壶镇农民、会党组织光复军，11月15日入丽水，成立处州军政分府，被推为都督。

湖州、衢州、严州、台州、温州等处也先后光复。汤寿潜通告各属，宣布首先归顺的清朝官吏可以连任，但由于革命党人和地方士绅在光复前有所布置，各府政权全都握在这些人手中，在一些偏远的县份里，少数旧官吏则照旧供职。省军政府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各地主要长官作了有利的选择，除王金发在绍兴取代程赞清外，陈黻宸因不满处决贵林，辞去民政部长回乡，活动出任温州军政分府民政长，省中不予承认，另派人担任。

杭州新军除派一支队支援嘉兴独立外，又派俞炜率一支队往上海守卫江南制造局。当时南京尚未光复，上海都督陈其美倡议组织联军

进攻南京，浙江新军立即组成一混成支队，以朱端为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浙军攻宁，支队于11月12日自杭州出发，加入苏浙联军序列。

汤寿潜任都督后不久，认为大权旁落，不安于位。他上任时下了一道免除漕粮的命令，这项慷慨的“仁政”弄得全省财政困难，而他掌握的雄厚的沪杭甬路股份却不肯借贷救急，更受到舆论的责难。12月底，南京临时政府阁员商定，汤任交通部总长，即辞去都督职。1912年1月11日，各界推蒋尊簋继任都督。

当汤寿潜辞职时，曾有人提议在章炳麟、陶成章、陈其美三人中推一人为都督。陶成章在江浙光复后才由南洋回到上海，没有能施展抱负。他与章炳麟在沪设光复会总部，与同盟会仍然保持着分歧。金、衢、处一带的革命党人、会党很希望他出任都督，但他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陈其美。陈不愿放弃地位重要的上海，其下属便积极推举蒋尊簋。蒋尊簋（1882—1931）字伯器，浙江诸暨人。他是同盟会员，又是立宪派名流蒋观云的儿子，在浙江当过新军标统，在广东当过协统，颇负盛名，很容易地就为各界接受了。

三　江苏

清代，江苏省宁、苏分治，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武昌起义时，巡抚是程德全。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早年是个穷秀才，投身东北边地做幕僚，惨淡经营，升至黑龙江将军、巡抚、奉天巡抚。1910年调江苏，下车伊始，就与地方士绅张謇、沈恩孚等相结纳，博得开明之称。武昌起义后，10月16日，程邀请张謇到苏筹商对策，张代他起草了《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会同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入奏。他们要求清廷“先将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民更始”，也就是说让立宪派参预政权。随后，程一面加强戒备，防止境内发生变乱，一面通

过其僚属也与革命党人搭上关系。上海一光复，江苏失去最大的商埠、海口和军火供应地，全境震动，苏州岌岌可危。这样，程才在本地绅商和在沪立宪派、革命党代表的劝说下决定反正。

11月4日晚，上海民军五十人抵苏，入枫泾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营内，号召官兵响应。5日清晨，新军、民军入城，占领各机关，沿街布岗。民军径赴抚署，要求程宣布独立，程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167] 于是，民军呈上江苏都督印，悬挂白旗，鸣炮庆祝。程德全还命令用竹竿将大堂上的檐瓦挑去几片，以示除旧布新。同日，江苏都督（或称苏军都督）府成立，推张謇为民政部部长、应德闳为财政部部长、伍廷芳为交涉部部长、郑言为执法部部长。稍后，又任命顾忠琛为参谋厅厅长、刘之洁为苏军统领。至11月21日，成立江苏省临时议会，召集原谘议局议员到苏州开会，仍以张謇为议长。张謇的主张深刻地影响着程德全和江苏都督府的活动。

苏州光复后，松江于11月6日成立军政分府，同盟会员钮永建任军政长。同日，同盟会员秦毓鎏联合当地商会组织光复军，占领无锡、金匮县衙，成立锡金军政分府，秦任总司令。常州也于是日光复，同盟会员何键任军政分府司令。吴淞光复军这时也分兵占领了崇明、江阴，并应张謇之请，11月8日渡江入南通，以謇胞兄张詧为军政分府总司令。

在苏常光复的同时，新军第九镇分别在镇江和江宁举行了起义。

第九镇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赵声、林之夏、柏文蔚等革命党人曾在该军中积极活动，留有深刻的影响。此时，镇司令部和第十七协驻江宁，第十八协驻镇江。统制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广东番禺人，以幕僚起家，由文改武，1905年任统制后，还曾任苏淞镇总兵、江北提督，在军中颇有威信。武昌起义后，徐赴各营演说"忠君爱国"，但以顽固著称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丝毫不体谅他的苦心。张调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部旧军麕集江宁，却不

发给新军弹药。旧军不断向新军挑衅，新军群情激愤，徐则委曲求全，于10月30日率军出防秣陵关。

这时，驻镇江的五营新军正在同盟会员林述庆领导下酝酿起义。林述庆（1881—1913）字颂亭，福建闽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当过兵勇，到江宁后曾随赵声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正任第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去上海与同盟会机关接头后，又去南京，见高级军官们无心起义，便决定单独发难。同盟会员李竟成也奉上海机关之命回乡组织起义，二人便联合进行。他们很快得到了巡防营、沿江炮台和士绅们的同情。11月7日上午，新军各营集中于京岘山巡防队营房，下午四时，宣布起义，成立军政府，推林为镇江都督。新军编为镇军第一协，准备攻击城内旗营。当晚，士绅联名吁请京口驻防副都统载穆放弃抵抗，载穆同意在保全旗民生命的条件下缴械。于是镇江光复。镇军都督府以李竟成为军政部长，绅士杨邦彦为民政长，后又以陶骏保为镇军参谋总长。11月10日，从武汉退下的清军军舰十五艘在镇江江面起义，加入镇军序列。

7日晚，扬州发生孙天生领导的游民暴动，抢劫衙库、商铺，绅商派代表赴镇江请援，林述庆派徐宝山、李竟成率军前往。徐宝山（怀礼）是个盐枭，投诚清朝任新水师营管带，亦官亦匪。镇江起义前，徐向李竟成主动输诚，但要求让他事后开往扬州，并以盐款为军饷。9日，徐军抵扬，很快捕杀了孙天生，成立军政分府，徐为军政长。

7日、8日，江宁也连续发生起义。原来，第九镇出防，张人骏也没有发给弹药，士兵平均每人仅子弹三粒，而城外旧军对新军取包围态势，炮口都对准秣陵关方向。11月4日，满族军官两人怀枪求见徐绍桢，企图行刺，徐忍无可忍，才考虑起义，开会商定起义方略。6日，徐示意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江宁商会会长仇继恒等面请张人骏宣布独立，被张拒绝。这时，沪苏光复的消息传来，官兵纷纷请战，负起义指挥责任的协统沈同午怕部下自行起义，便不顾上海方面的弹药

还没运到，催徐提前于8日起义。

城内的革命党人联络了学生、士绅、旧军，准备响应。7日，湖北军政府侦察员苏良斌误闻新军当晚攻城，便发动了起义，率队进攻督署，卫队、巡防营响应，因无外援，很快失败，张勋在城内大肆搜捕。

8日黎明，第九镇在秣陵关誓师，分三路攻城。沈同午自率一支攻雨花台，傍晚，大队抵达，与清军对峙。至夜，各路均无进展，沈又命令各路集中攻雨花台，由第三十四标主攻。该标三营管带、同盟会员杨言昌率敢死队直薄敌垒，终因地势不利，未能得手。队官汉铭率部袒衣攀登东台，徒手夺取机关枪，也因后援不继，全部战死。拂晓前，士兵疲惫，弹药将尽，只好乘雾撤退。徐绍桢命令全军撤往镇江，但队伍已经溃乱，残存的官兵抵镇，被镇军收编。

苏北清江浦（清河县，今淮阴市）还有一支新军，番号为第十三混成协，属北洋系统。武昌起义后，坐镇清江的江北提督段祺瑞被调走，地面混乱。11月4日，原标掌旗官、同盟会员龚振鹏与队官赵云亭起义，率数十人入城攻道台衙门，不克。6日，新军大队攻城，士绅开城欢迎，不料新军入城后即大肆劫掠，龚、赵无法控制，起义变成了兵变。变兵很快被未附义的军队驱逐，士绅们推江北督练公所总参议蒋雁行出来主事。蒋雁行（1875—1941）字宾臣，直隶河间人，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月12日，清江召开光复大会，宣布成立江北都督府，蒋任都督，署江北提督杨慕时为民政总长，第十三协统领魏宗瀚为军政长。

北洋军人掌权的江北地区，反革命事件迭出。11月17日，清朝山阳（今属淮安）知县姚荣泽杀害了回乡发动独立的学生周实、阮式。不久，学生陈兴之收容溃兵到清江请求收编，竟被蒋雁行杀害。由于当年大水歉收，江北民变蠭起，蒋等还将手下官兵都派往各属镇压。上海报纸还揭露："江北都督有取消独立之议"，"已派人赴鲁与孙宝琦

接商军事。”(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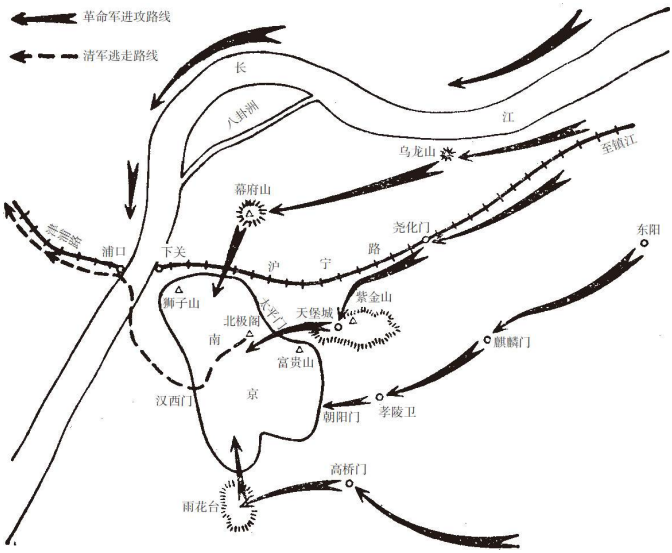
11月14日成立的徐州军政分府，情况也与江北相仿，在籍道员段书云被推为民政长，原十三协统领徐占凤任军政长。后来张勋率军逃到徐州，他们便自动取消了“独立”。

苏、常、淮、扬等处光复后，江苏重镇，只有江宁还在清军盘踞下。城内外江防军、巡防营以及旗兵还有将近两万人，对江浙已光复的地区是严重的威胁。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分电程德全、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各处联军，会攻南京，并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程、汤两督迅即复电赞同。13日，徐绍桢在镇江设立司令部，以陶骏保为参谋部长（后增顾忠琛，部长二人），史久光、于右任、范光启、伍崇仁等为顾问，孙毓筠为军事参议，陈懋修、吴忠信、马良（相伯）、郑赞丞等分任经理、执法、交通等部部长，并在上海设立总兵站。参战各军先集中镇江，先后加入联军战斗序列的有：镇军（支队司令官林述庆）三千人，浙军（支队长朱瑞）三千人，苏军（支队长刘之洁）三千人，淞军（司令黎天才）六百人，沪军先锋队（司令洪承典）六百人，此外还有松江、江阴等地的巡防营，总兵力万余人。徐绍桢在镇江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兵分四路：中路浙军，由紫金山南攻朝阳门；南路苏军，攻雨花台、聚宝门；北路淞军，攻沿江各小炮台；镇军由紫金山北攻天堡城、太平门。镇军还另派柏文蔚率镇军二支队和扬军从江北攻浦口，准备邀击逃窜的清军。19日起，各军陆续越过高资前哨。

11月24日，黎天才指挥淞军及浙军一营攻占乌龙山，乘胜前进，又于次日晨攻克幕府山，以重炮威胁城内敌军据点。25日，朱瑞率浙军主力及镇军一标、苏军巡防队越麒麟门西向，在马群与敌遭遇，歼敌千余，击毙清军悍将王有宏，进抵孝陵卫。26日，张勋率大队数千人反扑，浙、镇、苏军与敌来回争夺阵地，苦战自晨至夕，终迫张勋缩回城中，朝阳门外敌人全部肃清。同日，刘之洁指挥苏军扫清自淳化镇至上方门之敌，与浙军成犄角。27日，林述庆率镇军后续部队抵

迈皋桥、尧化门、麒麟门一线，投入战斗。28日，联军决定对江宁城发动总攻。29日凌晨，浙军埋炸药爆破朝阳门不成，仰攻失败，苏军进攻雨花台也失利，于是决定先取城外制高点天堡城，然后俯攻南京。30日晚，镇军从紫金山北坡，浙军敢死队从南坡攻击天堡城，新到的沪军先锋队也投入战斗，经过一夜苦战，终于在12月1日黎明攻克了天堡城。是役，击毙清军统领成文均，全歼七百守敌，联军也伤亡惨重，镇军管带、同盟会员杨韵珂、浙军敢死队长、光复会员叶仰高阵亡。天堡城一失，南京城全部暴露在革命军炮口之下，无法据守。张勋等派入分别向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江都督林述庆求和，徐、林允许清军投降，但拒绝了让张勋率所部转移他处的条件。当晚，张勋率部渡江北窜，张人骏、铁良逃走。12月2日，镇军与联军司令部由太平门，苏军由聚宝门，淞军由仪凤门进城，次日，浙军也由太平门入城。城内残余清军胡令宣、赵会鹏等部全部投降，张勋则在浦口受到镇军、扬军的截击，狼狈逃窜徐州。

南京光复是革命军的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它使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所有，稳定了汉口、汉阳失守以后的战局。不仅如此，这次胜利还因这座古都的历史而带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南京曾经是朱元璋、洪秀全的都城，这就使主张“革命排满”的人们特别兴奋。联军入城后，将士们络绎不绝地到紫金山阳的明孝陵去祭奠，文人墨客们也竞相鼓吹。当时，各省都督代表正在汉口开会筹组中央政府，他们迅即将南京定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联军攻克南京形势图

联军入城后，林述庆自称江宁临时都督，遭到浙军和徐绍桢的反对，几乎发生火并。经宋教仁、范光启等调解，林取消了临时都督称号，并同时取消了镇江都督府，就任北伐军临淮总司令。程德全受各方面特别是张謇等的支持，从苏州移驻南京，并任命了新的江苏都督府官员，程自兼参谋总长，顾忠琛、钮永建、陶骏保为次长，政务厅长宋教仁，外务司长马相伯，内务司长张一麐，财政司长熊希龄，通埠司长沈缦云，军务司长陈懋修，参事会长范光启。不久，程辞职，庄蕴宽被推为都督。

四　广东

两广总督张鸣岐在镇压了“三二九”起义后，7月间又命水师提督李准、陆路提督秦炳直、广州清乡总办江孔殷等大举清乡，企图消灭屡次响应革命的绿林。清兵“四出骚扰，良民受累甚多，人心日形解体”[(169)]，革命党人则“分赴各属，动以演说招人入党，谓之播种子”[(170)]。广州城也因张的倒行逆施，弄得“商业萧条，金融停滞，较三月间扰乱情形尤甚”[(171)]。武昌起义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张鸣岐

虽然强作镇静，筹谋纾策，遣将调兵，也丝毫不能挽回颓势。10月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刚抵广州，就在街上被革命党人炸死，这件事使人们愈加相信清朝在广东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了。

同盟会光复广东的工作由在香港的南方支部主持。由于“三·二九”的损失，他们没有力量在广州直接发动起义，便将注意力放在发动各地绿林、会党上。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等负责广州府方面，其他地方分为四军，东江为第一军，北江为第二军，西江为第三军，韩江为第四军，指定陈炯明、徐维扬、苏慎初、姚雨平分别负责。事实上，由于形势的急速发展，各地革命党人、绿林、学生、士兵没等建立指挥系统，便纷纷自行发动。

广州、惠州两府民军发动最为迅速。

广州方面：10月中，陆领等受朱执信之命，首先在顺德乐从墟起义，因势力孤单，被江孔殷战败。自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先后又有陆兰清等起义于南海、三水间，李福林等起义于番禺，周康等起义于顺德，谭义等起义于新会，何克夫等起义于花县，任鹤年等起义于香山，陆领也卷土重来，其他小股数不胜计。

惠州方面：10月下旬，陈炯明、邓铿等返惠起义，11月3日，各军齐集德水墟，5日，分四路进军府城，连败清军秦炳直部于马鞍墟、大石桥，8日入归善县城，9日，清军洪兆麟部起义，10日，秦炳直放下武器，民军入惠州府城（惠州、归善，府县两城相连，今为惠阳市）。与陈、邓起义同时，王和顺、石锦泉、谭瀛等也在归善、博罗、东莞、新安等地起义。

广、惠民军蠭起，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11月初，民军前锋已达广州城郊，隐伏民间。

广州城里，少数同盟会和地方绅商则一直在运动张鸣岐实行和平独立。广州《平民报》主笔、同盟会员潘达微，邓慕韩希望能以“和

平策略”光复广州，便说动江孔殷去劝张放弃武力镇压，改行怀柔政策，保境安民，张没有反对。10月25日，在江的策划下，邓华熙、梁鼎芬等绅士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同时，张也奏请清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并特赦党人汪精卫、陈景华。商界、学界不满绅士们摘的“独立”，29日在爱育堂集会，决议承认共和政体。下午，当各团体在文澜书院再次开会时，有人就在门口竖起了白旗，旗上大书“广东独立”，各商店则悬旗挂灯，鸣鞭炮庆祝。傍晚，又有两万多民众拥向督署，请张鸣岐宣布独立。独立，共和，人心所向！可是，张鸣岐晚间得到清军在武汉获胜的消息后就变了脸，命令龙济光派兵将旗灯扯去，巡街捕人，声言如敢反抗，格杀勿论。

当时，城内外驻有李准、龙济光等部四十余营巡防队，张鸣岐满以为可以凭此负隅顽抗。谁知，他请李准入城会商军务，李却因兵权被张削减，赖在虎门不来。不但如此，李还设法很快同香港同盟会机关挂上了钩，答应献出虎门反正，必要时用兵力制服张鸣岐。张派江孔殷抵御顺德方向的民军，江回来报告，说民军声势浩大，无法战胜，劝张早定大计，免蹈凤山覆辙。龙济光部亦告不稳，龙本人因李准的串通，向张表示没有可以反对民军的理由。军心一变，张鸣岐在广州就站不住脚了，他通过江孔殷向邓慕韩等表示愿意交出政权，邓等坚持“欲免广东糜烂，非将大权交与革命党人不可”[(172)]，他也同意了。

11月8日，张鸣岐召集各界代表在谘议局讨论独立问题，胡铭盘代表张参加，决定次日独立。9日上午，各界代表再在谘议局开会，到会者数千人，推同盟会员陈景华为主席。决议：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所有向日官吏，愿留为新政府服务者听，惟必须宣誓忠于中华民国；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等等。同时决定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蒋尊簋为军事部长。陈景华等当即将印信送与张等，这时才发现张已于黎明前逃往沙面，龙亦不允就任。于是，又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胡到任前，

以蒋尊簋为临时都督。

广州，这座中国资产阶级开始革命活动之日就想夺取的城市，终于摆脱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消息传出，万众欢庆。十二点钟，长堤水师公所首先高悬国旗、军旗，鸣炮志贺。各兵船、衙署、局所，一律同时升旗鸣炮。城内外各商店都挂起三色旗，有书“中华民国万岁”者，有书“民国军万岁”者。爆竹如雷，欢声雷动，人们纷纷剪去辫发。入夜，四城大开，一些兵船、商店还用电灯结成欢庆字样表示庆祝。“三二九”以后那种沉闷、紧张、萧条、破败的景象，顿时一扫而空。

10日，胡汉民自香港抵达广州，就任广东都督。胡任命蒋尊簋为军政部长，魏邦平副之；李煜堂为财政部长，廖仲恺副之；黎国廉为民政部长，伍藉槃副之；王宠惠为司法部长，汪祖泽副之；伍廷芳为外交部长，陈少白副之；梁如浩为交通部长；王宠祐为实业部长，利寅副之；丘仓海为教育部长。随后又以何启、韦玉为总顾问官，并由朱执信、李文范、李纪堂、廖仲恺、黄世仲、陈少白、陈融、刘古香、胡毅生、姚雨平、谢良牧等组成枢密处。17日，各界代表会又增选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

军政府首先面临的困难是财政问题和军队问题，它们直接威胁着革命政权的生存。

张鸣岐等逃跑时席卷而去，官库极度匮乏，军队给养、政府开支均无来源。为此，军政府只好向商人借款，广州、香港商人均踊跃垫支。李煜堂即通过杨西岩、陈赓虞等借得港商款四十万。军政府还将库存官钱银局纸币一千二百万，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发行，使商会同意通用。这样，初步度过了财政危机。

军队问题更为复杂。广州和平光复，城内外留下大批反正军队：新军、防营、绿营、旗营，这些军队，特别是龙济光、李准所部，军

心并不稳，而民军也纷纷入城，号称十万，与反正各军矛盾很大。针对这种情况，胡汉民决定采取“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而张民军之势，以压迫降军与防营”[173]的策略。不久，李准即因怕民军寻衅报仇出走香港，胡即命胡毅生、李文范等成立全省军务处，管理旧军；随后，又将龙济光部调往钦廉剿匪，这样，军政府的心腹大患才消除了。

随后，民军也成了军政府棘手的问题。多数民军纪律松懈，将领桀骜不驯，社会上甚为不满，但他们有功革命，一些将领更是革命“元老”，不能简单处置。胡汉民先后任命刘永福、黄世仲为民团总长，进行整顿和编练，以维持军风纪，统一军令，都收效甚微。为了严肃军令，胡撤了兰字营镇统陆兰清的职，枪决了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才使不法分子稍为收敛。后来陈炯明当都督，采用强制办法，整编、遣散、消灭，才将民军问题解决了。

军政府还赶走了政府内的反动分子黄士龙。黄原任新军标统，在高州听说省城光复，便赶回来谋取高位。他不满足于当参都督，竭力挑拨胡、陈关系，企图去陈制胡，没有生效，接着又提出都督分治、统一军队，阴谋掌握军权，又被胡、陈挫败。最后，黄利用防营和民军的矛盾，劝龙济光率军叛乱，被龙拒绝了。黄见自己真面目已经暴露，而军政府又日趋稳定，只好逃走，不久，就投靠了袁世凯。

解决内部困难稍有眉目，军政府就组织了广东北伐军，北上扫荡清军。北伐军全军八千人，以姚雨平为总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自12月8日起，分批开往上海，转赴前敌。随军前去的有华侨炸弹队、学生地雷队和女子北伐队。这支军队后来在津浦路前线与清军张勋部进行过英勇的战斗。

广东其他地方则在广州独立后不久全部光复。潮汕地区，张醁村、梁金鳌、孙丹崖等率民军于11月10日光复汕头，12日光复潮州，诛清知府陈兆棠。嘉应（梅州）地区，同盟会员温翀远等率民军

于12日入城光复。肇庆地区，同盟会员曾传范运动驻肇清军管带隆世储宣布独立。高雷地区，同盟会员林云陔等率民军起义，苏慎初率新军反正。钦廉地区，黄明堂率民军起义。韶关地区，当地学堂师生和绅士出面运动独立。海南地方，清琼崖道范云梯随大势宣布独立。

12月21日，孙中山归国过香港，胡汉民率陈炯明、廖仲恺等大批同盟会骨干赴港请示方略。孙中山要胡随同去沪组织民国政府，胡当即辞去都督职务，命令陈炯明代理都督，陈遂回省就职。12月24日，广东临时议会在广州成立。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汪坚辞，所以仍由陈担任。

出席广东临时议会的，有同盟会员庄汉翘等十名女代议士。妇女出任议员是民主共和政体带来的福音，这在中国和远东都是创举。

五　福建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福建革命党人立志复仇。1911年6月，同盟会福建分会在福州开会，决定加紧活动。为加强同内地党人的联系，林斯琛奉派前往上海和长江各埠联络。史家麟、潘祖彝等在上海参加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发起。在福州，分会会长郑祖荫则以省谘议局常驻议员的身份出现，通过公开团体桥南公益社在社会上联络各界，暗中扩展同盟会组织。武昌起义后，官府十分惊慌，社会秩序混乱，同盟会分会便趁机全力以赴地筹备起义。他们在学界、商界都有良好的基础，掌握有民团、体育会，但与军界关系有限。这时，分会成员彭寿松从武汉归来，立即发起组织福建军警同盟会，吸收新旧军官兵和警察参加革命。福建因过去由湘军驻守的关系，湖南人在军警界势力很大，彭是湘军将领之后，曾任省城保甲局总办，便利用这种身份广为招徕，使军警同盟会迅即发展到近万人。新建陆军第十镇是驻闽清军的精锐，闽浙总督松寿却不信任新军，将新军弹药收存于旗界，革命党人便设法争取新军将领。10月30日，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至桥南公益社宣誓加入同盟会。11月5日，该镇统制孙道仁也由彭

寿松主持加盟。争取到新军官兵之后，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11月4日，上海等地光复的消息传到福州，城里商店停业，居民走避。福州将军朴寿一面派旗兵分防，一面也偷运家财，预备逃跑。5日，同盟会在城外白泉庵召集军事会议，成立由郑祖荫等组成的总机关部，以桥南社为发号施令的总机关。同日，郑祖荫、林斯琛代表同盟会与新军将领许崇智、林肇民等在台江舟上会晤，秘商起义军事方略，议定在花巷设立国民军司令部，以许为前敌指挥官，节制所有新军，起义时，先占领于山，放火为号，先烧都统、将军二署，后烧旗下街，留东门不攻，给旗兵一条生路。起义日期，定在11月12日。6日，彭寿松又往台江会见孙道仁，孙决心全军反正。

7日下午，谘议局开会，经副议长刘崇佑提议，一致决议：所有福建之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8日，谘议局照会松寿，要他交出权力，并缴出旗兵的枪械弹药。由于敌人的实力并未全部瓦解，这种和平接管的愿望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松寿顽固地反对交权，命令所部整顿备战，预定次日直扑桥南社，消灭革命力量的首脑，并组织杀汉队，妄图施行种族屠杀。面对这种情况，同盟会总机关和起义军司令部紧急决定于当晚起义，以武力消灭顽抗的敌人。

当天，武备学堂和福州各校学生齐集桥南社，分编为炸弹队、洋枪队，炸弹队入城随军攻守，洋枪队占领和守卫城内外重要单位。9日零时，新军出动，迅即占领于山，在其北面山腹布防，装置大炮。彭寿松率炸弹队攀登而上，与新军会合。旗兵以法政学堂为中心点，据民房作战，并派人四处放火，以阻止革命军的进攻。新军和炸弹队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前进，旗兵不支退却，死伤数百人。革命军树大旗招降，旗兵纷纷逃亡。松寿闻败，吞金自杀。晚，朴寿写降书请求停战。10日黎明，旗营挂起白旗，革命军正准备受降，不意突出数百旗兵，直扑于山，劫夺大炮，双方短兵相接，拼死搏斗，许崇智等将领也亲上火线，终将敌人杀退。朴寿头天晚上求降后即行逃跑，被炸弹队活捉，拘押在司令部，这时，他乘清军反扑逃出，被抓回即行正

法。松寿、朴寿死后，旗兵零散的反抗迅速被消灭；大批旗兵投降，受到革命军的优待。

11月11日，同盟总机关由桥南移入城内。郑祖荫等率新军、学生军和同盟会员列队前往旧督署，沿途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各商店悬旗庆祝，爆竹争鸣。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由同盟会分会推举职员，孙道仁为都督，同盟会员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黄光弼、李恢、刘通等十人为参事员，协同都督掌握政权。同日，选定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并决定各部正副部长十人人选。至12月8日，又决定将参事会改为政务院，任命彭寿松为政务院总长，林斯琛、郑祖荫为副长，高登鲤（原谘议局议长）、陈能光、陈之麟（华侨）、林之夏、郑烈、黄展云、黄乃裳、翁浩分任各部部长，林森、萧奇斌、林长民、蔡良垣、潘祖彝等分任次长。此外，还保留了省谘议局，作为都督府的咨询机关。福建都督府虽吸收了立宪派人物参加，但实权牢牢掌握在同盟会手中。

福建都督府宣布自身只是一个过渡性政权，“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蕲至共和为旨”[174]。它强调“共和政体之精神，首在三权之分立”[175]，为不使“政府骄横渐成无对之尊”[176]，它积极筹设省议会，并决定改正清朝的审判制度。孙道仁还下令豁免厘金及1910年以前旧欠钱粮，改良租税，以利民生。外交部长陈能光致书本省和外洋各商会，要求他们支持新政权，他谴责了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表示“他日‘国际条约’终有修改之一日”[177]，鼓励商人、侨胞为此努力。新军整顿以后，以许崇智为闽军北伐总司令，于12月率杜持一协北上。这支军队后由杜持率领赴山东烟台，在那里和清军作战。

福州起义前后，福建各地革命党人和民众也在积极准备夺取当地政权。都督府成立后，命令各地原有地方官和民众团体、自治所一同维护地方治安，等待省方派官员接管。这样，福建大部分地区，如兴化（治莆田）、福宁（治霞浦）、延平（治南平）、建宁（治建

瓯）、邵武、泉州（治晋江）、漳州（治龙溪）各府，都是在革命党人、民众或官吏宣布、承认光复后兵不血刃地接管的，只有厦门、汀州（治长汀）两府由革命党人起来夺取了政权，而经过比较激烈战斗的仅仅汀州一府。

厦门地方革命党人力量较强，同盟会员张海珊、光复会员王振邦在此积极准备光复。11月8日，清厦门道庆蕃逃走，10日，福州光复，王振邦等见形势已成，去找厦门自治会会长陈子挺商量光复问题，陈不赞成武装起义，同盟会骨干乃自行决定于15日起事。到15日，他们召集了群众大会，宣讲革命宗旨，然后率领数千群众列队向道台衙门进发，吏胥奔逃一空。次日，厦门军政分府成立，张海珊被推为统制。厦门革命党人因籍贯不同而分成福州、厦门两派，张属于人数较少的福州派，不久即遭到王振邦为首的厦门派的攻击，发生内讧。省方派参事员宋渊源安抚闽南，出面调解，由省中派出道尹、司令驻厦，另设参事会，聘请当地革命党人和绅士参与政务。

汀州府与省会相隔虽远，但在广东影响下，早有革命党人在活动。11月19日夜，上杭在同盟会员涂演凡（广东大埔人）等的促进下宣布独立。次日，游勇樊彪部侵扰上杭，为保卫治安，涂等向大埔革命军请援。大埔已于13日由革命党人光复，组成军队向汀州发展，18日光复永定。24日，大埔民军司令李宗尧派童国珍率部抵上杭，成立军政府，以童国珍为军政长，收缴了清军枪械。同日，会党温开元也率所部民军入城，与童部冲突，26日，李宗尧到杭，当晚消灭了温部。但是，知县龚开富以孙道仁有令保守地方，拒不交印，绅士们也与军政府离心离德，加以军政府禁烟禁赌，地痞流氓也蠢蠢欲动，革命政权并不稳固。27日，府城长汀的同盟会员约集当地清军宣布独立，被守旧派阻挠，也请李宗尧派军前往。30日，民军到达，成立军政府，以教员刘家驹为民政长。军政府要清军移交军政权并缴出枪械，清军拒绝，恰好樊彪率部窜汀，二者便勾结谋叛。12月4日，民军仓促应战，激战四昼夜，不支突围，李宗尧出走，刘家驹等三十余

人被害。长汀失败后，上杭反动势力愈加嚣张，12月18日，龚时富勾结民团、地痞流氓袭击民军，杀害了童国珍等四十余人，上杭革命势力失败。1912年1月，孙道仁始派军赴汀州接管政权，但是汀州的反动势力并未受到应有惩处。

福建都督府成立后，军警同盟会与同盟会福建分会于11月21日合并，郑祖荫将分会会长职让于彭寿松。彭一手掌握党政大权，日渐骄横跋扈。他只依靠原军警同盟会的一帮人，对清朝官僚马绛生尤其言听计从。很快，就因权力问题与孙道仁、许崇智发生矛盾，彭没有军队，便组织卫队两营，由其子统领。其侄彭荫祥要挟都督府授予延建邵道尹职务，下属三府均由亲信担任，割据一方。同盟会元老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也被彭疏远，虚居其位。原来军警同盟会的人，成分复杂，不守法令，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弄得民怨沸腾。为了制止舆论的反对，彭指使其部下刺杀了同盟会员蒋筠、黄家宸，封闭报馆，逮捕主笔苏眇公。这样，社会上的反对更加强烈，守旧分子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些力图维护革命政权和同盟会威信的人，也为之束手。

彭寿松在福建起义中立有大功，后来牺牲在反袁斗争中，但是他个人权势欲很大，更不懂得怎样职掌政权。他的胡作非为，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动摇了革命政权的基础，使得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有借口插入福建。

第七节　北方各省响应

一　陕西

陕西，是北方地区最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个省。

早在1907年，同盟会员井勿幕等从日本留学回国，就在西安展开革命活动。他们联络的对象就是新军和会党。陕西的会党有很大的势

力，主要有哥老会和“刀客”两种。特别是哥老会，在新军中势力很大，在各标营中建立了和军队编制相适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这些“舵把子”分别联系和掌握所属的“哥弟”。1910年夏天，同盟会员井勿幕、钱鼎、朱彝铭、常仲昭、张钫等人，同哥老会头目张云山、刘世杰、万炳南、陈殿卿等人，在西安城南大雁塔举行歃血的仪式，结成“三十六弟兄”，奉行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在西安的同盟会和会党领导人钱鼎、张钫、张云山、万炳南等于10月17日秘密集公，相约在10月29日举事响应。西安将军文瑞和护理巡抚钱能训，惊恐万状，调巡防营进城防守，大事搜捕，并决定在10月23日将革命力量最强的新军第二标第三队和第一标第二队调离西安，以分散革命力量。革命党人钱鼎得到这个消息，以事机紧迫，于10月22日上午九时在西关林家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天发动起义，推举张凤翙担任指挥，钱鼎为参赞。张凤翙字翔初，陕西咸宁人，留日士官出身，曾参加同盟会。在这以前他并未参加革命活动，因为他是新军协司令部参谋兼代二标一营管带，地位较高，有威信，遂受到大家推举。张凤翙慨然应允，“并谓既已举事，当先发制人，不宜缓至天晚也”[178]。于是，起义便在上午十一点发动。因为发动仓卒，事先没有来得及拟定完整的军事进攻计划，也来不及通知外县。除了同盟会人数较多的炮队等是整队入城外，其他都是三三两两分散进城的。进城后合力进攻军装局，夺取了枪支弹药后，就分头占领了各个衙门机关。抚署卫队闻警即作鸟兽散，全城文武官吏纷纷逃命。文瑞逃进了西安城中的满城，钱能训和其他官吏都逃到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钱能训后来被拿获，升允在混乱中出城，逃往甘肃。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全城。第二天黎明，就全力猛攻满城。文瑞率领旗兵拼死抵抗，到下午三时城破，文瑞投井自杀。

攻占西安后，急须出安民布告，但首领的名义还未确定。革命党

人听说湖北起义军有“复汉军”之称，大家就仿其意，定首领名称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并推举张凤翙担任。这时，同盟会会员、原陕西谘议局副议长郭希仁已写好了一张布告，全文是：“各省皆变，驱逐满人，上征天意，下顺民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179] 这张布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陕西起义军的思想。

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陕。各州县革命党人、会党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0月23日，临潼哥老会首领焦林、黄生荣率领会党占领县署，宣布光复。24日，同盟会员胡定伯在耀县药王山起义，响应西安。哥老会首领向紫平光复富平。25日，三原、商州光复。次日，王士骥率陆军学生赴咸阳，联合当地民团，光复咸阳。接着，凤翔、黄陵、华州、同官、雒南、宝鸡、洛川、邠县、兴安等地都相继光复。

西安起义时，新军的建制已完全打乱。一些同盟会会员，虽然在新军中担任中下级军官，但都不能起指挥作用。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把自己一帮哥弟抓在手里，加上其他愿意参加的人，各自形成了人数不等的部队。哥老会大头目一转瞬间都成了拥有实力的人物。全西安已成为哥老会的天下，他们也自认为军政府的最高权力应归他们，因此纷纷争当大官。大头目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各树一帜，各自占据一个衙门作为山头，发号施令。当议定各人官位名号时，意见横生，互不相让。同盟会员陈同还当了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的谋士，煽动争权。各头目之间感情几致破裂。后经郭希仁调解，讲述“中外大势及古今英雄起事成败之由，及近世洪杨之失”[180]，才消除分歧。结果除大统领外，又设了两个副大统领，六个都督，都是哥老会的头目[181]。副大统领钱鼎是同盟会兼哥老会，字定三，陕西白河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09年回陕，在新军中曾任督队官，是有革命胆识、顾全大局、热情能干的领导人，可惜在一次率队东征时，在渭南意外地被土匪杀害。

正当起义者还在为建立新政权而争吵的时候，清军分为东西两路发动进攻了。袁世凯命赵倜率河南清军数营从东面进攻，11月4日，就占领了潼关。同盟会员张钫奉命前往抵抗，沿途收集各县团防，冒着大风雪与清军激战，在刀客严纪鹏等部的配合下，夺回潼关。潼关三得三失，战斗十分激烈。张凤翙、吴华堂等都亲率援军前来支援。当时更大的战斗发生在西路。清廷起用升允为陕西巡抚，升允督率甘肃清军数十营，11月20日长驱入陕。一时醴泉失守，咸阳告急。陕西境内土匪蠭起扰乱，所有电线杆都被毁坏，与外界消息隔绝，起义军孤军奋战。新建立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许多哥老会头目挺身而出，与革命党人团结战斗。张云山慨然承担抗击长、武、乾、醴方面的升允所部清军，于28日指挥三营军队进驻乾州，再由邠州至长武，连战告捷。升允暂时退出陕境。万炳南自请承担防截凤翔方面的敌军，率兵三营至凤翔，分兵防堵陇州、宝鸡一带敌军，屡战不利，退守凤翔待援。战事一直进行到南北议和达成才停止。哥老会哥弟们虽然在与清军拚死搏斗中，表现很英勇，但是，这个主要由失业破产的劳动人民组成的集团，由于缺乏明确的革命思想和严格的纪律，又沾有一些坏的习气，在事变过程中对人民也造成一定的危害。他们所夺得的政权，后来很快被旧势力所篡夺。

二　山西

陕西光复后八天，10月29日山西也宣告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脱离清廷。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山西留日学生有一百多人加入同盟会，组成山西支部。王用宾、景定成等人先后创办《晋话报》、《晋阳公报》，进行革命宣传，影响颇大。山西人民的革命意志日渐昂扬，参加同盟会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山西编练新军时，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因而新军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同日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害怕波及

山西，极为惊慌。他一面抽调旧军巡防营进驻太原，警卫抚署；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企图把驻扎在太原的新军调走。太原新军是新成立不久的第四十三混成协，共四千余人，协统是谭振德，下辖步兵两个标。八十六标驻在城内，标统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八十五标驻在城外，标统黄国梁不是同盟会会员，但是该标的同盟会员数量较多。陆钟琦以防止陕西革命军入晋为借口，调八十五标去扼守河东。黄国梁率领一、二两营不带弹药已经出发。同盟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第三营，以没有弹药为理由，不肯出发。陆钟琦不得已发给了一部分弹药。三营管带姚以价虽非同盟会会员，但有革命思想，领到弹药后的当晚，就和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苗文华、于凤山、刘得魁等人密议，决定第二天黎明起义，并推姚以价为总司令。起义军分兵三支，埋伏于南门外，拂晓夺门而入，一支由姚以价率领进攻巡抚衙门，一支由苗文华率领进攻满城，一支由崔正春率领进攻军装局。同时，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八十六标的部分官兵也起而响应。起义军很快地攻占巡抚衙门，陆钟琦、谭振德等被当场击毙。新军炮营把大炮架在城墙上，向满城轰击，只发几炮，旗兵便竖起白旗投降，太原就告光复。

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推举都督。原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梁善济主持会议，开始公推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都督，姚力辞不就，遂改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温寿泉（同盟会员）为副都督，谘议局副议长杜上化为总参议。设军政府于谘议局。当天出示安民，发布起义宣言和讨满檄文，均用中华民国黄帝纪元年号。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并介绍赵戴文、康佩珩、赵成三、徐翰文等加盟。回国后，历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八十六标标统等军职。武昌起义后，他曾与赵戴文、张瑜、乔煦等密谋响应。张、乔都是同盟会员，分别担任八十六标一、三营管带。但是，阎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及至姚以价率领起义军攻入城内，他才命令

所辖各营以保护为名，分别开向抚署、藩库及军装局，并派兵防堵驻城内的巡防营。他出任都督得到新军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地位一直比较稳固。

姚以价由于发动起义有功，被派为陆军总司令，率兵三营进驻娘子关，以防清军进攻。

清廷得到陆钟琦被杀的报告，就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吴是同盟会员，当时他曾企图联络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部夹攻北京。清廷已有所闻，派吴出任山西巡抚，企图以此笼络吴。吴禄贞在11月5日密约阎锡山、温寿泉和姚以价等在娘子关会晤，议决成立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任副都督兼副司令。但11月7日晚，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燕晋联军的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清廷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派北洋军第三镇一协、巡防营两营进攻山西。姚以价率军抵抗，在乏驴岭一带节节败退。娘子关失守的消息传到太原后，谘议局议长梁善济邀集立宪派士绅集会，准备欢迎张锡銮，阎锡山被迫于12月13日急忙离开太原，撤往晋北。接着，温寿泉与景定成、王用宾等革命党人一起也撤往河东，并请求陕西革命军支援。陕西革命党人派陈树藩部渡河入晋，攻占运城，遂即成立了以温寿泉为首的河东军政分府，张士秀为民政长。

太原起义后，雁北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同盟会员续桐溪（西峰）、弓富魁等在五台县东冶镇起义，组成“忻、代、宁公团”，续桐溪担任团长，所部三千人，声言出平型关，以奇兵攻北京，连克繁峙、应州、怀仁，所过之处，势如破竹，于12月5日抵大同。在此之前，大同已于11月30日光复。同盟会员李德懋、刘幹臣等早在1907年就在大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0年正式成立了支部。太原起义后，大同附近各州县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驻扎大同的清军总兵王得胜派兵四出镇压。革命党人刘幹臣、宋世杰、李国华等趁城内空虚之

际，于11月30日夜晚发动起义，一举占领全城，王得胜逃跑，城内清军步一旗在大势所趋之下，全部加入起义军。翌日，成立大同军政府，推举李德懋为都督，李国华、刘幹臣为副都督，宋世杰为虎贲将军，统领全军。军政府成立后，即编练民军，准备防御清军反攻，同时派人向忻代宁公团和太原请求援助。以后不久，袁世凯派郭殿邦指挥毅军和淮军各一部围攻大同，大同军民在续桐溪的指挥下坚守四十余日，最后与清军议和撤出。

阎锡山从太原撤出后，经忻州北上，集合朔方诸军共计八千人由府谷渡河，穿过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于1912年1月13日到达包头。前此，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塞北后，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的巡防营由管带周维藩率领起事。其中曹富章等几个头目率兵二百余撤至包头，包头的同盟会员李士修等便与之联系，想依靠这支队伍宣布包头独立，响应武昌起义，结果遭到官吏的镇压而失败。阎锡山进驻包头后，便以“秦、晋、蜀北伐先锋队司令官”的名义布告安民，并分别任命蒙古族同盟会员云亨、经权、安祥三人为绥远将军、归化城都统、归绥道尹。一星期后，阎军东进，于21日进入萨拉齐。原计划进攻归化城，因南北议和，即南返太原。

南北议和时，袁世凯借口山西兵变，拒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经山西革命党人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力争，孙中山当即电袁：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和议破裂，在所不惜。袁被迫复电承认。不久，北洋军从山西撤退，阎锡山返回太原，继续当都督。温寿泉因阎回省，遂宣布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从此山西全省统一。

三　直隶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统治的心脏直隶，曾出现对革命十分有利的形势。

山西起义后，清廷赶忙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兵前去镇压。吴禄

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清末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1902年回国后被派创练新军，先后担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东三省军事参议、吉林延吉边务督办等职。1910年出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扎保定。他曾秘密参加同盟会，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往湖北，他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陆军大臣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依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密谋，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正在这时，清廷又命令他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他急忙赶赴石家庄，亲自至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一面筹划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令十二协停战，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吴禄贞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汉口停战。清廷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假言传旨嘉奖，并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冯国璋虽然握有重兵，但尚在鄂北、豫南一带，忙于与武昌革命军作战，京津并无重兵防守，如果当时吴禄贞、张绍曾与山西革命军协力行动，夹击北京，清廷就会顷刻瓦解。

但是，吴禄贞志大气豪却疏于警惕，当他得悉袁世凯派周符麟到石家庄谋杀他时，仍不加戒备。周符麟原为第十二协协统，被吴禄贞撤职，因而怀恨在心。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被周符麟收买的马步周率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其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周符麟官复原职，第六镇又置于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张绍曾虽然倾向革命，却缺乏斗争性，满足于向清廷提出要求君主立宪，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吴禄贞被刺后，他便消极起来，直到被清廷撤职了事。这样就丧失了在近畿起义的大好时机。接着，清廷任命原四十协协统潘矩楹接任二十镇统制，潘是袁世凯的爪牙。他奉命把二十镇分

别调往奉天、锦州、沟帮子、葫芦岛等地驻防，仅留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所部一二三营驻滦州，借以分散军中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人仍坚持发动起义，以配合南方的斗争。他们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推汪精卫、李煜瀛为正副部长，下辖军事、文书、财政、司法、外交、实行各部。彭家珍为军事部长，不久吕超继任，彭即以暗杀为己任。由于汪精卫从刑部狱中被放出来后，便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因此，一些不愿与汪精卫共事的北方各革命团体，如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共和团、共和革命党、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则与同盟会员胡鄂公、白逾桓、白毓昆等联合起来，在天津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该会“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182)]。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与北方革命协会虽然有矛盾，但基本上还是合作的。从1911年11月至1912年1月，革命党屡起屡仆，多次发动起义。

11月下旬，革命党人张雨岭、南琴轩在张家口组织总司令部，准备起义，因从天津运送军火时被查获，李飞仙、秦宗周等七人牺牲，起义夭折。

12月18日，为牵制北洋军进攻山西，革命党人在任丘发动起义。起义军大都是保定各学堂的学生和任丘、雄县一带的农民，共五百余人。他们一度攻占任丘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派清军两营前往镇压，起义军被迫转移到雄县，清军围攻雄县，城陷，靳广隆等百余人遇难。

在革命党人白毓昆、孙谏声及凌钺等人的积极策动之下，驻滦州的七十九标官兵于1912年1月2日宣布起义，成立滦州军政府，推举第二营管带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管带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滦州知州朱佑保为民政部长，凌钺为外交兼司法部长，

陈涛为前敌总指挥，张良坤为秘书长。军政府成立后，布告安民，“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183]。次日，召开全军誓师大会，按原计划，当晚十时向天津进军。临开拔时，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起义军被迫退至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行至雷庄与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发生激战。起义军英勇抵抗，苦战一昼夜，弹尽援绝，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白毓昆等均遇难。白毓昆被捕后，临刑犹唱绝命诗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此身虽死了，千古美名传。”[184]

滦州起义失败不久，革命党人蔡德辰等在通州张家湾组织司令部，联络学生和退伍毅军三百多人，组成敢死队，拟从通州进攻北京。未及发动，1月15日便被袁世凯破坏。蔡德辰、王丕承、杨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张雅堂、王斌等七人被捕。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还组织了刺杀袁世凯的活动。在通州革命机关被破坏的第二天，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钱铁如、吴若龙、杨禹昌、罗明典、郑毓秀等十多人在北京行刺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当他走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扔下炸弹，炸死炸伤袁世凯的卫队长等十余人，袁世凯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

先是，袁世凯逮捕通州革命党人蔡德辰之后，立即电询已南下参加议和的汪精卫。16日，袁接汪复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185] 袁便以此电为据，诬蔑革命党人为“土匪”，于17日下令斩决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三人于北京，斩决蔡德辰等七人于通州。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袁世凯的窃国阴谋。

由于起义不断失败，革命党人李煜瀛、白逾桓、胡鄂公等五十余人于1月27日在天津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并决定29日在天津发动起义，计划攻占督署，一举光复天津。29日夜，革命党人集合各地志士数百人，在白逾桓、胡鄂公的指挥下，分兵九路猛攻督署和金钢桥等要地，与敌人激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少甫、韩佑治等十余人战死。

以后，革命党人曾酝酿再度起义，由于南北议和告成，未能发难。

四　山东、河南

辛亥革命前，山东革命党人曾以创办学堂等方式，开展革命活动。但是一直没有掌握武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在济南的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亦积极策划响应。他们和一些立宪派议员及学生代表等连日在谘议局集会，议论响应办法。在11月7日的会上，各界代表发言甚为踊跃，议论颇激烈。发言的大意是："山东当时所处的境况非常险恶，必须急谋应付之策，这是谘议局的责任，而现在的谘议局，非但不能造福地方，而且勾结官府，是最大的障碍。"接着，遂宣布该局种种腐败恶劣罪状。群情更加激昂，齐声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186) 于是全场一致通过。

推翻谘议局的消息，立即轰动全城。各界代表认为必须另有组织，以代替谘议局。于是，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便成立起来。但是，联合会在一些立宪派士绅和官僚的控制之下，迟迟不肯宣布山东独立，而仅仅要求山东巡抚孙宝琦答应不出兵帮助清政府、不许抵押借外债而已。因此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他们遂策动第五镇一些下级军官逼迫联合会和孙宝琦宣布独立。

在军民要求独立的压力下，联合会于11月13日召开大会，讨论山

东独立问题。巡抚孙宝琦和第五镇的一些军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晚上九点，目的就是要逼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世代都是清朝的大官僚，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都有儿女姻亲。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会赞成革命的。但是，在当时群情沸腾的情况下，他只好勉强表示：大家既然都认为独立好，我也不坚持。于是联合会就推他为都督，第五镇统制贾宾卿为副都督。孙宝琦被迫当都督不到半个月，急得须发皆白。他一面电奏清廷说："仰恳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为遥制，俾免另生变端。"一面积极与袁世凯勾结，策划对主张独立的人进行镇压。这时袁世凯已到北京组阁，立即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赴济南，策动取消山东独立，以稳定北方的局势。北洋第五镇的协统、标统如吴鼎元、张树元等，都是袁世凯的旧部，就立即公开转向反动，他们首先联名写信给孙宝琦和联合会，要求取消独立；后来就架起大炮示威。于是，孙宝琦于11月24日又宣布取消独立，同时把巡抚印信交布政使胡建枢，一面电请清廷罢黜治罪，一面称病避入医院。张广建、吴炳湘、聂宪藩等分任军政要职，掌握了山东的大权，就大事逮捕革命党人。

济南取消独立后，革命党人纷纷转移到登州黄县、烟台各地发动起义。同盟会会员杜潜、张雨臣、王耀东等在烟台领导起义，先用枪劫持清军统领董保泰，迫令防军全营缴械。兵备道徐世光逃走。起义者就在道尹公署召开大会。舞凤舰舰长王传炯能说会道，假充革命，就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他与孙宝琦等暗通声气，他大权在握，就对革命党人发动围攻。

1912年1月14日，同盟会会员徐镜心等联络关东绿林军千人在登州（蓬莱）登陆，占领全城，推连成基为山东都督兼总司令。连成基率领部队攻克黄县、潍县、即墨，后又为清军打败。

山东党人向南京临时政府请求支援。孙中山派海筹、海容等军舰开赴登州，又派刘基炎率沪军一部、杜持率闽军一部增援，同时委任胡瑛为山东都督。山东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到南北议和，山东大部分

地区仍被反动势力所控制。停战后，袁世凯派周自齐为都督，又用收买、解散等手段，使革命部队全部瓦解。

河南省地处要冲。武昌起义后，河南革命党人便立即筹划响应。辛亥前三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杜潜等到开封成立革命机关，扩大组织。开封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学监刘纯仁等教育界人士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骨干分子。1910年成立同盟会支部后，刘纯仁代理支部长，乃更加积极地联络绿林武装、仁义会、新军下级军官及青年学生，灌输排满革命思想。因此革命势力迅速扩大。至次年春天，就议定分甲乙丙丁四部进行起义准备：甲部策动新军防营，由刘纯仁、杨源懋等负责；乙部策动学校教员学生，由王杰、杨铭西负责；丙部发动各州县仁义会党，由王天杰、岳秀华等负责；丁部组织绿林武装，由王天纵、刘镇华负责。每部刊刻将军大印一颗，何部起义，即称何部将军，待成功后，再推都督。

武昌起义，陕西继起响应，河南巡抚宝棻奉命派标统张锡元率领第二十九混成协第五十八标和骑兵、炮兵各一队，开往湖北，抵抗革命军。不久，又派五十七标标统王钰锡率所部开赴潼关，抵抗陕西革命军。河南革命党人感到如不迅速起来响应革命，就无面目见天下父老。因此急切准备起义。10月中旬，刘纯仁在开封法政学堂秘密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镇华、刘炳阁、吴沧洲等二十余人。会议决定，立即策动二十九混成协留守开封的宪兵、骑兵、炮兵起义，准备推举协统应龙翔为都督。本来同盟会在新军中已建立了一些联系，由于袁世凯再起，一些倾向革命的下级军官多踌躇不前。应龙翔这样的高级军官更断然拒绝附合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被迫改变计划，决定赴洛阳、嵩县一带，依靠王天纵的绿林队伍，攻取洛阳，以震动开封，威胁南下清军后路。

王天纵原为嵩县绿林首领，因杀人越狱，逃往上海，加入同盟会。后返回嵩县联络绿林，与李永魁、柴云陞、关老九等结为“十兄弟”，聚众万人，声势煊赫。清军屡剿屡败，无可如何。武昌起义

后，黎元洪曾派人与之联系，王天纵即在嵩县羊山寨召集部众，宣布起义，自号“丁部大将军”。当刘纯仁、刘镇华抵嵩县后，王天纵便挑选精壮千余人，与刘纯仁等一起向洛阳进军。因走漏风声，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率所部防守洛阳，刘纯仁企图说服周符麟反正，惨遭杀害。王天纵率所部南下，攻占南召、镇平，与湖北北伐军先锋队司令马云卿会师于南阳城下。马云卿，原为南阳仁义会首领，1903年因被清政府通缉，逃往武昌，入新军当兵，先后参加日知会、共进会和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参加敢死队，奋勇攻击总督衙门。胜利之后，与刘凤桐、樊钟秀等招募在武汉的河南人，组成北伐先锋队，出兵鄂北豫南，连克枣阳、新野、唐县。马云卿与王天纵会师光复南阳后，推王为河南临时都督兼北伐左路总司令，王率所部占领宛西各县，驻兵老河口。马云卿驻扎南阳。南北议和休战期间，袁世凯部下吴庆桐率兵偷袭南阳，城破，马及其参谋长刘凤桐同时遇难。

刘纯仁牺牲后，河南同盟会支部由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张钟端主持。他在开封联络军警学生及各州县仁义会成员准备于11月4日发动起义。这时，巡抚宝棻已调回北京，袁世凯派其亲信齐耀琳接任，以加强对河南的控制。3日晚，革命党人正在优级师范学堂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巡防营包围了学堂，革命骨干数十人被逮捕，齐耀琳指令巡警道邹道沂、营务处商作霖当夜酷刑拷打，各志士慷慨不屈，均被判处死刑。5日，张钟端、张照发、王天杰、刘凤楼、徐振泉、单鹏彦、张得成、李干公、王梦兰、李鸿绪、崔德聚等十一人，惨遭杀害。张钟端，字毓厚，河南许昌人，1905年以诸生考送留学日本，入中央大学。旋加入同盟会，参加创办河南杂志，鼓吹革命。当齐耀琳指令营务处商作霖及警道府县会审时，张钟端慷慨直言说：“方今人心思汉，胡运将踣，武汉振臂，全国景从，我豫管毂南北，举足轻重，此间同志四百余人，谋据省垣，共图大举……成则促鞑虏之命，败则为共和之魂。”商作霖问：“同党共有几人？”答曰：“满奴汉奸外，皆是同党。”[187] 就义时年仅三十四岁。

张钟端等被杀害后，革命党人刘积学等逃往上海，请求沪都督陈其美筹拨枪弹，组织北伐军，打回河南。当时旅居上海的河南留日学生五十余人都积极支持刘积学的倡议。于是，就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很快组成“威武军”，以张国威、张鹗翎、盛典型（安徽人）分任正副司令，召募士兵数千人，由南京渡江入皖，分兵两路，一路至颍上，一路进抵信阳。不久，南北议和，威武军即被解散。

五　新疆、甘肃

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先后组织新军发难，响应武昌起义。

1908年，清伊犁将军长庚奏调湖北新军第四十二标作为骨干，成立混成协。原标统杨缵绪当了协统。杨缵绪在日本户山学校留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当他来新疆时，湖北有些参加同盟会和日知会的知识分子，抱着献身边疆革命事业的目的，加入了这支新军，其中较著名的有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李辅黄等十多人。他们在新军和哥老会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出版《伊犁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刘先俊在迪化也开始展开革命活动。刘先俊是湖南宁乡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经其亲属介绍来新疆投效巡抚袁大化，以新军督练处督练官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建立革命团体。

1911年秋，四川保路风潮日益扩大，新疆革命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到任后，对新军极不放心，就借故下令解散新军，停办讲武堂，并将协统杨缵绪免职。他勒令新军遣返关内，却迟迟不发遣散费。这等于火上加油，促使新军大部分官兵都转向革命。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新疆后，人心大为振奋。一些对清朝不满的士绅和知识分子互相联络，企图采取上书“请愿”方式，劝新疆巡抚袁大化宣布独立。袁大化是个顽固的封建官僚，认为革命党是“土匪”，断然拒绝“请愿”，并派军警四出侦探党人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刘先

俊、田昔年等首先在迪化发动起义。1911年12月28日晚，刘先俊率领新军士兵和会党群众共百余人，先后袭击抚署东营、陆军炮营及警察第一区等三处，结果都因清军有备，未能取胜。刘先俊退回协营后，袁大化立即调动清军将其包围，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失败，刘先俊等数十人惨遭杀害。

伊犁革命党人经过紧张的准备，于1912年初在混成协署组成起义指挥机关，推举李辅黄为总指挥，决定1月7日晚发难。志锐事先得到消息，一面急令满蒙驻防各盟旗兵入城警戒，一面又调军标及新旧满营，进攻协署。在这紧急关头，起义军抢先发动，兵分五路进攻：一路由冯特民和黄立中统率，攻占南库，获得了大量武器；一路由李辅黄统率，攻占东门，迎接城外的起义军进城；一路由冯大树统率，攻占副都统衙门；一路由郝可权率领，攻占将军衙门；一路由李梦彪率领攻北库。前四路进展顺利，迅速攻占各地，只有攻击北库的一路遇到满蒙旗营的顽强抵抗。革命党人利用志锐与卸任将军广福之间的矛盾，由杨缵绪说服广福（蒙古族）出面劝降，满蒙旗营就停止抵抗，解除武装。第二天，各界代表在商会开会，组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成立临时都督府，推广福为都督。10日，正式组成政府，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实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新成立的都督府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军士商民齐呼万岁”(188)。

革命成功后，伊犁起义军立即整编军队，攻取迪化，派李辅黄为前敌总指挥，徐国桢为东进支队司令。起义军与袁大化派来的清军进行了几次激战，在精河、西湖之间相持很久。后因南北议和而停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派原新疆提法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杨增新对革命党人进行分化和屠杀，调杨缵绪为喀什提督。冯特民、李辅黄、李伯泉等先后被暗杀，郝可权等被迫逃亡。此后，新疆又长期处于杨增新的黑暗统治之下。

陕西起义后，革命风暴由东北向西发展，会党蜂起，一连串的暴动给甘肃的官吏以极大的威胁，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是宁夏起义。当

时，宁夏（今银川市）尚为甘肃省的一部分。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刘照藜听到西安会党起义，就积极联络当地军警准备响应。11月19日晚，刘华堂率领三十多人沿街燃响纸炮，呐喊叫杀，警官刘照藜、教练官刘复泰率全部警察和标兵一百多人持枪加入，旗官黄建升也率本旗士兵鸣枪响应，城内贫民数百人纷纷参加。起义军民烧毁当铺十余家，打开县狱，攻杀代行总兵职务的游击贺明堂、知县陈元骧。第二天晚，会党又在平罗县起义。11月21日成立宁夏军政府，推宁夏道孙延寿为革命军大元帅，刘华堂为总指挥。12月10日，围攻离城十里的满城旗兵，连攻十日终不能下。清军陕甘总督长庚派马步兵六营前来镇压。民军闻讯散走大半，刘华堂弃城逃走，清军入城后大肆掳掠屠杀。

陕西起义后，陕甘总督长庚派统领黄钺率领六营骁锐军前去堵击陕西革命军。黄钺字佑禅，湖南宁乡人，曾加入革命党。他进驻秦州（天水）后，联络当地进步青年和开明士绅，在1912年3月11日发动起义，击杀清游击玉润，逮捕知县张庭武，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自任甘肃临时都督，举原道台向燊为副都督。同时颁布“约法”，其第一条规定：“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189] 又添募军队，共成步兵一标，以谢汉秋、杨展鹏、赵鼎钟分任管带，预备北伐。当时袁世凯已就任总统，兰州官绅表示承认共和，由布政使赵维熙为甘肃都督。赵维熙一面以长庚名义调兵威胁秦州，一面致函黄钺，要他取消独立。黄钺据理力争，坚持了几个月，秦州军政府于6月7日被迫解散。

六　东北三省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人心震动。奉天（今沈阳）、吉林、营口等地商铺都极力“收回银货”，群众纷纷持纸币向大清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挤兑现洋。纸币价值猛跌，乃至不能流通。各地市面均呈现出一片紊乱现象。

革命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张榕、张根仁、柳大年、钱拯、赵中鹄、刘雍、刘艺舟、商震、徐镜心、宁武、顾人宜、李培基等，大都集合到奉天省城，“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190]。立宪派首领、奉天谘议局局长吴景濂，看到清廷大势已去，极力拉拢革命党人，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谋求“独立”。一部分革命军人又组成“军人联合会”，积极策动驻在奉天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起义。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向主张革命。11月6日，蓝天蔚、张榕、徐镜心、赵中鹄、商震、齐希武等在北大营开会酝酿起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驻有军队，正寻机扩大侵略活动，革命党人担心发动武装起义会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因而便决定进行“和平革命”，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走，宣布东北独立，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东革命军“讨虏军大都督”，张榕为奉天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民政长，并决定11月中旬发动。

但是，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叛徒告密。赵尔巽得悉实情后，立即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他一面密报清廷将蓝天蔚解职，并迫令出走，保荐蓝部标统聂汝清代理。同时，调驻扎洮南的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所部三千五百人入省，以旧军监视新军。另一方面，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激昂情绪，“使其不致暴动”[191]，赵尔巽勾结立宪派首领袁金铠等，于11月12日召集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章规定：尊重“人道主义”，“为保卫地方公安起见，无论汉满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192]。保安会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它的反动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它所谓的“尊重人道”，实际上就是禁人民以革命手段掀起反抗。它所谓的“保卫地方公安”，实际上就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东北统治的旧秩序。保安会的反动性由它的领导人看得更清楚：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及三十九混成协协统伍祯祥为副会长。另设军政、财政、外交、参议等八部。部长都是旧官僚、旧军人或立宪派，如军政部长聂汝清，副部长张作霖，财政部长萧应椿（原东三省提法使），参议部长袁金铠，等等。

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参加了保安会，职务是参议部副部长。参议部是“监督机关”，副部长更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革命党人是被拉去作为点缀的。

奉天保安会成立后，吉林、黑龙江于16、17日也相继成立了保安会。吉林会长为巡抚陈昭常，黑龙江会长为巡抚周树模。接着，东三省各府厅州县纷纷成立保安会，均以地方官吏为会长。自各级保安会成立后，表面上，各地方的行政权统归保安会，实际上仍操在地方官吏手中。

东三省各地革命党和人民群众很快识破了保安会的骗局，纷纷掀起反对保安会，要求独立的斗争。吉林保安会一成立，学界代表即表示“万不赞成”，“非独立不可”。并痛骂保安会的官吏，呼之为清朝的走狗[193]。黑龙江中学堂学生发起组织“国民联合会”，要求周树模宣告独立。革命党人张榕等原想通过成立保安会，逼迫赵尔巽出走，宣布三省独立，没料到却落入赵的圈套，“反为其所制”[194]，于是决定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与赵展开斗争。11月17日，奉天各革命团体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宣布“响应南方”，以“人道主义，政治革命积极进行为宗旨”，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195]。急进会宣布的宗旨，表明它是一个革命的团体。根据东北满汉两族杂居的情况，它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吸收满族革命志士参加急进会，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或与同盟会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正会长张榕，副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参议吴景濂、钱拯、左拯之，总务部长杨大实，执法部长赵中鹄，军务部长辜天保，交通部长洪东毅，侦察部长赵元寿，秘书部长汪谦等。

急进会成立后，一面发行《国民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一面派出杨大实、赵中鹄等领导骨干，分赴东三省各地联络，发展会员。各界进步人士争先入会，不几天，奉天就超过三万人，以军人占多数。吉林省城分会会员达二万人以上。当急进会在奉天、吉林、长

春等城市迅速扩大力量的时候，一些在州县地方活动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展开了武装斗争。

首先起义的是奉天庄河和复县。1911年11月20日，革命党人顾人宜、顾人邦策动和组织当年8月间抗捐失败的庄河联庄会群众起义，宣布响应武昌革命，一举击败清军。同时，复县警察所长杨大实率所部警察五百余人发难于县城，与庄河义军互为声援。后来，杨大实代表急进会前去庄河授旗，27日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顾人宜为“中华民国军征清满洲第一司令官”。起义军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不数日就扩充到数千人，迅速影响到辽阳、凤凰厅等地。

11月25日，革命党人祁耿寰等策动辽阳巡警教练所学生起义，占据城西四十里的刘二堡等地。与此同时，商震、郭斗升等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民团二百多人，在辽阳东高丽门起义，准备进攻县城，不幸被清军包围，郭斗升等数十人牺牲。

革命党人刘雍、宁武、鲍化南、何秀斋等在凤凰厅发动联庄会群众起义。右路巡防营管带邵兆中率领所部一营，原计划反正，未能实现。起义军孤军苦战数日，未能占领厅城。后来多投奔庄河或渡海赴烟台等地。

黑龙江革命党人策动“红胡子”绿林武装首领刘献芹起义，在东荒一带聚集千余人，攻占拜泉县。

此外，在奉天宁远州、海城、昌图，吉林长春等地都有革命党人策划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革命形势在三省范围内迅猛发展。

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紧要关头，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张榕却表现出犹豫、软弱，他既反对保安会，又和保安会的要人赵尔巽、袁金铠维持着和平关系，与袁金铠的联系尤为密切。当赵尔巽派兵镇压各地起义军时，他曾当面质问赵尔巽，并要求赵宣布独立，“以静人心”；可是，由于他惧怕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迟迟不敢在

奉天省城发难，推翻赵尔巽的统治。

赵尔巽是一个颇会见机行事保全自己的老官僚。当全国革命风云日益紧急的时候，他对东北革命党领导人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一再表示东三省地位特殊，俄、日或将干涉，因而不能骤然独立，只能“保境安民”。后来，他取得张作霖等实力派的支持，又见关内开始南北议和，便拒绝谈“独立”问题。及至1911年底，取得清政府大权的袁世凯鼓动他更坚决地镇压革命党人时，他自以为有了靠山，便不再有所顾忌，公然指使张作霖于1912年1月22日杀害了张榕。张榕（1884—1912），奉天兴京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积极推动东北三省的革命斗争，颇多贡献。由于在与反革命决战的关键时刻，缺乏坚定的革命态度，不仅使东北的革命遭到失败，也给他个人带来不幸。殉难时年仅二十八岁。赵尔巽和张作霖等并不以杀害张榕为满足，他们的目的是要扑灭三省境内的革命烈火。所以，接着便派出反动军警捕杀各地急进会骨干分子共百余人，无情地镇压各州县的人民起义。

东三省的局势，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深切关怀。于是，孙中山任命旅居上海的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领舰队载北伐军数千人北上，在安东附近登陆，支援东北人民。庄河、铁岭、哈尔滨等地革命党人闻风纷纷发动起义响应。但是，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攘夺了民国大总统。蓝天蔚奉命撤军到山东烟台，关外都督府解散。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摇身一变，当上了民国的都督。残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张作霖飞黄腾达，而且很快压倒赵尔巽，成为袁世凯统治东三省的支柱。

从以上关于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在武昌的胜利，把保路运动掀起的革命高潮推进到新的阶段。武昌起义后十天，湖南、陕西同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接着，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都在二十天内相继宣告独立。四川较迟，至11月27日也宣告光复。中国沸腾起来

了。

对于首义要地武昌来说，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的响应最为重要，这使革命军消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南下的北洋军。地处北方的陕西和山西两省起义，威胁着清朝的心脏，牵制了清军主力，使之不敢倾巢南下，减轻了南方革命军的压力。当汉阳于11月27日被北洋军攻陷之际，却有江浙联军崛起，于12月2日一举光复南京。从此长江上下游联为一气，造成了独立各省的优势地位。

仍旧在清政府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局势的发展也是有利于革命的。直隶、河南、东北三省、新疆、甘肃以及一度宣告独立的山东省，由于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革命力量无法取得胜利。然而，当地的革命党人也都闻风而动，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前仆后继，为争取本省独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在不少府县建立起革命的政权，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总之，革命的潮流已经无法阻挡，清朝的大势已去。这个王朝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出现，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广大新军官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人参加了争取民主共和的战斗。除了成为士兵和会党者外，农民没有能广泛地发动起来，他们的自发斗争，受到普遍的压制。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这次起义。各省同盟会分支机构、各地同盟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在起义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几乎所有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策动下举行的。正是这无数的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打先锋，作前驱，方才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是，同盟会的领导层对突然出现的新形势，事先思想准备不足，他们既没有及时地提出把革命更向前推进的统一的政治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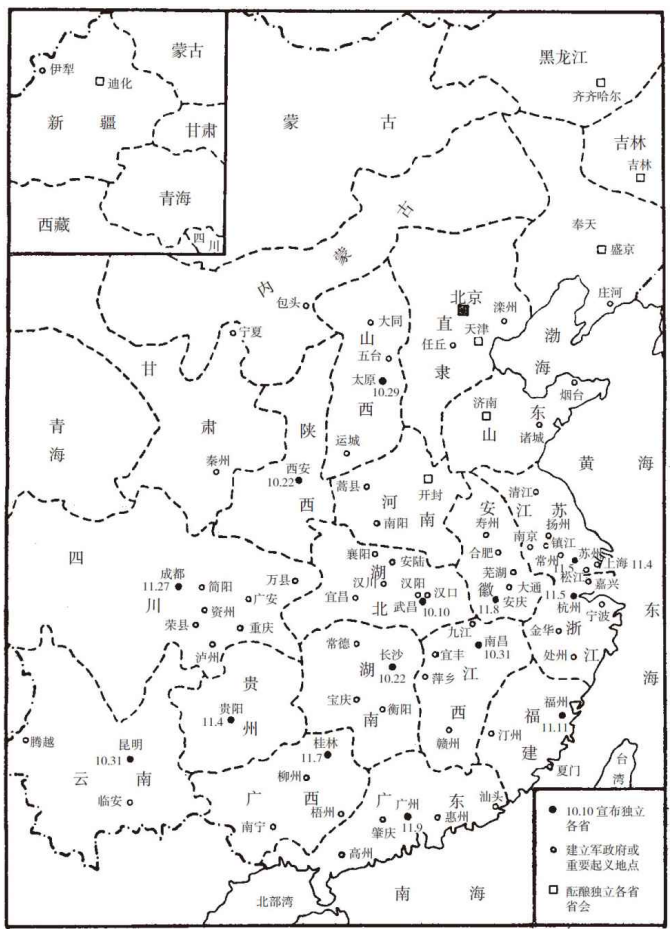
领，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当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的时候，同盟会就无法把这次革命有效地从政治上组织上领导起来，使之普遍持续地高涨，直到取得全面的胜利。

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经开始并逐步取得胜利，他们看到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就要灭亡的时候，便翻然表示赞成。立宪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还有谘议局这个现成的机关供其利用。他们转身到革命方面来，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但又使反清阵营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了。立宪派依靠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与革命党人争夺革命的果实。对于立宪派的这种企图，革命党人的反应极不一致，一部分人进行了抵制，而更多的人却因立宪派分子“咸与维新”而模糊了两派的界限，失去警惕性，从而给立宪派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各地军政府中，革命派比较稳固地掌握了主要权力的有广东、上海、山西、陕西、福建、安徽等处，立宪派和他们支持的旧官吏掌握主要权力的有湖南、江苏、广西等处，而湖北、贵州、四川、浙江等处，两派之间则有着曲折起伏的斗争。当然，这只不过是简单而论，实际过程是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多彩的。

在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权力斗争中，无可隐讳的事实是，革命党人由于缺少严格区别于立宪派主张而为民众所乐于接受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方案，从而使自己往往处于被动的和孤立的地位，并且削弱了这种斗争的社会意义。立宪派、旧官吏的得势，使一些地区的革命涂上了一层温和的改良色彩，急进的革命党人或革命群众甚至遭到无情的镇压。

然而，革命热潮在全国范围内不断高涨。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遏制这股潮流的做法都是徒劳的。立宪派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就是在他们掌握主要权力的省区里，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也不能不将对革命派的打击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且隐蔽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当时，清政府仍在做垂死挣扎，袁世凯的

态度也还不明朗。大敌当前，立宪派和革命派无论有多么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他们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大目标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尽快地成立中央政府，以便统一领导独立各省的政治军事活动，这既是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立宪派分子扩张其势力和活动地盘的需要。因此，各省爆发起义不久，组织中央政府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图

(1)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页。

(2)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25页。

(3)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71页。

(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0页。

(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6—48页。

(6) 上述名单各书微有不同，此据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28页。

(7) 这一计划现存各本均为事后追记，因而有所修饰。此据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昌开国实录》及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等资料整理，借示大概。

(8)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75页。

(9) 《彭楚藩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1页。

(10) 章裕昆：《刘尧澂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2页。

(11) 《杨宏胜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4页。

(12) 《时报》，辛亥八月二十四日。

(13) 《瑞澂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89—290页。

(14)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36页。关于这一枪，吕中秋有不同说法，见同上书第65页。

(1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64页。

(1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0页。

(1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汉口光复始末纪》，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4号。

(1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99号。

(19)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0)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

(21)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

(2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6页。

(2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4)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云："张彪原系张之洞亲随，娶之洞使女为妻，因有'丫姑老爷'之名"。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2页。

(2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4页。

(2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7) 李翊东：《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0页。

(28) 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2页。

(29)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9页。

(30) 向讦谟："晚八时，谟接领胡君子笏解来大银宝一百四十九个，又小银锭十五个。"见《治国日记》（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31) 《民立报》，1911年10月20日。旧说以为汤化龙的职务是民政部长，误。当时的民政部长是张和伯。

(32) 张肖鹄：《回忆辛亥武昌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183页。

(33) 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50页。

(34) 查光佛：《武汉阳秋》，1916年版，第4页。

(35)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6页。

(36) 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50页。

(37)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38)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39)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40)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41)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

(4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12页。

(43) 居正：《辛亥札记》，1929年版，第71页。

(4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1—82页。

(4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7、60—63页。

(46)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7、60—63页。

(4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9页。

(4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3页。

(4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99页。

(50)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9—50页。

(51)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1页。

(5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4页。

(53)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01页。

(5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66页。

(55)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28页。

(56)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29页。

(57) 《致英外部大臣葛垒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64页。

(58) 《致英外部大臣葛垒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65页。

(59) 《革党之文告》，见《鄂乱汇录初编》，1911年版。

(60) 《1911年11月1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9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28页。

(61) 《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文》，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342页。

(62) 《东京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鄂乱汇录初编》，1911年版。

(63) 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集，第53页。

(64)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革命日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363页。

(65)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革命日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366页。

(66) 《时报》，辛亥年九月一日。

(6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3—136页。

(6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9—100页。

(69) 余家菊：《回忆录》，第69—70页。

(70)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8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13页。

(71)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3号函》，《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8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9页。

(72) 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各省》，第5页。

(73)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湖北博物馆藏，（三）328号。

(74)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第34页。

(75) 《湖北汉阳知府李示》，《时报》，辛亥年九月六日。

(76)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内务司实录》，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9号。

(7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6号。

(7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6号。

(79)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2月13日。

(80)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屈子厚行略》，湖北省博物馆藏，（三）101号。

(81)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5页。

(82)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光复宜昌大概情形说帖》，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8号。

(83)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施南光复始末记》，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88号。

(84)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0号。

(85)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0号。

(86)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郢中战史》，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86号。

(87)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第68页。

(88) 张玉衡：《十年见闻录》，《江湖会资料选辑》，第69页。

(89)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63、265页。

(90)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63、265页。

(91)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93页。

(9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33页。

(93) 谭人凤：《石叟牌词序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52页。

(94)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50号。

(95)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1（a）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12页。

(96) 《湘汉百事》上，第10页。

(97) 《致军咨府电》，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80页。

(9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伍正林事迹》，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33号。

(9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91页。

(100) 《为进行革命计画致冯自由书》（二），《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73页。

(101) 《英驻中国水师统帅致英海军部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94页。

(102) 转引自《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6页。

(103)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19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55页。

(104) 《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39页。

(105) 《宣统政纪》第63，第49页。

(106) 《时报》，辛亥年九月二十四日。

(107)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9—70页。

(108)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1页。

(109) 《武昌专函》，《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110) 《武昌专函》，《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111)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12) 在汉口失陷之后，黎元洪还有一封复萨镇冰的信，更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信中针对萨所说“民主政体不宜行之中国”等话答道：“钧示所虑各节，同人等早已筹计，兹事之解决，在各省成功之后，联合会议，视程度之所至，改革政体。以意揆之，大约不出吾师之所主张。特揆诸舆论，清廷不能占此位置耳。”见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武昌》，第81页。

(113) 王树枏：《武汉战纪》，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34页。

(114)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6页。

(115)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39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75页。

(116)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8页。

(11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祁国钧呈》，湖北省博物馆藏。

(118) 《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48页。

(119) 关于甘绩熙夜袭磨子山的时间，诸书记载多误，甘本人也记错了，此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孙鸿斌事略》等资料订正。

(120)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何亚新小传》，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07号。

(121) 《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

(122) 《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汉口汉康书局版。

(12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57页。

(12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83页。

(12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91页。

(126) 《民国报》第三号，辛亥十月二十一日。

(12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95页。

(12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129)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

(130) 彭楚珩：《湖南光复运动始末记》，第4页。

(131)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

(132) 10月23日改称“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

(133) 《民立报》，1912年11月2日。

(134)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三。

(135)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杨任传。

(136) 据记载：“武昌同志得焦达峰任都督信，均手舞足蹈，前方将领勇气倍加。”（居正：《辛亥札记》，第76页）

(137) 粟戡时：《湖南反正记》。

(138) 《中国革命记》，辛亥年十月出版，第五册。

(139)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陈作新传。

(140) 和丰火柴公司发行有三百文、一百文两种纸币，原是一种工资券，后来流通市场，数额渐多，价值不稳，时人称为“洋火票”。

(14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4、285页。

(14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26页。

(143)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3。

(144) 刘约真：《醴陵革命人物纪要》，见《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96页。

(14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5页。

(146) 刘约真：《醴陵革命人物纪要》，见《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97页。

(147) 《李烈钧自传》，1944年版，第12页。

(148) 冯汝骙在清政府封疆大吏中政声算是比较好的。他自知大势已去，便在一夕悄然离开巡署，趁船出走。行至九江上岸，吞烟自尽。

(149) 余辉照：《赣西独立记》。

(150) 《卸任安徽军事参议官唐启垚呈袁世凯禀》（原件），宣统三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1) 韩衍字耆伯，同盟会员，江苏丹徒人，后入安徽太和籍。自朱家宝逃走后，他与管鹏、易白沙等一起，召募青年学生，编成青年军三大队（营），韩衍自任总监。青年军朝气蓬勃，军容严整，对安庆革命贡献颇多。民国元年3月韩衍被人刺死，青年军亦被解散。

(152) 蒲逃回老家广安；朱庆澜逃到重庆，受到夏之时的礼遇，资送离境。

(153) 《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第102页。

(154) 《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84页。

(155)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9页。

(15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页。

(157)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民立报》，1911年11月

17日。

(158) 《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呈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159) 《尚侠女学代表薛素贞上陈都督书》，《申报》，1911年11月13日。

(160) 《女子军事团传单》，《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161) 军政府通告，《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

(162) 《摘抄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及外交总长伍廷芳所发致各省都督通电大意》，《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1150页。

(163) 《陈都督力顾大局》，《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164) 《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呈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165) 《致王饶生》，《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1005页。

(166)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156页。

(167)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6页。

(168) 《清江专电》，《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

(169)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3页。

(170)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御史温肃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0页。

(171)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3页。

(172) 邓慕韩：《辛亥广州光复记》，《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

(173) 《胡汉民自传》。

(174) 《军政府施政方针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83页。

(175) 《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

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79页。

(176) 《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79页。

(177) 《闽外交部致闽省商会函》，《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90页。

(178) 郭希仁：《从戎纪略》，1913年3月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

(179) 郭孝威：《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陕西光复记”。

(180) 郭希仁：《从戎纪略》，1913年3月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

(181) 两个副大统领为钱鼎、万炳南。六个大都督为：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粮饷大都督马玉贵，军令大都督刘世杰，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行营设在潼关），西路征讨右翼大都督万炳南（行营设在凤翔），西路征讨左翼大都督张云山（行营设在乾州）。

(182)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4页。

(183) 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

(184) 吴守正：《滦州革命记》。

(185)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117页。

(186)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295页。

(187) 《革命首领张烈士毓厚传略》，见《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殉难传略》，1929年刊本。

(188)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431页。

(189) 黄钺：《陇右光复记》，1913年刊本。

(190)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191)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3页。

(192)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193)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9页。

(194)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0页。

(195)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四日。

第十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第一节　各省代表会议筹建临时政府及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一　建立临时政府的酝酿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斗争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的胜利为这个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予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正如后来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所说："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1)] 武昌起义后不久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2)]。孙中山是革命人民的公认领袖，这一点外国舆论也是看得清楚的，当时美国报纸就曾报导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3)]

因此，认为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不能否认在各地起义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政权，一部分落入立宪派、旧官僚手中，这给全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难产并不等于胎死腹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新生婴儿，终于呱呱坠地了，虽然只生存了三个月。

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活动，是在武昌和上海两地分别进行的。

1911年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以“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为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越二日，便通电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

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开会，筹建政权，理由是上海位居交通枢纽，又为列强注视之地。陈其美随即于13日通电各省代表来沪。15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这样，便形成了武昌和上海两个中心。

上海方面的意见，体现了孙中山的关于仿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思想。这在陈其美邀各省代表来沪的通电中，表达得相当清楚：

>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

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上海方面提出的集议方法是：一、各省旧谘议局各举代表一人；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已经到上海的几个省市的代表们，把自己会议的名称定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们认为，武昌的鄂军都督府可以执行“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的政务，但代表会议则应在上海召开。

武昌方面对上海方面提出的仿照美国会议方法，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定不易之办法”，但对开会地点表示异议。武昌方面认为，它的通电发出在先，有的代表已经到鄂；而且，鄂军都督府既被认为中央军政府，那么，代表会议亦应在武昌召开，不然，“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4)]。

争论结果，上海方面同意了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需留一人在上海，“联络声气，为通信机关”[(5)]。

当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广西、四川、山东、直隶、河南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的时候，汉阳刚刚失守，武昌全城皆在龟山清军炮火的威胁之下，代表们只得跑到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的楼上去草拟和讨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代表会议于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12月3日，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议即日公布，由各省代表签名。

这个《大纲》，共三章二十一条。

第一章临时大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之权；临时大总统

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设临时中央审判所”等权。

第二章参议院，规定：“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参议院之职权，除第一章中所列者外，尚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议决暂行法律”等权；“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会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案办理”；“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三章行政各部，规定设立外交、内政、财政、军务、交通等部。

这个《大纲》的“临时”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还缺乏资产阶级宪法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如参议员的产生办法，也没有人民权利的规定，等等。但在当时急于要产生一个统一政府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也还是可以的。《大纲》最后规定：“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6)]。

当汉口的代表们还在开会的时候，南京已于12月2日为江浙联军攻克。汉口的代表们得到这个消息，遂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代表于七日内齐集南京，并规定俟有十省以上代表报到，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7)]。

在上海的代表们，特别是陈其美、宋教仁等同盟会员，本对在武汉开会持有异议。他们担心武昌成了中央政府所在地，于同盟会不利。所以，当南京攻克的时候，陈等便乘机鼓动上海的代表们，以急

需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为由，于12月4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出席会议的除各省都督府代表外，还有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都督程德全、沪军都督陈其美等。大会投票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8]，即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又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仍驻武昌。

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使政府不致落于旧官僚、立宪派手中，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陈其美等人的宗派观念很深，作法又欠妥善，以致事起仓卒，效果不佳。在选举过程中，选举人争吵不已。在选举后，被选举人坚持不就。直至次日开欢迎大会时，黄兴仍当场“起辞”，“谓才力不胜”，并说：“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而后已；至于组织政府，则非兴所能担任者也。”代表问：“现今事机危迫，战事未息，黄大元帅苟不俯从众请，其如全国人民何？”黄答：“孙中山将次回国，可当此任。”会议开了两小时之久，最后黄才答应“暂时勉任”，以作为孙中山回国前的“一时权宜之计”[9]。

在汉口的代表们对上海的决议深为不满，认为其选举不合法定人数，而由黎元洪以都督名义电请取消。

12月12日，各省代表（十四省，共三十九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代表会上，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任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任副议长，并作出决议：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这时又传来了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的消息，由鄂续到的浙江代表陈毅在次日的会议上报告说：“唐绍仪到汉时，黎大都督代表已与会晤，据唐代表称，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10] 前此，代表会议在武汉开会时，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推翻清政府，曾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为了虚位以待袁世凯，代表会议遂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承认上海代表所举之大元帅、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11]

但是，黄兴以黎元洪等反对于前，在南京之江浙联军又持有异议于后，坚不就大元帅职。他于12月17日发出“力辞”通电，并推黎元洪暂任大元帅。其真实意图，在于等待孙中山的归来。

代表会议接黄兴电后，遂又于当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由副元帅代行职权。不到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古人有置君如弈棋之讥，此则举元帅如弈棋，真是如同儿戏。事既如此，黄兴更坚意不就。而黎元洪也不能前来南京。这样，就使各省的代表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议长“因病”在沪，副议长“因事”留沪，12月20日的代表会议上不得不另举景耀月代理议长，并议决再函请黄兴来宁组织临时政府。次日，黎元洪致电各省代表会议，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海外归来了。

二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是从巴黎经香港归国的。过香港时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会晤，曾有人建议他留在广东活动。孙不同意，坚持前往沪、宁前方。他说：“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12)

孙中山到达上海，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到沪的当天，《民立报》即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专栏言论说：“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13)

12月25日的早晨，上海外滩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挤满了欢迎孙中山归来的群众，各国领事和外国记者也都赶来参加。“孙先生乘香港

船入港，沪军都督府派建威兵轮……往吴淞口迎迓……”[14] 当轮船接近码头尚未靠岸的时候，身着黑色西服的孙中山出现在轮船的上层，他脱帽高举右臂，面含微笑，向欢迎群众频频点首致意。船靠码头，刚一登岸，他就被众多的新闻记者包围了。记者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次带多少钱来？”（在孙未到上海时，中外各报皆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孙中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15] 孙的回答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气概，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人们。

在到达寓所后，孙又接见《民立报》记者说：“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幸劳，将归于无效。”[16] 这些话，也是语重心长的。

孙中山到上海后，立即和同盟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紧张地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在讨论中发生了分歧：孙中山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则主张采取内阁制，设总理。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17] 黄兴当即表示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同盟会的要员们还决定先期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18]。

孙中山回国，临时大总统之人选，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团体都纷纷致电南京各省代表：“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兆众一志，全体欢迎。”[19] 在美洲的全体同盟会会员也致电《民立报》转各省代表说：“孙先生才、德、望，中外相孚，请举为总统，内慰舆望，外镇强邻。”[20]

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十七省，四十五人[21]，华侨二名代表列席），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首先，将头天夜晚预备

会投票揭晓，计有候选资格者三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然后分票于十七省代表，由议长按省份次序逐呼省名，依次投票。开票结果，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孙以超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当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22]。

代表会立即作出决议：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当选消息后，立即复电南京各省代表，表示接受，他说：

> 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23]。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致电各省都督说：

> ……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24]

以国家元首而自称“公仆”，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封建帝制的根本区别。对两三千年来一直受着“天子”、“君父”一类欺骗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一新耳目。

当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出后，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民立报》等报上，连续发表国内外各界各团体和各地群众的贺电。安徽各界代表及军民万人曾集会都督府庆贺；福州万人举行提灯游行[25]。南京的气象是：“宁垣军学各界自悉各省代表举定孙大总统后，均色舞眉飞，互相庆祝，所有各商铺居民无不预备香花灯烛，以争迎迓。总统府内，均用五色电灯，排成花样，其光采焕然一新，虽白叟黄童，无不共称中华民国万岁云。”[26] 至于海外侨胞，

则是“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27]。

三　临时政府的组成

1912年元旦，为孙中山前往南京就职之日。上午十时，孙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同行者有南京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在上海车站送行者除陈其美等同盟会要人外，上海各军队均事前齐集车站持枪列队相送，送行者还有各团体的群众代表，总计不下万余人。火车徐徐启行，礼炮齐鸣致敬，一时欢声震天。当日午后五时，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上也传来了二十一发隆隆的音响。在迎接者中，除各省代表外，也包括了驻南京的各外国领事。旋由宁省铁路与沪宁铁路接轨，孙等仍乘花车入城。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下午6时15分，孙的专车抵总督衙门车站，即换乘马车由车站去总统府。至总统府时，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接入府。当晚十一时，孙中山举行了大总统受任典礼，仪式庄严而朴素，参加者除各省代表外，还有驻南京各部队团长以上和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

孙中山在典礼上宣读誓词说：“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28]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规定对内的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29]孙中山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宣言发布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改用阳历的决议，是在孙中山的提议下，于1911年12月31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作出的。在讨论这一提议时，曾发生过争论。反对改历的代表说：“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夏历到现在，已二千年，不可轻改。”赞成改历的代表反驳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的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一月一日，是与轩辕氏所定以冬至为岁首相近，不同夏历正月初一日，要后冬至四十五天。”[30] 经过讨论后，多数代表都同意改用阳历。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的那一天——1912年1月1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关于临时参议院的设置，各省代表会曾议决，在临时参议院未成立前，由该会代行其职权，并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

鉴于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只有大总统，而无副总统；行政各部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颇感不便，于是宋教仁以湖南代表身份提议在大总统外加一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此提议，亦经代表会议通过。

1月3日，代表会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十七票（每省一票）当选。

孙中山出席了这次代表会，并提出中央行政设立各部及其权限案，经议决后随即提出国务员九人名单请会议审查同意。孙最初提议的名单是：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钟瑛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教育总长	章炳麟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31)

但是这个名单交付讨论时，代表们对宋教仁、章炳麟多不同意。经黄兴和孙中山交换意见，黄提议内务改为程德全，教育改为蔡元培，遂得到了代表会的一致同意票。接着，又委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参谋总长，并委任了各部的次长。这样，最后确定的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名单如下：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瑛	次长	汤芗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兼议和全权大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32)

从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名单看来，虽然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是，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非常注意各部次长的人选。在孙的任命名单中，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而且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张謇、

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即跑往上海租界居住。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这些人掌管的部均由次长代理[33]。因此，当时便有人说这个临时政府是“次长内阁”。

黄兴长陆军部，又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又值战争未已，因此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章炳麟最后虽未被任为教育总长，但不久（2月初），孙中山函聘他为枢密顾问。

关于临时政府中的人选，当时许多人，特别是同盟会中的一些元老、骨干，是有些看法的。例如蔡元培就曾致函孙中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针对蔡提出的问题，在复信中作了一个简短的回答和解释，表达了他的用人原则。他的复信全文如下：

> 孑民先生大鉴：来示敬悉。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指康有为）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专此即颂
>
> 道安并复
>
> 孙文谨覆十二日[34]

这封短信，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孙中山关于临时政府人选之原则：

第一，用人唯贤，惟才能是称，不是用人唯亲。

第二，要联合“海内名宿”，但反对民国者，如康有为之流，不能用之，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第三，对章炳麟和康有为当分别，章只是“友谊小嫌”，对他不能

有“睚眦之见”。

看来，孙中山的这几条用人原则，还是比较得体的。

在各部之外，临时政府还设置了若干局（法制、印铸、公报、稽勋、铨叙），如宋教仁是法制局局长，黄复生是印铸局局长。

此外，总统府内还设有秘书处，先后在这个处任职的有：

秘书长：胡汉民

总务组：李肇甫、熊成章、萧友梅、吴玉章（永珊）、任鸿隽

军事组：李书城、耿伯钊、石瑛、张通典

外交组：马素、张季鸾、邓家彦

民事组：但焘、彭素民、廖炎

电务组：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另有回国华侨多人参加）

官报组：冯自由、易廷憙

发收组：杨铨 (35)

从以上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来看，同盟会在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应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但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政府。

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又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请大总统颁布各省。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 (36) 。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统治，也同时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37]

第二节　临时参议院和临时约法的产生

一　临时参议院

废除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仿照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榜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的指导思想。直到晚年，孙一向是把自己的三民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相比拟。他说："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平等和我们的民权相同……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38]；"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39]

更具体一点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关于政治设计的蓝图，是从美国学来的。1903年，邹容在风靡一时的《革命军》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主义"，其办法是："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40]

总统，国会，宪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象征。《同盟会宣言》在解释"建立民国"这条政纲时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

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41]

孙中山在这里说的“平民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所实现的参政权当然不可能是“国民皆平等”（只能说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仍不平等），但是这种制度和封建制度（形式上、实际上均不平等）相比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大体上都是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上述政治思想来实现的。

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临时参议院的建立。各省代表会在致各都督府的电中说：“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立须组织参议院。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三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遣参议员三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尅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以前，每省暂留代表一人以至三人，驻宁代理其职权。”[42]

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开正式大会，各省参议员到会者四十余人，名单如下：

广东：赵士北、钱树芬、邱逢甲

湖南：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

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

江西：汤漪、王有兰、文群

广西：曾彦、邓家彦、朱文邵

浙江：王正廷、陈毓川、殷汝骊

福建：潘祖彝、林森、陈承泽

江苏：陈陶怡、杨廷栋、凌文渊

安徽：常恒芳、凌毅、范光启

山西：李素、景耀月[43]、刘懋赏

贵州：平刚、文崇高

云南：段宇清

陕西：张蔚森、赵世钰、马步云

四川：张懋隆、吴永珊（玉章）[44]、周代本

奉天：吴景濂

直隶：谷钟秀

河南：李鑿[45]

从以上四十多人的名单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约占三十余人，即占四分之三以上；而立宪派不到十人，即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和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一样，这个临时参议院也是一个革命的立法机构。

孙中山参加了参议院的成立大会，并发表祝辞说："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为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46]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提出了一个国会组织法大纲及选举法大纲，其组织法的要旨是：

（一）采两院制，即定名为元老院、代议院。

（二）元老院取地方代表主义，各地人数均等。

（三）代议员取人口比例主义。

（四）两院同时开会闭会。

（五）国会会期以四个月为限，但得延长。

（六）代议院议员任期四年，元老院议员任期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

（七）国会之职权依约法。

从这个组织法的要旨来看，它以美国国会为蓝本，就更加明显了。这里说的元老院即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代议院即相当于美国的众议院。

民国开始，政党林立，但很多是徒具形式，或者是旋兴旋灭，根本不能称其为政党。宋教仁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局局长，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内阁。后来（七月间）章士钊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政党组织案》，竭力倡言政党内阁如欲有好结果，必须把议员分为两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毁党造党说”。显然，此说来源于英国的两党制。

但是，两院制、两党制都没有来得及实行，中华民国就被袁世凯扼杀了。

二　临时约法

为了用法律的形式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起来，以巩固国基，预防后患，临时政府在立法建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议

院是立法机关，凡属重要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后，呈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咨请参议院议决。参议院议决后，再咨复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依照这个立法程序，南京临时政府先后公布了许多重要法案，如《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南京府官制》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附则》中指出，“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47]。这个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的产生，是临时政府立法建制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宪法史上也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标榜的民主精神，是1905年《同盟会宣言》中所揭示的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辛亥革命斗争得来的重要积极的成果之一。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依此而提倡的“公民道德”，加以条文化和法典化了。这一系列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特别是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更无从谈起参政的权利了。现在清朝专制政权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伊始，就以国家根本

法的形式，宣布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这对于促起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以上各章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显然也是根据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等原则而制订的。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即明白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48)

关于"三权分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被资产阶级学者崇拜的神圣而绝无错误的原则，不过是把普通的产业分工原则运用到国家机构而掩饰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而已。

但是，这种学说和制度，比起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以三权分立为组织原则而建立的民国，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孙中山晚年，又在三权之外，"加入中国的考

试权和监察权”，形成“五权宪法”[49]。这种孙中山本人“所独创”的学说，主张分权以限制个人专权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孙中山曾说：“从前君主时代，有句俗话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头反到下头，或者是把下头反到上头。在君主时代，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个五权宪法不过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权，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来做三个独立的权，来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员一方面，另外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机关就是国会，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和弹劾与考试两个机关，同是一样独立的。”[50] 又说：“如果实行了五权宪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凡是我们人民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51]

关于“代议政治”。《临时约法》和前此之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点，即不是采取总统制，而是采取内阁制。《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的关系中规定，参议院有广泛的权力，国务员负有实际的责任，只有临时大总统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是因为，当时南北和议已经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是包含着限制袁氏专权以保障民国的目的在内的。

《临时约法》最后一章（第七章），是《附则》，规定：“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临时约法》是依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制订的。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52]

《临时约法》在不同的情况下抛弃总统制而采取内阁制，用心是很好也是很苦的。但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还是政体问题。而关键在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53] 此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政权完全落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的手中，约法、议院、内阁，都成了他任意摆布的工具。

第三节　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公布了许多法令，内容极为广泛，其中有建立新制的，有改革旧习的。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行了，有的则只具空文而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专制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现仅就其主要者概述如下：

（1）建元改历。（详见第一节）

（2）限期剪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年12月29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表示庆祝[54]。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致各地的电文中，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55]，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此后，剪辫的地区或有早晚，甚至也有个别坚持留辫的顽固派，但大势所趋，剪辫的潮流已是不可阻挡的了。

（3）劝禁缠足。3月11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

害，更仆难数。曩者仁人志士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56] 内务部根据孙令，在通饬各省文中，曾提出下列要求：“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57]

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着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以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像临时政府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从上述令文和办法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

（4）禁止刑讯。刑讯是一种封建性的野蛮方法，孙中山在禁止刑讯令中说：“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声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他要求“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58]。接着，他又在禁止体罚令中指出：“乃有图宣告之轻便，执行之迅速，逾越法律，擅用职权，漫施笞杖之刑，致多枉纵之狱者，甚为有司不取也。夫体罚制度，为万国所屏弃，中外所讥评，前清末叶，虽悬为禁令，而督率无方，奉行不力。顷闻上海南市裁判所审讯案件，犹用戒责，且施之妇女。以沪上开通最早，四方观听所系之地，而员司犹踵故习，则其他各省官吏，保无有乘民国初成，法令未具之际，复萌故态者。”他着重申明：“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

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59]

（5）保障人权。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平等学说的核心。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通令改变所谓“贱民”的身份，他说：“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及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为此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60]

（6）禁止买卖人口。从保障人权出发，孙中山还专门发布过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令中说：“前清入主，政治不纲，民生憔悴，逃死无所，妻女鬻为妾媵，子姓沦为皂隶，不肖奸人，从而市利，流毒播孽，由来久矣。”他要求：“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61]

（7）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孙中山长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之疾苦，因此临时政府成立后，专门向外交部下达了禁绝买卖猪仔、保护华侨令，令中说：“查海疆各省，奸人拐贩猪仔，陷人涂炭，曩在清朝，熟视无睹，致使被难同胞，穷而无告。今民国既成，亟应拯救，以尊重人权，保全国体。又侨民散居各岛，工商自给者，亦实繁有徒，屡被外人凌虐，然含辛茹苦，挚爱宗邦。今民国人民，同享自由幸福，何忍侨民向隅，不为援手？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62]

（8）严禁鸦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决的禁烟派。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的严禁鸦片令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

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63] 他“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缅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他还提出要求说：“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64]

鸦片贸易，英国为罪魁祸首，南京条约更把这种罪恶行径合法化。因此，孙中山在严禁鸦片时，非常注意和英国的关系，即使他在临时大总统解职后，仍为禁烟问题致伦敦各报说：“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吾人今既建筑共和政体，切望扫除此毒，告成全功。予自引退临时总统之任后，对于此事，潜心推考，知今日最要紧之举，即在禁绝中国栽种罂粟。然非同时禁绝售卖，势难停种，故必须将买卖鸦片悬为禁令，则禁种始能收效。兹因与贵国订有条约，碍难照行，予今敢请贵国于吾新国定基之初，更施无上之仁惠，停此不仁之贸易。予切愿以人道与真正之名义，恳贵国准许吾人在本国境内禁止售卖洋药、土药，害人毒品，并许悬为厉禁，则栽种自能即停，谨为全国同胞乞助于英国国民。”[65]

（9）改变称呼。这虽是个形式问题，但一定的形式也反映着一定的内容（不同性质的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保持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反对封建制度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因此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也非常重视，他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命令中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

清官厅恶称。”[66]

以官职相称，比较起“大人老爷”来，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10）废止跪拜。跪拜之礼，是一种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极不平等。而这种礼节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67]。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此后，鞠躬礼便逐步流行开来。

（11）禁止赌博。临时政府内务部曾分咨各部及各省都督，要求“无论何项赌博，一体禁除”。其办法是：“凡人民宴会游饮集合各场所，一概不准重蹈赌博旧习。其店铺中有售卖各种赌具者，即着自行销毁，嗣后永远不准出售。责任各该地方巡警严密稽查，倘有违犯，各按现行律科罪，以绝赌风而肃民纪。”[68]

（12）廉洁奉公。孙中山为革命到处奔走，生活极为俭朴。他的旅费多半是别人资助的，自己身上经常一文不名。就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身穿的大衣也是一件极粗陋的呢子制成的[69]。由于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只是给了由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三十元[70]。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的生活。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有人前往祝贺，正遇上这位总长自己在洗衣服[71]。由此可见临时政府职员生活之一斑。

（13）任人唯贤。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在用人方面，基本上做到了“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从他对待自己的胞兄孙眉的态度，便很可以说明。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孙眉从澳门组织卫队随行。他还“携大宗军饷到宁”[72]。时粤人拟举眉为粤督，中山坚不同意，他对孙眉说：“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劝其“从此勿预

政事，息影林泉，以娱暮景”[73]。1912年2月21日，他还专门致电孙眉，劝其勿任粤督，电中说：“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74]

当时到南京或来电来函向孙中山谋取职位的很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孙主张采取考试制度。他要求法制局迅速编纂文官试验章程，说：“查国家建官分职，惟任贤选能，乃懋厥职，古今中外，罔越斯旨。第考选之法，各有不同，尚公去私，庶无情弊。今当民国建立伊始，计非参酌中外，询事考言，不足以网罗天下英才而裨治理。”[75]当内务部将试验章程草案拟出后，他又令法制局详加审查，令中说：“现在南北统一，兵事已息，整饬吏治，惟有举行官职试验，以合格人员分发各省，以资任用之一法。兹据内务部呈送官职试验章程草案前来，其所定试验资格及其他项规定，有无尚须改订增加之处，合行令仰该局悉心审查，尅日呈复，候咨交参议院议决。事关要政，切勿稽延。”[76]当法制局将草案审查后，他又立即咨文参议院，要求“提前议决”。咨文中说：“前经令行法制局，拟订文官考试章程。今据该局将所拟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及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各草案缮具前来，合行提出贵院议决。又昨据内务部函称，‘各处待用之士，荟萃金陵，而各省办事人才，反觉缺乏，则文官考试实难再缓’等语。按之现在情形，诚如该部所云。今拟请贵院将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草案，提前议决，以便颁布施行。”[77]

以上述考试办法选拔官吏，虽然不见得十全十美，但它比较封建专制政府的“任人唯亲”，显然是一种进步的制度。遗憾的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文官考试制度并没有来得及实行。

（14）民主作风。资产阶级革命派据人权说，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君主专制，因此，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期间，也表现出对待群众的民主作风。现举二例：

例一，孙中山任大总统后，某日偕随从数人骑马到雨花台视察炮台，归途至中华门时被群众发现、围观，群众鼓掌欢呼“大总统万岁！”孙在马上频频含笑点首，表示谢意。时警察局派人来维持秩序，拟驱散群众，一巡官更高举指挥刀挥舞。孙中山见此现象立即制止说：“对老百姓不能这样！”(78)

例二，孙中山任大总统期间，每天接见大批来访者。某日，一个八十余岁的长者，从扬州专程至京拟瞻仰大总统丰采，在传达室被阻。孙中山闻知后，立即召见。长者至，孙正拟行握手礼，但长者掷杖跪地，行见君主的三跪九叩礼。孙急将长者扶起，告以：“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长者问：“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回答说：“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谈话毕，孙派车将长者送回住处，长者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79)

综上所述，临时政府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有力地触动了封建专制秕政和社会陋习，具有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作用。这些改革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临时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一　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解放生产力。还在1905年7月，即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华侨和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即表达了迅速“建一大共和国”，并利用大好资源“振兴中国”，以赶上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强烈愿望。他说：“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又说：“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事半功倍乎？”(80) 孙中山在从巴黎回国时，

念念不忘的也是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竟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81]

要发展资本主义就需保护私有财产和打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下达了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五条命令：

（一）凡在民国势力范围之内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

（二）前为清政府官产，现入民国势力范围者，应归民国政府享有。

（三）前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现无确实反对民国证据，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者，应归该私人享有。

（四）现虽为清政府官吏，其本人确无反对民国之实据，而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内者，应归民国政府管理，俟该本人投归民国时，将其财产交该本人享有。

（五）现为清政府官吏，而又为清政府出力，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内者，应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82]。

当制定《临时约法》的时候，又根据资产阶级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在《约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第六条）。这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有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这项规定，目的在使生产力从清朝专制政府的所谓"官办"、"官商合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除《临时约法》这种根本大法外，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布过一些保

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

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有实业部，而且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司。实业部在给各省都督的电文中说："本部司理本国农工、商矿、山林、渔猎及度量衡，窃念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今虽兵战未息，不能不切实经营，已成者当竭力保存，未成者宜先事筹画。今外省官制，虽未画一，而各省之实业司，当速行成立，隶属本部。"(83)

除官方之实业部外，这时，在民间也纷纷兴起了各种实业团体。如在上海，在一月间即有中华工学会的组织，其宗旨为："甲，工程营造之统一；乙，工程事业之发达；丙，工程学术之日新。"(84)

1月30日，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选李四光、万葆元为正副会长，马君武为名誉会长。协会的宗旨是："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85)

二月间，上海又有中华民国商学会之组织。其《缘起》中说："破坏匪难，建设惟难，矧值此金融紧迫、事业凋疲之秋乎。故论建设，允以经济为前提。而经济问题之要者，如货币，如银行，如铁道、航路，以及关税、殖民诸大端，莫不汇于商学。……同人不敏，组织中华民国商学会，征声气之应求，为知识之交换，庶学理以辩难而发明，事实以讨论而策进。"(86)

与此同时，在上海还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之筹设，其《发起趣旨》中说："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它并且提出了"产业革命"的口号："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87)

除工业建设会外，上海及全国各地建立的类似实业团体，还有很

多，有如雨后春笋。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各地工商界（包括侨商）纷纷投资申请开办工厂、企业。这些申请，有直接递送临时政府实业部者（如开办煤矿、设置各种工厂、公司等）；也有送各地都督府批准者（如沪军都督府于1月13日批准内地电灯公司总理陆熙顺在沪招股开办电车公司）[88]。

这种兴办实业的热潮，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虽然还没有当时各种工厂、企业数目的精确统计，但从一切现有的间接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猛烈发展的总趋势。据1912年5月上海的一个材料记载说："目前上海工业发展中，一个令人注意的特点，为电力日见扩充。现在各个干线的电力已在2000匹马力以上，而最近的将来，将为这个数目的三倍。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准备工作，将使这个消费量马上增加一倍，同时在未来的十八个月中，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89]

孙中山在1912年《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这篇文章中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要能预见未来，我们必须是有远见的人。"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当时除上海这种沿海的大工业城市外，内地各省企业也有很大发展。例如，湖南长沙，据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斯在1912年长沙商务报告中说："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90] 再如湖北，据1912年记载，自民国成立，文明锐进，官民采办（指采矿）已及三十余种之多，呈请开矿者，不下数十起。

不仅一些大城市的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就是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一

定程度的发展。例如镇江，据1912年记载：镇江光复后，一般志士咸有振兴工艺之思想。故有办织袜工厂者，此外如织帽、织衣诸厂，皆能极力经营。再如安徽，自光复之后一二年间，当涂、繁昌两县陆续发现铁矿多至数十处。

除南方外，北方一些城市的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民元以后，华北各大都会，如平津等地，中上人家渐改用机器面粉，而机器面粉由是勃兴。

华侨一直是支持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1912年1月，海外华侨归国代表团，在上海成立华侨联合会，“一方面对于政府欲补助其建设，一方面对于华侨谋未来之幸福”[91]。“临时政府初立于南京，库藏如洗，得南洋经济之助，殊非浅鲜，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五六百万元”[92]。在兴办实业的高潮中，许多华侨纷纷回国投资，从事建设。当时上海有一个同仁民生实业会，即为华侨资本家所组织，“其宗旨注重民生，在在维持协助，对于已办之实业极力保护，未办之实业设法提倡”。因此，它受到各省实业界的欢迎。到1913年初，“外洋华侨入会者，已有二十余万人之多”[93]。除旅欧和南洋华侨外，旅日华侨还组织有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其会长曾在1912年3月7日向南京临时政府申请倡办兴业贸易株式会社，“以增国力，而厚民生”[94]。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农村经济，特别是对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孙中山仅仅给内务部下达了一个通饬各省重视农事令，要求对农民，“严加保护。其有耕种之具不给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设法资助，俟秋成后，计数取偿”[95]。后来，黄兴等发起拓殖协会，编纂书报，鼓吹开发边疆地区。孙中山批令财政部发给该会维持费三十万元。

“国家富源，在于实业，而实业命脉，系于金融。”这是南京临时政府所一再强调的观点。为了贯彻这一点，1912年3月，临时政府财

政部拟定举办各种农业银行的计划，孙中山在批示中说："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员，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创设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96] 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临时政府连自己的经常开支，都拿不出来，哪里还有钱去办银行呢？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办了银行，农村经济也不可能显著地改善，因为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还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农民。

既然土地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农村生产力便不可能得到解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二　财政危机和内外债

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是十分严重的。当时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97]

财政困难，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帝国主义的破坏。帝国主义公使团为攫取中国海关税款所拟之《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八条，在清政府外务部同意下，于1912年1月开始执行。其中规定：各海关净存税款每周汇解上海，由总税务司分存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银行，并依"委员会"所列次序按期偿还外债。关税实权本来就掌握在外人手里，但还有"关余"可以动用，这个"办法"把关余也卡住了。

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也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因此困难重重。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虽经孙中山哀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解

部款，从速完缴”[98]，但效果甚微。而列名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宪党人，也不予支持。如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孙中山、黄兴等本拟请张謇担任财政总长的，目的是借助他的财势帮助解决一些军政开支的困难。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担任。最后，他勉强担任了实业总长，却又长期居沪，根本不过问南京的事情。他那时兼任两淮盐政总理，对于筹措北伐军费及临时政府的经费，更是百般阻挠。他自上海三番五次地致电孙中山，要求“无论军饷若何紧急，不可于盐价商本内有丝毫挪移”[99]，并说什么：“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者……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问题。”[100]

孙中山由外国回到上海时，他的同志们及光复各军将领是把他当作财神来欢迎的，当时盛传他“携华侨捐款数十百万以来饷军者”[101]；江浙联军的将领们轻视黄兴而支持孙中山，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孙当选大总统之日，即有将领前来相问：“公携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但是，孙当时既无华侨捐款，也没有借到外债，回答的仍然是那一句话：“我携带革命精神耳！”[102]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只好借债度日：一是借内债，一是借外债。

1912年1月8日，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一万万元，发行《弁言》中说：“民国肇兴，扰攘屡月，临时政府，虽立初基，而北虏未摧，南服多事，饷糈筹拨，固难缓乎须臾，政费繁兴，又日见其推广，凡停战期内之筹备，迄和局解决后之设施，均非厚集资财，何以宏兹伟业？故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当此军事倥偬，尚乏整顿经营之余力，全恃募捐微末，亦无永久继续之功能，倘或一篑功亏，垂成坐败，神州铸错，大局沦胥，固非维持人道之本心，抑岂冀望和平之始愿，此公债票发行之所由亟亟也。”[103]虽哀告劳劳，但定购者很有限，只得7,371,150元[104]。

在此之前，1911年7月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的时候，就曾发

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亦称国民救济局），第一次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照券面金额的半额推出，并规定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就可以作为国家货币正式使用。还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荣誉；捐款五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款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优先权利”[105]。

通过上述及类似的各种方法，到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自世界各地筹集到的资金总额约一百四十万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偿还了其中的五十万左右。其余部分，本应由接任总统的袁世凯负责偿还，但袁却置之不理。这样，就使海外同胞的爱国热忱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

关于举借外债，这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1911年12月，他在归国途中过新加坡时，即向人表示：“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106]

利用外资，进行建设，这是无可厚非的事。近代中国的历届卖国政府都靠借外债过日子，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举借外债，却不可同日而语。问题不在于借外债，而在于是否因借债而出卖国家的主权。孙中山在过香港谈及筑路主张时，一方面强调必须借外债，但同时又指出，应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107]。据此精神，孙的借外债主张，是不应受到指责的。稍后，孙中山解大总统职，4月17日在上海被中华实业联合会举为会长，他在该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利用外资时说：“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欧美各国无限制投资之事，盖一国之财力有限，合各国之财力则力量甚大矣。”[108]

当孙中山未回国前，黄兴在筹建临时政府时，即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日金三十万元。不过，这是一宗私人交涉，是由张謇作保的[109]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进行的几笔外债，很不理想。有的根本没有谈成，有的谈成了，也为数甚微。特别是在“南北未统一之前，外人既守中立，而南京政府，亦不便自我开端，资北方以口实，自不得不假资本家的凭借，以求间接之吸收”[110]。

当时的几笔借款主要是由江苏铁路公司、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几家出面的。债权国主要是日本。

日本政府这时对华的总方针，是尽可能地使中国陷于长期混乱状态，以浑水摸鱼，扩张自己的领土和获得经济上的支配力量。它所以愿意考虑对江苏铁路公司、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几家进行贷款，就因为这几家都是英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一带的重要企业。而与南京临时政府对立的袁世凯政权，也主要是在英国支持下的。因此，日本的经济借款是包含着和英国争夺在中国的统治权这个政治目的在内的。

几笔借款的进行情况和结果如下：

（1）苏路借款：1912年1月下旬，南京临时政府以江苏铁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三百万日元借款合同，以上海至枫泾间铁路为担保。此项借款，江苏铁路公司以二百五十万元转借给临时政府，其余五十万元借给江苏都督府。因此，曾遭到英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政府答以此项借款，系大仓个人对于铁路公司之事，毫无援助南京政府之意，（驻日）英使遂不复置议”[111]。

（2）招商局借款：1912年1月下旬，临时政府“以民国新立，军需孔繁”，拟“暂借招商局抵押银一千万两备用”。这一借款是由招商局出面，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和日清公司商谈的。

当时，长江流域的航运业，是在英国控制之下。日本的意图是控

制招商局借以和英国相抗衡。但是，日本的这一活动，不仅引起英国的激烈争斗，也遭到德、美等国的反对。同时，招商局股东以至临时政府内部也有强烈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样是把中国航运业出卖给日本），因而这笔借款也就没有兑现。

（3）汉冶萍借款。汉冶萍煤铁公司是当时中国综合铁矿、煤矿、炼钢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原为盛宣怀产业之一部分，并由盛任公司总理。这个公司曾在1902年、1904年、1908年多次向日本银行借得大量款项，而以向日本八幡制铁公司以低廉价格供应生铁、铁砂五十年为条件。辛亥革命发生，日本认为有机可乘，企图以合作经营名义将汉冶萍攫为己有。当时，汉冶萍公司处于起义军控制之下，盛宣怀本人也因被清政府解除邮传部大臣职务，先逃大连，后逃日本。当盛于1911年底逃亡大连时，即和日本密谋中日“合办”汉冶萍事宜，以免其财产被民国政府所没收。他到日本之后，知南京政府借款甚急，因此一方面积极表示对筹款“义不容辞”[112]，同时又按日方的意图，表示将汉冶萍“华日合办，或可筹借”[113]。

1912年1月26日和29日，民国政府和盛宣怀分别在南京和神户同日本三井、正金财团签订了两个性质相同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草约。南京草约中规定：“公司股本为日金三千万元并由中日合资办理。”“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公司现存由日本借入日金一千万元外，公司尚须续借日金五百万元。”“在本合同第三款借款内，由公司借政府五百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合同为“购买武器与军火”）”[114]。

从以上草约，可以看出：日本通过贷款取得了中日“合办”的权利；盛宣怀通过“合办”达到保存自己产业的目的；南京政府通过盛的转借，能得到五百万元的实际利益。

但是，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民立报》指名道姓地骂“盛贼将汉冶萍（卖）与日本”[115]。连双冶萍公司的股东们也认

为：盛宣怀“以私人资格擅与外人订约，不独国权，亦我等血本所关，断难承认，而全国舆论哗然，鄂、湘、赣三省人民起而反抗，将恐激成变端，我等同受其累，决不甘心”[116]。

孙中山很快发觉了日方的阴谋和盛宣怀的圈套，因此他两次亲莅参议院提出咨文，坚决废除“合办”草约，并正告盛宣怀：“该草约，前虽批准，后以其交款濡滞，并不践期，已电告前途，汶（文）定取消，盛氏万不能以已由政府核准为借口。……今各省反对，舆论哗然，盛氏宜早设法废去此约。”[117]

当盛宣怀知道孙中山坚主废约后，仍图骗取南京政府的批准，造成既成事实。但这时，“反对合办将成大风潮”[118]，“舆论反对已成燎原”[119]，而他又曾“因铁路借款，得罪舆论”[120]，因此很害怕陷入“死有余辜”的境地[121]，于是不得不同意废约了。

3月22日，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开临时股东会，“到会者四百四十票，计二十万零八千八百三十八股。投票开筒，公同验视，全场一律反对合办，已逾公司全股十分之八，照章有议决之权，草合同自无效”[122]。这样，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草约遂告取消。草约虽然取消，但是仍然留下了一个尾巴：“此约废后，汉冶萍亦不能与他外人合办”；“汉冶萍如欲以厂矿抵押托外国银行代借款项，或代售债票，须先尽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商办”[123]。

孙中山在回答参议院的质问中，曾对汉冶萍借款作了如下的说明：“政府据院议通过之国债一万万元，因仓猝零星征集，颇难应急，遂向汉冶萍及招商局管产之人，商请将私产押借巨款。由彼等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万元国债内之一部分。嗣又因政府批准以汉冶萍由私人与外人合股，得钱难保无意外枝节，旋令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议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万元以应军队之需要，手续未及分明，至贵院有违法之防。”[124]他在二月间《覆黎元洪告

与汉冶萍公司借款经过电》中，也说明："汉冶萍款原急不择荫，前途陆续仅交过款二百万，随到随尽。现订仅以此数变为虚抵，而废弃合办之约。"[125]

除以上三笔借款外，南京政府还进行过一笔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912年2月下旬，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向参议院提出："现拟借华俄道胜银行之款，系五厘息，九七扣，一年期，用中央名义担保，毋庸抵押……共借一百五十万镑。"[126] 参议院已表同意，但因借款合同中有"此款为民国之直接负欠，当以其赋税之所入，备为付息及偿本之用"等语[127]，遭到各省官员及人民团体的反对，最后也成泡影。

为了应付军需亟需，临时政府财政部在1912年1月间发行了一百万元的军用钞票，但在市面信用很低，"无知商民，不明大义，胆敢异视军用钞票"，以致"钱业、米店相率停市"[128]。到2月间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3月22日，财政总长陈锦涛在给孙中山、陆军部的万急电中说："自袁举总统后，借款银行皆请与袁直接。故本部月来不能办理借项。……而宁垣军钞每日兑现十余万，今日已由中国银行借念万，专备此用。现已计穷力尽……"[129]

就是在这样借债度日的困境中，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存在了三个多月。

第五节　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和新闻政策

一　教育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正值战争时期，新旧交替，各处学校大都停办，教育部初成立时只有三个人：蔡元培、蒋维乔和一个会计，而且没有公署，只好暂借江苏都督府内务司楼上三间空房办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教育部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

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奠定了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基础。

首先，教育部于一月份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要求“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程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初、高等小学毕业者，称初、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者，称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130)。

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颁发的同时，又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十一条，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各种暂行课程表，着各校遵行。如“初等小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师范学校（即旧制之初级师范学堂）之学科目，为修身、教育、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习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女子加家政、裁缝。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农工商业之一科目。”(131)

临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也予以关注。继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后，它又电告各省说：“本部高等以上各学校规程，尚未颁布，各地方高等以上学校，应令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此外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滥用。”(132)

临时政府不仅重视学校课程的改革，而且抓紧各级学校的及时开学，以免影响学生学业。在上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已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视地方财力亦以能开学为主。”三月初，教育部又通告各省速令高等专门学校开学。接着，孙中山又以

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令中说："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虽一时权宜与永久强制自殊，而统筹全面亦不可顾此失彼。此时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为此令仰该部迅即妥筹办法，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学校一并开学，其中小学校仍不可听其停闭，速筹开办，是为至要。"(133)

除教育部主管的普通学校教育外，临时政府的其他部，有的也计划办理培养干部的学校。如陆军部拟办理陆军军官学校(134)；内务部开办有警务学校(135)，等等。

在学校教育中，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教育部公布的章程中，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同时，各种独立的女学校也更多地出现了。如南京光复军女子队在民国建立后便改组为复心女子学校，并由陆军部支援开办费一千元(136)。再如，对曾经"尽力民国"，而现又"热心向学，拟赴外洋"的女学生，临时政府也加以支持。1912年3月14日，陆军部便一次批给尹锐志等女生"各一千五百元，以备三年学费"(137)，等等。从各级各种女学校之开办，略可看出辛亥后女权之解放了。

上海中国公学为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著名学校，蔡元培、黄兴、宋教仁等皆为该校理事。辛亥事起，师生多半从军，校舍亦为吴淞民军所借住，各省公摊之经费也落空，因此，公学陷于停办。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即积极恢复该校，并批准以前清上海道抵押之源丰润等钱号的财产，移作公学经费(138)。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以上各项改革措施，使新式的学校教育迅速地恢复并有所发展。1912年，全国学校数达到87，272所，学生数达到2，933，387人。其中包括初级学校86，318所，中级学校

832所，高级学校122所[139]。

关于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五个方面，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这五项虽然属于蔡元培的个人主张，但民国以后的教育界，莫不受其影响。兹逐项加以解说[140]。

关于“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在清末已经成为一种有力的教育思潮，蔡元培认为潮流所趋，难于改变，所以采纳此种主张，但并不认为此种教育有永久的价值。他说：“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僻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逼处，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不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

关于“实利主义教育”。封建的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没有谋生的技能。实利主义教育在于改革这种弊端，使受教育者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技能。他说：“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分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为急者也。”

关于“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道德教育在于培养人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种教育是其他教育的根本，他说：“何为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世界观教育”，目的是要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说：“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

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

蔡元培认为，“美感教育”是实现教育目的手段。他说：“美感者含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通……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并以中国古代儒家的教育来论证他的五方面教育说：“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乡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

他还以西方之教育来论证他的五方面教育说：“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脱氏，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德弗伊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他又从教育界的三育说，概括他的五育说：“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蔡元培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大都来源于西方，或来自德国，或来自美国，或来自其他西方各国。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都是以超阶级的姿态出现的，蔡元培也是这样在中国宣扬的，把资产阶级教育说成是超阶级教育，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却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教育的进步作用。蔡在上文的最后说：“满清时代，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敢于反忠君，敢于反尊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二　新闻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言论自由”的原则。

临时政府内务部最初曾颁布了一个《暂行报律》，规定比较严格，向报界约法三章。

>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本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日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
> （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
>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141)

上述《暂行报律》电文发布后，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大共和日报》等均通电指责。其中，以章炳麟最为强烈。3月7日，章为《大共和日报》撰写了题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当知报界中人，非不愿遵守绳墨，惟内务部既无作法造律之权，而所定者又有偏党模胡之失。”(142)

在上述情况下，孙中山也认为上述报律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令饬内务部宣布无效。他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

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143]

其实，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对反革命的言论，如煽惑破坏共和国体者，加以限制和取缔，还是必要的。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缺乏资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他们盲目地模仿西方的“言论自由”。这样，就在实际上为一些反革命言论开了绿灯。

但是，总的说来，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即开放言论的政策，对破坏清政府的钳制言论的政策，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12年，全国报纸约达五百家之多，其中北京五十家，上海十五家。一些中等省会城市，也都有许多家报纸，如广州有十三家，福州有十一家，南昌有八家，甚至象扬州、常州、无锡、南通、绍兴、汕头、烟台、常德等城市，也都各有一两家报纸[144]。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

第六节　临时政府的根本弱点和北伐的夭折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暂的三个月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领导革命的政党——同盟会，存在着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根本弱点：政治上纷歧，组织上涣散，使革命缺乏坚强的领导；不敢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又使革命缺乏依靠的力量；酝酿北伐又半途而废，革命势力未能胜利发展；加以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革命内部敌人的捣乱，这样就使南京临时政府最后不能不归于失败。

一　同盟会的涣散

革命形势的迅速到来，要求革命政党加强统一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同盟会却恰恰相反，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虽然指出了“元凶尚在，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但却表白革命党

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145]。同年12月，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旅沪各省份会部分负责人也参加。这次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虽然指出了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并强调了“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146]。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能阻止“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继续发展，相反，却更加严重了。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日益激化。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自称都督，李初拟率部攻陈，后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章炳麟即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自任会长，以程德全为副会长，接着又推张謇为“特务干事”[147]。章在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讲演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148] 1月4日，他创办《大共和日报》，在发刊辞中公然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149] 其攻击的矛头显然指向刚刚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公布自1912年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却在《大共和日报》第2号上以“本社社长”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况此次参事会，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变名，既非国民公选，何有决议改历之权。故在议员未选，历书未颁，对于此等少数空言，断难遵行，愿全国人民审思之，愿各代表反省之。”

浙江独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自南洋返国，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招兵买马。沪军都督陈其美不能容许禁脔之内出现一支异己的军队。于是，就指使蒋介石于1月14日暗杀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陶成章被刺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轰动一时的政治暗杀事件。陈其美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解决政争，不仅无补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反而给向往革命的

人们的心中投下了阴影，由此，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更形扩大。章炳麟断然拒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

3月，章炳麟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他在改党大会的演说辞中说："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150] 接着，统一党又发表《宣言书》，声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

总之，章炳麟在辛亥革命后已经明显右倾，不论联合会或统一党，都不过是一种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因此，它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无不加以反对。例如，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章极力反对，公然为袁张目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151] 3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参加，而章炳麟却送来了这样一副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对于章的这种态度，四川革命党人吴玉章在后来曾加以评论说："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152]

对于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之间的争端，孙中山主张尽力调解。如，广东汕头民军司令、光复会员许雪湫、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要他"解释调处"，并强调指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153]。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双方仍然纷争不已。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等由于未能取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部长席位，也愤然脱离了同盟会，而联合湖北的立宪派另组“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因此，同盟会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黄兴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他虽然在1907年因旗帜设计问题和孙中山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和孙中山配合得不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支持了孙中山。但是，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民国建立之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思想。他在一个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154)

在黄兴看来，只要把满人统治换成汉人统治，革命就算达到目的，就可以“大风歌罢不如归”了(155)。这样，当然就失去了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仍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

综上所述，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已处于思想混乱、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样的政党当然不能领导南京临时政府走向胜利。孙中山在后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156)

二　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广大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又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盟会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其纲领中提出了解决

土地制度的主张，即“平均地权”，并把这一主张作为同盟会的三大纲领之一。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方针、宣言和一系列法令、规章中，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密切相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矛盾，又同封建的地租剥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在革命时，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敢于承认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必要，但在实践上却没有触及封建势力根基的勇气。

当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之时，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极为广泛。在南京临时政府管辖的地区，也到处发生农民的抗租斗争。仅1912年1月间便有多起：江苏昆山、青浦交界地区一百三十余村农民，“宰牲结社，齐心抗租”。上海南汇地区大团等处人民抗租，“聚众千余人，打伤政府收租委员，抢走当地驻军枪支”。江苏奉贤蔡家桥乡民，“闻南汇抗租，遂遍发传单，抗纳租粮，影响遍及全县”。浙江海盐县“澉浦乡民因抗租聚众千余抢夺民团枪械”(157)。浙江嘉兴府石门湾鸽子滨一地主因催收租米、扣押佃户，结果被乡民一二千人围殴。其中，以江苏青浦县的抗租斗争，最为典型。现将当时关于这一斗争经过的原委报导，节录如下：“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政部以租务攸关赋税，传知地保，谕各地乡民依限还租，地保不善处置，语多压制，致乡民激怒，麕集县城，与民团抵抗。该乡民受伤数人，遂将民政长徐彭龄之子劫去，大起风潮。当经徐君请松军政分府派兵弹压。”(158)

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反映出广大农民渴望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革命党人支持，相反，差不多都遭到各省都督包括革命党人的都督派兵镇压。江苏都督多次出示，严禁抗租，竟说：如抗租不还，“准由各业户禀经该管衙门，按户提案押追以凭照例严办，如聚众抗租或竟持械横行，即属有意破坏治安……惟有按军法从事。”(159)

由于革命党对农民的自发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广阔的农村依然如故，一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丝毫触动，封建政治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组织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斗争，因而，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软弱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60]

三　不敢明确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是革清政府的命，因而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武昌起义后不久，英国的《字林西报》就直截了当地承认："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

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在反帝方面所起的客观效果是显著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下述事件就是显明的例证：

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集会，升旗、鸣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遭到荷兰警察的武装干涉，华侨三人被打死，十多人被打伤，百余人被逮捕，书报社被封，外埠来电被截[161]。华侨全体罢市，以示抗议，荷兰政府出动军队强迫开市，继续逮捕了四百多人，最后的逮捕数目，竟达一两千人[162]。

事件发生后，泗水华侨分别向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上海华侨联合会发电，请求保护。南京临时政府接电后，立即连电袁世凯要其必须和驻北京的荷兰公使交涉，并同时要驻荷兰中国公使直接和荷兰政府进行交涉。上海《民立报》曾以《讨荷兰之辱我民国》为题，发表社论说："当满清窃国，献媚外人，弃我数百万华侨于海外，不与保护，致备受强敌凌辱，可惨可痛之事，不止一端。……今日之民国，非昔日专制时代可比也。外人对我，胡犹若是之野蛮残暴也。呜呼！荷兰人竟辱我民国矣，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以是裂眦愤

书，而为泗水华侨请命。”[163] 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6日“电荷外部，要求赔偿损失，辞极激昂”[164]。2月28日，临时政府拟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165]。

交涉结果，荷兰政府不得不接受了下面的条件：（1）惩办杀害华侨的荷兰人；（2）对被害华侨，由荷兰政府优礼埋葬，并抚恤其家属；（3）受伤华侨，由荷兰政府负责治疗；（4）赔偿华侨财产损失；（5）对华侨应和荷兰人同等待遇。

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一向是屈辱忍让，卖国残民，而这次中荷交涉，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新纪录，使国外华侨扬眉吐气，一新耳目，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国开国的重大结果。

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主观上并没有提出反帝的目标和纲领，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也没有。如果说在同盟会成立前还出现过《警世钟》、《猛回头》那样痛快淋漓、激动人心的反帝文字，可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越接近辛亥革命前夕，这样的文字反而少见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其《宣告友邦书》中，明确地宣布愿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宣言书中又说：“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166]

要想在一个早晨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那是不现实的。革命也允许权宜之计。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切都加以“照旧”、“承认”，那么中国就无法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了。正是由于这种无区别的“承认”，在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中，立即呈现了它的恶果。下述事件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1912年1月下旬，山东青岛附近地区的即墨县为同盟会所光复。

但是根据1898年的《中德条约》，德国租借了青岛，并且规定在青岛周围约五十八公里的面积，划为由德国监视的不设防地区。而即墨县就在这个不设防地区的范围内。因此，德国派遣一百三十名骑兵前往即墨，以条约为借口，要求革命党撤退武装；同时自青岛发电给山东巡抚胡廷枢，告知即墨情况。清政府闻讯后，立即派兵四百余人突袭即墨，杀死革命党人三十多名，并将附近村庄烧光。当地革命军请求南京临时政府与德国政府交涉。而临时政府拘于旧约之“承认”，也就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由孙中山于2月10日下令革命军自即墨撤退(167)。

南京临时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和同盟会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认识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革命是向它们学来的，学生向先生学习，先生自然会对学生进行帮助。孙中山长期旅游海外，就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种种“睦邻”、“保护外人”、“承认”一切旧约的宣言和法令，也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

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时代的反革命“先生”并不帮助半殖民地中的革命“学生”。它们绝对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就是证明。

四　北伐的夭折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起义各省的革命群众团体和都督府就酝酿进行北伐。最早倡议北伐的是群众革命团体。广东独立不久，一个名叫光汉社的团体，在11月15日致广东都督胡汉民书中就要求“即日召集各府州县各团体代表，开大会决议筹兵筹饷平胡之大计”(168)。表达了广东人民北伐的决心并愿为天下倡。

稍后，江浙一带也出现了许多主张北伐的团体。上海旅沪各省人

士纷纷发起组织北伐队，青年学生尤为积极，一时出现了“学生北伐队”、“中华民国学生军团”、“学生军”、“学生北伐团”、“国民军北伐团”、“学生守卫团”等组织。特别应指出的是，妇女们也组织了“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中华女子竞进会”、“女子劝捐会”等团体，积极支援北伐。“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在简章中指出：“本会专为北伐军而设，随赴战地医救受伤士兵。”(169)

与此同时，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名义建议组织北伐联军。他在致各省都督要求派代表到沪组织临时政府的电中说：“北京未下，大局难平，拟组织联军，共谋北伐。现定蜀湘楚为第一军，由京汉路进行。宁苏皖浙为第二军，由京（津）浦路进行。闽粤为第三军，由海道进行。”(170)

当时，孙中山既未回国，临时政府也未成立，北伐活动还只是民间的倡议和各省都督间的自愿结合。12月5日，北伐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推程德全为会长，章驾时为副会长，朱芸为司令。11日，北伐联合会设立“军机统一总汇处”，并发布该处章程说：“本处为民立战时机关”，“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招集兵队，统合军机，以期一致进行，共谋光复为宗旨。”北伐联合会一面在上海招募士兵，一面致电各省都督，要求各省将北伐之师电告，以便划一军制。

南京方面，12月20日“江浙联军在谘议局开军事大会，提议北伐，并推举北伐总司令，当用投票互选法。到会各军将校一百余人，当举定徐绍桢为北伐总司令官，随即电各省都督”(171)。

广东北伐军是最早见诸行动的。其第一军于1911年12月抵沪，约一混成协，组织甚完备。并准备在当月再发广东第二期北伐军约一混成协。1912年一二月再发第三期北伐军约一镇。由于广东北伐军有华侨支援，所以兵精饷足，战斗力较强。

当时的北伐，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机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忙于南北议和，加以财政又非常困难，革命党的领导人对北伐有各种具体不同的态度：如宋教仁等“认为攻取北京之类，只能做为鼓舞士气的一种策略，实际上难于实行”[172]。孙中山则是坚决支持北伐的，他在1912年1月4日令广东都督陈炯明速出兵北伐的电文中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173] 孙中山本人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174]

1月9日，黄兴领导的陆军部正式成立，不久即确定了北伐计划；以湘鄂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在宁之各省北伐军为第二军，沿津浦路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标后，再与五、六军会合，攻占北京。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即已经是以议和为主了。北伐军虽然组织起来，并表示一旦“和局破裂，即行宣战”[175]。但仍不能摆脱下面的困境：“各军名目众多，编制歧异，且统帅指挥，既不统一，后方接济，又无专责。”[176]

北伐也受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军北伐。蓝军乘海容号等三艘军舰先到达山东烟台，后又进军满洲，拟在辽东半岛登陆，支援东北人民的斗争。1月20日，日本“音羽”舰将校访蓝天蔚，谈到在满洲中立地带登陆问题，日本将校即一再强调，不但中立地带绝对拒绝利用，即在其他满洲沿岸地域登陆，“亦将使满洲之安宁秩序发生紊乱……为避免将来发生紊乱，应该请贵军放弃登陆计划”[177]。最后，北伐军主力不得不驶向大孤山、安东方面登陆。

孙中山组织的六路北伐军，在实际上，除宁皖、淮扬二路于1月下旬北进，烟台、关外二路有所行动外，其他二路并无进展。

南方是以北伐配合议和，逼清帝退位，而北方则以议和破坏南方的北伐。这一点无论是伍廷芳或唐绍仪，都看得很清楚。伍曾对唐说："宜速谏君让国，自保安全。则北伐之师，无名可借。"[178] 议和果然破坏了北伐。如担任淮扬一路北伐司令的林述庆便认为南北议和行将达成协议，此后，决无战斗，随即"电请交卸……并遣散本部各员"[179]。

谭人凤在谈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形势和对北伐的评价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分析："时南军援鄂者，有沈秉堃统率之湘桂联军，马毓宝移驻九江之赣军，南京派遣黎天才之镇军，唐牺支、王政雅光复荆襄，重庆四川亦已光复，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领滇粤军驻临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扬州徐分府合皖军屯宿迁，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阳六合等处亦有军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合于南京城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以及固有之军队与新编之各军，合计不下十万余众。而广东、闽、浙尚议继续出军，兵力不可谓不厚。加之长安、太原早已光复，烟台有刘基炎等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有滦州兵变之一事，东省自牛庄发难后，关外都督蓝天蔚尚谋大举。使南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三路夹攻徐州，分一支捣开封与鄂军合，一支由京（津）浦取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为瓮中之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乃袁奸险狡猾，一方断行组织内阁，胁迫皇室军费数百万，着着准备进行，而于休战期间，使倪嗣冲攻下颍州，为安徽进攻南京之计划；一方与伍代表用电报谈话之创举，再请延期十五日，冀使民党师疲饷匮，易就范围。民党堕其术中，号令各军不许进击，决与议和，则大错特错者也。"[180]

谭的这段论述，具体地描绘了北伐的形势，特别指出了以议和阻

止北伐的重大错误，是比较中肯的。

第七节　南北议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

一　帝国主义的干涉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革命，一向是极力破坏和阻挠。还在武昌起义的前夕（10月3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根据情报，便要求增派英舰来汉口。武昌起义爆发，英、美、德、日、俄、法、奥等各帝国主义国家驻远东的舰队，纷纷驶向汉口。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尖锐，没有能够互相勾结起来，重演八国联军的丑剧，以暴力干涉中国革命。它们所采取的手法是相继宣告“中立”。从此，帝国主义就披着“中立”的外衣，借口“保护”外侨，对中国革命不断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武昌起义一发生，日本政府就把这次革命“仅看作一次内乱”，采取了“不与叛党发生任何外交关系”的方针[(181)]。

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后三天，清政府陆军部尚书荫昌特派人赴日本驻华公使馆恳请青木少将：“欲由日本火急购买炮弹三十万发，枪弹六千四百万粒，步枪一万六千支。”[(182)] 日本政府立即决定予以援助。日外相给日使的复电说：“帝国政府鉴于清国政府为剿讨革命军急需枪支、弹药等迫切情况，已决定由本国商人设法供应，予以充分援助。”[(183)] 在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下，10月23日，由泰平公司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和清政府陆军部之间签订关于购买武器合同，总计价款日金二百七十三万二千六百四十元整。

11月3日，即上海起义的当天，帝国主义者以“侨民义勇队”的名义，一度侵占沪宁路车站。同月上旬，美、英、德、日等国停泊在南京的军舰派兵入城，其游弋福建的海军也在福州登陆。同月15日，俄、日、美等国借口保护驻烟台的领事馆，也派水兵在烟台登陆。综

合统计，到11月中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河停泊的军舰，已达五十一艘，兵力配备达一万九千人。此外，他们还借口保持北京、天津、山海关间的交通，陆续在这条线上增加兵力。据12月15日英国陆军武官的报告，当时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地，帝国主义驻军（包括英、美、日、俄、德、法、意、奥、荷、比等国），已达七千多名。

除武力威胁外，帝国主义还从经济上百般设法扼杀中国革命。例如扣留海关税款，便是极狠毒的一招。原来，作为清政府所借外债和对外赔款担保品的税款，照例是在征收后存在中国的银行里。但当革命军占领一些南方口岸后，帝国主义公使团竟然于11月17日议定将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均置于总税务司之下”，并“委托”上海各外国银行组织专门机构管理。此后不久，公使团又指定由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联合组成一个非常委员会，来劫夺和分配中国的税收。帝国主义者扣留海关税款的目的，英公使朱尔典在11月23日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一当某一条约口岸的管理权从清政府落到革命党手中时，征收的款项就处在后者的支配之下，因而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可能被他们用来充作军费，或供满足叛党政府的其他急需之用。”(184)

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害不尽相同，因此在如何破坏和干涉革命的主张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日本和俄国较为贪婪，可以算作一类。英国和美国可以算作另一类。

日本口称“中立”，实则窥伺时机，企图宰割中国，力图将革命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而在华北、内蒙和东北一带保持帝制，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日本军部便认为“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的时机已到”，并曾秘密指使川岛等人，在满蒙一带进行此项阴谋活动。1911年12月18日，日本通过横滨正金银行，贷给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银二万两，以该王“所辖全部领土为抵押”(185)。

日本对满洲之阴谋侵吞，更为其一贯之政策。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即作出决议："鉴于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清国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故我政府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的地位，并须多方划策，使满洲现状得以永恒持续。此乃前任内阁在执政期间经过庙议所决定的方针。"(186)

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立场，与日本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趁机"一举分割满洲、蒙古"。10月21日，武昌起义后不久，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说："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为我国利益起见，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时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完全赞成他的见解(187)。

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会见俄国首相的一次谈话说得更为露骨，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辛亥革命"对日、俄两国的特殊利益实是一场很大的危险。迄今为止，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与其坐视事变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满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同时，还公开地谈到，"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〇七年协约中规定的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88)。不过，他们都担心英、美、德各国的干涉。所以尽管反复商讨，终于没有付诸施行。

英国不同意日本大规模武装干涉的主张。它看到清政府"似已没有希望"，"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朱尔典11月6日的报告）。而它的经济利益又主要在长江流域一带，因此它一方面不敢公开得罪革命政府，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另方面又反对日本等国的单独行动，以免影响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三番五次地警告日本不得对中国采取单独的干涉行动。

美国也不同意日本的主张，因为它在远东的兵力不仅不及英国，也不及日本。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有利于日本势力范围的扩大，却不

利于实现自己的野心。因此，它在德国支持下，提出列强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来牵制日本。

德法两国因忙于欧洲事务，也都希望不破坏原来在远东的“均势”。西方列强都不同意日本的主张，而唯一同意的俄国，也处于矛盾状态。俄国驻华公使在寄往彼得堡的报告书中说：“一系列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将我们同法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与这两个友好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上述情况下，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的手段，就不是按照日本的主张，而是按照英国的主张进行，即从中国内部找寻代理人，窃夺革命战果，埋葬革命。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189) 英公使朱尔典在袁入京前夕向其外交大臣格雷报告说：“袁世凯可望于明日清晨抵京，这件事情已在此间产生一种安定人心的效果。”15日，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190)

此后，正是在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支持下，袁世凯加紧搞“南北议和”的骗局，借以绞杀革命。

二　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

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内奸的联合进攻，革命党人中妥协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革命党的领导人不敢发动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睛，错误地把袁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

他为共和国大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取得胜利。黄兴致电袁世凯，提出保证说：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191]。这一切自然使政治野心家袁世凯大为动心，并立即展开了攫取共和国大总统以扑灭革命烈火的阴谋活动。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十一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唐绍仪于11日抵汉口，由英国代理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开会。17日唐至上海。这时，英国资本家李德立以“私人”身份出面，在唐绍仪和伍廷芳之间奔走撮合。唐绍仪至上海，即住在李德立家中。

12月18日，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举行首次会议[192]。这时的汪精卫，也已由北方来到上海，被任命为伍廷芳的“参赞”，参加会议。

帝国主义各国决定对会议，实际是对革命派施加压力。早在12月15日，北京公使团已决定由英、美、日、俄、德、法六国共同出面，向南北双方代表发出相同的照会：“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因此各国政府“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12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往访袁世凯，袁表示：“一旦唐绍仪交涉无效，不得已，只好借助于各同调停。”[193]同日，日、英两国公使即向袁发出通告，愿意为双方协商进行斡旋[194]。

12月20日，即和议开始后的第三天，上述六国照会即由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双方代表分别提出。照会虽然说“持绝对中立态度”，但干涉之粗暴，已跃然纸上。俄国《新生活报》记者说：列强“在上海的这一行动乃是外国干涉的开端”。连《字林西报》也不得不但心：这个照会“可能在某些革命党人当中引起模模糊糊的不信任态度，对于外国中立的真实性发生怀疑”[195]。

会议至12月底，共进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除讨论了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争论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实，君主和共和之争，还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政权。由于革命党人已经屡次公开表示，如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袁世凯心领神会，他派唐绍仪南下的目的，就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当时的报刊舆论都有所觉察："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196)

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讨价还价，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逼清帝退位，这就是袁世凯在谈判中的手法。这一点，连清皇室也觉察出来了。如"御前会议"讨论是否赞成共和时，便有人对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指袁世凯）借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197)

南北会谈，几经周折，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198)。所谓召开"国民会议"，就是要使袁世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但是，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地点仍然争论不休，南方坚持在上海召开，北方则主张在北京召开。袁世凯给唐绍仪的指示电中，举出必须在北京开会的理由是："（一）北京久为中央政府地点，而民军完全统一之政府，尚未成立。（二）按全国道里，以北京为相距适中之点，而蒙回各属人民，远赴上海未必肯去。（三）各国公使驻北京，万国具瞻，可昭大信，非上海一隅之地，所能并论。"(199) 三条理由，说穿了，无非是袁世凯不能离开自己势力的中心，不能离开自己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离开了，他就无所恃了。

正在南北争论坚持不下的时候，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会议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使袁世凯大为恼火，他不仅使唐绍仪辞代表职，"停止开议"，而且公开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

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200]

这时，帝国主义也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为袁世凯助威。孙中山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字林西报》即发表社论，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独裁”，是“寡头政治”，“远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于革命党人急急忙忙企图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行动感到某种忧虑。”《纽约太阳报》则干脆说：“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纽约时报》甚至提出：“中国人最好还是保存帝国，并慢慢地实行政治改良。”日俄两国为反对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多次进行密谈，并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统一的行动。它们认为：“只要日、俄两国政府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恐亦不会急于承认。至少法国政府将同俄国政府采取同一立场。”[201]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也纷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进行活动。1月上旬，张謇密电袁世凯说：“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袁接电后，一面按张的计谋积极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202]？

汪精卫南下时，本与袁克定有密约，在南北议和会议期间，他参与机要，积极为袁氏父子卖命。他在致袁克定电中，奴颜婢膝地保证：“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203]

孙中山回国之初，本想要坚持革命到底的，曾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204]但是，在内外夹攻下，面对革命派的涣散状态和既成的议和事实，他无能为力了。汪精卫竟然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205]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开始妥协了。因此，当袁世凯探询如清帝退位选自己为总统“有何把握”时，孙中山立即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

氏。”(206)

袁在得到孙的保证后，立即加紧了逼宫的步伐。在清皇族内部，争议是非常激烈的。一些王公亲贵结成的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京津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投弹炸杀宗社党首领、军咨使良弼，彭当场牺牲，良弼重伤，于二日后死去。这一事件，使清皇族胆战心惊。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纷纷逃出北京，前往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托庇于帝国主义。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暗中指使北洋文武官吏，“请愿共和”，迫使清帝退位。26日，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北洋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骤。经过南北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主要是：“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付给”；“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的条件，如“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等。

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于1912年2月12日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诏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207)

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

三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

清帝退位诏书系张謇所拟，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讨论后，由唐

绍仪电达袁世凯转交清廷公布。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系袁世凯蓄意加入者，以表示他的权力乃得自清廷，而不必受革命政府的约束。就在这个诏书宣布的同一天，袁即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将清帝退位条件及退位诏旨副本，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并请转各国政府。2月13日，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208)]。

孙中山得悉清帝诏书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为了实践让总统职位给袁的诺言，除对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表示异议，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外，遂即于2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在后一咨文中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209)] 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是日发电给袁，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6日，袁欣然接受，并表示“勉尽公仆义务”。就这样，袁世凯攫取了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孙中山虽然让位给袁世凯，但对他并非没有保持戒心。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时，孙中山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210)]

孙中山想以这三个条件达到两重目的：第一，建都南京，把袁世凯调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第二，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防止他实行封建军事独裁。

关于建都问题，孙中山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强调说：“惟临时

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原来，南京方面许多立宪派分子乃至一部分同盟会员并不同意建都南京，而主张迁就袁世凯，建都北京。因此，临时参议院第一次讨论建都问题时，竟议决临时政府改设北京。只是由于孙中山坚持复议，才纠正过来。

狡猾的袁世凯深知北京是自己势力的中心，他绝不愿意离开这个中心，而到南京去受约束。有军即有权。他依靠自己培植的北洋军，一箭双雕，使清朝和民国都把政权交给他。他要继续依靠这个军队，来巩固窃取到的政权，以便为所欲为。因此，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就电告唐绍仪：“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211)

自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一再催促他南下就职，并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欢迎。他表面上不拒绝南下，只是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不能立即启程(212)。暗中却请求帝国主义列强出面干涉。

帝国主义立即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蛮横地表示：迁都南京在外国公使看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一则临时政府首都只是临时的，二则在南京“没有适合公使馆用的房屋设备”(213)。

2月27日，蔡元培等抵京。29日晚七时许，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即在北京发动兵变。变兵在东城及前门一带大肆放火抢劫，至次晨始渐平息。“北京城内枪声四起，所在纵火，招待所亦有兵士纵抢殴门而入，掳拐一空”(214)。蔡元培等仅以身免。3月1日晚，变兵复大肆劫掠西城。同日晚，保定受北京影响，亦发生兵变。乱事延续两昼夜，京保铁路沿线市镇亦受其害。3月2日，天津亦发生兵变。变兵四出烧杀掳掠，京奉、津浦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及造币厂等处均遭抢劫，许多民房、店铺被焚毁。袁世凯一方面制造兵变，一

方面放出空气，说“袁总统尚未离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变”。

兵变后，北京外交团立即采取措施。当日下午，召集会议，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部队每天在通衢大道担任巡逻”。次日，各国军队七百余名在市区列队示威。与此同时，日、英、美、法、俄、德等国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军队入京“护卫”，总数达三千多人。

在上述情况下，蔡元培等不再坚持迎袁南下了。他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袁世凯南下之要求，准许其在北京宣誓就职。并说：“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点：（一）由参议院电知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电复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六）临时总统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统不掌握实权。袁世凯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孙中山等人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争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调解，唐绍仪出任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25日，唐抵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新内阁内政、陆军、海军、外交四个重要的部都由袁世凯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袁的立宪派手中，同盟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同盟会原来企图掌握陆军、财政两部，由于袁世凯坚决反对，未能实现。新内阁的成立表明，革命党人再次遭到重大失败。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临时总统职。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迁往北京，新生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政府大权转到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中华民国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

---

(1)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页。

(2) 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

(3)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4页。

(4) 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2页。

(5) 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2页。

(6) 以上均见《时报》，1911年12月11日。

(7) 《时报》，1911年12月11日。

(8) 《时报》，1911年12月5日。

(9) 《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

(10)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05页。

(11)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05页。

(12) 《国父全集》，第二册，台湾1973年版，第789、790页。

(13) 《民立报》，1911年12月25、26日。

(14) 《民立报》，1911年12月25、26日。

(15)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16) 《访问孙中山先生》，《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

(17) 《胡汉民自传》。

(18)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6页。

(19) 《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

(20) 《民立报》，1911年12月27日。

(21) 《民立报》，1911年12月30日。

(22) 《民立报》，1911年12月30日。

(23) 《民立报》，1912年1月1日。

(24) 《民立报》，1912年1月1日。

(25) 《民立报》，1912年1月2日。

(26) 《民立报》，1912年1月3日。

(27) 《民立报》，1912年1月6日。

(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史馆档案（三十四），（2）34。

(29) 《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

(30)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7页。

(31) 参见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6—447页。此名单系仇鳌根据居正所谈，后又见1944年出版的《梅川日记》。但据《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刘星楠遗稿）所载，名单略有出入，即教育为汤寿潜，交通为程德全。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简任员名单》（1912年1月1日），国史馆档案（三十四），（2）34。又见《民立报》，1912年1月5日。

(33) 参见《胡汉民自传》。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蔡元培个人档案，165。

(35) 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11—412页。另据《时报》发表的《总统府秘书人员表》是：秘书长：胡汉民；总务科：冯自由、李肇甫、熊成章；军事科：耿觐文、石瑛、李书城；财政科：秦毓鎏、唐支厦、王夏；民政科：张通典、程明超、郑宪武；文牍科：康宝忠、张炽章、王毓仁、黄藻、廖炎、林启一、彭素民、任鸿隽；英文科：马素、邓家彦；电报科：李骏、邵逸周、余森郎、刘

式庵、谭熙鸿、李晓生。见《时报》1912年1月22日。

(36) 据现有文献看来，孙中山似乎没有根据决议向各省颁布使用五色旗的命令（见《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1912年2月3日）。自1906年同盟会讨论旗帜时起，孙一贯主张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但当时因意见不一，未作正式决定。武昌起义时，共进会在湖北用的是“十八星旗”，陈炯明在惠州用的是“井字旗”，陈其美等在上海用的是“五色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仍不统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省则仍被当作国旗使用。

(37)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38) 《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90页。

(39) 《五权宪法》，《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2页。

(40)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61页。

(41)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42) 《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43) 景耀月以现任教育次长，未便参与立法，故未到会。

(44) 吴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人员，因当时四川参议员尚未委派，他和其他两人系以代理身份参加了1月28日的参议院正式大会。后来蜀军都督委派了熊斐然、李肇甫、黄树中三人为蜀军政府参议员，见1912年2月5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八号。又据2月22日出版的《公报》第十九号载，吴永珊（玉章）复任内务部参事。

(45) 据《临时政府成立记》记载：“政府成立，应设立法院，以为立法机关。照代表团所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应由各省都督府所派参议员组织，业经通电选派。惟以道路暌隔，未能尅日到宁。而会议事件，不容延搁，乃先由各省代表员暂行代理。除星期停议及特别开议外，每日会议两小时。其后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抵宁，乃于正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开会，选举林森为正会长。然仍有数省未到者。计已到者为广东、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西、福建、广西十省，共参议员三十人。未到而以代表员代理者，为贵州、云南、陕西、四川、奉天、直隶、河南七省，共代理员十二人。”见《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4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史馆档案（三十四），（2）34。

(47) 《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

(48)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4页。

(49) 参见《五权宪法》、《民权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下卷。

(50)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3页。

(51)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3页。

(5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7页。

(53)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8页。

(54) 《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55) 《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1912年3月5日。

(56) 《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7号，1912年3月13日。

(57) 《内务部咨各省都督禁止缠足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1912年3月22日。

(58) 《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59) 《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

(60) 《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1912年3月17日。

(61) 《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2) 《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2号，1912年3月19日。

(63) 《大总统令禁烟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4) 《大总统令禁烟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5) 《为禁烟问题致伦敦各报书》，《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64—265页。

(66) 《内务部咨各部省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7)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8页。

(68) 《内务部请大总统查禁赌博陋习及禁售各种赌具呈》，《临时政府公报》第31号，1912年3月7日。

(69) 这件大衣仍存广东中山县翠亨村中山故居中。

(70) 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13页。

(71) 《蔡元培向校役脱帽鞠躬》，香港《大公报》，1980年3月7日。

(72) 《民主报》，1912年1月17日。

(7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19页。

(74) 《劝兄德彰勿任粤督仍办理实业电》，《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18页。

(75) 《大总统令法制局迅速编纂文官试验草案由》，《临时政府公报》第19号，1912年2月22日。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②八。

(76) 《大总统令法制局审定官职试验章程草案由》，《临时政府公报》第21号，1912年2月24日。

(77) 《大总统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与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草案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2月28日。

(78) 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3、294页。

(79) 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3、294页。

(80) 《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66页。

(81) 《自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盼速定总统电》，《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63页。

(82) 《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7。

(83) 《实业部通电各省都督设立实业司文》，《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2月5日。

(84) 《民立报》，1912年1月31日。

(85) 《天铎报》，1912年2月3日、6日。

(86) 《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87) 《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2月10日。

(88) 《天铎报》，1912年1月14日。

(89)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8页。

(90)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9页。

(9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1。

(92) 陈宗山：《南洋华侨革命史略》，第21—22页。

(93) 《时报》，1913年3月29日。

(9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18。

(95) 《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慎重农事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7号，1912年3月13日。

(9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6。

(97) 《胡汉民自传》。

(98) 《大总统通令各省将应解部款从速完缴以资挹注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1912年3月22日。

(99) 《临时政府公报》第9号，1912年2月6日。

(100) 《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2月10日。

(101)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55页。

(102)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

命》（七），第56页。

(103) 《民立报》，1912年1月30日。

(104)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3页。

(105) 《最新中国革命史》上册，第35—39页，美洲中国同盟会员撰述兼发行，1912年版。

(106)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1948年版，第82页。

(107) 《胡汉民自传》。

(108) 《提倡实业在实行民生主义》，《国父全集》，第二册，第225页。

(109)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51页。

(110) 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111) 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11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113)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114) 《辛亥革命前后》，第235页。

(115) 《辛亥革命前后》，第239页。

(116) 《辛亥革命前后》，第255页。

(117) 《辛亥革命前后》，第253页。

(118) 《辛亥革命前后》，第250页。

(119) 《辛亥革命前后》，第261页。

(120) 《辛亥革命前后》，第239页。

(121) 《辛亥革命前后》，第253页。

(122) 《辛亥革命前后》，第261页。

(123) 《辛亥革命前后》，第263页。

(124) 《临时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3月1日。

(125)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24页。

(126) 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1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7。

(1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22。

(1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02。

(130) 《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1912年2月1日。

(131) 《临时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2月2日。

(132) 《教育部禁用前清各书通告各省电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2号，1912年3月8日。

(133) 《临时政府公报》，第42号，1912年3月19日。

(1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77。

(135)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1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45。

(1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45。

(1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5。

(139)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367、368页。

(140) 《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1912年2月11日。

(141) 《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1912年3月6日。

(142) 《太炎最近文录》，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4页。

(143) 《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1912年3月9日。

(144) 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8—181页。

(145) 《同盟会本部宣言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4日。

(146)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1页。

(147) 章炳麟说："特务干事，即领袖之异名，国有大疑，即当咨访。"见《与张季直先生书》，载《大共和日报》第17号，1912年1月20日。

(148) 《大共和日报》第2号，1912年1月5日。

(149) 《大共和日报》第1号，1912年1月4日。

(150) 《大共和日报》第53号，1912年3月3日。

(151) 《致南京参议会书》，《时报》，1912年2月13日。

(152)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52页。

(15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74、75页。

(154) 《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

(155)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18页。

(156) 《致邓泽如论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1914年10月24日），《总理全书·函札》上，第375—376页。

(157) 《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158) 《民立报》，1912年1月8日。

(159) 《民立报》，1912年1月7日。

(16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161) 《外交部为和官横暴事三致新选大总统袁电文》及上海华侨联合会来电。见《临时政府公报》，第23号，1912年2月27日。

(162) 《外交部为和属华侨被虐事四致袁新选总统电文》，及《五致》电文。

(163) 《民立报》，1912年2月25日。

(164) 《民立报》，1912年2月26日。

(165) 《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

(16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2、23页。

(167) 《大总统及外交总长电烟台都督饬即墨民军照约暂行退出文》，《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2月10日。

(168) 《民国军行政用军文牍》第5集；《开国规模》，第587页。

(169) 《民立报》，1912年2月4日。

(170) 《民国军行政用军文牍》第5集；《开国规模》，第567页。

(171) 《民立报》，1911年12月21日。

(172) 1911年12月1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致内田外务大臣函。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邹念之编译）。以下所引日本外交电文，同见此书。

(173) 《开国规模》，第586—587页。

(174) 《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175)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55页。

(176) 林述庆：《镇军北伐记》。

(177) 1912年1月23日，日本驻芝罘副领事相羽致内田外务大臣函。

(178)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16页。

(179) 林述庆：《镇军北伐记》。

(180)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60页。

(181) 1911年11月17日，斋藤海军大臣致川岛第三舰队司令官（时在汉口）及加藤中将（时在上海）电。

(182) 1911年10月13日，伊集院驻清公使致林董外务大臣电。

(183) 1911年10月16日，内田外务大臣复伊集院驻清公使电。

(184) 《英国蓝皮书》1912年中国1号，第121号，第107页。

(185) 1911年12月6日，北京川岛致福岛参谋次长电；12月12日外务省仓知政务局长致正金银行井上副总裁函；12月31日横滨正金银行山川代总裁致内田外务大臣函。

(186) 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关于对清政策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109页。

(187) 张蓉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版，第337页。

(188) 1911年10月23日，本野驻俄大使与俄国总理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之谈话纪要，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105、107页。

(189) 克罗莱：《司戴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年版，第418页。

(190) 《英国蓝皮书》1912年中国1号，第58号，第40页。

(191) 《时报》，1911年12月18日。

(192) 《时报》，1911年12月19日。

(193) 1911年12月17日，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

(194) 1911年12月17日，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

(195) 《北华捷报》，1911年12月23日。

(196) 《时报》，1911年12月29日。

(197) 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14页。

(198)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841页。

(199) 《正宗爱国报》，1912年1月2日。

(200) 《袁世凯1月4日致伍廷芳电》，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60页。

(201) 1912年2月27日，本野驻俄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03页。

(202)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71页。

(203)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17—118页。

(204)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205)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57页。

(206)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8页，

(207)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83页。

(208)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209) 《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210) 《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211)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

(212)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213)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2号，第205页。

(214) 《蔡元培向南京孙大总统等报告北方兵变之东电》，《民立报》，1912年3月2—5日。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蔡元培个人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川督岑春煊奏折》，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馆藏，北京

《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不详

《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不详

《川路特别股东总会代表张知竞上查办大臣冤状》，不详

《法国驻东京公使致印度支那总督》，1900年6月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藏

《福公司矿案述略》（稿本），王敬芳，河南省档案馆藏，郑州

《福州邮政司李蔚良致北京邮政总局帛黎函》，1908年9月15日，清政府邮政总局档案，北京

《复张继函》，孙中山佚稿，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京

《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庚子革命先烈公墓碑》拓片，藏地不详

《光复宜昌大概情形说帖》，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国史馆档案》（三十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南京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武汉

《汉口光复始末纪》，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武汉

《何亚新小传》，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黄克强先生上孙总理述革命计划书真迹》，藏地不详

《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王以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北京

《寄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电旨》，军机处电寄档，北京

《静观斋日记》，藏地不详

《柯劭忞等沥陈莱阳官激民变后复纵兵焚掠戕毙无辜实在情形恳请代奏呈文》，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藏地不详

《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武汉

《孔府档案》，曲阜

《矿务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黎经诰复两江总督张人骏禀》，宣统二年三月，清政府农工商部档，北京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报面粉公司专利病民迭滋事端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农工商部档，北京

《蒙自法国代领事致法国驻香港领事》，1908年5月21日，法国外交部档案

《内务司实录》，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女国民拒款会公启》，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北京

《祁国钧呈》，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清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马福增防堵皖北涡、蒙、怀、凤一带饥民抢米致陆军部申文》，宣统二年九月十日，清政府陆军部档案，北京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书》，1904年，东京

《清季军机处》，叶恭绰，文史资料未刊稿，北京

《屈子厚行略》，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致外务大臣小村报告》，1911年6月10日，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北京

《神奈川知事报告》，外务省机密受第1532号；《福冈县知事报

告》，外务省机密受第5932、9942号，《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日本外务省档案

《施南光复始末记》，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四川咨议局第一次议事录》，不详

《孙鸿斌事略》，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孙逸仙谈话》，1900年7月25日兵库县知事报告，发兵秘字第410号，《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日本外务省档案

《汤觉顿致梁启超信》，国家图书馆藏，北京

《外务部档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北京

《我的家庭庆亲王府》，溥铨，文史资料未刊稿，北京

《伍正林事迹》，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武汉阳秋》，查光佛，1916年，藏地不详

《辛壬闻见录》，逸民（黄中恺），抄本，藏地不详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四川铁路案档案》，故宫档案馆藏，北京

《亚洲和亲会约章》，藏地不详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0年10月7、2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藏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8年2月12日，法国国家档案馆藏

《英国自治领中之中国革命党》，英国外务部档案

《郢中战史》，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云南总督丁振铎奏大兵收复临安府城折》，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张之洞未刊电稿》，国家图书馆藏，北京

《章太炎、陶成章合传补充》，樊光，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上海

《郑孝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北京

《知之录征料来鸿集》，张难先，抄件

《治国日记》（稿本），向讦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致大埠致公总堂函》，孙中山，藏地不详

《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林圭，藏地不详

《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成立及四川分会之发轫》，林启一（冰骨），四川文史馆藏，成都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谢缵泰，中译本未刊稿，藏地不详

《朱希祖日记》，稿本，藏地不详

《驻法公使刘式训致外交部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电报档，北京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藏地不详

《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为山东盗贼益炽关系大局安危恳请代奏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故宫军机处档，北京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油印本，藏地不详

中文著作

《巴县志》，出版地不详，1931

《北京来信》（英文版），出版地、时间不详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程家柽革命大事记跋》，白逾桓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出版地、时间不详

《川汉路过去及将来》，詹文琮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从戎纪略》，郭希仁著，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1913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北京，中华书局，1964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吴承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鄂乱汇录初编》，出版地不详，1911

《梵天庐丛录》，柴萼著，上海，中华书局，1936

《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四川留日学生，出版地、时间不详

《革命人物志》，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

《革命文献》，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革命逸史》，冯自由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

《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出版地、时间不详

《宫崎滔天全集》，魏育邻译，日本平凡社，出版时间不详

《龚自珍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共和关键录》，伍廷芳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75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

《光绪政要》，沈桐生辑，上海，南洋书局，1909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邹鲁著，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4

《国父全集》，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国父全书》，台北，中华学术院，1975

《国民军行政用军文牍》，出版地、时间不详

《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殉难传略》，出版地不详，1929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侯太夫人行述》，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出版地不详，1912

《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湖南反正记》，粟戡时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南光复运动始末记》，彭楚珩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出版地、时间不详

《华侨革命开国史》，冯自由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华侨与中国革命》，黄珍吾著，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

《皇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编，铅印本，出版地不详，1921

《黄帝魂》，上海，东大陆图书局，1904

《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8

《回忆录》，余家菊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陈天华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寄螺行馆》，出版地、时间不详

《江湖会资料选辑》，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出版地、时间不

详

《江浙铁路风潮》，墨悲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交通史路政编》，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31

《近代日中关系史料》，南里知树编，东京，龙溪书舍，1976

《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出版地、时间不详

《警世钟》，陈天华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拒俄运动》，杨天石、王学庄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荣德生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李烈钧自传》，出版地不详，1944

《李文忠公全集》，吴汝伦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台北，世界书局，1958

《列宁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列宁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浏阳烈士传》，萧作霖，出版地、时间不详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

《陇右光复记》，黄钺著，出版地不详，1913

《滦州革命记》，吴守正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出版地、时间不详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梅川日记》，居正著，出版地不详，1944

《美国外交文件》（1909），出版地、时间不详

《美国外交政策史》，莱丹著，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徐市隐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莫里逊通信集》，出版地、时间不详

《南海诗集》，康有为著，上海，广智书局，1911

《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张孝若编，上海，中华书局，1930

《南洋华侨革命史略》，陈宗山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南洋华侨史》，李长傅著，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29

《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出版地不详，1920

《南洋与创立民国》，张永福著，上海，中华书局，1933

《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清国视察复命书》，森藤吉郎著，出版地不详，1902

《清季的立宪团体》，张玉法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

《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辑，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地不详，193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6

《尪书》，章炳麟著，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邹念之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容庵弟子记》，沈祖宪、吴闿生著，台北，台湾文星书店，1963

《三十三年之梦》，宫崎寅藏著，林启彦译，香港，三联书店，1981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著，铅印本，出版地不详，1925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山西矿务档案》，李庆芳等编，出版地不详，1907

《山钟集》，苏绍柄编，上海，鸿文书局，1906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

《少年时代》，郭沫若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盛宣怀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

《师复文存》，刘思复著，广州，革新书局，1927

《司戴德》，［美］克罗莱著，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戴执礼编，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

《四川商办铁路驻宜公司第二期报告册》，出版地、时间不详

《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苏报案纪事》，上海，东大陆图书局，1904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纪芬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汤寿潜》，［日］支南玉一郎，出版地、时间不详

《陶成章信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0

《外人在华投资》，雷麦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3

《晚晴园与革命史略》，陈楚楠著，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40

《汪精卫文存》，出版地不详，1927

《望岩堂奏稿》，陈璧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章裕昆著，北京，三联书店，1952

《无尽庵遗集》，周实著，上海，国光印刷所，1912

《吴烈士旸谷革命事略》，出版地、时间不详

《吴稚晖全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7

《武昌革命真史》，曹亚伯著，上海，中华书局，1930

《武昌开国实录》，胡祖舜著，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

《熙朝纪政》，王庆云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湘汉百事》，载《满清稗史》，北京，中国书店，1987

《湘路纪闻》，出版地、时间不详

《湘事记》，子虚子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革命》，吴玉章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鄂公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枏、王忍之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

《辛亥革命史料》，张国淦编，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辛亥革命先著记》，杨玉如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辛亥革命在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辛亥滦州起义记》，凌钺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武昌首义纪》，李廉方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彭芬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徐愚斋自叙年谱》，徐润著，出版地不详，1927

《宣统南海县志》，桂坫等编，出版地不详，1910

《宣统政纪》，金毓黻编，奉天，辽海书社，1934

《雪生年录》，李根源著，曲石精庐，出版地不详，1934

《养寿园奏议辑要》，袁世凯著，出版地不详，1937

《乙巳政艺丛书》，邓实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义和团》，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瀛壖杂志》，王韬著，台北，广文书局，1967

《庸庵全集》，薛福成著，上海，醉六堂，1897

《愚斋存稿》，盛宣怀著，出版地不详，1939

《越南华侨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台北，1958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张季子九录》，张謇著，上海，中华书局，1931

《张謇日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张文襄公电稿》，张之洞著，出版地不详，1918

《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著，北平，文华斋，1928

《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汉康书局，汉口，时间不详

《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赵公季和电稿》，赵尔丰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浙江革命记》，顾乃斌著，出版地不详，1912

《镇军北伐记》，林述庆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北京，三联书店，1955

《中国革命记》，上海，自由社编印，1911

《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威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冯自由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邓泽如著，上海，正中书局，1948

《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6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孙毓棠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汪敬虞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舒新城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李文治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宓汝成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徐义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秘密社会史》，平山周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中国棉纺织史稿》，严中平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移民》，古丽芝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美］马士著，北京，三联书店，1958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冯自由著，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28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台北，正中书局，1961—196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外条约汇编》，马慕瑞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周悫慎公全集》，周馥著，出版地不详，1922

《资本论》，马克思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总理全集》，黄季陆编，重庆，众志书局，1943

《总理全书》，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编，台北，1950—1952

《最新中国革命史》，美洲中国同盟会员撰述，出版地不详，1912

《罪案》，景梅九著，京津印书局，出版地不详，1924

中文报纸

《北华捷报》，上海

《砭群丛报》，广州

《大公报》，天津

《大共和日报》，上海

《大同日报》，旧金山

《帝京新闻》，北京

《复报》，上海

《光华日报》，槟榔屿

《国风报》，上海

《国风日报》，北京

《国民报》，东京

《国民公报》，成都

《国民日日报》，上海

《京报》，北京

《警钟日报》，上海

《鹭江报》，厦门

《民报》，东京

《民国报》，天津、北京

《民立报》，上海

《民主报》，上海

《南洋总汇新报》，新加坡

《强国报》，武汉

《清议报》，横滨

《人民日报》，北京

《申报》，上海

《神州日报》，上海

《盛京时报》，沈阳

《时报》，上海

《蜀报》，成都

《四川官报》，成都

《苏报》，上海

《太平洋报》，上海

《天铎报》，上海

《天义报》，东京

《星洲晨报》，新加坡

《选报》，上海

《亚东时报》，上海

《亚细亚报》，北京、上海

《有所谓报》，香港

《预备立宪公会报》，上海

《越铎日报》，绍兴

《正宗爱国报》，北京

《中国白话报》，上海

《中国女报》，上海

《中国日报》，香港

《中国新报》，东京

《中外日报》，上海

《中兴日报》，新加坡

中文期刊

《川路月报》，成都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

《东方杂志》，上海

《俄事警闻》，上海

《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海

《二十世纪之支那》，东京

《革命评论》，东京

《国史馆馆刊》，南京

《濠头月刊》，澳门

《衡报》，东京

《湖北学生界》，东京

《湖南历史资料》，长沙

《汇报》，上海

《甲寅》，北京

《江苏》，东京

《教育界之风潮》，上海

《教育今语杂志》，东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经济导报周刊》，香港

《觉民》，金山

《临时政府公报》，南京

《满地红》，桂林

《南社湘集》，长沙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厦门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成都

《檀山华侨》，檀香山

《天讨》，东京

《童子世界》，上海

《文献丛编》，北平

《宪政》，重庆

《宪政新志》，东京

《宪志日刊》，北京

《新民丛报》，横滨

《新世纪》，巴黎

《游学译编》，东京

《宇宙风》，上海、广州、香港、桂林、重庆

《云南》，东京

《浙江潮》，东京

《政论》，上海

《政艺通报》，上海

《直说》，东京

《中国研究》，东京

《中华民国公报》，武汉

《传记文学》，台北

日文著作

《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平山周著，出版地不详，明治四十四年

《支那革命外史》，北一辉著，出版地不详，大正十年

《中国关税制度论》，高柳松一著，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

《宗方小太郎文书》，出版地不详，昭和五十年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出版地不详，日本印，1903

日文报刊

《朝日新闻》，大阪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部守太郎

阿礼国（R．Alcock）

安详

安定超

安西满

敖嘉熊

敖康夫

B

巴甫洛夫（И．П．Павлов）

白　坚

白金柱

白逾桓

白毓昆

柏丽斯辉

柏文蔚

柏玉田

坂西利八郎

宝　棻

宝　书

保　恒

鲍　何（P．Beau）

鲍化南

北一辉

本　野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必卑尔（倍倍尔August Bebel）

毕永年

毕　钟

卞　鼐

卞绔昌

宾步程

波伦哈克（Conrad Bornbak）

伯伦知理（Bluntchi Johann Caspar）

博　易

卜　力（N．A．Blake）

布　斯（C．B．Boothe）C

C

蔡　锷

蔡成勋

蔡成煜

蔡大辅

蔡德辰

蔡德懋

蔡登高

蔡艮寅　见蔡锷

蔡公时

蔡谷清

蔡汉卿

蔡河宗

蔡鸿仪

蔡汇东

蔡　杰

蔡济民

蔡　钧

蔡良垣

蔡乃煌

蔡人奇

蔡锐霆

蔡绍南

蔡　森

蔡廷幹

蔡突灵

蔡文森

蔡　岳

蔡元培

蔡钟浩

曹阿狗

曹　笃

曹富章

曹　锟

曹启荣

曹汝锦

曹汝霖

曹雪芹

曹亚伯

策　楞

岑春莫

岑春煊

岑得贵

柴云陞

长　福

长　庚

常恒芳

常荣清

常仲昭

陈　璧

陈　才

陈　潮

陈　春

陈　纯

陈　范

陈　福

陈　幹

陈　介

陈　磊

陈　冷

陈　强

陈　融

陈　涛

陈　同

陈　毅

陈　育

陈宝琛

陈宝箴

陈璧君

陈斌升

陈炳焜

陈伯平

陈布雷

陈昌镛

陈朝政

陈承泽

陈崇功

陈楚楠

陈从新

陈道循

陈殿卿

陈独秀

陈发炎

陈方度

陈福颐

陈黻宸

陈甫仁

陈高第

陈更新

陈赓虞

陈耿夫

陈国桢

陈汉第

陈汉钦

陈宏诰

陈宏生

陈吉甫

陈金瑞

陈锦涛

陈景华

陈景仁

陈竞全

陈敬第　见陈叔通

陈敬岳

陈炯明

陈可钧

陈孔伯

陈夔龙

陈勒生

陈侣笙

陈懋修

陈民情

陈能光

陈其美

陈启源

陈乾生　见陈独秀

陈勤宣

陈清畴

陈去病

陈少白

陈少武

陈诗仲

陈时夏

陈叔畴

陈叔通

陈树藩

陈树屏

陈树勋

陈太龙

陈陶怡

陈天华

陈廷威

陈威涛

陈惟彦

陈文褒

陈文锡

陈晓峰

陈撷芬

陈新政

陈兴之

陈训正

陈仪侃

陈逸川

陈涌波

陈由己　见陈独秀

陈犹龙

陈与燊

陈雨苍

陈玉著

陈毓川

陈遹声

陈元骧

陈云龙

陈芸生

陈载之

陈占梅

陈昭常

陈兆棠

陈兆雯

陈镇藩

陈之麟

陈钟麟

陈钟灵

陈仲赫

陈仲岐

陈仲恕　见陈汉第

陈子范

陈子挺

陈佐黄

陈作霖

陈作新

成炳荣

成文均

诚　勋

程　良

程　潜

程璧光

程昌祺

程德藩

程德全

程定国

程恩普

程吉甫　见陈吉甫

程家柽

程奎光

程石溪

程蔚南

程莹度

程赞清

程子楷

池亨吉

池汝谦

崇　厚

崇　善

崇　祯

褚辅成

楚　英

慈　禧

崔德聚

崔通约

崔正春

D

达　寿

大杉荣

大隈重信

戴　勘

戴　皮

戴鸿慈

戴季陶

戴子辉

丹　敦（Georges Jacques Danton）

但　焘

但懋辛

刀安仁

道　光

德　济

德　寿

德　馨

德为门（B．Twyman）

邓　铿

邓　勒

邓　实

邓汉鼎

邓华熙

邓家彦

邓警亚

邓莱峰

邓慕韩

邓万林

邓文辉

邓斡隆

邓西林

邓孝可

邓艺孙

邓荫南

邓玉麟

邓泽如

邓子瑜

狄　氏

狄楚青

迪理斯

刁春园

丁　槐

丁　锦

丁初我　见丁祖荫

丁笏堂　见丁立中

丁惠康

丁立中

丁世峄

丁惟汾

丁振铎

丁祖荫

丁作霖

董　盛　见董之威

董保泰

董鸿祎

董履高

董梦蛟

董天人

董修武

董之威

窦秉钧

窦以钰

都永和

杜　持

杜　牧

杜　潜

杜凤书

杜磷光

杜上化

杜武库

杜锡钧

杜亚泉

端　方

端　锦

段　云

段祺瑞

段宇清

段芝贵

段志超

敦　本

E

恩　铭

恩　寿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F

伐根年（Adriam Valekenier）

樊　彪

樊　光

樊　松

樊　锥

樊增祥

樊钟秀

范　模

范　涛

范　燮

范传国

范传甲

范光启

范腾霄

范贤方

范源濂

范云梯

范增福

范之杰

方　还

方　兴

方潮珍

方次石

方定国

方椒伯

方君笄

方君瑛

方瑞麟

方玿舟

方声洞

方声涛

方声煊

方先亮

方孝纯

方于笥

房宗岳

费道纯

费公直

费莱齐（H．P．Fletcher）

冯　平

冯　如

冯　煦

冯超骧

冯承钧

冯炽中

冯大树　见冯国璋

冯国璋

冯镜如

冯开濬

冯懋龙　见冯自由

冯乃古

冯仁铨

冯汝骙

冯斯栾

冯嗣鸿

冯特民

冯锡嘉

冯秀石

冯用霖

冯子和

冯紫珊

冯自由

冯祖荀

凤　全

凤　山

孚　琦

福　本

福　临　见顺治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福禄特尔

傅慈祥

傅华封

傅亦僧

G

噶尔丹

甘大璋

甘惠德

甘绩熙

甘兴典

甘兴汉

刚　毅

高　平

高　燮

高　旭

高　种

高登鲤

高尔伊

高冠英

高剑父

高尚志

高天梅　见高旭

高亚衡

高震霄

郜翔宸

戈克安

格　雷

葛　福（Sir Herbert Goffe）

葛　谦

葛敬恩

耿　毅

耿伯钊

耿瓞文

弓富魁

宫崎弥藏

宫崎民藏

宫崎寅藏

龚宝铨

龚春台

龚国煌

龚焕辰

龚开富

龚炼百

龚铭义

龚培林

龚世英

龚寿图

龚霞初

龚心湛

龚照瑗

龚振鹏

龚自珍

辜鸿恩

辜天保

辜天祐

古　柏

古　河

古　纳

古川清　见古河

古应芬

谷思慎

谷钟秀

顾　松

顾　馨

顾　英

顾乃斌

顾人邦

顾人宜

顾维钧

顾忠琛

关　唐

关老九

关仁甫

关云培

管　鹏

管　子

管曙东

光　绪

广　福

贵　福

贵　林

桂　良

桂　荫

桂丹墀

桂荣昌

桂太郎

郭　藩

郭策勋

郭殿邦

郭斗升

郭抚宸

郭鹤卿

郭继枚

郭懋仁

郭沫若

郭人漳

郭思曼

郭希仁

郭尧阶

郭镇瀛

郭中广

郭重光

H

哈德安（M．Hardouin）

哈汉章

哈华托

哈蒙特（L．Marmond）

韩　信

韩　衍

韩登举

韩凤楼

韩国饶

韩建铎

韩绍基

韩世忠

韩文举

韩佑治

汉　铭

杭慎修

杭辛斋

郝可权

郝濯继

何　健

何　宽

何　启

何　遂

何　震

何长清

何海鸣

何海樵　见何士准

何剑吾

何克夫

何阆仙

何牧士

何其义

何少卿

何士准

何腾蛟

何天炯

何渭生

何锡蕃

何香凝

何燮桂

何秀斋

何永盛

何育杰

何自新

何宗莲

和　珅

和田三郎

荷马李（Homer Lea）

贺公侠

贺金声

贺明堂

贺之才

赫　德（Robert Hart）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恒　钧

弘　历　见乾隆

洪承典

洪承点

洪东毅

洪念祖

洪全福

洪思亮

洪秀全

洪兆麟

侯　五

侯艾泉

侯宝斋

侯延爽

侯治国

胡　峻

胡　谦

胡　潭

胡　瑛

胡　源

胡彬夏

胡秉柯

胡岱铭

胡道南

胡定伯

胡鄂公

胡冠南

胡光瑞

胡国廉

胡国梁

胡汉民

胡寄尘

胡建枢

胡锦棠

胡景伊

胡兰亭

胡朗和

胡良辅

胡令宣

胡稑芗

胡铭盘

胡晴崖　见胡镇超

胡瑞霖

胡石庵

胡廷幹

胡廷枢

胡廷佐

胡万泰

胡惟德

胡效骞

胡新三　见胡鄂公

胡毅生

胡应升

胡玉珍

胡燏芬

胡元倓

胡镇超

胡宗畹　见胡瑛

胡祖舜

华　尔

华　鸿

华金元

华南圭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华振基

皇太极

黄　帝

黄　铎

黄　方

黄　郛

黄　福

黄　节

黄　侃

黄　牧

黄　锳

黄　钺

黄悲汉

黄凤之

黄复生

黄格鸥

黄葛树

黄光弼

黄国梁

黄汉湘

黄鹤鸣

黄宏宪

黄洪昆

黄华恢

黄华廷

黄焕章

黄魂苏

黄吉亭

黄家宸

黄驾白

黄建升

黄金福

黄金庆

黄金台

黄景南

黄九姑

黄开文

黄可权

黄坤荣

黄立中

黄隆生

黄鸾鸣

黄明堂

黄乃裳

黄庆澜

黄庆武

黄仁茨

黄韧之　见黄炎培

黄瑞兴

黄三德

黄申芗

黄生荣

黄士龙

黄世钦

黄世仲

黄书霖

黄树中

黄太盛

黄万里

黄为之

黄五肥

黄希纯

黄心持

黄　兴

黄炎培

黄耀廷

黄咏商

黄与之

黄元吉

黄元桢

黄芸苏

黄泽霖

黄展云

黄之萌

黄中恺

黄忠炳

黄忠浩

黄钟英

黄仲涵

黄宗羲

黄宗仰

黄遵宪

黄佐卿

霍殿臣

J

基尔斯

稽　镜

吉　升

吉　特

吉田松荫

戢翼翚

籍忠寅

纪鸿钧

季光恩

季雨霖

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

嘉　纳

嘉　庆

贾　生

菅原传

简　书

蹇念益

江　潘

江　树

江春霖

江恭喜

江继复

江孔殷

江三乘

江永成

江召棠

姜登选

姜桂题

姜国梁

姜明经

姜守旦

蒋　筠

蒋　群

蒋方震

蒋观云

蒋介石

蒋维乔

蒋雁行

蒋翊武

蒋肇鉴

蒋智由

蒋尊簋

蒋作宾

焦　林

焦达峰

焦逸仙

解荣辂

堺利彦

金　鼎

金邦平

金天翮

金兆龙

金振邦

金琢章

靳广隆

靳云鹏

经　权

经亨颐

经莲珊　见经元善

经元善

井勿幕

景定成

景梅九

景廷宾

景耀月

居　正

K

凯约翰（John L．Kaye）

阚鼎泰

康　格

康　格（E．H．Conger）

康　熙

康宝忠

康德黎（James Cantlie）

康广仁

康建唐

康佩珩

康同璧

康有为

柯　尔

柯逢时

柯劭忞

柯玉山

肯宁汉（A．Cunningham）

孔　庚

孔　子

孔庆镕

孔庆叡

孔伟虎

孔希伯

蒯寿枢

蒯寿育

匡　一

邝　杰

邝华汰

邝敬川

邝佐治

奎　保

奎　俊

昆　冈

L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莱　丹

赖承裕

蓝天蔚

劳　培

劳乃宣

雷　飚

雷　奋

雷光宇

雷鲲池　见雷在汉

雷沛鸿

雷天壮

雷在汉

雷震春

雷竹村

冷　遹

黎　德

黎　德（T．H．Reid）

黎　科

黎大钧

黎国廉

黎怀瑾

黎靖瀛

黎尚雯

黎天才

黎勇锡

黎元洪

黎仲实

黎宗岳

李　昌

李　纯

李　槐

李　恢

李　箕

李　骏

李　明

李　盤

李　杞

李　群

李　实

李　素

李　晚

李　鑫

李　准

李安国

李白贞

李白重

李炳寰

李炳辉

李伯东

李伯泉

李长龄

李长生

李成梁

李春萱

李大志

李德膏

李德瑚

李德立

李德懋

李德沛

李德山

李登辉

李发根

李藩国

李飞仙

李逢春

李凤楼

李福基

李福林

李辅黄

李干公

李冈中

李根源

李观海

李光炯　见李德膏

李国枫

李国华

李海云

李和生

李鸿祥

李鸿绪

李鸿章

李纪堂

李稷勋

李家焯

李家驹

李剑农

李金奇

李金山

李经方

李经羲

李景濂

李竞成

李敬通

李炯斋

李克果

李烈钧

李六如

李隆建

李梦彪

李慕尧

李培基

李培仁

李培松

李沛基

李鹏升

李平书

李乾玉

李清河

李庆元

李儒修

李汝魁

李少卿

李绍伊

李胜美

李盛铎

李石曾

李士修

李是男

李书城

李树芬

李思浩

李四光

李泰国（H．N．Lay）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李天邻

李维源

李文成

李文范

李文甫

李文楷

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

李熙斌

李仙云

李襄麟

李晓初

李孝章

李燮和

李秀昂

李牙聪

李亚东

李雁南

李耀堂

李翊东

李毅轩

李应生

李应元

李永洪

李永魁

李祐卿

李煜堂

李煜瀛　见李石曾

李源水

李云彪

李云书

李湛阳

李肇甫

李征五

李征庸

李植生

李忠孝

李钟岳

李仲揆　见李四光

李仲南

李仲特

李竹痴

李卓峰

李自平

李自重

李宗岱

李宗尧

李祖恩

李作栋

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

立花小一郎

利　寅

连　魁

连成基

联　裕

良　弼

梁　诚

梁　海

梁　史

梁柄农

梁大炮

梁鼎芬

梁端甫

梁敦焯

梁敦彦

梁焕彝

梁辉汉

梁经鳌

梁墨庵

梁慕光

梁慕信

梁启超

梁启田

梁乔山

梁如浩

梁瑞阳

梁善济

梁少廷

梁士诒

梁耀汉

梁钟汉

梁子刚

廖　炎

廖九妹

廖淑保

廖湘芸

廖翼朋

廖仲恺

廖子良

廖宗纶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蕃

林　圭

林　虎

林　肯

林　清

林　森

林　旺

林　文

林　獬　见林白水

林　旭

林长民

林干廷

林冠慈

林灏深

林焕廷

林建章

林觉民

林君复

林启一

林少甫

林绍年

林绍泉

林盛初

林述庆

林斯琛

林西惠

林白水

林修明

林义顺

林翼支

林懿均

林尹民

林云陔

林兆栋

林肇民

林之夏

林直勉

林宗素

铃木久五郎

凌　毅

凌　钺

凌文渊

刘　邦

刘　鹗

刘　崛

刘　谦

刘　三

刘　通

刘　同

刘　祥

刘　询

刘　炎

刘　彦

刘　英

刘　雍

刘炳福

刘炳阁

刘伯奇

刘朝望

刘成禺

刘承恩

刘承烈

刘崇佑

刘春霖

刘纯仁

刘存厚

刘单子

刘道一

刘得魁

刘东海

刘凤楼

刘凤起

刘凤桐

刘福彪

刘复基

刘复权

刘复泰

刘幹臣

刘赓藻

刘　公

刘古香

刘冠三

刘光第

刘光汉　见刘师培

刘光谦

刘汉柏

刘汉卿

刘鸿逵

刘华堂

刘化欧

刘槐森

刘辉廷

刘积学

刘基炎

刘家驹

刘家佺

刘家运

刘建藩

刘金声

刘锦藻

刘经文

刘景烈

刘静庵

刘九畴

刘鞠可

刘揆一

刘坤一

刘礼谦

刘林生

刘六符

刘懋赏

刘懋政

刘岐山

刘瑞阳

刘少舫

刘绍峰

刘慎终

刘声元

刘师培

刘世杰

刘世钧

刘树森

刘思复

刘思裕

刘松龄

刘崧衡

刘铁云　见刘鹗

刘维焘

刘温玉

刘文吉

刘文锦

刘文贞

刘锡麒

刘先俊

刘贤构

刘显明

刘显世

刘献芹

刘小林

刘心源

刘醒吾

刘学询

刘学泽

刘燕翼

刘艺舟

刘易初

刘翊宸

刘永福

刘永年

刘咏阊

刘于臣

刘玉山

刘元栋

刘照藜

刘震寰

刘镇华

刘之洁

刘紫骥

刘佐楫

柳大年

柳聘农

柳人权　见柳亚子

柳亚子

龙　璋

龙绂瑞

龙积之

龙济光

龙鸣剑

龙绍伯

龙毓峻

龙泽厚

龙湛霖

隆　启

隆　裕

隆世储

楼守光

卢　骚　见卢梭

卢　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卢　信

卢光诰

卢镜寰

卢汝翼

卢师谛

卢喜福

卢仲农　见卢光诰

鲁　鱼

陆　领

陆　祐

陆费逵

陆皓东

陆建章

陆兰清

陆乃翔

陆荣廷

陆熙顺

陆亚发

陆元鼎

陆钟琦

陆宗舆

鹿传霖

禄　显

吕　超

吕　复

吕　杰

吕大森

吕东升

吕逢樵　见吕东升

吕公望

吕逵先

吕留良

吕熊祥

吕志伊

吕中秋

罗　干

罗　何（R．Reau）

罗　杰

罗　进

罗　坤

罗　联

罗　普

罗炳顺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罗伯雅

罗大佺

罗殿卿

罗洪升

罗　纶

罗明典

罗乃琳

罗佩金

罗嗣广

罗遇坤

罗泽溥

罗织扬

罗仲霍

罗子舟

M

马　良　见马相伯

马　侣

马　荣

马　士（H．B．Morse）

马　素

马　骧

马步云

马步周

马达臣

马福益

马继增

马建忠

马绛生

马锦春

马君武

马克思（Karl Marx）

马龙标

马明熙

马培生

马汝骥

马相伯

马叙伦

马玉贵

马玉昆

马裕藻

马毓宝

马云卿

马中骥

马宗汉

麦　奎

麦孟华

毛复旦

毛庆藩

毛泽东

毛仲芳

梅　馨

梅际郁

梅乔林

梅青福

蒙　经

蒙民纬　见蒙经

孟　森

孟　子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孟恩远

孟华臣

孟昭常

米洛宾

密切尔（Mitchell）

苗　燮

苗金声

苗文华

旻　宁　见道光

摩　赓（Pritchard Morgan）

末永节

莫　牙

莫拉维诺夫（М．Н．Муравьёв）

莫里逊（G．E．Morrison）

莫锡纶

牟鸿勋

穆　勒

穆　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zenstein）

穆炳元

穆湘瑶

N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那　桐

那　文

南琴轩

内田良平

尼古拉二世（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икол йII）

尼拉托夫（Анатол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е ратов）

倪嗣冲

倪映典

聂　荆

聂　豫

聂炳基

聂缉槼

聂汝清

聂宪藩

宁　武

宁调元

牛广生

钮　瑗

钮传善

钮永建

努尔哈赤

诺克斯（P．C．Knox）

O

区凤墀

欧极乐（C．Ozil）

欧榘甲

欧慎刚

欧阳鸿钧

欧阳瑞桦

欧阳武

欧阳煦

欧阳振声

欧阳中鹄

P

潘宝璜

潘宝琳

潘达微

潘鼎新

潘赋西

潘国寿

潘缙华

潘矩楹

潘康时

潘若海

潘善伯

潘信明

潘训初

潘月樵

潘赞化

潘祖彝

盘　恩

庞　雄

庞鸿书

庞元济

彭　芬

彭程万

彭楚藩

彭尔堃

彭光烈

彭汉遗

彭纪麟

彭家珍

彭临久

彭汝琮

彭寿松

彭述文

彭素民

彭锡圭

彭荫祥

彭友胜

彭渊洵

彭允彝

片山潜

朴　寿

平　刚

平冈浩太郎

平山周

平田东助

蒲　洵

蒲殿俊

璞　良

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濮振声

溥　儁

溥　良

溥　伦

溥　颋

溥　仪　见宣统

Q

齐宝善

齐汝汉

齐希武

齐耀琳

祁耿寰

祁国钧

奇　列

琦　善

钱　鼎

钱　润

钱　拯

钱宝仁

钱能训

钱树芬

钱铁如

钱维骥

钱允利

钱允生　见钱宝仁

乾　隆

乔　煦

乔树枏

乔义生

乔治三世

秦　炳

秦炳钧

秦炳直

秦力山

秦瑞玠

秦毓鎏

秦载赓

秦宗周

覃　振

覃老发

青　木

清藤幸七郎

庆　蕃

琼　斯

丘　四

丘仓海

邱逢甲

邱炜萲

邱文彬

秋　瑾

仇　鳌

仇　亮

仇继恒

裘文高

曲士文

屈开埏

渠本翘

瞿鸿禨

瞿式耜

权道涵

全祖望

犬养毅

阙　龙

R

冉崇根

饶辅廷

饶国樑

饶汉祥

饶景华

任鹤年

任鸿隽

任可澄

任青合

任重远

日野熊藏

荣　炳

荣　禄

荣　庆

荣　铨

荣德生

荣福桐

荣宗敬

容　闳

容星桥

柔克义（Willaim W．Rockhill）

阮　式

阮德三

阮卿云

阮荣发

阮英舫

阮毓崧

瑞　澂

瑞天咸（Frank Suretenham）

S

萨　端

萨道义（E．M．Satow）

萨镇冰

三上丰夷

山川均

山田良政

善　耆

单道康

单鹏彦

商　鞅

商　震

商作霖

尚安邦

尚庆翰

邵　羲

邵　章

邵从恩

邵兆中

绍　昌

绍　英

佘　英

申锡绶

沈　荩

沈　权

沈　英

沈　瀛

沈葆桢

沈秉堃

沈恩孚

沈尔昌

沈鹤年

沈惠钧

沈家本

沈钧儒

沈联芳

沈林一

沈缦云

沈懋昭　见沈缦云

沈敏政

沈其昌

沈棋山

沈同午

沈维周

沈翔云

沈益古

沈瑜庆

沈云翔

沈增铭　见沈惠钧

升　允

盛典型

盛宣怀

施从云

施化龙

施正甫

石　瑛

石长信

石德宽

石锦泉

石敬瑭

石山俨

时　璧　见时功璧

时功璧

时功玖

时慧宝

史　青

史家麟

史家修　见史量才

史久光

史可法

史量才

史如坚

史推思

世　续

寿　耆

舒高第

舒礼鉴

舒先庚

税钟麟

顺　治

司　铎

司戴德（Wilard D．Straight）

司马昭

司徒芳

寺西秀武

松　寿

宋　恕

宋安枢

宋炳炎

宋鼎元

宋教仁

宋居仁

宋世杰

宋炜臣

宋锡全

宋新洲

宋学皋

宋玉琳

宋渊源

宋振东

宋镇华

苏　鹏

苏　秦

苏成章

苏凤初　见苏鹏

苏复初

苏良斌

苏曼殊

苏眇公

苏清泉

苏慎初

苏寿松

苏无涯

苏元春

苏子谷　见苏曼殊

肃　顺

粟道生

孙　林

孙　眉

孙　棨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　稳

孙　武

孙　毅

孙宝琦

孙宝瑄

孙秉堃

孙昌福

孙丹崖

孙道仁

孙德成　见孙林

孙多森

孙发绪

孙洪伊

孙家鼐

孙家祥

孙谏声

孙菊仙

孙揆均

孙梅堂

孙铭新

孙士鐼

孙天生

孙万乘

孙文鼎

孙延寿

孙逸仙　见孙中山

孙翼中

孙毓筠

孙泽沛

孙兆鸾

孙中山

孙竹丹

T

塔虎脱（W．H．Taft）

谭　昌

谭　馥

谭　义

谭　瀛

谭柏生

谭道源

谭二式

谭浩明

谭人凤

谭汝霖

谭石基

谭嗣同

谭西庚

谭熙鸿

谭心休

谭延闿

谭振德

谭钟麟

汤　雷（Townley）

汤　叡　见汤觉顿

汤　绪

汤　漪

汤　樵　见汤尔和

汤尔和

汤化龙

汤觉顿

汤寿潜

汤芗铭

汤一鹗

汤增璧

汤仲祚　见汤重希

汤重希

唐　豸

唐才常

唐才中

唐大通

唐尔庸

唐继尧

唐鉴章

唐景崇

唐琼昌

唐群英

唐绍仪

唐松岩

唐廷枢

唐维藩

唐文治

唐牺支

唐钟元

韬　美（P．Doumet）

陶　俊

陶　铸

陶成章

陶骏保

陶启胜

陶勋臣

陶亚魂

田　桐

田邦璿

田叔扬

田添铁二

田昔年

田野桔次

田应诏

田振邦

田征葵

田中玉

田仲扬

铁　良

铁　忠

同　治

童保暄

童国珍

童宪章

童挹芳

头山满

涂鉴衡

涂演凡

屠　寄

W

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

宛思演

万葆元

万炳南

万福华

万廷献

汪　东

汪　谦

汪　镕

汪　熙

汪炳山

汪长林

汪大燮

汪德渊

汪凤瀛

汪精卫

汪康年

汪龙光

汪曼锋

汪懋琨

汪荣宝

汪世荣

汪锡九

汪笑侬

汪性堂

汪贻年

汪祖泽

王　斌

王　汉

王　杰

王　莽

王　圻

王　群

王　韬

王　棪

王　猷

王蔼庐

王安石

王安之

王秉必

王秉恩

王秉璋

王炳楚

王灿登

王宠惠

王宠祐

王传炯

王垂书

王大侯

王得胜

王德涵

王德威尔德（Emile Vandervelde）

王发科

王法勤

王夫之

王冠三

王广龄

王和顺

王鸿猷

王怀庆

王季同

王嘉榘

王金发

王金铭

王景岳

王璟芳

王闿运

王隆中

王梦兰

王铭新

王慕陶

王乃澂

王丕承

王清江

王清穆

王庆云

王人文

王善德

王时泽

王士珍

王世骥

王世龙

王守愚

王思诚

王天杰

王天培

王天纵

王文锦

王文庆

王文韶

王锡彤

王先谦

王宪章

王学锦

王耀东

王一亭

王荫藩

王英楷

王用宾

王有宏

王有兰

王钰锡

王遇甲

王毓江

王占元

王振邦

王振畿

王振尧

王镇邦

王正廷

王政雅

王之春

王之禄

王芝祥

王志勋

王治增

王子匡

王缵承

威廉二世（Kaiser Weihelm II）

威勤逊

韦　玉

韦荣初

韦尚文

韦树模

韦统淮

韦统铃

韦云卿

韦兆熊

魏　兰

魏邦平

魏宸组

魏光焘

魏会英

魏金龙

魏荣斌

魏万侯

魏友琴

魏宗瀚

魏宗铨

温　翀

温朝钟

温楚珩

温带雄

温翰桢

温开元

温少雄

温生才

温世霖

温寿泉

温雄飞

温宗尧

文　斐

文　群

文　瑞

文　雯

文崇高

文经纬

文廷式

文显谟

翁　巩

翁　浩

翁人健

翁同龢

乌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

邬　钢

吴　楚

吴　镜

吴　昆

吴　馨

吴　煦

吴　樾

吴葆初

吴柄枞

吴炳臣

吴炳湘

吴沧洲

吴长纯

吴长庆

吴春阳

吴赐龄

吴从周

吴鼎昌

吴鼎元

吴凤岭

吴贡三

吴冠英

吴华堂

吴趼人

吴健彰

吴介璋

吴金彪

吴景濂

吴禄贞

吴庆桐

吴庆熙

吴若龙

吴弱男

吴三桂

吴绍璘

吴施德

吴士鉴

吴世荣

吴思豫

吴太山

吴天成

吴铁城

吴铁樵

吴绾章

吴醒汉

吴旸谷　见吴春阳

吴应培

吴英元

吴永珊　见吴玉章

吴玉章

吴渊民

吴元泽

吴兆麟

吴振黄

吴振麟

吴芝瑛

吴稚晖

吴忠信

吴重熹

吴子垣

吴梓生

吴宗慈

吴宗禹

吴作霖

伍　庄　见伍宪子

伍安全

伍崇仁

伍藉槃

伍盘照

伍铨萃

伍廷芳

伍宪子

伍桢祥

伍正钧

X

西太后　见慈禧

西乡隆盛

西园寺

锡　良

喜　源

下田歌子

夏　斌

夏　超

夏　时

夏道南

夏寿康

夏廷义

夏文炳

夏月润

夏月珊

夏允麐

夏之麟

夏之时

夏重民

咸　丰

向　楚

向　燊

向讦 谟

向炳焜

向海潜

向寿荫

向紫平

萧　参

萧　亮

萧　湘

萧安国

萧佛成

萧贵生

萧克昌

萧奇斌

萧星垣

萧友梅

萧雨滋

萧钟英

萧竹漪

小室友次郎

谢　持

谢超武

谢奉琦

谢汉秋

谢鸿焘

谢介僧

谢良牧

谢日昌

谢汝翼

谢石钦

谢寿祺

谢无量

谢晓石

谢英伯

谢元恺

谢远涵

谢子修

谢缵泰

谢缵叶

邢伯谦

幸德秋水

熊　垓

熊　通

熊秉坤

熊成基

熊成章

熊范舆

熊公福

熊继贞

熊克武

熊希龄

徐　濂

徐　勤

徐　润

徐　樾

徐　卓

徐宝山

徐宝亭

徐保生

徐碧泉

徐达明

徐尔音

徐佛苏

徐甫陈

徐广滔

徐国泰

徐国桢

徐翰文

徐怀礼　见徐宝山

徐寄尘

徐进炤

徐敬吾

徐镜心

徐觉我

徐礼明

徐廉辉

徐临端

徐满凌

徐茂燎

徐培添

徐佩旒

徐彭龄

徐日培

徐容九

徐少斌

徐绍桢

徐声金

徐世昌

徐世法

徐世光

徐述夔

徐松根

徐万年

徐维扬

徐锡麟

徐熠成

徐应安

徐赞周

徐则恂

徐占凤

徐昭良

徐振泉

徐祝平

徐宗汉

许宝衡

许崇智

许鼎霖

许景澄

许寿裳

许雪湫

许子麟

续　彪

续桐溪

续西峰　见续桐溪

宣　统

萱野长知

玄　烨　见康熙

薛　哲

薛大可

薛福成

薛金福

薛锦琴

薛仙舟

Y

严　端

严　复

严国丰

严纪鹏

严确延

严信厚

阎凤阁

阎锡山

阎一士

颜　楷

颜太恨

阳　明

杨　度

杨　坊

杨　霖

杨　铨

杨　任

杨　锐

杨　维

杨邦彦

杨伯谦

杨昌济

杨昌铭

杨朝杰

杨承溥

杨翠喜

杨大实

杨大铸

杨笃生

杨二虎

杨豪侣

杨鹤龄

杨宏胜

杨鸿钧

杨虎臣

杨会康

杨荩诚

杨敬宸

杨开甲

杨明远

杨铭西

杨慕时

杨彭龄

杨谱生

杨衢云

杨仁山

杨深秀

杨时杰

杨士琦

杨士骧

杨寿彭

杨树青

杨庶堪

杨天骥

杨廷栋

杨万桂

杨王鹏

杨文鼎

杨文柟

杨西岩

杨玺章

杨心如

杨信之

杨选青

杨言昌

杨耀琳

杨以德

杨荫杭

杨用楫

杨禹昌

杨玉如

杨毓麐

杨毓麟　见杨笃生

杨源懋

杨韵珂

杨载雄

杨曾蔚

杨增新

杨展鹏

杨兆林

杨兆霖

杨兆龙

杨兆蓉

杨振鸿

杨卓林

杨宗瀚

杨宗濂

杨缵绪

姚宝珊

姚东生

姚洪业

姚鸿发

姚金镛

姚晋圻

姚荣泽

姚文柟

姚以价

姚勇忱

姚雨平

姚运钧

姚志强

冶　公　见陶铸

叶　恩

叶　瀚

叶　澜

叶秉诚

叶赫那拉氏　见慈禧

叶惠钧

叶廷标

叶廷琛

叶仰高

伊　集

伊藤博文

宜　贵

易本羲

易季服

易世龙

易延憙

易正柏

易宗夔

奕　詝　见咸丰

奕　谖

奕　沂

奕　劻

荫　昌

殷承瓛

殷次伊

殷汝骊

殷子衡

尹昌衡

尹锐志

尹维峻

胤　禛　见雍正

应德闳

应龙翔

雍　正

颙　琰　见嘉庆

尤　列

游　寿

游德胜

于邦华

于凤山

于式枚

于右任

于赞扬

于祝三

余　诚　见余仲勉

余　丑

余　切

余　通

余诚格

余大鸿

余大猷

余德元

余东雄

余凤斋

余化龙

余焕东

余辉照

余鹏来

余屏垣

余昭常

余仲勉

俞　炜

俞诰庆

俞廉三

俞明霞

俞子夷

虞维煦

禹之谟

玉　昆

玉　润

玉源太郎

喻培伦

毓　朗

袁保庆

袁葆初

袁大化

袁家声

袁甲三

袁剑非

袁金铠

袁菊山

袁克定

袁南亭

袁世凯

袁树勋

袁希涛

袁义保

远藤隆夫

岳　飞

岳秀华

岳兆麟

岳钟琪

云　亨

恽毓鼎

Z

载　淳　见同治

载　穆

载　涛

载　湉　见光绪

载　洵

载　垣

载　泽

载　沣

载　振

臧冠三

曾　杰

曾　静

曾　培

曾　朴

曾　彦

曾　贞

曾　铸

曾阿义

曾长福

曾传范

曾根俊虎

曾国藩

曾继梧

曾连庆

曾日全

曾省三

曾省斋　见吴从周

曾锡周

曾昭鲁

曾昭文

增　祺

增　韫

查光佛

查嗣廷

詹大悲

詹天佑

战殿臣

张　彪

张　詧

张　潮

张　钫

张　昉

张　恭

张　煌

张　继

张　謇

张　澜

张　纶

张　铭

张　潜

张　榕

张　融

张　勋

张　仪

张　颐

张　樾

张百斛

张百麟

张百熙

张百祥

张保德

张秉庚

张伯烈

张伯歧

张楚材

张达三

张得成

张定甲

张斗枢

张鹗翎

张凤翔

张根仁

张观风　见张雅南

张贯夫

张广建

张国荃

张国溶

张国威

张海珊

张鹤龄

张鸿藻

张华丹

张怀芝

张奂池

张煌言

张汇滔

张季鸾

张季煜

张家镇

张嘉森　见张君劢

张建功

张捷先

张介礼

张进治

张劲夫

张景良

张敬尧

张静江

张君劢

张开儒

张莲芬

张良坤

张醁村

张懋隆

张鸣岐

张难先

张培爵

张人骏

张荣楣

张绍曾

张石朋

张士珩

张士秀

张世膺

张树柟

张树元

张天师

张廷得

张廷辅

张庭武

张通典

张惟聪

张惟圣

张蔚森

张文光

张文涛

张文祥

张锡銮

张锡元

张先培

张相谟

张学济

张学龄

张雪耻

张雅南

张雅堂

张尧卿

张耀曾

张一麐

张怿伯

张荫桓

张永成

张永福

张永汉

张雨臣

张雨岭

张元济

张云卿

张云山

张允斌

张曾敭

张照发

张肇桐

张折培

张折卿

张振标

张振武

张振勋

张镇芳

张正金

张之洞

张知本

张治祥

张智若

张钟端

张周垣

张祖同

张作霖

章　棂

章　梓

章炳麟

章驾时

章士钊

章太炎　见章炳麟

章裕昆

章宗祥

昭　椹

赵　缭

赵　伸

赵　声

赵　倜

赵　瑜

赵滨彦

赵秉钧

赵炳麟

赵成三

赵承武

赵城壁

赵春霖

赵戴文

赵德全

赵鼎钟

赵尔丰

赵尔巽

赵凤昌

赵复祥

赵公璧

赵国贤

赵恒惕

赵会鹏

赵家艺

赵鹏飞

赵启霖

赵士北

赵士龙

赵世钰

赵维熙

赵学奎

赵延泰

赵永昌

赵元寿

赵云亭

赵振清

赵正平

赵中鹄

甄　璧

甄吉庭

郑　垂

郑　金

郑　权

郑　言

郑葆晟

郑成功

郑观应

郑贯一

郑汉淇

郑兰荪　见郑兆兰

郑螺生

郑士杰

郑士良

郑陶斋　见郑观应

郑宪成

郑孝胥

郑毓秀

郑赞丞

郑藻如

郑兆兰

郑祖荫

志　锐

钟　杰

钟　琦

钟昌祚

钟麟同

钟木贤

钟宪鬯

钟倬宾

周　馥

周　华

周　骏

周　康

周　实

周　增

周承弼

周承荧

周代本

周淡游

周定原

周凤歧

周符麟

周果一

周海珊

周宏业

周鸿勋

周金箴

周君实

周来苏

周培善

周培艺

周瑟铿

周树标

周树模

周廷弼

周维藩

周维刚

周维桢

周学熙

周亚卫

周咏曾　见周来苏

周云祥

周震鳞

周之翰

周之贞

周仲岐

周自齐

朱　畴

朱　淇

朱　瑞

朱　深

朱　熹

朱　芸

朱宝奎

朱葆三

朱秉麟

朱朝瑛

朱次琦

朱登五

朱尔典（J．N．Jordan）

朱福洗

朱光复

朱贵全

朱国琛

朱和中

朱鸿度

朱槐之

朱家宝

朱九江　见朱次琦

朱敏仁

朱其昂

朱庆澜

朱三进

朱少穆

朱少屏

朱寿同

朱述堂

朱树烈

朱文邵

朱锡麟

朱扬武　见陈金瑞

朱彝铭

朱佑保

朱郁荃

朱元璋

朱云石

朱蕴章

朱之洪

朱执信

朱钟琪

朱子春

朱子龙

朱子淘

朱祖荫

竹内善朔

竺绍康

祝大椿

祝制六

庄赓良

庄汉翘

庄守忠

庄崧甫

庄廷钺

庄银安

庄蕴宽

庄之盘

卓秋元

邹　鲁

邹　铨

邹　容

邹代藩

邹代烈

邹道沂

邹永成

邹玉溪

邹毓霖

邹子良

祖绳武

左斗山

左学谦

左拯之

左宗棠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二卷
(1912—1916)
上

李 新 李宗一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二卷

（1912-1916）

上

李新　李宗一　主编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主要论述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就是从1912年2月到1916年6月。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年4月迁往北京，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变动。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官僚所代替。这不是一般的更换政府人员，而是一次全面的改组。表面上，改组是通过合法选举进行的，还带有中国古代揖让天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集团一连串政治阴谋活动和兵变暴乱的结果。从效果看，它起到了反革命政变的作用。

政府的性质，是由掌握政府权力的主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主导集团改变，政府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当权，就标志着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在中国统治的开始。所以我们把这一事件作为《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结束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端。

从民初的社会全貌来看，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凭藉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柄。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他们常常不使用政治手段，而是直接利用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封建专制时代，毫无民主可言；在军阀政治的高压下，人民无权和官僚擅权的情形依然如故。对北洋集团荼毒社会、祸国殃民的罪行，本书使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鞭笞。

作为一种特殊统治形式的军阀政治，并非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出现。随着民初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它的特征才愈来愈明显。袁世凯的上台不同于改朝换代，与欧美国家总统更替也不一样。他之所以能出任大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掌握着一支军队。北洋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与南京临时政府有根本区别，与晚清政府也有不少差异。特别是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不仅仍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些同盟会领导人直接参加了政府的工作。唐绍仪内阁期间，除总统府由袁世凯亲自控制外，内阁各部基本上是北洋集团和同盟会平分秋色。总理唐绍仪虽然出身北洋派，但他加入了同盟会，并试图找到一种北洋集团和同盟会两大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唐内阁不满一百天便夭折了。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里，尽管清末立宪派势力有明显的扩张，但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从控制政府的派别分析，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洋集团独占的政府，而是北洋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过渡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清政府的倾覆和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清朝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就政党而言，清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结社组党，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团体外，公开的党派是无法存在的。但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有政治纲领的就有三十多个。在五光十色的党派团体中，首屈一指的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同盟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由于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党员素质下降，组织涣散，失去了革命党应有的战斗力。但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李烈钧、张继等著名的革命家仍在党内起重要作用。这个党虽然也有少数人关注议会外的斗争和保持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和平手段，制定宪法，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致国家于富强。其次，是以清末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和民主党。1913年5月这两个党合并为进步党，其主要领导人有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

等。此外还有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中，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业界头面人物，也有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他们的政治品格虽有高下之别，但都以拥护或标榜拥护共和为宗旨。这表明，人们参加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对建设共和国抱着美好的幻想。在当时，这种政治积极性的主要倾向，有反军阀专制统治的性质。对此，本书加以适当的肯定。

应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民初政党林立，十分活跃，但并没有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临时政府的存在也不是以多党政治为背景。多党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实现本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在内阁制的国家里，多党政治以政党轮流控制国会多数和组织内阁为前提。国民党和进步党虽然在国会中有左右论坛的力量，但谁也没有掌握过内阁实权。何况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重心根本就不在内阁，而始终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所以，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关于两党政治的设想和宣传，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国民党人为追求政党内阁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宋教仁惨遭暗杀而告终。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暂时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存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南北政治和军事的严重对峙。为此，本书发掘不少新史料，特辟专节来阐述南北对峙的形势。拥兵雄踞北方的北洋集团，以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为其腹地，不许他人染指。在南方，除立宪派和旧官僚占主导地位的湖北、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外，都是国民党人的势力范围，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被人称为他们的“根据地”。所以，民初虽有中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各地区和北京一样，三大政治势力——北洋集团、进步党和国民党互争雄长，而惊心动魄的斗争则大都发生在北洋集团和国民党人之间。1913年下半年，袁世凯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南北对峙的形势基本消失了，袁世凯便恣意解散国民党和国会，

又急忙将进步党人赶出政府，才实现了北洋派的一统天下。

对北洋军镇压二次革命的军事动员，以往估计不足。对这支军队来说，这是一次最全面的动员，此后因内部倾轧加剧，再也不可能统一行动了。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是民初政治历史的重心。对此，本书用了很多的笔墨加以阐述。同时，我们也没有忽视揭露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洪宪帝制的内幕，以往人们所知甚少，揣测之言颇多。近年来发现的有关洪宪帝制的数千件原始函电说明，筹安会和请愿团都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帝制派并不看重这些活动，除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外，他们最关注的是封疆大吏的态度。对各省封疆大吏的密电和北京军警官僚的密呈，袁世凯不仅亲自阅览，而且有的还加了批示，甚至哪些应登政府公报，哪些缓登或密存，都由他决定。这表明，他亲自控制着帝制运动。关于袁克定或杨度操纵帝制运动，蒙蔽了袁世凯的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北洋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在洪宪帝制问题上也表现出来。筹安会一成立，首先密电政事堂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电文长达千言，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接着，直隶将军朱家宝要求先办好外交，再行改制。他说“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定”。更引起袁世凯不安的是，拥兵坐镇江淮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和长江巡阅使张勋都迟迟不肯上书劝进。由于段芝贵等人一再密电催促，他们才联名密电政事堂，说应由国务卿徐世昌定稿领衔推戴。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广西将军陆荣廷对冯、张密电均表示赞同。这些封疆大吏对帝制采取反对或暧昧的推托态度，目的虽不尽相同，但普遍不满则是非常明显的。徐世昌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不仅未敢领衔劝进，反而决然辞职脱身。这是帝制运动一再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前史从未记载过的这些内

情，本书作了较详细的揭露。

护国战争是民初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一部分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势力共同发动的。

进步党人是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代表。与国民党人一样，他们也主张实行宪政。但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和清末结下的宿怨，使他们经常站在北洋集团一边，攻击国民党人，而试图依靠袁世凯的“开明专制”来达到宪政的目的。在民初的政争中，他们留下了极不光彩的记录。直到洪宪帝制发生，他们才决心独立地发挥作用，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最早举起讨袁旗帜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不久，他们就组织起中华革命党，多次发动讨袁起义，流血牺牲，百折不挠。从这方面比较，说进步党人的反袁是抢旗帜，并没有错。然而，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进步党人从拥袁到反袁，并不单纯是策略手段的变化，而是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变使资产阶级的两大派别得以暂时站在一条战线上，为反袁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赢得了推翻洪宪帝制的胜利。忽视这一方面，就很难全面地说明进步党人的作用。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争持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护国军宣言中有关维护共和国体的主张，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政治要求，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说，护国战争无疑是属于革命战争一类。长期坚持反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理应成为这次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心，但由于他们缺乏实力，没有能成为指导中心，而被排挤到一边去了。保守的进步党人却起了领导作用。因此，这次战争就有了更明显的阶级局限性。进步党人特别强调“文明革命”，反对“破坏”，而且一旦达到既定的有限目标，便立即改变战略方向，与当权的北洋集团妥协，无情地压制民主革命力量。

民初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危机及其解决，都与帝国主义列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是由列强的侵略活动所直接引起的。如蒙、藏交涉，善后借款及“二十一条”交涉等。不充分揭示列强与中国政治的联系，就不可能把许多重大事件讲清楚。所以本书既有专门章节集中阐述列强在华的侵略活动，也在有关中国内政的章节中如实地写出它们所起的作用。

本卷书重点是写政治史，同时对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财政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从宏观来看，政治状况的好坏和经济状况的盛衰常常是同步变化的。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也有暂时不完全一致的情形。

北洋政府建立之后，政治状况急剧恶化。但中国资产阶级“振兴实业”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迅速低落下来。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持续高涨。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对中国的掠夺有所和缓，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外部条件。除此而外，本书较多地考察了经济发展的内因。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势力，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比清末有所提高，创办工矿企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组织实业团体，从经济和舆论方面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推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跻身政府，或担任工商总长，或掌握地方要政，在他们的主持下制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法令、条例。这些法令、条例虽然不可能全部贯彻实施，但也有一些起了促进作用。当然，这是从局部来看，从整体估量，北洋政权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并不是积极因素，而是消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

对袁政府时期的财政、税收，过去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历年预算均未实行，更没有决算，所以收支状况在当时就没有精确的统计，而现存的北洋政府财政档案只有一鳞半爪，不成系统，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困难。本书利用档案资料、政府公报、报刊及其他公私文书，

只能勾画出这一时期财政状况的基本轮廓。

袁政府初期，中央财政收入被地方截留，库空如洗，几乎完全依靠外债，地方财政为庞大的军费所累，普遍入不敷出。以出卖国家主权得到的大量外国借款，几乎全部用于填补纯消耗的军政开支。资产阶级渴望的建设投资、整顿币制和裁撤厘金等均未能进行。经过财政整顿、加重捐税和发行公债，1914年和1915年财政状况稍有好转，大致做到了收支平衡。但接踵而来的帝制运动，导致了财政崩溃。袁政府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金融危机爆发，致使京钞问题在以后很多年内成为北洋政府财政金融上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统治时期，一共只有四年多，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这是十分短促的一段。当时，正值共和初建，社会风气丕变，新旧冲突激烈，政局动荡不已；在民国史上，这是颇具特色和颇有影响的年代。对这段历史，我们分工合作，进行探讨。本卷书就是集体探讨的结果。参加本卷编写的共有八人，具体分工如下：

前　言	李宗一
第一章	徐辉琪（第一、三节及第二节部分） 曾业英（第二节部分）
第二章	徐辉琪（第二、三节及第一节部分） 朱宗震（第一节部分）
第三章	汪朝光（第一节），朱宗震（第二节）
第四章	朱宗震（第二、三节及第一节部分） 曾业英（第一节部分），李宗一（第四节）
第五章	张兰馨（第一节），朱宗震（第

	二、三节）
第六、七章	李宗一
第八章	尹俊春
第九、十章	曾业英

本卷编写提纲的拟定和初稿的修改是由李宗一负责的。曾业英对第一、第二、第四章的部分初稿作了较多的修改，李宗一对第五章第一节及第八章作了较多的改动。关于注释的统一、地图的绘制和照片的搜集，曾业英、徐辉琪、汪朝光等做了许多工作。全书由李新、李宗一定稿。

承蒙审阅本书初稿并多所指正的有：张振鹏、金宗英、王述曾、杨天石、韩信夫等同志。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限于我们的理论和业务水平，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敬希读者多多指教。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一节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一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　唐绍仪内阁成立
　　三　临时参议院的变迁
　　四　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第二节　各党派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
　　一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二　同盟会改组及其新纲领
　　三　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
　　四　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
　　五　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
　　六　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
　第三节　各省政情与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
　　一　同盟会领导的南方各省
　　二　立宪派、旧官僚控制的南方各省
　　三　处于激烈争夺中的南方各省
　　四　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
　　五　东三省
　　六　山西与西北各省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
　　一　唐内阁垮台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
　　二　陆徵祥组阁风潮
　　三　张振武被杀事件

四　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五　军民分治与江西民政长事件
第二节　同盟会维持共和国的努力
一　孙中山鼓吹民生主义及其实业救国计划
二　孙中山、黄兴应邀赴北京调和南北冲突
三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四　部分同盟会员的反袁活动
第三节　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一　国会组织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
二　各党派竞选活动与国会选举结果
三　宋教仁被暗杀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
第一节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一　列强在华势力的新布局
二　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及中俄交涉
三　英国觊觎西藏及中英交涉
第二节　银行团与善后借款
一　列强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
二　善后借款合同的签订和性质
三　反对善后借款的风潮
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一节　国会召开和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实施
一　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
二　国会的召开和进步党的组建
三　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活动
第二节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一　二次革命的酝酿
二　南北调和活动的失败
三　李烈钧和湖口起义
四　各地响应

第三节　北军南下和讨袁军的失败
一　浔湖之战与南昌失守
二　徐州之战与上海制造局之役
三　讨袁阵线的崩溃
四　南京保卫战和重庆失守
五　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四节　白朗起义及失败
一　从“拉杆”起事到纵横于豫皖鄂边区
二　进军陕甘和回豫失败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
第一节　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二　官僚资本企业的发展和交通系
三　外国资本的侵入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变化和破产趋势
一　农村生产关系的若干变化
二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农村经济的衰败
第三节　财政和税收
一　财政体制和财政方针
二　1912年—1913年间的财政状况
三　1914年—1915年间的财政状况
四　税收制度的变革和税收概况
五　金融币制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一节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一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是北洋军阀集团攫取政府大权的预定步骤，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退让的结果。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提出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才正式辞职以及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是约束他的。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并公然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1)

然而，袁世凯的要挟并未改变孙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电促袁世凯南下就职；一面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绍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

面上不拒绝南下，而在暗中策划阴谋。2月27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内外城各商铺、车站均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组织了六百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在与蔡元培等的谈话中，袁世凯的腔调也为之一变，声言“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2)]。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结果，南方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竟被袁世凯这番表演所蒙蔽，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3)]。

可是就在这时，一场“兵变”发生了。29日晚7时许，北京城内突然枪声大作，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曹锟第三镇第九标炮营首先涌入朝阳门抢掠。接着，驻禄米仓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各军闻声而起，分队自东而西，恣意焚掠。一时，东城及前门一带“火光烛天”，“枪声动地”，“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4)]。煤渣胡同法政学堂南方代表团驻所更是首当其冲，变兵“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5)]。蔡元培等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次日晚，兵变再起西城，烧杀掳掠较29日晚更甚。两日以来，北京商民损失“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6)]。3月1日晚，驻保定第二镇一部受北京影响，也相继变乱。乱事延续两昼夜，“市廛阛阓化为灰烬，人民之横遭惨杀者枕藉于道”[(7)]。兵变同时波及京保铁路沿线各市镇。2日夜，天津驻兵也如法炮制，“放火行劫，通宵达旦”[(8)]。京奉、津浦铁路局以及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哄抢，店铺、民房被烧毁无数。

北京兵变发生后，袁世凯宣称系由“误听谣传”引起[(9)]。但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事发前，日坛等

地驻兵曾向附近铺户透露："你们还不躲躲，俺们要动了。"少数得到消息的商人，已"先行迁移"[10]。27日晚，袁世凯对唐绍仪、汪精卫也曾暗示："赴南之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11] 据当时任第三镇参谋官并与曹锟相当熟悉的杨雨辰后来回忆，兵变前一个星期，即2月21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在其公馆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人谈话，煽动他们将南方迎袁专使"吓回去再说"。次日又把曹锟单独叫去。随后，曹锟召集第三镇标统、管带及参谋长会议，他破口骂道："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12] 另外，变兵一哄而起，恣意焚掠，却"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这也足以说明焚掠范围，事前是预有布置的。出动弹压的军队也只是"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还有，当时人多称兵变系为"裁饷"和强迫剪辫而起，可是北京陆军部2月25日发布的"裁饷札文"并不包括第三镇在内[13]；何况直接参与其事的还有根本无裁饷之虞的袁世凯卫队。而且兵变所喊口号为"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与裁饷、剪辫绝不相干。

据袁世凯左右说，兵变发生当晚，袁闻讯后异常镇定，指令江朝宗、姜桂题无须弹压[14]，一味采取"消极策"[15]。第二天下午，他虽对再行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但对曹锟及肇事各营长官却绝口不言惩办，还"命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给参加变乱的卫队[16]。袁世凯对违抗军令的士兵历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唯独这次一反常态，这只能说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尖锐质问道："使于事起时有一千（人）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17] 唐绍仪则以亲身所见明确指出，兵变实为袁世凯所指使："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

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18] 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这场给广大商民带来惨重灾难的兵变正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在于制造紧张空气，借以证明他不能离开北京。

果然，兵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各国借口保障使馆安全，立即采取行动支持袁世凯。3月2日下午，北京外交团召集会议，决定从天津迅调军队，“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19]。接着，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兵入京，总数达三千余人。其间，南京临时政府曾准备从汉口、浦口和烟台调兵北上，帮助恢复北京秩序，但却遭到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外交团也声称“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的禁区”[20]。帝国主义各国报纸攻击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全系意气用事”，以致招来这次“扰乱”[21]；袁世凯“能得南北之信用，仍为现势上之主人，则尚不难以其威望镇定祸乱，否则仅有列强联合干涉之一途”[22]。

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咨议局以及各政团，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23]。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24]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时便与北洋派遥相呼应，指责孙中山“一念虚骄”，“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25]。

如此北呼南应，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蔡元培对袁世凯早有所认

识，曾指出武昌起义后“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26]，并断言此行“必不能达目的”[27]。宋教仁于北京兵变后，也识破“此中隐情，定是手段”[28]。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再坚持促袁南下的立场。3月2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29] 接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和袁不必南下受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30]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日，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为达到自己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不惜纵兵荼毒人民，充分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和极端残忍，也暴露了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

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31]。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下午3时，仪式开始。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32] 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33] 就这样，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的阴谋。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对一个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袁世凯就职的当天，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34]。但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说：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其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须至民国元年夏间方行截数，不得谓之实欠，即不在免除之列”[35]。可见“豁免钱粮令”对一些省区“仅属虚文”，毫无实际意义[36]。同日，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服从他的“统一”，接受他的统治。为防止革命党人的反抗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袁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37]。这就预示着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并没有因革命党人对袁在北京就职问题上的让步而消除。

二　唐绍仪内阁成立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组织内阁。

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内阁制，以便限制袁世凯专权。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意图，宋教仁当时曾明白说过：“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38]

还在南北议和期间，革命党人就提出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39]。但袁世凯坚持由唐绍仪担任。双方一度争执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人调停，达成一个被称为“双方兼顾”的协议：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40]。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属中山市）唐家湾人，商人家庭出身，幼年随父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年留学美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为袁世凯所赏识，调充西文翻译。从此，由于袁的保荐，先后任过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并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与英国办理交涉。武昌起义后，被袁指派为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其间，他一面表示赞成“共和”，一面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一起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所以，在袁看来，唐绍仪乃是他抵制革命党人担任内阁总理的理想人选。由唐担任内阁总理，既可保证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又能缓和革命党人的对立情绪；即使唐参加同盟会，也难以摆脱他的控制。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唐绍仪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41]。这也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他在加入同盟会的前提下出任内阁总理的根本原因。

3月13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25日，唐绍仪赶到南京组织内阁。关于阁员人选，争夺同样激烈。袁世凯一开始提出的十二人名单中，除蔡元培、王宠惠属革命党人外，其余“概属亡清旧吏”。为此，南京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纷纷表示反对。有的致电各报馆，请“大张公道”，要求袁世凯“翻然醒悟”[42]。南京临时参议院也以与原定十部不合，径予驳回另议。之后，袁世凯虽被迫作了一些变动，但仍把持外交、陆军、内务、海军等部不放，坚持由其亲信担任各该部总长。对陆军总长一职，南方革命军将领强烈要求由黄兴继续担任，反对任命段祺瑞。他们通电全国，忿忿不平地指出：“陆军总长非中外著闻、富有才学威望者，决难维系南北军心而谋全国幸福。黄总长兴缔造民国，苦心经营，尤为全球所钦服。……现在国基未固，全国军队正在易动难静之时，再四思维，足以从容镇抚、措置裕如者，黄君而外，实难其

选。”[43] 在这个问题上，唐绍仪也赞成南方意见，并一再致电与袁世凯“磋商”。但袁世凯寸步不让，他鼓动北洋将领以“军界统一会”名义致电参议院，公然声称如不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即“要求大总统另行组织政府”[44] 。于是，陆军总长人选问题，即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便成了组织内阁的又一争持焦点。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照例又是赵凤昌等人出来为袁世凯帮忙。赵凤昌原来就拟了一个内阁名单，提出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黄兴为参谋长[45] 。这时，他与张謇等接连致电黄兴和汪精卫说：“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方）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克强，黄兴字）就参谋为调和计。”[46] 为诱使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要求，袁世凯与赵凤昌等人相配合，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由黄兴任留守，统率南方各省军队，又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交换条件。结果，又是革命党人让步，同意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此外，革命党人希图掌握财政大权的努力，也因袁世凯的坚决反对而失败，最后确定由立宪派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

29日，唐绍仪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交通总长梁如浩外，均获通过。30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后以次长王正廷署理），交通唐绍仪兼任（不久以施肇基充任）；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军队。黄兴拒不接受任命。3月31日，袁世凯改任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又遭到南京部分驻军的反对。4月13日，袁遂任黎元洪领参谋总长事。

唐内阁通过后，4月1日，孙中山践约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成了历史名词。

为了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议员正常行使民主权力，孙中山提议派王芝祥率革命军一万人护送国务员、议员北上，然后留驻北京，但却遭到袁世凯的竭力反对。袁复电唐绍仪说，这是“糜烂”大局的“破坏”之举，他“万难接受”[47]。他还致电王芝祥，要他单独北上，并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惟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48]。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等北洋将领在袁鼓动之下通电全国，叫嚷：“北方秩序，业已平定，国务员北来，北方军界力任保护之责。若必携带重兵，则是有心猜忌，北方军人万难忍受。倘有意外，本将校等不负责任。”[49] 但革命党人仍坚持派兵北上，唯表示人数可减至两千人。于是，袁世凯又别有用心地提出将临时政府移设南苑，令赵秉钧等负责在南苑兴建兵房，梁士诒、关冕钧等监督铺设铁道，故意借此虚张声势，挑动反对情绪。北京市政维持会、总议董会则宣称：“南军倘必北来，则北京各处即一律罢市。”[50]

其间，黎元洪也接连发表通电，攻击派兵护送阁员是“猜心藏忌”，“足以亡国”，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断不能“一误再误”[51]。黎元洪的电报深为袁世凯所“欢迎”[52]。北洋“军界统一会”通电全国宣称，如果五天以后“犹事迁延”，就要请袁世凯先行派员署理[53]。接着，东三省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等纷纷通电表示赞成。

在北洋集团与拥袁官僚群起反对之下，革命党人被迫再次让步。4月11日，即黎元洪发电的第三天，唐绍仪电告袁世凯：南方已决定取消派兵护送阁员行动，并向袁解释，他在南专注于处理善后事宜和邀集阁员北上，绝非有意“逗留”[54]。其实，南方革命党人自孙中山提出派兵护送阁员后，包括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在内，均未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对于袁世凯及追随者的恶意中伤更未据理抗争，其机关报《民立报》甚至发表评论，要阁员“顾全大局”，“毋迟迟不行，放弃责任”[55]。所以，派兵护送阁员计划的取消，实际上也是革命党人

害怕南北决裂，不敢坚持斗争的结果。

4月20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21日，在总统府召开由唐主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告内阁正式成立。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新旧参用”，即南北原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表示“南北合作”，提议“多用南方人”[56]。但袁世凯明令各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57]

内务总长赵秉钧公开声明，他“于新知识毫无所得”，坚持该部全用北洋旧人，并屡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迫使唐绍仪同意“决不干涉部中用人权”[58]。结果，该部各重要位置大多被北洋旧官僚窃据，仅象征性地安置原南京内务部二十人，其中参事、司长各一，其余均为一般办事员。段祺瑞原欲荐其心腹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因“群滋不悦”，不得已而改提蒋作宾。但未等蒋到任，他就抢先荐任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长，同时荐任王揖唐（赓）等五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八十余人无从位置。蒋大为不满，但段“亦不稍让”，他公开说：“次官与以前副大臣、侍郎均不相同，无干预委任秘书长、司长之权。”后来，经过“调停”，段勉强同意增设三司，安排南方诸人，但声明：“以后司长由总长荐任，次长不得预闻。”[59]外交、财政、海军、交通等部，情况基本相同。胡惟德“任人惟求旧”，所以外交部仅调用南方四人。财政部熊希龄上任后，下令除金银库员司及案卷管理员外，其余全部人员“先行解散”，但由于筹备处“概用旧人”，一班旧书手“不甘废弃”，纷纷“求其庇护”，结果仍留用一百零三人[60]。海军部因“用人不当”，引起“南京人员大哗”，他们以海军协会名义致函海军总长刘冠雄说：“若不改易轨辙，则手枪炸弹请储以待。”[61]交通部虽然位置南方八十余人（原邮传部录事一百三十人，仅留四十人），但“大权多由梁燕孙（士诒）暗中主持”，加之袁世凯、施肇基采用批条子等方式随意安置亲信，因而同样激起了南方的强烈不满。几个被排斥的南方人员联名致函施肇基说：“阁下于民国无横草之

功，仅恃泰山势力（施为唐绍仪之婿）而忝居高位，我辈求一末僚微秩而不能得，天下不平之事，孰有逾于此者？”并表示：“某等数人去留，原无关乎轻重，不过诸公似此虐待南来之人，虽以某等素性平和，亦不免生恶感。此后反对阁下，将惟力是视，而尚欲南北意见融和，恐非易事。”[62] 这些情况清楚表明，唐绍仪内阁在组织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唐内阁设于铁狮子胡同前陆军部署内，每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同时设秘书厅，以魏宸组为秘书长，又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每日午后2时至5时接待记者，发布新闻。

三　临时参议院的变迁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同样荆棘满途。早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前，参议院的合法地位就受到了以湖北省临时议会为首的各省议会、咨议局的严重挑战。2月2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湖北省临时议会，率先倡议每省选举十到十二人，齐集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63]，并很快得到了江苏、湖南、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十四省临时议会或咨议局的积极响应[64]。湖南省特别议会公然要求“订定临时参议院权限”，提出凡民国建设、民国法律以及人民权利、义务等事，南京临时参议院“绝对无议决之权”，必须“由各省选举人民代表组成临时国会”议决[65]。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湖北省临时议会随即放弃了在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的主张，于3月16日电请各省“迅选举议员”，齐集北京组织临时中央议会。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他们极力诋毁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各省军政府委员组织而成”，“不可视为人民代表机关”，声称自2月27日非法通过道胜银行借款，江苏、湖北议员相继辞职后，已“无议事之效力”；其电请各省“补举”议员，不过“意在巩固该

院基础”，所定《临时约法》纯“由少数人议决”，“是直以至重且大之事视若儿戏”，“人民决不承认”[66]。他们并进而提出，组织政府无须交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应“暂由袁大总统独力主持，俟临时中央议会成立后，再行追交通过”[67]。3月17日，江苏省临时议会也致电袁世凯说：“鄂议会发起组织民国临时中央议会，由各省议会或咨议局选举议员定期集合，系为表示人民意思，成立民国正当之立法机关起见，本会极表同情。应请大总统认可，迅速通令施行。”又说：“至此次任用国务员，俟中央议会成立，自须追交通过，以期合于国民之意向。”[68] 接着，湖北省临时议会派郑万瞻等十人先行赴京，以联络各省议员和筹办“开会事宜”。

湖北等省临时议会重组临时中央议会的活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反对。3月19日，临时参议院致电袁世凯指出：“本院之成，根据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现公布之《临时约法》亦载明十个月内由大总统召集国会。当此参议院成立之后，国会未成立之先，乃以一省议会名义召集临时国会，不知何所依据？”为此，“本院公认湖北省议会此举为不正当行为，断然无效”。并强调说：“若不承认《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临时约法》，则已公布之法律，已选出之总统，已组织之临时政府，皆将无效。”[69] 同日，临时参议院又分电湖北省临时议会和各省都督、省议会及咨议局，公开谴责湖北省临时议会发起临时中央议会为“法外之举动”，于大局“非徒无益，实生纷纠”。电文表示：“方今国基初肇，所赖以维持培植者端在守法。参议院为法定机关，不可任意破坏。”[70] 但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维护其合法地位的同时，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各省参议员可“尽由民选”[71]。

对于湖北等省临时议会妄图推倒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叫嚷，袁世凯起初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任其嚣然尘上。直到南京临时参议院发出上述各电，严正提出他的临时大总统的法律地位时，他才复电表示“所论极为正当”，“《临时约法》既经议决公布，自为今日办事惟一

之依据”，湖北省临时议会的倡议，对南京临时参议院“未免歧视”[72]。但他同时又宣称：依照《临时约法》“组织约法上参议院”，“与各省主张之中央议会无异”[73]。所以，当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议员可“尽由民选”后，他立即连电各省以临时议会为选举机关，依照原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从速选举；其未成立临时议会省份，“应各就原设咨议局撤去咨议局之名，改为临时省议会，即以原选议员作为该会议员，行使其应有之职权”[74]。袁世凯的这种态度，表明他同样忌恨南京临时参议院，只是惟恐由此影响其临时大总统地位，表面上才不能不有所收敛。他后来公开诋毁南京临时参议院由少数人把持，非出于“人民公举”，不能代表“人民之真意”[75]，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同样的原因，黎元洪这时也公开表态，不赞成重组临时中央议会。他咨复湖北省临时议会说：“前后两次临时总统，均由参议员选举而出，南京临时政府国务员亦由得参议院之同意组织而成，今北京组织新内阁，该国务委员又已决定在南京组织，须经参议院之同意，是参议院在此时期内极为重要。本军政府为大局起见，决不能不承认该院为临时立法机关。”黎并回绝了省临时议会请他通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不承认《临时约法》和电告南京临时参议院不许补举议员的要求。他表示，省临时议会如拒绝补选议员，即由军政府添派前往与会[76]。

由于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反对，加上袁世凯、黎元洪也有所顾忌，湖北等省临时议会不得不停止重组临时中央议会的活动。南京临时参议院终于渡过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危机，而保住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是湖北等省临时议会也非全无所得，他们达到了议员“民选”的目的，为其以后的活动争得了便利条件。湖北郑万瞻等人就公开表示：俟“民选”议员全部选出，再提出“修改约法，更易院名，增加人数，另组国会”，“一切俱有把握”[77]。其实，湖北等省临时议会标榜的议员“民选”，不过是由省临时议会议员互选而已，并非由人民直接选

举。同时，他们所以要求议员“民选”，也主要不是为“体现民主精神”，而是为了满足立宪派争夺最高立法权的需要。因为各省临时议会多由原咨议局改组而成，除个别省外，立宪派占有绝对优势。如湖北省临时议会，即主要为立宪派控制，被称为“发起反对前南京参议院之第一人”的该会副议长郑万瞻[78]，就是原咨议局的骨干成员。以著名立宪派首领张謇为议长的江苏省临时议会，也是“原承咨议局之旧议员”而来[79]。湖南、江西等省情况，大体也如此。可是，作为中央立法机关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却以同盟会员占优势。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立宪派遂提出了议员“民选”要求。

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迁往北京，并于当日通电宣布：“自本月初八日始，休会十五天，于本月二十二日齐集北京。”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设于象坊桥法律学堂前资政院旧址内。议员额定一百二十六人，但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经常到会八九十人，“组织甚不完全”。

北京临时参议院虽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而来，《临时约法》也仍是它一切活动的依据，但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相比，却有了不少明显的变化。首先，经过各省所谓“民选”，议员构成有了很大改变。以湖北、湖南、江苏、江西、贵州、直隶六省为例，共计“民选”议员三十人（每省定额五人），其中原议员当选者四人，新当选者二十六人[80]。原议员当选者中，同盟会员三人，立宪派一人；新当选者中同盟会员八人（尚包括与立宪派结为一气，公开与同盟会作对的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三人），其余俱为立宪派或倾向立宪派的所谓“中间派”。由此可见，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旧立宪派势力有了显著增长。

其次，与此相联系，正副议长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前夕，汤化龙、郑万瞻、曾有澜、汪荣宝等立宪派议员以及张伯烈等人无视南京临时参议院“新、旧议员陆续交替”的决定，也不顾各省所谓“民选”议员尚未全部选出的事实，联络各新举议员要求完全

由“民选”议员即新议员召集会议，反对原议员即旧议员出席。汪荣宝更因“旧参议员多同盟会人”，“联合新选参议员不遗余力”，以“谋举议长”[81]。因此，当4月29日参议院开院典礼一结束，他们便借口议长林森允许湖北、江西原议员出席会议，群起责其“违法”，声称必须重新选举议长，全部取消“官派”议员资格，始能正式开会，并当场签名决定取消30日议事日程。30日上午，“民选”议员召开“谈话会”，推汤化龙为临时主席。会上，李国珍、曾有澜、汪荣宝、张伯烈认定参议员既经“民选”，先前“所有各省官派之参议员”，当然“无继续存在之理由”，必须“一律退院”。只是由于同盟会和部分立宪派“民选”议员的反对，才没有通过他们的提议。最后议决：“未经改选参议员省份及已经改选省份而新选之参议员尚无一人到会者，其原省旧有在院之各议员仍得出席，俟该省新选议员有一人以上到院，即行解职。”[82] 当日下午，部分立宪派“民选”议员又反对召开常会，而改为全院“谈话会”，正式提出议长改选问题。尽管同盟会议员极力维护林森的议长地位[83]，表示“谈话会”断不能决定议长改选问题，议长亦不宜遽行改选，但立宪派“民选”议员坚持林森系“在南京少数人选出”，已失议长资格，必须重新选举，以迫使林森提出辞职。5月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举行选举。由于立宪派议员事前曾以极不光彩的手段，与所谓第三党达成“暗相提携”的协议[84]，结果，吴景濂被选为正议长[85]，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同盟会内定议长候选人张耀曾，以一票之差而落选。

第三，继议长改选之后，审议长及各部审查员和其他常任职员也全部重新改选。南京临时参议院原于正、副议长之下设审议长一席，负责主持全院审议会，设财政、法律、外交、请愿四个审查会，具体审查各有关提案；审议长（李肇甫）和各审查员均由大会选举产生，各审查会并互选审查长一人。另设秘书、干事科，秘书长和干事长由议长遴选并受议长“指挥监督”，但须经议员公同认可。北迁前夕，经议员提议：已确定的各审查会额定人数不变，同时议决审议长改称全院委员长，外交审查会改称庶政审查会，并新增惩罚审查会。迁到北

京后，立宪派“民选”议员在要求改选议长的同时，又提出各常任职员纯为南京少数“官派”议员选举或认可，也必须全部改选，重新组织，并要求扩大各部审查员人数。5月2日，正式举行全院委员长和各部审查员（称“常任委员”）选举会。3日，各部委员会互选委员长。结果，谷钟秀、林长民分别取得了仅次于正、副议长的全院委员长和秘书长席位。各部委员人数也较前大为增加。同盟会议员张耀曾、曾彦、彭占元虽互选为法制、请愿、惩罚委员会委员长，但财政、庶政委员会委员长却为其他党派的殷汝骊和郑万瞻所得。

最后，同盟会议员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虽然总的说来，同盟会议员在临时参议院内“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步武亦较整齐”[(86)]，但涣散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有的无视“党议”，自行其是；有的为了个人的地位，不惜牺牲“党见”，大搞政治投机，成了唯利是图的政客；有的则不分是非，一味以谩骂、攻击谋求党势发展，徒为反对派提供指责的借口。这些都给同盟会后来的活动投下了阴影。

四　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清楚地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表面上依据《临时约法》行事，一是始终贯穿着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激烈争夺。这既规定了它的组织形式，也决定了它的性质。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军事政治集团。多年来，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上交权贵，下结死党，肆无忌惮地扩充势力。武昌起义后，其全部活动，无论是公开的，隐蔽的，军事的，政治的，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建立北洋军阀的统治。所以，袁世凯必然要竭力控制北京临时政府。

首先，组织总统府，“专以封其党羽，充其实力”[87]，把总统府变成了北洋集团的大本营。袁世凯刚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设立“临时筹备处”，作为办事机构。其《规约》规定：本处“直隶于新举临时大总统”，“所有各股办事员应由新举大总统选派”[88]。而袁所选派的五十人，大多为“前清时代红人”[89]。他又改前清军咨府为军事参议处，“一切皆仍其旧”。同时设秘书总长一职，委前清侍郎宝熙充任。唐绍仪内阁成立后，袁世凯将部分人员安插各部，对总统府班底加以重新调整。4月21日，他下令撤销临时筹备处、军事参议处，改设秘书厅及军事处为总统府办事机关。秘书厅以梁士诒为秘书长，阮忠枢为次长，施愚、吴廷燮、张一麐、余迪侯、闵尔昌、沈祖宪、李景铃、陈毅、余抚辰、曾彝进等为秘书；军事处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兼任总长（后以荫昌接任），傅良佐为次长，田文烈为秘书长，均系北洋亲信或幕僚。为了加强总统府的实力地位，他不顾南方革命党人的反对，将原巡防队、武卫右军改编成一支拥有三十五个营的拱卫军，任段芝贵为总司令，袁乃宽为军需长（后以田文烈接任），受总统府直接节制[90]。

此外，袁世凯还以“咨询一切”为名，于总统府内设立外交、政治、军事、海军、法律、教育、边事等各种顾问，顾问又有头等（高等）、二等、三等之分，其实际目的不过是借以安插私人，网罗社会“名流”和牢笼革命党人。正像著名记者黄远庸所揭露：“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故其最得意之政策，在宠人以勋位，以上将、中将、少将种种，其他或以顾问，或以赠与，或以其他可以得钱者之种种。”[91] 因此，顾问愈设愈多，名目愈出愈奇，以致有人讥评说：总统府顾问“比较前清弼德院尤为茂盛”[92]。

其次，蔑视《临时约法》，蓄意破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不仅强行夺去外交、内务、陆军和海军等重要各部权力，怂恿这些部门奉行“独立主义”，以拆内阁的台，而且千方百计缩小内阁权限。临时参议院迁京前夕，曾依据《临时约法》通过了《国务院官制》和《各部

官制通则》。唐绍仪内阁成立不久，袁世凯即提出“修正案”，交参议院议决。其重要“修正”为：一、将国务总理“承宣机宜，统一行政”的权限，改为“保持行政之统一”；二、对于“国务总理于必要时，得中止各部总长之命令处分”，以及各部总长“于各地方行政官于必要时，亦得撤消或停止其命令处分”的规定，认为“必要”二字“范围太广”，“非有一定之权限”，难免“滥用其停止或撤消之权”，须限制为“只在违背法律、逾越权限时用之”；三、各部简任、荐任各官，在分司以上者“权限属于大总统”，“应由大总统下令”；分司以下者“权限属于各总长”，“应由各总长下令”[93]。关于第一点，参议院讨论时议员彭允彝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仅规定“保持行政之统一”，则内阁“政治上必不能活动”，且与《临时约法》所定责任内阁制原则相违背，主张改为“国务总理为国务院首领，定全国大政之方针”。但出席参议院常会的政府委员则声称，确定大政方针“乃大总统之权限”，决不能属于国务总理，否则“大总统何所事事？”[94]由于政府委员的坚持和多数议员不表同意[95]，彭允彝的提议未能通过。这样，通过“修正”官制，袁世凯不仅取得了内阁各部分司以上各官的任免权，而且从法律条文解释上取消了内阁得制定大政方针的权力。

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内阁的控制。例如，“财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96]。由财政总长与“其他通晓财政人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则专为控制财政大权而设，它的任务是“研究各项财政问题，以供政府之采择”；而所谓“研究”，不过是先由财政委员会“筹备一切，始交财政部遵照办理”而已[97]。因此，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财政一项，则交通部、财政部与总统府是一是二，何人知之？”[98]

再次，以“限制过苛”为借口，竭力摆脱参议院的监督。还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以前，袁世凯就认为参议院“权限亦须略为改缩”，特命临时筹备处“将该院院章悉心考核，量为增减”，作为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先决条件[99]。后来他虽未敢正式提出，但行动上却

常不经参议院议决，便“巧立官名，以为任命”，公然以命令取代法律，致使“私官日多，直与专制之任官无异，而荒谬绝伦之任官遂亦层出不穷”[100]。

但是，由于同时受到内阁和参议院两方面的牵制，袁世凯毕竟还没有达到他所企望的垄断全部权力的目的。

在内阁方面，尽管袁世凯对它极力破坏、操纵，但在法律和事实上，它仍具有责任内阁的性质。首先，即依“修正”过的《国务院官制》，内阁仍然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官制》规定：国务总理依其职权或特别委任得发院令；就所管事务对于地方长官得发训令及指令，并得停止或撤消地方长官所发违背法令的命令或逾越权限的处分；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关于国务的文书，须由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署；法律案与教令案、预算决算案、预算外之支出、军队编制、条约案、宣战媾和事项、简任官进退、各部权限争议等等，均经国务会议，会议时以国务总理为议长[101]。其中，“副署权”的规定尤其重要，因为这项规定意味着对袁世凯“公布法律、公布教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而不同意即意味着袁世凯公布的法律、教令等无法律效力，如一意孤行，就是侵法越权。这对袁推行专制统治不能不是莫大的限制。因此，当时就有人发表评论说：《国务院官制》规定国务总理之权，“范围非常广大，苟本此而实行之，则内阁政治之精神实于此寄”。并指出：国务总理职权虽未指明“定大政方针”一语，而国务会议所议各项内容，已“尽举其实”[102]。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普遍认为责任内阁制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国的巩固，绝不能听任袁世凯及其党徒随意破坏。因此，同盟会阁员决心以维护和实行责任内阁制为职志。例如宋教仁，农林原非其所长，更“非中心所愿”，但为实行责任内阁，他毅然就任，不仅“对于当尽之职务莫不次第实行”，相继拟定了一整套发展农林的计划，而且努力使内阁成为一个“志同道合，行大决

心，施大毅力，负大责任，排大困难”，“有系统、有秩序之政见”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103]。每开国务会议，他发抒政见，议论政策，“说话最多”[104]。他认定制定“大政方针”为内阁当然“责任”，屡次提议于国务会议，继而又自告奋勇代内阁草拟了一份全面而详尽的“政见书”。他虽然主张“集权政府”和“速行军民分治”，但完全是作为巩固和建设民主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并为加强与提高内阁地位而提出的，与袁世凯企图独揽大权、专以削弱同盟会力量有本质的不同。又如蔡元培，同样竭诚维护责任内阁制原则。他坚决主张“划清大总统及国务院权限”，反对“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为此，他提出：国务院是个“定大计，负责任”的有机体组织，阁员不能随意单独行动，更不可“用阴谋，逞机智”[105]等等，表现了他一贯追求民主政治的进取精神。在宋、蔡及其他同盟会阁员的影响和支持下，有意实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事事咸恪遵约法”[106]，“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宋二君”[107]。“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108]因此，当时舆论都称唐绍仪内阁为“唐宋内阁”[109]。

在参议院方面，虽然它迁到北京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仍是它最基本的特性。首先，临时参议院是在承认《临时约法》的情况下迁到北京的，这就使它不能不拥有《临时约法》所赋予的极大权力。其次，同盟会议员坚持民主共和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维护《临时约法》有关“同意权”、“议决权”的态度。再次，反对派议员固然拥护袁世凯，但也仅是“假借”其实力，以求达到分享权力的目的。每当袁世凯背离宪政轨道时，《临时约法》照样是他们抵制袁的有效武器，这说明他们同样需要“议会政治”。所有这些，都使临时参议院不能不与袁世凯处于对立的地位。

其实，早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曾向他指出：“《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要求他“守之维谨，

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110]。迁到北京后，临时参议院更明确宣布：立国根本，全在于“廓清秦政以来十二朝专制之锢习，及晚清时代社会传染之恶风”。并表示：“苟有利于国者，措施虽有时以权济变，本院亦靡不乐为赞助，期于成功；否则，苟且之策，补苴之术，形式徒具，精神坐亡，本院职司所在，万不能同流自陷，辜负国民。”[111] 这实际就是对袁世凯的警告。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为维护民主共和，反对专制独裁，临时参议院与袁世凯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仅7月以前，就有以下数端：

其一，反对违法任命政府官吏。4月10日，袁世凯无视《各部官制通则》关于各部设次长一人的规定，又不经参议院议决同意，便下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为内务部次长。5月4日，袁的追认咨文送到参议院，遭到议员一致反对。他们指出，“以咨文而忽然变更参议院议决案，并无提出修正案，在法律上已不正当”，况增加案未经提出，先已任命，“殊于约法相违背”。他们表示：“断不能以位置私人之故而增加次长”，“徒为政府增加闲职”，更“不能以咨文而即可以变更法律”。最后，参议院议决维持原案，“内务部无须增加次长一人”[112]。12日，袁世凯只好下令取消对张元奇的任命。此外，他不经参议院议决，擅自任命胡瑛为新疆青海屯垦使等专断行为，也同样受到参议员的严厉质问。

其二，对于袁世凯交议的国务院官制修正案、各部官制通则修正案以及各部各局官制修正案，临时参议院不仅常发反对之词，且运用“议决权”，多所删减。对于财政部官制修正案，它指责该部“设局不妨其多，用人不妨其滥”，“造币厂、印制局皆为安插私人之地”。对于蒙藏事务局官制案，它认为第一条“关于一切”四字“权限太大”，径予删去，所定秘书、佥事、主事人数亦须减少。对于法制局官制修正案，它删去了聘任外国人为顾问一条，而对“酌设编辑员”一条，以“人数未经定明，恐有滥竽之弊”，改为限制在“四人以内”，参事也由十二人改为八人。对于铨叙局、印铸局、临时稽勋局的佥事定额，它坚持

铨叙局由十四人改为四人，印铸局由八人改为四人，临时稽勋局则全部删去，仅保留调查员，由委任改为荐任，专任十人，兼任无定额[113]。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袁世凯安插亲信的机会。

其三，临时参议院还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咨催政府交院议决。其中包括预算决算、迅定地方官制、迅定户籍法、迅定服制服色并注意采用国货等案，尤以催交预算决算最为坚决。自5月11日到7月14日，它连续三次咨文袁世凯，最后一次并限期一月内交院议决。袁世凯不得不于7月15日向参议院交出一纸《六月份支出概算书》。不料这样更激起了参议员的愤怒，他们一致斥责袁世凯“敷衍了事”，“与约法上大有冲突”，指出：7月“始将六月份之概算提出，其昏愦为何如？直可谓之不懂法律。设使本院亦盲从而议决之，岂非亦是一个不懂法律耶？”“政府如此欺诈手段，本院一经议决，岂不贻人口实，传为笑柄？”[114] 于是，临时参议院当即议决将原书退回，重申袁世凯必须于一个月内交出临时预算。参议院所以如此坚决地要求袁世凯交出预算决算，除其职责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此事“与民国前途关系极大”，“盖必有预算，而后政府用款方有标准，不至浮滥”，借款亦不致“漫无限制”[115]。有的议员还指出：“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儡……如不定以期限，令政府交议临时、正式预算，恐垫款用罄，参议院、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亦将从此相随而告终矣！”[116]

事实证明，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的斗争虽然有限，威力也不大，但毕竟对他的手脚有所束缚，使他无法恣意妄为，实际上成了他专制独裁的重要障碍。

如同袁世凯揽权有其社会基础一样，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潮流的蓬勃发展，和同盟会在南方仍拥有相当力量，也为内阁、临时参议院行使《临时约法》赋予的权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没有南方各省革命力量作后盾，仅靠内阁或临时参议院来约束袁世凯，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事实表明，在北京临时政府建立过程中，袁世凯北洋军阀势力显然居有优势地位，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为他们所控制。因此，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乃至前清立宪派，还掌握着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并力图利用内阁和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加以制约，因而还不能说北京临时政府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它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一般形式，所以它实质上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

第二节　各党派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

在清朝封建专制时代，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集会结社，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革命团体外，公开的政党组织是“无从发生”的[117]。但自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118]。

起初，由于北方尚在清廷控制之下，这些新生的政党大都集中在上海、武汉、南京等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尤以“上海为中心”[119]。及清帝退位，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北移，各党本部也纷纷北迁入京。据当时报载，北京“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120]。可见，挂名党籍已成为当时一种时髦。这些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细察实际，却各有所图。为扩张党势，它们一谋合并，二借招徕，凡有“不党”之人，不管相识与否，“辄曰吾当为君介绍入某党，不俟承诺，翌日则党券党证已送至矣”[121]。更有甚者，即非“不党”之人，也免不了为这党那党所运动和追逐，从而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星期之日，湖广会馆、织云公所等处无不开会，有身兼数会者匆匆画到即去，谓吾尚有数会须赴也”[122]。这是当时政党一大特点。

然而，这时党会名目虽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却只有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之分；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则不过统一党、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国社会党等十数党而已。

一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前清江苏巡抚、当时苏州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和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章炳麟二人发起于上海，其核心人物为章炳麟[(123)]。

武昌起义爆发时，章炳麟正在日本讲学，11月15日，抵达光复后的上海。当时，武昌军政府代表胡仰、胡伟、胡瑛、何海鸣、邹廓等人正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又称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章炳麟下船伊始，即被举为章程起草员。但他同时又联络程德全独立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25日，共和中国联合会宣布与苏州所发起的联合会合并，派章炳麟赴苏接洽。29日，他以双重代表身份与程德全议定：除他们二人外，尚须招致各省若干“宏硕之士”为发起人，并由章亲自拟定一个十五人的名单。12月14日，章炳麟等人以“创办员”名义发布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开始公开罗致会员，不到半月，即获二百余人。

1912年1月3日，章炳麟等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大会，宣布中华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章炳麟和程德全为正、副会长。唐文治、张謇、熊希龄、黄云鹏、陈荣昌、邓实等十九人由各省会员互选为参议员。大会还议决于驻会干事之外，由参议会公推“名望最著者”为“特务干事”[(124)]，以“咨访”国家“大疑”[(125)]。次日，由章炳麟亲任社长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7日，章指定唐演、黄理中、符鼎升、廖希贤、林长民、景耀月、江谦等十五人为驻会干事。接着，参议会推定赵凤昌、张謇、叶景葵、庄蕴宽等为特务干事。以上事实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领导层中不少是旧官僚和立宪

派人士。所以，当时有人称它为“清逃官墨吏之逋逃薮”[126]。章炳麟本人也承认他欲借梁启超“门下之英材，以作党中之唇齿”[127]。

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简单套用法、美等国的现成模式，主张“因地制宜，不尚虚美”，建设中国型的共和国。为此，它强调：1．万不可破坏中国固有的统一传统而采美国联邦制度。章炳麟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劈头就说：“至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盖美之各州，本殖民地，各有特权，与吾各省之行政区划、统一已久者不同。故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美之分离。至所谓独立者，对于满廷而言，非对于新建之民国也。”[128] 2．宜采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因为“君主世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又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129]。3．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不可骤言共和，而应采取特别办法，“许以自治权，如爱尔兰之于英国”[130]。4．应于三权分立之外，再予教育、纠察二权独立。5．关于民生问题，只宜采用社会政策，绝不可行同盟会的“社会主义”。它的所谓“社会政策”，就是“维持现行私有财产制，以改良社会，保护贫民者也。具体言之，如设手工学校、夜学校、贫民学校，增长其技艺，设劳动保险、劳动交换所、救贫法等，维持其经济也”[131]。它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据称在于：一则维持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破坏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振贫者与富者齐一，一则抑制富者与贫者同等。这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所代表的主要是当时拥有财产的富有阶级的利益，或者说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由于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并未真正取得政权，这些主张虽有某些合理因素，却是无法实现的。

基于以上认识，中华民国联合会于1月22日召开参议会，在张謇等人所拟政纲的基础上，议定以下十条“假定政纲”：1．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整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

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中华民国联合会所提出的这十条政纲，其中虽有一些是可取的，但它在当时激烈的现实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指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首先，章炳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就是针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的。诚然，如章所反复声明，促进统一共和国的成立，是为了预防“割据”和避免“瓜分”。这虽也是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原因之一，但却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章炳麟因不满于孙、黄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故在沪暗中联络党人，极力设法反对”[132]。章自己也对梁启超说过，现在民国虽然成立，但“微窥时势，犹非故人飞跃之时。盖党见纷争，混淆黑白，虽稍与立异者犹不可保，况素非其类耶？自金陵光复以来，弟与雪楼（程德全）、季直（张謇）、秉三（熊希龄）、竹君（赵凤昌）诸公，即尝隐忧及此，与诸君子相合，为中华民国联合会”[133]。可见，他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联络的对象是旧立宪派和旧官僚。他强调的所谓“联合”、“参用各处人”，不过是联合、参用同盟会以外的势力，与同盟会分庭抗礼而已。这正是他得以被程德全、张謇等拥为正会长的根本原因。程、张等清楚地意识到：由享有“革命文豪”盛名的章炳麟出来挑头反对同盟会，要比他们自己出面合适得多。

其次，中华民国联合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发表宣言说：“对于此等少数宣言，断难遵行。”[134]《大共和日报》公然宣布：“本报纪年仍用辛亥，以黄帝纪元无据也。纪月仍用阴历，以新历未颁，不能遽用。”[135]南京临时政府迫于革命战争尚在进行，没有也不可能组织民选参议院，这也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不满。还在成立会上，它便通过了请愿组织民选参议院的提议。会

后，又一面上书孙中山，要求各省选举议员，速赴南京组织参议院；一面通过《大共和日报》大造“无民选组织之机关，其主权所在不明”的舆论[136]。在建都之争中，它带头反对建都南京。《大共和日报》事后宣称：“自本报首先发议主张北京，而参议遂倚为后援，南京政府亦有所惮，无复固执，而首都之问题以定。”[137]南京临时政府被迫举借外债，它借他人之口，攻击南京的财政部成了“民国借债部”[138]。

当然，就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全部活动而言，它在维护共和制、反对君主制方面还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当时，尽管社会舆论已“趋于共和”，但各种反共和谬说远未绝迹。袁世凯也还在利用“君主立宪”来压迫革命党人向他让步。为此，中华民国联合会与袁世凯及其他反共和派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机关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就是《论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主义》。该文开宗明义就说：“北方汉土，尚有一二惑于袁氏君主之说，以对外问题为口实，而欲苟安旦夕者；复有近见之士，以蒙、藏携贰，拥戴满清为羁縻之术，或持虚君共和，模棱两可，为调停之计。此种谬说皆足以阻挠共和之进行而置国家于累卵。吾人为百年根本计，不能不就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应采如何主义为天下告。”接着，社论便从巩固国基、根本改革、平均政权、统一边疆、拥护国权，以及“外国干涉之说绝不足虑”等方面，论证了“确定共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139]。9日，该报又发表题为《问清袁内阁》的社论，专驳袁世凯所谓“存亡绝续之交，不忍收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和“虑伤各国皇室之感情，为列邦所否认”的谰言，指出“此后之中国断不容有君主也明矣”[140]。14日，再次发表社论，驳斥君主立宪论者鼓吹“改造政体，蒙藏必至分离”的谬说，认为“诚使今而后，藩邦崩析，危亡莫救，袁世凯之罪也，于改造政体何尤？”[141]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及早定计，与坚持反革命立场、“以和欺人”的袁世凯决一死战。这说明中华民国联合会在当时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虽不完全如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自本报以‘大共和’命名，大为鼓吹，共和之政体以定”[142]，但说它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也是符合事实的。

遵循章程的规定，中华民国联合会于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酝酿改为政党。起初，它曾试图与某些“宗旨大约相同，本可合而为一”的政团合并，无如政见分歧，不能实现，遂于3月1日单独发表改党通告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照章本应改党，特开参议会，询谋佥同，兹署新名曰统一党。”[143] 2日，统一党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五人为理事，唐文治等十七人（十省）为评议员，宣告正式成立。5日，又由全体职员举定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十三人为参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特派刘莹泽、王印川入京筹组北京事务所。4月23日，正式组成北京本部。

统一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144]。其政纲与联合会提出的“假定政纲”相差无几，仅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删去了“确定共和国体”，增加了“提倡征兵制度”等个别内容，但领导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联合会实行的是由正会长代表全体“总理一切会务，并指导各科干事”的个人负责制[145]，而统一党则实行集体领导，由“理事主持一切党务，以合议体行其职权”[146]。据章炳麟解释，这是“因此后本党所筹划之事甚重大而且繁缛，故以合议制为宜”[147]。至于组织路线，它公开宣言：“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148] 稍后，它又宣称：“本党招集党员，凡有公民资格者，无论在朝在野，皆得入党。惟曾任北廷、南京两政府人，有与他国勾串作奸者，或著名贪秽者，或借吏职以遂其暴乱欺诈之术者，皆应严行甄别，摈不入党。”[149] 这表明它所要摈弃的主要是被当时的官僚派和立宪派普遍称为“暴烈派”的同盟会急进分子。事实也是这样。尽管它以不偏不倚相标榜，实际上它所吸收的主要还是前

清“被裁之官吏”[150]。当时《大公报》曾指出：“统一党以罗致亡清官僚为事，久为他团体僇笑。”[151]在实际活动方面，它声明“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152]。它对当时行将取消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多所指摘。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为巩固共和新秩序，颁布暂行报律三章。统一党机关报立即发表社论加以“驳议”，并联合上海报界俱进会通电表示“万难承认”[153]。同盟会为加强在南北统一政府中的实力地位，力争掌握陆军、财政两部，它指斥这是少数军人挟有“私意”，要求“公同婉劝黄君（指黄兴）权任参谋部长，以安南北之军心”[154]。它并通过《大共和日报》呼吁“南京政府及参议院均持恬淡主义，交相为让”[155]。与此同时，章炳麟还大骂南京临时政府“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人……长此不悟，纵令势力弥满，人莫予毒，亦乃与满洲亲贵等夷”[156]。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尉荆吴。”[157]对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他认为多不完备，“应即提出修改”[158]。以上事实说明，统一党在政治倾向方面与联合会是一脉相承的。

二　同盟会改组及其新纲领

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内部争论过程。武昌起义以后，胡汉民等人坚持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159]。但多数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分子则都主张适应新的“共和”形势，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

然而，就是这后一种意见，也不无分歧。曾一度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的刘揆一，率先于1911年12月10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

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160]。接着，章炳麟也抛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161]的口号。在他们的影响下，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均持同一态度，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162]。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甚至鼓吹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163]。但孙中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自国外回到上海后第五天，即12月30日，便召开由各省旅沪同盟会分会负责人参加的本部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严厉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同盟会“必先自结合”，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郑重表示：“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期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164]这表明孙中山虽赞成改组同盟会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但不同意取消同盟会名义，也不赞成马上改组。

孙中山所以不赞成马上改组，据他自己说，一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165]；二是为了避免“一党专制”。他说：“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166]“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167]因此，孙中山坚持保存同盟会名义，暂不改组为议会政党，而只是加以适当的整顿。

孙中山这次整顿同盟会的努力，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张继等人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愿继续留在同盟会内，以“保持革命精神”[168]，但却未能使多数同盟会员接受他暂不改组，以求他党“发达”的意图。会后不久，美洲旧金山同盟会员伍平一便拟就《同盟会改组政党计划大纲》，函请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

人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机，速集各省及海内外支部开全体大会，“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坚决主张：“不让异党标榜相异之政纲，致妨建立宪政之进行。”[169] 陈其美等人则仍然不理睬孙中山维持同盟会名义的主张，擅自将同盟会改组为“共和本党”、“军国党”、“共和党”等等名称的政党[170]。在此纷乱的趋势下，同盟会本部不得不于1912年1月22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同盟会何去何从的问题。黄兴、胡汉民（代表孙中山）以及各省代表均出席。会上，赞成与反对改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赞成一派“占多数”，通过改组政党的决定，同时修改同盟会誓词为“推翻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改选汪精卫为总理[171]。

但是，由于孙中山事实上仍不赞成遽尔改为政党，而汪精卫又不肯担任总理职务，所以大会之后，具体的改组事宜，实际上并未进行。到2月底3月初，全国组党形势日益高涨，且对同盟会越来越不利。一方面，立宪派、旧官僚利用组党机会，加紧联合“非同盟党之力，以摧陷同盟党”[172]；另一方面，同盟会内部自行设会组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使同盟会实力大受影响。加上袁世凯已取得临时大总统地位，同盟会也必须采取办法，以确保其行动不致逸出宪政轨道。这时，孙中山、黄兴等人才深感同盟会“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大加扩张，以实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并责成居正等人积极筹备改组大会[173]。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再次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174]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随后又选定汪精卫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175] 其中仅广东支部，自4月中开始吸收新会员，“计在支部加盟者约四百人，在广州分会加盟者约八百人，在各分会加盟者约二千人”；且仅指“发证书者而言，其在远处分会加盟，尚未报领证书者，不知凡几”

[176]。这就为日后国会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4月25日，随着北京临时政府建立，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往北京。

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它的政纲是：1．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实行种族同化；3．采用国家社会政策；4．普及义务教育；5．主张男女平权；6．励行征兵制度；7．整理财政，厘定税则；8．力谋国际平等；9．注重移民垦殖事业[177]。对于第一条，它的一个机关刊物发表文章解释说：所谓“完成行政统一”，即是“举凡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大权悉集于中央，各省行政悉受中央行政之制裁，有若心之使臂，臂之使指，庶不致混乱无章，茫无次序，乃足以收政治敏活之实效”；但同时又必须“于行政便宜上，划其行政权之一部分，让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公益”，“以促进地方自治”[178]。这表明同盟会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专制独裁，危害民国。至于主张“男女平权”、“力谋国际平等”等条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与积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前者反映了广大妇女群众要求参政的愿望，后者反映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后者，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虽未在政纲上写上“平均地权”一条，但并不等于放弃了这一主张。因为，同盟会不仅于“总章”中明确规定了以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且在随后发布的《中国同盟会募集基本金公启》中进一步强调：“吾侪试平心以思，今日所完全办到者，仅第一主义。其第二主义，就精神上观察，不过基础初奠，未底健全。第三主义则尚待集群策群力，研究其如何稳健进行，始可冀不与今日社会现象相舛驰，以获和平之改造。”又说：“于此步履艰难之际，吾会遂不得不联袂攘臂，与当世贤者共厕于政党之林。此固吾会所以求贯彻第二、第三主义之精神所在，又实吾全国同胞所属望者也。”[179]各支部改组，也都把“实行民生主

义”摆到最重要的地位。例如：无锡支部召开成立会，吴稚晖发表演说称：“同盟会系一政党，现在则当实行民生主义，故又可谓之民生进步党。”刘民畏接着说：“吴君‘民生进步党’一语，实表同情。今民族、民权虽达目的，而民生主义方始发轫，愿诸君实行社会政策，以苏民生之困，谋社会之平等。”[180] 所以，黄兴不止一次地指出：同盟会“特别之党纲者，即孙中山先生夙所主持之民生主义”[181]。其次，据孙中山解释，“平均地权”实包含于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之中。他说：“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182] 可见，“实行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有的同盟会员也指出：“同盟会若握政权，则政见可行，平民生计日渐等均，社会不平庶几可免。是即同盟会改组政党时代，与人民之关系者也。”[183]

以上事实说明，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不仅适应了当时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且坚持了先前所订宗旨和纲领，“同盟会之精神，依然充实”[184]。它虽如同孙中山所说，确有一些人对“实行民生主义”表现冷淡，认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185]，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放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和局限。其一，为发展党势，它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拉入会内，造成了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致“纯粹的革命党”“多变了官僚派”[186]，一般会员也“由铁血主义一变而为权利主义”[187]，从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其二，它虽推举孙中山、黄兴为总理、协理，但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两人都不注重“党事”。作为“辅佐总理或协理指挥本会一切事务”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先是力辞不就，继则不顾本部一再挽留，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众望难孚，不甚热心。所以，改组后的同盟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率领全党为实现其政纲而进行有效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其三，由于缺乏领导核心，

会员意见纷歧，步调极不统一。即如孙中山、黄兴倡导的“国民捐”，也未能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宋教仁认为“缓不济急”，不表同意。谭人凤则诋毁为“信口狂谈，无意识已极”[188]。同盟会议员也多持消极态度。因此，轰动一时的“国民捐”活动，最后不能不以流产而告终。所有这些都说明，同盟会还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189]。

三　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

共和党由前述统一党和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它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两大政党之一，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地位仅次于同盟会。

民社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一样，也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刘成禺等二十四人发起，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2月20日出版机关报《民声日报》。它的本部虽设在上海，但发源地和大本营却在武昌。其核心人物是清末革命团体共进会领袖孙武、政客孙发绪和未公开挂名的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其支部发展至“十余省，党员过万人”[190]，主要是旧军官、旧官僚、失意同盟会员和清末立宪派分子，其中立宪派分子尤其受重视。但就职业而言，则以现役军人为主，南京支部发起人共四十人，其中军人多达三十二人，多数系浙、粤军高级军官。立宪派汤觉顿根据这种情况，指出民社的特点是握有“武力”[191]。

起初，民社未颁布何种政纲，仅表示“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192]，至2月底才议决三条富于民族主义内容的政纲：1．提倡军国民教育；2．采用保护贸易政策；3．扩张海陆军备。其实，民社维护的主要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南北建都之争初期，它既不支持建都南京，也不支持建都北京，而主张建都武昌。它发布通告指出：“际兹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吾党似未可加重一方，启内部党派之争，堕外人挑拨之术。折中定制，莫若武

昌。”[193] 接着，《民声日报》连续发表《论临时政府宜在武昌》、《国都平论》等专稿，论证“武昌建都之说为不可易”。

民社以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诬蔑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是“无功受禄”，“掠人之功以为功”；南京临时政府坚持同盟会的领导地位，是日谋“蟠踞之私利”；坚持建都南京是“沐猴而冠，盗终不变其盗”[194]；颁布暂行报律是“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指清朝政府）之覆辙”[195]；批准道胜借款是“效尤”前清所为；等等。与此同时，它拥护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大总统，咒骂持反对意见的同盟会员为“从龙之辈”，欲“长保南都富贵”[196]。袁上台以后，它虽继续标榜“监督政府”，实际上却在“赞助政府”。为适应袁世凯集权需要，它鼓吹全国政令“应听之中央”[197]，“各省都督宜由中央任命”[198]。为实现袁世凯的“统一”，它攻击黄兴南京留守府“发表之官制，俨然帝制自为，有南京政府之状态”，并借口陈其美已任工商总长，要求“撤消”沪军政府[199]，等等。

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较早的政团之一，1912年2月由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成立时有会员二百余人，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它与梁启超关系甚密，曾表示愿为梁“所用”[200]。

武昌起义后，范源濂等人意识到共和将成，决心联合京津各团体组织大政党，并准备于3月2日举行成立大会。后因北京兵变，成员星散，延至18日方于天津正式宣告成立，后移本部于北京。它不设会长，仅选举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周大烈、王璟芳、严修、蹇念益等十八人为常务干事，而“主脑”则是宪友会要人籍忠寅、黄远庸。它宣布的政纲是：1．巩固共和政治；2．确定统一主义：3．发达社会实力。其政治立场是拥袁拒孙。为促进袁世凯统一政府早日成立，它致电南京参议院及唐绍仪等，请唐及南方国务员“先期到京”[201]，并电请上海民国公会“联合团体，分别劝阻”南方“率重兵北来”[202]。当北京报界传说袁世凯拟同意南方派兵北上，袁将与国务员同时移

居南苑时，它连忙上书于袁说：“京师甫就稳靖，倘一日移居南苑，恐地方再生变故。”要求袁取消此举[203]。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1912年1月底成立于上海。会员最多时不过二三百人，基本上没有支、分部，是当时人数较少的一个政团。主要骨干多系前清立宪派政客和“光复会中稳健分子”[204]。其政纲是：“1．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2．建设健全之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3．成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继此永无障碍；4．扶植国民经济之发展。”[205] 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它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的统一活动。孙中山提议建都南京，它先是献计于袁世凯：“政府地点问题，就时势论，自以北京为是”[206]；后又以“京津变起”，压迫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火速定议[207]。在“北京兵变”中，它深以袁世凯的安危为虑，曾驰电表示“慰问”。

国民党由潘昌煦、朱寿朋、潘鸿鼎、陆鸿仪等三十余人于1912年2月下旬在上海发起。他们当时宣布：“本党同志集合至五百人以上时，即开成立大会，公举党首及各职员”，“未经成立以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208]。但事实上直至5月，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因此，与统一党、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的，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同志会。可见，该会成员始终不多，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209]。由于势单力薄，它从未颁布任何政纲，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也无甚表现，仅宣布其宗旨为“于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扬　共和之精神”[210]。

统一党等五政团虽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它们联合组党的政治基础。1912年3月中旬，国民协进会刚刚成立，即决议“与民社联合，推黎为党魁”[211]，并推定籍忠寅、周大烈二人为南下协商代表。接着，民国公会也派陈敬第等同行。他们先到武汉取得黎元洪、孙武的同意，然后与民社

代表孙发绪东下上海。4月15日，第一次合并协商会议在上海商学公会举行，参加者由国民协进会等三个政团发展到七个政团。经过近十天的反复磋商，除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因“理事问题，稍有异议”，中途退出外，其他五政团于24日正式签订协议书，一致同意合并为共和党。5月9日，共和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张园举行，出席者千余人，公推张謇为临时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共和党规约及支部分部条例，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并宣布林长民、刘成禺、籍忠寅、沈彭年、张一鹏等五十四人为干事，暂以上海为临时本部。次日，临时本部举行第一次职员会，推举干事周大烈、胡钧、陈敬第、袁毓麟、沈彭年五人前往北京协同组织本部。29日，北京共和党本部宣告正式成立，上海临时本部改为交通事务所。

共和党宣布的党义是：1．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核心是第一条。孙武说：共和党“最大宗旨在国家统一主义”[(212)]。所谓国家统一主义，据其本部所撰《共和党党义浅说》（以下简称《浅说》）一文解释，“就是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的意思”，即凡办一事，除应属地方各省办理者外，应“绝对由中央政府办理，不准各省各自为政”。因此，它主张“取国家主义，从前所有统一的形式，保持它不使分割，从前即有不统一的地方，从此更加统一，事事趋向国家一方面，即事事由国家有统系的办来”。关于“以国家权利扶持国民进步”一项，《浅说》指出：所谓“进步”，就是“国民一日一日的兴盛起来，日新又新，蒸蒸日上，有动作往前进的意思”。这就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去扶持国民”。比如国民几个人创办一工厂，“起初的时候，必要用国家的权力帮助他。当招股时，国家就可认股，助他开办，开办之后，国家可以许他种种特别的利益，助他发达起来。即令不幸偶有亏损，国家可以限定多少年担保股本官息。于是股东可以放心，不动摇这工厂的根本。到了后头发达起来，国家还时时保护他，替他排去障害。倘若在国际上与外国同样工厂相竞争，也可以将国家

的权力补助他力量不足”。关于“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一项，《浅说》解释说：实利就是国民利用土地、资本、劳力三项，年年求其增殖，以发达生计的意思。所谓“平和实利”，就是坚持以和平办法，而不以战争手段解决生计冲突[213]。至于共和党为何采用国家主义为政纲，其审计员张振武说：“有鉴于今日时势，社会主义（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足以救危亡，乃变其方针，一采国家主义而改组斯党。诸君试思今日我国民程度若何，有美国之托拉斯等弊否？如提倡社会主义，将使游手好闲之辈人人脑中存一均财思想，诚恐中国不亡于专制政治，而将亡于社会主义也。”[214]

从以上事实来看，共和党标榜的是要“将这共和民国造成世界第一等强国，使全国人民共享受共和民国的幸福”[215]。它理想中的共和国，不但高度统一，“能与外国对敌”，且能扶持全国人民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成为他们生计竞争中的坚强后盾。可见，共和党同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是，它对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政纲，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却诚如孙中山所说“多有误解”[216]，并持否定态度。以为它是“社会均产主义”，将损害富有者的利益。共和党对同盟会政纲的“误解”和否定，是和它的组织成份大多数都是富有者密切相关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支持真正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势力代表袁世凯，而与同盟会对立的可悲歧路。它支持袁世凯“实行武断政策”[217]，建议他迅速编定官制，以便南北“不至意气用事”[218]；并要求其党员“对于中央政府必确守本党党纲，而发为稳健之政见”，“其与吾党党义合者，固乐为赞成；其与吾党党义愫【悖】者，亦只尽监督之责，而不必为无益之破坏也”[219]。正因如此，所以袁世凯也把它看作对付同盟会的难得伙伴而优加维持。1913年3月下旬，共和党参议员李国珍、郭同等风闻同盟派议员将对他们有所不利，急函袁世凯请求保护。袁当即“着内务部传知警察厅严密防范”[220]。与此同时，他还应共和党本部和黎元洪之请，命京师各警区于共和党议员住所和不久前宣布加入共和党的梁启超的“往来地点，妥为保护”[221]。共和党错误地与

袁世凯结成了同盟关系。

共和党成立后，借助统一党等五政团原有的基础，在组织方面确如其原先所期望的那样，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共和党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它宣告成立不久，即出现了章炳麟宣布统一党重新独立的危机。

为抵制同盟会的“专横”，章炳麟虽不反对与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政团合并，但由于统一党成立在先和党员人数远胜各政团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不以与国民协进会等“不能独立之小团”“平等合并”为然[222]。早在这几个政团提议合并之初，他就傲慢地提出过，以不更改统一党名称，不设理事长为先决条件。可是，自他离沪入京以后，在上海主持“合并事件”的张謇，为加强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在新党中的地位，非但不恪遵其所提条件，且变本加厉地与国民协进会等四政团，达成不论各团人数多寡，一律各举四人为“基本干事”的协议，从而更激起了他对合并的不满。他说：“后上海来电，欲举基本干事。所谓基本干事者，各团各出四人，此假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且各团基本干事，多至二十人，各不相识，办事亦不能如意。故仆对于基本干事一节，始终极端反对，与季直电商者三四次。”[223]

但是，章炳麟的反对并未奏效。张謇以不可失信为辞，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于5月9日在上海共和党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包括“基本干事”在内的各政团所选干事名单。这使从不甘为人傀儡的章炳麟，更加怒不可遏。他一面力辞共和党理事，一面向前来要求合并的在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提出四个条件：1．上海所推理事须经北京开会认可，理事长如不便住党，必于其余四理事中推举一人常住党内，以对本党负完全责任；2．干事与评议员不同，须由理事派定，须住本部办事，不得徒拥虚名，但特别交际科不在其内；3．各团体所负之债，须各团体自行偿还，新团体不负责任，但各团体余存之款，当归缴于新团体；4．各团体所设立机关报，须由新团体管辖。

他企图从根本上“将上海之成立会取消”[224]。北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得知章“所提条件无从置议”[225]，于是一面采取既不辩驳，也不赞成，装聋作哑，终不复信的迁延战术，以稳定章炳麟；一面拉拢刘莹泽、龚焕辰等部分在京统一党成员，于5月14日达成各团事务所同时取消、以后各团不得私发电信等六项合并协议，加紧策划成立北京共和党本部。章炳麟忍无可忍，遂毅然向报界披露了统一党不能合并的详细理由，并于17日在统一党本部举行大会，痛斥老立宪派及官僚派“以抵制同盟会为名，而阴怀攀龙附凤之想”，其害“过于同盟会远矣”，表示绝不能以政党为他们“争官争衣食”开辟门径[226]。大会最后通过了《统一党独立宣言书》，正式宣布与共和党决绝。为更新标帜，避免与他党混淆，章炳麟宣布独立后的统一党由先前的理事制改为总理制，并接受推选，出任该党暂行总理。与此同时，江西、云南、贵州乃至北方各省的统一党支分部也多有“不愿合并者”[227]，这表明统一党的独立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事实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章炳麟对张謇等老立宪党和旧官僚利用政党与同盟会争权夺势的真面目，已有所认识，并断然采取了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重新独立的抵制措施。这对章炳麟和统一党都是可取的。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由于各党“私争”激烈，章炳麟对“政党政治”大失所望。他先是主张“吾党此后应改监督政府之眼光转而监督政党”[228]，继则干脆“宣告脱党，居于超然地位”[229]。这就给袁世凯死党王赓以可乘之机。9月2日，王赓在北京召开统一党改组大会，他和王印川等人被选为理事；不久又增推袁世凯、黎元洪为名誉理事长，岑春煊、徐世昌、冯国璋、赵秉钧、张镇芳等二十八人为名誉理事。统一党从此成了地地道道的袁世凯的御用党。

四　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

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是一个以“第三党”相标榜的政党。

共和统一会等三个政团，以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1911年12月，由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起，同时创办机关报《大中华报》。他们宣称唯一的天职是“设一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230]。国民共进会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1912年1月初由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拟设总会于南京或上海，曾举沈钧儒等四人为特派员，前往宁、沪联络。它以组织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政体统一主义、民族共和主义、社会民生主义为政纲[231]。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所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以上三个政团均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又都主张“绝对统一制”和组织所谓健全的大政党。因此，1912年2月，随着全国组党高潮的出现，它们也开始谋求合并，另组新党。在此过程中，以景耀月表现最活跃。他原先认为“共和建设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奏功，亦非片面单独之见解所能办理”，曾倡议同盟会“易名改组”，“以接纳热心革命与运动共和之贤豪者”[232]，但遭到多数同盟会员的反对。他于是改而提出联络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另组一党。经多次协商，2月底，共和统一会等三政团在上海达成合并为“统一共和党”的初步协议。

此外，云南都督蔡锷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他便在财政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筹资十万元，准备“合全国军界、政界极有能力及社会上极有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稳健强固之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为此邀约萧堃、袁家普、石陶钧等入滇“面授机宜”。起初，他欲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反对同盟会政团相联合，派萧、袁二人前往上海“筹商一切”[233]。对于蔡锷这一主张，章炳麟等人也十分赞成，曾复电表示“万里一心”，待萧、袁抵沪后，即“筹合并进行之法”[234]。可是不久，章炳麟因和张謇发生矛盾，拒绝与民社等政团合并，此议遂告失败。随后，蔡锷同意

萧、袁继续留沪，与粗具规模的“统一共和党暂时周旋”，“以暗移旧日有力之一部以同趋一途”[235]，即企图通过组党办法，将同盟会势力引上立宪派的轨道。由于他答应以十万元党费相助，又有云南都督的显要地位，加上该党本有他不少昔日留学旧友，所以反而后来居上，被拥为最主要的发起人。

从此，蔡锷不等统一共和党本部正式成立，便在云南积极展开了筹组支部的活动。他命回滇不久的萧堃、袁家普与当地“政学社”协商合并，“更新组织”，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吸收政学绅商各界百余人参加[236]。4月7日，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为支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指出：1．统一共和党务要以“国家为前提”，因为“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故吾党主义，勿徒骛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嚣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2．“务期本党内部之巩固。”这就要求“党内分子之健全。故本党党员与其骛多数之虚名，广为征引，致涉于滥，不如定格稍严，取具有常识、足以为齐民之表率者而结合之，庶足以举国利民福之实，而罔滋流弊”。3．党员绝不可“藉党势以谋私利，图个人之侥幸，或藉党援以为倾陷排挤之资”；“即对于他党，纵主义不同，趋向互异，可以言竞争，而不可以施排挤。尤不可以异党之故，伤及个人相互之友爱”。总之，统一共和党“宜鉴世界之趋势，察本国之情形，务择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而采用之。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237]。足见他与同盟会存在原则分歧，而对该党寄于满腔希望。为了“恢张党势”，他又电催各府厅州县迅设分部。仅一月之间，云南“入党者已有数千人之多”[238]，成为该党势力最雄厚的省份。

在蔡锷推动下，4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张凤翙、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殷汝

骊、袁家普、陈陶遗、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钧儒、萧堃等二十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曰垓等二十五人为特派交际员[239]。蔡锷虽以“滇居边远”，力辞总务干事一职，但对“筹维扩张”党务却仍十分“竭力”[240]。他电令陆鸿逵、章遹协助组织本部，委派萧堃、殷承𡢁为滇省常驻代表，甚至不惜自食“军人不预闻党社”之言，电请唐继尧、戴戡、李烈钧等发起组织贵州、江西支部。正因如此，所以他仍被奉为当然领袖。至于孙毓筠、张凤翙等则莫不欣然就职。特别是张凤翙，不仅公开表示：“同盟会以革命为宗旨，我即为同盟会员，现在革命目的已达，破坏之后急宜建设，故我注意于统一共和党”[241]，而且发起组织陕西支部，亲任支部长。以上组党过程清楚表明，统一共和党主要由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两部分人组成，并“多为政治界人物”，具有一定实力。据该党自己宣布，成立不过数月，支部即“遍十余省，党员达数万人，参议院议员亦占有三分之一之席次”[242]。

统一共和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厘定税则，以期负担公平；3．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8．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243]。与同盟会、共和党政纲相比较，这个政纲显然具有“调和”的色彩。对此，统一共和党并不隐讳。它明确宣布说：“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又说：“国基初定，安危之机，间不容发。若两党皆走极端，相持不下，难免感情有伤，实非国家之福。本党奔走于折中政纲之下而取调和之态度者，正因时势之要求，不得不如此也。”[244]

随着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统一共和党本部也迁到北京。经过一番角逐，其议员吴景濂、谷钟秀被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全院委员长，并由此成为该党实际领袖。在参议院，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245]，专意于“融洽两党之感情，措国家于安全之地位”，“绝无把揽政权之思想”[246]。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为了发展党势，它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所以到后来，社会舆论普遍指斥它为“反复无常的党”，是“混杂的官僚派”[247]。

五　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

国民协会是张嘉璈等人于1911年10月24日在当时尚未光复的上海发起的。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904年中秀才。不久，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学习财经。1909年毕业回国后，先在北京任立宪派机关报《国民公报》的路透电讯翻译，后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即离京至沪，联络杨景斌等三十二人发起国民协会，“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国体之完成”[248]。接着，扬州、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相继成立支部。1912年1月21日，国民协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选举张嘉璈与温宗尧等二十二人为干事，唐文治为名誉会长，温宗尧为干事总长，正式组成上海本部。不久，温宗尧以“力所不胜”[249]，宣布辞职，国民协会改举唐绍仪为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后唐因任内阁总理，改称名誉总理），但实际负责人仍是张嘉璈。

国民协会的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前清咨议局议员。其政纲是：1．统一国权；2．培养元气；3．发达民力。所谓“统一国权”，主要指“消融意见，合群策群力，以图统一南北”[250]。为此，在当时全国“万众一心，人人争欲得共和”的形势

下[251]，它赞成以民主共和制统一南北，反对袁世凯提出的“虚君立宪制”。1911年12月下旬，它一面致电袁说：“满洲君主，万无存理”，“清帝逊位，为目前第一要义”[252]；一面联合其他政团通告人民：“今共和之成否，全在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愿同胞毅力图之。”[253]与此同时，它还积极联络各省人士，赞助南方成立临时政府。其名誉会长唐文治一再呼吁：“今北方行政操于一人，军队调遣，听其所使，有臂指之效；而南方则军府林立，虽群策群力，无阂隔之弊，然函电筹商，动稽时日。而军事规划，尤宜统筹全局，布置分配，必皆有成谋预计，依次进行，庶足达期望而成大功。即其他各种行政，亦必有统一之办法，使行者励战术上之策略，居者展政治上之经猷。此组织临时政府所不可一日或缓者也。”[254]所谓“培养元气”，就是“免战祸，固财产”[255]。因此，它“对于国体问题，坚持和平解决之说”；对于共和新政府主张采法国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总统制，以免一旦政府不为人民信任，重新爆发“革命”[256]。所谓“发达民力”，就是“确立地方自治，使国民为政治上练习，因以养成其政治上良习惯”，以避免“暴民专制之祸”[257]。由此可见，国民协会所代表的还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宪派并无重大差别。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人于1912年2月在上海发起的。当时，南北议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他们认为“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258]。于是便以讨论民国建设问题为名，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以为改组政党之备”[259]。

经两个多月的广泛联络，征得会员三百人，计划刊行的会报也筹备就绪。孙洪伊等随即于4月13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正式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本部。随后“省会成立者闽、鲁、湘、赣、蜀、滇、秦、晋八省（鄂不日成立），以外各省各州邑成立约二十处，会员殆逾万人”[260]。

相对而言，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当时各政团发起成立较晚的一个，因此其成员多为他党跨党分子。该会要员吴贯因说：“所谓讨论会员

者，多挂名他党籍。”[261] 而考其组织构成，则以立宪党人、旧官僚为主。上海本部“多旧议局议长”和旧官界中所谓“矫矫”者[262]，各省交通处也大多系“中流以上人物”，且往往由现任都督之类的“大力之人出任发起”[263]。至其活动经费，除部分会员（主要是华侨会员）捐款外，更大部来自官僚、军阀之手，据孙洪伊说，其中一半是湖北都督黎元洪给的。

共和建设讨论会与梁启超关系相当密切。它发起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介绍梁启超入会，奉他为实际党魁，并暂停已有成议的“各团合并事”，倾力运动副总统黎元洪、国务院铨叙局长张国淦、云南都督蔡锷、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力促袁世凯召梁速归。而梁也明确表示同意入会，并事实上负起了指导责任。当时的同盟会机关报北京《民主报》曾载文说：共和建设讨论会实由梁启超暗中主持，其“两次所发商榷书，即出梁启超之手”[264]。不过，由于革命党人“反对之气焰犹昔”[265]，共和建设讨论会尚不敢公开打出梁的旗号，甚至婉言拒绝了他提出在该会会报上刊发文稿直署其名的要求[266]。它奉梁为党魁的主要目的，是在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为该党提供政见，指导舆论，招徕会员，扩大党势。

然而事实证明，梁启超同样未能改变共和建设讨论会无力竞取政权的地位。因此，它只好标榜“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267]，而不公开发布任何政纲，仅在内部宣布：“吾辈所抱铸党主义，不外乎稳健进步主义。以此主义协谋国是，则吾国种种建设，对外必取乎和平政策，对内必取乎实利政策”[268]，并通过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一文，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它的总纲领和总政策。

共和建设讨论会在这篇长文中首先提出它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具备以下四条标准的“世界国家”：1．其人民皆以国家为本位，努力从事“完全国家”的建设。所谓“完全国家”，就是分子调合、结合致密、持久不涣之国。这就必须消灭个人主义、地方感情、无秩序之自由、无系统之平等、无意识之排外、无计划之改革等等障碍。2．其国土

统一，政权集中，绝不“效颦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269] 3．“以平和为职志”，绝不“自为破坏平和之导火线”。4．在生计界能占优胜。这篇文章表明共和建设讨论会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巩固、统一、和平与在生计界占优胜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实现这一目标，它认为关键是实行“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涉政策，幻想通过现行国家政权来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它提出关键在于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在宪法上规定：1．不可效法美制，限制中央集权；2．不可各省自选都督，以免“寡人专制”和唐代方镇之祸再现；3．不可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两极端同时骈行，不相妨也，适相济也”；4．不可效颦美国立法、行政绝对分离之法，以免政治责任无所归和政府与国会外则各不相谋，内则私相交涉的恶果；5．更不可像现行制度那样，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专务以立法部掣肘行政部，干涉其用人权”。总之，“人民之对于政府也，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责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其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内部组织成一系统，然后可以观后效也”。这是为它在政治上拥袁制造的理论根据。

最后，共和建设讨论会还提出建设强有力政府的可靠保证，不是美制“不党内阁”，而是英制“政党内阁”。因为不党内阁阁员系总统私人工具，总统“虽横恣污黩，民莫如何”，“欲易政府，势必出于革命”，且每届改选总统，国内必骚乱无已。而政党内阁则不但无此弊端，且“阁（内阁）会（国会）一体”，内阁权力虽大，却不至利用其“国会多数之后援，以恣行秕政”，因而有两方面相反相成，两种“福国利民”政策交替为国所用等优点。它提出现时应从三方面为实行政党内阁预作准备。首先是确立以下政治原则：1．内阁必由政见相同之人组织；2．政府所提议案不能通过于国会、国会弹劾政府以及为不信任投票时，即或解散国会，或政府辞职，二者必居其一；3．严格选举制度，以防“少数桀夫壬人私相授受，变为寡人专制政治”；

4．须禁用武力，保证议员发表意见、审择表决的自由权利。其次是厘正政党观念：1．排除“官僚势力之集合”和秘密结社这两种伪政党；2．勿为己党垄断政权，而以卑劣手段妨害他党行动；3．防止小党分裂。第三是通过灌输政治常识、增强政治责任心等方法，提高全体国民的共和程度。这说明它最终还是要竞取政权的，所谓“不入政界”，不过是入不了政界时所唱的一种高调而已。

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在政治上同属拥袁反孙派。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是它们决定于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独立发起一党的基本条件。1912年10月27日，它们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六政团，正式成立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孙洪伊、向瑞琨、梅光远等三十人为常务员的民主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政纲。

六　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破天荒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270]，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它于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

江亢虎（1883—1954），名绍铨，以字行，江西弋阳人，早年受维新派思想影响。自1901年起，他两次赴日留学，与社会主义运动著名领袖片山潜、幸德秋水有所接触，共同讨论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诸问题。1910年春，他再次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先后游历了日本和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沙俄等国。目睹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日进千里，不可阻挡，他立志回国后即“倡导社会主义”，希图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上而朝廷，下而阛阓”皆能“赞同”的“正轨”。但在当时清朝专制统治下，他没有勇气“倡言社会党”，只好先采“称名异而取义同”的办法，代之以“个人会”的名称。

1911年6月1日，江亢虎赴杭州惠兴女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鼓吹“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271]。这是他在国内进行公开演讲，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江的演讲当时本“无人注意”，但由于杭州某巨绅欲借此“推倒其私仇”，浙江巡抚增韫为取媚此巨绅，于是派员“查办江亢虎”，最后又将他“驱逐出境”。经此一查一逐，江亢虎声名一时大噪。他避居上海后，遂乘机借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名称，于7月10日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以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272]。当场签名入会者五十余人。这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辛亥革命爆发后，江亢虎感到清政府再无干涉可能了，便于11月5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党”，并宣布由他一手制定的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273]江的提议获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带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早在留学期间，他就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274]。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所谓“三无主义之说”。但是，江亢虎又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首先，他并不笼统否定政治，而“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275]。其次，在方法手段上，他不赞成“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276]，认为“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所不取者也”[277]。既不主张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和阶级。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在成人之前“受一致之教育”，成人之后“各谋生计”，不受供养，也不供养于人，而死后又实行遗产归公，不给子孙继承，社会

主义的“极乐世界”就会到来[278]。所以，他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上了“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个口号。显然，这只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成立后，各地响应者颇不乏人。据它宣布，至这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279]。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全国有不少地方曾一度挂过中国社会党招牌，有不少人耳食过“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则是事实。在众多的党员中，就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绝大多数是“莫知其然”的盲从者，只有极少数，如天津支部干事李大钊等才称得上是真诚追求真理的革命者，还有一些则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280]。

中国社会党早期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它成立于民主共和制和君主专制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它把“赞同共和”定为头条纲领，即是对革命的声援。各省军政府代表在南京议组临时政府时，它联合上海惜阴公会致电各省代表团，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281]。它赞成并力求贯彻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江亢虎说：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这与中国社会党的党纲“近合无间”[282]。他选定长江口上的崇明岛作为试验场，由崇明支部发起成立了地税研究会。此外，它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它在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283]这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284]。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

但是，江亢虎毕竟是个投机政客，他发起中国社会党不过是借“社会主义”的美名，妄图争取国会“多数议席”，以谋取个人权力而已[285]。因此，当袁世凯及其他各省当局为巩固专制统治，而对某

些所谓“有意扰乱秩序”的中国社会党支部横加压迫和摧残时，他便不顾多数党员和地方支部的反对，而极力主张妥协让步了。1913年8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江亢虎以所谓“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为理由，不顾广大党员速起讨袁的要求，自动卷起“社会主义”旗子，辞了总代表名义，从容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了。

除上述统一、同盟、共和、统一共和等党派团体外，其他较有影响的小党派还有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

中华民国自由党是林与乐、梁舜传、谢树华等十二人于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发起的，2月3日正式宣布成立。它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主裁，推举李怀霜为临时副主裁，林与乐为理事长，谢树华为理事，实际首领是李怀霜。

李怀霜（1878—？），广东清远人，自掇科名后，即同情革命。光绪末年，与黄节、谢英伯等创办《时事画报》，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不久，受同盟会资助赴日留学。1911年春，自日本回国，出任奉孙中山之命而创办的上海《天铎报》总编辑兼主笔。武昌起义爆发后，协助陈其美光复上海，随后即被林与乐等同盟会员发起的自由党推为“首领”。

该党领导成员，从上海本部到各地支分部大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党员则主要是小资本家、小商人、小房产主、手工业主、小律师、医生等。因为它声称凡入党者将终身受其“保护”[286]，所以也吸引了一部分下层人民。

该党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思想，认为人生下来，不论男女贫富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幸福之权。因此，它宣布“以维护社会自由，扫除共和障碍为宗旨”[287]。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它公开声明“与同盟会是一个宗旨”[288]，所以自发起之日起，就得到

孙中山的热情支持。1912年1月中旬，孙中山接见该党代表王树谷，表示将“尽个人力助”[289]。4月18日，孙中山亲赴其本部发表演说，指示它对政府应“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290]；26日又指派马君武代为宣读他所拟该党政纲十条：1．保障人民自由；2．防止虚伪共和；3．促成地方自治；4．反对中央集权；5．励行强迫教育；6．主张男女平等；7．力谋币制统一；8．采用虚金本位；9．实施征兵制度；10．劝励拓殖事业[291]。这就更激起了袁世凯之流对它的仇视。1913年6月，其湖北荆州分部首遭黎元洪取缔。8月30日，所有该党各省支分部无不遭此厄运。

中华民国工党虽打着“工党”旗号，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徐企文在上海发起，1912年1月21日正式成立。

徐企文（？—1913），又名继曾，出生在上海一个小职员家庭，肄业于中等工业学校和德文医学堂。武昌起义后，他先入中华共和宪政会，任宣讲部长，继而加入中国社会党，随后则联络工厂主朱志尧等人共同发起工党，并被举为临时干事，负责筹备一切。21日，徐召集大会，推举正副党长及各职员，朱志尧当选为正长，他和钟衡臧当选为副长，中华民国工党上海总部遂告正式成立。

工党领导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头、开明士绅。它的基层组织是按行业建立的，各行业皆选有正、副领袖。这些所谓“领袖”，多数也是有产阶级。其党员也并非“以工人为主体”。它宣布：工党“万不可屏逐资本家于局外”；工党是“工界之工党”，而非“工人之工党”[292]。在此思想指导下，徐企文一次就介绍二百多“工头领袖”入党[293]。

该党宗旨是：1．促进工业发达；2．开通工人智识；3．消改工人困难；4．提倡工人尚武；5．主持工界参政。其核心是第一条，实际就是“实业救国”。它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与资本家通力合作，以与欧美各国争存竞胜。工人如有加资要求，“必先通告各企业家，及

要求不遂，不得已始行罢工政策”[294]。它宣布：工党的任务在“提倡国货，改良制造，使中国物产为外所欢迎”[295]。其进行手段是要求政府厉行普及工业知识，争回治外法权，厘订专利条例，奖励发明创造，补助实业教育经费，提供工业贷款等等[296]。它还呼吁国人“爱用国货，勿购洋货，以挽回利权”[297]。

为了发展实业，使工人不致因“过度劳动”而对“劳动问题”“起恶感情”，该党对工人的经济利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心。这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思想上，它认识到“职工者，工业之花也”，“可爱而不可贱”[298]。在行动上，它支持工人反对个别“不人道”的资本家。1912年7月，上海翻砂工人为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它组织“罢工干事会”作工人后盾。同年12月，上海小木工人罢工期间，面对雇主解雇威胁，徐企文邀请“素抱人道之资本家二十余人”发起工党第一木工公司，以防工人失业。1913年2月，它曾“议就关于儿童工作、成年人工作之时间，星期休业，最少数之工金以及劳动保险、罢工律等十余种议案”[299]，准备向国会请愿。等等。

工党在政治上属于同盟会派。它拥戴孙中山为“名誉领袖”，以其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5月1日，徐企文代表工党出席了自由党等团体为声讨袁世凯而发起的公民大会。紧接着，他又与张尧卿、柳人环等发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武装起义，并为此献出了生命。由于领袖被杀，工党随即瓦解。

第三节　各省政情与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人们企盼已久的南北统一终于实现了。但正像时人所说：“统一者其形式，而不统一者其精神。”[300]综观各省政情，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实际上仍然存在。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仍处于对抗地位。同盟会企图通过地方革命政权，保存与发展革

命势力，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袁世凯北洋集团则力图仗恃他们攫得的中央政权，铲除和消灭革命势力，维护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这实际上仍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政治势力较量的继续。此外，立宪派、旧官僚控制下的南方各省，虽然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又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其性质尽管与前者不同，但也可说是南北对峙形势的又一种表现。最后，包括北方在内的其他各省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斗争，以及某些省份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从根本上说也是这种政治形势的反映。

一　同盟会领导的南方各省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江西、广东和安徽等省仍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俨然成为同盟会的“根据地”[301]。

当时，江西、安徽都督分别为李烈钧和柏文蔚，广东都督由胡汉民复任。李、柏本是反对让权袁世凯的激进派。胡汉民虽主张交出政权，但也很快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中感到共和有被断送的危险，主张继续坚持反袁斗争。为此，他们采取了以下各项巩固革命政权和发展革命势力的措施。

（一）加强同盟会的领导地位。李烈钧接任江西都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根据同盟会党部决议，“对军政两界人员大加淘汰”，将“旧有人员更调大半”[302]。其中新委各司司长，除教育司长符鼎升为统一党党员和军务司长俞应麓党籍不明外，内务司长钟震川（继任者王有兰）、财务司长魏期灵、司法司长王侃、实业司长曾桢等，均为同盟会员。又设政务会议，自都督以下各司长及都督指定的顾问皆参加，“议决事项，交由各司分别执行”[303]。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后，所有司厅旅长“悉由都督任命”[304]，而且“非同党不用”[305]。如以陈炯明为总经略，邓铿为陆军司长，廖仲恺为财政司长，罗文幹为司法司长，朱执信为核计院长，邹鲁为官

银钱局总办，陈景华为警察厅长等。柏文蔚在安徽政争十分剧烈的情况下，为“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而接任都督。就职后，他以思想激进的陈仲甫（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王曙笙为机要秘书，徐唯一为高级参谋，“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他自己则在管昆南、卢仲农、谢叔骞等人协助下，“将所有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他明确指出：革命党人决不能违背“革命的宗旨”[306]。

（二）牢固掌握军权。这不仅表现在各同盟会都督向袁世凯力争发布征兵令、调动军队和整饬兵工厂之权，还表现在对于裁军的数量与步骤，始终坚持依本省实际情况而定，既不受袁世凯限制，更不以他的意旨为转移。因此，各省虽裁遣一部分乌合之众，但也有效地保存了一定数量的革命军队（详见下章裁军问题）。

（三）积极整顿财政。为解决财政困难，李烈钧一面详定章程，慎选贤能，开发资源，改革税则；一面设立民国银行，严禁钱商典当发行钞票。同时规定各项财政措施，均以“维持地方权利”为宗旨。例如，对淮盐统由两淮盐政总理张謇派员督销一事，他坚决要求将所收各款十分之六留赣，“其盐局总办及派委分销、缉私各员，赣省应有节制商撤之权”[307]。对萍乡县煤矿，他不顾汉冶萍公司董事会的反对和工商部的查办，仍主积极开办。结果，经过短期整理，江西财政“居然绰绰有余”。当时广东财政也十分困难，每月“收入不过百万元，不敷之数在二百万元以上”[308]。廖仲恺从确定货币流通办法、清理各类厘捐税收和发行有奖公债等方面入手，切实加以整顿，使财政有了明显转机。安徽通过“统一币制，厘定钱粮”等项措施，也取得一定成效。比如芜湖常关，监督李葆林“以裕课宽商为宗旨，将所有积弊革除净尽”，每年约增收三十余万[309]。为切实控制财权，各同盟会都督还坚决要求各省自定税法及征收法，反对袁世凯在各省设立财政专司，监理财政[310]。

（四）坚持地方分权。胡汉民原来就持地方分权意见，因此他复

任不久即通电提出“有限制的集权说”，要求“分权各省”。他说：“此时不能采集权制，一则视察难周，易启奸人之心；一则易使人狃于故常，不能唤起其爱国之念；最大之忌，则在使全国易返专制，稍不幸则全局皆翻。且其国内治既未完全，与其赖中央数人之力以整顿，不如分权各省，自为整理，成功较易。”[311] 接着，李烈钧也认为这是“吾国今日建设之方针”[312]，联合各省都督，电请袁世凯实行[313]。他还明确表示：“鄙见对于地方分权，信为民权根基，当竭心力，以期扩张。”[314] 可见，各同盟会都督主张地方分权，完全是为了扩张“民权”，而目的即在反对袁世凯集权，返回专制。这与同盟会纲领是一致的。当时陪同孙中山视察江西的马君武就曾称赞李烈钧说：“地方分权为吾党所主张，而李督为实行本党主张之第一贤豪。深愿猛进不怠，造成新江西，以为中国模范。”[315]

此外，各同盟会都督在改良社会风气和实行民生主义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对于社会风气的改良，以安徽柏文蔚态度最为坚决，也最富于成效。主要表现在：1．雷厉风行推行禁烟政策。柏文蔚督皖不久，即下令封闭烟馆，铲除烟苗，规定有私种二十株以上者，处以极刑[316]。对于私贩鸦片，更坚决予以打击。如安庆某商勾通英商偷运鸦片，被警务人员截获，柏文蔚当即令警察厅就地全部焚毁。事件发生后，英人公然出动战舰，百般威胁。但柏毫不示弱，集中炮队，严阵以待，迫其退出安庆。2．破除迷信，“废除淫祀”。省城内外庙宇庵堂中的土木偶像大都被毁除，庙产一律充公。有人上书，请保留城隍庙中的纪信偶像，柏文蔚批道：“城为城垣，隍为城濠，安得有神为之主宰？”“城隍专司鬼录，某人为某处城隍，此原巫觋之流言惑众”，“是为我国民最大之污点”，“本都督废除淫祠，正欲先毁城隍为拔本清源之计，岂有任听存在，留此障碍物，以阻进化之理？”[317] 3．禁演淫秽戏曲，并对不听劝告之园主依法拘留，震动颇大。

在实行民生主义方面，江西和广东都进行过或试图进行某种尝试。江西李烈钧上任伊始，即宣布他的唯一目的在于“为地方计安

全，为人民谋乐利”[318]。为减轻人民负担，他宣布自1912年6月15日起实行新的田赋征收办法，规定田赋每丁一两，征足钱二千七百文，每漕一石，征足钱三千六百文，亩捐串捐概行取消；地丁赋加税，每丁一两，征收至多不得超过三百文，每漕一石，征收至多不得超过四百文[319]。他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如：下令取消武宁等县浮粮[320]；主持政务会议议决设立贫民借贷所，以使贫民“易于借贷，而轻于酬偿”[321]；严令“禁止米谷出口及米商平价”，一再调整、减轻茶税；积极兴办社会公益，如继续修筑南浔铁路，拨款修筑南昌、新建等县圩堤，使人民免受水患之害；等等。这些措施，固然不可能给人民生计以多大改善，但毕竟反映了同盟会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注。

广东则试图实践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廖仲恺的更换土地契约法案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提出来的。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1．每个土地所有者持前清政府所发旧地契，于两个月内交军政府进行登记，换发新照；2．业主自由呈报地价，政府按价抽税百分之二；3．逾期未换契者，加倍征税，甚至没收土地。廖仲恺指出：这不单是沿袭中国历代更换必改税契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为将来广东改革地租，以实现孙中山土地照价纳税的主张创造条件。1912年7月中旬，经过激烈辩论，换契法案在税额减为百分之一与延长换契期限的条件下为省临时议会所通过。孙中山对此十分赞赏，认为这种单税法，为平均地权的一个办法[322]。更换契照当然不可能解决土地国有问题，但力图将孙中山的学说付诸实践，这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严格说来，各同盟会都督在巩固、发展革命势力和改革社会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有限的，而且很不彻底。但是，即使这样，也具有明显的反专制独裁的战斗意义。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反对派的态度就清楚了。在江西，据一篇发自南昌的通讯记载，李烈钧督赣后，“赣省之前清官僚派深恐君子道长，大生嫉妒；又有某党（指共

和党江西支部）排斥异己，每思推倒李督，以乱赣省”[323]。共和党参议员郭同、李国珍和所谓江西旅京同乡公益会也在京遥相呼应，或提出查办李烈钧违法案于参议院，或四出活动，以为后盾，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安徽，立宪派、旧官僚肆意攻击柏文蔚授权“佥壬”，“拥兵自卫”，要求袁世凯代之以北洋军阀陆建章。而广东的立宪派、旧官僚则颠倒是非，攻击胡汉民“武断专横”，意在“专制”。至于袁世凯更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和打消各同盟会都督的改革计划。他屡派大员到皖，“币重言甘”，拉拢柏文蔚；又以二百万元和晋勋一级为诱饵，邀李烈钧入京；对胡汉民则以高等顾问相许。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柏、李、胡等始终虚与委蛇，不为所动。以上事实表明，同盟会领导下的各省确实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处于对峙地位。

二　立宪派、旧官僚控制的南方各省

湖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一般说来，属于由立宪派、旧官僚完全掌握政权或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省份。

湖北黎元洪受革命之赐，由前清协统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总长，但他与革命党人并无感情，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和全国形势的变化，其反动面目也就暴露出来了。他打击革命党人的主要策略是“阳为附合，徐图敉平”[324]，伺机利用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以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7月，同盟会鄂支部（由前文学社改组而成）横遭迫害一事，就是典型事例。

6月中下旬，所谓同盟会谋乱的谣传，在武昌内外不胫而走。月底，以孙武为首的共和党鄂支部和同盟会鄂支部各军界要人，在黎元洪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又大起冲突，孙派指责同盟派王宪章、杨玉如等“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同盟派自辩这是共和党的诬陷。双方相争不下，以至动武[325]。会后，都督府民政总监、军务司等府署轻信“同盟会亦欲推倒共和党重要人物”，公然架起大炮，空气异常紧张。黎元洪见有机可乘，于7月1、2日宣布

武昌戒严，下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326]。尽管居正、胡秉柯等代表同盟会向黎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政党断不至有革命之举”[327]，但王宪章（代二镇统制）、杨玉如（都督府顾问）和祝制六（警察学校监学）仍被黎无理解职。到了17日，黎元洪更出动大批军警，逮捕江光国、滕亚纲和祝制六，随即秘密杀害。随后，黎宣布祝制六为“群英会会长”，“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罪大恶极”[328]，并依照所谓“名册”索捕处死“文学社同志”“不可计数”[329]。由此可见，这次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风潮，实际上是黎元洪利用“党争”打击同盟会力量的一次阴谋活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祝制六等遭无辜杀害后，同盟会内尽管有人看出是黎元洪“做成的圈套”，而领导人却不敢为他们伸冤，甚至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蒋翊武就公开表示与被杀三人“志不同，道不合”，“祝等犯罪与否，不得而知”[330]。他们还一味指责孙武为谋取都督职位，出钱唆使李忠义告发，一手制造了这次事件。孙武则上书黎元洪，指控事件为同盟会“主持”，要求“宣布罪状，通告国中”[331]。就这样，一场黎元洪打击、迫害革命党人的活动到头来反淹没在派别斗争之中。

与此同时，黎元洪又狠抓军政大权，全面控制各要害部门。他作为一个武人，自然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便一面扩充军队，一面位置私人[332]，以后又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将军队缩编为三个师，以前清旧军官唐克明、王安澜和卖身投靠、声称给他“四十把大刀包把文学社员杀绝”的蔡汉卿为师长。对军政府各要害部门，他更是“远贤亲佞”，极力把持。如立宪派夏寿康“顽固荒谬”，继杨时杰、周汝翼之后委以内务司长，潘祖裕“贪婪狡猾”，继胡瑞霖、李作栋之后使长财政，其他“若饶汉祥之狡谲，李国镛之卑鄙，孙发绪之阴险，唐仲寅、吕丹书辈之诡暴，刘有才等之无赖，凡能助黎氏以滥杀为事者，黎无一不信任之”。总之，所任之人“非前清

龌龊之旧员，即市井无赖之朋类，否则旧日野蛮之军官，旧部污贱马夫卒弁”[333]。此时，他虽通电提出“军民分治”，并于7月1日正式宣布实行，但正如时论所说，不过是虚有其名。因为代理民政长刘心源就是他的亲信，而且各司司长的任免，仍受他的“干预”。如饶汉祥升任内务司长，黎澍继潘祖裕为财政司长，“均出自黎氏之手”[334]。可见，黎元洪实行“军民分治”，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此外，为了加强统治地位，黎还和袁世凯日相勾结。在当时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历次争执中，黎元洪几乎无不站在袁世凯一边，推波助澜。而袁世凯为了向南方渗透北洋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对他极尽笼络之能事。据张国淦说，袁军事上利用陈宦“削弱武汉革命武装”，而政治上即通过他“和黎进行联络”[335]。黎、袁合谋将有影响的首义党人调离武汉，由袁世凯“笼以高官厚禄”，加以羁縻。包括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在内的“起义功人”先后被调到北京。但除孙武等少数人外，大都识破了袁、黎的诡谋，不久又相继回到了湖北。

在黎元洪统治下，首义之区的湖北很快恢复了旧的统治。省城武昌阴森恐怖，直如“黑暗地狱”[336]。“法庭之黑暗有甚于前清州县衙门，贿赂公行，毫无顾忌，草菅民命，仍用酷刑”[337]。革命之初发布的铲除一切陋规的文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甚至“变陋规为正税，于满清薄税之名亦不保存”[338]。而且罗掘无穷，人民“生命财产直等之空花幻影，绝不能得确实之保护”[339]。总之，“幸福未见丝毫”，人民依然水深火热。

但另一方面，黎元洪终非北洋派，他控制湖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厚势力于一己”。他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勾结，从根本上说是建筑在共同对付革命党人基础上的，本身就是相互利用的政治交易，因而有着矛盾的一面。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袁世凯包藏祸心，欲以亲信代黎督鄂，而任黎为参谋总长；黎则借口参议院于兼任“颇生疑义”，拒不受命，甚至鼓动左右，大造他“万难离鄂”的舆论。

同时，黎元洪固然不遗余力打击湖北革命党人，但对省外革命党人，特别是同盟会本部，却不愿决然断绝关系。同盟会选举他为协理，他未予反对，而且在有的问题上还往往采取“调和”态度，并不完全以袁世凯的意愿为转移。例如，对贵州问题，他支持杨荩诚反对唐继尧，并为此发起召开鄂、湘、黔三省四方会议，通过黔军回黔、滇军回滇的协议。接着，他又以执行“协议”为名，请袁任命他所派代表赵钧腾为贵州宣慰使，企图以赵督黔。黎元洪的“调停”虽因后来遭到袁世凯的破坏和唐继尧的反对，未能变为事实，但却明显反映了他与袁世凯的争夺。以上事实说明，黎元洪也是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袁世凯的。

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与湖北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基本立场和发展动向等方面，却颇为相似。

首先，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和广西，各都督都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宣称“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340)]，并且从政治、财政、舆论、组织和军事等各方面全力支持和维护袁的统治。唐继尧说得更直截了当：“继尧外观时变，内察国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341)] 所谓“力助中央”，即是“力助”袁世凯。

其次，他们都排斥同盟会势力。唐继尧虽是老同盟会员，实际上这时已完全成为立宪派和旧官僚的代言人。他攻击孙中山坚持“南北之见”，要求袁世凯取消省制，企图根本取消各省同盟会势力。他残酷镇压贵州自治学社的反抗，即使《临时约法》保护的集会结社，也企图加以取缔。唐继尧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是得到蔡锷支持和默许的。当唐因受到贵州同盟会的反对，意欲率军回滇时，他就出面劝阻，说是“一旦舍去，不独黔省良善无以安生，且全黔又必为某党（指同盟会）势力所弥胜，于国家前途，关系匪浅”[(342)]。在云南，蔡锷虽因同盟会拥有很大势力，且未对他造成直接威胁，因而未对革命党人采取粗暴的压制措施，仍保持着形式上的联合，但其瓦解和削弱同盟会力量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主用文官、反对军人入党及

公开提出毁党主张等等，都明显含有这种企图，而且在行动上也与同盟会日渐“疏淡”[343]。至于广西，陆荣廷一经地位巩固，就公然宣布不许革命党人有所活动。即使后来他参加了国民党，也如他所说，“只知有国，不知有党”[344]，仅仅挂名而已。

再次，他们都力图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唐继尧随着地位的巩固，个人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袁世凯曾对他加力拉拢，但他总半推半就，“不肯完全买账”。蔡锷对袁世凯也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就有他奉行“大西南主义”的说法。陆荣廷则在“桂人治桂”的旗号下，把旧军中的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等人，以及广西籍旧官僚和立宪派豪绅陈树勋、唐钟元、韦锦恩等网罗在自己的周围，日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一切以发展自身利益为转移。

当然，三省的实际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蔡锷拥袁就非完全效忠袁世凯个人。在他看来，民国初建，“当以救国为前提”[345]；而“救国”，就必须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而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就必须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把救国和拥袁混为一谈，以为拥袁就是救国，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也表明他的拥袁同时交织着爱国思想的因素。因此，蔡锷虽拥护袁世凯，但对袁的所为绝非一味盲从。如他要求袁世凯“于用人行政之际，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使秕政余毒，不至复生，民国基础，得以巩固”[346]。又如在借款问题上，他强烈反对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接受帝国主义的苛刻条件，并在云南全省掀起认购爱国公债的热潮，以实际行动抵制帝国主义的要挟；等等。这表明蔡锷与唐继尧、陆荣廷还是有区别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湖北等省政局的变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以反对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和极力维护既得利益为特征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在根本上代表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利益和要求。由于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形势主要表现为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斗争，它

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地方实力派的色彩。尽管其表现形式与程度在各省不尽一致，但这个总的格局及发展趋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三　处于激烈争夺中的南方各省

浙江、福建、江苏、湖南、四川等省则是另一种情势。一方面，同盟会或居于实际掌权地位，或掌握大部分军队，或依然为政治上的中心力量。另一方面，立宪派在这些省份基础雄厚，力量相当，同革命党人的争夺十分激烈。因此，这几个省既不同于同盟会完全领导的省份，也有别于立宪派、旧官僚直接控制的各省，政局明显表现出急剧变化的特征和不同的发展趋势。在江苏、湖南，同盟会影响在继续扩大，而在浙江、福建、四川，同盟会的力量则在日渐削弱。

第一种情况，可以湖南为例。湖南独立不久，立宪派便通过政变夺得政权，推谭延闿为都督。但革命党人没有停止斗争，加之革命在全国尚处于高潮中，谭延闿不敢与革命党人“过于立异”，所以“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347]。

当时，部分中下层革命党人对“非同党出身”的谭延闿推翻革命政权一事，愤恨不已，“常有排去之意”[348]。以周震鳞、程潜等人为代表的上层革命党人，为把湖南变成同盟会的前进基地，则普遍赞成遵照黄兴指示，采取争取谭参加革命与尽力发展同盟会势力并举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北京同盟会本部的支持。同盟会本部于6、7月间特派仇鳌回湘主持党务。仇到湘后，经内外革命党人积极活动，被谭任为民政司次长。他政治上“主急进”，组织上“主用少年英俊”[349]，很快把各方面力量聚集到同盟会的周围。而这一切，居然又得到了谭延闿的默许或赞同。因此，不但谭本人早在4月就加入了同盟会，到9月下旬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几乎所有立宪派头面人物及骨干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员，谭延闿并被举为支部长。仇鳌本人也由此正式取代刘人熙担任民政司长，握取了行政用人大权。随后，黄兴、宋教仁又相继返湘，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财政、实业和军事厅厅长也

都改由革命党人担任。

当然，谭延闿靠拢革命党人并不表明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而主要是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他倚重程潜等人，既是为着假党人之手裁减军队和对付中下层革命党人的反抗，但同时也意味着革命党人势力的不断增长，使他不得不迎合以至接受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他不顾旧势力的反对，长期保留周震鳞的筹饷局局长职务就是一例。周“大权独揽，操纵自如”，而且所行政策也颇具革命意味。例如募集捐款一事，他规定一律按房产、田产的多寡摊派，豪绅权贵照样“提充”。湘潭袁树勋拥资近千万，因“不愿多捐”，即将其田产五千余亩及省城镇沅典铺（约值银五万两）一律没收充公。长沙瞿鸿禨原认捐不多，后又逃往上海租界躲避，遂将其所存长沙蔚丰厚票号银四万两以及日升昌票号银一万两，一并提出充公。湘乡曾国藩祠被改为“大汉烈士祠”，其田产五百余石拨充烈士祠常年费，并提现银四万余两，充作军饷。即使对于谭延闿之兄也“驰电交攻”，迫其认捐缴纳。这种经济上严厉打击豪绅的做法，在当时全国也是十分突出的。

此外，谭延闿还在军事、实业建设等方面采纳了革命党人的一系列建议。在军事上，黄兴提出另编一支新军，推荐张孝准担任军事厅厅长，谭表示完全接受。同时因购械“为中央所不许”，他拨银六十万两，计划于醴陵自设兵工厂。在实业建设方面，他支持废除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原订川粤湘鄂筑路借债合同，主张“由湘人自行主持”。在改革风俗方面，他“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破除鬼神迷信”[350]。对临时政府的组织，他要求袁世凯不再留用“从前名誉已坏、为民国所不认可者”[351]。对于省制、省官制，他主张无论省长取何种方式产生，总须经省议会同意或择定。对梁启超回国问题，他“反对极力”[352]。如此等等。可见，谭延闿虽意在利用革命党人，以加强自己的地位，但革命党人也极力把他拉向维护共和的轨道，而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双方关系日益密切毕竟对袁世凯北洋集团是不利的。

第二种情况，可以福建为代表。福建独立后，革命党人彭寿松身

兼数职，实际控制着军政大权。起初他尚“虚心接纳”，不久即对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老同盟会员“逐渐疏远”，甚至不惜以暗杀手段，先后派人刺杀了同盟会员蒋筠和黄家宸。接着，又查封《群报》和《民言报》，逮捕并严刑拷打《群报》主笔、同盟会员苏渺公。

但总的说来，这还不是福建全部问题的根本所在。首先，蒋、黄被刺一案，据当事人刘通说：蒋筠光复后“畀以县长（县知事），不满所欲，自负才力，愤怒不平”，于是“到处演讲，肆意攻击”。黄家宸光复后曾招集数百人，请彭寿松编营给饷，彭以事前未奉命令，中间又无报告，加以拒绝。黄遂“散布仇恨之言”，并图谋暗杀彭寿松[353]。其所办《民心报》，则“主张裁撤政务院”，迫彭寿松去职[354]。因此，蒋、黄被刺后，上海《太平洋报》刊载的一篇《福建通信》说：“《民心报》主任某（指黄家宸）不得辞其咎。”[355]可见蒋黄案主要还是革命党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其次，彭寿松在查封《民言报》馆告示中指出：“及至光复告成，人人竞争权利，要求位置，本总监以建设方始，人浮于事，总应因地择人，不能人尽有事。此辈所求不遂，捏造无稽之言，任意污蔑，滥登报中，言之深堪愤懑。”又说：“现民国虽已成立，国际潮流日急，基本未尝巩固，功罪尚不敢自知，何暇计及求全之毁？业败垂成，本总监非有司马昭之心，不可无伊尹之志，不得已权行专制手段，期达共和目的。”[356]此外，当时舆论也认为，“彭之为人，与官僚派誓不两立”[357]，又始终主张“政权应操于革命党人之手”[358]。这说明彭寿松“权行专制手段”，固然表现了他的专横跋扈，但其本意也多少含有维护革命政权的成分。

然而，彭寿松的恃权骄横，却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提供了可乘之机。

本来，由立宪派和旧官僚联合组成的闽省共和党支部以及所掌握的共和实进会，早已“生觊觎之念，暗嗾该省人民排彭”[359]。因此，蒋黄案和查封报馆案相继发生后，“其乘瑕蹈隙，谋攫政权者，

如水银泻地之无孔不入”[360]。他们首先广造舆论，攻击彭“把持政权，广植党羽”[361]，继而推举省临时议会议长宋渊源（同盟会员）及议员陈祖烈、朱腾芬等赴京请愿查办彭。宋等先到上海运动岑春煊率兵赴闽镇抚，得岑同意后，即联合福建公会及南洋华侨联合会所举代表径赴北京，请袁世凯委以正式名义。袁当时正拟委张元奇为闽省民政长，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宋等此举自然使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当即任命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同时下令撤免彭寿松都督府总参议、警视厅总监各职，听候查办。

当蒋黄案和查封报馆案发生后，部分同盟会员为“稳定政局”，曾主张请陈其美担任都督，林森为民政长，但为立宪派、旧官僚所坚决反对。袁世凯查办令下，黄展云、马景融、郑祖荫、董光弼、林衡可、林雨时等同盟会员又以“人心惶恐”为词，一面致电袁世凯要求“阻止岑带兵入闽”；一面召开市民大会，发表演说，号召罢市，以谋抵制。立宪派、旧官僚则以共和实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党闽支部等五十六团体名义，致电欢迎岑春煊“速来”[362]。

彭寿松虽曾准备抵抗，但因势单力孤，又不为党人所谅，终于9月辞职离省。1912年10月3日，岑春煊带兵赴闽。他到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袁世凯通电缉拿彭寿松，“解赴闽省归案讯办”，并大兴党狱，逮捕林斯琛、陈景松，株连数十人，欲将“同盟党人一网打尽”[363]。至于他保荐的民政、司法、外交等司司长，则无一非前清旧官吏[364]。11月16日，袁世凯任张元奇为福建省民政长。从此，北洋派进入福建。

浙江、四川与福建情形大体相似，所不同的是浙江继任都督朱瑞直接被袁世凯拉拢，成为北洋势力在浙江的代理人；四川由于尹昌衡一意宠信胡景伊，大权旁落，终于使胡景伊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勾结演为事实。

以上两种情况清楚表明，革命党人只要继续坚持斗争，即使像湖

南、江苏这样并不实际掌握政权的省份，也会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反之，如果居功骄横，热衷于个人权势，或看不到加强革命政权的重要，就都将导致政局的逆转和革命力量的被摧残。而后一种情况则又无一不是立宪派、旧官僚和北洋集团合谋导演的结果。

四　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

袁世凯直接控制的直隶、河南和山东，则呈现另一番景象。

直隶等三省，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迹地。武昌起义后，这三省也出现过“炸弹横飞，前仆后继，势不可遏”的革命形势。但由于袁世凯的残酷镇压，斗争大都失败了，旧的统治秩序本没有什么改变。袁世凯上台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对这些省的控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首先，袁世凯不顾南京临时政府和三省人民的反对，强行安排自己的亲信、死党为各省都督。还在他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不久，南京临时参议院就通过了一个“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甘肃和新疆等未独立各省，须将原有督抚撤除，另由各该省临时议会公举都督[365]。但袁世凯认为这样势必动摇他对北方的控制，拒绝实行。他先令上述各省督抚改称都督，“职权仍旧”[366]，然后宣布“南方都督为革命时代所推戴，北方都督乃从前督抚之改称，“沿革不同”，军民“心理亦不同”，故都督民选问题“非军政民政分析之后，无从解决”[367]。他并抢先造成既成事实，于1912年3月15日任其亲信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1912年9月8日改任冯国璋为都督），23日改任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28日任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到任前由余树达署理）。当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新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同意撤换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时，袁世凯竟蛮横表示：“三省都督，业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368]

袁的倒行逆施，引起三省人民的强烈不满。以河南为例：张镇芳

督豫命令一下，全省“舆论哗然”，各团体纷纷上书，表示“死不承认”。省咨议局并致电袁世凯拒绝张镇芳到豫，同时提出举同盟会员曾昭文为河南都督，河南旅宁将校团也发电响应，要求推曾督豫。因此，张镇芳抵豫后，终日如坐针毡，不敢出门一步[369]。但袁世凯毫不让步，他密电张镇芳说，河南旅宁将校团推曾督豫，出于黄兴“私意”，断不能接受[370]。

在袁世凯支持下，张锡銮、周自齐、张镇芳等为“增涨北方势力”，首先牢牢控制各级地方官吏的任用大权。张镇芳走马到省，一次即保荐三十余人，请袁“破格录用”，致使省府各官“非前清之翰林，即前清之主事”，府一级知事“非前清之进士，即前清之中书”[371]，成了清一色的“官僚派”。周自齐向袁保证：“到任后，一切要政，万不敢自作主张，惟有事事禀命大总统而后行。”[372]张锡銮、冯国璋上任后，也再三宣称“维持现状”，将都督府和各级地方政权完全置于袁世凯北洋集团控制之下。其次，对待省临时议会，也完全按袁世凯意旨行事。冯国璋独断专行，凡事拒不提交省议会讨论。直隶省临时议会要求他：1．都督府各官一律更换；2．任用司道须得省议会同意；3．各州县知事考试录用；4．财政由省议会举人掌理[373]。但他在袁世凯怂恿下[374]，除第三条曾口头敷衍一时外，其他各条表示概不接受。张镇芳更“视省议会若仇敌”[375]。河南省临时议会制定《临时省议会法》，规定有议决本省官制、官俸、官规和承诺及否拒本省行政主管官任用的权力，他借口与《临时约法》相抵触，坚不承认[376]。甚至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河南省会于中央省制未颁行时，有暂行议决本省官制之权”[377]，他仍横加阻拦，破坏实行。

袁世凯对直隶等三省加强控制的另一措施，是在“保持公安”的名义下，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及一切进步势力。

首先是强行改编和遣散革命武装。当时，河南、山东都还保留有革命党人的军队。河南仅王天纵、刘凤同、马云卿领导的南阳民军，就有六七千人，马四五百匹，炮十二尊[378]。另有旅沪豫人组织

的“威武军”，驻军信阳。对于南阳民军，袁世凯先是企图强令他们退出豫境[379]。王天纵等通电反对后，他随即加委李纯督办豫南剿抚事宜（不久改任豫南总司令官），相机“收抚”，同时密电张镇芳，“收抚”必须“不令多留”[380]。李根据袁世凯旨意，提出改编刘凤同所部为陆军两营、炮队一队，王天纵、马云卿所部各为巡防两营（内有马队一营），其余一概缴械遣散。袁当即电准照办，并表示“豫饷不敷，可暂由京协济”[381]。对于威武军，袁世凯同样采取“剿抚并用”策略。6月初，威武军因国民捐问题发生内讧，要求撤换司令，率众回沪。袁世凯密令张镇芳会同李纯乘机“将该军勒令缴械，就地遣散”，不可令其“成师回沪”，并说：“如虑滋事，可酌拨兵队震慑。”[382]李纯也认为“趁此除根，方足弭其后患”，并提出三种遣散办法，即“以威严整饬……令留械潜逃，是为无形遣散；以大势开导，给饷一月，并予凭照，是为名誉退伍；末以审察人数，实行强迫收械遣散”[383]。曾在辛亥革命中威震一方的南阳民军和威武军，就这样在袁世凯软硬兼施之下，被相继取消了。以后，王天纵、马云卿应袁电召先后入京，王最后终被袁世凯收买。威武军司令官张鹗翎、主令参谋陈星枢则被袁以“折变公债票”罪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年，各褫夺公权十五年。后因李书城等四十七人联名上呈抗辩，才又下令“特赦”。山东民军重要组织人连成基的命运更惨，他于军队改编后奉令入京，刚抵天津，就被陆建章派人杀害于码头。

其次是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当时，直隶等三省的不少革命党人为维护共和，反对专制，仍继续坚持斗争。仅河南开封就有“共和中立死士团”、“监察共和团”和“铁血团”等革命团体。他们或以“流血”相号召，或以“暗杀”为宗旨[384]，决心将不惜生命对付那些“假意共和者”[385]。对于革命党人，袁世凯一开始就确定了“重治”的方针。他以总统府军事处名义密电直隶等三省都督及各统领，“于军队驻扎之所，专设收信处，派亲信员弁专司检查”；如发现革命党人联络函件，“即行扣留，密访下落，以清奸宄”[386]。于是，天津“铁血监督团”首当其冲，惨遭北洋集团剿杀。该团是1912年2月由曾广为、

方正、马伯援、凌钺等人，为防止袁世凯效法拿破仑称帝而组织的，宣称“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387]，在直隶、河南各地广泛开展活动。铁血监督团出现于北洋腹地，袁世凯当然不能容忍。6月，赵秉钧便以谋刺袁世凯罪名，拘捕曾广为兄弟四人，并判处曾广为监禁二年，其弟曾广伟等各一年，武装押解河南光山原籍，但行至信阳，即被李纯借“土匪”之手杀害了，该团随即也被取缔。山东周自齐主要采取软化手段，对付革命党人。他令登州（今属蓬莱市）、黄县所有“有功人员”，到济南都督府稽勋局登记，“论功行赏，从优议叙”；甚至假惺惺委任同盟会主要负责人徐镜心为济东泰武临首道，但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以官禄为钓饵，实行分化瓦解而已。徐镜心等人虽然进行了抵制，但山东革命势力终究为周所肢解，从而使袁世凯达到了完全控制山东的目的。

再次就是摧残舆论，禁止人民“私自结社、集会、演说”[388]。张镇芳逮捕开封《自由报》总编辑贾英，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不懂得什么法律，宁拚着都督不作”[389]。直隶巡警道杨以德在天津肆意殴辱、拘捕新闻记者。他手下一个稽查员是这样说的：“尔等开报馆者……均属目无长官，要造反，再要不改，吾们杨大人（指杨以德）有的是势力银钱，不难将尔等按土匪炮制。”[390]仅此二例，便足以看出北洋集团摧残舆论到了何等暴虐的地步。

总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较之辛亥革命前并没有多少变化，所不同的是北洋势力急剧膨胀，控制进一步加强。1912年5月10日，开封《大中民报》曾刊载一组题为《哀河南》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堂堂贵戚[391]莅中州，亡国余威使人愁。大陆依然崇专制，共和若付水东流！”这首诗所描绘的，不只是河南一省的情况，其实也是直隶和山东的真实写照。

五　东三省

袁世凯对东三省的控制，同样不遗余力。

武昌起义发生后，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封建势力，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顽固对抗革命。他们通过奉天咨议局表示：“如竟成共和政体，应请将东三省暂予特别办法。”[392] 所谓“特别办法”，就是“举恭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393]，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小朝廷。

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东三省的局势。他认为赵尔巽心怀叵测，便暗中加紧收买东三省将领，以牵制赵尔巽。他派遣密使，赠给张作霖“军刀一柄及其他贵重物品，价值一万余元”[394]。同时委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张锡銮的任命遭到赵尔巽公开抵制后，他又一面调动北洋第四镇，进行“武力震慑”，一面派心腹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在袁世凯拉拢下，张作霖态度一变，公开通电拥戴袁世凯做“共和大总统”，并向袁表示：如满族贵族在东三省建立小朝廷，“自有统领等抵制，请纾廑念”[395]。在此形势下，赵尔巽被迫作出拥袁决定，但同时提出以东三省用人、行政不变更为条件[396]。袁世凯权衡利害，满足了赵尔巽的要求。3月15日，他正式下令分别改任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为东三省都督和吉林、黑龙江都督。就这样，在充满狡诈和肮脏的交易中，东三省挂起了五色国旗。

东三省虽然宣布改旗易帜，但用人行政一仍其旧，来往公文、示谕仍用总督印信，大清银行、官报发行所等名目依然存在如故。直到这年11月张锡銮取代赵尔巽时，还发布告示，劝导各界剪发，改用阳历，宣布不准再用前清衔翎及钦命字样，大人、老爷、卑职、沐恩等名称，请安跪拜诸仪节以及前清官帽官服，等等[397]。可见，在此之前，封建统治秩序并无丝毫改变。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遭受迫害是并不奇怪的。赵尔巽公开宣称：“今者政体已定，更无革命之可言”，“倘再意图破坏，扰害治安，即属国民之公敌”[398]。他强令所有革命军队及革命团体“立即解散”，凡非奉籍党人，一律驱逐出境，奉籍党人必须“各回旧业”[399]，否则，就“借重武力”。锦州铁血会支部未及全部解散，即被指控“存心扰乱治安，破坏大局”，“一日拿获

三十七人”，后经丁开嶂极力营救方陆续开释，但铁血会调查部长王寰已冤死狱中[400]。

吉林、黑龙江并不比奉天好些。黑龙江宣布共和当天，宋小濂还在捕拿革命党人。同盟会支部长管颖侯、理财部长关步青就因揭露他“破坏共和，暗助宗社党”，一个被通缉，一个被逮捕。同盟会虽一再派人交涉，致函诘问，他仍声称“按律惩办”，绝不“稍涉宽纵”[401]，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吉林陈昭常同样“阳奉共和之名称，实阴施其毒辣之手腕”，致使“遍地叫苦，民不聊生”[402]，“人民空享共和之虚名，常受专制之实祸”[403]。

赵尔巽等肆无忌惮迫害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早在劝赵赞同共和时，他就有话在先：“如省内有借名革命紊乱秩序者，均认为马贼，即行弹压勿贷。”[404] 赵等后来解散革命团体，遣散革命党人，他又派朱锡麟、张英华、张石携巨款协同办理。朱等到奉天，仅用二十天时间，便“将东三省及所属各蒙旗党人一概资遣净尽”[405]。

但是，袁世凯支持赵尔巽“保全”东三省，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扩张北洋势力。因此，当赵尔巽自恃“保全地方”有功，企图垄断东三省权力，而坚决反对三省都督平权[406]，要求改称奉天都督为大都督，仍照前清律例，“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一切政事”，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袁的“军民分治”阴谋计划提出异议时，他便毫不客气地要迫赵去位了。

其实，袁世凯先前委任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派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就有乘机取代赵尔巽的意图。只是由于赵尔巽宣布“赞成”共和，打乱了他的如意计划。1912年4月，袁准备再次采取措施，策划由齐耀琳出任东三省都督，但未及实行，即遭到赵尔巽的抵制。赵鼓动东三省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声称东省时局万分危险，若骤易生手，恐将“全局动摇，前功尽弃”，并特别指出：东省现在局面纯系“赵

都督剖心呕血换来者”，为“彰公道而安人心”，必须“倾心推重”，“决不令赵都督避谤引退”[407]。但袁世凯去赵之心并未因此而打消。随后，他改采“釜底抽薪”办法，策动东三省将领，特别是张作霖叛离赵尔巽。张作霖本与赵貌合神离，自袁世凯改编其部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他为师长后，便更加有恃无恐，处处与赵作对。赵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再次提出辞职。11月3日，袁世凯批准赵“辞职”，以张锡銮署奉天都督（16日正式任命奉天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终于实现了他对东三省的直接控制。

六　山西与西北各省

山西与西北各省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实际上也被纳入北洋集团的势力范围。

山西临近京畿重地，是袁世凯极力争夺的省份。当派兵干涉和拒绝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的阴谋相继失败后，他便以强硬手段压迫阎锡山就范。开始，他严令阎锡山仍驻忻州，不准返回省城太原，并放风说将以布政使李盛铎取代他的都督地位。后虽迫于舆论，他不得不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为山西都督，但同时又委李盛铎为民政长，以牵制阎（李以病辞，改委原太原府知府周勃署理）。

阎锡山对革命本不十分坚定，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为了保住他的都督地位，自4月4日回到太原后，即开始积极投靠袁世凯。他不惜以四十万重金贿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又把袁早年的把兄弟董崇仁派往北京进行疏通，甚至将他的父亲送到北京作人质，以表示对袁的恭顺。在政治上，他极力迎合袁世凯，“在北方首倡裁兵”，“极主军民分治”，因而很快就博得袁世凯的赏识，认为：“革命人才鲜当人意，独阎都督器宇深纯，与流俗异也。”[408]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适应袁世凯的需要，还极力排挤打击革命势力。首先，他“对于一切革命有功者咸不信任”[409]。其次，他借“裁

军”之名，压制革命力量的发展。如晋北续桐溪等提出将“忻代宁公团”改编为正式军队，晋南河东革命党人要求以李鸣凤旅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师，均被他拒绝。再次，对在晋外籍革命党人，尤心怀猜忌。总之，凡不肯为他所用的，没有不遭到他的忌恨和排斥[410]。

阎锡山一面遏制革命势力，一面又以同乡五台人为中心，以封建纲常名教为纽带，结成死党。以同乡关系充任都督府秘书长的赵戴文就常说：阎与他是“君臣之分”[411]。同时，为巩固权力，阎还大力扩充嫡系军队（即同乡军队），“配以新式快枪精良武器”，待遇极为优厚。反之，对外省、外乡军队，则视为异己，处处加以限制。由此可见，阎锡山虽依然列名同盟会、国民党，实际上已毫无革命党人的气味。

但山西毕竟是辛亥革命中风雷激荡的省份。阎锡山投靠北洋军阀和排除革命势力的行径，必然要引起不甘顺从的革命党人的不满与反抗。到1912年底，终于酿成了震动全国的“河东案事件”。

河东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重要据点，也是革命党人力量最集中的地区。阎锡山回太原不久，为了全省的统一，温寿泉曾自动宣布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但以观察使张士秀、驻军旅长李鸣凤为首的革命党人，认为“袁不可靠”，阎为保地位计，也“恐将附袁”[412]，主张拒绝阎锡山的裁军改编命令，继续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他们提出二十四项附加条件，要求“对于都督或民政长所发命令，见为不合时，得暂令所管地方官吏缓期执行”[413]。他们并利用河东经济富庶的有利条件，控制全部盐课钱粮，准备坚持长期斗争。

阎锡山攻击张、李“聚财称雄，俨然割据”[414]，借口统一财政，接连派员向张、李施加压力。随后又派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兼会办军务，坐镇河东，伺机夺取军政大权。南桂馨原为同盟会员，这时已完全成为阎的亲信。他一到运城，即命令各县钱粮地丁一律直接解局，以控制财权，并以巨款运动各团、营长反抗张、李。他威胁

说：如不服从，即“借都督名义设法处置”[415]。但是，各团、营长终不为所动，夺权阴谋也很快被张、李察觉。于是，阎锡山抢先下令撤免李鸣凤，而代以亲信孔繁蔚。

12月27日，张、李等人忍无可忍，将南桂馨拘捕严讯，并于当天致电袁世凯，揭露南“煽乱酿变”，要求从速查办军政司司长黄国樑。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河东案事件”。这是阎锡山积极投靠袁世凯，一意排除异己的结果，也是不甘妥协的革命党人反对阎锡山斗争的总爆发。

阎锡山获悉南桂馨被拘后，惟恐阴谋暴露，急令张、李交出南，由孔繁蔚解省“讯断”。李鸣凤表示：“当整率全旅来省交代。”阎锡山见李将诉诸武力，便一面急电袁世凯，指控张、李违法抗命，请派大员前往河东“督饬裁并军队”；一面亲派董崇仁入京，请示“机宜”。袁世凯本对河东革命党人恨之入骨，自然有求必应，当即电令张、李放出南桂馨，归阎“办理”，并威胁说：“南桂馨等倘有丝毫损害，定惟该旅长是问。”[416] 同时密令阎锡山，若李率部回省，“即以土匪相待，痛加剿办可也”[417]。张、李针锋相对，明确指出：“阎实为此案原动”，自在“统一讯办之列，无再参与讯办之权”。为昭“平允”，应由中央特派大员，并另委邻省都督或接境带兵大员，来运城会同办理，同时取消阎锡山的会办权，一并提拿归案讯办[418]。接着，他们又发布宣言书，声明不认阎为都督，不认袁再有特任山西都督之权[419]。阎、袁见威胁恫吓无效，便进而勾结起来，大动杀机了。

阎锡山宣布张、李为国民公敌，电请袁世凯速派兵“会剿”，声称“若再延长时期，不以武力解决，不但南桂馨性命堪虞，而晋省大局将不堪设想”[420]。袁接电后，即令保定北洋第二师王懋赏率混成一团“迅赴太原”，归阎指挥；令陕州毅军统领赵倜率军渡河，勒令交出南桂馨，“解散该处军队”。12月22日，赵倜率马步炮六营直抵运城，将张、李拘押，解往北京，交军警执法处审判。阎锡山为置张、李于死地，也专程赶往北京。结果，原告成了被告，南桂馨宣布“无

罪释放”，张、李反以“称兵作乱，危害民国”罪被判处徒刑，河东革命军队也被遣散。一场正义的斗争，就这样被狼狈为奸的阎锡山、袁世凯残酷镇压下去了。从此，阎完全控制了山西的军政大权，成了北洋军阀的附庸。

控制西北，也是袁世凯的既定目标。对陕西，他如同对山西一样，主要采取威胁拉拢手段，利用革命党人削弱革命势力；而对西北其他各省，则主要是扶植旧势力，打击革命党人，进而扩张北洋势力。他在甘肃，采取的就是这后一种办法。

辛亥革命后，甘肃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中心。一个是兰州的以代理布政使赵惟熙为首的旧官吏和立宪派，他们迫于大势，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军学各界“自举都督”，“酿成暴动”[421]，于1912年3月6日，由赵领衔致电袁世凯和资政院表示“承认共和”。另一个是秦州（今属天水市）的以黄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他们经多方努力，于3月11日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袁世凯为达到控制甘肃的目的，3月15日，正式下令委任赵惟熙署甘肃都督。随后又以兰州承认共和在先为借口，诬蔑秦州独立是“甘心破坏”，“为全国公敌”，强令黄钺取消独立，一切听候赵惟熙命令办理[422]。赵在袁的支持下，也攻击黄钺为“匪徒逆党”，准备调军围堵。但黄钺不畏强暴，据理抗争。他复电袁世凯，申明秦州独立时，“未闻兰有承认共和之事”，并揭露兰州承认共和后，除“悬国旗”和宣称政纲服制“暂仍旧贯”外，“一事未办”，是名为承认共和，实则沿袭“腐败专制”。至于甘省统一问题，电文表示秦州军政府成立不久，即拟约八条，谋求解决，但赵惟熙等拒不答复，惟以武力相威胁，是破坏统一责任不在我而在彼[423]。黄电义正辞严，使袁无辞以对。但是他为了达到控制甘省的目的，紧接着又蛮横宣称黄“擅拥甲兵，自称独立”，“非辟以止辟不可”[424]。本来就准备采用武力镇压手段的赵惟熙，这时更加狐假虎威，叫嚷黄钺“蓄意扰乱和平，甘为天下公敌”，“不能不诉之于武装”[425]。

对于袁、赵所加罪名，黄钺能够据理进行驳斥，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他仅仅停留在要求袁承认秦州军政府的合法地位，而没有进一步采取巩固革命政权的措施。他一再向袁表示："钺始终守和平恬退主义，所以解决稍迟者，正因大总统屡次来电，全与钺事实不符，必俟心迹彰明，方能去此。"[426] 因此，当袁世凯顺势变换策略，表示承认他"前次倡议反正，自系误会甘省未承认共和所致"[427]，"心迹实有可原"[428]，赵惟熙也虚伪表示承认他所提解决条件时，他便接受"和平解决"，于6月7日宣布取消秦州军政府了。

袁世凯支持赵惟熙取得了甘肃全省的统治权，赵自然懂得怎样报答这一知遇之恩。他公开宣布将以袁所标榜的"渐进主义"为治甘方针，并向袁保证说：以此"办理一切，自有把握"。他竭诚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赞成袁大借款和对各省省长实行任命。与此同时，他又以袁为榜样，实行个人专制。尽管当时的省临时议会远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议长李镜清也只是一个与革命党人有过某些联系的开明士绅，但由于对他"招权纳贿、任用私人"表示过不满，便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利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民族成见，挑拨、操纵回族将领马安良派兵围困省议会，接着又派人于7月17日刺杀了李镜清。连当时北京国务院也认为他的某些行为"殊乖共和政体"[429]。

在赵惟熙统治下，封建秩序重又笼罩了整个甘肃。"即冠服一端，犹复红顶花翎，朝珠补服，招摇过肆，忝不为怪。"大小官吏唯以"保全利禄为心"，"不识共和为何物"[430]。以周务学、刘尔炘为核心的封建复辟势力，甚至公开组织"保清会"，开列条件，要求以"特别法治甘肃"[431]。其实，这不仅甘肃一省如此，也是袁世凯控制下的所有西北各省的缩影。

---

(1) 《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第49页。

(2) 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1912年版，第119页。

(3)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3页。

(4) 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1912年版，第10页。

(5)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0页。

(6)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27、28、123页。

(7)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27、28、123页。

(8) 李克格、杨绍周：《天津壬子兵变记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9)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03页。

(10) 《第三镇兵变真因》，《民立报》，1912年3月14日。

(11) 《专使会议要闻录》，《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12) 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38—440页。

(13)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3页。

(14) 唐在礼：《辛亥革命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41页。

(15)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45页。

(16) 叶恭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31页。

(17)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49—150页。

(18)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1—172页。

(19)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3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4页。

(20)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11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502页。

(21)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第513页。

(22)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第518页。

(23) 《共和实进会上袁世凯书》，《大公报》，1912年3月3日。

(24) 《北京三军统之危言》，《申报》，1912年3月10日。

(25)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8页。

(26) 《致吴稚晖函》，孙常炜编：《蔡元培集》，第1034—1035页。

(27) 黄世晖记、蔡元培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22页。

(28)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3页。

(29)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版，第114页。

(30)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9日。

(31) 《袁总统受任余记》，《申报》，1912年3月18日。

(32) 誓词为叶恭绰起草，梁士诒修正，先于3月8日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认可。誓文见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版，卷首。

(33)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

(34) 《命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2日。

(35) 《袁世凯致各省都督电》，《申报》，1912年3月27日。

(36) 如福建沙县共和实进会与农商教育自治会联名致电袁世凯，指出除免民元以前实欠在民钱粮，“则辛亥年份钱粮自在应予免除之内”，但随后又“强以清宣统三年钱粮纳入民国元年范围”，是“徒负失信之恶名，于实际上毫无补益”；且“闽光复时已豁免至庚戌年”，故豁免令“仅属虚文”（《申报》，1912年4月26日）。

(37) 《临时大总统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2日。

(38)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39)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6页。

(40)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6—197页。

(41)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6—

197页。

(42) 《覃振致各报馆电》，《申报》，1912年3月17日。

(43) 《顾忠琛致袁世凯等电》，《民立报》，1912年3月18日。

(44) 《新政府成立之种种》，《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日。

(45)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3页。

(4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3—1084页。

(47) 《大总统哭告唐总理》，《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9日。

(48) 《王芝祥将督直隶》，《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1日。

(49) 《北方各界力阻南军》，《申报》，1912年4月13日。

(50) 《北方各界力阻南军》，《申报》，1912年4月13日。

(51) 《关于劝阻南军北上之要电汇志》，《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9日；《黎副总统敦促临时政府成立》，《民立报》，1912年4月12日。

(52)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4月18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557页。

(53)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3册，未刊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54) 《唐绍仪电告逗留之原因》，《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7日。

(55) 血儿：《顾全大局》，《民立报》，1912年4月12日。

(56)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

(57) 《袁总统安慰人心》，《太平洋报》，1912年4月16日。

(58) 《内务总长辞职不成》，《申报》，1912年5月2日。

(59) 《陆军部之暗潮》，《民立报》，1912年4月30日。

(60) 《事在人为》，《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20日。

(61) 《新政府之人才评》，《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页。

(62) 《一声声鸣不平》，《民立报》，1912年5月25日。

(63) 后经江苏省临时议会提议，每省选举七人。

(64) 湖北省临时议会自称先后得十五省复电赞同（其中包括福建省）。但福建都督孙道仁通电声明："鄂省临时议会发起召集临时国会一节，闽并未表同情，来电想系误会。"（《申报》，1912年4月6日）

(65) 《湖南特别议会致各省议会等电》，《申报》，1912年3月12日。

(66) 湖北省临时议会致各省临时议会咨议局等电，《申报》，1912年3月15日；《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1日。

(67) 《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1日。

(68) 湖北省临时议会致各省临时议会咨议局等电，《申报》，1912年3月15日。

(69) 《申报》，1912年3月24日。

(70) 《参议员力持保存参议院》，《申报》，1912年3月24日。

(71) 《临时约法》第十八条规定，参议员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3月1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致各省都督、省议会及咨议局电中亦极力维持，说参议员"或民选，或公派，一惟各省自定，万不能执民选二字反对参议员，因以反对参议院"。但时隔一日，又发电提出"若谓都督选派之参议员不足代表人民，尽可按照约法第十八条规定，选派五人之数尽由民选"（《参议员力持保存参议院》，《申报》，1912年3月24日），可见完全是为了满足湖北等省临时议会的要求。江苏省临时议会就公开说："是该议员等亦已知舆论之所在，幡然思返。"（《三纪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7日）

(72) 《三纪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7日。

(73) 《两总统对于中央议会之政见》，《申报》，1912年4月4日。

(74) 《致各省都督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9日。

(75) 《梁士诒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6) 《三纪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7日。

(77) 《北京鄂省议员电》，《申报》，1912年4月12日。

(78) 《鄂省改选参议员》，《申报》，1912年4月19日。

(79) 《程德全致袁世凯电》，《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18页。

(80) 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与江苏的杨廷栋，原为南京参议员，后宣布辞职，故不包括继续当选者之内；江苏陈陶遗、杨廷栋、凌文渊基于同样的原因，亦不包括在落选者之列。

(81) 《汪荣宝蝇营狗苟》，《太平洋报》，1912年5月5日。

(82) 《参议院秘书厅通告》，《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2日。

(83) 副议长王正廷已担任内阁工商次长，自应改选，故同盟会全力维护林森议长席位。

(84) 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见的见闻纪实》，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85) 吴景濂（1873—1944），奉天宁远州（今辽宁省兴城市）人。他所以被选为议长，还因为：第一，他原为奉天咨议局议长，于参加统一共和党的同时又为民社、统一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团的发起人或成员，与立宪派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二，他既是南京参议员，又是“民选”新议员，且手段圆滑，“于新、旧感情均洽”（《申报》，1912年5月9日）；第三，统一共和党议员中，有一半以上为东三省人，一直唯吴马首是瞻。

(8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5页。

(87) 《社说二·论袁党之动机》，《太平洋报》，1912年5月7日。

(88) 《袁总统新设临时筹备处》，《申报》，1912年2月29日。

(89) 《新北京宦海升沉记》，《申报》，1912年4月9日。

(90) 据1912年5月17日《太平洋报》载：拱卫军于5月1日正式改编而成，共计三十五营。其分布情况为：北京驻十五营，天津驻三营，保、正、顺三府各驻一营，郑州驻二营，彰德驻十营，京津车站驻二营。

(91) 《游民政治》，《远生遗著》卷1，第23页。

(92) 《唐绍仪充高级顾问》，《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29日。

(93) 《参议院第十三次会议速记录》。

(94) 《参议院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

(95) 主要是三种意见：一、定大政方针既不属于大总统，也不属于国务总理，而属于国务院；二、定大政方针自包含于“保持行政之统一”中，不必

标明；三、大政方针不属官制问题，不必讨论。（《参议院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可见多数议员并未完全明了彭允彝的真实用意。

(96) 《中华民国名人传·蔡元培》，第39页。

(97) 《徐傅霖等质问大总统府另设财政筹备处、军事处书》，《参议院议决案汇编》乙部，第四册。

(98) 《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远生遗著》卷1，第7页。

(99) 《组织参议院消息》，《时报》，1912年4月5日。

(100) 《时报》，1912年2月29日。

(101) 《参议院议决中央官制案》。

(102) 章行严：《论国务院官制与内阁制》，《民立报》，1912年6月30日。

(103) 《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104) 《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2日。

(105)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106) 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2集，第302页。

(107) 《政界内形记》，《远生遗著》卷2，第9页。

(108) 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2集，第302页。

(10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10) 《南京参议院电致袁大总统受任祝词》，《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4日。

(111) 《参议院致袁大总统辞》，《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1日。

(112) 《参议院第一、三次会议速记录》。

(113) 《参议院第二十二、二十九、三十次会议速记录》。

(114) 《参议院第四十一次会议速记录》。

(115)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

(116) 汤化龙语，见《参议院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

(117) 匪石：《两年来政党变迁之大势》，《民权报》，1913年11月13日。

(118) 善哉（丁世峄）：《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1913年5月。

(119) 善哉（丁世峄）：《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1913年5月。

(120) 本馆驻京记者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121) 本馆驻京记者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122) 本馆驻京记者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123) 《共和国新发生政党之调查》，《大公报》，1912年2月6日。

(12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6页。

(125)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53页。

(126) 驻宁云南同盟分会何畏、吕志伊等致张儒澜等电（1912年2月23日），《滇南公报》，1912年3月13日。

(127)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8页。

(128)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32页。

(12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40页。

(130) 节初：《论政府亟宜筹安抚蒙藏》，《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7日。

(131) 《联合会改党纪事》，《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4日。

(132) 《章炳麟反对孙黄》，北京《民视报》，1912年1月14日。

(13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0页。

(134)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9页。

(135) 《特别广告》，《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

(136) 一谔：《释共和》，《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8日。

(137) 斐青（即解树强）：《本报百六十日之回顾》，《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21日。

(138) 一谔：《外债诤言》，《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2日。

(139)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

(140)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9日。

(141) 《正蒙藏分离说》，《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4日。

(142) 斐青：《本报百六十日之回顾》，《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21日。

(143) 《中华民国联合会政党通告》，《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1日。

(144)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79页。

(145)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71页。

(146)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80页。

(147) 《联合会政党纪事》，《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4日。

(148)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8页。

(149) 《统一党广告》，《国民公报》，1912年5月7日。

(15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2页。

(151) 《闲评二》，《大公报》，1912年6月2日。

(152)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93页。

(153)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8页。

(154) 统一党致孙中山等电（1912年3月29日），《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0日。

(155) 一谔：《时评二》，《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25日。

(156)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7页。

(157)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4页。

(158) 《章太炎之政见》，《时事新报》，1912年5月7日。

(159)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60) 《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0日。

(161) 《章炳麟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162) 《太炎最近文录》，第77页。

(163) 《说丛》，《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

(164) 《同盟会本部改定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天铎报》，1912年1月2日。

(16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页。

(166) 《共和民主两党宴孙中山先生记》，《宝山共和杂志》第5期，1912年12月。

(16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0页。

(168) 《张溥泉复章太炎书》，《缔造共和之英雄尺牍》卷5。

(169) 《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事略》。

(170) 据《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载江西马毓宝、吴铁城致陈其美电，29日载广东潮州留日同盟会员林国英等致陈电，以及《天铎报》1912年2月2日载蒋作宾致陈电，均称陈在沪发起将同盟会改为“共和本党”，并称以“辅助及监督新政府之行政”为宗旨，后因同盟会决定改组政党而作罢。另据《民权报》1912年7月13日载《尹仲材启事》称，“军国党”签名参加者计512人，后以同盟会改组政党，公议取消。又据1912年3月28日《天铎报》载张治澜等致孙中山等电称，四川成都同盟会分部于1月14日开会议决组织“共和党”。

(171) 据胡汉民说，因孙中山“方综国政，不宜兼摄党事”，所以改举汪精卫为总理。（《胡汉民自传》）

(172) 《汤觉顿致梁启超书》，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173) 居正：《梅川谱偈》，第18页。

(174) 当黎元洪伙同袁世凯阴谋杀害湖北党人张振武、方维后，同盟会本部即发表“启事”，宣布革去其协理并予除名。（《民立报》，1912年8月28日）

(175) 《中国同盟会滇支部全体公启》，昆明《天南日报》，1912年8月19日。

(176) 《前中国同盟会粤支部长谢英伯报告北京本部及各省支部书》，

《民谊》第2号，1912年12月。

(177) 《中国同盟会总章草案》，《民立报》，1912年3月6日。

(178) 百砺：《本会政纲第一条说明》，《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1912年。

(179) 《民权报》，1912年4月27日。

(180) 《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18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8页。

(18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0页。

(183) 郑少壮演稿：《同盟会与国家人民之关系》，《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184) 居觉生（正）：《梅川日记》，大东书局1947年版，第74页。

(18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186) 《时报》，1912年5月22日。

(187) 《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1912年。

(188) 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189)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1页。

(190) 《民社大事记》，《民声日报》，1912年4月22日

(191) 汤觉顿致梁启超函（1912年7月18日），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192) 《民社缘起及规约》，《天铎报》，1912年1月21日。

(193) 《建都武昌之倡议》，《民声日报》，1912年2月20日。

(194) 春雨：《龙蟠虎踞之南京》，《民声日报》，1912年3月15、16日。

(195) 《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民声日报》，1912年3月7日。

(196) 春雨：《龙蟠虎踞之南京》，《民声日报》，1912年3月15、16日。

(197) 《国民之声》，《民声日报》，1912年4月27日。

(198) 留予：《论各省都督宜由中央任命》，《民声日报》，1912年4月14日。

(199) 《敢问今之执政》，《民声日报》，1912年4月15日。

(200) 张伯桢致梁启超函（1912年3月27日），《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第974页。

(201) 《大公报》，1912年4月9日。

(202) 《太平洋报》，1912年4月8日。

(203) 《大公报》，1912年4月12日。

(204)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2页。

(205)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59页。

(206) 《民国公会主都北京之公电》，《大公报》，1912年2月28日。

(207) 民国公会致孙中山等电（1912年3月4日），《神州日报》，1912年3月5日。

(208)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73页。

(209)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2页。

(210)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73页。

(211) 蓝公武致梁启超函（1912年3月），《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184页。

(212) 《专电》，《时报》，1913年4月16日。

(213) 共和党本部撰稿：《共和党党义浅说》，《宝山共和杂志》第3期，1912年10月。

(214) 《共和党成立大会纪事》，《大公报》，1912年6月3日。

(215) 共和党本部撰稿：《共和党党义浅说》，《宝山共和杂志》第3期，1912年10月。

(216) 《共和党欢迎孙中山纪事》，《时报》，1912年9月10日。

(217) 《民声报之三大罪》，《民权报》，1912年7月27日。

(218) 《孙武之谈论》，《时事新报》，1912年6月11日。

(219)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26—27页。

(220) 京师警察厅总监令（1913年3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1) 内务部秘书处致外左四区警察署函（1913年4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2)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9页；《六团不能合并实情》，《国民公报》，1912年5月9日。

(223)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0页。

(224) 《附太炎提议条件》，《时事新报》，1912年6月2日。

(225)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15页。

(226)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2页。

(227)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2页。

(228) 《统一党谈话会纪事》，《新纪元报》，1912年7月22日。

(229) 《统一党第一周年纪念大会纪事》，《新纪元报》，1913年3月3日。

(230) 《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3日。共和统一会各发起人除景耀月外，后来均未参加统一共和党。

(231) 其原文为："政体以统一为主义，民族以共和为主义，社会以民生为主义，为本会三大政纲。"（《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纪事》，《时事新报》，1912年1月9日）

(232) 景耀月：《国民党与同盟会》，《民主报》，1912年8月14日。

(233) 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234) 《章太炎等复蔡锷电》，《华南新报》，1912年4月4日。

(235) 萧堃致梁启超函（1912年5月9日），《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962页。

(236) 《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布告》，《华南新报》，1912年5月1日。

(237) 《华南新报》，1912年5月6日。

(238) 《滇池鳞影片片》，《民立报》，1912年6月3日。

(239) 关于统一共和党，历来都称由蔡锷和谷钟秀、张耀曾所组织，虽

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但至今仍多沿袭此种说法。事实是，除了蔡锷之外，主要参加者为景耀月、陈陶遗、彭允彝、吴景濂等人。谷钟秀成为统一共和党重要人物，是该党迁往北京以后的事，在组党期间他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甚至成立时连一般参议都不是。至于张耀曾，则始终未参与该党组党活动。

(240) 《华南新报》，1912年5月9日。

(241) 《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开会详志》，《秦风日报》，1912年6月25日。

(242)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243) 《统一共和党规约》，《民立报》，1912年3月10日。

(244)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245) 《大总统与统一共和党代表谈话纪要》，《大公报》，1912年6月30日。

(246)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247) 《时评》，《大公报》，1912年7月30日。

(248) 《国民公报》，1911年12月28日。

(249) 《温宗尧君力辞国民协会干事总长函》，《时报》，1912年2月28日。

(250) 《大公报》，1912年2月8日。

(251) 《民立报》，1912年1月23日。

(252) 《申报》，1911年12月24日。

(253) 《申报》，1912年1月2日。

(254) 《国民协会为提议组织国民参事院与全国同胞商榷意见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9日。

(255) 《大公报》1912年2月8日。

(256) 《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

(257) 《大公报》1912年2月8日。

(25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29页。

(259) 共和建设讨论会第一次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79页。

(260)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65—166页。

(261)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430、432页。

(26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32页。

(263)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67页。

(264) 《民主报》，1912年3月4日。

(26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1页。

(266)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68—169页。

(26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8页。

(268) 《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84—85页。

(269) 《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9页。以下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270) 怀霜：《中国果有党争乎》，《天铎报》，1912年3月13日。

(271) 《时评二十则》，《社会星》第3号。

(272) 《社会星》第2号。

(273) 《中国社会党规章》，《天铎报》，1911年11月24日。

(274) 江亢虎：《洪水集》，1913年版，第36页。

(275)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48页。

(276)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48页。

(277)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社会星》第2号。

(278)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记》，《社会星》第2号。

(279) 《中国社会党传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80) 《社会世界》第4期，1912年7月。

(281) 《新闻报》，1911年12月29日。

(282) 《洪水集》，第55页。

(283)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97页。

(284)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40页。

(285) 《社会主义之今昔》，《江亢虎演讲录》，第79、82页。

(286) 《自由党修改章程草案》，《天铎报》，1912年3月23日。

(287) 《自由党修改章程草案》，《天铎报》，1912年3月14日。

(288) 《中华民国自由党湖南支部白话报》，未刊稿，中国共产党湖南临澧县委党史办公室藏件。

(289) 王树谷致自由党本部电（1912年1月），《民立报》，1912年1月16日。

(29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3页。

(291) 《敬录本党政纲》，《自由月报》第1期，1912年5月。

(292) 《中华民国工党宣言书》，《民立报》，1912年1月28—29日。

(293) 《工党之发轫》，《天铎报》，1912年1月26日。

(294) 《何某君之不惮烦》，《中华民报》，1912年12月5日。

(295) 《工党宣讲会志盛》，《民立报》，1912年7月20日。

(296) 钟衡臧：《论工党进行之手续》，《天铎报》，1912年1月26日。

(297) 《工党之进行》，《天铎报》，1912年3月10日。

(298) 《何某君之不惮烦》，《中华民报》，1912年12月5日。

(299) 《民权报》，1913年2月22日。

(300) 沙曾诒：《论中国今日急待解决之三大问题》，《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1912年9月。

(301) 同盟会本部致电胡汉民，即称“粤为根据地”。（《申报》，1912年7月5日）

(302) 《李都督之新猷》，《申报》，1912年3月26日。

(303) 王辅宜（侃）：《民初江西省政府》，《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赣省政界近闻》，《申报》，1912年7月7日。

(304) 《粤议会尊重约法之议案》，《申报》，1912年12月12日。

(305) 《筹议广东善后意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06) 柏文蔚笔记、王坦夫整理：《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

期。

(307) 《李烈钧致国务院电》，《申报》，1912年6月30日。

(308) 啸秋：《各省政谈》，《民立报》，1912年6月30日。

(309) 《芜湖改革今昔观》，《申报》，1912年8月7日。

(310) 《广东胡都督致大总统暨国务院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17日；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1978年版，第147页。

(311) 《粤都督之治国策》，《民立报》，1912年6月8日。

(312) 《李烈钧致袁世凯等电》，《申报》，1912年6月19日。

(313) 《江西都督李烈钧咨请各省联合反对中央集权文》，《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2之1，第27页。

(314) 《孙中山抵赣纪详》，《申报》，1912年11月1日。

(315) 《孙中山抵赣纪详》，《申报》，1912年11月1日。

(316) 《皖都督理直词壮》，《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8日。

(317) 《柏都督告全皖同胞文》，《申报》，1912年11月24日。

(318) 《宣言》，《民立报》，1912年3月23日。

(319) 《李都督规定田赋办法》，《申报》，1912年6月16日。

(320) 《李烈钧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8月版，第21页。

(321) 《江西内政述要》，《申报》，1912年8月17日。

(322) 《孙中山与各界谈话会》，《民立报》，1912年6月15日。

(323) 《赣省风潮始末记》，《长沙日报》，1912年12月26日。

(324) 《黎大总统政书》，上海晋益书局1916年版，卷26，第3页。

(325) 《鄂省共和同盟两党之大决斗》，《申报》，1912年7月7日。

(326) 《鄂省共和同盟两党大决斗续志》，《申报》，1912年7月8日。

(327) 《民权报》，1912年7月9日。

(328) 《副总统黎解散乱党示文》，《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7。

(329)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7页。

(330) 《蒋翊武致孙武书》，《民立报》，1912年8月19日。

(331) 《孙武诬陷同盟会之真据》，《民国新闻》，1912年8月11日。

(332)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333) 《社论三·大革命之一回顾》，《民立报》，1912年10月16日。

(334) 《内务财政两司长之八面观》，《长沙日报》，1912年11月23日。

(335) 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36) 《屠户黎元洪》，《太平洋报》，1912年10月4日。

(337) 《湖北之五光十色》，《时报》，1913年3月7日。

(338) 《湖北征收钱漕之变本加厉》，《时报》，1913年5月23日。

(339) 《社论三·大革命之一回顾》，《民立报》，1912年10月16日。

(340) 《蔡松坡集》，第436页。

(341) 唐继尧：《〈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序》，《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

(342) 《蔡松坡集》，第549页。

(343) 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33页。

(344) 《公电》，《广西公报》第65期，1913年8月。

(345) 《蔡松坡集》，第716页。

(346) 《蔡松坡集》，第348页。

(347) 仇鳌：《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79页。

(348) 《谭组庵之脱身计》，《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6日。

(349) 《湘民政司辞职之原因》，《申报》，1912年10月13日。

(350) 《湘人之改良风俗热》，《太平洋报》，1912年10月9日。

(351) 《谭延闿致袁世凯等电》，《申报》，1912年3月26日。

(3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5页。

(353) 刘通：《福建光复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

(354) 《闽军政府亦封禁报馆矣》，《申报》，1912年5月12日。

(355) 《共和党党员之野心》，《太平洋报》，1912年9月20日。

(356) 《彭寿松封〈民言报〉告示》，《申报》，1912年9月8日。

(357) 《共和党党员之野心》，《太平洋报》，1912年9月20日。

(358) 刘通：《福建光复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

(359) 《共和党党员之野心》，《太平洋报》，1912年9月20日。

(360) 郑祖荫编：《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第340页。

(361) 《宋渊源等报告书》，《申报》，1912年9月19日。

(362) 《福建团体欢迎岑镇抚使电》，《申报》，1912年9月27日。

(363) 《请看岑氏之三罪》，《长沙日报》，1912年11月26日。

(364) 《一幅魑魅魍魉图》，《长沙日报》，1912年11月24日。

(365) 《参议院议事录》；《议决北省公举都督条件》，《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24日。

(366) 《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3月15日），《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7日。

(367) 《袁大总统复国民共进会函》，《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28日。

(368) 《袁总统以去就争自举都督》，《申报》，1912年4月13日。

(369) 《张镇芳之闭门羹》、《豫都督自请告退》，《太平洋报》，1912年4月6日、8日。

(370)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2册。

(371) 《大中民报》，1912年7月9日。转引自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372) 《京师谈荟》，《申报》，1912年5月11日。

(373) 《异哉直省会之要求条件》，《申报》，1912年11月1日。

(374) 袁致电直隶省临时议会说："任免官吏之权自应归之都督，议会不

得干涉。”（《申报》，1912年12月1日）

(375) 《参议院咨请查办张镇芳函》，《申报》，1913年2月12日。

(376) 《河南都督咨文》，《申报》，1912年5月23日。

(377) 《参议院三十日会议情形》，《申报》，1912年6月6日。

(378) 据《李纯致张镇芳等电》（《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2册）。实际数字则不止这些。王天纵在1912年6月22日同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即称其所部解散两万三千人。（《申报》，1912年6月29日）

(379)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册。

(380)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2册。

(381)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3册。

(382)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0册。

(383)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0册。

(384) 河南“流血会”所布传单，即宣称“以平均贫富、专事暗杀为宗旨”。（《河南近讯》，《太平洋报》，1912年6月8日）

(385) 《强国公报》，1912年4月25日；《民约报》，1912年4月22日。转引自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第141页。

(386)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1册。

(387) 《铁血监督团宣言书》，《大公报》，1912年2月28日。

(388) 《强国公报》，1912年4月11日。转引自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第141页。

(389) 《参议院咨请查办张镇芳案》，《申报》，1913年2月12日。

(390) 《新天津报社同人公启》，《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29日。

(391) 指张镇芳，为袁世凯的表弟。

(392) 《华兴报》，1912年2月21日。转引自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第844页。

(393) 《盛京时报》，1912年2月14日。转引自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第844页。

(394) 《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2

页。

(395) 《退位后之东三省》，《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396) 《赵尔巽为国体解决后东三省行政用人勿遽变事致内阁电稿》（1912年2月13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81页。

(397) 《张都督最近政见》，《长沙日报》，1912年12月25日。

(398) 《奉黑两省解散民党之办法》，《申报》，1912年4月6日。

(399) 《赵尔巽为资遣南方党人回乡劝谕奉籍党人各回旧业的告示》（1912年3月2日），《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261页。

(400) 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401) 《黑省党祸纪闻》，《申报》，1912年6月24日；《宋小濂致各省都督等电》，《申报》，1912年6月14日。

(402) 《侠义党出现有期》，《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8日。

(403) 《弹劾都督案续闻》，《太平洋报》，1912年8月14日。

(404) 《袁大总统电致奉天赵次帅》，《正宗爱国报》，1912年2月25日。

(405) 《赵尔巽为饬令预备朱锡麟等遣送东三省党人用费事给度支司的札文稿》（1912年3月30日）、《赵尔巽给民政部的咨文稿》（1912年4月6日），《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264、266页。

(406) “东三省都督平权”，是当时东三省政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旨是改东三省都督为奉天都督，吉林、黑龙江不再受奉天节制。自东三省宣布赞成共和后，吉林、黑龙江临时省议会即倡此议。陈昭常、宋小濂从加强自身权力出发，亦极为赞同。1912年5月，东三省参议员将此案作为“建议案”正式提出于参议院，同月被参议院通过。但袁世凯认为“于事实上有种种之窒碍”，主张“变通办法”：“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设都督，一律平权。惟吉、黑两省军事、交涉两项，仍统属之于奉天，其余三省用人行政各不干涉。”7月1日，参议院开会通过袁的“修正”。17日，袁遂下令公布，并改赵尔巽东三省都督为奉天都督。

(407) 《潘榘楹等东三省将领致袁世凯等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7日。

(408) 尚秉和：《辛壬春秋·山西第六》，历史编辑社1924年版。

(409) 《山西乱党伏法详情》，《申报》，1912年11月24日。

(410) 《山西乱党伏法详情》，《申报》，1912年11月24日。

(411) 《阎锡山在山西》，《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

(412) 王用宾遗稿：《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123页。

(413) 《河东抗命始末记》（十一），《申报》，1913年2月28日。

(414) 《河东抗命始末记》（十一），《申报》，1913年2月28日。

(415) 《河东抗命始末记》（二），《申报》，1913年2月19日。

(416) 《河东抗命始末记》（六），《申报》，1913年2月23日。

(417) 《河东抗命始末记》（六），《申报》，1913年2月23日。

(418) 《河东抗命始末记》（七），《申报》，1913年2月24日。

(419) 《河东抗命始末记》（十），《申报》，1913年2月27日。

(420) 《河东抗命始末记》（九），《申报》，1913年2月26日。

(421) 《甘肃赵藩司惟熙等来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9日。

(422)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3)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4) 《大总统批斥黄钺之严厉》，《申报》，1912年5月10日。

(425) 赵星缘：《赵惟熙向袁世凯报告黄钺反正事件电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6) 赵星缘：《赵惟熙向袁世凯报告黄钺反正事件电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7)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8)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9) 《赵惟熙反对剪发》，《长沙日报》，1912年12月15日。

(430) 《兰州某君致旅陕同乡函》，《民立报》，1912年6月30日。

(431) 其请求条件为：1．甘肃不准办新政；2．本省人不得免本省行政官；3．解散省议会。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

一　唐内阁垮台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

唐内阁成立不久，就为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垮台。

责任内阁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又是同盟会所极力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对实行责任内阁抱着满腔热忱。唐绍仪也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如裁军问题，他主张全国一律，“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对北洋派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他采取调和的态度，并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同盟会“诸君皆以诚相待”，“决无他意”[(1)]。蔡元培认为唐绍仪的主张虽然与同盟会的主张不完全一致，但也可说是“调和南北之政策”[(2)]。

袁世凯对唐绍仪本来是信任的，所以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但在袁的心目中，内阁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总理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因此，他非但不能容忍同盟会阁员坚持责任内阁，对唐绍仪也心怀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3)]。他的党徒更露骨攻击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4)]。

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进行公开抵制。赵、段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

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的整体，主张各国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诚如蔡元培所说：“同一谋统一也，甲派（指同盟会阁员）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指赵、段等袁党）主因利乘便，以一方面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5)] 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向袁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他仍旧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延用旧人”[(6)]。他有时和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之类的威胁话。到了5月初，他们之间的冲突，便终于以借款问题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了。

唐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先以唐曾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逼他“谢罪”，接着又提出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严酷借款条件。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指出：银行团“监督我财政也，皆是致我国今日之死命”，“与其因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国稍延一线生机”[(7)]。4月29日，黄兴更通电提倡“国民捐”，以免“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8)]。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银行团大为不满。《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9)]。袁世凯认为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

本来就不甘心同盟会占有内阁一半席位的统一党和共和党，这时也把“借款失败”归咎于唐绍仪。他们指责说：“借款团之所以必求监督

我中国财政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求监督。”[10] 其参议员还准备向参议院提出弹劾，大有非推唐下台不可之势。共和党甚至已内定熊希龄为“候补总理”。而熊则在内阁内部屡为单独行动，动辄以辞职相要挟[11]。统一党、共和党排斥唐绍仪，根本目的在打击同盟会。唐绍仪就说过：统一党、共和党“非反对我总理也，是反对我同盟会也”[12]。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绝无实现希望。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13]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咨议局也发电要求以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但袁的许诺，如前所述，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5月26日王芝祥到京，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便于27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慑”[14]。袁随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针对直隶各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令国务院致电署理都督张锡銮，不准各界“随意迎拒”。唐绍仪认为政府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力图挽回。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了，遂于6月15日出走天津。

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先后到津作了一番虚情假意的挽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

唐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同盟会本部致电驻沪机

关部，指出“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陈其美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15] 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一片谴责声，公开揭露袁世凯摧毁内阁，欲实行“拿破仑之目的”。

但是，同盟会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内阁制的大门，而只是从内阁的组织形式，探寻唐内阁倒台的原因。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机关部电中，即把袁世凯剥夺副署权和熊希龄的“独断专行”、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最后归结为：“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16]。6月20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更明确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17]。即使抨击袁世凯最猛烈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并提出“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18]。为此，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19]，同时作出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等规定。

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而发挥它的正常作用，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就满怀信心地说：“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目的之一日也。”[20] 同时，同盟会宣称它主张政党内阁就是为了“革除社会专制思想”、“养成政党习

惯”和“引起人民政治兴味”[21]。这不啻是向全社会树起了一面坚持共和、反对专制的旗子。

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他说：“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22]断然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政党内阁出现。同盟会针锋相对，坚持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杨度曾说得很明白：政党内阁的主张虽“云根据学理”，实对袁世凯“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23]。

二　陆徵祥组阁风潮

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计划二次内阁“一切照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24]。关于国务总理，他最初放风说由徐世昌担任，因遭到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的反对，后转而属意陆徵祥。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又字子兴，是清末一个长驻国外的外交官。武昌起义爆发时，任驻沙俄公使，受梁士诒策动，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因而得任唐内阁外交总长。他表面上无党无派，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所以袁认为由他担任总理，既可达“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目的，又能随意操纵，并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陆起初尚犹豫，袁答应“代负责任”，陆方欣然应命[25]。6月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称贺。

同盟会同意陆徵祥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混合内阁抱抵制态度。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决阁员全部退出内阁。7月1日，再次召开会议，强调“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

由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26]。同盟会这一行动，打乱了袁世凯企图利用同盟会为他继续装点门面的如意算盘。因此，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等同盟会阁员，遵照党议到总统府向袁提出辞职时，他并没有立即同意，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留君”。蔡等当然坚辞，蔡并针锋相对回答说：“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27] 7月10日，他们又联名致函陆徵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14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袁无奈，只好批准蔡等四人辞职，但仍继续物色同盟会员入阁。

袁世凯认为孙毓筠、胡瑛、沈秉堃三人既有同盟会籍，且“所持主义稳健”[28]，打算拉他们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和工商总长。同盟会听说后极为愤慨。宋教仁发表谈话说：“袁世凯此举，系一种逼奸政策。”[29] 同盟会本部一面派魏宸组劝袁打消此念，一面于7月14日召开会议，作出孙、胡、沈三人不得参加内阁的决定。然而，袁世凯除将胡瑛换成王人文外，仍执意拉孙毓筠、沈秉堃入阁，而且不出袁所料，还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该党表示“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30]。为保证参议院顺利通过袁世凯所信任的人选，共和党还极力拉拢统一共和党，许诺将支持位置该党的参议员为国务员[31]。在共和党的引诱下，统一共和党为使殷汝骊、谷钟秀、吴景濂等人进入内阁，遂与共和党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这样就给同盟会限制袁世凯的正义斗争蒙上了一层党争的色彩。

7月18日，袁世凯派陆徵祥到参议院要求通过所拟阁员补充人选。他们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教育孙毓筠。同盟会本来不同意混合内阁，自然反对。统一共和党原抱入阁希望，现竟无一人，自知受了共和党愚弄，同样愤愤不平。而共和党部分议员也认为陆徵祥演说“言词猥琐”，不配做总理。于是，陆演说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当即于投票前“先提出不信任总理问题”。袁世凯闻讯，急忙致函参议院，提议暂缓投票。次日，参议院讨论投票与否，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袁函非正式咨文，

不予承认，坚持投票。结果，袁所提六阁员，一律被否决，并演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

陆徵祥于六总长被否决后，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则“仍持极端的超然内阁主义”，宣称：“无论如何，总不能改我此项宗旨。”[32] 他先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指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坏大局”[33]，继邀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大谈内政、外交危迫，要议员化除成见，协力挽救“国家”。接着，他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煽动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扞格”，“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34]。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心领神会，随即纷纷发电，攻击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要袁“将提出各员仍交该院再付表决。如其不知自反，一意把持，惟有先行派署，以专责成”[35]。章炳麟也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则写信给袁世凯，表示“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湖北四镇统制邓玉麟等甚至声称要以武力相对待，表示“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36]。袁世凯见逼迫参议院就范的舆论已初步形成，遂乘势于7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二次阁员补充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

为使所提二次阁员通过，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向参议院、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进一步施加压力。仅24日一天之内，他们便抛出《讨议员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布告》、《忠告参议员图》、匿名传单各一件和“健公十人团”恐吓信一百零三封。参议院守卫长也于是日称病请假。25日，北京军警联合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如不通过，就请袁世凯下令解散参议院。午后2时，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等军警要人，又于安庆会馆“招待”参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各员，声称“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

急”[37]。与此同时，共和党也不顾7月19日有该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部分议员投票反对袁世凯所提六阁员的事实，将否决六阁员的责任全部推到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头上，通电攻击两党有意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

对于袁世凯以军警威胁参议院的行径，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起初也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抵制。特别是统一共和党曾召开会议，决议对陆徵祥“绝不信任”，并发表声明说：国务员任命由参议员同意，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否认同意权者，是否认约法；侮蔑同意权者，是侮蔑约法”；本党议员行使“同意权”，正是为“保民党之精神，洗官僚之陋习，持稳健之政见，谋真正之共和”[38]。共同的斗争，还使两党开始了谋求组织上的联合，但是毕竟没能经得起袁世凯的武力威胁。7月26日，参议院投票表决二次阁员补充名单，两党多数议员都屈从袁的压力，投了同意票。结果，除蒋作宾外，其余五名阁员均获通过。实际上，二次阁员人选并不比前次好些，竟能获得通过，连袁世凯都感到意外。这说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多数议员都把维护个人的地位放在了首位，当他们的议员地位与“党见”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牺牲党见”以换取个人的议员地位。袁世凯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个弱点，采取由武装军警施加压力的办法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后，以谷钟秀为首的统一共和党议员，为了挽救参议院表决的失败，在部分同盟会议员的支持下，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指责陆负有军警干涉议员行使“固有权利”的责任。这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但即使这样，也很快又在袁世凯的破坏和共和党的抵制下，改成了“质问案”。

以上事实说明，陆内阁风潮实际上是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为反对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又一次重要斗争，是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与同盟会维护民主共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惜，同盟会当时还不懂得议会斗争必须以武力作后盾，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反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

三　张振武被杀事件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持克制。但是，袁世凯并不以取得的权势为满足，也在寻找一切机会，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8月15日夜，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突然下令捕杀，就是一桩典型事例。

张振武（1870—1912），字春山，湖北竹山人。他于1911年6月在武汉加入共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于起义成功之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口实，先后将孙、张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当时，张振武虽然与孙武一起组织了拥黎的民社，但张实际上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他对自己被无辜排挤出军务部非常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者，利用黎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毕竟不是北洋系军人，而且还担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也是袁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宦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玩弄阴谋诡计。陈宦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39] 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的心意。

1912年5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40] 还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先委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张一气之下，竟不辞而别，于6月中旬返鄂，

然后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很是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一直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对黎、张之间的矛盾非常注意，殷殷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赠与张路费四千元，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41] 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又来到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钻进了袁、黎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42]。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10时左右，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当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枪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43] 方维也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知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然而，陆建章淡然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面对这令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孙武默然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44] 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万瞻、哈汉章感到他们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时又前往总统府质问，但不得要

领。旋至哈汉章家会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对张振武案，故意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元洪在密电中，以十分含混的措词，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扇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45] 袁便根据这份不足征信的电报发布命令，残杀了这位参与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但事后，他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赙赠三千元，企图安抚因张振武被杀而感情受到伤害的人。

当然，权术是压制不住人们的愤怒的。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派首先发难。他们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46]。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按惯例，质问案直接送交政府，不在院内讨论），刘成禺首先登台，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47] 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的问题，但却无法通过。当时共和党方面，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态度激昂，主张弹劾；而共和党的非民社派分子，只是因为不敢开罪于民社派而随声附和，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并无改变。在同盟会方面，虽然个别议员言词比较激烈，但他们同张振武的个人感情比较疏远，多数人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乘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

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然而他们并不敢冒推翻袁世凯的风险。因此，参议员们都用循规蹈矩来掩饰他们的怯懦，首先在提出弹劾案的问题上就表现迟疑不决。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48] 的确，参议院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中：为了维持约法，必须对违法的政府提出弹劾；而提出弹劾，根据约法规定，必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即95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来就没有那么多议员出席，因此限于规定，又不能提出弹劾案。结果是，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

但是，袁世凯历来不把这个怯懦的参议院放在眼里，他抓住参议员们害怕动乱的心理，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闪烁其词地说："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49] 实际上，他是用所谓"暴民政治"的阴影吓唬胆小的参议员，并暗含扩大事态，株连革命党人的用意。参议院受到藐视，气愤之余，不得不决定于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提出弹劾问题。

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只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双方在细节问题上扯皮，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反而轻轻放过了。参议院所要提出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徵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发生之前，就因政务困难，托病住院治疗，与张案毫无关系，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主动提出辞职了。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袁世凯也蓄意要让它流产。

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派分子，让他们"出为调停，冀得平和了结"。这些人劝告民社派说："如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50] 经过幕后的密议，本来就支持袁世凯维持秩序的民社派开始退缩。就在参议院开秘密谈话

会的当天，即21日下午5时，袁世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袁首先虚伪地向他们表示了对张振武的钦佩，表彰了张在武昌起义中的功绩，然后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袁以治乱相问，竟使鄂议员难以对答。于是，袁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亦不完全耳。"[51] 他这一席话，使民社派终于软化。此后，民社派竟在参议院中大呼起"维持大局"来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则唯恐国家重陷动乱，因而不愿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于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52]。稳健派对于党内的所谓"轻躁之士"的这些言论，十分忧虑，他们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他们并一再强调："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53] 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依然在谋求与袁世凯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月28日，拖延了一个多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四人提出，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八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徵祥、段祺瑞"辅佐乖谬"[54]，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他们的职，丝毫未涉及张振武案的阴谋。与此同时，刘星楠还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55]，要求政府查办。然而，这两个不中要害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徒然激起共和党、

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而已。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则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四　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按照4月13日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56]，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57]，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黄兴就任后，即通电表示：“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58]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11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12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

尽管如此，反对派还在落井下石，横加攻击。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宦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59] 虽然，同盟会内确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的手段，但黄兴本人则一直打算功成身退。他虽然对袁世凯排挤、打击、分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却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思想。在他看来，"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60]。何况中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61]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黄兴面对着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就索性洁身明志，正式提出辞职。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即行销职"。他表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62]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至6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63]。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因此，当留守府结束时，有限的应变工作并没有完成，致使裁军整编不仅削弱了军队数量，也

挫伤了军队士气，更谈不上提高战斗力。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政府与银行团的垫款合同成立后，袁世凯即于5月18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守府，拟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程德全，考虑江苏方面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得悉袁拟裁撤留守府后，即电告袁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要袁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疑。他建议：“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64] 于是，袁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赴宁。

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本来就主张提倡国民捐以抵制列强的野心，他获悉合同的严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时解职，决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本拒绝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关，以便获得中央军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办法。袁世凯遂于5月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65]

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66] 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烈等组织“洗程会”，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举陈为江苏都督[67]，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月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

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但此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他于处理苏州洗程会事件后，即赴宁接收南京军政事宜。6月14日，黄兴通电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残存下来的军事指挥中枢，从此宣告结束。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肢解和分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时，由于全国尤其是南方，兵多饷绌，秩序混乱，袁世凯利用裁兵来削弱南方军事力量，有着正当的理由。他在5月间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说："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68] 北京政府成立后，就一直在规划整理、裁遣军队事宜。6月中旬，参议院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整理军队问题。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席说明政府裁军计划。他说："今于无标准之中定一标准，即姑以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69] 就是说，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对袁世凯这一阴谋，多数人不甚了然，参议院就抱支持态度。只有少数同盟会急进分子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他们"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70]。但一则当时调和妥协空气浓厚，二则袁世凯"添兵"尚在秘密进行，三则南方各省财政更加困难，军队事实上无法维持，所以也只好相继自行裁遣了。例如广东，到1912年6月初，陆续裁兵十一万余。江西李烈钧则通电称："任事以来，首施此裁军节饷政策。"[71] 于4月底接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也表示"以裁兵节饷为第一要义"[72]。袁世凯政府当时缺乏经费，大借款尚未成立，实力不足，除从政令、舆论上督责南方尽量压缩编制外，对操纵南方各军尚力不从心。所以，各省对军队裁遣事宜仍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唯各省政情不同，裁军的方针方法也不尽相同。

程德全接收南京留守府后，按照黄兴所定裁军计划"节节实行"

[73] 。7月底，陈其美被迫辞去沪督职务，军队交程接收。8月1日浦口第一师兵变后不久，柏文蔚将一、九两师也交程。程依靠中央财政接济，大事裁遣，至1912年底，除扬州第二军及第八师外，苏属军队实存不满四万。1913年初，又整编为三师二独立旅。清江十九师原拟裁遣，因剿匪需要，暂于保留。为稳定局势，程德全除以亲信章驾时任驻苏州的第二师师长外，仍以革命党人章梓、冷遹分任驻南京、徐州的一、三师师长，并拒绝了陆军部重用张斯麐、尹同愈、朱志先等人的要求。他认为："此间军官党派之意见尚小，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意见甚大……夫此数子者，非谓其竟不可用，但用以与军队对抗，致酿风潮，则殊觉可以不必。"[74] 江苏各派相持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湖北则不同，它是首义之区，军队本来就多，加上位置起义有功人员，1912年3月间军队编至八镇。黎元洪又竭力扩大一己权力，排挤、打击革命党人，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裁军进展不快。陆军部允湖北保留三师，因困难重重，不得不求编五师。黎本唐写信给蒋作宾说："湖北自去秋倡义，军队甚为复杂，历经裁汰，尚剩八师，兵士虽不足八师之额，而官佐则额数皆备，且又全系出力人员，目前拟归并五师，尚多掣肘，如三师则更困难矣。"[75] 黎元洪也电京力争。由于湖北军队风潮愈演愈烈，革命党人一批批地倾向倒黎，黎元洪决心将旧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编组三师。他一面依靠客军黎天才的江南留鄂第一师维持地方，一面于1913年4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76]，引狼入室。

湖南辛亥后兵额增至五师二旅，经费支绌，发饷维艰，且军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使谭延闿一筹莫展。但谭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6月间他派人与黄兴商量裁军，得到黄的支持。黄原主留二、三师以备缓急，但谭认为："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77] 程潜主张每师留二营，作为成立新军的干部，也未予采纳。由于缺乏裁军的监视部队，谭致电

袁世凯请王芝祥赴湘协助，得到袁的允许。谭又电请王带兵入湘，以资镇慑。时驻南京第八师旅长赵恒惕与八师其他将领不和，待王芝祥南京事务结束，遂率八师陶德瑶团以返桂为名，于8月底随王入湘。谭延闿由于得到革命党人的赞助，又优给退伍年金，遂于9月间将五个师顺利裁遣，仅留剩余兵队及旧巡防队一万一千余人，编为守备队四十八营，分全省为六个守备区，只赵恒惕所率一团扩编为一旅。

广东自胡汉民复任都督后，军权仍掌握在陈炯明手里。胡、陈虽同属革命党人，但屡生摩擦。循军[78]改编的陆军，“品格不齐，年龄不合”[79]，缺乏战斗力。裁余民军则改编为警卫军一百零四营，属地方警备队性质。南京留守府裁军时，驻在江苏的粤军两师，由军长姚雨平电商胡汉民，拟回粤驻防高州、廉州一带。但陈炯明私心太重，拥兵自固，横加阻挠。姚雨平遂与部下相商，全军解散。姚保存的训练有素的炮兵一营，回粤后也为陈派兵缴械。北伐粤军系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如此率尔解散，殊为失策。陈炯明于1912年12月3日由袁世凯任命为广东护军使后，继续主持裁遣军队达十二三营之多，而陆军二师一旅“合计逃亡、死伤、退伍，缺额已逾半数”[80]。

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将第四师及张汇滔旅（淮上军，寿州起义部队）归属安徽，柏所部葛应龙旅也早经孙中山命令调皖。一、九师归江苏后，柏答应由安徽补助江苏军饷。这一切引起了安徽士绅的强烈反对。段祺瑞因是安徽人，在安徽军界影响较大，他派得意门生吴中英出任安徽军政司长。吴排斥革命党人，与淮上将领屡起冲突。柏文蔚所受压力较大。陆军部定皖省为一师一旅，柏于1912年8月30日解散第一军，仅留军长名义。至10月间，为安置军官，暂定为二师一旅，士兵实数则为一师一旅，先后裁汰三万余人，取消官长二千余人。10月后，袁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要柏继续裁并。至1913年3月编裁完成，原皖军归并为一师，由淮军宿将胡殿甲之子胡万泰任师长，而将第四师缩编为一旅，驻军临淮。柏的实力，严重受损。但柏文蔚顶住了陆军部要他裁遣淮上军的压力，将淮上军改编为屯垦部队，驻

扎寿州一线，仅张汇滔被迫离开部队。

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不仅致力于裁遣游民组成的军队，整肃军纪，镇压兵变，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整补训练，备战应变。至1912年8月，他将防军（旧军）三十六营全部遣散，辛亥后扩编的十六标新军也被裁减一半，编成四旅，暂不设师。此后，李又继续将洪江会组成的团队士兵遣散，另行征补。与此同时，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同意将有战斗力而无所归属的林虎所部留守府警卫团调赣，于8月9日到达江西，随后又拨一团，编为一旅。他一方面购置枪械，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又调动异己将领，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6月间，李将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会调赴赣州，以后又将二旅长余鹤松以都督代表资格调京，三旅长刘槐森调任军事顾问，而以林虎、欧阳武等升任旅长。10月28日，李烈钧陪同视察江西的孙中山，校阅军队，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为了充实兵力，李又于11月22日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改造军队素质。1913年1月，他拒绝了陆军部将赣军缩编为一师一旅的要求，编成两师，以俞应麓（后以欧阳武代）、刘世钧为师长。

除上述各省外，第五军朱瑞回浙后出任都督，将二师一旅裁并为一师一旅，但保留了巡防营四十营。福建军队不多，除裁去一些旧军外，保留了十四师，以许崇智接替杜持任师长。四川有兵五师，但蜀、渝对立，虽陆军部规定编三师，并于1913年7月发表了三师师长的任命令，但并未实行编并。贵州则以滇军二团为骨干，驱散了北伐黔军，至1913年7月编并为新军一师，国民军三十三营。云南除裁遣部分旧军之外，保留新军二师。广西新军在北伐的名义下全部被排挤出省，驻军南京，陆荣廷所部均系巡防营，改编为二师。北方起义各省，除山东烟台地区革命军被北洋派全部遣散外，晋、陕则自行进行了编并。

五　军民分治与江西民政长事件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推举出来的都督手里。袁世凯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也不能不正视现实，于7月间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黎元洪为迎合袁世凯大权独揽的政治野心，早在4月10日就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列举革命时期暂时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81]。袁世凯对黎这一主张十分赞赏，力图马上付诸实施。

但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却率先起来反对。他通电指出，革命方法本来就分军政、约法、宪政三个时期，革命后的形势要求以“兵权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因此都督一官，“目前决不能骤废”，“应统揽一省之治权”[82]。接着，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响应，表示：“非国基大定，宗社党无从煽发，不宜行军民分治。”[83] 他在详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的长电中，针对袁世凯的隐衷，更进一步提出：中央应对“各省都督授以军政、财政两权，令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先使恢复旧规，然后徐图根本上之计划。断不宜大举借款，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84]。为了反抗袁世凯的控制，他们两人不仅公开活动各省都督，共同抵制“军民分治”，而且秘密联络南方各省，企图建立应变联盟。8月12日，李烈钧曾密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长张培爵说：“诸君……皆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结一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如政府夹有私心，藉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总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庶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种种险象，或可消弭。”[85] 对李、胡这一正确立场，孙中山采取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他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本来不成问题，不过反对者藉此肆其鼓簧。……盖须相因而行，不能执一。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86]

正因如此，袁世凯对李、胡更加忌恨。但广东僻处南疆，他一时

鞭长莫及，于是江西李烈钧就首当其冲了。1912年12月10日，南昌发生兵变，矛头直指李烈钧。事后查明，这次兵变是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发动的。余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同学，被李调京，失去了实权，因而对李十分不满，就去走袁世凯的门路。袁正求之不得，就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推倒李烈钧，就委他为都督。于是，余回到江西，策动旧部发动了这次兵变。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背景，但他还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只好隐忍待机。为了缓和北京对江西的压力，李烈钧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情谊。李原以为汪处世温和，可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世凯的矛盾，因而一再敦请他出山帮忙，不料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反给袁造成可乘之机。原来汪瑞闿是一个官迷心窍的旧官僚，并没有什么革命的新思想。据耿毅回忆，当时“汪认为李既叫他当省长，江西方面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请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87]。袁见汪主动上门，正可借他牵制李，所以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四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任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待李获悉真相，大错已经铸成，只好另谋补救了。

在李烈钧暗中主持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随即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88]，要求袁政府“实行赵（秉钧）总理对于内治维持现状之宣言，无事变更吾赣政局，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89]。但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饬李烈钧传令广饶协会等团体必须遵守法律。20日，汪瑞闿有恃无恐，贸然抵南昌上任。李表面上对他殷勤接待，共和党人及当时共和党占优势的省临时议会对他更是十分欢迎。

然而，李的部属却纷纷给汪以难堪。水巡总监蔡锐霆就当面对他讥讽讪笑，语带威胁。汪行馆差役也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一致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勒令两日内离省”[90]。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匪徒”暴动，全城戒严。汪惊惧万分，逃离行馆藏匿。翌日，他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李派员故示挽留，但汪于当日下午5时即乘轮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了。

1913年1月3日，袁准汪病假二十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事宜，并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91]。李复电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92]，实际上打算把汪推出了事。但是，当时欢迎汪瑞闿的江西共和党人，以江西省临时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名义自汉口电袁，要求袁世凯“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93]。袁也曾先后打算派遣张勋、岑春煊及孙武前往江西武力对付李烈钧。张、岑等虽因种种困难，均未成行，但一时舆论哄传，形势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七千余支枪械及一批子弹于1月11日自上海起运，15日运抵九江。袁世凯获悉此事后，即饬参、陆两部以该批军械未经陆军部批准为借口，密令早已被袁收买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遵令于次日扣留了此项军械，随即以密电向参、陆两部报告，并称：“唯恐李督以决裂手段对待，此间兵单饷绌，将如之何？”要求设法接济，“一面调张勋军队及海军兵舰，按照前寒、删两电办理”[94]。22日，海军六艘军舰驶抵九江，以一舰停泊湖口，准备对赣用兵。与此同时，李烈钧一面复电参、陆两部申述原委，要求将所扣枪弹放行，一面以冬防为名，向湖口一带增兵设防，积极备战。24日，段祺瑞电复李烈钧，诈称“此项枪弹已分给各水师军舰”，拒绝李烈钧所请[95]。于是，李发出通电，坚决要求发还。对此，段批文说：“今日李督通告天下，谓部扣留军械，是李不

受善，莫可救药。”[96]

鉴于江西风潮日趋激烈，黎元洪于1月20日左右，派遣程守箴、邓汉祥前往南昌调解。24日，黎向陆军部密报江西军队调动情况，要求陆军部将此批枪支子弹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区区之军火亦何济事？”对于派遣镇抚使一事，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97] 27日，海军楚谦舰奉令提取枪械，蔡锐霆率百余人屯扎岸上，声言如敢装运，即开炮攻击，双方剑拔弩张。适黎26日发出的调解电到，戈克安才请楚谦舰长王光熊登岸协商，然后，由王光熊电告海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解〔结〕。”[98] 李的强硬立场，终于迫使袁世凯作了让步。

在调解中，黎元洪向双方提出和解条件：“非水陆退师，无以保地方之安宁；非发还军火，无以平赣人之疑虑；非迎回汪民政长，无以重政府之威信，应由李都督、省议会公派代表往迎汪民政长莅职。”并要求李烈钧“将怀夹私忿、造谣生事之人量加处分，以除祸本”[99]。显然，黎的调解，对袁是十分有利的。但李这时表现了少有的顽强精神，他干脆复电拒绝了上述撤兵、迎汪、惩凶三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于永久计划，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汪去赣无人胁迫。不仅如此，他还愤懑指出：“烈钧奔走国事，将近十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见容于满者，今共和告成，转不能见信于民国政府。”[100] 当然，袁也不再让步，仍坚持迎汪莅职的前提条件，并强硬表示：“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存，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101]

黎的调解活动没有成功，戈克安密报段祺瑞说：“李督现正多方布置，一意反抗中央，志极坚定。”[102] 不仅如此，风潮还在扩大。

2月3日，南昌召开公民联合会，宣布省议会成立前，“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103]，摆出了与袁世凯对抗的姿态。大会提醒各省，袁对江西的压迫，绝不是孤立的事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矣”[104]。会议对袁的指责绝非耸人听闻。就在江西民政长事件发生不久，袁世凯便不顾《临时约法》的规定，不经参议院通过，即以命令公布了《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一系列官制官规，并且强行规定“按照政府计划，以民国二年三月以前为限，一律办齐”[105]。省官制问题，一直是有严重争议的重大问题。1912年间，袁政府曾两次草拟中央集权的省制方案，交参议院讨论，都因参议院反应强烈而不得不在开议以前就收回修订。袁世凯这时公布官制官规，充分暴露了他在全国范围内追求封建独裁的目的。

眼看江西风潮继续扩大，除黎元洪外，程德全、柏文蔚、朱瑞、谭延闿等人也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损伤国家元气，向袁世凯表示愿去江西调停。袁即乘机要他出任“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事”，以便调李入京。但王没有答应，他认为：中央“不宜纯用手段，反启纷争”。磋议再三，王始勉强同意任“查办”[106]，并于1913年2月16日离京南下。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派耿毅作王的副手，亲自交给他一封密信指示机宜，对解决江西事件的方针作了明确规定：“一、汪瑞闿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107]耿本是革命党人，袁看中他是直隶人，因而留在身边办事。但耿与李烈钧关系也好，因此他先王芝祥到达南昌后，便立即着手与李密商对付袁世凯的策略。

3月1日，王芝祥也到达南昌。他一面责成江西取消公民联合会，一面向袁表示，赣人对汪恶感甚深，请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则赣事至易了结。袁一时无力南顾，不得不同意妥协。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致函外交部，为太古洋行索取枪械的“耽延赔偿费”[108]，自1913年1月28日起，每日索价二百两。这个经济压力也使袁政府承受

不了，不得不从速解决江西事件。3月11日，袁世凯发布赵从蕃署理江西民政长命令，参、海、陆三部也电令发还扣留的江西械弹。在李烈钧的顽强抵抗面前，袁世凯只得表示让步。

但是，李烈钧毫不妥协地坚持原来的立场。他表面发电欢迎赵从蕃，实际上却把民政长一案交给省议会，因这届议会已改变了原来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局面。江西省议会一开幕就讨论民政长一案，并通过决议，根本否认袁有任命民政长的权力，并致电袁世凯说："省官制未经参议院议决，实无承认之理由。……大总统简任之命令，实非根据法律，未敢服从。"[109] 袁世凯接电后，大为恼怒，即电告黎元洪，申斥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扬言"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大局"[110]。但江西省议会不畏强暴，痛斥袁实行专制，表示要为"维持约法，保障民权"而斗争[111]。慑于江西的民气，赵从蕃裹足不前，害怕重蹈汪瑞闿覆辙。

此外，李烈钧还在3月15日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并毫不迟疑地对袁世凯走卒戈克安采取了断然措施。他首先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上三台任命陈廷训为总台官，下三台任命陈传曾为总台官，并且命令驻浔第九团编入第一师，从而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统统剥夺了。接着，他又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命令第一师长欧阳武在沙河（今九江县）设立司令部，压迫戈部。戈克安一日数电向北京告急，王芝祥闻讯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27日晚11时，蔡锐霆率兵二连袭占湖口炮台。结果，袁世凯只好让戈克安离职赴京，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节制浔、赣各军，李烈钧遂于4月2日通告"地方安宁，人心大定"[112]，实际上是宣告对袁斗争的胜利。

自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同袁世凯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胜利。李烈钧在这次江西民政长事件中所取得的胜利，是当时革命党人所赢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虽然只是局部性的和暂时的，但它证明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必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

离开武装斗争，革命党人就不可能在同袁世凯的斗争中取得任何胜利。

第二节　同盟会维持共和国的努力

一　孙中山鼓吹民生主义及其实业救国计划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详尽阐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和解职后的打算，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13]　三天后，他离开南京到上海，接着开始周游各省。到是年底，在大半年时间里，除8月应袁世凯邀请赴京"商谈国是"外，曾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足迹几达半个中国。孙中山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以民生主义为内容或主要内容的即达三十八次之多，占全部演说和谈话的三分之一以上[114]。

在这些演说和谈话中，孙中山主要宣传了以下各点：

（一）强调实行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他说：当南北"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115]。况且振兴中国的目的，绝不是把它变成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而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对立的理想"社会"。因此，"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耳"[116]。"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117]。那种以为"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至社会问题则相去甚远"，不过是"浅见之徒，不足言治也"。

（二）实行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他

批评同盟会内一部分人认为“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的观点，指出：待“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118]。对所谓“凡事必有等级，今资本家之等级尚未经过”，不可“蕾然言民生主义”的论调，他批驳说：“果如所言，则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阶级，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辩而自明者也。”[119]

（三）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但“平均地权”非“计口授田”，而是实行“单一税法”，即“从税契入手”，包括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收税”和将来土地“涨价归公”等环节。同时“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因此，孙中山又把“平均地权”简单归纳为：一是照价纳税，一是土地国有。并说：“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120]

（四）发展实业为民生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指出：处当今时代，“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121]。同时明确说：“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122]他在一次演说中把振兴实业、铁路“国有”，正式归作民生主义“四大纲”之一。

（五）实行民生主义“须以和平手段从事”，而不能采取“武力手段”。孙中山说：“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123]。他还一再申明：“民生主义并非推倒富豪，如世俗所传抢富济贫之说。”[124]“今日讲民生主义，可以不用革命手段，只须预为防范。”[125]

（六）实行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少数资本家“压制贫民”。孙中山反复强调，他“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126]。“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路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则可以

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地矣。”[127]所以，他总结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128]

由此可见，孙中山这时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基本上还是他辛亥革命以前的理论的简单重复，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强调和注入了某些新的内容。首先，他更加强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社会主义充满着同情和向往。他痛斥资本家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痛苦全然不负责任，是“无良心者”。对工人则称赞说：“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129]他指出他们因受资本家“戕贼”、“苛遇”，起来反抗是完全正义的，理所当然的[130]。他在宣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土地公有论的同时，也称赞马克思的资本公有，说：“亨氏之土地公有，麦（马克思）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131]其次，为防止资本家垄断，他明确提出了“大资本国有”的主张，力图限制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132]。因此，尽管他倡导的民生主义，依然是一个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他的社会主义也远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孙中山不但积极宣传民生主义，而且身体力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他的这个计划，从解职后就开始酝酿，到6月下旬由广东回到上海后，经与黄兴共同磋商而渐趋成熟。孙中山早年就十分重视铁路建设，进行过一些研究，此时更认为发展实业必须从铁路入手。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133]；铁路发达，并可移民垦荒，开发资源，繁荣商业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所

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134]。他计划十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由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135]。资本定为六十万万元。

孙中山修路的基本方针，是实行“门户开放”，利用外资。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136] 如果不采取“借款修路”办法，而全用本国资本，“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需六十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137]。且排斥外资，势必重价购置外国机器，“其不合算亦甚矣”[138]。因此，在难以迅速自筹大量资金及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情况下，为早收铁路之利，非但不宜反对外资，而且应该“欢迎外资”，乃至利用“外国人才”和“良好方法”。但孙中山同时强调指出：实行“开放主义”，必须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前提，“但求主权不丧失，无论何国包修，皆未尝不可”[139]。对于帝国主义欲利用借债而提出诸如“置兵保路”等损害中国权益的要求，孙中山断然表示反对，坚持“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140]。为此，他提出：1．所有借款事宜，以所设公司名义进行，而不通过政府交涉；2．借款“非全用现款”，其中五分之四“由外国购买材料”；3．采取借资兴办、中外合股和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办三种形式，以“批办为最相宜”。孙中山认为，如是借款修路，不仅可能，而且“能兴利，又无伤主权”，自是“绝好法子”。

孙中山还一再表示，借款修路，最终以“铁路国有”为归宿。他说：“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且欲实行民生主义，以救种种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办铁路之大意也。”[141] 这里

说的“实行民生主义”，即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用以防止少数资本家的垄断。所以，孙中山有时又把“铁路国有”直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并明确宣布：所修铁路，四十年后一律收归国有。

为发展铁路交通，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并采取种种制约措施，应该说是富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所持某些理由，如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争先恐后”借款给中国，认为“彼欲保此资本之安全，则有投鼠忌器之思，而不甘破坏平和”，因而无须担心会乘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142]等等，则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这表明他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不曾认识到在真正获得民族独立以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互利的借款；外国资本家即使愿意借款给中国，也只是为了攫取中国的权益，而绝非真心帮助中国发展铁路交通事业。

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筹措资金、设计干线等不切实际的修路准备工作。当时，连一些革命党人都说他“理想太高”，但他批驳说：中国幅员如此广大，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此为至小之计划”，“并非大言夸众”。还说：“以二年募齐外债，以二年测量线路，有五年之功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并非空言。”[143]然而，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不独外国资本家无意帮他实现修路计划，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没有提供最起码的条件。

袁世凯表面上不表示反对，并满足孙中山的要求，于9月9日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但任命刚一公布，北洋集团控制的御用报纸就对孙中山发动攻击，叫嚷该项任命为“违法”，外人承办，“势必丧失主权”，等等。后来，孙中山派王正廷、徐谦携《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到北京请袁世凯交参议院审议，袁又从中作梗，致使参议院对条例多所修改。孙中山虽愤怒抗议，指斥条例修改太多，说“若无特权，即不须有条例。若照修改之条例通过，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144]。但毫无效果。袁世凯最后以命令公布的条例，对铁路

总公司的职权仍大加削弱。如原条例第一条规定："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应筑各路，属交通部之职掌外，所有贯穿各省及边地各干路铁路，总公司有全权办理。"而袁公布的条例改为："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或载在草约成案上应筑之路，属交通部直接办理，暨政府已批准他公司承办之路仍归他公司办理外，所有全国各干线，总公司得全权筹办。但指定各干线时，须先协商政府，经其认可。"[145] 实际上将孙中山的修路计划完全纳入了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袁世凯的暗中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很快陷入了困境。

那么，孙中山解职后，何以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于提倡民生主义和发展实业呢？这除了渴望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外，也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首先，他没有认识到革命已经根本失败，反而为南北"统一"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革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造成了"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并由此认为人民为民国主体，"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146]，客观上具备了放手从事"社会革命"的条件。其次，他认为当此"内力日竭，外患日逼"之际，关系民国命运的首先不是政争，而是"经济问题"。政治上的"意见纷歧"，"皆为经济问题所窘"而引起，且"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因此，"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147]。第三，也是主要的，他对袁世凯非但没有认识，而且相信袁有能力治理国家。对社会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使他陷入了绝无希望的"社会革命"幻想之中。

不过，孙中山致力发展实业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他的思想及其"铁路计划"却鼓舞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实业建设，从而推动了兴办实业热潮的进一步高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所进行的又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徒劳的。

二　孙中山、黄兴应邀赴北京调和南北冲突

袁世凯十分重视利用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致电孙中山，要他解职后，尽快北上担任最高顾问。以后又多次通过第三者，甚至派专人专车南下迎接。对于黄兴，也同样如此。但他们都一一谢绝了。唐、陆内阁风潮相继发生后，袁世凯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再次派人到沪殷殷相劝。孙、黄从巩固新创民国的良好愿望出发，这时也认为有必要亲自了解北方的情况，调和袁与同盟会日益激化的矛盾。他们于是在8月2日复电袁世凯，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接到孙、黄电报，除立即复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外，又急派蓝建枢、张昉为迎接专员，携函至沪迎接。并特派赵秉钧、梁士诒、王赓、傅良佐、陈宦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接待事宜；还腾出他的公事房——外交部迎宾馆，供孙中山下榻。袁虽极力装出竭诚欢迎的样子，然而就在这时，他又下令杀害了张振武。许多同盟会员从领袖安全出发，反对孙、黄北上。有一女会员甚至向孙中山坚决表示：“公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入虎穴，某誓死反对。”但孙中山认为，既已同意北上，就无论如何不应“失信于袁总统”，且正可借此检验一下袁世凯到底可靠不可靠，因而坚持就道[(148)]。只有黄兴为群情所动，决定暂不进京。

8月24日，孙中山一行经天津到达北京，果然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隆重接待。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约见孙中山[(149)]，还亲至门口迎接，态度极为“谦恭”，说他受国民付托，识薄能鲜，“用敢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150)]。28日，袁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他在致词中对孙中山“备极嘉许”，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151)]。孙中山在答词中，也称袁世凯“善于练兵”，“富于政治经验”，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接着，便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秘密会谈。

经两次会谈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于是，他致电黄兴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152) 在孙的电促和赵凤昌等人的怂恿下，9月5日，黄兴遂偕陈其美、李书城等十余人离沪北上。11日到京，受到袁世凯同样“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到京当天，曾开宗明义宣布：“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153) 黄兴到后也说：“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154) 为达此“宗旨”，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就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并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155)。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156)。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也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157) 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158)。当然，孙、黄所说“破除党见”，也有反对不顾大局，不重党德，纯争“党见”的意思，但主要是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行动。孙中山就说过：“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159)

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孙中山应袁世凯要求，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提议国务总理人选可遂袁意”，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同时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刚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内阁”。他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

民党首领。孙中山称赞黄兴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160] 实际上，这个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讥为"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161]。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十三次，每次谈话由梁士诒一人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三、四次直谈到凌晨2时。由于袁世凯竭力装出诚恳的样子，孙中山也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自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骗取孙中山的好感，实际上是要孙作更大让步。因此，谈话中他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就这样终于取得了孙中山"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指袁世凯）莫属"的保证。

从孙中山和黄兴发表的大量言论来看，他们对会谈是满意的。孙中山说：与袁世凯"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162] "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163] 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164]；"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165]。这些议论，显然不全是应酬之词。凡此种种，说明孙中山、黄兴确有为袁世凯的伪装与花言巧语所蒙骗的一面。

当然，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黄兴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例如：对于南北冲突，黄兴指出："南北现已统一，而尚有以为仍未实行统一者，并非南北不愿统一实现，在政府无一定政策，南方各省无从遵守，故似未统一。若中央将此策拟定，则南北行政自然统一矣。"[166] 孙中山也

说："只须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167] 对于借款，孙中山告诫袁世凯说："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168] 黄兴批评说："政府专借外债，以消耗于无形，而不谋生产事业，殊甚非计。"[169] 对于裁军，孙中山提出"宜南北同时举行"，反对只裁南方军队[170]。对于军民分治，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短期内难于实行，主张民政长"民选"和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此外，孙中山还始终不渝地宣传民生主义，宣传他的"铁路计划"和坚持迁都的主张，指出北京处外人牵制之下，"万不可居，将来急速迁移"。黄兴既主张"调和"，又认为必须维护革命党人的地位。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和黄兴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革命政治家本色，说明他们从事"调和"，不单是为了"疏通"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感情"，消除彼此的"隔阂"，最重要的是为了求得共和国的根本巩固。

正因如此，孙中山、黄兴同袁世凯的会谈，除了同意由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之外，在上述问题上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而这些问题则又是当时南北争执最烈和袁世凯一直在压革命党人屈从的问题。因此，黄远庸在评论孙中山同袁世凯会谈时说："惟是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著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171] 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孙中山和黄兴既热心"调和"，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就为袁利用会谈进一步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为给全国人民造成会谈圆满成功的假象，9月25日，袁以总统府秘书厅名义，抛出一个所谓共同协定的"内政大纲"。这个由袁世凯一手拟订的"内政大纲"，又称"八大政纲"，其内容是：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

认之根本[172]。十分明显，这个“大纲”的主旨是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服务的。其他“收束武备”、兴办实业等等，虽与孙、黄主张相似，但各自的内涵及出发点都不相同，这是当时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骗取了孙、黄对“八大政纲”的默认和赞同。“政纲”公布时，孙中山已离京南下，但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黄兴当时尚在北京，他对袁世凯说：“承示内政大纲八条……睹兹伟画，实所赞同。”[173]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在北京期间不仅对袁世凯大加赞赏，称他“忠心谋国”，决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而且同意了他提出的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这就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关于这一点，袁的党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认为这是袁世凯“收笼异派”的一种高明手段，从此以后，“内可减群恶（指革命党人）之破坏，外可坚他族（指帝国主义列强）信吾南北确已统一，于承认、借款两端或易为力”，实在“令人钦仰”[174]。总之，经他们这次北上“调和”，政局诚然出现了某种和缓的现象，但对革命是不利的。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刊载一则驻北京记者的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175]同一天的上海英文刊物《国民评论》也载文说：“黄兴到北京后，继续致力于消除党派之间的猜忌和纷争，其结果无疑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176]这清楚说明，孙中山和黄兴企望通过“调和”，消除南北冲突，维持共和国的努力，终究事与愿违。

三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宋教仁从唐内阁垮台中，感到同盟会要反对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就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同时，他还认为党派纷立，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造成

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因此，从退出内阁，“尽力党务”以来，他便积极主张并实际成为改组同盟会的主持者。

1912年7月16日，同盟会本部召集全体职员会，讨论改组问题。多数会员认为“现值各党竞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势力，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177)]。白逾桓、田桐等人反对尤力，表示“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所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178)]。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改组同盟会提案没有通过。21日，同盟会召开夏季大会，多数会员仍不表同意，蔡元培也提出“不能舍己从人，决不能变更名称”[(179)]。但大会选举结果，宋教仁与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分别当选为总务、财政、政事部主任，改组意见实际上占了上风。此后，由于多数会员主要反对同盟会改变名称，而并不反对改组本身[(180)]，所以宋教仁等人继续坚持改组工作。

他们首先与统一共和党谋求合并。统一共和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摇摆不定，受到北洋势力和共和党指责，便转而与同盟会取一致态度，主张政党内阁。但即使这样，它也不同意无保留地与同盟会合并。谈判一开始，吴景濂就提出三项先决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去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8月5日，以旧官僚岑春煊为首领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消息，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三项条件外，还提出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为了求得合并的成功，对于这些条件和要求，原则上一律加以接受，但坚持政纲中须保留“民生”这一特殊名词。7日，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推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代表杨南生起草宣言。是日，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两个小政团也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11日，五党代表集会，通过“宣言”，即于13日以五党本部名义公诸于世[(181)]。25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

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党纲坚持了同盟会“发展地方自治”的一贯主张；但同时把“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糊的“采用民生政策”，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毫无斗争意义的“保持国际平和”，又不顾女同盟会员的强烈反对，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这表明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从党纲上看，革命精神的确有所减退，妥协色彩更加浓厚了。吴景濂等人在致岑春煊电中十分得意地说：国民党“名虽合党，实系新造”，“同盟会牺牲一切，从我主张，尤为难得”[182]。

但同当时所有政党一样，单从党纲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它的真实意向。实际上，宋教仁等人改组同盟会，更多的是着眼现实斗争的需要。宋教仁说：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183]。他一再强调：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184]。“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185] 有的同盟会员说得更为明确：“当此时也，进步派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186] 此外，国民党虽然在党纲里放弃了“民生主义”的提法，但从它对“采用民生政策”的解释和党员坚持的实际内容来看，“民生政策”不过是“民生主义”的代名词。《国民党宣言》说，“采用民生政策”，就是“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宋教仁则直截了当地说：党纲第四条，“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187]。这表明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废去民生主义”。

由此可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有妥协（主要是迁就统一共和党等政团的要求），同时又充满了进取和斗争精神。或者说，它的妥协含有一定策略成分，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斗争。

那么，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成立又是什么态度呢？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前夕，他与黄兴联电同盟会各支部，说各党彼此所提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要求对改组“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电文并针对部分会员反对改名，强调说：“同盟会成立之时，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188] 25日，他亲自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发表演说称：“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又说：“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189] 国民党成立后，他又不止一次地称：“合党之功与南北统一相同”，要党员“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建设民国之事业”[190]。此外，同盟会本部致各支部电中，称改组为孙中山和黄兴所“提议”：“两先生由上海屡来函电，欲与他党谋合并之方。”[191] 宋教仁还为此发表“声明”说：“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192] 这些都说明，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深为赞成”的。

孙中山赞成同盟会改组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与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孙中山此时同样认为同盟会革命目的已达，为着巩固共和国，“非合大多数人才”造成一大政党不可。他说：“今则共和成立，我同盟会目的已达，并不能再言破坏。凡赞同共和者皆我良友，故须广为联合，以巩固共和；若仍坚持同盟会以前手段，是为守旧。故改组一事，今日为必要之事。”[193] 其次，孙中山同样认为政党内阁“可

以代表民意”；认为造成两党对峙，有利于竞争。这样，当同盟会为着实现“政党内阁”改组为国民党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视为“时势所趋，不得不然”[194]，甚至称“同盟会即国民党”[195]。

但孙中山虽然赞成同盟会改组，却并不热心。这是因为，他一则此时正专心致志他的“铁路计划”，“无暇顾及党务”；一则由于他认为一味从事政治斗争不可能有多大希望。因此，他只愿做一个普通党员而坚辞理事长一职，采取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的态度。

国民党成立后，在孙中山和黄兴影响下，开会议决“取稳健态度，与袁总统提携”。但为时不久，即又在下述问题上与袁世凯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一）省长“民选”、“简任”之争。袁世凯为削弱革命党人在地方的势力，在顽固推行“军民分治”的同时，一直鼓吹省长简任，即由中央直接任命。为反对袁世凯这一“欲极端集权，以便威福”的阴谋，国民党坚持民选立场，针锋相对地指出：“以全国人民之铁血精神购此共和，其希望目的在能发达其民权”，“省长民选与否，即与共和政治能成立与否同一问题”，只有省长民选“始能完全发现民意”；“若由中央简任，前清督抚旧习必将复现”，“与民国精神大相反背”。且国民党主张地方自治，“以发达民权为惟一目的”，于省长民选“必死力以争之”。还有的径直提出：省长民选本为“政治问题”，“不必以法理空争”，“当以政治眼光解决”[196]，即不管袁世凯同意与否，坚持实行。1913年1月8日，袁世凯借口全国行政“划一”，公然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国民党转向集中反对该项命令的斗争。议员彭允彝等首先提出质问书，指斥袁“逾越约法，蔑视立法机关”。接着，国民党各省支部纷纷通电猛烈抨击，要求参议院根据《临时约法》，“迅即提起弹劾案，交大理院组织特别法庭，秉公判断，以维约法、固国本而警专横”[197]。在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对下，尽管袁世凯百般狡辩，诡称“并非以命令制定官制”，但实际上还是被搁置了起来。

（二）宪法起草权之争。据临时参议院议定之“国会组织法”规定，制定宪法为国会固有权利，其他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但程德全竟通电倡议由各省推举代表共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此论一出，袁世凯如获至宝，当即电令各省都督即刻派人到京，“讨论宪法大旨”。于是，为反对袁世凯肆意控制制宪权，国民党坚决主张宪法必须由国会自定。宋教仁发表演说指出：“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198] 就连一向较为温和的《民立报》也发表文章，认为：“宪法之制定与起草权均当然属之上下两院，无容另生异议”；否则所定宪法，“国民必不承认”[199]。后来，袁世凯以“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为参议院所否决，又提出设立宪法顾问。国民党人指出这不过“是劫夺国会起草宪法之故智，易其名而不变其实”，是“袁世凯欲得宪法之提案权，又欲得宪法之裁可权”[200]。针对袁世凯所谓“制定宪法必须取消防御主义”的说法，国民党提出“共和国家之宪法，其作用即在限制元首，使其不能如专制君主之为恶”，“若大权仍操诸元首，则是总统其名，而君主其实”[201]。可见，国民党反对袁世凯干涉宪法起草，不只是维护宪法起草权，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将来宪法按其意愿制定，使总统真正“处于无责任之地位”。这与它主张“政党内阁”是完全相一致的。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部分议员并主张大总统无解散省议会权。为加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提出了改革税约、厘清地亩、开发产业、兴办铁路、振兴教育、厉行征兵制度、统一司法、统一币制等一系列积极政策。

因此，从实际活动看，国民党是当时积极维护共和，决意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的中心力量，是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最大障碍，因而它仍然是一个反映革命党人利益和要求的有生气的资产阶级政党。对此，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中曾给以很高的评

价，称赞国民党是“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积极斗争”的党。并说：“不管那些以国内反动势力为靠山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但是这个党的工作永远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202]

当然，国民党自身的弱点也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内部权力分配的激烈争夺。成立不到十天，共和实进会就因该政团无一人被选为参议，不甘居于“随班逐队”的配角地位，而重组“群进会”，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统一共和党等其他政团，从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出发，也极力反对以同盟会为中心，动辄以退出相要挟。而部分同盟会员“把持权力”又为这些政团提供了借口。这样，国民党内部赖以维系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其次，为了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在“新旧合糅”口号下，组织上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发展方针。这就使得一大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为着个人政治目的，“或家道殷实富于财产者，以为苟不欲与同盟人联系，恐不能全体保身”，纷纷跻身于国民党，并从各方面施展他们的政治影响。所以，当时有人评论说：“中国之革命党，非使官僚党同化，是同化于官僚党。”[203] 谭人凤甚至“以狐群狗党目之”[204]。这种情况说明国民党成分较同盟会公开后尤为庞杂。再次，主张纷歧，步调不尽一致。如上所述，国民党议员为“防总统滥用权力，以蹂躏立法之机关”，主张大总统无解散省议会权，而胡汉民、李烈钧则坚决反对，联名电请总统有解散省议会权。固然，胡汉民等从本省临时议会与都督对立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大总统有解散权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地位，但也反映国民党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领导核心。最后，国民党由于以实现“政党内阁”为职志，全力从事议会斗争，以致越来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所有这些，决定了国民党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造成极大声势，对袁世凯形成一定威胁，但最终却无法战胜袁世凯而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

四　部分同盟会员的反袁活动

当时，尚有部分同盟会员根本不相信袁世凯，认为他终将“帝制自为”。他们或以报纸为阵地，或一直坚持武装斗争，成为革命党人中维护共和、反对专制最激进的力量。

在舆论方面，上海《民权报》可称为代表。《民权报》原由自由党谢树华发起筹备，但大宗股本多由周浩招集，且自周浩以及编辑重要人物“俱未入自由党”。因此到1912年3月正式创刊，实际成了周浩、戴季陶、牛辟生、尹仲材等同盟会员所掌握的一份反袁报纸。创刊伊始，戴就在《失败之革命》一文中尖锐指出：“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以后，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面目的不断暴露，《民权报》对他的揭露和抨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4月16日，《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文，揭露袁下令特赦杀害革命党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姚荣泽。接着，以同样题目连续发表时评九篇，抨击袁以私人名义向外国接洽借款，任命黎元洪为参谋总长和听任张作霖封禁《中华日报》。19、20两日，戴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一文，历数武昌起义以来袁对抗革命、抢夺革命果实的种种罪恶活动。26日，又发表《讨袁世凯》一文，指出：当撰写《袁世凯罪状》时，“深欲袁之悔悟而改其所为，以谋国利民福，为共和之保障。故语意间于激烈之中，尤含劝勉之意。孰意袁氏病国病民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弃民者民亦弃之，杀民者民亦杀之。则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

5月以后，《民权报》对袁世凯的揭露批判更加无所顾忌。它指斥袁世凯为达其中央集权之目的，压迫黄兴辞南京留守；猛烈抨击财政总长熊希龄仰承袁的意旨，与六国银行团秘密签订垫款合同。唐绍仪内阁被袁挤垮后，它载文指出：“此次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

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中华民国所以亡矣！”[205] 袁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徵祥内阁后，它进而指出：“今后之内阁，既为段祺瑞以兵力逼迫成立，又为袁世凯私意组织，质言之，是非中华民国之内阁，而袁世凯之秘书院也。”[206] 袁与黎元洪合谋杀害张振武和方维后，它直称“袁世凯之盗国，与悍盗贼之行抢掠无异”[207]。该报还坚决反对孙中山、黄兴北上调和南北冲突。

《民权报》还公开鼓吹武力反抗袁世凯。它指出：“新造民国之结果，所以至于如斯者，‘借重’二字误之也。”[208] “袁氏之在民国，盖病者血中之毒菌，留之病者之身，则虽有良医，终不能愈病者之痼疾也。”[209] 且“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210]，因此对袁万不可再存幻想，唯有“以武力治之而已”。为此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武力反袁的必要和号召“全国同胞共革彼命”，指出：“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盖借兵力以行恶者，仍不能不以兵力防止其恶也。”[211]

当武力反袁不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时，《民权报》也主张利用法律同袁世凯进行斗争。但《民权报》的真正目的是借以把袁世凯拉下大总统的宝座，并为此发动了一场国会脱离袁世凯控制的活动。

《民权报》对临时参议院本不抱希望，更痛恨它不敢坚持《临时约法》，屈从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它曾愤慨指出：“苟袁氏而真以兵力压制解散参议院，杀参议员，则参议员之死，为遵崇约法而死，为代表民意而死，死亦荣也，更何必瑟缩畏惧，忍以代表民意之机关而曲服袁世凯之私意？”“袁世凯将来若更以兵力胁参议院，使上皇帝劝进表，然则参议院亦将畏威力而草改元诏耶？”[212] 因此，它认为行将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必须摆脱袁世凯的武力胁迫，自由行使权力。9月，《民权报》发表文章提出：鉴于将来国会议员“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第一届国会应“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相当集会地点”。12月，尹仲材、何海鸣（何原在武汉主编《大江报》，8月黎元洪查封该报并下令捉拿何就地正法，何逃至上海加入《民权

报》编辑部）、李元箸等遂发起成立“欢迎国会团”，宣称“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临时政府之纷扰，欢迎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开预备会于上海，自择集会所在地为宗旨”；还特别指出：“第一届正式国会既兼有参议院之特别职权，又有草定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之特别事项，且又应避北京武力世界之虐”，“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极为得体”[213]。与此相配合，《民权报》接连发表文章，说“正式总统非袁莫属”、“正式总统非袁则乱”、“袁如不当选，军人必以武力干涉”等谬论，都是“妄谈而已矣”[214]。由于“欢迎国会团”以“预防北京军警之干涉”相号召，尖锐地提出了“自由议定宪法”和“自由选举总统”，不啻宣告取消袁世凯继续为正式大总统的资格，袁世凯“张皇失措”，惊呼：“此项团体之用意，显系纯为反对本总统一人而起”，“宜速行解散”[215]。他一面指使孙毓筠通电反对，授意冯国璋进行恫吓，一面秘密与法使交涉，转饬驻沪领事加以查禁。何海鸣等进行了坚决反击，但终因袁世凯的破坏，又得不到国会议员的积极响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后，“欢迎国会团”即演变而为“铁血监视团”，由何海鸣任团长，继续从事反袁活动。

除《民权报》外，上海《太平洋报》、《中华民报》、天津《民意报》、北京《国光新闻》、《中国报》等等，同样充满了反袁文字。如《太平洋报》发表文章斥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日日以帝制自为为心”，鼓吹“欲解决此种问题，非从根本上着手不可”[216]。《民意报》从8月19日至23日连发论说，指名道姓称袁为“袁贼”，斥袁“为桀纣，为操莽，为狼子，为猘犬”，号召“国民必速立大决心，人怀死志，全国奋起，与此残害国民之民贼相周旋”[217]。该报曾因此一度遭到查禁。《中国报》于文字反袁的同时，并发起组织“国会地点研究会”，与“欢迎国会团”遥相呼应，表示：“同人等不惜牺牲生命财产，组织斯会，其间不知经几多挫折，受几多诽谤。同人等坦白之心矢志不移，虽头断身裂亦无所辞，总期达到军人不干涉政治，司法能以独立之目的而已。”[218]

《民权报》等在鼓吹反袁的同时，对同盟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稳健派”也提出了批评或忠告。《民权报》并同《民立报》展开了公开论战。论战的中心，即是认为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已经失败；认为造成形势日益严重的根源，完全由于袁世凯的“弃民”、“卖国”的反动统治，而绝不是由于无谓的“党争”；“今日之所谓总统及内阁总理与各部代理大臣，为往日中国之蟊贼者，什之八九”[219]，当然不能相信；袁世凯帝制自为，绝非“虚造之伪言，摇惑天下之人心”。这说明革命党人中的激进派同稳健派对形势的看法和对袁世凯的态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激进的同盟会员，一直在坚持武力反袁斗争。

湖南邹永成，武昌起义后反对与袁妥协，到处宣传袁“靠不住”。及见革命党人拱手交出政权，他在上海“因此郁闷于心，决计自杀”，以为反抗。他在绝命诗中写道：“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谅猿猴（指袁世凯）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220] 1912年4月20日晚，他怀着满腔悲愤，投入黄浦江，经人救起后，经北京回到湖南。他在湖南积极联络军界中下层革命党人，进而与退职骑兵团长刘文锦、飞翰水师统领易棠龄、分统杨玉生及谢介僧等“密谋起事”，首先“推倒谭延闿”，将政权重掌革命党人手中[221]。在以“湘政改良会”名义发布的告全省“布告”中，他们号召说：“湘省自前年反正以来，我辈死力经营，皆为同胞起见，不料政界当道诸人昏愦用事，遇事迟疑，成此腐败现象。……今已抱定目的，准于日内实行，改建湘政府，扶助谢（介僧）、刘（文锦）诸君，代我同胞作事。”[222] 只是由于计划泄露，这次夺权行动没有成功。

湖北革命党人的斗争从未停止。1912年9月发生了南湖马队暴动。这次暴动是在何海鸣等人策划下，由顾斌、罗子常联络驻省城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它矛头直指袁世凯、黎元洪，宣称：“袁、黎不死，即不能真享共和幸福。”[223] 他们原定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

念日武装起义，推倒黎元洪，夺回湖北政权，但起义计划被黎元洪侦悉，先于9月23日晚派宪警包围札珠街总机关，逮捕罗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十余人，连夜处决。于是，驻南湖马队第二标官兵群情激愤，深夜1时全副武装直扑起义门。经三小时激战，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南湖马队暴动是袁、黎相互勾结，残酷摧残革命力量的必然结果，也是激进派进行的一次最有声势的反抗行动。

其他各省，包括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都有革命党人不畏强暴，或秘密组织团体，或积极筹饷购械，散发传单，组织暴动，掀起一次次的反袁声浪。袁世凯的亲信、署理直隶都督张锡銮曾惶恐不安地叫嚷说："各省人民每多招集党徒，建设团体，或擅称某军，或号为某队，铁血、敢死种种名称，怪异离奇。……天津尚有镇北敢死队等名目，名称奇异，骇人听闻。即此意气嚣张，实足以酿乱阶。"[(224)] 就是在北京，也有人倡言："袁大总统将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225)]

激进派的反袁活动，无论是舆论鼓吹还是武装反抗，集中表现了不妥协的立场和坚持继续革命的决心。这是由于，激进派主要是一些与人民群众比较接近的中下层同盟会员。他们满腔热忱参加辛亥革命，对胜利充满无限希望，并始终主张通过革命党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对旧势力深恶痛绝，更反对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妥协。他们中有的人虽也曾"惑于共和二字"，以为"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至为袁氏所把持"，但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226)]。同时，革命并没有使他们获得实际利益，而只是一般处于无权在野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敏锐感到"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227)]，而且无所顾忌，毅然坚持斗争，矛头直指袁世凯。

由于缺乏实际力量，又得不到同盟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228)]，激进派的活动终未能汇成强大洪流。但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了袁世凯的欺骗伎俩，揭露了他企图帝制自为的罪恶用心。历史证明，他们

是最早看清袁世凯反革命真面目并为之积极斗争的革命党人。

第三节　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一　国会组织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

《临时约法》规定：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国会组织及议员选举法由临时参议院制定。因此，1912年5月6日，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二次常会，即把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列为第一议案。经全院委员会审议与大会多次讨论，7月9日，一致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法大纲》。接着，以此为基础，起草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经8月2日、3日三读会多数议决通过，10日由袁世凯正式颁布。

“国会组织法”共二十二条，首先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次，规定参议院不取“地方代表主义”，由以下几方面议员组成。1．各省省议会每省选十名；2．蒙古选举会选二十七名；3．西藏选举会选十名；4．青海选举会选三名；5．中央学会选八名；6．华侨选举会选六名，总计议员二百七十四名。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名额，各省取“人口比例主义”，每八十万人选议员一名（人口不满八百万的，得选议员十名）；蒙古、西藏、青海同参议员额数。但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咨议局额数三分之一为标准，总计议员五百九十六名。第三，规定宪法制定以前，两院同时行使临时参议院职权，并特别规定宪法由两院合议，“非两院各有总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会，非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因此，参、众两院虽与一般立宪国家的上、下两院相当，却没有贵族、平民之分，也无职权轻重之别。

关于国会议员的产生，“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讨论中，有议员极力主张普通选举，认为《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万不能因选举法之限制，致人民不能行使其选举权”；“如果于民权有所剥夺”，“甚非立法慎重之道”。还有的提出：“民国成立之始，又系初次举办国会选举”，“以年龄满二十岁以上及在选举区住居二年以上者即可，不必过于限制”。但这些主张均遭到否决。有的甚至说：现时中国人民程度根本不能实行普通选举，“明知其不可而勉强行之，将必选出一般无智识之议员，不使国家陷于极危险之地不止”[229]。

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住居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和教育限制。《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二年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蒙、藏、青海得以动产计算）；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其中一、二两项为财产资格限制，三、四两项为教育资格限制。直接税是采用日本选举法的说法，包括田赋、所得税和营业税。但中国当时根本不存在所得税和营业税，因此所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实际仅限于地丁、漕粮[230]。不动产规定为“补充直接税限制之不足，以为纳间接税者提供选举权”，但限于土地、房屋、船舶（包括所有权及抵当权）[231]。相比之下，教育资格较财产限制稍宽。据临时参议院解释，凡“前清生员以上”和“毕业于六个月以上之各种传习、讲习、研究等所，简易、速成、预备等科，并曾在小学以上学校充当教员一年以上者”（体育教习除外），均当视为“与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可获得选举权[232]。但在当时中国教育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具有这种资格的也为数甚少。

议员选举，众议员为复选制。初选以县为选举区，复选合若干初选区组成，每省不超过八区。初选、复选设选举监督，全省设选举总

监督，均由各该地方长官充任[233]。其具体步骤是：先于初选阶段选出五十倍于本省名额的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于复选阶段互选产生。蒙古、西藏和青海众议员选举与各省相同。各省参议员选举，则先选举省议员，组织正式省议会，然后以省议员为选举人，进行选举[234]。省议员也须经初选、复选两阶段产生。参议员被选资格与众议员同，但年龄须满三十岁以上，较众议员年满二十五岁为长。

参议员选举其他部分，由于情况各殊，“选举法”分别作了专门规定。1．蒙古和青海，由各选举区划王公世爵、世职为选举人，组织选举会，依所定名额选举，或联合两区以上举行。选举监督以选举会所在地方行政长官（得委托相当官吏）充任。2．西藏，分前藏、后藏两个选举区划，分别由该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会同驻藏办事长官遴选五倍议员名额的人员，于拉萨和扎什伦布组织选举会，各选举五名。3．中央学会，由该会会员为选举人选举，但被选举人不以会员为限。中央学会属全国性高级学术团体，依临时参议院所定办法组成。会员无定额，由具备在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等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为当选[235]。设立并规定中央学会为选举参议员机关之一，目的是为了“选出学问优尚之人为议员”[236]。其选举在北京举行，以教育总长充选举监督[237]。4．华侨，初定由华侨居住地商会，后增加中华会馆、中华公所、书报社，各选出选举人一名，到京组织选举会进行选举。选举监督以工商总长充任。选举会会员因事不能到会，可委托相当代理人行使其选举权。

“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对蒙古、西藏和青海选举极为重视。最初担负起草“国会组织法”的议员，鉴于蒙古、西藏和青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由人民直接选举众议员甚为困难，而参议院内又规定有这几个地区的议员名额，因而主张不再选举众议员。但这种意见遭到了绝大多数议员的坚决反对。他们

指出：《临时约法》既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蒙、藏、青海选举众议员当然为其应有权利，“若因困难而剥夺蒙、藏选举权，则于法律上、事实上均相违背”；“参议院为立法之地，不能以不易办到遂置而不办”，困难与否为“办法上之问题”，“应办不应办乃原理上之问题”。况且，“若要巩固民国国基，必当开化蒙、藏人民，输入文明程度。今不与蒙、藏人民选举权，则是蒙、藏政治永不能进行”。至于因参议院有蒙、藏议员，认为众议院即可不必有蒙、藏议员之说，更不能成为理由。因为“参议院议员皆系王公世爵，与蒙、藏地方之关系甚浅，并不能代表蒙、藏全体人民”。只有“于蒙、藏普通人民中选出之议员，归入众议院议员，然后始能引起蒙、藏人民政治上之观念而真正代表蒙、藏人民，蒙、藏政治可渐臻于改良之地步”[(238)]。在多数议员的坚持下，起草员最后也认为“理由非常充足”，“全无辩驳之余地”，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业已通过二读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停止继续讨论，转入蒙、藏、青海议员选举法的起草、审议和讨论，最后形成了包括蒙、藏和青海议员在内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选举法”不仅明确规定蒙、藏、青海人民有权选举众议员，而且还根据实际情况，在选举资格方面特别规定财产以动产计算，并规定：选举监督认为调查选举资格不能普遍实行时，得专就其驻在地进行，驻在地以外区域可由具有选举资格者自行呈报；关于停止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师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规定，于蒙、藏、青海概不适用，唯一增加的一项新规定是被选举人必须通晓汉语。后来当外蒙古和西藏提出在北京就近举办选举，参议院也破例照准，还为此制定了《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施行法》。所有这些规定和变通办法，显然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和保证蒙、藏、青海人民能选出自己的议员。

其二，设立华侨专额，给海外华侨选举权以特殊照顾。华侨选举权问题，是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时就已讨论过多次，到北京后着重讨论的问题。虽有议员以为“不合法律”，不赞成华侨有选举权，多数议员

则认为“华侨于国家前途关系极大”，万不能不许他们有选举权。经过辩论，多数议员的主张获得通过，并议决作为“特殊势力”，于参议院明定其议员名额[239]。特许华侨有选举权，是海外侨胞的殷切愿望，也是临时参议院的一个创举。正像有的议员所说：“侨居外国人民而享有选举权，各国无此制度，今由中华民国创此特别例。”[240]而多数议员所以坚持华侨有选举权，一是认为同系炎黄子孙，与国内人民自应“权利平等”；二是“华侨热心爱国，扶助祖国之力不少，现在共和成立，对于华侨不能不有所酬报”；三是“华侨在外之人甚多，而有特殊势力者不少。将来中国经济上种种关系，甚希望华侨之扶助”[241]。正因如此，当华侨对选举议员仅限于商会表示不满，要求修正“选举法”时，参议院极为重视，认为以商会为唯一选举机关，使无商会组织或未入商会的华侨丧失选举权，诚“不公平”；并说明参议院原来规定华侨有选举权，就曾抱定“决不希望小部分人得其选举权，而不能达其大多数之意见”[242]。于是，在不修正“选举法”，以保持法律严肃性的前提下，提出并通过了《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华侨选举会施行法》，完全接受了华侨扩大选举人范围的要求。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华侨参议员选举何以后来又增加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和书报社的原因。

但是，“选举法”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限制选举的实行，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斥于选举之外。“选举法”规定“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或“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的财产资格，固然不算太高，但它只能使一部分农民和城乡小资产者获得选举权，广大贫雇农和城镇贫民能获得选举权的则极为有限。它同时又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因此，即便不受财产限制，多数人也将因此而丧失选举权。由此可见，国会选举实际上与一般劳动人民无缘。

其次，无视女界要求，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当时，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取政治上男女平等，从南京到北京掀起了颇有声势的女子参政活动。因此，“选举法”公布

后，该会接连两次上书临时参议院，指责参议院不承认女子选举权，是“全用特殊压制，剥夺其应有权利”，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不以女子为人”，坚决要求补定“女子选举法”，颁布实行[243]。而参议院却以“前在南京已经批复候国会解决”为词（实际上当时的批复仅称参政权候国会解决，并未言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一味敷衍。后经同情女界议员介绍，提到大会。但尚未开议，多数议员即群起反对，责怪介绍人不该介绍，请愿委员会不该受理，更不该向大会提出，并称此案已经“否决”，再次提出“实与法律不合”。尽管有议员一再说明南京时“并未否决”，此次请愿与那时也不相同，是要求女子有选举权，不应拒绝讨论；有的还以秋瑾为例，说“女界中为革命牺牲性命者不少”，自应享有选举权，但大多数议员仍无动于衷，坚持“无成立之价值”[244]。结果，未经讨论，女界要求即被打消了。

再次，限制了相当一部分工商资产者的选举权。“选举法”采限制选举制，按理应极大程度满足工商资产者的愿望。其实，除少数人外，相当一部分资产者（主要是商人）由于无田产，又“未必能在小学毕业”，显然不具备上述选举资格。讨论中，曾有议员提出：“中国不欲发达商业则可，如欲商业发达，如欲收商捐，即不能打消商人之选举权。”[245] 他们并针对多数商人虽无不动产，却“大多赁屋而居”的情况，主张将“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的规定，改为“占有不动产”若干，以扩大这部分人的选举权。同时，也有议员主张索性改作“有资本金五百元以上”，或把“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改为“年纳税二元以上”。但这些意见没有引起大多数议员的重视，均以少数遭否决[246]。因此，“选举法”公布后，特别是参议院作了直接税仅限于地丁、漕粮的说明，全国工商界大哗，认为：“直接国税指地丁、漕粮，是分明剥夺工商之选举（权）。商人纳税多为关厘等间接税，然所得税、营业税参议院不先规定，是商人无法纳直接税，非不愿尽义务也。况厘金未裁，关税繁重，加以地方捐税烦苛，商工对于国家负担已多，而何以享权利则最少？且以学识程度论，商工果不如农人耶？至有不动产五百元以上即得选举权，而商人有动产数万、数十

万、数百万，反不得与五百元者享同等之权利，尤为不公。财产所得税不行，参议院不得借口无法调查也。以彼所定五百元而论，略有田宅者合计即可取得选举人之资格。然多半乡僻居民，知识不开，视久居都市之工商，程度果孰为高下？”[247] 工商界并于11月初，召开全国临时工商大会，决定请愿要求修改“选举法”，并声称如参议院不接受要求，“今后无论国家、地方各捐税，一概不纳”[248]。袁世凯见工商界群情激愤，于是改变态度，动用“复议权”，要参议院接受工商界要求，“变通”财产限制条款。但多数议员依然不同意修改，同时对袁世凯的做法大为不满，指出：在营业税、所得税根本无从划分而召集国会又刻不容缓的情况下，袁“明知事实上做不到”，而一再提出“修正案”，并非真心维护工商界权利，不过是“故意用此有名无实之选举权，以欺骗国民，而自告无罪，并且欲借此诿过于本院。本院万不能通过”[249]。就这样，在多数议员坚持下，临时参议院否决了工商界修改“选举法”的要求。后来，各省商会又联电请求援照中央学会和华侨选举会办法，为各省商会设立议员专额，也遭到了临时参议院的拒绝。

如果说，排斥一般劳动人民，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表现了参议院议员的阶级偏见和成见；那末，漠视工商界要求则主要与他们大多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关。他们一般在政治上、经济上同资产者较少联系，或没有什么联系，既无兴趣也不曾感到为这个社会力量争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因此，他们宁肯放宽教育资格的限制，保证那些财产有限、既不纳直接税又无不动产的“寒士”获得选举权，也不愿对财产资格条款稍作“变动”，以满足工商界的愿望。当然，资产者自身力量微弱，对政治又大多不甚热心，不足以引起参议院议员的重视，也是一个原因。

“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从各省登记的选民共有四千万以上，占总人口四万万的9.98%，约每十人中便有一名选民来看[250]，较清末咨议局选举则增加了二十四倍以上。当然，选民

由各省自报，不无浮报和滥报。但随着辛亥革命后民主空气的高涨，“选举法”放宽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毕竟是一个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选举法”还是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反映了人们要求民主权利的愿望，因而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吸引力。

二　各党派竞选活动与国会选举结果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做准备了。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本来就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它号召党员：“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251]，“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252]。它不但于本部特设“选举”一科，还要求“各分部为筹备选举事宜，应联合数部设分部联合会于复选举投票地”[253]。它毫不隐讳自己的竞选意图，宋教仁就说过：“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254]。他并充满信心地宣称：“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255]

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决心倾力以争。它一面广设分部，一面发布《选举须知》等文件，鼓励党员“不争做官，而争做议员”。它说：本党政纲“最合乎现在中华民国立国之大要”，“但是选举若一失败，则虽有此美善之党义，仍不能见诸实行，万一有危险之事发生，大局不可问矣。故共和党之于选举，一党之胜负问题，不啻即全国之存亡问题”。为此，它要求党员一不可放弃选举权利；二不可选举本党以外的人；三要学会选举，“不可空投”[256]；四则“运动急宜着手占先，不可退落人后”[257]。对于竞选前景，它同样充满

信心，声称：于苏、皖、赣、湘、鄂等省，曾一一调查，“凡富有经验、声望素孚者，多吾党人，将来胜负不言而喻”[258]。

统一党“于选举一事”，同样不甘落后。该党中坚人物袁乃宽曾以密函致河南都督张镇芳说：“京师本部刻已极力扩张势力。揖唐（王赓）、月波（王印川）一力进行，创一法政大学，新设言论机关，名曰《黄钟报》，又设招待所二。天津、上海皆派要人前往扩张。”他要求张镇芳：河南支部亦宜“放手前进，实力进行”，“万不可稍存退步”，并说：“党之发达与否，全恃经费，既本部有力，支部可大为扩张。如石青（胡汝麟）、承轩（袁振黄）有急切需款之处，请师座拨付，由受业拨还，或万或数千，祈照拨。”在这封“乞阅后付丙，切不可令幕中人见之”的密函中，袁乃宽不仅和盘托出了统一党的竞选“计划”，还声称：“无论用何项手段”，总以不使国民党取胜为是[259]。

民主党虽成立最晚，势力不若他党，但因它的中坚分子非前清咨议局联合会成员，即宪友会会员，“全以政见结合”，因而“团体之坚固则十倍于他党”[260]。还在合党前，它的骨干成员萧湘、李文熙就曾函请在日本的梁启超：“国会选举期转瞬即至，吾党不可不早预备正坛演说资料，并各交通处着手运动选举方法，亦请择其纲要，汇帙见示，俾本部早日刊行，通告各地，扩张党势，必有大影响。”[261]合组民主党后，他们更以选举胜利激励党员说：“本党成立稍后，在事实上不得不为第三党。其实他日居如何之位置，全视选举之结果而定。”[262]“若举国欢迎，则出而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掌握政柄，亦何所不可。”[263]以上事实表明，各党都在期望选举的胜利，激烈的竞选将是不可避免的。

为控制选举，各党一开始就通过行政力量，极力掌握选举机关。如江西李烈钧委任的六名复选监督，全都是国民党人[264]；广东胡汉民委任的七名复选监督，有六人为国民党员[265]；湖南由专程从北京回湘“掌握选举”的国民党员仇鳌“筹备选举事务”，对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使“省、县、区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266]。湖北选

举总监督为共和党干事夏寿康，筹备选举处长为共和党本部特派回鄂运动选举的阮毓松，结果“复选监督亦多该党之人”[267]。甘肃赵惟熙以共和党支部长名义致函地方行政官，声称“如他党战胜，不惟有碍大局，即我甘现状万难维持”，必须将本属初当选人“用全力联络入党，已入他党者勒令退党”[268]。四川各党也先抓“各地区的选举监督，把本党有关系的人安排去办理各地选举事务……使初选的代表基本上能受本党的运用”[269]。山东各党势均力敌，所有遴派投票、开票、管理、监督各员，“务宜相等，不得专派一党”[270]。

党派竞选本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正常现象。各党虽然都以“注重党德”、“宣传党纲”相标榜，但实际上除个别人发表一些竞选演说外，对此并不感兴趣。正如梁启超所说：“今者建国第一次选举，而未闻有一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又未闻有一选举区焉开政党演说之会，此实普天下立宪国所无之现象，而天下政党所未睹之前例也。”[271]由于各党主要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则势必使选举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种种“怪状”和“丑闻”。

（一）浮报选民，竞相效尤。因“选举法”规定各选举区议员按选民比例分配，各党为争取更多议员名额便纷纷多报选民。如河南各属“只求增加选民，不恤逾限与否，甚至有报过判定总数之后，补报选民至四、五万之多者”[272]。湖南“每每于限期外，补报至再至三，辗转效尤，需求无已”，以至临近选举，犹“难得齐全总数，以为分配标准”[273]。广西尤为严重，其中浔州、柳州所属所报选民竟占“人口二分一或三分二”，而又“皆系选举事务所违背法定报告日期，故纵各属浮报所致”[274]。其他各省也都有浮报选民的现象。

（二）拉票，冒投，无奇不有。苏州初选省议员，“共和、统一、国民、自由各党及各团体均于附近特设选举人休息所，预发休息券，并派有招待员”，“招待颇为周到”[275]。“至于运动，有用酒饭者、面点者、川盘者、火车票者，纷纷不一”[276]。广西桂林民主党

则于“发给选举票时，每一初选人附送一券，上写凭券发米粉若干碗，如未使用，或使用未完的数量，得按值换取现金”[277]。于是顶冒，代投，“或一人而投数票，或散票而预书名”，“几为各省之流行病”[278]。“其有资财者，则雇人轮番往投，其吝于财产，则只请戚友数辈往投，甚有成卷整百投入”[279]。广东某些地区，选举前“多列假名”，“及投票时雇用数十人承认假名，每人另予一小铜牌为标识。办事人见此铜牌，即投数十次亦不追究”[280]。更有甚者，某些办理选举人员，或以调查选民之便，“私匿选票”，“届时雇人冒投”[281]；或“将票偷藏于衣袋及裤裆中”，以瞒人耳目[282]；或“通同舞弊，私自填写选举票多张，并令私党多人各填多票，夤夜投入票筒，以图当选”[283]。安徽宿松县北乡一区松塘庄选举调查员黎宗干于“调查选民时即捎匿选举票一千余张”，或自投，或由他的子、婿投，“狼狈为奸”，“令人发指”[284]。

还有比拉票、冒投更为“新奇”的，就是“列名指定”，强要选民选举。广东选举前夕，胡汉民即以同盟会支部长名义分函各县分部长，“指定某县应举某人为初选当选人”[285]。复选众议员，更致电复选监督“必举”林伯和、黄增耇、司徒颖、易次乾等人。为此，报纸抨击他“大有专制时代牌示委派之象”[286]。

（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如奉天营口选举省议员，商会总理李恒春“当场强索选票一千五百张，嘱私人三、五名分派填写”[287]，是为倚势“强索”；湖北省城一次“放抢”，有十余名监管选举人员“各抢一二千票出外，交其机关处填投”[288]，是为公开行抢。以至出现未到中午，票已发完，续来选民无票可投的现象[289]。由于行抢不遂，进而捣毁投票所，也屡见不鲜。江苏武进选举省议员，共设十投票区，由于共和、国民两党相争，有八投票区被毁，管理员被殴，签到簿、投票匦无一存者[290]。袁世凯不得不电饬各省：“应由各初选监督，摘录刑律第八章关于妨害选举之罪各条，揭示于投票所”；“一面依照选举法于投票所、开票所周围临时增派警兵，保持秩序”[291]

。

（四）金钱收买，变本加厉。起初“每一选券价值两角以至五角”，最多不过二三十元。到复选阶段，“辇金收买初选当选人，或一百元一个，或二百元一个。时期愈促者价愈昂”[292]。湖北选举竞争激烈，“因之票价飞涨”[293]，“凡当选者无人不出于金钱运动，即大名鼎鼎之汤化龙，亦被初选当选人吴宝璜控其掯骗票价不付”[294]。湖南贿选参议员，“有消耗至数千金者”。甚有“破产运动，因耗费已多，而票额仍难如愿，竟在家放声大哭”，或“悬梁自缢为家中瞥见得免于死者”[295]。四川胡景伊“对选举代表的拉拢收买，不惜施用各种卑鄙手段，要官许官，要钱支钱”，遂使共和党金钱收买肆无忌惮[296]。各党不仅要收买非党和反对党选票，就是本党党员，为了不被他党贿买，保证所提候选人当选，有的也需用金钱来控制。

（五）威逼胁迫，“手枪相向”。安徽第一复选区选举监督、国民党员潘世琛“意图私人当选”，临时改派史推恩为管理员，“当场胁迫选举人，并带凶伙多人，身着军服，手持手枪，分布投票所内外”[297]。四川胡景伊为对抗国民党，迫使省议会选举民主党员胡骏（同时为共和党员）为议长，“令会场内外罗列军警，枪上刺刀，封门威迫”[298]。湖北两党互相指控，直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揭露共和党欲选举覃寿堃为议长，不惜“令军警到场，百般威胁”，其党员梅宝玑并“拿出手枪向议员等射击”[299]。共和党则指责第一复选区“国民党当选省议会议员梁钟汉及在该党之高等检察长王镇南，当场武力胁迫本党汉川选民李流芳、张春山等投欧阳启勋票。及投票非欧……拳足交加，强要李流芳写贿托投汪哕鸾字据”；第二区“国民党暴徒石瑛、田桐等竟以手枪逼投己票，并当场枪伤本党初选当选人四人”[300]。可见两党暴力胁迫，实不相上下。

（六）拒不到会，以为抵制。“选举法”规定参议员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并得票满三分之一为当选，这一规定竟也成为各党用以竞选的一个手段，在竞争激烈的省份尤为突出。湖南第一次

选举参议员，共和党预料不能取胜，即相约全体不出席，嗣又强迫、欺骗超然派议员不到会，致使选举“迟之又迟”[301]。湖北共和、国民两党或“因内部组织未能完备”，或须筹谋新的对策，“均以不出席为能事”[302]。最后相持不下，只得以平分议员名额相妥协。江苏、四川，莫不如此。

（七）起诉，审判，几若虚设。“选举法”固然有违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的明文规定，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有效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如上述湖北两党互控一案，黄冈地方审判厅为共和党控制，省高等审判厅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各偏袒本党，互相抵制，谁也没有受到“制裁”，反而激起更严重的对立，到后来连筹备国会事务局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303]。又如广西、安徽、四川、湖南等省，或一党把持，“无可伸诉”[304]；或虽经起诉，“高审厅庇徇，延不开庭”[305]；或“拘留在案”，旋由同党“保释”[306]；或以“妄控长官”罪名“滥行逮捕”[307]；等等。总之，起诉、审判完全以党势为转移，结果舞弊者继续舞弊，当选者照常当选，真正秉法制裁的，实不多见。

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308]。但五花八门的选举现状，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首先，一般选民对选举“不甚热心”。江苏江宁县初选省议员，“共投票二万四千二百二十七张，弃权者约六千票”[309]。上海选民五万一千零四十二人，选举省议员到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人，约占25%，选举众议员到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约占25.2%。其次，对骫法舞弊，多有抵制。广东省议会选举参议员时，选票上有写“何必举”的，有写“钱运动”的，有写“你谬之”的，更有一张写“那班鬼”三字，下注两行小字：“浊世无是非，可哀中国之前途。”[310]其中书写“你谬之”一票，即系针对某人以“每票一张，谢以礼服七件”而发[311]。四川省议员游运炽等愤于胡景伊以武力胁迫选举胡骏为议长，通电表示：“不得最终正当解决，惟有

蹈东海而逝耳。”[312]

但另一方面，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而且，它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举人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卷入了唯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也不都出于非法运动手段。当时曾有人分析选举人心理说：“上焉者，本自己所信仰，不受政党之支配，亦不为人所运动，纯然以自己意思为意思者也；其次则以政党之意思为意思者也；又其次则富于村落思想，以地方主义之意思为意思者也；又其次则殉交游，重然诺，而以交谊之关系为意思者也；最下者则无意思，只知计金钱报酬之厚薄而已。”[313] 这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各党竞选实质上是拥袁、排袁两大势力的公开较量。从国民党方面说，它不遗余力地争取选举胜利，主要还是借以实现其政治主张，进而打破袁世凯与反对党的实际联盟，创造一个好的政治局面。

国会选举自1912年12月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基本结束。选举结果，综合报刊披露资料，大体如下：

第一，在国民党领导的江西、广东、安徽和湖南，参议员全部为国民党囊括；众议员九十九人，占83%以上。第二，在东三省和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西、云南等省，国民党也居于明显优势。其中除山西无法统计外，参议员计九十人，国民党七十二人，占80%；众议员计二百零二人，国民党一百六十二人，约占80.2%，或一百六十四人，占81%[314]。第三，在共和党实际控制或势力相当的湖北、江苏、四川、直隶、河南和山东，众议员计二百十二人，除超然派一人以外，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计一百零九人，比国民党只多七人[315]；参议员则“平分秋色”，国民党占三十人，共和党等三党合占三十人。第四，仅在新疆和贵州，共和党取得绝对多数。当然，由于跨党现象极为普遍，各党都把跨党党员计算于本党之内，以上统计，不见得十分准确，但大致还是反映了各党的实际情况

的，说明国民党以较大优势击败反对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316]。

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使全党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连孙中山也兴奋地说："此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本党竟得占有过半数……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317] 共和党则"多丧气"，不管新近宣布加入该党的梁启超如何以"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318]。然而，就在国民党以为大局已定，满怀胜利喜悦，准备组织责任政党内阁时，一桩震动全国的血案发生了。

三　宋教仁被暗杀

宋教仁主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了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319]。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这些演说，主要内容包括：

（一）猛烈抨击袁政府。宋教仁结合他曾任国务员的亲身感受，指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于是，列强"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320]。"至于民生困穷，实业不兴，政府亦无策以补救之"[321]。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震动全国的"库伦问题"，袁世凯事前"置之不问"，事后"亦无一定办法"，迄未"得一正当解决"[322]。所以如此，"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323]。这种政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

之政府”[324]。

（二）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宋教仁首先指出：在民主立宪国家，“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对于“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他认为也“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关于集权、分权，他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宋教仁提出：国民党这些主张，绝非一党“私见”，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325]。

（三）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指责袁政府，阐发国民党政见，最终是为了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326] 又说：“盖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而其道即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327] 为唤醒国人的注意，他尖锐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328] “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329] 他号召党员：“从今而后，宜将国民所以失望之点为之补救，而使国民得一一慰其初愿。”[330]

宋教仁上述言行，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仇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331]

还在宋教仁离京南下前，袁世凯就预感将对他不利，曾企图用五十万元加以拉拢，但遭到宋的拒绝。随后，他便指令亲信爪牙，密切监视宋的一举一动。一天，他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说：“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

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332]。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暗杀阴谋也在加紧进行。

宋教仁对袁虽有所警惕，例如他曾劝说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333]，还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334]；但同时又认为，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前，袁尚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说：对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335]。可见，他还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同时，当有人告知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也不相信，并说：“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336]

然而，袁世凯一旦感到他的权力受到直接威胁时，是一点也不迟疑的。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由黄兴等人陪同，自《民立报》社赴沪宁车站，准备北上。10时40分，他们走到检票处，突然三颗罪恶子弹从背后向宋教仁射来。宋当即被送往附近铁路医院。由于伤及要害，抢救无效，于22日晨4时40分逝世，享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临终前，于痛苦中曾请黄兴代笔，口授致袁世凯一电，报告枪击情形及一生致力社会改革而“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的心迹。最后说：“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337]这说明宋教仁临死，也没有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也表现了这位忠诚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坦荡胸怀。

袁世凯自以为谋划诡密，凶手又当场逃之夭夭，可以瞒天过海。他得知宋教仁死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

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338] 他并电程德全等：“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339] 同时，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但事态的发展出乎袁世凯的意料。23日，由于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向捕房提供重要线索，当天即将要犯应夔丞缉捕归案，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并于应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以及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使案情很快有了重大突破。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时为内务部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目，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得充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等职，但不久就被孙中山撤职。回到上海后，他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于长江沿岸一带鼓吹所谓“二次革命”，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共进会名义，批给五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夔丞投靠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系一毫无政治头脑、唯知金钱的亡命徒，流窜上海不久，即被应夔丞诱骗收买，拉入共进会。袁世凯布置这些爪牙，说明杀害宋教仁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应、武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他又电催程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麐这时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340] 但是，袁政府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在孙中山和

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夔丞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41)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致应夔丞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14日，应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18日，洪复应夔丞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不到四小时，应致洪述祖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23日，洪致应夔丞函：“号、箇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342)

这些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不但震动了全国，也教育了许多的国民党人。他们指出：“杀一宋遁初者，非杀人也，乃打击平民政治、伸张专制政治也。”(343) “所谓绝大之凶犯即某氏（指袁世凯）是也。……使某氏而仍为正式总统也，吾恐死者不止遁初一人，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将悉为所断送。”(344) 因此，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严究主名”，矛头直指袁世凯。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这表明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了。

---

(1) 阮忠枢致张镇芳函（191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3)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21页。

(4) 《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0日。

(5)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6) 《总统、总理之异同》，《太平洋报》，1912年6月19日。

(7) 《列强监督财政之警告》，《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8) 《黄兴集》，第171页。

(9) 《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1912年6月19日。

(10) 李国珍在参议院第四次常会上的发言，《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

(11)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12) 《孙武氏之抵掌高谈》，《申报》，1912年6月7日。

(13)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14) 《旧军官攻王芝祥》，《太平洋报》，1912年6月4日。

(15) 《陈其美致袁世凯等电》，《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

(16) 《太平洋报》，1912年7月1日。

(17) 《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18) 《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民权报》，1912年6月27日。

(19) 《同盟会之宣言》，《正宗爱国报》，1912年7月2日。

(20)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21) 《国民党主张国会内阁之理由》，《国民杂志》第1号，1913年4月。

(22) 《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23) 《杨度与国民党之关系》，《时报》，1912年11月21日。

(24)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

(25) 《组织内阁问题汇志》，《正宗爱国报》，1912年7月2日。

(26) 《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支部等电》，《民立报》，1912年7月3日。

(27)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28) 《乔妆打扮之内阁》，《远生遗著》卷2，第66页。

(29) 《乔妆打扮之内阁》，《远生遗著》卷2，第67页。

(30) 《政界风云汇志》，《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25日。

(31) 《黄炎培致赵凤昌函》，《近代史料藏札》（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32) 《陆内阁之中流骇浪》，《申报》，1912年7月30日。

(33) 《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3日。

(34)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版，卷5，第6页。

(35) 《徐宝山致袁世凯等电》，《申报》，1912年7月31日。

(36) 《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远生遗著》卷2，第72—74页。

(37) 《三日观天记》，《远生遗著》卷2，第78页。

(38) 《统一共和党启事》，《民主报》，1912年8月11日。

(39) 《世载堂杂忆》，第194页。

(40) 海鸣：《鄂中之政海逆潮》，《民权报》，1912年8月14日。

(41) 《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8日。

(42) 《调和党见之第一声》，《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5日。

(43) 《枪毙张振武、方维之惨史》，《民立报》，1912年8月21日。

(44) 《张方大冤狱（三）》，《民权报》，1912年8月24日。

(45) 《步军统领军政执法总长布告张振武正法之原因》，《民主报》，1912年8月17日。

(46) 《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9日。

(47) 《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8日。

(48) 《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8日。

(49) 《张方案之八面观》，《民主报》，1912年8月21日。

(50) 《民权报》，1912年8月22日。

(51) 《参议院第六十六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11日。

(52) 《张振武案之善后策——武力解决》，《民权报》，1912年8月21日。

(53) 疾世：《论主张武力解决张方案者之非》，《民立报》，1912年8月23日。

(54) 《民主报》，1912年8月28日。

(55) 《民主报》，1912年8月28日。

(56) 北京《临时公报》，1912年4月14日。

(57) 北京《临时公报》，1912年4月14日。

(58) 《黄兴集》，第158页。

(59) 《民权报》，1912年6月1日。

(60) 《黄兴集》，第141页。

(61) 《黄兴集》，第287页。

(62) 《黄兴集》，第178—179页。

(63)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3页。

(64) 《程德全致袁世凯漾电》，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65) 《政府公报》，1912年6月2日。

(66) 民畏：《留守去留问题》，《民权报》，1912年6月2日。

(67) 胡觉民回忆：《辛亥革命后的程德全》，苏州《文史资料》第2辑。程德全事后向袁世凯报告说："（先锋营）假托二次革命，另举正副总统，改易国旗……已预行举定军政司、水陆军统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陆军部档）

(68) 《遣散军队及优待军官之办法》，《申报》，1912年5月21日。

(69) 《优待军人办法之大决定》，《申报》，1912年6月21日。

(70) 《远生遗著》卷2，第35页。

(71) 《赣都督主张裁军节饷》，《民立报》，1912年5月23日。

(72) 柏文蔚致段祺瑞电（1912年11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73) 程德全致袁世凯电（1912年7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74) 程德全致张一麐电（1913年5月），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7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76) 《黎副总统政书》卷19，第1页。

(77)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85页。

(78) 陈炯明所部民军号称“循军”。

(79) 《粤都督说明募兵原因（胡汉民复省议会函）》，《申报》，1913年6月18日。

(80) 《粤都督说明募兵原因》，《申报》，1913年6月18日。

(81) 《黎副总统政书》卷9，第11—13页。

(82) 李烈钧通电（1912年4月18日），《时报》，1912年4月22日。

(83) 《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2，第17页。

(84) 《政府公报》，1912年6月15日。

(85) 据胡景伊、张培爵致程德全电，江苏都督府密电密件室抄存件。按：胡、张电抄转了李电全文，据李电称，已分别另电起义各省，但程德全似未收到。

(86) 《孙先生游赣记》，《民立报》，1912年11月2日。

(87)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41—542页。

(88) 《广饶人反对汪瑞闿》，《民立报》，1912年12月23日。

(89) 《国民党江西支部通电》，《民立报》，1912年12月28日。

(90) 《分治声中赣江潮》，《民立报》，1913年1月5日。

(91) 《赣都督转汪颉荀君电》，《民立报》，1913年1月5日。

(92) 《民立报》，1913年1月12日。

(93) 《中华民报》，1913年2月22日。

(9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9) 《黎副总统政书》卷16，第16页。

(100) 《黎副总统政书》卷16，第18页。

(101) 《国务院致黎副总统各省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1日。

(10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03) 《江西公民联合会通电》，《民立报》，1913年2月16日。

(104) 《江西公民联合会通电》，《民立报》，1913年2月16日。

(105) 《政府公报》，1913年1月9日。

(106) 《王铁珊访问记》，《民立报》，1913年3月10日。

(107)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44页。

(10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09) 《时报》，1913年3月18日。

(110) 《黎副总统政书》卷17，第8页。

(111) 《时报》，1913年3月27日。

(112) 《中华民报》，1913年4月7日。

(1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114) 此根据《孙中山全集》第2卷所载材料统计，时间从1912年4月3日至是年底，包括演说和谈话。

(11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5页。

(11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4页。

(11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1页。

(11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0页。

(11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12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5页。

(12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2页。

(12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

(12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124) 《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远生遗著》卷2，第121页。

(12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3页。

(12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12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12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12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9页。

(13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9页。

(13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6、518页。

(13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8—509页。

(13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3页。

(134)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3页。

(13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3—384页。

(13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页。

(13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8页。

(13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9页。

(13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1页。

(14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8页。

(14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0页。

(14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7—498页。

(14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2—433页。

(144)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1页。

(145) 《政府公报》，1913年4月1日。

(14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8页。

(14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148) 《民权报》，1912年8月19日。

(149) 孙中山因路途劳累，决定次日会见袁世凯。但袁当晚即派人约见孙中山，孙只好改变原来的安排。

(150) 《欢迎孙中山再纪》，《申报》，1912年8月29日。

(151) 《总统公讌孙中山之详情》，《时报》，1912年8月30日。

(15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0页。

(15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6页。

(154) 《黄兴集》，第255页。

(15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页。

(156) 远生：《孙黄来京后之影响》，《时报》，1912年9月26日。

(157) 《黄兴集》，第255页。

(158) 《黄兴集》，第259页。

(15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3页。

(16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161) 《政谈窃听录》，《远生遗著》卷2，第153页。

(16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4—485页。

(163)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2页。

(164) 《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申报》，1912年9月18日。

(165) 《黄兴集》，第301页。

(166) 《黄兴集》，第259页。

(16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2页。

(16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7页。

(169) 《黄兴集》，第272页。

(170) 《孙中山对于四问题之意见》，《大公报》，1912年9月1日。

(171) 《记者眼光之孙中山》，《远生遗著》卷2，第120页。

(172) 《民国政府与政党首领之协定政策》，《民立报》，1912年10月1日。

(173) 《黄兴集》，第276页。

(174) 《叶崇质致张镇芳函》（1912年9月16日）、《某某致张镇芳函》，《张镇芳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5) 转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176) 转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177)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7月17日。

(178) 《乔妆打扮之内阁》，《远生遗著》卷2，第68页。

(179) 转引自久保田文次：《辛亥革命与孙文、宋教仁——中国革命同盟会的解体过程》，《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

(180) 稍后同盟会各省支部也大体持这种态度，如蜀支部致本部电说："同盟会名义光大，宗旨纯美，义当护惜，以尽死难诸贤未完成之志。若会名遽行取消，则精神无所系焉。"（《天南日报》，1912年9月13日）粤支部提出："更易会名不宜急遽"，"缘同盟二字，久印粤人脑际"，"一旦更名，颇多窒碍"。（《民谊》第1号，1912年11月）

(181) 随后，北京的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所以后来的《国民党宣言》增加该会列名，因而又称六党合并。

(182) 《太平洋报》，1912年8月14日。

(183) 《国民党鄂支部欢迎理事宋遁初纪事》，《民主报》，1912年10月26日。

(184) 《宋教仁集》下册，第486—487页。

(185)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页。

(186) 戴天仇（季陶）：《国民国家与国民党》，《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

(187) 《宋教仁集》下册，第447页。

(18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5页。

(18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9、410页。

(190) 《民权报》，1912年10月7日。

(191) 《同盟会又致各支部通电》，《民立报》，1912年8月17日。

(192) 《宋教仁集》下册，第420页。

(193) 《国民党成立大会纪略》，《时报》，1912年9月1日。

(194) 《孙中山救国伟论》，《平民日报》，1912年9月2日。

(19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2页。

(196)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记事》，《民立报》，1912年12月6日。

(197) 《国民党粤支部致本部电》，《民立报》，1913年1月26日。

(198) 《宋教仁集》下册，第460页。

(199) 《呜呼半月来之政局》，《民立报》，1913年1月17日。

(200) 民畏：《异哉宪法顾问》，《中华民报》，1913年3月18日。

(201) 《议院政治促进会宣言书》，《民谊》第6号，1913年4月。

(202) 转引自《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203) 思秋楼主：《一知半解》，《民国》第1年第1号，1914年5月。

(20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05) 天仇（戴季陶）：《政治之恶潮》，《民权报》，1912年6月23日。

(206) 天仇：《兵力专制中之政海潮》，《民权报》，1912年7月27日。

(207) 仲材：《袁世凯之毒手》，《民权报》，1912年8月19日。

(208) 天仇：《鄂中之政海逆潮——附志》，《民权报》，1912年8月14日。

(209) 仲材：《孙、黄北上观》，《民权报》，1912年8月12日。

(210) 《民权报》，1912年6月27日。

(211) 天仇：《张振武案之善后策——武力解决》，《民权报》，1912年8月21日。

(212) 天仇：《兵力专制之大成功》，《民权报》，1912年7月28日。

(213) 《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41—45页。

(214) 天啸：《辟主张举袁氏为正式总统者之妄》，《民权报》，1913年3月6日。

(215) 《大总统对于欢迎国会团之意见》，《正宗爱国报》，1913年1月22日。

(216) 朴庵：《辟邪说》、《言论界之张方案》，《太平洋报》，1912年7月24日、8月26日。

(217) 《政府方面对于〈民意报〉封禁之抗词》，《申报》，1912年10月25日。

(218) 《国会地点研究会紧要启事》，《民主报》，1913年3月28日。

(219) 《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220) 《谭人凤启事》，《民立报》，1912年4月23日。

(221)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22) 《湖南革命风潮详志》，《民主报》，1913年3月18日。

(223) 《鄂省南湖马标起事剿平之始末》，《时报》，1912年9月30日。

(224) 《解散铁血敢死团布告》，《太平洋报》，1912年7月3日。

(225) 《同盟会语必惊人》，《申报》，1912年7月2日。

(226) 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10日。

(227) 《记韩衍》，《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50页。

(228) 当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同盟会上层领导人对激进党人的活动都采取了反对乃至敌视的态度，认为纯属“意气之争”，是“捕风捉影”，“妄加揣测”。胡汉民甚至致电袁世凯请严加惩办，说：“各省立心不正之徒，每以二

次革命为口实，若不严诛一二，将何以遏止乱萌？请谕知各省，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民立报》，1912年12月5日）

(229) 《参议院第三十一次、三十五次会议速记录》。

(230) 《参议院咨大总统请将众议院选举法第四条各款转饬遵照文》，《政府公报》，1912年9月13日。

(231) 《参议院咨大总统请将众议院选举法第四条各款转饬遵照文》，《政府公报》，1912年9月13日。

(232) 《参议院咨大总统请将解释众议院选举法第四条各款转饬遵照文》，《政府公报》，1912年9月13日。

(233) 凡实行“军民分治”省份，选举总监督由民政长担任，其他省份由都督担任（参议员选举监督同此规定）。

(234) 为保证参议员的广泛性，“选举法”规定：各省省议会议员被选者至多不得过定额半数。

(235) 《中央学会法》，《民立报》，1912年12月6日。

(236) 《张耀曾关于起草“中央学会法”的说明》，《参议院第一〇七次会议速记录》。

(237) 中央学会实际上并未成立，当然也未选出议员，1914年2月19日由教育总长呈准正式废止。

(238) 《参议院第四十六次会议速记录》。

(239) 见参议院第二、三、七、九等各次会议速记录。

(240) 《刘崇佑在参议院第七十八次常会上的发言》，《参议院第七十八次会议速记录》。

(241) 《参议院第一〇四次会议速记录》。

(242) 《张耀曾关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华侨选举会施行法”提案的说明》，《参议院第一〇四次会议速记录》。

(243) 《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44) 《参议院第一〇四次会议速记录》。

(245) 《参议院第五十九次会议速记录》。

(246) 《参议院第三十五次、三十六次会议速记录》。

(247) 《工商界之要求选举权之热》，《申报》，1912年11月4日。

(248) 《工商界之要求选举权之热》，《申报》，1912年11月4日。

(249) 《参议院第九十二次会议速记录》。

(250) 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251) 《云南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支部致国民党本部电》，《民主报》，1912年8月20日。

(252) 《粤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之盛况》，《民主报》，1913年2月6日。

(253) 《国民党规约》，《国民》第1号，1913年5月。

(254)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页。

(255) 《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

(256) 所谓“不可空投”，指投票之先，首先考察所投的人能否当选，其次了解他的已有票数，如尚不足则投票，若有余，便无需再投，可投他人。

(257) 《时事新报》，1912年11月11日。

(258) 《请看共和党刘树堂之亲笔书信》，《民立报》，1912年11月3日。

(259) 《张镇芳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60) 《民主党江苏支部开本党省议员欢迎会及分部代表大会记事》，《时报》，1913年2月17日。

(26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7页。

(262) 《民主党上海分部成立日演说稿》，《时报》，1912年12月13日。

(263) 《论民主党》，《时报》，1912年11月12日。

(264) 据共和党赣支部和共和建设讨论会致参议院等电，李烈钧的办法是：临、饶、抚三复选区所在地知事原为国民党员，径委充复选监督；赣州、南昌两区以知事非国民党员，则委国民党员汤祚贤、徐元诰为复选监督；吉安区论交通便利，当以庐陵为宜，但庐陵知事非国民党员，则委吉水知事国民党员刘存一为选举监督，旋调刘任庐陵知事，便改庐陵为复选区。

(265) 《粤同盟会运动选举之手段》，《时报》，1912年10月15日。

(266)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1页；《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82页。

(267)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68) 《秘密谈话之一证》，《民主报》，1913年1月22日。

(269)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页。

(270) 《山东都督周自齐训令》，《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28页。

(271) 《敬告政党及政党员》，《时报》，1913年3月25日。

(272) 《张镇芳致筹备国会事务局电》，《申报》，1912年11月27日。

(273) 《谭延闿致袁世凯等电》，《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日。

(274) 《内务总长致广西都督电》，《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日。

(275) 《苏、常、镇、扬省议会初选现状》，《申报》，1912年12月9日。

(276) 《松江省议会初选投票之现状》，《申报》，1912年12月8日。

(277) 魏继昌：《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会议员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278) 《宿松选举大弊窦》，《申报》，1913年1月11日。

(279)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80) 《粤省选举之怪状》，《时报》，1912年12月24日。

(281) 《松江省议会初选投票之现状》，《申报》，1912年12月8日。

(282)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83) 《宝山之选举诉讼》，《申报》，1912年12月17日。

(284) 《宿松选举大弊窦》，《申报》，1913年1月11日。

(285) 《粤省选举之怪状》，《时报》，1912年12月24日。

(286) 《粤省选举之怪现象》，《时报》，1913年1月30日。

(287) 《营口之选举诉讼》，《民立报》，1912年12月27日。

(288)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89)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90) 《武进选举捣毁记》，《申报》，1912年12月10日。

(291) 《临时大总统袁为选举竞争非法诰诫各官吏严行整饬秩序文》，《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26页。

(292) 《自由谈话会》，《申报》，1913年1月7日。

(293) 《湖北国会选举与政党竞争》，《时报》，1913年2月22日。

(294) 《鄂省选举新笑史》，《申报》，1913年3月3日。

(295) 《湖南参议员选举情况》，《民主报》，1913年3月31日。

(296)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页。

(297)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安徽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1月29日。

(298) 《内务总长致四川都督兼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3年3月28日；《四川民报等致袁世凯等电》，《民主报》，1913年3月19日。

(299) 《赵光弼等致内务部等电》，《民主报》，1913年3月15日。

(300)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湖北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26日。

(301) 《湖南参议员选举情况》，《民主报》，1913年3月31日。

(302) 《湖北参议员之难产》，《时报》，1913年3月31日。

(303) 《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304)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广西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1月12日、2月19日、3月23日。

(305)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安徽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17日。

(306) 《皖省国会复选之风潮》，《申报》，1913年1月24日。

(307) 《内务总长致湖南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11日。

(308) 《敬告选举人》，《申报》，1912年9月5—6日。

(309) 《省议员选举开票记》，《民立报》，1912年12月12日。

(310) 《粤省会选举参议长余闻》，《申报》，1913年2月19日。

(311) 《再志粤省选举参议员怪象》，《时报》，1913年2月24日。

(312) 《内务总长致四川都督兼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3年3月28日。

(313) 《选举人心理之实测》，《申报》，1913年1月11日。

(314) 据《国民》载《众议院议员一览表》统计。

(315) 据《时报》载《各直省众议院议员表》统计（其中山东因未列党籍而采《民主报》所载《国民党众议员一览表》）。

(316) 国民党所获议员，流行的说法为三百九十二人，较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总和多一百六十九人（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69页）。但由于跨党，又有四百九十人（《两院议员之确实调查》，《民主报》1913年4月16日）、四百七十一人（《国民党议员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等说法。

(31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页。

(31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8页。

(319) 宋教仁离家时间，无明确记载。据他致刘蕡臣信推断，当为是年12月下旬。

(320) 《宋教仁集》下册，第457页。

(321) 《宋教仁集》下册，第462页。

(322) 《宋教仁集》下册，第461页。

(323) 《宋教仁集》下册，第458页。

(324) 《宋教仁集》下册，第466页。

(325) 《宋教仁集》下册，第459—460页。

(326) 《宋教仁集》下册，第446页。

(327) 《宋教仁集》下册，第463页。

(328) 《宋教仁集》下册，第459页。

(329) 《宋教仁集》下册，第458页。

(330) 《宋教仁集》下册，第459页。

(331) 《张镇芳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32) 《救国团驳宋遁初演说词》，《时报》，1913年3月16日。

(333)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34) 程潜：《辛亥革命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87页。

(335)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

(336) 《宋遁初先生遇害始末记》，《国民》第1卷第2号，1913年6月。

(337) 《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

(338) 《临时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339) 《大总统令南京程都督等电》，《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340) 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341) 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赵秉钧命去沪，临行前曾谒见袁世凯，洪到沪密电曾由他转过数次。

(342) 《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

(343) 张百麟：《说明本党国会期间之遭遇与态度》，《国民》第2号，1913年6月。

(344) 《湖南公民大会》，《民立报》，1913年4月4日。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

第一节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一　列强在华势力的新布局

民国初年，以英、法、德、俄、美、日六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在相当程度上主宰着中国的命运。经过了辛亥革命时期一段“中立”的观察后，随着中国内部局势趋于明朗，列强之间也在调整立场，为巩固既得侵略权益，并进而攫取新的侵略权益而纵横捭阖。

英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居于主导地位。1914年外国在中国的总投资为225,566万美元，其中英国为66,459万美元，占29.4%[(1)]。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巨大的经济利益决定了英国的对华政策是尽可能避免使中国陷于动乱局面，而维持相对的稳定，这样才有助于巩固英国的既得利益。英国老牌侵华分子濮兰德说：“英国在中国有两种利益——国民的利益，它依赖于保护并扩张我国的商业；帝国的利益，它依赖于维持现状并保卫我们作为亚洲强国的地位。为了促进这两种利益，必须在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2)]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英国政策出发点的高度总结。另一个在英国对华政策中不能

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是欧洲局势。1911年—1913年间，先后爆发了摩洛哥危机、意土战争、两次巴尔干战争，欧洲局势日渐紧张，两大对峙着的帝国主义集团间的战争迫在眉睫，此时英国无力过多顾及东方问题，维持中国的相对稳定局面也就是必须的了。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中国扶持能够控制局面的代理人，而袁世凯则适逢其选。英国把袁世凯视为能够稳定中国局势，进而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唯一代表。英国当时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又使它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态度。

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经济力量已居于世界首位，但就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势力而言，尚远不及英国。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在于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基础，凭借它的优厚的经济实力，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扩张。美国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比其他列强更为积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金融工商界的压力。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总统的当天，“美亚协会”（美国金融企业家的组织之一）就通过一项要求尽快承认袁政府的决议。华尔街老板们的意图当然是借此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找到更多的市场。虽然碍于列强行动一致的原则，美国政府一时还不能独自动作，但美国众议院却于2月29日通过提案，表示了对“中国新秩序的赞同”[(3)]。这个提案的通过，对尚未完全控制全国的袁世凯建立袁记新秩序的支持及其作用是可以想见的。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称许袁说：“还没有比袁世凯更强的人出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集中于袁世凯一人”[(4)]。

法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追随英、俄两个同盟国。对法国来说，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即将来临的与宿敌德国的大战。如果英、俄这两个同盟国因为中国局势而进行干涉，将会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力量，从而影响法国的地位。因此，法国不希望中国内部局势出现动荡，而把袁世凯看作“一个老练的人”，“能使中国避免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唯一力量”[(5)]，支持袁世凯成为列强的新代理人。

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在欧洲是与英、法、俄对峙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一的同盟国集团的核心力量。但在中国，德国与英、法、俄之间尚无根本的矛盾冲突。德国同样不希望自己的力量被牵制在中国内部事务中，因而支持袁世凯的上台。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在给首相的电报中认为："如果人们置袁世凯政府命运于不顾，让可以引导到一个混乱局面上去的一些未成熟的或超出这个目标的政治企图自由发展，则其危险将会更大。"[(6)] 由于德国当时在中国一时还无进一步的具体侵略目标，因此它在承认袁政府等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于英、俄、日等国，而更接近于美国的立场。

在英、法、美、德四国力求使中国保持在袁世凯统治下的"稳定"局面时，日本、沙俄两国却对中国采取了更富于进攻态势和侵略性的政策。

日俄战后，日本一跃而为东亚强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及和中国的关系，它在侵略中国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1914年，日本在华总投资为29,089万美元，居列强中的第四位。早在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中公然声称，日本在中国"占有优势地位"，"一旦该地区发生变乱，能够紧急采取应变措施的，除帝国而外，别无它国。这从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帝国的实力来看，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时也是帝国政府对于亚洲所负担的重大任务"[(7)]。这一决议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排除其他列强势力，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图谋。虽然日本在辛亥革命中武装干涉中国的动议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但它在民国成立之后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内政，在承认、借款等问题上处处逼迫袁政府出让更多的权益。与英、美等国不同，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不以支持袁世凯为中心，而是多方下手，制造中国内部的混乱，乘机渔利。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这样说，日本"不想要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想要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想要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国家"[(8)]。这种看法支配着日本的对华

政策，不管其国内党派间的政见分歧如何，在这一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

列强中唯一与中国毗邻的沙皇俄国，也对袁世凯采取了拆台多于支持的政策。沙俄驻华公使曾对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说，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使中国保持衰弱地位，并坚决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9)]，这样才符合沙俄的利益。沙俄在民初的对华政策特别注意和日本的合作。在它看来，俄、日两国同为中国邻国，在中国的利益远较其他列强为优越，“因此，俄国和日本应特别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以便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10)]。这一方针同样为日本政府所认可。在承认、借款等问题上，沙俄与日本狼狈为奸，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但沙俄主要还是一个欧洲国家，欧洲局势不能不牵制它的力量，这又多少限制了它的活动范围，使它的对华政策不能完全和日本同一步调。沙俄外相萨查诺夫曾对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承认：“由于欧洲形势，本国财政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俄国政府不希望在远东酿起事端。”[(11)]

民国初年的列强对华政策，英、美、法、德四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着重于扶持袁世凯为列强的新代理人，并使他有一定力量保持中国的“统一”，从而能够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日、俄两国则更希望中国内部的动乱与分裂，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然而，具体行动政策的不一致，并不妨碍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总的目标上保持一致。况且，日本对中国的扩张，也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列强在华的势力均衡，因此列强间的对华政策还能保持大体上的合作局面。

在中国扶持新的代理人，是列强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利用中国内部形势，为自己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是列强政策的又一方面。日本、沙俄自不待言，就是希望中国能保持“稳定”的英国也不例外，总想乘机捞上一把。英国对西藏，沙俄对外蒙，日本对东北，都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为了不致因为争夺权益而影响列强合作的“大局”，列强间又进行了许多幕后活动，达成种种新的协议和默契。

1907年日俄第二次协约及其密约，划定了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民国初年英、俄在西藏和外蒙古的侵略行动，使日本十分眼红，觉得自己“不应再事袖手旁观”，“亟应乘此时机，力图进一步巩固我国（指日本）在满蒙之地位”[(12)]。外蒙既已划为沙俄势力范围，日本就进一步向沙俄提出就两国在内蒙势力范围的划分进行交涉。1912年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就开始第三次日俄密约谈判正式通过决议，声称：内蒙古与日本“势力范围之南满洲关系至为密切，日、俄两国在适当时机就此问题签订协定，不仅对于帝国将来之发展以及永远敦睦两国邦交有利，且在当前清国因此次事变而使蒙古问题即将展现一新局面之际，日俄两国就内蒙古问题签订某种协定，实为最得机宜”[(13)]。其后，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与俄方就此事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以张家口至库伦间大道为界，划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而沙俄则认为这侵犯了它固有的势力范围，并进一步提出，日本应承认俄国在中国西部享有特殊利益。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7月8日，本野与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在俄京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密约除了将两国在东北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加以延长外，又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约为今北京、多伦、锡林浩特一线），划分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此线以东为日本势力范围，以西为沙俄势力范围[(14)]。这一密约完成了日、俄两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瓜分。同月，日本前首相桂太郎赴俄访问，《大阪每日》评论此行的目的，是“将日、英、俄三国的远东政策达成一致”，而访问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15)]。德国驻东京大使雷克司认为：“很明显，三强对于它们的利益范围已经达成协议，并在某种程度上在它们的利益范围内各有行动自由。”[(16)] 这从日本对英、俄在西藏、外蒙的行动不加指责这点，可以见其端倪。

日、俄两国而外，英、俄两国亦就西藏和外蒙问题有所接触。1907年的英俄协定中，双方曾允诺互不干涉西藏内政，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不为自己在西藏谋求筑路、开矿等让与权。现在英国觉得这些规定“严重地阻碍它对于中国在拉萨丧失权力所造成的局势做出反

映，英国也感觉到俄国在蒙古的影响大为增加，英国应当在其他地方得到相应的补偿”[17]。1912年9月，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访英。英国外相格雷在和萨查诺夫的会谈中，表示不允许中国大量派兵进入西藏，同时暗示萨查诺夫，英、俄可就两国在西藏和外蒙的地位做笔交易。这一建议虽然受到萨查诺夫的反对，但他仍将即将赴外蒙的廓索维慈的秘密使命通知了格雷[18]。英、俄实际就此达成了谅解。以后，英、俄两国又就正式修改1907年协定问题进行了谈判，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作罢。

英、俄、日三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得到它们的盟友法国的支持，美、德两国则采取了暂时静观的态度。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一度较为平静的中国边疆问题再次趋于严重。

二　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及中俄交涉

外蒙古很早即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政府对内外蒙古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尊崇喇嘛教，笼络教众，与蒙古王公联姻。为了加强控制，清廷又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派官吏率卫队常驻外蒙的库伦，此为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始设。此外尚置有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阿尔泰办事大臣。

自十九世纪末开始，由于沙俄势力日渐渗入蒙古，构成对中国北部边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对蒙政策遂由过去的禁垦一变而为移民实边，废除蒙汉通婚禁令，奖掖汉人赴蒙垦荒，并开始在外蒙筹划新政。1909年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积极在外蒙推行新政，设立了巡警队、审判厅、卫生局、商品陈列所等一批新机构。

清朝政府对外蒙的移民实边政策和新政的推行，对于加强外蒙古与内地的联系和外蒙古本身的进步发展，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清政府在外蒙的新政，与外蒙上层封建王公、贵族、库伦活佛等的既得利益发生了很大矛盾，他们不甘心失去往昔的特权，对清政

府渐生外向之心。不仅如此，清政府在外蒙施行的新政，徒求形式，而且过于操切，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当时“中央各机关督促举办新政之文电，交驰于道，急如星火”，“库伦一城，新添机关二十余处”，所有开办支应费用悉取之于蒙民，“使蒙民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各旗，为之一空”[19]。及至宣统二年（1910）库伦开办兵备处，筹练新军，“虽一兵未练而蒙情汹汹”[20]。一般蒙民因此难免对清政府产生埋怨之心，希望能减轻负担，而他们这些可以理解的愿望，又为心怀异志的少数上层人物所利用，成为这些人要求“独立”的借口。

与清廷统治在外蒙的衰弱伴随而来的，是沙皇俄国对外蒙的渗透和扩张。中俄外蒙边界本来早经1728年的《恰克图界约》划定，但是沙俄始终没有放弃对外蒙的侵略野心。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沙俄获得了在外蒙免税通商等特权，其势力开始全面渗入外蒙境内。日俄战争后，沙俄在东北的扩张受到日本的阻遏，遂将侵略矛头转而指向外蒙，企图通过外蒙进一步侵入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1907年，沙俄与日本签订第一次密约，外蒙被划为沙俄势力范围，使它可以放手进行对外蒙的扩张活动。

沙俄在外蒙的扩张，其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笼络和收买外蒙上层封建王公、贵族、喇嘛，扶植亲俄势力。对在外蒙居优势地位的宗教势力，俄人及俄商“于活佛暨各大喇嘛既多所遗赠，表示亲睦”，“力结喇嘛之欢心”[21]；对世俗王公贵族，则利用他们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施以贷款，加以控制，使他们依赖俄人施舍过活，“故于生计方面，则蒙人久已隶属于俄国势力范围之下”[22]。这样，沙俄就在外蒙上层王公贵族中扶植起一个甘心出卖民族利益的亲俄集团。

清政府在外蒙推行新政、加强控制的措施，沙俄认为是对自己扩张的威胁，从而觉得有必要在外蒙有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没有忘记利用外蒙分裂主义分子来实现自己的阴谋。1911年夏，外蒙各盟王公举行会盟大典，沙俄即利用亲俄派首领杭达多尔济亲王在会上“蛊惑活

佛，密主联俄”[23]，虽然赞成者甚少，但杭达等人仍于会后率代表团去俄，冒充代表全蒙王公之意要求沙皇的“保护”。这个代表团于8月15日抵达彼得堡后，被沙皇“当作宫廷贵客招待”。沙俄各部大臣向他们保证支持外蒙的“独立”。当年8月17日，由沙皇政府总理斯托雷平在圣彼得堡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各主要大臣参加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在蒙古拟实行的新政……尤其在紧靠近我国领土的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不能不使我们忧虑”。蒙古问题对于俄国“具有重大意义，支持蒙人反对上述中国政府计划的愿望完全符合我国利益”[24]。由于当时近东的紧张局势，沙俄没有力量对外蒙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因而此次会后沙俄在外蒙的行动是按照会上制定的方略双管齐下。首先，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8月28日，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致文清外务部，声称清在外蒙的政策，“于两国邦交显示危险现象，致使俄国于疆界上不能不筹必要之保护”[25]，迫使清政府于9月13日下令缓办外蒙新政。其次，直接的军事入侵。10月初，沙俄哥萨克骑步兵八百余人开至库伦，还有几千人在恰克图遥为声援。沙俄陆军大臣下令将一万五千支步枪和七百万发子弹拨给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以便一旦需要，就可发给外蒙叛乱分子[26]，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沙俄分裂外蒙的阴谋诸事皆备，只等动手的有利时机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就在清政府手忙脚乱地调兵镇压起义时，沙俄认为机会已到，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利用“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的困难”，迫使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27]。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等人由俄兵护送回到库伦，早就准备好的枪支子弹及追加的一万五千把军刀，由沙俄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通过驻库伦领事，打着私人贸易的幌子送给了外蒙叛乱分子[28]。沙俄驻库伦的领事官员到处煽动蒙人“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29]。这样，由沙俄一手策动的外蒙“独立”由此开场。

1911年11月30日，外蒙亲俄分裂主义分子杭达多尔济等人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称外蒙“宣布独立”，“库伦地方已无须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体驱逐”，限三多等于“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30]。次日，一队俄兵及携带俄造新式快枪的蒙兵包围了办事大臣衙门，三多见兵单力薄，势不能敌，遂避居俄国领事馆，其卫队“由俄兵收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兵看管”。“此外，局所衙署，如印务处、兵备处、电报局等，均以蒙俄兵守之”[31]。12月5日，三多等人由俄兵押送出境，经恰克图回内地。12月16日，所谓“大蒙古国”正式成立，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以“共戴”为年号，车林齐密特任“总理”，三音诺颜汗任“副总理”，杭达多尔济任“外交大臣”，一个分裂主义政权粉墨登场。

外蒙“独立”的后台是沙俄，这个事实连沙俄自己也不否认。1912年1月，俄国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表示对外蒙“愿意提供友好支持”。声明打着蒙古人的旗号，要求中国不在外蒙设立行政机构，不驻兵，不殖民，并威胁中国说，俄国将与外蒙古实际的政府发生关系[32]。其实，在这项声明之前，沙俄政府早就在各方面，尤其是军事上大力支持库伦傀儡政权。外蒙的军队本为乌合之众，不过几千人，又缺枪少械，经与沙俄订立契约，由俄人廓洛维慈为指挥官，授与指挥军队之权，俄人范西礼夫等为教练官，负责训练蒙兵，到当年底训练了六个骑兵中队。至于军械则全由沙俄提供，计快枪四万枝，子弹四千箱，大炮八尊[33]。在沙俄的支持下，库伦当局组织军队在外蒙各地四出征战，扩大地盘，压迫各地王公附和“独立”，以摆脱自己的孤立局面，并进而骚扰内蒙各地，以图扩大影响。

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要清廷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于5日内离境。沙俄驻华公使接到消息后，立即向清外务部表示愿意出为“调停”，调停的结果却是奎芳被俄兵以“保护”为名押解出境，乌里雅苏台为库伦当局所占。外蒙西部重镇科布

多自库伦独立后一直拒不响应。库伦当局为了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从5月起即派兵数千围攻该城，守军虽顽强抵抗三个月之久，但因“援军未至，弹药告竭”，8月6日科布多失陷。沙俄驻科布多领事再次出面“调停”，结果又是“令参赞溥润偕同官兵交出印信，即日离科”[34]。沙俄的所谓“调停”，无非是把外蒙“调停”到沙俄的卵翼之下。不仅如此，在科布多遭到围攻前后，新疆都督杨增新曾奉命增援，遭到沙俄领事的一再阻拦。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竟狂妄地宣称：“我们系奉君令，不放你们进兵”，“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35]。在沙俄的威胁下，新疆军队的援科计划只得作罢。

除了策动外蒙的“独立”外，沙俄还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东北和内蒙。在东北，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缔“诱惑蒙旗额鲁特总管胜福……诸员主动独立，响应库伦”，并以“俄兵改装助蒙，合攻胪滨府”[36]，最后成立了以胜福为首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在内蒙，沙俄策动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叛乱，于8月20日宣布“独立”。乌泰在《东蒙古独立宣言》中自供：“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俄国供给武器弹药，给以援助，故宣布独立，同中国断绝关系。”[37] 所谓外蒙“独立”的真相，在这段话里一目了然。由于有沙俄的支持，库伦当局在1912、1913年间，数次派兵大举南犯沿边各地，梦想把内蒙也囊括进“大蒙古国”的版图。因为遭到当地军队的反击，这几次进攻才以失败告终。

沙俄策动的外蒙“独立”发生于辛亥革命的高潮期间，穷途末路的清政府已无力顾及外蒙的事态发展，及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日渐恶化的外蒙局势才开始提上共和国新领袖们的议事日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8] 1月28日，孙中山又致电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人，向他们解释推翻清朝的目的是“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

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39]。袁世凯上台后，也于3月25日发布《劝谕蒙藏令》，谓：“现在政体改建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40]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对于蒙古局势，政府内部及舆论主剿主抚者兼而有之，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北京政府的对策是首先稳住内蒙，然后再设法解决外蒙问题。在外蒙“独立”的影响下，内蒙少数王公企图附和库伦当局，鼓噪“独立”。为了避免重蹈外蒙覆辙，北京政府“极意优待效顺之王公喇嘛，以坚其内向”[41]。1912年8月，《蒙古待遇条例》公布，规定蒙古与内地一律，不以藩属待遇，蒙古王公原有之世爵、封号、特权一律照旧，俸饷从优支给。接着任命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对内蒙各旗参加叛乱的官兵，规定“但能释兵来归，其原有之产业，仍准享有，决不苛求。其原无产业者，应予设法安置，俾遂其生”[42]。通过这些措施，安抚了内蒙人心，使一度动荡的内蒙局势得以稳定，库伦当局企图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内蒙的图谋从此破产。1912年10月和1913年1月，内蒙东四盟和西二盟先后在长春和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了王公会议，通过声明，赞成共和，反对外蒙“独立”。蒙古王公联合会也于1912年11月23日发布通告，表示蒙古各部“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藏人民，共建新国”；声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妄称独立，伪立政府……蒙古全体，并未承认。……该伪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43]。一些已“独立”的盟旗宣布取消“独立”，许多在京蒙古王公还派人回旗劝导各属拥护民国。这些事实说明，绝大多数蒙古人民和王公热爱祖国，也说明北京政府对内蒙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可是，当北京临时政府企图由此进一步解决外蒙问题时，情况就远不是如此简单了。

在《俄蒙协约》签订前，北京政府对外蒙“独立”问题可说是犹豫

不定，久无对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外蒙问题的复杂国际背景，不仅仅是沙俄的插手，日、英两国还和沙俄互有密约和默契，使迫切需要得到列强承认的北京政府在解决外蒙问题时更难着手。另一方面北京临时政府面对的国内局势也不容乐观，财政困难，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安定，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尚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逐步铲除革命党人的势力，实现自己的“统一”计划，实际处于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自然不会把外蒙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但如果听之任之，事关国家主权，对全国人民无法交代。因此，袁世凯在外蒙问题上，实际上陷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既不能听任外蒙离去，国内外环境一时又使其无心也无力去彻底解决外蒙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拖延。

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外蒙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自应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确实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44)]。北京政府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除此之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中先行出发的兰逊（Lanson）牧师等已在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改与中国政府协商。但是，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在给袁世凯的回电中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45)] 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的联系，自然更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袁世凯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队出征不甚积极，沙俄又为外蒙后援，极力威胁中国不得进兵。1912年3—4月间，正当中国东路由黑龙江向外蒙边境调兵，西路由新疆调兵援阿尔泰时，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决不承认”。沙俄外交部公开威胁中国公使：“中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46] 逼得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暂缓调动，免生交涉”[47]。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和沙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这是沙俄自外蒙“独立”后的基本立场，由中俄间的交涉，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现状，无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能为其后的侵略留下伏笔。

还在清帝退位前，沙俄已在要求由中俄接触解决外蒙问题，其“目的在于缔结一项保证蒙古自治的中蒙条约”。对该条约所应包括的内容，沙俄政府也详细指示了驻华代办谢金[48]。1911年12月31日，谢金即据此照会清外务部，提出中国在外蒙不驻兵、不殖民、外蒙自治、俄国在库伦有筑路权等五条要求[49]，被清政府婉拒。1912年，俄方又重提上述要求。4月2日，沙俄驻华代办谢金在会见袁世凯时，要求中俄尽早就外蒙问题达成协议，并向袁明白表示“帝国政府通过的决议不能改变”。鉴于在中国内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屡行不通，袁向谢金表示他个人“赞成”同俄国“达成协议”[50]。不料在内阁会议讨论沙俄要求时，大多数人认为，外蒙是中国领土，不容俄人干涉，决议对俄国要求置之不理。会后，外交部于8月13日授权驻外使节再次声明：“民国对于满蒙藏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51] 此时外蒙虽声称“独立”，但国际国内尚无公开承认者，北京政府自觉事态尚未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拖的方针还可以维持下去。

《俄蒙协约》的签订使外蒙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中国一直拒绝与沙俄交涉，沙俄考虑必须对中国施以进一步的压力。沙俄驻京公使库朋斯基建议“俄蒙条约宜从速订结”。而英国在西藏问题上

的态度，也使沙俄“觉得对待蒙古问题，亦有仿英办法采用强硬手段之必要”[52]。在此情况下，沙俄决定将前述之威胁付诸行动，与外蒙发生直接关系。1912年10月，沙俄派前驻华公使、侵华老手廓索维慈去外蒙和库伦当局进行秘密谈判。行前沙俄总理大臣可可维慈指示廓索维慈：“蒙古必须对俄提出若干权利，以报偿之，尤其是应当允许俄人得有在蒙殖民、在蒙购地之权。”[53] 在俄蒙谈判中，廓索维慈软硬兼施，一方面威胁外蒙不得与中国谈判，否则“若无俄国之参与，而蒙古径与中国订约，则俄国政府对于此种条约，决不加以承认”[54]。另一方面又以二百万卢布贷款为诱饵，引诱库伦当局上钩。最后终于1912年11月3日迫使库伦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

《俄蒙协约》共四条，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蒙古无论与何国订立任何条约，未经俄政府允许不得违背本约及附约内之各条件。附约《通商章程》共十七条，给予俄国人广泛的权利，如俄人得在蒙境内自由居住、往来、经商、租地、买房、开垦、经营矿产、森林、渔业等事业，进出口免税，俄国银行有权开设分行，俄国可在外蒙设领事，领事居所可设专归领事管辖的贸易圈，有治外法权，俄国可在蒙古设立邮政[55]。《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一方面完全无视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地方当局根本无权与外国订立这样的条约，另一方面又使沙俄在外蒙获得了近似于殖民地的种种特权，使外蒙实际上沦为沙俄的保护国[56]。通过《俄蒙协约》，沙俄等于承认外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尽管它还不敢公开承认外蒙是一个独立国家。然而沙俄深知，没有中国的承认，《俄蒙协约》很难真正付诸实施。因此它仍然要通过中俄谈判进一步迫使中国承认这个协定，而《俄蒙协约》签订的本身，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拒不谈判的一种威胁手段。

《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革命党人一致指责袁政府应付无方，坚决主张不予承认。孙中山分别致电袁世凯

和参议院，认为“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必须坚决“否认”[57]，并提出以钱币革命对抗沙俄的主张[58]。全国各政党团体也都通电痛斥沙俄侵略行径。各地纷纷成立“救蒙会”、“抵制团”等，抵制俄货，不为俄人服务，并索兑俄币，以致出现了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币“不能流通市面”的局面[59]。

面对《俄蒙协约》签订的形势，北京政府对外蒙问题的拖延策略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得知《俄蒙协约》签字的消息后，北京政府首先令驻俄公使刘镜人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立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60]为了在外交上有所转圜，北京政府又令各驻外使馆探听反应，希冀能得到列强的一点支持，岂料“各国官方的反应非常冷淡”[61]。当时英、日正为西藏、满洲问题与中国讨价还价，法国是沙俄同盟国，它们当然不会反对沙俄的行动。列强中只有德国表示了一点所谓“同情”，但这并不足以为北京政府的寄托。反观国内，主战声浪虽高，实际出兵并非易事，面对日趋紧张的与革命党人的矛盾，袁世凯也不会轻易调兵北上。正如时人所分析的，“袁项城因为内地异己势力尚盛，既不肯调同派军队远征，又不欲遣派异派军队立功，尤虑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不利于己”[62]。结果只有与沙俄谈判解决外蒙问题。这是中国一直力图避免而沙俄则求之不得的解决方法。

《俄蒙协约》签订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梁如浩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前驻俄公使陆徵祥继任外交部长。1912年11月起，陆徵祥开始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基会谈外蒙问题，至次年5月双方商订六款草约止，共会谈二十余次。在11月30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沙俄提出四项条款，包括中国不更动外蒙行政制度、不在外蒙殖民、承认蒙古得有军备警察之组织、由俄国调处规定中蒙交涉及领土范围事宜、承认俄蒙商约各条[63]，俨然一副外蒙主子的架势。

中国方面在对案中，同意中国不改变外蒙古旧制，不于旧制外驻

兵、设官、殖民，但要求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完全领土主权及治权，不干涉中国在外蒙的政策措施[64]。此后的会谈，双方即围绕各自的基本立场反复争执。沙俄抱定“欲使外蒙恢复旧状万不可能”的蛮横态度，极力压迫中国接受其提案。1912年底，北京临时政府为应付财政困难，向列强提出暂缓交付庚子赔款。沙俄立即在中俄会谈中表示：“倘蒙案尚未解决，则俄国不能应允。”[65] 次年5月，库朋斯基唯恐会谈久拖不决，更直接地威胁说：“若不从速议决，本国只有直接与库伦提议，彼时情变事迁，条件亦必因之迥异，果尔则中国虽欲按照今日之条件议结，本国政府亦不能应允矣。”[66] 对中国来说，外蒙本是中国领土，自应坚拒沙俄的无理要求，无奈实力不够，气也就壮不起来。北京政府事前即规定了交涉方针是“持和平主义，以事折冲，不欲致有决裂”[67]。当时又值“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迫切需要列强的谅解和支持，因此急于早日结束这场交涉。沙俄之所以敢于如此威迫中国，正因为它看透了北京临时政府的弱点。在此情况下，中俄双方遂于1913年5月20日达成协约草案六条，主要内容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尊重中国旧有权利，中国不更动外蒙古历来之地方自治制度，许其有组织军备警察之权、拒绝非蒙古籍人殖民之权，俄国不派兵至外蒙，不办殖民，中国以和平办法施用其权于外蒙古，中国同意《俄蒙协约》所给予俄国的商务利益[68]。沙俄除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让步外，实际上达到了谈判开始时的预定目的。

中俄草约于5月26日经国务会议通过，5月28日提交国会讨论。为了从速通过，袁世凯特意咨请众院秘密审议，省略通过及三读手续。陆徵祥在出席说明中，解释达成此草约是因为“北蒙地势辽远，非我国现时财力所能经营，只能姑允俄请，日后另筹回复”[69]。袁世凯在国会中的追随者进步党立即表示“承认大体修正条文，并认定此事绝无党见发生之余地”[70]。但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坚决反对这一草约，认为这无异于断送外蒙。国民党人还利用这一草约揭露袁世凯无心抵御外侮，却一心消灭异己的行径，指出政府“空言搪塞，不肯

实力维持，蒙古尚可增兵，我国未加守备，反至调兵南下，贻俄人以乘间进行”[71]。众院讨论草约后，提出修改意见，其最要之点为外蒙不得称中央长官，军警须受中国政府节制。然陆徵祥据此和俄方交涉时，俄使竟声称，“已奉有政府最后之命令，无修改之余地”[72]。因此袁世凯只能将草约强行交付表决，众院于7月8日通过，参院则于湖口起义的前一日7月11日将草约否决。沙俄政府不少官员本来就对草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不满，现在见草约未通过，干脆于13日由政府致中国外交部一份照会，另提四条提案，明白要求中国承认外蒙自治。至此中俄交涉暂时陷于停顿，袁世凯忙于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一时也顾不上此事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一”了全国，外蒙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中俄双方又开始了新的一轮会谈。此时孙宝琦继陆徵祥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方面，俄方代表仍为库朋斯基，从1913年9月18日起，至10月29日结束，共会谈十次。沙俄在会谈中，除了坚持过去的要求外，又得寸进尺，提出中国应允许外蒙办理境内一切内政、工商事宜，条约中应将中俄蒙三方并列，使外蒙成为实际上的独立国家。对中国方面所主张的于条约正文中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理所当然的要求，沙俄坚不同意，只允列入附件[73]。既然袁世凯在以前的谈判中已是步步退让，那么他现在也别无良策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能屈服于沙俄的压力。更有甚者，尽管国民党人在战场上失败，但袁政府仍心有余悸，为了逃避国会审议的手续，竟在会谈中主动提议，不以缔约形式而以互换公文的方式解决，沙俄当然同意。1913年11月5日，中俄双方正式签字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

《中俄声明文件》正文共五款，规定：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三、中国承认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事权，不驻兵，不派驻文武官员，不殖民，俄国亦担任不派兵、不干涉外蒙内政、不殖民；四、中国声明承认俄国调处。按照上述各条及俄蒙商务专款明定中国与外蒙

古之关系；五、凡关于俄中两国在外蒙之利益及发生之问题均应另行商订。《中俄声明文件》还有另件四款：一、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三、正文所载随后商定事宜，当由三方面约定地点委派代表接洽；四、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74)]。

《中俄声明文件》的签订，使中国除了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外，丧失了对自己的领土外蒙古的几乎一切权利。从此中国在外蒙只剩下一个什么也管不了的驻库伦都护使及人数少得可怜的一点卫队。对沙俄来说，文件基本满足了它的侵略野心。它虽承诺不派兵，不殖民，但它在外蒙已驻有军队，俄蒙商约里也允许俄人在外蒙自由居住经商，因此，文件对沙俄的侵略行为并无约束力。难怪沙俄外交大臣在给驻外蒙外交代表的信中得意地声称，外蒙“虽然对中国还有一种宗属关系，但实际上对一切事务皆可独立处理”[(75)]。所谓“独立处理”，其实就是听从沙俄处理。袁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给袁世凯的呈文中，竟还厚着脸皮说什么此约“似与土地主权稍获挽救”[(76)]，真是自欺欺人。

《中俄声明文件》签订后，根据文件的规定，中俄蒙三方于1914年9月8日起在恰克图会议，解决各项未决问题。中国代表为专使毕桂芳、驻墨西哥公使陈箓，俄国代表为驻外蒙总领事密勒，外蒙代表先为达喇嘛达锡札布，后为“司法副长”希尔宁达木定。三方各自提出了条约草案，其争执的要点在于铁路、邮政、税则、司法诉讼等具体问题。沙俄代表在会上力图扩大各种侵略权益，并一再威胁中国方面，“若会议因中国提议让外蒙万难承认之条件而无效，俄当一再扩充承认蒙古政府事实上自治发生之效力”[(77)]。中国代表曾希望通过会议挽回一些利权。但是，此时正值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吃紧，袁政府唯恐再得罪沙俄，指示代表“务望设法勉力解决，免致功

败垂成，且碍大局”[78]。为了打破会议的僵局，袁政府令代表可以用“彼有实事，我徒虚名”的方法向俄方让步[79]。这个“徒虚名”的指导方针是导致中方失利的原因之一。结果虽然保存了虚名，许多国家主权和利益却被断送了。这是封建自大思想加妥协退让精神的半殖民地外交的典型。

由于中国代表的让步，在经过几十次会议后，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协约》共二十二条，大致内容包括：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中、俄承认外蒙办理一切内政及与各国订立关于工商事宜条约之专权；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内政之制度；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不纳关税，但须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凡关于中蒙、中俄人民诉讼事宜，均由中蒙、中俄双方会同审理，《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等[80]。《中俄蒙协约》将前此沙俄获得的各项侵略权益确认并加以具体化，中国除了得到一个毫无实际作用的册封权及使用民国纪年外，于实际一无所获。

《中俄蒙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库伦活佛于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北京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于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民国初年喧嚣一时的外蒙问题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沙俄除了策动外蒙独立、扩大侵略权益而外，还非法窃占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唐努乌梁海在外蒙西北部，面积17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中国。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界约》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清朝统治时期，它一直属于清驻乌里雅苏台将

军管辖。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金矿和其他资源的发现，俄国人蜂拥而入，到辛亥革命前后，已达到一万多人，占当地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沙俄开始积极图谋吞并该地。1912年1月，沙俄驻华代办谢金呈请沙皇立即占领乌梁海地区，可是就连沙俄外交大臣萨查诺夫在研究了国家档案后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极为不满，他提醒萨查诺夫："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解决此事，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利益。"[(81)] 1914年初，萨查诺夫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内阁关于合并乌梁海的政策是正确的[(82)]。4月，沙皇批准了这一备忘录。6月，沙俄军队即开进唐努乌梁海地区，任命格里哥列夫为乌梁海事务长官，组织大规模的俄国移民，1915年又宣布俄国的民、刑法典全部适用于该地区，并拒绝了外蒙根据《中俄蒙协约》划定的界限在唐努乌梁海派驻代表的提议。沙俄就这样强占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

三　英国觊觎西藏及中英交涉

西藏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清朝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顺治和康熙帝都曾给该地区两大统治首领达赖和班禅喇嘛优加封号。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叛军之乱后，开始派员驻扎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设驻藏正副大臣二人，分驻前后藏。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有关藏内大小事务，"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83)]，并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整套制度，表明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印度的地位不受损害，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次是掠夺西藏丰富的

羊毛、皮革、矿产资源，推销印度茶叶和工业品，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为达此目的，英国先后发动了1888年和1903年—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通过随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英国攫取了一批侵略权益，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尽管如此，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也不得不“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84]。但它并不就此住手，而是在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实现其侵占西藏的阴谋。

英军两次侵藏战争，更兼沙俄也野心勃勃，窥视西北，使清廷感到西藏地位的危险。清政府内部的不少官员鉴于“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的状况[85]，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1906年，张荫棠出任查办藏事大臣，拟定善后办法二十四条，主张在西藏练兵筹饷，革除苛政，振兴农工商业。未及实行，张即离任。新任驻藏大臣联豫积极推行新政，设立督练公所、巡警局、电报局、学务局等新机构[86]。在西藏改革的同时，清廷又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藏人聚居的四川西部进行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改革。清廷在西藏与川边的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巩固祖国边疆，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改革往往带有民族歧视意味，不容易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同时又与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阶层的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遭到他们的反对。

英军两次侵藏后，为了消化侵略成果，也为了避免与沙俄的冲突[87]，英国对西藏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更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势力。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专员等人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汉藏关系，制造和扩大汉藏矛盾。驻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麦克唐纳曾供认，每当汉藏间发生争执时，他总是火上加油[88]。随着藏印贸易的发展，西藏产生了一批靠

垄断羊毛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亲英派的主要人物。亲英派首领伦青夏札即因专靠羊毛贸易营私舞弊，被联豫下令抄没家产。清廷在西藏的改革措施自然激起西藏上层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除呈请暂缓改革外，还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决定恢复鸦片战争后名存实亡的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入藏，以加强控制。1910年2月12日，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入藏的企图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偕夏札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英国如获至宝，“处处从事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为他打气。并“预备馆舍，供给一切，未及两年，达赖与藏员尽为所愚，而倾向维殷矣”[(89)]。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至西藏后，原本平静的藏局再次开始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活动，此时革命消息传来，即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13日，郭元珍、何光燮等人领导兵变，囚禁联豫，推钱锡宝为首领。不久为钟颖击散[(90)]。其后，联豫称病避入布赉绷寺休养，藏政由钟颖主持（次年5月1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钟颖为驻藏办事长官），拉萨局势稍定。但不久征讨波密的军队于撤退途中闹事抢劫，与藏军发生冲突，并波及江孜、日喀则等地。次年三月，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抢掠寺院而激化，双方为此而开战。汉藏间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清廷民族压迫政策的恶果，然而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可是英国却感到有机可乘，遂极力插手，企图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在英国的怂恿和策动下，所谓西藏“独立”的喧嚣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掀起。

辛亥革命爆发后，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明托赶赴大吉岭与达赖密谈。其后达赖遣派的官员即潜回西藏进行煽动，达赖的内侍亲英分子达桑占东负责具体组织军事叛乱。他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自

任总司令，1912年3月开始向江孜驻军进攻。经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当地清军被迫交出武器弹药，取道印度回内地[91]。接着，日喀则的驻军亦遭同样之命运。自1912年4月起，达桑占东调集各路叛军包围并进攻拉萨，与守军展开激战。守军因“兵饷欠罄”，“内缺枪弩”，英国声援藏人，“复禁卖粮食”[92]，不得已只能接受英国指使的廓尔喀驻藏官员噶卜典的“调停”，和藏军达成四点议和条件，将枪弹交出，经印度回内地，并赔偿兵变损失，只驻藏大臣留驻拉萨[93]。9月，驻藏军队陆续启程返回内地。11月，达赖强令留藏所有官员必须于11月10日前离开西藏[94]。钟颖及其卫队被迫离开拉萨，先移驻靖西，次年3月回内地。至此，所有驻藏官员及军队均被英国支持下的西藏上层亲英分裂主义势力驱赶出境。

1912年6月，在印度流亡了两年多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从噶伦堡启程回藏。在行前的欢送仪式上，英国官员公然表示：英国的愿望是，“在中国维持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不进行干涉的条件下，看到西藏内部自治，他们期望达赖喇嘛能尽其一切力量，达到目的”[95]。有了英国人的支持保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更为猖狂。在藏内，他们挑动民族仇恨，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净尽”。在藏边，藏军东进，切断川藏交通，到6月中旬，藏军先后攻陷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川边未被攻陷的县城，南路只有三个县，北路尚余八个县，由此直接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96]。

1913年初，达赖派亲信德尔智潜赴库伦，与沙俄卵翼下的外蒙当局秘密谈判，签订了所谓“蒙藏条约”，议定双方相互承认脱离中国而“独立”，互相援助[97]。通过这一行动，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又得到了沙俄的支持。这样，西藏问题就成了继外蒙问题之后，困扰北京政府的又一大边疆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已明确宣告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袁世凯任总统后，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在1912年4月22日发布的大总统命令中，要求“蒙藏回疆等处”“通筹谋画，以谋内政之统一”[98]。

面对当时的西藏局势，首先是藏军武装进犯川边所造成的对川、滇两省的威胁，北京临时政府决定对藏政策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这一政策之所以能付诸实施，主要原因在于川、滇两省的地方当局鉴于切身利害关系，对进兵态度积极。川督尹昌衡认为，必“先有武装而后有和平”[(99)]。因此川、滇两省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派兵西征。对袁世凯来说，只要不出动北洋军队而由川、滇两省出兵，既可免伤实力，又可削平藏乱，自然是件好事。川、滇两省军事行动的部分成功，成为稳定藏局，使西藏事态发展没有演变到外蒙那种地步的重要因素。

1912年7月，川督尹昌衡亲率川军前队二千五百人从成都出发。8月，川军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收复河口、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解察木多、巴塘之围。与此同时，云南都督蔡锷派遣的一支军队在殷承谳的率领下也收复了盐井等地。到8月底，川边失陷之地已基本收复，形势趋于稳定。

川、滇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后台老板英国终于忍耐不住了。它放弃了所谓“不干涉政策”，开始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还在川、滇两省的进兵尚在准备中时，6月23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会谈，就中国迫切需要的借款问题提醒袁注意，如果川军的进兵超出一定范围，英国政府就“不会对中国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100)]，进而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或与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101)]。此后朱尔典在与袁世凯的几次会谈中，又重提中国不得派兵入藏，不得改西藏为行省，否则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102)]。在这些威胁一时未见效，而藏军在川、滇军兵锋之下不断败退的情况下，8月17日，英国方面正式向中国提交照会，声明五点：一、英政府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二、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三、英国不欲允准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四、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意施于民国；五、暂时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视为

断绝[103]。英国的照会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明目张胆的干涉。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如何行事完全是自己的事，英国根本无权干涉，何况英国自己也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承认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英国此举，是洞悉袁世凯政府迫切要求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不敢轻易与英决裂，才如此行事的。9月6日，朱尔典在与外交次长颜惠庆的会谈中，更进一步威胁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不令川滇军停止西进，英国不仅不承认中国政府，且将以实力助藏独立[104]。前此，袁世凯与朱尔典的会谈中，袁已承诺中国并无将西藏改为行省之意[105]。现在，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有求于列强的北京临时政府终于改变了立场。8月30日，国务院致电尹昌衡，令其“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106]。9月12日，又令尹昌衡，“该军已到察木多之队，务饬切勿过该处辖境”[107]。同时，滇军亦奉命暂缓进军。这样，川、滇军基本上停止于怒江一线。有人评论说：“战胜川军者，非藏兵也，英使朱尔典也。”[108]

武力解决的方法既行不通，北京临时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剿为抚，“冀以怀柔之手段，牢笼藏人”[109]，即通过和西藏地方当权人物的直接交涉，求得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1912年9月，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参院秘密会议上说明北京政府今后的对藏方针是，“不施行新制，悉依旧法”，“承认达赖之归藏，及复其封号”，保护英人在藏之生命财产[110]。10月28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因离藏出逃被清政府开革的达赖封号，次年4月1日又加封班禅，并对联豫等人及滋事官兵予以处分。蒙藏事务局着手拟定《西藏待遇条例》，内容大致同于《蒙古待遇条例》。北京政府任命的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和劝慰员杨芬也先后到达印度，准备入藏与达赖交涉。1912年12月，袁世凯致电达赖，表示已令有关方面停战，并希望达赖“亦转饬属下停战”，“所有滋事以来汉番曲直及善后一切事宜，另派专员商办”[111]。

在北京临时政府的努力下，西藏地方当局一度有过和解的表示。1912年底，达赖先后通过钟颖及袁世凯任命的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项条件[112]，同时还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表示愿意“妥商”西藏事务。北京政府和达赖的接触之所以未能最终导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除了达赖本人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外[113]，更主要的在于英国的干涉和阻挠。自8月17日英国递交照会后，英印当局立即切断了中藏间经印度的交通（这是当时进藏的主要通道）。杨芬、陆兴祺等人滞留印度，不能前进。杨芬“迭电达赖及其噶布伦等”，“然所发函电皆为英人扣留，复密行雇人投递两次，亦为该处英人阻回”[114]。后来还是通过达赖驻印交涉员札喜旺堆，杨芬才与达赖建立了间接联系。对陆兴祺出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英国根本不予承认，也不准其与藏人通信，否则即要令其离印[115]。和达赖的直接接触都无法建立，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就更谈不上了。在英国的怂恿支持下，达赖于1912年底致电袁世凯，声称汉官兵尽退，藏自相安[116]。西藏当局并作出决议：“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限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117]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自恃有英国为后盾，关闭了协商大门。武力和和平的路都走不通，北京政府于无可奈何中只得和英国交涉解决西藏问题。

民国初年的所谓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政府有意制造出来的。而自问题发生后，英国政府的中心政策，是要由中英双方的交涉，规定西藏今后的政治地位。其目的是：“西藏虽然名义上仍可保留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邦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应使它处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实际上是英国政府——编者注）的地位，而且还应该成立一个有效机构，以便把中国和俄国都排挤出去。”[118]毫无疑问，这将给英国带来莫大的好处，可以由此分裂西藏，控制西藏，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再添上一笔资本。沙俄在外蒙的扩张及北京政府的软弱态度，同时刺激着英国的侵略欲望。英印总督哈定在给本国政府的信中写道：“既然俄国对蒙古政府的支持并没有随之以反俄浪潮，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猜想，英国反对把西藏划入中国会导致反英浪潮。”

[119] 1912年8月17日英国的照会，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川、滇军队的进军，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中英就西藏问题改订新约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英国的侵略合法化。照会提出后，北京临时政府虽已下令暂缓进军，但也不想和英国重订新约，因为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对英国照会一直采取拖延而不作答的态度。英国在几次催促无效后，12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授意朱尔典，如果不承认民国政府尚未构成对中国的足够威胁，则可通知中国，除非它按照英国条件在三个月内进行谈判，否则英政府将视1906年《中英条约》为无效，并将自由地与西藏直接谈判，英国政府还准备给西藏以实际支持，建立和维护西藏的独立 [120] 。两天后，朱尔典在与外交次长颜惠庆的会谈中，两次要求中国作出正式答复。他还进一步暗示说，这些条款是在中国于西藏尚有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提出的，远远超过中国现时所能期望获得的最大权利 [121]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可以得到的英国方面的让步不会超出条款以外的范围。这些话中公开和暗含的意义都不难理解，北京政府当然不会不明白。

1912年12月23日，中国政府对英国照会逐条作出正式答复，声明：一、中国对西藏拥有全权，惟现时无意改西藏为行省，但亦不许其他一切外国干涉西藏之领土权及内政；二、中国于西藏为履行条约，维持治安，必须驻有军队，但非无限制；三、中英已两次订立关于西藏之条约，今无改订新约之必要；四、中国政府并无有意阻断印藏交通之事，以后更当加意保护；五、承认中华民国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深望英国先各国而承认 [122] 。这个答复在不改西藏为行省，不驻扎无限制军队等问题上满足了英国的要求，但答复仍然拒订新约，又使英国“十分不满意”，因为拒订新约，实际上就是认为旧约有效，从而也就确认英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英国政府在对中国答复的答复中，无理认为中国答复“无法讨论”，英国政府只能以“上年八月十七日所备节略为根据，会商允洽之法” [123] 。朱尔典公然威胁外交总长陆徵祥：“不订约恐办不到。” [124] 此时，正值“善后大借款”前夕，为了不得罪英国人，北京政府终于1913年3月27日通知朱尔典

称，中国准备按照8月17日照会中所列条件与英国会商[125]。经过一年多的抵制、拖延、犹豫，北京政府最终还是只有屈服于英国的压力。

中国方面同意英国要求后，在正式会谈前，中英双方曾就会谈的方式、内容有过几次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英国节外生枝，提出由西藏代表作为独立方面与会。举行中英藏三方会议的想法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于3月间首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他认为三方会谈是达成协议的最好解决办法，“即使谈判失败，也将使我们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和西藏人进行独立于中国人之外的谈判”[126]。此后，英国政府将朱尔典的建议当作一项政策执行。在和中国方面讨论会议方式时，英国坚持要中英藏三方共同会商订约，共同签字。如同中国方面所指出的，此“不啻承认西藏有主约之权，而等于自主之国”[127]。中国方面为了满足英方的要求，作了一点让步，同意举行三方会谈，但为避免给人以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中国建议，西藏代表不称全权字样，而是“称为掌权员，随同商议”，或者由中英、中藏分别会谈，分别签约。此项建议遭英方拒绝，他们声称，三方会议的办法英国政府“势在必行，必无更改之理”[128]。8月25日，英国通知中国，无论中国代表与会与否，会议都将在10月6日开始[129]。中国方面在英帝的威胁下只能再次让步，同意参加三方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与陆徵祥的会谈中提出，“鉴于四川之设西康省，其西部纯系藏境，将来立约不能不规定藏境，明分川藏疆界”[130]。这为其后西姆拉会议中的划界问题埋下了伏笔。

1913年10月6日，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开幕，10月13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会址选在印度，是英方的主意，目的在于就近控制会议进程[131]。英方代表是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另以原英驻华使馆官员罗斯为中国事务顾问，英驻锡金委员柏尔为西藏事务顾问，西藏代表为亲英集团头目、首席噶伦伦青夏札。还在会议开始前三个月，柏尔就与夏札在江孜秘密勾结，“每日互商对付中国交涉

办法”[132]。柏尔要夏札搜集各种档案文献资料，以此作为西藏“独立”的“证据”[133]。中国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10月5日方抵达西姆拉，在会议期间，“英人又禁止藏代表不与通信”，中国代表“一切举动，均派员陪侍，名为招待，实无异监视”[134]。西姆拉会议就是在这种英藏双方“协而谋我”的气氛中进行的。

西姆拉会议开始后，藏方首先提出六条草案，主要内容包括：西藏独立；西藏疆域要包括青海、理塘、巴塘、打箭炉等处；中国不得派员驻藏；英藏修改通商章程，中国不得过问等[135]。这些要求不仅要使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还就西藏疆域划了一条囊括青海和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的界线，其荒谬程度连英驻华公使朱尔典都无可为其辩解。朱尔典曾就此评论道：“没有一个人能使我相信，打箭炉和巴塘不属于中国人。”[136]藏方的要求遭到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11月1日，中国代表提出驳复条款七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可派驻藏长官及卫队二千六百人驻扎西藏；西藏于外交及军政事宜均应听命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通商条款之修改应由中英双方商议；中藏边界以当拉岭、江达等处划分[137]。次年1月，中、藏双方各自提出正式意见书，内容大略同前，请英方审查。本是侵略一方的英国，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内部问题的仲裁人。麦克马洪主持会议，名为“调停”，实际处处干着有损中国主权的勾当。

就在西姆拉会议进行之中，1913年11月5日，关于外蒙问题的《中俄声明文件》发表。麦克马洪立即从这个英国的侵略伙伴的行动中得到“启发”，便向英国政府建议，仿效沙俄办法，将西藏一分为二，以此解决显然将成为会议关键的西藏划界问题。英国政府于1914年1月6日认可了这一建议[138]。2月17日，麦克马洪在就中、藏双方的提案提出审查意见时，抛出了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计划，其要点是：“承认外西藏业已成立的自治权，而中国于内西藏仍有若干权利。”这就是英国心目中“俾全藏可复返太平”的“合理的解决办法”[139]。3月11日，麦克马洪正式交出英方调停约稿十一条，内容包

括：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承认外西藏有自治权，所有外藏内政由拉萨政府掌理，中国不改西藏为行省，西藏不有代表于中国议院或类似之团体；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英藏议订新通商章程，废除190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英国商务委员可于必要时随时带卫队前往拉萨等[(140)]。约稿将青海的大部分及四川西部均划入西藏界内，其中再划为内藏与外藏，即使外藏亦包括青海及川边的部分地区[(141)]。这个“调停”约稿表面上使中国对西藏保留了某些权利，如可派代表驻藏等，但约稿的其他条文，又使这些权利的作用几近于零。约稿只允许中国在西藏有卫队一百名，除了能起些驻藏代表的警卫作用外，对控制藏局没有任何影响。约稿的实际作用是让西藏以自治之名，行独立之实。而这种所谓“独立”，无非是由英帝国主义控制，使西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从约稿中规定给予英国的种种特权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英国方面的“调停”约稿提出后，除了划界以外的其余各条，北京政府鉴于外蒙的成例可循，没有表示过多的异议，只提出西藏在中国议院不得有代表的条款不能接受，英藏通商章程须经中国同意；惟对划界一事，虽一再让步，但坚持不同意英方的主张。因此，西姆拉会议的争执焦点即在于西藏（包括内外藏）界限的划分问题。中国方面最初主张以江达为川藏界，当拉岭为青藏界，这是前清时代赵尔丰经营川边所达到的最远界。其后，为了和英国达成妥协，中国一让再让，由江达，而丹达，再到怒江，最后提出，当拉岭以北青海地方及巴塘、理塘等地仍归中国完全治理，怒江以东及德格、瞻对、察木多、三十九族等地定为特别区域，不再添设郡县，维持达赖喇嘛向有之利益，怒江以西由西藏自治[(142)]。中国对英国的要求可谓是曲意迁就，但英方仍固执不让。4月15日，麦克马洪对英方约稿作了部分删改，但实质未变。麦氏尚抄袭沙俄故伎，另拟七款作为附约，包括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企图诱惑中国上钩[(143)]。4月27日，英方提出修正案，除在界务问题上作了少许让步外，文字基本照旧，仅在条约附图上将白康普陀岭、阿美马顷岭东北之地划归青海。英藏

代表先行签字后，英方威胁中国代表在此修正案上签字，并声称如“不于今日画行，则约稿中之第二、第四两款（即承认中国对藏有宗主权及代表驻藏的条款——编者）全行删去，即与西藏订约，不再与贵员商议”[144]。在此情况下，中国代表陈贻范被迫于约上草签，但随即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签押一层，必须奉有训令而后可。”[145]

西藏问题与外蒙问题虽都是英、俄帝国主义挑起的，但两者却有一点重要不同。外蒙没有驻扎中国军队，内外环境又使进兵不可能，北京政府于无可奈何中只有接受沙俄的摆布。而民初川、滇军队的西征，使中国在藏边有了一块根基，它虽不甚稳固，但毕竟在中国手中，西姆拉会议中英方所划的内藏区域，相当一部分尚驻有中国军队。即使有英国的支持，藏方一时也无力占领这些地方。中国无力改变西藏现状是一回事，但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军队，拱手送人，则是北京政府于心不甘，于势亦不敢的。这是北京政府在划界问题上不肯轻易让步的原因所在。4月28日，中国政府接获陈贻范草签的报告后，立即去电声明：“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146] 29日又通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陈使为势所迫，以个人不正式之画行，本政府不能承认，仍希根据前电，向英政府交涉，请其电英员按照中政府业经让步办法，接续磋议为要。”[147]

1914年4月以后，西姆拉会议的日程表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澜。英国唯一可做的事就是逼陈贻范在草约上正式签字，同时在外交上与沙俄就条约中可能违反1907年英俄协约之处达成谅解。1914年6月25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照会中国政府，再一次公开威胁中国“除非该协约于本月底前签字，本政府将自由地单独与西藏签约。在此情况下，中国当然将失去所有三方协约内载的特权与利益，包括她的宗主权的承认。驻藏大臣之返藏亦将无限期推迟。本政府并将尽其所能协助西藏抵抗中国侵略”。[148] 虽然中国在划界问题上又作了若干让步，但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仍于7月2日通知中国代表将于次日签约。

英代表还重复了一遍以前的威胁。为了引诱中方签约，英代表故作姿态，告诉陈贻范："明日会议有图两份：一为旧图，一将昆仑以北之境，划归中国……不再有内藏之名，如中、英、藏三面签押，则签此新图。如仅英、藏两方签押，则签四月二十七日之图。"(149) 但陈贻范奉中国政府之命拒绝签字。7月3日，英国代表只能与西藏代表私行签订了所谓《西姆拉条约》。陈贻范当时即严正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150) 7月6日，中国政府又向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并通过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向英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致不能同意签押，并不能承认中国未经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牍。"(151)

《西姆拉条约》正文共十一条，除个别之处，基本上同于3月11日的英国"调停约稿"。条约另有交换文书七款及声明一件。交换文书一方面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达赖喇嘛的封号由中国政府加封，另一方面又规定，外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免，外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国会及其类似机关，从而实际上使西藏居于"独立"地位。声明一件则认定："只要中国拒绝在上述条约签字，中国将被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生的一切权利。"(152) 《西姆拉条约》虽由英藏双方签署，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因而这一条约完全是非法的，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进一步而言，当时的西藏地方是中国的完全领土，西藏地方当局受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根本无权与外国私自订约，这更说明《西姆拉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可言。它只能作为英国侵略中国、阴谋分裂中国领土的铁证留于史册。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除了逼签条约外，还进行了其他一系列阴谋活动。7月3日，英、藏还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十一条，其中包括英国可以在西藏全境租赁土地、兴修建筑、自由贸易、架设电线、会同审判等条文(153)。这个章程未经中国政府认可，其根据又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因而同样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同年3月24、25日，麦克马洪在德里和夏札两人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

西藏东南与印度的界线[154]。它以英国阿波尔远征为基础[155]，把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约九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印度。这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由来。此事根本没有在西姆拉会议上讨论过，中国政府也不知道此事，当然就更谈不上承认了。这是一条完全非法的无效的边界线。

西姆拉会议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而就此收场。7月10日，英国外相格雷在议会演说时，再次要求中国签字，并威胁说：“只要中国不这样做……后果对中国来说一定是灾难性的。”[156]然而中国政府坚持不签约的立场，终于使英国无计可施。

第二节　银行团与善后借款

一　列强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

国际银行团是对华资本输出的垄断组织，发端于前清末年。当时，铁路让与权的争夺迫使各资本集团降低了对华贷款的条件，削弱了彼此之间掠夺中国的力量。于是，他们着手筹组国际银行团，以便垄断对华借款，共同剥削中国。1909年7月6日，英、法、德财团之间，签订了组织三国银行团的协定，翌年11月10日，美国也加入了银行团，遂发展为四国银行团。就银行团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经济组织。英国财团以汇丰银行（The Hongkong＆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为主，英国国内的主要银行没有加入对华贷款的英国财团，汇丰银行在英国政府支持下，享有对华金融上的独占地位。其他三国财团则不同。法国财团以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I'Indo chine）为主，主要的法国银行，如巴黎国家贴现银行（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里昂信贷银行（Credit Lyonnais）、法国振兴商工业合股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Favoriser le developement du Commerce et de 1，lndustrie en France）等都参加了法国财团。德国财团以德华银行（Deutsch-

Asiatische Bank）为主，德国的四家大银行都是德华银行的合股者，即贴兑公司（Diskont Gesellschaft）、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德莱斯登银行（Dresdner Bank）和达姆斯太国民银行（Bank für Handelund lndustrie）。美国财团则由摩根公司（J．P．Morgan＆Co）、坤洛公司（Kuhn Loed＆Co）、第一国民银行（The First National Bank）、花旗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组成。四国银行团组成后，即着手压迫清政府签订条件苛刻的贷款合同，1911年4—5月间，先后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整理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借款合同和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前一笔贷款因日、俄反对，除支付过少量垫款外，合同并未履行；后一笔贷款则激起了保路风潮，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列强不敢贸然给清政府以财政支持，即使是列强赞赏的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之后，他们仍持观望态度，采取了“金融中立”的政策。不过，在清帝退位之前，银行团就已在积极准备给袁世凯以财政支持。这样，银行团的对华借款的性质，就从实业借款转入了政治借款。1912年2月，清帝退位，列强即着手向袁世凯提供财政经费。当时俄、日两国处于和四国银行团对立的地位，但是列强在对华政策上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因此，英、美政府一开始就希望俄、日参加，英国政府并曾警告银行团，不要缔结没有俄、日两国参加的中国借款合同。中国政府方面，袁世凯认为“消除俄、日两国对四国银行的不信任是第一件应办的事”[157]，希望列强协调支持，来巩固其统治，并幻想借助列强合作来抵制俄、日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日本方面于3月初即表示，鉴于贷款的政治性质，它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并指定横滨正金银行为日本财团代表。俄国方面则一度表示犹豫，担心中国把借款用来对付俄国在蒙古的扩张，但为防止列强之间的竞争，“损害列强在华之政治地位”[158]，以及希望从中牵制和监督借款的实施，也打算加入银行团，因此，它指示道胜银行（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ий Банк）避免与四国银行团竞争，不要正式参加与银行团竞争的对华贷款，但为了向四国银行团施加压力，以便将来

与四国银行团达成有利的协议，因而让与俄亚银行组成辛迪加的华比银行（Banque Sino-Belge）[159] 作为私家银行出面，谈判对华贷款。

当时，中国政府方面由唐绍仪主持借款谈判，他力图利用外国银行家之间的竞争来获得借款。因此，他一面与华比银行经理德福斯（Devos）谈判一千万英镑借款，一面又通过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W．Straight）与四国银行团秘密商谈，以前清币制借款为基础，续付款项。唐考虑到一千万英镑不能满足中国方面的财政善后的需要，于是遂有成立善后大借款的拟议。当时，中国政府急需七百万两银子，主要是供给南京政府遣散军队及偿还债务（主要是日债）之用。以英国为主的四国银行团为了支持袁世凯稳定局势，同意在阳历3月份内向南京政府方面提供七百万两作为军事善后之用。袁于2月27日即电请南京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向上海汇丰、汇理、花旗、德华四行提款。次日，汇丰银行向南京政府提交了首批二百万两垫款，以中国轮船招商局船只作为担保。这笔垫款事后通知了俄、日两国，并建议俄、日两国参加。同时，唐绍仪又向四国银行团提出了3—6月的垫款要求，和在夏季达成一笔供五年用的六千万英镑善后大借款的建议。

由于北京发生兵变，四国银行团借口局势不稳，没有续付垫款，并且提出了额外要求，要袁世凯保证除了四国银行团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唐绍仪本来就厌恶银行团的垄断，现在银行团又背约不续付垫款，遂向银行团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160]。然而，袁世凯却于3月9日以信函方式接受了银行团的要求。信中说：“鉴于四国银行团在目前紧急关头所给予中国的援助，及其在外国市场上支持中国信用的贡献，中国政府向四国银行团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161] 当天，银行团即向北京当局交付了一百一十万两。尽管有此函约，中国政府仍与华比银行于3月14日签订了一百万英镑的借款

合同，以京张铁路为担保，并拟续借至一千万英镑。中国政府方面由陆宗舆代表度支部首领周自齐签字，经两总统（指袁世凯、孙文）核准，后经南京参议院通过。唐绍仪就凭借这笔比款南下组织新政府，比款也旋即向北京、南京、武昌当局交付使用。

比国借款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团的垄断，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银行团指责唐绍仪失信，违背了3月9日袁世凯的函约，原拟3月16日交付的一百万两垫款也扣住不交。3月25日，英、法、德、美四国公使直接出马晋谒袁世凯，就比款问题提出抗议，并要求取消比款（主要是取消关于给比利时发行一千万英镑借款优先权的条款），并表示如果他们的抗议得不到重视，“则需立即归还所有垫款”[162]。四国公使并且声明，“自此以后，凡关于中国借款之事，应与本国驻使交涉”[163]。当时，袁世凯竟扮演起一个银行团与唐绍仪之间的调人的角色。据德国驻华公使报告：“袁世凯对于这件轻率的行动（指比款）表示惋惜说，这是唐绍仪在因为兵变恐怕造成更困难局面的印象下进行的。”[164] 并且，袁世凯把外交交涉的责任推到唐绍仪的头上，他答复四国公使说，“此事系由唐总理经手，须商之唐总理方能决定”[165]。

列强之热衷于向中国提供贷款，除了银行家为了赢得高额利润之外，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英国外交部认为，使中国政府“克服无政府势力而趋于巩固，对于在中国拥有利益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166]。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以稳定局势，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汇丰银行代表熙礼尔（Hillier）曾对周学熙说：“我欧洲各国之外交政策之对于中国，有二种意思，既不愿中国为野心之国所并吞，亦不愿中国有异常之发达，以二者皆足破列强之均势也。自中国共和告成，我欧洲各国未尝不有戒心，深恐中国能力发展，扩充国权。”[167] 但是，在中国爱国民主精神高涨的形势下，如何去控制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呢？“他们想到，在目前只能采用一种施加影响的手段，这就是控制中国的国库”[168]。于

是，四国银行团一面答应向中国提供贷款，一面于4月间蛮横作出决定："应赋予该银行团以发行中国国家公债专权并同时监督财政，以十年为期。"[169] 同时。列强政府把银行团的活动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下，把银行团作为列强对华政策的工具。据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说："法、英两国政府拟使中国不能随意举借外债及毫无监督地使用所借之款，拟将整个对华提供款项一事，置于与中国事务关系最密切的俄、法、英、德、美、日六国监督之下，银行家只应执行这六国政府之决定。"[170] 列强妄图用财政监督的办法来扼杀所谓的"中国的沙文主义"，也就是中国的爱国主义，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当时正在南方的唐绍仪，不理会四国公使的抗议和银行团的责难，他又与华比银行订约借款二百万英镑，银行方面于4月12日先行垫付了二十五万英镑。这时，俄国政府已于4月6日正式表示同意参加银行团，并指定俄亚银行作为俄国财团的代表，因此，俄亚银行奉命不参加这笔贷款。唐绍仪于4月20日回京之后，银行团向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一方面阻挠华比银行在法国发行债票，使预定的二百万英镑借款无法续付，一方面要求唐绍仪"第一取消比款，第二谢罪"[171]。唐绍仪为了从银行团获得急需的款项，被迫于4月23日拜谒英、法、德、美四国公使，表示道歉，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在与袁世凯商议之后，于4月27日正式具名致函银行团宣布取消比款，并同意"中国政府将不从银行团未来借款中偿还从比国公司方面借到的数目"[172]。银行团当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借口唐绍仪在南方滥用比款，指责"中国用款习为冒滥"[173]，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财政监督的无理要求。当时，四国公使会议"建议银行家在同中国人讨论最近六周之内中国人所需三千五百万两垫款细则时提出条件：开支军饷、解散军队应由外国军官监督；今后使用垫款，应由各银行向财政部选派外国审计员进行监督。此外，要求中国政府保证采取措施，在外国专家参与下改革作为垫款担保的盐政"[174]。5月初，唐绍仪在与银行团谈判时，对于监督条件严正表示："国民决不承认，故亦不敢允诺。"[175] 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银行

团蓄意打击唐绍仪，他们扬言："非唐辞职，不能借款。"[176] 时适财政总长熊希龄自上海赴京履任，唐遂于5月5日向银行团声明"总理无暇，以后由熊总长直接磋商"[177]，自5月7日起，借款谈判就由熊与银行团（日、俄已加入谈判）举行。在以后的谈判中，熊希龄奉令承教于袁世凯，把唐绍仪挤出了借款谈判的决策人之列。唐绍仪为此气愤地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178]

袁世凯迫切地需要钱，他只有获得财政支柱才能稳固他的地位，因而不惜答允任何条件，5月15日，六个国家的财团在伦敦会议上，起草了给北京代表的电报，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苛刻的垫款条件，只是因为列强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电报才推迟发出。该电报草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中国政府提出垫款目的和用途清单，由六国银行团进行监督；二、作为抵押的税收必须由海关或类似机构来管理；三、垫款是善后借款的一部分，在善后借款合同规定的五年内，中国不得向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借款；四、在此期间，银行团应为中国政府的财政代理人[179]。5月17日，银行团略为降低了监督的条件，中国政府就签署了垫款合同及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该章程规定，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由银行和中国政府各任用一名核计员，签押向银行提款、拨款的一切支票，而且规定，"关于各省发给军饷及遣散军队费用，须由该地方军政府备三联领饷清单，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军官及该地方海关税司会同签押，并须予该军官、税司以调查应需之便利"[180]。这就给了列强以监督中国财政，甚至监督中国军队的特权。合同签字之后，银行团先后于5月17日、6月12日、6月17日各交付了三百万两垫款，累计垫款数为一千二百一十万两。

列强控制中国的野心和袁世凯政府饮鸩止渴以加强统治的图谋，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更遭到了革命党人的严厉抨击。

孙中山早在1912年4月底，针对列强企图监督中国财政的野心，就曾一再发表谈话指出："若果监督，则应拒之。"[181]"倘四国利用

中国现今财政困难而阻中国之进步，则国人必将发愤自助，设法在国中募集公债，以济目前之急。”[182] 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由南京留守黄兴出面，于4月29日通电提出劝募国民捐的主张，以挽救“借债亡国”的危局。他在电文中愤激地指出：“二十年来，忠义奋发之士，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躯，不稍稍退却者，徒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乃一旦幸告成功，因借债以陷入危境，致使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此则兴血涌心涛所不忍孤注一掷者也。”[183] 于是，在人民中间掀起了一阵劝募国民捐的热潮。5月20日，当唐绍仪、熊希龄向参议院要求通过上述合同和章程时，参议院内群情愤激，对政府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指责（不过，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占优势的议会鉴于迫切的财政需要，仍然通过了签订的文件）。革命党人的舆论界更万矢齐发，痛斥熊希龄卖国。5月23日，陆军次长蒋作宾从北京抵宁，与南京留守黄兴商量交付垫款、裁遣军队事宜，带来了有关文件。黄兴察阅之后，十分震怒，当即发表通电，痛斥熊“违法专断”，要求参议院“责令毁约”。他指出：“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埃及前车，实堪痛哭。”[184] 他再次呼吁发行不兑换券，举办国民捐。当时，黄兴在同俄国领事的谈话中，对列强也提出了严正的警告：“要知道你们之所以这样慷慨大度，是因为每提供一笔贷款，你们便愈觉得在中国如同在家里一样。但是，难道中国人民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你们忘记了，是什么事件引起的震动最终地、决定性地导致了革命。”[185] 6月1日，孙中山出任国民捐总会总理，并表示“民国存亡，胥视此举”[186]。广东都督胡汉民更揭示了袁世凯的用心，指出：“断不宜大举借债，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转使外人因借债之故，得以财政权操纵中央。”[187] 在各界的强烈反对下，熊希龄不得不与银行团重开谈判，要求改变条款。但是，六国银行团不久即告成立，垄断之局已定，列强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更为严酷的借款条件。

六国银行团之间的谈判，于1912年5月15日在伦敦正式开始。当

时，俄、日方面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条件，一是俄国要求在协议中承认俄国在中国的北满、蒙古和新疆的利益和特权，日本则要求承认日本在中国南满和毗邻的蒙古东部的利益和特权；二是俄、日两国要求在国外市场上自由发放分得的贷款的份额，尤其是俄国，要求让许乐德公司在伦敦市场上发行。除了法国对俄国的要求表示同情之外，对于第一条，原银行团认为这是政治问题而拒绝讨论，他们更顾虑到，这样做“只可能加深中国对银行团的不信任”[188]。对于第二条，原银行团也一致予以拒绝，因为违反了国际银行团在本国市场上销售的原则。汇丰银行经理阿迪斯（Addis）反对尤力，他不愿意放弃汇丰银行的特殊利益。为此，俄、日代表中止了在伦敦的谈判，在北京的俄代表郭业尔（Гоер）和日代表小田切也退出了六国银行团对华贷款的谈判。6月7、8日，六国银行团在巴黎一度复会，又因未能达成协议而中止。俄国方面遂积极准备谈判破裂，但因难于把法国集团拉出银行团而作罢。6月18日，六国银行团再次在巴黎复会，由于俄国方面担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四国方面也不能不借助于俄、日这“两个在远东的善后借款的宪兵”[189]，因此最后达成了妥协，当日签署了成立六国银行团的协议。六国银行团把俄国的要求列入了议事录，即：如果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与俄国或日本的利益相抵触，那末，“俄国或者日本集团，以事情的涉及者为转移，有权拒绝协议”[190]。四国银行团同样为自己保留了退出的权利；在发行方面则允许俄国可以通过比国财团在布鲁塞尔发行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债券。

六国银行团在完成了肮脏的交易之后，就联合起来向中国敲诈勒索。6月24日，新成立的六国银行团与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熊希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银行团根据上面提到的5月15日起草的电报及后来的修正方案，正式向中国政府递交了进一步垫款和善后大借款的四项条件：“一、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部顾问，四、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191]熊希龄鉴于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条件。他声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敢提请参议

院审核类似的草案，它在各省将激起愤怒，并被立刻拒绝。”[192] 银行团方面明知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提出的越来越苛刻的条件，但不准备作任何让步。中国政府请求先行垫款，并减少借款数额至一千万英镑，以求减轻监督条件，也为银行团方面所拒绝。按照法国总理普恩加赍的意见，“应该停止支付垫款，因为垫款的继续，只能更难于缔结最后的协议，并使北京政府更加固执”[193]。7月8日，六国公使向陆徵祥和熊希龄声明，六国政府不赞成与所提条件不同的任何贷款。熊希龄当即声明：“垫款无着，只得令各省自行设法，或由中央另筹他法，以救目前之急。”[194] 翌日即正式以函件方式发布。于是，大借款谈判宣告中断。

二　善后借款合同的签订和性质

大借款谈判停顿后，银行团停止了垫款。但是，中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袁总统需款甚急，不惜答允任何条件，他以为如能有五百万镑，他就可以使他的地位稳固，并控制军队”[195]。于是，袁世凯在总统府组织了财政委员会，以卸任财政总长熊希龄为会长，目的是向银行团以外的外国财团接洽借款。当时，在华的外国掮客十分活跃，只是由于列强政府的反对，小借款的谈判往往很难成功。经过极为秘密的谈判，至1912年9月初，外界才获悉，中国驻英国公使刘玉麟和伦敦鲁意特银行（Lloyd's Bank）的负责人克里斯浦（Crisp）达成了一千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原来，汇丰银行在英国并不是主要的银行，英国的大银行集团对英国政府支持汇丰银行垄断对华贷款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们和汇丰的矛盾，构成了银行团垄断中的薄弱关节。自从善后借款谈判停顿后，英国姜克生国际银行团（Jacks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ndicate）代表白启禄、克尔顿（伦敦《国民评论》记者）即与中国政府联系借款事宜，并于7月12日与熊希龄签订了草合同。中国政府旋委刘玉麟以借款谈判全权，与姜克生面谈，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

循也在伦敦从旁襄助。北京方面则由熊希龄一手经理，仅袁世凯和赵秉钧掌握谈判情况。而姜克生旋把承办借款的权利让给了克里斯浦。新借款得到鲁意特银行、京郡银行（京都省银行The Capital and Counties Bank）、伦敦西南银行（The London and Southwestern Bank）、麦加利银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等的支持，并有法、美资本家参加。9月2日，袁世凯电令刘玉麟签字。9月15日，五十万英镑的第一批借款交付中国政府方面。

克里斯浦借款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团的垄断局面，引起了银行团的震动。英国外交部当即表示反对克里斯浦借款，并公开声明不能担保这项债务，企图阻止债票的发行和销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于1912年9月11日接到了中国政府关于签署克里斯浦借款的通知后，即发起银行团列强代表会议，寻找破坏契约的方法。朱尔典又奉命向中国政府声明，英国政府不赞成这笔借款，并对它的缔结表示抗议。

尽管克里斯浦借款的第一批汇款已到，但中国政府举棋不定，没有马上提用。当时，新上任的财政总长周学熙事先对克里斯浦借款一无所知。他认为“借款利害影响及于政治，因噎废食，终非久计”(196)，因而于8月底通过日本财团代表小田切与银行团接洽恢复谈判，并于9月17日就大借款的条件问题，交参议院讨论。不足法定人数的参议院，当时在讨论中原则上同意了政府的方案。周学熙对克里斯浦借款很不赞成，多次主张取消，以与银行团恢复谈判。时值中秋将届，需款甚急，中国政府要求银行团先行垫款五十万镑，但银行团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先行取消克里斯浦借款。9月23日，银行团最后拒绝了垫款要求，谈判再次中断，中国政府遂不得不动用克里斯浦交付的款项。

列强不把中国的财政咽喉卡住是不肯善罢甘休的。9月25日，朱尔典晋谒袁世凯，再次表示抗议，并且开单逼债。其他几国也群起效尤，法国政府更节外生枝，无理地提出了赔偿辛亥革命时外侨所受的损失的要求。尔后，六国公使又就克里斯浦借款以盐税羡余为担保的

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银行团更通电各省分行，阻止金融汇兑，并相约不准买卖麦加利银行汇票。

当时，中国政府积欠外债达一千一百万英镑，无法偿还，而列强逼债甚急。中国政府希望克里斯浦提前交款或续借一千万英镑，均因为六国银行团所扼，未能实现。袁世凯遂于10月初请法国公使出面调停，以求与银行团恢复谈判。在银行团方面，汇丰银行面临着本国银行团的竞争，十分焦急。英、法、德、美四国尤其是英国担心袁世凯政府财政困难，控制不住局势而陷于混乱，影响列强在华利益，因此他们赞成减少债额至二千万英镑，并降低监督条件，及早达成大借款。但俄、日方面，尤其是俄国，力求浑水摸鱼。美国驻德国大使莱西曼（Leishman）说："无疑地它（指俄国）将乐于看到六国银行团陷于分裂，因为它害怕款项可能被用来加强中国在蒙古的地位。"[(197)] 因此，俄国力求拖延大借款的成立。但是，俄国不能没有英、法的支持，因而也不能不向英国的要求让步。于是，大借款的谈判又恢复进行，于11月27日正式开议。不过，银行团方面先是要求中国政府委定办理借款的专员。于是，袁世凯于11月30日发布命令，责成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任借款事宜，并将熊希龄调任热河都统。随后，银行团又要求取消克里斯浦借款合同关于借款优先权的第十四条。中国政府与克里斯浦公司方面几经磋商，最后决定赔偿十五万英镑，五百万英镑提前于1913年1月15日付清，其余五百万镑归入大借款案内，由六国团办理。银行团在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答应于1913年1月下旬垫款二百万英镑，双方遂达成了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的大体合同，克里斯浦借款也于1912年12月23日废除。

袁世凯政府迎合列强要求，积极准备签署大借款。1912年12月27日，周学熙将大借款合同的五项特别条款交参议院讨论，得到参议院的大体同意。翌日，袁世凯又命令周学熙任税务处监督，准备大借款合同要求的盐务改革。1913年1月6日，袁世凯命令盐务收入各款自民国二年1月起专款存储，以备抵债。1月14日，袁世凯又公布了盐

务稽核造报所章程。

尽管如此，银行团依然在节外生枝。12月31日上午，法使康德（Conty）、日使伊集院拜会外长陆徵祥、财长周学熙，就赔偿外侨损失和财政管理中的财政顾问问题进行交涉。中国方面被迫同意加借二百万镑以赔偿外侨损失。对于顾问问题，周学熙面有难色，他表示："现在已多有谣言，谓财政受外人之监理，用人之权亦操之外人，以故若将聘用财政顾问等员载在借款合同内，更易引起国人之反对。"因而不敢同意将顾问问题列入合同。康德表示："管理财政一层……承认之法，或载在合同，或另行订定，原可通融。"于是决定用秘密询问方法，由中国政府秘密答复"聘用外人条件薪数等事"[198]。列强代表对此表示满意，才指令银行团于当日下午4时与中国方面会议借款事宜，议定明年1月—3月，银行团先后垫交七百万英镑，并约定1月16日伦敦会议后即行签约交款。尽管中国政府"凡可迁就者无不迁就"[199]，但列强仍枝节横生。1月15日，法国公使康德又拜会外长陆徵祥，就中国政府拟议任命的三名财政顾问提出异议，要求法人占有一席，并出示法国政府来电中提出的主张："关于聘请顾问事，以理论应用出资国之人，以势论应按出资之多寡以定供给顾问之数。"[200] 1月17日，六国银行团驻京代表通告财政总长，得伦敦回电，因巴尔干风云日紧，欧洲金融异常恐慌，不能先行垫款。与此同时，银行团要求把大借款利息加至五厘五。而对革命赔偿问题，中国政府也只同意限于武汉战区，财政顾问问题中国政府只同意私函解决，列强代表再次表示反对。上述各项磋商不定，大借款签署不能不延期。

当时，连一贯主张达成大借款的记者黄远庸也愤慨地说："六国团最无理之行动，在屡次迫我取消别国借款，及既经取消后，则彼又不肯付款。比款时代如此，谷利斯浦（即克里斯浦）团时代又如此。……此次取消谷团优先权时，银行团亦未尝不以年内垫款若干相饵，及至年底，乃一毛不拔。一国至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六国银行团今已纯粹一外交性质，综言之，即六国国际保证监督中国财政之委员会，并殖民银行之总汇是也。”[201]

由于银行团不能垫款，中国政府需款孔亟，周学熙遂效法熊希龄，于1913年1月19日致函银行团代表熙礼尔，声明“本总长有自由借款之权”[202]。翌日，总统府会议，也以垫款无着，不得不停止与银行团会议。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弄不到大宗款项以应付列强逼债，而旧历年关又将来临，仍然不能不求之于银行团。1913年2月1日，中国政府外交总长以秘密函件的方式，向六国公使承认了关于革命赔偿和聘用财政顾问问题上的要求。为了在旧历年前得到银行团的垫款，预定2月4日，即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签署善后借款合同。是日，中国政府通知六国驻使，任命丹麦人欧森（Oiesen）为盐务稽核处会办，德国人龙伯（Rump）为借款局会办，意大利人罗西（Rossi）为审计处会办。然而，这个任命在列强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善后大借款的签字再次被推迟了。

当时，在俄国的支持下，法国公使反对中国的提名，尤其不愿承认六国中只有德国人占有一席，法国公使坚持委派借款有关国家的人任顾问的方案。俄国正积极向蒙古扩张，别有用心，更极力阻挠大借款的实现。它借口在以盐税为担保的庚子赔款中占的份额最多，坚持有权派代表参与盐政。法国支持俄国占有一席顾问职务的要求，而美国则强烈反对。方案几经变化，而英、德又展开了争夺盐务稽核处会办一职。列强把欧洲两大集团的纷争也带入到对华贷款事务中来，久久不能达成协议。3月3日，银行团通知中国政府，列强商定借款聘用的顾问应以国籍分配，但中国政府考虑到国会将开，局势复杂，不敢接受列强明目张胆干预用人行政的方案。周学熙在致熙礼尔的信中抱怨说：“在这次借款谈判中，首先是常常拖延，其次是合同条件不断改变，我被迫处于一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地位。”[203] 协议的签署依然虚悬。

其时，美国政府新旧更迭，威尔逊出任总统。美国政府在答复美

国财团询问政府的有关政策时，于3月18日发表声明，撤消了对美国财团参加善后借款的支持，美国财团遂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这个被称作威尔逊宣言的美国政府声明，表面上是出于道义的理由，即所谓“借款的条件近乎损害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204]，但实际上，则是因为美国在银行团内的处境孤立，并对俄、日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强烈不满，为贯彻其依靠门户开放政策打入中国市场，才决心退出银行团。所以这个声明中说：“现政府将鼓励并支持为给予美国商人、制造商、承包人及工程师以银行的及其他金融方面的便利所必需的立法措施，他们现在是缺乏这些便利的。而如果没有这些便利，则他们与他们的工商业方面的对手们比较起来，将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这是现政府的责任。这是它的公民在开发中国方面的主要的物质利益。”[205]

美国的退团，对于五国团来说无关大局，但顾虑到美国可能会单独对华贷款，五国团尤其是英国，希望尽快达成善后借款。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内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时，围绕着国会成立和总统选举，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日趋尖锐。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刺死，革命党人讨袁的声浪陡然高涨起来。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付革命党人的力量，迫切地希望弄到钱，也急于达成善后借款。袁世凯一方面再次迁就列强，接受了五顾问方案，即英国占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一席，后任丁恩（Dane），法、俄各占审计院顾问一席，后分别任宝道（Padoux）、葛诺发（Коновалов），德占审计院稽核外债室洋稽核员及盐务副总稽核各一席，后分别任龙伯、斯泰老（Strauch）。另一方面，袁世凯在与俄国进行的秘密谈判中，屈从俄国的压力，承认俄国在蒙古的扩张。而列强看到革命党人高涨起来的反袁情绪，也急于达成善后借款，以便鼓励袁世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达成交易的时机终于到来。4月22日，袁世凯命令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会同签字。24日，签订了草合同。25日，袁政府秘密向有关国家去函并递交了顾问合同，满足了列强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尽管在合同

签字的前夕，革命党人同列强进行了严重交涉，反对签署善后借款，但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得悉了孙中山反对善后借款的声明后，“即授权英银行代向伦敦拍发一个安慰的电报”，法、德两国公使也同样行动，以“防止国内方面将来受到有作用的新闻报导的不利影响”[206]。26日夜至27日凌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经过最后谈判，签署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善后借款是列强和袁世凯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一年多来，袁世凯一直在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列强也一直在支持袁世凯稳定局势，克服中国的所谓“无政府”状态。除了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之外，一年多来，由于革命党人的牵制，才使这笔政治交易迟迟未能完成。当时，袁世凯不能不有所顾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Крупенский）报告说：“我觉得可以确信，无论是袁世凯，无论是主持政府的其他人，充分理解国外贷款对中国的必要性，并且准备好为缔结贷款而同意建立外国监督。但是，没有敢于公开表示这点，这是由于顾虑激起参议院和中国的知识界的愤慨，特别是在南方，在缺乏属于政府的足够巩固的威信和有力的政权的条件下，将导致它的倾覆。”[207] 而列强通过监督中国财政以控制中国政局的企图，也因革命党人的存在，一时难以实现。六国团成立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同俄国大使本肯多夫谈话时，明确表示：“第一批垫款应该具有恢复秩序的目的，没有必要的和不能促成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应该支付垫款，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的权力没有恢复。”[208] 也就是说，只有当袁世凯能够对付革命党人、稳固政局时，英国才愿意提供垫款。而俄国更进一步希望，用少量的贷款和严重的监督条件来控制中国，既使中国无法整顿财政，又促使中国内部对抗，从而“把这里的政府从我们利益范围内富有毅力的活动中吸引开”[209]。袁世凯准备和革命党人决裂，使袁世凯和列强的要求一拍即合，善后借款的签署也就水到渠成。

列强通过善后借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通过政治借款来操纵中国政局，善后借款开了先例，这在前清是没有的。而且，善后借款条件严酷。继海关之后，列强又控制了中国的主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中国政府提用盐税抵还外债后的余额都必须经过银行团的核准。列强通过对盐税的管理，通过对善后借款用途的稽核，通过对审计院的干预，也就监督着中国的财政；通过监督和控制中国财政，列强就可以摆布中国的政局，使北洋统治者成为其得心应手的工具。

善后借款又是一次高利的盘剥，是列强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恶债。这次借款期限特别长，达四十七年，为从来所未有，年息五厘，累计须付息达四千二百八十九万三千五百九十七英镑。善后借款折扣大，中国政府实收八四，仅得二千一百万英镑，利息总额即达实收额的二倍，而按实收额计算，实际利率高达年息5.95%。根据合同的规定，善后借款的主要部分用来抵还外债和准备赔偿外人在辛亥革命中的损失之用。计归还庚子赔款二百八十七万英镑，不久到期外债约一百三十九万余英镑，预备赔偿外人因革命所受损失二百万英镑，共计约一千零七十八万英镑，占实收额的一半还多。转手之间，银行团在外国金融市场上募集的款项，仍然落入了列强的腰包之中。而袁世凯政府能用于行政的经费，只能供六个月之需，转瞬即尽，实际上，列强不过是向袁世凯提供了一次战争经费而已。

三　反对善后借款的风潮

自1912年五六月间革命党人反对垫款章程以后，政局多变。在调和妥协的气氛中，革命党人对大借款不再持抵制的态度，但自宋案发生以来，南北决裂在即，革命党人对借款问题再次警惕起来。《民立报》于1913年4月19日载文反对大借款，指出："须知政府杀人之钱，买收议员之钱，皆得于此取求，而异日仍以吾民之膏血抵偿之也。"但大借款谈判屡次中辍，进展情况异常秘密，外界难知底蕴。

大约24日前后，黄兴在上海得到善后借款即将成立的密报，急电北京国民党总部，“请本党诸公力行设法反对”[210]。4月25日，刚刚当选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张继、王正廷（国民党籍）获得消息后，急忙与国民党本部同人商讨对策。随后，张、王即以议长资格去见袁世凯，打算陈述反对违法借款的意见。但袁托故不见，张、王只好留书而去。4月26日，黄兴发表通电，企图阻止大借款的签署。他指出，政府行将签署的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没有经过国会承认，而政府企图等国会开始议事，再行提交追认，是违背《临时约法》关于借款必由参议院议决的规定的。他强烈指出：“临时政府将遂告终，国势未安，百政莫举，掌财政者全无计划足以昭示国人，骤须巨款，用途安在？此小之表示政府之不诚，大之人民得坐政府以破坏约法、蹂躏国会之罪。今宋案证据已经发表，词连政府，人心骇皇，倘违法借款之事同时发生，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他表示“深望政府俯从民意，非得人民代表之画诺，一文不敢苟取”[211]。同时，孙中山、胡汉民分别到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孙中山对汇丰银行上海代表声明，“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对抗北方，并以武力抗议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212]。孙中山并通电各国银行团，表示反对违法的善后借款。

在北京，4月26日晨，袁世凯复书张继、王正廷，表示“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213]，并派梁士诒前往解释。梁向张继等声明，借款协议前参议院已经通过，并撒谎说，借约已经签字。梁走后，国民党人才获悉当晚才是正式签字之期。于是，王正廷去向各国银行交涉，希望劝阻银行团签字，但遭到各银行的冷遇。一部分国民党议员跑到汇丰银行守候，企图作最后的努力，来阻止大借款的签字。袁世凯政府人员躲过国民党议员，秘密进入汇丰，延至27日凌晨2点30分签字完毕后，又偷偷地从汇丰银行的后门溜走了。

善后借款成立后，张继、王正廷当即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

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他们指出："政府如此专横，前之参议院既屡被摧残，今之国会又遭其蹂躏，不有国会，何言共和？继等惟有抵死力争，誓不承认。"[214] 在国会里，国民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情绪激昂，由汤漪领衔就五国借款一案提出质问书。参议院于4月28日公决，要求国务总理暨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于29日午后1时来院出席，答复质问。但至时政府人员没有出席，只是送交了咨文。政府咨文声称借款条件曾于上年12月27日交由临时参议院特开秘密会议，业经表决通过。因此，袁世凯政府只是将借款合同全文咨请查照备案，不仅拒绝交付国会讨论表决，而且也不是请求国会追认。参议院接到咨文后，十分气愤，当即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215]

当善后借款风潮掀起时，国会众议院正为议长选举问题所纠缠，故迟至5月3日才开始讨论大借款案。5月5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应众院要求，出席答复质问。在国民党议员据理诘责之下，段无言对答。他想含糊了事，向议员们表示："政府对于此项借款案手续实欠妥协，而其不得已之苦衷，尚乞诸君曲为原谅。"[216] 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也起来为政府辩解，他认为借款已签押，万无取消之理。李的辩词激起了国民党议员的愤慨，两党议员群起舌战，段祺瑞遂乘机溜出了议院。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进行表决，谷钟秀提出动议："对于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217] 当时，正在筹备中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的进步党，在议会中已经联合对付国民党，偏袒袁世凯。但民主党籍议长汤化龙对袁世凯的违法专断行为也相当不满，他不顾党内的异议，将谷钟秀的动议交付表决，结果，以二百二十九人赞成，多数通过了谷的动议（是日出席人数为三百七十六人）。

众议院散会以后，进步党议员对汤化龙群起责难，汤难以招架，遂借口祖母丧请假回鄂，避开了议院的纷争。5月7日，共和党籍的副

议长陈国祥主持众议院会议，进步党议员借口5日动议带有弹劾政府性质，因此需要三读通过，以便借此翻案。国民党议员当然坚决反对，双方发生争执，相持不下。议长借口休息，示意本党议员退席，使众议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尔后，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将5日表决咨达政府，但议长借口咨文要向议院报告，而议院人数不足，无法报告，以此来延宕出咨。国民党议员气愤万分，谷钟秀登上讲台大骂“亡国议长”，有个议员扳下议席上的墨盒向陈国祥掷去，议场秩序大乱，几乎酿成武斗。陈乘机一走了之，众议院会议一哄而散。

5月8日，袁世凯政府向两院发出咨文，以列强逼债相威胁，要求两院承认大借款。咨文说：“设再迁延，（列强）势必横加干涉，实行监督财政，致陷民国有破产之虞。……值兹财政艰窘，国际债权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218] 袁世凯完全无视国会表决，态度十分强硬。进步党议员因担心国会再次否决大借款，遂以不出席会议，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的策略，来对付国民党。于是，善后借款案在国会搁浅，国会的正常活动也无法进行。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的舆论界，纷纷口诛笔伐，谴责袁世凯违法借款。黄兴和湘、粤、赣、皖四都督、省改会联合会、各省议会也纷纷连电抗争。借款案与宋案一起，成为激荡南北风潮的两大事件。

当时，黄兴和国民党四都督的抗争，是以实力为背景的，因而在当时的斗争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在磨刀擦枪、积极备战的李烈钧在反对大借款的通电中，更暗示了战斗的决心：“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奴。”[219] 黄兴在接获国务院和财政总长为大借款辩护的通电后，进一步指出：“国会初成，民意待白，政府乃悍然不顾，借口于经年之废案，在临时政府告终之期，当局挥金僇辱人民之际，暮夜之间，骤加人民以二万万五千万元负担。事前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避国会质问，聚为秘谋，出乃规避，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

国政至此，体统安在？……倘以此激动民心，酿成巨变，责将谁负？”[220] 5月5日，湘、粤、赣、皖四都督更联名发表通电，以联盟的力量，严词反对大借款。通电指出：“不意以号称民国，期限既终之政府，乃有悍然不经院议私借巨款之事。且举债至二千五百万镑之重，其条件内容概未宣布，竟先许外人为审计局总理、借款局总理、盐务顾问、长芦盐务总监各要职（按：与事实有所出入，系当时传闻——引者）。财权先亡，国本随之，陷民国为埃及之续，以前清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民国之政府。海内外烈士前仆后继，躬冒万死，缔兹民国，而政府甘以断送于借款之下，凡有血气，孰不发指眦裂！况宋案证据宣布，词连政府，有以巨金资助凶手之语，全国汹汹，方虞震动。今复不经院议违法借款，人心一失，窃恐虽有大力，无以善其后。应请大总统立罢前议。”[221] 四督辞气严重，已经近乎决裂了。

孙中山在善后借款成立后，再次与汇丰银行交涉，要求停止向袁世凯交款，同时又发出通电，向欧美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袁世凯）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借给北京政府。”[222] 然而，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蓄意支持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发布大借款之辩明书声称：“中国党争甚形激烈，其能镇定之者，厥惟袁总统，五国银行团之借款，实出于赞助之态度。”[223] 并自5月12日起，向袁世凯交付垫款。是日，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即大举挥师入鄂，对江西进行武装监视。

对于革命党人的抨击，袁世凯政府方面一再发布通电进行辩解。它一方面死死咬定大借款已经前参议院通过，“观在签字之合同，悉与上年通过之条件相同”[224]，拒绝交付国会表决；一方面声称，“顾问稍增数员，由我自行黜陟，与主权无涉”[225]，矢口否认它与列强的秘密交易和列强对中国财政的实际监督。周学熙更无理地对黄兴反唇相讥：“黄先生为手创民国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

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226] 5月初，周学熙即提出辞呈，袁世凯未予准辞，仅允其病假，至5月16日由梁士诒代理财政部部务，以此来缓冲革命党人的抨击。北洋各省都督则纷纷支持政府立场，他们甚至攻击革命党人是“无理取闹”，“奸人惟恐世不乱”[227]。一贯以调人自居的副总统黎元洪，也通电反对取消大借款。他认为：“纵政府止渴饮鸩，铸兹大错，亦惟本共衷之念，筹救济之方，内定人心，外全国体。若遽尔飞檄四布，全案推翻，其危言义愤固属可钦，然债务不清，兵祸相继，能保外人不实行瓜分乎？”[228]“国民惟有监督用途，力求补救。”[229] 实际上他是为虎作伥。进步党自甘充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声称对于大借款，“本党自当以维持大局之苦衷。为正当公平之对待”，指责国民党“反对借款，纯系一种手段，别有用心，马迹蛛丝，当为国人所共见”[230]。袁世凯重兵在握，前有进步党摇旗呐喊，后有列强撑腰打气，他胆壮气粗，在四督通电之后，亲自出马，对四督下令严加申斥：“该督等当国基将定之秋，不于国际债权求根本之解决，坐待破产，徒为叫嚣，若惟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者，其何以对既死之烈士，更何以对起义之军人耶？”袁世凯蓄意分化四督联盟，软硬兼施，他说：“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胡汉民僻处南疆，或有误会。至柏文蔚、李烈钧身处近省，岂于此事始末懵无所知？似此张皇宣告，荧惑人心，国事更将何赖！”他训斥四督说：“都督为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之义务，万国通义，讵尚未闻？……似此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人心一失，大命随之。”[231] 他企图用一个命令来封堵四都督的嘴。

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孙中山的革命动员遭到挫折，党内的妥协倾向抬头，大借款问题被局限于国会之内。黄兴在答复黎元洪青电时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终始如一。”[232] 然而，国会内的斗争，却十分沉闷。当时，银行团在合同签署后发现，中国政府另有秘密奥国借款，认为有损银行团的垄断权，因此没有按协议如期向中国交付垫款。于是，奥国借款得以披露。奥国借款共有两笔，第一笔债额一百二十万英镑，第二笔债额二

百万英镑，于1913年4月10日签字。奥款异常秘密，国会和舆论界事先毫无所闻。消息传出，群情哗然，政府违法借款的事实已无可掩饰。于是，参议员汤漪再就奥国借款问题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要求“咨请政府将奥国借款确实内容明白答复”[233]。在众议院，国民党则就大借款问题对政府提起弹劾，此案由邹鲁起草，国民党众议员连署。然而，这些合法斗争是非常软弱无力的，由于进步党的抵制，它甚至难以在议会中提起讨论，不能不被搁置一边。由于议会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国民党不能不与进步党进行幕后交易，以期达成妥协。当时，“进步党以借款既成事实，姑不反对，惟监督其用途，并主张改造内阁，使事实上负借款失措之责；国民党则以使政府将借约依法交议，即一字不改，亦可做到。现争交议，并非反对借款，不过反对不依法交议而已。至改造内阁之主张，可以赞成，并援助进步党出面组织，而汤君化龙更所属意”[234]。然而，进步党人仍然十分担心，他们生怕大借款案一旦交议，在国民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参议院仍然会遭否决，因而没有同意。5月30日，由黎元洪领衔，会同除国民党四都督外所有其余十七省都督（当时共二十二行省）和热河都统熊希龄致电国会，危言耸听，以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为词，要挟国会放弃同袁世凯的斗争，“念时局之艰危，加借款以承认”[235]。面对着袁世凯和进步党的压力，国民党国会议员会发布宣言书，近乎哀求地表示：“为今之计，惟有政府迅将合同提交议院，本党亦无不力予维持，俾底于成。”[236]然而，这点小小的顾全面子的要求，袁世凯都未予理睬。

半死不活的国会，一直延宕到6月25日，众议院才就奥国借款开秘密会议，向梁士诒提起质问。政府特派员陈威（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当众撒谎说，奥国借款系六厘公债作抵，可以不交院议。议员们当场查阅合同原文，谎言立即拆穿。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同协商弹劾内阁的问题。但当时的内阁形同虚设，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总统府，所谓的弹劾案，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记者黄远庸感慨地说：“总理、总长早同退院打包之僧，左右不过是一去，尤无畏于弹

劾。盖今日吾国政界，法律政治失其权威；凡百有位，丧绝廉耻与责任，此根本无可救药处也。”[237]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国会对大借款案也就不了了之。

---

(1)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2—53页。

(2) J．O．P．Bland：*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London，1912，P．284．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P．71．

(4) 《嘉乐恒给国务院的报告》（1912年5月21日，11月12日），*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1911—1941），No．552、671．

(5) 《法国外交部档案》，28/5，32/318，转引自巴斯蒂：《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81页。

(6)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3页。

(7)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10页。

(8) K．K．Snum：“Japan′s Attitude Towar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Series 21，（1980，3），P．151．

(9) H．Croly：*Willard Straight*，New York，1925，P．421．

(10)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6页。

(11)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53页。

(12) 《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第421页。

(13) 《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第150页。

(1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6页。

(15) *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 ，PP．343、346．

(16)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04页。

(17) 兰姆：《中印边境》，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1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2 ，No．1034，Москва，1938—1940．

(19)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页。

(20)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页。

(21) 高劳：《外蒙古之宣布独立》，《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1912年8月。

(22) 林唯刚：《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版，第2页。

(23) 《远生遗著》卷2，第38页。

(24)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8，ч．1 ，No．329．

(25) 《清末民初外交部交涉案节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6) Friters：*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49，P．61．

(27)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8，ч．2 ，No．607．

(28)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P．61．

(29)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1 ，No．192．

(30)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版，421页。

(31) 唐在礼：《蒙古风云录》，1912年版。

(32)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279—280页。

(33) 《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第26—27页。

(34) 《蒙古风云录》。

(35) 杨增新：《电呈驻乌里雅苏台俄领来文不令中国进兵请由部与俄使严重交涉文》，《补过斋文牍·戊集一》，第55页。

(36) 《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3页。

(37) 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东京1919年版，第1544页。

(38)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1月29日。

(39)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1日。

(40)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5月。

(41)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1913年2月。

(42)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1912年11月。

(43)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

(44) 《库伦风云大事记》，《震旦》第1期，1913年2月。

(45) 《库伦风云大事记》，《震旦》第1期，1913年2月。

(46) 外交部吉林交涉署：《中俄蒙古交涉节略》，1913年版。

(47) 《清末民初外交部交涉案节略》。

(4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1，No．253．

(49) 陈箓：《蒙事随笔》，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6页。

(50)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722．

(51)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10月。

(52) 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5页。

(53) 《库伦条约之始末》，第32页。

(54) 《库伦条约之始末》，第65页。

(55) 吴成章：《俄蒙协约审勘录》，顺天时报馆1915年版。

(56) 1913年—1914年间，沙俄和外蒙还签订了关于训练军队及购买武

器的协定，以及贷款协定、《开矿条约》、《架设电线协定》、《敷设铁路协定》、《借款契约》等一系列协定，获得大量侵略权益。

(57) 《天铎报》，1912年11月24日。

(58) 在12月3日的通电中，孙中山倡议改革货币制度，以纸币代替金银，从而解决财政困难，抵抗沙俄侵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549页。

(59) 《民立报》，1912年12月16日。

(60) 陈博文：《中俄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83页。

(61) 吕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台北1976年版，第28页。

(62)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国际协报社1923年版，第144页。

(63) 外交部吉林交涉署：《中俄蒙古交涉节略》。

(64)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52页。

(65)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54页。

(66) 《中俄协约案件·总长会晤俄使问答》（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7) 《中俄交涉大事记》，《震旦》第2期，1913年3月。

(68)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84—285页。

(69) 《外蒙古近世史》第2篇，第12页。

(70) 《时报》，1913年6月29日。

(71) 邹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63页。

(72) 《中俄协约案件·总长会晤俄使问答》（6月4日）。

(73)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1册，台北1983年版，第138—144页。

(74) 卓宏谋：《蒙古鉴》第5卷，北平普善印刷局1935年版，第11—12页。

(75) 蒋廷黻选，张禄译：《帝俄与蒙古》，《国闻周报》第10卷第50期，1933年12月。

(76)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1961年版，第26页。

(77)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94页。

(78)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114页。

(79)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117页。

(80)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编：《中俄中英关于蒙古西藏约章合编》，1929年版。

(81)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75页。

(82)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PP．103—104．

(83) 《卫藏通志》卷12。

(84) 《光绪条约·英约（三十年丙午）》，外交部印刷所1916年版。

(85)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86) 《陆兴祺咨送前清末季西藏沿革大略文》（1918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87) 英俄两国曾于1907年签订协约，在关于西藏的部分中，两国约定不干涉西藏内部行政，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不派代表至拉萨，不为自己谋求特殊权力等。这是英俄妥协的产物。

(88) 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6页。

(89) 《陈贻范报告西姆拉会议情形及自请惩戒文》（1914年10月15日），北洋政府政事堂档案。

(90) 辛亥革命在西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历来著作均称“兵变”，近年有人认为应属于“革命”。但驻藏清军中赞成帝制及拥护共和者兼有，兵变领导人的旗号亦是先勤王，后革命。在未深入研究前，这里沿用旧说。

(91) 《旅藏二十年》，第68—70页。

(92) 《川督尹昌衡报告达赖派兵围攻汉军电》（1912年8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93) 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版，第29页。

(94) 《江孜关监督史悠明报告汉藏第二次议和条款电》（1913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95) 《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1878—1917年），第2类第20卷，

第220—221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历史研究》1959年5期。

(96)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藏案纪略》，第25页。

(97) 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附录，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1—32页。

(98)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6月。

(99) 尹昌衡：《西征纪略》，第15页。

(100) F．O．535／15，No．150，Jordan's Memorandum of Interview on 23rd June，1912．

(101)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议案》。

(102)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Delhi，1979，P．66．

(103)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藏案纪略》，第14页。

(104) 杨德麟：《西藏大事记》，台北1955年版，第34页。

(105)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2，P．66．

(106) 《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107) 《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08) 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4—5页。

(109) 王勤堉：《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66页。

(110) 《内外时报·英藏交涉始末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年4月。

(111)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6页。

(112) 这五项条件是：1．西藏人当与汉人有同等之权利；2．民国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两；3．西藏人得以西藏境内之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借；4．西藏人得自由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但承认得以我国内地军队一千五百名派驻西藏；5．一切官制虽照民国政府之规定施行，而人才则采用西藏人。北京政府的答复是，第三条不予承认，二、四两条须说明理由，余均可答应。（《内外时报·英藏交涉始末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

年4月）

(113) 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初并非亲英派。西藏另一宗教首领班禅喇嘛及许多僧侣都表示拥护民国。在拉萨召开的僧侣代表大会上，倾向民国的“亦不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93—94页）这些意见达赖不可能不考虑。但是，西藏当权人物如夏札、达桑占东等人，多数为亲英分裂主义分子，达赖为他们所包围。而且达赖本人自流亡印度后，受惠于英人及其影响，回藏后倾向联英，所以他一度摇摆后，最终以英国为靠山。

(114) 《杨芬呈报入藏情形文》（191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115) 《陆兴祺致北京政府电》（1913年8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116) 《达赖致袁世凯电》（1912年12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117)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44页。

(118)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New York，1969，P．149．

(119) F．O．535／15，No．44， Viceroy to Secretary of State．23，March． 1912．

(120) F．O．535／15，No．303，Grey to Jordan 12，December，1912．

(121) F．O．371／1239，No．55588，Jordan to Grey，16，December，1912．

(122)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12月30日。

(123)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北1974年版，第221页。

(124)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北1974年版，第222页。

(125) F．O．371／1610，No．14001，Jordan to Grey，27，March，1913．

(126) Political External Files 1913/40，No．916/13．Jordan to Grey，6．March，1913；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London，1966，PP．454—

455．

(127)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30页。

(128)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30—232页。

(129) F．O．371／1612．No．39306，Alston to Grey，25，August，1913．

(130)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23页。

(131) 中国提出会议在伦敦举行，为英方拒绝。

(132) 《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19页。

(133)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99—100页。

(134) 《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19页。

(135)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

(136) Li，Tish-tseng：*Tibet*，*Today and Yesterday*，New York，1960，P．136．

(137)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

(138)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P．491．

(139) 《西姆拉会议记录》，《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44—245页。

(140)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

(141) 《西藏议约案·界字第22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45页。

(142)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P．104．

(143) 《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49—250页。

(144) 《藏案纪略》，第14页。

(145)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9页。

(146)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1页。

(147) 《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54页。

(148)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P．133．

(149)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0页。

(150)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0页。

(151)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2页。

(152)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2—306页。

(153)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PP．119—123．

(154)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18—119页。

(155) 1911年底，由于英国官员威廉逊于西藏东南部从事间谍活动时被藏民击毙，英国派兵进入藏东南地区。这次入侵中的地理调查等活动为“麦克马洪线”的划分创造了条件。

(156) （British）Parliamentary Papers，1914．Lxlv，PP．1447—1448．

(157) 施阿兰：《使日记》。转引自孙瑞芹译：《清帝逊位与列强》，第329页。

(15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557．

(159) 参加俄国财团的银行还有英国许乐德公司（Messrs J．Henry Schroeder＆Co．）、东方银行（Eastern Bank，Ltd．）、比利时的合股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海外银行（Banque d'Outremer）、法国的施毕策公司（A．Spitzer＆Co．）等等。

(160) 《比国借款之内容》，《时报》，1912年3月7日。

(161) J．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New York，1921，Vol I．pp．852．

(16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688．

(163) 《四国借款近闻》，《申报》，1912年4月3日。

(164)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88页。

(165) 《申报》，1912年4月3日。

(166)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688．

(167) 《远生遗著》卷2，第214页。

(16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675．

(169)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91页。

(170)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723．

(171) 《远生遗著》卷2，第2页。

(172)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00页。事实上，比款后来仍在大借款中扣还。

(173) 高劳：《银行团借款及垫款之交涉》，《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1912年7月。

(174)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852．

(175) 《大借款破裂记》，《时报》，1912年5月9日。

(176) 《民权报》，1912年5月9日。

(177) 《远生遗著》卷2，第3页。

(178)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6月20日。

(1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Washington，1919，PP．141—142．

(180) 《黄兴集》，第199页。

(18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0页。

(18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0页。

(183) 《黄兴集》，第171页。

(184) 《黄兴集》，第197页。

(185) П．И．Остриков：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в Китае в 1900—1914 годах，Москва ，1978，СТР．172．

(18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9页。

(187) 《胡汉民致袁世凯电》，《政府公报》，1912年6月15日。

(18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157．Москва ，1938—1940．

(189)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157．Москва ，1938—1940．

(190)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 ，No．208．

(191) 《今昔借款始末记·财政长呈大总统文》，《民立报》，1912年9月28日。

(19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лоху империап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 ，No．268．

(193)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лоху империап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6т．20，ч．1 ，No．247．

(194) 《熊氏之通函》，《申报》，1912年7月20日。

(195) 《莫理循日记》，转引自《莫理循》，《传记文学》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

(196) 周学熙：《中国政府善后借款案据汇编·借款情形说帖》，1913年。

(19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3．Washington，1920．p．156．

(198) 《陆徵祥、周学熙接见伊集院、康德时的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199) 《1913年1月21日陆徵祥接见伊集院、康德时的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00) 《康德拜会陆徵祥时的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01) 《远生遗著》卷3，第45—46页。

(202) 《政府公报》，1913年2月8日；《远生遗著》卷3，第62页。

(20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3．Washington，1920，P．169．

(204)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New York，1921，Vol．II，P．1025．

(205)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New York，1921，Vol．II，P．1025．

(206) 《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上帝国首相文》，《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78页。

(207)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356．Москва，1938—1940．

(20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229．

(209)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355．

(210) 《国民党反对借款之种种》，《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

(211) 《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

(212)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78页。

(213) 邹鲁：《余之癸丑》，《澄庐文集》第3卷，第196页。

(214) 《民立报》，1913年5月1日。

(215) 《违法丧权之大借款》，《民立报》，1913年5月5日。

(216) 《5月5日众议院记事》，《民立报》，1913年5月10日。

(217) 《5月5日众议院记事》，《民立报》，1913年5月10日。

(218) 《政府公报》，1913年5月9日。

(219) 《民权报》，1913年5月2日。

(220) 《民立报》，1913年5月2日。

(221) 《民立报》，1913年5月8日。

(222) 《中华民报》，1913年5月23日。

(223) 《五国银行团之辩明书》，《时报》，1913年5月11日。

(224) 《财政部鱼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5) 《财政部鱼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6) 《财政部勘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7) 《豫督张镇芳东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8)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3页。

(229)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15页。

(230) 《进步党通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31) 《政府公报》，1913年5月10日。

(232) 《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

(233) 《民立报》，1913年5月16日。

(234) 《澄庐文集》第3集，第202页。

(235)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30页。

(236) 《民立报》，1913年6月7、8日。

(237) 《远生遗著》卷3，第157—158页。

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一节　国会召开和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实施

一　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

1913年7月爆发的二次革命，总的说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发动的；但从爆发前夕的准备情况来看，实际上是袁世凯有意挑起的，因为他早就作了武力统一的准备。

经过辛亥革命，北洋各军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密札善后办法九条”[(1)]，着手整补各军。但由于遭到南方的抗议，除雷震春新招八营外，其他各军基本处于停顿，至1912年6月间，缺额状况仍十分严重。据当时有关记载，二镇只存六千，三镇四千，四镇三千[(2)]。然而，袁世凯懂得没有军队便没有他的一切，因此，他一面“敷衍元勋”，一面仍“尽全力为秘密军事上之准备”[(3)]。

1912年8月，袁世凯密令“各军统制，一律招足十成，不准缺少一名”[(4)]。同时，他继续用封建宗法关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总统府军事参议处传谕各镇初级以上军官说：“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今我北方军订互约三事，从者签名，不从者用武力对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有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

知有总统，不知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5] 因而北洋各军就一直在秘密备战。1912年底，李纯的参议李廷玉为出席中央军事会议，曾为李纯草拟“简练劲兵，迅筹军实九策”[6]，得到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可。尽管中央财政拮据，但袁世凯仍在充实军备。据海关统计，天津一口输入的军火，1912年为二百七十二万两，1913年为四百九十万两。而1913年宋案发生前的瑞记第三次借款三十万英镑和陆军部捷成借款二十八万八千余元，更全部用于订购军火。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针对南方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他把第六师（镇改称师）部署在信阳，以师长李纯任豫南镇守使。他支持溃退兖州的张勋所部江防军，同意张于1912年四五月间扩编至一万多人，改称武卫前军，约二十三营，超过一师编制，并不顾南方的强烈抗议，拒绝裁撤张勋所部。他让辛亥时招募的武卫军左翼倪嗣冲部屯兵颍州，兵力扩至十营，于1913年初改编为武卫右军。这三支部队，成为袁世凯监视南方的第一线部队。他又任雷震春为护军使，驻兵郑州；任刘询为直隶混成旅旅长，将建制扩充完备，驻廊坊。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于1912年四五月间即着手将武卫右军右翼二十五营扩编为拱卫军，共五路三十营，任段芝贵为总司令，分驻北京、彰德两地。拱卫军的组建，既加强了袁世凯对军队的控制，又使北洋军有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性质的军队。除上述各部外，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北洋各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驻张家口，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三师（师长曹锟）、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在京畿、直隶一线，护卫京师，前清禁卫军仍由冯国璋统率驻于北京，第五师（师长靳云鹏）驻山东，第二十师（师长潘矩楹，后为卢永祥）驻奉天新民，中央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驻奉天旺官屯。毅军（军统姜桂题）主力驻热河，一部由赵倜统带驻豫西，另一部交直隶提督马金叙统带。而地方上，河南有一师一旅，山东兖州尚有田中玉部巡防营等等。以上总兵力，大致相当于十五个建制师，整补后的总兵力当超过十五万人，而整体部署相当严密。

1913年3月间，河南都督张镇芳致函段祺瑞，建议用兵。他说："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7] 段复函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8] 北洋派在宋案发生以前，就已磨刀霍霍了。

随着南方反袁情绪的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并由此引起了一场意外的内部冲突。4月初，参谋部借口蒙事不靖，电令张勋暗中准备，驻济南北洋第五师师长靳云鹏也奉命下动员令，实际上是要他们做好对南方用兵的准备。但参谋部电令不明确，张、靳两部互不摸底。张勋是个顽固的复辟派，企图据有山东，拥宣统复辟。他于4月11日发饷时，宣布备战令，截留津浦车辆，准备向南移动。时靳云鹏的第五师也正向韩庄集中，看到张勋行动异常，即拆毁铁轨，截留车辆，对张戒备。江苏第三师得到警报，根据苏督命令，立即作了战斗准备，并希望与北洋第五师协调行动。参谋部看到自相冲突，只好电明解释误会，靳且亲至兖州与张会晤。于是，一幕喜剧性的冲突暂告结束，各方复归原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从此停止备战活动，而且继续加紧募兵添械。4月中旬，陆军部密令上海制造局督理陈榥赶运一批枪弹交扬州徐宝山，用徐以牵制革命党人，不久又令陈解步枪子弹六十万颗到京。但程德全害怕给南方革命党人火上浇油，命令截留缓发。北京当局遂令德州北洋制造局解运给徐。善后大借款合同签订后，袁世凯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顿时觉得胆壮气粗，开始明目张胆地对南方用兵了。

1913年4月30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海晏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决定采取措施制裁反袁报纸。翌日，袁命陆军总长段祺

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5月3日，袁世凯以西文报纸报道的革命党人备战消息为由，公然发布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孙中山、黄兴。命令威胁说："总统向称公仆……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藉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9)

5月6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10) 李纯即于5月12日命令步兵第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亲率二十一团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蕲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5月底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

与此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经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二　国会的召开和进步党的组建

袁世凯虽一心想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人，对国会与政党政治本无兴趣，但为笼络人心和保证他的武力统一计划的顺利进行，他暂时采取了克制与容忍的态度，并极力支持梁启超并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以争取政治同盟军。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遵袁世凯3月19日

通告，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遍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志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并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首先委托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代行宣读开会词，继请袁世凯特派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登台致贺。梁代袁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11)！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更增加了北京国民党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宋案"的幻想，致使"二次革命"爆发时，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仍稳坐国会主张"法律解决"，只有少数议员毅然南下讨袁。

随着国会的开幕，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2日，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四党商定2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并援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有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正、副议长。次日，众议院在共和等三党议员的坚持下，改采无记名投票法选举议长，民主党汤化龙获二百七十二票，超过国民党吴景濂六票，但因未过投票总额半数，依选举规则，应由二人决选解决。经28日、30日两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副议长续于5月1日选出，共和党陈国祥当选。

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

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12]。但是，它与临时参议院一样，毕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代表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和革命先烈们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进步意义。

国会开幕大大加速了进步党的成立。进步党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三党合并的计划虽是梁一二月以前提出的，但其构想却早在上年初便形成了，并为实现这一构想作了长期努力。当时，由于同盟会革命主张的胜利，多年来一直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的立宪派人士普遍陷入“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的窘境。为了继续对抗同盟会，他们以为唯一的出路是与袁世凯结成同盟。为此，1912年3月24日，梁启超向袁提出：共和国体下，“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并建议他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来的分子，组织一个所谓“健全之大党”，以与同盟会为“公正之党争”，使“彼自归于劣败”[13]。袁世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欣然接受了梁的献策。他复函梁说：“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14]并托张謇为梁归国问题向南方革命党人代作“疏通”[15]，以期他能及早回国将此计划付诸实行。

这年10月8日，梁启超应袁世凯电召由日本回到天津。其时，同盟会已联合统一共和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成了党势澎湃、莫能禁御的第一大党。共和、民主两党为抵制它的影响，虽正在谋求合并，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梁启超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是积极推动两党合并成功。梁的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他答应为新党提供活动经费二十万元[16]。在梁启超的积极活动下，两党很快达成合并协议，共同议决新党举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准备于一月之内成立发表。为消国民党之忌，梁又通过舆论工具故意放风说合并“难成”[17]。

但是，这次眼见“必成”的合并，事实上并未成功。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与当时形势有关。随着侵犯中国主权的《俄蒙协约》的披露，自11月上旬起，举国上下都在抗议袁政府对俄妥协投降。在此形势下，共和、民主两党对公开合并附袁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他们反不受梁启超约束，联合发表通电，宣布政府十大罪状，以争取主动。其二则涉及两党权力加减问题。当时，举国正准备国会大选，共和、民主两党皆欲借此造成自己的优势，以作合并时向对方索价的筹码。特别是民主党，更有它自己的如意算盘。它预计各省大选结果，当选者必定前清咨议局议员居多，而前清咨议局议员又因历史关系大多将参加民主党。这样，它就有希望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不仅战胜国民党，且令共和党也黯然失色。正因如此，所以两党皆对合并渐形消极，甚至有根本“反对合并者”[18]。梁启超无可如何，一气之下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了共和党。

然而，截至2月24日的大选结果，不仅民主党仅得约三十席，即获得二百四十余席的共和党也同样不能独占国会多数，而国民党反处于二百六七十席的领先地位。事实证明除非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而为一，将难与国民党对垒。此外，国民党大选获胜，使袁世凯对“健全之大党”的需要也更为迫切了。他意识到不赶紧组织一为己所用的大党，就不能有效控制国会。为此，他要求政见本属相同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以国事为重，速求合并成功，以扩大影响力。这是3月中旬梁启超组党活动出人意外地获得“大进步”，由谋求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发展到三党合并达成“定议”的主要原因。三党合并后的新党拟举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分任协理，梁决定于3月19日入京，然后正式发表。

但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全国舆论集矢袁世凯，梁启超也备受责难。三党部分党员为避免国民党之忌，又多不欲举袁世凯为总理。三党内部对合并后的组织形式与干部配置仍纷争不已，共和党主张总理制，由黎元洪任总理，梁启超任协理，汤化龙和孙武分

任政务部长和党务部长，而民主党为提高汤化龙地位起见则仍主理事制，由黎任理事长，梁、汤、孙并列为理事。这样就使刚有“定议”的三党合并计划重又搁浅。袁世凯为减轻国民党对三党合并的压力，一面宣布他暂不入党，一面通知梁启超“暂缓入京”。梁启超虽不满于“民主党诸人所为”，愤愤不平地对他的女儿说：“民主鬼吾恨之刺骨”[19]，并欲公开宣布“不复与闻党事”[20]，以要挟民主党人。但面对国人的反袁情绪，也不得不改采“半消极半积极”的态度，准备辞去“协理”之职，别设进退裕如的“参事长”以自任。

但是，当时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也是不会长久的。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21]。兼以正式国会即将开幕，由于“形式之分立”和“步伐不能如军队之整齐”[22]，三党在议院的多数并未形成。所以三党合并的步伐反较前加快了。4月2日，梁启超为“合党事”在袁世凯所派马队、宪兵、探访队的严密保护下赶往北京。经与各方反复磋商，决议于16日举行三党党员联谊会。届时，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速求“合并成功”。梁启超指出：“三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他呼吁：“为三党计，为敌党计，皆宜三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23] 经此次大会后，三党意见渐趋统一，于25日正式签订合组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3日，三党本部联电各党交通处，报告各党本部审时度势，已决议合并，一旦筹备完成，即开成立大会，希各支分部先行接洽合并。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28日，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9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九人为理事。另由理事长、理事共同推举各地重要党员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

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翙、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等人为名誉理事。其本部下设政务、党务二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峄任部长。该党遵循梁启超制定、袁世凯批准的组织原则，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同时也不拒绝“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入党[24]。它的支分部遍布全国各省区，大多数相应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支分部改组而成，也有少数是本部特派员在各省区地方当局支持下建立的。鉴于国会大选时华侨“全败”的教训，它还专门派出特派员前往南洋群岛各华侨集中地发展组织，以争取海外华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以上事实表明，进步党是在袁世凯直接操纵下成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与进步党人联盟关系的正式确立。

进步党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它成立后，即宣布其党纲是：1．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2．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这个党纲虽也笼统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赋自由”、“平和实利”等纲领，但最根本的是第一条。这第一条究竟是什么意思，参照一下进步党的其他声明和主张就清楚了。进步党曾反复声明：它“以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目的”[25]，其“唯一之希望在国家不致糜烂，大局不致忧乱”[26]。它以“稳健派”、“建设派”自居，凡事主张“从和平改革入手”，断然摒弃任何“推翻现状”之举[27]。它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暴烈派”，实行“暴民专制”，抱怨袁世凯对革命派“含糊敷衍”[28]，镇压不力。由此可见，进步党所要建设的“强善政府”就是一个抵御“暴民专制”的政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袁世凯政府的代名词而已。

正因如此，所以进步党极力为袁世凯一手制造的宋教仁血案辩护，声言“宋案确与政府无关”[29]，并捏称“系同盟会人自屠”[30]，“真主使者，陈其美也”[31]。直到6月15日，宋案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它仍一面主张“法律解决”，一面散布赵秉钧是否“有罪”，尚待“证

明”。至于袁世凯违法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因袁已允诺以部分回扣“作该党费用”[32]，自然更为它所竭诚拥护。4月26日，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发表反对违法借款通电后，参议院的进步党人即于5月3日向张、王提出质问，并由丁世峄等八十七人发表通电，声明张、王26日通电“业由张、王二君当院声明纯系个人私电，与参议院无涉”[33]。接着，为了“证明”袁世凯并未“违法”，汤化龙等四十八人又以前参议院议员身份通电全国，说“此项条约，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34]。当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提议将善后借款咨请查照备案的咨文咨还袁政府时，进步党议员们一面大造舆论，鼓吹“政府为不违法”[35]，攻击国民党“反对借款即是破坏民国”[36]；一面又以暗中退席、制造不足法定人数的手段，阻挠国会表决通过。据坚决反袁的《中华民报》揭露：除此之外，进步党议员还相约以下列办法阻止国会表决此案：1．如遇国民党议员发言，“即大起喧哗，必使其不得发言而止”；2．要求袁政府“概不发给”国民党议员“本月之津贴”，“使其穷困无聊，必为三党所用而后已”；3．如暗中退席和上述二法均无济于事，“即以激烈手段对付”[37]。5月13日，它甚至顾不得进步党尚未正式宣布成立，即迫不及待地以进步党名义发表通电，公开申明善后借款“在实质上本无可议”，“我党在两院势难坐视，不能不据理力争”[38]。

此外，进步党虽口口声声说它深惧“戎马生郊，地方糜烂”，但对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却从无异词。对于北洋军的备战活动。它早有所闻，5月2日，梁启超就在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中说过“此次战祸必不能免”，并表示过完全支持袁世凯发动一场消灭南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战争。为此，战争爆发前，它多次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责问袁政府对李烈钧、柏文蔚等所谓“违抗中央、破坏民国”的种种举动，“畏首畏尾，日事敷衍”，强烈要求袁世凯“执行约法，不可稍缓须臾，以致养痈贻患”[39]。战争爆发后，它指控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40]，并接连两次召开特别会，“讨论维持国家之计划”。会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当此国家多事之秋，本部必须有以自

见，始不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之本意，本党党员务望逐日拨冗至本部互相讨论，共筹良策，以各尽一分子之义务”[41]，并决议：1．由汪荣宝起草《咨请政府征伐叛徒建议案》，即日提交众议院议决；2．同意由熊希龄代替赵秉钧组阁，以巩固中央政府；3．取消程德全、陈炯明进步党名誉理事资格。与此同时，它还两次发表通电，一面极力为袁世凯开脱罪责，一面号召国人明辨所谓“是非”，叫嚷“有效逆者，当共殛之”[42]。至其参、众两院议员即在国会再三要求袁世凯采取坚决有力的“戡乱”措施，并屡次提出诸如《请惩罚破坏国宪扶助乱党之韩玉辰案》、《请拿捕张继案》之类的提案，以打击国民党。关于进步党此时的所作所为及其作用，该党名誉理事、广东支部长徐勤事后曾供认：进步党“当时通电各省，日用电费至八万余元。并各言论机关，随处发挥拥护政府，群疑乃释”。又说：“平乱之功，固由赳赳者之奋勇有以致之，而鼓吹舆论，团结人心，以为武力之后盾者，非他人实吾党也。”[43] 以上事实说明，袁世凯在争取同盟军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三　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活动

为了实现武力统一计划，袁世凯还玩弄了其他一系列政治阴谋，主要有：

（一）笼络资产阶级。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目击者，他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参加武装起义、组织政团、奔走呼号废除君主政体，要求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和通过各种途径从财政上支持革命战争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自知这是革命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从准备发动内战的第一天起，就十分注意体察资产阶级的心理变化及其种种要求，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普遍要求维护秩序，安定人心，保障和平。1912年5月1日，上海出口皮毛杂货公会、商界共和团皮商公会为通告同业而发的一则公启十分典型地说明

了这种情况。该公启说："生命财产，人人自有保护之权。……故光复之初，吾商界输财助饷，不遗余力，无非欲保全治安，维持大局。近因政党中人横争意见，总统未经选定，宪法未经提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外间妄加揣测，遂有南北剖分之谣。……刻下金融机关，十分停滞，推原其故，实由于造言生事者危词耸听，构成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象，使人人皆有戒心。就市面情形而论，金钱不活动，货物无往来，谁实使之然哉？皆此造言生事者阶之厉也。此而不急求维持之法，对待之方，生命财产，从何保守？用是拟开临时会议，其开会宗旨，无非图社会之安宁，免邪说之煽惑。至如何办法，或电政府、议院及各都督，伏恳同业诸君于本月三号齐集事务所，公同研究，各抒谠论。"(44) 其为保守自身生命财产而渴望社会安宁的倾向，表达得何等露骨而突出！资产者们为此提出的"对待之方"，不外要求政府维持秩序。5月7日，上海总商会致电袁世凯等说："近日纷纷争议宋案也，借款也，选举总统也。……若有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叠据各业团体交相诟责，殊难缄默。务祈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业喘息余生，再罹惨祸，坐致大局沦胥，贻革命丰功之玷。"(45) 与此同时，北京、汉口、苏州等总分商会、蜀商公益会、旅沪全浙工业团、洋货九业公会、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香港各银行团以及各业公会公所等也纷纷向袁世凯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袁世凯对当时绝大多数资产者的心理变化是清楚的，因此，当他看到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时，便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商民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发布命令说："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46) 接阅上海等地总分商会电报后，他连忙表示"愿商旅不惊、廛市不变，安居乐业为十年生聚之谋"，并再次装出关心其命运的样子，命各省都

督民政长官“督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藉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47]。为了进一步取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和信任，他还故作姿态，自我责备说：“自前年九月以迄今兹，人民之颠连困苦，损失于无形者不知凡几……骎骎焉成为暴民专制，此皆由本大总统无德无能，未克尽职，旁皇夙夜，悲愤无穷，所愿与我无罪之良民洒一掬同情之泪者也。”并解释他所以“懔佳兵不祥之戒，作横逆不校之观，任彼隳突叫嚣者内省良知，自崖而返，非懦也，为救民计，为救国计，当祈天永命，不当张脉偾兴也”[48]。针对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要求，7月13日，他又发布“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49]。其实，对袁世凯来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把资产阶级引上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讨袁派的邪路，其针对商民心理而发的一道命令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命令中说：如果全国军人（实际上指的是讨袁派军人）都能服从他的命令，不“逾越范围”，不干涉“非分之事”，“提倡改革之先觉”（暗指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又能“爱惜名誉，诰诫同侪，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他“必当与我全国人民开诚见心，刷新政治，造世界和平之福，永民国无疆之庥”[50]。意思是说，你不是请我维持社会安宁吗？当然可以，但须先与我共同对付讨袁派的“暴动”，固我“邦家”。其用心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袁世凯的哄骗、唆使下，资产阶级除了频电袁世凯，表示“效忠政府，服从命令”[51]，“反对此次扰乱”[52]，“通电全国各省埠商会及海外华侨团体，请勿助破坏”[53]，广发传单劝谕“商人务宜各持定见，安居乐业、切勿为流言所惑，互相惊扰”[54]外，很快就由主要请求袁世凯维护秩序转向直接反对国民党讨袁派了。江西商务总会总理曾秉钰致函李烈钧，要求他“即出布告，禁止谣言，维持市面”[55]。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和各省商会联合会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国民党议员“勿持党见，勿尚意气，以国事为前提，以道德为正鹄，速定良善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俾安民志，而巩邦基”[56]

。其中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还气势汹汹致函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三人说："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本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庶几诸公爱国之心乃大白于天下，彼造谣生事之匪徒，自知计穷力竭，不复敢公然倡乱。"[57] 而湖南商界则莫不主张"以不助捐不开市相抵制"[58]。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的廉价许诺，的确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右倾，使他们大部分站到袁世凯反革命一边了。这正是"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三年后《民国日报》曾总结说："癸丑义师之挫，即一般商民姑息苟且之所致。"[59]

（二）分裂国民党。袁世凯为什么要分裂国民党，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它拥有多数议席，是国会第一大党，对他的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他分裂国民党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使入进步党，二是"别设小团以容纳之"，由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及总统府的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等代为经营。据邹鲁回忆，他当选众议员到达北京不久，就有原北伐军参谋刘某和淮军司令陈某（陈幹）来同他拉关系。一天，他们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四十万元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陆处长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来致意先生的。"邹鲁严词拒绝之后，陆建章又亲自请他吃饭，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60] 邹鲁虽然拒绝组织新党，而一些政治上的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却纷纷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团。大体说来，首开另组小政团纪录的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孙毓筠，接着司徒颖、刘揆一、景耀月等也纷起效法，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先后从国民党分裂出七八个小政团。它们是：

1．国事维持会　由孙毓筠、王芝祥、林述庆、杨曾蔚、温寿泉等人发起，1913年2月17日宣告成立。它宣布"其宗旨在维持时局，巩固国家，以至诚大公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61]。凡议会与政府有意见隔阂，各省与中央有误会抵触，甲党与乙党有激生恶感，它都

将设法疏通，委曲解释，居间调停。关于它的性质与作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密信中曾明白透露："孙少侯（毓筠）兄在政界有年，虽系国民党重要人物，而党见并不深，深悉时势之危险，非袁大总统不能担任，创办国事维持会，欲联合各党及各省都督力争宪法□□四端：一、加入解散权（总统解散议会）；二、消去通过权（国务员概不通过）；三、先选大总统；四、大总统有发紧要命令权。"又说："以上各事皆系设维持会之表面，其实则欲销薄宋（指宋教仁）之势力。其势力既薄，必不至捣乱。"[62] 可见，当时的日本《新支那报》说它"虽藉国民党人所组织，而事实上多赞助中央者"，"与统一党首领王赓颇接洽，应可视为统一党之右游击也。……国民党员之人数渐减，此实与有力焉"[63]。这个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该会建有不少地方支部，影响恶劣而广泛。

2．潜社　由司徒颖、陈垣、梁仲则等十多人发起，约成立于1913年4月中旬，以司徒颖、黄霄九为领袖。司徒颖等虽系国民党员，但自另组潜社后，"一切行动不与该党相关。嗣正式加入公民党，即一律登报脱离关系"[64]。

3．相友会　由陆内阁时期曾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起，1913年5月8日正式成立，推举刘为会长，陈黻宸为副会长，主要骨干有辛汉、张国溶、黄赞元、汪秉忠、王黻祎等。其宣布的宗旨是"实行调和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65]，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其总务部主任干事辛汉就曾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会计部主任干事黄赞元也自我供认："六月，相友会在议院设议员休息室，自是与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66]

4．超然议员社　由夏同龢为首的秦、晋、鄂、浙、赣、吉、滇、黔等省部分议员发起，1913年5月18日宣告成立。该社不置社长，全体社员俱为事务员，所推职员皆以一月为限，届期递推轮换。首期总务科主任为张汉、王鸿宾，文牍科主任为夏同龢、李增，交际科主任为黄懋鑫、汪哕鸾、俞炜、范樵。它标榜"以不偏不倚之精神

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67]，但实际上是倒向袁世凯一边的。其参众两院议员为反对江西李烈钧宣布独立所发的通电就是证明。该通电说：“赣军倒行逆施，首〈先〉倡乱，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望各军统帅剿抚并用，公私团体，扫除荧惑，使奸邪无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肃清。”[68]

5．癸丑同志会　由陈家鼎发起，1913年6月15日宣告正式成立，选举刘公为正会长，张我华、王湘为副会长，胡祖舜、陈家鼐、胡鄂公、马小进、高旭等分别为总务、政务、交际、文事、评议各部正长。据当时记者黄远庸说，该会纯因陈家鼎“与吴景濂争议长不合而起”[69]。它宣布的宗旨是“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虽不敢直命为第三党，而天道后起者胜，一旦时势到来，夫亦未遑多让”[70]。对于当时政局之争。它认为“本无所谓南北问题，自奸人从中播弄，南疑北帝制复生，北疑南割据独立，大局岌岌，势将破裂。……此类非常举动，有逾宪政常轨之外，无论孰胜孰败，皆足破坏民国本体，宁不若恪守政争范围，以维持共和为维持国家统一之道”[71]。其用语和腔调与当时的进步党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这表明它在政治上对袁世凯同样有利而无害。

6．政友会　原为景耀月所发起，初举景为会长，于右任、彭占元为副长，以巩固共和国体、发展国民经济、力谋教育普及、完成国内交通、增厚边防军备、经营拓殖事业、维持国际平和为会纲。后又与孙毓筠所发起的另一小政团民宪党实行合并，仍名政友会，于1913年6月19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景耀月、孙毓筠为理事（后增选袁乃宽、程克二名理事）。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72]。该会成员以国民党籍居多，其余属进步党籍，占五分之二。其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袁世凯，据说所给达五十万元之多[73]。这是它政治上脱离国民党转向袁世凯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　这是一个完全由广东人组织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

小政团，以朱兆莘为首领，有社员二十余人。后除朱外，其余全部并入梁士诒所组织的袁世凯御用组织公民党。

此外，湖南众议员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又称大公俱乐部、自由俱乐部）也是一个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主张“稳健”的小政团。

以上事实说明：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威胁利诱下，国民党早在与袁世凯决战之前，便已四分五裂，丧失了战斗力，这对袁世凯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三）施放和平烟幕。袁世凯明明在加紧扩军备战，但表面上却大念和平经，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1913年6月22日，他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塞，丝毫无滥”[(74)]，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炳麟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75)] 与此同时，他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与“和平天使”。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

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76]

事实证明，袁世凯的欺骗宣传的确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即如满腹经纶的章炳麟也确信“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77]。

（四）拉拢黎元洪。由于黎元洪捞有武昌首义的虚名，在湖北又拥有相当实力，且武汉地处要冲，是北洋军进攻南方国民党人的前进基地，因此，袁世凯从准备发动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把争取黎元洪视为至关紧要的问题。5月初，他特意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即是对黎的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来电效忠，表示“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不瞻顾”。黎的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嘉勉，并且表示：“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78] 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是“奸人”，“假政党之名义，图利己之私衷，以破坏为宗旨，以运动军队为至计”；并传谕“各军队如遇有运动之人，无论官兵出首报告，或拿获首领，或探悉秘密机关，俾先事预防得保治安，则按照后开各条给赏，以昭激劝。计开赏格：一、如有乱党运动兵士，由该兵士拿获确实证据，报告长官者，赏洋一百元；二、运动官长，由该官长查获确据，报告长官者，提升官阶一级；三、有查确

乱党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匪首者，赏洋一万元；四、有查确分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要犯者，赏洋五千元；五、有查确各机关地点报告长官，因而破案者，赏洋一千元”[79]。黎元洪的这些表态和措施把他的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早就做了军事、政治、舆论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一　二次革命的酝酿

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民国元年一直抱着与袁世凯合作建国的思想，缺乏备战应变的准备。自宋案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访问日本后回到了上海，当天晚上，他立即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解决宋案的策略。然而，革命党人在反袁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黄兴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戴季陶一贯主张二次革命，竭力反对黄的意见。黄兴仍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80]。他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81]，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82]。孙中山一向认为暗杀不足取，对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指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83]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强烈主张：“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他并强调说：“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84] 在血的教训面前，孙中山决心重新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然而，孙中山要领导革命党人转入革命战争的轨道，诚非易事。

在宋案之前，李烈钧等人虽有备战应变的思想，并且时断时续地有建立都督联盟的活动，但当时国民党内妥协空气浓郁，总希望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国会选举后，宁调元曾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先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85] 但胡汉民却不能不通电申斥："此种妄人妄语，粤人决不承认。"[86] 然而，反对派报纸却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的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备枪械，割据东南"[87]。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仍然相忍为国。宋案发生以后，面对着时局的激烈震荡，多数人一时难以适应策略的大转变。

当时，孙、黄争论不决，遂分电粤、湘两省征求意见。胡汉民和谭延闿因战备不足，都复电不赞成马上起兵。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曾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通电，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88] 但军权在陈的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89] 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他甚至遣使至鄂游说，企图争取黎元洪，但"黎公不为所动"[90]。

1913年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皖督柏文蔚、赣督李烈钧及湘、粤等省代表周震鳞、覃鑾钦等参加了会议。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且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91]，但当时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

视”[92]。军事会议的结果，据周震鳞回忆说：“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93]

“宋案”证据公布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义愤，达到了高潮，违法大借款案的签字，更是火上浇油。4月27日，《民权报》刊布徐谦《布告国民》一文，历数袁世凯政府十四大罪，并向国民呼吁：“嗟乎，国民！惟能死者乃能生存，惟能战者乃能得平和，惟能除暴者乃能保全其国家。民国根本，共和基础，已为万恶无道之民贼破坏以尽，吾民国再不能姑息养奸，借口于维持现状，顾全大局矣！”这几乎是一篇讨袁檄文了。孙中山主张乘民气高涨之机，“速兴问罪之师”[94]。皖、赣两督在沪上军事会议后，积极备战。临淮关一旅和安庆省城的军队，正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的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一批激烈派分子张尧卿、韩恢、何海鸣、王宪章、尹仲材等于4月27日组织了铁血监视团，并举何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95]。浙籍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金发）、丁匡公等致电浙督朱瑞，要求浙江与中央断绝关系，宣告独立；张尧卿、刘天猛等湘籍党人也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96]。他们还成立中国军界联合会，企图招募闲散军人和游民，准备起兵。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却于4月27日、28日、29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综论大暗杀

案》，他不顾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即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对于袁世凯为了战争而签订的大借款，他们也认为可以和平地打消："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97] 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据陈其美说，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98] 当时，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昌言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99] 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竟无可奈何，遂罢出师之议。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由于革命党人迟疑动摇，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1913年5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革命党人的第二次军事会议，竟一筹莫展，武力讨袁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二　南北调和活动的失败

大体说来，革命党中稳健派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民立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

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100] 所以，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而当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袁世凯气势汹汹地进逼的时候，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因此，5月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中间派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5月4日，由岑春煊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这通由谭人凤起草的电报，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大借款交国会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一贯以调人自居，正在积极助袁备战的黎元洪，也于5月9日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督，竭力为袁世凯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他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解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其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101] 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想，来侵蚀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于是，对决战缺乏信心的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102] 柏文蔚、胡汉民也先后派人入京疏通。仅李烈钧未肯屈服，但也不能不表示听从法庭和国会的解决。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中间派系的劝诱之下，就这样走上了幻想调和的道路，以求保存实力。

但是，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对革命党人的压力。5月13日，由变节的国民党籍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领衔，与袁系都督冯国璋（直）、张锡銮（奉）、周自齐（鲁）、张镇芳（豫）及甘肃护

理都督张炳华联名发表通电，点名攻击“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并咄咄逼人地威胁说：“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103] 15日，袁世凯悍然取消黄兴陆军上将的资格，且企图罢免反袁最坚决的赣督李烈钧。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急电呼吁和平，要求各方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锁，以谢天下。”[104] 浙督朱瑞也起来伪充调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川、闽诸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励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共遵轨道”[105]。朱瑞捧袁的做法太露骨，不像调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6月10日才由浙、滇、川三督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谭人凤为避免革命势力遭到摧残，加紧了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沪上调人，分成二路，一路赴鄂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三人前往，一路应袁世凯三次电邀，由谭人凤、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5月17日，岑春煊等自沪启程，前往武昌。他们在调停的名义下对黎暗中进行了策反活动。当他们到达时，章炳麟已经先期至鄂。章于1912年底曾被袁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不久就弃官南下，重新与孙中山、黄兴合作反袁。这时，他从上海来到武昌，策动他所最推重的黎元洪出来竞选总统。适黎召北军南下，章与湖北诸将一起劝黎不要引狼入室，但黎不听，第一师师长黎本唐因此辞职，后由石星川继任。当时，岑、李、两章四人轮番劝黎“毋辞大选”[106]。两章言词恳切，“处处劝黎公以国家人民为重，慎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之言，并谓非公出任总统，则南北分裂，兵连祸结无已”[107]。他们对这个徒拥虚名的黎元洪竟寄予莫大的希望。然而，黎在宋教仁死后，“惧及己，益懔懔”[108]，

他抱定“非袁则乱”[109]的信念，不听任何劝说。而且，他还把来客的说辞报告给袁世凯，并示意来客“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鄂。至此，革命党人策动黎元洪反袁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18日，谭人凤、王芝祥自沪进京，但同样毫无所获。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对王芝祥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110]谭人凤见袁时，袁更“痛诋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111]。袁用一派官话来对付谭人凤，他说：“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112]谭委婉地向袁陈述了“南北宜融和，不宜决裂”的意见，袁就把北军南下的责任往黎元洪身上一推说：“兵为黎宋卿所请求，中央并无用武之意。”[113]谭见话不投机，即离京往鄂。临行前，向袁辞行，“仍以撤兵、毋易赣督为请”。袁世凯稍稍改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114]谭抱着一线和平的希望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告诉他：“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115]他们早已准备对赣动手了。

当时，袁世凯已经做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5月21日，他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其语词狂妄蛮横，不留余地，前所未有。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116]

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江西，北洋第六师于5月中旬部署在兴国、

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黎屡次托人要李“洁身引退，举贤自代”[117]，李烈钧断然表示拒绝。黎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退军撤防，并暗示可荐欧阳代李出任赣督。时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撤退前沿防兵。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士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于6月3日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配。”[118] 黎也令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家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鄂陈述政见，黎元洪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后方案：“（一）请公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接任。”[119] 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的咽喉的调和办法，李烈钧当然不能接受，他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于是，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

正当江西局势紧张之时，上海发生了进攻制造局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2日，袁又电嘱程拿办张尧卿。23日，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军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郛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黄兴、陈其美为了与袁世凯调和，轻率地抛弃了这批可以利

用的激烈分子。

程德全、陈榥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5月29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徐企文起事失败后，陈其美于5月31日偕《民强报》记者赴制造局，他在谈话中暗示，此次事变系北京当局勾结匪徒破坏，以便派兵来沪。他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阻止北军南下。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一方面向程德全施加压力，要程同意由中央调兵入卫制造局，一方面将徐企文押赴北京审讯，企图指实为黄兴、陈其美发动。但徐企文倒是很有骨气，他始终没有捏词诬栽，借此报复，后于1913年9月8日被处死刑。

柳人环于进攻制造局之役失败后，带了十多人跑到江西，企图依傍反袁最坚决的李烈钧。6月3日，柳抵达南昌，径至都督府求见，但遭到李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复电说：“张光曦（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获，以表白克强之心迹，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120] 5日，李竟派军警逮捕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十三人（除上述三人外，其余不久释放），并拟解赴江苏交程德全审理。时任李秘书职的何海鸣向李烈钧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见自相残杀，十分伤心，被迫离赣赴沪。后来，李下野后，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与徐企文同日处死。

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所以要牺牲这批激烈派分子，无非是想缓和袁世凯的压力，以便保存革命党人的地盘和实力。然而，革命党人保存实力的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剧的阵痛变成慢性的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的政治瓦解手段

呢，他们一度寄予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的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经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宋案的法律解决，由于组织特别法庭的斗争失败，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仍归县一级的小小的上海地方审、检厅办理。由于上海厅的级别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和嫌疑犯朱荫榛。6日，上海地检厅秉公执法，居然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宋案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内务部秘书）到沪候质。同时，沪检厅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遂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然而，这个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5月3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他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121) 与此同时，京检厅在沪检厅的催促下也居然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致京检厅的复函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公然拒绝到案对质。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122) 就是那个小小的程经世，也因背后有靠山而拒绝出庭。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智庵（赵秉钧）放心住医院就是了。"(123)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不能到庭，宋案的审判一拖再拖。5月30日，上海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泯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程、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他们强烈要求上海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程、洪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审厅未经审案，即不得不宣布

退庭。

在此期间，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儆出面，编造伪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5月17日在北京住处被捕。但谢为议员，搜检他的住宅又未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5月29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组建的京检厅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6月11日毅然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做法，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124) 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由于袁世凯的分化收买政策和进步党的抵制，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后来，邹鲁回顾这一段国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大借款案，主张由国会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125)

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凤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凤昌取得联系，准备通过张謇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6月5日，赵凤昌在致陈陶遗的电报中说：“经武（胡瑛）来商，精卫与切要处（似指孙中山、黄兴）研究大局，已一致和平，对于前途，亦力趋稳定。惟望中央勿遽信伪谣，勿骤有更动，俾汪更

易进行。”[126] 汪、蔡与张、赵拟定的调停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要政为正当之宣告”[127]；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128] 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有利。

磋商正在进行之际，汪精卫因等待回音，在沪无所事事，遂于6月10日赴粤，“谋党见之一致”[129]，由蔡、胡继续与赵凤昌保持联系。而前一天，即6月9日，袁世凯已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形势为之一变。不过，谈判继续进行，张謇于12日将调停条件电告袁世凯。14日，袁世凯又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16日，袁复电张謇，就调停问题表示意见说：“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傥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130] 袁世凯并没有放弃政治瓦解革命党人的手段，不过他对调停显然表示疑虑。经赵凤昌与蔡元培、胡瑛两次会谈，蔡、胡表示：“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131] 但实际上，孙中山在袁罢免赣督后，正积极运动起兵。这时他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澳、港，不在上海与议，而汪精卫也滞留广东不回。前述条件实际上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调和早已到了尽头。赣、粤两督的罢免，也破坏了调和的最后一点基础，战争的风云即将来临。汪、蔡的调和活动，倒是起了一点掩护革命发动的作用，所以战争爆发后，张謇写信给赵凤昌，愤愤地说：“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132]

三　李烈钧和湖口起义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在做好了政治、军事准备以后，指责李烈钧“不称厥职”，“不孚众望”[133]，悍然下令罢免李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重要部将，袁世凯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企图用政治手段来瓦解革命党人。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先后在赣、滇任职。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九江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后率舰队西上援鄂，任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后，坚持革命立场，与袁世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誉为民党急先锋。李烈钧被罢免，就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地方实权的剥夺，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是隐忍待时呢，还是背水一战？尽管局势已经十分明朗，革命党人在做出最后抉择时仍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摇摆过程。

当时，孙中山义愤填膺，竭力主战。他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及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动员李烈钧声罪讨袁。但这时李烈钧鉴于他的同盟反袁的主张久久得不到响应，因而顾虑重重，打起了退堂鼓。法律解决的思潮，磨损了李烈钧的战斗意志。

还在免职令下达以前，李烈钧在和邓汉祥的一次谈话中就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据邓的回忆说：“我到江西见到李烈钧后，就问他反袁的结果会如何？李说：‘一定打仗！’我问：‘打仗胜负如何？’李说：‘国民党一定失败……’”[134] 免职令下后，李烈钧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赣中将领纷纷主战，但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表示坚决反对。当时正在江西的赵正平献议，“不如先行电询湘、皖、闽、粤诸

省，再行决定”。赵去电后，“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谭（延闿）主张我从众，皖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撤手，粤胡（汉民）且言我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孙（道仁）也含糊。这样一来，李氏就决定下野，自己且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135]。6月15日，李烈钧卸职离开南昌前往上海。他在路过湖口时，九江一线的军官们也向他建议即时讨袁，但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并说：“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136] 当李经安庆与柏文蔚会商，然后于6月19日到达上海时，孙中山已离沪赴澳门。李草率卸职离赣，遭到沪上党人的责难，尽管他还在犹豫，已不得不放弃出洋的打算。

就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欧阳武即致电黎元洪，表示拥护中央。他说：“武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137]，旋即就任江西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6月18日，欧阳武从九江启程赴南昌，路经湖口时，撤换了反袁比较坚决的水巡总监蔡锐霆，19日到达南昌，翌日即接管都督印信，履行职权。第二师师长刘世均旋由南昌调赴九江。欧阳上任后，立即着手破坏李烈钧的备战体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138]，并将前沿部队撤回江西腹地。这是李烈钧轻易离开江西所造成的恶果。与此同时，为稳定江西局势，黎元洪表示“可担任鄂军不入赣境一步”[139]。

在李烈钧离赣的前一天，即6月14日，袁世凯又以调任的方式，撤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贻范（原上海通商交涉使，参与发布宋案证据）、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原吉林都督）为广东民政长。胡汉民于16日通电接受新任。

当时，革命党中枢曾两次电请陈炯明出师“抵抗命令”[140]。但陈炯明召集诸将开会讨论出师时，遭到粤中将校的反对。汪精卫这时正从上海赶到广州，他对胡汉民、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商

定了胡、陈接退的办法。三人又联名密电黄兴，明白表示一致讨袁，请黄专力主持长江军事。胡、陈在联名致邹鲁的电报中也表示："这次更接，不特于大局无碍，而且有益。"[141]

不过，当时的广东局势还是很微妙的。革命党人指望陈炯明的权力欲望得到满足以后能起兵讨袁，而广东高级军官们则希望拥陈上台后一起倾向袁世凯。双方都希望陈炯明早日接任都督。陈处此局面，觉得"接也难，不接也难"[142]。他既害怕起兵失败，又害怕为袁利用，下不了最后的决心，迟迟不肯接任。他在6月16日曾向袁世凯提出了很高的要价："（一）中央政府须即汇款二千万元，以为收回地方纸币之用；（二）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三）如政府为一时权宜计，暂以炯明充粤督，则不如速去。"[143] 如此高价，袁世凯当然难以接受。

6月20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澳门，22日，胡汉民偕汪精卫乘宝璧兵轮离粤赴港。孙中山遂约见陈炯明。陈为避嫌疑，以巡视为名，乘军舰与孙会面。孙中山终于"征得陈炯明对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144]。7月4日，陈接都督任，着手调集军队，准备独立。

赣、粤两督的罢免，使革命党内武力讨袁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黄兴为大势所逼，开始着手规划倒袁的实际部署。他把行动的方向，首先定在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自辛亥革命后，备受袁、黎的压迫和摧残，他们一批一批地觉醒起来，相继走上反抗袁、黎压迫，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觉悟有迟早，被黎元洪逐次各个击破，革命军队也被黎遣散殆尽，而北军已经重兵入鄂，革命党人不再像辛亥年那样有力量了。然而，他们在策动黎元洪中立失败之后，还想抄袭辛亥年的老文章，希望在湖北首先发动，扫除湘、赣出师的障碍。湖北著名革命党人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炳坤等在黄兴支持下，纷纷回鄂运动，前军务司长蔡济民也密谋内应。黄兴又续派宁调

元、熊樾山前往联络，敦促起义。

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广泛联络，准备起兵之际，先前发动上海制造局之役的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在李烈钧离赣后被解赴湖北，并于6月23日乘京汉火车转解北京。途中，文仲达变节招供："机关在上海麦根路三十二号〈B〉。其派来湖北运动军队，并行暗杀之人为刘敦榘，年二十三岁，湖南人，机关在汉口《民国日报》馆。"(145) 黎的探访人员中途回鄂作了紧急报告。24日，黎元洪饬令军警会同法租界巡捕查封《民国日报》馆，搜获文电布告多件，逮捕曾毅等四名报馆编辑。

负责起义全局的詹大悲，看到机关被破，心急如火，命令起义部队于25日夜于南湖集合暴动。但是，由于各处机关陆续被破坏，联络指挥人员被捕，没有发动就流产了。翌日，宁调元、熊樾山因疏于防范，在汉口德租界日本人所开富贵馆被黎的军警会同德租界巡捕逮捕(146)。是日晚，詹大悲再次鲁莽发动，到处派人纵火，但依然一事无成。仅驻扎天门、潜江一带的原季雨霖旧部章裕昆一营于25日夜如期响应，举行起义，旋亦因孤立无援而溃散了。事后，黎元洪大肆搜捕、屠杀。詹大悲等在武汉立脚不住，在日本人掩护下，乘日轮岳阳丸逃往下游。经这次失败，湖北革命党人被摧残殆尽。

6月底，孙中山由香港回到上海。这时候，各省的空气依然相当沉闷。李烈钧滞留沪上，陈炯明迟迟未上任，革命党的一些带兵将领还在希望保存实力。尤其是南京第八师，作为革命党人的精锐部队，师旅长们借口中下级军官不能一致，依然不赞成出兵讨袁。孙中山对于党内这种涣散的状况非常气愤，他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力促陈其美在上海独立，章梓在南京倡义，又派朱卓文前往南京运动第八师的营连长赞成起兵。但是，谁也不敢先发。于是，孙中山、黄兴又宴请李烈钧，动员江西起兵发难。席间，李"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并以南京情形告之，李遂告奋勇"(147)。当时，恰巧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派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寻找李烈

钧探听消息。李思广向李以及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汇报了江西军队士气旺盛、斗志高昂的情况，李烈钧终于下了首先发难的决心。他令李思广赶速回报："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148] 并密电赣中将领速作起兵准备。

当革命党人为发动二次革命奔忙之际，袁世凯也在积极抢占先机。7月2日，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向袁世凯密报："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149] 这个叛将竟要求袁世凯商请黎元洪派遣军队和军舰前往九江镇慑。4日，黎元洪违背信约，电告袁世凯"拟援缨冠往救之义，迅饬李总司令（指李纯）酌派军队驰往赴援"[150]，支持北军强行入赣。5日，参、陆两部向李纯转达袁世凯命令："严行戒备，一闻有警，立即驰援。"并告李已电黎派兵，"并饬徐司令亲率各舰先驶至浔驻守，以防意外"[151]。事实上，李纯未待袁的命令到达，已根据黎的指令，于5日派遣十二旅吴鸿昌的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先行赴浔，6日又亲率第十一混成旅继进，并于8日抵达九江，轻易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

当北洋军队前锋到达九江地区后，林虎于6日向南昌屡电告急，并宣布"本团现已实行防御"[152]。他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将前哨布防到沙河一线。是日，欧阳武感到为人愚弄，遂致电国务院抗议派兵入赣，并向袁世凯电请辞职，并要求袁致电黎元洪"速将军队调回"[153]。由于欧阳武连电黎元洪担保江西局势平静，要求履行北军不入赣境的诺言，黎曾一度电令李纯撤兵。但李纯不听，并亲率一团进驻九江城内，前锋更于10日推进到沙河一线，离林虎所部仅数里之地。南北两军虎视眈眈，战事一触即发。

在北军进兵江西的同时，袁世凯借口徐企文案，一再向程德全交涉，坚持派兵南下进驻上海制造局。7月6日，北洋第四师臧致平团伪装成海军警卫队（共三营，约一千三百余人），由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乘招商局新昌、安平两轮抵沪，入据制造局军械重地。当北军未

登陆前，陈其美建议邀击于海上，孙中山表示赞成，但黄兴认为不妥，因而没有拦截，让北军安然上岸，在南方腹地插进了一把尖利的匕首。

尽管决战即将来临，革命党人依然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没有统一的指挥，步调十分凌乱。本来，赣、皖结成了反袁的联盟，但这时柏文蔚认为大势已去，意志非常消沉。6月30日，袁世凯任命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解除了他的安徽都督职务，同时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柏拒绝了新任，但表示“文蔚交卸，即日归省（省亲）”[154]。安徽革命党人要求即时举义，柏没有同意，也没有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上海革命党人指派龚振鹏回安徽策动反袁。7月6日，孙多森到安庆上任，安徽革命党人管鹏、陈紫枫运动胡万泰部排长彭尚述企图暗杀孙，但被胡捕获。当时，李烈钧正从上海经南京返赣准备起义，但他没有去联络柏文蔚合作反袁。8日孙多森在胡万泰的保护下安然接任。柏文蔚竟在临战之际，于7月10日乘建威兵轮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藉以休息”[155]。

7月8日，即李纯到达九江的那天，李烈钧也悄然抵达湖口[156]，部署起兵事宜。然而，他在湖口无法掌握他的基干部队。他的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即一师二旅三团当时被分割部署在九江（二个营）、南昌两地，而且被敌牵制，无法运动，因而他只能以九、十两团为基干力量。九团为戈克安旧部，十团由湖口炮台兵改组而成，战斗力可想而知。李又调集辎重、工程两营，以湖口为基地，设立讨袁军司令部。9日晚，李烈钧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机关，“鄙人免官赴沪养疴，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157] 欧阳竟严词答复李烈钧：“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158] 并派代表三人赴湖口劝李烈钧离境。李对代表说：“烈钧亦知南雷（欧阳武字南雷）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南雷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159] 李烈钧以生死的抉择示意欧阳不得阻挠起义。

11日，李纯得到陈廷训的当面紧急报告，得悉李烈钧已经占领湖口。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也急报林虎正向九江开进，要求通过北军防地。于是，李纯向京、鄂急电请援，袁世凯遂命黎元洪调拨海陆各军迅速赴浔增援，令欧阳武“严束所部，勿受乱徒指挥”[160]。欧阳武在南昌得悉李烈钧已执意起兵讨袁，企图调集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但这时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的部下原是李烈钧旧部，支持革命。江西革命党骨干分子俞应麓（在上年李烈钧病假期间曾代理过都督职权）控制了南昌的局面，国民党掌握的省议会，更一向主张激进。于是，欧阳于11日晚上召集民政长、各司司长、都督府顾问、各报馆主笔、各公团各党派领袖开会，宣布自己已无调遣军队的能力，表示从此辞职，但因大家要他维持南昌秩序，才勉强留下下来。

同日，李烈钧对军事作了部署，密电委任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沙河、十里铺一线北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九江城南金鸡坡炮台北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当日晚，林虎向所部下达了攻击令。12日拂晓，林虎所部前卫司令唐天鹏向沙河北军侧翼发起猛攻，林军另一支向十里铺前进，企图包抄敌军。酝酿已久、几度濒于流产的二次革命战争终于打响了。

在湖口，李烈钧令要塞鸣炮，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还向各属及人民通电宣布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161] 讨袁檄文慷慨激昂，谴责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号召“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162]。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开会，推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唯欧阳武称病不出。这样，江西首先举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

四　各地响应

当江西着手准备起义的时候，南方各省革命党人也在纷纷准备响应。

江苏是革命党人核心力量所在地区，上海为其指挥中枢所在地。但是，由于南下袁军的牵制和内部不统一，对于究竟先在南京还是上海发难的问题，革命党人还一度踌躇难定。南京第八师高级将领还缺乏革命的决心，南京其他革命党将领章梓、洪承点、冷遹认为“苏省军队的命脉，完全在上海高昌庙的制造局，所有枪炮子弹的补充都在局中，现在袁氏已先发制人，派臧致平率兵一团南下，驻扎在局，如果上海确实没有办法，苏省军队实在危险。”他们要赵正平回沪复命，请黄兴、陈其美先行宣布上海独立，然后“南京即行通电响应”[163]。陈其美原以为“以海陆两军驱逐制造局北军，其事易易”[164]，但事实上海军已经变卦，不再支持革命。他先责成黄郛运动其驻制造局的旧部六十一团发动，但该团一营已被调往龙华，全团被北军分割监视，不敢先发；继又企图调宁波顾乃斌旅来沪发动，但因尚未宣布独立，师出无名，顾旅不便行动。而袁世凯也已获得情报，命令海军予以拦截。陈其美智穷力竭，只好再请南京首先发动。

当时，孙中山正不顾一切地运动起兵。朱卓文受命在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165]。这些中下级军官，情绪激昂，跃跃欲试，他们表示：“我们不能等高级官长了，只有先动了。”[166] 7月13日，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获悉上述情况后，惊慌失措，仓卒赴沪向黄兴报告了军队内的危机。他们在下层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保存实力的打算，表示愿意起兵讨袁。不过，王、黄两人提出了条件：请黄兴赴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一致服从，但认为孙中山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去组织政府”[167]。为了防止孙中山的激越措施，避免第八师的自相残杀，黄兴也不得不改变了对起兵的消

极态度。当时，义愤填膺的孙中山正准备前往南京，“亲统六师”[168]，“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169]。他先至黄兴寓所相谈，黄以孙“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170]为词，劝孙勿往，表示自己愿代孙前往指挥。孙中山勉强同意了黄兴的意见。

这时，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已由南京讲武堂副堂长蒲鉴向北京告密，7月13日，北京又转告程德全，程遂复电请派北兵驻宁，但北军尚未行动。7月14日夜，黄兴轻车简从，由沪抵宁，至八师师长陈之骥宅邸，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独立和作战计划。翌晨，章梓派人切断了都督府内的电话线，八师士兵开入都督府，江苏都督程德全从睡梦中惊醒。旋黄兴率南京高级将领入府会见程，说明讨袁大义，请程协助。多病的程德全为突然事变所震惊，一时嗫嚅难言，不肯贸然同意。八师长陈之骥等若干高级将领竟纷纷跪泣哀求。程遂虚与委蛇，附和独立讨袁，即请随黄来宁的章士钊起草讨袁通电，以程德全、应德闳、黄兴三人的名义，宣布江苏独立，并以程德全的名义委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革命党人以如此屈辱的态度，去争取一个同盟者，表明他们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虚弱。他们这样做，当然只会招致同盟者的蔑视和叛离。程德全很快就让陈陶遗来向黄兴疏通，要求离开南京。当时，柏文蔚被黄兴从家中请出任事，他向黄兴建议：“最好快刀斩乱麻，处程于死，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171]黄兴不听，纵虎归山。7月16日夜，程德全、应德闳分别离宁赴沪。程到上海后，马上通电声明：“本月15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搘拄，本日来沪调治”[172]，借此卸脱了南京独立的责任。更严重的是，程、应旋即秘密地与袁世凯联络，以便伺机扼杀革命。

在南京独立的当天，第一师师长章梓派兵捕杀了倾向袁世凯的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蒲鉴、要塞掩护团教练官程凤章，并逮捕了讲武堂堂长朱志先（后为柏文蔚保释）、都督府参议官陈懋

修（后在小营被杀）。

在军事方面，南京独立之后，黄兴调任章梓为都督府参谋长（章本是文人，不会打仗），由洪承点接任第一师师长，任马锦春为要塞司令（未上任），并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第八师和第一师各编组成一混成支队，分别由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和第一师第一旅长周应时率领，开赴前线，支援第三师，洪承点则负责节制一、八两师，赴前线指挥。

南京是革命党人的军事重心所在，南京通过曲折的道路，终于实现了讨袁独立，于是，二次革命就在各地逐步发动起来。

安徽介于江西和江苏之间，长江大动脉贯穿三省，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安徽进则是前进基地，退则是重要屏障。它既可藩卫南京，又可支援江西。但是，由于柏文蔚离开安庆，赣、皖军事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安徽的革命发动脱出了原来的轨道，造成了分头发动的涣散局面。在寿州一线，是原淮上军屯田的地方，张汇韬、郑芳荪早在6月底就在蚌埠召集旧部军官前往寿州，“声称将募十营”[173]。龚振鹏则从芜湖带了少量军队前往庐州（合肥）运动其旧部起兵。但其旧部在营长夏永伦策动下表示反对，龚仓皇出走，安徽第二旅代旅长李乾玉（驻庐州）也被迫逃亡。龚只好独自前往寿州活动，并于7月13日进占正阳关。龚本人则于7月19日辗转回到芜湖。革命党人范鸿仙原是淮上军的领导人，7月15日从上海到达芜湖，当日夜，他即策动驻芜湖的安徽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程芝萱宣布芜湖独立，适龚振鹏也自正阳关来电嘱响应，遂以第二旅旅长龚振鹏的名义宣布独立讨袁。同时，宣城驻有张永正一团，张即与芜湖汇合一起。接着，临淮关和寿州淮上军队均发布讨袁檄文。在安庆，袁世凯任命的代理都督孙多森没有实力，曾请调南京第八师一部驻皖，未成。胡万泰手下也兵力不足，因安庆之兵大都为柏文蔚调赴淮上，而革命党人在安庆尚有较强的实力。于是，胡万泰和孙多森串通起来，于7月17日也宣布安庆独立，胡万泰自称都督，演出了一幕假独立的丑剧。不过在表面

上，安徽除倪嗣冲控制的地区外，都实现了讨袁独立。

上海是南京的后勤保障，但南京独立之后，上海并没有立即宣布讨袁，从而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责难。有位师长责问在宁、沪间联络的赵正平说："你说南京独立了，上海没有问题，为什么上海到今天还没有宣布？"[174] 上海方面苦于力量不足，正在尽力集结兵力。7月17日，钮永建在松江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约一团兵力，其中一营是新兵，称松军）和当地沈葆义的水师开抵龙华；同时陈其美组织了一支由军校学生组成的奋勇军，由其直接掌握，从松军那里获得了一些武器。这样，陈其美才宣布成立上海讨袁军，由黄兴委任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以黄郛为参谋长，在南市设立司令部。然而，上海独立之后，仍然没有对据守制造局的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从而使南京讨袁军缺乏一个安全的后方。

当时，沪上商界十分害怕战争。7月17日，由上海南市商会发起，与商团公会、救火联合会、教育会等四团体组织上海保卫团，公推李平书为团长，声称以"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务使我上海地方不遭兵火为目的"[175]。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上海总商会更貌似公正地致函南北两军说："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176] 这实际上是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帝国主义列强也公然出面干涉，在上海地区增加了军队，在租界构筑了工事。根据上海租界当局的要求，北京公使团电饬驻沪领事团向南北两军蛮横地宣称："（一）无论南北，如欲在沪开战者，须离租界三十英里；（二）须各存金镑一千万镑，预备偿还各项损失。否则即以违背万国公法论，实行干涉。"[177] 企图迫使革命党人放下武器。这一切，导致力量微弱的上海讨袁军迟迟不敢用兵，而希望通过谈判，使制造局北军和平退让。上海保卫团也出面致书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和郑汝成，向双方进行调停。李平书要求北军"和平退让制造局"[178]。7月20日，李又特邀郑汝成、臧致平与陈其美在高昌

庙自来水厂内举行秘密会谈。李再次提出了一个调停办法，建议“以制造局作为中立，应将该局军火一并封存，以待南北大局定夺之后，再行办理”[179]。郑、臧断然拒绝了李的方案，声称：“我等系奉袁氏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来前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180]谈判毫无效果。

广东是革命党人的根本之地，由于长期经营，革命党人的实力从表面上看来也比较强，且远离袁系势力。江西首义，本指望湘、粤的支援，因此，独立后即一日数电敦促广东响应。陈炯明本欲即时响应，但部下各师旅长依旧反对，遂派二人前往上海观察形势。延至7月18日，陈炯明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强行宣布独立，两个团长表示支持。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以不宜过急宣布独立为请”[181]，遭到陈的严斥，各军官在表面上不敢表示违抗。陈炯明遂亲至省议会正式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当时，陈曾致电驻梧州的龙济光、云南都督蔡锷等邀约一起反袁，并派人动员陆荣廷起兵。但龙济光一心投靠袁世凯，滇、黔、川、桂也正在合作对付革命党人。蔡锷复电陈炯明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182]广东处境十分孤立。陈炯明宣布独立之后，即以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旅各编组成一支队，出师援赣。但是，各师旅长互相推诿，“故行延缓”[183]，迟迟不肯出发，致使江西前线苦战无援。

福建都督孙道仁比较胆小怕事。福建各方面的力量都比较薄弱，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小。湖口起义之后，福建十四师师长许崇智和由部分国民党人组成的讨袁同盟会积极筹划起义，并与上海方面取得联系。他们向都督孙道仁施加压力，要求宣布独立。孙一向态度动摇暧昧，这时鉴于身边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又担心粤、赣军队向福建进攻，不得不于7月20日宣布“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并声称“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184]。孙不称独立，仅称断绝关系，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同时，孙又借口保守疆土，拒绝了许崇

智等出师讨袁的要求。由于孙的掣肘，许竟无能为力。

湖南都督谭延闿虽然在革命党人的包围下参加了四省联盟，但他本是一个为人圆滑的立宪派人士。湖口起义后，他发布通电说："伏望大总统开诚布公，与民休息；副总统、各省都督排难解纷，各抒谠论，以维大局。勿使浔阳一隅，首为全国糜烂起点。"(185) 当时，谭人凤、蒋翊武等湖南籍革命党人纷纷回湘活动。谭人凤、周震鳞、陈强、唐蟒等人日夕向谭延闿进言，要求宣布反袁独立。谭穷于应付，偷偷派人到鄂向黎元洪私通款曲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186) 黎元洪担心湖南没有谭延闿就更难以抑制革命党人的活动，因此他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187) ，向他传授了自己对付革命党人的秘计。于是，谭延闿尽量敷衍革命党人，竭力推迟宣布讨袁的时间。

对于湖南革命党人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军力不足的为难局面。当时，程潜刚刚编成了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不足一师兵力。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军队缺乏武器弹药。长沙的军火集中在荷花池军装局，袁世凯在湖南的走卒向瑞琮、唐乾一等在7月7日放了一把火，把荷花池的军火烧个精光，使湖南军队几乎瘫痪。革命党人不得不向粤、赣要求支援军火，从而延缓了他们的军事行动。直至7月25日，谭延闿才被迫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并部署讨袁军事，一方面出师湘、鄂边境，一方面组织援赣。

四川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四川第五师师长熊克武迟至8月4日才在重庆宣布独立。当时，四川都督胡景伊为共和党籍，投靠袁世凯。川督原为国民党籍的尹昌衡，因尹平叛西征，远在川西理塘，川督遂由胡景伊代理。袁世凯蓄意扶植胡景伊，1913年6月13日遂正式任命胡为四川都督，尹为川边经略使，解除了尹的川督职务。四川革命党人为了反胡，派吕超等赴雅安谒尹，密邀尹昌衡返省复政讨袁。尹虽于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尹不敢复政反袁，并曾通电谴责赣、宁独立。在袁的严令催促下，尹于7月底离省重返川

西。于是，胡景伊便放手镇压革命党人，并企图编遣由革命党人组成的驻重庆的第五师。第五师是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由川籍军校学生组建的蜀军演变而来，革命性较强。熊克武面临胡景伊的压迫，在起兵反袁还是提出辞职以求保存五师实力之间，一度犹豫不定。但重庆革命党人和五师旅团干部群情忿怒，要求起兵，熊克武这才最后下了起兵的决心。重庆独立前夕，革命党人就东下讨袁还是西上讨胡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达成了西上讨胡的决定。这样，重庆独立就成了局限于四川一隅的内争。

重庆是二次革命最后宣布独立的重要地区，当时二次革命败局已定。此外，在一些省区，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反袁起义，如：浙江宁波顾乃斌曾一度宣布独立，旋即取消，没有发生战争；马逢伯则奉陈其美之命在嵊县起兵。刘铁在湖北沙洋起兵。1913年9月间，刘古香、刘震寰在柳州宣布独立，等等。这些起义都旋起旋灭，没有发展成一支较大的势力。

当各地的反袁斗争逐步发动起来之后，革命党人理应建立起政治中枢和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犹如辛亥革命中那样。但是，革命发动前的犹豫、观望和内部纷争，使他们无暇去仔细考虑革命发动后的政治、军事设施问题，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国会是民国法定的立法机构，它是民国的一面旗帜。如果国会撤消对袁世凯的支持，无疑是在政治上对袁世凯的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在国会两院占有一定优势，武装斗争发动起来后，理应把国会这面政治旗帜抓在自己手里。为此，在上海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于南京宣布独立后发布宣言，严厉谴责袁世凯对议会的蹂躏，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188]。南方国民党系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但是，这些政治眼光极为短浅的议员们，除少数人南下奔赴各地参加革命外，多数议员（包括国民党议员中的多数人）依然端坐议场，静观事变。他们对国会议员的区区政治权利留恋不舍，听凭袁世凯翻云覆雨来操纵他们的命运。

既然国会议员不能南下建立一个与袁世凯对抗的国会，讨袁军方面也就缺少一个能够代表各省的议事机构，于是，在上海的省议会联合会就来担当起这样的角色。省议会联合会是4月间在天津成立的，由广东发起，各省议会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其目的是争取省议会参加总统选举的权利。省议会联合会在天津的活动，遭到地方当局的压迫，不久即迁往上海。袁世凯曾电令程德全予以解散，但没有成功。这时，它就起来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7月16日，省议会联合会致电袁世凯，提出忠告说："公自悔过，宜下令罪己，以谢天下。吾民胥爱平和，决不忍公陷绝境，苟可救国于不亡，不惜委曲求全，隐忍迁就。不然，人心已去，大势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回，诚不忍见公之沉迷不返，追随查尔斯、路易辈于断头台下也。"(189) 18日，又发布《布告友邦书》，郑重表示："对于友邦从前国际上之条约当然继续履行，勿有差忒，各友邦居留人之生命财产，完全担任保护，勿使损失。"但是，它警告说："袁氏不得以尺寸领土、丝毫权利割让列邦，列邦亦不得以金钱暨战品贷与袁氏政府。本会为全国省议会之代表，自中华民国7月18日宣言起，请友邦注意，诚实履行。苟其甘冒不韪，贷与金钱或输战品，是与袁氏个人交易之行为，与中华民国无涉，吾民决不承认。"(190) 省议会联合会的这些政治活动，表明它试图担当起二次革命的政治中枢的作用。不过，它并不是在各省讨袁过程中汇集起来的，因而它的地位相当虚弱。

在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方面，革命党人只作了一些软弱无力而又没有成效的努力。在筹划二次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几乎找不到同盟军。他们勉强找到了一个早已失去实力的岑春煊。岑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不和，革命党人希望利用岑、袁矛盾，借助于岑在前清时遗留下来的影响（广西的陆荣廷、龙济光本是岑的部将），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决定推岑出山主持军事，而岑本人却主张以清宗室为大总统。章炳麟责问岑说："君欲复辟耶？"岑才作罢，遂"教克强奉程都督为主，勿令走，有亟则己来助之"(191)。所以，南京独立后，南京方面即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7月19日，省议会联

合会也通电举岑“开府江宁，主持中枢”[192]。22日，省议会联合会更正式开会选举，一致通过拥岑为讨袁军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可是，岑春煊一直滞留上海，没有勇气到南京去“开府”。

二次革命在政治上竟然如此软弱，以致他们不敢立即打出孙中山这样一面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愿把一面比辛亥革命中的黎元洪更灰暗的旗子作为自己的掩护。这也说明，二次革命的政治立场，不仅没有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他们不敢以自己革命的坚定立场，依靠群众的支持，去争取右翼同盟者，反而以尽量模糊自己政治面貌的办法，去求得他们的同情。

孙中山本人在政治上也未能有所建树。他迟至7月22日上海开战前夕才发表宣言，向国民呼吁：“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193] 同时致电袁世凯进“最后之忠告”[194]，劝袁辞职。此后，由于战事的失利，孙中山再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主张。这场缺乏英勇气概的革命，连一个革命的中央政权机构都未能建立起来。

第三节　北军南下和讨袁军的失败

一　浔湖之战与南昌失守

当二次革命在各地发动起来的时候，袁世凯的军队已经越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插入了南方腹地。多数地方部队即使不听袁指挥，也能对他保持善意。尽管形势对他有利，但他在策略上仍然相当谨慎。他的军队在战略展开上，处于攻势，但这种攻势主要是利用革命党人因动摇而暴露出来的空隙，实施战略箝制。而在战役上，在各个战场上，袁世凯则采取了后发制人的军事策略，相当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部队，强调“衅非我开”，不让各部队主动出击，以赢得战场上和政治

上的主动权。

在江西战场上，李纯仅拥有一师兵力，悬军深入，态势突出。他以一混成旅兵力部署在九江城内至沙河一线，另以一混成旅兵力部署在长江两岸集结待命。7月12日8时，林虎以一团兵力猛烈攻击沙河北军（二十三团）的左翼，首先打响了战斗。北军在兵力上虽居于劣势，但进行了顽强抵抗。于是，林虎续增步兵、机关枪共一团兵力向北军右翼发起猛攻，另分兵一支进击十里铺要道，企图抄袭敌军后路。适北军一支也由十里铺出发，抄袭赣军，遂于中途发生遭遇战。当时，李纯全师尚未集中，立足不稳，面临赣军左右两翼威胁，又要防备九江城内赣军的袭击，加以湖泊众多，地形不熟，处境十分危险。他一面赶紧集中全师兵力，一面频繁急电呼援。是日，激战竟日，讨袁军伤毙敌军一百二十多名，初战获胜，占领沙河，迫敌退守瓜子岭。

可惜，李烈钧未能协调左、右两翼的行动。当左翼苦战之时，右翼方声涛尚未进入攻击阵地。九江赣军本有五营之众，但一则受到北军监视，一则军心不一，未能及时响应。讨袁军失去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态势孤立的北洋第六师的良好战机。

7月12日下午，北军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部进驻金鸡坡—马宿岭一线，协同叛将陈廷训（拥有一营兵力）布置防务。入夜，六师后续部队全部开赴九江战区，增强了十里铺一线的兵力。13日，两军复激战竟日，不分胜负。是日夜，李纯获得李烈钧将于当晚夜袭金鸡坡炮台的情报，急忙从右翼前线抽调兵力增援张敬尧。方声涛把队伍开赴前沿之后，听到沙河方向炮声停顿，以为战机不利，命令部队退回原地，放弃了进攻计划，又一次丧失了协同作战的时机，并且一进一退之间，也挫伤了士气。

当时，驻在九江的赣军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与六团团长李定魁及第二师师长刘世均曾协谋内应，歼灭城内两营北军。但刘本动摇不定，

而李部原驻萍乡，为刘槐森旧部，刘已投袁，策李叛变。因此，李定魁未按预定计划行动，致使内应受挫。伍毓瑞在自己的政治面目暴露后，对部队行动机宜作了部署，随即独自逃离九江前往湖口。三团驻九江城外的第三营由营长万勋率领辗转撤至姑塘参战。至此，讨袁军失去了有利时机，陷入了被动局面。

李纯看到林虎攻击顿挫，讨袁军左右两翼不能协调行动，遂制定了反击的计划，以摆脱被动的局面。他向袁世凯报告说："（六师）前方后路，在在堪虞，加以沙湖弥漫，背水列阵，尤为可虑。纯以一师兵力，当此危情险状，势不得不以全力先行压倒林军，俾免为彼等诱攻牵制，堕其计中。以一部暂时固守浔城附近金鸡坡炮台至马宿岭一带，以待增加兵力。"[195] 14日拂晓，李纯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向沙河镇—苗家湾一线发起进攻，林虎率部顽强抵抗，驻南昌的第二旅一部也赴前线增援。激战至下午3时，林虎左翼不支，纷纷向蓝桥方向撤退，营长李穆被俘。右翼退守沙河附近高地，被北军十二旅旅长吴金彪部包围。至16日，李纯因第二师援军迟迟不至，江西右翼军进攻金鸡坡炮台，同时，又有驻浔赣军将袭击十里铺的警报，不得不收紧中央突出部的兵力，林虎右翼得以突围。这时，林虎指挥的原驻德安的李定魁团第一营营长郭懋修策动叛变，林虎虽及时发觉，立予平定，以前营长郭懋仁复任营长，但军心已被动摇。左翼军一蹶不振，再也无力主动出击了。

林虎失利之后，右翼军司令方声涛率第九团、机关枪两连、新编独立营于7月16日7时向金鸡坡炮台发起进攻，在八里坡一线激战，张敬尧指挥本团第三营、二十一团第一营、二十四团第一营竭力抵御，势几不支。李纯自十里铺一线急行抽调二十二团第一、二两营增援，向讨袁军左侧抄袭。战至下午6点，讨袁军失利，被迫退却。在撤退途中，营长龚星胜叛变。第九团为戈克安旧部，多河北、山东人，战争爆发后，戈克安、陈廷训均派人前往策反。龚受陈廷训的唆使，枪杀了勇敢善战的团长周璧阶，率九团一、三两营及炮队、机关枪队投

敌。右翼军遭此挫折，也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江西讨袁军自开战之日起，只经过了五天时间，左右两翼的进攻先后遭到挫败，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政治上的动摇，造成了军事指挥的紊乱和军心不稳，是讨袁军失利的主要原因。

7月17日，北洋第二师鲍贵卿旅二千人抵达九江。二师全师及原驻奉天（辽宁）的第二混成旅第四团（欠一营）随后陆续开抵江西战场。袁世凯于7月16日任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江西宣抚使，节制赣、鄂北洋各军。7月20日，段芝贵率拱卫军八营抵达九江。海军次长汤芗铭也从北京经汉口前来指挥海军舰队。李烈钧鉴于战斗失利，遂将司令部移驻吴城，部署节节抵抗，以待湘、粤援师。但湘、粤北援之师迟迟不发，江西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

李纯在击败了江西讨袁军之后，自恃功高，对段芝贵前来指挥江西军事十分不快。二师四旅旅长鲍贵卿担心将帅不和，前功尽弃，曾电陈袁世凯，认为李师辛苦两载（包括镇压武昌起义），获此战果，不宜遽更主将，请速定名分，或者让段、李两人各领一军。段到达九江后三次晤李，李纯竟称病不见。李纯士卒甚至公然扬言："段再登岸，即以武力对之。"[196] 段对李的傲慢大为震怒，密电袁世凯："李某如此专横，非明正典刑，则军务不堪设想。"[197] 为此，袁世凯曾命令解散李纯的司令部，并严词训李，李不得不向段芝贵表示道歉，才重新协调了彼此的行动。江西讨袁军兵败之余，未能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可惜的。

段芝贵掌握军事指挥权后，即着手规划以后的作战方略。据林虎回忆说："段芝贵到九江询问李纯的作战方略，李说江西部队最顽强者唯有林虎部，击破这部，其余各部可迎刃而解。段说攻强不如摧弱，摧弱成功速而影响大。"[198] 段遂以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除以李纯率一部驻守十里铺一线，与林虎相持外，其余各部会同海军舰队进攻湖口。7月23日晚开始，北军兵分三路，向湖口一线

展开军事行动。北军右翼支队，由军总预备队第二师第三旅旅长王金镜指挥，进攻姑塘。赣军姑塘一线由伍毓瑞率第三团第三营、由南昌开来的第一营三连及独立营驻守。翌日，两军在狭市激战一昼夜，北军稍有进展，迫近姑塘。北军中路由旅长马继增、团长张敬尧指挥，进取灰山、湖口西炮台（在鄱阳湖与长江汇合处西岸）。24日侵晓，北军攻击前进，在新港遭到赣军顽强抵抗。下午4时，讨袁军撤出新港。24日夜，张敬尧派出步兵二连，分别乘黑夜潜近灰山、回峰矶设伏。25日晨3时，北军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3点才予以完全占领，湖口西炮台台官刘镜福投降。北军左翼由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鲍贵卿率领，于24日晚乘船出发，从江面直攻湖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江利（座舰）、楚同、湖鹗、江亨四舰掩护陆军登陆。凌晨3点，北军乘黑偷渡，被赣军发觉，当即发炮猛攻。北军凫水登陆，激战至中午，讨袁军放弃湖口，由水路向吴城方向撤退。26日，鲍旅分兵支援右翼，占领姑塘，伍毓瑞率部沿湖岸向吴城转移。

当湖口激战之际，九江刘世均命令所部开赴湖口助讨袁军作战。李定魁部不听命令，刘仅率第三团郑鸣澍一营撤离九江，开赴江北。27日刘部反攻湖口，为海军击败，还走小池口，遭到李定魁部的拦截，郑营全部溃散。湖口失守之后，江西讨袁军的士气几乎崩溃了。敌军因战后休整，暂未进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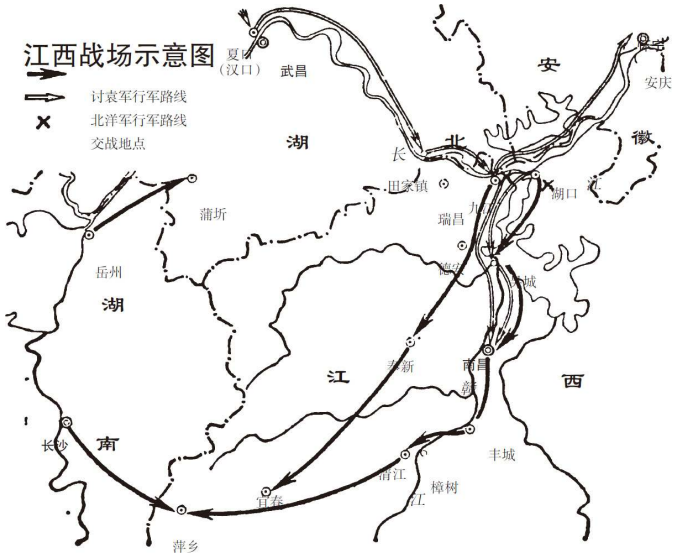
当时，江西讨袁军左翼仍扼守瑞昌、蓝桥一线，右翼军退守南康（星子）、吴城。7月30日，北军分兵三路，发动全线进攻。北洋陆军第二混成旅（吴庆桐独立旅）进攻瑞昌，于8月1日占领，赣军第二、第七团溃散。李纯率部自正面进攻林虎，讨袁军向蓝桥、黄老门、德安、建昌（即永修）边战边撤，黄老门一役，曾予北军严重杀伤，敌主力一连，仅剩八人。8月10日，李纯占领建昌，林虎退守二里半（潦水南岸）。北洋左翼马继增旅于8月1日占领南康。8日，北军化装成难民模样，乘民船数艘，要求进入吴城。守军受其蒙骗，没有戒备，北军驶近望夫亭即一跃登岸，发枪攻击。讨袁军惊惶失措，

士无斗志，方声涛严令抵抗，已无能为力，被迫撤出吴城、灌口。

北军自占领建昌、吴城之后，李纯、马继增均屯兵不进，养敌自重，要求袁世凯、段芝贵派精兵赴援。他们明知北洋精锐已调拨一空，故意借机要挟。段芝贵看到骄兵悍将不听命令，企图撤换前敌将领。李纯的参议李廷玉居间疏通，北军将领之间才重新协调，向南昌发起总攻。

讨袁军自吴城失守之后，欧阳武眼见李烈钧将回南昌，遂于9日只身逃走，赴青山自称止戈和尚。鉴于南昌不稳，李烈钧于8月11日率部回防，宪兵司令廖伯琅企图叛变，闭城不纳。李部越城而上，打开城门，迎李入城，廖即逃走。李烈钧在南昌重新整编了部队，任伍毓瑞为南昌卫戍司令，向乐化、樵舍一线布置防务。这时候，整个讨袁战线已经瓦解，渴望已久的湘、粤援军已经无望。湘督谭延闿电劝李烈钧说："微服过宋，古有名训。"[199] 请李赴湘后出走。

8月14日，李纯令张敬尧渡河进攻二里半。翌日，林虎向奉新撤退，随后又向湘、赣边境转移。同时，马继增旅进占樵舍，南昌门户洞开。16日，李烈钧率一部分军队先期撤出南昌，前往湖南。8月18日，张敬尧未经激战占领南昌。赣军余部向浙、闽方向撤退，并于途中解散。这时候，北军久战疲劳，减员严重，伤病累累，一路上又肆意抢掠，占领南昌后已军无斗志，也就没有追击的能力了。



李烈钧撤至萍乡，湘军援赣之师由唐蟒率领与李会合，掩护赣军撤退。李于途中与林虎会见，商讨了部队善后事宜，即率少数亲随人员于9月2日到达长沙，与谭延闿会见。时谭已取消独立，李烈钧通过日本人的掩护，乘船潜往上海转赴日本，流亡海外。林虎所部则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由湘省收缴枪械，按退伍办法出资遣散，林也辗转前往日本。江西讨袁军宣告失败。

南昌失守后，驻赣州江西第四旅旅长蔡森即归附北军，并截获讨袁军残部黄馗、廖伯琅（廖系反复无常）。黄、廖解赴南昌后为李纯所杀。欧阳武于9月初向北军交出印信自首，被解赴北京，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八年，但袁世凯旋即予以特赦。

二　徐州之战与上海制造局之役

在江苏战场上，战斗爆发前，北洋第五师在韩庄前线仅驻有两营兵力，由旅长方玉普率领（方升任旅长后尚未接任，实际上只是担任团长职务），五师其他部队散处各地，尚未集中。张勋屯兵兖州，跃跃欲试，但并未南移。连袁世凯也认为江苏第三师师长冷遹“向顾大

局”，命令“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200]，尚无主动南侵之意。在讨袁军方面，同样也无起兵准备。这与江西战场上早已两军对峙的情况不同。所以，冷遹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讨论起兵讨袁时就指出：“我的军队尚散在四乡剿匪，南京一宣布讨袁，山东边境的北军势必进攻，我若把不住第一线，怎么对得起各位？”[201]

冷遹于南京宣布独立之前回到徐州，仓促地收拢部队，于7月15日占领利国驿。16日晨，冷遹未待全师集中，也未待一、八两师北上，即以孤军率先投入进攻，企图一举占领韩庄。方玉普率部抵抗，坚守待援。江苏第三师攻击竟日，未能得手。17日晨，冷遹加强了前线的兵力，继续发动猛攻。正酣战间，张勋武卫前军统领张文生率部来援，田中玉部巡防营随后也到达韩庄前线。江苏第三师遭北军夹击，被迫退守利国驿。

张勋自辛亥年败退兖州以来，时时妄想复仇。这时，张部成了江苏战场上北军的主攻部队。对于这个封建余孽，黄兴竟企图利用他的忠君思想，策动其反袁，希望他“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202]，这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无益的举动，当然不可能改变张勋仇视革命的顽固立场。

7月18日，北军转入反攻。袁世凯调兵遣将，支援前线。是日，北洋第五师十九团由团长潘鸿钧率领，步行二百里赶到韩庄，炮五团团长郑士琦也自济南率步兵一营、炮队一连赶到前线，将利国驿车站轰毁。北军兵力加强，讨袁军后援未到，被迫撤出利国驿，扼守二郎山口。19日，富有战斗力的讨袁军主力第八师由刘建藩率领抵达前线，向敌军左翼实施反攻，激战一昼夜，包围敌军一部。北洋第五师将两营后备队全部投入战斗，才突围后撤。是日上午，讨袁军江苏第一师一支队开赴前线，声势大振，再度向敌反攻，迫使北军撤退到利国驿附近。讨袁军前锋一度追过运河。

但是，讨袁军兵力不足，未能扩大战果。22日，北洋第四师何丰

林旅开抵前线，北军实力加强。张勋所部马队绕道台儿庄进击徐州东路，威胁讨袁军侧背。讨袁军在徐州北的柳泉—茅村之间与敌激战，态势不利。这时，江苏第三师张宗昌部马队在北军策动下竟率先后退，扰乱了讨袁军的阵线。讨袁军全线溃退，放弃徐州，直奔蚌埠。

北军于7月24日未遇抵抗，占领徐州。讨袁军尽管建制完好无损，但高级将领们斗志消沉，无意部署节节抵抗。一、八两师奉命撤回南京。第三师则军心涣散，冷遹脱离部队回到南京，旅长伍崇仁等退守浦口，向北军接洽投降。只因北军进兵迟缓，才使战事处于间歇状态。

当讨袁军在徐州北鏖战之际，上海讨袁军因幻想和平接管制造局，因而迟迟没有开战。这样就使北军于抵沪之后，赢得了半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临战之前，郑汝成放弃了龙华分局以收紧兵力，集中力量坚守总局。他又迫使原驻局内的六十一团、三十七团撤往局外，防止发生内应事变。北军日夜兴工，加强防御工事，决心坚守待援。

对于上海战局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海军倒向了北军一边。海军自烟台回沪以后，态度就有所变化，但在上海开战前，依然“人心甚活”[203]。当7月16日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宣布独立时，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曾派舰队会同步队一营往攻吴淞，“乃兵舰多不赞成，愿守中立”[204]。于是，袁世凯政府又派人持京、沪外国银行汇款一百四十万两运动海军官佐。应瑞舰长毛仲方、楚有舰长魏子浩因不赞成参战，被迫辞职。7月18日，飞鹰舰奉命上驶九江，企图驶进吴淞口时，遭到吴淞炮台的攻击，军舰受伤。这样，海军与讨袁军就对立起来。上海开战之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指挥舰队协助郑汝成攻击讨袁军，从而使讨袁军遭到意外袭击。

陈其美鉴于沪上各军力量不足，不得不向南京请援。南京方面看到上海行动不力，影响大局，只好从镇江赵念伯的三十二旅拨出一团支援上海，于7月19日到达；又把南京的福字营调回上海，于22日到

达。福字营为刘福彪统带，辛亥革命时由上海游民分子组成，1912年间由程德全将该军调赴南京，有炮一营，步二营，但实力不足。刘部到沪后，陈其美将福字营改编为特别敢死队。至此，上海讨袁军的兵力部署大体完成。

23日凌晨2点55分，战幕揭开，上海讨袁军向北军驻守的制造局发动进攻。六十一团、三十七团攻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松军、镇军攻击望道桥制造局正门。北军死战，海军发巨炮压制讨袁军火力，沪军炮兵营被摧毁，讨袁军的进攻遭到挫折。北军凭借既设阵地，发挥训练有素的技战术优势和火力优势，成功地以微小的代价击退了讨袁军的进攻。讨袁军由于军官缺乏战术素养，士兵缺乏战斗训练，队形密集，射击不准，攻击乏力，自清晨3时一直战斗到上午11时，攻击无效，伤亡累累，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上海战事爆发后，列强明显地支持袁世凯。租界当局于当日悍然议决将黄兴、孙中山、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八人逐出租界。列强外交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向袁世凯政府透露讨袁军的军事秘密。

23日夜，讨袁军因白天攻击不利，发起夜战，但依然未能奏效。郑汝成看到讨袁军攻击受挫，士气不振，顿时猖狂起来。他函致南市商团威胁说，如果陈其美不取消司令部，他就要进攻南市。陈其美为避免南市商场遭到战火破坏，遂将司令部迁往闸北南海会馆。

24日晚，讨袁军依然出师不利。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英国医生柯司在驻沪领事团支持下，向讨袁军运动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25日晚，双方续有战斗。翌日，驻沪领事团与工部局西董会议，再次干涉中国内争，竟出通告宣布：“或在本界，或于本界以北毗连各乡，不准作为行军根据及阴谋计策中点之用。两方面之中国兵弁，无论何方，均须迁出本界北乡之外，以免战事波及本界，而保卫各国守分商民之安宁。且军事领袖与有连带者，无论何党，或文或武，亦应由本

界及本界北乡立即迁出，如违定行提究。”[205] 显然，这是租界当局打击讨袁军的严重步骤。27日晨，租界工部局借口闸北中国商人请求保护生命财产，派遣总巡捕卜罗斯率马队三十余人侵入中国地界，开往闸北南海会馆和湖州会馆，驱逐讨袁军。蒋介石所率原六十一团一部约二百零七名讨袁军为英军缴械。于是，闸北一度为英、美军队控制。

28日晚，讨袁军对制造局北军象征性地发起最后一次进攻，很快就脱离了战线。这一天，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舰队护送北洋第四师李厚基旅南下，三天后陆续抵达制造局。讨袁军遂由龙华向七宝一线退却，制造局解围。7月31日，浙江都督朱瑞派遣浙军开赴上海支援北军。松军被迫辗转撤往吴淞一带。进攻制造局之役至此完全失败，上海讨袁军被迫侷守江湾—吴淞一隅。

还在上海讨袁军进攻制造局刚刚受挫的时候，一度蛰居的程德全又重新活跃起来。他看到讨袁军到处失利，败局已定，遂于7月25日发表通电，声明南京独立的一切文电，是“假用德全名义号召”[206]。他又与应德闳联名通电声称：“17日抵沪后，即密召苏属旧部水陆军警，筹商恢复。”[207] 并宣布在苏州行署办事，从而在政治上给南京独立以沉重的打击。驻苏州江苏第二师师长章驾时于南京独立后即弃职赴沪，旅长朱熙代理师长职务，这时接受程德全指挥。翌日，镇江也接受程德全命令宣布取消独立，沪宁铁路当局也奉北京交通部的命令停止通车，宁、沪的联系被截断了，二次革命的中枢南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严重局面。

黄兴坐镇南京，面临着军事形势恶化，一筹莫展。程德全于7月26日致电黄兴，要黄“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208]。28日，南京军界接到了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长张鹏翥更接到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看到败局已定，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是夜乘日轮静冈丸离宁，一走了之。他本拟赴沪，因无法上岸，遂

随轮前往日本。临行之际，他嘱陈之骥维持南京秩序，免遭乱兵蹂躏。黄兴走后，讨袁军重要将领章梓、洪承点、冷遹也相继离去。于是，南京陷入了“三军无主”的局面。

黄兴出走的同一天，没有上任的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也在上海发表声明：“自问对于南北两方面，无非以维持和平为惟一宗旨，不料两方决裂，竟以兵事属之。鄙人业已迭次坚辞，未肯承认矣，试观上海一隅，战端甫开，伏尸遍地，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如果各省纷纷效尤，内乱不已，酿成瓜分，吾辈何可自为祸首乎？现在谣言繁多，若不去沪，无以自明心迹。”[(209)] 岑随后即离沪赴粤。

7月29日，即黄兴出走的翌日，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代江苏第一师师长（原第一旅旅长）周应时等当即宣布取消独立，并立即发电与袁世凯联系，要求程德全、应德闳回到南京处理善后事宜。南京独立运动黯然瓦解。8月2日，孙中山看到宁、沪失利，不得不离沪赴粤，希望在广东坚持讨袁。于是，二次革命的核心地区失去了精神支柱，整个二次革命战线很快就全线瓦解了。

三　讨袁阵线的崩溃

湖口起义之后，袁世凯在政治上仍小心翼翼，避免树敌过多，并紧紧抓住“民国”的招牌，以争取中间派。7月15日，袁除下令褫夺李烈钧军职，命令欧阳武、李纯设法拿办外，没有涉及其他人，以姑示宽大。17日，袁世凯以斥责欧阳武通电（此电系江西革命党人用欧阳名义发表）的形式，从政治上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声称：“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他谴责欧阳“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

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但他对欧阳本人留有余地，认为“难保非佥壬挟持，假借名义”[210]。这篇冠冕堂皇的辩词，虽然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但他既然紧紧抓住了“共和”、“国会”的旗帜，又后发制人，不涉及其他人，甚至故意不涉及正在指挥革命的领袖人物，这样就对中间派具有迷惑力，并对革命党人具有牵制和分化的作用。

赣、宁战事全面展开之后，袁世凯迟至7月21日才正式发布“平叛”通令，宣布“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211]，同时宣布在北京和战地戒严。翌日，又命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孙中山发布讨袁的宣言和通电之后，即7月23日，袁世凯仅命令销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避免采取更严峻的措施。虽然，这时袁世凯已同革命党人全面决裂，但他在策略上仍保持着弹性，以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在整个二次革命过程中，各地的独立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在犹豫、迟疑、观望、动摇之中勉强进行的，到处都呈现着冷冷清清的局面。革命党人既没有发动群众，也没有镇压在内部猖狂活动的敌人。一批不可靠的同盟者，掌握着独立运动中的军权和政权，革命党人缺乏忠诚可靠的力量。当南京独立取消之后，各地的反独立分子就嚣张起来，从内部瓦解着讨袁阵线。北洋军队尚未南下，各地的独立就纷纷取消了。

福建在独立各省中是最缺少生气的一个省。都督孙道仁虽佯附革命，实际上他在旅长孙宝镕支持下，密谋调集旧部来扼杀革命。福建讨袁军总司令许崇智主要依靠新兵的支持，力量不足。他看到孙无意革命，企图把孙推倒。但孙有旧部支持，许不敢贸然发动。当宁、沪失利的消息传来，许崇智看到形势不利，即于7月31日离开福州，逃往香港。8月1日，孙道仁密电在京的前福建十四师师长杜持，说明闽中反袁的真相，并要杜向袁世凯政府“秘密陈明”：“闽省情形，须广东势衰，赣省肃清，闽省即可取消脱离字样。”[212]孙道仁一直小心翼

翼地控制着福建局面，他虽早已与袁世凯密电往还，但直至大局明朗，才于8月13日正式通电各界，陈明“苦衷”，宣布取消脱离袁政府。

广东都督陈炯明自宣布独立之后，一直督促部队出师北伐。但师旅长们阳奉阴违，北伐之师始终未出羊城一步，陈炯明不得不强令8月1日出师，但这时龙济光已经率部自梧州进逼广州。7月30日，驻肇庆警卫军管带李耀汉叛变，投降龙氏。要隘失守，陈炯明不得不先行对付龙济光，命第三旅旅长叶举前往三水一线布防。广东援赣之师被迫停止出发。

龙氏进逼，叶举外调，那些驻在广州密谋叛变的军官们就大肆活动起来。当时，广东反对派人物如黄士龙、李准等都或明或暗地派出暗探进行策反活动。正当广州局势紧张之际，岑春煊自沪偕李根源到达广州。他们立即着手争取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希望他们积极反袁，但没有成效。岑又派人拿了自己的亲笔函件去劝龙济光反袁，但龙不念旧恩，对来人十分冷淡。李根源为了挽救危局，就同自京回粤的邹鲁一起去见陈炯明，提出“杀携贰之将领一二人，军心自振”[(213)]。陈害怕发生兵变，不敢采取果断行动，仅逮捕密谋叛乱的第一师参谋陈钟英等三人。结果，打草惊蛇，钟鼎基、张我权闻讯于8月3日逃往香港。

这时，孙中山正在赴粤途中，他派张继、马君武先行抵粤联系。陈炯明鉴于军心不稳，只好请张、马前往香港劝阻孙中山。孙中山于8月3日到达福州马尾，得悉广州局势不稳，二次革命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只得偕胡汉民改道台湾，流亡日本。

8月4日午后1时，冯德辉受黄士龙唆使，赴燕塘策动炮兵团和辎重营叛变，自称粤军界临时总司令，炮击都督府。陈炯明匆匆忙忙枪杀了陈钟英等三人，然后逃往香港。广州商会等团体推举苏慎初为代理都督，宣布取消独立，维持地方秩序。翌日，独立第五旅又逼迫苏

慎初下野，拥张我权为都督。黄士龙也返广州活动，企图捞上一把。但袁世凯早已于8月3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自然不承认广东方面的拥立。龙部济军继续向广州前进。

8月10日晚，原驻三水陆军第二团一部返省，驻扎观音山原来的营房。11日，龙部济军抵达广州，蛮横地逼迫陆军迁出观音山，引起了陆军的愤怒，与济军发生冲突。随后，济军陆续到达，到处逼迫陆军让营，一些革命党人也策动陆军士兵杀掉官长后抵抗济军。济、陆两军在广州城内断断续续激战三日，陆军的反抗并无组织，遂全部溃散。龙济光全面控制了广州，那些拥袁的陆军军官们也被迫离开了广州，一无所得。后来，邹鲁曾企图重新举事，被龙察觉，广州警察局长陈景华等被杀。广东的讨袁独立运动完全失败。

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宣布独立之后，心怀鬼胎，居心叵测。他和黎元洪密商之后，以讨袁为名，将省城拥护革命的军队由第一军司令程子楷、副司令赵恒惕率领，调赴岳州；又以蒋翊武为鄂豫招讨使驻岳州，部署对湖北军事；并派唐蟒率新兵援赣。但援赣军行动迟缓，湘军抵达萍乡时，李烈钧已经退出南昌了。谭将革命党人率领的军队调走之后，乘省城空虚，以亲信余道南为省防守备队司令，又以自己的亲信童锡梁等为新募五营管带，从而控制了省城长沙。谭延闿布置完毕以后，即于8月11日密电袁世凯表示输诚："湘事措置无方，咎在延闿一人，惟维持操纵，实具苦衷。现情安谧，终当始终保持，不敢上烦荩忧。"[214] 8月13日，谭延闿公开出示布告，宣布取消独立："现在闽、粤、宁、皖，已均各取消独立，大势所趋，皆以保境息民为主。湘省既不能以独立为支柱，又何可以全省为牺牲？于事无裨，于心不忍。本都督已一面发布命令，即行罢兵；一面电达中央，静待处分。"[215] 在取消独立时，有人主张"应杀一、二有名人物谢中央，借为取消话柄"[216]。但谭延闿是个圆滑的官僚，他并不打算与革命党人完全断绝瓜葛，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留有后路。因此，他不仅眼开眼闭地让湘、赣革命党人逃脱袁世凯的追捕，还亲自接待了李烈

钧。他在一封电报中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217] 这两句滑头话，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政治品格。这种适应中国社会复杂形势的两面手法，为谭日后在政界的浮沉打下了基础。

当时，湖南一批激进的革命党人对谭延闿取消独立十分不满，于9月9日再次发动独立，进攻都督府。谭延闿事先获得谍报，作了戒备，"遇犯即杀"[218]，残酷地镇压了暴动，暴动的领导人刘崧衡等遇害。谭延闿对人说："我平日何尝欲杀人，越不杀人越不得结束，故我不得不杀人，以稳定局势。"[219] 革命党人的尸骨，最终成了他赢得袁世凯宽恕的垫脚石。

安徽各地宣布独立之后，柏文蔚奉黄兴之命赴蚌埠成立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皖北各部赴正阳关集中，淮上屯田部队则由张汇滔率领扼守凤台—寿州一线。倪嗣冲获得寿州独立的消息后，即率八营兵力开抵颍上，进逼正阳关，在鲁口与皖军隔河对峙，遭到皖军的袭击。因当时河水盛涨，进兵困难，双方没有发生重大战斗。7月20日，豫督张镇芳遣旅长王钰锦率一支队自周口出发，增援倪嗣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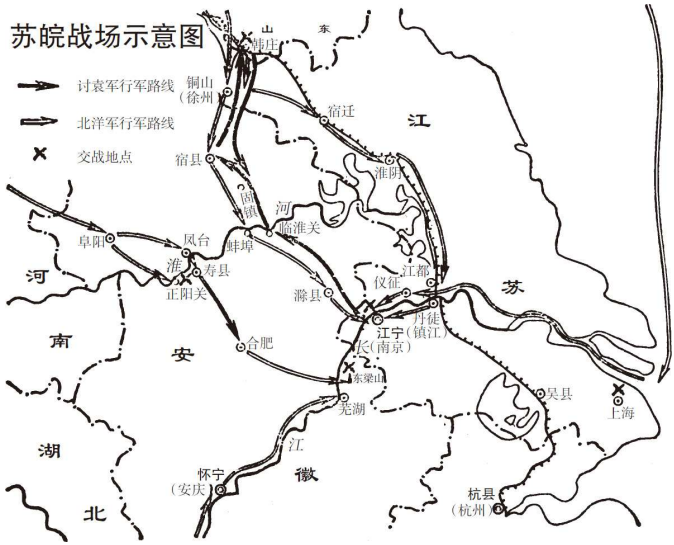
在安庆、芜湖方面，芜湖革命党人对孙多森、胡万泰的"独立"十分怀疑。张永正部遂以援赣为名，沿江上溯，于7月19日进攻大通，与胡万泰部发生战斗，其目的是与胡争夺大通盐厘的财政收入。胡部不敌，退回安庆，胡、孙相偕乘船逃往上海。但船到南京后，胡万泰却留了下来，跑到柏文蔚身边进行投机。胡的父亲胡殿甲为淮军宿将，与段祺瑞系世交，而与柏文蔚同乡，关系也不错。所以，柏对胡表示信任。孙、胡离皖后，柏文蔚的亲信、宪兵司令祁耿寰自称都督。7月23日，商团推举刘国栋为都督，出兵驱逐了祁耿寰。于是，安徽革命党人要求柏文蔚回镇安庆。时徐州战事失利，黄兴为了稳定上游局势，也促柏速回安庆。7月27日，柏文蔚率部回皖，胡万泰随行，刘国栋闻风潜逃。柏回皖后，其部下曾向他陈述胡万泰不可靠，但柏不听，命胡率第一线部队至太湖方向作战，并部署淮上各军分三

路迎击倪嗣冲。

倪嗣冲在得到豫军的支援后，以豫军虎视正阳关，自己亲率主力向凤台转移。7月31日起，倪部向凤台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淮上讨袁军主力在凤台城外布防。8月2日凌晨，倪部向讨袁军发动猛攻。讨袁军竭力抵御，支持至下午2时，被迫退守凤台；下午4时，又放弃凤台渡淮溃退。3日夜，倪军渡淮，讨袁军继续溃退。正在南下的冯国璋，分兵一团，协同攻击寿州。5日，寿州失守，张汇滔率部退向庐州，被驻军夏永伦部包围，张仅率少数人突围逃亡。6日，豫军占领正阳关，淮上讨袁军全部失败。

当淮上失败的消息传出，胡万泰在军中得悉后，立即率部回师安庆，蠢蠢欲动。这时，柏文蔚已接到黄兴密电说："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220] 葛应龙、端木璜生等也以函电向柏报告南京混乱情况，事为胡万泰所探悉。胡即于8月6日面见柏文蔚，讽柏离皖出走。柏文蔚见胡不怀好意，尽量与之敷衍。7日凌晨1时，胡万泰、顾琢塘在城外与反对革命的皖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柴宝山部署叛变。8月7日8时，以柴部为主力，自城外发动进攻，获内应入城，围攻都督府。柏文蔚率卫队抵抗，叛军遭到城西狮子山炮兵的袭击，被迫转移兵力，先行占领狮子山。柏文蔚乘机向南突围，经大通退往芜湖，与龚振鹏会合。

胡万泰于叛变的当天，即通电取消独立。翌日，鲍贵卿率部由九江乘军舰开抵安庆，由胡万泰迎入城内。至此，安徽仅芜湖尚在讨袁军掌握之中。



当安庆失陷之时，长江门户吴淞尚掌握在讨袁军手中。吴淞原由姜国梁率广军驻守，段祺瑞派到上海的前第九师师长郑为成及蔡春华等人对广军进行了策反活动，广军动摇，偷走炮闩，图谋叛变，姜国梁出走。陈其美派白逾桓、居正率镇军平叛，扼守炮台。7月26日，海军进攻吴淞，白、居指挥台兵反击，联鲸舰受伤投降。刘冠雄抵达吴淞口后，一再指挥海军进攻，屡攻不克。时刘福彪部由南市撤守江湾，经程德全的勾诱，阴谋叛变。7月31日，程命令刘福彪倒戈，反攻吴淞炮台，策应海军。命令为居正截获。8月6日，居正率部主动进攻，将刘部击溃。但是，本来就十分微薄的炮台兵力，就更加衰弱了。适钮永建率部到达吴淞，遂推钮为总司令，镇压了通敌的水上警察，协同守御吴淞。当时，北军因不能通过租界行军，行动迟缓，故于8月11日才进抵江湾，江苏第二师也进抵浏河，吴淞被围。11日夜，钮永建夜袭北军，小有斩获，但因兵力薄弱，无法扩大战果。12日早，沪、淞信息断绝，居部各军官逃走一空，军心动摇。是日，红十字会医生柯司奔波于海军与炮台之间，与双方协商和平解决。是夜，讨袁军和平让出吴淞炮台，退往嘉定、罗店之间。翌日，吴淞炮台由海军占领。长江门户洞开，北军源源入口。讨袁军残部退至太仓后遣散，但队伍尚未散尽。北军赶到，立即对手无寸铁的遣散官兵大

肆搜杀。至此，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

四　南京保卫战和重庆失守

正当整个讨袁战线崩溃之际，南京于8月11日再次宣布独立，重新举起了讨袁的大旗。

在此之前，袁世凯任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江淮宣抚使，于7月24日率部自天津南下。袁命其沿铁路进兵，速取临淮；同时命张勋取道清江、扬州，由水路进取镇江，与冯会攻南京。可是，由于铁路遭南撤讨袁军破坏以及镇、扬两军发生内讧等原因，他们的进军速度大受影响。迟至8月11日，冯国璋前锋施从滨一部才抵达浦口，张勋前锋更于12日才到达南京郊外的龙潭。尽管袁世凯一再催促他们进兵南京，但也无法阻止南京的再次独立了。

南京自取消独立之后，军政各界一再电请程德全、应德闳返宁收拾残局。但程已无意从政，仅派杜淮川至宁出任第一师师长。杜威望不足，难以控制局面。当时，中上级军官都已丧失斗志，只待北军前来接洽。但第八师、第一师等部的下级军官及士兵群众，对取消独立表示强烈不满。袁命将南下，曾一再指令北军“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221]。南京军队听说后更加愤怒，遂纷纷集会，决心誓死抵抗。

激进的革命党人何海鸣、韩恢，在各地讨袁独立运动掀起后曾赴苏北活动，因无成效，回到镇江，获悉黄兴出走，星夜赴宁图谋补救。时詹大悲、戴季陶也到南京活动，但双方缺少联系。韩恢与第一师士兵有广泛的联系，即从运动该师着手。8月8日中午，何海鸣率百余人占领都督府，宣布“卷土重来，恢复独立”[222]，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推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派代表往迎陈履任，陈初不应，旋派他的参谋首斌与何接洽。至晚，首斌又偕参谋长袁华选将何劫往八师司令部，由陈之骥宣布再次取消独立。

鉴于军情不稳，陈之骥经英国领事的联系，偕宪兵司令茅乃封于8月10日渡江至其岳父冯国璋军营，商谈和平解决方法。是夜，第八师二十九团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首先起义，击毙企图阻止起义的代理团长李浚，不久又与第一师官兵联合起来，拥入第八师司令部，将何海鸣迎至小营二十九团团部，并宣布解散第八师司令部，以断绝陈之骥的归路。八师高级军官纷纷逃跑，旅长王孝缜躲到船上电告陈之骥部队哗变，陈仓促赶回。11日下午，何海鸣宣布第三次独立。陈之骥回宁，见大势已去，便在日本领事馆参赞护送下乘日本军舰转往上海，后赴日流亡。

戴季陶于何海鸣第一次宣布独立时，又从上海赶到南京，旋因独立失败，本想重回上海，适再次独立成功。二十九团派人把他接到团部，希望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援。戴对何海鸣说："予须回沪一次力筹之，此间事须以知兵之人为司令，钮永建可承其乏，尔可退让贤路也。"[(223)] 但沪上名将均知难而退，并未一至南京，而从上海来的经济支援也十分有限。

8月13日，张勋到达龙潭。他以为可以"趁其内乱，速行进取"[(224)]，一面要求冯国璋自大胜关、三汊河渡江配合，一面令所属部队火速进攻，企图一举占领南京锁钥天保城。14日拂晓，张勋所部武卫前军不待冯部协同作战，即偕江苏第四师（师长徐宝珍，徐宝山之弟）突袭紫金山。由于驻守部队叛变，张勋不战而克。旋为城守部队发觉，富贵山炮台当即发炮反击，第八师等部亦发起反攻，至中午夺回天保城，随即在天保城架炮，轰击紫金山。下午6时，张、徐两军不支，弃山而走。是役，据北军战后报告，徐军被击毙团、营、连长各一名，排长以下五十五名，旅长方更生重伤；张军被击毙管带（营长）一名，伤管带二名，死伤士兵无算。张勋第一天进攻即遭惨败，锐气顿挫。惜讨袁军有战斗力的部队不多，且无深通军事的将校指挥，未能自雨花台出奇兵抄袭张勋后路，围歼敌军。同日，投降北军的张宗昌第三师一部偷渡长江，潜入下关，被守军歼灭大半，残部退

入南京东北要地幕府山。16日，冯国璋曾命令渡江，但未能成功，仅第三师一部占领老虎山。同日，张勋佯攻雨花台，突袭天保城，虽曾一度占领，但由于讨袁军主力第八师二十九团的反攻，旋即丢失。翌日，讨袁军乘胜收复紫金山。

在南京城内，新任第一师师长徐涛、第八师师长李可钧、卫戍团团长吴浩联络南京地方维持会，勾结北军图谋献城叛变，取消独立。16日下午，何海鸣卫队被卫戍团击散，何一度躲入金陵医院。第八师二十九团、第一师第三团等部士兵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是日深夜，第八师士兵围攻师部，镇压了李可钧和徐涛，但攻击卫戍团时失利。翌日，吴浩仍出布告，取消独立。一、八两师士兵遂联合击溃卫戍团，吴浩逃走。取消独立的阴谋再一次为革命士兵所粉碎。

此后，张尧卿乘变乱自任为江苏都督，何海鸣兼第八师师长，韩恢任第一师师长。但是，这一新的领导集团也缺乏威望。何海鸣是个浮躁文人，不懂军事，不为军人所信赖。连韩恢也说："余等之举何海鸣为总司令，不过儿戏而已。何为文人，彼岂知兵哉？"[225] 张尧卿则因谋镇江独立未成，转入南京，在军中并无基础。实际上，南京重新独立始终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南京的战斗，是以在天保城一线的第八师第二十九团和在雨花台一线的第一师第三团为主的士兵群众依靠高度的革命精神自觉进行的。"军队举动，悉由兵士自为"[226]。每当临敌，士兵们无须军官督促，欢欣鼓舞，勇往直前，几乎人自为战。他们一不谋官，二不为财，除第一师部分士兵纪律不良外，主力第八师始终保持着自觉的纪律，使战时的南京保持着良好的治安。

19日，张勋再次对南京发起猛烈攻击，重占天保城，并先后三次向太平门、洪武门一线发动进攻，一度攻入太平门，但遭城内讨袁军的堵截，被迫退回。20日晨，第八师二十九团、三十二团及炸弹队等部向天保城发起反攻，再次予以收复，但翌日下午，终因寡不敌众，复为张勋所占。这时，退至芜湖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应南京

方面的邀请，于8月19日率卫队一营及宪兵共约一千多人到达南京，给血战中的南京军民以很大的鼓舞。柏文蔚当即被推举为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领导南京的讨袁战争。21日晚，在柏文蔚指挥下，讨袁军向天保城发动反攻，但未能攻下，终使南京城失去了屏障。天保城的争夺战凡五得五失，讨袁军给予张勋所部以严重的杀伤，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概。

当张勋和讨袁军血战的时候，冯国璋一直在隔江观火。22日，冯国璋看到张勋已确实占领天保城，才命令第二师和第五师于翌晨分别向神策门、太平门发起攻击。但是，冯又指示："本军首天攻击，早迟必定成功，无须太为着急。"[227] 显然，他是要让张勋去火中取栗。24日，袁世凯担心南京久攻不下，他处再起，训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会合海陆各军迅速荡平，切勿延缓，致牵动大局。陆军大队尚未渡江，望刘使（时刘任南洋巡阅使）速设法护渡"[228]。是日，雷震春（时任第七师师长）率部由上海开抵镇江登陆，海军进驻南京下游卸甲甸，准备掩护冯军渡江。

正当北军围攻之际，南京城内领导集团又起纠纷。第一师师长韩恢因不受该师官兵欢迎，转任第三军军长（新募之兵，徒有虚名），而张尧卿则对柏文蔚占去都督一职表示不满。柏文蔚见何海鸣不得人望，内部矛盾重重，强敌压境，前途无望，留书何海鸣，欲带第八师出走。八师官兵坚决反对，柏的卫队多数也不愿随行。结果，柏文蔚于8月25日仅率少数人出水西门离开南京，中途为北军击散，仅与祁耿寰化装工人，逃往上海，转赴日本亡命。于是，何海鸣又兼任江苏都督、第八师师长等职，全权指挥。何海鸣在南京的坚持，毕竟起了协调和维系军心的作用。

25日夜，海军海琛、应瑞、楚有三舰暗渡上游，直抵大胜关，不仅截断了南京与芜湖的联系，且利用舰队炮火助陆军攻城，并协助北洋第四师等部自上游渡江。26日，北军全力攻城。张勋马队突入朝阳门，张宗昌第三师一部攻入神策门。张勋狂喜，电京告捷。但是，张

勋马队一入城即遭到预设坑道的阻拦，被守军全部歼灭。张宗昌部也遭到城墙两侧火力封锁，被迫退出城外。仅第五师按兵不动，未遭损失。此次失败后，冯国璋严饬南岸各部约会海军，联合张军协同进攻，再也不敢轻率冒进了。28日晨，第八师二十九团约一百多人，出敌不意，由仪凤门出击，占领宝塔桥，直冲至幕府山下江岸处，距第三师司令部仅四五百米。敌死力抵抗，伤亡达四十余名，司令部被迫后撤。

恰在这时，上游又传来芜湖失守的不利消息。8月26日，汤芗铭率长江上游水师攻克芜湖上游要地荻港。翌日，芜湖下游要地东梁山亦为庐州夏永伦部袭占。28日，倪嗣冲部统领王治国、安徽第一旅旅长顾琢塘会合海军进攻芜湖，龚振鹏弃城出走。至此，南京完全陷于孤立。

29日，北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全面包围。张勋、徐宝山部攻朝阳门，第三师攻神策门，第五师攻太平门，雷震春第七师及杨善德第四师一部协攻雨花台，四师另一部扼守通向芜湖及秣陵关的要道，海军控制江面，南京的形势顿时险恶起来。于是，南京商界通过英国医生马林向何海鸣交涉，表示愿意出钱请讨袁军和平让城。何海鸣拿了商会的钱，向部队发了一次饷。但第八师士兵群众坚决反对和平让城，决心死战到底。作了让城准备的各部，也只得各回原防。30日，何海鸣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以攻为守。他计划以第一师出雨花台，攻击紫金山；新编第五师出朝阳门，接应合攻；第八师出太平门，突击天保城；新编第六师出仪凤门，攻幕府山。可是第一师迟迟没有行动，既打乱了出击计划，也打乱了守城部署。

31日晨，北军发起了总攻击，讨袁军各部均为攻城敌军压制。9月1日晨，讨袁军卫队团长叛变，张勋所部乘机猛攻，用地雷轰开太平门、朝阳门间城垣，蜂拥而入。中午，敌第三师攻入神策门，第五师攻入太平门，徐宝山部也由通济门拥入。何海鸣、韩恢率讨袁军在钟鼓楼、内桥、鸽子桥一线进行巷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一部由清

凉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台。下关及狮子山炮台也相继失守。9月2日晨，何海鸣率卫队及第一师第三团、第八师二十九团残部，在雨花台进行了最后一战，伤亡殆尽，队伍溃散。何海鸣与少数亲随躲于草丛中，后潜至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北军入城之后，已经无意扫清残敌，他们按照事先大掠三日的许诺，各部划分地盘，肆意进行抢劫。冯国璋部一把火把繁华的下关烧为灰烬，穿蓝大褂、拖长辫子的张勋所部士兵，更是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南京“被劫一空，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229]。在中国近代史上，雄伟壮丽的南京城，又一次遭到了浩劫！

南京保卫战尽管失败了，南京革命英雄们的光辉业绩，在国内外正义人士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英国医生马林后来在上海向人们热烈赞扬说：“第八师兵士实为今此革命之特色（第八师中尤以第二十九团为最优），足以当英雄之名而无愧，故彼等之声誉，当永留于中国之历史。”[230] 士兵群众顽强奋战的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软弱、消沉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京保卫战为二次革命谱下了最光荣的一章。

南京的陷落，是二次革命最后失败的标志。但从全国来说，作为二次革命尾声的四川战线却还在激战。

早在重庆宣布独立以前，四川讨袁军就以龙光为第一支队长，进驻永川，准备进攻泸州。独立宣布后，即分兵两支，一支由吕超率领，向隆昌进攻；主力自王坪向立石站、寒坡场进击。讨袁军又以余际唐率部进攻合江一线，配合进攻泸州。对重庆北面，则以防御为主。

成都方面，胡景伊部将、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骏驻守泸州。胡于重庆宣布独立后，令王陵基将所部模范团及四川第二、三师编组为一支

队，由北路进攻重庆；令四川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编组一支队沿江东下。8月12日，袁世凯命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翙、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231]。四都督遵令拨队援川。

战斗开始后，两军在隆昌、立石站—寒坡场相持不下，互有进退，讨袁军难以进展。8月14日，川军周骏所部左纵队即第一师第一团的营长梁渡、贺重熙、吴行光在隆昌前线击毙团长吴成礼，响应讨袁。28日，梁渡率部配合吕超夜袭泸州，直逼龙透关。周骏率部死守，岌岌可危。血战两昼夜，讨袁军屡攻不克。9月7日，讨袁军又四面攻泸。周骏在五峰顶督战，两军在泸州前方数里之草店子、半壁关、黄角村一带鏖战一日，讨袁军伤亡严重，攻势顿挫。

这时，川军第四师于9月8日进占资中，9月10日攻克内江。北路王陵基支队一路攻占南充、定远，于9月10日占领渝北门户合川。南路援川黔军由旅长黄毓成率领占领綦江，兵逼重庆。滇军由刘云峰率一旅之众入川，进至宜宾。陕军由张钫率一师之众兵临夔州。于是，余际唐、吕超率部还救重庆。但熊克武已于9月11日离渝出走。12日，黔军占领重庆。讨袁军残部陆续溃散。四川讨袁军失败，整个二次革命战争完全沉寂。

五　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

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战斗。

辛亥革命是以清帝退位、南北达成妥协而宣告结束的。袁世凯虽然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北洋派掌握了民国中央政府的实权，但袁世凯就任时，既作了“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232]的誓言，《临时约法》又确定了民国的议会民主制度，而且同盟会—国民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拥有政党议会活动的民主权利，革命党人在地方上更拥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因此，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一年多来，袁世凯违背誓言，破坏共和，摧残

革命党人，阴谋帝制自为，终于迫使革命党人起兵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这是一场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战斗，正像李烈钧在《江西讨袁军公启》中所说："袁氏帝制自为，务期破坏共和，与全国为公敌……烈钧等目击颠危，诚不忍诸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奋起。"(233)

二次革命虽然很快就遭到失败，但它仍然是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一次冲击。这场战争，暴露了北洋军队的腐败无能，尤其是南京一战，群龙无首的革命士兵，顽强抗击了北洋海陆各军的四面围攻，予敌以严重杀伤，击破了袁世凯长于治军的虚誉。而北洋军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南京城破后的大抢劫，更使世人震惊。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建立稳定秩序的希望感到幻灭。上海《时报》评论责问道："春秋之义，严在诛心，彼居高位而执大权者，将何以谢吾民而对天下欤？"(234)

二次革命继承了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中国的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尽管在二次革命发动期，革命党人一度表现得犹豫和动摇，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避免了不战而走的屈辱结局。战斗虽然遭到失败，重要的是，战斗的传统得到坚持，革命的火种得到保存。这对今后革命的复苏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否则革命将走上更加迂回曲折的道路。

二次革命也证明了单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以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民国的《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了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因为没有一支民主化的军队的支持，同盟会—国民党希望通过议会竞选的胜利出掌政权的企图，不能不遭到失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命脉，谁掌握了军权，谁才能取得政权。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没有创建一支真正革命的、民主化的军队，他们所赢得的共和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很快就被袁世凯用刺刀摧毁。

二次革命的失败是辛亥革命的归宿，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丧

失殆尽。一年多来，革命党人一再忍辱退让，希望通过调和妥协的道路，维持一个所谓共和的局面。而当袁世凯蓄意挑起战争的时候，他们依然在徘徊观望。当他们不得不举兵应战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敢到人民中去寻找力量，终于使自己孤立无援，并且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最后几乎未经顽强的血战，即兵败如山倒。孙中山后来感慨地说："第二次革命，我党乃无一死于战事者。"[235] 二次革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

第四节　白朗起义及失败

一　从"拉杆"起事到纵横于豫皖鄂边区

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袁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也不是平静的。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时有发生，而且由于受到南方各省反对袁世凯斗争的鼓舞，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就是发源于河南省的白朗起义。

白朗（1873—1914），河南宝丰县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农民出身的白朗，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236]，后因"犯律潜逃"回乡。民国初年，河南农村连年荒旱，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自1912年3月上任后，横征暴敛，专务朘削，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交相煎迫，因而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乞丐成群，"铤而走险者日众"，出现了"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237]。豫西一带民情向称强悍，穷人求生不得，便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据当时官方探报所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一带著名的杆首就有二十四人，其中：杜起宾，宝丰县西乡四十里韩庄人，带七十五人，快枪七十五杆；牛天祥与杜起宾同村庄，带五十八人，快枪十八杆；李风朝（一名红毛），郏县龙虎店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四杆；白狼，宝丰县

西二十四里大刘庄人，带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杆；郜永生（即秦小红），鲁山连洼人，带一百余人，快枪十四杆；崔乾（即崔张记），汝州新庄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一杆。另外还有宋老年、郭玉德等十八人，皆系杆首[238]。

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拉杆”起事成为啸集山林的绿林头目。据记载，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239]。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一带为基地，四处活动。大约于民国元年又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各地著名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之合并，愿听指挥。到1913年春，各杆头在白朗领导下所带的人马共约二三千人，所着服装，错杂不一，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农工商贩。由于“贫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240]，白朗军消息灵通，神出鬼没，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把他们镇压下去。相反，白朗却不时给各地方官吏和豪绅地主团练以打击。这时，白朗主要从事经济性的斗争，政治目标并不明确。

1913年五六月间，袁世凯把驻在信阳的第六师调入湖北境内，仅留河南陆军第三旅王毓秀部在平汉路沿线设防，豫西南一带空虚。这时河南国民党人熊嗣鬻为了武装讨袁，与白朗联络。白朗一面委派熊赴南方联系反袁力量，一面借“二次革命”之说，号召群众乘机展开活动。高鑫、宋一眼等各杆数百人袭扰叶县、襄城等地，白朗亲率各杆一千余人南下，意图攻取唐县、泌阳。当时盛传，白朗宣言，“如能占领唐、泌等处，即当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241]。由于有唐县守军作内应，5月31日夜，白朗一举攻占该县，夺获大炮六门、机关枪两挺及许多枪械子弹，声势大振。白朗占领唐县后，恐官军追来，当天弃城北上，连克数村镇，复经南召直攻鲁山。当

时，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带兵刚到达豫西南，便急令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营援救鲁山。王军至鲁山时，白朗军已改变计划，于6月15日突然攻取了禹县，守城官军弃械而逃，白朗缴获枪支三百，财物无算，捆载大车二百辆，凯旋回归鲁山一带。“自此白朗声振豫西，各地绿林附合者骤达二千人”[242]。

二次革命爆发后，黄兴曾写信给白朗，要求他进攻湖北，配合讨袁军作战，因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能送到。同时，黄兴还委派河南国民党人杨体锐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赴洛阳策动镇嵩军反正和联络白朗。杨体锐亲往白朗军中游说，“白感动，愿听约束”[243]。但不久，杨被张镇芳捕杀[244]，国民党人与白朗的联系中断。1913年七八月间，不仅南方反袁军曾多次与白朗军联系，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听消息，但是，由于反动当局的破坏，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当白朗威震豫西时，他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满业倒了运气”，接着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末了则说：“现在中州真主，荡荡如同天神。”这个告示大致反映出1913年夏季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

白朗军从禹城撤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军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王毓秀和防军十余营，分头把守各县镇和山口要地，对白朗军进行围剿，白朗军一度受挫，不得不避入深山中。正当雷震春做“一鼓荡平”的美梦时，白朗翻山越岭，突然出现在数百里外的卢氏县境，7月1日攻占淅川县属的西坪镇，次日又夺取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重镇荆紫关，并攻克淅川县城。邓州、内乡、镇平等地震动，纷纷向张镇芳告急。7月14日，白朗军进入湖北均县贾家寨以东地方，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不利，又折回豫省，17日围攻镇平县，逼近南阳。8月，在百泉山击败南阳镇守使周符麟所辖官军，转入唐县、泌阳、桐柏一带山区。白朗军稍事休整后，于9月下旬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十一天，至10月6日始弃城北上，经唐县、裕州等地返回鲁山和宝丰

地区。当时雷震春率领的军队已离开宝丰，白朗乘虚于11月12日用云梯爬城办法攻占宝丰县城。由于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步四营来攻，白朗当日撤出县城，避入鲁山西北山区，建寨据守。

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一支武装反袁力量，更加引起袁政府重视。袁政府一面严令张镇芳限期肃清，一面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三万人，具体部署是：毅军统领商德全率兵驻扎郏县、宝丰和临汝三县，张锡元师驻扎舞阳和泌阳，王毓秀旅驻方城、鲁山、南召和伊川四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分兵把守南阳附近六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警戒嵩县至卢氏县一线，北洋第二师一部守卫京汉铁路沿线。此外，赵倜亲带马队赴各地巡逻，督饬诸军认真剿办。张镇芳以为万无一失，致电袁世凯表示，1913年12月一个月内即将白朗军全部消灭。袁世凯命令张镇芳、赵倜等人，“非获白朗，不准请奖”[245]。

面对北洋军压境的局面，白朗没有固守鲁山一带的根据地，而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迅速跳出包围圈，攻击敌军防守薄弱的地方。12月下旬，他率二千人（其中不少青年人），一半有快枪，一半持大刀，急速南下。至泌阳附近后，他又东进，于1914年1月初在确山和新安店之间越过京汉铁路，于1月11日、15日、16日接连攻克光山、光州（今潢川）和商城等三座县城。随后又继续向东挺进，入安徽境内，于24日一举攻克六安城，2月6日又攻克霍山。白朗军连得数县，击溃了地方武装，缴获了大批枪械子弹，战斗力显著增强；由于各地会党、游民纷纷归附，队伍也显著扩大，马队步队共计约四千人。这些胜利的取得，除这一带敌军防御力量薄弱外，与白朗的战略战术有密切关系。白朗善于在运动中作战，一日夜间能走二三百里。其战术多用设伏诱敌之计。官军跟踪追击时，他们常常一边退却，一边将银元或财物等弃掷于地，贪财的官军拾取钱财后，他们便回首猛扑，往往取胜，以缴获军火，补充自己。他们攻城也有一套办法，先派遣侦探侦察城内虚实，如城内空虚，便派人装扮成小贩、卖艺人或乞丐等

混入城内潜伏下来，又策动会党和守军士兵作内应。一旦布置妥当，主力队伍便长途奔袭，突然兵临城下，里应外合，使守军猝不及防，不战而溃。

前此，袁政府仅仅把白朗视为一个严重的地方问题，责成张镇芳负责剿办。豫东和皖北的城池不断被攻占，才使袁政府大为震惊。袁世凯于1月20日严厉申斥张镇芳和赵倜“督率不力”，将他们撤职留任。2月11日，任命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13日撤去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这些人事变动表明，袁政府已把白朗起义视为牵动全国政局的问题，并决心动用北洋军主力了。段祺瑞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所谓“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二万多军队，除赵倜所率领的毅军八营外，有王占元的北洋陆军第二师一旅，皖军十营，拱卫军一团，王汝贤和陈文运两个混成旅等。这次合围白朗的主力是北洋正规军。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骄兵悍，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清匪氛，指日可待。”安徽都督倪嗣冲鉴于六安之变，将弃城逃跑的知县枪毙，并通令皖北各县一体戒严，倘有再失城池，定将按军法严惩，决不宽贷。

在北洋各军四面包围、步步进逼之下，白朗军在叶家集和金家集一带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多次突围，均受到堵截。2月21日、23日，李鸿宾和白朗各带二三千人与北洋军王占元师两次激战于酆家集南面一带高地，都未能达到突围的目的。白朗的处境日益不利，遂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分为几路，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一路偷袭光州。当敌军抽调兵力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2月末于一夜之中在信阳以南二十里的双河越过京汉铁路。当时，设在信阳的豫南围剿司令部正张灯置酒，大宴将士，至天明始发觉。但事后他们却向袁政府报告说：“白狼进犯铁路，我军迎头痛击，贼军大败，伏尸遍地，仅悍酋数人步行，敝衣杂入避难人民

中逃去。”这是腐败的官军谎报军情以邀功的惯技。

白朗军越过京汉铁路后，分兵两路，一路攻湖北应山和安陆，颇有南下进窥武汉之势。另一路经随县等地西进，3月7日一举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歼灭驻军一营，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枪弹二十余万发。老河口是汉水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号称湖北第三商埠，殷商富户不少。有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也有教堂、教会医院和英、美、意等国传教士多人。白朗军每到一地都打劫豪富，筹饷械，在商业繁盛的老河口自不例外，外商投资的企业也在劫难逃。根据记载，该镇“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246]。但是，白朗在老河口对于外国传教士和教堂，如攻克枣阳、六安等县城时一样，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打击目标。因此，老河口教堂虽稍有损失，但“人口尚安”[247]。白朗对待教会的态度，可能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在老河口，挪威医生费兰因拒绝为白朗军士兵做手术而被枪杀。这件事似属个别人的行动，并不能反映白朗的政策。

白朗取得的胜利，使袁世凯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都十分吃惊。

各国驻华公使接连集会，并照会袁政府外交部说，政府虽派兵剿办“白狼”，至今未能扑灭，“外人之财产损失颇巨，即各国之商务间接受其影响亦非浅显。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拟电请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日肃清”[248]。袁政府的反应，由袁世凯致段祺瑞等人的几件急密电可见一斑：

3月11日，“万急华密”电：“白狼潢池小丑，乘隙蠢动。近日发兵二万人，奔驰两阅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极为军界耻辱。老河口又生残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近日匪之内容，毫无所闻，是侦探太不得力，望注意。”

3月21日，“华密”电：“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近日中国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望努力设法督饬速平为要！”

3月23日，“拱密”电：“以部长久在外，各国注意白狼更重，且久未平，尤损声威，可商田民政长妥为布置，仍宜早回京……。”(249)

白朗起义异军突起，在1914年春发展到顶点，成为国内一些大报纸的每日要闻之一，为全国各阶层、各派别（包括中华革命党人）所注目。袁政府心劳日拙，动用北洋军数万，而不能控制白朗军在广大地区策马长驱的局面。

二　进军陕甘和回豫失败

在老河口，白朗将分散活动的各路首领召集起来，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战略问题。一些头目认为流动作战不是长期办法，应建立根据地，如梁山泊一样，作为归宿。但主要头目大都反对此说，而极力主张流动作战以集资粮，扩充队伍。白朗采纳了后一说。鉴于袁政府不断向河南增兵，中原地区不易立足，所以决定避实击虚，伺机入陕。同时，白朗改编了队伍，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以李鸿宾为参谋长，正式组织起统率机构。又将近万人的队伍分编为前、中、后三军，以王生岐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军之下又分“队”，各“队”都有自己的“队旗”。

就在这次会议前后，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到白朗军中。如王生岐原是陕军第一师的团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于1913年8月在凤翔响应二次革命，失败后率领队伍进入豫陕边，当年10月加入白朗军。在《中华革命党委派人员别号、住址及委派回国者姓名登记簿》中，将“白朗部分重要人物”独列一项，与该党各省支部并列，内写白

狼、宋老年、李鸿宾、孙玉章等二十余人的姓名。由此可见，海外中华革命党人对白朗是十分重视的。有记载说，孙中山有致白朗函，还积极向白朗军中派遣人员，如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250]。此外，二次革命失败后，河南国民党人和进步青年因不堪张镇芳的迫害，有不少人投入白朗军中。他们不会不给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以积极的影响。

老河口会议不久，白朗发布的告示中完全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功绩，斥责袁世凯窃国卖国。告示说："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251]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讨袁宣言，可与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表的讨袁檄文前后辉映；与1913年白朗发布的告示相比，政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篇告示可能出自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手笔。白朗及其周围的重要谋士和猛将的实践活动，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水平，他们仍然沿着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老路行进。因此，从总体来说，这次起义不是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而是深受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影响的一次旧式农民战争。

白朗在老河口停留三天，便麾军北上，3月14日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由此进入陕西境内。3月下旬到4月初，接连攻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孝义（今柞水）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翙开始认为白朗实力有限，不足措意，事前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及至白朗进占商县，张凤翙始率兵一旅出防蓝田。他刚到蓝田，就得到白朗攻孝义的消息。孝义一失，西安危险。于是张踉跄回省，坐守危

城，不出城门一步，日日向袁政府告急，并乞求邻省协剿。袁世凯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第七师和毅军由潼关进驻西安。赵倜所率毅军马步五千，号称北洋精锐，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同时，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一带。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则分别驻南阳、淅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各军分进合击，取三面包剿之势，“重兵劲旅，云集一隅”，袁世凯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进入陕西后，曾贴出布告，宣称将“跃武咸宁，观兵长安，克城之日，但申沛公三章之约，不举项王三月之火”。但越过秦岭后，他并没有攻击西安，而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鄠县、盩厔（今周至）、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252]。至醴泉县附近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两日，损失近千人，为入陕以来首次恶战。白朗回师袭取永寿和邠县，在邠县又与陈树藩军血战，损失颇大。据说白朗曾痛心地说：“吾率数千之众，纵横皖鄂豫三省两年之久，从未损好兄弟如此之多！”[253] 白朗军虽然受到损失，但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他们又接连攻克凤翔、千阳、陇县，破固关，击溃甘军统领崔正午所部千人，直下张家川，进入甘肃省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调集军队防堵，赵倜的毅军也跟踪而至。白朗军行动迅速，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总兵马国仁被击毙。白朗于4日攻占秦州，然后取道徽县南下，企图由此入川，因有川军堵截，便改走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企图由碧口入川。因又受到川军阻击，遂西向，于5月21日占岷县，25日破洮州。岷洮地区回汉藏民杂居，由于白朗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遇到了回民的激烈抵抗，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军纪开始松弛，抢掠烧杀之事日益增多。

白朗军占领城镇，一般“只劫官家及绅富财物”[254]，以洋元现银为主，铜钱纸币弃置不顾，并严禁烧民房，严禁奸淫妇女。如果闻风降服，箪食壶浆给以欢迎，则往往秋毫无犯。如白朗至武功县时，

官吏潜逃，商民杀牛宰猪羊以迎。白朗停留一夜，“临行馈以现银数千两”。又如白朗至通渭时，城内无兵无械，县令无奈，只得请绅民出城欢迎。白朗大喜说：“吾所以西来，谋大事耳。事之成败，天也，决不涂炭生灵。”遂约束所部居城外，仅带亲信百余人进城，住在高等小学校，并问县令：“沿途无煤可购，何燃料之缺也？”县令答道：“南乡罗家峡有煤矿，特无资本开耳。”又问“城周围多少里？”等等。饭后，白朗至教室，看了学生的课本，对其亲随说：“此城小如斗，民贫可怜，不图学生尚堪造就。”遂捐银二千两交县令收存，以作买书之用[255]。但是，如果城镇抗拒，激怒白朗，则“必大掠，继之以火”。白朗攻占洮州后，据文献记载，“城中所有房屋大半已付一炬，葬身火窟者不计其数。人民以争欲出城，互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计数，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城外商店被焚者亦夥，然死者则较城内多至数倍”[256]。

攻取洮州后，白朗原想经狄道突袭兰州腹地，因敌军云集，各口有防，一时无计可施，遂在洮州县署召开军事会议。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十八大首领居中，众谋士坐左右，小头目在四周及门外。白朗说：“我辈今日势成骑虎，进退两途，取决会议。”白瞎子高声叫道：“请大哥黄袍加身，事成则为明洪武，不成亦可为太平天国。”许多头目鼓掌赞成。但谋士中无一人响应，白朗亦不以为然。有人建议取道松潘攻成都，各首领多反对，而主张回河南。白朗军各级头目大都是河南人，长期苦战，不得休息，思乡心切。于是，白朗决定带队回河南家乡。5月末，白朗亲带前队三千多人由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相继出发。白朗军在漳县、宁远等地遭敌军截击，伤亡惨重，但终于突破敌军对岷洮地区的包围圈，6月4日再占秦州。接着，经过几场激烈战斗，白朗军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

凯闻讯震怒，于6月16日致电陆建章，饬令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陆建章本为袁政府特派人员，有督帅各军的重任，但他到西安后深居简出，惟不时向袁世凯上密呈，说张凤翙声名狼藉，“民心既已不顺，兵心又皆不服，中央再不派人员接替，猝有缓急，关中非复中央所有”。袁信其言，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翙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陆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邠县、乾县、武功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多以北洋派官僚代替。他并以整军为名，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冲破宝鸡防线，一日夜行一百七八十里，风驰电掣般东进，经郿县（今眉县），盩厔、鄠县入子午谷。他们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回河南途中，又遭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至回到鲁山、宝丰一带，虽仍有数千人，但枪械弹药缺乏，战斗力大大削弱，无力与官军公开对抗，只得分散为数股。孙玉璋领一杆人由西坪赴邓县一带，尹老婆及李鸿宾之弟等也各带一杆人经邓县进入桐柏地区，宋老年带有一千多人往鲁山娘娘山，白朗自领五六百人在平顶山一带活动，宋一眼率五六百人一度攻取西华县城，并派人在郾城等地收买民间军火，接济白朗。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与敌军搏战，不幸负伤，数日后死去。宋老年等各杆也先后失败，部众瓦解星散。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以致重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

白朗死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

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从1913年7月起，大约一年时间，袁世凯北洋军南征北战，击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们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统一”。从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气焰更为嚣张了。

---

(1) 《杨善德致段祺瑞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 《远生遗著》卷2，第35页。

(3) 吴鼎昌：《赣宁战祸之原因》，《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五》。

(4) 《袁总统之军事秘密》，《民国新闻》，1912年8月19日。

(5) 《袁总统之军事秘密》，《民国新闻》，1912年8月19日。

(6) 李廷玉：《平赣日记·序》。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 《政府公报》，1913年5月4日。

(10) 《中华民报》，1913年6月5日。

(11) 《政府公报》，1913年4月11日。

(12) 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

(1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20页。

(1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9页。

(16)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8页。

(1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8页。

(18)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2月17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1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8页。

(2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9页。

(21)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4月5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2)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3)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8页。

(25) 《进步党之宣言》，《时报》，1913年5月15日。

(26)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7)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8)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5月2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9)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5月2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30)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3月26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3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5页。

(32) 《进步党袒护原因》，《中华民报》，1913年5月10日。

(33) 《丁世峄等八十七人通电》（1913年5月3日），《宪法新闻》第5册，1913年5月。

(34) 《前参议员对于借款之通电》，《宪法新闻》第6册，1913年5月。

(35) 《进步党议员辩言》，《宪法新闻》第7册，1913年5月。

(36) 《众议员胡汝麟等有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37) 《进步党秘件》，《中华民报》，1913年5月15日。

(38) 《进步党对于借款之通电》，《时报》，1913年5月13日。

(39) 《进步党人关于赣皖都督之质问书》，《宪法新闻》第7册，1913年5月。

(40) 《进步党对于政局最近之主张》，《时报》，1913年7月24日。

(41) 《进步党之特别会议》，《时报》，1913年7月29日。

(42) 《进步党反对独立通电》，《时报》，1913年7月23日。

(43) 《进步党粤支部徐君演词》，《时事新报》，1914年1月14日。

(44) 《商界急谋自保》，《申报》，1913年5月2日。

(45) 《总商会电请维持秩序》，《申报》，1913年5月8日。

(46) 《命令》，《申报》，1913年5月7日。

(47) 《命令》，《申报》，1913年5月16日。

(48) 《命令》，《申报》，1913年6月24日。

(49)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45、43页。

(50) 《命令》，《申报》，1913年6月24日。

(51)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

(52)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页。

(53) 《鄂议员与商民意见之冲突》，《申报》，1913年5月19日。

(54) 《粤人之时局观》，《申报》，1913年5月29日。

(55) 《赣督维持市面大会》，《申报》，1913年5月9日。

(56) 《公电》，《申报》，1913年5月16日。

(57) 《商界对于时局之主张》，《申报》，1913年6月5日。

(58) 《湖南独立声中之各界态度》，《申报》，1913年6月22日。

(59) 《民国日报》，1916年6月15日。

(60) 《回顾录》第1册，第54—55页。

(61) 国事维持会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等电（1913年2月下旬），《申报》，1913年2月24日。

(62) 《张镇芳存札》，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3) 《日人之政党竞争记》，《申报》，1913年4月26日。

(64) 《内务部警政司第二科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65) 《相友会之发起》，《申报》，1913年5月9日。

(66) 《黄赞元致熊希龄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67) 《超然议员社成立》，《申报》，1913午5月26日。

(68) 《超然议员之超然谈》，《时报》，1913年8月5日。

(69) 远生：《政界之大混沌（二）》，《时报》，1913年5月4日。

(70) 《癸丑同志会宣言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71) 《癸丑同志会宣言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72) 《政友会规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73) 谢彬：《民国政党史》，1928年版，第55页。

(74) 《命令》，《申报》，1913年6月24日。

(75)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76) 《时报》，1913年5月29日。

(77)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78) 《爱国报》，1913年5月15日。

(79) 《黎督查拿运动军队者》，《申报》，1913年5月14日。

(8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页。

(81) 《黄兴集》，第357页。

(82) 田桐：《革命闲话》，《玄玄遗著》，1937年版，第190页。

(83)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3页。

(84)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8页。

(85) 《亚细亚日报》，1913年2月25日。

(86) 《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10日。

(87) 《国民党本部通电》，《民立报》，1913年2月23日。

(88) 《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19日。

(89) 《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19日。

(90) 《黎本唐致段祺瑞函》（1913年4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1) 柏文蔚：《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667页。

(92)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48页。

(93)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38页。

(94)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8页。

(95) 《铁血监视团成立通告》，《民立报》，1913年4月30日。

(96) 《民权报》，1913年5月3日。

(97)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8页。

(98)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9页。

(99) 《官其彬致段祺瑞函》（1913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00) 朱宗良：《二次革命声中之冷眼观》，《民立报》，1913年6月1日。

(101)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15—16页。

(102)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18页。

(103) 《时报》，1913年5月19日。

(104) 《民立报》，1913年5月20日。

(105) 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06)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07) 《时报》，1912年5月31日。

(108)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09) 《时报》，1912年5月31日。

(110) 《时报》，1913年5月23日。

(111)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2) 《燕市燃犀录》，《民立报》，1913年6月2日。

(113)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5)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6) 《专电》，《时报》，1913年5月24日。

(117) 《黎副总统政书》卷21，第7页。

(118) 《时报》，1913年6月10日。

(119) 《黎副总统政书》卷21，第7页。

(120) 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21) 《时报》，1913年5月9日。

(122) 《时报》，1913年5月27日。

(123)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5月21日。

(124) 东方：《宋案竟无消息耶》，《民立报》，1913年6月8日。

(125) 邹鲁：《回顾录》第1册，第59页。

(126)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96页。

(127)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3页。

(128)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1页。

(129)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0页。

(130)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8页。

(131)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4页。

(132)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8页。

(133) 《政府公报》，1913年6月10日。

(134) 邓汉祥：《我赴江西了解李烈钧反袁动向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585页。

(135) 赵正平：《仁斋文选》，第522页，刊印《仁斋文选》筹备会1945年版。

(136)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51页。

(137) 《黎元洪致袁世凯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38) 《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39) 《黎副总统政书》卷22，第7页。

(140) 《官其彬致段祺瑞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按：函称发电者为“某党之最有力者”，当指孙中山或黄兴。

(141) 邹鲁：《回顾录》第1册，第67页。

(142) 钟德贻：《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43) 《民权报》，1913年6月24日。

(144) 张醁村：《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领导人物的政治分歧及其分裂》，《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65页。

(145) 《黎元洪致袁世凯段祺瑞敬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46) 宁调元、熊樾山被捕后，刘揆一等营救不果，二次革命失败后，于9月25日被杀。

(147)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48) 《林虎回忆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国民党国史馆材料。

(149) 《赣案续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150) 《黎元洪致袁世凯支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1) 《赣案续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本。

(152) 《民立报》，1913年7月15日。

(153) 《民立报》，1913年7月15日。

(154) 《柏文蔚致段祺瑞等东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5)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56) 李烈钧抵湖口的日期众说纷纭，李自述为12日，林虎回忆为11

日，欧阳武狱中口供为9日。当以陈廷训向李纯的报告为准，即7月8日。（《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157) 《时报》，1913年7月12日。

(158) 《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9) 《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60) 《赣案续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161) 《李烈钧自传》，第24页。

(162) 《李烈钧自传》，第28页。

(163) 《仁斋文选》，第523页。

(164)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83页。

(165)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7—208页。

(166) 《仁斋文选》，第525页。

(167)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7—208页。

(16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16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8页。

(1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171) 柏文蔚：《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671页。

(172) 《时报》，1913年7月18日。

(173) 《参谋部陆军部致倪嗣冲转大总统令》（1913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74) 《仁斋文选》，第527页。

(175) 《民立报》，1913年7月18日。

(176) 《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77) 《时报》，1913年7月23日。

(178) 《郑汝成致袁世凯巧电》，《政府公报》，1913年8月24日。

(179) 《讨袁声中之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80) 《讨袁声中之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81) 《李民欣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82) 《蔡松坡集》，第720页。

(183) 《钟鼎基致段祺瑞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84) 《孙道仁通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邮政档案。

(185) 《黎副总统政书》卷24，第3页。

(186) 《黎大总统政书》卷26，第3页。按：《黎副总统政书》将此电删去，留下空白。

(187) 《黎大总统政书》卷26，第3页。按：《黎副总统政书》将此电删去，留下空白。

(188) 《民立报》，1913年7月17日。

(189) 《民立报》，1913年7月17日。

(190) 《民立报》，1913年7月18日。

(191)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92) 《民立报》，1913年7月20日。

(19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6页。

(19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9页。

(195) 《时报》，1913年7月26日。

(196) 李廷玉：《平赣要事记》，第1页，财政部印刷局1915年版。

(197) 李廷玉：《平赣要事记》，第1页，财政部印刷局1915年版。

(198) 林虎：《江西讨袁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600页。

(199) 《李烈钧自传》，第26页。

(200) 《袁世凯复周自齐、靳云鹏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01) 《仁斋文选》，第525页。

(202) 《民立报》，1913年7月21日。

(203) 《郑汝成致袁世凯电》（1913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04) 《郑汝成致袁世凯电》（1913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05) 《民立报》，1913年7月27日。

(206) 《时报》，1913年7月26日。

(207) 《时报》，1913年7月26日。

(208) 锋镝余生：《南北恶感新文牍》卷3，1913年版。

(209) 锋镝余生：《南北恶感新文牍》卷4。

(210) 《政府公报》，1913年7月19日。

(211) 《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

(2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13)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曲石精庐1934年版，第6页。

(2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邮政档案。

(216)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17)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18) 《湖南近变之真相》，《亚细亚日报》，1913年9月24日。

(219) 《湖南近变之真相》，《亚细亚日报》，1913年9月24日。

(220)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221) 《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22) 《时报》，1913年8月11日。

(223) 何海鸣：《金陵纪战》，《寸心》第6期，1917年6月。

(224) 《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25) 《马林演说》，《时报》，1913年9月21日。

(226) 雪山：《围城杂记》，《时报》，1913年9月23日。

(227) 《第二军参谋处通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28) 《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29) 《特约路透电》，《时报》，1913年9月9日。

(230) 《民权报》，1913年9月22日。

(231) 《政府公报》，1913年8月13日。

(232) 北京《临时公报》，1912年3月11日。

(233)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484页。

(234) 阿严：《乱定痛言》，《时报》，1913年9月7日。

(23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2页。

(236)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页。

(237) 佚名：《白狼猖獗记》，《时事汇报》月刊第3、5、8号，1914年2月、4月，1915年1月。

(238) 《白朗起义》，第3页。

(239) 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40) 《白朗起义》，第277、278页。

(241) 《大公报》，1913年8月21日。

(242) 《白朗起义》，第321页。

(243) 《河南杨先烈体锐殉难事略》（抄本）。

(244) 杨体锐字子英，河南孟津人，1913年8月17日被惨杀，时年仅二十一岁。

(245) 《白朗起义》，第77页。

(246) 《中原狼祸记》，《大公报》，1914年6月14日。

(247) 《白朗起义》，第237页。

(248) 《大公报》，1914年3月8日。

(249) 《白朗起义》，第133、145、149页。

(250) 《记白朗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51) 《白狼猖獗记》，《时事汇报》第8号，1915年1月。

(252) 《续修醴泉县志稿·兵事》卷11。

(253) 《白朗起义》，第383页。

(254) 《白朗起义》，第362页。

(255) 《白朗起义》，第343页。

(256) 《白朗起义》，第387页。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

第一节　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三个多月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这就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鼓舞。他们认为创办实业的时运到了，于是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竞相提倡实业，挽回利权。一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几十个团体。191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商学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经济协会。此外，还有西北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协会，黑龙江省实业总会。海外华侨在上海也组织了同仁民生实业会，外洋华侨会员达二十余万人[(1)]。他们认为“破坏告成，建设伊始”，应致力于国民经济建设事业。

鉴于中国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稀少的情况，他们又组织了中华国货维持会，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了扭转不务实业的社会风气，鼓励人们投资实业的兴趣，还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工商部于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到会的实业家一百多人，开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2)]。代表们在会上纷纷提出了发展实业的各种计划和提案，并要求政府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法律，修改税则等。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提出：要扩充纺织工业，设立母机厂，制造轮船、火

车、农、矿、军械各项母机[3]，并提出资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学成回来当技师等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这次会议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1914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于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二个省代表一百八十余人，各地代表提出的议案多达28项，122条款，内容涉及商会法、税则、公司、矿务、盐业、贸易等各方面。当时人们称赞此次会议“俨然一地方议会”[4]，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合群大会”。

北洋政府农商部成立后，曾电令各省都督调查实业发展情况，并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专管实业调查和发展实业计划[5]。农商总长张謇在前清即提出了著名的“棉铁主义”的主张，认为发展棉铁两种工业有利于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他指出：“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6] 他又指出：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发展工业也必须要有重点。若没有重点，则力量分散。“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7] 为了实现“棉铁主义”，他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分三个时期进行，即：（一）法律时期，（二）技术时期，（三）经济时期；认为法律时期很重要，没有法律就不能保护工商业者正当的权益，企业就不能发达。他指出：法律的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过去经营企业之所以失败，“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8]。所以在他就任农商总长后第一个计划就是立法。在他任内，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奖励实业发展的法律和条例，据北洋政府农商部参事厅所编纂的《农商法规》统计，1912年—1916年间所公布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八十六项之多。内容包括了矿政、农林、工商、渔业等各方面，无论从内容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清政府时代不可比拟的。其中重要的条例有：1912年12月公布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的

《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月的《矿业条例》和《矿业条例施行细则》，5月公布的《审查矿商资格》，7月公布的《商人通例》，9月公布的《商会法》，1914年7月公布的《商业注册规则》及《商业注册规则施行细则》，1914年4月制定的《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1915年7月公布的《农商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细则，虽尚未完备，有些规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认真执行，但毕竟解除了清政府统治时期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障碍，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了绿灯。上述法令、章程内容繁杂，兹就有关实业发展的几个条例加以综合剖析。

（一）改官办商会为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

清朝末年设立的商会，形同官署，类似政府属下的机关。商会总理和协理都由政府委派。商务总会、分会、分所等多层次组成，弊害很多，往往成为束缚商人行动的枷锁。商人注册要由商会转呈，商人间的纠纷由商会仲裁，商人不得直接与官厅联系，有关商事的联系必须经过商会。1914年公布的《商会法》规定商会为法人，是一个独立组织，是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商会及各商会事务所从职员到会长和副会长，皆由商会会员选举产生。《商会法》还规定：“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权”，“选举用记名投票法由选举人自行之”，“会董由会员投票选举”，“会长、副会长由会董投票互选”。“会长、副会长、会董、特别会董均以二年为一任期”，“再被选者得连任，但以一次为限”。《商会法》并规定，商会的任务是：

一、筹议工商业改良事项。

二、关于工商业法规之制定、修改、废止及与工商业有利害关系事项，得陈述其意见于中央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

三、关于工商业事项答复中央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之调查或咨询。

四、调查工商业之状况及统计。

五、受工商业者之委托，调查工商业事项或证明其商品之产地及价格。

六、因赛会得征集工商物品。

七、因关系人之请求，调处工商业者之争议。

八、关于市面恐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地方行政长官维持之责任。

九、得设立商品陈列所、工商学校或其他关于工商之公共事业，但须经农商部核准[(9)]。

可见商会所承担的任务，涉及工商业者有关利害的各个方面，包括：反映商人的切身利益和要求；有权参预政府制定、修改、废止工商业有关的法令的权利；有独立处理工商业事务的权利。商会成为“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的“合群组织”[(10)]。因此《商会法》一公布，各地即纷纷成立商会。商会增加得很快，据农商部统计，1912年（公布《商会法》之前）共有商会七百九十四所，入会之商店会员共十九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人。《商会法》公布之后，1915年商会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十一所，会员增加到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五人[(11)]。

（二）在商业注册方面，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设厂注册的若干限制。

清末，政府虽已放松了对开办企业注册的一些限制，并曾颁布了某些奖励章程，但获得便利的主要是那些与清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大官僚、地主和大商人。他们开设的厂矿除呈准注册“由官厅保护外”，往往还能取得专利。而一般商人呈请注册，不仅不能受到优惠的待遇，而且还要受到官府的刁难。“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

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等等[12]。在呈请注册手续方面，清政府规定：商人不得直接呈请注册，须由商会转呈。“凡公司设立之处业经举行商会者，须先将注册之呈，由商会总董用图记呈寄到部，以凭核办。”[13]

辛亥革命后，商人呈请注册开办厂矿，只要“资本充实，无有纠葛”，符合注册条例章程，就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厅呈注[14]，不必经过商会转呈。《商人通例》中规定：“应注册之事项，由该商人各就其营业所所在地该管官厅呈报注册。”[15]该管官厅系指地方法院，若地方法院未成立的地方，由县知事接收注册。这就方便了商人开办企业。如井陉商民创办正丰煤矿公司，曾向清政府请领矿照，乞未获准，直到民国元年始得采照[16]。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申请开办企业的较多，以至实业部也忙起来了，“接收各埠公司呈请保护、注册、立案、给示等事，纷至沓来”[17]。

（三）取消清政府对开采矿产方面的若干限制，鼓励商人和吸收外资开矿、探矿。

清朝末年颁布的《大清矿务章程》，比较重视地主的利益，忽视探矿采矿者的利益。该章程中第十款规定：“所得矿利，除开支一切费用外，净有余利，业主应得十成之二五，国家酌提十成之二五，矿商应得十成之五”，矿商净利的一半都归了政府和地主。开矿还必得政府和地主的同意，否则就不能开矿。这就为官吏的勒索和迷信风水等奸猾之徒的敲诈开了方便之门，使商民裹足不前。

1914年政府颁布的《矿业条例》则轻地主之权，对商人呈请采矿、开矿者予以优先权。政府宣布：地下矿产皆为国有，除地面盖屋用地应偿地价外，地主不得任意需索，地价也须照时价出售，不得任意抬高。为了鼓励商人开矿，还减轻了矿产税。旧《矿务章程》中规定矿产税抽百分之十；新《矿业条例》规定：按出产地平均市价抽千

分之十到千分之十五[18]。

开矿区域也比以前扩大，清末规定最大的矿区不得逾九百六十亩，这时规定煤矿区可达十方里，别种矿产区为五方里，如因特别情形，农商总长“认为必要时得增减之”[19]。这就使采矿者能扩大经营范围，促进了矿业的开发。例如：山西为中国重要煤矿产区，自《矿业条例》颁布后，设专管官署，开矿为利益所在，商民纷纷呈请注册立案。

为了吸引外资，鼓励中外合资兴办矿业，《矿业条例》第四条规定：“凡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得与中华民国人民合股取得矿业权，但须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法律。”“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前清矿律外股只准十分之四）。外国人民只要领有该国外交官或领事官之证明书，即可与中国人民合资经营矿业。这就简化了外人投资的手续。《矿业条例》第四十七条又规定：“矿业权者得依一定条件，以矿业权抵押借款。”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外合作投资的条款。《矿业条例》公布之后，受到中外人士的欢迎，领取矿照的人不断增加。

（四）开办企业时封建性的专利垄断权逐步被取消。

专利权在欧美各国系给予某些生产技术发明创造者，以资鼓励。清政府则视其为开办企业的垄断权，排斥其他企业的发展。1912年底北京政府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等条例，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发明者和改良者，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该章程规定：“凡关于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得呈请专利，其年限定为三年、五年两种。”“在专利年限以内，如有他人私自仿造妨害专利权时，享有专利权者得呈请禁止。”[20] 如1912年渔商陈文翔设立渔业公司呈请准予立案专利，实业部批准该公司注册立案，惟所请专利一节，认为“贩卖自由乃商业上应有之权利”，“捕鱼一业，非发明新制等可比，碍难照准”[21]，予以驳回。又如1915年周学熙等人创立华新

纺织公司，申请在山东、河南两省专利三十年，一时舆论哗然，未几此项三十年专利之权即被取消[22]。封建性的专利权被取消有利于打破垄断，使工商业能够自由竞争，促进企业的发展，这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是一个进步措施。

（五）奖励商办企业，办有成绩者可以得到政府奖赏。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列在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的最后一级，社会上轻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清朝末年，虽然也颁布了一些奖励商人的办法，但获得赏赐的只是些经营工商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大商人，一般商人是享受不到奖赏的。1915年，农商部颁布了奖励商人经营企业的奖章规则，规定凡创办实业较有成效者，只要符合下列各项条件，都能得到政府不同等级的奖章：

一、建设工厂制造重要商品者，其资本金在五万元以上，营业继续满三年以上。

二、经营直接输出贸易者，其每年货价总额在十万元以上，营业继续满三年以上。

三、承垦大宗荒地依限或提前竣垦者，其竣垦亩数在三千亩以上。

四、发明或改良各种便利实用之工艺品者，视其种类有一二特色以上。

五、开采大宗矿产纯用本国资本者，其每年矿产税额在二千元以上。

六、从事公海渔业者，其汽船吨数在五十吨以上，帆船吨数在三十吨以上，营业继续满三年以上。

七、捐款或募款设立商品、农产、水产等陈列所，农事、林艺、

畜牧等试验场、实业补习学校及其他与此相类之事业者，捐款在一千元以上，募款在五千元以上，事业继续满一年以上。

八、办理商会或农会固有之职务，确有裨益于农工商各界者，其经办满三年以上[23]。

奖励的范围包括农工商、矿产、农林、贸易、垦荒、交通运输、水产等各个方面。奖励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商人，目的是鼓励人们创办新企业和增加新产品，把对内发展工商业、农业和对外贸易结合起来。这个奖章规则的公布，对改变社会风气，一扫数千年来贱商的陋习，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六）政府设立各种示范场所，引导人民创办实业。

清朝末期，除了商部在京师设立了一个商品陈列所，袁世凯在天津创立了工艺总局，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临时搞了一个南洋劝业会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常设机关。1915年农商部在北京成立了劝业委员会，并设立了劝业场和附属商品陈列所、工业试验所，不久又成立了中央农事试验场、气候观察所、农林传习所，并在直隶正定、江苏南通、湖北武昌创办了棉业试验场。此外，还在北京天坛设立了第一林业试验场（1912年）、第二林业试验场（1915），在东北哈尔滨设立了东三省林务局，在沈阳成立了奉天林务局（1915），在北京西山、东北哈尔滨、安徽凤阳等地开办了种畜试验场。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成立了权度检定所（1915）和权度制造所。所有这些会、局、场、所都制订了详细的章程[24]。这些机关的建立对提倡实业，交流商情，研究新产品，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为了保护和促进棉、铁、丝、茶等工业的发展，政府于1914年1月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并拟拨款二千万元作为发展这些工业的基金。《公司保息条例》规定，保息公司种类分甲

乙两种。甲种为棉织业、毛织业、制铁业，乙种为制丝业、制茶业、制糖业。所列“甲种公司，得按实收资本金额之六厘，乙种公司得按实收资本金额之五厘，呈请保息”。“呈请保息者以本国人民依本国法律新成立之公司为限。”“凡新成立之公司，自开机制造之日起，继续三年为保息期间。”[25] 这些规定能够保证新成立的企业公司在开办初期也有利可图，这对资产阶级开办新企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对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推动作用，使资产阶级发起工厂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据农商部统计：1912年公司数为九百九十七家，1913年为九百九十二家，1914年《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公布之后增为一千一百家，1915年为一千零九十三家[26]。

由以上六点可见，民国初年所制定的各种经济法令、法规、章程，在不少方面确是消除了清政府对发展工商业的若干障碍，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以辛亥革命前1903年—1908年为例，新工业公司在旧商部注册的为二百六十五家[27]，平均每年注册的企业为约四十四家。而1912—1921年间在北洋政府农工商部注册的企业则为七百九十四家，平均每年注册的约八十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一倍[28]。

从投资额来看，辛亥革命前1895年—1911年间厂矿投资总额为一亿一千一百三十一元[29]，而1912年—1918年六年之中投资总额就达一亿四千二百八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四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十六年之间的投资总和还多三千多万元[30]。

从注册公司数来看，1912年—1914年为九十九家，1914年—1918年为三百七十七家，四年之间增加了近三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棉、丝、纺织染公司，从1912年—1914年间的十个增加到1914年—1918年的五十个，增加了四倍，资本额也从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元增加到二千五百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元，增加了近七倍。面粉工业同期

也由九个公司增加到三十二个公司，资本由六十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增加到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三百六十元，增加了近五倍。此外，增长得较快的是火柴工业，从十六个公司增加为二十四个公司，资本由六十三万零二百元增加到三百四十三万八千五百元，增加了四倍多[31]。这一统计说明了辛亥革命后确曾出现了一个设厂高潮。

商业公司投资的发展也很快。据农商部统计：全国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公司，民国三年（1914）有一百六十九家，民国四年（1915）发展到二百零六家，到民国五年（1916）发展为二百二十家[32]。工业发展速度也很迅速。1920年本国资本的主要工业和1912年相比，棉纺和面粉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4%和22.8%，矿业年平均增长率为9%，其中机械采煤为13.4%，而机械采铁矿达25.7%[33]。

再从具体的工业部门来看，有些部门的发展也是较快的。以纺织业为例，辛亥革命前洋纱洋布充斥于中国市场，每年进口大量的棉纱棉布，致使中国纺织工业不能发展。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减少对中国的棉货输出，中国棉纺工业得以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1910年中国共有纺织工厂二十九家，其中除外商经营的七家，二十二家为华商经营，纱锭为五十二万四千零九枚；1912年华商经营的工厂增为二十四家，纱锭为五十八万零三百四十一枚；1916年华厂增为三十家，纱锭增为七十二万一千一百零五枚，自1912到1916年的四年之间工厂增加六家，纱锭增加了十四万多枚[34]。

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经营的纺织、面粉工业，在辛亥革命后发展很快。荣氏投资于纺织业，始于1909年在无锡创立的振新纱厂，起初资本只有三十万元，是一个只有纱机一万二千锭的小厂，经营七八年成效不大，至1914年增加纱锭一万八千枚。1916年荣氏从振新分出，独自创立了申新纺织公司，额定资本为三十万元，纱锭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锭，获得很大利润，1918年盈利22

万元，盈利率达74.2%[35]。随后申新又增建了一个厂（申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九个厂，荣氏也成为中国有名的“棉纱大王”。

天津的民族工业，在民国初年的发展也较快，1912年—1914年新开办的工厂就有七家，大都为面粉、榨油、火柴等轻工业。1915年王郅隆等开办了规模较大的裕元纺织公司；周学熙等人开始创立华新纺织公司，资本达一千万元，后来发展到四个厂。号称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和铸铁业集中地的天津三条石地区，这时也正由工场手工业逐步向使用动力生产的工厂过渡[36]。

天津民族工业大规模发展是在1916年以后。1916年—1922年，天津新建了六个纱厂，资本总额达到一千八百九十万元，纱锭总数达到二十二万三千枚。“天津在这个时期增加资本，占全国增加资本的30%强。”[37] 这些新设的工厂，在此期间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如裕元纱厂1918年完工时资本仅为二百万元，以后四年内便盈利六百余万元。又如华新纱厂1918年开工一年后即获利一百五十万元[38]。

武汉的纺织工业在这个时期也得以恢复和发展。清末的武汉纺织工厂主要是张之洞创办的纱、布、丝、麻四局，辛亥革命前夕，经营大多无利，时常关厂停工。1913年以徐荣廷为首的资本家租办了官办的纱、布、丝、麻四局，组成了楚兴公司。这个公司经过整顿，从此大有起色，布匹销售供不应求，除了支付1913年—1914年的租金外，每年净利都在15%以上[39]。1918年，楚兴公司又在武昌开办了裕华纱厂，以后逐步形成资本雄厚的裕大华集团。

民国初年，全国面粉工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全国机制面粉厂数目1903年—1908年为十二家，到1919年已经发展到六十二家，1920年—1921年更发展到一百二十三家[40]，中国的面粉也由过去每年入超一变而为出超。面粉入口不断减少，1912年为三百二十万担，1913年为二百五十万担，1914年为二百十九万担，1915年迅速降低为十五万担；而面粉出口则不断增加，1914年时还不足七万担，

1915年上升为二十万担，到1918年达二百万担，1920年更猛增为四百万担[41]。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各国粮食生产减少，迫切需要面粉，中国所产面粉运销英、法、土耳其、日本、东南亚等地，从而促使中国面粉工业得以迅猛地向前发展。以无锡荣家为例，1902年荣家在无锡创办了保兴面粉厂（茂新前身），只有石磨四套，日出面粉不过三百包，由于外粉倾销，颇多亏折。辛亥革命后形势好转，营业大有起色。1912年茂新获利十二万八千两，转亏为盈，除付还各欠外，尚余数万[42]。荣家依此扩大生产，于1912年—1914年创建了福新一、二、三厂[43]。到1916年，荣家茂新、福新系统发展到六个厂，粉磨增加到一百零一台，比创办时增长二十四倍多。1921年茂新发展为四个厂，福新系统增加到九个厂，日生产面粉七万六千袋，其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资本粉厂的三分之一左右[44]。

当时上海是面粉工业最发达的地区。1918年前，上海面粉厂除福新系统福二、三、四、六厂外，新成立的还有七家[45]。其他如天津、济南、汉口以及东北哈尔滨等地面粉工业也相当发达。

缫丝工业也有进展。上海不仅是中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也是缫丝工业的中心。江浙地区盛产蚕茧，为上海缫丝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辛亥革命前丝业萧条，工厂停工停产的居多。1911年上海拥有丝厂四十八家，丝车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台。1914年增为五十六家，丝车一万四千四百二十四台。1917年猛增为七十家，丝车一万八千三百八十六台[46]，比1911年增加了二十二家和四千多台丝车。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加，蚕丝出口也逐渐增加。1911年出口各种蚕丝为七千四百五十多万两，1913年增为八千三百十五万两，其中机器缫丝出口由三千六百多万两增加到四千六百名万两，增加了近一千万两[47]。

卷烟工业发展也颇为迅速。上海卷烟厂由1910年的一家烟厂发展到1916年的七家[48]。侨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所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公司于1906年成立于香港，最初资本不过十万元，而且由于外资竞争，处境危险，辛亥革命后资本发

展到一百万元，1918年增资到五百万元，并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开设了分厂，规模逐渐扩大，盈利也增长很快。1920年—1921年盈余达四百多万元[49]，从而能与外国资本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相匹敌。

榨油工业也有较快的发展。中国新式榨油工业，东北以大连、营口为中心，华北以青岛为中心。东北出产黄豆，以生产豆油为主；山东出产花生，青岛是花生油生产的中心；江浙产棉籽，上海多产棉籽油；汉口为桐油集散地。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油料为各国所需，我国旧式油坊不能满足需要，新式油坊应运而生。东北大连1913年有新式榨油工厂五十二家，1919年增加到八十二家（其中大多数为华商所开办的工厂）[50]。油料输出也逐年增加，以豆油为例，1913年输出为四十九万一千担，1916年增加到一百五十六万五千担，四年之间增加了二倍多[51]。

民国初年，火柴工业的发展也较快。据统计，1905年—1913年我国的火柴厂开设了52家，1914年—1923年增加到113家[52]，十年时间就增加了61家，比1913年前增加了一倍多。由于国产火柴的增长，部分满足了人民的需要，进口的火柴不断减少。据统计：1913年火柴进口为五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三箱，1914年就降为四十七万六千七百十五箱，1915年降为四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八箱，1916年更降为四十一万二千四百十四箱。若以1913年进口指数为100，到1916年进口火柴指数降为72.5%[53]。当时经营火柴的工厂，“无不获利倍蓰。即如北洋一厂，开办时资本不过二万元，到1917年—1918年间竟获利十万余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于1920年创办了鸿生火柴公司，最初资本不过十万元，后来发展为规模巨大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所产火柴行销长江流域和两广、闽浙地区。

此外，在造纸、针织、制糖、制烛、食品罐头等工业方面，这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中国的煤铁开采和铁路、航运等部门，一向是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官僚资本为了巩固其统治，也办了一些军火工业、煤矿和铁工厂。民族资本在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是很微弱的。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乘隙在重工业方面得以发展。

采煤工业。中国的采煤工业大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资本投资采煤工业的很少。辛亥革命后政府公布的《矿业条例》鼓励人们从事采矿业，因而采煤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12年向农商部领取的矿照为二十一件，1913年为三十二件，1914年为五十八件，1915年猛增为一百五十三件，其中以领取煤、铁、金、银矿照的居多。例如领取采煤的矿照，1912年为十四件，矿区面积为五千一百四十五亩；1913年为十九件，八千三百九十七亩；1914年《矿业条例》公布后，就上升为二十七件，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二亩；1915年更增为五十六件，二十四万一千八百十四亩[54]。四年之间领取的矿照增加了三倍，矿区面积增加近五十倍；如果把各地方开办的小煤窑计算在内，数字就更多了。全国煤的总产量也有所增加。1912年机械采煤量只有五百一十六万吨，1919年增为一千二百八十多万吨，1920年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十三万多吨。用土法开采的小煤窑为数也不少，这期间每年都有增加，产量约在四百万吨左右。九年之间，机械采煤量（包括帝国主义投资各矿在内），总共增加了近二倍。若剔除外矿产量，则从1913年的五十四万多吨上升为1916年的七十五万多吨，1920年则猛升为三百二十八万吨[55]，增加了五倍多。例如，纯为民族资本创办的山西保晋煤矿公司，产量就增加很快：1912年产量为二万一千多吨，1916年上升为七万一千多吨，1920年猛增到二十二万五千多吨，比1912年增长九倍多，企业也由亏损一变而为盈利。该矿在1916年以前年年亏损，1916年盈利达四十三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5%，1919年盈利也有十一万九千余元[56]。随着煤产量的增长，进口煤逐渐减少，出口煤不断增加。据统计：1914年进口煤炭价值为八百七十万海关两，出口煤炭价值为九百二十六万海关

两。出入口相较，出口额已经超过了进口额，煤炭业的发展“猛进无绥”[57]。

钢铁工业。1911年全国钢铁总产量为十二万一千多吨，1916年发展为四十一万四千吨（其中铁为三十六万九千吨），增加近二倍半。钢铁入口量也在减少，1911年入口为二十一万九千吨，1915年降为十二万五千吨，降低了约43%，1917年更降为十二万三千吨[58]。随着钢铁产量的增加，国内铁矿需求相应增加，铁砂产量也随之增长，出产的铁砂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有出口。如1912年铁砂的产量（机械开采）为二十二万一千多吨，净出口为二十万另四千多吨；1916年上升为六十二万九千多吨，净出口为二十五万二千多吨，产量增加近二倍[59]。从铁矿开采手段来看，也有显著进步，机械开采和冶炼的比重都有所提高。1912年机械开采的铁矿只占30.6%，机械冶炼生铁只占4.5%。1916年机械开采的铁矿上升为55.6%，机械冶炼生铁上升为53.8%[60]。

这时期由华商经营的制铁工厂也有增加。除原有的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厂外，还有上海新成立的和兴钢铁厂、大冶的济华铁矿公司（1917）、汉口的扬子公司以及后来的石景山炼铁厂等。汉冶萍公司在此期间产量迅速上升：以汉阳产铁量为例，1912年为七千九百八十九吨，1913年为七万九千五百十三吨，1914年为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五吨，1915年为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吨，四年之中增加产量近十六倍[61]。该公司由于产量上升而扭转了历年来的亏损，增加了盈利。辛亥革命前几乎每年要亏损一百五十万到二百八十多万元，到1914年仅亏十万元，1916年至1919年，每年都有盈余。1918年盈利多达三百七十七万九千元[62]，该公司并进行了扩建，在大冶附近新建两座高炉，在汉阳铁厂添建化铁炉及炼钢炉。1918年产量增为十三万九千余吨，1919年增为十六万六千余吨。和兴公司创于1917年，最初资本仅八万元，在欧战期间，获利甚巨，改组增资至一百万元，添置炼钢炉二座，专以炼钢为主[63]。

锑、钨等有色金属业。锑、钨为军事战略物资，欧战期间价格猛涨，我国出口猛增，获利倍蓰。1912年纯锑产量为一万五千吨，1917年增至三万三千吨。钨在1915年始发现，1916年产量就达二千吨，1918年猛增至一万余吨。钨主要输往美国和日本[64]。它主要产于湖南，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湖南的锑砂和纯锑在欧战期间为各参战国所争购，纯锑一吨价值由一百四十六元上涨至一千元。据统计：1914年锑砂出口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九石，总值二十五万五千多两，1916年纯锑总值为四百六十三万四千七百二十五两，生锑总值为四百六十七万多两，1917年生锑出口为三十二万多石[65]。湖南用机械开采锑矿的华昌公司，在此期间利润收益猛增，因此于1915年扩充商股至九十六万两，1916年冬又加入商股二百另四万两，总资本达到三百万两。该公司除在长沙设立冶炼厂外，另于益阳、安化、新化等县设立采矿场及生锑制炼厂，并在上海和美国纽约设有分售处，直接对外贸易。由于锑价猛涨，该公司1916年的纯利竟达到一百二十七万两[66]。

水泥业。辛亥革命前，中国所有水泥一半来自欧洲。欧战期间，欧洲水泥来源断绝，因此国内水泥工业得以发展。除原有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湖北大冶水泥公司、广州的广东士敏土厂三家水泥厂外，又新设了上海龙华的上海水泥公司，南京龙潭的中国水泥公司与无锡的太湖水泥公司、河南的六河沟水泥厂四家水泥厂。这期间，水泥生产异常有利，每桶水泥由市价五元涨到十元。

交通运输业。1912年—1916年，北洋政府为兴建铁路的对外借款共为二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元[67]。这些借款大多数为北洋政府挪作军事、行政费用，真正用来修路的经费很少。民国后并没有修筑大的铁路干线，只是零星地修筑了干线中所未完成的地段和一些支线。1912年—1913年间修筑了二百五十六英里[68]，1914年—1920年间修筑了八百零四英里[69]，九年间总共修筑铁路不过一千零六十英里。

这期间民营铁路虽有发展，但成绩也不大。除苏、浙、湘等省各有已成铁路一二百里外，其他各省商办铁路还处于修筑土方或购买材料阶段。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力倡“开放路权”，借外资兴办铁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并制定了要筹集六十万万元，建筑十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计划。孙中山的计划，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未能实施。

商办铁路不但集资困难，而且营业亏损。在孙中山国有铁路计划的影响下，商办铁路纷纷要求让归国有，于是北洋政府用了六千多万的期票，于1913年—1914年间先后收回了湘、苏、豫、川、鄂、浙、晋各省的商办铁路。

轮船航运事业。旧中国的航业大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所办的轮船公司手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上海、汕头、广州、杭州等几个大的通商口岸，陆续出现了一些民营的轮船公司。1910年，中国共有轮船八百八十五只，总吨位为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吨。1912年为八百九十七只，总吨位为九万五千四百四十七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商船增加较快，1914年为一千一百四十七只，吨位上升为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吨。到1916年，猛增到一千三百四十三只，吨位上升为十万零二千七百五十七吨。1919年轮船数达到一千四百一十只，总吨位上升为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五吨，与1910年相比，轮船增加五百二十五只，吨位增加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七吨[(70)]。这期间我国船数虽然增长较快，但增加的大多数为小轮船，而且以4吨以下的居多数，4吨以上的较大轮船增长得很少。所以中国的轮船只能在沿海和内河航行，航行外海的很少。这说明中国的航运事业虽有发展，但仍很落后，中国内河航运和外海运输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轮船公司手中。以长江为例，中国运输的船只和运输的吨位各只占26%，而英国船只占38%，总吨位占40%，日本次之，船只占31%，总吨位占31%[(71)]。

此外，公路、邮电等事业也有所发展。

总之，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和投资规模以及发展速度方面，都比革命前大有进步。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辛亥革命既没有改变这一社会条件，因而它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仍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截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近代工业生产能力还是十分微弱的。中国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7％，而近代工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不到20％[(72)]。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一些弱点就暴露得更加明显。

（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不平衡。正如上面提到的，这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发展迅速，重工业的发展则很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周转灵活，能够迅速获得利润。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不能允许它发展重工业；即使有了一些重工业，也大都还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虽然有人提倡发展重工业，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工业结构上也不平衡。例如我国的钢铁工业体系和棉纺织工业体系就不完整。钢铁工业方面，铁砂大量出口，炼钢冶铁设备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棉纺织工业方面，一面是棉花大量出口，一面棉布却大量进口。国内大都是棉纱厂，织布厂很少，纺与织不配套，印染能力更少于织布能力。纺织机械自己不能制造，完全依靠进口。这种畸形现象，是中国工业发展不能独立所造成的。

在地区配置上也不平衡。新式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等城市，内地的新式工业却很少。据统计，1919年注册的工厂共有四百

七十一家，其中江苏就有一百五十五家，直隶五十七家，浙江四十二家，广东三十三家，山东三十一家[73]。这几省总共就有三百一十八家，占注册工厂数的67%。中国最发达的棉纺工业也大都集中江苏、上海、汉口等地。如1918年全国纺锭的80.32%集中在江苏和上海，仅上海一地就占61.82%，而在广大内地如西康、新疆，甚至云、贵、川和陕西，一枚锭子都没有[74]。这在我国工业地区配置上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二）中小企业发展快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辛亥革命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大多为中小资本和手工工场。由于资金薄弱，因而企业规模狭小，机器设备粗陋不全，生产工艺落后，大多还没有脱离手工工场性质，使用动力生产的也就很少。据统计，1916年全国动力机器总数为二千零三十台，电力总数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瓩，尚不及当时美国匹茨堡一个城的动力[75]。即使有些工厂购置了动力设备，但由于设备不全，电力昂贵而搁置不用。因此工人劳动条件差，强度大，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由于资金短缺，有些企业就不得不向帝国主义银行借款，借款的条件苛刻，利息又高，一经举债，企业往往就受人控制而陷入无力自拔甚至被吞并的地步。

（三）技术人员缺乏，企业管理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厂由于技术人员缺乏，往往要用高薪聘请外人为工程师。工厂的业主大多出身于官僚、地主和商人，他们对现代科学知识不甚了解或一知半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利润而不知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以棉纺织厂为例。1916年—1922年以前建立的32家纺织厂，商人投资的占多数[76]。商人投资工业，他们着眼点是从流通领域中获取利润，而不知道如何组织精工生产、改良和更新生产设备，而且不提或少提公积金和折旧费，以至机器陈旧，不能使用新技术。工厂的产量和质量都不能提高，在市场上也就缺乏竞争力。最后的结果往往不是停工闭业就是被人吞并。

中国工厂有一种奇特的管理制度即官利制度。这种制度不论企业

盈亏，股东们必得官利，其数目总要在八厘以上，股东们既可以坐享官利，就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情况。例如，南通大生纱厂初创时为了招徕投资，规定凡股东一经入股，便按年利八厘起息。虽然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1895—1899）工厂筹建期间资金困难，几至于不能成厂，但一万七千余两的官利还是不能拖欠的[77]。这种官利制度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取消，如1912年荣宗敬扩充茂新面粉厂时，“招足股银二十万两，分派两千股，每股银一百两，常年官利一分，每年以正月月半后派分官利余利，凭折支付”[78]。这种官利制度，股东形同高利贷者，借钱生息，不问盈亏。这就势必增加工厂产品成本，也限制了资金的积累。这也是妨碍中国工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　官僚资本企业的发展和交通系

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有所发展。原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办的军事工业，现在都转到了北洋政府手中。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山东机器局、新疆机器厂、成都机器局、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广州机器局、湖南机器厂等十几个军火工厂，这时都入于军阀之手。1904年袁世凯在德州创办的规模巨大的北洋机器新局所属的十二个厂，在辛亥革命后都一概成为北洋军阀制造军火的重要工厂。此外，袁世凯于1915年筹办了规模较大的河南巩县兵工厂，并在湖南新设了湖南兵工厂。官僚资本除继续经营各种军火工业之外，还陆续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主要是一些煤、铁矿和纺织、造纸、皮革等工业。银行也是他们投资的主要场所。据统计，从1896年至1913年为止，全国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五百四十九个，资本总额为一亿二千零二十九万七千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有八十六个厂矿，资本额为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元，约为新式厂矿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在四十二家煤矿中，属于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有十七家，资本额约占资本总额的一半[79]。辛

亥革命后一些民用工业也同军火工业一样转到了北洋军阀手中，成为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据1912年统计，在中国煤矿生产中，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外，官僚资本在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12年，全国机械采煤量为四十一万六千五百多吨（不包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采煤量），官僚资本用官办、官商合办等手段控制了煤的机械开采量的82.2%。1916年控制了开采量的79.3%，直到1919年以前，官僚资本控制的煤开采量都在70%以上[(80)]。

在职官僚凭借其政治特权办了许多企业，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如北洋官僚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以私人的名义，经营山东中兴煤矿。他们凭借着政治上的特权，在运费和税率上比其他煤矿取得许多“优待”，从而攫取了巨额利润。据统计，1914年，中兴煤矿账面盈利与资本的比例为9.1%，1918年就上升为46.4%，1920年达到69.2%的高额利润[(81)]。其他大官僚控制的正丰、长城、宝华、烈山、贾汪等煤矿，在此期间也获得了巨大利润。

袁世凯、周学熙等人在清末就创办了北洋机器局、滦州煤矿，以后还控制了井陉煤矿，又开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等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所产水泥垄断了市场。中央机关、华北的铁路和其他城市的各项公用工程所需水泥，都由该公司包售。该公司于1907年由唐山细绵土厂改成，资本不过一百万元。辛亥革命后，1912年旧股升值，资本额达到六百万元，六年之间资本增加五倍，利润也由1907年的四万五千多元增加到1914年的四十五万多元，七年之间增加九倍[(82)]。为了进一步垄断市场，启新于1912年利用强权，吞并了湖北水泥厂。

北洋军阀官僚投资的主要场所，主要集中在他们统治中心的京津地区。1914年到1925年间，天津新建工厂有二十六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就有十一家，占新建二十六家工厂的42.3%。这十一家工厂的资本总额达—千五百七十二万元，占二十六家资金总额二千九百二十一万元的53.8%。1915年开始创办的裕元纱厂，实际上是安福系军

阀官僚为主体创办的，该厂董事会成员有段祺瑞、倪嗣冲、徐树铮、曹汝霖、周自齐、朱启钤、冯国璋、张勋等人，该厂全部股本二百万元，而倪嗣冲一人就有股本一百十万元[83]。

曹锟用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手段搜刮来的大量财富，除了开当铺、买地产外，还投资于新式工业。1919年曹锟等创办了恒源纱厂，资金四百万元，曹氏家族股份就占了八十二万元，占总资本额的五分之一强[84]。曹氏家族还开办了直东轮船公司、罐头公司，还投资井陉煤矿、遵化兴隆铁矿等。此外，他们在保定中国交通银行分行都有约六百余万的巨额存款。曹锟家族积累的财产价值约有六千万元[85]。

曾任江西督军的李纯，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除在天津大量购房地产外，也投资于新式企业。北京电车公司、天津裕大纱厂、龙烟铁矿和天津一个大皮革公司等企业中，都有他的股票；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山东省工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也都有几万至几十万元的股票[86]。

此外，还有许多官僚军阀在这个时期投资新式工矿企业和银行。1912年—1916年一些主要军阀投资的工商企业共有三十七家[87]。其中在天津的有八家，在北京的有八家，在京津附近的有五家。

京津地区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所以他们的经济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地区。要统计军阀的财产和投资企业股份的确切数字，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除了供其挥霍外，还大量购买土地和房地产，或存入外国银行，企业投资只是他们的一部分。为了逃避人们的视线，他们在投资和存入银行款项时往往不用本人的姓名，而是用别名和妻子儿女或亲信的名义。或者用某某堂的名义购买股份。因此，他们在各种企业和银行中的投资就很难确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一些主要军阀的投资数字，也是大得惊人的。如徐世昌就有一千万元，靳云鹏二千万元，梁士诒三千万元，徐树铮八百万元，倪嗣冲

二千五百万元，曹锟五千万元，王占元三千万元[88]。

军阀官僚不仅投资于工商企业，也积极投资于银行、银号等金融业，主要投资场所也是京津地区。设在北京的中国、交通、新华储蓄、劝业、边业、盐业、殖边等银行中，都有许多军阀官僚私人投资。王克敏、李士伟、周学熙、熊希龄等人都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交通银行是梁士诒等交通系官僚掌握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殖边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的主要股东，也大多是些军阀官僚。王克敏为中国银行总裁、殖边银行董事、天津保商银行董事，当时新成立的银行几乎都有他的股票。新华储蓄银行的大股东为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朱启钤等交通系的人物。盐业银行大股东为袁乃宽、张镇芳、梁士诒、李士伟、周学熙等人。

军阀官僚们不仅投资于新式银行事业，还创办了不少银号。冯国璋开办的华通银号，是以吸收自己势力范围的“银钱收支及军队饷糈为业务”[89]，实际上是冯家的银库。江西督军李纯开设的义兴银号，吸收当时两广军阀陆荣廷、山东督军张怀芝的存款，以及田中玉、蔡成勋、何丰林等督军、师长的存款，仅天津分号吸收的定期存款就达八百万元，在天津银号中“无出其右”[90]。此外还有张敬尧开办的祥盛银号、海军总长刘冠雄的信富银号、王怀庆的华茂银号、王占元的日亨银号、田中玉的永豫银号等。差不多一些重要军阀都有自己开设的银号。这些银号的资本一般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大银号对金融的影响很大，军阀的存款往往能左右银号的业务。例如蔡成勋从天津益兴银号一次提出30万元，致使天津的三家银号同时倒闭[91]。

由于军阀官僚竞相投资银行、银号，致使金融业发展很快。据统计：1896年—1911年间设立的银行为十七家，1912年—1916年间就有三十家，比前期增加了76%。1912年银行资本总额为三千六百二十五万四千九百十九元，1916年为三千七百八十万零六百九十元，比1912年增长4%。1917年—1923年银行增加更快，达到一百三十一家。1920年的银行资本总额达到五千一百九十八万七千零七元，比

1912年增加了43%。

据1925年的调查，全国华商银行数为一百四十一家，开设在北京及直隶的银行就有三十七家，占总数26%以上[92]。

军阀官僚除经营银行、银号之外，还开办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贸易公司等。

军阀官僚踊跃投资于金融事业，这同当时政府的财政政策有关。北洋政府连年发动反革命战争，财政窘困，除借外债和对内增加税收以资应急外，主要方法就是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以补其不足。发行公债都有很高的利息和折扣，而公债的发行大都是通过银行代理和抵押承销的。公债折扣最低的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为三分左右。这样高的利息自然就吸引了军阀官僚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向银行投资。军阀官僚凭借政治特权开设的银行，就可以捷足先登，抢先购公债，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据统计，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1916年发行公债，实发行额为二亿零九百五十三万元[93]，不难想象，他们从中得到的“利润”该有多么巨大！

在这个时期，官僚资本中还出现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叶恭绰、周自齐、朱启钤等人。他们掌握着铁路交通大权，控制着交通银行，垄断了铁路借款，势力膨胀到能左右政局的地步。

交通系首领是梁士诒。他赖以操纵财政的大本营，主要是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于前清末年（1907），差不多与前清度支部所设立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同时成立。该行成立时，是由邮传部拨资四百万两，集商本二百万两组成，最初由邮传部左丞李经迈为总理。宣统三年（1911）加募商本四百万两，股票还未售完，辛亥革命爆发，遂中止发售。李经迈因所开善源金店亏欠倒闭，欠交通银行数百万元而去职。有人乘机侵入，召集京、津股东会，陆宗舆被选为会

长，不久又任总理。陆曾提议发行纸票以救济市面。民国成立后，北方银根异常吃紧，该行股票每百两落至二十两。梁士诒乘机大量收买股票，更借总统府秘书长资格，推倒陆宗舆而取得总理。梁夺取了交通银行的控制权之后，将各种交通机关的收入共约千万元寄存该行，又把屡次所借修筑铁路的款项也存入该行，均无利息。交通银行因此有了大量存款，信用日增，凭此大发纸币。

梁士诒为了能持久地把持交通银行，指使周自齐、朱启钤两人提出《交通银行则例》，呈请袁世凯于1913年4月批准公布。

交通银行成立时本来是官股大于商股，梁为牢固地控制交通银行，就设法增加商股。他利用已批准的《交通银行则例》第三条，“交通银行股本总额为库平银一千万两，计分十万股，每股库平足银一百两”的规定，除前邮传部为辅助交通事业所附入的四万股外，其余六万股由人民承购；如欲“增减资本，须经股东会总会议决，呈报财政部交通部核准”[(94)]。这样，交通银行就由官商合办的银行一变而为商办的股份公司，国家不能任意变动股本了。

为了继续保持交通银行代理国库的权利，总揽交通上收入及其他债款收入存入该行的特权，《则例》第七条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第八条规定：“交通银行得受政府之委托，分理金库。”第九条规定：“交通银行受政府之委托，专理国外款项及承办其他事件。”此三条保证了交通银行有寄存国家收入的权利。

《则例》第十三条又规定：“交通银行受政府之特许，发行兑换券。其办法照财政部所定之银行兑换券则例进行。”但发行的式样、数目、日期得呈请财政部核定。这样，交通银行又取得了纸币发行权。

为了取得人事任用权，《则例》第十四条规定：“交通银行设董事五人以上、十一人以下，由股东会就二百股以上之股东选出，呈报

财政部及交通部存案。任期四年，期满得再选再任。”第十五条规定：“交通银行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帮理一人。总理由股东总会就四百股以上，协理就三百股以上之股东选出，呈报交通部转咨财政部存案。任期五年，期满得再选再任。帮理以路政局局长充任，由交通部委派。”有此两条，用人之权，政府便不能直接过问。

梁士诒凭此《则例》取得了交通银行正式总理，从此牢牢地控制了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的股东大多数为铁路、电局的要人，开股东会时“非与各路局、电局有连之股东不得入场，质言之，直谓交通系之集会可也”[(95)]。

交通银行的存款，主要的也是铁路存款。梁士诒、叶恭绰等把持路政，各路局长大多为梁、叶亲信。他们串通一气，隐匿盈余不报。每年未报之盈余约千余万元，“均以私人名义存入交通银行，以便居股东地位而操银行之大权，并持银行为交通系之大本营而挟持政府”[(96)]。

此外，梁、叶等人把持铁路，利用特权，开办运输公司。如津浦路的汇通公司，京汉路的广兴长转运公司，垄断了铁路运输，每年获利千余万元[(97)]。

他们还把掠夺来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企业，开办煤矿和纺织公司。前面提到的朱启钤，就是中兴煤矿的大股东兼总理。叶恭绰为裕元纺织公司赞成人、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名誉董事，又是交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董事。梁士诒也是中兴煤矿大股东，盐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董事和发起人。周自齐为新华储蓄银行董事、中华懋业银行总裁和裕元、裕大纺织公司发起人。

梁、叶等结成私党，把持要政，左右政局。梁士诒在“交通部布置多年，上下各级重要人员无不由其一手提拔，凡重要事件无论梁氏

在部与否，无不禀命而行”[98]。梁士诒、叶恭绰等内以朱启钤、周自齐、张岱彬、任凤苞、施慎之等为其羽翼；外以五路局长赵庆华（津浦路局长）、关赓麟（京汉路局长）、关冕钧（京绥路局长）、李福全（正大路局长）、钟文耀（沪宁路局长）等为其爪牙，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派系。

梁士诒等既掌握交通银行和路政，又通过铁路借款和各国银行往来密切，深得帝国主义信任。从1912年到1916年，袁政府通过交通系借款二亿三千二百多万元。交通系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影响政府财政用人大权。如1914年5月，袁世凯本想委张镇芳担任财政总长，交通系凭借英人的势力出面干涉，英国声明财政一席断不可委张镇芳，因而迫使袁仍任周自齐为财政总长[99]。北洋政府历届内阁的交通、财政总长，多半为交通系占据。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官僚资本有所发展。其投资的特点是：以现任官僚私人投资工矿企业和开办金融银行事业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它的发展远不如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快，更不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

官僚资本之所以在这时发展缓慢和分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官僚资本是直接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取得发展的，而新建立起来的袁世凯政权还不巩固，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战争迭起。因此，军阀官僚把夺取来的大量财富，大半用以购置土地和房地产，进行封建剥削，或用于商业和金融等投机事业，投资工矿企业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三　外国资本的侵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内部战争，某些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口货的减少和出口货的增加方面。据统计：1911年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

为四亿七千多万海关两，1913年输入为五亿七千多万海关两，到了1915年输入锐减为四亿五千多万海关两，1915年输入比1913年减少了五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输出却在逐年增加：1911年为三亿七千七百多万海关两，1913年上升为四亿零三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更上升为四亿八千一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输出比1911年增加一亿零四百多万海关两，增加近三分之一[100]。

输入减少的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美、日对中国的贸易输出则是逐年增加。据统计，大战之前英国商品输入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位，日本次之，美国第三。欧战爆发后，贸易位置则有很大变动，日本占第一位，美国次之，英国第三。日本乘英、法、俄、德等国忙于欧洲战争的机会，利用它地理上邻近中国的优越地位，加紧其独霸中国的侵略活动。据统计，从1914年至1917年间，日本对华贷款总额达到八千一百多万元，其中以交通、铁路、矿山、工厂等部门贷款最多。

日本势力的扩张还表现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激增。1914年日本对华输出货值一亿六千多万元，1917年增加到三亿一千八百三十八万元，1918年更增为三亿五千九百十五万元[101]。输入增加最快的是棉纺织品。大战期间，日本棉布的输入大为增加，打破了以前英国对中国棉布市场的独霸局面，取得了在中国棉布市场的优势。据统计，1913年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口的棉布价值，英国货占33%，日本货占29.6%，其他各国进口货占37.4%。1914年—1916年间，日本上升为36%，英国下降为33.4%，其他为30.6%。到1917年—1919年间，日本则猛增为57.7%，英国则下降为29.5%，其他为12.8%[102]。与日货输华的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打进了中国市场，向中国大肆进行资本输出，在华直接投资，开办工厂矿山，特别是注意投资于棉纺织业。日本三菱、三井财阀等所属的纺织会社，在中国开办了许多纺织厂。如受三菱财阀控制的内外棉会社，在中国就设有纱布厂十四所，而在日本本土只有两所工厂[103]。“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及津

沪等地增设工厂甚多，单是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为数已一百三十九家”[104]。日本财阀不仅在中国投资纱厂，而且也大量掠夺棉花原料。他们对棉花的生产、收购和贩卖，都设有完整的投资系统，势力十分雄厚。如天津是华北棉花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输出棉花最多的口岸，而输往日本的棉花为数最多。据1912年调查，每年由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新疆各省运集天津的棉花，约有一百二三十万担。天津、唐山两地纱厂消费约四十万担，申帮及欧美商约运二三十万担，其余均以日本为销售市场[105]。日商在天津设立的以棉花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商行就有十五六家，势力远在华洋各商之上。

日商在天津操纵棉市，规定市价，“计价剔货，皆随意行之”[106]。日本资本家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重大障碍。

日本资本家不但直接投资于纺织等轻工业，同时还通过各种方法，经营和掠夺我国的煤铁资源。除了继续在东北掠夺抚顺、本溪湖、鞍山等地煤铁资源之外，他们还在中国其他各地“以中日合办”或借款等名义进行投资，夺取中国的煤铁资源。例如：1913年，日本通过借款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日本资本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向汉冶萍公司放款一千五百万元，并规定该公司应允在四十年内售与日本八幡制铁所上等矿石一千五百万吨、生铁八百万吨，并以聘任日本财务顾问和日籍工程师为借款条件，从而控制了汉冶萍公司。欧战期间，铁价暴涨，但由于日方限制，价格不能提高，销售也不能自由扩大。“售给日本生铁约三十万吨，矿石约一百万吨——可炼生铁六十万吨。若照当时生铁每吨最低市价一百六十元计价，便可售银一亿四千余万元。可是事实上卖给日本的每吨生铁价格，只有一百二十元。东京市价每吨高达四百八十日元，约合中国为六百元左右。只此一项，公司损失三千万元，若与铁砂合计，公司损失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元”[107]。由此可见，日本夺取了公司大部分利益。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较晚，乘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之

际，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与日本进行激烈的竞争。“欧战四年中，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额计达一亿一千五百余万元之多……其中有增进者只有中日、中美之贸易而已。”[108] 据统计，“1914年中英间贸易额计一亿二千七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为八千一百余万两；1916年中英贸易额减为一亿零五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增为一亿二千五百万两之多。1917年中美之间贸易增至一亿五千五百万两，比1914年增加了93%”[109]。至此，美国对华贸易一跃而超过了英国。1918年中美贸易由于美国限制进口，只达到一亿三千五百两，而中英贸易更减至七千五百万两。“计四年间，中美贸易之超过中英贸易之数，在一万万两以上”[110]，“为中美通商以来所未有”[111]。

由此可见，美国对华贸易已超过英国，仅次于日本，而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美国输华货物的钢铁、各种机器、铁路货车及客车、汽车等在不断增加，而棉货、棉花、纸张在不断减少。而我国运销美国的货物大都为原料及食品，包括油类、生丝、羊毛、蛋粉、生皮、草帽辫等。

美国在华势力的增长，还表现在通过借款来取得经济上的特权。据统计，1914年—1916年6月，美国借款给袁世凯政府共五次，计四千六百万元。1914年美国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签订协定，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夺取了在中国的陕北延长和承德地区开采石油的权利[112]。1916年5月17日，美国托拉斯裕中公司的代表，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撮合，与袁世凯政府秘密签订《裕中公司承造铁路合同》，让美国垄断资本攫取在湘、桂、晋、甘等七省内造一千五百英里（二千四百公里）铁路的权益。合同载明如果造价“确较省俭”，中国政府应准公司再造一千五百英里的铁路[113]。此项协议因袁世凯垮台而未能实行。

随着列强之间竞争日益剧烈，为了协调侵略步伐，美、日于1917年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也不否认美国对中国的权利。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是从来不

惜牺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利益的。

欧战期间，英国设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大银行如汇丰银行，仍然影响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怡和洋行等各大商行还在发展，开滦煤矿、英美烟草公司等大矿厂依然获得巨大利润。虽然英国对中国贸易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被挤掉。正如《时报》所指出的："兹查英国近六七年中在华贸易实际，特与日本人所经营者相比，当知英人之生意确能保守，并未被人所挤也。"[114] 由此可见，英国仍保有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它依然是袁世凯政府的靠山。

总之，辛亥革命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革命的影响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法令，消除了清政府束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使得"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口号深入人心，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资兴办实业，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由于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以良好的时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但是日、美两国，特别是日本，却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的障碍。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变化和破产趋势

一　农村生产关系的若干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虽然继续热心鼓吹民生主义，但应者寥寥。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无法付诸实践。宋教仁于南北统一后，首任农林总长，他作为同盟会在京从政集团的灵魂，在其施政纲领中，却回避了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仅仅强调"农业纯为生产事业之一，当以增加其生产力为要着"[115]，主张开荒、造林、兴修水利。至于国民党纲领，竟完全取消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政策，把民生主

义修正为“采取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116]。这样，就把民生主义从原来的根本上解放生产力的土地政策，修改为一般的鼓励民族工业的经济政策。

至于掌握着民国实权的袁世凯，和依附于袁的共和党等政治派别，自然不会提出改革土地制度的政策。农民本身也缺乏有力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土地关系当然不可能得到改造。张謇于1913年秋出任农商总长后，从为民族工业提供廉价原料出发，特别提倡发展棉花生产。他在就职宣言中说：“今日国际贸易，大宗输入品以棉为最……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尚宜有各种之规划。”[117] 1914年4月11日，政府公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张謇且在任内于正定、南通、武昌等处成立棉业试验场。但根本体制不变，这些措施难期成效，而且由于财政困难，也并未着力推行。自1912年—1920年间，虽然各地设立的农业试验场达二百五十一处之多，但其成果甚微。“第一是缺乏人才，第二是缺少经费。所以，十余年来对于农民一点效果没有发生。”[118]

虽然前清的封建土地关系，在民国以来大体上继续维持着，但是，由于政权的更迭以及客观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关系毕竟还是发生了某些缓慢的变化。

前清的官庄（包括皇室庄田、宗室庄田、旗地）是封建性最强的土地占有制，虽然按照优待条件，仍作为皇室和旗人的产业维持不变，但已呈现瓦解的趋势。民国成立后，佃户抗租，冒认旗产，甚至庄头（庄田管理人员）盗卖皇产的事件，屡屡发生。1912年底，永清县议、参事会要求“取消旗地，暂缓交租”[119]，激起了抗霸旗租风潮。袁世凯曾屡次下令保护旗产，并不能阻止抗租风潮的发生。而大批的旗地，经旗人变相出卖，陆续转入了汉族地主和农民手中。1931年有人调查，南京地区“今旗地十九已在汉人之手”[120]。辛亥革命促使封建性最强的土地关系趋于解体。

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对鼓励开垦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张謇主持下，1914年7月政府公布了《垦荒暂行条例》，把官有的荒地、海滩、湖荡的沙田丈放给私人。同时，由于政府财政困难，不断变卖官产，各种各样的官有土地，也变卖给了私人。如东北地区在1914年—1915年间，吉、黑两省着手整理官庄，丈放给民间，并解除了庄丁的农奴身份。据1917年—1920年间统计，吉、黑两省的官有土地自43%减为27.9%，而私有土地自50%增加到63.5%[121]。又如四川土地，“过去三分之一以上集中于庙、寺、祠、会、公家、土司之手……受封建关系的制约，不易自由出卖……但至民国以后，公共田地被官卖、私卖、提卖殆尽，使三分之一的土地完全加入自由买卖之商品化过程”[122]。

在私有土地关系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作用，土地买卖更加自由，封建关系的束缚有松弛趋向。1913年，大理院在判决吉林某一案件的判词中说：“吉林习惯，对于本族、本旗、本屯卖地时，有先买之权。此种习惯，不仅限制所有权之处分作用，即于经济之流通，与地方之发达，均不无障碍，为公共之秩序及利益计，断难与以法之效力。”[123] 这样，本族先买权就被打破了。与此相应，大理院判决，除有契约者外，也不再保护赎回制，即卖主向买主赎回土地的权利，这种“死头活尾”制也就被打破了。而佃户的永佃权，也开始崩溃。1913年后的大理院判例，赋予地主以更大的撤回权利。这些措施，虽然对土地制度的冲击十分微小，但毕竟有利于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产生，也促进了农村的分化。

同时，在商品经济扩大的趋势中，乡绅地主向工商业方面的投资也逐步增多。县级政权中的纯封建性势力，在辛亥革命中大都遭到打击，一批县咨议局长、商会领袖、开明士绅和留学生掌握了一些地方政权。一批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对县级政权有着很深的影响。如张謇在南通一带，黄炎培在川沙，使共和党人控制了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支持设立农会、商会，对于提倡实业、改进农业技术等，起了一

定的作用。如云南新平县编辑《农学大意》到各区宣讲，江苏川沙县设国货进行会，浙江遂安县设蚕桑学校，福建政和县发展职工教育和农工试验场等等。这样，“在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各县的大地主都似乎变得更聪明了。在满清政府尚未坍塌以前的若干时，尤其是所谓隆盛之时，乡村中的大地主，无论南北，大概都有一种相同的广置田土的心理……到了民国时代……他们便把剩余的金钱拿到城市里去经营一种他们自己认为最稳的商业……1914年以后，各县的地主在县城里的商会上握重权的例证，已是日渐增多”[124]。封建的呆滞的资金积累投向工商业，促使农村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地主—资产阶级阶层的扩大；另一方面，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的工人队伍，与务工务农相结合的家庭结构，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

在农业经营方面，富农经济也有所发展。例如南通，到1915年，即有十六家经营养鱼业，其中有一家原始资本一千元，养鱼一百二十万尾，用工人七人，除伙食外，月薪三元，1914年获纯利四五千元，1915年预计可获纯利一万元[125]。在北方，“小资本家具有农业专门知识，从事植棉事业者，年来亦颇有其人。如正定，如河南，均有此等小农场之设立，资本多者十万，少者二万，纯用新法种植棉花”[126]。

同时，新式的资本主义农场，也有所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以后，更刺激起新式农场的扩展。如江苏，“苏南农场的兴建时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战争期中已得到适当发展的时期”[127]。这类农场，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张謇在前清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种植棉花，民国后复开办大有晋等盐垦公司。前清常州道台宋盈，1912年开办的金檀茅麓公司，经营林木。当时，宝山有奶牛和养鸡场，江湾有靛青种植场，松江有养蜂业，无锡有果园，丹徒有蚕桑、园艺，琼崖有树胶业，广西、福建有林场，都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东北和苏北沿海垦荒地区，也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有的还采取了机械化生

产。例如，1915年在黑龙江呼玛“出现以浙江财阀为背景的三大公司机械化农场，从海参崴万国农具支店购入马柯尔墨克拖拉机五部和其他机械农具”[128]。

下面是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察哈尔八省区开办的农场的不完全统计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农场发展的大体趋势。

江苏等省农垦公司统计[129]

年份	公司数	已缴资本（元）
1912	59	2,859,248
1913	55	2,872,219
1914	60	3,680,293
1915	66	4,453,611
1916	87	5,628,085
1917	91	7,331,152
1918	92	6,477,029
1919	100	12,445,304

在这些垦殖公司中，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占了很大的势力，如苏北的一批垦殖公司就有张謇、冯国璋、岑春煊、张勋、韩国钧等人的投资。因此，这些公司在经营上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封建性，并且在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失败后，又往往恢复封建的租佃制。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农场毕竟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

当然，农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依然十分薄弱。封建的租佃关系仍然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成分。而且，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趋向集中，导致农村经济崩溃的规律，仍然在起主导作用。

二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深入，日趋解体，农村经济日益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去。民国以后，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民族工业的重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因此，农村的商品经济也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而发展。

棉花的种植，首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民国以后，政治界、实业界对棉纺织业十分重视，曾创“棉布救国论”，因此也对棉花的种植和改良相当重视。如云南实业司长华晋三于民国初年曾往日本、上海购美国棉籽和通州棉籽，在云南推广，使云南棉花产量从前清的数十万斤发展到1915年的三百余万斤。农商总长张謇更注意棉花生产。欧战以后，民族纺织业发展迅速，而日本也在华大量收购棉花，并在青岛等地大量投资设厂，发展其在华的纺织业，从而更加刺激了棉花的生产。

如江苏，“自五年以来，吾国纺织业勃兴，棉之需要骤增，花价乃日昂，农人遂相率舍稻、豆而专事棉作，以图厚利。查去岁（1918）产棉数，几倍于昔日”[(130)]。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诸省，由于华北棉纺业的发展，尤其是日本方面的需求，“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131)]。及至1918年，全国的棉花产量，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四百多万担。

由于缫丝工业的发展和国外需求的扩大，传统的蚕桑事业也有所发展。桑地面积在不断增加，一些新的蚕桑地区也正在开辟。如江苏，“苏属的农民，在前清并没有大规模地饲养家蚕，顶多不上十箔。……民国以后，茧价不跌，反见上涨，农民见这养蚕的利息很不差，养蚕的农民渐多，种桑面积也跟着扩展起来。我们看到江苏常、锡一带，桑树那样多，也都是民国以来种起来的”[(132)]。广东的东莞、清远、新会、香山诸地，都是民国后发展起来的新蚕桑基地。而云南，是“自民国初年起，方开始提倡育蚕事业。以后丝茧之产量，增进甚速。当1919年由腾越海关输出丝茧计三八四六担，值一七二〇

〇三一海关两”[133]。其间，因欧战影响，生丝出口运输困难，蚕业曾一度停滞。但不久，因“意、比等国产丝之区均受战争影响，无丝出售，是以吾国江、浙、皖三省所产之丝茧，自上年（1915）至今，销数比以前增起二倍，业此者大获其利”[134]。

烟草和大豆、花生、桐油是新起的商品性作物，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外输出逐年增加。

1913年，英美烟公司派员调查华北烟草种植状况，并由美国输入良种，在山东潍县试种，获得成功。于是，农民群起改种。而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也刺激了烟草的种植。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烟草种植逐年扩大，江西、浙江、奉天等地的烟草种植业也发展起来。据《第九次农商统计表》，烟草种植面积，1914年为五百二十八万亩，1915年为五百六十五万亩，至1918年为一千零五十一万亩。

大豆是中国的特产，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东北是中国大豆的主要产区，1914年—1918年间，全国大豆年产量约八千六百多万担，而东北大豆占全国产量的36.6%。大豆大量用于对外输出，以对俄对日为主。1917年后，对俄输出萎缩，对日输出仍在发展，且经日本加工后，以大豆制品转输欧洲。

花生和大豆一样，是区域性较强的作物，山东、河北、河南是主要产区，而荒芜的黄河故道是花生的良好种植地。花生自“民国以来，渐为出口土货之大宗物产”[135]。欧战虽然影响花生出口，但国内市场仍刺激着花生的生产。欧战结束，“及民国九年而后，花生油忽成为国际商品”[136]。于是出口激增，成为重要的出口物产。

由于美国鼓励人造漆工业的发展，免税进口桐油，中国的桐油在清末即已大量对美国出口。民国后，桐树的种植在四川、贵州、两湖、江西、两广、浙江一带发展。据报道：“民国四年，桐油出口价值，每年均约五六百万元，及至八、九年，竟达一千万元”[137]，在

植物油出口中，继大豆、花生之后，占第三位。

此外，由于城市经济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水果、蔬菜的生产也扩大了。而作为染料的靛青的生产，欧战前已奄奄一息，欧战中由于德国人造靛停止进口而重新恢复了生产。

在粮食生产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粮食加工业特别是面粉工业的发展，商品粮食的生产也扩大了。

首先是小麦生产扩大了。荣宗敬说："迨粉厂加增，（小麦）求过于供，爰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138] 1912年—192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也说："虽然没有统计，也找不到可靠的资料，但是，小麦种植确已传到了上海地区，并且随着中国人对面粉和面制品日益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地农业可能要日益显现其重要地位。"[139] 当时，东北是重要的商品小麦产区，输往日本和西伯利亚，并且供应东北地区日益扩大的面粉工业。据农商部统计，小麦种植面积由1914年的二亿七千多万亩，上升到1918年的五亿二千多万亩。

由于经济作物排挤了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区不得不仰给于商品粮。于是，一些地区就成了商品粮的基地。如南通成了棉花作物区之后，粮食仰给于江苏之东台、如皋、常熟、无锡等地。当时，湖南、安徽、江西是大米输出省份，而山西则向邻省供应小麦。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农业技术的落后，粮食的商品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结果，缺粮的情况日趋严重。如陕西、河南一带广种棉花的结果，"平时可以以棉易粟，荒时不能一饱，县县如此……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140]。广东在清末时，粮食已经不足，而"晚近蚕业大兴，桑田日辟，禾田日隘，谷米出产转因日少，又加以农人素乏讲求，墨守故法，一岁所获，益远逊于前。故谷食中一大部分，非仰给于镇江、芜湖、广西，则输入于安南、暹罗；设彼有水旱兵燹之状，而此即有粒食告罄之惧"[141]。结果粮食的进口量日益扩大。1911年

米麦杂粮净进口数为一千零二十三万一千担，至1916年增至一千七百八十二万五千担[142]。

在商品性农作物中，中国传统出口的茶叶，在清末就开始衰落。面对着发展起来的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地茶叶的竞争，受封建关系束缚，不能进行改良的华茶，逐步被排挤出世界市场。欧战爆发后，对欧美出口锐减。而1915年洋茶入口却值五百万元以上，可见我国茶叶衰落的程度。

除农业本身之外，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所发展。佃户因为受剥削，种田少，往往依赖副业维持生活。虽然由于工业产品的排挤，手工缫丝和一些地方的土布衰落了，但一些新的副业又兴起了，如山东的草帽辫，无锡、上海一带的花边，经过改良的高阳土布，江浙的织袜，烟草产区的油坊，等等。这些副业物产的出口，虽不免受欧战的影响，但仍是这一时期农家的重要副业。这些副业生产和商品作物发达的少数地区，农民获得了较多的工作机会，以付出更多的劳动为代价，也可以使生活有所改善。

三　农村经济的衰败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农村的繁荣。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列强的经济侵略所促成的，因此，中国农村越是被深入地卷入国际市场，列强对中国农村的控制和剥削也越加深重。而且，列强对中国农村的掠夺，是通过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同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来实现的，这种格局严重地阻抑着民族资本的发展，即使在欧战时期，也只是有所放松而无可避免。由于封建的土地关系在辛亥革命后没有得到改革，农村的生产关系继续恶化。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的趋势在加剧，农村经济由于缺少活力而日趋衰败。

民国成立以后，前清贵族的土地占有制趋于衰落，但民国的新贵们却在贪婪地掠夺土地。例如江苏督军李纯，“先后在天津周围的魏

庄子买地二十四顷，价八万元；东局子地六顷，价五万元；芦新河地十八顷，价四万元；军粮城地四十六顷，价五万元。还有大毕庄三顷，李家祠堂西苇地八十亩，以及窑地七十亩，共价六万余元。大城县吕召庄有地一顷三十亩，武清县有地五顷，共价七万余元。一九一八年准备修建浦口商埠时，曾在其附近九袱洲以两万元买地两顷。在新河附近买了有三个熬盐池的盐滩，价三万元；在运河裁弯取直时，出现了很多废河地，经警察厅长杨以德手买到西自西大弯子至单街子北，东自狮子林南一直到水梯子大街两大段废河地，长三里左右，宽约五十米，亩数和买价不详。”[143]

土地的兼并，在放荒地区显得格外严重。当时，“当放荒之际，有势力（行政官及巨绅）、有关系者（知事、放荒员及其戚友），择地之肥美而交通便利者，若者数百方，若者数十方”[144]。张作霖在1916年曾强迫开放达尔汉亲王旗辽河南北沃土四千多方（每方四十五垧），“张作霖及其岳母王老太太、鲍贵卿、冯麟阁等分割了千余方”[145]。那时南北著名的军阀、官僚，无不广占土地。

就是商人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广买土地。甚至华侨商人，也回乡购置地产。东北有一人以经营小铺起家，至1915年时，发展成杂货杂粮商人，而出租土地已达一千八百一十六点七亩。商人“认为把赚来的钱用于土地投资比较安全”[146]。在动乱比较厉害的地区，这种情况更甚。如安徽涡阳，“辛亥以前，拥资者醉心商业，视置产为迂图。是年（1911）冬，王士秀屯军县垣，沿门索饷，继以威逼，窖镪发掘靡遗。县人知动产之不足恃也，负郭土田，逐渐腾贵，不十年且倍蓰”[147]。这样便形成了工商资本转移为封建地产的逆流，从总体看来，商人占有土地的情况很普遍。

此外，列强在华势力也广占土地，尤其是俄、日在东北铁路沿线占有大批土地，而日本更蓄意向东北殖民。1914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主办“除队兵移民”，从南满洲铁道守备队的退伍兵中，选定三十四户在“满铁”属地内务农。1915年，日本关东厅预先在辽东半岛的金州附

近收买了一批水田，实施“爱川村移民”，把土地分给十九户日本移民耕种。虽然上述移民规模很小，成效不大，却是后来日本向东北大举移民的滥觞。1914年间，日本利用奉天谋求向日本借款的机会，要求中日合办农业，以遂其向东北殖民的图谋，因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拒绝，没有成功。日军占领青岛之后，日本拓殖株式会社也在胶济铁路沿线收买地产。此外，列强在华教会也广置地产，列强在华企业更违背条约，通过买办来购买土地，侵我主权。如江苏南通，“比年盗卖与私垦，不一而足，且有多数为教会购置者”[(148)]。又如英美烟公司，于1915年通过买办任伯言在许昌用永安堂名义，替公司半霸占、半收买占去了数百亩土地。日本人在东北通辽县收买土地，也是如此，“一向是用自己所雇用的中国人的名义买入，或者利用堂号，向例并不表明资本主为日本人”[(149)]。

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使农民失去土地，生计艰难，而北洋政府的横征暴敛，封建剥削的苛重残酷，又导致无数农民趋于破产。

民国时期的征收制度是从前清继承下来的，弊病很多。各地没有确切的田赋征收图册，全凭地方经征人员——粮柜、社书、地保等的操纵。土豪劣绅又向农民转嫁田赋负担，加上经征人员贪污舞弊，敲诈勒索，使普通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上交给国库的面额。据《神州日报》1916年9月估计，农民每岁增加的额外附加和额外暗索，达银元一亿三四千万元之多[(150)]。此外，农民还要承担公债和纸币贬值的巨大损失。

由于田赋及各种负担增加，地主遂纷纷提高田租率，以致租佃矛盾日趋严重。如浙江嘉兴地区，“嘉兴之田，业户不恤佃，佃户不顾业。束于重赋之下，业以定课之故，租不得轻；佃以完租之故，力不能胜。业则味同嚼蜡，舍田而他图；佃则终岁勤勤，无斗粟之储，遂至于抗租终讼，业、佃两困”[(151)]。

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农民趋于破产，因而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

立日益尖锐。民国以来，江苏一些地区的地主纷纷成立田业会，与佃户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使阶级斗争日趋表面化。如苏州地区，“其专司拘押笞扑农民之责者，在前清时有巡检司。民国成立，巡检司裁，诸田主惧无威吓农民之具也，乃结一会，名曰田业公会，并辟一陋室，围以栅栏，名曰押田公所，农民有不如意者则押之，室小而押者众，有时之骈足立，身不得曲，粪秽狼藉，虮虱丛生，毙者时有所闻焉”[152]。因此，农民的抗租斗争层出不穷。农村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附庸。随着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扩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残酷剥削中国人民。列强历年通过赔款、借款，尤其是善后大借款对关盐两税的控制，使北洋财政不能不依靠增加田赋来弥补财政亏空。列强对华的政治贷款，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副重担。在民国初年，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继续扩大，洋货更为深入内地。如云南，“自数年以来，盖趋于滥用洋货之陋习，自光复以来，此风尤有一日千里之势”[153]。不过，由于欧战的爆发，列强对华输出一时趋于停滞和下降，相应地也就减弱了掠夺中国农产品的能力（参第五章第一节）。

但是，由于列强把中国农村卷入了国际市场，欧战的爆发和结束，都使中国的农村经济受到强烈的冲击。如杭州，自欧战爆发，“出口货受损失更甚，洋丝一项日来毫无交易，从前每两售一角，今则即减百分之二十尚无人问津。其余若茶叶、羊毛、骨头、旧絮、破布、杂粮等等，皆因之而停止交易矣”[154]。一年之后，汉口市场仍然“土货滞销，价值大跌（牛皮、芝麻、油类、布匹各货皆因出口稀少，顿减其值）”[155]。中国交通运输业不发达，也使中国的出口产品遭到重大损失。朱执信说：“自开战以来，上海常积三万吨之货物……则各原产地之货亦无从运出，坐待腐败。此其损失，不仅在息，乃在于本。此非每年数万万之损失乎？”[156] 欧战期间，茶叶、芝麻等农产品，以及草帽辫、花边等副业产品，受到沉重的打

击。欧战结束后，欧洲严重缺粮，日本也因乘欧战之际发展工业，导致粮食危机。于是，1919年—1920年间，各国从历来缺粮的中国大批收购粮食出口。北洋政府和军阀、奸商，惑于小利，也不顾民食，大量运米出口。而恰在1919年，江南发生水灾，1920年春，北五省又遇大旱，造成全国严重缺粮，饥馑遍地。上海米价在夏秋之际，从每石七元暴涨至十六元以上。粮价上涨使囤粮的地主商人获得了收益，而粮农并未受益，缺粮的贫苦农民还不能不陷于挨饿的境地。

虽然欧洲列强卷入战争，削弱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但日本却进一步崛起，利用它在华的特权和雄厚的资金操纵物价，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的掠夺。

在1900年—1910年间，东北大连输往日本的大豆及豆制品，占全部输出量（包括本国其他地区）的43%，而到1919年—1920年间竟增加到80.9%[157]。同时，日本对华棉的收购，也因日本本土及在华纺织业的扩展而急剧增加。当时“日本人在夏季，往往深入腹地，直接贷资于农人，每亩自二三元至七八元不等。农人受此定银，所产棉花概须由日人收买，已完全失却自由脱售之权。因其曾受定洋，致受压迫，货主买客，何方得利，不烦言而自见。以故腹地棉业，往往受日人之控制，轇 轕 日多，人民不堪其状。官吏、绅士、棉商均畏惧之，噤不敢声”[158]。这种情况不仅使棉农深受其害，也使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在收购原料上十分困难。

列强通过对华资本输出，直接在原料产地设厂，剥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低价掠夺农产品，更加剧了中国农村的衰败。如英美烟公司1902年在华设厂，1913年起在湖北光化、老河口和山东潍县、坊子设立美种烟草试验所，向农民推广美种烟草。由于种烟需要较多的资本和集约程度更高的劳动，公司通过买办和当地的士绅结合，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烟种，垄断烤烟的收购，并利用买办在非条约口岸收购土地，开设烤烟厂，在当地封建势力的保护下压价剥削农民。如1919年，收购商所定平均价格为20元，而农民所得平均价格仅9元，只有

实际价格的45%。农民的收入甚至不够偿还生产费用。正是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英美烟公司发展成为在华的“烟草王国”。

由于政治腐败，兵祸连绵，致使水利失修，天灾频仍。1912年湘、赣、闽、粤大水。1913年，直隶永定河决口，江淮泛滥，赣、豫、皖大旱。1914年，粤、桂、湘、赣等省水灾，濮阳黄河决口，川、湘、鄂大旱，苏、皖两省虫害。是年受灾农田几乎占全国农田的一半左右。1915年5月，濮阳河工决口，8月黄河决口，浙、赣、鄂、湘、鲁、粤、辽、黑大水。1916年8月江苏水灾，江北淮河、运河一带大水，灾区达三万四千方里。而尤以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为最甚，灾民二千万，死亡达五十万人。

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破产农民日渐增多。各地农民离乡背井，四出谋生。如福建厦门一带，“人们相信这十年（1912—1921）中，耕地面积已经缩小了一些，各种作物产量也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身体强壮的劳动者已经放弃了田间工作，流亡到海峡殖民地、爪哇等地”[(159)]。在欧战期间，山东省有十五万工人作为劳工移往英国和法国。河北、山东的农民还大批向东三省移民。1912年—1920年期间大约移民二十九万人。总之，这时从全国来看，农民的处境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第三节　财政和税收

一　财政体制和财政方针

唐绍仪内阁成立后，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1912年4月6日陈锦涛交卸了部务，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宣告结束。熊于5月6日接收了北京度支部事务，不久即解散了度支部，另行成立财政部筹备处，以王璟芳为总办，章宗元为帮办，糅合南北新旧部员办事。

当时，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一方面，由于战争破坏，经济萧条，

税收减免，体制紊乱而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由于军队膨胀而使支出剧增。尤其是中央财政，几乎没有收入。除了要各地厉行裁兵节饷之外，“惟以输入外债，以救急需”[160]。尽管财政如此困难，但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国务总理唐绍仪在规划财政时，仍强烈地希望以振兴实业来促进民族的复兴。他在与银行团接洽借款时，提出了五年内借款六千万英镑以整理财政、振兴实业的计划，准备在偿还外债之外，其余的款项以80%用于实业，20%用于军政及教育方面。然而这个计划，由于列强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而未能实现。面对着列强干涉中国财政的图谋，各派之间在财政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孙中山、黄兴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同盟会由黄兴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五百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十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带有强迫性质，并非自愿认捐。同盟会的方案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同情。但是，袁世凯、熊希龄以及共和党、统一党等都不赞成。中国银行正监督吴鼎昌（熊派）认为，强迫国民捐和不兑换纸币是行不通的。他说：“试观现时全国殷富巨室，大都以就近租界为护符，以外国银行为库藏，内地所余不过日用零星之现货，与土地房屋等之不动产而已。若以强迫之力，夺其生活之资，恐中下社会人民势必相率迁入租界，全国骚然，大祸立至矣。”[161] 袁世凯在参议院正副议长进谒时明确表示：“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闻前日唐总理亲以此意商诸贵院诸君，故仆今日亦为诸君言之，聊表区区之意耳。”[162] 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和后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实行单纯依赖外债的政策，使民国元年、二年间的财政，不能不为列强所牵制和操纵。

1912年6月，为了整理财政，增加中央收入，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财政部提出了在各省设立国税司（后改称国税厅）的计划。国税司由财政部直接领导，司长由部委派。财政部打算“从北方入手，先行整理北方税务……渐行推及于南方”[163]。但一方面，中央

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没有解决，要把地方的财权收归中央，在事实上还做不到。另一方面，国家税和地方税如何划分的问题也在争论之中，没有解决。江苏都督程德全主张“如地税之属于直接者，应归地方收入”[164]，“各省有此经常之费，可以兴办实业，可以推广学校，可以整顿警察，不数年间，地方行政气象一新，民生既因之发荣，税源亦随之展拓”[165]。而奉天都督赵尔巽则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各省地丁钱粮，占全国收入之大部分，一经整理，可以岁增巨款。乃因土质肥瘠不同，税率高低不一，拟全数划归地方，国家失此可靠之税源，势必益形支绌。”[166]财政体制问题意见纷歧，一时难定。

由于当时政争激烈，熊希龄任内，在财政方面并无多大建树。随着唐阁倾倒，熊也于7月间辞职。旋由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于8月19日就任。周学熙曾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经办新式工业的主要助手。他出任财政总长，能直接贯彻袁世凯的理财方针，在其任内奠定了北洋财政体制的基础。

周学熙一上任，即撤销了熊希龄的财政部筹备处。他按照国务院官制，在部之下设立总务厅，派赵从蕃署理，又设盐务筹备处，任汤寿柟为总办。他选择赵椿年为财政部次长（旋改齐耀珊），改变了熊希龄南北部员兼用的方针，起用前清旧吏，排斥南京部员。周学熙改变了熊希龄原拟设立三司（即会计司、赋税司、财务司）的方案，在财政部中设立五司，即：赋税司、会计司、泉币司、公债司、库藏司。财政部官制经参议院通过后，于1912年11月2日由袁世凯命令公布。

周学熙着重注意的问题是统一财政。为此，他于9月间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以王璟芳为会长，并向各省派出财政视察员，考察各省财政状况，与各省都督协商财政事项。当时，财政部要和各省都督商量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要求各省都督支持财政部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第二是要求各省赞成成立国税厅筹备处，以期划分国家税和地方

税。1912年12月11日，山西都督阎锡山首先通电表示赞成，各省都督也陆续表示同意。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利用参议院活动停滞的机会，未待参议院通过，即擅自批准了财政部拟定的成立国税厅筹备处章程，由国税厅筹备处“掌监督及执行关于国税事务”[167]，并陆续任命了各省的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财政部调查委员会也改为国税厅总筹备处。

国税厅的设立，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按照前清的财政体系，虽然财权名义上属于中央，但事实上由各地督抚负责征收，然后按一定的数额解送中央，地方拥有财政实权。而民国成立之后，财权完全掌握在地方手里。国税厅的设立，就是要由中央直接经管原由地方征收的国家税，把财权收归中央。在税目的划分上，将十七种重要税目（一、田赋，二、盐课，三、关税，四、常关，五、统捐，六、厘金，七、矿税，八、契税，九、牙税，十、当税，十一、牙捐，十二、当捐，十三、烟税，十四、酒税，十五、茶税，十六、糖税，十七、渔业税）列为国家税。仅将田赋附加税、商税等十九种不重要的税目，列为地方税。

各省都督表面上不反对国税厅的方案，但在实际上消极抵制，对新设的国税厅，拖延不交有关国税案卷，全案交出者寥寥无几。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主张：“应从元年度出纳闭锁，二年度开始之期，为国家、地方出入一律划清，接收案卷，分报机关，厘订税则，组织金库，同时并举，方能一致办行。”[168] 江苏都督程德全和苏省士绅一再主张地税划归地方税，因而苏省的田赋也迟迟不交。程德全对财政部中央集权的做法十分不满，“以部中事事独立，不顾地方艰难，颇多抑郁”[169]。财政部不得不放慢步骤，“令（各省筹备处）暂缓接收，先行筹备。所有应办之事，均令会商财政司办理”[170]。

周学熙在签署善后大借款之后，因受到舆论的抨击，被迫于1913年5月间辞职。5月16日由梁士诒任财政部次长，暂时代理部务。在梁士诒任内，首次运用铁路借款的名义来筹措军费，显示了交通系在财

政上的实力。在财政方针上，梁认为“统一主义之实行，尤以财政为唯一之根本”[171]。而治标之策则为：一、励行裁兵节饷主义，二、励行减政主义，三、增加新税，四、整顿旧税。此外，在梁主持下，财政部编订了民国二年度预算案。

先是，临时政府北迁后，参议院议员认为，“预算者乃人民监督政府最要之点”[172]，“使国民晓然于政府之措置，以坚其信用之心”[173]，所以咨催政府提交预算甚急。同时，按照民主体制，政府设立审计处，任陈锦涛为总办。因陈未到任，由王璟芳署理，于1912年9月28日开始任职，以监督财务行政的执行。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各地簿据不全，预算迟迟不能草定。财政部仅编制了中央1912年8月至12月和1913年上半年收支的临时预算，而审计处也形同虚设。唯善后借款成立后，审计处的外国顾问对善后借款的支出，监督颇严。民国成立后，参议院和行政当局大体上倾向于以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为财政年度。至梁接任财部，民国二年的财政年度即将开始，而国会也已召开。于是，梁于7月下旬匆匆将预算案编定，交国会审核。由于政局变化，民二预算旋被撤回，由后任财长熊希龄加以修正。事实上，民二预算既未经国会通过，也没有执行。后来，民国三年度只有概算，并未交立法机关讨论。1915年4月，因“实际分配经费，均以年份计算”[174]，7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成为累赘，便更改财政年度与历年制相同。1915年底，袁世凯“欲以办理帝政之经费责国民负担”[175]，匆匆交参政院通过民五预算，号称“中国预算第一次正式成立”[176]。实际上，袁世凯的统治摇摇欲坠，所谓预算制度始终徒有虚名。至于审计制度，虽然于1914年6月16日公布了《审计院编制法》，规定审计院直隶大总统，并采事后审计的办法，仅审定国家岁入岁出的决算。但事实上，“内外官署大率不照审计手续，即遵照矣，亦依式填注，类多虚伪之事”[177]。袁世凯统治时期，始终没有办成决算，审计更无从说起。

袁世凯本人从1913年底起，就开始直接控制财政事务。他在接见

进京的各省都督时，就要他们向中央解款，着手解决财政问题。熊被迫向袁请辞财长职时，袁世凯表示："中国财政困难，君等皆不愿担任，说不了自今以后，我竟不能不分一部分之精神，照料财政。"[178] 熊希龄于1914年2月辞职后，周自齐署财政总长，而"所有每月行政经费之分配，大率由总统自行决定"[179]。

1914年2月间，袁世凯召集财政会议，由各省、各部和财政部代表以及袁世凯选派的代表参加，着手全面建立北洋的财政体制。会议讨论了当时的财政状况，确定支出概算方针，削减各省原开预算，财政收支有余的省份承认了中央解款数目。5月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此次核定三年度各省概算，军政、行政各费业经限定支数，不准逾越范围。"[180]

记者黄远庸评论说："自熊内阁以前，可谓吾国财务行政之理想时期。综言之，即照各国成规，用预算设审计，以国税厅独立于各地方长官之外，为中央特派之官，划分国税与地方税，财政权一切集权于中央之办法是也。而以财政支绌，解款不符于预计之故，乃遂群归咎于新制度之不善。其（第一）有联想而起者，即谓欲整理中国财政，必须规复原有税额，欲规复原有税额，则必规复前清原有之制度，及以前清有经验之官员为经理税务机关。盖此皆应同时发生之联想也。"[181]

1914年5月，袁世凯实行总统独裁制，除财政部外，政事堂下设主计局，职掌筹议财政、稽核预算事项。6月1日，袁世凯又批准了周自齐的呈文，取消国税、地方税名目。先是，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底相继成立，然而这一体制没有成效。国税厅设立后，"各该行政官多疑赋税等项一经解厅，即为中央之专款，不得自由取支，或委延不交，或既交之后于督促概不出力，任其短绌"[182]。至此，遂取消了两税的划分，采取了地方解款中央的体制。

但是，与前清不同，袁世凯加强了中央集权。6月11日，袁世凯

公布了《财政厅办事权限条例》，规定各省财政厅长由大总统任命，直隶财政部，受财政部指挥，并奉特别命令，“受巡按使之监督，在规定范围内，受巡按使之指挥”[183]。而巡按使关于财政事务，“一切当受成于本部（财政部）”[184]。袁世凯终于完成了财政的统一体制。体制的这一变化，是要地方上尽量腾挪款项，以供中央之需，同时也给地方上较多的支配收支的灵活性。所以，袁世凯对各省说：“现在国家税、地方税业已取消，岂乏腾挪余地，移缓就急，自当力任其难。”并要求各省除认解外，另行“妥筹的款若干，作为筹解”[185]。

同时，袁世凯谕令“以后对于收税各官之赏罚，必须分明，以重国课”[186]，并于1914年间制定了一系列考成条例，以厉行奖惩制度，强化赋税的征收，一方面整顿旧税，一方面推行验契、印花税、烟酒牌照税等新税。欧战爆发以后，外债来源断绝，袁世凯任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靠发行内国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袁世凯认为：“在人民一方面，希望减轻负担，本属恒情；即政府亦非不欲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若经费不继，无以维持秩序，则人民必将受其痛苦；或信用丧失，牵动外交，益复不可思议，而人民之受痛苦恐将百倍于今日。”[187]于是，袁世凯政府就用加强国内搜括的办法，使财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申报》评论袁世凯的财政方针说：“以前之计划，所谓蚀国之计划，以国易财，国将为财所尽矣。今日之新计划，所谓蚀民之计划，于民取财，民将为财所尽矣。”[188]

1915年3月5日，袁世凯任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起用皖系，来压抑势力膨胀的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部署称帝。但周学熙在筹办帝制经费方面，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需要，因而“以筹款维艰四字，受不知大体之申斥”[189]。而梁士诒则积极为袁世凯筹划帝制经费，得以东山再起。然而，超强度的搜括，最终导致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崩溃。

二　1912年—1913年间的财政状况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财政就十分拮据，不能不靠借债度日。南北统一后，财政状况并未缓解，库空如洗。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接任时，“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190]。按照前清财政体制，中央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各省的解款。据前清宣统三年所作四年预算，中央岁入为一亿八千九百七十三万余元，而其中中央解款则达一亿七千四百九十万余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强。然而，自武昌起义以后，各省不仅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连在前清时期不敢耽误的“赔款”（庚子赔款）、“洋款”（外债）也截留不解，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收入。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向各省呼吁解款，但应者寥寥。鉴于外债难借，湖南都督谭延闿首先于1912年5月28日通电表示拨银三十万两接济中央，粤督胡汉民接着表示拟拨百万解京，各省也纷纷担任解款。但事实上，各省财力不支。江苏都督程德全讥评说：“无如考其实际，或则移缓就急，或则挖肉补疮，甚且有长于肆应者，一面维持中央，一面增发纸币。”[191]因此，各省承担的解款多数落空。1912年—1913年间，中央政府从国内征集到的财政收入，为数不多。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12年—1913年间，中央政府除外债外，收入状况大致如下：

（一）各省解款：从1912年5月到1913年10月，收入二百六十余万元[192]。（1912年10月以前为一百七十多万两[193]。）

（二）国民捐：至1913年6月，收入三百零五万余元（其中1912年为二百五十五万余元）[194]。

（三）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左右两翼等税务收入：这几个由中央直接经征的常关税收，按“宣统四年”预算约为一百七十七万余元，两年收入估计总在三百五六十万元左右。

（四）盐税：除各地截留盐税不计外，长芦、山东、河东、奉天、两淮等地盐税，1912年5月到1913年6月，解款共四百七十八万余元[195]。

（五）交通部路航邮电收入：1912年—1913年间，交通部代财政部拨款二百五十八万余元[196]。

（六）其他：如新辟印花税1913年间收入五万元，华侨爱国捐几十万元，等等，为数不大。

（七）国内银行垫款：银行借垫，在1912年—1913年间，一般为短期往来性质，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垫款也属有借无还。据孙多森呈，至1913年初，财政部已向中行借垫一百多万元[197]。不过，这一时期，中、交银行的垫款还不算多。

上述各项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过二千万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军政各费的需要。因此，1912年—1913年间，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外债。

1912年—1913年间，用于军政费用的外债收入，除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期的比国借款一百二十五万英镑和善后借款垫款规元银三百一十万两不计外，主要是1912年五六月间善后借款三次垫款共规元银九百万两（约合一千一百九十万余元），1912年9月到1913年春的克里斯浦借款五百万英镑（实收约合银元三千八百三十四万余元），以及1913年4月达成的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其中，1913年12月底以前用于军政各费的数目为六千五百三十一万余元，1914—1915年间为二千四百二十万余元）。三项合计，1912—1913年间军政费支用的外债为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五万余元。除上述借款之外，中央政府还四出谋求小借款。财政部于1913年3月1日与德商瑞记洋行达成了三十万英镑借款，4月10日又由瑞记洋行经手与奥国公司达成了两笔分别为一百二十万英镑和二百万英镑的借款。这三笔借款都以购买

军火为条件，“所付现款，仅得半数”[198]。两笔奥国借款，在1913年内，“已交者只一百万（英镑）”[199]，约合一千万元。而民国元年、二年间，中央各部的零星借款约有二百二十万元[200]。估计上述几笔外债用于军政开支的部分，约达一千五百万元左右。

善后借款成立后，列强在实业借款方面，放弃了垄断的政策，改为自由竞争。中国政府遂以出卖路权为代价，签订铁路借款合同，挪作军政用费。早在1912年9月签订的陇海铁路借款，第一期债票发放四百万英镑，财政部就挪用五十五万八千余英镑[201]，约合五百五十八万元。至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急需战争经费，遂于7月22日签订了《同成铁路借款合同》，条件是法比公司承认“至迟在合同签字之第十八日，交付中国政府一百万英镑，如不交此款，合同即行作废，并无效力”[202]。这笔约合一千万元的垫款，全部挪作财政经费。连同前项，总共约一千五百五十八万元。

总之，1912年—1913年间，用于中央军政开支的外债约达一亿五千万元左右，而1912年间所耗外债费用不超过三千六百万元，1913年间所耗外债即达一亿一二千万元之巨。袁世凯政府有这些外债输血，就着手镇压革命。

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赔款和外债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本来，在前清时期，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武昌起义以后，列强把中国的关税控制起来，由税务司存入列强在华银行，以备抵付赔款和历年所欠的外债。但关税收入拨付之后，仍不足以偿清外债。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其主要用途也是清偿赔款和历欠外债。按照善后借款甲、乙、丙三号附件，清还1912年底到期赔款约二百万英镑；清还到期的前清中央政府和各省借款本息，以及1912年的银行团历次垫款和比国借款本息共约六百七十八万余英镑（其中银行团垫款和比款本息为三百二十二万八千英镑），共计约合八千七百八十余万元。其余一些无确实担保的外债，因为无力偿还，只好与债权人商量付以国库证券，延期清还。中国政府为了借债还债，蒙受了巨

大的财政损失。如克里斯浦借款优先权取消时，中国即被迫赔偿了十五万英镑。而1912年—1913年间，大小借款利息、扣用、汇水、贴费损失竟达六千万元左右[203]，真是一笔惊人的负担。当然，这些都不得不在借款项下拨付。

南北统一时，民国财政的另一沉重负担，是军费支出的膨胀。当时无论南北都扩张了军队。就陆军部直辖军队来说，北洋方面增加了拱卫军、备补军、武卫前军，相当于三个加强师。南京方面，留守府所辖军队，完全之师即达十六师之众，总计兵额达二十余万人。“月需经常费三百六十余万元，即军队额给一项，已占三百零六万余元。”[204]南北两方军饷合计，据财政总长熊希龄声称，每月为七百万两[205]，约合九百七十余万元，较前清宣统三年所作四年中央军费预算平均每月二百一十六万余元之数膨胀达四倍多。为了裁兵，必须清还欠饷，发给恩饷，又是财政的一大负担。留守府军队迅速裁遣后，一部分划归江苏整理，中央军费才得以大大减轻。据预算，1912年8月—12月四个月，经费每月为三百零九万七千余元[206]；1913年1月—6月，该项经费每月增至三百八十万六千余元[207]。而民二预算，中央陆军经费每月达四百八十三万二千余元（其中经常费据12月份支付概算书为三百五十七万六千余元）[208]。当南方裁军之际，北洋军费却在扩充，收入的外债主要用于军费。仅在《政府公报》公布的垫款、克里斯浦借款、国民捐和大借款所支出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万余元中（到1913年底），军费即达五千余万元，其中陆军各师费用达四千五百多万元，占支出总数的一半。在1913年7月以前，支付的遣散费一项达四百七十九万余元。同时，地方上也因军费支出庞大，感到财政困难。袁世凯为控制地方计，1912年—1913年间，协助各地方达一千四百万元之多[209]，其中主要也是用于军费，而最主要的是用于江苏地区裁军之用。截至1913年初，中央补助江苏都督程德全的费用即达五百万元，补助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百万元（第一军有两师驻在江苏境内）[210]，补助扬州第二军徐宝山约百万元，遣散无所属的驻徐州的三十九旅二十五万元[211]。

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费用，是又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虽然大借款规定了具体用途，但由于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这笔借款中规定的裁兵费项下被挪作战争的经费，据说达一千九百万元[212]。至于其他来源的经费，难以查考。

至于行政经费，则十分拮据。除必不可少的支出，诸如举办实业、推广教育、司法行政诸费外，大多落空。据估计，1912年3月—1913年3月间，“中央政府每月政费约须五百万元，其中最占多额者为陆军部之经费三百万元……自去年三月至今一个年间，经常支出每月五百万，即六千万元，与临时支出约三千万元余”[213]。行政经费每月经常费只有二百万元。1913年春，国会召开，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党人，收买议员，各项政费膨胀。1913年5月，中央军政费用支出一千四百零七万余元，6月支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余元[214]。因此，财政更困难。中央政府于7月间不得不实行减政主义，裁汰冗员，裁并不重要的各司和中央直辖机关，并实行减俸。自1913年8月份起，薪饷搭放公债票，旋改有利国库券。11月后军务告竣，停止搭放，改为凡在京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人员，月俸自二百元以上至三百元者暂减一成，三百至五百者减二成，五百以上者减三成的办法[215]。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时，中央政府“每月仅仅开支六百万元”[216]。扣去军费，行政费仍然只有二百多万元。

1912年—1913年间的中央财政危机，根源于地方财政危机。辛亥革命当中，独立各省纷纷减免田赋，废除厘金，停征苛捐杂税。由于革命情绪高涨，人民不再如前清时被迫纳税。虽然独立各省因财政困难，不久即恢复赋税的征收，但是新的财政体制的建立相当缓慢，因而各省的财政收入，远远达不到前清的目标。浙江都督朱瑞报告说：“上年光复后至今年三月无丝毫入款，三月以后，赋税稍稍收入……以言开源，则生计凋敝，民气嚣张，向来应纳各税捐尚多观望，遑论加增负担，另辟税源。”[217] 苏督程德全也报告说：“辛亥年忙漕至今尚未扫清，本年忙银则解数尤属寥寥。推原其故，人民疲

玩成习者有之，官厅征收不力者亦有之。”[218]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财政体制都十分混乱，税收自然得不到保证。

这时的地方各项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大大超过前清。粤督胡汉民说：“改革以来，税入虽不逮前时，而行政经费少于前清时代者不止倍万，复无赔款之负担，何以困厄至此，皆因兵额骤加，遂至军需浩大。”[219] 据1912年7月间的统计，各省兵额由清末的陆防四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人（不包括旗兵、绿营）扩充到一百零八万七千六百八十人，增加六十万二千一百一十人，月饷由三百六十七万四千七百两，扩大到六百九十四万零五百两又二百四十九万四千元，增加五百四十一万零六百两。[220] 这些数字虽然不免夸大，但军饷远远超过前清新军、绿防各营年饷五千八百四十九万余两（月平均约四百八十七万余两）之数，则是没有疑问的。到1912年底，各省裁军大体就绪，合计全国陆军人数仍达九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八人，年饷一亿一千二百七十五万余元（相当于八千一百一十八万两），而饷额尚不到定制的三分之二。[221] 因此，各省财政状况也异常拮据。

三　1914年—1915年间的财政状况

1914年初的财政局面，基本上尚未改观，1913年10月5日签订的中法实业借款一亿法郎，要到1914年2月以后才能发行债票。新历年关，熊希龄靠中法实业银行于1913年12月30日提供的二百万元垫款勉强度过。旧历年关接着降临，原拟的二三百万元垫款，中法银行临时变卦，不肯交付。虽然各省解款有一百十万元，五国银行团通融了短期垫款一百万元，但短缺尚多。而历来作为财政挹注的京奉、京汉两路收入，“交通部声称，将以供给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险费之用，不肯通融”[222]。熊希龄内阁由于难度年关而倒台，袁世凯直接经管财政事务。

当时，大借款只剩尾数，是年用于军政开支的部分仅为八百六十万四千零七十五元。虽然达成了几笔外债，可以挪作军政用费，但为

数无多。其中，中法实业借款一亿法郎，挪作政费部分为四千二百万法郎（约合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五千余元）。1月21日签订了钦渝铁路借款条约，财政部获得了三千二百十一万五千五百法郎垫款，实收二千九百五十九万三千法郎（约合一千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余元）。4月间海军部达成了第三次奥国借款五十万英镑，用以购买军火，实收十九万二千一百三十六英镑（约合二百十一万二千余元）。上述外债收入总计约为四千零十一万七千余元。此外，为了清还以苏路作抵的太仓洋行借款（南京临时政府所借），于2月14日向中英公司借款三十七万五千英镑，以债还债。1913年12月31日，驻英公使刘玉麟与比利时证券银行签订的借款条约，未经财政部批准，允许比行发售民国元年八厘军需公债票，一则损失太大，二则招致银行团的抗议。为了结束这笔债务[223]，1914年8月7日遂向狄思银行借款四十万英镑。1913年10月间，由熊希龄和德、英、法三国银行代表开始举行的一千万英镑币制借款的谈判，几经周折，未能达成协议。一直拖到欧战爆发，欧洲金融市场吃紧，谈判不得不宣告终止。中国政府从欧洲市场上获得资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由于外债靠不住，袁世凯直接掌管财政后，力图从国内筹措财政费用，“誓不复借外债”[224]。于是，一方面整顿旧税，推行新税，以期增加收入，一方面实行减政，压缩军政费用。

在增加收入方面，首先将常关税收划归中央，加强了中央的直接收入。自1913年底起，各省举办验契以及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增收、烟酒税增收等作为中央专款，直解中央。当时，因刚刚开办，没有具体数目规定，但其中验契收入颇丰。

其次，在财政会议上，核实了各省收支实数，命各省将收支盈余解归中央。袁世凯在批复“财政部呈酌拟各省认解洋赔各款及京饷处分条例，请准施行一案”时，强调说：“环视各省秩序大定，财力渐充，所有以前应解京饷、洋赔各款，除向盐关两项拨解之数外，自应如数照解。”[225]根据民国三年度概算，核定各省解款总数为二千九

百七十三万七千零十三元[226]。

第三，强向交通部筹款。交通部经管的铁路系统，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据叶恭绰说："自项城听某某之言，强迫接济政费"[227]，于是，责成该部每月筹拨五十万元，"一俟库款稍裕，再由财政部如数筹还"[228]。

第四，筹办内国公债。1914年3月间增设筹办公债所，印刷民国元年六厘公债票，预备发行。但民元六厘公债期限长达三十五年之久，难以发行。故债票仅印刷二千万元，"酌发各处抵付欠款约四百余万元，并按期认付利息外，并未实在发售"[229]。至欧战爆发，遂于1914年8月3日发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总额一千六百万元，九四折，六厘息，十二年还清。由于发息还本比较可靠，用途较广，期限较短，而资产阶级也支持袁世凯"维持治安，巩固邦基"[230]，因而发行顺利，增额甚多。于是至年底又增加发行额八百万元。1914年10月又成立新华储蓄银行，发行有奖储蓄票一千万元。

此外，盐税经整顿后，收入不断增加。只有关税一项自欧战后收数下降，影响了财政收入。

1914年上半年，袁世凯政府因为有各地解款、验契和常关收入，及银行团拨还盐税余款，月收渐达七百万元以上，财政情况开始好转。1914年1—6月间，各省收入国税达六千六百零三万七千零四十八元[231]。1914年下半年虽因欧战，关税减少，影响到盐税余款的拨还，但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7月间，"主计局复核民三预算，以恢复宣三旧额为标准"[232]，一再通电各省整顿，规复税率，增加收入，节省政费，接济中央，因此各省解款比较踊跃。再加上公债收入足以应付支出的需要，赔洋各款也得以偿清。据《申报》记载，除盐关两税外，7月—11月五个月国税收入总计达四千四百六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八元[233]。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14年中央收入列表如下：

1914年中央收入各款表

单位：元款

款目	收入数
拨还盐款	31,304,818 [234]
常关税	6,201,661 [235]
各省解款	14,000,000 [236]
验契	17,000,000 [237]
印花税	450,000 [238]
烟酒牌照税	400,000 [239]
契税增收	2,458,910 [240]
交通部拨款	6,000,000 [241]
官产收入	5,000,000 [242]
民三公债	20,424,321 [243]
民元公债	4,000,000
外债	40,117,000
合计	147,356,710

袁世凯直接经管财政后，对支出亲自核定和分配，并将北洋军队分布到南方就地筹饷，这使中央军政费用得以减缩下来。1914年3月，袁“批军费定三百万元，政费二百二十万元……是月军费仅支银二百九十九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五十七万余元；政费仅支银二百九十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六十五万余元。全年约略推算，可减银一千二百余万元” [244] 。但内外债支出费用巨大，民三概算近一万万元。瑞记借款等到期款项，到年底因无力偿还，不得不签订延期偿付合同。此外，平定白朗暴动的临时支出，也十分可观。据估计，自1914年1月1日到6月15日共支军饷九百余万元，其中，中央四百余万，陕西二百余万，鄂、豫一百余万，甘、川一百余万 [245] 。

由于欧战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14至1915年收入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支出方面，各省军费没有完全核减下来，中央“各部出款，列数过少，迨实支时间有超过原数者” [246] 。总起来看，财政形

势大体上稳定了下来。

即使如此，财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4年底，财政部就民四（1915）财政进行概算，不敷达五千万元以上。袁世凯令在京谒见的湖北将军段芝贵“回鄂后，赶紧筹款拨解，以济急需”[247]。国务卿徐世昌等致函各省将军、巡按使，要求各省“凡有可兴之利，可筹之款，不辞劳怨，不拘文法，并进兼营，切实举办”[248]。1915年1月3日，徐等又恐“函到稍迟”，复致电各省，指出：“财政部编订四年概算，应支项下，计长期外债共银元一万二千四十七万三千八百余元，短期内外债必须应付之款共一千九百三十三万九千余元，分期应付之款一千六百四十四万余元，中央概算应支八千三百三十四万九千余元，总共二万三千九百六十万零二千八百余元，核计四年岁入可指抵之款约一万四千七百四十万元。待整顿增加之款，验契、税契、烟酒、牧畜、印花等税及变卖官产约共三千九百万元，总共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万元。出入相抵，约不敷银五千三百二十万零二千八百余元。来日大难，殊深焦灼”，要求各省“将筹办情形电复”[249]。

各省奉命之后，纷纷提出筹划增加收入的办法，尽力搜括。中央政府则于1915年4月1日公布《四年内国公债条例》，募债二千四百万元，至1915年9月如数募足。

由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分配、核算都是按历年制进行的，于是，中央政府离开预算，与各省重新商定中央解款和中央专款的数额。各省共认解款二千一百七十八万元，专款一千八百九十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四元[250]。

1915年5月28日，袁世凯批准了《中央解款考成条例》，严加奖惩，因此各省解款比较积极。随着财政形势的好转，袁世凯在1915年7月6日发布的申令中说：“自上年春间，誓不复借外债以供消耗，迭由财政部督饬经征官吏整顿旧税，推行新税，近来颇有起色，外债得以支付，国中秩序亦勉可保持，危亡之忧，庶几获免。人民爱国程度

日高，踊跃输将，深堪嘉尚。”[251] 事实上，1915年的收支也确实比较平衡，岁入实收银元一亿三千零六十七万八千一百二十七元，支出银元一亿三千九百零三万六千四百五十四元[252]。财政赤字不大，可以不依靠外债而获得财政自给了。

袁世凯的财政措施虽然取得了如许成绩，使他沾沾自喜，但实际上财政紧张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善，更说不上充裕。中央和各省的财政方针，只能是勉强维持局面，政费开支只能压缩在近乎无所作为的水平。虽然教育经费未便大事核减，但资产阶级所迫切希望的振兴实业的经费却无从筹措。

而且，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还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强烈不满。各地一再发生争论甚至冲突，如广东反对赌饷，上海反对加赋，广东、湖北、上海等地反对印花税的苛征，以及南北各地频频发生抗捐抗税的风潮。结果，“搜括之效绩，除稍加少额入款外，则为商民对于国家观念增加极高之冷度而已”[253]。袁政府的信用正在迅速堕落。而袁世凯毫无自知之明，其帝制自为的活动，对财政更增加了新的巨大压力。1915年12月底，财政部匆匆将民国五年度预算交代行立法院通过，袁世凯即于1916年1月1日予以公布。根据民五预算，中央解款增加到四千二百三十万余元，中央专款达六千四百六十二万余元。这些沉重的负担，促使人民对袁世凯政府愈加不满。

四　税收制度的变革和税收概况

辛亥革命以后，前清税收系统大都遭到破坏，南方各省对前清的苛捐杂税大加减免撤废，后来由于财政困难，才逐渐予以恢复和重建。至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倾全力整顿旧税，推行新税，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一、海关税　海关税包括海关税和距海关五十里内的常关税，均

归总税务司经征。税务处作为中国国家机关掌管海关税收，但实权操在外国人掌握的总税务司之手。辛亥以前，总税务司只是按照税则，切实核计应收税钞数目，对于所收税款，均交与各地海关道，税务司没有直接管理之权。武昌起义之后，各地税务司均扣留税款，拒绝向当地革命政府交出，各国公使以关税备抵外债和赔款为由，迫使前清政府承认关税由总税务司征收后交在沪各国银行保管的办法，并为此设立了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于是，海关税进一步陷入了列强的控制之下。

海关税收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超过了前清的收入，但欧战以后，此项税收大为减少。

1912年—1916年关税收入如下 (254)

（单位：关平两）

1912	41,020,922.246
1913	44,668,744.479
1914	41,051,658.349
1915	39,710,384.686
1916	40,672,421.438

由于1902年订立的《通商进口税则》十年期满，从1912年8月开始，北京政府即与列强商议改定税则，希望把税则由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一二点五，同时免除内地厘金，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便利商品流通。鉴于十年来商品价格上涨颇多，即使不提高税则，只要从实核定商品价值，确实做到值百抽五，也可以大大增加关税收入。然而，由于列强一再拖延，直到欧战爆发，始终没有能达成协议。欧战之后，连谈判都搁置下来。

二、盐税　前清盐法，头绪纷繁，弊病百出。辛亥革命中，“引岸之制”多遭破坏，各地截留税款，甚至动用军队强运，以筹军饷。

民国以后，关于盐政改革问题，虽经一再讨论，但因盐政过于繁杂，难以下手，因而议而不决，迄无结果。

鉴于拟议中的善后借款行将成立，而盐税为预定的抵押品，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发布命令，自是年1月份起将盐务收入各款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庶几内讧财政，外昭国信”[255]，实际上准备把盐税拱手交与列强管理。善后借款成立后，按照合同成立了盐务署，以财政总长为督办，财政次长为署长，聘洋员为顾问。下设稽核总所，以次长兼总办，聘洋员为会办。各地设立分所，设华经理一员，洋协理一员。盐税交由五国银行团存储，遂为列强控制，“名为归诸中央，实已不能活动”[256]。

盐务署顾问及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就任后，为确保盐税增收，以备抵还善后借款等外债，主张“将商人运售盐觔之引权一律取消，改行自由贸易之制，以期上益政府，下益人民”[257]。这个主张是企图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封建性极强的盐政，结果遭到盐商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也认为“此事不宜采用激烈手段”[258]。因此，盐务的改革只是逐步采取在产盐地方征收盐税（就场征税）的改革办法，并规定每百斤抽二元五角，这样既可以增加税率，又可使各地高低悬殊的税率逐渐趋于平均。这项改革办法虽在1913年12月24日公布的《盐税条例》中作了规定，但事实上也没有全面实行。丁恩对此在报告书中指出：“夫专卖之制度废除，则盐价必落，而搀和杂质之弊亦可祛除，价廉物美，则用之者必多，销路既广，税收不患不旺……不图竟为保全一班专商之利益起见，而置无数贫困小民于不顾……事与愿违，一切希望均成泡影。”[259] 尽管如此，盐税收入还是大大增加了。

历年五国银行团所收盐税净款表[260]

（单位：元）

年份	实收盐款	提还外债	拨还政府

1913	11,471,242元		
1914	60,409,675元	21,106,572元	31,304,818元
1915	69,277,536元	34,599,082元	27,523,066元
1916	72,440,559元	24,911,905元	52,226,185元

三、田赋　田赋历来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前清田赋征收凌乱无章，弊病百出。辛亥以后，对前清旧制有所改革，大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一）地丁、漕米改征银元。前清币制不统一，各地征银征钱各不相同，辗转折合，官吏从中贪污。漕米等项系征收实物，十分烦琐。辛亥以后，江浙等省首先改折银元。如江苏省议会议决，地丁额银一两改征银元一元五角，漕粮每石征收四元。浙江在辛亥后曾一度将漕粮裁免，后又恢复，但改为抵补金，每米一斗改征银元三角。财政部于1912年12月28日通电各省："凡民间定纳丁课税厘并发放俸饷官款及一切出纳事项，概以银元计算。"[261]　于是各地逐步改征银元。至1916年，只有少数内地省份尚未改征。

（二）征收田赋附加税。前清田赋旧制，正额以外例有平余、火耗、串费、票钱等项名目，纷繁复杂。辛亥后，各省改良征收方法，改为附加税，如江苏地丁额银一两附税三角，漕粮每石附税一元，使田赋的征收趋于简明。

（三）准备清丈。前清田赋鱼鳞册经过历次内乱，散失无存，征收田赋缺乏确凿根据。甚至有的有田无粮，有的有粮无田。"官无可考之粮籍，吏有私藏之秘册"[262]，隐瞒飞洒，百弊丛生。民国成立，朝野人士都主张实行清丈。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各地都不敢贸然进行，只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稍作改良，以期增加财政收入。如浙江"先从清厘户粮、整理旧册入手，以为将来清丈之预备"[263]，只是对现行的实际征收情况进行登记整理，而不丈量田亩。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设立了经界局，"先由京兆区域筹办

清丈”[264]。但经界局缺乏经费，而各地阻力重重，且屡起反抗清赋、清丈风潮。1916年春，经界局虽在涿县、良乡两县试办，但因袁世凯政府摇摇欲坠，害怕发生风潮，遂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着一律缓办”[265]。仅江苏宝山县由当地士绅集款，完成了清丈。

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只有田赋是最普遍的税源，袁世凯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一直在想方设法从土地上增加税收。1914年11月间，山东巡按使蔡儒楷向袁世凯条陈加赋，认为：“现在田赋虽未减轻，然按亩计算，少者仅数十文，多亦不过数百文。查各国征收地租，皆取地亩时价及收获所得以为标准，若以吾国税率与现时地价收益相较，则取于民者实属微乎其微，不独视各国为极轻，即按古者什一之税，尚不逮远甚。纵使照现额加倍征收，在人民不难负担，亦非厉民之举。”[266]但几经筹议，当局担心各地反对，不敢实行。在事实上，各地已用多种方法变相加赋。如江苏自1914年起，地丁每两增加省附加税三角。湖北用“划一丁漕折价，以期增加于无形之中”[267]。湖南则举办随粮特捐，“每正额银一两，带收钞一串文”[268]。直、鲁两省更以濮阳工款紧要为名，举办亩捐，也就是借水利工程为名来进行搜括。1915年底袁世凯又通令将亩捐推向各省，并列入民五预算。

因当时体制混乱，田赋收入没有统计数。民三预算收入七千九百多万元，民五预算增至九千七百多万元。1915年1月到6月，各省报告的田赋收入，总数为三千七百二十九万五千余元，其中缺四川、吉林、奉天、热河、归绥、川边六处的数字。

四、厘金　厘金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征收的一种苛税，由于层层设卡，厘卡人员敲榨勒索，严重地妨害了商品流通，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清时就一再酝酿废除厘金，有的地方稍作改革，改为统捐，以减少关卡。辛亥以后，江浙等地曾一度废撤厘卡，但不久浙江

改征统捐，江苏苏属改征产销税，湖北则改为过境销场税。由于税率减低，税局归并，厘卡减少，收入锐减，且各省“办法既不一致，收入亦漫无稽考”[269]。如江苏苏属地区，旧时厘金比额为二百八十九万余元，而1912年5月11日—1913年5月10日仅收二百三十三万五千余元，短收约五分之一。浙江厘金在前清宣统三年，预算为四百三十九万七千余元，而民国元年仅收二百三十六万五千余元，民国二年也只收三百十六万四千余元[270]。

裁厘加税问题，由于列强拖延关税谈判，一直未能达成协议。政府当局担心单方面裁撤厘金后，关税加税谈判将更加困难，而若关税不加，厘金裁撤后财政收入又无从弥补。因此，所谓裁厘问题，仅于1914年秋由财政部通饬各省将原有厘金改办产销税，为裁厘之预备。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1914年—1915年间，当局用提高税率及对征收官严加考核的办法，使厘金收入大幅度增加，至1916年，核定比较数高达四千七百四十七万余元。

五、常关税　沿江沿海五十里内常关归海关管理，属财政部管辖者分三种：一是内地常关，一是沿江沿海五十里外常关，一是京师、左右翼及各边关。前清旧制，仅京师、左右翼及各边关直隶中央。五十里外常关及内地常关均由各省经征。民国以后，各地截留税款。至1913年春，中央政府派出各地海关监督兼管五十里外常关。1913年底至1915年间，又先后将内地各关收归财政部直辖，常关税遂为中央直接收入。

从1914年秋开始，各常关调查物价，改定税率，照海关半税之例，值百抽二点五，并且革除陋规，严定比较，以增加税收。1913年常关税收入银五百五十余万元，1914年为六百二十余万元，1915年增至七百七十三万余元[271]。民五预算且定为七百八十万余元。

六、验契和契税　验契并非税收，而是基于政权的更换，新政权承认公民不动产时收取的手续费（当时套用日语称手数料）。袁世凯

政府之所以急于推广验契，是因为“民国成立一载有余，而财政困难达于极点，海关备抵赔款，盐税另款存储，若无补救之方，难资挹注之用。各省军队林立，饷糈缺乏，哗溃堪虞”[272]。1913年6月3日，财政部通电各省《划一契纸章程》九条，规定呈验不动产旧契，收纸价一元，注册费一角，不动产价格在三十元以下者只收注册费，令各省筹议举行。

1913年8月至11月间，各地先后举行，而以山东推行最猛，收入也最多。泰安县知事冯汝骥、寿光县知事徐德润为此受到嘉奖，山东各县遂雷厉风行。乐安县知事王文域实行告发倍罚的办法，激起群众团聚抗验，王本人被杀。山西盂县群众抗验，则遭地方当局镇压，被杀四十多人。鉴于各地风潮迭起，财政部不得不通电各地慎重办理。

验契收入甚旺，成为1914年—1915年间袁世凯政府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自开办至1914年12月止，收入总数达三千二百余万元，1915年全年复收一千六百余万元，合计达四千八百余万元[273]。

契税在前清宣统三年规定税率为：卖契收税9%，典契收税6%。由于税率过重，人民隐匿不报，税收锐减。1914年1月颁布的《契税条例》，仍规定卖九典六税率，另收契纸费五角。但一则税率过重，二则和验契冲突，事实上不便推行。因此，财政部电令各省体察情形，自定税率。由于税率减轻，虽然仍受验契影响，但收数仍然增加，1914年4月—9月半年收数超过民二收入六十余万元，民三财政年度（1914年7月—1915年6月）全年收入（川、吉、奉、归绥、川边缺全年数，京兆、察哈尔、热河缺半年数）达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八元，距一千一百零九万余元的预算数相差不大[274]。其中，契税增收部分自1914年起属于中央专款。

七、印花税　印花税系对财物成交所有各种契约簿据可用为凭证者用贴印花票的方法征税。印花税在欧美被认为是良税，前清时即酝

酿多年，但未能推行。民国成立后，即拟推广印花税作为大宗财政收入。1912年10月21日，《印花税法》经参议院议决公布，后定于1913年3月1日起自京师开始实行。各地接到印花票后也相继推行。1914年8月又公布《人事证凭贴用印花条例》，对人事证书征税。

《印花税法》公布时，适在京召开工商会议。会议代表胡瑞霖上书要求“先宣布裁厘计划，再行实施印花税，以恤商艰”。他认为“处此国民经济沉滞之际，商民对于固有租税之负担已属勉力，骤添新税，势实难于推行”[275]。但因厘金难于抵补，当局没有采纳。印花税法初定十元以上起征，贴印花一分，以成交额累进至一元五角止。至1914年底，为推广印花税税额，规定十元以下一律贴用印花一分，旋又定为一元起征。由于征收苛细，加上警察有权检查罚款，引起商界强烈反感。广东等地要求取消一元起征的规定，甚至酝酿罢市。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上书财政、农商两部，强烈指出：“各省商会代表提出，印花税苛细扰民……目前所最不便者，发票须贴印花，甚至乡民入市，担柴尺布，亦遭苛罚，以本厂或本栈之货物，运至本店发卖，沿途经过亦被拘罚。良税成为怨府，言之殊堪痛惜……其弊之所由生，则由授警察以检查之权。”[276]但袁世凯政府一意孤行，仍强制推广。

然而，印花税的收入并不理想。民二仅收五万余元，民三收入四十五万余元，民四也只达到三百多万元。尚未成为重要税源。

八、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和烟酒公卖　烟酒税在清末即作为专税设立，但各地各自为政，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税率亦不一致。民国后并无多大变革，往往通过强加税率、税种以增加收入。民三预算，除原有税款外，又划出烟酒税增收，作为中央专款。1913年冬，财政部以烟酒税作为大宗奢侈性消费税，税率尚轻，为弥补财政亏空，筹议加税。但因烟酒税十分复杂，不敢轻易更张，遂设立烟酒特许牌照税。1914年1月11日公布《贩卖烟酒牌照税条例》，规定烟酒营业无论整卖零卖，均需领取牌照，每年按经营规模交纳税款。财政部为筹

集大宗税款，于1915年又仿照外国的税收办法，筹办烟酒公卖，于5月间设立烟酒公卖局（后改全国烟酒事务署，独立于财政部），公布《全国烟酒公卖简章》。烟酒公卖采取官督商销的办法，按烟酒价值外加公卖费，其费率轻重则由各地酌定，互不相同，当局预计年收可高达二千余万元。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则照样征收，但由公卖局统一管理。由于税法复杂繁苛，往往重复征收，小贸小贩甚至被迫停业，引起商界的不满。

九、当税和牙税　当税和牙税为典当和商行的营业税，领取营业凭证（帖）时尚需缴纳帖捐，均系前清旧税。但前清并无普遍推行的营业税。民国后，原议设立特种营业执照税、普通商业牌照税，但均议而未行，只有当税和牙税经整顿推行。鉴于当税和牙税历来各地经征情况互不相同，故政府当局于1914年3月令各地自定章程，视不同情况，分别等级，交纳税捐，并将前清旧帖改换新帖。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三年度当税收入为五十七万余元，牙税收入为一百三十八万余元[(277)]。

十、其他捐税　除上述各税外，尚有糖税、矿税、茶税、渔业税、牲畜屠宰税等等，年收入各有几十万、上百万不等。

此外，地方上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木税、渔业税、斗税、包裹税、驴税、牛税、花布税、房税、船税、油税、货捐、火车货捐、车捐、船捐、戏捐、妓捐、花生捐、瓜子捐、猪捐、羊捐、粮米捐、商捐、码头捐，等等。这些苛捐杂税，各地名目不一，花样百出，往往激起社会风潮。如广东的品茗捐、牛皮捐，江西南城县的人丁捐，都曾激起抗捐风潮。福建“创办轿捐、屠兽捐，几酿变故”；“龙溪县知事陈家栋，捐例尤酷，民间买牛一只，捐洋一元。此外小猪有捐，大猪有捐，猪肉又有捐，羊也悉是。大概每只猪、羊须上捐三、四次。现在米捐已办，又议粟捐。余如笋丝捐、火柴捐、竹叶捐、道士捐、和尚捐、妓女捐，亦正在筹拟进行”[(278)]。该县“近两月以来，箔工、竹工，均因捐重罢市歇业”[(279)]。

更为恶劣的是，袁世凯于1915年4月29日任命蔡乃煌充江苏、江西、广东禁烟特派员，事实上这个禁烟特派员，却是一个卖烟特派员。他先增加鸦片税，使烟禁松弛，9月底又亲到广东，实行鸦片专卖，由鸦片商每箱报效银四千五百元，预计可筹款二千七百余万元作为帝制运动费，从而使民国以来的禁烟运动功亏一篑。其不择手段，一至于此。

对于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张謇于1916年4月20日愤懑地写信告诉梁士诒说："惟时闻商民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而已……商之于税，重可忍而烦不可忍；官之于民，信可谅而欺不可谅！"[280]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

五　金融币制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金流通和货币制度问题，逐渐为社会所重视。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结束大清银行的基础上于2月5日在上海开始营业。南京临时政府还把货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鼓铸民国新币（银元）。

临时政府北迁后，中国银行总行也改设北京，于1912年8月1日开业，1912年—1913年初，先后在天津、汉口、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地设立分行。至1916年，除云南、广西、甘肃、新疆、西藏尚未开设外，其余各行省均已一律设立。1913年4月15日，参议院通过公布《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定为银元六千万元，政府先行认垫一半（三十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1915年10月修正《则例》，招募商股。到1916年3月止，实际上政府仅拨资本一千万元，商股认购只五百万元，实交仅二百余万元。中国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国币及兑换券的特权，1914年6月归财政部直辖。尽管中国银行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但当时交通银行资本雄厚，经理轮电路邮四政款项。因

此，在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代理财政部部务期间，于1913年5月31日又委托交通银行代理金库。这样，中、交两行同时经理国库。事实上，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也已广泛流通。1914年3月，交通部制定《交通银行则例》，于4月7日公布，规定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库平足银一千万两，官四商六，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分理金库，发行兑换券。在1912年—1915年间，中、交两行既有经理国库之权，又经管外债收支，因而实力充足，发行兑换券（纸币）也十分谨慎，现金准备充分，因而信用坚挺，得以逐步向全国各地推广。袁世凯政府在整理币制时，准备逐步用中行券来代替各地滥发的纸币。

在币制方面，就金本位、银本位、虚金本位问题长期讨论之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2月7日公布了《国币条例》，采用银本位制，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一圆，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后改银八九），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281]，并以施行细则规定，“凡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282]。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统一币制，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机关，袁世凯政府的这些措施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尽管如此，币制统一的过程十分缓慢。银两和银元仍然并用，仅以银元结算。至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所铸发的银元也仅铸成新币七千一百余万元[283]。

这一段时间，中央政府由于获得了比较多的外债，紧缩了开支，开辟了财源，中央金融体制虽然还不能统制全国，但没有形成金融危机。然而，地方上银根紧张的局面比较严重，虽然进行了一些整理，但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各地官僚富豪为逃避革命军筹饷，把大量资金转移到租界，存入外国银行。据当时调查估计，汉口外行即存有五千余万两。上海、香港、天津等三处合计共有五六万万两，据说有利息者不过三分之一，无息认保险费者达三分之二[284]。结果，“内地所余，不过日用零星之现货”[285]。如湖南由于汇往上海、汉口的汇票过多，到1912年下半年须兑现时，现银极端缺乏，造成钱号纷纷倒

闭。由于银根紧张，现货不足，市面上杂乱无章的纸币盛行，甚至“小贸细贩亦发行百文或二百文之钱票行使在外，并无准备金以资拨兑”[286]。湖南当局因财政拮据，1912年初发行筹饷公债五百万元，仅售出三百五十一万，至4月间遂将官钱局改为湖南银行，发行纸币。至1913年5月，纸币总数以银元计算，已逾二千万有奇，流通在外者则有一千一二百万，致使通货膨胀，纸币贬值。1913年初，湘币汇上海每银千两需贴水至三百五十两之多，到1913年11月竟腾涨至一千一百余两，超过了面值。湖北于武昌起义后，官钱局停止营业，原官钱局钞票成了不兑换纸币，信用低落。1912年6月间限额兑换后，兑换拥挤不堪，时有死伤。军人强兑，曾酿成1912年10月1日汉口钱业罢市情事。湖北官钱局旧币即近四千万元，民国后新增钞票一千万，“鄂中军队林立，饷糈未至缺乏者，皆得其力”[287]。1912年11月间，纸币每元值八角四分，到1913年5月间只值七角多。由于银元票泛滥，又无现银兑现，至1913年6月间，又添印官票（铜元票）一千万串，实际上更加剧了通货膨胀。广东于起义之初，“亟发纸币共壹千伍百万元，以济急需”[288]。1912年间，由于纸币泛滥，造成“粤省经济恐慌，市面钞票汇兑不通”的局面[289]。广东地方政府遂销毁各版及印成未发行的纸币。因此，在二次革命前，广东纸币仍能以九折流通。二次革命后，龙济光督粤，金融危机急剧发展，币值猛跌。1913年底跌至五八折，1914年5月跌至四折以下。据1913年底广东财政司长报告，计新纸币共发出一千九百万元，前清旧币发出一千三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一元，合计新旧纸币发行总数三千二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一元。江西在前清时，曾发九五官票一百九十二万六千四百七十五串，辛亥革命后继续流通，并续发九五官票二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串，银元钞票一百六十八万九千九百元，铜元票一百四十四万二千七百串，九五百文小票一百三十七万串，官票每串定价五钱五分（以上共计约合银元七百万元）。当时，江西“因于省外各属普设民国分行、汇兑所、代理店，丁漕税务除淮盐局外，非官票一律不收，商民因其利便，亦不复兑现”[290]。因此，在二次革命前江西币值稳定，银元票甚至升值。但在二次革命后，江西“金

融奇窘，纸币而外，几无现银”[291]，难以出省贸易。不久，江西当局又增发九五官票二百万串，结果，“市间伪币杂出，遂停止兑现”[292]。纸币贬值，引起市面骚动。东北三省由于处在日、俄的控制之下，金融危机的发展比内地更形严重。据调查全国财政专员王璟芳、李景铭报告：“（东北三省财政）受病根源全在滥发纸币，奉天小银元票将近千万元，吉林官帖一万二千余万吊，约合银元二千万元，江省（黑龙江）官帖亦在千万元以上。一年之间，吉、黑钱票价值跌至一与三之比例，国家收入暗亏三分之二。奉天虽可兑现，而准备不及十成之一，外人辗转盘剥，岌岌可危……银钱比价一日三易，有朝为富户，夕成穷民者，外国银行乘机操纵。”[293]此外，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仅值四角，陕西军饷全靠官发纸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少数地区，如江苏仅发行一百万元，浙江仅发军用票二百万元，数量不大，并有所控制，因而纸币与实币价大略相等。

据1913年10月间调查，各省官银钱行号纸币发行数目共达一亿四千五百五十七万四千一百六十五元[294]。

滥发纸币，不仅影响到国民生计，也严重影响财政。熊希龄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中曾指出：“近则各省滥发纸币，价格低落，市面恐慌，人民咨怨。其直接影响及于财政者，则缘币制紊乱之故，征收复杂，官吏得上下其手；汇价参差，国库损失；缘纸币低落之故，国家一切征收即以其低落之额为损失之额。凡兹弊害，无俟枚举。”于是，计划用中国银行兑换券易收滥钞。1913年11月间，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监理官，监督各省官银钱行号，并命令各省“各种纸币，不能再行增发”[295]。1915年10月，又批准《取缔纸币条例》，禁止新设的商办银钱行号发行纸币，已发纸币则逐步收回[296]。

由于币制借款没有成立，袁世凯政府没有财力全面去整顿各地的金融，清理并收回各地滥发的纸币，仅于1914年—1915年间对部分省区的币制作了整理。

广东由于纸币价值暴跌，1914年初市面极端恐慌。当局强令商场贸易以纸币为本位，遭到商界的强烈反对。自阴历正月起，商业各行即实行以银毫为本位。社会上商行罢市，工人罢工，巡警逃亡，风潮迭起。当局竟于2月13日左右强行出示宣布："限三日后均应以纸币为本位，十足通用……拒绝纸币及任意低折者，则是有意破坏大局，与乱党行为无异。"[297] 这种完全无视经济规律的告示，只能到处碰壁。2月19日，当局干涉银业公所，不准纸币开盘，银业便于2月20日罢市，迫使当局取消了禁令。

1914年3月初，调查全国财政专员王璟芳抵粤，与地方当局筹划整理纸币方法。鉴于粤省自行整理纸币没有妥善的办法，王遂于3月25日回京，与中央财政当局会商。28日，王奉袁世凯命令会办广东财政事宜，并于5月初再次抵粤。为了清理广东纸币，财政当局遂向银行团商议借用善后借款整顿盐务项下闲置的英金一百万镑。银行团经丁恩说项，考虑到整顿广东纸币可以增加盐税收入，遂同意拨付，但规定："财政部应派华洋专门家各一人为委员，前往广州监察管理收回纸币事宜，其所派之洋员应得五国银行团之同意。"[298] 于是，1914年6月1日在广州开设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以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发行新的大元纸币[299]。7月1日起开始收换，以一月为限，广东纸币每元定价为毫洋五角（依据1914年5月15日前三个月内之平均市价），折为大洋四角五分五。这样，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全部收回销毁。对于旧币折收，广东总商会曾电中央抗争，指责当局"自失信用"[300]，遭到当局的严词申斥。

东三省官银钱行号因垫支政费，滥发钞票，造成金融恐慌。1913年底王璟芳将调查三省财政金融状况报告中央后，袁世凯于1914年1月9日任命巢凤冈督办东三省官银钱局及广信公司事宜，并充东三省中国总分银行会办，任命潘鸿宾督办东三省中国总分银行事宜，以期统一纸币发行机关，整理纸币。

东北通行小洋，市价小洋十二角合大洋一元。小洋纸币发行过

多，准备空虚，信用薄弱，商民持票往兑，不能如数付现，纸币价格日渐低落，小银元价格也为纸币拖落。当时，日、俄两国操纵着东北的金融市场，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银本位钞票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发行的金票（老头票）以及俄国的卢布票（羌帖）在市面上流通。他们用纸币收购小洋，尤其是日本老头票系金本位不兑换票，日人以空纸币吸收现货，改铸辅币，获取暴利，扰乱中国金融市场。投机商人也收购小洋熔铸宝银，再以宝银购买小洋，循环图利。尽管东三省官银号限制兑现，日本为了控制东北金融，其驻奉领事唆使日侨向官银号兑现。1914年4、5月间，日侨甚至随同日本宪兵到东三省官银号、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强行兑现。1914年秋，日侨又到东三省官银号“聚众滋闹，甚至横卧柜台，日夜不休”[301]。因此，东北市场现银越来越少。

同时，由于小洋票信用薄弱，即使是官办的各电报局、齐齐哈尔邮政局等，也蓄意压低小洋票价格。哈尔滨电报局甚至“非羌帖则概不收受”[302]。京奉铁路除中、交两行大银元票外，也不收小洋票。官营事业不收官发纸币，使小洋票流通范围更形狭窄，价格也更加低落。

中国财政当局为补救东北金融起见，同意潘鸿宾的意见，由中国银行发行小洋汇兑券，“于东三省境内概不兑现，凡汇往上海者照每日行市在上海付给规银，在该行作存款者仍照章生息”[303]。同时，财政部一方面向黑龙江推设中国银行分行，一方面准备逐渐回收东北地方银行所发纸币，于1914年7月咨行东北地方当局，“自本月1日起，不论军需政费如何窘迫，此项纸币未发者不得续发分毫，已发者逐渐设法收回”[304]，并严令各行商收回私发纸币。

但是，由于一方面日、俄操纵着东北金融，一方面官场腐败，而中行财力也不充足，东三省发行汇兑券以整顿金融，收回滥币，抵制外币及制止现银外流的目的未能达到。对于上述政策，地方上“别具深心者，即须摭拾浮言，藉词抵制”[305]。因为有人靠滥发纸币牟

利，如黑龙江广信公司的红利为官场朋分，“多则二三十万元，少亦一二十万元”[306]，虽然黑龙江议定“以官银号及广信公司所收赢余分年收销”[307]的办法，但吉、奉两省一直没有定出办法，日侨强兑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如1915年12月17日、18日两天，中国银行奉天分号即被日侨兑去小洋三十二万有奇。所以，东北三省的金融币制，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整理。

至于其他各省，中央政府没有余力直接参与整理。浙江、江苏、安徽、直隶等省纸币问题不严重的省份，地方纸币由本省筹资收回。贵州纸币因扩大了使用范围，币值逐渐回升九成。1915年11月1日，贵州财政厅与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订立了中国银行兑换券一百五十万元的收回黔币借款合同，按原价在两年内收回。江西直至1915年5月还在请求增发钞票八十万元。江西于1916年2月间，才与中国银行订立合同，由中行经理发行币制公债四百万元，以收回九五官票。但债票刚刚开始发售，中、交停兑，江西整理币制的措施遂告失败。四川于1915年将盐款收入的军票销毁，泸州销毁一百七十万九千多张，重庆销毁一百四十九万六千多张，又全部收回了钱票，金融状况有所改善。两湖则没有起色。湖南于1915年秋田赋改征银元，纸币更加无用。湘绅刘人熙、叶德辉等致电中央政府抗议说：“名为改征，实则加赋，是人民骤加重负，纸币全失信用，而此巨额纸币，势成废物，人民暗中破产，冤屈无伸。”[308]至1916年初，湖南又增发铜元票。财政已届崩溃的中央政府，竟致电湖南巡按使说：“湘省增发铜元票，金融活动，操纵得宜，并可以虚易实，深冀腾出款项，接济中央。”[309]这真是掠夺式的金融政策！由于滥票未经整理，省银行钱号垫支政费过多，中国银行一直未能接管两湖等省金库。金库完全归中国银行接管的，只有中央与直隶、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福建、安徽、吉林、黑龙江、奉天、贵州、四川等省。

由于各省滥币未清，国库不统一，银圆发行数量尚少，币制尚未划一，中国银行兑换券的发行量不能扩大，财政总长周学熙对中行券

的发行持谨慎态度。迨护国战起，袁世凯政府拟用军事手段强行扩大发行，而交行券的发行越来越失去控制，终于导致了1916年的金融危机。

---

(1)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7页。

(2) 《全国工商会议开幕记事》，《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0日。

(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4) 《神州日报》，1914年3月30日。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

(6) 张謇：《辛亥五月十七日召见拟对》，《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第37页。

(7) 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第31、32页。

(8) 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7卷，第1页。

(9) 北洋政府农商部参事厅编：《农商法规·工商》，1925年版，第66页。

(10) 《余姚商务分会简章》，《商业杂志》第2年第1号。

(11)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纂：《第四次农商统计表》，1917年12月刊行，第490页。

(1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6页。

(13) 《大清新编法典》附录，第121页。

(14) 《农商法规·矿政》，第70页。

(15) 《农商法规·工商》，第42页。

(1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82页。

(17) 《大总统咨参议院提议实业部呈送商业注册章程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

(18) 《农商法规·矿政》，第14页。

(19) 《农商法规·矿政》，第6页。

(20) 《农商法规·工商》第1、2页。

(21) 《实业部批鱼商陈文翔请设立渔业公司准予立案专利呈》，《临时政府公报》第40号。

(22)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8日。

(23) 《农商法规·总务》，第10页。

(24) 《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787—810页。

(25) 《农商法规·工商》，第135页。

(26) 此项数字系据《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535页表中计算。

(2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30页。

(28)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据第6页表数字计算出。

(29)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49页表计算。

(30) 据《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7—11页表计算。

(31) 据《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7页表计算。

(32) 《八年来之社会状况》，《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第182页。

(33)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40页。

(34) 《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第76页表中数字。

(3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58页表中数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6) 徐景星：《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44—148页。

(37) 蔡孝箴：《天津经济中心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5页。

(38)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55页。

(3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591页。

(40)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67页表中数字。

(41)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9页。

(42)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1页。

(43)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5—37、106、107页。

(44)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5—37、106、107页。

(4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0页。

(46)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163页。

(47) 黄炎培等：《中国商战失败史》，第88—89页表中数字。

(48)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49)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序》，第1—2页。

(50)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80页。

(51) 《记中国植物油料输出之进步》，《东方杂志》第15卷第2号，第182页。

(52)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0页。

(5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54) 《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812、813页。

(55) 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3—124页表中数字算出。

(56) 自《中国煤矿》第200页表中摘出。

(57) 《中国商战失败史》，第36、161页。

(58) 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1页表中摘出。

(5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4、139页表中数字。

(6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4、139页表中数字。

(61) 自《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825页摘出数字。

(62)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次矿业纪要》，1926年版，第126—127页，第131、133页。

(63)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次矿业纪要》，1926年版，第126—127页，第131、133页。

(64)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次矿业纪要》，1926年版，第144、166页。

(65)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345页。

(66)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345页。

(67)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3页。

(68) 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8、27页。

(69) 《中国铁道建设》，第18、27页。

(70) 《中国近代史经济统计资料选辑》，第227页。

(71) 《中国航运界之大势》，《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第170页。

(72)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73) 杨铨：《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申报馆1923年版，第8页。

(74)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6页表中数字。

(75) 杨铨：《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申报馆1923年版，第7页。

(76)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8页。

(77) 张謇：《承办通州纱厂节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1卷，第17页。

(78)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9页。

(79)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59—919页表中数字算

出。

(8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4页。

(81)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5页。

(82) 《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49、152、161页。

(83) 《天津早期民族近代工业发展简况及黄金时期来源的特点》，天津市政协未刊稿。

(84)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5页。

(85) 北京《晨报》，1924年12月12日。

(86) 窦守镛、苏雨眉：《李纯一生的聚敛》，《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20页。

(87) 这三十七家企业是：开滦煤矿公司、中国银行、中华捷运公司、北洋淑兴渔业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康年保寿公司、中华书局、高线铁路公司、中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烈山普益煤矿公司、嘉兴通利电话无限公司、久大精盐公司、中日实业公司、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殖边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双利锑矿公司、裕通公司、鹤岗煤矿公司、淮上第一火柴公司、裕元纺织公司、大振熔罐公司、金星水火保险公司、盐业银行、通惠实业公司、裕华兴业公司、华宁矿业公司、炽昌硝硷公司、保阳火柴公司、广勤纺织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华新纺织公司、松江林业公司、裕津制革公司、天津商业保市银行、中孚银行。

(88) 来新夏等：《略论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89)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第266页。

(90)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第266页。

(91) 《晨报》，1925年10月30日。

(92)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第14页。

(9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第367页表中计算得出。

(94) 《交通银行则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95) 《神州日报》，1915年6月1日。

(96) 《神州日报》，1915年6月25日。

(97) 《神州日报》，1915年7月2日。

(98) 《神州日报》，1915年6月25日。

(99) 《神州日报》，1915年8月24日。

(100) 《论历年国际贸易情形》，《东方杂志》第15卷第2号，第179页表中数字。

(101) 蔡正雅、陈善林等编：《中日贸易统计》，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

(102) 摘自《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43页表。

(103)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48页。

(104) 《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中华民国九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之中国纱厂一览表。

(105)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1页。

(106)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1页。

(107) 全汉昇：《汉冶萍公司史略》，九龙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94页。

(108)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09)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10)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11)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12) 长野朗著、丁振一译：《中国领土内帝国主义资本战》，上海联合书局1928年版，第158页。

(113)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246页。

(114) 《英日在华贸易统计》，《农商公报》第6卷第5期，1919年。

(115) 《宋教仁集》下册，第395页。

(116) 《宋教仁集》下册，第749—750页。

(117) 《实业政见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7卷，第2页。

(118) 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16号，1922年8月。

(119) 《袁世凯命令》（1913年12月8日），《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

(120) 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第42页。

(121) 瞿明宙：《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1935年10月。

(122) 《四川农村经济》，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0页。

(123) 《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民法》，北京北洋政府大理院编辑处，1926年再版，第37页。

(124) 李奇流：《中国农民生活之吟味》，《汗血月刊》第1卷第5号，1933年8月。

(125) 《南通县农业概况》，《农商公报》第17期，1915年12月。

(126) 《北方棉业界新发展》，《银行周报》第4卷第19号。

(127) 《苏南农场概况》，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41页。

(128) 《满洲农业再编成的研究》，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9页。

(129)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0页。

(130) 《民国八年棉产调查报告》，《农商公报》第69期，1920年4月。

(131) 杨钟健：《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

(132) 《农村经济》第1卷第12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0页。

(133) 叶抱寰：《述云贵二省之经济状况》，《商业月报》第14卷第5号，1934年5月。

(134) 《农商公报》第26期，1916年9月。

(135) 《农商公报》第65期，1919年12月。

(136) 《天津益世报》，1935年8月17日。

(137) 《中国桐油业》，《农商公报·选载门》第102期，1923年1月，第37页。

(138) 《农村衰落之过程及复兴之管见》，《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卷第1号，1933年6月。

(139)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卷，第24—25页。

(140) 《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

(141) 《广东全省农林试验场成绩报告》，《农商公报》第18期，1916年1月。

(142)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45—146页。

(143) 《李纯一生的聚敛》，《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9页。

(144) 《东三省荒务概况》，《农商公报》第14期，1915年9月。

(145)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年报》，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页。

(146) 梶原子治：《满洲农地集中分散的研究》，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04页。

(147) 黄佩兰等：《涡阳风土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页。

(148) 《农商部咨财政部文》（1914年10月2日），《农商公报》第4期，1914年11月。

(149) 1920年9月11日日本驻郑家屯领事池部正次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机密第23号信附件，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页。

(150) 《神州日报》，1916年9月15日。

(151) 金蓉镜：《均赋余议》，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2页。

(152) 张祖荫述：《震泽之农民》，《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

(153) 徐为邦：《国货与洋货》，《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4号。

(154) 《申报》，1914年8月5日。

(155) 《申报》，1915年12月13日。

(156) 朱执信：《中国存亡问题》，日本东京会文社1917年版，第22页。

(157) 屈维它：《现在的满洲经济》，《前锋》（广州平民书社）第3期，1924年2月。

(158) 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2卷第1期，1920年10月。

(159)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卷，第159页。

(160) 唐绍仪在参议院的演说，《政府公报》，1912年5月16日。

(161) 《政府公报》，1912年6月4日。

(162) 《申报》，1912年5月14日。

(163) 财政委员刘颂虞说明，《参议院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6月25日。

(164) 《程雪楼先生书牍》上卷，第44页。

(165) 《程雪楼先生书牍》下卷，第25页。

(166) 《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第6卷，第39页。

(167) 《政府公报》，1913年1月11日。

(168) 《申报》，1913年2月22日。

(169) 《张一麐致程德全哿电》，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70) 《政府公报》，1913年4月5日。按：财政司系各省都督属下财政机构。

(171) 《代理财政部部务梁次长财政会议演说稿》，《政府公报》，

1913年9月6日。

(172)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5月14日。

(173) 《参议院咨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5月19日。

(174) 《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1915年4月21日。

(175) 吴贯因：《中国预算制度雏议·自序》。

(176)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民国财政纪要·关于预算编制事项》，1915年石印本。

(177)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42页。

(178) 《熊总理辞职后之财政进行观》，《申报》，1914年2月18日。

(179) 《申报》，1914年3月28日。

(180) 《政府公报》，1914年5月27日。

(181) 《远生遗著》卷4，第22页。

(182) 《大总统命令》，《政府公报》，1913年12月24日。

(183) 《政府公报》，1914年6月12日。

(184) 周自齐呈，《政府公报》，1914年6月10日。

(185) 引自屈映光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186) 《周氏视事后之民国财政谈》，《申报》，1914年2月19日。

(187) 《总统致财政会议委员训词》，《申报》，1914年5月14日。

(188) 冷：《财政新谈》，《申报》，1914年5月21日。

(189) 《时报》，1916年5月1日。

(190) 《民立报》，1912年5月27日。

(191) 《程雪楼先生书牍》卷下，第23页。

(192) 熊希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1913年单行本，第3页。

(193) 《财政部致江苏都督冬电》（1912年10月），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94) 《政府公报》，1913年3月17日、8月9日、11月29日。此外，当另有华侨爱国捐没有统计在内。

(195) 《善后借款告罄后之中央财政》，《申报》，1913年11月16日。

(196) 《交通部开本部欠付各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按：1912年路政营业收支盈余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余元，1913年盈余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余元。但交通部为偿还外债，整顿路政，仍然入不敷出。邮电路航四政收支属特别会计，单独核算，这里仅指挪作军政经费部分。

(197) 《政府公报》，1913年6月30日。

(198) 《民国财政史》下册第4编，第46页。

(199) 《申报》，1913年12月14日。

(200) 参见《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军阀政府所借外债表》，《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201) 曾鲲化：《中国铁路史》下册，第496页。

(202) 《法比公司上中国政府密函》，《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915页。

(203) 财政部沁电（1913年10月），《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日。

(204) 《黄兴集》，第216页。

(205) 《黄兴集》，第219页。按：北方军队指陆军部直辖各师，南方则指留守府所部。

(206) 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编《中华民国二年一月至六月预算总册》所列增加数推算。

(207) 《中华民国二年一月至六月预算总册》，此数中新增湖北兵工厂、上海制造局、南京第一军及第一团属官等单位。

(208)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49页。

(209)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第3页。

(210) 《柏文蔚致陆军部青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11) 《政府公报》，1912年11月14日。

(212) 《申报》，1913年10月9日。

(213) 《中央政府之罗掘策》，《申报》，1913年3月11日。

(214) 《申报》，1913年9月20日。

(215)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6日。

(216) 《减政主义将次实行矣》，《申报》，1913年12月7日。

(217) 《申报》，1912年11月22日。

(218) 《江苏都督咨送江苏省征收地税暂行章程由》（1912年12月11日），《田赋案牍汇编》中册。

(219) 《申报》，1912年6月13日。

(2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未扣去中央直辖各师。元、两折算有误差，似应为增加七百三十九万二千七百元，合四百九十二万八千四百六十六两。

(221) 据《民国财政史·国防费》，未扣去中央直辖各师。

(222) 《远生遗著》卷4，第11页。

(223) 此笔借款经过复杂，当时又称贺尔飞借款。

(224) 《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1915年7月7日。

(225) 《财政部致内务总长文》（1914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26)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0页。

(227) 叶恭绰：《交通救国论》，某某当指梁士诒。

(228) 《交通部开本部欠付各款》（191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29) 《民国财政纪要》。按：元年公债后来曾不断贱售和抵押，至1915年7月止发售额为一千二百二十九万余元。

(230) 参见周金箴演说，《申报》，1914年9月3日。

(231) 《申报》，1914年7月28日。

(232) 《贾士毅致吴廷燮函》（1914年7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见《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

(233) 《申报》，1915年1月6日。按：累计数与分计数略有出入。

(234) 丁恩：《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盐务署1922年10月刊行。

(235) 《民国财政纪要》。按：周自齐报告常关收入为六百二十七万二千余元，略有出入。

(236)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2页。

(237) 《政府公报》，1915年3月11日。按：此为解中央数，周自齐报告为一千七百四十余万元。

(238) 《民国财政纪要》。按：周自齐报告实收三十四万八千余元。

(239)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18页。按：原文为四十余万元。

(240) 据《民国财政纪要》，契税预算收入一千一百零九万九千七百零八元，实收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八元，又据《民国财政史》1914年概算契税增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零四十元，以此推算实际增收数。

(241) 按前述要求推算，实际不足此数。

(242)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18页。按：原文为五百万元以上。

(243) 《政府公报》，1915年8月3日。按：此为1915年6月收齐时的实收净额。

(244) 周自齐报告，《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18页。

(245) 《专电》，《申报》，1914年6月21日。

(246)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2页。

(247) 《段芝贵密呈》（191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2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249) 《政事堂致各省将军巡按使财政厅长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按：当时称“亿”为“万万”，引文照列。

(250)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2—53页。

(251) 《政府公报》，1915年7月7日。

(252)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一编，第60—66页。

(253) 《申报》，1915年8月25日。

(254) 据《关税纪实》编列，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1936年版。

(255) 《政府公报》，1913年1月7日。

(256) 财政部通电，《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日。

(257)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第52页。

(258)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第68页。

(259)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第172页。

(260)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按：元以下数略。上述数仅指解入五国银行团的盐税净款，盐税的实际收入当超过此数。

(261) 北洋财政部编：《田赋案牍汇编》上册，1914年。

(262)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2编，第91页。

(263) 《田赋案牍汇编》中册。

(264) 《政府公报》，1914年12月12日。

(265) 《政府公报》，1916年5月25日。

(266) 《申报》，1914年11月16日。

(267) 《段芝贵密呈》（191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268) 《刘心源、何思澄致财政部电》（1915年3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69) 《民国财政纪要》。

(270)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厘金案牍汇编》中册。

(271) 《民国财政纪要》。

(272)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验契及契税案牍汇编》第2页，1914年。

(273) 《民国财政纪要》。按：《民国财政史》民三收入为三千一百八十二万余元，民四为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余元，稍有出入。

(274) 《民国财政纪要》。按：《民国财政史》民三收入为三千一百八十二万余元，民四为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余元，稍有出入。

(275)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印花税案牍汇编》第1辑，第85页。

(276) 《申报》，1916年1月14日。

(277) 《民国财政纪要》。

(278) 肃政使夏寿康呈，《政府公报》，1915年9月14日。

(279) 《政府公报》，1915年9月15日。

(2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16年4月条。

(281) 《政府公报》，1914年2月8日。

(282) 《政府公报》，1914年2月8日。

(283) 《民国财政纪要》。

(284) 《申报》，1912年6月10日。

(285) 《吴鼎昌致大总统电》，《政府公报》，1912年6月4日。

(286) 《湘省纸币流毒至此耶》，《申报》，1913年6月27日。

(287) 《鄂省财政新谈片》，《申报》，1913年4月30日。

(288) 《廖仲恺函》（1913年4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89) 《申报》，1912年11月6日。

(290) 《徐绍熙禀财政部文》（1915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按：民国银行为江西省银行。纸币发行数据李烈钧1913年1月14日报告折合银元达一千四百六十九万五千三百二十元，远远超过上述数，而1913年10月间核实统计报部之数与徐文接近，但也有出入。

(291) 《南昌商务总会致大总统电》（1913年9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92) 《徐绍熙禀财政部文》（1915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93) 《调查员整顿东三省财政之条议》，《申报》，1914年1月10日。

(294) 《申报》，1913年10月21日、23日。

(295)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8日。

(296) 《政府公报》，1915年10月22日。

(297) 《粤省财政之大恐慌》，《申报》，1914年2月22日。

(298)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整理广东纸币始末记》，1915年版，第30页。

(299) 广东通行毫洋，新纸币以中央新铸银元为准。

(300) 《申报》，1914年6月14日。

(301) 《中国银行致财政部函》（1916年1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2) 《调查员姚传驹致财政部条陈》（1914年10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3)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致财政部详》（1914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4) 《财政部致东北三省巡按使咨》（1914年7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5) 《会办东三省官银钱号及广信公司事宜潘鸿宾呈三省币制整理困难轻材不克任重恳恩准予辞职文》（1914年9月），《政府公报》，1914年10月3日。

(306) 《黑龙江官产调查员楼振声密陈》（1914年7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7) 《民国财政纪要》。

(308) 《申报》，1915年10月10日。

(309) 《财政部致湖南巡按使电》（1916年3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二卷
(1912—1916)
下

李 新 李宗一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二卷

（1912-1916）

下

李新　李宗一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熊希龄内阁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
一　熊内阁及其大政方针
二　袁世凯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
三　列强承认北洋政府
第二节　国会被解散和毁法造法
一　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和国会遭难
二　熊内阁垮台和进步党人失望
三　《临时约法》被撕毁和袁记约法的产生
第三节　袁世凯独裁制度的建立
一　政事堂及其他行政机构
二　中央军事机关的改组
三　地方官制的变化
四　警察系统及其对人民的迫害
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
第一节　封建复古逆流和恢复帝制的酝酿
一　封建复古逆流及祀孔、祭天
二　清室复辟活动的失败和帝制的酝酿
第二节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一　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
二　“二十一条”交涉
三　袁政府对日屈服和群众的反日风潮
第三节　袁世凯称帝
一　筹安会策动“请愿君主”及各界反应
二　北洋派内部的请愿和分歧
三　帝国主义列强对帝制态度的变化

四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
五　洪宪皇帝
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一节　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
一　国民党人坚持讨袁活动
二　孙黄分歧
第二节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一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二　武力讨袁活动
三　暗杀活动
四　肇和之役
第三节　黄兴与欧事研究会
一　欧事研究会的成立
二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
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一节　云南首义
一　梁、蔡拥袁立场的转变
二　京津策划军事讨袁
三　云南反帝制斗争的酝酿
四　蔡锷抵滇与云南宣布独立
第二节　护国军分路出征和黔桂响应
一　第一军北攻四川和贵州独立
二　北军南下和川南、湘西之战
三　第二军东出桂粤和广西独立
第三节　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和帝制的取消
一　中华革命党军事讨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二　各阶层人民对反帝制战争的支援
三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第十章　全国一致迫袁世凯退位和袁的败亡
第一节　全国一致迫袁退位

一　川南停战与广东浙江独立
二　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三　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四　四川和湖南“独立”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结局
一　袁世凯忧惧而死与新旧约法之争
二　护国阵营的分裂和军务院撤销
三　护国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熊希龄内阁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

一　熊内阁及其大政方针

宋案发生后，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自5月间就被迫“请假”，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7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各部总长也七零八落，除陆军、海军、外交、司法、农林、交通有总长之外，其余各部都以次长代行总长之权，内务为王治馨，教育为董鸿祎，工商为向瑞琨，财政为梁士诒。当时，袁世凯正在全力准备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暂时无暇顾及内阁人员的补充问题。7月底至8月初，对南方用兵节节胜利，使调整政府机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对于总理这一重要职位，袁世凯不想让与北洋毫无关系的人担任。他曾想请徐世昌出山，表示“舍徐菊人殆无第二人足以相属”(1)，但由于遭到国民党和进步党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对，徐不肯从命，只得作罢。最后，他不得已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他表面上说除国民党“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暂时利用。因为对南方的战争尚未结束，正式大总统选举也没有进行，此时取得进步党人的支持，对战胜国民党是非常重要的。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县，祖辈在湖南世代为官，遂入凤凰籍，故人称熊凤凰。他是进士出身，怀抱经国济世大志，戊戌维新运动时，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改革封建弊政，参与创办学堂、报纸及学会等维新事业，并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理，

聘请梁启超为学堂中文总教习。戊戌政变发生后，他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1903年，由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准起用，任湘西路师范学堂监督。1905年，他随钦差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出洋考察政治，游历日、美、英、法、德、俄各国。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历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盐运使、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兼奉天造币厂总办等官差，有理财能手之称。在此期间，他还多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与梁启超、杨度和徐佛苏等立宪派名流过从甚密，并暗中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大吏为立宪派捐款，还参与创办政闻社等立宪活动。民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皆为理事。1912年4月就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7月14日解职。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任命他为热河都统，次年2月赴承德上任，曾筹划热河建省及整修前清避暑山庄等事务，同年5月被推为进步党名誉理事。他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7月初，当江西准备起兵抵抗北洋军时，他曾以热河都统名义通电全国说：“尚望参众两院破除党见，电责叛军首领迅速解兵，听候裁判”，否则“愿与副总统及各都督共击之”[(2)]。至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

与前几届内阁一样，熊内阁组阁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次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希龄在7月初得到组阁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意外，7月18日上辞呈说：“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所以总理一职“万难从命”[(3)]。袁复电不允，并命他速来北京“计议大局”。7月20日熊希龄入京，与袁面谈，并与进步党领导人筹商进退。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并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北洋派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

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8月26日熊就职，28日赴参众两院发表施政演说，但内阁人选仍未完全确定。一直拖到9月初，袁才同意采取折衷的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9月11日，各国务员经国会通过，并由袁世凯任命。至此，民国以来的第三届内阁才正式组成。阁员九人中，进步党四人，其余五人都是北洋派。熊内阁是北洋派和进步党的联合内阁。由于梁启超、汪大燮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人的黄金时代。鉴于赵秉钧内阁应办之事都由总统包揽，“国务院不过盖章、副署之机械而已”[(4)]，熊希龄一上台就表示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府划清权限”，并“勉成责任内阁人员，当不顾利害，积极负责任”[(5)]。梁启超也想一显身手，为内阁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经国务会议通过。熊率领全体国务员出席国会，郑重宣布大政方针，此后并在全国各大报纸刊布。这是以往历届内阁所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所以熊内阁给不少人以政象一新的观感。

内阁宣言书，洋洋万言，对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各项大政都有论及。叙论一段说，民国“破坏之时告终，建设之时方始”，“然希龄等今日不敢语于建设，但有竭其绵薄，以立建设之基础，为愿已足”。试图把国家引向建设，这是宣言书的根本点。在外交方面，宣言书表示抱“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和“审时相机以结悬案”两大方针，“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治”。他们认为，内治根本在于财政。民国两年来“中央既一无所入，惟仰给外债以度岁，地方则又思分中央所借外债之余沥以自活，循此不变，债债相引，其势将举全国所入尽充外债利息。如此，则破

产之祸岂俟数年后哉”？因此，必须大力整顿财政，而整顿之道，则从治标治本两方面着手。治标之策为政府严格控制预算，量入为出，以便达到“实际上收支适合”和“勿以外债充经常费”。治本之策有三点：一为改正税制。“就现行诸税择其中最繁苛厉民者裁汰之”，余则加以改良整顿，同时“略参以国家社会主义，添设新税，求国家增加收入，而民亦间接受其利”。计划采用的税目有田赋、盐课、契税、宅地税、印花税、出产及销场税、烟税、酒税、矿业税、一部分营业税、一部分所得税、遗产税、通行税、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此外还有验契税、官发证婚书费等。二为整理金融，统一货币，暂照旧习惯用银本位，将来实行金本位。三为改良国库。关于军政，他们计划练兵五十万，“其性质大别分为两种：甲种用陆军编制法，以军长、师长统之，分驻要塞边防，纯由中央节制调遣者；乙种用警备队编制法，归各地方行政长官节制调遣，分配各州县从事捕盗，诘奸，以补行政警察、司法警察所不及者”。他们还认为：“中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又由于“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斟酌两者之间，则须就各种产业之性质以为衡，若棉若铁若丝若茶若糖，其最宜保护者也；若普通之矿业，其最宜开放者也。外商投资于我境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恒得其六七，故政府愿与国民共欢迎之”。

对于私人工商业，他们也拟加以提倡奖励。宣言说：“官办事业择其性质最宜者乃行开办，其他皆委诸民，不垄断以与争利，但尽其指导奖劝之责而已。”不仅要重视工商业，还要“辟垦荒地，改良农业”，“一面设法普及农业银行，一面以国力兴修水利”。

除以上所谓“谋自立以渐进于富强”的政策外，在宣言书里还大讲改革弊政，如励行军政民政分治，取消行省制，改为道、县两级制，实行减政主义，推行官吏考试制度。此外还准备整饬纲纪，齐肃民俗，提倡教育，奖励工商诸学，增进国民智能，等等[(6)]。

熊希龄一再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上任伊始，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就表示：“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制

国是也。”“谓中国人无共和国程度，鄙人绝不敢言。欲使中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制国不可。”[7] 在大政方针宣言书里，他又说：“今之稍知治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而养成法治国家的办法，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不可。使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懔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针对以往“法规之不适”和“法官之乏才”的弊端，他提出“宜参酌法理与习惯，制定最适合于我国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据”，同时“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以杜滥竽，而肃官纪”。法官的选择任命，比其他官吏要更加严格[8]。

应该说，熊内阁宣布的大政方针，从主观上讲，并不完全是徒托空言，借以愚弄人民。虽然这个方针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如军队“皆以维持国内秩序为职志”，“以收锄暴遏乱之效”；在教育方面，以“孔教为风化之本”；对外未敢涉及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等等。但从总体来看，宣言在经济上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政治上，主旨在于贯彻法治精神，不失为是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人的确也想循此方针，有一番作为。但是，这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真实意图相抵触。袁的政策是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建立封建独裁统治。所以，大政方针作为“抽象的计划”，袁世凯甚为“嘉许”，对于责任内阁也表示“绝不掣肘”[9]，但一旦见诸实行，则阻力横生，以致流弊百出，面目全非。所谓“第一流人才”“心力虽坚，而能力不足”，他们想做的事既不能做，他们能做的事，就只有助纣为虐了。

二　袁世凯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

国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但这两项工作谁先谁后，却发生争执。袁世凯深知总统非他莫属，所以极力主张先选总统。他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帝复辟的危险。北洋派和一部分进步党国会议员都附和他的主张。

持先制定宪法说者，多为国民党议员。他们说：总统的地位和权力都根据宪法产生，只有依宪法选举总统，才能使民国走上法制的轨道，否则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本来意见不一致，于1913年6月15日开会讨论时局时，梁启超发表政见说："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10)]。经会议表决，大都赞成以梁氏意见作为该党的主张。由于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看法趋于一致，国会于6月底议决先制定宪法，并按《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分别互选出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赶制宪法。

7月初，参众两院分别选举宪法起草委员，各党派竞争颇为激烈，都希望多得名额，以便对宪法起草有较多的发言权。选举结果，参议院在国民党籍的有：汤漪、蒋举清、杨永泰、高家骥、段世垣、金永昌、向乃祺、张我华、王鑫润、宋渊源、吕志伊、金兆棪、蒋曾燠、朱兆莘、王用宾、赵世钰、石德纯、金鼎勋；在进步党籍的有：丁世峄、蓝公武、解树强、陈铭鉴、陈善、王赓、陆宗舆、曹汝霖、王家襄；在共和党籍有：钱应铭、车林桑都布、阿穆尔灵圭。众议院在国民党籍有：张耀曾、杨铭源、谷钟秀、孙润宇、刘恩格、褚辅成、孙钟、李芳、伍朝枢、史泽咸、易宗夔、陈景南、彭允彝、李肇甫、徐秀钧；在进步党籍有：刘崇佑、李国珍、汪荣宝、汪彭年、王印川、张国溶、王敬芳、孟森、李庆芳（后来加入公民党）；在共和党籍有：黄云鹏、何雯、黄璋、王绍鏖、吴宗慈；超然派有夏同龢。此外，参众两院又各选出候补委员十五人。

当时有一些议员同时参加两党，又不时变动，因此对议员的党籍进行精确统计颇不容易。从上述正式委员来看，国民党员三十三人，占多数；其次为进步党员十八人；共和党员八人，居第三位。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大多数都主张监督袁政府，是政府的反对派，所以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使袁政府北洋派深感不安。

7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众议院会堂举行成立会。在15日召

开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规定“非有委员三分之二出席不得开议”，“决议以委员总额半数之一致通过之”，“非国会议员禁止旁听”等。19日，会议决定组织理事会，并选举汤漪[11]为委员长，蒋举清、杨铭源、王家襄[12]、黄云鹏、夏同龢、杨永泰等六人为理事，并选定天坛祈年殿为会所，从第四次会议起即在天坛召开，所以他们制定的宪法就称为“天坛宪法草案”。

正当宪法起草委员会赶制宪法时，二次革命爆发，政局突变。国民党籍议员素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些激烈派，敏锐地感到在袁世凯的暴力面前，国会、宪法不足恃，在北京难以容身，遂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但仍有一些激烈派议员和稳健派一起留在北京，准备在国会弹劾袁世凯，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视激烈派为附乱分子，为配合对南方用兵，他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借此对国会施加压力。“北京军警联合会”到处散发传单，诬称国会“结党逞凶”，“阴谋倾覆政府”，并威胁道：“倘仍怙恶不悛，甘为民贼，当与全国共弃之。”[13]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籍议员公然实行镇压。7月23日下令逮捕冯自由等人。8月1日，伍持汉在天津被捕，罪名是“勾结乱党，谋叛民国”，于19日惨遭杀害[14]，为民国以来议员为国流血的第一人。8月4日，居正、胡秉柯、杨士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以所谓“犯内乱罪”被通缉。宪法起草委员徐秀钧在北京突然被捕，被解往江西九江，9月1日遇难[15]。8月27日，褚辅成、张我华、刘恩格、赵世钰、朱念祖、常恒芳、丁象谦、高荫藻等八人同时被捕，其中前四人为宪法起草委员[16]。

当时，国民党本部由留在北京的稳健派议员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汤漪等人负责维持。由于袁世凯的血腥手段，国民党人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逃出北京，国会有瓦解的趋势。梁启超忙上书袁氏，要求发布“尊重国会”令，并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乘时“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他同时派人劝说国民党籍议员：“苟非有附逆实据，政府

必不妄逮捕，脱有误捕，本党任为保结。”[17] 袁世凯使用恐怖手段对付议员，本来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以便利用他们选自己做大总统，因此对于梁氏的建议表示赞赏。他不仅公开发布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而且对稳健派的国民党人故示“宽大”，将二次革命的责任完全推到孙中山、黄兴及起义各省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7月31日，袁命令军警传询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等，勒令表明态度：“如果不预逆谋，应限于三日之内自行宣布”，并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如“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关”，必按法惩办[18]。吴景濂、王正廷等即召集国民党人商议，决定“遵政府命令办理”，以保全国民党[19]。因此，当南方国民党人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人仍然照常活动，议员照常出席国会。

为了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8月间袁世凯指使一些议员，接连向国会提出先选举总统案，同时策动黎元洪领衔，联合直、鲁、豫、黑、陕、甘、浙、川、黔、滇、桂、闽及新疆等十四省都督致电国会，要求速选总统。8月30日，黎元洪又电催梁启超和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20]。在内外压力之下，进步党人首先变了腔调，赞同先选总统，并派刘崇佑、黄群等为代表，与国民党人张耀曾、谷钟秀等一再协商，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国会于9月5日顺利地通过了选举总统案。

国民党之所以同意先选总统，主要是因为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党员为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还特别声明虽曾入党，“足也未至党门一步”[21]，以示清白。有的转入以前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派别，如景耀月和孙毓筠的政友会，刘揆一的相友会，夏同龢的超然社等。有的则投入进步党。因此，国民党一蹶不振，留在国民党内的人，也不敢倡言“法律倒袁”了。许多人还误认袁世凯的最大野心只是在于取得正式大总统。既然无人能和他竞争，不如趁早称他的心愿；否则他如解散国会，则政治上失去一个活动场地，制宪工作也会中断。他们没有料到，对野心家的迁就，很快便带来严重的灾难。

袁世凯对国会活动的干预和压迫，引起许多议员的不满，原来进步党和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形势，反而日趋和缓。两党议员遇事经常协商，国民党人支持熊希龄组阁，两党一致反对徐世昌出任阁揆，所以熊希龄内阁在国会能以绝对多数票顺利通过。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不利于己，便指使梁士诒出面另组御用党。梁士诒收买一些平素与他接近的小派别，其中包括山西李庆芳为首的同志会，广东司徒颖组织的潜社及集益社的一部分人等，于9月7日凑成公民党。该党以梁士诒为党魁，以叶恭绰为副，主要骨干有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由于交通系官僚纷纷加入，财力雄厚，一时气势颇盛。他们发表宣言说："本党以国家权力实行统一，增进人民福利"，关键是要"选举正式大总统"，否则不仅"无论何种政策皆难设法"，而且国家将有"至大危险"[22]。他们又通电各省都督，请一致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由此可见，公民党完全是袁氏为攫取正式大总统的桂冠而纠集起来的一帮打手，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

有公民党鼓噪，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9月12日，国会决议由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五天之内制定出总统选举法，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公布。1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0月4日国会讨论通过，咨送袁世凯，并于政府公报上发表。

国会于10月6日召开总统选举会，王家襄为主席。这一天，袁世凯仍放心不下，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出军警"保卫"国会。此外，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便衣军警千余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参观的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王家襄也宣布，议员不得自由离去。此前，在进步党的一次集会上，已一致通过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唯一有可能与袁竞争的黎元洪，又多次表示他绝对无意担任总统之职。因此，进步党人大都不怀疑袁世凯将顺利当选，但袁氏这套包围国会的把戏，实在使他们感到难堪。国民党人更是满面愁容。会场气氛一开始就十分沉闷、紧张。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轮尚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候选人只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并以过半数即可当选。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人。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其余的选票中伍廷芳得三十三票，段祺瑞得十六票，孙中山得十三票，康有为得十一票，还有几个名人各得数票。因为没有人达到法定的当选票数，袁世凯尚缺九十九票，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议员共七百四十五人，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离当选仍差六十三票。时已过午，有些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见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叫苦不迭，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轮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以五百零七票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9点。议员们饥肠辘辘，仓皇归去。

第二天，国会选举副总统。七百一十九名议员出席，黎元洪以六百一十票的多数当选。但黎元洪不愿到北京就职，仍留在湖北继续当都督。至当年12月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武昌促黎北上，黎才不得不离鄂进京。

对袁世凯唆使军警强迫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全国人民普遍不满。上海、天津等地报纸揭露了选举的情况和军警的不法行为。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国务院通电各省说：“此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23)

10月10日，北京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本应赴国会宣誓就职，为防不测，改在清宫太和殿举行。这里原是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的地方，殿内划为东西南北四片，北面正

中设就职台（即前清皇帝登极的宝座）。文武官员立于东侧，西侧为各国公使、前清皇室代表、蒙古地区代表及记者，南面居中为国会议员。议员所以得此位置，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争来的。先是，大典预演之际，本定议员立于两侧。王家襄说："民国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和议员宣誓，议长、议员的席位应设在北面向南居中处，听取总统矢誓，万不可侧居客席，贻讥世界，此事必须持重审慎。"袁世凯则坚持他非坐北朝南不可。经过一番争论，才折衷决定将议员侧立改为中立。上午10时，赞礼官宣布总统将至，全殿鸦雀无声，这时戴金线军盔、着蓝制服、佩带军刀的武士三百二十人雄赳赳地整队进入大殿，分两排站在东西两席前，形成警戒甬道。接着，侍从文官梁士诒、夏寿田和侍从武官荫昌、唐在礼，分别乘四人抬彩轿四座进殿。最后袁世凯乘八人抬大彩轿进殿。他身穿钴蓝色大元帅服，金线装饰甚多。下彩轿后，由四侍从官簇拥登就职台。少顷，赞礼官赞礼。袁世凯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略称："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而不取急进"，"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对于国家建设，他强调以道德为体，法律为用；道德范围广大，"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他要求"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他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的原因，一在教育幼稚，一在资本缺少，因此要"输入文明教育"，"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最后他表示："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24)

当天下午3时，由一群文武官吏前呼后拥，袁世凯乘二人肩舆登天安门，举行阅兵式。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五人陪同检阅。接受检阅的队伍包括拱卫军、京卫队等共两万余人。袁世凯还颁发各种勋章，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获勋一位，以此表明

民国总统的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室禅让的。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三位。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大张宴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同时，由外交总长孙宝琦邀请达官贵人和外国公使及夫人，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迎宾楼举办盛大晚会。人人穿晚礼服，男女翩翩起舞，至夜半尽兴始散。

对于北洋派和进步党人来说，1913年10月10日确实是“双喜日”[25]。当时参加庆祝典礼的记者黄远庸亦无限感慨地写道：“中华民国已由筚路蓝缕之时期，入于重熙累洽之时期，此后庄严民国之现象亦当若此耳。”[26]

三　列强承认北洋政府

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曾多次要求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列强均置之不理。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北迁。东交民巷外交使团虽然和北京临时政府频繁往来，“暗示承认”，但始终不肯呈递国书，给予公开承认。北京政府得不到列强承认，在袁世凯看来是了不得的事情。为了取得“明示承认”，他派人与列强驻京公使屡次谈判，不仅表示承认前清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对于日、俄、英三国还不惜让予新的权益作为交换条件。

列强暂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原因很复杂，各个国家的想法也不一样，但绝不像它们所标榜的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意味拒绝支持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一般来说，它们拒绝承认的共同原因，是要袁世凯对列强在华的权益不仅要作出口头保障，而且还要表明他具有履行“各项国际义务的意志和能力”[27]。早在1912年2月21日袁世凯刚刚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日本政府就照会欧美列强，建议对承认民国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并应以保障前清各项条约、外人在华享有一切权力、特权及豁免权等，作为承认的先决条件[28]。英、俄、法、德、美各国对日本建议的原则都表示赞成。英文《京

津泰晤士报》还发表题为《承认民国与中央权力》的社论，露骨地表示："对于正式承认问题，应视其权力能否强迫各省继续奉行前清所订条约，然后再行提议。"[29]

至1913年春，由于中国国会即将正式组成，列强之间再次磋商承认问题。此前，美国在同意日本提出的列强行动一致原则时，曾附有声明："此种行动不致对于承认中国新政府引起不必须之延缓为限。"民国建立后，美国国内舆论主张立即承认，国会在1913年1月2日就通过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决议案。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列强对华一致的原则，决定从缓承认。1913年3月，美国新总统威尔逊就职后，于4月2日通知其他列强，说明一旦中国国会开幕，美国即行承认。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认为：承认将在全国起稳定作用，增加老百姓对共和国的尊重，还可以使袁政府的反对派丧失信誉。对美国的做法，其他列强多不表赞同，日本反对尤甚。4月4日，日本驻美大使对美国国务卿表示：由于"宋案"发生，中国南北双方将起重大纷争，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此时"若遽然承认北京政府，即等于援助袁世凯与南方孙、黄等人作对。倘若造成如此结果，不仅为各国着想有欠妥善，即为中国本身着想，恐亦难以谓为得宜"[30]。美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所谈的情况"含有某种偏见"[31]，乃单独行动，于5月2日送达威尔逊致袁世凯国书。同时送达国书的还有墨西哥和古巴。巴西和秘鲁则已于4月9日承认，为最早承认民国的国家。

同年秋，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将南方各省置于北洋势力的控制之下，列强认为他已经具有了强迫各省继续奉行不平等条约的能力，承认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经过多次秘密的和公开的交涉，袁政府和列强终于达成了协议。依照列强的旨意，袁世凯在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

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32] 袁氏的声明底稿早已于10月2日送北京外交使团，并经他们认可。同时各国公使据此底稿都向本国政府请示了承认问题。因此，袁世凯一当选总统，日、英、俄、德等国都立即表示承认，并致贺电[33]。列强驻华外交官于10月10日参加袁氏就职典礼，亲自听到他的保证，“无不为之欣然”[34]。

必须说明的是，除维护列强在华的条约权益外，日、俄、英三国还分别以承认问题要挟袁政府，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

日本帝国主义对任何可能在华扩张其势力的机会从不放过。1913年8月5日和11日，山东兖州和湖北汉口先后发生日本军官被拘留事件。9月1日，张勋的辫军攻占南京时，有日侨三人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大肆渲染，叫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日本驻北京公使山座园次郎按其政府训令，于9月11日向袁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赔偿要求，并表示如不尽快满足要求，将影响承认问题。山座提出的要求如下：

关于兖州事件的三条：一、事件直接负责人罢官；二、武卫前军指挥官前往日军司令部谢罪；三、由中国政府行文向日本政府致歉。关于汉口事件的四条：一、中国政府应严惩此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指挥官和士兵，并由日本军官观刑；二、革斥事件之军队长官；三、由其师长赴日本领事馆谢罪；四、由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表明歉意。关于南京事件的六条：一、犯事兵卒及其直接指挥官应处以死刑或严刑，并由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官员观刑；二、直属长官应严加戒饬；三、江苏都督应赴日本领事馆谢罪，并予以撤职；四、日方之死伤损失由中国政府如数赔偿；五、犯事之中国军队应至日本领事馆门前行举枪礼，以表谢罪之意；六、中国政府应派代表向日本政府谢罪。

接到日本的要求后，袁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支持南方反袁力量，一方面急切希望得到日本承认，以稳定反动统治，遂于9月15日除拒绝立即撤换张勋外，满足了日本的全部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8月间还以承认问题挟制袁政府，勒索满蒙地区铁路建筑权。经过多次交涉，10月5日遂有中日关于满蒙五路借款预约换文。该项换文是秘密的，经孙宝琦、曹汝霖签发。通过该项换文，日本取得三条铁路的借款权，即四平至洮南府，开源至海龙城，长春至洮南府；还取得关于洮南府至承德，吉林至海龙城两条铁路的借款优先权。由此，日本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日本控制五路的目的，不单纯为了经济掠夺，主要是为其进一步扩张军事侵略作准备。这实际上是第三次日俄密约的具体实施。

沙皇俄国乘承认民国之机，蓄意扩张它在蒙古地区的侵略权益，“不看到蒙古问题的解决，将不会予以承认”[35]。经过长期交涉，袁政府终于屈服于俄国的压力，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实际上满足了它的无理要求。英国也以承认问题为筹码，迫使袁政府派代表参加由它控制的西姆拉会议，企图通过改订新约，进一步染指西藏地区。

帝国主义列强虽然承认了民国政府，但其在华外交使团和袁政府的外国顾问，大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中国必须由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来进行统治，才能免于混乱。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次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36]虽然主张有限的代议制政体，但他认为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对中国是十分必要的。法律顾问古德诺[37]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和制定法律时，如若借鉴西方国家，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的。另一法律顾问有贺长雄[38]认为“中华民国并非纯由民意成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因此中国应有合乎国情的独特立法。他说：议会政体对中国是不理想的，中国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1913年他出版了

《观奕闲评》一书，极力鼓吹修改《临时约法》，以扩张总统权力。他说，中国若采用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一定会造成“南北分裂，土崩瓦解”，若采用“法国式议院共和政体，对富国强兵诸事殊多窒碍”；惟有由大总统决定政治方针，不问何党派，只要“有愿依此方针行其政治者则举之组织国务院”，才能致富强。正是在这些顾问的帮助之下，袁世凯一当上正式大总统，就肆意破坏幼稚的民主共和制度，并迅速地建立起封建独裁统治。

第二节　国会被解散和毁法造法

一　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和国会遭难

国会战战兢兢地给袁世凯戴上正式大总统的桂冠以后，原以为可以专心制定宪法，把袁氏的权力约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使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但抱独裁主义的袁世凯，根本不喜欢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加以限制，所以一当上正式大总统，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对国会的憎恶了，并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动进攻。

在制宪问题上，国会步履艰难。早在北京参议院时代，各党派就开始蕴酿制定宪法。1913年2月，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及民主党等四大党的议员十八人，组成宪法讨论会，由共和党的汪荣宝和国民党的易宗夔担任干事，定期交换意见，磋商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则和内容。当时，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和古德诺对制宪问题横加干涉，都极力鼓吹“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扩张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也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多，并下令成立了一个由北洋官僚、政客组成的宪法研究会，任命杨度、马良为正副会长，作为政府编纂宪法的机关，以此与宪法讨论会对抗。同年7月，国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后，宪法讨论会便自行解散，但政府的宪法研究会依然进行活动，并粗暴地干涉国会起草宪法的工作。

8月19日，当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时，袁世凯派官员将宪法研究会制定的“宪法大纲草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共二十四条，主旨在于扩大总统权力，如“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等等。此项草案引起宪法起草委员的激烈反对，认为政府无权干预宪法起草工作，并将袁派来的官员驱逐出会场。于是，袁世凯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开始趋于表面化。10月中旬，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脱稿，共十章一百十三条。与《临时约法》比较，草案虽然明显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对袁世凯让步很多，但是仍含有责任内阁的精神，没有满足袁氏强烈的独裁欲望；尤其对他事先要求的两条，即任命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和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均未采纳。

10月16日，即国会选举总统后的第十天，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他说：“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餍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得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生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他要求国会“从速议决见复”[(39)]。他还提出应行修正的具体条款为：大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官吏、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均无须经国会同意；在国会闭幕期间，大总

统有权制定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及临时财政处分权等。

时隔一天，即10月18日，袁世凯又向国会提出咨文，指责国会10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侵犯了他的法令公布权。他说："本月四日宪法会议议决大总统选举法案，来咨虽仅止声明议决宣布，并公决送登政府公报等语，显与《临时约法》及《国会组织法》规定不符。然以目前大局情形而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友邦承认问题又率以正式总统之选举能否举行为断。是以接准来咨，未便过以《临时约法》及《国会组织法》相绳，因即查照来咨，命国务院饬局照登。惟此项咨达饬登之办法，既与约法上之国家立法程序大相违反，若长此缄默不言，不惟使民国议会蒙破坏约法之嫌，亦恐令全国国民启弁髦约法之渐，此则本大总统于宪法会议之来咨，认为于现行法律及立法先例俱有不宜，不敢不掬诚以相告者也。"接着他提出："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40] 这就是说：如不经他批准，不仅他所依以当选总统的《大总统选举法》无效，即将完成的宪法他也拒绝承认。

这时国会正在讨论宪法草案，认为没有必要再修改约法，并且因宪法草案尚未通过，公布权问题也无必要马上答复。同时，国民党和进步党的一些议员看到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咨文，深感局势严重，制宪工作前途未卜。为了表示制宪的决心，他们便联合起来于10月18日组成民宪党。该党以"保障共和、拥护宪政"为宣旨，公开声明："对于国家负忠诚之义务，有摇撼吾民主国体者，必竭力以维持之，保护之。"[41] 其领导人是原国民党人张耀曾、谷钟秀、汤漪、锺才宏、杨永泰，和原进步党人丁世峄、蓝公武、刘崇佑、李国珍、汪彭年等。因此，国会里一时形成国民党和民宪党联合，与进步党和公民党抗衡的局面。而且前者稍占优势，基本上控制了国会的制宪工作。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等虽然卖力地瓦解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极力用"开明专制"的谬论蛊惑人心，支持袁世凯扩张权力的主张，但是他们始终未能左右国会制宪工作，所以袁世凯不得不亲自出马横加干

涉。国民党和民宪党携手与袁世凯斗争的唯一结果，是加快了袁氏摧毁国民党和国会的步伐。

鉴于国会无意对制宪方针作出重大改变，袁世凯便进一步挑衅。10月24日，当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时，他派遣施愚、顾鳌、黎渊、方枢、饶孟任、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等八人为政府委员，突然出席。他们说是“奉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并宣布袁氏咨文，要求此后开会都要事先通知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宪法起草委员会屡经摧残，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迫逃离北京。当时，每次开会出席议员不过四十余人，但国民党和民宪党籍议员仍占多数。他们仍企图控制立法权，建立法制的国家，以维持民国以来的政治局面。所以他们当即拒绝八“钦差”出席，并指出按会章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即旁听亦不可”。

袁世凯闻讯，恼羞成怒，指责“国会专制”，并决心用暴力手段对付国民党和国会。25日，他公开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要他们对《天坛宪法草案》逐条研究，“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并煽动说：“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乃国民党人破坏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又说：“此次草案既有人主持于前，自必有人构成于后，设非借此以遂其破坏倾覆之谋，何至国事民情，梦梦若是！证诸人民心理既不谓然，即各国法律家亦多訾驳。本大总统忝受托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而不言。……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42)

此电发出后，各省都督、民政长等都心领神会，纷纷复电响应。10月28日，直隶冯国璋和刘若曾通电说：国民党人的“破坏行为，未得志于南方，今又肆毒宪法”；“得志于南方，糜烂一时，肆毒宪法，永远受害”。因此要求对宪法草案“关于行政各条，务宜殚心研究，详加修改”[43]。次日，浙江朱瑞和屈映光通电要求修改宪法，扩充政府权力。他们说：“吾国现状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必不足以振兴内治，抵御外侮。欲有强有力之政府，则断不可使行政权横受国会束缚。”[44] 河南张镇芳通电列举了宪法草案的所谓“谬点”后，说宪法起草委员会“欲蹈专制君主之喜怒用事”，“竟敢订此暴民专制之宪法”，要求将国会中“凡在国民党籍者概行开除，或即另行改造，布告各省，严行取缔，停止国民党人被选举权”[45]。湖南汤芗铭通电说：“以行政一部为国会附属品，必致国亡种灭。”他要求袁世凯毅然独断，解散国会，“切实搜捕乱党，以断根株，庶几海宇澄清，治安可保，否则祸变相寻，将有不忍言者”[46]。10月31日，张勋通电指责宪法草案“谬点甚多，摘不胜摘”，只有立即宣布作废，并解散国会。最后他表示“勋虽不才，诛锄叛逆，以身捍国，虽冒万死所不辞焉”[47]。此外，广东龙济光、江西李纯、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及湖北黎元洪等都通电附和，几天之内即有数十通，都以修改或取消宪法草案作引言，肆意诋毁国民党和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而且大都主张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有的则干脆主张解散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而由袁世凯“察纳众言”，另定“中华民国万世不易之宪法”。

在一阵舆论攻势之后，袁世凯便借口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密电，于11月4日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他说：“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议员潜相构扇”，“乱国残民，于斯为极”，并饬令北京地区警备司令和京师警察厅立即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证章。当天，有军警数百人包围国民党本部，次日又包围国会，不仅将当时国民党籍议员证书、证章全部没收，而且将已经宣布脱离国民党而改入他党或“曾通电反对赣乱者”，

也一律追缴。两天之内共追缴议员证书四百三十多件，超过国会议员总数之半。国会从此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只得停会。

为了掩饰解散国民党的不法行动，袁世凯于当天还发布了一个冗长的告示，肆意歪曲二次革命的过程和意义，把民国以来坚持反对袁氏独裁，努力维持民主共和制度的国民党人，诬蔑为“称兵构祸之暴徒”，而他则是“为救国救民起见，不得已而依照国家法律用兵定乱”。他说：“本大总统何能宽容少数乱徒，置四万万人利害于不顾，不得已始有解散该党之令。”(48)

国会危机，引起非国民党籍议员的普遍忧虑和恐慌。11月6日，进步党集会讨论时局，汤化龙报告国民党被解散的经过。他说：“民国成立，宪法尚未制定，此事之发生，对政党而言固为不幸，而影响于两院、关系国家前途至大。”他劝告进步党议员说：仍要积极进行，以维持大局，“万不可以感情用事，飘然引去，置国事于不顾”(49)。经过讨论，许多人都希望设法维持国会，要求袁世凯保留业已脱离国民党籍的议员，使国会能有开会的必要人数。次日，两院议员开联合会，赞同进步党的主张。王家襄和汤化龙两议长晋见袁世凯，代表国会议员提出要求。袁世凯表示此事关系颇大，政府需要调查之后，才能决定。此后，袁氏提交国务院解决，国务院答以调查困难，无法办理。于是，国会便只有取消一途了。

11月1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乃自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2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除广东、江西、湖南等省议会因附和“乱党”已经解散外，其他各省议会，凡国民党籍议员一律取消资格。黎元洪不仅通电赞成“对国民党省议员一律追缴证书证章”，而且要求“对各县国民党籍议员，亦应一体办理”(50)。从此，全国各级议会皆陷于停顿状态。

11月上旬，国会残余的议员迭次集会，相顾沮丧，均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议事。王家襄和汤化龙便于14日联名宣布停发议事日程。

对于袁世凯摧残国会的行径，社会舆论普遍不满。11月17日和12月3日，众议院议员一百九十四人和参议员六十一人联名分别向袁政府提出质问。众议院议员气愤地指出："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至于追缴证书证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又说："查议员中有早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最后质问究竟政府方针如何？"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51] 早在这年夏天，梁启超已多次上书袁世凯，建议他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依靠进步党人的支持，控制和利用国会，巩固北洋派的统治地位。在梁氏看来，国会和政党虽然只是形式，但决非无足轻重。他曾劝袁说："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52] 而今国会危如朝露，梁启超和张謇便先后晋见袁世凯，询问善后办法。袁说，这是他为挽救国家危亡，减轻国民痛苦，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并无意根本取消国会。事后，他又发表了一份"维持国会意见书"，说要简化议员选举手续，尽快补选议员。

袁世凯一面对进步党人敷衍搪塞，一面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于11月26日下令组织政治会议。

政治会议由中央和各省官吏所派代表组成，其中每省派二人，蒙藏两地区各派八人，总统派八人，国务总理派二人，每部派一人，共计八十人。所派代表大部分是清末官僚，如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为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赵惟熙、马良、杨度等人，后又增派杨士琦和饶汉祥两人。由于李经羲在清末曾任云贵总督，地位最高，袁世凯就指定他为议长，派张国淦为副议长，顾鳌为秘书长。

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到会委员仅六十九人。上午9时，委员们赴总统府觐见，在居仁堂静坐等候到11时，袁世凯才出来。各委员起立向袁氏行三鞠躬礼，然后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聆听训话。袁致训辞说："共和政治为宪政之极轨，本大总统固欣然慕之。然初何敢谓招牌一改，国力即随之充足。即以目今之内政而论，紊乱何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而犹欲侈谈共和者，真不啻痴人说梦也"。他把"内政紊乱"的原因，归咎于：一是国民"误认平等二字"，二是国民"误认自由二字"，三是国民"误认共和二字"。总之，在他看来，内政紊乱的原因全在国民受乱党的煽惑，而他则是不惜以"一身支撑危局，时而身命财产陷于危险之地，则不妨牺牲一己之身命财产，以保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时而名誉陷于危险之地，亦不惜从而牺牲之，以付身后之公论，以期巩固政府，整饬内政而伸张国力"。最后，他要求各委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务以国情社习为准，勿徒高谈学理"，"切实负起责任，凡利之当兴，害之当除，群策群力，一致进行，生命财产及一身之名誉概可牺牲，则转危为安，即唯诸君是望"[53]。下午，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开幕，李经羲致辞说："本日大总统训辞，兢兢以共同救国为言，而救国之道，则以扶植强有力政府为归。"要求全体委员"无负大总统召集本会之盛意"[54]。

政治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它所讲的"救国救民"的真谛，就是解散国会和修改约法。就在政治会议召开的前后，各省文武官吏为迎合袁世凯的意旨，纷纷通电陈述所谓"救国大计"，如龙济光建议以政治会议代替国会；黎元洪等主张将残留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尽行遣散。袁世凯即据此向政治会议提出一大堆咨询案：十九省都督、民政长要求解散国会案，增修约法案，组织造法机关案，停止省议会案，等等。政治会议无条件地顺从袁的意旨，一一作出了决议。

袁世凯"据政治会议的决议"，于1914年1月10日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四百元，饬令回籍。同时他还煞有介事

地成立了一个“筹办国会事务局”，派顾鳌为局长，接收参议院和众议院，为将来组织新国会作准备。民国第一届国会就这样被正式取消了。当上年4月国会开幕时，袁世凯曾派梁士诒为代表致词，高呼“民国国会万岁！”国会还不满一岁，便被他扼杀了。2月3日，他以各地方自治机关良莠不齐，流品滥杂，藐法乱纪，甚至以“乱党”盘踞把持为理由，下令“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55]。28日，又进一步以“统一国家不应有此庞大地方议会”为理由，下令将“各省议会一律解散，所有一切事宜，由各省行政长官力负完全责任”[56]。十年前，袁世凯是清末筹办“地方自治”的带头人和“召开国会”的支持者，而今在他的眼里，一切“民选机关”都变为罪恶的渊薮。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言行，正是一切独裁者、阴谋家的惯技。

袁世凯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措施，与当时的政府性质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由极少数封建军阀官僚操纵的政府，其权益不可能不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自然也就不可能给予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只有剥夺人民的参政权，不让人民监督，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

二　熊内阁垮台和进步党人失望

与以往两届内阁一样，熊内阁的生命也非常短促。从1913年9月11日组成，到次年2月12日熊希龄被迫辞职，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熊氏的“政绩”主要是恭顺地副署了袁世凯一切倒行逆施的命令，清除了国民党在国内的残余力量，将第一届国会送终。进步党人的“政绩”，正是他们的耻辱，不仅当时受到舆论的抨击，后来也多遭非议。

熊氏在其内阁大政方针宣言中所夸下的海口，如划清内阁和总统府的权限、废除省制、整顿财政、实行法治、改良教育等等，全都成为空头支票，没有一桩兑现。

以划清府院权限来说，民国成立以来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习惯上分府院两方，其秘密者单致府方，因为他们都明白中央实权在总统府。总统府直接复电，末尾署“奉谕特达，公府秘书厅”字样，而不经国务院。国务院仅办照例公文而已。熊希龄曾建议袁世凯改变这种局面，使责任内阁名实相符，并曾令各省关于军事公文直达国务院。但各省文武官吏置若罔闻，重要电文仍直接呈总统府，根本不把内阁放在眼里。熊氏知难而退，只好默认既成事实。

关于废除省制问题。熊内阁原想对中国的地方制度大加改革，实行道县两级制，废除行省制。袁世凯认为他们的想法是书生之见，表示此事牵扯太多，须要召集各省军民长官代表会议讨论。1914年初，袁世凯命令每省派代表二名来京，召开行政会议。但各省代表尚未到齐，袁就取缔了国民党，使国会名存实亡。行政会议变为政治会议，讨论的内容完全改变。后来，政治会议讨论废省问题，熊希龄出席说明计划，大遭反对，并受到种种揶揄。

司法改革也是纸上谈兵。法院独立审判，及审判和检察分立的制度，是从清末司法改良开始的，民国初年仍沿袭。到1913年底，各省成立高等审判厅共十九所，地方厅共一百一十三所，初级厅一百九十七所，法官多由法政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当时司法方面的弊端仍很严重，主要是司法不能独立。除设有初级厅的一百九十七县之外，全国近两千县都由县官兼理审判。在设审判厅的地方，行政官吏干涉司法也视为当然。判决案件不得本地行政官吏认可，不能定谳。军警机关蔑视法律，擅自捕人，司法机关不敢过问。其次是“司法风纪败坏”。法官有不懂法律，“引用条文悖戾原意者”，“有积案多年不予判决者，有任意转移管辖，使当事人疲于奔命者，有设法阻抑上诉，致含冤莫伸者”。检察官“有畏避豪强，坐视罪犯，匿不举发者，有徇庇故纵者，有架诬敲诈者”。法庭书记官“有于出状时勒索规费者，有滥改供词者”，甚或有与“律师朋比阴行苞苴，使当事人饮恨无可陈述者”(57)。

针对上述种种弊政，梁启超曾主持拟定各种条例，试图加以改良，但由于袁世凯抱消极态度，“致生出无限之阻力”，“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加以有些审判厅因“用人未尽当，又系初办，弊病自不能免，遂贻旧派人口实，攻击甚烈”。他们说法院的弊政“较旧日州县衙署且有过之”[58]。因此不仅袁世凯“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制”，就是司法总长梁氏本人也以为“改革太骤，锐进之余，乃生反动”，转而“从维持现状上努力”[59]了。至于熊内阁大政方针宣言所提出的“养成法治国家”云云，自然更如痴人说梦了。

熊希龄上任后，对于整顿税收和财政，计划最为详细，但结果却一筹莫展，以致财政紊乱，国库空虚，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借外债。“各省既不接济中央，反求中央接济，请款之文，告急之电，沓来纷至，积案如山。”作为财政总长的熊氏补疮剜肉，竭蹶腾挪，终日穷于应付。及至1913年底，陆、海军部及各省都督纷纷电请拨发军饷，熊束手无策，只得请求交通部挪借和交通银行垫款。但这两个单位都在梁士诒的把持下，他们公然拒绝垫付，使内阁财政陷于“万难之境”[60]。袁世凯从梁士诒处取得五百万元，转交熊希龄，熊“自不胜其难堪矣”[61]，乃决心辞职。

袁世凯挑选熊希龄组阁，并非看重他有什么经纶大才，让他分享统治权，以施展抱负，而是企图利用他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当熊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以后，袁便立即把内阁看作妨碍自己实行封建独裁政治的障碍，不时抱怨“内阁办事太迟缓”，还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殊多滞隔。”进步党人汪荣宝出任驻比利时公使，辞行时劝袁说：“请勿行总统制，而行总统内阁制，以该制实令总统当冲。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殊多不利。”袁辩驳道：“不然。往年本行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讨段。”袁的决定是无可挽回的。废国务院事既定，1914年1月24日，安徽都督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倡议修改约法，改行总统制，接着各省都督民政长群起呼应。四川胡景伊、陈廷杰通电说：“项城袁公，

绝世之才，中外具瞻，天人合应，允宜屏息退听，纵其展舒。若实行内阁制，俾元首退处无权，何异困蛟龙于沟壑，击麟凤以钳铁。”江苏冯国璋说得更具体：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总理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解散国会则取法，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由于各省都督攻击内阁制的调门越来越高，熊内阁的命运岌岌可危，加以财政困难，无法解决，熊希龄见事不可为，悲观失望，遂于2月3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辞职，9日，他正式上辞呈给袁世凯表示：“到任以来，晌经数月，黾勉从事，不敢惮劳”，“特是筹维鲜效，擘理多疏”；“上无以副钧座殊常之遇，下无以慰国民望治之情。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准予辞职，另简贤能”[62]。当天，袁世凯批准他“免兼财政总长，专任国务总理”，由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熊氏急求摆脱，于12日再上辞呈，坚请“另简贤员，担任国务”[63]。袁世凯当予照准，并派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

熊希龄辞职后，梁启超、汪大燮也连上辞呈。像对待熊氏一样，袁世凯仍假惺惺地慰留，没有照准。梁启超愤愤地说：“大政方针本出自予一人之手，前之不忍去者，实待政策之实行，今已绝望，理应辞职。”[64] 2月18日，梁氏再次上书坚辞，袁于20日照准梁启超和汪大燮辞职，以章宗祥接任司法总长，以严修接任教育总长，严未到任前，由蔡儒楷暂行署理。同时，袁一再派梁士诒、杨士琦等北洋官僚拜访进步党要人，说明尽管将要实行总统制，仍然渴望与他们一起为国效力。进步党要人每以能利用北洋官僚沾沾自喜，而今反为北洋官僚所利用，自然满腹牢骚，怨愤不已，但对袁世凯仍有幻想，认为只要袁氏实行“开明专制”，不愁没有回旋余地。所以熊、梁、汪诸人都分别担任了新职，参政院成立后，又都出任参政。

熊希龄于3月4日出任全国煤油督办，负责筹划探测和开发煤油矿事宜。熊氏拟定了不少勘查开采条例，并延聘外国技师二十余人，勘查全国油矿。他又与美孚石油公司签订合同，合资开采延长和建昌两

地石油。为了取得袁世凯北洋派的支持，他呈请任命袁的亲信袁乃宽（拱卫军军需处处长）为坐办。但此种机构一无资金，二缺人才，所以办理经年，毫无成效。

在辞掉司法总长的前一天，即2月19日，梁启超已接受币制局总裁的新职位。当时全国币制极端混乱，梁氏拟定了整顿币制计划书，企图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改进。但币制局职权范围有限，经费不足，财政部又掣肘，经营数月，梁氏一无展布，加上欧战爆发，原拟币制借款变成画饼，所以自7月以后，梁就不断呈请辞职，到12月27日始蒙照准。接着，币制局也被裁撤。

汪大燮担任参政院副院长。

经杨士琦劝说，张謇仍留任农商总长。1914年初，他与美国公司签订了导淮借款，计划疏导淮河，因欧战爆发，未能兑现。导淮云云，都成纸上谈兵。后来成立全国水利局，他兼任总裁。正在他想对水利建设有一番作为时，帝制运动发生。他知事不可为，便请假回原籍去了。

三　《临时约法》被撕毁和袁记约法的产生

1913年12月22日，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约法增修咨询案”。该会认为《临时约法》必须修改，由大总统提出修改也是“合法”的，但政治会议委员均由政府派遣，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并没有增修根本法律的权力。因此，他们建议袁世凯另设造法机构，以表示尊重约法。

次年1月11日，袁世凯乃就“造法机构究竟应如何组织，应用何种名称，其职权范围及议员选举方法等”，再次咨询政治会议，并令其“尅日议决具复”。政治会议于24日呈复，建议设“约法会议”，其职权“以议增修约法案及其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其议员“酌用选举方

法，然当以学识经验为准”。根据这些建议，袁世凯于26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并下令组织约法会议。

按《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议员共六十人，其中京师四名，每省二名，蒙藏青海共八名，全国商会联合会四名。议员选举是在袁政府严密控制之下进行的。选举会在各地方官吏的监督下组织，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才可以参加选举会：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而通达治术者；二、曾由举人以上出身而夙著闻望者；三、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毕业而研精科学者；四、有万元以上之财产而热心公益者。因此，各地有选举权的人寥寥无几。如京师只有七十一人参加选举会。被选举人均由政府提名，实际上议员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或经他同意的，选举只是形式。3月14日，袁世凯公布“当选议员”共五十七人，其中北洋派官僚占绝大多数。所以当时就有记者说：“约法会议是法制局的放大。”

18日，约法会议在象坊桥前参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实到议员仅四十四人。议长和副议长形式上是推举的，实际上都由袁世凯圈定。袁世凯特挑选孙毓筠为议长，用以表示修改约法并非是北洋派的私意，“革命党”也是赞成的。法制局局长施愚是北洋集团里所谓“法律派”干将，被指定为副议长。袁世凯的秘书王式通为秘书长。不久，王调任政治会议秘书长，由另一个“法律派”干将顾鳌接任。孙宝琦代表袁世凯出席会议并致词，大谈《临时约法》“束缚政府”的滥调，要求约法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最后高喊：“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20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修改约法大纲七条”：

一、《临时约法》昧于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至流于多头政治之弊，亟应修改，以求主权统一。

二、《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须交议会议决，任命国务员、外交官及缔结条约，须得议会同意，使政府用人行政无活动之余地，亟应修改。此外，大总统紧急命令及紧急财政处分均须增

加之。

三、《临时约法》以国务员特为一章外，更设国务院单行法，是不啻以国务员为政府，应予删除。

四、《临时约法》参议院权限失之过泛。立法机关其权限应以狭小之规定，方为合宜。

五、应增设咨询机关。

六、会计应增专章。

七、《临时约法》规定民国宪法由国会制定，其实国会应产生于宪法，不应先有国会。民国宪法自应另有造法机关制定[65]。

依据袁世凯提出的大纲，约法会议推定由施愚、顾鳌、黎渊、程树德、邓熔、王世澂和夏寿田七名议员为起草员，很快就炮制出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共十章六十八条。5月1日，袁世凯正式公布，同时废除《临时约法》。两年前，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谨守《临时约法》，骗得了临时大总统职位，而今他却毫不留情地将《临时约法》撕毁，并公然说：他的地位和权力与《临时约法》毫不相干，而是清帝禅让给他的，现在是他恩赐给人民一部约法。的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是袁世凯的，而不是人民的，全国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过它。

袁记约法采取极端集权主义，完全否定了民国以来的民主主义精神，通篇贯串着封建专制“大一统”、“定于一”的皇权思想。袁党还吹嘘说，只有如此，才合乎中国之“国情”，才能表示中国“国家制度之特性”，否则中国就不成其中国而要发生混乱，以至灭亡[66]。从以下几点足以看出其反动意义。

一、袁记约法第一章虽然仍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但在具体的条文中并没有贯彻主权在民的精神。关于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权，都加上“于法律范围

内”的限制条件，而法律则是由袁世凯一手制定公布，人民根本无权过问。这就等于说人民权利的有无，均由袁氏自由决定。因为民国的招牌尚在，不能不在第二章写有人民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项自由，以及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自由和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二、袁记约法修改了《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原则。内阁制的特点在于大总统不负实际责任，而由内阁行使职权，内阁则须对国会负责。袁记约法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这种特殊的“总统制”，并不是一般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的总统制。

一般总统制，大总统权力虽然较重，但与立法、司法两机关三权鼎立，互相制约。而袁记总统制，既“隆大总统之权”，又取消了对总统权力的有效控制，将大总统置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其第三章有关大总统权力的规定，几乎都是绝对的。《临时约法》规定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袁记约法则改为“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而大总统作为元首，又有代表国民全体的权力。这就是说，他实际上仅对自己负责。他可以盗用“国民之全体”的名义，做他想要做的一切，谁要反对他，谁就是国民的公敌。事实上，袁世凯正是按着这种“道理”实行暴政的。

袁记约法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只要经参政院同意，就有解散立法院之权。但是，参政既都是由大总统任命的，这项限制实际上等于具文。其唯一的限制是立法院“须自解散之日起六个月以内选举新议员，并召集之”。此外，《临时约法》中“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予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予增加”[(67)]。

三、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政院，其职能是“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该院对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有否决权，还有宪法起草权。第九章第五十九条规定：“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参政院所推举之委员组织之，其人数以十名为限。”宪法草案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这样，袁世凯便把制定宪法的大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

四、袁党虽然认为“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68]，但迫于辛亥以来人民要求民主的大势，袁记约法第四章不得不规定成立立法院。立法院为民国议会，由各省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规定议员二百七十五人，其职权为议决法律、预算，答复大总统咨询，收受人民请愿事件。对于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以总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通过，可以提出弹劾之诉讼于大理院。但大理院受理与否，却要由大总统决定，所以立法院的弹劾权，也只是具文。当年10月27日，袁世凯公布《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具体的资格限制。如京师有选举权的人必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有勋劳于国家者”，“任高等官吏满一年以上者”，“硕学通儒”，“有商工业资本一万元以上者”，“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者”，“八旗王公世爵世职”，“本国或外国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充教员二年以上者”，“华侨在国外有商工业资本三万元以上者”。就是这样一个严格限制选民的“民选机关”，袁世凯也始终不把它成立起来，而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袁记约法之所以要特别压抑民权，据说是因为“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救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69]。袁党的这类论调，与进步党要人所鼓吹的“开明专制”的理论，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所以，袁世凯毁法造法的活动，得

到了一些进步党人的支持。

通过“增修约法”，袁世凯把两年来恣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取得的各种专制特权，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而且为他进一步扩张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难怪袁记约法公布之日，他不胜喜悦地说：“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70]

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而代之以自己的约法，引起人们很大的不满，不少人著文加以抨击。有人指出：此“乃承急激革新之后，而生出一大反动”。“往者南京政府时代，以旧为戒，事惟求新；今则以新为戒，事惟复古，毋亦一国之政制，不循进化之原则，竟依循环之原则耶”？[71] 对袁记约法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有人谴责说，这是“假总统政治之名，而行独裁政治之实”，是“约法最大恶劣之点”[72]。

除制定约法外，约法会议还承命炮制了袁记《大总统选举法》。

此前，1913年10月国会制定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由国会选举，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等等。对此，袁世凯深为不满。但为了攫取总统职位，他当时并没有公开反对。袁记新约法公布后，梁士诒即趋承袁氏的旨意，在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案。1914年8月18日，参政院开会赞同梁士诒等人的提案，即咨请袁世凯提交约法会议。约法会议于8月26日开会讨论，认为此次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宜注重共和之精神（指中国唐虞时代揖让之风），而不可概袭共和之形式（指选举总统），宜参稽本国之遗制，而不宜涂附外国之繁文”[73]。至12月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袁世凯于次日公布。

袁记《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民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居住国内满二十年者，有被选为大总统资格。”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每届应行选举大总统之

年，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参政同意，即可连任，无须改选。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藏于大总统府内金匮石室。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管，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及国务卿分别掌管，非奉大总统命令，不得开启。选举大总统之日，由现任大总统交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各五十名组成，由大总统召集之。

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实际上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第三节　袁世凯独裁制度的建立

一　政事堂及其他行政机构

袁记约法公布以后，政府机构立即进行了重大改组。改组工作标榜创新，实为复旧。所设新机构大都由前清制度脱胎而来，就是气派也无不模拟帝王。南京临时政府所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遭到无情的践踏。

北洋政府建立以来，政府政事的中枢表面在国务院，实际上在总统府秘书处。为了根本改变这种名实不符的局面，袁世凯于5月1日撤消国务院和秘书处，而在总统府内成立了政事堂。“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其地位略相当于前清的军机处。通过政事堂，袁世凯把行政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他下达命令原来钤用大总统印，现加“政事堂奉策令”之类的字样，而钤政事堂印，这恰是前清“内阁奉上谕”那种文牍格式的翻版。政事堂设国务卿一人，赞襄大总统政务，承大总统之命监督政事堂事务。国务卿略相当于前清的首席军机大臣，仅对大总统负责，对任何机关任何人概不负责。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民国以来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争论，集一切权力

于大总统。

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晚号水竹邨人。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小官吏家庭出身。青年时代他在淮宁县教家馆，结识袁世凯，遂结拜为兄弟。此后，他考中举人、进士。由袁世凯保举，他先后担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及东三省总督等要职。辛亥革命前夕，官至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民国建立后，他以遗臣自命，托辞“国变忧愤”，退居青岛，表面不问政事，实则暗中参与袁世凯的各项重大决策，早有“海滨宰相”之称。他一出任国务卿，总统府上下都尊称他为“相国”。他与袁交往二十余年，对袁的性情和野心了如指掌，深知在玩弄政治阴谋方面，袁不仅不亚于他，而且在许多方面高他一筹。关于大政方针，他从不主动提出方案，只是制定为达到目标必须使用的策略性的办法。据记载，他刚刚上任，就有人建议他发表施政方针，以慰国人之望。他表示为政不在多言，说：“往日阁员入阁之初，多所发表，而实质上则多一事不能行。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余既未敢多言，惟择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勿行。行而有成效者善也，否者即为恶也，视其结果何如耳。今纵讥余无所表现，余决不辞，或者各方面所以必须余出之意，即在此无所表见之中。”[74]

除国务卿之外，政事堂还设左右丞二人，其地位略低于国务卿，按规定应“赞助国务卿，预闻政务”，实际上也直接对袁世凯负责，其性质颇似前清“军机上行走”。袁任命杨士琦[75]为左丞，右丞则由钱能训担任。另有政事堂参议林长民、曾彝进、伍朝枢、方枢、李国珍、许士熊、张国淦、徐佛苏等八人，负责审议法令，而不能预闻政务。政事堂直辖六个局：法制局局长施愚（后为顾鳌），机要局局长张一麐，铨叙局局长夏寿康（后为郭则沄），主计局局长吴廷燮，印铸局局长袁思亮，司务局局长吴笈孙。除机要和主计两局为新设的机构外，其余均为原属国务院的机关。

国务院存在的时候，各部政务由总长主持，并预闻国家大政。按1914年袁世凯颁布的修正各部官制规定，各部“直隶大总统”，只有执行部务之权，而不能预闻政务；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处理外，一切须经国务卿核准。因此，各部总长对于国务卿实质上也是一种从属关系。各部总长为：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交通梁敦彦，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76]。以上各部长、局长，除汤化龙、张謇属进步党外，其余都是北洋派。

政事堂设在总统府遐瞩楼（在勤政殿旁），为徐世昌赞襄袁世凯的办公处，故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的匾额及两旁“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楹联，均为徐世昌自拟、自书。5月4日，袁世凯亲临政事堂训话，宣称“本大总统当与诸君以‘洁己自爱，开诚布公’八字共勉”，“以共挽狂澜，维持大局”[77]。就是在这类娓娓动听的辞令掩饰下，北洋派会聚一堂，开始了“屈天下人奉一人”的新步骤。

裁撤总统府秘书厅之后，原秘书长梁士诒被调离总统府，改任税务处督办。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894年中进士，曾在原籍凤冈书院讲学，力倡“学归实用”。1903年应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清廷误认为是维新派康有为的同党，名落孙山。同年袁世凯聘他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从此追随袁世凯、唐绍仪创办北洋新政，长期管理铁路交通事业，先后担任京汉、京沪两铁路局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及交通银行帮理等官差，与帝国主义列强财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协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和筹款有“功”，他一直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综揽中枢机要，1912年5月兼交通银行经理，次年秋又兼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事权之重无可比拟。他常常代表袁与中外各方接洽。有人到总统府请示工作时，袁经常说：“问梁秘书长去！”因此他有“二总统”的绰号[78]。因为他把持交通部和交通

银行，能在短时期内筹挪巨款，又被称为“财神”。梁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在北洋派内部形成著名的交通系，控制政府财政和交通。尤其是他自受命组织公民党后，势力更为膨胀，俨然政府党魁首。各省军政官吏进京觐见，多先拜访梁氏，以探听消息。对梁士诒包揽政务，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后就开始不满。杨士琦等又乘机进谗，说他“心怀叵测，勾结军人，欲为总统”[79]。因此袁更感不安。1914年初酝酿改制时，梁士诒主张“将秘书厅扩大组织”，以“张府制，网罗人才”，而不必另设国务卿[80]。袁很不以为然，遂下决心把他撵出总统府。袁世凯将原秘书处的班底改组，更名为内史监，专门负责办理其“切身政务机密者”，派原副秘书长阮忠枢为内史长[81]，曾彝进、王式通为副内史长，内史有夏寿田、张凤台、闵尔昌、刘春霖、董士佐等十余人。内史监成立后，仿照前清皇帝经筵进讲之例，由参政严复等人逐日编述有关中外大势、帝王治国以及军事、经济诸事，复由夏寿田等人书写送到袁世凯的办公室居仁堂，供袁批阅，称“居仁日览”。

除人事更动外，大理院机构照旧，仍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袁世凯特任董康为院长，总理全院事务。其审判事务采取合议制，以推事五人组成法庭，以大理院长为审判长。总检察厅设总检察长一人，检察官若干人，罗文干任总检察长。

1914年3月成立的平政院，为行政裁判机关，有监督行政的性质，专门审理行政官吏的违法不正行为。此外，还有肃政厅，专门纠弹行政官吏的违法、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玩视民瘼等。这两个机构分别独立行使职权，相当于前清的都察院和御史台，都由大总统直辖。平政院院长先后为汪大燮、周树模[82]。肃政厅都肃政史为庄蕴宽，另有肃政史十六人。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与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大同小异，于是北京官场上“都老爷”之名称复活。袁世凯曾对平政院长和都肃政史等人说：“中国之大，官吏之多，一人耳目不能周到，故靠诸君主持风宪。”[83] 按《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处

罪极重，五百元以上枉法赃即处死刑，不枉法赃一千元以上处无期徒刑，遣送边远烟瘴地，一如古代流刑[84]。尽管如此规定，但平政院和肃政厅实际上都属闲曹，除非背后有袁世凯主使，弹劾和审理都是空话，因为“民国有势无法，少有凭借者断非平政院所能裁制，其无势力者先自默尔，与人无竞，更不劳裁判”[85]。

原国务院审计处于1914年6月改组扩充，更名审计院，作为全国财政总监督机关，负责审查政府收支预算，对各部的收支有审核权。但“机密费”不在审核范围之内，各部经常以“机密费”为借口，逃避审核，所以实际上达不到监督的目的。加以院长丁振铎对财政审计法一窍不通，老朽顽固，只因为是清末大官僚和袁世凯的同乡，就被安排到这个有地位而无权力的冷衙门。不久丁病逝，袁派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接任，李未到任，由副院长李国珍代理。

1914年5月，原蒙藏事务局改名为蒙藏院，直属大总统，根据《蒙藏院官制》和《蒙藏院办事规程》，负责管理蒙古和西藏地方事务。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为总裁，熙彦为副总裁。

袁世凯于1914年7月28日颁布《文官官秩令》。令称：“历代官制精意，重在官与职分。诚以因资序官，斯人无躁进，量才授职，斯事有专责”。因此“本九品官人之法，仿六计弊吏之道”，特定官秩令，以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矢靖共之意，杜奔兢之风”[86]。文官分为九秩，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另外还有同中卿、同上大夫等秩。上、中、少卿均授予特任级官吏，少卿及上、中大夫均授予简任级官吏，中、少大夫及上士均授予荐任级官吏，上、下士均授予委任级官吏。按照此令，授徐世昌为上卿，杨士琦、钱能训为中卿，各部总长除海、陆两部属武官外，都授中卿，惟章宗祥、汤化龙资望稍轻，授少卿加中卿衔。其他文官均按其地位和资历分别得到不同的官秩。

参政院是大总统的最高咨询机关。袁世凯于5月26日任命黎元洪

兼院长，副院长汪大燮，秘书长林长民。副总统黎元洪到北京后，年俸十二万元，交际费二十四万元。与一般高级官僚相比，待遇优厚得多。袁又和他结为儿女亲家。但只因为他不是北洋派，所以从来没有起副总统的实际作用，至此总算有了具体的差事。参政共七十名，都由袁世凯亲自选定，其中有当朝显宦周学熙、梁士诒、黎渊、施愚、王赓、刘若曾、陆徵祥、孙多森、李士伟、严修、杨度、荫昌、张镇芳；有立宪派、进步党名流梁启超、熊希龄、蔡锷、马良、严复；有实业界人士冯麟霈、宋炜臣、张振勋、孟继笙；有宿儒王闿运、杨守敬；有变节的革命党人孙毓筠；有前清皇室溥伦；更多的则是老朽不堪的前清大官僚，如赵尔巽、那彦图、丁振铎、唐景崇、增韫、李经羲、宝熙、宋小濂、劳乃宣、于式枚、袁树勋、王树楠、赵惟熙、姚锡光以及瞿鸿禨等。当时，有人对参政院内老官僚“枯木逢春之气象”不理解，曾探询袁世凯的用意，袁回答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87)

袁世凯虽然热衷于请前清“老成物望者”出山，但这些人并不都甘心被利用。有的断然拒绝受命，如瞿鸿禨、袁树勋、于式枚、劳乃宣等；有的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肯进京。至6月8日参政院近开会之期，报到者尚不足三分之一，因此不得不一再延期。6月20日，参政院在原参议院会场开幕，出席参政仅四十四人，冷冷落落，不成样子。

《参政院组织法》规定，每年9月1日至12月底为开会时期，实际上自开幕之后即不断开会。到1914年10月杪，常年会议四个月期满，大家便要散会。袁世凯以尚有重要法案交议，命令延长两个月。至12月底闭会时，参政院共开议事会二十多次，所议各案大都由政府交来，如7月3日会议，到会四十二人，所议法案有“违令惩罚法案”、“诉讼法案”、“请愿法案”、“纠弹法案”等。先由法制局参事报告法案制定经过和原则，接着有二三名参政提问题，参事一一解答，讨论就告结束。参政院开会与国会“乱糟糟轰腾腾的景况”全然不同，“诸

参政三三五五笑悦而语”，与从前金刚怒目之国会议员也不可同日而语[88]。

参政院成立后，便宣布代行立法院职权。作为代行立法院开会时（如7月3日会议）允许旁听；作为大总统的咨询机关开会时，则不许旁听。袁世凯有意将组织立法院的事推得遥遥无期。这样，在一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便消灭了一切民主选举的痕迹，所有重要官职都改为“钦定”，还美其名曰“以资简捷，而节经费”[89]。

二　中央军事机关的改组

袁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军权，如：“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军”，决定陆海军编制、兵额及宣战媾和，等等。据此，袁世凯于1914年6月8日下令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将原来总统府的军事处撤销。统率办事处是最高的军事机关，与文事方面的政事堂并立，一武一文，作为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左右手。

对统率办事处组织章程的拟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90]起过重要作用。据组织令规定，办事处设办事员，“由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大元帅特派之高级军官及办事处总务厅长担任”。袁世凯任命荫昌（侍从武官长）、王士珍、段祺瑞、刘冠雄、萨镇冰（海军司令）、陈宦（参谋次长）为办事员，唐在礼[91]为总务厅长，张士钰为副厅长。按规定，办事员轮流在办事处值日，实际上王士珍担任常务，一切要政都呈袁世凯定夺。办事处设有军政、军令、军械三所，各有主任主持其事。

统率办事处的权力十分广泛，凡所讨论的事务涉及外交、内务、财政、交通时，都召该部总长列席，往往当场就作出决定。各部或各省的重要机密事务，也大都呈报办事处。袁世凯的命令、批示，均以大元帅名义发出。京内外文武官吏对此类命令从不敢怠慢。唐在礼后来回忆说：“本来政事堂有些相当清室军机处的样子，其后来倒是统

率办事处在实际上起着新的军机处的作用。”[92]

成立统率办事处的原因，袁世凯说是为了集中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其真正目的是削弱陆军部的权力，把军权收归他一人掌握。原来，自北洋政府成立后，军权一直在段祺瑞控制的陆军部，内阁屡次更迭，陆军总长一席总是非段莫属。在军事上袁也完全信任和依靠段，重大措施差不多都要和段商量决定。总统府军事处仅仅起袁世凯与各军事机关联络的作用。段对袁感恩不已，愿受驱策，事事奉命唯谨。为摧毁非北洋派，特别是国民党人的军事力量，段卖过死力。但自镇压二次革命后，陆军部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或降黜，段往往擅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这自然使一向重视军权的袁世凯感到不安，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军权旁落的趋势。

统率办事处成立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又组织了一个军需处，由唐在礼兼任处长。这个以军需为名的机构，并不管陆、海军的军需事务，而专门管理秘密支付的“特别费”。这种特别费的开支很大，也很频繁，每笔一两万到几十万不等，均凭袁世凯的字条支付，无需说明用途，主要用于收买文武官吏、政党首领和报纸发行人，军政执法处等特务警察机关的重大案件侦缉费用，以及为筹建模范团购买军火等。这个机构和统率办事处一样，在袁死后都被撤销。

为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决定在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编练模范军，派王士珍、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1914年10月，成立了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式的“模范团”，抽调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中高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每期半年，一期计划培训两个师的军官。第一期袁世凯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光远和陆锦都是袁克定的亲信，所以模范团实际上由袁克定一手包办。该团的训练计划是由蒋方震草拟的，完全采用德国训练方式。袁氏父

子一向崇拜德国的军事，对德国皇太子在德军中的影响略知一二。模范团的建立，表明袁世凯有意仿效德皇的办法，为自己的儿子在陆军中树立权威，为家天下作准备。模范团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为北洋陆军第十一、十二两师，以张永成、陈光远为师长。第二期毕业后编为第九师，以陆锦为师长。

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袁克定，突然插足军队，激化了北洋派内部的矛盾，北洋将领多为之寒心，而以段祺瑞为最甚。段祺瑞素性刚愎，对统率办事处的成立，早已公开表示不满，常常借故拒绝出席该处会议，陆军部的事务也让他的心腹徐树铮办理。他对袁克定毫不敷衍，对其左右的人更不客气。因此，袁世凯和段的关系日益恶化，段即托病请假赴西山“疗养”，北洋军事重心就转移到王士珍身上。1915年5月31日，袁派王士珍署理陆军部长。王对袁唯命是从，遇事绝不敢有所坚持；又不培植个人势力。袁在军事上很尊重他。为了清洗段的势力，袁世凯授意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四十万元，并以此于6月26日免去了徐的陆军次长，派田中玉继任。此为段和徐后来拒绝拥袁称帝的远因。

为了从精神上加紧对军队的控制，袁世凯于1914年11月11日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其中第一条为“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93)]。并由统率办事处派出大批“宣讲员”，至各师传达宣讲。前此在1912年12月26日，袁曾发布过一个“告诫军人训条”十条，其中并没有“忠事元首”字句，而今却命令官兵忠于他个人，以加强其独裁统治[(94)]。1914年11月20日，袁又命令“以关（羽）岳（飞）为武圣”，由全国军人供奉，并指令统率办事处拟定供奉礼制。但北京从来没有关岳合祀之庙，新建又来不及，便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之白马关帝庙大加修饰，由驻京军队及模范团列队前往行礼宣誓。1915年1月13日，模范团第一期全体官兵在陈光远率领下赴庙宣誓，袁世凯派侍从武官长荫昌监誓，誓词为：“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

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会党”，最后表示“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地谴”。

新成立的将军府，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直隶大总统。按其组织法规定，有上将一人，将军二十六人，参军二十五人。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凡在一省做过都督而被解职来京者，都任命为将军，冠以“威”字，以区别于各省有督理军务之权的“武”字将军，如蔡锷为昭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将军月俸千元，安富尊荣，清闲自在”[95]。将军府实际上是安置失意将领的闲曹，被人嗤为“养老院”[96]。

三　地方官制的变化

对地方官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问题，袁记约法基本上没有涉及。但这并不是忽略，而是有意回避。袁世凯企图通过具体条例，逐步地改变清末以来各省权力过重的局面。

北洋政府建立以来，对地方制度屡经讨论，多次起草条例，其中包括省制的存废问题。民国元年，各党派争持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省长简任或民选，及省长是否有解散省议会之权。袁政府于7月将省长简任或民选问题，提交参议院讨论。这个问题和国民党对袁世凯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因此参议院各党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袁世凯恐民选省长的主张占上风，妨碍他的集权计划，便将提案撤回，讨论遂中断。其后，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施愚拟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即仿照普鲁士的办法，将地方政权分为自治机关和官治机关两种：省长执行官治，故由中央简任；议会总董执行自治，故由各省选任。“官治与自治既然化分为二，故省长既不得解散议会，议会亦不得弹劾省长”[97]。此说发表后，江苏、江西等省都督纷纷通电反对。袁世凯于10月12日在总统府亲自召开地方官制研究会，决定采用所谓“虚三级制”，即省道县三级，“存虚省而设实道”。此项办法经国务会议通过，法制局遂起草了道官制和道自治草案。因当时准备国会选举，议员多

离京外出竞选，参议院不能开会，袁政府遂借口无从交议，于12月直接以命令发表了《道官制道自治条例》。依照此项条例，有些省设立了道观察使。此实为熊希龄内阁废省计划之先声。1914年5月间，与中央军政机构改组的同时，袁政府也制定了地方官制草案，经政治会议讨论后，由袁世凯亲自删改定稿，于5月23日公布实行。

地方文官采用三级制，主要内容在于存省分道。全国二十二省区及蒙古西藏地方未加变动，惟每省划为若干道[(98)]，由道辖县。省置巡按使，道置道尹，县置县知事。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各官及巡防警备等队，并受政府之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及司法行政等。此制度表面上与前清及民国以来实行的制度无大差别，但内容略有不同。原来各省行政公署所设的内务、教育、实业各司（厅），全部裁撤。巡按使公署内仅设立政务厅，由巡按使荐任厅长一人，掌握厅内事务。厅内有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各科，由巡按使自委掾属，佐理各项文牍事务。巡按使一律由大总统任命，不许地方保荐。冯国璋曾因保荐巡按使，受到政事堂申斥。新官制公布后，各省原民政长均改为巡按使。过去以都督兼民政长的省份，如安徽、湖南、贵州、奉天、黑龙江等省，都另外特任巡按使，实行军民分治。所任命的巡按使大都是所谓“富从政经验”的旧官僚，安徽为韩国钧，湖南为刘心源，贵州为龙建章，奉天为张元奇，广西为张鸣岐，等等。

道尹为一道的行政长官，原来的观察使改称道尹。依地方官制规定，道尹由中央政府简任，其职权比较广泛，最为重要的是有呈请任免县知事之权。因此，官场上钻营道尹的人颇多，1914年下半年由于京外文武官吏不断保荐，到年底仅政事堂记存的名单，即达五百多人，而全国只有近百个道。因此，袁世凯不得不于12月4日下令暂停保荐。他说：所保荐的人员中“滥竽充数、名实相乖者亦复不少……嗣后除县知事任职三年以上确有政绩者仍准保荐外，其余暂行停止”[(99)]。

县知事为一县行政长官。全国有近二千个县。对县知事的选拔和

任命，袁世凯颇为重视，他曾多次命令各省巡按使严格考核所属县知事，对“劣员”要“立时撤换，勿稍瞻徇”[100]。为了“统一中央用人行政之权，荡涤地方滥用私人之弊”[101]，袁世凯命令内务部主持于1914年3月至11月举办了三次“县知事试验”。“试验”分为考试和保荐两种。按考试条例规定，曾任简任或荐任官满三年以上者，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法律、政治、经济学三年以上有文凭者等，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当时，全国失意官吏和失业知识分子很多，1914年初，仅在北京奔走谋事者即有四万多人[102]，县知事考试对于他们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次考试共录取一千九百二十一人。由于口试特别重视做官经验，所以被录取者多为旧官吏，学校出身而中榜者为数寥寥。此外，由大官僚保荐免试的三百余人，其中自然更是“贤能老吏”居多[103]。被录取的县知事并非都能分发各省补上实缺，只有行贿或有后台的人才能如愿以偿。举办“县知事试验”，本来说是为了“澄清吏治”，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连主考官朱启钤也承认“适启仕途奔走之风，欲清其源，转滋其弊”[104]。

民国以来，地方武官系统比较紊乱，除都督外，还有都统、护军使、镇守使等。各省都督的权力极为广泛，实际上总揽军政民政，是一省的最高统治者。都统仅设在热河等特别区，也是兼管军民两政。护军使的地位略低于都督和都统，如江北护军使（驻清江）、甘肃护军使（驻宁夏）等。镇压二次革命后，在军队较少的福建和贵州两省部不再设都督，而改设护军使。镇守使则设于一省要冲之地。各省所设镇守使数目不等，以军队的多寡而定，如江苏驻军多，就有江宁、松江、上海、徐州、镇江等五个，陕西则只有陕南和陕北两个。镇守使大都由师旅长兼任，为都督的属吏。

为改变都督掌握一省军政大权的局面，袁世凯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设立将军诸名号。令文说：“都督之称，肇自汉魏。武昌起事，仓猝定名。其时兵事初兴，人心未定，类晋齐之雄长，似楚汉之剖分。民国纪元，未遑变置，黎副总统首倡军民分治，

所陈十害三无之弊，刿目怵心，海内贤达，咸表同情。方今大难削平，主权统一，各省都督皆深明大义，恪守准绳。若复因仍方镇之名词，无以移易军民之耳目，即欲实行省制，而窒碍殊多。应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务者，就所驻省分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维，呼吸一气。”[105] 7月18日，袁又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和将军行署编制令，并在北京设立了将军府，安置闲散将军（详见本节目二）。另外，有督理一省军务者，都在该省设行署及参谋机构，“承大总统之命督理本省陆军”，并受陆军部和参谋部监察。凡“有特殊功勋者”均授上将军，如定武上将军张勋兼长江巡阅使，镇安上将军张锡銮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督理江苏军务，彰武上将军段芝贵督理湖北军务，振武上将军龙济光督理广东军务，昭武上将军姜桂题兼热河都统督理热河军务。同时，山东靳云鹏、吉林孟恩远、浙江朱瑞、江西李纯、湖南汤芗铭、陕西陆建章、四川胡景伊、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等都授予将军，督理本省军务，除孟恩远和朱庆澜冠“镇安”两字外，其余都冠以“武”字，如泰武将军靳云鹏、开武将军唐继尧等。另外，直隶朱家宝、河南田文烈、甘肃张广建、新疆杨增新等则都以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本省军务。贵州刘显世和福建李厚基都仍任护军使，督理本省军务。绥远潘矩楹和察哈尔何宗莲都仍任都统，管本地区军政民政事务。

袁世凯裁撤都督，本来是想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推行军民分治，以避免所谓“历代藩镇之祸”，然而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除改变名称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与往日的都督一样，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视巡按使“如前清督抚之于布政使”[106]。

当时，除云南、广西、四川及新疆外，各省督理军务的将军几乎都是袁的亲信。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与广大人民起码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如果不靠各地将军的军事压力，他的政权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和袁世凯一样，各地将军一切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

了防备人民，愚弄人民，和一旦发生人民起义可以立时扑灭。袁世凯和各地将军之间完全是封建的依附关系，为保持将军对他的忠心，达到一呼百应，就不能不允许将军有极大的特权。所以都督更名刚刚一个月，袁就下令“所有督理军务各将军，略与原设都督职权相类”[107]。各地将军深知自己的祸福荣辱完全由袁的喜怒决定，只要不失宠信，无论怎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不会被贬黜，至多调任他职而已。所以，他们在袁世凯面前无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而在地方上则莫不独揽大权，模仿袁氏作一个省区内的土皇帝。正如张一麐后来所说，自行总统制后，袁氏大讲“混括统一”，然而“省权转重”，乃至“帝制萌芽”，“各省将军纷纷添募军队”，“藩镇之势已成”[108]。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正是封建独裁统治所结下的恶果。

四　警察系统及其对人民的迫害

中国的警察制度始于清末，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清末一样，民国初年的警察仍有缉私、捕盗、消防、卫生及维持交通等多种职能，但其主要任务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政府当局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北洋政府内务部设有警政司，总揽全国警务。警政司下辖四科，第一科管行政警察，第二科管高等警察，第三科管著作审查，第四科管出版事项。内务部的名称虽然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沿袭下来的，但其司员大都是前清民政部的旧人，特别是警政司，变动很少，始终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为了控制全国警察教育，袁世凯于1912年10月下令停办各地警察学校，只留北京警察学校（原京师高等巡警学堂）一所。按袁政府的规定，各省及大商埠设警察局（厅），由内务部及各省民政长管辖。各县设警察事务所（后改名警察所），多由县知事兼任。但实际上，1913年10月以前，各地的警察机构并没有统一的名称，如上海称“巡警总局”，下辖沪南、闸北两公所，1913年5月改称淞沪警察厅。北京的警政十分庞杂，除京师警察厅外，还有几

个半警半军的机关。袁世凯有意把北京的特务警察机构分为几个系统，不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迫害人民，而且使它们互相监视。

京师警察厅，其前身为工巡总局，1905年改为京师内城和外城两个警察总厅，下辖九个分厅。后又将九个分厅改划为十个区，于区下设警察派出所。至1913年1月3日将内外两总厅合并，称京师警察厅，先后以王治馨、吴炳湘为总监。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于1912年5月改组成立的。总办是陆建章。陆建章（1879—1918），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自1895年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后，先后任北洋第四镇第七协统领、山东曹州总兵、广东高州总兵、京卫军统领。1914年春，他率北洋军入陕，执法处总办由雷震春接任。

步军统领衙门，本是清朝皇族控制的一个警察性质的军事机构，所辖士兵皆旗籍，满人乌珍为统领，主管巡捕东西南北中五营，又管京师九门门政，故又称九门提督。民国元年本拟裁撤，袁世凯认为它“足补警政所不逮”，乃托言事关旗制，从缓计议，其后一直以江朝宗担任统领。江朝宗（1864—1943），字宇澄，安徽旌德人，从小站练兵时即追随袁世凯，清末官至总兵。他控制步军统领衙门后，机构反而扩大，权力日增。“京师每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弹压，则步军出而维持秩序”。直至1924年，这个衙门才被裁撤。

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为曾参加过同盟会的王天纵。王本是绿林出身，河南嵩县人，辛亥革命时在豫西起义，自称豫西都督，民国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赐名建忠，加陆军少将衔。

此外，还有段芝贵建立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处长为陆启荣。以陈兴亚为营长的京师宪兵营，则负责“纠察军警风纪”。

以上这些机关，除警察厅隶属内务部，由内务总长赵秉钧管辖外，其余都由袁世凯直接控制。这些机构都豢养秘密侦探，都有监视

人和缉捕人的特权，不受法律约束。其中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凶横。该处流行一种说法："错拿了不能错放。"[109] 它还有特设的监狱，使用各种酷刑逼供，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秘密执行，滥捕滥杀，草菅人命，因此又有"屠人场"之称。先后担任该处总办的陆建章和雷震春都被人骂为"屠户"。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前，袁政府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迫害，还不敢大规模地公开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派变为"乱党"、"暴民"，袁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他们的仇恨。按照他的旨意，军警机关印行《乱党之真相》、《孙黄小史》等书，肆意污蔑，并悬赏缉捕革命派领导人，黄兴为十万元，陈其美为五万元，还不断派遣刺客前往国外，企图暗杀孙中山。当时革命派领导人多逃亡到日本，袁政府与日本驻华公使秘密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对有明令逮捕之"乱党"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一律宣布驱逐出境，并不准再行登岸。被袁政府通令缉拿的"从逆军官"前后达一百多人，其中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有邓铿、程潜、陈强、唐蟒、程子楷、刘英、龚振鹏、张汇滔、袁家声、杨冠英、翁式亮、张煦、刘铁、张永正、张光曦、吴藻华、傅鑫、洪兆麟、赵恒惕、陈复初、林虎、方声涛、周璧阶、谭人凤、李书城、冷遹、洪承点、朱执信、李根源、戢翼翘、吴忠信、刘文锦、余道南、童锡梁、张孝准、张华甫、赵正平、瞿钧等[110]。这些人不能在国内立足，大都被迫流亡到国外或香港。

特务警察残杀革命派的事件，在北京和各省时有发生，而且北京比外省更厉害。许多被捕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仅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及著名的革命党人程家柽等。

北京各监狱“收禁犯人极多，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分批送至保定监狱“寄禁”[111]。长期被关押的人，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1913年秋，袁世凯一面忙于对南方用兵，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一面加紧对北方的控制，在京师实行戒严，明目张胆地杀戮国会议员，制造恐怖气氛。章太炎曾撰文激烈批评袁世凯的暴行。二次革命后，北京共和党本部邀请章太炎进京，主持党务。章自以为名气大，袁世凯奈何他不得，泰然入京，企图依共和党与北洋派抗争。但章进京后，就失去行动自由。次年1月，他以大勋章作扇坠，直闯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因此被军政执法处拘捕。只是慑于社会舆论，未敢轻易杀害，而长期软禁于龙泉寺，当年7月又移入钱粮胡同民宅，继续被严密监视。警察总监吴炳湘直接指挥，“以巡警充阍人，稽察出入，书札必付总厅检视，宾客必由总厅与证”[112]。直到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才获自由。1914年春，四川都督兼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奉命来京，不几天就被军政执法处秘密逮捕，关押半年之久，最后以所谓“危害四川省人民利益”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也是到袁死后才释放。

在袁政府三令五申的催促下，各省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一类的特务机关，对人民横加摧残。

1913年9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6月至11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其中武昌有祁国钧、车继斌等十一人被杀，监禁数十人。汉口宝善党案，被捕男女学生及“党人”共八九十人。“其所杀者以未宣布罪状，姓名亦无人知”。汉阳石灰店案，由于侦探报告该店“有党人机关”，即抓获“党人”六名，均枪杀。《大汉报》胡石庵因一向吹捧黎元洪、孙武等，被段芝贵判处四年半监禁，报馆被封。

1914年6月汤芗铭破获“长沙革命党机关”，一次逮捕四十多人，杀害二十九人。“此案前后遇害者计二百余人”[113]。另外，还枉杀前湖南财政司长杨德邻，并株连伍任钧、易宗羲、文经纬、梅景鸿、

杨守真诸人。

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

自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广东省在龙济光、龙觐光兄弟的统治下，“党狱繁兴，除兵变杀人不计外，死者殆不可数算也”。国会议员林文英于国会解散后回到原籍琼州，以开通民智为己任，倡办《琼华报》，方议立案发刊，林及其友陈文甫（富兴隆店主）均被绥靖处逮捕，未经审讯便遭杀害。陈文甫的母亲悲愤交加，自杀而死。1914年3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龙军借口顺德县上淇乡附近有“乱党机关”，前往围捕，乘机抢掠，烧毁房屋三四十间。“乡民之因是而死者，闻共四十七名，伤者以百计”[114]。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呈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军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加制止，反而于3月30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依重。务望撑柱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后来，由于龙迭次破获乱党机关，“厥功甚著”，袁特赠他一等嘉禾章。

袁世凯及其党徒控制的庞大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横遭迫害，以至含冤而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类似的冤案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以致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外省官吏，奉行不善，间有捕役邀功，侦探行诈，诬诱平人等事”，并于1914年12月19日命令各地文武官吏“除恶不可不严，而治狱不可不慎”[115]。

从1914年初至1915年底，袁政府公布了一连串主旨在于反人民反民主的条例，妄图用严刑酷法使全国人民屈服于暴政之下。

起初北洋政府沿用1908年公布的《大清报律》，以压制舆论。至

1914年4月2日，内务部始公布《报纸条例》。这个条例是《大清报律》的翻版，而《大清报律》则是依据专制野蛮的俄国沙皇政府的报律制定的。《报纸条例》规定，所有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和“妨害治安”的新闻，由邮局检查内容，政府阅看大样。这样，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至逮捕编辑和记者，判处徒刑。在《报纸条例》公布之前，迫害报业人员的事件已层出不穷。1913年8月，北京《爱国报》编辑丁葆桢所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因这句话，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 (116) 。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又公布了《出版法》，其内容与《报纸条例》的精神是一致的，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并规定文书图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出版：“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布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在此限；八、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名誉者。”如有违犯，轻者罚款，重者处有期徒刑或拘役 (117) 。袁政府公布这些条例、法令的主要目的，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要建立法制，而是为了堵塞言路，钳制人民的思想。袁政府根本没有实行法制的愿望，违法和不违法在实际生活中都以官方的意志和政治需要为转移。袁世凯曾批评不按他旨意审理案件的大理院，是“为法所奴役”。

1914年3月2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和《警械使用条例》。前者共四十一条，其中“政治结社”和“政谈集会”，都要呈报警察官署批准，严禁秘密结社和所谓“扰乱安静秩序”的结社。第二十二条专门为对付“劳动工人之聚集”，规定凡有“诱惑及煽动”、“同盟解雇”、“同盟罢业”、“强索报酬”、“扰乱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等，均得禁止之 (118) 。5月20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

例》，命令各县属未设警察地方，由县知事监督，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11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119]。1915年6月22日，又公布了《惩办国贼条例》。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直接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而制定的。为了瓦解革命党，1915年元旦，袁世凯又颁布了所谓《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1914年底以前“犯附和乱党罪者”，只要自首，一律赦免。

袁政府用扼杀民族生机的恐怖手段，巩固其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事情却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人民和袁政府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的不满和愤慨，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在地下沸腾、翻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接近爆发。

袁世凯的特务警察统治，不仅引起人民的普遍愤慨，而且也使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为加强警察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1913年以后，袁世凯对他的爪牙也更多地采用血腥手段。

1913年底，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夔丞脱狱来到北京，请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鉴于刺宋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断然拒绝接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次年1月19日，应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应的性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刚刚到天津担任直隶都督的赵秉钧，言语之间也微露不平。他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并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袁世凯闻知，大为震怒，但他不动声色，2月19日又让赵兼任直隶民政长，对他表示格外的信赖。赵赴任几天后，即2月27日，突然在天津督署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当时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遣人置毒羹中”，杀人灭口。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清末曾任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2年他创办保定和天津两地巡警，得到袁世凯赏识，由袁奏保担任巡警部右侍郎，掌握该部机要大权和北京警政。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

仅人民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达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北洋集团特务头子的赵秉钧随袁入京，担任民政部大臣，协助逼宫和维持北京秩序，为袁效尽犬马之劳。尽管如此，袁对他为应夔丞被杀事指责自己，仍不能原谅。在抱封建独裁主义的袁世凯看来，赵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都是他的恩赐，凡有利于他的事，无论如何都应无条件服从，如若有所反对，就是忘恩负义。这是袁所不能容忍的。但堂堂大总统居然毒杀自己的属吏，毕竟不免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因此，赵秉钧死后，袁先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前往吊唁，后又派荫昌为政府代表致祭，发治丧费一万元，并亲题“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挽联[120]，以后又批令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为赵建专祠一座。

袁世凯深恐他的这些鬼蜮手段瞒不过赵秉钧的心腹王治馨。王曾先后担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宋案发生后，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开会，要求赵秉钧出席。赵派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次日，袁世凯阅报大怒，说：“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121] 此后袁对王一直怀有反感。赵死不久，王就以声名恶劣被免官，改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闲职。接着，肃政史夏寿康、周登皞等人联名弹劾王在顺天府尹任内定价卖缺，所得赃款约在七万元以上。6月27日袁下令逮捕，并于10月21日批令“立予枪决”。贪赃纳贿，本是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袁世凯从来视若无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需要，才惩办个把县知事之类的小官以欺世盗名。如他于1914年9月，按所谓《官吏犯赃治罪条例》，下令把赃官刘鼎锡（直隶霸县代理知事）立予枪毙，但从来没有公开处决过次长级以上的赃官。而今他却忽然下令将王治馨处以极刑，这一举动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为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10月23日，他指令总检察厅长罗文幹

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将王枪毙。此后又将王的属吏潘毓桂等逮捕判刑，从而清洗了赵秉钧在京师警察界的潜在势力。王死后，袁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勿贪赃枉法。他说："顾念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未敢信为必无，毖后惩前，不可不引为大戒。"(122)

杀王治馨一案，虽然袁世凯别有用心，但声名恶劣的警察头子被处极刑，还是大快人心的。当王被捕后，"北京各报大多数以一律最大之字刊布此项策令，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123)。著名记者黄远庸也认为"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痛快人心之创举也"(124)。

---

(1) 《民立报》，1913年7月5日。

(2) 《时报》，1913年7月27日。

(3) 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4) 《熊希龄集》，第502页。

(5) 《熊希龄集》，第502页。

(6) 《熊希龄集》，第560页。

(7) 《熊希龄集》，第503页。

(8) 《熊希龄集》，第559页。

(9) 《熊希龄集》，第502、560页。

(1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1页。

(11) 汤漪，字斐予，江西人，美国墨西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出任宪法起草委员长时，年三十三。

(12) 9月初，王家襄当选为参议院院长，辞起草委员会理事，李国珍被

补选为理事。

(13) 《时报》，1913年9月14日。

(14) 伍持汉，广东台山人，精医术，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广东创办医学堂，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任广东都督府医务部长，急公好义，建树颇多，后被选为国会议员。宋案发生，他主张依法弹劾袁世凯，并上书袁氏，促其退位。有人劝其勿鼓动民气，他说："此乃议员天职，苟利国，死生以之。"被害时四十二岁。

(15) 徐秀钧，字子鸿，江西九江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清末在江西办教育，组织江西教育会，鼓吹革命。后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幕。民国建立，加入国民党，先后为江西都督公署顾问，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主张南方五省结盟，抵抗袁政府。被害时三十五岁。

(16) 褚辅成、朱念祖、常恒芳三人在袁世凯死后出狱。其他五人被关押在天津，国会解散后获释。

(1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4、675页。

(18) 《政府公报》，1913年8月1日。

(19) 《爱国白话报》，1913年7月31日。

(20) 《黎副总统政书》，第329页。

(21) 《许世英亦脱国民党》，《时报》，1913年9月18日。

(22) 《时报》，1913年9月11日。

(23) 《大公报》，1913年10月10日。

(24)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5—11页。

(25) 《远生遗著》卷3，第207页。

(26) 《远生遗著》卷3，第211页。

(27)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97页。

(28)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97页。

(29)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912，6，19．

(30)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28页。

(31)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30页。

(32)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11日。

(33)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712页。

(34) 《远生遗著》卷3，第211页。

(35)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43页。

(36) 莫理循（G．E．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人，清末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与袁世凯关系密切。1912年8月1日起担任总统府政治顾问，为袁出谋划策。他是袁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之间的联系人，与蔡廷幹（袁的英文秘书）、梁士诒等交往颇多。

(37) 古德诺（F．J．Goodnow，1859—1939），美国人，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德国法律。1912年7月来中国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至1914年夏天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第二年7月又到北京。袁克定、周自齐等人与他关系密切。

(38) 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人，法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国际法的研究者。1913年3月初到北京，担任袁世凯的宪法及附属法顾问。袁依靠他联系日本政界要人，传递消息。

(39)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3日。

(40)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1日。

(41) 《顺天时报》，1913年10月18日。

(42)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5日。

(43)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6日。

(44)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9日。

(45)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8日。

(46)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9日。

(47)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6日。

(48)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5日。

(49) 《时报》，1913年11月12日。

(50)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16日。

(51) 《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8页。

(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5页。

(53)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26年版，第29—31页。

(54)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26年版，第35页。

(55) 《政府公报》，1914年2月4日。

(56) 《政府公报》，1914年3月2日。

(57) 梁启超：《令京外各级审判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一，第18页。

(5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83、687页。

(5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85、687页。

(60) 《远生遗著》卷4，第12页。

(61) 《远生遗著》卷4，第12页。

(62) 《政府公报》，1914年2月10日。

(63) 《政府公报》，1914年2月14日。

(64) 《爱国报》，1914年2月19日。

(65) 《庸言》第2卷，第4号。

(66)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67)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68)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69)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70) 马震东：《袁氏当国史》，1930年版，第367页。

(71) 柳隅：《新政制》，《庸言》第2卷第5号，1914年5月。

(72) 汪馥炎：《中华民国约法摘疑》，《中华杂志》第1卷第6号。

(73) 《时事汇报》第8号，第50页。

(74) 《远生遗著》卷4，第44页。

(75)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人，举人出身，报捐道员，因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被称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清末曾入李鸿章幕，李死后投靠袁世凯，充洋务总文案。袁氏“事罔洪纤，尽以咨商”，因而素有“智囊”之称。他是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之一。

(76) 1913年12月22日，袁世凯下令农林、工商合并，称农商部。

(77)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5日。

(78)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87、188页。

(79)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87、188页。

(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87、188页。

(81) 阮忠枢（1867—1917），字斗瞻，安徽合肥人，生于淮军将领家庭，举人出身。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曾任为北洋军械局总文案。1895年入袁世凯幕，“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从清末以来，一直充当袁与北洋文武官吏之间的联络人员，参与机要。

(82) 周树模，字少模，翰苑出身，清末当过御史和巡抚。1914年7月由黎元洪举荐，接任平政院院长。

(83)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27日。

(84) 《政府公报》，1914年6月6日。

(85) 《民国十年官场腐败史》，第61页。

(86) 《政府公报》，1914年7月29日。

(87) 陈灨一：《新语林》第2卷，第9页。

(88) 《远生遗著》卷4，第73页。

(89)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27日。

(90) 坂西利八郎，日本炮兵大佐，清末曾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1912年7月到北京应聘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他会讲汉语，经常与袁世凯交谈，对民初军事的建议颇多，统率办事处的组织条例初稿就是由他拟定的。他有两名日本助手，其中之一是后来臭名昭彰的侵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坂西与王士珍、段芝贵等人关系密切，1915年7月回日本

(91) 唐在礼，字质夫，日本士官一期毕业，清末曾在练兵处和北洋督练公所任职。民国后任总统府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等职。

(92) 唐在礼：《辛亥革命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20页。

(93) 《政府公报》，1914年11月12日。

(94) 《政府公报》，1912年12月27日。

(95) 《民国十年官场腐败史》，第52页。

(96) 《民国十年官场腐败史》，第52页。

(97) 《远生遗著》卷2，第188页。

(98) 一般一省划分为四道，黑龙江、贵州各两道，奉天、湖北、安徽、山西各三道，江苏五道，广东、广西各六道，甘肃最多，为七道。

(99) 《时事汇报》第8号，第40页。

(100) 《政府公报》，1914年5月23日。

(101) 《政府公报》，1914年4月23日。

(102) 《远生遗著》卷2，第45页。

(103) 《政府公报》，1914年3月20日。

(104) 《政府公报》，1914年3月14日。

(105) 《政府公报》，1914年7月1日。

(106)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补遗，第4页。

(107) 《政府公报》，1914年8月1日。

(108) 《心太平室集》补遗，第4页。

(109) 王建中：《洪宪惨史》，1925年版，第11页。

(110) 《陆军部呈准缉拿从逆军官名单》及《大理院通缉从逆军官名单》。

(111)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2日、6日。

(112)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4年。

(113) 王健：《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114) 民智：《党祸记》，《民国》第2期，1914年。

(115) 《时事汇报》第8号，第44页。

(116) 《民立报》，1913年8月21日。

(117) 《时事汇报》，第8号，第99页。

(118) 《政府公报》，1914年3月3日。

(119) 《政府公报》，1914年5月21日。

(120) 《赵秉钧哀挽录》，1914年印。

(121)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59页。

(122) 《时事汇报》第8号，第20页。

(123) 《远生遗著》卷4，第67页。

(124) 《远生遗著》卷4，第67页。

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

第一节　封建复古逆流和恢复帝制的酝酿

一　封建复古逆流及祀孔、祭天

随着封建独裁政治制度的确立，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复古思想也迅速流行开来，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二次革命以前，辛亥革命对封建制度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政治势力。因此，在舆论方面，有关民权、法治的宣传一度占有优势，对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制度和道德习惯的抨击，也是比较尖锐的；以致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政治平等和言论、结社、通讯等项自由在表面上已为人们所公认。封建孔教和等级观念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被否定，孔孟的经典在各级学校中都丧失了特殊地位。社会上，特别是经过革命洗礼的南方各省城镇，反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度十分高涨。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民国元年、二年间，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从北洋政府建立之日起，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就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他们千方百计地曲解或丑化民主制度，但是开始还不敢直接公开攻击民国，而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贩卖封建专制主义的货色，故意把他们看不惯的新现

象和清末原有的腐败风气混在一起，说成是民国带来的。在他们看来，民国政局和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封建势力继续作祟，也不在于国家贫困衰败，更不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在于人们追求挣脱封建纲常礼教的桎梏。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1)]。因此，要“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唯有提倡纲常名教。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2)]。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以所谓“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小团体，如上海有孔教会，北京有孔社，济南有孔道会，太原有宗圣会，扬州有尊孔崇道会，青岛有尊孔文社，等等。其中以孔教会的活动最为突出。

孔教会于1912年10月7日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姚文栋等。其简章规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目的。次年9月27日，在曲阜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总会，并从上海迁到北京，把康有为推为会长，陈焕章担任主任干事，负实际责任。各省成立分会或支会，此外在曲阜设立总会事务所，以衍圣公家族孔祥霖为经理，以张勋任名誉会长。1914年孔教总会由北京迁往曲阜，上海、北京各设一总事务所。孔教会的头目和活动分子很复杂，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人：一部分是清末的保皇党人，如康有为、麦孟华、陈焕章等；一部分是封建文学名士，如陈三立、王锡蕃、张尔田以及著名的翻译小说家林纾等；另一部分人是清朝遗老，如梁鼎芬、沈曾植等人；还有孔氏家族成员孔令贻、孔祥霖、孔祥柯等。以上这些人大都是前清举人或进士出身，受封建文化熏染最深，又以“卫道者”自命。孔教会自称是一个宗教团体，奉孔丘为教主，诵读四书五经，表面上说是不涉政治，实际上政治倾向十分明显。大多数骨干分子都仇视民国并阴谋复辟帝制。他们反对新思想、新文化，认为辛亥革命后

的形势是“礼坏乐崩”，“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如不挽救，“人类将灭”，“相率而为禽兽”。挽救的办法就是要尊孔读经。1913年8月，当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联合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人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一些在朝文武要人，也纷纷通电，支持他们的要求。一时闹得全国乌烟瘴气。孔教会的活动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革命党人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宗教团体尤为反对，因此国会宪法会议否定了孔教会的无理要求。

袁政府虽然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但对于尊孔读经却是极力提倡的。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说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他还说：“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3)]。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表示鼓励。为祝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衍圣公孔令贻应召来到北京，向政府呈献孔氏族谱及前代冠服各物。袁世凯批令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继续享受前代荣典祀典。次年1月24日，政治会议开会，根据所谓“多数国民的意见”，议决祀孔，并制定仪礼，仍沿用前清制度，作为大祀，还要求各地方将所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每县设奉祀官一员，管理庙务和祭祀。接着，袁政府公布崇圣典例，规定衍圣公的荣典和岁俸，孔氏祀田由地方官清厘升科，等等。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曾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袁世凯把孔子抬出来，目的是要用纲常礼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

他颁布的祀孔告令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黌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篱而维持不敝？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4)] 最后，他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省地方文庙，由各省长官主祭。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道，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祀孔活动。

在举国祀孔的前后，袁政府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根据参政院的决议，袁世凯于1914年3月11日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政府官吏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0月27日，参政严复在参议院会议上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连署者有梁士诒、王世澂、施愚、王家襄、汪有龄等二十人。该提案主旨是：忠孝节义，久为古人所倡导，应以此四端为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并附有办法六条："（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记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足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上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令人民演唱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葺整理，以为公众游观

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更，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暱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集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祛天下之惑。（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著，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此案提出后，参政“多数赞成”，当日咨送政府。袁世凯据此于11月3日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对参政院建议“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认为切中时弊。他说：“天下无不可移之风气，即无不可挽之人心，况今环球大通，互相砥砺，将欲合群救国，惟有保存固有之国粹，以发挥天赋之本能。盖自科举末流，习为浮伪，而考据词章之士，又以义理之学为不足观，道德沦丧，小人道长，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付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立国之精神。他传喻内务部和教育部，按六条办法分别实行，并分咨各省，将此项建议案及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最后他又警告说：须知“积人成家，积家成国”，“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忠臣孝子，节义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乱臣贼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5)]。

与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政府也决定恢复祭天，并由礼制馆制

定了《祭天仪礼》，公布了《郊天乐章》。

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亡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之精神隐相翕合。"根据内务部的呈文，袁世凯命令："本年十二月二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届时"本大总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诣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6)]。23日清晨，袁世凯亲自祭天，自新华门至天坛用黄土垫道，戒严净街。袁乘坐汽车，警卫森严，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行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威仪与前清帝王出宫毫无二致。袁至天坛，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在阶级社会里，神权往往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服务。中国历代帝王，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护身符，说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都是上承天意，人民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奴役，否则便是逆天。袁世凯大搞祭天活动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企图借天来震慑百姓，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那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说成是上天神圣意志的表现，谁要反对他，谁就是上逆天理。

但是，由于祀孔、祭天遭到人们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在祀孔令中特别说明，祀孔决非模拟"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而是取孔学"大同共和之义"，"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7)]。在祭天令中，他也极力否认"尊天为帝制所从出"。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实际上是欲盖弥彰。所以从祀孔、祭天之日起，人们都预感到恢复帝制已为期不远。

二　清室复辟活动的失败和帝制的酝酿

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赶下台，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并没得到根本改造，帝制观念也没有完全破产。一些失去统治地位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士大夫，仍不甘心失败，妄图改变民国政局，实现清室复辟。

清室复辟派内部大致有四股势力，其一是以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为首的亲贵集团。辛亥革命时他们顽固反对逊位，反对共和，号称宗社党。民国建立后，他们仓皇逃离北京，避居于大连、青岛等地租界，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善耆接受日本财阀太仓喜八郎等侵略分子的枪械援助，指挥蒙古亲王升允、铁良等人在东北和内蒙一带组织所谓“勤王”武装，多次发动叛乱。其二是一批清朝遗老名宿，如直隶提学使劳乃宣、礼部侍郎于式枚、学部副大臣刘廷琛、翰林院编修胡嗣瑗，以及章梫、署理安徽巡抚沈曾植、吏部主事胡思敬、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等。这些人曾在清朝中央和地方担任过要职。他们以“臣当忠君，民当忠国”的气节自励，自称“顽民”，耻食民国俸禄，而蜷伏在天津、上海、青岛、大连等地，招朋引类，著书立说，抒发怀念“故国旧君”之情，丑化和诋毁民主共和，并时常潜赴各地，拉拢一度反对共和的在朝人物如张勋、冯国璋之流，企图制造混乱，乘机“旋乾转坤”。其三是清末保皇党康有为等人。民国后，康有为仍然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成为清室复辟的积极鼓吹者。他创办《不忍》杂志和《国是报》，先后发表《共和救国论》、《共和政体论》和《救亡论》等文章，歪曲和攻击共和制度，鼓吹“虚君共和”。他说：“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洽人心。存帝制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其四是长江巡阅使张勋。在清室复辟派中，他是唯一掌握兵柄的。他的队伍先后驻扎在兖州和徐州，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因而人们讥笑张勋为“辫帅”，他的定武军也有“辫军”之称。

以上就是清室复辟派的主要阵容。像一切腐朽没落的政治派别一样，复辟派互相猜忌，倾轧剧烈。他们都以拥戴废帝溥仪（宣统）复辟为号召。当时，尚未成年的小皇帝溥仪和隆裕太后仍然居住在清宫里，根据退位优待条件，每年享用北洋政府四百万元的优待费，称孤道寡。溥仪继续用宣统年号颁发上谕，对任民国政府官吏的前清故臣如唐景崇、赵秉钧等人，赐寿赐恤，死后还要赐谥及宣付史馆立传，等等。宗人府及内务府各衙门当差人员，依然翎顶发辫，不改衣冠。内务府慎刑司仍按清代律例，拘禁刑罚太监，置民国法律于不顾，俨然是国中之国。

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袁世凯不仅千方百计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时也挖空心思对付清室复辟派。然而，他对这两方面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尽管清室复辟派认为袁世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了大清的天下，把他比作王莽、曹操之流，但袁世凯一直谋求与他们和解。他认为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小朝廷和遗老们对北洋政权没有严重的威胁，唯一使他担心的是掌握兵权的张勋。当探知张勋与遗老们密谋支持清室复辟时，他便于1912年6月派徐世昌和田文烈专程到兖州去说服他。从小站练兵时起，张勋就拜徐世昌为师，对徐言听计从。他对徐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8)] 他并请徐转告袁："袁公在，唯袁公之命是从。"从此，袁不仅对张放心了，而且有意加强了"辫军"的实力，用来作为对付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工具。为了争取清室复辟派为袁政府效力，袁世凯曾屡次电邀康有为入京"主持名教"，"共天下之事"；对康等恶毒攻击共和制度的言论，一概置若罔闻，因为他和康有为虽然各有各的用心，但仇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是一致的。袁政府还竭力作出尊重清室的姿态。1913年2月15日，隆裕太后诞辰，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入宫道贺，呈递"国书"称："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太后陛下，愿太后万寿无疆。"七天之后，隆裕病故，袁世凯派荫昌、段祺瑞、江朝宗前往致

祭，特致赙仪三万元，并命令北洋政府各公署下半旗志哀三日，所有官员挂孝戴纱。在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时，他坚持把优待清室条件写入，并多次表示他的元首地位是由清廷禅让而来，不能不“饮水思源”[(9)]。1913年下半年，袁政府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能担任民政长，并多次表示“优容前清耆旧”。袁世凯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北京做官，凡是应邀而来的，他无不接见，“礼敬如宾”，百般笼络。当年底，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应邀入京担任参政和清史馆馆长，袁世凯单独接见赵时说：“此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谋欲卸肩，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忍辱负重，蹈此浊流。”[(10)] 这些话传开以后，一些遗老以为袁世凯真要把政权交还故主了。

1914年7月，徐世昌聘请刘廷琛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拒不应聘，上辞呈说：“自国变后，伦纪坠地，禽兽逼人，识者咸知中国不能专以法治，则修明礼教诚当今急务。”他还说：“民主之制，不合于中国国情，已为众所共信，项城若遽自称帝，则自悖初意，非特为中国举国所不服，亦必为外国各国所不承。”因此，他要求徐世昌转告袁氏，“奉还大政于大清朝廷，复还任内阁总理，总操大政，以令天下，则名正言顺，人心翕然”，并表示如此则“故老遗臣亦皆肯出而宣力”[(11)]。

劳乃宣也以为复辟的时机已成熟，把他所著的《共和政解》、《续共和政解》及《君主民主平议》等三篇文章印刷成册，广为散发，并送给赵尔巽、徐世昌等人转呈袁世凯。书中说，“项城之心实未忘大清也，革命变起，四方响应，专用兵力，诛不胜诛，故不得已而出于议和，而议和之中首重优待皇室。……其不忘故君，实为众所共见。特限于约法，不能倡言复辟。且幼主方在冲龄，不能亲理万机，亦无由奉还大政，故不得不依违观望以待时机也”。他给袁世凯献策说，转圜之良法唯有“定宪法之名曰中华国共和宪法”，定国名

为“中华国”，以共和纪年，并希望袁世凯连任总统十年，等宣统十八岁时还政于大清，大清皇帝封袁世凯为王爵，“世袭罔替，所以报项城之勋劳，亦以保项城之身家也”[12]。据说袁阅后，“一笑置之，不欲过事追究”[13]。这一来，复辟的风声越来越紧，皇宫里上上下下都笑逐颜开，大为活跃，以为很快就会“日月重光”。逃亡到日本的铁良也潜回北京暗中活动。京城内外谣传清室勾结日本浪人，密议在京起事。一时复辟之说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

袁政府深恐复辟谣言酿成“大患”，即以“杜乱防嫌，保全清室”为名，决定查办复辟魁首。1914年11月13日，肃政使夏寿康呈请“严行查禁复辟谬说”，袁世凯立即“批交内务部查照办理”。内务部列为“重大内乱案件”，通饬各省及京师警察厅迅速查办。16日，袁世凯召集军政要人在总统府开谈话会，详述辛亥革命时清帝逊位经过情形及自己“维持国家之苦衷”。当即议决制止复辟谬说的三项办法：1．向全国宣布当日皇室赞成共和的详情，“使一般顽固之徒自知觉悟”；2．禁止关于宣传复辟的书籍出版；3．如仍执迷不悟，“则治以煽动人心、反对共和之罪”。为了杀一儆百，步军统领江朝宗于次日传迅并拘留了倡言复辟的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同时，参政院开大会，孙毓筠串连旗籍参政荫昌、联芳、宝熙、增韫、赵尔巽等五人及梁士诒等三十人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指斥鼓吹清室复辟者，“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患，酿成内乱”，实为“全国之公敌”，要求政府像去年查办“请总统称帝者”一样，对“假此谬论希图扰乱治安者，即照刑事内乱罪从严惩治”[14]。参政院参政一致通过，即将此案咨送政府。劳乃宣本在济南，闻风避入青岛。赵尔巽也极不自安，面谒袁世凯说：“劳之心地实属糊涂。”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对总统府内史夏寿田说：“他们（指宋育仁等）胡闹，我绝不能附和。”司法部一面饬总检察厅检举造谣人，依法严办；一面于11月20日通知各省文武长官检举所属，“按刑律内乱罪分别惩办，并出示晓谕地方军民，一体知悉，毋得轻信浮言，致干刑典”[15]。于是，各省将军、巡按使张锡銮、张元奇、朱庆澜、段芝贵、朱家宝、汤芗铭、阎锡山、金永、陆

建章、朱瑞、屈映光、赵倜、田文烈、李纯、龙济光等二十多人纷纷发出通电，要求严禁复辟。这些电文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般都有两个要点：一是颂扬袁世凯“雄才大略，维持大局”，“舆论人心，同声悦服”；甚至吹捧说：“中国之安全，实惟大总统一人是赖之。”另一点是声讨清室复辟派，有的电报无中生有地说：制造清帝复辟之说者，“皆乱党百出诡计，以图扰乱治安”。倪嗣冲要求袁对“与此事发生最有关系”的“皇室”、“清流”和“乱党”“从严惩办，以遏乱萌，而固国体”[16]。

袁世凯的党徒故意把清室复辟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硬扯在一起，借以打击清室复辟势力。这一着果然奏效，遗老们吓得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小朝廷内一片惊慌。世续急忙向袁氏表白说，复辟之说，“清室毫无所闻”；并请袁“适当惩办，以全清室，而固民国”。瑾皇太妃哭泣着派正蓝旗都统志锜前去谒袁，“力为疏通，以释嫌疑”。袁派内史长阮忠枢为代表，接见志锜。志锜说：“此等谣言，内廷毫不知情。匪唯不敢存此心，并亦不愿闻此说，以清室荷蒙大总统优待，铭感万分。”阮忠枢答应代为转陈，并“告以大总统向以保全中国，保全皇室为唯一宗旨”，可放心回去。志锜唯唯而退。

11月23日，袁世凯“应全国军民的请求”，下令“申禁复辟邪说”。令文说：“此等狂瞽之谈，度倡言者不过谬托清流，好为异论，其于世界之大势如何，国民之心理奚若，本未计及，遑顾其他。岂知现当国基未固、人心未靖之时，似兹谬说流传，乱党将益肆浮言，匪徒且藉以煽惑，万一蹈瑕抵隙，变生意外，势必至以妨害国家者倾覆清室，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究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17] 接着，他又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司法总长章宗祥前往清宫，与世续商洽，根据参政院的建议，定出清室“别嫌明微”的七项办法：尊重民国

现行法令，裁撤宫内慎刑司；通用民国纪年；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应一律服民国制服；政府照优待条件依旧保护；等等。

宋育仁、劳乃宣等倡言复辟，本宜处以“紊乱国宪”罪，但袁政府不仅有意从轻处理，而且有意将此案从速了结。袁世凯“申禁复辟邪说”的命令，措词比较温和，主旨在说明“既往不究，申戒将来”。发布禁令后，徐世昌又以个人名义，在政事堂宴请在京前清遗老，疏通意见。对宋育仁的处理则更是“宽大为怀”，由内务部派一个科长和八个护兵，于11月30日“护送”回四川原籍，不但发给川资一千元，而且到原籍后由地方官月送三百元，以资养老。袁氏不仅“于宋既留不尽之意”，对劳乃宣也惋惜不已。结案以后，他邀请黎元洪、徐世昌等谈话，不胜遗憾地说：“玉初（劳乃宣字）极有作为，为余特拔之人，前者不受参政，疑即有因，但尚不知有此谬见匿于心中。”(18)

袁世凯对清室复辟派如此宽宏大量，并非真的对这些昏聩老朽有什么偏爱，而是要收买人心，给帝制自为预留余地。某日政事堂开会，谈起清室复辟派，袁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也可以做。”身为共和国总统，公开倡言可要皇帝，只是不要满族，要汉族，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其“用心正堪寻味也”(19)。

袁世凯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至晚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已有成就帝王之业的打算。武昌起义后，倪嗣冲、段芝贵等人都认为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劝袁世凯黄袍加身。但袁世凯认为称帝风险太大，因为：“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巡抚）均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

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倾向“表面维持清室”[20]，而极力反对建立民国。袁氏曾说：“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21]后来，他为了取得民国总统的地位，虽然不得不信誓旦旦地宣布“共和国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22]，但对民主共和政体“诸多隔膜”[23]，近代社会任何比较深刻的变革，都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尽管如此，在二次革命被镇压之前，袁世凯及其党徒都还不敢公开谈论帝制，而且忌讳谈论这类事情。

1913年3月，湖北商民裘平治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声称：“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隶，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袁氏觉得“商民”这么一说，无异泄露“天机”，会授革命派以柄，所以立时下令严拿，“按律惩办”。令文说：“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24]但镇压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认为帝制的最大社会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被打垮了，北洋派一统天下，便开始进行帝制的尝试。他在私下里就几乎不再说大总统是“国民公仆”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了，而公开以“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指导来行事。他安居总统府中，拥卫队数万，侍妾成群，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他深居简出，日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号施令，其中不少告令全然类似前清时代的上谕，以华美的文词，援引古圣昔贤的格言，侈谈“仁义道德”，“救国救民”。这类告令，都是欺世盗名的。

最多的一类告令是任免官吏。袁世凯以官爵利禄为羁縻工具。对于高级官吏的选拔，政府规定过详细办法：凡政事堂记名简任人员，都由内外大吏保荐，分班送觐，有如前清“引见”。觐见后，由国务卿及内务总长接见，咨问考察，各加考语送呈总统。总统随时传见，询其在官经验成绩，再加考语，封固密存，分别存记及发交部省录用。遇有官吏出缺，即由总统选拣名单，与政事堂卿丞审慎择用。其实，规定只是形式，官吏的实际任命，非贿赂即情面，最后由袁一人拍板决定。文武官吏上任前，由总统府承宣厅安排觐见，领受训辞，有如前清“请训”故事。这样使文武百官都感觉到只有依靠袁世凯的恩宠，才能升官发财，自然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袁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庞大的官僚队伍成为一特权阶层。他们“特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极丧尽其廉耻，与者乃极肆其骄倨，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25]。

袁世凯用以观察政治生活的根本观点，依旧是封建的官治思想。在他看来，民主主义的制度是罪大恶极，只有专制主义的官僚统治方式才是天经地义。他认为中国数千年都是帝王君临天下的历史，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革命；辛亥革命只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盗贼禽兽”般的暴乱。这种政治观点，从许多告令中不断流露出来。1914年10月31日，他在一道申令里说：“辛亥事起，各省响应，孙文因闻改革将成，急遽返国……遂以数十私党拥护，设临时政府于江宁，举措乖戾，纲纪荡然……谬解共和，伪托平等，实则败坏法度，殄灭伦理，倒行逆施，上尤下效，使我二千年声明文物之邦，几一举而陷于盗贼禽兽之域，言念及此，可为浩叹。”[26] 尽管袁世凯在总统的名义下，已经获得了皇帝独裁的权力，他仍然感到不满足。他认为要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只有窒息民主精神，彻底地消灭共和的形式，恢复君主制。袁世凯所追求的君主制，不是当时英国的虚君君主制，这种君主制，必须有民选的国会和对国会负责的内阁，也不是日本的寡头专政的君主制。这两种君主制都是以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袁世凯所向往的是中国传统的以封建势力为基础的家天下君主制，与

英、日迥然不同。这种君主制，皇帝立于法律之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袁世凯常常以否定的口气问他的亲信："共和办得怎么样？"共和国体是经过革命和国民公意建立起来的，袁世凯竟称为"办"。这句话露骨地表现出他对家天下的迷恋。

袁世凯于1914年11月镇压了清室复辟派，次年初帝制自为的鬼影，便若隐若现。元月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约请梁启超赴汤山春宴，只有杨度一人作陪。据梁启超回忆说：谈话时袁克定"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27]。

正当总统变皇帝的把戏，由秘密而将要公开时，袁政府忽然接到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不得不暂时中断帝制活动而转入中日交涉。

第二节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一　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形势发生变化。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互相厮杀，暂时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大隈内阁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机会，遂以英日同盟为幌子，积极展开参战活动。

当时，英国在远东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担心日本参战，可能影响远东的和平和它的商业利益。所以欧战发生后，它曾通告日本，说明如果威海卫及香港等地受到德国攻击，将要求日本援助，否则将尽力避免使日本卷入战争。美国当时也希望维持远东现状，对日本抱有戒心。沙皇俄国为了确保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认为有必要尽力维持同日本的"亲善"关系，不反对日本参战。但是它也害怕日本在远

东“自由行动”，损害它的权益。所以俄国外交大臣曾向英、法大使表示，将来可由英、法、日三国分割德国的殖民地，而不赞成由日本独占胶州湾。为了达到参战目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向英国表示：日本参战的目的在维持远东和平，对中国领土并无野心，也不会损害英国的贸易，同时强调日本内阁应英国之邀而参战，已经奏明天皇，非有重大事变不能变更。到8月初，英国乃不得不放弃初衷，以限制战局地区为条件，赞成日本参战。日本表示愿意遵守战区限制，但不在对德通牒中声明。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23日正午前答复。通牒的内容是：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今属青岛市）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届期德国没有答复，日本乃于23日对德宣战。

日本大隈政府参战的真实动机，是乘机扩张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所以参战以后，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在日本向德国发出通牒前，袁政府就宣布了中国的中立立场；8月3日，又照会各国政府，要求参战诸国不在中国领土领海以及各国租借地内作战。6日，正式宣布“决意严守中立”，公布局外中立条规二十四条。同时又向美国、日本提议，由中、日、美三国联合，共同劝告欧战各国限制战区，勿及远东。这个建议不仅没有得到日本的赞成，因为它正想乘机渔利，而且还无理质问袁政府说：“此等关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28] 袁政府便赶忙电令中国驻美公使婉言取消此项提议。德国在青岛的驻军仅五六千人，自知无力抵抗日本，其驻华使馆参赞马尔参（Baron Maltzan）便与袁政府交涉，试图将胶州湾直接归还中国。但由于日本的阻挠和威胁，软弱无能的袁政府不敢接收，而暗中要求美国接管，以后再交给中国。美国不想得罪日本，拒绝考虑；仅依据《罗脱—高平协议》，于19日致函日本，声明各国应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及机会均等主义，将来应将胶州湾归还中国，日本派兵至中国应与美国取得协议。前此，英国于17日也将英日商定的战区限制自行宣布，说明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超出中国海以西之亚洲海岸，除东亚

大陆的德国占领地外，不侵犯任何外国领土。

英国对日本的安抚政策，和美国仅止于口头声明，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日本对德宣战后，即封锁青岛港口，并与英军一起对德军发动攻击，同时秘密要求中国于黄河以南划出中立外地区，以便日军登陆。袁政府外交部答复说："黄河以南，几包括山东全省，一有此议，必致中外惊疑，万难应允。"并要求日军缩小战区范围，登陆后"行军路线宜限在潍县以东平度一带离华军较远地点"，中国军警保护胶济铁路潍县以西一段[29]。为了表示对日本的"好意"，外务部还声明日军登陆后，中国军队不抵抗，只提出"抗议"；并表示"临时发生之事，如先与我商，苟可通融，无不竭力"[30]。尽管袁政府如此曲意妥协，但日本却蛮横无理。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突然在山东龙口登陆，强占电报局，不许中国商民发电报，又派兵占据附近村镇，断绝交通，强迫商会为其供应骡马车一千辆及夫差数百人，还发行军用钞票，强制中国人使用，若有拒绝，即被打骂甚至拘捕、枪杀，诛求驱使，为所欲为。次日，又有日军三千登陆。

袁政府一边提"抗议"，一边赶忙通告各国，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辽东境内的先例，把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划为交战区域，并声明：在交战区"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但对中国的"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身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31]。日军在龙口停留五天后，便向平度进军，一路大肆骚扰。9月10日侵占平度，包围县署，强迫县知事供应肉类数千斤和米麦燃料数百万斤，限五日内交出，过期按军法惩办。更有甚者，日军还张贴布告，对中国人宣示斩律五条[32]，公然把中国人视为被征服者。袁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提出抗议，日置益置之不理。日军于17日占据胶州火车站，将中国警察尽行驱逐。23日，英军九百人由天津出发，在崂山湾登陆，参加围攻青岛。日军无视中国所划的交战区，有意侵犯中国主权，忽于26日占领潍县车站。袁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退日军，"以重信睦"。日置益恃强狡辩，竟说胶济路是德

国产业，日本有权占领，与中国无关。其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还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日军不仅占领潍县，对胶济全线均将如此行动，并要中国军队撤离，否则发生冲突，日本将认为中国协助德国。对此袁政府外交部再次提出抗议，说明胶济铁路系华德商办，按国际公法，“交战国官产在中立国领土，其他交战国尚不能侵犯，况中德商办产业，安得占据”？并指出日军此举“违反协商，侵犯中立，破坏公法”[33]。日置益仍一味狡辩，同时日军继续西进，10月5日占领青州，次日进占济南车站，将胶济全线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占领胶济路全线，乃是日军作战之初就已拟定的计划，所以尽管袁政府多次抗议，日本政府始终充耳不闻。袁政府为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便秘密命令沿路中国驻军撤退。

日本的侵略行为和袁政府的迁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山东各地受害商民纷纷呈递公禀，要求袁政府执言伸理。当日本占领潍县时，梁启超在参政院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袁世凯就山东问题答复。他说：欧战发生，“大总统曾召集本院同人到府，报告外交经过情况，当时对于报告虽尚不甚满意，而以现在之地位及时局，政府措施若此已觉不易，故亦认为相对的同意。日来据各方面报告，事情已为之一变，虽政府外交因有应守秘密，不能宣布，而本院既代行立法院”，不能不提出质问[34]。蔡锷补充说：“万一日本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实行其大陆政策，政府究竟如何对付？或者已有办法，实亦本院所乐闻。”[35] 经过讨论，参政院向袁世凯提出质问，列举日军在山东的种种侵略行为，最后表示：“日来各地军民因痛外交之失宜，惧亡国之无日，或设救亡敢死之团，或倡排货修怨之议，有识之士日思所以节制之。瘏口哓音，始获少安，若外交当局不能以国权切实之保障明示吾民，则疑愤所集，万一激成度外之举动，将何求以善其后？”[36] 对此，袁世凯没有明确表示。

10月30日，日军对青岛开始总攻，德军不敌，于11月7日投降。至此，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全部为日本攫取。日本以战胜国自居，

对青岛和胶济铁路实行军事统治，制造事端，拒不撤兵。次年1月7日，袁政府正式照会日、英两国，声明取消中立区战，恢复原状，要求在该区域的日军一律撤退。日本政府竟然蛮横地说：中国的声明，独断不当，日本不能因此而受拘束。袁政府于16日再次照会日本，说明中国当时划定交战区域，实是基于“外顾邦交”的一项措施，并没有与日本签订协定，战事既已结束，中国自行宣布废止，本无征求日本同意的必要；况且该区域内德军早已解除武装，英军也已撤去，日军自无继续停留的理由。日本此时已酝酿新的侵略阴谋，所以始终不肯撤兵，有意制造“悬案”。震惊中外的“二十一条”要求即于此时提出来。

二　“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帝国主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动机，是企图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1914年8月，日本政府在参战的讨论会上，就决定以归还青岛作为解决满蒙悬案的交换条件。所谓满蒙悬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清末以来在中国东北南部和蒙古东部地区无视中国主权，不断扩张势力，故意制造出来的。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通常受到元老重臣、军部和民间右翼浪人的影响。这三方面对于侵略中国的手段各有不同的主张，时有矛盾发生，但都认为应乘欧战之机扩大日本在华势力，否则一旦欧战告终，有欧美列强掣肘，日本将失去主动机会。所以欧战爆发后，元老、陆军、财阀及右翼浪人的各种意见书，纷纷递到日本外务省。右翼浪人团体中势力最强的黑龙会，就曾提出《对支问题意见书》，极力主张“独立自主外交”，反对与欧美列强协调。该意见书认为日本应向中国提出“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的优越权，将其统治权委任于日本”；中国应聘请日本军事、财政、教育等顾问，采用日本兵器，将福建海港租借给日本；还要求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等等，企图借此机会一举树立东亚霸权。正是在这种迫不及待的独占中国的侵略思想指导下，大隈政府拟定了所谓《对支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要求的草案，

并寻找向中国提出的适当时机。

日本对德宣战不久，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即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报告，要求乘机向中国提出“悬案”交涉，但外务大臣加藤认为时机尚早，并未予以采纳。至11月上旬日军攻占青岛后，加藤认为最适当的时机业已到来，乃于11月11日将《对华交涉训令提案（即对支政策文件）》提交内阁会议讨论通过，12月初奏明天皇批准，随即召日置益回国述职，令其办理。日本政府的所谓训令，除“二十一条”外，还附有交涉时日本可对中国保证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四点：一、保证袁大总统地位及其一身一家之安全；二、严厉取缔革命党及中国留日学生，对反袁的日本商民浪人予充分注意；三、适当时期商议胶州湾交还问题；四、考虑审议袁大总统及有关大官叙勋或赠勋之事。日置益还提出要加上压迫或引诱手段，如：留驻山东日军，必要时可占领津浦路北段；煽动革命党、宗社党从事颠覆袁政府的活动，以此来显示日本之威力和决心；针对袁政府财政困难，拟以借款为诱饵；等等。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便秘密从事交涉布置。当时，他已看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遂把支持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他曾对外交次长曹汝霖表示：“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37] 他并以新归任为词，请求晋见袁世凯。

1月18日下午3时，由曹汝霖安排，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日文“二十一条”一份，并逐条说明主旨及日本的立场，还威胁说：“中日两国间，近来真意殊欠疏通，中国对日本举措既多有疑虑，且挟有无谓之误解。日本国民中的一部分，亦怀疑中国当局的诚意，常抱反感，加以第三者挑拨中伤，对两国邦交时肇意外之危险”；“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条件，则可证明日华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最后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38]。两日后，日置益又将另一份条款、附有翻译汉文，递交袁政府外交部，作为正式交涉的根据。

“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号。

第一号，关于山东省四款：一、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二、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三、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四、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二、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三、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四、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五、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六、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一、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二、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

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三、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六、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七、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充分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狰狞面目。

对于日本提出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交涉，袁政府事先懵然无知。日本有意径向袁世凯提出，开元首直接外交恶例。袁世凯本完全有理由严正驳回，拒绝讨论。但袁因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原来打算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没想到日本竟然企图鲸吞中国，连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都不顾及了。这使他惊诧无措，“殊为失望”，但他未敢断然拒绝。在听完日置益的陈述后，他表情严肃地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39] 当时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具体地透露了袁政府的窘况：“查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40] 据袁的秘书夏寿田说：“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41] 1月18日晚，袁世凯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出席人员除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外，还有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杨士琦、钱能训也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大致有三方面：一、日本提出如此苛刻条款，非因政府宣布废除交战区域所引起，应尽快弄清日本的目的，以便制定对策。二、日本要求对条款绝对保密是不可能的，一旦泄露，在国内必然招来麻烦。再者，日本必然与第三国早有默契，过早泄露，欧美列强会援引

均沾。三、日本所提条款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要考虑满足日本的一些要求，而又避免与其交涉有关主权各项。最后袁氏决定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尽快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同时预作了一些布置：一、让孙宝琦称病辞职，派陆徵祥（时为总统府外交顾问）接任外交总长，以新任总长须对案件加以研究为借口，拖延时间。袁氏更换外交总长的另一个原因是，自日军侵入山东以来，外交部因对日交涉颟顸，受到各方面严厉抨击。袁为使孙代其受过，早就有意更换孙。为了直接指挥此项对日交涉，袁选中了一向对他百依百顺的陆徵祥接任。陆于1月28日到任，次日拜会北京公使团。二、19日袁于总统府接见其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说："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作高丽第二。"袁有意表示愤慨，借以试探日本的态度。坂西立即报告日置益。同一天，曹汝霖赴日使馆与日置益晤谈甚久。曹汝霖表示二十一条"真令人感到难以承受"。日置益则说，此次要求各款，均经日本政府深思熟虑，有坚强决心，以期必成[42]。三、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把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事告诉日本元老松方正义侯爵和山县有朋公爵，并探询他们的"真意"。有贺临行时，袁亲批赠送"路费"一万元，并带有运动元老派的交换条件[43]。四、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但是袁世凯的这一套把戏，被日本帝国主义一眼看破。日本外相加藤于2月3日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44] 此外，袁政府向中外报界透露了日本要求的一些内容，用以鼓动舆论，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

当时因日军侵入山东，中国各阶层人民愤懑已久。"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或投书报刊，或通电全国，一致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袁政府拒绝日本无理要求。1月末和2月初的几天当中，各地商会就发出通电五百余件。反日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

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江西有“妇女救国会”；广东有“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有“国事研究会”；等等。同时，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斗争。上海商会首先于3月16日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四万人。各界代表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上海商民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而且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商人拒卖日货，人人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现了以反日爱国为题材的戏剧和歌曲。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进行鼓动。4月初，上海商会倡议救国储金，成立了以虞洽卿、马佐臣、陈炳谦为首的“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向各地商会发出通电，倡议“人人爱国，人人输金”，在全国征集储金五千万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各省城镇商民热烈响应，一月之间，成立了储金分事务所二百五十余处。学生、工人、商人及家庭主妇等都节衣缩食，踊跃参加储金，未及一旬，承办储金的中国银行即收款二十余万元。

各界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很快超出了袁世凯所能允许的范围。这使他如芒刺背，时刻不安。在日本的要挟之下，袁政府只得多次通令禁止抵制日货。但反日斗争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二十一条”交涉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的。

中日交涉会议完全采取秘密的形式，自2月2日起，每周举行二三次，至4月26日，共有二十五次之多。日本方面为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高尾亨。中国方面是陆徵祥、曹汝霖、秘书施履本，实际由曹包办，一切秉承袁世凯的旨意进行。交涉一开始，日置益就坚持要陆徵祥对“二十一条”整体表示态度，并对各号发表意见，企图使陆先囫囵吞下。陆徵祥认为以逐条讨论为是，双方曾有争论。袁世凯鉴于全

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屈服将使自身难保，加以他通过有贺长雄了解到日本的主要意图是在满蒙获得扩张机会，于是便提出对日方一、二、三号提案的修正案，对第四号则主张由“中国政府自行宣言”，对第五号表示“碍难商议”。修正案的主旨是满足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要求，其他地方则使日本暗中有所收获，而明处又表示自己不轻易出卖主权。但日置益一再逼迫讨论第五号，并以不允继续开议为要挟。曹汝霖秘密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会见加藤高明，要求日本“留亲善余地”。以后会议时开时停。日置益态度极为蛮横，“词意决绝，几无磋商之余地”。同时日本政府以换防为名，增派军队至大连、青岛及塘沽等地，以武力支持日置益。袁世凯无奈，便请求有贺长雄拜会日本政府要人，“奔走说情”。同时，欧美列强获悉“二十一条”的真实内容后，对日本的欺骗行为也一致不满。

原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号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号各条。“二十一条”全文真相为中外所知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纷纷予以激烈抨击。2月10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号，深表遗憾。此后又照会日本政府，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相侵”。加以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日趋高涨，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表示可以“减轻要求”[45]。它一面宣布第五号为“希望条件”，系属劝告性质，借以蒙混舆论；一面又于4月26日提出修正案，共二十四条，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上依然如故。它声言此“系最后修正，务请同意”，并称：如中国政府将二十四条全体承认，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以适当时机，附加条件交还中国。袁政府认为日本的修正案“比较初次提案固有部分之让步”，但仍有一些条款“与中国主权、其他列强之条约上权利以及机会均等主义均相抵触”[46]，故不能接受。据此，袁政府又作成修正案，于5月1日提交日置益，并“解释中国难复行退让之苦衷”[47]。日置益反指责袁政府无诚意，百般恫吓。中日关系十分紧张，

似乎战祸迫在眉睫。5月6日，袁政府开会决定再示让步，以挽危机。但日本大隈政府决定采取最后手段压迫袁政府，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宣称除第5号各项允许以后再行协商外，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48]。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

三　袁政府对日屈服和群众的反日风潮

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以英美两国为后援，希望它们从中调解。英国虽然忌妒日本扩张势力，但对日在南满和东蒙所攫取的特权持同情态度。英国所关注的限于它的在华利益是否受到影响。所以日本取消了在长江流域内修筑铁路的要求以后，英国就改变了态度。日本提出通牒后，英公使朱尔典于8日上午到外交部访陆徵祥，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不宜作武力之争”[49]，并要陆转告袁世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门户开放”，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和行径，自然引起美国朝野的反感。驻华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曾试图“为中日谈判进行斡旋”，但美国政府怕招致日本反对，加以又得不到英、法、俄三国的支持，所以仅仅于5月5日发表声明，“劝告”日本。13日又声明：“凡关于损害美国之条约权利及旅华美国人民权利”，美国政府“决不承认”[50]。俄、法两国虽然猜忌日本，却因欧战无暇顾及。5月7日晚，袁政府外交部派员前往俄国使馆寻求支持，俄使克鲁朋斯基竟然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皇帝当不成，便决定对日屈服。8日下午，袁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出席的有黎元洪、徐世昌、杨士琦、钱能训、梁士诒及各部总长等。先由陆徵祥报告上午会见朱尔典的情况，然后讨论。发言者大都迎合袁的旨意，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惟独段祺瑞主张动员军队，对日示以强硬。最后，袁说：“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权衡

利害，不能不接受日本通牒。接着他还引用古训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51] 据参加会议的梁士诒后来说："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52] 但未几，正是这个袁世凯和这伙"忧国忧民"的文官武将，敲响了洪宪帝制的锣鼓。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号中各项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允诺"，最后还表示："以冀中日所有悬案就此解决，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53]

袁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史称《民四条约》。日本方面代表是日置益，袁政府代表为陆徵祥。两个条约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洲及东蒙古的，换文十三件，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总之，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

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其卖国行径。在决定接受通牒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于10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他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嫚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54] 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损失权利颇多"。而在公开的通电中，为保持他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体面和威风"，则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

结，中外敦睦”。同时，袁政府还动员各省官吏拍发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又命令御用报刊颠倒是非，把对日屈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开会庆祝“外交胜利”。然而，这一切愚弄人民的鬼蜮手段，并没有能把他承认“二十一条”绝大部分要求的卖国行径掩盖住。

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敌忾心。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民四条约》，誓雪国耻。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请缨杀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

面对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袁政府开始不敢公开镇压，各地方“官厅能维持其秩序，不能禁止其进行”。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的救国储金活动，还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支持。袁世凯本人也认为救国储金“最为今日切要之图”，并认储十万元，表示“勉力赞助”。但袁政府所能允许的反日爱国范围，仅仅是集会纪念和爱国储金。当抵制日货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露出了反人民的真面目。由于对日本侵略的无比愤慨，各城镇商民相戒不买日货，不用日货，有的还焚毁日货，以示抗议。许多地方群众集会，向袁政府提出质问，要求惩办陆徵祥和曹汝霖，称他们为“卖国贼”。有的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骚动。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会，庆祝日本所取得的“外交胜利”。当地学生和商民怒不可遏，群起捣毁日本商店。镇守湖北的段芝贵，急忙由武昌抽调军队，前往协助日本军队镇压。事后，他向北京统率办事处密报说：“武汉三镇人心颇形不靖，街谈巷议多属仇外之言”，“人人脑筋中隐蓄一番愤激”，恐“再有特别事故发生”，并要求给他屠杀爱国人民的权力[(55)]。

袁世凯见欺骗不生效，就公开采用高压手段。5月26日，他颁布申令，公然诬指爱国群众是“匪徒”，杀气腾腾地说：“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诱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匪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发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56] 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袁世凯于6月16日又以“妨碍邦交”为名，再次申令禁止抵制日货，还以“取缔排斥日货不力”的罪名，撤换了湖南巡按使。由于袁世凯的严令敦促，各地方官署派出军警，逮捕爱国群众，将反日热潮镇压下去。对中国人民张牙舞爪，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这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入主出奴的丑恶面目。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的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正是由于全国反日爱国热潮，才迫使袁政府事后不能不声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四条约》是由日本最后通牒而被强迫同意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未承认为有效，而在后来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都要求改订，甚至全面予以废除。所以《民四条约》从国际法来看，“固未尝成立”[57]；从事实上来说，也未能执行。

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完全如愿，一举控制中国，但它的野心不死，以后以《民四条约》为口实，在南满、蒙古东部、山东等地，不断扩大侵略权益，导至中日关系长期恶化。同时，《民四条约》完全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因此日本与在华有侵略权益的欧美列强不断发生冲突。美日矛盾自此日趋尖锐，这对远东国际关系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节　袁世凯称帝

一　筹安会策动“请愿君主”及各界反应

“袁世凯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革命党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还半信半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流言，实际上是袁世凯为发动帝制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当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师旅长等要人，被召陆续进京觐见。袁垂询政情时常常问：“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各文武官吏除少数吐露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觐见时，还“痛陈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人”[58]。袁氏不仅未加责备，而且一再赐以贵重衣物。

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北洋将领中辈分最老，进京后，段芝贵等人推他向袁世凯劝进。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

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59] 袁世凯喜用权术，所言所行，真假难辨，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思。

冯国璋本来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入京后不得已而劝进，听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立即转告梁启超。前此，梁启超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于1915年4月请假南下省亲时，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60]。袁世凯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他由南方回京，与冯国璋一路北上，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他得到袁对冯的讲话后，便认为袁政府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15年7月赶到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

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61]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而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在古德诺文章发表的同时，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预闻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觐见，由夏寿田陪同。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故作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于清末已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当密探，因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1913年他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充当都督府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其他三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政府一边。袁党特地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就是过去的革命党人也改变了调子。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名流，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国成立后，并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袁世凯对严复也颇重视，先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不久辞职，又先后被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严复列名筹安会，使袁世凯“极为欢悦”[62]。但严复却不肯动笔鼓吹，推波助澜。这不是因为他不赞成帝制，而是他迟疑不决[63]。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

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此外还有名誉理事和参议若干人。

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64) 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他们的文章五花八门，像样的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据说，《君宪救国论》早在1915年4月间就已定稿，曾由夏寿田呈送给袁世凯。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声。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后来，段芝贵又将杨文付印，广为散发。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他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战乱和危机，硬说成是实行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袁世凯，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其二，和古德诺说的一样，认为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

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他们把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当成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认为总统选举会扰乱人心，不合中国国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虽然筹安会挂出来的招牌是“学理讨论”，但人们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搞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投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反对恢复帝制的人纷纷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开始这些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既声讨筹安会，也不放过袁世凯。他们准确地看出筹安会不过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舆论工具。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或海外的华侨，如上海的革命党人发起组织“共和维持会”，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孙中山在东京发表了讨袁宣言，等等。另一类则仅仅反对筹安会，不涉及袁世凯，而且有不少函电是直接给袁世凯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筹安会。这些人大都是进步党人或比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于受蒙蔽，真以为袁世凯与筹安会无瓜葛，大部分人则是从策略考虑的，在高压手段下，他们不敢揭露袁世凯，而把矛头仅对准筹安会。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约法规定开明专制，袁世凯已握有极大的权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强；如改行帝制，对内召乱，对外召辱，又使袁世凯背誓失信，必然要“动摇国本”。当时报刊上这类言论颇多，尤以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文著名，皆传诵一时。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接着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也相继于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这样，此文便很快传遍全国各大城市。该文共万余言，一开始梁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他说：“立宪与非立

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的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新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已有所补救，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梁启超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打动袁氏，他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十余年，实行已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65)

梁启超虽然仍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帝制派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袁氏也还留有余地，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由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

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梁氏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66)]。

筹安会引起的愤慨，还表现在有不少人上书政府，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8月15日，贺振雄呈肃政厅代呈袁世凯，恳请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17日，李彬致书袁世凯，要求取消筹安会。18日、19日，先后有李诲、周震勋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这些人的理由大致是，杨度等人在中华民国公然鼓吹帝制，“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诬指孙中山、黄兴），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因此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当纠弹。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越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不干涉。”章说：“此责任却负不起，待与内务总长商酌办法。”罗文幹见筹安会有后台，无法检举，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辞职。肃政厅比总检察厅要勇敢一点。为了讨论筹安会问题，都肃政史庄蕴宽召集肃政史开特别会议，议决呈请袁世凯“迅予取消，以靖人心”。袁批令内务部“确切考查”。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内务部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袁政府对筹安会不仅不加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一成立，京师警察厅就派警察到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的私宅，守门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出活动，策动湖南、吉林、

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遥相呼应；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有段芝贵等人密电策动，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从附和，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便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这些所谓“请愿团”的领衔人，大都是各省的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山东王锡蕃，陕西张风翙，福建陈壁、梁鸿志，湖南杜俞、叶德辉，京兆恽毓鼎，等等。与此同时，梁士诒、张镇芳、朱启钤、周自齐等一些政府要人也在幕后策动请愿。特别是梁士诒，帝制发动之前不久，其手下的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都因营私舞弊被肃政厅参劾。袁世凯申令“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召见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67] 及帝制公开，梁士诒开始迟疑不决，但很快就跟上形势，把请愿帝制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时机，于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商务总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等。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之类的表示拥戴之辞，好像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中国就会立即亡国，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参政院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等人都是参政，又是请愿团的策动者。他们原打算一鼓作气，让袁世凯黄袍加身。但是，袁氏突然于6日派杨士琦为代表到院宣布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他

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但接着又表示："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68] 袁氏的宣言，语意含混，自相矛盾，一度造成混乱。不少人看出他"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69]。但也有人误以为他不赞成帝制，以致参与帝制密谋的袁党，不得不密电向这些人解释说："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70] 袁世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赞成急遽轻举，而要通过另造民意机关，把帝制运动放慢一点，以便使国内外都知道他对做皇帝并不热衷，但不能不尊重"民意"。

于是，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氏旨意，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袁世凯遂于25日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二　北洋派内部的请愿和分歧

帝制运动拖延时间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袁世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而是外交方面还没有把握，同时又传来了封疆大吏对帝制不满的确实消息，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慢步伐，迂回前进。

筹安会策动的请愿风潮，原来仅仅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与此同时，北洋军政界内部还有不公开的请愿活动。各省给袁世凯的请愿密电、密呈，他都亲笔批阅，交政事堂存档，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场秘密的请愿也是从北京开始的。

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8月24日下午，由段芝贵、袁

乃宽发起，在石附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当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个区的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为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

军警大会之后，文武官员纷纷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在政府要员之中，有杨士琦、钱能训、陆徵祥、朱启钤、章宗祥、梁士诒、周自齐、梁敦彦、贡桑诺尔布、阮忠枢、唐在礼、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张士钰、傅良佐及京兆尹沈金鉴等。军警界的人最多，有以陆军总长王士珍为首的中央军事各机关三百二十多人，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为首的海军各舰长，以张绍曾为首的陆军中将二十二人，和以吴介璋为首的少将四十三人及上校五人，步军统领江朝宗率阖署员司及全体营翼官兵，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领各省警察厅长，京师宪兵营营长陈兴亚率领全体官兵，等等。这些密呈，大都是官样文章，其中不少是操纵者代办的。当时官场上已经形成一种压力，逼迫人人表态，其中许多人虽心以为非，口亦不敢不附和。

尽管如此，在政府要员中，仍有少数几人从维护北洋统治出发，公开表示不以帝制为然。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拒绝劝进，但又不愿公然反对，而是采取了超然的态度。他对袁克定说："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71] 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拒不劝进。8月2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由附和帝制的王士珍接替。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均借故辞职。农商总长兼水利局局长张謇请假南下，回到南通后即正式辞职。婉言劝阻帝制的张一麐被调离政事堂机要局，接任教育总长，"阳为显擢，实意疏外"[72]。黎元洪、周学熙等人均有密呈致袁世凯，内容大同小异，都主张实行总统世袭，反对君宪。周氏还劝袁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73] 黎元洪所讲的理由大致可代表持总统世袭说者的看法。他说："迩者筹安会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然默观时势，障碍颇多，乱党既易于生心，外人尤难于承认。且大总统尝以维持共和誓于众矣。福国利民，昭然若揭，百尔君子应如何仰体上心，统筹全局，岂忍快一时之辩，而贻总统累卵之危。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未敢与总统宗旨相背而驰也。窃以为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选举之弊，学者类能言之。至如约法推举，扶偏救弊，似具苦衷。然大宝所在，争端易生。彼心怀叵测者，固宠盗权，皆可以觊觎金匮，一也。国本未定，群不知继任总统果属谁某，人心惶惶，将无宁宇，二也。为今计，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为各国开一先例。扬历练习，后起有资，利一。先朝旧人，易于驾驭，利二。开国守成，政策一致，利三。以国为家，关系密切，利四。综此四利，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定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74] 对黎元洪和周学熙的密呈，袁世凯均令密存，留中不发，无任何表示。在他看来，京官赞成与否，影响不大，对手握兵权的地方军帅则不能不特别注意，他们的拥戴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

筹安会开始活动不久，段芝贵就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多数讨论趋重君主立宪，望熟筹电复。外省第一个直接上密呈给袁世凯的是奉天张作霖。他要求袁“速定国体，以安大局”，并说“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虽刀锯斧钺加身，示不稍有顾怯也”。他还发誓说：“若有二心，天实殛之。身既许国，即赴汤蹈火亦所甘愿，区区血诚，惟期与我大总统一效驰驱。”[75] 许多将军、巡按使唯恐失此攀附机会，至9月2日已有十九人回电，一般地表示赞成变更国体。段芝贵即据此缮写密呈，当面递交给袁，说“合词恳请元首改君主国体，以固根本，而救危亡”。除领衔人段芝贵外，被列名的有龙济光、赵倜、靳云鹏、王占元、倪嗣冲、陈宦、李纯、唐继尧、陆建章、张广建、汤芗铭、朱瑞、阎锡山、孟恩远、朱庆澜、张怀芝、潘矩楹、李厚基。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值得注意的是：直隶朱家宝、江苏冯国璋、广西陆荣廷等都无表示。徐州张勋的态度暧昧，他密电袁说：“近闻各界人士讨论国体，滋事体大”，希望袁“折衷群言，扶植正论，庶中国前途尚克有长治久安之望”[76]，对拥戴袁做皇帝事，未提一字。特别是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态度不甚明了”，使北京“要津之人甚为廑虑”[77]。为了迫使张勋、冯国璋等人表示拥戴，在递上十九将军呈文的当天，段芝贵串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等十人，联名再次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共和不能适用，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望熟筹解决电复”[78]。这十人都是在京军警政三界要人、袁世凯的心腹。此电的用意所在，十分明显。不少将军、巡按使立即密电政事堂或统率办事处，再次明确表示赞成君宪。但是筹安会所遭到的反对，和北京袁政府的动荡，不能不影响一些地方官吏的态度。首先起来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9月1日，他密电徐世昌“请求中央取消筹安会，以释群疑”，又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不下数千言。他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后，9月6日再次密电说：“人心可静不可动，若既动矣，静之甚难”，目前应“群策群力，聚精会神”，解决“军国民及人民生计等类”问题，“至国体问题并无研究价值，俟天下

太平再行提议”。最后他说：“建章赋性愚戇，不识时务，以为今日天下正大有可为之时，若因此停顿，殊为可惜，故期期以为不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79] 同日，直隶将军朱家宝致电政事堂表示：筹安会发生之初，他不知其详，认为“兹事体大，不得不审慎，故迟迟未复”；对段芝贵等人的主张虽“极表同情”，但见于“民国建设之始，外人赞成之难”，此次统筹全局自不能不先办妥外交，否则“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能定”[80]。

冯国璋于6月间亲耳听到袁世凯决不做皇帝的谈话，以为帝制近期不会发生。筹安会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寒心，曾气愤地对亲信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81] 因此，他对筹安会不予理睬，暂作壁上观，同时派人入京探听消息，又与驻徐州的张勋联络，希望持一致态度。张勋倾向清室复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有反感。冯国璋和巡按使齐耀琳接到段芝贵等人的电报后，便推张勋领衔，密电政事堂各部及统率办事处说：“近日京中有人发起筹安会，意在变更国体，一再通电各省，并要求派员入会讨论。勋等因此种举动仅由三五私人立会号召，何敢率行附和，致蹈越职违法之嫌，故未复电派员。静候中央办法。”电文接着说，段芝贵等人的联名电，“自与私人发挥己见冀倾众听者不同。大势所趋，风云一变”，但此事“当如何定计决疑，必早权衡至当，应请统筹立断，由国务卿定稿领衔，联合京外文武长官列名陈请，提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议，以召公正，而免参差”[82]。他们还将此电咨发各省征求同意。云南唐继尧和任可澄本来于5日已复电段芝贵等表示赞成君主，次日接张勋和冯国璋的电报后，又急电政事堂，表示对由徐世昌等“挈衔联陈，提交议院一节”，“极端赞成”，而且说如此才能“释群疑，而定国是”[83]。陆荣廷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正愁难以应付，突然收到张勋、冯国璋的电报，便致电政事堂说：冯电“持论正大，先获我心，应请国务卿立断定夺，领衔陈请交议，以昭详慎”[84]。张、冯、唐、陆等封

疆大吏采取推托态度，目的虽不能说完全一样，但对帝制运动的普遍不满是非常明显的。

帝制运动开始时，袁世凯及帝制派对地方封疆大吏已做了反复考虑和安排，认为不成问题。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热察绥三区（今内蒙古及河北、辽宁一部分）都是北洋旧部，或已变为北洋系。山西阎锡山虽革命出身，但无实力，又在北洋势力包围之内。新疆杨增新地处边远，只能听命中央。东北三省关键在张作霖，早由段芝贵极力拉拢，最后又以段督理奉天，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南方各省，江苏、江西、安徽、湖北、福建都是北洋旧部，浙江朱瑞表示输诚。湖南、四川都是袁的亲信，又有曹锟第三师驻岳州，威镇西南。广东龙济光和龙觐光兄弟，早已俯首中央。广西、云南、贵州兵力都不多，并有北洋官吏王祖同、龙建章等监视之。他们以为布置已极为周密，万无一失，没料到问题正出在北洋派身上。

对于龙建章，帝制派没有给予特别重视，因为龙手中没有军队，不敢造反，所以不仅断然拒绝他的请求，而且指斥他受“乱徒嗾使，首鼠两端”。龙被迫很快改变态度，随声附和。云南起义后，他又电请另行表决国体，再次遭到训斥，及至贵州独立前夕，被迫离任。经过一番疏通，朱家宝也改变了态度。冯国璋和张勋两员上将，拥重兵坐镇江淮，一举一动，事关大局，又有陆荣廷、唐继尧附和其说。袁世凯及帝制派虽然认为他们的“电文语含讥讽，皆不甚满意”[85]，但也不敢施加压力，鲁莽从事，只好采取“调停”态度，以避免事态扩大。他们认为此种“波折”处理不当，“对内对外均足惹起误会”，“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大局不堪设想[86]。“调停”的办法有三点：一、放慢了帝制运动的步伐，这就是9月6日袁世凯突然宣布要征求“多数国民公意”的真实原因。二、派袁乃宽劝说徐世昌领衔劝进。三、急派阮忠枢南下，调解矛盾，消除“误会”。

袁乃宽的活动不成功，徐世昌不仅仍然拒绝领衔劝进，而且提出辞职。袁世凯亲自挽留，他答复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余地，若

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87] 由于他坚持离开北京，袁世凯只得允许他请假，而派陆徵祥代理国务卿。阮忠枢到南京和徐州反复陈说北洋团结的重要性，并允许冯、张保留他们的意见，对帝制“虽不必明白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不久，冯国璋探知帝制已是大势所趋，无法挽回，也就不顾“悠悠毁誉”，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公开发电“辟谣”，说明他对袁以公谊论则“心悦诚服”，以私情论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至9月下旬，冯国璋、张勋先后密电袁世凯表示，各省人民业已争先上书请愿，请袁世凯“俯同民好，早定大计，而奠久安长治之基”。冯电还解释说：以前未能及时电复，因考虑“职在镇抚地方，未便轻率建议”，密电堂部领衔，目的是“商询办法”，并无他意。[88]

北洋派内部的一次政治危机表面上过去了，请愿帝制的活动便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　帝国主义列强对帝制态度的变化

从帝制运动开始发动，袁世凯及其党徒就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在他们的眼里，取得列强的支持，比制造民意更重要。他们之所以以少数人之私心，诈称全国之公意，而且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改行帝制，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列强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袁党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讲得十分清楚：“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目前虽稍有困难，而于国本将来之利益实巨。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依法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

(89)

由于欧战的影响，列强对袁世凯推行帝制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的前后变化很大。德皇威廉二世在二年前接见中国驻德公使梁敦彦时，就表示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当时袁克定正在德国养病，威廉赐宴便殿，也有类似的“劝告”，并“亲书长翰，密贻项城”。袁世凯从小站练兵时就崇拜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对德皇的“劝告”，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按新约法改革政府机构时，他就常常对文武要员说，要以德国为榜样。帝制发动之初，欧战激烈，德军强横，大有席卷全欧之势，帝制派深受鼓舞。帝制发动后，德、奥两国已暗中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世凯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

袁政府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袁世凯认为，“有力挟制中国者，厥惟日本”。但日本已从《民四条约》中取得了巨大利益，短期内不致再有更多的要求。其实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民四条约》是一份厚礼。所以其政府一些要人，如首相大隈重信、外相石井菊次郎、伊集院等，对袁世凯称帝忽而表示不干涉，忽而改口说不赞成，忽而又怂恿，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其目的是以承认帝制为诱饵，索取更多的报酬。驻日公使陆宗舆于9月6日密电外交部说：“顷见大隈总理，谈及帝制。渠言：‘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问，惟万勿因此致乱，有妨邻国商务。余深佩大总统实有统治之能力，但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须于名义多所更换。’”9月10日陆又密电说：“伊集院密告帝制尚非其时，即欲改制，亦以取法尧舜，示人无家天下之心为佳。”(90) 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也极力反对帝制。袁世凯认为日本政府要人的表示是表面文章，只要给予一定的权益，不难取得承认。他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

度。有贺于1915年9月下旬返回北京，转达大隈的口信："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9月23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电告曹汝霖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91] 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无异为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他得到电报，就急不可耐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陆宗舆回电说，如派特使，只有徐世昌和曹汝霖一起来"于事方济"。陆还建议授予他权力，"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方以大员前来正式商办为宜"，并表示似不可就之太骤，以免日本要价过高[92]。从以上两电报可见，袁政府为了帝制事，曾与大隈政府秘密交涉，而且在9月下旬已有进展。

英国对帝制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袁曾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意见。当时欧战激烈，英军处于被动地位，英国无暇顾及远东。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后来，他又直率地告诉梁士诒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的。"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93]。所以，筹安会成立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袁的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8月29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但是，当朱尔典得悉帝制已取得大隈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对袁表示，英国"亦赞成帝制"。10月2日，袁约见朱尔典，由蔡廷幹做翻译，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

谈。朱尔典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袁世凯答道："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及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各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他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立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他又进一步鼓励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94)

美国对帝制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态度，认为承认新王朝的诸条件中包括帝制"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秩序的能力"(95)。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返美述职后于1915年10月1日回到北京，周自齐和许多政府要人都对他说：各省纷纷发生强烈呼吁，要求袁赞同帝制。如不顺应这种要求，将会遇到很大麻烦，甚至发生军事暴动。芮恩施虽不完全相信周自齐等人所说的一切，但看出"共和变帝制是势在必行的事情"(96)。10月4日，袁世凯又接见他，谈到不久将举行的公民投票。芮恩施表示："政府要真正发挥代议制机关的作用和鼓励地方自治，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尊敬。"(97)

会见朱尔典、芮恩施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以取得英、美、德等强国的承认，日本也不至于阻挠，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

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同时，袁政府御用报纸连篇刊载英美公使晋见袁的事，“谓恢复君政之议，为外国政府所赞成，英美尤无异词”，以此来压制人民的反抗情绪。

四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态度变化和北洋派内部风波的平息，袁世凯及其党徒乃悍然不顾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决定尽快实行君主制。他们认为时间越拖，天下越乱，这种乱不是由于帝制运动引起的，而是因为没有皇帝，只要有了皇帝，就可以稳定人心，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推翻了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成案。他们说：“国体问题发生以来，至今已有悬崖转石不至地不止之势，四民百业延颈以待久矣。”他们以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持”为理由，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98)]。同时上请愿书的还有“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于10日申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又命令京外文官武将“保全地方”，“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所谓“保全地方”，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内务部10月3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武官吏心领神会，纷纷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湖北王占元保证“力任地方

治安”。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安徽倪嗣冲保证：“凡所以维持秩序，防患未萌以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自应担负完全责任，并另筹马步炮十五营派皖北镇守使倪毓棻统率驻蚌埠，以备缓急，而资调遣。”湖南汤芗铭说：“倘有阻挠救国大计，誓当为王前驱，除此公敌。”四川陈宦表示：“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识其他……袍泽同行，馨香祷祝，所愿中原有主，保我黎民世世子孙免沦异域。”(99)

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地方”的榜样。筹安会出现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醒华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北京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等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道：“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100) 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再出言反对。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谁若出语反对帝制，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甚至处以极刑。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张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的纸条。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开封、长沙、西安等大城市，都有密探四出侦查，迫害商民。上海名流中被列入“罪榜”者达七十三人。“国货维持会”和“劝用国货会”因拒绝请愿帝制，被诬为“革命机关”，北京统率办事处密电拟捕两会会员十余人之多。《民新日报》、《民国公报》、《爱国报》、《民意报》、《民信日报》等，或以“防害治安”，或以“造谣煽惑”等罪名，都被取缔。在袁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下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101)。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全国各地于10月25日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从28日起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

的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为威胁。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再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每个代表发大洋五百元，作为“川资或公费”；将军或巡按使还要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敢写“反对”二字了。投票之后，紧接着又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至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包括对帝制一度持保留态度的冯国璋、张勋、陆荣廷、唐继尧、龙建章等，都有劝进的密呈或密电给袁世凯，报告各地选举投票情形，内容差不多都是“万众欢腾、歌声雷动”之类的话，又都要求袁氏“俯顺民情，早登大位”，“以承天命，而慰人心”，等等。此外，北京及各省商民团体的劝进电报、呈文、奏折，形形色色，成百上千。有的省数十件，有的省一二百件，多者达三百余件。文电的多少，以该省官吏对帝制的态度为转移。不少电文都是数百人签名画押，以示郑重。如奉天商会会长孙百斛等一千铺户，广东七十二行商劝进团五百一十五人，以杨度等“六君子”为首的“宪政协进会”会员一万五千余人（这是帝制运动中列名最多的一个劝进表），等等。袁世凯差不多全部批阅了这些文电，有的还批上“发登公报”字样。段芝贵的代奏文电首屈一指，袁批“奉电甚多，然不宜多发表”。

在文武官吏和“商民”的一片劝进声中，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于12月11日上午9时开会，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开票。由秘书长林长民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之人数与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立即拿出早已准备

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歌功颂德一番之后，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故作谦辞说：“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102)

另行推戴是假，要党徒为他背誓失信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由秘书长报告袁氏咨文，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众赞成，退席休息。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二千六百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

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103]。

有了参政院的无耻诡辩，袁世凯自以为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12日）一早，他就发下冠冕堂皇的申令，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公然厚着脸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就是说，他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104]。

经过请愿、选举、推戴三个步骤之后，袁世凯才肯称帝，无非是想要说明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野心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鳌、段芝贵、朱启钤个人署名的。据唐在礼后来回忆说：文电多由杨度起草，经朱启钤、梁士诒点头后，再由朱启钤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重要文电还一定要经袁世凯看过[105]。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0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防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10月11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10月23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子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26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11月7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

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29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21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106)

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袁世凯所谓的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梁启超于反袁之后所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

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107] 这确是对帝制运动的最生动的写照。

五　洪宪皇帝

1915年12月13日，即袁世凯承认帝位的次日，他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上午9时，被召去朝贺的有大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局长以上各员，军队警察师长以上各员。北京附近地方的大员也有来参加的。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段芝贵传袁世凯的话，说朝贺时行三鞠躬，但届时大家仍旧跪拜，很多人如见前清皇帝一样，行三跪九叩首大礼。袁世凯站着对行礼者不时点头，表示接受。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提出“警告”，朝贺显得十分局促草率，“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108]。

当天，各省请愿团头目和北京“绅商耆民”共四百余人麇集于新华门前，跪求皇帝即时正位，群呼“中华帝国万岁！”并唱新“国歌”[109]。结束以后，各代表团头目回到请愿团联合会总部。孙毓筠宣布请愿代表任务已完，根据路程远近，每人赠送路费大洋一至二百元，请暂回本省，朝廷如有需要，再行召集。各代表要求增加路费。孙说领款已用尽。众乃大哗，说：“大家抬你做龙灯头，我们连龙灯尾巴都够不上，今日事不决，都不出门。”各代表狂骂不已，进而捣毁物件。孙以电话招警察宪兵，维持秩序。众益愤怒，与警宪相持不下。后经朱启钤等出面调解，每代表增路费二百元，一场闹剧才算结束。

经过这次朝贺，在政府内部算是换了朝代。此后，北洋派给袁世凯的“呈”都改为“奏”，抬头均称“大皇帝陛下”。新王朝的年号取名“洪宪”，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所谓“洪宪”二字，原本意味着宪政时代的开始，袁世凯称帝后也曾颁布过准备制宪的命令，但他并无诚意实行。12月13日，他颁布的第一道申令，仍然重弹“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的老调，主旨是严禁人民反

对皇帝，令文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110]，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由此可见，新王朝的头等要政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

为了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袁世凯滥授爵位，广布“恩德”，用以牢笼庞大的官僚阶层和争取人心。

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因不赞成君主制，已辞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并从中南海瀛台迁到东厂胡同，名义上虽是副总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在野人物。但他还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一些湖北籍的官吏仍在他周围活动。袁世凯有意要笼络他，所以于12月15日下达的第一个赐爵令，就是册封他为武义亲王，这是当时最高的封爵。当天，以陆徵祥为首的简任以上文武官吏数百人，前往黎宅“致贺”。陆捧着策令封诰，鹄立门口，企图强迫黎接受，但黎拒不接见。前此，黎得到要封他为王的消息，即召集左右研究对策。有的说不能不接受，否则会有危险；有的说要为湖北起义的人留脸面，应坚决拒绝。最后，黎赞同后者的意见，并表示“牺牲个人，亦所愿意”。于是，黎断然拒绝封号，上辞函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明神，愿为编氓，终此余岁。”19日，袁又申令“毋许固辞”，并派九门提督江朝宗等前来，直入黎宅大厅，“手捧诰令，大呼‘请王爷受封！’黎在内大怒，骂逐出之”[111]。

清室对袁世凯称帝，惶恐不安，准备让出故宫，迁往颐和园。为了安抚清室，使散处各地的遗老不致反抗，袁世凯于16日申令所有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当天，清室内务府表示：“推戴今大总统为中

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112)

18日，袁世凯申令：“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继续有效。”同日，又申令说：“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此后，“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113) 经政事堂议定：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世续七人列为旧侣，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列为故人，王闿运和马良列为耆硕。隔了一天，袁世凯认为对故人的礼遇不够，又申令以徐、赵、李、张四故人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帧，“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114)。

对为袁世凯效命的北洋派文武官吏，袁一向是慷慨的。21日，他颁布“赐爵令”说：“今之渐就安定，全赖文武将吏深明大义，保国卫民。或屡建殊勘，或力戡变乱，或防守边塞，或保护地方，使国家得以安全，人民得以苏息。予甚嘉之，允宜特沛恩施，论功行赏。”(115) 21日和23日，他两次电传策令，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次年2月又晋封龙济光为郡王。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以上这些人都有谢恩呈电致袁世凯。

袁世凯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12月1日，登极大典筹备处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开幕礼，以朱启钤为办事员长。到会者有周自齐、贡桑诺布尔、梁士诒、唐在礼、杨度及政事堂各局长等二百余人。至1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成立筹备处，该处共四百余人。由于事关“旷代盛典”，该处经费充足，事事讲究排场。办公房屋之华丽，饮食之讲究，虽最阔绰之交通部，也无法比拟。对于大典筹备工作，袁世凯指示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116]。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达五百九十余万元，其中祭典费二十六万，修理大殿工程费一百零五万，调度费一百一十七万，飨宴费二十二万，接待费五十一万，犒赏费六十九万，大礼关系费一百六十六万，等等。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归真返朴”和“轸念民生”！

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制度拟好。袁极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觐见免除跪拜。“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著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挑选宫女之例，著永远革除，以祛秕政，而重人权”[117]。

袁世凯下令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纪念金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字；还派人赴景德镇烧“洪宪”瓷器。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皇家事务，都在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加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推行反动政治的必然结果。但是，历史潮流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的时候，南方各省反帝制的烈火也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

(1) 《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第48页。

(2) 《正宗爱国报》，1914年9月20日。

(3) 《政府公报》，1913年6月23日。

(4) 《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5) 《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5日。

(6) 《政府公报》，1914年12月21日。

(7)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政令》，第51页。

(8) 张勋：《松寿老人自叙》，1922年刻本，第4页。

(9) 《申报》，1914年4月2日。

(10) 《劳乃宣致徐世昌书》，《亚细亚日报》，1914年11月16日。

(11) 佚名：《复辟案》，1914年印。

(12) 《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

(13) 佚名：《复辟案》，1914年印。

(14) 《复辟案》。

(15) 《复辟案》。

(16) 《复辟案》。

(17) 《政府公报》，1914年11月24日。

(18) 《爱国报》，1914年11月24日。

(19)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20) 《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1) 《申报》，1916年6月11日。

(22) 《辛亥革命资料》，第117页。

(23) 《伍廷芳劝袁世凯退位书》，《袁世凯盗国记》下篇，第118页。

(24)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54页。

(25) 《远生遗著》卷1，第34页。

(26) 《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2日。

(2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2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0页。

(2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5、46页。

(3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8页。

(3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9页。

(32) 日军通告五条：一、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源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有一人妨碍日军行动者，该村人民尽处斩刑。

(3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55页。

(34)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5)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6)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7)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38—139页，张一麐眉批。

(38) 《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益电信》，1月18日第26号至急电，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1966年版，第218页。

(39) 《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益电信》1月18日第26号至急电，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18页。

(40) 《外交部致陆宗舆密电》（1915年1月20日）。

(41)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3期。

(42)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77页。

(43) 曾叔度：《我们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抄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82页。

(44) 《加藤致日置益电》2月3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82页。

(45) 《陆宗舆致外交部电》（1915年4月24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19页。

(46) 《外交部宣布中日交涉始末》，《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49页。

(47) 《外交部宣布中日交涉始末》，《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35页。

(4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41页。

(49)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6页。

(5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7页。

(51)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7页。

(5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8页。

(53)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9页。

(5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60页。

(55) 《段芝贵致王士珍函》（1915年5月19日），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56) 《申报》，1915年5月28日。

(57) 王正廷：《二十一条交涉经过》序，1923年印。

(58) 《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密呈》（19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59) 《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60) 《上大总统书》，《盾鼻集·函牍二》。

(61) 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9月。

(62)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0期。

(63) 侯毅：《洪宪旧闻》。

(64) 《君宪纪实》，1915年9月。

(65)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4—95页。

(66) 《国体声中之见见闻闻》，《神州日报》，1915年9月11日。

(67)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96页。

(68) 《政府公报》，1915年9月7日。

(69)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70) 《唐在礼、袁乃宽等致王怀庆密电》（1915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1) 沃丘仲子：《徐世昌》，1918年版，第27页。

(72)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7页。

(73) 《周学熙密呈》（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4) 《黎元洪呈袁世凯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该呈不著年月，从内容看，当在筹安会出现至9月6日之间。

(75) 《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密呈》（19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6) 《张勋致袁世凯密电》（1915年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7)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

(78) 《段芝贵、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致各省将军巡按使密电》（1915年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9) 《龙建章致徐世昌密电》（1915年9月1日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0) 《朱家宝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1) 恽宝惠：《说袁克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82) 《张勋、冯国璋、齐耀琳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3) 《唐继尧、任可澄致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密电》（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4) 《陆荣廷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5)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

(86) 《陆建章致徐世昌电》（1915年9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7) 徐一士：《谈徐世昌》，《越风》第4期，1936年1月。

(88) 《冯国璋致袁世凯密电》（1915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9) 黄毅编：《袁氏盗国记》，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印，第99、109页。

(9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3页。

(91)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1915年9月24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49页。

(92)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1915年9月24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49页。

(93) 《莫理循致朱尔典函》（1915年8月20日），《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8年版，第453页。

(94) 《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油印本原件。

(95)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

(96)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38页。

(97)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38页。

(98)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60页。

(99) 陈宦等致统率办事处转呈袁世凯密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0) 《申报》，1915年10月13日。

(101) 《申报》，1915年10月11日。

(102)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103)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104)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3日。

(105)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57页。

(106) 《袁氏盗国记》上篇，第90—113页。

(10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9、103—104页。

(108) 《辛亥革命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63页。

(109) 歌词为："帝国数万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懿欤大国民，休哉！惟我大国民，今逢盛德主，琳琅十倍增声价。吾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步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懿欤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110)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4日。

(111)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112) 《政府公报》，1915午12月17日。

(113)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9日。

(114)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1日。

(115)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2日。

(116)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3日。

(117)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6日。

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一节　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

一　国民党人坚持讨袁活动

二次革命中，国民党军队溃散，地盘沦丧，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几乎损失殆尽。袁世凯乘势大兴党狱，诛锄异己，国内笼罩着一片搜捕国民党人的恐怖气氛。国民党籍议员经此惨重打击，内部的分化尤为激烈。国民党内各色人物原形毕露，各种思想暴露无遗。

支持举兵讨袁的激烈派议员，被袁氏视为附乱分子，而遭通缉，被迫亡命海外。稳健派议员力主以法律限制袁氏，希望借政治竞争，图谋挽救，但这点微弱的抵抗，也遭到袁氏无情的打击。失望之余，他们纷纷出逃，各奔东西。其余的议员则各自为谋，有的登报申明脱离党籍，但图苟全；有的避祸离京，销声匿迹；有的临时转舵，改入他党；有的卖身投靠，堕落为袁氏的爪牙。鱼龙混杂、精神涣散的国民党，已成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次革命中被击散的党人，在国内一部分匿居上海租界，一部分潜赴东北几省，以大连为据点，南方数省也有部分党人在继续活动。1913年8月中旬，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

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上开秘密会议，商议今后进行方法。季雨霖提出应有长远的规划和部署。经大家商议决定，今后分“一、实行部；二、继续部；三、暗杀部”[1]，三部之间相互配合，开展活动。实行部支撑此次军事；继续部择党内表面平和稍有政治能力者，阳与袁党联络，实则布置民党实力，万一此次失败，这些人尚可留在中国作后起之备；暗杀部择最有毅力决心者，阳与袁党联络，以便实行暗杀。又经反复商议，决定“一面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图湖州、宁波各处；一面由戴季陶、刘艺舟潜赴大连组织机关部”[2]，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红帮，并运动军队，谋二次独立。

9月初，陈其美、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3]，并派姚某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起事”[4]。同时，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天津路生泰客栈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赴浙江起事”[5]。陈其美等在宁波的活动，因浙督朱瑞态度有变而受阻。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清运入千余枚炸弹至董家渡，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所运炸弹连同秘密机关一同被破获，雷铁生不幸被捕入狱。陈其美图浙未成，便改变方针，再次计划“以一半经长崎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英杰与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6]。这次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辍。此后王金发继续在上海筹备武器弹药及军服，冒充长江水师，招募军队，于静安寺路“设立机关”[7]，准备再举。

戴季陶、刘艺舟从上海出发，8月27日抵大连，寓辽东旅店[8]。他们联络日本浪人及东三省绿林及阿城、伊通、双城、长春一带黄天教，“预定阴历八月十五日举事”[9]，图谋奉天独立。此外，吉林省纪东流、林文美等人，也在暗中组织机关，并密派人至天津购买快枪，运往公主岭，筹组东北讨袁军，“而备大举”[10]。还有一部分党人，或潜伏于朝鲜北境，或隐蔽于南满沿线各站，暗组机关，伺机进

行。

除民党较集中的江浙与东三省外，还有不少流散党人自动聚集在一起，暗中发展组织，图谋再起，在各地孤军奋战。

广东讨袁事败后，避居港澳的党人问邓铿“将来以何法从事？”邓铿坚定地回答：“仍以炸弹从事。”[11] 11月初，朱执信等曾潜回广东，筹备起事，但为敌探跟踪，只得暂返香港。到港后，朱执信、邓铿召集党人，继续筹划广东独立，派任鹤年在澳门设立机关；刘龙标、葛宝成，运动高州军队；黄世棕、周玉堂，运动阳春、阳江军队；尹俊卿运动各赋闲军官；朱执信、邓铿计划“由外间运动军队，由高州来收省城”[12]。湖北党人潜匿汉口租界，组织“救国社”[13]，拟从武汉着手，暗杀黎元洪，拔除障碍，再图举事。同时，南漳县国民党分部长张正楷秘密招集党员，在袁氏下令解散国民党时，准备约期发动。但因走漏消息，县知事有所察觉，张迫不得已，率众数百人仓猝举事。起义队伍大呼“斩民贼，杀卫队”[14]，持械围攻县署。但力量过于悬殊，不久即被镇压。

同时，一些地区相继成立了暗杀组织和机关。天津暗杀机关，企图暗杀袁政府之重要人物，“破坏京津之秩序，以图再行举事”[15]。上海、浙江等地有人组织了新同盟会，其宗旨是“实行暗杀手段，铲除专制魔王及一切强权，组织完全共和”[16]。该会在组织上实行等级制，按参加革命先后，将会员分为大字辈、议字辈、光字辈、明字辈四等，并明确规定了各等的权限与义务。在行动上分：一、暗杀，二、游说，三、交际，四、刺探，五、运动，六、制造，七、秘录，共七个部[17]，并以上海为总部，另在浙江、广东、湖北、大连、奉天等地建立秘密机关。他们多活跃于沿海地区。上海新同盟会机关，秘密设于民国政法大学，由校长龚荫槐主持。龚借学校名义，“发行股票，散布简章，网罗金钱，暗收死士为诸先烈复仇”[18]。另有一部分会员，密赴内地发展组织。但新同盟会组织屡遭破坏，首领多被捕。上海还有侠义铁血团、大同民党、社会改进团等秘密组织，坚持

斗争。革命志士的活动，使得袁政府惶惶不安，曾严令各省都督“通饬所属，严行侦缉，如有乱党私立新同盟会名目，散布牌记，一经拿获，立即就地严惩”[19]。

国内各地国民党人的革命活动，虽给袁政府以打击，但从全局来看，难成大业。他们的努力，只是二次革命的余波，无力重卷巨澜。

除上述部分党员在国内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王有兰、石瑛、马君武等去了欧洲；陈炯明、何子奇、彭程万、徐维扬、姚雨平、古应芬等则逃往南洋群岛。

孙中山、胡汉民一行，1913年8月4日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神户。孙中山于途中致电萱野长知说：“文如远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20] 请其在日代为疏通，协助入境。经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等与日本山本首相交涉后，日本当局勉强同意孙中山等人上岸，但考虑到孙中山等此际来日本居住，鉴于内外种种关系，“于帝国不利”[21]，不愿他们在日本久居，决定“促其另赴他国，并不许其在日本设立机关”[22]。孙中山9日到达神户，8月18日转抵东京，寓赤坂区灵南坂二十七号海妻猪勇彦宅[23]。黄兴继孙中山之后，8月4日由香港出发，乘云海丸经日本门司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寓芝区高轮南町。先后到达日本的国民党人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遹、程潜、耿毅、章梓、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覃振、杨庶堪、周震鳞、何成濬、陈强、程子楷、王统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在国内坚持斗争失败后，也相继到了日本。

国民党人的出逃，得到了一批意在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的日本军人的协助。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少将青木宣纯曾致电参

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24] 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不顾外务省的制止，帮助国民党人潜往上海或香港，然后转赴日本。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25]，拒绝了倪嗣冲的要求。

然而，日本当局对接踵而至的大批国民党人，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既顾虑收留国民党人会引起袁政府的不满，也担心国民党人影响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鉴于国内外形势，帝国政府认为，以防止与此次中国骚乱有关之领袖来本国为上策。"[26] 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也看到，国民党虽已失败，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因此也不愿轻易舍弃国民党人。再加上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从中斡旋，日本当局表示，党人既已前来，"强行驱逐亦非上策"[27]，于是采取了既不舍弃国民党，又不致激怒袁世凯的折衷办法：一面对国民党人"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一面对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虽然袁世凯派陆军少将刘茂曾率探缉队前往日本，专事"侦察亡命民党之行动"[28]，但却不能得逞。孙中山等人仍可"自由来往，并无危险"[29]。同时，日本当局派出警探严密监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将他们每日每时的行动及来往人员的活动详细记录后，密呈外务省备案。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暂借日本为安身立足之地，一面活动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争取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

国民党新败，多数真正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也认为"三次革命时机尚不成熟"[30]。其他财、军界人士，更不愿在无把握的情况下轻率提供援助。日财界巨头涩泽荣对孙中山说："贵国目前虽不完备，但形式上已是立宪国，如议会机关完备，则不战自胜之日不久就会到来，所以目前举兵不合时宜，我不表赞成。"[31] 为筹集起事经费，孙中山打算与日商合办中国实业。他一面与国内实业界联系，

一面与日企业界人士洽谈，欲成立中日实业协会。但此事为袁政府探知，立即致函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府概不承认。"[32] 日企业界因此改变态度，此事也跟着搁浅。此外，孙中山为购军械与日本军部的交涉，也遭挫折。孙中山与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局长过村进行商谈，并通过与军界关系密切的坂野吉三郎运动军界。为此，孙中山还特意与坂野主持的精神团立约："一、孙文为改变中国现状，在进行时期，与贵团体协力合谋；二、中国现状改变后，若在借款或其他政治上必须与外国交涉时，当先通告贵团而后行。"[33] 但日本军界仍不愿提供援助，声言目下发动三次革命"不合时宜"。坂野吉三郎也劝孙中山"暂时忍耐，静待时机"[34]。孙中山等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收效很小，想再举革命，面临着种种困难。

与此同时，亡命海外的国民党人，在生活上也陷入困境。多数人在失败之后，仓促出逃，身无分文，连食宿衣被的费用都成问题。时逢冬季，饥寒交加。有的人只得向所熟识的官费学生乞贷，"买点熟红薯充饥"[35]。有的为生活所迫，"流为苦工，其苦乃不堪言状"[36]。他们过着困苦颠连的流亡生活，又感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情绪滋长，思想极度混乱。于是"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37]。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38] 因而不复过问政治。也有少部分激烈分子认为："异地不宜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唯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39] 更多的人则感到，失败之余应及时总结教训，确定下一步进行的方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因看法不一，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40]，革命进入了最艰难困窘的时期。

二　孙黄分歧

“辛亥言功，癸丑言过。”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孙黄重逢于东京，即因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同，发生了争执。

孙中山认为战事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41]，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42]。他指出，许多同志把以前同盟会时候的纪律完全抛弃，首领的命令既不服从，旧日的主张也不遵照，人人在那里自由行动，使革命主义无从贯彻，因而失势力，误时机不少。战事已起，国民党籍各省都督不听号令，以致坐失良机。其次，在于党内不能统一。在组织上，国民党改组以来，“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43]。自精神上言之，投机分子涌入党内，“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44]。这样的党，敌人不攻也会自破。因此，这次失败是“自败也，非袁败之也”[45]。

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的看法。他认为“此不得已之战争，实袁氏迫成之耳”，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党在各方面缺乏足够的准备。战争前，袁世凯早有布置，当袁氏公开挑战时，民党已进退维谷。战争之初，南京已非完全革命党的势力；在广东又有江孔殷、梁士诒等走狗用金钱收买，军队不尽可靠。加之迫不得已，仓促应战，遂致湖口失败，死战而不得上海，南京亦难于坚守。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次失败只是“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46]。

革命党内部，对战争失败的原因产生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现象。只要客观地总结失败的教训，痛定思痛，团结协力，共谋恢复，认识是不难统一的。但如果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陷入互相推诿的争执

之中，则会适得其反。

孙中山强调宋案发生后，他即力主开战，但黄兴想以法律解决，以致贻误战机。战争发生，黄兴又以“文不善戎伍”，阻拦他“亲统六师，观兵建康”，使其正确策略得不到实行，结果“措置稍乖，遗祸匪浅”。孙中山还责备黄兴不坚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47]。

黄兴身为三军主帅，对战争的失败，理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这点，黄兴本人也不否认。他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48] 但对孙中山一些过分的指责，黄兴也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战争胜负未知，自己决定去南京代替孙中山指挥战斗，“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49]。

应当说孙中山对黄兴过分地指责是不正确的，这不但不能消除在癸丑之役中产生的不同意见，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这次争执之后，“孙黄裂痕显然”[50]。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在1913年9月间“几乎每天往访孙黄，以缓和他俩对立”[51]。但两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两大领袖的矛盾，对党内的团结不能不产生直接影响。拥护孙中山的人认为，宋案发生，黄兴欲待法律解决，“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52]。战斗中，黄兴指挥的南京军队未战先溃，轻弃其地，并两次阻止孙中山出奇制胜的良谋，因此，“赣宁之役，南京方面的失败，黄克强不能卸脱责任”[53]。支持黄兴的人，以孙中山词锋所指，“大抵责难黄克强招致失败”[54]，而深表不满。他们认为，黄兴赴南京代孙中山亲征，其爱护领袖的苦心，真是可白天日。南京失利，不但黄兴无法挽回，就是孙中山也一样，因此苛责黄兴是不恰当的。由于上述原因，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由于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发生的争执，没有能正确处理，因此，孙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及以后斗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

也出现严重分歧。

孙中山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他认为袁世凯表面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北有蒙古兵逼长城，西有回民揭旗关外，而宗社党亦蠢焉思动，徒党辈复各争权，时局若此，乌能久哉！”[55] 与此相反，革命党遭此失败，“自表面观之，己党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创造革命党”[56]。因此，在这种形势下，“革命运动决非极难”，如果从现在准备，“一两年中一定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势”[57]。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当此四方不靖之时，惟有聚精会神，一致猛进，持积极主义，共图三次革命。

黄兴则认为，革命党新败，袁世凯依恃重兵，进步党又拥护他，正值盛时；更何况袁氏野心还未暴露，普通国民被袁氏政府之伪共和招牌所惑，过于信任袁氏。在此形势下，如若再举，多数人不肯赞同，不免再败。再则，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可据之地不止一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如果这时和袁硬拼，只能徒然白送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又无所补。因此，当前革命时机还未成熟，应从长远计议。他强调，今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58]。等待袁氏野心暴露，国民回头思念我们，拥护我们，我们再举义讨袁，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所谓“蓄之久而发之暴也”。

陈其美、戴季陶、许崇智、廖仲恺、朱执信、谢持、居正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激进主张。朱执信认为袁世凯之施政“酷虐数倍前清，民积怨于政府，而无一之德泽可以讴歌也。其助寡于前时，而毒深于万姓”[59]，这样的政府难以长久。再从当前形势来看，革命党人“固难免于虎口矣”[60]，莫如再举反抗，“将来犹有望也”。陈其美四处奔走，力劝革命党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他说：“机会必须由创造而来，决不能由等候而来，我们若能努力创造机会，则虽然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促进社会的进步。”[61]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则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李根源说："三次革命谈何容易，恐非十年后不能见诸实行。有主张急进者，以余观之，实无急进之余地。"[62] 陈炯明更激烈地批驳激进派是"以冒进突击为能，对于昔年经过之困难毫不计虑，而目无障碍，向壁猛撞，迨烂额而踣，尚不知返"[63]。其他人也觉得再举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要过五年、十年再来筹备革命的事业"。革命党内部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为界线，日见分明地分成了"激进派"和"缓进派"。

"主张既歧，着手各异。"双方策略方针不同，在具体问题上的做法，自然相去甚远。

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当前应该做些什么？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更应该鼓起从前的勇气，勇往直前。为此，目前当务之急应立即纠合同志，组织机关，再图进行，"务以武力削彼暴政"[64]。

黄兴主张不能盲动，必须"从根本上做去"。因此目前所应做的事情是：一、宣传党义，"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65]，把前期所为的是非，披露于国民面前，以求恢复国民党的信用；二、广泛团结，"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66]，以结成更广泛的讨袁战线；三、组织干部，计划久远。黄兴准备设军官研习所，培养一批军事人才。他还强调，将来共和世界是以法治国，"今乘此修养时代，宜培植法律人才，亦为今时不容或缓之事"[67]。他鼓励同志，"趁这亡命期间，大家偷闲去研究学问，多造就一些人材"[68]。

其次，孙黄在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上，意见也截然相反。孙中山痛感二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69]。失败后的国民党，"袁氏即不迫令解散，亦已名存实亡"[70]。流亡海外的党员，又因"意见不齐，缺乏统一"。显然，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再继

续领导革命了。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党。

黄兴则坚持要继续保全国民党。他说："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71]，并劝孙中山"不可因噎废食，使党有所分化"[72]，而应从维持固有的党势入手，"仍用旧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之"[73]。黄兴同时还指出，今则袁氏独断专行，政党失其效力，且排斥而消灭之，若吾党不与他党联络，则势力既嫌单薄，且将多己之敌。在此形势下更应"广通声气，团结感情，庶同舟共济，奋力与专制魔王搏斗"[74]。

因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事关重大，李根源、程潜、熊克武特邀在长崎的柏文蔚等人到东京面商此事。柏文蔚提出，国民党内部已欠纯洁，官僚政客投机加入，势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但是"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75]。谭人凤对此意见表示赞成。程潜、熊克武、冷遹等则主张仍旧"保全国民党"。李烈钧亦深表赞同地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政府从未干涉"，如孙中山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之国民党而取消之，是以绝不赞成"[76]。

孙黄两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甚至互相攻讦，终于由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化。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张，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不愿加入，其中一些人随后成立了欧事研究会。

第二节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一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使孙中山日益明确地认识到：革命事业要者有三，即立党、宣传、起义[77]。其中首要是立党。他坚信，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为此，孙中山不顾面临的种种困难，倾全

力于创建中华革命党的事业之中。

鉴于前车之失，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的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在孙中山的理想中，新生的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坚固的宗旨，党员有纯洁的志趣”[78]，朝气蓬勃，具有旺盛战斗力的党。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在东京“发起重新党帜”[79]。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这天，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首立誓约，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80]。其誓约全文如下：

>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
> 一、实行宗旨：
>
> 二、服从命令；
>
> 三、尽忠职务；
>
> 四、严守秘密；
>
> 五、誓共生死。
>
>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
> 中华民国　省　县（捺指模）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孙中山特别在誓约中提出，“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本意想借此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他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81] 入党者在誓约上打指模是克服异党入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82]。但是，由于孙中山片面地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甚至错误地认为服从他，就是服从他所主张的革命，服从他的革命，自然应服从他。这种思想驱使他固执地改变了同盟会时期民主选举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借用了旧式会党的落后组织手段。其结果使秘密发展中的中华革命党染上了宗派主义的色彩，这不但对他党有讨袁之心又有所归向者，表现为简单排斥，就连许多昔日风雨同舟的人也难以接受。一些老同盟会员指出，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中华革命党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孙中山强调树立领袖的权威，同封建意义的独裁专制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既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83] 他主动挑起再举革命的重担，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领袖的作用。在近似于“专制”的落后形式后面，仍不难看出他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

孙中山在开始发展党员的同时，在东京组织了通信机关，以调查亡命客人数，联络革命党人；随后又成立了“亡命客救护团”，办理流亡日本党员的登记、济助及归队工作。亡命客中，尤以下级军官为多。在失去组织联系、四散各方的情况下，时间一长，多数同志衣食无着，借贷无门，时逢冬季大雪，甚至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84]。孙中山下令择最困窘者，每人送学生装二套，按月发给津贴日币十五圆[85]，同时致函邓泽如，请南洋同志筹集资金相助解决。经孙中山

等人的努力，多数亡命党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精神也为之一振。孙中山激励大家："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86]

在孙中山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增强了再举革命的信心。他们认识到"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87]，大家的认识日渐统一，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不断增多。继第一批入党同志之后，1913年10月陈其美、戴季陶等二十二人，11月邓铿等五十七人，12月夏重民等一百一十三人，在东京先后入党[88]。在国内，中华革命党在大连和上海建立了两个发展党员的据点。1913年10月，张人杰（静江）、蒋介石在上海入党。12'月陈德出等六人在大连入党。此外，在菲律宾的吴宗明、郑国梁与在美洲的谢英伯，以及12月途经日本赴美的林森，也相继入党[89]。中华革命党不断发展扩充，三次革命的火种从日本逐渐向国内和海外蔓延开来。

当时，国民党海外支部多还存在。孙中山初意将海外支部也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1914年初，他发给美洲支部三项指示：一、各埠党部取消国民党名目，自后一律须改称中华革命党；二、海外国民党员须一律重新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及加盖指模；三、海外各党部应即设筹饷局[90]。后因美洲支部提出，为便利筹饷，须沿用国民党名义。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4月18日，他致函邓泽如，阐述立党宗旨，委托邓泽如在南洋各埠，"本此宗旨，设各埠支部，以张党势"[91]。

经孙中山等人几个月的宣传活动，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闻风倾慕，纷纷聚集到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之下。至1914年四五月间，入党者"先后已得四五百人"[92]。为此，孙中山深感欣慰地说："吾党分崩之象悉已消灭。"[93] 他指示陈其美、居正、胡汉民、田桐、杨庶堪、周应时等人成立筹备委员会，讨论组织机构、干部选举、党员大会等问题，为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作准备。

为进一步扩大宣传，5月1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创办了《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夏声为编辑。《民国》杂志发表文章，揭露袁氏“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94]的阴谋，并且针对革命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的消极情绪，激励党员，应“发挥其能力，斩除其惰性，遇艰险而益厉，更丧败而益前”[95]。《民国》杂志社不但是舆论机关，也是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孙中山等人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党内的重大问题。5月14日，孙中山指示：“本党干部未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96] 16日，孙中山委任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柏文蔚、周应时、陈其美、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钺、文群、陈扬镳、张百麟、田桐等，在《民国》杂志社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6月6日、孙中山在此召集陈其美、田桐、胡汉民等人讨论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初步商定总理及各部部长名单[97]。21日，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大会。陈其美逐条说明了中华革命党总章，介绍了各部部长的人选，与会党员对上述问题也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首由居正说明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的理由和大会宗旨，接着孙中山当众入盟，宣誓就任总理，并发表了近二小时的演说。他激励大家“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98]。最后孙中山号召全体党员：“在第三次革命兴起之际，务必团结一致，亲爱精诚，统一步伐，以国家百年大计为念，努力奋争。”[99] 经过半年多流亡生活的革命党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聆听孙中山的演讲，无不倍感振奋。随后陈家鼐、蔡锐霆、田桐、熊尚文相继发表演说，与会同志也都纷纷表示坚持革命的决心，会场出现一派热烈的气氛。大会结束时，一致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

9月1日，中华革命党发布成立通告，将重整革命阵营的消息及该

党的宗旨布达于世。总部陆续颁布了七十九次委任令，先后委任了八百三十二名各级干部[100]，其中总部各部部长人选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其美、谢持；党务部正副部长居正、冯自由；军务部正副部长许崇智、周应时；政治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张人杰、廖仲恺。在总部直接指导下，国内十八个省成立了支部。孙中山亲自委任了各省支部长，同时派遣党内骨干到海外各埠筹建支部。通过他们的努力，先后在海外建立了三十九个支部和四十五个分支部。中华革命党在海内外组织系统建立后，新党员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中华革命党总章》是指导党员进行革命实践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党的宗旨、进行程序、组织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在政党建设方面的探索，有些方面较之国民党的纲领也有所前进。

一、重申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最初阐述三民主义时，把推翻满清暴政，建立共和国作为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沉浸在民主战胜专制的喜悦之中，以为从此共和国将植根在中国的土地之上。然而，袁世凯“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的惨淡的政治图景，无情地改变了他民族、民权二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的天真想法[101]，迫使他重新作出为实现民权主义而奋斗的决定。孙中山在总章中再度提出“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102]，这并非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集十几年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赋予了民权主义更深刻的内容。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孙中山惋惜地指出：“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103]因此，孙中山在发动三次革命，为实现民权主义而斗争时，不仅揭穿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实质及其帝制自为的阴谋，同时还告诫人们，只除去袁世凯一人，并不能完成再造共和的重任，只有同时清除其属下的全部官僚，才能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的影响。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加深了民权主义的内在含义，使其有了更现实的社会意义。

中华革命党各省主盟人、筹备处长、支部长、司令长官表

省　别	主盟人	筹备处长	支部长	委任日期	司令长官
湖　北	田　桐	刘　英	田　桐	1914.10.7	蔡济民
云　南	邓泰中	黄嘉梁	杨益谦	1914.10.7	黄毅生
江　西	周道万		徐苏中	1914.10.7	夏之麒
安　徽	范光启	张汇滔	张汇滔	1914.10.12	
陕　西	焦易堂	徐朗西	宋元恺	1914.10.12	
江　苏	周应时		吴藻华	1914.10.12	周应时
河　南	凌　钺		凌　钺	1914.10.12	
浙　江	陈其美	戴季陶	戴季陶	1914.10.22	夏尔玛
山　西			阎崇义	1914.11.19	
湖　南	陈家鼐		陈家鼐	1914.12.18	林德轩
甘　肃			张宗海	1914.12.18	
广　东	何天炯	谢良牧	何天炯	1914.12.18	邓　铿
山　东		邱丕振	刘　光	1915.1.5	居　正
贵　州	张士麒		凌　霄	1915.1.22	安　健
福　建	许崇智	万黄裳	许崇智	1915.4.29	黄国华
四　川	谢　持	杨庶堪	龙　光	1915.5.1	卢师谛
东三省		徐东园	刘大同	1915.11.10	
广　西			苏无涯	1914.11.2	刘　崛

注：一、本表只录第一任支部长。

二、资料来源：《干部委任令》，《革命文献》第45辑，第213页；《总务部收信簿第一号》，《总务部机要处文件分发簿》，引自《近代中国》第22期。

实现民权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在总章中把《同盟会宣言》中所规定的革命程序，重新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大阶段，并统称为“革命时期”，目的在于改变过去“《约法》之治”时造成袁氏篡权，约法却无能为力，反被袁氏废弃的被动局面。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总章强调，训政时期不再以《约法》为依据，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104]。以此加强党在巩固政权时的地位和领导作用。虽然这些规定存在着轻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消极方面，但在探索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实现民权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二、在思想上，强调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孙中山认为，国民党丢掉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致使内部鱼龙混杂，组织涣散，不攻自溃。所以，孙中山在重建新党

时特别指出：政党中最要紧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牺牲精神[105]。当革命处于艰苦时期，立志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只有牺牲，没有权利”[106]。因此，入党本身就是能否保持革命精神的一次严峻考验。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华革命党唯一宗旨，是以革命精神图主义之实现者”[107]，谁志愿加入中华革命党，必须明确地表示他是革命党员，“如果不愿意挂革命党党员的招牌的人，尽管不进党好了”[108]。为此，总章中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109]只有每个党员真正具备了这样的革命精神，才能有效地保证党内纯洁，使新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组织上，孙中山把革命党能否统一，看作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他说：“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事业已成功过半矣；不能统一，则即使成功，等于第一次，其结果亦必如今日矣。”[110]为改变前期内部意见分歧的弊病，孙中山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者，“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11]。值得惋惜的是，孙中山从痛苦的失败中换取的正确认识，却以绝对服从领袖个人的落后形式表现出来。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正是孙中山建党时矛盾思想的反映。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又痛感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难以抵御旧势力的冲击。他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以集权于个人的方式，来强化党的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亦本素所怀抱平等自由主义，行权于建设之初期，为公乎？为私乎？以待天下后世之论定可耳。”[112]诚然，孙中山的这种作法是不足取的，但是在建党时，他力图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隼中统一，也是当时斗争的迫切需要，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使全党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坚持武装斗争。二次革命失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知，欲雪癸丑之耻，竟辛亥之功，只能以武力推翻袁氏的反动统治。孙中山

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把武装讨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十分重视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他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113]《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也明确规定，本党“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114]。

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军事问题，孙中山在1914年初便开始编写《革命方略》。4月初，他把已写完的《革命方略》初稿，秘密散发给党内核心人物，并逐条加以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115]从9月至11月，孙中山在东京召集陈其美、胡汉民、许崇智、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开了十七次会议，对《革命方略》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讨论。《革命方略》分为六篇，其中对革命军的目的、服制、勋记、饷项，军政府的组织，军律，军法，举义前后之要务，攻取响应之要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最完备的一部军事著作。《革命方略》指出：“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116]，是中华革命军的最终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华革命党倾全力发动武力讨袁。

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洋溢着革命热情的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同样也暴露了它本身所存在的弱点和错误。

首先，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却没有提出含有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最初提出民族主义时，就忽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族主义只是排满。因此，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他便认为民族革命已经完成。再则，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为扩大在中国南方的权益，曾由大陆浪人引线，暗中向革命党提供了武器和贷款。二次革命爆发，日本政府内部又有人主张，以“援助”南方革命党来牵制亲英美的袁氏政权。日本政府虽未采纳这种意见，但其对革命党的政策，比全力支持袁世凯的英美两国要缓和得多。再加上革命党流亡日本，得到了日本浪人及部分主张援助革命党以取得中国南方权益的日本政界人士的支持。这些因素促使孙中山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

想，希图“联日讨袁”。他曾对日本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我们这些同志，准备卧薪尝胆，如果军费筹集能获解决，则图再组织讨袁军队。”[117] 并希望涩泽荣说服日本政府，尤其是陆海军省，对此行动给以援助[118]。同时，他又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支援中国革命，以“救东亚危局”[119]。

中日交涉事起，民族矛盾骤然激化，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华革命党却没有给予积极支持。孙中山指出：“袁氏实为误国卖国之魁，设非急速去袁，则祸至无日。”[120] 他只强调内反国贼的一面，而没有鲜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这个方针对急于解除国难的民众缺乏号召力，使中华革命党与国内人民的斗争脱节，在反日爱国运动中影响甚微。相反，袁世凯却乘机散布孙中山为日作伥，“第一次革命后与日本之某某重要人物有最惠之约”[121]，借以离间中华革命党与民众的关系。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威信，也因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孙中山依赖帝国主义力量进行中国革命的幻想，使他的认识难以升华到明确提出反帝纲领的高度。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中华革命党的发展规模和斗争水平。

其次，孙中山在总结教训时，只看到党员脱离领袖的表面现象，却没意识到阶级脱离政党、政党脱离人民的深刻危机。当他准备再举革命时，仍然没把争取国内资产阶级支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华革命党的纲领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超出其实际认识水平。它过分地着重于军事，而忽视对群众的发动。孙中山没有针对本阶级和一般人民的迫切愿望，提出维护其切身利益的口号，以吸引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加入三次革命的行列。

再次，中华革命党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因此势孤力单。其总章中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三等，规定在革命军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革命时期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

民”，只享有选举权利[122]。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连公民资格也没有。孙中山如此规定，意在将“革命时期”的政权掌握在忠于革命的“首义党员”和“协助党员”手中，防止革命成果被投机分子篡夺，但客观上则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人为地形成一个权力阶层，并在党员和群众中划出一条分明的界线，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使党脱离群众。孙中山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志士仁人身上，认识不到发动、组织群众的力量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

历时三年的白朗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指袁氏政府，纵横五省。与此同时，群众自发的反袁斗争也此起彼伏，不断出现。中华革命党不但不有效地利用这一局面，领导群众力量共同对敌，却错误地认为国内民众“与政治无争”，唯有等待他们的恩赐；甚至对人民的公民权利，也要待将来革命胜利，“宪政既成，则举而还之齐民”[123]。结果是把自己孤立于群众斗争之外，孤掌难鸣，只能从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中寻求援助，或则把讨袁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行动之上。

综上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以反对封建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并拥有万名以上的党员。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新振作起来，在袁世凯的黑暗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

二　武力讨袁活动

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活动，与其筹建工作几乎是同时展开的。1914年初，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事的军事计划。鉴于当前的形势，陈其美建议暂时避开袁军重兵密布的东南，先从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东北地区建立革命基础。他说：“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之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于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者也。”因此“谋第三次革

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根基，以为犁庭捣穴之计”[124]。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14年1月派陈其美和戴季陶前往大连设立机关，联络东北各省，继续策动讨袁军事[125]；3月又派夏重民、邓铿等到香港部署南方军事，以为东北声援。

1月23日，陈其美自神户乘船密抵大连，当时在大连潜伏的革命党人有山东的吴大洲、薄子明、刘大同、孙祥夫；东北的刘艺舟、朱霁青、刘纯一、宁武；山西的王庆肇、王殿松及二次革命后到大连的沈缦云等。他们在资金缺乏、衣食不周的困境下正准备举事。陈其美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一面“力戒大连革命党人不要轻举妄动”[126]，一面致函孙中山“迅予筹款接济”；同时派陈宁等前去运动黑龙江的军队，为配合奉鲁方面发动作准备；并发给宁梦岩手枪二百支，令其带领手下三百余人，活动于公主岭一带，继续扩展力量。此后，他又召集大家商议下步活动计划，决定在大连暂设机关，以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为主点，外与东京总部及各省革命党联络，聚集力量，运动军队，等待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127]。

但是，陈其美在东北的消息，不久便被吉林护军使孟恩远所探知。他密报袁世凯说：“陈其美、戴天仇、宁秉然、谢宝轩共同谋乱，扰害治安。”[128]袁世凯闻悉，大为震动，即命各省都督、民政长令饬所属各营队“严密查缉，勿令煽乱”[129]，并与日本政府交涉，“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130]。张作霖奉命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秘密表示：“大总统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131]日本关东都督府对陈其美等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对革命党人的行动百般干涉，甚至下令逐客。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革命党人难以立足，开展工作更是困难重重。孙中山了解到东北进行情况，也认为在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轻率举事，反倒造成不利局面。于是，他密电陈其美，嘱其“暂缓进行”。陈其美见在东北一时难于进展，便将东北举兵事宜划

归刘纯一负责，山东举兵事宜划归刘大同负责，交给他短枪四十只，命其编队回鲁。3月15日，陈其美、戴季陶乘船离开大连。

在东北进行的同时，湖南、浙江、广东等南方几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加紧筹划武装起事。

6月初，中华革命党总部接到贵州的报告，得知袁世凯为提防革命党在湘、粤、桂之间发展势力，将贵州前都督杨荩诚在沪所购大批军械取道湘西运往贵州，调拨给护军使刘显世。总部决定派凌霄秘密赴湘，招集同志及黔军旧属截劫军械，就地起义。凌霄奉命赴常德，计划起事成功，便占领湘西，再图进展，如起事不成，便将军械炸毁，削弱敌人力量。但因准备时走漏了风声，欧阳煜、李贵成、田文魁三党人遇难。凌霄被捕，死里逃生。7月，王伯乔、陈元霆、周永广在浙江台州筹划攻占临海，也因计划败露而被包围。王伯乔等率众与敌军激战，不得脱身，多数人在战斗中牺牲。同月，夏之麒在浙江筹备起事。有人劝夏之麒为自己前途考虑，不要轻举妄动。他当即回答："诸君为我谋善，然我不更为我四万万同胞乎？"[132] 遂决定加紧在杭垣设立机关，计划7月24日举事。起事发动之前，不幸密设机关被破获，三十余名党人被捕遇难。夏之麒、黄化宙等再次逃往日本。

上述几次准备发动的起事，都因事漏而夭折。二次革命失败后，首次爆发的武装起事，是1914年6月李国柱在湖南郴县发动的。

李国柱字石琴，湖南嘉禾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之命回湘起兵讨袁。回湘后，他立即召集同志，重组力量，在宜章、临武、郴县、零陵等处暗设机关，以联络各县驻防军、团防局、警备队为主要策略。数月间，各县的运动工作颇见成效，军中"歃血订盟，誓志讨袁者，日有所闻"[133]。起事准备日渐成熟，起事地点确定郴县。恰逢汤芗铭正在湖南调动部队，办理守备队退伍事宜。李国柱决定趁部队换防、裁撤人员的混乱

时机发动起事。

1914年6月28日，李国柱在郴县组成讨袁军，旗书“中华民国民主孙”[134]，布告远近，宣布讨袁。讨袁军骤起，敌军措手不及，五营营长吴万春当场被击毙。三营长企图调兵抵抗，“而兵不用命”[135]，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袁世凯电令汤芗铭“厚集兵力，迅即荡平”，“勿任乘虚响应，致启燎原”[136]。汤芗铭迅疾调兵前往郴县一带，但并不能阻止义军的发展。义军一路由邬云陛率领，挥戈北进，“突袭耒阳、永兴，图攻衡阳，声势颇盛”[137]。另一路由陈广章率领，进兵宜章，在刘延扬等人的接应下，义军迅速占领宜章。

与此同时，雷瀛、雷英等人率众于7月1日在桂阳起兵。雷瀛继李国柱之后，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在湖南策动武装讨袁。他先赴保定，邀雷英一道回湖南，以办理矿务为名，在桂阳城内设置“协记矿务公司”，作为联络各地民军的总机关。他们利用建立县警大队的机会，密选地方壮丁充任警兵，逐渐将县警两连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到粤桂边境的大山中，联络潜伏在当地的一千多民军。雷瀛派人到韶关、坪石一带，向驻军购买枪支装备民军。经过近半年的筹划，组成了以雷英为司令、雷瀛为参谋长的湖南讨袁军。义军在桂阳起事，约定义旗一举，粤桂边境民军即攻占临武、蓝山、嘉禾等县，然后至桂阳集合，南下袭击衡阳。

7月26日，陈校经、陈应品、邓蔚林一路在临武县起事。义军杀官据城。陈校经率队出西门入嘉禾，击毙清乡委员汤勋等数人，占领嘉禾县，随后又率军进攻蓝山。

不到一个月内，各地接踵而起，“各县纷纷告变”[138]。汤芗铭调集重兵“围剿”义军。汤军营长贾凯率领一路，由耒阳、永兴至郴县，以郴县为根据，扼守东路；团长赵锡龄由常宁出发，以桂阳为根据，扼守中路；营长罗先闿由蓝山进行，“三路会剿，以期包击”[139]。同时，北洋军王承斌、张福来、伍祥祯部溯江进击，进驻衡州，以

便指挥中东两路。汤芗铭仍感力量不足，急电袁世凯，“令饬广东、广西、江西各省一体防堵，俾免溃窜蔓延”[140]。袁世凯电令广东龙济光、广西陆荣廷“遣得力军队，联络湘军越境协剿”[141]；又命江西李纯“迅饬所属，妥为防堵”[142]。龙济光派陆军四营由坪石出境，开赴宜章、桂阳一带；派驻防军三营由连县出境，直向临武，援蓝山、嘉禾等地。陆荣廷也派兵入湘增援，以期各路夹击，“剿灭”义军。

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义军虽顽强抵抗，但因交通不便，呼应不灵，各路之间缺乏联系，不能互相支援，配合作战，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再加以饷械不足，难以坚持。始则败退于永兴、耒阳之间，后撤往临武、蓝山、嘉禾交界处的部队，又遭宁远、蓝山知事率部伏击。陈校经被捕遇难，其余人多数也当场阵亡。攻占宜章一路，则在敌军的夹击下撤出宜章，曾纪光在战斗中牺牲，余部向广东境内撤退。

雷瀛、雷英一路起兵占领桂阳后，原计划粤、桂民军集合响应，但时隔半月，粤、桂民军仍无消息。经派人急往探询，才知道民军误向零陵方面前进，路遇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派往桂阳攻击讨袁军的一团兵力。民军不敌，多被缴械，余众败退山区。雷瀛所部正待行动，衡阳镇守使赵春霆的部队一团已开到了距桂阳仅六十余华里的郴州附近。义军基本部队不过五六百人，一部分开赴郴州，途中与袁军遭遇，寡不敌众，顿告溃败。其余部队更觉势单，挡不住敌军的进攻，遂一哄而散。雷英往汉口转赴上海走日本，雷瀛由坪石走韶关，经广州往香港避难。

李国柱、雷瀛发动的武装起义，经过近二个月的激战，死伤二千余人，在袁军几省力量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这是中华革命党在革命低潮时发动的第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枪声，表明革命党人又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打破了二次革命后的沉闷局面。

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不久，正值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刻下欧州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143] 决定乘时起兵举事。经与陈其美、戴季陶、周应时等商议，他改变了最先在东北建立革命基础的方针，转注全力于江、浙与广东三省。遂派“邓铿图粤，夏之麒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144] 。为便于统一指挥，又决定在上海设立总部，并派蒋介石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同时派遣大批党员回国，调查情况，运动军队，筹备起事。8月下旬，三百多名党员相继从东京、大阪、长崎回国。

8月17日，哈在田等人在江苏南通率先举旗讨袁。革命党人获悉袁军在南通戒备稍弛，哈在田招集吴俊、陈强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恺自尔路瑞康里273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在南通举事，并推选哈在田为总指挥。

17日半夜12时左右，哈在田等三十余人，一部分身着便服，一部分换上日本学生服，暗中携带武器弹药，搭乘吉和轮由上海开赴南通。

翌晨9时许，哈在田一行抵芦沟港时，得知革命党在南通的秘密机关已被破获，原定在港口接应的同志一无所见。港口已戒备森严，港警严密检查登岸同志的行装，当场“搜出凶器”[145] 。哈在田见事已败露，不得不拼死一击，遂掏出手枪、炸弹向港警发动攻击，其他同志一齐发动，击退港警，夺得枪支，整队分三部向城中进发。行至城下，见城门紧闭，革命党人以万死一生之计，以手枪、炸弹攻城，在城下与袁军激战数小时，党人受伤者十余人。此时敌人援兵又至，革命党人力不能支，哈志才、李广生、姚文等相继阵亡，其余二十四人因弹尽被捕。起事在仓猝中发难，迅速失败了。

邓铿回到广东与朱执信商议，由邓铿负责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龙门东北方面与香山、江门两处；朱执信负责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恩平、开平、阳江、阳春西南方面。

他们决定派革命党人分赴各县，以在南洋、香港、安南、东京筹得的捐款，分头联络绿林，运动军队，待活动成熟，即同时并举，合攻省城，根除龙济光，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东北一路，邓铿派邓国平负责增城、龙门，洪兆麟负责惠州，陈景桓、林景云两人负责香山，约定10月27日同时发动。

10月27日，邓国平集众于增、龙，如期发动。但本已答应同时举事的两营军队临时变化，拒不响应。义军击溃驻军一连后，改变计划，转攻东莞、石龙。在东莞与敌军激战一日，义军因子弹已尽，又得不到石龙增援，遂败。

洪兆麟在惠州运动军队，驻军两营长应允相助。绿林听说有军队相助，也想起义。10月27日，洪兆麟欲率部发动，与增、龙呼应，但驻军不应，举事受阻。11月1日，洪兆麟赴三多祝集众，号称万人，直取平山，实际上义军只有枪一千余支，又缺乏子弹。在平山附近，义军前锋遭到敌军伏击，死伤甚众。11月2日，义军向平山发起总攻，洪兆麟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部队冲锋，不幸中弹负伤。11月3日，龙济光所派两营援兵到达平山。洪兆麟本约定由陈景桓、林景云举香山之众前来增援，但陈、林二人因炸药案在香港被捕，不能按期发动。义军孤立无援，弹药已尽，被迫退至三多祝。洪兆麟伤势日重，邓铿派邓国平前去代洪指挥。但没等邓国平到达，三多祝的义军在敌军的夹击下已经溃散。

因内地信息不通，朱执信不知东北路成败如何，决定派邓子瑜在博罗起事，以番禺、花县、清远、南海、顺德之众响应。11月3日，邓子瑜集众一千余人，在博罗附近狗仔潭举事，与从省城调往惠州的敌军遭遇。义军见其势大，料不能敌，便转赴增城。但增城守军已有准备，义军见难以攻城，遂各自散去。

11月10日，朱执信、陆领在南海、顺德起兵响应，率领数千人，

进攻佛山，与佛山敌兵钟子材部及济军李嘉所部遭遇，“彼此相持，枪弹如雨”[146]，自半夜战至天明。11日，敌军三千人由省赶到，义军以主力移向火车站迎击，击毙敌军三百余人。下午敌军增兵，义军相持至午后3时，收兵退驻张槎，夜间又转移至沙坑。13日，义军在沙坑拟集大都、濠滘、沙岗等处各队再攻佛山。但敌军贺文彪率部进攻沙岗，打破了义军集中的计划。此时，龙济光又调重兵集中佛山附近，会同原驻军合攻义军。义军急忙向各县求救。但此时博罗之军已散，花县刘济川集众三千余人，苦于经费不足，离去半数，又为谣言所惑，其余亦归散各处，附近几县皆不能发兵增援。义军人困马乏，饷械已竭，虽“党人不顾一切，奋勇向前”[147]，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

高山一路，朱执信委李海云、林拯民负责，另由陆志云、许国平往电白县策动。李海云等闻佛山已起事，聚集绿林及退伍士兵准备发动响应。但中途因办事机关被敌人破获，林拯民等十余人被捕，不能应时起兵。先期到达电白县的陆志云不知高山事变，仍决定11月16日举事，进攻电白城。义军虽有三千余人，但发难时有枪者不足二千。陆志云为防备省城驻兵及邻省兵自东面来增援，先以一千余人据守东方之白花山，而以数百人夜袭电白城。在陆志云的策动下，城内陆军营长林成登已约定反正，乡团警察皆同情义军。17日晨，内应陆军开门迎义军进城，义军占领城内各衙署，出告示安民。城内“商民皆燃炮竹、竖旗，表欢迎意”[148]。18日夜，陆军营长林成登中途叛变，领所部进城后直奔县署司令部，假意要见司令取襟章，进县署第二道门时，便向义军开枪。义军急忙应战，同时派一支部队绕道去夺济军枪械。两军遭遇，激战至天明，击毙济军连长一名及数十名士兵。驻白花山部队知城内有变，急忙前来增援，路遇敌军拦击，因而不能入城。城内义军连续奋战两昼夜，弹尽粮绝，又无增援，只得放弃县署，退到白花山、望夫山一带。他们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在此连战十余日，敌军死伤数百，义军伤亡也不小，守住了阵地。他们在广东讨龙之役失败的情况下，保存了这支力

量，等待新的机会到来，再度举旗起事。

与江苏、广东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东北、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也在积极策动武力讨袁。1914年7月，邱丕振在东北组成关外讨袁军总司令部。9月，邱丕振以关外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借券，筹集军费，准备起事。借券写明："袁贼无道，本司令兴师问罪，伐暴救民，军需不足，不得不就地筹措，以充军用。"[149] 讨袁军联络绿林数百人，计划先攻下昌图，以南满为根据，然后第一军占领营口，第二军占领安东，第三军占领铁岭。9月5日，邱丕振以昌图敌军戒备甚严，拟改攻通江口。但敌军先闻风声，迅速调集各路巡警赴通江口要道，"扼要设卡，以图邀击"[150]。这天又逢暴雨，各路讨袁军与绿林不能按期会合。9月6日，讨袁军驻孙家站机关被破获，整个讨袁计划由此而失败。邱丕振一路刚刚失败，活动于本溪的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发动了起义。9月8日革命党人联合绿林，树起讨袁军旗帜，向县署警署进攻[151]，迅即占领了本溪县城。义军捣毁衙署，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省中闻知，即派重兵"驰剿"。义军力量单薄，又无支援，很快就被击败。零散的义军多潜入抚顺境内十金寨地区。陈中孚、刘廷汉继续联络绿林，策动矿区工人共同起事，谋再进攻本溪。但此事为抚顺县知事侦知，刘廷汉等人不幸被捕，起事又遭顿挫。

在徐州方面，韩恢于9月1日在宿迁颍口一带联络绿林，集众八百余人，高举讨袁军大旗，发动起义。义军初发，声势颇大，当地知事惊恐万分，急忙向省中发电求援说："该处兵力单薄，民穷思乱，风声甚为吃紧。"[152] 徐州即派兵增援，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上海方面，由范鸿仙主持，运动上海及附近的北方部队。范鸿仙等人通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运动北军过半"[153]，准备以此力量攻取制造局。但走漏了风声，范鸿仙于9月20日被刺身死，革命党人前功尽弃。12月，江西南昌革命党人筹划运动省城驻军、退伍士兵组织决死队[154]，1915年1月范玉田、张拱民在江苏南通再次筹划起义[155]，同月，广东刘光、蔡苏在横江组织讨袁军筹备起事[156]，都

因事泄，半途而废。各地起义纷纷失败。孙中山利用欧战爆发之机，在国内重组力量发动武力讨袁的计划，再度受挫。

1915年1月，中日交涉事起，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孙中山召集会议，分析时局，商议对策。与会同志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势必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其一，袁世凯政府拒绝接受“二十一条”，日本为达到目的，必将以武力迫使袁政府就范。袁政府外强中干，又失民心，不堪一击，那时由谁出面支撑政局难于料定。其二，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必将激怒国人，引起全国上下的反袁怒潮。若出现前一种局面，应采取的策略是“待时机之到来，一旦机会成熟，便随时起事，不可踌躇”[157]；若是后者，则应“乘此趋势，一面非难日本之要求，一面极力攻击袁政府此次措施，大力鼓吹反袁，使中国人心更加激烈。同时努力怀柔民心，待时机成熟后，再举旗起事”[158]。中华革命党总部决定，在“二十一条”交涉之时，进一步揭露袁世凯卖国称帝阴谋，再次发起武力讨袁的高潮。

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发布第八号通告指明：“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己氏，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159]通告向全国人民揭示出“二十一条”交涉与袁氏帝制阴谋的关系，号召人们“不为浮言所动，不为外表所摇，本坚忍不拔之精神，冀除卖国之蠹”[160]。4月9日，中华革命党又发布《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指出袁世凯企图让日本政府援助其二事，一、称帝，二、平“内乱”，袁氏为达此目的，终将承认“二十一条”。因此，“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再无可以容喙之余地”[161]。告国人书发布一月后，袁世凯正如党人所预料，基本接受了“二十一条”。顿时，举国激愤，国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反日爱国热潮。孙中山指出，这股风潮，“比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162]。

为抓住时机，在全国各省组织力量策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在1915

年春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发动起事工作，其中有广东朱执信、邓铿，广西刘崛、刘玉山、苏无涯，四川卢师谛、向传义，湖北蔡济民，湖南林德轩、郭庞，贵州安健、张百麟，浙江夏次岩，江苏周应时，江西董福开，云南董鸿勋。他们奉孙中山之命，分赴各省组织军队，制定具体的讨袁计划，并根据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第二条，在省中分若干区，各设司令官一人，综理区内军务，以形成省与各区的严密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蔡济民调整了湖北革命军各分区，重新任命了各区司令官，以赵鹏飞、熊炳坤、刘英、曾向武、王华国分任一、二、三、四、五各区司令。卢师谛在四川也作了相应的部署，命吕超、石青阳、丁泽煦、刘国佐分任川南、川东、川西、川北区司令。此外，各省负责人还把分散在各地区现有的小股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左景阳、符言一、丁士杰、张孟介在沪、宁、浦口、蚌埠四处设立的秘密机关，宋拼之、刘本、庞三杰等组织的丰、沛、砀地域秘密团体，范庆升、丁少春等在福建设立的机构，廖海楼、吴家东等经营的安徽凤阳县境三埔及小蚌埠地方的机关，黎萼在广东运动的绿林，徐天复、周永广等组织的浙江台州、温州等地的军队，张宗海、李子和等经营甘肃地区的机关，都与本省司令部取得联系，听命于中华革命军总部的指挥，深入到各地活动。

革命党人正在各地加紧活动之时，又传来了筹安会出笼的消息。中华革命党立即发表通告说“数年来蓄志以亡民国者，袁氏实为第一人”[(163)]，指出筹安会受袁氏主使，是“一种主张变更国体，改民主为君主之政治法社也”[(164)]。通告向国内同胞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与，惟我内外诸同胞速图之。”[(165)] 12月，孙中山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的种种恶行，愤怒指责袁氏政府是“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166)]。孙中山向国人坚决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为此，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

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发动武力讨袁的组织与领导，建立一支中华革

命党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总司令部。1915年夏末，孙中山在东京委任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总司令，在上海设筹备处；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在青岛设筹备处；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在广州设筹备处；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省三原县设筹备处。10月，居正、于右任分赴各省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筹建司令部。孙中山以“举义要件，不外乎兵力财力”[167]，又派胡汉民、许崇智、杨庶堪、宋振、郑鹤年、邓铿分赴南洋筹募起义军饷。

中华革命党美洲、南洋所属海外支部，都以“筹募第三次革命军饷为唯一急务”[168]。随着国内武力讨袁的兴起，海外各支部不断以巨款支援国内起事，许多爱国侨胞一再慷慨解囊，热情支持国内的讨袁斗争。与此同时，海外各支部还纷纷组织军事团体，聘请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回国，以尽杀贼救民的责任。美洲支部组织“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其宗旨在于“养成美洲民党热血健儿，有指挥队伍，驱除国贼之学识”[169]；并组成了“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延聘党员中受过军事教育者为教员，逐日操练，为回国讨袁加紧准备。美洲同志还组织了“中国民智航空社”，在革命青年中培养航空人员，志在应用最新的航空技术，为铲除民贼，维护共和出力。中华革命党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全力以赴，积极进行，筹备发动武力讨袁，以期“一举即达吾党素志”[170]。

在大兴讨伐之前，孙中山特将陈其美从上海召回东京，与居正、许崇智、周应时等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大举计划。他们一起研究了袁世凯的兵力布置及革命党在国内力量的分布，考虑到袁氏以皖、粤、湘三省为民党势力的根据地，特派心腹镇守，并遣北兵驻防，而且汤芗铭、龙济光、李纯、倪嗣冲等又极力趋合袁氏旨意，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在这几省内，革命党的力量几于尽绝，一时恐不易发动。相比之下，袁世凯的势力在西南一带比较薄弱，特别是云南“自辛亥以后，袁家势力未曾侵入”[171]。因此，陈其美提议先从西南入

手，“尤其是云、贵两省，乘隙抵虚，较易为力”[172]。孙中山深表赞同，当即决定派陈其美到西南主持，并在香港设一办事处，加强与西南几省的联系，积极策动云、贵起事，“先从西南造我根据”[173]。

10月，陈其美回国到上海准备南下。因袁氏卖国，人心激愤，在革命党的活动下，上海一带海陆军归附日众。当地负责人认为机不可失，要求陈其美留沪主持。陈其美请示孙中山，征得同意后，取消了西南之行，云、贵的策动工作改由安健、张百麟、黄毅先负责。

早在1915年初，孙中山曾任命杨益谦为云南支部长，陆亚夫为干事，回滇组织支部，发展党员，活动讨袁。但因唐继尧从中阻挠，党务工作被迫停顿。之后，杜去恨、蔡济旺等人入滇秘密组织讨袁机关，运动学生及滇军，筹备发动起义。滇中董建章、罗海峰、赵飞凤等配合活动，组织军、政等各界人士响应[174]，但因中途事泄而失败，蔡济旺被捕遇难。吕志伊回到云南，继续活动于军、学、绅界之间，策划倒袁。

在贵州方面，张百麟与安健、杨荩诚、席正铭、凌霄共同主持。他们集中力量在黔省各路军中运动起事。黔北路陆军中有部分辛亥革命时随张百麟起义人员，还有革命党前期所办法校学生二千余人。张百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委托凌霄等人前往运动。黔南路铜仁、思南方面，由席丹书主持，运动知事、连长等接应策反，援为起事内应。另外，革命党人在黔东路和黔西北路的陆军中也有一定的基础，张百麟派人前往运动，期望黔省一旦发动，即可支持响应。张百麟等人在黔军各路都作了布置，计划各路在黔省发动，“牵制黔贼，使不寇川、滇，俾以揭晓后，再以兵力为黔革军声援，内外相应，黔事本可传檄可定”[175]。

除西南以外，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斗争，在全国其他各省也在蓬勃兴起。1915年5月，革命党人金鼎隆在东北开原县聚众五百余

人，占据孙家站，在南满铁路沿线开展讨袁活动。6月，孔庆平、钟鼎飞在河南开封运动军警，联络会党，策划举事。同月，前绍兴府都督王金发在浙江发动反袁斗争。刘文艺、刘石裕、魏珍在汉口法租界印湖北官钱票，筹集起义经费，联络绿林，筹备起事。7月，姚庭、杨海在浙江嘉兴组织救亡会，准备发动。9月，司徒权在广东江门运动军队，密谋讨袁。10月，陕西革命党人在三原、泾阳一带起事，攻占数县。接着，四川革命党人也在成都附近聚众举义。11月，居正到青岛建立起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他召集吴大洲、薄子明、邓天乙、尤超凡、庞子舟、吕子人、赵中玉、尹锡五、马海龙及朱霁青、刘廷汉诸部，并招募各乡的民团、退伍士兵、青年学生及警察，组成东北军二个纵队、五个支队，拥有数千人的队伍。同月，金维系在安徽集合同志，筹备发动；曾跃廷在湖北京山、应山、天门、汉川等县招集四千余人，并运动军队，策划攻署劫狱，发动起事。

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策动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孙中山对讨袁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现在海内风云，以袁氏称帝之故，愈趋愈急，夫己氏股肱诸将亦有土崩瓦解之势，乘时蹶起，机不可失"(176)；"袁氏末运，去兹不远矣"(177)。

三　暗杀活动

中华革命党发动三次革命，在致力于以武力讨袁的同时，还采取了暗杀行动。狙击暗杀，往往是革命党人用来作为军事冒险的补充手段。特别是当革命处于低潮，发动起义困难重重，一筹莫展之时，暗杀活动更被视为快速有效的歼敌捷径。许多党人认为，通过暗杀，"既可以促成反动统治内部之混乱，又可以振奋民心士气"(178)。为此，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中华铁血模范新军炸弹暗杀团"(179)，还在广州成立了敢死队、炸弹队，进行了多次暗杀活动。

1．钟明光行刺龙济光

自1914年末中华革命党发动了“讨龙之役”后，袁世凯恐革命党在广东再举暴动，一再电令龙济光“严加防缉，而杜祸萌”。龙济光乘机大肆搜捕党人，并再三表示：“乱党之谋，注重在粤，诚如钧示，济光仰蒙付托之重，敢不殚诚竭虑，力保治安。”[180] 龙济光媚袁惟恐不周，当袁氏承认“二十一条”后，他竟不顾举国一致反对，仰承袁氏意旨，电请“提灯庆贺”。革命党人闻龙此举，“愤不欲生，切齿誓杀龙以儆凶顽”[181]。再加上龙济光督粤多年，苛捐杂税，贩烟开赌，纵兵淫掠，杀戮党人，无所不为。革命党人李作汉、罗刿湖、李稚陶、钟明光与丘汉苗女士等结义，组成暗杀团，专以刺杀龙济光为己任。他们最初计划采用手枪为狙击武器，但钟明光认为手枪远程射击，命中困难，主张采用炸弹，并慷慨表示：“必要时愿与龙贼同归于尽。”[182]

5月末，暗杀团准备就绪，开始侦查龙氏行踪，伺机进行。但龙济光自知在粤与民结怨甚深，党人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因而行踪诡秘，深居简出。革命党人潜伏多日，也未得手，便改变主意，先杀龙氏之兄龙觐光。龙觐光任广惠镇守使兼陆军一师师长，是龙济光的主要帮凶，先杀他即是断其左膀右臂。暗杀团乔装成小商贩，肩挑瓜果、杂货，将炸弹藏在箩筐中，在将军署镇守使署一带叫卖，但在外巡候数日，仍未得时机。

7月11日，广东大水成灾。15日，油行又起大火，火苗随着漂在水上的浮油，顺河而下，延及船艇，惨声四起。龙济光深恐局势生变，在严密的保卫下，前呼后拥，到龙觐光处察看。暗杀团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由钟明光“托名摆卖卤酸菜为业”[183]，潜伏在龙济光必经之路。17日，龙济光一行路经积厚坊时，钟明光从容扔出炸弹。炸弹威力巨大，当场炸死炸伤龙氏卫士及路人各十余人[184]。遗憾的是龙济光在护卫包围之中，仅伤其左足。钟明光不幸被执，凌迟而死。

2．杨玉桥行刺薛大可

北京《亚细亚报》是帝制派的御用宣传机关，平日鼓吹帝制，不遗余力。该报总理薛大可为进一步扩大帝制宣传，特在上海筹设该报分馆，定于9月10日出版。革命党人杨玉桥闻讯，怒不可遏，欲置薛大可于死地，以张正义。

9月11日晚7时许，杨玉桥携炸弹潜至报馆，向馆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三人，伤数人，但薛大可未被炸死。杨玉桥被英捕抓获，后由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引渡入狱。革命党人萧美成急欲营救，亦因走漏消息而被捕。12月23日，两位志士在沪殉难[185]。

3．吴先梅行刺蒋士立

袁世凯以中华革命党为心腹大患，特派变节分子蒋士立携巨款五十万元到东京，与驻日本公使陆宗舆共商分化瓦解中华革命党的对策。他们以资送回国、予以政治地位、送到国外休养、予以优裕生活费和补给留学官费的办法来引诱革命党人叛变自首，并规定凡党人前来办理自首手续，须检讨过去讨袁大逆不道，写下“犯上作乱，天诛地灭”[186]的誓词，还要定期汇报党内消息及党人行踪。

当时麇集东京的革命党人，多数生活贫困，在敌人金钱收买之下，一些意志薄弱之徒堕志变节，奔走于蒋士立的门下。叛徒的出现，搞得中华革命党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甚至隔几天未见面的朋友，也怀疑是否被收买了。孙中山也觉察到，“吾党秘密事，何以袁政府总能得消息？”[187]为制止这种腐蚀剂在党内蔓延，孙中山召集居正、田桐、廖仲恺、谢持、覃振商讨对付办法。这时湖南青年党员吴先梅自告奋勇，向覃振提出，愿负除害具体责任。覃振赞同吴先梅的意见，决定派其刺杀蒋士立。

覃振的同乡湖南岳阳人周鳌山是蒋士立的爪牙，为蒋收买党人四处奔走，深得蒋的信任。某日周往访覃振，因覃振不在，便留下一张便条。覃振就仿效周的字体，假冒周的名义写一便条伪称向蒋引见自

首党人。1915年10月17日晚9时许，吴先梅持便条赴蒋士立赤坂寓所，诡称有要件面交。蒋以为是党人前来自首，同秘书一起下楼会见。吴先梅因事先见过蒋的照片，蒋刚进接应室门口，即拔枪射击，一弹贯通蒋的右胸，一弹伤腹，蒋应声倒地[188]。吴先梅见目的已达，快步走出蒋宅，并举枪大呼："杀袁探，我革命党也。"[189]随即趁雨夜飞驰而去。事后，在孙中山、陈其美等人的掩护下，吴先梅顺利地回到了国内。

4．王晓峰、王明山行刺郑汝成

袁世凯深知上海为全国重镇，又向为"乱党"发源地，特派心腹大将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郑汝成"权谋诡谲，干练多才"。帝制发生，郑极力赞助，声言："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190]为防备暴动，郑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仅以1914年9月计，即"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成为革命党的凶恶敌人。

1915年末，陈其美与杨虎、孙祥夫等策划在上海举事。他们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要想取上海，须先除去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191]。为此，第一目标是刺杀郑汝成。

11月8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郑汝成必定要亲往祝贺。陈其美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9日，他召集党人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开会，周密安排了狙击郑汝成的具体方案。凡郑可能经过的地方，都派同志埋伏于路口：吴忠信领安徽同志在十六铺，江、浙同志在跑马厅，谢宝轩等在黄浦滩，马伯麟、徐之福等广东同志在海军码头，各路分头前往，准备伺机伏击。英租界外白渡桥是最重要一处，不但离日署近，是郑汝成必经之地，而且车辆在此须转弯慢行，最利于伏击。陈其美考虑再三，决定派干练沉勇、射击术娴熟的王晓峰、王明山担此重任。因

这次行动事关重大，陈其美特于11月9日会见他们二人，问道："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二人慨然许诺，表示："郑不诛，袁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192]。

10日上午10时半，各路伏击人员携炸弹、驳壳枪与五百发子弹分头出发。王晓峰、王明山与孙祥夫潜伏于白渡桥北墩三四丈处。郑汝成知近期风声甚紧，出动倍加警惕，故意改变原来路线，绕道乘汽艇至汉口路外滩登岸，换乘汽车。因此，各路均未遇到郑的车队。11时许，郑的汽车行至白渡桥北墩，车速转缓，将上桥脊，孙祥夫认定身着黑披肩、大礼服者是郑汝成，急发令执行。王明山立即向郑的汽车投去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炸弹落在车后。郑的司机见事危急，想加速急驶而逃。王明山眼明手快，又冲上前去，投出第二枚炸弹，命中车的后身，郑汝成在车中被震得失去知觉。王晓峰趁势跳上车缘，左手握车栏，右手提驳壳枪，对准郑的头部连发十枪。因射击距离近在尺寸，郑汝成立刻脑浆迸裂，头若蜂巢，当场毙命。王晓峰将郑击毙后本可逃脱，他却再次验明正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立桥头演说一分钟，从容被捕。受审时，二位壮士侃侃而谈："郑汝成辅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193] 但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二人"坚不吐实"[194]，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195] 12月7日，二人在上海被害。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以暗杀作为打击敌人的一种手段。虽然靠暗杀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暗杀的作用也远不如革命党人想象的那样巨大，但从客观上看，成功的暗杀的确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士气，为武装起义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对郑汝成之死，袁世凯"大为伤感，辍会终日"[196]，并下令"追赠郑汝成一等彰威侯"[197]。而革命党人却为之振奋。孙中山深表敬佩地说："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

为。”[198]

四　肇和之役

郑汝成被诛，敌人在上海的部署已乱。袁世凯惊恐之余，急忙遣将调兵，撤除上海镇守使一职，改派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何丰林为上海防守司令。为加强东南地区的力量，袁世凯致电冯国璋说：“迭据各地探报均称，多数乱党窥伺东南甚急，苏省极关重要，非有得力活动军队随时应付，不足以资防范。希即编两混成支队，以备相机策应，遇有警报，即分头迎剿，迅即扑灭。”[199] 他并答应给这支部队筹备费二十万元，先拨十万元，促冯国璋加紧筹备；同时又令张勋协助防守上海。张即“特派专员率同侦探多名，常以驻沪，调查协缉”[200]。袁世凯想借此巩固淞沪重镇，稳住阵脚。

新任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平庸无能，在军内毫无威信，人心浮动。革命党人趁时加紧运动，长江及江浙各省同志亦纷纷前来敦促，表示：“苟上海能任发难，则各省必可克期响应。”[201] 再加上袁氏帝制阴谋暴露，“全国人心愤激，均属望于革命党”[202]。孙中山等人遂决定首先在上海发难。

孙中山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主持策划上海义举。原主持上海军事的吴忠信及蒋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等人，共同辅助陈其美，分任军事、财政、总务、文牍、联络等职务。他们一起为筹备起义，反复磋商，认为上海起事必须有充足的准备。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三艘海军战舰在长江停泊。陈其美命杨虎加紧运动这几艘军舰的官兵响应起义，以期“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203]。因得“肇和”舰长黄鸣球的支持，该舰策动工作成效最著。其中实习生陈可钧最为积极，主动担负起倡导起义的任务。舰上大多数官兵同意响应起事。在“应瑞”、“通济”两舰上，赞成起义的官兵也逐渐增多。此外，运动陆地军警的工作，进行

得也颇为顺利，“陆军及警察，已多表同意于我党”[204]。指挥总部认为时机已渐成熟，计划在12月中旬发动。

此时，情况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在运动海军时，走漏了风声，袁世凯当即采取措施。他对陆军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所疑陆军分别驻扎，将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则索性解散。对海军中有不稳定动向的“肇和”舰，则采取了“隔离战术”，并派萨镇冰以检阅海军为名，命令各军舰出海。12月1日，萨镇冰乘宁沪专车来沪检阅海军[205]，他命“肇和”舰12月6日出航外海，开赴广东，俾使革命党人鞭长莫及。

突然的变化，打乱了革命党人原先的部署。“肇和”舰内革命党人认为：“我党联络‘肇和’之成绩为各舰之冠，今若听其开去，则将来发动尤困难”[206]，要求总部决定于6日提前发难。总部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经反复思考，多数认为：“肇和”、“应瑞”、“通济”舰俱泊上海，皆海军的精华，根据当时党人的力量和进行的情况，再加上内应，一旦发动，这几艘军舰定会同时得手，然后再用军舰的威力对付陆军，陆军必定溃败。当即决定趁各舰长公宴萨镇冰之日，即12月5日午后4时发动。

这次上海发动的战略目标是：“袭击海军，后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207]

在战术上，总部拟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具体分配了任务。陈其美任淞沪司令，吴忠信任参谋长，黄鸣球任海军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作战计划如下：

一、海军以“肇和”舰为海军司令部，杨虎率一部分人占领“肇和”，占领后即开炮猛击制造局；孙祥夫等率一部分部队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以为“肇和”之辅助。

二、制造局同意之军队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之军警，闻军舰炮

声，即同时响应。

三、夏尔玙担任于城内各城门举火响应。

四、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同志攻击警察局。

五、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担任攻击电话局、电灯厂。

六、陆学文担任攻击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

七、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等担任攻击闸北方面军警，余建光并任散布告示檄文。

八、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等担任留守总机关部，并办理后方勤务。

约定以海军炮声为号，各路同时并举。

5日下午3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暗藏手枪、炸弹，装作游客，乘汽艇由黄浦出发，直奔“肇和”。途中，汽艇上悬起“青天白日旗”。因此旗与当时海军旗近似，“肇和”舰上官员误以为有人前来校阅，乃集合官兵在甲板上列队欢迎。当汽艇靠近“肇和”船舷时，陈可钧按计划率众响应。因事先已有默契，响应者颇众，其余的人也随声附和。杨虎顺利地登上“肇和”，当众宣布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宗旨及起事目的，舰上水兵欢呼赞成。接着杨虎命令发炮。傍晚6时许，水兵们射向制造局的炮声，拉开了起义的战幕。

另一路由孙祥夫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由杨树浦乘小汽船出发，以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为目标。但当孙祥夫一行接近“应瑞”时，即被巡捕发现，索阅出港护照。革命党人因款绌与时间紧迫，于5日晨才购得这艘小艇，这天海关不办事，未能注册领牌，取得护照。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束手无策。孙祥夫等被巡捕所阻，被迫折回。夺取“应瑞”、“通济”的计划流产，使“肇和”陷入孤立

无援的局面。

“肇和”舰炮声骤起，潜伏于陆地租界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声而动，在总部的指挥下分兵几路，向预定目标进发。

谭斌、朱霞率数十名革命党人，身着便衣，手持短枪，冲入南市电话局。局中人皆徒手，无从抵御，革命党人“立悬三色旗及海陆军总司令旗”[208]，占领了电话局。党人迫令该局长陶菊如交卸职务，控制接线人员，使敌人断绝联系。不一刻，敌军即从制造局派兵反击。革命党人只执短枪，弹药也不充足，两军相持良久，党人终因力量不支而退，电话局复为袁军所占。

薄子明率所部二百余人，潜伏于警察局附近的隐蔽地，候炮声起，即向警察局发起进攻。但因“袁军密布，尽扼要衢”[209]，再加武器精良，机关枪封锁要道，薄所部皆持短枪，难于和敌军抗衡，同样不支而退。

吴忠信部下陆学文率数十名党人，各持炸弹、手枪，向淞沪警察第一署及工程总局猛攻，打算夺得军械，占据局署，设置起义前线指挥部。革命党人冲至警察署，为门岗所阻，党人即以炸弹摧毁该署大门，同时手枪齐鸣，向顽抗的警察射击。警察抵挡不住，全体溃散。党人攻入警察署，缴获枪支、弹药若干。时近拂晓，袁军重新组织兵力大举反扑，将警察署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激战，终因袁军势大，党人死伤过半，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阵地。

还有一路由姜汇清、曹淑实率四五十人，于夜半攻击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革命党人一与警察遭遇，即“开枪击伤警察二名”[210]，尔后也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革命党人各路并起，“分途并进，声势甚张”[211]。但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依恃雄厚实力，急忙组织反攻，下令一体戒严，派兵把守关卡要地，又将城内巡警一律召回，“每岗另派出十余人，均各荷枪实

弹，严密梭巡”[212]。同时法租界捕房派出巡捕沿界防守；英租界捕房口也拖出大炮两尊；西门方板桥则由巡长带领全班巡士会同宪兵阻断交通。另外，江苏冯国璋亦“分电该地方官警益加戒备”[213]。

在袁军的反扑下，义军多因寡不敌众而溃败。本拟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因联络不周而落空。“应瑞”、“通济”两舰又未能附和起义。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陈其美见此局面，急回总部，商议再取“应瑞”、“通济”舰及陆地各路重新组织进攻的方案。正在计议之中，忽有法捕房侦探和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当即逮捕了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丁景良二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等人听得楼下骚动，迅速登上屋顶，潜入邻舍，得以逃脱。革命党的指挥系统，因总部机关遭到破坏而陷于瘫痪，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继续指挥战斗。只有“肇和”舰仍在孤军奋战。

“肇和”舰在5日6时发出第一炮的同时，即向“应瑞”、“通济”两舰发出信号，问其“是否同意”[214]。两舰皆发回信号，称：“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215]“肇和”舰上得此信号，皆“坦然无虑”，安心等待两舰策应。

夜半1时，杨善德、萨镇冰与海军司令李鼎新、参议杨晟赶到制造局，商议对付“肇和”舰的办法。因“肇和”是海军中装备精良的主力舰，是否下决心对它开炮轰击，“众说莫决”。最后只得电请袁世凯指示。袁命令“将该舰击毁”[216]。于是李鼎新决定以离“肇和”最近的“应瑞”、“通济”两舰承担攻击任务。

李鼎新等人对“应瑞”、“通济”舰中有革命党人暗中活动，早有耳闻。为抵消革命党的影响，约束舰上官兵，他决定“厚贿海军”，并立即派人到交通银行提现金十万，分别运往两舰，还答应在事成后“许以一百万元犒赏费”[217]，并以封官许愿相诱，促两舰官兵立即攻击“肇和”。

“应瑞”、“通济”舰上革命党人接到“肇和”的信号，本想立即响应，但又顾虑舰中将士意见不一，便继续在舰内说服官兵，动员举义。正在这时，上海当局的大批贿款运到，舰中气氛顿时为之一变。一些原已答应响应起义的官兵得到厚贿，又垂涎于今后的高官厚禄，纷纷改变主意，转而赞成攻击“肇和”。革命党人虽竭力从中阻拦，但经不起金钱利诱的官兵占了多数，革命党人也就无能为力了。

6日拂晓4时许，“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发炮，向“肇和”猛攻。正在静等两舰响应的“肇和”舰，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急忙发炮还击。但由于慌乱，多数炮弹都未能命中敌舰。战斗持续将近一小时，“肇和”屡屡中弹，舰上死伤枕藉。杨虎打算将舰开出吴淞口，避其锋芒。但起义人员不懂电气起锚法，无法开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据守“肇和”应战到底。此时“肇和”前身起火，锅炉房又被“应瑞”的炮弹击中，锅炉炸裂。杨虎见败局已定，不得不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舰上陈可钧等数十人因伤势严重，行动不便，被袁军捕获，英勇就义。义军仅存的一支力量也被击溃，“肇和”起义失败了。

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肇和”军舰鸣炮发难，举国震惊，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肇和”之役给了袁世凯及其帝制追随者一个打击。起义刚刚结束，全国各大报即纷纷发表评论。12月8日，《申报》指出：“上海事件突发，帝政问题之进行大受影响，今后帝政热心者之运动，不问取何手段，必含危险，须加注意，此一般之观测也。”[218]《神州日报》载济南来电说：“上海乱事之警报传来，此间大受影响，尤以附和帝制者经此意外之反动，颇为震骇。”[219]《中华新报》在起事的第二天，即发表了《沪乱与帝制》的社论，指出：“沪上有乱，在当局心目中最所深恐。”[220]号召人们奋起讨袁。全国舆论鼎沸，对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和压力，使他们感到日益被国人唾弃而惶惶不安。袁世凯唯有一再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防查，毋稍疏忽”[221]，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为其追随者壮

胆。

其次，“肇和”之役暴露了袁氏军心浮动，内部虚弱，并显示出反对帝制已是人心所向，增强了人们对讨袁的信心。虽然袁世凯在淞沪一带密布重兵，海军主力一半以上亦在附近，但革命党人仍能在敌人全力防守的重镇组织起义。起义初发，革命党人登上海军的主力战舰，舰上官兵立即响应，调转炮头，向制造局开炮。可见袁军内部多数官兵亦痛恨帝制。

再次，“肇和”之役向列强揭穿了袁氏所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的谎言。11月20日，袁世凯刚刚演完一幕“国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的丑剧。未及数日，“肇和”之役爆发，使真相大白。《中华新报》发文对袁氏假托民意的做法，进行了尖刻的讽刺。文章指出：“政府答复五国警告，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若逆民意，必生内乱。今则此次动乱之生，实由帝制运动当无疑义。不知政府又何以答外人？”[(222)] 外报也为此发表评论说：“协约国前致袁总统之劝告，苟欲证明其言之正当，则今之事变可为充分之物证矣。”[(223)]

“肇和”之役在全国反帝制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孙中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224)]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下，唯有中华革命党首举讨袁义旗，孤军奋战，虽屡起屡败，而志不稍衰。它先后发动起义四十余次，这些起义虽然由于脱离群众、有冒险盲动的弱点，没能从根本上动摇袁氏反动统治的根基，但在国内重新点燃讨袁的火种，“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之中，而促以实行”[(225)]。他们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鼓舞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志，加速了进步党人的转变。在整个反对帝制的斗争中，中华革命党人的倒袁先锋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节　黄兴与欧事研究会

一　欧事研究会的成立

欧事研究会是一部分国民党人以继续反袁为目的而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是全国反袁斗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1914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如前所述，孙黄两派观点不同，分歧日深。黄兴等人终因反对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和誓约及党章中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和元勋公民的规定，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因而两派在组织上形成了公开分裂的局面。陈其美全力支持孙中山，“力排众议，主亟进”[226]，对持反对意见者大加攻击。一些人对陈之所为不以为然，遂散布陈是青帮首领，“在新党未宣布成立，就以青帮身份窃取组织部门要津”[227]。再加上陈其美误认为黄兴携巨款在东京建造私宅，无理指责黄兴，许多人对陈更表恶感，孙黄两派对立情绪加剧。黄兴认为这是因他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而对他施加的压力，十分恼火。他在给宫崎寅藏的信中气愤地说：“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228] 黄兴觉察到“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229]，因而对党事更觉灰心，心情十分沉重。他说：“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230] 这时，国民党中一些官僚党员乘势到处活动，主张“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231]。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黄兴处境十分为难。他目睹党内已成分裂的局面，感到非常痛心，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他既不肯违心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屈从孙中山的做法，也无法说服孙中山改变主张，更不愿另树一帜，与孙中山对抗。因为黄兴虽然与孙中山的意见经常针锋相对，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在坚持民主革命立场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是一致的。1914年初春，黄兴为新成立的浩然庐学

校题匾额时，愤然挥笔写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232]。这充分表明，黄兴虽身处逆境，但与孙中山一样，讨袁救国的壮志未衰。再则，尽管孙黄之间出现裂痕，黄兴仍然视孙中山为革命党中唯一的领袖。因此，当一部分人想拥他另行组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233]

孙中山见和黄兴意见无法一致，便不再谈合作问题。1914年6月3日，他给黄兴去信说：“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234]既然孙中山已表明将独立进行，黄兴也不想从中阻拦。他认为长在东京相持下去，不但对党事无补，反会使“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235]，不如离开日本。这样既可以“避免党内纠纷”[236]，又可以向孙中山“表明心迹”，以便使孙中山可行其所是，各不相妨。于是，黄兴给孙中山回信说：“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237]同时决定离开日本，前去美国。6月27日，黄兴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叙别。30日，他在李书城等人的陪同下，由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离日，并没有缓和革命党内部孙黄两派的对立情绪。追随黄兴的一些革命党人，见东京僵持的局面，无所作为，也纷纷出走。李烈钧离日赴法，漫游欧洲；柏文蔚转道香港，去了南洋；钮永建经美转赴伦敦[238]。在南洋的陈炯明也宣称“不问国事”[239]。

仍留在日本的一些人群龙无首，主张各异。一些人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仍想“别树一帜，与孙对抗”[240]；一些人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又不知如何进行。李根源、程潜等人则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以等待时机。总之，追随黄兴的部分国民党人，既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又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同一盘散沙。

恰逢此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在日本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认为时局紧张，便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世界大战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应付方针。这种机会使他们得以常常聚会，以前那种无组织的状况，多少有些改变。1914年8月，由李根源等人倡议，以讨论欧事为名，把散居各地的人组织起来。大家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在一起反复磋商了确定组织名称的问题。多数认为：一、应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可以借此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相互商榷；三、这个名称不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241]。从上述几方面考虑，最后决定将新成立的组织取名为“欧事研究会”。

欧事研究会的参加者，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在政治上坚持讨袁，又赞成黄兴“缓进”主张的国民党人，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一百多名，其中基本上由国民党内两部分人组成。

一、追随黄兴的革命党人。他们大多数是同盟会的军事骨干，所谓“黄派军人”或“士官生”。这部分人是欧事研究会的核心力量。二次革命时，他们在各省讨袁军中担任着重要的军事职务，其中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陈炯明，安徽都督柏文蔚，四川军长熊克武，还有担任江苏或上海讨袁军高级将领的钮永建、李书城、冷遹、章梓、赵正平、方声涛；江西讨袁军将领林虎、李明扬；安徽将领龚振鹏；湖南将领程潜、张孝准、陈强、程子楷等。他们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直接带兵与袁军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然而，惨败于袁军手下的沉重打击，却使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普遍认为，讨袁之役，各自手下都有不少兵将，仍致失败，现在无一兵一卒，何能妄言激进？因此，对孙中山提出要重组军事力量，继续发动武装讨袁，更觉得是纸上谈兵。另外，黄兴是三军主帅，他们跟随黄兴征战多年，从感情上也多和黄兴接近，“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242]。孙黄之争中，他们在观点上也都倾向于黄兴，因而也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其中主要是前统一共和党的成员，如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欧阳振声、张耀曾等，还有杨永泰、徐傅霖、韩玉辰等人。二次革命后，他们分别任参议院议员或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他们留恋议员职位，不希望以武力方式解决，主张依据法律，制成完备宪法，以限制袁氏职权。1913年7月上旬南北交战之际，宪法起草委员会仍积极进行。自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他们“更欲据宪法起草委员会孤军奋斗，以期最后之法律胜利”[243]。讨袁事败，他们也遭到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当两军兵戎相见时，他们仍幻想以法律解决；战事失利后，对孙中山继续以武力讨袁的激进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244]。还有部分国民党议员自辛亥革命之后身居显位，被袁世凯逼迫亡命，实出无奈，“只要能够逸居东瀛，坐待东山再起，于愿已足”[245]。因此，黄兴的缓进主张，正合他们的意图。

革命党黄派军人和国民党稳健派的结合，也并非偶然。他们都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坚持讨袁，在策略上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政治观点的基本一致，是他们结合的基础。在组织上，他们原来同处于国民党之中。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把这批坚持反袁的国民党稳健派排斥在外；黄派军人又因和孙中山意见分歧，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于是，由于不同原因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两派，便以讨论欧战为名，很快就结合起来。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云南光复，任云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并受中将衔兼军政部总长，1913年任国会众议员。军人和议员的双重身份，使他和两派人都有密切的联系，成为联络两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欧事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中，集合同志，或协同章士钊草拟对外文字，衡量局势，斟酌词句，或发函联系国内、欧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筹划和组织上都起了重要作用[246]。

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遹、林虎、程潜等连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李书城等人，告知成立欧事研究会的目的和具体做法，请他们加入。黄兴认为欧事研究会的宗旨，没有违背其一贯的主张，又能组织同志图谋进行，便欣然赞同，回信表示："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画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247] 欧事研究会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设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它的成员多是黄兴的部下和追随者，黄兴的思想对欧事研究会也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黄兴是欧事研究会成员心目中的领袖。

欧事研究会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性文件，只留下了一份该会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内容如下：

一、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

二、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

三、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为究竟[248]。

"协议条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欧事研究会力图联合各派，以"缓进"的方针坚持讨袁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从中可以看出，在革命危难之际，欧事研究会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在根本点上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上各持所见。在欧事研究会"缓进"的方针中，存在着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极因素。但是，他们反对以"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249] 的做法，提出"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的主张[250]，则是对中华革命党军事上冒险盲动的否定。再则，欧事研究会反对中华革命党在组织发展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主张应不分党界，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共同讨袁。这在当时无疑是

正确的斗争策略。

二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指导方针也几经变动。因此，其活动的范围、特点、作用在每个阶段中也都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1914年8月—1915年2月）

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在“缓进”方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反袁的宣传活动，同时逐步聚集人力、物力，为将来的发动作准备。活动地点以海外为主，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南洋。在国内，则集中在上海。

上海方面的活动由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徐傅霖、殷汝骊主持。1914年冬，谷钟秀等人在一起分析国情，商讨今后进行的方针和活动计划。

他们讨论了国内政局与各界人士的动向，认为：“全国之中，有政治智识，有政治能力，而又一趋于正轨者，仅此少数之人才，分则势孤，或更生有力之敌。”[(251)] 因此，目前必须尽量联络各界人士，集中人才，在全国发展、扩大反袁势力。为达此目的，需要积极扩大联络范围，应当“不分党派，即前为敌党，但有可以接近之道，即极力与之接近”[(252)]，“感情融洽，主张自易一致”。

另外，谷钟秀等人通过对国民心理及舆论界状况的分析，提出国内辛亥、癸丑两次动乱，人人皆喘息不遑，故无论政府如何可恶，激进之主张则不能唤起国人之同情。因此，要促进舆论的转变，当务之急是“鼓吹共和国家组织之原则，共和国民应具之智识”[(253)]。人们增强了民主观念，对当局实行专制的所作所为，便可借鉴返观，由此便不难形成健全的舆论。

鉴于以上认识，他们把在上海的活动计划归结为二个重要方面：

一、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使人才集中，主张一致；

二、对于现今之政局，取缓和的改进主义，使人心渐入舆论同情[254]。

谷钟秀、杨永泰等人一面将计划送至东京，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李根源等取得联系，求助海外的经费支援，一面按计划在上海开展活动。

为便于与各界人士联络，欧阳振声等曾与北京丁佛言、刘松计划发起一个学会，以聚集当代有望人物。但刚着手进行，丁佛言即被政府派探尾随。这使他们警觉到，突起一学会，会遭到政府怀疑而难以发展，只能以迂回的方法进行联络。他们决定“纳学会于学校之中”，这样事易成而且不至招忌，在学校中还可以培养无数青年，为将来政治上之臂助。于是，他们筹备在上海办一政法专门学校，延聘有名而为当局所不忌之人才，共襄其事。开学后，每个学科都可以发起各自的学会，既能培养学生，又便于联络活动，可谓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谷钟秀、欧阳振声、彭允彝、殷汝骊设立了明明编译社和泰东书局。泰东书局撰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欲以牖进社会文明，隐力商贾之间，密图改革”[255]。泰东书局还作为联络海外同志的机关，被称为“国内民党之重镇”[256]。谷钟秀等仍觉联络范围狭小，“不足以容纳众流”[257]，便着手合并泰东书局、明明编译社，重组一大图书公司，打算以公司为基础，作为实业上的根据地，与活动的退藏之所，为今后的扩展打下基础。他们自称这种办法是：“似迂缓而实迅速，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位。”[258]

谷钟秀等人还敏感地察觉到：“现今民党之新闻，一家无存，然除政府直接收买之报馆听其命令外，余皆时露攻讦之态度，此正舆论

变转之机会。”[259] 为此，他们创办了《正谊》杂志，由谷钟秀主笔，其目的在于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及共和国家的组织原则。谷钟秀在《发刊词》中激愤地写道：“民国自成立以来，掷数十万之头颅，糜恒河沙之金钱，墟沼无数有名之城镇市埠，所汲汲购得者，迄今不过共和两字之虚名，与五色旗飘扬于空中而已。而环顾吾人民，不殪于水火，即死于刀兵，幸而生存，颠沛流离。”[260] 他明确指出，这是袁氏破坏共和，政治腐败所致。他说：“共和为人民谋幸福云云者，毫不相属，则不得不归究于政治之窳败。”[261] 他提出：“对于政府，希望其开诚心，布公道，刷新政治，纳入共和立宪之轨道；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智识，并培养道德，渐移易今日之不良社会。”[262] 当时，在袁世凯黑暗的文化专制下，全国报纸、杂志多谄媚袁氏，抨击民党。唯独《正谊》杂志金鸡独鸣，首先打破了舆论界沉闷的气氛，“敷陈正论，为神州放一线光明”[263]。

在美国，黄兴一行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每到一处便召集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或撰著文章，进行反袁宣传。

黄兴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264] 黄兴在多次演讲中，着重揭露了袁氏在国内破坏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他说：“我国名为共和，乃袁世凯所行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265] 他列举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五大罪行，“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266]，形象地勾画出袁世凯这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的嘴脸。他号召所有海外侨胞“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267]，并坚决表示：“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268]

黄兴的宣传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也在美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争取了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在东京，欧事研究会以《甲寅》杂志为喉舌，开展反袁宣传。《甲寅》创办于1914年5月，章士钊主笔。《甲寅》的宣传，最初言词并不激烈，而以生动流畅的文笔，从理论上阐明必须维护民主共和的道理。它在前几期中，发表了《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调和立国论》等文章，指出："开明专制者，人治政治也"[269]，并深入地剖析了专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阐明了建立法制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专制国之法则不然，举所谓法，不越一人之意，即意即法，莫能明之。果兹一人者，亦落形气之中，则意决无衡，而法因靡定。"[270]与"人治"相反，"今之文明国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质固，审判有定员，解释有定义，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唯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无弊"[271]。因此，要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否定"人治"思想，建立法制观念。文章在批判"开明专制"论时，虽然过分强调和夸大了资产阶级法制的作用，甚至对以法律限制袁世凯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文章对封建的"人治"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坚定人们实行民主制度的信心，起到了促进作用。文章在否定"人治"的同时，也使更多的人认清了袁世凯托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本质，这对唤起国民的反袁情绪，扩大讨袁的力量和声势，产生了潜在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南洋，欧事研究会的活动以筹款为主。1914年冬，李烈钧由巴黎抵南洋。不久，他联合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宋渊源、周震鳞、熊克武、龚振鹏、冷遹、耿毅等人，组织了"中华水利促成社"。其对外宗旨称"拟兴办水利，并计划在南洋设立世界轮船大公司，分劝募股"[272]，还声称要"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273]。其实，他们只是用"中华水利促成社"之名，避开居留政府的干涉，而真实目的在于"筹备大款，然后举事"[274]。该社成立之后，柏文蔚、白楚香、宋渊源等人四处奔走，赴各埠募款。但因南洋华侨中，信仰孙中山者居多，中华水利促成社的筹款活动，成效甚微。柏文蔚等奔走半年，只得"荷兰纸币九万三千余盾，英纸币一万余镑，

共合中国钱十二万数千元”[275]。为改变这种局面，李烈钧、陈炯明商议，改用公司集资办法，给以股票，俟成功付息清偿，由出名人签名负责。

中华水利促成社想尽办法在南洋筹款，必然和中华革命党发生冲突。为此，邓泽如、郑螺生、王慎刚找陈炯明等到槟城，与该埠同志陈新政共同会商。邓泽如劝陈炯明、李烈钧服从孙中山主张，一致革命，以免分歧[276]。但陈、李却推说：“对先生十分爱戴，断无不从之理，惜乎总章不善，易惹国人反对，未敢妄从。总之，宗旨既同，异途同归，虽未加入本党，系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先生，施展救民政策。”[277]李、陈借词推托，拒绝与中华革命党合作。他们单独进行宣传和筹款活动，为了争取款项，有时甚至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攻击。

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对海外华侨的反袁热情是个打击。有些人认为讨袁事败，现内部又不能统一，有何东山再起的希望，因而灰心丧气，“不愿出钱出力”[278]。更严重的是，革命党内部矛盾外露，使袁世凯有了可乘之机。袁派人到南洋，混称革命党，四处募捐，“藉敛华侨之金钱，捣毁吾党之信用，挑拨华侨对于吾党之恶感”[279]。此时，一些投机者也乘势招摇撞骗，私自募捐集资，以为己用。中华革命党的声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筹款工作阻力重重。中华革命党总部不得不发出通告：“以后凡属筹款各项，须奉有总理及各部长委任证书者，方生效力”[280]，并增派骨干力量到南洋协助筹款，以求改变被动局面。

由上可见，欧事研究会另立“中华水利促成社”在南洋筹款，虽意在积蓄力量，但实际上与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使革命力量相互抵消。特别是当中华革命党提出合作建议时，遭到了陈炯明等人的拒绝，这种不顾大局、不利于团结的做法，客观上起到了加剧内部矛盾的消极作用。

第二阶段（1915年2月—1915年5月）

1915年1月18日，日本当局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出，举国惶然。国内外形势的激剧变化，使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处理好反侵略和反国贼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决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欧事研究会以国家将亡，民族受辱，强调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他们改变了以往缓进的讨袁方针，倾注全力于反日救国斗争。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程潜、熊克武、陈强等在东京最先联名通电申明：“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281] 之后，黄兴、钮永建与在南洋的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也于2月25日联名通电指出：“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282] 他们反对借助外力进行革命，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免妨碍袁政府之对日外交[283]，希望以此为条件，联合袁政府，共同对外。

国难当头，号召人们反对侵略，维护国权，本是革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何况每当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人们也往往要求调整各种关系，以求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从这个愿望出发，号召人们携手共进，抵御外侮，他们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外有强邻紧逼、内有国贼当权的复杂形势下，欧事研究会只强调外御侵略，忽视内反国贼，甚至提出停止革命，则是顾此失彼，其客观后果只能是助纣为虐，适得其反。欧事研究会的错误首先在于，混淆了国家和袁氏政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钮永建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本党向以反对恶政府为宗旨，然尤以国家之利益为前提。”因此，“如国家遇危则当先其所急，即暂时中止革命”[284]。有人更直接地说：“吾党革命本缘内政不良，国若不存，命于何革？”[285] 在他们看来，只有停止反袁，支持袁政府，才能抵制侵略，维护国权。

再则，欧事研究会只看到了“此次外交受侮，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286]，但却对袁世凯为自己黄袍加身，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而就不免产生联袁反日的幻想。钮永建于2月28日在纽约第二次救国大会上呼吁：“一、全国人民，不论何党何派，应协力一致为政府之后援，俾政府得以全力为对日之交涉；二、我民党中人，亦勿于此对日期内为掣肘政府之动作，且当善劝国民实行右第一项之义务。”[287] 爱国热情的冲动，使他们不能理智地看到，袁氏独裁政权，就是丧权辱国的根源。与他们的认识相比，孙中山的看法要高明得多。孙中山明确指出：“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288]

值得惋惜的是，欧事研究会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正确主张。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对讨袁救国斗争带来的损失也就愈大。袁世凯利用欧事研究会停止革命的时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在黄兴等通电发表后，袁党大肆宣扬：“黄兴与柏文蔚一派，因孙文为日作伥，已与孙反对，不日将宣告与孙离脱”[289]，并攻击孙中山等人企图“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290]。袁世凯乘势宣布“宽赦党人”，加紧劝诱党人停止讨袁。他在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文中说：“此次政府宽赦党人，务令迅速回国自首，共济时艰，以卫祖国。”[291] 同时又密令各省将军，防范党人以“二十一条”交涉为借口闹事，“应即严督所属各军警严行侦察缉办，以资防范”[292]。袁世凯对内想方设法打击革命力量，稳住政局；对外则卑躬屈膝，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事实说明，欧事研究会的行动，不但没起到御侮救亡的作用，反为袁世凯所利用。

第三阶段（1915年5月—1915年12月）

事实比语言有更大的威力。孙中山的劝说没能使欧事研究会改弦更张，而袁世凯卖国的事实，却使他们豁然醒悟。无情的事实毁灭了欧事研究会联袁反日的幻想。他们看到的是，袁世凯不但不拒绝日本

的无理要求，而且“忍心迎受，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293]。失望之余，主张缓进者于是重树讨袁旗帜，急起直追。

1915年5月9日，黄兴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十七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文中指出：“当此举国听命，内讧尽熄之时，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他，条约既成，国命以绝。……今兹结果，实由吾国自始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294]电文向全国表明，欧事研究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

袁世凯并没有把欧事研究会的通电放在眼里，于同年8月在北京成立筹安会，悍然公开进行帝制。消息传至海外，恰似火上浇油。在南洋的柏文蔚、林虎愤怒地说：“袁氏帝制自为，无论我党，全中国国民均必起而反对。”[295]李根源参加了在日本神田举行的留学生侨属演说会，认为形势所迫，必须抛弃前日所坚持的观点，“主张非革命不可”[296]。身居海外的欧事研究会会员，看到袁世凯怙恶不悛，日甚一日，一致表示不能再事优容，必须立即回国，武装讨袁。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龚振鹏、但懋辛、陈泽霈、曹浩森、何子奇、方声涛等人，在槟榔屿开会，商议对策。李烈钧激昂地说：“君等皆系军人，自应速回东方。”[297]多数人赞同他的意见。经大家最后商议决定：尽快回国，分途筹划举义[298]。在日本，由李根源、程潜召集欧事研究会成员开会，详细研究了回国的具体步骤。会上有人提议：程潜和李根源是欧事研究会的干事，应首先回国了解情况，考虑下步进行办法。其余的人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陆续回国[299]。与会者都认为这样办比较稳妥，遂决定李根源和程潜先行回国。

1915年11月3日，李根源和程潜由横滨出发，乘船直赴上海。先后抵达上海的还有从美国回来的钮永建，从南洋回来的林虎、章梓、

冷遹、陈强、程子楷、耿毅、章士钊。他们又会晤了上海的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张季鸾等人。欧事研究会分散在海外的各路人马聚集上海，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和事态的发展，共同感到，欧事研究会以往的方针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们重新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一、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二、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三、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300]。

欧事研究会这个新的方针，断然抛弃了“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和“缓进”主张，保留了他们联合各派力量，共同对敌的策略，确定了武装讨袁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欧事研究会成为讨袁斗争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的讨袁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

欧事研究会重举讨袁大旗，他们的宣传活动也更加富有生机和战斗力。在欧事研究会的宣传阵地上，除了《甲寅》、《正谊》杂志以外，又新出了《新中华杂志》。为进一步扩大影响，让宣传更迅速、更直接地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作用，1915年10月5日，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新报》。该报作为全国讨袁阵营中第一家报纸，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欧事研究会前期的宣传，重在阐明民主共和的理论，以启迪民智，那么，这时的文章就恰似一篇篇战斗檄文，以犀利的笔锋，咄咄逼人的气势，揭露袁氏的种种阴谋，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1．揭露袁氏卖国与帝制的关系。

袁世凯几无保留地接受了“二十一条”，却四处宣扬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还开会庆祝所谓的外交胜利。对此，《甲寅》、《中华新报》连续发表了《时局痛言》、《国耻》、《中日交涉谈》、《纪中日交涉》等文章，披露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让世人皆知，此次外交受辱，实由袁氏一手造成。这些文章切中要害地剖析了袁氏急欲称帝的心理，指出：在袁氏看来，“国无大小，皇帝之尊荣则一，故领土固不欲弃，皇帝又所乐为，二者不可得兼，姑舍领土而取皇帝矣”[301]。这些文章深刻地揭示出袁氏为图谋称帝，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本来面目。

“二十一条”交涉时，广大民众纷纷捐赠爱国储金，诚心支援政府，抵御外侮。袁世凯却企图将这笔储金变为帝制活动的经费。《中华新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本为储金以救国，岂知竟储金以制造皇帝，并间接以此亡国，初心所期，适得其反。”[302]同时，他们还注意从理论上向国人阐明“爱国不等于爱袁氏政府”的道理，指出：“谓吾有国而不知爱，是谓大瞀；谓吾于恶政府而宜爱，是谓大愚”[303]，并提醒大家，“决不能使此倚国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304]。他们引导人们看清袁政府的本质，把蕴藏在人民中间的爱国主义激情，吸引到反帝制复辟的斗争中来。

2．反对帝制，痛斥筹安会。

欧事研究会宣传内容的核心是“反对帝制，维持共和”[305]。他们猛烈抨击袁氏政府“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306]，并向国人呼吁：“共和既立，不得复建君主。”[307]谁若妄想拨弄专制的死灰，必定为民心所不容。

筹安会成立，袁氏窃国之心大白于天下。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等人立即组织了“共和维持会”，发布“维持共和国体宣言”，最先

出来公开驳斥筹安会的谬论。宣言指出杨度鼓吹变更国体，目的是将“国家移诸一姓子孙之手”[308]。他们发誓说：“某等不忍乱亡惨祸之将至，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发鸿愿，力予维持。”[309]

随后，《甲寅》和《中华新报》也连续发表了观点鲜明、言词锐利的文章，猛烈抨击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文章指出：古德诺在既不了解中国国情，自身理论又陷于混乱的情况下，仓促抛出所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的理论，其用心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甲寅》论坛的文章中，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今日时势不可变共和为君主。须知一变共和为君主，其恶影响所及，足以覆国而痛民。”[310]《中华新报》也发表社论坚决表示：“对于共和主张到底，宁死勿退，宁辱勿改，今日于共和之下主张之，他日于君主之下亦主张之。”[311]这些文章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筹安会妄图复辟帝制的实质，还向国人表明了与筹安会势不两立，坚决反对帝制的决心，给宣传赋予更大的感召力。

3．号召民众加入反袁斗争。

与以往的宣传相比，欧事研究会宣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深入而又广泛。他们把宣传触角直接深入到各个阶层，特别是面对广大民众。他们既注意揭穿袁氏的种种阴谋，又重视由此而唤醒国民；既从大义上申明复辟帝制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危害，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分析帝制发生对他们带来的损失，激励他们去斗争。《中华新报》说：“自运动皇帝之开始，至制造皇帝之始终，统合费用，撙节图之，总额当在万万元以上。人祸天刑，外患内忧，交起并作，民穷财尽，析骸剥肤，试问款从何来？曰地丁钱粮耳，储蓄票、印花税、土膏捐耳，及傥来之救国储金耳。吸吾民之膏血，以为帝制之供张，剥吾民之资财，以发扬一姓之私业。”[312]他们还在醒目的位置，破例登载了一则小百姓的怨言：“新皇帝登基，一切铺张扬厉之费，一般百姓莫不蹙额相告，种种需费，又将在吾民头上打主意矣。”[313]宣传直接反映了民众的呼声，自然就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宣传阵地《中华新报》，不仅时常发表社论，对一些重大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还开辟专栏，报道全国各地反帝制斗争的最新消息，刊登短小精悍的时评，痛快淋漓地道出“国民心中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对于袁逆之举，无不直揭其隐”。因此，报纸一出，风行中外，“不一二月，销数达至万余份”[(314)]。有人曾评价说：“推倒满清，得力于《民立报》；摧灭洪宪，得力于《中华新报》。”[(315)]

二、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讨袁

当时，最大的几支反袁力量，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以及倾向讨袁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是各自独立活动。全国讨袁斗争形势的发展，日益迫切地需要联合一切反袁力量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洞悉到斗争进程中出现的转机，主动地担负起了联络各派力量的使命。

与其他各派相比，欧事研究会更多地具备了完成这一使命的有利条件：一、欧事研究会在指导思想上，十分重视联合各派共同讨袁。黄兴一再强调：“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316)] 二、欧事研究会的活动和宣传，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各党派中已具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三、欧事研究会有别于政党的组织形式，有利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中包容了各派人士，也为他们四方联络提供了方便条件。另外，欧事研究会和讨袁的其他三大派别——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有利条件，使它在联合各派结成讨袁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起到了其他各派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是在思想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重新携手合作的。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黄兴深感形势危急，一改缓进观点，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他让其子黄一欧马上赴日，带给孙中山

一信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317]，表示了与孙中山重新合作的愿望。孙中山也强调，应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联合一致，共同讨袁，希望黄兴早日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欧事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也日感与中华革命党重新联合，共谋三次革命的必要。他们说："当兹国势危殆，吾党仍分缓急两派，各自为谋，实于国家大大不利，宜设法早日团结一致，共谋国事，庶不致被内奸外患所乘。"[318]于是，钮永建等人一起商议，委托冯自由赴日本向孙中山表明联合对敌的想法。1915年7月，冯自由赴东京面谒孙中山，详述了希望实现各派大团结以推翻袁世凯的愿望。孙中山对他们的这一表示深为嘉许，愉快地和他们一起商讨了合作的办法。

聚集在南洋的欧事研究会成员，也希望尽早和中华革命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派章士钊、周孝怀到日本见孙中山，表示愿捐弃前嫌，共图进行。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在灵南坂寓所宴请章、周二人，冯自由、胡汉民、戴季陶、居正、廖仲恺、谢持、邓铿等人在宴会上作陪，席间欢谈甚洽。

在湖南，程潜联络中华革命党杨王鹏、廖湘芸，"以大敌当前，正义所在"，表示应联合对敌，杨、廖欣然同意。他们一起商量了在湖南的进行方法，决意从湘西宝庆边远地区着手，组织队伍作为根据，等云贵军队出兵湘西，一同奋斗，以图恢复湘南。程潜答应帮助杨、廖解决在上海的活动费用及回湘的旅费。不久，程潜便集资一千多元给杨王鹏等作活动经费[319]。

在筹款问题上，双方也开始互通声息，合作进行。黄兴在美国积极筹备讨袁经费，要华侨把捐款"随集随汇"回国，或直接寄给孙中山支配。张继、李根源欲向上海外商借款二百万元，以作西南起义之用。外商所敬仰者唯黄兴，声明非黄兴签字不可。张继电告黄兴后，黄兴立即致电孙中山商议办法。孙中山亦觉此事应加紧办理，乃电托

张孝准代表签名，随后又电促李烈钧、柏文蔚在南洋筹饷，以资接济[320]。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在各方面的合作，结束了革命党内分裂的局面，增强了讨袁的力量。

与此同时，进步党也完成了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从而使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的联合成为可能。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后，进步党既痛恨袁氏之所为，又忏悔前日之谬误。为此，1915年11月7日孙洪伊等发表了《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愤然指出："帝制发生，人心愤恨，若不即此终止，灭亡之祸，无可幸逃。"[321]第二天，他们又立即通电各省分支部，表示"当此存亡危急，一发千钧之际，吾党力障狂澜，义无旁贷，请诸公及时奋起，共谋补救"[322]。对于进步党的转变，欧事研究会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他们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赞扬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利国为民的义举。文章指出，进步党"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影响所及，必能昌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彼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一方面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援君宪以欺国人"[323]。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以相互支持的形式，迈出了合作讨袁的第一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自天津抵沪，以便和上海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取得联系，"思与提携进行"[324]。欧事研究会当即表示，对志在讨袁者都推诚结纳，不存党见。双方开始共谋讨袁良策。为解决筹款购置武器及对日外交等事，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林虎等六人联名致函梁启超，说明岑春煊须赴日活动外援，希梁协助进行[325]。梁启超本主张岑赴滇，以壮军威，但他还是接受了李根源等人的意见，帮助岑赴日活动筹款。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的合作，在护国战争高潮阶段，就更加密切了。事后，梁启超总结说："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326]这是很有道理的。

武装讨袁，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西南地方实力派拥有兵权，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势力，所以欧事研究会十分重视联合他们的力量。

曾经效忠袁世凯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因袁在洪宪封爵时，将其爵位置于龙济光之下而大为不满。欧事研究会认为，这是促陆反袁的大好时机。遂决定钮永建、林虎两人冒险潜入南宁，联络陆荣廷起兵讨袁。1915年12月，钮永建和林虎分两路入桂。钮永建由香港搭轮直到梧州转南宁，林虎从安南由海路绕道越南，经镇南关到南宁。钮永建到南宁后，即与护理陆荣廷职务的第一师长陈炳焜密谈。陈代表陆荣廷向钮表示接受“海外同志对桂今日的要求”[327]，所虑者“龙济光冥顽，非以兵力平之不可”[328]。林虎抵南宁，即致书陆、陈。陆派其亲信马济会见林虎，向林表示：所有海外同志要求广西应负的责任，绝对尽力做到[329]，只是目前因袁氏在粤拨给桂省的军费一百万元、步枪五千枝，须下个月始能领到，为缜密计，拟请钮、林两人先回港，尽管进行其他工作[330]。陆并派曾其衡、雷殷随同到港，以便于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络。随后，陆荣廷还下令“悬五万金购拿李根源、钮永建、林虎”[331]，以遮掩袁氏耳目。

黄兴在美国亦感到促陆倒袁事关大局。他于1915年12月22日致函陆荣廷，促其兴师讨贼。信中说：“今袁逆谋叛民国，公然帝制，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人民痛恨，外邦非议，内援外助，俱已断绝，此其自亡之日也。弟知足下素富爱国之热忱，且智勇冠绝一时，临兹事变，必有宏谋伟略百倍于弟之所期。……望足下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勿使时机坐失，贼势日张，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332]在陆荣廷和袁世凯矛盾加剧时，钮永建、林虎冒险入南宁与黄兴致书劝说，对坚定陆荣廷讨袁的决心，是起了作用的。

除上述几支主要的讨袁力量外，凡倾向于反袁的党派、团体与个人，欧事研究会也都尽可能与他们联合。李根源、程潜、钮永建等人到上海后，主动找唐绍仪、王宠惠、温宗尧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邀他们在杨永泰住宅共商讨袁之策。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瞿鸿禨等人“骂袁最痛切”，与欧事研究会在倒袁这一点上具有某种一致

性。李根源等人特登门相访，但在谈到联合问题时，康有为却提出："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333] 李根源策略地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余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334] 尽管在政见上相差如此悬殊，但欧事研究会仍表示愿与他们在反袁的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康有为等人对此也表赞同，他们说："君等戮力倒袁，后事再说。"[335]

为联合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伍廷芳、唐绍仪、庄蕴宽等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共同讨袁，黄兴于1915年12月21日特意致函给他们说："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先生等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中复维持国体，委曲求全。今岂能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乎？……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336]

由上可见，在反袁斗争进入高潮之时，欧事研究会奔走于各派之间，呼吁所有反袁力量通力合作，共讨国贼。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以及各种反袁政治力量，正是以欧事研究会为纽带，实现了直接或间接的联合。

三、策动武装讨袁

在国内发动武力讨袁，是欧事研究会的中心任务。他们反复商议了各省的武装策动计划，并决定相应的部署：由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任广西的联络[337]，程子楷、杨永泰也负责广西之事[338]；李烈钧担任筹划粤赣军事；程潜和张孝准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谷钟秀、欧阳振声等人任长江之事。他们相约，组织发动起来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在讨袁斗争中尽量发挥作用。

为确定发动武装讨袁的突破口，欧事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起

深入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西南五省的袁氏力量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云南起事的条件最为成熟。其原因是：一、云南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且四川地方军队既杂又乱，陈宦一时统一不起来，可以作为云南的有力屏障。二、云南两师陆军的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讲武堂的学生，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并曾受到李烈钧、李根源等教官的影响。三、云南陆军所使用的军械精良，超过南方各省的军队。四、云南当时几个主要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等，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有革命倾向的人[339]。因此，他们决定以云南作为起事反袁的基地。

李烈钧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在滇中不乏故旧，和唐继尧也颇有交情。他曾多次与柏文蔚秘商回滇策动举义之事，认为利用和唐继尧的关系，在云南活动十分有利。1915年10月，李烈钧托人送给唐继尧一幅刺绣，上面绣有“西南保障”、“国家柱石”等字样，以试探唐的态度[340]。当李烈钧得知唐继尧对赠品甚为满意，对本党主张不表反对，即与唐“密函往来相通候”[341]，商讨回滇起事。与此同时，李烈钧等人共同筹划了回滇的具体步骤。由于方声涛和云南的中级军官谊属师生，进行工作诸多方便，决定方声涛先赴昆明探明情况，进行一些联络策动工作；如进行得顺利，其他人就立即动身回国，共策进行。

10月，方声涛率学生邹以庄、周汝康二人抵昆明，密隐于骑兵教官黄毓成家[342]。他们利用和云南军人的密切关系，进行策动工作。当方声涛等了解到云南军界人士也反袁甚烈，大为高兴，立即报告李烈钧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蓁、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社、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极端反袁，久已跃跃欲试[343]。李烈钧得到消息，决定立刻动身入滇。12月初，李烈钧、陈泽霈、曹浩森、吴吉甫、周世英等至香港，向云南富滇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张木欣借到大洋十万元，作为回滇策动的活动费用[344]，然后经海防、河内进入滇境，12月17日到达昆明。

欧事研究会成员相继入滇，不仅为发动起事做了诸多组织工作，也鼓舞了滇军将士讨袁的斗志，增强了他们首举义旗的决心。

黄兴也极为关注云南讨袁事态的发展，他认为凭借蔡锷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345]。因此，他积极设法帮助蔡锷回滇，为此特意致函张孝准，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切联系，相助进行”[346]。黄兴还考虑到蔡锷在滇声望甚高，恐唐继尧对蔡入滇产生其他顾虑而影响大局，便写信向唐继尧说明“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347]，以消除唐继尧的疑虑。

此外，在上海的谷钟秀、彭允彝、何成濬等人也与唐继尧的联络员李宗黄建立了联系，共同筹商发动长江上游各省起义，以扩大讨袁力量，减轻袁军对云南的压力[348]。《中华新报》在云南起义前，“亦直接间接相与筹划一切”[349]。因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国内外消息多不灵通，《中华新报》社便成为联络各方面的据点，传递消息，“对外之交涉，对内各方面之运动接洽进行，亦多以《中华新报》负其责任”[350]。上述事实说明，云南起义的发动是和欧事研究会的努力分不开的。

综观欧事研究会讨袁活动的三个阶段，当革命转入低潮时，它虽然主张缓进，但并没有与反动势力妥协，而坚持开展反袁宣传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当时除中华革命党外另一支坚持反袁的政治力量。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欧事研究会提出了“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虽然其中含有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因素，但客观上毕竟对袁氏有利。欧事研究会的一些成员虽一度陷于迷途，但当袁世凯卖国行径暴露之后，他们便断然抛弃了错误的主张，立即展开了各种方式的讨袁活动，为全国大规模武装讨袁斗争的爆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1) 《京华新报》，1913年8月28日。

(2) 《国民党之回顾录》第5卷，萃文社1915年3月版，第20页。

(3) 陈果夫：《癸丑讨袁》，《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第349页。

(4) 《时报》，1913年10月5日。

(5) 《时报》，1913年9月2日。

(6)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部分·革命党关系》（以下简称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4号：《陈其美致赵平信》。

(7) 《乱党机关》，《新闻报》，1913年11月16日。

(8) 日本外务省档案：高秘特收第1464号，大正二年9月16日。

(9)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112号，大正二年9月9日。

(10) 《东省破坏党之死灰犹燃》，《时报》，1913年9月9日。

(11) 《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1月22日。

(12) 《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2月4日。

(13) 《乱党又在汉口组织机关》，《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0月11日。

(14) 《南漳县乱党暴动始末》，《时事新报》，1913年11月5日。

(15) 《时事新报》，1913年10月11日。

(16) 《新同盟会会章》，《时事新报》，1913年12月20日。

(17) 《新同盟会组织草案》，《申报》，1913年12月21日。

(18) 《许元度寄龚植三萌槐信》，《申报》，1913年12月25日。

(19) 《政府公报》，1914年2月5日。

(20)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第198页。

(2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97页。

(22) 《京华新报》，1913年8月19日。

(2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326号：《在本部亡命中国人名簿》，大正二年9月23日。

(24) 栗原健：《满蒙政治史之一面》，第338页。

(25)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67号，《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复倪嗣冲电》，大正二年9月22日。

(2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92页。

(2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400页。

(2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572号，《刘茂曾组探缉队有关情况》，大正二年11月4日。

(29) 《党人在东之旅况》，《时事新报》，1913年11月5日。

(30)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790号，《海妻猪勇彦的谈话》，大正二年12月21日。

(31)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415号，《孙文之行动》。

(32) 日本外务省档案：外癸字第18号，《中华民国临时代理公使马廷宽致日外务大臣函》，1913年10月21日。

(3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594号，《孙中山与精神团誓约书》，大正二年10月8日。

(34)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23号，《孙文之行动》，大正二年1月8日。

(35)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7页。

(36) 容恢：《南游琐记》。

(37) 《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284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4页。

(39)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第127页。

(4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2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3页。

(42) 邵元冲：《中华革命党史略》，《革命文献》第5辑，第98页。

(4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44) 邹鲁：《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272页。

(45) 《总理致邓泽如论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书》，《革命文献》第5辑，第20页。

(46) 《黄兴集》，第357页。

(4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48) 《黄兴集》，第357页。

(49) 《黄兴集》，第357页。

(50)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

(51) 宫崎寅藏：《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308页。

(52) 陈其美：《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233页。

(53)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3页。

(54)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4页。

(5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5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57)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0页。

(58) 《黄兴集》，第398页。

(59) 《朱执信集》上集，第214页。

(60) 《朱执信集》上集，第163页。

(61) 《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1页。

(62) 《申报》，1915年5月11日。

(63)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34卷，第5期，第66页。

(6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65) 《黄兴集》，第357页。

(66) 《黄兴集》，第357页。

(67) 天忏生：《黄克强轶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第35页。

(68) 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6、127页。

(6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页。

(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71)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29页。

(72) 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1期，第13页。

(73) 李根源：《雪生年录》。

(74) 天忏生：《黄克强轶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第35页。

(75)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9页。

(76)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

(77)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78)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0页。

(7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页。

(80) 《中华革命党党员名册》，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40页。

(8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84页。

(8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2页。

(8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页。

(8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85) 施方白：《中华革命党时期见闻录》，《革命文献》第46辑，第551页。

(8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4页。

(87)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4页。

(88) 《中华革命党党员名册》，《国父年谱》增订本上，第543页。

(89) 冯自由：《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68页。

(90) 冯自由：《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71页。

(91)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124页。

(9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82页。

(9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82页。

(94) 《发刊词》，《民国》第1卷。

(95) 《民国》第1卷。

(96) 《党史会藏史料原件及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人员名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4年，第823、824页。

(9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152号，《孙文动静》，1914年6月17日。

(9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文补报》。

(99)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文补报》。

(100) 《委任令第七十九号》，《革命文献》第45辑，第159页。

(10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0页。

(102) 《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161页。

(103)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1页。

(10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10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5页。

(106) 邵元冲：《中华革命党略史》，《革命文献》第5辑，第105页。

(107)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5页。

(108) 《革命文献》第5辑，第98页。

(10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

(11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

(11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11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52页。

(113) 《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卷3。

(11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115)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746号，《孙文动静》。

(116)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邹鲁全集》（三），第170页。

(11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415号，《孙文之行动》。

(11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415号，《孙文之行动》。

(11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8页。

(120)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页。

(121) 北京《亚细亚日报》，1915年5月6日。

(12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

(12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52页。

(124) 蒋中正：《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17页。

(125) 陈其美遗墨：《抵大连后致诸同志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17页。

(126)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289号，《在大连之革命党员及宗社党员等的动静》。

(127) 《总务部第二局来件存稿》，引自《近代中国》第22期，第42页。

(128) 《孟恩远致大总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29) 《统率办事处致各省民政长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30) 《蒋总统秘录》第4册，第102页。

(131) 《蒋总统秘录》第4册，第104页。

(132) 《夏之麒烈士事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32页。

(133) 邹永成：《湘南讨袁之役》，《革命文献》第46辑，第234页。

(134) 《张福来致曹锟电》（1914年7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4页。

(135) 《汤芗铭致参谋本部陆军部密电》（1914年7月20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0页。

(136) 《统率办事处致汤芗铭密电》（1914年7月1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79页。

(137)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138) 《伍祥祯致统率办事处密电》，（1914年7月2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2页。

(139)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4年7月2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0页。

(140)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4年7月21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4页。

(141) 《统率办事处致龙济光、陆荣廷电》（1914年7月27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9页。

(142) 《统率办事处致李纯电》（1914年7月30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3页。

(14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651号，《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

(144) 《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新华社史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7页。

(145) 冯国璋致袁世凯电（1914年8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46) 《申报》，1914年11月19日。

(147) 《朱执信经营粤事史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353页。

(148) 《朱执信集》上集，第248页。

(149) 《关外讨袁军借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50) 奉天巡按使张锡銮致总统办事处函（1914年10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51)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152) 《申报》，1914年9月2日。

(15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2页。

(154) 《洪兆麟等为请江西政府发还邓承昉余款上总理呈》，《革命文献》第48辑，第149页。

(155) 《中华革命党军事部日记》，《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79页。

(156) 《神州日报》，1915年2月4日。

(15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840号，《中国流亡者王统一谈时局》。

(15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955号，《关于中国革命党之事》。

(159)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160)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161) 《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革命文献》第46辑，第11页。

(162) 《孙中山致区慎刚等函》（1915年5月10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49页。

(163)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4)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5)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0页。

(16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168) 林森：《美洲三藩市民国维持总会征信录序》，《革命文献》第45辑，第415页。

(169) 《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简章》，《革命文献》第45辑，第425

页。

(1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171)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9页。

(172) 潘公展：《陈其美传》，《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第486页。

(17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3页。

(174) 《云南讨袁党人被捕或殉难概况》，《近代中国》第22期。

(175) 《张百麟致陈其美报告策动黔省革命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7辑，第308页。

(17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0页。

(17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0页。

(178) 罗翼群：《中华革命党活动回忆》，《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77页。

(179) 《总务部复曾集棠铁血团应经过入党手续函》，《革命文献》第45辑，第67页。

(180) 《龙济光致袁世凯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81) 《邹鲁全集》（五），第1060页。

(182) 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97页。

(183) 《神州日报》，1915年7月27日。

(184) 《东方杂志》第12卷，第8号。

(185) 《袁氏盗国记》上篇，第30页。

(186) 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37页。

(187) 谢持：《总理嘱件记录》，《国父年谱》，第543页。

(188) 《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9日。

(189) 《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274页。

(190)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民口》，第129页。

(191) 蒋中正：《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0页。

(192)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民口》，第129页。

(193) 《邹鲁全集》（五），第1054页。

(194) 《神州日报》，1915年11月15日。

(195)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

(196) 《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2，第167页。

(197) 《政府公报》，1915年11月12日。

(19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5页。

(199) 《袁世凯致冯国璋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00) 《张勋致大总统府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01)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9页。

(202) 《陈其美致邓泽如报告刺郑汝成及肇和失败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0页。

(203) 《肇和发难纪实》，《革命文献》第46辑，第161页。

(204)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8页。

(205)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2日。

(206)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9页。

(207) 《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3页。

(208)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7日。

(209) 《山东革命党讨袁史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49页。

(210)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6日。

(211) 《淞沪护军使保奖戡定肇和舰变乱出力人员电》（1916年2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12)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6日。

(213) 《冯国璋奏平定上海叛乱情形并查明防御出力人员请奖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14) 《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34页。

(215) 《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34页。

(216)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7日。

(217) 《陈其美致邓泽如报告刺郑汝成及肇和失败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1页。

(218) 《申报》，1915年12月8日。

(219)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10日。

(220) 《中华新报》，1915年12月7日。

(221)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4日。

(222) 《中华新报》，1915年12月8日。

(223) 《申报》，1915年12月7日。

(224) 孙中山：《致各总长各议员请国葬陈英士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下集，第416页。

(225)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6页。

(226)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行状》，《革命文献》第46辑，第133页。

(227)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228) 《黄兴集》，第355页。

(229) 宫崎寅藏：《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4页。

(230) 《黄兴集》，第358页。

(231)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0页。

(232) 《黄兴集》，第352页。

(233) 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13页。

(23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1页。

(235)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2页。

(236)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41页。

(237) 《黄兴集》，第358页。

(238) 杨恺龄：《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第34页。

(239) 《陈炯明历史》。

(240)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4页。

(241)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242)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6页。

(243)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57页。

(244)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页。

(245)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7页。

(246)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5页。

(247) 《黄兴集》第388、389页。

(248)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4页。

(249) 《黄兴集》，第390页。

(250) 《黄兴集》，第389页。

(251)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2)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3)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4)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5)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56)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57)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58)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59)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60)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1)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2)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3)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护国军纪事》第5期。

(264)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288页。

(265) 《黄兴集》，第380页。

(266) 《黄兴集》，第367页。

(267) 《黄兴集》，第378页。

(268) 《黄兴集》，第363页。

(269) 秋桐：《开明专制》，《甲寅》第1卷第2号。

(270) 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271) 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272) 《时报》，1915年9月17日。

(273)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3页。

(274)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3页。

(275)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1页。

(276)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277)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278)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7页。

(279) 《华侨与中国革命》，第235页。

(280) 《革命文献》第45辑，第640页。

(281) 《林虎、熊克武等联名通电》，《正谊》第1卷，第7号。

(282) 《黄兴集》，第397页。

(283)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5页。

(284) 旧金山《少年中国报》，1915年5月2日；杨恺龄编：《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第46页。

(285) 《申报》，1915年7月4日。

(286)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1页。

(287) 《申报》，1915年4月7日。

(288)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82页。

(289) 《神州日报》，1915年3月4日。

(290) 《神州日报》，1915年2月18日。

(291) 《大公报》，1915年3月14日。

(292) 《大公报》，1915年2月9日。

(293)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94) 《与陈炯明等十七人联名通电》，《中国最近耻辱记》，第295页。

(295) 《时报》，1915年9月1日。

(296) 《申报》，1915年10月19日。

(297) 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

(298)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607

页。

(299)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4页。

(300)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01) 《交换条件》，《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9日。

(302) 《呜呼！救国储金》，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31日。

(303) 《爱国储金》，《甲寅》第1卷第8号。

(304) 《爱国储金》，《甲寅》第1卷第8号。

(305)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06) 《复辟平议》，《甲寅》第1卷第5号。

(307) 《帝政驳义》，《甲寅》第1卷第9号。

(308) 《维持共和国体宣言》，《顺天时报》，1915年8月26日。

(309) 《维持共和国体宣言》，《顺天时报》，1915年8月26日。

(310) 《中国国体论》，《甲寅》第1卷第9号。

(311) 《筹安会之所示教于国人者》，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8日。

(312) 《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精神》，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3日。

(313) 《帝制声中之南京面面观》，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9日。

(314) 《上海中华新报与护国军》，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15) 曾毅：《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页。

(316)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5页。

(317) 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18)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83页。

(319)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0页。

(320) 《黄兴》，《革命人物志》第5辑，第456页。

(321) 《进步党反对帝制的通电》，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7日。

(322) 《孙洪伊等反对帝制致各省分支部电》，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8日。

(323) 《对进步党通电感言》，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9日。

(324) 《护国军纪事》后编。

(325) 《梁任公先生年谱》下，第469页。

(326) 《松坡军中遗墨》，1926年8月，松坡学会重印版，第1页。

(327)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28)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50页。

(329)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30)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31) 李印泉：《护国军始末谈》，京华印书局1917年版，第8页。

(332)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1—303页。

(333) 《雪生年录》。

(334) 《雪生年录》。

(335) 《雪生年录》。

(336) 《黄兴集》，第414、415页。

(337)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38) 《雪生年录》。

(339)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3页。

(340)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2页。

(341)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42) 《李烈钧自传》。

(343)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44) 熊达成：《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未刊稿。

(345) 《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46) 《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47) 《陈嘉全日记》，1937年1月13日条。

(348)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第31页。

(349)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50)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一节　云南首义

一　梁、蔡拥袁立场的转变

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加紧，梁启超及其门生蔡锷等原进步党人的拥袁立场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如前所述，梁启超本是拥袁派。至于原云南都督蔡锷，他领导过云南的辛亥“重九”起义，且在南北议和期间，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不久，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的态度也为之一变，与他的老师梁启超完全一致了。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六七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保障西南”[(1)]。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予袁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次年三四月，“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情，为袁多所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10月，蔡锷奉调入京，临行前，他当众宣布：衡量中国现在形势，非袁“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2)]。到京后，他接受袁的任命，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

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

总之，直至筹安会发生前，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蔡锷，都没有公开揭出反袁的旗子。

但是，梁、蔡拥袁也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首先，他们拥袁，最终还是为了改良政治。而改良政治，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和“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官僚派和革命派）才有可能。但是，这两大敌人“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而胜之”，实在是“力所不能逮”。于是，他们不得不急其所急，“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3)]。这便是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拥袁的基本原因。

大体说来，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前，梁、蔡“先注全力以与抗”的第一敌，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二次革命”被镇压后，由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身之地，他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转向先前的第二敌——“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了。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滇前的一次演说中，曾明确说过：“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诸君尚其注意。”[(4)]这表明梁、蔡与官僚派头子袁世凯的矛盾和冲突，有其不可避免的根源。

其次，梁、蔡并未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诚然，他们对民国成立后的政治多所不满，但却从未对共和国体提出异议。不仅蔡锷如此，即如民国成立前曾倡议过“虚君共和”的梁启超，也当众宣布过“拥护共和国体”为其“理论上必然之结果”[(5)]。1914年11月，他甚至在参政院与蔡锷等人一起，联名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要求对淆乱国体的清室复辟派，“照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期消弭祸患于无形”[(6)]。他们始终坚信立宪制度是近百年来“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7)]，为世界各国“早晚必须采用之制度”[(8)]。因此，他们

虽然同意袁世凯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但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不要国会。1914年1月8日，蔡锷在政治会议茶话会上就特别强调：处置国会一事，只能按当时各都督原电所云，“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围”[9]，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此取消国会。梁启超1915年7月20日发表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也明确指出：“民国初元之政，诚尤不足以餍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由，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10] 梁后来回忆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11]。他所谓的“上政治轨道”，就是依照他的主张实行立宪政治。

再次，梁、蔡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其拥袁的前提。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所以翼赞袁世凯，原因之一就是惧“邦本屡摇”，想借他的势力以“奠定国基，振兴中华”。至于蔡锷，直到1915年5月9日中日“二十一条”签字后，仍向人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蔡自称）：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12]

以上事实表明，梁启超、蔡锷虽然也拥袁实行开明专制，但同时却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品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

梁、蔡对袁世凯的疑虑始于1914年下半年。正如前面所述，这年5月，袁世凯非但没有重开国会之意，而且公开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种种复古举动，实在使他们“越看

越不对了”[13]。于是，一种“时事日非”、“国事不可论”的感觉渐渐在他们心头萌生、郁结、滋长起来。开始还只是二三朋辈间的窃窃私语，不久便公开见之于参政院了。他们不仅就外交、财政和军政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14]。

蔡锷这时与梁启超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1915年1月16日，袁世凯特任蔡锷为经界局督办，命令发布前，蔡曾以“对于此事素少研究”为词，向袁力辞[15]。命令发布之日，他正在天津。次日，他急忙赶回北京，再次具呈表示“不愿身预其事”[16]。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辞呈均为袁世凯所拒绝。蔡锷无奈，只好勉强于22日就任，以便将计就计，从清理经界入手，解决征兵退伍后的移垦屯殖问题，为将来军事上改行征兵制度，增强国防力量准备条件。所以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使所有筹办事宜“均粗具规模”[17]。接着，又于局中设立编译所，“督率各员搜集中外专籍，悉心探讨，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暨《各国经界纪要》各一册”[18]。蔡锷就任后，为贯彻己意，态度固然积极，但对袁的种种不满，也屡有流露。当有人问他：“各省设立经界行局，何时始有眉目？”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此办去，恐民国十年亦无何等效果。”又说：“当初李仲仙（李经羲）等再三不肯担任，我就知道此事不容易办。现在非但不容易办，而且办了也不讨好。任公先生办币制局毫无结果，将来恐怕我师生同一命运。”[19]至6月初，他又一次向袁具呈，请求解职。

不过，这时梁、蔡都没有想即起反抗。甚至到1915年1月，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透露变更国体后，梁还认为“改号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仍按原定计划，“二月半南下，在沪小作勾留，便归粤为老亲介寿”[20]。他们对袁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失望而非绝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只“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裁制之，惩治之”。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在某天早上，接受他们的忠告，悬

崖勒马。用蔡锷的话说，就是“竭忠尽智，希冀感格”[21]。这年6月底，梁启超匆匆离粤，随江苏将军冯国璋入京，还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回忆道：“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正值冯华甫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22] 如前述，当梁氏听到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诡称：他绝无帝制自为之意，甚至说他，“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23]。梁便相信了他的鬼话，“以为他真没有野心”，而回天津继续过其书斋生活了[24]。

然而不久，袁世凯就自揭假面。8月14日，由他一手操纵的筹安会，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梁启超、蔡锷数月来力图“匡救”和“阻止”的帝制，终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发生了。这使他们受到一次莫大的嘲弄。多年来，针对革命派人士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揭露，他们一直为袁向国人保证：“今日大势，子孙万世之业，决无人敢作此幻想。”[25] 现在袁世凯却无视他们的体面，公开打出帝制旗号，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难堪的呢，他们在革命派面前又输了一着。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无论为公为私，都不容许他们继续缄默了。于是，梁启超、蔡锷从此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

二　京津策划军事讨袁

筹安会发表宣言后不久，蔡锷匆匆赶到天津，在汤觉顿寓所与梁启超等共同商定：为争四万万人的人格起见，非拼着生命与袁世凯干一场不可。具体步骤是：1．由梁启超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切实掌握舆论主动权，并力争通过推心置腹的规劝，促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四起，生灵涂炭；2．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得以立即发动军事讨袁；3．由于军事讨袁尚需一定准备时间，而梁、蔡师生间的特殊关系又为众所周知，为使蔡锷不致因梁启超发表反袁文章而遭袁世凯忌

恨，他们约定在一定时期内，表面上要装成“分家的样子”[26]。

此后，梁、蔡二人便各依计而行。8月21日，梁启超用一夜的功夫，写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交汤觉顿带京登报。梁在这次行动中表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果敢精神和坚决态度。属稿之时，虽说也“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27]，但主导思想还是如他对女儿梁思顺所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28] 至于这篇文章发表前所经受的各方面的压力就更多了。先是筹安会打电报给他，直言“勿将此文公布”[29]；继而袁世凯又亲派内使夏寿田赴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30]；但都被他严词拒绝。9月1日，他干脆呈明袁世凯：“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31]。袁见后更加恼怒，复遣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没想到这时的梁启超还是不怕死，他笑笑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32] 不少好心的朋友恐他招祸，特派代表二人“赶至天津，劝其少安”。但他的回答是：除原文语气可略改婉转外，其他一概不改。他对来人说：“诸君虽爱我，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33] 随后，他遵循友人劝告，删去了“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那一段痛斥帝制的文字，其余各段“亦改就和平”[34]。为避免他人受累，又特地声明脱离进步党，以示纯为个人行动。经此周密布置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终于发表出来，表现出进步党人反帝制运动的鲜明态度。

与此同时，蔡锷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8月25日，不等梁文发表，他便约集袁世凯心腹原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新任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其他在京高级军官蒋尊簋、孙武、蒋作宾、陆锦、覃师范、张士钰、张一爵、姚鸿法、蒋方震、陈仪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不但亲书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

八月二十五日”题款一行，并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35]。随后，又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与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等八人呈请袁世凯“乾衷独断，迅予施行”[36]。9月16日，他还与田中玉、蒋尊簋、张士钰、唐在礼、蒋雁行、陆锦、蒋作宾、袁乃宽、张凤翙、马龙标、傅良佐、雷震春、孙武、丁槐、蒋廷梓、张钫、刘基炎等军界要人在东厂胡同将校联欢社，设筵款待由各省应筹安会请来的赴会代表八十余人，“要约始终抱定君主立宪主义”[37]。不仅如此，他对所任各职，也较前更为主动和积极了。他按时出席参政院会议，充任帝制请愿案审查员，赞同由立法院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在将军府，他继段祺瑞之后为“暂代主席”，主持讨论划分军区案及统一军械各项事宜。对于入值统率办事处，他奉命唯谨，从不渎职。他的这些表现，与梁启超长期蛰居天津，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甚至请求辞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指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此外，他还在生活上“姑从事妇人醇酒”，示人以“乐不思蜀”的样子。曾经传诵一时的真假掺杂的他与京中名妓筱凤仙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时期。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带些权术作用”的斗争策略，签名赞成帝制尤其是这样。正如蔡锷后来答复统率办事处责难时所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38]他支持经界局秘书长周钟岳拒入筹安会，便证明了这一点。8月30日，唐继尧、任可澄在蔡锷的督促下，致电筹安会，称：“已派杨晋、赵鹤龄、周钟岳、杨本礼等四人充滇省军政商界代表就近赴会。”[39]但周不欲“觍颜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请蔡准其“先行辞职”。他当即表示：“吾事尚须相烦料理，此时未便遽离，如不肯入会，吾可电莫公，谓此间已派惺甫（周钟岳字）赴东三省调查经界事宜，请另派代表，并将此情通知筹安会可也。”[40]果然，9月1日蔡即致电唐、任，谎称周“已派赴东省调查经界事宜，刻难回京，筹安会代表请另派替员”[41]。可见，蔡锷反对帝制的态度，在“自己人”中是毫不隐瞒的。

实际上，即在他赞成帝制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军事讨袁战争，已在有计划有步骤的酝酿着。8月20日，蔡锷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一面告以“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一面表示拟派人“前赴滇、黔，切商一是”[42]。不久，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瓛 便奉命出发了。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促其早日入京。一星期后，戴即登程离筑，并于10月中旬抵京。这就是梁启超所说：“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人叫来。”他们预订的计划，正在具体实施。随后，由于帝制“迫速”，蔡锷不等殷到达云南，便不顾袁探检查邮电的危险，径直“用经界局关防发一密电往滇”，鼓动“人民反对帝制”[43]。

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袁世凯正在密切注视着京外各省，特别是云、贵对帝制的反映，而他与云、贵的关系又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他又频频指使云、贵随波逐流，尽可能向袁表示忠顺。8月26日，他复电贵州刘显世：“筹安会发起后，京外多主张赞同，军界重要诸人亦皆预闻其事”，“该会即有电相嘱，仍以推举代表为宜”。28日，他同时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刘显世：“筹安会各省代表均将派齐，尊处希早日指派为要。”9月6日，又电刘显世：“至电呈一节，各省已大半照办，尊处似亦不妨以同。”18日，再电刘：“国体事现仍进行，各省军、巡来电，主张均归一致，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44]刘显世颇有感慨地说：国体问题，承“松公随时赐电，俾不致茫茫无主，感激何似”[45]。

当然，蔡锷的策略也是灵活的，只要有机可乘，就绝不放弃宣传反对帝制。例如，9月6日，袁世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至参政院发表国体意见后，袁的意图已尽人皆知。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46]。其实，蔡锷对此也是明白的。当参政院指定他为帝制请愿案审查员时，他就和其他审查员一样，表示“各请愿书可以成立”[47]。但是，他在会后分别打给云贵的电报中却说：“主峰今日（派员）到参政院宣示意见，有维持共和，为其职

责，更改国体认为与时事不合等语。”[48] 这表明他是在利用袁世凯的语言，合法地暗示云贵不可不反对帝制。

为使讨袁战争更有把握，蔡锷还在京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络准备。如：9月29日，他在己宅与黑龙江将军朱庆澜“畅谈半日，叩其对于帝制问题，沉吟者久之”，“知其已有会心”[49]。差不多同时，又与前四川都督胡景伊“熟筹川事，密约南旋”[50]。他还了解到山东靳云鹏于筹安会发生时“颇形反对”，沿江各省如江苏、江西皆持异议。此外，筹安会初起，他便嘱经界局评议员袁家普“与上海民党暗通消息，得其真相报告之”[51]。9月底，又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潜赴西南发难的计划”[52]，等等。

然而，袁世凯也没有睡大觉。他既早就认为蔡锷有阴谋，所以把他调来北京，现在冒险实行帝制，自然不能对他没有防备。果然，不久他便接到报告，据云南人说，京中有重要人物致密电该省，唆使人民反对帝制。经向电报局详细调查，此人用的是经界局关防[53]。接着，路孝忱又报告说滇省反对帝制，蔡锷等人也“通信与谋”[54]。为了拿到真凭实据，10月14日，他令军警进一步搜查棉花胡同蔡宅。这天上午10时，“有着军服者五人贸贸然来，声称系军政执法处卫队，奉处长谕：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蔡宅家丁方欲拦阻，已排闼而入，翻箱倒笼，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后阍者约集多人壮胆向前语之曰：‘此系昭威将军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凭据？何得无故动蛮？速言其故！’”军警见搜查无所得，这才顺水推舟，“云系奉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赃物。既现在为蔡宅，我等另向旁处搜查可也。遂相率驰去”[55]。

至此，梁启超、蔡锷深感北京已不可久留，军事讨袁应从速作为主要方针提上议事日程。蔡宅被搜后三天，梁启超便退了北京正阳门内前细瓦厂的租屋，一切器具悉运天津。蔡锷也随即“称病，云非有温泉地方，不能适养身体”，为出京制造借口。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

却认袁克定常住的“汤山合宜，令其养病”[56]。其时，适贵州戴戡、王伯群到达北京。经过密议，都认为“欲活民国，非出京不可”[57]。随后，他们密约至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等，就起义事作进一步研究。“初议以梁任公往日本办报鼓吹，蔡、陈、戴、蹇与伯群或往云南，或往两广运动起义。讨论多时，佥谓办报东京，袁不许入口，无益于事，不如分头运动”。“蔡自担任云南，戴与伯群担任贵州”[58]。他们计划滇、黔两省同时起义，具体步骤是先发一警告电，要求取消帝制；袁不应，再发最后通牒；又不应，即通电全国，宣告独立。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们并决定：“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59] 最后，还深入讨论了不发军用票，通过扩大富滇银行解决财政问题，以及梁启超在外策应，暂不赴滇、黔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直奔云南，梁启超留在天津准备各种起义文告，蔡锷回京做好出走准备。

三　云南反帝制斗争的酝酿

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当局曾经一度追随袁世凯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首任都督蔡锷是这样，继任都督唐继尧也不例外。唐本是蔡锷的部下。蔡任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领时，他是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重九”起义后，经蔡一手提拔、保荐，他一路顺风，由北伐军总司令而贵州都督，而云南都督。1913年11月，蔡虽然调离云南到了北京，为确保唐在云南的地位，仍不断为他向袁世凯说项。唐因此大受感动，他致电蔡说：“奉梗、有两电，公为滇计，划一事权，实佩远谟”[60]，并且“萧规曹随”[61]，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早年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这时却操着袁世凯的腔调，咒骂企图重返云南组织反袁起义的李烈钧、李根源等为“乱党”，一面通令本省文武“严密防范”，一面电请袁世凯商请法国驻京公使“迅电越南总督转饬海防、河内法官，于火车船站严密查拿”[62]，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到云南的革命党人。

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区。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正如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向袁政府所报告的："滇中军学界人士众多，十九为国民党籍，反正以来，嚣张已极，近虽潜伏，遗孽实多。故报馆论调，几全属于激烈一派。"[63] 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和将军龙济光也说：滇军"将士自辛亥以来习于骄抗，即无国体问题发生，亦必乘机谋变"[64]。因此，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首任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就以"创办纱厂，以塞漏卮"为名，于1915年春回到昆明。他在翠湖边赁住小楼一幢，表面"日以莳花种竹，饮酒赋诗为事"，暗中却与军学绅界，特别是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筹反袁方略，并议定由他和邓泰中、杨蓁联络上中级军官，由日本回滇的老同盟会员杜韩甫、马骧和滇军营长田钟谷、李文汉等联络中下级军官和士卒。经他们多方活动，"滇中军界全体已隐有共同一致之轨道矣"[65]，从而为日后云南的反帝制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月，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了云南。首先揭起反对旗帜的是昆明的言论界。当时，昆明的《滇声报》、《共和滇报》、《觉报》和《崇实报》等四种报纸，几乎没有不公开反对帝制的，其中尤以《觉报》为最激烈。《觉报》创刊于1915年7月30日，由徐纂武、唐质仙、杨光庭、张子琴分任总编辑、副编辑、总经理、总发行，主要编辑有罗小池、龚荫轩、徐虚舟等人。他们宣布：《觉报》所持言论、所持宗旨，"以造福国家、有益社会为目的，其他强权暴力，一概置而不计"[66]。这是它敢于进行反帝制宣传的根本原因。

《觉报》的反帝制宣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它对筹安会进行了公开的揭露与批驳。9月28日，《觉

报》发表了反对筹安会的第一篇社论《对于筹安会之商榷》，紧接着又连续发表《驳筹安会》、《驳君宪救国论》、《辟筹安会所谓势力说之谬》等一系列社论，揭露筹安会头目杨度等人“阳借筹安之名，阴行劝进之术”[67]，并不点名地把攻击矛头指向袁世凯，说：“信誓旦旦不许帝制复活之×××，对此紊乱国宪之妖人，不惟不予以刑法制裁，甚至闻以大宗款项补助筹安会经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68]它斥责筹安会鼓吹“共和不洽国俗民情”是一派胡言，认为“吾国人备受君主专制之流毒，其厌专制而喜共和也久矣”。“现在五族之中，除宗社党仍思复辟，库伦[69]一隅妄冀独立外，夫谓共和制与国俗民情不洽者，吾始未之或闻”[70]。文章并指出：我国衰弱到现在这地步，“实出数千年专制流毒之所赐，绝非共和之所致”[71]，并以世界历史为证，说明只有由专制变为立宪，由君主立宪变为民主共和的先例，“从未有立宪而专制，由共和而君主也”。而且“旷观全球，横览五洲，几无一非共和国也。即有一二君主国，将且不能存在，归诸淘汰矣”。因此，筹安会此举“究非世界大势趋向之所宜”，将来“难免天演之公例”[72]。对于筹安会的前途，它作了令人信服的预言：“以此孤独之势力而欲以之宰治天下，抵抗国民，岂能始终必其足以制人而不为人所制耶？恐狼狈周章、众叛亲离之变即随之于其后也。”[73]

其次，《觉报》还积极与国内其他反帝制派别或个人互为声援，“或传播其言论，或表彰其事迹”。例如，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它不惜篇幅，于10月1日全文转载。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致电袁世凯，斥其“妄行帝制”。它为此发表题为《此之谓大丈夫》的时评，称赞孙“正直不阿，清高自爱”，“真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74]，等等。对于帝制派，特别是云南人士的劝进活动，它却报以无情的嘲讽和抨击。10月间，原云南民政长、滇军第二师师长李鸿祥在京以云南代表名义屡上劝进书，《觉报》立即发表《可笑哉李鸿祥》的专题短评，斥其无权代表云南[75]。不久，各省奉命举办所谓国体投票、征求民意的

把戏，它又发表时评指出："各省之投票解决国体问题也，除赞成二字外，不闻有若何之音响"[76]，并抨击云南议员对此国家安危大计，采取不负责的态度，"以有用之金钱，作无益之报效"[77]。

最后，号召人民"举大名"，推翻帝制，是《觉报》反帝制宣传的又一重要内容。《觉报》认为"姑今无论渠等发起之筹安会为学理的研究，抑非学理的研究，要之，欲破坏共和制，即为共和之蟊贼，民国之公敌，不问汉满蒙回藏人，咸当急起而攻，伸罪致讨，维护此共和之雏，以尽国民之天职"[78]。它激励人民为保卫共和奋起战斗，号召人民"振衣千仞，倒挽狂澜。或著书立说，触破奸邪；或鼓吹嘘唏，唤醒国民"[79]。它更鼓吹"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彼王莽、杨雄今安在耶？惟忠臣义士斯不朽耳"[80]！

与言论界公开倡言反对帝制的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

自筹安会发生，滇军各中下级军官愤慨异常，酝酿武装讨袁。起初，他们"三五组集"，各自为谋，互不通问。李曰垓与赵又新、黄毓成"同为一组"；罗佩金、顾品珍、邓泰中、杨蓁、董鸿勋、吕志伊等又"各有组集"[81]；而李文汉、田钟谷、金汉鼎等则"每星期日到景虹街杜韩甫家讨论"[82]。后经彼此"相聚倾吐"，知道宗旨大同，目的一致，逐渐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行动。

当时，他们以唐继尧身居将军要职，由他出面领导反帝制斗争，不仅可收省内一致之效，而且在省外也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争取唐继尧列为首要任务。他们推举1912年曾随唐赴黔任过旅长、时正在家闲居的黄毓成和唐最信赖的两位团长邓泰中、杨蓁为进言代表，屡促他早下决心，速定讨袁大计。但由于唐一不了解蔡锷等人的"意向"，二不熟悉各省各方"真相"[83]，加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84]，且财力也很匮乏，因此，他虽然私下表示过不愿"臣袁"[85]，然而真要他公开宣布，却也不免顾

虑重重。9月，他在征求对筹安会意见的军政会上，告诫首先表示反对意见的杨蓁："宜量力，无易言。"[86] 10月，又在中下级军官会上提出"一、须有数百万外款接济；二、须得三两省同意"等等条件，方可宣布独立，始终未能"斩截决定"[87]。

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中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又传来蔡锷被抄家的消息。在这些刺激下，他们愤怒地议决："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88] 当然，他们的立足点仍在促唐反袁。他们认为：以大局而言，仍以促唐早下决心为上策，"因发之自上，秩序井然；如发之自下，秩序难免紊乱，反为不利"[89]。为使唐继尧早日宣布讨袁，他们采取了通过董鸿勋"佯言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90]的策略。董到处扬言："如唐不反袁，我们就倒唐。"[91] 至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察暗访，发现如再不宣布宗旨，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于是，他不得不向驻省连长以上军官表示：对国家大事，等时机成熟，他"自有决定。一旦国家有事，使用军队，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个波浪"，并命令他们"好好练兵，好好掌握部队"[92]。话说得虽然含蓄，但"安定军心"的意思，却是人人都理解得到的。从此，中下级军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11月25日贵州刘显世函告北京陈国祥、戴戡说："滇事至唐开武（唐继尧被袁世凯授为开武将军）宣示宗旨后，军界已大定。"[93]

随着唐继尧的转变，军界的反帝制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下级军官的活动已不再限于"进言于莫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而是公开地抵制帝制和具体地进行反帝制准备了。当任可澄派人向省议会商借会场，以选举所谓国民代表，投票取决国体时，董鸿勋决然通知省议会："不许借与。"[94] 当袁世凯派宣讲官至滇军各部队宣传袁是"真命天子，有百神庇护"等谬说，并散发袁的所谓训令、训条，以灌输拥袁思想时，杨蓁断然拒绝到他步七团"演说"[95]

。在反帝制的具体准备方面，他们一面嘱吕志伊“出外联络”，一面密请唐继尧“为各种之筹备，如退职军官之起用，铁路存款之保留，兵工厂、制革厂等之加工赶造”[96]，等等。为厚集军费，杨蓁还与任可澄针锋相对，坚持暂时缩减教育经费[97]。

与此同时，唐继尧也化被动为主动，转而积极与中下级军官合作。他虽屡向袁世凯奏报云南国民代表大会的召集、选举是在他与任可澄的“亲临监视”下进行的[98]，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巡署内务科主事李子辉后来回忆说：这是任可澄在唐继尧“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由“巡署单独办理”的[99]。其实，唐继尧这时所最关心的已不是怎样为袁制造民意，拥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而是如何顺从民意反对帝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问题。因此，他接受中下级军官的建议，于11月下旬颁布了第一号饬令，要求历年来曾在各军队充任中下级官长，或因过撤销差使，或因故自请长假，而现愿报效的赋闲人员，迅即照表填注履历，限十日内详报到署，听候定期查验；如果才质可取，过差可原，即“分别酌予任用，俾得及时自效。其有赋闲日久，学术荒疏者，应令补习学术，亦着听候传取入校，授以相当教育，以备异时补充之选”[100]。接着又先后采取：1．召集退伍士兵；2．编练警卫二团；3．招添讲武学员；4．添练新兵；5．征补各团营缺额；6．筹备军需军械等多项措施，以扩充和加强军队。为了解省外形势和取得外援，他还与中下级军官议定：“一、密与贵州军界约，二、招纳海内外同志，三、派员赴各省联络，四、派员侦察各省军情。”[101]

此后，吕志伊、李宗黄、刘云峰等在唐继尧的支持下，纷纷离滇前往港、沪等地，从事反袁联络活动。方声涛、张煦、李烈钧、熊克武、但懋辛等大批欧事研究会成员，被陆续迎到昆明。同时，“得力可靠军队”奉唐继尧之命开始“集中省城”，其中两营并在“协捕匪徒，助铲烟苗”的旗号下向川边进发[102]，至12月中旬，云南已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即使政治盲人也能感到地火的奔突和大地的微微颤抖

了。14日，任可澄致电袁世凯，建议他“立下取消帝制之命”，或“申明延期，俟数年后斟酌国势，再议实行”，使“乱党无可藉口，外人无从置词”[103]，就是这一政治形势的反映。

四　蔡锷抵滇与云南宣布独立

正当云南军事讨袁一触即发之际，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胜利到达昆明，给云南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蔡锷自10月下旬在天津与梁启超等人具体议定军事讨袁计划后，一直在京寻机南下。他自知恶网四布，一举一动都有密探监视。要脱离虎口，不但需要勇敢，更需要机智和谋略。其时，他恰巧喉病初起，于是便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于28日试探性地呈请袁世凯给假五天。袁不知是计，据呈照准了。11月3日，假期届满，蔡锷一面“遵即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一面又以“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为由，再上一呈，要求续假，“赴津就医”。袁仍不疑，欣然批道：“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治矣。”[104] 蔡于是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105]，顺利地实现了南下计划的第一步。帝制谋士杨度听说蔡锷已引病出京，连忙提醒袁世凯说：“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106] 袁急饬“派人察视”。但侦探回报说：蔡锷在津，“时赴病院，时或不往”[107]，有时还“溷迹于娼寮中”[108]。这才使袁世凯一块石头落了地。其实，这正是蔡锷为逃离虎口而精心设计的“误侦者耳目”的骗局。待监视稍懈时，他却“旋移德义楼，由该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109]，转乘日轮山东丸破浪而去。这一天是11月18日[110]。袁世凯虽然目睹这一切，却始终“不知其意何居”[111]。

蔡锷安全逃出京、津后，不由得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在山东丸上致书友人说：“脱离故国，心绪少定，现食能下咽，夜能获睡矣。”[112] 然而，要到云南，海天万里，潜在危险依然存在，为防不测，袁

世凯的护身符仍不可不备。19日，蔡锷按事先约定先斩后奏之计，电告北京经界局周钟岳他已上船离津，可速拟续假三月赴日就医之文代呈袁世凯。22日，周代蔡呈袁续假三月，并请派员代理经界局督办和参政院参政职务。袁当即批令给假两月，并于24日特任龚心湛、张元奇分别代蔡锷兼署督办经界局事务和署理参政院参政。周见事顺利，随又代上一呈，径直呈明："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早痊。"袁见木已成舟，虽不情愿，也只好假惺惺地批道："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113)

12月初，蔡锷安抵日本东京。他事先曾派殷承瓛赴日与欧事研究会成员石陶钧、张孝准等联络，请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但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据当时报载："留东人士闻之，一如飞将军从天而下，争往探问。即日本官场中及新闻界亦多有来访者。"(114) 蔡锷深知，东京虽比北京安全，仍不可不谨慎从事。因此，当有人问其抵日后意欲何为时，他只答以"吾辞呈内本曰迁地调理，此行当往热海避寒"(115)。"有叩以时局上之意见者，则但答以多病之人，不欲多谈耳"(116)。"同学之往见者，皆不肯见。住所亦无一定，往来飘忽，不可捉摸"(117)。直到离日前夕，他才致袁一电，"切词披布腹心"(118)，首次对帝制提出异议。随后，即在石陶钧、张孝准等人的周密布置下，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直奔云南。

袁世凯接到蔡锷东京来电，大吃一惊。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如何，唯一的希望是唐继尧能践其拥护帝制的诺言，拒之于外，或击之于途。19日，他致电唐说："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应严密查访。"(119) 并于越南海防、河内、老街一带广布密探，以求截杀。然而，他哪里知道，这时的唐继尧已非两年前甚至两月前可比。就在他下令严防蔡锷入滇"煽乱"时，蔡锷一行即在唐继尧所派委员唐继虞、

邓泰中的严密保护下，有效地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知事张一鹗的行刺阴谋，安全到了昆明。唐却于次日复电给袁说："皓两电均悉。昨据探报：蔡锷、戴戡到港，似有赴滇之意。当以两君行踪倏忽，莫测其情，经即飞电劝阻，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未据报告。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宗旨，如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否亦令其速即离滇赴京，勿稍逗留。"并信誓旦旦地表示："继尧宗旨夙定，布置周密，但得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致有变故发生。"[120] 这对奸诈过人的袁世凯，真是莫大的捉弄。

蔡锷二次入滇，受到云南人民的极大欢迎。正如他自己所说："锷经越入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乃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平静。"[121] 云南人民的信赖，增强了蔡锷反袁的信心和力量。抵滇当日，他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致电上海梁启超、贵州刘显世、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四川将军陈宦的参谋雷飙等，或报告情况，或请示方略，或授以机宜；一面据京津所议，与唐继尧具体安排了先出兵后宣布，出其不意打击袁世凯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滇军一旅将于23日向四川进发，待其抢占川南各战略要地后，滇、黔同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这中间，大概需要二十天时间。

但是，刚于12月18日秘密到达上海的梁启超突接有关情报说：袁世凯将以补贺日皇加冕为名，派周自齐为贺礼赠勋特使，赴日洽谈条件，以换取日本承认帝制。紧接着，江苏将军冯国璋又派人至沪传言，说他"盼滇速起"，且将"立应"[122]。在这外交紧急、内助得人的情况下，梁启超感到有必要打破京津成议，提前发难；何况蔡锷、戴戡现已抵达云南，"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123]。于是，他一面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运动日本政府拒绝周自齐赴日[124]；一面于20日托南京友人代发一电至唐继尧代转蔡锷："外交紧急，袁将卖国，

请即发动。”[125] 唐、蔡以为梁“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126]，加上袁世凯又严电唐继尧查缉蔡锷，一时“风声大起，迟恐生变”[127]，遂决定改变计划，及早发动。

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有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承、殷承瓛、由云龙、籍忠寅、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当众宣读了梁启超的来电，指出：“宣布举义日期，不可再缓。”[128] 接着，蔡锷介绍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经过和各方面反对帝制的情况。他说：“大家都是抱心非的态度，都怀疑这个皇帝是否做得成。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我们必先出其不意，从速发动。”[129] 与会者一致赞成，并共同议决举义步骤如下：1．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2．届时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之。随后，蔡锷命戴戡宣读梁启超早在天津就起草好的讨袁通电，征求同意。多数人认为，由于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因此原稿中“幸大总统始终持稳重冷静之态度，未尝有所表示，及今转圜，易如反掌”以下一段文字已不切时宜，须略加删改，方可为用。但戴戡坚持任公文章，他人不得更改一字，要改也要电请任公自己改。后经李烈钧调和折中，方同意由隶籍进步党的任可澄代笔。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次护国起义中的确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接着，又讨论了军队命名和出兵方略等具体问题。对军队命名，蔡锷欲袭明永乐靖难之例，命为“讨贼军”或“讨逆军”，而吕志伊、李根源方面人士却提议“护国军”或“共和军”。李烈钧以元、二年有“共和党”之故，为避免误会，反对用“共和军”。李曰垓则从反对帝制和救国救民双重意义出发，主张采用“护国军”。讨论结果，一致采纳了李曰垓的意见。对于首脑机关，戴戡根据天津成议，提议设立元帅府，但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认为如此即近于竞争权利，殊失大公。蔡锷也坚持应“力事谦抑，以待来者”，主张暂时“从

缓”。最后议决仍采民国元二年旧制，“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130]。至都督人选，因唐、蔡推让不止，只好公决唐留守，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官；蔡出征，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并推李烈钧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总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

次日晚10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王伯群、殷承瓛与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在将军署举行宣誓典礼，一致表示：“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逾。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逾此盟，神明必殛。”[131] 23日夜11时，唐、任署名的首通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电报操着进步党人的老腔调首先指出：“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言。’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要求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十二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词，限25日10时以前答复[132]。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人并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24日，蔡锷、戴戡二人再电袁世凯，促其“迅予照准”唐、任“所陈各节”[133]。

当然，唐、蔡等人十分清楚，袁世凯早已利令智昏，仅凭一纸通电，是休想让他取消帝制的。因此，电报发出后，他们并没有坐待袁的答复，而是加紧作武力解决的准备。24日，唐继尧继21日之后，再

次任命了一大批下级军官，并放饷发械，积极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及25日期满，未见袁世凯的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并宣布他们“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134)]。

次日下午1时，唐、任召集省会所有各机关科长、各学校校长以上人员于第一师部大礼堂庄严宣告：为反抗袁世凯称帝，云南已宣布独立，希各照常办事。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135)]，历数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后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等等丑行。31日，唐、蔡、任、刘、戴与张子贞、刘祖武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1．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2．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3．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4．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同日，唐、任并照会英、德、法、俄、日等国驻华公使、领事，发表类似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所发的五点声明：1．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任；2．本将军、巡按使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3．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契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4．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5．如各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为妨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为时，即反对之[(136)]。蔡锷等人向全世界宣布：护国战争爆发了。

第二节　护国军分路出征和黔桂响应

一　第一军北攻四川和贵州独立

云南宣布独立后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除总司令官蔡锷外，还有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议处长殷承瓛、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等。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梯团，每梯团两个支队，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一、二、三梯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此外尚有耿金锡炮兵一大队、贾紫绶警卫一大队和宪兵一中队、骑兵一连。第一军虽是云南护国军的主力，但其总兵力也不过三个旅，约计九千人，武器装备仅一、二支队较为精良，配有德造管退炮四门、机枪四挺，其他支队多为旧式九子枪，甚至还有没有枪的士兵。

蔡锷的战略目标，首先在夺取四川。如前所说，这是他与梁启超等人早在京津密谋时就确定了的。当时，他们不仅密与云南联系，且与黔、桂暗通声息，深知两省必可于云南发难后继起响应；而四川雄踞长江上游，进可沿江东下，直取武汉，或北出秦、晋，直捣幽燕，退可以“天府”的富力，扼险自固，与袁世凯长期抗衡。这是他们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目标的主要根据。这一战略选择，得到唐继尧、罗佩金和多数滇军将领的赞同和支持，他们“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137]，就是证明。然而，对具体的进军路线却存在分歧。罗佩金等人原拟“总大军，取道会理，袭成都”[138]，而蔡锷则认为欲图四川，最重要的是占领其门户重庆，截断长江援路；否则即使侥幸取得成都，袁世凯也仍可利用长江水道源源派兵入川，成都便没有保障。因此，他主张：由他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二、三两梯团为主军，出永宁，取泸州，然后东下重庆；左翼由刘云峰率第一梯团出昭通，取叙州（今宜宾市），占领川南富庶之区，相机进迫成都；右翼由戴戡回贵州联络护军使刘显世驱逐巡按使龙建章，率黔军出綦江，会攻重庆。比较而言，蔡锷的主张是正确的。

总司令部成立后，所辖各部队依集中之迟速，分路向四川进发。左翼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于27日首先出发。次年1月2日，右

翼戴戡随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长徐进，离滇向贵阳前进。接着，刚从临安（今建水县）调省的中路先锋董鸿勋支队也于10日离省。但是，由于军队分驻各地，相距遥远，事前又无充分准备，加上交通不便，动员集中，极为濡滞，以致朱德支队延至1月28日才得以离开昆明。从上年底刘云峰率部出发起，出师先后延续近一月，这样迟缓的动作，加上过早宣布独立，给以后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鼓舞士气“而促进行”，蔡锷在兵力“不厚”的情况下，提前于1月16日向四川泸州进发。出发之际，他发表《告滇中父老书》，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139]，并率全体官兵宣誓，誓词为：“谁捍牧圉？曰维行者。与子同仇，不渝不舍。严尔纪律，服我方略。伐罪吊民，义闻赫濯。汝惟用命，功懋懋赏。违亦汝罚，钦哉弗谖。”[140] 这篇庄严的誓词对护国讨袁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为避免辛亥年“滇川交恶”历史悲剧的重演和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还特地发布《谕四川同胞文》等一系列告示，一面说明云南出兵讨袁是为了“永护中华民国”，护国军所以起于云南而先到四川，不过是为“补助四川同胞赶速举义”，并将“处处申明纪律，不许有丝毫扰害民间，若有不守规则之人骚扰民间，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必定从严惩治，决不宽贷”，希望四川人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相揣测，致有误会，转多妨碍”[141]；一面宣布：1．“本军所至，所有应用夫役，应专雇觅闲人，并照给资力，勿使人民感其苦累”[142]；2．“各属人民如有能侦获逆军实情及擒获逆军间谍，或截获逆军军械、辎重，送交各该部队、县署者……自应权衡轻重，酌予优奖”[143]。对各属原有地方官吏则要求：1．本军到后仍应一律照常供职，若有擅离职守及卷款潜逃情事，通缉拿获，均照军法从事；2．暂行直接受命于护国军总司令部，不得私通伪廷，违者重办；3．各属钱粮、税课、厘金及一切杂项收入应行报解者，统由各该经收人查照向章，按月解缴永宁道署，不得拖欠挪移，违者究办着赔；4．维持地方安宁秩序，如有土匪盗贼抢劫滋事，扰乱治安，或持械拒捕者，准予便宜行事，但办后仍应据实详报查核；5．皆应奉民国正

朔，一切公文程式均仍用中华民国字样，不得稍有歧异，违者以叛逆论。此外，他还规定不准虐杀战俘，对“不甘从逆，自愿归诚，查无反复情事及间谍行为者，尤应优加待遇，俾得自效”[144]。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争取川省人民的支持，瓦解敌军，推动护国战争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蔡锷出发之日，左翼刘云峰两支队已进抵驻川北军川南镇守使伍祥祯旅设防的新场附近。1月17日晨，首战告捷，逼敌退守燕子坡。接着，刘命邓泰中作正面佯攻，自己与杨蓁率部“绕道许堰，突击敌军后路”[145]，出其不意地击败了燕子坡守敌，然后又乘胜追击，连下黄泡耳、凤来场、棒印村。18日晨，刘部向横江挺进，下午2时，在黄果铺与敌展开激战。守敌以混成一团和巡防数营的优势兵力，依仗山高路险，企图俯击制胜。刘云峰仍采迂回包抄战术，以邓支队突入峡谷，猛攻敌之左翼，命杨支队绕出右翼，由山后冲上山顶，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当晚11时占领横江。19日，刘部乘胜向安边前进。安边地处金沙江北岸，背后是巍巍群峰，守敌高踞峰巅，以机枪、大炮严密封锁江面。刘云峰见正面进攻不易取胜，乃命邓支队以少数兵力留在南岸牵制敌军，自率主力从上游罗东地方渡江，直插安边后方。下午3时半，刘督队蜂拥登山，直扑守敌之背，击毙敌军营长戴鸿智一员，杀伤敌兵，缴获军械无数，次日晨终于攻占了安边这个通往叙州的要津。自此之后，伍旅将无斗志，兵无战意，竟弃柏树溪、三关楼、叙州城而走。汉军（巡防军）统领张占鸿败归叙城，见伍祥祯已去，也率残兵三十余人一走了之。21日夜10时，在叙城绅商各界代表的欢迎下，刘云峰率部进驻叙州，取得护国战争的头一个重大胜利。

叙州失守后，四川将军陈宦十分恐慌。他急忙悬赏五十万元，命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两个营由泸州出发攻叙东，败将伍祥祯率残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北，朱登五统汉军由犍为、屏山攻叙西，又由泸州别派两营经高、珙两县绕攻叙南，企图乘护国军立脚未稳之机一举夺回

叙州。于是，紧接叙州克复，一场激烈的保卫战又开始了。26日，刘云峰命邓泰中支队开赴叙北宗场迎击伍旅，27日战于斗牛岩，30日再战于宗场，将敌全数击溃。接着，杨蓁支队也开赴叙东白沙场作战，31日与冯旅相遇，大战三昼夜，击杀、溺毙、捕获敌军无数，冯玉祥率残部遁去。南路敌军见北、东两路连遭惨败，不战而退。唯西路朱登五仍率众自柏树溪前进，遭刘云峰所派游击队痛击后，又绕出叙西牛喜场与陈宦所派亲军二营及新增北军倪文翰一混成团继续向叙州推进。2月7日，刘云峰一面以少数兵力在正面相持，一面由宗场分兵包抄其后，经五小时前后夹击，朱等兵败不支，亡命奔逃三十余里。至此，陈宦四路围攻叙州的计划遂告破产。

在左翼刘梯团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中路前锋董鸿勋支队也顶风冒雪，以每天八九十里的速度向泸州疾进。1月26日，董部抵达贵州毕节，遇川军师长刘存厚所派军事特派员，告以刘将“在彼内应”，“请滇军速进”，并共同约定：滇军一入蜀境，两军则伪装对垒，刘军“诈败而退”，滇军“步步尾追，迨抵泸州，则两军一合，直捣州城”[146]。29日，董支队进至川边赤水河，30日在雪山关与刘军相会，依据前约，两军“佯作战争”，自雪山关至纳溪，不费一枪一弹，逐“敌”四百余里。在此过程中，尽管刘存厚、蔡锷采取了种种掩人耳目的措施，今日由刘电奏统率办事处，报告正与滇军“激战”[147]，明日由蔡锷通电各方，鼓吹战胜刘部的“血战”[148]之功，但由于刘存厚先前所发约请滇军速行入川的电讯为敌人所截获，泸州已严加戒备。刘存厚不得不于2月2日在纳溪提前宣布起义。刘、董合军巧取泸州的计划化为泡影。

2月4日，董支队到达纳溪，当晚即与刘存厚部署强攻泸州南大门蓝田坝事宜，并决定由刘部川军陈礼门团攻正面，董部绕牛背石向南寿山前进，攻其侧背。5日晨，陈、董两军分头出发。下午2时，董支队占领南寿山附近的烟墩山，陈团也进抵预定位置。6日黎明，两军同时向蓝田坝发起进攻，守敌稍事抵抗，便纷纷渡江逃命，仅用半个

多小时就占领了蓝田坝和月亮岩。7日，董鸿勋将两地交陈礼门镇守，自率所部由泰安场渡江，占领大龙山、罗汉场一带，从东面完成了对泸州的包围。

至于右翼戴戡所部，直到贵州宣布独立后才正式组成，因此其进军速度自然也远不及左翼刘梯团和中路董支队敏捷。

如前所说，依梁启超、蔡锷等人原来的设想，贵州应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事实上，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云南宣布独立前夕，态度也是明朗而积极的[149]。他曾毅然复电云南，表示“赞成独立”，使蔡锷禁不住“距跃三百”[150]。然而相比之下，贵州独立的困难却比云南大得多。从外部条件来说，贵州东接湖南，北邻四川，一旦宣布独立，即面临汤芗铭、陈宦的两面夹攻。就内部而言，一方面黔军只有步兵六团、旧式炮兵一营、未经改编的巡防军四、五营，总兵力不及云南三分之二，而且军械陈旧，又不及云南有自己的兵工厂可资补给和更新；另一方面耆老会刘春霖等又公开鼓吹反对独立，“倡言保全地方，不能因附和云南独立而首先受祸”[151]；特别是巡按使龙建章仰承袁世凯旨意，“多方扩张势力，各县知事，胥其羽党”，并借梁士诒交通系势力，完全控制着“黔省之交通机关”[152]，以致云南致电刘显世也只能由兴义转电贵阳。加上“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袁政府又“虚声恫喝”[153]，终于使贵州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

但是，贵州人民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早在筹安会发生之初，贵州达德学校教员凌云、黄鲁连、聂正邦等十七人就旗帜鲜明地致电筹安会说：“君主之说，适足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望速解散。”[154]云南独立后，又有爱国志士不受耆老会的鼓惑，上书刘显世说：“将军、巡按可欺，广大人民不可欺”，“滇中首义，海内同声，七百万黔民喁望弥殷，请讨尤急”，要求他步滇后尘，“以爱国之热忱，问其滔天之罪恶，相率牂牁子弟，还我河山”[155]。至1916年1月17日，更发展到贵阳绅、商、农、工各界数千人在省议会举行联合

大会，一致议决“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皆非先由本省亟谋自主不可”，并公推刘显世为“贵州军都督，与各省联合一致，乘方新之民气，振必胜之军威，驱彼北军，御之境外”[156]。会后，各界举代表数百人齐赴护军使署，恳刘“承认”[157]。

在贵州人民反对帝制的活动中，黔军中下级军官堪称为急先锋。黔军六团本由唐继尧督黔时的基干改编而成，军官大多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与滇军关系密切。“及闻云南举义，群情踊跃，咸有磨砺以须之势”[158]。其中尤以刘显世外甥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主张最力”[159]。最高军事当局刘显世，这时虽不能与中下级军官相提并论，但也多少还有一点军人的爱国心。当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密函参政院参政陈国祥说：“此次交涉，若第损失利权，不至箝束国权，国体勉可图存，尚可承认。若必满其所欲，则战而亡与不战而亡等耳，岂甘心束手待毙，坐听宰割！”并表示：“弟十余年前即忧吾国之将沦，抱定必死之意。今忝列军人，若至国交决裂，将以求吾死所矣。”[160]后来刘虽遵命以军民长官和国民代表两种名义通电赞成过袁世凯称帝，但他解释说，这是为了“塞外人之口”[161]。这些事实说明他在袁世凯不惜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支持，和七百万黔民“咸思奋袂”的条件下，与人民一道采取反对帝制的态度，不是偶然的。

因此，贵州虽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但早“已有义不返顾之决心矣”[162]，一切部署和准备都在着着进行。首先，为争取准备时间，刘显世先后于1915年底及次年初多次通电全国，声明“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衔名者，均系由滇冒列”[163]，并摆出“双方调处，委曲求全”的姿态，鼓吹“滇军北军均不入黔之说”[164]，以暂时稳定袁世凯及其在贵州的代理人龙建章。其次，为防止北军进攻，他借口“滇变”，宣布全省戒严，派兵进驻龙建章一手控制的邮电机关，并严密封锁湘、蜀边境。湖南将军汤芗铭密告袁政府说：云南独立不久，贵阳便派出大批军队进驻黔东铜仁、镇远、天柱等地，“邮局、

电局均派有兵”[165]，“通湘各路隘口，黔军均驻扎两边，中间仅留一小隙”[166]。四川南川县知县王承梁也报告：“黔省于交界地方有加重兵力之事”，“探问称系防备北军。凡有由川入黔之人，盘诘尤严，军警团练无论人数多寡，均不许过境”[167]。但是，与此相反，对于经黔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他却大开方便之门，任其通过。唐继尧电告蔡锷说：“毕节及界连川边一带黔军概行撤往他处。所有军粮等项早经聂知事陆续预备，我军可以畅行。”[168]其三，为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刘显世宣布禁止现银出省，并一面向云南请兵，一面大力扩充黔军。据南川县知县王承梁调查，黔省“桐梓境内正在大招军队”，其“县属挨连黔边一带乡民，均有前往应募者，各处土匪投效更多”[169]。

至1916年1月中旬，刘显世的“附滇”之心，已是路人皆知的了。龙建章见势不妙，于14日借出巡之名，潜离贵州。17日，刘接受贵阳绅、商、农、学、工各界的讨袁请求，表示“愿与父老昆季共生死，虽成败利钝不可预卜，但有一弹一刀，决不使其存在”[170]。19日，戴戡及徐进所率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经易资孔、两河头到达郎岱，贵阳鼎沸。刘显世以时机成熟，催他们兼程赴筑。24日，戴戡率二十骑先行驰抵贵阳。26日，绅、商、农、学、工各界千人在原省议会举行欢迎大会，主席吴协安致词说：戴戡回黔“不仅为黔人治安欢迎，且为中华民国之国家欢迎”。接着，戴戡发表长篇演说，揭露“袁世凯之在今日，岂惟帝制问题足以亡国，即以之充共和国行政首长，亦觉国无不亡”。“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他哉”[171]。他表示这次回黔，一不占各机关重要位置，二叫作何事便作何事，叫在何处死便在何处死，唯诸同志及共和国家之命是听。到会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即1月27日，刘显世发布一号布告，宣布贵州响应云南独立，“同心巩固共和”，并升任王文华为东路司令，率吴传声、彭文治等团攻湘；任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统熊其勋梯团两支队及原徐进所辖炮队、机枪队北取川黔门户綦江。刘自居都督，统辖全省军民两政。

2月4日，戴戡率炮队、机枪队离筑北进，省内各机关自刘显世以下各长官、职员以及绅、商、农、学、工各界各团体，一齐出郊欢送，道旁环列至十数里。13日，经遵义抵松坎。次日拂晓，即命熊其勋及总司令部副官李雁宾亲往前线督率三路大军，向綦江境内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右路攻青羊寺，中路攻九盘子，左路攻东溪。战线宽约四十里，纵长约八九十里。经半天激战，下午2时，中路首传捷报，有炮二门、机枪二挺以及坚固防守工事的天险九盘子宣告攻克，并歼敌三十余，俘虏六十多人枪。紧接着，右路也攻占青羊寺，缴获机枪二挺，其由新州向南川方面进攻之部相继占领沙溪、大锅场、马桑等地。至晚9时，中路再奏凯歌，夺取赶水。15日，左路在中路友军的支援下攻克东溪。之后，三路大军乘胜前进，连占分水岭、柑子垭、马口垭等地。至18日，前锋直抵桥河场、鸡公嘴，距此仅一二十里的綦江，“大有朝不保暮之势”[(172)]。

二　北军南下和川南、湘西之战

袁世凯历来是迷信武力的，对这次云南护国起义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从他获悉云南要求取消帝制的第一天起，就已下定了“荡平”云南的决心，并即向驻守湖南岳州（今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下达了备战密令。12月29日，曹致电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处，自称曾奉“讨贼”之令，就是证明[(173)]。无奈云南道路险远，交通不便，兵难遽达，加上战争舆论尚未造成，尽管袁很不情愿，也只好采取“晓以情理，动以利害”的分化政策，以便拉拢唐继尧等人，妄图坐收不战而胜之功；同时鼓动各省军民长官，大造“讨伐”舆论，为其武力进攻制造“民意”。

12月25日，袁世凯以政事堂名义致电唐继尧、任可澄说：“本政事堂实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示，以便核转。”[(174)]无中生有地硬把唐、任从云南反帝制领导集团中分割出去。26日，他虽强词夺理地通

电逐条反驳唐、任首次讨袁通电，但最后又说："纵有政见不同，尽可从容讨论。"为了加强"动以利害"的效果，并在结尾之处亲笔添了如下一段话："尤可异者，立限答复，率部待命，慢上藐法，服从全无。倘滇之军民相率效尤，官将何以驭下？变恐生于肘腋，明哲当不出此。"(175)

当然，袁世凯深知策反唐、任，谈何容易，因此，更要紧的是加紧准备武力"讨伐"。27日，他致电云南以外各省军民长官说："唐继尧等曾迭电劝进，今忽反复，请取消帝制。诸长官有何意见，望速据实陈述，用备采纳。"(176) 其用意一在试探他们的忠诚，二在挑起战争。

果然，自28日起，各省军民长官请袁速行"天讨"的电文，纷纷而来。奉天将军段芝贵奏称："现在国体已定，奚能为一二叛徒所动摇"，"芝贵等不敏，愿率所部将士驰赴云南，殄此凶顽。"(177) 安徽将军倪嗣冲也表示"愿整备三军，听候驱策"(178)。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则"请宣布该逆等罪状，俾与国人共弃，一面迅速进兵，以彰天讨"(179)；等等。接着，岳州曹锟又报告说："锟奉令讨贼，誓将出师，前队已拔，大军继发，天心既顺，荡平可期。"(180)

在这"民意"大顺，战备告成以后，29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唐、任、蔡"构中外恶感"、"违背国民公意"、"诬蔑元首"等三大罪状，令"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应着褫职夺官，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拿来京，一并听候查办"(181)。同日，又采汉高祖以金钱爵禄收买陈豨部将的策略，下令加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加第二师师长刘祖武少卿衔，代理云南巡按使。但是，仅仅两天之后，张、刘二人便与唐继尧、蔡锷等人联名发表讨袁檄文，宣告了这一策略的破产。随后，袁世凯一面于31日正式发布训令，"特派虎威将军曹锟为行军总司令，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官，督

率第六师及第五旅由湖南经贵州向云南进发；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官，督率第七师及第六旅由四川向云南进发。该总司令由四川前进，务激厉将士，联合进行，早奏肤功”[182]；一面命“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183]，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由他亲自主持的征滇临时军务处。稍后，又令保定李长泰第八师和南昌第六师齐燮元第十一旅入川增援张敬尧作战，奉天范国璋第二十师第二混成旅、河南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加入第一路作战。

1916年1月17日，第一路前锋进至黔边，第二路前锋行抵重庆。19日，曹锟遵命乘舰驶离岳州，西上入川督战。2月6日，所部吴佩孚旅王承斌团首先到达泸州。四天之后，张敬尧率十四旅一团也相继赶到。至此，第二路抵渝、泸兵力已超过一师以上。当时，泸州、纳溪一带形势，正如重庆镇守使周骏向袁世凯所报告的那样：“刘逆（指刘存厚）现据江（安）、纳（溪），截断攻叙军冯（玉祥）旅后路。此时若不派兵荡平江、纳，北岸冯旅危险实甚。现泸城西则敌已据方山，本军与冯旅联系既失，而距城东二十里之大安桥（疑指泰安场）敌又占领，泸（州）、合（江）之交通已断。城南即为刘逆主力，并裹胁滇、黔逆军及土匪，约计不下二万人。北则隆（昌）匪复窜入嘉明镇附近。距泸二三十里内均系敌兵，四面受敌，危状莫名。”[184]因此，解救泸州之围便成了曹锟、张敬尧的燃眉之急。

2月9日下午2时，守泸旅长熊祥生以所部二营和驻川北军李炳之旅一营，在炮火掩护下，由泸南沙湾渡江，占领南岸营盘山。10日拂晓，即向刘存厚部据守的蓝田坝阵地发起攻击，并于午后6时占领了蓝田坝、月亮岩。护国军团长陈礼门退至纳溪斑竹林忧愤自戕，刘存厚退往江安。反攻泸东南董鸿勋支队的任务由新到曹军吴佩孚旅和李炳之旅一部担任。10日晨，吴及其所部团长王承斌分别由罗汉场、特凌场向中兴场进攻，李旅则直趋泰安场。由于兵力过于悬殊，且川军刘湘一团又有由合江绕向纳溪后方，截断护国军退路的企图，董鸿勋在大龙、高楼、高果等山顽强抗敌两天之后，遂于11日夜悄然渡江南

撤。12日，熊、李两部占领泰安场等长江南岸各要地，泸围立解。

接着，曹锟又命张敬尧率所部三团会合熊祥生一旅直扑纳溪。但张敬尧在双河场被刚刚赶到的何海清支队打得大败。眼看护国军叙州增援部队又源源开到，北军不得不暂停攻势，转而与护国军相持于纳溪四围的深沟高垒之中。

为了打破北军的围攻，蔡锷于19日指挥全军分三路进行反击：一路由禄国藩率一营“由黄土坡向蓝田坝进攻”；一路由何海清率两营由永宁河“右岸向双河场进攻”；一路由朱德率两营附炮兵一连、机枪队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同时命刘存厚以一部“担任纳溪城内外及其附近市街之警戒及掩护”，一部北渡长江，“对龙透关急作佯攻”[185]。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各路皆取得一定胜利，有时且“颇占优势”[186]。如朱德等部曾迫使菱角塘之敌“退据原阵地之后”[187]；何海清支队“毙敌十四名，捕虏二名，夺获枪枝、子弹甚多”[188]；义勇军张煦支队甚至于22日黎明占领了张敬尧设在牛背石的司令部[189]。但总的说来，敌人仍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敌第七师又源源开到泸州，投入战斗。加上护国军自身伤亡颇众，曹之骅、雷淦光等营排长相继阵亡，后方弹药补充也难以为继，蔡锷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自23日起暂取防御，整顿队伍，待转攻势。

28日，经过五天休整和部署，蔡锷再次发动反攻，并带病亲往前线督战。这次反攻，主攻部队由何海清支队担任，其任务是“从侧面攻击逆军阵地据点之石色沟、七块田等处”；朱德、王秉钧支队和刘存厚部均属“助攻部队”，从正面掩护何支队前进[190]；刚从叙州赶来增援的金汉鼎支队为总预备队。蔡锷对这次反攻抱有很大希望，虽因“地形艰险，守易攻难”，头两天的战果并不理想，因而“其正面尚依然未动”[191]，但他仍决心“继续猛攻”，以图击溃敌军，“转危为安”[192]。

然而就在这时，敌探侦悉叙州护国军“所留与袁军抵抗者，惟少

数之部队与新招之士兵数百而已。所有劲旅，悉开赴泸城”[193]。为了夺回叙州，并配合泸州张敬尧作战，陈宦乘机命冯玉祥督率所部约五千人和伍祥祯所部赵锡龄一团，向叙州发动猛烈进攻。29日，冯旅声势汹汹，迫近叙州。当时驻守叙州的护国军仅田钟谷一营二三百人。他们兵力虽单，却毫无惧色。3月1日，田营英勇顽强地在催锅、光斗两山和吊黄楼一带，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抵抗，虽死伤过半，弹药告罄，仍“有用石而将敌击退者”[194]。但是，力量对比毕竟过于悬殊，次日拂晓，所剩七十余人不得不撤离阵地，退往安边。3日，冯玉祥侵占叙州。

叙州失守，给战斗在纳溪前线的护国军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心理影响。从董鸿勋2月5日围攻泸州起，他们已在这里战斗近三十个日日夜夜了。由于旷日持久，弹乏饷竭，士气本已不高，现叙州又失，“其颓丧之情，自然益甚于前”。不仅一般将士如此，即如罗佩金、刘存厚等高级将领，也认为“非暂退不足以全师”[195]。蔡锷虽曾“一意主积极”，“退却之命，缮定不发者屡日，既发复予迁延一日”，但在各方“煎迫”之下，也“不得不以退为进矣”[196]。3月6日夜，他终于最后决定于次日凌晨分左、中、右三路退出纳溪，南撤至大洲驿、上马场一线，“另择阵地扼守，一以伺敌以制胜，一以迁延时日，用待时变”[197]，并深为罗、刘“熬不过最后之五分钟”而“扼腕”。7日上午10时，张敬尧进据纳溪。8日，刘湘进驻刘存厚放弃的江安，次日再占南溪。蔡锷的反攻又一次落了空。

纳溪本是护国军主动放弃的一座空城，其撤离时，张敬尧也“未发一追兵”[198]。可是事后，他却煞有介事地与副司令熊祥生联名电告袁世凯等人说：“今日拂晓……逆势不支，遂向永宁、仁怀方面败退。我军尾随痛追，将逆之坚固堡垒暨最高之无底山、螺丝山全行夺据，稍留防兵，余仍事追击，十时多完全克复纳溪。”[199]

几乎与中路护国军退守大洲驿的同时，分兵略取綦江的右翼戴戡部也因兵力单薄，防守不足，竭力缩小范围，于3月1日退守东溪、赶

水一线，不久又遵蔡锷之命退往黔边松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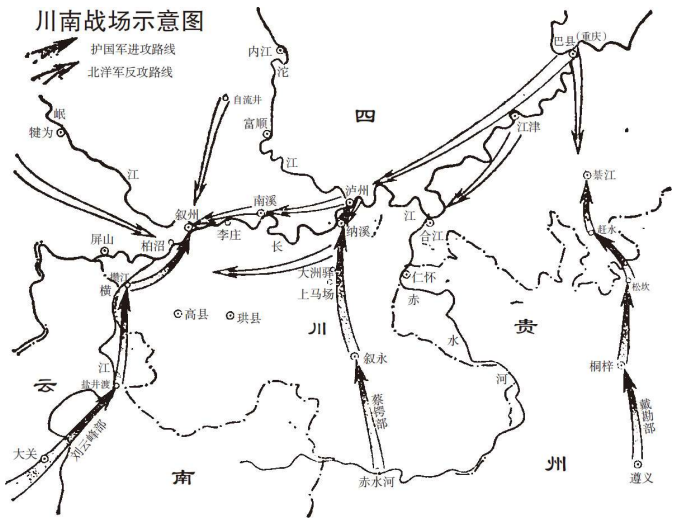
在此形势下，袁世凯得意洋洋地于9日发布申令说："蔡锷蓄谋作乱，借端称兵，竟敢攻略国土，扰害闾阎，希图割据，破坏统一，实属异常谬妄。现叙州先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200] 并晋授张敬尧勋三位，升授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13日，又以"刘湘奋力督战，连复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为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201]。

然而，袁世凯高兴得太早了。他的申令墨迹未干，泸州前线就又传来了护国军反攻的隆隆炮声。

蔡锷兵退大洲驿后，除留金汉鼎、王秉钧支队在三层铺、白节滩一线轮番警戒外，其余"皆集合后方从事休养"[202]，并重新调整了部队建制。经过十天的休整和训练，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7日，蔡锷乘势对泸州发动第三次攻击。其中路为顾品珍梯团，任务是占领茶塘子高地，以威胁鹞子岩。左路为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由何支队进驻和丰场一带，警戒顾品珍左侧；刘部进驻牛滚场一带，威胁江安之敌。右路是这次反攻的主力，由白节滩向牛背石、纳溪及蓝田坝前进，以扫清长江南岸为目的，参战部队为赵又新梯团的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队的张煦、廖月疆支队，其中朱德支队又担负着右路的主攻任务。15日蔡锷特召朱德到大洲驿总司令部面授机宜[203]。

自17至23日，三路护国大军"连日激战，大获胜利"。中路顾品珍梯团20日夜袭成功后，"逐次穷追"，先后攻占金盘山、龙头铺、大湾坡、茶塘子、鹞子岩等地，击落敌人侦察飞机两架，"杀伤逆敌共约五百余人，夺获山炮三门、机关枪四挺、子弹百余箱、饷银粮秣等数船，又虏获总兵站长陈庆周一员"，正面之敌"已无反攻之勇气"[204]。左路何支队和刘存厚部分别收复了江安和南溪。右路金支队从红花地出发，连克沙山、大小山坪、牛背石，前锋直趋双河场；朱支队更是长驱百里，所向披靡，相继夺取五里山、十二湾、鱼登坪、女儿

井、背猪坳、白石塔、观音榜等地，像尖刀一样直插张敬尧的大本营泸州。其先头部队甚至到达距离泸州仅仅十余里地的南寿山附近。张敬尧损兵折将，恐慌万状，一面收缩战线，放弃安富街、纳溪等城镇，于双河场、棉花坡、南寿山一带专务“固守”；一面飞电各方，请“火速分兵援泸”[205]。护国军终于化险为夷，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由湖南经贵州进攻云南的马继增第一路军，也在湘西被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军王文华部打败，主将身亡，全军上下不可收拾。早在1月17日，第一路军前锋汪学谦旅即已沿沅水西上，抵达湘西芷江（沅州府治所在地）。因贵州刘显世以重兵封锁黔东各要隘，无法继续西进，马继增不得不暂设大本营于沅陵，屯兵黔边。不久，贵州响应云南独立，王文华出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分兵三路，进攻湖南。于是，北起永顺，南至武冈的湘西大地即刻成了埋葬“洪宪”王朝的第二战场。

1月30日，中路王文华率第一团，一马当先，突入湖南晃州属大鱼塘。2月3日晨，激战三小时，占领晃州，毙敌“三十余人，生擒十一人，夺获枪枝、子弹甚多”[206]。4日下午，又击破晃州败敌及其

二营增援部队的恃险顽抗，攻克蜈蚣关。晃州从此成了王文华东路军司令部所在地。右路吴传声第三团，由天柱相机进取圢口寨、黔阳、会同、洪江等地。2月2日，吴率所部到达黔湘边境瓮洞，3日，进入湖南，“在泸平、矿山等处与逆军接战，击毙逆军兵士十四名，生擒数名，击伤逆军连长一名、兵士十余名”[207]。5日攻克黔阳，俘获敌军二百五十余名，步枪二百余枝，银洋二万余元，其他军用器材、粮秣、辎重无数。经此胜利，士气更旺，吴乘势于6日占领洪江。王文华见洪江克复，芷江后路已断，且守敌为增援麻阳分拨三营而去，内部十分空虚，即于13日命一团二营长胡瑛率部直攻齐天界，并调吴传声团由右翼截出，两面夹攻芷江。吴身先士卒，不幸阵亡。14日午前，在王文华亲率袁祖铭第一营及王天培部的增援下，将芷江“完全占领，逆军纷纷逃溃”[208]。

左路卢焘第二团由铜仁向麻阳进攻。2月2日，其前锋由漾头司渡河进驻半坡田，直逼湘西重要门户文昌阁。3日，卢一面致函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所部文昌阁守军，请“假道进兵，限三日答复”[209]，一面派兵进驻牛角坪等地，对文昌阁造成四面包围之势。田为保存实力，主动撤防。卢部遂于5日进逼麻属咽喉要隘小坡，威胁麻阳。芷江汪学谦闻报，大惊失色，一边急电马继增、周文炳火速派队“救应麻阳”，一边请湖南将军汤芗铭飞电田应诏“无分畛域，加兵速救”[210]。当日，马继增所部殷本浩营赶到麻阳，分兵把守童湘溪。10日，卢焘于童湘溪相持数日后，改采声东击西之法，以一部与童湘溪之敌周旋，大部分路投入麻阳攻城战。13日，王文华发动芷江战役，麻阳之敌分兵回援，卢乘机向麻阳发动总攻击。经三天激战，敌营长赵景忠身负重伤，士卒死伤数百，其余纷纷向凤凰、江口、高村败退。17日晨，恶战兼旬的麻阳战役，以护国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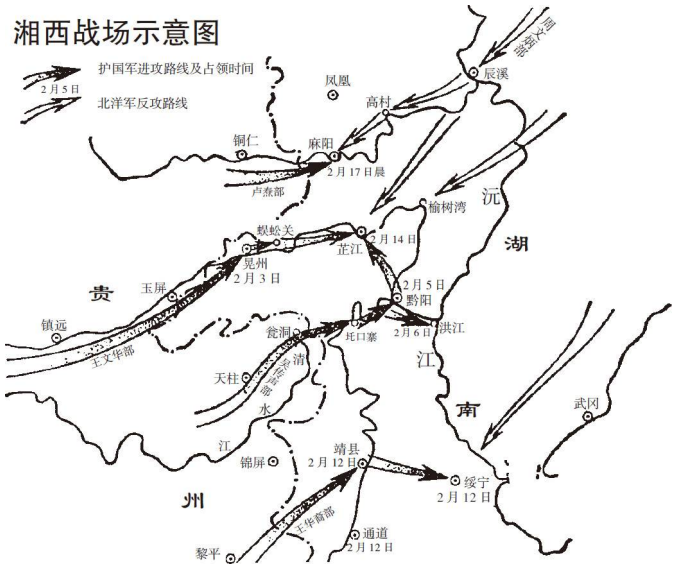
此外，2月12日，游击队统带王华裔联络湘军进攻靖县，也获大胜。“逆军两营抗战一夜，天明时仓皇奔逃。我军追击，连占通道、绥宁诸城”[211]，残敌退入武冈一带。

马继增见所部连连败北，晃州、黔阳、洪江、会同、麻阳、芷江等县相继落入护国军之手，难向袁世凯交差，遂于2月29日服毒自杀，所遗司令一职，由周文炳代理。袁世凯为掩饰败绩，稳定军心，却发表策令说“该中将……忧愤成疾，军中暴卒”[212]，并追赠他为上将，从优议恤，颁发治丧银一万元。

为了挽回败局，周文炳亲率大军自3月3日起向王文华部进行反扑。他由辰溪出发，先占高村，然后分三支队向麻阳进攻。团长毕化东率右支队向岩门推进，团长宋大霈率左支队沿麻阳河右岸推进，旅长张中和率中支队由麻阳河左岸推进。4日，中、左支队猛攻江口，下午进抵心仁溪，右支队占领岩门。5日，左、中支队侵占江口，右支队逼近麻阳东。6日，三支队会攻麻阳。王文华在敌我兵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抵抗一天后，向铜仁、芷江撤退。下午6时，麻阳失陷。8日，武冈一带也遭到周文炳所部刘跃龙旅的猛烈攻击，高沙、渡头桥、曹家巷等地先后被占。13日，花园、武阳相继失守。不久，绥宁、洪江、黔阳、罗旧、巴州塘、怀化、芷江皆失。数月来愁肠满肚的袁世凯以为皇帝梦又可继续作下去了，忙发申令嘉奖，授周文炳为陆军中将，并给予二等文虎章；张中和授为陆军少将，并给予三等文虎章；卢金山给予二等文虎章，毕化东授为陆军少将[213]。

但是，王文华并未被周文炳的嚣张气焰所吓倒。3月10日，麻阳陷落仅四天，他即调集兵力举行反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天，虽未能最后收复麻阳，但其英勇顽强的精神，连敌人也不能不叹服。周文炳在其作战报告中写道：“我军克复麻阳后，正分兵预备进剿，寇调铜仁六股及晃、芷一带溃寇约近万人，携管退山炮及机关枪多尊，于三月初十晚七时向麻阳猛袭”，“至十一日拂晓，寇三面包围我之左翼”，“下午六时，寇始暂却，仍激战终夕。十二日，又相持竟日。……是役连战数昼夜之久，肉搏十余次”[214]。此后，王文华便主要不以攻取北军集结的县城为目标，而将部队化整为零，“每起至多不过十数人，占据要路山顶等处”，并与所谓“土匪及下等社会”的人民反

袁力量相结合，利用湘西山路崎岖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专袭敌人“兵力单弱之处”[215]，如此一直坚持到袁世凯命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谈判议和。



三　第二军东出桂粤和广西独立

按护国军最初所拟出师计划，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1916年1月，以李烈钧为总司令，何国钧为参谋总长（未到任）的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该军由两个梯团、一个警卫大队组成。第一梯团长为驻防开化（今文山）的原云南陆军迤南边防第一旅长张开儒，参谋长为成珖，第一、二支队长为钱开甲和盛荣超。第二梯团长为新从海外抵滇的方声涛，参谋长为李炳荣，第三、四支队长为黄永社和马为麟。2月21日下午，李烈钧率总司令部和第二梯团部乘滇越铁路火车离开昆明前往广南，准备与张开儒梯团会合后向广西进发。这一天，全城商民一律悬挂五色国旗，军、政、绅、商、学各界齐赴火车站送行，“军容甚壮，观者如流，极一时之盛”[216]。

这时，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正奉袁世凯之命，派其兄兼代广东巡按使、广惠镇守使、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督师由广西进攻云南，并密使其子龙体乾与侄龙毓乾潜回云南老家蒙自犒吾卡等地，组织力量为内应。1月30日，龙觐光行抵南宁，2月下旬分兵五路向云南发动进攻。第一路以署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李文富为司令，出百色攻滇边军事重镇剥隘；第二路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司令，间道入广南，以遏援剥之师，并相机会攻剥隘；第三、四两路分别以广西将军陆荣廷所荐桂林正司令张耀山、田南道尹兼陆军游击副司令吕春琯为司令，作一、二路后援；第五路以朱朝瑛为司令，直趋黔边，阻贵州方面的护国军南下，以保后路。

2月29日，李文富进至百色，3月1日驰赴罗村口，晚8时开始攻击剥隘。当时，李烈钧大队尚未赶到，剥隘守军仅两连，约三百人，不及敌军五分之一，虽经一夜的英勇抗击，仍不免寡不敌众，于次日晨为敌所陷。随后，李文富乘势夺取者桑，进据皈朝。龙觐光大本营也由南宁移驻百色。其二路司令黄恩锡2月19日由百色出发，经广西逻里、旧州、八达、古障，于3月上旬进据云南龙潭、石洞一带，离广南已不到五十里。此外，他还派著名匪首唐惠、吴华两人潜入竹园、朋普、弥勒、十八寨等地，或购枪招人，或秘密设立机关，或与地方保卫团首相勾结，妄图里应外合，扰乱护国军后方。与此同时，龙体乾等人在犒吾卡、纳更等地纠集一批土匪、游民、无赖，于3月9日夜间同时蜂起，分扑临安、蒙自、个旧三县，并于次日攻陷个旧县城。在此情况下，迎战龙觐光就成了挥戈东进的护国第二军的首要任务。

3月初，李烈钧率部经阿迷、蒙自、马塘、开化、江那里、阿基街、板郎等地抵达广南后，一面命张开儒、方声涛各率所部开赴皈朝和石洞、龙潭前线，阻击李文富、黄恩锡；一面电请唐继尧急调正经贵州开赴湘西的挺进军司令黄毓成和护国第三军第一梯团长赵钟奇各率所部改道南下，直趋广西百色，协攻敌后。

张开儒奉命后，迅即驰往皈朝，与李文富激战七八昼夜。至16日，渐不能支，有的部队竟未奉命令而自行撤退。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张开儒镇静如故。他亲临前线，指挥炮兵连长鲁梓材准确地摧毁敌炮阵地，然后趁敌慌乱，命各部队冲锋向前，一鼓作气收复了皈朝，紧接着又乘胜击破者桑、剥隘之敌，夺获大炮二尊、机关枪四挺，其余枪支子弹无算，杀敌千余。在龙潭方面，方声涛所率朱培德、毛本良两营及张怀信警卫大队一个中队与黄恩锡部血战三昼夜，于16日先后夺占石洞、龙潭。黄率残部窜走架衣、丘北、弥勒、竹园、十八寨等地，企图与龙体乾汇合。

其间，奉唐继尧之命援救蒙自、临安、个旧的赵世铭、马为麟两支队，也在南防剿匪军总司令刘祖武的指挥下，于击溃围攻临安、蒙自之敌后，在蒙自境内的鼓山击败龙体乾主力，20日收复了个旧。之后又回师阿迷，配合警卫第四团长李识韩击溃自龙潭败后窜入丘、弥等地的黄恩锡部，先后于4月6、8、12日收复竹园、十八寨、弥勒和丘北，龙体乾、黄恩锡相继败退江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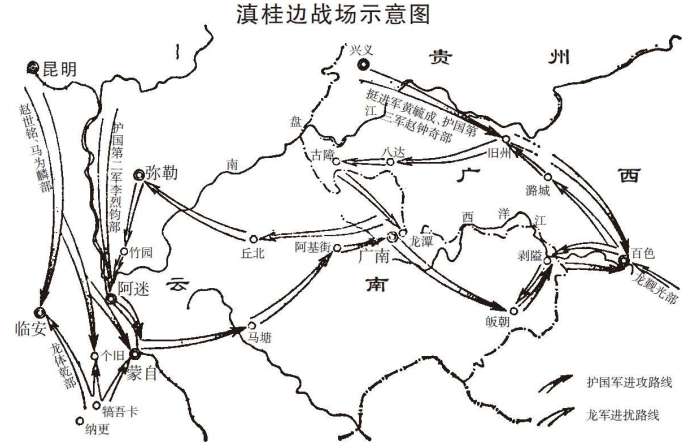
赵钟奇、黄毓成所部则依李烈钧所请，分别于3月4、5两日从贵州黄草坝、兴义出发，南下会攻龙觐光大本营百色。他们途经西隆、西林、旧州、潞城等地，一路上龙军望风而逃，未遇什么抵抗，仅仅黄毓成所部于16日在黄南田与其第五路司令朱朝瑛进行过一昼夜的激战。次日，朱部大溃，黄乘势追至距百色不过八十里的塘升，与剥隘东进的张开儒梯团和桂军马济部对百色形成包围之势。龙觐光见大势已去，被迫缴械投降，并于17日发表通电，宣布辞去“云南查办使责任，赞助共和，以谢天下”[(217)]。至此，袁世凯企图由广西攻取云南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导致龙觐光缴械投降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攻滇军事的失败，然而与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其退路被截断，也是密不可分的。

辛亥革命以后，陆荣廷同样是袁世凯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不仅残酷镇压了广西革命党人为响应二次革命而发动的柳州起义，杀害过刘古香、蒋翊武、农实达、李群等大批革命党人，而且在饷械和兵力方面大力支持其儿女姻亲龙济光进攻广东讨袁军。为此，袁于1914年6月30日授以宁武将军，次年3月晋升为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但是，随着陆荣廷实力地位的加强，袁对陆的戒心也愈来愈大。1913年8月3日，袁世凯任龙济光为广东都督；1915年7月13日，任其心腹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接着又以派充侍卫武官为名，调陆荣廷之子陆裕勋入北京，等于人质。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控制和对付陆荣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陆的心里埋下了对袁不满的种子。因此，陆荣廷在袁世凯卖国称帝，国人“痛心召侮，无地不然”的时候，便下决心与他决裂了。

滇桂边战场示意图



广西独立，酝酿颇早。还在筹安会发生之初，陆荣廷就通过蔡锷所派代表黄实、黄永社与蔡有所计议。嗣后，他又先后接受了革命党人林虎以及老上级岑春煊的进言和劝告，赞成反对帝制。他先以病假为掩护，对帝制“独守缄默”(218)；继又采取消极态度，暗中抵制。截止1915年11月15日，全国已有二十个省和特别行政区遵命举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投票赞成帝制，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但陆荣廷却迟迟未动，以致“浮言”四起，“传闻”纷纷，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袁世凯对他已有所怀疑，不得不赶紧与王祖同联名发表一

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通电，声明广西办理选举稍后于各省，是由于“交通不便”，并预先保证：“将来投票结果，必能一致。”[219] 这说明早在云南独立前，陆荣廷的反袁已有所表现。所以蔡锷说，桂省陆（荣廷）、陈（炳焜），“早已决心，业作准备”[220]。

但是，云南独立后，陆荣廷由于饷械不足和龙济光、汤芗铭逼处东、北，并未立即循蔡锷、唐继尧所请，宣布广西独立，而继续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佯装拥护帝制。1915年12月26日，他通电各省，说明他已与王祖同会电警告唐、任，“并约川、湘、鄂、粤军巡各帅合词诘责”[221]。28日，他特电请袁“大伸天讨”[222]，随后一面派旅长陆裕光、团长李祥禄率步兵两营、炮兵一营先后出发，“防守边地”；一面电请龙济光所派征滇军万人迅即出发[223]。次年1月3日，他请袁“早正大位，以定民心”[224]。嗣又于18日公开辟谣说：“近日沪上《中华新报》载有广西独立之耗，似此造谣煽乱，殊堪痛恨。除电请外交部暨冯（国璋）上将军、齐（耀琳）巡按使请向领团交涉，将该报查禁外，特电声明。”[225] 如此等等。

在上述活动的掩护下，陆荣廷悄悄地部署着独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派其义子曾彦至滇接洽”，说明“桂省饷力、械力俱不足以有为，只好暂守中立，待机而发”[226]；一面“托商会以损害商业为辞”，拒绝袁世凯派北军由桂征滇[227]。龙济光承担攻滇任务后，陆荣廷明知其为假虞灭虢之计，但也不便再拒，乃遣其子陆裕光、桂军将领张耀山、吕春琯等统兵随行，暗中监视，同时“戒龙少带兵士，多携饷械”。龙济光不知是计，又以粤中党人环伺，兵不敷用，欣然电令陆荣廷所荐张、吕二人就地招兵四千，以候进取，并先后运桂六厘米八无烟枪九千五百枝、七生的克虏伯开花炮六尊、机关枪三十五架、子弹称量、饷银一百五十万元[228]，成了名符其实的帮助陆荣廷的义务运输大队长。为团结内部，1916年2月14日，陆荣廷召集陈炳焜等主要将领二十余人宣誓说：“皇天后土，鉴临廷等。一德一心，驱逐国贼。保卫民生，保障共和。如有违异，饮弹而死。”[229]

接着，陆一面暗中动员军队，一面派陈祖虞、唐绍慧前往沪、宁，联络冯国璋和迎梁启超入桂。陈、唐向梁启超声称：梁朝至，桂省独立夕发矣。3月4日，梁启超一行七人踏上了艰苦的赴桂征途。

随着时间的推移，陆荣廷不稳的消息渐为袁世凯所知。3月7日，他接过陆自请率师攻黔的饰词，特任陆为贵州宣抚使，“将剿抚事宜，悉心筹画”[230]，妄图调虎离山，另任他人督理广西军务，以便激成变端，继续控制广西。然而，这恰恰为陆荣廷提供了名正言顺向袁索饷要械和遣兵北进的借口。陆受命后，张口就索取军饷百万和大批军械，与袁讨价还价。袁世凯有苦难言，只好“如数拨给”[231]。接着，他领兵北上柳州，屯兵湘桂边境。这时，如前所述，入滇粤军在李烈钧所率护国第二军的攻击下，正节节向广西败退，云南挺进军和护国第三军又从贵州南下，抄其后路，龙觐光困守百色，已成瓮中之鳖。而且梁启超代表汤觉顿已抵南宁，并向陆荣廷报告说：梁已启程，不日即到。于是，陆荣廷一面命令随粤军出发的桂军反戈相向，配合云南护国军围攻百色；一面指使南宁陈炳焜等立即通电讨袁，宣布广西独立。15日，陈等致电陆说：“当经会议表决，即日宣布广西独立，公推我上将军为广西都督。”[232]同日，陆荣廷继贵州刘显世之后，以都督名义通电反袁，号召“各省文武忠勇志士，协心戮力，诛彼独夫，载宣国威”[233]。

广西独立，不但直接促成了龙觐光的缴械投降，巩固了护国军的大本营云南，而且有力支援了正在川南、湘西各战线浴血奋战的护国军。当时川南前线一位梯团长说：“设广西再有十天不宣布独立，真不知如何收场。”[234]同样，它对袁世凯集团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广西独立后三天，四川将军陈宦忧心忡忡地致电王士珍说：“陆（指陆荣廷）既如此，龙（指广东龙济光）必可虑”，“瞻念大局，切抱隐忧”[235]。同日，湖南巡按使沈金鉴在给政事堂和统率办事处的电报中也说：广西独立，致湖南于“四路受敌”之中，“湘危，则大局益不可收拾”[236]。“洪宪”王朝的末日为期不远了。

第三节　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和帝制的取消

一　中华革命党军事讨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与护国军分路出征的同时，中华革命党也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讨袁活动。如第八章第二节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后继续不屈不挠坚持反袁斗争的唯一政党。还在1915年夏秋之交，它已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进行武装讨袁。但由于经费、人员等条件的限制，云南首义前有重大影响的起义并不多，而且旋起旋败。真正富有成效的全面展开是云南首义以后的事[237]。

云南独立后，孙中山指出“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238]。当时，江苏、上海、江西、湖北等地的中华革命党人，均纷纷准备发动，但他认为“长江一带敌屯重兵，且有津浦、京汉两线运输之利”，困难较大，主张改变策略，首先“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以便“与云贵打成一片”，一旦“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伐”[239]。为此，广东中华革命军在司令长官朱执信的领导下，于1916年二三月间先后发动了两次以攻取省城广州为目标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在2月上旬。当时，龙济光正奉命派兵西攻云南，广州相对空虚。朱执信及其同志们议定一个三路同扑省城的计划：一路由澳门出发沿增城、罗岗洞、龙眼洞前进，攻小北门；一路由广九路沿途登车，直扑东关；一路由谢细牛统率绿林武装，从城北七十里的番禺县石湖村出发，夺取石井兵工厂，然后分兵夹击西关和大北门，以援应东、北两军。部署停当后，朱于2月5日夜亲率中华革命党员数十人潜入石湖村，指挥谢细牛所部绿林数百人和其他民军千余人，解除了该乡福军和乡团的武装，占领三座当楼为炮台。次日晨，又制青竹毒签，广布村外要道，准备于9日与其他两路同时举事。不料事为龙济光探悉，8日晨即遭其所派亲军千人的疯狂围攻。石湖军民英勇抵抗

一昼夜，击毙龙军团长、营长、排长各一人，重伤营长一人。相持至9日晨，龙军增援炮队赶到，朱执信见敌众我寡，硬拼不利，遂下令撤退。三路进攻广州的计划也临时取消。

3月上旬，朱执信再次对广州发动攻击。这次行动，计分两步：第一步是袭取袁世凯由沪派来黄埔的肇和舰，第二步以所获之肇和舰“驶进省河，谋攻观音山等处”[240]，进而夺取省城。行动之前，朱与李天德以及上海陈其美所派杨虎、李元箸、马伯麟、余建光、冯启民等人在澳门筹议多次，决定以一部分同志密登澳门开往广州的永固客轮，抵黄埔后，即迫其泊近肇和舰，利用该轮与肇和舰高度相等之便，越舷而过，向敌发起突然袭击，夺取该舰；以另一部分同志在永固轮发难的同时，向黄埔两岸各炮台发起猛攻，牵制陆上之敌。

6日晚9时，一批身怀炸弹和手枪等轻武器的中华革命党人，夹在搭客中登上永固轮由澳门启航，次日晨3时50分驶抵黄埔。他们唤醒酣睡的搭客，向他们宣布：“吾人欲借永固以袭肇和而讨袁贼，并非行劫，如有金钱财物，一概保护，请即齐下舱底安息，以免危险。”[241] 接着，便纷起奔向各预定目标，迅速占领了舵房、车房、电灯房、火房以及船首船尾等要害部位，迫船主驶向肇和舰之侧。时值黎明，江面雾气弥漫，肇和舰尚以该轮误驶航线，鸣钟告警。永固轮却不顾水流湍急，多次向其靠拢，且有人企图登舰。这时肇和方知将发生事变，急起向永固轮开火。预伏在东浦墟一带的中华革命党人听见肇和枪声，知轮上同志已经发动，遂向鱼珠等炮台发起攻击。顿时，肇和内外，黄埔两岸，枪声、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十分激烈。永固轮上的中华革命党人为夺取肇和舰，不怕牺牲，多次发起进攻，先后有两人为跃过肇和而堕水献出生命。但是，在肇和舰严密炮火的封锁下，永固轮的靠舰企图始终未能实现，而攻击陆上炮台的队伍又被击散，永固轮陷于腹背受敌之中。为了保存实力，中华革命党人不得不迫该轮驶向沙滩，凫水登岸，弃轮而退。

广东中华革命军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给龙济光的震惊却不小。

正是中华革命军和其他民军的频繁起事，才使他有所顾忌，而不敢对云南护国军倾力相加。朱执信指出："石湖一役，歼其团长，激战数日，俾以全力防北江、西江。继以决死之队攻袭肇和，虽其事不成，而龙济光益严于防守。""龙氏在广东有兵五万人，仅以三千往滇者，中华革命军牵制之也。"(242)

与此同时，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回籍招集旧部，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给袁世凯及其各省代理人以沉重的打击。

在四川，自云南护国军攻入后，各地"缙绅耆旧，游侠健儿，闻风群起，动辄千数"，其中不少是中华革命党人直接发动，或接受中华革命党领导的。2月16日，由上海返川的谢兆鸾集合各路民军千余人，快枪七百余支，铜驼十余尊在合州（今合川）首先倡义，宣布成立以他为司令官、黎握中为参谋的中华民国革命军四川第一支队，活动于合州、酆都、万县、云阳一带。3月初，分别由昆明随护国军入川的王维纲和由上海溯江西上的刘伯承等人，运动涪州警备队长杨光烈和哥老会众在涪州（今涪陵）新庙子起义，成立以王维纲为支队长、杨光烈为参谋、刘伯承负实际军事指挥责任的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积极展开讨袁活动。12日，刘伯承率队进攻长寿，缴获水警快枪四十余支。14日，在石家沱与北军安庆轮开战，毙其军官一人。接着，王维纲一面命支队大部转扎临江庙，准备进攻酆都；一面分兵一连至马颈子截夺北军船只。其时，恰有名为商轮，实已成为北军兵船的大川号驶至，当即被击伤，搁浅江岸，俘获北军参谋一人，兵士二十余人，快枪三十余枝。16日夜，王维纲再接再厉，亲率全支队由临江庙出发，向有本县警备队和北军第八师第三十二团张福臣营分守各要隘的酆都进攻。次日拂晓，一举突破新城要隘，迅速攻入城内，将张福臣营全部逐出城外，并生擒与处决了为虎作伥的县知事许石生，歼敌八十余人，获快枪五十余枝。王支队除刘伯承右目受伤外，仅伤亡官兵九人。

紧接谢兆鸾、王维纲之后，龚天福、周晋敷、杨海清等人也在马尾坝宣布起义，组成以龚天福为支队长，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长官卢师谛为司令官的四川中华护国军第三支队，并于3月21日占领石砫。4月1日，以知事附义独立，和平进入忠县，“横断北军交通者十三日之久”[243]。其间，还有李善波等人于3月11日在酉阳龚滩宣布独立，自称共和革命军司令官，“声言三次革命”[244]，不及半月，便“陆续攻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筹饷十万，战士盈千”[245]。颜德基等人则聚兵新宁（今开江），击毙县知事，拥兵五百余人，与北军周旋于云阳、万县间。

4月10日，这些名目纷杂、各自为战的讨袁军，正式联合组成以石青阳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暂先编川东、南、北三支队。并于11日以石青阳名义誓告国人：“自今伊始，本军当贯彻唯一之主义：1．推翻专制政府；2．恢复完全民国；3．启发人民生业；4．巩固国家主权，以期大憝元凶殄而后已。扶持国体，生死同之。”[246] 至于川西，则由卢师谛“指挥孙（泽沛）、吴（庆熙）、丁（厚堂）诸军，运动独立”[247]。至5月中旬，成都附廓各属，几非陈宦所有。

四川中华革命党人，在袁世凯进攻云南的主要通路川江航道上攻城略地，据山筑垒，劫其军船，歼其兵士，阻其交通，不但扰乱了敌人的后方，而且严重地威胁着泸州北军的安全。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对此说得很明白：“当兹逆匪充斥，形势变迁，交通益形梗阻，输送愈觉不灵。职师之新兵及军需物品、炮营驮马，均到万县多日，不能上驶。忠（州）既不守，万亦频惊，邀寄军储，万分危险。”[248] 为了“保护输送，无碍进行”，他不得不于涪州留步兵一团、炮兵一连，酆都留步兵一营，并再次向袁提议“由万（县）稍加兵力两营”[249]，这样就大大分散了直接用于泸州的兵力。四川中华革命党人的这些军事行动，对蔡锷反攻泸州，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持。

湖南中华革命党人在军事讨袁中，先主“中心突破”，力图在长

沙、衡阳、岳州等要冲地方策动军队，树立义旗，以广号召[250]。所以，他们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便是长沙暴动。这次行动酝酿于云南独立后不久。当时，杨王鹏、王道、谭蒙、邹永成等人纷纷由日本回国，在上海谋进行倒袁办法，决定：先派廖湘芸回湘，运动长沙三十九混成旅和汤芗铭的模范营为内应，彭泽鸿前往岳州，准备响应；谭蒙、殷之辂负责联络。至2月中，各方筹备已略有头绪，单等沪、汉两地赴湘参战同志全部集齐后即可发动。可是，少数急进分子为了“居功”，要“先期举发”[251]，加上汤芗铭搜捕日紧，潜伏同志，隐蔽不易，杨王鹏不得已于2月21日冒险发难。杨与廖湘芸、毛邦华等数十人，身怀炸弹，向汤芗铭将军署及其邻近之军械所、警察厅、高等审判厅等目标冲去，毙其卫兵五人，余皆纷纷逃散。据当时报载，汤芗铭与巡按使沈金鉴也由后门鼠窜而逃。不料，杨王鹏等刚抵辕门，因“先所运动之军队忽爽约，助汤抵御”[252]，旋即失败。杨王鹏、龚铁铮、李岳崧、毛邦华、湛文炳、杨诒庆、陈树生等二十七人惨遭杀害；李泰阶等七人被判徒刑；遭株连而不知姓名者达四十余人[253]。

经此挫败后，湖南中华革命党人暂时放弃了夺取省城的计划，而开始致力于各地的武装起义。其中比较成功的是湘西罗剑仇、萧英等人领导的起义。3月12日，罗剑仇联络地方保安队和乡团武装三百人，在永顺松柏场宣布起义，成立以他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独立军，号召北伐讨袁。17日占领王村，19日攻克永顺。警备队长谢伯纲正“脱振振军服，着裈布单衫，由民房出走”，突为人所识，当即被独立军击毙。县知事车赓与人易服后侥幸保命，于当夜“潜至岳某家，偕其小星，泛艇而逃”[254]。攻克永顺同日，罗剑仇乘势分军为二：一由石雄指挥攻桑植，一由罗自率攻大庸。24日，桑植克复，知事潜逃。不日，大庸也宣布独立。萧英自称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讨袁军事筹备委员，所部数千人，不仅活动于大庸、永顺、古丈等地，而且远及辰（州）、常（德）一带，严重威胁北军后方[255]。北军师长范国璋向袁世凯诉苦说：“本师自出征以来，原以靖寇为目的，

嗣奉兹令担任常、辰防剿事宜，乃将兵力分拨各处。现庸、桑、古丈、南县之匪虽稍敛迹，惟兵来则去，兵去复来，若遽将队伍撤回援助前线，不惟克复各县仍为匪有，且恐常、辰亦陷于危险地位。万一后方不保，前方作战更多掣肘。而在后方剿匪各队既难撤回，而前方又亟待援助。师长据此地位，万分焦灼，筹思至再，实难兼顾，究应如何办理，恳请迅示方针。”[256] 这是罗、萧等部中华革命军在湘西牵制与打击北军的真实记录。

湖北中华革命党人主要于武昌南湖策动了一次马、炮队起义。自1915年冬以来，中华革命军湖北司令长官蔡济民与刘英、赵鹏飞等陆续回鄂组织军事讨袁，决定先由武昌发难，汉口、汉阳同时响应。经多方运动，他们先后在武昌南湖马队、炮队、城内守军以及汉阳兵工厂卫队播下了讨袁种子。但由于武汉为北军集中之地，且湖北将军王占元已有所闻，正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因此，多数同志认为不可操之过急，暂以缓发为宜。可是，蔡济民偏听刘英等人所言，误以为军队运动成熟，发难决操胜算，遂命南湖马队准于2月18日夜10时举义，汇合炮队进攻中和门，与城内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武昌，并约定以放火为号。届期马队虽遵命发难，炮队也同时行动，但因王占元早有准备，旋遭镇压。城内军队则因是夜大雨如注，未见火光，迄未响应。此役固然“误于蔡（济民），幸无大损”[257]，且“实足以动鄂吏之心。自是以还，鄂兵只自保治安，不复为袁敌滇”[258]。

至于长江下游陈其美的讨袁活动，更未曾中止过。自1915年12月5日肇和起义失败后，上海虽未再举，但在陈的策动与部署下，江苏、安徽等省却发动过多次起义。江苏中华革命党人于次年4月16日攻袭江阴，一度进据吴江。安徽中华革命党人也于17日联络大通陆路警察，占领榷运局。为此，5月18日，陈其美终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此外，在山东还活跃着一支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以吴大洲为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的山东护国军。他们旗号虽各异，却同是中华革命党人组织的讨袁武装。1916年2月，孙中山亲自

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吴大洲与薄子明、邓天乙、吕子人等，先后返回青岛，准备组织讨袁军。接着，孙又以云贵护国军局限一隅，且胜败难测，认为要缩短战争期限，保全国家元气，事半而功倍，“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因此“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军事进行事宜”[259]。3月，居正率朱霁青、陈中孚、刘廷汉等由大连至青岛，设立以许崇智为参谋长、萧汝霖为秘书长、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的东北军总司令部，编成以刘廷汉、朱霁青为司令的两个本队和以薄子明、马德龙、吕子人、杜仲三、赵中玉、尹锡五为司令的六个支队，积极准备起兵讨袁。

5月4日，东北军分两路展开行动：一路由薄子明率第一支队与吴大洲所部合袭长山县周村；一路由居正亲率朱霁青、刘廷汉、吕子人等部进攻潍县。5日晨，吴大洲、薄子明攻克周村，次日占领长山县城，随后将所部整编为五个梯团，改称山东护国军，连克邹平、淄川、博山等地。居正所部也于4日当夜进抵潍县火车站一带，次日开始围攻县城。为孤敌势，居正同时命吕子人、马德龙、刘廷汉等人分兵袭取高密、安丘、诸城、昌乐、临淄等地。15日，北军第五师长张树元被迫与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签订退出潍县议和条件十五款。23日，东北军胜利进入潍县县城，并发表宣言说：“本军以袁世凯背誓叛国，违法殃民，认为国民公敌，特与西南各省护国军互相呼应，一致讨贼。”[260]其后，又遣敢死队百人，与吴大洲所部护国军组成周、潍联军，由邓天乙、陈中孚率领进攻济南。山东将军靳云鹏抵御无力，归降不能，只好弃职出走。

以上事实说明：在反对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中华革命军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在四川、湖南护国战场上与云贵护国军并肩作战，它的功绩将与护国军一样，永远彪炳于史册。

二　各阶层人民对反帝制战争的支援

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首要的表现是云南、贵州两省人民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支前热潮。云南、贵州是护国军的大后方，讨袁战争的根据地，为争取胜利，两省人民除积极支持军政府创设团防组织，维持地方秩序，消除护国军后顾之忧外，还广泛开展了以下支前活动。

（一）踊跃从军。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的头一件事就是动员人民参军，先后在省城昆明和云南、楚雄、武定、大理、丽江、曲靖、蒙化、临江、开化等九府设立征兵机构，号召退伍官兵踊跃归队。不到十天，自动报到的“不下五六千人”[261]，退伍军官叶荃并致电唐继尧说：“拟就近于顺、云、缅召集义勇乡团一营，躬赴前敌，为国效死。”[262] 其他各界人士，也“莫不忿恨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均愿慷慨从军，稍尽义务”[263]。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为踊跃。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十五个班的学生上书唐继尧，请组织“讨袁学生队”[264]。女子农业学校学生茅极珍、王桂莲等十五人呈请编练女子军北伐[265]。云南高等警察学校全体学生，也借口滇垣秩序整然，警员“实成疣赘”，请求“派随军队，或充他职”，以“效驱于战阵”[266]。而要求加入云南讲武学校志愿队的人，则为数更多。

起初，征兵事务所还依据征兵条例，坚持必须持有退伍执照，方可登记收录，但实际上许多报名者根本不是退伍兵士。为此，它不得不临时改申：“只须邀请妥实铺保填具保证书，即准投考分拨”，以“免阻其爱国热忱。”[267] 然而，即使如此，由于招收名额有限，仍有不少报名者未能如愿。如宪兵队招收八十名，而报名人数多达数百，“其未考取者，皆深以不得从征为憾”[268]。在这股从军热潮中，随处可见新婚青年“绝裾而出”，与妻子送夫、母亲送儿的动人情景。退伍营长马灿文出发时，他的母亲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国家养汝辈，正为今日用力，其速理粮临敌，以快母心。”[269]

贵州情况，与云南大体相仿。据当时报载：“自宣布独立后，无人不愤恨袁氏无道。稍有血气者，均愿从戎北征，而青年学子，尤为

有志。”[270]

（二）积极筹饷。云贵两省，地瘠民贫，平时财政即感支绌，何况战时。因此，竭力从财政上资助护国军政府，乃是两省人民的急务。在这方面率先作个人捐献的是护国第一军参谋总长罗佩金。他承继祖产十余万金，起义之后，即“尽以其田产之契券交与唐都督存储富滇银行，以充军费”，并说：“他日共和无恙，己身犹存，或可酌量领回瞻家之费。否则，将演亡国灭种之惨祸，何以家为？”[271] 紧接着，绅商农工学各界也纷起效法。据当时报载：滇省由于“民贫地瘠，每届年底，完纳粮税，甚属迟延。近因军兴之故，省内外各县人民输纳粮税，异常踊跃”[272]。滇蜀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决随粮附加铁路股百余万元，“全数提充军饷”[273]。昆明群舞、云华两戏园经理、司事以及全体坤伶和男伶为此举办义演，他们具禀警察厅长唐继禹说：“滇省地处边僻，军饷甚绌。筹饷之源，端赖国民。毁家纾难，正斯时也。商民等亦系国民一分子，自当勉尽棉薄，为他人倡。拟由群舞、云华两园各演义务戏午夜三日，所售之款，涓滴归公，以助军饷。”[274] 讨袁爱国的热情，跃然纸上。云南商务总会也慨助军饷二十余万元。

贵州人民的筹饷活动主要由征兵抚恤会主持。征兵抚恤会是个拥军优属性质的社会群众团体，为贵州绅、学、农、工、商、报各界所自动发起，正式成立于3月19日，以郭重光为正干事，张彭年、熊述之等为干事。该会劝捐对象初以个人为限，具体办法是：上等月捐一元，中等五角，次等二角，又次等一角，任凭自认，以战事结束之日为止。后贵阳县知事王具光“引身作则，共乐输将”，又议定将劝捐对象再扩至以县为单位，并定办法三等：一等县七十元，二等六十元，三等五十元。他一面将本县所捐七十元送交省城征兵抚恤会，一面相应通告各县知事“酌照所议，量予捐助”[275]。为动员更多群众踊跃认捐，征兵抚恤会于4月3日在贵阳公园举行公民大会，到会者万余人，肩摩踵接，几无隙地。场内并设有收捐处，由中国银行直接派员

经手。大会首由郭重光演说征兵抚恤会成立缘起，他说："袁逆谋叛，致起兵端，出征之军，异常辛苦，盖为保护共和，舍死忘身，吾民应尽抚恤之责，以致其功，是以有征兵抚恤会之设。"继由张彭年等人着重演说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号召各界"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俾得早日讨灭袁逆，还我共和"[276]。演说进行了四个钟头，直到散会时，"光复楼之下，收款处输捐者尚络绎不绝"[277]。

此外，地方各县还有各自助饷的。紫江县曾竹屏等"闻本省护国军兴，遂与绅、商、学、农各界商议将以前救国储金团改为护国筹饷团，该县人士照常捐输，以为义军后盾"[278]。修文县绅士颜香澄等以黔军讨袁，兵饷为要，发起"护国军饷捐"。"此议一出，乐从者甚众"。息烽僧人法瑞等以"袁氏帝制自为，割地售矿，大有害于人民"，"特召集缁流，发起护国捐金团，以补助军饷"[279]，等等。

（三）激发民气。云贵人民懂得："大义以阐扬而益彰，民气以激发而尤奋。"[280] 为此，他们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创办报纸，二是组织演说。在创办报纸方面，昆明的《中华民报》、《义声报》和贵阳的《铎报》都是为声援护国军而创办的。《中华民报》发起人陈禹平、邓质彬、罗养如等人说："窃自我滇起义，声罪讨袁，同人等不自揣谅，奋其忠忱，欲借三寸毛颖，聊助北伐声威。是以集合同志，组织《中华民报》，用以鼓吹共和，扫除专制。"[281] 在组织演说方面，早在1916年1月初，昆明法政、师范两校就曾挑选学生四百余人，组成一团，分往各县、市、乡巡回演说[282]。但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是云南护国演说社的活动。

护国演说社是李增、由云龙、倪德隆、杨钟年等二十五人发起成立，并与护国战争相终始的一个社会群众组织，其简章规定："本社以声明大义，发扬民气，辅助本省政府扫除帝制，拥护共和为宗旨。"[283] 它发轫于省城昆明，推广至各府、县、市、埠，每星期三、六、日均派德望素著、通达事理的演说员前往各处演说，曾先后演说过《滇军举义讨袁，实为国民前途造大幸福》、《护国军之责任

与身价》等十二讲，主要宣传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袁世凯是个抢掳中华民国的大贼，败国害民的祸根，只有并力将他除了，中国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安乐；2．护国讨袁，“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为全国四万万人造将来的大幸福”；3．护国军必胜，袁世凯必败；4．全国讨袁形势大好，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的日期不远了；5．“唐、蔡诸公既出死力救我们国家的覆亡，保我们种族的危急，我们百姓也应该出死力帮助，不可袖手旁观”，“或是直接的捐助些军饷，或是间接的补助些劳力”，而最重要的是要履行共和国民最荣耀的当兵义务[284]。护国演说社的演说不仅战斗性强，而且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甚至妇孺女子，亦有听而不倦者”[285]，在激发广大群众的讨袁爱国热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四）慰劳将士。为了鼓舞士气，两省人民一向十分重视劳军工作。军队出征，有分送手巾、手套各用品的，有置牛酒以饯行的。伤员回省，倍受优待。在贵州，凡负伤官兵到省，征兵抚恤会一律备置火腿、牛乳、川糖、蜜食、藕粉、手巾等物，前往殷勤慰问[286]。不仅如此，两省人民还多次推派代表，亲往各战地劳军。4月初，贵州征兵抚恤会就曾备置牛酒，派员赍往川南、湘西慰劳各出征将士，并致词说：“袁氏谋逆，志士投袂。图存宗邦，头颅拚碎。天鉴精神，连歼丑类。既固民国，兼保社会。社会中人，敢忘斯忠？无以酬功，扪心抱愧。远献牛酒，聊供一醉。”[287]同时前往川南劳军的还有遵义、桐梓各界代表王嘉春、杨崇、王长龄等。他们到达战地，适值大雨，官兵颇受感动。云南劳军代表由唐继尧委派前川军第五师旅长龙灼三等人充任。商务总会闻讯后，立即召集商界会议，提议各商量力捐金，购备物品，托其代赠前敌各将士。会后，又广布《启事》，劝谕各商，“一时认捐者异常踊跃，多者数十元，少者亦拾数元”[288]。当其所购慰劳品运抵战地之时，全军上下，莫不感奋，恨不能即除袁氏，以谢同胞。

全国各阶层人民支持护国战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川南、湘西等战区人民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支援护国军、打击北军的斗争。关于护国军所受人民欢迎与支持的情况，蔡锷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说：当他率部到达川南永宁时，“官绅商民悬旗结彩，夹道欢呼。附近各属亦派代表前来接洽，群称我军之神勇慈惠，情愿编入戎籍，共效前驱”[289]。随蔡入川的支队长朱德也说：“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290]有人还与辛亥以来的几次入川情况相比较，指出：“此次入川，对于人民感情，与前大异，每一战争，所有附近村民，箪食壶浆送入阵地者，不可胜数。”[291]驰骋湘西的东路司令王文华说：“我军所至，扶老携幼，壶浆箪食，馐彼前线。”[292]可见湘西人民对护国军的支持并不亚于川南人民。

川、湘人民也和云、贵人民一样，毁家纾难，踊跃从军。仅四川叙永县就“筹款至三十余万之多”，“乡团之遥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之众”[293]。他们还主动向护国军报告敌情，指带道路，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据护国军营长金汉鼎说：1月31日叙州白沙场之战，就有驮子弹的马哥头，于战斗激烈之时，取“我阵亡之兵之枪，而各击敌人”[294]。支队长华封歌也说：黔军占领九盘子、赶水、东溪等要隘，“多得棒客之力”[295]。湘西民众每当护国军与北军“对垒之际，或至鏖战不休，妇女之属分为炊食以进，男子则持白刃尾随其后，所至成群，杀声雷动，昼为冲锋，夜为劫营，枪林弹雨之中，赤血横飞，犹各贾勇前驱，捐身不顾。因此，陨命者每战实复不少”[296]。可见，护国军的每一胜利，除其自身的英勇牺牲外，也是川湘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但是，与护国军相反，北军及其附庸却处处遭到川湘人民的反对。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家家闭户，人人远避。代理南川县知事颜孔铸说：“春初，北军至南，搜刮奸掠，民不堪命，城乡妇女，转徙流离，县城昼扃，各乡罢市。”[297]北军兵监监员关洵也供认：“沿途经过之地，居民旅店关闭居多，不惟日用物品极其昂贵，且求其有

而不可得。”[298] 欲求向导，更“无一应者”[299]。迫而为之，非“乘间而逸”，即“故引歧途，速其被歼”。3月，王维纲进攻酆都时，北军营长张福臣以土人余见龙为向导，欲西出新城，扼王来路，但余却骗他“左出大桥”。结果，王维纲取道大池已抵新城，而张还蒙在鼓里。17日拂晓，“张前队出新城，未戒备，猝与纲遇，枪不及弹，伤数十人，遂溃退不可收拾”[300]。几乎同时，川南松坎两营北军也因向导略施小计，被护国军打得死伤枕藉，狼狈不堪。其时，松坎北军欲抄袭护国军后路，迫旧时老乡约王思孝为向导。王虽年已七十有余，但“精明谙练，素恨袁兵”，“因略施诈术以陷之”。他先引北军多人自松坎经蛇皮滩至石壕，“逾沟越岭，绕东转西，其中相距四五十里，逐一指明，又插竹为标。”而真正可以用埋伏、行抄袭、权避让之处，却“秘而不宣”。北军于3月23日派兵两营，携机枪两挺，迫击炮六尊，依竹标所指，向石壕进发。岂知在他们未到石壕以前，护国军已衔枚急走，由小路先行暗抵石壕，对他们实行反包抄了。北军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争先沿原路退回。护国军“认标追逐”，直至蛇皮滩乃止。一路上，北军“死伤无算”，并损失机枪一挺、炮一尊[301]。

然而，这些还不是北军最感困难的问题，最难对付的是那些遍地蜂起的武装民众。

自护国战争爆发后，川湘人民即在护国军的鼓舞下，纷纷组织武装，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有的隶属于地方政权，有的直接投奔护国军，而更多的是散处各地独立从事游击战争。这后一种也就是北军所诬称的“匪”。这些民众武装虽多系山野村夫，武器也窳劣不良，仅有土枪土炮甚至棍棒刀矛之类，又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凡奇正分合之法，条教号令之施，大抵懵然不解”，但本其果勇朴诚之气和熟悉地理、进退敏捷、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便利条件，却常给教练有素、器精械利的北军以有力的打击。3月27日，企图进犯赤水的一营北军竟被六十余名乡兵击败，就是一例。这一天，听说北军将至，士民急

议守城之策，“有勇者攘臂而前，扬言于众曰：‘北军炮巨且利，城不可恃也，不如相机击之，有胆识者能从我乎？’语毕，应之者六十余人。结队而往，散布于鲢鱼溪岸。北军既至，各自为战，殪其前锋十数人，后继者回头急返。时值阴雨霏霏，泥涂滑泆，加以羊肠鸟道，不能星散而奔。于是窜入稻田，困于革履，将前复却，欲速反迟。乡兵四起乘之，刀枪并举，杀北军七十余人，夺获快枪一百七十余件。而乡兵不幸受伤者仅三人焉”(302)。

至于那星罗棋布、左仆右起的所谓“匪”，对北军的威胁就更大了。他们时而攻城池，劫器械；时而砍电线，断交通；时而击步哨，歼溃兵；时而预伏要道，俟北军经过，“啸起抢擒之”；时而伪装采樵妇，乘其不备，“戮其人而夺其枪”(303)。据蔡锷说，凡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人以上不敢径行乡镇”(304)。他们时聚时散，出没无常，东奔西窜，飘忽不定，“遇兵力单则抵抗，遇大队则窜匿，追剿无踪，防不胜防，虽有兵力，亦无所施”(305)。在他们的打击之下，北军上下无不惊呼：“最可虑者，现当逆乱吃紧，而匪焰日炽。影响所及，于逆则利，于我则害。”“万一连为一气，演成草木皆兵之势，则祸患曷堪设想！”(306)

此外，在这期间，袁世凯统治区人民的反袁斗争也有新的发展。距离护国军发源地云贵两省较近的四川、湖南、广东、浙江等省固不必说，即使素为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也不例外。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为了镇压护国军，除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列强乞求借款外，又加紧在国内推行地亩清查，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反对清丈地亩就成了北方各省人民反袁斗争的主要内容。3月22日，山东肥城县长清农民为此举行暴动，焚毁县署及四乡丈量局。随后，又波及平阴、东平、东阿、新泰等邻近各县，数千农民“袭县衙官署、学校及官绅之住宅而火烧之，势极猛烈”(307)，旋为当地驻军所镇压。4月，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农民也掀起大规模的反抗风潮。海龙县乡民三千余人将县署团团围住，要求停止清丈。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

市）乡民二千余人意欲捣毁清丈局，声势汹汹，延袤百余里。东丰县乡民散发传单，揭露地方当局和官吏借端搜刮，苛捐杂税，日增一日，相约5月13日入城夺回已丈的土地大照，要求缓丈。绥中县斗争尤烈，抗丈群众千余人，夺取保卫团枪械，围攻县城，要求驱逐县知事，实行自治。阿城、盖平、岫岩、兴京（今新宾）等县农民也展开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抗丈斗争。至5月间，反抗清丈风潮，几无县无之，三省当局被迫停止清丈。与此同时，河北易县爆发了山北社千余人为抗阻清丈地亩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武装起义，并蔓延冀中十数县，后以兵力不敌，被军警击散。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在这次反袁爱国斗争中，国内各兄弟民族和海外华侨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川南和湘西，各兄弟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一面积极欢迎和支持护国军北伐，一面自动组织武装抗击北军的进攻。李长泰不止一次向统率办事处报告说："赤水又来苗匪千余人，携明火枪，并有抬炮。"[308] 这说明苗族人民不仅建立了讨袁武装，而且是一支人数不少的队伍，其武器装备虽不甚精良，但却给李长泰以莫大的威胁。在四川宁远，"猓猓人（彝族）蜂起与官吏为难"[309]。在贵州铜仁、松桃等苗族聚居区，组成一支三千余人的苗民义勇队，准备"即行出师北讨"[310]。在黑龙江，鄂伦春青年学生阿兰布及拉札立等十余人，因对袁世凯"僭窃神器大抱不平，年假归家，对其父兄演说此事，全族中闻而大愤，遂约期起义"[311]。在吉林，爆发了赫哲族反对袁世凯盐务缉私马队的起义。活动于吉林宝清、密山、富锦、虎林等县的盐务缉私马队本是袁世凯的一支武装军警，由于它常假"缉私"之名，栽赃以倾良善，人民深受其害。赫哲族愤激而约齐全族，挑选精锐五百人，高树讨袁大旗，于1916年2月17日直扑该队驻地。该队方在梦中，衣不及着，即被"杀得落花流水，全营五百人，生逃者不过三十人"[312]。

海外广大华侨的爱国讨袁热情，也很令人钦佩。这主要表现在踊跃输财和组织敢死队直接回国参加讨袁斗争等两个方面。云南起义

后，南洋华侨认捐巨款者，大不乏人，连留法学生爪哇华侨吴伟康也捐了四千元[313]。云南起义后，百余万的捐款很快汇到昆明。美洲、澳洲华侨认捐更多，“闻数在二百万左右”。直接回国参加武装讨袁斗争的华侨则以北美加拿大为多。1916年1月初，国民党加拿大支部颁布《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规则及章程》，号召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参加敢死先锋队回国效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没多久，报名参加者便达到五百人，经中华革命党东京总部正式命名为“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并召它赴日候命。2月，三百多名加拿大敢死先锋队员分三批抵达日本横滨。接着，又加入一批侨居日本的新队员，队伍扩大到五百余人。5月初，在孙中山所派代表夏重民带领下，进入山东潍县，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受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先后参加过袭击济南等一系列战斗。广大爱国华侨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业绩，诚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314]

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意志与愿望的。因此，它得到了包括广大爱国华侨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和各兄弟民族的积极拥护与支持，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护国战争也是一次得人心的战争。而这正是滇黔护国军在“兵力本不甚厚，且子弹缺乏，粮饷不足”[315]的劣势下，得以战胜兵多械利饷足的北军的根本原因。对此，王文华在复贵州征兵抚恤会的信中曾明白说过：“自维入湘以来，以直壮之众，当曲老之师，前后数月，大小十余战，攻城夺地，逐北追奔，近赖将士忠勇争先，远承各界激扬鼓励，幸不辱命，非华之力所能致此。”[316]戴戡也在致该会的复信中表示：“特是胜之以武者，固贵军人之先声，持之以坚者，尤赖众心为后劲。倘非邦人君子，道合志同，必致良将劲卒，瞻前虑后，是则收今日之效，集异时之功，未始非诸先生之所赐，而戡则乘便多多矣。”[317]

三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表面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深“疑帝制之难安”。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之时，他就在国务紧急会议上抱怨过：“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指“洪宪”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318] 极力为自己的丑行开脱。12月31日，他虽硬着头皮，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由于害怕引起更大的“变乱”和所谓“匪徒蠢动”[319]，毕竟没有勇气依原计划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2月23日，他更公开下达延缓登极令说：“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320] 28日，又申令早已被他遗弃的“立法院”提前于5月1日召集，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企图以此缓和全国人民的反抗。

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以袁世凯的意志为转移。不仅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讨袁斗争仍在猛烈发展，与此相联系，袁政府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也急遽发展起来，从而更加速了他的失败。

首先是财政陷入破产。云南独立前，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耗资约六千万元，财政本已极其困难。云南独立后，为了镇压护国军，各项费用更加浩繁。光张敬尧督队南下，曹锟布置司令部及设兵站、安粮台等种种开支，便用去五百余万元。结果，连大典筹备处呈领二十万元登极费，也未获“照数全支”，仅领得“十二万元”[321]，可见其财政已拮据到何等程度。

为了渡过这一难关，袁世凯先令各省将中央直接收入之款认真整理，按月督解，不得有丝毫挪欠及截留情事；继则设立洪宪元年中央专款，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月各二十万元，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月各十五万元，四川、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月各十万元，山西、陕西、奉天、吉林四省月各五万元之数摊派筹解。他并

一面于2月底命警厅暗禁商民前往中国、交通银行提款兑现，5月12日更公开发布停兑令，以维持此两大纸币发行银行在金融界的信用；一面命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二千万元，胁迫全国官民认购。此外，他还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不止一次地试图以各种税收和利权作抵，换取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支持。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竹篮打水，完全落空。不管袁世凯怎样三令五申，催促各省速解“应解中央之款”，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解款综核处作为专办各省解款机关，然而事实却是：置诸不复者有之；答以“云贵事起，为保卫本省安宁，费用骤加，无款可解者”有之；借口地方危急，反向袁世凯请款者有之。财政总长周学熙束手无策，惟“转陈袁氏，徒唤奈何而已”[322]。对洪宪元年中央专款，除奉天段芝贵先后汇解三十万元，鲁、豫、苏、赣等省总计解交百万元外，“各省或解未足额，或因军务倥偬，呈请截留”，实际解款者寥寥无几[323]。中国、交通银行“经袁下令维持，商会演说劝导，警厅暗中严禁后，商民提款兑现者”不但没有减少，反日有增加，“形势愈觉不稳”[324]。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也未给他带来什么转机。人民膏血早已榨干，加上灾荒频仍，哪有余力认购公债？何况他卖国称帝，久已失信于民，即有余力，也无人受骗。无怪乎不少地方官吏在电复袁世凯询问能应募公债若干时，或答以“现在情形与年前不同，前定募额能否足数，殊无把握，或以该处人心未定，募债实多困难等语”[325]搪塞。由于全国商民拒绝认购，原定二千万元的公债额实际仅得七百万元。至于对外借款，在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更是一无所得。“初向日本某银行借款二百万，而某银行拒绝之。继以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而美国拒绝之”[326]。其他各国自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后，自顾不暇，又怎能救袁之急？所以，英国麦加利银行董事一见梁士诒欲启齿借款，便“立刻拒绝”[327]。不仅如此，连袁政府赖以苟延残喘的盐税余款也为各国所扣留[328]。在此内部罗掘已尽，对外告贷无门的窘境中，袁世凯的财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破产的深渊。

其次，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更加公开化了。前陆军总长段祺瑞虽然迫不得已，于9月21日以管理将军府事务名义列名“劝进”[329]，但背地里却满腹牢骚，另有打算。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他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330] 1916年2月底，他甚至不顾袁世凯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331]。

与段祺瑞采取同一态度的还有江苏将军冯国璋。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他已不满足于做一省之主，而野心勃勃地想要接袁世凯的班，过一过总统瘾了。这是他反袁称帝的根本原因[332]。1915年12月18日，袁特任他为参谋总长，并表示可先依昔年黎元洪在武昌“遥领”先例，暂不遽卸南京军署责任。冯国璋懂得这是对他拥兵在外不放心，借口“政躬违和”，一推了之，连南京军署事务也交其参谋长师景云和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代拆代行。至于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屡次要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一席，就更无意承担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袁世凯虽曾先后以“调查防务”等名义，派蒋雁行、阮忠枢等心腹干将前往南京对冯国璋阴加监视，又以“赐药”、“诊病”为名，派去大批所谓“医官”，直接“驻署诊视”[333]，使他“半失自由”[334]，但终究未能阻止他与上海各派反袁势力和西南护国军的暗中联系。1915年11月中旬，冯国璋派人至沪，通过清朝遗老郑孝胥密约欧事研究会李根源等赴宁共商大计。只因临事发生变故，李未能成行。12月18日，梁启超刚刚潜抵上海，就有冯国璋的代表登门求见，告知冯被袁世凯任为参谋总长后，“自危甚至”，极盼云南“速举”。据梁启超事后回忆说，早在“滇师初起时”，冯就曾与他“密布腹心”，表示“已有迫袁退位之决心”[335]。此外，冯国璋还与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以及当时同在上海从事反袁联络活动的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云南唐继尧所派联络代表李宗黄，他不仅拒不执行袁世凯“严拿究办”之令，反于1916年二三月间待

以连续两次接见的殊礼。头一次，他向李表示："至低限度，我这边的队伍是决不会开去跟护国军打仗的。这一点，你请唐督【将】军尽管放心。"[336] 第二次，他答应三事：1．立即复电唐继尧，表示赞同推翻帝制，恢复共和；2．由他负责维持长江中下游各部北军的绝对中立，尤将拒绝增援川、湘北军的命令；3．必要时，他将联络长江各督发表通电，请袁取消帝制，并宣布调停时局办法[337]。果然，3月10日，他宣布"政躬渐就平复，自即日起消假视事"。接着他乘广西宣布独立之机，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338]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行取消帝制。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将军密电"。冯等五人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门生故旧，而且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的挑战，对袁精神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据当时报载，袁阅电后，惊恐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339]。

然而，冯国璋尚非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与护国阵营暗通声气的人。据梁启超说，东南诸镇大多如此。孙洪伊也说，淞沪护军副使卢永祥曾通过他与上海商会秘密接洽过上海独立事宜。海军与革命党人张继、柏文蔚、耿毅、何成濬等也"颇有联络"[340]。至于像段祺瑞那样消极抵制帝制的，就更不乏其人了。1916年2月，袁世凯以川、湘战事屡败，拟征调各省军队组织征滇第二军增援前线，但各省将军大多以防范本省为词，不肯受命。奉天将军张作霖初借口"防地紧要"，表示"未便将得力军队分出"，后又借口饷械问题，与袁讨价还价，最后在袁世凯满足其全部要求的条件下，才勉强答应以半师兵力开赴湘边[341]。山东将军靳云鹏以"鲁省近日民党举事风传甚急"为由，电请袁世凯许其募够新军十营后，"再拨第十旅南下"[342]。其实，即使奉命出发之师，也并不真愿为袁卖命。曹锟受命为征滇第一、二两路军总司令后，滞留岳州迟迟不发，甚至密电所亲，求代为打通关节，以免此行。张敬尧索饷要挟，节节观望。李长泰停驻合江，按兵不动。冯玉祥虽一度拼力攻占叙州，然而城下之后，却止戈不进。范国璋、唐天喜非留"后方"，即保"路线"，所驻均非前方战线

重要部位[343]。连汤芗铭也从自身利益出发，拒不接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其内部矛盾之深，意见之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前面说过，袁世凯酝酿帝制之初，无论是东方霸主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英国与德国，都曾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表示过不加干涉之意。这是袁世凯敢于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决心称帝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命驻日公使陆宗舆将筹备帝制的“真实内容”密告日本政府，以示亲密之际，日本政府却在贪婪的侵华野心的驱使下，突然改变了主意。1915年10月11日，大隈重信致电驻华临时公使小幡酉吉说：“无论从那一方面言，日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而特殊，由日本自身利害加以衡量，日本毕竟无法容忍事态（指袁世凯称帝）之自然发展。”[344]并命令他质问袁政府，能否保证不因称帝而酿成事端。1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拟邀约英、俄、法、美等国共同向袁提出警告。当时除美国外，其余三国均忙于对德战争，无力兼顾远东，即有异议，也不能不顾及盟国之谊而力为迁就。于是，日、英、俄三国遂以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日本及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为由，命令他们的驻华公使于28日向袁政府提出了第一次劝告。小幡口述日政府训令说：帝国政府“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345]。英、俄二使也作了同样劝告。法国虽因时值内阁更迭，未及参与，但仍于30日令其驻华公使康悌与日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美国觉得追随日本捞不到多少好处，而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词，拒绝参加。

对这突如其来的警告，袁世凯因先有大隈和朱尔典“不加干涉”的暗中许诺，初本不在意，以为不过是日本为攫取更大权益所作的表面文章。因此，他在11月1日分别答复日、英、俄三国公使时，除了声明“实行改革，断不致发生事端”外，只字未提是否延缓帝制的问题[346]，实际上就是拒绝劝告。岂料这时的日本却是动真格的了。据陆

宗舆3日自日本报告：日“海军已有二舰南行，外务省已预备第二警告，为借口出兵保护之准备”；又说：他刚刚会晤过石井外相，石井对袁政府的答复“殊深遗憾”，并表示日政府将“另作计议”。6日，石井再次接见陆，声称如中国数月内仍改帝制，将被认为是对日本的“欺侮”，态度极为强硬[347]。至此，袁世凯才感到事态严重，为缓和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反对，不得不于9日非正式声明本年内不实行改制[348]。11日，又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面谈，密告“国民解决国体之后，应行各事，头绪纷繁，必须筹办，择一合宜时间，方可举行大典，同有不得不稍缓之势”[349]。他以为这样总可以堵住各国的悠悠之口了。可是第二天，意大利代理公使请缓办帝制的照会又送到外交部，三国劝告扩大为五国劝告，袁世凯这次答复，同样未能阻止各国对帝制的干涉。此后，日、英、俄、法虽曾一度为中国参加欧战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英、俄、法三国为了拉拢袁世凯对德宣战，甚至打算以承认帝制为交换条件，但却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活动下，12月15日，五国驻华公使向袁政府提出第二次警告，声称“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350]。

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迟早必败，将对帝制的外交干涉政策，开始转变为倒袁政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16年1月15日，它以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和避免两国间各种误解为借口，突然宣布不接待原来准备以亲王殊礼接待的袁政府贺礼赠勋特使周自齐。紧接着，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又命在袁政府充当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将日本将采取强硬态度之意转告袁世凯。19日，日内阁会议果然通过一项要袁政府不得忽视“南方”动乱而实行帝制的决议。21日，石井正式通知陆宗舆：日政府希望袁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它将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宣告袁政府妨害东亚和平，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351]。与此同时，日本还采取制造混乱的策略，极力鼓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反袁。无论中华革命党，还是西南护国军，甚至以复辟清朝统治为宗旨的宗社党，都或多或少得到过它

的暗中支持。这已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所承认。梁启超就坦率地承认他赴桂之行，曾得到日人“全力相助”，“殊为可感”[352]。袁政府也非一无所闻，其军事咨议吴金声即说过：云南起事“缘因庞杂，渺渺东瀛，实据主动地步”[353]。

3月而后，随着护国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政府的倒袁政策也进入一个以一定的实力支持各派反袁势力的新阶段。7日，日本内阁正式作出决议：1．等待一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2．（日本）国内民间有志者对于为反袁目的从事各种活动之中国人寄以同情，并接济其资金者，（日）政府虽不公然予以奖励，但可予默认[354]。虽然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一事，由于没有得到英国的响应和时机尚不成熟而终未兑现，但在默认“民间有志者”资助各派反袁势力方面却不乏其例。自3月以来，先后与中国各派反袁势力达成借款协议的有大仓喜八郎、竹内维彦和久原房之助等人。大仓贷与前清肃亲王宗社党头目善耆一百万元；久原接济孙中山六十万元，黄兴、陈其美各十万元；而竹内则与云南军政府代表岑春煊、张耀曾签订了一百万元的借款契约[355]。对此，袁世凯政府也有所闻，淞沪镇守使杨善德就说过：“日政府确有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党人之说，闻此语即出于日人青木之口。在沪各逆，欲借此接济为扰乱长江之用。”[356]此外，日本还不断派员对各派反袁势力进行具体协助。在西南，它加派崛之和太田分任驻滇、驻肇庆领事，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在山东，它派萱野长知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并以驻鲁日军为其后盾。在东北，它派土井市之进为总指挥，策应川岛浪速和宗社党人的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总之，日本除未直接出兵外，其他倒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袁世凯在这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不得不采纳前述冯国璋等五将军和政治顾问莫理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357]，以应危急。他先令天津造币厂所铸帝国纪念新币暂缓启用；接着批准停发大典筹备处经费，悄悄摘下了臭名远扬的大典筹备处招牌。与此同

时，他一面召见因反对帝制而被他免去了机要局长的张一麐，要他参照现任机要局长王式通所草原稿，重新起草一份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358] 一面召见老朋友徐世昌，因徐曾劝他取消帝制，特问他"变更宗旨，能否相助？"并恳求他务必敦促段祺瑞出而共任时艰[359]。为了统一思想，3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各方联席会议，自国务卿陆徵祥以下至各部总长一律参加，徐世昌、段祺瑞以及新由安徽到京的倪嗣冲也应召出席，总计三十余人。首由袁世凯说明帝制无法坚持，决用明令取消，其态度虽似"从容、镇定，但声音颤震，显有内受激刺，外示镇静之象"。接着便将张一麐起草的命令文稿"交诸人传观"[360]。其间，虽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倪嗣冲跳出来反对，但多数以为舍此已无他法。会议最后同意取消帝制，其手续是先由袁世凯将推戴书却还参政院，然后再由参政院议请袁世凯取消，借此表示与承认帝制一样，也是循"民意"所请。同日，袁世凯命开去陆徵祥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即日视事"[361]。22日，正式发表由徐副署的申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消，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362] 次日，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并告令"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363]。稍后，又公开焚毁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以期达到笼络人心和销赃灭迹双重目的。

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宣告破灭。这是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护国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从袁世凯1916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止，总共不过八十三天。即使从1915年12月11日承认帝制算起，至1916年3月22日明令取消帝制，也只有一百零三天。洪宪王朝垮得如此之迅速，这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然而却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尽管袁世凯握有全国政权和优势兵力，处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的鼎盛时期，但是，当他一旦走上公开背叛共和，恢复帝制，开

历史倒车的道路以后，这一切都如盛暑冰山，顷刻消融，到头来，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仍不能不在严正的历史审判官面前低头认输。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并不意味着他已放下屠刀，取消帝制令本身就是证明。在这通颠倒是非的令文里，他先以很长的篇幅叙述癸丑以来所谓“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而他却“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又有多数人“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他又一再宣言以原有之地位维持国体。可是，参政院又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结果，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他还是“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然而该院仍“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在这般“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的情况下，他“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即便如此，也“并未实行”[364]。这样说来，袁世凯对帝制是没有责任的，完全是代人受过。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悔罪之意。他尽管曾私下对人说什么恢复帝制“是自己不好，不能咎人”[365]，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更有甚者，他还在命令中杀气腾腾地警告反对帝制者：“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366]这表明袁世凯下令取消帝制，首先是为了缓和和限制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在他看来，帝制既已取消，就不得再“扰乱地方”了。其次，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总统地位。正如蔡锷所指出：“袁逆之撤消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续增高，无力抗御，姑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367]事实证明：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袁世凯也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

(1) 《蔡松坡集》，第548页。

(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页。

(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19—20页。

(4) 《蔡松坡集》，第768页。

(5)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1页。

(6) 《参政院建议书》，《申报》，1914年11月24日。

(7) 《蔡松坡集》，第1278页。

(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2页。

(9) 《八号政治会议之茶话会》，《时报》，1914年1月13日。

(10)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2页。

(11)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6页。

(12) 《蔡松坡集》，第797页。

(1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8页。

(14)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17册，1914年。

(15) 《经界局有派人消息》，北京《群强报》，1915年1月12日。

(16) 《蔡督办辞职与经界之前途》，《时报》，1915年6月8日。

(17) 《经界局经过情形之报告》，《时报》，1915年4月14日。

(18) 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7月28日。

(19) 《无声无臭之经界局》，北京《群强报》，1915年5月4日。

(20) 梁启超致何擎一函（1915年3月8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1) 《蔡松坡集》，第882页。

(2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3) 《梁启超选集》，第677页。

(24)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5) 《蔡松坡集》，第717页。

(2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

(27)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1915年9月1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0—721页。

(29) 《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十二）》，《神州日报》，1915年9月5日。

(30)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31)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1915年9月1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32)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33) 北京通信：《筹安会最近之写真》，《神州日报》，1915年9月9日。

(3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1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影印件。

(36) 蒋雁行等呈袁世凯文（191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7) 《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二十七）》，《神州日报》，1915年9月20日。

(38) 《蔡松坡集》，第864页。

(39) 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9月1日。

(40)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92页。

(41) 《蔡松坡集》，第821页。

(42) 《蔡松坡集》，第810页。

(4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4) 《蔡松坡集》，第814、816、829、832页。

(45) 刘显世致陈国祥函（1915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46)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7) 《公民请愿之审查》，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9月13日。

(48) 《蔡松坡集》，第829页。

(49) 《蔡松坡集》，第1084页。

(50) 《蔡松坡集》，第850页。

(51) 《记袁厅长所述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

(52)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第4辑，第92页。

(5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92页。

(55) 《北京新发现之大劫案详记》，《时报》，1915年10月25日。

(56)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7) 《志各界欢迎王伯群先生》，《贵州公报》，1916年6月7—10日。

(58) 《志各界欢迎王伯群先生》，《贵州公报》，1916年6月7—10日。

(59)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60) 唐继尧致蔡锷电（1914年4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61) 《唐继尧祭蔡锷词》，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祭词》，1943年版，第17页。

(62) 唐继尧致沈汪度等电（1914年4月2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63) 唐继尧、任可澄致顾鳌电（1915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4) 张鸣岐、龙济光致政事堂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4页。

(66) 《异哉封禁报馆之奇闻》，《觉报》，1915年12月16日。

(67)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68) 《驳君宪救国论》，《觉报》，1915年10月11日。

(69) 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70)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71) 《为国体问题事誓告同胞书》，《觉报》，1915年10月9日。

(72) 《对于筹安会之商榷》，《觉报》，1915年9月28日。

(73) 《辟筹安会所谓势力说之谬》，《觉报》，1915年10月19日。

(74) 《觉报》，1915年12月11日。

(75) 《觉报》，1915年11月4日。

(76) 《赞成，赞成》，《觉报》，1915年12月8日。

(77) 介唐：《呜乎议员，呜乎国民代表》，《觉报》，1915年12月8日。

(78)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79) 《觉报》，1915年12月13日。

(80) 大觉：《慨言》，《觉报》，1915年11月6日。

(8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8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26页。

(83) 《蔡松坡集》，第879页。

(8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8页。

(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8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88)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页。

(89)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26页。

(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91)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49页。

(9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0页。

(93) 刘显世致陈国祥、戴戡函（1915年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9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60页。

(95)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14页。

(9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97)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13页。

(98) 唐继尧、任可澄致统率办事处等电（1915年1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99)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9页。

(100) 《云南将军行署饬第一号》，《觉报》，1915年11月23日。

(1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9页。

(102) 唐继尧致参谋部电（1915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3) 任可澄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4) 《水利与经界两局之现状》，《时报》，1915年11月25日。

(105) 近人多云蔡锷是在筱凤仙的帮助下离京的，其实不过是哈汉章等人为掩饰他们与蔡锷的关系而虚构的故事（见《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106) 《蔡灵到埠后之续闻》，《晨钟报》，1916年12月12日。

(107)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08) 《滇人反对帝制之蛛丝马迹》，《神州日报》，1915年12月29日。

(109)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10) 《记袁厅长所述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关于蔡锷离津日期，无一致说法，笔者认为这一天比较可靠。

(111)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12) 《蔡松坡先生之略史》，《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5日。

(113) 《蔡松坡临去之辞呈》，《时报》，1915年12月7日。

(114) 《蔡将军东游之近讯》，《香港时报》，1915年12月18日。

(115) 《蔡松坡变服出京之秘幕》，《香港时报》，1915年12月8日。

(116) 《蔡将军东游之近讯》，《香港时报》，1915年12月18日。

(117) 《蔡松坡变服出京之秘幕》，《香港时报》，1915年12月8日。

(118) 《蔡松坡集》，第851页。

(11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10页。

(120) 唐继尧致唐在礼电（1915年12月20日），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12月29日。

(121) 《蔡松坡集》，第879页。

(12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7页。

(12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124) 唐继尧复李宗黄函，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125) 墨江庾恩旸著：《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9页。

(12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2页。

(1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7页。

(128)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9页。

(129)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9页。

(130) 《蔡松坡集》，第880页。

(131) 云南、贵州两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132) 《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133) 《蔡松坡集》，第851页。

(134) 《护国文献》，第74页。

(135) 有些论著说同时列名的还有李烈钧，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原件没有李名，见《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

年第4期。

(13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33页。

(137) 《蔡松坡集》，第866页。

(138) 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战史》，《护国军纪事》第5期，1916年12月。

(139) 《蔡松坡集》，第866页。

(140) 《蔡松坡集》，第901页。

(14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51—153页。

(14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7页。

(14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6页。

(144) 《蔡松坡集》，第176页。

(145) 《刘云峰占领叙州之详报》，《中华新报》，1916年2月25日。

(146) 《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中华新报》，1916年5月6日。

(14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3页。

(14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4页。

(149) 《蔡松坡集》，第880页。

(150) 徐进：《贵州独立记》，第1页；《蔡松坡集》，第847页。

(151) 《贵州独立记》，第1—2页。

(152) 《贵州独立记》，第1—2页。

(153) 《蔡松坡集》，第880页。

(154) 云南特别通讯：《黔中之反对帝制声》，《中华新报》，1915年11月27日。

(155)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24页。

(1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1页。

(15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9页。

(158) 《贵州独立记》，第4页。

(159) 《贵州独立记》，第4页。

(160) 刘显世致陈国祥函（191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61) 刘显世致陈国祥戴戡函（1915年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62) 《蔡松坡集》，第880页。

(16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6页。

(16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9页。

(16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页。

(16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2页。

(16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338页。

(16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1—342页。

(16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338页。

(17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0页。

(17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3、345页。

(17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19页。

(173) 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6) 袁世凯原电未见，转引自朱瑞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7) 段芝贵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8) 倪嗣冲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9) 靳云鹏等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0) 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1)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0日。

(182) 袁世凯原令未见，转引自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6年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3) 《政府公报》，1916年1月6日。

(18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6页。

(1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4页。

(18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6页。

(1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5页。

(18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6页。

(18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9页。

(1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0页。

(19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0页。

(19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2页。

(19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19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1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4页。

(19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20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6页。

(2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70页。

(20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9页。

(2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89页。

(20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01页。

(20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03页。

(2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3页。

(20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6页。

(2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9页。

(209) 《麻阳战事之实况》，上海《民意报》，1916年3月25日。

(21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5页。

(211) 王文华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5日），《民意报》，1916年3月18日。

(21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2页。

(21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66页。

(21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0页。

(2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8页。

(216) 《云南快信》，《中华新报》，1916年3月9日。

(217)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21页。

(218) 《广西独立记》，《护国军纪事》第3期，1916年6月。

(219) 陆荣廷、王祖同致统率办事处及各省电（1915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0) 《蔡松坡集》，第848页。

(221) 陆荣廷、王祖同致各省通电（191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2) 陆荣廷、王祖同致统率办事处电（1915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3) 陆荣廷致政事堂等电（1915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4) 陆荣廷、王祖同致政事堂等电（1916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5) 陆荣廷、王祖同致政事堂等电（1916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6) 《蔡松坡集》，第912页。

(2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页。

(22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378—379页。

(22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80页。

(230) 《政府公报》，1916年3月8日。

(23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页。

(232) 陈炳焜等致陆荣廷等电（1916年3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3月23日。

(233) 陆荣廷致各省通电（1916年3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3月29日。

(23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2页。

(235) 陈宦致王士珍电（1916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36) 沈金鉴致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电（1916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37) 王玮琦著：《中华革命党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23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20页。

(23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7页。

(240)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年3月17日。

(241)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年3月17日；李天德述、邓慕韩记：《黄埔谋袭肇和兵舰记》，《革命文献》第47辑，第390页。

(242)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7页。

(243) 《桓桓赫赫之蜀中民军》，《民国日报》，1916年5月30日。

(24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7页。

(245) 李善波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6年3月24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30日。

(246) 《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石青阳通电》，《民国日报》，1916年6月28日。

(247) 《熊克武军在川之活动》，《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4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43—444页。

(24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44页。

(250) 《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页。

(251) 王健：《杨王鹏烈士事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500页。

(252)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0页。

(253) 《汤芗铭祸湘录》，《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254) 张孔修总纂：《永顺县志》卷26，长沙吟章纸局1930年版，第10页。

(255) 萧英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3月27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29日。

(2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67页。

(257) 廖仲恺致居正函（1916年3月10日），《革命文献》第48辑，第81页。

(258)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8页。

(25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7页。

(260) 《东北军宣言》（1916年5月25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85页。

(261) 从军记者无伪：《云南倡义纪闻》，《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62) 叶荃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1月6日），《时事新报》，1916年2月26日。

(263) 《民国日报》，1916年3月4日。

(264) 《云南学生界之请愿从戎》，《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265) 昆明《共和滇报》，1916年2月1日。

(266) 《云南学生界之请愿从戎》，《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267) 《昆明政闻录》，《中华新报》，1916年2月14日。

(268) 《关于云南起义之杂述》，《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69)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70) 曲斋：《贵筑近事记》，《民国日报》，1916年4月30日。

(271) 《滇中人物小志》，《时事新报》，1916年3月27日。

(272)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73) 《财政纪事》，《护国军纪事》第2期，1916年4月。

(274) 《护国文献》，第125页。

(275) 《贵州通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30日。

(276) 《征兵抚恤会开公民大会纪实》，贵阳《铎报》，1916年4月5—7日。

(277) 《征兵抚恤会开公民大会纪实》，贵阳《铎报》，1916年4月5—7日。

(278) 《紫江发起筹饷团》，《贵州公报》，1916年2月19日。

(279)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5月10日。

(280) 唐继禹呈唐继尧文（1916年2月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12页。

(282) 《云南共和军纪实》，《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83) 《护国演说社简章》，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4) 云南护国演说社讲演稿，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5)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86)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12日。

(287)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12日。

(288) 《昆明小录》，《民国日报》，1916年4月21日。

(289) 《蔡松坡集》，第904页。

(2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10页。

(29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3页。

(292) 王文华复贵州征兵抚恤会函（1916年4月），《贵州公报》，

1916年5月6日。

(293) 岑炯昌主修、宋曙总纂：《叙永县志》卷5，重庆肇明铅石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5页。

(294) 金汉鼎致王诘修函，昆明《义声报》，1916年3月9日。

(295) 华封歌致华封祝函（1916年3月11日），昆明《义声报》，1916年5月18日。

(296) 《湘西人民之助战》，《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

(2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3页。

(29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65页。

(299) 《两军在湘之片片录》，贵阳《铎报》，1916年3月1日。

(300) 《重修酆都县志》卷14，第2—3页，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36页。

(301) 《乡民之助顺》，《护国军纪事》第4期，1916年10月。

(302) 《赤水县乡兵之捷》，贵阳《铎报》，1916年4月10—11日。

(3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6页。

(304) 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3月24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27日。

(30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31页。

(3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31页。

(307) 《山东农民亦起》，《民国日报》，1916年4月6日。

(3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16页。

(309) 《民军助义记》，《护国军纪事》第3期，1916年6月。

(310) 《苗族义勇队之组织》，《中华新报》，1916年5月16日。

(311) 《鄂伦春也要讨袁》，《中华新报》，1916年2月7日。

(312) 《赫哲族愤起讨袁》，《民国日报》，1916年3月1日。

(313) 李烈钧致唐继尧电（1916年3月1日），《义声报》，1916年3月9日。

(31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99页。

(3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1页。

(316) 《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317) 《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318)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19) 杨善德、卢永祥致袁世凯电（1916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20) 《政府公报》，1916年2月24日。

(321) 《登极费仅发十二万》，《中华新报》，1916年1月23日。

(322) 《财政部急催欠款》，《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323) 《北京财政之窘状》，《中华新报》，1916年2月23日。

(324) 梦公：《为维持中交两银行者进一言》，《中华新报》，1916年3月1日。

(325) 《各省对于发行公债之意见》，《中华新报》，1916年3月1日。

(326) 梦公：《敬告外国资本家》，《中华新报》，1916年3月2日。

(327) 《袁政府财政纷乱之实况》，《中华新报》，1916年3月26日。

(3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47页。

(329) 王士珍、段祺瑞等呈袁世凯文（1915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30) 彬彬：《中央公园之起义纪念会》，《时报》，1916年12月29日。

(331) 《段氏意见之西讯》，《时报》，1916年3月7日。

(33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5页。

(333) 《南京快信》，《时报》，1916年2月23日。

(33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3页。

(33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09页。

(336)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中》，《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1969年3月。

(337)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中》，《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1969年3月。

(338) 一说没有张勋，而是湖南将军汤芗铭。

(339) 《专电》，《时报》，1916年3月24日。

(340) 孙洪伊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1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41) 《奉军调赴湘边》，《时报》，1916年3月1日。

(342) 《山东兵调不动》，《中华新报》，1916年3月14日。

(34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68页。

(344) 日本外务省文书，大隈外相致小幡代理公使函（大正4年10月11日），转引自《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25页。

(34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页。

(34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8—9页。

(34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1—12、14页。

(34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2册，第127—8页。

(34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6页。

(35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9页。

(35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页。

(3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63页。

(353) 吴金声呈冯国璋文（1916年），《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5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第46页。

(355)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06页。

(357) 《莫里循致袁世凯便笺》（1916年3月21日），《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6年版，第496页。

(358) 《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9页。

(359) 《专电》，《时报》，1916年3月26日。

(360) 《取消帝制与南方大局》，《申报》，1916年3月27日。

(361)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2)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3)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4日。

(364)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5) 《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9页。

(366)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7) 《蔡松坡集》第1004页。

第十章　全国一致迫袁世凯退位和袁的败亡

第一节　全国一致迫袁退位

一　川南停战与广东浙江独立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日，蔡锷尚在川南发动猛攻，广西陆荣廷也正秣马厉兵，准备攻湘图粤。因此，他取消帝制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企图利用全国人民和护国军将士的强烈爱国热情，借口“阋墙御侮”，胁迫护国军停战议和。起初，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梁启超等人，提出“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1)]，并电令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张鸣岐负责与陆荣廷等进行具体“斡旋”[(2)]，以期达到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的目的[(3)]。接着，又于3月30日以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名义再次致电蔡、唐等人，说什么“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元气”[(4)]。

然而，民国四年以来，袁世凯翻云覆雨，背誓食言，“专操权术以侮弄万众”的事实，毕竟太昭然了；他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所给人们的教训，也太惨痛而深刻了；因此，蔡、唐等人没听他这一套。4月2日，蔡锷复电黎元洪等三人说：“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清，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5)]表

示不能继续承认袁世凯为总统。4日，唐继尧也复电指出："今袁氏虽取消帝制，实已构成叛国之罪名"，倘若"真诚悔祸"，即应"毅然引退"[6]。至于梁启超，则早在3月28日赴桂途中便电告过陆荣廷："龙（济光）、张（鸣岐）来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柄，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7] 陆这时刚刚宣布独立，正垂涎湘粤，本无议和之意，接梁告诫后，当即拒绝了龙、张的调停，并于4月17日正式电请北京政府"依据约法转陈项城速行宣告退位"[8]。结果，袁世凯所企望的全国范围的停战议和终因其不允退位而未能实现；仅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单独达成了川南、湘西战场的停战协议。

陈宦在云南护国军和四川人民的打击下，实际上早已存心谋和，只是没有适当机会而已。现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请求罢兵，机会终于到来了。3月27日，他致电蔡锷要求即日停战，妥筹善后[9]，同时又两次密遣信使晤蔡，面告他将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取联邦之制，并推举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为继任总统"[10]，"并谓已派人联络湘、鄂、赣三省，已得赞同等语"[11]。蔡锷见陈宦愿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自己的部队于激战后也急待休整，遂于31日复电陈，同意所率滇、黔护国军自即日起停战一星期。这明明是蔡锷满足了陈宦的请求，可是陈却于4月1日呈报黎、徐、段等，谎称："蔡锷近有悔祸之意，顷来函提议停战七日，以便协商平和办法等语"[12]。袁世凯于绝望之中，忽闻蔡锷同意停战议和，自然大喜过望。他当即指示徐世昌照准停战，并立即举行国务会议，讨论议和具体条件。就这样，陈宦的求和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正式批准，只是议和条件由按袁的意旨修改为"须仍一致承认今大总统袁世凯"[13]了。

4月6日，一星期停战限满，应陈宦之请，蔡锷同意自7日起继续

展限一月，双方于川湘境内一律停战至5月6日下午12时止。9日，陈宦所派议和代表刘一清、雷飙到达永宁，接受蔡锷所提停战规约三条：1．两军暂守防线，无论大小部队不得进出步哨线外一步，如违约冒进，格杀勿论。2．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军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二人为限，且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记，如军使无故被伤害者，依刑律治罪。3．凡有着便服，携带器具，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间者，准予射击擒捕[14]。后来，由于袁世凯于停战期内借口“剿匪”，疯狂镇压川湘各地起义民军，蔡又补充规定：“各地起义之民兵，其有指挥官而有一定标志者，亦应与护国军视同一律，在停战期内彼此均不得相犯。”[15]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各地的起义民军。对于议和条件，陈宦首先提出草案八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仍须一致承认袁世凯为总统。据陈供认，刘、雷二位议和代表出发时，他曾特地交待：“此条如得赞同，其余不妨迁就。”[16]接着，蔡锷提出修正案十条，其中一至九条是：1．仍暂以袁世凯为总统。2．限两个月内召集已解散的民国元年参、众两院议员在上海解决总统问题。3．务期实行民国元年约法。4．起义各省将军以下各级官长，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不得更换。5．大赦党人。6．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为维持国会起见，将起义各省军队编为二师，分驻于北京附近。7．起义各省军队所用军费应由中央协济。8．任段祺瑞为湖北将军驻武昌，仍任冯国璋为江苏将军驻南京。9．护国战争爆发后开拔至各省的北军一律撤回原防[17]。但是，当他通告独立各省征求意见时，除桂、粤（龙济光已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两省因电线梗阻未复外，云贵两省，特别是贵州刘显世却对仍认袁世凯为总统一条极力反对，致使议和陷入僵局。

陈宦见协议难成，无法向袁交差，只好于19日撤回代表，并借口“望浅言轻，实难独膺艰巨”，请求黎、徐、段准其“联合宁、浙、赣、鄂、湘、鲁各省共同担任”[18]，实际上就是撂挑子不干了。此后，陈宦虽继续与蔡锷保持联系，并于5月6日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次议定展限一月，自7日起至6月6日夜半止为第三次停战期限，但所

商议的事已不是什么仍认袁世凯为大总统，而是联合各省迫袁退位了。

蔡锷独自同意与陈宦停战议和，遭到中华革命党乃至护国军阵营内部很多人的反对。4月2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议和二字，在今日不成名词，且亦绝无可以议和之余地。"[19] 7日，李烈钧更直接致电蔡锷等人说："窃谓停战之约，于袁有大利，于我军则不利"；袁可乘此时机维持内部，缓和人心，"割让乞怜，谀媚求逞"；而我则因此"朝锐顿挫，后难为继"；北方准备积极反袁的良将劲卒，也必因此而复怀观望，反为袁世凯所"羁制"。他希望蔡锷等人能"奋志扫除妖孽，建立新猷，永奠邦基，以解时危，以餍民望"[20]。15日，黄兴也自美国通电唐绍仪及全国各界，表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21]。最后，连梁启超也以袁世凯"未有退位决心"而电嘱蔡锷："蜀湘续停战之议，切勿许之。"[22] 但是，如前所说，由于护国军屡经激战，极需切实整理，而各路敌军又"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备，决难移转攻势"[23]。因此，蔡锷终究还是不顾各方的"责言"[24]，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请求。

至于后来一再宣布停战延期，除有陈宦再次转向同意迫袁退位，决心宣布独立等客观情况外，也是唐继尧"增援计划迄未能见诸事实"，和李烈钧"率所部违命入桂，致令全般计划为之牵动"的结果，而这些恰恰是蔡锷所深为"扼腕"的[25]。他虽同意过仍暂认袁世凯为总统，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交换意见，借以为探刺各方面情形及运动联络之地"，是一种过渡性的策略措施[26]。就在他对陈宦所提议和条件提出修正案，"征请众意，以供研究"之时，他还曾"迭电二庵（陈宦），力辟首条之万不可行，促其联合各省迫袁退位"[27]。

其实，蔡锷对停战议和并不存在什么幻想。早在3月底，他就表示过："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28] 为此，他告诫唐继尧"不宜以一隅之小利害而易其喜戚，尤不可因小故而竞意气"

[29]，力促他“赶派增援，分赴川湘，并补充弹药”[30]；同时催促他从速决行以下各事：1．派妥员分赴各省切实联络，促其速速举义，或守中立；2．对粤宜促桂积极进行，赶速攻下羊城；3．速向日本订购军火及制造弹药器械，火速运滇；4．派专员驻日，并请唐绍仪、伍廷芳等以半公半私资格赴欧、美各国接洽一切。候政府成立，即任为驻外代表；5．组织举义各省总代机关，以资提挈；6．赶行筹划军备，以图大举。至于他自己更未因停战议和而放松继续作战的准备。3月31日，他下达首次停战令，但同时又命令前线各将领：“停战期中，逆军难保不破约乘虚以袭，我所有前线各部队仍应固守现阵地，严密警戒，万不可稍有松懈。”[31] 4月7日，他通令续行停战，同时命罗佩金等人：“饬所属前线各部队，于原有阵地扩张强固工事，严密防守，不得稍有疏虞”，“并加意教练新兵，整理一切”[32]。随后，又电告刘显世等：只要敌有机可乘，对我可操胜算，便“不妨借端开衅，痛予打击”，绝不可一味“拘守停战规约之意”[33]。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展开了敦促陈宦宣布独立，以迫袁退位的活动。事实证明，蔡锷“护国倒袁”的立场并没有因停战议和而有所改变。

川南、湘西虽已停战，但从全国来说，反袁斗争却仍在向前发展，所不同的只是斗争形式有所改变而已。在此之前，主要表现为军事斗争，而此后即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广东、浙江等省的独立就是这一斗争形势的产物。

广东为广西近邻，广东不独立，广西独立即无保证。因此，广西独立后，陆荣廷所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解决广东的问题。当时，护国军内部多主由陆直接派兵东下，攻克羊城，驱逐龙济光。连梁启超也说：舍龙、张（鸣岐）退职外，对广东无调停余地[34]。但陆荣廷却“别有规画”[35]。他既不愿损伤龙济光这个昔日同僚和儿女姻亲的情面，也不愿广东落入讨袁驱龙的民军之手，更不愿将自己的实力消耗于羊城一拚之中。他深信，凭他握有百色所俘龙觐光这张王牌，兼以利诱势迫之策，和平解决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以维持龙济

光的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梁启超开始不以为然，后来为避免地方“糜烂”和“专力规复中原”着想，随即也表示“首肯”，并同意派汤觉顿以陆荣廷代表身份赴粤协商一切[36]。

为实现上述“规画”，陆荣廷一面利用龙觐光以兄弟之情动员龙济光“赞同共和”；一面频电龙、张速下决心，与滇黔一致行动。直至4月5日广东独立前夕，他还致电龙、张说：“至北京进军一层，原在意中。荣廷既勉从军民之要求，则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其多寡强弱自亦无所容心，要在两公一转念耳。”[37] 与此同时，他还派大批桂军集结梧州等地，扬言将以龙济光态度决进止。至3月底，他见龙仍无独立表示，遂于27日夜命朱超群为司令，率部斩木越界，向广东廉州灵山县进发，迫该县知事于次日宣布独立。在此形势下，钦廉镇守使隆世储也于同日辞去镇守使职，改就安边都护使，并致电陈炳焜，表示以后一切进行，“唯广西之命是遵”，愿“整饬军旅，直捣黄龙”[38]。此外，龙济光的老上司岑春煊和唐继尧、刘显世等人，也纷纷致电龙济光，或责以护国大义，或相约以讨袁为唯一宗旨，造成一股强大的迫龙独立声势。

但是，对龙济光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广东内部各派讨袁驱龙民军的进攻。龙原本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自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被起用入主广东后，开始成为袁的忠实代理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而且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据《中华新报》徐傅霖揭露：他“一方面自行卖烟（指鸦片烟土），一方面纵令兵士搜烟；一方面得贿包赌，一方面纵令兵士捉赌，以致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杀人之惨，“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指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即使二次革命期间首先迎他入粤的广州总商会，也转而主张“非去龙不可”了[39]。这虽是护国军舆论机关的宣传，某些具体事实难免夸大，但它所揭示的

人心向背却是无可争辩的。

广东讨袁驱龙民军可大别为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两部。中华革命军奉孙中山为大元帅，主要领导者除总司令官朱执信外，还有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南海、新会、江门、新宁、高州等地是他们主要活动的地区。护国军又有自成系统的三大支：一支与朱执信中华革命军一样同奉孙中山为大元帅，实际上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的任鹤年部，即属这种性质。另外两支分别以前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康门高足、原进步党重要成员徐勤为首领。陈炯明在林虎、何海鸣、唐蟒、文群等人的赞助下，自称广东大都督，并组成一支以林海山、陈国强，陈月侨、董伯群、叶匡等人为支队长、号称“十路十八支队”的庞大队伍，在惠州、博罗、增城、淡水、顺德等地积极展开讨袁驱龙斗争。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以著名会党领袖王和顺为副司令，吕仲明为南路司令，王伟为北路司令，关仁甫为东路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朱执信、陈炯明、徐勤等军虽因党派关系而各树旗帜，“向少提携”[40]，甚至明争暗斗，时有竞争，但在讨袁驱龙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或联络绿林发动武装起义，或策动军队实行反正与独立，彼此都在为这个大目标奋力进击。

3月26日，驻潮州陆军团长莫擎宇在陈炯明、林虎、何海鸣和汕头少年再造党的运动下，首先命其军需科长莫序云在潮阳宣布独立。接着，又调饶平、澄海之军，迫潮安知事秦恩述与省城脱离关系。然后致电龙济光、张鸣岐说：“团长受全潮绅商重托，担任军饷，爰于二十七日率师占领潮城，宣布独立。地方秩序，安堵如常。务望顺从民意，克日宣布独立。”[41] 30日，汕头警卫军也响应独立，各方一致推举莫擎宇为潮汕护国军总司令。4月3日，莫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之间，整个潮梅地区已非龙有。与此同时，徐勤在运动海军方面也大获成功。徐原定3月27日进攻省城，由于叛徒出卖，计划流产。随后，他一面“改易方针，从各属起事，以牵制省城”，一面“运动水师，再图大举”。在谭学夔、魏邦平的“斡

旋”下，“宝璧、江固等兵舰首先反正。徐乃以护国军正司令名义，任魏邦平君（为）攻城司令，统率舰队，进迫珠江”，准备于4月7日拂晓，以水陆两军向广州发动总攻击[42]。至于各民军所发动的地方零散起义就更计不胜计了。据《中华新报》驻粤记者梅公说：除羊城一隅外，几遍地皆民军，广州“官僚眷属，富商大贾，迁徙一空，不独龙氏蜷伏观音山不敢越雷池一步，若张鸣岐、凌润台、蔡伯浩诸无赖亦靡不倚观音山为兔窟”[43]。

在外有桂军压境，内有民军突起的情况下，龙济光又因禁烟督办蔡乃煌告发他与陆荣廷密电频传，“要与独立有关”，因而受到袁世凯的疑忌。袁一面“饬驻沪第十师长卢永祥率师赴粤”，一面命他“亲督师旅出屯肇庆，进规梧州”[44]。龙被逼得走投无路，进退失据，终于在4月6日选择了陆荣廷等人为他设计的以独立“保全地位”的道路。这天下午7时，他答复请他宣布独立的警察厅长王广龄说：“时已入夜，出示恐不及，可先由警厅通知各界，然后出示宣布。”王当即“转知报界，并谓尚有都督告示登报，请留版稍待”[45]。于是，广东独立的消息即刻传遍了羊城的大街小巷。

龙济光的独立，当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是为了迫袁退位[46]。他发布的所谓《独立布告》，就是证明。《布告》说：“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民之责。”[47] 这表明他的“独立”主要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但在袁世凯的大厦将倾之际，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对袁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据袁的亲信团长索崇仁说：袁世凯“自粤浙相继独立后，大约即受肝疾，饭量亦减”[48]。可见，广东独立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当然，这是龙济光始料所不及的。

浙江独立几乎与广东独立同时发生，仅晚六天而已，但宣布方式却不同于广东，是通过浙军的武装起义来实现的。正如当时的《民国日报》所指出："浙江独立，与他省不同，他省为将军独立，浙江则人民起义也。"[49]

浙江军队除警备队外，计有陆军一师一旅，多数官兵参加过辛亥革命时会攻南京的战斗，是一支富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军队。对于袁世凯称帝，除兴武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参谋长金华林、警备队司令官徐乐尧等少数人甘于同流合污外，其他中下级军官如十二旅旅长童保暄、警察厅长夏超、水警厅长徐则徇等莫不持反对态度。因此，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后，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响应滇黔独立的准备活动。童、夏两人不仅多次借机亲往上海与各派讨袁志士接洽，而且还在杭州暗中充当反袁志士的保护人。据朱瑞说，警察总厅就是他们秘密会商起义事宜的机关部[50]。

在策动浙江独立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投入的力量最多，所起作用也最大。孙中山说："浙江独立，以吾党势力为多。"[51] 袁世凯的军事咨议吴金声也证明："查浙江方面独立，实由国民党人运动下级军官，成斯变局。"[52] 具体说来，即是王文庆、莫永贞、阙麟书、郑康甫、陆翰文等人长期联络运动的结果，其中王文庆尤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王文庆又称王军、王钧、王文卿等，早期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浙军营长，后退役闲居。袁世凯称帝后，他与莫永贞等人相约倒袁，因而"对于浙事，早有计画"[53]。他一面派阙麟书、项霈、汤榕甫、陆翰文、郑康甫等人赴杭"主持一切"；一面嘱王赞尧运动军队，林柔远联络警界[54]。经过他多方努力，独立时机，渐趋成熟。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仍继续抓住总统权力不放。广东独立后，他又准备移南下入粤受阻的卢永祥第十师和陈光远第十二师于浙江，以巩固他对江南的统治。消息传开，全浙人民，特别是浙军中下级军官无不愤慨异常。竞相要约："如北军果入浙境一步，即以武力拒之。"[55] 王文庆因势利导，决定于4月10日夜发动

武装起义。后因准备不及，临时决定推迟至11日夜举行。

10日晨，阙麟书等率炸弹队三十余人自沪抵杭。次日，召集童保暄、夏超和军警两界多数中下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对起义事宜作最后抉择。与会者一致决定：起义于明晨4时举行，由倪遇开凤山、候潮等门，迎接二十四团；由吴骏开艮山门，迎接二十三团；并设临时司令部于报国寺。12日晨，起义如期发动，二十四团以阙麟书、郑康甫等人组成的炸弹队为前导，迎着黎明的晨曦，直扑将军署。当时，将军署卫队大部因故他调，所剩仅朱瑞新招海盐家乡亲兵百余人。这些未经战阵的兵卒，一闻枪声，即缩作一团，毫无抵抗力。朱瑞见势不妙，偕金华林匆匆逃去，将军署迅即为起义军民所占。接着，起义诸要人在此举行了第一次善后会议。首由主席莫永贞提议先举都督，继由郑康甫提出推举都督的四个条件：1．素有德望者，2．有联络各民党能力者，3．与北京无特别关系者，4．对人民无恶感者。紧接着，阙麟书提议举王文庆为都督。这表明莫永贞等革命党人在力图争取独立后的领导权。但这一提议，遭到以童保暄为首的军界实力派的反对。童针锋相对地提出："目下宜变通办理，都督以屈巡按使为宜。"[56] 莫永贞等虽为此辩论多时，但由于军界坚持甚力，不管屈映光本人如何"誓死不从"[57]，最终还是通过了童的提议，王文庆仅被举为参议会会长。事实证明：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单靠运动军队反正，是难以掌握领导权的。

当日下午，在军绅各界头面人物的"合词恳吁"下，屈映光勉强同意以浙江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名义维持全省秩序。他一面布告各方，声称："本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一切军政民政照常办理"，"凡尔各色人等，务须各安生业，共遵法令。倘有私自招兵及假托独立名义，煽惑人心，扰乱秩序者"，"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58]；一面致电袁世凯，力陈其不得已而从"军绅各界之请"的苦衷。袁为了稳定人心，立即于14日全文公布了屈映光的呈文，并发布命令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

兼署督理浙江军务”[59]。这就反映了浙江独立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革命党人和浙江人民是不会同意这种“只闻维持秩序，不闻有反袁声调”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王文庆得知屈映光仍以巡按使名义发号施令，“乃勃然大怒，宣言与屈氏誓不两立”[60]。一个不愿公布姓名的人也致函独立各要人说：“试问诸君，名为独立，而总司令乃由袁政府任命，且曰巡按使兼任云云，天下滑稽可笑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乎！”[61] 原浙江省国会议员杜士珍等人除号召各界另推贤者维持治安外，还直接向屈映光提出：“非公退让，蔑以明志桑梓，恭敬墟墓财产。”[62] 已于13日宣布独立的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更派兵两营开进杭州，直接用刺刀逼屈交出政权。屈映光见此情状，只好赶紧宣布正名为都督，以缓和人民的反抗，但暗中却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杀中华革命党人夏次岩就是突出的事例。人民忍无可忍，终于重新摘下他的都督桂冠，并“派兵一连送其回籍，阳为保护，阴实监察”[63]。5月6日，新举都督原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宣布正式就任，“浙事从此大定”[64]。

浙江独立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由于它地居“濒海要冲，形势颇胜，交通最便，又为财赋素著之区”，因此，其影响和作用却是其他独立省份无可比拟的。一个袁世凯死党说：“查滇黔桂粤相继独立，时局艰难，已渐呈尾大不掉之象。第各该省远在西南，其势力仍限于一隅，譬犹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自浙省有四月十二日之举，于是变生肘腋，迫在眉睫，而长江下游治安，遂为摇动。”[65]

二　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继广东、浙江宣布独立之后，独立各省为统一军事和“对外取得战团承认”[66]，又进一步联合起来，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一军务院，与北京袁世凯政府相对抗。

军务院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唐继尧等云南首义领导人以为云南一动，各省必然响应，袁世凯很快就会垮台，本不打算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建立政府，只待袁世凯推翻后，再举黎元洪为总统，行内阁制，以梁启超为总理，“届时发表，庶不失先后程序”[67]。可是，首义一月有余，除贵州刘显世外，“各省将军仍复拥兵观望，未即望风响应。虽有蒙古称兵，又闻其以拥护清室为帜者”[68]。加上驻滇外人又屡讽以“既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当然自树”[69]。于是，唐继尧于2月中旬致函上海梁启超，提议略变前计，“按照约法，将举黄陂为总统一层，及组织中央政府大概情形，先行发表”，并要他尽快撰一稿寄滇，同时“寄登上海、日本各报，一以引起各省之响应，一以消弭蒙古之异谋”[70]。但是不久，随着广西宣布独立和袁世凯取消帝制，形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护国军不但渡过了它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似乎胜利也在望了。于是，唐继尧对先行组织政府一事又不那么以为然了，转而同意刘显世的意见，“我辈为收拾全局，巩固国基计，但使袁氏引咎退职，国家无恙，自宜与段（祺瑞）、冯（国璋）两公联络一气，速谋根本解决之法。似不必别设临时统一机关，蹈分立之嫌，成相逼之势，致段、冯两将军与各方镇各自为谋，转生种种障碍”[71]。

然而，梁启超却与此相反，他早在天津策划反袁起义时就怀有组织临时政府的主张，所以接唐继尧函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策划活动。他先与上海各有关方面协商，大家都赞成“早立”。3月8日，他应邀赴桂，到达香港时，又与李根源、杨永泰、林虎、文群等人进一步“商及元首问题，决定拥戴黎公”[72]。他们认为设立临时统一机关与联络段、冯并不矛盾：“吾辈即欲联络段、冯，共襄国事，亦须速谋发展实力，至少须以先达扬子江流域为第一步，俾南方位置日益巩固，然后居间转移之，段、冯始有所恃，以与袁氏周旋。”[73] 随后，梁启超在密赴海防的日本运煤船妙义山丸上，起草了护国军军政府宣言、致黎元洪电、致各国公使团和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与组织条例等文电。接着，他一面派遣随员黄群带着他的“手书及计划组织

临时机关各稿”，前往云南征求唐继尧的意见；一面致电陆荣廷，告以他在沪、港与各方面熟商，拟组一军务院，“执行军国重事”[74]。3月底，唐勉强复函表示：“组织军务院条例诚为过渡时代不二办法，均可照行；所尚待研究者，地与人之问题耳。现在成、渝未下，我之范围只滇黔桂三省，究以何者为合宜？抚军长一职，究推何人为适当？同人几经研究，均尚未得正确之解决。仍恳先生与干公（干卿，陆荣廷字）切商提出，再征求各方面意见，方能确定。”[75]

正当梁启超准备就人地两问题继续与各方面交换意见时，龙济光突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这固然使独立省份增加到四省，壮大了筹划中的军务院的力量，但由于乘海容舰南下的北军一旅将到，而广东独立后，城厢内外欲乘机蠢动者又颇多[76]，梁不得不暂时中止这一计划，转而与陆荣廷先谋广东内部的调停和统一。4月8日，陆、梁应龙济光与讨袁民军各方之请，由南宁启程赴粤。出发前，他们一面劝谕广州各官署、团体和报馆“戮力同心，协助各官厅维持秩序”；一面告诫陈炯明、徐勤、朱执信等讨袁民军要顾全大局，捐弃小忿，勿以“义愤太过，流于躁进”，致“为人借口生事，陷粤境于糜烂”[77]。显然，他们幻想通过牺牲民军利益来求得广东局势的稳定。

可是，当他们13日行抵梧州时，忽闻广州发生海珠惨案，梁启超多年挚友，以他和陆荣廷代表身份先期抵粤的汤觉顿和陆军少将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徐勤所部护国军中路司令吕仲铭[78]、广州商团团长岑伯著等人，在12日徐勤召集的海珠联席会议上竟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的狙击，汤、谭当场殒命，王、吕也未及救治而亡。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但是，陆、梁并未从中吸取到什么教训。事后，他们仍向龙表示，如果他能答应下列几项条件，将仍维持他的广东都督地位：1．交出蔡乃煌、颜启汉；2．分调警卫军出省；3．整顿济军军纪，解散侦探；4．陆抵广州住所临时酌定，由龙来陆所会晤，陆不上观音山；5．将来济军以一半自卫，一半出师征赣；6．定东园为桂军屯所。虽然他们也曾致电广州总商会和报界公会，

扬言将率桂军万人“星夜东下”，“为乡邦挽此浩劫”[79]，却不过是虚张声势。事实上，陆荣廷、梁启超到达广东肇庆后就驻足不前了，其前锋莫荣新也仅仅到达三水。

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沪、港同至肇庆。他与梁、陆一样，认为“龙之独立，如出于伪，则与袁之关系必未绝。操之过激，将取消独立，回复奉袁之状态，江西、福建两省之北兵必乘机而入，吾将何以应之？”因此，“龙恶固所必去，惟俟大问题解决后，再作处置”[80]。但是，陈炯明、徐勤、朱执信等讨袁民军认为海珠惨案乃是龙济光“伪独立”的大暴露，力主“排而去之”。且还有别的反龙势力，“其驰电反对龙济光督粤者几于应接不暇，就中若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诸人为最力者”[81]。在这样的情况下，陆、梁无法，不得不续向龙提出如下三项条件，以调和民军的反抗：1．让广东都督于岑春煊，限十日内交代清楚；2．筹集军饷二百万元，由龙率师北伐；3．所有退伍济军，由龙遣散回籍。龙济光在民军和桂军的压力下，只好稍示让步，于20日早复电陆、梁：“愿率济军赴赣，粤督敬烦西林担任。”[82]接着又同意陆、梁意见，划地而守，马口及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防守；马口及西南以下由龙派兵防守，彼此不相逾越。龙既已表示让步，陆荣廷遂将善后交由岑春煊、梁启超等驻肇庆处理，自己回梧州布置征湘事宜去了[83]。

其实，龙济光并不准备兑现他许下的诺言。陆回桂之后，他“以肇庆兵力不足畏，遂谓辞职北伐之事，必二月后方能实行，此为龙氏第一次食言”。接着，他又表示“粤都督一席决不辞去”，甚至要他“出一自将北伐之宣言”也办不到[84]。他一面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工具，公开捏称“岑春煊以都督相让”的谎言，以蒙蔽舆论：一面于4月18日和23日派兵“进剿”新会江门和佛山石湾两地，镇压反对他窃据都督地位的朱执信中华革命军。稍后，他又拟定一个全面“进剿”各地民军的恶毒计划，企图彻底解除各地民军对其都督地位的威胁[85]。以

上事实表明，陆、梁逼龙让位于岑的计划，由于内无实力保障，外不依靠民军助力，终于不可避免地破产了。

为了尽快结束广东内部的混乱局面和出师北伐，梁启超等人又煞费苦心地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新方案，并拟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根据《都司令部组织令》的规定：两广护国军都司令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政。显然，这主要是针对龙济光拒不肯让出都督一席而设的。《时报》菊庄通信指出："明明都督之任（指广东都督）不能接收，故特设此都司令之名，使都督亦受其节制，此提高一级以图可以驾驭，特一委曲求全之术而已。"[(86)] 据当时参预其事的吴贯因说："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亦赞成此议。"[(87)]

4月27日，龙济光率段尔源、郑开文、李嘉品等人与陆荣廷联名电奉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5月1日，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岑宣誓就职。其下设有参谋部、秘书厅、参议厅、外交局、财政厅、盐务局、饷械局、副官处等机关。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冷遹为参谋厅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曾彦为饷械局长，杨其礼为副官长[(88)]。盐务局本专为收广东财权而设，因龙济光不肯撒手，不特虚有其名，"且并职员也无之"[(89)]。本部之外，还"设有将校团，专以搜集各级军官。初以孔照度为之长，后孔赴汕头任第一师参谋长，以独立团长张习兼任之"[(90)]。两广都司令部直辖军队四师二混成旅一独立团，以莫擎宇、李耀汉、莫荣新、林虎为师长，程子楷、魏邦平为混成旅旅长，张习为独立团长。从此，龙济光虽仍牢牢把持着广东军财两权与西南护国军貌合神离，但名义上毕竟是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了。这就为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龙济光宣布拥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后，梁启超立即向各有关方面重新提出了军务院组织计划。首先讨论了抚军长人选和军务院

所在地问题。在此之前，唐继尧曾通过黄群向梁表示："拟先定军务院设置地，即以所在地之抚军代表，暂不设抚军长名目，较觉圆融"[91]，实际是暗示他要当抚军长，因为他心里明白：云南作为首义省份，定为军务院所在地将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李根源说："军务院所在地，初议云南。继以广东濒海，策应较易，佥谓广东便。"[92] 这是护国战争发生后，唐继尧野心家面目的首次暴露。李根源以乡土关系，附和唐意。上海陈叔通等人则认为"领袖何人不敢下一断语，然总不可使有总统嫌疑之人为之，以为袁氏利用，转坚他派忠于袁氏之心"；并指出：如以陆荣廷为领袖，"便无何等嫌疑"[93]。梁启超初主岑春煊，"意以年高望重，非此莫属"[94]；后根据各方意见折衷提出："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唐继尧）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似不能不在粤。蓂公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岑春煊）任之。"[95] 这一折衷办法为军务院的实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蔡锷起初以为设立军务院将与大总统问题"并为一谈"，本不赞成，后接阅梁启超所草各宣言及军务院组织条例，知是"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才勉强采取支持态度。这固然说明他没有争权的欲望，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他害怕因此引起北洋军阀反对的怯弱心理[96]。

5月7日，滇、黔、桂、粤四省都督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宣布：为统一对袁军事和筹画建国方策计，"今由继尧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97]。《军务院组织条例》也同时公布，共十条，其中关于抚军的规定是："军务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各省都督或护理都督，两省以上联合军都司令、都参谋及各独立省确已成军有二师以上之军总司令任之。凡新取得前项资格者，同时取得抚军资格"[98]。这是一个有意"避大元帅制，免贼借口"，对所有尚未宣布所谓"独立"的军阀、官僚、政客均预留余地的八面讨

好的方案。所以，“于与段、冯接洽，固毫无滞碍也”[99]。

8日，酝酿两月有余的军务院，在龙济光拒绝于广州提供办公地点之后，不得不在肇庆宣告正式成立，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因唐不能驻院，其职权由抚军副长岑春煊代摄。推唐绍仪为特任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范源濂、谷钟秀为驻沪委员，钮永建为驻沪军事代表。抚军初由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吕公望十人组成。后蔡锷“为取得发言权，贯彻其主张计”[100]，又坚持补入罗佩金、戴戡二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不断增加，但直至军务院最后撤消，也没有增补一个中华革命党的代表。

军务院成立前后，曾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早在4月18日，唐继尧等人便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表了第一、二号宣言，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101]；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102]。军务院成立后，当即于5月9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103]这样就从内外两方面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11日，军务院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曰：拥护国法而已”；号召“各省国会议员迅速筹备集会程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各种法定机关得以成立”[104]。它于云南首义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拥护“约法”、保障国会的主张。次日，针对冯国璋否定“约法”的谬论，梁启超再次声明：“约法”者，民国之生命也。项城毁之，国人争之。国人以爱护“约法”，故不惜糜顶踵以为之殉。项城虽自绝于“约法”，而“约法”未尝因此而损其毫末也。项城所以失去总统资格，全因其犯“约法”上之谋叛罪，并非“约法”消灭，总统名义消灭，而彼之资格随而消灭也[105]。梁氏的这一声明，进一步表达了他捍卫“约法”的

决心。

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进行军事“围捕”。5月7日，陆荣廷乘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之机，亲督陆裕光、马济、林俊廷、沈鸿英等部三十余营入湘北伐，由祁阳进迫衡州（今衡阳市）。为配合陆、望作战，岑春煊命龙济光饬原驻粤北连县、乐昌、阳山等处军队移扎出境，向郴阳、桂阳方面前进。而刚由昆明经贵阳抵达湘南靖县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的程潜则集重兵于武冈，压迫宝庆（今邵阳市）。在大军齐发的形势下，湖南北军倪毓棻、唐天喜、刘跃龙等部望风而逃，不战自退。据林俊廷等5月16日电称：“前派赴衡州委员回报倪毓棻确即退兵，现已陆续开发起程。”[106] 24日，望云亭也报告说：衡州“倪军全部退出。长沙、湘潭唐天喜之兵，日内亦完全出境。至宝庆刘旅长（指刘跃龙）迭次函称：‘大局危急，力求和平’”，“日内决意全行退出”[107]。至此，湘南几已无北军踪迹。

赣闽两路，由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直接担任。早在军务院正式成立之前，岑春煊即已开始筹组军务院直辖部队。他征得唐继尧同意，调李烈钧所率云南护国第二军至肇庆“拥护根本”[108]。李部自广西百色出发，经南宁、梧州，于5月12日到达广东肇庆，受到岑春煊、梁启超以下全体军务院成员的热烈欢迎。这月下旬，除龙济光济军一军尚暂未任定司令官外，其他各军皆已编组就绪，正式组成了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他们是：云南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部，两广新编第三、四、五、六军总司令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部，两广新编第一师师长莫擎宇、第一混成旅旅长程子楷部、独立团张习部和粤军一军，总计九军，经唐继尧同意，由岑春煊就近直接指挥。其作战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扫除赣闽边界敌兵；第二期，驱逐福建、江西境内敌兵，占领福州、南昌；第三期，集中湖北，进驻武汉；第四期，直捣幽燕，绝敌根据。

5月27日，岑春煊命滇军李烈钧部和桂军莫荣新部两团于6月2日

集中肇庆，15日前经三水、琶江口出韶关，向江西赣州前进，并以方声涛梯团向福建方面运动，协同广东潮军进行；林虎所部于6月10日集中肇庆附近，加入江西方面作战，务于20日前到达江西虔南（今全南县）。粤军于6月20日前由广州出发，取道惠阳，于和平集中，经江西安远、雩都（今于都）向南昌前进；潮军莫擎宇部待李烈钧所派方梯团进抵福建边界之后，以一部防诏安之敌，一部协同进逼福州。程子楷旅于6月20日以前由肇庆出发，向湖南方面前进，掩护入赣滇军作战。6月1日，岑春煊等人郑重宣布：1．我军为讨袁而起，袁不退位，绝无调停可言；2．袁氏退位，我军务院恭承继任黎大总统正式就职；3．非至袁退位，黎大总统正式就职时，决不停止军事进行；4．拥护约法，保障国会，俟前参众两院议员依法集合时，国家大计交其解决。5日，滇桂军入赣先锋队张开儒、申葆藩、江永隆各率所部由肇庆出发。同日，岑春煊发表宣言，正式宣布出师北伐。

此外，广东局势长期纷乱不堪，对大局影响甚大。因此，收拾粤事就成为军务院的又一大任务。岑春煊、梁启超也明白，粤局不稳，纯属龙济光之流所为。梁就说过："吾为粤事亦吞声呕心，卒无善果。海珠之变，歼我之良，虽非龙主谋，而粤局内容可以想见，悍将蟠于上，私党哄于下，浩劫终无幸免，所争早暮耳。"但他们又认为："以围攻观音山双方相消之兵力，足举湘赣闽而有余，龙灭而桂亦疲，更何挟以御贼？况糜烂后之收拾，非期月可奏功，而独立省份内讧之丑声，徒令老贼匿笑，友邦藐侮"，因而决定仍以"饮泪言和"为收拾粤事方针[(109)]。他们应龙要求，责令各路讨袁民军司令剀切劝谕所部，"务轻权利与私心，并即列册报名，听候编师北伐"[(110)]，并拟定改编办法四条：1．确有枪枝者方为合格；2．合格民军首领或委为统领，或委为营、连、排、棚长；3．不愿北伐者，准其归农，但枪枝须作价缴官；4．自出示后，如有不报名请编，始终负隅抗拒，意图扰乱治安者，即以土匪论，当调集大军严加痛剿。对这名为改编、实则取缔的所谓改编办法，各讨袁民军当然不能接受。朱执信针锋相对地提出：1．各路民军必俟龙济光离粤始允停战；2．中华革

命军编为北伐军，饷械由粤省供给；3．仍用中华革命军旗帜。可是，这些正义的要求却为军务院主要负责人岑春煊所一一否定[111]。军务院对讨袁民军如此苛刻，而对龙济光的倒行逆施却一味迁就、隐忍和优容，“宁蒙养奸之讥而不辞”。连岑春煊自己都承认：李烈钧出师北伐，由粤出赣，龙济光一面假托各界名义电拒经过，一面调重兵于西南狮子窦一带以示威，“我当时力劝李协和委曲求全，改道琶江。龙初驻兵韶州不过两营，及知李将赴韶、北江方面，龙即加派六营以待李。至李军既到，龙阴令朱福全闭城绝道以困李军，并开炮轰击。我闻耗惶急，力为调停”[112]。这就是军务院收拾粤事的真相和内容。

以上事实说明：尽管军务院一再声明它“并非政府性质，且为临时机关”[113]，但其组织过程和成立后的活动已证明它是一个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当然，它还只是一个不“完备”的政府雏形。李根源说它远逊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临时政府，是符合实际的。就其组织成分来说，则是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临时联合机构，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讨袁各派的联合机构，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反袁最早且最坚决的中华革命党人，始终被排斥在外。梁启超、陆荣廷、唐继尧等人无论在成立过程中还是在成立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表明其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手里。

然而，军务院的成立还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的。它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玩弄和谈阴谋，企图继续窃据总统位置之时宣告成立，这本身就是对袁世凯最沉重的打击，何况它成立后还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袁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上海《时报》记者彬彬为文指出：“北京政府所惧者，南方军务院之组织已俨然一临时政府。从前南方势力虽大，尚无统一机关，北方尚有城社可凭。今如此，则所谓中央政府已无复奇货可居。又连接紧要报告，南方一面依约法戴黎，一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废止北京政府，此等消息较之某省

独立、某战失败之惊报，何啻十倍。”[114] 李根源也说“此举于军事、外交上收效颇巨”[115]。特别是它屡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昭示天下”，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其意义就更非一般可比了。这不仅为护国战争补充了新的纲领，树立了新的旗帜，而且为它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为此郑重宣布：“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116] 可见，军务院已将护国战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军务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除其内部各方面为种种私利而相互竞争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对军阀、官僚、政客的信任与依靠，远在人民之上。虽然这在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袁世凯方面也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留下的后患是无穷的。以广东龙济光为例，由于军务院对他姑息，结果反使军务院处处遭到刁难与掣肘，以致出师北伐也难以顺利进行。当然，这并不是军务院任何个人的责任，而是中国整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即如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人，也曾一度认为“大敌当前，而内纷不息，事实无谓”，并电令广东中华革命军勿与济军相持，“俾泯猜疑，并力求事实上之一致”[117]。

三　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随着护国战争的发展和袁世凯失败前景的明朗化，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进一步加剧，袁政府最终陷入了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境地。首先是段祺瑞、冯国璋这两员北洋干将已不甘心作袁世凯的工具，转而野心勃勃地企图效法他辛亥年的老戏法，准备乘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迫其退位之机，取而代之。

4月中旬，袁世凯眼看和谈阴谋破产，为巩固其总统地位，决定任命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享有一定威望，而又为护国军所注重的段祺瑞为国务卿，以代替3月21日上任以来在挽救危局方面迄无成效的徐世昌。他满以为段是他一手提拔的，这点面子总不至于不给。万没料到段会向他提出改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袁意识到，这是四年前国民党人限制其权力的老法子，心里不免窝火。但一想自己所处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也只好忍气吞声于21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118]。次日，他下令准徐世昌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23日，任段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原名王赓）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以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宣告成立。5月8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正式宣布撤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但是，段祺瑞所要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他接任后不久，即要求袁世凯“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119]，明目张胆地逼他交权。然而，袁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不但“三机关之裁撤终未实行，且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120]，从而更加深了段祺瑞的不满。

正当袁世凯为段的背主自立而大伤脑筋之时，4月18日，冯国璋突然会同新任督理安徽军务张勋、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通电各省，提出总统留任、大赦党人、惩办奸党等八项主张，请求同意[121]。袁世凯对此虽不尽满意，但总统留任一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冯国璋可用，因而“颇欲置段而倚冯”[122]。蒋雁行5月4日向冯透露：“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人，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123]

然而，冯国璋对袁世凯并不比段祺瑞更忠实。帝制取消后，他不

但继续与梁启超等护国人士保持联系，反对袁世凯“以武力为后援”，甚至要求他“敝屣尊荣，预作退计”[124]，而且一直在利用护国军和袁世凯双方对他的依赖心理，积极联络、组织第三势力，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4月25日，他致电未独立各省，提议“各省联络，结成团体”，“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指南方独立各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并露骨地表示：“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125] 5月1日，他又在先前与张勋、齐耀琳联合所提八项主张的基础上，依据所谓“法律”与“国情”，重拟关于总统、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官吏、祸首、党人等八项主张，作为他们的共同纲领。关于总统问题，他荒谬地提出：“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为【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国事，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126] 可见，冯国璋所以承认袁世凯暂负总统责任，不过是为了抵制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而他所以抵制黎继任，正是因为他自己要当总统。

为此，冯国璋于5月5日亲赴徐州疏通张勋；过蚌埠时，又邀新任长江巡阅副使兼署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同行。6日晨，冯、倪抵徐，与张勋晤商，一致同意发起南京会议，以决国是。同日，他们一面急电袁世凯，请他“切勿轻听流言，灰心退位”[127]；一面电请未独立各省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15日以前齐集南京，“开会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128]。但是，他们对会议所抱的希望却各不相同。冯国璋意在借此确立其盟主地位，为提前召集国会，选举他为总统奠定基础。当时舆论指出：南京会议“表面上系为维持现总统袁氏，其实黑幕中实为冯华甫利用此会……笼络未独立各省结一大团

体（各将军为自己地位起见，亦无〈不〉趋而拥戴冯氏），以为将来执牛耳，提出条件，效辛亥袁氏之故事”[129]。张勋则企图乘冯国璋承认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为清室所委任之机，妄图复辟清朝废帝，而倪嗣冲却是“洪宪”王朝的孤臣孽子。这就注定了南京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

袁世凯对冯国璋的这一阴谋早就看在眼里，他私下对王士珍说过：“此次南京会议，明为北方势力，实不啻由予手中攘夺大柄，其结果予早洞悉。”[130] 因此，他表面装作对冯十分信任，许以特权三端：“1．和局之解决，准其有自由断决之权；2．政府关于和局提出之议案，准其有酌核之权；3．和局不成，倘出以决裂，准其有参预重要军政之权。”[131] 他甚至假惺惺地电冯等说：“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宦亦相劝以休息，均之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132] 但他暗中却一面指派蒋雁行前往南京监视会议，一面派阮忠枢等人前往徐州搬弄是非，扩大冯、张矛盾，极尽操纵、破坏之能事。

南京会议本定5月15日召开，由于袁世凯的干预与破坏，张、倪日渐消极，各省代表，所到无多，延至18日才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二十三人，公推冯国璋为主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袁世凯的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峄首先发言说：“大局危迫，宜吁请总统暂弃尊荣，使天下早日息兵，以救危亡。”[133] 接着，湖南、山西代表表示赞同，其他代表也相继附和，主张袁氏退位之说占了上风。袁世凯见势不好，急命倪嗣冲亲自出马，力挽危局。倪率卫队三营于当晚

赶到南京，次日抢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并力图变南京会议为“征剿”护国军的军事动员会议。在倪的讹诈与威胁下，原主张袁世凯退位的代表，大都噤若寒蝉，有的甚至改变初衷，反主袁留任了。为挽救败局，冯国璋借口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提议由国会解决。接着又接过丁世峄的建议，提出电邀南方独立各省派代表出席会议，以解决总统问题，幻想借助护国军之力打击倪嗣冲等人的嚣张气焰。岂料南方独立各省早已不满于他5月1日所提仍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的八项主张，断然拒绝派代表赴会。而张勋、倪嗣冲二人则有意散布他也是拥袁留任的主战派，大违冯的本心。冯以希望落空，遂于30日宣布保境安民，解散南京会议。

但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争夺，并没有随南京会议的解散而结束。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与冯已隐成敌国。”(134) 这种争夺极有利于护国事业的进行，而对袁世凯则十分不利。他沮丧地供认：“滇黔反侧，远在边地，尚非紧要。浙粤之变，余亦另有把握。冯乃我手下最有力量之人，彼竟公然宣布叛言，遂使各省皆为摇动，大事益为棘手，令予进退维谷。”(135)

与段、冯逼袁交权的同时，曾自命为袁世凯“屏藩”的陕西将军陆建章，为了自身的生命财产，竟也不顾袁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而听任陕北镇守使陈树藩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

陆建章入主陕西以来，“除奉迎袁政府及贩卖烟土外，殆无余事”(136)。他一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大力撤换与裁遣受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陕西陆军官兵，扩充随他入陕镇压白朗起义的北洋军；一面仿效袁世凯，大搞特务统治，“以多数皖人为侦探，多方罗织，冤狱屡见”，“极力摧残民党”(137)。袁世凯称帝后，他是最早几个俯首称臣者之一。1916年1月5日，他与帮理陕西军务刘承恩、巡按使吕调元等联名上奏说：“唐继尧等怙恶不悛，断非口舌所可感化，伏恳速即登极，以定名分，而慰人心，并明降谕旨，声罪致讨。臣等谨当整饬

劲旅，以为前驱。”[138] 3月18日，他一次就残杀在西安密谋响应云南护国起义的王绍文、南南轩、陈德卿、郭子余、吴鹏、赵贞吉、姚南熏、李桂森、袁守礼、焦林、杜守信、南风熏、胡德明、杨景震、章雨苍、张镇方、陈宗卿、齐子乾十八人，真不愧为“陆屠户”。

但是，4、5月以后，全国和陕西的形势都发生了对袁世凯更为不利的变化。就全国而言，如上所述，独立省份已发展到滇、黔、桂、粤、浙等五省，并成立了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统一机构军务院，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即不罢兵。就陕西而言，广大人民群众非但没有被陆建章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且在全国讨袁形势的鼓舞和陕西革命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的领导下，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袁逐陆斗争，仅渭北一处就集结会党、“刀客”和退伍军士两万余人。他们分编为两个军，公推郭浤为第一军总司令，萧荣绶为参谋长，焦子静为第二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参谋长，于4月1日传檄讨袁，布告四方，并先后占领了朝邑、郃阳、韩城和富平、蒲城、白水等县。不到两月，“自三原以北，东至黄河，西至陇境，北尽绥米，此数十县中，几无一为陆建章势力所能及”[139]。

1916年5月初，陆建章派其子陆承武率混成一旅前往渭北镇压曹世英、郭坚、杨景娃等部讨袁民军，7日，陆承武行至富平，与陕军陈树藩旅胡景翼营遇。陆部“行为素暴”，陕人本恨之入骨。加上当时有人传言，“谓承武之行，名为拒敌，实欲收回胡之枪械”[140]。胡景翼愤恨之余，遂与开战，恶斗竟夕，“大获全胜，竟生擒陆承武，虏其全部炮械”[141]。接着，胡营所在旅长陈树藩也宣布独立。消息传到西安，陆建章惊惧万状，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只好弃袁自保，与陈“舍战言和”。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辛亥革命时任陕西东路招讨使，民国成立后为陕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5年初升任为陕南镇守使。但是，北洋军阀对异己势力的信任毕竟有限。云南起义后不久，陆恐

陈“不稳，由汉中捣四川，且渭北民军已将动，陆自知棘手，乃欲委之于陈”，遂改调陈为陕北镇守使。陈“知己之遭忌，故自保之心，无时或忘”[142]。他表面奉命唯谨，对陕北之任毫无异言，但暗中却利用渭北民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到达陕北后，“阳奉政府，阴与民党联络，资给军械，补助军费”[143]，甚至对手下两名团长王飞虎和严锡龙加入民军也毫不介意。及至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陆承武后，即于5月9日在蒲城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为人质，一面会合郭浤、焦子静所部，分别由三河口、渭桥、草滩渡河，摆出三路围攻西安的架势；一面电请陆建章“俯顺舆情，改称都督，为地方保护治安，与中央脱离关系”[144]。陆感于袁世凯二十年豢养之恩，虽“不敢赞同”，但摄于讨袁民军的威力，也不敢反对。在多次向袁“乞休未允”的情况下，陆遂派代表至三原与陈树藩达成如下协议：陕西全省治安，由陈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完全责任”，陆建章“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而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即由“建章长子陆承武任之”[145]。16日，陈树藩率部进驻西安，18日“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名义布告大众”[146]。25日，陆建章雇车二百余辆，满载其入陕以来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陈树藩所派军队的护送下离开西安，最终放弃了袁世凯对陕西的统治。

陈树藩的“独立”，并不能与陕西人民的护国讨袁事业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地方小军阀利用人民群众的护国讨袁热情，在胜利可望的条件下所发动的一场个人权利之争。但是，陕西毕竟是云南起义后继起独立的第五个省，而且是袁世凯所恃为根据地的北五省之一。陈树藩虽怀个人野心，毕竟未另树旗帜，因此其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当时《时报》评论说：陈树藩“宣言陕西全省独立，其与云、贵、两广稍异其趣，固可勿论，而非为自树一帜，如世上所传，乃系加入于南方派者，则将开潼关，以临中原。以陕西之地势易守而利于进取，则进出河南当不甚难，一旦进出河南，则中断延长达八千里（实际是二千四百余里）之京汉铁路亦复易易”。“由此以观，则陕西之独立固与北京政府以莫大之打击已”[147]。正因为如此，所以黄兴、肇庆军务

院和各有关方面对陕西的独立，都十分重视，不仅纷纷致电祝贺，且要求蔡锷就近“设法救济”[148]。

四　四川和湖南“独立”

陕西独立后不到半月，陈宦又于5月22日宣布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四川成了脱离北京统治的第七个省。

陈宦（1870—1943），字二庵，湖北省安陆县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生，初任武卫前军管带，后经袁世凯推荐，随锡良辗转四川、云南、奉天等省训练新军，颇得锡良赏识，先后任过四川常备军统领、川滇两省新军协统、第二十镇统制等职。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倚重，任参谋部次长，代理黎元洪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事。1915年袁准备称帝，虑滇黔“反侧，乃以安陆陈二庵将军镇蜀”[149]。3月12日，陈以会办军务名义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离京“西征”。关于这天离京情况，其军务处一等参谋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凌晨2时，车站已“军警密布，送行者纷集，京中文武显要无弗至者，不独民国以来空前之盛举，即后亦无继美者”。“五时许，安陆将军至，万头攒动，簇拥登车，真有大丈夫当如是之感”[150]。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他是何等的宠信。而陈宦的确也没有辜负袁的期望，5月31日，他到达成都第三日，即“拜成武将军兼巡按使之命”，积极充当袁氏万年基业的“开路先锋”。8月，帝制运动开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恳袁世凯“迅择吉辰，举行大典”[151]。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五个多月后，陈竟那么绝情，公然宣布和他“断绝关系”。

四川独立，几经周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蔡锷早在入滇之日，就曾致电陈宦，促其“立揭义旗，共灭国贼”[152]。他内部的帝制反对派将军署顾问刘一清、副官长邓汉祥、巡按使署总参议杨穆生、旅长雷飙等也力劝他“同蔡切取联络，共策进行”[153]。但陈宦这时正追随袁世凯，昏昏然处在“帝制热”中，不仅未接受蔡锷的忠告，反“一面出示晓谕，详述利害，严禁造谣；一面于叙、泸、永

宁、重庆、会理等处，拨驻可靠重兵，节节联络，接近滇边，分扼要塞”[154]，妄图阻挡云南护国军进入四川。直至接连在叙州、泸州附近吃了几个败仗之后，才不敢“十分表示反抗”[155]，转而通过刘、邓等帝制反对派与蔡锷暗通声息。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两面政策。事实上，他同时又通过军署参谋长“张联棻与曹锟、张敬尧等取联络”[156]，长期“抱骑墙主义”。

陈宦搞独立，发端于帝制取消后与蔡锷谈判停战议和期间。当时，袁世凯的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他自己在四川的统治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川南早已入护国军之手，川东涪陵、忠县、酆都、石砫各县到处是“党人队伍”。建昌属内大小相岭、宁远披沙等地，活跃着起义川军王先导、瞿豹岑部和当地彝族人民以及团总刘鸿章与都龙光土司相结合的武装。川西自2月27日起，哥老会大爷、前保路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孙泽沛等人，即在温江县召集旧部，成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郫县、温江、大邑、邛崃、崇庆、灌县等十余县尽失控制。整个四川，除省城和川北外，几无“净土”。为稳固统治，他不得不请求蔡锷停战议和。而蔡锷即乘机促其一致迫袁退位，一面电陈坚“主急进”，并“派代表陈光勋至省接洽”[157]，一面力促冯玉祥、伍祥祯迫其宣布独立。

在蔡锷的推动下，冯玉祥一边电劝陈宦俯顺独立舆情，一边派参谋长张之江与陈光勋同行赴省。伍祥祯也于4月25日由自流井回到成都，共同对陈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四川各界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先是吴庆熙、谭创之等人上书请陈“从速宣布”独立。接着省议会议员郭湘等七十六人又函陈说：“议员等为七千万同胞请命，为全蜀父老昆弟救危，势非请钧府明白宣布独立，与袁氏脱离关系，不足以镇人心而消疑畏，维现状而弭后灾。”[158]继而向称稳健派的前清状元骆成骧也函称：“省议员前有郭湘等数十人上书，刻又有傅春萱等数人续上，皆请早定大计者，人心所希望如是，当道宁能反其前日所谓和平之计画乎？”[159]至于成都报纸所持论说，更是“一致讽当道从速解

决此问题”[160]。结果，连陈宦的参谋长张联棻也“自以与项城亲近，虑一旦有变，祸及其身”，而日夜“欷歔，甚至泪下”，冀早日“脱武城之险”了[161]。在这种形势下，陈宦“独立之心萌矣”。

恰在这时，陈宦于2月间派往南京联络冯国璋的胡鄂公，也于4月24日回到成都，使他“得闻南中事甚悉”，因而“意志为之冲动不少”[162]。他一面“密令周骏所部于东大路一带防曹（锟）”[163]；一面要求蔡锷借给护国滇军四梯团，由刘一清、雷飙统带，以外拒北军，内安反侧。蔡锷明知陈宦请援，主要不在“防袁军”，而是为了“自卫”，因为“道路传言，谓川人一般心理对陈感情甚恶，欲以对赵尔丰者对陈”[164]，他所统护国滇军也总共只有十三营，且兵不足额，其中持新械者只九营，但为了促成陈宦独立，仍毅然允拨十营，委雷充第一梯团长，刻日赴叙。陈见“大势所趋，皆不满于袁”[165]，“虽有大力者，不能逆天以挽之矣”[166]，又有蔡锷切实为其后盾，遂于5月3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并表示“应如何优待条件，宦与各省疆吏亦必力争以报”[167]。

然而，陈毕竟与袁私交甚深，而当时曹锟又虎视眈眈，镇守渝江，威胁蓉城，因此，陈的行动也仅止劝袁退位，未有“进一步绝交之表示”。紧接着，他还唯袁命是从，将其巡按使兼职奉献给袁的心腹黄国暄，并于7日晚与黄会衔出示说：本将军“业已电恳大总统退位”，“自今日始，军民人等如有假托名义，倡言独立，扰害治安，以及造谣惑众，意图破坏者，实为地方之公敌。本将军、巡按身任地方，负有维持安宁之责，对于此等扰乱地方之人，当适用惩治盗匪之法，并准由各该地方军民长官查拿究办”[168]。由此可见，他劝袁退位不过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

但是，四川人民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4月30日，萧德明独立于大竹，自称中华护国军四川东路总司令，檄告全省，明令邻县。5月1日，某警备队长独立于广安、岳池，逐走知事，截收税款。5日，熊克武旧部龙少伯联络川军独立于隆昌，知事被拘。6日，川军连长

王靖澄利用押解武器之机，起义于风洞子，自任讨袁军总司令。12日，川军混成旅长钟体道独立于南充，以罗纶为民政厅长，张澜为总参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电告各独立省，劝陈宦迅即宣布独立。13日，吴庆熙所部护国军千余人出发围攻成都。15日夜，其前队进抵青羊宫，成都当局彻夜未眠。此外，荣昌、达县等地驻军也纷纷举义，风声所播，全省趋向独立，谁也不能阻挡。

在四川人民的催促下，陈宦左右急进派杨穆生、邓汉祥等人奉刘一清为“盟主，愈怂恿川省独立”。他们悉心研究时局，屡以轻重利害向陈宦进言，并声称“苟有人更事阻挠，便当杀却”[169]。冯玉祥也于19日由自流井遄行返省，向陈宦表示：“某此来，系向军宪陈情。曹锟小儿与某有素仇，军宪纵不校，某亦将自告奋勇。”[170]接着，冯又约同伍祥祯、丁鹏九在成都青年会发表演说，表示：“此次奉调回省，只知维持秩序。浅识者对北人则言川人不相容，对川人则言北人有异志，致生恶感。不知同是中国，有何南北之分？尚望于此等谣言，力为解释。”[171]其间，冯国璋也再次来电，支持陈宦迫袁退位。蔡锷则以湘将独立，“在湘黔军不能拘守停战规约”[172]相要挟。

在此形势下，陈宦“非常之谋复动”[173]。18、19日，他先后两次通过刘一清等致电蔡锷，一面表示日内即宣布独立，一面要求除雷飙一梯团外，再借两梯团，且一须真正滇军，二须刘云峰亲率，速开赴叙府，以便雷部移扎自流井。19日，他召集军事官长会议，征求意见，“各军官皆称善”[174]。20日，他又收到蔡锷复电，告以“已飞饬晓岚（晓岚，刘云峰字）率领最朴勇善战之何（海清）支队先行来叙，后续部队俟抽选就绪，再行续派”[175]。这样，陈的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四川独立，千回百转，终于告成。22日，陈宦致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宣布：“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176]意思是说，他的独立仅对袁世凯个人而言，并非和北洋派脱离关系，这在独立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难怪蔡锷指斥他“此次独立，亦在四

处讨好，面面俱到”，纯系“取巧”[177]。

陈宦独立既属勉强，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要他以实力与护国军共同倒袁，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蔡锷所说：“观其致京两养电，殊有奉旨独立意味。以此种心理而独立，而欲迫袁退位，不其左耶（第二电竟谓以大独立而取消各处之小独立）？”[178] 虽然如此，他毕竟为护国军增加了“一省独立之声势”，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据袁亲信索崇仁说：“陈二庵末次与元首断绝关系之电，（袁）阅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则发显病情两次。”[179]

继陈宦叛袁独立之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于5月29日宣布独立，使湖南成了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八个省。

汤芗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省蕲水（今浠水）县人，早年受学湖北文普通中学堂，1903年秋中乡试，选送法兰西留学海军[180]。毕业归国后，历任镜清舰舰长、海军部参议等职，1912年4月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次长，次年10月，改调湖南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成了袁世凯在湖南的忠实代理人。他治湘三载，横征暴敛，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据其呈报中央者已达一万一千余人”[181]。有“汤屠户”之称。在支持袁世凯称帝方面，各省地方长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182]，其机关报《大中报》自筹安会发生后，“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皇气郁葱’、‘圣德汪洋’等种种奴婢口吻，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而捏名劝进，制造民意，亦无所不用其极”[183]。正因如此，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袁世凯的“屠户干儿”。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独立省份的日益增加，汤芗铭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大中报》“昔之称皇帝、道圣上等尊严名字倏改为袁逆、袁贼，最可笑者孙中山、黄克强、岑云阶、钮永建等该报素称之曰乱党、乱党，至是忽尊之曰伟人，称之曰先生”[184]。他虽也曾为袁世凯的总统地位表

示过要“誓当激励所部，以备前驱”[185]，那不过是一种姿态，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汤芗铭这时抱的是“旁观主义”，“其用意所在，直坐观成败而已”[186]。造成他这种不即刻抉择独立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由于他杀戮太多，害怕独立后革命党人不见信，以致进退失据；其次是，当时湖南衡州、湘潭、岳州、长沙等地，驻有北军不下三万余人，而他自己的兵力却不过万人，因而不敢“冒昧从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湘省因袁军全力压境，遂致本省行动不能自由。”[187]

为此，汤芗铭一面要求袁退位，以讨好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前往上海，请跻身护国行列的长兄——进步党人汤化龙，代为疏通与湖南革命党人的关系。汤化龙一面通过蔡锷，“迭电湘中健者，务与铸新互相提携，力戒龃龉”[188]，一面请前湖南都督、原立宪派谭延闿为居间调人。谭先与欧阳振声、唐蟒、陈复初、曾继梧等国民党人达成谅解，接着又约中华革命党人覃振以及前湖南民政长龙璋等人会谈。覃初以公义私仇，表示与汤芗铭无调和余地。后经唐蟒、陈裕时往返斡旋，兼以龙璋“亦不欲重拂调停者好意”，覃才“强制感情作用，忍痛苦以就妥协”，与汤化龙等人在谭宅拟定如下“妥协独立条件：甲、民党承认汤将军为湘都督；乙、汤将军先拨枪械完备之军队三营以上至五营交民党接收；丙、设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权，民政长由民党公推；丁、组织北伐军时，总司令由民党推任；戊、军事厅长由民党推任”[189]。汤芗铭得知湖南独立后革命党人仍可承认他的都督地位，一颗久悬之心才算落了地。

为了取得个人行动自由，汤芗铭一方面精选老兵，筹备添募，扩充实力。据驻湘安武军司令倪毓棻调查，其募兵“数目在株洲招三营，衡山两营，湘潭三千人，湘阴二千人，湘乡五千人……大约共招一万八千人，均分驻株洲、湘阴、益阳、沅江等处”[190]。另一方面他又多方设法，请袁世凯将倪毓棻、唐天喜两军撤离湖南，以消除障碍。他向袁表示：如将倪、唐两军撤出湘境，他即全权布置，“使湘

省属地不复有独立之事，并使南军亦不能侵入湘境，以中立的态度保全地方，卫护中央”[191]。接着，他又派代表陶德瑶前往南宁与陆荣廷协商和平，借陆之口迫袁撤军。最后甚至不惜实行“武力迫挟”。在汤芗铭软硬兼施和陆荣廷等人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于5月9日复电与汤：“允将倪军退回皖境，唐军亦一律撤退”[192]。次日，汤芗铭电告上海陈裕时：“日内正在布置，使其出境。此种绝人障碍幸得解除，嗣后操纵之权可由己出。”[193]并一面促其“来湘相助”[194]，一面要他“火速设法电致桂省，于倪、唐两军未撤尽以前，万不可进兵，使中央有所借口添增兵力”。他表示：“湘南北军退去湘境以后，湘省定可以与桂省一致进行。”[195]

其时，湖南各县独立纷起。4月26日，原陆荣廷部下游击、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在陆的督责和广西护国军的声援下宣布独立，自任湘南护国军总司令。5月10日，前湘南检查使张学济自署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乾城（今乾州镇）独立。12日，湖南郴县、宜章、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同时宣布独立。18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凤凰宣言独立。19日，湘南镇守使汪学谦乘倪毓棻撤退之机，在衡阳宣布独立。至此，“湖南自表面上观之，尚未正式独立，其实内容实情已经正式独立者实有五十余县之多，归汤芗铭节制者只有二十余（县）”[196]，而且西有护国黔军，南有护国桂军，内有以程潜为总司令，以湘南靖县为根据地的护国湘军，与之互为声援。汤芗铭的统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级官吏恐慌万状，纷纷潜逃。首开纪录的是湘江道尹张官劭，接着财政厅长严家炽效法而去，连赫赫大名的巡按使沈金鉴，也借故溜之大吉。随后，湖南银行监理官吴藩、长岳海关监督兼交涉员刘道仁及各属县知事也都纷纷卷款潜逃。各署虽复经汤芗铭派人接任，“而被派者均恐慌悚惧，借故推辞”。汤无奈，不得不随即下令“以后不论何人何职，均不准辞职”[197]。此外，湖南进步党首领施礼鉴、李诲、陈光耀等，也一再催促汤芗铭独立。至巨绅刘人熙、陈树藩、殷怀安、汪颂年等则发起湖南共济会，专事筹备独立及独立后种种善后事宜，并得到谭人凤、唐蟒

等国民党人的“襄赞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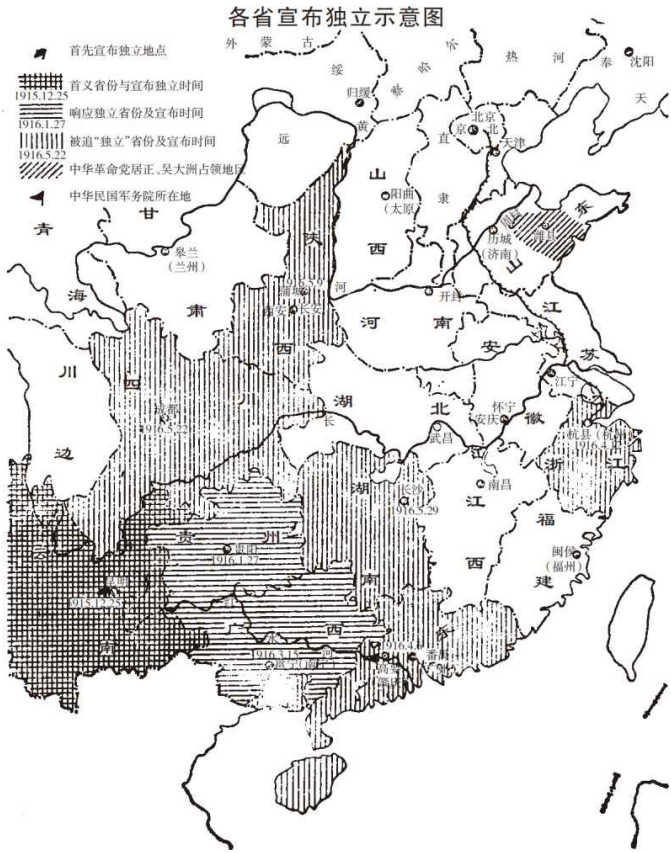
在此形势下，汤芗铭自知大势所趋，倘不速定向背，急谋独立，恐湖南全省将不等他宣布独立，“而已慴伏于民军之势下”了。于是，他一面于5月27日致电张勋，痛责他和倪嗣冲无理驱逐在南京会议上主张袁世凯早日退位的湘、鄂、鲁、赣四省代表；一面于28日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并柬请刘人熙等人入会旁听。汤陈词说：“鄙人本亟主张独立，徒为种种所掣肘，致未实行。现在唐、倪两军悉已退去，望镇使业已与鄙人和衷共济，全省秩序得不棼乱。然近日蜀、鲁、秦、晋奋起独立，广西陆荣廷又有督师入湘之耗，鄙人始终以保全地方为宗旨，今鉴于袁氏无退位之决心，若再不独立，其隐患何堪设想？故鄙人拟明日宣布独立，诸君以为何如。”[198] 全体军政要人暨绅界代表莫不赞成，当场推举汤芗铭为都督，并一致通过致袁世凯与未独立各省等通电。次日上午11时，汤芗铭正式宣布湖南独立，“与云贵粤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199]。

汤芗铭的“独立”，与云、贵独立特别是云南首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舆论就指出：汤是在“各县纷纷独立，若不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则将来之地位难以保全”的情况下宣布独立的[200]。“汤氏之所以急急乎图谋独立而固其禄位者也”[201]。他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宣布：“本省各道县，凡已经宣布独立而未经本都督认可者，均须服从本都督命令，听候检查处分，不准自由行动，违者按军法治罪。”[202] 这说明与四川陈宦一样，汤芗铭打的也是以“大独立取消各处小独立”的如意算盘，难望他在倒袁中贡献什么力量。但是，他毕竟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因而对袁精神上的打击也就格外沉重。据索崇仁说：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电到达北京时，他恰进谒袁世凯，“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203]。不几天，袁就病死。时人有“催命二陈汤”（陈宦、陈树藩、汤芗铭）之说，语虽尖刻，倒也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结局

一　袁世凯忧惧而死与新旧约法之争

袁世凯的身体向来不错，据其三女袁静雪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四个人，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204] 可是，云南护国起义后不久，他却"政躬违和"，再也无法不请中医诊脉开方了。当时，袁住在居仁堂楼上，楼下即是公事房，虽常见他在此办公见客，却是依靠日拥药炉来维持的。不言而喻，帝业未稳，护国军兴，西南一动，举国响应，瞻前顾后，形影相吊，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乃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



此外，袁世凯所以致病，还与上述主要原因相联系的劳累过度和家庭纷争的刺激有关。据袁静雪说，云南起义前，袁世凯经常晚上9时即上楼休息。自云南起义后，由于各地告急，文电纷至沓来，他不得不“日夜紧张忙碌”，以致袁静雪虽与父亲同住一个楼上，也常常很晚“不见他上来”，至于逗她们姐妹们说笑玩耍就更是“很少有的了”(205)。关于家庭纷争，最突出的是“立太子”问题。袁克定作为嫡出长子，当然最有资格当选。正因如此，所以他协助袁世凯推行帝制也最力，甚至不惜编印假版《顺天时报》，隐瞒国人反对帝制的真相，欺骗乃父。可是，袁世凯却因他骑马致残，不便“君临万民”，而打算在老二、老五中择一而立。袁克定知道后，怒不可遏，扬言：“大爷”（袁克定对乃父的称呼）立谁就杀谁。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姨太

太们又为“妃”、“嫔”名义闹翻了天。1916年2月17日旧历元宵节这天，六、八、九三房未封上“妃”的姨太太当面要挟袁：如果不同时封她们为“妃”，她们就要带着孩子回河南彰德去住。袁世凯眼见帝制前途的劫数难逃，家庭间又为此纷争不已，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206] 果然，不久就成了现实。

袁世凯之病，初起于2月下旬他下令缓办帝制后不久，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经4月粤浙独立一逼，病情有所发展。但是，纵然如此，他仍一边吃着中药，一边挣扎着下楼办公和见客，力撑危局。至5月中旬以后，由于陕西、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和南京会议“未即如愿”[207]，其病势渐渐加重，这才不再下楼，而改在卧房里直接办公和见客了。及6月1日，袁看到汤芗铭发来的“词多不驯”的独立电报，“甚为动怒，至夜病遂转剧”[208]。次日为星期五，以其“病重”之故，“军官均未照例进谒”。然而，为安定人心，“府内仍传说元首事忙不得见”[209]。其实，袁世凯这时正患着“小便不通之症，苦闷焦燥殊常”[210]。其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乱作一团，三儿媳谬思“割股”疗亲，袁克定则主张服西药，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袁世凯及其“幕友等也不赞同”，直到袁克定“捧西药长跪多时始服”。5日，由法国公使馆医生卜西尔行右肾注射并导尿，“由是胸满更甚，而热度过常矣”[211]。

在此之前，袁世凯虽然病势沉重，可他全然不信会立刻死去。5月29日，他还发布帝制议案始末告令，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从无“帝位自居之心”，即使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其“诚”，迫切吁请，无可诿避之时，也“借词筹备，不即正位”，“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212]。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并声称他“无可讳饰”的过错，是未能料及“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213]，公开警告那些为了各自的私利，不惜对他“落井下石”的门生故旧们，不要再闹什么“独立”了。6月1日，

他一面召见蔡廷幹了解帝国主义各国对他固守总统地位的态度，一面召集王士珍、荫昌、周自齐、朱启钤等一班幸臣密议改组内阁、维持财政、筹画军备等等事宜，妄图对川湘发动一场新的军事进攻。不料，就在这时，其病情急剧恶化，至5日“夜十时，即已气闭一次”[214]。袁世凯自知生命垂危，急传段祺瑞、王士珍、徐世昌等上楼，嘱其好心维持北京及周围地区的秩序。次日晨，袁已不能说话，仅在徐世昌的催问下，才对未来人事安排说了“约法”二字。袁克定野心不死，仍痴心妄想通过其父自造的约法，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因而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金匮石室吗？”袁点头称是。延至上午10时40分，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窃国大盗，便在护国军的进攻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满怀恐惧和恚恨地死去了。

袁世凯“自遭诛灭”，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要求其退位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临死前留下了按其1914年所造约法办的遗言，特别是继袁而起的段祺瑞，决心继承他的衣钵，不顾护国军依照《临时约法》，恭承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宣言，公然于6日下午3时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袁世凯自造的所谓“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215]。这样，紧接着又展开了一场持续二十余天的新旧约法之争。

其实，段祺瑞何尝不想当总统，可是细察大势，刚刚推翻“洪宪”帝制而锐气未减的护国军各要人，屡以拥黎为言；而北洋军阀内部又各怀异志，一盘散沙，难为后盾；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又公开宣称将给黎以“道义上的支持”[216]。在这种局面下，他也只好将计就计，接受徐世昌建议，先奉黎元洪为总统，其他待以后再图了。为此，袁世凯尸骨未寒，他便携教育总长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以相视而坐半小时不出一言的特殊方式，履行了请黎元洪任总统的手续。当夜，黎元洪听说北洋军人对他有所不利，急派张国淦前往府学胡同段宅打听情况，段又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

[217] 由此可见，他对请黎出任总统是很不情愿的。这也是他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宣言依袁世凯新约法，奉黎元洪代行总统，借此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的根本原因。

段祺瑞的恶劣行径，遭到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护国军早就宣言过："黎副总统继任乃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宪法会议所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事关信誓，自然反对袁世凯遗命和段祺瑞通电所称"代行职权"之说。6月8日，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致电独立各省说："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国法程序之所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且继承与代行职权大有区别，"继承"尚有二年任期，"代行"即止于三日。为此，他鼓动独立各省，速起抗争[218]。11日，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汤芗铭首起响应。他复电岑说："顷接北京国务院鱼电，援引伪法。正拟痛加辞辟，兹读尊示，准据法理，严正斥驳，名言至论，溥利国家，钦佩无量。"并表示同意联名电呈黎元洪，请其特颁明令，允从民意，声明"在宪法未定以前，民国元年约法及国会制定属于宪法一部之大总统选举法，均回复其效力，其袁氏擅改之约法暨所谓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一律废止"[219]。接着，陆荣廷也表示赞同，指出：临时约法，"效力犹在，凡属国民，皆当遵守，断不能因袁氏一死而改变主义。乃国务院鱼电通告，竟援据伪约法，显系包藏祸心"。他主张由岑春煊"主稿领衔，辟其谬妄"[220]。岑春煊虽无勇气公开批驳段祺瑞，但仍于13日联合陆荣廷、汤芗铭、陈炳焜等人致电黎元洪，请他明令宣布四事：1．总统承位，乃继任，非代行职权；2．"南军政府迭次宣言拥护约法，乃指民国元年之民定约法，非民国三年项城改定之约法"；3．同时恢复国会；4．依据约法，指定总理，组织新内阁，交由国会同意[221]。其实，黎元洪何尝不想依旧约法"继任"。早在就任之日，他就亲自向国会议员郭同表示过反对"新约法"之意[222]。怎奈他手无一兵一卒，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得不看段祺瑞脸色行事。所以，他虽认岑春煊等所举四事"实为目前当务之急"[223]，但却不能单独有何表示。

其间，梁启超、唐继尧也积极展开活动。8日，梁一面派黄群为代表，进京“上谒府院”，陈述意见，一面致电黎元洪，请先行四事：1．规复旧约法；2．速集国会；3．任段祺瑞组织新阁；4．惩办帝制祸首，以新观听。他并电护国桂军“宜驻节现在所到之地，不必进而授他人以口实，亦不宜退而懈义师之志气”[224]。10日，唐继尧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撤退北军，和在沪举行军事会议。为扩大声势，梁启超又电请南京籍忠寅、胡汇源力促冯国璋采取一致态度。

对恢复旧约法，孙中山的态度尤为坚决。5月初，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即提出“武力进行，为目前唯一方针”[225]，决心武力迫袁世凯退位。他为此致电岑春煊，愿与护国军同心协力，“取一致之行动”，并函请尚在日本的黄兴“借购军械”，以便将山东中华革命军扩充为两师。他严正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226] 因此，当袁世凯死去，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后，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强调指出今日求治无他，“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揭露段祺瑞为“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号召国人如对待袁氏一样，群起而攻之[227]。同日，黄兴也致电军务院与各省都督，愤怒斥责段政府“仍以伪法乱国法，适与护国军暨民意相背”，要求黎元洪“以明令规复旧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与民国抵触者，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祸首，昭大信于天下，以定民志而奠邦基”[228]。旅沪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袁世凯遗命及段祺瑞通告所称依约法第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理之说，系根据袁世凯三年私造之约法，万难承认”，“如有妄逞异议，破坏国宪者，即视为民国公敌，与国人共弃之”[229]。

此外，北洋军阀内部也为此发生分歧。早在6月8日，河南德武将军赵倜和巡按使田文烈就通电指出：“考之民国数年来法律之经过，与夫全国人心之趋向，黄陂现今代行大总统职权，亟应遵照原选举法

第五条之规定正式继任，庶几全国景从，万难俱解。”[230] 接着，12日，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也通电表示：“元年约法不必从新另议。”[231] 更有甚者，在梁启超等人的动员下，正与段祺瑞激烈争夺北洋军阀领袖地位的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说：“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舍恢复临时约法外，即别无可以造法之道，此节似已无待再计。”[232]

由于全国一致反对，段祺瑞被迫表示同意“约法复旧”，但又在恢复手续上大做文章，主张由各省推任本省旧国会议员三人，克期到京会议，“议决后据以发表”[233]。他并派林长民、冯耿光前往南京，争取冯国璋和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的支持。这表明他的同意完全是假的，因为独立省份只有滇黔桂浙湘五省（陕川粤三省此时已取消独立），这样的会议是绝对作不出“约法复旧”决议的。段祺瑞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护国各方的拒绝。16日，黄兴致电旅沪国会议员说：“北京召集各省代表议约法，意在破坏旧约法及国会，请沪同人择定安全地方早开国会，并速电请独立各省不派代表。”[234] 梁启超、唐绍仪也认为：“各省派三议员代表解决，似可不必，且难办到。政府但当发一简单申令，称某年某月某日公布之约法，未经《临时约法》某条修改之程序，今废止之云云使得。此非以命令变更根本法，不过将已成事实依法宣言。”[235] 这和孙中山意见不谋而合。19日，孙致电黎元洪说：“其实，约法停废，国会解散，俱系前人越法行为，今日宣言承认遵守，不过以适法之命令变更不法之命令，其间毫无疑义。”[236] 18日，旅沪国会议员致电段祺瑞，痛斥其“未便以命令变更说”的错误，并声明：“此间并未公推代表入都，其或以个人资格有所陈说，与国会议员全体无干。”[237]

但是，段祺瑞却强词夺理，顽固地说什么由政府下令废止新约法，恢复旧约法，就是“蓄命令变法律”，既为各派法理学说所不容，自然也为政府所“未敢附合也”。22日，他公然通电全国，一面极力为袁世凯新约法辩护，一面重申：“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

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238] 直到25日原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联合发表宣言，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后，才打破这一僵局。

李鼎新（1861—1930），字丞梅，福建省闽侯县人，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四届毕业生，1881年被派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留学。1886年归国后历任北洋海军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海军部军法司司长等职。1912年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参事，后为驻沪海军总司令。1915年12月，肇和舰官兵反袁起义失败后，随着驻沪海军司令部的裁撤，李也被罢职。为防止肇和事件重演，袁世凯除撤换嫌疑官兵外，还同时命各舰队司令“各行独立职务，不相统一，全部海军统归海军部直辖”[239]，以便分而治之。从此以后，各舰分散驻防，严格隔离，煤斤食粮供给均有限制，行动十分不易。

但是，海军将士大多富于爱国思想，在上海护国讨袁人士张继、柏文蔚、孙洪伊等人的积极联络下，对护国讨袁早已跃跃欲试[240]。用李鼎新的话说：“自云贵起义，各舰之间，早有密约，对于凡足以赞助袁世凯之命令概不服从，不过未得机会齐集一地为之一致宣言耳。”[241] 粤浙独立后，海军反袁态度日渐明显，甚至发展到拒不执行袁世凯轰击广东汕头海港和浙江镇海炮台的命令。为了便于控制，袁不得不放弃分而治之的策略，转而命令各舰集中福州、厦门。但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却给海军将士提供了一个“会面密议”的极好机会。不久，各舰一致决定加入独立各省反袁行列，并公举李鼎新为总司令。李随即与军务院驻沪代表唐绍仪、钮永建、谷钟秀等人取得联系，命各舰开赴上海吴淞待命。

正当海军准备宣布护国讨袁之际，北京突然传来袁世凯病死的消息。李鼎新当即取消前令，以静待大局和平解决。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如前所述，握着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却丝毫没有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意思。“沪上政客激昂，议论日歧”[242]，一度有所缓和的南北形势，重又紧张起来。6月15日，部分旅沪国会议员致电黎元洪，强烈要求北京政府“当机立断，明白宣告自民国二年十一

月四日以后，所有袁世凯自造新制，悉行废除，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及二年《大总统选举法》”，“否则，从前讨逆战争将一变而为约法战争”[243]。谭人凤则致电岑春煊，提出复约法，开国会，不过是政客议员的事，“公总任师干，所谋似宜更进”。“今首恶虽殂，群凶尚在，政府形同傀儡，余孽盘踞要津，不将若辈荡除，执政者仍属藐法犯法之人，约法安有效力？务望本其初志，持以决心，击楫渡江，申防风氏复【后】至之诛，问莽大夫助逆之罪”[244]。在此形势下，海军独立也重新提上了日程。李鼎新商承唐、钮、谷等人后，再次向各舰发出了集中吴淞的命令。

24日，经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与各舰长的精心布置，原驻福州的海容、海筹、海琛、肇和四艘巡洋舰和豫章、建章、同安三艘驱逐舰，冲破福建将军李厚基的重重拦阻，驶抵上海吴淞口外。次日，李鼎新亲率海圻、通济两巡洋舰和飞鹰、永丰两水雷炮舰自黄浦江来会，并于当天下午与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暨各舰长联名通电全国：“今率海军将士于6月25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245]

当时，中国海军仅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为其“中心势力”，拥有四千三百吨巡洋舰一艘，二千至二千九百五十吨巡洋舰四艘，其他吨位不等的巡洋舰、驱逐舰、炮舰十艘。第二舰队概系小型炮舰，分泊长江一带，威力不大。因此，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的独立，实际上就是整个海军的独立，使北京政府完全失去了制海权，万一再诉诸武力，得到海军支持的护国军，“纵可以驶至津沽闽粤，横可以驶入长江”，“不数日间，即可直捣燕京”[246]。倘若引起连锁反应，又发生其他“独立”的话，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形势迫使段祺瑞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态度，尽管他仍企图通过辞职来要挟黎元洪。

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说：“宪法未定以前，仍

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247] 并同时宣布定于本年8月1日续行召开国会。至此，历时近一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而结束。这是南方护国军继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在维护共和制方面所取得的又一胜利。

二　护国阵营的分裂和军务院撤销

袁世凯死后，护国阵营各方虽尚能在新旧约法之争中保持一致，但其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是显而易见的。6月7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陈树藩首先宣布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8日，四川都督陈宦通告全国：“遵照独立时宣布，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248] 9日，广东都督龙济光率属开会庆祝段祺瑞“总秉国钧”时，也宣布“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不过，他与陕川二陈不同，由于广东内部存在着朱执信、陈炯明、徐勤各派讨龙武装，众怒难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粤省党派分歧，诸多困难”，因而尚暂时不敢公开通告各地[249]。

陈树藩等人脱离护国阵营，取消独立，并非偶然。首先，如前所述，他们的独立本来就很勉强。陈树藩是纯粹为了个人私利；陈宦、龙济光则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宣布的；特别是陈宦，宣布独立时就公开声明，他仅“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现在袁世凯死了，岂有不取消独立之理？其次，这也是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多方运动的结果。为了统一南北，段祺瑞一面要求南方裁撤军务院，一面鼓励独立各省自行取消独立[250]。陈树藩宣布陕西取消独立后的第三天，北京政府即特任他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对于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的龙济光，北京政府称扬他“具世界之眼光，急谋统一，热忱爱国，良深嘉慰”，并命令“该省善后事宜，即由该上将军悉心筹画，妥为办理，以维地方”[251]。由此可见，陈宦、龙济光这类本属

北洋军阀和极力依附北洋军阀的地方军阀，相继取消独立是不足为奇的。

滇、黔、桂、浙、湘五省，虽然暂未取消独立，直接参预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的进步党、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也仍然打着护国旗号，但在对待北京政府方面，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6月7日，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省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252] 9日，蔡锷也通电全国说："廓清积困，恢复故状，为事大难。欲进而恢张国运，百废俱兴，更属不易。非赖中央提挈于前，各省翊赞于后，群策群力，共趋一的不为功。""伏望内而中枢诸贤，外而已独立未独立各省长官，蠲除成见，以福国利民为前提，以拥护中央为要义。"[253] 14日，他又致电张敬尧说："独立各省亟应宣布取消独立，自是正办，日前曾以此意电致滇黔等省矣。"[254] 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思想上已经率先"蠲除成见"，回到一年前的老立场，转而与北洋军阀握手言和了。

事实也是这样。在新旧约法之争中，梁启超从防止所谓"野心家之利用，贻多数人以口实，更起纷扰，为外所乘"的立场出发[255]，虽然赞成和坚持恢复旧约法和国会，但却力戒独立各省勿露所谓"意气"，以避"捣乱"之嫌。如前所述，6月12日，陆荣廷曾致独立各省一电，指斥段祺瑞拒绝恢复旧约法是"包藏祸心"，但梁却认为这样用词"太激烈"了，有必要"再电劝之"[256]。25日海军为维护旧约法和国会宣布独立后，袁世凯未死以前曾一度盼望"海军归附"[257]并"稍有间接交涉"[258]的梁启超，却一反常态，生怕因此而激怒了段祺瑞。他赶紧声明："事前既未有闻，骤听不禁失色"[259]；同时致电刘显世等人，嘱"以军院行将解散"，"严拒"李鼎新加入抚军[260]。为了维持和提高北京政府的威信，他极力规劝段祺瑞以"精心巨眼，细察全国心理所趋，逆料某事某事为政府所不能不办者，即自动以办之，无俟国人之要求；逆料某事某事为政府所不宜坚执者，务再思而

后行，勿惹国人之反对”。如“约法复旧”、召集国会、惩办祸首等“舆论所请求之数事，本非强政府以甚难，何苦作无谓之迁延，徒以致无穷之口实”，“广东取消独立所发之明令，于解决时局有何裨益，徒挑众庶之恶感，增意气之激昂”[261]。他一面推动冯国璋“力助”段祺瑞，以加强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的团结；一面百计为段开脱，说先前国务院通电所称黎元洪依新约法代行总统，“实非有意”，而是秘书起草电稿时“案头只有新约法，随手征引，顷已知误”[262]。他且不止一次地向独立各省保证“段绝无野心”[263]，说段“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现有数派人专以排彼为事，无非欲达个人权利目的”[264]。

梁启超这里说的专以排段为事的数派人，实际指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以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和以孙洪伊为首的倾向孙、黄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的确，他们在对袁世凯死后的国内形势与北京政府的估计和认识方面，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是不一致的，因而所采取的态度与方针也不同。6月7日，中华革命党国内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贼未尽，国未安”，“不以迅雷疾风之手段解决之，旁枝侧叶，杂出不已，他日之患，有不忍言者”[265]。14日，孙中山在答上海《民意报》记者徐朗西问时也说：“目下时局，尚未敢骤言容易解决，因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斯时之民军，正未能从此息肩而即云国是已大定也。”他并说明在此之前，他虽曾连电山东居正、广东朱执信、福建中华革命军按兵勿动，“不过请其暂时停止进行，息肩一层尚未易语及”[266]。黄兴意见与孙中山相同，6月7日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说：“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267]他7月由日本回国后，针对梁启超一派的妥协调和言论，明确地指出“斯乃大谬”，“北京当局之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268]。与此同时，胡汉民、张继、章炳麟、李烈钧等人，也纷纷发表谈话和宣言，指出“今日尚在革命状态中”，“万不可主张软弱”，更“不

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主张驻护国军于北京，以保护国会[269]。谭人凤甚至不满于军务院“斤斤以复约法、开国会为词”。他大声疾呼：“约法乃一纸空文，必有武力盾其后，方能维持。况今之秉政者，仍是藐法犯法之人，约法安有效力？国会可用武力胁迫，前事具在，讵得一之已甚，遂不至再乎？”[270]原进步党党务副部长孙洪伊也主张“军事仍积极进行，必俟实行约法、国会、内阁完全成立始行停止”[271]。正因如此，所以当海军为反对段祺瑞顽固拒绝恢复旧约法和国会而宣布独立时，既有黄兴致电李鼎新表示祝贺于前，又有岑春煊宣布接受其为抚军于后，与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与此相联系，护国阵营内部各派之间，因讨袁战争而一度有所克制和缓和的矛盾和斗争，也重又发展起来。梁启超对此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还在1月27日，他就致函四川前线的蔡锷说：“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搏控。”“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272]因此，袁世凯一死，他便提出了一个全面控制西南六省的计划。当时的西南六省，贵州已完全是进步党人的天下，广西唯梁启超马首是瞻，云南唐继尧虽别有野心，但进步党人任可澄仍有相当潜势力，需倾力相谋的实际上只是川、湘、粤三省。对于这三省，梁启超的设想是以蔡锷督蜀，戴戡督湘，两广陆荣廷、龙济光对调。在他看来，“龙部悍将，惟陆能驭。龙虽颟顸，在桂则必就范”；而“蔡、戴稳健，顾大局”，“中央既不能弃置不用，莫如以（之）安抚蜀湘，则四省问题皆解决矣”[273]。为此，他一面建议段祺瑞举行一次不包括国民党人岑春煊、李烈钧和地方实力派唐继尧，而由他和冯国璋、王士珍、蔡锷、戴戡、陆荣廷诸要人择地直接会晤的善后会议，解决时局；一面指示他派往北京的私人代表黄群、范源濂力劝当局“垂采”其计，“告以罗致人才，真人才不能求诸好出风头之辈”，“若亮侪（籍忠寅）、印昆（周大烈）、孝怀（周善培）、佛苏（徐佛苏）、幼苏（陈廷策）等皆巡按妙选，

得间不妨切实推毂。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274]。由此可见，梁启超在千方百计排挤国民党人。

当然，国民党人也不示弱。他们联合以孙洪伊为首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在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对立的同时，也与以梁启超为首的拥段进步党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西南，他们积极活动岑春煊督粤，谭延闿督湘。在中央，他们以曾任“袁家参政”为由，极力否定原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和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议员资格。甚至刘显世、梁启超先后于7月11、15两日发表通电证明陈国祥确曾参预云南首义，“其贤劳坚卓，视从军者未遑多让”，王家襄也“与蹇（念益）、陈（国祥）及梁君善济共事，同历艰苦”后[275]，仍坚持认为“彼等以国会议长之尊而甘为违法机关供效奔走，是今日不受国会议员之信任乃一当然之事，将来即令不作附逆惩办，而议员之不再信任亦陈、王当然应受之结果，不必代为辩护者也”[276]。这使梁启超十分恼火，他愤愤不平地说：“沪上党人有专以排吾辈为事者，孙洪伊—派尤可恶。”[277]派别斗争使双方都陷入了是非敌友不分的地步。

至于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在四川。在袁世凯未死以前，唐对在四川前线与北军浴血奋战的蔡锷是支持不够的。增援之师，表面虽不能不答应，实际却拖延不发，弹药补给，蔡虽“迭电衷恳，究未照办”[278]。然而，当陈宦宣告独立，护国战争胜利在望时，他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首先，他迅速在原先护国三军的基础上增编了四个军：改挺进军为第四军，以黄毓成为总司令；将叶荃所率警卫团、步骑团及新由云、顺、缅招集的五千志愿兵编为第五军，以叶为总司令；扩充张子贞、刘祖武第一、二师为第六、七军，以张、刘为总司令。接着，他又命川边滇军二千人由披沙开抵普格，直逼四川宁远。及“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并“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279]。这表明唐继尧已成“独立自割”的地方新军阀，梁启超的谋川计

划遭到他的抵制是必然的。

此外，护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裂，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裁撤军务院的态度上。关于军务院裁撤时限，如前所述，早在其成立时就曾明确宣布过：俟正式国务院成立即行撤消。袁世凯暴毙后，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又再次公电声明，“现仍照此办理”，并于同日致电梁启超说，即使让步，也需待旧约法恢复，段祺瑞重新组织经军务院同意的临时内阁后，方可先行撤消[280]。但是，段却借口“统一”，切盼早撤。据天津《大公报》报道，陕川等三省取消独立后，他就“要求撤消军务院”[281]。梁启超起初是赞成唐继尧意见的。14日，他曾致电天津蹇念益，对唐电所言表示同意[282]。后因段祺瑞催撤日紧，特别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和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以国会为唯一武器，以军院为唯一后援”，日益激烈地鼓吹排段，甚至继续运动海军宣布独立，大有“不尽灭北洋势力不止”之势[283]，梁的态度才迅速发生了变化。28日，他通电独立各省说：“军务院宜亟图撤废”，“若此机关久存，非惟我辈倡义本心不能自白，且恐有人假借名号，生事怙乱，将来反动之结果，转助复辟派张目”，“鄙意宜各省联名将舟公（刘显世）巧电所主张径电中央，请以明令改组国务院，任员署理，军院即行宣告撤废”[284]。7月1日，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第二天，他又致电独立各省，表示“我辈要求已达，军院宜立即宣言撤废”，并拟撤废电文一通，要求“即日由滇拍发，用抚军全体署名”[285]。

在梁启超的鼓动下，7月2日，浙江都督吕公望首先通电响应，“请即由唐抚军长用军务院全体抚军署名，宣告撤消军务院”[286]。6日，蔡锷复电梁启超，同意在撤消军务院通电上“附署贱名”。8日，陆荣廷也回电说：“任公先生所拟宣言电稿，最为妥协，廷极赞同。即请由唐督拍发，附列贱名为盼。”[287]并于11日与陈炳焜联电唐继尧，请“领衔联名通电京省，将军务院刻日撤消，使国权统一，恢复和平。庶外系友邦之观听，内息异己之衅隙，俾吾辈光明正大之

行动，昭示天下”[288]。至于刘显世，他本来就是主张速撤军务院的。于是，在军务院内部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颇为强大的“速撤”派。

但是，唐继尧、岑春煊等却不接受梁启超的旨意。7日，唐复电梁，表示“拟正式阁成始撤军院”[289]。12日又致电岑春煊、陆荣廷说：“顷得梁新会电促即取消军务院，现在约法、国会但已恢复，〈既〉内阁亦经改组，本拟照办。惟阁员尚未就职，因未经国会同意，尚非正式成立，若即取消，恐不免发生困难问题，转有异词。”岑当即复电赞成仍“自守条例，不必取消”[290]。其间，唐继尧还以“军务院尚未取消，则名义所存，自未可一日而没”为由，公然致电岑、梁各抚军，推荐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刘存厚为抚军[291]。唐、岑反对速撤军务院，并非如梁启超所说，是“受人运动”。除段祺瑞独断独行，重组临时新阁阁员未如唐继尧所要求的那样，预求军务院同意，损伤了他们的体面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和他们“个人之权利加减”有关。唐继尧自恃有“首义勋劳”，理应在新政府中占有相应位置。岑春煊身居抚军副长，代摄抚军长职务，年高望重，正作着“副总统”的美梦。军务院乃是他们加减个人权利的砝码，当然不能撤消。

同时反对速撤军务院的还有黄兴、谭人凤、章炳麟等人，也就是梁启超说的所谓海上政客。7月3日，被袁世凯软禁多年刚刚由北京回到上海的章炳麟致电岑春煊说：“近闻道路传言，有取消军务院计画，斯事若行，则民气挫折，而奸回得志，元首等于赘旒，国会受其蹂藉。公瞻言百里，当为全国生民请命。”[292]后他又急匆匆地赶往肇庆，面责李根源：“余孽犹存，段氏专恣，大难未已，何其轻于收束如是？”[293]黄兴也再三呼吁：“凡属于正义派之人，宜结合为一，进而推之于前，以为国内势力之中坚，不致使非正义派仍有恢复旧势力之一日。”[294]不指名地批评了梁启超一派的分裂行为。谭人凤更痛心地指出：“此次又成一不痛不痒之收场，敢决其长治久安无事杞忧乎？窃以为未必也。”[295]他们从辛亥革命的惨痛失败中得出

了正确的结论，但由于不握有任何实际力量，终究还是未能阻止梁启超等人谋求裁撤军务院的活动。

梁启超为达到速撤军务院目的，首先是否认他先前倡导的由“独立省份会派专员与北协商”的善后会议，以使军务院失去存在必要。6月27日，他致电独立各省说：“鄙意前议似可作罢，别由各省、前敌各军各自与中央交涉，反为有益实际。”[296] 并单独电请刘显世倡议否认此举。关于否认此举的目的，他在同日给陆荣廷、陈炳焜的电报中说得十分清楚：“此议既罢，则军院宜谋速撤。”[297] 刘显世接电后，当即通电独立各省，倡言“总代表之议，似可作罢”[298]。其次，梁启超还一面敦请段祺瑞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组织新阁，对南方速作适当让步，以造成他向南方促撤军务院的口实；一面极力散布段深以未统一为忧，对外颇有难处，如日、俄新约及银团劝美加入等事、任命督长等令，“不先求军院及本人同意，诚可议，然实缘手忙脚乱，非有恶意，即前次任阁员亦然。且各事非尽出自段，若有咎，黎亦当分任”，“其举措间有失当处，乃识力不足……安可以待袁者待之”[299]？等等，企图借此骗取唐继尧等人同意速撤军务院。最后，梁启超亲电岑春煊、唐继尧，说什么“窘毙中央需一月者，未半月而我先已自窘毙”，今若不毅然撤消军务院，即将“生反动、续战祸、召外寇”，等等[300]。除这些危言耸听之词外，他还发动陆荣廷、陈炳焜、刘显世等人同时向岑、唐施加压力。6月27日他首次提出速撤军务院后，随即致电陆、陈，请“联各抚军一致主张”，并“劝西林（岑春煊）认真急流勇退”[301]。7月13日，他又电陆、陈：“中央举措虽多不满人意处，然各方面利用军院名义行种种罪恶者，实大有人在。望两公更以己意警告莫公（唐继尧）勿代人受过。”[302] 并于同日电示刘显世“联桂蜀警告莫”[303]，以造成岑、唐独力难抗的局面。

与梁启超等人软硬兼施，压迫唐、岑裁撤军务院的同时，北京政府也部分地接受梁启超的要求，对南方采取了有限的调和、折中和分化瓦解政策。7月6日，黎元洪申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

长官改称省长，废除将军、巡按使名称，但也不规复“都督”名义，并同时公布了各省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唐继尧、陆荣廷、陈炳焜、刘显世分别任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督军。数日后，消息传到云南，唐继尧见个人地位有了保证，而梁启超、陆荣廷等又纷纷催促他领衔撤消军务院，于是便顺水推舟，不经岑春煊等人同意，径领衔暨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李鼎新、罗佩金、刘存厚十三人名义，于14日发表军务院第六号布告，宣布“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适相符合。虽国务员之任命尚未经国会同意，然当此闭会时，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认，实为约法所不禁。本军务院为力求统一起见，谨于本日宣告撤废，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304]。但是，他后来解释提前撤消军务院的原因时，却只说“政府切盼统一，梁任公再四敦请，而浙桂黔均先表同意，西林亦有请将李总司令鼎新加入取消之电。此间素顾大局，毫无成见，遂毅然从权于寒日通电撤消”[305]。这里显然只说了事实的一半，而隐瞒了更为重要的另一半。同日，段祺瑞下令惩治帝制祸首，以敷衍南方各省。

岑春煊本不自由，在此形势下就更加独木难支了[306]。25日，他复电段祺瑞说：“军务院建置之初，本一时权宜之计。方兹约法恢复，国会重开，我公巩固共和，天下宗仰，况于组织新阁，延揽名贤，物望咸归，国命有托，倾诚拥护，固天下之公心，国赖老成，尤鄙衷所私幸。”[307] 表明他已默认唐继尧领衔宣布的既成事实。同日，中华革命党也奉孙中山谕通告各支分部：“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308] 到此为止，无论从哪方面说，护国战争都以护国军的妥协而最终结束了。而在促成这种妥协中，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三　护国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日益高涨的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以黄兴为旗帜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等共同发动的，其中尤以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和唐继尧等人均曾比较长期地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各级官吏，且一度是拥袁派，因此，参加云南首义的云南籍中华革命党员马幼伯致函上海陈其美说："此次滇南举义，首领多系官僚派。"(309) 其实，岂止"滇南举义"，整个战争的始末又何尝不如此。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虽属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急先锋，然而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而且又一无根据地，二未掌握军事实力，因此始终也未能取得斗争的实际领导权，仅处于被排挤的配角地位。

但是，这并不影响护国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上一次重要革命战争的历史地位。首先，它宣誓"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要求恢复孙中山公布的《临时约法》和据此而成立的国会，并誓灭国贼袁世凯，说明它在政治上与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二次革命，宗旨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继承了孙中山开辟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其次，它的参加者不但有深受孙中山革命教育和思想熏陶与影响的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即孙中山本人也于南方军务院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新阶段之后公开声明过"愿与国民共助之"。第三，它还认真地履行宣言，组织了切实有效的战斗，不仅实实在在地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复辟封建帝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正义性质。正义的战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它的胜利和成功。其次，它得力于以"护国"相号召和策动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的

正确决策。根据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新的历史条件，它提出了“护国”这个战斗口号，宣布“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310]，有机地把反对封建帝制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与孙中山那种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只知照搬由二次革命到“三次革命”之类的老口号相比，自然对国民更富于吸引力。而且它集中经营为袁世凯鞭长莫及的西南诸省，特别是注重于策动足以震动全国的云、贵两省的联合起义，而不像孙中山那样，一味采取“聚集散兵，结合土匪，以思一逞”[311]的策略，当然也为其胜利铺平了道路。第三，要归功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直接间接的团结合作。护国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各派虽因其固有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而且中华革命党自树中华革命军旗号，护国军内部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并非毫无芥蒂，但由于大目标一致，毕竟没有爆发公开的武装对立。中华革命军虽与护国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联络，但客观上却仍起了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作用。至于护国军内部各派的统一性当然就更多了。早在云南起义之初，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三人就联合声明过：“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312]这说明他们为了“倒袁救国”，是有合作诚意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盖此次各派……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313]正因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在主客观上都有团结合作的愿望与行动，这就为反袁反帝制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取得了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是，对护国战争的胜利也不宜估价过高。诚然，袁世凯是打倒了，民国也算恢复了，可是胜利者却重蹈辛亥覆辙，把胜利的果实又拱手奉给了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所不同的只是辛亥时期的袁世凯以总统名义接管了政权，而段祺瑞这次是以内阁总理名义接管政权罢了。此其一。其次，它不但未打倒北洋旧军阀，反而实际上造就和扶植了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新军阀。这是护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们所始料不及的。其三，它在声讨袁世凯“以国家为牺牲，引虎狼以自卫”的同时，却又照会各国，宣布“帝制问题发生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认”，也就是说，连袁世凯在日本“二十一条”基础上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民四条约》也在“担认”之列。这表明它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同样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谓“保全国权”，不过是一句空话。事实上，它时刻都在幻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且同样不计利害。唐继尧就表示过：为了获得日本的军事“器械”，“必不获已，以相当抵押品抵借数十万暂付械价，亦必尽力为之”[314]。梁启超也曾动员蔡锷，查一查蜀中有何抵押品，以便举借外债[315]。尽管其性质与袁世凯借款不尽相同，个别领导人如蔡锷还能一再警惕日本的“野心”[316]，但若照此下去，前门拒虎、后门引狼的后果将仍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护国战争所争得的不过是一块“民国”的空招牌，如同当年辛亥革命一样，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护国战争时期的客观条件是较为有利的。一方面，经过辛亥革命，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袁世凯卖国称帝面目的彻底暴露，孙中山所说的那种“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倖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317]的情况，已经改变，整个中国除极少数帝制死党外，“莫不以反袁为是”。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此外，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固然是不利的因素。但总的说来，列强可施加于中国的蛮横力量，不是增强而是相对地减弱了。所有这些，都是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可是，护国战争却未取得与此相应的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这次战争的领导权主要落入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手中，而革命党人却无力

扭转乾坤。

固然，中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妥协特性，即使革命派也在所不免，但是相对而言，在护国战争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毕竟还是坚定得多。他们不仅主张打倒袁世凯，而且坚决认为“袁世凯一人，并不难于推翻，而我们的目标尚在于同时清除其属下之全部官僚，以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影响”[318]。用谭人凤的话说，就是：“若农夫之务去草然，芟夷蕴崇，毋使潜滋焉。”[319]为此，他们极力反对荐举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继任总统。谭人凤听说蔡锷也有“推荐黎、徐、段、冯继任总统之事”，就赶紧致函蔡说：“黎氏者，乘风云以博倖位而肇祸共和者也；徐氏者，亡国之大夫也；段与冯者，袁氏之爪牙，以宠禄生心者也。麾下荐而重之，扐　谦之德，诚足多矣，仆窃为麾下耻之。”[320]直到袁世凯忧郁自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之后，他们仍坚持“护国诸军必须将背叛民国之逆贼及北京之龌龊政府灭而廓清之”，反对“轻率取消独立”[321]。此外，他们还反对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各省官僚宣言独立和在野名流的口舌文字之争上，主张直接依靠人民，进行武力征讨。5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官僚有转移时局之地位，而无转移时局之真意。”“名流有转移时局之苦心，而无转移时局之实力。”因此，“转移时局之主力，还须问之于国民本身，而无待乎他求耳”[322]。不过究应如何问之于国民，它也没有说出办法来。以上事实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对护国战争的指导，比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还是要高明一些。可惜的是他们不掌握领导权，缺少推行贯彻的力量。

具备这种实力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西南地方实力派。然而，他们的指导方针却与此截然相反。首先，他们所要打倒的只是袁世凯个人，并不是北洋军阀。梁启超说：“今日之事，惟袁氏一人实为戎首，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袁氏朝退，兵祸夕解。”[323]岑春煊也声明：“义军之起，职在讨袁，袁苟朝去，

兵即夕解。”[324] 他们虽然早在京津密谋时，就提出了打倒袁世凯后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主张，但却丝毫不意味着要杜绝北洋军阀觊觎大位。蔡锷就说过：“至于继任之人，以段芝老（段祺瑞）之资望、勋业、道德、经验，人无间言。惟移花接木，苦无善法。”并主动献计献策，允“与滇黔桂粤诸当道力为斡旋”，“务使芝老当选”[325]。至于梁启超，更是在袁世凯死后就一头扎进了段祺瑞的怀抱。其次，他们非但不依靠人民，反而对人民多所限制。云南首义后不久，蔡锷即传檄四川人民：“但有一层，凡举事须有个系统，有个秩序，才不致紊乱。即如云贵此次举义，是由两省长官决定，一纸风行，民间毫无扰乱。四川的长官，若能顾全大局，顾全地方，即由长官决定，也不过一纸风行，就算完事，民间不致丝毫受害，岂不甚善。”[326] 这表明他们所赞成的仅仅是各省军阀、官僚、政客自上而下的所谓“独立”。正因如此，所以只见他们今日动员冯国璋“响应”，明日劝说陈宦“独立”，独不见其鼓励自下而上的人民起义。岂止不鼓励，甚至还有被他们诬为“匪徒”，惨遭武力镇压的。5月中旬，入湘护国桂军就曾应地方绅商之请，分兵新宁，与湘南护国军总司令望云亭所部合力“弹压”过宝庆各属的所谓“土匪”[327]。第三，他们虽然倡议和坚持过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但纯属不得已的应付，并非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象征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真正重视。这是梁启超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过的。6月27日，他致电刘显世等人说：“约法复旧之议，导源于四省推黄陂（黎元洪）继任之宣言，元首地位既从旧法来，旧法安得不复？法复而国会自随之，此舆论所由共趋于此也。”[328] 蔡锷提议由议员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行国会职权议宪法，实际上就是不同意恢复旧国会。梁启超于6月29日致电蔡说：“约法、国会复旧，已成舆论，不宜撄其锋。”[329] 并促其迅电各处取消前议，以免引起国人不满。第四，他们虽然在护国倒袁的大目标下，表现了一定的团结合作精神，但对中华革命党却始终心怀敌意，连李根源都承认：“数月以来，力持稳健，不敢窃附于轻躁一派者所为。”[330] 所谓“轻躁一派”，指的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他们宣言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的是“杀国人非分之心，而

杜将来无穷之祸”[331]。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防止他人觊觎总统之位[332]。前面说过，对于北洋军阀，他们并无防备之心，那么，究竟要防备谁呢？其实就是防备孙中山。因为当时有总统声望而最为他们所不喜欢的，正是孙中山。他们还一个个地安排各省军阀、官僚为军务院抚军，却不给中华革命党一个席位。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袁世凯未死以前，他们的派别成见也是很深的，以致袁世凯一死，终于导致了护国阵营的大分裂。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尽管客观上具备一定的胜利条件，但由于它的主观领导者是本来就很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富于保守性和妥协性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因而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护国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不流血的和平改革，而且还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独有的特点。但同时也证明：即使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战争期间，它也还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因为它所推行的，仍然是一向与革命相对立的、自上而下的、反对“破坏”的所谓“文明革命”的方针，其改良派的基本品格并没有丝毫改变。

护国战争的历史又证明：在争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合作，是至关紧要的。护国战争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护国战争之所以未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直接的原因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的结果，是改良派占了上风，革命派无能为力。革命派为什么没有取得这次战争的领导权呢？那就不能不归结到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犯了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它不仅重复了辛亥革命时期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而且把国民党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也排斥出去。要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充当领导，不能单靠革命口号喊得多么高，也不能靠单纯的军事冒险多么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坚决地发动群众，正确地组成统一战线。中华革命党没有这样做，

因而未能成为护国战争的领导者。护国战争的领导权既然主要地落到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手里，它的结果就只能是那样。这些都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但是，护国战争的历史也证明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自辛亥革命后，已经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谁要想再把它抬出来招摇过市，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即使如袁世凯这样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人物，也不能免。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人民意志不能违背，护国战争为人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

(1) 《关于西南之纪载》，《时报》，1916年3月27日，参见同日《申报》所载《取消帝制之应付与影响》。

(2) 《退位问题之北京消息》，《申报》，1916年3月31日。

(3) 《专电》，《申报》，1916年3月25日。

(4) 《伪政府请滇黔息兵之原电》，上海《民信日报》，1916年4月23日。

(5) 《蔡松坡集》，第1017页。

(6) 《护国文献》，第489页。

(7) 梁启超：《盾鼻集·电报第三》，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页。

(8) 《申报》，1916年4月22日。

(9) 《蔡松坡集》，第1005页。

(10) 《蔡松坡集》，第1006页。

(11) 《蔡松坡集》，第1008页。

(12) 《申报》，1916年4月9日。

(1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94页；参见《南方力主退位》，《申报》，1916年4月15日。

(1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94页。

(15) 《蔡松坡集》，第1091页。

(1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94页。

(17) 《记者与刘杏村君之谈话》，成都《国民公报》，1916年5月2日。第十条内容待查，据宣布以上九条内容的刘一清说，此条“不便与诸君言也”。

(18) 《申报》，1916年4月22日。

(19) 《非议和》，《民国日报》，1916年4月2日。

(2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89页。

(21) 《黄兴集》，第425页。

(22)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9页。

(23) 《蔡松坡集》，第1015页。

(24) 《蔡松坡集》，第1081页。

(25) 《蔡松坡集》，第1045页。

(26) 《蔡松坡集》，第1056页。

(27) 《蔡松坡集》，第1054页。

(28) 《蔡松坡集》，第1004页。

(29) 《蔡松坡集》，第1054页。

(30) 《蔡松坡集》，第1023页。

(31) 《蔡松坡集》，第1006页。

(32) 《蔡松坡集》，第1038页。

(33) 《蔡松坡集》，第1092页。

(3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4页。

(3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8页。

(36)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8页。

(37) 《广东独立续志》，《民国日报》，1916年4月15日。

(38) 《广西护国军要讯》，《中华新报》，1916年4月9日。

(39) 驻广州记者怡公：《桂省独立后之广东》，《中华新报》，1916年4月1日。

(40) 秋声通讯：《广东伪独立之大披露》，《民国日报》，1916年4月23日。

(41) 《莫擎宇致粤当道电》，《民国日报》，1916年4月19日。

(42) 秋声通讯：《广东伪独立之大披露》，《民国日报》，1916年4月23日。

(43) 梅：《珠江风雨》，《中华新报》，1916年4月10日。

(44) 四月十五日香港通信：《广东独立之原因》，《中华新报》，1916年4月26日。

(45) 《粤事之两大索隐》，《民国日报》，1916年4月23日。

(46) 龙济光、张鸣岐致各省通电（1916年4月7日），《民国日报》，1916年4月17日。

(4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92页。

(48)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9) 《浙江独立详志》，《民国日报》，1916年4月15日。

(50) 《前附逆将军朱瑞致西医梅滕生［更］书》，《中华新报》，1916年5月3日。

(5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0页。

(52) 吴金声呈冯国璋文（1916年），《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3) 《黄兴集》，第430页。

(54) 《浙省独立始末之补述》，《民国日报》，1916年4月20日。

(55) 《浙江独立》，《民国日报》，1916年4月13日。

(56) 《浙江独立后之要闻》，《民国日报》，1916年4月28日。

(5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98页。

(58) 《浙江独立志（三）》，《民国日报》，1916年4月17日。

(5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98页。

(60) 《浙江独立后之要闻》，《民国日报》，1916年4月28日。

(61) 《某君致浙江独立诸要人书》，《民国日报》，1916年4月16日。

(62) 《浙江国会议员反对屈映光电》，《民国日报》，1916年4月17日。

(6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04页。

(64) 《曲石文录》，第249—252页。

(65) 张宗昌折陈（1916年6月），《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66) 两广都司令部参谋厅：《军务院考实·第四编》，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71页。

(67) 《护国文献》，第425页。

(68) 《护国文献》，第425页。

(69) 前云南都督府秘书厅：《会泽首义文牍·书牍》，1917年版，第28页。

(70) 《护国文献》，第425页。

(7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58页。

(72) 李根源口述、刘寿朋笔记：《护国军始末谈》，《中论》第2期，1917年4月。

(7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1页。

(7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页。

(75) 《护国文献》，第426页。

(76)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9页。

(77)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0—11页。

(78) 《海珠惨杀案（二）》，《民国日报》，1916年4月21日。另有说吕系南路司令的。

(79)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2页。

(80) 《护国军始末谈》，《中论》第2期。

(81) 《粤局一大结束》，《中华新报》，1916年4月29日。

(82) 《粤局一大结束》，《中华新报》，1916年4月29日。

(83) 梁启超、温宗尧致广州总商会电（1916年4月23日），《民国日报》，1916年5月3日；《时报》，1916年5月2日。

(8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0—781页。

(85) 菊庄通信：《粤省民军龙军之消长观》，《时报》，1916年5月15日。

(86) 菊庄通信：《粤省大局糜烂之痛史》，《时报》，1916年5月6日。

(8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9页。

(88) 《军务院考实》附《两广部司令部考实·第六编》，第1—17页。

(8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3—784、779页。

(9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9页。

(91)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页。

(92) 《护国军始末谈》，《中论》第2期。

(9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7页。

(94) 《李印泉致滇军政两界友人书》，《中华新报》，1916年5月25日。

(9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6页。

(96) 参见《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58页。

(97)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3页。

(98)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4页。

(99) 《曲石文录》，第249—252页。

(100) 《蔡松坡集》，第1110页。

(101)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1—2页。

(102)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1—2页。

(103)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6页。

(10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0页。

(10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6页。

(106)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8页。

(107)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9页。

(1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40页。

(109)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8页。

(110) 《都司令之严禁骚扰》，《时报》，1916年5月15日。

(111) 秋声通讯：《粤局内幕之真相》，《民国日报》，1916年5月18日。

(112) 《军务院考实》附《两广都司令部考实·第四编》，第105—106页。

(11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2页。

(114) 彬彬：《最近时局要闻》，《时报》，1916年5月18日。

(115) 《曲石文录》，第251页。

(11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页。

(117) 菊庄：《粤滇桂会师北伐之表面观》，《时报》，1916年5月20日。

(118) 《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

(11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1页。

(12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2页。

(121) 《冯上将态度之索隐》，《时报》，1916年5月15日。

(12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2页。

(12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6年5月4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24)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92页。

(125) 冯国璋致未独立各省通电（1916年4月25日），《中华新报》，1916年5月15日。

(126) 冯国璋致未独立各省通电（1916年5月1日），《民信日报》，1916年5月13日。

(1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1页。

(128) 张勋冯国璋倪嗣冲致未独立各省通电（1916年5月6日），《时

报》，1916年5月13日。

(129) 《南京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5月15日。

(130) 《袁世凯与王士珍之谈话》，《中华新报》，1916年5月25日。

(13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5页。

(13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5—656页。

(13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6页。

(13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61页。

(135) 《袁世凯与王士珍之谈话》，《中华新报》，1916年5月25日。

(136) 《陕西特别通信》，《民国日报》，1916年5月30日。

(137) 《再志秦中独立之详情》，《时报》，1916年6月5日。

(138) 陆建章等致政事堂电（1916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39) 记者何汉：《秦军宣布独立之快报》，《民信日报》，1916年5月7日。

(140) 《再论秦中独立之详志》，《时报》，1916年6月5日。

(141) 《三秦豪杰起义之真相》，《民国日报》，1916年5月26日。

(142) 《陕西民军之大活动》，《民信日报》，1916年5月17日。

(143) 《陕西独立详志》，《民国日报》，1916年5月24日。

(144) 陆建章、陈树藩致北京国务院等电（1916年5月18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6日。

(145) 陆建章、陈树藩致北京国务院等电（1916年5月18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6日。

(146)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03页。

(147) 《陕西独立之真相》，《时报》，1916年6月5日。

(148)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05页。

(149) 季自求：《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50) 季自求：《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51)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152)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153)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154)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155) 《川省糜烂不堪之惨状》，《时报》，1916年5月15日。

(156)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157)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58)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5页。

(159) 《独立声中之四川近况》，《时报》，1916年5月19日。

(160) 《不可捉摸之四川独立》，《时报》，1916年5月23日。

(161)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62)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63) 《蔡松坡集》，第1064页。

(164) 《前督军蔡公致罗督军殷镇守使书》，成都《中论》第2期。

(165)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66)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7页。

(167)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7页。

(168) 《不可捉摸之四川独立》，《时报》，1916年5月23日。

(169)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70)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71) 《川省独立记》，《时报》，1916年6月7日。

(172) 《蔡松坡集》，第1092页。

(173)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74) 《四川独立记》，《护国军纪事》第5期。

(175) 《蔡松坡集》，第1097页。

(176)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8页。

(177) 《前督军蔡公致罗督军殷镇守使书》，成都《中论》第2期。

(178) 《前督军蔡公致罗督军殷镇守使书》，成都《中论》第2期。

(179)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80) 陈执中：《汤芗铭历略》，1916年秋撰未刊稿。

(181) 《覃振之湖南独立谭》，《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82) 彬彬：《湘省独立后中央要闻》，《时报》，1916年6月6日。

(183) 泪红：《呜乎，湘中御用服》，《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84) 泪红：《呜乎，湘中御用服》，《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18页。

(186) 《湘省各属独立之面面观》，《时报》，1916年6月2日。

(187)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88) 《蔡松坡集》，第1122页。

(189) 《覃振之湖南独立谭》，《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19页。

(191) 彬彬：《湘省独立后中央要闻》，《时报》，1916年6月6日。

(192)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3)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4)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5)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7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6) 长沙特约通讯员泪红：《湖南各属独立统系表》，《民意报》，1916年5月31日。

(197) 长沙特约通讯员泪红：《湖南独立前之大恐慌》，《民意报》，1916年6月2日。

(198) 长沙特约通讯员泪红：《湖南全省独立详记》，《民意报》，1916年6月6日。

(199)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6年5月29日），《时事新报》，1916年6月5日。

(200) 《湖南近况与川省将来之战事》，《民意报》，1916年6月1日。

(201) 《湖南独立前之酝酿》，《民意报》，1916年6月1日。

(202) 汤芗铭独立布告（1916年5月29日），《时事新报》，1916年6月5日。

(203)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04)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05)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206)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207)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08) 《袁大总统病故之确闻》，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7日。

(209)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10) 《袁总统病革前后之详情》，《大公报》，1916年6月8日。

(211)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12)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中册，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第82页。

(213) 《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82页。

(214)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65页。

(21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第132页，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65页。

(217)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21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71页。

(21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76—677页。

(220)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31页。

(221)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33—34页。

(222) 殷汝骊等致黄兴电（1916年6月8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2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35页。

(22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3页。

(22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92页。

(22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5页。

(22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5页。

(228) 黄兴致黎元洪等电（1916年6月9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2日。

(229) 《国会议员宣言》，《中华新报》，1916年6月11日。

(230)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43页。

(231) 《朱家宝主张恢复元年约法之通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32) 冯国璋致黎元洪段祺瑞电（1916年6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8日。

(233) 黄群致梁启超电（1916年6月12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34) 《黄兴集》，第442页。

(235) 梁启超复黄群电（1916年6月16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3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10页。

(237) 《关于恢复约法问题之要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19日。

(23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85页。

(239) 《海军李总司令最近之宣言》，《中华新报》，1916年7月9日。

(240) 孙洪伊致冯国璋函（1916年4月12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41) 《海军李总司令最近之宣言》，《中华新报》，1916年7月9日。

(24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7页。

(243) 旅沪国会议员致黎元洪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16日。

(244) 谭人凤致岑春煊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20日。

(245) 《中华民国海军举义记》，《中华新报》，1916年6月26日。

(246) 梦公：《海军独立之关系》，《中华新报》，1916年6月28日。

(24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89页。

(248) 《陈宦致北京国务院和黎元洪电》（1916年6月8日），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11日。

(249) 龙济光致段祺瑞电（1916年6月13日），《大公报》，1916年6月18日。

(25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6页。

(251) 《政府公报》，1916年6月22日。

(252) 梁启超致独立各省电（1916年6月7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9日。

(253) 《蔡松坡集》，第1144页。

(254) 《蔡松坡集》，第1152页。

(25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94页。

(2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80页。

(257)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9页。

(258)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0页。

(259)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48页。

(26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10页。

(261)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48—49页。

(262)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8页。

(26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4页。

(26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3页。

(265) 《袁世凯死后之时局》，《民国日报》，1916年6月7日。

(26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8—309页。

(267) 《黄兴集》，第440页。

(268) 徐朗西：《黄克强先生与记者之谈话》，《民意报》，1916年7月8日。

(269) 《胡汉民先生之时局观》，《民国日报》，1916年6月8日；《张溥泉先生之政谈》，《民国日报》，1916年6月14日；《章太炎致岑春煊电》（1916年7月3日），《民国日报》，1916年7月4日；《袁氏死后之护国军表示》，《民国日报》，1916年6月24日。

(270) 《谭人凤先生演说词》，《民意报》，1916年7月25日。

(271) 孙洪伊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6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15日。

(272) 《盾鼻集·函牍第二》，第10-11页。

(27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0页。

(27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17页。

(27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69页。

(276) 《梁任公为陈、王表功之反响》，《民信日报》，1916年7月17日。

(27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31页。

(278) 《蔡松坡集》，第1139页。

(279) 《蔡松坡集》，第1199页。

(280) 唐继尧致梁启超电（1916年6月10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5日。

(281) 《四省独立同时取消之时期》，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16日。

(282)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7页。

(28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8页。

(28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2页。

(28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3—54页。

(286) 吕公望致独立各省电（1916年7月2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

(2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4页。

(288) 陆荣廷陈炳焜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7月11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18日。

(28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3页。

(290) 岑春煊致唐绍仪等电（1916年7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20日。

(291) 《会泽首义文牍·电报》，第35页。

(292)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32页。

(29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53页。

(294) 《黄兴集》，第448页。

(295) 《谭人凤先生演说词》，《民意报》，1916年7月25日。

(296)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1页。

(2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34页。

(298) 刘显世致岑春煊等电，《中华新报》，1916年7月15日。

(29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1、742、748页。

(30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0、748页。

(3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34页。

(30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5页。

(3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6页。

(304) 军务院撤销通电（1916年7月14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17日。

(305) 唐继尧致李宗黄电（1916年7月），《中华新报》，1916年7月17日。

(3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7页。

(307)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21页。

(308)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中华新报》，1916年7月28日。

(309) 马幼伯致陈其美函（1916年），《革命文献》第48辑，第162页。

(310) 经唐继尧亲自审定的护国演说社演说稿：《护国军之责任与声价》，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1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8页。

(312) 《蔡松坡集》，第894页。

(31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24页。

(31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81页。

(3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29页。

(316) 《蔡松坡集》，第1004页。

(31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284页

(31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99页。

(319) 《谭人凤致蔡松坡书》，《民国日报》，1916年4月26日。

(320) 《谭人凤致蔡松坡书》，《民国日报》，1916年4月26日。

(321) 《湖南军务与大局》，《民意报》，1916年6月20日。

(322) 《转移时局之主力》，《民国日报》，1916年5月2日。

(323) 《盾鼻集·公文第一》，第27页。

(324) 岑春煊等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6月1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9日。

(325) 《蔡松坡集》，第1083页。

(326) 《蔡松坡集》，第939页。

(327)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9页。

(32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9页。

(32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11页。

(330) 《粤省宣布独立后之民军（二）》，《民国日报》，1916年4月20日。

(331)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21页。

(332) 《盾鼻集·公文第一》，第26页。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各部院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程德全致袁世凯漾电》（抄件），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藏，南京

《筹议广东善后意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大树堂来鸿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

《护国军之责任与声价》，唐继尧护国演说社演说稿，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近代史料藏札》（稿本），北京图书馆藏，北京

《梁士诒函稿》（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抄件），中华书局藏，北京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抄件），中华书局藏，北京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抄录》（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

《汤觉顿致梁启超书》（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

《汤芗铭历略》（稿本），陈执中著，1916，藏地不详

《唐继尧致蔡锷电》（稿本），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稿本），熊达成著，藏地不详

《张镇芳存札》（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俄协约案件·总长会晤俄使问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华民国自由党湖南支部白话报》，中国共产党湖南临澧县委党史办公室藏，临澧中文著作

《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编，1912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杜春和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补过斋文牍·戊集一》，杨增新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北京，新潮社编，1920

《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松坡先生遗集·祭词》，刘达武编，出版地不详，1943

《参议院议决案汇编》乙部第4册，南京参议院编，1912

《澄庐文集》第3卷，邹鲁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程雪楼先生书牍》上卷，程德全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大理院编辑处编，北京，1926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宓汝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吴承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盾鼻集·电报第三》，梁启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第二次矿业纪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编，北京，1926

《俄蒙协约审勘录》，吴成章著，北京，顺天时报馆，1915

《鄂州血史》，蔡寄鸥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二十一条交涉经过》，王正廷著，出版地不详，1923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郑祖荫编，福州，出版时间不详

《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出版地、时间不详

《光绪条约·英约（三十年丙午）》，北京，外交部印刷所，1916

《国父年谱》（增订本），罗家伦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9

《国民党之回顾录》第5卷，萃文社，出版地不详，1915

《汉冶萍公司史略》，全汉升著，九龙文海出版社，1971

《洪水集》，江亢虎著，出版地不详，1913

《洪宪惨史》，王建中著，出版地不详，1925

《洪宪纪事诗三种》，刘成禺、张伯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胡汉民先生年谱》，蒋永敬编，台北，1978

《护国军始末谈》，李印泉著，北京，京华印书局，1917

《护国文献》，云南、贵州两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李希泌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会泽首义文牍·书牍》，云南都督府秘书厅编，昆明，1917

《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黄兴与中国革命》，薛君度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台北，文星书店，1962

《回顾录》，邹鲁著，独立出版社，1947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两广都司令部参谋厅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上海，中华书局，1930

《李烈钧自传》，三户图书社，出版地不详， 1944

《黎大总统政书》，上海，晋益书局，1916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上海，广益书局，1914

《联豫驻藏奏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支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选集》，李华兴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王芸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

《旅藏二十年》，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梅川日记》，居觉生（正）著，上海，大东书局，1947

《南北恶感新文牍》卷3，锋镝余生著，出版地不详，1913

《民国财政纪要》，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北京，1915

《民国政党史》，谢彬著，出版地不详，1928

《民元藏事电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蒙古风云录》，唐在礼著，出版地不详，1912

《蒙古鉴》第5卷，卓宏谋著，北平，普善印刷局，1935

《蒙事随笔》，陈箓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平赣要事记》，李廷玉著，北京，财政部印刷局，1915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邹念之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凤冈及门弟子编，上海，联合书局，1946

《世载堂杂忆》，刘禺生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松坡军中遗墨》，松坡学会重印版，出版地不详，1926

《松寿老人自叙》，张勋著，出版地不详，1922

《宋教仁集》下册，陈旭麓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孙中山全集》第2、3卷，孙中山著，北京，中华书局，1982

《谭人凤集》，石芳勤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田赋案牍汇编》，北洋财政部编，北京，1914

《外蒙古撤治问题》，李毓澍著，台北，1961

《外蒙古现代史》第1册，张大军著，台北，1983

《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杨铨著，上海，申报馆，192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西藏大事记》，杨德麟著，台北，1955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63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朱锦屏著，出版地不详，1925

《西藏问题》，王勤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柏尔著，宫廷璋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杨大金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陈旭麓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辛亥革命在河南》，王天奖、邓亦兵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辛壬春秋·山西第六》，尚秉和著，历史编辑社，出版地不详，1924

《熊希龄集》上，林增平、周秋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徐世昌》，沃丘仲子著，出版地不详，1918

《叙永县志》卷5，岑炯昌主修，宋曙总纂，重庆肇明铅石印刷公司，1933

《玄玄遗著》，田桐著，出版地不详，1937

《雪生年录》卷2，李根源著，曲石精庐，出版地不详，1934

《验契及契税案牍汇编》，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北京，1914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芮恩施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胡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陈复光著，昆明，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徐有朋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

《袁氏当国史》，马震东著，出版地不详，1930

《袁氏盗国记》，黄毅编，上海国民书社，1916

《远生遗著》卷1、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永顺县志》卷26，张孔修总纂，长沙，吟章纸局，1930

《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熊希龄著，出版地不详，1913

《整理广东纸币始末记》，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北京，1915

《中俄蒙古交涉节略》，外交部吉林交涉署编，北京，1913

《中俄外交史》，陈博文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中俄外交史》，何汉文著，上海，中华书局，1935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吕秋文著，台北，1976

《中俄中英关于蒙古西藏约章合编》，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编，南京，1929

《中国存亡问题》，朱执信著，日本东京会文社，1917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李文治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领土内帝国主义资本战》，长野朗著，丁振一译，上海联合书局，1928

《中国棉业之发展》，严中平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中国铁道建设》，张嘉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周学熙编，出版地不详，1913

《中国之棉纺织业》，方显廷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中华革命党之研究》，王玮琦著，台北，正中书局，1979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李毓澍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中日贸易统计》，蔡正雅、陈善林等编，上海，中华书局，1933

《中印边境》，［英］兰姆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远东外交研究会编，国际协报社，出版地不详，1923

中文报纸

《爱国白话报》，北京

《长沙日报》，长沙

《大公报》，重庆、上海、天津

《大共和日报》，上海

《滇南公报》，昆明

《铎报》，贵阳

《广西公报》，贵州

《国民公报》，成都

《国闻周报》，上海

《河南近讯》，郑州

《华南新报》，昆明

《觉报》，昆明

《临时公报》，北京

《民国新闻》，上海

《民立报》，湖州

《民权报》，上海

《民声日报》，广州

《民视报》，北京

《民信日报》，上海

《民谊》，广州

《民意报》，上海

《民约报》，天津

《民主报》，上海

《南洋总汇新报》，新加坡

《平民日报》，上海

《前锋》，广州

《强国公报》，武汉

《秦风日报》，西安

《群强报》，北京

《申报》，上海

《神州日报》，上海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顺天时报》，北京

《太平洋报》，上海

《天津益世报》，天津

《天南日报》，昆明

《天铎报》，上海

《香港时报》，香港

《新纪元报》，北京

《新青年》，北京

《亚细亚日报》，北京

《义声报》，昆明

《正宗爱国报》，北京

《中华民报》，上海

《中华新报》，上海

《中论》，成都

中文期刊

《东方杂志》，上海

《国民杂志》，北京

《汗血月刊》，上海

《甲寅》，北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社会星》，上海

《天津社会科学》，天津

《云南实业杂志》，昆明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

《宪法新闻》，北京

《正谊》，上海

《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传记文学》，台北

日文档案文献

《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部分·革命党关系》，日本外务省档案

日文著作

《蒙古地志》上卷，柏原孝久、滨田纯一编，东京，1919

英文著作

Bland，J．O．P．*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London，1912

Croly，H．*Willard Straight*．New York，192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Friters．*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49

J．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New York，1921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London，1966

Li，Tish-tseng．*Tibet，Today and Yesterday*，New York，1960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Delhi，1979

Snum，K．K．*Japan's Attitude Towar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Series 21，1980，3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New York，1969

英文报刊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Beijing

俄文著作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20，2，1034，1938-1940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迪斯（Addis）

阿穆尔灵圭

B

白　朗

白启禄

白逾桓

柏　尔

柏文蔚

坂西利八郎

坂野吉三郎

宝　道（Padoux）

宝　熙

鲍贵卿

本野一郎

毕桂芳

薄子明

C

蔡　锷

蔡　森

蔡成勋

蔡春华

蔡汉卿

蔡济民

蔡儒楷

蔡锐霆

蔡元培

曹　锟

曹浩森

曹汝霖

曹锡圭

岑春煊

柴宝山

常恒芳

车继斌

车林齐密特

陈　榥

陈　篆

陈　强

陈　威

陈　仪

陈　宦

陈　毅

陈　英

陈宝箴

陈炳焜

陈炳谦

陈传曾

陈德出

陈独秀

陈黻宸

陈复初

陈光远

陈广章

陈国强

陈国祥

陈果夫

陈焕章

陈家鼐

陈锦涛

陈景华

陈景桓

陈景松

陈敬第

陈炯明

陈懋修

陈其美

陈荣昌

陈三立

陈叔通

陈树藩

陈树勋

陈陶遗

陈廷训

陈文甫

陈文运

陈校经

陈兴亚

陈星枢

陈贻范

陈应品

陈元霆

陈月侨

陈泽霈

陈昭常

陈振先

陈之骥

陈中孚

陈钟英

陈仲甫　见陈独秀

陈紫枫

陈祖烈

陈祖虞

程　潜

程德全

程凤章

程家柽

程经世

程守箴

程树德

程雪楼　见程德全

程泽湘

程芝萱

程子楷

褚辅成

D

达桑占东

达锡札布

大隈重信

戴　戡

戴鸿慈

戴鸿智

戴季陶

但懋辛

德尔智

德福斯（Devos）

邓　铿

邓　熔

邓　实

邓汉祥

邓泰中

邓泰中

邓天乙

邓蔚林

邓玉麟

邓泽如

丁　恩（Dane）

丁葆桢

丁佛言

丁景良

丁开嶂

丁匡公

丁世峄

丁振铎

董伯群

董崇仁

董光弼

董鸿勋

董鸿祎

董士佐

杜　持

杜韩甫

杜淮川

端　方

端木璜生

段尔源

段祺瑞

段芝贵

F

樊增祥

范鸿仙

范西礼夫（Wassiljew）

范玉田

范源濂

方　维

方　正

方更生

方继英

方声涛

方亚凡

方玉普

冯德辉

冯国璋

冯麟阁

冯嗣鸿

冯玉祥

冯自由

符鼎升

傅良佐

G

高　溯

高尾亨

戈克安

格　雷

格里哥列夫（Григорьев）

葛宝成

葛诺发（Коновалов）

葛应龙

耿　毅

宫崎寅藏

龚焕成

龚天福

龚心湛

龚星胜

龚荫槐

龚振鹏

贡桑诺尔布

古德诺（F．J．Goodnow）

古应芬

谷钟秀

顾　鳌

顾　斌

顾开文

顾乃斌

顾琢塘

关步青

关赓麟

关冕均

管　鹏

管昆南

管颖侯

桂太郎

郭　同

郭懋仁

郭懋修

郭人漳

郭业尔（Гоер）

郭元珍

郭则沄

H

哈　定（Charles Hardinge）

哈汉章

哈豪森（E．Von Haxthausen）

哈在田

海妻猪勇彦

韩　恢

韩国钧

杭达多尔济

何成濬

何丰林

何光燮

何国钧

何海鸣

何海清

何子奇

何宗莲

贺国昌

贺振雄

贺重熙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洪承点

洪述祖

洪兆麟

胡　钧

胡　骏

胡　伟

胡　仰

胡　瑛

胡秉柯

胡殿甲

胡鄂公

胡汉民

胡经武

胡景伊

胡汝麟

胡瑞霖

胡石青　见胡汝麟

胡思敬

胡嗣瑗

胡万泰

胡惟德

胡祖舜

华封歌

黄　郛

黄　旭

黄　群

黄　兴

黄　钺

黄复生

黄国樑

黄家宸

黄恺元

黄克强　见黄兴

黄理中

黄鲁连

黄懋鑫

黄鸣球

黄士龙

黄世棕

黄霄九

黄永社

黄毓成

黄元秀

黄远庸

黄云鹏

黄赞元

黄增耇

黄展云

J

籍忠寅

季雨霖

加藤高明

嘉乐恒（William James）

贾德耀

简玉阶

简照南

蹇念益

江　谦

江朝宗

江光国

江亢虎

江孔殷

江永隆

姜桂题

姜国梁

姜克生（Jackson）

蒋　筠

蒋方震

蒋介石

蒋士立

蒋雁行

蒋翊武

蒋由南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尊簋

蒋作宾

金邦平

金汉鼎

金泯澜

靳云鹗

靳云鹏

景耀月

久原房之助

居　正

瞿　钧

瞿鸿禨

K

康　德（Conty）

康有为

柯　司

克尔顿

克里斯浦（Crisp）

孔繁蔚

孔令贻

孔祥柯

孔祥霖

孔　子

库朋斯基（Крупенский）

奎　芳

L

廓索维慈（Кокович）

莱西曼（Leishman）

兰　逊（Lanson）

蓝公武

蓝建枢

劳乃宣

雷　飙

雷　英

雷　瀛

雷克司

雷铁生

雷震春

冷　遹

黎　澍

黎　渊

黎本唐

黎元洪

黎宗干

李　彬

李　纯

李　诲

李　浚

李　穆

李　准

李葆林

李炳之

李长泰

李大钊

李鼎新

李定魁

李福全

李根源

李国镛

李国珍

李国柱

李海云

李恒春

李鸿祥

李厚基

李怀霜

李嘉品

李进才

李经迈

李经羲

李景铃

李景铭

李镜清

李开儒

李可钧

李烈钧

李流芳

李鸣凤

李平书

李乾玉

李庆芳

李善波

李盛铎

李士伟

李书城

李思广

李廷玉

李文富

李文汉

李文熙

李燮和

李雁宾

李耀汉

李元箸

李曰垓

李肇甫

李忠义

李子辉

李宗黄

李作栋

连成基

联　芳

梁　渡

梁鼎芬

梁敦彦

梁鸿志

梁启超

梁如浩

梁士诒

梁舜传

梁思顺

梁燕孙　见梁士诒

梁钟汉

梁仲则

廖伯琅

廖希贤

廖湘芸

廖仲恺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虎

林　森

林　纾

林伯和

林长民

林成登

林衡可

林景云

林俊廷

林述庆

林斯琛

林文英

林与乐

林雨时

林拯民

凌　霄

凌　钺

凌　云

刘　松

刘　铁

刘　通

刘　询

刘　彦

刘　毅

刘　英

刘伯承

刘成禺

刘春霖

刘存厚

刘鼎锡

刘尔炘

刘凤同

刘福彪

刘古香

刘冠雄

刘国栋

刘槐森

刘济川

刘建藩

刘金标

刘镜福

刘揆一

刘龙标

刘茂曾

刘人熙

刘瑞麟

刘师培

刘世钧

刘崧衡

刘天猛

刘廷琛

刘廷汉

刘文锦

刘显世

刘心源

刘星楠

刘延扬

刘艺舟

刘莹泽

刘有才

刘玉麟

刘跃龙

刘云峰

刘震寰

刘镇华

刘祖武

柳承烈

柳人环

龙　伯（Rump）

龙济光

龙建章

龙觐光

隆世储

卢　焘

卢汉生

卢师谛

卢永祥

卢仲农

鲁梓材

陆　锦

陆承武

陆鸿逵

陆鸿仪

陆惠生

陆建章

陆兰清

陆梦熊

陆启荣

陆荣廷

陆兴祺

陆裕光

陆徵祥

陆宗舆

吕　超

吕丹书

吕东升

吕公望

吕志伊

吕仲铭

吕子人

伦青夏札

罗　斌

罗　斯

罗　西（Rossi）

罗佩金

罗文幹

罗子常

罗子达

M

马　济

马　良

马　素

马　骧

马安良

马伯援

马尔参（Maltzan，Baron）

马逢伯

马继增

马金叙

马景融

马君武

马克思（Karl Marx）

马为麟

马云卿

马佐臣

麦克马洪（Herry Sir McMahon）

麦克唐纳

麦孟华

毛仲方

茅乃封

梅宝玑

梅光远

梅景鸿

孟恩远

密　勒

闵尔昌

明　托（Morley Minto）

莫理循（G．E．Morrison）

莫擎宇

莫荣新

牧野伸显

N

那彦图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南桂馨

尼古拉二世（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Н．II）

倪嗣冲

倪文翰

倪毓棻

聂正邦

宁调元

牛辟生

钮永建

O

欧　森（Oiesen）

欧阳启勋

欧阳武

欧阳煜

欧阳振声

P

潘昌煦

潘鸿鼎

潘鸿钧

潘矩楹

潘世琛

潘毓桂

潘祖裕

彭光烈

彭寿松

彭文治

彭允彝

彭占元

片山潜

蒲　鉴

蒲殿俊

濮兰德（J．O．P．Bland）

普恩加赍（Raymond Poincare）

溥　润

溥　伟

溥　仪

Q

齐耀琳

祁耿寰

祁国钧

钱能训

钱锡宝

覃　振

覃鎏钦

覃师范

覃寿堃

青木宣纯

邱丕振

仇　鳌

仇　亮

曲同丰

犬养毅

阙麟书

R

饶汉祥

饶景华

任凤苞

任鹤年

任可澄

日置益

荣　勋

荣德生

荣宗敬

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

阮毓松

阮忠枢

芮恩施（Paul S．Reinsch）

S

萨查诺夫（С．Д．Сазо́нов 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萨镇冰

三音诺颜汗

桑诺尔布

涩泽荣

山县有朋

善　耆

邵元冲

沈葆义

沈秉堃

沈凤祥

沈鸿英

沈钧儒

沈缦云

沈彭年

沈云霈

沈曾植

沈祖宪

胜　福

盛宣怀

师景云

施　愚

施履本

施慎之

施肇基

石　瑛

石井菊次郎

石陶钧

时功玖

史推恩

首　斌

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

司徒颖

斯泰老（Strauch）

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宋教仁

宋小濂

宋育仁

宋渊源

宋渊源

苏渺公

苏慎初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　武

孙宝琦

孙宝镕

孙道仁

孙多森

孙发绪

孙洪伊

孙祥夫

孙玉璋

孙毓筠

孙中山

T

太仓喜八郎

谭　斌

谭浩明

谭人凤

谭学夔

谭延闿

汤　漪

汤化龙

汤觉顿

汤寿潜

汤芗铭

唐　蟒

唐　演

唐继尧

唐继禹

唐景崇

唐克明　见黎本唐

唐乾一

唐绍仪

唐天喜

唐文治

唐在礼

唐钟元

唐仲寅

陶德瑶

陶菊如

滕亚纲

田　桐

田文魁

田文烈

田中义一

田中玉

田钟谷

铁　良

童保暄

头山满

W

万　勋

汪秉忠

汪大燮

汪哕鸾

汪精卫

汪荣宝

汪瑞闿

汪学谦

汪有龄

王　道

王　赓　见王揖唐

王　寰

王　军

王　钧

王　侃

王　统

王　湘

王　逸　见王金发

王阿发

王安澜

王秉钧

王伯乔

王伯群

王宠惠

王光熊

王广龄

王华国

王怀庆

王家襄

王金发

王金发

王金镜

王璟芳

王克敏

王陵基

王茂元

王懋赏

王明山

王清穆

王人文

王汝贤

王慎刚

王升允

王士珍

王世澂

王式通

王曙笙

王树谷

王树堂

王天纵

王廷桢

王维纲

王文华

王文卿

王文庆

王锡蕃

王宪章

王晓峰

王孝缜

王一亭

王揖唐

王印川

王有兰

王钰锦

王毓秀

王月波　见王印川

王占元

王镇南

王正廷

王之纲

王芝祥

王治馨

望云亭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威廉二世（K．W．II von Deutschland）

威廉斯

韦锦恩

魏邦平

魏宸组

魏期灵

魏子浩

温寿泉

温宗尧

文　群

文经纬

文仲达

乌　泰

邬云陛

吴　浩

吴　俊

吴宝璜

吴炳湘

吴成礼

吴传声

吴大洲

吴鼎昌

吴贯因

吴光新

吴洪昌

吴吉甫

吴金彪

吴景濂

吴佩孚

吴庆桐

吴萨缔

吴绍璘

吴廷燮

吴万春

吴先梅

吴行光

吴藻华

吴稚晖

吴忠信

吴宗明

伍朝枢

伍持汉

伍崇仁

伍任钧

伍廷芳

伍祥祯

伍毓瑞

武士英

X

希尔宁达木定

熙　彦

熙礼尔（Hillier）

夏　超

夏粹芳

夏杰唐

夏寿康

夏寿田

夏同龢

夏永伦

夏曾佑

夏之骐

夏重民

向瑞琮

向瑞琨

萧　堃

萧　湘

小幡酉吉

小田切

谢　持

谢　金

谢介僧

谢叔骞

谢树华

谢英伯

谢兆鸾

辛　汉

幸德秋水

熊秉三　见熊希龄

熊炳坤

熊成章

熊克武

熊其勋

熊尚文

熊嗣鸞

熊希龄

熊祥生

熊樾山

徐　谦

徐　勤

徐　涛

徐邦杰

徐宝山

徐宝珍

徐佛苏

徐傅霖

徐镜心

徐乐尧

徐企文

徐荣廷

徐绍桢

徐世昌

徐树铮

徐唯一

徐秀钧

徐血儿

徐则徇

徐子俊

许崇智

许世英

续桐溪

萱野长知

薛大可

Y

严　复

严　修

阎锡山

颜德基

颜惠庆

杨　度

杨　芬

杨　虎

杨　晋

杨　琼

杨　晟

杨　蓁

杨本礼

杨德邻

杨冠英

杨光庭

杨海清

杨荩诚

杨景斌

杨靖波

杨南生

杨其礼

杨善德

杨时杰

杨士琦

杨守真

杨树浦

杨庶堪

杨王鹏

杨信之

杨以德

杨永泰

杨玉桥

杨玉如

杨玉生

杨曾蔚

杨增新

杨钟年

姚鸿法

姚文栋

姚雨平

叶　举

叶　匡

叶　荃

叶德辉

叶恭绰

叶景葵

叶夏声

伊集院

伊藤大八

易次乾

易棠龄

易宗羲

荫　昌

殷承巘

殷汝骊

尹昌衡

尹俊卿

尹同愈

尹仲材

应德闳

应桂馨

应夔丞

由云龙

游运炽

有贺长雄

于式枚

于右任

余道南

余迪侯

余扶辰

余国祯

余鹤松

余际唐

余建光

俞应麓

虞洽卿

袁承轩　见袁振黄

袁大化

袁华选

袁家普

袁家声

袁静雪

袁克定

袁克文

袁乃宽

袁世凯

袁树勋

袁毓麟

袁振黄

Z

臧致平

曾　彦

曾　桢

曾秉钰

曾广为

曾广伟

曾国藩

曾绍文

曾彝进

曾有澜

增　韫

札喜旺堆

詹大悲

张　钫

张　昉

张　继

张　謇

张　石

张　煦

张　勋

张百祥

张伯烈

张春山

张岱彬

张鹗翎

张尔田

张凤翔

张凤台

张光曦　见张尧卿

张广建

张国淦

张国溶

张华甫

张怀芝

张汇滔

张季直　见张謇

张嘉璈

张锦芳

张敬尧

张静江

张开儒

张鸣岐

张培爵

张鹏翥

张人杰　见张静江

张人骏

张绍曾

张士秀

张士钰

张树森

张斯麐

张文生

张我权

张锡銮

张锡元

张孝准

张行志

张秀全

张尧卿

张耀曾

张一爵

张一鹗

张一麐

张一鹏

张荫棠

张英华

张永成

张元奇

张肇基

张振武

张镇芳

张正楷

张子贞

张宗昌

张作霖

章　棂

章　遹

章　梓

章炳麟

章驾时

章士钊

章太炎　见章炳麟

章宗祥

章宗元

赵　倜

赵秉钧

赵从蕃

赵戴文

赵尔丰

赵尔巽

赵凤昌

赵鹤龄

赵恒惕

赵钧腾

赵念伯

赵鹏飞

赵庆华

赵世铭

赵惟熙

赵锡龄

赵正平

赵智庵　见赵秉钧

赵钟奇

赵竹君　见赵凤昌

哲布尊丹巴

郑芳荪

郑国梁

郑螺生

郑鸣澍

郑汝成

郑士琦

郑万瞻

郑为成

郑孝胥

郑祖荫

钟　颖

钟鼎基

钟衡臧

钟明光

钟文耀

钟震川

周　浩

周　骏

周鳌山

周璧阶

周大烈

周登皞

周符麟

周官和

周晋敷

周汝康

周汝翼

周世英

周树模

周文炳

周务学

周学熙

周应时

周永广

周予儆

周予觉

周玉堂

周震鳞

周震勋

周钟岳

周自齐

朱　德

朱　瑞

朱　熙

朱　霞

朱超群

朱登五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朱家宝

朱念祖

朱启钤

朱庆澜

朱森林

朱寿朋

朱腾芬

朱锡麟

朱荫榛

朱兆莘

朱执信

朱志先

朱志尧

朱卓文

竹内维彦

祝制六

庄蕴宽

邹　廓

邹　鲁

邹以庄

邹永成

左宪章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三卷
(1916—1920)

李 新 李宗一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三卷

（1916-1920）

李新　李宗一　主编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叙述的内容，是北洋军阀皖系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与变化过程。时间从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上台，皖系军阀开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直胜皖败为止，前后正好四年。

这也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

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军阀统治失去了统驭和中心的人物，便到了梁启超所谓“神奸既伏，人欲横流，而进于演水濂洞，演恶虎村”的时期，原来的“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各派军阀开始称雄割据。段祺瑞当政后一年，便因“府院之争”和“对德宣战案”，导致了张勋拥溥仪复辟，使共和政体再一次面临倾覆的威胁。张勋复辟比“洪宪帝制”更加鄙拙可笑，因而经历的时日更短，只有十三天即告结束。复辟失败后，原来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曾一度独立的南方各省，因护法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同北方分庭对抗，国会南迁，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北京中央政权，支持、效忠或倾向于段祺瑞的一部分官僚政客，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即安福系），然后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违反《临时约法》，通过贿选和官宪干预，成立了安福国会。于是便形成一个国家，两个国会、两个政府的奇特局面。西南各派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号，乘势各霸一方，并互相火并，拼命扩张自己的势力，而真正倡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却被排斥在一边。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南北议和，都无法消除分裂，实现统一。

北洋军阀内部因原有的凝聚力融解消失，权势之争加上在对待南方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大派。直皖矛盾的演变激化，进而超过了南北之间的矛盾，直系转向同西南军阀结成联盟，共

同反对皖系，结果两派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在皖系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分裂，段祺瑞手下两名主将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的角逐日趋激烈。靳因不满徐的专横跋扈而同情直系，又成为直系争取反徐反皖的同盟者。

当南方各派军阀势力发展和直系吴佩孚崛起的时候，东北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势力也很快膨胀起来，摆脱了依附于皖系军阀的从属状态，成为一支影响政局的独立力量。新的直奉联盟，进一步削弱了皖系的力量，使直皖两派的均势失去平衡。曾经一度和段祺瑞合作、成为段内阁有力支柱的研究系，被段抛弃后，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因此，这一时期政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种政治势力并峙发展，权力分散，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削弱，不仅南方军政府所属各省拒不听命，就是北洋所管辖的省区也多貌合神离。段派军阀统治比袁世凯的统治还要脆弱得多。从总体来说，北洋军阀势力已在走下坡路，开始了它的衰落过程。

段祺瑞为了恢复北洋军阀一统天下的霸业，坚持对南方进行讨伐，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但他力不从心，北洋派中除了徐树铮、倪嗣冲等极少数顽固主战派之外，支持赞成的人不多。段祺瑞在起初掌握北京政权时，因他曾反对袁世凯称帝，得到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后来又因举兵讨平张勋复辟和主张对德宣战，赢得了一些声誉，但他远没有袁世凯一度有过的那种威权。他出任内阁总理，三上三下，最终还是不得不下台，退居幕后操纵。皖系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掌握中央政府的全部权力。

皖系军阀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借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内扩编军队，炫耀武力，进行内战。安福系结党营私，毁法乱政，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完全失去了人心。因此，在直皖战争中，皖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不过三四天即被直军完全打败，导致了皖系军阀

统治的倾覆。从根本上说，是民意和人心决定了这一结局。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进程来看，这个时期又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刻。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缔造的共和政体不断遭到破坏，反面人物一再出场，演出了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历史丑剧，时局愈来愈坏，人们的怀疑失望增长了，也在开始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对当时这种现实的反抗和反思的表现。人们虽然起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和出路，但毫无疑问是在重新探索，起步前进了。辛亥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级力量有了新的变化，教育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旧的封建主义教育得到了某些改革，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逐步确立，具有爱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意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进一步扩大，这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社会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以重大的影响，使人们从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马克思主义从此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造就了虽然当时为数不多但却是崭新一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给腐败的社会机体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协约国战胜德、奥匈同盟国，也给当时的思想界和政界以很大的影响。广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公理对强权，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和平人道主义对暴力武断主义的胜利，从而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对民主主义的空泛幻想。这些都影响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爆发的五四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其矛头实质上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卖国的皖系军阀官僚政客的。从“五四”到“六三”，爱国运动从北京扩展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各地城镇，继学生之后，工人、商界和市民也被卷了进来，形成巨大声势。军阀政府对此莫可如何，并且不得不让步，被迫遵从人民的意愿，将曹、章、陆免职，同意拒

签和约。这固然是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抗争的结果，同时也和当时分裂型政治，统治阶级在内政外交方面不能协调一致行动，作出统一的决定有关。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空前大觉醒，第一次真正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威力。它给皖系军阀统治以很大的冲击，使其威信扫地，从而也给其政敌提供了进行反皖活动的大好时机。“五四”前后，研究系活跃一时，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对皖系旁敲侧击，对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吴佩孚在五四运动后，更是利用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加速了他的倒皖活动进程。

中国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前后有新旧之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此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价值。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研究中国问题，寻求社会改造的新方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也在进行新的探索。从此，同封建军阀对阵的，不止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还产生了一批比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彻底更强劲有力的无产阶级民主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分裂，权势的削弱和趋向衰落；另一方面是新思潮的勃兴，人民新的觉醒，进步民主力量的重新组合聚结。把这两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观察，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时代在阔步向前，民意不可侮，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军阀势力虽然还可以横行一时，但历史注定他们末日的来临为期已不会很远了。

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但总是有规律可循的。本卷围绕皖系军阀的兴衰这个总题，对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张勋复辟，西南军阀的纷起，护法运动，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以及这一时期内的中外关系等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题，进行了探

讨，阐明皖系军阀兴衰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同时兼及其他重要问题。编写者力图通过翔实的史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评析历史事件和人物，避免主观随意性。如有舛误和不当之处，希望史学界的同行们和读者诸君多予批评指正。

本卷由彭明、周天度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

前言　周天度

第一、第二章　潘荣（其中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周天度）

第三章　谢本书

第四章　方式光

第五章　章伯锋（第一节），周天度（第二节）

第六章　周天度

第七章　邓野（其中第七节彭明）

第八章　周天度

钟碧容提供了部分资料。彭明作了较多的组织工作。全书初稿由周天度、彭明进行整理修改，统一体例，核定史实，并最后定稿。邓野参加了第二、第四章部分史实的核对工作。李新、李宗一审阅了全书。

王述曾同志协助审阅了全稿，提了不少好的修改意见，并改正了某些地名、人名和引文方面的错漏，谨向他深致谢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一节　段祺瑞政府的成立
　　一　段内阁的组成和国会的召开
　　二　各省督军、省长的任命
　第二节　各派政治力量的动向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动向
　　二　进步党人的动向
　　三　北洋集团的开始分化
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第一节　府院之争
　　一　研究系和商榷系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二　督军团对国民党人的攻击
　　三　府院权限之争
　　四　对德绝交及其国际背景
　　五　参战问题引起的风波
　第二节　张勋复辟
　　一　北洋八省“独立”和国会解散
　　二　张勋集团与皖系军阀的角逐
　　三　复辟丑剧和全国反复辟的斗争
　　四　复辟失败和段祺瑞的乘机再起
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一节　滇系军阀
　　一　川滇黔军之战
　　二　滇系军阀的扩张
　第二节　桂系军阀对两广的控制

一　桂系对广东的控制
二　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
第三节　川黔两省军阀割据势力
一　川系势力
二　黔系势力
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
第一节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
一　孙中山南下筹备护法政府
二　海军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
三　孙中山成立军政府
四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
第二节　南北战争的开始
一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其战略部署
二　湖南的争夺战
三　段祺瑞内阁的第二次倒台
第三节　南北和战之争
一　护法军内部和战问题的分歧
二　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的争吵
三　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四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五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六　吴佩孚与陆荣廷签订停战协定
第四节　军政府改组和护法运动的失败
一　孙中山炮击观音山
二　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
三　军政府改组和孙中山离粤
四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第一节　日皖勾结
一　日本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

二　“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
三　日美的争夺与勾结——《蓝辛—石井协定》
四　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
第二节　安福国会的召开
一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二　安福国会的召开
三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四　围绕选举副总统问题上的斗争
第六章　南北议和
第一节　南北议和的时代背景
一　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
二　国内和平呼声的高涨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
第二节　南北和会的召开及其破裂
一　南北和会的酝酿和准备
二　南北和会的召开和中断
三　南北和会的恢复及其破裂
第七章　五四运动
第一节　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二　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一　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二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三　巴黎和会开幕与山东问题的提出
四　山东问题的交涉和失败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
一　各界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二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和各方面的评论
三　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四　北京政府应付山东问题的初步方针
五　五月下旬政局恶化
六　六三运动和罢免曹、陆、章
第四节　继续动荡的政局
一　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
二　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三　一个独特的军阀——吴佩孚
四　西南方面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意图及镇压
第五节　拒签对德和约及其他
一　拒签对德和约
二　对奥和约的签订
三　几段尾声
四　山东问题的继续
第六节　“五四”前后的孙中山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二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和中国国民党的建立
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八章　直皖战争
第一节　直皖矛盾的激化
一　吴佩孚的撤防北归和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的策略
二　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三　安福系的倒阁运动和靳内阁去留之争
四　张作霖的调停及其失败
第二节　直皖战争的爆发
一　直皖战争前夕双方的备战活动
二　战争经过
三　直胜皖败的原因
四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战争双方的态度
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理
一　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二　内阁问题
三　惩办祸首问题
四　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五　解散新国会问题
六　一项政治分赃密约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一节　段祺瑞政府的成立

一　段内阁的组成和国会的召开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则掌握北洋政府的实权，成为稳定北京政局，处理洪宪帝制善后问题的关键人物。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故后来人们把以他为首的一派北洋军阀集团称为“皖系”。清末，段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炮兵，毕业后曾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一年。1896年，袁世凯将他调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担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从此一直受袁赏识，成为袁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以后人们把他和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1906年—1909年，段先后任北洋军第三和第六镇统制，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官职。因此，北洋军官大多是他的门生故吏。北洋政府成立后，他长期控制陆军部，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效力。袁氏开始准备称帝之后，便逐步削夺段的兵权。段对此深表不满，对袁氏的帝制公开进行抵制和反对。他说：“项城本清室大臣，以赞成共和，遂为总统，今若称帝，何以对故主，微论民国。”[(1)] 后来，袁派曹锟、张敬尧率北洋军讨伐护国军时，段曾遥约冯国璋暗中对张“竭力阻遏，勿使进兵”[(2)]。张受段密意，后在泸州屯兵不进。陈树藩在陕西逐走袁党陆建章，实行独立，

也与段祺瑞的幕后策划有一定关系[3]。

1916年3月下旬，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为了收拾残局，他重新起用段祺瑞，任命他为参谋总长，随后又改任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希望段能重新效力。但袁仍抓住军权不放，对段提出的撤销海陆军统率办事处，取消拱卫军和模范团，将中央一切军权统归内阁辖制等要求，并不付诸实行，引起段的严重不满。因此，段对袁仍然采取表面敷衍、实则拆台的手法，对于南方强烈要求袁氏退位，暗中表示支持。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特别是由于在反对帝制运动中的表现，段祺瑞在全国享有一定的“人望”。袁死后，徐世昌极力支持段，以便维持北洋势力。有能力与段竞争北洋首领地位的冯国璋，远在江南，对北京政情一时还摸不透，对段也不表示反对。黎元洪也认为不取得段的支持，就很难行使总统职权。因此段祺瑞便成为北方政局中唯一可以出来收拾局面的人选。对南方反袁势力来说，在北洋集团中，也只有段才是可被接受的人物。6月7日，黎元洪就任总统职。就在这一天，梁启超致护国军电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方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4] 6月8日，梁又致电黎元洪：“项城以违法专欲失天下望，今宜尽反其所为，请以明令规复旧约法效力，克期召集国会，委任段公组织新阁，延揽各派俊彦署理阁员，共图匡济。”[5] 孙中山也表示了大体相同的意见，认为：“黎氏依元年约法出任总统，乃当然之事，余甚表同意。段氏维持秩序，尤属有裨大局，厥功甚伟。日来有人主张调护国军若干入卫京师者，不知段氏既能膺此艰巨，人民安堵，又安用此一着？调兵多，则力有未逮，少则仍无济于事，是徒伤北军感情，且先示人以不信，余甚不取也。”[6] 6月23日，他在致段祺瑞的信中说：“民国初元，曾亲教诲，伟人丰采，至今不忘。盖当南北议和之际，惟执事为军人领袖，赞成共和，大局以定。洎帝制发生，尤能以大义自持，冒犯险难，终始不变，求之当世，诚拔萃而寡俦。而今日天下汹汹，扶危定倾，又

唯执事是赖，此文所倾服不置也。……愿执事翊赞当机，不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纷纠，亦文之望也。”[7] 南方其他一些实力派人物，如陆荣廷、唐继尧、龙济光等，对段祺瑞也没有恶感，愿意承认他在北京中央政府中的地位。

但是南方认为，段内阁作为事实上的内阁，牵涉一个法理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法统问题。所谓法理问题，就是段祺瑞的国务卿是由袁世凯任命的，国会早已被袁解散，其任命未经国会同意，因而是不合法的；国务卿的“卿”这个名词，本身就含有帝制味道，是帝制运动的产物。而且国务院中除段祺瑞等一二人外，其他大多数人是属于要清算惩治的帝制祸首，这样一个为帝制派盘据的内阁，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南方曾致电北京政府，指出：“国务员多为袁党，应即改组内阁。”并要求改国务卿为总理[8]。所谓法统问题，就是约法与国会问题。南方认为，1913年国会解散后，帝制运动即已开始进行，只有国会未解散以前所制定的法律如《临时约法》等，才能承认有效；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等是不合法的，应当废除。黎元洪继任总统，任期应当依据《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的规定，至前总统任期满时（1918年10月10日）为止。前国会应立即召集，新副总统由国会选出，新内阁由黎元洪总统任命，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9]。这就是说，南方对段内阁的赞同和支持是有条件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南方在袁世凯死后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三大要求：一、恢复旧约法；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南方需要看看段祺瑞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态度，然后才能决定弃取。如果段能满足这些要求，当然会得到南方的支持，从而可以实现南北的和解与统一。这是南方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主张，尽管他们所抱的目的各有不同。当时南方和段祺瑞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利用的关系。南方向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帝制祸首的要求，需要黎元洪下命令，并且必须有段祺瑞的副署，才能有效，如果不承认段内阁，则其所副署的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另一

方面，段内阁只有得到南方的支持，国会的同意，才是合法有效的。

对于南方所拥戴的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段祺瑞首先表示赞助，并予以坚决支持。6月5日，袁死的前一天晚上，段即往黎宅请他“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10]。6日晨袁气绝后，段又两次谒黎，重申前请[11]。7日，在黎元洪就职典礼上，他代表全体阁员致祝词，表示“余等必竭力赞助总统”[12]。对于当时北京反对黎出任总统的一些军事头目，段作了不少说服工作。人们拿这件事和前此袁称帝时他采取抵制反对的态度进行比较，认为他还是泾渭分明的。报纸评论说：“今日各界公电纷纷，谓大总统未能完全自由者，不仅疑帝制派人尚盘据政局中，亦有一部分人疑段之态度不甚分明，或谓为人利用也。吾谓段于前既反对帝制而退，今又首先拥护总统，态度无所谓不分明。”[13]

关于恢复旧约法和召集国会问题，段祺瑞开始时态度迟疑，但随后不久还是同意了。6月29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开会，最后决定恢复旧约法，废止新约法，并决定于8月1日以前召集国会。当日晚，由段祺瑞和内阁其他成员副署，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公布的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会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14] 与此同时，黎还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颁布了“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的命令[15]。

这样，新旧约法存废问题的争持遂告一结束。在肃清帝制、恢复共和方面，段祺瑞虽然是艰难地然而是果敢地迈出了一大步，从而也就为消除南北对抗，实现和解，扫清了最大的障碍。《申报》为此发表的一篇《时评》说：“西南军起义，即宣言为约法而战，故帝制取

消而仍进战不已，袁死黎继而仍备战不已，以约法未复，战之目的未尽达也，今则可谓目的尽达矣。以南方最初之主张言，既可谓为完全达到，而以最近一致之要求，又可谓为已得三分之二。仅余惩祸首一端未有表示，然亦屡传其拟议办法，当必有以慰我国人。然则南方之志愿所未满者，亦无几矣。……而民国之无穷之希望，亦自此始矣。吾故为今日之约法国会贺。”[16] 著名记者邵飘萍也在一篇短文中指出：“上之数者，可谓根本解决。收效稍迟，而结果圆满，可深为民国前途庆者。”[17]

同一天，黎元洪颁布命令，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废去原来国务卿的头衔[18]。

关于惩办帝制祸首问题，西南原提出一个名单，除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共十三人（人称“十三太保”）。段祺瑞起初不同意惩办，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党人一起予以特赦。黎元洪认为不能将两者混同起来，因而黎、段在这个问题一度发生意见分歧[19]。后来因为南方坚决要求惩办，而北方又有一些人求情，为了满足南方的要求，又不多事株连，经过多次磋商研究，北京政府于7月14日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前法制局局长）、梁士诒、夏寿田（内史，一切帝制文电多出自其手）、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亚细亚报》经理）八人列为祸首，“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概宽免”[20]。

在北京惩办祸首令发表的同一天，南方鉴于恢复旧约法和召集国会这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已经达到，也发表通电，宣布将军务院予以撤销[21]。

北京政府的惩办祸首令，自然是很宽大而不彻底的，而且在命令发表前祸首们早已逃之夭夭（只顾鳌一人乘车离京时在车站被捕）；

命令发表后又未采取有力措施，将他们拿交法庭惩办。但是段祺瑞还是协同黎元洪为肃清帝制余毒，废除了不少袁世凯制定的反对共和、实行专制独裁的条例制度和设立的机构。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其职权分别归还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接掌办理[22]。

袁世凯为巩固其统治，镇压反对派，曾于1914年4月设立京畿军政执法处，派其党羽杀害异己，罪恶昭彰。6月19日，北京政府特明令予以撤销[23]。该处奉令后，于6月29日将已结未结各案分别情况，移交陆军部接收核办。各地的军政执法处，亦同时取消。

袁世凯蔑视人权，草菅人命，违反原《暂行刑律》第四十条“死刑非经司法部复准，不得行之”的明文规定，往往通过咨转、呈请、批准等程序，随意执行死刑，妄施杀戮。7月1日，北京政府申令：“死刑非经司法部核准回报，不得执行。”“所有关于执行死刑之咨转、呈请、批准等程序，均应废除。”[24]

7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废止袁世凯颁布的《颁爵条例》、《惩办国贼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纠弹法》[25]。这些条例都与帝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袁世凯实行窃国，阴谋复辟帝制，借以惩办反对派及奖励其鹰犬爪牙的工具。这一措施颇为舆论所重视。《字林西报》发表评论指出：“今晨若干命令颇可满意，足征政府步趋渐正，已以反对帝制者所注意之点为然。”“此举尤可为南方所嘉纳，视为政府意在悉反袁氏所行之明证。”[26]

7月8日，北京政府废止袁世凯颁布的《文官官秩令》[27]。前此两日（6日），为慎选人材，郑重吏治，北京政府成立由十人组成的“文官甄用委员会”，由段祺瑞任委员长[28]。

7月13日，北京政府申令释放政治犯，并撤销政治犯通缉各案。令文指出：“现在《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赦令》业经废

止，所有本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因政治犯被拘禁者，应即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但触犯刑事罪名者不在此限。”[29] 命令公布以后，在上海、湖南等地陆续释放了因反袁而被拘捕的爱国正义人士。

袁世凯当政期间，厉行箝制舆论，取缔言论自由，国内报纸遭统率办事处、政事堂以及各地军事长官知照或函请内务部查禁者不少。袁死后，上海日报公会电请解禁。7月6日和8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先后两次咨各省区：“现在时局正宜宣达民意，提携舆论”，前此查禁各报“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30]。解禁的报纸计有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共和新报》、《民意报》等共二十余种。7月16日，北京政府又颁布命令，废止《报纸条例》[31]。国务会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一部分人不同意，另有人则提出此次条例废止后，仍采用从前报律。段祺瑞不赞成，认为“报律系订自前清，尤不宜于共和国体，应暂持放任主义，俟将来查看情形再定办法”[32]。

7月18日，北京政府申令废止袁世凯制定的《官吏犯罪特别管辖令》、《官吏犯赃治罪法执行令》、《徒刑改遣条例及施行细则》、《清查地亩诉讼变通办法》、《简任法官预保办法》、《道署暂设上诉机关易笞条例》[33]。

此外，还有袁世凯假托国民总代表名义助成帝制的参政院、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和在总统府内设立的含有帝制性质的内史，以及在国务院设立的临时机关等机构和职官，也都予以裁撤。现行的国务会议章程也被取消，仍改用1912年制定的国务会议章程。

段祺瑞一面配合黎元洪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一面积极着手改造旧内阁，组织新内阁。他原先提出一个阁员名单，由汪大燮任外交总长，许世英任内务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章宗祥任司法总长，张国淦任农商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曹汝霖任

交通总长。这个内阁名单与原来旧内阁变化不大，交黎元洪审核盖印时，黎为了多容纳几个南方人士以争取南方，实现南北和解，将其中刘冠雄、章宗祥、曹汝霖、范源濂四人换掉，加入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张耀曾，并征求段祺瑞的意见，段也表示同意[34]。6月30日，即段被任命为国务总理的第二天，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唐绍仪未到任以前，由陈锦涛暂兼署外交总长；张耀曾未到任以前，由张国淦暂兼署司法总长；同时免去原兼署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的职务[35]。

这个内阁名单除陈锦涛、张国淦两人外，其余都是新任命的，南方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表明段祺瑞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南方对这个“混合体制”的内阁并不满意，原因是内阁中还保留有帝制分子。许世英长内务，张国淦长农商，不仅南方人士反感，北方也有人不表赞同。7月3日英文《京报》说：他们两人“一为声名狼藉之徒，一为帝制余孽同类，亦得公然备位阁中，明令发表，举国哗然，可见好恶人有同心，天下岂无公论！”[36] 7月6日，军务院派代表高尔登、方声涛进京谒见黎元洪，于陈述军务院拥护政府之诚意的同时，希望政府：一、肃清帝制余孽；二、“内阁虽成立，良莠不齐，应摒去不肖分子”[37]。黎对南方的意见表示可以理解。

名单发表后，黎元洪、段祺瑞随即一再致电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等人，敦请他们速来京就职。7月3日，段祺瑞致电唐绍仪说：“公长外交，历数十年，硕德重望，中外镜仰，斲轮老手，倾盖旧交，公谊私情，两无可诿。外交一席，为国暂屈，星驾北遄，无任企祷。”[38] 同日，段致孙洪伊的电文说：“世衰学敝，雅待扶轮。先生硕望通才，万流仰镜，尚希慨念时艰，勉纡星轸，士林额庆，大局

蒙麻。戒形〔行〕有期，敢祈电示。”[39] 但唐、孙由于：第一，阁职的任命，事先未征得他们本人的同意；第二，内阁中还保留有与帝制有关系的人如张国淦、许世英；再加上他们对北洋政府的不信任感，都表示不愿就职。唐绍仪复电段说：“为国驰驱，本仪素志，果能尽职，何必在位。逖听殊猷，曷胜企跃。知我爱我，毋强所难。”[40] 孙洪伊在致张继的电文中指出：“此次改组，似去轨道尚远。况内阁伏有黑幕，如果成立，必增长官僚势力，政治终难清明，循是以往，国将不国。”[41]

黎元洪希望唐绍仪、孙洪伊出来共济国事，固然出于诚意，段祺瑞也很希望他们就职，“借便时局之收拾”[42]。为了尽快组成一个为南方所满意，能够得到国会通过的内阁，黎、段一方面派张继、王正廷前往上海促驾，另方面对内阁名单再次作了更动。7月13日，批准汪大燮辞职，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43]。后来张国淦也辞职。为表示容纳原军务院人士，又任命谷钟秀接替张国淦任农商总长。孙洪伊在黎元洪、段祺瑞一再敦请和一些南方人士的劝说下，于7月27日抵北京就内务总长职。唐绍仪则始终不肯北来。

当时，进步党人对黎元洪竭力延揽国民党人士唐绍仪、陈锦涛、程璧光、张耀曾和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非常不满。7月11日，梁启超在致西南各省的电文中说：“各事并非全由段作主，有咎黎当分任。前次任阁员，除许（世英）外，皆黎亲简也。”[44] 实际上黎元洪出任总统之初，对南方人士，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进步党人，都竭力拉拢。黎曾电邀梁启超进京“共商国是”，但被婉言谢绝。7月初，黎又任梁为总统府秘书长，召梁迅即进京，也没有得到响应。梁启超原是热衷政治的，此时为何一再辞官不就？原因有二：一是他周围的同党多劝他暂不出山，以免重蹈“第一流人才内阁的覆辙”[45]。二是他本人也考虑到段祺瑞与黎元洪矛盾重重，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无异“作重茧以自缚”。“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

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46]。

梁启超既一再推辞，所以黎元洪没有举荐梁入阁。黎不知道，梁本人虽暂不愿出山，但他却不愿意看到国民党人纷纷入阁。梁的本意是，自己暂不出来，以在野从事社会教育为名，评论时政，既可赢得声望，又不冒风险。8月，梁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透露了他的这种思想，说：“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47] 梁启超曾想推荐几个心腹当官，但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牢骚满腹，并把怨气发泄到黎元洪身上。

内阁任命后，就等召集国会予以追认了。

6月中旬，当北京政府还未作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的决定时，参众两院议员发出《集会紧急通告》，宣称“国事危迫，一发千钧”，根据《临时约法》第二十条“参议院得自行集会闭会”的规定，要求所有议员于6月30日以前抵达上海，7月10日两院在上海合行开会[48]。政府决定恢复旧约法，于8月1日召集国会后，参众两院又联合发出通告，要求所有议员于7月31日以前齐集北京，俟足法定人数，即行开会[49]。与此同时，政府内务部也派代表沈钧儒、孙熙泽于7月中旬赴沪欢迎议员团。

8月1日，参众两院议员在北京众议院举行开会式，这次会议名称为国会第二次常会，到参议员一百三十八人，众议员三百一十八人。会场中，“议员彼此握手，频语寒暄”，对国会的恢复，“不胜悲喜交集”[50]。黎元洪、段祺瑞及其他在京阁员均出席。由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致开会词，黎元洪致祝词。

国会开会后，政府计划交议的议案有：一、阁员的追认；二、副总统的选举；三、各种法律的修正；四、宪法的制定；五、民国六年

度的预算案[51]。其中制定宪法是最重要的，而人们所最关心的，则是追认阁员和选举副总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在程序和人选问题上，属于南方国民党的一些议员，主张先选举副总统，再行追认阁员，认为副总统选出后，“则民国根本上要点既定，余则均易表决”[52]。其意图是想选段祺瑞为副总统，而将内阁总理一席留给唐绍仪，这样可以避免“武人内阁”的称号。政府的意见，以为“国会倘能先将内阁承认一项解决，则中央行政基础即可从兹巩固”，内阁总理以段祺瑞担任“决能称职”[53]。《申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国会开后之第一幕，为副总统与内阁总理之两问题，而实则为唐、段二人之问题。副总统之名虽尊，然而宾也，无实权者也。内阁总理之名虽尊不如副总统，然而主也，有实权者也。取实权而让空名，南北意见之所同。此两问题孰先决者即孰方胜，故两问题亦可视为一问题也。”[54]

段祺瑞当然不想当那种名虽尊而无实权的副总统，而将拥有实权的总理位置让给别人；而且在他看来，阁揆一席，“非彼莫属”，惟有他才能担当此任，他是“当仁不让”的。他屡次对人说：“近闻外间有人主张举余为副总统，余实感激，但陆军总长苟无相当继任之人，恐不足收统驭全局之效；即总理一席，尤非南方允孚不可。余虽驽下，自愿早避贤路，然遇万不得已时，亦断不以维持之责诿之他人。余意两年以内，为收拾难局最紧要之关头，过此则主持之人较易为力矣。”[55]他还声称：“某以国事为重，但使贱躯可以勉支，亦断不肯撒手而去。”[56]有人因风闻段有“辞让政权”之说，写信劝段勿让，他复信说：“瑞本忧患余生，饱尝世变。……昔创共和，曾与其役，今因纷革，竟召沦胥，罪案千秋，将何以自解。是以幡然改计，重入漩涡，国是未宁，誓不返顾。非谓衰庸必能有裨，盖援佛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说，爱国之念，犹之诸君子也。所幸并时贤达，能谅愚衷。”[57]言下之意，他是决心非任总理不可的。唐绍仪则表示，他既坚辞外交总长，更绝无想出任国务总理的意思。

黎元洪和国会大多数议员以及舆论都表示支持段祺瑞膺任总理，认为“改组内阁宜出以慎重”，“段氏显为暂时必要的人物”[58]。南方也表示同意总理一席可不更动。那些曾经主张先选副总统，举唐绍仪为总理的议员们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经各方面磋商，决定先追认内阁，副总统选举暂缓进行，并属意此席将来留给冯国璋。

8月21日，众议院开会，到四百一十三人，已足法定人数，由副议长陈国祥主持会议，宣布本日第一议案为《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咨请同意案》。后由黎元洪的代表黎澍登台陈述理由。他说：“大总统依约法第三十四条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咨请追认。查段氏在民国成立之初，厥功甚伟，虽属军人，而于政治经验甚富。当民国二年时，曾代理国务总理，成效昭著。当帝制发生时，极力反对。民国恢复，大局多赖维持。兹特任为国务总理，尚希表示同意。”[59]接着投票，结果同意票四百零七票，不同意票七票，以绝对多数通过。会后黎元洪立即通电各省知照。23日，参议院开会投票，又以一百八十七票对六票的绝对多数通过。9月1日和4日，唐绍仪、陈锦涛、程璧光、张耀曾、孙洪伊、范源濂、许世英、谷钟秀八名阁员也先后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予以通过。至此，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

段祺瑞组阁，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从此开始了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历史。护国战争结束了袁世凯推行的帝制连同袁本人的生命。段祺瑞在全国反帝制运动浪潮的影响与推动下，和黎元洪一道，继续清除帝制的遗毒，恢复了旧约法，召集了国会。但是，段并不真心实意地拥护共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缔造的共和制度，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对约法和国会，皖系军阀可以随时践踏它，毁弃它。段祺瑞政府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袁世凯统治曾经赖以存在的旧的封建官僚势力和思想并没有触动，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就在段内阁成立之初，1916年9月，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在一篇文章中曾深刻地指出：“袁氏的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

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会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60] 这实际上也是段祺瑞政权的社会基础。袁世凯的败亡，解决了全国人民与帝制的矛盾，表面上暂时一度呈现出“维新”、“统一”的局面，但是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独裁这个根本性的矛盾依然存在，南北之间的矛盾也还存在。北洋军阀以及其他官僚政客们，为了自己的私欲和集团派系的利益，都想顽强地表现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以及南方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又开始出现，并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段祺瑞独裁专制的加强而迅速激化起来。

二　各省督军、省长的任命

段祺瑞在组织新内阁的同时，即着手安排地方军政长官，首先是省一级。对此，段祺瑞是按军事实力来进行分配的。当时，全国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武装力量：一、北洋军（包括依附于北洋集团的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军阀）。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拥有众多军队，并占据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大部（当时北洋军尚未占领浙江）和华南一部（福建及海南岛）。二、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它们占有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以及广东绝大部分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三、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护国战争中，李烈钧领导护国军第二军（滇军两师组成），经贵州、广西进入广东，当时驻在韶关一带；程潜组织的护国军（共三旅），占据了湘西，7月初驱逐汤芗铭，控制了长沙[61]；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共二师一混成旅），占据了山东潍县一带[62]。

上述三种力量，当然是以北洋派实力最为雄厚，占绝对优势；其次，西南实力派经营已久，也有一定的兵力；国民党及其军队则比较

涣散，根基也不牢固。特别是山东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由于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即力主解散武装，“息纷争，事建设”，已处在收束阶段[63]。

段祺瑞之所以急于确定各省军政长官，是打算稳定北洋派，瓦解西南护国阵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现北洋政权下的“统一”。

7月6日，北京政府重新任命了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因军务院多次要求废除有帝制色彩的将军、巡按使名称，改称都督、民政长，北京政府遂采取妥协的做法，将都督、将军、民政长、巡按使等名称都予废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其他职权机关，则“暂仍其旧”[64]。各省军政长官的名称虽然变了，但实际内容并没有多少改变。北洋派控制的各省督军几乎是袁世凯在世时的原班人马。其名单如下：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督军，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直隶省长兼督军朱家宝，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65]。上述除陕西督军陈树藩是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任命的外，其余十三省新任命的督军就是原来本省的将军。为了达到既能安抚西南实力派和进步党，又不影响日后时机成熟时“统一”南方的双重目的，段祺瑞在安排南方独立各省的督军问题上用了很大心机。7月6日北京政府的命令中，南方独立各省除云南督军唐继尧和贵州督军刘显世为原来的本省将军外，其他督军、省长均换了人[66]。

对地方政权的分配，进步党人本来是抱着很大期望的。如前所述，梁启超等热烈拥段，其目的除与国民党人对抗外，还有以此换取段的支持，在西南取得一两省地盘的意图。

在段祺瑞着手安排各省军政长官之前，梁启超即开始运动段，要他多起用进步党人担任西南地区各省的军政长官。7月3日，梁致电范源濂说："亮侪（籍忠寅）、印昆（周印昆）、孝怀（周善培）、佛苏（徐佛苏）、幼苏（陈廷策）等皆巡按妙选，得间不妨切实推毂。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循若（戴戡）必须有位置。"[67] 但是，段祺瑞没有满足进步党人的要求，仅任命戴戡一人为贵州省长。而进步党人最为属意的是湖南。戴本人为避免与接近进步党的刘显世冲突，也不愿任贵州省职。10日，梁启超亲自出面致电段祺瑞说：戴戡"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68]。13日，梁又电当时已在北京的籍忠寅，要他出面运动黎元洪、段祺瑞将戴戡改任湖南省长，电报说："循（戴戡）长黔，实不宜。陈（宦）既不能入湘，干（陆荣廷）又不能久，惟以循任湘省长，迅速到任，俾陆以湘委之而自解粤纷，则两局皆略定耳。"[69] 同日，他并电请陆荣廷也向黎元洪、段祺瑞推荐戴戡[70]。但是，段祺瑞在这一问题上根本没有理会进步党人。16日，北京政府任命刘人熙暂代湘督，作为缓和国民党人反对陈宦的临时措施[71]。20日，蔡锷向梁启超表示，愿意回家乡湖南任职，以便养病。梁接电后认为这也是插手湖南的好借口，立即电请熊希龄运动段祺瑞实行[72]。但是，梁的这个计划也被段搁置不用。很明显，湖南是南北军事要道，如果蔡锷在湘，湖南就可能成为南方的屏障，对以后北洋军南下不利。段内心还是要北洋派一统天下的。后来段选中文人出身且当时在湘军中尚无很大实力的谭延闿暂代湘督，显然也是另有打算的。段还一度策划任命戴戡为湖南查办使，调解湖南地方势力与北洋军的矛盾，实际上是要进步党人为北洋派火中取栗。梁启超虽然曾经极力为戴戡争湖南省长一职，但此时湖南形势已变，戴前往查办"必无效果"，只能与各方"徒生恶感"，只得又为戴力辞此职。

梁启超对北京政府仅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而未予戴戡以湘省省长极为不满。他向同党大发牢骚说："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

彼，真短气！”[73]

从7月6日对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的任命看，段祺瑞似乎在浙江、四川、广东等省的问题上对进步党人和西南实力派做了些让步。但如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妥协大都是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浙江、广东就是这种情况。（四川问题，留待后述）

1916年4月，袁世凯在浙江的走卒朱瑞和屈映光先后被浙江军民赶走。5月6日，吕公望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宣布独立，并按照西南军政府纲领，组织浙江护国军政府。段祺瑞对于浙江脱离北洋集团的束缚当然是不甘心的，但在袁世凯死后南北妥协的形势下，又不愿因浙江而影响大局。况且浙江在北洋势力包围之中，打入的机会很多。因此，段在安排各省军政长官时承认了浙江的现状，任命吕公望为浙江督军兼省长。

对广东，段祺瑞的方针是竭尽全力支持龙济光任督军，但由于各方激烈反对而未能达到目的。龙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即宣布广东取消独立。当时李烈钧率滇军至粤北，拟假道韶关进入江西，但驻在韶关的龙济光的振武军，紧闭城门，不准滇军通过，并在韶关城上架炮轰击滇军，引起战争。振武军和滇军发生冲突后，龙济光即向段祺瑞乞援。段电令江西将军李纯将北洋军集结于赣南，准备出击李烈钧。但北洋军尚未动作，振武军已被滇军击败。陆荣廷又令桂军乘势由西路攻入三水，将龙济光困在广州。这时，如果北洋军入粤，就意味着一场新的南北战争。段祺瑞权衡局势，感到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把握，只好暂退一步。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调任两广矿务督办。但是，段祺瑞同时又以陆荣廷本人尚在湖南为借口，令陆暂署湖南督军；在陆未到广州以前，仍以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对与振武军开仗的滇军领导人李烈钧，段则未予任何位置，仅令其“来京听候任用”[74]。从北京政府处置广东的命令来看，段祺瑞仍在拖延时间，力争保留龙济光广东督军的地位。但是，包括梁启超进步党人在内的南方各派，都对龙衔恨已久，

坚决反对龙继续督粤。陆荣廷也没有理睬北京政府暂行署理湘督的命令，而于7月10日返回广西。8月下旬，陆率兵入粤，以武力逼迫龙济光交卸。龙在桂滇大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广州。

对南北用兵必争之地的湖南，段祺瑞本是意在必夺的。但是，7月4日晚，北洋派的走卒汤芗铭在湖南护国军逼迫下逃出长沙，打乱了段的计划。段一时难以调兵遣将，便匆忙任命从四川逃到鄂西的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这一任命遭到南方各省特别是湖南军民的强烈反对。7月6日，程潜率军进入长沙后，与曾继梧、赵恒惕等湘军将领及各界代表协议，于7日举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刘人熙，字艮生，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与陆荣廷有交。程潜等想通过他取得桂军的援助。陆虽不是乐为老朋友捧场的古道热肠之士，但湖南为两广门户，如落入北洋军手中，就会危及两广。从自身安全考虑，陆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陈宦督湘。国民党人和部分湘军将领都欢迎刚由日本回国的黄兴出任湘督。7月14日，程潜、曾继梧、陈复初、赵恒惕和龙璋、覃振等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任命黄兴为湘督，“以资镇摄”[75]。但黄兴力辞不就，推荐谭延闿或蔡锷出任此职。最后，段祺瑞任命谭延闿为湘督，其用心已如前述。

段祺瑞在地方政权的分配上，对国民党人显然持排斥态度。他不仅排斥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也排斥国民党稳健派。护国军共三军，一军司令蔡锷、三军司令唐继尧分别被授为川督、滇都，独二军司令李烈钧无所授受。其他籍隶国民党的护国军统兵大将如熊克武、方声涛等，也遭排挤。军务院“运筹决策”的“主干人物”李根源，虽被任命为陕西省长，但命令发表后，却由于陕西督军陈树藩的阻挠而不能到任。直至次年2月，在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李才到陕西做了不到半年的省长。

第二节　各派政治力量的动向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动向

孙中山和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对于袁世凯死后代之而起的段祺瑞封建军阀专制的本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认识不清的。袁世凯病亡次日，孙中山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对于今日之时局，颇具乐观。……若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位夺权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76] 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曾多次表示他能够与段合作。6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在上海发表谈话说：段祺瑞"曾为逆党所不容，此时或能与民军相互提携，亦未可料"[77]。他对段祺瑞虽然也有些担心，但主要是对段身边的袁世凯的一些旧人不信任，怕段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于纷纠"；而对段本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一再称颂段"扶危定倾，经武图强"，为北洋将领中的精粹。

孙中山为了表达愿与段祺瑞合作的诚意，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的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6月10日，孙中山分别致电朱执信和居正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78] 6月13日又致电黄兴，"黎能复约法，召集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79] 他还在给各地中华革命军将领的电文中说："今者袁死黎继，我辈革命之目的物不存，则革命军亦无从继续。"[80] 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华革命党不应以军事争政权，而应顺应国民心理，对赞成共和的执政者"暂为监视"[81]。当时，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力量虽不很大，但分布还是比较广的，山东、广东、福建、四川等地都有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其中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有一定实力，已组织起二师一旅的正规军。对于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的意见，当时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军反袁的华侨是持有异议的，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

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曾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十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82]

中华革命党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侨捐款。护国战争结束，华侨捐款也告终止。这也是孙中山不得不取消中华革命军的一个原因。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于8月上旬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12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在此前后，广东、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在孙中山"息战争，事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华革命党人在反袁战争中组织起来的一点武装，就这样完全收束了。

这时，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组织本身，也宣布停止活动。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分部发出通告，宣布奉总理指示，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83]。

不论是收束武装，还是停止政党活动，孙中山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都在于从事和平建设。他认为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执政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国内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84]。

为了向国人说明自己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孙中山还表示将不问政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今后想无有野心家矣。则维持现状，以使政理从渐而进，国内大有人矣。"他本人决意从此不再过问国事[85]。

当然，孙中山解散中华革命党本部组织，表示不想过问政事，也还有一些策略上的考虑。袁世凯死后，基于广大群众厌倦政党政治的心理，社会舆论普遍地批评政党。而进步党人和国民党稳健派也都标榜“不党主义”，以适应舆论和群众心理。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为了争取群众，也必须有所表示，这也是他表示不问政事的原因之一。

在袁世凯死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对用和平方法来改善政治抱有很大的期望。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孙中山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孙中山为了表示和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还改变了民国初年拒绝袁世凯授予大勋位的做法，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于1917年1月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中华革命党人的议员田桐等也相继宣布，要“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86]。

1916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国民党人（无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稳健派）都以国会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孙中山虽不在北京任职，但对国会也抱有很大期望。他一向把宪法和国会看作实现民主共和的根本途径。反袁战争结束后，孙中山曾总结袁世凯背叛民国的教训，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实行封建专制，复辟帝制，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智未开”，人民未能行使主权。因此，他认为：维护民主共和必须使民众参政，而使民众过问政治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渐次实现直接民权。7月中旬，孙中山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第一次向各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7月下旬至8月中旬，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这时所找到的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

9月，国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一部分议员即在孙中山的影响

下，提出将地方制度加入宪法的修改宪法提案。但是，段祺瑞实行的仍是军阀独裁专制，他根本不想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从来没有把宪法和国会放在眼中，也根本不可能采纳孙中山等提出的所谓“地方自治”的方案。不久，事实就告诉了孙中山，他的“地方自治”的设想，只能在国会中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而得不到任何结果；即使“地方自治”的条文被列入宪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任何中央集权，只能是中央封建专制；地方自治，也只能是地方军阀的割据和专制。

二　进步党人的动向

袁世凯一死，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立即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袁死后的第二天（6月7日），梁启超即致电段祺瑞说：“扶危定倾，惟公之责。愿当机立断，宏济艰难……护法奉国，尽瘁荷艰，早奠邦基。”[87] 如前所述，他还致电西南护国军，敦劝大家同他一道支持段祺瑞。嗣后，梁便说服唐继尧、陆荣廷等撤销军务院，拆散了南方护国阵营。

进步党人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不是偶然的。首先，袁世凯被护国运动冲垮之际，旧日国民党的势力（不论是中华革命党，或是所谓稳健派）在国内逐渐恢复公开活动，力量也有所发展。第二，从进步党人的改良主义本性看，他们在政治上原与北洋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就是在1914年进步党内阁被袁世凯一脚踢开后，梁启超等人都仍然拥袁不变。只是到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时，进步党人才迫于形势，感到必须改变方针。他们看到：袁世凯称帝必然引起国内大乱，不仅中华革命党一定要加强反抗，南方各省残存的国民党势力也不会袖手旁观；即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也可能借机图谋自立，而北洋派内部也已孕育着反袁的潜势力。正是由于上述考虑，梁启超等人既不愿与袁世凯一同垮台，又不甘为牛后，才与蔡锷等一道决然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于1916年3月下旬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梁启超等

人反袁的政治目标虽已达到，但他们深知：袁不退位，将对发动反袁的进步党人是一大威胁，因而不肯与北洋政府妥协；而在袁世凯死后，他们认为进步党与袁的继任者并无重大矛盾，北洋势力不仅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而且他们必须依靠北洋派才能有所发展，才能防止国民党势力的抬头。进步党人与北洋派的矛盾远不如他们和国民党人的矛盾深刻。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的种种表现，完全合乎历史客观逻辑的发展。

特别重要的是，进步党人企图在北洋派的支持下，在西南取得一块地盘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这也是梁启超卖力地帮助段祺瑞支撑政局的基本原因之一。

1915年秋，梁启超在天津策划反袁时，已有利用反袁运动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企图。11月18日，梁给其时在云贵等地同党的一封信中说："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甚调于其旁（指国民党）。"[88] 梁在这里把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勾结，说成是为人"劫持"、"利用"，并归咎于没有根据地，显然不合事实。但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动西南的进步党人在反袁运动中自谋"树立"。12月云南宣告起义，梁启超在上海起草了大量的起义文告。在《云贵檄告全国》一文中，梁为起义军提出四项目标："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国际团体上之资格。"[89]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篇檄文中不仅激烈抨击了袁世凯称帝，而且提出要"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一向主张中央集权的梁启超，此时之所以提出限制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限，不仅仅是为取悦西南地方实力派，而且与他要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计划是紧密联系的。在私下通信中，梁对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在西南建

立根据地的计划就更直言不讳了。1916年1月27日，梁致信给当时在四川前线的蔡锷说："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抟控。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自兹方始。……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90] 梁启超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进步党人准备控制川、滇、黔，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进步党人在西南建立基地，显然与西南各省实力派以及北洋集团的利益都是有冲突的。他们在西南的活动首先受到唐继尧、刘显世等的挟制。蔡锷、戴戡率滇、黔军入川作战后，唐和刘特别是唐，唯恐蔡部在和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给予必需的援助。蔡在致梁启超信中曾提到："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至衣不蔽体，食无宿粮。"[91] 直至6月7日（袁世凯病亡，蔡锷在军中尚不知道），蔡还致电唐继尧，苦苦哀求唐支援一些子弹。

由于唐继尧对梁启超、蔡锷防范严密，进步党人后来不得不放弃经营云贵的计划。两广方面，当时进步党人也很难打入。不仅陆荣廷在两广的地位已趋稳固，而且国民党人（中华革命党和稳健派分子都有）在广东也较活跃。在这种形势下，进步党人只有将经营的目标放在四川。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派黄群前往北京与段祺瑞接洽，为蔡锷活动在四川的职位。开始，段并不想把四川交给蔡锷，未给梁启超肯定答复。但到6月中旬，四川发生陈（宦）周（骏）之争，局势大乱[92]。为稳定局势，段祺瑞只好暂时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末，蔡锷指挥护国军攻抵成都，赶跑周骏。在此情况下，北洋势力才退出四川。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对经营四川，开始因健康关系和以前曾声明反袁胜利后即引退等原因，有所顾虑。但面对四川的混乱局面，他又不忍“绝裾而去”。此外，梁启超也极力敦促他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最后，蔡接受了川督的任命。接任后，蔡锷在驻地泸州与秘书、参谋长等研究了重建四川的计划[93]。7月末，蔡带病抵成都履任。他果断地将入川滇、黔军和川军进行整顿，制定奖惩条例，并统一财政，初步处理了一些急迫的战争善后事宜。但是，蔡的病势日渐恶化，实在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时离职休养。9日，蔡离开成都。

蔡锷在成都期间，曾亲临绅界会议，表示四川富庶，大有可为，愿以较长时间尽心经营四川[94]。他还带病召开军政会议，对四川的复员善后及人事作出安排。会后，他又对熊克武等人说，原想到中央政府任职，现在不想去了，病好后仍要返川[95]。蔡离开成都后，在泸州休息了几日。其间，梁启超为保住四川，曾几次打电报给戴戡，要他劝蔡不要立即离川，先在重庆养病，待戴戡等在川站稳脚跟后再离去[96]。但此时的蔡锷，已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了，声息微弱[97]，无法执行梁的意图。

进步党人谋得四川后，还想争取湖南，但由于段祺瑞的阻挠，未能如愿。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竭力谋取川湘，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并非要与段祺瑞唱对台戏。梁在当时的《电稿纲要》中写得很清楚：段氏主持政局，“西南得有所根据，以图拥护。”[98]但是，进步党人既然想开辟一块地盘，在北洋派和国民党中间充当第三种势力[99]，也就不可能得到段祺瑞的实际支持。

8月末，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病，因医治无效，不久即在日病逝。梁启超在西南为进步党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因蔡氏之死而更加无法实现了。蔡锷离川前，曾保举罗佩金暂代四川督军，率滇军驻守省

城，同时推荐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率黔军驻守重庆。梁启超、蔡锷以罗、戴分掌川局，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蔡锷本拟把四川交给同窗至交蒋方震，但因尚未准备妥当，而且身边还离不开蒋，因而只好暂安排罗、戴分掌川局。但这样的安排，对进步党人在四川的地位是不利的。因为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进步党人在川只能依靠戴戡，而戴的威望和才能都远逊于蔡锷。蔡锷在川时，唐继尧摄于蔡的声威，对入川滇军虽然垂涎，但不敢过问。蔡离川并很快病死，唐便无所顾忌了，入川滇军实际上为唐遥控。而戴戡所部黔军仅有一混成旅，实力单薄，不仅不能与入川滇军相比，也远不及川军。蔡离川后不久，川滇军发生冲突，1917年4月，戴戡乘机夺得督军职位。但嗣后不久，川军实力派首领刘存厚即与戴戡因分赃不均发生冲突。刘在北京政府段祺瑞的鼓动下，倾全力围攻驻川黔军。戴戡所领黔军本来实力不强，所以很快失败，而在撤逃时又遭到刘部围歼，连戴戡本人也因之身亡。此时，蒋方震料理完蔡锷的后事，正匆匆赴川，但行抵重庆即得知驻川黔军完全失败的消息，他只好黯然离去。进步党人在护国战争中所掌握的武力就这样完全瓦解了。

对于戴戡在川的失败，梁启超等当然是痛惜的。梁在经营西南屡受挫折后，便放弃了在西南建立根据地以充当第三者的设想，转而进一步联合北洋派，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力谋在北京政府中分得一席地位。

三　北洋集团的开始分化

前卷已述及，袁世凯称帝引起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的不满，北洋集团即已出现严重裂痕。袁氏败亡后，北洋集团因失去重心和统驭的人物而更加呈现分化瓦解的趋势。北洋嫡系分为两支，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虽然公开分裂是后来的事，但袁死后两派的矛盾分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段祺瑞由于长期在北洋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并曾在北京政府中任

陆军总长，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如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等，成为他的亲信。袁死后，他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又在北洋集团中积极网罗私党。原来就与他比较接近的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1917年1月3日任命）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1917年1月6日任命）等，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段祺瑞通过这些地方军阀，不仅掌握了大批军队，而且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由上述这些军事实力派人物组成的皖系军阀集团。

除段的嫡系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也依附于段。河南督军赵倜（所部由毅军改编）、热河都统姜桂题（所部亦由毅军改编）、奉天督军张作霖起初也曾支持段（张、赵1919年开始转向同直系合作反皖）。

此外，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许多政客也纷纷投入段系，如王揖唐、田文烈、方枢、张弧等。段对这些人都予以重用。在财界拥有雄厚势力的交通系政客曹汝霖、陆宗舆和叶恭绰等，也和段有密切关系。

段祺瑞虽然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但是并没有完全掌握北洋军队。

在北洋嫡系中，另一实力大、地位高的首领是冯国璋。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符），直隶省河间人，所以后来人们把以冯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直系。冯领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为北洋派坐镇江南。此时，冯国璋的亲信王占元和李纯也先后被任命为湖北、江西两省的护军使。冯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苏、赣、鄂三省开始连成一气，为后来直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袁世凯时代，冯国璋与段祺瑞曾是北洋上将中向袁争宠的主要对手。袁世凯称帝时，段被打入冷宫，冯也遭到袁的猜忌疏远。为自身利害计，二人都对袁世凯称帝采取抵制的态度，一度成为同盟者。但自袁死后，段、冯很自然地又成为北洋集团中争夺权势的主要对手。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南方的不同态度上。

段祺瑞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以北洋派来统一全国，由他来宰制天下，把南方国民党、进步党和其他反袁实力派，看作是一种异己力量而不愿与之合作（梁启超等进步党人随后同段合作，但很快即被段抛弃）。对南方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大要求，段祺瑞开始时并不乐意接受，只是后来由于南方坚持不让步，他才不得不表示赞成。他虽同南方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是面和心不和。

冯国璋则不然。护国战争期间，孙洪伊、唐绍仪等为拉冯反袁，与冯保持经常接触。袁死后，冯仍与孙洪伊、吴景濂等函电往还不断。冯与军务院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军务院曾先后派林长民、范源濂、周善培等到南京与冯“商榷要政”[100]。对于南方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的要求，冯国璋比较早地表示了赞同的意见。6月11日，他针对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内阁成员所提出的对帝制派不起诉的主张，特去电驳议，认为“帝制诸人，惑元首，祸国害民，罪恶万千，若不惩办，何以谢天下而服人心”[101]。6月15日，他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关于恢复旧约法，他说：“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定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为非正统。……此法早已无效。新法无效，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舍恢复《临时约法》外，即别无可以改造之道。”恢复的方法，他认为：“恢复与修正不同，自非变更法律之比，可用明令宣布，但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三年五月一日起施行中断，兹恢复云云，似较直截了当，且亦无损庄严。”关于召集国会问题，他指出：“恢复

民国二年国会本与《临时约法》相联。因《临时约法》而有国会组织，依国会组织法而有国会。约法既复旧，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因而复。”因此结论是：“应依《临时约法》续行召集。”[102] 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他和段祺瑞与南方之间意见的异同。后来有些国民党人在北方因受段祺瑞压迫而呆不下去时，便跑到南京托庇于冯国璋。因此，许多国民党人把冯视为反段的盟友[103]。

以后，直系和皖系在南方问题上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到1918年，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中国，对南方用兵，冯国璋在北京中央政权的地位（代理大总统）也被排挤掉，两派就出现公开的对抗了。

---

(1) 沃邱仲子：《段祺瑞》，上海广文书局1920年版，第42页。

(2) 沃邱仲子：《段祺瑞》，第48页。

(3) 沃邱仲子：《段祺瑞》，第49页。

(4) 《梁任公致护国军电》，《申报》，1916年6月9日。

(5) 《梁任公复黎大总统电》，《申报》，1916年6月10日。

(6) 《南海中山对于时局之主张》，《申报》，1916年6月13日。

(7) 《致段祺瑞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11—312页。

(8) 《译电》，《申报》，1916年6月16日。

(9) 《译电》，《申报》，1916年6月16日。

(10) 《黎总统就任纪》，《申报》，1916年6月10日。

(11) 《黎总统就任纪》，《申报》，1916年6月10日。

(12) 《黎总统正式就任之详情》，《申报》，1916年6月11日。

(13) 《段祺瑞之个人与时局》，《申报》，1916年6月13日。

(14)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日；《政府公报》，1916年6月30日，第175号，命令。

(1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日；《政府公报》，1916年6月30日，第175号，命令。

(16) 《最后之目的已达》，《申报》，1916年7月1日。

(17) 《根本解决》，《申报》，1916年7月1日。

(18)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日；《政府公报》，1916年6月30日，第175号，命令。自6月30日起，段祺瑞所副署的命令，头衔一律改称国务总理。

(19) 《东方通讯社电》，《申报》，1916年6月13日。

(20)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6日。

(21) 《军务院宣告撤销电》，《申报》，1916年7月18日。

(22) 《命令》，《申报》，1916年6月12日；《政府公报》，6月11日，第156号，命令。

(23) 《命令》，《申报》，1916年6月21日；《政府公报》，6月20日，第165号，命令。

(24) 《命令》，《申报》，1916年7月3日。

(2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9日。

(26) 《译电》，《申报》，1916年7月9日。

(27)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1日。

(28) 《政府公报》，1916年7月9日，第184号，呈。

(29)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5日；《政府公报》，1916年7月13日，第188号，命令。

(30) 《政府公报》，1916年7月9日、10日，第184、185号，咨；《恢复言论自由》，《申报》，1916年7月13日。

(31)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8日。

(32) 《国会与报界之今后责任》，《申报》，1916年7月22日。

(33) 《政府公报》，1916年7月19日，第194号，命令。另见《申报》，1916年7月20日。

(34)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东方通信社电》，《申报》，1916年7月3日。

(3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2日。

(36) 转引自《内阁人物之评论》，《申报》，1916年7月6日。

(37) 《专电》，《申报》，1916年7月7日。

(38) 《段总理再致唐少川电》，《申报》，1916年7月5日。

(39) 《段总理致孙洪伊电》，《申报》，1916年7月5日。

(40) 《唐少川再复段总理电》，《申报》，1916年7月5日

(41) 《孙洪伊复张溥泉电》，《申报》，1916年7月7日。

(42) 《新内阁劝唐孙就职》，《申报》，1916年7月12日。

(43)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5日。

(44) 《致陈炳焜陆荣廷电》（1916年7月11日），《护国之役之电稿》。

(45)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2—793页。

(46) 《致与庐诸贤书》（1916年9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94页。

(47) 《与报馆记者谈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32页。

(48) 《国会议员紧急集会通告》，《申报》，1916年6月17日；《民国议会集会通告》，《申报》，1916年6月23日。

(49) 《民国议会集会改正地点通告》，《申报》，1916年7月11日。

(50) 《纪国会第二次开幕情形》，《申报》，1916年8月5日。

(51) 《译电》，《申报》，1916年7月26日。

(52) 《国会议员之薪俸与议题》，《申报》，1916年7月30日。

(53) 《国会议员之薪俸与议题》，《申报》，1916年7月30日。

(54) 《杂评·先决问题》，《申报》，1916年7月30日。

(55) 《将来内阁总理之人物》，《申报》，1916年8月3日。

(56) 《内阁总理之将来人物》，《申报》，1916年8月4日。

(57) 《段芝泉并无辞让政权意》，《申报》，1916年8月18日。

(58) 《内阁问题之最近主张》，《申报》，1916年8月8日。

(59) 《参众两院开会纪》，《申报》，1916年8月25日。

(60) 蔡元培：《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旅欧杂志》第3期，1916年9月15日。

(61)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39—42页。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商务印书馆1946年再版，第79页。

(62) 《中华革命军改制文件》，台北《革命文献》第46辑，第329—339页。

(63) 《中华革命军改制文件》，台北《革命文献》第46辑，第329—339页。并参考辜仁发：《中华革命军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记》；锺冰：《中华革命军讨袁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64) 《政府公报》，1916年7月7日；《申报》，1916年7月7日。

(6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7日；《政府公报》，1916年7月7日。

(66) 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后又改为陈炳焜兼署），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宦。（以上均见1916年7月7日《政府公报》。）

(67) 《致范源濂》（1916年7月3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68) 《致段祺瑞电》（1916年7月10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69) 《致籍忠寅》（1916年7月13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0) 《复陆荣廷电》（1916年7月13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1) 7月4日，汤芗铭被湖南军民赶走。6日，北京政府发表当时从四川退到鄂西的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遭到湖南各界的强烈反对。

(72) 《致熊希龄电》（1916年7月25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3) 《复周善培电》（1916年7月24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4) 《政府公报》，1916年7月7日。

(75) 《程潜等举黄兴为湘督致黎元洪、段祺瑞电》，《革命文献》第48辑，第253页。

(76) 《在上海对某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3页。

(77) 《在上海与徐朗西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9页。

(78) 《申报》，1916年6月14日。

(79) 《申报》，1916年6月14日。

(80) 《致杨寿彭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65页。

(81) 《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1页。

(82) 《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3页。

(83)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1916年7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3页。

(84)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1916年7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3页。

(85) 《批今后决意不问国事》，《国父全集》第4册，第259页。

(86) 《田桐声明解散秘密团体电》，《中华新报》，1916年7月29日。

(87) 梁启超：《护国之役文电稿》。

(88) 《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1915年11月18日），《盾鼻集》第1卷，函牍，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3页。

(89) 《云贵檄告全国文》，《盾鼻集》公文，第8页。

(90) 《盾鼻集》第1卷，函牍，第20—21页。

(91) 《致梁启超》（1916年6月28日），《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3页。

(92) 陈宦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后，袁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袁死后，周仍以四川将军名义进攻陈宦，于26日占领成都，并自立为四川都督。

(93)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第137页。

(94) 《在成都绅界会上的讲话》（1916年8月），《蔡松坡集》，第1218页。

(95) 李乐伦：《护国之役后四川的动乱局面》，《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89页。

(96) 《致戴戡电》（1916年8月9、13、17日），梁启超：《护国之役文电稿》。

(97)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38页。

(98) 《电稿纲要》（1916年7月27日），梁启超：《护国之役文电稿》。

(99) 1916年7月11日，梁启超在致蒋方震的电报中说："蜀不能失，尚可联西南作第三者资格。"（《护国之役文电稿》）

(100) 《专电》，《申报》，1916年6月15日、16日、17日。

(101) 《申报》，1916年6月12日。6月12日段复电冯说："大赦帝党案已取消。"见《申报》1916年6月13日。

(102) 《冯华甫主张旧约法电》，《申报》，1916年6月18日。

(103) 《林森致孙中山函》（1916年12月4日），转引自《国父年谱》下册，第661—662页。

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第一节　府院之争

段祺瑞执政不久，便和总统黎元洪发生激烈的争执，而造成北京政局极不稳定，并因此引起一场民国史上再一次复辟帝制的事件——张勋复辟。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争执，被称为“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指黎元洪一派；“院”即国务院，指段祺瑞一派。这场斗争，从国际根源来说，它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从国内政局的具体变化来看，它反映了研究系与国民党的矛盾、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　研究系和商榷系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从国内政派分野来看，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国民党人和南方的地方势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则是研究系（进步党）和亲段的北洋督军。因此，研究系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在府院之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护国战争期间，为了反对袁世凯，进步党人与国民党人曾在西南地区有所合作，但护国战争一结束，这种合作即马上破裂并开始了新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国会制宪问题上。

1916年7月，军务院撤销。国民党和进步党双方便积极组织力

量，力图由自己控制即将恢复的国会。当时，梁启超布置各地进步党人组织起来。18日，他在致贵阳进步党人的一封信中说："吾党今虽取冷静态度，亦不能长此终古"，明确指出要组织"无形政党"，并令贵阳同党请求蔡锷、刘显世提供组党经费[(1)]。所谓"无形政党"，就是不以政党之名而行政党之实。因为民国初期的政党热潮没有什么好结果，袁世凯死后，各政党复活时便纷纷以"不党主义"相标榜。8月22日，汤化龙、刘崇佑召集在京进步党人于安庆会馆讨论组党，决定成立"宪法案研究会"[(2)]。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进步党人结成"宪法研究同志会"，以王家襄、陈国祥为头目[(3)]。31日，"宪法案研究会"召开正式成立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约》。《宣言》大谈一通"精审良宪"的宗旨[(4)]。两天以后，"宪法研究同志会"也召开正式成立会，通过了《公启》和《简章》，其内容与"宪法案研究会"如出一辙，也大谈"抛开党见"，精研宪法，等等[(5)]。从这些公开宣言的字里行间，虽然也可以看出进步党攻击国民党"偏于党见"、"理想过高"的用意，但其组党的实质毕竟是被表面文章所掩盖。梁启超在私下对组党目的就讲得清楚多了："今决组强固无形之党，左提北洋系，右挈某党一部稳健分子，摧灭流氓草寇两派。现国会即开始讨伐。"[(6)]

南北"统一"后，国民党人也公开声称"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7)]。开始，张继在北京寓所召集国民党人聚会，有所策划，但尚无组织名义。8月底至9月初，国民党议员也相继组织起三个政团：一、中华革命党议员为骨干的丙辰俱乐部，马君武、居正、田桐为主要人物；二、国民党稳健派为主体的客庐系，包括谷钟秀、王正廷、吴景濂为首的三个小派别；三、韬园系，以原进步党分化出来的孙洪伊、丁世峄、温世霖等为首领。9月9日，在孙洪伊倡议下，丙辰俱乐部、客庐系和韬园系三派议员三百八十余人在北海公园集会，组成"宪法商榷会"。"商榷会"集合了参众两院的国民党人，是国会的第一大党。但其内部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与客庐系的谷钟秀派存在很大的矛盾。11月，谷钟秀、张耀曾等因选举副总统问题与吴景濂等发生严重争执，脱离客庐系另组"政学会"。吴景濂等亦改客庐系为"益友

社”[8]。自此，“商榷会”由三系变为四系，但在政治上仍为三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系由于政治主张接近，不久合组为“民友社”[9]

进步党人看到国民党各派合组“商榷会”，遂于9月12日宣布“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案研究会”无条件合并为“宪法研究会”[10]。“宪法研究会”在参众两院共拥有议员一百六十余人，是仅次于“商榷会”的第二大党。

研究系与商榷系在国会的斗争，开始集中于制宪问题。9月22日，宪法审议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即1913年制订的《天坛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因袁世凯解散议会而被搁置）。会议延续至1917年5月。在审议过程中，两派争议最大、冲突最激烈的是省制加入宪法问题。在国会体制等问题上，两派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1916年10至12月，宪法审议会讨论地方制度问题。研究系和商榷系各持己见，争论不休。10月中旬，在商榷系议员的强烈要求下，焦易堂、吕复等提出省制订入宪法的提案被列入审议会议程。20日，审议会开会，焦、吕等首先发言，指出欧美等共和制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地方制度的条文，中国既行共和制，也应学习欧美共和国家，将地方制度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并给予地方以一定的自治地位[11]。陈善、汤化龙相继发言反对。陈、汤发言的要点是：一、宪法应有固定性，地方制度目前尚不能确定，不能以宪法进行“试验”。二、虽各省议会多赞成省制入宪，但各省督军、省长多持反对态度，“倘宪法上规定稍存不慎，则惹起政潮，影响所及，贻害匪浅”[12]。双方争执激烈，会议无结果而散。23日、25日，11月7日，审议会又进行三次辩论，均无结果。29日，进行投票表决，也因研究系反对，赞成票不足三分之二，未能通过。12月4日、5日，宪法审议会又连续两次投票表决，结果与11月29日投票一样，仍未获通过。8日，投票表决“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命，地方制度加入宪法”，斗争更加激烈，以致引起武斗。是日，出席审议会议员六百三十九人，四百二十二人投赞成票，二百一十四人投反对票，赞成票差四票不足三分

之二，提案未获通过。商榷系感到非常懊丧。这时有人检举个别研究系议员持有两张选票，使商榷系议员更加愤怒。张我华、刘成禺等大骂副议长陈国祥发选票时徇私舞弊，而研究系议员则矢口否认，刘崇佑、籍忠寅反指摘商榷系方面无事生非。双方争夺讲台，扭作一团，并以墨盒、椅子为武器乱砸对方，整个议场陷入混乱[13]。事后，研究系公开通电各省督军，攻击商榷系。商榷系也在报刊上揭露研究系选举时舞弊，回击研究系[14]。

研究系如此激烈地反对省制入宪的原因，从北洋督军对此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端倪。自商榷系提出省制入宪的提案后，北洋督军纷纷表示反对。国会辩论省制问题前夕，十六个省的北洋督军联名通电威胁国会不得“以不适国情之条文草率加入，致酿异变”[15]。在研究系表态反对省制加入宪法之后，王占元又致电国会，要国会“博采群议，不必遽行加入”[16]。而商榷系主张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的实质，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的半独立地位，以使国民党得到生存和发展。7月17日，孙中山在欢送旅沪两院议员北上的茶会上，曾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督促国会开会后予以实现[17]。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四川、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山西、吉林、甘肃、山东、江西等十六个省议会都通电支持省制订入宪法，其中南方数省并要求省长实行民选[18]。所以商榷系提出“地方自治”的要求，不仅一般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当时更具体地反映了南方各省实力派和地方人士的利益。

国会关于国会体制等问题的辩论，也和地方制度的讨论相仿。国民党人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断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军阀专制的需要。但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的主张不能如愿以偿。因此，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和打击国民党人。

二　督军团对国民党人的攻击

1916年6月，冯国璋发起的南京会议结束后，张勋、倪嗣冲即以对抗南方和国民党势力为号召，邀请参加南京会议的吉、黑、奉、直、晋、皖、豫七省代表便道前往徐州开会，这便是第一次徐州会议。张勋在会上提出解决时局的“要纲”十条，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仍以武力解决”。“要纲”还声称“绝对抵制迭次倡乱的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意即反对国民党人参政[19]。6月9日，皖、奉等七省代表通过“要纲”，并于当日通电发表。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虽然没有打出什么旗号，但在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以张勋、倪嗣冲为首的北洋地方军阀同盟。9月，张、倪又召集北洋各省代表在徐州开会。21日，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十三省区督军代表，由张、倪领衔宣布组成“各省区联合会”，并发布八条纲领，其主要内容为“固结团体，巩卫中央，庶免为少数人所牵，率致贻大局之虞”；国会如“各怀党见，违反真正民意，不顾国家，至不得已时，亦当为正当之干涉”；宪法如有“必不可行之处，当共抒正论”；等等[20]。“各省区联合会”后来即被人称为督军团。

这次会议后，张勋又先后两次（1917年1月和5月）邀集北洋各省代表在徐州集会。这些会议的攻击矛头，都是对着国民党人的。

张勋等攻击国民党议员是“暴徒”、“不良分子”，要求“改组”国会。8月初，张勋致电黎元洪及全国各省督军，要求在国会开会之前，将议员中参与二次革命的反袁党人与附和帝制的分子一同罢免，“以昭公允”；并攻击国民党议员在上海开会等活动是“违法行为”；要求北京政府速将议员名单交有关机关审查，“详加厘剔”。

张勋等还诬陷选入内阁的国民党人，阻止他们入阁参政。8月初，上海租界英巡捕查获一批烟土，本与张耀曾无关，但是督军团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9月2日，张勋首先通电，指责张耀曾“贩土营

私，丧权辱国”，并要求将张驱出内阁。13日，张勋、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十五人，又由张勋领衔联名通电，向张耀曾发起更猛烈的攻击，要求即日予以罢斥，交法庭公审。9月，张勋等又对正准备入京就任外交总长的唐绍仪发动攻击，要求将他逐出内阁。

督军团肆无忌惮地干涉国会、宪法、内阁，攻击国民党及其议员、阁员，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南方的实力派也表示不满。8月21日，来自广西的议员赵炳麟在众议院提出禁止军人干涉议会案[(21)]。9月，云南议员李燮阳又在众议院提出查办张勋案。李燮阳在提案中指出，张勋“力主复辟之邪说，身作复辟之保障。叛国逆贼，延为上宾，帝制余孽，悉成佳士，今日之徐州，竟成帝党之巢窟。阴谋会议，志存乱国。……密结十三省督军同盟，干涉国政。……霸据徐州，形同强盗。……清江浦关税直由其征收，两淮盐运税款亦由其自由提拨，江北官吏悉归其支配，津浦铁路沿线亦为其蹂躏不堪，徐淮一带地方主权已成其个人势力范围，与中华民国显成分立之象，直言之，已演成中华民国内一小独立国之景象”。李在提案中还指出，政府“及今不图，滋蔓难治”[(22)]。27日，《中华新报》以《诛张勋》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指出：“张勋羽翼已成，势在必反……政府苟欲自树，则唯有立罢张勋军职，庶乎大祸可以止息。”[(23)]

总统黎元洪对督军团的活动深感忧虑，曾几次派人到徐州敦劝张勋，但张根本不买他的账。唐绍仪被督军团吓跑后，黎感到事态严重，9月29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训令说：少数军人“每囿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轹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且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之渐……尚望翻然自省”[(24)]。同日，段祺瑞也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督军，委婉地批评他们“间有过情”。但段的电报极力掩盖督军团及其徐州会议的真面目，居然说督军团干涉国会、诬蔑阁员的不法行为是由于“热情所激”，把

在光天化日下举行的徐州会议竟说成“道路传闻”[25]。张勋将北京政府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视同弁髦，10月1日公然复电反对，指责北京政府“上无道揆”[26]，又去电威胁国会，声称要“循部曲健儿之请，橐鞬入京”[27]。

段祺瑞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的真相，是因为他本人与督军团及徐州会议有难解之缘。8月国会复会以后，段通过他的头号心腹徐树铮，一直与张勋保持密切联系，信使往还，不绝于北京、徐州之间。8、9月间，皖系重要骨干张志潭、曾毓隽先后到徐州活动，策动张勋驱逐张耀曾、唐绍仪[28]。10月，国民党议员邹鲁联合十数人再次在众议院提出查办张勋案。提案列举了张勋私自组织军人团体，对抗中央，破坏统一；破坏制度，紊乱宪法；干涉内阁阁员任免，图谋颠覆政府和肆意攻击国会、违反共和精神等四大罪行[29]。由于段祺瑞置之不理，邹又提出十大质问案，再次指出张勋割据徐淮、残害人民、干政干宪等不法行为[30]。11月，段以国务院名义咨文众议院，为张勋饰词辩解，认为割据徐淮，残害人民一节，“事属传闻，未可为据，至徐州会议经政府训诫，早已解散，所谓章程大都出于报章，不足为信。”[31]

第二次徐州会议结束后，督军团的集体活动一度中断。这并非段祺瑞“劝导”的结果，而是由于冯国璋为首的部分督军表现不同意向。当第二次徐州会议倪嗣冲提出驱逐唐绍仪的动议时，“长江三督”（苏督冯国璋、赣督陈光远和鄂督王占元）的代表已表示疑义，为倪嗣冲所压制。后倪擅自代替三督列名驱唐通电[32]。通电发表后，冯国璋等先后声明与通电无涉，使张勋、倪嗣冲非常难堪[33]。在冯等影响下，有些督军也将代表从徐州撤回。

张勋和倪嗣冲是反对国民党和南方实力派的死硬派。二次徐州会议结束后，他们仍然继续攻击国民党阁员，干涉宪法和政治。他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一直得到皖系的支持和鼓励。徐树铮始终与张勋、倪嗣冲保持密切联系。1917年1月初，徐与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

等皖系骨干分子南下为冯国璋祝寿，与倪嗣冲商定，乘机邀请各省督军代表和靳云鹏、徐树铮等齐集徐州，由张勋主持召开第三次督军团会议。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四项所谓解决时局主张[34]。研究系政客对北洋督军团的活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第三次徐州会议前夕，梁启超由上海至北京，中途在徐州下车，与张勋密谈数日。在此之前，梁与张勋函电使节往来已渐频繁。后梁又两次派张君劢到徐州见张，策划与国会中的研究系内外配合。他在致张勋的信上说："惟鞭策救济之功，终须随时仰诸疆吏。"[35]

段祺瑞和研究系利用督军团，通过破坏国会以打击国民党的伎俩，当时就已被人们识破。早在1916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国会方开，锋芒正锐，政府……别树二三悍将于外，使国会无日不发生危险之机，以挟持国会，俾国会不得不昵以就己。"[36] 不难看出，督军团正是由于有段祺瑞等的包庇纵容，才能如此嚣张。

三　府院权限之争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个人关系的恶化，最初主要表现在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限问题上。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立即起用他的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人，十二岁时中过秀才。1905年由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回国后即入段幕府，赞襄帷幄。他当时仅二十七岁，少年得志，十分自负。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陆军部军学处处长。1914年，他升任为陆军部次长，同时在北京创正志中学，自任校长，并请林纾等人为教员。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他力劝段祺瑞抵制，并与段共进退，因此深得段祺瑞的信任。此后，段的许多重大措施，大都出自他的策划，因此人们称他是段的"小扇子军师"。

段祺瑞以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起初曾遭到黎元洪的反对，但由于段的极力坚持，又由于徐世昌、张国淦等人的劝说，黎才勉强从段所请，但对徐始终没有好感[37]。

徐树铮自恃段的倚重，又有皖系军人为后盾，根本不把没有实力的总统放在眼里。内阁的文件、命令呈交总统审阅、用印，本属国务院秘书长本职，但徐却时常借故不出面，派手下人向黎呈请用印，使黎非常不快[38]。而当徐本人进府面见总统时，老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甚或开口顶撞。有一次，某省同日更动三个厅长，黎向徐问了一句："任命的都是些什么人？"徐便抢白道："只在这里盖印好了，管他任命什么人。"使黎非常难堪。黎因此愤怒地表示，再也不愿与徐见面[39]。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与黎元洪、段祺瑞的关系很深，为人又圆滑，有他从中周旋，所以没有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8月1日，张国淦因故辞去本兼各职，总统府秘书长由参议员丁世峄继任。丁世峄（1879—1930），字凫严、佛言，清末曾任山东咨议局议员，是立宪派中的激进分子。1913年加入进步党，在党内属孙洪伊一派，二次革命后倾向国民党。他到任后，力主提高总统地位，限制国务院秘书长职权。8月下旬，他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二、所有国务院议决事件及任免官吏命令须经该管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40]。这样，就使黎、段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段祺瑞不能容忍黎元洪插足国务院，他一见此草案，便称病请假不出，并放风辞职，后经熊希龄等劝解，才于26日销假视事。他当日即向徐树铮下了一道命令，凡国务院呈请总统核阅的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阅印后赍回。无论风雨星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歧误"[41]。至于总统出席国务会议问题，段坚决不肯让步。最后府院双方议定了几条折衷的办法：一、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二、国务会议议

事记录随时呈阅。三、紧急军政要件，由国务员进府直接报告。四、总统对于国务会议议决案件，如有认为不合者，得命总理及主管国务员说明理由，说明后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回复议一次。五、每日呈阅文件与呈请用印，由国务院秘书长亲送[42]。此后，黎、徐关系一度表面上有所缓和。

但是，黎元洪与徐树铮冲突的根子在于段独揽政权，而黎又不甘心只作盖印的工具，这个矛盾不解决，府院之争是不可能平息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到任后不久，即与徐树铮发生冲突，黎与段的关系又随之紧张起来。

7月底至8月初，孙洪伊、张耀曾等国民党阁员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鼓励下，先后由上海北上就任。他们到任，对段、徐的专擅是不利的。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直隶人，清末为立宪党激进派领袖，1913年加入进步党。二次革命后，转向国民党阵营，并博得好评[43]。他到任未及一月便与徐树铮展开斗争。

8月下旬，湖南议员郭人漳、周震鳞对投靠皖系的官僚政客胡瑞霖（时任福建省长）在湖南财政厅长任内的劣迹提出查办提案转到国务院后，徐树铮不与主管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协商，也不经国务会议，就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咨复众议院，极力为胡辩护，将提案驳回。孙以此事关系责任权限甚大，向段祺瑞据理力争，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同时还致信众议院，撤销其辞退议员书，表示仍愿就议席，搞得段、徐非常狼狈[44]。嗣经黎元洪、段祺瑞极力挽留，孙始打消辞意。段当即命徐将原咨文追回。徐答应照办，继又捏称该咨文已由众议院秘书厅印送各议员，无法追回。孙洪伊即用电话询知众议院并无此事，方知徐是故意撒谎，于是又起冲突[45]。

此后，段祺瑞、徐树铮对不受他们羁束的孙洪伊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9月初，孙为整顿内务部，裁减部员，被裁汰者祝书元等在徐树铮煽动下，向平政院起诉，控告孙违法。20日，平政院裁

定："撤消内务部原令，准被解职人员仍回内务部供原职。"[46] 孙拒不接受此项裁决。于是，徐批就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书的命令，送府盖印，但孙拒绝副署，黎元洪也不予盖印，批复"交院再议"。黎并从孙所请，将此案批交国会审议。事情拖到10月，段再也不能忍耐，于19日呈请罢免孙，但遭黎拒绝。

这次政潮，还波及到国会。早在9月24日，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便刊文攻击孙洪伊"违法"。10月23日，研究系首领汤化龙又以"老友"身份进总统府，以所谓"舆论"向黎元洪施加压力[47]。在段祺瑞和研究系的威胁之下，黎开始动摇，劝孙"自请辞职"，或"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或"转任其他特任官"[48]。但是，孙毅然表示"自信无过"，宁受免官处分，决不自请辞职。

商榷系的韬园系和丙辰俱乐部两团体坚决支持孙洪伊与段祺瑞抗衡。24日，直隶议员王玉树就国务总理径自呈请罢免国务员是否合法问题，在众院向段提出质问。11月上旬，吕复又提出查办徐树铮案，列举徐七大罪状，联署者六十余人[49]。

孙洪伊既不肯辞职，段祺瑞便以自己辞职相威胁。黎元洪只好采纳左右意见，请徐世昌出来组阁。袁世凯死后，徐世昌长期居于河南辉县水竹村，名为"退耕"，实为观望。10月下旬，黎的代表到辉县请徐出来组阁，徐托故拒绝。11月初，黎又派代表去请，徐表示："倘允不入政界……一俟感冒就痊，即当就道。"黎只好答应徐仅负调停之责[50]。其实，徐并非不想出山。赴京之前，他曾致电冯国璋，商讨调解政局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试探，但冯未置可否。冯对混乱的政局有自己打算，他在黎与段、研究系与国民党的对立中，采取第三者的姿态。9、10月间，梁启超到南京活动，极力劝冯与段合作，支持研究系，冯未作积极响应。在此前后，段曾数次派人到南京争取冯的支持，冯也采取敷衍态度。

11月16日，徐世昌抵京。次日，黎元洪便亲自到东四五条胡同徐

宅拜访。嗣后，徐向段祺瑞建议，将徐树铮改任陆军总长，孙洪伊改任农商总长。但是段不以为然，他认为孙“不择手段，破坏北洋团体”，必须逐出内阁。19日，徐又向黎、段建议，将孙和徐同时去职，由张国淦任国务院秘书长。段勉强同意。20日，孙被解职。两天以后，徐也在段授意下辞职。研究系对孙洪伊被逐出内阁，感到很快意。22日，梁启超从广州致电徐世昌说：“维持内阁，实今日不二法门，公大力主持，大局当可立定。”(51)

孙洪伊被免职后，回到国会，利用国民党在国会的优势，继续抵制段祺瑞。国会接连否决段提名任命任可澄、张国淦为内务总长的提案。孙并进一步策划利用国会推倒段内阁。12月2日，韬园系首领、直隶议员温世霖在众院提出弹劾段祺瑞的提案。孙洪伊在国会的活动，威胁到段内阁的存在，段决以武力相待。1917年1月13日，步兵统领江朝宗派兵包围孙宅，进行搜查，准备逮捕孙洪伊。孙事先得人通报，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国璋。

逼走孙洪伊后，段祺瑞仍不满足，又挑唆督军团要求总统黎元洪罢免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2月25日，黎被迫批准丁辞职，由夏寿康继任。

府院政潮虽因孙洪伊、徐树铮和丁世峄相继去职而暂告一段落，但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关系并未改善，而是处于暂时僵持状态。不久，双方又因对德外交问题发生新的斗争。

四　对德绝交及其国际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在华势力迅速加强。大战爆发不久，日本就以参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省，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权益。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贸易来看，自1914年起，英、法、俄、德等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其中德国的对华输出完全停

止），只有日本和美国对华输出猛增。美国因参加世界战争最迟（1917年4月对德宣战），保存了实力，还有力量与日本抗衡和争夺。当时美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呼吁本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52]。

1917年初，美国准备对德宣战，并企图借机加强它在中国的影响。2月1日，美国政府在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命令芮恩施设法运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53]。芮恩施奉命积极开展活动，连日拜访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等，鼓励他们与美国联合，对德国采取行动。此外，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和《远东时报》编辑唐纳德等对北京政府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也被芮恩施动员起来，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芮恩施等人的活动下，2月9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日本政府获悉美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动向后，迅速改变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2月上旬，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奉北京政府命令，就中国向德国潜水艇袭击公海商船提出抗议一事，征询日本政府意见。9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召见章，表示中国“仅提抗议，于中国地位似非得计，不如即行宣布断绝国交，并不必俟抗议回答；至此次抗议，深惜事前未与接洽，现两国力谋祛除隔阂，深冀中国政府熟考”[54]。两天以后，本野再次接见章，表示希望中国与德国断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55]。13日，本野又派寺内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再次赴华。西原赴华的主要使命是以同意中国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和提供参战军费为饵，诱使北京政府立即向德国宣战。为保证西原完成使命，外务省并将对支持中国参战尚抱怀疑态度的驻华公使林权助调回东京述职[56]。日本报纸对本国政府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转变作了如下剖析：“日本人士对中国放弃中立，向持异说，即赞成与反对二派是也。反对者谓，中国参战，将于和平会议取一席地，而获与日本对等

之投票权，则会议处分青岛等问题时，日本将不利云。斯说也，杞忧而已。良以和平会议关于各国势力消长滋大，发言与投票权视国之强弱而为轻重。故中国虽获投票权，亦不足与日本抗也。即使投票以多数取决，实际上尤有借于外交术，否则仍不能贯彻主张也。”[57] 这个分析是很透彻的。

事实上日本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它一面积极鼓动中国参战，一面与英、法、俄等国进行幕后交易。中国参战是协约国所企望的，日本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与英法等国达成协议：“保证将来在讲和会议中，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岛屿之领土权利。”[58] 当美国与日本在中国对德问题上产生冲突，阻挠中国参战时，英国和法国，特别是英国坚决支持日本，抵制美国，怂恿北京政府参战[59]。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向德国提出抗议后，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分歧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蓝辛指示芮恩施立即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世界战争[60]。不久，他又进一步要芮恩施向中国政府表示，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协商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61]。

美国政府改变支持中国参战的立场，得到总统黎元洪的支持和响应。黎本来就担心段祺瑞在参战的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2月初，芮恩施拜会黎元洪时，黎已表露出这种顾虑[62]。

段祺瑞为解决扩充军队等问题的财源，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实行对德绝交，继之以宣战。2月14日，国务院及外交部合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说：中国方面已决定，一旦发生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船只事件，中国即不俟德国回答，对德绝交，并表示绝交后“需费甚巨”，希望联合国（指协约国）准许中国“酌加关税及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期”[63]。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对章宗祥表示，日本对加税及缓解赔款两事赞成[64]。此时，西原也抵达北京，就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条件问题与曹汝霖、汪大燮、陆徵祥等进行磋商，并会见

了段祺瑞和特意赶到北京来“研究”对德外交问题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65]。同时，章宗祥也连日在东京与本野谈判中国参战的条件。3月初，段祺瑞等炮制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66]。3日，国务会议通过向国会提出的对德绝交咨文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交国会通过，并将《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发给章宗祥，与日本政府协商。但是，黎以事关重大，还需慎重为辞，拒绝盖印。段愤怒离去，当晚即宣布辞职并离京赴津。这样就使表面上一度缓和的府院斗争骤然激化。

段祺瑞出走天津后，黎元洪本想借机改组内阁。5日，他请徐世昌、王士珍和赶到北京来磋商外交问题的副总统冯国璋一起到总统府议事。黎元洪请徐世昌和王士珍分别出任总理和陆军总长，但徐、王二人连连作揖，敬谢不敏。冯国璋则自请赴津劝段祺瑞复职。6日，北洋系各省当局又相继打来电报，挽留段“力任艰难”。黎元洪害怕激出事变，只得请冯国璋赴津劝段复职。冯临行前与黎商订了段复职的条件：一、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加以反对；二、内阁拟定的命令，总统不得拒绝盖印；三、内阁训示各驻外使节、督军、省长，总统不得干预[67]。段祺瑞见黎元洪已暂时屈服，当晚返京。次日，段密电各省及驻外公使，声称内阁对德外交方针已获总统赞同，各省“切勿再生异议”[68]。

当时，对德外交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主题。孙中山自开始即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立场。2月，他口授要点，由朱执信执笔，撰成《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以朱执信名义发行。此书的要点是，中国为救亡图存，不应参战；加入协约国的条件可自外交斗争取得，而不必参战；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应当友好亲善。孙中山的主张在国会得到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的坚决支持。

研究系在对德参战问题上完全追随段祺瑞，主张绝对“加入”[69]。两年前曾预言德国必胜的梁启超这时也变为积极的对德宣战论者。梁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固然是看到德国失败的迹象已逐渐显露，更

主要的是，他想借外交问题达到压迫反对派的目的。3月7日，他在给段祺瑞的信中说，对德国“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部分活动余地”[70]。

商榷系各派虽多持反对参战态度，但各派反对段内阁对德方针的程度又有所不同。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不仅反对向德国宣战，而且反对对德绝交，益友社和政学会则主张对德问题可做到绝交为止。由于益友社和政学会投了赞成票，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参战问题成为府院和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强烈的反对参战的舆论。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71]。14日，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向德宣战，广州、武汉商会继起响应[72]。当段祺瑞邀梁启超同到总统府逼迫黎元洪表态赞同参战时，黎便以社会舆论不赞成反驳他们[73]。使段祺瑞感到棘手的，不仅仅有孙中山和国民党议员以及其他名流[74]掀起的反对参战的强大舆论，而且北洋各省的督军也多不理解段祺瑞参战的用心，对这一问题态度消极。由于有上述障碍，所以尽管日本一再逼迫中国迅速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段祺瑞一时却无法实现参战的意图。他还需要说服各省的北洋督军。

五　参战问题引起的风波

段祺瑞要达到对德宣战的目的，首先需要得到北洋督军们的支持，然后再利用他们压制黎元洪和国民党议员。

段祺瑞知道，各省督军反对参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领兵远征欧洲。要使他们积极支持参战，必须解除他们不愿打仗的顾虑。于是，段假借“军事会议”名义，把各省督军召集到北京，解释自己参战的真正用心。

4月中旬，倪嗣冲首先应召赴京。动身前他还公开表示反对参战。但是，抵京后段祺瑞向他说明，所谓对德宣战乃是“宣而不战”，不需各省出兵，可以不必顾虑。于是，他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反对参战的健将变成力主参战的先锋。他私下向人透露：“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对加入；即各省督军，除非北洋系外，其余十七省，我敢断言，其与我同一意见。及到京后，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变计，知业经抗议绝交，则第三步文章，决无可以中止之理。”[75]

在段祺瑞的督促和倪嗣冲的撺掇下，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河南督军赵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和绥远都统蒋雁行先后抵京。其余江苏、黑龙江、奉天、浙江、湖南、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督军，也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25日，段祺瑞亲自主持首次会议，参谋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程璧光、训练总监张绍曾等也被拉来列席。首次会议即就内阁对德外交方针进行表决。结果，出席会议二十五人，赞成者十七人，依从多数者七人，段的外交方针在北洋督军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76]。

但是，在北洋督军中，冯国璋的态度始终不明朗。2月，段即曾派专人向冯解释对德问题的“曲折与利害”[77]。23日，冯入京与段会谈，态度有所转变。3月中旬，冯返回南京，于21日密电北洋各省，说：“抵京后，犹冀事势可以挽回，自量国力，勿为多事。乃观察各方情况，知内部绝未一致，而外交紧迫，已难自持。东海相国，合肥总理老谋深算，则欲趁此机会，力图富强。总理决心，加以外交趋势，绝德之举，非成事实不可，于是璋亦未敢胶执成见。”[78]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冯国璋同意对德绝交的态度很勉强，内心并不赞同段祺瑞立即对德绝交并进而宣战的方针。3月15日，冯私下密示江苏省官员，对德问题“以断绝国交为限”[79]。4月16日，冯又故意将“英法失利……宣战更宜持重”等内容的外交探报转给正在北京的各督军[80]。

4月末，军事会议结束后，倪嗣冲等北洋督军即开始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向德国宣战。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倪嗣冲、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等闯入会场，倪以所谓军界首脑名义表示，各省督军一致支持总理段祺瑞的对德方针，政府应当立即对德宣战，张怀芝等随声附和[81]。在督军团的胁迫下，内阁匆匆通过对德宣战案。段随即率领当日出席会议的阁员到总统府面请黎元洪核准[82]。是日，日本公使林权助也登门“拜访”黎元洪，警告黎说，如国会否决参战案，政局将发生纷扰[83]。3日，倪嗣冲又率督军团到总统府，向黎陈述参战意见。在督军团、段祺瑞和日本公使的压力下，黎元洪被迫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辩论。这样，参战问题又转移到国会。

在国会中，反对向德宣战的力量占了优势。益友社和政学会对向德宣战问题的态度与绝交问题态度不同。益友社早就公开表示，反对对德宣战。段祺瑞把很大的希望寄托于政学会，但该会经过几次讨论，最后举行内部投票，结果还是否决了宣战案[84]。在这种情况下，段不敢贸然将对德宣战案交国会表决。3日，国务院在外交部迎宾馆宴请参众两院议员，段到会演说，略谓世界各国皆反对德国，协约国希望中国参战，要求国会合作[85]。4日，督军团又假迎宾馆宴请议员，为段疏通宣战案。李厚基代表各督军演说，声称：要不惜一时的名誉，实行对德宣战，“乃至受人指骂，固所当然”[86]。这时，督军团已经凶相毕露了。8日，众议院讨论宣战案。段祺瑞亲自到场督促投票表决，但结果众院会议仍议决提交全院委员会审查。皖系军人料知全院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不会对他们有利，便决心撕下面具，使用强硬手段，伙同督军团制造了公民团事件。

10日下午，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当日上午，议会门前忽然聚起数千人，手持“五族公民请愿团”、“学界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各种旗帜，沿街散发传单，要求国会即日通过对德宣战。国民党系议员田桐、邹鲁、龚

政、吴宗慈、郭同等人因不愿接受传单，遭到殴打[87]。中午，“公民团”包围了国会。自称“公民代表”的张尧卿、赵鹏图、白亮等人闯进议场宣布：“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88]。军警闻讯赶来“维持秩序”，但并不驱散胡作非为的“公民团”，只是不准许议员外出。下午2时半，参加全院委员会的议员一致决定，暂不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即将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议员大会，请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到会，质问北京秩序和议员安全问题。下午5时，内务总长范源濂到会，但他指挥不动军警，只好等段祺瑞和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来。傍晚，段、吴先后到场。段走出汽车时，请愿“群众”居然摇旗鼓掌，表示欢迎。段向议员们表示，对“公民”请愿，“事先一切不知”，并命令吴到外面解散“请愿群众”。吴到议场外温言劝导了一番，根本无效。一直到晚9时，一些“公民”向议院院内投掷砖瓦，打伤了日本记者，段恐引起交涉，才派出马队将“公民团”驱散。

10日“公民团”围攻议会事件，是皖系军人策划的。当8日众议院决定召集全院委员会表决参战案时，在京各督军便议定，如果全院委员会不通过此案，“决当积极进行解散国会，无论如何障碍，必其达到解散目的”[89]。傅良佐、靳云鹏和王揖唐，组织收买大批游民，准备在10日国会开会时进行捣乱[90]。所谓的公民代表，也大都是国务院和陆军部的官员，国务院参议陈绍唐则直接参与了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的活动[91]。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孙中山与谷钟秀等立即联合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严惩肇事者。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学界、商界和南方各省的督军及省议会，随即纷纷通电响应。北洋派中未到北京的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也通电附和[92]。为抗议皖系军人一手制造的“公民团”事件，国民党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相继宣布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也潜离北京。11日，段祺瑞在府学胡同宅邸召集亲信开会，商讨对策。张国淦建议段辞职，改组内阁，由国民党二人、研究

系二人、北洋系二人联合组织“国防内阁”，收拾局面[93]。段本人最初有些意动，但徐树铮、傅良佐、靳云鹏等极力反对。在徐、傅等人怂恿下，段决心干到底，15日、16日又先后两次咨请国会从速议决对德宣战案。仍在北京的北洋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关系，分别设宴招待议员，继续为段疏通。15日，督军团又设宴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仍由李厚基代表各督军致词。他说：“公民团”事件完全是“无意识”的举动，希望议员不要介意，以大局为重，维持内阁，实现对德宣战[94]。但是，“公民团”事件造成的影响，不是李厚基几句花言巧语所能挽回的。商榷系各派在“公民团”事件后，一致采取抵制内阁的立场。19日，众议院复议对德宣战案时，议员褚辅成提出内阁阁员多数辞职，内阁实已无法负责，建议暂缓讨论对德参战案，先行改组内阁[95]。褚的动议，得到商榷系各派赞同，经投票表决，二百二十九票赞成，一百二十五票反对，五十票弃权。将近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改组内阁，实际上已构成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

段祺瑞利用“公民团”胁迫国会未能得手，便决心解散国会。21日，督军团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最后步骤，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研究系的骨干分子籍忠寅等参与了督军团的策划。当天，在京的北洋督军和督军代表由孟恩远领衔，具呈黎元洪，借口宪法会议通过的宪法条文，将导致所谓议会专制，陷内阁于“颠危之地”，要求“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96]。先一天，即20日，张勋致电督军团支持解散国会，声称当“为诸公后盾”[97]。

黎元洪无力应付督军团，只好求助于美国公使芮恩施。是日，芮恩施到总统府与黎进行长时间密谈，表示“允为后盾”[98]。21日，黎召见督军团领衔呈请解散国会的孟恩远、王占元二人，训诫他们切勿超越宪法行事，对宪法草案有不同意见可商诸国会；并指出，时局的症结在内阁，段祺瑞“理宜引退”[99]。孟、王退出后将黎的态度转达在京诸督军。督军团密议对策之后，当晚，倪嗣冲、王占元、李厚基等直奔徐州，其他人各回任所。

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等同时，派钱能训到天津敦请徐世昌进京接替段祺瑞。段得到消息，也委派张国淦为代表赴津，请徐世昌“接代”。结果，徐不仅拒绝出任总理，并表示无意出面调停。21日，段祺瑞又亲自登门拜访王士珍，请其“代理”，王吓得连连作揖，推辞不迭[100]。段请徐、王代理不过是装样子，实际上他根本不想下台。徐世昌、王士珍既不肯接受总理职务，黎元洪即准备以伍廷芳暂时代理内阁总理。20日，黎批准程璧光、谷钟秀、张耀曾辞职，却留下伍廷芳的辞呈未发。段祺瑞深恐黎元洪采取行动，22日，他向黎提出补充阁员人选，其中大多是黎平素有好感的人：内务总长夏寿康，司法总长饶汉祥，海军总长汤芗铭，财政总长孙宝琦，农商总长庄蕴宽，交通总长汪大燮[101]。

22日，当张国淦把补充阁员的名单交给黎元洪阅后，黎罢免段祺瑞的决心有些动摇。但是，左右亲信提醒他不要中了段祺瑞的缓兵之计。23日，黎元洪发布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委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委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102]。同时，黎还通电各省，阐明“迫不得已”罢免段祺瑞的原因，希望段仍“内外一心，共图国是”。免段令交付印铸局印行之前，张国淦匆匆赶到总统府，劝黎元洪再加考虑。黎表示外交、军事都已有布置，未为所动[103]。

段祺瑞接到免职令，当日仍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104]。嗣后，段即赴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

第二节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同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一样，

是有它的历史原因和阶级、社会基础的。所不同的，一是要建立新的袁家王朝，一是要恢复爱新觉罗氏的清王朝。

如前所述，自民国建立后，张勋一直没有停止复辟清王朝的阴谋活动，并且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赞成复辟的前清遗老和部分督军，形成为一个复辟集团。1913年和1916年，以张为首的复辟集团两次策动复辟叛乱，均未得逞。袁世凯帝制失败，张勋从反面总结了它的“教训”。他认为恢复帝制是应该的，但不应建立袁家王朝，而应该复辟清王朝。袁世凯曾受恩前朝，而自己却来做皇帝，未免“辜负皇恩”，有失忠义，其失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因此，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张勋的复辟阴谋活动，不仅未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起来。

一　北洋八省“独立”和国会解散

1917年春，府院关系因对德问题再度恶化后，段祺瑞和黎元洪争相拉拢拥兵徐州的张勋，以为奥援。4月中旬，段策划召集各省督军“军事会议”时，就企图把张勋引进北京，借张之手压制国会，推倒黎元洪。为了诱张进京，段不惜以日后实行复辟为钓饵。当时，倪嗣冲对在京代表张勋与各方联络的阮忠枢说，此次会议由他发起，“东海（徐世昌）、芝泉（段祺瑞）均极端赞成，曾电约大树（指冯国璋）。大树不来，我辈亦不强其必至，正可推定武（指张勋）作一领袖，执坛坫之牛耳”。他还声称，一定要改组内阁，“如黄陂（黎元洪）不以为然，即可借此推倒黄陂，倒黎排冯，即可拥戴东海。此系千载难逢之机会，断断不可错过。……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指溥仪），其势由顺而易。凡此种种，从现在地位、声望、魄力而论，均非待定武前来解决不可”[(105)]。

在段祺瑞积极拉拢张勋的同时，黎元洪也竭力争取张勋的支持。张勋在对待国民党人和国会、内阁等问题上虽与段态度一致，但在“参战”问题上却由于复辟派与德国的关系[(106)]，与段大相径庭。

黎元洪就企图利用段、张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把张拉到自己一边。在段召集军事会议前夕，黎即通过阮忠枢、金永等向张勋示意。4月19日，阮函告张，黎对于此次军事会议，“深恐各省督军受芝泉之运动，赞成与德宣战，而亟盼我公来京，反对此举。因令郛郑（唐浩镇，总统府秘书，黎元洪的亲家）往告小松（张寿令），意欲使小松赴徐劝驾。小松则推荐道坚（金永），电约道坚到京，由郛郑介绍私谒黄陂”[107]。不久，金永应邀至京，唐浩镇代黎接见。唐向金表示，黎“实处孤危之地”[108]，希望张“维持大局”，并说，张如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应反对向德宣战，“主张大计”。金表示张不拟进京，唐又请张“发一直截电文”反对参战[109]。5月，黎元洪又派亲信哈汉章等南下，游说张勋。

阮忠枢与另一在京、津为清朝复辟集团与各方联络的重要人物张镇芳，完全了解段祺瑞、黎元洪争相拉拢张勋的用心。他们一面与双方周旋，一面秘密写信给张勋，力劝张暂不进京。阮忠枢指出：段祺瑞欲借张勋之名，分散西南各省和国民党人的攻击，“保全”自己；黎元洪则欲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双方“概置大局于不顾，各挟私意以私争”。张如到京，必将为难，“何如置身局外，作壁上观”[110]。张接信后，依计而行，拒绝段、黎双方的邀请，蜷伏在徐州作复辟的准备。4月19日，张勋密派心腹商衍瀛到天津活动。商到津后，与复辟分子张镇芳、雷震春详细商讨了发动复辟后如何控制北京的计划。20日，商衍瀛函告张勋，“大约西苑、南苑、通州、廊坊、北京游徼队、警厅等处，皆可呼应。”[111]

张勋一面在京津布置力量，一面争取北洋各省的支持。5月，他多次写信与冯国璋商讨时局。19日，在北京开会的北洋督军们联名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得讯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赞成。他在电报中表功说，他于国会“去岁召集之初，固已早持另组之说”，并声称：“今者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而有解散之请，词严义正，一秉大公……勋虽无似，敢不力持正义以盾诸公之后。”[112]

如前所述，督军团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呈文被黎拒绝。嗣后，倪嗣冲等便纷纷南下徐州。21日至22日，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曾毓隽，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与奉天等省的督军代表十余人先后抵徐。

5月23日，张勋与抵徐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举行所谓第四次徐州会议。徐树铮、倪嗣冲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鼓动张勋领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是日，黎元洪发表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倪嗣冲闻讯后立即在会上借题发作，顿足大骂，声称要“首先发难，请诸君随后继起”。张怀芝也随声附和，并提议与会各省份由京奉、津浦、京汉三路进攻北京。张勋则乘势提出，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113]。徐树铮为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当场表示，段祺瑞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但只要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其他—切在所不计[114]。倪嗣冲、张怀芝等也表示支持。张勋、万绳栻见徐树铮和各省督军都赞同复辟，非常高兴，当场要与会者签名为信。

24日，张勋致电黎元洪，声称：“民国定制，适用责任内阁制度，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经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历办有案。秘书厅掌司机要，类于幕职，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旷例，当然不能认为有效。旋接段总理以前项命令未经副署不能负责为言，其违法更无待言，群情益复愤激，以为共和国家首重法制，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今中央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115] 这个电报，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斥责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为非法，挑唆北洋各省“自由行动”；另一方面又说此违法令为秘书厅逾权“擅发”，要黎元洪“持平”，以免“激生他变”，为充当“调人”埋下伏笔。

研究系议员也对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坚决抵制。5月31日，汤化龙辞去众议院议长。嗣后研究系议员也纷纷辞职南下[116]。

在北洋各省督军和研究系政客的抵制下，黎元洪一筹莫展。开始，黎竭力拉拢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和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但徐坚决不肯应召。24日，黎派吴笈荪、饶汉祥赴津，促徐出山，徐以“杜门谢客，不能入京”为辞，拒不见面。受到直系军阀拥戴的王士珍与徐世昌的态度略有不同，对黎元洪的处境表示同情，但他为人一向谨慎小心，不肯冒风险。25日下午，黎亲自到堂子胡同王的私宅劝驾，王称与段交谊甚笃，不能取而代之，婉言谢绝。经黎再三恳求，王最后答应出任陆军总长。在这种情势下，总理职位便落到李经羲身上[117]。李经羲，字仲仙，一作仲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之侄，清末曾任云贵总督，辛亥革命时被蔡锷礼送出境。1913年为政治会议议长，次年改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把他摆到“嵩山四友”之列，以示优待。黎之所以任李为总理是因李一向注意与淮军将领拉拢，与张勋有些瓜葛。

5月25日，黎元洪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批准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27日，黎又发出通电，诉说组阁之难。电报说：“初议东海（徐世昌）出山，未获允诺，遂坚请聘卿（王士珍）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瘏口哓音，再三敦劝。聘卿终荐先生（李经羲），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机危迫，不得不曲徇其请。”[118] 是日，众议院破例开会，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提案。次日，参院也通过此案。李经羲这个老官僚能为国会通过，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议员投了赞成票。黎元洪和国民党议员希望李经羲能在影响张勋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李经羲还未就职，倪嗣冲即在蚌埠宣布安徽“独立”。通电声称：“群小揽权，扰乱政局。……政府几乎一空，宪法又系议院专制，自今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119] 旋下动员令，并截留津浦路车辆，运兵北上。在此前一日，奉天督军张作霖已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及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120]。继皖、奉之后，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山东督军张怀芝，陕西督军陈树藩，直隶督军曹锟，黑龙江督军毕桂芳

等也先后宣布“独立”。

皖、奉等八省的“独立”，是段祺瑞和徐树铮一手策划的。段“下野”回津后，皖系军人和研究系、交通系政客，每日聚在段府，密谋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121]。皖、奉宣布“独立”后，徐树铮立即密电倪嗣冲说；皖、奉均已“独立”，天津“须有主持之人，方能与中外官长交接办事”。“前在徐议，有朝彦（雷震春）总司令名目，似宜早日商明各省，通电揭晓，俾便进行。”[122]于是，6月2日，“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推雷震春为总参谋长，并宣布要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123]。

美国对北洋各省在段祺瑞煽动下脱离北京政府很不满，并曾予以干涉。6月4日，美国务卿令公使芮恩施持照会告北京政府外交部，内称：“中国对德开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美国尤为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124]，并特别指示芮恩施将上述内容通知“反对总统的军人派领袖”[125]。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日、英、法等国提议，以上述内容向中国提出联合劝告，以稳定总统黎元洪的地位。美国此举立即遭到日本的有力反击。日本外务省明确照会美国政府：“日本坚持其早已声明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故日本政府坦率相告，没有理由参加美国政府提议的对华一致劝告。”[126]由于英国明确支持日本，美国企图制止北洋各省叛乱的企图失败了。

对北洋各省督军在段祺瑞煽动下纷纷独立，冯国璋也不以为然。6月1日，他致电各省，力主“调停”[127]。但是，段祺瑞和“独立”各省对冯根本不予理睬。

北洋各省的“独立”，使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露面。黎元洪再三派人催请，他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在此之前，张镇芳等已多次向黎“献策”，请张勋率军进京“保护”。黎别无他路，只好采纳他们的建议。5月31日，黎元洪向张勋发出邀请

电。电报说："倘承移驾津门，与仲轩总理慎密筹商，并即联袂来京，立图解决，执事之功，民国之福。"[128] 次日，黎又发布请张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命令。有人曾提醒黎元洪，张勋进京"恐加入复辟文章"，不要上当[129]。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容黎有其他选择。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步炮兵十营四千三百余人由徐州登车北上[130]。行前他还致电北洋各省，望"坚持原旨，一致进行"[131]。

8日，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但张本人却在天津停留下来。他在津停留有两个目的：一、等待黎元洪解散国会；二、征求徐世昌、段祺瑞和各列强对复辟的意见。是日晚，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奉黎元洪之命，到天津迎接张勋进京。张当即提出"调停"的六项条件：一、实行责任内阁；二、解散国会；三、解散省议会；四、改定宪法；五、惩办群小（指总统府军事幕僚处处长哈汉章及金永炎等人）；六、特赦政治犯[132]。黎元洪不敢怠慢，当天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幕僚处[133]。但张的主要条件是解散国会。在张的武力威胁和冯国璋"两害取轻"的劝诱下，黎终于答应立即解散国会[134]。次日，他拟好解散国会令，交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发表，但遭到伍的坚决拒绝。

10日，张勋气势汹汹地威吓伍廷芳："兵临近畿，旦夕即可横决，设以一人之梗议，致大局之全隳，责有专归，悔将何及？"[135] 但伍廷芳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非得全国一致赞同，不能"遽然从事"[136]。黎元洪、冯国璋等见伍廷芳不肯向张勋妥协，敦促李经羲"即日进京就职"，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而李也躲闪不前。黎元洪怕激变张勋，只得于12日下令免去伍廷芳的代总理，改任步兵统领江朝宗暂代。次日，由江朝宗副署，发布解散国会令[137]。同时，黎元洪又发通电，表明为保留民国名号，下令解散国会的苦心所在。通电说："皖奉发难，海内骚然。……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

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为保存共和政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138] 是日，张勋也通电全国说：大总统已颁明令解散国会，“拟即复命入都，共筹国是”[139]。次日（14日），张勋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及刘廷琛、胡嗣瑗等乘车进京。

二　张勋集团与皖系军阀的角逐

张勋复辟集团与皖系军阀虽都主张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但两派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前者要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后者要拥戴段祺瑞重新组阁，继续皖系军阀的统治。当事态进一步发展时，两派的矛盾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张勋设下“调解”的圈套，诱黎邀请他进京时，段祺瑞和徐世昌也另外布置了一套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的计划。如前所述，6月2日在津成立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是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在幕后策划组织的。按照段祺瑞和徐世昌的计划，各省“总参谋处”仅是他们另组政府的第一步。当时，他们已与皖、奉、鲁各省暗中议定：一、废除约法；二、迫使黎元洪退位；三、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6月3日，曹汝霖入京将此计划报告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140]。日本内阁对此计划立即表示理解和支持。次日，日外务大臣本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深信徐世昌出山即能“收大局重谋建树”，并进一步指出：应“先事消灭”北京现政府，再谋建立新政府[141]。8日，日本首相寺内的心腹西原龟三化名山田宪三秘密抵达天津，筹划“促使徐（世昌）、段（祺瑞）出山”[142]。

然而，当徐、段等人将另组政府计划电告当时尚在徐州的张勋时，遭到张的强烈反对。张坚决主张乘机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并警

告段、徐等人“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别立名目”[143]。日本政府得知张勋态度以后，大不以为然，即通知章宗祥：“复辟万非所宜，日当局深信徐能主持大局。对于前电宣言，均甚首肯。若徐不能统率，分裂可虞。……务请俟张（勋）到津后，详细劝阻”；“并望告以万勿为无责任之日人所惑”[144]。这里所说的“无责任之日人”，是指当时在中国活动的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5月，田中在徐州与张勋会见时，对复辟问题“语多游移”，张遂以为日本亦赞成复辟。日本内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电令田中派员向张勋声明，日本不同意复辟清室[145]。

日本当局自1916年10月寺内上台，便改变了原大隈内阁纵容“宗社党”复辟清室的方针，全力扶植段祺瑞。徐世昌之所以不支持张勋复辟清室，是由于已清楚日本的意图。民国成立后，徐世昌一直与张勋为首的复辟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人们都认为他是清朝遗老的领袖。1916年袁世凯死后，徐确实有过乘机推翻民国、拥清室复辟的打算。但他富有政治阅历，深知没有列强特别是邻国日本的支持，难于成功。因此在1917年初，他派心腹陆宗舆以接收交通银行借款名义东渡，试探日本当局对复辟的态度。当时，外务大臣本野明确表示：清室复辟，“时机”不到，“以十余龄之幼主，又有种族问题”，“致乱有余，为治不足”[146]。徐摸清日本意图以后，遂打消了拥清室复辟的计划。3月26日，日本陆军大臣大岛也曾训令日军驻青岛司令大谷转告清室复辟集团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升允：清室复辟“目下尚非其时”[147]。6月8日，张勋抵津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又电令驻京公使林权助以“适当方法”向张直接表明不支持复辟的态度[148]。

在日本政府的干涉和徐世昌等的劝阻下，张勋复辟的决心也一度有些动摇。当时，他打算先把李经羲内阁扶植起来，作为控制中央政权的工具，至于复辟，观望一个时期再说[149]。13日，张勋通电独立各省“撤回军队，效顺输诚”[150]。次日，又通电宣称国会“既经解决，则组阁断难延缓”，吁请各省支持李经羲组阁[151]。

日本政府和段祺瑞对李经羲组阁都持反对态度。6月11日，日本首相对中国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俟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和，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仍非根本解决之道。”[152] 寺内的话清楚地表明，日本是反对李经羲出组内阁的。于是，在日本当局和段祺瑞、徐世昌的操纵下，北洋各省纷纷通电反对李经羲内阁。14日、15日，张怀芝、倪嗣冲、赵倜，张作霖相继通电反对李经羲组阁，并称能收拾大局者，只有段祺瑞。与此同时，曹锟致电张勋，声称现时“势必军人内阁，乃能统一兵权，大振国威”，主张由王士珍出组内阁[153]。嗣后，浙江、山西、山东等省督军相继通电响应，推戴王士珍组阁。

张勋面对这种局面，虽然内心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吁请冯国璋体谅“调停之苦衷”，出面为李经羲捧场，并向北洋各省疏通[154]。冯国璋虽对张勋妄自尊大早有不满，并看到北京政局尚在混乱中，李经羲即使上台，也一定会短命，但为保持对北京和各省的影响，于16日、17日致电各省，为李内阁疏通[155]。这时，段祺瑞已另有打算。研究系熊希龄等向段祺瑞献策，利用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然后再以讨伐复辟为名，重掌北京政权。因此，段于22日撤销了天津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156]。“独立”的各省也相继宣布“归附中央”。同日，李经羲宣布就职，声言“断以三月为限”[157]。

对李经羲内阁，日本的态度仍然是，力促北洋督军拥立徐世昌、段祺瑞，迫使李内阁流产[158]。在徐世昌、段祺瑞的授意下，各省督军以李经羲内阁阁员李盛铎、龙建章、江庸等“不孚众望”为辞，仍取不合作态度[159]。有的督军仍推王士珍组阁。

对李经羲内阁，复辟集团内部也有人拆台。张勋在日本劝阻下，复辟的决心动摇。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他周围的遗老们焦虑不安。遗老的首领刘廷琛斥责张勋“欺君卖友”，与张闹翻。升允、王宝田等复辟骨干分子见势不妙，先后离去[160]，还有的躲闪不前。为了挽回复辟“事业”，万绳栻与遗老们终日策划，“搜索枯肠”[161]。据陈

曾寿事后披露，万绳栻等经多次密谋，决定搞垮李内阁，使张勋无脸下台，逼其走复辟一途。于是，他们背着张密电各省，“令反对李经羲之内阁，利其纠纷不解，以为复辟之机。不数日，反对李内阁之电果纷纷出矣”[162]。

张勋维持李内阁不成，已无退路，遗老们乘机鼓噪。陈曾寿以天津诸遗老名义写信，催张行动。信中说：“今统一之局已经破裂，牵就调停万难息事，非申明大义，复子明辟，不足以镇服颠危。……内蒙独立，龙旗已树；东省联合进兵，势难中止；乱党勾合东南，行将蠢动；若复依违两可，必致进退失据。……称兵各省，已与乱党结不解之仇，非归命朝廷，依附义旗之下，无以自处。……是公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决矣。”张勋看了这一派胡言后，居然认为很有见地，为之“大动”[163]，于是决心不顾一切，发动复辟。

6月末，康有为在沈曾植鼓动下进京，为复辟推波助澜。早已由维新派领袖堕落为保皇党党魁的康有为，在民国建立以后更加反动。他与清朝遗老们沆瀣一气，诽谤共和，鼓吹君主制。遗老们多视康为异己，但又要利用其名声造复辟舆论，表面上对康备加推崇。沈曾植在沪得知张勋在日人和徐世昌劝阻下思想动摇，便一面写信要京津遗老切勿星散，一面急促康有为与他们一道北上参加复辟[164]。康一直对复辟抱莫大希望，张率兵进京后，他曾向人表示：张若能复辟清室，“一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165]。因此，他一经沈邀请，便欣然就道。

26日，康有为在沈曾植、王乃徵和弟子徐勤之子徐良三人陪同下，从上海登程北上。他眼见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非常得意，途经丰台望见西山时，特赋诗一首。诗中写道：“廿载流离逐客悲，国门生入岂能知。长驱津浦有今日，大索长安忆昔时。朝市累更哀浩劫，天人合应会佳期。西山王气瞻葱郁，风起云飞歌有思。”[166]复辟集团的遗老们原来以为，民国建立后，政局混乱不堪，只要他们起

来“立建龙旗，宣言复辟，使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忠义奋发，必将天旋地转，旦夕遂定”[167]。王公贵族，遗老遗少，部分看风转舵的封建军阀，再加上鼎鼎大名的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这些就是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未免太薄弱了。尽管中国社会还未从根本上改观，但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经过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和共和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对于皇帝这个偶像已经不再顶礼膜拜了。复辟违背人心，因而也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三　复辟丑剧和全国反复辟的斗争

6月28日，康有为一行抵京，下车后即被张勋迎至他的公馆。当晚，张勋、康有为与沈曾植、王乃徵、张镇芳、雷震春在张宅举行会议。康有为说，徐勤“自两广来归，悉南方诸帅，俱备响应”，督促张勋立即动手。会议当即决定了复辟计划[168]。

30日傍晚，张勋偕刘廷琛潜入皇宫，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举行“御前会议”，将复辟行动计划告知清室。会后，张勋装作没事一样前往江西会馆看戏。实际上，这时复辟的行动已经开始了。12时，张勋离开戏场，返回住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和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被辫兵“请”至。张勋当即宣称：此次入京，实为复辟而来，现已定于明晨举进，并厉声诘问王、江等人态度。王士珍壮着胆问了一句：“各省及外交有否接洽？”张勋说：“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不等众人回答，他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在张勋的恫吓下，王士珍、江朝宗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话。张勋遂命令吴长植等打开城门，放辫军尽入[169]。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瑗、陈曾寿、陈毅、商衍瀛、沈曾植、王乃徵和王士珍、江朝宗及几位辫军统领共五十余人，乘车进宫。这时已是7月1日凌晨。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

勋等。张率领诸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他嘟嘟囔囔地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又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十二岁的溥仪便连忙按照他师傅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170)

张勋下去以后，其余各人也开始给溥仪叩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然后又有太监拿来了事先就写好的一堆"上谕"。这一天，溥仪一气就下了八道"上谕"，内容分别为：

一、下诏即位。这道诏书说什么"权衡重轻，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即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

二、锡封黎元洪为一等公。这道伪谕诡称"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

三、设内阁议政大臣。这道伪谕宣布，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照常供职。

四、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

五、授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

六、授各部尚书：任命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

七、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八、授总督和各省巡抚。（总督只授三人，即直隶总督张勋，两江总督冯国璋，两广总督陆荣廷。各省督军一般改授该省巡抚，原直隶省长朱家宝授民政部尚书，巡抚一职授曹锟；安徽因张勋离职，巡抚授倪嗣冲；江苏因冯国璋已授两江总督，巡抚授原省长齐耀琳。）[171]

当天，张勋还通电各省，攻击辛亥革命是“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宣称中国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并命令各地立即改用宣统年号，悬挂黄龙旗[172]。7月1日早晨，北京街头警察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没有办法，有的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173]。

只有那些早就盼望着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和遗老遗少们非常活跃。他们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那些没朝服的人则急忙到估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则到戏装店定作用马尾制的假发辫。他们穿着袍服马褂，晃着大辫子（有些人是假的）招摇过市，“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在宫内，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四个太妃几乎天天都去神佛前烧香，乐得不知怎么是好[174]。

张勋及其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极为愤慨，当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随即发表讨逆宣言，指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175]并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还派员北上策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部接令后，即向天津方向移动[176]。当时，章太炎还提出迎黎元洪南下在沪组政府的建议。6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章太炎等人乘军舰南下，谋在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推动下，上海和南方许多城市相继掀起口诛笔伐、申讨张勋复辟的强大舆论。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布

《讨逆檄》，严正宣布张勋、康有为已成民国叛逆，“再有言调和者，国民当以国贼视之”。同日，《中华新报》也大声疾呼：“只有杀开一条血路，再无反顾之势。”上海其他各报，如《时报》、《民国大新闻报》、《新闻报》也都态度明朗。自7月3日起，各报每日都以大量版面刊登各界人士声讨张勋的通电，报道各地反对复辟的消息。支持复辟的报纸，只有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但不久也因排字工人拒绝排印而停刊。各界团体也闻风而起。7月2日，上海中华民国公民会、学生救亡会、平民求治社等团体都召开紧急会议，到会人员异常愤激，一致主张“组织义师，扫灭妖氛”[177]。同时，学生救亡会、中华民国公会、上海神州女界协济社、中华政法学会、中华共和保障会、基督教公民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公函，号召各界“投袂奋起，群策群力，共拯危亡”[178]。上海工商界也参加了反复辟的斗争。3日，沪北、沪南两商会邀集各业同人紧急会议，决定反对复辟，并致电冯国璋，要求“维持共和国体”[179]。商会还联合上海县教育会，在6日至8日“高揭共和国旗三天”，以示拥护共和，反对复辟[180]。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传反复辟别开生面，特创以五色旗为商标的“爱国牌”香烟，并将此烟捐献几十大箱，犒劳准备北上讨逆的军队。

两湖各界声讨复辟的舆论也非常激烈。长沙广益学校教师鲁赫喧听到张勋复辟，为号召讨逆，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个大字，以震视听[181]。3日下午，长沙市民万人集会，誓师拥护共和，反对复辟[182]。5日，华容商人李醉白谒见湖南督军谭延闿，表示愿意捐钱万串，帮助讨伐张勋[183]。次日，商轮公司同人决定，当湘军出师北伐时，该会同人每日从收入中提十分之二作为军饷[184]。在湖北，“武汉各界人士初闻复辟之说，皆不信”，及经证实后，“无论绅商士庶、贩夫走卒，皆表示一种反对态度。民情愤激，有过于袁氏称帝之时。……各政团党会莫不急祛私见，开联合会议，筹商救亡之策。各团体亦纷纷开会，文电纷飞，表示反对”[185]。

复辟消息传到两广后，各界发起组织“国民哭临大会”。“上至官长，下至舆夫，无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对”[186]。“哭临大会”后又改名为“国民护国后援会”，鼓吹武力讨伐张勋。

在复辟祸首张勋、刘廷琛和万绳栻等人的家乡江西，各界民众反对复辟的情绪也不稍逊于其他地方。南昌各报从复辟发生后，同声谴责张勋等，斥其为“祸胎”，给江西人民带来耻辱。在群众的谴责下，甚至刘廷琛和万绳栻的家属都不能在家乡安身[187]。

在北京城内外，辫子兵持刀禁谈“复辟之是非”，“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188]。复辟当日，李大钊愤然离京赴沪。3日，鲁迅（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复辟后一、二日内，《国民公报》、《真共和》、《东大陆》、《大中》、《大中华》、《启明》、《六更公报》等大小十一二种报纸先后停刊，“以避不随心之言论”[189]。市民对龙旗“无欢呼，无庆祝，衙门中人皆垂头丧气”，“辄见频摇其首”[190]。

旅外公民、学生及南洋华侨也对张勋复辟表现了极大的义愤。7月7日，工商界侨民一万五千人发表讨逆通电，建议“各省区各盟旗尽量地组织”“平民自立讨逆军”，“杀除叛国之群贼，扫清帝制之毒根”[191]。8日，留日的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召开讨逆大会，戴天仇（戴季陶）在演讲中说，前清“遗孽一日不除尽，中华民国国基一日不能巩固”。何香凝挥泪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男女青年一致奋起，“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192]。

人民群众的反复辟斗争，由于张勋的迅速垮台，历时很短，但这次斗争的广泛性、群众性却非常突出。它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古老中国新时代的潮流。

张勋复辟集团原以为，只要他们在北京干起来，至少北洋各省督

军们及陆荣廷会降心以从，然而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复辟发生后，各省军政长官，包括曾宣布独立的各省，响应者也寥寥无几。二十余省的军政大员，只有原直隶省长朱家宝在授任伪民政部尚书后，上折“谢恩”[193]；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伪谕后，派人到长春宣布接任吉林“巡抚”，并上表“谢恩”[194]；此外还有自立为绥远都统的王丕焕接到伪谕，率同官员“望阙叩头”。全国大多数军阀，在观望一阵以后，看见复辟不得人心，都相继表示反对。

7月1日，张勋派梁鼎芬去找黎元洪，要他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遭到黎的严辞拒绝。次日，黎又采纳张国淦的建议，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派秘书覃寿堃星夜赶往天津，将委任令交段祺瑞。当天，张勋逼迫黎元洪一日内交出总统府，并派兵更换原总统卫队。这时，黎得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帮助，避入东交民巷，先投法国医院未被接纳，又折入日本使馆武官随员斋藤少将的宿舍。次日，日本公使宣称，黎元洪已进入日本使馆区，按照国际惯例，予以保护[195]。

段祺瑞在津得知张勋发动复辟后，立即集合左右商讨对策，决心利用这一时机，重新登台。3日，段祺瑞匆匆向全国发出反对复辟的通电。电文说：“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师，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中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今翻云覆雨，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今兹之举，出于逼胁，天下共闻。……祺瑞罢斥以后，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

灭。”[196] 这个通电是梁启超为段祺瑞起草的，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先朝旧臣”的本色。

复辟后第二天，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暂移天津出版。北洋派和交通系各报如《公言报》、《民言报》等停刊。

是日，冯国璋也通电反对复辟。电文指斥张勋“奉令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兵力包围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197]，表示要“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刻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在段祺瑞、冯国璋通电反对复辟之前，已有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杨善德等通电反对复辟。继段祺瑞、冯国璋之后，直隶督军曹锟、贵州督军刘显世、广东督军陈炳焜、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等也相继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南北军阀反对清室复辟，其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如上海一国民党人组织的团体在致浙督杨善德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杨善德等北洋督军“前日与张逆一致行动，固为保全禄位，而今日之反对复辟，空言敷衍民党，亦无非保全禄位”[198]。

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荷兰除外），出于自身利益，对复辟也普遍持反对态度[199]。日本态度已如前述。6月，美国外交部也公开表示“不愿见帝制复现于中国”[200]。复辟发生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五国联合警告张勋，要他保证黎元洪人身安全[201]。此外，外国人办的报纸，反对复辟的态度都十分明朗[202]。

张勋复辟集团失去国内国外的支持，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四　复辟失败和段祺瑞的乘机再起

张勋宣布复辟的次日（7月2日），段祺瑞与徐世昌略事商讨后，便偕同靳云鹏、张志潭、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从天津乘汽车赶往马

厂，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段祺瑞要在天津附近组织讨张的军队，也有一番周折。当时驻京畿的军队除张勋辫军外，十一师（师长张永成）驻北苑，十二师（师长陈光远）驻南苑，十三师（师长李进才）驻西苑。此外还有近畿第一旅（旅长张锡元）、近畿第二旅（旅长吴长植）和江朝宗统领的京城卫戍军驻扎北京城内。这些军队的将领在复辟发生后态度暧昧。江朝宗、陈光远、张永成、李进才、张锡元、吴长植等人都在宣告复辟的通电上列名，段祺瑞不敢打这些人的算盘。除以上京畿驻军外，直隶北部还有：一师（师长蔡成勋）驻宣化，八师（师长李长泰）驻马厂，三师（师长曹锟）、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驻保定，十六混成旅（旅长杨桂堂）驻廊坊。上述各军队的将领除蔡成勋外，都未列名复辟通电，多数尚在观望，有的已表示反对复辟。但是这些军队大都非段祺瑞的嫡系，使段大费踌躇。段与左右再三商讨，最后确定运动驻马厂的八师发起讨伐张勋的军事。该师团长阎繁瑞、阎繁敏原系段的马弁，师长李长泰与段私交甚厚。与此同时，段还派人运动驻廊坊的十六混成旅。该旅旅长原为冯玉祥，4月初被段的心腹排挤，改任直隶巡防营统领。冯走后，十六混成旅旅长由原参谋长杨桂堂继任。杨平庸无能，冯的潜势力仍在。复辟发生后，张绍曾、陆建章都有所举动，段祺瑞深恐冯玉祥为他人利用，赶快重新任命冯指挥第十六混成旅。

3日，驻保定第三师师长曹锟，在密电征得冯国璋的意见之后，通电宣布反对复辟，参加讨逆，从而加强了段祺瑞讨逆军事的阵容。当日，段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研究系政客梁启超、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和段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张志潭、曾毓隽、丁士源、张弧、任凤苞以及徐世昌派的陆宗舆、张国淦、吴鼎昌等人都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分任各职[(203)]。

马厂会议决定：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西

路由曹锟任司令，率三师、二十师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任司令，督八师和十六混成旅集合于廊坊，然后沿京津铁路西进。4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破坏民国的八大罪状，宣布讨伐。同日，八师自马厂誓师出发，经天津赴落垡、廊坊。

讨伐张勋的军事自7月5日开始。5日凌晨4时，讨逆军东路军八师一部在廊坊、万庄之间与辫军首次接战。辫军无备，稍事抵抗，即退往丰台，讨逆军追至黄村（今大兴县城）以北。同日，西路军三师也乘火车北上，占领涿州、良乡，直抵芦沟桥[204]。6日，讨逆军东路冯玉祥部也参加战斗，与八师王汝勤部合兵追击辫军至丰台以东。同日，由南苑航空学校组成的讨逆航空队轰炸了丰台辫军的阵地[205]。7日，讨逆军攻丰台，东路先发起。辫军正在抵抗之际，西路会同新加入讨逆阵营的十二师陈光远部自西发起攻击，辫军不支，向西北逃窜。原依附张勋的近畿第二旅吴长植部在战场上倒戈。正午，讨逆军完全占领丰台。据曹锟报告，此役辫军仅死“数十名”，“我军人马一无损伤”，可见战斗并不激烈。同日，西路三师吴佩孚旅占领协寨、跑马厂等地[206]。自此，北京城东南要隘尽为讨逆军控制，辫军只得紧闭城门，龟缩在北京城内。

与进攻丰台同时，讨逆军航空队轰炸了北京城内辫军营地和清宫。投下的三枚炸弹，两枚落在宫内，炸伤轿夫一名，使辫军人人自危，惶惶不安[207]。清室不得已，才出面托日本公使林权助函劝段祺瑞停止轰炸[208]。

叶恭绰出任讨逆军司令部交通处长，对讨逆战事顺利展开作用颇大。经他运动，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局将大批客货车皮集中于天津和保定，载讨逆军北上；同时又将徐州附近各车段的空车皮完全调走，使徐兖地区的辫军不能北上增援张勋[209]。

研究系的重要成员几乎全体出动，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梁启超、汤化龙直接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这一时期段向外发

布的重要文电，都是梁启超的手笔。熊希龄则躲在幕后为段祺瑞向四方活动。7月1日，复辟消息一传出，熊即致电上海赵凤昌，要他疏通国民党人与段祺瑞“速释嫌怨”，联合起来反对张勋。“万不可于北军范围内发起革命军，恐北方将领畏有萧墙之祸，反致团结一气，投入复辟漩涡”[210]。4日，熊希龄再电赵凤昌，请“设法运动海军……开赴大沽”，威胁辫军，并促使当时态度尚不明朗的陈光远、蔡成勋两部迅速加入“讨逆军”[211]。

随着“讨逆军”在军事上的进展，段祺瑞于5日将司令部自马厂移至天津，并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暂以直隶省公署为办事处。

段祺瑞早于2日已收到黎元洪重任他为国务总理的命令，但当时他的左右意见不一：丁士源为首的一派，主张抛开黎元洪，自立旗帜；另一派以张国淦为代表，主张接受黎元洪的命令，就任总理，名正言顺，便于号召。段经过考虑，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后三日，仍得不到外省响应，大为恐慌。4日，他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说，第四次徐州会议，首由张怀芝、倪嗣冲等人“揭出复辟宗旨，坚明要约”，自己“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词旨为言”，而现在复辟已实行，“诸公意怀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闻之不胜悚愧”[212]，要求他们实践前言，赞助复辟。6日，他又有电致北洋各督军说：复辟之举，“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213]。但是，张勋的哀求与威胁，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困境。没有一个北洋“同袍”肯于此时为张解围，而原来附张的孟庆远、王丕焕等人见势不好，也都倒戈。

随着辫军的接连失利，龟缩在北京城内的复辟集团也动摇瓦解。当日鼓吹复辟最甚的张镇芳等人争相外逃。9日，张镇芳和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讨逆军”查获。同日冯德麟亦在天津车站被拘获。

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得一面向伪清廷提出辞职，一面央请北京公使团出面“调停”。8日，溥仪发布所谓“谕旨”，准张勋辞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内阁政务暂由王士珍“妥慎办理”，俟徐世昌来京，“再会同筹商善后办法”[214]。经徐世昌斡旋，段祺瑞派出讨逆军的交涉处长刘崇杰入京，与各国使团接洽。刘崇杰代表段向张勋提出了实行停战的三个最低条件：一、取消复辟；二、保全清室优待条件；三、在京定武军立即解除武装[215]。但张勋还企图带兵退归徐州老巢，不肯解散辫军，谈判破裂。11日晚，讨逆军通知外交使团，和平解决已无可能，但军事行动将竭力设法限制在不危及在京外国人的范围[216]。

继陈光远之后，十一师张永成部也参加讨逆军事，与十二师组成讨逆军中路，由陈光远任司令。东路、西路和中路讨逆军计达十八旅五万七千余人[217]。12日拂晓，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城内的辫军发起总攻。东路军八师和十六混成旅自城南经永定门直取天坛，西路军三师自城西占领彰仪门；中路军十一师、十二师占领了朝阳门。当时，辫军分两处设防：城外统领李绍臣率步兵六营守天坛；城内统领苏锡麟率一营卫队、一营炮兵和两营步兵驻守辫军大本营南河沿地区（当时辫军在南河沿张勋宅周围设防。南起前门，沿东华门向北一直到景山、北海、西四牌楼一线）。讨逆军发起进攻后，天坛辫军稍作抵抗，经段芝贵许以缴械投降不加追究，并发给三个月军饷后，即放下武器。南河沿地区直至中午才结束战斗。初时辫军恃天安门城门墙坚壁厚，进行抵抗，讨逆军无法前进。直至11时，讨逆军炮轰张宅，张勋始在外国人保护下逃往荷兰使馆，苏锡麟缴械投降[218]。这场讨逆战争也就到此结束。张勋的复辟丑剧，只经历短暂的时日，即以彻底失败而告终[219]。

段祺瑞能如此迅速地平息辫军的抵抗，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寺内正毅的心腹西原龟三，于六七两月间一直潜伏于天津，为段出谋划策。在战争紧急关头，日本在华的金融机关

及时向段提供了大笔军费。7月12日，直隶财政厅长汪士元以补助直隶金融费用为名，在天津向日本三菱洋行借款一百万日金。这笔钱实际上完全充作讨逆军的军费[220]。同日，讨逆军东路司令段芝贵通过日本公使林权助，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八万银元，用来收买驻守天坛的辫军[221]。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以后，急忙向西原表示：政局几经变化，再度出任总理，“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舍此当无更好的机会”[222]。此后，皖系军阀便有恃无恐地加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日下令将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私下早已开始组阁的活动。张勋复辟不仅帮助段解决了总统黎元洪和国民党占优势的国会，而且为组织完全排除国民党人的内阁创造了条件。由于研究系为皖系反对国民党和黎元洪效了大力，段便起用不少研究系政客，组成段派官僚和研究系的混合班子。而研究系与冯国璋也一向有所拉拢，所以冯对段的内阁班底表示赞同[223]。14日，段由津入京。次日，冯国璋任命汪大燮、刘冠雄为外交、海军总长。18日，冯又任命五名总长：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224]。

冯国璋虽通电接受代理总统，但对于是否北上正式继任总统却犹豫了很久。当时，冯派、段派内部对此问题都有歧议。在段的左右，徐树铮、丁士源一派恐冯手握兵权，再加总统名义，比黎元洪更难对付，力主段自行摄理总统。张志潭、张国淦一派则主张黎元洪解职，由冯国璋北上继任，比较合乎情理；而且把冯调离南京，比较更容易对付。段派内部尚在酝酿之际，李纯、曹锟等纷纷通电拥护冯国璋北上就职。段祺瑞恐因此问题在北洋派内部闹起风波，便采纳张志潭等的意见，派靳云鹏南下劝冯北上[225]。冯国璋左右对冯是否应北上也意见纷纭。冯的女婿陈之骥等认为冯不能离开经营有年的南京和自己的军队，去北京做空头大总统；而冯的参谋长师景云等则认为，中

央无主，元首虚悬，是冯扩大权势的大好机会。冯本人尚在犹豫，靳云鹏已衔命来到南京，向冯国璋表示：段祺瑞此次组阁，一定服从冯国璋，并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语，力促冯、段合作。在师景云、靳云鹏等人怂恿下，冯国璋终于答应北上就总统职，但提出必须以调江西督军李纯接替他走后所遗的江苏督军职务为条件，此外，提升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接替李纯。段祺瑞原打算以自己的心腹段芝贵接替冯国璋出任江苏督军，但为了对付西南，稳定政局，只好答应冯的条件。同时，段也提出交换条件：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冯国璋见段已同意李纯和陈光远的任职，也接受了段的交换条件[226]。冯、段幕后交易做成后，7月29日，冯国璋通电宣布：黎元洪“坚持引退，长此濡滞，则政令多歧，人心不定，进退维谷，负疚弥多。兹定于三十一日早自宁出发至京，亲造黄陂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不胜大幸”[227]。

冯国璋所谓进京敦请黎元洪复位，当然是骗人的鬼话。8月1日，冯率警卫部队抵北京，当天上午到东厂胡同拜访事先特意从避居的法国医院中赶回来迎候的黎元洪。二人见面后，冯假意劝黎复位。黎当然明白冯的用意，坚决拒绝。冯敷衍了几句即欣然离去。4日，冯通电宣布代理总统。

北京政府表面上在冯、段合作的新体制下重新组成了。但是，这一体制仍是脆弱的。冯、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处于对立的地位。冯国璋上台前，二人在用人与地盘上的讨价还价已为新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线。

张勋复辟平定之后，对德国宣战一事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由于再不存在国会干扰的问题，因此宣战命令顺利发表，并且将宣战的范围扩大到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布告声称：“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

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乃自断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228] 该布告由段祺瑞及各部总长汪大燮、汤化龙、梁启超、刘冠雄、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曹汝霖联名副署发表。

是日，外交部照会各协约国、中立国驻华公使以及德国驻京代表（中德断交后，德国委派一名代表照看在华利益）、奥地利驻华公使，通告中国对德、奥宣战。美、英、法、日、意、俄等国公使当即复函外交部，对中国参战表示欢迎。然而奥地利公使则在复函中声明：“此项宣战，本公使以为违背宪法，当视为无效。盖按黎前大总统之高明意见，此项宣战之举，应由国会两院同意赞成，方可施行。”[229] 外交部认为，中奥已为敌国，不能接受这一公文，当即将公文退还奥地利公使。其实，由于段祺瑞根本不愿恢复旧国会，因此宣战案也无法提交国会。该宣战案是在一年之后，仅仅于战争结束前数日，才为安福国会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以协约国胜利、德国战败而告终，中国自然也忝居于战胜国之列，段祺瑞因对德宣战有功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

宣布对德宣战后，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并筹建自己的嫡系武装，以便同南方作战，消灭异己，便以参战为名，于1918年3月1日成立了参战督办处，由他的心腹干将靳云鹏任处长（后又由段亲自任处长，故当时人称“段督办”）。参战督办处和随后用日本借款建

立的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成为皖系军阀统治的一大支柱。

---

(1) 《复熊铁崖、刘希陶电》（1916年7月18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2) 《宪法（案）研究会之先声》，《晨钟报》，1916年8月23日。

(3) 《组织宪法研究会》，天津《大公报》，1916年8月24日。

(4) 《晨钟报》，1916年9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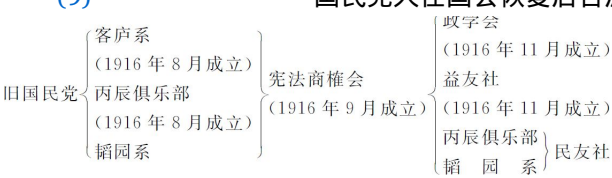
(5) 《宪法研究同志会开会》，《大公报》，1916年9月3日。

(6) 《致熊铁崖、刘希陶电》（1916年8月21日），《护国之役文电稿》。按，梁电中所说某党稳健分子系指谷钟秀、张耀曾、李根源等人；流氓草寇指中华革命党议员马君武、居正、田桐等及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议员。

(7) 《中华新报》，1916年7月29日。

(8)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第15页；《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参见韩玉辰：《政学会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9) 国民党人在国会恢复后各派分合概况，表解如下：



(10) 《晨钟报》，1916年9月14日；《大公报》，1916年9月15日。此后，进步党即被世人称为研究系。

(11)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1、23日。

(12) 《晨钟报》，1916年10月21日；《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3日。

(13) 《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1日；《晨钟报》，1916年12月9日。

(14) 《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0日—15日。

(15) 《晨钟报》，1916年10月17日。

(16)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7) 《民国日报》，1916年7月20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19日。

(18)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0日。

(19) 《中华新报》，1916年6月14日。

(20) 《晨钟报》，1916年9月25日。参见《中华新报》，1916年9月29日。

(21)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2) 重庆《商务日报》，1916年10月9日。

(23) 《中华新报》，1916年9月27日。

(24) 《政府公报》，1916年9月30日，第266号。

(25)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4日。

(26)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96页。

(27)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96页。

(28) 《徐树铮致张勋函》（1916年8月29日），《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6页；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2页。

(29) 邹鲁：《回顾录》卷2，第95—96页。

(30)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86页。

(31)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6日。

(32) 《中华新报》、《民国日报》，1916年9月29日。

(33) 重庆《商务日报》，1916年10月13日、19日。

(34) 《新青年》第2卷第6号：《国内大事记》。参见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2—23页；《张君劢致梁启超函》（1917年1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02页。

(3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22页。

(36) 哀：《政府之所不为》，《民国日报》，1916年9月4日。

(37)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124页。

(38) 《大公报》，1916年8月29日。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4日。

(39) 张国淦：《黎元洪与段祺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未刊稿。参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6页。

(40) 《大公报》，1916年8月29日。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8月29日。

(41) 北洋政府徐树铮档案。参见《政府公报》，1916年8月29日，第235号。

(42) 《大公报》，1916年9月2日。

(43) 周震鳞在1916年11月4日致孙中山信中说，孙洪伊“自二次革命至今，早与真正之国民党愈接愈近，较之国民党中新官僚分子品格固相霄壤矣”，并说孙“崇拜先生，久出至诚”。《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出版，第659—660页。

(44) 《徐树铮作祟史》，《民国日报》，1916年8月31日；《徐树铮七大罪案》，《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4日；《胡瑞霖查办案之索隐》，《晨钟报》，1916年9月20日；《申报》，1916年8月31日。按孙洪伊原为众议院议员，议员法规定，凡议员不能任政府官职。孙任内务总长后，曾辞去议员。

(45) 《府院间权限问题》，《申报》，1916年8月31日。

(46) 《晨钟报》，1916年9月22日。

(47) 《汤化龙启事》，《晨钟报》，1916年10月25日。

(48)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9日；《晨钟报》，1916年10月24日。

(49)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2、14日。

(50) 《黎大总统请徐东海来京各电》，《文电汇选》，1915—19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未刊稿。

(51) 梁启超：《致籍忠寅转徐世昌》，《护国之役文电稿》。

(52) 《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2月6日、7日、2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0—21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3) 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1章，第188页。

(5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4页。

(55)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6页。

(56)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36页。

(57) 转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之参战》，《人文月刊》第7卷第1期。

(58) 《英国驻日大使致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照会》（1917年2月16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2、73页。

(59) 《日本外务省档案》，第25号，第8228页；第27号，第10369页。

(60) 《蓝辛致芮恩施》（1917年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61) 《蓝辛致芮恩施》（1917年3月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62)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1章，第189页。

(63)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7页。

(6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9页。

(65)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35—137页。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11页。

(66) 《节略》要点为：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同意中国将进口税增至百分之七点五，待裁撤厘金后，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三、取消辛丑条约关于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3月18日）。

(67) 《中华新报》，1917年3月8日、9日；《民国日报》，1917年3月8日。

(68)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69) 《汤化龙在宪法研究会上演说》，《晨钟报》，1917年5月4日。

(70) 《致段祺瑞函》（1917年3月7日），中华书局藏手抄本。

(71) 《中华新报》，1917年3月9日。

(72) 《中华新报》，1917年4月1日。

(7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68页。

(74) 指伍廷芳、陈锦涛、王正廷和陈友仁等，这些人也可列入国民党范围之内。

(7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45页。

(76)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485。

(77)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65页。

(78) 《冯国璋致北洋各省密电》（1917年3月21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79) 《冯国璋电稿》，北洋政府零散军事档案。

(80) 《冯国璋致禁卫军铣电》（1917年4月16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66页。

(81) 《晨钟报》，1917年5月2日；《中华新报》，1917年5月3日；《民国日报》，1917年5月3日。

(82) 《中华新报》，1917年5月3日；《民国日报》，1917年5月3日。

(83) 《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15页。

(84) 《中华新报》，1917年5月11、12日。

(85) 《中华新报》，1917年5月4日。

(86) 《民国日报》，1917年5月5日；《中华新报》，1917年5月5、7日。

(87) 《众议院公报》第2期，第112号，1917年5月13日。参见《雷震春、张镇芳函》（1917年5月11日），《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9—50页。

(88) 《晨钟报》，1917年5月11、12日。

(89) 《傅良佐致吴光新电》（1917年5月9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0页。参见《张勋藏札》，《近代史资

料》总35号，第49—50页。

(91) 《晨钟报》，1917年5月18日。

(92)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0页。参见《晨钟报》，1917年5月13日。

(94) 《专电》，《民国日报》，1917年5月16日。

(95) 顾敦鍒：《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第255页。

(96)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2日。

(97)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3日。

(98)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51页。据1917年5月26日端纳致宋发祥函称："外交团之意见，皆于违犯宪法举动，极力反对。段若竟施强力，必归失败。"见《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70页。

(99)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4日。

(10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1—822页。

(101)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5页。另据1917年5月23日《晨钟报》报导，段祺瑞委派张国淦向黎元洪提出的人选为：内务总长范源濂、外交总长高尔谦、交通总长汪大燮、财政总长李经羲、海军总长萨镇冰、教育总长蔡元培、农商总长夏寿康。两说有很大出入。

(102) 《政府公报》，1917年6月23日。

(10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6页

(104) 《革命文献》第7辑，台北1969年版，第29页。

(10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45页。

(106) 辛亥以后，张勋与许多清朝遗老和王公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复辟活动，章宗祥所著《东京之三年》、西原龟三所著《梦的七十余年》，以及《郑孝胥日记》中，都有德国人供应张勋金钱、枪炮的记载。分见《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71页；总38号，第49、144页。

(107)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页。

(108)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7页。

(109)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6页

(110)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7页。

(111)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36—37页。

(112)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4日；《晨钟报》，1917年5月24日。

(113) 《徐州特别通信》，《中华新报》，1917年6月1日。

(114) 当时徐树铮对王郅隆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见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3页。参见《张勋揭露段祺瑞电》（1920年7月20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15) 《晨钟报》，1917年5月26日。

(116) 《晨钟报》，1917年6月2日—5日；《中华新报》，1917年6月5日。

(117) 《提出李经羲为总理之经过》，《民国日报》，1917年5月28日。

(118) 《黎元洪致李经羲电》，《民国日报》，1917年5月31日。《政府公报》，1917年5月28日。

(119) 《中华新报》，1917年6月1日。

(120) 《张作霖上大总统电》，《中华新报》，1917年6月2日。

(121)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22)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233。

(123) 《天津之总参谋处》，《晨钟报》，1917年6月4日；《中华新报》，1917年6月5—7日。

(124)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6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25)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6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26) 《美国提议对华劝告经过概要》，《日本外务省档案》，第24号，第8158页。

(127) 《中华新报》，1917年6月7日。

(128) 《夏寿康往来函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0—181页。

(129) 《夏寿康往来函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2页。

(130) 张勋于1917年6月6日通电各省督军："奉命入京调停国事，规定本月七日首程北上．特闻。"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一〇一一，45。

(131) 《晨钟报》，1917年6月9日。

(132) 《晨钟报》，1917年6月9日、10日。

(133)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134) 1617年5月，黎元洪曾驳回北洋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呈文，并表示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186页。

(135)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136)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

(137) 《政府公报》，1917年6月13日。

(138) 《政府公报》，1917年6月14日。

(139)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40) 《日本外务省档案》MT80号，第5407—5409页。

(141)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3—44页。参见《中华新报》，1917年6月7日。

(142) 西原作为寺内特使，曾于1916至1918年数度前来中国与皖系军阀勾结。关于他经手的借款问题，第五章还有专节述及。1917年5月段祺瑞被免职下台后，他潜来中国，为段棋瑞出谋划策。详见西原龟三：《梦的七十余年》，第198—200页。

(14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4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45)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另见《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5页；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王文说，张勋率军北上，"田中乃急派日人中岛比多吉在半途追阻，议缓期举行，故张勋到天津遂屯兵不前"。另有《张勋与佃信夫》一文说，田中在徐州会见张勋时，也面谕张勋，复辟"时机尚早，希慎重考虑"。《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6页。

(14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3页；《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3—114页。

(147) 《张勋与佃信夫》，《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6页。升允，字吉甫，清末曾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时顽抗失败，逃窜哈尔滨，在满蒙王公支持下，勾结沙俄和日本，招收马贼，组织各种复辟武装，与张勋相呼应。

(14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2册，第28页。

(149)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参见赵星缘：《张勋与宣统复辟》；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50)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1)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2)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6页。

(153) 《中华新报》，1917午6月21日。

(154)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

(155)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

(156)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57) 《中华新报》，1917年6月24日。另见同日《民国日报》。

(158)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43页。

(159) 原李经羲提名的内阁阁员有张謇、严修、赵尔巽等“名流”。但这些“名流”不肯应召就职，李只得任命李、龙、江等人为阁员。

(160) 据冷汰《丁巳复辟记》载，“张（勋）既闻日人言，到津后，沮之者尤众，意稍移。刘公（刘廷琛）愤其失信，语侵之。退草一函以贻之，责其欺君卖友。张亦怒，事遂中挫。”（《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据陈毅记载，“张公（张勋）军过天津，顿而后进，饴山（王宝田）托病去，潜楼（刘廷琛）愤甚，交几绝，予亦谢不前。”（陈毅：《丁巳同难图记》，《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95页）刘廷琛，字幼云，别号潜楼，江西德化人，光绪甲午科进士，为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堂总监等职。辛亥后往来于上海、青岛之间，积极策划复辟，为遗老首领。王宝田，字饴山，山东人，清末曾任兖州团练使，辛亥以后留居山东，1913年在刘廷琛鼓动下，参与复辟清室的活动。

(161)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2)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3)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112页。

(164) 《沈曾植函稿》，《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88页。

(165) 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48页。

(166) 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51页。

(167) 《郑孝胥丙丁日记》，《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74—75页。

(168) 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未刊稿；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

(169)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陈光远报告张勋在京复辟活动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上海文艺编译社编：《复辟始末记》卷上，第49页。

(170)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5—16页；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114页。参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36页。

(171) 《内阁官报》第1号，1917年7月2日（旧历五月十四日）。

(172) 《内阁官报》第1号，1917年7月2日（旧历五月十四日）。

(173)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7页，

(174)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7—18页。

(175)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176) 杨虎：《革命缀言》，桂林力报馆1943年版，第17页。

(177) 《中华新报》，1917午7月3日。

(178) 《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上述团体电函均见7月3日—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

(179) 《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上述团体电函均见7月3日—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

(180) 《时报》，1917年7月4日。

(181)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8日。

(182)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5日。

(183)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8日。

(184)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7日。

(185) 《复辟实现后之湖北》，《时报》，1917年7月9日。

(186) 《复辟声中之广东》，《复辟始末记》卷下，第32页。

(187) 《复辟声中之江西》，《复辟始末记》卷下，第33页。参见长沙《国民日报》，1917年7月29日。

(188)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89页。

(189)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0) 《时报》，1917年7月6日。

(191) 《旅外公民讨逆通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6日。

(192) 友周；《记留东学生之讨逆大会》，《时报》，1917年7月16日。

(193)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4) 《旅外公民讨逆通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6日。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第129号，第2114—2118页；《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39—140页。

(195) 《民国日报》，1917年7月3日。

(196)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7)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8) 《中华民国护国军后援会致浙江杨督电》，《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8日。

(199) 这时中国已与德国绝交。

(200) 《顾维钧电报》（1916年6月1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201) 《复辟中之京讯》，《时报》，1917年7月5日。

(202) 《西报之评论》，《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

(203) 《晨钟报》，1917年7月7日。

(204) 《段祺瑞关于廊坊、黄村等地进剿讨逆军战况通电》，《段祺瑞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6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

(205) 《秦国镛致冯国璋等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206) 《曹锟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

(207) 《秦国镛致冯国璋等函》（1917年7月8日）。参见《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9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1页。

(208) 《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书馆印行，第335—341页。

(209) 陈文运：《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42页。

(210)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1917年7月1日），《赵凤昌藏札》（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211)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1917年7月4日），《赵凤昌藏札》（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212) 《革命文献》第7辑，第76页。

(213) 《晨钟报》，1917年7月9日。

(214) 《紧要新闻》，《晨钟报》，1917年7月10日。

(215) 《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0日。

(216) 《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4日。

(217) 《丰台电话》，《晨钟报》，1917年7月11日。

(218) 《段芝贵详报讨逆情形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12日）；《讨逆军总司令部收复北京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12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参见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219) 1923年9月，张勋病死于天津。

(220)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152

—153页。

(22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152—153页。参见《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6—117页。

(222)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46页。

(223) 徐树铮反对段吸收研究系入阁，曾向段、冯表示，组阁不宜“偏重党会”，但未被段、冯采纳。见《徐树铮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

(224) 内阁共九席，陆军总长由段祺瑞兼任，教育总长为范源濂。《政府公报》，1917年7月15—19日。

(225) 曾毓隽：《忆语随笔》（三），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66—167页。

(226) 曾毓隽：《忆语随笔》（三），文史资料未刊稿；陈之骥：《冯、段矛盾的焦点及冯联南议和的经过》，文史资料未刊稿；张国淦：《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4—45页。

(227) 《冯国璋艳电》（1917年7月29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101—102页。

(228) 《政府公报》，1917年8月14日。

(229) 《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第215页。

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一节　滇系军阀

一　川滇黔军之战

四川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及其追随者黔系军阀刘显世对外扩张的主要争夺对象。1916年11月蔡锷病逝后，滇系唐继尧的对外扩张遇到了川系的反抗。原来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互相残杀，发生了1917年以四川省会成都为战场的川、滇、黔战争，即“刘罗”、“刘戴”之战。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

先从“刘罗”之战说起。

护国战争结束后，段祺瑞为了“强干弱枝”，削弱异己力量，下令“收束军队”，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出省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护国战事发生以来新扩充的军队。段祺瑞拟就一套裁兵计划，全国陆军规定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万人。此外，各省可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北京政府的裁兵计划，实际上只是要裁减南方军队。南方军队当然听命于北京政府。这个裁兵计划却直接导致了川滇军阀之间发生的1917年“刘罗”之战。

蔡锷离川后，滇军将领罗佩金[(1)]、黔军将领戴戡[(2)]分别担任了四川督军和省长。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发表罗佩金暂署四川督

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3]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领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那时，川军已编为五个正规师。罗佩金所率进入川省的滇军编为两个师，戴戡所率进入川省的黔军编为一个混成旅。护国战争后，在川的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滇军在川已编为顾品珍[4]、赵又新[5]两师，还以贾紫绶为四川督署卫队团长，增设兵工厂卫厂营、造币厂卫厂队等，又在滇招募徒手士兵七千人来川。这样使入川的滇军总数达三万人左右[6]。此外，护国军银行迁往成都，以云南大资本家李临阳为总经理，大量发出富滇银行钞票，吸收市场的银元、黄金；又握川南盐税，先后提取数百万元。大批滇人出任各级地方官吏。例如，罗佩金对军署、省署的人事作了引人注目的更动：委韩凤楼为四川讲武学堂校长，以修承浩代尹昌龄为民政厅长，以杨宝民代邹宪章为财政厅长，以雷飙代嵇祖祐为全省警务处长，委赵又新兼永宁道尹。川军刘存厚部曾参加护国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护国战争后，川省大权落入滇、黔外籍人士手中，因而刘存厚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

北京政府要各省“收束军队”，甚至有“将蜀军队遣七留三”[7]的安排。而川省财力有限，仅1916年四川各项军费开支达一千三百万元，比“核定预算，已超越一倍有余”[8]。川省财力很难继续供养这么多的驻川部队。于是罗佩金决定裁军，然而他的裁军计划是要把段祺瑞的“强干弱枝”改为“强滇弱川”。这是适应唐继尧向四川扩张的需要而拟订的。1917年1月，罗佩金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军费由中央负担。随后，北京政府核准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师一旅，在川的黔军改编为一混成旅一独立团。这样，不仅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而且饷银亦优于川军，滇军

每师饷银为一百二十万元，川军每师才八十万元。

段祺瑞表面上支持罗佩金的裁军计划，实际上却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罗佩金以为有了北京政府的支持，乃于1917年4月召开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罗佩金在会上宣布，北京同意将滇军编为一师一旅，黔军编为一旅一团，番号是国军，饷械由中央负担，享有国军的同等待遇。川军则编为地方军，三个师一个旅，番号是四川陆军暂编第某师或某旅，没有与国军的同等待遇。川军现有五师，先自缩编，做裁并的准备，去特科，只留步兵。

罗佩金早已担心刘存厚会反对这个裁军办法，因此在会前他就密电请段祺瑞政府将刘存厚调往北京，另行安排职务，而保荐滇军梯团长（旅长）刘云峰继刘存厚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职务。段祺瑞回电予以核准，但调职的命令却迟迟不发，段还以参陆办事处的名义把罗佩金的秘密计划密告刘存厚，煽动刘进行反抗。密电甚至还说，罗佩金要求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企图借此进一步煽动全体川军将领进行反抗 (9) 。

罗佩金为了杀鸡吓猴，先从实力较弱的川军第四师开刀。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滇军系统，但自调任川军师长以来，就渐渐靠拢了川军将领，与罗的关系日益疏远。罗乃下令将该师缩编为一个混成旅。陈泽霈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及一个团，并要求发清欠饷，这实际上是拒绝执行缩编命令。罗佩金乃于1917年4月初第二次下达命令："照得川省军队过多，亟应收束，前经本督统筹规划，分别办理，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命令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将所部一师裁为步兵一旅，并按照改订四川陆军暂行编制，将所有兵额分别裁汰，统限于三月十号以前一律办竣，所有退伍给奖证书、奖章、奖状以及该师恩正各饷，均经先后核发承领在案。乃逾限日久，该师裁编事宜仍未办理完竣，实属延玩已极。裁兵关系要政，万难任令迁延，应将该师长立予撤任。该师所辖部队及一切经手事件，即日交由第七旅旅长卢师谛接管。此令。" (10)

罗佩金下令以卢师谛接管第四师的同时，于4月15日将该师在省城部队集合在成都市区皇城内，全部缴械，并扣押了师长陈泽霈、师参谋长周绍芝等人。该师在省城外的部队，亦被包围缴械，勒令解散。罗的做法引起了川军的不满，川军一、二、三、四、五师师长联名，以刘存厚领衔发出通电，指责罗佩金“强滇弱川，编遣不公”[(11)]。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一千余支、子弹十余万发来省，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将人械一并扣留。当场滇军死十余人，余均被禁闭[(12)]。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过成都通惠门，刘存厚又下令开枪射击。这样就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军开炮互击，而双方都指责对方首起衅端。罗佩金指责刘存厚“派兵围攻军署，弹如雨下，全城震惊”；继又通电说，刘存厚部进攻军署，“纵火烧及商民数百家，全境蹂躏，川局糜烂”[(13)]。刘存厚则反唇相讥，指责罗佩金迫使川军第四师缴械，“更生擒千数百人，杀于新东门等处以示威，累累陈尸，万目共睹。穷凶极恶，万古无传。川军闻之，发指皆裂。而罗氏犹以为未足，更欲斩草除根，于本月十八夜，分兵三路，一路由武备街袭击本军司令部，一向羊市街，一绕通惠门，夹击二师炮团。又有先期藏匿少城滇籍军官家内之便衣士兵，同时突起，八面围攻”[(14)]。这天，成都巷战发生，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罗”成都巷战正式爆发。这是护国战争之后西南军阀之间的第一次混战。

这次战争的双方都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使人民群众遭到巨大的灾难。4月19日，滇军顾品珍师王秉钧旅派兵焚烧皇城周围民房（贡院街、三街北街、皮房街、东西皇城边街、东西御河沿街、永靖街等处），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皇城上滇军还发射烧夷弹，机枪步枪交织扫射，禁阻警察前往救火。一时黑烟蔽天，红焰照地，人民奔窜，哭声载道，数百家房屋顿成灰烬。刘存厚部为诿罪滇军，亦派士兵数百人伪装滇军，戴上红边军帽，伙同流氓地痞分头放

火，抢劫财物。火势一直延烧到4月22日。滇军赵又新师第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后来回忆说："王秉钧在督署被围时，不预先通知人民迁移，就放火焚烧皇城边的民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营长李正芳任意捕人，将善良男女老少也带上城墙，用武力戮死，推倒城下，真是民怨沸腾，哭声震天。"[15] 有人还称这"可谓三百年来未有之惨剧也"[16]。滇军两旅分路猛扑刘存厚军的防线，企图占领北较场刘的军部。川军拼命阻击，白刃肉搏，双方都有严重伤亡。滇军未能按预订计划占领北较场，只得退回原地。

其时，川、滇两省议会亦互相指责。川省议会通电说，此次战役，"经红会调查，人民惨被焚杀、击毙、受伤者，约千余人。飞灾奇祸，实数百年来所罕见。窃此次肇衅之由，原因复杂。推原祸始，罗督实为厉阶。川军固当裁汰，但能开诚布公，宁有阻力？"滇省议会则通电声明，刘存厚叛攻川督，"称兵犯上，侮蔑中央，弁髦法令，恣意捣乱，妨害国家，罪恶贯盈，令人发指"[17]。入川的黔军则保持"中立"。

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经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调停，双方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当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改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饬令停止战斗，来京供职；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

4月21日，罗佩金将督军印信送交戴戡，表示愿意交卸。22日，在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当晚双方又发生了战斗，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条约。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张习来川查办，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黎元洪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佩金愿意遵令卸职，但川军仍攻督署。黎元洪乃下令罢免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听候查办。命令说："兹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于中央停止争斗之令，置若罔闻，仍攻督署等语。崇威将军刘存厚着

即免职，听候查办。所有在省川、滇各军，责成该兼督严饬各该管官长即日开拔出城，分别驻扎，懔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18]

其时，滇军赵又新部金汉鼎团在简阳、资阳间被川军所阻，无法西进支援罗佩金。罗佩金乃于4月24日率领滇军由东门退出，次日刘存厚率川军由西门退出。其后川、滇军继续互相指责，但两军在成都已脱离接触；在省城外两军虽有接触，但规模不大。总的说来，“刘罗”之战已停顿下来。罗佩金率领滇军一直退到自流井、富顺一带。

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在三千人以上，财产损失达四十七万余元，房屋烧毁七百八十户，被抢劫的达一千一百九十四户。北京政府财政部曾拨款十万元、总统捐款二万元，以为救灾之用。有的记载说，这次战争，“计焚烧民舍三千余家，人民死者六千余人，财产损失达亿万以外”[19]。

“刘罗”之战刚结束，“刘戴”之战又起。

戴戡控制了四川大权，黔系军阀刘显世十分得意。刘显世（1870—1927），字如周，贵州兴义人，辛亥革命前为乡兵管带，贵州辛亥起义后投机革命，任新军标统、贵州军务处长、国民军总司令、护军使等职，却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及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后为大势所趋，响应护国起义，宣布贵州独立，自任都督。护国战争结束后，又任贵州督军兼省长，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戴戡所率黔军在川，得到了刘显世的全力支持。

还在“刘罗”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将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刘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有意推卸。刘甚为不满，且知黔军兵力弱于滇军，仅有熊其勋旅九营和省署组织的警卫队二团，不过七千余人，而警卫队又是临时从各县抽调来的川

人，不会为戴卖命。于是，刘存厚将自己的司令部迁到成都近郊，对戴戡施加压力，并杀害戴的军需课长。戴不能忍受，决定进行报复[20]。

1917年7月1日张勋扶持溥仪复辟时，曾以伪谕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既未拒绝，亦未接受。戴戡即于7月2日发出声讨张勋的通电，同时准备使用武力对付刘存厚。为此，他急电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说：“惟刘存厚得任四川巡抚，态度虽尚未明，然其乱谋久蓄，或思一逞。若果甘心附乱，亦惟有合滇军力，先予痛剿，免碍进行。”[21] 7月3日，戴戡在督署召集军事会议，请刘存厚出席，并要他对北京伪谕表明态度。刘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会议，要求先撤去电局的检查员，然后表态。戴即以刘存厚态度暧昧为名，决定对刘用兵。

7月5日晚，“刘戴”战争爆发。当晚，熊其勋旅派团长袁光辉、胡忠相、熊其斌等，率队分路猛扑北较场的刘军军部及西较场文殊院等地。刘存厚早有准备，并于战争爆发前一天，即7月4日，发出讨伐张勋、拥护共和的电报，在舆论上使戴戡的“讨伐叛逆”失去目标。刘存厚还就这一问题致电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希望一致行动。电报说：“诸公民国元勋，素所钦佩，艰难共济，谅有同心，况属辅车，岂忘袍泽，尚祈酌示办法，以期一致进行。”[22] 实际上，刘已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当黔军向刘存厚川军发动进攻时，刘军立即进行了反攻。黔军力弱，被迫后退，并沿锣锅巷、玉带桥、白丝街、线香街、西顺城街一带纵火焚烧民房，直烧至古中市街、大坝巷口，以图阻止川军的追击。“黔军暴行，过于滇军，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23]。

“刘戴”之战几乎是“刘罗”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川军周道刚、熊克武等部采取“中立”态度，准备联合川滇

将领发起武装调停。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云南督军唐继尧企图重新恢复滇军对四川的控制，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准备“亲督三军，誓除叛逆”，宣称“思惟北征，宜先靖蜀”[24]。为此，云南方面从昭通运往叙州的军火源源不断，其数量超过了讨袁战争时期。尽管如此，退守皇城的黔军，坚持了十余日，却始终没有见到援军，伤亡颇重，粮弹匮乏，无法继续再坚持了。于是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颗印信给省议会，表示愿意退出成都。7月13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但黔军惧川军有埋伏，在掠夺了南门粮食后，又退回皇城。7月17日，戴戡率黔军由南门突围而出，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退走。7月21日，戴戡所率黔军行至仁寿县秦皇寺遭遇刘军腰击，熊其勋为川军所俘，后被斩首，黔军逃散。戴戡亦同时被川军杀害[25]。“刘戴”之战以刘存厚胜利而结束。此次川黔成都巷战，仅据红十字医院收容统计，兵士战死者三百六十四人，伤者六百六十一人；市民死者一百一十人，伤者三百一十人。

战争虽然是刘存厚取得了胜利，然而北京政府却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并派北洋系的长江上游巡阅使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同时命令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交周道刚接收统率。到了此时，人们才看清楚，原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是有意利用南方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借以把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

与成都两次巷战差不多同时及其稍后，又发生了川、滇两军在川南地区的两次战斗。这是“刘罗”、“刘戴”战争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次战斗，是由于刘存厚企图乘胜直追，把滇、黔军全部赶出川境，以及唐继尧、刘显世不甘失败，要继续控制四川而引起的。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残民以逞。

1917年7月中旬，滇军罗佩金奉唐继尧之命，向刘存厚部反击。

罗派韩凤楼、刘云峰、赵钟奇为第一、二、三路军司令，分兵三路，向成都挺进，口称援助戴戡，但故意迟滞行动，实际上是企图恢复失去的“四川督军”的宝座。刘存厚部陈洪范、舒云衢旅与滇军相遇于青神、眉山一带。一时之间，大军云集，川、滇两军，阵地交错，城内城外，炮声震天。刘存厚部倾全力向滇军反扑，激战数日，双方死亡惨重。滇军后因赵钟奇部内部不稳，主动撤出战场，退回资中。进攻眉山的滇军闻讯，军心动摇，加上滇军后路乐山为川军占领，滇军大为震恐，狼狈逃走。刘存厚军跟踪追击，连续占领了青神、仁寿、乐山、犍为、井研、荣县等地。滇军北上成都的计划遂成泡影。罗佩金也因多次战斗失利，乃由宜宾返回云南，此后在川滇军就由顾品珍指挥。这是川滇军在川南的“青眉攻防战”。

到1917年8月底，又发生了“资内争夺战”。其时，唐继尧已派大批滇军入川，邓泰中、李友勋两旅与赵又新部合驻自贡，黄毓成、叶荃两军与赵又新另一部共驻泸州，顾品珍军据守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一带。刘显世亦派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率兵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川军方面，第一师周道刚部驻重庆，第二师刘存厚部沿岷江上游布防，第三师钟体道部在沱江东岸和涪江下游沿线布防。川军的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打黔军。8月底，川军第二、三师进攻简阳、资阳，与滇军发生激战。顾品珍腹背受敌，先后放弃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等地，分队退往富顺、自贡。9月12日，顾品珍命金汉鼎旅三日内收复内江，滇军乃向内江急进，川军阻击，战斗相当激烈，内江的争夺几反几复，死亡枕藉。9月22日，滇军撤出内江，一路经自贡向宜宾撤退，一路经富顺向泸州撤退。资内争夺战以川军获胜而暂告结束。

此后，滇军在川南取守势。稍后，顾品珍率滇军李友勋、耿金锡两旅与入川黔军王文华部配合，分路奇袭重庆，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川军不得不从川南撤退[(26)]。

1917年川、滇、黔两次成都巷战，从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战争

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客观效果等几个方面来看，是一场典型的军阀混战。

首先，关于战争的目的。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三方，都是在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他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地盘而互相混战。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滇军要向四川扩张，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川军则希望独揽川政，再向外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要求扩张以至独霸四川或西南的动机指使下，川、滇、黔三省军队的矛盾集中于四川省会成都，从而爆发了“刘罗”、“刘戴”两次成都巷战。尽管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参与或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战争对于川、滇、黔三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违背民心的。“刘罗”、“刘戴”间的非正义之战，正是西南军事领袖们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这样就决定了不管是战争本身，还是各派军队，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护国战争以后，滇军在川就遭到了川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继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滇军此时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27]。四川人民“一致仇视滇军，坚壁清野”，使之“粮秣无从筹备”，连“井水亦无所得食”，造成“军心散漫，毫无斗志”[28]。稍后任唐继尧秘书长的周钟岳也说，“此次战争，（川人）绝我粮秣，断我交通，行军之难，数倍往日。”[29] 这些话已把滇军在川的处境刻画了出来。这与不久前的护国战争期间，滇军出师川境，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焚烧抢掠，无所不为，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成都巷战过程中，烧杀抢掠，触目惊心。随后川南战役的结果，更造成纵横千里，哀鸿遍野，四境萧条，村市丘墟的景象。据《古宋县志》记载，川、滇、黔军阀的争夺，“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劫后遗黎，已不聊生。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伕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疠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

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30] 古宋乃川、滇、黔间一边远小县，非争夺中心，犹且如此，他地情况，可想而知。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这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不具有正义性。第二，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以后，省与省之间，省与中央政权之间，以至于各省内部，都发生过一些战争，然而不管是辛亥起义，北伐出师，援川援黔援藏，二次革命，以至护国战争等，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战争都具有某种合理性或正义性，至少不是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间的战乱，才出现了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三，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战视为西南各省军事头目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根源在评价1917年川、滇、黔战争时曾说：“川事结果如是，西南局面破矣。”[31] 所谓“破”，就是指“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形成和混战局面的出现，这正是西南军阀形成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　滇系军阀的扩张

从护国战争结束，滇系军阀形成，到1920年的几年间，是滇系军阀的扩张时期，也是它的极盛时期。虽然在1917年的川滇、川黔成都巷战中，滇系军阀暂时受到挫折，但它随后就又以“靖国”之名，进一步向四川扩张[32]。

张勋复辟时，唐继尧于1917年7月3日发出讨逆通电[33]。他甚至表示，为了讨逆，“愿负弩矢，以为前驱”[34]。然而，当孙中山决心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准备开展护法运动时，唐继尧却采取了对孙中山“暂虚与委蛇，以敷衍中央”[35]的态度。当驻粤滇军第三师

师长张开儒[36] 7月14日在广州公开发表拥护护法通电时，唐继尧就很不以为然，在收到张开儒的通电后批道："该师通电，言太激烈，有损无益。"[37] 这时，唐继尧不仅控制了滇、黔，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川、粤。他自恃实力强大，既以"西南领袖"、"东大陆主人"自居，又把眼睛盯着总统宝座[38]，哪里还愿意屈居于孙中山领导下进行护法战争呢！

然而，形势逼人。一方面，两广在1917年6月20日通电暂行"自主"，孙中山又于7月17日抵达广州，宣传护法宗旨，准备进行护法斗争；另一方面，唐继尧也想利用护法时机，进一步向四川扩张，以称霸西南。就在孙中山到达广州的同一日（7月17日），唐继尧首先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随后又多次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内阁，声明："决心自主，不认非法内阁之命令。""谨奉告全国，自复辟事起以后，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39] 8月11日，唐继尧连发两电，正式宣布"护法"。他宣称护法的四点纲领是："一、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当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仍应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辞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一项办理。二、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开会。三、国务员非经提交国会同意，由总统正式任命，不能认为适法。四、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科办，以彰国纪。凡此四义，一以约法为依归，不能意为出入。"[40]

不过，唐继尧的"护法"，却采取了自立门户、别树一帜的办法，打出了"靖国"的旗号。孙中山领导的是"护法战争"，而唐继尧参与的却是"靖国战争"。所谓"靖国"，乃是"涵有别种在外滇军之意，非仅因护法之故"[41]。关于这一点，唐继尧1917年10月8日在致梁启超的一份密电中，曾加以说明："真日之宣言，实欲维正义……非与激烈分子为和声。"[42] 他所谓的"激烈分子"，显然是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而言的。因此，打着"靖国"旗号的"护法"，虽然壮大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声势，却掩饰不了唐继尧利用"护法"之名进行扩张

的实质。后来唐继尧拒绝就任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广州军政府的元帅职，正是这种实质的反映。唐继尧对此也作了绝妙的解释："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利益。"[43]

为了"靖国"，唐继尧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自任总司令，下属六个军，分别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靖国第一、二、三、四、五、六军总司令，准备大举入川。稍后，他又将四川汉军张熙部改编为第七军，新编叶荃第八军，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个营，总兵力约四万人，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自封为"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决定"全力定川，川局既定，再图第二步之发展"[44]。为此，他在给孙中山并各界的函件中声明："尧是决心亲督三军，长驱北上。第川事于中作梗，不先戡定，终难免内顾之忧。"[45] 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并将联军总司令部驻扎于贵州毕节，指挥滇黔军向川军刘存厚等部发动进攻。

在这次战争中，滇军最初失利，不仅丧失了川中盆地，川南也未能保住，直退到川滇、川黔边境的盐津、镇雄、叙永等地。11月以后，战事起了变化。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成功地突袭了重庆，北洋派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于12月3日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到湘、鄂，周道刚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旋即向川南进击，并于14日占领泸州。

12月8日，北京政府发表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受任督军后，在成都号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

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这样，军事形势又进一步发生变化。虽然在川东南的战斗（东路）互有进退，呈胶着状态，但川中和川西（中路与北

路）的联军却取得了比较迅速的进展。1918年2月16日，刘存厚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以图缓和局势。但是，这时刘存厚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军事上处于劣势，内部又不稳，所部纷纷脱离其控制，因而不得已于2月19日与省长张澜、川军钟体道师、田颂尧旅、赖心辉旅等部撤出成都，一直败退到陕南汉中地区。到2月20日，“川滇黔靖国联军”所属的纵队司令吕超、黔军司令袁祖铭及四川靖国军萧德明等部先后进入成都。至此，唐继尧以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就基本上结束了。

唐继尧控制了川、滇、黔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不经广州军政府同意，以“联军总司令”名义以电报直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并促其速赴成都就职（4月，孙中山才补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三四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出席会议的有：四川的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以及黄复生、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各司令，云南方面的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贵州方面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湖北方面的鄂军总司令黎天才[46]，河南方面的豫军总司令王天纵[47]等。

唐继尧于9月10日从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逗留一周之久，一方面故意冷落与会的各军将领，以显示“联帅”的威风，另一方面趁此时机联络各方，分化收买川军，直到9月17日，他才在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所有各码

头的渡船均勒令停靠对岸海棠溪。自太平门到学院衙门行辕，沿途断绝交通，每一铺户站一武装哨兵。沿街商铺及楼上窗户，一律勒令关闭。唐抵海棠溪，鸣礼炮二十一响。乘坐借来的美军摩托艇渡江，经太平门入城，仪仗甚盛，前列为护卫骑兵，次为御用的“饮飞军”（警卫军），头戴钢盔，身背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出巡的仪仗；再次为掌旗官，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才是唐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内放着绣龙金黄褥靠垫，轿后为唐的坐骑黄骠马，紫金鞍。殿后是其护卫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他入城后，即乘其黄骠座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他到达重庆后，竟然宣称“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意思就是要打破省界来兼并四川。而这时已排斥了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唐吹捧备至，居然说是“西南半壁，付托得人”[48]。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了早先7月在贵州毕节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所谓《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已在这个同盟书上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同盟即告成立。这个同盟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五点。第一，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即全归滇、黔军所有。第二，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第三，四川全省的厘税，包括盐税、关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即是作滇、黔军军饷。第四，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防地，仅以面积计算，已占当时全省的三分之二。第五，上述各项由联帅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唐继尧拿出同盟书，逼迫熊克武签字。熊深感事情重大，一签字就等于正式承认把四川划入云南的势力范围，因而表示无权处理，拒绝签字，并说：“北伐我完全赞同，出兵出款，四川应该尽力所及，兵工厂也应该尽量供给械弹，但全省厘税和兵工厂归总部直接掌管，这样重大事件要经省议会通过，我做不了主，即使我个人同意也没有用。”[49]

唐继尧从9月17日到重庆，至10月8日离开重庆的二十天内，翻来覆去地就同盟书条款进行谈判。根据同盟书，滇军提出每月需四川协济32万元，黔军提出每月需28万元，这样一年共需720万元。熊克武以四川无力负担如此巨款而要求重议，滇军方面坚持不能少，黔军方面则减为每月23万元。熊仍认为数额太大，断然拒绝。因此，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50]。唐继尧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匆匆收场，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与此同时，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国”相号召。这样，唐继尧俨然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51]。这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声威达到顶峰的时期。唐继尧正是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经营其扩张地盘的军阀事业。

还在护法战争进行之际，当1918年三四月吴佩孚先后占领长沙、衡阳等地时，南北双方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立即得到了以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的响应。6月，吴佩孚与南方湘系代表签订了湖南停战协定，这样湘系就成了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的中介人。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就进一步加紧了。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军事密约，详第八章第一节）。

唐继尧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使他与孙中山的距离愈来愈远。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国民党时，唐却正颜厉色地表示拒绝，甚至和龚争论得拍桌子。他最后说：“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52]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正在做着“川滇黔巡阅使”的梦[53]。

为了实现其“川滇黔巡阅使”的野心，唐继尧视四川为滇军的征服地，不仅恣意奴役搜括，而且进一步蓄谋“倒熊”，对川军进行分化，

挑动杨庶堪、吕超等部川军反对熊克武。1920年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刘湘为四川靖国军正、副总司令，这就又一次“点燃了川滇黔战争的导火线”[54]。5月下旬，新的川、滇、黔战争正式爆发。

这时，滇军在川有顾品珍、赵又新两个军。唐继尧命令顾、赵两军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攻击熊克武。虽然在6月10日把熊部赶出成都，转往川北保宁（今阆中），但滇军伤亡五千余人[55]，可见战况是比较激烈的。熊克武退出后，吕超进入成都，于7月18日就任川军总司令。然而，滇黔军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入与四川兵工、造币两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深感事关重大，“以民政应归省长管理，军人不得干政为理由，迁延未决”[56]。

是年秋，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川军务部，分路向成、渝两地及川南进攻。9月5日，吕超逃离成都，滇军败退。川军乘胜直追，驻川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被打死于泸州城外学士山。于是，滇黔军全线溃退，滇军直退到贵州毕节，驻川的客军全部被逐出了四川。唐继尧向四川的扩张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驻川的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原来就不满唐继尧强驱滇军混战，这时又得到熊克武的鼓励，遂以“士兵厌战”为由，准备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派周钟岳前往毕节，以慰问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虚实。周钟岳到毕节后，向驻扎毕节的顾品珍提出四个问题：一、此次我军退却之真因？二、我军经此次损失后，现在实力如何？三、现在军队如何分布？四、现在粮糈情况如何？顾品珍回答说：滇军在川计有两军，原有三万人，现只剩一万，枪械只余七千余支，辎重行李则荡然无存。然后反问周钟岳：“唐帅既促开和会，何必出兵以争四川？既废除督军之名，何必创树联军之帜？”周钟岳为唐辩解

说："联帅意将敌焰稍为压服，仍趋重于调和，并非有争川之心，始终不过欲排除护法阻碍而已。""废督之后，军队无人统率，则裁兵计划无从执行，地方治安无人保卫，故暂设联军总司令部，以为收束军队之机关。"[57] 周钟岳回昆后，向唐继尧汇报顾品珍的言行"殊属可疑"。唐为了稳定顾品珍，任命顾为云南东防督办。顾一方面宣誓就职，一方面又率师向昆明进发。驻省的叶荃第八军与顾品珍的行动配合，倒戈反唐。

在顾品珍大军压境，叶荃倒戈，内部分裂，军心动摇的情况下，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于1921年2月8日率亲信卫队百余人离开昆明，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

第二节　桂系军阀对两广的控制

一　桂系对广东的控制

袁世凯暴死时，陆荣廷的部队已深入湖南，占领长沙。北京政府拟任命陆为湖南督军，但是陆垂涎"财富之区"的广东，要在两广站稳脚跟，因此积极向广东扩张。这样就逐渐造成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控制两广的局面。

如前所述，袁世凯死后，在广东爆发了李烈钧滇军和龙济光济军的战争，龙济光战败后退守广州。由于龙在广东极不得人心，7月6日，段祺瑞政府迫于形势，宣布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驻海南岛；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但是，龙济光赖在广州不走。段政府在同一天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之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这个命令的实质在于，调开李烈钧，以拔除龙济光的正面敌人；派陆荣廷署湖南督军，以阻止他到广东接任广东督军。这个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段祺瑞又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

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但是，汤芗铭没有敢到广东来“查办”。

一心垂涎于“财富之区”的陆荣廷，坚辞湖南督军，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不予理睬，于7月10日由衡阳自动班师回广西，接着由广西带兵东下，进驻肇庆，压迫龙济光。而李烈钧也没有去北京，等待“另有任用”。龙济光在滇、桂军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提出卸职条件四条：一、济军二万人以上（虚报），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费三百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方屯驻济军，在此区域以内，其他各军均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按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不过，他在还未能实现这些要求时，即向广州索取开拔费五十万元，匆匆退出广州，进驻海南岛。李烈钧则于8月17日通电解除职务，将在粤滇军交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然后取道香港赴上海。10月2日，陆荣廷就在肇庆宣布就任广东督军，两天以后率军进驻广州。自此，广东军政大权落入了桂系军阀陆荣廷之手，广东成为桂系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霸占两广的局面正式形成。

还在护国军军务院结束之时，原属军务院的李耀汉、林虎两军都表示愿归陆荣廷统率指挥，于是桂系在广东的兵力进一步增强。陆任广东督军后，将桂系军阀的要员安插到广东，控制要职：以谭浩明率军驻广东，以莫荣新兼任广惠镇守使，以林虎兼任高雷镇守使，以沈鸿英兼任钦廉镇守使，以李耀汉继续任肇罗镇守使；广西方面，以陈炳焜为督军兼省长，以韦荣昌继莫荣新为浔梧镇守使，以林俊廷继陈炳焜为桂林镇守使，以黄培桂继谭浩明为龙州镇守使。经过如此部署，桂系便完全控制了两广的实权。所以有人说：“陆荣廷既据有广东，乃令其爪牙陈炳焜继承广西地位。躯壳虽离，灵魂尚在，预为统一两广之野心，亦作为两广巡阅使之张本。”(58)

1917年3月，陆荣廷接黎元洪电邀去北京会晤。其时，黎元洪总统府和段祺瑞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已很尖锐，双方都想拉拢、利

用陆荣廷。段想拉拢陆荣廷作为其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因陆是拥有实权的人物；黎则想利用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猎取到的名誉，希望他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作为他与段争夺的得力伙伴和心腹。陆于3月中旬从广州出发，经香港乘轮船直航上海改乘火车北上。沿途受到新当选的副总统、江苏督军冯国璋、安徽督军倪嗣冲、长江巡阅使张勋的欢迎。3月27日，陆抵达北京，下榻总统府怀仁堂。黎、段各设盛宴款待，礼遇甚崇。陆即利用这个机会，向黎、段双方讨价还价，以谋取得更多的权利。黎、段于4月10日升任陆为两广巡阅使，而且按照陆的意图，任命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至此，陆荣廷完全操纵了两广的军政大权，桂系势力“极形膨胀，一时（军队）编至七军”之多[59]，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各省中最大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陆利用黎、段之争，把两广统治权从名义到实际，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为当时全国颇有影响的人物和势力。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人曾写道：“西南实力派之巨擘，有广西王之称之陆荣廷……彼等在广西人中为最大阶级之物。不仅广西人而已，即长江以南，能与彼等比肩者，亦无几人。”[60] 有人评论，陆荣廷与北方军阀奉系头子张作霖、直系头子冯国璋已经并驾齐驱了，因而有“南鹿北獐”（“南陆北张”）或“北冯南陆”之说。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的实力已超过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的实力。桂系军阀控制地区的条件较之滇系军阀控制地区的条件更为优越富庶，更靠近国内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桂系军阀对当时全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明显。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对西南采取敌视政策，企图玩弄“武力统一”的把戏，这就引起了西南实力派的反感。西南实力派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不得不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因而和孙中山的护法反段找到了共同点。还在张勋复辟前夕，北京政局混乱之际，孙中山曾致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督军，指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呼吁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61]。6月14日，孙中山派胡汉民为代表前往广州，与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商谈护法讨逆。6月

17日，胡汉民又前往南宁会见陆荣廷，邀他去广州共商护法大计。陆荣廷托辞足疾，不肯起程。6月18日，广东各界在明经堂举行公民大会，要求省当局即日出师北伐。同时，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的日益增多，驻粤滇军亦跃跃欲试。桂系为了维持自己在两广的统治，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6月20日由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出面发出通电，宣布两广暂行“自主”。所谓“自主”，在民国初年还是一个新名词，与独立有所区别。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的干涉，但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元首。这就是说，自主是一种半独立状态，是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这是袁世凯死去后第一个宣布自主的地区。张勋复辟时，曾多方拉拢陆荣廷，先后授以陆为“一等公”，“两广总督”，“参预议政大臣”等名义，但陆始终不参与张勋的活动。两广自主为孙中山来到广州掀起护法运动提供了条件。

9月初成立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然而，宣布两广自主的桂系首领陆荣廷，不仅拒绝就任元帅职，而且反对另组政府，主张“总统复职”，甚至通电全国声明，“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问题，概不负责”。这等于否认广州护法军政府。其实，陆荣廷等人让孙中山来到广州，不过想拉大旗作虎皮，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帜，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非真拥护共和。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说，陆荣廷“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而已[62]。北方密探也说，陆荣廷“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63]。陆荣廷只是不要使自己的地盘“统一”到段祺瑞手里，也不能容忍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凌驾于他的头上，在两广出现一个“太上政府”。

陆荣廷等人不仅不就元帅职，还多方面干扰和破坏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实际上没有掌握任何军队，是一个“有同寄寓”[64]似的“影子政府”。这时在广东的军队，除了属于桂系军阀的队伍外，还有驻粤滇军和警卫军两种军事力量，而龙济光的

济军则已进驻海南岛。驻粤滇军是护国战争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来的。最初桂军与驻粤滇军尚能和平相处，但是后来由于驻粤滇军将领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人反对陆荣廷、唐继尧的扩张政策，因而发生了许多矛盾。

警卫军则是由朱庆澜建立起来的。朱庆澜在辛亥革命时曾任四川副都督，后任黑龙江巡按使、护军使，一度拥戴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时被逐出黑龙江。护国战争后，段祺瑞政府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长，是想利用他作为进攻西南的内线。但是，朱到广东后，态度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倾向于联合孙中山，这就引起了段祺瑞的不满和陆荣廷的嫉妒。朱庆澜吸收了一些民军和龙济光系统的杂牌军，组成了警卫军二十营，由省长亲自统率，这就形成了这个省在督军之外还有一个“督军”的局面，更加引起了桂系的仇视。桂系军阀要求滇军回滇，警卫军的统率权应划归督军。但是，滇军既不想轻易离去，朱庆澜也不想交出兵权。这样，朱自然更倾向于联合驻粤滇军与孙中山进行合作，以对抗桂系军阀的压力。为此，朱庆澜聘请了前广东都督、著名国民党人陈炯明、胡汉民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并经常邀请国民党人到广州会谈。

1917年6月24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借口自主时期军事指挥权应当统一于督军，令高雷镇守使林虎为接收警卫军的专员。朱庆澜得到滇军和国民党人的支持，拒绝交出警卫军。朱并与由上海回到广州的李烈钧商议，将警卫军与驻粤滇军改组为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第二两军，准备北伐。李烈钧首先通电就任第二军总司令职务，驻粤滇军师长张开儒、方声涛也发出“枕戈待命”的电报。但是，桂系军阀却拒绝提供北伐所需饷械。朱庆澜乃将警卫军二十营改称省长亲军，交陈炯明统率，由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亲军司令。桂系军阀于是集中攻击朱庆澜，“借口北方官僚不宜在护法旗帜下任省长为名，鼓动一些省议员倡议省长民选”[65]。同时，陈炳焜派兵包围陈炯明司令部，收缴其关防，迫使陈炯明逃往香港。朱庆澜也被迫于8月26日向省议会提

出辞职。省议会乃选举胡汉民为省长。桂系要求选出李耀汉，未被接受，陈炳焜便派兵一营移驻省议会，进行恫吓，夺去了省长印信，还以督军名义接管了省长亲军。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只得辞去省长职，省议会被迫另选李耀汉为省长[66]。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广东各界群起反对。孙中山气愤之余，在11月15日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的广东督军署，以驱逐陈炳焜。但程璧光拒绝执行命令，且将各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炮击督署计划虽未执行，但是孙中山与桂系的矛盾表面化了。加上北军南下，湘桂边境战云密布，陆荣廷为了缓和与孙中山的矛盾，决定调陈炳焜回广西，以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孙中山、胡汉民提出以陈炯明复任亲军司令，作为莫荣新督粤的交换条件。莫荣新被迫同意后，于11月22日就任代理广东督军职。

亲军二十营交还军政府以后，孙中山拟将这支军队改编为护法武装，一方面为了实行北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暂时躲避桂系的压力，保留这支直属军政府的陆军武装。为此，孙中山把亲军改组为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开赴福建。可是桂系军阀仍企图从各方面扼杀这支武装，从经济上卡这支武装的脖子。廖仲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多方筹款接济这支武装。何香凝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在上海的房子因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由仲恺亲自带到漳州交给这批驻闽粤军了。孙先生满希望这批军队将来可以成为比较进步的革命武装力量”[67]。

莫荣新独揽广州大权以后，继续刁难和破坏护法军政府，竟然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68] 莫荣新等还有计划地谋害支持孙中山的干部和身边卫士。金国治是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莫荣新把他绑架杀死。1918年1月2日，莫荣新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属粤系地方派军人李福林所部）的连、排长多人为“匪”，擅行逮捕枪杀，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十分气愤，为惩罚莫荣新的跋扈行为，于第二天（1月3日）命豫章、同安两舰炮击观音山的广东督军

署，并且表示："吾为民除害，今即以身殉，份也。"[69] 孙中山严正指出，当陈炳焜督粤时，"谓听军政府自生自灭"，"今则愈逼愈紧，只许自灭，不许自生"；炮击莫荣新督署，"实所以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者也"[70]。炮击督署是孙中山对桂系军阀反动气焰的一次回击。莫荣新莫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这以后，援闽粤军才得以在1月12日于广州东郊誓师出发。

然而，桂系军阀的倒行逆施只是略加收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嚣张了起来。是年5月4日，莫荣新竟然假唐继尧之命，强行剥夺了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滇军军长张开儒的兵权。5月12日，莫荣新又派兵拘禁了张开儒，枪杀了张的秘书长崔文藻。接着，在桂系的操纵下，又于5月20日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变大元帅制为多头的总裁制，使孙中山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而被迫辞职。孙中山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与桂系断绝关系。桂系军阀之上的"太上政府"事实上没有了，他们可以更加为所欲为了。

二　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

桂系对两广的统治，"凡百施为，无不本其强盗天性"[71]，致使两广人民深受其害。

陆荣廷对广西的统治确是无恶不作。"其种种敛钱之法，如开赌、加赋、发行纸币等，屈指难数。单就发行纸币而言，其数达二千余万，既无抵押，又无担保"[72]。加之其他各种残酷剥削和掠夺，以及水旱灾害频年，弄得工农业生产一蹶不振，民不聊生。陆荣廷在广西厉行专制统治，"将广西人所有之权利，完全收归于自己之一身。……广西一切幸福权利，只陆荣廷一人享之，一家享之，一派享之。……其余数百万人民，皆陆荣廷之奴隶也"[73]。陆荣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在武鸣霸占了四千多亩土地，建筑了豪华的"上将台"、"陆公馆"、"宁武庄"，还有纪念其父亲、叔父的"业秀公园"、"明秀公园"；在南宁、龙州等地建筑有"耀武上将军府第"和"陆

公馆”；在上海、苏州等地购置豪华的别墅。陆荣廷有妻妾八人、婢女几十人；家里养有桂林戏班，逢年过节或逢吉庆之日，日夜演戏，供其娱乐享受。陆荣廷为光宗耀祖，还联络陆姓人氏在南宁南门外兴建“陆氏总宗祠”。为了几个门额大字，竟挥金如土，悬赏“入选的每字一百元酬金”[74]。

桂系军阀拥兵据粤，实行封建军事专政，需要大量的军费和行政费，必然要对广东人民实行经济掠夺。就以军费支出的增加来看，比“南海龙王”龙济光统治广东时期还要厉害。龙济光统治广东时，1915年度的预算中，陆军费按月应支出毫银459，520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29，480元，共计每月889，000元，另每月兵工厂支出30，000元，总计年支出11，028，000元。桂系军阀进驻广东以后，军费逐年增加，1916、1917年度，陆军费每月支出645，000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48，284元，兵工厂费每月支出50，000元，共计每月支出1，143，284元，总计年支出13，719，408元；1918年、1919年度，各项军费每月支出2，271，551元，总计年支出27，258，612元。1920年度，各项军费支出每月约2，144，464元，全年支出约25，735，968元[75]。如此庞大而又不断增加的军费，主要依靠掠夺和榨取而来。

首先，加紧掠夺人民。设置名目繁多的捐税，致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虽前清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否则拿人酷诈”[76]。为了增加税捐，开放烟赌，结果使广东“烟苗遍地，赌馆满街”[77]。仅赌捐一项，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之多[78]。桂系军阀的敲诈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当莫荣新要撤出广州时，还提出要所谓“开拔费”5，000，000元。广州各团体代表商量后同意筹款500，000元，作为对桂系的“送行费”。莫一再讨价还价，硬要广州地方筹集2，000，000元，并进行各种威吓和诡骗，最后还是增加“让城费”到1，500，000元。这笔巨款的筹措办法是由省城商店、居民各抽租捐一月；赌馆捐三月，约400，000元，其余由银行垫支，以后再筹还。

其次，大借内债、外债。桂系统治广东四年多，所借内外债总额达1，600多万元[79]。其中日金4，740，000元，港纸1，024，259元，大圆纸1，520，000元，毫银4，956，681元，省行券143，000元，毫票4，272，679元。桂系所借外债的情况，参见下表：

桂系据粤时期借入债款表[80]

债权	借　额	起借日期	利率	未还数	担保抵押品
台湾银行	日　金 3,000,000	1917年4月2日	月息一分	2,656,476元	以士敏土厂及大沙头旧藩署广府衙门为担保品

（续）

债权	借　额	起借日期	利率	未还数	担保抵押品
台湾银行	日　金 500,000元	1917年4月2日	月息一分	140,000元	以烟草税70万元、牛皮捐26万元、屠牛捐23万元作按
	港　纸 40,000元	1918年11月13日		40,000元	
	日　金 760,000元	1919年1月17日	月息九厘	603,000元	以广东电话总局一切财产权利作担保及全省烟酒税收入作为偿还该借款本息。
李嘉生	港　纸 20,000元	1918年5月11日	年息一分	20,000元	准其完钨矿砂税扣压
李察纯	港　纸 100,000元	1918年10月25日	年息一分	70,00元	以粤省香山、海丰、陆丰、惠阳四县岁收矿税为担保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多数借款没有偿还；第二，借款多以税权作为担保；第三，还债负担最后又转嫁到人民群众的身上。

再次，抢占广东公私钱财。例如："广东中国银行被桂系提取现款"，由于现款提取过多，致使兑现停止，纸币价格一落千丈；"造币厂所出毫洋，概运回桂"；"兵工厂所出枪械子弹，悉数发给桂军，或运回广西"；甚至广雅图书亦"劫掠殆尽"[81]。至于专私牟利，更是家常便饭。桂系控制广东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由于战争的影响，粮食的国际市场价格猛涨。桂系军人见有利可图，即加紧在广东搜刮粮食，用官轮或军舰派兵护运至香港出售。每出口大米一

担，可获利2元以上，每轮可装六百至七百担，因此每运输一次，即可得利7000至8000元。桂系兵舰出口，都可以免于检查。有时上半夜运米出口，下半夜又运盐出口。这样，兵轮大搞非法买卖，每月可获巨利。桂系还与滇、黔军阀勾结，贩运鸦片至广东销售，亦获利甚厚。至于贪污舞弊案件，更是数不胜数。一个小小的排长有的发财至数十万元。1920年据梧州粤商调查，仅陆荣廷“寄贮于外国银行之黄白现金，约一千二百万元之多”[82]。这笔不义之财，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广东掠夺而来的。

第四，非法出卖矿权及资源。1918年10月25日，广东督军莫荣新、财政厅长杨永泰与英商烈察臣订立合约，出卖陆丰、海丰、惠阳、香山四处矿产，取得借款十万元。1919年6月，莫荣新、省长张锦芳与英商事业公司委托人路易加士、岑伯铭签订合约，广东政府允许该公司钻穴探查及测量南海、番禺等几十个县的煤炭等矿藏。签订合同后，其他人不得参与。成交后，莫荣新、张锦芳的广东政府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收入。

第五，纵兵作恶，残害人民。桂系军阀的部队，军纪荡然，士气低落。军阀们为了“鼓励”士气，纵兵寻欢作乐，胡作非为，因而桂军军行所至，淫掠焚杀，无恶不作[83]。1920年1月，“广东桂军在三水芦包某乡强奸全村妇女，四十岁以下莫能免”[84]。同年5月，桂军在广东新兴县天堂、河头等处，“任意抢掠财物，焚杀居民，该灾区百余村乡之财物，被抢掠一空”[85]。黄绍竑对此曾回忆说：“初到肇庆的时候，去林虎军中看俞作柏、伍廷飏，他们由新兴打完李耀汉回来，邀黄绍竑去参观战利品。那些战利品不是武器弹药，而是耕牛和家私什物，用条子标明是某连某排某人的，有些还标出价钱出卖。他们还问黄要不要。肇庆城满街都是这些东西。伍廷飏曾说，以前作战有护法护国的政治口号作为号召，骗士兵去卖死，现在只有用‘发洋财’来引诱士兵卖命了。”[86] 后来桂军兵败回桂，沿途仍大肆骚扰，“西江沿岸的圩镇，都被溃退的桂军骚扰抢劫，凄凉满目”[87]。

桂系军阀的残暴行为，终于导致了1920年孙中山领导的驱桂战争，使陆荣廷的统治宣告失败。

第三节　川黔两省军阀割据势力

一　川系势力

川系军阀是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其来源却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康藏地区，决定成立第十六、十七、十八三镇。四川不仅负担三镇的全部经费，每年还要定额接济邻省：西藏一百万两，云南五十万两，贵州四十万两，甘肃、青海各三十万两[(88)]。为了培养聚集军事人材，需要设立军事学堂，派遣青年出国学习军事。四川首先派遣周道刚、徐孝刚、胡景伊、张毅、刘鸿逵、徐海清六人，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随后，四川相继设立了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官弁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培养中下级军官。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四川军队的骨干力量，大多成为军阀部队的各级军官。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已建成的新军，仅第十七镇。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队已编为五个师，即宋学皋（后为周骏）的第一师，彭光烈的第二师，孙兆鸾的第三师，刘存厚的第四师，熊克武的第五师，而以胡景伊为全川陆军军团长，控制五个师。袁世凯死后，川军仍保留五个师的兵力，分别以周道刚、刘存厚、钟体道、陈泽霈、熊克武为一至五师师长。由于这时中国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无论是附袁川军，还是倾向护国军或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其首脑人物无不利用“南北角逐”的形势，乘机窃取和扩大军权，招募私人军队，发展个人势力。一些中下级军官，也逐渐坐大，占据一定的地盘。这些割据势力，无论南、北政府都鞭长莫及，只好采取居间操纵，使其互相牵制

的策略。这样，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四川的军阀势力就基本形成了。

四川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开始于1917年“刘罗”、“刘戴”之战，已如前述。战后，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为四川督军，但是段祺瑞又派吴光新入川查办，企图控制川、滇、黔地区。于是川、滇、黔联合起来赶走了吴光新。北京政府又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以张澜为省长。

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响应护法，联合滇黔军，共同讨伐依附北洋军阀的刘存厚，进占成都，刘存厚退至陕西宁羌。4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熊克武在当时的国民党人中不愧为革命志士，然而他当上督军后，处在封建割据和军人专政的环境中，也走入了军阀的行列。

1920年5月至10月又发生了新的川、滇、黔军阀大混战，熊克武联合川军各部，对抗滇黔军，结果滇黔军全线崩溃，退回云贵。从此辛亥以后客军驻川的局面结束。但是，四川本省各派系军阀混战的局面，却又延续了下去。川军此时扩大至十个师以上。

二　黔系势力

黔系军阀势力的形成是与刘显世分不开的。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字统之），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一言而决，居然盘江小朝廷气概。”(89)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营管带，从此他发迹。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他们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

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90] 这副对联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刘氏父子残害地方的无比义愤。

武昌起义后，贵州巡抚沈瑜庆曾调刘显世尽快进省，协同镇压革命。但刘显世招募的徒手五百人尚在途中，贵阳已于1911年11月4日发动起义，宣布共和。刘显世遂混入贵州军政府，担任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其徒手五百人均发给枪支，编为新军第四标。不久，刘显世于1912年2月2日发动政变，掌握了贵州军政府的实权。3月3日，刘显世等人又与入黔的唐继尧所率滇军相勾结，里应外合，突袭贵州军政府，杀害革命志士。3月4日，成立了以唐继尧为临时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的贵州政府，这样就建立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刘显世则被任命为贵州护军使（因贵州省小，袁世凯撤都督而设护军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中将。袁世凯称帝时，刘曾签名劝进。但云南宣布反袁独立时，从云南发出的讨袁通电中也列有刘显世的名字。他虽通电否认反袁，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不久，戴戡去四川任省长兼军务会办，所遗省长一职由刘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桂系军阀阳为赞助，阴则破坏。其时，唐继尧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自任总司令，而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军四川。然

而，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91]，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黔军取川东为立脚之地，仅1917年8月30日一次，就由重庆提取现款20万元回黔[92]。稍后，黔军又与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18万元[93]。黔军主力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近二万人。

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在贵州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代表的黔系军阀桐梓系。兴义系是以刘显世为首，在刘氏兄弟周围，形成了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和郭重光“四大台柱”为核心的集团。这个封建宗法集团的主要成员，非刘氏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刘显世在贵州建立的军阀政权，是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与旧官僚“三合一”的政权，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除了依附滇系向外扩张外，对内则实行封建军阀的统治。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贫瘠“为各省冠”的省区[94]，清末全省年支出约需银120万两，其中本省仅能收入40万两，还有约80万两要靠外省协饷。辛亥革命以后，协饷停止，然而军队日益扩大，军事活动频繁，财政支出逐年增长，例如贵州1912年支出为250万元，1913年为300万元，到1928年竟增至900万元之巨，入不敷出达一半以上。刘显世为解决财政困难，除向外扩张外，在省内则加紧盘剥和压榨，如纸币抽签兑换、食盐加税（每包加抽二两入口省税）、增加田赋和厘税较清末达一倍，开放烟禁等，使“物价骤涨，百物因而昂贵，社会之害遂不止”[95]。刘显世集团还从一般官员和士兵的薪饷中进行克扣，“黔省官俸微薄，久为中外所闻。弁兵薪饷与陆军定章相差几倍。以一师团全年之费，不过80万两，为各省所无”[96]。因此社会矛盾和刘显世集团内部的矛盾普遍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兴义系也分化为“旧派”和“新派”两大派别[97]。旧派以刘显世为首，新派则以王文华为首。

王文华，贵州兴义人，早年曾参加民主革命。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1911年王任刘显世徒手兵的前队官，贵阳光复后任

营长、刘显世的副官长、团长等职，护国战争时任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东路支队司令。袁世凯死后，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1917年9月，又任黔军总司令。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陆军第一师的组成，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这时，王文华罗致了自己的妹夫何应钦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委以重任，加上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形成了新的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和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派的智囊。新派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处于兴义系集团的中下层。他们不满于现状，权力欲望很强，因而新旧两派“权位争夺，夹杂着从南从北、联段（祺瑞）联孙（中山）的各种纠纷，就掀起了你死我活的一场政治风波”[98]。

新派利用人民群众对刘显世统治的不满情绪，以“刷新政治”为口号，争取民心，颇具吸引力和迷惑性。王文华、王伯群兄弟发起并操纵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成为“全省政治之枢纽”[99]，并召开“贵州政治会议”，“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100]。他们利用“军民分治”的口号，逼迫刘显世先让出省长一席。新派操纵省议会，推王伯群为省长，并要求广州军政府简任。何应钦与王文华兄弟相配合，除控制讲武学校和少年贵州会外，还控制了八十一县同乡联合会，并任第五旅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要职。

1920年初，唐继尧发动了进攻熊克武部川军的滇黔川联军行动，王文华乘机赶赴四川。他一面抓黔军军权，向外发展，一面清除黔军内部不附己的分子，对内待机观变。10月，入川黔军被迫回黔，王文华遂采取紧急行动。他在策划反刘显世活动的同时，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借口养病，留居上海，而以第一旅旅长卢焘为代理黔军总司令。11月，在何应钦、谷正伦的直接指挥下，谷正伦旅的孙剑峰营开入贵阳，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

杀死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及其子侄三人，迫使刘显世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这就是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民九事变”。卢焘以黔军代总司令、代省长名义统治了贵州。

但是王文华的代理人卢焘无力控制贵州，从而形成了“五旅争夺”（王文华部五个旅互相争夺对贵州的统治权）的局面，结果为袁祖铭所取代[101]。

黔系军阀除具有一般军阀的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依附性和掠夺性。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般要依附于邻省或国内某些较强的势力，以求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然后在这些势力的扶持和卵翼下，夺取贵州的统治权，形成地方军阀的割据。黔系军阀的鼻祖刘显世是依附于滇系唐继尧而成为独霸一省的军阀的。后来的袁祖铭、周西成都有类似的特征，只是依靠的对象不完全相同罢了。所谓掠夺性，主要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据地取财，攫取大量税款和枪械，扩充军队，饱填私囊。这两个特点，则是与贵州的贫瘠、弱小、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西南军阀中，除有滇系、桂系、川系、黔系等势力外，还有湘系和粤系势力的存在。关于这两个派系的情况，已在本书各有关章节中分别讲到，此处不再赘述。

---

(1) 罗佩金（1878—1922），字榕轩，云南澄江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和护国起义。1922年为唐继尧所害。

(2) 戴戡（1879—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人。立宪派。辛亥后任贵州都督府参赞，省长、巡按使，后参加护国起义。1917年战死。

(3) 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加

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响应护国起义。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1960年病逝。

(4) 顾品珍（1883—1922），字筱斋，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云南辛亥、护国起义，后任滇军军长，滇军总司令等职。

(5) 赵又新（1881—1920），宇凤喈，原名复祥，云南顺宁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护国起义，后任军长。

(6)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7) 《国民公报》，1916年9月3日。

(8) 《四川财政厅厅长黄大暹呈四川省长文》，《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59页。

(9) 杨兆蓉所著《辛亥后之四川战记》。该文还说，北京政府陆军部长靳云鹏有意将罗佩金的报告泄露给刘存厚，因为刘是共和党，与靳早有勾结。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

(10) 《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裁为步兵一旅给卢师谛旅长令》，《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66页。原件所注日期为1917年2月27日，误。

(11) 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25页。

(12) 《刘存厚叛乱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第95页。

(13)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台北版，第172页。

(14) 《刘存厚布告罗佩金向所部进攻的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77—278页。

(15)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16) 《东城碧血录》，黄绶：《罗戴祸川纪实》副册。

(17) 《四川省议会报告滇、川军冲突情况电》，《云南省议会请彻查刘存厚称兵犯上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79—280页。

(18) 《黎元洪发布刘存厚免职查办令》，《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79页。

(19) 《四川各界代表吁请消弭川乱根源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

辑，第285页。

(20) 杨兆蓉：《辛亥后之四川战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第52页。

(21) 《戴戡拟痛剿刘存厚电》（1917年7月2日），未刊资料。

(22) 《刘存厚致西南各省电》（1917年7月4日），《云南档案史料》第2期第27页。唐继尧在电报上批“不理”。

(23) 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28页。

(24) 《唐继尧》，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89页。

(25) 戴戡之死有不同说法，一说被杀，一说自杀。

(26) 钟和光：《“刘罗”“刘戴”之战在川南的继续和发展》，《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

(27) 唐继尧在李烈钧电报（1917年12月16日）上的批语。未刊资料。

(28) 唐继尧在徐之琛密电（1917年9月12日）上的批语。未刊资料。

(29) 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06页。

(30) 四川《古宋县志》卷9，第22页。

(31) 李根源：《书丁巳川事》（1917年），《曲石文录》卷2，1932年版，第22页。

(32) 关于唐继尧参加护法的情况，将由另章叙述。这里只从滇系军阀扩张的角度略加叙及。

(33) 《唐督军布告全国克日出兵诛讨复辟电》，云南《护国报》，1917年7月11日。

(34) 唐继尧：《致天津段总司令共同征讨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昆明1923年版，第28页。

(35) 《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年7月5日），未刊资料。

(36) 张开儒（1869—1935），字藻林，云南巧家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后历任滇军旅长、师长、军长、广州军政府陆军总长等职。

(37) 《唐继尧复张开儒密电》（1917年8月2日），未刊资料。

(38) 徐之琛在1917年7月12日致唐继尧密电中说："太炎有举公为总统之电。"未刊资料。

(39) 《决心自主复上海张镕西等电》，《再以反对非法内阁通告京内外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第36、39页。

(40) 《阐明四义拥护约法通告京内外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第37页。又见《云南档案史料》第3期，第15—16页。

(41)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389页。

(42) 唐继尧1917年10月8日致梁启超电，未刊资料。

(43) 唐继尧1917年9月16日复徐之琛电，未刊资料。

(44) 唐继尧1917年7月15日致李曰垓、李烈钧电，未刊资料。

(45) 《唐继尧致孙中山支持戡定川局函》，《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3页。

(46) 黎天才（1886—1927），字辅臣，彝族，云南丘北人。曾参加辛亥起义，后任师长、镇守使、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鄂豫联军总司令等职。

(47) 王天纵（1879—1920），字旭九，号光复，河南嵩县人。曾参加辛亥起义，后任北京地区稽查长、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等职。

上述两人皆宣称"靖国"，所部又驻扎川边，故参加了重庆会议。

(48) 四川省文史馆资料室：《重庆联军会议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入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

(49) 熊克武：《四川护法期间内部分裂与滇军入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7页。

(50) 参见《重庆联军会议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40页；又据周钟岳说："滇军每月要求补助军费28万，黔军要求18万，熊克武未允。故此次会议，效果殊少也。"（《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13页。）

(51) 关于唐继尧以七省、八省或十省联军总司令自命，说法不一，此系根据《唐继尧》一书第22章记载归纳。该章说："唐氏所指挥之靖国军，其区域则达八九省，人数则有二十余万。"

(52) 龚师曾：《孙中山先生与唐继尧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53) 刘光烈：《我代表熊克武赴北京活动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61、87页。

(54) 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10页。

(55) 张廷勋：《赵又新将军传》，《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58页。

(56) 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14页。

(57) 《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34—243页。

(58)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广州艺苑印刷所1921年印行，第2页。

(5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编，第337页。

(60) 园田一龟著，黄惠泉、刁英华译：《新中国人物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424页。

(61)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62)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页。

(63)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64)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37页。

(65) 郭翘然、李洁之：《粤军史实纪要》，《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8页。

(66) 《军政府成立详记》，《民国日报》1917年9月20日。

(67) 何香凝：《我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68)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8—19页。

(69) 叶声夏：《国父民初革命纪略》，第122—123页。

(70) 《民国日报》，1918年1月17日。

(71) 《广东讨贼第二军总司令李绮庵等致孙中山电》，1920年9月22日。

(72)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9页。

(73)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9页。

(74) 《中央日报》（桂林版），1947年5月28日。

(75)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52页。

(76)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8页。

(77)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78) 《申报》，1920年6月10日；《民国日报》，1920年7月22日。

(79)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23、47页。

(80) 据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参见夏琢琼、钟珍维：《旧桂系军阀在广东》，《西南军阀史料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81)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7页。

(82)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83)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84) 《申报》，1920年1月15日。

(85) 《民国日报》，1920年5月13日。

(86)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6页。

(87)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6页。

(88)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3页。

(89) 吴雪俦、胡刚：《贵州辛亥革命散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7页。

(90) 冯祖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0页。

(91)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汤志钧编：《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0页。

(92) 《渝埠要闻》，《国民公报》，1917年9月9日。

(93) 《紧要新闻》及《令分酌调款办法》，《国民公报》，1918年6月5、6日。

(94) 《论理财当从实业入手》，《贵州公报》，1912年4月13日。

(95) 《贵州民国以来政治大略》，未刊资料。

(96) 《龙巡按使呈大总统文》，《贵州公报》，1915年2月26日。

(97) 兴义军阀两派，历来有新派、旧派，少壮派、元老派，王派、刘派，武派、文派几种不同的提法。这里使用新派、旧派的提法。

(98) 桂百铸：《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20页。

(99) 《戴议员等上刘兼座书》，《刘兼座复函》，见《贵州公报》，1920年1月23日。

(100) 《贵州政治委员会组织大纲》，《贵州公报》，1920年1月21日。

(101) 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辛亥革命前与王文华同为刘显世部的队官。辛亥以后升至贵州陆军第二师师长，与王文华争夺权利而发生矛盾。1921年，袁祖铭与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将王文华刺死于上海。此后贵州陷入混乱之中，袁祖铭于1922年返回贵州逐走卢焘，自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然而1923年滇军又护送刘显世回黔，重任贵州省长。第二年刘又垮台。到1926午，桐梓系周西成掌握了贵州大权，开始了桐梓系军阀对贵州的统治。次年1月，袁祖铭被刺身亡。

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

第一节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

一　孙中山南下筹备护法政府

孙中山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北方局势的发展。

早在1917年5月22日，孙中山与岑春煊、章太炎、唐绍仪曾联名致电段祺瑞及众参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若与政客交换条件，使少数人得被擢用，而以国家为牺牲，无论官僚、民党，悉为国人之所不容。”[(1)] 同时，他又与章太炎等联名致电黎元洪及两院议员，指出“乱党独立，要求元首退位、国会解散，此但威吓行为，断不可长其骄气”；要求黎元洪“信赏必罚，勿事调停”；希望议员们“与宪法共死生……以保民国代表之尊严”[(2)]。随后，他怒斥“倪逆叛乱，附者八省”[(3)] 的反革命罪行，指出倪嗣冲一伙“举兵谋另组政府，为复辟先声”[(4)]。他揭露天津伪政府玩弄“拥护总统，解散国会”的花招及张勋借调停之名解散国会、大搞复辟的阴谋，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5)]。

孙中山从正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过程的表现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重要性。他认为黎元洪身为国家元首，在“群盗鸱张，叛形已著”的情况下，屈服于督军团的压力，“求与调和，以损元首之尊严，国会亦或自议解散。……不知国会一散，去中坚而存守府，叛党得挟

元首以令全国，反客为主，其祸更甚于反侧跳梁”，这种做法，“实同降伏”。因此，他指出：今日的中国，“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宜宣言拥护总统”[(6)]。冯国璋身为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时，“力能申讨而佯守中立，阴与周旋，兼为从中游说，迫胁元首，申请解散国会，实属通同谋叛”[(7)]。既然正副总统或者“降伏”叛逆，或者“通同谋叛”，完全丧失了充当国家元首的资格，那么，建立护法政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孙中山也从段祺瑞在张勋复辟的表演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紧迫性。段始则嗾使张勋复辟，继而打着“讨逆”、“拥护共和”的旗号，窃权盗国。这种“以叛讨叛、以贼灭贼”的行径，完全暴露了北洋军阀政府“乃与张勋争权攘利，而非拥护共和”[(8)]。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9)]。

鉴于护法各省因无正当的统一机关，“内无以号召全国，外不能交际友邦”[(10)]，“正式国会急切难成，而对内对外又不能不有继绝扶危之中心组织”[(11)]，孙中山决定加紧筹建护法政府的工作。7月1日张勋复辟事起，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孙中山一面先行通电否认副总统冯国璋有代理大总统资格，一面又把一度考虑实行的“驱黎”策略改为“迎黎”，因为他获悉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当天否认还政，对复辟政权“严词拒绝，誓不承认”[(12)]。与此同时，孙中山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13)]，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致电西南各省，强调今日的中国，“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14)]。7月5日，黎元洪派总统府军事幕僚长金永炎抵沪谒见孙中山，说明黎决意辞职，现避居日本大使馆，将印信移交冯国璋副总统。而冯于6日抢先在南京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同日，程璧光派军舰四艘赴秦皇岛，迎黎元洪南

下，但黎执意辞职，终不肯行。

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这个策略上的改变是正确的。因为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和他长期从事革命的策源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是西南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枢。从历史上看，那里无论是粤军或驻粤的桂军、滇军，在护国战争时期都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参加“革命”、“拥护共和”的光荣经历，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在督军团祸乱北方期间，两广宣布“自主”最早，陆荣廷为了保存和发展两广的地盘，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采取了某种对抗形式，这在客观上也为护法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15)]。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组织内阁，遥戴黎公”[(16)]。于是孙中山在7月6日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7日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张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在粤召集国会及请黎元洪前来执行大总统职务。19日抵广州，出席省议会欢迎会，与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孙中山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定大计；如法定人数不足，可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朱庆澜表示赞成。陈炳焜态度暧昧，以“南方力薄，经济困难”为辞，加以推托。孙中山逐一解释，并希敦促陆荣廷东下合作，“陈始无言，勉强同意”[(17)]。同日，孙中山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18)]。

二　海军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

在孙中山护法的号召下，早在1917年5月底，当倪嗣冲宣布安徽独立，派其侄倪毓芬为“北伐军”司令，率兵直迫丰台之时，海军总长程璧光即以复辟祸起，大局危迫，电令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驻扎大沽，以资镇慑。随后，督军团集会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拟成立伪“临时政府”，程璧光乃于6月4日清晨入见黎元洪，告以张勋复辟的严重性。他说：“今叛督称兵，围困京邑，凌迫元首，危害国家。为大总统计，宜急离京暂避其锋，免为要挟。西南各省，暴力所不逮，璧光愿躬率舰队，护我大总统南下，号召义旅，歼除横逆，庶几共和可保，国命有托。愿大总统速行勿疑。”[19]　黎元洪犹豫不决。程璧光敦促再三，但黎始终未能下决心，只要求程先行出京，集中舰队，相机行事。程璧光于6月5日离京，临行前夜访伍廷芳，探询他对时局的看法。伍回答说：“国事至此，若图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孙中山、唐少川（绍仪）、岑云阶（春煊）三君虽在野，未尝一日忘国事，现皆居沪。君抵沪，必与计议，国事可为也。”[20] 程9日抵沪，拜会孙中山。孙促其即行出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2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程璧光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27日，孙派人送交麦加利银行支票30万元，以作护法军饷之用。7月4日，程璧光和卢永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指出：“造此逆谋，不特四万万人艰难缔造之共和国体将为所绝，四千年之文明国家将为所覆，且逆世界进化之潮流，招万国舆论之侮笑。”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清帝制之余孽，杜汉奸之蔓延”[21]。21日，程璧光收到孙中山关于粤省欢迎海军南下的电报后，随即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自吴淞口开往广东，计海圻、海琛、飞鹰、永丰、舞凤、同安、永翔、楚豫，连同过象山时增加的福安、豫章两舰共十舰，一万二千余吨。唐绍仪、汪精卫等同行。他们在沪发表“养电”——《海军护法宣言》，宣布海军讨逆三大目标：“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拥护国会；三曰惩办祸首。”表示“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必使已毁之约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

状。元恶大憝、为国蟊贼者，无所逃罪，然后解甲。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皆无根据，当然认为无效。发此命令之政府，当然否认。”[22] 这篇宣言在段内阁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之前三日发表，实为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第一声。24日，广东省长朱庆澜致电程璧光，热烈欢迎海军护法来粤，表示广东省政府“以拥护约法，回复国会，划除国贼，为一致之进行”[23]。8月5日，海军舰队全部抵黄埔。

海军护法南下，鼓舞了正在苦斗中的孙中山，震动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激起了广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壮大了西南护法运动的声势。6日，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集会欢迎海军南下，“到会者，数逾数万”，盛况空前。各界代表争先发表演说，“淋漓慷慨，闻者咸为动容”[24]。

三　孙中山成立军政府

孙中山通电全国主张择地另开国会，重新组织临时政府。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先后至沪，住在法租界恺自尔路惟善里国会议员通讯处。孙中山抵粤后，致电国会议员来粤开会。广东各界也通电表示欢迎。至8月中旬，南下抵达广州的议员已达一百五十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事宜。与会者认为，北京政府既已毁废约法，向护法各省用兵，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为了对内团结护法各省，对外实行独立自立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议员人数虽不足法定，可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19日，南下国会议员一百余人在广州回龙社前烟酒公卖局原址第一招待所举行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问题。决议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称，定于8月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七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随后南下议员通电西南各省，指出：“同人等昔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

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惟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段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荷重要，亟待讨论，爰绎主权在民之用，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二十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25)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到会祝贺。粤督陈炳焜仅派代表列席。29日，国会非常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二十一条，规定国会非常会议以现任国会议员组织之；国会非常会议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之。31日，国会非常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共十三条，其主要内容如下：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军政府设立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者任之。

显然，这个《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是为了适应戡定叛乱的战时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作为《临时约法》的补充而存在的。其特点是把恢复《临时约法》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在《临时约法》未恢复以前，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对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力；对总统则虚位以待。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出席议员九十一人，孙中山以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翌日选举元帅，唐继尧得八十三票，陆荣廷得七十六票，均当选。余一名元帅原预定为程璧光，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居此名义，会议乃从缓议。同日下午，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及国会议员数十人，乘舞凤舰至黄埔，举

行大元帅授印仪式。吴景濂致大元帅颂词道："民国不造，倪、张倡逆。国会解散，大法扫地，以启清廷复辟之变。段祺瑞与张勋，同恶相倾，迭为起灭。孱清斯覆，而大总统亦被废斥。国法圮绝，民无所依。景濂等以为救拯焚溺，不可格以恒轨。用是依准法国前例，开非常会议于广州。佥谓大盗移国，非武力不能镕治，西南各省与海军第一舰队，兵力雄厚，士心效顺。而部曲散漫，未有统帅，殊不足以取齐一之效。即于六年八月三十日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九月一日，投票选举。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悃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续，不胜郑重期望之至。"[26] 旋由王正廷代表授印。孙中山致答词说："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畔换，频烦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义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以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27]

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表就职宣言，痛斥北京政府"权奸当道"，祸乱中华，"侵约法宣战媾和之权，辱国会神圣立法之地"；"嗾贼兴戎，以肇解散国会之祸"，张勋应机复辟，"民国根本，扫地无余"。宣言指出："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所赖海军守正，南纪扶义，知民权之不可泯没，元首之不可弃遗，奸回篡窃之不可无对抗，国际交涉之不可无代表也。"于是召开国会，"以文为海陆军大元帅，责以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之事"。孙中山最后表示：因为身与共和死生相系，"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28]

经孙中山提议、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任命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　伍廷芳　　次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　唐绍仪

陆军总长　张开儒

海军总长　程璧光

内政总长　孙洪伊　　次长　居正

交通总长　胡汉民

除各部总长外，军政府还任命若干军政长官：

军政府秘书长　　章太炎

军政府总参谋长　　李烈钧

军政府海军总司令　　林葆怿

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　　李福林

大元帅府参军长　　许崇智

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　　陈炯明

大元帅高等顾问　　吴景濂

川滇劳军使　　王　湘

湖南劳军使　　林祖涵

从上述各部及各部门任命的人员看来，军政府是由国民党、海军

及驻粤滇军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一开始就采取“虚与委蛇”的消极态度，桂系没有参加政府工作，这就决定了军政府将是个短命的政府。

四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

军政府的成立及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力量，促进了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

四川：当军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四川的时候，11月1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告独立，并致电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表示“拥护真正之共和，扫除非法之政府，爰举十邑之地，州【卅】营之众，遥承军府，近联滇黔，为国讨贼，虽死不避”[29]。唐继尧将该部编为靖国军第七军，任张煦为总司令。3日，颜德基以“四川靖国临时司令”名义，在绥定（今四川达县）通电独立，声讨段祺瑞祸国殃川罪行，宣布与西南一致行动。12月14日，陈凤石在大竹县宣告独立，通电护法，自任为“四川靖国招讨司令”。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旅长王祺　在合川通电护法，被军政府任命为四川靖国联军川北总司令。1918年2月16日，川军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在乐山宣布拥护西南护法军。17日，川军一、三两师全体军官联名致电李烈钧，表示加入西南护法军。18日，川军一、三两师及刘成勋、陈洪范、汪可杰、舒荣衢各旅再次联名宣布与西南靖国、护法各军一致，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湖北护法力量迅速发展。1917年12月1日，鄂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门（今江陵县）宣告自主，组织湖北靖国军，并电请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取一致行动，还致电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痛斥段祺瑞“施袁（世凯）故智”，“藐法徇私”，煽动叛乱，怂恿复辟，“乘机攫踞大位”，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以巩固共和国基，恢复约法为目的”[30]。孙中山复电表示祝贺说：“义帜飚举，共誓讨逆，露布传来，欣喜何极。”指出“荆沙为大江师旅树之

先声，从此西通巴蜀，南连三湘，奉提挈左右，共规大计，会西南之雄锐，清河洛之氛祲”[31]，并派张伯烈、蒋文汉前往犒师慰问。同日，原鄂军第三师师长王安澜率旧部于鄂豫边境宣布独立，3日通电进驻随县、枣阳一带，决心“与西南各省一致进行，负弩先驱，整旅北伐，会师武汉，直捣京畿，迎还总统，恢复约法，巩固国基，促成法治，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竟西南护法之志”[32]。6日，鄂军第一师一团在黄州（今黄冈县）宣布自主。10日，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率民军攻克广济，次日占领黄梅，自称鄂军总司令，随后攻占施南、利川、咸丰、来凤等县。16日，襄阳镇守使黎天才通电宣告自主，并就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决心跟石星川“誓同生死”[33]。孙中山复电黎天才表示祝贺。黎天才随即攻新野，克天门，夺宜昌，击溃北军吴光新部，有力地配合南军的湘南作战。

陕西：护法运动发展广泛。1917年11月25日，焦子静等在白水县通电宣布自立，筹建陕西护法军，并发布讨伐陕督陈树藩檄文。12月4日，陕西龙驹寨（今丹凤县）驻军王明敏等以护法军名义，占据商（县）、洛（南）一带。11日，陕西警备军分统领耿直在西安发动政变，赶走陈树藩。21日，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告独立，就任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声明护法讨逆，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次年1月25日，胡景翼部营长张义安在三原独立。27日，胡景翼、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县赶到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发表檄文斥责陈树藩“甘作倪、段之螟蛉，实为共和之蟊贼”，声称“高搴义旗，进据三原，陈师河北，直逼西安，为西北特树风声，我与东南遥相策应”[34]。随后曹世英、胡景翼分任陕西靖国军左、右翼总司令，各自独立。后高峻、郭坚、卢占魁等部亦加入，2月8日攻占临潼，17日占领西安。3月8日，陕西靖国军全体军官会议举唐继尧为川、滇、黔、陕四省靖国联军总司令。

安徽：1917年11月22日，程蒯等通电护法，宣布成立皖北讨倪军，声讨倪嗣冲倡言解散国会，阴谋复辟，次日攻占寿县。1918年3

月12日，安徽含山县李雨春等举义，称护法讨倪军，攻占县城，释放囚犯。

浙江：1917年11月26日，宁波驻军通电宣告自主，与浙省军民两署脱离关系，组成宁波独立军，设浙军司令部于宁波，综理军民两政事务，推前督蒋尊簋为浙军总司令，宣称“誓必荡除叛逆，兴复约法，还我国会，厉行自治”[35]。同日，温州、处州宣布独立，与宁波取一致行动。绍兴、台州、严州等处也随之响应，或宣告独立，或声称自立。

湖南：继湘南自主之后，1917年10月2日，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五师三团团长宋鹤庚联衔通电宣告自主，声讨段祺瑞蹂躏约法、解散国会的罪行及湘督傅良佐标榜实行“以湘治湘”的祸湘计划。11月9日，宁乡护国军数百名占领县署，宣告独立。

此外，山东靖国军、福建靖国军、河南自主军相继起事。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的烽火遍及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36]。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或者是革命党人举义讨逆，或者是爱国将领反对段祺瑞武力兼并，或者是北洋系的军人反戈抗段，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打起护法的旗号，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并想方设法取得军政府和孙中山的领导和支持。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使孙中山受到莫大的鼓舞。他曾计划把各地分散的护法力量纳入军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具体部署是：由唐继尧统一滇、黔、川三省兵力，攻取四川，顺江东下；陆荣廷统一粤、桂及驻粤滇军援湘，协同程潜、刘建藩抗击北军的入侵，夺取湘省，直趋江汉；黎天才、蔡济民攻占湖北，挥师北指；陈炯明、李烈钧率粤军攻闽袭赣，西上武汉；黄复生、熊克武北击祁山，东进荆襄；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统一中国。但是，由于西南

军阀的牵制和破坏，各地护法力量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孤军作战，不能在军政府和孙中山的统一指挥下形成一支有坚强领导的护法武装力量，因而自生自灭，最后终于导致失败。

第二节　南北战争的开始

一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其战略部署

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对付西南护法，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1917年8月6日，段特派其心腹大将、北洋“四大金刚”之一的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特派其内弟、北洋“四大金刚”之一的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

关于四川省的变幻离合情况，前章已有述及，这里主要叙述和分析湖南战场的情况。

护国战争后，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拼命扩编军队，到1917年下半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全国正规军已由护国战争时的五十万人增加到六十四万人。其中北京政府陆军部直辖的部队，由袁世凯死前的十三个师三十二个混成旅（团）增加到十七个师四十三个混成旅（团），约合四十七万四千余人（不包括全国警备、巡防部队）。这是段祺瑞赖以发动内战的基本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所统辖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十个师，广西四个师，由唐继尧指挥的驻云、贵、川六个师，由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包括巡洋舰三艘、炮舰六艘、其他辅助舰四艘）以及各地的护法军、靖国军、护国军，共约十五万人以上。虽然总兵力不及北洋军，但南军在本地区作战，可将大部分兵力投入火线。因此，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南军与北军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护法军政府所在地，但南北争夺的前哨战是在湖南。正如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所指出的：“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37] 这就是说，段祺瑞要想统一中国，必须先征服粤、川，“而粤宜急”。要夺粤，必先攻湘。因此，湖南成了北洋军阀进攻的首要目标。

陆荣廷清楚地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38]。他认为“湘督易人”，是段祺瑞政府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妄想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露骨表现，唇亡齿寒，必须认真对待，于是赞成率两广军队援湘。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一致议定：一、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二、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三、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四、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五、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这是孙中山为军政府统一领导护法各军所制定的战略方针。

二　湖南的争夺战

1．北军三路夹攻湖南，南北战争开始

早在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政府就派其心腹大将、前陆军次长傅良佐代替湘督谭延闿，并调北洋第八、第二十师入湘，南北战争行将一触即发。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9月29日，代总统冯国璋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常国会，“擅发伪令，煽动军队”，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严缉交法庭依法讯办”。10月1日，段祺瑞与《大陆报》记者谈话，声称将“出师剿

灭”南方军队，表示对反对派领袖“政府必不宽宥”。在北京政府如此咄咄逼人面前，陆荣廷邀请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赴桂，参加护法援湘会议。3日，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陆荣廷在会上谴责段祺瑞“蔑弃约法，目无国人”，指出“国事鼎沸，日趋险恶，推原祸始，系段祺瑞一人之过”；声称：“今余所抱宗旨，在使谭延闿复职，撤回湘省北军，然后再与段氏谈法律。欲达此目的，非实行征伐不可”，号召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讨贼”[39]。会议决定由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通电，痛斥段祺瑞毁法叛国，制造内战，“构衅川湘，不惜以西南各省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供其牺牲”[40]的种种暴行，同时提出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撤退傅良佐四项主张。会上还决定：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入湘后，谭自称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军政府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陈继祖为参谋长。广西出兵四十五营，广东出兵三十五营[41]，共组成五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为第一至第五军司令。10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查段祺瑞实为首逆，倪嗣冲为叛军之魁，梁启超、汤化龙为主谋，朱深假藉检察职权，公然附逆，着各路司令一体进剿，有能擒斩以献者，本大元帅当视厥等差，予以厚赏。”[42]

至此，以南北对峙为主要形式的护法战争正式拉开了战幕。

湘南自主，傅良佐十分恐慌。当时只有第八师两个营抵达湘阴，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同时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府既决计用兵，宜即从速准备，先发制人。京保各队务望迅饬开拔，加速运送，现我军分两路进攻衡宝，近甚得手。再得一、二旅协力猛攻，一鼓而平。一面仍盼中央迅电赣、闽龙（济光）准备进行，俾两粤军队不敢实行援湘。一俟湘境肃清，彼自无能为力”[43]。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左岸开进。22日，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所部接战。28日，李军第一团第一营不愿“以湘攻湘”，

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刘建藩、林修梅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投入护法军，或携枪逃散。一旅之众顷刻瓦解。傅良佐欲一举扑灭湘南起义军，使“两粤军队不敢实行援湘”的企图就此落空。

9月28日，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统一组织指挥湘南作战。10月初，桂系召开南宁会议，决定大举援湘，通电公开讨逆。随后，段祺瑞即下讨伐令，命湘南王、范两司令分兵三路夹攻湘南：正面攻衡山，右翼攻宝庆，左翼攻攸县。此时，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旅长张纪）相继开抵长沙。稍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及第三师闵文湘旅。

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反戈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为之一振。从9月底至10月初，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和广西陆裕光所部由旅长贲克昭率领的先头部队，先后抵达衡阳，加上林修梅部原有五个营（包括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所辖两个营），使衡阳地区的护法军增至四十营，约一万五千人。这时，程潜受孙中山的派遣，也由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护法军的进军路线是：粤军由第四军司令马济率领约七千人，从广州出韶关，经湖南耒阳向攸县、醴陵、长沙进攻，是为右翼；桂军一路由第一军司令韦荣昌从三江入湘，经新宁逼宝庆，一路由第三军司令陆裕光部和第二军司令林俊廷部从全州经永州、祁阳、衡阳攻长沙窥岳州，由谭浩明指挥，是为中部；湘军由湘南总司令程潜、第一师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指挥，约二万余人，自宝庆北上，是为左翼。两广三路入湘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

南北两军在湘南地区展开了厮杀，其大战役计有衡山之战、宝庆之战和攸县之战。

2．南军轻取长沙

正当南北军在湘南鏖战之际，北洋开入湘南的主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电称："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客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藉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为息事宁人计。此次湘南自立，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44] 18日，"长江四督"（直督曹锟[45]、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也联名通电，主张撤兵停战，与护法军和平解决，电云："伏顾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46] 赣督陈光远还发表宣言，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北洋军队假道江西开往湖南，要求停止川、湘两省的战争。

王、范的通电停战主和及"直系四督"的热烈响应，是直系头子冯国璋"和平混一"政策与皖系头子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冯派势力倒段的具体表现。

王、范均是直隶籍人，因乡谊关系加上派系关系，都直接听命于冯国璋。他们当初离京出征请命之时，段祺瑞态度坚决，百般激励，冯国璋则不以为然，欲言又止，略露反对武力解决西南之意。王、范默揣到冯国璋的意图所在，入湘后又不满于傅良佐的飞扬跋扈，因而消极怠战，静观形势的发展。在湖南"网开三面（即衡山、宝庆、攸县之战）、全面作战"之时，傅良佐"深恐湘乡有失，衡山后路可虑"，

便商同王、范，要求他们一面“进攻衡阳之背”，一面“正面奋力进剿”。但是，王、范却采取不合作态度，联名复电声称“兵疲力尽，万难作战”，要求“速找调人，令各方面一律停战”，并哀叹“战固不能，守亦不可，撤退亦难”[47]，唯一的挽救办法是双方立即“停战媾和”。段祺瑞一直要直系军人打头阵，在连续作战中，王、范部队损兵折将。为保存实力计，他们秉承冯国璋的意旨，不愿继续为段祺瑞卖命了。

王汝贤、范国璋于发出主和通电的当天，不经北京政府许可，就自行停战，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右路朱泽黄部和左路李传业部收缩兵力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走北兵狼子”的怒喊，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是日，省城绅商组织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公推王汝贤为办公处主任。

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是北洋军的嫡系王牌军。这两军擅自停战求和，犹如晴天霹雳，给段祺瑞当头一棒。为了挽回湖南的惨败局面，他被迫对王、范采取笼络办法：一面将擅离职守的傅良佐、周肇祥先行免职，听候查办；一面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段祺瑞在命令中特地指出：“王汝贤等身任司令重寄，统驭无方，以致前敌败退，并擅发通电，妄言议和，本属咎有应得”，但因“悔悟尚早，自请处分，心迹不无可原。此次维持长沙省城，尚能顾全大局，暂免置议”。段要求王汝贤等戴罪立功，并说：“倘再退缩畏葸，贻误戎机，军法具在，懔之慎之！”[48] 这个命令，是冯派势力对段派的另一个胜利。王、范停战求和，打乱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计划，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军法”处分，反而把皖系的心腹干将傅良佐逼走，取代督军和省长的地位。于是，他们一方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另一方面向南军提出维持南北两军现有界线，一切问题留待谈判中和平解决的主张。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后，向北推进，连克湘

潭、株洲，直趋长沙。北军节节败退，王、范被迫逃往岳阳。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湘军总司令程潜电令其“扫径以待联师，勿得发生何种名义”。21日，程潜赶到长沙。第二天，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但谭浩明立即令程“勿得擅自建立，致涉纷歧”。于是，12月8日，程解省长兼职。12日谭到长沙，18日宣布“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这样，谭浩明把湖南划入桂系势力范围，完全剥去了“以湘治湘”的伪装。他自居三省联帅，陆荣廷就变成湘粤桂三省巡阅使了。这时，谭延闿又搬出“以湘治湘”口号大造舆论，迫使北京政府于12月下令“特任湖南省长谭延闿兼署督军”。8日，谭致电北京政府提出五项主张：“（一）对于中央命令并无抵抗之意；（二）赴湘就湖南省长兼督军之任，特请中央准其将驻岳州等处之北军一律撤退；（三）现驻湘境之桂军，应由该省长向谭浩明交涉，请其退出湘境，勿庸政府干预；（四）湘省叠遭兵火惨焚，商民萧疏，应由中央拨予巨款，维持市面；（五）湖南原有陆军两师，仍须照旧募齐，担任本省防务。上述数项，如中央不表同意，决不就职。”[(49)] 谭延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与北京政府讨价还价，无异承认了段内阁的合法地位。由此可见，在一片胜利声中发生于长沙的这幕争权夺利的闹剧，生动地反映了湘粤桂联军以“护法为名，地盘为实”的军阀性质。

三　段祺瑞内阁的第二次倒台

傅良佐的仓皇逃走，宣告了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11月15日，段向代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16日，他给北洋系将领一份密电说：“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结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此不顾

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一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柢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者，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种而后快。王汝贤等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决藩篱，落彼陷阱也。”他在电文中还说：“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倘能达我愚忱，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50] 这份密电随即被报纸披露了。它半是谤文，半是哀歌；既是一篇绝妙的辩解词，也是一篇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段祺瑞攻击南方对北方采取“利用、离间、诱饵”的策略，“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亡国灭种而后快”，实是他以己度人的写照。

“四督”响应王、范通电主和，激怒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段祺瑞。他愤于冯派将领逼迫太甚，于11月20日再次提出辞职。22日，代总统冯国璋自以为夺取北洋军政大权的时机已到，毅然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又令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免职。段祺瑞第二次内阁宣告倒台。

第三节　南北和战之争

1917年11月28日，日本国会议员菊池来电请孙中山派人访日，电称：“俄国内乱，由俄之德俘煽成，恐有入中国煽动扰东亚和平

者，对支政策一变。昨阁议决定，与协商国商议，使南北妥协，中国早归平和，南方须多让步，勉求东亚大局一致，此际认为必要。至急派西南各省之人于日，代表南方各派，以在日有信用之张继、汪兆铭为宜。”孙中山随即致电唐继尧，征询他对于派张继、汪精卫赴日的意见[51]。这里所说的“阁议”，显然是指日本寺内内阁的态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强迫南方护法政府作出让步，促使南北妥协后的中国纳入日本侵华战时轨道的阴谋，这样就增加了中国南北和战之争的复杂性。

一　护法军内部和战问题的分歧

北洋将领停战主和的通电，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始终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南北调和。他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52]。随后他致电孙洪伊，指出议和“当以取消非法机关，恢复旧国会为唯一无二之条件”[53]。与此同时，他揭露日本寺内内阁插手我国“南北和谈”的阴谋，强调指出：“南北和议，本不容外国干涉，但恐为强有力者所制，是为可虑。”[54] 当他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那里获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与日本连起来，而且对德宣战”时，就明确表示：“我赞成日本维持中国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据孙中山后来透露，他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拉开做两半”。他说：“我那时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单拿外交来征服中国，就在请中国参战这个表面名称里头，打算着用军事统辖来征服中国了”，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果然能牵制着日本军阀的计划”[55]。他在复头山满等人的信中再三强调“解决今日时局，以恢复国会为唯一之根本”。除此之外，不求其他条件。“背乎此者，则无论示以何种条件，文必不甘承认之。何也？为图中国之长治久安，实舍巩固国体外，无

他道耳。”[56] 他也深刻地看到了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致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劝李在南京独立，勿为日本寺内利用。他在致孙洪伊电中，要孙转告李纯，“如南京宣布独立，军舰当可一致相助，文或乘之来沪，以取淞浙，为李督后援，请李放胆做去，断不致孤立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寺内决定方针，使中国南北调和，利用我人众物力以攻俄国，此事若成，中国其高丽矣。”“此时救亡妙策，在南北分离，庶不致为寺内利用，劫持中央，以临各省。我能分立，寺内无所施技；中国不与寺内一致，寺内当不敢建攻俄之策，盖除中国之人众物力，世无足以御德俄者。文决日美之败，更速于英法也。望将此意设法传布国人。”[57] 这里，孙中山从大局出发，用分离南北以抵御日本侵华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看到了日本侵华政策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性，表现了远大的政治眼光。但他对协约国将败的看法，却不合乎实际。29日，孙中山复电李纯，重申停战必须以完全恢复约法、国会为条件，电称：“惟是军政府与西南诸省，既以护法讨逆为职志，倘能约法国会完全恢复，创乱诸逆依法惩办，并由正式国会解决总统内阁诸问题，则半国之兵不难一朝而罢；否则法治难复，共和徒有虚名，劳师旷日，士气忿郁，口舌既穷，战祸益烈，亦非执事息事宁人之意也。”[58]

由于陆荣廷热衷议和，一意孤行，甚至抢在北京政府停战令发表之前首先宣布停战，孙中山对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表示愤慨，因而他把希望寄托在滇军头子唐继尧身上。12月7日，他致电章太炎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除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至此，危险实甚！”但他认为黎天才、石星川举义荆、襄，联军亦攻下重庆，“大江脉络，可望贯通”，形势为之一变，“此实一大转机”，请章敦促唐继尧迅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石之鄂军会师武汉，造成逐鹿中原之势。在孙中山看来，“武汉三镇，桂所必争，倘能为我所有，即形势略定”[59]。10日，他又致电促唐继尧等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昌。该电指

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故于近日荆襄举义，概称之为暴动，其态度可见。惟各方对于此举，多不赞同。现海军及滇粤军已于佳日开始向闽出发，荆襄及南阳已先后举义，滇黔联军已下重庆。文于黄河流域，亦有大部分兵力布置，不久即可由弟发动，望莫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悉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60) 但唐以川中尚未荡平逆军为词，拒绝东下援鄂，回电声称："北方言和并无诚意，特缓我师，乘间图南。此间早已窥破，故始终一致主张，积极进行。惟以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61) 当北方的皖系主战派加紧调兵遣将，南北战争乌云密布，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李纯有声援南军的表示时，孙中山再次致电促唐继尧克日东下。他说："伯兰（孙洪伊）敬日电云：'段复出，局势大变，北兵陆续南下，并决议先取南京。宁督已悟，调停无望，且借调停，以缓我师，决以宁力抵抗。日昨已密下动员令，军队已由浦口出发，事机迫切，请转唐、莫、谭三督及西南各军，迅速一致进行。'……查此间所得各路消息，宁已动兵，已成事实。但恐孤立无援，长江或为北军所蹂躏，深望贵埠军克日东下，以分北军之势。武汉北军，久无斗志，事必有成。协和（李烈钧）、竞存（陈炯明）攻闽之师，已继续出发，若共和有幸，得以保全，破贼必矣。"(62) 但唐继尧和陆荣廷一样，对孙中山采取虚与委蛇的敷衍态度，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州，会师武汉的大好时机。

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他们按兵不动，忙于争权夺利，静待和议的发展，一切问题消极等待谈判中解决。他们认为进攻岳州，就要冒破坏直桂联盟，从而促使直皖两系重新结合的风险；反之，不进岳州，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协议。于是他们一再催促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宣布停战，甚至迫不及待，于11月24日复电李纯转大总统，赞成"四督"主和通电，并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5日他们获悉冯国璋颁布停战令后，28日谭浩明奉陆荣廷之令，以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停战。该电称："顷奉府院通电，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

决，自应照约法停战，请转知前敌各军遵照办理，以便磋商条件等语。希即遵照办理，饬令前敌各军，暂时先行停战，以便磋商条件。”是日，谭又致电直、苏、鄂、赣四督军说：“诸公雅意调停，解决大计，三军额手，申庆和平。业经令饬前敌各军即日停止作战，以期解决。惟迭据前敌前路报告，岳州方面，北方连日增兵，似以准备激烈作战举动。桂粤各军团昼夜不安，而湘军愤深之气，尤勃勃难遏。……伏望通饬各军前敌军队一律停战，并将驻岳各军完全退出湘境，以表示和平决心。”[63] 12月5日，谭浩明致电唐继尧，要求“西南一致，以免纷歧”[64]。12月9日，陆荣廷无视孙中山反对停战谈判的呼吁，背叛广州护法军政府，暗中与冯国璋秘密勾结，通电主和。他给程璧光和莫荣新的电报中说：“迭接冯代总统来电，主张调和，直苏鄂赣亦与前军提议停战条件。海军出发，可否少缓日期，暂候解决，以免发生冲突，请两公协商斟夺为盼。”[65] 这一主张，遭到程璧光的强烈反对。程在复电中尖锐指出：“冯总统及直苏四督主张调停，似应遵从，惟旧国会尚未恢复，岳州北兵尚未撤退，停战确无担保。况莫擎宇据地称兵，李厚基增兵来援，我不攻人，人日谋我，潮汕一日未平，粤疆万难镇定。在粤海军派出五舰，滇军方师长派出一旅，于九日由省出发，径讨潮汕。如果中央诚意调和，俟潮属完全收复，再行相机进止。”[66]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对和战问题采取两面派手法，态度暧昧。唐一面于11月28日致电孙中山，慷慨陈词，坚求护法，声称“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若“执政者必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南方各省人民宁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能偷活于暴戾淫威之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67]。另一面他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遥相呼应，于12月4日致电直、苏、鄂、赣督军，宣布已令驻川滇军实行停战，并请代陈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唐继尧反对停战调和是假，目的是为了敷衍孙中山；要求停战调和是真，其如意算盘是为了谋求个人权位，实现军阀割据。

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处于战争第一线，生死存亡，利害攸关。他们坚决要求乘胜夺取岳阳，认为不攻下岳阳，长沙也保不住。程先后于12月6日致电陆荣廷“请以武力解决岳阳问题”；10日致电西南各省，指出北洋政府继续增兵岳阳，不能“轻与议和，致中诡计”；12日致电孙中山，强调“非有激烈之战，岳阳问题不能解决”，宣称“潜等率师只有言战”。他认为，既然“调和已成一说”，也该考虑调和条件，其原则是：一、恢复国会；二、惩办祸首；三、北军退出岳州；四、裁减北方军队；五、应规定全国兵额；六、解决四川问题：七、放逐奸邪[68]。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等热烈支持他们，“主张根本廓清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以缓我攻取岳州之师，阴则厚增援兵以为由岳再犯长沙之计”，断言“调和之说，最足误人”，要程潜“联合两粤援军，迅速决计攻取岳州，一面分派劲旅固保常德，遥为湖北荆、襄声援”[69]。

滇军驻粤第三师师长张开儒提出了和谈十条原则：“（一）恢复旧约法之效力，以固国体；（二）恢复旧国会以促成宪法；（三）请黎大总统复职，如黎公辞职，则由国会解决；（四）组织合法内阁，以促进改良政治之程序；（五）惩办叛督及新旧帝党以除祸根；（六）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以免死灰复燃；（七）解散非法之参议院；（八）反对肥私殃民之一切卖国借款；（九）厚恤义军阵亡将士；（十）取消逮`捕民党之伪令。”他强调“以上十条如有一未做到，万不能罢兵”[70]。

综上所述，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包括湘军和驻粤滇军将领），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原则上也赞成和平谈判，但反对无原则的妥协调和，不能使“武力战胜之军队蒙政治上之失败，蹈丙辰单

独议和之覆辙”[71]。这是军政府内部真、假护法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在和战问题上矛盾斗争的反映。

二　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的争吵

段祺瑞政府虽然再次倒台，但段本人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退居幕后指挥。段的心腹、陆军次长徐树铮为挽回北洋败局，重新组织力量，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潜在势力蠢蠢欲动，直皖矛盾开始激化了。

日本寺内内阁的全力支持，是段祺瑞东山再起的重要因素。12月3日徐树铮致各省督军密电中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讯，称以各省不挽留为疑。经弟切实告以我辈但求国家治理，不争意气权势之私，若后任能施善政，我辈为太平百姓，讵不甚美。若其不然，时势自有相需之日，相机而发，迎刃立断，《孙子》所谓‘解棼丝不控拳’也。此时各省之沉静，正见我辈秩序。彼闻此说，极意赞服。……又询此次结局如何，答以在个人之见，恐不免小则苏、赣易人，大则东海（徐世昌）出而收拾云云。彼即立电寺内，详报一切。昨燕孙（梁士诒）自日来电，言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权助）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所关甚大，特飞闻。又昨电议和条件尚有惩办祸首一条漏列，所谓祸首者，段、倪、汤、梁（启超）、吴、傅及弟也。”[72] 这里，徐用“利害相通”四字形容皖系军阀与日本寺内内阁的密切关系，证明了日本寺内内阁是北京政府的幕后操纵者。徐用“时势自有相需之日”答复日本对段去留的提问，反映了他对段的复出充满着信心。他寄望于徐世昌出来收拾残局。从此，徐世昌处于直皖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了时局的中心人物。

督军团的密谋策划，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败而复起的直接推动力量。12月2日，在段祺瑞、徐树铮的策动下，经曹锟、张怀芝邀

集，晋、奉、闽、皖、浙、陕、黑、沪、察、绥、热七省、三区督军、都统、护军使代表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商讨对西南的和战问题。与会代表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会议初步制定了两路进攻湖南的计划：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军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会议还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数目：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一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73]。显然，这种无视北京当局的自由联合行动，是督军团干政的复活，是皖系主战派对抗直系主和派的赤裸裸的宗派活动，因而对冯国璋、王士珍是个很大的威胁。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十人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明令，讨伐西南。关于这次天津会议，据当时亚东通讯社刊登的消息，有人分析说："天津会议之发生有三个原因，而曹、王、陈、李四督军之巧电，实为其大关键。先是巧电未公布之前，时局已极浑沌。奉天张督特电直隶曹督军，征其对于时局之意见，以便取一致之行动。曹复电有讨伐无调停语。及此电发布，张严电责曹，以为不独国家大事不应如此儿戏，即朋友私交，亦不可如此无信。曹于巧电实未与闻，接电后气愤不可名状，遂决欲主战，以谢张督，此第一原因也。巧电之发生，实由江苏李督军派员赴津与曹督军接洽，表示调停意见，征曹督军同意。曹循例答以极表赞成，而李遂发出巧电。曹于事先实未闻知，各方接洽者，多至宁而不至津。曹尤愤李，故为独树一帜计而有天津会议，此第二原因也。直、鲁两督于前日先后来京会晤时，即彼此谈及时局，曹表示主战，张尤愤甚。两督言语极为投机，即同车赴津，召集会议，此第三原因也。"[74] 其实，这三个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直系实力派曹锟骨子里是个主战派。据说，徐世昌曾告诫曹锟："从此北洋军人团体解散，皆诸君之过，他日为人鱼肉，悔且莫追！"[75] 曹锟顿然大悟，开始从附和主和一变为坚决主战。这次督军团天津会议是北洋将领中皖系主战派阴谋策划对直系主和派的反击，也是主战派决心重新点燃南北战火的严重步骤。

冯国璋为了贯彻执行其“和平统一”政策，一心想促成南北和议。他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谈判中解决，并命其心腹大将、江苏督军李纯与陆荣廷接洽。与此同时，前西南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也在沪倡议和平，电请北京政府速颁停战令，责成内阁“罢兵尊法”，与“直系四督”通电主和相呼应。11月25日，即在陆荣廷发起南北停战第二天，冯国璋通电宣布停战。该电指出：“国势濒危，人心厌乱，操戈同室，夫岂本心？迭诵南京李督军与陆干老来往电文，希望和平，正与鄙意符合。本拟早日发布，以定方针，只因内阁易人，辗转访求，迁延时日。……或恐明令一颁，或生反响，不如先从两方面剀切晓示，使其涣然冰释。区区苦衷，当蒙鉴谅。但在此犹豫期间，若双方稍有冲突，势必难以收拾。请各饬现在交战地点之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进行，听候解决，不过一星期，当有分晓。”[76] 但一星期过去了，和谈毫无进展。12月4日，“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电请冯国璋正式宣布停战。但在主战派的逼迫下，国务院任命直督曹锟为攻湘援鄂“第一路总司令”，鲁督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令各率其部“应援鄂赣，以定大局”[77]。18日，冯国璋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这样一来，不仅军事指挥大权仍然操纵在段祺瑞手中，而且“参战督办”有权任命官员，插手外交，指挥作战，无异于第二个内阁总理。

为了促进和局早日实现，李纯派其高等顾问李廷玉同冯国璋的私人代表王芝祥先后亲赴广西武鸣，同陆荣廷面谈和平条件。陆提出恢复国会，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停止湘粤进兵，以换取两广取消自主，作为护法军谋和的基本条件。24日，李廷玉致电湖北督军王占元说：“昨抵武鸣，当将调解苦衷，并种种碍难内幕，痛切陈明。干老（陆荣廷）闻之，颇为见谅，并谓：‘尊重法律，拥戴河间（冯国璋），始终如一。段阁倒后，无他问题，只在双方撤兵，赶速恢复国会，俾黄陂（黎元洪）正式辞职，河间依法继任，一切善后处置，静待中央解决，遵令而行。连次电止湘粤进兵，并劝两粤取消自主，以

示同心排解，早息阋墙。乃停战命令迄未明颁，两段（段祺瑞任参战督办，段芝贵任陆军总长）进据要津，曹（锟）、张（怀芝）等同任司令，且龙（济光）就巡使，兵迫雷州。岳军进兵占据黄沙一带，各将校连电报告，且来责言。万一在此调解期间发生冲突，不特前功尽弃，且恐时局益危'各等语。玉云：'春督（王占元）既作调人，万无进攻之理，但湘军前方有此电告，自应电询春督，期得真相，以息群疑。'所有驻岳各军，是否前进，抑或部下妄动，尚未退还原扎地点，均希速示，以免有碍调停。"[78] 25日，冯国璋经多方疏通，终于颁布了弭战布告。该布告强调欧战之后的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更无内讧之理"，重申："国璋夙以平和为主旨，久拟警告同胞，早弭战祸。徒以荆襄忽又自主，潮汕攻击不休，以故迟尚未发。近日上将军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广西督军谭浩明等，均有遵饬所属各军停止进争之表示，陆荣廷且有劝告桂粤取消自主之宣言。此天心厌乱之机，即人事昭苏之会，中央与各省均应表示同情。深愿容纳劝告，解息纷纭，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事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若或尔虞我诈，藉和平之标目，逞侵略之野心，斯全国当视为公敌，既非国璋所愿闻，抑亦重违陆荣廷等劝告之本旨矣。"[79]

但是，弭战布告虽下，战争阴云未散。直皖两派主和、主战的不同立场，导致了在国会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如前所述，张勋复辟失败后，西南护法各省一再坚持恢复旧国会，北京政府硬要召集临时参议院，而冯国璋则采用折衷办法，主张通过和谈实现南北统一，同时取消旧国会和临时参议院，再根据旧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从而产生新总统和合法的新政府。但按照旧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皖系对新国会的选举是无法控制的，因而极力反对。12月31日，主战派之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卢永祥、张敬尧等十督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总统。显而易见，皖系反对恢复旧国会，反对南北和议，妄想通过由他们一手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一方面在北方进行所

谓新国会的选举，另一方面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包办西南各省的选举，从而以“政治倒冯”和“用兵西南”的办法，双管齐下，控制大局，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冯国璋洞悉皖系这一阴谋，暗示“长江三督”于1918年1月4日通电主张解散临时参议院。对此，主战派恨之入骨。5日，皖系督军团再次集会于天津，反对恢复旧国会，请代大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冯不便拒，但不发明令，只发电令照议决案施行”[80]。10日，北京政府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电令直、鄂军队进攻荆、襄。这是冯国璋对主战派的让步。但他不以“总统”名义下令，而用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办法，于9日对前方战士发出讨伐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很清楚，这是企图对南方的“全面讨伐”缩小为“局部讨伐”。同日，北京政府在声讨石、黎电中，强调“查荆、襄、随、枣均属鄂省内地，石星川、黎天才等于息争盟令布告以后，仍复多方扰乱，实属形同匪类，贻害商民”[81]。这就是说，把北军进攻荆、襄看作是“剿匪”行为而非对西南用兵。同时，冯国璋又请王士珍向陆荣廷的代言人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1月下旬，冯国璋又以个人名义致电岑说：“中央（对荆、襄）的讨伐，实为被迫而然，且有不得已之苦衷。执事若能转知荆、襄按兵不动，听候解决，则政府必当命鄂省不以治匪区域待荆、襄，非独鄂省之利，实亦大局之福。”[82] 他这种两面敷衍的态度，引起主战派的不满。徐树铮连续密电其同伙，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今日解决时局的关键，“仍应从整理政府入手”，“更易一总理，政府便可厘然清明”[83]。他进一步具体地说：“欲求国事进步，非先更易阁王（士珍）、苏李（纯），万无着手之地。李去则赣之陈（光远）无能为，惟虑其才不足当此要冲，即可量为移调。王去则河间（冯国璋）亦难为害，不妨暂置。王去极以东海（徐世昌）出任为策之至长。盖河间虽可暂置，究恐无颜自处，懊咎之余，益以惊悴，一旦天良发现，自悔违誓之愆，必无永年之理。继大任者，除东海外，自无可议。……陆欣老（陆荣廷）只可暂时维持。万一河间猝有不测，中央仍陷于困境，仍须另出他计。”[84] 这里，徐树铮主张在继续对西南用兵之前，必须从改组政府入手。从直皖之间的和战分歧发

展到谋倒王士珍内阁，逼李纯下台，推徐世昌出山，甚至预言冯国璋之“必无永年”，可见直（冯）皖（段）二派怨毒之深了。

随后陈炳焜、王芝祥先后到达南宁，与陆荣廷、李廷玉举行会谈。双方首先达成协议，免去龙济光两广巡阅使及任命陆荣廷为湘、粤、桂三省宣抚使，由李、王于1月12、14日分别电致北京政府，请予明令发表。但冯国璋接电后，对陆、龙任免迟迟不敢发表，使北方这两位会谈代表很是为难。于是他们商定，由陆亲致冯国璋、王士珍各一书，让李廷玉先行北返，携书面陈一切。李离南宁前夕，曾致电李纯，对冯的犹豫不决十分不满。王、李作为直系主和派的全权代表与两广实力派陆荣廷进行和平谈判，而双方达成协议的一项先决条件，竟不能付诸实施，其处境狼狈，可想而知。李廷玉在电中把和议迟迟不能成功归罪于冯国璋的优柔寡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事实上，当时北京政府已大体上接受西南实力派条件。23日，徐树铮给皖系各督军电透露说：“府中今日定稿交国务院电致西南要人，提出中央议和意见：一、国会以旧法新召；一、岳州北军调回，以西南人物督湘；一、陆荣廷如愿巡阅两粤，仍可复其原职，并兼粤督，龙（济光）则另作安置；一、川中许驻滇军一师半，划江为界。黔军亦可照前清保盐路办法，留驻一旅以上云云。”[(85)] 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之争，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集中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导致了后来直皖战争的爆发，无论是皖系主战派还是直系主和派，他们都尔虞我诈，两面三刀。这是北洋军阀集团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三　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岳阳为湘省门户，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自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落入北洋军阀手里。1917年11月中旬南方护法军占领长沙后，要求攻占岳阳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桂系首领陆荣廷急于保存地盘，按兵不动，使南北处于不战不和的混沌状态。12月1日，荆、襄

自主，武汉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从主和变为主战。督军团天津会议决定向西南下讨伐令以后，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但皖系主战派置之不理，吴光新、张学颜等竟于1918年1月14日开始发动进攻，荆、襄先后陷落。

早在1月上旬，正当北军利用和谈之机加紧调兵遣将的时候，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阴东北）连续召集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率该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箕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破岗口（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所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军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则为总预备队。16日，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兵岳州。18日，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他在训词中慷慨激昂地指出："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敌。"[86] 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克箕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是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右翼托坝被攻破后，王金镜向北京政府告急说："北军所有队伍已全数开至前线，对于北路，再无兵可派，现拟收集守城官兵及卫队两连，背城一战，如仍不支，今晚岳城恐失守。"[87] 24日上午，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敌包围，急求援兵，第二天拂晓被迫退往康王桥（亦称三眼桥）。王金镜命萧耀南死守，"作背水一战，以挽回危局"[88]。当天，他再电向北京政府告急说："现时敌人多，有两师之谱围攻左翼乌江桥及桃林一带地方，势

甚危急。若无援兵，必至不支。然岳州已无援兵可派。查汀泗桥尚驻有安武军多营，如能使其由长安驿下车，径攻敌之右侧，庶可解围，请电令王督转饬或径电该军火速遵行。”[89] 但援军未达，乌江桥已失守，萧旅残部争相逃命，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

这次湘粤桂联军攻占岳阳，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第一，湖南人民要求驱逐岳阳北军的情绪日益高涨，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等早就奔走呼号，跃跃欲试。这是桂系军阀所无法强行压制的，否则必然会影响桂系军阀在湖南的领导地位；第二，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对桂系军阀占领长沙后按兵不动十分不满，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会促使军政府与湘军的联合，从而影响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第三，北军进攻荆、襄，湘省吃紧。北方直系主和派不能控制局势，皖系主战派的兵锋必然指向湖南。因此，为自身生存计，为确保两广地盘计，桂系军阀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岳阳。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当时的形势是：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会战，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因此，南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即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军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并致电李纯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为首的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90]。湘军总司令也致电李纯宣称：“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91] 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1917年11月联军占领长沙后，岳阳指日可下。前面提到，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分别于12月内宣布独立。随后，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率领旧部起义护法。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荆、襄“北趋彰、许而抵幽燕，南则与湘、蜀两省互为提挈”，乃是“南北竞争之点”[92]。因此，荆、襄自主，武汉陷于孤立，“河洛幽燕，大为震动”[93]。鄂督王占元一面电北京政府，乞兵增援，一面调兵遣将，组织鄂省军队围歼靖国军。北京政府也惊恐万状，匆忙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急措施，决定立即增调重兵由陕、豫、皖三面入鄂，幻想用一千万元的专款，削平黎天才等起义军[94]。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在王占元的支持下，北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两大“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旅“围剿”石星川部。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十六省督军、都统，先后于1月8日、13日两次电促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14日，北军向荆、襄发动进攻，其进攻兵力之分配为：襄阳方面，第三师吴佩孚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攻。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由于桂系谭浩明坐视不救，靖国军孤军作战，众寡不敌，荆、襄遂于22和27日先后陷落。但2月7日黎天才乘吴光新部的主力聚集荆、沙之机，突袭第二旅留守部队，占领宜昌。这时，湘粤桂联军已攻克岳阳，王安澜军据守荆门。不久，黎天才放弃宜昌，进据巴东一带，准备接应滇、黔、川靖国军出川。3月19日，在孙中山的再三催促下，唐继尧发布出兵援鄂令，分别委任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路总司令，石青阳为援陕第一路总司令，率领一万余人，出川援

鄂。4月初，滇军先头部队抵达巴东。但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之战夺回岳阳后，又派一部分兵力沿长江向四川进攻。于是，南、北两军相持于宜昌、荆州之间。

四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南军夺取岳阳，武汉人心浮动。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李纯等直系主和派“优柔适以贾祸，姑息更足养奸”[95]。1月8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上，有人建议惩戒李纯，这个建议虽未获得会议通过，但也引起冯国璋的注意，他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纯作为主和的倡导者，既不能见信于西南护法各省，又受主战派的无端攻击，十分灰心，乃于11日电请辞职。李纯的辞职虽经冯国璋一再挽留而作罢，而湘、鄂战事的复起，使和谈时断时续，前途渺茫。

为了摆脱皖系的羁绊，冯国璋于24日邀王士珍、段祺瑞一起访徐世昌，商讨和战对策。席间，冯突然提出“为了团结和巩固北洋派，决定亲征”。他说：“近日旧同袍对于自己均不见信，拟亲赴直、鲁、蚌、苏再转鄂，面相信誓。”徐世昌“未置可否”，段祺瑞“力以为非”[96]。但冯仍执意前往，于26日携带幕僚及随从一旅，由津浦路乘专车南下，准备到南京与李纯会见。27日岳州落入南军之手，鄂督王占元惊慌失措。第二天李纯通电主和，说“岳州失守，奉中央密令，仍主调和”[97]。该电恰值冯南下出巡之时发布，引起主战派大肆攻击。当冯国璋车抵蚌埠时，被段系干将倪嗣冲所阻，只好于29日扫兴折回。冯返京后的第二天（30日）向西南下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进兵湘鄂，特派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两湖宣抚使，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兼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命令他们“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98]。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以曹锟为总司令的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集中蒲圻、嘉鱼一带，准备袭取岳阳；张敬尧率领第七师另两

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到汉口后，移驻汀泗桥，进攻湖北通城。曹锟于2月6日到汉口坐镇指挥。以张怀芝为总司令的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阳，张之杰的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和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冯玉祥率领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此外，以杜锡珪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率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等五舰，由水路开进，以策应陆路进攻。

护法联军方面兵力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在岳阳；刘建藩部在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在岳阳至羊楼司之间。桂系这种部署，其目的明显在于胜则居功，败则先退。

1．岳阳攻守战

2月26日，吴佩孚抵达蒲圻，兵分两路进攻岳阳。第三师主力及第二、三、四混成旅，由蒲圻沿武岳铁路进攻南军的正面防御阵地；王承斌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沿江岸进攻岳阳侧翼。27日，吴佩孚亲自指挥主攻部队向联军第一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并于当日占领羊楼司，第二天乘胜攻占了新店诸要点，占领了万峰山高地，突破了联军第一防御阵地。3月10日，北军开始对联军第二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实行钳形突击战术，先以优势兵力向云溪西面战斗力薄弱的湘军侧翼猛攻，企图击溃湘军后插入云溪，截断羊楼司的后路。湘军闻讯，自动后撤。此时守卫羊楼司的联军第三军司令陆裕光正由岳阳乘火车满载军火北上，一闻前方失利，便下令掉转车头南逃。北军于11日上午攻克羊楼司，15日占领云溪，16日上午对岳阳发起总攻。右路之第一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攻陷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突入岳阳城内，因怕联军埋伏，旋又退出。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联军未经坚强抵抗，当晚弃城南逃。18日上午，北军占领岳阳。

联军岳阳之败，显然是败于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无意与北军在湖南战场上决一雌雄。如前所述，早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一部分部队撤回广东，以便巩固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势力，扫除境内的异己力量。岳阳攻守战揭开后，他鉴于北军两路进兵，水陆夹攻，气势逼人，眼看湖南战斗就要爆发，长、岳既无险可守，江防又无海军护卫，联军腹背受敌，作战地位十分不利，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赌博，便决定必要时保全实力，不战而退。桂系这种不准备应战的消极态度，决定了联军在湖南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

2．平江之战

平江地处山峦地带，北与湖北通城相接，系长沙东北的重要屏障。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全部和鄂军、直军、安武军各一部，准备进攻平江，3月中旬已在通城一带集结。3月11日，北军分三路进攻平江，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所部向梧桐山、梅仙市方向进攻；以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各率所部从两翼前进。当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在花凉亭的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左纵队占领麦市，次日攻下盘石铺，直插天岳关。18日，北军相继占领了大州、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中央纵队进攻梅仙市，遭到六千余湘军的反击，激战两昼夜，不分胜败。后来北军除主力部队正面追击外，两翼采用穿插战术。联军刘建藩无心再战，22日平江为北军占领。北军开进平江，张敬尧采取“三天不封刀”的野蛮办法，在他的纵容下，士兵以搜索残敌为名，闯入民舍，烧抢淫掠，无所不为。三天后才贴出所谓安民告示，但也无济于事，奸淫抢劫的情况并无改善，其惨状为南北之战以来所未有。

当北军疯狂向岳阳和平江进攻时，坐镇长沙的湘鄂桂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岳阳失守，联军各路退到长沙，谭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上，互相推诿责任，争论不休，什么问

题也没解决。岳阳被占后，谭浩明还胁迫长沙商会搜刮军饷，并于当日发出“四言韵示”的安民布告，声称“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99]。但到了3月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省“联帅”竟弃守长沙，率领所属桂军溜之大吉了。

谭浩明走后，长沙陷入无政府状态。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兵一弹地开进了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并犒赏攻克岳阳和长沙的将士各三十万元。

3．湘东之战

4月初，段祺瑞政府鉴于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广东龙济光登陆阳江后，正遭受护法军的反击，乃确定北军的作战方针为“定湘援龙，同时并举”[100]，“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阳攻郴州援粤，阴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101]。根据上述方针，北军占领长沙后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张怀芝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以吴佩孚之第三师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夺衡山、衡阳；以张敬尧之第七师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浙江一师援闽，解龙济光之围。

联军弃守岳阳、长沙后，陆荣廷决定：湘粤联军全部退到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唐继尧率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两广桂粤军集中主力讨龙，以除去侧后隐患。4月下旬，谭浩明将大部分军队撤回广东，他本人于22日由衡阳退驻永州，而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湘军见桂军撤退，也急向后撤。24日，北军中路军吴佩孚不战而占领衡阳。

4月15日，北军左路军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的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驻扎在攸县城外，以便伺机夺取永兴、郴州，直逼粤境。20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由萱州渡过湘江，秘

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恰好迎击了来犯的施从滨师。23日，湘军赵恒惕、刘建藩等部队从五个方向对攸县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北军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跑，湘军光复攸县，毙敌千余人，俘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随即分数路追击北军。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慌乱败退，放弃黄土岭，分向萍乡、浏阳和株洲逃跑。湘军乘胜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李传业等师旅，纷纷向长沙、萍乡撤退，首尾不相顾，均溃不成军。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只剩两营，李传业的安武军也伤亡过半，形势对北军很不利。

但是，这时的陆荣廷却极力避免在长沙地区与北军主力决战，不仅不协同湘军进行大规模反击，且将接应湘军的部队撤退，以致丧失了重占长、岳的大好时机。5月1日，刘建藩不幸在株洲渡河时失足身亡。张敬尧一面急调进攻宝庆的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率第七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这时，湘军突然失去勇将，加上腹背受敌，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随后，田树勋旅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和耒阳。至此，湘东的拉锯战宣告结束。

五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1月30日，即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的当天，岑春煊通电提出南北划分的主张。他认为现在全国和战之争，都集中在湘、鄂二省，“岳固湘辖，北军原不必屯兵；鄂本主和，西南亦无须敌视。各守疆界，两不相侵”，呼吁南北当局维持现状，互不侵犯，“释兵戎而息内纷”[(102)]。31日，李纯致电孙中山，也提出为今之计，只有双方“勿再前进”，才是“战和一关键”，请孙中山调停南北，“先各停战，双方限日提出一定条件，明白宣布，通告国人，必如此而后和”[(103)]。徐树铮以此为借口，采用“兵谏”手段，引奉军入关，以迫使直系就

范。为此，他于2月1日致电皖系各督军说："冯、王、岑密使往来商量，已有成说。观岑卅之电了然可揭。……统一局面一破，必有一半引外人保护，其一半能否自立，是不陷灭亡不止。……推原祸始，冯公聩聩，尚不足责，足责者厥惟阁之王，督之李。……现议由奉省抽调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运京奉、京浦路次，强请命令罢李，李去后王必自退，不退再请罢之。"他认为"奉电[104]出后，鲁、徐、皖、沪应之，李（纯）难自安，或不待明令，即自求退"，并指出上述办法历经徐、段赞许，希促进行，以免"武汉再有动摇，益形危殆。李去王退后，两老（指徐、段）中必有一毅然出荷艰难者"[105]。此电暴露了皖系的全盘计划：以引奉军入关相助为手段，迫使冯国璋明令罢黜李纯，逼走内阁总理王士珍，为段祺瑞重新上台开辟道路。该电特别嘱咐皖系各督："仲珊（曹锟）、子志（张怀芝）两督处，非届兵发之时不能明告，希暂勿通电。"这句话也足以说明徐树铮对曹锟、张怀芝的不信任，反映了皖系及北方主战派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眼看岳州失守，湖北两面受敌，为自保计，竟出卖其同伙，将苏、鄂、赣三省联合条件密告徐树铮。2日，徐电告皖系各督说："顷子春（王占元）专员密持确函，来通殷勤，详告苏省主动，密商苏、赣、鄂联合条件：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浦口；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四、海军第二舰队饷款，由苏、赣、鄂共同担任。以上四条，皆由三督亲笔签字。子春极愤苏之无状，自言'签字取其不疑。现北军到汉者，仍听其通行，决无阻挠。我已年近六十，岂肯对于北洋数十年老同人作出不成人格之事。同志各省但定有妥当办法，一经示及，立即与苏翻脸'云云。又商派员赴津一同会议。弟以此时我辈办法未经商定，不如由渠打通苏省消息为便。来员极赞同弟说，已径归矣。"[106]

王占元泄露"长江三督"联合条件，引起皖系主战派对直系主和派的极端憎恨。他们含沙射影地攻击冯国璋，要求惩办李纯，向西南下讨伐令。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为了向主战派妥协，连发数令：4

日，以“时事多艰，人材难得”为名，取消袁世凯复辟帝制死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通缉令；5日，布告罪己，自责“委曲迁就，事与意违”，“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同日，发表整饬纲纪文电，分别惩戒与湖南战败有关之吴光新、王汝贤、范国璋、王金镜、傅良佐、周肇祥等人，并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冯国璋如此追究湖南战败责任，似乎决心一战，引起主和派的强烈不满。

冯国璋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或者在向西南下讨伐令的同时，又密令李纯照旧调停，其章法之混乱，达到十分荒唐的地步。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往来函电都处在工于心计、独断专行的皖系“智囊”徐树铮的严密监视之中。在皖系的逼迫下，冯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能对各方敷衍应付，结果，既受主战派的攻击，也引起主和派的非难，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他终于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2月23日，徐树铮亲赴秦皇岛，会同事先约定入关进驻滦州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旅，截留日本依据中日军事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枪支。25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开到滦州，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将日本运来的步枪二万七千余支劫走，其中除晋督阎锡山购械部分放行外，另以三千支分给直、闽，其余一万七千多支扣车运往关外，以供装备奉军之用。同日，徐树铮赴奉天晤张作霖，商请继续调派奉军入关作战，声援段祺瑞，张表示同意。随后，奉军直达京津，严重地威胁北京政府的安全，冯国璋大为恐慌。3月18日，北军占领岳阳，皖系主战派为之一振。19日，以曹锟为首的包括长江三督在内的十五省三特区督军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由于主战派的坚决要求，冯国璋被迫请段出山，并托徐世昌促驾，但段虚假地表示坚决不干。20日晚，日本公使林权助访徐世昌，劝段祺瑞复出组阁。由于日本公使的幕后插手，徐最后一言以定[107]。段祺瑞终于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容出山了。3月23日，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宣告了王士珍内阁的解体。29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　陆徵祥

内务总长　钱能训

陆军总长　段芝贵

海军总长　刘冠雄

教育总长　傅增湘

司法总长　朱　深

农商总长　田文烈

交通总长　曹汝霖

财政总长　曹汝霖（兼）

段祺瑞第三次内阁完全是由段系主战派的军阀武人、官僚政客及效忠于段的新交通系所组成。这次内阁同第二次内阁一样，未经国会通过。

六　吴佩孚与陆荣廷签订停战协定

曹锟、吴佩孚本为直系冯派军人，挥师南下攻克岳阳，收回长沙，占领衡阳，战功最大，但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毫无战绩而以屠戮著称的皖派嫡系张敬尧，使吴大为不满。这时曹锟也屡得冯国璋密电诘责，意识到继续主战，徒为皖系扩大地盘，乃派人至京日使馆，请日本转告南军谋和，结果被拒事泄，情报落入徐树铮手里。为了笼络曹锟，并防止他怀有贰心，4月4日段祺瑞政府特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但曹、吴不为所动。5日，曹藉口两湖地区的善后事宜应由各省自行负责，请辞两湖宣抚使职。此时，徐树铮以“奉军副总司令”名

义，将奉军两混成旅编为一支队，以张景惠为支队长，于9日沿京汉线南下，开往信阳、孝感，声称增援，听候曹锟指挥，实则部署在直军后面，用以监视曹、吴。13日，曹锟以第一路军过于疲劳为由，电请将吴佩孚第三师及其余各旅调回岳阳；次日，在汉口再次电请辞两湖宣抚使职，并请给病假。吴佩孚秉承曹锟的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29日，曹锟未经段政府同意，即擅自离开汉口，回师天津守住直隶地盘。吴佩孚南有南军对峙，北有张敬尧及奉军监视，深感久驻衡阳不利。这时候的陆荣廷，鉴于湖南、广东人民蓄意反桂，认为吴佩孚尾追其后，力量雄厚，无法击退，而湘、粤比较，粤比湘富裕，便决定和吴佩孚讲和，撤回部队，力保广东，以稳定两广局面。于是，经过谭延闿派其心腹张其锽从中斡旋，5月25日，南军代表与直军代表在耒阳举行谈判，6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据谭浩明致电岑春煊等透露，这次停战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永不开衅，不许他项军队通过，并不受他项军队之牵制。如不幸受威力胁迫时，当密为通报，设法对付，决不开衅。联军与他项军队作战时，直军决不暗助与干涉……"[108] 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109]。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桂军阀联合反对下，8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陆荣廷通过湘军与吴佩孚结成新盟友。新的直桂联盟的形成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

第四节　军政府改组和护法运动的失败

一　孙中山炮击观音山

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听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后来更发展到公开进行破坏。粤督陈炳焜秉承陆荣廷的"釜底抽薪"之计，驱逐拥护孙中山的省长朱庆澜，强行收回由朱交给军政府管辖的二十营亲军（即省署警卫军），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陈炳焜在广东混不下去，乃由莫荣新继任粤督，但是，莫并不比

陈好些。如前所述，莫曾杀害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金国治，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及新招卫士六十余人为土匪，任意枪杀。孙中山曾愤怒地说："如果曾做过土匪的便要枪毙，那就怎样的去处置现在的督军省长？"[110] 这里，孙中山指的就是当时的广东省长李耀汉和督军莫荣新，因为他们都做过土匪。他强烈要求莫荣新严惩所部肇事者，向军政府谢罪，但莫置之不理。接着，又有两名招兵人员在广州被捕，孙中山写信要求保释，莫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招兵人员枪决了。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炮击观音山，惩罚莫荣新。1918年1月3日晚，他率领亲信将领及少数警卫部队，亲登同安、豫章两舰，驶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同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李福林等同时发难，许崇智、邓铿、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七十余发。当舰上发炮作为起事信号，炮弹打到观音山时，除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陆上部队全无响应。陈炯明认为孙此举"冒险"、"轻率"，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因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极力反对，亦不能行动。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徘徊观望。莫荣新先得密报，接受其参谋长郭椿森的献计，采取"不理睬"政策，电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程璧光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舰、同安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军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势孤力薄，又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

炮击观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中华革命党一些元老们，对这一事件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五个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表示，第一至第三条须向陆荣廷请示；第四、第五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的同意"。这种答复，等于一个条件也没有接受[111]。但莫故作

姿态，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疾，并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二万元，又循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难怪当时就有人指出："陆阿宋（荣廷）及其伙伴能有今日发迹，也有他们两手的。"[112]

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的事实经过，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戎机"。他表示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

这次炮击观音山，时人也称为"炮教莫荣新"，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并表现了孙中山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二　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

军政府成立后，陆荣廷、唐继尧始则采取"虚与委蛇，敷衍中央"的态度，拒绝受元帅职，使军政府形同虚设；继而密谋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1917年11月4日，李烈钧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发出"支"电，提出"拟组织军事联合会，并设政务委员会"[113]。同日，在陆荣廷的策动下[114]，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等集议于海珠，讨论议和及组织西南联合会事宜。会上，唐绍仪认为先恢复伍廷芳的总理职务[115]，"一切问题，较易解决"。程璧光则强调指出："今日之事，其急待进行者，在切实统一机关之建设而已。"[11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会上，谁也不提军政府的存在问题。会后，李烈钧拟定了西南联合会章程草案，征求护法各省意见。7日，陆荣廷致电程璧光，认为"大局已有转机"，西南联合会议组织可以从缓。所谓"大局已有转机"，指的是南北议和。他急于与段祺瑞政府妥协，甚至带头宣布停战。在他看来，这时候结合团体，成立西南联合会议，容易惹起南北恶感。因此，"审查现势，无组织会议之

必要，此举似可从缓”[117]。随后，唐继尧力主在粤成立军事联合会，致电孙中山等，指出：“筹思再四，非此实不足巩固西南，即乞诸公合力赞同，速派军事代表组织会议，一面联电唐、岑、伍三公出任政务委员会。开会地点似以广州为适中，较能使两种会议克日成立。”[118] 12日，贵州督军刘显世通电声称，西南联合会议，虽陆巡阅使主张从缓，但为现势所不可少，不过因条例与初意不合，惟宜修改条件，期对内对外一致进行。12月31日，程璧光、莫荣新将修改后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条例》通电各省。恰好此时北京政府宣布龙济光任两广巡阅使，直接影响着桂系军阀占据两广的地位，打破了陆荣廷妥协求和的幻想。1918年1月9日，陆复电程、莫，表示西南“联合条件，极所赞同，即请公决，速行组织为盼”[119]。15日，西南各省护法会议在广州成立。依据该条例第七条规定，举行宣誓式，并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日，广东莫荣新等十三人联衔通电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

西南联合会议，原为协调、疏通西南各省军事问题而设，属于军事联合机关的性质。孙中山为促成团结，曾致电唐继尧表示：“组织军事联合会及政务委员会各节，足收同力共举之效，鄙意亦甚赞同，望由尊处分头进行为荷。”[120] 但从《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特别是稍后颁布的《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组织条例》看，则远远不止是个单纯军事协调机关，而具有政府雏形。它明确规定对外对内执行政务，其职权有诸如“办理共同外交，订立契约；监督共同财政，办理内外公债之募集；统筹军备，计划作战，议决停战议和事件；议决各与省之争议事件”等等，还规定“联合会议置军事、外交、财政、议和各参赞若干员，由各总代表分别聘任之”[121]。这就是说，从军事、政治到内政、外交，联合会议均享有广泛的权力，俨然与军政府相抗衡。

西南联合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是蛰居上海的岑春煊。据北洋密探马

凤池情报，岑暗与冯国璋勾结，不仅插手南北和谈[122]，而且“极力促成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荣廷）、孙（中山）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有了这个西南联合会议，他就可以排斥孙中山而充当西南各省的盟主。“万一至督军团与大树（指冯国璋）决裂时，则立可划江水为鸿沟，由自主各省另立旗帜”。李烈钧也密电唐继尧透露说：“煊意只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销。”[123]陆之所以开头反对联合会议，后来又表示赞同，据人分析，是因为“陆荣廷脑筋简单，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经西林（岑春煊）一再派人与说，又请庄思缄（蕴宽）密函疏通，始承诺加入联合会”[124]。

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终于使孙中山逐渐清醒，表示反对。孙认为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指为“督军团之第二”[125]。章太炎也通电怒斥岑春煊等为“倪嗣冲第二”、“李完用第二”。该电说：“岑云阶、李协和发起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夫以武汉且下，荆襄且复，逆寇命在咽喉之间，北方宣战，而我遽主和，堕三军之心，长仇雠之气，真无异自杀政策。此等集会，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该会亦深知不韪，恐人犹豫，故作宣誓式。宣誓云者，不过预为盟约，推倒黎总统，拥护冯国璋耳。”[126]忠于孙中山的滇军第三师长张开儒也敏锐地指出：“各省联合会议之组织……其表面虽似省政府联合之过渡机关，其用意在第一步推翻军政府，第二步推翻旧国会政府。组织名虽为联合会议，其内容实为合议政府。其议事条例，实为第二国会。此种似鹿非马之会议，如不经国会通过，则为非法会议，与叛督之天津会议又何以异？如经国会通过，则国会曾产生一军政府，试问国人及友邦将何所适从？”[127]由于孙、章等的及时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国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西南联合会议终于流产了。

三　军政府改组和孙中山离粤

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在岑春煊的策划下，政学会国会议员杨永泰、郭椿森、汤漪等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联合吴景濂、褚辅成等倡议改组军政府。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赞同，并以调人身份，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极力疏通。

2月2日，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莫荣新等，邀请孙中山在海珠开会，讨论改组军政府问题。会上决定将军政府的领导体制进行改组。会后，拟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用意约有两端：甲、将军政府原来之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会议，地位平等，责任同负。乙、护法各省各军仍旧派出代表，组织联合会，统筹军备，计划作战，其议决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128]。这样一来，军政府的护法性质就改变了。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许多革命党人也不赞成。21日，章太炎从重庆发来通电，指斥岑春煊的议和主张“于义师初起之宣言，一概抛弃”，“莠言乱政，乃至于此”，并揭露其“热中利禄，谄媚僭盗，欲使南方护法靖国之师，皆为一己利用”。他提出：“除电请唐帅否认外，应请宣布岑春煊罪状，以告天下，毋使老奸再行煽惑。”[129] 22日，当军政府岌岌可危的时候，孙中山通电全国，呼吁尊重国会，拥护约法，指出：“此次西南兴师，目的止于拥护约法，根本主张，惟在恢复约法之效力，与求国会永久之保障耳。……执权者若能共喻斯旨，弃其非法乱命，息战罢兵，一切解决，悉听国会，则国是既一，大乱立定。若徒恃个人之智与力，以图保持权位，不特战祸延长，殃及国脉，即于各执权者自身，亦为速亡之道。”[130] 同日，他通电西南护法各省，说明对时局主张，指出经国会非常会议选出之元帅及各部总长，多未就职，“举国国民，见北京政府既为非法僭窃之机关，而西南护法诸君，又未能毅然赞助国会所组织之军政府，乃彷徨歧路，无所适从。世界各友邦见我主张拥护国会者尚不能服从国会，更疑我护法之战争为割据争雄之举动。内不能示国民以趋向，外不能得世界之

同情，是非不明，国是不定，国家危险莫大乎此”。孙中山吁请各将帅贡献救济良策，倘能恢复约法效力，愿即引退[131]。随后，他向唐继尧提出改组军政府，必须有切实可行办法，并郑重声明：“护法之惟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无论改组内容如何，此主张绝对不能有所牺牲，必须一致坚约，始可共议改组。”[132] 但唐继尧始终不置可否。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者六十余人，由罗家衡等提出改组军政府组织案，因桂系及政学会议员运动的结果，赞成者竟达四十余人。居正、邹鲁、马君武等反对改组，屡欲起立发言，均遭无理禁止。最后由议长指定二十人审查提案。同日，田桐在沪上书孙中山，报告在沪议员反对改组军政府，“联名致电非常［国］会，提出二办法：一、挽留大元帅；二、改组施行延期”。[133] 11日，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至军政府，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他说：“军政府视国会如君父，国会之决议，军政府无不服从。顾如昨日所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之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夫今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明文，今日何以自解？军政府近于外交方面正在进行接洽之中，今蒙此影响，军府基础已摇，日后必无进步可言。……故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134] 13日，国会非常会议审查会推代表褚辅成、王湘、吴宗慈、卢仲琳、王葆真五人会见孙中山，征询对于改组军政府之意见，孙中山再次表示：“改组事，余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也。苟不论法律而论事实，则余无不可委曲求全者。若国会必以联陆为有利者，则余虽亲至南宁、梧州晤之，或以大元帅让之，皆无不可，是可见余非争一己地位者矣。”[135] 在这期间，传来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的下列主张：“护法各省亟应组织统一机关，现在办法宜遥戴黎、冯为大副总统，或认冯为代理大总统；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置六部，伍廷芳长外交，孙洪伊长内政，陆荣廷长陆

军，林葆怿长海军，唐绍仪长财政，张继或王宠惠长司法。政府地点宜暂在广州，俟局势稍形发展，则迁往南京或武汉。总理（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136] 至此，孙中山终于看到了唐继尧勾结政学会分子与桂系军阀阴谋推翻军政府，踢开大元帅的真面目，于是决心辞职离粤。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议员八十余人，首先由汤漪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赞成改组军政府者四十余人，超过四票通过。孙中山当时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通电向国民痛切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斯时瘠口哓音，以蕲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罪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137] 7日，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二十七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不许其辞职”，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138]。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同月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十二条，其名称仍用军政府，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而主席总裁则由政务会议选出。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出席议员一百二十余人，选举结果，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当选。随后，陆、唐又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21日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四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护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

首先，“护法”口号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法治，反对封

建主义人治的光辉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是个延续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缺乏法治观念和民主传统。“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139]。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君命大于天”，“一正君而天下定”。孙中山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声疾呼“民主”、“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指出“国家治乱，一系于法”[140]，“共和国家，首当守法”，如果“约法毁灭，国会废弃”，势必恢复封建专制时代的“因人而治”，“燃人治已死之灰，播专制未尽之毒”，军阀武人借此“以天下私”，可以窃权盗国，残民以逞。但历史走向民主，法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国法不容妄干，而人治断无由再复也”[141]。他宣称护法的使命，就是要“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142]。这种正义的呼喊，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其次，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共和精神，反对专制，反对复辟，反对一切黑暗势力。这对于抵制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粉碎复辟帝制的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诚然，孙中山的“护法”口号，没有提出和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没有反映广大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至于那个时候的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只不过作为革命胜利后的点缀品，甚至成为某些政治集团相互角逐的工具罢了。凡此种种，注定了护法运动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但是，当时的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在政治上又找不到新的出路。他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统治，坚持走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政治思想武器的历史条件下，就不失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因而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当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传来后，广东人民“于举国阴霾沉雾之中，忽睹霹雳青天之象，群情欢

跃，莫可明言”。在广州长堤东园召开的广东各界欢迎海军南下大会上，到会者数万人，盛况空前。辕门以生花嵌成“扫除伪政府，拥护真共和”十字。爆竹声，万岁声、鼓掌声，“檐宇为震”[143]。孙中山一声“护法”号召，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斗争的烽火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144]。但是在当时军阀专权的条件下，孙中山毕竟失败了。

护法斗争的失败，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辛亥革命后，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压迫的加剧，革命党人不断分化。中华革命党以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出现了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严重情况：“维时官僚之势力渐张，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145] 辛亥革命胜利后，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鱼目混珠”，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并造成了宗派林立，成分“过于复杂”，“总是想做大官”[146]。许多党员非但不支持孙中山，反而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改组，就是原国民党中的政学会与西南军阀相勾结而实现的。像这样一个组织不纯、四分五裂的革命党，是不可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引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

第二，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但孙中山手中却没有掌握什么可靠的武装。这时候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争取、利用旧军阀武装的阶段，不懂得用革命军队代替或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用民主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组织严密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在护法战争中，程璧光以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身份，率领一支舰队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个师以及广东省长朱庆澜交给大元帅直接指挥的二十营省防军，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当时也增加了军政府的威望。

但也仅此而已，力量十分有限。北洋密探马凤池还在军政府成立以前，就断言护法运动的必然失败。他说："查孙文定计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陆使（荣廷）、陈督（炳焜）均未附和。朱省长（庆澜）亦但利用彼党巩自己地位，决非乐从其诡谋。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147] 不仅如此，拥护孙中山的海、陆军还不断受到西南军阀的压制和排挤，以致程璧光遭暗杀，张开儒被囚禁，崔文藻（陆军次长）被枪杀，驻粤滇军和省防军被调离广州地区。这样，孙中山成了一名无兵可统、无将可依的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

第三，西南军阀的破坏。早在孙中山宣布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时，陆荣廷就曾表示："中山拟在粤召集国会，恐难办到，不敢有闻。"[148] 孙中山当选大元帅的第二天，陆荣廷拒不接受元帅职，说什么"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当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义，尤滋疑议"，"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149]。他还致电唐继尧，密谋对军政府共同采取暂时虚与委蛇的骑墙态度，说："粤另组军政府，殊难慊人意。此间事前已复电劝其审慎，未蒙采纳，刻已发生，亦且置之。"[150] 唐继尧的主张同陆荣廷完全合拍，对军政府采取表面上敷衍，实际上不合作的态度，同样不接受元帅职务。唐的拒不受职，是因为一怕得罪桂系，二怕结怨北方。他曾经说过："此间所谓组织军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愈失其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151] 由于陆、唐拒绝接受元帅职，以致军政府六个部的总长，除张开儒延至1918年2月宣布就职外，其余五位总长均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就职而由次长代理职务。朱镜宙在《梦痕记》一书中写道："自大元帅成立后，号令不出河南士敏土厂，各部总长均未就职，元帅陆、唐二公亦在观望中。大家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奕棋自遣。"[152] 1918年10月初，章太炎征得孙中山的同意，赴云南劝说唐继尧同孙中山合作。

据负责接待章太炎的李宗黄回忆，唐继尧仅在10月7日接受章太炎带来的元帅印，但不肯举行就职典礼，表示他的处境远较广州方面复杂，同时他既已接受孙先生新颁发的印信，当然也就是承认军政府的设立，何必一定要举行典礼、授印、通电、开府[153]？章太炎的记载说："余至云南，莫赓犹豫不敢受元帅印证。余谓五议员曰：'不受，诸君为无面目，宜速归。余名义亦属军府，随君等去矣。'莫赓始具礼受印证。然其文移号令，终自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未肯称元帅也。"[154] 由此可见，唐继尧是在章太炎等中央代表半说服、半强迫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元帅印证的。当时的军政府，实际上是一座空架子，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影子政府"。"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155] 孙中山独力支撑军政府，内外遭受攻击，处境十分恶劣。他的护法主张，实际上一筹莫展。同时，军政府本身既无收入来源，仅靠海外华侨少数捐助，经济又十分困难。自部长、秘书、参军以至书记、事务员，每月均领零用钱二十元，有时还维持不下去，依靠廖仲恺多方筹款接济。如前所述，孙中山当时在上海的住宅就因此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莫荣新对大元帅府又处处刁难，以至发电不能用头等，不得挂账，只能用现款发四等电。孙中山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和招到的新兵，也多为莫荣新的一伙所驱逐、逮捕或暗杀。当孙中山在忍无可忍，亲登军舰炮轰观音山督署时，唐继尧竟破口大骂是"胡闹已极"[156]。正如章太炎所说的："孙公与荣廷恶，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57] 孙中山也自叹在粤"有同寄寓，军权吏治，失所挟持"，"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158]。他愤怒地指出："护法军兴，战争连年，大功未竟，此中大梗，皆由桂贼缘敌为奸有以致之。"[159] 为了孤立陆荣廷，孙中山一度在策略上提出"护法必联唐"的口号，曾致电唐继尧说："民国前途，希望惟在执事一人，尚冀毅力首出担当，则桂人自难立异，而他省亦可景从。苟达护法目的，文无不可退让。"[160] 但唐继尧不仅拒绝同孙中山合作，而且相反，与桂系军阀加紧勾结，策划西南各省联合会，排斥孙中山。1918年5月，莫新荣在唐继尧的纵容和支持下，强行夺了张开儒的兵

权，并派兵逮捕了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唐继尧称赞莫此举“处理甚为适当”，还要将张开儒押解回滇“依法处办”[161]。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使孙中山失去了驻粤滇军的支持，完全暴露了唐继尧借护法之名，搞割据之实的军阀本质。

第四，军事上的难以作为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孙中山身为海陆军大元帅，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作战的指挥权。各个战场多半是各自为战，很少请示军政府，甚至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因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法制订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作战计划。无论是桂系还是滇系军阀，他们参加护法，主要是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实行军阀割据，故对待和战的态度完全以本集团的私利为转移，根本不顾整个护法战争的全局。例如1917年11月20日南军占领长沙，北军处于前方崩溃，后援不继，直皖矛盾十分尖锐之际，孙中山坚决主张乘胜推进，攻克岳阳，进而夺取武汉，以造成逐鹿中原之势。但是，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因而按兵不动，忙于争夺权位，鼓吹一切问题等待谈判中解决，甚至带头宣布停战。唐继尧也对孙中山采取敷衍的态度，同样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阳、会师武汉、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陆荣廷、唐继尧之流，“其所以治兵西南者，迹彼用心，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章太炎也于事后评论说：“原群帅所以怯于规鄂者，非兵力不任也。……徒以部落主义蔽其远略，广西（陆荣廷）不过欲得湖南，云南（唐继尧）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湘、蜀既得，而彼已偿初志矣。……外人徒见其宣布明申，慷慨自矜，而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里巷讼棍之所为，而可以欺大敌欤？要之，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162] 这里，章太炎与孙中山一样，从各个军阀在和战问题上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恶劣表演中，看到了近代封建军阀的欺骗性和残暴性，从而也得出南与北“一丘之貉”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相当深刻的，很有政治眼光的。

孙中山发起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找中华民族解放之路而不断探索、奋斗、前进。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当时也已经觉察到“护法断断不能解决问题”[163]，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164]。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指岑春煊、陆荣廷控制下的军政府）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165] 他还说：“南北新旧国会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免致他再出来捣乱，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166]，并坚决表示：“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167] 不久，这个“开一新纪元”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

(1) 《致段祺瑞与参众两院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5页。

(2) 《致黎元洪及参众两院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0页。

(3) 《致陆荣廷唐继尧等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1页。

(4) 《致陈炳焜等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1页。

(5) 《致黎元洪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4页。

(6) 《致陈炯明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3页。

(7) 《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页。

(8) 《致津沪国会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8页。

(9) 《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页。

(10) 《致王文华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37页。

(11) 《通告护法各省军政首领支持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9页。

(12) 《中华新报》，1917年7月7日。

(13) 《致参众两院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页。

(14) 《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15) 《致津沪国会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8页。

(16) 《中华新报》，1917年7月8日。

(17) 参见广州《粤报》，1917年7月20日；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3页。

(18) 《致津沪国会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8页。

(19)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4页。

(20)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4—5页。

(21)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6页。

(22)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9—10页。

(23)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2页。

(24)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4、6页。

(25)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4册，第1074页。

(26)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4册，第1075—1076页。

(27) 《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参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编第4册，第1076页。

(28) 《大元帅就职之布告》，《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29) 《靖国联军第七军司令张煦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25号，1917年11月19日。

(30) 《湖北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35号，1917年12月20日。

(31) 《大元帅复湖北靖国军第一军石总司令电》，《军政府公报》第35号，1917年12月20日。

(32) 《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致大元帅电》，《大元帅复湖北靖国军第一军石总司令电》，《军政府公报》第35号，1917年12月20日。

(33) 《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36号，1917年12月24日。

(34) 《军政府陕西靖国军命令曹世英等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49号，1918年2月23日。

(35) 《蒋尊簋宣布自主电》，《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0日。

(36) 《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1月20日），云南档案106—3—129。

(37) 《致吴佩孚敬电》（1918年5月24日），《徐树铮电稿》，第182页。

(38) 《粤桂军援湘确讯》，《民国日报》，1917年9月21日。

(39)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3页。

(40)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6页。

(41) 据谭浩明致唐继尧密电报告南宁会议的情况时说：会上“决定组织两粤联军援湘北伐。计粤军二军共三十营，桂军三军共四十营，数约三师以上，先锋均已出发”。这里粤、桂两军各少五营，待考。详见《谭浩明致电唐继尧》（1918年10月12日），云南档案106—3—138。

(42) 《大元帅令》，《军政府公报》第10号，1917年10月1日。

(43) 《傅良佐致国务院咸电》（1917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1011—5961。

(44) 《王汝贤、范国璋停战主和寒电》（1917年11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一〇一—（2）—342。

(45) 通电原有直督曹锟，但曹后用长途电话向段否认，声称此电未经本人同意，概不负责。

(46) 《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第212页。

(47) 傅良佐：《陈军法会审原文照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一〇二—（2）—24。

(48) 湖南善后协会编：《湘灾纪略》，第16—17页。

(49) 湖南善后协会编：《湘灾纪略》，第23页。

(50) 《段祺瑞致北洋军人铣电》，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11月20日。

(51) 《国父年谱》下册，台北1961年版，第704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7年1至12月，第971页。

(52) 《大元帅对于时局之通电》，《军政府公报》第25号，1917年11月19日。

(53) 《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5日。

(54)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1页。

(55) 《在上海欢迎美国议员团时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8—299页。

(56) 《复头山满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2页。

(57) 《致孙洪伊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6页。

(58) 《复李纯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2页。

(59) 《复章炳麟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1页。

(60) 《复唐继尧等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2页。

(61) 《唐继尧以川中尚未荡平逆军为词延缓东下援鄂复孙文勘电的密电》（1918年1月11日），《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51页。

(62)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76页。

(63) 《联军通令停战》（1917年11月28日），《湘灾纪略》，第21—22页。

(64) 《谭浩明致唐继尧电》（1917年12月5日），云南档案106—3—138。

(65)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9页。

(66)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10页。

(67) 《唐元帅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31号，1917年12月5日。

(68) 《军政府公报》第33号，1917年12月12日。

(69) 《国会非常会议致湖南程省长电》，《军政府公报》第38号，1918年1月4日。

(70) 《张开儒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28号，1917年11月26日。

(71) 《莫荣新、程璧光、李烈钧致陆荣廷等电》（1917年12月16日），云南档案103—3—139。

(72) 《致各省督军江电》（1917年12月3日），《徐树铮电稿》，第2页。

(73) 《东方杂志》第15卷第1号，第191页。

(74) 《中华新报》，1917年12月22日。

(75) 警民：《徐世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38页。

(76) 《中华新报》，1917年12月9日。

(77) 《北洋政府致曹锟、张怀芝督军电》（1917年12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一〇一一，3078。

(78) 《李廷玉致王占元电》（1917年12月24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页。

(79) 《政府公报》，1917年12月27日，第698号，布告。

(80)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第134页。

(81) 《顺天时报》，1918年1月11日。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26页。

(82) 《顺天时报》，1918年1月25日。

(83) 《致各省督军鱼电》（1917年12月6日），《徐树铮电稿》，第2—3页。

(84) 《致各省督军阳电》（1917年12月7日），《徐树铮电稿》，第3—4页。

(85) 《致各省督军之漾电》（1918年1月23日），《徐树铮电稿》，第7页。

(86) 《湘粤桂联军攻克岳州血战史》，《民国日报》，1918年2月22日。

(87) 《王金镜漾电》（1918年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848。

(88) 《王金镜关于守岳北军失败经过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1386。

(89) 《王金镜有电》（1918年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848。

(90) 《谭浩明致电李纯》（1918年1月30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114页。

(91) 《程潜致李纯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114—115页。

(92) 《义声报》，1917年12月27日。

(93) 《邱北县县志》第6册，第30页。

(94) 《义声报》，1918年2月27日第3版。参见高光汉：《西南军阀混战中的黎天才》，《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第187—190页。

(95) 《张敬尧反对停战议和的通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2），352号。

(96) 《顺天时报》，1918年1月4日。

(97) 《顺天时报》，1918年2月2日。

(98) 《湘灾纪略》，第26页。

(99) 《湖南省志》，第1卷，第370页。

(100) 《致靳云鹏真电》（1918年4月11日），《徐树铮电稿》，第99页。

(101) 《致各省督军轸电》（1918年4月11日），《徐树铮电稿》，第100页。

(102) 《顺天时报》，1918年2月2日。

(103) 《南京督军李纯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47号，1918年2月15日。

(104) 指奉天督军张作霖1月19日电请对南方下讨伐令。

(105) 《致各省督军先电》（1918年2月1日），《徐树铮电稿》，第10页。

(106) 《致各省督军冬电》（1918年2月2日），《徐树铮电稿》，第11页。

(107) 当时有人对徐世昌说，可“不必问芝老出否”。徐表同意，提出“诸

公可将命令办好，带府请印，庶免再有推托”。见《徐树铮电稿》，第6页。

(108) 《谭浩明报告吴佩孚订约九条内容致岑春煊等电》（1918年9月25日），云南档案106—3—186。

(109) 《吴佩孚主和电》，《湘灾纪略》，第63页。

(110) 陆丹林：《总理炮教莫荣新》，《革命文献》第49辑，第135—136页。

(11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7页。另据张开儒致电唐继尧称：孙中山向莫荣新提出三条件：“一、由莫督军致孙大元帅及派员道歉；二、令广东政府（当局）尊重大元帅政府及非常国会；三、广东外交特派员由大元帅任命。”见《云南档案》：106—3—128。到底是三条还是五条，待考。

(112) 罗翼群：《孙中山南下护法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114页。

(113) 《唐继尧为组织军事联合会致电孙中山等》，《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8页。

(114) 据谭浩明11月14日密电透露：“前在邕，陆巡阅使曾筹商及此（指西南联合会），并议请伍秩庸（廷芳）、岑西林、唐少川（绍仪）来粤，会商办法。（见《云南档案》106—3—138）

(115) 1917年初，在“府院之争”中，伍廷芳站在黎元洪一边，5月，曾代理国务总理（时任外交总长），协助黎元洪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旋因伍廷芳拒绝副署解散国会命令，黎元洪在张勋逼迫下，又不得不免去伍的代理总理职务。详见本卷第2章第1节。

(116)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1页。

(117) 《陆荣廷致电李烈钧等》（1917年12月7日），云南档案106—3—138。

(118)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等》（1917年11月），《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8页。

(119)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2页。

(120) 《孙中山致唐继尧电》（1917年11月21日），《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8页。

(121) 《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组织条例》，《东方杂志》第15卷第2号，第

212—213页。

(122) “西林现与大树极融洽。李纯不过表面为大树作调人，实皆西林在中斡旋。”见《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73页。

(123) 《李烈钧行营秘书厅来电》（1918年1月2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106—3—141。

(124)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73页。

(125) 《陈璧金陈述孙中山坚决反对联合会议》，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306—3—130。

(126)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5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192页。

(127) 《张开儒反对西南联合会议致唐继尧密电》，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106—3—129。

(128)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8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394页。

(129) 《驳岑春煊提和议条件之通电》，《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47页。

(130) 《通告全国各界主张和平尊重国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7、348页。

(131) 《军政府公报》，1918年2月23日，第49号。

(132)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8页。

(133) 《田桐上国父报告在沪议员对军政府改组意见电》，《革命文献》第49辑，第143页。

(134)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23页。

(135)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23页。

(136)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23—24页。

(137) 《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472页。

(138) 《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等主张非常国会延期改组电》，《革命文献》第7辑，第91页。

(139)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2页。

(140) 《大元帅致西南护法各省将帅电》（1918年2月23日），《军政府公报》第49号，1918年2月23日。

(141) 《元旦布告》（1918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85页。

(142)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页。

(143)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2、4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375—377页。

(144) 《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29。

(145) 《八年今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1页。

(146)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页。

(147)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41—42页。

(148) 《徐之琛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

(149) 《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10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380页。

(150) 《陆荣廷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38。

(151) 《唐继尧致张开儒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764。

(152) 镜宙：《梦痕记》上册，第223页。

(153) 《李宗黄回忆录——奋斗人生》，《台湾新闻报》，1960年7月14日。

(154)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49页。

(155) 《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30。

(156) 《在李烈钧报告孙中山炮轰观音山致唐继尧电上的批示》，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28。

(15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50页。

(158) 《复陈赓如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37页。

(159) 《复伍毓瑞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63页。

(160)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8页。

(161) 《唐继尧复李根源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338。

(162)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89—590页。

(163)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11日。

(164) 《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9页。

(165) 孙中山：《平白的话》，《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1975年版，第338页。

(166) 《申报》，1919年10月23日。

(167)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21日。

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第一节　日皖勾结

一　日本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虽攫取了种种侵略利益，但始终认为袁世凯是依靠英美抵制日本的，因此当袁因推行帝制而声名狼藉时，便决心“倒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曾直接策划，以巨额金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1)]，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和革命党人[(2)]，企图搞垮袁的统治，扶植一个更便于操纵的亲日政权。

袁世凯统治覆灭后，日本“倒袁”目的已经达到，遂把注意的重点转向在华组成一个稳定的亲日政府这个目标上。1916年6月1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日本政府便立刻表示支持。日本政府这时的判断是：黎元洪既是根据《临时约法》继任的，南方反袁各省不会反对，南北可以统一；以北洋派合作（主要是段祺瑞、冯国璋）为基础，吸收进步党、国民党及南方各派势力，组成亲日政府。故日本外务省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即6月7日，便以急电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今后相信黎氏必将首先努力协调统一国内政见分歧者，对南方的主张加以慎重考虑，相互协力，为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实现国内和平而尽力。当前之急务，首先任命一个不至重复执行袁世凯时代造成日中两国关系乖离之政策的新政府。黎氏亲自任命的新政府，若真正诚意努力于恢复国内秩序，并确立日中友好，

帝国政府将尽可能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对帝国政府，尽可信赖，无论何事，均可提出商谈。”[3] 与此同时，它又通知日本驻南京、广东、云南、上海等地领事，将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分别转达给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唐绍仪、张继等南北要人，要求他们支持黎元洪，与黎和衷共济，解决当前时局问题[4]。6月29日，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暂时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但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鉴于大隈内阁所执行的露骨的侵华政策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在国际上也加深了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国内各方人士也不赞成政府这种过分冒险的做法，因此多主张趁袁氏覆亡之际，修正对华政策。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1852—1919）继任总理大臣。10月9日，即寺内内阁成立的当天，日本元老松方正义拟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意见书》[5]。《意见书》对日本自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回顾，特别是对大隈内阁的对华方针提出批评，强调中国作为日本对付西方所起到的屏障作用的重要性，主张“日华亲善”，协力合作，对华政策要坚持与各国协调一致的方针，等等。松方的《意见书》，并不是要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对华侵略的“大陆政策”，而是要求改变日本军阀、政客所经常采取的那种赤裸裸的军事威胁的愚蠢做法。松方的意见得到元老山县有朋的支持。另外，日本政友会总裁原敬于11月11日会见山县有朋后，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据山县说，关于对华问题，“‘寺内必须设法改善’。余深以为然。此问题已成为国家当前突出的急务。如何确立方针，亟待研究”[6]。这些都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大隈内阁所执行的对华政策的不满。这也是大隈内阁倒台的重要原因。

寺内正毅系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军阀的重要人物，曾多次出任陆军大臣，在组阁前任朝鲜总督。寺内内阁的智囊人物胜田主计（任大藏大臣）、西原龟三都是他在朝鲜总督任内的心腹。

胜田主计（1869—1948）在此以前任朝鲜银行总裁，是日本“大

陆政策”的鼓吹者。胜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结束，“国际间的经济战争必将十分激烈，已毋庸置疑”，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如欲参加竞争，“必须从国外输入许多原料，并将其加工制成商品进行商品贸易。若不如此，可以推想十数年后，我国国民将难以维持经济独立。是故，欲谋求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当求诸地大物博的中国”[(7)]。“我国国民经济及执行国防计划所需的原料及一切物资，几乎完全可以从中国求得。从这方面来说，经常保持日华间经济上充分的联系，也是帝国独立方面最为迫切的事。我对中国问题最重要的考虑之点，即在于此”[(8)]。胜田出任大藏大臣后所拟定的《对华借款方针》，其指导思想就是：“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利权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做法，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9)] 这就是说，对华侵略应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那种军事讹诈、武力压迫的做法，由“强夺”变为“巧取”，先诱之以利，然后谋取特权利益。

西原龟三（1873—1954）在寺内内阁并无正式职务，但在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上，却是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积极的参与者。他早年结识日本政治活动家神鞭知常（1848—1905），后参加神鞭组织的对俄同志会。当时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竞争十分激烈，该会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政策。在神鞭影响下，西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思想的熏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西原随神鞭来到朝鲜，游说朝鲜当局助日对俄，并提出在朝鲜应以“王道主义”发展殖民事业。西原自称是“王道主义”的信徒[(10)]，“东亚和平”的使者。1905年神鞭死后，西原在朝鲜从事棉布商业活动，与朝鲜商界和金融界有着广泛的联系。1911年西原通过其同乡朝鲜总督府总务长官有吉忠一的介绍，结识了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他由于通晓朝鲜殖民事务，受到寺内的信任和赏识。1915年，西原向寺内推荐胜田主计出任朝鲜银行总裁。于是寺内、西原、胜田之间的关系，随着他们共同在朝鲜的殖民活动而日益密切。

寺内在未组阁前曾于1916年6月派西原来华“考察”中国的政治情况。在此期间，西原就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广泛征求日本在华各方面人员的意见。同时他了解到大隈内阁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曾暗中派遣日本军人并网罗日本浪人在我东北地区操纵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成立所谓“勤王军”进行武装暴乱，企图搞“满蒙独立”，并支持革命党人在山东的反袁军事活动。西原根据这些事实，于回国后起草了三个文件，即《满蒙的革命军、宗社党与日本军人及日本人的关系》、《山东省的革命党和日本人》、《山东省的革命军以及套购铜元的过去与现在》，并把这些文件誊印出来，交由后藤新平（寺内内阁任内务大臣，后又转任外务大臣）在日本贵族院广为散发。这些文件在日本政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因此而遭到各方人士的抨击，成为当时有名的所谓“秘密出版物事件”。大隈内阁的倒台和寺内新内阁的成立，都与西原这些活动有关[(11)]。西原与寺内的关系之密切，也由此可见。

西原此次中国之行，主要是为寺内上台组阁制定对华政策搜集情报的，所以在他回国后，即向寺内提出一份名曰《在目前时局下对华经济措施纲要》的文件。文件内容的重点是：一、组织对华实业投资团，确保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二、为解决中国目前财政的紧急需要，上述对华实业投资团应提供2000万日元借款；三、稳定中国财政，其办法是由日本提供资金建立省立银行，而由中国政府公布法令，发行一种金本位纸币，其形状名称应与日本现行金币划一，并规定可以相互兑换。西原认为：“确保在华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当可日益发展，以至百世不衰。”[(12)] 他一再强调说：“目前形势已迫使我们必须拟订一个妥当准确的对华方案。就目前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须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13)]

胜田的《对华借款方针》和西原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实际上成为日本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蓝本。寺内上台后，即在1917年1月9日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五点对华方针，表面上提出“尊重并拥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中国的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涉及日本在华侵略利益时，则露骨地提出：“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帝国政府将按既定方针逐步扩大、增进帝国的特殊利益；在福建根据明治三十一年（1901年）和大正四年（1915年）两次换文精神，确保中国所承认的帝国与该地区之特殊关系，并逐步努力培植我国势力；至山东问题，应俟和平恢复后再求其最后解决。当前的问题，是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归于帝国所有。”这个对华方针还指出，除上述地区外，“帝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努力使列强逐步承认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14)]。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向内阁提出的《对华方针意见书》，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修正，作了如下的解释：对华方针应该是根据中国局势的发展，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以建立日本在华的优越地位，抵制英、美势力的扩张。日本对华方针首要之点，“必须采取手段使中国不陷于任何人手中”，故在此意义上日本必须把“维护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作为帝国对华方针之基础”[(15)]。大藏大臣胜田主计更是赤裸裸地说：“今日几乎帝国朝野一致的议论，均认为中国决不可被瓜分，不仅为中国，盖为东亚之和平或日本之利益，亦不可使其瓜分。置中国于列强共同管理之下，对帝国亦利少弊多，应使中国在其本国主权之下达于统一。”[(16)] 上述这些有关对华政策的说明，充分暴露出日本妄图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力求独霸中国的侵略野心。寺内内阁标榜不干涉主义，以示其所执行的是与大隈内阁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正因为如此，它最初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扶植和勾结还是比较隐蔽的。但当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控制北京政府后，日本即抛弃了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骗人幌子，公开支持皖系军阀的政权。

1917年7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宣称：“现鉴于各国既已对中国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表示承认，并表示同情，因此，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日中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得策”；同时决定给予段政府以财政援助并供给武器军需品，拒绝南方所提出的有关这类要求[17]。这说明日本已认定段祺瑞皖系军阀是其理想的侵华工具，决心全力支持段祺瑞北京政府。

寺内内阁确定援段方针后，便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以大量借款，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便假皖系军阀之手，向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扩张其侵略势力，并迫使欧美列强承认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

二　“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

“西原借款”是指寺内内阁时期西原所经手的借款，但这仅是日本当时对华借款的一部分。据日本大藏省档案资料记载：在寺内内阁执政期间（1916年10月9日—1918年9月28日），日本与中国新签订的借款总额达386，450，000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前当时的对华借款总额120，000，000日元相比，仅仅两年之间，就增加到三倍”；这其中，“对中央政府借款279，860，000日元，对地方政府借款18，570，000日元，对公司及私人借款88，020，000日元”[18]，对中央政府的借款即占借款总额的70％以上。上述借款中，由西原直接经手或参与交涉签订的有八项，共145，000，000日元，其名目如下[19]：

借款项目	借款数目	订约日期
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	5，000，000	1917年1月20日
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	20，000，000	1917年9月28日
有线电信借款	20，000，000	1918年4月30日
吉会铁路借款	10，000，000	1918年6月18日

吉黑两省林矿借款	30，000，000	1918年8月2日
满蒙四铁路借款	20，000，000	1918年9月28日
山东二铁路借款	20，000，000	1918年9月28日
参战借款	20，000，000	1918年9月28日

除上列西原所经手者外，其他大宗借款有：善后借款三次垫款30，000，000日元、京畿水灾借款5，000，000日元、军械借款32，081，548日元等。

西原龟三往往秉承寺内和胜田的意图，不通过日本驻华公使而径自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谈判借款合同，并决定两国间很多重大问题，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不满。特别是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曾多次致电日本外务省，反对和攻击西原的在华活动。为此，寺内致函外务大臣后藤新平说："如所周知，迄今为止，西原向中国政府当局提出的各项问题，决非西原个人向中国当局进行的交涉，其主旨都是我国政府所同意并想要实行的。"[20] 由此可见，"西原借款"及其活动，集中反映并体现了寺内内阁对华的侵略方针和政策，其所经手的借款是直接为寺内侵华政策服务的。

寺内内阁能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向段祺瑞北京政府提供各种名目的贷款，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日本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外贸易连年入超，1913年，它的对外债权与对外债务两项相抵，是总数达122，400万日元的负债国家[21]。与欧美列强相比，它的经济实力薄弱，无力对华提供大宗借款。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各参战国忙于相互厮杀，民用工业生产瘫痪，国际航运停顿，而日本则因远离欧洲战场，成为军需物资的供应地。因此，日本商品几乎未遇到竞争即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刺激了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自1915年至1918年间，日本出口贸易急速增长，国际贸易顺差达28亿日元，一跃而成为拥有137，000万日元的债权国家[22]。日本银行的现金储备，1918年增至158，000万日元[23]。这是日本寺内内阁能够对华提供大量

借款的经济背景。

帝国主义各国历来是把对旧中国的借款作为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寺内内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造成的有利时机，企图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等要害部门，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市场。这是它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它力图以大量财政资金输出的形式，加强其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准备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的争夺。但是，由于四国银行团垄断了对华政治借款的优先权利，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又是四国银行团的成员之一，日本若以政治借款的名义对华借款，势必要与英、法、俄等国协商一致，从而妨碍其自由行动。为在短时间内达到上述目的，大藏大臣胜田主计主张采取经济借款形式，以避免与欧美各国在华势力产生矛盾和对抗。因此，日本政府于1917年1月20日批准由兴业、台湾、朝鲜三家银行组成特别银行团，规定对华政治借款由“横滨正金银行主负其责”，“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及朝鲜银行共同应承中国经济借款”[(24)]。西原经手由三银行提供的总数为14，500万日元的八项借款，其中除第一次交通银行500万日元借款是三银行自己的资金，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及参战借款是用大藏省储蓄部资金外，其余五项借款均由日本议会批准，政府保证支付本利，由三家银行发行1亿日元债券支付[(25)]，亦即以日本财政资金为后盾，由三银行出面对华借款。其名目虽标为银行、电信、铁路等经济性借款，实际上大多充作当时北京政府的军政开支，成为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南方发动战争所需的军费，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借款。

支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加强日皖之间的勾结，是寺内内阁推行其侵华政策的重要手段。西原龟三的各项借款活动，也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西原不仅参与寺内内阁对华外交和侵略方针的制定，而且先后六次来华，代表寺内进行活动，与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皖系军政要人和亲日派官僚

关系密切，并干涉和操纵中国的内政。他是日皖之间的直接牵线人物，而“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下面是西原通过各项借款活动与皖系进行勾结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1916年10月间，西原与胜田密议，“深悉此时中国如能特派一适当的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实在是最适机宜的事”，并表明以曹汝霖为特使最为适宜[26]。他们将此意透露给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立即电告段祺瑞：“近日晤后藤（时任内务大臣），谓两国亲善，宜从经济联合入手，为疏通意见起见，最好由中国政界素有名望之人来日一游。”[27]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深感自己的政权还是不稳固的。他们不仅要对付南方的反对势力，还要提防北洋系内部各实力派的相互倾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急需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由于当时西方国家正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日本遂成为可以左右中国政治的帝国主义势力，北洋军阀内部的亲日派官僚政客，便竭力鼓吹亲日外交路线。这对段祺瑞来说，自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后，当即将赴日的新任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他请示对日外交方针时，他即表示：“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至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于今日，现阁方针如是，幸君善为之。”[28] 其言外之意，显然是决心要改变袁世凯原来执行的亲英、美的外交路线。

因此，当日本示意要改善日中关系时，段祺瑞立即予以响应。段以赠予“日本大皇帝大勋章”名义，拟派曹汝霖为赴日专使。其目的，段祺瑞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曹汝霖）曾条陈中日亲善，不是空言。我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节，遇事麻烦，以达中日亲善之目的。”[29] 后因总统黎元洪及国会的反对，曹汝霖的赴日之行未能实现。

于是，寺内便于1916年12月中旬派西原龟三秘密前来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直接洽谈。12月22日西原到达北京，23日就与曹汝霖、陆宗舆会谈。西原认为："此次会谈，接触到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双方充分地交换了意见。"[30] 随后，西原又会见了段祺瑞及中国政界各要人和在华日人，积极进行活动。为了表示日本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诚意，12月28日，由西原经手与曹汝霖、陆宗舆草签了第一次交通银行五百万日元借款合同。这就是"西原借款"的开端。

交通银行是前清政府邮传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发展它所管理的铁路、轮船、邮电事业的金融机关而成立的。1914年该行又拥有发行纸币和管理交通通信事业特别会计国库金的特权。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由该行提取了大量现金作为军政费，并滥发纸币，以致币值猛烈下跌，市民纷纷拥向银行挤兑现金。1916年5月12日，北京政府被迫宣布暂时停止兑现。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中国最大的发行兑换纸币的银行，停止兑现对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影响很大。日本同意给予交通银行借款，这对于处于财政危机的北京政府，当然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西原在华的活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段祺瑞皖系军阀加快向日本靠拢的步伐。西原回国后，段祺瑞急忙派他的亲信吴光新（段的妻弟，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4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拜访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及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真臣等人，申述段祺瑞希望投靠日本的迫切愿望。1917年1月14日，吴光新在与林权助密谈时说，"段曾拟认真与日本合作"，"关于特派曹汝霖赴日，其实际目的即就有关中日亲善的方法，与日本有关当局会谈"[31]。1月15日吴拜会石光真臣时又说："（段）深知中日两国的亲善为当务之急"，希望日方谅解其苦衷，并予以相当帮助。石光据此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报告说："吴一心为段谋与帝国接近，正向各方积极努力。"[32] 日本与皖系军阀之间，一方积极引诱拉拢，一方急欲卖身投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试探，双方终于勾结在一

起了。

1917年2月至7月这一段时间里，如前所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两起重大政治事件：一是由于对德参战问题而引起的所谓“府院之争”，二是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败张勋，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重执北京政府大权。在此期间，寺内内阁为怂恿中国对德参战和支持段祺瑞，曾两次派西原龟三来华进行活动，使日皖勾结得到进一步发展。

段祺瑞再度出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孙中山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西南各省军阀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护法”为招牌，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相对抗，中国政局出现南北分裂的形势。此时，日本政府决定公开支持段祺瑞北京政府。7月20日，寺内内阁通过援段的对华方针，自此以后，就以各种方式援助段祺瑞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形成日皖全面勾结。在此期间，日本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给予段祺瑞北京政府以各种名目的借款。除西原所经手者外，还有1917年8月28日签订的善后续借款第一次垫款1000万日元[33]；1918年1月6日和7月5日又签订了第二次、第三次善后续借款各1，000万日元（前后三次共3000万日元）；中国以地租和盐税剩余金作为借款担保。同时日本应段祺瑞的要求，同意给予军械援助，1917年12月30日，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1800余万日元军械借款合同，加上1918年7月31日签订的第二次2242万余日元的军械借款合同，两次共购买日本军械计有：步枪125，000支，子弹7550万粒，山炮316门，野炮228门等以及各种炮弹、武器附件、配件等[34]。（最后结算为32，081，548日元）1918年8月初，西原龟三又与曹汝霖商定，由日本供给2000万日元，作为编练“参战军”的经费[35]，此后即于9月28日正式签订参战借款。借款合同附约规定：“本借款金应交付直接主管国防军队机关所属之经理主任”，按月由日本朝鲜银行委托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代办拨付，“每次由参战军训练处督练及军需课长会同署

名盖印，始得领取”[36]。参战军均系日本军械装备，并由日本派出教官训练，以坂西利八郎主持其事，受参战处管辖，从而使这支新编练的军队，直接由皖系军阀和日本所控制。参战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称边防军，共三师四混成旅。

段祺瑞皖系军阀所以能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正是由于有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靠山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金钱和军火武器。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根本无力支持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南北战争。

北京政府财政部所经手的电信、吉黑两省林矿、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五笔为数共1亿日元的借款，其开支明细账表明：其中直接用于军费开支和购买军械之款，即占借款总数的35.3%；支付内债本利占34%（内债系指北京政府临时挪用或借用交通银行等用作军政开支之款），实际上这笔钱也多用作军费。上述两项合计即占借款总数的69.3%[37]。至于归陆军部、参战军训练处直接掌管的军械借款和参战借款，则全部用于内战军费开支。曾任段祺瑞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在他写的《民初外交回忆录》一文中说：当时军政开支“每月约需2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之收入，每月只余关余、盐余（海关、盐税抵押外债，每月付本息所余者）、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等，合计不足1200万元，尚短800万元，则藉借款为弥补”[38]。上述有关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均说明若无日本的支持，皖系军阀是无力向南方用兵的；而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支持段祺瑞打内战，则是为了向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长江流域南方各省扩张侵略势力，妄图利用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来达到它独占中国的侵略目的。

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中的两大实力派。段祺瑞控制着北京政府；冯国璋的直系则盘据长江流域的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与西南地方军阀有着一定的联系。段主张武力统一，对西南各省用兵；冯则主张和平统一（这一主张得到英、美等

国的支持）。双方明争暗斗，不时出现矛盾和摩擦。1917年11月间，湖南前线直系将领通电主和，致使皖系进攻湖南的计划破产，11月22日段祺瑞被迫辞职。从此在和战问题上，直皖矛盾表面化，并随着政局的发展而日趋尖锐。

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始终支持皖系，压制和打击直系。1918年2月皖系为反对直系，准备发动政变，迫使冯国璋下野。为实行上述计划，皖系拉拢奉系张作霖，将奉军陆续调进关内。日本虽然对直系的活动和段祺瑞下台深为不满，但也不赞成皖系的政变计划，因为日本考虑北洋派发生内讧，势将引起北方政局的混乱，这对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极为不利，且易引起英、美的干涉。所以，正当皖系积极策划政变之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于2月21日致电驻华代理公使芳泽谦吉说："本大臣于2月20日邀章公使前来，作为私人谈话，对他说：'据各方面的情报，似有使冯总统和王总理退隐，使徐世昌与段祺瑞等掌握政权的计划。其根本目的虽系树立举国一致的中央政府，以谋求中国的统一，但北京政界将因此而更加混乱。鉴于世界政局的现状，并鉴于中国目前对外关系，相信此计划决非适当措置，而且中国政界的动摇不安定，将对实现中日提携的两国方针形成莫大障碍。希望此时在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之间，充分疏通意见，取得同心协力，以谋求解决目前时局的办法，尚希章公使对此有所尽力。'其次，对于冯国璋，预定由青木（宣纯）中将[(39)]，对于段祺瑞，预定由坂西（利八郎）少将[(40)]，根据上述意旨予以劝告。希阁下即与二人协商，为完成此任务而采取适当措施。"[(41)]

与此同时，曹汝霖、陆宗舆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邀请西原龟三尽快来华。寺内、胜田认为西原应"立刻前往"。3月18日，西原抵北京，20日见段祺瑞，极力怂恿段再次复任国务总理，不要计较冯国璋有无诚意。西原说："当前中国的现状不容许吾人斤斤于此类问题，只要能灵活运用政权、兵力和财力，天下事何不可为？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以设法资助。如欲为日

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42] 日本既不希望直皖兵戎相见，又不愿自己苦心扶植的代理人失势，故而一面制止皖系军阀轻举妄动，一面向冯国璋直系施加压力，促其同意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

由于日本出面干预，直皖双方终于妥协。3月23日，冯国璋重新任命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段一上台，即于26日召集国务会议，决定再次向南方用兵，声言要在三四个月内打下广东和四川。对于段再次向南方发动战争，日本予以积极支持。4月12日，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将段祺瑞的战争计划报告给日本政府[43]。4月20日，外务大臣本野转达寺内的指示说：不管是对南方的“讨伐方针”，还是促进南北妥协，总之，要使中国政局迅速得以解决[44]。4月21日，林权助遂向外务大臣本野提出有关解决中国时局的方案，认为“目前的（中国）政局，不仅是段内阁对西南政策的危机，而且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当前段祺瑞应“进一步南征，有必要向南方施加压力”，段政府在夺回广东和肃清四川以后，“再提出南北议和较妥”。“在讨伐经费方面，如果我方不予相当援助，也显然难以成功。”林权助估计。需要“8000万元乃至1亿元的外债”始能维持下去[45]。西原龟三在5月31日给大藏大臣胜田的电报中，也提出据他与曹汝霖会商，“为维持现在政局”，本年内“至少希望达成7000万日元的借款”[46]。为了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对南方的战争，日本于1918年4月30日，由西原经手以电信借款名义，给予段政府2000万日元借款。对于这笔借款，“彼此心照，不用于电信方面”[47]。全部拨充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以后于6月至9月间，日本又以各种名目给予段政府如前所举的大宗借款。

此时的日皖关系，正如徐树铮所说的那样：“我北军（实际上指皖系军阀）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48] 而林权助也认为段内阁的危机，“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显然，双方的勾结已发展到同休戚、共命运的程度了。

日本寺内内阁，一方面通过“西原借款”逐步将段祺瑞皖系军阀变为它侵华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具体贯彻推行所谓中日“经济合作”，通过各种名目的借款，在华攫取大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1918年5月22日，寺内亲笔拟定题为《借款问题及其他》的文件，“其中列记了对华交涉的各项经济案件，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重点”[49]。这份文件是在西原龟三和陆宗舆于1918年4月13日在北京所交换的备忘录[50]的基础上，寺内与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共同商定后起草的。据西原记载，当陆宗舆签署备忘录时，因为“害怕被骂作卖国贼战战兢兢地签字的”[51]。寺内在这份文件中提出的借款项目有：一、以黑龙江、吉林两省金矿及森林为担保的借款；二、吉会铁路借款；三、以烟酒专卖利润为担保的借款；四、为设置国营炼铁厂的借款；五、交通银行发行与日本货币相同的金纸币；六、退还庚子赔款发展棉花栽培、繁殖绵羊、地质调查三项事业；七、延长山东有关铁路路线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等。文件所列各项，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矿、棉花、羊毛及其他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倾销的市场；而吉会铁路和山东铁路的修建，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的战略地位，并企图组织由日本控制的中国铁路投资团，以排斥阻止英、美以修建铁路划分势力范围的侵华格局；发行金本位纸币，则是为了使之与日本货币联系起来，以便于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而最突出的是企图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利益据为己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要以大量资本输出的形式，加强它在华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为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竞争作准备。

1918年5月29日，西原携带着寺内的指示，第六次来到北京，与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曹汝霖会谈。6月18日，签订吉会铁路1000万日元借款合同；8月2日，签订吉林、黑龙江森林金矿3000万日元借款合同。8月6日，交换了下列各项文件：一、国营制铁厂借款合同，制铁及铁矿砂供给合同及其附属文件；二、退还庚子赔款及产业开发议定书；三、关于中国铁路资本团的议定书。上列几个文件，俱作为

曹汝霖、西原协定，拟成备忘录互换，言明俟征得日本政府同意后，另行缔订正式合同。同时，双方还就整理税制和改革币制等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52]。关于山东问题，段祺瑞北京政府同意日在青岛和济南驻军，中日合办胶济铁路等；而且在9月24日双方互换照会时，驻日公使章宗祥竟在复照中说："中国政府对日本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53] 此项照会遂成为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坚持侵占山东的借口。日本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部分如愿以偿。西原为此非常得意，他在日后回忆时说："到燕以来，以七十天的时间，为日中经济合作结成纽带，为东亚永久和平打下基础。前年访华时值袁世凯去世不久，回忆当时日中关系的情况，实有隔世之感。"[54]

1918年9月28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吉林黑龙江森林金矿、满蒙四铁路、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参战等四项借款合同。至于制铁厂一亿日元借款，则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倒台，而被搁置起来。

段祺瑞皖系军阀对日本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有求必应。只要日本给钱，给军火武器，支持他们扩张地盘，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拍卖。段祺瑞的卖国行为，已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寺内正毅下台时曾自夸其侵略中国的功绩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什倍于二十一条。"[55]

三　日美的争夺与勾结——《蓝辛—石井协定》

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就有关中国问题签署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一般称作《蓝辛—石井协定》。在换文中，"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56]。《蓝辛—石井协定》

（以下简称《协定》）是日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在华经过激烈争夺之后暂时妥协的产物，是日美为掠夺和宰割中国所进行的一笔幕后政治交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在华大肆扩张殖民特权。它以恪守英日同盟为名，对德宣战，囊括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全部侵略利益和特权；一年后，又向袁世凯北京政府提出酝酿已久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由于欧洲列强各国正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故而使日本在远东成为唯一拥有实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美国因参战最迟（1917年4月始参战），是在远东有力量和日本对抗的大国。美国对华贸易，1913年为35，427，198海关两，至1917年即达60，960，777海关两，增长近一倍[57]。自1914年至1918年，欧洲列强各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而日美两国却迅速上升。在中国输入总额中，日本所占比例由20.7％猛增至38.9％；美国由8.8％上升至13％[58]。双方都力求在华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排斥和打击对方，结果使已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如1914年当日本对德宣战之际，美国立即于8月21日照会日本政府说：“若在中国内地发生骚乱，为恢复其秩序，日本或其他诸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时，希望日本政府在考虑此问题时，务必于其决定行动之前，和美国政府协商。”[59]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以武力胁迫袁世凯接受时，美国又于5月13日照会日本政府，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一概不能承认。”[60] 这些均说明美国密切地注视着日本在华的一举一动，力图阻止或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独占的特权，以维护美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正如列宁1916年所指出的那样：“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61] 这一斗争，在袁世凯死后，日趋激化。

袁世凯为筹备帝制和发动对西南护国军的战争，大量军政费用的

开支，使北京政府本已拮据的财政濒于崩溃的处境，急需外国贷款。在此期间，美国对华借款空前活跃。以1916年为例，4月7日北京政府与美国李希金逊公司签订五百万美元借款合同[62]；同年4、5月间，又以整理山东、江苏境内运河为名，与美国广益公司签订600万美元借款合同[63]；5月17日，交通部与美国裕中公司签订1000万美元借款合同[64]；10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供给北京政府500万美元借款，以中国烟酒公卖为抵押，按合同规定，可再续借2500万美元[65]。1916年美国对华借款的大量增加和积极活动，显然对抱有极大侵华野心的日本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日本利用它在华所拥有的实力地位以及与皖系军阀的密切关系，竭力抵制和破坏美国在华的活动。如日本对中美签订的600万美元运河借款合同，即以侵犯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为借口，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使借款难以兑现。1916年12月，美国广益公司向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永野提议，由日美合作承担这笔借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表示同意。经过谈判，日美双方于1917年3月9日正式签订合作契约，规定运河借款（包括以后的续借款）由两国分别承担[66]。又如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与北京政府签订借款合同后，日本即向中国提出：如停止与美国的借款交涉，它将立刻给予1000万日元借款[67]，结果使中美借款合同中所规定的“续借美金2500万元”的计划为日本所破坏。日美两国在华相互排斥相互竞争之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917年上半年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参战问题的矛盾和斗争，更是双方在华激烈争夺的一种反映。由于日本勾结皖系军阀段祺瑞，将亲美势力驱逐出北京政府，美国遭到失败。1917年4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卷入欧洲大战，一时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对抗，因此谋求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办法。这就是《蓝辛—石井协定》产生的历史背景。

1917年5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向日本驻美大使佐藤爱麿表示，希望日本派遣特使来美，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及远东问题进行会商[68]。日本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也想就中国问题与美国达成某些谅

解，故对美国提议表示赞同。5月22日，日本内阁议决派遣特使赴美谈判，随即于6月13日派前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为特使，随员中包括有海军中将竹下勇、陆军中将须贺野、外务省秘书永井松三等人[(69)]。按日本政府的指示，双方将就关于日本人在美国的地位问题和协调日美两国在中国的行动问题进行商讨。6月15日，日驻美大使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指示，要求美国政府就1915年美国国务卿布赖安承认日本对中国有着特殊密切关系的声明[(70)]，以适当方式重新加以确认，以便消除日本人民对美国在华活动所产生的疑虑[(71)]。日本的意图，显然是试探美国现政府对1915年布赖安声明的态度。7月6日，蓝辛在复照中指出：布赖安声明虽承认日本在与中国毗连地区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但绝不意味着美国同意日本对中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扩充其在华的政治影响[(72)]。从日美之间的这些来往照会，可以看出谈判前双方各自的主张，以及日本希望美国承认它在中国享有特殊的侵略地位的迫切要求。

8月23日石井抵达华盛顿，9月6日与美国国务卿蓝辛开始进行谈判。双方谈判的重点，很快转到中国问题上。蓝辛提议日、美就废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及机会均等诸问题发表宣言，企图借此排除日本在中国的独占优势。石井原打算以同意废除势力范围作为代价，以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如果各国也仿此废除势力范围，日本就可凭借地理邻近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使在华的经济竞争处于有利的地位[(73)]。石井将这一方案请示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因在上年7月与俄国签订了互相确认两国在中国东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的第四次密约，因此不赞成石井的方案，并指示石井说：放弃势力范围，影响甚大，所以不要涉及这个问题，而要致力于“不拘形式如何”，“只谋求其承认我之特殊地位”[(74)]。美日双方经过往返磋商，最后于1917年11月2日完成换文，并分别于11月6日、7日在华盛顿、东京同时公布。日本政界普遍把这一协定的签署看作是日本外交的一大胜利[(75)]。美国也宣称这一协定“获得的主要成果是：两国政府关于对中国政策的指导原则，达

成了相互间的谅解”[76]，并极力向中国宣传说：“这不仅对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重新的肯定，而且加进了不干涉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个原则，如果一般地予以施行，正是威尔逊总统所公开宣布的永久国际和平的精髓。”[77] 但当蓝辛将换文内容通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时，芮恩施一语道破地说：“照会声明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这一行动会深刻影响他们（指中国）的利益，而且一看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变。”[78] 英国驻日公使格林评论说，他“担心‘特殊利益’这一词，将会引起日后麻烦”[79]。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背着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相互交易的筹码，任意宰割，相互承认在华侵略的所谓“原则”，还说什么这个“原则”是“国际和平的精髓”，这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

《协定》一经公布，中国舆论为之哗然，众口同声地谴责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这一可耻的侵略行为。北京政府被迫于11月8日、12日分别向日、美两国政府提出照会，声明：“中国仍保持向来之主义，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80] 但这种做做样子的表态，对日、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效用，更何况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本来就是俯首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卖国政府。然而《协定》本身，却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多么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协定》既然是美国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进行对抗情况下的妥协产物，因此，随着大战的结束，美国卷土重来，日、美两国遂以更加激烈的争夺，取代了战时的妥协。1920年新四国银行团的成立，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都是美国联合英、法，抑制日本在华扩张，并迫使日本让步的几着棋。双方在华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深。1922年2月，日本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已把美国列为第一个假想敌国[81]。1923年4月14日，日美换文废除了《蓝辛—石井协定》。

四　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沙皇俄国势力的瓦解，使世界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中国东三省北部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俄国势力的极大削弱，无疑是日本扩大势力范围，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大好时机。因此，它迅速地作出了侵略性的反应。1917年6月，日本外务省委托满铁理事川上俊彦开始对俄国进行了四个月的考察。11月中旬，川上向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提出一件《俄国视查报告书》，在结语中建议：如果俄国苏维埃政府单独对德讲和，日本“至少要占领满洲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82)]。1918年1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成立军事共同委员会，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持，负责研究出兵西伯利亚的各种方案及出兵的准备工作。

为配合这一侵略计划，日本必须取得出兵进驻中国东三省北部的合法依据。为此，缔结中日军事协定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如日本外务省在《日中同盟缔结之意义》文件中所说的：“帝国外交之中枢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之要谛，其归结点即是日中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紧密联盟。……若以同盟的形式明白确立日中两国间的关系，帝国将根据盟约所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无须顾忌列国及中国产生的疑虑，得以公开的推行我之对华政策。……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83)] 在这份内部文件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的侵略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是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政

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多年孜孜以求的侵略目标，现在却利用所谓防止德奥势力经由西伯利亚东侵为借口“给予实现日中军事协同问题，以绝好的机会”[84]。

1917年11月14日，段祺瑞的亲信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乘机相继向靳、曲极力渲染俄国爆发革命后德军有侵入东方的危险，暗示有必要加强中日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的东侵[85]。日本参谋本部密令时任北京政府军事研究员的坂西利八郎（当时正陪同靳、曲等在日参观军事演习）向中国军政各界要人进行游说，以促成协定的缔结。1918年2月1日，田中义一致电坂西利八郎，指示他采取措施，立即诱使冯国璋、王士珍（时任国务总理）同意并主动向日本提出中日建立军事同盟事，以免“万一由我方建议而冯、王不同意时，极有损我国的体面”，并要坂西与段祺瑞接洽[86]。次日，坂西复电报告说：“本职已和参战督办段祺瑞、陆军总长段芝贵正在制定大体计划”，并建议由田中本人非正式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由章向北京政府报告[87]。2月5日，田中向章宗祥提出：鉴于德国势力东渐，“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章立即报告北京政府[88]。

国务总理王士珍就此事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段立即表示：“日本政府关于此问题好意热心的表示欲与我合作，我亦宜以热诚相待，与其达成完满之协定”[89]。段又向外交总长陆徵祥说：“此问题紧急，不可有片刻耽搁，此事系外交总长专管事项，望阁下迅速主持其事，热切希望尽全力促其成功。”[90] 与此同时，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及坂西利八郎连续对冯国璋、王士珍进行工作，强使他们承认中日军事协定的重要性[91]。日本频繁地活动于外，段祺瑞皖系军阀积极响应配合于内，冯国璋迫于内外的压力，终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军事合作的建议。2月22日，北京政府电示驻日公使章宗祥：“近日馆迭派员

探询对于俄边紧急情形，中国是否愿与日本提携，共同干涉；青木中将并谒见主座。经面告以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该中将要请先向日政府用正式声明，然后由两国陆军当局规定办法。……复经国务会议公决，与日本协商进行。”[92] 冯国璋确定的这一中日军事合作，仅限于中国国境之外，中国境内防务则由中国军队自己承担的方针，很明显是针对日本企图侵占北满而提出的，当然不合日本侵略者的胃口。故在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洽谈时，本野表示：两国军事共同行动，没有必要分境内境外，“现事机实已迫切，尤望中国勿事游移”[93]。2月26日，田中义一又向章宗祥提出两项办法：“一、先由两国外交当局结共同行动之协约，其余军事布置由两国军事当局再商；二、先由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外交当局但予认可，俟时机再订。”[94] 这两项办法显然是想绕开直系的反对，直接与皖系军阀交涉，以便顺利签署军事协定。在此期间，直皖矛盾激化，皖系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将奉军调入山海关内，迫近京畿，拟发动军事政变，驱冯下台。在此日皖勾结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冯国璋被迫妥协让步，将中日军事协定具体交涉事，交由参战督办段祺瑞主持。3月2日，北京政府同意按田中的第二项办法，“由两国军事当局各委专员共同规划”[95]。同日，段任命其亲信靳云鹏为中国方面协商中日军事协定的委员长。这样，有关与日本商订军事协定的交涉，完全为段祺瑞所控制。日本通过皖系军阀的积极配合，终于把所谓中日军事合作的侵略计划纳入它们所希望的预定轨道。

段祺瑞一接手总理参战事务全权，即对日本表示，不论境内境外，均可提供一切方便。他对坂西利八郎说：“请放心吧！我所担负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至使日军有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无任何障碍。”[96] 段祺瑞这种甘为奴仆的媚态，深得日本主子的欢心和信赖。坂西在其致田中的电报中说：“（参战处）负责人段祺瑞的意图既然如此，相信在实行中日同盟上不至有何障碍。”[97] 3月23

日，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他一上任，首先处理的问题，就是中日军事协定。3月25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按照日方所定的调子，提出："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我国境内"，威胁远东和平，两国政府应就共同防敌之战略范围进行协商[98]。本野立即复函表示同意。此即所谓中日共同防敌换文。至此，这一出完全由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编自导的侵华丑剧，终于拉开了序幕。

双方换文后，"共同防敌"的具体条款细项即交由两国任命的军事委员进行协商。中国方面由靳云鹏、沈寿堃，日本方面由斋藤季次郎（日驻华公使馆武官）、吉田增次郎（日本海军少将）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协商委员长，并各有军事委员若干人。谈判开始，日本首先提出共同防敌协定草案。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在日本的不断催促之下，稍加修正后，双方即于1918年5月16日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十二条；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九条。以后又于9月6日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七条[99]。这些协定的主要内容为：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须与日军合作，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则"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等。这些规定意味着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而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

军事协定一经签订，日本立即将其策划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付诸实施。19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对俄出兵，13日即往黑龙江省调兵；16日未与中国政府协商，即单方宣布出兵北满，17日日军陆续侵入哈尔滨、博克图、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并强占满洲里驻军营房，勒令中国在满洲里的驻军"退驻后方"。黑龙江驻军急电北京政

府告急称："此次日军举动，志在乘机侵吞北满，其借口满站我兵单薄，迫令退出，已事在必行。将来沿线驻军，恐亦在排斥之列，即明不为排斥，而路权若归日人主持，交通难免受制。"[100] 同时，在黑龙江各地，日军公然行使军用票，俨然如占领军。10月18日，新疆督军杨增新致电北京报告说：日本调查员九人已来新疆，分赴塔城、伊犁、喀什等地进行调查，并"拟在兰州、肃州（今酒泉市）一带屯驻四师团之重兵，又酌分一、二师团集中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名义上仍托为防俄防德云云"[101]。上述日军的种种侵略行径，充分说明了中日军事协定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凭借这个协定，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即使按协定规定应由两国共同商定的重大事项，日本亦可任意单独行动。当英美等国询问北京政府，日本出兵北满是否事先征得中国同意时，日本竟蛮横无理地胁迫中方出面"澄清"，声明双方事先已有所协商云云[102]。中日军事协定中所谓的双方"互相尊重其平等"的漂亮辞令，完全是欺骗世人的谎言，军事协定实质上为日本侵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皖系军阀这种赤裸裸的卖国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根据日本的要求，双方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以《日本的对华劝告》为题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103]；4月17日北京《晨钟报》以及在此前后的上海中外报纸又揭载了有关中日正在秘密谈判军事协定的消息。这些新闻报道引起人们的注意。4月23日，上海三十七商民团体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军事密约。4月27日，广东护法军政府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等联合致电冯国璋，质问是否有中日密约事，并声称"若果有此事，应请严行拒绝；若确无之，则请明白宣布，以祛群疑"[104]。消息传到日本后，各省留日学生于5月4日、5日先后分别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后又由各省各校留学生代表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同时散发《警告大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文》，揭露日本借口联

合防敌，欲吞并中国的侵略野心，呼吁留日学生即刻回国，组织团体，拒绝密约，为救亡图存竭尽全力[105]。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响应，结伴回国，进行活动。据日方统计，当时留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均参加了罢课抗议的斗争；响应号召回国者约有一千二百余人[106]。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国内特别是在北京、天津、上海起到了有力的宣传鼓动作用，全国各地反对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抗议活动日益高涨。5月18日，全国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中日密约[107]。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日报》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刊出；20日，北京各报纷纷转载。同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紧急集会，声讨北京政府亲日卖国。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较、法政专门学校等学生二千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108]。22日，天津千余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在中日军事协定上“勿盖印”[109]。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起而响应，请愿要求废除军事协定[110]。皖系军阀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各界的同声声讨。

中国人民反对日皖勾结的爱国正义斗争，使日本侵略者、段祺瑞等惶恐不安。日本担心协定谈判若迁延时日，将愈加遭到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于己不利。5月3日，田中义一走访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在协定签订之前，不能指望日本方面提供贷款和武器。”[111]由于日本不断施加压力，段祺瑞北京政府不仅加速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并为迅速使协定合法生效，与日本议定以双方换文形式代替批准手续，协定自交换之日起立即生效。5月29日，双方在北京完成交换手续，5月30日同时公布《共同防敌换文》（即3月25日双方之换文），但对协定内容却秘而不宣。

段祺瑞自恃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后台，内有皖系各省大小军阀的实力支持，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军事协定。他自以为得计，但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卖国行径不仅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皖系一伙卖国贼的嘴脸，从反面教

育了人民，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

第二节　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国会来源于安福俱乐部。在叙述安福国会之前，首先要交代清楚安福俱乐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以及它是怎样形成的。

一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安福俱乐部，简称安福部，通称为安福系，是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政客为了操纵国会选举，掌握政局，与直系冯国璋相抗衡而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所谓“再造共和”之功出任国务总理，成立新政府，国内政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国会和总统问题。段祺瑞以前次对德宣战案，国会与之为难，与国会的嫌隙已深，不愿见其复活。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当时参加了内阁，成为段内阁的重要支柱。研究系阁员因国会中本系人数过少，不能伸张其主张，也不愿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即段内阁成立的那天，梁启超、汤化龙等向段献策，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既经一度复辟推倒，即已蜕化死去，现在复生的中华民国，系由段祺瑞一手另造，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因此国会断无恢复之理；何况国会不好，首先是因《国会组织法》不完善，倘不先组织一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必将蹈旧国会的覆辙[(112)]。梁启超还指出：第一，“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之担保”[(113)]。因此，他们谬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

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对研究系这一改组国会的主张，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表示赞成。

7月24日，由梁启超起草，北京政府国务院致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改组国会的电报说："国体新复，政府初成，国会已经解散，宪法尚未成立……则组织立法机关，实为最急之务。"电报认为恢复旧国会之说，事实上必不可行，因为明令解散之后，断无重新召集之理。且自经解散，国会之威信全失，"威信既失，精神不存，假令恢复，徒滋纷藉"。至于改选一说也不可取，因为选举程序繁重万分，调查宣布，非一时所能完成，加以初选复选需要时日，则国会成立，为期遥远。而且国会人数过多，权限不明，规制未善，不仅目前困难，亦非长久之计。电报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改组，减少国会人数，提高议员资格，"则所选必为良材，而议事庶遵轨道"。但要改组国会，必须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其是必须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的合法机关。这个合法机关，就是约法上规定的参议院。电文说："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违悖；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救时之图，计无逾于此者。""至于国会组织法，乃约法上参议院所制定，既有制定之权，畀以修改之任，于法为宜，于理为顺，则改组之主张，亦必先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乃能贯彻也。"(114)

电报发出后，隶属于北洋的各省督军都复电表示赞成。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五省，则主张恢复国会，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如前所述，孙中山发动了护法战争，从此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

9月29日，北京政府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命令。令文指出："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115) 命令要求各省及蒙、藏、青海各长官选派参议员，于一个

月内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以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同时并令内务部按照民国元年筹备成立国会事务局的办法，迅速筹办预备选举。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席会议并致词。11月14日，参议院进行选举，出席人数一百零二人，王揖唐（1877—1948，安徽合肥人）被选为议长，那彦图被选为副议长，由王印川任秘书长。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便积极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将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公布。新的修正法与旧法有两点较大的不同：一为减少了两院议员名额。当时研究系以为从前国会人多口杂，议案不易成立，主张减少人数。梁启超说："中国地广人众，每议员一人代表公民四十余万，安能代表真正民意？而在议会则嫌其多，人杂言庞，此其所以捣乱也。不如裁减其数，政府可省豢养之费，议会易收统一之效。"[116] 因此，参议院议员名额由原来的二百七十四人，减为一百六十八人，其中一百三十八人由各省选出，其余三十人由中央选出。众议员以每百万人口选出一人，由原来的五百九十六人，减为四百零六人。二为提高选举人资格。原法规定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出，新法改由省区地方选举会选出，采复选制。初选以县为单位，规定必须具有高等专门学校以上毕业、有相当资格、任事满三年，或曾任荐任以上官吏满三年、简任满二年，或拥有不动产五万元以上，或年纳税百元以上者，始得为初选当选人，参加复选。其由中央选举会产生者，规定须曾有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以上，任事满三年，或退职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及曾任特任官满一年以上，或经营农工商年纳直接税一千元以上，或有一百万元以上之财产者。众议员初选选举人资格，亦较民元选举法规定为高。提高选举人资格，在于将选举人人数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便于操纵。

《修正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公布的第二天，即2月18日，北京政

府即命令内务部筹办国会选举事宜。此时，一些皖系军阀、官僚、政客，认为政治上竞争角逐的时刻已到，机不可失。他们为了争取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以便操纵国会选举，把政敌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自己的领袖段祺瑞或能为己派所用的人来当总统，并进一步把持政坛，控制局势，于是组织了安福俱乐部。

早在1917年8月间，属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当时不过是一个寻常俱乐部性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筹备事宜的进行，皖系及倾向皖系的官僚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谈论的中心议题自然也是国会选举问题。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曾毓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瀚、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3月8日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政党相标榜。一次，在讨论名称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徐树铮表示赞同。但议论很久，仍不得一适当之名称，郑万瞻、光云锦提议说："今余侪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乐部乎？口采既吉，名称亦宜，余愿同人亦既安且福也。"[(117)] 大家表示赞成。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成立，次年3月8日王揖唐在该部成立周年纪念会上曾作了如下的记述："自前年段合肥马厂誓师扑灭复辟后，恢复共和，中华民国死而复生，共和国家斯不可以无国会，又鉴旧选举法、组织法之不良，于是根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修正两法，本部同人彼

时在参议院者，对于两法有所商榷而为一种结合，在安福胡同始觅房屋，因委托梁式堂筹办一切。开始之初，假定梁宅以为收发函件之标帜，又经徐又铮君极力赞成，遂告成立。此为本部筚路蓝缕之起点也。去年三月七日晚，本部开会，经郑万瞻等提议正名为安福俱乐部，虽因地而定名，实有安国福民之宗旨也。于是安福俱乐部自去年三月八日起成立。”(118)

安福俱乐部后来因参加人数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因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用语，又为俱乐部的发祥地，所以一般仍称为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世称安福系，因为它是一个派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其组织逐渐扩充，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后两人均厕名于安福系十大祸首之列）。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吴文瀚、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则较国务会议尤为完密，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

安福系作为一个政党，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完全是一群皖系军阀、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的政治集合体。一次，徐树铮曾向他一个亲信吐露他成立安福俱乐部的目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某亲信问：“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说：“余持金钱以驱策

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119)

安福系除北京中央成立组织处外，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收一党员。王揖唐本为旧统一党头目之一，但没有旧统一党党员加入安福部。

安福系的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徐为段祺瑞的门生，最得段的信任。因此，安福系隶属于皖系，是皖系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但安福系并不等于皖系，皖系不尽为安福，如段祺瑞本人就不是安福部中人。靳云鹏也是段的门生，其受段的宠信不亚于徐树铮，同属于皖系，但与徐不睦，两人暗中争斗激烈，后来甚至站在直系—边，同倒安福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国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内凭借皖系的军事实力，盗卖国权，大借外债，操纵国会，把持政权，阻挠和议，祸国殃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了两年零四个月，其罪行罄竹难书，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

二　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即全力投入了国会的选举。

国会，亦称议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及其政权组织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象征。

在中国，一切民主主义者都把国会看得十分重要。但对于想实行封建独裁专制统治的军阀来说，它却是一种束缚和绊脚石，因此军阀都不喜欢国会。如前所述，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曾经将国会解散过一次，后来张勋复辟，国会又遭到第二次解散。军阀有时也需要保留一下国会，不急于去扼杀它，并不是对它有何好感，而是想利用它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一旦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把国会当

作赘瘤，予以抛弃。袁世凯“剿灭”了南方的二次革命后，为了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总统，以便合法地进行统治，并没有立即解散国会，但当他一登上总统座位时，很快便把国会一脚踢开。

段祺瑞自然也是不喜欢国会的。国会重新开会后不久，在一些督军的策动和皖系军阀的喉舌《公言报》的鼓吹下，解散国会的论调，就一度甚嚣尘上。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和段派军阀不仅不愿让国会复活来同自己作对，即使新成立一个国会，他们也担心不听自己使唤，难以驾驭。因此，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他们本想干脆不通过国会，而由临时参议院这样原本是过渡性质的立法机关来代行国会职权，因为临时参议院成员人数很少，又是经指派产生的，易于操纵，并且可以免去召集新国会或恢复旧国会等的许多麻烦。在这个问题上，段派主战派的领袖倪嗣冲、徐树铮主张最力。倪、徐名义上以时间紧迫（总统任期1918年10月届满），通过全国选举，成立新国会，再由新国会选举总统，已经来不及做借口，实际上是因为由临时参议院来代办，可以保证能让冯国璋下台，由段祺瑞来当总统。同时倪嗣冲自己也有想当副总统的意图。段祺瑞起初对这点也是默许的。但是，当时不仅南方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则南北绝无调和之余地”[120]，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钱能训、梁士诒及段派内部的重要分子靳云鹏（已开始和徐树铮有矛盾）等，也都不赞成。4月下旬，段祺瑞南下到汉口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对南战争的军事问题外，国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列席者有曹锟、张怀芝、徐树铮、王占元、赵倜、叶恭绰及各省代表。段征求大家关于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总统的意见。曹锟（曹此时尚介乎直皖两派之间）当即起来表示反对，认为：“总统选举，固极紧迫，然选举机关不可不依法律所定，以示慎重元首（指冯国璋）之意，并以减反对者之口实。至所谓法律上之选举机关，自以赶行召集新国会为当。现在新国会既在办理选举，自无须临时参议院代行职权。”[121]与会者没有不同意曹锟意见的人。段祺瑞鉴于这样赤裸裸的违法毁法行为会遭到全国包括皖系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才决定不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而加速

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二重性。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国会，但又不能完全不要国会。这除了为上述形势所迫的原因之外，还在于：第一，如前所述，他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非法向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借款，这些借款都是政治性的，多数以国家税收为担保，但又没有一项是经国会批准的，他需要征求国会的同意，召集新国会予以追认。当时有的外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说："夫新国会之选举，其根本主义非欲藉此以促北京与广州之调和也。其意不过欲使目下所视为不甚合法或全不合法之某种事业变为合法而已。如向日本接洽之各种借款，政府中人多与有关系，必使其立于无可驳斥之地位。而就目下言之，则无一曾经国会之通过者。夫纯粹之实业借款，固无须国会批准，而今之借款，则大多数实业其名而已。就其实际言之，悉供政治上之用，而多数以国家税入为担保，即此一端，已不得不征求国会之同意。今新国会之召集，盖即所以追认此种种借款者也。"(122) 第二，既然国会是民主制度的象征，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就不能没有国会。有一个国会的存在，让它形同虚设，也比没有要好，因为它可以欺骗迷惑群众，对于实行军事封建独裁统治，多少可以起到一些掩饰作用。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国会的利与害，就看由谁来掌握国会大权。如果国会的成员多数是对立党派的人，由敌对势力掌握，于段派当然不利；如果国会中己派的人占了多数，成了自己的囊中物，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国会就能变成个人独裁或一派一系专制的御用工具。他们可以通过国会自身的权力，有效地控制内阁，并使一切非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对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国会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掌握即将新成立的国会，首先是如何能使己派和支持己派的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的问题。

3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了第二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的命令，规定参议院议员选举于6月20日举行，众议院议员选举初选于5月20日举行，复选于6月10日举行。两天后，安福俱乐部正式

成立。3月23日，段祺瑞再次登台组织内阁。4月26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请迅速召集新国会。5月4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否认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王揖唐等为了使安福系或倾向于安福系的人多多当选，使己派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制造一个为皖系军阀统治效忠尽力的国会，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怜于“财神”梁士诒。梁曾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此时正想借段祺瑞、徐树铮的帮助，“重振交通系之势力，为卷土重来之计”，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三百万元巨款的援助[(123)]。徐树铮将这笔钱交王揖唐，包揽选举。其时，徐正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出任奉军副司令，先后又挪用奉军军饷二百余万元交王揖唐支配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的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于是派员分赴各省活动，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124)]。

这场包办选举的策划者和幕后指挥者是徐树铮。从下面几封密电中，可以清楚看出，为了使自己的同党多多入选，徐树铮是如何在其后台老板段祺瑞的支持下，密谋策划，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发号施令，指使其亲信和党羽倾力包揽选举的。

5月27日，徐树铮在岳州途次给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密电中说：“新奉国会为国家根本，晋省选事得我兄大力包举，凡在同人，极深倾佩。兹更有进者，人才以坚定不摇为上，而举总统、任总理、制宪法、议法案、选议长荦荦诸大政，尤须与我辈一本公义专谋利国之主旨步骤合一。顷者复选期迫，往来京津，互叩菊、芝两老（即徐世昌、段祺瑞）意见，选才一节，佥主严加披拣，谓此时多一分考察，即异日减一分枝节。诚以目下党派纷歧，诡谋繁衍，一有不慎，将来

院内情形，即非院外人所可推测云云。昨由揖唐议长与子琮、芬圃（即田应璜、李庆芳）诸君仔细切商，务求一劳永逸之计，一俟诸君审议有定，即行专电奉察。吾兄与国休戚，谅已成竹在胸。”(125)

6月1日，徐过郑州时致电皖系各督军说：“飞急。密。亲译。顷接一堂（即王揖唐）沁电：‘接王仲芗（即王善荃，时任福建政务厅长）由闽来电：两院选举，闽、漳、建三道均有把握。昨忽有人自京来称，中央不甚赞成，闻之惊讶。除仍照旧进行外，祈速确示遵办。敝处复电文曰：奸人希图破坏，幸赖高明洞烛，祈始终坚持，无论何人造此浮言，严予拒绝云云。邦本安危，在此一举。选期迅迫，少纵即逝，拟请迅电同志各省，杜遏奸谋’等语。此次选政，所系甚大，若辈诡谲多端，造谣煽惑，自无所不用其极。闽中既发现此事，难保不分途秘进，极盼坚持促办，俾奸人无所施其伎俩，庶选政可早日告成。除电复一堂外，特以密闻，祈赐鉴察。”(126)

6月6日，徐返回北京后，致电陕西南郑镇守使管金聚说：“此次选事，关系国本，稍有不慎，立蹈覆辙。吾兄关怀大局，谅在洞鉴。陕省选举，闻已依法进行，请【诸】赖维持，无任企佩。惟闻汉南方面，颇有阻碍选政之人，近在贵治，故芝揆（指段祺瑞）谕即转达吾兄严切注意，会商张道尹协力援助，俾可多得贤材，则裨益大局，良非浅鲜。用特奉达，尚祈照察。”(127)

6月7日，徐又密电阎锡山，进一步具体提出了参众两院议员候选人名单，请他大力支持，使这些人得以当选：“此次选举，顷由一堂、誉甫（即叶恭绰）诸兄，约同田君子琮、李君芬圃公同商酌，就贵省人才，各举所知，备兄参考：‘参’，拟田应璜、贾耕、祁景颐或曾纪纲、陈钰或刘懋赏、解荣辂或张瑞，候补拟梁万春、张友桐、冯司真、樊振声、兰承荣。‘众’，拟冀宁道属：李庆芳、祁景颐、郭象升、吴淞、冀贡泉、常赞春或李友莲、裴宝棠，候补王学伊、林孚、赵丙燮、任应春。雁门道属：耿臻显、狄麟仁、邢殿元、蓝钧、刘棫或梁济，候补马晋、庞士俊、穆郇、陈毓沂、兰承荣。河东道属：郭

德修、高时臻、杨柏荣、李道在或庞全震、刘培泽或张集义，候补许喆、郭沛、仇元踌、张承绪、王禄勋。各员乡望素孚，宗旨纯正，特请鉴定，惠予揄扬。如蒙鼎力扶持，幸得入彀，于国于晋，两俱裨益也。”(128)

同日，徐在致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密电中说：“顷闻此次选举，某党系竞进甚烈，芝揆极注念。前属一堂议长于卅日两电某党之赵世钰等姓名及中央妥拟乡望素孚之崔云松等姓名分别奉达，力为抉择，兄处必已坚卓进行。顷谒揆座，又以选期已迫，稍纵即逝，特更嘱弟敦嘱，务望植兰刈艾，以期永奠邦基。一、某党暴徒赵世钰、李述膺、杨铭源、冠【寇】遐、尚镇圭、焦冰、马骧、李含芳、焦易堂、刘治洲、于右任、茹欲立、郭希仁、李元鼎、张炽章、李异、田中玉、薛其昌、南岳峻、雷溥等，千万严切防闲，勿令有一选。一、崔云松、谭湛、张蔚森、王觐墀、宋伯鲁、段大信、何毓璋、钟允谐、高杞、罗仁博、张树森、白建勋等十二员，宗旨纯正，若得入选，利国匪细，极盼揄扬，俾获一当。查陕省参、众员额共十九名，此十二名外，尚余七名，兄更就地取材，必益稳惬。为国征贤，共趋正轨，跂幸无似。至一堂前电有高增融一名，复查与某党甚洽，又朱家训留沪未归，亦恐与他系结合，应请查酌。又闻研究中人近在陕勾结老派，大肆煽惑，确与雪（雪亚，刘镇华字）有勾连，乞相机防制。”(129)

上列致陈树藩电文中所称“某党”，指的是国民党。此时南方因护法问题已与北方决裂，形成对峙局面，段祺瑞、徐树铮视国民党为敌党，要求“植兰刈艾”，不要让国民党人赵世钰、李述膺（均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等当选，而按他们所拟订的己派名单进行选举。他们不仅排除国民党“暴徒”，而且还提出“相机防制”曾经是自己同盟者和友党的研究系分子渗入。

如前所述，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曾经支持段祺瑞组阁，梁等也参加了内阁，并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以改造国会。1917年11月下

旬，段祺瑞因对川湘的战争失败而被迫辞职，梁等以连带关系也一同退出了内阁。此时，段派军阀和交通系紧密勾结，研究系从此下野失势。1918年3月，段祺瑞重新组阁时，研究系被排除在外。段派为了不让研究系在将来的新国会中同自己作对，因此他们要求严防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7月17日，徐树铮致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珮瑢的电报说得十分露骨："顷闻研究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狼入室，至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是要。"[130] 这充分暴露了安福系企图霸占国会的阴谋野心。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曾投靠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支持来制服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力量，但不久即被袁世凯抛弃。现在研究系想投靠段祺瑞来扩充党势，排斥异己，结果又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原来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研究系与安福系最大的意见分歧，即是研究系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则主张须改由各地方团体选出。两者都是从自己的派别利害出发考虑的。研究系因它在各省省议会尚有相当基础，且议会究竟与其他团体不同，不易为政府所操纵，由省议会选出，于己派有利。而安福系则认为，由地方各团体选出，容易把持，能保证自己的人入选。但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中席位极少，他们的主张无法通过，因此梁启超等变更计划，不以之作为提案，仅由一二议员发表一意见书，以唤起各方之注意[131]。选举法上的主张分歧，体现了两派的利害冲突，促使两派间的隔阂和矛盾加深，因而在选举中，安福俱乐部对研究系分子也极力排斥。

中央和地方参议员、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从5月下旬开始进行的。在选举中，安福系通过中央派员和地方长官干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违法作弊，其丑闻层出不穷。

中央选举会选举参议员，6月20日第一部（有学识者）投票选举时，事先安福系用金钱贿买选票，每张约定200元，山西大学派投票团五十五人晋京，临时忽要求每票增加至400元，并须加付来京川

资。另有某大学亦作同样的要求。王揖唐等经多方奔走交涉，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投票时，选举人按安福系“预先印就的投票次序名单”投票，上印有“阅后即毁”的字样[132]。张玉昆以8000元收买林建伦所有之二十票，被安福部以2万元高价夺去。张与林交涉，林贪安福重金，与张废约[133]。6月21日投票选举时，上午到会者二百余人，不足《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规定“选举非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到会不得投票”的法定人数，即行开始投票选举，“随到随投，随投随去”。安福系指派负责监督投票的人并任意延长时间，直至下午6时，仍不满法定人数。当场有人指出此种投票实属违法，应立即停止，另行依法办理，监督人不允。更有甚者，监督人竟于22日继续举行投票，与先一天之投票人合并计算，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134]。张玉昆、何竣业等向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揭露中央选举会选举的种种违法舞弊情形。因当时司法总长朱深是安福系的党魁之一，北京司法界的要人又均与徐树铮有关系，朱乃“密令高检厅以政治手腕办理”[135]。张、何等的起诉虽经开庭审理，但均被驳回而败诉。

京兆地区众议员选举时，安福系党魁康士铎和成员张汇泉，与京兆选举事务所所长曹倜串通勾结，通过伪造选民册，大大增加选民的办法，使自己在复选中当选。大兴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三万人，后竟增至六万一千余人；宛平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二万四千余人，后增至六万五千余人；涿县原为一万余人，后增至二万二千余人。三县选民事项调查者，均为康士铎。安次县选民调查由张汇泉主持，亦由原来的二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一千人。康士铎、张汇泉买通曹倜，“援引不论财产、直接税各项资格，凡为伊等党援者，皆列名册籍，甚至并无其人，虚名捏造”[136]。按省议会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为合格，众议院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为合格。大兴县省议会选民只四万七千余人，而众议院选民则高达六万一千余人，反而超过省议会选民一万四千余人；宛平县省议会选民只三万三千余人，众议院选民竟超过省议会选民三万二千余人。这就是说，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反大大超

过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事理悖逆如此，不是作假舞弊，又是从何而来？

湖北众议员选举完全为安福系所包办。选举前，王揖唐拨巨款交安福系重要骨干、临时参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南下，专驻汉口，主持贿选。每张票价400元至800元不等，江汉道甚至高达1000元。江汉道众议员复选在武昌城司门口省长公署举行。6月18日投票之前，安福俱乐部即在省公署对面汉口春酒馆设立一交易所，陈列现银，“凡缴纳（选民）证书一张，即可取得成千累百之代价（该俱乐部买得证书，另雇人投票）”[137]。但是，不论安福系如何高价贿买，还有属于研究系及守正不阿之初选人一百七八十不能全行收买。于是主持人便采取违法手段，“以期一网打尽，并宣言某系（指研究系）团结力无论如何巩固，决不使伊等有一人当选”[138]。6月18日下午4时，投票完毕后，依照选举法规定，应即日开票。但安福系非法将开票之日期延至次日，并将票匦收入省长公署内。初选人多人要求即行开票，均被拒绝。旋经初选人当场自行调查及临场监察之报告，均确认是日投票结果，研究系的阮毓崧、熊树棻、倪鸿钧、刘绍炎等各有四五十票，都有希望当选。但票匦当晚被打开，选票被涂改掉换，结果第二日上午开票时，阮等四人各只二十余票，降至候补之列。而安福系候补者之胡柏年、王彭、汤用彬等四人，则由二十余票提升获选。

湖南众议员选举，为安福系分子吴剑丰所包办。投入票匦的选票，同样被打开涂污。研究系杨度用每张票五百元的高价，收买了选票四五十张，不料开匦后，废票约占三十张，杨度二字被改写成“杨皮”、“杨之度”、“洋豆”、“羊豆”等，致有效票仅十九张而未能得选[139]。安福系与研究系选举参议员的竞争亦很激烈，结果湖南应产生参议员五人，悉数被安福系收买。

江苏为冯国璋和直系地盘，该省军民长官属于直系而非皖系，而且研究系在省议会中占有相当势力，因此安福系与研究系的斗争最为激烈。众议院选举结果，淮扬道安福系占三名，研究系占一名；沪海

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苏常道安福系四名，研究系二名；徐海道安福系三名，研究系二名；金陵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两相比较，安福系仍占优胜。参议院选举，研究系为挽回败局，特派其健将蓝公武亲临指挥。安福系亦特派段书云携带巨款南下，两不相下。一时票价涨至每张300元。后来两派互不相让，进行斗争，以致酿成选民捣毁票匦之闹剧[140]。

陕西选举，全由督军陈树藩一人指派，不许旁人过问。关中道有一名众议员非陈所派，亦被选出，陈闻知大怒，选举参议员时，遂极力从严，只许投指定的王樾、武树善等人的票。选举当日，“军人监场，一一干涉”[141]，结果，王樾等均被选出。投票选举候补人时，有三人未按指定名单而别选他人，陈树藩查出后，下令逮捕，“三人几遭杀身之祸”[142]。8月1日，陈将选举结果电告徐树铮。8月3日，徐复电表示嘉勉说：“东敬悉。选员得人，为国称庆。诸赖荩筹，佩仰无任。”[143]

类似上述黑幕，其他各地选举均有。安福系通过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在全国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对此，徐树铮不免喜形于色。6月29日，他在致各省督军的密电中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俟得续报，再行奉闻。”[144] 7月底，选举全部揭晓，除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共选出参议员一百四十七名（按总额为一百六十八名，西南五省一特区二十一名未选出），众议员三百二十五名（总额为四百零六名，西南五省一特区八十一名未选出）。两院合得四百七十二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为三百八十四名[145]，占百分之八十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只得二十余名，遭到惨败。

7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在8

月1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以便正式成立新的国会。随又指派曾毓隽为参议院会议筹备处处长，王印川为众议院筹备处处长，积极着手筹备两院开会事宜。

8月12日上午10时，新国会在象坊桥众议院开会，到参议员一百零六人，众议员三百五十八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开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于宝轩登台报告召集国会之由来，并由年长的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主席就席宣读开会词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就于这一天宣告正式成立。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同日下午也开会宣告解散。

安福俱乐部为了收买议员，供其驱使，8月18日在太平湖中华大学旧址召开欢迎所属两院议员大会，由王揖唐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三百元，票面上印有“任重致远”四字[(146)]。是日，安福“议员到者颇多，皆欣欣有喜色”[(147)]。安福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贩卖议员，所以当时人们“以鱼行老板称之”[(148)]。

新国会成立后，需要选举产生两院议长。安福俱乐部的成立及国会选举，实赖交通系梁士诒的赞助，参议院议长一席，安福俱乐部早在6月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已拟定由梁来担任。安福部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笼络敷衍交通系，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使梁不至于成为将来国务总理一席的竞争者[(149)]。梁士诒虽曾支持安福系，但完全是为了自身派别的目的。他并不赞成段派的武力政策，而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同西南的纠纷；加上在推举总统和副总统问题上的分歧（详后）以及在选举中彼此的争夺，两派间的矛盾加深，开始出现分裂，梁因此表示不愿出任参议院议长。7月初，梁士诒为斡旋南北纠纷，同时为其女儿主办婚事，南下到香港。8月初，段祺瑞、徐树铮托徐世昌电劝梁担任参议院议长，梁即复电坚辞，并有“议员亦不就”之语[(150)]。因梁士诒不愿就，安福系拟推朱启钤或周自齐（均为旧交通系

首领）以代梁。徐树铮于8月14日致国务院秘书长方枢的电报中说："燕（燕孙，梁士诒字）既如此，参长何如即举桂（桂莘，朱启钤字），祈转商揖兄。"[151] 但朱、周已有与梁在政治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密约，均不肯就。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无奈，只好接连电促梁士诒，早日回京共商大计[152]。参议院多数议员决定不等梁同意，举出再说[153]。

8月22日，参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参议员一百二十三人。梁士诒是日抵京，当即赶赴会场参加。投票结果，梁以一百一十九票当选议长，朱启钤以一百一十四票当选为副议长。

王揖唐为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一席将由他担任，早在议员未选出之前即为人所共知。20日，众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议员二百七十八人，王揖唐以二百六十二票当选。副议长安福系原定为王印川，但与他争夺最力者为刘恩格。刘为奉籍议员，有张作霖撑腰，故双方相持不下。张坚持须由刘膺此席，声称："国会用我奉军军费二百余万，乃这些事竟要与我较量，我定有相当办法。"[154] 安福系闻言大起恐慌，决定改提刘恩格，聘王印川为秘书长。6月21日，王揖唐在安福胡同本部大办筵席，宴请议员二百余人，自中午12时至晚10时，分省分班，轮流招待，竭力为刘疏通，说："王月波（印川）为顾全团结计，业已退让，现改就秘书长，望同人体谅王君之意，一致举刘，勿令团体分裂。"[155] 除少数人仍不赞成让步外，多数碍于情面，表示首肯。是日，徐树铮致电奉天督署秘书长袁金铠说："鲤门（刘恩格）副席煞费经营，揖唐八面奔走，至昨日始有定局，特先奉达，以释注念。"[156] 22日，众议院开会补选副议长，议员出席者二百六十七人，刘恩格得一百七十六票，以多数当选。

这一届成立的国会，人们称之为新国会，而把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由于新国会是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产生的，并占有绝对多数议席，因此人们又把它叫做安福国会。研究系伙同皖系军阀把国会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据，研究系自身也被排挤掉。安福系以

俱乐部为巢穴，以新国会为护符，一系一会，狼狈相依，把国会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其一党一系把持的工具。安福国会是西方议会政治的变种，背离了民主共和的原则。这也说明，适合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的议会制度，在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军阀官僚专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三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新国会成立，两院正副议长选出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皖系成立国会的第一个直接目的，就是选举自己的领袖或是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来当总统，以达到合法倒冯，制服直系。

按照1913年10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五年。……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157)] 袁世凯是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的。袁死后，黎元洪继任。黎去职后，由冯国璋代理。按照规定，冯国璋的任职，到1918年10月9日就满了法定期限，10月10日应为本届大总统任期开始之日。当时距总统任期仅一个多月，因此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举行次任总统的选举。

当时能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究竟谁来担任较为合适，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这是包括直皖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直皖之间就这个问题暗中进行激烈的争斗。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在法理上没有什么不合；他又是直系领袖，并得到研究系等一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由于他不同意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同南方的争端，背地里同西南军阀声息相通，保持联系，因此，他还得到西南的同情和支持。西南曾表示，如果北方不选举冯为总统，南方的非常国会可以举

他为总统。但是冯国璋在北方政界的势力不大，在国会中的力量十分微弱，只有江苏和直隶一部分议员支持他。冯虽身为代理大总统，但一切实权都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手里，早已是一个被排挤遭冷落的人。1918年初，他曾异常懊丧地对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据，我自己亦实在处不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好在我之私宅已在外边租妥，继任之人随时可以请进府来居住。现在我已无事可办，不过作一个看守印信之人而已。"[158] 而且，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的第一个直接政治目的，就是把他这个劲敌赶下台，他已被段派视为"在所必去"的人物[159]。因此，冯国璋不得不一再表示不愿当选总统，希望另举德高望重的贤才。他说："下次总统选举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余决不再作冯妇，俟正式国会成立，当喻以此意声明。"[160] "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且余乃承认新国会而不承认旧国会者。如西南于策略上举我为总统，则西南亦必同时举出副总统，我不往就，听彼副总统自代职权可也。至新国会之举总统，如为东海（徐世昌），我竭力赞成，万一而及于余，亦惟有不就而请副总统代理。余已在河间构置住屋，退职以后，不住在京，亦不在天津，将归河间故乡，耕种自活。"[161] 8月12日新国会开幕后，他立即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表明自己告退之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162]

段祺瑞对膺任大总统一席，也不是不感兴趣的，他掌握有中央政权，并且有日本帝国主义后台的支持和援助。在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又占了多数。因此，他很可以运用金钱和权势，引诱和强迫新国会选他为总统，如同袁世凯迫使第一届国会选举袁为总统一样。事实上，在1918年初，徐树铮初次出关联结奉系首领张作霖出兵，以压制冯国璋时，即有将来总统推段，副总统推张，徐本人或王揖唐出组内阁的

默契[163]。段派中也颇有一部分人替段奔走活动，拥戴他为总统，以“发展雄图”[164]。他们举段所持的理由是：“我们费尽全力，办成新国会，就应选举我们的首领当大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就得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165]

但是，段祺瑞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段的武力政策在国内十分不得人心，他被看成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形象已很不光彩，不仅西南视之若仇雠，誓死反对他，北方政界如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从本派系的利益和同西南的关系考虑，也不同意他当选总统。就连段派内部也有些人持有异议，认为“北洋派已经分为直皖两系，现在直系首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务，假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迫使直皖两系之分裂愈形恶化”[166]。因为直皖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如果冯国璋下野而让段祺瑞上台，直系绝对不会答应，只会加深直皖之间的分裂，导致整个北洋的解体。何况冯国璋的同意下野，是以段祺瑞的下台为先决条件的，这不仅意味着段祺瑞不能当总统，而且连现任内阁总理的职务也必须辞去。这种斗争形势，也影响并加深了皖系内部的意见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从缓和北洋内部矛盾，稳定政局着眼，也主张另提一接近皖系，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因此，由段祺瑞出任总统，也为情势所不容。段只好知难而退，表示“自身绝无希望，非但不希冀总统问题同彼发生关系，倘选举进行能顺利，不生波折，则国家主持有人，彼并愿抛弃现有之政治上地位”[167]。当然，前提条件是冯国璋必须从总统位置撤下来。

直皖斗争和南北纠纷使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这样，总统的候补者就只有徐世昌一人了。

徐世昌为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善观风向，长于玩弄权术。他在直皖对立和南北斗争中，以“调和者”自居，两面讨好，不为左右袒；对段派不即不离，对直系则暗示亲近，对西南则表示有和平妥协的愿望。皖系以段祺瑞无法选任总

统，徐世昌为文人，没有兵柄，易于操纵，便决定改提徐，想让他作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诸事“反有益于进行，而便于倒冯”[168]。6月12日，徐树铮给王怀庆的电报说：“时局多艰，非东海莫克负荷，尤非我辈共矢公忠，莫为捍卫。”[169] 冯国璋以段祺瑞不当总统，于自己的北洋首领地位无损，也表示同意由徐世昌任总统，认为要度过目前政治上之难关，“而谋大局统一，非东海登台不可”[170]。前面提到他希望“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指的就是徐世昌。直皖之间的斗争，需要有一个第三者缓冲人物出来，借以维持北方政局，徐世昌正是这样一个适当和权宜的人物，因而受到两方的拥戴，可以说是坐收渔人之利。此外，交通系大多数与徐世昌皆有渊源，梁士诒曾向安福系提出过他就参议院议长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徐世昌任总统[171]。研究系讨论会一派原本属徐，研究会一派议员因冯国璋在选举中完全失败，也倾向徐。这样，徐世昌便受到北方各政派的一致支持。

7月底，北洋各督军在天津开会时，已决定推徐世昌为总统。8月2日，冯国璋的亲信从天津打电话告诉冯说：“津议一致推徐，决请钧座息肩。”[172] 徐世昌本人认为，“今为武人专政时期，无容纳文治派和平议论之余地。”他希望直皖“两派相安无事，自行约定择一为总统”，他“当与以善意之援助”；但又表示：他“非绝对不再出山。惟此种形势之下登台，必至自毁，故不欲上此大当”[173]。这就是说，只要直皖两方互相让点步，形势有所缓和，他还是愿意出来干的。一荣俱荣，徐世昌如果担任总统，他手下的人自然也会从中得到好处，因此他们为徐的当选大力进行活动。

正当新国会成立，总统选举迫不可待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间，吴佩孚等前敌将领接连发出通电，要求罢战主和，并同南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吴佩孚还表示强烈反对新国会选举总统。8月7日他致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说：“民国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乱。国会者，立法之最高机关也。此次新国会选举，政

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因之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立法机关受行政之指挥而等赘瘤。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行专制，酿成全国叛离、外人瓜分之祸。缘此推之，亡国之兆已萌，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174] 8月21日，他又通电指出：“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祸，即在目前。国利安在？民福奚存？……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尤为我经略使（曹锟）与长江三督帅及各省军民长官所急应注意者也。”[175]

接着，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亦实行新的结合，发出先决时局，然后选举总统的通电。三督之间常有代表往返，商议促进南北妥协事宜。西南对吴佩孚的通电，也予以积极响应。谭浩明、谭延闿8月23日致吴的电报说：“马日通电诵悉，大义凛然，同深赞服。依法解决，笃爱和平，本西南宗旨。顷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以副盛意。”[176] 吴佩孚的举动，暗中得到曹锟和冯国璋的默许和支持，因此实际上是直系向皖系发动的一次新的挑战，其意图是推倒主战的段祺瑞内阁，挽救冯国璋的失败。

主战派认为，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建议是冯国璋的阴谋，一致表示反对。8月24日，奉天督军张作霖、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督军陈树藩、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吉林督军孟恩远，由张作霖领衔联名通电，要求速举总统，以安政局，并另有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分致参众两院[177]。25日，倪嗣冲响应张作霖等五督的通电，表示要“竭尽绵力，为公后盾”[178]。28日，张作霖又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吴佩孚发表主和电，必有主谋之人，应请查明，从严惩治[179]。显然其矛头是指向冯国璋的。

这样，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主张

先决时局，后选总统；一种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争执的背后，仍然是直皖、冯段之间的斗争。皖系以国会为武器，以速选总统倒冯；直系则以前敌军官作先锋，以缓举总统谋和倒段。当时舆论指出："所谓先决时局云者，质言之，则先倒段内阁耳。所谓先举总统云者，质言之，则先倒冯总统耳。一方以国会之多数党为武器，以张、倪等主战之电及五督请速举总统之电为声援，一方以前敌将卒停战请和为武器，以曹锟与长江三督沉默为声援，旗鼓相当，日逼日紧。京津之间密布愁云，一经道破，总统问题，时局问题，冯段两派之问题；南北问题，和战问题，北方内讧之问题也。"(180)

在直皖两派关于选举总统问题上的对立中，梁士诒又同段派站在一起了，认为先决局势，缓举总统，"为目下形势所不许"，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181)。研究系则赞成缓举之说。

段派唯恐迁延时日，夜长梦多，时局将进一步发生剧变。为了抵制直系阻挠总统选举的图谋，便决定加速组织总统选举会。8月27日，安福系议员盘据的众议院开会，由议员王伊文提出，并有程克、徐世一等六十人连署的《两院从速会合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案》，认为"本届国会业于八月十二日行开会式，两院议长均经举定，计距大总统任满仅一月余日，不惟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且目前内政、外交之紧迫，在事实上亦有次任大总统产出之必要"。因此，提案主张由众议院会同参议院从速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182)。众议院表决，以多数通过。少数派研究系议员黄群等要求先决时局、缓举总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决定咨行参议院，限七日内开两院会合会议，决定选举总统日期。

8月29日，参议院开会讨论众议院移付的《速选总统案》和参议员吕调元、张玉庚等提出的《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案》，以多数票通过，决定于8月31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商定选举日期。8月30日，安福俱乐部开会，决定9月4日为选举日期，并举定发言人，在两院联

合会提出主张速选的理由。8月31日，参众两院联合开会讨论选举日期，结果决定9月4日进行总统选举。

由于此前徐世昌一直未正式明确表示他选出后是否愿意出任总统，有些议员还有点不放心。因此，9月1日，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往东四五条胡同徐宅敦劝。徐世昌说："诸君何苦推我衰朽之人登台？"梁、王说："相国（按徐1914年曾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故人称为"相国"）之外，无人能解决时局，时局不解决，无以一致对外，相国忍见亡国之惨乎？"徐于是回答说："诸君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亦无法。但是诸君举我，是希望我将一切事件办好，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不好，我亦无把握。"[183] 显然，徐已经默认就职了。

8月31日和9月1日，研究系接连开会讨论选举总统问题，到会五十余人。梁善济、籍忠寅报告了他们拜见徐世昌时徐派吴笈孙同他们谈话的情形。梁、籍曾向吴提出三个问题：一、徐被选后是否肯就职？二、徐对于时局是否主张和平统一？三、如主张和平统一，有无具体办法？吴答说："（一）东海本不愿出，某即为劝东海不出之一人。但届时东海如果被选，其势亦不能不为大局所牺牲。（二）东海被选后，一时尚不能表示对于时局之态度，但要以和平统一为最后之目的。（三）现在尚说不到解决时局之具体办法，但东海终以事实问题当先解决，而其他涉及理论问题者从缓。"[184] 接着黄群又报告他和籍忠寅等应梁士诒之约会谈的情况。黄等问梁：徐是否肯就职？梁答："必肯就。苟于被选之后即将当选证书送去，则选举总统问题即可完全解决。"问："东海对于时局之意见如何？"答："主张和平。"问："当选后，是否即可发表？"答："即可发表。"问："合肥对于东海主张，其态度如何？"答："不必虑，东海当选，则合肥必下野，不日当有表示。"问："主战各督对东海主张是否可以让步？"答："当可让步。"问："前敌将领已表示缓选总统，今日遽行选出，能不发生障碍否？"答："东海主和，前敌将领亦主和，当然无问

题。”黄群因此向研究系同人提出：“（一）数年来吾国始终为武人总统，东海非武人；（二）东海入民国来，尚未入政治之旋涡；（三）东海主张与本会相同，本会为大局起见，于东海之为总统则赞成，而于速选则怀疑，盖恐速选之结果反有障碍也。”[185] 会议讨论后表决，一致通过徐世昌为总统候补者，但因对速选表示怀疑，未做出决定。9月3日，研究系又开会，鉴于参众两院议员绝大多数赞成9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会，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抛弃其对速选怀疑的意见，决议：“推定徐世昌为大总统候补者，本会会员四日一致投票。”[186]

为了使速选总统得以顺利实现，段祺瑞表示决定与冯国璋同时下野，于8月31日发表愿意辞职的通电：“良以统一不成，和平直成虚愿，而国纲所在，断不容弃统一以就和平，理既甚明，事非得已。惜祺瑞襄赞无方，未能早纾国难，上负大总统知人之哲。今幸国会告成，已议决组织大总统选举会，实为我国第一次改选大典。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187]

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即9月3日，安福俱乐部还在太平湖分部搞了一次总统选举预演——“总统预选会”。是日到会者三百八十四人，用记名投票方式，共得三百八十三票（一人弃权），一致举徐世昌为总统[188]。

9月4日，总统选举会在象坊桥众议院正式举行。是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居民商铺奉命悬挂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安福俱乐部特备汽车十辆往来于会场和各招待所之间，接送该部议员到会投票，由议员李庆芳专司稽查任务。上午10时，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宣布开会，梁因患感冒，改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任大会主席。宣布参议员出席者一百三十一人，众议员出席者三百零五人，共四百三十六人，超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的法定人数。接着举行投票，结果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另段祺瑞得五票，王士珍、张謇、王揖唐各一票，废票三张，冯国璋未得一票），当选中华

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全场一致鼓掌欢呼。安福系苦心经营了半年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获得了全胜。在参观席上的徐树铮，亦“面有喜色”[189]。

会后，徐树铮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立即两次通电告知各省督军，并为这次选举粉饰吹嘘，说：“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不崇朝而国本以定。院外警备，比之常会，不过于照例警察外，多悬彩旗，以昭盛典。外人参观者，院内外均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云云。闻东海尚拟具电辞让，以表谦德。议员已当场决议，责成两议长代表全体恳切劝驾，勿容推让。”[190]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9月5日，按照官场惯例，发表一篇揖让文章，“以示谦德”，实则并非真想退避。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各省长官纷纷致电恭贺他荣膺大总统，并同声挽劝，其中以张作霖的捧场最为起劲。9月8日，他在分致徐世昌和国务院及参众两院的电报中说：“我大总统当代耆英，群伦冠冕，山斗望重，中外咸钦，正宜膺众选，正大位，得时则驾，解民倒悬，以庆天而顺人，则时局虽危，未必不能挽回气运。所谓天生李诚晟【存勖】，以为社稷，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若夫谦抑为怀，遽尔引退，此皆山林隐逸硜硜自守者所为，窃为大总统不取也。”[191] 废帝溥仪和逊清遗臣们，从维护皇室利益出发，也敦劝徐勿辞总统职。据徐世昌1918年9月15日（八月十一日）日记记载：“前此醇王偕世中堂来劝勿辞总统之选举后，又自来敦劝担任被选，世中堂复来劝勉。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任，而可维持皇室也。”[192] 又9月17日（八月十三日）日记：“昨日世中堂代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云：‘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193] 一个民国总统在他走马上任之前，竟然要请被推倒的皇上来核准，这个总统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吴佩孚和西南公开表示不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不同意他上任。9月13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并另有一电致各当道，主张另行改选总统。他在致徐的电文中，力陈徐不可就任大总统的理由说："我国既称共和，纯以法律为根本，法律不完，邦基不固。此世界所共认。国会为国家立法最高机关，国会议员为国民完全代表，而选举总统又为国家非常重典，故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斯全国拥护，乃见真诚。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之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未经选送，似此卑劣不完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我公若曲从除却西南五省之劝电，勉为就职，则民国分裂，乃由公始。天下后世，将谓公何？且分则必争，斯和局永无希望矣。"电文还指出："若我公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首领，并敦促冯代总统颁布罢战明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德莫厚焉，功莫大焉。对于国会议员，通国另行改选，以期完美，届时国会有良好议员，重选总统，自然舍公莫属。则西南既不以非法借口，中央亦得免违法訾议；将士既无暴露之虞，人民亦无涂炭之苦。尔时我公虽欲不就厥职，窃恐欢呼万岁，拥戴一尊者，同声相应矣。"(194)

西南从"法统"观念出发，只承认冯国璋的代理大总统地位，不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认为对徐本人并无成见，只因他为新国会所选出，因为要反对非法机关，所以也要反对它所选出的人选。9月6日，冯国璋曾致电广州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等人，为徐世昌疏通，请他们赞成徐为第二任大总统(195)。9月14日，岑春煊等复冯电说："公电谓全国人民皆厌乱望治，诚然诚然。煊等恸国权之失，伤民困之增，想望和平，不敢独后。但以非法国会强行大选，使解决时局之道益形困难，是否合厌乱望治者之心理，或为应付厌乱望治者之适当方法，请还诉之人民。煊等军府备员，对于北京大选，早有布告，谓所重在法，于人无所容心。东海宿望高年，人所共晓，惟为非法机关所自出，则煊等不敢赞一词。年来北京政治浊乱，法纪荡然，我公代职，原属依法，所愿以依法始，以依法终。"(196)

9月16日，岑春煊、伍廷芳等致电徐世昌，劝他勿就总统职："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斲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任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诗张为幻，与日俱增。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可以非法选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慨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选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蛊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197)

后徐世昌上任，曾设法促成南北议和，谋求南北和平统一，但安福国会和他本身的地位涉及到一个法统问题，就成了南北妥协和解的难题和一大障碍。

显然，吴佩孚和西南反对徐世昌就任总统，矛盾并不是指向徐本人，而是指向主战的段内阁和由段派所操纵的非法国会。

紧接吴佩孚9月13日致电徐世昌之后，曹锟因其当副总统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加上其部属等前线将领坚决主和，亦于9月14日致电京沪各报馆，也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号，在其洋洋洒洒千余言的电文中，一反其以前主战的态度，痛责国内阋墙之斗和武人权利之争。他说："民国七稔，祸变侵寻，政潮之湍激未平，地域之争衡愈烈。始则一方相怨，继而同室相仇，俶扰纠纷，于斯为烈，穷其流极，虽圣哲无以善其后。……今日阋墙之祸，殆如狭路之逢，一言以蔽之，曰权利竞争而已。果使具有国家之观念，何暇争权利之攘夺。国步频危，民生已蹙，颠连之状，呼吁之声，设竟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嚣嚣然惟个人权利是图。内讧方殷，外侮将至，循此以往，立召危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要求全国同胞，"不分畛域，事事协助，推诚相与，誓诚共见。惟大厦将倾，尤须众木撑持。切望当世明达，急

起而共挽之”[198]。曹锟虽不如吴佩孚态度鲜明，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表示反战主和立场。前此不久，他因受北京政府指责，还屡电申斥吴佩孚，现在却不顾一切，与吴唱一个调子了。同日，曹锟还有一电致徐世昌，同时分电国务院、参众两院各当道，声称：“地方之于中央，腹心所托，干城所寄。既担拥护之诚，为大局策万全，非为一方徇私意；为亿兆谋幸福，非为一人谋禄位。”[199]这更是明显向段内阁的挑战，对主战派的有力打击。曹锟电报发表后，吴佩孚、李奎元等于20日通电表示响应，要求早息内争，促成和局，并提出请曹锟主持一切，“请长江各督仍任调人，公推东海先生为调人领袖，则和局之成，易于反掌”[200]。

在总统选举以前，段祺瑞曾有“乞退”的表示，而在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他反而渺无声息。原来，段本人并无下野之心。8月31日，他发表愿意辞职声明，在属稿时曾对他的一个亲信说：“不能无此语，亦并不重此语。”[201]可知其辞职云云，不过是为了敷衍舆论，应付时局而已。段左右的人如徐树铮等，亦想竭力维持段内阁不变。徐世昌又当然表示挽留，不能劝退，故相传有一时决不更动内阁之说。但此时段祺瑞由于为军事和财政问题所困，已处于绝境，实非下台不可，而曹锟、吴佩孚的电报，又具有明显的“逼宫倒阁”性质，“实对于段阁恋栈下一针砭”[202]。9月15日，段祺瑞看到曹锟的电报后，顿时“仓皇失措”，当夜即召集各要人在府学胡同私邸开紧急会议。会上，靳云鹏同徐树铮展开激烈争论，认为“非速退无以自全”[203]。结果，段祺瑞决定下野，随即与徐世昌商量继任内阁人选问题。段的下野，为徐世昌上任和冯国璋的下台，铺平了道路。

由于除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反对徐世昌上任外，包括曹锟和长江三督的北方各督，都一致催请徐就职，同时段派也盼冯国璋速即下台，徐既不能违反段派的意愿，并指望因冯下而段亦下，故决定于10月10日就职。

9月16日，梁士诒和王揖唐到徐宅行授受新大总统当选证书礼，

徐受证书时致答词说："世昌不敏，承全国重托，两院公推，义无可辞，引为己任。此后厉行宪政，发扬国光，敢竭寸长，冀符舆望。"[204]

10月9日，段祺瑞正式向徐世昌递交辞呈。10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正式就任大总统职，同时与冯国璋行交替礼。他在就职宣言中表示："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205] 同日，徐发表上任后的第一号命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钱能训代理。这样，就最终实现了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时下野、徐世昌上台的局面。段祺瑞递交辞呈那天，还发表了一个退职通电，表示以后专任参战督办，以贯彻参战宗旨，对于国内战争无权过问[206]。冯国璋则声称要"返我林泉"，回河间老家休养，"绝无希望出山之意"[207]。

在这场斗争中，冯国璋和段祺瑞表面上看去似乎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是段占了上风。段祺瑞虽然不当总理，但他任参战督办，掌握了几师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有很大兵权。同时他掌握着安福国会，并在内阁中安插自己的党羽，占据重要阁职，实际上仍然对内阁起控制作用，北京政府仍然印着"皖系"的标记，而冯国璋则真正失去了政治地位和权柄。此时直系的一个后起之秀吴佩孚正在引人注目地崛起，积极争取发言权和对政治生活的干预。直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冯、段的同时下野而平息，而且相反，只是刚刚揭开了序幕，斗争正在方兴未艾地进行着，直到1920年两派以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四　围绕选举副总统问题上的斗争

西方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除了总统外，还设有副总统一人，以便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总统代理。按照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政府时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七条"副总统之选举，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

行之”的规定[208]，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还有一个副总统问题有待解决。

副总统在法律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惯例，使副总统无形中成了第二任大总统的有力候补者，特别是这个席位的选举又与当时的南北和战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副总统人选问题也很为人们关注。如果说，总统选举，意见还比较容易趋于一致，进行得还算顺利的话，那么副总统选举，情况就复杂得多，分歧和困难要大得多。围绕着副总统的产生问题，直皖以及其他各个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副总统候补者除冯国璋、段祺瑞外，还有曹锟、张作霖、倪嗣冲也跃跃欲试。为了谋求同南方的妥协和平，梁士诒等还主张将此席让给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

1918年二三月间，徐树铮等曾同张作霖接洽，答应举他为副总统，以换取他出兵关内压迫冯国璋，支持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张作霖自然为之心动，因此对徐有求必应，成为主战的段内阁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遂以此身投入段派与西南各省及冯总统战争之旋涡”[209]。

5月底6月初，曹锟因对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不满，同时吴佩孚在攻克长沙、衡阳后即按兵不动，主张与南方言和；加上此时国会选举开始，总统及副总统人选有待确定，他便以养病为名，从长沙返回天津。支持曹锟的张怀芝，也将他设在汉口的援粤司令部撤退，径行北上。曹锟对副总统一席，也是有意染指的。他擅自从战争前线撤下来，倾向主和，就是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要挟。当时报纸披露说：曹张“二人北返动机起于曹欲得副总统，张欲得总理，在汉口时已经决定。惟欲得之，不可不要挟当局，欲要挟当局，不可不有一种表示，此曹氏主和之所由来”[210]。

曹锟抵津后，徐树铮亦追踪而至，极力劝他继续主战。徐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上钩，答应只要他南下继续主战，将来此席即可给他。6月12、13日，曹锟、徐树铮、张怀芝、龙济光等在天津开会，就南征和国会选举问题交换意见。就在这时，徐树铮在天津诱杀了直系主和派的领袖人物之一陆建章。6月15日，张怀芝晋京，向冯国璋、段祺瑞报告了天津会议情况。17日，张在刑部街陈宅开会，提出曹锟当副总统最为适宜[211]。段祺瑞对徐树铮举曹锟为副总统以争取他主战南下的主意表示完全赞同。冯国璋也不反对。徐树铮当即派人赴奉天向张作霖疏通。6月17日，徐给曹锟之弟曹锐的密电中说："三哥（指曹锟）事，芝揆极所赞助，即属弟转知各同人分头进行。奉省本有接洽，弟暂无须前往，已托邻葛（杨宇霆）兄夜车遄返。知念特闻。三哥勋誉在人耳目，谅易得当也。"[212] 6月20日，北京政府即发表了委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的命令，这是段祺瑞稳住曹锟，提高他的身价，以便将来举他为副总统的策略和预定步骤。

但是，曹锟回津后，南方派人士也频繁出入曹邸，竭力拉拢他[213]。主和派的梁士诒、张绍曾、周自齐、张耀曾等人，乘机向曹锟进言，晓以"未来之利害"[214]，劝他不要上当。因此，曹锟在津"优游坐镇，沉机养望"[215]，"不但不南下，反与长江督军秘密运动，调停南北"[216]。倪嗣冲、李厚基、杨善德等相继发电到津，催促曹锟起节南下，甚至一日数电，"措词紧迫异常"，曹一概搁置不理。徐树铮在津多方敦促，并曾婉托某要人向曹锟催问行期，曹回答说："徐副司令何日起节，余定附骥尾。"[217] 7月下旬，北京又派员前往天津恳劝，曹复电说："病躯屡承慰问，感激奚如，本应早日成行，藉纾南顾之忧。但现虽逐渐减轻，而精神一时实难复元，医云须静养为宜。"[218] 曹锟打定主意，在副总统确有把握并拿到手以前，他绝不南下，"轻离根据地，致失其操纵之能力"[219]。

7月28日，张作霖由奉天到达天津，倪嗣冲也于此时到津。7月

31日，曹锟、张作霖、徐树铮、倪嗣冲、王揖唐、张怀芝、鲍贵卿等在天津曹家花园开会，除讨论军事，请曹锟南下，继续对南作战外，还决定举徐世昌为总统。副总统问题，曹锟、张作霖表面上为了避嫌，互相推让，其实心里都是“当仁不让”。原来张作霖到津后，确知段派又将副总统席给了曹锟，大不高兴，认为自己威名及其对段内阁之功绩不在曹下，宣称要将南下奉军“移回京津，以践原议，并履行某要人（指段祺瑞）亲笔函之成约”[220]。曹锟鉴于张作霖插了进来，也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受人推戴，“至南下与否，并不以此席之得失为衡”[221]。徐树铮很尴尬，打电话报告段祺瑞，段即电倪嗣冲，请他从中斡旋。倪在张曹之间“往返婉劝”，并提出副总统一席留待“征南有功者”[222]，实际上仍然是以副总统作为征南之交换条件，张作霖才没有提出异议。后来有人提出请段祺瑞出任副总统，除徐树铮未表示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成。但段本人对这一没有实权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不愿意担任[223]。段派最顽固的主战分子倪嗣冲也想当副总统，并用金钱进行活动[224]，但他的资望相距甚远，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没有多少人理会他。因此，这次天津督军会议没有就副总统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按照1913年10月6日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之次日（7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之成例，徐世昌当选总统之次日，即9月5日，应行副总统之选举。因此，8月底9月初，北方各政派及国会参众两院，就副总统选举问题进行了紧急的磋商。

奉系想举张作霖为副总统。9月3日，奉军张作相有一电致刘恩格，大意是说：副总统人物如有预定之时，务希电知奉天，以免将来有所可否[225]。弦外之音，可知张作霖的意旨所在。因此，国会中刘恩格一派主张选张。但安福系议员前因张作霖强迫选举刘恩格为众议院副议长，恶感很深，绝对不赞成[226]。安福系拟举段，“以抵制徐世昌之和平政策”[227]。因段祺瑞不愿当选，多数又主张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但需曹锟南下督战作为交换条件。梁士诒的旧交通系和梁

启超的研究系又表示反对，他们主张仍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安福系同冯处于反对地位，自然也不赞成。冯表示不愿意得副座，最好举西南方面人士以息内争，梁士诒建议举岑春煊，长江各督也表示赞成。但段派决不能同意将副总统让给自己的敌人。各派意见分歧，互不让步，无法统一起来。因此，多数人主张副总统选举暂行从缓，等总统选举后，待各方面徐徐疏通，意见比较趋于一致后，再行选举。

由于8月31日两院联合会已作出9月4日选举总统、5日选举副总统的决定，故9月5日仍开了副总统选举会。是日到会参议院议员仅二十九人，众议院议员五十九人，离法定人数相差很远，选举会不得不中止。接着开谈话会，决定6日开两院议员联合谈话会。

9月6日，开两院会，出席者三百余人，会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主张共分三派：第一派认为，依照民国二年成例，以选举总统之翌日选举副总统，5日为选举副座之期，既不足法定人数，则按日顺延，直至举出为止。第二派认为，鉴于各派对副总统人选问题意见不一致，势不能如期选举，与其徒事迁延，不如先事疏通，然后定期决选，既无背乎法律，也有当于情势，因而主张缓选。第三派认为，南北纷扰，大局不定，主张从全国着眼，留副座一席，为南北妥洽时留伸缩之余地，或虚位以待和平有功者[228]。讨论结果，多数主张缓选。最后决定于相当时期选出，大概期限以10月10日总统就任之前为准。

张作霖看到副总统无希望，于是要求设东三省巡阅使，并由他来担任。9月初，段派致电张左右，探询张对副总统一席的意向，嗣得复电说："雨帅无一定要此之意，惟前日所谈之事，政府若能从速发表，雨帅亦颇满意。"[229]因此，9月7日，北京政府发表了特派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命令。这是段派疏通张作霖的一种做法。冯国璋、段祺瑞都宣称不就副总统，张作霖又表示愿意退出，这样只剩下了曹锟。曹锟因对安福系迫他先行南下作为交换副总统的筹码不满，同时受前线主和将领的影响，于9月中旬发表通电，表示厌弃主战政

策，倾向主和。此时，段派由于其主战政策和国会选举受到吴佩孚和西南的不断抨击和严正挑战，惟恐曹锟也倒向主和派一边，导致局面不可收拾，于是一致决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并从速举行选举会，希图以此稳定曹锟，并进而和缓吴佩孚，团结北方，挽救时局，继续进行对南战争。

9月30日，国会参众两院开会讨论选举副总统日期问题，决议10月5日开两院联合会协定正式选举日期。10月5日，两院联合会决定9日开副总统选举会。

10月初，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向段祺瑞报告副总统选举问题，段向他们表示："予闻两院诸君颇欲举予为副总统者，在议员诸君此种意思实属厚爱，但予最初对于副总统一席，已迭次表示绝无希冀意思。总统之选举为国会之大权，他人毫无干涉余地。惟予个人意思亦无妨向议长声明，冀得转达议员，以备讨论此问题之一助。予对于大局，始终主战，贯彻到底。本年亲统大兵南行，平荆襄，下长岳，使既失之湖南得恢复者，实曹使一人之力，厥功甚伟，未可磨灭。议员诸君倘能注重国家奖劝有功之意，推曹经略使以此席，则实为至当。希将此意代为转达，则厚爱于予者，或不至有以此席相强也。"(230) 随后又致函梁、王说："曹使督战湘中，功绩昭著，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当选副座，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231)

但是，梁士诒和以他为首的旧交通系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研究系也不赞同，决定如10月9日进行选举，他们的议员一致不出席。一些主张选冯国璋的江苏籍议员，也表示要进行抵制。梁士诒恨徐树铮专横跋扈，旧交通系此时组织了一个侨园俱乐部，已经与安福俱乐部完全决裂。他们不同意举曹锟，一方面固然是认为曹的功业一无足取，对他任副座，许多人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南北之间的关系和全国和平统一考虑，实际上是反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方策。因梁主张与西南携手言和，副座一席留待西南较为有利；

如果曹锟被选为副总统，他就会督师南下作战，这意味着段派主战政策的胜利，无异堵死同南方的和平通道。梁士诒当时致北洋各督军的信中，列举了他不同意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的三点理由：

> 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终始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232]

当时舆论剖析说："对南问题又于副座有绝大关系，万一北方同时将正副两总统全行选出，则南方必更气愤，执法律问题以进与北方相角，而统一之势，必多一层障碍。"[233] 研究系及无所属议员的想法，适与旧交通系的观点相吻合[234]。还有，自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旧交通系为武人势力所压迫，以曹汝霖、陆宗舆为首的新交通系渐渐崛起，霸占了交通地盘，梁士诒心滋不满，如果国会选出曹锟，则武人势力如虎附翼，己派势力更无从发展。梁派为自身利害计，也不得不倾全力予以打破。梁士诒为了消除曹锟的嫌隙，不使因选举副

总统问题对自己衔恨在心，事先曾告诉曹锟，说他反对速选，并不是反对曹本人，而是为了促成南北和议。

梁士诒是个诡计多端的人，连徐树铮都自认不是他的对手。此前不久（9月间），梁士诒还耍了一个花招，他改变主意，反而运动段祺瑞为副总统。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举曹锟之成议不得不变，以便惹起曹的反对，使段内阁早日塌台。

不同意曹锟为副总统的，还有一部分主战的安福派议员。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曹氏虽口称服从中央，而实则盘据保定不肯进战，实非良善军人，决不举彼。"[235]

除了上述国会中一部分议员持否定态度外，直系长江三督基于想同西南和平妥协，以保存和发展己派势力的相同理由，也主张缓选副总统，反对曹锟当选。10月初，苏督李纯托人捎信给徐世昌说："徐总统如赞成和议，则副总统不妨缓举，留此一席以为议和之一种条件。"[236] 10月8日，由李纯领衔，长江三督又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表示："若必欲强行推举曹氏，则长江督军当连袂而不承认副座。事若至此，则大势所趋，至不得已之时，竟逼于独立而否认徐氏之总统，亦在所不惜。"[237]

是否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之争，变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斗争，它是南北斗争和直皖斗争的一种表现。

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副总统选举和总统选举一样，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始为当选。照当时情况，只要有一百名议员不赞成曹锟，选举就不够法定人数，副总统就选不成。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一派议员有五十余人，并能影响一部分人，研究系（包括宪法讨论会）议员有五十二人，梁之赞成与否，具有决定作用。"副总统会之能否成立，以梁士诒及其部下之向背决之。"[238] 因此，安福系竭力拉拢疏通梁派，梁则虚与委蛇。

10月9日上午，在象坊桥众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会。出席众议员二百四十六人，参议员九十二人，合计三百三十八人，不足法定人数四十余人[239]。梁士诒建议缓选，但安福系反对延期，辩论结果，决定下午继续开会。下午续会时，仍不足法定人数，安福系用汽车和电话到处请议员出席，“无有应者”，致选举会流产，决议16日再开选举会。是日缺席议员，旧交通系及研究系实占其大半。会上安福系议员痛斥梁士诒故令议员缺席，借以阻挠副座产生，并大骂不出席议员“丧心病狂，别具肺腑”[240]。

会后，安福系与梁派各坚持自己的主张，暗中进行了剧烈的斗争。王揖唐遣人向各议员威逼利诱选举曹锟，宣称：“不然，国会将遭解散。”[241] 安福系在其所办报纸上大肆攻击梁士诒“昧良负义”，指名直书，不复遮掩。梁毫不退让，他劝安福系中止选举副总统，说：“勉强必无良果，否则惟有辞议长。”[242] 梁派《民福报》痛诋安福系《新民报》，揭其隐丑，两派势成水火。旧交通系等反对派的国会议员，为抵制16日选举会，纷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16日到津人数达一百三十四人[243]。议员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和平促进会”，与安福系抗衡。安福系派代表八人前往天津斡旋，邀请议员返京，答应每人送五百元，但求出席选举会，均遭拒绝[244]。

10月16日上午10时开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主席梁士诒两次宣告延长时间。至11时20分，出席参议员八十二人，众议员一百八十九人，共二百七十一人，与法定人数相差达一百一十余人，较之9日选举会到会人数尚少六十余人。选举会再次流产，会议宣告副总统选举延会，实际上是无限期延期，后来终未能选出。

副总统选举的失败，标志着段祺瑞主战政策的彻底破产。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对和平要求的增长，和平的声浪压倒了段派的主战叫嚣。这样，便把南北议和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 《日本与宗社党关系》，《近代史资料》总35号。

(2) 《在山东的革命党和日本人》，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平凡社1975年版，第88—104页；岑春煊：《乐斋漫笔》。另见《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总50号。

(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1969年版，第136页。

(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1969年版，第138—139、154—155页。

(5) 德富苏峰编：《公爵松方正义传》坤卷，1935年版，第923—930页。

(6)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7卷，乾元社1950年出版，第65页。

(7) 胜田主计：《菊分根》，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8页。

(8) 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1972年版，第84页。

(9)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68页。

(10) 西原将大隈内阁以武力威胁攫取侵略利益的对华政策称之为“霸道主义”，而称自己所主张的经济侵华的种种设想和计划为“王道主义”。

(11) 有关西原龟三的简介和活动，参见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

(12) 《梦的七十余年》，第83—86页。

(13) 《梦的七十余年》，第82页。

(14)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14页。

(15)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24—427页。

(16) 胜田主计：《菊分根》，《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288页。

(17)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37页。

(18) 1926年12月大藏省理财局国库课编《日本兴业银行及其他两家银行对华借款一亿日元的经过及关于该借款三银行整理债务始末》（以下简称《债务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354页。

(19) 《梦的七十余年》，第205—206页。

(20) 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119页。

(21)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59页。另见信夫清三郎主编：《日本外交史》上册，1980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419页。

(22)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59页。

(23) 山泽逸平著：《贸易与国际收支——长期经济统计14》，1965年版，第52页。

(24) 日本政府关于成立特别银行团《批准书》，《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1页。

(25) 《债务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8—360页。

(26) 《梦的七十余年》，第125页。

(27)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

(28)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

(29) 许田著：《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

(30) 《梦的七十余年》，第133页。

(31)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79，第4380—4382页。

(32)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79，第4383—4387页。

(33) 根据1913年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北京政府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规定：中国不得单独向五国银行团以外任何一国进行政治借款，也不得单独向五国中之一国进行政治借款。为此，日本指使段祺瑞政府于1916年9月向五国银行团申请借款1，000万英镑。时欧战正在紧张进行，英、法、俄等国无力提供这笔借款。经协商同意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分期垫付。此即为垫付善后续借款的由来。

(3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94—399页，第409—414页。

(35) 《梦的七十余年》，第199页。

(3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86—91页。

(37)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354页。

(38) 《西原借款之原委》，《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74页。

(39) 青木宣纯时任总统府军事顾问。

(40) 坂西利八郎时任总统府军事研究员。

(41)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83，第9106—9109页。

(42) 《梦的七十余年》，第182—183页。

(4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4页。

(4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4—5页。

(4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5—7页。

(4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下卷，第814—815页。

(47) 曹汝霖：《西原借款之原委》，《近代史资料》总38号。

(48) 《徐树铮电稿》，第2页。

(49) 《梦的七十余年》，第188页。

(50)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84—185页。

(51)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85页。

(52) 《梦的七十余年》，第198页。

(5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67页。

(54) 《梦的七十余年》，第199页。

(55)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116页。

(5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68页。

(57) 杨端六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18页。

(58) 《农商公报》，1920年第7卷，第2期。

(5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3册，第208页。

(6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67页。

(61)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2页。

(62)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6页。

(63)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8页。

(64)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32页。

(65)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52页。

(66) 《日本加入运河借款问题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88—90页。

(67) 《一九一九年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说帖》，《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第134页。

(6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08页。

(6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31页。

(70) 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安在其致日本的一份照会中曾说："美国有理由反对日本有关对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不过美国坦白承认：领土的接近产生日本同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系。"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29—730、732页。

(7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39—742页。另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3) 石井菊次郎著：《外交余录》，1930年版，第138—139页。

(7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73页。

(75) 1917年11月16日美驻日大使莫里士致蓝辛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6) 蓝辛致驻日大使莫里士电（1917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7)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8) 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11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9) 莫里士致蓝辛电（1917年11月1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8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833页；中国驻美公使致美国务卿照会（1917年11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81)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1卷，第32

页。

(8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第594页。

(83) 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刊：《小幡酉吉》，1957年版，第207页。

(84) 日本参谋本部编：《日支协同防敌军事协定颠末概要》，转引自《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26册载关宽治《1918年日中军事协定成立史序论》一文。

(85) 关宽治：《1918年日中军事协定成立史序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6册，第186、195页。

(8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8—269页。

(8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8—269页。

(8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0卷，第241—242页。

(8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7页。

(9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0页。

(9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1页。

(9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2页。

(9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3页。

(9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4页。

(9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5页。

(9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3页。

(9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3页。

(9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51页。

(9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53—261页。

(100) 1918年8月22日黑省代督军张焕相电，引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第277页。

(101) 《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第127—128页。

(102) 《次长会晤日本林权助公使问答节略》，《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第301—302页。

(10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93页。

(104) 《民国日报》，1918年5月7日。

(10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29—332页。

(106) 据日本官方统计：1918年5月中国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共计2783人。《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60、362页。

(107)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3日。

(108)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4日。

(109)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5、27日。

(110) 《民国日报》，1918年6月1日。

(111)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134页。

(112)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神州国光社1920年版，第3页。

(113)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7年7月25日。

(114) 《关于召集参议院问题政府之电文》，《晨钟报》，1917年7月29日；《申报》，7月30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

(115) 《晨钟报》，1917年9月30日。

(116)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14页。

(117) 鸿隐生：《安福秘史》，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年版，第1页。

(118) 《安福俱乐部纪念志盛》，《公言报》，1919年3月9日。

(119)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3页。

(120) 《西南反对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晨钟报》，1918年1月18日。

(121) 《段总理在汉议会内容》，《晨钟报》，1918年4月30日；《申报》，1918年5月3日。

(122) 《外人之新国会观》，《晨钟报》，1918年9月1日。

(123)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4页。

(124) 《京闻零拾》，《申报》，1918年7月1日。

(125)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126) 《徐树铮电稿》，第195页。

(127) 《徐树铮电稿》，第203页。

(128) 《徐树铮电稿》，第205页。

(129) 《徐树铮电稿》，第205—206页。

(130) 《徐树铮电稿》，第277页。

(131)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湾文海出版社1954年版，第19页。按刘为福建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属研究系，新国会选举又被选为众议员。

(132) 《咄咄贿买选举票之大秘密》，《晨钟报》，1918年6月21日。

(133)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31页。

(134) 《中央选举会之风潮》，《晨钟报》，1918年6月23日。

(135) 《专电》，《申报》，1918年7月6日。

(136) 《京兆之选举诉讼》，《晨钟报》，1918年6月20日。

(137) 《请看湖北选举之黑幕》，《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38) 《请看湖北选举之黑幕》，《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39) 《湘省之国会议员与舆论界》，《申报》，1918年7月26日。另参见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31页。上述名字错写的票，亦说是湘人鄙弃他故意写错的。

(140)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28页。

(141) 《议员大贴报单之佳话》，《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142) 《议员大贴报单之佳话》，《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143) 《徐树铮电稿》，第261页。

(144) 《徐树铮电稿》，第253页。

(145) 按此总数包括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议员约五十余名，旧交通系不久即与安福系分裂，另组一侨园俱乐部，故纯粹安福系议员只有三百三十余名，仍占议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强。

(146) 《专电》，《申报》，1918年8月21日。

(147) 《安福部欢迎议员》，《晨钟报》，1918年8月19日。

(148)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中篇，第155页。

(149) 《王揖唐之双窟》，《晨钟报》，1918年6月22日。

(150) 《两院之议长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4月。

(151) 《徐树铮电稿》，第310页。

(15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25页。

(153) 《副议长亦成难决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12日。

(154) 《副议长之逐鹿观》，《晨钟报》，1918年8月22日；鸿隐生：《安福祕史》，第17页。

(155) 鸿隐生：《安福祕史》，第17页。

(156) 《徐树铮电稿》，第316页。

(157)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0卷第5号，1913年11月1日。

(158) 《内阁问题与总统》，《申报》，1918年3月21日。

(159) 《西报之段总理引退通电评》，《晨钟报》，1918年9月6日。

(160) 《冯河间与选举》，《晨钟报》，1918年5月10日。

(161) 《冯河间归田之准备》，《晨钟报》，1918年7月12日。

(162) 《冯总统宣明态度》，《晨钟报》，1918年8月14日。

(163)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11—12页。

(164) 《天津会议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6月15日。

(165)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66)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67) 《段合肥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68) 《冯段对于非法总统之手段》，《民国日报》，1918年7月10日。

(169) 《徐树铮电稿》，第213页。

(170) 《冯段下野之各方情势》，《申报》，1918年9月3日。

(171) 《梁士诒就议长之条件》，《晨钟报》，1918年8月26日。

(172) 《天津会议之一结束》，《申报》，1918年8月5日。

(173) 《徐东海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7月6日。

(174) 《吴佩孚致江苏李督军电》，《申报》，1918年8月21日。另见《晨钟报》，8月23日。

(175) 《吴佩孚等主张和平之马电》，《申报》，1918年8月25日。另见《晨钟报》，1918年8月25日。

(176) 《南方赞成吴电之两电原文》，《晨钟报》，1918年9月1日。

(177) 《选举总统之形势》，《晨钟报》，1918年8月27日。另见《申报》，1918年8月29日。

(178) 《主战主和之宁讯》，《申报》，1918年8月29日。

(179) 《外电》，《申报》，1918年8月29日。

(180)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9月1日。

(181) 《政局转变之经过》，《申报》，1918年8月27日。另见《申报》，8月30日《专电》。

(182) 《速举总统之提案》，《晨钟报》，1918年8月27日。

(183) 《徐东海之态度》，《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4) 《宪法研究会与正副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9月2日。另见《申报》，1918年9月4日。

(185) 《宪法研究会与正副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9月2日。

(186) 《宪法研究会之重要议决》，《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7) 《合肥表示辞职之通电原文》，《晨钟报》，1918年9月2日。

(188) 《安福部之总统预选会》，《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9) 《徐东海当选总统之情况》，《申报》，1918年9月7日。

(190) 《徐树铮电稿》，第333页。

(191) 《张督促东海就职》，《晨钟报》，1918年9月14日。

(192) 徐世昌：《弢养斋日记》第43册，未刊件。

(193) 徐世昌：《弢养斋日记》第43册，未刊件。

(194) 《请看吴佩孚之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16日；《时

报》，1918年9月18日；《申报》，1918年9月18日。

(195) 《冯总统推戴徐东海》，《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196) 《西南复冯河间麻电之辞令》，《申报》，1918年9月22日。

(197) 《岑伍劝东海勿就总统电》，《申报》，1918年9月23日。

(198) 《曹锟最近之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16日。另见《申报》，1918年9月16日。据《晨钟报》9月17日刊载的一条题为《曹经略使寒电之由来》的消息透露，此电发表之先，曹锟曾派员晋京与徐世昌商量过，因此电为专对段祺瑞而发，徐曾传谕“措词务须和婉，俾留回旋余地”。

(199) 《曹仲珊又一寒电》，《申报》，1918年9月20日。

(200) 《吴佩孚又有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23日。

(201) 《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202) 《段阁不能维持之一原因》，《晨钟报》，1918年9月19日。

(203) 《专电》，《申报》，1918年9月17日。

(204) 《总统证书授受式》，《晨钟报》，1918年9月17日。

(205)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206) 《内阁问题之一段落》，《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07) 《冯河间痛心内争之通电》，《申报》，1918年10月9日。

(208) 《宪法会议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东方杂志》第10卷第5号，1913年11月1日。

(209) 《自误误人之徐树铮》，《晨钟报》，1918年8月18日。

(210) 《曹张互相表里》，《民国日报》，1918年7月12日。

(211) 大隐居士：《政闻纪要》，《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37页。

(212) 《徐树铮电稿》，第224页。

(213) 《最近之时局》，《晨钟报》，1918年6月11日。

(214) 《天津会议与时局》，《晨钟报》，1918年6月12日。

(215) 《曹锟之行期》，《晨钟报》，1918年7月9日。

(216) 《曹锟态度与时局》，《晨钟报》，1918年7月15日。

(217) 《曹使南下尚无确期》，《晨钟报》，1918年7月19日。

(218) 《曹使一时决难南下》，《晨钟报》，1918年7月29日。

(219) 《曹使之行期》，《晨钟报》，1918年7月9日。

(220) 《天津会议之过去谈》，《晨钟报》，1918年8月9日。

(221) 《天津会议之过去谈》，《晨钟报》，1918年8月9日。

(222) 《倪嗣冲到后之天津会议》，《晨钟报》，1918年8月2日。

(223) 《副总统问题之解决难》，《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224) 《大选举竞争之一》，《申报》，1918年6月8日。

(225) 《新国会缓举副座之原因》，《申报》，1918年9月7日。

(226) 《副总统仍是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26日。

(227) 《西报之时局观》，《晨钟报》，1918年9月19日。

(228) 《选举副总统之时期》，《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229) 《东三省巡阅使将发表》，《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230) 《曹锟将为新国会副座》，《申报》，1918年10月6日。

(23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23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32页。

(233) 《无期延期之副座选举》，《申报》，1918年9月8日。

(234)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16日。

(235) 《新国会之副座潮》，《申报》，1918年10月17日。

(236) 《新国会之副座难关》，《申报》，1918年10月16日。

(237) 《长江三督反对非法副座》，《民国日报》，1918年10月13日。

(238)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5日。

(239)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10日。按参众两院议员总数为五百七十四人，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应为三百八十三人。

(240) 《新国会选举副座不成》，《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4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7日。

(242)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43)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21日。

(244)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22页。

第六章　南北议和

第一节　南北议和的时代背景

一　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

1918年下半年，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德国帝国主义，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是年9月下旬，在协约国联军的攻击下，德国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德军在西线遭到了完全失败。10月间，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也遭惨败。战争给德、奥匈等国的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人民生活困苦异常。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激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

11月初，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德国共产党。10月，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成立了国民议会，随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被奥地利统治压迫了几个世纪之后，终于获得了解放，成为独立国家。奥匈帝国内部的革命，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彻底覆灭。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奥匈帝国于11月3日在帕多瓦投降，和意大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不久（九十月间），属于同盟国集团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也已向协约国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

由于土、保、奥、匈投降，退出了战争，德国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西线战线的溃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汹涌澎湃，使德国政府认识到再也无力进行战争，唯一的出路是签订停战协定。11月11日清晨5时，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上将，和德国政府派出的以外交大臣埃尔

兹贝尔格为首的代表团，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签署了停战协定，11时宣布停战。根据协定的条款，德军在十五天内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撤退完毕，同时还必须全部撤出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以及非洲殖民地。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以德奥集团的覆灭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各国人民从长达四年之久的残酷战争中解脱出来，世界呈现一派和平景象。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摆脱了战争之后，着手准备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处理战争的善后问题，同时开始把眼光从战争军事转向政治外交方面，谋划如何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政局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在战场上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东方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因没有卷入欧洲的战争，同时凭借着邻近中国的便利条件，大肆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企图排挤英、法、德、俄等国的在华势力，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并进而在远东建立霸权统治。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夺，既有协调一致的时候，也有相互矛盾抗争的时候。当它们在华的利益得到均衡发展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协调的。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遭到破坏，它们中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出现矛盾和斗争。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势力的膨胀，和它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助长中国内乱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及与其有伙伴关系的英法在华的利益，因此引起英美等国的关注。“英美协会因中国滥借外债，危及财政，并因南北抗争既久，外国各受损失甚巨。……寺内之援段滥借，招致在华英美人之猜视”(1)。1918年7月初，美国政府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借款的垄断，向日、英、法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对华国际银行团（即新银行团），实行统一对华借款，并且规定两条原则：一、绝对不借给中国用于国内战争之借款；二、日本对中国之借款，如有用于国内军事之危险者，当促使

其绝对停止交付[2]。

美、英、法特别是美国不赞同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造成中国的分裂局面。在西方列强看来，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专权、南北对峙的中国，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对他们都较为有利。因此，欧洲大战结束前后，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促使日本同他们采取相一致的对华政策。

9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访晤外交总长陆徵祥，表示希望南北实现和平，以免危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朱尔典说："贵国近来情形愈趋愈下，南北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长此以往，必有分裂灭亡之惨。现时前敌将士均不愿战，人人皆知。身外人观之，实无十分必战之理由。中央政府屡借外债，举凡国家所有可以抵押者均已抵押殆尽。此款尽充军费，而未收丝毫实效，万非长久之计。西南声称彼等实愿和平了结，因中央政府向无诚意。此说真假不可得而知，惟伍君廷芳曾向本国驻奥领事声明数次，托其向本公使转探中央政府口意，大约实有调停之余地。"陆徵祥说："南北战争，全民涂炭，诚有如贵公使所言有分裂灭亡之惨。中央政府岂不愿和平解决？无如西南极坚持，如请恢复旧国会一层，此万难办到。"朱尔典说："总而言之，此事若不早日解决，贵国将来地位实有不堪设想者。贵总长亦知两月以前英美驻华各界要人曾立一会，对于中国现状曾有决议，请本公使转达本国政府设法劝告中国等情。该会要人类皆久居中国，深知中国内情，且与彼等私人亦有利益关系，均以为贵国内部如不即日平静，国家万无存在之理，此事贵国政府不可不注意也。"[3]

9月下旬，美国政府委托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转达美国欢迎徐世昌当选第二任总统，希望他迅速解决国内时局问题[4]。同时美国将威尔逊总统希望世界早日恢复和平之宣言送达中国外交部。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时，威尔逊又向他发了贺电，规劝中国停止内

争，实现统一："本大总统之所馨香祷祝者，不仅以中、美两国素敦睦谊，而实因值此文明变化最关紧要之时，中国因内乱而分析，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维持正义之目的。今贵大总统就任之日，正贵国各派首领以爱国为怀，牺牲一切，息争之时，更宜和衷共济，力谋国民幸福，统一南北，而于各国际公会中亦占其应有之地位也。"[5] 驻华外交使团在祝贺徐世昌当选的颂辞中，也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尤切望大总统极力谋猷之事，必有南北早日统一之成功，俾中华人民全享衽席炽盛之幸福。"[6] 与此同时，在京的协约国各公使几次开会，就解决中国内争问题交换意见。10月17日，总统府顾问美国人韦洛贝（W．W．Willoughby）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份关于南北调和妥协的意见书。第二天，新从美国回任、携带有威尔逊总统希望停止南北战争意见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晋谒徐世昌，提出非正式之劝告，说和平"为美国全体之希望，但此事究属中国内政，如为外人所左右，殊多不便"。徐答称："余现正依和平之方针有所设施，但恐今日公然表和，反使南方有过大之要求，故宁暗中谋和之进行，谨谢贵国之好意。"[7] 也就在此时，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亦有详电回国，报告欧战即将结束及中国所面临的形势。胡惟德在报告中还提出警告说："我国国内如不统一，将不得列席欧战议和之会。""列强近已一转其外交之眼光注意于远东之现状与夫中日之关系，请政府慎重注意。"[8] 10月底11月初，顾维钧又接连电告北京政府说："美国国务卿转述美总统愿以实力助华息争，免失国际地位。"[9] "美政府对于我国内乱异常关心，务乞将最近所定办法电示。"[10]

在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同时，东方日本也发生了对中国政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变化。

如前所述，日本原来是由寺内内阁执政的。寺内"深信段氏一派在中国必将永握实权"[11]，采取了积极扶植皖系军阀的方针，对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大量金钱和武器的援助。日本援段政策，助长了段派的主战决心，成为中国内乱纷争的一个外部根源。9月21日，日本国

内发生了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全体辞职。寺内下台后，9月26日原敬受命组阁，28日原敬内阁正式成立，外务大臣由内田康哉担任。原敬（1856—1921）曾任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加入伊藤所组织的政友会，后任干事长。明治三十三年（1900）西园寺第一任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四十四年西园寺第二任内阁任内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山本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兼大礼使长官，赐大臣礼遇，大正三年（1914）4月任政友会总裁。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具有强烈的军事封建性，内阁更迭，虽名为出自“大命”，实则取决于少数军阀元老。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直接组织内阁者。原敬为政党领袖，又无爵位，出面组阁，开创政党政治的局面，被看作是“日本民政发达之特征”[(12)]。政友会对前寺内内阁，“夙以是是非非主义为消极的援助”[(13)]。原敬列席于外交调查会，对寺内之外交政策，“尝加以限制”[(14)]。1918年1月20日，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和宪政会、国民会共同发表宣言，指责政府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乱，招致人民怨恨。

原敬内阁成立后，当然要继续实行侵略中国的方针。它所宣称的“尊重中国主权”、“谋中国全国国民之利福”，不过是掩饰日本侵华政策的一种外交辞令和宣传标榜。但是，原敬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能不考虑改变侵略的手法。当时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要求打破日本一方独霸中国的局面；同时，前任寺内内阁支持皖系军阀的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如1918年5月全国爆发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浪潮。日本国内舆论对其侵华政策也甚不以为然。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一篇题为《对华绝对和平主义》的社论说：“当兹世界悉醒其帝国主义外交之迷梦之今日，我日本亦应剖明我日本外交方针之本来面目，以一扫国际间之误会，固无论矣；而吾人于此机会更进一步，则对外应宣明和平主义的精神，对内应破除从来动辄即招各国误会之因之军阀外交是也。至于中国问题，须力唱绝对平和主义，以为我外交之一新时期。夫绝对平和主义云者，亦无他，即所谓放弃特殊地位是也，真意味之门户开放是也，表里一致之

机会均等是也；要言之，即绝对的废弃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是也。”[15] 这篇文章，说什么要废弃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方针虽然是假的，但它反对寺内的对华方针却是真的。原敬根据舆论的要求，表示“希望中国鉴于世界形势之急转，应速息内争，以为战后之筹备”[16]。他在外交策略上相应作了某些较大的改变，采取了与英美等国协调一致的对华侵略方针。

10月中旬，日本内田外相对原敬内阁的对华方针作了非正式声明，其要点有：一、决不采秘密之政策，如利用西原龟三等与中国政府缔结借款条约等；二、决不采仅以日本之利益为本位之方针；三、对于中国南北两派绝不偏倚，放弃从前援助北方之手段，而以公明正大为宗旨；四、图南北两派即中国全国民之福利[17]。为了和上述外交政策相适应，原敬内阁大藏省和日本的银行团，即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理事开会，重新研究了对华借款方针，决定：一、暂行停止借款；二、对于寺内内阁已成立借款之善后处理，其政治借款因有碍于中国之统一，应即停止；“经济借款中有性质上不确实、于该事业之收益上无偿还元利之希望者，或并无经营事业之意思，而其目的在通融为别种用途者，一律停止。”[18] 原敬还任命小幡酉吉为新任驻华公使。小幡在前寺内内阁时，因反对西原龟三的对外借款，曾与前大藏大臣胜田发生冲突。他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后，日本记者询问他的对华意见，他表示：“日本当与列国行动一致”，“希望中国统一”[19]。

显然，原敬内阁的对华策略方针，与前寺内内阁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外交政策上的这一转变，使得它同英、美、法等国家的政策趋于一致，在对华问题上有了共同的语言，能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10月间，美国政府指示其驻日大使协同英、法、意各国驻日大使，与日本外交当局磋商，共同对中国进行调停劝告，实现南北停战，和平统一。商妥后，由各大使将其结果电告本国政府，经承认后，再转电北京各国公使，作劝告之准备。

英、美、法、日、意五国驻华公使经过几度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于12月2日一同晋谒徐世昌，当面呈递劝告觉书，说明劝告之理由，并表示："欧战已终，世界各国希望和平甚切，对于贵国亦盼能早日统一全局，以协助世界人民和平思想之新建设。倘贵国乱局不及早解决，则万无可以为世界和平新建设尽力之日。吾协商各国今与贵国感情独厚之故，极望贵国为世界各国切望和平方面着想，务从速研究解决办法。"[20] 其觉书原文如下：

> 中国南北乖离之内讧，计已两经寒暑，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常引以为深忧。此不祥纷争，非独危及中国自身之康宁，损及诸外国之利益，且延而动摇一般之人心，致予敌国以可乘之隙。际此次战争最大难题，中国之与联合国协力业受莫大阻害，今幸危机渐过，各国诚希望平和及正义实现于各国民间。当此企图以实现平和及正义为目的之全世界组织成立之时，而中国内讧不息，此伟大事业必加一层之困难。日英美法义联盟政府既悉中华共和国大总统所执妥协内讧之措置，深望偿此莫大之希望。同时南方各首领之态度，亦示有同样稳健解决纷争之意，实无任欣幸之至。是以前记五国政府深愿北京政府及南方各首领勿以个人感情用事，勿拘法规枝节，凡有障害于树立平和之一切举措，亟须力避，以便速为无隔意之协议。更以顾念理法大则与中国民福之感情为基础，以举中国国内平和统一之实为要。对于妥协成就手段案出之兆候，特以同情与期待以欢迎之，并更言明于兹：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欲图解决南北双方致招乖离之各项难题，故极力特表深厚之同情。且五国政府并无何等干涉之企图，更无指示何等特殊条件以左右之之意。是等妥协条件，纯欲由中国人士自行协定。五国政府为妥协统一之实现计，南北双方凡有热望，自当力为声援。此不过深望中国国民得以参与现在各国所企图之世界改造之伟业，以发扬其国威而已。[21]

同日，五国驻广州领事亦向军政府提出劝告，帖文内容大致相

同，不过事先声明，提出劝告并非承认军政府，或为一独立之交战团体。

西方列强东返，和日本外交策略上的转变，是1919年初南北议和的外部条件。

二　国内和平呼声的高涨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

和国际环境改变的同时，国内政治局势也有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反对南北战争，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呼声的高涨。

自从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后，在北方军阀中一直存在着主战和主和的两派：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主战，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主和。1917年冬和1918年春，曾一度有南北议和的酝酿。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表通电，主张撤兵议和，并愿出任调停。岑春煊与之相呼应，亦倡言和平。随后，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发布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动。一时和平空气很浓厚。但是，当时主战派占优势，直系的和平主张很快被压下去。到了1918年下半年，和战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变。主和派的和平声势，挫败了段祺瑞的武力政策，压倒了主战派对战争的鼓吹。

全国的和平运动，是从吴佩孚等通电罢战主和开始的。

如前所述，4月23日，吴佩孚率领直军占领了湖南衡阳后，即不再前进。6月15日，吴佩孚与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从此湘南无战事。8月间，吴佩孚接连发表通电，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南北战争，导致“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在此时期，耗款数千万，糜烂十余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生灵涂炭，尤足令人寒心”。“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22]。他认为西南各省同是中国土地和中国人民，不能以法

律之争而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他虽分属军人，自当爱国，而武力统一是一种亡国政策，他罢战言和，不是抗命，是“为延国脉”。吴佩孚还请求当时在台上的冯国璋，“根据约法之精神，实行悲悯之宏愿，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地，以备将来一致对外”。他并希望曹锟和长江三督及各省区长官，“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大局”[23]。

吴佩孚的和平主张，虽遭到主战派的一致攻击，张作霖甚至提出剥夺他的职权，从严惩处，但他毫不动摇，坚持要同南方停战讲和，声称：“张作霖及此外各主战派虽来电声言，‘讨伐西南系吾辈之天职，无论遭何种之障碍，决不因此而中止’云云，但余仍尽力于主和运动，决计撤退湘南防务而北还，以贯彻余之初志。”[24] 吴佩孚的行动，得到直系长江三督的支持，冯国璋和曹锟暗中也予以默认。

直系的主和运动，得到舆论界的同情和支持。京报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一篇通信中说：“论其比较的是非，段内阁之失政如此，全国国民之痛苦如彼，主张和平休战，解决时局，吾人不问其心理如何，不能不赞成之。”[25]

南北战争的两军战线，西北起汉中，经巴东、衡山、大庾岭，东南以至潮汕，蜿蜒二千余里。但北军的主力是在湘南的吴佩孚第三师和三个混成旅，湖南战线一直是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吴佩孚在北洋军人中，是属于“打硬仗，扎死寨”的，他的退出战争，湘南前线实现停战，与南方握手言和，是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加上主战派是全恃日本政府为后援的，日本改变援段政策，给段祺瑞财政上也增加了极大困难。从此，无论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这些顽固的主战派如何坚持要同南方作战，但和平的帷幕已经拉开，战争实际上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南北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受害者只是人民。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痛恨皖系军阀对南用兵，渴

望早日实现和平。和吴佩孚倡言和平的同时，国内商、学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士，对和平的要求日益高涨。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受世界和平局势的影响，加上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主张调停南北纠纷，不赞成继续对南用兵，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全国形成了较广泛的和平运动。

早在4月底，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开会，就提出要求南北停战息争，随后派代表四人晋京谒冯国璋，陈诉商民痛苦现状，哀求立即实现和平。6月3日，各省省议会又在南京开会，代表各省人民恳求北京政府和西南早息争端，以纾民困。代表们发表的一项宣言说："为今之计，亟宜双方罢兵，回复统一，为全国商民留一线生机，为国家前途留一分元气。"(26)

10月初，张謇发表关于时局通电，痛陈南北战争的祸害，殷切要求实现和平。他说："同胞相杀，战祸绵延，商业凋零，生灵涂炭，凡有血气，谁不渴望和平。加以边境出兵，武力虚糜于内地，既失主观之重，徒为与国所轻。侧闻朝野上下，无南无北，皆知乱不可怙，祸不可极。推原恶感所循环，诚未见一方之独是。揆度坚持之现状，已驯至两败俱伤，而实受其伤者在民，实受其败者在国。……事至今日，尚安有意气可争，智术可用？哀我小民，命悬于南北当局之手，地处局外，势不能左右取重其间。但野老之愚，惟知和平两字为圣神，亦愿诸公根除虚骄一切之门面。与其忘远虑而重近忧，不如推诚心而布公道，明示双方悔觉，有如辛亥唐、伍二公在沪会议前事，直接解决种种滞碍。"(27) 蔡元培受世界大战英美法协约国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影响，于11月15日在天安门对民众演说大会上，发表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借德国失败事实预示穷兵黩武、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段派军阀的末路，期望中国有一个和平和光明的未来。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

义，向光明方面去呵！”[28] 张謇和蔡元培是当时全国负有重望的人物，他们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痛恨战争、热烈要求和平的呼声，同时又对正在开始兴起的和平运动给以积极的影响。

前面提到，10月中旬，曾因副总统选举问题，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与安福系决裂，旧交通系和研究系以及一部分无所属议员百余人，为了反对段祺瑞的主战政策，谋求与南方议和，抵制安福国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离京到了天津。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等在天津发起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准备邀请梁启超、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等一些南北名流参加，以促进和平的实现。拟议研究的问题有：一、以怎样的形式谋求双方之妥协，或开全国国民会议，或开南北代表会议；二、会议地点以何处为宜；三、会议召开之后，将协议哪些问题，一俟议决后，即向南北两政府提出建议[29]。和天津和平促进会成立的同时，北京一些名人也纷纷起来探讨和平问题。仅10月22日这一天，就有三处和平讨论会，即蔡元培和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直隶省议会会长边守靖等，在民国大学开会“讨论和平之预备”；谷钟秀、文群等在江西会馆“讨论和平之进行”；由一些满蒙要人组成的五族联合会在雍和宫讨论“和平解决之方法”[30]。舆论欢称：“京津间风靡一时之和平声”[31]；“主战之北京，忽而和平声浪高起万丈”[32]。

梁士诒、朱启钤和周自齐都是旧交通系的领袖，梁、朱又是安福国会参议院正副议长，由他们出头露面发起并领导和平运动，和平有被政派利用之嫌疑。而当时人们憎恶政党政派，旧交通系在社会上的声名又不好，因而不愿同它搅在一起，舆论也“不赞成一派一系之运动，希望在野者共举以图其成”[33]。于是，10月23日，由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此时也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居于议长地位，不便出面倡导，便赞成用和平期成会名称，将和平促进会取消，旧交通系以个人资格加入和平期成会（仅周自齐、汪有龄等数人加入），梁士诒和朱启钤均未参加。

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于10月23日发表“漾”电说：

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希龄等夙夜焦思，以为内争一日不息，即国本一日不定，险象环生，无有终极。况欧战将终，国际势迫，若仍兄弟阋墙，何能折冲御侮？且不自谋和解，难逃世界责难。是以人心厌乱，举国从同，各抱忧危，苦难宣达。希龄等外察大势，内观舆情，瞻顾前后，义难缄默，拟组织一和平期成会，为同情之呼吁，促大局之和平。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切望同声相应，协力进行。盖和局早成一日，即乱机减少一分；群力增加一分，即国本早定一日。忧时君子，当韪斯言。谨布腹心，伫候明教。再本会宗旨，不分党派，亦非政团，平和告成，本会即行解散，决无他种作用，谨并声明。[34]

熊希龄还向记者声明，和平期成会：一、不带政派臭味；二、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三、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35]。

和熊希龄、张謇、蔡元培同时列名发起和平期成会的，还有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共二十四人。这些人除无党派名流外，包括了国民党或政学会、旧交通系、研究系、直系，但都以个人资格参加，并不代表党派。和平期成会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开始酝酿时，黎元洪和冯国璋认为该会与他们的求和本旨相同，表示愿意列名发起。熊希龄和蔡元培等以黎元洪虽已下野，但与政治问题多少有些关联，请他另外通电赞成；对于冯国璋则因和战问题与段派的隔阂已深，又系刚刚下野，担心引起主战派的反感，也未同意他列名。

和平期成会的通电发表后，博得了各方面人士的热烈反响，不仅主和派和其他希望和平的人士给予充分同情和支持，就连一些平日的

主战派也在一旁打边鼓，表示“喝采”。

第一个发电表示赞成的是冯国璋。10月24日，他在复和平期成会的电文中说：“诸君创办此会，导舆论政治上之正轨，而一反隳突叫嚣之所为，各本热心，辅以毅力，振发聋聩，促进和平。岂惟大局实利赖之，国璋一年以来所有志未逮者，亦得因诸君之继起而告厥成功。祷祈以求，诸维努力。倘有相需之处，必竭绵薄以从。”[36] 多数督军也都先后复电表示祝贺赞同。曹锟说：“诸公爱国爱群，同深钦仰。锟忝膺重任，愧无匡济之方，伫听宏谋，冀遂观成之愿。”[37]

值得注意的是，有名的主战派督军倪嗣冲也复电赞同和平，说：“漾电敬悉，毅力热诚，至深钦佩。国家不幸，同室操戈，现在欧战将终，势益岌岌，非急筹统一，无以御外侮而救危亡。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对于贵会宗旨极表同意。”[38] 这些话虽然不是倪的由衷之言，但却足以说明和平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还有一向与安福系沆瀣一气，为段派军阀积极筹措战费的新交通系首领、财政总长曹汝霖，因中央财政竭蹶，而各师索饷纷纷，无法应付，也响应和平期成会“漾”电，赞成和平[39]。

西南的反应是：和平是他们所赞同的，但必须服从护法的目的。10月31日，军政府复电和平期成会说：“得悉通电，极表敬佩。惟念民国七稔，政变迭乘，无一次非调和了局，然不旋踵而变化即起，无他，苟且偷安，图一时之结束而已。故愈调和而愈纠纷，前事俱在，思之痛心。然则欲求和平，必为依法之和平，而非违法之和平；又必为永久之和平，而非暂时之和平，谅诸公有同情也。护法之举，惟在匡救时变，回复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轨，苟能以和平而达护法之目的，乃吾人年余以来日夜求之惟恐弗得者，尚望诸公本救国之热忱，求根本之解决，尽国民之职责，提携从事，敢不拜嘉。”[40] 旧国会电文的措词和态度则更强硬一些，提出：“欲使长治久安之策，当以护法戡乱为先。若释奸慝之重诛，置国宪于不问，则是扬汤止沸，公理法

律，长屈服于强权之下。国人血气犹存，良知未泯，恐未能默尔息也。来电谓内争一日不息，则国本一日不安，窃谓国本一日不安，则内争一日不息。公等明达，当知根本之所在。要之，和平固吾人所渴望，而必衷于法律，期以永久，苟安雷同，所不敢蹈。”[41]

10月28日，和平期成会的发起者在北京绒线胡同八十八号徐佛苏寓所开筹备进行会，讨论会章，严定入会条件，决定在各省一律设立和平期成会，还决议向徐世昌提出建议案，主张南北两方面在对等的基础上，由双方各派代表开妥协会，并立即起草文件，由熊希龄等七人面呈徐世昌[42]。30日又开谈话会，决议纲领十条：一、以发抒民意，促成和平为宗旨；二，进行方法：1．随时以文字或演说，宣达国民渴望和平之心理；2．随时以函电或派专员对各方当局为同等之劝告；三、本会不提出和平条件，但会员得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四、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赞成本会宗旨，经本会会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五、本会公推会长一人，干事若干人，主持本会事务；六、本会由各地会员分地筹设，在某地即名某地和平期成会。各地和平期成会，应各派代表一二人在某地合设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七、和平期成会专图各会之交通联络，并主持第二项事务之进行；八、各会经费各由发起人分担，不得向一般人募集；九、本会议事及办事规则另定；十、本会至和局成立之日即解散[43]。

11月3日，和平期成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开成立会，到熊希龄、蔡元培、梁士诒、王克敏、张一麐、林绍斐、孙宝琦、谷钟秀、汪有龄等共三百多人，熊希龄当选为会长，蔡元培为副会长。次日，和平期成会代表熊希龄、边守靖、安迪生、陈宝泉、谷钟秀、汪有龄、张一麐七人进谒徐世昌，陈述关于实现南北和平妥协之意见。徐表示愿意主和，并接受代表们提出的和平意见。

和平期成会成立后，呼吁和平，不遗余力，并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对促成和议的召开，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继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也都成立了和平期成会，并于次年（1919）3月2日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3月6日会址由南京移至上海），选举熊希龄为会长，梁士诒、张一麐为副会长。

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后不久，12月18日，由京津商学各界发起组织的有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代表参加的全国和平联合会，在北京京师总商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二十余省区代表四十余人，会员二百余人，由蔡元培任主席。全国和平联合会发表宣言说："本会由全国法定团体组织而成，为真正民意机关，故对于南北和平会议，应实行共和国民应尽之义务。遇有双方冲突之点，及与大多数利害关系之处，实行发表国民真正意见，以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44)] 蔡元培声称：该会"以代表真正民意，要求于此次和平会议定永久和平之计划，取武人政客所妄夺巧偷之国权而举以还之于国民为宗旨"[(45)]。全国和平联合会比和平期成会联合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

此外，在北京还成立了和平统一会和五族和平合进会。和平统一会由赵炳麟任主席，有会员二百余人，其后台是徐世昌和钱能训。五族和平合进会的成员为满蒙王公、回藏教首和汉族要人，共百余人。它在一则通电中指出："不先统一内部，国际地位焉存？法律政治问题，皆可以从长计议。五族组国，祸福共之。惧受栋榱之压，用垂涕泣之忠。"[(46)]

全国除极少数皖系主战派以外的各阶层人士要求实现南北和平，反对战争情绪的高涨，是南北议和的内部条件。

第二节　南北和会的召开及其破裂

一　南北和会的酝酿和准备

上述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于停止南北战争，促进国内和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和平，还需南北双方作出让步和努力。南北战争中，皖系军阀是北京中央政权的统治者，又是战争的主要一方，北方对和平的态度如何，是南北和议能否顺利召开及其成败的关键。

徐世昌是不同意继续进行战争，主张南北和解的。还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冯国璋和朱启钤等就有意请他出来促进和平统一。他曾说："朱桂老来对我说希望和平之意，我极赞成，但我为在野之人，政府方针如何，不便干预。"他还表示，如果段祺瑞与冯国璋两人"意见完全一致，我必乐为赞助统一之业"[47]。10月10日，徐在就职宣言中提出："今我国民心目中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宜尊重和平。……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48] 当段祺瑞辞职时，他委令钱能训代理，随后又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钱能训于清末在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曾在徐手下任参赞，被人们看成是徐的"夹袋中人物"和心腹。钱也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任命他出来组阁，显然是徐世昌为谋求南北议和作准备的。

徐世昌虽有谋和的愿望，但他就职后，对于如何解决时局问题并未明白表示，宣言书中希望和平，也是"含混其辞，直令人无从捉摸"[49]。这固属老于官场的一种圆滑手段，其实在他心中也并无一定把握。徐为北洋界元老，但他属于文治派，没有实力，虽由钱能训组阁，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仍然掌握在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手中。徐世昌需要以北洋派为后援，他出来首先是为了协调和缓直皖之间的矛盾，维护北洋的统一和团结。"无东海则北洋派分裂，无北洋派则东海失据。"[50] 因此，人们认为，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统一北洋派，至少是不要使北洋内部的矛盾加剧，"至于解决南北问题犹在其后"。"牺牲北洋之统一而与南方握手，为东海所不为"[51]。何况他是被主战的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推戴出来的，在和平问题上，他需要观察形势，小

心谨慎从事，不能完全违背段祺瑞、徐树铮的意愿，走得太快太远，以致损害皖系军阀统治的根本利益，“转与自身不利”[52]。他还认为，南北统一固以和平为主，但必须保全政府之威严，故打算不先由政府出面，而托在野名流疏通双方意思，俟有把握，能得双方同意后，再作具体的妥协[53]，并且以为，如果“以北方名义先行表示，则必惹起西南无穷要求”[54]。这种状况，多少决定了后来南北议和的结局。

10月下旬，由于副总统选举失败，和平促进会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南北名流纷纷出来谋和，京津间的和平空气骤然浓厚起来，主和派的声势明显地占了优势。徐世昌默察时局，知道各方面均有厌战之心，又得梁士诒为他暗中策划，胆子才大起来，下了主和的决心。梁士诒为徐解决时局献策：一、副总统让南方选出；二、内阁由北方组织；三、恢复旧约法，新旧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旧约法所定选举法选举总统，组织正式国会[55]。这样可以使北方选出的新国会不负违法的名义，从而免得新国会选出的总统因株连关系而为非法之总统[56]。徐世昌对此主意颇加赞赏，便以促进和平之责委托梁士诒[57]。徐、梁因此互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之局”，“梁得徐而胆益壮，徐得梁而志益坚”[58]。

10月23日，钱能训致电西南，声称“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提出“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作为和议的步骤[59]。这是第二次南北战争发生以后，北京政府第一次直接向西南去电并表示和平的姿态。

10月24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和平命令。令文说：“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攸关公义，一经息争弭乱，遂若众口同声。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既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上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

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本大总统不惮哓音瘏口，以着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国民，固渴望我东亚一隅与世界同其乐利。”[60]

钱能训的和平通电和徐世昌的和平命令，是徐上任后谋和采取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为了促使南北接触议和，徐世昌一面多方与段派疏通，争取他们的同意；另一面派出特使赵炳麟到广西，与岑春煊、陆荣廷接洽，谋求和平。赵随后复电说：岑、陆“皆甚倾向和平，政学会运动和平尤为奋进”[61]。10月30日，岑春煊等致电北京政府，主张南北两方各派同数代表，开对等会议。徐世昌原拟请著名的主和派领袖人物之一李纯出任调人，全权代表北方，与西南商洽办理和平妥协有关事宜，而不采南北两方会议的形式，后因西南方面认为这样做无法促进和平，坚持需双方派出代表召开和平会议而作罢。

与此同时，梁士诒也派林绍斐和亲家吴伯珩到广西与陆荣廷联系。和平期成会也派出代表，分赴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向西南各实力派陈述和平意见。蔡元培和熊希龄还派王铁崖持函到广州会见孙中山，征询他对和平的意见，恳请他“大力匡勷，随时指导，俾和平目的克期可以达到”[62]。蔡元培还在致孙中山的另一封信中阐述了他对和平的看法。12月4日，孙中山复信指出：“国民所蕲望之平和，为依法之平和，为得法律保障之平和”[63]；认为和平必须实行法治，尊重国会。

徐世昌和平命令发表后，南北主和领袖和人士都请求政府下停战令，因为停战是和平解决时局的先决条件。和平期成会成立后，首先也以速开南北对等会议为请。徐世昌和钱能训虽然放弃了前此中央与地方不能对等的主张，表示赞同召开对等会议，并经11月初的内阁会议通过，但要开对等会议，必须先停战，要停战又必须以停战命令作为北京政府表示的保证。而停战命令不是徐世昌一人所能决定的，他

需要征求北洋各督军的同意。

11月上旬，徐世昌召集各督军来京会商。他先以国际国内形势和实现和平的必要性，逐日向各督灌输疏通，然后，15、16日，徐在公府集灵囿四照堂召开督军会议，与会者有曹锟、张作霖、倪嗣冲、孟恩远、赵倜、王占元、陈光远、阎锡山、卢永祥、蔡成勋等及全体国务员，参战督办段祺瑞亦出席。会议讨论停战议和、外交等五案。段祺瑞声称“和战均总统之命令是听”[64]，但表示不同意牺牲新国会和召开南北对等会议。张作霖也持相同意见。其他各督表示，如果“南方无过苛刻条件，愿服从总统方针”[65]，同意发表停战令。以前几次天津督军会议，均是研究军事问题，只有这次讨论和平问题，这标志着时局开始由战争向和平的转折。16日，徐世昌发表了停战令。全文引述欧洲战事业已停止，国内人民渴望和平，应即实行停战议和；要求“所有前方在事各军队，务当即日罢战，一律退兵。其各处地方治安，责成该管区军民长官派队接防，妥筹布置”[66]。这是徐世昌谋和采取的第二个实际重大步骤。《字林西报》评论称：“近来南北间趋向和平，各事中当以此为最著。”[67]

北京政府停战令公布的同一天，和平期成会熊希龄、蔡元培致电广东军政府，希望南方“同声相应，使国民知此后永永弭兵，止戈为武，德莫大焉”[68]。

广东军政府为响应北京政府停战令，也于11月22日通令前敌休战，与北方依法和平解决。令文指出：“自从南北开战以来，全国陷于穷乏，国力疲惫，元气损伤。军政府兴护法之师，原为保全国本起见，业已再四声明，依据法律之和平及永久之和平，此志永远不变。苟和平而能贯彻护法之主张，何忍重烦国民。北方既已发表停战令，军政府本爱和平，更何乐而必欲用武力之事乎？兹特通令前敌各军着固守现在防地，静待后命。北方而可以言和，自当依正当方法从事解决也。”[69]

北京政府的和平方针，遭到安福系的抵制和反对，主和派和主战派仍在暗中进行激烈斗争。在徐世昌发表停战令的前后，安福俱乐部又掀起了一股政潮。由于钱能训接任内阁总理后，竭力主和，和平的声浪日渐增高，和平团体纷纷出现，从前段内阁的政策被一脚踢翻，使一些主战派人物也不得不虚与委蛇，发抒和平议论。同时，因南北议和，北方还有解散新国会的传言。安福系因此对钱能训恨入骨髓，大有誓不两立之势。

安福系先是威吓，说新国会将不通过钱内阁，并且重新提出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以此作为对钱阁同意案的交换条件，随后又扬言要提出对钱阁的弹劾案。11月24日，北洋督军为了巩固北洋团体，在北京组织“戊午同袍社”，选举曹锟为社长（后改为“参战同志社”，拥段祺瑞为社长）。这显然是与安福系选举副总统的谋划相配合的。11月27日，徐世昌与段祺瑞会见时，段说：“钱内阁对南方表示退让，实属毁我北洋派之体面。”徐为钱辩护说：“钱氏之意，大致与余之意见相同。从大局上打算，忍一时之苦痛，以期将来集大权于中央，并不违背阁下统一之希望。”[70] 段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仍露不满之色。安福俱乐部于是决定立即对钱阁提出弹劾案。当晚，钱能训去见徐世昌，提出辞职。徐安慰他说：“若汝果辞职，则余亦将辞总统之地位，以后收拾时局，一任诸段祺瑞。”[71] 11月30日，张作霖、倪嗣冲和曹锟又要求徐世昌让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张作霖还为曹锟任副总统向梁士诒进行游说[72]。安福系则提出副总统如能照该派的主张速行选出，则不仅对钱阁的弹劾案可以取消，而且同意案也予以包办[73]。因此，一时又出现主战派重新抬头、段内阁即将复活的迹象。

形势逆转刚刚露头，立即引起驻京外交使团的关注和干预。如前面所说，12月2日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联合劝告北京政府和南方速谋和平统一的觉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五国劝告提出后，徐世昌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立即于次日（12月3日）在公府召开会议，段祺瑞和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各督军及全体国务员均出

席。徐介绍了五国劝告内容后，声称："欧战既终，外交纷来沓至，我国实不能不亟谋统一，以求振兴国是而资对外。"[74] 段祺瑞此时看到洋人出来说话表态，形势对自己不利，立即起来表示："予本主战之一人。予之主战，实为统一国家起见。今既情移势变，为谋对外起见，予亦绝无坚持从前政策之理。深望大众嗣后务应本总统政策以行，借谋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倪嗣冲也说："关于军事各问题，前此业经定有办法，自当遵照办理。至选举副座及内阁改组两问题，系政府与国会之事，非吾等职责所关，吾等大家理宜依元首之谕而行。"[75] 其余各督都表示赞同。徐世昌最后说："余本不愿出山，只以时局无法收拾，国家陷于危险，故不得已而徇众人之请，任兹艰巨。乃余就职以后第一事如组织内阁问题，即似有人不甚曲谅苦衷，迁延未决。若事事皆然，余何能负此重任？"[76] 发言时声色颇厉。会议决定允许同西南开对等和平会议，副座问题暂搁置，内阁同意案即行提出。这次会议正式决定了和平方针，是北方由主战最后转向和平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会后，段祺瑞立即召集王揖唐、曲同丰及安福系六人在府学胡同私邸开会，声称他对徐总统的和平政策，前经宣言决不反对，现在协商国公使团又提出劝告，"更宜辅助元首，力维大局"[77]。他要求王揖唐等对所有足以阻碍和局的问题，不要再事争执。王等唯唯，不得不表示同意。12月9日，王揖唐召集安福系国会议员开会，主张通过钱能训内阁。12月14日，众议院开会通过钱内阁案。参议院也于18日通过。在通过之前，安福部与徐世昌、钱能训订有下面四项口头契约，作为同意案的交换条件："一，欧战告终，和议开始，吾国为国际团体员之一，应以国民总意共谋对外，故永久和平必须兼顾统一。政府能本此义以与西南有责任者妥协时局，实为吾人所赞同；二，现在元首依法就任，不惟国内所赏戴，且为列邦所钦崇，国本所关，岂容置议？故对元首应绝对维持其地位；三，现行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因旧法两院性质混同，员冗议滞，为世诟病，经临时参议院修正，认为适当，非宪法制定有所变更，不得加以修正或废止；四，宪

法为全国根本大法，不宜有所偏执，亦不容有所垄断。故对于重重问题，学理国情，均应斟酌地方意见，并须容纳，以达改良约法之目的。”[78] 这四条，特别是后面三条，后来成为南北和议中，安福系压钱能训向其屈服的一种把柄。

主战派破坏和平的计谋未能得逞，一阵风波很快平息，时局继续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2月11日，北京政府阁议通过参加南北和平会议的名单，随即发表了委任令。代表姓名及其所代表的党派和方面如下：

朱启钤（总代表，代表徐世昌）

吴鼎昌（代表安福系）

方　枢（代表段祺瑞和安福系）

汪有龄（代表旧交通系梁士诒）

施　愚（代表直系李纯）

刘恩格（代表奉系张作霖）

王克敏（代表直系冯国璋）

李国珍（代表研究系）

江绍杰（代表安福系）

徐佛苏（代表研究系）

在拟定名单时，安福系因其首领王揖唐未获选，大发牢骚，向徐世昌提出必须将他补进去。徐因不满意王的所为，表示朱启钤已答应担任首席代表，不便更改；如果派王为普通代表，则又与王的众议院

议长地位不相称。安福系无可奈何，又推荐普通代表多人如王印川、郑万瞻等，徐世昌无法应付，只好让安福系最初所推荐的江绍杰加入[79]。研究系以李国珍非其嫡系，要求改为籍忠寅。和平期成会则极力反对刘恩格为代表。徐世昌均不同意更动。

随后，12月16日，南方也决定委派西南七总裁之一、前不久从日本回国的唐绍仪为总代表。

继对等会议问题解决之后，在当时南北开始对话接触过程中，还出现了南北会议地点问题、名称问题以及陕西剿匪问题的争论。

关于会议地点问题，北京政府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则要求在上海。11月30日，西南七总裁致电徐世昌说："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双方各派相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解决。"[80] 12月5日，徐世昌复电表示，他对会议有关问题一无成见，办法由国务院另电答复[81]。

同日，钱能训在致七总裁的复电中声称：会议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少之分，但为迅速解决纠纷，可以不拘成见，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主席，公共协议。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点，认为京沪同属国土，何有中立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国家行政区域之外，所举辛亥前例，当时因国事问题而有两种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系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则国际交涉，只有一个政府，更不可以辛亥时期进行类比[82]。后西南方面唐绍仪又提出"南京为驻兵地点，万难适应"[83]，"舍上海租界外，实无安全领土之可言"[84]。12月17日，钱能训复唐电中说："若以安全而论，则南京秩序安宁，未必不如沪上，且李督夙重和平，众所共喻，必能妥为维护，负保安之全责，似可毋

庸过虑，务请立照前议就宁定期开议。”[85] 因西南方坚持会议地点须在上海，北京政府最后不得不让步，放弃在南京开会的主张。

关于会议名称问题，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对等之名，开始提出善后会议名称而不用和平会议，曾托李纯转告西南。西南认为“善后”二字含有对待土匪的语气，表示反对。12月中旬，唐绍仪致电钱能训要求以会议地点作为会议名称，称上海会议，其所举理由是：“吾国向例，肃清土匪始有善后问题，今以对等会议而有善后名称，是直以土匪视西南耳，西南宁甘受此善誉？”[86] 钱能训12月17日复电表示：“中央于会议名称本无成见。善后二字，亦系普通名称，初非义有专属。且会议既由双方组织，岂有南方独蒙恶名之理。惟尊意既拟以会议之地点为会议之名称，当可照办。”[87] 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关于陕西问题，比上面两个问题要复杂得多，解决也很费周折，曾一度使后来召开的议和会议中断，并且最终成为导致和议破裂的因素之一。

1918年1月下旬，陕西陆军第三团胡景翼所部在三原举兵讨陈树藩，宣告独立，成立靖国军。8月8日，于右任、张钫被靖国军将领胡景翼、曹世英、郭坚、卢占魁、高峻、樊钟秀等推举为总副司令，占领了三原、兴平、盩厔、郿县等地区，并加入了护法军，迫使陈树藩退出渭南。

陕西属关中地区，在地理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我国北方到西南的通道，也是北方的屏障。因此，段派军阀决不能容忍让南军占领。北京政府因为段派所挟制，在颁布停战令时，曾规定陕西和福建为“匪”乱区域，不在停战范围以内，并且派张锡元、许兰洲重兵攻陕，李厚基攻闽。陕西、福建两省有土匪活动滋扰，固然是事实，但是，把于右任所辖的一部分靖国军也看做匪军，把民军所占领的地盘一律视为土匪区域，派兵进行清剿，显然是段派军阀打击和削弱南军

的一个阴谋。因此，这个问题引起西南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认为这是北方没有和平诚意的表现。

11月29日，岑春煊致电钱能训说："李厚基猛攻不已，明明在尊处下令停战后，是否李厚基原不奉命令？……张锡元逼西安，晋军进宜川，张联陞入白河，陇军攻凤宝，许兰洲入关，四面攻陕，是否陕不在停战之列？请明白电示。"[88] 12月9日，广东军政府开政务会议，议决有关和议事项共十二条，其中关于陕、闽问题的有：陕西南北各军应各守现驻地点，北方不得藉口讨伐土匪，阴行攻击南军；陕西、福建问题为和平问题之先决条件；北京政府如不将陕、闽两境确实停战，则认北方政府无和平之诚意[89]。西南方面认为：北方强以陕西、福建两省民军占领的地域为剿匪区域而出兵进攻，其居心是要先除民党，使北方占得有利之地位，然后议和。此种心理，实与历来段之宗旨无异。故除非先由北方完全停止闽陕方面之军事行动，则和议不能实行。如北方再不改变现有计划，南方则唯有固结团体，再事进行战争[90]。还声称，陕西原为护法省份之一，果有和平诚意，则南北两军，应指定驻兵地点，万一各辖区内有土匪滋扰，则应责成各自肃清，不应进攻南方民军所占领的地区[91]。

但是，北京政府坚持陕闽两省为匪祸地区，力主清剿。12月16日钱能训致电岑春煊："陕省免划匪域，则揆诸人民心理及友邦言论，固有万难办到者。此节仍赖吾公悉力疏通，勿使剿匪计划有所牵碍。"[92] 同日，他还致电西南七总裁，认为"陕省匪患经年，如卢占魁、樊老二（即樊钟秀）、郭坚等积年巨匪，肆行抢掠，人所共知，近且屡陷城邑，警报迭告。故由中央派许、张各军驰往协剿。至闽省匪氛遍地，双方驻兵之处均有土匪，无可讳言。……如因渴望和平之故而纵匪不办，是坐视两省糜烂而不恤；如因剿匪之故而和平忽生障碍，谓为表面言和，阴行作战，群公设身处地，何以处之？……倘终不见谅于群公，亦惟有听诸国民及友邦之公论。所谓迁延时日，益陷闽陕两省于不可收拾者，咎将谁归？"[93]

由于闽陕问题特别是陕西问题，南北双方各执己见，成为和平前途的一大障碍。12月17日，熊希龄、蔡元培为了促成和议的早开，和平的早日实现，代表和平期成会特致信北方议和总代表朱启钤，主张双方划界停战，希望朱从中斡旋。信中说：

> 陕闽问题，内容复杂，而陕尤特甚。昨国务院电复南中，认陕闽为剿匪区域，在当局虽自具苦心，而内容问题，实非如是单简。陕乱经年，兵匪糅杂，人民疾苦，地方糜烂，诚如院电所云。惟查该靖国军本部曾经南方承认，其总副司令于右任、张钫曾受南方任命，现既南北停战而独对陕闽用兵，则南方所争，似亦不能全置之不顾。闽事纠纷，稍逊于陕，然协商解决，要亦宜速。伏念中国今日，处不得不和之势，有外人干涉之危，无论南北均宜觉悟大势，先决根本。会议早开一日，则危机减少一分，对局部问题，总宜舍弃成见，顾全大局。敝会斟酌各方情形，以为剿匪安民，为大局善后要政，而划界停战，则目前待决之亟务。拟恳我公毅力主持，商请政府暂令停战，一面电商南中，会同派员至两省监视划界，暂维现状。其靖国军区域中之土匪，即责成该总司令负责剿办，静候解决。如是既便大局和议之进行，且无碍地方善后之计划。为大局计，似莫逾此。[94]

信中所提陕西问题与和局的关系是中肯的，其解决办法也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后来事实上为双方议和代表所采纳。

朱启钤对熊、蔡的意见表示赞同，但当熊希龄本着上述主张去见钱能训，劝政府对陕闽两省让步，曲从西南时，钱答称：福建问题好办，只要南军不进攻，即可划线互守。“陕中遍地皆匪，中外咸知，若认此为护法军，未免贻外人笑。且纵匪不办，问心难安。请转西南谅政府苦衷，勿过坚持。”[95] 随后，蔡元培、熊希龄又致信钱能训为于右任说项。钱复信说：“于既非土匪，应令先行离陕。”[96]

南方原来在对待和议上意见就有分歧。孙中山和旧国会内的一部

分人坚持护法，主张除非北方能完全满足南方的护法要求，不同意与北方议和。诚然，孙中山是真护法，他要求维护民主共和原则，并力求实现这个原则来改造中国，但他这个主张在当时是脱离实际的，很难行得通。他在南方又是属于少数派，没有实力。岑春煊、陆荣廷和政学会温和派（军政府包括在内）赞成护法，是为了自身及本派系的私利。他们鉴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为大势所趋，加上南军将士也不愿再战，因此赞成同北方有条件地实行议和。他们属于多数，又是实力派。在南方与北方关于陕西、福建问题争论展开以后，南方内部的分歧，也开始加大并表面化。

北方议和代表派出以后，已于12月29日离京南下，1919年1月2日抵达南京。而南方则因陕闽问题与北方僵持，代表迟迟未能派出。人们殷切希望南方也即速派出代表，以便和议早开。1月7日，和平期成会熊希龄、蔡元培致西南各总裁电说："南北双方及各和平团体所愿促进和平者，其意无非为欧洲和会将开，我国不能不速谋统一，以冀国际上得列席发言之地位。今若失此千载一时之机，将使吾国吾民永无出死入生之日。时会迫促，宁忍因循？及今不图，万悔莫及。……现幸北方代表已抵南京，同人抱其促进和平之夙愿，冀效奔走之微劳，亦于四日到宁。顾以南方代表诸君姓名尚未宣布，何时到会亦未得知……务乞电促军政府即将各代表姓名电布，并促即日首途，克期集会，俾和议早开一日，国家人民即早安一日。"[97] 这些意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这样，舆论转而对南方不利，无形中给南方以一种压力。

1918年12月中旬，西南内部两派因陕闽纠纷在派遣代表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岑春煊及政学会一派主张代表不妨先遣，等陕闽问题解决后再行开议，或是等开议后再来解决这些问题。旧国会林森、吴景濂、孙洪伊、张伯烈等表示反对。12月19日，旧国会开会议决两条：一、非至北京政府将陕、闽、湘、鄂军队概行撤退，一律停战，军政府不得派代表；二、军政府应向外交团声明北京政府藉口讨伐土匪，

派兵赴陕、闽、湘、鄂各省以阻挠和议进行之罪状[98]。12月30日，军政府招待参众两院议长，协议陕闽问题和派遣代表问题，因旧国会方面坚持反对意见，未获结果。

1919年1月初，岑春煊发表对时局的谈话，就速派代表问题提出七条理由：一、北方代表已经南下，并要求南方派遣代表，如不答应，则内外将误解南方无和平诚意，殊属不利；二、目下外国报纸均说陕、闽问题应让诸议和会议解决，时间迁延之罪在南方；三、国民厌乱已达极点，如各省省议会、总商会等要求解决时局，以去商业上之障害而恢复秩序，若放任不管，则民心将去南而附北；四、军政府以护法各省之军民为基础，今陆荣廷及其他各省军队均希望速派代表，唐绍仪总代表亦主张速派，军政府现如与之意见相左，将陷于困难境地；五、开对等会议以外，所谓不派总代表和其他代表等，均属毫无意味，且如此停滞，不特不能解决陕、闽问题，如兵端再启，则对于陕、闽、湘、鄂各省殊为不利；六、北方对于陕、闽军队称作土匪，南方称为南军一层，亦决非仅恃电报所能解决，如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认陕西军民为土匪，嗣后在会议上经民军代表抗议，终归屈服。前例俱在，彰彰可考；七、北方既已派遣代表，南方如不派遣代表，则议和不成功之罪将转嫁于南方，如藉口继续进军，不容易解释各国之误会[99]。

1月6日，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邀请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出席，对于选派代表问题虽再力谋疏通，而旧国会方面仍不肯变更其主张。军政府遂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不经国会同意径行选派代表。1月9日，军政府以七总裁名义将所派定的十名代表及总代表正式电告北京政府。其名单如下：

唐绍仪（总代表）

章士钊（代表岑春煊，政学会）

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国民党）

李曰垓（代表云南唐继尧，随后改为缪嘉寿）

曾　彦（代表广西陆荣廷，政学会）

郭椿森（代表广西莫荣新，政学会）

刘光烈（代表四川）

王伯群（代表贵州）

李述膺（代表陕西，政学会）

彭允彝（代表湖南，政学会）

饶鸣銮（代表福建及海军）

随后，由于以下几种原因，旧国会也表示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意军政府派遣的代表：一、唐绍仪曾电告旧国会，说代表派出于议和无大影响，宜速派遣军政府所希望之代表，因之国会、军政府之间的意见得以疏通；二、北方关于议和地点已经让步；三、军政府同意付与唐绍仪以议和全权，各代表不过有局部之发言权；四、陕闽问题未解决以前不开会议[(100)]。

南方代表派定后，由于政学会有五名议和代表，占有很大比例，因此旧国会议决代表条例共五条，交军政府实行：第一条，和平会议之代表，由护法政府（1月11日，旧国会开两院联席会议，决议军政府改名为护法政府）选拔总代表一名、代表十名，但总代表之选定须得国会同意。第二条，总代表代表护法政府，握办理和平会议事项之全权。第三条，代表受总代表之指挥（后改为代表赞助总代表），处理议和事项，但代表有违反护法之主张，总代表得停止其代表资格，由护法政府改派他人。第四条，和平条件之决定，须得国会同意。第

五条，本条例至和平会议终了之日即行废止。[101] 这些条例的规定，显然是对代表的权力起一些约束作用，以保证能按旧国会的旨意行事。

1月中下旬，南方代表先后赴南京（后到上海），等待和议的召开。

关于陕西、福建两省问题，李纯根据南北双方以及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意见，经过多方斡旋，往返磋商，于1月中旬提出五条，并征得南北当局同意，作为双方商定的解决办法，于2月7日通电全国。五条办法是：

一、闽、陕、鄂西双方一律实行停战。

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

三、闽、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

四、陕西内部由双方公推德望夙著者前往监视，以杜纠纷。

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102]。

2月13日，北京政府以上述停战办法五条电令陕西督军陈树藩遵照执行。

唐绍仪推荐张瑞玑为双方派往陕西办理划界事宜的大员。张为旧国会山西众议员，曾在陕任职多年，情况比较了解，北京政府亦表示同意。

这样，陕闽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其他有争论的问题也得到了

解决，一些准备工作大体上已经就绪，和议就要召开了。会议地址选定在上海仁记路黄浦滩口前德国总会。北方代表住在哈同花园，南方代表住在愚园路九十号。

双方还未涉及关系重大、南北根本对立的有关国会、宪法等法律问题，只是就某些局部和会议枝节问题交换意见，各自就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僵持了两个多月，预示着和议凶多吉少，前途不妙。

二　南北和会的召开和中断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前德国总会开幕，双方代表均出席。唐绍仪和朱启钤两总代表在会上各自发表了宣言。南方代表对于法律问题及陕西问题略有表示，北方代表亦说及西南五省取消独立和陕闽南军纵匪骚扰问题，决定次日正式开议。

2月21日，和会正式开会。首先讨论陕西问题。唐绍仪发言说："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徐东海所发表之停战命令，所有军事省份均包括在内，然北方竟将陕西、福建两省划出停战范围，指为土匪，屡次进兵攻击。后以福建一方北军武力稍弱，且离北京较远，不如在陕北军武力充足，且距离较近，故以全力攻击陕西。旋经南方力争，陕民反对，江苏李督出面调停，于是乃有五条办法之调处。按五条办法实根据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之命令而来，未尝非解决陕事之一办法。乃南北一面磋商解决办法，而北军仍陆续暗中进行，则虽有办法亦等于无办法。"[(103)] 他要求徐世昌命令许兰洲退回原驻地，并撤换陈树藩，以解决陕民困苦。

朱启钤发言说："陕西党派甚为纷杂，剿办土匪，已非一日。当时并无明了之护法军，而土匪遍地，该省长官告急请兵，故闽、陕不在停战区域范围之内。旋因军政府屡次抗议，往返商讨，有直接电致中央者，有由李督转达者，电文具在，此事实在派遣代表之前，甚有因此不派代表之传说。嗣后李督从中调停，提出五条办法。自提出

后，又复往返磋商，在此期内，两方军队或不免有冲突之事。现在李督提出五条，中央政府及军政府业已同意，而五条中之公推监视员一条，商明由代表开议后实行。至停战一层，中央政府已于十三日通电，其电文已转达唐总代表。现在监视员张瑞玑已来，应相接洽，令其速赴陕西，遵照五条办法实行，监视划界事宜，以纾民困。”(104)关于撤换陈树藩问题，朱表示不同意，认为“此时尚在两军对峙之时，当求息争之法。若先更调军事长官，转恐另起波折”。他还说：“今日讨论五条办法，自是正当，倘及其他，急剧辩论，转失感情。”(105)

因为上年11月16日停战命令公布后，至2月13日五条办法宣布，北军在陕西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南军一些地盘，唐绍仪根据这一情况提出，实施五条办法应按11月16日命令为标准。朱启钤则坚持要根据2月13日五条公布后以电文达到之日为标准，不然又将引起纠纷，并声称自此以后如再有战事，他当负责。争论未得结果。最后商定请张瑞玑迅速赴陕与双方将领接洽，实行五条办法。张瑞玑于先一天由广东抵上海，21日分别走访唐绍仪和朱启钤，商讨赴陕事宜。

2月22日，和平会议继续讨论陕西问题。双方代表商定按照停战划界五条办法，由和平会议两方代表会请张瑞玑赴陕逐一实施，俟得张报告后，再作定夺。接着讨论军事外交问题，实即国防军（参战军）的取消与停支参战借款问题。因国防军及参战借款问题关系对日外交，故双方协议，以军事外交为议题，谋求根本解决办法。

国防军原名参战军，是段祺瑞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以便消灭异己，实现武力统一中国，假借“参战”、“国防”之名而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参战军于1918年7、8月间开始筹备成立，计划编成三师四混成旅；同年12月，因欧战结束，无战可参而改名国防军。

与参战军的成立有密切关系的是参战借款的签订。1918年9月28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帝国朝鲜银行总裁美浓签订了一笔二

千万日元的借款，供段祺瑞编练参战军之用。其借款合同原文如下：

中华民国及日本帝国，依据两国陆军协同防敌军事协定之宗旨，中华民国政府（以下略称为甲）为充编练得为完全协同动作之国防军队及参战所需各经费，特与日本帝国朝鲜银行所代表之日本帝国朝鲜银行股份公司、日本兴业银行及股份公司、台湾银行共三银行（以下略称为乙）订立借款合同如左：

第一条：日本借款金额为日币二千万元，以中华民国政府国库证券交乙承受。

第二条：前条国库证券之发行，其期限一年，按年行息七厘，以贴现之方法发行之。外加佣费一厘，由该国库证券之金额内扣除。期满之日，得由当事者双方协定，照上列所定同一条件换给发行。

第三条：甲受领本借款金额时，应存于乙。乙对此存款按年付息七厘。

第四条：前条存款甲有提用必要时，乙应依另行协定之手续交付于指定之受取人。

第五条：本借款所需之国库证券制造费、印花税及其他杂费归乙负担。

第六条：甲将来如有与本借款同一目的更欲借款时，应先向乙协议。[106]

参战借款合同签订后，共已支付给中国政府三百万日元，尚存一千七百万日元。欧战结束后，参战已不成为理由，参战军应予裁撤，参战借款应予取消或停支。但因段签订参战借款、编练参战军的目的是想扩充兵力作为消灭异己之用，故仍继续向日支领借款，将参战军改名国防军（参战督办处相应地改为国防军督办处），继续进行扩充

编练，并且按照《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规定，聘请了一些日本军官。国防军和参战借款问题，为当时中外人士所关注的一大问题，尤其为南方所忌，是南北和平会议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

在和议预备阶段，南方就有电致北京政府，对继续扩充编练国防军、支取参战借款表示抗议，要求取消参战借款，首先是取消国防军。2月初，南方一个重要人物在上海就此问题向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一）裁兵之议，现已蔚然成为国论，此时即不能一时尽数裁去，而分期裁撤，必须实行，国家始有生机。乃国防军现方从事召募，是裁兵之善议尚未行，而增兵之恶例已开始。各省若相率效尤，何以善其后。（二）全国陆军，无不为国防之用，今忽于全国陆军之外，另创一国防军之名，是限定某人某派所募之兵，始得称为国防，外此一切陆军皆不得谓为国防，顾名思义，实不可通。（三）袁世凯时代，设置统率办事处及编练模范团，皆轶出陆军行政之范围，彼时段祺瑞曾力持反对之议。今国防军亦模范团之类。（四）国防军督办处为参战处之改称，参战处又基于中日军事协定，故国防军督办处中有外人十数人执重要职务，目之者已不禁骇诧。现德国亦既降服，无战可参，军事协约当然在解除之列。而因一派人保存国防处之故不肯裁撤，是予外人以操纵吾国军事之机会。以上四端，皆国防军万不能存在之理由。不惟南代表所视为要案，想北代表亦必表同情。"(107)

因为国防军的成立，与参战借款有密切关系，而参战借款的签订，又来源于中日军事协定，要取消国防军，必须先取消国防军赖以存在的参战借款；而要取消参战借款，又必须先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申报》当时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自有中日军事协定，而后有参战处借款之约。有参战处借款之约，而后国防军乃得成立。此三者，其事有相联者也。今欲取消国防军，必以取消参战借款之约为先决问题。欲取消参战借款之约，尤必以取消军事协定为先决问题。此三者，其势又相因者也。盖中日军事协定而能废者，则由军事协定而生之参战借款，自然根本废除。参战借款既废除，则国防军自无力存

在，而取消不取消，自不成问题矣。是故不谋解决于根本，而仅仅以国防军之存废为争，已末矣。若不能废，而更仅仅劝以军权移转于他人，不末之又末哉？”(108)

所以，在2月22日南北和平会议上，唐绍仪在提出裁撤国防军的建议时，要求停止支取参战借款，公布中日军事协定。他说：“目下关于裁缩军队、整理财政，以为急须进行。姑无论国防军与日本有种种秘密关系，固当裁撤。即无上列各种关系，然此际扩充军队实与此次和平会议之本旨违反，与友邦忠告之善意违反，与全国人民希望之心理违反。况国防军原于中日军事协约发生者，近北京有令使赴欧特使将中日密约随时宣布。既可宣布于外人，自可宣布于全国，毋使切肤之国民，茫然不知本国国权丧失何等程度。此事应由双方代表迅电北京政府，要求将中日军事协约及一切附件宣布于国民，使全国国民得以研究救亡之法。”(109) 朱启钤对唐绍仪的提议表示赞同。

是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就北京政府准备支取参战借款余额提出质问，说：“本日路透电载北京国务院通告日本使署，愿接受参战借款余额一千七百万元。查欧战已停，参战不成理由，前已有电抗议。况现时和议已开，若再提取外款，是否欲和议进行，抑欲横生障碍？请即核夺。”(110)

这一天会议商定，以后会议，星期一、三、五为正式会，二、四、六为茶话会，均上午9时开会。

2月24日，开第三次正式会议。首先由朱启钤说明北京政府复电内容：一、中日军事协定日内可以抄寄和平会议阅读，并声明该约并无附件；二、参战军和参战借款来源于欧洲战争，欧战虽停，但和议尚未签字，各国军队亦未完全撤回，参战军纯系对外性质，此时未便解除；参战借款现尚在条约效力拘束中，不能中途变更(111)。唐绍仪对于北京政府拒绝南方代表所提解除参战军的要求大为不满，复电提出抗议，指出：“欧洲既无战事，则参战机关不能存在”；中日军事

协定事项，应交付和平会议解决，因为国民已将讨论国家大计之权，付托于本会[112]。他要求朱启钤再去电声明。

接着，唐绍仪提出，2月15日于右任从陕西来信，陈树藩所部旅长仍在进攻，南军所占领之乾县、盩厔被困，要求北方代表履行诺言，对陕西战事负完全责任，万一和议因此破裂，南方不负责。当时北京政府正发行民国八年公债5600万元，并已提交新国会讨论，唐绍仪认为此等有关人民负担之巨款，不应由北京政府擅行募集；国会问题尚未议及，竟提交新国会，是对和议绝无诚意的表现，他要求北方代表去电阻止。关于陕西事，朱启钤答应再致电政府，请严令前方将领遵照五条办理。关于公债问题，他认为假如政府因有事实上之必要，亦应先将计划告知代表，表示要向政府陈述一切。

南方国会与军政府对北方在陕西进攻和在国防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迅速作出了反应。2月23日，国会参众两院就陕西问题特开联合会议，议决三条，请军政府实行：一、陕西北军如不完全撤退，即行中止和议，并召还代表；二、请军政府即开紧急会议，以准备军事上之进行方法；三、通电中外，宣布北方破坏和平之罪[113]。军政府亦连日开会，七总裁随即联名致电徐世昌及各督军，指出："北京政府输送军器于陕西，仍取攻击态度，是对于和平会议无异于南辕北辙，此不可解者一。内外舆论俱希望裁兵，今藉国防之名，而为军队之扩张，此不可解者二。如陕西不停战，国防军不取消，则议和破裂之罪，北方应负担之。"[114]

2月25日，开第四次正式会议，讨论陕西问题。唐绍仪发言说：据于右任函告，13日、14日、15日、16日、17日，每日均在战斗。盩厔之靖国军因无力抵抗，已退至郿县。"陕西虽系一部分事，然南方军政府认为先决问题；只因为大局起见，故委曲求全，11月16日以后、2月13日以前之事，姑不苛求，暂按五条办法商榷。今并此五条尚未实行，如何解决？当初本席要求撤换陈树藩，原是一种根本解决方法。今既若此，非即将陈树藩撤换，北京命令必不能行，陕战亦无

解决之法，惟有极力要求即将陈树藩撤去。如此事不解决，和议必不能进行，我等固难负此责任，恐贵代表等亦不能负此责任。”(115) 他声明，在撤换陈树藩的命令未下以前，南方代表每天到会只询问是否已撤换陈树藩，此外不讨论别项问题。

朱启钤发言说：“陈树藩之不洽舆情，本席亦非为之辩护。即北京政府对于更换军事长官，亦非不可能之事。不过，此事重在息争，不可激起反动。贵代表连日所得于右任信，系属一方之报告，似亦不能据为定案。本席所接政府之电，谓已严饬停战，而双方将领奉到之后，情形如何，尚不可知。或者须候张君瑞玑到后，方有划界互守办法。昨日本席又有电致政府，措词尤为恳切。俟此次复电到后，情形如何，再行酌定办法。”(116)

唐绍仪接着指出：“陈树藩在陕，全陕人民固欲去之为快，即北京政府亦不以此人为然。今以袒护一人之故，与全陕人民心理违反，障碍和议，困苦人民，殊为不值。且本席主张撤陈，盖深知其不遵守北方政府命令，特为陕民代达痛苦之要求，绝非与陈个人有何种关系及为靖国军谋地盘也。”唐绍仪认为，陕事为大局一部分最要紧之事；陕事不决，其他关系重大之各事，只有暂不进行，“惟有通电中外，布告吾等为陕民疾苦起见，专候陕事解决，然后进行而已”(117)。

朱启钤认为：从前因政治之纠纷而启争端，在后因国民之催促而开和议。和会一方面在解除纷争，一方面在筹议建设，似未可因陕事遂至停顿。唐绍仪说：“停战公例，万国所同。今因陕西不停战，我南方自当主张公理。在公理未白之前，不能讨论他事。此等主张，理由极充分，无论中外不能加以责备。如谓主张错误，我南方完全负责。此刻除每天到会静候撤陈树藩之外，余事均暂不议。”(118)

至此，会议陷于僵局。后由两方总代表商定本日正式会改为谈话会。谈话时，南方代表提出三事：一、先停战，后划界；二、不必等

张瑞玑到陕始实行停战；三、须于右任有电正式证明战事已停，三事办妥，方能继续开议他案。朱启钤答应电北京照办[119]。

2月28日，开第五次会议。朱启钤报告《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已由北京寄到，计《中日协定文书》一件，《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陆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解释欧战终了文书》一件，共四件，此外别无附件。并声明，寄交欧洲和会专使者亦只此四件。唐绍仪提出，现据北京政府声明，宜由本会双方代表郑重向中外宣言，除上列四件外，如别有私定关于《中日军事协定》之附件，全国人民不能承认，将来不能发生效力。至对于该协约如何办理，暂时不能讨论。

接着，唐绍仪询问北京对于陕事有无解决办法之复电。朱答称，此刻尚未接到。唐说：自2月13日五条停战办法宣布后，每日均接有于右任报告陕军攻击详情函件。昨日又接19日由陕来函，报告连日战事剧增，北军各部移其东路向相桥、交口、红崖头、兴市、关山等处攻击，与三原相距仅数十里，三原亦恐难坚守。“是非北京政府威令不行，即系无议和诚意，实属不顾议和前途，不恤陕民呼吁，与世界和平宗旨大相违反。”[120] 唐问朱启钤：“贵总代表所谓负完全责任，究竟如何担负之法？”他说：“两方总代表本有‘全权代表’字样，当然有全权解决之权，不必与北京往返文电后，方能发生效力。若听北京命令，必无办法。除非（一）决裂和议；（二）贵代表向北京声明，陕战不停，即不能再负代表之责；（三）双方代表一致向本国人民及外交团声明北京处理陕西之不当。舍此以外，恐别无办法。”[121]

朱启钤答称：关于陕事，经多次切实电京，请以严厉办法防止陕西军队进攻，如政府无确实办法，必当以去就力争。“至向外交团声明一层，以为尚须考虑，未便同意。”[122]

唐绍仪最后声明，从本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北京如无满意答

复，南方代表当单独向中外宣布和议停顿，并申述其理由[123]。

当日会后，朱启钤即将会议情况电呈北京政府，并以“材轻任重，（和议）无法进行，请另简贤，以免陨越”为词，全体代表列衔提出辞职[124]。

北京政府认为，国务院2月13日电报究竟到陕西前线否，尚不清楚，南方代表遂以于右任的来信为据，说北京对和议无诚意，未免过于苛刻；同时还认为朱启钤对国务院致偏远之陕西省电报，从发电之日起，即对于南方誓言停战，也是错误的。关于陈树藩问题，北京政府指出：“于右任与陈树藩交恶，两不相容。于右任对陈树藩不能有好话，犹陈树藩对于右任不能有好话也。今凭于右任之言撤陈，不足以昭公允。两方既公推张瑞玑，自应静待张氏到陕查明再定，此时唯一办法在催张氏速行。”[125] 北京声称：“尚有无数重大问题须待依次协议之和平会议，竟因此等一地方之问题而致停顿，实属遗憾。”[126]

朱启钤为了挽救和局，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第一，由陈树藩电告于右任，由于通电上海，证明陕战已停；第二，在划界未定以前，暂缓剿匪；第三，由徐世昌明令实行停战。3月1日，钱能训在复朱启钤电中指出：第二、第三项可以照办，惟第一项很难办到。“陈、于本有宿怨，未必能互通款曲”[127]；“陈固不能与于接洽，于亦岂肯为陈证明”[128]，只能由陕西公共团体及闻望夙著之绅耆，电述停战实情以为保证。但事情较繁重，非限期所可能办到。钱表示，今后如果陕西再有战事发生，当由他负责。他还说：唐绍仪声称四十八小时如无满意答复，即向外交团声明停止和议，“此系外交界最后宣战之名词，同属国内，何必如此，此间无法承认”[129]。

随后，北京政府于3月3日发表了由徐世昌签署的陕西前线停战的明令。3月4日，国务院又发一训电致前线各将领，令停止剿匪。

3月2日上午，唐绍仪会见朱启钤后，得知北京对所提要求迄无复

电答复，南方代表团因已超过四十八小时的期限，遂于下午3时全体齐集愚园路寓所开紧急会议，议决将和议停顿原因通告中外。当即拟就《致北京外交团电》和《对各省宣言》两文发表。《对各省宣言》主要内容有三点：一、陕西问题，不独不停战，反而继续进攻；二、国防军问题，不独难望停募裁撤，反而利用国防之名，行增兵之实；三、中日密约问题，北京政府仅寄正文而无附件。其画龙点睛之语为："盖所议者和也，和战不能并立。今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北京政府谋和之无诚意，即其威信之不能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130)

这样，和议开幕不到十天，正式会议不过五次，就因陕西停战与国防军停募两件事横生梗阻而宣告停顿，致使其他一些带根本性问题如国会、宪法等，均未及讨论。

事情很清楚，和议停顿的责任主要在北方。如果简单说北京政府没有和平诚意，那当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如上所述，徐世昌和钱能训都还是希望和议成功，实现南北的和平统一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段派从中作梗，徐、钱的威令不能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北京政府并不能独立地作出决断。

陕西问题，北京政府先后以徐世昌和国务院的名义，连续下了几道停战命令，但陈树藩等北军将领拒不听命。其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暗中得到段祺瑞的支持。在和议开始以后，北京段派军阀还不断将军火武器运往陕西，供进攻南军之用。因此，陈树藩才有恃无恐，不遵令停火。《字林西报》有一篇文章指出："北军司令之违背总统命令，破坏和会约言，决非出于自主，自必由北京有势之员暗中授意所致。"(131) 关于南方提出撤换陈树藩问题，徐世昌对陈原无好感，为了和平，撤换他也是可以同意的。他曾说："和平会议如主张撤销，则我当将他撤销。"(132) 但陈树藩是段派的一名重要藩将，段祺瑞不同意，他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而段是决不肯屈从南方，按照他们的旨意随意将自己的重臣予以撤换的。因此，徐世昌和钱能训都

奈何陈不得。3月4日，北京政府要求陈树藩等遵照五条办法实现停火停剿的命令发表后，朱启钤和张瑞玑都认为太轻，太不严厉，表示不满意。钱能训则表示“无法严厉”[133]。熊希龄因陕事致和议中断，以和平期成会会长名义致电徐世昌，主张撤换陈树藩。徐复电说：“撤换陈督，现尚难办，希商之唐绍仪让步，暂时勿提。”[134]

国防军和参战借款问题也是如此。一切军阀都是爱兵如命，他们都懂得“有军则有权”的道理。段祺瑞把参战军（国防军）视为命根子，他几次辞内阁总理，但是始终抓住军权不放，从不愿意卸去参战督办、国防督办的职务。因此，要取消或停募国防军，或者将国防军移归陆军部管辖，段祺瑞是绝不会答应的。这实际上是给北京政府出了一道难题。参战借款原是段内阁主持办的，现在留待钱内阁来处理，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徐世昌对借外债来打内战，作为进攻陕西的张本，并不赞成[135]。但是要取消参战借款原约，不但日本未必应允，要偿付已交付之三百余万元，就当时中国财政状况来说，也不容易办到。而参战借款如一旦取消或是停支，国防军就无法生存了。因此，北京政府只能维持国防军和参战借款的存在，无法满足南方的要求。为了消除国人特别是南方的担心和外国人的怀疑，只好一再声明，它绝不会用于内争。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

北京政府的这种处境，当时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3月2日，唐绍仪将和议中断情形电告吴佩孚，吴复电说：“陕省停战及国防军停募两条，中央延迟多日，迄未正式答复，并非言和无诚意，系因某党派从中作梗。东海受困，威信不行，故致停滞。亟应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136]这里所说的某党派，就是指的段派。其实，唐绍仪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在谈判中，他曾对朱启钤说：“陕军究竟为谁管辖，其直辖于国务院，抑直辖于其他政府？”“现在北京政出多门，如最近借入外债一千七百万，余知实非东海本意，尚有一政府操纵于其间。”[137]

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政客，本来就不愿意同南方讲和，只是为内外

形势所迫，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要损害自己一派系的根本利益，并让南方占据上风，成为谈判桌上的获胜者，是他们所绝不答应的。徐世昌、钱能训和段祺瑞虽有矛盾和不同，但又有利害一致的地方，也不会牺牲北方去迁就南方。因为如果那样做，他们本身的地位就会立刻动摇；因而只能以段祺瑞所能容许的某些妥协让步去同南方进行讨价还价。和议是这样开始的，也将这样收束。

三　南北和会的恢复及其破裂

北京政府电令陈树藩等切实遵令停战后，陈于3月5日复电国务院表示，他和前敌将领一体遵照执行[(138)]。但南方代表完全不相信陈的表态是出自真意。

陕西问题成为南北和议的一大障碍。南北双方以及一切关心和局的人们，都期待张瑞玑早日赴陕，执行停战划界任务，解决善后问题。张瑞玑从2月26日由上海晋京后，和政府有关人士多次磋商赴陕事宜，等待陕西停战和陈树藩、于右任赞同欢迎他入陕划界的来电，直到3月12日始离京赴陕。行前，张对人说，他入陕是勉为其难的。“余此时为情势所迫，不能不去。其实，陕西事情非常困难，该省南北两军颇极复杂。陈树藩不能代表北军，于右任亦不能代表南军，将来划界问题必甚棘手。”[(139)] 他还表示，他赴陕不受任何一方约束，“与南北两方政府均不发生直接关系，将来所有划界情况，只报告于沪上和会”[(140)]。

3月18日，张瑞玑到达潼关，20日抵渭南，先后电和会报告：红崖头、相桥、兴市、交口一带，张锡元旅长与靖国军岳维峻、曹世瑛均经奉令停战，现正与两方会商各后退四五里，以免冲突[(141)]。3月22日，张瑞玑到达西安，23日又发来一电，报告双方均已停战，并痛陈陕西人民历经兵匪之祸的惨状。电文说：“养日抵西安。陕省双方军队刻俱停战，前蒲城小有冲突，今已平息。……统计南北主客驻陕军约十三万，八省之兵，合数省之匪，星罗棋布于关内一隅，纵卸甲

坐食，秦已不堪。瑞玑入关，所经市阛，比户墟落断烟，闻西路尤甚。陕南已收括无遗，陕北则糜烂殆尽。父老相见，捂手失声，咸谓兵火之惨，十倍回乱。但愿自今以后，再勿多生伟人英雄，使愚民得稍稍安集，于愿已足，若欲恢复元气，非三十年后未易言也。其言甚怆，闻之恻然。”[142] 他告和会说，拟定一二日内亲赴兴平、三原各战线，与许兰洲、于右任各军接洽会商停战划界事宜，务求两免冲突，暂息民喘，并说：“和议既开，则是非曲直，听之南北公判。陕人受祸较烈，故陕人希望和平之心，较他省尤为迫切，此电入览，八百万呼吁之声，隐隐纸上矣。”

3月下旬，因和议中断已二十余日，国内各方面人士迫切要求继续开议。上海五十三个商业公团联合会于3月19日召开紧急会议，并致电南北政府及两方代表，请求在七日内开议，“以定人心，而维大局”[143]。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联合会等团体也通电要求恢复和议。同时，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又几次开会，准备提出第二次劝告。英国公使朱尔典并将此事非正式地通知了外交部[144]。张瑞玑抵陕后拍发的电报，证明陕战已停，给恢复和议提供了可能。因此，北京政府和其总代表朱启钤一再催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继续和议。3月27日，朱启钤往访唐绍仪，说迭接张瑞玑来电，证明陕西战事已停，希望能于31日（星期一）开会，以慰全国人民之望。唐绍仪以陕事真相尚未明了，前向政府提出之各项要求迄未答复，亦无相当办法，此时难以开议；表示须俟张到三原后，于右任来电证明陕战已停始能作准，然后才可提及开议问题[145]。

4月1日，北京政府致电朱启钤，指出：张瑞玑几次来电，均系亲自拍发，现又由三原来电，告以已发密电致唐绍仪，望即敦促开议[146]。是日，张瑞玑从三原返回西安，又致电南北两政府及议和代表，报告陕西停战情况，说：“与陈督商，乾县战线均退后五里，关山军退至关道及下邽，兴市军退至荆西北各村堡。晨，晋督及郃阳县公民电报高峻侵扰郃阳一事，已由于右任飞饬高峻速勒部下谨守原防

矣。三原密电亦通。”[147] 4月2日，北京政府再次电劝朱启钤、唐绍仪：“倘再停顿，于国际和会必生碍障，中央准实践前言，完全负责。”[148]

4月1日，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吴佩孚联名致电朱启钤、唐绍仪及全体代表，要求速开和议。电文说：“自中央颁布严令一律停战，陈督军固已通电声明遵令实行。虽于右任尚无证明文电，而划界员张君瑞玑行抵陕省，陕已一律停战，有张君迭电可证。是则陕省方面解决有期，自非传闻异辞。……当此时机危迫，一发千钧，潮流所趋，实为公理，人心所向，咸在和平。众欲未可拂逆，武力断难存在。故非迅速开议，无以慰中外之望；非慎循轨辙，无以救国家之亡。”李纯等提出三点希望：一、即日继续开议；二、双方议题以一次提出为一定范围；三、提出议题，以合乎今日时势及事实所必要而确能办到者为标准，“总期早日解决，免致徒托空言”[149]。军事实力派的主张，较商民呼吁强而有力，何况长江三督和吴佩孚与南方的关系密切，他们出来说话，显然是起作用的。

4月4日下午，南方代表齐集老靶子路唐绍仪寓所开紧急会议，根据张瑞玑几次来电，陕西已经停战划界，讨论是否应行开议问题。会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三原于右任、张钫均无来电证实已停战，且于右任来信说3月28日尚未停战，今专恃西安来电，不能为凭，不主张开议。另一派则认为，陈树藩不能撤换，陕西终在其权威之下。三原电报前既阻隔不通，今电线杆修好，陈仍多方阻止，不能使用，北京命令又不能行。张瑞玑已由三原到西安，张自三原来电已经不能，想于右任自三原发电恐亦无望。国人不明此中真相，仅凭单纯判断，出于哀痛心情，迫切希望开议，吾辈不得不特别谅解，尤其不可拂逆民意，致令误会。据目前情势观察，惟有顺从舆论，继续开会。北方代表已声明，陕西问题尽可在会上解决，倘以后仍如从前纠纷不已，则曲在彼而不在我，国人自有公论。且长江三督来电要求速开和议，并主张另派大员查办，辨明以前是非，保障以后避免冲突，此亦可以认

为解决陕事之切实方法[150]。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开议，商定4月7日（星期一）继续开会。

4月7日上午9时，南北代表在德国总会开谈话会，停顿了一个多月的和议又得到恢复。是日第一项议题为陕西问题。因先一天张瑞玑又有两电到上海，一是致和议各代表及全国和平期成会、和平联合会，电文说："陕战已停，屡经电闻。前者右任所争，在乾县围兵退驻地点之远近，本非争战与不战也。今则郭坚指乾县为渠旧部，请许兰洲赴乾收抚，是乾县又为许有矣。其余各处，更无战事可言。事实昭然，非可饰言。"[151] 另一密电指出："江电敬悉。三原电已通，查询电局，由粤沪致右任电已照转，而右任迄未去电，想不久亦有电去也。战事确已停止。"[152] 故会议讨论陕西问题时，没有发生争执。南方代表希望实行长江三督的主张，另派大员赴陕西查办，辨明以前的是非，保障以后避免冲突。

接着讨论其他议题，唐绍仪提出：一、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二、裁撤国防军机关及所属兵士；三、参战借款不得提用；四、和平会议未终了以前，双方不得借入外债及发行公债；五、陕西问题；六、湖南问题共六项问题，并逐一诘问朱启钤如何办法。朱答称：关于军事密约，北京政府本拟宣布，因和议停顿，以致延搁；参战借款因日本已交付政府存汇业银行，本可自由提用，已屡电阻止，迄无效果；八年公债不仅南方反对，北方亦有人不赞成，亦已迭电劝阻。其他如国防军停募等问题，均应确实商量解决方法[153]。最后协议开会方式，双方决定，各种议案一次性提出，并议决限两星期完结。

和议恢复时，南北两方部分代表如章士钊、郭椿森、汪有龄、王克敏、徐佛苏、吴鼎昌等，以和议往往容纳会外人意见，各代表实际上处在群众包围之中，不能自由发表意见，主张开"扃门会议"（即秘密会议），不公开会议内容，以免受各方之干扰，但遭到南方多数代表和舆论的反对。结果，双方相约负责保守秘密，不开关门会议。

4月9日，开正式会议，首先由双方总代表将具体议案提出。唐绍仪除承前续议问题六项外，另提出议题十三项：一、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二、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制度；三、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征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浚河道，以安插兵士；四、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军费、军实；五、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六、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七、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八、指定的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九、整理财政，免除厘金；十、贩卖人口，贩卖烟土、吗啡，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严行禁绝；十一、惩办祸首；十二、各省治安善后问题；十三、整顿海军问题。朱启钤提出的有：第一，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束问题：一、裁减标准与其方法；二、安插方法；三、裁减费用。丙、军需独立问题。第二，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一、省之改革；二、道之改革；三、裁减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四、扩充全国教育；五、推行全国警察。丙、地方自治：一、县自治；二、省自治；三、振兴自治事务办法。丁、发展国民经济：一、兴筑国道；二、改革币制；三、废除恶税；四、革除条约及习惯之束缚。戊、善后借款问题：一、借款额数；二、借款用途[(154)]。可以看出，北方代表所提出的议题，完全是属于具体事实问题，琐碎而不着边际，避开了南方代表提出的法律、军事等重大问题。

在讨论中，双方就一些有重大分歧的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唐绍仪指出，他所提议案中，第一条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问题是根本问题。“盖既为民国，自不能无国会。此条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第十一条惩办祸首问题，“追原祸始，一年以来，国家何以陷于危险，人民何以受此痛苦，责有攸归，孰尸其咎，想全国人民亦不肯放任不问也。虽本会不能遂作执行机关，然本会此时不能不申明公理”。朱启钤说：“国会问题，本为此次南北争持之起点，若各抱一种学说，各持一方意见，极端主张，必无结果。现为消弭国内之纷争起见，不应有极端的主张，方有解决。”至于惩办祸首属于对人问题，

朱认为和会讨论极不相宜，亦不在职权范围以内，不应议及，要求唐绍仪撤销。唐说：今日南北之所以形成对抗局面，追本溯源，是从解散国会开始的。“国家根本在此，战争原因在此，若此等重大问题可以不议，则南北代表所议者何事？盖未有重于此者。”他还表示不同意朱提出的和议不能讨论祸首问题的说法。朱启钤坚持不主张将祸首问题列入议题，国会自由行使职权问题即使列入议题，也应改称“国会问题”。他说：“此次南北争持，皆由于此一国之内，不幸而有两种国会。试问去某一国会留某一国会，是否本会所能主张？只可协商双方对于国会之意见。”[155] 唐绍仪表示同意改为“国会问题”列入议题。惩办祸首问题，按照会议规则第三条“议题由双方总代表协定”，即有一方不承认，不能成为议题的原则，唐也赞成不将它列入议案。最后会议改为谈话会，由唐、朱两总代表逐项讨论双方提出的议题，合并为六大纲，即：第一国会，第二财政，第三军事，第四政治，第五善后，第六承前续议案。

因为国会问题是和平会议最为棘手的问题，双方商定作为最后议案。但因其他议案已陆续分别审查，意见不难趋于一致，国会问题很快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和议恢复后，朱启钤即在努力寻求一条根本解决的途径，并在秘密中与唐绍仪接洽。4月初，朱启钤派吴鼎昌回京，与北京政府商讨国会等问题。4月9日，朱致吴的密电中说：“国会问题，现已接洽，定为最后商议之案，除根本解决外，几无别法可想。然少川心中最近抱何主张，尚难捉摸。中央各方既赞成我辈主张，不惜点缀，请兄与府院预商办法，俾临时应手。”[156] 4月16日，又密电吴说：“军事案就我范围，他事不难归束。法律密与唐交换意见，另电紫公（钱能训）请趁兄未行时，密为计划。此等事此间无人可以参预。电文在寓自拟，如有不明了语，想兄可以意会，代为解释。少川屡以执事不回为问，其意可知。就目前接洽而论，作用在先定办法，不必急需实质。安福部状况如何，盼示一二。”[157]

关心和平的人士，曾就解决国会问题想出种种方案，但均未得多

数赞同。当时比较有力的主张有两种：一为民国六年6月13日解散时之国会重行集会于南京，组织宪法会议，将二读会通过之宪法继续完成，并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俟总统选出，宪法公布，南北两国会同时消灭，再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选举新国会。在广东的旧国会议员与军政府多数赞成这一主张。另一主张为民国六年之宪法会议继续开会于南京，将从前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案继续完成，追认徐世昌为总统，新旧两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宪法选举新国会。北方各派包括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己未俱乐部[158]（安福俱乐部除外）及未赴广州的旧国会议员，多表示赞同。岑春煊、陆荣廷也倾向此说。两说彼此不同之处在于：赞成第二说的，认为总统既已选出，则元首地位业已确定，当然不成问题。赞成第一说的，认为总统系由北方新国会产生，手续合法与否，姑且不论，而新国会既无西南五省代表，终属一方之国会。国家元首不能由一方国会选出，故必须再选一次，方为圆满。但两说也有两点趋于一致的地方，就是：一、以宪法解决国会问题；二、承认从前二读通过之宪法案为有效。

北京政府在和议恢复前后，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国会问题上，并倾向于上述第二种主张。4月8日，吴鼎昌致朱启钤的密电中说："国会问题，日昨讨论最久，府院甚以根本解决之法为然。纵有牺牲，亦属值得。"[159] 同日另电中说："府院均以整理二读会条文宣布，为根本解决之法，极表赞同，主座谓，即牺牲金钱亦无不可。"[160] 吴主张在同南方谈判国会问题时，要软硬兼施，态度要强硬一些，"力往决裂一方面做去，再以金钱为饵"，以使唐绍仪就范，并暗示政府已买通陆荣廷。"陆要1，500，000元，先给500，000，中央已允汇往"[161]。9日，吴又连发电致朱启钤："本日在院与揆席详细讨论法律问题，决定采根本解决之法，不必迁就两会，致遗后患。"[162] "法律问题，决不迁就两会。议宪之说，已详□（疑为"庚"）电，府院意照此决定。"[163] 这里所谓"不迁就两会"，"根本解决"，以及上述朱启钤电文中提出的"根本解决"，就是要继续完成从前之二读宪法条文，

将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不迁就任何一方。4月18日，钱能训在给朱启钤的密电中说得更明白："法律问题，顷与达铨（吴鼎昌）熟商，渠尚有一种计划，拟将两国会宪法起草分子约计各七十人左右，召集完成二读旧案，并修正选举组织各法，在代表无议宪之嫌，而法律有下台之地，用意不无可采。达铨归时，当可详陈。鄙意此事最好仍用简捷办法，一了百了。……欲照法律会议办法，则事前必有先决问题。一则新、旧两国会须同时闭会，以俟解决。一则须认为统一已成，元首业经全国承认，西南一律取消独立。果如是，则法律问题虽暂时解决，尚不致发生意外之变化。"[164] 南北双方代表多数也倾向赞成这一种方案。

安福国会是安福系议员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其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段派军阀统治的一个重要职能机构，是不容任何人碰它一下的。关于上海和会讨论国会问题以及南京制宪、重选或追认总统、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之说一传到北京，立即遭到段派和安福系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4月12日晚，段派在段祺瑞寓所开秘密会议，由安福系报告，说明上海和会对于国会问题，双方多数代表赞成先恢复民国六年宪法会议，在南京开三读会，将宪法完成，克期公布，一切问题不解自决；此主张一经提出，必当通过，形势非常危急，宜速筹挽救办法。经与会者讨论很久，决定一致反对，如无效时，将派员赴巴黎和会控诉，求列强公开裁决，并运动日本先行出面干涉[165]。

安福系议员因去年12月通过钱能训内阁时，曾与徐世昌和钱能训订有口头契约，对南方议和不越出安福部四大主张范围，现在听说和局将成，形势大变，违反前诺，非常激愤，纷纷谒钱诘责，并语侵徐世昌，斥为"卖友"。4月12日晚，安福部召开紧急会议，有人在会上提出，上海和议所提国会议案，完全是大政方针，而不是和平条件；朱启钤已与南方联成一气，想瓜分政权，目前对付方法，只有将朱的总代表职务撤销。会议主持人认为事关重大，应从长计议。最后决定，一面飞电因丁忧回徐州的徐树铮速示决策，一面密电陆徵祥在巴

黎和会上，在所有与日本争持的案件上即行让步，以争取日本的支持；同时还做出了以下几点决议：一、依照上次决议之宣言，认为大总统地位不能因和议而动摇；二、国会非依宪法不能改组，南京制宪之说及两国会同时取消、按旧法重新召集国会之议，系动摇元首地位，违反北方二十省之民意，皆绝对不能赞成；三、和平会议中，如有人因企图瓜分政权之故，为不公正之主张，其所议决者概不承认；四、国会问题，若赞成南方一偏之主张，使中央及北方各省军民及政府冒违法之名，概不承认[166]。

4月13日上午，安福系召开大会，议决两项：一、推两院议长会见钱能训总理，叩询所派总代表等是否能不违背他赞成的安福系四大主张，及最近和议情形与政府之方针；二、两院开会时，请全体国务员出席，依法质问[167]。下午，参议院议长李盛铎[168]、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去见徐世昌，陈述安福系开会决议，反对上海和会所提的南京制宪、追认或重选总统、修正国会组织法等主张，希望得到徐的支持。徐世昌不满于安福系的专横跋扈，知道它所谓“维护大总统地位”，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把他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实际上是想维护他们一派的私利。因此，他并不买安福系的账，回答说：“余无成见，但既予代表全权，未便有所表示。”[169]李、王以徐答复不得要领，声明两院下次开会，要求全体国务员出席质问。徐沉默不语，未表示赞成与否。

与此同时，段祺瑞致电张作霖，请他速赴天津，倪嗣冲亦将赶至。他们又准备在天津开督军会议，并由段亲自任主席，动员督军出面对上海和议进行干涉。后因曹锟不赞成在天津开会，张等才中止入京，改派代表来京请示，并主张改在奉天开会。

一连几天，安福系拼力活动，历访各当道要人，谋求贯彻其保存新国会的主张，“再呈现其盛旺之状态”[170]。安福系对国会之主张，据该系一个重要人物所谈，就是依现行国会组织法、选举法，从西南五省选出议员，以完全新国会，然后由新国会制定宪法。如果这

个办法不行，则由新国会修正约法，而以国民会议为制定宪法之机关，另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除上列两办法外，无论依旧约法召集新国会，或恢复旧宪法会议等，都绝对不赞成[171]。这就是说，安福国会是万万不可动摇的。

4月14日，王揖唐、李盛铎会见钱能训，陈述安福系对时局主张，并询问政府对于国会的意见。钱表示三点："第一，国会为选举大总统及通过内阁之机关，故国会、总统、内阁三者有相连之关系，根本问题，万难摇动；第二，新旧并废，用旧法召集新国会之说，政府亦不赞成，诚以修改两法，召集国会，政府已依法宣布命令。若云解散新国会，如何解散？又应如何下命令？要用旧选举法，有种种困难，故难施行；第三，南京制宪之说，原非政府之政见，乃王家襄（原为旧国会参议院议长）君等之主张，政府已由朱总代表表示否认之意旨。"[172]

钱能训在安福系的猛烈攻势和强大压力下，显然有些胆怯，开始后退，不敢坚持前此解散新国会的主张。同日，他在给朱启钤的电报中说："南中近日盛传南京制宪之说，无论旧会开幕后行使职权难于限制，即就制宪而论，新会完全撇开，势必激起反动。日来新会亦开议讨论，并质诘政府。故南京制宪之说，中央已难赞同。……能否由两代表将宪法草案及选举组织法核定后，仍交两国会通过公布。但得新会公布，则法律上手续已可自圆其说，旧会布否，不妨听之。"[173]

4月17日，安福系在太平湖开会，议决：一、联名致电朱启钤，声明总代表性质为两院通过的国务总理委任，等于行政委员，法律问题无权解决；二、对全体国务员质问，宜取和平态度[174]。当即由安福系议员王郅隆等三百三十余人致电朱启钤并通电全国，指出：朱总代表"系受国务院委任，其权限不能出乎行政范围。国会系国家立法机关，断非行政委任人员所能议及。倘若越权擅议，则紊乱国宪，摇动国本，必有尸其责者"[175]。

4月18日，众议院开质询会，钱能训率国务员出席。钱发言要点有三：一、不使北方政府陷于违法之地位；二、维持新国会；三、不赞成以旧约法召集新国会及在南京开旧国会[176]。安福系议员刘映奎发言说："代表受政府委任，系一种行政委员，议及法律，即为违法，请问政府从前委任时，曾否授以此权？"钱不同意安福系认为代表无权议及法律的说法，但他对这个问题未正面回答，只是说："南方如提恢复旧会，北方不能不加以讨论；北方如提保存新会，则南方亦不能不加以讨论。"议员吴文瀚问："政府是否承认新国会无磋商之余地？"钱答："政府承认新国会无磋商余地。"[177]安福系议员表示满意，请钱退席。

安福系所谓议和代表无权讨论法律问题，完全是一种强词夺理的狡辩，其目的是为上海和平会议设置障碍，阻挠和破坏和议的进行。因为正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才出现南北对立纷争的局面，解决这个问题，实现南北的和平统一，不是任何一方单独所能决定的，而只能通过双方平等协商的方式，求得一个比较公平合理大体能为双方接受的妥协方案。和平会议的主旨之一也即在此。当时《申报》曾刊载北方政界某要人的谈话说："和会之设立，不独国会问题可以解决，即总统问题亦应由其解决也。盖政变以还，南北两方对于行政首长及立法机关，因法律上见解之不同，遂发生两重之组织，彼此对峙，不能立于国家统一权之下，乃有南北分立之现象。而此种问题又非一方政府所能解决，故始有南北对等和议之举。是和平会议正惟解决此种问题之纠纷而设，欲使不统一之政象而期于统一也。倘一方固执己见，不稍变通，即不啻抹杀相手方之人格与意思，又何所谓对等议和哉？至于北方代表虽经国务院委任，则对于疑难案件固不妨电京随时商洽。谓竟无权解决，则委任代表，所司何事耶？况外交内政危迫至此，倘不从国家根本着想，徒逞一二人之私心，致妨碍统一，阻挠和平，殊为舆论所不容。"[178]

安福系议员联名通电发表后，朱启钤于21日电京询问："安福派

假参众两院名义阻止和议席上提议国会问题一事，总统是否赞成，请即刻详复，否则贻误和局，不能负责。”[179] 钱能训认为此事于和议前途关系重大，随即一面致信众议院，予以解释澄清，一面通电全国加以辩明，说：“此次上海会议，本为解决国内纷争问题，法律问题亦其一端。所派代表负有解决时局之责，对于此项问题，自不能存而不论。”[180] 同时，他还复电朱启钤：“新议员联名筱电，由政团名义拍出，不足以代表政府，故政府对该电不负何等责任”[181]

安福系的阻挠和破坏，给刚刚恢复的上海和平会议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在安福国会对北京政府及其议和代表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南方旧国会中的一部分人，也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坚持国会必须完全自由行使职权，非法的新国会必须解散，丝毫不能让步，以维护法主旨。

原来唐绍仪在和平会议上提出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后，看到北方很难接受，舆论也并不积极支持，担心和议难以进行，曾拟同南方代表协商变通办法，谋求一个互相妥协的方案。4月13日，朱启钤致吴鼎昌的密电中透露说：“昨日少川表示，国会问题应由各代表互相接洽。……少川见我方对于国会问题屡屡表示决绝态度，故恢复民国六年国会之主张，亦知其难。又知国会在广州开会，人数日益寥寥，补选制宪，决办不到，故对于国会一事，益觉束手无策。此后会议国会问题时，究竟如何情形，现实不能预定。微观其隐，希冀之心甚切，而又不敢放胆做去。”[182] 4月19日，朱又电钱能训说：“唐少川对国会拟有变通办法，与我中央所定者，似觉相近。”[183]

但唐绍仪对如此重大问题，自己一人不能做主，需要请示军政府。4月17日，他电呈军政府：“连日会议情形，经已电告。计军事、财政、自治各案，彼此当无大出入，易取一致。惟法律案第一日提出以国会完全行使自由职权问题，北方代表即抗议，改为国会问题。默察彼方情形，恐不能同意于我之主张，而此案为彼此争持之要点，内

外注目。万一正式讨论及此，意见牴牾，强硬到底，恐使和议不能进行；而放弃主张，则重违护法之本旨。究竟应如何对付，关系最大，请由军政府确定方针，拟示办法。专候速复，俾有执持。”[184]

4月18日，广东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褚辅成发表通电，指出：“和议续开，国会问题已经唐总代表提出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窃以今兹之役，既以毁法启其端，当以复法为其钥。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实为和议中之根本问题，若不待完满解决，则其他问题纵能如我要求，亦不过敷衍苟且，决非长治久安之计。我辈既以护法为职志，对于法律问题，非一致主张，坚持到底，诚恐稍纵即逝，致违初衷。事机急迫，立盼卓裁。”[185] 接着军政府于4月21日又复电唐绍仪：“铣电奉悉。国会问题，关系护法主旨，务恳依照前所决定议和大纲，毅力坚持，以维法治，是所切盼。”[186] 后来国会又电告南方代表团：“拥护国会执行职务之绝对自由，实为诸代表应尽之唯一责任。如法律问题不能满意解决，则议和全案将归无效”；并警告代表不要做牺牲国会的想法[187]。

南方坚持护法，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在国会问题上的主张，事实上也很难行得通。因为：

第一，北方新国会虽是不合法、不完全的，但毕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个国会选举了总统徐世昌，尽管南方认为不合法，但他是由北方各政派所共同推戴的，并为各国政府所承认，南方也有一部分人表示拥护他。因此，完全不顾这一客观存在，要求存其一，废其一，单单要求将新国会解散，而让旧国会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是通不过的。既然是通过谈判来消除纷争，求得和平统一，而不是征服了对方迫令其投降，就只能双方都从实际出发，作出妥协让步，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当时并不赞同安福系死硬主张的北方代表吴鼎昌说：“新旧国会议员各有其主张，其主张之属绝对的者，在各议员原为正当。然双方果欲贯彻绝对的主张，则除非南方攻取北方，北方侵略广东，而后能如意之所欲为。和平会议原为不能如

此彻底的解决而设，则双方应有互让之精神，以行其协议之必要。”[188] 陈独秀还在和议开始时就指出：要使和议能有成就，先决条件就是双方都要有所让步：北方不要固执“中央威信观念”，南方不要固执“单纯的绝对的护法观念”。他说：“想想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当采用？……况且世界上一切的争端，到了双方都承认议和，便双方都到了半降服的运命，双方都默认了有让步的条件。若是双方都执要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还是要武力解决，这和平会议便没有成立的理由。”[189]

第二，恢复旧国会，让它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仅段派万难同意，北方其他各政派也不会赞成，而且一般舆论对旧国会也漠然视之。他们认为旧国会成立时间已久，分子又复杂，有的议员并不怎么真正考虑国家人民的利益，并且早已将民主共和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本人就是一个投机政客），不能代表今日真正之民意。同时舆论还认为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有不适宜于今日之中国者”[190]。1918年12月27日，蔡元培、王宠惠、陈启修等二十人联名发表宣言，发起国民制宪倡导会，就是一个例证。就连广东军政府内，也有人对恢复旧国会不太热心。军政府在1918年5月就已将孙中山排斥去职，而为西南军阀所把持。西南军阀虽然打着护法的旗帜，但他们所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盘问题。岑春煊认为北方对于恢复旧国会绝难同意，如南方坚持到底，则和议势必决裂，而西南各省均有厌战之心，故表示可以让步[191]。上述唐绍仪的思想，也多少反映了岑春煊的思想。陆荣廷始终就不曾以恢复旧国会为主旨。他自国会解散以后，在对北方的通电中，只说国会不可不召集，而并无应复旧之说。相反，他主张对旧国会进行改组。梁启超就曾以陆的态度作为他反对恢复国会，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组国会的凭借之一。岑、陆两人早已同徐世昌、钱能训暗通声气，寻求妥协。他们公开宣言表态，不能不打护法的旗帜，而背地里的主张和活动，却是另一回事。唐继尧开始主张不可牺牲旧国会，后

因鉴于形势，也无绝对保存旧国会的意思[192]。这些西南军阀首领们，都对旧国会中的强硬分子表示不满。

第三，让旧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如何行使法？旧国会自身几乎四分五裂，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人数不过半数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约有一百五十余人）是国会南迁后由候补议员递升的。内部又各自为派，有丙辰俱乐部及孙洪伊派（进步党之激进派）一大派，政学会、民友社及研究系之南下派一大派。党争未尝一日止息，意见很不一致。那些新递补的议员，甚至不赞成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而提出要求保存现在的广东国会；因为如果复旧，他们所得的正式议员资格就要丧失了。广东国会前以补选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就因意见不同，几经难产，最后始达成协议。后来开两院联合会，又因故大起冲突，一片混乱[193]。按照民国元年8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民国二年10月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都需有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并有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投票赞成，始能认可通过。要凑足这个法定人数，是完全不可能的。所谓国会制宪行宪，选举总统，自由行使职权云云，就不免是一种纸上空谈，无法实现。

所以，单纯就事实而论，无论存新废旧，或是废新存旧，都是各走极端，绝难行得通。当时南北多数不存党派成见的人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新旧两国会共同制宪，两会同时解散，依宪法另行召集新国会。“法律问题，新旧议员各有建议，多主张就两会折衷合开会制宪，无绝对保存说”[194]。“国会问题，各派主张不同，以两会共同制宪，依宪法另召新会说最有力”[195]。但这一说不能为新旧国会两方所接受。

南北都认为国会问题是双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议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讨论审查即使有结果，也是等于零。但因“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196]，和“彼此地盘之争”[197]，而没有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在这个问题上各固执一端，

距离太远，无法接近。南北和议两方代表中，由于分别代表各自派系，也是意见纷立，不能统一。4月28日，双方代表开会讨论国会问题，争执不休，没有结果，和议实际上又趋于停顿，成为僵局了。

鉴于法律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加上南方所提停募八年公债、取消参战军、罢免张敬尧、陈树藩等要求，北方均未应允，唐绍仪认为和议成功无望，即使能达成协议，也难以厘定与实行，旷日持久，徒耗时间与精力。同时他受到了旧国会中以孙洪伊为代表的一派的攻击，不堪忍受。于是，他不得不准备和议的破裂了，这也是他自己准备借此下台，谋取脱身之计。

5月初，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了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段派的卖国外交，受到学生及全国舆论的猛烈攻击，民心激愤，使他们处境十分不利。唐绍仪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就有关法律问题及国家应办之事，列为八条，于5月10日送交朱启钤。12日，南北代表各自开会讨论八条。5月13日，和会开第八次正式会议，唐绍仪将八条在会上宣读，并逐条加以申述如下：

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理由是外交问题，国家应以一种宣言或明令或公文的方式，向世界各国为坚决正当的表示，不徒电止专使签字而已。如无此等不承认之表示，此后即无办法。

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人”。理由是中日一切密约辱国丧权，未经正式国会同意，如按约法，当然不能成立。订约者引入特殊势力，以便私图，贻祸国家，至今为梗。非取消密约，惩办订约有关系之人，不足以谢国人。

第三条，“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理由是参战军、国防军皆由中日军事协约发生，倚赖一种特殊势力，为患无穷，应即

一律裁撤。

第四条，“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理由是此等害民长官当道，应不俟和会呼吁，早予罢斥。

第五条，“由和会宣布前黎总统六年6月13日解散国会命令无效”。理由是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不依据法律之命令，是为违法。违法命令，当然无效。况黎之解散，系被逼所致，当时黎已通电自认违法。至以步军统领代理总理副署命令之江朝宗，亦通电自认违法。违法命令，当然取消。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凡年来丧权辱国之事，无一非于国会解散后次第成立。国人痛定思痛，愈知国会恢复为救亡最急最要之图。

第六条，“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理由是国会未开会，正式内阁无由产生，故设此为临时机关，至内阁成立之日撤销。

第七条，“其他议定及付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理由是此乃结束各案当然之事。

以上七项，北方如一一同意履行，南方本互让精神，为承认统一，表示订立。

第八条，“由和平会议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理由是此为谋互让与统一起见，始有此最大牺牲。但须郑重声明：第八项与第一至第七项有连带关系，互为因果；如第一至第七项不能办到，则第八项无效[(198)]。

唐绍仪表示，上述之八项条件，为南方的最后让步。

显然，这八项强硬条件，是北方所不能接受的。讨论结果，南方代表以北方代表不能容纳其主张，尤其是第五项认为绝对无磋商余

地，于是本诸责任问题，向军政府提出总辞职。

当日，唐绍仪总代表及各分代表联衔致电军政府说："本日即开正式会议，将八条详细说明，并表示此为最后让步。朱总代表声明，第五条由和会宣布黎令无效，北方万难照办；此项不易，他项终无可议；并言南方如此主张，北方惟有请西南五省补选议员，加入新国会云云。法律问题，两方意见太远。其他政治改革诸条，证以会中状况及北京政情，厘定与实行，终无希望。陕西乾县至今尚未停战，四月初间，尚有大批军火输入。如张敬尧、陈树藩且几于撤换无方。仪等智尽能索，愧恨交并。自以才力不胜此任，谨即申述愚情，恳将仪等总代表及分代表各职一律开去。"(199)

接着，朱启钤等北方全体代表，也于5月14日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

5月1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上海和平会议问题，钱能训及各部总长、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议长均出席，决议拒绝南方代表所提出的八项条件(200)。5月15日，钱能训连发两电给朱启钤，准许北方代表辞职，即日返京，并驳斥了南方代表提出的各条。电文指出："以上各端，此间公同筹议，均认为毫无理由，必应坚拒。南代表既以和平为重，乃以此等不可能之事实列为条件，其侈语和平，非出诚意，无可讳言。务希切实驳拒，要求将所提条件即日撤回。倘仍胶执前见，则是彼方于和平问题已无磋商余地，我代表等应克期回京，另筹解决。"(201)

艰难而曲折的和议，在人们的期待和失望中，最后终于破裂了。

---

(1)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5日。

(2) 《外人劝告息争之传说》，《申报》，1918年10月20日。

(3) 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4) 《专电》，《申报》，1918年9月27日。

(5) 《美总统望中国息争之表示》，《申报》，1918年10月19日。

(6) 《冯徐交替与时局》，《申报》，1918年10月13日。

(7)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20日。

(8) 《欧战变化与中国时局关系》，《申报》，1918年10月19日。

(9)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日。

(10) 《和平之声》，《申报》，1918年11月7日。

(11)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2日。

(12)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3日。

(13)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1日。

(14)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1日。

(15) 转录自《日本之对华特殊地位放弃论》，《晨报》，1919年1月16日。

(16) 《日本对我内争之态度》，《申报》，1918年10月23日。

(17)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5日。另见《申报》，1918年10月20日《外电》。

(18)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1月13日。

(19) 《新日使之对华意见》，《申报》，1918年11月27日。

(20) 《五国劝告南北调和》，《晨报》，1918年12月3日。

(21) 《五国劝告南北调和》，《晨报》，1918年12月3日。参见《时报》，1918年12月3日；《民国日报》，1918年12月4日。

(22) 《请看吴佩孚之主和电》，《晨钟报》，1918年8月23日。

(23) 《前敌将领之两大主张》，《晨钟报》，1918年8月25日。另见《申报》，1918年8月25日。

(24) 《专电》，《申报》，1918年9月3日。

(25)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9月1日。

(26) 《各省省议会代表之宣言》，《申报》，1918年6月10日。

(27) 《张季直主和通电》，《民国日报》，1918年10月6日。同见《申报》，1918年10月6日。

(28)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29) 《京津间之和平声浪》，《申报》，1918年10月25日。

(30) 《北平和平声浪之一斑》，《申报》，1918年10月26日。

(31) 《申报》，1918年10月24日第3版。

(32)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4日。

(33) 《和平会发起之经过》，《申报》，1918年10月29日。

(34) 《熊希龄等拟组和平期成会电》，《民国日报》，1918年10月26日；《申报》，1918年10月26日。

(35) 《和平期成会之自白》，《民国日报》，1918年10月27日；《申报》，1918年10月27日。

(36) 《北京运动和平之两会》，《申报》，1918午11月1日。

(37) 《运动和平之新消息》，《时报》，1918年11月3日。另见《申报》，11月3日。

(38) 《运动和平之新消息》，《时报》，1918年11月3日。另见《申报》，1918年11月3日；《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1日。

(39)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1日。

(40) 《军政府又一表示对和意见电》，《申报》，1918年11月9日。

(41) 《旧国会坚持法律》，《申报》，1918年11月13日。

(42)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30日。

(43) 《北京之和平声》，《申报》，1918年11月3日。

(44) 《全国和平联合会宣言》，《晨报》，1918年12月22日；《民国日报》，1918年12月25日。

(45) 《和平联合会之成立会》，《民国日报》，1918年12月15日。

(46)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30日。

(47) 《晨钟报》，1918年6月11日。

(48)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49)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3日。

(50) 《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51) 《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52)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3日。

(53)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25日。

(54) 《徐东海与新时局》，《申报》，1918年9月19日。

(55) 《今后南北妥协问题之观察》，《申报》，1918年10月21日。参见《申报》，1918年10月22日、23日。

(56) 《今后南北妥协问题之观察》，《申报》，1918年10月21日。参见《申报》，1918年10月22日、23日。

(57)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39页。

(58)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3日。

(59) 《钱内阁之主和通电》，《申报》，1918年10月26日。

(60) 《命令》，《申报》，1918年10月27日。

(6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30日。

(62) 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14页。

(6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1页。

(64)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24日。

(65)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7日。

(66)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8日。

(67) 转引自《南北议和之外评》，《申报》，1918年11月20日。

(68)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9日。

(69) 《中国特约电》，《申报》，1918年11月25日。

(70) 《中国各电》，《申报》，1918年11月29日。

(71) 《中国各电》，《申报》，1918年11月29日。

(72) 《副总统问题复活》，《晨报》，1918年12月2日。

(73) 《副总统问题复活》，《晨报》，1918年12月2日。

(74) 《昨日之公府大会议》，《晨报》，1918年12月4日。

(75) 《昨日之公府大会议》，《晨报》，1918年12月4日。

(76) 《劝告后之公府大会议》，《申报》，1918年12月7日。

(77) 《段邸之会议及晚宴》，《晨报》，1918年12月4日。

(78) 《安福部之议员会》，《晨报》，1918年12月10日。

(79)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2月14日。

(80) 《国内和平之三大要电》，《晨报》，1918年12月7日。

(81) 《国内和平之三大要电》，《晨报》，1918年12月7日。

(82) 《钱总理致七总裁电原文》，《晨报》，1918年12月8日；《申报》，1918年12月9日；《时报》，1918年12月3日。

(83) 《国内和平进行中之唐绍仪》，《晨报》，1918年12月16日。

(84) 《钱总理与唐绍仪往还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

(85) 《公电》，《申报》，1918年12月20日。

(86) 《钱总理与唐绍仪往还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

(87) 《钱总理与唐绍仪往还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另见《申报》，1918年12月30日。

(88) 《西南诘问北军不停战》，《申报》，1918年12月8日。

(89) 《南方各总裁致电总统内容》，《晨报》，1918年12月15日。

(90)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8年12月18日。

(91) 《陕闽问题障碍和局》，《申报》，1918年12月18日。

(92) 《关于国内和平之两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0日。

(93) 《专电》，《申报》，1918年12月18日。

(94) 《熊蔡对于闽陕问题之主张》，《晨报》，1918年12月19日；《申报》，1918年12月22日。

(95)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8年12月19日。

(96) 《闽陕问题两方似接近—步》，《晨报》，1918年12月24日；《申报》，1918年12月27日。

(97) 《和平期成会致西南电》，《申报》，1919年1月10日。

(98) 《闽陕问题中之西南态度》，《晨报》，1918年12月22日。

(99) 《军政府与旧国会之两歧》，《晨报》，1919年1月7日。参见《申报》，1918年1月10日。

(100) 《南方代表决定之由来》，《晨报》，1919年1月18日。

(101) 《旧国会果将为和平之梗矣》，《晨报》，1919年1月20日。

(102) 《专电》，《申报》，1919年2月8日。参见《晨报》，1919年1月30日。

(10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6页。

(10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6页。

(105)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0、151页。

(106) 《申报》，1919年3月18日、4月10日。按此系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的文件。

(107) 《南北和议之昨讯》，《申报》，1919年2月9日。

(108) 《杂评·国防军》，《申报》，1919年2月19日。

(109)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7页。

(110) 《和平会议纪事（三）》，《申报》，1919年2月23日。

(111)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8、161页；《和平会议纪事（四）》，《申报》，1919年2月25日。

(11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3页；《和平会议纪事（四）》，《申报》，1919年2月25日。

(113) 《和议中之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2月27日。

(114) 《和议中之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2月27日。

(115) 《一九—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8—169页。参见《和平会议纪事（五）》，《申报》，1919年2月27日。

(116)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9页。

(11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9页。

(118)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70—171页。

(119) 《国内和议竟因陕事停顿矣》，《晨报》，1919年2月28日。

(120) 《和平会议纪事（六）》，《申报》，1919年3月1日。

(121)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82页。

(122) 《和平会议纪事（六）》，《申报》，1919年3月1日。

(123) 《和平会议纪事（六）》，《申报》，1919年3月1日。

(124) 《和议停顿后时局益险恶》，《晨报》，1919年3月2日。

(125) 《和议停顿与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3月1日。

(126)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2日。

(12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84页。

(128)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85页。

(129) 《国务院致朱代表电》，《晨报》，1919年3月8日。

(130) 《和平会议停顿矣》，《申报》，1919年3月3日；《民国日报》，1919年3月3日。

(131) 《关于陕西问题之外讯》，《申报》，1919年3月9日。

(13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1页。

(133)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6日。

(134) 《和议仍无进步》，《晨报》，1919年3月13日。

(135)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9页。

(136)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七）》，《申报》，1919年3月9日。

(13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9页。

(138) 《和议停顿中之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3月7日。

(139) 《张瑞玑本日出发》，《晨报》，1919年3月12日；《申报》，1919年3月15日。

(140) 《张瑞玑之行止》，《晨报》，1919年3月1日。

(141) 《专电》，《申报》，1919年3月22日；《晨报》，1919年3月22日。

(142)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二十五）》，《申报》，1919年3月26日；《晨报》，1919年3月26日。

(143) 《商业公团联合会呼吁之函电》，《申报》，1919年3月22日。

(144) 《公使团将提劝告与抗议》，《申报》，1919年3月24日。

(145) 《和议略有转机》，《晨报》，1919年3月28日、29日。

(146)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2日。

(147)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三十二）》，《申报》，1919年4月3日。

(148)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3日。

(149)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三十二）》，《申报》，1919年4月3日。

(150)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三十四）》，《申报》，1919年4月5日。

(151) 《和议续开前一日之消息》，《申报》，1919年4月7日。

(152) 《和议续开之第一日》，《申报》，1919年4月8日。

(153) 《和议续开之第一日》，《申报》，1919年4月8日。

(15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4页。

(155)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5—227页。

(156)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5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7页。

(158) 己未俱乐部为北方一个小政派，成立于1919年初，表面上主持人为内务次长于宝轩，实际党魁为徐世昌、钱能训。它赞成解散新国会，并对重新选举新国会已做有准备，但以不妨碍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为条件。见《申报》，1919年4月16日《北京通信》。

(159)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9页。

(160)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页。

(161)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页。

(16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6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6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43页。

(165)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66)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67)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68) 1918年12月，梁士诒因同安福系政见不同，与之决裂，辞参议院议长职务，由李盛铎继任。李为安福系重要骨干。

(169)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70)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16日。

(171)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16日。

(172) 《安福派国会问题之波浪》，《申报》，1919年4月20日。

(17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6页。

(174)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9日。

(175) 《公电》，《申报》，1919年4月20日。

(176)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20日。

(177) 《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4月22日。

(178) 《和议正式续开之第十一日》，《申报》，1919年4月20日；《和议中之国会问题》，《晨报》，1919年4月22日。

(179) 《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4月24日。

(180) 《政府声明和会法律权责》，《申报》，1919年4月25日。

(181) 《专电》，《申报》，1919年4月23日。

(18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4页。

(183) 《专电》，《申报》，1919年4月21日。

(184) 《国内和局最近形势》。《晨报》，1919年4月20日；《和议正式续开之第十九日》，《申报》，1919年4月28日。

(185) 《广东参众两院议长之通电》，《申报》，1919年4月26日。

(186) 《和议正式续开之第十九日》，《申报》，1919年4月28日。

(187) 《专电》，《申报》，1919年4月29日。

(188) 《吴鼎昌之国会谈》，《晨报》，1919年4月26日。

(189) 陈独秀：《我的国内和平意见》，《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2日。

(190) 蔡元培等：《国民制宪倡导会宣言书》，《晨报》，1918年12月28日。

(191) 《国会问题之西南观》，《申报》，1919年4月29日。

(192) 《国会问题之西南观》，《申报》，1919年4月29日。

(193) 《纪旧国会之党派》，《时报》，1918年10月24日。

(194) 《申报》，1919年4月22日。

(195) 《申报》，1919年4月24日。

(196)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197) 张一麐：《直皖秘史》，第5页。

(198) 《和议又将决裂》，《申报》，1919年5月14日。参见《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0—261页。

(199) 《和议再停后之第一日》，《申报》，1919年5月15日。

(200) 《申报》，1919年5月16日。

(201) 《北代表撤回之经过》，《申报》，1919年5月19日。

第七章　五四运动

第一节　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自北洋军阀政权建立后，中国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以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而后期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批判封建文化，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的思想补课。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大多从政治上思考这一问题，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指出："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1)] 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2)]。"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

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3]。通过共和思想来赢得共和国体，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走了一段同西方前辈们相反的路程，这个迟到的思想运动，决定了下面这个历史特点：它一面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障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这三个基本内容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较，反映出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追求，也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具体差异。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以《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这个杂志的主编是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896年中秀才，翌年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中，但自此开始接受康、梁的影响。1901年留学日本，因参加革命活动，1903年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1904年，陈在芜湖办了一个《安徽俗话报》，以后他又和柏文蔚等人组织了“岳王会”，该会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地区重要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后，陈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帮助同乡汪孟邹筹办亚东图书馆。1914年夏，应章士钊之邀到日本，帮助章编《甲寅》杂志。1915年6月回到上海，同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

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当时，民主称作“人权”。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这段话，概括地阐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的，即求得政治、经济、信仰、妇女的解放，总之，要同欧

洲一样，在中国全面完成一番“解放历史”。“天赋人权”，是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共同的基本口号。关于科学，陈独秀指出：科学的重要性不在人权说之下，“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谓，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强调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陈独秀高声疾呼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民主和科学，当时也称作“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这两面旗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帜。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是李大钊。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是年冬，由汤化龙资助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归国，8月，应汤化龙等人邀请，在北京创办了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并担任编辑主任。9月，因政见不合，李脱离该报。在留日期间，李开始从事反袁革命活动，并和《新青年》建立联系。在日写成《青春》一文寄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

李大钊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撰文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尖锐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4)] 此外，他还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封建文化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纲常名教。陈独秀曾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5)] 在这里，陈独秀精辟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文

化思想，新国体与旧文化绝对不能调和。辛亥革命忽视了这个问题，重视前者，轻视后者，陈独秀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通过失败后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个认识称作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基于上述认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伦理发动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6)] 忠、孝、节的封建秩序，和天赋人权所提倡的人格自主是根本对立的。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学说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表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写出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抨击儒学。在鲁迅的笔下，封建礼教被斥为“吃人”。吴虞也写道：“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7)] 同时，他们还撰文抨击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陈独秀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8)] 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年轻的留美学生胡适和《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0年至1917年，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时师从杜威学习哲

学。1917年7月归国，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这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名著，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启迪心智、开扩思想的作用。

1916年10月，胡适在美国致函陈独秀，倡议改革文体，并提议从八个方面着手改革，而后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这八个问题是："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这个意见，立即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并把它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以他特有的勇猛的性格和笔法，宣布："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9)] 胡适的倡议主要是讨论新文学的形式，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则触及到了新文学的内容。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战斗队伍中，又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军"。

文学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当时被钱玄同斥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对此，陈独秀曾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宣称："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10)] 又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11)] 陈独秀这种坚定的态度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文学革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若干年后，胡适对此仍给予高度评价。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显著最普遍的成果。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

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鲁迅生于1881年9月，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1898年5月，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接受《天演论》的影响。1902年留学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以后开始了文学活动。1909年归国，在杭州任教。民国成立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至北京。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抨击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文学作品，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民主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学。胡适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最初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大多集中在语言的技巧和风格上，如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2)]。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13)]，从而把新文学理论提高了一大步。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而这一点恰恰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本质区别。

把文学革命概括起来看，胡适首倡白话文，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鲁迅率先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周作人则具体而深入地阐述了新文学理论。同时，钱玄同、刘半农等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特别是宣传白话文方面，也有所建树。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都是应该肯定的。

新文化运动既是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最初，陈独秀曾表示不干预时政，不久，随着洪宪帝制的发生，这一运动的政治色彩也随之浓厚起来。陈独秀指出：“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问题。”又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14)] 公开宣称要参预“抉择政体”，要把个人政治改变为“国民政治”，这就公开宣布了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目的。

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活动，都是围绕其政治目的而展开的。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5] 这表明，他们所提倡的新思想，目的都在于"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文学革命同样如此："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6] 可见文学革命也被纳入了"革新政治"的范围。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深知，建立西洋式国家，必须使国民参预政治，打破少数政党垄断政治的局面。他们指出："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因此，强调国民必须参政，"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17]，力图把党派政治改变为国民政治。的确，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在它的旗帜下，集聚了一支中国最进步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个"国民运动"实际上是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还不是真正的国民运动。然而这个进步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身都是非常激进的，他们不承认任何传统的权威和因袭的教条，礼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乃至汉字、中医、京剧等传统文化，都遭到无情的批判。"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正如陈独秀所说：对于一切问题，都要"诉之主观之理性"，否则，"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18]。这个勇猛的、也是简单而绝对的批判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偏向，但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行将到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二　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就任北大校长。针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好同恶异”的劣根性，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9) 这个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思想专制的否定。

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仍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进步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士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陈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瑾】（崔适字怀瑾）、辜汤生（辜鸿铭）、刘申叔（刘师培）、黄季刚（黄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

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对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做法，陈独秀表示反对，认为：“像董仲舒那样的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然。”(20)

陈独秀这封信，提出了学术争鸣的重要意见。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形成万马皆喑的专制局面，直至五四时期才真正撞击了这种封建专制，再度呈现百家争鸣的自由学风。陈独秀反对董仲舒那种强行压制某一学派的做法，主张“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同时，陈独秀也指出，蔡元培的兼收并蓄是“很有分寸”的，并不包括扶乩剑侠、丹田术数等在内。这种既有自由，又有分寸的方针，是正确开展学术争鸣的典范。可以认为，提倡民主自由的思想争论，也是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专制学风的批判。

值得称道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成辜、刘、黄、崔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刘师培也领衔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讲演团、新闻研究会、静坐社、雄辩会等等。各类刊物也很多，著名的有《新潮》、《国民》等，属于保守势力方面的则有《国故》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一扫沉闷、颓废的旧习气，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总的来看，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旧势力对它的攻击还不很激烈，所以，《新青年》还要用“双簧戏”[21]的办法，来引起新旧思潮的争论。然而到1918年底至1919年初，情况就不同了，封建卫道士们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这场谩骂的高潮，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发表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荆生对三人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赶走。小说实际上是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情绪的发泄。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旧势力的挑战。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2]《荆生》小说发表后，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他正告林琴南等人道：“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23]

通过这场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过，怎样才能推翻军

阀的统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仍旧是人们探索中的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后，就以其真理的力量传播于全世界。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中国人王韬随即将有关报道编成《普法战纪》一书，其中用诋毁和偏见的言词，介绍了巴黎公社及其斗争。

还在上个世纪，马克思的名字就出现在中文报刊上。1899年，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该文作者是英国人颉德，译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中国人最早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附带提到马克思："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24] 二十世纪初，由于新刊物增多，不少文章开始谈论马克思。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著作。

这段时期，某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开始谈论马克思及社会主义。1905年初，孙中山在欧洲曾专程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并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25] 同年，朱执信撰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以及《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26]。朱执信的介绍并不准确，而且目的在于防止社会

革命，但这却是中国人第一次较多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

1911年，江亢虎组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党，标榜“社会主义”，鼓吹遗产归公、地税归公等。1912年10月14至16日，孙中山应邀到中国社会党本部，连续三日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说，听众上千。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为人人心中应有之理想，故孕育于数千年以前，然无专门之名词为之表示。”“其后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以三十年之心力，成一社会学名著，曰《资本》者。于资本之来历、性质、流弊、结果，均详述无遗。于是社会主义别开生面，二三十年来，学者渐多。”他又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之福音也，主张平等、博爱，即人道主义之根本也。”[27] 这就是孙中山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本来是无产阶级争取建立的社会制度，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成了它的介绍者。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从事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但帝国主义时代所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使他们一面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又对它的某些方面采取批判态度，孙中山就是典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如何，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主要思潮之一。中国革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了，因此，中国人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并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后逐步形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形成，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增加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向青年们号召道："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28] 然而这新的径路是什么？人们还不清楚。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发生在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把一个崭新的社会现实地摆到了中国革命者面前。鲁迅后来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29]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欢迎和歌颂十月革命的人便逐渐多起来了。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第一篇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伟大革命，"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强调："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30]

随后，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演说和文章。在举国上下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候，李大钊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这场战争。他认为："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他指出：布尔什维克看到了这一点，反对"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主张"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使"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他热烈地欢呼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

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1] 当然，这段时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较为粗浅的，但他已明确表示拥护十月革命，因此，李大钊成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总的来看，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了解还是很有限的，相当多的人对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特别对巴黎和会抱有很大的幻想，然而问题是，不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就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以及中国外交的失败，进步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也就随之而破灭。

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一　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北洋政府自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后，因旧国会已于6月解散，而安福国会又未成立，因此对德奥宣战案一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1918年10月，德国向协约国方面提出停战请求，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10月27日，徐世昌匆忙向众议院提出《对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亲至众议院对该案作了说明，众议院在经过简短辩论后，随即以二百四十四票赞成，全体通过该案[32]。11月5日，参议院以一百零四票赞成，一致通过该案[33]。六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了停战协定，持续五十一个月又两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欧战告终，国内南北战争趋于停顿；欧洲将举行巴黎和会，上海将召集南北和会；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徐世昌的罢战退兵命令，这一切似乎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片光明，人们对于战后时局充满着乐观估计。

威尔逊在1918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的国际关

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国与国之间不得订立任何秘密协定，外交活动必须公开，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同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威尔逊又说："此次战争，非国际政客之战，系人民之战。将来议和，应以无偏倚之公道为原则。"他为战后议和提出五条大纲，第一条便是"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34]。

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引起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反响，钱能训在众议院演说指出："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密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35] 威尔逊的言论，甚至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人士也为之迷惑，陈独秀就公开称其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总之，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随着战争结束，举国上下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庆贺战胜的热潮。

徐世昌在11月16日的命令中声称："我协商国士兵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36] 钱能训在众议院的演讲中也颇为欣慰地说："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武力、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37] 11月20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分别致电美、英、法、意、日等国国会，祝贺胜利。国务院于23日发出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38] 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盛大阅兵式，美、英、法、意、日等国士兵参加受阅，中国士兵以段祺瑞为总指挥。同时，内务部发出训令，要求各类宗教团体均于12月1日按各自教规举行祈祷仪式。训令说："欧战告终，各协约国教堂皆行祈祷之礼，吾国对德宣战，与各协约国立于同一地位，各省区宗教团体届期亦应一律举行祈祷。"[39] 从始至终宣而不战的北洋政府，厚颜地分享着"战胜国"的喜悦。

同样，各界人士也普遍认为，欧战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蔡元培的理论依据是，战争的爆发，是由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所导致，而今后取而代之的是互助论的进化思想。他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40)] 这在当时是一种极普遍的思想。

在一片欢呼声中，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似乎成了一位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一次嚣张起来。1919年1月18日，众议院有人提出《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案》，提案人声言：“马厂誓师，推倒复辟，实可为三次恢复共和之纪念日。如无此日，试问中华民国何能存在于今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期，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倡义之期，均已定为纪念日，马厂誓师，关系尤为重大，岂可即不定为纪念日乎？”湖南籍议员罗正纬反对，认为民国纪念日不宜过多。有人反驳道：“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与黎前总统武昌起义事迹相同……当然应定为纪念日。”又有人说：“至此次复辟事起，首都陷落，若不有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国体几将变更，是其关系之重大，无异于武昌起义、云南倡义之事。”[(41)] 当日，众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该案。2月7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之。”[(42)] 这样，便出现了三个民国纪念日并存的现象。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中心。人们既然把中国摆到了战胜国的地位上，当然就指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指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改变八十年来受屈

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司法部曾急电各省，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意见，国会中也有人提出收回山东权利的议案。各界人士纷纷围绕巴黎和会献计献策，甚至连参预张勋复辟的康有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写了一封长函，提出中国应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

此外，被排挤下台的梁启超等研究系政客，则决定亲赴巴黎，协助中国代表团。在宪法研究会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梁启超表明此行的目的在于："欧战和议关系于吾国利害者至巨，由国民分子的义务而言，则凡有利于吾国而为鄙人力之所能逮者，必当竭诚有所贡献。"[43]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一行由上海登舟赴欧，同行者有张君劢、蒋方震、丁文江等。行前，他们"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44]。然而不久在巴黎，他们又一次卷入到政治漩涡中。

二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为处理巴黎和会所带来的日益繁重的外交事务，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和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咨询及建议，并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该委员会设在中南海集灵囿，其成员均为政界知名人士，计有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张国淦、周树模、周自齐、朱启钤、沈瑞麟、靳云鹏、陆宗舆、王宠惠、高而谦、陈箓、张志潭、孙宝琦，后又加派了王揖唐、刘式训、许士熊三人。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事务员有叶景莘、梁敬㦸等四人。以上人员多为挂名，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汪、林二人。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个为研究系所掌握的机构。

徐世昌在外交委员会成立时发表演说，认为：巴黎和会的召开，"将确定国际间将来之一切局面，解除国际间一切易生危险之要

点，是国际间将开一新纪元”。“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之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诸君子研究有素，阅历较深，务希各竭心力，为我增益”[45]。

在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威尔逊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倡议，而且舆论界对国际联盟有一种奇特的理解。近代大同学说倡导者康有为，立即将国际联盟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认为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世界大同的到来。为响应威尔逊这一建议，1919年2月9日，北京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同志会”，梁启超任理事长，汪大燮为代理理事长，理事有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李盛铎、王揖唐等，林长民为总务干事，胡适等任干事。显然，这又是一个以研究系分子为主体的团体。该会在发起宣言中声称：“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46] 人们喋喋不休地论证着国际联盟的设想渊源于大同学说，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古代圣哲是世界文明和人类进化的先知，其实这恰恰表明中国上层人士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的无知。

为了在对外方针上取得较自由的发言权，2月16日，张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林长民等七人任理事。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中国向无外交政策，亦无所谓国民外交作用，每度交涉发生，政府临事仓皇，不知如何应付……吾人追源祸始，误于政府之无外交政策者半，误于国民不解国民外交作用者亦半。……同人不敏，爰设斯会，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47] 该协会日后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政团。

上面几个官方和非官方机构，都是针对巴黎和会的召开而设立的，又均由研究系控制。随着欧战结束，在内政上失意的研究系，却立即在外交上活跃起来，他们将围绕外交问题而展开自己的政治活动。

外交总长陆徵祥是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1918年12月1日，陆徵祥偕其夫人乘火车启程离京，外交部暂由次长陈箓负责。陆徵祥的行程是，从东北经朝鲜至日本，再由美国赴法。由于当时巴黎和会还在筹备中，列强对于各国全权代表的名额尚未确定，因此中国代表的名单也未公布，但国务会议已内定由陆徵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此时尚未任命）五人为中国全权委员，当时一般称作“专使”。

陆徵祥行前，徐世昌曾召集会议讨论方针。段祺瑞发言，认为此次参战，宣布过迟，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取消其在中国的权益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以及修订海关税则；至于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声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当时政府的态度是“随机应付，没有确定”[48]。后来由外交委员会拟出一个方案，包括破除势力范围，统一管理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该方案后由国务院电致中国代表团。由此可见，政府在讨论和拟订方案时，山东问题并不占重要地位，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12月9日，陆徵祥在驻日公使章宗祥陪同下，在东京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会谈中，“内田颇主张两国步调一致……至青岛问题，内田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49]。对此，陆徵祥没有明确表态。日方提出青岛交还手续问题，其实质是企图继续保持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强调“步调一致”，其实质是防止英美插手中国问题而由日本来包办，并约束中国方面的行动。总之，这次会谈一开始就给山东问题的解决投下了阴影。陆徵祥一行，于12月10日离日赴美。

顾维钧于1918年12月10日抵达巴黎。顾维钧，字少川，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归国，任袁世凯和外交部秘书。1915年出使华盛顿，任驻美公使。在欧战期间，他密切关注着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曾在一份致政府的密电中指出，日本已构成对

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法已没有力量顾及其远东利益，“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他环顾中国的国际环境，认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因此他力主中国应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他预料，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因此，“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50)]。显然，还在战争期间，顾维钧已确立了战后“赖美为助”的基本思想，他此次奉命出使巴黎，正是抱着这一基本思想前往参加和会的。

驻英公使施肇基晚顾维钧一日抵巴黎。施肇基，字植之，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文案。民国成立后，曾任唐绍仪内阁的交通总长，1914年出使伦敦，任驻英公使。

王正廷于1919年初到达巴黎。王正廷，字儒堂，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后，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民国二年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后，他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时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他奉广东军政府之命前往美国办理外交事务，在陆徵祥逗留美国期间，为向国际社会体现国内南北一致，陆和王私下接洽后，王被陆接纳为中国代表，并由王取代驻法公使胡惟德的代表职位。

魏宸组于1919年1月5日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他于清末留学法国，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后任唐绍仪内阁秘书长。他较早参预战后议和的准备工作，且擅长起草各类电文，因此陆徵祥选择他作为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以及参事严鹤龄等，代表团秘书长是驻法使馆参赞岳昭燏。以上成员只限于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从代表团的

整个组成阵容看，确是集中了清末民初以来一代外交人才，他们大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等的历史关系，显然“亲日派”不占优势。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云集巴黎，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张静江、徐谦等；研究系方面的梁启超、蒋方震、张君劢、丁文江等；还有旧交通系首领叶恭绰等，叶因不满于中日山东换文，愤而辞职，出游巴黎，经中国代表团聘为顾问[51]。他们都是来窥探和会进展情况的，都企图对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施加各自的政治影响，不论他们的派系与政见如何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都是皖系的政敌。

对于巴黎和会这样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广东军政府是不甘心于被排斥在外的，必须争取参加和会，以向国际社会体现它的存在，争取列强对它的合法地位的承认。

1918年12月中旬，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致电南北和会主要斡旋者李纯，建议巴黎和会“由南北会同遣派代表，即为适当。例如北派若干人，南亦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员，北方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同时，南方亦一律正式任命发表”。他认为：“鄙意此项办法，原为求形式上统一之唯一良法，仍乞我公加电促成。”[52] 岑春煊提议南北政府分别任命代表，是要表明军政府的独立性，表示北方无权单方面任命代表。

为了造成一种南北和解的气氛，为即将召开的上海南北和会铺平道路，北洋政府决定接纳南方人士参加中国代表团，此时，陆徵祥已在美国和王正廷进行接洽。但是，由南北政府双方任命代表的建议，北京方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无疑向世界表明，北洋政府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李纯也致电政府表示：“岑电调停之策，拟双方正式任命，殊属不妥。”[53] 然而就在函电交驰之际，军政府单方面任命了它的五位代表，他们是：大使伍廷芳、孙中山，特使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54]。军政府这一举动，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孙中山致函谢持表示不能担任该职，他说："南方派遣特使，未得国际承认，断然不能代表发言。且文亦不能受北方伪政府所委任，此事当然无从进行。若明知其不能代表、不能发言，而贸然前往，亦甚无谓。"[55] 此外，伍廷芳年事已高，本不便远赴巴黎，而北方的王宠惠当然也不会接受南方这一任命。但伍朝枢乐意受命，他于1919年3月抵法，他的到来及其身份问题，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一场风波。

伍朝枢最初提议由北洋政府加派他为全权代表，理由是葡萄牙与中国地位相同，而全权代表却有六名。但北洋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尔后伍朝枢又提议，在原有的五名代表中抽换一人，由他顶替，但再次遭到拒绝。最后，为敷衍南方，北洋政府任命伍朝枢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但为伍拒绝。这样，伍朝枢实际上始终未能参加代表团，南方代表仍为王正廷一人。

三　巴黎和会开幕与山东问题的提出

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大厅举行开幕式，陆徵祥和王正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当时中国方面多称为会长或议长），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四人为副主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二名代表组成，称作十人会议或五国会议。他们是：美国的威尔逊和蓝辛，英国的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法国的克列孟梭和外长毕勋，意大利的奥兰多和外交大臣索尼诺，日本的牧野伸显男爵和新田子爵。

会议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各为五名代表，巴西等国三名，中国二名，而古巴等国则仅一名。由于中国内定的五名代表均已到达巴黎，不便安排两名，因此陆徵祥仍旧将五名代表上报和会，但每次会议仅由其中两名出席。其他弱小国家大多也采取这一办法。中国代表排列顺序是：陆、王、施、顾、魏。

在中国代表中，较早注视并深入研究过山东问题的，是那位名气不大、资历甚浅的青年外交官顾维钧。还在战争期间，顾就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研究小组，着重研究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主权等问题[56]。1919年1月23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三次会议，陆徵祥简要报告了中日山东换文的情况。他说：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案，“系去年经阁议议决向日本借款建筑，于九月间签定预备合同。其内容我国政府准日本发行公债，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当有交换条件，日本允将山东军队调回（现在移驻青岛），民政署撤废，警察归中国自办”，等等。在这里，陆徵祥讲得很清楚，政府是以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的路权作为日本部分撤军的“交换条件”。铁路合同既然是作为“交换条件”而提出，那么也就不是一项孤立的经济合同，而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北洋政府默认了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否则日本决不会自行撤兵的。显然，铁路合同和日本撤军这两项于1918年9月24日同一天签订和商订的文件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曹汝霖等人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均回避了这两项文件之间的联系这一关键问题，孤立地谈论两项协定。

在陆徵祥发言后，顾维钧当即发言说：山东问题、铁路问题以及中日间许多条约，“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57]。顾维钧的发言，实际上是否认了中日政府关于山东的各项换文，统统称之为“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因此必须在巴黎和会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和会开幕之初，五强国在如何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在1月27日上午的十人会议上，临时改议日本代表提出的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要求，美国代表表示应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当日下午出席十人会议。

这天中午，中国代表们同往常一样，在顾维钧房间内共进工作午餐，只是陆徵祥称病卧床没有参加。1时许，顾维钧忽然接到美国远

东司长密告，下午3时中国代表将出席十人会议说明山东问题。据顾维钧回忆，“这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58]。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议，时间紧迫，责任重大，由于陆徵祥称病卧床，已不能赴会，根据代表席次顺序，顾维钧提议王、施二人出席，施则推顾，王又推顾发言，最后决定，王、顾出席，而由顾代表中国发言。

当王、顾二人赶到会场时，十人会议成员均已就座。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首先发言，提出：“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所享有之各种权利”，“要求德国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59]。而对于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60]。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中国方面尚不及准备。顾维钧接着发言说：“此项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深望联邦各国俟中国方面之意见表示后，再行审查定议。”[61] 于是十人会议决定，翌日再度听取中国代表发言。

势态骤变，中国代表团陷入了困境。陆徵祥途经日本时，内田外相提出的是山东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就在数日之前，内田于1月21日在日本众议院演讲外交问题时还说：“即如胶州湾租借地，帝国政府从德国获得自由处分权时，自当遵行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山东中日条约关系交换公文条项，将该租借地还付中国。”[62] 而现在，日本代表发言却是“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

27日晚，陆徵祥与顾维钧约请美国远东司长密商对策，美方极为注意胶济铁路问题，一再询问中日间有无秘密协定，陆徵祥只得承认。美方表示惋惜，说：“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63] 表示美方无力协助。

28日，王、顾二人再度出席十人会议。山东问题的突然提出与辩论，是中日两国间一场遭遇战，顾维钧在没有充分时间作准备的情况下，果断地采取了一项对策，即撇开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束缚，而从山

东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阐述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从而冲破密约的束缚，争取列强的同情。他沉着镇定，不亢不卑，侃侃陈词："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也……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竟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他感谢日本驱逐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但又指出：不能以"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最后，顾维钧坚定地表示："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接着，牧野发言，以"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为理由，企图让各国承认青岛已为日本"领属"的既成事实。牧野又说：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也"。他是在向其他四强示意，中日政府对于山东问题已有协定，不必插手这一问题。然而威尔逊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他紧接着说："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意思是要求公布中日密约，因为他的十四条宣言，第一条就是反对签订密约。为此，牧野答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顾维钧深知，要借助欧美力量破除密约，首先必须公布密约，他当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中国政府极愿提出。"于是，会议主席克列孟梭决定："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这时，牧野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先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维钧针锋相对，立即表示对牧野这一姿态"尤为喜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他着重指出："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

国矣。”顾维钧最后强调：德国没有将山东“转交他国之权”[64]。辩论至此结束。

顾维钧的发言，立即引起热烈反响，美国方面威尔逊与蓝辛，英国方面劳合—乔治与贝尔福，相继走上前去，与顾维钧握手道贺，克列孟梭也声言道贺，意大利的奥兰多后来向陆徵祥表示，对顾维钧的发言“极赞美”。据顾维钧回忆，事后他还收到过徐世昌、钱能训及外交部的贺电。辩论获得成功。

顾维钧的发言，起到了以下四个作用：第一，迫使日本代表在交还山东问题上，由“一字不提”到表示愿意交还，只是在交还手续上继续纠缠。第二，迫使中日政府不得不考虑公布各项密约。第三，为中国争取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以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山东问题说帖，以及国内的广大舆论，大都以这一发言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第四，最重要的是，这场辩论使山东问题顿时成为中国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引起举国关注。山东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斗争的焦点，中国在出席和会之初所准备的其他议案，现在统统让位于本不占重要地位的山东问题。

顾维钧这次发言，是中国代表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最重要的发言，一度赢得西方列强的同情，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他的发言叙述清晰，论证有力，措词得体，内容涉及山东的历史、现状、国防、地理、交通、经济、文化、宗教、俗尚等方面，表现出他的才干和胆略。顾氏本人也因之一举成名，成为民国一代著名外交家。这一发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维护了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也是少有的一次机智勇敢的表现。

顾维钧的发言，使日本政府大出所料，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1月31日，小幡要求拜访外交部次长陈箓，因当日为中国旧历除夕，外交部放假，陈箓未见。后因小幡多次催问，陈箓只得于2月2日会见了小幡。

小幡首先说："顾氏在会议席上并未与日本代表接洽，遽告各国新闻记者谓：关于山东之各项问题，中日两方面所订之秘密文件，无论何时可以发表。……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陈箓答称："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但小幡仍不罢休，继续对顾维钧进行指责说："今顾氏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可以发表，日本政府殊不愉快。"陈箓以"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指顾、王）等言及此事"作了解释，小幡转而说：顾维钧指责二十一条为强迫签订，"抑知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日约定关于合办胶济铁路及该铁路之延长，何尝非出中国之自由意思？……乃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显然，日方已看出顾维钧此举是企图以欧美势力破除中日密约，因此，小幡对陈箓表示："总之，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65) 所谓英国方面不可靠，是暗示英日双方已有密约，英国不会支持中国。

小幡与陈箓会谈一事，并未就此了结，而是立即引起舆论界强烈反响，特别是英美在华舆论机关纷纷报道此事，并且大肆渲染，抨击日本。社会上且谣传小幡曾要求撤换顾、王二人。在国内外舆论抨击下，日方为避免事态扩大，请求中国外交部将会谈情况公之于众。为此，外交部于2月9日发表正式声明，否认撤换顾、王二人，并表示："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66)

这时，公布中日密约问题，成为中外舆论和各界人士关注的中心。2月5日，和平期成会主席熊希龄密电唐绍仪，提议："弟拟请双方各代表，目前将内政□□（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指陆徵祥）等所请，概将密

约宣布。”[67] 同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68] 2月8日，上海的南北和会尚未开幕，南北两位总代表即联名致电巴黎王、顾二人说：“闻在和会力争主权，至理名言，举国嘉许。……国土存亡，关系甚大，除电致东海一致主张外，望勿稍瞻徇，以竟全功，四万万国民自能为君等后盾也。”[69]

在各方面催促下，政府同意公布密约。2月23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欧会主张国际公开，我政府亦决将各项密约提出大会，此项军事协定条件业经电达陆使，属其相机提出。”[70] 随后，政府陆续向南北和会提交了山东换文以及各项军事协定等密约。后来又经徐世昌和外交部批准，自3月14日起，向全国公布中日密约。是日，外交部将各项密约的印刷品交付各报馆陆续公布。

公布中日密约，无疑是对皖系势力的一次政治打击。这样，皖系势力和徐世昌、钱能训政府的冲突势必日益加剧。

自1月28日十人会议上辩论之后，中国代表团着手起草了山东问题说帖，并将中日密约附于说帖之后，准备一并提交和会。说帖由顾维钧执笔起草，2月11日，代表团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初稿，在13日的第十六次会议上，代表团通过了说帖，同时决定先将说帖及密约分送美国、日本等国。

中国代表团之所以急于提出说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倚为靠山的威尔逊将于2月中旬暂时离法返国，因此必须赶在威尔逊离法之前提出说帖，以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中国代表团在说帖正式提交大会之前，“将说帖等件先密交美总统一份，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颇为满意”[71]。

但是，当中国方面按照惯例将准备提交和会的密约送往日方时，却遇到麻烦。2月15日上午，中方参事严鹤龄奉命前往日本代表团送

交密约，日方由驻意大利大使伊集院、驻英大使珍田先后接见。日方问：这些文件“贵处系定今日送会，抑明日送会？”严答“不知”。因密约已译成英文，日方提出，要将英文密约和日文原件校对后，再答复中方，并说：“中日两国前有约定，凡交会文件，必由两国全权委员先行接洽。”严答“不知”。日方说：“阁下不知，陆总长必知。”[72] 意思也就是说，必须由日方答复并同意后，中方才能提交和会。

严鹤龄回来报告后，在当天中午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第十八次会议上，针对日方一再提出中日双方遇事先予接洽一事，顾维钧向陆徵祥问道：“究竟政府有无与日本约定之事？”“前月英、法报上，载有总长过日本时，曾与日本政府接洽，对于和会之事，中日两国一致进行。”对此，陆徵祥否认道：“过日本时，与彼政府往来，全属礼节上之周旋，并无何种接洽。”顾维钧接着说：密约“当初送日本之意，本不过为手续上之圆到，并不待其答复。……所谓接洽二字，亦有界限，将文件送彼阅看，即可谓之接洽，不得谓接洽二字须得其同意也”[73]。最后，陆徵祥决定：将山东问题说帖及中日密约，当日下午5点由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送交和会。

然而就在当日下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派其秘书官吉田茂[74]来到中国代表团，先由严鹤龄会见。吉田茂重申：“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企图阻拦中方提交密约。随后，顾维钧出面会见吉田茂，吉田茂说：“当日贵全权向五国会议陈述山东问题，若能于未陈述之前，向牧野男爵预为接洽，岂不甚佳？”责问顾维钧为何不“预为接洽”。而顾维钧则接过预先接洽这一话题，机智地反问道：“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极不知悉，待临时会议电话通知赴会，始知牧野男爵已将此问题提出矣……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75] 言外之意是，日方口口声声说两国遇事先予接洽，而牧野在提出对山东的要求之前，为何不与中国方面接洽？吉田茂无言以对。这样，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及有关中日密约终于冲破日方的阻拦，于当日提交和

会。

该说帖全称是《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帖》，并附各项密约、条约、外交文书十九件。这是中国向巴黎和会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项文件。说帖再次强调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同时，为了赢得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说帖特意将山东问题和西方各国在华利益联系起来，提出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76]的基本方针，企图以此打破日本独霸山东的局面。“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旧中国这个有着多种外国势力并存的半殖民地的外交特征，这一政策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够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如清末的“三国干涉还辽”即是如此。但是，这一政策的产生与实施，毕竟是无权掌握国家命运的表现，因此，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列强间的斗争与妥协。现在，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又一次采用了这一政策，山东的命运将如何呢？

中国代表团于2月15日提出山东问题说帖之后，又陆续向和会提出了三个主要说帖。3月8日，提出对德、奥要求条件，其中对德提出九项要求，第一项即表示：“中国政府愿助长国际贸易，并推行各国在山东及中国他处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立意于收回胶州租借地之后，立即开放青岛及山东省内他处合宜地方，俾外人贸易居住。”[77]可见该文件仍旧采取将各国势力引入山东的办法来排除日本势力。此外，还提出了归还德国在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要求，等等。

4月15日，代表团提出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因此，“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之条约。”由于巴黎和会原则上只讨论战争期间的问题，为使和会有充分根据研究这一问题，说帖强调说：“此条约之全部，自直接发生于战争，研究此案，自当为和会职权内之事。且和会亦有修订其条文之资格也。”说帖还指出：1917年2、3月间日本和英、法相继签订密约，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意、俄两国也承认这一

点。但这些均发生在中国宣战之前，而中国宣战之后的情况，“自与协约国允诺日本之时绝对改变，所处地位亦完全不同。有此理由，则英、法、意三国更无所用其联合赞许日本关于中国事务之要求，而其种种诺言，自当视为破毁矣”[78]。这就是说，中国认为英日等密约，应随着中国对德宣战而作废。

在此之后，中国代表团还向巴黎和会提出了一项重要文件：《中国希望条件》。该文件的实质，是希望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文件在绪言中指出：“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胪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庶障碍消除，而发展得遂其自由，幸甚。”不难看出，该文件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使中国能够独立地自由地发展。文件提出七项希望：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然而提出这七项希望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是对战后建立“新世界”的幻想。正如文件在结论中所说：中国方面知道所提希望条件，并非发生于战争期间，“然和平会议之目的，固不仅与敌国订立和约而已，亦将建设新世界，而以公道平等、尊敬主权为基础”[79]。这就是中国方面提出希望条件的全部依据。但是，不是自己去挣脱锁链，而是指望系链者帮助取下锁链，其结果只能是彻底的失败。

5月14日，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复函陆徵祥，对于中国废除“二十一条”和希望条件两项说帖答复如下：“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声明：再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80]，拒绝予以讨论。

四　山东问题的交涉和失败

3月中旬，威尔逊返回巴黎。这时，五强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

激烈，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性质日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各弱小国家的民族利益，统统成为列强斗争中的交易品而从属于列强的政治需要。中国的山东问题，于是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砝码，被强迫放到了列强间权衡利益的天平上。

陆徵祥预感到情况不妙，他在致北京政府的密电中忧心忡忡地说："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指美国）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陆徵祥从种种迹象中看出一个道理："总之，强权利己之见，决非公理正义所能摇。"[(81)] 他能够看到这一点，表明中国代表开始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慢慢地清醒起来。

4月8日，陆徵祥会晤了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再次说明，"中国欲直接交还收回胶澳，并非含有拒绝日本，屏诸门外之意，不过愿于收回后实行开放门户主义，使欧美各国共享其益，不为日本一国独占。"[(82)] 他仍企图以维护欧美各国在山东的利益为招牌，争取列强支持中国的立场。然而用利益均沾来实施"以夷制夷"的方针，在巴黎和会上却难以奏效，因为列强间有更大的利益要交换，比较起来，山东问题是次要的。在1917年2月订立的英日密约中，英国承认日本继承山东以及赤道以北各群岛的德国权利，而日本则回报以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小幡才得意地对陈箓说：中国代表想假借外国势力以抑压日本，但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并不可靠。

4月16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排斥在外，未能参加。美国国务卿蓝辛提出一个新方案，内容是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先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俟山东开作商埠后，再归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起而抗议，认为山东问题中日政府已有协定，应由日本转交中国。对此，英、法、意三国代表均沉默不语，蓝辛方案未能通过。17日，在对德和约起草会议上，美国方面转而提议将山东问题由巴黎和会暂

管改为由五强国处置，又遭日本反对。美方声称：“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一国独为处置。”结果，该方案经提交五国外长会议，将该条通过[83]。这样，山东问题初步定为暂由五大国共管，但日本代表仍表示反对。显然，美国先后提出由和会及五国暂管山东，都是旨在反对日本独霸山东，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均沾的方案。考虑到直接归还山东事实上已难以办到，北京政府复电陆徵祥，同意在山东必须交还中国的前提下，暂由五国共管。

但就在此时，意大利提出的对阜姆的领土要求为各大国拒绝，于是意大利首相宣布退出巴黎和会。意大利这一举动给巴黎和会造成一次小小的危机，同时却给日本带来良机，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立即强硬起来，并向和会施加压力，声称如不答应其要求，将随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只得重新权衡利弊，为使和会免遭破产，决定牺牲中国，满足日本要求。向为中国倚为靠山的威尔逊突然改变立场，意味着世界列强将采取一致立场对付中国，中国将单独承受东西方帝国主义联合的压力，这无疑使山东问题陷入了更加困难、复杂、严峻的境地。

4月22日，陆徵祥、顾维钧应邀出席五国会议，这是继1月27日、28日之后，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最高会议。这时，日本提出在对德和约草约中，将山东问题单列一条，目的是要把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分列出来，使之不从属于中国问题范围。威尔逊首先发言，他一改同情中国的论调，认为：“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威尔逊在十四条宣言中，头一条即反对密约，现在却提出“维护条约之神圣”，而他要维护的这些“神圣”条约，大多是密约。顾维钧起而解释说：1915年条约为强迫所订，1918年条约是根据前约而来。这个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威尔逊反问道：“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

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84] 顾维钧只得含糊其词，因为他无法说出段祺瑞政府为借二千万日金而与日本“欣然”订约的实情。英国首相接着发言，他提出两个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一是按中日条约办理，二是按对德和约规定，由德国移交日本，要求中国从中选择一项。顾维钧表示反对。自这次会议后，山东问题的交涉急转直下。

4月24日，意大利首相离法返国。列强为使和会免遭破产，急于达成协议，以尽快完成对德和约的起草工作，互相作了一些让步，同时进一步排斥各弱小国利益，一切均由三国会议裁决（意大利退出和会后，五国会议改为英、美、法三国会议）。

4月29日，三国会议在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方面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因为日本方面多次口头表示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因此蓝辛提出应以文字声明作为保证。日本代表珍田发言说：“欲得文据，是明明对于日本为无信用。”蓝辛说：“确系不敢相信。”珍田说：“此与日本国家体面有关。”蓝辛说：“国际予一文据亦寻常事，何与体面有关？”最后，珍田仍坚持不允而止[85]。自意大利首相退会后，日本方面有恃无恐，得寸进尺，而美国则是步步退让，拆除了它的全部防线。

4月30日，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决定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即有名的第一五六、第一五七、第一五八条[86]，规定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与日本。由于日本代表的反对，三条款中没有写上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

自山东问题交涉发生后，中国始而提出直接归还，继而退为五国共管；美国则最初提议和会接管，次而提出五国处置，最后仅要求日本以文字声明将来交还山东。但是，所有的妥协方案均为日本拒绝，

山东问题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愿而做出最终裁决。

4月30日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当日即探听到会议消息，并立即报告北京政府。但和会方面秘而不宣，没有将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立即公布。

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施肇基、顾维钧，通告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贝尔福说："查山东问题，议决办法大致不外两端，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87) 将经济权和政治权分别而论，是不能成立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对此评论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政治控制名义的政治控制。

是日，中国代表团向三国会议提出强烈抗议："查德人在山东权利，原于一八九七年之侵暴行为，今如是决定，是以暴易暴。日本在满蒙势力已极重大，若再益以山东半岛，则北京咽喉之渤海湾完全为日本所扼，而政治中心之首都，悉为日本势力所包围矣。""三国会议欲维持和会不生破裂，竟以中国为殉，是中国运命反因参加联合国之故而为联合国之利益交换品。此种不信不义之处置，实属万难缄默。"(88)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指出："总之，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谨合呈大总统，请即开去全权。"(89) 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

经过长时间激烈的讨价还价，对德和约草约总算起草完毕，列强决定5月7日将草约交付德国代表，而仅仅于前一日，即5月6日才正式公布于五强国之外的其他协约国成员。5月6日，陆徵祥与王正廷出席协约国大会，在看到对德和约全部文本后，陆徵祥当即发言抗议："中国代表团对于三国会议所拟关于胶州及山东问题之办法，不得不表示其深切之失望之情。""现中国代表团业已向三国会议提有正

式之抗议，反对其所拟之办法，深望得以修正。倘竟不能如愿，则自今以往，本代表团对于上述条款，实有不能不保留之义务。”[90] 会议主席克列孟梭同意将这一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至此，中国代表正式提出对山东条款的保留意见。

5月7日，对德和约草约交付德国代表，并允许德国方面于十五日内可要求和会对草约作出解释。对此，陆徵祥致电政府说：“查此次和会办法，种种情形，实堪愤懑。……且对于敌国尚有十五天限期，准其质疑问难，而对五国外之各国，定稿以前秘不肯以示人，定稿后并无时期可以讨论，其对我情形，实为可慨。”[91] 这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充分暴露。

对德和约草约向各国公布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以失败而告一阶段。山东交与日本的条款已难以改变，但中国代表并不甘心就此签字，于是提出一个新方案，即和约可以签字，但必须加入中国对山东问题不能承认的保留意见，即“保留签字”。此后，中国代表团围绕“保留签字”这一方案，展开了困难的、长时间的交涉。

中国代表们所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导致国内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

一　各界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当时身居巴黎的梁启超，对于山东交涉的种种内情自然是了解的，他一面在巴黎撰文向国际舆论呼吁，同时将各种情况迅速通报国内。3月9日，梁启超在巴黎发表文章，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借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92] 3月11日，梁启超又致电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指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查自日本占据

胶州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93] 这就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了皖系军阀。

与此同时，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联名致电中国代表，表示：“我等已再电和会，要求青岛等一切权利直接交还，及取消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铁道各密约，请公等尽力主持。倘公等不能尽此职，请勿返国。”[94] 梁启超与国民外交协会之间，函电交驰，内外呼应，颇为引人注目。

随着山东交涉的步步失败，国内各群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或召开集会，向巴黎和会表示抗议。同时，随着外交失败原因的披露，人们立即将矛头指向签订各项中日密约的皖系政府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诸人。章宗祥于4月间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曾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中掷去”[95]。上海的几个群众团体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96] 4月20日，山东群众十万人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大会在致中国代表团的通电中表示：“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誓死抗争，义不反顾。”[97] 上述情况表明，各界群众正在自觉地紧张地动员起来。

在朝野各界人士中，研究系显得最为活跃，最为敏感。他们充分利用其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身份以及手中的舆论工具《晨报》，与巴黎的梁启超等人一道，不断报道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

4月30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启超24日来电报告：“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98] 梁氏此电有两个意思，一是督促国民外交协会将山东问题

已经失败的最新消息公之于众，二是公开呼吁拒签对德和约。林长民接电后，立即起草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由外交委员会事务员梁敬錞 交晨报馆发表。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以“代论”的形式，用大号字体登载了林长民署名的这篇文章。林长民在文中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99] 林长民此文不长，但文字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以他特有的身份，透露山东问题确实失败的消息，进而指出失败的原因为中日各项条约，呼吁四万万同胞起而抗争。该文发表后，向各界敲响了警钟，立即引起北京朝野人士极大关注。

5月2日下午，众议院在王揖唐主持下召开会议。安福干将光云锦发言说：“青岛问题各报登载有五国共同管理之说，宜电致和平会议时，加入直接交还中国字样，方保无虞。”[100] 王揖唐随即将这一动议付诸表决，多数赞成通过。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做出几条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我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当夜，北京大学校园内一片沸腾，在法科礼堂聚集着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共同商讨行动方案。会议气氛异常激昂，有一学生当众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最后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每周评论》后来评论道：“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更于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101] 这两个会议，一个以上层政界人士为主体，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这两部分力量都准备对山东问题公开采取行动，一页激动人心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

了。

二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和各方面的评论

5月4日，因章宗祥刚刚回国，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投箸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1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三千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102)

爱国青年在天安门聚会的消息，立即报告到正在与曹、陆、章等人欢宴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大约在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一同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察厅估计到学生将来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决定到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据《每周评论》记载，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后，“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103) 因当天是星期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内容是：“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

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104] 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进发。

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大门紧闭。据曹汝霖回忆：这时，“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字）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学生们到处寻找曹汝霖，曹躲在箱子间内甚至可以听到学生与其妾苏佩秋的谈话。曹汝霖接着回忆说：“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105] 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事不妙，立即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大众奋起发动的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开端。陈独秀在五四当天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他在文中指出：“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06] 他提醒人们这两个会议实质都是“分赃”，不能指望这两个会议给人民带来幸福与和平，必须抛弃对帝国主义和南北军阀的幻想，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己起来担负救国责任。五四运动正是人民群众自己站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展开的示威行动。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历史性的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纷纷撰文、通电，对内外时局发表评论，重新认识欧战后的世界与中国。

5月9日，《申报》发表主笔陈冷血所写题为《图穷而匕首见》的时评，其中说："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会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107] 严峻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不能依靠帝国主义解决问题，"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成"，而必须"自谋""自助"。这个论点，同巴黎和会召开前的舆论相比，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国民外交协会原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耻纪念会，因五四运动刚发生，政府深恐再度引起动乱，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外交协会当天就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长篇宣言："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同时，宣言将矛头直指签署山东换文的皖系军阀："因此换文曾借日本金圆二千万，此则应由当局者设法清还，与我国家何与，与我国民全体又何与也？"最后，宣言责问西方列强说："公等既日以正义人道标榜于众，今乃许野心之国犹为侵略之举动，然则巴黎之和平会议，直无正义可言耳。威尔逊之种种宣言，直当视同取消耳。……若仍以野蛮之举动，而偏悬文明之招牌，竟容受此横暴侵凌之所为，则殊有损文明国家之声价，正义和会之威严，使人觉所谓正义云者，人道云者，其实际不过尔尔，则人类对于大同之理想，将绝望于今后之世界。"[108] 该宣言从列强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中，看出"大同"理想的破灭，看出巴黎和会"直无正义可言"，应该说，这反映出中国某些上层人士也在一定意义上有所觉醒。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许多言论，是中华民族政治觉醒的集中体现。《每周评论》特辟山东问题专

栏，李大钊在该栏撰文指出："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109] 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曾经是最动听的言论，现在，他以自己的行动揭穿了自己的谎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更怒斥道："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110] 在他们的推动下，"五四"火种广泛而深入地燃烧起来。

综上所述，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深刻地教训了中国各阶层人士，从陆徵祥到陈独秀，都从不同的认识角度，程度不等地否定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爱国运动，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最广泛的政治基础，爱国运动往往能够赢得最广泛的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曾经发动并领导过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于5月6日迅速表态支持学生。他指出："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他接着说："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对于学生此举，康有为高度评价道："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最后，他呼吁："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111] 康有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北宋末年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抗金的爱国行动的继续，或者看作是"公车上书"的继续，这说明他对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不理解的。康有为尽管在政治上已堕落为保皇党人，但仍旧执著地保持着青

年时代“公车上书”时那样的救国热忱，这在他晚年的历史上，还是值得称道的一页。

与广大进步舆论相反，皖系势力则充分调动其舆论机关，对五四运动大肆攻击。5月5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发表一篇题为《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大捣乱》的评论文章，公开为曹、章二人辩护，并哀叹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为之太息不已。”文章还指出：“当兹社会主义思想输入，民情易于激动之际，一任血气未定之青年为此无意识之纷扰，教育当局实不能不负相当之责任也。呜呼！曹、章所受之损害固为无妄之灾，而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吾书至此，不觉悲从中来也。”(112)

《公言报》这篇评论，反映出统治当局对于五四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们所哀叹的，并不只是曹、章二人的焚屋被殴之祸，而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导致“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他们凭着统治者所特有的政治嗅觉，察觉到这次事件非同寻常，而是“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此外，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113) 梁漱溟的论点，试图脱离五四运动爆发的政治背景，孤立地从法纪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实质上站到了人民运动的对立面，说出了反动当局不便说、不敢说的话。这篇文章当时就遭到进步舆论的猛烈抨击，是理所当然的。

三　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在5月4日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因各方面出面保释，于5月7日上午全部释放。这时，教育界成为反动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各种压力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9日晨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114)

同时，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提出辞职，经徐世昌于5月15日下令批准任命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部务(115)。傅增湘辞职后，教育总长一职，政府提出由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继任。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教育总长继任人选，"大总统及钱总理亲对鄙人谈及，拟以田君应璜担任之。鄙人询及田君之意思，初不肯就，后以为既是本部党员，应听同人之公决。好在此举非本部所要求，乃大总统之意思"(116)。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听任政府处置。也就是说，田应璜准备走马上任，安福系企图染指教育大权了。

但是，田应璜将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反对。5月17、18两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连续召集会议，决定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等要求，如不获准，则于19日举行总罢课。19日，总罢课开始了，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要求拒签对德和约，惩办曹、陆、章，同时指出："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励之气，皆分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之元气可伤。"(117)　张謇也通电谴责说："报载将有安福派继长教育之说。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

人，无暇闻此。惟闻前此出钱收买议员，即此派人；则扫荡国人之廉耻者，此派人也；煽播政争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岂将夷全国于牛马襟裾之列乎，抑将熏学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118) 慑于舆论，政府只得悄悄撤销这一任命。袁希涛在5月21日致黄炎培的一道密电中称：“今日政府已声明撤回田教长之同意案。”(119)

蔡元培出走后，北京各校学生及校长纷纷督促政府挽留，同时，各校校长也纷纷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安福系大肆攻击蔡元培，但徐世昌、钱能训仍决定挽蔡。5月12日，袁希涛密电沈恩孚：“九日，大学蔡校长辞职，径行出京。直辖各校长亦遂辞职。各校员生，纷起请留。……涛昨见首揆，顷谒元首，均嘱部速留蔡。”(120) 13日，袁希涛再电沈恩孚道：“北京直辖各校长继续辞职者，因留蔡未有结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学生代表每日开会。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121)

显然，蔡元培的去留，在北京教育界造成极大影响。为尽快平息这一风潮，徐世昌于14日发布命令挽留蔡元培，命令说：“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122) 该令发表后，袁希涛于15日致电黄炎培说：“政府留蔡指令已发表，直辖各校长亦多允仍任职。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123) 可见北京教育界风潮，与蔡元培的去留有着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发生后，立即得到各地青年的响应，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团体，举行罢课，抵制日货，上街演讲，组织游行。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爱国运动都十分活跃，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

这时，北京、上海学联决定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以便统一领导全

国的学生运动，并派遣代表前往各地联络。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河南等地的数十名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代表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学联会址设在上海。全国学联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爱国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全国青年的团结。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曹汝霖立即提出辞职。他在呈文中首先对学生的举动大肆诬蔑，随后对签订“二十一条”和铁路借款两问题作了辩解。关于铁路借款一事，他蓄意将责任推给徐世昌。他说：“至于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时兼长财政，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接着，他又对铁路合同的性质解释如下：“此项合同内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他认为，山东问题的失败，原因完全在英、法维持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的密约，“汝霖决难分过”[124]。

5月10日，曹汝霖又通电申辩：“中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权自我操。该项合同（指顺济、高徐铁路合同），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他进而又说：“近年财政困难，借款为国家不能免之事实，而外交借款久为众矢所归，汝霖所自信者，历来经手借款，均无丝毫回扣……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为此，他申辩道：“名誉为第二生命”，“惟是他人嫁祸，重诬卖国，实难忍受”。最后他表示：“至青年学生不明事实，不辨是非，血气未定，受人煽惑，轶越常轨，其行为虽触犯国法，其心迹亦自可悯。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补偏救弊，尽心启牖，不至以学生为党派私人供政争之用……则汝霖今日虽因误会而牺牲身家，章公使因误会而几濒于死，

对于青年诸生，尤为厚望于将来也。”[125] 曹汝霖把学生运动认作是党派“政争”所引起，他所说的党派是指研究系。曹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五四学潮是研究系挑动起来的。

5月9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提出辞职，在辞呈中解释了签订“二十一条”的经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撤销第五号条件，既保持了和平，又“俾我国权得以保全”；反之，“但若使臣只知意气而战祸顿开，抑或听其要求而国权尽丧……则今日和会有无列席之资格已属疑问”。接着，他同曹汝霖一样，将攻击矛头直指研究系。他说：“至于币制总裁任内，惟阪谷顾问一案关系日人。但阪谷系汪大燮上年赴日为专使时所面请，而又为梁启超财政总长任内所约订。……论以亲日资格，汪、梁为优，而陆、曹媚日头衔，日人方面或恐未愿容许也。”[126] 尔后，陆宗舆又在另一辞呈中辩白说：“况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其间经历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他同样认为，五四学潮是“党争”的结果，说什么“始则由党争以引重外力，终则因外力以颠覆国家。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具在。”[127]

章宗祥于6月初提出辞职，并在后来撰写的《东京之三年》书稿中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同样指出，济顺、高徐铁路借款的原因在徐世昌，其借款背景是：“徐东海选任总统，南北罢兵，非巨款无以善后”，因此提出了这一铁路借款。中国当局原先考虑到，这两条铁路已于民国三年与德国订立了借款条约，日本占领青岛后，政府深恐日本有继承德国权利的意思，因此始终不与日本交涉。自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均废除，这两条铁路与德国已无关系，因而才与日本商谈两铁路借款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方面不过昔日借自德国者，今日借自日本，从新订立合同”，“与承继德人权利无涉”[128]。

章宗祥对山东换文的辩解是，胶济铁路原为德国控制，现在与日本订约，由中日合办，“则中德旧案尽行撇开，完全为中国允许日本

合办之新事业，与承继德人权利绝对不同。”“综观换文全体，在欧战未停之时，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与日本协定实为有利国家之事。”对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质问“欣然同意”一语，章宗祥反驳道：“在威尔逊之作此言，不过自卸其责，断章取义，初无价值。”(129)

综上所述，曹、陆、章三人均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竭力辩解，但是，山东换文并不是孤立的协定，而是作为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交换条件提出来的。这一点，在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交的山东问题说帖中讲得很清楚：“一九一八年九月与日本订立草合同，借款筑路二道，此二路者，即一自胶济线至徐州连接津浦、沪宁铁路，一连接京汉铁路者也。日本政府以此合同之故，乃于同月二十四日换文中，允将胶济沿路日军除济南留一支队外，余均撤回青岛，并裁撤山东省内之日本民政各署。”(130) 陆徵祥在中国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这两项协定是“交换条件”。而曹、章的辩护均回避了这一点，而是孤立地解释两项协定。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还申辩道：山东换文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部分撤军问题，所以中国方面才有“欣然同意”一语，认为“欣然同意”这句话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指撤军等问题）。……哪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131)。

然而问题就在于，日本是以铁路借款换取部分撤军的，既然是交换条件，中国方面就必须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以两条与山东主权密切相关的铁路路权，换取日本部分撤军，并借得二千万日金，其实质就是，承认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中国方面的解释是，两项协定均签自中国对德宣战之后，与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无关。而日本的解释则是，胶济铁路与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原均属德国权益，而现在则均由日本接替，这就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巴黎和会基于帝国主义的种种考虑，支持了日本的论点，因而中国关

于山东问题的交涉，遭到彻底失败。

鉴于曹、陆、章参预签订的各项中日条约，均与政府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铁路借款更是与徐世昌上台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局势的发展还没有严重到舍车保帅的程度，5月8日，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132) 5月14日，徐世昌又发布命令挽留陆宗舆说："其于二十一条案件，与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协力挽救，所全尤大。……该总裁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着毋庸议。"(133) 但是，徐世昌的命令，终究无法挽救曹、陆、章的下场。

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系与各方面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每周评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亲日主战派因为他们的爪牙受了委屈，便迁怒到林长民、蔡元培、吴炳湘三人身上。他们的机关报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他们恨吴炳湘，是说他袒护学生，要政府把吴炳湘付惩戒……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134)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皖系骨干人物之一，但在学生问题上，他反对采取强硬手段。五四当天，他曾制止段芝贵出兵镇压，后又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为此他也遭到斥责。5月6日，徐世昌发布一道指责警察厅的命令说，5月4日，"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135)

对于吴炳湘及警察厅的指责，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对其"调度

失宜，殊属疏误”，不能不有所表示。然而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抨击便不同了，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研究系与皖系的矛盾由来已久，1918年9月，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透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事遭到封闭。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发行。《晨报》在12月1日的《发刊词》中愤然表示：“军阀干政，计吏卖国，持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此诸病者有一不除，国家亡矣。”总之，他们将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皖系实行政治报复，而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机会。

从现象上看，研究系在五四运动中的确是极为活跃的，据《每周评论》报道：五四发生后，“国民外交协会里，无日不开会，无会不激昂”[(136)]。所以皖系也始终认为五四运动是研究系煽动起来的，是两系“党争”造成的。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国会准备提出一系列攻击研究系的弹劾案，对研究系的抨击达到了顶点。安福干将光云锦等人曾拟提出一个《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内称：“查自欧洲议和以来，大总统为慎重外交起见，于公府特设外交委员会，以为咨询机关……乃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力范围之名，不惜将全国铁路置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铁路为国家之命脉，汪大燮等宁不知之？乃不惜倒行逆施，倡此亡国之谬说，虽其计划未成，然彼等卖国营利之心，固已昭然若揭矣。又如梁启超者，自命名流，实同妖孽，趁欧洲和会之际，为自身活动之谋，领政府巨金，冒称以个人之资格为议和委员之后盾。梁启超自到巴黎之后，谬托政府委任，遇事干涉，并受外人贿使，不惜卖国求荣。……又煤油督办熊希龄，与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等勾通把持，狼狈为奸，其罪尤不可逭。今国事败坏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此种卖国求荣之辈，若不严加惩办，则何以彰国法而正人心？应请政府将上列诸人严行查办。”[(137)] 这份弹劾案，字里行间杀气腾腾，把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愤恨发泄无遗。

同时，还有人准备提出《裁撤公府外交委员会建议案》，抨击该会委员滥用职权，遇事干涉，贻误外交，“今青岛失败之警报已见告矣，国民愤激同深，不可遏止。该委员会对于政府之外交方针毫无建白，惟以少数人之私利是图，坐视外交失败至于此极，其罪可胜言哉。应由本院决议，咨请大总统即日裁撤外交委员会”[138]。实际上，不待这份弹劾案提出，汪大燮、林长民自知情况不妙，于5月3日自行解散了外交委员会[139]。

同时，钱能训内阁和中国代表团也成为安福系攻击对象。有人企图对钱能训和陆徵祥等提出弹劾案，指责政府任命赴法全权委员未经国会通过，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还谩骂“陆徵祥庸碌无能，依庇外国妇人以自重[140]；顾维钧少年轻躁，略善英语；王正廷卑污龌龊，才可传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辈为专使”，斥责政府“昏庸错乱，轻举妄动，竟演成今日之失败”[141]。反映出安福系和钱能训内阁的尖锐对立。

但是，罗正纬等少数有正义感的议员，也准备提出《弹劾交通总长曹汝霖案》，指出：曹汝霖在辞呈中“仅言个人之私，横加学生之罪，无一词片语怜其冒难救国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国。”“该总长辞呈内，备述借款有功，以为国家筹借外款事项，非我莫属。是欲借外人之势力挟制政府，盘据要津，情词毕露。”“拟请政府立即免职，并从严查办，以张国纪，而顺舆情。”[142]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公开化，互相指斥“卖国”“失职”，均欲置政敌于死地，其谩骂和愤恨的程度，几乎超过了对青年学生的攻击。统治阶层内部的这种公开化的分裂状态，造成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并且极大地制约着政府当局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决策。

四　北京政府应付山东问题的初步方针

五四运动是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各派系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北京政府对于山东问题的考虑与处理也颇感棘手，未敢轻作决定。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是，中央政府权威甚小，各地区、各派系实力人物握有很大权力，因此政府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往往先征求各方意见，以取得实力派的支持，山东问题也是如此。

5月12日，政府邀请参、众两院议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开茶话会，商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发言说："在印川个人之意，与其签字而断送青岛，不如不签字之断送，他日尚可设法，故绝对主张不能签字。"[143] 这次茶话会，政府仍未拿定主意。13日，政府再次邀集两院议员商讨，议员们再次主张拒签和约。当日，国务院密电各省督军、省长：青岛问题，"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指协约国）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本日招集两院议员开谈话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词，并谓未经签字，尚可谋事后之补救，否则铸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还之宣言，亦恐因此摇动。讨论结果，众论一致。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字。事关外交重要问题，务希卓见所及，迅赐教益，不胜祷致"[144]。该电反映出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对巴黎和会的决定表示愤慨，"断难承认"，另一方面又担心拒约将危及与列强的关系，因此政府方面"颇难决定"。但安福国会则不同，而是"众论一致"地反对签约。安福国会之所以"众论一致"地反对签约，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南北和会期间，徐世昌、钱能训企图解散安福国会以达成与南方的妥协，因此国会与政府的矛盾相当尖锐，所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会都采取了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于是，国务院一面致电各省实力派继续征求意见，同时准备将山东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也就是将这一棘手问题推给国会去处置。

该电发出后，国务院陆续收到各方面回电。15日，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复电说："阮电敬悉，极佩卢怀。窃谓青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甚重。又当此群情激昂之际，倘遽签字，国内或有沸腾之虞。若因此演出别项交涉，则办理将更棘手。故权衡轻重，似以暂不签字，徐图事后补救之说为较善。"(145) 湖南督军张敬尧复电说："日本所谓继承权利，系衔接德国租约而言，殊不知租约已完全失效，继承之说根本上不能成立。……务祈钧座始终俯采民意，毅力坚持，无论外交如何变幻，不达收回目的，决不可迁就签字，自行断送。"(146)

田、张二人均为皖系将领，那么直系态度又怎样呢？16日，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国务院："吾国为参战团一分子，并非征服降国可比，青岛为吾领土，关系国家主权，岂能不容我代表主张，和会遂自由处置？是不能施之于敌者，竟施之于我。……得失直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147) 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致电政府："请速致电欧会陆、王两专使，对于日本要求单独解决青岛领土问题，誓勿签字。"(148)

与此同时，安福俱乐部于16日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欧会如此主张，未免藐视公理，袒护强权，无论如何不能签字。"(149)

北京政府一方面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派人士均反对签约，同时又考虑到完全拒约将不能参加国际联盟，担心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并且还将失去一些有利条件，因此接受了中国代表团的"保留签字"的建议。5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国会提出山东问题咨文，表明政府方针："现由专使等在会提出抗议，如果无可转圜，政府熟权利害，决定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已电饬陆专使遵照此旨提出声明。"(150)

按例，对外条约应由政府签署之后再送国会审批，而钱能训政府这次却破例地先将山东问题咨文送交国会议决，其用意显然是要让国

会来承担这一问题的责任。这时，上海的南北和会已经破裂，徐世昌、钱能训企图取消安福国会以达成与南方妥协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国会与政府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钱能训内阁已成为安福国会的眼中钉，不可能得到国会方面的合作。

5月26日，众议院在讨论政府送交的山东问题咨文时，只是表示赞成政府提出的“保留签字”方案，但以该咨文并非条约，难以开议为由，拒绝列入议案，随即将该咨文退还政府，迫使钱能训内阁去独自承担这一棘手问题的全部责任。

五　五月下旬政局恶化

五四运动发生后，其范围逐渐由北京扩向全国，由学界扩大到各界，由下层扩大到部分上层，由自发性行动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特别是南北和会破裂后，安福系分子猖獗一时，一再公开指责政府的内外政策，不断向徐世昌、钱能训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决定调整对内政策。此外，在对外政策上，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是否签字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尽管举国舆论均反对签约，但是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作了一番权衡后，决定服从帝国主义的意志。这样，在5月下旬，北京政府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公开主张对德和约应签字；二是严厉镇压学生运动。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在下令停止南北议和，单方面撤回北方代表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舆论界的控制。

5月23日，北京《益世报》被封闭，原因是该报曾转载一份山东第五师官兵反对出卖山东的通电，而山东督军兼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否认该师曾发此电，于是该报被封，总编辑潘智远等人并被逮捕。尽管研究系律师刘崇佑为他们作了长篇辩护，但他们仍以妨害治安罪、侮辱官吏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报总发行人李雪舫等，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

23日晚，京师警察厅开始派专人对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实行新闻检查。

21日，徐世昌下令，任命王怀庆任步军统领，替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

这时，日本官方也改变了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相对沉默的态度。5月21日，日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一份抗议照会，其中指责道："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151)

5月25日，北京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公布了小幡照会。同日，林长民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辞呈中说：他撰文"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败，以全邦交"(152)。林长民的辞职书，不如说是抗议书，不少报刊予以转载，并就此发表评论，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同日，徐世昌对学生运动下达一道措词强硬的命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就要实行镇压。令文说："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事情，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53)

在这期间，北京政府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主张对德和约应当签字。政府的考虑是，签字是有害的，而不签字也是有害的，两相比较后，认为签字的危害轻一些，于是决定签字。驻法公使胡惟德等人也力主签字。

5月24日，国务院致电各省，通告政府签约的决定，同时再度征

求各地意见，意思是希望支持政府的决定。电称："经熟思审处，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154] 同日，为配合政府这一决定，段祺瑞亲自出马，致电各省军政高级官员，力主签约。他说："欧洲和约事，当局最后主张，业经电达。青岛问题，顾、王两使争执直接交还，国家有力，未尝不是……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欧约如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他还攻击爱国学生运动是"借爱国以祸国也"，要求各地维持治安，"赞襄政府"[155]。这是段祺瑞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头一次公开表态。他公开宣传失败主义论调，甘认我国无力直接收回青岛，无力与英、日对抗，因而只能俯首签约。

以上两电发出后，一时间泛起一股浊浪。5月25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复电响应政府决定，他首先重复段祺瑞的论调，认为我国国力弱，因而无法直接收回青岛，最后表示："今但以青岛之故拒绝签字，若将来争执无效，或反将其他有利益之条件同归消灭，则失败更甚于今日，而挽救亦绝无希望，固不如断之于先之为愈也。"[156] 倪嗣冲的电报，把失败主义理论发挥到了一个高峰，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怎样去争取成功，而总是考虑如果失败怎么办。

但是，这段时间大多数实力人物要么不表态，继续沉默，要么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河南督军赵倜就是一个典型。他于5月26日复电段祺瑞表示："倜一介武夫，智识短浅，事关国际，唯一听政府之主持。"[157]

北京政府在5月下旬对内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造成全国的政治气氛更加紧张。但是，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仍然在向前发展，运动的广泛性达到了空前规模。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有时甚至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例如，直系、研究系同皖系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他们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统治阶级难以形成

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局势的发展究竟有利于何方，决定于下一阶段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

六　六三运动和罢免曹、陆、章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徐世昌5月25日命令，逮捕了一百七十余人，均监禁在北大法科。但是，爱国青年没有被武装镇压吓倒，6月4日，他们仍旧上街演说。这一天，警方出动马队冲撞学生，并逮捕七百余人。因北大法科校舍已收容不下，警方便将马神庙理科校舍也用作临时监狱。同时，警方在法科校舍外东、西两侧搭起二十多个供军警驻扎的帐篷，将法科校舍紧紧围住，如临大敌。

军警连续两日的大逮捕，没有使爱国学生畏缩。5日，他们再度冲破阻挠，勇敢地走上街头，分路演讲。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坚决要求罢免曹、陆、章，指出国贼不除，挽救外交则无希望。在学生们的不懈斗争下，北京政府为避免事态更加激化，于同日释放了被捕的近千名学生，并撤走了包围北大的军警。然而北洋政府的这一暴行，早已激怒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上海爆发了伟大的六三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后，上海学生随即行动起来。当6月3、4两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学生纷纷罢课，以示声援，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5日，上海的部分工厂、商店举行罢工、罢市。这样，加上学生的罢课，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三罢”斗争，声援6月3日大批被捕的北京学生。所以人们把上海的这次斗争和由它掀起的全国斗争称作六三运动。六三运动把五四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

5日这天，上海的许多商店门前贴着“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标语，其中也有劝告群众“切勿暴动”的。在一家书局

门前贴有一副对联："罢课救亡，罢市救亡，我两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国不死，愿大家努力进行。"三罢斗争表明，各界群众的救亡运动正在融为一体，人民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增强。

6月5日以后，上海参加罢工的，计有纺织、机器、印刷、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烟厂等行业的工人。6月10日，沪宁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从而把罢工运动推向高潮，使沪宁线处于瘫痪状态。六三运动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出于政治要求而自觉地举行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不久，"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

对于上海的六三运动，安福系的机关报《公言报》发表评论说："北京学生酿成风潮后，上海方面继以罢市风潮，此二风潮表现后，已将此次骚动全系借对外问题以实行对内之内幕，次第暴露。吾人对于学生、商界之真爱国者，固只有馨香膜拜，而对于黑幕中之唆动人物，与夫一切过激自扰之举动，则良心上实不能赞成，且亦不能效研究派报纸之一味火上浇油。"(158) 安福系总是站在派系立场上，用派系眼光看待一切，因而也把一切事件看成了派系斗争的产物。他们既把五四运动认作研究系所为，现在又把六三运动归之于研究系的"唆动"。

与《公言报》相反，研究系的《晨报》对于六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报以《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为题，发表特约通讯，指出："工界罢工实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此诚最近所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也。"(159) 当大多数报刊，甚至包括一些进步报刊，尚未对上海的工人行动的历史意义做出评价时，研究系已经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工人阶级参与政治已经开始，并认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件，可见研究系的政治眼光是相当敏锐的。

在上海燃起的“三罢”斗争烈火，迅速烧遍各地，特别是天津、汉口等大城市，“三罢”斗争均形成相当规模。各地许多商会组织了不少大规模的罢市活动，如天津总商会于6月10日举行全市罢市，使得京、津当局极为恐慌。商界运动除了政治要求外，其一大特点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与学界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强大的六三运动，压倒了北洋政府与皖系的嚣张气焰，一举扭转5月下旬以来的不利局面，迫使当局不得不再度考虑调整其内政方针，以平息事态。同时，由于群众运动的声势再度高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六三运动发生后，各地局势发生了激剧变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特别是各地直接面对群众运动的军政官员，感觉继续维护曹、陆、章已经得不偿失，部分地方军阀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又向当局进言，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平息事态。

身处“三罢”斗争中心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于6月8日联名致电徐世昌等人：“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集，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160)

在全国一片诛讨声中，曹、陆、章也是如坐针毡，自知不能恋栈下去了。6月4日，章宗祥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自称“一月以来，伤势虽渐平愈，旧恙日形增剧。伏思驻日使职殷繁，断非孱病之躯所能胜任，惟有恳乞钧座俯念下情，准予免去驻日本全权公使本职，俾得侍奉老父，退居田间。”(161) 6月9日，陆宗舆也再次提出辞职。5月20日左右，曹汝霖曾再次辞职，北京政府仍表示“所请辞职之处，仍毋

庸议”，同意给假二十日。6月9日，曹汝霖假期已满，当日《公言报》披露一条消息：“交通总长曹汝霖氏给假二十日现将届满，闻已拟就辞呈，决意引退。政府方面亦有照准消息云。”[162] 显然，这是《公言报》有意放出风声，为曹、陆、章下台作舆论准备。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北京政府最终决定“舍车保帅”。6月10日，徐世昌发布如下数道命令：“交通总长曹汝霖呈请辞职，曹汝霖准免本职。”“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因病呈请辞职，章宗祥准免本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病一再呈请辞职，陆宗舆准免本职。”[163] 罢免曹、陆、章，是五四运动取得的头一个直接的胜利。

徐世昌的三道免职令，均说曹、陆、章呈请辞职，但曹汝霖在其回忆中却否认此事。他说；徐世昌“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他认为，徐上台后，一直企图“抑制合肥势力”，上海的南北议和就是这个意图。“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164] 。但是曹汝霖这段回忆不尽符合事实。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们三人先后提出辞职，但政府均予挽留。情况大约是这样的：在政府挽留他们之后，由于局势激剧发展，十分紧迫，于是徐世昌不待曹汝霖再度辞职，即下令辞职照准。此外，陆宗舆于9日辞职时，已当即获准。因此，三人下台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

曹、陆、章免职令下达后，段祺瑞即怒气冲冲到团城对曹汝霖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段大骂徐世昌，说曹汝霖等“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165] 说罢即悻悻而去。平日极少作诗的段祺瑞，后来曾写下五言长诗一首赠曹汝霖，以掩饰自己，其中有句曰：“不佞持正义，十稔朝政里。立意张四维，一往直如矢。”[166] 此外，他还为曹汝霖作了种种辩护。

曹汝霖从此退出政界，自号觉盦，据说是取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意思，不过从他年近九旬写下的回忆录来看，他仍然不知自己一生之非。

第四节　继续动荡的政局

一　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

北京政府罢黜曹、陆、章，不是孤立的事件，必然引起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北洋政权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政治危机。

徐世昌是在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即将开幕时登台的，当时他也曾一度踌躇满志，企图借助两个和会推行其内外政策，以此奠定其统治基础，然而半年来，两个和会相继失败，使他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6月11日，即罢免曹、陆、章的次日，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其主要原因就是两个和会牵涉到的内外政策问题。他在辞职咨文中说：关于对德和约，“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之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一层，已难办到。……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他说：“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167)

与此同时，内阁总理钱能训也提出辞职。

徐世昌选择这个时候辞职，以及辞职咨文中反复谈论的两个基本问题，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实，他并不准备“引咎”，在他的6月

11日日记中，对辞职这样重大的事只字未提。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统一职非己莫属，是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因此，他的辞职必然引起各界人士纷纷挽留，他企图通过挽留来换取各界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徐在辞职咨文中清楚表明，他是因其内外政策无法推行而辞职的，因此，挽留他也就必须支持其内外政策，从而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是徐世昌惯用的权术韬略。

果然，徐世昌辞职立即引起震动。尽管安福系对徐极为不满，但如徐倒台，势必导致更大的政治危机，因此，当徐世昌的辞职咨文送到国会后，当天便由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登门退还，李、王二人并联名发表通电："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赍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168) 是日，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接踵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挽徐浪潮。

各地挽徐电甚多，基本内容不外三条，一是挽徐，二是表明对德和约签字的态度，三是表明对再开南北和会的态度。其中一、三两条均不难表态，关键是第二条。在挽徐通电中，支持对德和约签字的有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树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四川督军刘存厚、甘肃督军张广建、凇沪护军使卢永祥。一度反对签约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又转而支持签约。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今保留一层，既万难办到，则两害取轻，不得已签字，亦无不可。"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叫喊甚嚣尘上。前一阶段出现过的"如出一辙"的拒约呼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是，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少实力人物的通电，或仅言挽徐，不谈其余；或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奉系张作霖、豫督赵倜、湘督张敬尧、浙督杨善德等，在他们的通电中除对徐恭维一番"负亿兆付托之重"不能去职外，其余皆敷衍搪塞之语。

当不少人郑重其事地通电挽徐时，安福系早已识破徐世昌的意图。就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的第二天，《公言报》发表安福系“某君”的谈话。“某君”以讥讽的口吻说：在当前的局势下，“想大总统亦不忍拂衣而去，以负天下苍生。此种咨文表示，只可当一种发牢骚之文字观也。”(169)

在各方面挽留下，徐世昌当然懂得适可而止，于是乘势收兵，再不言“引咎”了。

然而徐世昌可以挽留，钱能训则不能挽留。参、众两院议长早已讲明：现在为责任内阁制，一切问题由内阁负责。因此，钱能训的倒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13日，徐世昌下令：“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迭呈辞职，情词恳挚，钱能训准免本职。此令。”(170) 但是钱能训去职，并未使局势稳定下来，在继任总理人选问题上，安福俱乐部与徐世昌的斗争几乎白热化。随着继任总理一再难产，徐世昌由辞职而换取的“两害取轻”的微弱支持，又顿时化为泡影。他所换得的，是山东请愿团进京，和吴佩孚的一系列强硬通电。

当钱能训提出辞呈时，全体内阁成员均照例提出辞职。由于事情发生突然，难以立即组成新内阁，徐世昌仅同意钱能训一人辞职，其余阁员一律暂时留任。徐世昌决定先组成一个临时性内阁，同时尽快决定继任总理人选。然而在当时那种局面下，没有人愿意出任代总理一职。为此，徐世昌决定，按现任内阁成员的席次顺序，由排列在前者出任代总理。北洋时期内阁成员的席次排列，首为外交总长，但陆徵祥远在法国；次为内务总长，而该职为钱能训兼任，已连同总理一并辞去；再次为财政总长，于是时任财政总长的龚心湛被指定为代总理。

龚心湛是无可奈何而主持这个看守内阁的，就职当天，他立即通电各省表示：“比者幹揆（钱能训字幹臣）坚辞引退，心湛迫于主座重委，辞不获已，于本日到院暂任维持，声明十日为期，务希公推贤

能继任揆席，斡旋大局，是所至跂。”[171]

按照规定，国务总理人选应由总统提名，再经国会通过。为此，身为总统的徐世昌和盘据国会的安福俱乐部，都在考虑他们认为适当的人选。

徐世昌清末任东三省总督时，幕下有两位颇为倚重的心腹，一位是奉天右参赞、后任顺天府尹的钱能训，一位是奉天左参赞、后任黑龙江巡抚的周树模，两人形同徐世昌的左右臂。钱能训既下台，徐便有意由周树模接替钱任总理，以便于继续操纵国务院。

安福系的考虑是，徐世昌上台后处处和安福系作对，因此钱能训下台后，他们决不容忍再由徐世昌的人继任，决意由皖系人物出任总理，以控制政府。安福系考虑的总理人选是当时任农商总长的田文烈。田久在袁世凯幕下任职，为老北洋系军人，清末曾任陆军部副大臣，民国后曾任河南都督。

但是，田文烈坚决不肯出任总理，同时龚心湛代职十日已满，急于求去，为尽快结束内阁危机，徐世昌决定将周树模、田文烈两人选公开提出，正式征求安福俱乐部意见。6月28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徐树铮也出席坐镇，并对周、田二人作了介绍。接着王揖唐宣布进行辩论，安福干将克希克图发言说：“南北议和，北则北洋派为政治中心，南即滇、桂两派是也。内阁总理为解决时局之中坚，自以与北洋派关系较深者为适。田君为北洋名宿，故鄙人赞成田君。”[172] 对此，附和者甚多。最后，王揖唐宣布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周树模的仅两人，其余全部赞成田文烈。周树模为安福俱乐部否决，实际上等于非正式地被国会否决。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田文烈仍坚不肯上台组阁，于是又有人秉承徐世昌之意，再度游说周树模组阁。但是，安福系决心与徐、周对抗到底。因当时盛传徐世昌执意提名周树模，《公言报》于7月8日

发表某议员谈话，声称：“或曰总统已拟定周树模，或曰国务院已准备咨文提出，吾人则极为疑虑，以为大总统既征求意见于先，多数既赞成田而反对周也，何以大总统必欲提出吾等已经表决少数之人，强求同意？要知当议员者，当日之我万不能与昨日之我挑战，既经表决，当然服从党议，头可断，志不可夺。……如强迫横来，则吾人牺牲地位，在所不辞矣。”[173] 这番谈话，俨然要同徐世昌决战到底。结果，周树模最终未能获得提名。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继任总理问题，长时间未能解决。

问题不在于继任总理问题解决与否，而在于龚心湛这个看守内阁是个权威甚小、地位十分软弱的过渡性政府，对任何重大问题均无力做出决定。在龚心湛主持下，北洋政府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上，演出了一幕幕荒诞的笑剧。

二　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关于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英美在华势力同各自政府之间持有不同政见，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芮恩施于1913年出使中国，在历时六年的驻华公使任内，竭力维持“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芮恩施焦虑地注视着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一再提请美国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始终鼓励美国加强对华投资并提供贷款，以便让中国从对日本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但成效甚微。

战争结束后，芮恩施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日本“利用大战和协约国自顾不暇情况，使中国落入与它缔结秘密军事同盟的圈套”。他明确指出：“只有拒绝承认日本过去四年来在中国秘密操纵的种种结果，特别是日本在山东建立的政治势力和特权地位，才能避免这样一个结果：要末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的附庸……要末引起列强在华因建立势力范围和地方特权而不可避免地进行军事斗

争。”[174] 同中国广大舆论一样，芮恩施也认为，随着中国对德宣战，日本无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在巴黎和会前期，英、法、美、意驻华公使曾一致采取行动，抵制日本继续单方面向中国贷款，单方面向中国提供军火，以防止中国进一步倒向日本。正当欧美在华势力为抵制日本而积极活动时，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处置的消息传来了，芮恩施十分懊丧，他认为：“这个决议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因为它把这样一种丑恶行为做为它的重大决策。”[175] 他还认为，威尔逊和毫斯上校对日本退出巴黎和会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毫斯上校错误估计了这一点。

当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竭力想把这一运动说成是排外行动，与义和团相提并论，企图怂恿英、美共同镇压运动。当芮恩施得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对六三运动采取严厉措施时，立即指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不要介入，让日本单独去承受运动的打击。因为他看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

芮恩施甚至对五四运动作出这样的评价：“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76] 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情的，认为：“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我对此也寄于深切的同情。”[177] 芮恩施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代表之一，他所认识到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基本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言的，与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族觉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正在觉醒，并寄予同情，因此也不失为一位资产阶级有识之士。

6月6日，北京英美侨民协会召开会议，芮恩施和英使朱尔典均出席。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指出：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必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罪恶的后果

不但破坏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也否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中国的近邻日本现在代替了德国（其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心在地球的另一边），那么这种罪恶的后果还将会大大地加重。因此，我们北京英美侨民协会的全体会员决定向英美政府建议，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订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178]。这个决议，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意见。直到8月22日，天津英国商会还致电英国外交部，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芮恩施由于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政府的意见分歧日益加深，6月7日，他向威尔逊提出辞职，并在辞呈中提醒美国政府，如不改变对华政策，“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一百四十年来工作的成果”。

从总体上看，欧美方面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基本采取旁观的态度，即如芮恩施所说，“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在山东问题上，英美在华势力与各自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三　一个独特的军阀——吴佩孚

直系和皖系的矛盾早已存在，在护法战争和新国会选举中，两系公开发生冲突，南北议和破裂以后，其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五四运动的爆发，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击政敌、捞取政治资本的时机。

直系的主体“长江三督”，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皖系的对立面，不满皖系的内外政策，力主南北议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参预镇压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北督军王占元，曾制造“六一”大惨案，军警刺伤示威学生多人[179]。因此，在护法战争中因主和罢战而名噪一时的“长江三督”，这时被戴季陶斥为“长江三毒”。总之，他们并未因与皖系的对立而站到人民群众一边。

六三运动爆发后，李纯的幕僚白坚武力劝李“应时而起”，借助运动的波澜，促成直系崛起，然而李纯却没有这种胆略。7月初，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到南京要求会见李纯，他称病不见，将学联代表拒之门外。但是，直系诸将领中，却有一位才略和胆识颇为与众不同的将领吴佩孚，他应时而起，介入了五四运动。

吴佩孚基本上是在南北议和破裂之后才开始介入五四运动的。作为一个手握重兵、驻戍南北交战前沿的北洋高级将领，吴佩孚的言行确有不少独特之处。

6月9日，在三罢斗争的高潮中，当各地大肆镇压群众运动之际，吴佩孚向徐世昌拍发了一份电报，公开站到爱国学生一边，表示支持。他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180)。他还含蓄地批评了徐世昌5月25日逮捕学生的命令，指出大狱之兴，定招大乱。

罢免曹、陆、章之后，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集中为拒签对德和约。如前所述，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后，“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声时有所闻，当时各派军阀的基本状况是：皖系主签，奉系旁观，直系动摇，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签约的几乎没有。就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接连发出一系列措词强烈的反对签约的通电，打破了北洋军界相对沉寂的局面。

6月15日，吴佩孚致电南方将领，建议驻湘南北将领联名通电反对签约，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删电”。吴佩孚说：“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徐世昌等主张签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拒约会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对此，吴佩孚驳斥道：“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他还驳斥了两害取轻的论

点，最后以极为尖锐的措词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卫国之责，不惜对日背城一战。他说："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181) 该电后又略作修改，于7月1日以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南北六十一将领的名义联名发表。

吴佩孚"删电"对日本侵略者的抨击，反映出他这个封建军阀强烈的民族意识，既赢得对内主张南北和解的各界人士的赞扬，又赢得对外主张拒签德约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抓住对内主和、对外抗争这两个时局核心问题大做文章，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这就是吴佩孚不同于其他军阀之处。

不仅如此，当李纯将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拒之门外后，吴佩孚却在衡州会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盛称此次全国学生之举动"，同时表示愿作"学生保障"。

当包括南方桂系在内的各派军阀对五四运动或镇压或诋毁或回避的时候，吴佩孚却能够明确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山东问题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拒签对德和约，他的这种态度赢得各界的广泛称赞，并且博得了"爱国将军"的美名，从而一举奠定日后发迹的政治基础。

四　西南方面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意图及镇压

西南方面最初是全力支持五四运动的。运动发生后，广东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率全体议员通电谴责北京政府，表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勾结，外而阻挠赴欧代表之要求撤销中日密约及交还青岛，内则企图

破坏上海和议，以遂卖国阴谋。罪状昭著，天人共愤。京津学生怵于国亡之惨，目击贼党横行，奋不顾身，义气勃发，焚灭曹宅，痛击章獠，有史以来，无此痛快。”[182] 参、众两院于5月9日召开两院联合会议，一致议决，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维持各校现状，惩办曹、陆、章。

广东军政府也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指出：“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倘不求正本之法，但借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183] 从表面看来，军政府似乎完全站到了人民群众一边，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仍旧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在军政府七位总裁中，发电最多、态度最为活跃的是唐继尧。他曾通电要求惩办卖国贼，指出：“故使卖国诸人未能摒弃，则此后卖国之事，将续而无穷，而国内之和平，亦终无由恢复。当此国势岌岌，应请北京当局惩前毖后，将卖国诸人严行惩办，以谢天下。”[184] 他并且通电要求拒签对德和约，认为青岛交与日本，“此不独山东问题，实国家存亡之关系。现唐总代表（唐绍仪）已通电巴黎陆专使等，请其力争，勿予签字，尤冀我国上下一致坚持，为议和专使之后盾”[185]。总的来看，在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对德和约两个问题上，西南方面和全国广大进步舆论是一致的。

但是，西南方面对五四运动的支持，是抱有自身的政治目的的，简言之，就是借助群众打击北京政府。5月18日，孙洪伊致电曹锐、卢永祥、王占元、吴光新、陈光远、吴佩孚、张敬尧、阎锡山等三十多名北洋高级将领，煽动他们和徐世昌、段祺瑞决裂。他说：“夫大义可以灭亲，岂私交即可废公。……徐、段并非中国皇帝，公等并非徐、段臣子，乃甘举公众托命之国家，徇彼一二人之私图而不悔。……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徒党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人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

奸，然后合力对外。”[186]

5月16日，唐绍仪在上海会见群众代表时，首先高度评价学生运动。他说：“此次北京学生怒潮，实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所可惜者，学生所揭橥之卖国诸人，仅仅指为曹、陆、章等，不知曹等犹为附从，真正祸首，则固另有人在。”[187]

军政府作为北京政府的敌对政权，它的一切言行必然围绕其政治目的而展开。军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护法，护法的核心问题是国会；而当时人们所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山东问题、外交问题；把外交问题和国会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外交问题服务于护法的政治目的，这是西南方面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5月15日，唐绍仪通电全国，公布他在南北和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的八项条件。关于第五条国会问题，他强调指出：“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如民国二年袁世凯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以成，二十一条款以定。六年黎元洪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陆续缔结，可知恢复国会为救亡最急要之图。且今后所恃以取消一切不平等契约之一线希望，只有以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为理由。”[188] 5月14日，南方代表秘书处致函北方代表秘书处，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六三运动爆发后，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云集上海的广东非常国会的两院议员，早已看出群众运动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非常国会众议员张瑞萱等立即和商界、学界进行接洽，并于6月6日密电吴景濂：“可否由议会通电劝勉全国商会并再声明：订卖国条约，由于国会解散导其由；惩办卖国贼救国，进而主张维持法律救国。”[189] 所谓“法律”就是国会问题。

上述函电将外交失败和国会问题联系起来，无非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旧国会的解散，是一系列外交失败的根源，因此，要收回山东主权，救亡图存，也就必须支持恢复旧国会。可见，他们是力图把广大

人民群众的五四爱国运动纳入到他们的护法运动的轨道上，服务于护法的政治需要。

西南方面也是一个十分松散的政权，政府、国会、督军、政客，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对于五四运动，他们大都自行通电，发表意见，其议论也十分庞杂，难以给予统一的评价。单就军政府本身来说，态度并不十分积极。

从总体上看，西南方面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基本上以其自身政治利益为转移，因此，这种支持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他们可以怂恿、煽动北京政府统治区域的群众运动，并给予某种意义上的“高度评价”。但是，当五四烈火燃烧到他们自己的辖区时，军阀的本质便原形毕露，再也不把五四运动视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的美好事物了。

广州的五四运动，突出表现为抵制日货。5月下旬，广州市民一再宣传抵制日货，许多商号接受了学生的检查，不再买卖日货。当时广州有三家最大的百货公司——长堤的先施公司，西堤的大新公司，以及真光公司，这三家公司均不理会学生的劝告，继续经营日货，人称“三大亡国公司”。

5月30日，广州全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先施公司时，群众高呼“打倒亡国公司”等口号，并冲进公司。这时大批警察赶来镇压，先施公司乘机将商店大门关上，三百名学生被困在公司内，第二天才放出，警方并逮捕了数名学生骨干。翌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太田喜平致函广东督军莫荣新抗议道：“风闻近日本地各学校学生，因政治问题，遂欲抵抗日货，并运动排日。事果属实，恐将来于中日邦交大有影响……兹为防备未然起见，特请贵督军预为遏止，免成事实。”(190)

当日，莫荣新和广东省长翟汪联名发布布告：“本月三十日晚，惠爱街及长堤等处，聚有多数匪徒，借端滋扰，实属妨害社会康宁。

本督军、省长有维持治安之责任，断不容此等乱民扰乱秩序，亟应严行禁止。……倘敢仍纠众肆意骚扰，定予严拿，尽法惩办，决不姑宽。”[191] 他们把爱国学生称作“匪徒”、“乱民”，这是北京政府尚未敢说出的话。同日，翟汪在另一布告中宣称：“至政治问题，应听政府解决，断不能有妨碍邦交之举动。”[192] 这里说的“邦交”，就是军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军政府可以斥责北洋政府勾结日本卖国，但不能容忍辖区内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不允许损害它和日本的“邦交”。

7月10日，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对外交失败和国内政局表示不满。会后举行游行，到军政府请愿，要求下令讨伐卖国贼，废除一切密约，并要求伍廷芳任广东省长（翟汪于6月20日辞职）。军政府未置可否。请愿群众立即前往广州总商会，请其罢市。总商会当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商号于7月11日早一律罢市。14日后，工、商、学界和政府方面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军警枪伤学生多人，并逮捕大批学生。这样，西南军阀制造了五四运动以来军政府辖区内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7月19日，唐绍仪致电军政府政务会议及莫荣新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说：“当五月初间北京学界风潮，北京政府对于所捕学生亦随即释放，不复诛求。况广东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文明宽大更应过之，此为内外视线所集，不可不慎。敬请就于此事取宽和之态度，将所拘学生人等即予省释，无俾他人借为口实，是所切盼。”[193] 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作为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唐绍仪，曾义正词严地发表通电或谈话，斥责北洋政府反动，他对于军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却无一语谴责之词，仅仅要求军政府效法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无俾他人借为口实”而已。

事实证明，孙中山关于“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第五节　拒签对德和约及其他

一　拒签对德和约

如前所述，北京政府于5月中旬曾决定在对德和约问题上，采取“保留签字”方针，并电令陆徵祥执行。陆徵祥等人随即就这一问题和英、美、法三国代表磋商，希望得到支持。5月19日，法国外长毕勋对陆徵祥说：保留签字，“万办不到”[194]。25日，威尔逊对顾维钧说：“至于约上保留办法，予亦不主张。”[195] 22日，王正廷与顾维钧会晤英国方面代表，英方称：“此事关系极大，和约为协商及共事各国对于敌国之约，不但无不签字之理，抑亦无保留办法。”[196] 列强一致拒绝保留签字的理由，是因为不愿开此先例。26日，毕勋对陆徵祥说：“中国如开保留之例，义国于飞乌满问题亦欲保留（指意大利对阜姆的领土要求）。此外，各国不满意者甚多，倘使纷纷援例办理，岂非和约将不完全乎？”[197]

尽管保留签字一开始就遭到列强拒绝，但中国代表团仍竭力争取。5月26日，陆徵祥向北京政府报告：“现已备就公函正式致英、美、法三国，将非保留不能签字情形显明表示，以观其后。总之，无论如何，对于保留一层，必再竭力办理，至最后之时而止。”[198] 这样，中国代表团于5月26日再次向和会提出保留签字的要求。

北京政府考虑到保留签字实际上难以办到，于5月23日电令陆徵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28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约签字问题。王正廷首先发言，明确反对签约，并指出：“中国从前外交皆主逊让，遂损失种种权利。今则让无可让，不得不改变方针，各国屡欺中国，不可再受其欺。”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发言主张签约，认为如果拒绝，日本若以武力威胁，无法得到其他列强的援助。他认为王正廷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南方政府和此事关系不大。他说：“就今日外交情形言，签字则南方人民责备北方太弱，倘

将来国际巨害发生，则北方人民亦将责备南方不审国势。”这番话是针对王正廷及其军政府讲的。某参议接着发言说，如不签字将失去许多有利条件。显然，他认为签字是有利的。顾维钧明确反对签约，他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驻法公使胡惟德是代表团中主张签约的代表人物，他表示：“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施肇基最后发言说：“此次和约，各小国均不满意，恐不能永久践行，中国亦可以不签字。”[199] 陆徵祥和魏宸组没有明确表态。这次会议表明，在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拒约的意见略占优势。

这次会议是中国代表团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后，在国内外严峻的局势下，代表团逐渐解体。6月初，施肇基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其他驻欧使节也相继返回任所。身为外交总长兼代表团全权委员长的陆徵祥，在签约问题上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不能违抗政府的签约决定，另一方面，他本人则不愿签约。他曾致电政府表示：“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指签署“二十一条”），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200] 为此，陆徵祥一再向政府提出辞职，但均未获准，于是他便以“旧病骤发”为由住进医院，不再主持代表团日常交涉工作。

6月17日，陆徵祥致电政府，声称医生意见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提出“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201]，将签约一事推给了顾维钧。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局面下，顾维钧勇敢地承担起最后的艰苦的交涉工作，顽强地继续交涉保留签字，成为中国代表团后期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北京政府在5月24日的电报中，曾表示保留如不能办到，即全约签字，该电发表后，遭到安福国会猛烈抨击。6月9日，在李盛铎主持下，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安福干将光云锦拿出一份他起草的电稿征求意见，指出：“查日前政府提交众议院请求同意之咨文

（指5月20日咨文），对于青岛问题曾经郑重声明，主张暂行保留，以为异日挽救地步。……今国务院敬电所云，是青岛问题亦在签字之列，与政府提交众议院咨文全然不符，殊堪骇异。”该电稿最后表示：“上次众议院开会，对于青岛问题已有明确之表示，今后政府外交计划纵有变更，［议员］等一日在职，绝对不能承认。”[202] 该电稿当即经表决通过，以安福俱乐部全体国会议员的名义拍发。该电发于六三运动高潮之中，钱能训内阁风雨飘摇之际，其目的之一是借此推倒钱内阁。但另一方面，该电也对日后政府在签约问题上的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

如前所述，徐世昌曾以他的辞职换得了部分督军对其“两害取轻”的支持。但他没有料到，钱能训下台后由于安福系的对抗，继任总理迟迟不能产生，而龚心湛政府又是个十分软弱无能的看守内阁，根本无法对签约与否做出任何决定，正如北京政府后来编撰的《巴黎会议关于胶澳交涉纪要》中所说：“政府以民意所在，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日臻困难矣。”[203] 左右掣肘，不能做任何决定，这就是龚内阁的真实状况。

龚心湛在接见《华北明星报》外国记者时，就其代总理一职以及对德和约签字问题进行了交谈，报载如下：“无如现今继任总理究属何人尚未确定，渠对于时局不得不勉为支持。……龚氏引中国俗语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正渠现今代理总理之谓也。”关于对德和约问题，龚说：“巴黎和会，英、法委员暨美大总统威尔逊氏，既担保归还胶州与中国，中政府对于和约签字问题，则决定按照协约国所建议者办理，故近日政府电饬巴黎各委员，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204] 这是一个十分周到圆滑的谈话，既表示按列强的意见办理，以讨好列强，又不给中国代表任何明确指示，而令其“自酌办理”，以避免承担任何责任，这便是龚心湛应付时局的基本方针。

随着对德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全国学联等群众团体纷纷通电要求拒签和约，安福国会也于6月25日通过一项给政府的建议案，要求拒约。6月19日，山东省议会、省商会、省学联等七团体，选派了一个八十五人的请愿团进京请愿，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拒签对德和约；第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合同草约；第三，惩办卖国贼。20日，请愿团由北京山东同乡会会长、军警督察长马龙标陪同，整队来到总统府。徐世昌派秘书代表他对请愿团说："我国现在系取责任内阁制，此种重大问题皆听阁议解决，余（元首自称）实毫无主张。"[205] 不久前，徐世昌还在辞职咨文中坚持"两害取轻"，现在则表示"毫无主张"，将一切推给责任内阁。由于请愿团坚持要见徐世昌，徐最后答应，21日由龚心湛接见，22日再由徐接见。

21日，龚心湛在国务院接见山东请愿团。请愿团代表发言说："东人此次所以愤激，原因实为总统辞职电中主张签字，并闻政府曾训令专使，不能保留则相机签字，是政府已有主张签字之表示。故东人特举代表等来京，请政府垂怜东人，容纳民意。"对于山东代表拒约的要求，龚心湛答复道："今日为签字之期，不知我专使已否签字。"[206] 25日，龚心湛在接见北京学联代表时，又以同样的言词说："据路透电，和约于二十五日签字，我国专使签字与否，今尚未知。"[207] 徐世昌表示"毫无主张"，把一切推给责任内阁，然而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责任内阁则干脆答以"不知"、"未知"。徐、龚二人推诿责任敷衍舆论的技能，可谓不相伯仲。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徐、龚在这一时间，迫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再未敢公开坚持"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主张。

23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由马龙标、吴炳湘陪同前往的山东请愿团。关于对德和约问题，徐说："政府亦系主张保留山东三条，与诸君意见相似，前已去电，令驻欧委员相机图保留方法。惟此次欧洲和议，各国意见纷歧，利害冲突，无论何国不能贯彻其主张。以美国之强，威尔逊总统执和议之牛耳，犹不免有失意之事，而况弱

国外交，安得必求其有圆满结果？”[208] 徐世昌的谈话，实际上是宣传了一番弱国无外交的失败主义理论。问题的实质，现在已经不是“保留签字”，而是保留不能办到时，是签字还是拒约，但徐世昌回避了这一点。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的态度最后有所松动。27日，国务院对山东请愿团的要求做出一项批示，其中说：“所有各代表等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电达专使遵照在案。国家领土主权，断难丝毫放弃，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无论如何必将胶澳设法收回，此则夙具决心，可为国人正告者也。”[209]

当日，山东请愿团、北京学联、京师总商会、陕西学联等七八个群众团体约四五百人，集体到总统府请愿，提出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条款，和约决不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两铁路草案；三、立即恢复南北议和；并表示，如无切实答复，誓死不离开总统府之门。徐世昌答应第二天接见，四五百人竟在新华门露宿一夜。

28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接见群众代表十人，其中陕西学联代表屈武原受陕西学联委派，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后因经费不足，辗转来到北京。十位代表向徐世昌重申三项要求，徐一一做了答复。关于第一项，徐说：“不能保留山东则拒绝签字问题，政府已电令陆使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210] 这时屈武“突出发言，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211]。屈武此举，一时传为美谈，当时的舆论界称之为“颈血溅总统之举”。

国务院的批示和徐世昌的谈话表明，北京政府曾于6月26日电令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但是，这一电令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为当时向巴黎发电需数日才能收到，此时发电为时已晚。北京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发电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既发出该电，可以敷衍国内舆论；又不让中国代表团及时收到，可以避免承担拒约的责任。由于政府早已电令陆徵祥“自酌办理”，因此，签字与拒约的决

策者，已不是北京政府，而是中国代表团了。

如前所述，中国代表团的后期工作，实际上由顾维钧主持。顾维钧事后回忆说："对巴黎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6月28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顾维钧还说："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约，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212)

6月24日，顾维钧会晤了巴黎和会秘书长吕达斯达，声明："兹遵政府训令，愿于德约签字时，将关于山东条款声明保留。"当日下午，吕达斯达约见顾维钧，告知："贵国所愿将山东条件保留一层，已达会长，据云势不能行，只有签字或不签字之办法。"顾维钧立即又提出另一方案："譬如不在约内注明，而另筹一正式手续，于开会数分钟前，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但该建议又遭拒绝。25日，吕达斯达再次约见顾维钧，他说："会长嘱告贵使，保留一层实不能行。"顾维钧问道："会长之言，是否专指欲在约中保留者而言？"秘书长答："系指各种保留。"(213)

26日，顾维钧又前往会晤法国外长毕勋，再次表示："此次和会解决山东问题，我侪认为不公道。……中国委员并非不愿签字，惟对于山东几款必须保留。"毕勋说："贵使所云山东问题解决之不公道，亦可如此说，惟约内保留一层，殊多未便。"顾维钧坚持道："如果山东问题不能保留，欲中国全权签字，十分为难。"这时，毕勋提议："贵使如在约外有所声明，并无不可。"顾维钧于是表示，中国方面可以勉强同意将保留意见作为附属文件，载于对德和约正文之后。但毕勋蛮横拒绝道："附于约后，仍为条约之一部分，亦万难办到。本外部愿闻中国代表究竟是否签字。"鉴于约内各种保留方案均遭拒绝，顾维钧只得再度让步。但他仍然强烈地提出："鉴于国内民意，不能不设法保留。……如果约内保留万做不到，则约外保留非办不可。"(214) 约外保留，即顾维钧前日提出的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由

中国代表向和会提交一份正式公文，声明保留山东条款。对此，毕勋表示报告列强首脑后再予答复。

27日下午，顾维钧再次前往会晤毕勋，毕勋说："昨嘱转达备函交会一层，兹会长嘱告中国，当在签约后酌备一函交会。"也就是仅允许中国代表在签订对德和约之后，提交一份保留山东问题的公文。顾维钧问为何不能在签约之前提交？毕勋答："会长言，未签之前，不能允许有提出保留之事。"这样，约外保留方案实际上也遭到拒绝。顾维钧对此表示遗憾，并向毕勋暗示中国可能拒绝签约。他说："中国为顾重和会全局，已一再让步至于极点，会中尚不能承认，深为可惜。准此情形，恐中国委员团未能签约。"[(215)]

中国代表团的一再交涉，并未引起列强的重视。据顾维钧回忆，当时和会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京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216)]。因此列强根本不把中国代表的抗议放在眼中。列强全然不知，昏庸无能的北京政府，已将签约的决定权完全推给了中国代表团。

自巴黎和会开幕以来，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先后提出多种方案，计有直接归还；先由五大国共管，而后交还；在条约内注明保留意见；将保留意见作为附录载于条约之后；签约之前发表一保留意见的正式文件，然而所有的让步方案均遭拒绝。

27日晚，在对德和约签字前的最后时刻，顾维钧拟定了最后一个让步至于极点的妥协方案，以争取签约。考虑到列强一再拒绝任何保留方案，该方案避开保留二字，仅提议在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声明签约之后，不得妨碍将来重新提议山东问题。该声明全文如下："今日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因该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兹特以其政府之名义

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因对中国不公道之结果，将妨碍远东永久和平之利益也。”[217] 陆徵祥当即批准了这一声明。

6月28日，巴黎和会经过半年多的争吵，这一天将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是日晨，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这一声明带至和会磋商，结果是：“候至午间，该会秘书长以函稿送还，仍完全拒绝。”这样，拒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中国代表团随即“公同决定，不往签字”[218]。

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施肇基早已离法）联名致电政府，报告拒约情况，指出：“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由于拒约的决定并非政府的指示，因此，中国代表团“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219]。最后，四位全权代表以“奉职无状”为由，请政府罢免职务，“交付惩戒”。

然而在28日下午，对德和约签字结束之后，中国代表团收到北京政府来电，“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这个时候才来电报，顾维钧感到“实可惊异”[220]。顾维钧回忆道：“我们代表团内的某些人也在揣测，或许北京政府并不想由自己来决定。北京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221] 这个推测，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秘笈录存》的编辑者曾在一段按语中注明：5月下旬，“是时中央政府及国内要人讨论一致，并向外交团各方面考询结果，议决签

字，并通电全国。……遂致学界发生激烈运动，演成全国罢学、罢市风潮。国务总理钱能训引咎辞职。继任代阁以迫于群众，遂电令专使仍非保留不签字，而专使团已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拒绝签字矣”[222]。该按语反映出钱、龚内阁在签约问题上态度的变化，证明政府电令确在中国代表拒约之后才到巴黎。同时表明，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是促使北京政府改变签约决定的根本原因。

拒签对德和约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中国外交开始冲破近代以来“始争终让”的惯例，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这一先例对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影响。

二　对奥和约的签订

对德和约的全称为《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也称凡尔赛和约，共分十五部，四百四十条。中国问题列在第四部第二编，共七条，其中规定德国放弃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归还庚子年间掠夺的古代天文仪器等。山东问题列为第四部第八编，共三条，规定德国在山东的铁路、矿产等等经济权益让与日本。

由于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从法理上讲，中德战争状态便未终止。6月28日，陆徵祥致电北京政府，提议：“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布中德战事状态告终。通过后即用大总统明令发表，愈速愈妙。”[223] 北京政府接电后答复说：“至所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国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224] 该电反映出北京政府在拒约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

尽管帝国主义出卖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徐世昌仍分别致电英、美

等国，对德约签字表示“最恳切之贺忱”。直至7月10日，徐世昌才发布一道命令，正式公布拒签对德和约一事。该命令以徐世昌特有的含糊其词的腔调表示：接到陆徵祥拒约电后，“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旷览友邦之大势，返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推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做为终结。”(225)

根据陆徵祥的建议，徐世昌于7月23日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对德恢复和平案》咨文，指出：“此次德约未经签字，系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其余各款，我国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现在协约各国对德战争状态既已告终，中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所处地位当然相同。查各国对德状态和好日期，系以六月二十八日为始，兹拟宣告：自六月二十八日起，中德战事状态终止。”(226) 8月1日，众议院以二百二十七票赞成，通过该案。8月2日，参议院以九十九票赞成，通过该案。9月15日，徐世昌发布布告，正式宣布：“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227)

在此之前，广东军政府于7月16日通告对德国恢复和平，表示：“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问题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保全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228) 未签和约竟然要向协约国表示“非常抱歉”，似乎是我国对不起协约国，军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然后，经广东非常国会议决，10月25日，军政府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对德战争状态应即宣告终止。”(229)

遵照北京政府训令，9月10日，陆徵祥和王正廷在圣日尔曼宫签订了《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又称《圣日尔曼条约》。该条约共十四部，三百八十一条；中国问题列在第四部第四编，共五条，规定奥地利放弃在中国的各项权益。该条约于1920年5月26日、29日，先后经国会众、参两院通过，徐世昌于6月18日下令批准。

1919年9月18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德战争状态终止，业于九月十五日布告在案。兹据专使陆徵祥电称：奥约已于九月十日经我国签字等语。是对德、奥战争状态，业已完全解除。"[230] 这样，中国自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以来，历时两年多的战争状态全部终止。

由于战争状态宣布终止，北京政府在对德、奥宣战后设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已不能继续存在。由于该机构并非简单地督办参战事务，实际上已成为皖系军事力量的核心机构，因此也无法将其简单地裁撤。7月20日，徐世昌命令："现在欧战告竣，所有督办参战事务处应即裁撤。惟沿边一带，地方不靖，时虞激党滋扰，绥疆固圉，极关重要。着即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特置大员，居中策应。"同时，徐世昌下令特任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231]。这样，督办参战事务处便改头换面，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继续作为皖系势力的核心。

由于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中断两年多的中德外交关系一时未能恢复。到1921年5月20日，德国政府代表卜尔熙在北京发表正式声明："允认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同日，根据这一声明，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和卜尔熙签署了《中德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人民于生命以及财产方面，均在所在地法庭管辖之下。""关税税则等事件，完全由该国之内部法令规定。"[232] 从此中德外交关系宣告恢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形式上平等的条约。

三　几段尾声

五四运动结束后，一度作为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逐渐恢复正常秩序。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北大师生三千余人为蔡元培返任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首先由学生代表致欢迎词说："当此秋光宜人之际，吾人得会集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情与莫大之感兴。""五四以来，为国家争外交，为国民争人格，备历诸人间辛苦、亡国先味。有受逮捕而入监狱者，有

被罗织而受审问者，有蒙殴击而丧生命者……四月之间殆无日匪困苦悲剧之生活。生等并非以此哀诉于先生、于国人而自馁也……自经历此四月困苦悲剧之生活，对于本身而得有许多之觉悟，对于人世而得有许多之了解。”最后，学生代表以深厚的感情对蔡元培说：“回忆反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校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接着，蔡元培致答词说：“四月不见，今日相聚，殊觉愉快。但我想自我出京以后，诸君数月以来，所处境遇日在困苦艰难之中，而我乃卧病乡里，甚为抱歉。吾以为诸君甚恨我，而不愿与我再见，不料叠被催促，勉强北来，今日复得闻此最恳切的谈话，非常惭愧。”(233)

21日，北京各校教员举行欢迎蔡元培的茶话会，蔡元培在会上致答词说：“我从五月九日出京以后，这几个月之中，学界发生种种艰难困苦的事，都是诸位先生身当其冲，我没有帮着一点忙。今天反受诸位先生的欢迎，真是惭愧得很。”他接着说：“这回学生举动对不对且不论，但因此可以证明，学生很有自动的精神。我们应该维持他们这种很好的自动精神，我们更应该自勉。”(234) 尽管蔡元培因学生之举也遭到当局的指责和打击，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学生们的行动，但他仍旧保持着他那可贵的开明的教育指导思想，爱惜保护学生的积极主动精神。

五四爱国运动虽然告一段落，但是，爱国救亡的火种在中国青年中一经燃起，就再也不会熄灭，中国青年运动一经发生，就再也不会中断。不久，青年运动又转向了对鲁案和闽案的抗议声援活动。此后，在中国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青年运动始终是一支十分活跃的政治力量，并且始终保持着爱国救亡的基本精神。

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次全民族的觉醒。巴黎和会惊醒了许多上层政治家，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被彻底摒弃，人们开始重

新认识世界和中国。梁启超在赴欧之前，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的希望，曾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互助进化的新纪元。随着中国外交的失败，他在英国写了一篇《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的文章，他说："当知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虽今日尚依然适用，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权者之一种口头禅，弱国而欲托庇于正义人道之下，万无是处。……当此吁天不应，呼地不闻之际，苍茫四顾，一军皆墨，忽然憬觉环境之种种幻想，一无足依赖，所可依赖者，惟我自身耳。"[235] 这个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帝国主义是世界救世主的幻想。

康有为曾把国际联盟的成立认作世界大同的到来，并为能亲眼见到这一天而"欢喜距跃"。但到1919年7月，他致函日本友人犬养木堂，请其将他归还山东的要求转达日本政府，同时对战后的国际关系做了重新认识。他说："诸国未平等，国际同盟惟强者马首是瞻，必不能即见大同之盛。"[236] 尽管他仍旧保留着不少的糊涂观念，尽管他仍旧瞩望着世界大同的到来，但他毕竟意识到，世界大同"不能即见"。

国民党人一方面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主要是对威尔逊还有幻想，另一方面也对巴黎和会表示愤慨。《星期评论》于7月6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德国停战那一天，凡是世界上参与战事和中立各国，没有不庆祝公理战胜的。""大会（指巴黎和会）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就是强国的会议。所以这欧洲的讲和会议，所标榜的'自由''正义''人道''民族自决'，都是虚伪的宣示，那些强国政治家的根本观念，仍旧不外'强权即正义'。这样看来，靠'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竟【只】能做一种空想。"[237]

以上言论表明，巴黎和会之后，各界人士都在程度不等地反省，尽管他们不可能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样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能够否定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这也是一定意义上的觉醒。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于6月7日提出辞职后，便准备离华。8月18日，芮恩施接到电报，威尔逊批准其辞职。随着芮恩施即将离任，北京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饯行宴会和欢送会。9月6日，国民外交协会等六团体为芮恩施饯行，芮恩施作了长篇讲话，后由胡适译成中文发表。他说："今年中国发生了一种国民舆论的大警觉，即以这事本身而论，已是一大进步。""这一次有许多少年学生很出力做事，帮助舆论的发展。他们的爱国心使人对于中国前途很可乐观。""这一次中国民意的大觉悟，总括看来，可以使我们断定中国将来的重要国事必须要先得国民的意见，必须要合于国民的需要。……一个政府若没有国民的公意与帮助作一个基础，决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政府。"(238) 这篇讲话，再次体现出芮恩施这位资产阶级外交官的比较开明的政治见解。

行前，芮恩施还特地约请北京学联代表前往谈话。9月9日，张国焘、傅斯年等五人应约来到美国使馆，芮恩施对他们谈道："此番学生运动发生后，我实敬佩，中国当此时会，自必有此类之提醒作用。"张国焘代表学联向芮恩施递交了一份《北京学生联合会送别美使书》，表达了对芮恩施的惜别之情，其中说："敝国现当内忧外患交乘纷逼之秋，将欲藉重于先生之明教者，视前尤为恳切。则先生此次离华归国，实令吾人懊丧之情靡有止际。"(239)

最后，徐世昌于9月8日设午宴为芮恩施饯行，徐说："中国人都希望您做他们的朋友和指导者，我希望您的行动和影响会延续好几十年。"(240) 上述种种临别赠言表明，芮恩施所坚持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对华政策，由于直接针对着当时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芮恩施也给中国各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9月13日，芮恩施接受北京政府的聘请，担任政府顾问，并签订了顾问合同，随即到总统府向徐世昌辞行，二人做了长时间交谈。当晚，芮恩施乘火车离京返国，后于1923年去世。

陆徵祥自1918年12月出使欧洲，历时一年。1919年12月11日，陆偕夫人由马赛登轮归国，王正廷、魏宸组等同行。然后王正廷返回广东，陆、魏等人于1920年1月22日抵达上海。当轮船驶入吴淞口后，数千群众沿岸举着标语欢迎，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等等。船靠黄浦码头后，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等，代表各团体登轮拜访了陆徵祥。当晚，陆乘火车北上返京。24日晚，陆徵祥回到北京，前往迎接的有美、法、比等国外交官员，日本使馆没有派人前去。各群众团体万余人聚集车站表示欢迎，手执“欢迎不签字之陆专使”等标语，并高呼“尊重民意”、“公开外交”等等口号。人民群众将陆徵祥视为拒约的英雄，但是他却有自知之明，一言不发，匆忙离去。

鉴于国内外严峻的形势，特别是拒约后国际局势难以预料，2月13日，陆徵祥提出辞职呈文，声称：“病难骤痊，恳准开缺。”陆徵祥使欧一年，几乎也辞职一年，这回总算如愿。这位民国以来曾十度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其中一次为国务卿）的外交元老，自此基本脱离仕途。1927年，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1949年1月15日病逝于布鲁日。

四　山东问题的继续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得到西方舆论广泛同情，特别是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情。美国各界舆论对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让步极为不满。7月，北京政府顾问美国人福开森致电政府，报告美国舆论情况。因为当时盛传中国将补签和约，他建议说：“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对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241)

美国政府虽签订了对德和约，但必须经美国国会通过才能生效，然而该条约遭到国会特别是共和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其中重要一点就

是山东问题。一位参议员表示："中国加入欧战，系因美国劝告，并允在和平大会上维持中国权利。今以山东畀日，无异卖友。故宜将德约内关系山东一款删除。"[242] 7月15日，美国参议院在辩论对德和约时，又有一议员发言说："日本曾以秘密运动得英、法、意、俄四国之保证，允于战后和会将德人在山东所享之一切利益转移于日本。……日本此种预备媾和之举动，行同贿赂，实属不顾名誉。"[243]

由于受到国会和各界舆论的压力，美国国务卿蓝辛于7月提出一个调停山东问题的八条措施，其中规定："山东省内日本无主权"，"日本归还胶澳租权，并除铁路外，凡租借地内日本获得之权利、物权及特权，均向中国放弃之。"[244] 为此，美国方面于7月25日会晤了日本牧野男爵，"告以美上议院反对德约内山东条款，甚为激烈，如日本不允照蓝辛外部所提八款重具宣言，恐全约将为美议院拒不批准。"[245]

这时，日本方面多次催促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芮恩施建议北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直接交涉无异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主权。他建议："美民以为山东事宜，中国政府现以完全不问为上策。在中国承诺德约以前，日本仅能要索，而不能谓在山东已得有何等权利。"[246]

与此同时，国内舆论也强烈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反对补签对德和约。9月5日，吴佩孚发表通电，指出："前据鲁省会皓电称，有中日直接交涉补签德约消息。当即电询中央，据养日院电文曰：'吴师长鉴：马电悉。德约现无补签之事，鲁电失实，希释疑虑。院养'等语。师长以'现无'二字语涉含混，复电请示，其文曰：北京国务院龚代总理钧鉴：养电敬悉。德约现无补签之事，已据情答复鲁会……惟细味原电'现'之一字，似有含蓄未尽之余意……可否由钧院将'现无'二字易为'决不补签'一语，宣示全国，而定人心。"[247]

此外，广东军政府六总裁也于9月5日以"歌"电致龚心湛："据谭

湘督延闿等沁电，略谓：顷闻北方将与日人直接交涉补签德约，人心愤激。……前次拒绝签字，深合人民公意，且得友邦同情，今若补签，将何以自解于天下？”9月9日，龚心湛复电说：“歌电悉。德约并无补签之事，湘电系出传讹。”(248)

在国内外人士的建议和反对下，北京政府没有补签对德和约。同时，由于对德和约未能确立美国在战后的世界霸主地位，该条约最后未能得到美国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为美国国会否决。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给予一向藐视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教训。日代表牧野伸显由欧返日途经上海时，曾在船上对上海日侨谈道：“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之中国委员，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余观察则不如是。余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已数年之久，有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耳。”“此次中国委员既非激于意气，出于偏爱，而为代表国民全体之活动，则留意中日根本关系而欲图永久亲善者，又乌可漠然视之乎？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难境，未可知也。”(249) 显然，牧野已意识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之举，并非个人行动，而是中国国民酝酿已久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爆发；日本如不认识这一点，可能因中国问题而陷入困境。这种见解不失为有先见之明。

为应付美国参议院和中国的反日情绪，8月2日，日本外相内田发表山东问题正式声明，要求将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无赔偿、无条件引渡之于日本，同时信守一九一五年与中国所结之誓约（指“二十一条”），宜将该租借地全部还附中国，俟议和条约批准之处，即当从速实行”，实际上是重申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的要求，即德国租借地先交付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所不同的是，以往对此只作口头声明，现在则改为正式声明。内田还表示：“中、日两国商议胶州湾还附之协定成立之后，所有现在该租借地及胶济铁路日本之守备军队，当即全部撤去。”(250) 这实际上是在诱使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内田声明发表后，美国方面曾征询顾维钧意见，中国是否可以补签对德和约。顾维钧认为，内田声明措词空泛，缺乏明确保证。对于内田提出信守1915年条约，交还胶澳租借地的许诺，顾维钧深刻指出："日本似欲以承认二十一款之条约为交换条件，果尔，中国更难与议。"[(251)] 8月14日，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建议："就目下情形，在我仍以暂不补签为宜。"[(252)]

由于对德和约为中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所拒绝，这样，山东问题便成为中日两国间和世界列强间一个悬而未决的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就为在1921—1922年召开的以解决远东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会议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山东问题，准备了条件。

第六节　"五四"前后的孙中山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包括"五四"与"六三"两个阶段，而国民党人在这两个阶段有着鲜明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五四运动发生后，5月7日，《民国日报》发表叶楚伧署名的社论，标题是《五月七日之神》。他指出："在万钧压力下，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来，这是五月七日之神，这是中国的恩人，这是山东问题濒危中救命的丹方，这是留得一分两分良心的国民的模范，所以我应该代表国民，向北京学界，伸一百二十分的谢忱，并且誓与被捕的学生同生共死。"[(253)] 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叶楚伧把北京学生称作救亡雪耻的"五月七日之神"，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5月8日，张继、戴季陶等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各通讯社、各报社驻上海的新闻界人士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的要求表示愤慨，指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

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与日本各方面有着长久的历史关系，张继等人最后表示：“予等因个人与日本国民间之友谊，谨以至诚恳真率之言，为日本国民告，深望贤明之日本国民以自由、平等、互助之精神，自根本上改造其政治组织，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爱和平、重德义，为中国数千年之德性，他日必能弃旧恶，以与日本国民相友善也。”(254)

就像许多西南护法人士那样，国民党人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地把五四救国运动和他们的护法运动联系起来。南北和议破裂后，叶楚伧随即发表题为《和议争点之第五条》的社论，集中对唐绍仪提出的八条件中的第五条即国会问题作了阐述。他说：“卖国之贼，与依法召集之国会，势不两立者也。有国会则贼虽欲卖国，国会得扼其吭，使不吞吐国脉。”“自国会非法解散以来，卖国之贼，大行其志，送路、送矿、送主权、送土地之事，不绝发生。国民含一泡眼泪，见其脔割出卖于人而无可如何。呜呼！假令有国会在，诚何至于此。”(255)

如果说国民党人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还能够给予一般性的支持，那么当六三运动发生后，他们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就不同了。

6月9日，《民国日报》发表题为《罢工问题的商榷》的社论，对于工人运动一开始就表示出一种“商榷”的保留态度。社论说：“工人的生计，是很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又说：“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如确有振兴国货挽留利益的功效，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因为能多出产许多国货，即所以抵制许多日货。”还说：“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害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256)

在国民党人眼中，无产阶级仅仅是“很穷”的受苦的一群，对于工

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救国并非他们的职责。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估价，表现出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他们所担心的是，罢工会影响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要求多产国货以抵制日货，总是拿自己的利益去要求工人阶级服从。对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他们赞之为“中国的恩人”、“国民的模范”，而对于“缺乏智识”的工人爱国行动，则只是表示“忧虑”。

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也曾对学生问题和山东问题发表意见。7月中旬，当广东军政府大批逮捕学生时，孙中山曾致电军政府要求释放学生。他说：“闻警厅因国民大会拘捕工、学界代表，将加以殊刑。……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257] 另外，在对德和约签字前夕，孙中山发表了一份关于山东问题答日本记者的书信，谴责日本对山东的权利要求。他指出：“夫中国尚未隶属于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对中国擅行其决否之权，而且以行此权而得列强酬偿矣，此非卖中国之行为而何？”他最后表示：“是日本今日之承继德国山东权利者，即为他年承继德国败亡之先兆而已。东邻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258] 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山东应归还中国的种种理由。

上海的工人运动发生后，孙中山于6月中旬和戴季陶做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专门讨论劳工问题的。戴说：“那些工人本身，多数是不曾受过教育，几十人中找不出一个识字的来，所以他们阶级的自觉，是一点也没有的。”戴季陶在谈到六五罢工斗争时说：“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对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危险的。”以上就是戴季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估价。但他从六

五罢工中敏锐地觉察到，工人阶级直接参预政治活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为此，他向孙中山建议，应加强对工人的指导和领导，否则是很“危险”的。孙中山接着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戴答是后者。孙说：“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我们要晓得，群众的知识是很低的，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或者是教训指导知识很低的人。”(259)

中国无产阶级一向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追随者，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来是指导和被指导、教训和被教训的关系。但是，随着六三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摆脱对资产阶级的追随地位而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国民党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要加强对工人的指导，以防止无产者脱离对他们的政治追随。

总之，国民党人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既不同于一般舆论的同情，也不同于一般舆论的抨击。这种态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褒或贬，而是中国无产阶级以磅礴的气势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性时刻，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思想状态。这当中，包括几分惊讶，几分茫然，几分同情，当然也包括几分恐惧，几分敌视。

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260) 事实正是如此。这表明，在新、旧民主革命开始发生转折的历史关头，国民党人也开始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他们的历史地位，正在为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取代。

二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和中国国民党的建立

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孙中山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党的组织建

设和思想建设，这就是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为其制订新的政治指导纲领，即著名的《建国方略》。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这时，黎元洪继任总统，表示遵行《临时约法》，并恢复了国会。因此，孙中山在取消中华革命军的同时，也取消了中华革命党。1916年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分、支部发出通告："奉总理孙先生谕：本党成立，实继癸丑革命而起，其重要目的，在推翻专制，重造民国。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见。"[261] 这篇通告，实际上宣告了中华革命党的结束。

考虑到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同时由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影响甚小，于是孙中山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以便增强在国会的地位，同时也便于扩充党务。1916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函全国各同志，表示："日前在京议员及各埠同志，每有规复国民党之议，而国会议员隶国民党籍者尚居多数"，"现弟为党务之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262]

但是，孙中山对于简单地重组国民党并不热心，不仅不参预组建，而且曾表示不愿加入。1917年1月27日，孙中山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关于改党之组织，弟并非不赞成……然弟以自身不欲入政界，故虽甚赞成组织政党，而决不加入。所有办党之事，悉以委之唐少川君。唐少川君本拟将旧国民党重行收集，立一新大政党。"[263] 可见孙中山最初曾将重组国民党的工作委托唐绍仪办理，而唐的基本方针是恢复旧国民党。

在重建国民党的方针上，孙中山和唐绍仪不同，他赞成恢复国民党名称，但不赞成简单地恢复旧国民党，更不赞成放弃中华革命党的

基本原则。1916年10月25日，孙中山致信郭标，指出："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故百【凡】凡【百】事业，须从整顿党务入手。承询组党办法，现方编订党纲及重订规程，所有党纲未寄到以前，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264)

1916年岁末，改组工作在迅速进展。12月10日，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说："各埠屡有函来问，满任职员应否改选？查本党改组在即，若重新逐一选举，反形烦琐。"(265) 不久，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在1917年第二号通讯中指出："恢复国民党名称……已经拟定章程，俟商诸各同志，征求各方面同意，再为发表。" (266) 数月后，1917年3月3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向党员发出通告，准备改用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但是，不久由于张勋复辟和护法战争等事件发生，中华革命党改组一事不得不暂告停顿。

尽管中华革命党没有正式改组，但孙中山已开始用国民党的名义任命干部。另外，缅甸支部在1919年3月的一份通告的附则中写道："本支部自去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惟历接上海本部来件，印章俱用中华国民党，故本支部亦当从之，以昭划一。"然而新加坡支部1918年5月所发一份函件，则仍用"中华革命党新加坡支部"名称 (267) 。可见这段时期名称的使用比较混乱，中华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两种名称曾同时并用。

1918年6月，孙中山因护法战争失败，回到上海。如果说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起到过一定作用，那么，在护法战争中，由于孙中山几乎完全依靠滇、桂军阀，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护法战争的失败给予孙中山一次深刻的教训，他开始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不能依靠他们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依靠革命党。他决心著书立说，整顿党务，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增强党的建设，重振国民革命。于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上。

1918年8月30日，孙中山发表《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他感慨地说："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国事者垂三十年，无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强富；此心此志，为公为私，当为吾党所共喻。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不挠者，此非尽文一手一足之烈，纯恃吾党诸君子竭力相维。"从不断的失败中，孙中山看到只有一些国民党人能够追随他奋斗，深感只有国民党能够肩负起救国重任。他说："故文深信吾党实系于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向海外同志表示："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268)

为发展党务，孙中山改变了中华革命党只对海外招收党员的做法，开始在国内公开组织并吸收党员。许崇智等率粤军援闽后，有人致函孙中山请示可否在闽建立党部，1919年8月23日，孙中山批复道："自本党本部成立以来，只对于海外招徕新党员，对于内地尚未举行，以不在吾人范围也。……以后凡在吾人势〈力〉所到之地，皆当仿行就是。"(269)

孙中山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引用西方通讯社消息，迅速报道了十月革命消息。1918年1月1日，《民国日报》发表孙洪伊署名的元旦社论，写道："爱自由、爱平和之俄国国民，其对于罗马诺夫皇家之革命，与吾国辛亥义师同一意义也。然新政府（指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组织甫成，而外患内忧益加强度，里昂失陷，彼得城之危险更急，新政府颠覆，全国重陷于无政府之状态，其乱今未艾也。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所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270) 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俄国二月革命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认为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意义相同，但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则比较模糊，竟然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垮台和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之后的一系列失败做简单的类比。

但时隔不久，孙中山对俄国革命逐渐有所认识，1918年夏，他曾致电苏维埃政府，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271] 该电虽未找到原件，但确曾拍发，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载："总理电祝苏俄布尔塞维克党革命成功。其时欧美各国，皆仇视苏俄甚，得此一电，列宁大为感动，乃乐与本党携手。"[272]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也记载了此事。孙中山当时对俄国革命的理解究竟如何，目前尚缺乏材料，但该电至少表明，孙中山已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引为革命同志。

由于孙中山专心致力于党务和著述，因此对时事政治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1918年10月3日，他在一封复函中说："文返沪以来，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273] 1919年8月28日，他又在一份复函中写道："文近时观察国事，认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274] 正因为孙中山采取闭户著书、专理党务而对时局暂守静默的态度，因此他没有能够给予五四运动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但是，五四运动不论文化运动，或是爱国运动，都曾给予孙中山以很大影响。

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在《复蔡冰若函》中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正【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275] 不久，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又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

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76]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不仅加紧了自己的著述、研究工作，而且积极指导他的战友办理《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

其次就是爱国运动的影响。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277] 正是爱国运动的影响，促进了孙中山关于组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经过长时间筹备，1919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日，国民党发出通告，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规定：“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278] 国民党之前再加上“中国”二字，为的是在名称上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而且其性质也和旧国民党不同。旧国民党由五党团合并而成，而中国国民党则直接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新党章第四条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华革命党的基本精神得以延续。

10月13日，原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主任居正呈请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主任，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当即批令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279]。

与此同时，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曾经以排满为主要目标，因此辛亥以后，革命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一度模糊起来，中华革命党党章干脆取消了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了反对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的纲领。这次重新恢复三民主义，表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说，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这是确定不能改易的。"[(280)]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所作的这一解释，表明他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民族问题的基本问题，表明中国国民党党章是在对帝国主义做出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恢复三民主义的。这是一个进步。

为了更广泛地吸收党员，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同时，新党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十元者即可入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带有封建性的苛刻条件。应该说这也是一个进步，使国民党更加具备现代政党的面貌。"五四"以后，国民党"大量吸收青年入党"[(281)]。

尽管中国国民党在10月10日的通告中要求即日停止使用中华革命党名称，但两日后，孙中山在给福建方面的一封复函中指示道："又闻拟重新结合党人，以发展党势，切实进行，此诚今日切要之图。惟国民党分子太为复杂，非仍用中华革命党名义不能统一号令，发扬革命原始之精神。"[(282)] 可见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始，由于影响有限，仍要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区分从前的旧国民党，党的名称并未立即统一。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他的建党思想的根本点，即是要把国民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建成一个有战斗

力的政党，以肩负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任。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阐述党的责任问题。他说："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九年以来，我们得了许多经验，许多教训。以后我们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同【传】他到全国，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283] 在这里，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再进行"一番大革命"，以建立一个真中华民国，并且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向全国。

孙中山一生重视党的建设，在每个历史阶段，除了进行组织整顿外，都制订了相应的思想、政治指导原则。同盟会时期，他制订了《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华革命党时期，他制订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现在，为组建中国国民党，他精心撰写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篇著作，后与《民权初步》合并，这就是著名的《建国方略》。可以说，《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面对革命的不断失败，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应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为此，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又称《心理建设》，提出了"知难行易"这一著名命题。这不仅反映了孙中山的认识论和宇宙观，更重要的是，它是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性。它是孙中山在护法战争失败后，为清算党内消极思想，为推行其建国方略，再建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提出的理论基础。因此，孙中山将"心理建设"放在《建国方略》之首，作为"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先导。

孙中山所说的"知"和"行"都不是抽象的。"知"实际上是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行"即实行革命之意。孙中山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而中心思想是强调"行"。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他自信地宣称："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

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孙文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孙中山是第一个为解决自身的革命实践而自觉研讨知行关系的革命家。《孙文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史上最先进的认识论思想。

如果说《孙文学说》主要是解决革命实践的认识问题，那么，《实业计划》则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勾画出了具体而宏伟的蓝图。《实业计划》的撰写表明，孙中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建设两个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他的设想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尔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孙中山并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而是要建立起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

《实业计划》全面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中国将进行铁路、港口、水陆运输、电力、石油、矿业、钢铁、建筑、机械、纺织、粮食加工等等大规模工业建设，同时兴建水利，移民垦荒，改良种籽，广泛造林，实现农业现代化。孙中山还提出了开放门户、吸引外资、培养建设人才等重要思想，反对闭关自守的小生产思想，这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的实际需要的。

此外，还有不少具体建设方案，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总的来看，《实业计划》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在当时就不可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利用外资。这些宏伟的设想，只有在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能逐步变为现实。

如前所述，孙中山这次组建中国国民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它建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政党，使之担负起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但是，这次改组并未能实现孙中山的上述意图，相反，国民党的历史局限性却愈来愈大了。除了种种具体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潮流并没有按照孙中山所指示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的主流，正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开始走向另一条救国之路——俄国人的路。《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发表，没有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也不可能将广大革命人民吸引到国民党的周围。实际上，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孙中山的学说便逐渐失去了在思想界的吸引力。

1920年11月，粤军驱逐桂系，孙中山回到广东，开始组织第二次护法战争，重新踏上和军阀争地盘，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旧路。历史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已经改变方向，开始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两个阶段。“五四”前是启蒙运动的性质；“五四”后，这一性质虽仍然存在，但是，它已增加了新的因素，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综合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来看，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他在1918年的几篇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还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的话，那么，他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了。李大钊这时已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284)]。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

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从“马克思研究号”出版以后，《新青年》曾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

著名的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在“五四”前并没有发表过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在“五四”后，这类文章增多了。例如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登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第2卷第2、第3号连载有《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第2卷第4号载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

除《新青年》、《国民》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不同的角度大量登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晨报》副刊是在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实现改组的。改组的第一天，就登载了李的论文：《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和无血的社会革命》。论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5日）的时候，

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编了一个“马克思研究号”，而且也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了五篇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19年8月7日至11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1919年内）达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同时，实用主义也在中国流传开来。由于杜威亲自来华宣讲[285]和胡适的鼓吹，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思潮，不仅被引进到学术领域，也被引进到政治领域。

胡适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提出了他的政论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以教训的口吻说道：“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文中说的“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主要是指的马克思主义。

胡适的挑战引起了李大钊的反击。李在《每周评论》第35号（8月17日出版）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

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在“五四”当年（1919），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些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但是，他们都是三民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可以举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他们虽研究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学说，却只是徘徊在门口而未登堂入室。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他们不仅却步不前，而且站到它的反面去了。

在“五四”当年，真正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是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在青年学生中则几乎没有[286]。

不可否认，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在当时已成了时髦的名词。在1919年出现的不少刊物上，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多数青年学生都还没有科学的了解，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当时除科学社会主义外，以下各种学说都是被当作社会主义流派介绍到中国的：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

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使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眼花缭乱，莫知所向。这种情况，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287]

在各种新思潮中，对青年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互助论、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把以上

各种思潮加以综合提炼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主义”[288]。这种主义，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王光祈最初的设想，是想仿照日本的新村，在北京郊区建设“菜园”，企图通过一种美妙的没有剥削的菜园子生活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但是，知识分子既无土地，也不熟悉农村生活，“菜园”的空想无法实现。王光祈不得不把这种“新生活”移植到城市中来。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并把这种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有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

这样，在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于1920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一场工读互助运动。北京的互助团建立有四个组，此外，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也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实行公有制，“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它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289]。

工读互助团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却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一群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都躲进工读互助团这个美妙的“世外桃源”过着共产生活，这能够行得通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不科学的理论或措施，不论它是怎样用激情，即使是带有群众性的激情伴随着；不论它是怎样地受到鼓吹和赞扬，甚至是由衷的歌颂，都不可能逃避失败的命运。工读互助团运动由于它的空想，仅仅几个月就暴露出经济危机、人心涣散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并导致它的失败。中间，这种激情表现的最高

昂、步子迈得最猛的，它矛盾也就暴露得最早、最严重，失败的也就最早。北京互助团第一组就是这样。第一组解散后，第二组也跟着解散。大概第三、四组还继续了几个月，但没有多久，也就销声匿迹了。至于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进入尾声，有的则还在筹备期间便无下文了。

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界，特别是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即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而形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并以他们为桥梁，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所以在这样的时间形成这样的一种热潮，其因素是：

一、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教育了人们必须追求科学。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胜利。俄国在1917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个政权还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的困扰，那时还不能说这个政权是巩固的，因此中国人所听到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也是纷乱的。1919年下半年，盘踞在远东的高尔察克军被消灭，局势稳定下来了。到1920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在全俄巩固了。这就使中国人民不仅产生了希望，也看到了榜样。

三、和上面一个因素相联系的情况是：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就正式对中国发布了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但由于俄国当时被封锁，这个宣言直到1920年3月才传到中国。这给了中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三四月间，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都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谢电。

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六三运动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在日益加强。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比较

广泛地纪念“五一”劳动节，上海和北京的纪念规模都是相当大的。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隆重地纪念“五一”劳动节。《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还约了十三位工人题字。该号还发表了各国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许多调查报告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写成的。这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已经开始结合，因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深入工人群众，这些调查报告是写不出来的。

五、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包括列宁的一些著作，在这时也开始流行。

六、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引起了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1919年3月成立）的重视，因此在中俄交通已经打开的时候（1920），便急速派代表到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这样，到1920年下半年，在新文化运动著名领导人陈独秀及李大钊等的发起下，上海、北京等地便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准备。

---

(1)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

(2)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4)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175页。

(5)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6)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7) 《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

(8)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9)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0) 《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1)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2)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3) 《新青年》第5卷第6号。

(14)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15)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16)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7)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8)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9)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

(20) 《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1) 1918年3月，《新青年》导演了一场著名的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通信，以封建文人的口气抨击新文化运动，同时发表刘半农作的一篇近万言的文章，逐一驳斥了“王敬轩”的论点。

(22) 《新青年》第6卷第1号。

(23) 《李大钊文集》上，第661、662页。

(24) 《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

(25) 《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26)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3号。

(27) 《孙先生之社会主义讲演录》，《民立报》，1912年10月15、18

日。

(28) 《新的！旧的！》，《李大钊文集》上，第539、540页。

(29) 《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卷第18页。

(30) 《李大钊文集》上，第573、575页。

(31)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599、600、603页。

(32)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1918年11月2日。

(33) 《参议院公报》，1918年11月5日。

(34)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0页。

(35) 《众议院速记录》，1918年11月2日。

(36) 《政府公报》，1918年11月17日。

(37)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1918年11月2日。

(38) 《政府公报》，1918年11月23日。

(39) 北洋政府内务部礼俗司档案。

(40)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41) 以上均见《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

(42) 《政府公报》，1919年2月8日。

(43) 《宪法研究会之梁任公饯别会》，《晨报》，1918年12月21日。

(4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4页。

(45) 《总统在外交委员会之演说》，《晨报》，1918年12月20日。

(46) 《国际联盟同志会缘起》，《晨报》，1919年2月7日。

(47)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纪事》，《晨报》，1919年2月17日。

(48)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6页。

(49)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62、63页。

(50) 均见顾维钧1917年4月9日致政府密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

(51) 《叶遐庵年谱》，第68页。

(5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4页。

(5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5页。

(54) 《革命文献》第49辑，第259页。

(55)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页。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164页。

(57)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

(58) 《顾维钧回记录》第1分册，第183页。

(59)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附录。

(60) 陆徵祥1月27日致政府密电。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3页。

(6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附录。

(62) 《日本对华外交之宣言》，《晨报》，1919年1月23日。

(6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4页。

(64) 以上所述1月28日的辩论，均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4—267页。

(6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8、269页。

(66) 《外交当局对于中日问题之声明》，《晨报》，1919年2月10日。

(67) 《—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9页。

(68)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24页。

(69)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58页。

(70) 《—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9页。

(71) 朱启钤存稿，这是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致朱启钤的密电。

(7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十八次会议。

(73)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十八次会议。

(74) 吉田茂是牧野伸显的女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任日本总理大臣。

(75)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附录。

(76)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25页。

(77) 《对德奥提出之要求条件》，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78) 《秘笈录存》，第196页。

(79)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80)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81) 《秘笈录存》，第117页。

(8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89页。

(83) 陆徵祥4月18日致北京政府的密电，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5页。

(8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6页。

(85) 《秘笈录存》，第136、137页。

(86) 三条款全文如下：

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备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七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八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名义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

以上均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

(87)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88)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39、40页。

(89) 《秘笈录存》，第146页。

(90) 《秘笈录存》，第152页。

(91) 《秘笈录存》，第204页。

(92) 《梁任公在巴黎时报之言论》，《晨报》，1919年3月30日。

(93) 《梁任公之重要来电》，《晨报》，1919年3月22日。

(94) 《国民外交协会之来往电》，《晨报》，1919年3月25日。

(95) 《每周评论》第18号。

(96) 《七团体和平决议》，《民国日报》，1919年4月18日。

(97) 《上陆顾王三专使电》，《晨报》，1919年4月27日。

(98) 《山东竟如是断送耶》，《晨报》，1919年5月2日。

(99) 《晨报》，1919年5月2日。

(100) 《昨日之众议院》，《公言报》，1919年5月3日。

(101)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02) 曹瞒指曹操，历史上认为是奸臣，这里是指曹汝霖。章惇，《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这里是指章宗祥。

(103)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04) 《学生团上美公使说帖》，《晨报》，1919年5月6日。

(10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3页。据京师地方检察厅5月5日的调查报告，曹汝霖当时躲在浴室。另据该检察厅对曹宅佣工的调查，章宗祥当时躲在地窖。

(106) 《每周评论》第20号。

(107) 《图穷而匕首见》，《申报》，1919年5月9日。

(108)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晨报》，1919年5月7日。

(109)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

(110)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

(111) 《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1126年，金兵初围汴京，宋钦宗罢免李纲，对金求和。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痛斥投降派，要求复用李纲。高宗即位后，李纲再度被罢，陈东与进士欧阳澈再次上书，文词激昂，结果被杀。

(112) 《公言报》，1919年5月5日。

(113) 转引自《每周评论》第22号。

(114)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

(115)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6日。

(116)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117) 《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上大总统书》，《晨报》，1919年5月20日。

(118) 《张謇最近之主张》，《晨报》，1919年5月27日。

(119)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12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5页。

(121)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5页。

(122)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12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6页。

(124)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1日。

(125) 《曹汝霖氏声明受害被诬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12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29页。

(12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0页。

(128)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79—81页。

(129)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52、53页。

(130)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23页。

(131)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6页。

(132)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0日。

(133)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134) 《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5) 《政府公报》，1919年5月7日。

(136) 《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7)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熊希龄1914年曾任煤油督办。

(138)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139)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40) 陆徵祥夫人为比利时人。

(141)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142) 《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143) 《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

(144)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0、321页。

(145)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2页。

(146) 《张督军复国务院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

(147) 《陈光远力争青岛电》，《申报》，1919年5月27日。

(148) 《王占元来电内容》，《晨报》，1919年5月16日。

(149)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150) 《晨报》，1919年5月21日。

(151)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1、202页。

(152) 《晨报》，1919年5月27日。

(153) 《政府公报》，1919年5月26日。

(154) 《公言报》，1919年6月8日。李盛铎、王揖唐私下是赞成签约的，但在公开场所又表示反对。政府这一密电声称，签约的决定得到两院议长的同意，然而李、王二人后来均公开予以否认。私下一套，公开一套，这是政客惯用的手段。

(155) 《公言报》，1919年5月28日。

(156) 《公言报》，1919年6月2日。

(157)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3页。

(158) 《公言报》，1919午6月9日。

(159)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0) 《护军使、道尹请免曹、陆、章电》，《申报》，1919年6月10日。

(16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1页。该辞呈未署日期，据《公言报》6月5日消息，系6月4日提出的。

(162) 《曹汝霖再辞与政府》，《公言报》，1919年6月9日。

(163) 《政府公报》，1919年6月11日。

(164)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16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16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陈孝威序。

(167)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8)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9) 《安福系某君关于政局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6月12日。

(170) 《政府公报》，1919年6月14日。

(171) 《龚兼总理就职后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6月17日。

(172)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

(173) 《安福部某议员对于内阁问题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7月8日。

(174)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57、258页。

(175)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75页。

(176)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5页。

(177)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7页。

(178)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6页。

(179) 5月31日，武汉学联决定6月1日举行总罢课，声援北京、上海的总罢课。王占元立即宣布全城戒严，阻止学生上街游行。6月1日，各校学生不顾警方阻拦，冲出校门，军警用刺刀、枪柄对学生大打出手，数十名学士被刺伤和逮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18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1、352页。

(181) 《吴佩孚反对签字要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2日。

(182) 《广东参众两院通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

(183) 《请释讨贼学生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

(18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336、337页。

(185)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220页。

(186) 《孙洪伊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

(187) 《唐少川与无锡代表之谈话》，《申报》，1919年5月17日。

(188)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第51号，第147、148页。

(189)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第42号，第129页。

(190)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1)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2)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3)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第51号，第150页。

(19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8页。

(195) 《秘笈录存》，第221页。

(196) 《秘笈录存》，第212页。

(197) 《秘笈录存》，第212、213页。

(198) 《秘笈录存》，第213页。

(199)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

(20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7页。

(201) 《秘笈录存》，第219页。

(202) 《昨日安福部之特别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10日。

(20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6页。

(204) 《龚代阁与西报记者谈话》，《申报》，1919年6月26日。

(205) 《请看山东代表之热烈行动》，《晨报》，1919年6月21日。

(206) 《山东代表谒见总理情形》，《晨报》，1919年6月22日。

(207) 《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见总理详情》，《晨报》，1919年6月27日。

(208) 《鲁请愿团谒见总统详情》，《晨报》，1919年6月24日。

(209) 《政府对鲁代表呈文之批词》，《晨报》，1919年6月28日。

(210) 《昨日各界代表请愿详情》，《晨报》，1919年6月29日。

(211) 《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数日后，由北京学联贷款，屈武等离京赴沪，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

(21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页。

(213) 《秘笈录存》，第219—221页。

(214) 《秘笈录存》，第221、222页。

(215) 《秘笈录存》，第222、223页。

(21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页。

(21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52页。

(218)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219) 《秘笈录存》，第223页。

(2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9页。

(22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10页。

(222) 《秘笈录存》，第215页。

(223) 《秘笈录存》，第224、225页。

(224) 《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第222页。

(225) 《政府公报》，1919年7月11日。

(226) 《公言报》，1919年7月27日。

(227) 《政府公报》，1919年9月16日。

(228) 《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

(22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1月—12月，第323页。

(230) 《政府公报》，1919年9月19日。

(231) 《政府公报》，1919年7月21日。

(232)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67、168、169页。

(233) 《北大欢迎蔡校长之盛况》，《晨报》，1919年9月21日。

(234) 《晨报》，1919年9月22日。

(235) 《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236) 《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卷。

(237) 《拒绝签字》，《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

(238) 《美使芮恩施君的临别赠言》，《晨报》，1919年9月14日。

(239) 《美公使与学生代表之谈活》，《晨报》，1919年9月11日。

(240)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94页。

(241) 《秘笈录存》，第226页。

(242) 《秘笈录存》，第226页。

(243) 《秘笈录存》，第230页。

(244) 《秘笈录存》，第237页。

(245) 《秘笈录存》，第239页。

(246) 《秘笈录存》，第280页。

(247)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248)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249) 《牧野之中日关系谈》，《晨报》，1919年9月13日。

(250) 《秘笈录存》，第240页。

(251) 《秘笈录存》，第243页。

(252) 《秘笈录存》，第245页。

(253) 《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

(254) 《张继、何天炯、戴传贤告日本国民书》，《民国日报》，1919年5月9日。

(255) 《和议争点之第五条》，《民国日报》，1919年5月16日。

(256) 《民国日报》，1919年6月9日。

(257) 《致广东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4页。

(258)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3、74页。

(259) 以上谈话均见《星期评论》第3号。

(260)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261)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民国日报》，1916年7月28日。

(262) 《致全国各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7页。

(263) 《复宋元恺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页。

(264) 《复郭标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2页。

(265) 《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01页。

(266) 《革命文献》第49辑，第5页。

(267)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第412页。

(268)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500页。

(269) 《批赖□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0、101页。

(270) 《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271) 《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272)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韬养时期”。

(273) 《复阮伦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5页。

(274) 《复廖凤书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

(275) 《复蔡冰若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

(276)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277) 《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0页。

(2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7月—12月，第215页。

(279) 《批居正呈文》，《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6页。

(280)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281) 《邹鲁全集》第3卷，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303页。

(282) 《复宋渊源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6页。

(283)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263页。

(284) 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期，实际出版日期晚于5月（在9月），但有些文章的写成却早于5月。

(285)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在中国逗留两年零两个月，到过十一个省。《杜威五大讲演》，在他未离开中国以前，就已出了十版。

(286) 根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只有当时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学习的十九岁的张闻天在1919年8月19日—21日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问题。文章的最后，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这是在十月革命后继《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之后第二次公开介绍《宣言》的十条纲领。

(287)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

(288) 王光祈说：“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词，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见《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报告》第4期。

(289)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年5月1日。

第八章　直皖战争

第一节　直皖矛盾的激化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战争结果，皖系军阀失败，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取得胜利，导致了皖系军阀操纵控制的北京政府倒台，罪恶昭彰、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安福系被解散，直系和奉系掌握了北京政权，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影响甚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同一定的阶级和军事政治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直皖战争是直系和皖系这两派军阀势力争夺权势与地盘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的结果。

一　吴佩孚的撤防北归和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的策略

如前所述，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系和皖系两派。皖系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主张用军事讨伐手段削平因护法问题而崛起的西南军事割据。直系在以北洋为中心来统一全国，继续他们的军阀统治这个根本问题上，与皖系没有分歧，但反对对西南用兵，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维护西南军阀的地位和地盘，以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并且时与西南军阀暗通款曲，达成默契。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当时表现为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南北之间斗争的一种反映。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成为直系领袖，直皖之间的矛盾并未和缓，斗争并没有止息，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激化了。皖系以冯国璋既死，直系失去了中心，北洋首领只有段祺瑞一人，于是提出“重振北洋系问题”，“亟图北洋系之统一，以期发展今后

北方之新局面”[1]，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然而却遭到直系的抵制和反对。直系方面，特别是吴佩孚这个直系的“后起之秀”和急先锋，利用五四运动后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向皖系军阀统治冲击的有利时机，对段祺瑞控制的亲日卖国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吴佩孚自湖南前线撤防北归，更是直皖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突出表现，是两派军阀势力从政治角逐走向军事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2]。

吴佩孚由于直皖之间的矛盾，自从1918年4月占领衡阳后，即按兵不动，与南军划界而守，成立停战协定，并且公开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已如前述。

1919年5月南北和议破裂后，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苦不堪言”为由，屡次致电曹锟转请中央俯准撤防，北京政府不予理睬。此后，吴为了做好撤防准备，防备撤防时皖军的袭击，便加强了同西南的联系和结合，把此前同西南军阀形成的同盟关系发展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并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8月下旬，由吴佩孚起草，正式提出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军事密约），通过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转致西南各派军阀首领，征求意见。《草约》共一千余字，分为四个部分，全文如下。

第一条总纲　本约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起见，并非有党见性质。

第二条宗旨　军人以卫国保民为天职，无论何时，国内战〔政〕争不得牵动武力，惟须弭患无形，以尽保民之责务，并须保全现在之主权，兼收回已失之主权，为卫国之主旨。

第三条条目　（甲）对内主旨。查近世以来，国内政争牵动武力，其咎不在政客善于鼓动，而实在军人程度过于卑劣。自草约定后，如再有此等情事发生，凡在约军人均应起而理喻之，排

除之，决不为政党所利用。如有未在约军人盲从者，亦应理喻之，或划除之。其办法手续如左：（一）维持现状。现在和局混沌，无论如何困难，须协力促成之。（二）和局成功。如扫除内奸，废弃密约，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等条件，均取一致之态度；至必要时，得干预而纠正之。（三）和局破裂。如再起兵端，本团体攻守同盟，若有害甲，则乙援之；害乙，则甲援之。任至何地，彼此援助，不得坐视。（四）和平善后。即目前和成，而内奸余孽未清，则和平仍不能永保；对于非法机关巧立名目，凡未经正式国会通过，而私图扩张军阀势力，为将来和平障碍者，均取一致之反对，必达取消之目的。

（乙）对外主旨。（一）现在对外之意见。无论对于任何一国，有与吾国牴牾而侵占我国领土，妨害我国权利者，应合力争执，一体响应，以作外交之后盾，而促外人之猛省。（二）将来对外之实力。如至外交决裂，应付乏术，凡我军人均应同仇敌忾，以洗国耻，而为东亚吐气。除由与外人接近之军队出其全力对待外，凡同盟各军，应各出全力接济援助，以期最后之胜利，而博军人之荣誉。

（丙）附件。（一）凡属同盟军遇有危迫时，接近者应有实力之援助，不接近者亦应有函电之响应，或转托他军之援助。（二）如同盟军有意见时，得联合同志调解之，不得自起冲突。（三）如有扩张私人权利，破坏大局，或私通奸人，局部分裂者，应由同盟军摈诸团体之外，或驱逐之。（四）凡属南北将领，对内对外心理相同者，皆可联结同盟。惟必须主持和平，宗旨正大，而无权利思想，经本约同盟人认可者，方可列盟，不得以地区限制之。（五）以上各条，由同盟人署名盖章后，永久发生效力。

第四条结论　（一）此项盟约，因中央政府不良，元首大权旁落，深恐群奸盘据，延宕和局，实行其困惫南北征人之计，故

不可稍事迁延，以期组织将来良好政府，安内攘外。（二）自签约之日起，如一月内和局仍无解决之望，或和议敷衍完结，及取消非法机关诸目的未能达到，应先由同盟军预定办法暨进行手续，另订副约，秘密签字，以期一致行动，贯彻始终。（三）上列对内对外各条，团结一致，好恶同之。有渝此盟，神明殛之。[3]

《草约》的矛头指向皖系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是十分明显的。

谭延闿在转达吴佩孚提出的《草约》时说，“吴愤于段氏专横，欲结西南，以期促进和平，协谋国是，情意恳切。”[4] 他对《草约》各条所示主旨，自然完全予以支持。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也表示赞同，认为《草约》所提条件，与西南所持者基本相同，惟嫌涉及的范围较狭，希望予以扩大。随后，唐继尧派代表韩凤楼（五峰）至衡州（今衡阳），与吴佩孚洽商。10月中旬，吴佩孚又派其心腹石陶钧（醉六）作为全权代表至昆明和桂林，分别与唐继尧和陆荣廷进一步密谈[5]。11月下旬，谭延闿的代表钟才宏、唐继尧的代表韩凤楼、陆荣廷的代表朱兆熊及粤军代表等，齐集衡州，在《救国同盟军草约》的修改稿上签了字，后来川军代表也在这个密约上签了字。

与签约的同时，吴佩孚还与西南各代表在衡州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讨论了参加军事同盟条约各方下一步的共同行动和步骤，决定：第一步，由谭延闿主稿，联衔致电国务总理靳云鹏敦促南北议和；第二步，由军政府通电主和；第三步，由吴佩孚致电靳云鹏，要求停止内讧，恢复上海和议，实现国内和平；第四步，为防备皖军的进攻，由西南各方“密饬各前线为相当之准备”；然后第五步，由吴佩孚率军由湖南前线撤防[6]。

救国军事同盟密约的签约和衡州会议，把原来直军和南军互相对峙的局面正式变成为同盟关系，并且进入付诸行动阶段。这对直系和

西南均具有重要意义，对吴佩孚的决心北撤，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衡州会议后，西南首领唐继尧、谭延闿、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莫荣新七人，即按照会议的步骤，于12月14日致电靳云鹏。唐等由于找到了直系这个强有力的同盟者而有恃无恐，致靳电以强硬措词诘问说："前屡得来电，一则曰渴望和平，再则曰欲求精神上之融洽，而为日既久，未闻有具体办法，且进行种种借款，此渴望和平者所不当如是。究竟执事主张何在，用意云何，是否无从措手，徒托空言，抑或别有他图，故意延宕？况夫做事当机立断，和战一言可决，军人信义所关，必须以诚相见。"(7) 接着，军政府也于12月19日致电诘责靳云鹏。吴佩孚为履行第三步，于12月中旬派代表穆文善、赵中元晋京，赴府院向徐世昌和靳云鹏陈述对于谋和的种种意见，以及驻湘直军困苦情形和撤防问题(8)。1920年1月2日，吴佩孚又致电靳云鹏，请他"急求国内统一，促成和议"，并说："南北同胞也，强邻仇敌也。同胞之争，无妨相让，仇敌之侮，万难屈从。"(9) 与此同时，吴佩孚还再次致电曹锟，恳求他"俯念兵艰，准予撤防北归"，并"转请中央迅赐救济，明令撤防"(10)。吴佩孚的举动，得到曹锟暗中的支持。曹锟在向北京政府转呈吴佩孚要求撤防的电文中说："该师旅长及各官兵等，自湘事发生，苦战千余里，担任防务，已经两载。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而生存者尤为异乡之饿莩。"(11) 言下之意，吴佩孚所部处境值得同情，撤防要求合乎情理，应予核准。

在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军事和政治集团，为了保存和壮大自己，孤立并有效地打击敌人，克敌制胜，都需要争取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分化，以利自身的发展，西南利用直皖矛盾，把同吴佩孚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扩大为同整个直系的联盟，制定了"联直制皖"的策略。直系则除了同西南结盟外，还提出北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并与中央的徐世昌和靳云鹏通气，建立反皖的"三角同盟"。

1920年1月24日，桂系军阀元老、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在给唐继尧的密电中，把联直制皖的策略思想说得最为明确："河间（冯国璋）新逝，直系骤失中心，段派乘时一面吸收，一面排退。直系恐被压迫，若不自振奋斗，势难自保，现似有此觉悟。直系失势，西南更危。双方处境相同，非彼此彻底联络，无以自存。"[12] 岑春煊表示要对吴佩孚撤防加意联络，促其实现，并提出进一步托吴佩孚联络曹锟、李纯及张作霖，以谋共同解决时局的办法。岑春煊将上述联直制皖旨意电告南方驻上海议和代表章士钊，要他迅速进行活动。章随即将西南意见转达江苏都督李纯。李听后，十分欣喜，表示："苟和非计，徒使安福假借统一名义大借外债，又借政权排斥异己。非有切实之保障，和后仍无益于国。"[13] 李纯提出请岑春煊与唐继尧、陆荣廷连结西南诸帅为一团体，他则连结张作霖、曹锟、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为一团体，由两团体互商解决时局办法，并且认为必须实行直系与西南及在中央的靳云鹏、徐世昌的"三角同盟，缺一不可"[14]。李纯的意见，与西南联直制皖的主张完全合拍，双方决定一致协同行动。后来事实表明，在倒皖的斗争中，这些商订的计划都付诸实行了。

1月下旬，吴佩孚派秘书余道南到广东，与西南军阀进一步磋商撤防具体办法。吴请款六十万元作为撤防费，军政府慨然应允，决定先付给三十万（毫洋），当即由国会议员钟才宏解交与吴，其余三十万留待直军开拔时付清。吴则与之约定，直军开拔时，衡州由湘军填防；撤防时，如遇皖军开衅或直军中途受阻，由同盟军各方恪守协约，极力援助[15]。为了诓骗段派，争取撤防的顺利实现，吴佩孚在给北京政府及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电文中，均一再声称，撤防后由张敬尧的部队接防，他愿竭力负责促进南北两方调停，订立条约，湘南防务不致有虞。

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对吴佩孚接连不断的撤防恳求一直不予批准，命令他不许自由行动。段祺瑞、徐树铮反对吴佩孚撤防，

原因是清楚的：边防军要摆在北方用以自卫，没有足够的兵力接替前方防务；另外，他们需要吴佩孚这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同南军作战，没有吴佩孚，段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就不能实现。同时他们还担心，吴军北归，将会顺道直取长沙；到北方后，又构成对自己的威胁。但吴佩孚并不理会来自北京的不准命令，他有曹锟和直系长江三督的幕后支持，又找到了西南这个同盟者，表示撤防“志决议定，断无变更”[16]。

2月间，在段祺瑞策划下，河南易督问题发生，同时安福系又在北京策划倒靳阁运动（均详后），于直系不利，这样就促使吴佩孚不得不加速率部北撤。从2月底开始，吴佩孚派人将包括自己眷属在内的直军官佐七百余人、家眷约三千人护送北归，并发布撤防布告，禁止士兵随意请假[17]，以示北撤决心。曹锟的态度也强硬起来，接连六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准许直军撤防[18]。3月21日，北京政府再次致电曹锟，要他飞电制止吴军开拔。曹锟复电说：“现该军军官眷属等业已北上，归志已决，无法挽回，务请速发欠饷及开拔费，并电湘督拨队接防，迫切待命。”[19] 3月26日，吴佩孚拍发的最后一个要求撤防电报指出：“我军远戍湘南，瓜期两届，所有必须回防之苦衷，迭经电陈，无事赘述。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同属一家，并非外患仇雠，何须重兵防守。……若谓撤防太速，隳其前功，则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阅墙煮豆，何敢言功。”[20]

段祺瑞看到阻止无效，直军撤防势在必行，被迫只好同意撤防。5月18日，吴佩孚接到曹锟转来的允准撤防命令后，即于20日通电撤防北返，开始行动。

5月21日，张敬尧派所部暂编第二师师长吴新田到衡州，会商防务交代事宜。吴佩孚与吴新田及谭延闿的代表萧弼臣在衡州签订了六条协定，规定各守防区，互相不得侵犯。吴佩孚随即率所部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混成旅于5月25日一齐撤出了湘南防地，全体乘船至株洲，再水陆兼程，以期迅速行军。沿途军士们唱着吴佩

孚用《满江红》词牌写的军歌《登蓬莱阁歌》：“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21)

吴佩孚率部由湘江顺流而下，27日经过长沙，29日到岳州，均未停靠，31日抵达汉口。直军到汉口后，由鄂督王占元接济军费六十万元，吴向全军发饷三个月以振士气。吴佩孚一到汉口，即声称：“顺国人之公意，本正义之主张，撤防湘南，集中武汉，以清除奸慝，促进和平，力争外交，以维国体，一俟军队运输告终，即日挥戈北指。”(22) 这无异是对段祺瑞的宣战书。在武汉休息数日后，吴佩孚率部于6月5日乘车离开汉口，7日清晨到达郑州。吴将第三师全部驻扎在郑州，王承斌的第一混成旅驻许昌，阎相文的第二混成旅驻驻马店，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

吴佩孚撤防之先，段祺瑞认为这等于是放虎归山，因此与徐树铮等密议决定，一面密电张敬尧迎头截击，一面电令驻在荆州城内的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迅速率师东下集中岳州，准备将吴佩孚部队消灭于洞庭湖中。长江上游暂编第一混成旅旅长赵云龙、北洋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第二混成旅旅长刘海门等部已先赶驻岳州，其余驻沙市、宜昌、宜都等地的第二、第三、第四等旅亦分途开拔，长江上游第二旅旅长刘文明则奉派为前敌军事参赞，驰往长沙与张敬尧联系夹击吴军事宜。湖北都督王占元据报吴光新所部纷纷东开，认为是袭击武汉，急调所部北洋第二师和第十八师宋大霈、湖北第二旅寇英杰、第三旅卢金山，第二十一混成旅孙传芳等部队，沿长江两岸布防堵击。吴光新军第二旅三、四两团渡襄河（即汉水）时，被襄阳镇守使署所属部队迎击，死伤甚多，溃退沙市，第三、四两旅在途中亦被堵不能前进，退驻宜都、宜昌等地。吴佩孚率领全军经过长沙时，张敬

尧在长沙城内外及岳麓山布防，但因兵力单薄，不敢冒险截击。吴佩孚的船队到洞庭湖时，吴光新未能赶到岳州，在岳州布防的赵云龙等部皖军，无人敢负代为指挥之责，未向直军开火。因此，吴佩孚率部顺利闯过了两道险关，安全抵达武汉。

吴佩孚在撤离衡州前一天，与张敬尧和谭延闿代表三方签订的南北两方维持原有停战界线互不侵犯的协约，完全是迷惑张敬尧的官样文章。原来，吴佩孚早已秘密与西南达成撤防后由湘军接防，吴军退一步，湘军进一步的协议。因此，吴佩孚一走，湘军就立即行动起来，步步紧跟，抢先接防。5月21日，湘军就将祁阳防地占领。25日，侵夺耒阳。6月7日，进占衡山，并由湘潭、湘乡直逼省垣。张敬尧所部驻湘军队虽有七万人之多，但军纪腐败不堪，毫无抵抗能力，不战自溃。6月11日晚，张敬尧从长沙逃往岳州。次日，湘军赵恒惕进占省城。26日，岳州亦为湘军占领。从此，湖南完全为湘军所有。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的暴虐统治下，度过了两年零三个月的苦难岁月，对张的暴戾恨之入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驱张运动，最终实现了。6月13日，北京政府以“节节退缩，置原划防区于不顾，又复擅离省垣”为词，褫去张敬尧湖南督军兼省长各职，暂行留任[23]。29日，又明令查办。张敬尧的第七师残部退往湖北后，由王占元接管改编。

吴佩孚撤防，直军主力北上，湖南由原来皖系占据的地盘转归直系的盟军所有，不仅加深了直皖之间的对抗，意味着战争迫近了，而且这一变化，从军事形势和力量对比上来说，显然是有利于直系而不利于皖系的。这对后来战争结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与吴佩孚积极准备撤防的同时，发生了河南易督问题。它与直军撤防有密切关系，是直皖战争前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河南地处中原，居南北要冲，有京汉路纵贯其间，在军事上地理

上占有重要地位。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1871—1933），字周人，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隶属于毅军，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护军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4年被袁世凯封为宏威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任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虽属北洋派，但不是安福系人，对直皖两系采取中立态度，对于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愿积极执行。段祺瑞、徐树铮衔恨在心，早有去赵之意。

还在1919年七八月间，段派为了排斥直系，就密谋策划河南易督。因吴佩孚谋任湖南督军，其最初计划，即拟以湘督给吴，将张敬尧调豫，赵倜则调热河。此节做到后，再设法进一步谋去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使南北要区，密布心腹，以力制西南，宰割天下[24]。但因赵倜反对张敬尧，易督问题未得解决。稍后不久（11月），又提出以吴光新督豫。

吴光新（1886—1939），安徽合肥人，为段祺瑞的妻弟，皖系军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早就想谋得一个督军的位置，占有地盘。1917年8月6日，段政府于任命傅良佐督湘的同时，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让他率兵两混成旅由岳州入川。段原想以川军为驱逐滇、黔军的先锋，而用北洋军队在后面监视，然后以吴光新督川。不久，段祺瑞对湘用兵失败，傅良佐从长沙逃走。熊克武的川军也乘吴光新不备，把到达重庆的北军包围缴械。吴趁船逃走，重庆为熊克武所占领。段对川省方面的计划归于失败，吴的川督也就随之落空。

1919年11月间，靳云鹏组阁，吴光新为裁兵事回京见靳。靳为了想取得安福系对其组阁的支持，便向吴表示愿以陆军总长让出，请他担任。吴说他“志愿不在中央，如外地一省督军之任，尚可尽力”，并指明想当河南督军。靳未表示同意，说：“赵倜有兵三万余人，恐难收束。”吴答称他自己“有部下一万余人，可以全行携带前往。至豫军各将领，犹可以设法疏通”[25]。吴一面向靳表白心意，一面即极

力与段祺瑞、徐树铮商议谋取豫督。赵倜闻讯后，大起恐慌，即派其弟赵杰晋京运动。赵杰到京后，花了二十万元贿赂段祺瑞及其部下，段始答应暂不更动，但以裁兵为交换条件，故河南督军署于一月以内即全力从事裁兵。

不料裁兵刚刚就绪，尚未编定，段祺瑞又提出撤换赵倜。2月13日，皖派一些重要人物在段宅开会，决定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为河南省长。随后，吴光新以平定河南匪患为名，率兵到信阳，大有走马上任之势。吴还密谋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等河南内部的反赵军采取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徐树铮南下到济南，与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密议，决定如赵倜反抗，则由马良带兵入河南，援吴攻赵。随后徐又到蚌埠，与皖督倪嗣冲会商，牵制苏督李纯，为吴光新后盾。段祺瑞之所以重视河南地盘，迫不及待地想易督，是因为当时吴佩孚在衡州正积极准备撤防，河南是直军撤防北返必由之路，由吴光新接替赵倜任河南督军，就能成功地阻止北返直军通过；同时可以打破曹锟与长江三督的联络，使之首尾不能相接。

易督消息传出以后，河南人心浮动，赵倜部下大哗，群以段祺瑞无信，要与之决一雌雄。河南省议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易督，要求吴光新部队撤出河南。赵倜怒不可遏地说："二十万元只买得裁兵二字！"[26] 他不甘心被逐，当即一面以河南第一混成旅旅长成慎为第一路司令，豫东镇守使兼毅军统领宝德全为第二路司令，宏威军司令赵杰为第三路司令，分驻各处要隘，准备抵抗皖军进攻；一面派其亲信王杰到广东与西南联系，寻求援助，表示倾向西南，一致反皖。2月14日，赵倜给岑春煊的密电说："时局纠纷，已达极点，非速解决，难救危亡。靳阁现正竭力图豫，计在统一北方，破坏长江，然后进取西南，贯彻主战初衷。刻北方军人多已解体，宜速拒绝和议，联合各省，以定时局。敝省商定，均愿执鞭，强随诸君后，机不可失，祈即图之。"[27] 王杰从广东返回河南后给岑春煊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河南易督与西南的利害关系："现在吴光新督豫之说，声

浪日高，果成事实，则长江必危；长江危，则西南亦难支持。务恳速定大计，一面电商宁督设法阻止，阴电各军一致进行。”[28]

段祺瑞提出河南易督，以吴代赵，是想切断吴佩孚的归路，破坏直系的兵势连锁。他这一着关系到直系的兴亡盛衰，当时舆论就指出：“豫省为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点，无论如何，不肯轻易放手。”[29] 因此，除了赵倜进行抵制和反抗外，直系各省督军也一致表示反对。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都发电阻止。2月下旬曹锟给靳云鹏的电报说，“去赵用吴，北洋解体，万不可办。”[30] 吴佩孚更是怒火中烧，对段派进行了较前更加猛烈的抨击。2月23日，他在一则通电中严词诘质说：“夫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共戴一天。而乃长恶不悛，鬼蜮百出，值兹全国蜩螗之秋，潜为位置私人之计，只知扩张党势，不顾牵动大局，如果一意孤行，势必酿成大乱。……吴光新既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万取千取，法纪荡然，排除异己，人人自危。政府比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赞许者则排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威权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家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31] 他要求徐世昌和靳云鹏“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以弭战祸，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

为了防止段派的阴谋实现，吴佩孚派代表赴河南与赵倜接洽，商议共同对付皖系办法，同时加速撤防的进程，决心以实力援赵。吴还与西南互通声气，希望采取一致态度。2月23日和24日，吴佩孚连续给岑春煊发出密电说：“中央决定以吴督豫，虽各方反对，悍然不顾，即牵动大局，亦所不惜，发表命令，即在目前。除由敝处通电全国力争，并派专员赴豫与赵接洽应付外，并希我公密电转达豫督，嘱

其抗拒勿交，敝军立即撤防，以实力援助，决不令其蹈吉、鲁两督之故辙也。”他要求岑“联合西南各军全体，警告中央，以破阴谋而杜后患”[32]。吴佩孚还介绍赵倜参加了救国同盟军，与西南联为一体[33]。

河南易督如果成功，不惟予直系以沉重打击，而且显然对西南也是不利的。西南军阀从保存地盘和向外扩张的切身利害考虑，自然是支持赵倜和直系反对皖系，不同意易督的，况且他们还同吴佩孚签有同盟密约的关系。西南渴望乱中取胜，从北洋内部直皖两派的厮杀中坐收渔人之利，发展自己的力量。2月27日，岑春煊致西南军阀首领陆荣廷、谭浩明、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谭延闿的密电中，把这一意图说得最为明白：“段派阴谋夺豫，藉以控制长江，情势已逼。子玉（吴佩孚）义愤慷慨，既决以实力援助，若能回军武汉，而中原发生剧变，则北部内乱，适予西南以绝好发展之机。此时应请速谋团结内部，预筹战备，迎机速起，以求最后之胜利。”[34] 滇军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总司令、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认为战端发生，滇军“乘势东下，窥取荆、宜，互相策应，诚属千载一时之机”[35]。蓝天蔚则说：“吴佩孚撤防不专为湘，亦含有救赵之意。此事与西南作战计划，颇有关系。……前方机会虽好，而施、夔无能战之兵，若能于赵、顾两军中，分一东下捣武汉，直意中事。且武汉谋响应者甚多，一经连络，胜券可操也。”[36]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在2月下旬致电徐世昌，以赵倜部下群怀义愤，准备抵抗，北洋因地位争持，牵动大局，将追悔莫及，主张暂不更易豫督[37]。如前所述，张作霖原本是依附段祺瑞，在直皖两系关于和战问题的争执中是支持段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的。1918年2月间，徐树铮怂恿拉拢奉军在秦皇岛劫械，引奉军入关，胁迫冯国璋对南方护法军作战。随后，张作霖在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以徐树铮为奉军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帮助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国会。但不久，徐树铮未经张作霖之同意，随意调遣奉军，并以

奉军副司令名义在天津擅杀直军将领陆建章，嗣后又挪用奉军军饷数百万元，张因之对徐产生恶感。同年9月，他解除了徐的奉军副司令职，撤回奉军总司令部，从此张、徐分离。五四运动后，张作霖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完全失去了人心，而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经营外蒙，又有碍奉系势力的扩张，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同时直系利用张作霖同徐树铮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奉制皖”的策略，吴佩孚曾派人对张作霖说，徐树铮谋夺关外利权，劝张勿为徐所利用，以致不利于己[38]。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张遂转而倾向直系方面，从而在河南易督问题上，与直系持相同的态度。

1920年2月2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在安福系的操纵挟持下，通过吴光新任河南都督，王印川任省长。会后，靳云鹏即将两议案送徐世昌盖印发表。徐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只在任命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上签了字。徐之所以不肯撤换赵倜，是因为一方面他早就不满意安福系的专横，不甘心做段祺瑞的政治傀儡；另一方面徐和赵倜素有往来，关系比较密切，且赵之所部豫军，属于姜桂题的旧淮军，对徐素表忠诚，故人早视河南为徐的势力范围。加上曹锟当时有密电致徐，说先前湖南战后，段祺瑞即以湘督给了张敬尧，致使湖南风潮至今未息，今又为其亲戚谋地盘，使秩序完好之河南濒于战争危险，宁能服天下之心。如吴、赵果有争执，则他将助赵[39]。徐世昌害怕河南发生战乱，便坚不肯易督，曾对人说：“即不说我是总统，而我以河南巨绅之资格，亦决不能任河南地方发生扰乱，故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40]

由于赵倜的坚决抗拒，曹锟、张作霖、长江三省以及吴佩孚的声援，加之徐世昌也不同意易督，段派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被迫让步，表示暂时可以不撤换赵倜，但必须立即将移动的豫军一律撤回原防。3月初，曹锟致电北京政府替赵倜的军事调动辩解，提出将吴光新的部队撤离河南境内，作为豫军回防的先决条件。电文说：“豫省

此次震动，实因吴军抵境所致，如吴军能即日开离豫省，则豫军亦即日各回原防。”[41] 随后又补发一电：“吴光新之奉调到豫，原为剿办土匪，现豫省并无匪迹，则吴军自应迅为撤去，以免发生误会。”[42] 赵倜也致电北京政府，声称河南并无匪患发生，“境内弭平，堪纾廑念”[43]。“豫军回防原无不可，但必俟吴光新军队退出豫境之后，方能遵令办理”[44]。

安福系易督阴谋未能得逞，于心不甘。3月下旬，赵倜因南阳镇守使吴庆桐有叛迹，拒绝让他回任，其时又有驻郑州第八旅旅长靳云鹗（靳云鹏之弟）所部在荥泽县发生兵变。安福系以吴庆桐系中央命官，不得由本省大吏任意进退，今赵拒绝其回任，是大损中央威信，兵变一事，更说明赵无统治能力，再次向靳云鹏提出将赵倜撤换，并拟由安福国会对赵提出弹劾。靳云鹏因与徐树铮的关系早已形同水火（详后），而同赵倜感情颇好，在易督问题上，表面上采取骑墙态度，实际上是支持赵的。因此不同意撤换赵倜[45]。

河南问题发生后，使1919年秋冬间形成的直奉同盟日趋成熟。原来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孟恩远七省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现在又加上豫督赵倜，形成以直系为核心的反对皖系的八省同盟。

4月8日，曹锟在保定发起阵亡将士追悼会，各省区均派代表参加。次日，八省同盟代表，加上吴佩孚的代表共九人，在另一地点开了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皖系的方策。由于安福系罪恶昭彰，声名狼藉，成为全国人民众矢之的，所以八省在反皖特别是反对安福系的立场上基本取得一致。但参加八省同盟各方的见解不尽相同，因此会议只决定铲除安福系，而避开了段祺瑞这个皖系头目，认为搞垮了安福系，段便不攻自倒。会议当场通过三条：一、拥护靳内阁，但不反对段祺瑞；二、前线各省防军一律撤回，但须保证南军不进攻；三、宣布安福系罪状，通电政府，请求解散[46]。

段派为了破坏八省同盟，3月间曾策划进行选举副总统活动，并内定选举曹锟。他们以为举曹则其余七省必将以为曹与段祺瑞订有密约，由于暂时利益关系结合起来的八省同盟，必因之解体。曹锟在安福国会成立时曾受过一次骗，吃了苦头，这次当然不会轻易再上当了，他拒绝了这种诱骗。参加八省同盟的军阀也指使本籍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选举会。两次会议均因不够法定人数而流产，因而段派的计谋无法实现。

中止河南易督，是直皖斗争中直系的一大胜利。因八省同盟的建立，直系的声势更增大了，皖系处在直奉南北夹击之中，直皖两派间的斗争因之也更尖锐化了。

三　安福系的倒阁运动和靳内阁去留之争

河南易督问题发生后，不仅加强了直系和奉系及西南的同盟关系，开始实现李纯在1920年初提出的“借张胡（指张作霖）倾安福”，“直系与西南提携，协谋倒段”的策略主张[(47)]，而且为了利用徐世昌、靳云鹏在中央的地位来抵制安福系，他们把这种同盟关系正式扩大到徐、靳，形成直奉、西南及徐、靳反安福系的“三角同盟”。针对当时安福系发动的倒阁运动，八省同盟作出了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定。围绕靳阁去留问题，展开了反对安福系的激烈斗争，加速了直皖两派的决裂。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后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驻守云南。1911年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靳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化装逃走。到北方后，由段祺瑞引荐，袁世凯任命他为北洋军第五师师长，署理山东都督。袁死后，复受段祺瑞重用，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他忠实执行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被段倚为左右手，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同称为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即在此时，徐树铮因与靳争权争宠而矛盾日趋尖锐。徐处处揽权，又年壮气盛，仗势凌人，往往故意

使靳难堪，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徐是段的嫡系门生，政治关系比较简单，唯一的靠山是段，加上他会玩弄手腕，善于出谋划策，而深得段的宠信，人称为段的“小扇子军师”。靳与段虽然也很接近，且有师生关系，但他和冯国璋是同学同事，同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往来都较密切。因此，段对他不能毫无戒心，对徐的信任就逐渐超过他。靳因之对徐衔恨在心，两人关系更加恶化。

1919年6月13日钱能训内阁总理辞职后，由龚心湛兼代。9月5日，龚又为安福系所迫去职。龚辞职时，徐世昌的夹袋中原有一个周树模作内阁总理的继任人选，但亲日的安福系认为周是英美派人物，反对他组阁。于是由徐世昌提议并征得段祺瑞的同意，由靳云鹏（时任陆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靳云鹏组阁时，曹锟、张作霖为了能在中央多找到一个共同对付安福系的同盟者，都对他表示支持。9月2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致电徐世昌，略谓：“国政端在内阁负责，龚代阁久萌退志，继任之人，甚难其选，暂行代理。现闻有靳云鹏总长兼代之说，大总统潜移默化，想已得选。靳总长心地光明，操行稳健，以靳代龚，众望允孚。如龚代总理必欲退职，即请以靳总长组阁。”[48] 连一向同北京政府作对的吴佩孚，也表示赞同靳出任内阁总理。徐树铮曾推出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等通电反对靳云鹏组阁，但阻挠无效。11月5日，靳云鹏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旋即为参众两院通过。

靳云鹏上台后，想摆脱段祺瑞的控制而独树一帜，使自己成为各派的中心，以左右政局。他力主与南方议和，反对对南用兵，表示“中央主张所在，惟以和平统一为归”[49]。这一点与直系的主张完全一致。安福系拉他入伙，使其为该党的政治目的效力，他拒绝参加，说：“余系军人，万不能公然加入政党。”[50] 关于阁员人选，安福系为了便于操纵内阁，提出以己派人物吴炳湘、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隽分任内务、财政、司法、交通各部总长及国务院秘书长，

靳云鹏起初表示接受。及至国会通过靳组阁案时，靳改提田文烈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张志潭为农商总长，夏寿康为教育总长。靳以为周自齐为旧交通系梁士诒的人（旧交通系1918年底即已与安福系处于对立），由周长财政，可得旧交通系经济上的援助，为中央垫拨军政各项费用。张志潭本任陆军次长，为靳的忠实助手，平日也与徐树铮不睦，靳畀以农商总长，是想利用欧美资本发展国家财源，摆脱金融上的困境，同时拉他以与安福系相抗衡。夏寿康为湖北人，与黎元洪为旧识，关系较深。靳拟请黎出任调停南北和议，由夏任教育总长，便是为了联合黎元洪。

靳阁人选提出以后，11月7日和9日，曹锟、张作霖先后致电靳云鹏表示赞同。张在电文中说，“我公出膺艰巨，定能利国福民。承示各部总长，贤才硕彦，独出冠时，为国得人，共图匡济，逖听之下，极表赞同。”[51] 安福系则感到上了靳云鹏的当，认为“此项组阁与本系势力之消长至有关系，不可忽视”[52]，因而拚力反对。尤其是财政总长一席，提出非己派之李思浩担任不可，因为安福系每月十四万元党费要由财政部支付，他们视财政部为命根子，决不肯轻易让给他人。11月16日，傅良佐去公府见徐世昌征求意见，徐不肯迁就安福系，表示不愿更动财长[53]。靳云鹏引曹锟、张作霖为助，也表示宁可不干，决不更动[54]。安福系无可奈何，不得不稍事收敛。但19日徐树铮从库伦（徐于10月下旬去库伦）打来一电，内有“若有人主张危及国会，某将声罪致讨”的话[55]。在京的安福系分子得到徐的指示，态度复转为强硬，有人主张提出周自齐借款卖国案，以窘政府[56]。曾毓隽则多次游说段祺瑞，请他出面迫靳改变主张。11月22日，段召靳入见说：“财长一席，安福方面绝对不赞同周自齐，为之奈何。余意此时不妨依彼等之请，改提李思浩试办财政，如果实在不能支持下去，再换周自齐，亦不为晚。”[57]

靳云鹏虽然想摆脱段祺瑞的羁绊，但毕竟不敢公然违抗恩师的旨意，不得不屈服。于是，财政总长改提李思浩（后以周自齐任币制局

总裁）。对此，安福系自然喜形于色。11月25日，曾毓隽给上海王揖唐的电报说："阁员已定赞侯（李思浩，字赞侯）长财，吾党完全胜利，未始非合肥主持之力，本星期内可以完全通过两院，知念特闻。"[58] 11月28日和12月3日，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开会通过各部总长同意案，靳云鹏提出的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又被否决。靳与安福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失败了，预示着靳内阁的前途不妙。当时有舆论指出说："李思浩一上台，靳阁的命运决定了，靳得一内阁，不能损安福部的毫末，安福部得一财政总长，却是窘靳而有余。"[59]

12月3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靳内阁阁员：外交总长陆徵祥（陈箓暂代），内务田文烈，财政李思浩，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隽，农商田文烈兼，教育总长仍由次长傅岳棻代理。安福系对农教两部派员兼代大不满意，连日开会，企图压迫靳云鹏将两部人选更换，以己派之人充任，同时要几个部的次长。其中李思浩提出与他共事多年关系比较密切的财政部秘书钱锦荪为次长，靳云鹏没有答应。12月初，靳未经李思浩的副署，下令委自己的同乡和好友潘复（馨航）为财政次长，作为自己在财部的耳目，以便对李思浩起一些监视作用。李即愤而辞职，表示抗议，安福系予以全力支持，坚持不令潘复到任，并暗中策划倒阁运动。对此，靳云鹏大发牢骚说："以正式总理不能用一次长，处处受某派牵制，此等总理，有何趣味。"[60] 由于安福系的逼迫，靳又不得不退让，潘复请假告退，由钱锦荪任次长，靳与安福系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又失败了。以后，靳阁便因安福系处处牵制要挟，"一步不能发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顺手办理"[61]。

1920年初，河南易督问题发生，靳云鹏对安福系所提撤换赵倜代之以吴光新的计划，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未予支持。加上当时日本向中国提出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安福系为了想获得日本借款，暗中与日本勾结，阴谋出卖主权，满足日本的要求。靳云鹏在全国各阶

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八省同盟督军和吴佩孚也通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表示不同意直接交涉，声称："中国既在和议席上拒绝签字，早知日本方面必有此举。惟既拒签于前，在理势二方面说，均无今日反接受直接谈判之理。"[62] 他还向山东代表说："余宗祖坟墓均在山东，余之爱山东，决不后于国人。总之山东一案，本人在阁一日，必不至草草从事，余对此案，已抱定'尊重民意，保持主权'八字。"[63] 因此，安福系决定发动倒阁运动。

1月间，由于安福系的刁难和作对，即有靳阁不稳之说。2月26日，因徐世昌不同意在罢免赵倜、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的命令上签字，安福系把罪过归咎于靳云鹏的暗中作梗，乘机向段祺瑞进谗说："靳对公之至戚尚怀排斥，何能保其不叛公而去。"[64] 因此，当晚靳云鹏去见段祺瑞时，段斥责靳说："你如此无用，如何能配做总理。"[65] 27日，靳即向徐世昌请假，并于29日以"病迫才拙"为辞提出辞呈。徐世昌对靳辞职表示殷切挽留，当即派秘书吴笈孙将原呈退回。吴向靳转达徐的话说，"同是为国家做事，不必过于坚持"。靳说："总统好意，固极感激，但某方面有意为难，如不改就妥洽，实难再任国事。"[66] 徐还派人请段祺瑞出面挽劝，段也表示希望靳勿辞职。靳在徐劝挽之下，便打消辞意，于3月3日销假视事。但安福系把靳云鹏看成是直系在中央政府的代言人，必欲倒之而后快，于是便以"和议无期，而国会开会后诸端待理"[67] 为表面理由，电促上海王揖唐"即日回京"，实际上是要他来主持倒阁运动。

3月4日，靳云鹏一早到院，整理积压案件，预备提交国务会议。开会时，安福系阁员李思浩、曾毓隽、朱深等临时逃席，出席者仅田文烈、萨镇冰及傅岳棻三人。靳多次用电话催促，并派田文烈赴各处劝说，均无效果，直至下午2时，仍只三人，致国务会议终于未能开成。对此，靳云鹏很气愤。徐世昌也认为安福系这样做"殊欠堂皇"[68]，表示不满。在徐看来，维持靳内阁，可以收到府院一致之效，在对付安福系专横方面，靳云鹏可以是自己的一大帮手。因此，3月4

日，徐世昌派吴笈孙向安福系斡旋疏通，提出："时局孔艰，内阁不宜摇动，务须相与维持，免酿政潮。"[69] 安福系便提出三条要求：一、更易河南督军；二、山东问题必须按该党方针办理；三、委派该党之人充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因外交问题棘手于2月初提出辞职）、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如不满足这些要求，就决不与靳并立。对于这些条件，徐世昌自然不会同意。靳云鹏以阁员中安福系已有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如果外交、教育、农商三总长再为其把持，将来阁务更难办理，也表示决不答应，誓将以去就相争[70]。其他两项，也因八省同盟督军和全国人民反对，靳表示不能同意。

为了倒阁，3月9日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向徐世昌提出辞职，不出席阁议，声称："靳总理为人过于执拗，共事实难，不如另找合手替代"[71]，想以此相要挟，迫靳下台。11日，安福系开会决定对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提人问题坚不退让。安福系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想进一步操纵阁务，其目的还在于：外交部一得手，即可实行其对日直接交涉；掌握了农商、教育两部，便能联络各省总商会、劝学所，可为下次选举提供方便条件，且便于取缔学潮。徐一面对曾毓隽等辞职表示慰留，将辞呈退还，一面劝他们体谅靳的苦衷，勿以意气用事[72]；而对于安福系提出的要求，则置之不理。靳云鹏由于内有徐世昌支持，外得曹锟、张作霖等的援助，对于安福系的倒阁，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表示"阁员如必辞职，则先以各该部次长暂代部务，再作计议"[73]；并说："他们如同我干不来，只有任凭他去他的，我干我的，我不肯自己塌台，难道说他能把我拆台么？"[74] 曾、李、朱看到硬干不行，同时又担心徐世昌另委代理人员，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职位，于是采取暗中拆台的办法，在靳阁施政方面设置种种障碍。

在这次倒阁运动中，出面站在前台活动的，是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而在背后兴风作浪的则是徐树铮。安福系每次阴谋策划会议，均由徐树铮暗中主持。看风使舵的李、曾、朱等人，惟徐马首是

瞻。3月28日，由于徐、靳间的斗争激烈，段避居团河，闭门谢客，表示“不管闲事”。就在此时，徐树铮捏造了一封北洋系同人联合署名致靳云鹏的书信，对靳进行恫吓，信中说：“自公莅席总揆以来，吾党谓公必有一番振作，以为北洋系光荣。乃近来举止颠倒，长外藩嚣张之气，生宵小觊觎之心，中央威信，丧失殆尽。以合肥提携，我公方有今日，而我公反令合肥出走，公清夜自思，何以对合肥？何以对吾党？仆等亦无他言，请公作良心上之裁判。”[75] 此信辞锋所指，咄咄逼人，不啻一纸逼靳下台的通牒。31日，靳得此信后，即刻驱车前往公府谒见徐世昌，将书信呈徐阅览，并提出辞职。徐阅毕后将书信交还靳，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理他作什么？……倘若足下干不了，难道我又干得了吗？总而言之一句话，足下是不能走的。如万一他们逼迫，我们俩可以同时辞职。”[76] 经徐世昌慰留，靳又打消辞意。

如前所述，靳云鹏组阁，是得到曹锟、张作霖赞助的。靳上台后，没有按照安福系的旨意行事，在内政、外交上采取比较独立的立场，而且与直系的主张比较一致，因此直系和奉系对靳阁给予全力支持，坚决反对安福系掀起的倒阁运动。靳云鹏和徐树铮安福系之间的斗争，一变而为直皖之间的斗争，并使这一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靳云鹏提出辞职后，2月28日，曹锟致电劝他“勉力为国，万勿遽萌退志”，并通电各省拥护靳内阁[77]。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河南督军赵倜也都要求维持靳内阁。3月1日，张作霖致靳的电文中说得很恳切：“吾弟综握政衡，全国视线所集，岂宜于一发千钧之际遽萌退志，牵动根本。……务祈以国家为重，早日销假视事，藉副全体上下一致期望之殷，大局前途，实利赖之。”[78] 3月15日，张作霖还致书段祺瑞，责备段纵容安福系干涉政权，植党营私，希望他以后“勿纳宵小之言为盛德之累”[79]。所谓“宵小”，就是指的徐树铮。

八省同盟的建立和做出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加强了

反皖力量的结合，不仅使徐世昌反对安福系倒阁采取了比较坚定的态度，而且使段祺瑞不得不对安福系有所约束，对靳云鹏表示支持。4月1日，当靳云鹏持上述徐树铮捏造的北洋系同人的信件去见段祺瑞，诉说自己难以维持阁务时，段对他说："你做总理以来，舆论很好，东海（徐世昌）和各省督军对你都很融洽，此是难得之事，何故必要辞职。"[80] 他还表示自己并不与闻徐树铮等的主张，要靳不必多心。

4月间，阁潮一度平息，北京政局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稳定。但安福系倒阁计谋并未放弃，活动并没有中止。5月初，靳云鹏为财政、外交所迫，再次提出辞职，决心不再干下去。

原来自李思浩、曾毓隽、朱深取消辞职，出席阁议后，安福系改变策略，决定以不筹款困靳。5月份北京政府所需政费六百余万元无着，财政部所存现洋仅十五万元，各方请款之电报如雪片飞来，还有的派专人到财政部坐索。财政部长李思浩一概不管，要求索款者径直向靳索取，并请靳自行筹款，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赶他下台。靳因此如坐针毡，有说不出的苦痛。4月26日，日本政府又送来关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第二次通牒，催促中国政府迅速答复，措词强硬，语带恐吓。靳云鹏受全国舆论的影响，主张以明令通电全国不直接交涉，安福系不赞成。靳主张答复日本通牒须直截了当地写明不直接交涉，不留丝毫余地，而安福系则要求含糊其词，留有直接交涉之余地。外交次长陈箓（自2月份陆徵祥辞职后，即望坐升总长，倾向安福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所起草给日本的回文，措词含混，与靳意有很大出入。靳云鹏和徐世昌阅后发还外交部，令陈箓大加修改。陈箓大为不满，5月6日阁议即借病不出席，由外交部参事刘崇杰代述修改稿，仍与靳的主张有距离。而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为维持党议，留有机会与日本直接交涉，在会上支持外交部的意见，与靳展开争论，并对靳旁敲侧击，致会议无结果而散。至此，靳云鹏再也不能忍受，当晚召国务院秘书郭则沄起草辞呈，8日正式送呈徐世昌。徐一再慰留无

效，于5月14日签发三道命令：一、靳云鹏准假十日；二、由萨镇冰兼代国务总理；三、罗开榜代理陆军部部务[81]。由于靳云鹏坚辞而不肯销假，以后徐又连续几次给假。

是否让靳云鹏辞职，靳下台后由谁来继任，是徐世昌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直皖两派共同关注的中心，斗争的焦点。徐世昌是挽留靳的，但是他深知靳久为安福系所窘，表示体谅靳的苦衷，万一不可留时，即属意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开始也赞成周组阁，但提出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必须由己派的人担任，还须奉行该派的方针大计，作为交换条件。其实，安福系并非真正拥戴周树模，不过是想藉周以倒靳，靳阁倒后周阁亦不令产生，其时内阁当然落在自己手里。徐世昌窥破了这一点，因此他只给靳云鹏一再批假而不准他辞职，也不急于提周，只有等周组阁能保证在国会通过后，才正式提周，并准靳辞职。周树模是个老官僚，有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知道安福系的阴谋权术，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也不愿拜倒在安福系门下充当傀儡。有人问他关于组阁的事，他说："吾若于安福系条件下组阁，是绝不可能之事也。况徐总统亦并无劝我组阁的话。"[82]他还向人表示："为维持现状计，不如留靳，为组织内阁计，则不如拥段，故无硬拉余出山之必要。"[83]

安福系见此计不成，于是又表示反对周组阁，主张由萨镇冰组织过渡内阁。安福系像一股祸水，谁都怕同它沾边，萨闻讯后声称："如以组阁相强，即当襆被出京。"[84]萨镇冰深知徐树铮、李思浩、曾毓隽等奸险刁恶，难与共事。当徐世昌开始要他代理总理时，他就声明不能长期代理，并不负财政责任。靳云鹏续假十日快满期时，徐鉴于一再代理，于名义上不甚相宜，提出以改代为署的办法和萨商量，他坚决回绝，表示如果改署，就将一走了之[85]。

5月下旬，吴佩孚从湖南撤兵，南军步步紧跟，从张敬尧手中夺去了湖南大部分地方，安福系又几次召开秘密会议，提出请段祺瑞上台，组织"强有力之政府，以靖国内战争"[86]。段祺瑞未尝不想重新

粉墨登场，无奈这太不是时候了，由他出来取代靳云鹏，于己不利，也行不通，所以不愿冒此风险。

靳云鹏提出辞职时，曾派秘书到保定与曹锟联系，并和张作霖的驻京代表打招呼，说明自己去志已决，要求他们切勿挽留[87]。但曹锟、张作霖认为安福系逼靳下台，是对自己和民意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示弱。自靳辞职后，曹、张和长江三督等各反皖督军，掀起了拥护靳内阁，反对安福系的高潮，在短短的二十天内，便先后发表了数十份通电，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5月9日，曹锟致电徐世昌，陈述靳阁不宜更动的三大理由："（一）西南各省首领与靳之联络，颇有进步，倘内阁突然改组，则前功尽弃；（二）和议正在进行之际，倘内阁更动，未免受根本上之影响；（三）若因一党之意见即更换阁揆，将来恐无人敢膺揆席。"[88] 同日，曹锟还致电靳云鹏，请靳"勿为浮言所动，俾保阁基"，表示如果安福系再行逼迫，他必有办法对付[89]。5月10日、11日，反皖各省督军代表在天津开会，重申前此做出的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并提出各军一律撤防，用某种方法扫除一切时局之障碍[90]。后来又有人提议，这次留靳，"非文电所能为力，必由事实上着手"[91]。张作霖一方面派其子持密函送呈段祺瑞，规劝他维持靳阁，"勿轻信佥壬，致失信于天下人"[92]，一方面电请徐世昌"对于中央阁潮，务速行决然手段办理"，勿再"瞻徇情面，敷衍时局"[93]。6月13日，吴佩孚在郑州发表一个通电，谴责安福系"毒痛四海，腥闻于天"；说安福当道，国难难平，卖国党不除，不能长治久安，提出"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时局问题，"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94]。为了推倒安福系，吴佩孚准备实行兵谏，将部队撤回河南后，布置在京汉铁路沿线上待命。张作霖也准备调遣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入关，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坊。6月15日，吴佩孚偕所部第二、三混成旅旅长阎相文、萧耀南及曹锳到保定，参加曹锟的军事会议，张作霖、李纯也派代表前

往参加。16日，曹锟电请辞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17日，徐树铮从库伦返回北京应付时局（徐于4月9日离京赴库）。直皖之间准备诉诸武力了。

赞成维护靳内阁的，除八省同盟外，还有绥远、察哈尔、热河、新疆等省的军民长官，留靳声浪占了压倒优势，但安福系仍坚持倒阁。靳云鹏怕卷入两派的漩涡中，坚不肯复任，从5月初到6月中旬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四上辞呈。被拟定为组阁的那些人，也都知难而退，北京政局陷入严重的内阁危机之中。直皖两派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平日笃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的徐世昌，也感到左右为难，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为了想找到一条摆脱时局危机、避免战争的途径，他电召张作霖、曹锟、李纯来京一起会商。

四　张作霖的调停及其失败

6月7日、14日、18日，徐世昌连发三电，邀张作霖、曹锟、李纯等来京磋商挽救时局办法。6月19日，张作霖以“调人”的姿态应召抵京。北京全体军、警、政长官均往车站迎接。安福系希望张作霖保持一个真正调解者的立场，不要完全倒向直系一边，对他的来京，欢迎极其热烈，但张作霖对安福系的热烈表示却反应冷淡。他舍安福系特意为他设置的奉天会馆不住，而住在化石桥奉军司令部。这时，李纯称病不能长途跋涉，派参谋长何恩溥为代表前来。曹锟也未前来参加，派代表王某赴京，向张作霖说：“此次某方面（指安福系）把持政权，未可以理喻，即锟来京，亦无办法。况三军忿激，急需绥抚，故暂留保定，以促某方面之省悟。”[95]

20日、21日，张作霖两次晋谒徐世昌，陈述本人并代陈直系各督军对内阁的意见，认为责任内阁必须各阁员和衷共济，如果同床异梦，则政务难免纠纷，历观以前阁潮，均是如此。因此，他提出“以留靳为唯一解决办法”，同时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并撤换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总长[96]。徐世昌表示赞同，并请他去劝挽

靳云鹏。张随即去棉花胡同靳宅，劝靳销假，不可再持成见，“致使渔人得利”；并说：“总统对执事之诚恳，亦当稍答知遇。”[97]“余奉命劝君销假，君若不销，吾不能复命。”[98] 靳云鹏仍以病辞，没有答应。

21日，张作霖去团河会见段祺瑞，提出挽靳复职，劝段不要庇护徐树铮等人，以免发生“意外之事变”，损害自身“半世之名望”[99]。段表示他无意反对徐世昌，不想组阁，也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可以副总统给张[100]。关于靳阁问题，段说：已敦劝靳数次，无奈他执意不干，“今当再派人切实请其销假”[101]。

和张作霖与各方面进行斡旋留靳活动的同时，安福系则在太平湖开会议决，无论如何决不承认靳复职，仍拟提周树模组阁，以抵制各方面留靳[102]。

6月22日下午，张作霖偕同其部属王乃斌、张景惠以及苏、鄂、赣、豫、绥、察、新疆等省代表，乘车前往保定与曹锟磋商。当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及各省代表开会讨论解决时局方案。吴佩孚发言语词强硬，他说：“国事如斯，佩孚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部下士兵，虽不敢谓久经训练节制之师，但亦颇知大义”，如果安福系“不顾国家，徒以破坏大局为事，佩孚虽能容忍，诚恐部下义忿，亦难压抑。”[103] 他主张：第一、解散安福系；第二、免除徐树铮之筹边使，卸去其兵权；第三、将上海和议之总代表王揖唐及北京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均予免职[104]。各省代表亦相继发言，讨论结果，决定办法五条：一、靳云鹏复职；二、内阁局部改组，撤换安福系三总长，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三、撤换王揖唐议和总代表，取消上海和议，由中央与西南直接谈判；四、解散安福系；五、解除徐树铮之兵权，撤销筹边使官制，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张作霖对前三条表示赞同，后两条未置可否。他以此次来京系负调停之责，不愿趋于极端，为了避免纠纷扩大，不使徐世昌为难，决定回京后相机行事；如果前三条能顺利解决，则其余或者暂

可不提，等靳云鹏销假复职后再从长计议[105]。

6月23日晚，张作霖返京，次日将保定会议情况向徐世昌报告。徐表示可以酌量采纳，但需逐渐办理，万不能操之过急。徐电复曹锟说："中央自有办法，少安毋躁。"[106] 接着张作霖一连几天同各方面进行磋商，他认为靳的能否复任，主要关键在于内阁局部改组、安福系三总长出阁是否能成为事实，当即托参谋总长张怀芝把这个意见转达段祺瑞，并亲自去团河劝段动员三总长下野以为转圜。段没有同意，他表示希望各方面不要坚持成见，提出以恢复原状为调解办法，即阁揆仍由靳云鹏复任，而安福三总长也不下野[107]，至少也须保留财政、交通两席。安福系死抱住财政、交通不放，是因为两部关系安福系的党费命脉，尤其是交通部包含铁路、航船、邮电、航空四路收入，是安福系的金库和最大财源。曾毓隽曾说："有交通部，够安福吃十年饭。"[108] 不仅如此，安福系和政府的账目混在一起，通过两部侵吞了大量公款，仅交通部一部就有二千余万元不能报销的账目。

张作霖去劝靳即日销假，说："公一日不销假，我即一日不回奉。"[109] 靳仍不肯答应，以为因自己的缘故，使三总长同时去职，于友谊和面子上均过不去，但若三部不改组，则以后办事仍很棘手，徒拥总理虚名；同时，他感到处在直皖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左右为难，不好应付，还不如荐贤自代为好。因此，他极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答应继续担任陆军总长，全力协助周内阁。他说："余非置大总统、诸帅之意于不顾，余销假后，余之政策仍不能行使。余为合肥门下，几无人不知，苟销假后，对于应付时局之处，其有不便于合肥方面者，人将谓我忘恩；其有不便于各督方面者，人将谓我究竟是合肥的人。此种难题，实属无法解决。余之欲贡献于总统者，拟请政府另提周少朴（周树模）组织内阁，既可将前内阁之罪恶作一结束，又可将前内阁引起之政治葛藤一刀斩断，俾新内阁努力于建设之一途，而政潮于以平静，所谓不了了之，此则国与民皆蒙其利。"[110]

张作霖回京后，各省代表仍留在保定磋商时局，等待北京消息，各督军始终坚持强硬态度。25日至27日，保定方面连续致电张作霖及徐世昌，要求对内阁及时局问题从速解决，至少亦必须先办妥一两件，以安军心，除靳阁复职，撤免安福系三总长外，还必须裁撤徐树铮的筹边使，边防军归陆军部管辖[(111)]。与此同时，保定还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指出："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还说，"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112)] 直军所采取的仍然是历史上"清君侧"的做法，只提反对安福系和徐树铮，而表示不对"先进泰斗"段祺瑞采取敌对行为。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内部有分歧，张作霖不主张反段，另一方面显然也是为了分化皖系的军事力量。

6月25日，张作霖赴团河见段，正式提出免除徐树铮职务的问题（事先征得徐世昌的同意）。段含糊其词，表面答应让步，实际上是不同意。他说："安福之坏，我已知之，我非安福，君亦知之。偌大政党，难保无不良分子，无可讳言。""徐树铮得罪人，我亦知之，我对于国家，始终以直道，绝无权利之私，现在惟望徐总统收拾时局。"[(113)] 后又对人说："徐有功蒙古，为取消（蒙古）独立之经手者，不应遽夺其职。"[(114)]

由于靳云鹏坚决不干，并力荐周树模组阁，28日张作霖同段祺瑞达成一妥协方案，并得到徐世昌的认可，即：解散旧阁，改组新阁，靳云鹏不再复任，安福系三总长下野，双方各得其半；由周树模组织新阁，除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脱离阁席外，其余如内务、海军两部不动，外交、农商、教育三部补提，靳辞职后仍任陆军总长[(115)]。关于徐树铮免职，边防军、西北军归部直辖问题，段祺瑞和安福系同意做一种"掩耳盗铃式之让步"，即边防军西北军归段祺瑞节制，徐

树铮的筹边使保留，名义上虽有变更，实际上仍然照旧。当日，张作霖将靳云鹏坚不肯复职和上述调停情况电告保定方面。保定电复张作霖并转徐世昌，对于阁揆问题，其措词为“悉凭元首主张”，未表示可否，但仍坚持取消筹边使官制，解除徐树铮兵权，罢免李、曾、朱三总长及其他条件[116]。电文还举例说：“民国六年，段合肥联合各军，向黎黄陂兵谏，今日各军向合肥兵谏，均是为国，毫无私意。”[117]与此同时，安福系成员百余人则于6月29日在太平湖俱乐部开临时大会，讨论对付办法，提出周树模如组阁，他们在新内阁中无论如何须保留财、交两部，以维持现有势力，最后通过不保留两部，即不通过周阁的决议[118]。

6月30日，张作霖赴团河将保定回电报告段祺瑞，段拒绝保定所提条件，态度异常坚决，说：“调停政局，乃极好之事，惟吴佩孚以一师长干预政事，要挟条件，此风一开，则中央威信扫地。”[119]张作霖立即当面向段表示谢绝再做调人，即日出京，并于当晚即去徐世昌处辞行。时徐已就寝，未接见，但传谕请张务必不可出京。后由于徐坚决挽留，同时段祺瑞和安福系担心张走后，局势发展对自己不利，亦托人劝挽，表示“诸事尚有磋商之余地”[120]，张始答应留下。但声明东三省防务紧张，不可久居京城，只能以五日为期，如届时再不能解决，就将卸责不管。

7月1日，安福系又开会，决定请段祺瑞组阁及惩办吴佩孚两事，作为抵制直系进攻之计。他们认为：直系各督既只反对段祺瑞左右之人，对段本人并无意见，自应由段组阁；吴佩孚以一师长干犯国政，亦应惩办。这两条如能做到，则徐树铮可以解职，安福系愿意解散，三总长亦愿意辞职[121]。会后一二日间，安福系对段组阁事便大力进行。

就在此时，徐世昌抢先了一步。7月2日，北京政府发表了批准靳云鹏辞职的命令，同时将徐世昌总统关于由周树模组阁的咨文送至众议院，咨文内容仅提出国务总理一人，并无阁员名单。徐世昌这一

着，是同张作霖商量后做出的，一方面是破坏安福系拥段组阁的阴谋，另一方面是为下一步免徐树铮职做准备：先免靳，后免徐，可以减轻安福系的反对。安福系的计谋落了空，自然大不满意。7月3日，徐树铮去见徐世昌，质问为何不疏通各方即提周树模组阁，是谁的主张？徐世昌回答说："主提周，合肥也，汝若有疑，可询合肥。"[122] 徐树铮无言可对而退。

徐世昌决定由周树模组阁时，周声明并非出于自愿。曾毓隽去见他，请他宣布施政方针，并提出："新阁成立，须本党阁员有（财交）两部蝉联，国会方面方能担任通过。"周当即回答说："本人现尚无意出山，说不到宣布施政方针，即使宣布，亦当公诸国人，不能私向个人宣布，亦不能私向一党宣布。至国会通过不通过，与予本身毫无关系，请不必代为费心。"[123] 他还对人说，"现在内阁之地位，实一牺牲人之地位，我固知之，惟以总统交情所关，果非牺牲我不可者，我亦何能坚拒。"[124] 他提出组阁三项要求：一、阁员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二、各项行政不受各方面之束缚；三、关于军事、外交与财政各方面，亦不得把持[125]。明白人一听都知道，这些都是针对安福系干政乱纪而说的。安福系碰到了一个比靳云鹏还强硬得多的对手，感到十分沮丧。他们知道周树模其人不好对付，因此国会方面主张通过他组阁的人寥寥无几。而且由于议员出京的也很多，不够法定人数，众议院并没有就政府咨文提付表决。

显然，内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也丝毫没有满足直系的要求。对周树模组阁，保定方面也不甚赞同，认为他无力解决当前时局问题。吴佩孚曾说："周树模官场经验，纸片文章，吾人固甚佩服，若当太平无事之时，以为伴食宰相，固甚称职。但当此风雨飘摇之局，而欲责周戡乱致治，吾知其难矣。"[126]

其实，保定方面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内阁问题，而是解散安福系、罢免徐树铮的问题。在吴佩孚看来，只有解散安福系，除掉徐树铮这个罪魁祸首，时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他实行兵谏的主要目的也

在此。北京免靳令下后，曹锟、吴佩孚当即有电到京，指出：西北军不移归陆军部节制，祸根尚在，“归段统率，与归徐统率一也”[127]，坚持要求褫夺徐树铮的兵权。

7月3日，保定方面又发表曹锟致张作霖并转徐世昌的电报，要求罢免徐树铮一切职务。电文说：“安福奸党，倒行逆施，天人共愤，迭经中央申明法纪，迄未奉准。今闻彼党益无忌惮，竟欲拥段组阁，贯彻亡国主义，是皆徐树铮等之鬼蜮伎俩。三军将士，倏闻之下，义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歼此丑类之势。幸请大总统刚断，先行罢免徐树铮各职为入手办法，以平众怒，否则锟实无法排解，惟有不负维系之责。”[128] 张作霖是反对徐树铮的，夺去徐的兵权，对他扩张势力，向内蒙与热河发展有利。他在调停开始时没有急于提出这问题，主要是由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此，他同一天（7月3日）和曹锟、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宣布徐“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权”、“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声称：“为国除奸，义无反顾。谨厉戎行，引领待发，扫清君侧，奠我神京。”[129]

在保定咄咄逼人的形势和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里应外合的配合下，7月4日，徐世昌在公府召集特别会议，参陆处主要成员均与会。讨论结果决定：西北军用陆军部令改归部辖，西北边防司令部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令李垣护理。散会后，随即由公府拟就三道命令，发交阁员副署，同时颁发：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二、徐树铮现经任为远威将军，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代理；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130]。

徐树铮免职令发表后，安福系愤愤不平，要求徐世昌对“干政兵谏，紊乱国宪”的吴佩孚依法进行惩办，以维纲纪[131]。徐树铮认为徐世昌此举，并非是针对他一人的，而是助直排皖，一则巩固其元首地位，一则削夺段祺瑞兵权，于是往诉于段说：“树铮之滥借巨款，

编练重兵，甘为天下之不韪，无非为督办计耳。今总统惑于佥壬，免去树铮之职，是欲排去皖系也。排皖系，即所以排督办。树铮一身不足惜，其如督办一身之威名扫地何？”(132) 言毕痛哭不已。事实上，段祺瑞同徐树铮是穿连裆裤的，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当时人们把徐看成是段的灵魂，段是徐的影子。经徐树铮这样一激，段祺瑞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吾与东海有数十年之交好，故于改选之时，愿与河间同时下野，而以元首之位让之。何意彼年老昏聩，竟出此非法之举动。彼既不念前情，老夫亦顾不得面子，今日誓不与之甘休。”(133)

由于段祺瑞和安福系坚持要求惩办吴佩孚，7月5日，段并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积极准备对直战争，张作霖以劝阻无效，调停失败，便于7日深夜离京返奉。苏、鄂、赣、绥等省代表亦随即出京。

直皖之间的矛盾已发展成为尖锐的对抗，不可能用调停的办法来解决了。政治斗争无法解决时，必须让位于军事斗争，也就是只能兵戎相见，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了。

第二节　直皖战争的爆发

一　直皖战争前夕双方的备战活动

张作霖走后，段祺瑞于7月8日清晨由团河入京，上午即召集近畿各军重要长官及国务员、参谋总长、卫戍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百余人，在将军府开军事会议。段即席讲话说：“国家以纲纪为重，纲纪不振，则国不存。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以至湖南失败，涂炭生灵。撤防后又在保定兴风作浪，逆迹昭彰。曹锟竟敢以兵力要挟元首，胁迫中央，为种种破坏法律之主张，且要求下令免徐使之职。徐使此次收回外蒙，厥功甚伟，并未用中央之款项而收回数万

里之疆宇，曹吴等则要求元首罢免徐使，法纪荡然，是非不明。鄙人为维持国家纲纪及维持元首威信起见，不得不兴师讨逆。现拟呈请大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曹锟弟，时任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褫夺官勋，交祺瑞拿办。现已入军事范围，如有不听命令者，当按军法办理。”[134] 段讲完后，曾毓隽即站起来发言，宣称：“现时我等惟当知有督办，不当复问政府，督办此言，当一致赞成。”[135] 与会者自无不同意见，当即通过，并缮具呈请徐世昌将曹锟褫职留任、吴佩孚褫职拿办、曹锳褫职的呈文，由段祺瑞签名，各军官副署，交代理内阁总理萨镇冰转呈徐世昌。呈文略称：“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饬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用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136] 会上段祺瑞任命段芝贵为京师戒严总司令，吴炳湘为副司令，自任讨吴军总指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同一天，段祺瑞发表了声讨直系的通电，内容与呈文基本相同。

当天下午，上述呈文送至总统府后，徐世昌即召开全体阁员特别会议讨论。徐起初表示不同意惩办曹吴，希望和平解决。经曾毓隽等再三陈说，徐始答应免吴佩孚一人职。曾等仍坚持要求同时罢免曹锟，徐说：“盖印固易事，但因是使时局益纷扰，人民受战争苦，将谁负责？”曾答称：“总统止顾盖印，一切自有合肥负责。”并且威胁说：“苟总统不盖印者，恐时局益难解决，总统且贻后悔。”[137] 徐世昌仍不肯盖印，会后派袁乃宽至团河谒段祺瑞，征询缓和办法。段根本不把徐放在眼里，表示：“非将曹锟免职，吴佩孚惩办，曹锳交法庭，不能缓和。”[138] 并要挟说：“总统免曹吴职与否，彼亦自有权衡，我不便干与，亦不必干与。纵彼不下令，我岂遂不能免曹吴而拿办之耶？”[139] 段随即派重兵包围公府，对徐进行胁迫，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说，如免曹吴令候至晚间8时不下，则皖军将于次日（9日）上午在琉璃河首先开火。徐世昌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将内阁呈送

惩办曹吴之命令誊印发表，但声明自己不承担意外之责任[140]。令文如下："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141]

围绕徐树铮和曹锟、吴佩孚免职问题而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直皖双方都料知战争将不可避免，彼此都在积极进行备战活动。7月初，徐树铮连续召集所属旅团长开会，讨论对付吴佩孚办法，决定：一、持镇静态度，以避其锋；二、暂取守势，以待动静，三、密令驻洛阳西北军两旅牵制吴军；四、密电吴光新调部队到信阳遥为声势，并令其坚辞湘督，任南军扰鄂侵赣，以分其势；五、遇事请示段祺瑞，以资服从而免遗恨[142]。陆宗舆从中日汇业银行拿出现款二百万元，曾毓隽将交通部所存储之中交钞票一百万元，充作战费，给边防军每师开拔费十五万元。5日，边防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后，即向各军发足军饷与枪弹。6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向长辛店开拔。8日，段祺瑞在将军府开完军事会议后，即返回团河，在私邸召集近畿各师长开会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陆军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的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的陆军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瀚的陆军第九师为第五线[143]。随后又划定作战区域，以京奉线一带为东路，以固安一带为中路，以琉璃河至高碑店一带为西路。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向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房山、琉璃河一带进发，由于锦统带的南苑飞机队亦处于待命状态。消息传出后，京中大起恐慌，京钞暴落，军政要人眷属纷纷迁徙出京，避往天津使馆区，一如当年段祺瑞讨伐张勋时的情景。

直系方面，驻河南吴佩孚军也开始向北开拔，其前锋已达高碑

店。留驻郑州部队，严密监视驻洛阳西北军一、四两旅的行动。曹锟的军队亦由保定开赴高碑店。

自惩办曹吴命令发表后，保定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孚兼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直皖双方一方面进行军事调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制造舆论，扬己之长，暴人之短，进行反对对方的战争宣传，都力图证明自己是师出有名的，以求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7月12日，吴佩孚、曹锳、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实际上是对皖系的宣战书。通电一反前此不久曹锟、张作霖等为力求避免“以下犯上”的恶名而承袭“清君侧”的传统手法，露骨地指斥自我标榜“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段祺瑞暴戾恣睢，与徐树铮狼狈为奸，共同作恶。电文写道：“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己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己之喜怒为祸福。漠视民瘼，轻启兵端，嗜杀以争，残民以逞。……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斲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144)] 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痛斥段祺瑞为卖国的汉奸，略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

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145)

张作霖离京后，在天津附近之军粮城下车，表面上仍宣称“局外中立”，实际上和直系一致采取反皖立场。7月8日，他在天津省公署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对皖战争问题，曹锟、吴佩孚及八省同盟均有代表参加。曹锟当时对于是否能战胜段祺瑞有些担忧，态度游移，认为战争一开，直隶首当其冲，如不能获全胜，徐世昌将“受段之要挟，乘风转船，加以叛乱的罪名，则直省危矣”(146)。吴佩孚起来发言说：“共和国家，以法律为根据，违犯法律，即是叛乱国家，此等名词，非他人所能妄加也。段派种种行动，皆越法律轨道以外，我等起与相抗，何叛之有？”接着他分析当时直皖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就实际上论，段派所恃者仅边防军，该军成军以来，未经战阵，经验缺乏，且闻所用军官多系学生，颇有思想，决不肯效忠奸党，与同胞为难，一临战地，溃散立见。”吴佩孚还认为，仅他自己所部军队，就足当段祺瑞全部之众而有余，即万一战而不胜，我军扼守京汉路线，联合西南，以直省为前敌，河南为中坚，湘粤为后盾，徐图进取，更有张巡阅使控制东北，则段派直如瓮中之鳖，又何虑哉！”(147) 这一席讲话，使曹锟疑虑冰释，张作霖及其他与会代表也都表示赞同，直系倒皖的战争，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张作霖回到奉天后，即决心加入曹锟、吴佩孚倒皖战争的行列。7月11日，他召集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奉军总司令张景惠及吴俊升、张海峰两师长在奉天省公署开会，决定由二十七、二十八师各出兵一旅入关，保护京奉路，以卫队旅之一部协同二十八师留奉部队，保护关外京奉路，并随即下动员令。二十八师抽编之一

旅，已于先一天（即10日）入关，作为前锋部队，二十七师一旅于12日出发[148]。

同一天，曹锟致电张作霖，希望在对皖战争中得到他军事上的支持，并和他们联衔发表讨皖通电。张作霖即日复电表示赞同，说："现在弟处已备二十七八两师步队，兼以马队两旅，当能足用。二十八师先行进关，马队作为后盾。此次出师，由弟亲自带往，现在赶急调集之中，二十八师车到即可全数出发。日前奉军入关者，与贵处军队合计，约有七八万人，如有战事，尽可先行支持。叙五（张景惠）兄即速往前方，与三哥（指曹锟）面商一切，率领第一师并鲍旅许部筹画进行。愚见以兵力论，我众彼寡，以公理论，我直彼曲，绝无不胜之理。彼此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断不能不极力相助，请释厘念。至联衔通电，事已至此，即请拍发为要。刻下战事节节得力，足见天道至公，持强权者终难得善果也。"[149]

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即联名发表讨皖通电，谴责段祺瑞专横谬妄，"实为全国之公敌"，表示："对此衅起萧墙，无术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马厉兵，共申义愤，解元首之坐困，拯大局于濒危，扫彼妖氛，以靖国难。"[150]是日，张作霖还致段祺瑞一电，说他返奉后，拿获胡匪八人，皆持定国军委任状，阴谋破坏东三省秩序，并愤慨地说，"此事公或不知，然群小如此，殊堪痛恨。作霖誓率关外劲旅，入清君侧。"[151]7月13日，张作霖又向全国发出通电，声称："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哓音瘏口，出为调停。原期暂息争端，借以稍纾国难，无如我则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是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152]

段祺瑞也于7月13日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的传檄通电，指斥

曹、吴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他义难坐视，要亲自统率定国军，“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歼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其余概不株连”[153]。段祺瑞的通电表面上也冠冕堂皇，其势汹汹，实则色厉内荏，自知理亏。当他知道张作霖已完全倒向曹锟、吴佩孚一边，派奉军入关，并且听说皖军有厌战心理，前线直皖两军小有接触，皖军士兵即时有逃亡，眼看战争前景不妙，于是又转而向曹吴乞求和平。他敦请徐世昌于14日下了一道停战令，要求“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154]。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战争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停战令的墨迹未干，战争就爆发了。

二　战争经过

直皖战争是7月14日晚开始的。开战之前，直皖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大致如下，

皖系兵力：段祺瑞的定国军在近畿的军队有五师（并不足额）一混成旅，即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所部一万一千人，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一万一千人，陆军第九师魏宗瀚所部八千人（另宋焕章率一混成团驻守在海参崴），第十三师李进才所部八千人（另有两团，一团在公府当卫队，一团在河南彰德为袁世凯看坟），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八千人（另吴长植一旅于1918年赴山东剿匪未回），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宋子扬所部八千人，边防军训练处学生队约三千人，共约五万七千人。外省属于皖系的军队有：在山东的边防军第二师马良所部一万一千人和陆军第五师一万余人，在洛阳的西北军第一混成旅宋邦翰部和第四混成旅张亚威部各八千人，驻库伦的西北军第三混成旅褚其祥部八千人，安徽督军倪嗣冲所部安武军及新安武军（张勋旧部定武军改隶）约四万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所率之第四、第十两师（一部分驻杭州，一部分驻上海）约二万余人，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二三万人，陕

西督军陈树藩所部二三万人，在湖北的吴光新所部四个步兵旅和两个混成旅，实额约二万人，共约十七八万人。

直系兵力：曹锟、吴佩孚在保定附近和天津的讨逆军，有吴佩孚第三师一万一千人和第二、第三混成旅一万六千人（另第一混成旅驻郑州），一个补充旅约六千人，曹锟卫队三千人，直隶警备二十六营约一万三千人，曹锳第四混成旅八千人，共约五万七千人。外省军队属于直系的有驻山东德州商德全第五混成旅约八千人，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赵倜所部士卒总数约十一二万人。站在直系一边的还有张作霖的三师军队三四万人，另外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领的第十六师和绥远都统蔡成勋所部一师共约二万余人，亦倾向直系。

综观上述双方兵力，从数量上来说，无论是近畿还是外省，都不相上下。

双方兵力部署：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京保段）。皖军由段芝贵任指挥，有边防军第一师全部、边防军第三师第五混成旅、陆军第十五师全部、第九师两营、第十三师辎重营，在涿州、固安、涞水以北布阵。主力边防军第一师集中在涿州、琉璃河、良乡一线；左为边防军第三师，驻固安之后；右为陆军第十五师，跨门头沟支路列阵于第一师之后；第十三师沿京奉路向东布置，用以策应边防军第三师。

西路直军以吴佩孚为总指挥，有第三师及第二、三两混成旅，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线。吴佩孚为防皖军两翼包抄，以精兵第三师第六旅当左翼，第三混成旅及第三补充旅当右翼，而以第一补充旅当正面。以保定第一补充旅、曹锟卫队及新从天津开至保定的六营为后援。西路是皖军的主攻方向，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这路。

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京津段），皖军总指挥为徐树铮，有宋子扬之西北军第二混成旅、边防军第三师两个团及第九师一部，列阵于

落垡、廊坊一带。直军总指挥为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锟，有第四混成旅、李殿荣的第二补充旅及直隶守备队二十营，驻守杨村，与皖军对阵。

皖军的作战计划是，西路以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南下，第一个夺取的目标是保定，然后继续往南，在湖北的吴光新则率部沿京汉路北进，在洛阳的西北军两旅由西向东进攻，以这三支部队围歼直系主力，会师中原。东路沿京奉铁路线向东进攻，第一个夺取的目标是天津，然后继续沿津浦路南下，在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则沿津浦路由南往北进攻，与东路皖军会合。直军采取的相应对策是：西路以主力部队坚守住京汉路，阻击皖军南下，湖北由王占元的部队监视并拖住吴光新，驻守郑州、信阳一带的直军和豫军阻吴军北犯。洛阳方面，以观音堂（洛阳西面）的奉军和郑州的直军合围洛阳的西北军。东路由商德全的第三混成旅占领德州，与奉军配合，同徐海镇守使张文生的部队合攻马良。

西路段芝贵的指挥部设在琉璃河附近铁路的一列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上书“总司令处”四个大字，办事人员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尚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啦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厨师二十余人。吴佩孚则轻骑简装，在固安以南约三十里的牛驼镇坐镇指挥。他抱着“擒贼必先擒王”的宗旨，计划亲率第三师的第五旅，出奇兵直捣团河（距固安约五十里），捉拿段祺瑞。7月13日晚，吴以便衣手枪队占据固安、涿州两处，将电报通信交通机关控制起来，旋即派大兵赴团河擒段。不意这一军事行动被一电话分机的电话员泄漏给了段祺瑞。段闻讯后，一面飞调救兵，一面向京城逃走，等救兵到时，吴军仅离团河十余里。吴佩孚见擒段之计不成，而固安、涿州已在掌握之中，于是实行分兵三路的战略，坚守中路固安，以涿州、高碑店为西路，廊坊，杨村为东路，迎战皖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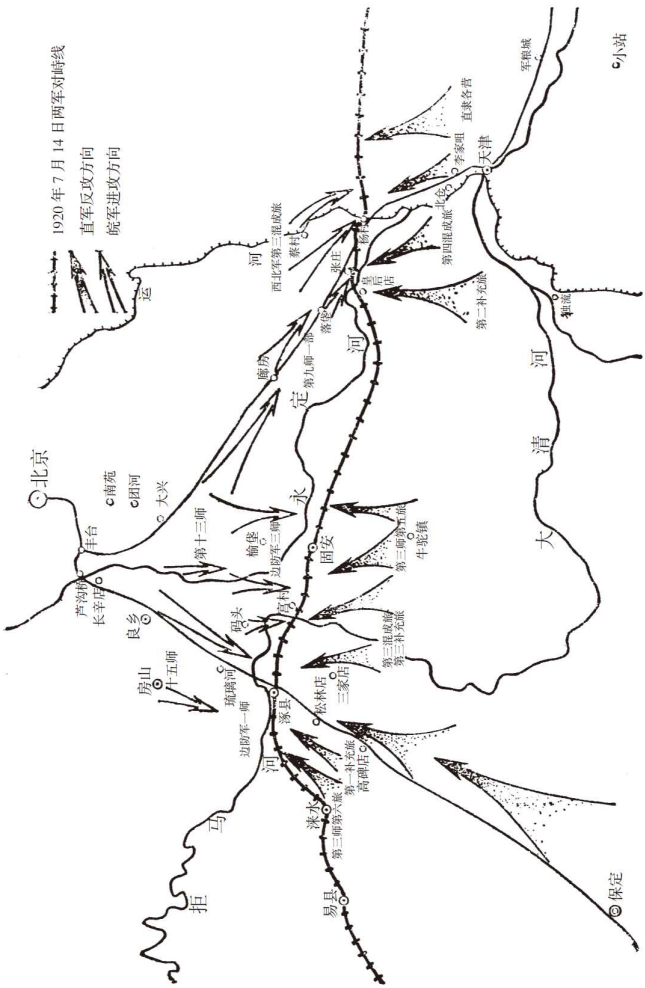
西路战争情况：

7月14日下午3时，段祺瑞颁发总攻击令。皖军首先在西路向直军发动进攻。晚8时，涿州、琉璃河的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及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兵，向直军第三师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接连不断地以大炮向直军营地猛轰。直军初以皖军来势甚猛，略事退让。边防军前进，刚要夺取第一道防线，直军突然反攻，边防军抗御不及，退回原线。11时，边防军又往攻直军的右翼第三营，直军第二营由边防军右翼抄袭，两路夹攻，边防军败退回琉璃河原阵地，死伤数十人，失踪营长一人；直军亦伤亡数十人。

15日晨6时开始，边防军第三师及陆军第十五师，由俞垡镇至码头镇西列成一字线，向固安及宫村镇附近的直军进攻。直军极力抵御，战至数小时之久，双方阵地均无变动。后皖军连陷直军外围防线数处后，再图前进，皆被击回，致遭受重大损失，声威顿挫。直军乘势进逼，皖军大溃，内有某营只剩数十人，直军亦伤亡不少。随后皖军再次发动进攻，涿州、固安两处均发生激战。边防军第一师前锋部队及陆军第十五师，在大炮的掩护下，占领涿州及松林店，将直军压退至松林店以南五十里的高碑店。中路皖军则以第十三师攻固安，直军由吴佩孚在城内指挥，极力抵抗，皖军猛攻，始终未下。

16日夜大雨，雷电交作，皖军所有榴弹炮、开花炮均失去效用。吴佩孚调二军分由松林店、三家店向皖军第十五师、第一师之后包抄袭击，切断其归路。正面由刚从河南赶到的奉军第一师第一旅邹芬所部加入作战，直军士气大振。皖军腹背受敌，大败，纷纷弃械逃走。十五师有两团人被围困，投降直军。边防军第一师开炮袭击直军，炮弹误落十五师阵地，士兵死伤不少。十五师官兵大愤，亦开炮还击，因不满段芝贵逼令作战，并向段的司令部开炮轰击泄愤。官兵纷纷往琉璃河方向逃跑，夺取列车，逃回北京。边防军第一师亦向后退，军官虽用机关枪在后押阵，亦不能制止。直军乘势克服松林店、三家店及涿州等城镇。十五师从琉璃河溃退时，适值河水暴涨，士兵溺毙不少。师长刘询涉水渡河时，携带现款七千元，全部落入河中。刘幸抓

得船桨一副，凫至对岸，为士兵救起，已不省人事。十五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备函派执事官送往吴佩孚军中，略称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155)。吴佩孚当即要齐宝善亲赴松林店面定办法，达成停战协定，十五师遂全部归顺直军。18日，张、齐两旅长又在前线发表罢战通电，指责“段氏不道，容奸卖国”，宣布十五师全体官佐目兵“不受乱命停战”(156)。



直皖战争形势图

16日，吴军右翼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和彭寿莘的第三补充旅，由固安向北进攻，将边防军的第三师击散，师长陈文运受伤逃走，第十三师一营投降直军，其余溃逃。皖军退至码头镇，直军占领南庄、长安城等地。

17日晨，直军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北面。由于十五师降直，第一师已成孤军，全被包围。经过鏖战，直军大获胜利，边防军第一旅旅长范尚品阵亡，第二旅旅长程长发潜逃，其团、营、连长及士兵伤亡很多。师长曲同丰见全军战斗力已完全丧失，树起白旗，派副官吴敬珉和法国传教士李司铎向吴佩孚乞和。吴当即答称："和战非我能做主，停战则可，但须缴械。"(157) 旋曲亲向吴佩孚投降。吴拒而不见，曲被押送保定。边防军第一师粮秣、子弹、重炮等一切军用物资，尽归直军所有。18日，曲到保定光园晋谒曹锟时，解下军刀，双手捧向曹说："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他们在俘虏期间，对于直军宗旨决不敢有所违背。曹锟当即接下军刀回答说："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158) 仍将军刀还给曲佩带，并允许曲等"享受军事惯例优待俘虏之自由"。19日，曲同丰在保定发表通电，敦劝边防军全体与曹锟一致共讨徐树铮。电文说："此次战争之起，本为驱逐徐树铮及安福部，名义正大，全国共表同情。同丰率队南来，宁不知此。顾以段督办严令驱迫，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及至交战以后，思及此次出师，似为徐树铮及安福部所利用，遂决计停战，俾国贼无所依恃，以延祸端。兹已将全部军械交由四省经略使接管，所有官兵亦极蒙优待。从此大愤既除，大局渐臻统一。我边防军同袍当各晓斯义，立与经略使取一致宗旨，誓驱奸凶，共申天讨。除电知外，拟再派一二军官面往接洽，以期倾陈鄙悃，尚祈鉴察。"(159) 同一天，曲还致电指责段祺瑞"纵恶养奸，数年于兹，以致国事日非，大局破裂，丛尤聚怨"，希望他幡然悔悟，将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人"速请大总统令交法庭依律研讯，以

治其殃民祸国之罪”[160]。边防军第一师为皖军主力，曲同丰又是段祺瑞最识拔的弟子，宠遇不亚于徐树铮，而今倒戈相向，遂使皖军全军溃散，不可收拾。

17日，西路皖军三个师全为直军所败，涿州北面完全为直军占领，总指挥段芝贵知大势已去，当晚由琉璃河搭车回京。行至中途，被直军追赶，弹如雨下，车厢内卫兵死伤数十人，段俯伏于车内，才得幸免。车开到良乡附近，枪声未息。段不得已，单身搭摇车逃回北京，形状狼狈不堪。他前往谒见段祺瑞时，跪伏地下，痛哭不已，表示无再战能力，请求段祺瑞转呈总统徐世昌下令停战。

18日，直军第三师第六旅进占琉璃河，双方炮火已停息，西路已无战事，只待办理善后。20日，直军大队抵长辛店和卢沟桥，将溃散的皖军扫清。

东路战争情况：

7月15日夜9时，皖军由徐树铮在廊坊指挥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各队、陆军第九师一部、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乘大雨之夜，分三路由张庄、蔡村、皇后店进攻杨村直军第四混成旅防线，而以铁路线上张庄一路为主力。每路配备六门大炮，与直军在杨村北面十里开战。皖军多不愿战，只因被上级长官逼迫，于是不问方向，任意放枪，炮队亦分三队轰击。直军士气甚壮，列阵还击，沉着应战。战至深夜2时，双方各有不少伤亡，于是更换生力军再战。16日晨，战斗更加激烈，直军略占优势，但伤亡甚多，援军由韩柳堡、北仓、宜兴埠、军粮城等地纷纷赶至。是日皖军进攻时，直军在杨村站吊桥两旁安设大炮多尊御敌。此地适与该处日本防军驻地毗连，日本军官出面抗议，要求将所有大炮即刻移走，并不准在铁路附近六里以内作战。直军抗辩无效，只好将部队撤离，退出站外，致第一道防线中央开了一道约十四里宽之缺口。皖军乘隙蜂拥前进，突入缺口。直军因左右翼不能联合，只得节节后退，退至北仓及李家咀中间，阵势才稳定。北仓距

直军东路据点天津仅十八里，皖军为租界条约所扼，不敢直入天津[161]。

天津小站原驻有龙济光部队振武军十二营，约二千人。龙支持皖系，皖军派参谋与他联系，想和龙军东西合攻直军。曾毓隽赠款十三万三千元，作为振武军军饷，龙满口答应调部袭攻天津，并与皖军合扑保定。但龙济光将全部款项攫为己有，吝不发饷，士兵怨怒，不肯发难。

当直军与皖军相持于北仓以西时，适有奉军工程兵一营驰来相助，直军士气大振，立即开始反攻。17日，张作霖发表通电，明确表示协同直军作战。电文指出："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曾毓隽）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有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树铮议妥，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电文还说："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之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162] 16日和17日，从京奉线入关奉军第二十七、二十八师两旅数千人到达天津附近。奉军因张作霖前年在秦皇岛劫夺了冯国璋从日本购运回国的一批军火，装备较好，配备有威力很大的四十生口径的大炮，机关枪也较多。奉军的参战，大大加强了东路直军实力，并给皖军心理上以很大威胁。直军与奉军并肩战斗，于17日重新占领杨村，直下落垡和廊坊，击毙皖军很多，剩下的逃散大半。徐树铮见战争失利，当晚踉跄逃回北京。20日，京奉线一带皖军已逃走一空。东路战争也以皖军失败直军胜利而告终。

东西两路战争全线溃败，段祺瑞愧恨交加，有如丧家之犬。7月18日，靳云鹏去见段，向他进最后忠告说："战争已完全失败，边防军战斗力已失，若不从速设法，恐三数日内，京中粮食问题将令全军不战自溃，至兵临城下，为时已晚，追悔莫及矣。"[163] 段表示同意，便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是日，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

7月19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电文说："顷奉主座巧日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厪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谬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共谅寸衷。"[164] 这个电报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罪责，不承认自己战败，而把停止战争的理由说成是出自外交团的警告和徐世昌的电谕，并且是他主动命令前方将士停止进攻的，真可谓恬不知耻。

直皖战争主要是在京畿一带进行，但其他地方也有牵动和连锁反应。双方都想调派在外地的军队和盟军配合和支持各自在京畿的军事行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湖北方面：战争爆发前不久，段祺瑞即密电在湖北的吴光新调遣驻鄂西的军队集中汉口，沿京汉路北上，以牵制吴佩孚，袭击吴军的后路。北京边防军司令部也有急电致王占元，要求他令已改编的张敬尧第七师"暂待后命"[165]，企图恢复张旧部，以配合吴光新的军事行动。为此，吴光新与张敬尧潜居汉口，进行密谋策划。曹锟、吴佩

孚则于7月上旬派代表余道南持函分赴汉口和长沙，和王占元、谭延闿联系，要求他们出兵监视吴光新的军队，如有异动，即予以消灭，以解除直军后顾之忧[166]。同时吴佩孚还致电陆荣廷，恳请西南各省发表宣言助直反皖，希望桂军一致行动，并另嘱在湘桂军“听候机会随时北上”。陆荣廷复电表示湖南刚刚恢复，宜暂时休养，不可遽然加入，牵动大局，且西南距离直隶太远，行军不易，嘱吴佩孚自己“竭力猛进”，西南只能在旁观察，保持中立态度[167]。王占元和谭延闿则从直系和自身的利害出发，对曹吴的主张积极予以支持。王占元派代表到长沙与谭延闿磋商，谭也派代表到郑州和保定，分别与赵倜、吴佩孚联系，并达成组织湘鄂赣豫四省援直联军的协议。

7月11日至13日，吴光新在汉口密调原驻宜昌所部赵云龙第一暂编混成旅和陶云鹤第三旅到汉口，并随即开赴武胜关、信阳一带，准备与河南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的军队联合，继续北上，从后面袭击吴佩孚的直军。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光新的一切举动，早被王占元所监视，并做了相应的部署。王将鄂军一些主力部队集结于武汉附近一带，以防备吴的反叛。7月16日，吴光新在武昌直隶会馆邀宴武汉军民两界高级官员，请王占元为首座，借以“离间军队，冀图一逞”[168]。候至下午4时，仍不见王来，吴于是亲往省督署面迎，旋即被王占元扣留，押于督署花园内。驻扎在汉口硚口吴光新的卫队千余人，得知吴被扣后，群起骚扰劫掠，当即被包围缴械。张敬尧闻讯后，连夜仓皇逃离汉口。7月16日、17日，王占元接连发表通电，揭露吴光新的阴谋，表示他扣留吴是不得已的。

扣押吴光新的当日，王占元命令直军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原驻通城，12日进抵武汉）迅即于晚间开赴武胜关南北一线待命。李率部于18日抵武胜关，21日占据信阳，吴光新所部赵云龙和陶云鹤两旅被包围缴械投诚。留驻宜昌、沙市的吴部刘文明第二混成旅和张元培暂编第二旅，见形势不利，亦宣告中立。

河南方面：驻守河南洛阳的西北军宋邦翰第一混成旅和张亚威的

第四混成旅，原拟配合京畿皖军的军事行动，东攻直军，后鉴于处在直奉军包围中，未敢轻举妄动。直军在京畿战场击败皖军后，7月24日，宋、张为了保存西北军实力，避免被直军改编，采取应变策略，发表通电，表示愿改隶陆军部，而战前（7月初）他们曾通电反对归陆军部节制。7月27日，吴佩孚致电宋、张，勒令其解除武装，指出："边防西北各军，由外债组合而成，豢养为一家之爪牙，断无存在之理由。且附逆各军如长江上游各旅及第九师，尚皆缴械遣散，况贵旅为小徐手造，何能独异？大丈夫弃暗投明，何时不可为国效力，更何争此一时之去就。贵部素明大义，理应自请缴械，以释嫌疑而去污点。"[169] 宋、张不愿归曹锟、吴佩孚节制，以"该旅成立之初，与奉军渊源可溯"为辞，提出愿拨归张作霖统率[170]。曹锟不允，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前往接收，并由张作霖饬驻扎石家庄的奉军旅长鲍德山派员帮同办理。7月30日，西北军宋、张两旅在洛阳哗变，王承斌率部会同奉军合力围剿，变兵溃散，向西北方向逃窜。

山东方面：在山东与河北交界处，马良所属边防军第二师，以黄河涯（位于德州南约二十五里之津浦线上）为界，与驻守德州的直军商德全第五混成旅对峙。7月18日，马良派兵一支北上，拟夺取德州兵工厂，然后率大队北上天津，与东路皖军会师。兵到德州境内时，为商德全所赶走。商并将德州以南的津浦路铁轨拆除，以防边防军第二师北进。19日，马良亲率边防军发动总攻击，20日夺取德州。与此同时，十五师留驻山东的吴长植旅，则移防济南与德州之间的平原、禹城一带。商德全部退至河北境内桑园（今吴桥，距德州约四十五里）连镇。天津小站龙济光的振武军又蠢蠢欲动，准备前往接应援助马良。但此时皖军东西两路均已失败，大势已去，边防军第二师已成孤军，败局已定。是日，靳云鹏、姜桂题致电马良说："直皖交战，两路边防军已退至京师附近，曲师长投诚缴械，陈师长受伤，不能动作，全部溃退，伊等自认听候处分。东路奉军大队已到，寡不敌众，人所共知。总之，此后两无战事，胜者让步，败者认罪，自无再行祸民之理。望即收兵勿进，听候办理，决无加罪于执事之理。"[171] 21

日，奉军总司令张景惠派员到龙济光军中交涉，阻止他援助马良，并要求他解除武装。龙济光拒不服从。22日，奉军与之开战，龙军溃败，全被缴械，龙济光挈眷逃走。

7月25日，直军商德全旅与曹锟的第四混成旅，在奉军配合下，在连镇举行反攻，马良的边防军第二师恐被包围，迅速从桑园、德州撤退至黄河涯。26日，直奉军再次会同进攻，边防军伤亡甚多，纷纷退至平原、济南一线。战事结束后，边防军第二师被遣散。

三　直胜皖败的原因

在直皖战争中，皖军投入战斗的兵力比直军多，装备也比直军好，战争爆发前，段祺瑞曾号称有“五师听其指挥”[(172)]；安福系还扬言：“若战，必七日内占保（定）、德（州），十日俘曹、吴。”[(173)] 然而，曾几何时，东西两路战场只打了三、四天，皖军即众叛亲离，全军覆没，一败涂地，直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其原因何在？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人心向背不同

军阀无义战。直皖战争是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争夺权势和地盘的战争，双方都不是义战，因此总的说来，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和直皖双方提出的口号，以及舆论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人民并不是毫无比较选择而一概加以排斥和反对的。

如前所述，自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成为中央的实际统治者。几年来，皖系军阀、安福系政客及其所操纵的北京政府盗卖国权，和日本私订密约，大借日债，培植私党，穷兵黩武，涂炭生灵，阻梗和议，干尽了坏事，恶贯满盈，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大有“时日曷丧”之慨。人们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的。恩格斯说

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74]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产生，孙中山虽然坚持革命斗争，但提不出正确的革命行动纲领，不依靠人民，而是联合某一个军阀去反对另一个军阀。孙中山从广东军政府内部斗争的需要出发，企图与皖系军阀合作，进行反对直系和桂系军阀的斗争，而这恰恰与国人深恶皖系、左袒直系的想法相径庭。五四时期，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北京军阀政府出卖山东的权利，但是不能根本推翻皖系军阀的统治。人民要求铲除祸国殃民的安福系的愿望，只能通过北洋军阀内部斗争来实现，通过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结局来实现。诚如当时舆论分析所指出："国民欲铲除卖国亲日之安福派也久矣。顾国民有心而无力。此出自国民之口，固当自惭，然亦实情，不必为讳。国民对于卖国亲日派虽有铲除之决心，然急切无实力，于此之际，苟有人焉，起而代为国民为之，不问其人为甲乙丙丁，但须不为外人，国民无不乐为赞成。国民之赞成其人也，绝非赞成其前此之行为与此后之期望，乃止断章取义，赞成其铲除卖国亲日者一事而已。故此次国民之赞成直系，乃止赞成其事，而非赞成其人。"[175] 如同历史上常常有过的人民盼望清官来取代赃官的情况一样，人们希望直系胜利，皖系失败；期望吴佩孚这个当时具有爱国思想，表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勾结外人，不做督军"，强烈反对安福系卖国勾当，同情学生爱国运动，主张和平统一的直系急先锋，来取代段祺瑞和徐树铮这类卖国祸民众矢之的的罪魁祸首。吴佩孚也正是顺应了这种民心，利用了群众对皖系和安福系的强烈不满，打着"锄诛卖国奸党"、"为民除害"、"召开国民会议"等旗号，来进行他的倒皖战争的。吴佩孚受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影响，他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和群众的斗争目标基本一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一部分人心，人民给予他从而也给予直军以某种同情和支持。可以说，人民要求推翻皖系军阀统治的意愿，是曲折地通过吴佩孚的行动反映出来的。

直皖战争前后，全国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徐树

铮和安福系的罪行，支持吴佩孚的对皖战争。7月15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等一百一十四个团体致吴佩孚等的电报说："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商学，无日不企望国民年出数千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前读吴子玉师长宣言，虽能如民意之所欲出，犹虑其不能见诸实行。今果誓众兴师，义声所播，河山壮气。使不于此时扫荡妖氛，去毒务尽，贻害国家之罪，诸公亦不能自诿。试观年来对外密约，卖路卖矿，何一非出于安福党人之手。使非绝其根据，国家主权，将永受他人束缚。诸公今日既有自负为国为民之责任，慎毋于堕彼方之诡谋，为感情所牵制，除恶未尽，遽藉口于息事宁人，致重贻国民以痛苦。倘能一本民意，以义始者，亦以义终，四亿同胞，固誓为后盾。"(176) 同一天，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给徐世昌的电文中指出："直军驱除安福，深符民意，免徐一令，众论翕然。"要求徐世昌"洞察民心，当机立断，惩办营私祸国之安福首领徐树铮、曾毓隽等，解散安福国会，卸段氏兵柄，彰明正义，与民更始，庶几乱原杜绝，和平可待"(177)。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声讨段祺瑞的电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种种罪状，同样表示了支持吴佩孚的直军对皖战争的态度(178)。当时一家外国报纸的社论也指出："北方舆论大多数表同情于吴佩孚，似愿诉诸武力，以期推翻误国已久之人物。"(179) 战争结束后不久，杭州学生联合会写给吴佩孚的信中还说："公此次誓师讨贼，救国热忱，歆动寰宇，凡有血气，罔不钦佩。兼旬以来，段党纷纷败溃，联军胜券可操。舆论推公，各界亦愿助公，此固廓清卖国贼之大好机会，吾国前途之一线曙光也。"(180) 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后来曾做了如下的追忆："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之长沙暗中替吴（佩孚）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181) 人们不仅对吴佩孚的反皖战争给以道义上的声援，而且在行动上也给予了支持。当吴佩孚在涿州及琉璃河一带与段军鏖战时，曾有数百名各界义勇队参加吴军，即其一例(182)。

人民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的痛恨，对吴佩孚倒皖战争的支持，是

皖系失败、直系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吴佩孚的取胜，是民众心理倾向的结果。”[183] 吴佩孚自己也说：“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184]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185]

二、两军士气不同

人心的向背，毫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两军的士气。直皖战争的首先发动者是皖系，但皖军是师出无名的。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提出讨伐曹锟、吴佩孚的罪名是“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其目的是“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186]。因此，他把出师的军队称为定国军。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正是段祺瑞、徐树铮一伙是应该铲除的奸凶；“目无政府，兵胁元首”的，也恰恰是他们自己。这种宣传是很难动员士兵，鼓舞士气的。皖军的主力是边防军，边防军建立的主旨是防边御外，现在拿来对内反对直军，这就亏了理，说服不了士兵。

吴佩孚利用段祺瑞的这种弱点，在战争爆发前夕，先后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指出：“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距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藉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堕其收买离间术中。我军人幡然觉悟，不为利用，而彼术穷矣。”[187] 又说：“试思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

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出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为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188] 这种宣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辟，颇能击中段祺瑞、徐树铮的要害，相当具有说服力。吴佩孚通过某种渠道将这些宣传品送到皖军中，在当时对瓦解皖军士气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上述情况和原因，皖军士气低落，缺乏斗志，普遍存在厌战情绪。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边防军军官及士兵即纷纷提出开往何处、与何人作战的质问[189]，并时有离队逃跑的情事发生。皖军“军官皆有智识，决不肯冒助卖国党之罪名”[190]。“军官皆曾受教育者，对于无聊之内争，为个人权利而战者，早不谓然。”[191] 段祺瑞在对皖军的训词中，于军官“则告以直派掌权，将并咨议差遣而不可得；于兵士则怵以我一失势，即将解散”[192]。边防军第一师誓师时，曲同丰竟无词可措，仅对兵士说：“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长官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193] 理由如此站不住脚，官兵自然无心恋战，在战场上不会拚死效力。魏宗瀚第九师官兵表示“绝不助逆”。7月10日，魏向官兵进行战争动员时，大家以师出无名为词，一致反对，魏当场昏倒，不省人事[194]。由于师出无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前线“段军部下，大半不肯作战……段军且多与吴佩孚表同情”[195]。“各路直皖军队，时有往返，互相嘻笑，感情甚洽，多数皖军不愿作战，以免自伤同类。”[196] “边防军将官多属学生出身，明白事理，声言边防军原用以对外，用以对内不肯任命。一日之间，营长、连长、排长逃走者达四五十人，即旅长团长亦有逃走者。段军军心不稳，可见一斑。”

[197] 因此，开战后，经不起吴佩孚的军队一击，皖军即开始溃退投降，倒戈相向。

曹锟、吴佩孚称兵反对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自然也是为了直系军阀本身的存在和谋求扩张的自私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和人民的利益无关。但是直系当时没有掌握中央政权，没有干皖系和安福系那么多坏事，人们对它没有像对皖系那样的憎恨。而且如前所述，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打出的是讨逆、铲除卖国奸党的堂堂正正的旗帜，这对士卒确能起到一些鼓动激励作用。吴佩孚的三师三混成旅官兵，曾远离家乡，在湘南戍防两年多，受段祺瑞的压抑，饱尝辛苦，且痛恨安福系的专横，因而在对皖战争中比较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很少有临阵脱逃倒戈反叛的。

三、两军素质的差异

段祺瑞号称有五师兵力听其指挥，但皖军的素质很差，而且真正能听命作战的，加起来也不过两师人。“定国军之实际战斗力，不过仅有直隶军之半数。”[198]

皖军的主力是段祺瑞亲手缔造的边防军，特别是边防军第一师被看成是主力中的主力。但边防军建制不久，兵系新招，未经战阵，缺乏实战经验。边防军第一师上中级军官除部分来自军队者外，多是保定军校的教职员，讲战术原则还可以，一到指挥实战则心中茫然，而初级军官多数是保定军校刚毕业的学生，更没有作战经验。这样一个学生班子率领的军队，与久经战阵，曾在湖南战场上屡建战功，有着比较丰富作战经验的吴佩孚军队相较量，在素质上就差了一大截；何况他们又素来慑于吴佩孚的声威，在心理上早就很有几分内怯，所以临战一触即溃，是不可避免的。

边防军官兵和直军将士，不少“非姻即故”[199]，有比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加之，边防军第一师出身于保定军校的下级军官，在校时

都曾受到曹锟的礼遇。“曹锟在保，礼军官学校学生甚厚，星期休假，特于各戏园池座中为军官学生备座，而点戏之单，则数日前即送至军官学校，以是凡出自保校者，罔不德曹”[200]。而且，“边防军多山东人，都赞成吴子玉的主张”[201]。因此，他们都不愿与曹锟、吴佩孚作战。当时一个在边防军中任职、了解内情的日本军官曾断言：“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202]

尤为明显的，是刘询的十五师问题。十五师是由禁卫军改编而成的，原系冯国璋的亲信部队，直系的主力，其前身是直隶第五混成旅。该混成旅1912年驻扎在天津西北韩家墅时，即由刘询统带。刘询为河间人，是冯国璋的同乡。1913年7月，冯在袁世凯指令下，组织第二军镇压二次革命时，该混成旅出力很多。是年12月，冯国璋任江苏都督，调该旅到南京，后刘询被任为淮扬镇守使。1917年8月，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改编禁卫军，加入第五混成旅，并以它为中坚，成立第十五师，担任公府警卫，由刘询任师长。1918年冯国璋下台后，十五师仍由冯掌握，购械发饷均听其自由处置，不受陆军部节制。段祺瑞知道冯野心未死，忌恨他兵权在握，一再怂恿徐世昌解除冯的兵柄。徐屡与冯交涉，均未获同意。冯死后，十五师归陆军部节制。刘询为了谋取枪械银饷，不得不依附于段祺瑞，但对段并不忠心效命。十五师官兵多数是河间人，不少下级军官且系冯国璋的亲族，由于这种同直系的历史渊源和血缘关系，他们仍然倾向直系，其“内部团结之坚，无异家人父子”[203]。因此，十五师并不为段派所信任。段企图扼杀这支异己军队，曾积欠军饷达七个月之久，并有一部分被改编裁遣回籍。1920年1月4日，十五师曾一度准备哗变，北京戒严，后发饷六十万元始平息。段祺瑞组织定国军时，刘询自告奋勇，表示愿赴前敌讨直，段疑信参半，将十五师作为后卫。当战斗开始前，就有刘询不稳之说。在琉璃河集中时，边防军第一师正式通知各级军官，说刘询部队恐有意外，要严加戒备，监视其行动[204]。7月16日，十五师调往前线与直军作战，终于不战倒戈降直，最后导致了皖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西路战场的失败。

四、战略战术的优劣不同

直皖战争爆发前，南面直军扼守了京汉路，保定与河南、湖北、湖南连成一片，并且与西南桂系军阀结了盟；东面直军与奉军占领了京奉铁路，得到张作霖的支持；西北则有倾向直系的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和绥远都统蔡成勋，北京实际上是处在直军四面包围之中。其他各地的皖军，也同样被直军所分割包围，后援缺乏。因此，军事形势对直系有利而对皖系不利。段祺瑞鉴于这种不利形势，加上部队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担心旷日持久，局面更将不利于己，因此在战略上主张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吴佩孚则有恃无恐，采取盘马弯弓，不急进攻，以逸待劳，巧战胜人的方针。“皖派之利在速，直派之利在缓。”[205] 在战术上，皖军凭藉自己的大炮优势，用密集的军队实行正面攻击，长驱直入；吴佩孚则把自己的精兵摆在左右两翼，采取诱敌深入，避实捣虚，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术原则。事实证明，吴佩孚的战略战术比段祺瑞、段芝贵、徐树铮要高明得多，这是他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西路和东路战场，都是直军先退后进，先败后胜。特别是西路，吴佩孚运用灵活的作战方法，不在正面与皖军硬拚，而是乘其不备，分兵两路，包围打击敌军。松林店一役，大获成功，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础，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另外，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领导者和战斗指挥者，吴佩孚的胆略与精力，也不是段芝贵、徐树铮之流所能企及的。当时一个在吴佩孚军中的目击者说：“延陵（指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敌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206] 段芝贵、徐树铮看到前线战事失利溃败，自己指挥失灵，即闻风丧胆，仓皇逃回北京。此外，吴佩孚不仅深明韬略，而且长于治军，他的军队纪律比较严明，因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也是段军所不及的。当时的报纸报道说：“直军士气旺盛，纪律严明，外人赞叹，大胜可必。”[207]

五、奉军的参战

在当时北方军阀中，除了直系和皖系外，还有奉系军阀的力量比较强大，张作霖也正想乘机向关内扩张势力，因此在直皖对峙、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奉军有举足轻重之势。好像一架天平，张作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的砝码就会往下降，失去平衡。段派原来指望张作霖保持中立，以便自己和直军单独作战；直系则极力拉拢奉军作为盟军，结成反皖的联合战线。双方都意识到奉军的参战与否，会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前途。7月16日和17日，在西路战场和东路战场战斗正激烈，直军处于不利的时刻，奉军大队先后分别赶到高碑店和北仓前线，协同直军作战，对振奋直军斗志，瓦解皖军士气，扭转局势，促成直胜皖败，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战争双方的态度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争夺的场所。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取得它们在华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都竞相培养扶植中国有利于自己的势力和代理人。在直皖战争中，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战争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从1916年6月到1920年8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直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的。日本通过对皖系军阀的支持，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权益；皖系军阀则通过卖国借款，从日本方面得到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其反动统治才得以维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正是依靠其一系列的卖国勾当，取得日本空前的借款支持，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皖系军阀与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徐树铮曾一语道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208)] 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日本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好处，还可以从下面情况中得到说明：1920年下半年，日本海外投资的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中国。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称为"满蒙"地区）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前已述及，寺内正毅下台后，由原敬接任日本内阁首相。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霸局面。原敬被迫采取与欧美各国协调一致的侵略方针，开始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作了某些修正，但并未根本改变它对皖系军阀的支持。

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一切政策均出自军阀元老之手，如寺内内阁时除派林权助为驻中国公使外，复派军国主义分子西原龟三长驻北京，一切借款的穿针引线，都经西原之手，权力远在驻华公使之上。此外还有两人，一为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一为北京政府顾问坂西利八郎少将，他们周旋于两国军阀之间，干了不少罪恶勾当。1919年春间，日本军部受内外压力，不得已召回斋藤，以避军阀外交之名，而让坂西转任段祺瑞的边防军顾问，以掩世人耳目。由此两国军阀间的联络，系于坂西一人。1920年初，坂西回国述职时，受徐世昌、靳云鹏的委托谒见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陈述北京政府殷切希望日本援助。坂西分析说："徐、靳均仰助段氏之势力。援靳与援段无异。而以靳较段可以缓和南方之攻击，援靳则北方军阀均托庇日本宇下，日本在中国之活动可以发展，对美外交亦容易就范。"[(209)] 山县听后，深表赞同，立即指示原敬内阁妥筹办理。原敬受山县之命，开始改变踌躇经年未决的对华借款方针，决定支持四国银行团，自为盟主，拟定借款纲领，通知英、法，求其赞同，并怂恿美国加入，以积极援助中国北方军阀。如美国不肯加入，日本将偕同英法支持旧借款团，实行三国共同对华借款：如英法也不赞同，日本则实行单独借款。2月间，北京政府曾向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要求借款五百万镑，迭次往来磋商条件，后因四国公使答复未能满意，不得不中止。旋即由日本单独借日金九百万元，利息八厘，实收九二，以国库债券为担保，期限六个月，于2月18日签约交款[(210)]。日本企图通过单独对华借款支持皖系军阀，以取得皖系同意与它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攫取中国的主权。

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由于是日本一手扶植的，所以他们处处依赖并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而直系吴佩孚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和皖系盗卖国权、投靠日本的可耻行径。因此，在直皖战争中，日本从切身的利害出发，支持皖系对直系开战。尽管战争前夕，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对，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训令其驻华使馆严守“中立”，不得参加一方反对另一方[211]，但它同皖系军阀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不可能对这场战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事实上它完全站在皖系一边，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战争。

如前所述，段祺瑞用以对直战争的主力边防军，不仅是用日本的借款建立起来的，其军火装备也由日本供给，而且直接接受日本军官的训练。边防军的最高军事顾问是坂西少将，边防军的一些军事教官大都由日本军人充任[212]，这种情况一直到直皖战争爆发时均是如此。战争前夕，坂西参与了皖军对直战争计划的拟定，日本借款八百万元给段祺瑞充作战费[213]，还有一些在华的日本人参加段军对直作战[214]。为此，曹锟曾电请北京公使团注意日本暗中助段这一事实。全国学生联合会致北京公使团的电报也指出：“日人加入段军，事实昭然，此不但助长敝国内乱，抑大背国际成例，除由国民直接提出抗议外，望主持公道。”该会在致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的电报中更加严正地指出：“贵国国民加入段军，业已证实。此举不特有背贵国严守中立之宣言，抑且贻贵国羞。倘不严加取缔，敝国国民自有正当办法，以对此等非礼无法之举。”[215]日本知道奉军参战对皖军极为不利，因此，当张作霖还未明确表示援直倒皖时，它的驻奉领事曾奉令照会张作霖，不准二十七、二十八师开入关内助直[216]。战争进行中，东路战场16日直军在杨村安置大炮抵御皖军时，遭到驻防该地日军的横蛮干涉，以致被迫后撤，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皖军占领杨村后，在该地架炮等一切军事设施和军事活动，日军却概不过问。两相对比，明显地表现出日本助皖反直的态度。

除了日本外，援助段祺瑞的还有意大利。7月初，意大利私将大

炮、炮弹、子弹、炸弹等军火，从山海关运往南苑，供给段军，意大利的飞行员也参加了战争活动。7月12日，曹锟、吴佩孚以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中有关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争，和各国外交使团关于中国不统一不售军火给中国的规定，特提出抗议[217]。意大利公使以并未同意外交使团禁运武器的规约为理由，表示拒绝接受曹吴的抗议[218]。

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后，中国亲日派被打倒，日本失去了多年扶植的代理人，其在华利益直接受到危害，因而感到沮丧和担忧。东京《朝日新闻》8月3日发表的社论说："亲日派既灭亡，于日本的利害，有不能不视为重大。……无论如何，段派比之其他各派，较了解日本所与以中国的利益。何言之，因彼派系有利用日本的势力，以固其立脚地的倾向，此系事实。……其结果至失全国人的信望，单剩因与日本军阀的关系而为列国嫉视之的，终至今日陷于悲惨的败亡。……此次段派势力消灭尽净，亲日派灭亡，世人一般不免叹息，此乃吾人所了解。"[219] 文章认为："段派之武力中心思想，乃与中国之情势相背驰，故助段图谋中国统一之日本，乃陷于非常之过误"；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战争结束，日本仍然偏袒皖系军阀余孽，深恐徐树铮等一旦伏法，亲日派势力被彻底铲除，势将丧失其在华利益，因而对安福系罪魁祸首极力予以庇护。

皖系被打败后，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国桢、姚震九人，为了躲避直奉和国人的惩办，先后逃入日本使馆，寻求主子的庇护（李思浩逃入华俄道胜银行内）。7月28日，各国外交使团在法国公使馆开会，讨论是否收容安福系罪犯问题。美、英、法三国公使主张除妇孺外，其他一律不许在使馆居住，但是日本和意大利公使表示反对，认为是违反了人道主义[220]，结果决定各行其是。会后，美、英、法三国公使发出训令，告诫各该国旅京侨民应按条约规定，不许华人男子寓于使馆界内，如有私自庇护罪犯情事，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勒令出境[221]。日本使馆则将徐

树铮等人藏匿在使馆界内的护卫营中，为了避免外泄，将中国男仆全行辞退，一切事务均由日本下女伺候，并在使馆秘书厅“宴以大餐”，“款待周至”[222]。

7月29日，徐世昌根据直、奉方面的要求，发表了通缉惩办徐树铮、曾毓隽等十人的命令。但是，要对他们进行惩办，就必须同北京外交使团和日本公使馆交涉，将徐等引渡归案。因此，8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公使团领衔法国公使柏卜，要求转达各国公使将徐树铮等十人，“切实查缉引渡，以便归案讯办”[223]。

8月9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奉本国政府训令，复照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拒不同意交出安福罪犯。复文声称徐树铮等九人，“各自投本公使馆，以求一身之保护，本公使顾及国际之道义及中国之事例（按此指张勋复辟失败后逃入荷兰使馆，使馆曾予庇护），认为不得已而对于以上各人决定加以相当之保护，收容于公使馆护卫营内矣。本馆严重告诫，在收容所内不得干与一切政治，且全然断绝与外部之交通。本公使当通告以上事情于贵代理总长之际，深信贵国政府能十分谅解本使馆之措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现在各氏所受之保护，非依其隶属于某政派而与以特别之待遇，亦如不能因其非属他政派之故而即拒绝收容者也。”[224] 22日，外交部又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表示不同意9日复照中所述各节，指出我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调查完了，即将犯罪证据详细奉复转达，俾将各该犯引渡法办，并要求在此之前不让各犯逃走，或迁移他处藏匿，以期归案讯办[225]。27日，日使又复照外交部，再次表示拒绝引渡祸首，认为中国政府7月29日惩办徐树铮等的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日使馆即视为政治犯而予以收容保护，并声称：“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说将彼等引渡。”[226]

日本包庇安福系罪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全国许多团体发表通电，表示强烈抗议。8月17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日本驻华公使的电报说：“查徐树铮等犯侵蚀国币，骫

法杀人，通匪谋乱等罪，均证据确凿，完全为刑事罪犯，绝对无政治性质，苟许容留，适蹈袒庇段党之嫌。敝国人民对此必更加一重遗憾”，要求日本公使尊重中国民意，“将徐树铮等罪犯引渡惩治，以申国法而全邦交”[227]。北京学生会的通电指出：“日使小幡此次庇护安福祸首徐树铮等，藉口国际习惯，强词夺理，中外共愤。该祸首等穷凶极恶，杀人赃污，靡所不为，安得与国事犯比。且按诸国际公法，公使馆决不能庇护犯人，其治外法权亦仅限于保护公使与公使馆之公文两者之独立及不受侵犯而已。今小幡滥用公使不可侵犯之权利，以庇护我举国欲甘之罪人，实属破坏国际公法，侵犯吾国主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除一面陈情政府速与交涉引渡外，务望各界厉行抵制日货，以为对待，促其最后之觉悟。”[228] 8月14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致电日本政府表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将不适任之小幡公使撤回，从速将徐树铮罪魁等九名引渡于我国，以顾全两国邦交，以平我五亿国民之公忿”[229]。

11月14日，日本公使馆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掩护安福系罪魁徐树铮从使馆逃往天津，转送至上海公共租界匿居。

段祺瑞、徐树铮倒台后，日本开始物色新的代理人，并且看中了张作霖；而张作霖也想利用日本作后台，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当时的外报指出：“外人界内，皆视张作霖为继段祺瑞而赞助日本军阀者。”[230]

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日本对皖系军阀的支持，阻挠了南北议和，影响中国的统一，它在中国独霸，损害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因此，英、法特别是美国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对皖系军阀投靠日本，坚持武力统一中国，表示不满。

1919年8月，由于美国人民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和凡尔赛条约中有关中国山东问题条款的规定，同情中国拒签和约运

动，美国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通过一项保留案："美国对德约第一五六条、一五七条、一五八条之规定，不予同意，并保留美国对中日间因此项条款所起争论之完全自由行动权。"[231] 英、法两国对美国参议院的保留案，也表示赞同，决定采取一致态度。11月间，日本为了保持对中国满蒙地区的独占，向美国提出所谓"满蒙除外"条件，美国以其违反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坚决予以拒绝。英国和法国也同美国取一致的步调，反对日本的要求。美、英、法三国还订有中国不统一不售予军火的协约，并拒绝日本提出共同向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借款的要求。前述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提出的一些主张，比较符合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口味，因此在直皖战争中，美英法三国在政治和道义上是支持直系的。

直皖战争前夕，美、英、法驻京公使对皖军发动对直战争即屡有不满的表示。1920年7月8日，法国公使柏卜代表驻华公使团照会外交部，声明倘有外国侨民，因战争"致受性命或财产之损失，公使团应使中国政府担负全责"，要求中国政府"筹设一切妥协办法，以免携械军队进入京城，或使用抛掷炸弹之飞艇于京城空际之上"[232]。这是企图限制边防军的军事行动，是不利于皖军的。英国驻京公使还通知北京政府，要求不用英国飞机参与战争，并将英国技师撤回[233]。一家英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从北方舆论大多数同情吴佩孚，反对段祺瑞和徐树铮亲日卖国政策，支持直军倒皖战争的理由出发，甚至认为公使团上述照会，从外国侨民的安全考虑，"固属正常"，但照会中劝止战争的话，"似为保全安福部之间接行为"，"未免有遗憾焉"[234]。战争爆发后，7月17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参赞马格德和江苏督军李纯督署顾问美国人安德森，曾一同到保定前线观战[235]，以表示对吴佩孚的支持。

在如何对待安福系罪犯问题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同日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反对日本对徐树铮等人进行庇护。如上所述，三国驻华公使曾指令本国侨民不许罪犯留居于使馆界内，并认为中国

政府有权引渡罪犯归案法办。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说："此次安福党之罪犯，纯属非政治犯性质。该人之行为，实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民国政府应有要求各公使将各犯等引渡，按照中国法律惩办之权。……使署界内，不得为犯罪之逋逃薮。"[236] 吴佩孚对三国上述所持态度表示赞许，他希望公使团协助捕拿藏匿在使馆界内的安福系祸首[237]。

战争结束后，一些英美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及其记者，对吴佩孚给予很高的评价，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并且对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等主张（吴的主张详见下节）表示支持。《密勒氏评论报》指出："吴佩孚将军为一时代之人物……公认为中国一国之英雄，与保障人格之伟大，一时人咸注目其身，而叹服其战段之神勇，中外之人，无不皆然。"[238] 一个英国记者说："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239] 另一美国记者说："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唯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待。"[240] 8月中旬，随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书中，认为中国只有像英美那样，实行代议制度，根绝军阀官僚政治，才能解决时局问题，因此他表示赞赏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他说："就目前中国之情势而论，苟欲解决时局，则不但在理论上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且在事实上亦系舍此而外，别无他法。"[241] 这些看法表明，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合意人选。

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理

直皖战争结束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社会舆论一致要求废除安福系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密约，严惩皖系军阀头目和安福系祸首，解散安福系和安福国会，彻底清算安福系的罪行，并且根据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主权在民的原则，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让国民有处理国家事务

的机会。人民指望吴佩孚这个积极倡导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风云人物，能代表民意，出来有所作为。但是，军阀战争本身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是一种妥协的结局。吴佩孚虽然表示要遵从民意行事，但他毕竟不能越出军阀的轨范；在同安福系作斗争和对皖战争中，他有着巨大的功勋，但在北洋系军人中，他还是个偏裨后辈，位卑职小，打仗是本分，说话是不能算数的，不能成为左右时局的人物。因此，战争结局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及其盟友徐世昌、靳云鹏共同分享胜利成果，也即是进行政治分赃。人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实际上也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

一　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7月19日，靳云鹏、姜桂题、傅良佐、张怀芝等六人受徐世昌的委派，并携带段祺瑞同意的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系及罢免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四、解散新国会（即安福国会）四项条件[(242)]赴天津与直奉方面议和。当时曹锟不在天津，张作霖也未来津，直系方面的意见，认为“六人之使命，如为总统所派，则督军受总统之调停，名分上实断不敢；如为段派居间，则段派已倒，更无所用其调停”[(243)]。显然，曹锟、吴佩孚他们觉得现在来讲调停，未免太不合时宜，另外这些条件也还嫌低，不能满足获胜者的要求。直隶省长曹锐对代表态度冷淡，告诉他们；“虽家兄（指曹锟）亦无主张可以发表，须俟各省公决。”[(244)]傅良佐因替段祺瑞做说客，并随带有武装警卫一百七十余人，被曹锐扣押，其警卫全部被缴械。姜桂题等四人无结果返京，靳云鹏则单独前往奉天与张作霖磋商。

靳云鹏到奉天后，除了转陈上述议和条件外，还替他的恩师段祺瑞求情，希望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时，给段祺瑞留点面子，不要使他太难堪，这也是徐世昌的意见。张作霖同段祺瑞的交谊原本不恶，在他看来，段祺瑞之所以不好，不过是被徐树铮这类奸佞包围利用了，

现在安福系既倒，这时出面为段转圜，必将可以赢得一部分皖系势力的支持，从而增加同直系抗衡的资本。7月21日，当张作霖接到段祺瑞19日发出的自劾乞和电报时，当即复电说："引责各节，不忍卒读"，"吾公一世令名，坏于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泪下如雨"，表示"作霖当躬率三军，愿为督办扫除群小。至对于督办，决不稍有侵犯"[245]。靳云鹏到奉后，7月23日，张作霖马上又给段祺瑞去电安慰他说："翼卿到奉，业已接洽。窃念此次兴戎，譬如子弟相争，无关长者，为父兄者尽可置之不问，任凭子弟自行设法了结。今日之事，无以异此。伏望我督办切勿介怀，遇事仍襄助元首，维持大局，并救济近畿一带之生灵。作霖日内到津，即当约集曹使，联络各省，筹商善后一切事宜，以资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勉节忧劳，为国珍摄，无任盼祷。"[246]这两个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张作霖对段祺瑞这个祸国殃民的魁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也为尔后处理皖系军阀定了基调。

同一天，吴佩孚给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拍了一个电报，要求严厉处置皖系。电文说："段氏窃柄，视元首为傀儡者三次矣。以国家为一家之私产，引狼入室，丧尽国权。为拥戴元首计，为保卫国家计，均非将奸党歼除不可。"他提出六项要求：一、解散边防军，取消边防督办官制；二、解散西北军，取消西北筹边使官制；三、安置段祺瑞于汤山，候国民公决；四、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审办；五、国会停会；六、追缴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证书，永褫公权[247]。吴请王怀庆将这六项要求汇呈大总统徐世昌核办。曹锟和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对这六条都表示赞同。因此，7月26日，这六项要求作为保定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的处理善后问题的条件[248]，吴佩孚还认为："共和国家，民为主体，凡所设施，苟能以民意为标准，则人心自易翕服。将来各项问题，最好召集全国国民大会以解决之，庶公论得伸，国事可定。"[249]因此，他再次提出从速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可以看出，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上，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比奉系张作霖的态度要明朗激进

得多。

吴佩孚的言论，立即引起张作霖的不满。7月25日，张作霖偕靳云鹏到天津，26日就向外报记者表示，他“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锟接洽”，并指出：“吴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250] 这样，皖系一被打倒，原来共同对敌的直系和奉系这两个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摩擦渐次发生。

战后直奉以及徐世昌、靳云鹏之间几个有分歧争执的问题及其协商处理结果，略如下述。

二　内阁问题

7月28日，曹锟应张作霖的邀请到达天津。自皖军战败后，所有在中央的段派势力已扫荡一空。萨镇冰因久代总理，早已感到难以维持，徐世昌为收拾政局，也需要一个适当人物来主持中枢，于是内阁问题被提上日程。张作霖为了把自己的势力早日引入关内，同时他希望有一个“操行稳健”的人来主持内阁，以防止像吴佩孚这样标新立异的人物来干政，也急于想先把内阁组织起来，因此他到天津后，即全力着手进行此事。

当时，在组阁问题上，直系和奉系以及徐世昌之间意见有分歧。吴佩孚主张先和西南实行统一，然后组阁，在正式内阁未成立时，所有一切措施均归军政范围。一般舆论对吴的主张多表同情，以为如此，统一可以促成，并且可以减少许多障碍[251]。但张作霖坚主先行组阁。在总理人选问题上，徐世昌主张仍由周树模担任，因前述7月初直皖两方备战时，他已一度提出周阁同意案于国会。对此，曹锟和张作霖都不赞成。曹锟说：“吾辈今日之战，牺牲许多生命，是为国民争人格，并非为官僚选机会。”[252] 张作霖说：“与其用周氏组阁，何如使翼青复职，俾各方面均易融洽。”[253] 曹锟提出由王士珍组阁，理由是王为北洋系老前辈，素无党派，和各方面均能搞好关

系，同时，王一向主张和平，出主中枢，南北统一之局可成。张作霖为了使他能控制北京政权，并谋得与包括皖系在内的各派势力妥协，则坚持要由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任总理。由于曹锟、张作霖的反对，周树模一连四次致电徐世昌，请将其同意案撤回，表示“无论通过与否，绝对不就”[254]。王士珍也表示不愿出山。徐世昌和曹锟只好放弃各自的意见，同意由靳云鹏复职担任总理。徐为了迎合张作霖，还特意派员赴天津致意曹张，说：“翼青如肯担任，自是最好不过”，并亲书手函致靳，促其来京组阁[255]。靳本人表示“愧对师门”，当时尚不愿意复职，因张作霖极力怂恿，并保证给以支持，才同意组阁。吴佩孚本来不同意靳云鹏组阁，曾对靳说：“闻公不欲组阁，公私两途，皆为最便，佩孚实表赞同。”[256]这时他也不得不表示服从。

7月29日，张作霖、曹锟、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曹家花园会商各项问题（即天津会议），吴佩孚在长辛店，没有参加，派张绍曾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决定五项办法：一、国会自行解散，用新选举法或旧选举法另行召集第三次国会；二、内阁问题，由靳云鹏重新出来组阁，并拟定阁员名单；三、取消上海和平会议，另行组织统一会议；四、裁兵问题，用靳云鹏之裁兵减饷计划，略加修正，即日实行；五、财政问题，清理旧债，节减军费，实行开源节流[257]。

8月4日，曹锟、张作霖进京，进一步与徐世昌等面商解决时局问题。此时，奉军入关的部队已达七万人，部署在京畿一带，张作霖已成为举世侧目、左右时局的中心人物。靳云鹏因吴佩孚主张先统一，后组阁，不赞成他出来组阁，因此对组阁事表现消极，在徐世昌、张作霖的催促下，8月5日始由津返京。因此，6日，将入阁诸人，“非常忙碌，群就张（作霖）商酌，仍向靳敦劝”[258]。7日，由徐世昌主持在公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时局问题，与会者有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张怀芝、萨镇冰、田文烈、王怀庆、吴笈孙、郭则沄等，会上一致同意由靳组阁。因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已纷纷逃走，提出靳阁同意案不足法定人数，故决定由他先行署理总理。8月9日，徐世

昌颁发了“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的命令。其各部总长人选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靳云鹏，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折腾了几个月的内阁危机，至此得到一个解决。张志潭为直系，王乃斌属奉系，靳、周、叶均倾向奉系，这个内阁的组成，反映了战后直奉特别是奉系在中央势力的增长。

三　惩办祸首问题

直皖战争结束后，从7月下旬到8月初，徐世昌在北京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直奉方面的要求，采取了一些善后措施：7月22日，派王怀庆办理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免职，准段芝贵免京畿卫戍总司令职，由王怀庆代理。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撤消督办边防事务处，其所辖边防军着陆军部即日接收，分别遣散；撤消西北边防军名义，遣散西北边防军。29日，通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十人（时徐等均已逃匿日本使馆），褫夺吴炳湘官位勋章，免吴光新职。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这些措施，不仅不能平息人民的义愤，满足群众的要求，而且离直系吴佩孚等的要求也有相当大的距离。

直系为了防止段祺瑞、徐树铮等伺机再起，要求彻底铲除段派势力，一是处分段祺瑞，置段于汤山，听候国民公决；一是严惩安福系祸首，其中吴佩孚态度最为坚决。7月底，吴佩孚在上徐世昌的一项条陈中说：“三年来，安福贼党之祸国殃民，实属罪大恶极，种种罪状，罄竹难书，如借外力以压迫国民，卖国产以图饱私囊；任用私人，把持要津；图逞党势，假名练军，此则略举其罪之重者，其余尚难细述。全国人民，恨之刺骨。今幸天诱其衷，群贼畏罪潜逃，虽经明令严缉，过案者尚属寥寥。此种元凶大憝，如无一日逮捕依法严惩，何以正国法而警将来。且祸首等之私产，尤应切实调查确数[259]

，概予查追，不然，恐其携带潜遁，异日借事生端，贻害地方。总期除恶务尽，免致恢复。”[260] 但是惩治祸首问题提出后，遭到徐世昌的多方抵制，他成为皖系和安福罪犯的最大庇护者。

吴佩孚要求首先将段祺瑞安置于汤山，以待国民公决。他曾说：“段总不宜再居京中，如恐汤山时有外人游玩，诸多不便，何妨改驻西陵，我可派一营担任保护。”[261] 这一点曹锟表示支持，他在天津向人表示：“段在北京城内，我们不便来，须先请他回避。”[262] 从人民的眼光看来，如此处置段祺瑞，还实在太轻，未免便宜了他，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都不赞成。

徐世昌顾念段祺瑞系数十年旧交，以及所谓段“三造共和，参战增高国际地位”[263]，“有殊勋民国，朝野属望綦殷”[264]，主张不为已甚；认为允其辞职，已是办到了极处，坚决不同意再做进一步处置。他提出，惩治祸首一条，须将段祺瑞撇开，无论如何不能伤其体面，宣称：“芝泉由我一人保险，如有伤之者，我愿以全家相保。”[265] 他还表示“绝不能负祺瑞”[266]，要“以去就争”[267]。靳云鹏在奉天和天津时，也极力向张作霖、曹锟求情，说如果将来段祺瑞再有轨外举动，他可负完全责任。因此，7月27日北京内阁会议上，已决定不将段祺瑞列入该惩办的祸首名单。曹、张进京后，徐世昌又一再为段说情，并愿担保一切[268]。靳云鹏也说：“段无寸地，失败至此，已成枯木，若再逐出京华，颜面难堪，彼必死无疑。”[269] 张作霖的态度，已在前述他给段祺瑞的两次电报中清楚表明，他对徐、靳为段求情表示理解和支持，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只剩曹锟一个人，他不好再坚持己见，于是处分段祺瑞的问题就搁置不提了。

关于惩办其他祸首问题。7月下旬，直系方面第一次所列名单为十四人，徐世昌只同意惩办五人。天津方面不同意，徐于是改为十人，还加有“此外概不株连”一语，当经天津方面力争，此语始被删去。7月29日，徐世昌惩办徐树铮等十人的命令发表后，紧接着天津方面又提出第二批十三人祸首名单，徐世昌决意不办。7月31日，北

京内阁开会时，在徐世昌授意下，专门单独草拟了一纸“十人之外概不株连”的命令。天津方面得知后，颇不高兴，次日即将盖印发表时，传来话说：“北京一味做好人，而令天津唱高调，未免不情。”[270] “各省讨段，原为恢复总统自由，奈何纵庇罪人，自留后患。”[271] 徐始不得不将“概不株连”令撤销，但仍将意思塞进了8月3日颁布的解散安福俱乐部的命令中，在令文最后加了“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272] 一句话。

吴佩孚等提出惩办安福系罪犯，原为肃清祸根，以为安福系频年为非作歹，人民深受其害，论其罪恶，实不止已明令所通缉的十人。因此，曹张到京后的第二天（即8月6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北京，研究时局问题，其中决定的第一条就是“铲除安福祸根”，要求进一步惩办安福系官僚、议员及段派的嫌疑犯，开了一张共有三十余人的祸首名单[273]。徐世昌自然不同意。吴佩孚以此原因，加上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等问题与徐世昌、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当晚即悻悻离京返回长辛店。

8月7日，在徐世昌于公府召开的研究解决时局问题联席会议上，讨论惩办第二批祸首时，曹锟力主按所开名单惩处，徐世昌则要求宽大为怀，认为“此次惩罚，应以定国军祸首为范围，不应多事株连，致开互相倾轧之渐。至安福党员，多系见利盲从，须从宽大为是。”[274] 讨论很久，结果议决通缉王揖唐和安福系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褫夺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李进才、张树元军官军职，交陆军部惩处，即日由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明令公布。令文重申：“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275]

曹汝霖、陆宗舆是段祺瑞的司库、安福健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当时舆论认为二人之罪实不减于徐树铮、曾毓隽等人，要求严办。吴佩孚和曹锟等也力主惩治。徐世昌因与曹、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关系[276]，极力加以包庇。直奉方面提出的第

一批祸首名单原列有曹、陆的名字，徐世昌亲笔将他们勾去，并传语曹张说，他们已经下台，“此次乱事，二人实无参预的确据”[277]。第二批祸首名单仍将曹、陆列上，并附有事实，一为在西北军总司令部搜出有关曹汝霖的反直文稿，一为陆宗舆曾向中日银行垫借八百万元（现银三百万，纸币五百万）巨款给段祺瑞作战费。徐世昌不能再为二人说情，于是“以概不株连为概括的拒绝”[278]。因此，8月7日第二次颁发的惩办祸首令中，仍无曹、陆二人。如此巨奸大蠹居然漏网，引起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南京各界联合会、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表的一项通电说：“安福祸国，于今三载，卖路鬻矿，无恶不作，推厥祸首，实由曹汝霖、陆宗舆等造成。此次近畿战争，曹汝霖阳托调人之名，阴主谋逆之实。陆宗舆私挪汇业存款，接济逆军至三百余万之多。是曹陆之罪浮于毓隽，不减树铮，于理于法，皆应处以相当惩罚。乃拿祸首命令，竟未提及曹陆二人，群情愤骇，罔知所措。去岁各地不惜罢市、罢学、罢工，群起请惩，仅得免职处分。今幸联军战胜，公理昌明，若仍任彼卖国巨魁逍遥法外，既不足以服国人，亦无以解于联军。兹代表民意，请将曹陆二人并案拿办，以清乱源。”[279]全国和平联合会的通电指出：安福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可以溯源到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协约。“不有卖国协约，则参战［军］无从发生；不有参战军，则边防军无从变形；不有边防军，则安福系无从跋扈。然则曹陆等实为胚胎安福之种子，即为祸国之根源。……其罪恶之重大，不减段、徐、曹〔曾〕、李，应请一并拿办，处以极刑，庶乱源可遏，国事得苏也。”[280]

最后，徐世昌与张作霖、曹锟达成一项交换条件：由徐给曹、张以某种好处，曹、张则负责保全曹汝霖、陆宗舆的面子（详下）。

四　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天津会议讨论了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虽未做出正式决议，但曹锟、张作霖、靳云鹏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因此，8月1

日，吴佩孚发表关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通电。电文指出："九年民国，变乱相寻，追原祸始，军阀与政客，阶之厉也。军阀以政客为灵魂，政客以军阀为武器，伪造民意之术日精，而国民愈无所控诉。迭次政变，委曲迁就，敷衍一时，祸不旋踵，而天下之乱亟矣。比年来安福逆党，朋比军阀，以武力造法律，以外债成国会，遂至二三竖子，颠倒众生，痛毒四海，可为痛恨。幸涿鹿一役，天诱其衷，群丑溃亡，元凶束手，正为拨乱反治之机。"他认为，为了解决历年的纠纷，拨乱反治，"发扬真正之民意，俾军阀无所施其力，政客无所取其巧，奠民国之丕基，而为一劳永逸之计"，只有召开国民大会，一切重大问题，由国民公决。他拟订的国民大会大纲如下：一、名称：为国民大会。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公决，他方不得藉口破坏。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选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阙勿滥。然后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上海或天津开成立会。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七、经费：由各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八、期限：以三个月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决议公布，即行闭会[281]。吴佩孚认为实行此八条办法，可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一切纠纷均交国民公议解决，"既可免军阀干政、政客投机之弊，更可免权利冲突、意见争执之嫌"[282]。为了表示召开国民大会不是他个人哗众取宠，自作主张，他在电文末尾还特地说明，曹、张两帅在天津会议已对此表示赞同。

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提出来后，立即获得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比较热烈广泛的响应。人们认为，上述大纲尽管办法未必周全，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国民大会能否开成也有疑虑，但都一致表示，它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是民意的体现，为解决当前国是提供了

一条正确办法，应予赞成。他们说："对于民国九年以来之感想，得一个最正确之公式，此公式为何，即人心之向背是已。……吴子玉将军主张国民大会，其用意正大深远，吾辈亟应赞成。"[283] "这次吴子玉将军主张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颇含职业的民主主义的原理，把这个精神扩而大之，很可以开一个新纪元。"[284] 上海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北京成立了国民大会促成会。北京学界蔡元培、李大钊、孟寿椿、陈启修等发起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解决目前切要事件"，并拟订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一、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三、裁减军队，废除督军及与督军同等制；四、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五、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六、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七、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七条每条均附说明，从略）[285]。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

首先起来反对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主张的是张作霖。原来张作霖在天津会议上没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以为这只不过是吴佩孚的一种空谈，说说而已，没有认真看待；现在吴居然用正式文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颇具号召力，于自己不利，他就不能坐视不理了。8月2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天津谒见张作霖，并陈述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时，张即表示反对。吴退出后，张对曹锟说："吴某通电，三哥曾否赞成，我则事前并未与知。如三哥任其所为，则我将单独通电反对。"[286] 张作霖还指责吴佩孚"有过激气味"[287]。曹锟本来胸无主见，开始他同意吴佩孚的主张，现在张作霖站出来反对，他不敢助吴而与张争，只好退让，当即指令经略使署电政科通电各省各机关，并关照电报局："第三师长吴佩孚通电召集国民大会一节，经略使已认为无效。凡各省机关若接得该电，概不可认为事实，各电报局接得该电，可以随时扣留。"[288] 因此，吴佩孚这一通电，当时天津电报局并未发往全国，只是京、沪一些报纸事先获知电文内容，才予以披载。吴佩孚的电文被扣后，张作霖拟好的通电才予以撤

销。张作霖后来一再表示反对召开国民大会。8月13日，他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国民大会，非可为问题也。该会系吴子玉将军所主唱，然其背后，有某国人煽动操纵，吴氏不过为其傀儡耳。就中国现状观之，此事万属不可能。"[289]

徐世昌也是反对国民大会的。这是因为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的总统地位就成了问题，徐左右一些人，当时也都向他明白指出了这一点[290]。8月5日，曹锟晋京同徐世昌谈及召开国民大会时，徐当即表示不赞成说："国民程度过浅，且此事为吴子玉一人之主张，各省未必全数赞同，究竟能否实行，尚待研究。"[291]

但吴佩孚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8月初，他连续致电北京政府，催促召开国民大会。他提出的主张是："第一，希望先将此案提出国务会议，以示正式通过，中央决无延缓之意；第二，主张以明令颁布后，凡中央地方行政手续即不能干预，俾听国民之自决；第三，以此项应由人民自定范围，当局不应加以限制。"[292] 8月6日，他入京和曹锟、张作霖讨论善后问题时，提出"先开国民大会，后议内阁问题"[293]。稍后（8月12日），他在复上海商业公团的信中指出："前所主张国民大会，盖鉴于全国纠纷，解决无术，此疆彼界，难期统一，故愿以全国民意之主张，为解决时局之标准，办法如何，胥赖国人之研究。纵不能全国一致，即由各地国民自由集合团体，发表正大之主张，当于国家统一大有裨益。主权在民，载在我国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294]

8月7日，在徐世昌主持召开的公府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除曹锟未表示反对外，其余各人均持异议，以为决不可行。"故一场会议，殆不啻对于此事为否决之一手续。"[295] 会议最后决定留待新阁成立后解决，而新阁总理靳云鹏就是国民大会的一个坚决反对者。有记者问靳，政府是否认为国民大会有必要并予以承认时，他回答说：只有在大乱之后，纪纲毁坏，法政失效，秩序破裂，没有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条件下，才不得不以国民大会来补救。现在政府尚在，

秩序未乱，纲纪法律虽有废弛，但未至失败毁坏的地步，政府可“从而整饬之，自有正轨可循，不当诿其责于国民”，“即不应有国民大会，故当然无从承认也”。关于吴佩孚提出政府应遵从民意的问题，他说：“一般国民，但求安居乐业，而不欲闻国政之何如，此为真正之民意。民无意于国政，而谓解决国政之大会，为出于民意之自动，谓非少数之民假借名义而何？真民意初不能发抒，徒供假借名义者之利用，谅非主张者所乐为也。”(296)

这样，国民大会就成了吴佩孚的独角戏，而吴佩孚又何尝能代表民意？因此，所谓国民大会在社会上喧腾了一阵之后，不久也就烟消云散，杳无声息了。

五　解散新国会问题

新国会为安福系所一手炮制，完全是非法产生的。现在安福系已倒，解散新国会应当是势所必至的。吴佩孚提出解散新国会的理由是：一、新国会组织之省份不健全，民意与法律二层都说不过去；二、南北统一，有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之约；三、新国会几乎完全为安福分子，安福部之罪状昭著，则新国会当然不能存在(297)。天津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其中之一即为解散新国会。当时一些群众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谴责安福国会，要求立即予以解散。但是这一问题又遭到徐世昌的抵制和反对。

徐世昌因自己的大总统是新国会所选出的，新国会一经解散，本身地位也就从根本上发生了问题。因此，他只答应解散安福俱乐部，不同意解散安福国会，藉口新国会任期已满，人又星散，可以让其自行消灭，并且认为保留它，可为以后“南北议和时索价还价之用”(298)，作为“取消旧国会之交换条件”(299)。曹锟到京时，曾向徐世昌当面提出解散新国会的要求，他说：“安福部既经总统以明令解散矣，则安福党员居绝对多数之国会，当然不能任其存在。……解散新国会与解散安福部之意，实相一致，不可偏舍者也。”(300)　他还认

为："苟仍留此安福分子垄断之国会，则解散安福部之命令，不啻一种空谈。所谓解散者，仅去安福俱乐部五字耳，议员仍此议员，国会仍此国会，铲除安福之言，无异自欺。"[301] 徐世昌坚决不允，表示在自己任内，不愿"为解散国会之行为而为段祺瑞之第二"[302]。靳云鹏是站在徐世昌一边的，声称如果徐下令解散新国会，他不反对，倘使要他"断然以解散新国会为请，彼亦有所不为"[303]。张作霖入京后，"对于新国会之命运问题，绝未有所表示"[304]，实际上他是支持徐世昌的。他认为新国会不久即将改选，如果马上解散，恐另生枝节，同时安福议员已声明与安福系无关，嗣后定能同中央保持一致。"若骤然解散，一切政令由中央命令直行，于共和政治不甚合宜"[305]。

8月7日，在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靳云鹏等人的联席会议上，除曹锟外，多数均不主张解散新国会，并且做了"类似断不解散之议决"[306]。至此，曹锟又不得不让步，同意不解散新国会，以免徐世昌为难，增加时局的纷扰。8月19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刘恩格代表参众两院议员，假江西会馆宴请曹锟、张作霖，并召名伶演剧，表示感谢曹、张主张不解散国会之恩。20日，两院全体议员又公宴一次。对国会议员这种丑恶表演，当时的舆论评述说："国会议员至招伶设宴以谢曹张两使之不解散，可谓极尽国会之丑态者矣。以如此人格而尚得谓之议员，以如此议员而尚得称之为国会，宁知世间尚有羞耻事耶？"[307]

当国内一些群众团体要求解散新国会时，还提出一个与之有连带关系的问题，即徐世昌的大总统地位问题。人们认为，安福国会是非法的，由安福国会产生的总统自然也是非法的，现在解散安福系和安福国会，也应该连徐世昌的总统一并取消；还指出，徐世昌与段祺瑞是一丘之貉，依靠他来惩办段党，如同缘木求鱼，是完全不可能的。7月下旬，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吴佩孚说："国人既厌恶安福党人，誓不承认由安福党人一手制造之非法国会与由非法国会产生之非法总

统。公等既以讨贼为职志，则讨段之后，应速起而讨徐。非法国会不能听其存在，非法总统万不能再尊为元首。一举而廓请之，庶能就平民政治之轨道，乃不失国人之望。”电文揭露了徐世昌在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和后来任总统时的种种罪行，然后说：“此等元恶，戴为元首，实污我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抑且有危国本之虞。”[308] 杭州学生联合会致信吴佩孚指出：“徐（世昌）段（祺瑞）厥罪惟均，讨段自不应免徐。徐系安福产儿，解散安福国会，戴徐尤无根据。切望徐惩办段党，是恳卖国贼惩其共犯也。拥徐讨段是为卖国之甲党利用以讨乙党也。事理俱不可通，徒为国人所不满耳。”[309] 但这个问题只有吴佩孚表示赞同和支持。

吴佩孚对徐世昌原无好感，在他心目中，徐不过是一个思想陈旧腐朽、毫无原则的昏庸老朽，完全不配担任民国总统的角色，曾在电文中直称徐为“东海先生”、“五朝元老”，而不称之为大总统。直皖战争刚结束时，吴即对人说：“如果战争结束，仍是东海总统，予惟有解甲归田而已。”[310] 7月28日，有记者问吴：“战事既定，是否拥徐世昌为总统？”他回答说：“徐乃四肢不全之总统，此问题俟国民大会解决。如国民乐举之续为总统，彼方为完全总统，此时只合算临时总统。”问：“然则吴师长之宗旨，与张作霖对外报记者所说拥护徐总统之言相差矣？”答：“非也。吾人宗旨亦拥护总统，惟拥护全国所承认之总统。今徐未经西南承认，只为半面总统耳。”[311] 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这种组织形式来解散安福国会，取消徐世昌的总统地位。

8月初，徐世昌派代表至长辛店，向吴佩孚征询有关时局的意见，吴未予礼遇，曾向代表宣称，他对召开国民大会、惩治祸首、解散国会等主张决不让步，并且重申：总统选举手续非法，“应由一人民代表之国会重选之，定其去留”[312]。8月6日，吴进京时，拒不往谒徐世昌。徐指责吴太骄傲，也根本没有把这个后生小子、偏裨牙将放在眼里。

张作霖是拥护徐世昌的。原先安福国会拥戴徐为总统时，他就极力表示赞成。在他看来，徐虽为安福系所选出，但后来受安福系排挤，对安福系的专横也是不满的，并且是直奉方面在反安福系斗争中争取的一个同盟者，现在斗争取得胜利，反而把他撵下台，未免不近人情；让徐留在总统的位置上，对于保护一切旧习惯旧制度，共同压制吴佩孚这样的“危险分子”，也是有好处的。因此，他决不肯让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有所动摇。曹锟是一个无思想、无主见的人，对徐的总统问题所持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313]。最后，当然又是张作霖的意见占了上风，吴佩孚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8月15日，吴第二次进京，被曹锟说服于次日去谒见徐世昌，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谈总统问题了。

六　一项政治分赃密约

自从曹锟、张作霖进京以后，一切重大事情均由张作霖做主，曹锟都是惟张是从。当时舆论指出，“溯自曹张入京，所有重大事件，概由作霖主持，故张为自动，而曹则被动，已尽人皆知”[314]。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处分段祺瑞、取消徐世昌的总统资格等重大问题，被张作霖、徐世昌等一一拒绝后，曹锟暗中告诫吴要克制一些，避免发生新的冲突。吴看到张作霖在北京城以战胜者自居，飞扬跋扈，武断一切，对自己极力加以排斥，心虽愤愤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他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上尊下卑的封建意识的军人，对顶头上司曹锟的旨意也只有服从。8月17日，他离开北京后，就决定不再预闻政事，约集冯玉祥、李奎元等直系将领开始准备在洛阳练兵，扩大直军的势力。他同张作霖的矛盾，成为后来直奉战争的伏线。

曹锟并不是只让步而毫无代价的，如果那样他也是不会干的。北京政府鉴于张作霖原有东三省巡阅使名义，而曹锟当时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也拟委派曹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后

因张作霖只有三省地盘，不愿曹锟拥有四省，同时山西都督阎锡山也反对归曹锟节制，故改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8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了由徐世昌签署的任命令（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使），同时裁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巡阅使与经略使不同，对所辖地区有控制实权，对此，曹锟是心满意足的。徐世昌、靳云鹏就是这样以权益为钓饵，取得曹锟对他们的妥协让步和支持的。

8月中下旬，曹锟、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之间，为了实行政治分赃，在张志潭、叶恭绰、吴笈孙三人的参与斡旋下，进一步多次协商，并签订了包括下面六项内容的密约，一、以后国家大计，须先征求曹张同意而后施行；二、东三省以及直鲁豫巡阅使范围内，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张以方便，不能有所干涉；三，总统地位，由曹张竭力维持，曹汝霖、陆宗舆亦由曹张负责保全其面子；四、靳内阁如有为难之处，曹张予以援助；五、各省如有不服从中央命令，曹张有劝告之责；六、段祺瑞生命财产，曹张予以保全[315]。此外，关于曹张二人之间势力问题，则采取平均分配办法，如西北军之军械归奉军所有，九师、十五师划归直系；在京抄没的段派军实，亦由直奉均等分配；此次讨段之直奉军，以后由陆军部发饷，并且规定每月发饷之准期；直奉两军驻近畿之兵，各为一师；等等。

曹锟和张作霖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于9月4日出京赴天津，旋各回保定、奉天。直皖战争结束后，上述有关时局的一些重大问题就这样处理结束了。原来由皖系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现在由直系和奉系来共同控制了。原来直皖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状态，由于皖系战败而消失，为新的直奉间的矛盾所取代，军阀官僚的统治依然如故。人们因吴佩孚推翻皖系军阀统治而一度流露的某些喜悦心情和对他的期望，很快就冰消瓦解。他们已经看出，张作霖、曹锟不会比段祺瑞好些，北京政府还是安福系专横时期的旧班底，没有任何新的迹象；依靠军阀的胜败来解决政局问题，寻求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要救中国，只有靠国民自决，奋起自救。《申报》发表的

一篇题名为《新旧之北京》的时评说："北京之内阁曰新内阁，其总理曰新总理，其国会曰新国会，皖直战争之崭然见头角者曰新人物，段派失败后取而代之者曰新势力，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然所谓新内阁总理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内阁总理，所谓新国会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国会，所谓新人物者仍是武人，所谓新势力者仍是武人。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之谓矣。"(316) 《民国日报》载文说："曹锟、张作霖、李纯及彼等同派之各武人，何尝能优于皖派。……今之排斥安福者，因反抗其公敌小徐，故暂时团结一气，并无一定之宗旨及主义。迨小徐既去，彼等将因争夺赃物而起内部之争，则中国政局中之纷乱也，阴谋也，争攘也，仍将如故。久之必再造成一反对党，取今日握权者而代之。"(317) 《民国日报》还刊载了7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政局的论文，译者在最后指出："今日欲解决吾国政局，真正救中国……决非任何军阀派的胜败所能生其直接的效果的。因彼等只知有军阀的盛衰，不知有国家的兴亡，那么如何可以靠他为吾国讲救济之策呢？今欲救中国，惟有国民自决，国民奋起自救之一途。吾望有国民资格的诸同胞，急急觉醒，急急兴起，勿再深入迷梦，信赖军阀能救国救民，那是我日夜所祈祷的。"(318)

这不但说明了国民的普遍失望，同时也说明了一部分国民已经开始觉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总是要在苦难中前进的。历史也在曲折中前进。

---

(1) 《神州日报》，1920年1月12日。

(2) 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3) 《救国同盟军草约》全文见1919年11月27日《民国日报》，1919年

11月30日《大公报》。另见《吴佩孚正传》初编，中央国史编辑社1920年10月第3版，第27—30页。

(4) 转引自《南与北一丘之貉——读新发现的吴佩孚的军事秘约》，《光明日报》，1964年3月12日。

(5) 《吴佩孚代表抵滇》，《时报》，1919年11月14日；《吴佩孚代表由桂回衡》，《大公报》，1919年11月30日。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7) 《谭延闿主稿致靳盐电》，天津《大公报》，1919年12月18日。

(8) 《吴佩孚代表昨谒总统》，《晨报》，1919年12月19日。

(9) 《直皖战争》，第2页。

(10) 《神州日报》，1920年1月26日。

(11) 《神州日报》，1920年1月26日。

(12) 《岑春煊致唐继尧密电》（1920年1月14日），《直皖战争》，第5页。

(13) 《岑春煊密电》（1920年1月19日），《直皖战争》，第4页。

(14) 《直皖战争》，第5页。

(15) 《直皖战争》，第7—8页。

(16) 《直皖战争》，第15页。

(17) 《吴佩孚遣眷回籍》，《晨报》，1920年3月14日。

(18) 《曹吴坚请撤防》，《晨报》，1920年3月14日。

(19) 《吴佩孚撤防消息种种》，《晨报》，1920年3月22日。

(20) 《吴师仍求撤防》，《晨报》，1920年4月3日。另见《吴佩孚书牍全篇》，1926年版，第139页。

(2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30页。

(22) 《吴佩孚战史》，1922年版，第39页。

(23) 《中央对于湘事之命令》，《晨报》，1920年6月14日；《政府公报》，1920年6月14日。

(24) 《直皖战争》，第77—78页。

(25) 《吴光新觊觎豫督》，《民国日报》，1919年12月4日。

(26) 《段派吴光新兵逼赵倜》，《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27) 《直皖战争》，第70页。

(28) 《直皖战争》，第72页。

(29) 《直皖两系大激战》，《民国日报》，1920年3月2日。

(3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2日。

(31) 《吴佩孚为赵倜抱不平》，《晨报》，1920年3月6日。

(32) 《直皖战争》，第71页。

(33) 《直皖战争》，第78页。

(34) 《岑春煊密电》，《直皖战争》，第71页。

(35) 《黎天才密电》，《直皖战争》，第12页。

(36) 《蓝天蔚密电》，《直皖战争》，第77页。

(37) 《张作霖主张暂不更易豫督函》，《直皖战争》，第73页。

(38) 《吴佩孚正传》附录，第3页。

(39)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57页。

(40)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57页。

(41) 《河南易督风潮将平静》，《晨报》，1920年3月6日。

(42) 《河南事件与吴佩孚撤防》，《晨报》，1920年3月11日。

(43) 《河南事件尚难乐观》，《晨报》，1920年3月10日。

(44) 《豫军暂难回防》，《晨报》，1920年3月8日。

(45) 《段氏出京后之阁潮》，《申报》，1920年4月4日。

(46) 《专电》，《申报》，1920年4月11日、12日；《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6页。

(47) 《直皖战争》，第5、8页。

(48)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编，第56页。

(49) 《靳云鹏的三通官电》，《民国日报》，1920年1月7日。

(50) 《组阁停顿中之安福部》，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1日。

(51) 《张作霖之文章》，《时报》，1919年11月14日。

(52) 《靳云鹏组阁之波折》，《申报》，1919年11月9日。

(53)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4) 《安福派仍在反对阁员案》，《申报》，1919年11月21日。

(55)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6)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7) 《阁员提出与安福成功》，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8日；《靳云鹏屈服于安福》，《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6日。

(58) 《靳云鹏屈服于安福》，《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6日。

(59) 《时评·李思浩酣睡靳侧》，《民国日报》，1919月11月25日。

(60) 《安福派逼走靳云鹏》，《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61) 《安福派逼走靳云鹏》，《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62) 《靳总理对于山东案之谈话》，《晨报》，1920年1月25日。

(63) 《靳总理否认直接交涉说》，《晨报》，1920年3月20日。

(6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7日。

(6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2日。

(66) 《靳云鹏已销假视事》，《民国日报》，1920年3月6日。另见《晨报》，1920年3月4日。

(67) 《安福部催王揖唐归京》，《晨报》，1920年3月4日。

(68) 《倒阁声中之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3月8日；《晨报》，1920年3月6日。

(69) 《总理销假与阁员请假》，《晨报》，1920年3月5日；《安靳争哄又一幕》，《民国日报》，1920年3月7日。

(70)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1)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2)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3) 《靳阁风潮又紧迫》，《晨报》，1920年3月10日。

(74) 《起落无定之内阁》，《晨报》，1920年3月15日。

(75)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76)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77) 《靳内阁又将动摇矣》，《晨报》，1920年2月29日。

(78) 《靳总理昨已销假视事》，《晨报》，1920年3月4日。另见《民国日报》，1920年3月6日。

(79) 《安福系倒靳风潮始末记》，《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

(80)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81) 《内阁问题之小段落》，《晨报》，1920年5月15日。

(82) 《靳倒后之内阁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5月18日。

(83) 《新阁仍难确定》，《晨报》，1920年5月22日。

(84) 《变化莫测之内阁问题》，《晨报》，1920年5月27日。

(85) 《靳总理将再给假》，《晨报》，1920年6月1日。

(86) 《内阁问题尚无眉目》，《晨报》，1920年6月4日。

(87) 《专电一》，《申报》，1920午5月12日；《北京阁潮之混沌》，《民国日报》，1920年5月15日。

(88) 《曹锟电留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5月12日。

(89) 《曹锟拥护靳阁》，《晨报》，1920年5月10日。另见《曹锟电留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5月12日。

(90) 《靳总理辞呈将批准》，《晨报》，1920年5月12日。

(91) 《内阁问题之前途》，《晨报》，1920年6月6日。

(92) 《靳云鹏辞职消息续报》，《民国日报》，1920年5月14日。

(93) 《拥段声中之政局》，《晨报》，1920年5月26日。

(94) 《吴佩孚提倡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6月22日；《申报》，1920年6月20日。

(95) 《政潮激荡中之张作霖》，《民国日报》，1920年6月27日。

(96) 《抵京第二、三日之张作霖》，《晨报》，1920年6月22日；《申报》，1920年6月24日。

(97) 《张胡之政潮调和法》，《民国日报》，1920年6月23日。

(98) 《政潮激荡中之张作霖》，《民国日报》，1920年6月27日。

(99) 《到京第四日之张作霖》，《晨报》，1920年6月23日；《申报》，1920年6月23日。

(100) 《专电一》，《申报》，1920年6月26日。

(101) 《紧要新闻——张作霖抵京与内阁》，《中央报》，1920年6月23日。

(102) 《靳内阁之起倒》，《晨报》，1920年6月23日，《张作霖抵京与内阁》，《中央报》，1920年6月23日。

(103) 《张曹吴会晤与政局》，《晨报》，1920年6月24日，《曹张晤面后之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6月26日。

(104) 《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8页。

(105) 《张作霖由保回京之政局》，《晨报》，1920年6月25日；《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8页。

(106) 《周阁决定之经过与将来》，《申报》，1920年7月2日。

(107) 《三总长出阁消息》，《晨报》，1920年6月28日。

(108) 《北京通讯》，《申报》，1920年6月29日。

(109) 《张作霖斡旋中之内阁》，《晨报》，1920年6月26日。

(110) 《内阁问题解决之别报》，《申报》，1920年7月1日；《张作霖与政潮之昨闻》，《时报》，1920年7月1日。

(11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6月29日。

(112) 《时事新报》，1920年7月2日；《申报》，1920年7月2日。

(113) 《内阁问题解决之别报》，《申报》，1920年7月1日。

(11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日。

(115) 《内阁变复任为改组之倾向》，《晨报》，1920年6月29日。

(116) 《孕育中之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政局最近之变化》，《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5日。

(117) 《内阁已实行改组》，《申报》，1920年7月5日。

(118) 《孕育中之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北京通讯》，《申报》，1920年7月3日。

(119)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北京政局之最近曲折》，《申报》，1920年7月4日。

(120) 《张作霖之去留与时间》，《晨报》，1920年7月2日。

(121)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内阁已实行改组》，《申报》，1920年7月5日。

(12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7日。

(123) 《周内阁复有周折》，《晨报》，1920年7月1日。

(124) 《靳退周进之内阁》，《晨报》，1920年7月2日；《北京政局之最近曲折》，《申报》，1920年7月4日。

(125) 《内阁实行改组》，《晨报》，1920年7月3日；《申报》，1920年7月5日。

(126) 《孕育中的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周阁决定之经过与将来》，《申报》，1920年7月2日。

(127)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9日。

(128) 《曹锟请罢免徐树铮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1日；《申报》，1920年7月11日。

(129) 《曹张李宣布徐树铮罪状》，《时事新报》，1920年7月4日；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30)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7月5日；《政府公报》，1920年7月5日。

(131)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

(132) 强国居士：《徐树铮秘史》，第25页。

(133) 强国居士：《徐树铮秘史》，第25页。

(134)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10日。

(135) 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36) 《段祺瑞请拿办曹吴呈文》，《申报》，1920年7月11日；《褫

曹吴军职之命令》，《时事新报》，1920年7月11日；《直皖战争》，第95页。

(137) 《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38) 《政潮危急之昨闻》，《时报》，1920年7月11日。

(139) 《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40) 《段督办之将军府大会议》，《晨报》，1920年7月9日。

(141)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7月10日；《直皖战争》，第97页。

(142) 《直皖战争》，第91—92页。

(143) 张一麐：《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6页。

(144) 《公电·吴佩孚等又一通电》，《申报》，1920年7月17日。另见《时事新报》，1920年7月19日。

(145) 《吴佩孚等之涕泣陈辞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公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

(146) 《补纪吴佩孚决战之言》，《申报》，1920年7月23日。

(147) 《补纪吴佩孚决战之言》，《申报》，1920年7月23日。

(148) 《奉军入关前之计划》，《申报》，1920年7月22日。

(149) 《张作霖要电补录》，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6日。

(150) 《曹张王李等通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4日。

(151)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7日。

(152) 《公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张胡派兵入关之措词》，《民国日报》，1920年7月16日。

(153) 《段祺瑞声讨曹吴檄文》，《时事新报》，1920年7月17日，《申报》，1920年7月17日。

(154) 《命令》，《申报》，1920年7月18日。

(155) 《专电一》，《申报》，1920年7月20日。

(156) 《高碑店第十五师通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21日；《公电》，《申报》，1920年7月21日。

(157) 《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158) 《国内专电》，《时报》，1920年7月24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30日。

(159) 《曲同丰也说讨贼》，《时事新报》，1920年7月25日。

(160) 《曲同丰又发两要电》，《申报》，1920年7月29日。

(161)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

(162) 《公电》，《申报》，1920年7月20日。

(163) 《段祺瑞屈服后之北京》，《申报》，1920年7月27日。

(164) 《段祺瑞引咎求和电》，《民国日报》，1920年7月26日；《段祺瑞自请解职之通电》，《申报》，1920年7月26日。

(165) 《鄂省直皖两军形势谈》，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9日。

(166) 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2、13日。

(167) 《陆荣廷与皖直之争》，《申报》，1920年7月18日。

(168) 《王占元监视吴光新电》，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0日。

(169) 《公电》，《申报》，1920年7月29日；《时报》，1920年7月29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3日。

(170) 《直皖战争文牍》，《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第134页。

(171) 《神州日报》，1920年7月29日。

(172) 《李秀山口中之北局》，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5日。

(173)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3日。

(1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

(175) 《时评》，《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176) 《请除安福勿惑调停之两要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

(177) 《全国和平联合会等声讨安福系删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申报》，1920年7月16日。

(178) 《公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

(179) 《外人之南北局势观》，《申报》，1920年7月13日。

(180) 《杭州学生致吴佩孚书》，《民国日报》，1920年8月1日。

(18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自序》，中华书局1940年版。

(182) 《字林报之吴张龃龉说》，《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183) 章廷谦：《时局善后的初步》，《晨报》，1920年8月9日。

(184) 《吴佩孚复商业公团函》（1920年8月12日），《申报》，1920年8月17日；《民国日报》，1920年8月17日；《晨报》，1920年8月21日。

(185) 《吴佩孚新近在汴之演说》，《晨报》，1920年8月18日。

(186) 《段祺瑞声讨曹吴檄文》，《时事新报》，1920年7月17日。

(187) 《直皖战争》，第87页；《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申报》，1920年7月2日。

(188) 《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申报》，1920年7月20日。

(189) 《专电》，《申报》，1920年7月7、8日。

(190) 《李秀山口中之北局》，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5日。

(19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3)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20年8月3日。

(194) 《曹锟致曹锐电》，《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5) 《段军败征之外讯》，《申报》，1920年7月14日。

(196)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

(197) 《昨日所闻之北方战讯》，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7日。

(198) 《段军失败之原因》，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4日。

(199)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18日。

(201) 《北方归客之谈话》，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3日。

(20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3) 《第十五师裁汰之里面》，《民国日报》，1920年1月13日。

(204) 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20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6) 《张子武上谭督书》，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7日。按张子武即张其锽，原籍广西，与谭延闿同榜中进士。辛亥革命后先后被任为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厅长。直皖战争爆发前夕，谭延闿派他前往保定作联络工作。此信1920年7月20日写于高碑店。

(207) 《专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208) 《徐树铮电稿》，第2页。

(209) 《中日军阀之新结托》，《民国日报》，1920年1月7日。

(210)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5页。

(211) 《专电一》，《申报》，1920年7月13日。

(212) 边防军聘请日本教官、下士、助教等计有：军需教练所教官鱼住慎一、卫生教练所教官野崎藤山郎、交通教练所教官近藤全房、教导团教官藤原胜千代、石井巳代吉、下元熊弥、仓崎清、山口卯吉、青原宇市、佐佐木丰臧、遇川弥一、佐藤重臧、小林元吉郎、福山芳臧、佐古永一、荒川武勇、猿渡竹次郎、多田骏、岩松英雄、铃木兵一郎、青岛正智、饭田由夫，此外尚有劈刺体操科助教多名。直皖战后，边防军被解散，上述这些日本教官于1920年8月下旬被解聘回国。

(213) 《吴佩孚战史》，1922年版，第48页；《直皖兵争之外讯》，《申报》，1920年7月12日。

(214) 战争结束后查明，在战场上被击毙伤的日本人有三十人，被俘多人。见《时报》，1920年8月3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5日；《晨报》，1920年8月7日。

(215) 以上两电均见《工学界反对助长内乱》，《民国日报》，1920年7月21日。

(216) 《中外新闻》，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6日。

(217)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

(218) 《义使署辩明军械问题》，《晨报》，1920年7月13日；《申报》，1920年7月14日。

(219) 转录自《日人拟改变对华政策》，《民国日报》，1920年8月14日。

(22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1972年日本外务省编纂，第191页。另见《外交团决下逐客令》，《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本报停刊中大事记》，《晨报》，1920年8月1日。

(221) 《外交团决下逐客令》，《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

(222) 《法报论日本庇护祸首》，《时报》，1920年8月13日。

(223)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224) 《日本承认收容祸首》，《晨报》，1920年8月11日。

(22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第546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7页。

(226)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7—18页。

(227) 《商业公团请惩罪魁之三电》，《申报》，1920年8月18日。另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第553—554页。

(228) 《北京学生会之公电》，《晨报》，1920年8月23日。

(229) 《留学界对日政府抗议文》，《晨报》，1920年8月27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

(230) 《字林西报反难日人之辞》，《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231)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132页。

(232) 《外交团对于时局之表示》，《晨报》，1920年7月10日；《申报》，1920年7月10日。

(233)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鸿隐生：《安福秘史》，第79页。

(234) 《外人之南北局势观》，《申报》，1920年7月13日。

(235) 《白坚武日记》稿本，第14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36) 转引自西塘野史：《安福部》，日新书局1920年版。

(237) 《时报》，1920年8月3日。

(238) 《西报论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21日；《西报揄扬吴

佩孚》，《民国日报》，1920年8月21日。

(239) 《外人目中之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10日。

(240) 《外人目中之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10日。

(241) 芮恩施：《对于中国时局建议》，《晨报》，1920年8月27日。

(242) 《段祺瑞屈服后之北京》，《申报》，1920年7月27日。

(24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1日。

(24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1日。

(245) 《张作霖之两电》，《时报》，1920年7月30日。

(246) 《张胡致段两电之婉转》，《民国日报》，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3日。

(247) 《直奉掌握中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7月28日。

(248) 《本报停刊中大事记》，《晨报》，1920年8月1日。

(249) 《吴佩孚最近之言动》，《申报》，1920年7月30日。

(250) 《字林报之吴张龃龉说》，《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25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4) 《靳阁复活之酝酿》，《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5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7) 《天津会议述闻》，《时报》，1920年8月3日；《收拾安福部之京电》，《民国日报》，1920年7月31日。

(25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9) 战争结束后，奉军会同警察等搜查安福系头目和骨干分子的住宅，所得动产与不动产的数目估计如下：徐树铮，动产一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余万；曾毓隽，动产三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万；丁士源，动产一百五十余万，不动产八十余万；朱深，动产五百余万，不动产无；李思浩，动产八百余万，不动产二百余万；吴炳湘，动产二百余万，不动产四百余万。所谓动

产系指现金及钞票而言，不动产系指股票及房屋而言。（见《北京查拿安福罪魁纪》，《申报》，1920年8月4日）

(260) 《一片捕拿祸首声》，《申报》，1920年8月6日。

(26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4) 《段祺瑞辞职之经过》，《时报》，1920年7月27日。

(26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日。

(266) 《段祺瑞辞职续闻》，《时报》，1920年7月28日。

(267) 《国内专电》，《时报》，1920年7月29日。

(268) 《段合肥之处分问题》，《晨报》，1920年8月10日。

(269) 《段氏不出京矣》，《晨报》，1920年8月24日。

(270) 《曹张入京前之周折》，《申报》，1920午8月7日。

(27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2) 《解散安福部之明文》，《晨报》，1920年8月4日。

(273) 《昨日公府之联席会议》，《晨报》，1920年8月8日。

(274) 《昨日之公府联席会议》，《晨报》，1920年8月8日；《七日之两大会议》，《申报》，1920年8月12日。

(275)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8日8日。

(276) 曹汝霖、陆宗舆过去的卖国活动，都是在徐世昌手下干的。五四运动中，徐对他们的罪行就极力予以包庇，后来被迫免了他们的职，但一直是自己的亲密顾问。

(277)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9) 《公电》，《申报》，1920年8月4日。另见《晨报》，1920年8月7日。

(280) 《公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81) 吴佩孚东（1日）电全文见1920年8月5日《民国日报》和《时

报》，八条大纲最先发表于《申报》，1920年7月13日。

(282) 《吴佩孚对战后之主张》，《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83) 张一麐：《对于国民大会之商榷》，《晨报》，1920年8月1日。

(284) 李大钊：《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7日。

(28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6日。

(28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87)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288) 《曹锟禁国民大会通电》，《民国日报》，8月4日。

(289) 《张使与日本记者之谈话》，《晨报》，1920年8月14日。

(29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9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1日。

(292) 《吴佩孚催决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5日。

(293) 《直奉争长中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8月8日。

(294) 《吴佩孚复商业公团函》，《申报》，1920年8月17日。

(29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9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9日。

(297)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29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9日。

(299)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10日。

(30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1日。

(301)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2)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3)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305) 《张使对于国会之意见》，《晨报》，1920年8月10日。

(30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307) 《时评·丑态》，《申报》，1920年8月20日。

(308) 《责望曹吴速起讨徐》，《民国日报》，1920年8月2日。

(309) 《杭州学生致吴佩孚书》，《民国日报》，1920年8月1日。

(310) 《非法总统之位置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7月25日。

(311) 《专电二》，《申报》，1920年8月1日。

(312) 《西报论中国政局》，《时报》，1920年8月11日。

(313) 《非法总统之位置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7月25日。

(31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8日。

(31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8日。另见《申报》1920年8月29日。

(316) 《申报》，1920年8月24日。

(317) 《民国日报》，1920年6月30日。

(318) 《日报评战后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8月10日。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零散军事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徐树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时期档案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北洋时期档案文献，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文史资料未刊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北京

《白坚武日记》（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贵州民国以来政治大略》，藏地不详

《黎元洪与段祺瑞》，张国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藏，北京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藏地不详

《弢养斋日记》，徐世昌，藏地不详

《文电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忆语随笔》，曾毓隽，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天津

《张勋复辟逸史》，王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北京

《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藏，北京

《郑孝胥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京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藏地不详

中文著作

《安福祸国记》，南海胤子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20

《安福秘史》，鸿隐生著，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杜春和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蔡元培全集》，孙常炜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程璧光殉国记》，莫汝非著，广州，1919

《杜威五大讲演》，出版地、时间不详

《段祺瑞》，沃邱仲子著，上海，广文书局，1920

《盾鼻集》，梁启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复辟始末记》，上海文艺编译社，1917

《革命缀言》，杨虎著，桂林力报馆，1943

《古宋县志》（四川），出版地、时间不详

《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金问泗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贵州辛亥革命》，冯祖贻、顾大全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李培生编，广州艺苑印刷所，1921

《国父民初革命纪略》，叶声夏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国父年谱》，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8

《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9

《国父全集》，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国际条约集》（1917—192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湖南省志》，出版地、时间不详

《护国之役》（电稿），出版地、时间不详

《回顾录》，邹鲁著，台北，三民书局，1976

《回忆辛亥革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会泽靖国文牍》，出版地不详，1923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蒋贵麟编，台北，宏业书局，1976

《乐斋漫笔》，岑春煊，出版地、时间不详

《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梁节庵先生年谱》，吴天任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诗文选》，方志钦、刘斯奋编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列宁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1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杨端六编，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罗戴祸川纪实》，黄绶著，出版地点不详，19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梦痕记》，镜宙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秘笈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民国川事纪要》，周开庆著，台北，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

《民国政史拾遗》，刘以芬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54

《邱北县县志》，出版地、时间不详

《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曲石文录》，李根源著，出版地不详，1932

《日本外交史》［日］信夫清三郎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风冈及门弟子编，上海，联合书局，1946

《四川军阀史料》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983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1986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项衡方编，上海申报馆，1921

《唐继尧》，东南编译社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

《吴佩孚将军传》，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1940

《吴佩孚书牍全篇》，出版地不详，1926

《吴佩孚战史》，得一斋主人编，出版地不详，1922

《吴佩孚正传》（初编），中央国史编辑社，出版地不详，192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湘灾纪略》，湖南善后协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新中国人物志》，［日］园田一龟著，黄惠泉、刁英华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

《徐世昌》，警民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徐树铮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62

《徐树铮秘史》，强国居士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黄季陆等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

《叶遐庵年谱》，出版地、时间不详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上海，中华书局，1936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直皖秘史》，张一麐著，上海，世界书局，1920

《直皖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

《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徐义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议会史》，顾敦鍒著，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中心，197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1962

《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公直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刘彦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

中文报纸

《爱国白话报》，北京

《晨报》，北京

《晨钟报》，北京

《大公报》，天津、长沙

《公言报》，北京

《光明日报》，北京

《国民公报》，成都

《国民日报》，长沙

《护国报》，云南

《民国大新闻报》，上海

《民国日报》，上海

《民立报》，上海

《商务日报》，重庆

《申报》，上海

《神州日报》，上海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顺天时报》，天津、北京

《义声报》，云南

《粤报》，广州

《中华新报》，上海

《中央日报》，桂林

中文期刊

《北京大学日刊》，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广东公报》，广州

《广东文史资料》，广州

《贵州公报》，贵阳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贵阳

《建国月刊》，上海、南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军政府公报》，广州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昆明

《旅欧杂志》，法国

《每周评论》，北京

《民报》，东京

《内阁官报》，北京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南京

《人文月刊》，上海

《商务公报》，哈尔滨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报告》，北京

《文史资料选辑》，北京

《新民丛报》，横滨

《新青年》（《青年杂志》），上海、北京

《星期评论》，上海

《云南档案史料》，昆明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昆明

《政府公报》，北京

《众议院公报》，北京

日文档案文献

日本外务省档案，东京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东京

日文著作

《安福部》，西塘野史著，日新书局，出版地不详，1920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时间不详

《公爵松方正义传》，德富苏峰编，出版地不详，1935

《原敬日记》，原奎一郎编，乾元社，出版地不详，1950

《贸易与国际收支——长期经济统计》，山泽逸平编，出版地不详，196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出版地、时间不详

《梦的七十余年》，北村敬直编，平凡社，东京，1975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联合国协会，东京，1957

《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编纂，大正三、五、六、七、九年，1969-1972

《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臼井胜美著，原书房，东京，1972

《外交余录》，石井菊次郎著，出版地不详，1930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铃木武雄编，东京大学出版社，东京，1978

《小幡酉吉》，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刊，出版地不详，1957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胜田龙夫著，出版地不详，1972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1卷，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埃尔兹贝尔格

安德森（Anderson）

安迪生

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B

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白　亮

白坚武

白建勋

柏　卜（August Boppe）

柏文蔚

坂西利八郎

宝德全

鲍德山

鲍贵卿

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贲克昭

本野一郎

毕　勋

毕桂芳

边守靖

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

卜尔熙（Herbert von Borch）

布赖安（William Brian）

蔡　锷

蔡冰若

蔡成勋

蔡济民

蔡元培

C

曹　锟

曹　锐

曹　倜

曹　锲

曹汝霖

曹世英

曹仲珊　见曹锟

岑伯明

岑春煊

岑西林　见岑春煊

岑云阶　见岑春煊

常赞春

陈　东

陈　箓

陈　善

陈　宦

陈　毅

陈　钰

陈宝琛

陈宝泉

陈炳焜

陈独秀

陈凤石

陈复初

陈光远

陈国祥

陈洪范

陈继祖

陈嘉佑

陈锦涛

陈竞存　见陈炯明

陈炯明

陈冷血

陈启修

陈绍唐

陈树藩

陈廷策

陈文运

陈幼苏　见陈廷策

陈毓沂

陈泽霈

陈曾寿

陈之骥

成　慎

程　克

程　蒯

程　潜

程璧光

程长发

仇元踌

褚辅成

褚其祥

川上俊彦

崔　适

崔怀瑾　见崔适

崔文藻

崔云松

D

大　岛

大　谷

大　隈

戴　戡

戴季陶

戴天仇　见戴季陶

戴循若　见戴戡

邓　铿

邓泰中

狄　莫　见胡适

狄福鼎

狄麟仁

丁佛言　见丁世峄

丁凫严　见丁世峄

丁士源

丁世峄

丁文江

丁泽煦

董　康

董仲舒

窦居仁

杜　威（John Dewey）

杜锡珪

段大信

段合肥　见段祺瑞

段祺瑞

段启瑞　见段祺瑞

段书云

段锡朋

段芝贵

段芝泉　见段祺瑞

E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F

樊老二　见樊钟秀

樊振声

樊钟秀

范国璋

范尚品

范守佑

范源濂

方　枢

方声涛

芳泽谦吉

冯大树　见冯国璋

冯德霖

冯德麟

冯国璋

冯河间　见冯国璋

冯华符　见冯国璋

冯华甫　见冯国璋

冯司真

冯玉祥

符经甫

符梦松

福　煦（Ferdinand Foch）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傅良佐

傅斯年

傅岳棻

傅增湘

G

高　峻

高　杞

高而谦

高尔登

高时臻

格　林（Green）

耿　直

耿金锡

耿臻显

龚　政

龚师曾

龚心湛

辜鸿铭

辜汤生　见辜鸿铭

谷正伦

谷钟秀

顾　鳌

顾品珍

顾少川　见顾维钧

顾维钧

官有吉忠一

管金聚

光云锦

郭　标

郭　坚

郭　沛

郭　同

郭椿森

郭德修

郭人漳

郭希仁

郭象升

郭则沄

郭重光

郭宗熙

H

哈汉章

韩凤楼

韩五峰　见韩凤楼

毫　斯

何葆仁

何恩溥

何竣业

何麟书

何珮瑢

何香凝

何应钦

何毓章

河上肇

后藤新平

胡　适

胡　瑛

胡柏年

胡汉民

胡景伊

胡景翼

胡瑞霖

胡嗣瑗

胡惟德

胡忠相

黄　侃

黄　群

黄　兴

黄复生

黄季刚　见黄侃

黄培桂

黄绍竑

黄炎培

黄毓成

黄云鹏

J

嵇祖祐

吉田茂

吉田增次郎

籍亮侪　见籍忠寅

籍忠寅

冀贡泉

贾　耕

贾紫绶

江　庸

江朝宗

江亢虎

江绍杰

姜桂题

蒋方震

蒋介石

蒋文汉

蒋雁行

蒋尊簋

蒋作宾

焦　冰

焦易堂

焦子静

颉　德

金　永

金道坚　见金永

金国治

金汉鼎

金心异　见钱玄同

金永炎

靳翼青　见靳云鹏

靳云鹗

靳云鹏

景　云

居　正

菊　池

瞿秋白

K

康　熙

康士铎

康有为

考茨基（Karl Kautsky）

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克鲁泡特金（П．А．Кропоткин）

克希克图

寇　遐

寇英杰

L

赖心辉

兰承荣

蓝　钧

蓝　辛

蓝公武

蓝天蔚

劳合·乔治（David Lloyd-George）

雷　飚

雷　溥

雷朝彦　见雷震春

雷震春

黎　澍

黎黄陂　见黎元洪

黎天才

黎元洪

李　纯

李　道

李　燮

李　异

李　垣

李安邦

李炳之

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李长泰

李传业

李存勖

李大钊

李殿荣

李芬圃　见李庆芳

李福林

李根源

李国定

李国珍

李含芳

李厚基

李进才

李经羲

李奎元

李烈钧

李临阳

李庆芳

李绍臣

李盛铎

李述膺

李司铎

李思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李廷玉

李完用

李协和　见李烈钧

李燮阳

李雪舫

李雁宾

李耀汉

李友莲

李友勋

李佑文

李雨春

李毓华

李元鼎

李曰垓

李赞侯　见李思浩

李兆珍

李肇甫

李正芳

李仲公

李仲麟

李仲仙　见李经羲

李仲轩　见李经羲

李宗黄

李醉白

梁　济

梁鼎芬

梁敦彦

梁鸿志

梁敬镈

梁启超

梁善济

梁士诒

梁式堂

梁漱溟

梁万春

梁燕孙　见梁士诒

廖仲恺

列　宁（В．И Ленин．）

烈察臣

林　孚

林　虎

林　森

林　纾

林葆怿

林长民

林建伦

林俊廷

林琴南　见林纾

林权助

林绍斐

林修梅

林祖涵

刘　湘

刘　询

刘　棫

刘　豫

刘半农

刘成勋

刘成禺

刘崇杰

刘崇佑

刘存厚

刘德泽

刘恩格

刘艮生　见刘人熙

刘官礼

刘冠雄

刘光烈

刘海门

刘鸿逵

刘建藩

刘鲤门　见刘恩格

刘懋赏

刘培泽

刘人熙

刘如周　见刘显世

刘绍炎

刘申叔　见刘师培

刘师培

刘式训

刘廷琛

刘统之　见刘官礼

刘文明

刘显潜

刘显世

刘雪亚　见刘镇华

刘映奎

刘云峰

刘镇华

刘治洲

龙　璋

龙济光

龙建章

隆　裕

卢　焘

卢金山

卢师谛

卢永祥

卢占魁

卢仲琳

鲁　迅

鲁赫喧

陆　干　见陆荣廷

陆阿宋　见陆荣廷

陆建章

陆荣廷

陆武鸣　见陆荣廷

陆欣老　见陆荣廷

陆裕光

陆徵祥

陆宗舆

路易加士

吕　超

吕　复

吕达斯达

吕调元

吕公望

吕志伊

罗　诚

罗家衡

罗家伦

罗开榜

罗佩金

罗仁博

罗翼群

罗正纬

M

马　济

马　晋

马　良

马　骧

马凤池

马格德

马君武

马克思（Karl Marx）

马龙标

麦喀士　见马克思

毛泽东

梅倬敏

美　浓

孟恩远

孟庆远

孟寿椿

缪嘉寿

闵文湘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莫擎宇

莫荣新

牟　琳

牧野伸显

穆　郇

穆文善

N

那彦图

南岳峻

内田康哉

尼　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尼志埃　见尼采

倪鸿钧

倪嗣冲

倪毓芬

钮永建

O

欧　文

欧阳澈

P

潘　复

潘矩楹

潘馨航　见潘复

潘智远

庞全震

庞士俊

裴宝棠

彭　璜

彭光烈

彭寿莘

彭允彝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溥　仪

Q

戚　扬

齐宝善

齐耀琳

齐耀珊

祁景颐

钱幹臣　见钱能训

钱锦荪

钱能训

钱玄同

钱紫公　见钱能训

秦望澜

覃　振

覃寿堃

青木宣纯

曲同丰

屈映光

犬养木堂

饶汉祥

饶鸣銮

任凤苞

任可澄

任应春

茹欲立

阮毓崧

阮忠枢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S

萨镇冰

山　本

山田宪三　见西原龟三

山县有朋

商　震

商德全

商衍瀛

上原勇作

尚镇圭

邵飘萍

神鞭知常

沈宝昌

沈恩孚

沈钧儒

沈铭昌

沈瑞麟

沈寿堃

沈瑜庆

沈曾植

升　允

胜田主计

施　愚

施从滨

施蒂那

施肇基

施植之　见施肇基

石光真臣

石井菊次郎

石敬瑭

石青阳

石陶钧

石星川

石醉六　见石陶钧

舒荣衢

舒云衢

双　清

寺内正毅

松方正一

宋邦翰

宋伯鲁

宋大霈

宋鹤庚

宋焕章

宋学皋

宋子扬

苏佩秋

苏锡麟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宝琦

孙伯兰　见孙洪伊

孙传芳

孙发绪

孙洪伊

孙剑峰

孙烈臣

孙熙泽

孙毓筠

孙兆鸾

孙中山

索尼诺

T

太田喜平

谭　谌

谭浩明

谭延闿

汤　漪

汤化龙

汤芗铭

汤用彬

唐郛郑　见唐浩镇

唐浩镇

唐继尧

唐蓂庚　见唐继尧

唐纳德

唐少川　见唐绍仪

唐绍仪

陶云鹤

田　桐

田其美　见陈独秀

田树勋

田颂尧

田文烈

田应璜

田中义一

田中玉

田子琮　见田应璜

头山满

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 ）

W

万绳栻

汪大燮

汪精卫

汪可杰

汪立元

汪孟邹

汪士元

汪贻书

汪有龄

汪兆铭　见汪精卫

王　祺

王　杰

王　彭

王　韬

王　湘

王　樾

王安澜

王宝田

王葆真

王秉钧

王伯群

王承斌

王宠惠

王纯祖

王光祈

王广圻

王怀庆

王家襄

王金镜

王觐墀

王克敏

王禄勋

王懋赏

王明敏

王乃斌

王乃徵

王丕焕

王聘卿　见王士珍

王人文

王儒堂　见王正廷

王汝勤

王汝贤

王善荃

王士珍

王天纵

王铁崖

王廷桢

王文华

王学伊

王一堂　见王揖唐

王伊文

王揖唐

王印川

王有兰

王玉树

王月波　见王印川

王占元

王正廷

王芝祥

王郅隆

王仲荃　见王善荃

王子春　见王占元

王祖同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韦洛贝（W．W．Willoughby）

韦荣昌

魏邦平

魏宸组

魏宗瀚

温世霖

文　群

乌泽声

吴　淞

吴　虞

吴炳湘

吴伯珩

吴长植

吴达铨　见吴鼎昌

吴鼎昌

吴光新

吴笈孙

吴剑丰

吴剑学

吴景濂

吴敬珉

吴俊陞

吴佩孚

吴庆桐

吴三桂

吴绍良

吴文瀚

吴新田

吴延陵　见吴佩孚

吴子玉　见吴佩孚

吴宗慈

伍朝枢

伍廷芳

伍廷飏

武树善

武者小路实笃

X

西园寺公望

西原亀三

夏寿康

夏寿田

萧　萱

萧弼臣

萧德明

萧耀南

小幡酉吉

谢　持

解荣辂

解树强

新　田

邢殿元

熊范舆

熊克武

熊其斌

熊其勋

熊树棻

熊希龄

熊正琦

修承浩

须贺野

徐　良

徐　谦

徐　勤

徐东海　见徐世昌

徐佛苏

徐海清

徐世昌

徐世一

徐树铮

徐孝刚

徐又铮　见徐树铮

许　喆

许崇智

许德珩

许兰洲

许士熊

许世英

薛大可

薛其昌

Y

严　复

严鹤龄

阎繁敏

阎繁瑞

阎锡山

阎相文

颜德基

颜惠庆

杨　度

杨宝民

杨伯荣

杨桂堂

杨邻葛　见杨宇霆

杨铭源

杨善德

杨庶堪

杨永泰

杨宇霆

杨增新

姚　震

姚步瀛

姚国桢

叶　荃

叶楚伧

叶恭绰

叶景莘

叶夏声

叶誉甫　见叶恭绰

伊　藤

尹昌龄

永　野

永井松三

由宗龙

于　锦

于宝轩

于右任

余道南

俞作柏

庾恩旸

袁大化

袁光辉

袁金铠

袁乃宽

袁世凯

袁希涛

袁项城　见袁世凯

袁祖铭

原　敬

岳维峻

岳昭燏

Z

臧荫松

曾　彦

曾纪纲

曾继梧

曾毓隽

曾云霈　见曾毓隽

斋藤季次郎　见斋藤季治郎

斋藤季治郎

翟　汪

张　钫

张　弧

张　继

张　謇

张　澜

张　瑞

张　熙

张　习

张　煦

张　宣

张　勋

张　毅

张邦昌

张伯烈

张步先

张承绪

张炽章

张春圃

张广建

张国焘

张国淦

张国溶

张海峰

张怀芝

张汇泉

张集义

张锦芳

张景惠

张敬汤

张敬尧

张静江

张君劢

张开儒

张联陞

张其锽

张瑞玑

张瑞萱

张绍曾

张士钰

张寿令

张树森

张树元

张维新

张蔚森

张文生

张我华

张锡元

张小松　见张寿令

张协陆

张叙五　见张景惠

张学颜

张亚威

张尧卿

张耀曾

张一麐

张义安

张永成

张友桐

张玉庚

张玉昆

张元培

张镇芳

张镇芳

张之洞

张之杰

张志潭

张子志　见张怀芝

张宗昌

张作霖

章士钊

章太炎

章仲和　见章宗祥

章宗祥

赵　杰

赵　倜

赵丙燮

赵炳麟

赵凤昌

赵恒惕

赵鹏图

赵世钰

赵又新

赵玉珂

赵云龙

赵中元

赵钟奇

赵周人　见赵倜

珍　田

郑万瞻

钟才宏

钟体道

钟允谐

周　骏

周　伟

周道刚

周善培

周少朴　见周树模

周绍芝

周树模

周树人　见鲁迅

周西成

周孝怀

周印昆

周肇祥

周震鳞

周钟岳

周自齐

周作人

朱　瑞

朱　深

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

朱桂莘　见朱启钤

朱家宝

朱镜宙

朱培德

朱启钤

朱庆澜

朱绍良

朱泽黄

朱兆熊

朱执信

竹下勇

祝书元

庄思缄　见庄蕴宽

庄蕴宽

邹　芬

邹　鲁

邹宪章

佐藤爱麿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四卷
(1920—1924)

汪朝光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四卷

（1920-1924）

汪朝光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研究的是1920年到1924年北洋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

1920年7月，直系在直皖战争中胜利，北京政治进入直系控制的年代，通常又可称为直系统治时期。不过，因为直系的实力尚有不及，而奉系在直皖战争中又支持了直系，所以，尽管不十分情愿，直系仍然不能不与奉系政治分赃，北京政治在一段时间中处在直奉妥协共治的局面下。

在北洋时期军阀相争的年代，北京的政治难以长久为多个派系所共享。实力优厚者总是想着独占中央政权，或武力或“和平”地实现自己的“统一”大业；而实力不及者则忙于合纵连横，既抵御实力优厚者的压力，又可觅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实现有朝一日争霸中央的“理想”。直奉共治时期的北京政治就处在双方如此这般的矛盾争夺的张力之下，直系势大，自然咄咄逼人，奉系势弱，但也不甘示弱。与皖系独控北京政治时期相比，北京内阁处于两强之间，谁也得罪不起，不能不左右逢迎，而又左支右绌，原本北京政府的力量就有限，此时更受着夹板气，实在难有作为。及至直系自信其武力可以压倒奉系，不愿再陪奉系玩共治的戏码，两强由“文斗”而“武斗”便不可避免。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为结局，奉系自然也就退出了北京政治的舞台，直系成为北京政治惟一的主人。

直系独掌北京政治之后，先是力倡“法统重光”，恢复旧国会，迎回“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民国法统又重归正朔。直系既以此作为己派完全控制政治的过渡，又以此作为打消南方反对派“护法”的说辞。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保护劳工”等等高调主张，在坊间也引来不少“好评”，从而使直系在掌政之初，似乎显得有点“另类”，多少给

人以“新”感觉。但不旋踵间，京汉路工潮被横暴镇压，“武力统一”的企图依旧，使直系的外界形象被打回军阀原形。尤其是直系出尔反尔，先迎黎后驱黎，操弄政治，公然贿选，虽然最终将曹锟送上了大总统之座，但却使直系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恶人”。尤有进者，总统贿选彻底败坏了国会制的基础和西式民主的形象，使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干政而本已非常脆弱的西式民主体制轰然倒塌，不再为多数人所喜所惜并由此而走上不归路，而民国法统的中落也预示着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逼近，旧时代又将走向新选择的十字路口。这些变化大概是贿选进行时的直系所未及预料，甚而是反对贿选的各路力量、外间舆论及社会各界亦未可完全预知者。由此亦可知，历史总是有些关节点在特定的时刻起着特定的作用，后人要做的事或许就是在纷繁的历史表象中发见这些重要的关节点，并予以合理的诠释。

虽然直系也是北洋军系的嫡传，但直系与同为北洋嫡传的皖系段祺瑞和北洋旁门的奉系张作霖有所区别的是，直系的内部关系相对松散，存在北派（直鲁豫）与南派（苏鄂赣）之别，缺少有力的领袖核心。冯国璋故去后，直系虽然形成以北派曹锟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但因为种种内外因素，其领袖构成为曹锟—吴佩孚的双核中心结构，从而使得直系内部的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既有曹锟部属为中坚的保派（后期又结合了津派），也有吴佩孚部属为中坚的洛派，所谓派中有派，彼此间冲突不断，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向心力，由此还导致北京阁潮及政治动荡，也不利于直系统治的稳固。与此同时，奉系却在东北埋首练兵，准备卷土重来，内以“励精图治”，外则结成奉系、皖系、孙中山“三角同盟”，不过两年的时间，直奉两派实力逆转，又一次战争不可避免。及至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不仅在军事上占了上风，而且直系大将冯玉祥背弃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开军阀派系内部大将背叛之先河，原先以地域、部属、出身、亲朋等关系为纽带的军阀派系忠诚也不再牢固，直系乃至北洋军系盛极而衰、终归末路的历史命运也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北洋时期各路曾经执掌中央政权的军阀中，与皖系和奉系比较鲜明的日本背景相比较，直系与列强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明确。直系既和英美有较多的联系，也和日本维持着一定的往来，直系首领吴佩孚还一度得到苏俄与共产国际的青睐。直系也曾不止一次地利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对外关系中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攻倒自己的对手，从而显示出其在把握社会大众心理方面较其他军阀的一定长处。

在直系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的同时，各地方军阀仍然以割据地方为中心，进则出击，退则自保。他们一度还利用民间舆论，高唱“联省自治”，制订省宪法，以此与控制北京政府的大军阀的“和平统一”或“武力统一”相抗衡。然而，只要军阀的枪杆子不受约束，“联省自治”的结局便不过仍是军阀之治，省宪多有名无实，军阀混战依旧。

面对国内南北当权者“如一丘之貉”的现状，孙中山仍然没有背弃他的理想，虽屡战屡败，但仍不气馁，继续坚持其主张。孙中山通过发动讨桂战争，重回广东，出任非常大总统，但又因陈炯明之变黯然离粤，遭受其革命生涯中的惨重一击。从此，孙中山对其革命前途有了新的思考，其政治选择逐渐转向，开始从传统的西式民主主义者，转向苏俄革命的同盟者，并酝酿国民党的改组并联合共产党一致奋斗。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着力推动的结果，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更有不解之缘。中共的成立，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其后随着工潮的起伏，在寻求新同盟者的过程中，由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中共选择与国民党联手，共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共成立的意义，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渐凸显，终至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外交，较前有了一定的变化。在民族主义浪

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外交由“五四”而开始的对列强强权的抗争得以继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中国与德国和苏联签订了平等新约，收回了山东权益，并确立了最终实现关税自主、取消列强治外法权和租界等废除不平等条约内容的目标。这些外交成果的取得，是中国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和推动的结果，也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审时度势、张弛有致、艰辛努力的成果。但是，因为中国分裂的政治格局如旧，中国的实力仍然低落，中国外交取得的成果也仍然是有限的。

从民国成立开始的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波十年左右的高潮，至20世纪20年代初达至其高峰。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金融银行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受制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国内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市场分割，国际的列强压迫，缺少自主，受制于人，等等，在在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型仍然是漫长的过程。

本卷所述内容大体如上，但考虑到民国史的总体格局与风格，本卷仍然以政治史为记述的中心内容，旁及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层面的叙述。其利在线条清晰，着重阐释历史的政治演进及其大格局，而其弊在忽略了历史的多样化及其互相影响的关系。或许留待今后，我们可以更从容的心态与更多元的思考，探究历史的多样化面相。

本卷运用的史料，以各种档案文献为主，兼及报刊、日记、回忆录，等等，并参考了已经出版的各种研究成果。惟以部分文稿的写作时间稍早，成稿后因为种种原因未及再改，故在史料运用上也还存有一些不足之处，或可留待今后再版时改正。

历史著作的写法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然其本质特征总不脱真实两字，因为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是可信的历史，也才是对读者有意义的历史。惟什么是真实，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理解的，或许只有历史事实

本身才可以论定其真实或者不真实，而历史的评论与分析，则总是仁智互见、难言惟一者。本着作者的历史认识与一贯原则，本卷以记述为先，也即如实再现历史的过程，并力求其真实，至于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分析与评论，不过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并不奢求读者诸君的认同，而只能是期待读者的理解或者是批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的评价因此也是十分复杂的，作者只能诚惶诚恐，在文稿完成出版后期待各方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本卷的写作经历了稍为曲折的过程，不必尽述，而作者介入此卷写作前后也有了超过二十年的历史，这段历程正是作者从青年学者成为中年学人的历程，好在全卷终得完成，并且以中年人的成熟，可以稍补青年人的青涩，或可为本卷经历如许时光而最终完成寻得所谓敝帚自珍的借口吧。当然，本卷存在的问题可能仍然多多，这是作者不能推脱责任而归之于任何其他原因者，只能是由作者个人负责，并期待各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卷写作提纲的拟订曾得孙思白先生的指导，拟出后经李新先生审定，部分文稿完成后亦经李新先生审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历任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部门及近代史所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为本卷完成有所贡献的机构和学者良多，难以一一列名，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责任编辑、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欧阳红女士，中华书局及历史编辑室的领导，对于本卷的编辑出版贡献亦多，一并致谢。

2011年5月18日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一节　北方的直奉妥协共治
　　一　第二次天津会议与直奉政治妥协
　　二　北京内阁改组与直奉分割地盘
　　三　吴佩孚的政治动向
　第二节　南方的粤桂战争与孙中山回粤
　　一　第一次粤桂战争与桂系退出广东
　　二　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
　　三　第二次粤桂战争与广西平定
　第三节　牵动南北的援鄂战争
　　一　“鄂人治鄂”与援鄂战争的发端
　　二　吴佩孚强势介入与援鄂战争的结局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中共组党的酝酿及其创建
　　二　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第五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外交的新变化
　　一　中国问题与华盛顿会议
　　二　华盛顿会议的中国问题讨论
　　三　华盛顿会议的山东问题交涉
　　四　苏俄对华外交的新姿态
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直系当政
　第一节　直奉矛盾的激化
　　一　靳阁垮台与梁阁登场
　　二　梁阁被攻的台前幕后
　　三　直奉两系的战争准备

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经过与结局
第二节　“法统重光”
一　徐世昌下台
二　黎元洪复职
三　反直阵营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应
四　旧国会的恢复与新阁组成的反复
第三节　直系当政后的南北政局
一　曹吴矛盾与保洛之争
二　罗文幹被捕案
三　“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
四　反直三角同盟的酝酿与行事
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一节　“联省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一　“联省自治”潮流的兴起
二　“联省自治”的实践
三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
第二节　西南军阀的混战
一　湖南的谭、赵之争
二　川、滇、黔的权力更替
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一节　孙中山继续奋斗
一　孙中山的北伐
二　陈炯明发难与孙中山再度离粤
三　南北对福建的争夺
第二节　孙中山的转向
一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
二　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顿挫
三　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其政治转向
第五章　北京政局与曹锟贿选
第一节　直系当政时期的社会状况

一　兵变与匪患
二　临城劫车案
三　京汉路工潮与“二七”惨案
第二节　黎元洪被逐
一　总统任期之争与倒阁风潮
二　黎元洪被逐出京
第三节　曹锟贿选闹剧
一　围绕总统大选的各方博弈
二　贿选告成　法统中落
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节　曹锟“当选”后的困窘之局
一　各方因应
二　阁潮纷争
三　内外矛盾
第二节　江浙战争
一　江浙战争的由来
二　江浙战争的结局与孙传芳的兴起
第三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端
二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
第四节　北京政变
一　冯玉祥与北京政变
二　北京政变与奉皖结合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终结与北洋军系的走向
第七章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一节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与起伏
一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
二　中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
三　近代工业发展的起伏
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停滞

一　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
二　农业经济的凋敝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财政与金融
一　北京政府中后期的财政状况
二　新式银行业的兴起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一节　北方的直奉妥协共治

一　第二次天津会议与直奉政治妥协

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因失败而基本退出北京政治舞台，直系认为己方是战争的胜利者，耀武扬威，表现高调，力图把持北京政治；但奉系亦自认其出兵参战，对直系的胜利出力甚多，同样企图在北京政治中分一杯羹，为己方势力自关外伸入关内并登上中央政治舞台打下基础。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皖系尤其是皖系首领段祺瑞的个人关系一向不错，再加上双方同与日本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所谓同气相通，故在对直皖战后问题的处理方面，奉系的看法显与直系有别，张作霖尤其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高调政治表现颇为不满，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遂由战前的直皖矛盾逐渐向直奉矛盾转化。只是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直奉双方都需要瓜分战争的胜利果实，调整派系之间及派系内部的利益关系，双方的矛盾尚在隐忍未发之态，北京政府便处在由直奉两系政治妥协所决定的共治状态之下。貌似独立第三方的大总统和内阁，虽然也希望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处在直奉两系争斗的夹缝之间，动辄得咎，难有独立而言。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经由天津首脑会议，对若干善后问题作出决定，暂时稳定了被战争打破平衡的北京政局。但因为各方利益不一，天津会议仍然遗留了若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直奉两系争斗的背景下，这些未决问题不时对北京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尤其使处在对直

奉谁都不能得罪、也得罪不起之地位的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深感“小媳妇难当”，大呼头疼。为此，由靳云鹏主动发起，邀请直、奉两系头领曹锟和张作霖二次聚会天津，讨论并解决直皖战后的若干未决问题。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平衡，加强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靳还拉来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参加此次会议。实际上，靳云鹏也知道，会议的主角当然是曹锟和张作霖，他们的决策就是北京政府的行事指南，他不过是恭陪末座，看人眼色，听命而已。

1921年4月25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王占元在天津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讨论议题包括国会选举、内阁重组、“南北统一”、“援库”，等等。直、奉两系勾心斗角，为各自的利益斤斤计较，不遑相让，惟格于内外环境，一时尚不能决裂，故可维持大体平衡，得出暂时的妥协。

国会问题。经上年天津会议的决定，1920年8月30日，安福国会在常会到期后自行宣布休会。随后，大总统徐世昌在10月31日通令全国谓：“和平、统一、善后各端，亟待次第施行。国会为全国人民代表，关系綦重，所有参众两院，应即重新选举，著内务部即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督同各省区长官，将选举事宜迅速妥善办理。”[(1)] 徐世昌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国会选举，回避新旧国会之争，建立新“法统”，有利于延续其总统地位，同时也杜绝南方的“护法”口实。但南方护法国会以维护民国旧有“法统”为己任，要求恢复旧国会，反对再选新国会。各省北洋督军信奉实力为上，对国会选举这种无味把戏兴趣不大，自然应者寥寥。皖系地方实力派、浙督卢永祥反对举办国会选举，认为“舍本求末，疑问尤多”。刚刚在战争中击败皖系的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认为卢的态度对其废弃南北国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有利，遂大加支持。1921年1月7日，吴致电曹锟，认为“彼既有正大之主张，我即当顺而从之，以表示声气之同。倘执意阻止，见解两歧，不特团体有碍，我将自陷于孤立地位矣”。2月3日，吴佩孚又致电直系

山东与河南督军，表示“中央突办不合法之新选举，实别有作用，推测将来，必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实深危惧”，要他们“各速出电，极力赞成”卢的主张[(2)]。在吴佩孚的心目中，北洋“团体”的利益实高于所谓“法统”。由于当事各方对新国会议员选举都不甚积极，除了江苏之外，全国各省在预定时日都没有举办选举。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为了敷衍徐世昌的请求，由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领衔发表通电，催促各省从速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向卢永祥疏通，以打消其反对意见。但说到底，曹、张、王对选举这样“劳民伤财”而又无甚实际效果的事也都不热心，在做足了发表通电的表面文章之后，也就不闻不问了，国会选举事从此不了了之。

内阁问题。上年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但靳组阁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不能任由其决定人选，故其属下出身交通系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与靳不合，他们把持财政，与靳为难，企图以财政困难逼靳下台，然后拥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上台。他们的如此作派，自然使其与靳云鹏的矛盾激化，势如水火，而靳又不愿即时下台走人，故不得不向直奉两系讨好求援。虽然张作霖不无支持梁士诒之意，但亦无意在此时与直系搞僵，所以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均表示，“默察大势，际兹国家濒危，内政外交非靳莫属”，决定“拥护靳阁勿使遽去，以维大局，除径电劝慰外，各省同胞，咸具爱国热忱，请一致主张拥护靳阁，以奠邦本”[(3)]。靳云鹏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后在5月中旬进行内阁改组，总算暂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详见后述）。

“南北统一”问题。在军阀相争时代，军阀们在朝时就高唱“统一”，在野时便声言“自治”，南北无不如此。由于此时南方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统”上亦与北方分裂的客观现实，当军阀们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时，自然就要鼓吹“统一”，而且为解决财政困难，便要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但外国银行团是否借款，又要以能否“统一”为条件，因此，无论直、奉两系何人在北京当家，都得高调推行“统一”。上年

的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致电南方各省，讨论“统一”问题，但结果是空有电文往返，不见“统一”行动。此次天津会议，决定由王占元负责与南方谈商“统一”，因王所占湖北地盘直接与南方各省相邻，而王从自身利益出发，亦有意拉拢南方各省，抬高自身地位。然而，南方军阀割据势力已成，同样不愿归附于他人，所以当第二次天津会议传出王占元将与南方谈商“统一”的风声之后，南方各省的军阀首领便纷纷公开否认有其事。湖南赵恒惕称：“吾人为争人格而驱张，焉肯自贬人格以投北乎？”[(4)] 贵州卢焘亦称，对于“南北均不附和”，“滇黔已宣布联防，与北归无关”[(5)]。所谓“南北统一”，在“和平”条件下自无法实现，而无论直奉又没有动用武力的实力和准备，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徒放空言而已。

“援库”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外蒙王公失去沙俄奥援，1919年11月外蒙撤销“自治”，中国军队重入外蒙。1921年，外蒙形势又发生变化。白军恩琴部于2月占领库伦，中国军队被迫撤离。3月21日，外蒙重新成立“独立”政府。值此外蒙局势动荡之际，社会舆论遂有“援库”呼声，希望中国出兵，保持对外蒙的主权。直奉双方对此都在唱高调，摆出势在必行之态，实则各有打算。直系希望由奉系出兵，以此削弱奉系争霸北京的实力，有利于自己控制北京政局。奉系因其地盘和军队靠近外蒙，对出兵似乎责无旁贷，实则是企图以此谋取控制热、察、绥地盘，进而增强与直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实力。当曹锟征询吴佩孚对出兵外蒙的意见时，吴认为：“小徐（树铮）自去年失败后，无一日不图报复。此次利用寇扰塞北，妄冀调虎离山，乘内地空虚，袭而取之。此声东击西之诡计也。我若出师援库，正堕彼术中矣。”第二次天津会议前，吴又电曹谓：某方“总以激动直军，竭尽全力援库，一出长城，即不能还师内地为得计。此系安福某要人希图一网打尽之毒计。……我帅此次赴津之行，于我军之利害关系至重且大，特恳切禀陈，祈注意以上情形防之。”曹锟接受了吴佩孚的意见，由吴出面恭维张作霖“统辖三省，威名远播，有雄师劲旅，当能为国效命”；建议“长城以北之边防，请雨帅（张作霖）完全负担”；

长城以内“应由我帅（曹锟）担任保持”；长江流域“则由鄂赣两督，联合川湘，协力维持”；闽浙方面，“有鄂督负责”；“如此分别负担，实力进行，则中央无北顾之忧，而中原有金汤之顾，防内防外，措置裕如之全策也”[(6)]。心怀个人打算的张作霖则顺水推舟，表现出乐得接受直系的倡议，第二次天津会议决定由张作霖全权负责“援库”。5月30日，徐世昌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特区，令其“整肃师旅，迅图戢定”，后方策应事项，由曹锟、王占元“随时会商妥善办理”[(7)]。张作霖随即组织“征蒙军”，摆出出兵架势，实则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借此“向叶恭绰硬敲二百万元”外[(8)]，始终未曾出动过一兵一卒。6月12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谓外蒙匪势已成，今后宜先劝慰王公，严剿余匪，电令活佛归顺，“如其不悟，再兴干戈，以示怀柔而息边患”[(9)]。“援库”、“征蒙”就此不了了之。而张作霖却以此名正言顺地得到了热、察、绥地盘，并以此为借口，扩充兵力，索取军费，否则即声明“宁为时日上之牺牲，决不冒昧从事”[(10)]。据说，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张作霖借“援库”讨得300万军饷，而曹锟只得50万，引得曹锟四弟曹锐大骂靳云鹏：“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而靳得张作霖助，不甘示弱，回骂道：“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11)] 活脱脱表现出军阀治下政治的流氓性和无序性。

4月28日，“四巨头”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经过此次会议的讨价还价，直奉两系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从而维持了北京政府在直奉共治下的暂时稳定。直奉两系在此次会议上各有所得，曹锟和张作霖都表示满意，但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张作霖排挤吴而向曹锟示好的举动，非但不能拉近他和直系的关系，反而埋下了吴张交恶的种因，成为造成后来直奉关系极度恶化的重要因素。而且，此次会议未能解决直奉双方的基本矛盾，即由谁控制北京政府，进而成为“中央”的代表。直奉共治不过是双方实力大体均衡的产物，但这种均衡是非常脆弱而不稳固的，一旦再遇有双方的利益之争，均衡即易转化为不均衡，当双方矛盾发展到不可缓和的地步时，最终还得靠武

力解决问题。由直皖战争和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可知，北京政治的稳定与动荡，在相当程度上即系于北洋皖、直、奉三大派系间的实力均衡与不均衡的关系演变。

二　北京内阁改组与直奉分割地盘

国务总理靳云鹏虽然是第二次天津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的陪衬，但曹、张在会上达成的妥协对靳维持个人地位却是有利的，就此点而言，靳云鹏也算是第二次天津会议的赢家。

靳云鹏内阁在直皖战后的产生，本也是直奉妥协的产物，但靳阁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均为交通系干将，成日图谋本系利益，“百计保持本系势力”，力图拥戴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以更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偏偏他们所掌握的部门，又是北京政府的软肋，因为“目下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非特不能接济中央，反向中央尽力要索，中央无生财之道，不能不取之于外债。而借用外债，不能不有抵押品，故交通、财政几成内阁养命之源”[(12)]。他们即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和其掌握的财权，频频发难，使得内阁总理靳云鹏的日子十分难过。

在后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的权威尽失，进项有限，财政十分困窘，“完全靠借债过日子”[(13)]，财政总长也就成了政府中最关键也最难当的成员，负有为政府找钱、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重要使命。靳阁成立后，财政本已很困难，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借款，因抵押将尽，债主们都不愿轻易出手。靳云鹏决定实行财政改革，1921年3月5日，由国务院通电各省称：“整理财政计划，决计实行。关于内债一节，已与国内银行界议定具体办法。惟整理财政，皆与军费有关，特交阁议决定召集各省财政军事会议，相应电报查照，希即迅速派员来京参与会议。”[(14)] 此次会议的结果，是提出建立“整理内债本息基金”，将政府所发各内债分别整理，以利继续借新债。但此项计划能否实现姑且不论，即便实行也是缓不济急，且因政府债信不佳，市场

上的债票价格还在继续大跌。正值此时，张作霖索要“征蒙”军费数百万，各地战争继起，各路军阀催饷电文纷至沓来，靳云鹏应付无术，甚而北京政府各机关亦不能按时发薪水，各部欠薪有多至数月者，其中以教育部最甚，自直皖战争结束后即未从财政部领到分文。面对如此窘境，本负有筹款之责的财政总长周自齐，非但不为靳云鹏排忧，却联手交通总长叶恭绰，“遇事独断，无一项禀呈靳揆”[15]，动辄向靳使脸色撂挑子，告其财政不敷甚巨，无法维持，而“无论中外银行，相戒决不投资于政费”[16]，企图以此逼迫靳云鹏下台，由交通系另组新阁。靳云鹏忍无可忍，“恨之入骨”，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低声下气地恳请曹锟和张作霖出手相助。曹、张都对靳未能满足己方的需索表示不满，但如果更换靳阁，又将牵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引发新的矛盾，是此时曹、张所不愿见者。因此，曹锟和张作霖都对靳云鹏表示安抚，支持他继续主持阁政。有了曹、张的支持，靳云鹏遂不再忌惮于交通系的脸色，为了赶走内阁中的交通系干将，他干脆自导自演，在5月14日宣布内阁总辞，随即由徐世昌下令重新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另组新阁。靳云鹏提名李士伟为财政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总算使财政、交通两部的权力回到了自己手中。但是，李士伟曾任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此时日本正在谋划将段祺瑞政府时期所借的日本对华无担保借款，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实际变为有担保借款，此事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报章仍以其亲日色彩颇有违言”[17]，李不敢到任，财政部只能由次长潘复代理部务。

靳云鹏挤走交通系，重新组阁，并得到直奉两系的支持，似乎可以施展一番了。靳云鹏对外公开宣布其施政方针为：一、先谋国内统一，征蒙平粤，接洽湘、滇、川、黔，双管齐下，以期早谋和平；二、整顿全国财政，维持金融，入手办法，仍在整理税则，清理积欠；三、添设各省省长，实行军民分治；四、清偿欠饷，入手裁兵；五、扩充利源，振兴实业[18]。虽然如此，上述政见也不过是靳云鹏唱高调而已，实际根本无法实行。“国内统一”遥遥无期，整理财政难

以进行，向手握兵权的军阀头领要求“军民分治”、“入手裁兵”，实无异与虎谋皮。而在实际政务方面，直奉两系对靳云鹏的支持都是有代价的，为了满足他们的各种需索要求（如双方都谋求获得更多的军费），靳云鹏实穷于应付，而当他们的要求稍有不合（如双方都谋取同一地盘），靳云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靳云鹏看似是北京内阁改组的受益者，惟其实际究如何，他的内心世界当有更深的体验吧。

直奉两系除了在中央层级的利益争夺外，地方层级的利益争夺也是无处不在，其中尤以对各省督军职务的争夺更为激烈。

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归根到底是地盘之争，有了地盘就有了兵源财源，也就有了军阀赖以为生的实力所在，而各省督军就是军阀争夺地盘最重要的支撑。直皖战后，两次天津会议及其间隙期都讨论了直奉双方的地盘分割问题。“地盘问题，尤为此次解决之重要事件。大约张争热、绥，曹要陕、甘，皆非达目的地不止”[(19)]。直奉两系为此互不相让，有激烈的交锋，最后的结果则维持了大体的平衡，直系在捞取实力、地盘方面略占上风。

安徽督军。在直皖战后皖系余存的地方督军中，皖督倪嗣冲可谓皖系老臣，但因其年老多病，常住天津，与皖政已经疏离，故成为直奉两系都在打主意的对象，而不似其他皖系地方督军，因握有实权而不便遽然下手。张作霖先是保荐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勋出任皖督，曹锟则以张勋为复辟祸首不得人心为由反对之。其后张作霖又保荐自己的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同样为直系所反对，直系实则是不愿看到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就在直奉僵持之际，江苏督军李纯保荐张勋旧部、徐海镇守使张文生为皖督，直奉双方于此都可接受，而李纯则因此将徐海地盘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0年9月16日，北京政府免去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职务，任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

苏皖赣巡阅使。李纯是直系在长江流域镇守的大将，就其地位、

资历和名望而言，实不输于曹锟和吴佩孚。直皖战后论功行赏，北京政府于1920年10月2日任命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与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和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可谓平起平坐，还高于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务，而且苏、皖、赣三省的地位及其对外联络的方便，也胜过其他省份，李纯在当时政坛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十天过后，李纯突然在10月11日晚举枪自杀，留下了有待后人解读的谜团[20]。李纯死后，苏皖赣巡阅使出缺，张作霖再次保荐张勋出任此职并兼江苏督军，力图将奉系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但从张作霖屡次保荐人皆鄙之的张勋亦可见，其夹袋中实在找不出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干才。然长江流域素为直系势力范围，绝不能容忍奉系插足其间，因此曹锟推出北洋元老王士珍接任。结果，双方“相持不决”，王士珍“表示不就”，张勋则“暗中大施活动”。张的旧部为此“乞援奉天”，奉系高层甚而有“如直派必欲再争三江巡使，即惟有以武力对待”的说法[21]。不过，在直奉相争中，直系还是占了上风。12月3日，王士珍被任命为苏皖赣巡阅使，但江苏各界群起反对，希望由苏人治苏，本已淡出政坛的王士珍遂声明不就职。吴佩孚内心里也不希望再见到有人在如此重要的巡阅使职位上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便附和苏省舆论，指使名流人士张一麐出面，声言“从官制说，苏皖赣本无此官，只以李纯调和南北，政府嘉之，而畀以此种虚衔，以示荣宠。然李纯未就职而殁，此官并无再设之理”[22]。苏皖赣巡阅使职的任命从此被搁置，1921年1月，此职被裁撤。

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后，为了向长江流域伸展势力，张作霖还曾表示自己愿任江苏督军，而由张勋任奉天督军，事为直系所反对。此时正值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为谋自身利益而极力靠拢曹锟和吴佩孚，吴佩孚即保荐齐燮元为江苏督军。10月15日，北京政府任命齐燮元代理苏督，江苏仍为直系的地盘。

陕西督军。陕督陈树藩为皖系干将，直皖战后直系亟欲获得陕西

地盘，将势力伸入西北地域，而陈树藩与陕西民军的纷争，恰为直系去陈准备了口实。吴佩孚电商曹锟，请其“速与中央切实交涉，克日将陈督明令罢免”[23]。张作霖也想染指西北，“援库”问题发生后，他以“征蒙”为借口，企图进军陕西，从侧翼牵制北京政府及直系势力。面对张作霖的动向，吴佩孚又表示：“现在陕省内讧未息，故欲平蒙，必先定陕，欲定陕必先黜陈。……陕局定而平蒙计划方能继续着手，陕局未定以前，请张总司令严整所部，持镇静主义，密为防守，以待时机。”[24] 1921年5月，曹锟和张作霖在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后入京，与徐世昌继续商讨地盘分割问题。张作霖第三次保荐张勋出任热察绥巡阅使[25]，曹锟则提出以直系获得陕西地盘作为交换条件。热察绥本已划为奉系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不甘以此已经到手的利益而放弃陕西，遂又保荐奉系将领许兰洲督陕。曹锟本意是将陕西地盘交给自己的亲信、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但与奉系僵持不下。此时王占元提议由驻鄂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督陕，阎与王虽同为直系，但毕竟所处地位不同，王担心阎部驻鄂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而将阎部调走，既可使王安心，又为直系争得地盘，虽然不是曹锟心仪的方案，但在直奉相争的背景下，曹锟也乐得接受。由于有曹锟和王占元两人的力荐，张作霖终落下风，5月25日阎相文被任命为陕西督军。

陕督风波虽在直奉之间暂告段落，惟陈树藩却不甘就此交权，他一方面以拨付数年欠饷、俟陕军改编后再移交、陕军官佐不得淘汰遣散、新任不得带重兵（至多一师）为交权的条件，以为拖延之计[26]；另一方面又指使部下多次致电北京政府，声明陕军一致拥护陈树藩，对陈的免职“全体将士誓死不承认”，陕境安危悉视陈去留为转移，务请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当惟力是视，不知其他[27]。由于陈树藩不愿去职的强硬态度，直系和平获取陕西地盘的企图落空，陕督之争成为直系与皖系残余势力赤裸裸的武力较量。

为了解决陈树藩，吴佩孚组织了定陕军，自任总司令，下令阎相文的第二十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吴新田的第七师，自豫西和

鄂西北分路入陕，并得到依附直军的陕西三原民军“靖国军”胡景翼部的策应，陕西省长刘镇华“对于陕局，纯抱观望主意，看风使船”[28]。6月21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要求中央“迅速颁发讨伐令，声陈之罪，以锄悖逆，而整纲常”。曹即电致阎相文称：“定陕利在速进，敏捷解决，迟恐旁生枝节，牵动大局。”7月2日，吴佩孚发出总攻令。5日阎相文军进占临潼，陕西省长刘镇华出面调和，吴佩孚以“事已至此，迫于眉睫，尚何有磋商之余地”为由，令阎“刻速进行”[29]。陈树藩无力对抗优势直军，步步后退，7日阎部占领西安，阎相文随即通电接任陕督，冯玉祥旅则扩编为第十一师驻咸阳，冯以师长兼任陕西剿匪总司令。陈树藩部最终退至陕川边界，背靠四川，联络川军，继续抗直。

陈树藩下台，阎相文就职，直系势力终以武力方式打入西北。但蹊跷的是，8月24日，刚刚出任陕督不过一月有余的阎相文，又突然吞鸦片自戕而死[30]。冯玉祥随即署理陕西督军，成为冯系势力在西北发展壮大之始。不过，冯玉祥在陕西同样面对地方民军的挑战[31]，主客军常年混战不已。冯虽收编了“靖国军”大部（胡景翼部即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任师长），然始终不能完全平定陕西，致冯亦不安于位，颇思另谋发展地盘。冯玉祥与吴佩孚有隙，吴驻节洛阳，距陕西可谓近在咫尺，却对冯的求援请求不闻不问。“冯以陈（树藩）、于（右任）、郭（赫，民军头领郭坚之子）所部愈逼愈紧，竟誓师进攻西安”，“特向中央辞职”[32]。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率部离豫北上作战，豫督赵倜在直奉之间首鼠两端，直系需要己方人马镇守河南，吴佩孚才同意冯玉祥调河南任豫督。在外界观察，冯玉祥“不去河南洛阳镇守，直军未必能战胜奉军，就是战胜，也未必有如此之快”[33]。可是作为当事人，吴佩孚与冯玉祥心结已成，互生恶感，“吴氏嫉冯玉祥与己争名，不能指挥自如，视为傀儡，因而决心去冯，以鄂豫两省连成清一色的地盘”[34]。这又为其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倒戈反直埋下了种因。

对皖、苏、陕督的争夺，直系占了上风，而奉系则得到了热、察、绥地盘。虽然热、察、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经济不发达，但是地方实力派仍不愿轻易放手。热河都统、北洋老将姜桂题公开反对奉军入据热河，声称“热河的治安，桂题当负完全责任。……奉军第二十八师勿庸来热相助，否则主客两军，因事发生冲突，桂题不负其咎”[35]。他还下令所部备战。而张作霖据有热河的决心已定，不会退让，遂令汲金纯的第二十八师准备武力进驻，热河战事一触即发。但因姜桂题与曹锟的关系比较密切，张作霖对是否立即动武还是有些犹豫。恰在此时，河南督军赵倜不甘受吴佩孚的压迫，向张作霖求援，张遂请赵劝姜让位。姜桂题在豫置产不少，赵倜是其旧部，对姜的产业多有保护，赵出面说合，姜不能不接纳，兼以姜毕竟年近八十，来日无多，北京政府又答应补发他的军费，并给他地位尊崇的虚职，也使姜的易职颇有面子。如此这般，终使热河易督事在经历了大小军阀之间种种迂回曲折复杂的勾兑之后终有转机。9月11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21日又将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调离，任命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张作霖最终如愿获得热察地盘。

在直皖战后的地盘分割方面，张作霖“分得东三省及热察绥三特区”，“张大帅之实力、地盘，使曹、王二使望尘莫及”；但张作霖却并不满意，认为“曹锟分得直、鲁、豫、秦、陇、晋六省”，得的太多[36]。如果就省区数量而言，曹锟和张作霖所获在伯仲之间，各有优长。但如就所获省区的经济富庶度、政治重要性及其对军阀执掌中央政权的意义而言，曹锟、吴佩孚的直系确实胜过张作霖的奉系。直系所占各省区，既有比较富庶发达的沿海沿江的苏、皖，又有相邻北京的直、鲁、豫，更扩张到了西北，而奉系的势力范围，基本仍局限在东三省和偏远的热、察、绥，其伸展势力范围到长江流域的图谋，在直系的阻击下终未如愿。直奉双方在地盘上的争夺，被时人认为，“将来争端，恐先由地盘问题而起”[37]，而双方在地盘、实力上的差距，在不久以后爆发的直奉战争中也将得以表现。

三　吴佩孚的政治动向

作为后袁世凯时代鼎足并立的三大军阀派系之一，直系共奉的首领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但与段祺瑞在皖系、张作霖在奉系中的强势地位相比，冯国璋和曹锟的首领地位则比较弱势。冯国璋因其早逝而不论，曹锟作为直系公认的掌门人，在其身前身后，始终晃动着吴佩孚的影子。无论是外界的观察，还是直系内部的私语，也无论是军事作战，还是政治谋略，吴佩孚都可以说是直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正因为如此，吴佩孚的政治动向也为各方所关注。

吴佩孚的军中升迁过程较为正常，从辛亥年的团长，到1918年初的师长，大约每三年升一级，但其出身第三师，常年追随曹锟左右，可谓直系嫡系正门，在讲究出身和人脉关系的军阀派系政治中，自有其天生的好处。吴佩孚久历戎行，征战南北，对于军事作战确有其长，这也是他能够在众多北洋将领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吴佩孚真正为人所关注，还不全在军事，更在政治，在他经常发表的、有时在军阀主流中显得颇为另类的政治言论。“五四”时期吴支持学生的言论是一例，直皖战后吴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言论又是一例。

直皖战争结束后，各方解决善后问题的政治主张多以国会为中心，无非是有恢复旧国会还是召集新国会之别，本质还在于如何在维持民国“法统”的前提下解决各方的利益诉求。然吴佩孚却独辟蹊径，提出召开代表“真正民意”的国民大会，由国民代表集议解决国是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治本”之方。吴佩孚曾经说：“国家政治，既不能为中产阶级以上所操纵，而议会制度，尤不能为中等智识以上所包办。”[(38)] 因为“主权在民，载在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39)]。吴的如此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一时间还出现了国民大会运动，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军阀干政的不满，对民主建政的追求。但是，吴佩孚的主张实为另起炉灶，果能实行，则民国“法统”有断裂之虞，

对于还需要利用这个“法统”说事的当权军阀并不有利，因此也为他们所反对，“当局赞成者少，在野派赞成者多”，尤以张作霖为甚。据时人称，张作霖对国民大会“虽未明白反对，然不甚赞同”[40]。张作霖甚而还向曹锟进言，挑动曹吴关系，认为吴佩孚不过是个师长，应该谨守分寸，听命上司，政治上的事还轮不到吴随便发表意见[41]，结果使曹锟也心怀犹豫，从原先赞成吴的立场后退，表示反对吴的主张。各省督军怀疑吴佩孚是“假公济私”，正在“护法”的西南方面，对吴的主张“无不力肄诋毁”。何况，吴佩孚虽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但由谁主持召开这个关键问题，吴却从未明言，显见吴亦有其考虑，他也不会真正听由国民自决，说他以此“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也不为无因。因此，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主张，在喧嚣一时后便归于沉寂。

自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未有下文后，时隔一年，吴佩孚又在“援鄂”战争胜利后，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不过与一年前有别的是，前此的国民大会主张确有新意，而且出自吴佩孚的主动，并因此而争取到不少社会舆论的支持；而此时的国是会议主张，则是吴佩孚在“援鄂”战争获胜但却引起社会负面反响后的被动应对，是他争取人心的需要，可谓新瓶旧酒。1921年9月2日，吴佩孚授意其儿女亲家张绍曾发表署名通电，对南北政府各打五十大板，指称“北则曰统一必由我就，南则曰改造必遂我意，南责北以非法，北责南以捣乱”；继而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以“解已往之纷争，消目前之战乱，开建设之程序”。其召开国是会议主张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此会议定名为国是会议，下分为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二、国民会议由各省议会及各法团联合会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组成，制订国宪，解决时局；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海军推六人，中央各师旅推六人，议决兵额、军制、裁兵、任免法规等问题；三、国军会议议决之案，须经国民会议通过，如国民会议否决，亦得声叙理由，但否决至二次，应即修正；四、由国军会议暂推一人，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而为议案发生

效力，但不干涉会内一切事项；五、此会务于太平洋会议召开前组织，至迟在当年国庆前开会；六、两会议议决之案由国民会议宣布实行，但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七、会议以各省区过半数同意即行集会，议事以到场代表过半数同意为通过；八、上述各项俟大会过半数通过后，作为法律案实行[42]。

张绍曾通电提出召开的国是会议，较上年的国民大会方案更具操作性，尤其是国军会议的设置，为军阀通过国是会议操控政治实开方便之门。可以探知吴佩孚的本意，除了以此争取舆论支持外，也不无以此方式使直系成为各方共主的想法，与上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激进”“放炮”主张显有区别。但为争取主动，吴佩孚自己不出面，而是藏身幕后操控，通过张绍曾放出试探气球，观察各方反应。吴佩孚曾经对人表白自己提议召开国是会议的用意：“我虽然德薄能鲜，但爱国之心决不后人，这是可质天日的。偏有许多人把我简单看成是赳赳武夫，骂我做武力统一中国的梦。孙中山整天高唱北伐，难道不算想武力统一中国吗？不过人家政治上总有主张罢了。……我在政治上是有抱负的。推翻安福系之后，我就主张开国民大会来解决南北争端，统筹国是，虽然没有成功，我总认为国家大事尤其是南北争端，应由全国各实力派以及民意机关代表由政治途径和平商讨解决。尤其是我们正在对湘、川作战，更应在政治上有所主张，以免又被人误解为武力统一。能成功，固然国家之幸；不成功，也可表白我心。”[43]

国是会议的主张提出后，因其牵涉各方政治，北京政府在军阀首领未有明确态度前，反映比较慎重，认为“如南北各方面，果均信任此会议，则中央决不阻止。否则，政府当筹相当之解决办法”[44]。大总统徐世昌电告吴佩孚“慎重进行”，“勿为政客所操纵”[45]。国务总理靳云鹏曾是吴佩孚的师长，告吴“深恐南北问题未能解决，反引起种种争端，使时局益见纠纷”[46]。各地实力派担忧国是会议凌驾于其权力之上，多持消极和反对态度。浙督卢永祥不为苏督齐燮元的

游说所动，认为国是会议“言见于此，而意生于彼，恐所期之目的未达，而反攻者已乘于后”；“由各派之觉醒而集议折中则可，由片面之主持而号召附和则不可”[47]。张作霖更以教训的口气说：“和平统一问题，曩日既经中央命令发表，今更以庐山会议解决时局，未免有重复之嫌，勿为奸人利用。”[48] 南方“护法”阵营认此为北方军阀所操纵，纷纷表示反对。孙中山表示：“此会议由武人组织，决难得真正民意。”[49] 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当权派，对国是会议“一致否认”，认为“此举不过是直系军阀与研究系政客垄断政权之手段耳”[50]。旧国会议员八十四人联名通电反对，称国是会议是“依附军阀，强奸民意，妄称会议，以欺全国，实谋割据，以扩地盘”[51]。各方舆论对国是会议的反应亦不佳，多将此视为军阀和政客“包办性质”。时人曾揭露吴佩孚主张召开此会的目的是：“想把偌大的中国，归姓吴的摆布……听说陈树藩和奉系要好，他就夺了陕西。看这王占元和奉系接近，他就半迎半拒的引起援鄂战争，乘势夺了湖北。不到几个月，连得了两省地盘，巧夺了两个督军。正在计划中的陕甘新巡阅使尚未到手，却得两湖巡阅使。……不料湘鄂自治军还未平定，民意却大大的不以他为然。接着南政府讨他，北政府又疑他，川军（熊派）要打他，鄂军要叛他（为王占元不平）。他在四面楚歌中，又要拿奉军的小心。万般无奈，发起个什么‘庐山会议’。……又出这个难题，给奉系去作。奉系要赞成，他的势力更大。……要反对，他便将反对民意的罪名，加在奉系头上。”[52] 语虽不无尖酸刻薄之处，确也反映出部分的实情。由吴佩孚主张在国是会议中加入国军会议，“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亦可探知吴的真实心态，实有以军事实力而挟持会议为直系当政谋求合法性资源之意。

由于社会各界对国是会议的反应并不积极，吴佩孚一面授意张绍曾致电府院解释召开此会的用意所在，“外传另有作用，确为各方之误会。且该会成立后，由各省公民主持，绍曾等决不干预，故特再电释疑，免由误会，再生枝节”[53]；一面又运动各地直系军政长官“一律提倡、赞成，通电表示态度”。于是，陈光远、齐燮元、孙传芳、

杜锡珪等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支持[54]。吴佩孚还致电曹锟与张作霖，请他们支持此举。曹、张实际都不以召开此会为然，但为了敷衍吴氏起见，发表通电称："倾见树威将军张绍曾冬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于庐山，制国宪以定国是。其所列举者，对于立法主体，固无背约法之精神。"[55]时值北京内阁改组之议又起，吴佩孚还曾提出以召开国是会议为新阁成立的交换条件。然以军阀纷争年代的政治实情，在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尚未完全控制中央权力，不能强力主导政治的情形下，此等由各方召开政治性会议的主张无法付诸实施，也就渐渐消失于无形。

吴佩孚的政治另类主张，与其个人出身、经历与交往不无关系。吴佩孚虽然出身军伍，但他早年还中过秀才，笃信孔孟之道，又以"学贯中西"相标榜，"好谈时务，而立治之根本，不外大同思想"[56]。他还不时表现出对文化的偏好和对文人的尊重。与其他动辄以武力为恃的军阀相比，吴在这方面的表现倒也颇显另类。吴佩孚在驻节洛阳时，对政务处长白坚武是"言听计从"，而共产党人李大钊是白坚武在天津法政学堂的同窗，私人关系尚好，互相之间函电往还不少，也有过直接交往。白坚武在思想上多少受到一些李大钊的影响，故李大钊的想法和主张可能也或多或少通过白坚武的途径能够传到吴的耳中，加上此时报刊上传播的各种东西方思潮，介绍的苏俄革命情况，可能对吴佩孚这一时期的思想也不无影响。吴佩孚的一些言论，不仅在旧军阀眼中，即便是在不少社会人士心目中，都显得颇为"激进"。比如吴佩孚主张尊重民意，认为"有违背我中国四万万人民心力趋向的，按已经的历史看，是终久归于失败的"[57]。他也曾主张保护工人运动，甚而"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悟，不可因彼等无学识、无思想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有爱国思想，则庶几矣"[58]。吴佩孚的独特个性和言论，一时使他颇著声名，也正因为他的此等表现，使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度联吴的行动。然据旁观者的观察，"直派声势似日增月盛，然满损谦益，不知诸公有无戒心也。吴号称得人望，然当此时局，不知其能

不贪权势、善全令名否也”？援鄂战争之际，吴佩孚刚刚得到湖北地盘，即“欲强银行借款，横暴情形又见。外人及新学小生不察其底里者多誉之。一得权势反便作威福，马脚已全露矣”[59]。因为吴佩孚终究出身军阀，又是军阀首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拘束。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激进”主张，一旦回归现实，他还是不能将其“另类”进行到底。不仅国民大会和国是会议的主张如此，其他诸如“保护劳工”等更是如此，二年后的“二七”惨案便充分说明吴佩孚的“另类”和“激进”所可能达到的限度。吴的近身谋臣白坚武有言：“时人泰欲以吴当政治之冲，冀达所谓澄清之望。实则吴固非其人，即令负其才、展其志，主帅之不能容，侪列之忌视，敢断其溃裂之结局尤速也。”[60] 以白对吴关系之密、了解之深，此诚可谓持平之论。

第二节　南方的粤桂战争与孙中山回粤

一　第一次粤桂战争与桂系退出广东

1918年5月广州军政府从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制后，在七位政务总裁中，孙中山和唐绍仪居留上海，唐继尧在昆明，留在广州的四总裁，伍廷芳和林葆怿较少参与政务，所谓政务会议实际难以举行，军政府的日常事务由主席总裁岑春煊打理，桂系首领陆荣廷则处在幕后，成为军政府实际的太上皇。参加军政府的各派各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只是因为联合应对北洋系的需要，才维持着形式的统一。

桂系以客卿身份得“护法”之便而在袁世凯败亡后占据着广东。广西贫瘠，广东富庶，桂系在广东享受了种种好处，乐不思归，且态度居高临下，不知持重，提出“以粤养桂”，以征服者自居，各级官僚多用桂人，为政苛刻，滥征税收，重重盘剥，与民争利，“虽前清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骚扰地方，军纪废弛，倡赌倡烟，流毒甚烈，“鸦片烟勒种遍地，乡人求免，反遭其祸”[61]；从而激起广东绅

商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桂系因而与广东地方势力积累下重重矛盾，也在广东民间引发了“仇桂”心理。驱逐桂系、“粤人治粤”的呼声渐起，给其时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创造了重返广东另开新篇的可能。

孙中山既是革命理论家，更是革命践行者，对于被迫离开广东，而由桂系把持军政府，他自然不甘听任。在双方表面维持、相安无事之余，孙中山实际正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并决意与桂系决裂，再开新局。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电护法国会，认为不法武人“借国会所授之权，以行国民所深恶之政治，移对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残虐尽力救国护法之人，毒害地方，结连叛逆，欺骗国会，蔑视人权”；声明“决不忍以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兹特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以后关于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虽然军政府政务会议立即致电挽留，但孙表示“文志已决，义不再留”。29日，孙中山又致函护法国会两院议长林森和吴景濂，表示“鉴于两年来经过之事实及南中不法武人最近阴谋之真相，觉护法之希望，根本已绝，万无再与周旋之余地”，希望“先将军政府取消，使不致为群盗所居奇”[(62)]。留在广州的护法国会议员多为国民党出身，他们虽然派系林立，与孙中山的关系有亲有疏，但在反对桂系控制军政府、为国民党谋取发展地盘方面则是基本一致的。在孙中山的号令下，国民党议员在护法国会提出对岑春煊的不信任案，迫其于10月27日提出辞职。此举最后虽未成事实，但国民党议员主导的护法国会实际已与军政府处在对立状态，从而动摇了军政府继续维持的基础。

继护法国会向军政府发难，桂、滇两系又因驻粤滇军统率权问题而生龃龉。驻粤滇军有二个师，其统领李根源因为与政学系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亲近军政府（政学系是军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者），岂料桂系仍不放心，还想进一步掌控滇军。1920年2月，广东督军莫荣新委任与唐继尧无甚关系的杨晋出任滇军师长，使唐颇为恼怒。军队本是军阀的命根子，桂系此举触动唐继尧的敏感神经，使他对桂系生发恶感，立即改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李烈钧统领驻粤滇军，确保其控制

权，并对军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使军政府权威大受影响。国民党方面随之借机与唐继尧商议将护法国会和军政府从桂系控制的广东迁至昆明另起炉灶的可能性，桂系此举实在是表现轻率而得不偿失。

1920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兼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不辞而别，离穗去港转沪，还随身带走了数额不菲的关余款项。伍廷芳此举不仅影响到军政府的声望，更使军政府因缺钱而难以运转。4月11日，军政府政务总裁林葆怿辞职。4月25日，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正式宣布脱离军政府，军政府总裁去其大半，已不足决策的法定人数。与此同时，国民党组织护法国会议员离粤赴港转沪，众议院正、副议长林森和褚辅成、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与三百多国会议员先后离去（他们之中的大半都到了上海，并在5月间决议护法国会迁往昆明），护法国会议员亦去其大半，“护法”的法理依据成了问题。伍廷芳、唐继尧、林森、吴景濂相继发表通电，以军政府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而否认其法定效力，提出其“所有一切政治行动，当然无效”[(63)]。为了应付此等不利局势，军政府匆匆召集留粤议员集议，推举孙光廷为参院主席，陈鸿钧为众院主席，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使军政府的运作在名义上具有法理有效性。但参加选举的国会议员人数本就不足法定，而被推举的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实际又未就职，广州军政府还是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桂系渐趋不利，居留上海的孙中山频频动作，一方面在政治上否认广东军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布置军事讨桂行动，企望由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打击桂系，为回粤再度开府创造条件。6月2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及唐继尧的代表李烈钧在沪会议。次日发表宣言，责广州“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论战则惟知拥兵通敌，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擅逞其欲，遂有所谓五条办法者。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宣示“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声明军政府移昆明办公，广州方面的“一切命令行动，及与北方私行接

洽之事，并抵押借款，概属无效。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在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64]。7月24日，孙、唐、伍、李在上海再次会议，并在28日发表宣言，表示“倘有违背护法救国主张，复假借名义，以谋个人权利者，不问南北，不问派别，当与国民共讨之”[65]。随后，部分到昆明的护法国会议员在8月7日集会，罢免了岑春煊的职务。护法阵营内部已然决裂，但昆明的对外交通不便，唐继尧实际上也不愿军政府和国会迁到昆明，在自己的地盘上养着太上皇，致其统治碍手碍脚[66]，孙中山继续革命的立足点仍然只能放在广东，而要重回广东，就要解决桂系的问题，为此，孙中山着手发动武力讨桂的行动。

孙中山作为“讨桂”主力运用的军事力量，是其时驻扎在闽南漳州、龙岩一带的粤军陈炯明部。陈部原为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警卫军，约有二万余人，1918年春以援闽粤军的名义进驻闽南，其后陈驻节漳州，经过两年多的整训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依靠的惟一嫡系武装力量。为此，孙中山将邓铿、许崇智等派到这支部队任职，并多方为其筹饷筹械，力图直接掌握这支部队并寄予厚望。但因陈炯明为驻闽粤军的直接领导人，部队各级军官多为其指派，故陈炯明对部队的影响力超过孙中山，部队实权基本控制在陈炯明手中，因此，与其说驻闽粤军是国民党的部队，不如说是陈炯明的部队。对于这支部队的使用，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想法实际是不同的，孙中山希望陈回师广东，驱逐桂系，重新建立国民党的根据地，但陈炯明却不愿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行动，以免有损自己的实力，妨碍自身今后的地位和发展。所以在直皖战前，当孙中山认为“讨桂”时机已经成熟，数次动员陈炯明率部回粤“讨桂”时，陈炯明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一再推脱，迟迟其行。

直皖战争的爆发为陈炯明部回粤“讨桂”创造了时机。直皖战前，北方的直系和南方的桂系虽分处“正统”和“护法”的不同阵营，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直桂双方实际达成了默契，彼此暗中互相支持。桂

系知其在粤不得人心，为维持其在粤统治，有意寻求与直系合作，共同对付国民党。桂系首领陆荣廷认为："直系如得胜利，时局庶有转机，我辈夙主联直，尤应乘时利用，援应直系，自属应有之义。"[67]北方的直皖战争打响后，桂系大将、粤督莫荣新随即部署在广东的桂军移师潮汕，出兵闽南，名为"讨伐"属于皖系的闽督李厚基，实则意在消灭对桂系控制广东构成威胁的陈炯明部。1920年8月，在桂系的督促下，岑春煊代表军政府下令分路攻闽，以桂军沈鸿英为总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林葆怿率海军配合作战，力图一举荡平闽南。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遂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到漳州，向陈炯明反复说明形势，陈明利害，并联合闽督李厚基（孙此时已有建立粤皖奉反直同盟的考虑），由其向陈部拨发相当数量的军费和军械，促其回师广东。而陈炯明此时亦感觉其部长期驻在闽南，四面被围，发展空间有限，不易得到外援，既为李厚基所疑，亦为桂系所忌，不如回到广东，另谋发展，故同意孙中山的回师计划。他派叶举、邓铿、许崇智分任中、左、右路总指挥，自闽南发兵回师广东。8月12日，陈炯明发出粤军誓师回粤通电称："全军同仁，忍无可忍，乃不得已全体宣誓，冒死杀敌，救我粤人，粉身碎骨，实有荣光。"[68]

因为桂系在广东数年的统治不得人心，陈炯明部回粤得到广东各地民军的呼应和支持，且陈炯明以"粤人治粤"收揽人心，进展比较顺利。8月中旬粤军回师，18日占潮安，20日占汕头，粤军在潮汕地区立下了稳定的根基。9月初，唐继尧和谭延闿分别派出滇军和湘军自西、北方向增援粤军，与东面的粤军共同构成了对广州的三面包围态势。唐继尧且致电陆荣廷，态度强硬地令其速撤驻粤桂军，"还政粤人"。

9月上旬，粤桂两军先是在河源激战，随后在惠州形成胶着。此时各路民军纷起，形势对桂系不利。9月16日，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在朱执信的策动下宣布独立[69]。18日，陈炯明对莫荣新发出最后通

牒，令桂军在两个月内退出粤境，桂系军政官员一律免职，并限岑春煊在双十节前离开广州[70]。民军首领李福林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广东警察厅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合作，在广州河南宣布独立，广州桂军已处在四面楚歌之境。在粤军的军事压力下，陆荣廷先还企图“弃惠州各县，麇集省城，稍养锐气，分守兵工厂，俟我桂军到齐肇庆，以全力分路进攻”[71]。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容陆荣廷的拖延之策，9月28日，陆荣廷被迫致电广东方面，表示“为保全地方计，即请粤省诸公公同筹议，妥速选举贤能，继任督军，以维治安，而息纷扰。除陈炯明倡乱逞私，不能交付，此外无论何人出担粤事，桂军在粤一日，无不尽力维持。……一俟粤局底定，桂军即当全数调回，以符不争利权之初心，而顾全唇齿之本旨”[72]。

为了避免粤、桂两军交战殃及广州市面安定，广东地方士绅出面调停。9月29日，广东省议会议长林正煊面见莫荣新，讨论善后办法。莫虽然知晓桂系已难在广州立足，但仍反对陈炯明接任粤督。林正煊遂与李福林、魏邦平等推举海军次长、广东人汤廷光接任粤督。但莫荣新又节外生枝，索要200万元的巨额开拔费，表示非如此桂军不能撤离。10月初，广东各界维持和平会决定筹款50万元付与桂军，俾其早日撤离。此时粤桂两军在东江前线对峙，莫荣新认为战局有望维持，故又出尔反尔，不愿交权，声明“凡驻粤各军安顿结束事宜，一日未能妥洽，本督军照常维持，断不敢稍弃权责”[73]。又提出以沈鸿英督粤，桂军留两师长期驻粤，陈炯明部退回闽南，广东承认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的方案。桂系此举无异于继续维持其对广东的控制，引来粤军上下的一致反对及同仇敌忾，双方战火重开，21日粤军攻占惠州，兵临广州城下，桂系方觉大势已去，不能不准备退出。24日，陆荣廷、岑春煊、林葆怿、温宗尧等以护法军政府总裁名义联名发表通电称：“即日自决辞去总裁，解除军府职务，以期回复国家原状，而减愆由于万一。自今以后，当局应从全国军民愿望，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轨，与民更始。西南诸省亦应顾念全局，迅速促成统一，妥筹善后，苏息民生。”[74] 莫荣新则于26日“率同将士宣布取消

自主，粤事应听中央政府主持。……一面派出代表切实磋商，一面迭电前方各军相机撤回，赶办收束。兹为保全粤民，减免战祸起见，于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所有维持地方治安事宜，应由粤民所举之新督军负此责任”[75]。随后，莫荣新入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暂避，马济、林虎收容桂军残部撤离广东。

10月28日，粤军进驻广州，结束了桂系对广东四年多的统治，但陈炯明并不承认先前广东各界推出的汤廷光为督军，孙中山为得到陈炯明对其回粤开府的支持，于11月1日通过广州军政府驻沪办事处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持广东军政事务，陈炯明从此成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二　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

桂系失去对广东的控制后，为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宣布撤销护法军政府并广东取消自主，又在11月4日由桂督谭浩明宣布广西取消自主，从而在北洋系中引起了对“统一”的鼓噪。10月31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和平统一”令，称“南北纠纷，累年未戢，民生久颓，国计日殚，国人延颈跂踵，惟日盼统一之日”，令各军民长官“务期导扬文治，康济民生，以巩固我中华民国维新之运”[76]。国务总理靳云鹏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讨论“统一”问题。11月7日，徐世昌主持召开“统一善后事宜”筹备会议，决定在北京国务院设立筹办“统一善后会议”事务处，14日由靳云鹏主持召开了“统一善后委员会”的首次正式会议。不过，北洋系的举动在南方护法各省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显得是自说自话。10月31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通电称：“最近粤军回粤，岑、莫败亡，乃相率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其情可悯，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为口实，据闻有伪统一之宣布，似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直无否认之价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实思以伪统一之名义，希图借取外债，以延长其非法政府之命脉。文等用不惮烦，更为正式宣告，须知岑春煊早丧失

地位、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个人反复致生问题。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绝不承认。”[77] 在桂系从广东败退之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因应政治现实，延续护法“法统”，从而与北洋军阀操控下的中央“法统”相抗衡。

为了在广东恢复政权，孙中山需要得到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而在当时南北对立的情况下，为了联合对北，只要不实际干预地方内部事务，西南各省对恢复广东政权也乐观其成，惟有广东的实际当家人陈炯明并不积极，因为广东政权恢复后，具有“中央”的名分，而且又驻留广州，陈炯明实在是不愿意有这个“中央”架在他头上，对其发号施令，妨碍其独断专行，所以他迟迟没有表态，反而电劝孙中山等可以就近在上海处理有关政务。不过，当时国民党内外都有孙中山回粤开府的强烈呼声，陈炯明刚刚回粤，立足未稳，孙中山考虑到陈的情绪，又赋陈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管理广东军务，全省所属陆海各军，均归节制调遣”的重任[78]。陈炯明不便即时发作，勉强同意了孙中山回粤开府的计划。

11月25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在许崇智到沪敦请后乘轮离沪，28日到达广州，在当晚广东省署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称：“吾国必须统一，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长久；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和平统一之基础”[79]。

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军政府，通告称“在广州重开政务会议，继续执行职务”[80]。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军政府重建宣言，称“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进国家于富强，谋社会之康乐”[81]。12月7日，军政府各部组成，孙中山兼内务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未到任前由王伯群署理），陈炯明兼陆军

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暂由次长蒋尊簋代理），徐谦为司法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

此次孙中山回粤重新开府，因为没有了桂系的掣肘，颇思有所作为。他自兼军政府内务总长，以其先前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为蓝本，希望从地方自治入手，推行民主政治实验。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清户口。以现居地为准，一律造册列入自治团体，悉尽义务，同享权利；二、立机关。组织自治机关，使成年人都有选举、创制、复决、罢免权；三、定地价。先定地价，后从事公共经营，庶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四、修道路。凡道路所经之地，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一通，则全境必立改旧观；五、垦荒地。凡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六、设学校。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以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推广，及于他事。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如是，由一县而推之各县，以至一省一国，而民国之基于是乎立”。此次他在广州重新开府，在内政部设立了地方自治、社会事业、劳动、土地、教育、农务、矿务、工业、渔业、商务、粮食、文官考试局和行政讲习、积弊调查所，希望对内政有所革新[(82)]。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孙中山的举措多半只能流于形式，而且在其施政过程中仍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令他颇为不满的是列强对“关余”问题的处理。

所谓“关余”，是指海关收入在支付各项债务还款及必须开支之后的余额。本来，1919年北京公使团已同意将关余总数的13.7％拨交广州军政府使用，但1920年4月因军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出走，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以伍“擅离职守”为由免其职，并请北京政府转告公使团，以后的关余交由岑主持的军政府领取。此后，原本交付广州军

政府的关余被冻结。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后，财政极为困难，伍廷芳向广东领事团和总税务司多次交涉，要求拨付被冻结的二百余万两关余，但北京公使团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孙中山难以代表西南为借口，不同意拨付，使孙中山深受刺激。1921年1月21日，孙中山下令强行接收粤海关管理权，要求“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之海关，须从二月一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83)]。但列强不仅不接受孙中山的通令，而且派出军舰到白鹅潭示威，使孙中山极为愤慨，也使他觉得只有建立正式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与列强打交道，盖因“时北方徐世昌事事以总统名义行使职权及向外借款，益使南方有成立正式政府之必要”[(84)]。

1921年元旦，广州军政府举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周年纪念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但建议设立正式政府之权，全在国会。国会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而在广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国会诸君建议，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中华民国前途其庶几乎！余认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85)]

对于孙中山的提议，云集广州的各方政治势力有不同的考量。国会议员中有主张选孙中山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者；有主张以委员制建立西南联省政府者，不过主张选孙中山为总统的意见占了上风，其理由仍在于总统代表全国，可获得国际地位与承认，也符合国民心理，否则听由徐世昌“窃据”总统之位，将混淆国内外视听。不过，国会议员的意见对政治运作并不具有根本影响，而实力派的意见则更为孙中山所看重。

在军政府所辖范围内，失掉了广东的桂系仍然控制着广西，四川内部纷争不已，湖南主张“联省自治”，云、贵地处偏僻且对听命于广东不以为然。因此，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的立足点仍在广东，而掌握着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对此不仅不热心而且反对甚力。陈炯明在两院议员招待会上公开声言反对选举总统，理由是在粤议员距开常会法定人数相距甚远，更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即令选出总统，仍不得谓之合法政府。如不首先巩固广东自治，再图团结西南，恐难共同对抗直系的武力统一。故当今急务，在保境安民，与邻省联防互保，以免兵祸，不至进退失据[86]。其实，对陈炯明而言，“法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在自己头上再架上位管着自己的“总统”。陈炯明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实力，嗾使手下军官对选举总统表示异议，提出一旦因选举总统而使广东成为北方的进攻目标，则军事方面能否支持战争实为疑问，以此要挟孙中山让步。孙中山受制于陈，但因陈握有兵权，对他亦无可奈何。据孙中山言：“陈炯明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凡此所言，陈炯明虽无以难，而终未肯信。”[87]实际上，陈炯明之所以不愿孙中山出任正式总统，是担心妨碍他在广东的统治，因“陈握广东最高政权，可进可退，于愿已足，匪特不须乎非常总统，即恢复军府，亦属多事，因军府之设，直接则损害其政权，间接则阻碍其南北之地步”[88]。因为陈炯明掌握着广东的实权，孙中山如果在广东建立正式政府，得到陈的支持至少是默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陈炯明的反对，孙中山不断向其说服与疏通，并得到了粤军中以许崇智为代表的部分将领的支持。由于陈炯明此时还需要利用孙中山的支持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因此最终同意了孙建立正式政府的主张[89]。

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的护法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因

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遂改开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一、大总统依本大纲之规定行使其职权；二、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三、大总统总揽政务，公布命令，统率陆海军；四、大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五、政府设置各部，掌理部务，部长由大总统任免之；六、本大纲自宣布之日实行；七、本大纲自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即废止[(90)]。当日，非常国会以218票（出席议员二百二十余人）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因其为非常国会所选出，故一般称其为“非常大总统”）。

对于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北京政府及北洋系自然表示反对。4月27日，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发表通电，称孙中山“是少数私党私认之总统，非全数公民公认之总统”；“彼既自绝于国人，当与国人共弃之”[(91)]。在南方阵营内部，陈炯明提出孙中山可暂不就职，或就职后先赴欧美考察，以避免南北矛盾的激化。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4月9日致电广州非常国会，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之总统，并在10日致电孙中山，“劝其严词拒绝，勿允轻就”。甚而在表面上对孙中山当选表示支持的唐绍仪和唐继尧，也在私下里对选举持反对态度[(92)]。

因为需要疏通己方阵营内部的反对意见，孙中山当选后并未立即就职，直到当选后近一个月，孙中山才于5月5日在广州举行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于4日发表通电，取消军政府，“所有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即应解除”）。他在就职宣言中阐述其“拨乱返治”的主张，号召“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主张“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至其内外政策方针为，“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外“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93)]。7日，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

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徐绍桢为参军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政府构架的搭建宣告完成。

出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力图在各方面有所作为，诸如刷新政治、发扬民主、厉行节约、致力建设、倡廉反腐、保护华侨等等，希望以此体现新政权的新气象。不过，虽然孙中山有了大总统和正式政府之名，但其政治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政府的政令仍只能通行于广东，并由于陈炯明的牵制而难能实行。与那些显得琐碎而不易为、短时间又难收明显成效的举措相比，孙中山上任后的施政方针着重于对外，即通过征讨桂系，平定广西，向外扩张，既可扩大广州政府的基础与影响，打开局面，凝聚人心，团结各方，为实行北伐、统一全国的宏大目标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又可缓解广东内部的矛盾，并以此培养自己信任的军事力量和将领。在这样的思路下，解决退出广东后继续盘踞广西，但却实力下降、内部不稳的桂系军阀，就成了孙中山下一步行动的最佳目标，而桂系在退回广西后，仍然威胁着广东的安全与稳定，并有与北洋军阀联手对抗西南阵营之势，征讨桂系较易凝聚己方阵营内部的共识，得到实力派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将讨桂作为其上任后的首要目标并非偶然。

三　第二次粤桂战争与广西平定

桂系军阀兵败退出广东回到广西后，并不甘于就此蛰伏广西，对他们而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供养自己属下的部队。与富庶的广东相比，广西是贫瘠之地，每年的岁入不过二百余万元，军费支出却占到收入的近半，这还不包括在广东的部队。当广东的桂军退回广西后，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广西每年的岁入总额，向外扩张实为桂系军阀不得不为之举。何况当经历了广东相对富裕的生活之后，桂军上下对被迫退回广西亦多抱怨连连。所以，桂系在退回广西后无日不在谋划重回广东，并为此而力图得到北洋系的支持。

对于南方阵营内部的分化以及桂系的动向，北洋系自然是乐观其

成。从大总统徐世昌到国务总理靳云鹏再到他们背后的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等，都对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与北方抗衡非常不满，力图打消，而桂系为自身利益而通款北方，当然为他们所喜，正可借此支持桂系反攻广东，推倒孙中山政府，实现南北“统一”。1920年10月30日，北京政府致电曹锟、张作霖及各省督军，表示“西林（岑春煊）引退，军府收束，并经分电西南各省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别接管，是军府已将西南统治之权归还中央，统一时机完全成熟，亟应及时妥筹办理，以资收束”[94]。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督办，1921年1月9日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5月任命陈炳焜为梧州护军使，摆出了支持桂系与孙中山对抗的姿态。此后，桂系与北洋系信使往还，联络密切，北洋系允诺给桂系以实际的财政和军械支持，从而也对刚刚在广东重新开府的孙中山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促使孙中山下决心对广西采取军事行动。

1921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讨桂而后北伐，掌握对北洋系斗争的主动权。北京政府则企图利用粤桂矛盾，挑动桂系攻粤，坐收“统一”之利。桂系在败退广西后颇思回粤，又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自然对攻粤颇为积极。6月13日，陆荣廷下达攻粤令，以林虎、沈鸿英、马济、陈炳焜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司令，由广西出动，分路进攻广东南路、北江、钦廉、肇庆，总兵力有六七万之众。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西南阵营各省为自身利益计，对讨桂态度趋向一致，孙中山得以大总统名义号令各军，展开讨桂战争。他以陈炯明为讨桂军总司令，率许崇智第一路、魏邦平第二路、叶举第三路会攻梧州；翁式亮第四路、黄志恒第五路、何国亮第六路出击钦廉；李烈钧率滇、赣军自湖南攻桂林，谷正伦率黔军自贵州攻柳州，形成合击桂军的态势[95]。与孙中山有隙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对此次出师亦态度积极，发表通电称：“桂贼无状，先开兵衅”，“炯明将率三军，保障乡土。……歼除桂贼，以拯救粤人。”[96]

6月20日，粤桂两军在桂东南的粤桂门户——梧州一线展开战

斗，粤军士气高涨，连获胜利，对梧州形成包围之势，除了海军之外，粤军还出动了当时少见的空军助战。梧州防卫司令卓伟民、桂军游击司令刘震寰战前即与广东方面有所接洽，此时决定倒戈。25日，陈炳焜见事无可为，放弃梧州，次日粤军进占梧州，打开了入桂的东南大门。与此同时，李烈钧指挥滇军与赣军自湖南出兵桂北，于7月13日占领桂林，打开了入桂的东北大门。驻贺县的桂军沈鸿英亦发表通电称："自治为近日潮流所趋，联省即将来统一之计"，"鸿英勉循军民之请，即于7月10日就救桂军总司令之职，脱离陆氏命令，与粤军一致行动，并从省议会诸君之后，厉行自治，而与西南各省联合一气，共奠国基。"[97]

桂系自广东退回广西后，陆荣廷的威望受到严重影响，首领地位已经动摇，上下失和，将相猜疑，内部矛盾渐起，影响到桂系内部的军心和团结。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不仅不能有效地整合内部关系，反而轻率决定发动对粤战争，而实际上桂军的作战意愿并不强，统兵将领为保存实力亦不愿力战，当战事初步失利后，桂军不能坚持，显出分崩离析之势，粤军则乘胜而击，扩大战果，各地民军纷起响应，使战争很快呈现出一边倒的势头。桂军先后失守梧州、桂林后，各部纷纷自谋出路，脱离桂系，粤军兵锋直指南宁。陆荣廷于无可奈何之下，7月22日与谭浩明发表通电，称"因年老病衰，久思息影，……倾接总司令沈鸿英等通电，主张自治，荣廷夙持爱民主义，乐于赞同，当即电饬该总司令等维持本省治安，勉负完全责任"；自身"解除兵柄，引退林泉，一切军民各政，概不与闻"[98]。此后，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及追随他们的桂军残部退居桂南龙州。23日，粤军不战而入南宁。9月下旬，粤军各部进逼龙州，桂军无力抵抗，30日粤军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逃往越南[99]。

孙中山发动的讨桂战争（第二次粤桂战争）为时三个月，虽然粤军兵力并不较桂系为优，但却进展顺利，平定了广西，实现了两广统一，扩大了广州政府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并使孙中山得以集中力量

筹划北伐统一事业，但讨桂战争也使陈炯明的实力大为增长，对孙中山的离心倾向日渐发展。8月8日，陈炯明进入南宁后，即利用他“全权办理桂省军事善后事宜”的有利地位，成立广西全省善后督办处，除了在广西的粤、滇、黔、赣诸军均归陈节制外，他还收容散落桂军，扩大自身实力，军事力量渐趋其顶峰时期。陈炯明还在南宁召集广西省议会和各县代表会议，讨论“广西和平秩序及改造方法”，并在8月18日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支持他“先定省宪，以树民治之期，进制国宪，以图统一之效”；“拟请各省区代表集沪开议，协立大法，付诸国民公意”的主张，请卢“领衔通电全国，定期在沪开会。届期当派代表出席，敬随诸公之后”[(100)]。陈炯明的如此主张与孙中山企望通过北伐实现统一全国的宏图显有距离，孙中山仍然面临着整合己方阵营内部关系的艰巨任务。

第三节　牵动南北的援鄂战争

一　“鄂人治鄂”与援鄂战争的发端

1921年下半年在湖北境内爆发的援鄂战争，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规模较大的地方战争之一。卷入战争的除了湖北地方势力及临近省份湖南和四川的武装力量之外，直系吴佩孚的介入，更使战争的范围扩大化，时间延长化，成为牵动南北各方政治力量敏感神经的重要事件之一，并影响到其后南北政治格局的发展。“从整体看，援鄂战争的政治形态表现为，以吴佩孚为代表的主张‘武力统一’的北洋中央军阀为一方，以赵恒惕、刘湘为代表的主张‘联省自治’的西南军阀为另一方，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一次军事上的较量”[(101)]。

援鄂战争的发端，主因在于湖北内部外来军队与本地绅商关系的恶化与矛盾的发展。出身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自1915年12月上任，督鄂有年，基础雄厚，又因在直皖战争期间的“表现”而升任两湖巡阅使，成为与曹锟、张作霖鼎足而立的北洋军系“三巨头”之一。王

占元在任期间，为政贪渎，重用同乡，压制党人，与商争利，搜刮谋财，敛财数千万，甚而利用兵变向商民勒索。如时人论，“综揽军民全权，苛政繁兴，秽恶山积。除吞蚀军饷，及北洋督军唯一财源之‘截旷’尽入私囊不计外，如法外剥削，非法侵占，以及伪造湖北官钱局钱票数千万，皆为社会共见共闻之事实”[102]。王之所为引起湖北绅商及鄂人的强烈不满。在当时各省涌动的“地方自治”浪潮的背景下，被不少鄂人认为是“亡省”，提出“鄂人治鄂”的主张。1920年8月，大总统徐世昌在直皖战争结束后下令免除安福系湖北省长何佩瑢的职务，任命王占元推荐的儿女亲家、山东人孙振家署理湖北省长。湖北绅商为抗拒此项任命，发起“拒孙”运动，“誓非请政府收回成命不可”，“力持鄂人治鄂主义”[103]。在湖北绅商的抵制和舆论的压力下，徐世昌在9月又改任湖北人夏寿康为省长，暂时缓解了矛盾[104]。不过，湖北绅商并未就此罢休，随着他们与王占元矛盾的发展，他们逐渐酝酿发动“驱王”运动，力图推倒王占元的统治，实行“鄂人治鄂”。1921年年中，湖北的“驱王”运动渐趋高潮。以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会为中心，多次集会，发动请愿，要求罢免王占元的职务，查封其财产，实行“鄂人治鄂”，疾呼“政府如果还不痛快答应，我湖北人死里求生，终究要想几个自治的方法，伸我民气，戮彼凶人”[105]。与此同时，在湖北的国民党人亦开始运动民众，组织民军，将“驱王”从舆论层面推向实际层面。

湖北“驱王”运动兴起后，虽有民间和舆论的强烈支持，但是，督军拥有武装，仅凭民意实难撼动其地位，何况撤换一省督军涉及错综复杂的军阀派系地盘之争，北京政府也不敢轻易做主。所以，尽管王占元在湖北非常不得人心，而当湖北绅商提出“驱王”的要求后，北京政府的对策只能是拖延，大总统徐世昌以“责任内阁制”为由将其推给国务总理靳云鹏，而靳云鹏则对湖北请愿代表称：“就法律论，王占元应当罢免；就事实论，尚未到罢免时机。”[106] 从而又将此事搁置起来。“鄂人以全力逐王，而政府反以全力保王”，和平请愿活动没有结果，使湖北绅商颇为失望。不过，“驱王”运动得到湖北省内社会各

界普遍支持，他们在无法依靠北京政府撤换王占元，自身又无实力驱逐王占元的情况下，开始图谋借助邻省力量，实现武力“驱王”。他们首先向毗邻湖北的湖南求援，反复说明湘鄂一家，湖北为湖南之门户，湖南主张自治最力，而自治断非一省所能成功，只有联省自治，自治之基方可牢固，因而鄂人不能不求助湘人，而湘人不可不援助鄂人[107]。游说湘督赵恒惕，称湘军出省援鄂，急人之难，一举占领武汉，四方风起云从，联省自治可望成功；汉阳兵工厂可源源供应湘军军火，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军饷亦可由湖北供给大部，财政困难可以减轻[108]。当时赵恒惕正谋向外扩张，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以缓解省内财源枯竭、军饷无着的困窘，鄂人的请求正可给赵以对外扩张的口实，湖北的地盘对赵亦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赵还可借出兵缓和省内的派系斗争（谭延闿虽下野离湘，但谭系人马仍在，对赵时有异心）。故“赵之援鄂，非为鄂也，为湘耳”，并且“颇有吞并湖北之野心”[109]。赵恒惕本来担心吴佩孚的态度，事先曾派人赴洛阳试探，吴佩孚表示不支持王占元，对其他事项则未置可否，而赵却以为得到吴的默认，因此在1921年6月20日的军事会议上，赵恒惕决策出兵援鄂[110]。

为了壮大己方出兵的力量和声势，赵恒惕又说动正在长沙的前川军总司令兼川督熊克武在四川运动武装出兵援鄂，并谓“川湘与鄂地域相接，援助鄂人自治，固为义不容辞。……务望同时并举，以期双面夹攻，俾联省自治早日实现”。他建议“湘川各出三师，湘以主力包武汉，川以主力出襄樊宜荆，会师武汉”。熊克武下野后奔波于西南各省，图谋另有发展，对此当即首肯。7月7日，熊密电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言称“大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吾川须从速准备，应此潮流。本军尤宜避去内争，向外发展。现鄂王为众毁所归，已呈不稳之现象，如出兵助成鄂人自治，实为不朽之伟业。昨与炎午（赵恒惕）密商，决定川湘各出五混成旅。请探察甫澄（刘湘），渠如对此意旨赞同出兵，则举办较易，倘尚迟疑，则本军单独亦须进行，武装准备停妥，克期发动，即回川与兄等共办此事。”7月中旬，熊克武回到重

庆，部署川军援鄂事宜。四川实力派领袖、川军总司令刘湘考虑到直系的态度，对援鄂本有犹豫，但湖南出兵在前，川军出兵正可顺水推舟，占领鄂西宜昌、沙市地盘后可得实利，故亦“完全同意”，并认为“大局如斯，更难坐视，失此不图，湘军独下武汉，吾川他日对南对北，均无发言之资格”(111)。所以最终也同意出兵。

对于湖北的“驱王”自治运动，直系大将吴佩孚一直予以密切关注，因为湖北处在辖 毂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又是直系已占多年之地盘，直系既不能容忍他人染指，亦不能听任其“自治”，因此，当鄂人向吴佩孚请愿撤换王占元时，为吴所拒，并称：“如果各省都像你们这样，全要求自治，那还要政府干什么？要是各省军政都归各省自己办，那么中国不成了五胡十六国了吗？”(112) 但王占元虽同为直系大将，却对吴佩孚存有戒心，担心其取代自己的位置，有与张作霖接近的趋势，故吴亦无保王之意。

可是当湖北“驱王”运动由“文斗”发展为“武斗”，且湘、川外省军队准备介入时，吴佩孚则不能不干涉，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维持直系的地盘，而且关系到吴心目中打破西南分离局面、实现由直系主导的“统一”大业。7月中旬，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将领军事会议，讨论湖北问题，吴佩孚认为：“这不是湖南与湖北问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助长南人反对北人的气焰，非把他们赶回去不可。”(113) 因此，此次会议决策出兵，直系由此成为援鄂战争的第三方。

湘、川、直三方在“援鄂”的名义下，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利益，然而当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出兵作战之际，颇有反客为主之意，而本来高唱“鄂人治鄂”的湖北各界，当战争来临时，似乎倒成了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局外人，这也是此次战争在“援鄂”名义下的吊诡之处。

湘、川方面的“援鄂”表示鼓舞了鄂人通过“驱王”而争取自治的决心。旅湘鄂人绅商首先行动起来，在长沙组织了“湖北自治政府”和“湖北自治军”，推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

军队”，孔庚为政务院长，驻长沙的鄂军团长夏斗寅为前敌司令，打出了“声讨祸国殃民之王占元，以铲除自治之障碍”的旗帜。7月24日，湖北各界万余人联名发表通电，痛责王占元“盗鄂七载，痛毒四方”，宣言“今以群策群力，创立湖北自治军。复以集思广益，制定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昭示自治之轨道。”[114] 26日，湘军举行“援鄂自治军”誓师大会，赵恒惕发表誓词称：“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富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115] 为将要爆发的对外扩张、获取地盘的战争涂上了一抹“正义”的色彩。二天后，“援鄂”战争在湖北打响了第一枪。

二　吴佩孚强势介入与援鄂战争的结局

援鄂战争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战争爆发到王占元下台，主要是湘军与王军的战争。

7月26日，赵恒惕举行援鄂誓师式，誓词声称：“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负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116] 28日，赵恒惕发出总攻令，湘军正面以夏斗寅率队为前锋，由岳阳、临湘攻击蒲圻，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率第一、第二师随后跟进，此路为湘军主力；右路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率部由平江攻击通城，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长唐生智率部从澧县攻击公安、松滋。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统一指挥各部的行动，赵恒惕自任援鄂军总司令，坐镇长沙。对湘军的进攻，王占元亦兵分三路抵挡，其中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兼中路司令，刘佐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分别阻击湘军的进攻。同时，王占元急电北京国务院、陆军部及曹锟、吴佩孚，声称“前方紧急，亟待增援”，要求曹、吴“电催各援军，迅速南下”[117]。但王占元又担心吴佩孚借机向湖北扩张势力，所以又要求“政府派遣援军，请从奉、豫两省指拨，不必令吴佩孚派兵赴援”[118]，寄希望于“诸公义重袍泽，必挽狂澜”，因“此次湘军北犯，实非局部问题，而为大局安危之关键”[119]。王占元对吴佩孚的戒心也是吴不愿立即伸手救王的原因

之一。

湘军与王军交战的主战场在中路，自7月29日至8月5日，两军在羊楼司一线交锋，作战激烈程度为北洋时期内战中所少有，双方屡屡发生肉搏战。结果湘军获胜，连克鄂南重镇，孙传芳部防线被突破。8月5日，王占元发出通电称："前敌苦战历八昼夜，将士疲劳已极。本省军队无可抽调，萧（耀南）总司令全师来汉已逾五日，经占元渡江两次敦请，萧总司令亦慨允赴援。奈以原定行军计划，非各军到齐，不便前进。……力尽援绝，何能持久？占元识虑弱，纵使勉强支持于一时，而外顾环境，将来必有穷于应付之势。"发了一通牢骚之后，王占元表示"现已电呈中央，坚请辞职"[120]。7日，湘军夏斗寅部占蒲圻，10日占咸宁汀泗桥，距武汉不过百余里，震动武汉三镇。赵恒惕遂于此时致电王占元，劝其下野，电称："湘鄂唇齿相依，年来联防互保，赖以宁息。……近顷鄂省之议会及各界人士前后来湘历诉，其不慊于我公督鄂之苦衷，抱定自治为救省之方策。……敢请当机立断，顺应民心，敝屐高位，使邻省顺序革新，完成自治。"王占元回复赵电称："已再电中央，力伸前请，一俟有人接替，当即释戈解甲，归老田园。"[121]此时王占元也顾不得此前他不愿吴佩孚出兵的表示，连电向吴佩孚求援，但吴却没有积极反应，"萧师观望不进，闻与鄂自治军暗行接洽，意在共谋逐王，窃据武汉"[122]。在外有湘军压境，内无救兵相援的情况下，王占元发表通电，声称"默察大势，非实行自治，无以应潮流而救危局。况军阀揽权，久已为世诟病，占元素性淡泊，更何苦以衰病乞退之身，冒拥兵自卫之名"[123]。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王占元在北京政府已失奥援。11日，王占元遵令解职并离开武汉，湖北的"驱王"运动得到了初步成果。

援鄂战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于王占元下台至直湘议和，主要是直军与湘军的战争。吴佩孚对"援鄂"早有准备，但在战争开始后，王占元迭电求援时，吴却一副事不关己之态度。其原因在于，王督鄂多年，

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且王占元因其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接近奉系的动向，更不为吴佩孚所喜，故吴佩孚有意借机逼王占元下台。但吴佩孚从来也没有考虑任由鄂人“自治”，他认为“鄂踞长江上游，为国家中枢，系中原屏障，一旦有失，则中原动摇，京师危险”[124]，因此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主动地位，吴佩孚在战争爆发前即派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和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赴鄂，部署在武汉以北，随时可以出动应战，并令赣、豫等省援军准备出动，表面为助王，实际是等待形势变化，占据湖北地盘。8月4日，因王军不支，萧耀南令第八混成旅接防王军防线，吴却电责萧耀南，“现鄂防迭次告急，皆由王督自相惊怯，藉以催援军之急进，代彼负责效力耳”；“支配布置，权衡应由我操，何得听王督随时调动，错误军机”[125]。其借机逼王下台之势呼之欲出。待王占元自请辞职，吴佩孚、萧耀南被任命后，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吴佩孚立即不避嫌疑，着手控制湖北局势，遏止湘军的攻击势头。他以实力为后盾，主张“和平解决”，提出由湖北“省议会实行宪法，与西南各省为联省之自治，并以种种有利于湘军之条件，予以确切之保证”[126]。实际上，吴佩孚在已获得湖北地盘的情况下，是以允诺湖北“自治”的“大度”之举，谋求舆论的支持并分化湘军的反对，以争取时间，稳固直系对湖北的控制。赵恒惕对吴佩孚的“和平解决”提议本有意考虑，表示将“饬各军停止前进，静候和平解决”[127]。但湘军上下自认“驱王”有功，不甘心胜利果实落入吴佩孚手中，提出和平条件为，裁撤王占元所部军队，撤退部分直军，保证湖北自治，偿付湘军援鄂军费等。吴佩孚已经视湖北为其地盘，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条件[128]。8月12日，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身份抵达汉口，他提出湘军应完全撤出湖北，为湘军所拒，而湘军提出的条件亦不能为吴所接受，双方和谈破裂，17日直军与湘军在前线开战。

直军与湘军的战争主要沿湘鄂边境一线展开。吴佩孚自任援鄂前敌联军总司令，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所部及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在左路攻击粤汉路汀泗桥、贺胜桥、咸宁一线的

湘军，这是直军主力所在；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指挥所部为右路，在石首、公安、监利一线取守势，监视湘军行动；吴佩孚指挥两个旅为中路，在金口、嘉鱼、罗山一线出击，居间策应左、右两路[129]。吴佩孚利用海军第二舰队的炮火优势为陆路作战的掩护，同时密令在金口上游掘堤引水，“南军死者数百人，辎重损失尤巨”。17日，直军占嘉鱼。19日，吴“急令直军将蒲、咸间之拦江堤挖断，溃口至四百余丈。湘军防线被水冲动，遂向后退”，沿江北岸为直军所据。此后直奉矛盾激化时，张作霖曾通电揭露吴佩孚在战争中决堤放水，淹毙湘民数十万，损失财产数千万，但吴发表通电认为是“莫须有之谈”，予以否认。而深知内情的吴氏贴身幕僚白坚武在日记中写道：“吴子玉战湘军，决湘堤以灌之，淹没四县。此四县之人民何辜？非万不得已，则决不可用兹毒举。”[130]可见掘堤事并非子虚乌有，不过是军阀战争中为争胜而不择手段之一例而已。此后，直军与湘军在汀泗桥一线激战，湘军一度攻下汀泗桥，吴佩孚乃亲率卫队督导反攻，与湘军展开肉搏战，“肉搏甚久，湘军疲顿难支，渐形后退，直军复夺汀泗桥”[131]。25日，吴佩孚下总攻令，“湘军之在前敌者，人数虽达四万，而枪械则甚缺乏，又以强弩之末，与生力军敌，终非易事，以故节节失利”[132]。28日，直军占湘鄂门户岳州，长沙震动，湖北自治政府和自治军亦无法支持，蒋作宾、孔庚等登轮赴上海。

直军攻下岳州后，湘军无力再战，在直奉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曾令吴佩孚继续南进，以利“统一”大业，但吴佩孚在回电中表示：“中央究竟已备若干兵费，足以进行战争，请先电示。否则兵临前敌，仍如七年佩孚在衡情状，实非能堪。赵恒惕求和是诚，苟粤不来攻，仍可乘势收拾。英美领事，先后面述速息内争。美使晤萧督，亦以息战为请。内察国情，外采舆论，暂约停战，以待和平。”[133]吴佩孚之所以不主张继续南进，并非其不愿“统一”，而是顾忌湖南乃西南方面必争之地，湘军实力尤在，川军入鄂后与湘军形成对直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再战并无必胜把握；直奉矛盾正在发展，奉系有与皖、粤联手对直之势，直系不能不有所防备；孙中山在粤桂战争中获胜后，有继

续北伐之计划；故吴佩孚不主张将直军多数兵力牵制在南方，而主张见好就收，对湖南暂时维持现状，以待情势的发展。“盖吴氏心目中之大敌，在南为粤孙，在北即奉张，其余皆可结交联防协同动作”[134]。如梁启超所论：“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作霖）南孙（中山）皆吴劲敌，……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局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135] 有鉴于此，9月1日吴佩孚与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岳州江面的英国军舰上举行会谈，议定休战协议，直、湘两军大体以汨罗江为界，各自撤归鄂、湘境内，不得再有作战行动[136]。至此，直湘两军的战争结束。

援鄂战争的第三阶段为直军与川军的战争。川军前此虽同意出兵援鄂，但因内部缺乏统一步调，迟迟未能出兵，直至9月1日才开始沿长江南岸进军，攻击川鄂门户——宜昌，此时直军与湘军已经停战，吴佩孚曾致电刘湘提议罢战，但川军已推刘湘为援鄂军总司令，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大军出动，成骑虎难下之势，直川间战事仍不可免。不过，川军与湘军本来在战前约定可以由东西两方互为声援，夹击直军，结果因为出动的时间不一，最后成了各自为战，自然对吴佩孚调配兵力、各个击破是有利的。

直军在宜昌的守军只有两个混成旅，由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任鄂西防务总司令，兵力数量远不及当面川军的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故面对川军的攻击步步退却，因“彼众我寡，伤亡相继，现已陆续退却”，开战不多日，宜昌已是岌岌可危[137]。此时驻宜昌的英、日等国领事以保侨为名出面干涉，要求交战双方从9月5日起休战三日，协商和平解决方案，给了直军喘息之机。吴佩孚借此时机，亲率第三师一部与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八师一部及第八混成旅增援宜昌，兵力总数超过了川军。9月16日吴佩孚抵宜昌，正值“川增兵数

万，宜沙危急”[138]。川军猛攻，直军“势已不支，纷纷退下，宜城岌岌，正在垂危”[139]。吴佩孚亲率卫队督战，卒使直军转危为安，稳住了防线。此后直、川两军在宜昌周边展开为时十余天的激战，直军中以北方人居多，不习惯山岳作战，而“川军娴习山道，每遇悬崖峭壁，辙以铁钩攀而上，北军莫名其妙，皆甚骇诧，以故崇山峻岭之中，时有川军踪迹，忽隐忽现，川军之敏捷灵变，实较北军为优”。17日至18日，“两昼夜激战，统由吴子玉督率，盖士无斗志，每一临阵，即退却”[140]。但由于吴佩孚的战术灵活，并不与川军在正面过多纠缠，而以两翼反击为主，同时调孙传芳部及海军增援，请陕督冯玉祥派兵南下鄂西助战，而川军远道入鄂，军饷军械接济困难，加之孤军作战缺乏友军支持，势渐不支，从9月24日起开始全线退却。此后直军转守为攻，连占秭归、巴东、兴山等地。但川军于节节后退中阵形未乱，仍有与直军对峙的本钱，四川易守难攻，吴佩孚亦暂无图川之心，战事发展至于停顿。10月27日，吴佩孚发表通电，表示谋和之意：“川湘鄂既曾联防，则无宿仇也；鄂未先越雷池一步，则无侵略川湘野心也；鄂省向未干涉川湘内乱，则川湘尤不应有此横逆之来也。自战端开始，以迄于今，鄂省始终谋和，非自逞武力也。”[141]其后吴佩孚将宜昌防务交孙传芳负责，于30日回到武汉。

直川战事停顿后，双方开始议和，但“川军条件甚苛，如湖北改总司令，荆沙宜汉允驻川军，偿我此次损失等项”，直方不能应允[142]。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直到12月22日，刘湘的代表张梓芳（另一说为宋毅夫）与吴佩孚的代表孙传芳在宜昌拟定议和协议草案，于1922年3月7日正式签字。其主要内容为：直川两军各自退回原驻地，各守边境；川盐运销楚岸，川鄂两省平均分配盐税收入[143]。至此，这场牵动南北多方纠结参与其中的援鄂战争最终结束。

直系及吴佩孚虽不是援鄂战争的发起者，却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佩孚成功地利用“鄂人自治”的呼声，假手赵恒惕，驱逐王占元，而后出兵夺得湖北，获得了胜利的果

实。湖北政权依旧控制在直系手中，王占元易为萧耀南，虽然在形式上满足了“鄂人治鄂”的主张（萧耀南为湖北人），但不过一个直系督军易为另一个直系督军，还是武夫当政，所谓“鄂人治鄂”空成画饼。但是，吴佩孚也为此付出了损失声誉的代价。“吴自推倒皖系以来，其声誉为北方首屈一指之人物，而十年援鄂之役，军事虽取得胜利，名誉却大受影响。论者谓：吴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过去不投机不取巧，现则借湘军之力倒王，以缓兵之计败湘，而湖北地盘稳稳到手”[144]。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使直系在全国巡阅使中三居其二（另二位是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和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既加强了直系的政治地位和吴佩孚个人说话的分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直奉间原有的脆弱平衡；直军的胜利打破了奉系向南扩张的可能，并占据了“九省通衢”武汉，控制了京汉铁路全线，向北可以呼应中原，向南可以威胁西南，获取了十分有利的战略空间。湘军死伤惨重，未获其利，战后反因直军占领岳州而面临着直系的直接威胁[145]。赵恒惕为了缓解湘军内部对他决策参战的批评，倡言“此次之战，虽属失败，然为自治而战，虽败犹荣”[146]，也不过是说些大话而已。川军退回川省后，虽然获得了川盐销楚的实际经济利益，但却因各派推卸作战不利的责任，导致军阀战争又起，刘湘、杨森等求援于吴佩孚，使直系触角得以伸入四川，也对直系扩张势力范围有利。总体而言，直军的胜利为其扩张势力，排挤奉系，结束对北京政府的共治局面，从而独占中央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吴佩孚在战争结束登轮回程途中赋诗言志：彝陵风雨洞庭秋，一叶扁舟驶上游。东北烽烟犹未熄，西南鼙鼓几时休。庐山面目真难现，巫峡波涛惯倒流。独坐梢头思逝水，江声咽尽古今愁[147]。如时人所论：“吴氏偏师来鄂击退湘军，遂以两湖巡阅使之名义，占有鄂省之地盘，虽王氏肆其远交政策，联奉拒吴，而其结果，吴氏势力益见扩大，奉直冲突又益接近矣。”[148]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中共组党的酝酿及其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最初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重要性却日渐凸显，并且真正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的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不过，中国在19世纪中叶刚刚被列强以武力打开大门，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很有限。目前所知，1899年由李提摩太据英国人企德著《社会进化》编译而成的《大同学》，初浅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因此《大同学》在《万国公报》的连载，可以认为是马克思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开端[(149)]。20世纪初，国人有感于国家危机而纷求救国之道，各种西方学说均成为国人关注介绍的对象，其中经由留日学生通过日文译本和日文著作而引介的马克思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1902年，戊戌维新失败后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其中称麦喀士（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开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之先河。后来他又发表过不止一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出他对新知的敏感。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及其基本观点——唯物论、辩证法、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等，均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为国人所知。但此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不发达，工人阶级仍在成长，马克思的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后，主要是作为学理探讨的对象而非斗争实践的指南。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朱执信、戴季陶等），尤其是在如何改善民生方面，他们因为有欧美各国的生活经历，目睹了资本主义之弊端，因而亦较易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他们了解与接受的马克思学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相当

的距离，尤其是他们始终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反对阶级斗争，从而基本上仍可归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得益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响，中国民众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对西方列强的普遍失望与拒斥心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等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创造了契机。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潮流。除了《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外，其他一些杂志（如《每周评论》、《国民》、《建设》等）和报纸（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都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文以至专栏。以1920年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著作纷纷被译介出版，更扩大了其影响。当然，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也有不少其他各派的学说被介绍进中国，由于各派学说纷呈，其间还引发了数次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这样的论战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150)]。

中共成立的阶级基础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经过民国创立的推动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经济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较前有了一定的进步，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阶级的成长。五四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后各地的工人罢工运动时有发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干政的政治性罢工，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的政治性鼓动与组织。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毕竟还比较弱小，政治诉求的表达与组织程度仍然远远不够成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的影响仍然不大，作为中共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此时多半还是理论上的基础而非实际中的基础。中共的建党活动主要还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经由马克思主义熏陶后，在苏俄革命影响下的组织实践。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成立了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即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国家政权层面进入实践过程。俄国革命的消息传至中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反响。李大钊撰文，鼓吹“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枫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为此，李大钊充满激情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51] 1919年，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的阐释，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李大钊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也是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程中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曾经专门阐释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他的结论是：“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

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152]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中俄间所订之一切密约与协约，放弃帝俄在华所有特权及租界、庚子赔款，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无偿归还中国，并希望与中国就此进行谈判。次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由加拉罕署名发出《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函》（中译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上年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除旧约事宜，在双方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缔结新约，建立外交关系[153]。苏俄二次对华宣言，虽然实际上对旧俄在华利益（如中东路）仍有坚持，但毕竟公开表示放弃旧俄在华特权，显示出与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对华压迫态度非常不同的姿态[154]，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为苏俄扩大在华影响添了分，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华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苏俄影响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关系的形象表达。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传播进入具体实践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实践过程的发端及其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为水到渠成之事。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各地已有不少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名义出现的、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团体。在这些团体联合组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革命成功之后正在广泛寻求盟友的苏俄给予了大力支持。1920年春，俄共（布）中

央远东局外事处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155]，寻求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探讨建党的可能性。维经斯基来华后，在北京和上海“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年8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设立东方民族处，下属机构设置包括了中国科。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负责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并在出版与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56]。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受命抵达上海，帮助中共的建党工作[157]。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建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也许过上一年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组织完善的政党”[158]。

1921年7月23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现兴业路七十六号）秘密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各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陈独秀时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两人均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而没有出席。7月30日晚，开会地点突遭租界巡捕的搜查。31日，会议转移到距上海不远的沪杭铁路线上的江南小城——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并在此结束[159]。

中共“一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组织上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并为新生的中共规划长远纲领和近期工作。大会听取了各地代表对组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并讨论了国内形势和中共成立后的任务及组织等问题。有代表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发展还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范围也不广，因此，中共成立后应该着重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再以此动员工人群众，为此，中共更适合成为公开的、合法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更多的代表则认为，共产党应该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目标，为此就要积极领导和参加工人运动，不能以合法和公开作为建党后的目标。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有代表认为，共产党员可以参加选举，当议员做官，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也有代表反对这样的意见，认为是放弃革命原则，对资产阶级有幻想。与此相对应，有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定立场，与其他党派斗争，南北政府皆为一丘之貉，另有代表认为，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比北京政府进步，应该支持孙中山，并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马林在会上介绍了列宁关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结合的理论，但并没有为多数代表所接受，“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对中国的强烈影响”[(160)]。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示中共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中共当时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不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及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一切宣传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的监督，不得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党中央应每月向第三（共产）国际报告工作[(161)]。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共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组成中共领导机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共服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具有和当时中国其他党派所不同的阶级基础、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中共的成立，也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并得到苏俄帮助指导的结果。中共既与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

的思想、组织联系，则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也不能不受到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诚足为后人总结。中共成立之时，人数不多，实力弱小，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尚不引人注意，但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共的成立对近代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其后有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62]

二　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中共成立之初，就与当时国内的其他党派有了明显的区别，表现为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和工作的实干性。但是，在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国内局势的认识和判断方面，中共成立之初也有脱离国情实际的方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不透，忽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民族矛盾和革命的阶段性，强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并以此为根据大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革命纲领和革命任务都有不能切合实际之处，也不能更好地争取同盟军。作为初生的革命党，中共建党之初在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幼稚不足之处是难以避免的，他们只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63]。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方面，就是领导工人运动，争取工人利益，表现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共提出，成立第一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同时"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1922年6月，中共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16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迁至北京），是有严密领导的工人组织，与当时许多有名无实的工会大为不同。张特立（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下设北方分部（北京），负责人罗章龙；武汉分部（汉口），负责人包惠僧；湖南分部（长沙），负责人毛泽东；广东

分部（广州），负责人谭平山；山东支部（济南，后合并于北方分部），负责人王瑞俊（尽美）。总部迁北京后，另设上海分部，负责人袁大时。后来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165]。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一些工人较多的城市陆续成立了工会组织。除此之外，中共还领导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166]。

从1922年初至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被镇压，主要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最初的高潮，其间有三十余万工人参加了一百多次罢工，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都市的工厂和湖南、湖北等省的铁路和矿山。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者，如1922年1月到3月的香港海员罢工，8月北京长辛店京汉路罢工，9月湖南安源煤矿罢工，10月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等工人罢工斗争，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并获得一定的政治待遇，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167]。通过组织与领导罢工，中共不仅在工人中开始建立自己的队伍与影响力，而且锻炼了从事实际斗争的能力，表现出中共的组织力、动员力、奋斗精神、勤于实干等等，也为其后中共在国共合作发起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中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的二十余万会员。出席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又有其他党派及各色人等。不过，中共基本主导了此次会议，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等都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实际为中共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掌握工运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劳动大会闭幕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自拟的《劳动法大纲》，其主要内容为：

政府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八小时工作制、接受教育等权利，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待遇等[168]。虽然这个《劳动法大纲》未能提上北京国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其公开提出和在工人中的宣传运用，成了工人据以要求保护及提高自身权益的参照与目标，为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正值吴佩孚为了凸显个人地位而高唱“保护劳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契机。1922年6月，吴佩孚通过其政务处长、李大钊早年的同学白坚武，约请李大钊在保定晤谈。其后吴佩孚在公开通电中提出四大主张，包括了“保护劳工”。为了控制铁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吴佩孚企图排挤一直把持铁路的旧交通系势力，而李大钊则通过白坚武，向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每条铁路设立密查员。得到同意后，李大钊推荐共产党员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干线的密查员，在密查交通系职员劣迹的名义下，大大推动了北方地区尤其是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169]。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寻求革命同盟军，以更好地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而寻求同盟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革命性质、革命基础和革命对象等问题的认识，也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如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70]

中共成立后，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国情与他国相比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所在，尤其是在对中国国情特殊性方面的认识，有了迅速的提高。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明确提出中国还没有“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由此出发，中国首先需要完成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现实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而非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依靠的基

础和联络的力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开始提上革命的日程。“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171]。

正是因为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中共据此开始有了革命阶段论的构想。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中共当时应当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议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决议案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步骤：先邀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适当的地点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使倾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民主派组成“左派联盟”；再与工、农、商、学、妇女、法律、新闻各界群众团体建立联系，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172]。由此可知，中共成立不过一年的时间，已经通过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构想了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从而为寻求革命同盟军，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有了对中国国情特殊性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必要性的认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建立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共面临的难题。谁是我们的敌人已然基本明确，但谁是我们的朋友，却因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远非认定敌人那般清晰。中共成立初期，在选择统战对象也就是自己的朋友方面，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都曾被考虑，而

吴佩孚和陈炯明更因其所处的地位和一时的表现，曾经一度成为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

陈炯明曾经在五四运动后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提倡新文化和新思想。在他驻留闽南期间，会见过苏俄政府的使节。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1921年都曾在广州会见过陈炯明，并对他抱有好感。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的回忆，当时到过广州的一些苏俄人士，对孙中山反有恶感，“好感完全在陈炯明方面”[173]。陈炯明在广东当政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统治基础，曾经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从事工农运动，使得部分中共党人也对陈抱有好感。1920年12月，陈炯明以广东省长的身份邀请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8月，他又聘共产党人彭湃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局长），并允许他在海丰试办农会，试行减租运动。与此同时，陈炯明还资助中共党员谭平山等编辑出版广东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但是，随着中共与孙中山接触的增多，孙中山和国民党成为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则不断发展，中共与陈炯明的关系随之转趋冷淡。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中共与陈的关系也告终结。

中共与吴佩孚的关系，更多来自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为了争取盟友、拓展外交、改变自身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孤立地位，苏俄一度颇为看好吴佩孚，认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174]。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首次来华后，“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175]。10月间，他还专程到洛阳访问了吴佩孚的亲信幕僚白坚武，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白认为，“俄之组织统系可为鉴也”[176]。维经斯基则认为，吴佩孚是中国政治的主要人物，掌握着军队和财政，“俄国在远东问题上与吴的一致性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177]。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苏俄对吴佩孚更

为看重，高度评价吴的作用，“多次讨论联合吴佩孚的方针”[178]，希望通过和吴佩孚的合作，恢复并稳定中苏关系，实现苏俄的国家利益。“最初苏俄外交是面向吴佩孚的，把他看作是最强大的和比较‘进步的’军事领导人。与这个指导思想相适应，也向中共提出了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同时努力争取实现孙逸仙同吴佩孚的合作，这种合作应该导致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179]。苏俄与共产国际的联吴政策当然会影响到中共。中共“二大”宣言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180]。中共也因此一度采取联吴政策，具体表现为中共北方党组织通过与吴佩孚的合作而推动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但是，随着苏俄与吴佩孚关系的起伏，苏俄逐渐开始倾向于和孙中山而非吴佩孚合作，如越飞在1923年1月所言：“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181]中共也随之改变了对吴佩孚的策略。1923年2月，吴佩孚以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表现出其军阀本质和倡言“保护劳工”口号的虚伪，成为中共大力主张的反帝反军阀革命的对象，中共与吴佩孚的接触也由此而基本告终。

经由对陈炯明和吴佩孚统战工作的无果而终，中共寻求革命同盟军的统战对象日渐向孙中山和国民党倾斜，并最终形成为国共两党联手的革命统一战线。

第五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外交的新变化

一　中国问题与华盛顿会议

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也因为美国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未批准和约，加以美、英、法、日之间既争夺又联合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巴黎和会实际未能解决一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

系调整问题。为此，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并希望主导这一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国，于1921年倡议召开各关系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以解决有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各项未决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命，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德、俄（苏俄）、法三国对于远东事务和利益的关注度与争夺力都大为下降，其中德国和苏俄的对华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表现为退出列强在华利益的争夺，与中国建立基本平等的关系。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随后即主动向中国表示，“愿意放弃治外法权，在处理山东问题上也向着中国”[(182)]。虽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并没有影响中德国家间关系的恢复。1920年7月，德国派出专门使节来华，于9月与中方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双方的谈判集中在若干技术性问题的讨论，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1921年5月20日，德国政府照会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表示愿意恢复中德友谊及通商关系，声明放弃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同日，《中德协约》在北京签字，双方决定以德国声明文件为根据，订立协约，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尊重彼此之领土主权，实行平等相互之原则，取消德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权。此外，德国声明以现款400万元及津浦、湖广铁路债券交与中国政府，作为战事赔偿之一部分，放弃庚子赔款，中国同意解禁被查封的德国财产。1921年7月1日，中德双方交换批准书，《中德协约》生效，中德恢复正常关系[(183)]。《中德协约》在平等基础上界定了中德关系，取消了德国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首个平等条约，也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应享的成果，在近代中外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苏俄对华关系的变化详见下节），同时也是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审时度势，冷静观察内外环境，抓住时机，妥为因应而得之积极成果。时人论为：“根据于此一纸新约，举凡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吾国已安然获得之，且根据新约，吾国得收回其丧失已久之关税自主权

及治外法权，使吾国国际地位顿形增高，数十年来吾国外交之足以扬眉吐气者，惟此一事而已。”[184]

一战结束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利益竞争者是美、英、日三国，尤其是美、日两国，远东国际关系态势较战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日都可谓一战的“红利”获得者，基本未受到战争的影响，还通过战争扩大了自身的实力，但日美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却是互为竞争对手的矛盾关系。美国视“远东市场为日美英的未来的希望”，因其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向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此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与日本追求独占性、垄断性、排他性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185]。日本对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行动，不仅不符合美国希望主导建立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新秩序，而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发起召开讨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会议，主要目的就是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确保美国利益的不受影响。而为了达成此目的，美国需要拉拢英国，拆散1902年订立的英日同盟[186]，以共同应付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对美英利益的挑战。英国在一战中虽然也颇受牵连，但毕竟非主战场，而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仍有广泛的利益需要维护，与美国又有特殊的关系，也不愿见到出现日本独大的局面，因此也有意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的扩张势头予以一定的限制。这样，就出现了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趋向以及美英联手遏制日本的可能性，而这对中国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同时，《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迫使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悬而未决[187]。这样，不仅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之中，而且各国也存在因为这一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处理各国在华权益，包括山东问题，以平衡和维持列强在东方的既得利益，是列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当1921年7月8日，美国向英、法、意、日等国提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时，各国均表同意，惟有日本担心“造成美国对华发展之基础，而将日本之对

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希望会议避免讨论“既成事实”（即山东问题），而只讨论与军备有关的问题[188]。实际上是不希望会议干涉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但日本此时的实力还不足与英美公开抗衡，其后几经折冲，日本终在7月27日同意参加会议，但仍表示“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由于日本的坚持，美国在会前即与日本达成妥协，会议将不提出违背参加国利益及非关国际问题之议题，山东等问题先由日本与关系国商议后再行解决。随后，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亦被邀参加。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将要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中国自然也在被邀之列。由此最后形成了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九国会议[189]。

1921年7月12日，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芮德克致函外交总长颜惠庆，询问中国愿否参加华盛顿会议。7月18日，颜惠庆会见芮德克，表示“此次会议无论研究限制军备或决定太平洋问题，或系一会抑或二会，本国皆乐愿参与”。8月13日，芮德克将美国总统哈定的正式邀请转致中国政府。16日，北京政府复文接受邀请并表示愿与各国平等与会[190]。接着，中国外交部设立以外交总长颜惠庆为首的“太平洋会议筹备处”，筹备赴会事宜。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参加会议的全权代表，施肇基为首席代表，前外交总长梁如浩和前财政总长周自齐为高等顾问，驻古巴公使刁作谦为秘书长，代表团全部成员包括代表、顾问、咨议、委员、秘书、随员、译员、书记等共143人，规模相当庞大，也可知北京政府对此之重视[191]。南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军政府声明不承认北京政府派遣代表的资格。孙中山公开声明北京政府“以道德言，以法律言，均无发言之余地，更无派遣代表之资格”。因此，“将来华盛顿会议，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与会，则关于中国之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192]。同时，孙中山还派广州政府驻美代表马素向美国国务院递交公文，转达此意[193]。为了对外表示团结一致，北京政府又加派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全权代表，但被其拒绝[194]。

华盛顿会议召开及中国将参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新的希冀。乐观者认为，既然美国对凡尔赛和约也不满意，此次会议又由美国发起，“会议性质又含有限制日本对华侵略之意，则于会议场中，美人必能赞助我国伸其历年之积愤，不特失之于巴黎和会者可收之于华盛顿会议；举凡有损我国独立主权，如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行政、列国在华驻兵及设租界等事皆可由是而取消，并继之以退还庚子赔款焉”。悲观者则以巴黎和会为例，认为此次大会“实权则握于英美日三强之手，虽法意两强尚不能为有力之主张，更遑论积弱之我国。故吾惟拱手以待三强之宰割，或列国共同管理之实现而已”[195]。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鉴于上次巴黎和会给国人的教训，明确提出华盛顿会议“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生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及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解放、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因此，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196]。但无论是乐观、期望，还是疑虑、忧心，各方人士对华盛顿会议的关注，还是反映出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各界人士组织的“后援会”、“同志会”、“研究社”、“讨论会”、“外交协会”等等一时蜂起，以至“各界团体之专为研究太平洋会议问题而设者，殆更仆难数”[197]。国人要求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大体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青岛等中国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在华租界，“主张公理，希望世界同胞，尊重中国主权和民意”[198]。其中又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于11月7日通过的《对于华盛顿会议中国提案之意见》表述得最为明确而具体：一、废除1915年5月25日之中日条约及换文；二、日本在胶澳及山东省内占据之土地、铁路、矿山及一切财产应无条件交还中国；三、各国声明废除在中国势力范围之协定，所有特殊权利、让与权、优先权概撤销之；四、各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关于中国有所协定，凡类似此项性质之协定，中国概不承认；五、收回各国在中国境内单独经管之铁路（如南满铁路等）；六、恢复关税自由。他们同时还提出了“希望要件”：一、提前退还租界地；二、限期废除

领事裁判权；三、撤退外国在华驻屯之军警[199]。出于对会议讨论事项的关切和对北京政府的不信任，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还在1921年10月12日于上海召开全国十七省区代表会议，推举余日章、蒋梦麟为民众代表赴美，宣传中国对会议的要求和民众的意愿。如顾维钧所言："举国上下，忧国忧民者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华盛顿会议能解救中国时局，带来和平，使国家能以得到发展。总而言之，这次会议实为各方所重视，中国尤其对会议结果寄予极大希望。"[200]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亦表示，他感到"一种强大的民族意识，一种有进取精神的爱国主义正在激动着中国的领袖人物和年青一代"[201]。

二　华盛顿会议的中国问题讨论

1921年11月12日，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九国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会议下设二个委员会，美、英、法、意、日五国委员会，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九国委员会，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但实际上为美、英、日三国所主导。

1922年2月6日，五国委员会讨论通过《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的海军军舰数量之比为5：5：3：1.75：1.75，美国取得了与英国并列的海上强国地位，日本的海上扩张受到限制，但毕竟被公认为第三海军大国，故对此结果也可以接受。美、英、法、日还经过秘密交涉，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四国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在太平洋岛屿属地、领地的权益，维持了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既存利益，英日同盟亦告废止。

华盛顿会议在讨论远东问题时，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会议将讨论的中国问题包括：应适用之各原则与适用项目，如领土、行政之完整、商业及实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经济上之优先特权、铁路发展，现有成约之法律地位等[202]。在会议召开前，中方事先对应向会议提出的问题有所讨论。顾维钧认为，"发起

太平洋会议一举，虽有英日续盟问题为其导线，惟主要目的在远东问题，而尤以我国为远东问题之中心点，是此项会议与我国前途关系较之巴黎和会尤属重要”。中国应在会上提出的原则为：各国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全，废弃条约上各种不公平之束缚限制，赞成各国在华工商业均等主义，宣告中国建设计划大纲。应提出的具体问题为：尊重中国主权的办法；解决山东及“二十一条”问题；重提前在巴黎和会提出之希望条件七项，其中废除势力范围、裁撤外国在华邮电机关、关税自由、撤除外国驻华军警可相机坚持；收回领事裁判权与修改条约问题，因情形复杂，至多只可要求各国赞同收回原则，再从长商议；收回租借地问题，恐遽难达到目的，或可商设委员会与我共同讨论；要求退还赔款专办教育，不妨酌量提出。“此外，如种族平等、亚波海线、修理无线电台、整理我国外债及我对四国银团政策等，恐均为他国将提之案，我国亦宜预先研究，决定方针”[203]。

根据中国代表团事先讨论的结果，1921年10月31日，北京政府发出致中国代表训令，提出中国应在会上提出的主要提案为：一、英日续盟，应设法他国提出；二、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三、取消蓝辛—石井宣言及其他类似之条约、协定；四、与会国共订公断条约；五、关税自主；六、定期召集会议，讨论远东国际重要问题。次要提案为：一、胶澳善后；二、“二十一条”；三、修正不平等条约；四、成约地位；五、外侨纳税；六、裁厘加税；其中最注意者为：一、取消英日续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主。与此相对应，日本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虽然原则上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却极力要求“既定条约、协约仍须承认”，“既得权必须尊重”，各项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以维持日本的“特殊权利”、“特殊地位”为原则[204]。这也表明中国向华盛顿会议提出的议案不会轻易实现，中国代表在会上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11月16日，九国委员会开始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

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中国将向大会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其意旨系专在得有规条，俾远东及太平洋方面现存及将来所有之政治经济各问题，可按照该规条有至公平之解决，并一面专在尊重与太平洋及远东有关系各国之权利与正当利益。如此，庶使中国之特别利益与各国之一般利益可得调和矣”。同时特别声明：“照目下情形，中国尤应脱离各国制夺中国自主之行政行为及遏制中国不能得充分国课之一切限制也。”他向大会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是：

第一条，（甲）各国约定尊重并信守中华民国领土完全及政治上、行政上之独立；（乙）中国自愿声明，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之任何部分割让或租借他国；

第二条，中国因完全赞同所称开放门户主义，即与有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之故，故自愿承认该项主义，实施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

第三条，为增进相互间之信赖并维持太平洋及远东和平起见，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俾有机会参预外，彼此间不缔结直接关系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和平之条约或协定；

第四条，无论何国在中国或对于中国要求之各种特别权利、特别利益、豁免权及一切成约，不论其性质若何或契约上之根据若何，均当公布。凡此等要求或将来之要求未经宣布者，均视为无效。其现已知悉及将来宣布之权利或特别利益或豁免权及成约当加以审查，以便确定其范围与效力。其经审定有效者，当使与本会议宣布原则相合；

第五条，所有中国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之行动自由之各种限制，应即时取消，或于情形所许时从速废止之；

第六条，中国现时之成约，其无限期者，概须附以相当明确期限；

第七条，凡解释让与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之条文时，应依照通行之解释原则，所谓绝对照让与国利益解释之方法处理之；

第八条，将来如有战争发生，中国倘不加入，则中国处于中立国地位之一切利权，应完全尊重；

第九条，应订立和平解决条文，以便解决沿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之国际间争议问题；

第十条，关于太平洋及远东国际间诸问题，应预定将来会议时期之条，以便按期讨论，而为各签约国取决共同政策之基础[205]。

中国提出的上述原则，几乎囊括了中国希望解决的所有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但其实质仍在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限制以至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的压迫和束缚。原则中强调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显然迎合了美国的要求，而不符合日本的意愿。为了有利于解决问题，中国代表团在内部讨论中还拟订了各项问题应行讨论的先后次序，即关税、领事裁判权、势力范围、租借地、外国驻兵、邮局、电话及无线电问题，而将中日“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置于最后。他们认为，华盛顿会议的主旨是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山东问题是影响此一关系的重要因素，故美英等国可能向日本施压解决此事，而关税等问题更有关于中国的整体国家主权，但因其牵涉到列强的共同利益，解决将更费周折。他们并不认为此次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将其重点提出，有利于中国今后继续要求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可以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形成一定的道义压力。应该说，中国代表团的交涉战略战术大体是得当的。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是美国在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意在挟其经济实力占领中国市场，进而实现对华扩张的目的。提出这样的原则当然非为对中国的“善意”，而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如时人所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八个大字，纯粹是美国为抵制在中

国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弄出的，他所要求的只是‘有饭大家吃’，并不一定和租借地或势力范围冲突。如今租借地和势力范围都未废除，我们主张门户开放只不过便宜美国罢了，于日本是毫无所损。”[206] 但是，客观而论，这一原则确实不利于日本对华独占性、垄断性、排他性的扩张政策，从而在客观上对弱势中国抵挡强势日本的扩张又有一定的助力。因此，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这样的原则，固有其不得已而为之被动性，但又表现出争取主动的进取性，即以此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力求以迂回方式抑制日本独占中国的扩张企图。对此，美国自然支持，英法等国也没有反对。对于中国提出的原则，英国认为，“其中有不甚妥当者，然大体尚属可行”；法国认为，“可为讨论远东问题之根据，惟颇嫌空泛，宜更提出具体办法”。日本代表认为，此案“不发自美国，而出自中国代表，颇为惊异。惟云该案概括一切，有日本所甚赞成者”。此时日本独占中国的欲望虽强，但尚无独霸的实力，在英日同盟已被打破、日美矛盾又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日本不能或不便公开反对此项原则，故其在会上一方面表示，“无条件或无保留遵守在华开放门户及机会均等之原则”，“并不要求特别权利或优越权利”，另一方面对此显有保留，提出对一些问题“须从长计议”，并反对“因小事之逐节审查而致讨议无谓之延长”[207]。同时还大谈“中国为一极富广之国家，……但天然之富源如窖而不发，置而不用，其价值荡然无存”[208]。但无论如何，“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成为华盛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的总原则。

1921年11月21日，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维持和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三、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的权利。这个草案的前二条只是敷衍中国的表面文章，而后二条才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当日本代表就其中某些词句进行质询时，美方表示，任何人不得破坏他人已得权利，也不影响各国合法的特别利益。日本对此解释表示满意。决议草

案经讨论而获得通过（中国代表因其与中国提出的原则不完全吻合而未投票）。1922年1月中旬，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休斯又二次提出《在华门户开放案》，要求缔约国不谋求本国人民在中国获取商务或经济之优先权利以及有碍他国人民在中国从事商务实业之权利。这是美国的一贯主张，得到了各国的赞同。1月21日，会议通过提案，表示各国不赞成在中国设立势力范围。但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提案，对各国在华既存的势力范围毫无影响，实际上，“在华盛顿与会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所关心的既不是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对中国的保护，而是主要关心如何在这个国家进行稳定的竞争”[209]。

1922年2月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各国签订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公约全文共九条，包括了前述关于中国的四项原则，以及缔约各国不得订立条约侵犯此四项原则；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各国在中国机会均等；各国不谋求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铁路对各国平等开放；尊重中国战时中立；各国不得订立有损本条约各项原则之条约，未与会各国亦可参加本条约。

在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中，中国代表根据事先拟订的方案，陆续向大会提出希望解决的各项问题，其讨论结果为：

一、关于废除“民四条约”问题。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说帖，提出废止该约，认为此约“侵略中国主权、妨碍各国机会均等之处，世界莫不周知”，“实为东方骚乱的种子”，提出“请大会公决”[210]。美国为了迫使日本接受限制其海军数量的方案，曾授意中国代表将此问题提交九国委员会，作为向日本施加压力的砝码，但日本代表认为这是中日之间的问题，反对由大会讨论[211]。而在日本接受了美英提出的海军数量方案之后，美国对此亦不再热心。1922年1月，在九国委员会讨论该问题时，日方称此约有“合法效力”，废约“必影响亚洲、欧洲及其他各国际关系之安定”，同时为避免与美英的矛盾，承诺将其中的南满东蒙铁路借款权等转移至新的国际银行团，也不再坚持在南

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中方则认为，“民四条约”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反对，中国人民对该条约始终视为事实上之压迫，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而且侵犯中国与他国签订条约及华会通过的各项原则，必须废止全约[212]。日本代表的发言被美国代表称许为：“您采取这样的态度，美国方面我可以负责，这个问题不会再提出来而成为喧嚣一时的问题了。”而中国代表的发言刚刚结束，主持会议的美国主席却宣布：“好了，进行下个议题。”[213] 结果，最后只将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了事。

二、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中国代表指出领事裁判权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危害，并以中国司法制度已有实质性进步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重要理由。但各国仍以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为由表示反对，认为不经详细调查，无法“取消现有之条约权”。1921年12月10日，大会通过《关于在中国领事裁判权议决案》，表示“各该国允助中国政府，以便实行其所表示改良司法制度期等于泰西各国之志愿，并宣言一俟中国法律地位及施行该项法律之办法并他项事宜皆能满意时，即预备放弃其领事裁判权”；同时决定组织委员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在办法，以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续”，建议以“适当之方法可以改良中国施行法律之现在情形，及辅助并促进中国政府力行编订法律及改良司法，足使各国逐渐或用他种方法放弃各该国之领事裁判权”，但各国“可自由取舍该委员会曾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214]。中方表示“愿助该委员会予以一切便利，俾得完成其职务”。但此项所谓“考察”迟迟未能进行，而且既然各国“可自由取舍”考察建议，关于此项问题的解决实际仍然遥遥无期。

三、关税自主问题。关税不能自主为妨碍中国独立主权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中国代表顾维钧11月23日在会议发言中所言：“世界各国均有自定关税之权，中国现行关税制度实侵犯中国之主权，兹以中国代表团之名义，应请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215] 中方在会上提出，应将现有关税税率立即提高至12.5%，同时为了缓和

列强的反对，主动提出实现关税完全自主的年限可以讨论（北京政府提出三年实现关税自主，代表团认为有困难，提议为十年），此前实行的最高税率可由各国商定，现行海关制度暂不变动，中国不干涉作为外债担保的关税收入等。但就是这个非常温和的提案，列强也不同意，他们只同意修正税则与调整税率，但税率调整“应尽力避免扰乱现在之经济情形”及“商业习惯”，“应先确实评定”后再予调整；增加的税金应首先偿还外债或用于建设事业等。日本的反对尤烈，连中国税率增加至实收5%也不能同意。经过激烈争辩，1922年2月6日签订了《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决定中国从速切实实行5%的关税税率（后自当年12月1日起实行）；从速筹备废除厘金，在厘金废除前，可另征2.5%的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为5%）；新税则四年后进行修改，此后每七年修改一次；税则修改依照平等待遇和机会均等原则。与会各国同意另行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裁厘加税问题[(216)]。

四、撤退外国在华军警问题。外国驻华军警严重影响中国主权，其中有些有所谓条约依据，而有些则并无条约依据，中国提出外国应撤走没有条约依据的驻华军警，是非常温和而合理的要求[(217)]。但是，列强以所谓中国治安状况不好为由而不予同意。日本代表居然说：“日本派驻军队于中国，从未怀有侵略之目的，或任何非法的侵犯中国主权之意思”，“日本警察对于中国警察不能保护之社会且时加保护焉”。美国代表休斯也质问中国代表说：“吾人所欲知者，乃实际上中国能否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是也。”1922年2月1日，大会通过《关于在中国之外国军队议决案》，授权各国驻华代表，会同中国政府代表，“共同秉公详细调查”有关情况，惟各国“可自由取舍报告书中所载调查结果所有之事实及意见之全部或任何一部”[(218)]。这样，中国的要求实际被否定了。

此外，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取消各国之间或中国与他国之间一切秘密条约、撤销外国在华邮局电台、收回外国租借地等问题。会议议

决，所有与中国签订或有关中国的条约、换文、契约等，一律送大会秘书厅存案，并转送与会各国；外国邮局除设在租界者外，在中国继续保持现行邮务行政及外国邮务总办的条件下可以取消；外国电台除有条约依据并得到中国政府同意者外，其他可由中国出价赎回。租借地问题，日本不同意交还旅顺和大连，英国同意交还威海卫[(219)]，不同意交还九龙，法国同意交还广州湾，但实际上采取了拖延策略[(220)]。

三　华盛顿会议的山东问题交涉

除上述讨论的各项问题之外，华盛顿会议讨论的中国问题中还有不能回避的关键环节——山东问题。巴黎和会结束后，日本虽然以凡尔赛和约为依据，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但中国却并不承认，故其仍然是一桩悬案，而且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还牵涉到美英等国的利益。1921年1月、5月、9月、10月，日本政府先后四次提出与中国直接谈判，解决山东问题，表示愿意按照过去的多次宣言，将青岛胶州湾租借地交还中国，由中国自行开放为商埠，同时日本撤退驻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但却要保留继承德国在山东掠取的一切经济权利，尤其是对胶济铁路及沿线矿山要求中日合办[(221)]。日本之所以再三表示愿与中国直接交涉，用意即在于以此诱使中国间接承认《凡尔赛和约》为有效，并避免美英等国插手，使日本“合法”攫取山东权益。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致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吉田伊三郎的电中称：“山东问题，在理论上中国当局者应谅解我国之提案决非无理之要求，始可达双方妥协之希望。然执迷不悟之中国民，专受某国之煽惑，以毫无知识之理由，罗列种种，力迫当局者强行解决，是以反恐惹起意外之问题。”[(222)]显见日本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胁迫心理。

与日本的主张截然相反，中国要求的是无条件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倘不同意，则将山东问题提交国际公断。因此，中国政府、民众与舆论均反对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1921年11月3日，中

国政府在致日方的复文中说："山东问题，关系中国利害至巨。中国政府急图解决之诚心，实较日本为尤切，徒以日本政府之所依据，与我人民及政府所期望相距过远，故不得不静待时机，徐冀日本之转圜。"复文就日本的无理要求驳称：胶州湾之租借权，日本认为因和约而转移，中国认为由中国宣战而消灭；中国既未签凡尔赛和约，则该约关于山东问题发生之效果，当然不能强中国承认。关于山东铁路路权问题，胶济铁路建筑在中国领土之内，中国参战后，则在中国领土内之铁路，理应由中国自行处分。为了缓和日本的反对，北京政府还提议，胶济路资产日本可得一半，由中国备款赎回[223]。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日本认为中国势将提出山东问题，乃由驻英、美、法等国公使设法活动疏通，并在会内外多方施加影响，反对将山东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而应由中日直接交涉。由于日本的多方活动，美、英当局也都在会外劝说中国，不要"遽行拒绝直接交涉"，否则"将使中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染有不光明之色彩"，而且"以后若日本更变其态度，则日人手中之权利更难收回"[224]。这不仅是日本"疏通"的结果，也是美英都不愿意因为山东问题而妨碍与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国际关系方面达成更大的妥协[225]。1921年11月23日，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美英代表均反对将此列入讨论议程，提出山东问题由中日在会外另行会谈的建议。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休斯警告说："山东问题如提出大会，恐发生不良结果"；"不特使大会不能解决此案，并将妨害友好解决此案之一切希望"。表示美国与英国将居间调停[226]。中国代表又要求先在形式上将山东问题提出大会，然后再行中日直接会谈，后又询问如直接会谈没有结果，可否仍提出大会，但英美代表均不赞成[227]。为此，中国代表向北京政府建议，美英既如此态度，将山东问题提出大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接受美英意见，于解决问题有利。11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施肇基，提出"问题解决后，应提交大会备案，亦极重要，因中国观察鲁案乃国际问题，应得关心本问题各友邦之赞同"[228]。30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表示英美"既有此等劝告，而

英美两国又为华会最重要分子，自当领解其意”[229]。基于美英的态度，中方最后接受了这种可称为“边缘”的交涉方式。

不过，中国民间舆论及社会团体仍然强烈反对这样的交涉方式，认为这仍是变相的直接交涉，于日本有利。11月30日，在美华人团体代表当面质问施肇基，为何接受这样的交涉方式，施肇基回以因有英美代表参加见证，故“此项交涉并不是直接交涉的性质”。在中日交涉开始的当天下午（12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代表又到中国代表团住处，反对与日本交涉，而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坚持赴会，王宠惠对学生说：“不承认英美之斡旋，必失英美两国之感情，强国尚怕孤立，何况柔弱之中国。”[230] 国内一些城市也有集会游行，表示对此种交涉“誓不承认”。在华盛顿的中国谈判代表感受到相当的压力，一度请求辞职，颜惠庆亦表示：“此次太议开会，英美善意调停，情无可却，势成骑虎。……一俟鲁案结束，太议开会，当即引避贤路。”[231] 为了平息反对声浪，12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中日代表在华盛顿交涉的情况，强调无论结果如何，均须交大会公认，并非即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实际上，中日双方都从原先的立场有所后退，最后的结果既非中国要求的由大会讨论，也非日本要求的直接交涉，而是在美英居间调停下，由中日双方举行会外非正式交涉。

12月1日，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会外谈判开始举行。日方代表为外相加藤友三郎、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等，中方代表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英方观察员为前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及驻华一等参赞蓝普森（Miles Lampsen），美方观察员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马慕瑞（J．V．A．MacMurray）与前驻日公使贝尔（Edward Bell）。会议形式为非正式的，无主席，亦无特定议程，而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根据北京政府外交部拟订的鲁案交涉方针，中国的要求是：胶州湾租借地完全交还中国，由中国自行开作商埠；胶济铁路管理权完全归诸中国，资产由中、日折半均分，日本所占份

额由中国定期分年赎回；德国在山东所有条约及合同权利，日本均不为要求；租借地德国官产交还中国；山东境内日军克日撤退[232]。双方在交还租借地及其官产、撤退日军等问题上的讨论尚属顺利，但对胶济铁路路权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与艰难，成为谈判的重点与难点[233]。日方提出，愿在“最初中德铁路协定的同样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并称“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解决方法很简单，在一切有关铁路利益的问题上，只消把日本当成德国的接替者就行了”[234]。日方的主张很明确，即要求胶济铁路由“中德合资”改为“中日合办”，同时由日本接替德国取得因筑路而产生之其他各项特权。中方认为，中国既经对德宣战并为战胜国，德国过去从山东取得之一切权益即不复存在，胶济路及有关权益应由中国无条件收回，路矿由中国自办，日本根本没有成为接替者的资格。日方其后提出，中国既不承认中日合办胶济路矿，日本亦愿交还中国，但须由中国备款赎回。此后双方争执的重点在于中国赎款的数额、付款的方式及任用日本技术人员的问题。中方先是同意以半价赎买，为日本所拒绝；继而表示可以偿还全价，但须扣除日人经营期间所得之利益，并应将中国股份加入计算，仍为日方所拒绝。谈至12月13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日本应将胶济铁路及其全线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二、中国应按胶济路产业之实价赔偿日本，折合计算为53，406，141金马克（约合中国银元2500万元）。但如何交付该款项，以北京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实有困难，日方利用此点，主张由日本贷款与中国赎路，贷款期限为二十三年，期间聘用日人为总工程师、车务长及会计长，以图尽量延长对胶济路的控制年限；中方主张自筹现款赎路，于三年内分六期付清，期间聘日人为总工程师；后又提出以十年为期分期付款，惟五年之后可以一次付清赎回。日方代表嘲讽说，中国政府对现有债务已无偿付能力，为什么竟愿筹现款赎路？中国代表则诘问日方，中国无偿债能力，正是中国不能再借外债的原因，日本为什么偏愿借款给不愿再借债的中国呢？双方代表经多次激烈争辩，形成僵持，并于12月20日后一度中止谈判[235]。

正当在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绝借日款赎路之时，北京政府内阁更迭，12月24日，素有亲日倾向的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2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会见颜惠庆，强硬表示：对于借款赎路事，“倘若中国答以不愿意，则日本政府将必令行代表终止谈判”。29日，梁士诒会见小幡酉吉，表示中国“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议”。梁士诒虽未提借日款事，实则默认之。此决定于12月31日电告中国代表团，代表团接电后表示对北京情形“不得其详。此间形势危急并极不顺利”。美国代表也对北京政府态度的突然转变颇为不解[236]。消息传出，激起国内其他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抗议。从广州孙中山政府到吴佩孚等直系将领，从工、商、学各界到报刊舆论界，纷纷通电、集会、游行、示威，汇成讨梁浪潮，结果使借款主张无疾而终，梁士诒也于不久之后下台。

1922年1月4日，中日会谈重开，此时会议的其他议题已基本讨论完毕，只有山东问题还在僵持，因此美英等国急切希望山东问题早日解决。1月18日，美、英提出新的方案，即中国以债券方式偿付路款，期限为十五年，并可在五年后提前付清，期间聘用日人为车务长。日本予以接受。19日和22日，美国代表休斯与英国代表贝尔福分别会见中国代表，他们告诫说，美英已尽其所能，山东问题必须在华盛顿解决，如失此时机，则不知何时方能解决，若不能解决，中国绝不能以武力驱逐日本出山东。25日，美国总统哈定亲自出马会见中国代表，警告说日本是在美国压力下做出让步，已不可能再让，如中国此次不能解决问题，有失去山东的危险[237]。中国代表遂电北京外交部请示，称“大会行将闭幕，不能再有谈判及迟迴之余地，窃以为所提解决办法未予中国以完全公道，但可得亦不过如此。”[238] 1月23日，中国代表又致电外交部，要求“请照通例电予基等以全权，因此案于本星期内必须结局也”[239]。在美英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认为如此结局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但“较之悬案不结，日本仍居胶澳以及路矿等事”不失为可接受的方案，因此于26日训令中国代表，“如实无商量余地”，则接受此方案；并对外界称：“国务会议，郑重讨

论，一致议决，再电三代表为前后之争执，万一时不我与，竟无商量余地，亦只迁就定议，并照原议报告大会公认，以图结束。”[240] 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终在列强干涉下结束。

1922年2月4日，在经过两个月另四天、共三十六次谈判后，中日代表在华盛顿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和《附约》，主要内容有：一、日本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由中国开放为通商口岸；二、德国所占之公产交还中国，日管时期各种公产之加修，中国予以赔偿；三、日本于六个月内撤退青岛和胶济路驻军；四、青岛海关交还中国；五、青岛日人开辟之盐场由中国赎回；六、德人旧设之海底电缆交还中国；七、日人所设之电线、电台交与中国，由中国给予赔偿；八、胶济铁路产业于九个月内交还中国，但中国允给日本以53，406，141金马克的铁路资产赎买费；付款办法为，中国政府发行国库债券交付日本，于十五年内赎回该路，但五年后中国如有现款亦可提前一次赎回；在未赎回前，用日人为车务长及中日各一人为会计长；九、德人在胶济路沿线经营之矿产，由中日合资公司接办，其中日股数量不得超过华股。《附约》规定，日本承认在山东放弃前中德条约所给予外人之各项优先权，同时，中国政府允许青岛各项公共事业的管理予外侨以适当的代表权。中日双方商定组织联合委员会，解决协议有关细节问题[241]。经过艰难的交涉，尽管在胶济铁路等问题上还留有遗憾，但中国总算大体收回了山东权益。然以此后出任“鲁案”交涉接收委员的陈幹所论：日本“将青岛空名交还，而借以开放内地；将胶济路空名交还归两国合办，而借以发展高徐、顺济，借以窥取中原而割据江北全部”[242]。由此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观察，陈幹所论亦为不虚。

华盛顿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列强调整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利益关系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与巴黎和会一起，形成了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维系列强之间和平竞争关系、减少彼此冲突可能性与激烈性的重要国际关系体系。通过

华盛顿会议，列强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大体平衡的竞争发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可能发生的矛盾及冲突。华盛顿会议对中国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日本独霸远东的可能性被阻止，其对华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有所缓解，“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成为各国对华关系的原则，这主要是列强间势力平衡与互相妥协的产物，但对于中国或多或少还是有有利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当时对中国最具侵略性的日本独占性、排他性与垄断性的侵略势头，尽管这种遏止是十分脆弱而不可靠的；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交涉，争回了部分权益，如提高关税、撤退外邮等，并在山东问题上得到了大体可接受的结果，从而与巴黎和会的空手而归形成了对比，这也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国际地位开始回升的表征，尽管这种回升是缓慢而不稳定的。因此，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所获之成果，应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

华会行将结束时，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中国报纸上撰文称：“虽然君等之所怀，在诉诸世界公论。……讵不知中有数国在远东问题上掣肘，莫能自由。……然美国当局不惮障碍，极望中国能得妥建公正之待遇”；但“在此幕中国欲完全得公道之解决势所不能。各方面不利之祸根犹牢不可拔；但因此一举，中国问题已引起世界之了解，则不能不谓华会之大有造于中国也”。“此后公论所在，决不容一国之独谋，不利于中华如往者之任意侵食也。”(243) 此论当然是表白美国对于华会之功，在中国政界和舆论界也有呼应。2月5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哈定称：“此次华府会议，关于山东问题，备承阁下及贵国各代表友谊赞助，得以解决，消除积年纠葛，巩固远东和平。本大总统不胜欣慰，谨代表中华民国全体国民，特申感谢。”(244) 但是，美英等国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仍表现出牺牲弱国利益，达成强国妥协的自私倾向，从而又给部分中国人留下了不佳的印象。会议期间，有位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写道：华会“最失败者则为吾中国”，“华会原以‘和平’二字相号召……孰意发起华会之美国，与夫参与之列邦，不过因目前彼此国力不完，求一‘暂时和平’之

方法，因是吾国和平永久之希望丝毫不能实现”；会议之决议案，“无非藉‘空名’与‘虚利’之方，为粉饰吾国之计，而仍以各国将来活动之互相谅解为唯一之目标”；“嗣后军国主义之国家自将在被承认之范围之内，奋力实施经济之侵略，以遂政治之野心。长此不已，非仅吾国民生永被剥夺，即门户开放首倡之国家，亦将受人摈弃，酝酿既久，巴尔干半岛流血之惨事，行将再见于东方”[245]。会后，著名学者周鲠生认为：“我国在华盛顿会议所得之结果，不能达赴会所抱之目的，已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列强共奏凯歌，而我无功而返，是不能不归于我国外交之失败也”[246]。而失败的原因，外为列强“假借和平正义的招牌，给本国图谋经济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保全本身利益”，“以保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内为“全国七零八落，没有统一的政府”，“军阀专制影响这次外交也很显著。北京政府被武人勒索得一贫如洗”[247]。2月24日，上海国民外交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否认北京政府及其代表签订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之决议案，认为机会均等主义“无异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侵略之场”，此乃中国“最大之危险”[248]。2月9日和25日，广州政府与非常国会先后否认华会对山东问题条约的有效性。中共则在7月发表的“二大”宣言中批评：“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249]列强不能充分估计中国内部情势发展与民族主义成长的短见，将给他们其后的对华关系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研究者有论：“与美国的初衷相反，华盛顿体制建立伊始就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拒绝和反叛。特别是列宁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以其对中国强大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接受后，这种反叛逐渐在2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反叛华盛顿体制，要求改变中外关系现状的国民革命。”[250]而美国学者则这样评价会议的结果：“这一系列协议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里都促进了亲善，但在中国却不然。令中国人感到极为不满的是，这次会议几乎没有做出任何事情

来削弱现行的外国支配权和废除繁多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大多数政治活跃分子要求列强归还它们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从中国窃走的一切。一项不再窃取的保证只是在既加伤害之后，又加侮辱。”[251]

四　苏俄对华外交的新姿态

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及随之产生的苏维埃新式政权，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俄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动自然也为中国各界所关心。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政变”为题，报道了有关情况。尽管当时的中国政界及舆论界还不能完全理解俄国革命对中国的意义，但中俄关系其后的变化，却是俄国革命发生的逻辑结果。

俄国革命发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内有国内反叛，外有列强干预的严峻形势，其地位并不稳固，远东方面的局势尤其堪忧（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支持白军与红军对抗）。为了稳定远东的形势，同时打破在国际上的被孤立地位，苏维埃政权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表现出与前沙俄政权不同的态度。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首次提出，苏俄可以放弃沙俄在中国获得的赔款等权利，并可由中国提前赎回中东路[252]。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中俄间所订的一切密约与协约，放弃帝俄在华所有特权，放弃帝俄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无偿归还中国，希望与中国就此进行交涉[253]。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由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发出《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函》（即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再次重申上年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除条约事宜，在双方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缔结新约，建立外交关系。苏俄政府在此次宣言中提出了中苏订约的若干具体条件，如中国不应支持俄国反革命派之旧党，并不允许其在中国领土内有所动

作；应将反对苏俄之军队及各团体解除武装；驱逐旧俄驻华外交人员；不得将苏俄放弃之庚子赔款付与旧俄人员。此次宣言，苏俄不仅未提放弃中东铁路之事，而且要求两国订立苏俄需用中东铁路办法之专约[254]。苏俄两次对华宣言表示了苏俄政府的对华外交新姿态，体现了苏俄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的愿望，与列强一向以来欺凌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巴黎和会期间列强对同为战胜国中国的冷酷态度显出区别。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在苏俄提出放弃沙俄在华特权时，前沙俄政府的在华特权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倒台等因素的影响已所余无几，苏俄宣言的实际目的，实为以放弃此等空洞特权为条件，争取中国对苏俄革命的同情、合作与支持，争取中国站在反帝反日及反白军的立场上，以恢复苏俄对仍在日本和白军控制和威胁下的远东地区的主权。而在苏俄实际利益所在的中东路问题上，苏俄自始就是有保留的[255]，1920年成立的远东共和国的“独立宣言”甚至将中东路区视为其领土之一部分，遭到北京政府的抗议[256]。苏俄官员曾经坦白地表示：“俄所深患者，即中东路界内之俄贼，如中国不将霍尔瓦特及旧党一般文武驱除净尽，则俄忧未已，……所谓先订大纲，交换意见，实欲以此事为前提。”[257]北京政府外交部在研究了苏俄宣言后认为，苏俄声明放弃满洲侵略品的表示，“语涉含混，且满洲为我领土，列入放弃权利，尤难索解”；放弃庚子赔款，“目的系在断绝旧党使领接济”；放弃各种特权及租界，“尚难及于在华俄官商，难期见诸事实”；结束俄国及其他国家对华强暴行为并希望中国与俄携手奋斗，“有煽动中国人民仇视协约国及反对政府之意义，不能认为友谊举动”；惟有无条件归还中东路及其附属产业“意尚确定”[258]。但恰恰是这一项，苏俄俟后在谈判中并不承认。曾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俄国人坚持“财政和经济利益”的政策，是中苏外交谈判拖延的主要原因[259]。

苏俄政府的宣言和提议，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未能传至中国[260]。而在外交政策上看列强眼色行事的北京政府，还追随列强之后，参加封锁与干涉苏俄革命的行动。1918年1月11日，北京政府命令张作

霖封锁中俄边境，断绝中俄交通；2月随同协约国一起撤走驻俄公使；8月派遣陆军第九师团长宋焕章为驻海参崴支队长，统军四千人进驻苏俄境内尼古里斯克地区，协助白军与日、美联军“驱战过激派”，“参列联军会议”，奉联军总司令大谷大将令，驻守乌苏里铁路，参加了列强对俄国的武装干涉[261]。在国内，北京政府继续承认沙俄外交使团的合法性，并向这个已经不能代表俄国的使团继续支付庚子赔款[262]；同时，解除中东路“附和过激党之俄军工人等”的武装，镇压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使中东路“所有沿线路政，悉归我军按段驻扎保护”[263]；对于退入东北的苏俄白军谢米诺夫等部，“均为之收容，复许其增募军兵，以图进取，助其运输饷械，以济军用，掩护其侧翼，俾免压迫”[264]。

1920年春，苏俄远东地区的形势发生变化，白军被红军击败，局势趋于稳定。列强于无可奈何之下，开始酝酿自西伯利亚撤兵。因此，北京政府的对俄态度也开始变化。2月间，北京政府宣布自苏俄境内撤回宋焕章部，并将退入东北的苏俄白军一律解除武装。3月通过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收到了苏俄对华宣言正式文本，并开始通过驻苏俄海参崴等地的领事及驻英国、丹麦等国的使节与苏俄接触。北京政府一方面表示此宣言“果否可凭，尚属问题，现正熟加考察”，要求“遇有此类文件，并应注意扣留，以杜乱源”；另一方面决定探询各协约国对俄态度，并取一致行动，同时派人赴苏考察[265]。6月，北京政府委派张斯麐为使者，出访远东共和国与苏俄，与苏方进行非正式接触。张在莫斯科会见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和政府首脑列宁。张在向北京政府报告时认为：“劳农极愿与我亲密，麐等到后，备极优待。……据所提取消一切旧约等条，实与我有益无损。设令拒绝，在我则将失时机，在彼必以我懦不足恃，届时另生他策，结合蒙古，并派员与他国订立条约，协谋中国，为害滋大。”因此，张建议“迅筹对待方针，以免贻误”，并倾向于接受苏俄提议，订立协约[266]。但北京政府此时既有列强的压力，又对苏俄在中东路等问题上的态度不满，尚无意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9月28日下令召回张斯麐

代表团，交涉没有打开局面。与此同时，苏俄外交代表维连斯基也访问了中国。5月27日，新疆与苏俄地方当局签订通商协议，成为苏俄新政府成立后中苏两国间签订的第一个协定[267]。

1920年7月直皖战后，苏俄方面认为，亲日的皖系下台对恢复中苏关系有利；而直系吴佩孚为了对抗日本支持的奉系，也想利用苏俄为己所用。中苏关系的改善出现了新的契机。

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国防部副部长优林1920年6月间曾在买卖城申请来华，但被北京政府以担心“惹起国际间之误会”，“于国际上颇感不便”为由拒绝，令其“尽可就近与地方官接洽”[268]。直皖战后，形势变化，7月21日，中国外交部电告库伦西北筹边使公署，告以如优林“不自居为正式代表，仅以委员名义，与中国接洽商务”，中国政府当予同意。优林获悉此讯后，同意改用“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来华[269]。该使团一行六人于8月26日抵达北京。北京政府对待优林来访议定原则为“表面上则接洽商务，内容则兼及政治”，“政治谈判及完全承认，不能不暂持审慎”[270]。因为列强担心中苏之间的接近不利于保持他们的在华特殊利益，对北京政府与苏俄代表的接触多次提出劝告，勿与优林使团作政治谈判。迫使北京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声明：优林既以商务委员名义而来，中国政府当然仅与接洽经济事务；惟承认过激派政府一层，保证当与各国取同一态度[271]。

为了与苏俄的接触和谈判，北京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姿态。1920年7月，中国方面完全停付向旧俄的庚子赔款。8月，中国政府宣布撤销同日本签订的、旨在反对苏俄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272]。9月8日，外交总长颜惠庆会见旧俄公使库达摄夫，告其久不能行使职务，所辖领馆与俄国侨民也大都不听其命，实际已失去代表资格，授意其自行辞职，同时自行取消所有俄国在华领事资格。库达摄夫仍不愿放弃其职务。9月23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宣布停止旧俄外交人员待遇，同时保护俄侨生命财产，“关于俄国租界暨中东铁路用地，以及各地方侨居之俄国人民一切事宜，应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区长

官妥筹办理”[273]。其后，各地当局派员接收了天津、汉口俄租界；关闭了十九处旧俄领事馆（包括外蒙），并令接收俄人在华特权利益，如封闭旧俄邮局、代管旧俄政府存于中国银行之财产；废除旧俄领事裁判权[274]。

然而，北京政府的举措却为列强所不满。驻京公使团为了维护列强的特权，要求北京政府“保全中俄条约所有之利益，勿使作废”，并要求“以后各项办法请与有关系之国先行协商，以免误会。”北京政府不得不声明，中国对旧俄利益只是代管，并不影响各国在华利益，并将北京俄使馆交外交团代管[275]。10月11日，日、法公使又向各国公使提出建议：“俄国在华之利益，应暂交列强代为保管”。各国公使多表赞同，并以公使团名义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声称：“中国政府万不能永远取消俄人按约在中国所享之利益”，“请中国政府与外交团商定暂时管理俄人在中国之利益办法”。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如下：“俄国领事裁判权当然中止”，而“俄国已宣布自愿放弃的权利，……自无再与外交团另订暂时管理俄人办法之必要。”[276]此后，外交团仍屡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交涉，以维护旧俄在华利益，但旧俄在华利益事实上已被中国逐渐清理，外交团最终亦只能作罢。

在列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对苏俄的态度忽冷忽热，处在矛盾之中。9月16日，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将与优林商议保护远东华侨办法及商务贸易问题，同时则回避了中国与远东共和国的政治关系问题[277]。优林在北京见不到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交涉处于停顿中。10月间，北京政府令中国前驻俄公使、现任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主持与优林的交涉。11月30日，刘镜人在首次会见优林时，提出了中苏双方商谈商务经济问题的四项条件，即苏俄不在中国领土内为任何政治行为之鼓吹，赔偿中国在苏侨民自俄国革命以来之损失，保护远东中国侨民之生命财产，明白处理中国人民在新疆边地及后贝加尔湖各地方所遇种种可憾情事[278]。优林不仅当面承认了上述四项条件，而且于12月13日以公文形式致函外交总长颜惠庆予以承认，但坚持苏

俄对中东路的权益[279]。不过，优林多次求见外交总长而不得，他在给颜惠庆的信中说："代表团在北京居住三月，其结局距开始公同商议与解决部分问题尚远，并未得有何等效果。"[280]结果他只好转而在民众团体和学者中间奔走活动，以获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影响中苏关系恢复的重要障碍之一是中东路问题。旧俄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在十月革命后仍居原位，并于1920年1月声明"对于铁路附近地居住俄人之国家统治权完全担负"，形同"独立"。中东铁路中方督办兼护路总司令、吉林督军鲍贵卿为此向霍氏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中东路区为中国领土，"不容有第二国家施行其统治权"，霍氏"断无担负国家统治之权能"[281]。2月28日，北京政府督办边防事务处指示鲍贵卿，"以现在情形，可以督办及护路总司令名义完全处理中东铁路事宜"。3月15日，鲍贵卿通知霍氏，"克日将东路一切政权悉行解除，由中国照约分别办理"，实际收回了中东路区的行政权[282]。此后在中东路路区"悬国旗，置军警，表面上似觉完善，然铁路营业权及路线两旁之地亩管理权，完全握于俄人之手"[283]。

1920年10月2日，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和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兰德尔签订了《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俄国革命胜利后，道胜银行为了避免被清算，以法国公司的名义注册，并将总部迁到巴黎。依照这个"合同"，中国获得的权益是：一、该行承认按照1896年签订的《东省铁路合同》，自1921年起，将所欠中国的库平银500万两之本利（利息应按息上加息），以铁路债券方式交中国政府，每半年交付一次；二、中国取得中东路的部分管理权，董事会九人中，中方四人，另由中国人任督办，使中方投票权超过董事会半数，同时由中方任该路总稽查；三、中东路限于商业范围内，中国政府得随时取缔路内一切有涉政治事项。但中国所受损失亦十分巨大，因为中国在这个协定中承认，1896年9月7日订立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有效》，即八十年期满时中国才能收回铁路及一切铁路产业，铁路所有决定必须由董事会至少七人同意，方可被执行，这就给了俄人董事以

否决权[284]。在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发表后，中国还和道胜银行签订协定，无异自缚手脚，也给未来的中苏谈判带来了新的问题[285]。此事经传媒报道后，优林对外公开表示，“中东路为俄国领土之一”，此约“实令人难信”，中苏交涉“此后亦难进行”，苏俄对于该约“不认为有效与合法”[286]。

1921年2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苏俄政府，表示对苏俄宣言“本国政府已加注意，而于国际平等及相互之宗旨尤为注意。……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复函希望苏俄对中国在俄侨民“认真保护，以礼待遇。倘本国在贵国之人民能令安居乐业者，则本国政府当信昔日之友好恢复，与中俄人民历史关系再有正式基础，必为日益近矣”[287]。当月，陈广平奉派为驻莫斯科总领事。中国外交部官员在与优林的会晤中，均提出将中东路收回，但优林则坚持中苏合办共管。1921年10月优林回国前，外交总长颜惠庆在会见他时提出：“从前劳农政府首领虽屡次宣言将中东铁路完全无条件归还中国，然在我决不敢抱此过大之希望，故所有前俄帝国政府暨人民所担负该路之建筑费，双方应派专门委员并聘欧美专门人员，会同估定价值，中国政府担任偿付半数。”但优林仍坚持苏俄在该路的“优越待遇”[288]。

影响中苏关系恢复的又一重要障碍是外蒙问题。自1915年以后，外蒙名为“自治”，中国先后派陈箓、陈毅为都护使，驻外蒙首府库伦，享有对外蒙的宗主权。苏俄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乱不已，远东红、白军及外国军队的争战影响到外蒙，使外蒙局势亦处于动荡之中，同时日本亦在通过其代理人谢米诺夫觊觎外蒙，图谋成立包括内外蒙古的所谓“大蒙古国”，以进一步控制西伯利亚。为保持外蒙局势的稳定，中国决定向外蒙增派军队，筹划恢复对外蒙的完全主权，而外蒙内部亦有撤销“自治”的呼声。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提出西北筹边计划，欲以实力经营外蒙。10月底，徐树铮抵达库伦。11月17日，外蒙呈文撤销“自治”。22日，北京

政府以大总统令正式宣布外蒙撤销“自治”，同时声明，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等文件此后“概无效力”[289]。但北京政府实力有限，鞭长莫及，无法真正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扶助外蒙，未能在外蒙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而苏俄白军利用外蒙为反对苏维埃革命的基地，苏俄红军不能容忍，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并危及中国在蒙主权[290]。1919年8月3日，苏俄政府发表《致蒙古人民宣言》，声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有权在没有北京或彼得堡方面的任何监护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同其他一切民族交往”[291]。苏俄同时支持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成立蒙古人民革命党，从事蒙古革命运动。担任经营外蒙的徐树铮不能善用时势，令外蒙倾心内附，而是依赖高压政策的压服作用，结果引起外蒙民众的反感，“自治”声浪又起。直皖战后，徐树铮失势下野，徐世昌于1920年8月15日任命陈毅为西北筹边使，下令“无论京外官署，对于内外蒙古，均应加意抚绥”[292]。然外蒙地处偏远，民情不洽，格于动荡的政局和软弱的地位，北京政府实不能给予驻蒙军队有力的支持。1921年，外蒙形势发生变化。2月，外蒙王公援引白军恩琴部占领库伦，驻防中国军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退出，3月21日，外蒙重新成立“独立”政府[293]。苏俄红军随之进入外蒙进剿，并称派军入蒙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匪徒，而保存中国主权”，“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294]。但事实说明，苏俄的表示不过为纸面文章。5月，白军进攻恰克图，为红军击败。7月6日，苏俄红军占领库伦，随后于16日扶持成立了外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苏俄军队在“苏俄与远东共和国安全之威胁”未解除前不会自外蒙撤离[295]。11月5日，苏俄与外蒙签订《俄蒙友好条约》，苏俄承认蒙古现政府为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双方互派外交代表[296]，外蒙从此实际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受外蒙问题的影响，中苏关系一度趋于停顿。1921年5月，优林奉召回国出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阿格辽夫代理优林在北京的工作。6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英公使顾维钧，请其通过苏俄驻英外交代表转苏俄政府，表示中国对苏俄出兵外蒙“殊难承认”[297]

。7月下旬，优林再度来华，途中他曾到奉天与张作霖会晤。8月间，优林再赴奉天会晤张作霖，提出承认远东共和国、通商、驱逐中东路旧俄党等问题，张表示这些事权属中央政府，请与北京政府讨论，同时提出蒙古问题应予解决，苏俄军队应撤出库伦，双方接触没有结果。

10月初，优林受命返国。在离华前，与外交总长颜惠庆连续三天会谈，主题仍为互相承认、通商、外蒙、中东路等问题，双方各执己见，中方坚持苏俄先自外蒙撤军并解决中东路问题，然后再谈互相承认与通商问题。会谈没有结果。10月6日，优林离京返国。

优林使团返国前后，中苏两国就苏联直接派外交使团来华事续有接触。北京政府几经反复，考虑到苏俄同南方孙中山军政府日益接近的趋向及解决苏俄红军驻扎外蒙和中东铁路等问题，终于10月15日同意苏俄政府派代表到北京。12月12日，苏俄派遣的裴克斯（又译巴意开斯）使团到京，试图打开中苏谈判的僵局，建立中苏正式外交关系。12月16日，外交总长颜惠庆首次会见裴克斯，双方讨论了外蒙与中东路问题，重点尤在外蒙问题。裴克斯表示，苏俄驻军外蒙是因“蒙古政府请求”，“一俟中政府与蒙古政府协议有结果时，敝国军队，彼时即行撤去”[(298)]。1922年3月，俄蒙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事被证实。4月26日，中国办理接收库恰事宜委员李垣约见裴克斯，表示此事“显系违背信义，并侵犯我领土主权”，要求苏俄立即自外蒙撤军。裴克斯答称，苏俄在外蒙驻扎军队，是因为防范白党，保持外蒙治安，并得蒙人请求；同时声称：“敝政府从前声明，所有旧帝政府时代各条约取消一语，并非谓根本取消，因尚有研究之余地。……而中东路亦归贵国管理，此乃贵国之误会。”李垣据此谴责苏俄方面“屡次失信”，“无诚意”。5月1日，外交部向裴克斯声明：“今劳农政府乃忽背反前言，擅与蒙古私订条约，此等行为直与俄帝政府时代之对华如出一辙。须知蒙古系属中华民国领土，久为世界所公认。劳农政府此次私与订约，既自食前言，复违反公理。本国政府实难容忍。为

此，特向执事严重抗议，所有劳农政府与蒙古私订无论何种条约，中国政府绝不承认。”但苏俄方面坚持其与蒙古订约并不违反1915年中、俄、蒙三方协约，如三方协约须修改，可由缔约各方共同与议[299]。外蒙问题由此成为影响中苏关系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裴克斯到京后，曾向北京政府递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信函，表示对中东路苏俄“准备于中国允行若干必要之保障条件下交还中国”，而在此一问题未解决前，“俄国在中东路之一切权利应仍保留不受侵害”[300]。正因为这些原因，裴克斯使团到京后，虽然中方曾表示可以“不日开议”，但结果“则仍在渺茫之中”[301]。在苏俄方面，此时则声称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仍然有效，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订约，但不再提无条件废除旧约的事。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苏俄政府对联络吴佩孚颇感兴趣，由此亦推动了与北京政府的谈商。6月29日，苏俄向中方提出派越飞为新任使华代表，得到中方同意。7月间，裴克斯使团结束在华使命。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15日，越飞与外交总长顾维钧首次会见，顾维钧请苏俄撤退外蒙驻军，“如苏俄能迅予办理，则其他各问题，亦必迎刃而解”。越飞强调外蒙问题应与其他问题同样讨论[302]。25日，越飞向北京政府提出正式节略，提出“重行磋商关于双方之一切问题，俾两国间成立政治、外交、经济、商务上适当之关系，以符两国人民所互相希望之缔交连合之意响”。节略还表示，两国先应讨论政治、经济关系之根本原则，订立条约，恢复外交关系，其余细则等等，可有特别委员会或使领代表办理。从而回避就具体问题作出承诺[303]。顾氏回忆说：“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顾氏向内阁和吴佩孚汇报后答复越飞：“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304]北京政府的答复使越飞大失所望。

9月2日，越飞致外交部节略称：“本全权代表现向贵政府再行提议磋商关于双方之一切问题，以期中俄两民国间成立善邻之睦谊，而符两国人民之心理。”同时表示：“今劳农政府主张始终一致，故仍欲悉照以前二次宣言之原则与中国开议。”9月7日，外交部回复越飞节略称：“贵代表拟请会议中俄一切问题，用奠双方邻好关系一节，中国政府可表同意，并准备与执事开议。所望会议时贵代表一本劳农政府迭次对华宣言之精神及贵代表此次节略所述之旨趣，彼此竭诚谈判，俾所有悬案得资圆满解决，一切问题自可顺利进行。”[305] 北京政府改变了先前不与苏俄商谈政治问题的立场，同意就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正式谈判。

越飞来华希望达到中苏订约并建交的目的，但顾维钧坚持以苏俄撤退外蒙红军、交还中东路主权为先决条件。在双方商谈中，越飞坚持，中东路主权虽可归还中国，但管理权应归双方；蒙古问题应按1915年三方条约规定，外蒙实行自治，宗主权归中国方面，但双方均不得派兵进入外蒙；庚子赔款事还待解决。上述主张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相距甚远，中方当然不能满意，表示对俄蒙条约等“概不承认”，谈判没有进展。越飞还声明：“倘以此项宣言为俄国完全放弃其在中国利益之结果，则未免太不公允。盖俄国在其宣言书内虽曾声明抛弃帝制政府之侵略政策，并允抛弃俄国以此项政策在中国所得之权利，惟此项问题未经中俄自愿协商解决以前，则俄国在中国之权利尚未失效，且其合法而且公正之权利亦不能因此项宣言而消灭。即如东路所有权，倘由俄国让与中国人民之时，则俄国对于该路之利益仍不消灭。”越飞还要求中国政府取消中东路管理处，逮捕中东路总工程师，与苏俄协定组织临时管理机关。而中国政府答以“此事根本办法，仍以该路完全移交我国为最扼要”[306]。苏俄方面多次重申，中东铁路为俄国财产，北京政府如漠视苏俄利益，苏俄政府将放弃以前宣言所提各点，并否认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路的说法，北京政府收到的宣言文本为误本[307]。1922年9月，越飞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中东路“为中俄间主要问题之一”，对中东路股东

在哈尔滨开会表示“严重抗议”。北京政府则回答，此事“事关路务，完全为该路内政”[308]。当越飞见到报载大总统令，中国将于1923年1月起停付俄国庚子赔款时，当即声明：“凡关于中俄间彼此有关系之各问题，若由单方独行解决，绝对不能容纳”；“在中俄会议未开会以前，关于中俄彼此有关系之一切问题，中政府所有议决及办法，俄政府断不承认。”外交部答称，此次停付系根据1920年的成案办理，当时“俄国并未有所抗议”，而且与苏俄宣言精神“亦属完全相符”，俄代表“抗议之理由，本部不能了解，殊难认为充分”[309]。

10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大总统提出说帖，认为“苏俄曾迭次宣言，对华表示亲善，越飞此次请求开议，又有一本前项宣言精神会议解决一切问题之声明，揆情度事，似亦未便深拒。……佥谓不如因势利导，试与周旋，先议悬案，再议通好，万一积年悬案，竟获结束，于我未尝无利。”[310]但“先议悬案”的谈判方针，显与苏俄的想法距离甚远。9月间，越飞去长春，与日本会谈苏日关系问题。10月初越飞回到北京后，即以养病为由不作公开活动，中苏交涉停顿。11月7日，在北京纪念苏俄十月革命五周年宴会上，越飞发表书面讲话，竟称“为了中俄的共同利益，从库伦撤兵实为不可能的事”；“中东铁路问题乃俄人希求承认其合法权益的唯一问题。……俄人也深盼其在该路的一切权益，将获得中国的谅解与承允，并予以必需的保证”[311]。此时，日军已自西伯利亚完全撤退，苏俄在远东的地位得以巩固，也不再如前那般急迫地希望打开中苏关系。

越飞在北京期间，“与各团体联络往还，甚为活动”，宣传苏俄的主张，批评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主张东方民族团结，并暗中津贴报馆，为其宣传。北京政府外交部认为“亟应特别注意，以免煽惑”，并因此密函内务部，要求“密饬京师警察厅，仿照从前优林到京时办法，选派有知识之干探，于该俄人等出入地方，秘密侦查，细心访察，……一面将越飞一切举动，随时报部，以凭查核”[312]。因谈判停滞和越飞企图联络孙中山的举动，吴佩孚对苏俄提出抗议，还要北

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检查苏俄代表越飞在华往来函件，吴佩孚与苏俄的关系似在恶化。而越飞则预备南下会见孙中山，另辟苏俄对华交涉的途径，并以此向北京政府示威。1923年1月13日，越飞会见外交总长施肇基辞行，施希望中苏“即行开议”，而越飞以“医师因本代表久病不愈，力劝赴南养病”为由，表示谈判可在三月以后。实则如越飞对顾维钧所言：“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项建议。”[313] 1月16日，越飞离京南下会晤孙中山，随后并与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示苏联已将孙中山作为重要的交涉对象。此后，越飞以养病为由滞留日本，其职务由达夫谦代理，他建议将中苏谈判移至莫斯科举行，但为中方所拒，中苏谈判又陷于停顿中[314]。

---

(1) 《政府公报》，1920年10月31日。

(2) 彭昌鲁编：《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215—217页。

(3) 《群英会闭幕后之所闻》，《顺天时报》，1921年5月6日。

(4) 《湘赵对宪审查表示态度》，《晨报》，1921年5月10日。

(5) 《卢焘自治与他省不同》、《西南现势与统一前途》，《大公报》（天津），1921年6月4日、5月13日。

(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20—223页。

(7) 《政府公报》1921年5月31日。

(8)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1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438页。

(9)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5页。

(10) 君侠：《层出不穷之靳揆难关》，《大公报》（天津），1921年7月16日。

(11)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2)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1年5月1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46页。

(1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14)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8卷第7号，第132页。

(15)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1年5月1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46页。

(16) 《行将破产之北方财政》，《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12月29日。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编：《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1年5月15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18) 《靳揆宣布大政方针》，《大公报》（天津），1921年6月3日。

(19)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4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26页。

(20) 李纯自杀事先并无征兆，颇为突然，根据其遗书，他自称“纯为病魔，苦不堪言。两月不能理事，贻误甚多。求愈无期，请假不准，卧视误大局误苏省，恨己恨天，徒唤奈何，一世英名，为此病魔失尽，尤为恨事。以天良论，情非得已，终实愧对人民。不得已以身谢国家，谢苏人，虽后世指为误国亡身罪人，但问天良，求心安。至一生为军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后人公评。事出甘心，故留此书以免误会而作纪念耳”（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11页）。据时人论：“李纯向以谨厚著名，问舍求田，最工心计，厚封殖而长子孙，是其唯一的人生观，……自立遗嘱，处分后事，遣散妾媵，捐出兴学，世人因其措置井然，不类神经错乱忧愤自杀者之所为。”（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71页）又据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和江苏省长齐耀琳致北京政府电称：“该巡阅使两月以来卧病奄缠，每以时局纠纷，统一未成，平时述及声泪俱下。近更疚忧愧恨，神经时复错乱，本月十二日忽于卧室用手枪自击，伤及右肋乳下，不及疗治，登时出缺。手写遗书，缕述爱国爱民，夙愿莫酬，不得已以身谢国。”（《政府公报》1920年10月16日）实际李纯自杀究为何因，众说不一。有说法是他患有“精神失常症”，对政局前途感到“悲观绝望”所致。但此时李纯刚刚出任苏皖赣巡阅使，又被授以“英威

上将军”称号，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似无自杀之动机。因此，当时也有风传是其部将、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阴谋弑上以代之。真相究如何，还待研究。

(2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0年10月30日、11月9日，1921年1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14、417页。

(22) 《新闻报》1921年4月6日。

(2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18页。

(24)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23—224页。

(25) 此前，在张作霖的一再保荐下，1921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勋督办热河林垦事宜。但任职令发表后，全国舆论大哗，各界纷纷通电反对。张勋慑于舆论的压力，未敢就职。

(26) 《张培梅致阎锡山电》（1921年6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60页。

(2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92、795页。

(28) 《张培梅致阎锡山电》（1921年6月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64页。

(2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32、237—238页。

(30) 时人谓，“闻阎师长自到潼后，始觉陕局头绪复杂恐不易制，颇抱隐悔”。（《张培梅致阎锡山电》1921年6月2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83—484页）据说阎相文留有遗书称：“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无颜对三秦父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第1075页）这是继李纯之后督军自杀的第二件疑案。有关阎相文的死因有多种说法：一说阎诱捕民军将领郭坚，并在8月13日以“啸聚土匪久为民害”为由枪杀之。其后，陕西靖国军逼阎驱逐刘镇华，以于右任为省长。刘已疑阎，因令镇嵩军备战，而靖国军又与各方结合图阎。阎四面受敌，不堪负担，遂自杀。一说冯玉祥在河南不能相容于吴佩孚，吴因令冯随阎入陕，而冯以皖人同乡名义结纳吴新田对付阎相文，阎死与此有关。而阎死后，又是冯得到陕督之职，故有此说。真相究如何，尚待研究。

(31) 陕西民军的发展始于护法运动，以“靖国军”自称，胡景翼、于右任先后任总司令，冯玉祥入陕时，“靖国军”已发展到七路共三万余人。

(32) 剑公：《冯玉祥辞职与陕局》，《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

22日。

(33) 《蒋百里在北大演讲裁兵》，《晨报》，1922年5月18日。

(34) 《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11月2日。

(35) 《姜桂题反对奉军到热河》，《晨报》，1921年7月17日。

(36) 《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1月8日，《晨报》，1921年5月29日。

(37)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4月1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25页。

(38) 《吴佩孚军略·书牍全编》第3编，世界书局1923年版，“书牍”第21页。

(39) 《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8月21日。

(40) 《商震致阎锡山电》（1920年8月7日）、《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0年8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385、376页。

(41)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697—698页。

(4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年（1921）7至12月份，台北“国史馆”1980年版，第284—285页。

(43)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44) 《对庐山会议之南北态度》，《时报》，1921年9月11日。

(45) 《庐山会议与各方面》，《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9日。

(46) 《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15日。

(47) 《卢永祥揭开庐山假面目》，《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21日。

(48) 《慎防不露面的人》，《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7日。

(49) 《庐山会议与各方面》，《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9日。

(50) 《庐山会议之反响》，《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14日。

(51) 《旧国会议员反对庐山会议》，《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7日。

(52) 《讨吴佩孚》，未见出版地与出版者。

(53) 《载沉载浮之庐山会议》，《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16日。

(54) 《吴佩孚力持庐山会议》，《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19日。

(55) 《曹张吴赞成庐山会议之见解》，《晨报》，1921年10月14日。

(56) 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上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75页。

(57) 武德报社：《吴佩孚》，第71页。

(58) 《晨报》，1920年8月18日。

(59)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1年8月10日、16日，第156—157页。

(6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7页。

(61)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0年版，第14页。

(62) 《致国会电》（1919年8月7日）、《复林森吴景濂函》（1919年8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105页。

(6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690页。

(64) 《四总裁宣言书》（1920年6月3日），《革命文献》第51辑，第295—296页。

(65) 《军政府公报》，1920年12月4日。

(66) 因为唐继尧对护法国会迁滇不积极，护法国会一度又决定迁往重庆，但因四川内战重起，计划告吹。不久，讨桂战争胜利，护法国会遂重回广州。

(67)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76页。

(68)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14—15页。

(69) 21日，朱执信在调解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冲突时以身殉职。

(70) 《陈炯明之哀的美敦书》，《晨报》，1920年9月20日。

(71)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101页。

(72) 《陆荣廷关于粤事第二次通电》（1920年9月28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四），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0页。

(73) 《莫荣新声明军事结束前不交卸督军职布告》（1923年10月9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四），第142页。

(74) 《岑春煊等关于解除军府职务电》（1920年10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75) 《莫荣新关于取消自主率将士退出广州通电》（1920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57—658页。

(76) 《政府公报》，1920年10月31日。

(77) 《军政府公报》，1920年12月4日。

(78) 《军政府特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令》（1920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10页。

(79) 《在广东省署宴会的演说》（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29—430页。

(80) 《军政府通告重开政务会议继续执行职务电》（1920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12页。

(81) 《军政府公报》，1920年12月4日。

(82) 《地方自治实行法》（1920年3月1日）、《内政方针》（1920年11月下旬），《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20—223、432—435页。

(8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30页。

(84) 《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系统表附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18页。

(85) 《在广州军政府的演说》（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50—451页。

(86) 《军政府孙陈两派之暗斗》，《晨报》，1921年1月22日。

(87)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49—550页。

(88) 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89) 陈炯明此时倾向于“联省自治”，实际即图割据广东，个人专断。他的亲信叶举、洪兆麟等以及国会中的褚辅成派均赞成“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孙中山为摆脱陈炯明的掣肘，将广州划为直辖市，直隶于军政府，任命孙科为市长，并在粤军中培养许崇智的力量。但实际上，因为陈炯明的力量在广东占绝对优势，孙中山上述举动收效甚微。

(90) 《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革命文献》第51辑，第307页。

(91) 《曹锟等反对广州旧国会另拟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通电》（1921年4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21—22页。

(92)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4月14日，唐绍仪和唐继尧在私下会见谈话中，“对这次选举持反对态度”，但因选举已是既成事实，他们均“不愿提出异议”（《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研究》第1辑，第379页）。

(93) 《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532页。

(94) 《国务院致曹锟等电》（1920年10月3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4册，第224页。

(95) 《大总统下令荡平群盗》，《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7月6日。

(96)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149页。

(97) 《顺天时报》，1921年7月22日。孙中山认为沈鸿英是势蹙归降，惟其人“反复无常”，“万难深信”，指示李烈钧控制桂林，对沈保持压力。而沈鸿英此举确非真心投附粤方，实为在粤方大军压境时的缓兵之计，他既未与陆荣廷真正脱离关系，而且还在9月间派代表赴岳州谒见吴佩孚，表示输诚投效（《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58页）。

(98) 《陆荣廷宣言退职之通电》，《大公报》（天津），1921年7月23日。

(99) 陆荣廷虽然下野，但仍然企图卷土重来，并向直系求援，成为直系在南方的政治盟友。1922年7月，陆荣廷由越南重返广西，占据桂西龙州，9月被北京政府任为广西边防督办。吴佩孚称，陆“始终赞成统一，而对于驱孙，则尤愿尽力，虽自出督师，亦所不辞”；认为“欲定粤驱孙，或防止联治，实不无借助于陆之处”；同意陆的要求，资助其款项10万，子弹100万粒，枪2000支，以“督促出师，当可早日助奠粤乱”。曹锟认为，陆“翊赞统一，合驱孙文，不胜欣快”，同意拨付款项及枪弹（《吴佩孚致曹锟电》，1923年7月18日，《曹锟致吴佩孚电》，1923年7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634—635页）。1923年11月，陆自龙州至南宁，就任广西善后督办，1924年1月30日又被曹锟特派为暂署督理广西军务善后事宜（原督办林俊廷于1923年2月19日就任，23日兼代省长，此时调任钦廉边防督办）。3月，陆荣廷与沈鸿英交战。吴佩孚闻讯颇为恼怒，认为沈“不学无术，被人播弄，致其部下有藉口防地开动回桂之事”；“迭经分电两方谅解制止”，以免“牵动大局”。见《吴佩孚致陆锦密电》（1924年4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51页。6月，沈鸿英与陆荣廷停战，23日李宗仁通电要求陆荣廷下野。7月16日，李宗仁就任定桂军总指挥，黄绍竑就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两军组成定桂讨贼联军，与沈鸿英部合作，击溃陆荣廷部。10月9日，陆荣廷通电下野，前往上海，从此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广西形成李宗仁、黄绍竑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

(10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年（1921）7至12月份，第250页。

(101) 邓野：《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0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268页。

(103) 《鄂人反对省长之激烈》，《晨报》，1920年9月2日。

(104) 夏寿康接任省长，王占元起初“坚不同意，迭电请假，以事挟制”。其后又嗾使部下第一师师长孙传芳等对夏“肆行要挟，声言不准接印，速自为计，否则大兵一到，不可测也”。《湖北旅京同乡会揭发鄂督王占元指使所部孙传芳以武力阻止夏寿康接省长印电》（1920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66页。夏因此在湖北不安于位，在任不过半年多，即在1921年3月让位于刘承恩。

(105) 南宫后人编：《湘军援鄂战史》，民强书局1921年版，第2页。

(106) 南宫后人编：《湘军援鄂战史》，第3页。

(107) 《鄂各界代表施洋致湘人泣恳书》，《大公报》（长沙），1921年7月4日。

(108) 彭伯勋：《湘军援鄂的前因后果》，《湖北文史资料》第6辑。

(109) 《直系军人之湘军失败原因谈》，《申报》，1921年9月7日。

(110) 据驻汉口日本总领事报告，王占元曾派鄂军参谋余范传赴湖南，“疏通一切”，“并携带现款十万元，子弹二十万粒，军米二千石，以王督之名义，赠与湖南赵总司令。当经赵总司令明白宣示，湘军决无出兵攻击湖北及有意侵略之举动，务将此意转达王督，万勿疑虑”。《汉口日本总领事向北京日公使报告鄂督王占元与湘总司令赵恒惕互相勾结情形电》（1921年7月7日—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军事》三，第469—470页。

(111) 《但懋辛致张冲、喻培棣等商议援鄂电》（1921年7月8日）、《刘湘致川军将领征询援鄂意见电》（1921年8月3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259页。

(112) 张方严：《1921年直军援鄂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06页。

(113) 张方严：《1921年直军援鄂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06页。

(114) 《湖北自治军将士兵民及各团体代表通电》（1921年7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72页。

(115) 《总司令援鄂之誓师辞》，《大公报》（长沙），1921年7月29日。

(116) 《总司令援鄂之誓师辞》，《大公报》，1921年7月29日。

(117) 《鄂督王占元报告湘军攻鄂应战情况密电》（1921年7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77页。

(118) 《湘军援鄂战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119) 《王占元致阎锡山等电》（1921年7月2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00页。

(120) 《王占元通电》（1921年8月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04页。

(121) 南宫后人编：《湘鄂战史》，民强书局1921年版，第23页。

(122)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8月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05页。

(123) 《王去萧来之鄂讯》，《大公报》（长沙），1921年8月16日。

(124)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39—240页。

(125)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43—244页。

(126) 《湘鄂战争之变幻》，《时报》，1921年8月22日。

(127) 《总司令致黎黄陂等电》，《大公报》（长沙），1921年8月19日。

(128) 彭洪铸：《湘鄂川鄂战争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59页。

(129) 《张国熔报告湘鄂川战争经过及赵恒惕向吴佩孚乞和等情致王怀庆呈函》（1921年9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87页。

(13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1年8月23日，第326页。

(131) 彭洪铸：《湘鄂川鄂战争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63页。

(132)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4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133) 《专电》，《申报》，1921年9月7日。

(134)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9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26页。

(13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5页。

(13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56页。9月11日，湘、鄂、赣三省代表在岳州商定，长江上游总司令率本部兵力驻扎岳州，维持治安，一切行政、司法及地方团体事业毫不干预，均仍由湘省主持办理。

(137) 《鄂督萧耀南报告川鄂战争北军由败转胜情况密电》（1921年9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84页。

(138)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9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30页。

(13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60页。

(140) 《川鄂战争之激烈》，《时报》，1921年9月27日。

(141) 《吴佩孚指陈川湘战事责任呼吁息争电》（1921年10月2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65页。

(142) 《鄂督萧耀南报告川鄂战争北军由败转胜情况密电》（1921年9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85页。

(143) 傅渊希：《川湘援鄂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32页。

(144)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56页。

(145)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后，驻岳州直军多被调回北方。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复任总统，以“统一”自任，6月22日下令：“现在湘岳地方业已安谧，前驻岳州及在湘军队着即撤防，由警察维持秩序，毋庸再行驻兵。”而直军此时亦无意再驻岳州，遂与湖南当局商定，划岳州为中立地带，由警察维持秩序。赵恒惕为此派人赴保定，与曹锟、吴佩孚订立了撤防条约。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81页。

(146) 《总司令部昨日茶话会纪事》，《大公报》（长沙），1921年9月7日。

(147) 张方严：《一九二一年直军援鄂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13页。

(148) 梓生：《奉直战争纪事》，《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第61页。

(149) 王也扬：《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

(150) 关于“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及其间之论争，请参阅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等论著。

(151) 《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52)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153) 程道德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9页。1919年8月26日苏俄《真理报》与《消息报》发表的第一次宣言，没有将中东路无偿归还中国的内容；但该宣言于1920年3月正式转交中国时，仍有该项内容。在第二次宣言中，苏俄政府提出了若干具体

条件，如中国不应支持俄国反革命派之旧党，并不允许其在中国领土内有所动作；应将反对苏俄之军队及各团体解除武装；驱逐旧俄驻华外交人员；不得将苏俄放弃之庚子赔款付与旧俄人员。此次苏俄不仅未提放弃中东路事，而且要求两国订立苏俄需用中东铁路办法之专约。

(154) 1920年3月，中国收回中东路区行政权；7月停付旧俄庚子赔款；9月停止旧俄外交人员待遇，接收天津、汉口俄租界及俄人在华特权，废除旧俄领事裁判权（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290—291、298页）。这些收回的权益在1924年被中苏条约基本确认。

(155) 维经斯基（1893—1953），曾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

(156) 根据俄方的报告，《新青年》杂志是由俄方资助出版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9页。

(157) 马林到上海前，荷兰当局已将此事通报给驻华使馆，并由他们通报北京政府，马林“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务必不使之入境”。《荷兰驻华公使致荷兰外交大臣函》，1921年7月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58)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9页；《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8页。

(159)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一大”的召开，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如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请参阅有关论著。日本学者石川桢浩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有关中共创建的史实、研究中的不同论点及相关资料有详尽之考辩，亦请参阅。

(160)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21页。

(16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成立初期，日常经费支出多依靠国际的支持，也有义务遵守国际的决议，听从国际的工作安排。中共成立的第一年，中央机关共支出17655元，其中自行募捐

1000元，国际协款16655元。直到中共“三大”时，陈独秀仍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168页。

(162)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49页。

(163) 《发刊词》，《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164)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6、50页。

(165)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页。

(166) 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有了发展，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工业协进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等，但影响不如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

(167) 在当时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罢工中也有基本未得胜利者，如1922年10月到11月的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关于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请参阅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8) 《载德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要求劳动立法等情报告》（1922年9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49页。

(16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17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页。

(171)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4—45页。

(172)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173)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74)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175)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76)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0年10月10日，第277页。

(177) 《扬松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7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97页。

(178)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页。

(17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页。

(180)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0页。

(181)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96页。

(182) 《颜惠庆日记》第1卷，1918年12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页。

(183) 《中德协约》（1921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954—958页。

(184) 罗罗：《中德关系之未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0号，第5—6页。

(185) F.M.Simonds：《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东方杂志》第18卷第23号，第17—25页。

(186) 英日同盟原为对付俄德的扩张而订，规定如缔约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双方应互为支援，故就理论的可能性而言，如美日间发生战争，英国将支持日本，这使美国极为不快，故力图拆散。英日同盟于1921年期满，日本希望续约，但未如愿。

(187) 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生效，但因中国未签字，故山东问题在法律上仍未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在1月、5月、6月三次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的要求，并以归还胶州湾、撤退胶济路沿线军队为诱饵，以换取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但遭到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因此不敢直接与日本交涉，回文予以拒绝（张一志：《山东问题汇刊》下册，第195—198、208—209、241—245页，引自吴沧海：《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台

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研究生论文，1972年，第41—43页）。而在此前后，皖、直两系关系紧张，北京政局动荡，亦使政府无从考虑交涉事。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败北，直系掌握北京政权，与皖系的日本背景有异，更使直接交涉难以进行。

(188) 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4—205页；吴沧海：《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86—89页。

(189) 盖平、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8页；黄惟志：《华盛顿会议提倡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合刊，纪事栏。

(190) 《中国被邀参加华盛顿会议有关文件》（1921年7月—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452—454页。

(191) 时人对中国代表团的评论是："全权代表全向驻外公使里头选择，多半不十分了解本国实际的情形和对外关系的全体。小代表则一味瞻徇情面，帝制派也要，亲日派也要，军阀派也要，官僚派也要。""中国代表里边，不但熟习美英日各国情形的太少，即真知本国一切实际状况的人也不多。这固是国家人才上一个大问题，然而当局不知延揽人才也是一种毛病。因此临时急抱佛脚，各事都无条理，外面一有风波，更是天旋地转不知何去何从了！"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第324—325页。

(192) 《就出席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代表资格的宣言》（1921年9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5—596页。

(193) 《新政府否认北庭代表》，《民国日报》，1921年9月8日。

(194) 12月7日，广州政府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解决中国问题计划书，要求列强撤回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实行公开外交，保持中国领土、经济与行政的完整，解决山东、满蒙和西藏问题，取消一切租界、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撤走一切驻华军队，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赔款，取消在华邮局、电台等。除了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之外，上述要求与北京政府向华盛顿会议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大同小异。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195) 曾琦：《第三国际党之华盛顿会议观》，《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第111页。

(196) 陈独秀：《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新青年》第9卷第

5号。

(197) 黄惟志：《华盛顿会议提倡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合刊，纪事栏。

(198) 《外交大会今日代表会》、《各界联合会致大会电》、《工界无不疾首北政府》，《民国日报》，1921年11月19日、12月3日，1922年1月8日。

(199) 《国民外交联合会对于华盛顿会议中国提案之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油印件，特件外312号。

(20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0页。

(201) 《远东周论》第18卷第1期第3页，引自蒋相泽：《中国与华盛顿会议》，《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202) 《中国被邀参加华盛顿会议有关文件》（1921年7月—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52—454页。

(203) 《驻英顾公使电》，1921年7月16日，《秘笈录存》，第333—334页。

(204)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1年10月31日），《秘笈录存》第388页。

(205) 各论著对各项原则文句之征引互有出入，此处据《外交公报》1921年第6期“条约”第34—37页、谭天凯《山东问题始末》（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秘笈录存》第398—400页的文字互相参照而录引。

(206)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45页。

(207) 《美京曹参事电》（1921年11月17日），《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1月21日），《秘笈录存》，第402、406页。

(208)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60—161页。

(209)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64、142页；［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210) 《外交部关于废除二十一条问题说帖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612页。该书注明，此说帖原件无时间，根据有关文件对证为1923年3月之件，但根据此帖内容判断，应为成于华盛顿会议时。

(211)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98—199页。

(212)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201—209页；《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114—116页。1922年11月和1923年1月，北京国会众、参两院先后议决“民四条约”无效。3月10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声明：“所有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已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并撤回所保留各项外，应即全部废除，并希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办法，及关于民国四年中日条约及换文作废后之各项问题”。3月14日，日本复照声称，中国“违背”国际信义，擅自废除“成约”，日本决不承认。见《外交部为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照会》（1923年3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613—614页；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213)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208页。

(214)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232页；《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条约及议决案》（1922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60—474页。

(215)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72—73页。

(216)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72—73页；《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条约及议决案》（1922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60—474页。

(217) 1921年12月25日，吴佩孚曾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称：“华会提出撤退驻华外兵案，乃千载一时之机会。现据驻防各军电称，对于外人生命财产担负完全保护责任，敢请贵部转电华会代表，务期达到取消，设立委员会议案，实行撤兵为要。”《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0—271页。

(218)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260、263、265页；《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议决案》（1922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60—474页。

(219) 威海卫租期至1923年期满，而且军事价值有限，英国再予保留意义不大。因此，英国在1921年12月向中国表示，可以在适当条件下交还威海卫租借地。但在交还前须解决若干问题，如准许英国兵船于夏季不加限制使

用威海卫港，存储军需物品，进行海军训练，外侨参与市政，并希望中国政府允准建筑铁路之便利。英国建议设立中英委员会，解决上述问题。《英国代表白尔福关于英国拟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事致中国驻英代表施肇基函》（1922年2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913页。1922年9月，中国派梁如浩等代表中方，英国派翟尔士等代表英方，成立中英委员会，商议交还威海卫事宜。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迟迟未能定议。威海卫直到1930年才最终交还。

(220) 会后，法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法使馆称："华盛顿会议时法国代表之倡议，原冀各国一致进行，今日本对于旅顺、英国对于九龙均无交还之意，法国对于本国舆论及在政治与实际上之利益，势须兼顾，容由主管各部详细讨论后，再将交还广州湾条件通知贵使"。《驻法使馆关于法国交还广州湾案致外交部咨》（1922年3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77页。广州湾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最终交还。

(221) 《驻日本胡公使电》（1921年9月16日），《秘笈录存》，第345—346页。

(222) 《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抄存日本驻华公使馆与日外务省互通关于山东问题谈判情况电译件》（1921年8月—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166页。

(223) 《外交部致施公使朱代办电》（1921年11月3日），《秘笈录存》，第383—385页。

(224) 《驻美施公使电》（1921年9月18日），《秘笈录存》，第351—352页。

(225) 美国曾表示，中日可在会前谈判解决此问题，不必列入华盛顿会议的议题。《驻日本胡公使电》（1921年7月22日），《秘笈录存》，第322—323页。

(226) 《美京施代表电》（1921年11月25日），《秘笈录存》，第409—410页。

(227) 太平洋会议档4732、4725、4994号，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08页。

(228) 《外交部致施公使电》（1921年11月28日），《秘笈录存》，第411页。

(229) 太平洋会议档岁字第198号，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

109页。

(230) 何思源：《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第61—63页。

(231) 叶遐庵：《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20页。

(232)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1年11月21日），《秘笈录存》，第413页。

(233) 中国代表团顾问黄郛主张先提出胶济路权问题，从难处入手，免为日本的拖延政策所误；施肇基等则主张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更为明智。施的意见被采纳。《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6—227页。

(23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7页。

(235) 参见《山东问题始末》第5、6章；《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4—234页。据顾维钧回忆，中国代表当时“在向国内非官方各方面询问，中国能否轻易而迅速筹集此项资金时，答案令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当时各方承诺募捐数额已超过四千万元，但“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这些诺言都有政治色彩，向许诺者收集捐款就极其困难了”。“正因为政府自知无法筹措如许款项，才指示代表团原则上接受贷款协定，但要努力协商，尽量缩短期限。”《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8—229页。

(236) 《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29日—1922年1月4日），《秘笈录存》，第482—484页。据当事者回忆，其时中国代表不明所以，“接电后张皇失措”。金问泗等：《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232页。

(237) 《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66、169页；《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22日—25日），《秘笈录存》，第495—497页。

(238) 太平洋会议档第410号，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70—171页。

(239) 《施肇基等致外交部电》（1922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58页。

(240)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2年1月26日），《秘笈录存》，第497页；叶遐庵：《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70—171页。

(241) 1922年4月29日中国批准该约，5月23日日本批准该约，6月2日两国互换批准书，条约生效。6月29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方由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王正廷负责，日方由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负责，12月5日结束。11月5日议定《山东悬案细目协定》，12月5日议定《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规定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及公产于12月10日移交中国，日本军队于此后20日内撤尽；中国为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公产及赎回日本盐场，向日本付赎金1600万日元；胶济铁路及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于1923年1月1日移交中国，中国向日本付赎金4000万日元；两者均以国库券付之。《外交部存“山东悬案细目协定”》（1922年11月—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179—199页。

(242) 《陈幹致吴佩孚》，陈隽、佟立容编：《陈幹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0页。

(243) 《美国芮恩斯（施）致中国人民书》，《民国日报》，1922年2月1日。

(244) 《大总统致美国总统电》（1922年2月5日），《秘笈录存》，第501页。

(245) 贾士毅：《华会见闻录》，第257—258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

(246) 鲠生：《华盛顿会议结果》，《太平洋》第3卷第5号。

(247)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323、329页。

(248) 《电请美参院否决九国公约》，《民国日报》，1922年2月20日。

(249)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6页。

(250)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有资料可为此论之佐证。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有人就国内外重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其中提出：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结果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497人认为俄国是中国之友，107人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认为俄、美均非中国之友者有226人，而认为俄、美均为中国之友者为12人。“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排美联俄开始成为主流”。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89页。

(251) [美]迈克尔·谢勒著，《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8页。

(252) Whiting，Allen S.，*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 pp．28-29．

(253)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9页。1919年8月26日苏俄《真理报》与《消息报》发表的该宣言，没有将中东路无偿归还中国的内容；但该宣言于1920年3月正式转交中国时，仍有该项内容。以后越飞与加拉罕来华时，否认苏俄宣言中有该项内容，从而使中东路问题成为中苏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

(254) 《苏俄劳农政府代理外交委员长加拉罕送交关于放弃帝俄与中国所订各约通牒事致中国军事外交代表张斯麐函》（1920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30—731页。

(255) 1918年1月18日，苏俄外交部与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的首次正式接触，即提出“清理中东铁路事甚紧要，拟请中国政府组织中俄混合委员会，俾清理中东铁路问题”。24日，刘镜人的秘书与苏俄外交副人民委员兼远东股股长伏时涅新斯基会见，伏氏提出中东铁路“在俄视为政治关系”，“再三筹思，似非两方派员合办不可”（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28、32—33页）。可见苏俄自始即无将中东路归还中国之意。

(256)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59页。1920年4月，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成立名义上独立的远东共和国，亦称赤塔共和国，作为与占领太平洋沿岸的日军之间的缓冲地带。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议，远东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服从于”苏俄，“一切原则性外交措施和声明均须经俄共（布）中央或外事人民委员会核准”（见李嘉谷前引书第61页）。1922年日军撤离西伯利亚后，当年11月远东共和国并入苏俄。

(257) 《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致外交部电》（1920年4月2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258) 《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致外交部电》（1920年4月23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4页。

(259) [英]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260) 1920年3月，北京政府收到苏俄宣言的正式文本后，此宣言才为中国公众所知，公众舆论多表欢迎态度，认为这是苏俄对中国的善意，要求北京政府接受苏俄的建议，建立中国与苏俄的新型关系。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2—91页。

(261) 《杨典钦等关于参加武装干涉俄国革命驻崴支队长宋焕章应予褒扬致陆军部呈》，1923年1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714—716页。北京政府曾声明："此次出兵系赞同联合各友邦之义举，而以尊重俄国领土与主权为目的，决不干涉俄国内政。一俟贯彻此目的，即当撤退全部军队。"《民国日报》1918年8月26日。

(262) 十月革命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12月决定暂缓支付俄国的庚子赔款，但遭旧俄公使库达摄夫的抗议，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驻华公使亦要求中国继续支付该赔款并存于道胜银行。1918年1月，中国恢复向旧俄使团支付庚子赔款。5月，北京政府再次决定暂缓支付该赔款。8月，在旧俄公使和日本、法国的抗议下，北京政府又决定恢复支付。

(263) 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在中东路沿线组织响应，1917年12月初成立了以柳金为主席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并要求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交出一切权力。12月26日，黑龙江当局派兵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缴械，递解出境，中国军队进驻中东路沿线。参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28—334页。

(264) 《国务院致外交部函》（1919年2月2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9—50页；《参战处关于日本美国干涉俄国革命发生矛盾中国应行采用政策稿》，191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01页。

(265)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8、第10号，第135页。

(266) 《张斯麐等自莫斯科致边防处、外交部电》（1920年9月18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80页。

(267) 根据新疆当局与苏俄签订的协定，商定双方互设商务兼交涉机关；货物进出口照新疆统税章程纳税；人民发生民刑诉讼各事，均以住在国法律裁判。《伊宁会议定案》（1920年5月27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77—78页。

(268) 《晨报》，1920年7月2日。

(269)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中国外交总长电》（1920年7月18日、2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99—100页。

(270) 《外交部俄约研究会第六次会议录》（1920年8月24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02页。

(271) 《代理部务次长会晤法柏使问答》（1920年8月13日），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内幕》，第127页。

(272) 1921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公使互换照会，声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及基于协定续订各附件，“均自是日起，完全失效。”《外交部关于签订及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经过致各省通电》（1921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644页。

(273) 《外交部关于停止帝俄驻华使领资格及其待遇与俄国使馆等来往文件》（1920年9月—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42—746页。

(274)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90—291、298页。

(275) 《外交部关于停止帝俄驻华使领资格及其待遇与俄国使馆等来往文件》（1920年9月—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47、749页。

(276)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91—292页。

(277)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137页。

(278) 《驻俄公使刘镜人会晤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1920年11月30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18页。

(27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733页。

(280)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函》（1920年11月23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16页。直至1921年5月，优林才与颜惠庆首次会见，其时他的使命已近结束。

(281) 《中东铁路督办、吉林督军鲍贵卿致国务院等电》（1920年1月20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42页。

(282) 《督办边防事务处发中东铁路督办吉林督军鲍贵卿电》（1920年2月28日），《中东铁路督办、吉林督军鲍贵卿致大总统等代电》（1920年3月17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47、350

页。

(283) 《外交部主事夏维松报告视察中东路情形及意见书》（192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65页。

(284) 《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1920年10月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74—376页；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第324—326页。

(285) 经手签订该约的交通部过后亦认为，此约“非根本办法”，“将来俄政府对于此项续订合同难免不生异议。俄国地大物博，虽经扰乱，终必恢复。本部以为，东省铁路问题仍须与俄政府磋商，始有根本解决之希望”。《交通部对中东铁路问题的意见》（1921年），《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79页。

(286) 《晨报》，1920年10月6日第2版。

(287) 《外交部关于复苏俄劳农政府对华宣言书致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电》，1921年2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32页。

(288) 《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1921年10月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87页。

(289) 《政府公报》1919年11月23日。

(290) 1920年11月10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以白军窜入外蒙，中国军队不能击退，并请苏俄军队协助为辞，照会中国外交部，谓苏俄将派军队进入外蒙，辅助中国军队击退白军，一俟白军扫除净尽，苏俄军队“立即撤回”。北京政府认为，“蒙疆系我国领土，俄匪窜扰地方，我军已次第进剿，可期肃清，并无向他国请求助剿之举。俄政府借词越俎，从中有何作用，殊可疑虑”，要求外交部对此“严词阻止，并将毋庸请援情形，切实告知，以杜窥伺”。《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往来电》（1920年11月—12月），《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32—434页。

(291) 《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59页。

(292) 《政府公报》1920年8月15日。

(293) 有关研究，请参阅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6年版；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版。

(294)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致中国外交部电》（1921年6月1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36页。

(295)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p．169．

(296) 《俄蒙修好条约》（1921年11月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62—463页。

(297)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246页。

(298)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272页。

(299) 《办理接收库恰事务处关于交涉归还库恰事致外交部有关文件》（1922年2月—5月），《外交部关于俄蒙通商与撤废苏俄在蒙兵卡问题与苏俄劳农政府来往文电》（1921年6月—1922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809—810、798—799页。

(300)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俄政变》（1921年）中东铁路篇，第482页。

(301) 《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23页。

(302)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23页。

(303) 《劳农代表越飞致外交总长顾维钧节略》（1922年8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34页。

(30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7页。

(305) 《苏俄代表越飞致中国外交总长函》（1922年9月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77页。

(306) 《外交部关于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与苏俄劳农代表团的来往文件》（1922年11月—1923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83—785页。

(307) 《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二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87、93—95页；《外交部关于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与苏俄劳农代表团的来往文件》（1922年11月—1923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86—788页。中方所引俄方宣言内容系1920年3月3日苏方交中国驻伊尔库斯克领事馆转致北京政府，该宣言为法文，由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西伯利亚及远东事务全权委员杨松签署，并经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证明抄写无误。同时，苏俄还将该宣言递交给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邵恒濬和边防处驻哈尔滨官员张斯麐。但1919年8月26日苏俄《真理报》与《消息

报》发表该宣言时，删去了有关归还中东路的内容。苏俄代表团亦称，该宣言俄文原稿、英文译稿及收入公文汇编里的文本均不载归还中东路事。（《外交部关于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与苏俄劳农代表团的来往文件》，1922年11月—1923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89、793页；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46—47页）关于苏俄对华宣言的文本问题，请参阅方铭：《关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薛衔天：《试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容变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李嘉谷：《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问题》（《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4期）。

(308) 《劳农代表团与外交部往来节略》（192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775页。

(309) 《外交部关于庚子赔款事与苏俄劳农代表团交涉的有关文件》（192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828页。

(310)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71页。

(311)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85页。

(312)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40—344页。

(31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7页。实际上，越飞曾对苏联政府不承认对华宣言中若干提法的态度提出过异议。他在给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信中说：“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如果我们在对内政策上还交出一些重要经济阵地，那就更是如此。”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仍指示越飞：“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关于蒙古问题，应由俄中蒙协议解决；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我们的一些特权”。越飞还提出，“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但托洛茨基表示：“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放弃帝国主义要以放弃我们的财产权为先决条件。”从而否定了越飞的意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1923年1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5、200页。

(314) 关于1920年代的中苏交涉，王聿均的《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与李嘉谷的《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有详尽之叙述，请参阅。

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直系当政

第一节　直奉矛盾的激化

一　靳阁垮台与梁阁登场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因其势力的大体平衡而形成了共治北京政府的局面，但军阀派系的团体利益和扩张意识，注定这种“共治”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直系以其军事实力战胜皖系，认为奉系的贡献有限，不甘与奉系分享北京政权，摆出了凌驾于奉系之上的态势；奉系亦有问鼎中原的企图，在助直倒皖之后，其向关内扩张势力范围，染指中央政权的野心日渐明显。直奉双方虽然还勉强维持着对北京政府的共治格局，但私下里都在勾心斗角、纵横捭阖、整军经武，各有图谋，力图超越对手，独占中央政权。1921年的援鄂战争，使直奉双方原本脆弱的平衡向着有利于直系的方向摆动。张作霖在援鄂战争期间曾经电请北京政府，请缨南下援鄂，目的就是为奉系“在长江下游树一根据地”[(1)]。但直系岂能容奉系染指长江地盘，直军援鄂的结果，夺得湖北地盘，占据两湖要冲，控制京汉全线，实力大为增长。吴佩孚得到两湖巡阅使的任命，成为同曹锟、张作霖并肩的显赫武人与实力人物[(2)]，从而大大增强了直系对于北京中央政治的发言权，也引起了奉系的强烈反应，直奉双方的矛盾由隐而显，逐渐激化。

直奉矛盾发展的最初表现，就是对北京政府控制权的争夺。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是直皖战后直奉双方共治妥协的产物，靳云鹏本与皖系有较深关系，直皖战后因缘际会当上了阁揆，为了维持其政治生

命，对直奉双方都不敢得罪，只能看直奉的脸色行事。但随着直奉矛盾的发展，靳云鹏的态度使奉系感觉其对奉“表面虽予尊崇”，但实则有“扶直抑奉”之嫌疑，靳云鹏的处境从此越加艰难，在直、奉两强的夹缝间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加以财政困难，无力开支，靳内阁的地位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3)]。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不宽裕，靳云鹏内阁成立后，财政状况更是江河日下。国内战争频仍，灾荒四起，各地大小军阀需索无度，用款之处所在多有，催款之电日日发至，就连直接支配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人，也在不断向北京政府催款，政府深以为难，应对无门。外债因主要抵押品已用尽而无处可借，内债“合计总额超出三万万元，历年本息积压甚巨”，“各银行饱受旧债之累，不复能承受”。北京政府的财政甚至窘迫到“使馆经费亦久不汇寄，致各外使借债度日，实不成体统”[(4)]。靳云鹏任内换了三任财政总长，还是无法解决财政困窘之局。值此之际，1921年11月发生的中、交两行停兑风潮，更凸显出北京政府财政之困窘，并对北京政局的演变发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成立较早、实力较为雄厚的两家主要银行，并因有较多政府参股而成为准国家银行，担负着为北京政府筹资放款的任务。正因为两家银行的官商特质，时因“筹垫军政各款为数太巨，以致周转不灵”，兼之日本为在华盛顿会议上逼中国就范，有意制造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之谣言，“谓中、交两行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现在政府不能按期付还债款，是政府已不能维持，即两行亦将不能自立。……于是外人共管之说随之而成，外国银行从前收用中交钞票者乃一律拒绝收用”[(5)]。消息传出后，影响到商家和普通民众对中交两行发行的钞票价值的信心，自11月16日起，主要在北京与天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并波及上海、汉口、济南等大中城市。天津中国银行“提存兑现约百万元，行力不支”。由于事发突然，银行准备不及，中、交两行一度限制兑现，天津每人限兑10元，“人极拥挤”，更增加了市面的紧张气氛[(6)]。为安定市面，平息风潮，11月18日，北

京财政部电令要求“凡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一律收用，毋得拒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出紧急办法，要求中、交两行在两星期内恢复无限制兑现，高级负责人不得出京，大额现洋不得运出北京，官家收入发饷概须通用钞票，各界不得散布各种捕风捉影之谣言，“遇有拒绝两行钞票之人，无论何界何人，无不立予严惩”，同时派出警察沿街巡视稽查[7]。经此严厉之动作，人心渐定，风潮止息。

在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中，掌握着交通银行大权及大量金融资源的交通系起初听之任之，不予置理，甚而主张干脆停兑，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仅反映出交通系对早先靳云鹏排斥己方人物入阁的怨恨，而且背后还有奉系支持的影子，反映出奉系因为与直系的矛盾，正在寻找干预北京政治的时机，而中、交停兑风潮恰时逢际会，成为奉系倒阁之手段。奉系的下一步，则为利用徐世昌与靳云鹏的矛盾，借徐之手赶走靳云鹏，改组北京政府，扶植中意的人物上台。

徐世昌和靳云鹏同与皖系有深厚关系，但靳与交通系有隙，而徐与交通系通好，府院关系时有龃龉，“府院同床异梦，徐氏故无时不欲乘机倒靳也”[8]。徐世昌的总统之位来自于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直皖战后因直奉妥协而得以暂保，但随着直系势力的坐大，对徐的总统之位形成直接的威胁，使徐世昌对直奉矛盾的态度开始偏向于奉系，以延续其权位。当中、交停兑风潮发生后，交通系在奉系支持下据以倒阁，徐世昌也乐观其成，借内阁人事问题向靳发难，从而形成了以奉系为后台，以交通系为吹鼓手，以徐世昌为直接运作者的三方共同倒阁运动，而直系因靳云鹏并非己方人物，本无所爱，靳又对解决直系军饷等等问题无能为力，遂对其不愿施以援手，靳阁倒台的命运由此注定。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辞职通电，向靳云鹏施加压力。交通系干将叶恭绰此前到奉，见张作霖言：“总统本有去靳之意，因靳召集新国会，实为曹谋，如张入京去靳，以梁士诒组阁，则国会召成，张当然被选总统。”[9] 张作霖为之动，9日电致徐世昌表示支持。12日，

张作霖由奉天到天津，14日再到北京，表示“此来绝不干涉政治”，但“对于政局上发生之风潮及政府各方面之一般的意见，彼甚愿斡旋一切而化除之”[10]。曹锟闻张作霖到京，亦于19日到京对张言：“内阁不宜更换，我等疆吏不应干预中央之事。”张言：“此系总统意思。”曹邀张同见徐世昌，徐言：“责任内阁，我无成见，惟翼卿（靳云鹏）实不相宜。”[11] 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下，虽然靳云鹏与张作霖有姻亲关系，与曹锟是换帖兄弟，还是吴佩孚的恩师，但夹在直、奉两大派系的利益诉求之中，左右腾挪无方，实已无法再干，17日辞职赴津，徐世昌遂顺水推舟，于次日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开始组建新阁的运作。

靳阁垮台后，徐世昌认为，“非于财政上有办法，政治上有手腕之人，不能起死回生”，乃属意由其老关系、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利用其掌握的金融资源，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交通系一向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从拥袁世凯称帝，到拥徐世昌为大总统，梁士诒都是主角之一。此时梁士诒亟图入主北京政府，过把阁揆瘾，并得到了奉系的大力支持。“奉张与旧交通，实已联合。奉欲攫交通权，旧交通欲攫内阁权，日内正积极进行”，故张作霖“力荐梁”[12]。不过，早先徐世昌询其意见时，他“以在北方则两大军阀对峙，中部则长江各督不一致，西南又另立总统，此时出而问政，殊非易易也”而“婉谢之”[13]。及至靳阁风雨飘摇，梁认为时机成熟，便在11月10日离香港北上，于月底到京，摆出了接任之势。

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对梁士诒组阁颇不以为然，吴担心以奉系的武力得到梁士诒的财政支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对直系大为不利，故主张由王士珍组阁，或以颜惠庆代之[14]，并告直系各省督军，“慎防梁士诒组阁”[15]。但未等吴佩孚布置周全，靳云鹏已经去职，徐世昌即邀梁士诒组阁，并与张作霖共同请直系首领曹锟入京相商，以示对曹之尊重。曹锟的政治敏感度不及吴佩孚，且以为梁士诒组阁事木已成舟，到京后未表反对。12

月24日，徐世昌即任命梁士诒为新任国务总理，交通系干将张弧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奉系出身的鲍贵卿为陆军总长，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奉系及其支持的交通系显然控制了内阁的大权，从而使直奉矛盾因此而激化。

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之初，因“既握揆席，又占财交两部，踌躇满志，如愿以偿”。他提出了三大政策方针：一、树立外交政策；二、活动金融经济；三、消弭内战[16]。但在实行方面，他的做法离此甚远，因为“消弭内战”显然是梁力所不能及者，“树立外交政策”则因其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同意“借日款赎路”的外交决策而广受批评，“活动金融经济”无非举债而已。梁士诒虽有“财神”之誉，但面对北京政府庞大的财政亏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国内主要银行均认为政府“无确立财政整理之计划，惟以滥借为能事，以致各银行号因之资金空乏，受累无穷”，不愿再借款于北京政府，使梁士诒无法靠借内债而解决财政危机。梁士诒只能铤而走险，低声下气地向以外国银行团为主的中外银行团提出巨额借款要求，以盐余为抵押，以新债还旧债，主要是偿还到期的各项短期借款，并以余款作为政府开支。外国银行团提出，“近年以来政府将盐余押借无数小债，抵押无度，致发生紊乱状况。稽核总所及银团方面均感不便，此后不可再蹈覆辙，请备函声明，此后不再用盐余借债”。为北京政府所首肯[1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922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与中外银行团签订“九六公债”借款合同，借款总额9600万元，以未来关税实行切实值百抽五后增加之收入偿还（关税未加前或不敷应用时，仍以盐余偿还），主要用途为偿还各项内外短期公债[18]。不过，此项借款虽成，无非以新债还旧债，对直接改善北京政府的财政困境并无多大裨益，反而引来直系的强烈反弹，被攻击为“挖肉补疮”，“丧心病狂”，“为维持私人银行之利益”，并为“垄断政权、植党贿收，而利用此公债以移花接木者”。2月9日，吴佩孚发出通电，直指此债是为“某当局伙开之东陆、大中等银行，历年均经营政府借款，现若如数归还，实不啻收回私债”[19]。同时，梁士诒上台后，在政府各部门广为安置交通系人

马，把持各个实权部门，在长江以南地方谋划任用奉系人马替代直系，赦免直皖战后被“褫夺官职，免职讯办”的皖系军人如段芝贵、曲同丰等，表现出与奉系合谋并联合皖系与直系对抗的意图。“如此举实行，时局将急转直下，而直系势力，不免大受影响”[20]。从而引发直系的强烈反弹，也为直系所不能容忍。吴佩孚的心腹幕僚白坚武即认为，“或将以此引起奉直战机”[21]。

二　梁阁被攻的台前幕后

还在梁士诒上台之前，直系首领吴佩孚即表示反对，并威胁“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22]。果不其然，梁士诒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验证了当初吴佩孚之担心，“张（作霖）的发言权高到极点，直系在中枢的地位几降为零”[23]。这当然为直系尤其是吴佩孚所不能容忍，“大局翻腾”自不可免。吴佩孚先以梁士诒为主要攻击对象，发起倒阁运动，但他深知梁与奉系的关系，故明为攻梁，实为攻奉，反对梁士诒的行动本身已经反映出吴佩孚对张作霖的强烈不满及其准备与奉系决裂的决心。

吴佩孚发起倒梁阁的由头是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日交涉。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中，强迫中国借日款赎回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的胶济路，以继续控制这条山东的主要交通干线，然中方坚持自筹款项赎路，以摆脱日本的控制。正当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却传出梁士诒在会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时允其以“借日款赎路”的传闻[24]，从而给了吴佩孚利用民意倒梁的绝好机会[25]。

1922年1月5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不过十日有余，吴佩孚即发表公开通电（“歌电”），打响了倒梁的第一炮。电称：“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

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电文表示要与全国父老“群策群力，急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吴佩孚此电既出，轰动朝野，又以其为公开通电，市井皆知，使梁士诒处于不能不辩白的尴尬处境。6日，梁士诒发出“微电”（发电日期倒填为5日），故作姿态，表白自己对胶济路亦“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7日梁再发通电及声明为自己辩解，称：“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借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26)

梁士诒的辩解非但未发生作用，其倒填日期发表通电的做法，无异于授人以柄，吴佩孚攻其“做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因此“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伪”；“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自8日起，吴佩孚连连发表公开通电，痛责梁士诒外以借款卖国，“铁案确凿”；内而起用曹、陆，“以辅助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声称“各省疆吏及各界团体，既皆有请公去位之表示，公亦必不肯拂逆疆吏与民意，而恋栈贻羞。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也。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吴佩孚电中还表示：“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矛头暗指支持梁士诒的奉系，对奉系也构成了挑战与压力。还在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吴佩孚即密电各地直系将领，请求他们

的支持，以形成一定的声势。1月6日，吴佩孚在致苏、赣、鲁、鄂、陕、豫等省督军电中称："梁阁突然实现，所蓄阴谋甚多，包藏祸心，勾结关外，扰乱长江，设不迎头痛击，则塞上风云，江汉波涛，汹涌而来，后患不堪设想。某因此奋作前驱，首先通电揭示，祈各一致声讨。"[27] 故当吴之讨梁通电发表后，直系将领纷纷响应，鄂督萧耀南通电称，吴电"义正词严，切中时弊"，自称"识见浅薄，原不敢越分言事，第以兹事关系国权，未便缄默"[28]；齐燮元等通电称，"梁氏入阁以来，种种倒行逆施，至于此极，不第中外大为失望，亦决非全体初料所能及也"；"若竟悍然不顾，依然恋栈，则是愿与国民宣战，国民虽愚，亦必力筹相当之对待"[29]。 一时间，梁士诒成为直系必欲推倒的对象。

吴佩孚与梁士诒之间的电报战，你来我往，一攻一守，成为1922年初北京政坛的大事。在吴佩孚凌厉的电报攻势下，民意舆论沸腾，此时，梁士诒究竟对日使说了些什么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吴佩孚成功地利用民意，将自己塑造为"爱国者"，将梁士诒打扮为"卖国者"，使梁处于很难辩白的不利地位，倒梁还是保梁也就成了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此对于直系以后用以攻奉，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进行舆论动员亦有相当之益处。1月13日，梁士诒发出"元电"，称自己向未主张借日款赎路，并未就此事训令华会代表，将外界攻击称为"流言迭起"、"误会滋多"，指责这些言论"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之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并表示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对筹款赎路"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绵力所及，尽当担任筹借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资倡始"[30]。即便梁士诒如此"慷慨"，但其"卖国"形象已成，此电仍然无法挽回其声誉之损失。

吴佩孚对梁士诒大加攻击，使梁的支持者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对吴攻梁之目的，张作霖亦心知肚明。早在1月1日，吴佩孚与梁士诒的电报战尚未开打时，张作霖即致电徐世昌，称华会办法"其间并未

参加梁阁之意见。是梁氏对于此案既未有单独之主张，即不得指为有若何之作用”[31]。为以后出面为梁辩解预留余地。吴佩孚发动攻梁后，张作霖先是致电梁士诒，“请其不可灰心”[32]。后又特意致电徐世昌，为梁曲加辩解，认为吴佩孚对梁士诒“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打击”；请求徐世昌“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33]。此时，“吴使（吴佩孚）攻击梁阁日见激烈，决无转圜余地。梁揆意态镇静，作事仍前积极，毫无退志。元首（徐世昌）亦以年关在即，华会将闭，不愿遽易内阁，奉天屡为新阁缓颊”[34]。梁士诒内阁似乎还有继续维持的余地。

吴佩孚攻梁的本意即为攻奉，故当张作霖出面为梁辩解后，吴佩孚更是不依不饶，在1月中旬发动新一轮电报战，矛头直指梁士诒，要求其立即下野，以此向梁的后台张作霖示以眼色。1月13日，吴佩孚在致鄂督萧耀南的电报中指示：“梁氏如果恋栈，联合各省，所辖之财交，用人行政，收归自主。”[35] 19日，吴佩孚与苏、赣、鄂、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联名致电徐世昌称：梁士诒“以洪宪罪魁，为国民共弃”；“孤行己意，罔恤人言，上负元首知遇之明，下违亿兆希望之切。既犯众怒，即属公敌”；“应请我大总统乾纲独振，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进而又威胁说：“倘贤奸不辨，忠悃莫伸，则佩孚等仰体元首苦衷，俯顺国民公意，万不获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36] 23日，吴佩孚又致电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告其梁氏“非常坚决，万不肯去云云。似此挟制元首，目无法纪，长此跋扈恣睢，势必危及至尊，摇动国本。我公既掌北门管钥，有拥护元首之责，巩固中枢之任，应速行使职权，以武力强迫梁士诒迅速去职，以安元首而定人心”[37]。可见吴佩孚已下了不得已时以武力倒梁的决心。同时，吴佩孚还给曹锟、张绍曾和直系各督军去电，言称倒阁后“阁事听元首主持，惟命是遵”，表示自己无意对组阁问题说三道四，以减轻倒阁的阻力[38]。

在直系吴佩孚倒阁的强大压力下，梁士诒备受攻击，无法再干，

上台不过一月，即于1月23日称病请假，离京赴津，由颜惠庆再度代理总理职；但梁士诒也未明确表示辞职；显对奉系支持仍持期望，并为自己复出留有后路。梁士诒黯然而去，使其后台奉系大失颜面。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攻势，张作霖十分恼怒，他不甘就此退让，公开站到前台为梁士诒辩护。1月30日，张作霖公开致电徐世昌，强硬声称："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惩，梁阁尚有何辞。倘事为子虚或涉误会，则锻炼周纳，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信，其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倘彰纪不明，是非莫辨，国民人心不死，爱国必有其人。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39]。张作霖此电既出，表明直奉矛盾已趋于公开化，为了准备与实力强于自己的直系决裂，张作霖开始联络皖系与南方广东政府，酝酿成立奉、皖、粤"三角同盟"共同抗直。2月1日，直皖战后皖系仅存的大将、浙督卢永祥发表通电，提出如有梁阁欲借日款之举，"不惟梁总理个人应负责任，即全体阁员亦应公同负责"；要求徐世昌"将总理梁士诒经办鲁案、赎路情形，迅饬查明，详为宣布"；"若不亟为宣布，则外间不明真相，国人何所适从"[40]。此电实际呼应了张作霖的主张，奉皖携手合作以对直的同盟雏形正在形成。

从吴佩孚发动倒梁阁的运动以后，直系对外表示的态度疾言厉色，剑拔弩张，一时间风云四起，大有战端将起之意。但梁士诒有奉系的支持，如何应对张作霖的挑战，对直系亦非轻而易举之事。在直系内部，曹锟的态度一直较为和缓，加上他与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关系，对奉系不似吴佩孚那般强硬外露、咄咄逼人。吴发起倒梁运动后，1月9日曾有电告曹："梁倒填日期之微电已经自认，我方倒梁原为救济外交，外无意见，请强毅镇静。"但曹锟态度谨慎，并有电致吴佩孚，吴碍于上下关系，只能复电表示，"默体尊指，不为操切"。曹锟毕竟资望高过吴佩孚，而吴对曹也一向表示尊重，曹既主对奉留有余地，故吴在对外猛烈攻梁的同时，也在私下里数次向奉系首领表示，"勿为外人挑拨，疏通误会"；"讨梁原为救国，直奉并无意见，拒

听浮言”。吴还向直系各督表示，“奉直亲睦照常”，以释他们可能有的疑义。1月30日张作霖通电发表后，吴特意致电直系各省督军，要求他们不要与张争辩，以免节外生枝。

2月初，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诸将领集议，不赞成与奉系决裂，并面训吴佩孚谨慎行事[41]。3月10日，吴佩孚针对外间“奉直两方将以兵戎相见”之议论，发表通电称：一、反对梁士诒，“乃反对其举国共愤之媚外政策，非反对其组阁”；二、“佩孚服从曹巡阅使，为国人所共知，对于张使抱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能反对也明甚”；三、“内阁失败，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此不能以佩孚之反对梁氏，终为奉直间别有问题者也”；四、“奉直元气也，内阁股肱也。股肱有疾，方欲进药石以救之，讵有自戕元气之理”；五、“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足以证明谣言之不足信，稍有智识之人，当悉为挑拨者另有作用，我奉直当局，亦何至为其所愚耶”[42]。吴电明示和解，实际不过是敷衍曹锟的面子，并非吴之本意，事实上也不能约束吴的行动。就在吴发出拥曹锟、张作霖电前数日，3月7日吴佩孚上呈大总统并通告各省督军，以财政部长张弧在发行“九六公债”中徇私枉法为由，“请明令罢黜，交法庭严追吞款，没收私产”[43]。其后直系各督一拥而上，纷纷发出通电，责张弧“处心积虑之阴险，实无有过于此者”；表示“若非立予罢斥，提交法庭判定罪状，实不足以快海内之心”[44]。吴佩孚一手策划导演了打张倒梁攻奉“盐余借款大参案”，在吴支持下，由代理司法总长董康主持对“九六公债”的审核，查出其间弊案重重，梁士诒自然脱不了干系，从而又为推倒梁阁投下了重磅炸弹[45]。

直系虽发动猛烈的倒梁攻势，但梁士诒自恃有奉系的支持，虽不到任却拒不辞职。张弧在被直系攻击后一走了之，司法总长王宠惠和教育总长黄炎培一直未到任，内阁成员残缺不全，无法办事，负责代理的颜惠庆苦不堪言，屡屡求去。徐世昌虽然与奉系和交通系联手驱除了靳云鹏，但他也知道，无论直奉双方谁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

权，都对他留在大总统之位不利，而直奉共治对他维持现状最为有利。故徐世昌在吴佩孚发动倒梁后，并未站在梁的一方，而是观察形势发展，决定自己的对策。他本有意请奉系首领张作霖的部属鲍贵卿接任阁揆，并已得曹锟之首肯，不料张却坚持维持梁阁。“当年内阁又以武人之喜怒为进退，何以吴以狮子搏兔之力推倒梁阁，一电不能则三电，三电不能则五电，五电不能则七电，而梁阁屹然不为动摇？不用说，梁以奉张为后盾，张叫他‘安心供职’，所以他有恃无恐，要与酸秀才互争一日之短长”[46]。及至直系非去梁不可之意大明之后，徐世昌已经无法两面讨好，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先舍梁以敷衍直系，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张作霖曾致电曹锟，企图以梁士诒为砝码，以吴佩孚辞去直鲁豫巡阅副使作为梁士诒下台的交换条件，结果当然为吴佩孚所严拒[47]。

4月8日，徐世昌不管梁士诒是否辞职，径行任命周自齐为署理内阁总理，免去梁士诒的总理职。至此，喧腾经月的梁士诒组阁风潮总算以直系的胜利而暂告结束（周自齐为交通系，徐世昌任其署理阁务，也有敷衍奉系之意）。但是，梁士诒内阁垮台虽遂了直系的心愿，却被奉系视为莫大的侮辱，张作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直奉矛盾因此而更加紧张，战争的阴影正在积聚。如颜惠庆所论：“梁内阁已然倒了，支持他的张作霖大帅又岂能甘休。北洋直、奉两系军阀，先是相互攻讦，继而剑拔弩张，军事行动如箭在弦上。……两系军阀争雄斗胜，互不相让，皆渴望夺取总统之位，不再有耐心等待一年半后的总统改选。此外，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中取得的某些成果，刺激了这些人的政治野心。两系的某些追随者虽然才智不足论，却极为觊觎内阁席位，或其他政府高级职位，因此煽惑他们的主人发难。而一帮失意政客似乎觉得不把政局搅乱，他们就无法浑水摸鱼，故也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48]

三　直奉两系的战争准备

吴佩孚敢于发起对梁士诒的攻击，当然知道梁背后依托的奉系势力，他早有准备，不患动武。1922年1月9日，吴佩孚在刚刚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即在给苏督齐燮元的电报中分析形势，认为张作霖“决不盲动无名之师，再蹈辫帅覆辙”；曹锟“不至为关外（指张作霖）及梁叶（指梁士诒、叶恭绰）所软化”；“川湘感情接近，必不肯甘心为关外与财神作伥”；“粤陈（炯明）已有接洽”；“就事实已表见者，据理辩论，彼亦无可藉口”；“倒阁以救济外交，于元首无涉”；“仅攻击交系阁员，余均维持不动”。有鉴于此，吴佩孚认为倒梁有很大把握[49]。不过为防奉系的武力介入，吴佩孚也进行了一定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令两湖直军整军备战，以其中一部由京汉路北上，以备应对奉系可能之行动，另有部队监视湘、川动向；对邻近京畿的直鲁豫各战略要地及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精心布防，确保万全；新编若干部队，补充缺额，赶造军火枪械，筹集战费。2月23日，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召开直、鲁、豫、苏、鄂、赣、陕、甘八省督军代表会议，一致主张“对奉坚持到底”，摆出了准备与奉系大干一场的架势。但是，吴佩孚的强硬态度在直系内部也非通行无阻，直系首领曹锟与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对张的态度一向较为缓和，不主张与奉系立即决裂，数次派人出关到沈阳，向张作霖疏通，寻求与奉张和解的可能性，直奉关系一时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

直皖战后将势力范围伸入关内的奉系，当然不甘心在直系的武力压迫下再退到关外，因此也在积极准备应付直系的挑战。自2月初起，奉系高级将领即连续开会，讨论应战部署，决定令关外奉军向关内运动，关内奉军进行实战演练，同时备粮备饷。由于奉系的军事实力不及直系，故张作霖更注意寻求反直同盟军。他一方面与残余的皖系势力联络，得其支持，另一方面向南方广东政府及孙中山示好，探寻与孙合作的可能性。1922年1月，张作霖派李梦庚到上海，向孙中山的代表杨庶堪转达：张意甚决，且促我速出师（北伐）。2月21日，李梦庚到桂林面见孙中山，陈述张作霖关于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主张。对于正在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而言，首要敌人就是控制了北上交

通要道的直系，故他对奉系的试探表示积极。3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外交次长）、朱庆澜（广东省长）、吴景濂（非常国会议长）等赴奉天与张作霖磋商，张作霖对孙中山推崇备至，建议奉、皖、粤三角同盟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法统[50]。孙中山设想粤方“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利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奉方则“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幸”[51]。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初步成立，进一步激化了奉直矛盾，对奉系敢于开战也有鼓励作用。“张作霖当初之计划，奉粤皖三系联络，加以复辟派张勋残余之势力，并力齐起，协以攻吴，则洛阳及其关系各省有全被包围之势”[52]。但皖系惟余浙督卢永祥较具实力，他和孙中山均因受种种因素牵制，未能如预期发动攻奉与北伐，不能担当对直系南北夹击的任务，应付直系武力的主要责任仍须张作霖承担。如时人所论：张作霖“欲联络孙文、段祺瑞、张勋等，以树吴之敌”；“而孙、段等毫不能为一臂之助。奉张骑虎成势，不能不孤军独进，以冀邀幸于万一。而不知其将骄兵疲，不足以致吴氏百战之兵，此又直胜奉败之原因也”[53]。

直奉矛盾的发展至梁士诒内阁倒台达到高潮，双方关系已接近破裂边缘，各自都在大张旗鼓地准备以武力最后解决问题。2月间，直奉双方都有在铁路沿线扣车之举，“双方均已积极预备”[54]。其后，关外奉军主力开始向关内调动，先期到达关内的奉军部队则集中在军粮城等京畿周边地带，每日操练备战，摆出进攻的军事态势。直军则以主力准备与奉军的交战，同时在南方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部署了专任防卫力量，态势先以防御为重心。

4月3日，吴佩孚以“陕西剿匪事殷”为由，婉拒曹锟令其赴保定相商之电，留在洛阳与以祝寿为由前来的直系将领商讨军事方略[55]。他曾对人说：“张作霖欺人太甚，看来战事不能避免，老师（曹锟）忠厚太过，受曹四（曹锐）蒙蔽，节节退让，时至今日，还犹豫不决，再这样下去，全盘皆成被动。我日内即去保定，军队已经部署，

造成箭在弦上之势，老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56]

4月初，关外奉军大举入关，集结于京奉与津浦沿线，后自名为“镇威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奉系自恃兵强马壮、枪精械足，对直系的态度表现强硬。10日，张作霖致电曹锟，提出三项条件：一、请元首颁令，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二、请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允许梁士诒、叶恭绰、张弧自动销假回任。张作霖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引起直系军人的大反感，表示“吾等不能容忍”，即便是本主缓和的曹锟也无法接受，而直系内部此前的和战之争亦因此而消解[57]。13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警告“奉军进驻小站、静海、独流，我马厂之二十六师已成包围之势，若不及早准备，必贻噬脐之悔”，望曹“速下决心，有备无患”[58]。曹锟外有奉系动武之压迫，内有吴佩孚等主战之动议，至此已无退路，只能决心一战。当日，曹锟在保定召开直系高级将领会议，决策“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并授吴佩孚作战指挥全权，并称“本人亦完全听令”。当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称：“奉军入关，逼人太甚，吴佩孚为大局计，不得不有所准备。”[59] 14日，曹锟下令直军驻马厂、德州的部队撤退至大城、河间，吴佩孚电致曹锟云：“此乃自杀政策，恐系四先生（曹锐）主谋，万不可服从。务祈固守根据，对奉暂行虚与委蛇，立候增援。”[60] 吴佩孚主导了直系的对奉作战部署。

与直军的部署相对应，奉军自称“镇威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将总部设在山海关。4月19日，张作霖发布入关布告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则通电指责“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官长”，要求张“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61]。

与北京政府历次军阀战争相仿，第一次直奉战争实际开战前，直奉双方均以电报战开场，以此指责对方的不道德，并为己方抢占道德

制高点，为发动战争寻求合法合道的理由。“宣战的理由都是巨大堂皇的‘法’或‘统’的理论，在好听的话的背后，真正的理由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政权、财权和合法有道的权威，也是控制地方的资源以养兵，以扩充势力”[62]。

4月19日，张作霖以“镇威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声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63] 21日，吴佩孚等直军将领通电回应，声称：“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舆论即为裁判，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职责攸在，除暴安良，义无反顾。”[64] 25日，吴佩孚等又联名通电，声讨奉系所谓“十大罪状”：一、窥窃神器，障碍统一；二、举荐帝制祸首，起用复辟罪魁，倒行逆施，危害国体；三、祸国通外，断送青胶；四、招匪为兵，“负罪友邦”；五、垄断政权，破坏法纪；六、滋扰京师，纵匪殃民；七、得陇望蜀，黩武逞兵；八、劫掠饷械，行同盗匪；九、招亡纳叛；十、残杀同类；宣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表示“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奸阙渠魁，以泄公忿，以快人心”[65]。27日张作霖发表回应通电，撇开曹锟不提，专责“吴佩孚者，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隐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大憝，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66]。

战前双方发表这些通电“主要是一场心理战，为了孤立敌人，争取中立者。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的谴责侧重于责备敌人违反了传统的个人道德而不是历数他在政治方面的功与过。子女的不孝顺，对友谊的背叛，对上级的不尊重，或违背了家庭关系的准则，为这样的谴责提供大量的弹药”[67]。这些多为旧式文人执笔捉刀而成，套用古文格式，用些四六骈体式的对仗文字，极尽道德煽动之能事，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68]。如果不解实情，只看一方文字，便以为天下美德尽在一方，而天下恶德尽在对方。以道德良善为标榜的电报战，亦可谓北洋时期北京政治一景。如后人所论：“大抵民国政争，往往朝为友朋，暮成仇敌，兵戈不足，济以笔舌，彼此相诟，无异村妪乡童之所为，而电文往复诋排，大抵脱胎于《古文观止》，徒为旧日文案师爷舔毫摇笔之资，非彼赳赳武夫所能卒读，一般老百姓亦茫然不知其所云。”[69]

在直奉开战前夕，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直奉双方都曾作出让步的姿态。张作霖曾在4月16日致电直隶代省长杨以德称：“奉直本系一家，复为本使原籍，断无歧视之理”；“绝不能轻启衅端，致令自相惊扰。”“本使安全大局，必与曹使商定最后之办法，以资解决。”[70]复于21日表示，“吴佩孚复省会电，肆口谩骂，足见从前谣传，皆彼一人嗾使。独惜曹使以老友至戚，听其谩骂，殊不可解。彼方不先开衅，我决不越雷池一步。师发在途，应饬驻守原地，未经出发者停止进行，仍候明教”[71]。曹锟亦电徐世昌，表示愿“严束军士，保护人民，静候奉军出关固防，以竟息事宁人之志”。然一论及退兵事，直奉双方又都先人后己，互责对方，不愿自己先撤。张作霖电称，“奉军原驻关内，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大总统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回，电牍具在”，责曹锟通电为“不合事实”，“断章取义”。吴佩孚则电称：“退兵非我军片面义务，不敢遵命。”[72]为了避免北洋系之间的又一次内战，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也出面调停直奉关系，尤其希望促成直奉两系的最高首领曹锟与张作霖

在天津见面相商，但因直奉双方的矛盾已发展之无可调和的地步，他们的调停没能成功。奉方还有人扬言："此次胜败，决不足虑，即使败北，究是蹂躏他人地盘，至更不关心，再做我事业，有何不可。"[73]

还想保住总统之位的徐世昌也在极力调停直奉关系。他有电致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称："畿辅无曹，孰为重心，蒙疆无张，谁可震慑，长江上游惟吴使赖，若使大局及我身而破裂，惟有引退。与其坐视乱亡，无宁避世而去。"[74] 不过，此等酸文假醋的文字打动不了对立的双方。4月25日，徐世昌先是请直奉双方军队各向后退30里，继又提议奉军完全退出关外，吴佩孚回汉口组织巡署，近畿治安及善后诸问题由曹锟完全负责，但根本未得到正在准备打仗的直奉双方的响应。次日，徐世昌徒劳无功地命令直奉"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75]。但此时直奉战争的炮火就要响起，哪里还有人理会徐世昌的纸上命令。等到战争打响后，徐世昌也只能例行公事，在29日发出三道命令，以"京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为由，令曹锟和张作霖"迅饬所属军队立即停止攻击，仍懔遵前令将移调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听候查办"；令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督饬所属严重警备，认真防卫，各该管长官等身任地方，责无旁贷"；令京内外军民长官，"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为保护，务令安全勿受损害，以重邦交"[76]。北京为外国公使团所在地，京津地区也是各列强的利益所在，无论是曹锟、吴佩孚还是张作霖，对于徐世昌的命令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于列强的眼色还是不能不看的。他们都表示战火不会波及京津城区。5月1日，吴佩孚还致电北京外交部称："外国生命财产，已分令所属各军队切实保护。惟此次战事实因奉军入关，越境寻衅而起，推原祸始，则一切应由首难人担负，方符公理。祈转知各使团。"[77]

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经过与结局

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直军，部署以京汉线北段为作战中心，下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司令张国熔，率第二十六师及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混成旅，驻防任丘、大城，负责津浦线方向；西路司令王承斌，率第二十三师、第一、第十五混成旅，驻防琉璃河、良乡，负责京汉线方向；中路司令由吴佩孚自兼，吴既为直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全盘战事，同时率第二十四师及第三师一部，驻防固安、霸县，位于津浦与京汉线之间，负责照应东、西两路，机动运用；令鲁督田中玉，“如奉军开徐州，万勿令其通过”[78]，以切断奉军与浙江皖系军队的联络通道；曹锟坐镇保定，镇守后方，往来支援。直军总兵力约十万人，数量少于奉军，为保证作战重点，遂主动放弃津浦线，收缩兵力于京汉线，以保定为中心，成三角阵形，态势稳固，进退有据，确保防御，再图进攻，体现出吴佩孚的军事素养与指挥谋略。时人论之为：“吴氏之作战计划，在缩短战线，以谋交通便利，兵力集中”；“或以为吴氏让津浦路于奉军，未免失策，而不知吴氏固以予为取，将以诱其深入也。”[79]“此次直军防务，布置迅速周密”[80]，是其能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4月22日，吴佩孚向各部发出号令，“通令各路军队速进，奉军已于二十六号攻击”。25日，吴佩孚自洛阳启程赴保定督战。27日，吴佩孚通告各部，“定二十九日开始运动，已到者准备，未到者速进”[81]。28日，吴佩孚向直系各督发出密电，称“奉军坚不撤退，依然节节进逼，不得不实行抵御”[82]。吴佩孚还向部下军官鼓动说：“此次兴师，纯为抵抗武力之压迫，惟力是视。事成则民国之福，不成则以死继之。若失败之余，托足于异国国旗之下偷生，非吴佩孚也。”[83]

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副总司令孙烈臣，参谋长杨宇霆，总兵力约十二万人，其部署东线以京奉、津浦线为中心，总司令张作相，下辖第一梯队张作相部第二十七师驻防廊坊，第二梯队张学良部第三、四混成旅驻防静海，第三梯队李景林部第七、八旅驻防马厂；张作霖坐镇津东军粮城，指挥一切；西线以京汉线为中心，总司令张景惠，司令部设长辛店，下辖第一梯队张景惠部第一师，第二梯队邹芬部第十

六师及第六混成旅，第三梯队郑殿陞部第二、九混成旅，驻于北京南郊长辛店、南苑等地。奉军人数及装备数量与质量均超过直军，但其部署注重进攻，摊子铺得过大，两线作战，兵力分散，中央空虚，易为对手所乘，且深入直军地盘，后方补给线较长，为直军突破留下了易受攻击的软肋，也为作战失利伏下了隐患。“所谓入人之地深，为兵法所忌。况千里运粮，于军不利”[84]。

时人论战前直奉双方的军事部署，认为“奉军意在久持，直军意在速战”[85]，而战事的演进，则基本符合直方的预期和部署。惟就直奉双方的战前态势而言，“直军志气激昂，军纪严明，且调动军队非常迅速，三日内即将前线军队调齐。而奉军秩序不整，随意游行，其调动军队甚为濡滞，由奉至前线，十日内仍未布置妥贴，加之军心涣散，有一营开至杨柳青，逃散过半，故人心皆倾向直军。至飞机重炮，两方皆有，军器锐利亦颇相等，惟直所缺者饷项，奉所缺者海军耳”[86]。“直军步兵优于奉，奉之骑兵胜于直”[87]。两相比较，直军在技术方面稍占上风，再加上相对合理的战略战术和吴佩孚的有力指挥，战争的结局偏向于直方并不意外。

直奉两军正式交战前，已有规模不等的接触。4月26日，直军在东路首先发动进攻，与奉军在任丘接战，此后战火扩展到静海、马厂、文安、青县一线。直军初战得手，但旋因奉军李景林部反攻而败退，丢失大城。西路直军则在良乡附近与奉军接战，暂成胶着。29日，直奉两军同时下令发动总攻击，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大幕正式拉开。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战场分东、中、西三路，其中西路京汉线战场为直军布防重点，战况最为激烈，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也最大。4月28日，直军首先进攻西线奉军司令部所在地长辛店，与奉军展开激战，直军一度攻入长辛店，后因奉军来援而退出。29日，奉军与直军激战良乡，两进两出，直军反败为胜，终保有良乡，并进至长辛店。自30日到5月2日，直奉两军集中西线兵力数万人，在长辛店及其附近地区

连续展开三日大战，其间炮火之猛烈、战况之激烈为北洋时期军阀内战中之少见，双方反复拉锯，死伤惨重，各折旅长一人（直军旅长董政国，奉军旅长梁朝栋）。奉军炮兵实力明显占优，炮火较为猛烈，“如此滥用炮火，为欧洲战事中所未见”。但吴佩孚的战术运用较为灵活，注重扬长避短，以步兵进行夜战和运动战，既可避开奉军炮火，又因地利而使奉军处于被动地位；奉军骑兵本为其强项，但在狭窄地域用处不大，而且用于正面作战，难免炮火袭击，结果“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与原计划全相违背”[88]。同时，直军渊源于北洋军系正宗，作战训练、经验与历史均强于出身“草莽”的奉军[89]，从而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直奉双方还出动了当时很少见的飞机助战。“直系利用其航空优势，派飞机在长辛店投掷重磅炸弹，对奉军弹药、给养、车辆等军用物资实施轰炸，炸得车辆翻滚、轨道纷飞，房屋震塌，并引起弹药爆炸和炽烈的燃烧，使奉军的前后方同时受到极大的威胁”[90]。5月4日，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91]，直军向奉军发动多路进攻，并利用奉军邹芬部第十六师原为直系冯国璋旧部的关系，诱迫其降直，致奉军自乱阵线，“骤然退下，致不可收拾”[92]，战场态势开始对直军有利。奉军“子弹不继，士无战志”[93]，主帅张景惠信心动摇，未能坚持，先是退往丰台[94]，继又脱离指挥，乘车逃往天津。奉军失去统一指挥后，全线溃退，直军连占长辛店、丰台。5日西路战事以直军获胜而告终。

中路津浦、京汉线之间战场的战斗主要发生在固安。29日大战开始后，直奉双方互有胜负，奉军于29日和5月1日两克固安，但又被直军两度夺回。奉军新锐张学良、郭松龄部加入战斗后，战况愈加激烈，直奉相持不下。为了占得主动地位，直奉双方主将吴佩孚、张作相均亲临前线督战。“奉军对于此路，本抱极大希望，故不惜重大之牺牲，而卒为直军尽力制止，不得逾固安一步”。结果，奉军首先不支败退，5月4日，直军连克永清、杨村、落垡，张作相败逃天津。5日直军占廊坊，中路战事又以直军获胜告终[95]。

东路津浦线战场以大城、马厂为重点。战争开始后，奉军初时在东路占有一定优势，29日占大城。30日，直军后续部队开始反攻，与奉军在大城一线展开反复激战，5月1日夺回大城，此后双方争夺的重点移至马厂。3日，“直军忽得中路胜讯，士气大奋，奉军始不支，向唐官屯、静海败退。直军遂克马厂、青县”。4日，直军在西、中两路连续获胜的消息传至，奉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帅“张作霖一日夜连闻中、西两路败讯，知大势已去，遂带六车头，运残部万余人，离军粮城奔滦州”[96]。战局发展至此，奉军一路败退，直军胜势已定，4日占静海，7日追至前奉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随后，吴佩孚将司令部移至军粮城，下令直军对奉军溃兵“赶速设法收束，解除武装及枪支，发给川资执照，遣送回籍。如有抗拒，不受收束者，应按照土匪，一律痛剿”，准备一举消灭奉系入关的军事力量，并摆出进窥东北的态势[97]。吴佩孚甚而致电张作霖，奚落他说：“胜败兵家之常，无足介意，退兵须按秩序的退却，如公无力制止，佩孚助送出关。”[98]

直系在军事上获得胜利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奉系的政治清算以及对己方的政治犒赏。5月5日，战争尚在进行中，大总统徐世昌即向直系主动示好，将“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军士”归罪于梁士诒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下令将梁士诒、叶恭绰、张弧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梁等不能束手就擒，即行离京赴津，7日乘船赴日）[99]。5月8日，曹锟发表通电，故作姿态地宣布，此次战争为张作霖“不惜甘冒不韪，首发大难”，而直系获胜则为“由人心公理战胜强权”，“穷究祸根，皆张使一念，争攘政权所致”[100]。吴佩孚也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要求惩处张作霖，褫夺其职务，并威胁非如此即不回洛阳。曹、吴要求惩罚张作霖的表态，容不得还在直系实力威胁下讨饭吃的大总统徐世昌斟酌犹豫。5月10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职，免去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因为东北当时还是奉系地盘，直系势力实

际上无法插足，故徐世昌仍任命奉系人马吴俊陞署奉天督军，袁金铠署省长，冯德麟署黑龙江督军，史纪常署省长。这也是直系企图在奉系中打入楔子，以在政治上淆乱奉系阵线的招数。但张作霖虽然在军事上大败，却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地境，以吴俊陞等之实力及其与张作霖的关系，当然不会贸然有代张之心，故他们不仅未接受徐世昌的任命，还发表公开通电，以“北庭乱命”称徐之命令，表示“概不承认”[101]。

直系碍于种种原因对东北还无力取之，但对紧邻其大本营的河南则是另一种态度。吴佩孚自洛阳北上后，河南督军赵倜暗通奉系，有独占河南之意。5月5日，在奉军已趋败退的形势下，赵却发表通电，宣布河南“严守中立。凡有加入战争之客军过境，均须一律卸除武装。如或不谅此衷，有意破坏中立者，河南为正当防卫计，自当不畏强权，唯力是视”[102]。其弟赵杰又率部攻击郑州，“起事原因，闻系交系造谣，谓吴使（吴佩孚）遭不测。赵杰认以为真，遂即发难”[103]。由此大大激怒了视河南为其后方根据地的吴佩孚。10日，徐世昌在吴佩孚的压力下，下令免去赵倜的河南督军职，听候查办；调陕西督军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刘镇华署陕西督军。赵倜本还不愿轻易离职，但在冯玉祥自陕西向东、萧耀南自湖北向北，对河南两路夹攻的军事压力下，被迫于11日通电遵令下台，河南地盘完全落入直系手中。

奉军在直奉战争中全面失利之后，向关外败退的张作霖先是停留在冀东滦州，并于5月12日宣布“自主”独立，观察形势发展，收束分途向关外败退的部队。“奉天内部甚为团结，此次竭全力由滦至奉，步步为营，似作久战之计”[104]。其后，直军继续压迫奉军，5月20日直军占滦州，张作霖随即下令奉军完全退至关外，准备利用关内外相对隔绝的地理形势，拥兵自守。

5月19日，奉天省议会在张作霖的授意下，宣布响应“联省自治”口号，在东北实行“闭关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

奉天省长（6月4日改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陞为副司令）。26日，张作霖回到老根据地奉天，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东三省一切政事与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并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铲除强暴，促进统一。"[105] 虽然吴佩孚希望利用军事上的胜势，直捣奉军关外老巢，直军将领王承斌还请吴佩孚联衔通电讨伐张作霖，但东北毕竟是奉系经营多年的地盘，"张之势力在奉，分毫未减，专制尤烈"[106]；且东北为日本经营多年的传统势力范围，日本当时虽对直奉战争保持克制，持中立立场，但也不能容忍有英美色彩的直系势力伸入东北。日本陆军大臣山梨半造曾明确表示："万一将来战事之结果乱及日本权利有重大关系之东三省……则军事当局实有相当之考虑。"[107] 加之孙中山在南方兴兵北伐，内外形势不容直军再进。吴佩孚遂令前方将领，"莫由海道进攻，因赣事吃紧，前方动作须格外审慎"；"以时机环境察之，不宜通电申讨，宜相机进行。现当徐（世昌）退黎（元洪）来，如黎果以各方面之敦促入京，前提既定，余可易于解决也"[108]。因此，直军兵至山海关而不得不停止，与奉军对峙于关内外。

为了解决直奉战争的善后问题，在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的调停之下，直奉双方代表自6月9日开始在秦皇岛进行议和交涉。14日，张作霖致电鲍贵卿，表示"元首如诚意息战，宜令彼军停止攻击，议定双方撤退办法。弟必勒令前方将士，撤出关外，以听解决。现已严令前方将士，不准进攻"[109]。双方实际达成了不再战的默契。17日，由王承斌、彭寿莘代表直军，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在秦皇岛附近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协定。主要内容为：一、直奉两军同意罢兵；二、奉军撤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三、双方军队于18日至20日之三日内撤离前线，脱离接触，奉军撤完前，直军不得有军事行动[110]。协定签订后，双方划滦州以东、锦州以西为中立区，双方在此驻兵均不得超过一旅。此后，直奉双方如约撤兵，7月4日，直军司令部撤离滦州。次日京奉路恢复通车，直奉战事终告结束。

张作霖退出关内回到关外后，在东北划疆“自治”，埋头练兵。7月3日，张作霖召开东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对北京政府守中立态度，不接受任何方面之命令及调解，并认真训练三省军队，准备以后与直系再作军事较量[(111)]。16日，张作霖将巡阅使署与督军署合并，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自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任副总司令，下设参谋、副官、军务、军需、军法、军医、秘书处。25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全部归三省所有，作为军政费用，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亦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8月3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拟定联省保安规约，主要内容是：东三省联合为自治区，拟定规约，军民共同遵守；自治权由三省人民共主之；人民权利义务遵照旧约法；实行军民分治；省长由省议会选举；共同立法由三省议会联合会行之[(112)]。对张作霖如此“独立”之举，北京政府亦无可如何，只能听之任之。

与北洋军阀掌权时期的几次大战相似，第一次直奉战争在战前经过较长时间的政治较量与酝酿，但实际的军事作战时间并不长，动员程度也不高，牵涉军力、人力与地域亦有限，军事作战的烈度与战前双方的政治高调并不匹配[(113)]。战争善后及对失败者的处置也无非是走过场的形式，如时人所论：“此次奉直之战，当其发动时，风波激荡，全国震撼，勿论两方遣将调兵，汲汲不遑，即关系各省之互相牵动，举国人民之奔走惶骇，亦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及既接战，以两方筹备之久，酝酿之深，大兵接触，亘数日而胜负难分。吾人观其初战斗之猛，死亡之众，大将之在前敌者，频以死伤闻，而后方之调遣，尤汲汲不遑，方以为此次战事，其始既如是其可惊，其后必将有如何震天动地之事，以更令吾人惊骇不置者。而不谓数日之间，胜负立判，奉军仓皇溃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势。”[(114)]

就战场表现而言，“此次直军战略多智术，如各小部队之诱敌与埋伏地雷、乔装、暗杀等，奉军每中其计。奉方则马队、炮队均甚得力，且俱勇敢无却，惟智术经验上实逊一筹”[(115)]。作为直系的对立

面，曹汝霖对此战有持平之论："双方均拥兵十万以上，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惟将领方面，似直优于奉。况吴自领之第三师，及后编的三混成旅，久经战争，尤善于迂回山岳之战，故开战以后，旗鼓相当，攻击猛烈。初则屡进屡退，不分胜负，奉方恃火力之强，马队之勇；吴方善攻人弱点，乘虚奇袭，加以接济方便，奉方接济辽远，于是吴方占优势，奉方渐渐不支。"[116] 不过，奉方自身的总结对骑兵（马队）的评价并不高，王永江认为："此次最误事者，为骑兵集团。许司令（许兰洲）本不长于骑兵，亦不谙骑兵之作用，而其所用之常参谋长（常荫槐），亦系不晓军务之人，且于总部计划亦不明了故。总部原计划骑兵必须集团者，其目的在绕出敌军战线，或扰其侧面，或扰其后路。今许司令乃用为正面作战，大城白洋淀一役，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与原计划全相违背，岂不可惜！"[117] 也有在华的外报将直奉战争比之为"民国第一大战，纪律战术均为进步"。据驻京外国公使团派出的观战人员在战地现场观察的印象："直军多谋，长于夜战，奉军勇往，长于昼攻，惟直饷械远不及奉"[118]；"直军战法强于奉军"；"双方军队布置整齐，战斗亦悉合程序，使团观战人员颇为赞美。"[119]

就政治意义而言，直奉双方虽然在战前的电报战中，都在拼命抬高自身行动的"正义"性，痛贬对方行动的非"正义"性，然军阀对垒，所在多为利益，其实本无所谓"正义"而言。不过，直方以吴佩孚为代表，较谙民众及舆论心理，通过此前声讨梁士诒内阁和战前对奉方的攻击，更善于塑造己方的"爱国"形象，而将对手塑造为"卖国"代表，从而为交战双方划出了"政治正确"的界限。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在弱势，民众及舆论出于对中国悠久历史及辉煌文明的追忆，天然推崇"爱国"者，而对"卖国"与否则高度敏感，故吴佩孚将对手定义为"卖国"的宣传技巧与成效显较奉方为成功。结果，即便是与奉系为盟友的皖系大将徐树铮也承认，"奉之败退，久在意中，吴胜祸小，奉胜祸大，天下莫不同此心理"[120]。甚而在不少外国人眼中，当时的张作霖是"藉日本的援助以自固其势力的，他在中国是一切保

守势力的代表”，而吴佩孚“却被人家认为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的人。他是一个能干的将军”[121]。这至少说明，吴佩孚的公众形象胜过张作霖，如果追溯到直皖战争时期，以吴佩孚和段祺瑞相比较亦如此，因此，或可以此解释“民意”在战争中的作用[122]。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此前此后的多次军阀内战，亦反映出北洋时期的军事政治特质。民国年间，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过程中，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社会组织、社会参与与民众动员程度均不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时间的现代战争。“因为饷械都有限，战争的期限很短，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不很大，死伤的人数远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数。因此战争的结果总是：（一）控制北京政府；（二）扩充地盘；（三）收编战败者的军队。换言之，这些都是分赃的战争，分赃不公平也就为下一次战争种下爆发的原因”[123]。战争本来是基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政治矛盾对抗的激烈化结果，而北洋军阀各派之间系出同门，虽有利益之争，却无本质的政治分野，互相之间并非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且在组织架构上间有重合，各级将领互有联系，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谁胜谁负，胜利者都不太可能对失败者痛下狠手，其政治上的清算也多为点到即止。再加上各派实力大体平衡，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均有其限度，内外关系又错综复杂，互相牵制，即便一派控制了中央政权，也无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能形成为高度集中统一有效的中央权力，控制中央的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也反映出上述各方面的特点。战争的结果，在军事上，直系获胜，力量发展至鼎盛期，但势力扩张的结果，也隐伏着力量分散、矛盾复杂、恃骄而衰的结局；奉系失败，但实力地盘犹存，并未伤筋动骨，仍存励精图治、卷土重来的可能。在政治上，直系此后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到处伸手，扩张地盘，获取利益，但也由此成为其他各派力量的“公敌”，反处孤立之境；奉系失去了对北京中央政权曾有之影响力，全国性政治地位大为下降，但也由此促成了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加速形成与稳固，政治上反处可以联络各方之主动地位。而且东北特殊的、与关内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丰

富的物质资源，迅速发展的现代经济与交通，以及日本与奉系较为紧密的利益关系，都有利于此次战争失败后，张作霖与奉系在东北治疗战争创伤，恢复元气，整军经武，为再起创造条件。因此，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奉双方仍然维持着一定的力量平衡，奉系暂避直系锋芒，而直系亦不能将奉系置于死地。直奉战后的国内政局重心，由原先之直奉矛盾转为直系为控制北京中央政府而引发之各种内外矛盾。

第二节　“法统重光”

一　徐世昌下台

直奉战后，直系一时间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派系，以南北交通动脉京汉、津浦铁路和东西交通动脉陇海铁路为依托，控制了从北到南十个以上的省份，并实际操纵着北京政治。这极大地刺激了直系各色人等的政治欲和权力欲，直系领袖曹锟开始作上了总统梦，也想过一把总统瘾；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则膨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企图以此而“青史留名”；其他围绕着曹、吴两人的政客、军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各有打算，或拥曹或拥吴，谋名逐利，在北京政治的浑水中搅和。不过在直系战胜奉系之初，对直系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善后，解决法统问题，争取全国舆论，获取合法资源，为独占北京中央政权打下基础。

奉系失败后，仍在大总统任上的徐世昌因其拥皖亲奉倾向而为直系所不能容忍，推倒徐世昌、改造国务院是直系的既定方针。张作霖在撤离滦州出关前，曾经有电致吴佩孚，对徐世昌在战争前后的作为颇有揭露，更激怒了直系。张电称：“前总统不愿有人干涉其用人行政，屡派徐世章、吴笈孙请予带兵入关维持，不幸而战而败，退守滦州，本拟收集余部，渐次出关，以保予关外利益。乃徐固派人来滦，劝勿罢兵，予不愿再被人利用，故毅然撤退，此次全系徐作祟，予不能负责。”[124] 不过，如何名正言顺地赶走徐世昌，以泄对徐之恨，

并利直系扩张势力之私，又要“合理合法”，以避舆论指责而引起他方反弹，却颇费思量。恢复民国六年被“非法”解散的国会、赶走徐世昌的谋划，因此而浮出水面，因为恢复了“旧”国会（民二国会即第一届国会），则由“新”国会（民七国会即第二届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之合法性自然失去，而一向不承认“新”国会合法性之南方广东政府，也将失去“护法”的合理性，如此承续民国法统，可谓一箭而双雕。这种设想最早源出于一帮既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又不愿附和南方非常国会的旧国会议员。1921年12月，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提出了恢复民六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的主张[125]。一班旧国会议员也在日日讨论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与步骤。旧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在脱离南方回到北方后，先是于直奉战前去东北劝说张作霖支持恢复旧国会，接着在直奉战后向吴佩孚游说其主张，引起了吴佩孚的重视。吴既有政治野心与“统一”梦想，又不时表现出讲求“道德”，故倾向于以恢复旧国会作为直奉战后解决政治善后诸问题之枢纽。

5月10日，还在直奉战争余波未了之际，曹锟、吴佩孚即召集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开会，商讨如何进行政治善后的问题，旧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也应邀出席。一些急于通过拥戴曹锟而得宠幸进的直系军人政客，提出立即赶走徐世昌，拥曹锟为总统的主张。但吴佩孚及其支持者则主张以恢复旧国会作为过渡，使曹锟的总统经由国会选举“合法”产生。参加会议的吴景濂对总统由谁担任并不介意，他向吴佩孚表白，“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他最关心的是恢复旧国会，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为此，他向吴佩孚进言：“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他还就进行步骤献计说：“既以揭出护法旗帜为然，予拟在天津先假直隶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予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并将筹办情况由予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

之响应”；“公等接吾电报，请联合直系各省军民人员复电响应，并就予之通电再为通电全国，令北京军警对徐不加保护，请其即日出都。”[126] 吴景濂的提议颇获主张循“法律途径”行事的吴佩孚之欣赏，“吴云恢复旧会，乃国会本省事，余愿作后盾”。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也同意先恢复旧国会、赶走徐世昌，作为政治善后的第一步。“曹云，余早主张恢复旧会者，请诸君速进行，有反对者，余当以武力待之”[127]。至于请出黎元洪复职，最初并未在直系首领的计划中，但赶走徐世昌之后，政府总须有人代表，“既恢复旧国会，无不恢复旧会产出之总统之理，而旧会产出之总统，袁、冯二公以外，惟有黄陂，自应请黄陂依法复位。此即保洛方面之本意”[128]。直系于是作个顺水人情，请出黎元洪复职，本意不过当其为可上可下可操纵之傀儡，“为曹过渡”，哪知黎元洪不识相，假戏真做，于是又有了一年后驱黎之一幕，初非直系扶黎复职时始料所及。

直系高层决策先恢复旧国会之后，其实行步骤即如紧锣密鼓，着着进行。第一步当然是制造舆论，这是军阀们的拿手好戏。吴佩孚令其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孙传芳代拟电稿，由其打头炮[129]。孙传芳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在直系将领中排名并不靠前，忽有如此“立功”机会，岂能轻易错过。5月15日，孙传芳率部下联名发表通电称：“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孙传芳的通电不仅提出了恢复旧国会，而且提出请黎元洪“复位”，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随后吴佩孚对北京新闻界称，“恢复旧国会及国事会议各问题，现正征求意见，应以多数人心向背为从违，不作成见”，实际是对外放风[130]。19日，曹锟、吴佩孚领衔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声称：“近来国内人士有倡恢复六年国会者，有倡召集新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究以何者为宜，特于本日通电各处，征求民意，以为处理善后参考。”[131]

曹锟、吴佩孚所谓“征求民意”之电既出，直系各督及不少政界名流，如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张耀曾等，纷纷通电响应，“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132]。同时又致电广州孙中山和非常国会称：“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133]从而给曹、吴的主张抹上了一层民意色彩。与此相呼应，吴景濂、王家襄等如约到天津，筹备第一届国会复会工作。5月24日，旧国会部分议员七十余人（其中一部分是未参加南下护法者，一部分是从广州非常国会脱离北来者）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国会筹备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任主席，讨论复会工作，决定选派委员到上海、广州等地，招揽议员回京，并对外发出通电，声明第一届国会将依法复会。5月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电复国会筹备会，表示赞成恢复国会，支持议员自行复之举。为了促成南方议员的北上，吴佩孚还于6月7日致电交通部，令其对“旧国会议员北上一律免票，以示尊崇”[134]。

有了恢复旧国会与请黎元洪复职的舆论铺垫，直系驱赶徐世昌下台的活动也就顺理而成章。5月10日，吴佩孚密电直系各省督军，“以收束现局分常局、创局两法。常局则恢复法统，即南政府可即时取消，中央可同时改良，副总统可即选出，北洋正统可即巩固，旧会制宪完毕闭会，正式国会、总统即根据新宪成立。创局则召集各省军政代表及省会各法团代表择地开会，共议国是，但事属创格，在常法上无根据。西南以法统说相抗，势必再以武力征伐，且代表集齐期限太长，各省现情太杂，夜长梦多，贯彻不易”。吴佩孚的意见当然是取“常局”而弃“创局”，并特意申明曹锟“尤赞成常局办法”[135]。此电

既出，直系各督当然群起拥护，实际也是暗示徐世昌准备下台。28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并联名电复旧国会筹备处，对民六议员自行集会表示支持[136]。孙传芳亦于同日再度致电徐世昌，明白提出请其下台的要求，电称“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望徐“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随后，苏督齐燮元也通电呼应孙之主张[137]。

徐世昌本为北洋元老，但毕竟是文人而非武人，没有实力的支撑，自出任大总统后，周旋于北洋各派系军人之间已属不易，而又因拥皖亲奉为直系所忌恨，在直系武人的嚣张面前，自知无力抗衡。吴佩孚、孙传芳等人电发后，徐久居北京官场，自然明白个中奥妙，5月31日即发出通电，称吴、孙等电“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实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表白“一有合宜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138]。当然，徐世昌并非愿意痛快离职，他还贪恋大总统的名衔，企图继续干下去，他曾以所谓“新新国会”的问题作为拖延之计。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操办的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被迫闭会，徐世昌曾下令依民元选举法进行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筹备召开所谓第三届国会。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自1920年秋到直奉战前，选举完成的省份亦不过三分之一，南方省份抵制此次选举自不待言，即便是直系内部对此亦有争议，直隶省即未进行选举[139]。直奉战后，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所谓第三届国会（即“新新国会”）已经选出的议员不甘寂寞，发表通电提出，“本届国会，系从旧法改选，在政府既足以维持法统，尊重民权，而被选者亦极自由，绝无党派官厅之操纵”，因此主张未选各省从速完成选举，召开新一届国会，解决“法统”问题。他们还讽刺旧国会议员说，“议员不过人民之代表，断未有十年以前之选举，代表十年以后之人民”[140]。但他们势单力薄，没有实力后台，也没有可为直系利用的意义，故其呼吁毫无反响，徐世

昌也不可能依靠他们摆脱下台命运。

直系为使徐世昌尽快走人，采取了双管齐下之法。一方面，6月1日由吴景濂、王家襄等领衔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责“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声明民国六年解散参众两院的命令无效，徐之总统纯属非法选举，应即宣告无效；自6月1日起第一届国会恢复，完全行使职权[141]。这就在名义上剥夺了徐世昌再任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吴佩孚也于当日致电在北京的直系干将、交通总长高恩洪，告其“日来各方以敦请元首下野之电，来商者联续日多。大势所趋，心理相同，似应及时自退，以保尊荣。公等宜再进府密陈，速下决心，免风气云发，更难收也”[142]。实为对徐再行威胁。1日深夜，吴佩孚的参谋长李济臣电驻京代表钱少卿（宗泽），谓：“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注意好好办？”钱聆电话，恐吓失状，次日大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疾声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143]当日，钱少卿还数次致电徐世昌，语气强硬地质问他何时离开北京。中午，徐世昌设宴欢迎刚刚返国的驻英公使顾维钧，席间又接到吴佩孚迎黎复职电。至此，徐世昌亦知总统之位不保，北京无法再留，但这位老谋深算的北洋老官僚接电后不露声色，当午宴结束时，却突然当众以“衰病”为由宣布辞职，并令“依法由国务院摄行职务”，然后即乘火车离京赴津，结束了三年多的大总统生涯。由周自齐领衔的北京政府不敢怠慢直系，随即电致吴景濂与王家襄，称“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而曹锟与吴佩孚也就堂而皇之地令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对北京秩序“务望督饬地方军警极力维持，保安大局”[144]。

二　黎元洪复职

徐世昌下台后，直系将领纷纷发出通电，以“国家不可无主，大

位不可久悬”为由，“恭请”黎元洪复职[145]。吴佩孚发出通电，宣称“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不仅“屡电黎黄陂，早定中枢，以巩国基”，而且“通告各省督军，电促黎黄陂复位”[146]。于是，直系治下各省纷发劝进通电，半壁江山处处高唱迎黎之声，大有黎不出山，如苍生何之势。本依附于黎元洪左右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等也颇为兴奋，极力劝黎出山，希图攀龙附凤；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敦请”，北京政府代表高恩洪专程赴津“迎迓”。一时间，“劝驾之代表往来不绝于路”，各方名流政要云集天津，使得因张勋政变下台后在天津蛰居多年、受人冷落的前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成了民国政坛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

面对直系敦请复职的举动，黎元洪在内心里当然自鸣得意，而对外则表示出清高之态，一方面称“国家未能统一，不敢冒昧出任”；另一方面又说“既各方面迫于救国热诚，力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之前途”。但是，为了表示他非为个人利禄权位而出山，也为了在军阀强势下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黎元洪故作姿态，提出以实现“统一”、“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作为复职条件，其中尤以“废督裁兵”为中心，并声称“非俟曹、吴、国会切实依我条件，决不就职”[147]。

6月6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废督裁兵”通电称：“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大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

后，慨然入都。”[148] “废督裁兵”就是削弱军阀专权，裁减庞大武力，实现国家在文治下的稳定发展，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要求，黎元洪此举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各地绅商和社团纷纷通电响应，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发出通电，提议召开国民废督裁兵大会，请北京政府下令永远废除督军制及军区制；组织裁兵委员会，限制军饷；督军如不解职实行废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以裁兵促进会理事身份，在7月2日具呈黎元洪，建议发明令：一、从是日始，无论如何情形，不得新招一兵；二、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三、即日召集全国裁兵会议[149]。而且列强也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认为中国财政困难、政局不稳，均由于军队人数过多，因此“切望中国政府应举行迅速暨切实之办法，以期裁减上开之军队与支出”[150]。这也给了黎元洪提出裁兵的底气。

但是，黎元洪的裁兵提议却使武装在手、拥兵自据的直系武人颇为恼怒，认为“以裁兵废督法律、政治两无所据，适丧威信，主谋、主稿之人恶不胜诛。”[151] 只是碍于解决“法统”问题，迎黎复职的声势已经造成，他们不便立即发作，而是在7日由曹锟、吴佩孚联名发表通电，表示“锟与佩孚对于元首废督裁兵意见根本表示赞成，决当以身作则，先从直隶做起，并决以诚意助元首进行。一切完全由锟与佩孚负责”[152]。接着，直系诸将齐燮元、冯玉祥、田中玉、萧耀南、陈光远等相继发出拥护“废督裁兵”的通电。张耀曾亦告黎，“外间风云大变，如再坚持，恐失人心，不做总统则可，不做人则不可，前途不堪设想云云。黎似有活动意”[153]。有了曹、吴的上述表示和社会舆论的态度，黎元洪也就有了复出的借口。他不再扭捏作态，于6月10日连发两电，一称曹、吴之表示“体国公忠，立志坚决，天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于此“群龙无首，京辅荡摇，再任悬延，或生剧变”之时，定次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一称其入都不过暂行总统职权，其他法律问题，俟国会恢复后听候解决[154]。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到达北京，中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他在复职演说中称："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斲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其后，他宣布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155]。为了消弭所谓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黎本意想组织南北"混合内阁"（他任命谭延闿为颜阁内务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即有此意），并由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出任内阁总理，故颜惠庆在任职后对外通电称，"在伍公首途以前，阁席未便虚悬"，自己不过"暂行承乏，维持现状。并经一面电促伍公早日莅驾，藉惋殷望"[156]。但因黎之复职不为南方广东政府所承认，谭延闿率先表示不能悖护法立场而就北京政府职，伍廷芳也于6月20日发表通电，拒绝出任内阁总理，并称黎之复职"缺乏法律依据，不敢轻易苟同"。所谓南北"混合内阁"的设想未能实现。

黎元洪在直系支持其复职之初，还是企图有所作为，其间他最为坚持的，应为"废督裁兵"的主张。军阀混战、武力交兵，是民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废督裁兵"的主张迎合了社会需要，也得到各地民众团体和舆论的积极响应，当黎元洪上台之初，各地民间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明，要求"废督裁兵"，永远废除军阀干政的基础，舒缓民众养兵并为兵所乱的痛苦。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其主要政治诉求，在北京政府设裁兵委员会，希望以此不仅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也为自己在直系武力威胁下当政寻求缓冲。但是，"废督裁兵"却完全有悖于军阀的利益，武力是军阀得以拥兵自重的根本，而且从上至下、从大到小形成为环环相扣的利益，面对社会各界的要求，军阀的利益是一致的，面对他系军阀的裁兵主张，本系军阀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督"的名义可废，而兵的实质万万不可裁，由此注定了"废督裁兵"的主张之不能实现。

当黎元洪提出"废督裁兵"主张之初，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

在口头上表示支持。6月15日，曹、吴在保定召开的直系将领会议上，呼应“废督裁兵”的主张，提出在全国“废督”，另行设置若干军区以掌兵的方案。7月6日，吴佩孚又在致北京政府电中提出了裁兵具体办法，建议大省置二师，中省置一师一旅，小省置一师，全国共置四十师，余悉裁撤[157]。不过，吴佩孚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裁别人的兵，而不准备裁自己的兵，因为“裁兵废督之举，要为百年大计，所关尤须通盘筹划，兹事体大，非俟统一之后，无从着手”[158]。而且，当时“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至惊动外交团在7月20日根据华盛顿会议要求中国裁兵的决议，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宣称“中国近日情形，不但与华府议案大相违背，即与黎总统鱼电主张，亦相径庭，对内对外不符之处甚多。”[159]直系既如此，刚刚在战争中失败的奉系更是如此，不仅不能裁兵，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扩军，以备来日再战，其他大小军阀的反应亦可想而知。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电陈北京政府，认为裁兵是“矫枉过正，徒骛虚名，反滋流弊”，“现有之兵，来自招募，生计艰难，迫而为此，一旦被裁，势必要求恩饷，当此财政奇绌之时，安有巨款遂其要求，稍不如意即哗变。充兵既久，坐食成性，被裁以后，穷无所归，辗转勾结，流而为匪”；“锡山久绾兵符，兼膺民政，熟权利弊，几费筹思，以为欲图根本之廓清，必当有完备之计划”[160]。“鲁拟领薪办法十一条，条文迄未到。皖以欠饷太多，无款谈不到裁兵。苏复电赞成，但无办法”[161]。说一千道一万，兵是军阀的护身符，是万万裁不得的。

裁兵既不可行，废督的名义倒是有了“成效”。6月15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江西督军陈光远本兼各职（因陈当时在江西的地位已不保），其后任命曹锟保荐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为“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27日，吴佩孚致电陆军部，提出“废督之制甚急，各省宜改以督理全省军务名义为宜”[162]。从此以后，换汤不换药的“督理”名义便代替了已经声名狼藉的“督军”名义。黎元洪还想以省长取代督军，以压抑军权，张扬民权，他上台后曾先后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

（后改王承斌），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等。但他的做法首先就遭到直系的反对。6月23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警告“南北尚未统一，封疆大吏，不宜大肆更张，恐生反动”。8月1日，吴又通过陆军次长金永炎转交黎元洪电，认为“督军一制，在今后万无存在之理，南北统一之后，军制军区如何兴革划分，应由中央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实行。现在新旧交替，各省军队复杂，治安所托，省长往往不能负责。如裁撤督军省份，似宜有督练或督理字样，以维现状”[163]。所以，黎元洪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上述经他委派的省长，除了直隶和江苏两省以外，其他省长均未能或未敢到任。黎元洪还曾企图令兼任省长的督军，如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辞去督军，专任省长，结果为阎、杨所拒；黎元洪又企图将河南督军冯玉祥改派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从而裁撤河南督军，但因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反对而未成。总而言之，黎元洪的“废督”，除了废了几个“督军”的名义或将“督军”易名为“督理”之外，几一无所成。

与黎元洪的“废督裁兵”主张相呼应，不在直系控制下的南方诸省则附和了黎元洪的主张，并与“联省自治”运动相结合，以“废督”而强调“自治”和“民主”。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职，“惟以尚无合法政府，未便交卸。且仓猝离职，恐滋军佐疑虑，不得已，乃以第十师师长名义，暂行维持原有防地”[164]。其后，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20日宣布“善后纲要”：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犯；所部各军防地，暂仍其旧；省内各行政机关均仍其旧；裁兵事宜关系重大，俟合法政府成立，全国裁兵计划确定，即时实行；各军饷项及关于军事各项经费，仍在国税项内开支[165]。可见卢永祥的“废督”根本不影响其实际权力，无非是从“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一变而为团体拥戴的督军”而已[166]。8月1日唐继尧出任云南省长，废除靖国军司令名义；12日，袁祖铭出任贵州省长，取消黔军司令名义；10月1日，赵恒惕被湖南省议会推举为省长，取消总司令名义；12月2日，四川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但

这些名义的改动无非是名改而实不改，控制各省实际权力的仍是没有“司令”名义的军阀“省长”。总之，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黎元洪的“废督裁兵”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三　反直阵营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应

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民国政治似乎重回民初轨道，那些从来以枪杆子为后盾、视法治为儿戏、对政治颐指气使的直系军阀们，却发出一片对“法统重光”的欢呼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反直阵营对此却有不同态度。徐世昌下台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于6月3日率先发出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他提出：“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任”；“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统系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认为黎元洪当年下台时所余之一年三个月的总统任期，已由冯国璋代理期满，黎“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进而声称：“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167)]。接着，同属皖系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于7日发表通电，主张以第一届国会从速制宪，“一俟宪法告成，再行依照宪法规定，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如此，则徐世昌“法律上之地位，固仍然存在，在未经依据宪法，改选总统以前，应仍由现政府维持现状，以免纷更”[(168)]。以徐世昌和皖系的关系，他们有此论并不意外，但此时皖系的实力远不能与直系相比，卢永祥等也不过表示其态度，而无力采取实际行动。及至黎元洪复职成为事实，卢永祥又在6月13日致电表示祝贺，曲以应付，但他只承认黎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声称黎为“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元首地位待诸国会解决”[(169)]。至于奉系的态度，因其军事失败，自知暂时无力干涉北京政治，而求保有其东三省地盘，故对此敷衍了事，态度模糊。6月3日，东三省议会发出通电，表示将“本自决之精神，谋统一之实现”。

黎元洪复职后，东三省商工联合会于20日发表通电，表示赞成统一，但同时又声称东三省“伏莽未靖，而沿边防务地方堪虞，……非有重兵，不足以资保卫，东三省原有军队，一时断难遽裁，绝非废督裁兵四字，空言漫能解决”[170]。此后，奉系在东北埋头练兵，整军经武，以图再起，对北京政治态度中立，轻易不表明态度。西南各省对黎元洪复职都“表示静默，以待时变”。广东陈炯明“方在避免政治之表示，故对于时局，大有不加闻问之态”[171]。

对黎元洪复职表示坚决反对者，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与非常国会。因为广东政府与非常国会直接与北京政府对立，如承认黎元洪复职、旧国会复会为恢复法统，则势须撤销己方政府与国会，犹如自废武功，不说孙中山等坚持理想的革命党人不同意，即便是非常政府与国会的不少成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不会同意。因此，当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酝酿之初，国民党内即有人认为：“北方现在拟恢复之旧国会，多为广州非常国会已经除名之议员所主动，且内幕中不免有为军阀利用之嫌疑，故当以现在广州之非常国会为合法国会，而不宜别有所恢复；且黎元洪为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国会之应负责者，而其任期已由冯国璋完全代满，在法律事实两方面皆无复职之可能。”[172] 旧国会宣布于6月1日复会后，广州非常国会于3日召集全体会议，对所谓恢复“法统”的主张表示反对，并通电中外，否认续开民六国会的合法性，声明中华民国合法大总统及合法国会均在广州，法统当由广州国会继承[173]。为了剥夺黎元洪复职的法理依据与道德正当性，6月6日，非常国会通电宣布黎元洪的三大罪状：一、毁法，“六年六月十二日竟下令解散国会，遂启南北连年战争”；二、叛国，“黎氏徇张勋之请，将中华民国统治权交付宣统，签字盖印，首先称臣”；三、辱国，“宣统复辟则中华民国既倾覆，元首有殉社稷之义，黎氏竟逃往日使馆躲避，受庇外人，污辱国体，莫此为甚”[174]。非常国会的通电不接受黎元洪复职为合法。

6月6日，广州政府总统孙中山发表《就徐世昌退职对外宣言》和

《工兵计划宣言》，表示其对黎元洪复职与旧国会重开的态度。孙中山在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及黎元洪复职与旧国会重开之事，但声明“溯自民国六年，武人称兵，国会被非法解散，构成大乱。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统帅陆海军将士以护法戡乱，致力所在，务扫除不法之武力，俾国会得以自由行使职权”。如此则为广东政府和非常国会勾勒出明确的合法性传承路线图，以打消外界对广东政府和国会的质疑，故孙中山对外郑重声明其为“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领”，“正从事于改造中国旧生活之事业，而使之适合于政治及经济的环境”，并要求列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实际还是否定了黎元洪复职和旧国会重开的合法性[175]。

关于如何“改造中国旧生活”，孙中山在宣言中重申其“护法”主张，提出“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使国会得自由行使其职权，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乱，适以长乱。故欲使今日以后，国会有自由行使其职权，不再受非法之蹂躏，第一当惩办祸国罪魁，第二当保障国会安全”。孙中山明确申明：“溯自黎元洪于一千九百十七年非法解散国会，全国政治即逞分裂之象。殆徐世昌于一千九百十八年非法就任总统，分离乃益以加甚。更因徐继续在位之结果，政府遂尔解体，国家之威信因亦堕落至往日未有之程度。”既然黎元洪和徐世昌的作为都被定义为“非法”，他们当然可以被合理的逻辑推理为“祸国罪魁”，徐世昌的退位固为正当，而黎元洪的复位亦不具有合法性。

对于如何解决民国政治的诸般问题，孙中山倡议以兵工计划对应黎元洪的裁兵计划，“祸首既惩，则乱法之武力，无自发生，故军队之安置，宜为要图”。为此，孙中山提议：“军兴以来，兵额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武力所驱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骤失所业，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为工兵，统率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以工具，每日作工约六小时至八小时，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饷，较现时倍加，将弁月饷百元以上者加

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则其工作所生产之纯利，以一半归于国家，以一半归于工兵，论人数均分，无自差等。如此则一转移间，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铤而走险之虑，工事日繁，有生产发达之象。然后善用外资，投之实业，以起积年之疲弊，谋社会之繁荣。转危为安，悉系于此。现有兵数，既以次悉改为工兵，征集爱国之士，编制国军，定为义务，两年一易，其兵额以二十万人至三十万人为止。此法既行，即有不逞之徒，亦无武力以为之衅，毁法之祸，不可再作。国家机关，依照法令行使职权，无能妨阻之者，然后政治乃可入新轨道，而国家乃有长治久安之望也。”孙中山的计划看上去似乎颇为周详，但在当时武人当政、军阀视军队为其命根子的情况下，所谓兵工计划亦不过是孙中山的美好理想而已，而在孙中山不具有黎元洪的大总统身份时，他的兵工计划在军阀中得到的反响甚至还远不及黎元洪的裁兵计划。

不过，孙中山之所以为孙中山，在于他始终如一的理想主义精神与不懈的奋斗和追求。所以，他在宣言中仍然坦诚自信地表示：“今者直军诸将领既能知毁法之为非而忏悔之，犹当知护法之为是而服从之。数年以来，国内战争，乃护法与毁法战争，绝非南北战争。苟北方武人赞同护法，即此共同携手，以济时艰。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留待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直军诸将如能履行此项条件，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若进退失据，惟知假藉名义以涂饰耳目，则岂惟无悔祸之诚，且益长诱张为幻之习。本大总统深念民国以来祸乱之由在于姑息养奸，决为国民一扫凶残，务使护法戡乱之主张，完全贯彻，责任始尽。”

孙中山对于黎元洪复职和旧国会复会的反对意见，在直系军人中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他们仍然是我行我素，操办着所谓“法统重光”之举。倒是吴佩孚在6月11日致电孙中山称：“戡乱而来，得仁而止。今当国是已明，山河再奠，东海于二日退隐津沽，黄陂依法复

位，同心一德，共图建设，宜取消非常总统，揽辔北来，薰沐以待可也。”[176] 可以想见，孙中山对此亦不会有正面的回应，南北对峙依旧。

就在孙中山刚刚表示了自己对北京政局变动的态度之后，6月中下旬，忽发生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驱逐孙中山的事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177]，广东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非常国会议员在广州感受陈炯明的威胁，不安于位，大部分人出走上海。到沪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旧国会恢复是护法的成果，应该参加，但出席者应为参加过护法运动的议员，并应在上海集会，这反映了接近孙中山的部分议员的意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旧国会既已恢复，自应赴京参会，至于参加者的资格问题，只能在赴京参会后讨论，这反映了希望保持议员身份以维护其个人利益的部分议员的意见。此后，两种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留沪议员与赴京议员各行其是，非常国会无形解体，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对声浪自然销声匿迹。

四　旧国会的恢复与新阁组成的反复

8月1日，经历了解散、复会、再解散、再复会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复会，由吴景濂担任众议院议长，张伯烈为副议长，王家襄担任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吴景濂在复会致辞中称：“今幸各方悔悟，法统重光，得再聚首一堂，共商国是，此为极可庆幸之事，又为极可痛心之事，以后同人应惩前毖后，一致努力，完成制宪大业，以尽吾人之天职，而慰国民之希望。”[178] 不过，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议员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讲求功名利禄者所在多有，故外界不少人并不看好国会的前途，认为议员们“无远大之眼光，为国家一计久长之策，而惟沾沾于一时之利禄权位以及枝节之细事”而已[179]。

国会复会后，首先在“民六”还是“民八”议员何为正统问题上争执

不休。1918年7月和8月，南下广州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决议，将留在北京不愿参加护法的109名参议员、216名众议员共325名议员予以解职，其后又另行增补若干议员，使广州国会的参议员人数达到212人，众议员人数达到310人，是为“民八”议员。他们认为，黎元洪在1917年下令解散国会是非法的，南下议员在广州为护法而召开非常国会，是为维护法统，主持正义，且合乎法律；当时部分议员因故或不愿南下护法而被非常国会解职另补，亦为根据法律进行；现在国会恢复，“民八”增补的议员当然有资格出席会议，而“民六”议员中被解职者则没有资格出席。“民八”在京议员成立了“法统维持会”，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向国会争权利。北京的“民六”国会议员则坚持，他们被广州非常国会开除没有法律依据，新增补的议员各项手续不完备，投票者亦不到法定人数，故“民八”增补议员没有资格出席国会[(180)]。国会复会后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就是当年被广州非常国会除名者，他与吴景濂都坚持“民八”议员不能参会的主张。一方要求参会，一方不让参会，双方剑拔弩张，尖锐对立，甚至动手动脚，发生肢体冲突，以至国会复会后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为了防止“民八”增补议员入场滋事，吴景濂等对国会会议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开会时两院会场均须戒严，议员凭证章入内，但仍无法避免参加过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的发难。舆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议员吵闹，实为个人利益，“以此各党互相争权夺利暗斗之故，其结果于立法事业将一无所成，故今日中国之国会，实有不如无也”[(181)]。

8月30日，“民八”议员45人赴众议院，要求面见吴景濂，出席会议，结果“初则闭门禁阻，嗣始入院，多数议员允为依法解决”。9月5日，国会召开宪法审议会，焦易堂、邹鲁、谢持等护法议员相继发言，质问王家襄，何以不许护法议员代表进场？王的答辩不得要领，众谓法律不明，制订宪法何能使国人遵信。王谩骂，护法议员哄上殴王。双方动起手来，会场秩序大乱，会议无结果而散。次日，国会开常会，“民六”、“民八”议员又发生纠纷[(182)]。其后，黎元洪请张伯烈、褚辅成出面调停，但“民八”议员坚持自身地位有效，反对调停，

结果致国会第二届常会于9月18日被迫宣告停开。

10月11日，在有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全体总长出席的国会第三届会议开幕典礼上，两派议员又发生激烈争执，护法议员干脆直接质问黎元洪，当年非法解散国会，何以不负责任，今日以何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处境尴尬，会场里只好以“鼓奏军乐，以乱质问之声”。不少议员被便衣“如捕罪犯，挟出院外，委弃于城根马路，肆意挤压”[183]。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闹大，影响国会的正常运作，吴景濂遂向黎元洪建议，设立“政治善后讨论会”，以此安置“民八”议员，并且每人每月补助400元。10月28日，“政治善后讨论会”正式成立，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担任会长。有了此等安置，多数“民八”议员不再坚持与国会相抗，“民六”与“民八”议员的对峙渐趋缓和。

纯就法理意义而言，“民六”或“民八”议员“合法”与“非法”之争各有其理由，不过如果按选举法的规定，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无论是“民六”还是“民八”议员，实际任期都超过了规定年限，所谓“合法”与“非法”的争执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与维护个人私利之口实，并不具有其本来意义。旧国会复会后，国会议员历经多年的政治动荡与分化组合，过往之党派特性更模糊不清，各种团体派系组合既有政治主张接近者，更有纯为派系个人利益者，他们对于制宪、组阁等事项各有主张，并为此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幕政治剧，只是场外的观众对此早已失去了观看的耐心，更不必提军阀只不过将他们当作“民意”的工具。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支柱之一的国会制度，在民初引进中国之后，并无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在军阀枪杆子的压迫与操纵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其应有之地位与作用，所谓易桔为枳，此时的国会制度似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中，空余那些议员们还在台上表演其无用功。

内阁方面。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职当天，任命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因“颜与何人皆能共事，且素无私人”，直系保、洛两派因而“素重视颜，黎据此征颜，颜亦力辞，经强劝而后就”[184]。黎元

洪企图“笼络”吴佩孚，任他为陆军总长，可是吴佩孚偏不给黎元洪面子，声称“不开军人干政之嫌”，因此“势难兼领”陆军总长。不过，颜惠庆出任总理后，却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野心勃勃，其“为人不学无术，使气逞强”；“遇事把持，意气偾张”；“一面与直系周旋，一面要索以巨额党费及自身组阁为报酬”[185]。他对颜惠庆上台很不满意，而且他“有一群新进的国会议员为其羽翼，供彼指挥。内阁的成败，悉视其喜怒而决定。而此一国会，既为产生下届总统的机构，因此更增重了他的牵制力量”[186]。由于吴景濂的反对，颜惠庆不敢将内阁名单提交国会通过，他本人也不安于此“临时”身份，急于求去。7月31日颜惠庆请假离职，并表示“决不再代”，内阁由教育总长王宠惠暂代总理。

黎元洪复职后，一直考虑拉进南方知名人士组阁，以实现“和平统一”，加重自己的政治分量。8月5日，他任命南方知名人士唐绍仪署理内阁总理，就是他实现自己政治企图的第一步。黎元洪也知道此事的敏感性，事前专门派下属金永炎（金晓峰）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但黎元洪的打算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张相抵触，所以遭到吴的坚决反对。唐阁名单发表后，吴佩孚发表公开通电，指责“唐主上海八年和会，世间啧有烦言”；“金晓峰来，言之再三，不意一回京，卒然发表，显示别有用心，何以惺惺来洛，貌为周施？”[187]吴佩孚还致电曹锟，称黎元洪“性情仁厚，迩来被奸党阴谋，力拥唐绍仪组阁”，请“通电同志各省，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成”[188]。唐绍仪知其不能为北洋系所容，故亦迟迟不到京就任。

北京新内阁难产，“因洛阳有异议，根本动摇”，黎元洪“已处绝境”[189]。为了解决内阁虚悬的危机，黎元洪只能屈大总统之尊，不断派人到洛阳专门“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吴佩孚所任之直鲁豫巡阅副使，本来的职权“从理论上讲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上则不然，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190]。吴佩孚曾经表示反对军人干政，表

示“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甚而指斥保派人物，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191)]。但他自己却并不如此实行，既然黎元洪前来“征求”意见，吴佩孚也就不客气地表示：“对唐组阁，绝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谈，以亮畴（王宠惠）代揆，高（恩洪）可不动，张（绍曾）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192)]。吴佩孚颐指气使地替黎元洪决定了内阁的主要人选，哪里还有黎再“斟酌”的余地。吴佩孚还劝张绍曾“勿组阁，劝王阁勿辞退，愿为其后盾”[(193)]。并令直系各督“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使成立，请以王宠惠正式组阁，则国计民生，实利赖之，非独团体安危所系已也”[(194)]。在吴佩孚的指使下，直系大将冯玉祥、齐燮元、萧耀南等亦纷纷发表通电，提出王宠惠“才学优迈，与各派初无恶涵，以之组阁最为相宜”[(195)]。由于吴佩孚的坚持，终使黎元洪理想中的南北统一混合内阁流产，黎元洪只能在9月19日任命王宠惠署内阁总理，对内阁组成则“不参意见”。而内阁组成前须“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则是黎元洪复职后历次组阁之惯例，于此亦可知黎元洪办事用人的“自由度”究有几何。

新任内阁总理王宠惠和其内阁成员——财政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汤尔和，当年5月曾和蔡元培、胡适等共同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所谓“好政府”主张，因此，王宠惠内阁又被称为“好人政府”，一度曾被外界寄予期望，而在实际上，吴佩孚是“内阁的后台”，“如果没有吴的支持，内阁就不能维持长久”[(196)]。但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此举却惹恼了保派。因为黎元洪就组阁问题“征求”吴佩孚的意见而未“征求”曹锟的意见，显有不以曹锟为然之“过”，而保派人马在王阁中只有交通总长高凌霨一人，也使保派颇为不满，辄以去王为目标。保派的图谋得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支持，正是因为担心阁员名单在国会表决中被否决，王宠惠上任后根本就未将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王宠惠对国会的蔑视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吴景濂，他在国会与王宠惠多次发生公开争执，致内阁与国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吴景濂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也怒形于

色地说："难到你就是国会？"接着，吴景濂骂王"混帐"，并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则骂吴不配当议长，"议长怎样可以说出下流话来"[197]。两位在外界舆论心目中理应温文尔雅的政界人物，却如泼妇骂街般使横，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紧张，人们亦可从中了解到北京政治的多重面相。

第三节　直系当政后的南北政局

一　曹吴矛盾与保洛之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独大，实际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北京政局也因黎元洪之复职一时似又复上正轨，但其内里之矛盾与冲突却一日不复停止。不但旧有的中央与地方、南与北、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依旧，而且新的矛盾还在不断产生，尤其是直系内部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形成保洛之争，成为影响此时北京政治的主要因素。

直系虽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但在其形成过程中，一直有南（苏、鄂、赣）北（直、鲁、豫）之别，其首领冯国璋较为低调且又早逝，内部关系不似皖、奉两系那般紧固密切。及至曹锟、吴佩孚以武力征讨而崛起，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早逝，苏督李纯自杀、鄂督王占元被逐、赣督陈光远势微，北派力量才在直系中占据了优势。曹锟、吴佩孚统率直系力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利后，直系力量得到大扩张，他们在直系中的领袖地位亦无人可敌。但曹锟虽为直系最高领袖，此时却基本不直接领军，而是依靠吴佩孚为他南征北战，他本人则一心希图成为大总统，过把总统瘾，满足虚荣心。有人论之为："曹锟一生庸暗，为直系偶像式之首领。然偶像非一无足取也，用不着时并不碍事，用得着时可比一尊活菩萨。盖曹与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同为袁世凯所办北洋武备学堂学生，资望颇高，为人蔼然可亲，深得直系诸将领之爱戴。"[198] 直系实际领军的吴佩孚，能

征善战，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但却不能统领直系所有的军事力量，也不是直系共同拥戴的政治领袖。曹锟与吴佩孚在一些问题如推举总统等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格于历史与个性，吴佩孚对曹锟保持以下事上的尊重、礼遇及效忠，而曹锟对吴佩孚也能大度容忍并容纳其不同意见，两人关系的融洽对维系直系团结与团体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吴之能出奇制胜，要亦由曹之大体信任，故能内外和协，内无问题可以专力作战”[199]。

不过，第一次直奉战后，情势有了变化。“直系之权力可以揽持中央政局，曹之总统欲望突生，短期欲其实现；而吴以时局之顾忌，不欲其遽行，于是迎合意旨者又从而为排挤倾轧，分裂之机乃启矣”[200]。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招贤纳士，插手政治，一方面公开标榜“军人不干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另一方面则频频对北京内阁之更换以及政府之政策表示意见，俨然政府之“太上皇”，难免有“功高震主”之势，使曹锟心生芥蒂。而且，曹、吴身边左右人等各有企图，各拥其主，都想在政治上发号施令，满足个人及小集团利益，他们在曹、吴身边的挑拨构煽，制造双方的恶感，离间双方的关系，尤其是吴佩孚与曹锟四弟曹锐“意见甚深”，曹锟“夹在中间，不能制止双方，于是影响及于政局”[201]。由于曹锟、吴佩孚分别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的名义驻节于保定和洛阳，因此曹、吴身边人的政治集合又被称为保派（保派在结合津派后又称津保派）与洛派[202]。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保派与洛派之间围绕一系列问题产生矛盾摩擦，暗中以至公开较劲，形成保、洛之争，并直接影响到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局。

直系内部的矛盾分歧自奉系失败、黎元洪复职后便已开始，其中心在于对所谓“最高问题”的态度，而其表现则为愈演愈烈的阁潮。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之后，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他常对左右说：“北洋系袁世凯、冯国璋都当过总统，现在该轮到我了。”[203]而吴佩孚虽不反对曹锟当总统，但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认

为应俟实现全国统一后，再行此举，俾可水到渠成。直系中的保派多为曹锟的直接下属，他们投其所好，加紧“最高问题”的进行，尤其需要控制北京政府，以利操作。拥护吴佩孚的洛派则对此不以为然，也在积极插手北京政府的组成。而曹锟谋求早日当总统的企图又与还想在总统位上待下去的黎元洪发生矛盾，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黎元洪自然偏向于不主立即选总统的洛派，从而使直系间的保、洛矛盾又渗入府院关系的复杂因素。加以内阁组成循例须国会通过，而国会内部各种集团派系的组合又时时变化。如此种种情况，使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发生之频、争斗之烈实为北洋时期之最，从而也反衬出北京政治在武人干政下之特有生态——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但基本上并无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自身利益的考量。

直皖战后，吴佩孚便以直鲁豫巡阅副使、巡阅使名义驻节洛阳，对外号称埋首练兵，实则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居中原之地而干预政治、发号施令。吴佩孚对洛阳的评价是：“洛阳地居中州，为九朝都会，可以控制四方。从军事上说，西凭函谷之固，东据虎牢之险，北倚大河，南阻龙门，四塞可守之地也；陇海东西横贯，京汉、津浦南北直达，兵力之运用，朝发夕至，攻势作战之理想根据也。……今欲统一中国，无论练兵或作战，洛阳都是上选。万一对外有事，京、津、宁、沪易受威迫，必要时也须迁都来此。此形胜之地，安可等闲视之！”[204] 吴佩孚自命习武而经文，在洛阳网罗了不少军政俊彦人才为其谋划。如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吴“酌剂献替，悉处以中，蓬莱（吴佩孚）倚为左右手，俾总持政务。公亦周详勤恳，裁决当世之务如列掌无遗。……蓬莱在军中久，治事简易。开府后，赖公时为招掖材俊，草创规制”[205]；“号称吴佩孚之‘小内阁’，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向吴进献武力统一中国之策，由此深得吴之倚重”[206]。秘书长孙丹林，“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孙氏功劳”；“攻段之计，与去徐（树铮）之计，都是孙氏出的主意”[207]。这些幕僚既富于干才，又心高气盛，较之围绕在曹锟身边的趋炎附势

之辈，似乎多出些许“抱负”，因此他们内心里就看不起曹锟及其保派人物，在曹、吴矛盾和保洛之争中，这些人起的作用自不可忽视。吴佩孚驻节洛阳的几年间，京洛道上，各方人士往来不断，上自总理、部长，下至督军、省长，乃至议员政客、各方代表、士绅文人等等，纷至沓来，请示报聘者有之，图谋私利者有之，而无论是什么来头，都使吴佩孚自我感觉好不威风，俨然政治“中枢”。直系中有人捧吴佩孚是“当代英雄，妇孺尽知，综核半生事业，无非为国为民，武穆公不爱钱，不怕死，正吴使之谓也”[208]。1923年4月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代表极一时之盛，应接不暇”[209]。康有为送吴的寿联所撰内容，或可谓吴本人的真实心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210]。

王宠惠内阁得到吴佩孚的支持，虽未因国会刁难而垮台，但对阁员安排，保派“极不满意”，结果是“王阁甫成，又见摇动”[211]，王阁面对的各方矛盾并未解决。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很想当总理，他所主持的国会与王宠惠势如水火，随时都在寻机倒阁，内阁诸事得不到国会的合作，举步维艰。王宠惠是在吴佩孚的力挺下上台的，在许多方面对吴自然多所关照，尤其是在军饷供应方面，让保派感觉有些厚吴薄曹，便谋求与吴景濂联手推倒王阁。黎元洪的复职得于直系的安排，故直系对其职位亦有予夺大权，但黎元洪又希望能在总统任上干下去，故对其职位变动的任何可能性都甚为敏感。黎元洪复职后，吴佩孚一直表现强势，虽然吴也提出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212]。然在实际上，吴佩孚对内阁组成动辄提出意见，使黎元洪内心不无忌惮，而王宠惠得到吴佩孚的支持，与吴佩孚走得比较近，故黎元洪担心因此而碍及自身地位，对国会和保派的倒阁举动虽未深度介入，但也乐观其成。由此使得王宠惠内阁上任后一直处在艰难的处境之中。

在国会与王宠惠内阁的矛盾中，外交总长顾维钧扮演了某种调停角色，因为他刚刚回国不久，从事的主要又是外交工作，与现实政治

的联系不似他人那般密切，而外交总长是总理之下的首席阁员，正好在发生矛盾时充当“和事佬”的角色。王阁未经国会通过，每当内阁需要向国会报告有关事项、接受质询时，王宠惠不愿面对议员的嘲讽攻击，屡屡缺席。而顾维钧认为，“这是每一个议会制政府必须应付的场面，唯一办法是面对现实，这是无法回避的”。王因而派顾代自己出席。顾维钧对议员的质询回答得很有礼貌，态度诚恳，尽可能说明各种真实情况及正反面理由，议员们也认为他应付质询很得体。顾维钧还常常宴请国会议员，并认为“这是与国会议员处好关系的一种中国式方法”。甚至于，他曾将王宠惠与吴景濂拉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以调解双方关系，但由于双方积怨甚深而收效不大。对于王宠惠迟迟不将阁员名单提交国会通过，顾维钧对王说，“你是个国际知名的法学家，大家都嘱望你在所有人中是最能够严格尊重宪法的人”。他提议，或将名单提交国会，或辞职，或请吴佩孚另外提出人选。他认为第三种办法实际做不到，第一种办法通不过，因此“唯一的办法只有辞职”。但王宠惠不置可否[213]。可是接踵而来的“罗文幹案”，成为王阁与各方矛盾汇集的焦点，并且将王阁逼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地步。

二　罗文幹被捕案

罗文幹（1888—1941），字钧任，1904年留英，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政府总检查厅检查长，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司法次长，大理院长，代理司法总长，盐务署长兼币制局总裁等职。王宠惠组阁时，推荐罗出任财政总长。北京政府的财政向来不宽裕，财政总长未必是个好差事。据财政部发表的《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称：“中国财政之困难，固不自今日始，然未有来源涸竭、债务层叠、岌岌可危如今日者。中央各机关及内外债权者之索欠，既以应付俱穷，绝无活动之余地；各省区又以政变迭出，军费日增，截留应解之款，而以为未足，复日仰给于中央。应之则库空如洗，罗掘无由；不应则逐电交驰，追索益急。日处此扰攘纠纷之中，中央与各省区遂交受其困，而无可振拔。”[214]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为了

解决军费难题，曾经在其治下的直、豫、鄂三省实行摊派，大县3万，中县2万，小县1万[215]。很显然，这些军费开销，最终还是要落到北京政府的头上。为了解决财政困局，罗文幹上台后，曾经议发“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1000万元[216]，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仅仅是每月的中央军费开支就远远超过财政收入，更不必提那些非军费开支的支出，如教育经费等等，往往就成了军费开支的牺牲品，欠款欠薪在所难免。而保派为了打击王阁，更借此掀起索饷索薪潮，甚至由曹锟直接出面，索取数百万元欠饷。王宠惠深感难以为继，提出辞职，黎元洪为了自身利益，又不接受其辞职，国会方面则与保派合作，质问黎何不同意王阁辞职，北京政治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辞职既不成，国会不合作，王宠惠干脆让罗文幹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国会经费，图逼国会让步。吴景濂为求国会拨款，通过外交总长顾维钧向罗文幹疏通，罗不仅不置理，还对顾说“别理他”。最后只能由顾给一家比利时银行写信说明，吴景濂才拿到一笔贷款，得以维持国会的运作。此举使吴景濂极为恼火。据顾维钧称，罗“是王的终生好朋友”，站在王宠惠一边，而王又站在吴佩孚一边，但王“并没有把他们之间的一些政治策划和磋商情况完全告诉我”[217]。11月14日，罗文幹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而签署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吴景濂即利用此事，与保派联手，指控罗文幹擅订合同、丧权辱国、违背法纪、滥用职权，并有纳贿嫌疑。18日晚，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等至东厂胡同黎宅，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幹，拘押于京师警察厅[218]。

奥国借款本为中国与奥国银行团在民初分次订立的借款合同共475万镑，应在1921年底还清，后因北京政府无力支付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缓执行，未还本金约432万镑。战后，债票持有人要求中方继续履约，但奥国借款本已由巴黎和会决定作为奥国赔偿中国之物，实已无效，当然没有签订新约、换发新债票的理由。此次罗文幹为救各处索饷、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并屈服于列强压力，同意续订合

同，换发新债票本息合计519万镑（约合四千余万银元），诚有可非议之处，而且合同里有“奉大总统核准，经国务会议通过”等语[219]，但实际上，据王宠惠告顾维钧，罗签协定前告诉了他，但并未经内阁讨论[220]。这更为保派倒阁提供了炮弹。

罗文幹被捕，引发北京政坛风潮。国会方面力主查办罗文幹，指罗“丧权辱国，渎职纳贿”，“违背约法，滥用职权”，指罗文幹此次办理失当之处有三：丧失国家权利约五千万元之巨，不先交国会同意、总统批准及国务会议通过，一也；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均须国会议决，载在约法，该总长竟敢私订有负担之契约，并发行以新换旧之公债，二也；据（大总统）云：确无此项批准案件。乃该总长擅敢于十一月十四日已签字合同内，竟有“国务会议通过及大总统批准”之字样，显系违背约法，滥用职权，三也[221]。20日通过查办罗文幹的动议。王宠惠等则力挺罗文幹，认为总统和国会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声称责任内阁对此无法负责，“理应立即引退”[222]。王阁外交总长顾维钧坚决反对逮捕罗文幹，他认为内阁向总统负责，不和政府打招呼就逮捕总长是违法的。“这个事件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作为外交总长，我曾经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223]。

王阁为吴佩孚所支持，“罗案”发后，吴不能坐视不管。他于20日发出通电，为罗辩护，同时训斥黎元洪，称此案“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同时致电曹锟云，此案“荒谬离奇，实所少见”，“请我师就近质讯，以维法纪”[224]。但曹锟却不给吴佩孚面子，23日曹发表通电，称“罗文幹身为阁员，丧权误国，……既经拿交法庭，应请大总统毅然独断，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期无遁饰，毋令徇纵，以彰国法”[225]。吴佩孚指“违法”者为黎元洪下令捕罗“不成事体”，曹锟则指“违法”者为罗文幹“丧权误国”，于此实将直系内部矛盾公诸于世。其后，直系保派将领连发通电拥曹，而洛派将

领出于武人对文人的轻视亦不愿多言，甚而有公开通电拥曹者。吴佩孚既不能得直系诸将之谅解，也不愿使事态扩大，影响直系团体利益，便“顺风转舵，对罗案完全软化了”，向曹锟解释自己“与王亮畴（王宠惠）素不认识，仅于觐谒元首时与之一面，而与罗财长则无一面之缘”；申明“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226]。2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说明自己对此案“疑虑冰释，如果确有犯罪证据，自应依法严惩，以昭炯戒”[227]。吴佩孚既如此表态，王宠惠也无法再干，只能于11月25日通电辞职，随后黎元洪在29日任命汪大燮署总理。

“罗文幹案”发后，黎元洪夹在曹锟的保派和吴佩孚的洛派之间，哪边也不敢得罪。吴佩孚通电训斥黎元洪，黎受此羞辱，无可奈何，先是复电吴佩孚撂挑子，称“予本不愿干，请即觅定人来，予已准备交替”；接着又少见地发飙，质问吴佩孚，“且言冠冕尊之，而履蔫视之，执事髦下如云，何以临众，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折元首”[228]。吴佩孚见此电勃然大怒，向其左右说：“我们为拥黎之人，我们有错，尽管教训，为什么公开登报？这并不把我们当自家的人。既然如此，以后洛方不准和府方再有电往来。”[229] 罗文幹身为内阁部长而被关押，黎元洪也觉有些过分，所以不几日便派人保罗文幹出狱，并安置在总统府[230]。可是出身法学硕士的罗文幹却认为，不能如此不明不白地了事，声明要求法律解决，自愿回狱。黎元洪只能再次让政府派人往迎，同时咨复众议院，以查办罗案违背约法有关规定条文，将案卷退回。黎氏的举动又引起曹锟的不满，保派连日指责有关“罗案”的电报在京不能拍发，向曹锟进言称：“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231] 曹、吴矛盾有激化之势，时人甚而有保、洛两派决裂，并发生战事之推论，且其“形势已成，将来变化，不可思议”[232]。

1923年1月11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文幹“犯罪嫌疑不足，行为不构成犯罪”，予以不起诉处分。但保派抨击检察厅裁决不当，要求重行处理。15日，保派司法总长程克屈服于曹锟的压力，以部令

再次将罗逮捕入狱。次日，在内阁讨论此案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由国务院出面为告发人，向法院申请对“罗案”再议，并自告奋勇起草国务院咨交检察厅的文件，直视庄严的司法为儿戏，从而又引起北京教育界轰轰烈烈的“驱彭”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7日辞职离京，他还发表宣言，揭露“议员的投票，看津贴的有无；阁员的位置，秉军阀的意志；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233]。司法界人士亦多为“罗案”抱不平，发起反对蹂躏法权、破坏司法独立的“法潮”。直到当年6月，黎元洪已被赶走，“罗案”作为直系保、洛两派权力斗争的砝码已失作用，而拥曹派急需“好人”出台帮忙，在顾维钧、王宠惠等疏通下，曹锟同意放罗。京师审判厅走了公开审判的过场后，于6月29日判决罗文幹等“伪造文书罪不成立，受贿等情弊均无实据”，宣告罗文幹无罪，恢复了他的自由[234]。

“罗文幹案”哄传一时，对北京政治生态造成颇大影响与冲击。“罗案”内情如何姑不论，但罗身为内阁总长，在国会起哄之下，由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确乎违反“法律程序”。究其实质，则为直系保、洛两派借“罗案”而斗法，所谓“法律”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罗案”结果，保派虽获胜利，推倒了王宠惠内阁，但直系内部矛盾因此而加剧，并公诸于社会及舆论，于直系维护自身地位并非有利。据称，吴佩孚对曹锟屈服后，“宴客酒醉，谈忠诚不见谅处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吴佩孚之智囊白坚武感叹曰：“曹使受蒙蔽，只知总统热，不知环境危，宵小从而煽之，祸遂作。”“津方宵小以排吴使，不惜种种陷诬破坏，取保方见信仇敌之集于各方者，亦复币重言甘以为饵，恶货驱逐良币，斯真军阀末路之现象也。”[235]而军阀在“罗案”中表现之强横更引起社会的反感，吴佩孚个人原有之“清誉”亦因此而颇受影响。史家李剑农评为：“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佩孚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缘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的望着一

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锟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锟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因为一般国人，已认定他也不过是曹锟个人的走狗，从前对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统一太过的大错误。所以曹锟篡夺的计划成功时，便是吴佩孚的势力毁灭时。”[236]“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另一冲击是，黎元洪因为在“罗案”中未能顺从洛派尤其是吴佩孚的意见，招致吴佩孚及洛派的不满，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坚定的支持，当其后保派为使曹锟出任总统而掀起驱黎风潮时，洛派不愿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观，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响。“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又一影响是，王宠惠内阁以“好人政府”而闻名，然这些所谓“好人”在军阀强横政治的干涉下，不仅做不成什么“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于朝夕之间，从而也断了“好人”从政为国谋政的念头，于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经由政治精英的体制内运作而实现稳定运转，只能经由军阀纷争而致社会失态，最终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乱的残局。

三　“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

王宠惠下台，汪大燮登台，保派的组阁意愿并未实现，仍继续攻击汪阁成员与“罗案涉有重大嫌疑”，“继任阁员仍复先行派署，并未同时根据约法提交同意”，因此“亟应另行改组，从速解决罗案”[237]。黎元洪曾有意请外交家顾维钧组阁，但顾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内阁阁员负共同责任，因此除非“罗案”得到澄清，他不可能担任政府职务。接着，吴景濂和王家襄亦登门请顾组阁，并表示了国会的支持，顾同样予以拒绝[238]。与此同时，因为保派对汪阁大加攻击，致汪大燮不安于位，通电声明，“专为鲁案接收问题暂时担任，现决计辞职”[239]。12月11日，汪大燮辞职，改由王正廷代总理，这已经是黎元洪复职不到半年时间里的第四位总理了。直到1923年1月4日，黎元洪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方使如走马灯般更替的内阁总理职务稍

有稳定。

张绍曾是王宠惠内阁的陆军总长，早有意谋阁揆职位，以至吴佩孚曾告其“宜专一维持部务，不可蹈干政之嫌”，“热中阁揆，尚非其时，宜远嫌为要”。吴还致电曹锟，告以“唐绍仪组阁不成，各宵小乃欲组变相之唐阁，以张敬舆为傀儡。张不察利害，冒昧弹冠，帅宜于张未组阁之先，以痛切阻止。如张不听，即通电与之断绝关系，以免外人目为直系政府也”[240]。但因为张绍曾接近保派，与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儿女亲家，可为洛派接受，且与吴景濂早有沟通，故一时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也成了黎元洪复职后经国会通过任命的唯一“合法”内阁总理。

张绍曾出任阁揆之初，自恃与曹锟、吴佩孚的关系不错，又经国会正式通过，故踌躇满志，提出实行“裁兵、理财、教育、实业诸大政”，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可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而其提出实现“和平统一”、先统一后选举、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既与曹锟急于当总统的想法不合，也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图谋相违。事实上，曹锟对张绍曾组阁“不甚赞成，亦不好明白反对”，而吴佩孚则“反对新阁”[241]，只是碍于种种因素，曹吴的犹豫和反对未公开表示而已，张绍曾不察，上台不久，即与直系保、洛两派均发生矛盾。

张绍曾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有黎元洪的影子，因为黎元洪知道曹锟急于当总统，为了延续自己在总统位置上的政治生命，只有抓住“和平统一”的旗帜，谋求各方的支持，抵制所谓“最高问题”的进行，而张绍曾企图在总理任上干出点名堂，实现“和平统一”可谓“捷径”之一。因此，黎、张双方互为依靠，实现“府院合作”，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与进行步骤。1923年1月9日，张绍曾首先致电南方各省，提出“愿努力促成国宪，对外则完成法律上之统一，对内则先谋事实上之协商”；提出“制宪大权，本属国会，一俟法典告成，自应共同遵守。至一切政局纠纷，则当推诚协议，力图改进”[242]。为此，张绍曾派人“陆续南下，向各方疏通，以预备实行他的和平统一的计

划”。为了表示其“诚意”和“善意”，张还下令“各军自守防地”，“援闽”直军暂停前进，“妥为协商办理善后”；派章士钊等赴沪，与孙中山接洽，表示“中央对于两广事项，决不过问并不援助何方”。至于实行“和平统一”的步骤，张绍曾主张召开“国事协商会”，“解决一切问题，并有请孙及所谓‘海内有力诸公’，到京去筹备，以便各项会议的组织召集和议案的起草，都可以预先商议”[243]。

张绍曾提出“和平统一”主张：“吴佩孚系主张武力统一，当然冲突。其实军事实力完全握在吴手，张阁空洞，吴以为聆命令之人而已，并不重视。”[244]“吴不仅干涉江浙问题及湖南问题，对川对闽亦然，他的巡阅使范围无形中扩大到全国。过去他采取‘舍己从人’的态度，恢复法统以求‘和平统一’。乃事与愿违，使他不知不觉地拾起了段的‘武力统一’政策”[245]。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时，直系实力大长，控制着北京政权，吴佩孚踌躇满志，曾经自信地表示，“此次总统就职，国会恢复，名正言顺，统一不难，孙某（孙中山）一小部分当无甚关系。日内中央下停战令，张某（张作霖）若不服从，惟有讨之而已”[246]；“余敢保证一年以内，全国即能统一”[247]。当时，吴佩孚正在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广东与福建策划新的“武力统一”行动。吴的计划是，“孙馨远（传芳）发表长江检阅使，以便调防武穴（湖北广济），再备后命（指进攻福建——作者注）”；“萧督军、孙馨远总司令到洛，陈报保定情况，并商酌援闽进行办法”；“张绍曾宣示，助陈竞存（炯明），放弃闽省。吴使大不赞同。余意孙陈之争，另一问题，定闽所以控浙”[248]。对西南各省，吴佩孚“用以毒制毒之手段，即利用残兵败将，给以饷械，令其反攻。如袁祖铭之收黔（1923年5月），沈鸿英之取粤（1923年3月），林俊廷之督桂（1922年7月），杨森之攻川（1923年2月），无一非出自此种方针。候驱逐孙中山出粤，屈服唐继尧于滇，藉孙传芳入闽而使浙卢孤立，将东西南渐次收归肘下，扫除一切后顾之忧，然后竭全力讨伐奉张，以达其武力统一全国之野心”[249]。为此，他在广东收买桂系军阀沈鸿英，作为攻粤的前锋，沈鸿英也同意脱离其他南北各方面的关

系，军费由吴担负，军事行动听吴指挥。在福建，吴佩孚督导孙传芳率直军“援闽”，企图夺取福建地盘，北可以监视浙江，南可以对付广东。所以，吴佩孚极力要求张绍曾任命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以激励沈、孙两人积极行事。

吴佩孚积极的“武力统一”主张为张绍曾所拒绝，因张认为吴之做法太过“操切”，过于刺激南方，但吴佩孚坚持其要求，并警告张绍曾，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发表”，责难张之“统一”主张为“处无责任之地，好为有责任之言；居有责任之地，乃为无责任之论。其得名也以此，其误事也以此”[250]。在事关直系团体利益的根本问题上，直系对外的态度是一致的。2月17日，曹锟、吴佩孚与鲁、豫、苏、皖、赣、鄂六省直督联名要求北京政府尽快发表沈、孙两人的任职令。直系和吴佩孚的态度给了张绍曾当头一棒，也使刚刚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张下不了台。“日来保洛连电紧催，并派人坐待，有不能不发表之势。但一经发表，则西南浙卢势必反对，与现阁之统一标榜又不合”[251]。张绍曾主持阁议，“经长时之讨论，无两全之策，遂提出全体总辞职”。并声称“五不干”：中山不取消大元帅不干；疆吏干政不干；国内自相残杀不干；国会不速制宪不干；不贯彻内阁精神不干[252]。3月8日，张绍曾向黎元洪提出内阁总辞职，表示“受任之始，即宣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指归，期以扫除已往之纠纷，企图未来之建设”；但“淹逾两月，心长力短，事与愿违。自维才不足以济变，诚不足以感人。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援立宪国之成例，全体引咎辞职”[253]。黎元洪此时需要借助张阁抵挡曹党，故不允其辞，并责其“岂可因责言之来，遂令作洁身之计”，“敦促阁员，即日视事”[254]。黎元洪的挽留不过是表面文章，张阁留任的关键仍在直系的态度。经过多次往还交涉，在吴佩孚的压力下，张绍曾最终屈服于直系的武力，同意发表沈鸿英、孙传芳的任职令。3月19日，张绍曾忝颜宣布内阁总复职，并通过以沈鸿英为广东督理，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内阁令，所谓“五不干”早被其置诸脑后

了。从此以后，即便是张绍曾本人也羞于再谈什么“和平统一”，而其关于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仍为正在策划由曹锟继任总统的直系保派所不容，保派又因此而掀起了新一轮更为剧烈的倒阁潮，北京政治又陷入动荡之中。

吴佩孚虽以强力推行其“武力统一”主张，但由于各地武人专政的现实，各拥地盘，各有实力，而吴佩孚的实力毕竟有限，难以扫平群雄，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然却有损于吴佩孚的形象。如著名报人胡霖所论：“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255]

四　反直三角同盟的酝酿与行事

直皖战争前后，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直系武力扩张，粤、皖、奉（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开始酝酿反直“三角同盟”，这本为段祺瑞广结联盟、对付直系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而孙中山也不反对与各派力量建立关系以为己用。早在1919年春夏之际，段祺瑞就曾派人秘密去上海与孙中山联系，表示愿意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合作。孙中山认为，“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附从”[256]，提出以段赞成革命学说，并放弃与日本订立的军事协约为条件。据孙的回忆，“自沪和议开后，徐、段俱派人来此接洽，予要以完全赞同学说之主张，乃有相商之余地”[257]。这是孙段接触的开始。之后，“双方接洽将近一年，段终接受先生条件”。所以后来孙中山说：“无分南北，只以主义同者则为同志耳。芝泉近日大有觉悟，先生自乐与共图国事，使真

正之共和，能早日实现于中国也。”[258] 其后，孙中山和段祺瑞之间保持了个人的接触，孙中山还派人与皖系在长江以南的实力派浙督卢永祥、闽督李厚基等接触，共商合作问题。

孙中山和段祺瑞关系的改善，亦使孙中山调整了对与皖系亲近的奉系之策略，开始与张作霖建立关系，“三角同盟”的雏形初现。1919年秋，孙中山曾派宁武到东北联络张作霖，目的是：“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1920年夏，宁武借引荐华侨投资事在天津对张作霖主动说：“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说了。”[259] 张未表态，但随后即派其副官张亚东携函与宁武前往拜会孙中山，其后宁武与张作霖又有多次接触。

直皖战后，皖系失去了基本力量，但又不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遂主动向孙中山示好，双方开始建立伙伴关系。奉系虽然与直系暂时相安，共治北京政府，但与直系的矛盾日渐发展，为准备与直系不可避免的决裂，奉系与皖系和孙中山的关系越走越近。孙中山认为：“今彼派即将段氏打倒，直奉之争乃又继续开幕。盖直曹奉张，其野心皆无底极，而两方势力又莫能相下。徐世昌今已为彼等所卵翼，更无涵盖之能力。由此观之，奉直必因权利而冲突、而决裂，而皖系之余烬，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260] 故孙中山采取了联合皖、奉共同对直的策略，虽然他也明白，张作霖和段祺瑞“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助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261]。

1921年9月，孙中山致函曾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表示“文奔走数十年，只知有国，不计其私”。希望他与段祺瑞疏通意见，“得前途相与开诚，共赴国家之急，则有功于国，名必归之”。12月，段祺瑞派其心腹徐树铮到广州，与粤方讨论对直问题。正在桂林独裁北伐的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与徐树铮“切商军事之进

行”，“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262]。

1922年初，直奉关系恶化，战争正在酝酿，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和张作霖的代表李少白（梦庚）先后在1月和2月前往桂林晤孙中山。徐树铮在见孙后函致段祺瑞，认为孙中山“虽不无疏略之虞，而励精进取，言不及私，因知其屡蹶屡起，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真力在，与钧座素所叹念甄取者相合”[263]。言外之意，自然主张段祺瑞与孙中山联手合作。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也在3月到奉晤张作霖，讨论三方合作讨直计划（已见前述）[264]。据宁武回忆，他携孙中山函去东北，转达孙的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张作霖）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变转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入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265]但因孙中山阵营内部的牵扯，孙的北伐讨直未能如期发动，对张作霖与直系的战争未起到配合作用，孙中山还为此特意致函张作霖，表示：“前以我军后方问题须先解决，故于上月改道出师，还定粤局，促成北征。乃值贵军已入关，不能同时相应，抱歉之至。事势所拘，当承谅察。”[266]虽然如此，外人已经看出，粤、皖、奉接近的举动，“不仅在奉直问题，直欲奉皖粤联合，以倒吴佩孚”[267]。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败退出关，孙中山因陈炯明兵变而退居上海，孙中山和张作霖均有再起之心，客观情势使双方的合作趋向密切。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认为“国事至此，非有确定之方针，坚固之结合，不足以资进行”；提出“今后破敌之策，仍须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268]。其后，孙中山派汪精卫等多次到东北与张作霖会商。10月2日，张作霖宴邀汪精卫和段祺瑞代表吴光新，慨然表示：“中山、芝

泉与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余等当协力同心，第一步以驱逐吴佩孚、曹锟为目的，第二步再谋新中国之建设。”[269] 汪精卫则对记者称：“余之来奉，因张氏数派使至孙氏处，故特来答礼。次则基于8月15日之宣言，关于统一问题，废督裁兵问题，又求张氏对斯意见。”孙、奉合作已经公开化。根据孙中山与张作霖商订的合作计划：先由南方出兵北伐，以牵制长江以南的直军；而后奉军由东北入关，直捣北京；实行南北夹击，打倒曹、吴；战争发动之后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扫除敌人以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为此，张作霖多次资助孙中山数量不等的军费与军火，孙对与张的合作基本满意，他曾致函张表示：“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270] 孙中山与皖系的关系也在加强，在福建和浙江都与皖系建立了合作关系。1923年1月，孙中山派于右任面见段祺瑞，“晋商要事”。12月，又让叶恭绰与段商洽，“分负建国之责”。段祺瑞的代表邓汉祥则长住上海，沟通孙、段关系。至于皖奉之间，“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271]。

经过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协商，“孙、段、张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孙中山的代表为汪精卫，张作霖的代表为姜登选、杨毓珣，卢永祥的代表为邓汉祥（卢是拥段的基本力量，因此邓也就代表段祺瑞），云南唐继尧的代表为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的代表为吕宓筹，川军总司令刘成勋的代表为费行简，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的代表为赵铁桥。各方代表天天集会，商讨倒曹、吴的办法。凡是指责北京政府一切措施的通电，都由代表会商，经邓汉祥以卢永祥的名义拟好电稿（电文系邓的助手浙江督署顾问李继桢执笔），送杭州拍发，一面由各代表电达其主官，通电响应卢永祥的主张，因之造成反直系的浩大声势。另外，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每月由孙、段、张各拨经费一千元，以邓汉祥任社长，胡政之任编辑，作为发布反直消息的宣传机构”[272]。可以

认为，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即正式形成，此后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是“三角同盟”的“蜜月期”。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之后，曾经公开声言，粤、皖、奉“三系已经携手了”，“这三派都已联合”[273]。三方代表、信使往来穿梭，沟通信息，商讨计划，在推翻直系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角同盟”是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方基于反直需要而成立的松散的军事政治同盟，在政治上并无明确的盟约或纲领，组织上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机构，以遇事临时协商为主。在“三角同盟”中，张作霖主要以其军事金钱实力，孙中山主要以其政治影响力而居于主角地位，段祺瑞则依靠其在北洋系中的资历和政治资本发挥作用，但需要借助张作霖的实力。不过，张作霖与段祺瑞同为北洋派系出身，在政治上有共同语言，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并非同路，政治主张和看法颇有差异，而在奉皖关系方面，也未必完全一致。奉系官员私下认为，“无论段（祺瑞）也、卢（永祥）也、孙（中山）也，皆不过骗我之钱而又要我而已，毫无可以依赖之处”。“要求接洽者甚多，无非希望我方之钱”[274]。由于张作霖据有东北地盘，财政方面的活动余地自较孙皖两方为大，孙皖两方自然对张有所期待。第一次直奉战后，孙中山面对陈炯明之变，困居上海，1922年9月曾向张作霖请求经费支持，表示：“文新失策源地，诸君所需维持补充等费，竭蹶应付，拮据殊甚，未审公能有以助之否？”[275] 1923年1月，孙中山又派人向张作霖“申请援助。如能照前所拟数，速与汇寄，则士饱马腾，荡平逆氛，可操左券。国步中兴，义师复振，皆悉出闳赐。万一时促不及遽集，亦请量助巨额，俾克有济三军，感激非可言宣”[276]。当张作霖向孙中山提议，派李烈钧回赣、谭延闿回湘活动，以扰乱直系后方地盘时，孙中山又提出，李需50万元，谭需20万元，“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绌，不能因应咸宜”，“在在需款，仓猝乃无以应之，如公处此时能助此额，协（李烈钧）、组（谭延闿）皆可立发，他无所顾”，并且拟派汪精卫向张交涉[277]。皖系在财务支持方面同样对奉系有要求。对此，奉方难免有所抱怨。所以，粤、皖、奉三方

只是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主张一致，而在倒直的具体安排尤其是倒直后的政治善后与建设方面看法不一，即便是在“三角同盟”结合的蜜月期，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也仍然存在。

在倒直后的政治安排方面，粤方曾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孙任大总统段任总理，或以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张作霖任副总统；皖方表示，“当然以孙作大总统为最适当”，实则段祺瑞希望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一副舍我其谁之概，卢永祥则表示，“赞成孙任大总统，段作国务总理，但必须商得张作霖同意。”对此，奉方先是含糊其辞，表示“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继则“坚决主张拥段拒孙”，“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278]。张作霖还明确告知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他们是要拥段的”，俾便以自己的实力控制北京政权。对国民会议主张，皖、奉均未明确表态[279]。1923年冬，孙中山派叶恭绰持其亲笔函北上，与张作霖等商洽合作事宜，并在致张作霖函中说：“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280] 12月初，叶恭绰先与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由沪赴杭，与卢永祥商讨，然后在当月中旬到奉天，与张作霖等会商。奉方表示赞同三方在军事上联手打击直系，并向粤方支付军费现金50万元，但对于粤方所提孙、段合作并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的方案，张作霖却“未置一辞”，而杨宇霆则从“根本上虑无合作之可能，且认为目下无从解决”。12月下旬，叶恭绰离奉回沪，其北行使命遂告中止。叶恭绰感觉“中山热心大局，意图与合肥携手，意极迫切”，“但奉浙至今无开诚之商榷，事实可惜”。他在写给杨宇霆的信中抱怨说：“弟因此焦忧成疾已旬余矣。所谓反直派者，如无一定之方针、目的，谋定后动，窃谓徒予直派以好机会而已。吾人固非徒只主张打倒曹吴，泄此一口气者。如局势变迁后，建设前途了无计划，何须多此一举为？乃最要关键，不能商量出所以然，他复何说。”[281]

对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奉、皖均坚决反对，因此，“三角

同盟”并非建立在三方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谋划之上的战略联盟，而更多的不过是出于推倒共同敌人——直系的暂时合作策略。当直系势力过大，威胁到三方的生存时，自可合作无间。奉方甚而向孙中山表白：“此间完全知中山真意，毫无误会。况将来事实可昭然于世，更无疑虑之可言。中山若另有其他办法，均可随时磋商，必无隔阂。我辈年来苦心经营，所为何事，岂可因少数浮言，致功亏一篑！又何忍坐视分乖于大事未成之日？”[282] 而当第二次直奉战后，直系统治垮台，大事已成之日，“三角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也就自然消失于无形。

---

(1) 《直系竞争地盘之暗斗》，《民国日报》，1921年11月7日。

(2) 北洋武人当政，军阀对地方的控制多以省为基础，“省区军阀继续扩张势力，进一步就要支配两省甚至两省以上，于是又出现了超省级的机关。最常见的是巡阅使”；“巡阅使按其性质来说原属一种临时特殊措施，出于对大实力派的安排，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制度。关于它的编制，只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作不同的规定”；“巡阅使的职权，从理论上说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上则不尽然，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2—254页）。

(3)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

(4)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叶遐庵先生年谱》，1946年版，第178页；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70页。

(5)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992—993页。

(6)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1年11月16日、17日，第168页。

(7)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二），第989页；《王怀庆以军权干涉提出挽救金融办法警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523页。

(8)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四），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

(9) 《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10) 《张胡在北京支配徐靳》，《民国日报》，1921年12月18日。

(11)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82页。

(12) 《徐一清致阎锡山电》、《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1年12月1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38页。

(13) 凤岗及门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655—656页。

(14) 《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56页。

(15) 彭昌鲁编：《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271页。

(16)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7页；《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57页。

(17) 《财政部与银行团商谈发行盐余公债有关文件》（1921年12月—1922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15、924页。

(18) 《国内盐余借款团成立》，《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1月22日；《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第137页。

(19) 《孙传芳通电》（1922年1月28日）、《吴佩孚通电》（1922年2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二），第950—952页。

(20)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1年12月2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42页。

(21)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1年12月24日，第342页。

(22) 《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56页。据梁士诒及叶恭绰言，吴佩孚向梁士诒逼索军饷225万元，梁未应，故吴有这样连珠弹的攻击电文。

叶遐庵述，俞诚之笔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的关系》，第225—226页。

(23)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60页。

(24) 1921年12月29日梁士诒与日使小幡的谈话内容，各家说法不一，但当时多数人相信了传媒报道的梁欲“借日款赎路”的说法。颜惠庆在日记中记载，12月27日，“小幡来访，问中国是否同意为铁路借款，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停止谈判”；12月29日，“小幡见梁，表示日本愿意支持他。梁谈起向日本借款，关于借款自办铁路，安福系流亡者等问题”（《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104页）。颜的记载似对梁不利。而身历其事、与梁关系密切的叶恭绰则坚持认为，梁士诒会见小幡时提出的是“筹款赎路自办”，相反，外交总长颜惠庆12月27日会见小幡时提出的却是“借款自办”，而小幡为了日本的利益，将两者混为一谈，“藉以哗众取宠，邀功疑敌”，颜惠庆则“嫁祸于梁”，并得到吴佩孚的有力支持（叶遐庵述，俞诚之笔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第227—228页）。不过，即便如叶所言，如何理解“筹款”仍费思量，如何“筹款”可以有多种方式，包括“借款”。其实，这其中的关键不在文字表述，而在如何把握当时的民意所在，塑造出“正”“反”相对的形象。吴佩孚在这方面较梁士诒可谓技高一筹。

(25) 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认为：“尽管某些文章有一些相反的说法，但这位总理抛开我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宣言，径自做主答应日本使节的提议却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非偶然，他可能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和公众舆论可能的反应。”“其时，公众舆论极其关注山东问题。即使是小有不慎，轻言妄动，便会立刻招来猛烈严厉的攻击。假如这个人本来就不被大家所欣赏，政治上树敌过多，或曾有劣迹授人以柄，则攻击者更容易如愿以偿。”《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4页。

(26) 《吴佩孚通电》（1922年1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5页；《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60、663—664页。

(27) 《吴佩孚通电》（1922年1月8日、10日、12日、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5—180、187页；《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4—275页。

(28) 《萧耀南通电》（1922年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6—177页。

(29) 《齐燮元等反对梁士诒内阁及劝告阁员洁身自退通电》（1922年1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第187页。

(30) 《梁士诒通电》（1922年1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0页。

(31) 《张作霖通电》（192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4页。

(32)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1月1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页。

(33) 《奉天保护梁士诒之原电》，《民国日报》，1922年1月14日。

(34)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1月1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页。

(35)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86—287页。

(36) 《吴佩孚等关于推倒梁士诒电》（192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8页。

(37) 《吴佩孚电》（1922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9页。

(3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页。

(39) 《张作霖通电》（1922年1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1—182页。

(40) 《卢永祥电》（1922年2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3页。

(41)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9、287、289—291、293、304页。

(42) 《吴佩孚通电》（192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4—185页。

(4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04页。

(44) 《冯玉祥通电》（192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5页。

(45) 《董康审查内外债报告》，《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4月12

日。

(46)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61页。

(47) 《京师稽查处张德恂呈》（192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9页。

(48)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59页。

(4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8—279页。

(5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26页。

(51) 《复张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8—559页。

(52) 张梓生：《壬戌政变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四），第15页。

(53)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近代稗海》第5辑，第82页。

(54)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2年2月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2—13页。

(55)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13页。

(56)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16页。

(5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72—873页。

(5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17—320页。

(5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74页。

(6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22页。

(61) 《曹锟吴佩孚等反对张作霖率军入关通电》（1922年4月21日—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64页。

(6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63) 《张作霖宣布率师入关以武力为后盾解决时局通电》（1922年4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页。

(64) 《吴佩孚等通电》（1922年4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62—63页。

(65) 《吴佩孚等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并对其作战通电》（1922年4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4—75页。

(66) 《张作霖于直奉接触后攻讦曹吴宣战通电》（1922年4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9—80页。

(67)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68)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62页。

(69)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88—589页。

(70)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0页。

(71)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1页。

(7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77页。

(73)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77页。

(74)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1页。

(75) 《徐世昌发布奉直移调近畿双方接近地点军队一律撤退令》（1922年4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6页。

(7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734页。

(7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41页。吴佩孚亦向天津总商会保证："津三十里内不驻军，不交战，我直军可负保护责任。"（《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38页）

(7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19—320页。

(79) 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47—948页。

(80)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

存》第6册，第55页。

(81)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36、338—339页。

(82) 《吴佩孚致陈光远电》（1922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81页。

(83)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88—89页。

(84) 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记》，《近代稗海》第4辑，第581页。

(85)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6页。

(86)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3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94页。

(87)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3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99页。

(88) 《王永江信》（1922年5月5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89) 据时人论，吴佩孚“处事刚愎自用，自信心极强”；“最看不起张作霖，说张是胡子出身，不是正规军人。”（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24页）

(90) 马毓福：《中国军事航空》，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91) 据时人所论，“吴佩孚指挥作战的习惯是，如遇某部在战斗中受到挫折，必躬身驰往战场，调兵遣将，弥补缺陷，因之尚能补救于一时，制胜于一时，使战役稳定，转危为安。因此吴佩孚本人具有极强的威慑控御力量，受挫部队的官长仍能尽力整饬部队，听候使用，决不敢任意放弃职守，临阵脱逃。但这种指挥办法必须是他本人执行，若以他人代替指挥，断无此等威望，势难驾驭；若一旦失利，局势便无法控制，最终导致失败。”（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76页）

(92)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58页。

(93)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34页。

(94) 据称，当时有两架直军飞机到长辛店奉军司令部投弹，张景惠十分害怕，当即带上几名卫士骑上快马一口气跑到丰台镇去躲飞机（马毓福：《中国军事航空》，第135页）。另说“直军飞机携带一百八十磅黄色炸药炸弹三枚，直飞长辛店火车站，连续投弹。第一枚炸弹落在长辛店火车站第三股车道上，铁轨、枕木炸得一齐飞上天。第二枚炸弹落在奉军总司令部列车的尾部，三节列车均被炸得粉碎，尾车上装有战马二三十匹，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奉军总司令张景惠立即下令开车，退往丰台，长辛店随即陷入混乱状态。”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95) 梓生：《奉直战争纪事》，《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第83页。

(96)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四），第100—104页。

(97) 《收束溃兵简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91页。当时规定对奉军溃兵上交枪支者，按章给价洋5—30元，遣散费按级别为10—30元。奉军溃兵扰民尤甚，“溃兵勾结土匪，多则千百成群，少则或三十或五十，盘踞城镇，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宝坻县公民呈文》（1922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00页。

(98)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51页。

(9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758页。

(100) 《曹锟关于直军在长辛店等处击溃奉军及溃退奉军到处骚扰情形电》，1922年5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95—96页。

(101) 《冯德麟等通电》（1922年5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99页。

(102) 《赵倜关于转述河南省议会等指责吴佩孚干涉豫省行政勒令出兵出饷及对直奉战争宣布中立通电》（1922年5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38页。

(103)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63页。

(10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

存》第6册，第203页。

(105) 《张作霖等通电》（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88页。

(106) 《副官长张德恂报告》（1922年5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106页。

(107)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9页。

(10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7页。

(109) 《张作霖提出直奉双方停战意见致鲍贵卿等电》（1922年6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18页。

(110) 《孙烈臣与王承斌等代表直奉签订“双方罢兵之规定”》（1922年6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19页。

(11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8页。

(11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04、918页。

(113) 据统计，直军阵亡1498人，战费1740余万元。《直军各师旅直奉战役阵亡官兵抚恤金欠饷数目表》，《总统府军事处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各部所用经费总册给陆军部咨稿》（1923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31、135页。

(114) 梓生：《奉直战争纪事》，《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第88页。

(115)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50页。

(11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117) 《王永江信》（1922年5月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26页。

(118)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11页。

(119)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12页。

(120) 《徐树铮与段祺瑞等书》，《近代史资料》总76号，第181页。

(121) 罗素：《中国的国际地位》，《东方杂志》第19卷第6号，第23页。

(122) 如果从“民意”的角度解释，则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吴佩孚的失败，或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归之于曹锟贿选给舆论和民意带来的恶劣影响。

(123)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57页。

(124)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20页。

(125)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126) 张树勇整理：《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127)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06页。

(128) 《齐燮元致田中玉等电》（1922年5月3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79页。

(12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5月14日，第359页。

(13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3、360页。

(131)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144页。

(13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867页。

(133)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69页。

(134)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0页。

(135)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87页。

(136)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87页。

(137)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55页。

(138) 《徐世昌通电》（1922年5月3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74页。

(139) 顾敦鍒：《中国议会史》，台中东海大学1962年版，第299页。当时已经完成选举的省份和地区有：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新疆、蒙古等十一省区。

(140) 王景濂、唐乃霈：《中华民国法统递嬗史》，第109页。

(141) 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东方印刷局1924年版，后编第2页。

(142) 《吴佩孚电》（1922年6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68页。

(143)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86页。

(144)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56—58页。

(145) 《王怀庆等拥戴黎元洪复任总统电稿》（1922年6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69页。

(14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9页。

(147) 《张华堂致王怀庆呈》（1922年6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70页；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58—59页。

(148) 《北洋军阀》第4卷，第221页。

(14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7页。

(150) 《关于裁减中国军队议决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70页。

(151)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6月6日，第363页。

(152) 《大公报》，1922年6月12日。

(153)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6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16页。

(154)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72—73页。

(155)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73页。

(156) 《颜惠庆等人通电》（1922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

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3页。

(15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3、899页。

(158) 《吴佩孚致黎元洪等电》（1922年6月2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32页。

(15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03页。

(160) 《阎锡山电告裁兵六营并陈乡兵制办法》（1922年6月14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9册。

(161)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6月1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27页。

(162)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3页。

(16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9页。

(164) 《卢永祥宣告先废督后裁兵通电》（1922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79页。

(165) 《卢永祥宣布善后纲要电》，《申报》，1922年6月21日。

(166) 《浙卢自表废督之别报》，《申报》，1922年6月17日。

(16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968页。

(16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010页。

(16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051页。

(17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174页。

(171)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69页。

(172)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64页。

(17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89页。

(1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0页。

(175) 《就徐世昌退职对外宣言》，《工兵计划宣言》（1922年6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4—147页。

(17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1页。

(177)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到上海，其后黎元洪曾派刘成禺等持其致孙亲笔函前往拜见，邀孙北上商谈国事。孙中山告来者，“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李大钊：《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4页。

(178) 《国会继续开会之第一日》，《申报》，1922年8月4日。

(179) 《国会之前途》，《申报》，1922年8月3日。

(180)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34、160页；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163页。

(181) 《外国对于国会之非难》，《大公报》，1922年9月7日。

(18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7、920页。

(18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719—720页。

(184)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87—288页。

(18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07页。

(186) 颜惠庆：《入阁参政》，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187) 《吴佩孚猛攻唐阁》，《大公报》（天津），1922年8月10日。

(18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74页。

(189)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8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60页。

(190)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第254页。

(191)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57—158页。

(192) 《吴佩孚猛攻唐阁》，《大公报》（天津），1922年8月9日。

(193) 《徐鸿宾致阎锡山电》（1922年8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63页。

(194) 《吴佩孚致阎锡山电》（1922年8月2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70页。

(195) 《齐燮元通电》（1922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4页。

(19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5页。

(197)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97页。

(198) 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9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6页。

(20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6页。

(20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10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93页。

(202) 直隶省长曹锐、王承斌在天津培植亲信，扩张势力，被时人称为与保、洛鼎足而立的直系第三大派系——津派。在对付吴佩孚时，津派与保派目标一致，两派合流，被时人称为津保派。据顾维钧回忆，“当时曹锟在保定，充当他的竞选代理人经常往来于保定、北京两地的是他的弟弟曹锐。曹锐被人们称为曹四爷，在选举前后为曹锟经办了大量政治事务。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或大型会议上露面，可是却在幕后进行了全部策划。曹锐比他哥哥曹锟受的教育多得多，他是个文人而不是军人，从外貌和举止看比曹锟总统显得文雅，但是行为不大检点，后来因缺乏教养而招致恶果。”而曹锟周围的一批人之所以为曹当总统事如此卖命奔走，也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吴毓麟直率地告诉顾维钧：“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2—263、265页。

(203) 张同礼：《张弧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204)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15页。

(205) 《白坚武自撰小传》，《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11—112页。

(206) 张达骧：《白坚武其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

191页。

(207) 《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2—384页。

(208) 《彭寿莘致李景林信》（1922年4月26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页。

(20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4月22日，第413页。

(210)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21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9月21日、10月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87、389页。

(212)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58页。

(21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8—250页。

(214) 《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9卷第23号，第115页。

(215)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82页。

(216)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87页。

(21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7—248页。

(21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7—253页。

(219) 《财政部关于奥国借款展期及取消原订购货合同咨呈》（1922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037—1042页。

(2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3页。

(221) 《吴景濂等列举罗文幹丧权渎职罪行请依法查办致黎元洪电》（1922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5页。

(222) 《财政部关于奥国借款展期及取消原订购货合同咨呈》（1922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037—1042页。

(22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3页。

(22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

1039页。

(22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1070页。

(226)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80页；《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210页。

(227) 《吴景濂等列举罗文幹丧权渎职罪行请依法查办致黎元洪电》（1922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5页。

(228) 《徐鸿宾致阎锡山电》（1922年11月2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05页。

(229)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91页。

(230) 据顾维钧称，实际这是为了在问题未解决前，不让罗离开北京，近似软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3页）

(23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第83页。

(232) 《田应璜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08页。

(233) 《蔡元培辞职后之宣言》，《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第147页。

(234) 朔一：《罗案的第三幕开场》，《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第13页。

(235)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11月26日、28日，第394页。

(236)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7页。

(237) 《吴景濂与张伯烈攻击汪大燮组阁通电》（1922年12月1日），《王承斌反对汪大燮等组阁电》（1922年12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7—198页。

(23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5—256页。

(239)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11页。

(24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71、375页。

(24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12日），《赵炳麟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16、415页。

(242) 《张绍曾通电》（1923年1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7页。

(24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53页。

(244)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95页。

(245)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90页。

(246) 《班廷献致阎锡山电》（1922年6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29页。

(247)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26页。

(24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11月14日、12月12日，1923年1月9日），第392、396、404页。

(249) 《武力统一乃扩张地盘别名》，《顺天时报》1923年3月16日。

(25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1月11日，第404页。

(251)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3年3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39页。

(252)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3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41页。

(253) 《张绍曾等向大总统呈请辞职电》（1923年3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0页。

(254) 《黎元洪发表敦促阁员视事及要求各省疆吏与张绍曾合作通电》（1923年3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9—210页。

(255)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王瑾、胡枚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256) 《孙中山致王文华函》（1920年3月27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四），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05页。

(257) 《批林修梅函》（1919年9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

107页。

(258) 《批姚畏青函》（1920年5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4页。

(259)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16页。

(260) 《致何民畏函》（1920年7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8页。

(261)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18页。

(26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78、1407页。

(263) 《徐树铮与段祺瑞等书》，《近代史资料》总76号，第179页。

(264)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26页。

(265)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19页。

(266) 《致张作霖函》（1922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1页。

(267)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2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9页。

(268) 《复张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1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8—559、627页。

(269)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07—1508页。

(270) 《复张作霖函》（1922年1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27页。

(271)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2页。

(272) 邓汉祥：《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36页。

(273) 《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20页。

(274) 《王永江信》（1922年春季），《杨毓珣信》（1924年8月），

《奉系军阀密信》，第15、150页。

(275) 《复张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9页。

(276) 《致张作霖函》（1923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7页。

(277) 《复张作霖函》、《致汪精卫电》（1923年5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23—424页。

(278) 邓汉祥：《我所了解的段祺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25、131页。

(27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8页。

(280) 《致张作霖函》，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9页。

(281) 《叶恭绰信》（1924年1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08—109页。

(282) 《杨宇霆信稿》（1923年春季），《奉系军阀密信》，第55页。

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一节　“联省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一　“联省自治”潮流的兴起

“联省自治”是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兴盛一时的政治思潮与实践，发端于湖南，流行于西南，历时数载，喧腾一时，不过除了留下几部未能实际实行的省宪法和若干理论文字，纸面上热热闹闹之外，它在实践层面的成果却乏善可陈，基本上是一场不成功的政治运动[(1)]。

“联省自治”运动发端于湖南。1920年7月22日，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称：“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际，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后权分事举，和平进步，治安乃有可期。”他在通电中提出：“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在湘人力图善后，认为非以湘政公之湘省全体人民，不足迅起疮痍，速复元气。揆之国人共同心理，必当不约而同，望我护法各省，一致争先，实行此举，则一切纠纷可息，永久和平可期。”[(2)] 谭延闿发表此电之时，正值湖南“驱张”运动胜利不久，“湘人治湘”呼声高涨，“自治的要求，并不止一二个绅士，全体湖南人几乎都有这个倾向”[(3)]。而且湖南北受直系威胁，南受广东挤压，处境微妙，官民都有“自治”的驱动力。故谭电发表后，得到湖南各界的支持，湘绅熊希龄、范源濂纷纷发表通电，主张“本自决精神，径由本省制定根本法”[(4)]，庶可使湖南免“权奸把持”，“亦可以免为南北之战场”[(5)]。得此支

持，11月1日，谭又发表通电，提出“此后各省，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宜仍互结精神，主张联省自治”[(6)]。此后，先由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的主张迅即传扬全国，从理论讨论到实践进行，一时间“联省自治”似已成“大势所至，人心所同，联邦政体已成天经地义之无所用疑”[(7)]。

“联省自治”口号在20年代的提出及其流行并非偶然。民国以还，军阀混战，民众深受其害，希望有平稳安定的生活，舆论便出而鼓吹“废督裁兵”，并将“地方自治”视为裁兵之根本，以“确立联省自治组织，先使各省各自独立，彼此没有打仗的机会”[(8)]，而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反映出“联省自治”运动是有广大平民百姓的和平愿望作为基础的。然而，平民百姓在当时并无对政治的发言权，不能对“联省自治”运动有实际的贡献。作为得到广泛传播的政治思潮与实际的政治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鼓吹者与参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新式士绅阶层以及他们的代言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经济的较快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参与力量，他们厌恶民国以来政治的混乱与军阀当道，希望通过参政议政，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特别强调职业代表制的意义，提出“省议会的立法须经职业的各团体所组织的审议机关审查之。因为立法都是关于人民生计权利的，所以非经各职业团体的审议不可”[(9)]。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最为活跃的职业团体，如商会、教育会、银行公会、律师公会等等，实际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在推动运动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联省自治”运动的深层经济动因，还在于民国以来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地域间的利益区别，促成了地方主义的抬头，虽然经济动因在运动中常常为政治动因所遮蔽，但却是客观存在，而对于这种不同地方经济利益的维护与强调，也与资产阶级的态度不可分离。

士绅阶层经由清末立宪运动而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一直主张扩大

地方权限，实行地方自治，许多当年活跃于清末咨议局中的人物，也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首倡“联省自治”的谭延闿就是当年湖南咨议局的议长。士绅阶层的相当一部分在民国年间已经逐步资本主义化，政治经济利益与资产阶级趋向一致。他们与乡野民间的联系较多，常以民间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有较强的地方自立倾向，对“联省自治”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认为，“各省人民欲整理或保卫其本省，当于其本省自为之，求诸政府无益也。何也，政府今日之能力，仅求自保尚且无暇，安暇代谋他省之人民，故人民所请求者政府而不纳固不必论，即纳矣亦岂其权力所能行”，故他们极力鼓吹“联省自治”[(10)]。可以说，“联省自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清末立宪运动在民国年间的合理延伸。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理论设计与鼓吹者。他们思想活跃，热情洋溢，许多人曾经留学欧美、日本，较多接触到西方自由民主理念、法治观念和政治理论。他们以知识分子阶层特有的敏感与热情，利用各种舆论阵地，如《时事新报》、《东方杂志》以及自办的《努力周报》、《太平洋》等，为“联省自治”奔走呼号，为运动本身抹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们中间，人们可以发现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适、丁文江等著名学者的名字，而《太平洋》杂志的主编李剑农不仅是“联省自治”的热心鼓吹者，大力宣传“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的理论[(11)]，他还是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实际参加了湖南的“自治”运动。

在“联省自治”的鼓吹者中，梁启超曾有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的两次参政经验，但结果都使他颇为失望，因此他又重提“地方自治”口号，认为“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以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各省乃至各县市皆由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12)]。胡适则认为，中国太大，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

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而“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主张“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并得出结论说，“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13]。北京大学的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李煜瀛等认为，近数年来，全国已完全陷入无法律无政府状态，若以武力征服南北，宰制全局实不可能，主张“分治的统一”，实行联邦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域，组织一个简单的中央会议机关，进行管理；中央的权力应小，地方的权力应大；联治区应扩大到最大限度[14]。一时间，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笔下，“联省自治”往往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过，知识分子虽然富于理想主义精神，但却往往脱离实际，结果反而不利于“联省自治”由理论而推向实践。

自“联省自治”的主张提出后，得到了各方的热烈反响，各种以“联省自治”为目标的学术或政治团体不断涌现，如北京有十三省区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上海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有六省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在各方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联省自治”开始由政治思潮而成为实际的政治运动，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两件事——制定省宪法与民选省长。

二　“联省自治”的实践

“联省自治”运动的理论潮流兴起后，实践上也很快开始进入操作层面。在“联省自治”运动的发源地湖南，1920年9月和10月，谭延闿两次召集自治问题研讨会，由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社会团体、绅商名流代表出席，并推出代表十人，组成制宪会议，着手起草省宪。然而就在此时，湖南军人中的程潜派图谋倒谭拥程，并得到孙中山部属李烈钧的支持，他们希望“以湘省为根据，并分兵入赣入鄂，实行自治”[15]，实际将湖南纳入广州政府的实际管辖范围。程派的举

动，得到湖南军人中的另一实力派赵恒惕的暗中纵容。谭延闿在程、赵两派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布“还政于民”，废除督军，推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本来还想由自己担任省长，但得不到程、赵两派的支持，只能于11月27日黯然离湘赴沪。随后，赵恒惕以实力压抑程派，控制了局势，成为湖南的统治者。

为了寻求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赵恒惕上任后继续推动“自治”运动。12月21日，赵恒惕发表通电，重申实行“自治”的决心，主张“先由西南各省树之风声，推而至于全国”，认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相联接，即举国有提携并进之道。为今之计，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几无他途可由”[16]。为避免谭延闿时期所谓“官绅制宪”与“公民制宪”的纠葛与纷争，赵恒惕决定走“专家制宪”之路，指令省府订定《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成立制宪筹备处，由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任主任。制宪程序是，由省府聘请专家学者拟订宪草，再由全省各县推出的绅商代表组成审查委员会审定宪草，通过后交付公民投票表决，最后由省长公布实施。

湖南省省宪起草委员会的遴选原则是“首重学识经验，无偏无党，超出政潮之外”。十三名委员为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石陶钧、向绍轩、陈嘉勋、黄士衡、董维健、唐德昌、皮宗石、张树声，其中留美者六人，留英者三人，留日者三人，国内大学一人；任职为大学教授者八人，各级议会议员三人；主席为李剑农[17]。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多为名流学者，对宪政理论多有研究，也都是“联省自治”的热心鼓吹者。他们从1921年3月20日起，在长沙岳麓书院潜心研讨，历时一月，于4月22日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湖南省省议会组织法草案》、《湖南省省议会选举法草案》、《湖南省省长选举法草案》、《湖南省法院编制法草案》、《湖南省县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等文件草案。

湖南省宪法审查会由各县绅商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组成，其中大

县二人，小县一人，湘省名流熊希龄、仇鳌、刘揆一任会长。从1921年4月起，省宪审查会开始审查宪草等文件，但因种种利害关系，各方意见纷纭，始终无法定案。直到湘军出动援鄂战败后，在吴佩孚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为求湖南自保，9月9日，省宪审查会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草案。11月上旬经全省公民投票表决，以1815万余赞成票对57万余否决票的绝对多数通过[(18)]。1922年1月1日，《湖南省宪法》由省长赵恒惕公布施行[(19)]。

《湖南省宪法》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各省制宪的范本。省宪包括序言及13章141条条文，分为人民之权利与义务、省之事权、省政府机关之组织及省政府权力之行使、下级地方之组织、本宪法之修改与解释五大部分，主要内容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省议会采取一院制，议员名额以人口为比例选举，任期三年；选举人有资格限制，实际有资格者大多为士绅阶层；省议会非经县议会过半数同意、省务院全体附署、全省公民投票过半数同意，不得解散；省长由省议会推举四人，交由全省公民直选产生，任期四年，不得连任，职权为公布法律、发布执行法律的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文武官吏、可经省议会同意后宣布戒严；省长在未满任前，工作如有失误和叛变行为，可由省议会提议交全民公决，令其退职；省设省务院，设院长一人（由省务员互选并呈请省长任命）及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司法、交涉、军务司，司长（省务员）由省议会推举二人，交省长择一任命；省长和省务院行使省行政权，省长命令须经省务院长及主管司长副署方可生效；全省常备军为一万人，军费不得超过预算支出的50%；人民自六岁起有接受四年教育的义务，教育经费至少须占预算支出的30%[(20)]。

湖南省宪体现了西式资本主义宪法的基本特征，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中心的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省长类似“国家元首”，省议会仿佛国会，省务院则形同责任内阁，其中以立法权为至高无上，行政权则受到严格限制，省长则接近于虚位“元首”。这是以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

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不满军阀专制、要求独立发展的愿望在政治上的体现，也表现了信奉西式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在当时条件下具有保障民权、遏制专权的进步意义。湖南省宪将人民的“政治基本权”、“经济基本权”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之，人民有选举、罢免、结社、请愿、居住等项自由权利，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或剥夺；强调民主的全民参与特质，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女有选举权，年满二十五岁的男女有被选举权，规定凡重大问题，如省宪的修正与法律的复决、省议会的选举与解散、省长的选举与罢免等等，均采投票制，“准许公民随时各抒怀抱”，享有“言论思想自由权”、“劳动收益权”和“生存权”。值得提及的是，湖南省宪规定男女平权，体现出起草者尊重女权的民主意识，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湘中一般富有希望知识之女子，俱乘时而起，作参政之运动，纷向各处联络，以冀当选”[21]。当然，湖南省宪对有产阶级的利益也很重视，如规定严格保护私有财产，不允无偿没收、征用、捐输，职业团体可向省议会提出法律案等，都满足了有产阶级的要求。而在民众的政治参与方面，省宪规定文盲无选举权，实际剥夺了占人口相当比例的文盲合法的政治参与权；其后在省议会选举中，又对省议员的竞选资格有严格的限定，实际排除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进入议会的可能，使省议会只能成为有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俱乐部。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利于动员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使所谓“联省自治”最终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有评论称：省宪规定的“自由权利，只是中产阶级的权利，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利。自然只是有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无福消受了。”《宪法》关于“自由权”的保障条文“看起来都非常漂亮，其实细细一看，便可以知道也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享受，无产阶级仍然毫无关系的。比如言论思想的自由，如果要来享受这个自由，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能生活，假定他求生不得，何能够受教育——强迫教育的规定，也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享受的——没有教育何能够享受言论思想的自由呢！”[22]

虽然湖南省宪的起草者满怀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军阀拥兵黩武、专权统治的现实，决定了湖南省宪法注定只是纸上谈兵，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军阀割据成为民国政治的现实之后，控制中央的大军阀想的是“统一”，割据地方的小军阀想的则是自保，“联省自治”就是地方军阀自保的政治遮羞布和贞节牌坊，他们以此为自己的拥兵割据抹上“合理”的油彩，因此，“联省自治”主张的流行与地方军阀的私利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地方军阀心目中的“联省自治”与其鼓吹者之设计并不搭界，说到底地方军阀只求“自治”之名，而从不要民主之实，因此，无论湖南省宪规定的程序如何严密，条文如何细致，都不可能改变文人面对武力的软弱无能，更不必提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远远不能达到省宪制定者的企望。说到底，湖南省宪不过是赵恒惕对付外界舆论和北洋系干涉的政治工具而已。如省宪明文规定，人民有自由表达权及自由结社和集会权；但省宪公布不过两周，1922年1月17日，赵恒惕便“假倡无政府罪名”，封禁湖南劳工会，查禁《劳工周刊》，逮捕并杀害劳工会主任黄爱和干事庞人铨，“惨击纱厂工人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23)]。至于所谓选举，也为“城乡劣绅、政治掮客所掌握。其进行交易的票价高达一二元”[(24)]。贿选买票等层出不穷，“衡山县投票，并未分发各公民，仅招致小学生数千人，饵以面包，令其书一‘可’字而去”[(25)]。湖南省宪的其他条文，也多不过是一纸空文，即如省议会与省长的关系，从来都是省长独大，而不必理会省议会的清谈，军费不得超过预算支出30%的规定也是虚文。因此，湖南省宪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时人论之为，军队“干涉行政官事，自征地方钱粮，实为实行省宪之最大障碍”[(26)]。

根据湖南省宪的规定，1922年3月，湖南举行省议会选举，选出议员166人。7月完成县议会选举，七十五县共选出议员2761人。“这次空前绝后的选举办得实在不成体统，简直是乌七八糟，乱不可言”。“诡诈、黑幕、丑闻、纠葛等各种各样的舞弊和暴力现象在这次选举中大行其道，无处不有。舞弊的伎俩，无非是以金钱运动和势力压迫相结合，贿托经办选举的官绅包办、造假，或收买地痞流氓强投

硬抢”[27]。8月下旬，省会议进行省长预选，选出赵恒惕、熊希龄、谭延闿等七人为省长候选人。9月10日，由各县议会进行省长决选，在总计2593张选票中，赵恒惕得1581票，当选为省长。11月，省议会选出各司司长候选人各二人，复经赵恒惕圈出一人为司长，各司长又选出教育司长李剑农为省务院院长。12月18日，赵恒惕向省议会宣誓就职，议长林支宇监誓，希望“今后省长，一本民意为从违，依省宪为设施，尊重代议政制之精神，事事与本会开诚相与，则省长宣誓就任之日，则吾湘邦命维新之时”[28]。至此，喧嚣一时的湖南“自治”运动算是有了个结果。

湖南实行“自治”之后，“民选”省长赵恒惕实际仍享有至高的权力，但是尽管如此，赵恒惕还是觉得省宪碍手碍脚。他曾对人说：“年来湘省交通、教育、实业诸端，未能有所发展，自问甚为惭愧，惟究其原因，虽系环境所迫，实系省宪不善，条文牵掣之故。”[29]所以，赵恒惕早有修改省宪之心。1923年11月，赵恒惕在谭、赵战争中获胜，但因此次胜利部分得益于直军相助，也给了吴佩孚要求赵恒惕取消省宪的借口。一方面因为吴佩孚的压力，一方面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赵恒惕在1924年10月下令召开宪法会议，修改省宪。修改后的《湖南省宪法》大大扩展了省长的权力，规定省长可以连任，并兼省务院长，可任免各司长、县长及法官，取消司长副署的规定，议员由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并减少了名额[30]。修改后的湖南省宪较前大为退步，亦可为在军阀统治下民主政治难产之例证。而舆论早有评论，称“省宪对于人民的成绩，只加进几层痛苦。对于政府的成绩，只造就一百多个金钱贿买的议员和几个金钱贿买的司厅院长而已”[31]。即便是赵恒惕本人亦承认，“军费过大，最紧要的自治及建设经费竟至无者，省宪殊无成绩可言”[32]。

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一个公布宪法并实行的省份，这与其所处的独特环境有关。湖南位处南北之间，一直是北洋系与西南系和孙中山革命党争夺的重点地区，在北军南进和南军北伐的压力之

下，处于夹缝中的湖南提出“联省自治”主张，除了军阀自保的需要之外，也有省内各界抵御并缓解外来压力的客观要求。但湖南办理“自治”的成效远不及倡导者的预期，至于其他各省实行“联省自治”的情形，又远不如湖南，除了轰轰烈烈的纸面文章之外，基本未能进入实践层面。

湖南率先提出“自治”主张后，西南各省纷起响应，以此与北洋系的“武力统一”相抗衡。1920年12月10日，四川刘湘等在重庆联名发出通电，声称四川实行自治，以期速解川局。1921年1月8日，刘湘等又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依据“川省人民公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政权”[33]。接着，贵州的卢焘于1921年1月28日宣布“自治”，并组织省宪会议。此后，云南、广西及东南诸省亦纷纷通电响应“自治”倡议，一时“联省自治”成为一股颇为强劲的政治潮流。1921年“援鄂”战争前后，赵恒惕还想以武汉为据点，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成立“联治”政府。8月中旬又通电全国，提议召开国民会议，讨论“联省自治”，只因“援鄂”的失败而未能进行。

浙江也是“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积极角色。浙督卢永祥是直皖战后皖系仅存的实力派大将，1921年6月4日，卢永祥发表通电，要求“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由各省区军政长官，选派全权代表，择定适当地点，先筹妥善办法，再付国民公决”[34]。卢永祥还通电西南各省，请“即日派遣代表来杭，组织联省会议，研究讨论，以期制定适当办法，早日推行”[35]。他提出的联省办法为：一、联省制系依法则之结合，造成真正统一，不受第三者之牵制。关于中央政令，亦由联省商榷进行；二、联省手续依省宪法案办理之，凡属非法之事，概行拒绝，彼此有互相协商义务及应得各项权利；三、联省法则与规约，以简单易于明了而与约法不相违背为宗旨，免使规定后受人指责[36]。因为卢永祥出身北洋系，如今却与西南各省同倡“自治”，引起了舆论的较大反响。卢电发后，不少省区表

示赞同，一时“南北各省赓续而起，捷如桴鼓相应”。福建李厚基电称，“敝处决与兄一致行动”；广东陈炯明电称，“此后救国方法在分权各省，俾自定省宪，力行自治”[37]。四川刘湘、贵州卢焘、江西陈光远等均表示赞同卢之主张。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对卢的宣言表示“不刚不柔，决不宣言卢有意外行动，且言所见不为无因，然非其时，中央不能采其建议”。他们派出何宗莲和鲍贵卿先后赴浙，向卢氏疏通，以北洋系之情义感化卢永祥，望其言行不为太过。卢则表示“仍以拥护中央为前提”，并请何宗莲转呈他给徐世昌的密信，坦白表示，“浙江地处南方”，“空气较他省不同”，自己的主张不过是“俾顺多数民意”[38]。6月27日，卢永祥再发通电，解释前电，谓“省治为统一基础，而与中央各项选政即无妨碍，又于行政方面更无障碍”；“中国幅员宽广，宜与联省自治而便和衷共济，一致拥护中央”[39]。同时又电致西南各省，请“即日派遣代表来杭，组织联省会议，研究讨论，以期制定适当办法，早日推行”[40]。

由于卢永祥的一度提倡，浙江的自治运动迅速发展。1921年6月，浙江省议会组成55人的省宪起草委员会，由曾参加湖南省宪起草的王正廷担任委员长。7月，十七章一百五十一条的省宪起草完成。8月12日，浙江省宪法会议通过《浙江省自治宣言》，声称：“民国之本位在省，中央不能治则不如近而求之省。自治主权之原动力在人民，统治者不可恃，则不如退而诉之人民自决。此省宪问题所以为今日救亡之急力，亦即将来统一之初基也。”宣言宣布：浙江省基于固有主权之发动，在国宪施行前，所有向属于中央政府之事权在本省范围内一律保留之；自宣言之日起，以中央名义对外对内一切政治行为，关系本省利害者，非至依省宪法所定正式政府决议同意之日，概不认为有效；所有现行法令，违反本省自治主义，或因而妨害公共治安者，本省得以自治权，宣告其失效[41]。其后，浙江省宪经宪法会议讨论修改通过（共计十八章一百五十八条），9月9日公布，俗称“九九宪草”，成为在“联省自治”声中各省正式公布的第一部省宪。浙江省宪的条文规章与湖南省宪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相异之处，如

省议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或其他地方议员；省长由全省选民分区组织选举会选举，省长的职权则未作具体规定；行政机构为省政院（修正后为省务院），省长兼任省政院长（修正后省务院长由省长提名并由省议院通过）[42]。11月间，又将省民自行提出的各种宪草案，连同“九九宪草”，交由宪草审查会审查，最后在1923年1月议定三种宪草，分别以红、黄、白三色作为识别，俗称“三色宪法草案”。但是，卢永祥提出“联省自治”，不过是在直系压力下表现自己顺应“民意”，企图以此自保，而省宪一旦实行，规定现役军人不能担任省长，省长职权受到议会的制约，对于如此碍手碍脚的省宪，卢永祥自然无意付诸实行。“九九宪草”甫公布，卢永祥被选为宪法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声明“鄙人分属军人，且系现职，既为职务束缚，循名责实，未便遽承”[43]。实际表明了他对省宪的态度。如时人所论，“卢是安福俱乐部主要的残存者，他绝非一定赞成自治者，是把自治作为对抗直系控制下之中央政府的一个衬托”。宪草本定于8月1日交付全省公民投票复决，但卢永祥“再三延宕，不肯交付公民票决，致成流产”[44]。“浙江所以闹了许多制宪的花样，终于不曾实行的缘故，并不是浙江人民不热心，只是卢永祥始终没有诚意，恐怕实行起来，要受宪法的拘束，不能专擅自由；原来他的意思，不过借制宪自治，抵抗直系的压迫罢了”[45]。至于其他制定宪法的省份，如广东、四川与福建，则多以湘宪或浙宪为蓝本，也都未能通过或付诸实行。如曾经亲历“联省自治”运动的史家李剑农所论：“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但在军阀势力宰制的下面，所有的运动，皆未发生实效，湖南的实行省宪两三年，算是例外。但这种例外的实行，也只有形式，与其他各省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差罢了。”[46]

1922年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吴佩孚志得意满，一手策划“恢复法统”，一手准备“武力统一”。对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图谋，西南方面自然非常敏感，唐继尧的幕僚周钟岳认为，“吴既以兵力统一北方，又欲以法律统一南方，以拆西南政府之台，其计甚巧”。为应对吴的政治攻势，周向唐建议，召开各省代表会议，采用

联省自治精神制宪，说明此时欲谋和平统一，恢复国会及总统复位不过是治标之策，治本则在制定联治宪法[47]。6月8日，唐继尧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国会，拥护黎元洪复职，主张“速集南北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筹议建国大计”[48]。29日，唐继尧再发通电，认为“以吾人经验所得，及国民心理所向，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遍输于宇内。此时仍惟有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果能由自治而联合各省，即由联省而组织政府，使地方自治，有自由发展之机，而统一国家，亦得免分崩之患，则所以消弭兵祸者在此，即所以建立国基者亦在此也。惟是联省自治，关系国家大计，既非闭关以自守畛域，亦非强人就我范围，诚宜结合同心，共筹办法。如何使制度依法产生，如何使主义免除障碍，不能不望各省之互相提挈，切实进行”[49]。唐电既发，已经实行“自治”的湖南率先响应，赵恒惕于7月1日发出通电，认为“观察现时之潮流，与人心之趋向，非实行联省自治主义，不足以解纠纷而维国是，并宜本此主义以制国宪。至于湘省，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势必抱此宗旨，积极厉行，决不为外界人所摇动”。同日陈炯明发出通电，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民俗各异，仍应仿照美国，建立联省制度。中央集权，适足以肇乱”。他提议组织中华民国联省，以实行统一；各省组织政府，处理本省事务，省宪法自定，但不得与国宪抵触；实行军民分治，政事完全还之各省人民，而军事则超然于各省之外，由中央执掌，各军给养由陆军部担任，不仰给于各省，驻地亦由陆军部统一指定[50]。陈炯明还与湖南的赵恒惕和云南的唐继尧相商，提议在上海召开联省自治会议，并得到四川的刘湘、贵州的袁祖铭、浙江的卢永祥、东北的张作霖的赞成，不过由于直系的强硬反对，会议未能开成。此时，“联省自治”呼声再度高涨，形成继1920年湖南初倡之后“联省自治”运动的又一高潮。

在直奉战后的政治环境下，地方军阀接过“联省自治”的口号，以图对抗直系的“武力统一”，而社会舆论和团体对“联省自治”的热捧，则出于对军阀相争混战的不满。这实际上也是“联省自治”运动自始至

终所表现的两种不同趋向：一种趋向是地方军阀的分离主义色彩，这已经为各省“自治”的实践所证明；另一种趋向则是以名流、专家、学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鼓吹，代表了希望稳定发展的有产阶级利益，也反映了希望生活安定的民众意愿。地方军阀需要借重舆论的鼓吹，有产阶级幻想得到实力派的支持，政治上本为南辕北辙的两股力量却因各有所需而暂时形成了颇为奇特的结合，使直奉战后的舆论界与政界显得颇为热闹。

1922年7月，“八团体联合会”（议会、商、教、农、工、银行、律师、报界联合会）在上海合开“国是会议”，主张由各省先制省宪，然后联合各省再制国宪。7月26日，他们召开国宪起草委员会，议定由张君劢拟订国宪草案。8月15日，张拟订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完成公布，其要点重在削减军人干政的可能：一、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国防军不超过20万人，岁费不超过联省政府岁出的20%；四、各省军队改为国防军；五、限定联省政府收入种类，余为省收入；六、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政府不得担任官职；七、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51)]。同期北京有“修正宪法草案请愿团”，主张修订宪法，划分中央与各省的权限，建立联邦制国家。当年8月，梁启超在湖南省议会以《湖南省宪之实施》为题发表演讲，阐述“联邦制”之来历及其在中国之发展，认为“民国成立以来，中央统一与联邦自治主义，彼此都在研究，两方面均有理由。但已经过去之十年均系中央集权，成绩如何？昭昭在人耳目。至于现在，即主张统一集权之人，亦皆转而主张联省自治，可谓全国一致”[(52)]。章太炎的意见更为激进，他提议：“今宜先由各省自制宪法，次定联省宪法”；“自此以后，乃设联省参议院，而现式国会可永断”；“大总统之职不废，枭鸷者处之，则有威福自专之患，……今拟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他认为民国以来的“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所以主张弃此“三蠹”，以制定省宪与联省宪法，成立联省参议院，以委员制代而行之[(53)]。

“联省自治”潮流的兴起，姑无论其实质如何，但至少对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虽然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处于弱势地位，但控制政府的大军阀总是企图有朝一日统一全国，当然反对地方小军阀的“自治”之举。直奉战后，直系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同样如此，吴佩孚甚而干脆指责“联省自治”是“豪强割据，部落称尊，又附会分权之说以自饰其乱”。黎元洪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却有不同。直系虽一手策划了黎的复职，但其拥曹锟出任总统的态势亦很明显，故黎元洪为了在总统位置上多留时日，企望借南方而自重，对以南方各省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态度宽容。7月1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表示尊重地方自治，并称“国会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候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在国会内部，也有不少议员对“联省自治”主张颇感兴趣，认为全国各方赞同，合乎世界潮流，俟正式国会召开后应予讨论。8月26日，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制宪原则：“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54] 可是，他们的主张却遭到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曹、吴对“联省自治”明确表示“不予赞同”[55]，由直系“统一”全国才是他们追求的基本目标。因此，7月5日和11日吴佩孚两次致电赵恒惕（后电与曹锟联名）称：“研究联省自治制，与单一国家制相抵触。所谓省区为国之固有版图，若强拟于邦州之列，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我国本属单一国家，数千年因袭已久”；“酌情度势要在扩充自治精神，不宜采取联邦之形式”[56]。7月7日，吴佩孚又致电唐继尧说：“地方制度业有明令附之宪章，权限如何，自有国会为之考订，愚意但求自治之实，不必更鹜联省之名。今若另开联省会议，非徒有蔑视国会之嫌，正恐枝节横生，纠纷益集，且亦非护法诸公所宜出也。”[57] 在曹锟、吴佩孚的直接控制下，黎元洪对政治的主张不敢越轨，他对“联省自治”的支持也只能停留于一些口头表示。

三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视环境不同和他个人思想认识的发展而有变化。对于在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孙中山一向主张实行地方自治。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在上海张园茶话会发表演说，强调“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58]。1920年3月，孙中山发表《地方自治实行法》，详细论述了实行地方自治的方法与步骤[59]。对于“联省自治”，当1920年12月湖南临时省长林支宇致函孙中山，希望孙在广东实行“联省自治”，并谓：“世界潮流日新，民族胥知自决，巩自决之基础，期政化之改进，匪厉行联省自治不为功。钧座返旆珠江，亟宜建立联省政府，促成各省制宪，以新耳目，而彰民治。”孙中山的回应是：“以分县自治为立国基础，联省只能成官治，不能达自治。”[60]

但是，“联省自治”有民意基础，有各方鼓吹，更重要的是，提倡“联省自治”的省份，有些名义上还归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治下，出于联合各方、共同对敌的考虑，孙中山初时对“联省自治”也未表示公开反对，而是采取了模糊态度。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就任大总统职宣言》中声明：“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61] 孙中山在此肯定了“自治”、“分权”、省宪、民选的意义，但并未明确提及“联省自治”，可知其对“联省自治”仍有保留。

1922年6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对军阀政治更为深恶痛绝。8月12日，他在由粤至沪的轮船上，对随行人员明确谈到：“以中国各省之土地与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国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独立之能力。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藉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裂之兆耳。故联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也。至言真正民治，则当实行分县自治。盖县之范围有限，凡

关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见闻较切，兴革必易，且其应享之权利，亦必能尽其监督与管理之责”；“至如今日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吾之主张联省不如分县者以此。”[62] 他到上海后，也曾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说：“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63] 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他对“联省自治”的反对态度趋向坚定而公开。

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大元帅。其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论及对“联省自治”派的评价时称：“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宣言”强调，“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64]。4月13日，孙中山又在《民权主义》第四讲中明确表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像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65] 由此表明，孙中山已经完全抛弃了过去对“联省自治”的实用主义态度，而以革命建国为奋斗目标。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态度的改变，除了他个人由于切身体验而致思想认识的变化外，也与他和共产党人的联系日渐密切分不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曾经支持过“联省自治”，如毛泽东曾撰文认为，“湘

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决，不能奋起主张，……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提出“超出南北竞争，建设缓冲地带，主张湖南门罗主义”，建立“湖南共和国”。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还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力促谭延闿“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最重要者，废督裁兵”[66]。李大钊也曾认为：“没有联治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了联治的主义，那时行民主政治，就像有了导师一般。因为民主政治与联治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67]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党人对“联省自治”转而采取反对态度，大力推动民族民主革命。陈独秀认为，“联省自治”“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而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他的结论是：“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68] 蔡和森对“联省自治”作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赵）……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他总结说，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军阀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亦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决定，唯一的出路只有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打倒军阀，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69]。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声明：“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

内容也决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因为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70] 中共对“联省自治”的看法和态度无疑会影响到正在筹划实行国共合作的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

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黎元洪复职又被逐，曹锟以贿选而出任大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法统”毁弃，北洋统治渐趋势微，广东革命势力正在发展，加以其他种种错综复杂之情势，“联省自治”的挥洒空间被大大压缩，其思潮与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日渐低落，终至消失于民国政坛，成为历史的名词。

第二节　西南军阀的混战

一　湖南的谭、赵之争

西南各省处在北洋系军阀的控制之外，为了对付北洋军系的扩张与“统一”，西南各省多能联合对外，保存实力，坚持“自主”，互相声援，“联省自治”就是他们对外自保的“护身符”之一。自护法战争之后，西南各省还不时“团结”在“统一”政府（广东护法政府、非常政府、大元帅府）的领导下，对外自成格局，俨然国中有国。但是，西南各省内部从来都不平静，各省与“统一”政府之间，尤其是各省内部派系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并且内争激烈。各省大小军阀拥兵割据，省中有省，以至县中有县，进则觊觎“统一”，担当霸主；退则割地自保，成“土皇帝”；为了自身派系和个人的利益，你争我夺，从无止息，以致政局动荡不已，民众深受其害；战争是家常便饭，动乱成社会常态。这种矛盾冲突夹杂在北洋系军阀南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北伐之中，更显复杂多变，头绪纷乱，甚而使研究者企望从中理出一条简单明晰的发展脉络与线索亦非易事。

湖南夹于南北之间，从来就是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南北交锋不断，但自吴佩孚率军北撤后，湖南省内的派系矛盾上升，激烈程度超过南北矛盾，成为湖南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1922年元旦《湖南省宪法》公布后，根据其规定，省长将由议会选举产生，统领军、民两政，为全省最高长官。正在掌权的赵恒惕视省长之位为其当然之座，但其他政治人物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其中最主要的争夺者是谭延闿。1920年11月，谭延闿因政争失利而被迫离开湖南，蛰居上海，后投身于孙中山阵营，但他在广东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对重返湖南政坛当家作主有浓厚的兴趣，如今省长明文规定由民选产生，谭将之视为机会，而且他在湖南还有不少支持者，自认可与赵一争，因此决定参选，从而掀起了湖南政坛谭、赵之争的波澜。

为了对付谭延闿争夺省长之位的挑战，赵恒惕采取的战略是联合林支宇，对付谭延闿。此次湖南省长选举的候选人，以地区分配，结果中路推出谭延闿，西路推出林支宇，南路推出赵恒惕，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各自组成社团为竞选后盾，谭派为民康社，林派为湘社，赵派为民心社。赵恒惕以助林支宇竞选省议会议长为筹码，利诱林支宇放弃参选省长而支持赵恒惕，使三足鼎立成为两强相争，而赵、林结合的实力显然强于谭延闿。1922年5月，湖南省议会选举结果最后揭晓，赵恒惕、林支宇派当选者有一百〇九人，占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二，形成对谭延闿派的压倒优势[(71)]。

谭延闿在省议会选举中失利，对此心有不甘，遂策动拥己之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驻郴州）发表通电，揭露选举“黑幕”，否认选举有效，并鼓动当选议员到郴州举行“非常会议”以抵制省议会。同时，谭延闿还以孙中山正在筹划之北伐向赵恒惕施加压力，并策动己派军人迎合湘人收回仍在直军手中的岳州之要求，放出出兵岳州的风声，企图以此离间赵恒惕与吴佩孚的关系，挑起湘直战争，以削弱赵在湖南的实力。但赵恒惕与吴佩孚早有默契，为避免与直军冲突而使谭收渔人之利，他派人向吴佩孚交涉，称“直军驻在岳州，破坏湖南自

治，如不及时撤退，他将无以约束部下”[72]。此时吴佩孚正在筹划“武力统一”，南方的赵恒惕和陈炯明为其重点拉拢对付孙中山的对象，因此对赵之要求表示优容。6月19日，吴佩孚致电赵恒惕，告其直军准备自岳州撤防，嘱其“会商陈炯明，将中山余部许（崇智）黄（大伟）等军早行消灭，以免若辈阴谋酝酿，扰乱湘粤，阻挠统一也”[73]。7月1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成立协定，规定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不得驻军，而由警察维持地方秩序。27日，直军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由岳州回撤至河南。赵、吴妥协加强了赵恒惕的政治地位，也使谭延闿“借刀杀人”的计谋未成现实。此后，孙中山因与陈炯明分裂而离粤，北伐军事中止，陈嘉祐旅被赵恒惕改编，谭延闿失去军事支撑，省长竞选更无成功希望。9月10日，湖南各县议会进行省长决选，赵恒惕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湖南行宪后的第一任省长。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谭延闿也不能忘情于湖南。他曾衔孙中山之命，派人入湘劝说赵恒惕与广东一致行动，取消自治，参加北伐，为赵婉拒。随后，谭延闿即联络陈嘉祐与沅陵镇守使蔡巨猷，策划武力倒赵行动。事为赵恒惕所知，他以蔡巨猷“在辖区增兵截税并与反赵势力通声气”，下令调蔡为湖南陆军讲武堂监督[74]，以削其兵权，同时授意部属联名通电，表示“倘有野心家不顾地方糜烂，只图一己之权利，离间内部袍泽，意图推翻省宪，……誓当禀承层峰，合力驱除”[75]。谭则请孙中山任蔡为湘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公开摆出与赵武力抗衡的态势，湘西已处在半“独立”的状态。

7月25日，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离粤赴湘。8月7日，谭延闿在衡阳就孙中山所委之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所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及陈嘉祐等均改称军长，预备北进讨赵；同时设立议员招待所和省宪修正事务所，准备在讨赵成功后接掌湖南政治。赵恒惕亦不甘示弱，他以维护省宪“自

治”为号召，通电责难“一二失意流寓之党徒，拥首倡制宪之人，为根本破坏省宪之举。……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以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76]。湖南省议会亦于8月11日发出通电，“对外声明，谭延闿以首倡自治之人竟有称兵毁宪之举，除咨请省政府以实力制止外，请各省主持公论；对内请各界奋起护宪”[77]。旋将所部改称“湖南护宪军”，8月11日以省长兼任“护宪军”总指挥，令贺耀组、唐生智旅由益阳、常德攻沅陵，叶开鑫旅由长沙、湘潭攻衡阳，拉开了伐谭架势。

赵恒惕的举措得到了直系的支持，因为直系“以大势观之，赣西如得完全，自非援助炎午（赵恒惕）不可。盖赵存则赣西可固，赵去则湘赣绝无相安之理”。所以，当赵恒惕向直军要求接济军械时，直军同意由湖北萧耀南处“提借”部分军火，使“湘军军实充足，得以拒谭，而炎午地位，因之巩固”[78]。而当湖南战局暂时不利于赵时，吴佩孚又决定出动部署在湘鄂边境的陈嘉谟第五十混成旅和胡念先的第二混成旅入湘重占岳州，以为赵助。如曹锟的参谋长陆锦所言，“赵炎午能否恢复，虽不可知，然必须设法利用，为吾们效用”[79]。

谭延闿决定发动讨赵，“自度之结果，以为在湘熟人较多，毅然回湘，必可不战而解决，不料竟至发生战争，惊动全湘”[80]。赵恒惕亦表现强硬，声称：“恒惕个人，以为只要不失政府威信，个人进退，不成问题。现在既已破坏宪法，恒惕系由宪法产生，当然与宪法相始终，必将此事办了，再言进退，若悍然不顾而去，实为三千万人民之罪人。”[81] 就谭赵双方的军事实力及部署而言，谭方可用的兵力主要为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所部，赵方则主要有叶开鑫、贺耀组、唐生智三旅，两军实力大体相当。宋鹤庚与鲁涤平部则宣告中立。双方攻防的重点在长沙。

8月23日，赵恒惕下总攻击令，赵军接连获胜。31日进占衡阳，谭延闿率部后撤。同日，因表示“中立”之湘军二师鲁涤平部团长朱耀

华倒向谭方，引谭军自湘潭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于仓促之间落荒而逃，出城奔醴陵，前线赵军亦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9月13日，赵军贺、唐、叶旅分兵攻长，谭军寡不敌众，退向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14日，湘军二师师长鲁涤平发表通电，提议谭、赵两方息兵止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续电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修正省宪法。谭赵双方因需要争取时间、准备再战，同意鲁涤平之请，派出代表进行和议。谈判持续了二十多天，双方因对省宪存废问题相持不下，没有达成妥协。其间鲁涤平因其妹夫、南县县长李希尚被赵军所杀而投向谭方。10月中旬和谈破裂，战事又起。赵恒惕因有直军支持（直军一部进驻岳州、常德为赵后盾），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反攻谭军，11月7日再占衡阳，完全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威胁。同时，沈鸿英领吴佩孚令，率部自赣边进击郴州，威胁谭军后方与广东联络的孔道，谭延闿不能不下令回师救郴，赵军声势大震。正当此时，陈炯明部正在广东与孙中山属下之部队交战，孙中山急调谭延闿回师援粤，11月13日谭部回师广东，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全境。

谭军撤退后，吴佩孚本希望赵恒惕率军跟进追击，将己方势力伸入广东，但赵恒惕不愿直军势力太过深入，影响其“自治”地位，婉拒了吴佩孚的意思。然而，“湘省自谭赵战后，赵氏得洛吴之助，逐去强敌，实际上久已附北，所未取消者，仅自治招牌耳”[82]。赵恒惕为维持其统治的代价，就是接受直军一部驻湘（岳阳和常德）的事实，从而也使其大力“倡导”的“自治”成为“招牌”。湖南虽然表面上还归属于南方阵营，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已成为直系的附庸。直军不仅重新进驻湖南岳州、常德等地，而且在岳州设立两湖警备司令部，客观上对湖南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1924年初，吴佩孚派人到长沙，要求赵恒惕取消省宪，实行北归。赵恒惕一直打的是“自治”旗号，如果同意吴佩孚的要求，其统治合法性自然丧失，但他慑于吴佩孚近在咫尺的武力，又不敢公然对抗，便虚与委蛇，再三拖延，只是动议修改

省宪，以此应付吴佩孚的压迫，同时则利用湖南民气，由省议会出面发表声明“护宪”，并由社会各界发起“护宪运动”。在湖南各界的抗争下，吴佩孚也不希望将赵恒惕推向广东方面，遂与赵恒惕达成妥协，由赵负责修改湖南省宪与国宪抵触的部分（已见前述），湖南的“自治”大体得以继续维持。

二　川、滇、黔的权力更替

四川军阀派系之多，战争之频，为祸之烈，政局之乱，即使在北洋时期也是全国少见。“袁世凯死去以后，四川饱受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之苦，吸毒成风，经济混乱，省级政府腐败无能，形同虚设。变化无常的军事联盟、频繁不止的武装冲突和有增无已的社会混乱，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变得扑朔迷离，令人头昏目眩”[83]。1920年，四川省内军队已有三个军（下辖十个师、九个混成旅）及川北边防军和川边军，人数不下十几万。其中有刘存厚的武备系、刘湘的速成系、邓锡侯的保定系、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系、刘成勋的三军系等等，由于四川军阀独有的防区制，各军驻防区域俨然独立王国，一切政务均由军人决定，互相之间你争我多，混战不已。据统计，北洋时期四川省内的军阀战争，每半个月就有一次，大战则几乎年年都有。自袁世凯死后，四川政局一直扑朔多变，省内各派军阀明争暗斗，还有外省军阀参与其间，并在护法之役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客为主，控制了四川政局，更加剧了四川局势的混乱与动荡。用时人的说法是：“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有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84]

1920年，先是3月唐继尧免去熊克武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务，引发川、滇、黔军之间的战争，熊克武部于6月被川黔联军击败，退出成都。其后，因唐继尧企图凌驾于川省当局之上，将川省军、民、财政大权归之于其任统帅的川滇黔“三省联军总部”，以此“存川督之虚名，割地方之大半”，又引起川籍军人的不满[85]。熊克武以驱逐滇

黔客军为号召，鼓动川省各派军人联合对滇黔军作战，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但懋辛、刘成勋为军长，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为师长。接战后，川军于9月5日克成都，10月克川南泸州、叙州（宜宾），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战死于泸州，滇军退川南永宁（叙永），黔军退重庆。10月，川军杨森、刘文辉等部攻永宁，但懋辛等部攻渝北合川，刘湘指挥邓锡侯、田颂尧等部攻渝南江津，陈能芳、陈国志等部攻渝西永川。15日，川军余际唐师占重庆，16日杨森部占永宁，滇黔军分别退回云南和贵州，结束了外省客军主导四川政局的局面。“综计开战以来，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公私涂地，井里为墟，商缀于途，农荒于野”[(86)]。

滇黔客军推出四川后，刘存厚在成都就任北京政府委派的督军，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广东政府委派的督军，形成一省两府的局面。川军将领于12月10日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暂维政局”，并提出“自治”主张，以“顺应世界之新潮，发达民治之基础”[(87)]。但刘存厚仍企图掌握四川省政，他鼓动北京政府在12月30日下令任命熊克武为省长，企图以此让熊交出军权，但熊不听命，同日声明解除督军职务，随后并通电声明，不以“非法政府之任官授勋为宠荣”，“川省完全自治，是则北廷命令，在川省无有丝毫效力。……武固甘为平民，厌弃官吏生活，即凡川中有识之士，亦绝非此种滑稽手段所能诱致”。刘湘、但懋辛等川军将领亦于1921年1月8日通电称：“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并对南北任何方面，不为左右袒。”刘存厚在川省任上，“既无战功之可言，而行事复大背人民之心理，其滥招匪队，更贻地方以无穷之患，故一般舆论，皆致攻讦之词，军界尤甚”[(88)]。1921年2月，四川各军联合发起倒刘行动，列举刘存厚的“十大罪状”。刘部势单力孤，无力抵御，刘存厚被迫在3月22日宣布解职下野。6月6日，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推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

刘湘上台后，政治上标榜川省完全自治，脱离南北政府；军事上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熊克武派），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刘湘派），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中立派，力量较弱，实力不及第一、第二军），但尽量扩充己派实力，削弱他派实力；经济上，力图控制四川税收与兵工厂，掌握物质资源。因其种种利己损人之图，很快即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尤其是与偏向于南方广东政府的熊克武（孙中山任命的四川督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熊克武、但懋辛联合刘成勋的第三军及省联军，发起倒刘运动。在各方压力之下，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职，实则心有不甘，如其所言："任职经年，政令不一，以致办事极感困难，虽欲稍加裁制，又恐人不我谅，枝节别生，不得已……知难而退，不能不为自处之道也。以后情形，当再斟酌应付。"(89)

四川政局的变化，使战胜奉系之后正在积极谋划"武力统一"的吴佩孚感到有机可乘，遂于6月间致电宜昌孙传芳和武昌萧耀南等，要他们对四川"相机援助，以树怀柔之德"。6月19日，吴佩孚在洛阳会见杨森，认为"将来川省内向，当赖此人"。随即致电刘湘，请其"与杨子惠（杨森）团结一致，以资应付，务使奸不得逞，功有所归，川局底定"(90)。有了直系的支持，刘湘自恃可战，声称"胜算要靠北军来援，尚须有待，只能加强准备"。但杨森急欲开战，以此树威并扩充实力，并谋代刘湘而领川政，擅发作战令，甚而派人告刘湘："杨在为你打天下，如战胜，功归于你；战败，由杨森负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哩！"刘湘只能默认，但告诫杨说："熊、但用兵诡诈，不可轻敌。"(91)

1922年7月初，杨森所部兵分两路，由重庆向驻在川东北的第一军发动突然袭击，并在7月9日发表通电，矛头直指熊克武称："上年援鄂之役，彼犹欲以总司令自居，及后投靠无方，又转而向孙中山悔过，仍遭唾弃，益致途穷。遂复倒行逆施，肆其挑拨手腕，东驰西突，昼伏夜行，使各军时起猜疑，以莠言售其倾轧。"(92) 第一军因

准备不足，初处守势，主动放弃忠县、万县，旋即反攻，第二军不支而退。8月1日第一军克渠县，2日克达县，第二军退回重庆，又遭到省联军的围攻，杨森被迫于7日率部出渝，节节后撤至川东万县、奉节一带。杨森的失败使吴佩孚颇为焦虑，他认为“渝在虽小挫仍能恢复，渝亡纵苟延亦必终败”，遂急令陕西刘镇华出兵川北绵阳，牵制第一军，策应杨森，“俾杨无后顾之忧”；同时令宜昌孙传芳率队沿江西上，“进驻夔万，以应急援”[93]。杨森退出重庆后，第一军继续追击，12日克万县，18日克奉节，杨森防备不周，所部大败溃散，本人只身逃出奉节，搭轮到宜昌，投靠吴佩孚，收拾整理残部，出任第十六师师长，从此成为北洋军阀武力图川可用之棋子与先锋。

当第一、第二两军交战时，但懋辛等致电在成都的刘成勋、赖心辉、邓锡侯等，请他们出兵相助。7月10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以邓锡侯、赖心辉分任正副总指挥，率部进攻第二军。第二军腹背受敌而不支，8月7日，与杨森离渝的同时，刘湘亦离渝暂避，并于月底回原籍大邑，四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1月上旬，第一、第三军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决定川省暂取自治态度，推刘成勋为总司令，暂兼摄民政；废除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分期实行裁兵，破除防区，统一财政[94]。由于明令废除军制，缩编部队，引起了各军内部的矛盾，各自争防区，争粮饷，所谓裁兵反成了扩军。12月2日，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并积极筹备制定省宪。此前，四川省议会在8月间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推刘成勋为宪法会议筹备处主任。10月间，推出戴季陶、谢无量、吴玉章等十三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1923年2月，草拟完成了《四川省宪法草案》、《议员选举法》、《省长选举法》等文件，但旋因内战又起，四川省宪草案尚未交付省宪审查委员会审查和省民投票通过即告夭折。

1923年1月，第三军下属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与刘成勋发生内讧，引起第一军助刘攻陈，而中立派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则助陈攻刘，

成都、重庆重又陷于混战之中。四川省军的内讧，有利于吴佩孚插手其间，挑动内战，以图其利。在吴佩孚的支持下，驻守宜昌的杨森部与刘存厚老川军系统的邓锡侯、陈国栋部联手，并得到刘湘所部的协助，向但懋辛的第一军、刘成勋的第三军及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开战。1923年2月14日，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文辉等，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随后杨森部由鄂西奔袭川东万县，邓锡侯部在川中围成都，拉开四川军阀又一次大规模内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吴佩孚下令组织援川军，其中以王汝勤为鄂西总司令，卢金山为总指挥，刘镇华为陕边总司令，吴新田为总指挥，孔繁锦为甘边总司令，袁祖铭为黔边总司令，四路大军在四川周边摆开合围之势，形成对川军各部的压力。

川军内战开始后，杨森、邓锡侯部发起进攻，东西呼应，占据上风。3月8日，东线杨森部占万县，4月6日继占重庆，第一军向永川、合川方向退却；西线刘成勋在邓锡侯等部的压力下于30日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及省长职，率部退出成都，4月5日邓锡侯、田颂尧部进占成都，6日邓锡侯被推为四川联军总司令，并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通电称："熊克武、但懋辛等现仍盘据东北西路，毫无悔祸之心。道路相传，彼等正勾结外援，意图反噬。"[95] 其后，熊克武、但懋辛、赖心辉等决定反攻计划，分兵三路，先取成都，再图重庆。5月5日，第一军发动反攻，击败川联军，13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赖心辉等又入成都。随后但懋辛部北进占绵阳，刘存厚军及陕军、甘军北撤，邓锡侯、陈国栋部退向通江、南江、巴中方面。为了支援川联军，杨森部由重庆西进，5月底与第一、第三军在资阳、资中、内江等地开战，6月上旬杨军败退，与袁祖铭率领的援川黔军合据隆昌，再败后杨军退泸县，黔军退大足，第一、第三军分途追击，先后占领合川、铜梁、大足、璧山等县，合围重庆。

为了呼应四川的战事，牵制北洋系的力量，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刘成勋为川军总

司令兼省长。24日，刘成勋通电复任川军总司令，7月25日熊克武通电就任讨贼军总司令，以吕超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石青阳为第三军军长，但懋辛仍任川军第一军军长，并发出讨贼军布告谓："川中历年事变，推其乱源，则曹锟吴佩孚诸人，实尸其咎……总之，捍卫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进窥武汉。"[96] 7月30日，杨森、邓锡侯、刘文辉、陈国栋、田颂尧等亦发出通电，拥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内争又以南北对峙的面目复现。

1923年8月以后，四川战事的攻防重点在重庆，攻守双方先在重庆外围反复较量，"鏖战兼旬，死伤近万人"[97]。杨森部渐渐不支，配合杨森作战的鄂军卢金山师亦"损失士兵枪炮，约在三分之一"，"战斗力完全失去矣"[98]。9月下旬，战事发展到重庆城下，双方反复较量，"巷战良久"，"伤亡甚巨"。此时刘湘亦自叙州乘轮赶到重庆，协助杨森的防守计划。此前，一直对四川"情有独钟"的唐继尧，于5月间派胡若愚率滇军第二军再次入川，10月中旬滇军到达前线，熊克武军得此外援，士气大振，一鼓而败杨军，杨森、袁祖铭逃奔万县，袁"仓皇出走，渡过浮桥，即弃舆徒步，履袜脱落，赤足而奔"[99]。10月16日熊军赖心辉部占重庆，但对退走的杨森部未大举追击，致其可以从容整理，图谋反攻。

11月底，杨森、袁祖铭与刘湘、邓锡侯在川东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决定以袁祖铭为前敌总司令，率部由万县沿江西进，邓锡侯、陈国栋部则由梁山趋长寿，对熊军构成两面夹击之势。而熊军在占重庆后内部矛盾又起，赖心辉图省长之位，与熊离心；滇军与川军有过往之隔阂，貌合神离；熊军内部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协力，结果不战而败。12月13日，杨军与邓、陈等军会师江北，次日再占重庆，其后与刘湘等部分途进军成都。熊克武本计划"东路取守，北路取攻，赶造子弹，强募新兵"[100]，继续与刘湘、杨森等部周旋。但刘湘已派刘文辉向赖心辉接洽，"许以保存，令归附中央，不与熊合"[101]。故赖心辉"意在暂取观望，至不得已时，即归服中央，刘禹九（刘成

勋）亦同此态度。熊见势将瓦解，又因省兵不愿纸币关饷，军心涣散，遂以但、张（冲）孤守成都，自率兵两团，并带行李八驮，现款十驮，铣（16）日离省，以赴中江潼川督战为名，究不知其何往”[102]。

1924年1月中旬，刘成勋与赖心辉致电刘湘，表示将劝熊下野，要求刘湘等停止前进。刘湘得知对手阵势已乱，25日令各部发起对成都的攻势。熊军各怀异志，兵无斗志，各部分向川南、川西退却。熊克武集中主力于潼川坚守，但力不能及，28日兵败于此，熊仅以身免。2月9日，刘湘等进入成都，赖心辉投吴佩孚，周西成投袁祖铭，刘成勋投刘湘，四川战事基本结束。熊克武、但懋辛等率部节节后退，由四川退入贵州，最后退到湘西，滇军则退回黔边。“此次战役历时一载有余，兴五省师，动十万众，交绥逾百次，糜烂遍全川，争地争城，动经旬月，此进彼出，迭为攻守。成都龙泉之役，重庆浮图关之役，梁垫之反攻，潼川之决战，师行所至，闾阎为墟。兵匪交侵，流离失所。其幸存者，勒筹饷款，敲骨剥肤。……强派收刮净尽，一县所出，率在数十万元，元气大伤，十年难复”[103]。

此次四川战事，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力最多，从而摆出了在四川当家的态势。2月18日杨森发表通电，称其奉袁祖铭与刘湘之命，后方防务与前方接济由其“完全负责”；所有后方驻在军队及军属机关，统由其“节制指挥”；成都所有行政司法事务，暂由其“主持”[104]。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并在此前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自认为倒熊立有大功的刘湘、袁祖铭未能当上川督，颇为不满。袁祖铭认为，杨森“为人跋扈专横，器量太小，将士不服，尚难独自称雄”，加以杨之“任性，必遭其他之攻击”；刘存厚“甚不洽人意”；“又以省长畀邓晋康（邓锡侯），完全偏一系，致令他方失望，枝节必多”；川军“各自扩张，互相排挤，毫无顾念大局之心。彼此情形，不乱何待”；因此又种下了次年川军各派联合讨杨的

远因[105]。

贵州自“民九事变”新派将旧派刘显世赶走之后，王文华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但王畏“以下犯上”、“以甥逐舅”之恶名，没有回黔主政，而是指派卢焘为黔军总司令，任可澄代理省长。卢焘在1921年1月28日通电各方，谓“现秩序大定，四境均安，此后施政方针，决当顺应潮流，实行自治。关于制定省宪，刷新政局，悉电民政当局主持。敝军确定军人不干政之原则，惟当整顿军纪，保境安民。”[106]不过新派虽在贵州政坛获得胜利，然贵州政局并不因此而得安宁，因为新派内部随即分化，矛盾斗争又起。

袁祖铭为刘显世提拔的将领，刘因担心王文华坐大而提拔袁以牵制之。袁祖铭曾任黔军师长、前敌总指挥等职，骁勇善战，在黔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王文华，但王文华逐走刘显世后，没有善待袁祖铭，反因担心袁超越其地位，调其为总参军，解除其兵权，使袁对王心怀怨恨，起而与王争夺贵州的领导权，双方的矛盾激化。“王不屡夺袁之兵柄，则不能高枕无忧，回黔统兵主政；袁不图王，终是笼中之鸟，要想振翼雄飞，决不可能”[107]。1921年，黔军退出四川后，袁祖铭图谋回黔夺权，因王系谷正伦等之监视、反对而未成，随后袁离队往上海，与同在上海的王文华相遇。王对袁持有戒心，命人暗中盯梢，监视袁之活动。事为袁知后，袁先设计脱离上海，继又令其表弟何厚光布置手下，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刺杀了王文华。王文华死后，卢焘于4月就黔军总司令，既表示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又赞成湖南的“联省自治”。但卢焘的实力有限，在贵州无力稳定政局，部下五个旅长各据一方，争权夺利，时人“比之齐桓公死后，五公子争立”，其中以谷正伦与何应钦的矛盾最为激烈[108]。何应钦是刘显世的外甥女婿，又是王文华的妹夫，刘、王既垮，他自然也待不下去，被逼离开贵州到昆明，后转广东，投靠了他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老同学蒋介石。

袁祖铭离开上海后到了北京，但无权无势，无处伸展抱负，成为

流浪军人。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经原在四川相识的友人张英华介绍，拜见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潘复，声称可以运动黔军归附政府，实际是想依靠北洋势力重回贵州。潘复将其意转报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因此前北京政府试图说服卢焘“北附”未成，今袁既主动投怀送抱，靳云鹏“以其能分化革命势力，扰乱西南后方，大悦之”[109]，当即表示可以助袁回黔，以将贵州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牵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孙中山方面”。北京政府决定拨款20万元作为袁祖铭运动黔军的费用，再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拨一旅军队归袁指挥，支持袁打回贵州。1921年4月，袁祖铭在武昌组建“定黔军”，自任总指挥，但假道湖南入黔之议被拒，只能又回北京活动。援鄂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靳云鹏电令吴佩孚，“就近与袁祖铭接洽，设法扶助，俾定黔局”。12月，袁祖铭与吴佩孚在汉口相见，吴“表示尽量帮助”，并拨枪六千支助其武力回黔[110]。此后，袁祖铭利用他在黔军中的老关系，对黔军进行分化瓦解，拉拢了不少黔军将领包括谷正伦的部下王天培等拥其回黔主政。1922年1月，袁祖铭自湘西洪江统军回师贵州，王天培等在贵州乘势发动政变。4月9日，袁祖铭率军进入贵阳，卢焘被迫辞去总司令与省长职，袁祖铭“定黔”告成。

因为是在北京政府和直系的支持下“定黔”，袁祖铭回黔后，政治态度偏向于北洋系。当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逼徐世昌下台，扶黎元洪复位，鼓吹“法统重光”时，袁祖铭亦在6月3日发出通电，称“主张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解决一切纷棼，至理名言，实中切要，与西南护法本旨洽相吻合。愚以为解散旧国会为违法造乱之主要原因，恢复旧国会即为依法解决时局之唯一方法。”[111] 8月12日，袁祖铭宣布废除“定黔军”司令的名义，改任贵州省长，且有制宪之议，并大力扩充黔军，成为西南实力军人首领中的“后起之秀”。

1923年2月，四川大规模内战爆发后，袁祖铭被吴佩孚任命为黔边援川总司令，率部由贵州毕节入四川叙府。与此同时，唐继尧利用下野后流亡昆明的刘显世，助其武力回黔推翻袁祖铭，而刘显世亦不

甘流亡在外，正谋出路，双方一拍即合，组织滇黔联军，由唐继尧任司令，刘显世为副司令，通电责袁祖铭“对外则阴谋祸国，违反民意，对内则烦兴苛政，暴敛横征”[112]。2月中旬，滇军两路入黔，黔军兵力薄弱，不敌滇军攻势，袁祖铭因远在四川，回援不及，只能决定放弃贵州，自任黔军总司令，率部入驻重庆，后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据有川东南大块地盘，并可窥视贵州。贵州则由刘显世于4月19日复任省长，唐继尧的堂弟唐继虞任贵州军务善后督办，实际掌握贵州的权力。刘显世因受滇军挟制，不安于位，9月辞职由唐继虞兼任，贵州再度沦为云南唐继尧的附庸。

1920年滇黔联军败于四川，滇军内部对唐继尧长年驱使滇军脱离家乡、南征北战颇多不满之情。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与唐继尧有矛盾，不满唐继尧之颐指气使，利用滇系军人内部的矛盾，发动驱唐之役。1921年1月27日，就在顾部自四川班师回滇之际，驻昆明的唐部军长叶荃亦表示响应，他还发表通电，责唐继尧“以土酋政策鞭策云南，我同胞呻吟痛苦于万恶专制淫威之下”。2月6日，邓泰中等滇军军官通电响应倒唐，声称“今幸潮流趋重自治，自应及时与民休息，整理内政，培养元气，暂不虚张联帅职徽，以息内外口实，乃一切悍然不顾，专戾自恣，语语拒人，致无商榷余地。此为吾滇计，不能不请公暂避。”[113] 唐继尧失去部属支持，2月8日被迫匆匆离滇，表示“为免除地方危险起见，不惜放弃个人之权利，决意解职，避让贤能，以舒民困而解内讧。”[114] 顾品珍随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实际控制了云南。唐继尧黯然离滇时仍不甘心，曾对人说：“过一两年后，我们再回来跟他们见个高低。同时还要请滇中父老兄弟，慢慢的评断评断，看看究竟谁是谁非，谁善谁恶。”[115] 据唐继尧自称：“当离滇之初，本拟周历名邦，藉觇大势，窃不自揣，欲一探其国家盛强之原与夫政治，异日苟有一得之愚，或可以补积年之过。乃舟过香港，即为国会军府暨粤中当局诸公以及地方团体坚招入省，……故拟暂住此间，竭其智能，以为军府及西南各省之助。”[116] 但唐继尧不甘失去权力，也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1921年3月到粤后，曾“授意己派议

员，组织总统选举会，欲自为总统”[117]。因得不到支持，又不愿卷入广东政潮，稍后蛰居于香港“养病”。

顾品珍在云南上台后，“议决对北方坚主护法，积极拥护军政府，坚持自治方针”；又致电广东政府，表示“尊重国法，服从民意”；其政治立场在南北之间似显模糊和游移[118]。而且顾品珍的施政也不理想，干部任用私人，部下争权夺利，各自贪图享受，使滇人大起反感，责其“兼综庶政，黜陟百僚，威福自恣”[119]。此等反顾心态，为唐继尧回滇创造了条件。1921年冬，孙中山集西南各军会师桂林，准备北伐，唐继尧则策动驻桂滇军不要“为彼辈一二人争夺地盘之工具”，应“先救云南，后维大局”[120]。他将驻桂滇军编为四个军，自任总司令，任命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军长，声称将回滇“戡乱”，并鼓动滇军官长，“望体察顺逆之分，准备戎伍，共襄盛举，以奠革命根基”[121]。为了打消唐继尧回滇的借口，顾品珍在1922年1月委金汉鼎代理云南总司令，刘祖武代理省长，自任北伐滇军总司令，准备率部参加北伐。当年春，唐率军自滇桂边境入云南攻蒙自，另一路则由滇黔边境入云南攻昆明，顾品珍部战败，3月20日顾品珍被土匪吴学显部打死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随后唐继尧复入昆明，重掌云南大权，顾品珍余部杨希闵、范石生等则由张开儒统领到广东投奔孙中山。

唐继尧在云南重新当政后，提出“民治潮流弥漫全国，知武力之实为民患，则惟有废督销兵；知集权之不适国情，则惟有联省自治；救国之策实无逾此”[122]。1922年8月1日，唐继尧在昆明宣布改组省政府，自任省长，撤销原靖国军司令的名义。《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规定，省政府为执行全省政务之最高机关，省长为一省之最高级长官，省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发布命令，省长民选，对议会负责，但在省宪未公布前由现任省长继续行使职权；省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军政、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司，司长由省长任命；省务会议以省长为主席，多数票决为通过[123]。虽然如此，云南省

宪并未公布，唐继尧在改组后的省政府中还是一言九鼎的独裁者，他人只能仰其鼻息而行事。唐继尧一方面以“联省自治”为名，巩固对云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企图重温“大云南主义”旧梦，向川黔以至他省扩张，如唐所言：“我军驻黔，原非久计，总以待机向外发展为宜”；“我军之发展，必先巩固黔局，以免顾虑。”(124) 唐继尧令滇军二次入黔获得成功，于是又有二年后袁祖铭杀回贵州的滇黔战争。

---

(1) 关于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请参阅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2)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泰东书局1920年版，第21—22页。

(3)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20页。

(4)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9—241页。

(5)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2页。

(6)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21—22、58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39页。

(7)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58页。

(8) 彭一湖：《我之无识的自白与对于今后时局的真觉悟》，《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第6页。

(9) 张东损：《宪法上的议会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张文第13页。

(10) 《告各省人民书》，《时报》，1920年12月7日。

(11) 《民国统一问题》，《太平洋》第3卷第7号。

(12) 《发刊词宣言》，《解放与改造》1919年创刊号。

(13) 丁燮林等：《分治与统一商榷书》，《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129—133页。

(14)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第119—123页。

(15) 《阎相文致靳云鹏密电》（1921年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44页。

(16) 《总座贯彻联省自治主张》，《大公报》（长沙），1920年12月25日。

(17)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第530—531页。

(18) 《省宪授受典礼志盛》，《大公报》1921年12月12日。据说，这些压倒多数的赞成票，主要是各县知事雇佣书记员代书而得，故时人论为："大凡国民总投票之制，其施行仅限于地小人稀，或素有组织之社会，知识程度较高之人民。苟其聚无数无知之人民，平日已未参与，临期莫详事由，本无意见可言，近以投票，将茫然不知所为。且吾国各省户口，至今未有翔实之调查，投票尤易于作伪。贪官劣绅，从而利用此机，以实行政治买卖。把持垄断，上下其手。其尤桀者，或且从而欺民窃国焉。此吾于湘省总投票之采用，不能不嫌太早。该宪草交由省民总投票时，已弊端百出，所谓'公民总投票决定'者，早经以其自身之经验，证明为有名无实之具文矣。"陈茹玄：《民国宪法及政治史》，引自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19) 谭延闿辞职后，先由林支宇担任临时省长。1921年3月初，林支宇因军人逼饷去职，其后赵恒惕被省议会推选兼任省长。

(20) 湖南省宪的内容见《湖南省宪法》，《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号，附录第1—56页。

(21) 《湖南选举运动之奇观》，《晨报》，1922年9月1日。

(22) 罗敦伟：《湖南省宪法批评》，《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号。

(23) 《湖南省志》，第434—435页。据陈独秀的报告，黄爱、庞人铨是"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而"被督军所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3页。

(24) 《赵恒惕迷了钱倒行逆施》，《晨报》，1922年2月14日。

(25) 《晨报》1921年12月3日。

(26) 杨端六：《对于湖南自治之希望》，《太平洋》第3卷第9期。

(27) 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

动》，第157、166页。

(28) 《赵省长昨日宣誓就任纪盛》，《大公报》，1922年12月19日。

(29) 《章太炎反对湘省改宪》，《申报》，1924年4月25日。

(30) 朔一：《湘宪在兵戈扰攘中修改竣事》，《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6—8页。

(31) 南雁：《湖南的省宪与报馆》，《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第10页。

(32) 赵恒惕：《民宪与复国》，《湖南文献》第3卷第1期。

(3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54、762页。

(34) 《浙江对中央之重大表示》、《晨报》，1921年6月7日。

(35) 《卢永祥自治尚不寂寞》，《晨报》，1921年7月1日。

(36) 《卢永祥促定联省法则》，《大公报》，1921年7月5日。

(37) 《卢永祥倡自治之虚声与实际》，《晨报》，1921年6月19日；《浙督豪电之应和》，《民国日报》1921年6月19日。

(38) 《浙卢倡言自治后之徐靳》，《浙江自治之真相》，《大公报》，1921年6月16日、23日。

(39) 《卢永祥来电表示态度》，《大公报》，1921年6月29日。

(40) 《卢永祥自治尚不寂寞》，《晨报》，1921年7月1日。

(41) 陈益轩：《浙江制宪史》，引自林孝文：《浙江省宪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42)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第244—248页。

(43) 《浙江当局不肯执行省宪》，《晨报》，1921年9月28日。

(44) 刘以芳：《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64—66页。

(45)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15页。

(46)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15页。

(47) 周钟岳：《惺庵回顾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4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1页。

(4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231—1232页。

(5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4页。

(5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2页。

(52) 《大公报》，1922年9月2日。

(53) 《大改革议》，《申报》，1922年6月25日。

(54)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77—1178页。

(55)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7月6日，第367页。

(5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4页。

(57) 《吴佩孚反对联省会议》，《申报》，1922年7月14日。

(58)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7页。

(59) 《地方自治实行法》（1920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20—225页。

(60) 罗家伦：《国父年谱》，第816页。

(61) 《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

(62)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4149页。

(63)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4页。

(6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6—117页。

(65)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305页。

(66)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

(67)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页。

(68) 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第130页。

(69) 《蔡和森文集》上册，第72页。

(70)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40页。

(71) 在此次选举中，有两位妇女当选为议员，一为醴陵的王昌国，一为湘乡的吴芝瑛，这是湖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72)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2页。

(7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3页。

(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5页。

(75) 南雁：《湖南的湘南湘西两问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第13页。

(76) 《湖南省志》第1卷，第523页。

(77) 南雁：《湘战的持满待发》，《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第6页。

(78) 《陆锦致蔡成勋密电稿》（1923年8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32页。

(79) 《胡恩光关于蔡成勋为防备卢永祥与谭延闿攻赣拟调驻赣援粤军增防致陆锦密电》（1923年9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4页。

(80) 《张石侯在总商会之谈话》，《大公报》，1923年9月5日。

(81) 《昨日省署对付湘局之大宴会》，《大公报》，1923年8月11日。

(82) 《湘赵召集军事会议》，《申报》，1924年3月4日。

(83) 罗伯特 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84) 吴晋航、邓汉祥、何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4页。

(85) 《刘湘等通电》（1920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59—561、564页。

(86) 《熊克武陈述击破滇黔军经过情形电》（1920年10月21日），《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328页。

(87) 范崇实：《1920—22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

(88) 刘克俊、陈祖武：《驱逐刘存厚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3—15、18页。

(89) 《刘湘表示对辞职问题将再斟酌应付密电》（1922年5月1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71页。

(9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2—363页。

(91)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963年第5辑，第85—86页。

(92) 《杨森等发动进攻一军通电》（1922年7月9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82页。

(9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6、368—370页。

(9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40页。

(95) 《四川文史资料》1963年第5辑，第102页。

(96) 《四川文史资料》1963年第5辑，第106页。

(97) 《重庆浮图关战场记》，《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6页。

(98) 《鄂军师长卢金山报告与川黔军联合作战失败经过致陆锦密电》，1923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0页。

(99) 《赖心辉通报攻克重庆情况电》，1923年10月18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381页。

(100) 《刘存厚转报熊克武在成都造械召兵速饬各路大军进攻省会致大总统电》，1924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6页。

(101) 《刘湘致军事处等密电》（1924年1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2页。

(102) 《陆军第七师长帮办陕西军务吴新田报告率师援川在梓潼绵阳等地战况致军事处等电》（1924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7页。

(103) 《重庆总商会陈述四川兵祸请求善后电》，《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0页。

(104) 《杨森攻占成都后被推为留守主持川省民政的通电》（1924年2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6页。

(105) 《袁祖铭关于成都下后以刘存厚邓锡侯杨森三人中选二人为正副首长主持川局电》（1924年2月26日），《袁祖铭关于四川首长问题认为吴佩孚以刘存厚为主不能保持各派平衡复陆锦密电》（1924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7—588、590页。

(106) 《卢焘通告贵州省局势通电》（1921年1月28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452页。

(107) 谌志笃：《袁祖铭“定黔”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6页。

(108) 丁宜中：《我所亲见的袁祖铭和“定黔军”》，《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09)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10) 谌志笃：《袁祖铭“定黔”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8页。

(111) 刘毅强：《袁祖铭与吴佩孚的关系》，《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

(112) 《刘显世声讨袁鼎卿及治理贵州方针通电》（1923年3月23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606页。

(113) 《叶荃通电》（1921年2月5日），《邓泰中等通电》（1921年2月6日），《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15—16页。

(114) 《唐继尧卸职离滇后二电》（1921年2月8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457页。

(115) 《李宗黄回忆录》第2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版，第296页。

(116) 《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19页。

(117) 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132页。

(11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69—771页。

(119) 《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29页。

(120) 《唐继尧致桂林北伐滇军胡司令张纵队长等密电》，云南省档案馆藏档，119—1—27。

(121)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04页。

(122) 《唐继尧通告改组云南省政府电》（1922年7月27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582页。

(12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212—213页。

(124) 孙代兴：《滇军第二次入黔浅析》，《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一节　孙中山继续奋斗

一　孙中山的北伐

自孙中山1920年11月回广东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始终以护法为号召，以发动北伐，推倒军阀政权，谋求全国统一为职志，声言“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1)] 为此，他在尽力谋求两广统一，联合西南各省的同时，还与皖、奉两系和解，结成“三角同盟”，广集同道，壮大力量，以谋首先推倒在北京当政的直系统治。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限，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充满了艰难困扰。

1921年9月，粤军在广西赶跑旧桂系领袖陆荣廷，两广局势的相对稳定为孙中山的北伐创造了条件。当月，孙中山发表《致海外同志电》，号召“凡我国人，务宜合力共进，踊跃捐输以助成统一，毋令全功亏于一篑也”[(2)]。10月8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北伐案，得到通过。15日，孙中山离广州，出发巡视广西，拟以广西为基地，集中军队经湖南北伐。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秘书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

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再加许崇智、李福林的粤军和熊克武的川军，号称有兵力十万之众[3]。孙中山的北伐方略是："吴（佩孚）逆若来，则用小包围之法，击之于衡宝一带。彼若退守武汉，则用大围之法，以荆汴、长岳为正面攻击，由汉水出萍樊为左翼，由赣出九江、黄州为右翼，三路以制其死命。两者皆以有他军为援，应为我之大利。闽王（永泉）攻赣之背面，鄂孙（传芳）乱吴之后方。形势既利，浙卢（永祥）皖马（联甲）即可据长江下游，而豫赵（倜）鲁田（中玉）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4] 关于北伐的进军路线，有人主张先出湖南再下武汉，也有人主张先入江西再下东南，孙中山兼顾两方意见，于1922年2月3日发布北伐动员令，饬令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自桂林经永州攻赣南鄂东，许崇智率粤军并联合湘军一部，经宝庆、湘乡攻武汉。27日，在桂林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上，孙中山颁布誓词谓："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5]

然而，在北伐誓师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并非一帆风顺。直系对北伐的政治阻挠和军事抗拒自不待言，关键是孙中山阵营内部对北伐的态度并不一致。孙中山本倚为军事主力的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广州政府内务、陆军总长及广东省长），对北伐很不热心，公开声称"余之所见，以为北伐云者，尚非时机也"；"虽属传报孙中山部下众皆从事北伐之计划，唯余并无所知"[6]。10月24日，孙中山在南宁与陈炯明会晤，向他陈述北伐的意义，希望能抽调粤军一部参加北伐，并由广东负责北伐军的后勤供应。为了消除陈的疑虑，孙中山对他恳切地说："吾北伐而胜，固事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7] 陈炯明仍不愿调其部队参加北伐，孙中山既无法说动陈出兵，只能令其回粤筹划北伐后勤与军饷，为陈炯明在广东图谋自立创造了机会，也为北伐留下了隐患。

就在北伐军刚刚出师之际，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于3月21日在广州广九车站突遭人狙击（23日身亡），北伐后方顿失依赖，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稳定后方。惟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不愿失去乘直系首尾难顾之机出师北伐的机会，故在4月16日的梧州军事会议上，又决定改道经韶关向赣南进军。当日孙中山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商讨北伐事宜，为陈所拒，孙愤愤而言："我们已经没有后方了。在桂林时，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还是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做后方，从韶关出兵。他总不能教我不革命。"[(8)] 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总长职，命广州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兼广东省长。5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中，4日孙中山在广州发布《声讨徐世昌令》，声明："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所认为民贼者，惟徐世昌及共恶诸人。"[(9)] 6日，孙中山与胡汉民、许崇智等到达韶关大本营，此时奉军已在战争中失败，但北伐军态势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孙中山致函张作霖称："此间准备完好，文于六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饬各军急速进行，不变初志，以践前约。贵军精锐，未失所望，乘时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10)]

经过调整后，孙中山督率北伐的军事部署是：以赣南为进军中心，赣州为夺取目标；以李烈钧任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总指挥，统领滇军朱培德部、黔军谷正伦部、赣军李明扬部，由南雄进攻大庾（今大余）、南康等地；右翼为粤军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部、赣军赖世璜部，由南雄进攻信丰、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等地；左翼为前敌总指挥、粤军许崇智部，由仁化进攻崇义、上犹等地。三路军队合共四万余人，超过当面的赣军陈光远部[(11)]。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人就商于浙督卢永祥，"切盼浙闽皆与我军同时一致动作"；"浙能于我军攻赣时即攻江苏，据南京为上策。我军得赣后会攻江苏为中

策。然中策非我志也。我计由九江夹攻武汉”[12]。

北伐军当面的对手——直系出身的江西督军陈光远部是直系在南方布局的薄弱环节，陈部实力有限，且为粤、闽、湘省三面夹击，态势孤立，陈又不能体恤兵士，缺额扣饷，专饱私囊，部队因此而士气低落，军纪松懈，战斗力不强。陈光远为前苏督李纯的部下，非曹锟、吴佩孚嫡系，与曹、吴关系不深，且在湘鄂战争期间对援鄂态度暧昧，意存观望，令吴佩孚颇为不满。北伐军入赣后，陈光远一面调集部队抵御，一面向北京政府求援，表示“军事方兴，需款万急，请饬财政部速筹拨巨款即汇来赣，以救燃眉”；“现在各军均在前线，后路一空，无队可援。除饬尽力支持相机办理外，请飞速派队来赣援助，方能御此大敌，保全危局”[13]。 但曹、吴虽然令蔡成勋领军援赣，其行动并不迅捷，以至陈光远抱怨，“此系南北兵争，而赣省首当其冲，以赣现有兵力，实苦敌众我寡，有守御之兵，即无策应之师，能顾一路，而不能兼顾各路，两电请援请弹，乃奉院部真寒两电，一无所应。光远惟有殚竭心力，激励部曲，勉尽撑持，至于利钝所不敢计也”[14]。

北伐军在江西作战初期的进展较为顺利，自5月中旬入赣后连战皆捷，25日占大庾，29日占崇义、信丰，陈光远部无力抵御。6月上旬，北伐军与陈光远部在赣州连战多日，13日北伐军克赣州，兵锋直指吉安，陈光远自觉无力控制局势，15日弃职逃离南昌。当日，刚刚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拿陈光远开刀，作为废督裁兵之例，免其江西督军职，由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节制江西军队，免杨庆鋆代署江西省长职，任谢远涵代署江西省长。也在15日，北伐军决定二期作战计划，确定沿赣江两岸向北进击，19日占万安、泰和，直逼吉安，形势似乎大好。不过，为了迅速取得北伐的突破，孙中山将大部分部队放置在前线，广东后方没有足够可靠的留守部队，当陈炯明在后方显露异动之状时，孙中山无力控制，而又存有一鼓而下江西之心，对广东后方情势的演变关注不够，在北伐进军的胜利声中，后方不稳势将影响前

方军情，致北伐功败垂成。

二　陈炯明发难与孙中山再度离粤

陈炯明本为孙中山所信赖的粤军将领，其在广东主政也与孙中山的扶持直接相关。如时人所论：“本来，总理对陈炯明，起初是很信爱。同时，陈炯明对总理也同样如此。后来因为彼此间意见渐渐隔阂，同时，又有些人在旁挑拨离间，便渐渐发生裂痕。”[15] 陈炯明与孙中山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看法不一，时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初不料陈有背离之心，而事实却是陈炯明羽翼渐丰之后，图谋在广东自立，认为孙中山在广东的地位与影响不利其个人利益，遂与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暗中有所联系。1921年冬，陈“派其私人代表朱兆熊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频频接触”。1922年初，吴佩孚的代表黄申芗到粤会晤陈炯明，其后，马育航、陈觉民又代表陈炯明到洛阳见吴佩孚[16]。接着，双方代表1月29日在洛阳订立言和条约[17]。据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的粤海关情报记载：“陈炯明将军正在惠州集结军队，并关注着直奉两派战斗的结果。若吴佩孚打胜仗，陈将回师广州，驱逐孙逸仙；要是吴打败了，陈将固守惠州基地，以待云贵之增援——陈早与吴佩孚、唐继尧结盟。”[18] 因此，当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6月2日吴佩孚致电陈炯明，要他“勉为其难，定粤之后，携手定国，所深望也”。5日又电闽督李厚基，要其“援陈去孙，早定粤局，以期统一”[19]。北伐军占领赣州后，还曾检获多封陈光远与陈炯明准备联合“夹攻”北伐军的密电，如陈光远给陈炯明电谓：“前与尊处所定夹攻孙军计划皆未照行。……务于本月15日以前，照行所订计划。”陈炯明复陈光远电谓：“贵军宜聚兵三南，予由惠州夹击，必操胜算。对许崇智所部及其本身，务取完全消灭主义；对黄大伟、李烈钧等军，实行缴枪解散。”陈光远的内部通报则谓：“陈部决计先期与我军协同动作。”[20] 因此，陈炯明最后的背孙拥直并非完全意外之举。

当孙中山在1922年4月免陈炯明职后，为了稳定后方，对陈还是留有余地，保留其陆军部长，划惠州、潮汕等地为陈军驻地，解决欠饷，还任命其亲信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安其心。为此，陈炯明还曾致电孙中山表示“感激”，同时他认为对政变尚未准备周全，密告在肇庆的叶举，“拥孙之魏邦平等军均在省，防卫之力不单，而海军已属孙，现在我动，省垣不能固守，许崇智、李烈钧等亦可提兵回战，并受民党群起斥弃，今时机尚未至，切不可轻举妄动，静待我最后之命”[21]。因此，他对孙中山表面敷衍，宣布下野，退居惠州，以示不问政事，私下却秘密联络亲信部下，准备发动政变。在陈炯明的指示下，叶举率部离桂回粤，并于5月中旬不顾孙中山各军不得入驻广州的命令，擅自进驻广州，占据城内外各军事要地，构筑工事，各处布防，为政变创造条件。随后，叶举等即以粤军官兵名义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5月25日，孙中山回电叶举等，告对陈炯明“每亟欲挽之复出，电报秘叠，信使不绝于道”，表明对陈“始终动以至诚”[22]。27日，孙中山迫于情势，任命陈炯明以陆军部长名义“办理两广军务，肃清匪患。所有两广地方，均听节制调遣”。但孙中山的做法已经不能挽回陈炯明的背孙之心。6月1日，廖仲恺函告孙中山，“陈炯明部屯集省城及白云山等处者日谋响应北吴。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广州叶举部更日向滋闹粮饷，受逼无已，因请孙暂回广州震慑[23]。当日，孙中山自韶关大本营回到广州，图稳定后方形势，但陈炯明及其部将对孙多避而不见，同时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9日，陈的亲信部下洪兆麟密电致陈，认为“现徐已下野，南方总统亦无存在之必要。否则有此赘疣，实足为南北统一之障碍。若不忍痛割爱于须臾，必贻生灵于万劫不复之痛苦”，提出“商谈一切进行计划，解决危局”[24]。

6月15日，叶举按照陈炯明的密令，在广州白云山总部召集会议，布置政变计划，决定于16日晨炮轰总统府，发动政变[25]。当晚，叶举部分头攻击观音山总统府、越秀楼孙中山住宅等处，政变始作。

在陈军发动政变前，孙中山已得到警示，他先怀疑这是“谣言”，其后当部属劝其离开总统府避往安全地带，但他慨然言之：“余负救国救民之责，艰苦不辞，改道北伐，……如陈果率其军以叛，占公府，使广州成为灰烬，置余于死地，余亦身死党国而已，夫复何憾。”[26] 直至15日晚夜深，广州各处隐然已闻枪声，孙中山才在宋庆龄和部属恳求下悄然离开住所，潜行至海珠长堤天字码头，由江海防司令陈策和海军司令温树德等陪同，登上海军军舰[27]，安然脱险。16日凌晨，陈军开始攻击总统府和越秀楼，与警卫团发生战斗，但未能突破警卫团的防线。16日下午，陈军利用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调停之机冲入总统府，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此坚持到最后，由卫兵护卫化装到达沙面，次日登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28]。广州市内各政府机关亦被陈军所占。孙中山事后回顾说：“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报告，于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事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帑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国会议员悉数被逐，并掠其行李。总统府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于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倒行逆施，乃至于此！”[29]

陈炯明发动政变时，拥兵2.5万余人，而孙中山能够指挥的不过是其警卫团数百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孙中山难以军事实力对抗陈炯明。不过，驻粤海军表示服从孙中山，发表《护法讨逆宣言》称：“叶举等包藏祸心，通敌谋利之不已，竟敢犯及元首，破坏政府，纵兵残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罪恶贯盈，当为天下所共诛。我等奉命声讨，先行炮击，冀其私心一悟，改逆从顺，免受天诛。如彼

仍顽抗，怙恶不悛，当合各省护法大军，协同扫荡，以免护法大业功亏一篑。”[30] 孙中山即以海军为依靠，以永丰舰为指挥部，率海军七艘军舰据珠江黄埔，与拥孙部队占据的长洲要塞炮台相呼应，与陈炯明部对峙。6月17日，孙中山在会见登舰请示的广州政府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时称：“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否则，中外人士，必以为我已无戡乱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畏慑暴力，潜伏黄埔，不尽职守，徒为个人避难偷生之计，其将何以昭示中外乎？”[31]

为了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令广州卫戍司令、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率部收复广州，但魏自称“中立”，态度暧昧，未有动作。孙又令北伐军自江西回师救粤，胡汉民、许崇智等接令后，于27日在赣州决定由许崇智先率粤军与滇军回粤，李烈钧则率其他各部暂时留驻赣南以为策应。7月初，北伐军自赣南回师粤北，沿粤汉路分路进军韶关，与驻守韶关的陈军接战。其后，留守赣南的北伐军在援赣直军蔡成勋部的压迫下退往粤北，亦加入对韶关的攻击。7月19日，回师的北伐军攻克韶关以北之乐昌及其东南之翁源，随后与陈军翁式亮、杨坤如等部在韶关一线激战。北伐军因连日征战，部队疲惫，后勤不继，军心动摇，作战失利，全线退却，滇军退往湘桂边界，赣军、湘军留湘赣边界，许崇智则率粤军退往闽赣边界，准备进军福建。

陈炯明发动政变之初并未直接出面，而以其部属叶举等打头阵，但孙中山坚持不离广州，坚持以武力讨陈，迫使陈炯明不得不走到台前。6月18日，陈致电魏邦平，将事变起因归于“孙公迫成”，明白提出“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戡乱，目的悉达，抑又何争？南政府不早收束，势必使粤再亡而止”，亦即请孙中山下台。同时，陈炯明对粤军将领解释其行动时，声称“若孙先生仍为一班宵小所蔽，不惜违反民意，只知贪恋权位，则必有人起而议其后，南方必从此多事，诸将领不患无立功之地”[32]。陈还堂皇地以广东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请出各界代表劝孙中山下野离穗，以免“糜烂”地方[33]。6月

21日，广东省议会在陈炯明的威胁利诱下推陈为临时省长，表示“赞成统一”，希望“双方停止战争”。23日，陈炯明在伍廷芳逝世的当天还有电给伍称：“现惟仗公切劝孙公，敝屣尊号，示天下无私，国会一开，依法再选，得位以正，为期匪遥。”[34] 不过，陈炯明对孙中山表面上仍表示尊重。29日，陈致函孙称：“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35] 只是陈炯明的如此表示并不能改变孙中山的现实处境。孙中山“决定坚持不动之计，无论如何危险，决不轻动也”[36]。但是，7月上旬，海军司令温树德及长洲炮台司令孙祥夫先后脱离孙中山附陈，永丰舰在珠江中处在陈军炮火威胁下，10日被迫转移锚泊地至白鹅潭，其间“敌炮以全力射永丰坐舰，弹下如珠，船身连中四弹，身动摇”[37]；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仍留永丰舰“坚忍以待之”。直到北伐军回援失利，永丰舰势处孤立，孙在永丰舰之部属群谓“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必危；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孙中山才决定离穗赴沪，“相与我护法同志讨论善后与中国统一计划”[38]。

8月9日，孙中山一行离开坚持了五十五天的永丰舰，乘轮途经香港于14日转抵上海。15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宣示对此次政变主谋及诸从乱者“当群起以攻，绝其本根，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藉口。”重申“奔走革命三十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

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39]

“六一六”广州变作，所谓“任用非人，变生肘腋”，使正处良好发展势头的北伐被迫中止，给孙中山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感受莫大的痛苦。如他事后所痛陈：“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胜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但孙中山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失败如此“惨酷”，但并不能使其放弃对理想始终如一的追求，他坚信“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知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40]。如何收拾残局，重上征程，是回到上海暂时安居的孙中山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他在进行新的思索，寻求新的道路，发现新的力量，由此开始酝酿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新的转折。就长期与广大的目标而言，孙中山力求实现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现代中国国家的理想一如既往，但对于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方法，除了沿袭联合各实力派的传统做法，着重加强粤、皖、奉三角同盟的合作之外，孙中山开始考虑借重苏俄的力量，引进俄国革命以弱胜强、以小击大的成功经验及其组织与方法，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党治，强调组织功用，加强政治宣传等等，一系列新的思路与方法开始在经历了痛苦失败之后静心思索的孙中山脑海中浮现、成形并渐渐清晰。孙中山的思路和可能之转向，得到了正在中国寻求革命力量、力图以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而壮大革命声势与阵营、改善自身革命成功后之相对孤立地位的苏俄的鼓励与激赏，也得到了成立不久、亟欲扩大力量、寻求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与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苏俄、国、共三方携手，共创中国革命新局的情势由此而渐成，孙中山及国民党通过自身改组、实行联俄容共、发动国民革命、实现中国统一的政略策略也因此而在酝酿之中。

三　南北对福建的争夺

对孙中山而言，在广大而长远的目标之外，短期与具体的选择更为迫切，他首先需要为自己的力量寻求落脚点与出发点，以便重组队伍，东山再起，他的眼光仍在广东，而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福建。

福建原为皖系地盘，督军李厚基自1913年率军入闽，统治福建有年。他“内则恣意挥霍，力事逢迎，外则张皇补苴，尽情搜括。税收不足，继之以募债，募债不足，继之以外资。其间不惜高利或巨额仲金，为吸引之具。以公家为孤注，博其一己短暂时间之荣宠”[41]。李厚基的贪婪引起闽人的强烈不满。直皖战后，李厚基因失去皖系依托而渐靠近直系，为吴佩孚所拉拢，以牵制在闽南的广东孙中山和在闽北的浙江卢永祥的力量。第一次直奉战后，李厚基见直系势力更盛，更亲近直系，并削去其手下臧致平的兵权[42]，又图谋削去王永泉的兵权[43]，以稳固统治。李厚基的作为使部下与其离心，埋下了倒戈的隐患，加以李厚基在福建当政多年，形象不佳，统治基础薄弱，闽人斥之为“祸闽”，在“联省自治”的浪潮中提出了“闽人治闽”主张，发起驱李运动。福建有较强的民军力量，由于李厚基排挤臧致平、王永泉，两部怨愤，暗中与民军联合，集款购械，日趋活跃，不利于李厚基统治的稳固。此时正值陈炯明在广东发动政变，孙中山的北伐军因措手不及而回师失利，而许崇智领导的粤军早与王永泉建立联系，许崇智本人又曾驻军福建，了解福建情况，并与福建军政界人士常有往还，粤军遂向福建退却，准备与王永泉联手合作驱李，然后以福建为根据地，整军经武，回粤驱陈。

8月中旬，许崇智率北伐粤军进入赣闽边境的会昌，全军人数尚不及万，而且缺械少饷，亟待有稳固的基地休整补充。为了减轻王永泉对客军入闽的疑虑，许电告王：“我军此次主张，纯为开创东南新局面，实行孙（中山）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因李（厚基）作梗，故不能不去李。去李以后，闽局自应请伯川（王永泉）主

持。”许的设想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和王永泉的赞同，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专程前往延平（今南平），与王永泉商讨联合行动。9月初，北伐粤军自瑞金启程，“入宁化，经建宁、泰宁、建阳以入建瓯”[44]。在粤、皖、奉“三角同盟”联合反直的背景下，粤军在福建的行动也得到皖系的支持，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带人在9月下旬从浙南潜入延平，协助王永泉策划驱李事。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要求李厚基下台离闽。10月1日，王永泉就任闽军总司令。

10月2日，许崇智与王永泉部联合向省城福州发起进攻。李厚基对于王永泉的动向已有所准备，先已派人向曹、吴求援，得吴佩孚下令从江西派兵及海军赴援（只是因为形势的迅速变化，援军未到，李厚基已下台）。但是，李厚基的兵力有限（守福州的只有一个旅不到万人），素质低劣，作战意愿不高。粤军和王军自发起攻击后进展顺利，不过十天时间，10月12日晨攻占延平到福州的咽喉要点水口，逼近福州，各地民军亦纷纷出击，牵制李厚基无法从外地调兵增援福州。12日当天，粤军向福州发动攻势，李厚基见大势已去，仓促避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随后转往闽南厦门、泉州，图谋再起。粤军进入福州后，与李部残余交战两日，至14日完全控制福州。

李厚基下台后，福建的局势一时出现了颇为复杂的状况。10月13日，黎元洪任命前海军总长萨镇冰为福建军务会办，15日又任其为福建省长。萨镇冰为福建人氏，符合“闽人治闽”的要求，能为福建各界所接受；他一直任职于海军，政治态度中立，与南北均有良好关系，故南北各方均未对其上任表示反对。对于孙中山而言，受陈炯明政变之累，需要有一地盘，作为再起出发的根据地，粤军在福建的进展，使孙认为“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则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亡命客耳，奚足轻重？”[45] 而皖系对福建地盘也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直皖战后皖系所控制的地盘只余浙江一省，而福建是皖系以前控制的地盘，王永泉的

第二十四混成旅原为徐树铮统领的参战军一部，故皖系企图利用此次机会，再次控制福建，壮大实力。10月2日，野心勃勃的徐树铮在延平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宣称将“克日移驻福州，处理一切军民诸务，依建国诠真，胪列诸端，切实办理，尽德信威力范围所及，自行其是”。表示“不至通国合一，复设正统政府之日，无论何人命令，树铮概所勿受。惟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物，服从其谋义，在今之日，我中华民国非此纯洁之二老出任艰巨，国基万难告安”[46]。

10月17日，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到福州。18日，徐树铮根据其《建国诠真官制》所倡之“中枢总管纲要”，“省权上合下分”的原则，以“建国军政制置府”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总揽全省军政。但是，王永泉并不乐意徐树铮凌驾于其上指挥一切，他和许崇智也没有否定萨镇冰的省长地位。福建舆论对皖系在福建的统治本无好感，不愿赶跑了李厚基，又来了徐树铮，“在省绅商耆宿，颇有致疑于新制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乃至皖系人物卢永祥等，对徐树铮如此特立独行的举动也不以为然。在各方反对下，徐树铮不得不在10月30日宣布废除“总抚”职，改任王永泉为总司令，并解释设置制置府的目的是：“建国军政府之设，因国无政府，故立此为发号施令之枢纽，职权略似国务院，负全国建设之责，非为福建而设。福建军民政纲，一经制定，自当移驻他地，别有经营，无常驻福州之必要，且一切经费决不取资于福建。”[47] 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影响反直“三角同盟”的内部关系，段祺瑞派原安福国会议员王郅隆到福州，劝徐树铮顾全大局，从速离闽。虽然徐树铮并不情愿就此离去，但王永泉已经稳住阵脚，控制了局面，徐树铮见事无可为，只能在各方压力之下，于11月2日被迫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由此结束。

已经被赶下台的李厚基也不甘寂寞，他以闽南泉州为中心，召集旧部谋划在福建复职。此时，被李撤职的臧致平从上海回闽，与王永

泉、许崇智等就划分地盘及协助粤军回粤等问题有所谋划。随后臧致平在厦门被旧部推为闽军总司令，李厚基还想借助臧部力量打回福州，不料臧却纵兵向李索饷并围攻，逼迫李厚基先是在11月7日逃到鼓浪屿日租界躲避，后又去广东汕头，向陈炯明求援，陈炯明遂派出钟景棠师入闽援李。臧致平在李厚基和陈炯明的压力下，与许崇智的讨贼军联合，击败钟景棠部。其后，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及民军张贞部联合进攻闽南，12月18日攻入泉州，李厚基的力量基本被消灭。直系派出的福建镇抚使刘冠雄致电北京政府，认为“李厚基在闽，人心全失，效力已无，万无振刷希望，用之徒滋纠纷。且建国军早经灭绝，情势已迁，请明令取消讨逆名义，并免李之职，请调京位置，并将闽督一缺裁撤，此后闽省善后，即由冠雄会同萨省长，协同各方继续办理，以一事权”[48]。1923年1月，李厚基从闽南到汕头转赴南昌，后到天津定居。

1922年11月7日，由孙中山任命的福建省长林森宣告就职，他和北京政府任命的福建省长萨镇冰各不相属而又相安无事。林森在福建施政，以“自治”为本，而孙中山则希望他多多筹款，以备讨贼军打回广东。孙中山致函林森说：“目前万事，自以筹款为最要，望兄放胆做去，勿庸瞻顾。无财政则军队嗷嗷，无以自守”；“近日西江军事紧急，香港机关乃不名一钱。……孔方困人，遂使西江及闽中军事，俱未能发展，殊可忧耳。”[49] 不过，林森在福建缺乏实力支撑，政令难以推行，筹款更是困难。许崇智得不到林森的钱财支持，与其关系渐远，王永泉一直谋划由其主政福建，更不会诚意支持林森，处在各种矛盾夹缝中的林森，地位并不稳固。

直系也不能忘情福建，他们通过北京政府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同时组织“援闽军”，企图将福建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援闽军”从河南、湖北、江西抽调二个师三个混成旅组成，由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常德盛统领。11月中旬，援闽军自赣入闽，随后被王永泉部击退。吴佩孚认为，“闽虽一隅，关系东南大局，设再迁延

不决，则乱事蔓延，将无底止”；决定调派驻守湖北宜昌准备“援川”的孙传芳部改而“援闽”[50]。12月，孙传芳率第二师从鄂西宜昌进驻江西。1923年1月21日，北京内阁总理张绍曾为标榜“和平统一”诉求，宣布取消“福建讨逆军”名义，“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商办理，但这个命令得不到直系的支持，无法付诸实施。

1923年2月，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回师广东，林森失去武力依靠。3月，吴佩孚主持在洛阳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川粤闽赣问题及促进南北统一办法，其主张与政府之计划，完全不同，其主旨：一、巩固长江防务。二、窥取闽粤地盘。前者收拾川局入手，再图滇黔。后者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指挥孙、沈，使闽浙粤桂不能联成一气，然后再及西北问题”[51]。直系派出的“援闽军”再度由赣入闽，王永泉、臧致平等在武力压迫下倒向直系，林森实无法再执行其省长职权，3月初被迫辞职，结束了在福建二位省长并存的局面，萨镇冰继续任福建省长。3月20日，北京政府在直系压迫下发布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令。4月17日，孙传芳就任闽督。福建的南北之争暂告段落，福建成为直系的地盘。

第二节　孙中山的转向

一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

在发动政变逼走孙中山之后，陈炯明于8月15日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并在18日通过省议会任命香港买办商人陈席儒为省长。陈席儒与孙中山和陈炯明都有联络，曾经捐资支持革命，因为当时广东地方财政困窘，而陈席儒自告奋勇出任省长，谓可筹得贷款，以作军饷，故陈炯明以其为省长。但是，陈席儒在位时间甚短，格于各种内外因素，不能根本解决广东的财政困难，广东纸币贬值，社会动荡，不利于陈炯明稳固其统治。

陈炯明在广东重掌省政后，标榜“军民分治”，提倡“联省自治”，并与北京政府和直系建立了联系。对陈炯明将孙中山排挤出广东，直系是支持的，但对其鼓吹“联省自治”，直系又是反对的。9月5日，陈炯明致函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张绍曾，表示“但使各方调协，则天下事固尚可为。炯虽无似，凡可辅成隆治者，亦极愿竭此绵薄”。张绍曾接信后，向曹锟、吴佩孚报告称：“顷得陈竞存（陈炯明）书，对于统一颇愿赞襄。”又复函陈炯明称：“方今法统虽已重光，全局尚未统一，……鄙意以为非法政府取消之日，正吾共谋建设之时。为今之计，各省惟有一致以尊重宪法，共策政治之改良，为赞襄统一之举。若仍各据一隅，以私见相峙，则国家不可救药矣。”[52] 直系希望陈炯明早日归顺北京政府，完成“统一”大业，但陈炯明需要的是直系的实际支持，以加强其对广东的统治，而对完全归顺北京政府，则又心不甘情不愿，双方的关系颇为微妙。

还不等陈炯明在广东当政有所施展，他的位置还没坐热，又要面临孙中山发动的军事反攻。李厚基倒台后，北伐粤军在福建获得了难得的休整之机。1922年10月，孙中山指示将北伐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在闽粤边界整军经武，准备打回广东。其后，孙中山又指示将驻守粤桂边境的滇军杨希闵、张开儒、朱培德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其时尚未投靠直系）部改编为西路讨贼军，准备自东西两路出兵夹击陈炯明，使其“不能有东西兼顾之力量，即为我军恢复百粤最良机会”；“惟有于最短期间，东西并举，使陈贼不能兼顾”[53]。同时在香港设办事处，以邹鲁为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募集款项支持。

面对孙中山部署以东西两路武力回粤的现实，以陈炯明有限的实力，确实无法“东西兼顾”，他遂将布防重点放在粤闽边境，以洪兆麟为总司令，同时令杨坤如部防守北江，梁鸿楷、熊略等部防守西江，又拉拢旧桂系将领林虎出任援桂司令，并允其事后主政广西。陈炯明

的布防计划偏东轻西，为孙中山的军事反攻首先在西线取得突破创造了机会，因为布防在粤桂边境西江方向的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与陈炯明的关系本不深，其部将李济深、邓演达等因为原师长邓铿的关系，与孙中山有较多联络，在军中密谋发动反陈起事，并得到孙中山的赞助。1922年10月，邓演达作为军中同仁的代表，秘密到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首先发动现在广西徘徊的张开儒滇军，刘震寰和沈鸿英的桂军，联合可靠的粤军，讨伐陈炯明，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作第二步计划。"其后当他们被调派西江布防后，即与当面滇桂军"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在后方做内应工作"，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对陈炯明反戈相向[54]。驻守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其中一部分原为许崇智旧部，对陈炯明派亲信熊略任师长颇为不服，旅长兼梧州卫戍司令莫雄遂秘密联络滇桂军，并派人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及其驻港办事处报告，建立了经常联系。陈炯明请旧桂系军人领军的举动，更使驻守西江的粤军上下均不满，坚定了他们反对陈炯明的决心。

1922年12月25日至26日，滇、桂、粤军三方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寺开会（即"白马会盟"），商议联合讨伐陈炯明的部署[55]。27日，滇桂军率先发起进攻，粤军主动后退。28日，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进据西江重镇——梧州。31日，滇、桂、粤各军誓师讨陈，然后兵分三路，滇军杨希闵等部沿西江北岸，桂军刘震寰等部沿西江南岸，直进广州，桂军沈鸿英部则向北江方向出动，抄陈炯明部之后。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布《讨伐陈炯明通电》，声讨陈炯明"半载以来，倒行逆施，纪纲荡然，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以百姓为鱼肉；尤复阴弛赌禁，操纵金融，以致民生憔悴，不可终日，祸粤之罪，更不容诛"。号令"诸军将士奋勇杀贼，为民除害，凡我粤人，务宜同仇敌忾，以成拨乱反正之功。……我广东全省人民既备受陈逆之毒害，必深知陈逆之诈伪，际此义师奋发，叛徒丧胆，当急起直

前，以人心为士气之后盾，俾肤功早奏，四境又安，有厚望焉”[56]。此后，西路讨贼军顺西江而下，陈炯明急派叶举担任西江前敌总指挥，还向直系曹吴、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等求援，但因讨贼军进展迅速，各方都未伸出援手，而取观望态度。1月9日，西路讨贼军占肇庆。次日占三水，逼近广州，陈炯明部军心涣散，无力再战，各部纷纷弃陈而去。1月15日，被陈炯明视为心腹亲信的洪兆麟，也在汕头宣告脱离陈炯明，迫使陈炯明不得不在当日发表通电，“宣告解职，完全下野，以谢父老”[57]。随后他离开广州赴惠州，转道于30日到香港。

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出乎意料的顺利，讨陈联军未经激烈战斗即拿下广州，说明陈炯明在广东的统治非常不稳固，但是也为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本被孙中山倚为回粤依靠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虽然在1月9日通电宣布即日返师回粤讨贼，2月初离闽回粤，却被洪兆麟部所阻，滞留于粤东潮汕一带，未能在讨陈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滇军比较亲近孙中山的朱培德部也还滞留在广西，首先进入广州的是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和滇军中与孙中山关系相对疏远的杨希闵等部，他们以战胜者自居，在广州占据公产，横行霸道，纪律松弛，扰商滋事，引起广东社会各界、舆论及粤军力量的反感，何况广州民众对桂系在广东多年统治的负面印象难除，对桂军更没有好印象；再者，他们随意扩充军队，扩张个人势力，分割地盘，也为其后广东的稳定带来隐患。当时孙中山在上海还没有做好立即回粤的准备，1月17日，他任命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邹鲁、魏邦平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希望依靠他们和魏邦平的粤军稳定广州秩序。18日，邹鲁等与粤军、海军首领开会，推魏邦平为讨贼军司令，决定设立海陆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推魏邦平为主任，决定已入广州各军由各军长统御而维持治安，军费临时由商务总会及其他各处借入，确定滇桂军驻屯地点，电请孙中山任命各长官。1月21日胡汉民与李烈钧抵广州，25日胡汉民就任省长，惟次日即发生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沈鸿英以杨希闵、刘震寰名义，邀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到滇军驻地

长堤江防司令部会议，讨论地方善后等问题，及至胡汉民、魏邦平、邹鲁等到会场后，沈部第一军军长李易标等寻衅生事，诘问："陈炯明已走，何以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之设立？是否以滇、桂军为贼？"一言不合即开枪动武，胡汉民卫士两人被打死，胡汉民和邹鲁在滇军人员护卫下逃出，翌日转赴香港，魏邦平被执扣押。由于事发后孙中山急令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和朱培德部滇军速向广州集中，令广州周边粤军严密监视，并争取到广州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迫使沈鸿英未敢决裂，于2月6日释放了魏邦平，将其部撤出广州。此事凸显了广东政局在驱陈之后的不稳与复杂，并将在不短的时间里始终困扰着孙中山及其继任者。如时论所言："广东境内之内外政派军阀，其关系似颇复杂，而迭次勃发变乱者，多因军人辈欲自握权势之野心所致。彼辈概系简单之武人，毫无政治思想，原欲藉武力一时镇压反对派，以恣达其政权欲望，并不知现代政治非如斯简单之物也。"(58)

因为广东政局的动荡，各界更期待孙中山速回，以稳定局势。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粤，17日抵香港，21日到广州，在当晚滇桂军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宣示"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整顿内部，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我们自今晚起，要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大家向前奋斗，另外造成一个新局面。"(59)

此次回粤，孙中山不再提"护法"，也不再成立政府恢复国会，表示他对"护法"和国会等等的失望。他在3月2日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自任大元帅，任命程潜为军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大元帅不经国会选举产生，不对国会负责，有权任命官员，发布命令，指挥军队，处理一切重要政务，实际上广州政府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大元帅一人之手，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因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60)。

二　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顿挫

孙中山出任大元帅之后，着手各项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的部署，首先是指定在粤各军的驻防地，其中粤军梁鸿楷部驻江门、四邑，滇军杨希闵部驻广州及粤汉、广三铁路沿线，桂军刘震寰部驻广州及东莞、虎门等处，桂军沈鸿英部驻肇庆至梧州西江沿岸，滇军朱培德部驻广州河南，拱卫大元帅府（大元帅府设河南士敏土厂），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自福建回粤后，4月下旬到汕头。经过如许安排，广东军事秩序初定，但是，孙中山面前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应对沈鸿英和陈炯明的军事挑战，统一广东，作为革命再出发的根据地。

沈鸿英部在进入广州又退出广州后，与孙中山的感情更恶，更有凭其武力取孙而代之心，而直系曹、吴亦以沈鸿英为棋子，挑动沈挑战孙的权威，意图乘孙中山立足未稳之际，以北军为后盾，支持沈鸿英驱孙占粤，至少可以使广东发生内战，形势不稳，削弱孙中山的地位和对外影响力。故此曹锟和吴佩孚坚持要北京张绍曾内阁发布沈鸿英督粤令，3月19日，吴佩孚致电张绍曾，直言不讳地说："中枢现在诚意谋和之际，孙文忽又回粤，背道而驰，统一之局重行破坏，迩者孙更庞然自大，野心暴露。中山一日不去，则统一一日无望。迭请电发孙、沈两令，实为大局起见。查沈鸿英在粤驻军有年，情形熟悉，近更实力充足，内则结联陈炯明旧部，外则与林督俊廷共同联防，如督理命令朝下，中山即夕必去粤。"20日，张绍曾内阁复职，作为其复职的条件，张阁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帮办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任粤军总指挥，陈炯光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钟景棠为第二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从而"可认为实力派向孙派宣战之通告"[(61)]。

沈鸿英出身绿林，辛亥革命后投陆荣廷，成为旧桂系成员，1921年又脱离陆荣廷，依附于直系，1923年借孙中山与陈炯明争夺广东之机入粤。孙中山回粤后，为稳定广东局势，任沈为桂军总司令，以示

笼络，同时令沈军移出广州，以为防范。北京政府对沈鸿英的督粤令发表后，沈观察形势，通电拒绝，而又阴与吴佩孚勾连，得其军火财政支持。“三月中旬，吴氏由赣密输步枪千杆，弹药五十万”；“四月上旬，吴佩孚遣间至港，阴为怂恿，鸿英约晤于新街，间者促鸿英就职，鸿英从之，（四月十日）召沈荣光、李易标、李根沄、古日光诸将秘密会议，适得岑春喧【煊】电及汇款，众益为动，欲决一战”(62)。除此之外，曹锟还令财政部拨给沈鸿英10万元。4月10日，沈鸿英召集部下秘密会议，部署作战事宜。15日，沈鸿英在新街（今花都新华镇）就北京政府委任之广东军务督理，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返沪，明示与孙决裂，并致电驻穗滇桂军将领称：“中山返粤，日言统一，而开府称尊，日言和平，而扩张军备，群小构衅，伐异党同，中山今日，人心已去，大势无可挽回，我滇桂军处此漩涡，惟望同德同心，共维粤事，促进统一，勿为一方所利用。”(63)

自4月16日起，沈鸿英部向广州发起全面进攻。担任阻击沈军攻击的主要是驻广州的滇军，驻广州之外的粤军和桂军刘震寰部奉令向广州驰援，参加战斗。双方动员的兵力大体相当，都不到2万人，但沈军一线部队的实力不甚强，经过三天的战斗，至19日沈军的攻势被遏制，沈军被逐出广州市区。因为粤、桂间的旧有恩怨及沈鸿英的出尔反尔，此次对沈军作战，得到广东各界的大力支持，沈军被逐出广州后，“原定于新街附近选择阵地，构成第二作战线，以乱军劫掠村市，商团围攻之，故新街遂亦不守”(64)。广东各界“念前敌将士之劳苦，协筹捐款，购物犒师”(65)。其后，广东各军继续追击沈军，吴佩孚令江西直军出兵援沈，并鼓动陈炯明部在粤东再起，合力反对孙中山。5月9日，广东各军攻下韶关，声势大震，北江战事暂告结束。援沈的直军方本仁部曹铁林团，“未战先溃，牵动全线，仓皇奔退，械弹尽弃”，被吴佩孚下令“严加惩处”，交沈鸿英“便宜行事”(66)。18日，广东各军又克肇庆，西江战事亦告段落。但是，沈鸿英不甘失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声称“感蒙曹、吴两帅知遇，付托之重，无论如何艰苦，此志始终不渝”。表示俟方本仁部再向粤赣边行动

时，“即行反攻，务期积极进攻，以报知遇”[67]。6月初，沈军乘陈炯明在东江起事之机，在北江和西江重新开始攻势，6月4日占韶关。广东各军对沈军展开反攻，7月3日收复韶关。18日，李济深率粤军第一师等部，在桂军黄绍竑部配合下，赶走沈军，占领广西西江重镇梧州。随后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所部归李济深节制调遣。至此，讨沈战事以胜利而告终，广东北路和西路的形势基本安定，不仅有利于广州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孙中山集中兵力，与东路的陈炯明部继续较量。

孙中山在军事上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来自陈炯明。1923年初陈炯明下野后，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并未解决，其部数万人也未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是以退为进，以惠州为基地，集结在粤东，对广州的安危和孙中山的地位都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且陈炯明出身广东又长期在广东活动，在广东军政界有一定基础，如何从根本上压缩陈炯明的活动空间，对孙中山而言并非易事。

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军事攻守行动集中在惠州及东江流域。陈炯明部编有七个军，其中林虎任第一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刘志陆的第四军和李易标的第七军（李原为桂军，沈鸿英败后投陈炯明），分驻兴宁、五华、龙川；叶举任总指挥，指挥熊略的第五军和杨坤如的第六军，分驻平山（今惠东）、河源、惠州；洪兆麟任第二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尹骥的第三军，分驻汕头、潮安。1923年4月底，陈炯明部将杨坤如将孙中山派往惠州收编陈旧部的招抚使姚雨平迫走。前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受北廷嗾使，挟陈逆重金，潜伏香港，遣党羽散布谣言，运动军队，希图扰乱治安，破坏大局”。陈炯明、叶举、洪兆麟、黄大伟等在香港几度会议，认为出动之机已至。5月11日，杨坤如在惠州“擅自称兵，进窥石龙”[68]。15日，陈军林虎部占梅县，洪兆麟等部攻潮汕，孙军许崇智部向揭阳退却。陈军由此开始了与广州大元帅府军队的反复拉锯战。

为了应对陈炯明旧部可能的进攻，孙中山着手加强东江前线的兵

力。5月11日，他致电在汕头的许崇智，告其“叶举、洪湘臣（洪兆麟）等逆已于十日到惠州，成立粤军总指挥部，现已大举来犯石龙、增城，望为注意”[69]。16日，孙中山亲赴东江巡视，并调西江和北江的军队前往东江增援，任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5月下旬，孙军范石生部滇军、刘震寰部桂军、李福林部粤军分三路向惠州发起反攻，与陈军在惠州周边各处激战。5月30日，孙中山亲赴石龙督战。6月4日，孙军克博罗，其后许崇智率部亦到博罗，“所部先后开到者亦数千”[70]。

6月上旬，孙军发动对惠州的攻击。惠州是广州之东百余公里处的要点，位于东江中下游，虽地处平原，但四面为水网地带，易守难攻。陈军据惠州可以窥广州，孙军据惠州可以进潮汕，故为双方必争之地。守惠州的杨坤如是惠州近邻博罗人，出身土匪，后被陈炯明收编，其部编为四个旅共约五千余人，利用惠州的水网地理环境，筑垒固守，给进攻的孙军造成很大伤亡，就连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也在进攻中受伤，攻势受挫。此时，因沈鸿英在西江和北江的攻势，部分在惠州的孙军被调离，双方形成僵持。

7月间，孙军与陈军在东江的战事又起。孙军集中万余人，猛攻惠州，但陈军坚守不退，双方均死伤惨重。19日，孙中山再赴惠州督战，在组织围攻惠州之外，还调动部队进攻潮汕、兴宁、梅县，以收配合之效。但时值雨季，不利作战，孙军再次无功而返。8月下旬，陈军集中兵力，发动反攻，孙中山自23日起在石龙设大本营，督师作战，为期八十天，是他一生中在前线指挥作战经历最长的一次[71]。孙军先是成功地守住博罗，其后在10月3日攻占河源，而在惠州方面，孙中山组织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局长杨仙逸等，“特制多量炸弹及鱼雷，运赴前地助攻惠城”。9月20日，孙中山“亲赴飞鹅岭，筹策攻惠城。午十一时到，着桂军各师来迓。至炮兵阵地，为惠城之敌窥见。未几敌炮继续向帅座射击，有距不寻丈者，从者多为帅座危，谕曰：但毋恐。盖敌炮表尺已用尽，纵密发，不相及，其后敌弹密

发，果于我无丝毫损也”。但孙中山舟次梅湖时，“杨仙逸、谢铁良取炸弹一枚，详为检视，示吴苏诸人以制造法，偶不慎弹隳及舱，声轰然如奔雷，杨谢诸将随行员兵均被难，电轮民船碎如齑粉”[72]。孙军攻城计划受挫，惠州仍是久攻不下。

孙军对惠州的攻击屡屡受挫，难免影响士气；陈军又得直系器械资财的支持，信心膨胀。10月间，陈军分路反攻，“敌我兵力遂达六万人以上”。因为滇军纪律欠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敌踪潜近，反攻前之夕犹未知”[73]，陈军于23日占平山、河源，28日占平湖，进迫大本营所在地石龙。惠州陈军杨坤如部亦出城反攻，围城孙军纷纷后撤。11月8日，陈军占博罗，12日占石龙，孙军全线后退，孙中山及大本营亦被迫撤回广州，孙军遭受重大挫折，惟滇军范石生部“率队来赴，卒破洪逆于石龙，几溺毙之，使敌挫折，不能穷迫我军”[74]。

孙中山退回广州后，收容溃军，整顿军纪，稳定战线。11月14日，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滇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广州保卫战，并急调谭延闿部湘军、樊钟秀部豫军自粤北韶关增援广州。陈军则由林虎、洪兆麟指挥，调动各部共约2万人，大举进攻广州。18日，陈军进至广州东郊石牌炮台附近，市区已闻枪炮声，幸得樊钟秀部豫军赶到参战，激战至晚，陈军未能突破广州市区防线。19日，双方仍在激战，孙军各部奋力抗击，渐渐夺回主动，加以谭延闿部湘军赶到参战，终迫陈军后退，广州转危为安。其后孙军继续追击，26日收复石龙，陈军再次退守惠州。就在广州激战之时，曹锟要求吴佩孚“转饬沈（鸿英）、方（本仁）各部火速前进，以赴戎机，而奠粤局”。同时，直系还派人拉拢滇军金汉鼎、杨池生部[75]，只是由于陈军在广州的败退，直系的计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督率所部与陈炯明部的战争进行了半年，其间有进有退，不断反复，终未能实现击败陈军、统一广东的愿望，于此亦暴露出孙军的重大不足与缺失。在讨陈战争中，孙军缺乏统一指挥，各军各有

自己的系统，经常是各自为战，不能形成有威慑性的合力，与联合一体的陈军恰成鲜明对照。虽然孙中山多次亲往前线督导指挥作战，但孙中山是卓越的政治家，毕竟不是卓越的军事家，他缺乏现代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实践，他在前线的作用更多在于鼓舞士气，而非实际指挥。更重要的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可以直接统领与信赖的基干部队，也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大批量的军事干部，其对外作战总是依靠其他派系的部队，依靠这些部队的领导者与军事干部，而这些领导者与军事干部又不似孙中山那样有长期的革命历史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理想，他们与他们的对手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实无本质区别，他们统领的部队士兵也多是当兵为了吃粮，不知为何打仗。以这样的部队，这样的干部，孙中山实在是难以依靠为他开创新篇的基本力量。因此，孙中山的军事实践，更使他痛感需要建立一支从属于理想和信念、能够真正听其命为其用的军队，并且为这支军队培养大批的干部，这也是随后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力求建立党军的直接动因。

三　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其政治转向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之后，不仅不再提“护法”，不再开国会，表示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践行有新的思考，而且开始接近苏俄，亲近苏俄，学习苏俄，其以苏俄为师的思想渐渐成型，从而预示着孙中山政治态度及其实践的重大转向。

孙中山一直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热诚践行者，但是，在孙中山的奋斗历程中，却并不能得到西方列强对其事业的热诚支持，相反，西方列强政府经常表现出对孙中山事业的冷淡，即便是被孙中山认为是“共和之友”的美国也是如此。1921年3月，哈定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孙中山派驻华盛顿的代表马素致电表示祝贺，却被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拒收，理由是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76)]，充分表现出美国的国家现实主义立场以及民主政治理想对现实政治的妥协。因此，孙中山越是在其奋斗历程中受挫，便越是期

待外来的支持，而又总是被冷淡被拒绝[77]，使他感同身受，对西方列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曾对外国友人愤愤地表示，“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已经绝望”，不得不寻求从其他途径获得援助的可能[78]。有研究者认为，孙中山本来是“一个言必谈美国，大半生以美国为榜样的政治家”，但是，孙中山与美国多年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美国对孙中山长期不冷不热的态度，使他对美国民主制的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反思自己过去的信仰与理念，认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谋求美国支持的希望完全不存在，整个西方世界已成为其事业的敌人。孙中山开始重新解释其三民主义，提出了激进的反帝主张”。从此，“孙中山从一个辛亥革命初期中外条约体系的坚守者变成一个决心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列强压迫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正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压迫使孙中山走向激进，把他和国民党推入了苏联怀抱，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兴起”[79]。

就在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日渐失望的过程中，俄国革命的爆发及其新政府对中国的新立场，使孙中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的眼光开始由向西看而有转变为向东看的趋向[80]。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即以护法军政府的名义，“特任王孰闻为西伯利亚调查员”，赴俄国调查了解有关情况[81]。1918年夏，在苏俄革命处在内外交困的艰难之际，孙中山特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82]。列宁收悉此函后，称之为“东方的曙光”，并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于8月1日复信“表示感谢”，不过因为当时中俄两国的政治及交通阻隔，孙中山并未见到列宁的复函[83]。其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中俄间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两国之间的新型平等关系。虽然苏俄宣言有宣传的意味，表现为口惠而实不至，但在当时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形势下，确实给中国社会各界带来了新思考，引起积极的反响。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对苏俄革命后的状况有不少新

闻和文章，一般而言还比较客观，反映出国民党人和孙中山当时对苏俄革命的看法至少不是那么负面。

苏俄革命成功后，面对国内敌对势力的反叛和西方列强的封堵，也在寻求可能的支持者，并且将目光投向了近邻中国。1920年中俄交通恢复之后，苏俄及共产国际都曾派代表来华，实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寻求对俄国革命可能的同情与支持。这些来华人士在中国接触过北京政府官员，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北洋军人、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访华观感不一，有人注意到孙中山在中国各地“都有追随者”，“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84)]；也有人认为吴佩孚是“进步军阀”，陈炯明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表示：“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称赞吴“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85)]。越飞还曾派人去见吴佩孚，其参观吴佩孚军队后递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吴本人和他的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越飞信中的意见，并“都说自己亲俄”[(86)]。俄罗斯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认为，陈炯明“是一名革命者”，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87)]。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苏俄一度将吴佩孚或陈炯明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对孙中山的实力并不特别看重，这些看法曾经影响到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双方合作的进程起始并不顺利。

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上海，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他表示“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

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88]。这大概是孙中山与苏俄方面接触的最早开端，不过，维经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与苏俄政府毕竟有所区别；因此，孙中山或许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他与苏俄方面已经有了接触。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致函孙中山，因为关山阻隔，孙中山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这封信，8月28日，孙中山在给齐切林的复函中，明确表示，这是他从苏俄方面“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虽然他在报上也看到有报道，说是苏俄方面向他作过一些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孙中山在复函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并且将北洋军阀与反叛苏俄政府的白军相比较，表示“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而“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在这封复函中，孙中山明确表示：“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说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自身政治组织的不足，注意到苏俄革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组织架构。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孙中山也注意到苏俄对东北的利益诉求和历史渊源，并且将张作霖形容为北京政府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89]。虽然孙中山此时已经和张作霖有了成立反直“三角同盟”的默契，但他向苏俄描绘的张作霖“形象”，却把握了苏俄的内心与利益诉求，说明与孙中山理想主义情怀并存的，也有精明的现实主义考量[90]。

自1921年起，苏俄和国民党即不断有实际的接触，彼此有更多的了解。1921年1月，苏俄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上海会见李烈

钧，李向他表示，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与国民党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同时还表示，“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9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1921年10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邀请国民党派人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1月7日，列宁致函齐切林，指示对孙中山“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92]。其后，马林由共产党员张太雷陪同，于12月23日到达桂林，同正在筹划北伐的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见。马林向孙中山表示，“苏俄坚决支持所谓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革命政府也应同苏俄合作，并应尽快同苏维埃共和国达成明确的协议，以增强国家的地位”。“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应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同莫斯科建立秘密联系”[93]。据马林回忆，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胜利前，与苏俄结盟事实上不可能，因为这会招致列强的干涉[94]。

1922年4月，来华出席正在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先行到达广州，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希望与苏俄建立更多的联系，而达林则提出国共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谈正在进行中，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驻留永丰舰时仍与达林保持着联系，直到其离开广州。在孙中山离开广州前，他曾经请陈友仁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95]

1922年6月的陈炯明政变，使正在进行中的孙中山北伐再遭重大挫折，而且陈炯明及其粤军是孙中山曾经鼎力培育并视为其可信赖的部队，如今于旦夕之间叛孙，确实使孙中山内心有深重的失败感。孙中山曾经寄予期望的西方列强，视其为缺乏实权的边缘政治人物，对

他并没有多少切实的支持，列强的现实主义态度，反而促使孙中山的反思，成为孙中山放弃其不切实际的“理想”，更多追求“现实”的动力，而苏俄恰恰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提供实际支持的一方力量，孙中山的政治态度由此发生重大转向，更多倾向于和苏俄结盟，以获得实际的支持。在此前后，陈炯明发动政变，吴佩孚镇压工运，而且无论是陈炯明还是吴佩孚，也都没有表露出和苏俄有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苏俄对陈炯明和吴佩孚在政治上的期待基本落空，他们的目光也在更多转向孙中山，将孙作为在中国合作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使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多了一条可行的沟通途径，较之完全由苏俄出面更有可伸可缩的方便性。孙中山和苏俄两方的现实需要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双方的合作具有了高度的可能性与相当的可行性，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当然，孙中山对这种合作的需要更为迫切，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1922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向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报告其中国之行时，建议中共应“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96)]。8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97)]，要求中国共产党“正确参与政治斗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98)]。8月25日，马林又一次来华后在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刚刚经受了陈炯明政变的打击、从广州返回上海、正在艰难处境中的孙中山，对马林来访很是欣慰，向他表示“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99)]。马林也向孙中山说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共同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100)]，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从成立初期“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01)]，先后调整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不加入国民党[(102)]，直至1922年8月下旬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视需要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03)]。其后，李大钊、

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有感于革命的屡起屡败，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软弱涣散越加不满意，自1922年8月他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会议，6日指定丁惟汾、陈独秀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1923年1月1日，经孙中山审定，《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开发表。《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创立的历史，表示“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强调“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能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重申奉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提出国民党的政策是：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以人民投票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实行地价税法；铁道、资源及大规模工商业由国家经营管理，并由工人参与部分管理权；制定工人保护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等。同时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也说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要内容[(104)]。《宣言》不提“护法”而强调“主义”，与以往表述有所不同。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会议，在大会演说中，孙中山告诫与会者，“我们自革命成功以来、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要求大家“把本党再改进、再扩张起来”；“切实把党务来改良、来扩张，使一日一日的进步才好”[(105)]。这些都表示国民党改组的逐步进行，预示着国民党改弦更张的开始。

1923年1月17日，苏俄代表越飞抵达上海，此后十天中，他与孙中山多次会见，就相关问题有广泛的讨论。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

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代表苏俄再次声明：“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双方“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状”；“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106]。《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苏俄与孙中山的接近与合作初见成效，也表明孙中山着力寻求苏俄援助以完成其革命事业。双方在“宣言”中都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各有所得。苏俄虽然表示“抛弃”中俄旧条约，但在事关苏俄国家利益的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上并未有实质的让步；孙中山得到了苏俄对其革命事业的援助承诺，同时又使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107]。所以，双方都可以对“宣言”作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双方对“宣言”也都表示满意。“宣言”发表的次日，越飞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同往日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昕夕相聚，议论上下古今”；“对各种问题，互相辩论”[108]；就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等问题达成原则意向。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示孙中山与苏俄建立实际的政治关系，其后苏俄对孙中山的实际援助开始到达广东。1923年5月，苏联政府向孙中山表示，将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炮和2辆装甲车，但请其“严守秘密”。孙中山复电接受苏方的建议[109]。在当时，这种援助是孙中山最急切需要的，因为据马林的报告，廖仲恺“经常对我讲，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110]。苏俄的金钱和物质援助对孙中山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苏俄还开始向广东政府及国民党派出政治军事顾问，最早的一批顾问在1923年秋季到达广州。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

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11]。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他肯定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认为“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112]。同时他也认为国民党存在纪律松弛、党员成分复杂、党内存在异己分子和野心家、党缺乏群众基础等问题，需要努力改进；建议国民党重新研究和审议党纲党章，建立党的核心组织和地方组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新的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等等[113]。这些建议为孙中山所重视所认同，并成为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步骤。

鲍罗廷的意见毕竟出自外国顾问，如何让这些意见为国民党内各路人等接受，颇费孙中山的思量。1923年下半年，为了替国民党改组造势，为国民党改组奠定思想认同的基础，孙中山在各种场合频频向党内成员宣传其改组的思想。10月1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员恳亲大会上提出：“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至于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因此，“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做党员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大家为党做事，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114] 11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员大会致训词，认为“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皆其且大者”。因此，“吾党同人今后当知所鉴，当自信吾党主义固有绝大把握，但能组织完善，则收效正大，否则恐终不能通力合作也”；“吾人既知组织

之未完，当思有以改善，务使以前党员活动由上而下的形式，一反为由下而上”[115]。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演说时进一步告诫党员：“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116]

在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早期，他派出代表团赴苏考察事占有一定的地位。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领衔、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状况，以期为中国革命寻求胜利的路径。孙中山与蒋介石早有接触，而自1922年6月蒋介石到广州在永丰舰随扈孙中山坚持对陈炯明的斗争之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亲近，其后孙任蒋为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大元帅府参谋长等职，派其率团赴苏考察，也说明了孙对蒋的信任[117]。

经过长途跋涉，海陆颠簸，蒋介石一行自上海乘轮到大连，再转铁路入苏，历时二周有余，9月2日到达莫斯科，停留近三个月，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代表团访苏期间，如蒋介石所言：“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118]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加米涅夫、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等领导人都会见了蒋介石，并讨论了有关问题。在代表团最关注的军事方面，他们提出：一、希望苏联多派人到中国，帮助我们按红军榜样训练部队；二、希望能为了解红军提供方便；三、请求共同讨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计划。苏方的答复是：可以多派一些中国干部到苏联学习军事，但暂时无法派遣很多人去中国；建议国民党加强政治工作，认为政治准备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待国内具备了足以保证军事工作顺利进行之时，方可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119]。11月26日，代表团参加由季

诺维也夫主持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就中国革命的纲领等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三民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如果我们根据三民主义口号开展革命工作，那么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很容易的。我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进行三五年之后，我们就能取得成功，而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他希望“共产国际将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仔细研究中国的局势，他们也将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120] 27日，在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蒋介石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宣传而造成的“政治活动的困难”，但他仍然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说“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121]。代表团还考察了红军部队、军事学校与军队党组织的状况，认为苏军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负责制是优点，对苏联红军的严明纪律、文化素养、政治工作留下深刻印象，表示愿意以红军为榜样，创办军官学校，组建军队。28日，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讨论中国国共合作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交代表团带回中国。这个《决议》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具体明确地阐述了看法，认为国民党要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必须按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民族主义的含义应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应包括，“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

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等等[122]。代表团在苏俄访问期间得到的意见、建议和印象，都通过考察报告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提交给国民党及孙中山的考察报告外，参加代表团的个人，因其具体情况的不同，访苏观感也有不同。蒋介石对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些方面颇为赞许，但对另外一些方面则有不满或心存疑虑。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是：“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缺也云。”对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表示不满，认为“普泛不实，其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季诺维也夫）似有颓唐不振之气”[123]。代表团在12月15日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向孙中山提交的访苏报告倒是反映了苏俄方面的看法，其中说：“我们的国民革命不能带有妥协性质。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作斗争。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124]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向孙中山再次作访苏口头汇报，既谈到苏俄建军成功的经验，也谈了自己的疑虑[125]。

孙中山的政治转向既包括他对苏俄的政策，也包括他对中共的政策。在筹备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不少共产党人被孙中山委派担任国民党的各级职务，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信任，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等。孙中山尤其着重组织方面的举措，以使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1923年10月，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4日又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量国民党改组问题，并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

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26]。

1923年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公布。《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奋斗的历史，承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而“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强调“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份子淘汰，去恶留良”[127]。《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提出：“吾党之目的，在于中国领域之内，养成一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使全体国民得于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遂其有价值之生存。本此目的，揭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主张，以奋斗之精神而图其实现。”党纲草案还对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具体内容作了阐释[128]。党章草案共十一章六十六条，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强调上下关系和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并要求在国民党活动的各团体中组建“党团”，以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成为“党军”创立的先兆[129]。这些党政军方面的原则规定显然吸收了苏俄的经验，是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发展及其政治转向的逻辑产物，并为其后国民党的改组和政治军事的“以俄为师”准备了前提条件。

(1) 《在广州宴请北伐军将领时的演说》（1921年9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8页。

(2) 《致海外同志电》（1921年9月），《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13页。

(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95、1403页。

(4) 《孙文以廖仲恺等为代表商讨对吴佩孚用兵之法电》（1921年12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5) 《北伐誓师词》（1922年2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90页。

(6) 《广东军阀大事记》，《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第155页。

(7)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90页。

(8) 《在梧州军事会议的演说》（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0页。

(9) 《声讨徐世昌令》（1922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12页。

(10) 《致张作霖函》（1922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1页。

(11) 《陈光远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5—686页。

(12) 《孙文关于与浙卢商讨会攻江苏事项电》（1922年5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9页。

(13) 《陈光远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4月23日、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4—685页。

(14) 《陈光远转报孙中山督师北伐向赣南挺进情形电》（1922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689页。

(15) 莫世祥编：《马君武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16) 广东省档案馆辑：《孙中山与陈炯明》，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

《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1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页。

(18) 《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研究》第1辑，第395页。

(1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358—359页。

(20) 李睡仙、谢盛之、鲁直之编：《陈炯明叛国史》，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69—170页。

(21) 《陈光远转报孙中山准备北伐遭陈炯明等反对情形致参陆部函》（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91页。

(22) 《复叶举等电》（1922年5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31页。

(23)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53、1455页。

(24)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25) 林廷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80页。

(26)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64页。

(27) 孙中山先登永翔舰，16日转至永丰舰。永丰舰在日本订造，1913年编入中国海军，1917年由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南下参加护法，官兵多为粤籍，支持孙中山。1925年改名中山舰，1938年10月参加武汉抗战时沉于长江。

(28)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胡应球：《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19页。6月29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从上海到广州，登永丰舰陪孙中山坚持，并护送孙离穗去沪。其后，蒋著有《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叙其事，得孙信任并为其在国民党中获得政治声誉。

(29)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2页。

(30) 《海军护法讨逆宣言》，《革命文献》第52辑，第204页。

(31)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5—6页。伍廷芳因此突发事变刺激，6月23日发病去世。

(32) 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7页。

(33) 段云章、沈晓敏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7页。

(34)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册，第515页。

(35)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第15页。

(36) 《蒋介石日记》1923年7月2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37) 《蒋介石日记》1923年7月10日。

(3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88—1490页。

(39) 《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1922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2—523页。

(40)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49、554—556页。

(41) 王孝泉：《福建财政史纲》上册，1936年版，第35—37页。

(42) 臧致平1916年领军入闽，后任福建第二师师长兼汀漳镇守使，被李厚基削职后愤而离闽赴沪。

(43) 王永泉时任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兼闽北镇守使，驻延平，其部比较有战斗力，且与许崇智等有联系，为李厚基所嫉。

(44) 《许崇智联王永泉攻闽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2辑，第385—387页。

(45) 《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7页。

(46) 《徐树铮在延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通电》（1922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03页。

(4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859—860页。

(48) 《杜锡珪致高凌霨密电》（1923年1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09—510页。

(49) 《复林森函》（1922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25—626页。

(50) 《闽督之争益烈》，《民国日报》1923年3月2日。

(51) 《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民国日报》1923年3月5日。

(52) 《陈炯明与张绍曾秘密勾结来往函件》（192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00—702页。

(53) 《致张开儒函》（1922年10月23日），《复朱培德函》（1922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91、662页。

(54) 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李济深的略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4—5页。

(55) 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56) 《讨伐陈炯明通电》（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0—11页。

(57) 《陈炯明宣告解职离省通电》（1923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09页。

(5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98、118、135—136、138页。

(59) 《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9—123页。

(60)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6页。

(6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378—379页。

(62)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485—486页。

(63)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4月20日。

(64)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492页。

(65) 《大本营内政部批第三号》（1923年4月27日），杜永镇编：《陆

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66) 《吴佩孚致曹锟密电》（1923年5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627页。曹铁林与曹锟“甚有关系”，因此陆锦得知此事后，即令蔡成勋将其“撤差”，“并转饬该团长迅速来保”，没有将他交给沈鸿英“便宜行事”。《陆锦致蔡成勋密电》，1924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7页。

(67) 《沈鸿英致曹锟等密电》（1923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33页。沈鸿英如此表示，实有借机索要好处之意。在粤汉路作战的方本仁对沈颇有看法，曾电告吴佩孚、蔡成勋等，指“沈军每当进退维谷之时，辄窃布浮词，诱人帮同动作”；沈之为人“向多欺饰”，“所报情形，不尽确实”，“以其遇敌即退，早无战斗能力”。《蔡成勋致保定巡阅使署等密电》（1923年8月18日、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1—642页。

(68) 《大元帅令》（1923年5月10日、22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54、67页。

(69) 《致许崇智电》（1923年5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44页。

(70)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07页。

(71) 《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25—736页。

(72)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17页；《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1—732页。

(73)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17—518页。

(74) 《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5—736页。

(75) 《军事处致吴佩孚电》（1923年11月20日、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7—739页。滇军为当时孙中山所属军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者，因而一直为直系所欲拉拢。齐燮元认为：“孙之所以不灭，恃有滇军，不速解决滇军，则粤局终不能定。”他提议或将滇军酌编师旅加以任命，或由中央资助其回滇，以收其心。《齐燮元致陆锦电》

（1923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40页。

(76)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77) 陈炯明发动政变之后，当孙中山提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时，为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所拒。参布赖恩·乔治：《美国国务院与孙中山》，曹前译，《新史学》创刊号。

(78) 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79)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第241—243、246页。

(80) 就地理概念而言，苏联在中国的西方，故此处的“西方”、“东方”概念并非地理意义的，而是政治意义的，“西方”指代资本主义国家，“东方”则指代社会主义国家。

(81) 《团结报》1985年3月30日第4版。

(82) 《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1918年夏），《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83)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76页。

(84) 《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85)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99页。

(86)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07页。

(87)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7—79页。

(88)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89) 《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1—593页。

(90) 苏俄在东北有过往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战略利益，对于东北当政者的倾向性向来比较敏感。维经斯基就曾形容张作霖“是日本的走狗，奉行的是日本的政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从苏俄方面说，同他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给他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即使是间接的帮助，都意味着加强敌人的力量。”[《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04页] 这也是苏俄一度希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完成中国革命统一事业的原因。苏俄还曾警告孙说，“削弱吴佩孚，就是削弱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中国，所以最终也就是削弱他自己”。《越飞给齐切林的电报》（1922年10月1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40页。但孙中山不同意越飞的判断，坚持与奉系和皖系的反直同盟，并对越飞表示：“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孚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是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的范围内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的。”《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45页。因此，孙中山对张作霖“亲日”的揭露，也并不妨碍他与张的合作并就此向苏俄方面解释其合作的动机与结果。

(91)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1—62页。

(92) 《列宁给齐契林的便函》（1921年11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7页。

(93)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94)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4页。有资料说，马林曾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共合作的建议（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但马林的回忆并未提及这样的建议。

(95)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6页。

(96)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

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0—21页。

(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98)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第118—119页。

(99)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4页。此据马林的回忆。据研究，8月25日，越飞亦曾派代表携函与孙中山会见，此人似为苏俄驻上海商务参赞利奥尼德夫（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第449页）。因此，此日孙中山会见的是马林、或利奥尼德夫、或马林与利奥尼德夫二人，尚待研究。

(100) 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则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2页。

(10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102) 陈独秀曾致函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表示中共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政策与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发布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被视为争权夺利之政党，在广东内部亦有陈炯明派反对孙中山，如中共加入国民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因此中共各地同志均“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103) 据陈独秀称：在西湖会议上，马林“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而据马林回忆，此前中共多数人已接受了他的意见，只有张国焘等一两

个人反对，“陈独秀同意我提出的观点。没有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7、91页。

(104) 《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

(105)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106)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107)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苏俄《真理报》、《消息报》等当时在报道《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将这段文字完全删去，说明苏俄官方其实并不认可孙的主张，写入这段话只能解读为苏俄当时为了争取孙的合作而作出的某种妥协。1936年，苏联驻华大使曾向蒋介石建议，将孙越联合宣言“作为中苏关系基础”。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苏联驻华大使的信中认为，因为这个宣言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259页］；这也说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而在孙中山方面，虽然他与苏俄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但他对苏俄仍然存有一些疑虑。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617页］

(108)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第463页。

(109) 《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的电报》（1923年5月1日），《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23年5月15日），薛衔天、黄纪莲、李嘉谷、李玉贞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678页。

(110)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17页。

(11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5—266页。

(112)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13)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

(114)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1页。

(115) 《在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训词》（1923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90页。

(116)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438页。

(117) 当时蒋介石对苏联抱有好感与热情，他对孙中山表示，如不允其访俄，则再没有什么事适合他做了（黄道炫：《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

(118) 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1卷，台北1984年版，第268页。

(11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2—288页；卡尔图诺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6年第4辑，第99—107页。

(120)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0—338页。

(121)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9—341页。

(12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123) 《蒋介石日记》1923年11月27日、28日。

(124) 《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01—

302页。

(125) 据研究，蒋介石访苏之初，“情绪很高，也很激动”，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但他对苏联的不满随后逐渐表现出来，原因一是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中山，使他得出苏方“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结论；二是苏方对于外蒙古问题坚持己见，使蒋大为不满；三是苏方对蒋提出的军事援助计划反应冷淡。因此，蒋介石在回国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谈及此次苏联之行时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黄道炫：《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据瞿秋白告鲍罗廷，蒋介石在同托洛茨基谈话后“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83页]。

(126)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10—1711页。

(127)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29—430页。

(12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47—1751页。

(129)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51—1752页。

第五章　北京政局与曹锟贿选

第一节　直系当政时期的社会状况

一　兵变与匪患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派系相争，政务不修，财政困难，政府既无心亦无力处理各种既存社会问题，更遑论考虑社会发展之长远规划。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醉心于“武力统一”与“最高问题”（即曹锟一心想当总统），北京政府内部尚且纷争不断，更无暇顾及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安与动荡依旧。1920年—1921年，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及西北的陕西连逢大旱，灾区逾三百余县，灾民多达二千五百余万人，死亡五十余万人，可谓哀鸿遍野，亟待救济。据估计，直隶成灾有九十二县，灾民592万，但赈灾款项不过百万（包括政府拨款与募捐）；山东成灾三十二县，灾民380万，赈灾款项只有区区20万[(1)]。“军政各费，在平时已岌岌不继，加以本年军事饷需浩繁，搜罗几尽。借贷俱穷，又复丁此奇荒，库款收入，绝无希望，虽欲挪拨而无从。当告灾之时，驰电各省，吁求赈济。虽军政绅商各界热心善举，分途劝募，汇款尚属寥寥”[(2)]。在此情形下，“赤贫者束手待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甚至专为求食，甘心随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亩之价，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举火，则数十家争往劫餐，于是土匪窜来，非匪者亦变为匪。饿莩满地，无疫者亦染成疫”[(3)]。

由于北京政府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力，使其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除了一般性的动荡之外，更突出表现为兵变与匪祸之频仍。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以养兵为头等大事，所谓兵多势众，自然是以枪杆子治天下的军阀所信奉之“真理”。其时中国并无征兵制度，士兵入伍或为强迫拉伕或为自愿投奔，但都需要发饷，所谓当兵吃粮，是为众所公认。而军阀养兵虽多，却因财政困难而无力按时发放足额之军饷，军费支出远远超出财政能够负担的范围，所以吴佩孚“最最注意者，则为将来之军需问题”，“凡关于财政可以活动之机关，皆握住不松一步”[(4)]。但即便如此，以当时“政府岁入，几以四分之三充军饷，而尤不能餍贪者之望”[(5)]。据估计，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仅直系军队就有二十三个师三十七个旅近40万人[(6)]，而当时北京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列的直军经费每月为74万元，直鲁豫巡阅使署每月经费7万元，两者合计不过80万元左右[(7)]，以80万元的经费维持近40万人的军饷，显然不敷应用，因此直系还要想其他的办法开支军费，如截留税款，擅征税收，扣留收入，硬性摊派，等等。直系如此，其他大小军阀亦莫不如此。但在用尽了这些办法仍然不能足额按时发放军饷时，士兵的离队逃跑以至哗变兵变等现象也就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22年的十年中，全国一共发生兵变一百七十九起，其中以直系当政的1922年为最多，达到四十五起，地域则几乎遍及全国各省[(8)]；而吴佩孚巡署所在的河南亦不能免，仅1922年7月中旬，“旬日中以兵变告者六次”[(9)]。

兵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饷，因“欠饷过多，迭谋变乱”[(10)]。当时即有论者指出：“国家兵费，支出虽多，地方捐税虽重，而并未能悉用之于兵饷。大抵至少半数以上，皆散入各级军官之私囊。是以国库已竭，而兵饷仍虚，地方凋敝，而兵变不免。”[(11)] 这些兵变虽然因欠饷而对长官发出实际的抗议，有其理所必至之处，但究其过程与结果，总是以烧杀抢掠共始终，给民众带来了许多苦难，“使大多数人民蒙极重之牺牲”，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如1922年5月，因助奉反直的豫东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师长宝德全被冯玉祥在开封处死，

其留守商丘之部五营于5月17日发动兵变，“肆行抢掠，城内商号无一幸免，并且到处放火，东西南北大街，所有市房，多成灰烬，直至十八日天明，始行捆载而逸。统计城内商民，除焚死数十人不计外，其损失财物，合洋为数实达一百一十余万元”[12]。8月2日九江兵变，“劫全埠商店居户，……纵火焚烧西大街商店百余户，全市精华殆尽，损失三百余万，并伤店主及平民数十人，因伤重毙命者不下十余人”[13]。不仅如此，因缺饷而离队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许多又沦落为匪，他们与众多流民相结合，使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尤为多发并具有破坏性。由兵变与“匪祸”而致之社会动荡，常常因天灾而加剧，又因政府人谋不臧而更趋恶化，不独直系当政时期如此，即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亦然。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表现形式不一，人数众多，全国各省，几无省不“闹匪”，“小股数十人”，“大股数千人”[14]，使当局极为头疼。除了一般性“打家劫舍”的土匪之外，还有一些打出政治旗号的武装集团，可以视为历代农民起事的延续，如河南的李明盛“高揭自治军总司令之旗”，贾青云“自称靖国军驻豫总司令”[15]；浙江的袁化南号为“民治军”，等等[16]。有些武装集团与军政界有某种关系，也是军政界人物或军阀派系争斗时拉拢的对象，如湖北的周孟容自称“援赣游击队”[17]。还有些武装集团与外国势力有一定瓜葛，如有传媒揭露青岛有股匪所用枪械“由日人供给”，“掠夺之款，也分给日人”[18]。而日本也特别注意扶植满蒙地区的民间武装力量。因此，对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不可一概而论，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中的大多数虽其情可悯，然毕竟不为正常社会接纳；至于其中少数提出了一定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因为其目标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其没有坚强的领导与严密的纪律，只能是昙花一现，以悲剧结局告终，不足为训。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匪祸”的又一“时代”特色是，不少土匪特别着意绑架外国人为人质，同时以传媒为媒介，将事态公共化、扩大化，

以利用当局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紧张心理，讨价还价，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身份的合法化，其中又以“老洋人”起事和临城劫车案为代表。

直系当政时期发生的“老洋人”起事，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事。“老洋人”名张庆，又名张廷献、张国信，河南临汝县人，1886年出生，曾经参加民国初年的白朗起事，后投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所部宏威军，任巡防队长[19]。第一次直奉战后，赵倜、赵杰兄弟因助奉反直而被迫下台，所部溃散后形成众多武装团伙，“人数超过原来匪数之大半”[20]，“老洋人”即为其中的一支。张原本在豫东发展，后由于官军追剿，改奔豫西，联络其他部众，声势迅即壮大，1922年6月底攻下鲁山县城，部属发展到一万余众。“老洋人”起事本无什么政治理念，而是抱着借此被“招安”而升官发财的念头，河南地方的军事将领起初也愿意接纳“老洋人”部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却力主剿办并督促进行，决定在全省分区清剿，限两个月内肃清，并对外宣称“河南匪患，不须旬日即可肃清。”“老洋人”失望之余，与赵倜、赵杰旧部集合，改称“河南自治军”，“老洋人”自任总司令，打出了反直旗号，而其实际行事风格，仍不过是四处流动作战以获取资财[21]。

“老洋人”部公开打出反直旗号，吴佩孚不能不下令派兵进剿，由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督率进行。“老洋人”部行动飘忽，避实就虚，先是在豫西伏牛山一带与丁部周旋，然后乘隙突围而出，乘丁部主力集中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于8月17日进占豫西镇守使署所在地陕县县城，在大加抢掠之余，强行带走陇海铁路局外籍员工二人。次日，“老洋人”部又占灵宝县城，声势大震，令吴佩孚大丢颜面[22]。在吴佩孚加派兵力进剿后，“老洋人”部忽而西进豫陕交界处，忽而东返到其家乡鲁山、临汝一带活动。10月下旬，豫督冯玉祥派出大军进剿，“老洋人”部为避其锋，越过京汉铁路东进，先后攻破新蔡、项城、沈丘等城，并继续东进。11月1日攻破皖北重镇阜阳，城中民众

死伤不少，财产损失巨大，精华被劫掠损毁净尽。其后，“老洋人”部重返河南，在攻破息县、遂平后，再度越过京汉铁路，进入豫西。

“老洋人”部窜扰河南，在征战过程中强行带走外国传教士多人（共有七名外国人为其扣押），其所经之处的外国传教士闻之风声鹤唳，纷纷逃往大城市躲避[23]，酿成涉外事件。逃亡外国传教士集聚的汉口外国侨民举行“万国居民大会”，请求北京公使团采取切实步骤，保护侨民安全[24]。11月16日，驻京英、美、法、意、瑞典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递交照会，声称“此等情形，对于中国政府之荣誉，有非常之损害”。顾维钧答称，已发电敦促吴佩孚等将领尽快设法救出被掳之外人，并谓营救工作必先采用和平方法，以免危及被掳外人之生命[25]。对于外国驻京公使团的态度，北京政府不能不予重视。其后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在驻马店设总部，由豫、皖、鄂三省军队联合会剿“老洋人”部。[26]但是，此时的“老洋人”部声势颇盛，官军几次进攻未收成效，又担心大力进剿将危及外国人质的生命安全，遂与“老洋人”部接触，开出“招安”价码，以剿迫降；而“老洋人”亦希望经由“招安”而成官军，升官发财，其方针是以扰求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于1922年12月下旬达成协议，“老洋人”部释放全部外国人质，所部被改编为三个支队，分归豫东和豫西镇守使节制[27]。

“老洋人”部虽被收编，但官军对“老洋人”部并不信任，改编不过是权宜之计。1923年春，“老洋人”部东开受编，正值此时，山东发生临城劫车案，北京政府在列强压力下，决定大举“剿匪”，“老洋人”部虽已受编，但也被暗中列为解决对象，“老洋人”风闻所及，不安于位。10月初，吴佩孚通过河南省当局令“老洋人”部入川作战，图谋借刀杀人。“老洋人”抗命不遵，率部脱离驻地再叛，回到其发家地鲁山地区。其后，河南督理张福来亲临许昌，指挥各部约5万人，对“老洋人”部发起大规模进剿。“老洋人”率部转战于豫西、鄂北、陕南间，受到直军四面围困，层层截击，难以立足，补给困难，部众连年长途征

战，军心涣散，怨言四起，“老洋人”众叛亲离，对部众渐失控制。1924年1月上旬，当“老洋人”率部奔回豫西鲁山行至郏县时身亡，“老洋人”部最终溃散[28]。

就在“老洋人”部刚刚受抚就编后不久，山东又发生了临城劫车案，演成了直系当政时期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一起外国人质劫持案和涉外交涉事件。

二　临城劫车案

一、临城劫车案的发生及列强的反应

1920年春，孙桂枝与孙美珠、孙美瑶叔侄在山东南部枣庄东北的抱犊崮拉起一彪人马，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收拢鲁、豫、苏、皖等地的贫苦农民以及安武军、毅军等军阀部队的流散军人入伙，以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瑶为总司令，部众陆续发展到数千人。1896年出生的孙美瑶，是抱犊崮武装团伙的核心人物，他曾在皖系张敬尧部服役，被认为“衣服丽都，人亦文雅，固不类山寨中人”[29]。他们起事后，除了干着劫富掠财之举外，也提出过颇具鼓动性的主张：“近年以来，国事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则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至沓来，使农不得耕，工不得造，商不得贩，兼以贪官污吏，干没剥削，劣董恶绅，表里为奸，……吾同仁奋然起义，纵横齐鲁，人强械广，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腐败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30] 表现出他们对既存社会秩序的不满以及传统农民起事的平均主义要求，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劫车案发后有时论谓：“吾人观察此次土匪行为，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一般国民对于政治现状与其生活之关系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观于匪等迭次之告示与函件可以证之。”[31]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山东督军田中玉派部围攻抱犊崮，因该地易守难攻，双方形

成对峙。1923年春，抱犊崮因天旱缺水，坚守甚难，为减轻官军围攻压力，孙美瑶孤注一掷，策划劫持铁路列车，绑架外国旅客，以向政府讨价还价，使己部摆脱被围困境。

1923年5月5日深夜，孙美瑶率部埋伏在沙沟至临城的津浦铁路沿线，并卸下其中一段铁轨，致6日凌晨2时50分行经此处的二次特别快车（俗称“蓝钢车”）出轨，孙部随后劫持了车上的外国旅客二十余人（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籍旅客，其中美国人最多）、中国旅客数十人，英国人洛斯门（Joseph Rothman）因拒捕而身亡，由此酿成中外之间的重大外交交涉事件。据交通部事后的报告，此因“事前疏于防范，临事毫无救援，以致危及外人，损毁国道，……若不速行扑灭，非惟引起重大外交，将国内路权，恐一隳而不可收拾”[(32)]。

在20年代北洋系军人当政时期，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地方军阀豪强横行，“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之中国是常有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33)]。仅1923年在外交部登记的涉及外国人的绑架案就有九十二起[(34)]。但是，临城劫车案发生于中国东部最为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有数十位中外旅客被掳为人质，就绑架人质数量和国籍之多，规模之大，策划之周密，影响之广泛，实前所未有。因此劫车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大哗，有关国家立即作出强烈反应。

得知临城劫车的消息后，美国公使舒尔曼（Schurman）在5月6日夜即到达济南，现场处理此案。驻北京外国公使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Freitas）于7日晚和次日连续召集各国驻华使节会议，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一、限期将被掳外人安全救出；二、死亡之外人应从优抚恤；三、惩戒肇事地方文武官吏；四、切实保障外人生命财产安全。8日下午，符礼德向国务总理张绍曾及交通总长吴毓麟、外交次长沈瑞麟面交抗议照会并严辞责问。张绍曾等除深致歉意外，还保证“以保全外人生命为第一目的”，“克日援救被

掳各国人士出险，再派兵痛剿”[35]。9日，外交次长沈瑞麟会晤各国公使，说明对劫车案的处理方针，表示此案“实属意外事变，本国政府抱歉达于极点”；“已决定采用和平方法，务期先将外人营救安全出险，然后进剿，以免被掳人遭遇不测”。英国公使麻克类（MacLeay）告以，“此事至为重大，尚不知贵国政府已否觉察其中利害，应请贵代理总长转总理暨全体阁员，自从庚子以来，贵国外交事件之重要，诚未有过于此次者，敢请贵国政府急筹相当办法是幸”[36]。

在华外侨因其切身利益所在，对劫车案的反应更为激烈，“乃至发为共管铁路及联军代剿之论，并认为为与庚子事变相类之事件”[37]。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的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提出：一、停止华盛顿会议所给予中国的利益；二、解散中国军队，将过剩军队退伍归农；三、中国政府的财政须受外国监督；四、水陆交通机关均驻扎外国军队；五、以外国警卫队占领中国的军事重地；六、停止退还庚子赔款；七、规定改革中国现状的方法。英国中国协会上海分会提出由外人管理中国铁路及办理护路警察等主张。前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也提出：“中国遍地皆匪，实为政府失败之结果，解决的第一步，即系组织国际委员团，加以全盘考虑。”[38]

临城劫车案发后，在事件解决的过程中，驻京外国公使团以其直接关系并依靠其所代表国家之强势，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公使团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不下十次联席会议，发出多份外交照会，向中国方面不断提出各种要求，如放人的期限、索赔的数额、建立铁路护路队、派团考察护路问题，等等[39]。对于劫车案之迟迟不得解决，公使团甚为不满，认为中国政府对劫车案未尽责任，并一再提出严重抗议。意大利公使的态度最为激烈，甚至提出“中国如无能力办理此事，则我等可以无政府之国待之，将直接与匪人谈判”[40]。9日，公使团提出以12日午夜为最后解决之期限，否则将依时提出加倍赔偿。16日，公使团会议认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应考虑向各国政府建议，在塘沽进行联合海军示威，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41]。但是，

各国政府对实行此举持不同意见，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持保留态度。18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电美国国务院，认为海军示威将使劫匪认为其行动之重要并提出更多的条件，反而将延迟人质的释放；应由中国政府向劫匪施加压力，以尽快解救人质[42]。6月1日，美国国务院致电舒尔曼，告以美国总统哈定（Harding）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只有在混乱和无序威胁到整个外国在华利权体制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时，才可以考虑武力干涉的可能[43]。在美国意见的主导下，各国协调立场，暂未实行大规模的海军示威之举。但在公使团的强硬要求下，6月2日，由美国少将康纳尔（Cornell）率领的外国武官团抵达临城巡视。他们态度骄横，在会见中方官员时，“近似训话”。正在临城督剿的第五师师长郑士琦感叹：“国权之弱，虽末节亦受影响，为之长叹。”[44] 外交交涉员温世珍有云：“国未亡，各国对我蔑视如此，真令人伤心，问北京及各省大吏，其稍有心肝者，能不抱头一哭耶！”[45]

除了各国政府和驻华使节对临城劫车案的直接反应外，各国舆论及国联也对临案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外国报纸异口同声，主张关系本案之列国，须力谋适当手段，彻底究问中国政府之责任，以免将来再发生如斯之事变”[46]。据中国驻瑞士公使陆徵祥电称，国际联盟秘书处要求其将每日所得消息通知秘书处；英国、法国、墨西哥均通知国联，要求保证人质安全，从速营救出险，并赔偿损失；意大利“对此案愤激异常，现与各国磋商，拟开国联会议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监督中国铁路”。驻美公使施肇基亦电称：近日欧美及日本舆论，多藉口临案，认为中国已失统治能力，盛倡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监督中国财政之议[47]。由此观之，临城劫车案之突发，使中国政府承受了相当压力，并成为仓促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外交交涉。

二、中国政府的对策

临城劫车案本为突发事件，中国政府事前并无任何准备，也就谈不上解决之预案。可是临案反响之大，牵连之广，于当时中国的对外

关系大有影响，从而震动了中央政府，使其不能不有“应变”之举。同时，“临案”发生正值北京政局大变化之前夜，黎元洪的总统府与张绍曾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颇为激烈；而直系首领曹锟为过其总统瘾，正在谋划废弃黎元洪，进行新任总统大选；北京政局之剧烈动荡，使本已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更成了毫无决断力的跛脚鸭。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事发地的负责官员对如何解决此案看法不一。山东方面的官员，如督军田中玉、第五师师长郑士琦等，因事发于其管辖地，负有直接责任，多主剿以尽快解决此案。案发当天，田中玉要求兖州镇守使何锋钰“亲往查看，并飞派军队追剿”。次日又电告北京国务院：“此案关系重大，闻报后立经飞电各路军队分途追剿，一面设法营救外人，以免发生重大交涉。”[48] 与事发地相邻的江苏方面的官员，如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和外交交涉员温世珍等，则因事发不在本地，没有直接责任，更多主抚，以首先保证人质的安全。北京总统府与国务院方面，因为政坛纠纷所牵制及实际权力之有限，一时无法决断。5月8日，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国务会议，首先议决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分别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文武官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同时议决电令山东、江苏两省军民长官，一面设法与孙部交涉，解救人质，一面派人送衣食上山，供人质之用[49]。出席此次会议的部长，除了自兼陆军总长的张绍曾外，只有交通和农商两部总长，其余全部缺席（包括直接负责外交交涉的署理外交总长顾维钧），而由次长代表，显见其决策力之有限。会后张绍曾致电田中玉称：“匪势浩大，非跟踪追剿不能追还被掳之人，而操之过急，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究应如何办理，方为妥善之处，希公同筹划，俾策完全。”[50] 张绍曾此电于剿、抚两策之态度模棱两可，未有明确的指示，可见中央政府对解决此案决策之无能无力。相反，劫车案却加剧了北京政坛的派系纷争，因国会方面正在掀起倒阁风潮，“临案”遂成倒阁重磅炮弹。参议员范振绪对国务院提出质问书，众议员张琴对交通总长吴毓麟提出弹劾案，要求追究政府的责任

[51]。难怪有时论谓："政府既不死不生，外长复无人负责，而本案之对外方法乃心惊气慑，不复能作一语，良可叹也。"[52]

真正对解决"临案"具有影响力且有权力作出决策的是坐镇保定的直系首领、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的权势大大扩张，实际控制着北京政治，任何重大决策未得其认可均很难实行。如时论所谓，此案之解决"决难望诸今日毫无能力之中央政府，只有望诸保境安民之直接责任者"；要求曹锟"务宜抛弃从来之侵略主义，以保境安民为天职。关于管辖内之匪祸，务宜根本剿灭，以保护内外人士此后之生命财产，免至再激起国际问题"[53]。所谓"国际问题"正中曹锟内心焦虑之所在。他正在谋划出任大总统，深知以中央政府内外地位之虚弱和财政支绌之实情，如无列强的支持，即便上台也很难维持，而临城被劫外国人质的生死，以及事件能否顺利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列强对华及对他本人的态度。换句话说，他本人和北京中央政府未来的政治前途，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列强的态度。因此临城案发后，曹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干预，"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54]。列强亦深谙北京政治之底蕴，劫车案发后，在与中国政府交涉的同时，还不断与曹锟直接打交道。5月6日，美国公使舒尔曼致电曹锟，要求他采取有效措施，立即解救人质。曹锟于次日回电表示极大的关切，并称已指示地方官员立即派出军队，解救人质[55]。同时，法国公使受各国公使的委托，星夜赶赴保定面见曹锟，要其负责营救被扣外国人质，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56]。由于列强"希望军队对于匪徒暂缓进剿，以免被掳之人，发生不测情事"[57]；且公使团特别要求曹锟，"凡军事行动，负有与外人生命及安全有关之责任，应请迅为设法撤退官军，以免各国人民之危险"[58]。在内外压力之下，曹锟对临城劫车案作出了以抚为主的决策，企图通过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孙美瑶的要求，解救人质出险。他对外国使节表示，"赞成先用和平权变办法"，并派"干员驰赴济南，帮同田、熊军民两长，商议急救办法"[59]。

负责直接处理临城劫车案的山东督军田中玉为直系干将，在案发后一直主剿，并派兵围困抱犊崮，随时准备动手。但由于曹锟决策谈判解决，5月7日，交通部决定先派遣部员前往出事地点调查，并电田中玉称，“匪众此举因被兵追逃无路，故意惹起外交，以为要挟招安地步”；“务请积极设法，早将中外搭客营救出险”。同时表示，如营救费用不足，交通部可以代筹[60]。9日，国务院和外交部又致电田中玉：“希即暂停追剿，迅筹和平方法，将外人剋日全数赎回。”曹锟随后致电田中玉，令其对该电“务望查照，迅筹赎回办法，俾外人安全出险”。此后“中央迭次来电，兢兢业业不敢说一剿字”。在此情况下，田中玉只能服从，令何锋钰“驰赴临城”，与外领“详细研究，如确于事实有利，不妨于最短期间暂缓进攻，俾外人得以安全出险”[61]。临城劫车案的解决进入官府与孙美瑶部讨价还价的谈判阶段。

三、解决劫车案的谈判及结果

北京中央政府以和平谈判解决临城劫车案的方针既定，中外有关人士随后云集临城，通过各种途径与孙美瑶部接触，磋商谈判条件。

干下劫车“豪举”后仍被困于抱犊崮的孙美瑶部，眼见己部以劫持人质而就编“脱困”的想法得以实现，也同意与官府谈判。他们在对外通告中提出：“是役也，非为抢掠财物也，非欲惹出国际交涉也。盖以中国若许政府若许军人，无诚意无统绪，诚不及外人之保其信耳，今已至此，别无可言。若无水落石出之办法，给予正式之条件，许我所要相当之驻点，决不放回西人。”[62] 10日，被扣人质杨毓洵被放下山，带出孙部的开价是：一、不派军队剿攻，围剿官军退归原防；二、其部编为正规军两个旅，并由地方士绅担保，准其自由往来；三、暂以被扣西人为质，剿则撕票[63]。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孙部陆续释放了被劫中外人质多人。其后，孙美瑶又派多人为代表下山谈判，当局亦派地方士绅李麟阁、外交交涉员温世珍、前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安特生（Andersson）、曹锟代表丁宏荃以及与孙部有关系的行伍人士等上山磋商。但因对立双方在孙部改编为两旅还是一旅、官府

撤兵与孙部放人孰先孰后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谈判一时未有结果。5月20日，孙美瑶部属一部由山外冲入抱犊崮，与围剿官军发生冲突，谈判暂告破裂。

自“临案”发后，田中玉一直主剿，“积极筹备进剿计划，略已齐全，四面包围防线，亦经布置周密。只以各方人士救票之热心，苟该匪等有一线悔悟之机，多主张委曲求全。玉亦不能独违众议”[(64)]。在谈判暂告破裂后，田中玉和吴毓麟回京与政府共商对策。一向主抚的吴毓麟此时感觉“实已处于两难之间，本人实不敢更言和平解决”。田中玉则认为：“倘能及时进剿，攻其负固，抚其归诚，当可作速解决。惟旅客尚困匪巢，不无忌器之虞，非得政府主持，使团谅解，亦不敢鲁莽从事。”由于孙美瑶不愿轻易就范，驻京公使团不再坚持反对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曹锟在得悉公使团的态度后，也不再坚持以抚为主的解决方针，改以指示可以剿办。因此，在5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田中玉提出：“先向匪索要最后之条件，俟得其条件后，即由大总统以命令保障此条件之实行。令下，匪如能尽释人票，即可彼此相安，倘仍不允，即用重兵以剿之。”阁议决策为“相机办理”，虽仍未对剿抚问题作出明确决策，但在曹锟示意下，国务总理张绍曾告田中玉，“相机办理四字，范围包含剿抚兼施及其他便宜行事意义在内，尽可放手做去，并允饬派飞机三架，电令直苏两省各派混成一团前往协剿，以壮声威而策万全”。吴毓麟在领会曹锟之意后亦告田中玉：“现在各防官军万不可再行撤退，以致不可收拾。鄙意为今之计，应先剿办附近土匪，断其外援，藉以示威，一面觇其态度何如，再定最后应付之法。”为此，田中玉特意于24日赴保定面见曹锟，请求指示，曹告其“熟权利害，兼顾并筹”，令其与张绍曾“商同办理”[(65)]。

在官军的压力下，孙美瑶的立场有所后退。5月26日，孙部释放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威尔（Powell），由其居间联络，与官府重开谈判。经鲍威尔、安特生等从中斡旋，官府与孙部

均有让步。31日，双方同意有枪者改编的原则，并由官府派人入山核点孙部人数。几次反复，最后决定收编3000人，番号定为“山东新编旅”，由第五师节制，以孙美瑶任旅长，另由官府给款85000元作为孙部经费。6月12日下午，安特生和孙桂芝在枣庄附近的十里河签订协议，约定官军即时撤防，孙部释放尚被扣压的全部外国人质，中国人质则迟至25日方全部释放。至此，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以人质平安获释、孙美瑶部被收编为官军而告解决[66]。

四、关于铁路护路问题的善后交涉

临城劫车案本身虽以被劫中外人质获释而收场，但有关劫车案的外交交涉却未因此而告结束。相反，在人质获释后，不再有保护人质安全压力的列强，因不甘于此案中之“受辱”，向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苛刻严酷的善后要求，令北京中央政府及其后台老板——直系面对着列强强大的外交压力，一时处于应对两难之境。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鉴于其负面影响之大，迫于内外压力，中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姿态。案件解决前，下令将田中玉和熊炳琦交部议处，肇事地官员撤任听候查办。案件解决后，6月26日又下令将对临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兖州镇守使兼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免职，听候查办；津浦路警务处长张文通及被劫车巡警队长赵德朝等立予撤职；任用瑞典籍保安队教官曼德视察铁路，调查路政，加强护路工作；8月25日发表《铁路警备规则》，29日发布“诰诫令”，令“各省长官于境内外人切实保护，倘有疏虞，决不轻贷”[67]。但是，列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企图通过“临案”攫取更大的利益，在善后交涉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后续要求，尤其是纠缠在赔偿损失、保障铁路安全和惩办责任者三个问题上毫不放松，逼迫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对于“赔偿”和“惩办”，列强的态度基本一致，但在“保障”方面，列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别。为此，列强在对中国提出正式的善后解决要求前，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本节只论铁路善后交涉，其他交涉详见下节）。

衡诸列强在临城劫车案发生后的态度，英国的反应最为强烈，因为“临案”发生之津浦铁路被认为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也是英国在华投资和经济利益的主要集聚区。“临案”发生后，无论是英国舆论，还是英国在华侨民，都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护英国的切身利益。英国政府因此而在“临案”解决前后，领头提出对中国进一步的勒索要求，主要是建立铁路护路警察，并通过财政和人事安排，确保列强在中国铁路沿线的利益不受中国国内局势变化的影响。为此，英国主张于必要时由列强展示武力威胁，准备舰队示威。早在“临案”解决前，英国已经提出这样的主张，但因各国意见不一而未实现。“临案”解决后，英国再度提出这一主张，并将其主要功夫用于说服美国，认为如果英美一致行动，则其他国家也必将加入其中[(68)]。6月19日和30日，英国两次致函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的局势要求列强采取坚定的行动，以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否则如“临案”之类的事件还会发生，列强所付的代价将更大；如果列强尤其是英美采取联合政策，中国将会让步；英国准备进行海军示威，并增加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如果可能，列强应通知中国政府，除非他们建立在外国官员控制下的护路警察，否则列强将考虑自己建立这种力量的可能性。英国强调，考虑到国内舆论之沸沸扬扬，英国政府很难消极无为，但是希望知道美国是否准备在必要时与英国一致采取行动[(69)]。

对于英国以武力威胁并企图控制中国铁路警察权的主张，美国持有异议，美驻华外交官及其政府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认为，英国的提议势将在中国激起反对外国人的浪潮，因此保护中国铁路安全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由外国人监督其事，而是鼓励中国人自己行动[(70)]。7月9日，美国答复英国称，尽管美国同意英国的诸多要求，但仍怀疑海军示威的有效性，因为此种行动是有限的；如果可能，美国建议通过撤销对中国现政府的承认以及停付关税和盐税，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71)]。美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并不反映两国对维护其在华特殊利益方面有根本区别，而主要是行事方式的差别。与老牌殖民帝国并惯用炮舰政策等“硬”手段

的英国相比，新起之强权美国更多是采用“软”手段，既达到其目的，又可得到被屈服国之人心，从而更有利于其长远利益。正是由于美国在临案中的态度与英国有差别，使不少国人对美国寄予期望。然而正如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所言，美国“尤愿她能够有机会使中国政府获得在外国协助下的合作，为了明显的必需目的，增强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内与外商的大动脉免于被劫掠的护卫能力，并使中国更能保护合法的外国利益，以实现她的国际义务”[72]。可见美国并不因与英国态度之差别而“忽视”中国的“国际义务”及其需要获得的“外国协助”。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态度。自日本作为强国在远东兴起后，一向视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在侵略中国、获取自身特殊利益方面，常常扮演着列强中之急先锋角色；而且作为英日同盟之一方，日本似乎也应该更多地站在支持英国的立场上。但在“临案”善后交涉方面，日本一反常态，不赞成英国的立场，而更多地支持美国的意见。7月7日，日本驻美大使专门造访美国国务院，讨论英国的善后解决条件，表示日本不主张派海军示威，认为那可能导致最终出兵的结果并将使局势更为复杂；日本同意组织护路警察的主张，建议建立如同盐务稽核那样的体制安排，但不赞成由外国组织及控制护路警察[73]。日本采取如此态度可能有多重原因，一则津浦路等主要为英国利益之所在，日本没有必要为英国火中取栗，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反对之所向，而赞成美国的主张并不妨碍日本的实际利益；二则日本已经在东北铁路有稳固的势力范围，不希望因护路警察问题而影响其自身在东北铁路的利益；三则日本过去在中国的扩张之速，影响到英美利益，因而有华盛顿会议对日本一定程度的约束，时隔未久，日本暂时还不想过于出头。但如同美国的态度一样，日本的这种表态丝毫不妨碍其享受列强从“临案”中可能得到的权益。

8月10日，驻京外国公使团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正式提出改组铁路护路警察，予以特别编制，由外国武官监督的要求，声

称："倘中国政府继续姑容或放任此种扰害，并不主剿除此项损害在华外人权利与利益之匪患，外交团不得不采用何种方法，以保护外人在华之生命财产权利与利益。"[74] 20日，公使团开会讨论护路问题。英国提出，在中国交通部内设护路行政局（铁路警察局），指挥6000人的护路常备队，保护及维持铁路的安全和秩序；该局设立华、洋局长各一人，两者有同等权力，由中国政府商请使团同意后任命，同时还将雇用不超过二十名有经验的外国雇员，作为铁路检查员和巡视员；该局经费由外国总稽查核准，作为铁路日常运营开支的一部分，每年共计160万美元，同时为筹集护路经费，各路会计长及路务总管由外国人担任。英国还提出，在两个月内拟出详细计划，交公使团批准后实行，以十年为有效期。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赞成英国的提议，美国、日本和法国则表示反对，"盖恐因此惹起中国人之排外，及中国之内乱，则于外侨之安全无补，反使之陷于危险"[75]。当天下午，日本驻美大使再度造访美国国务院，说明已接到本国政府的紧急指示，对于英国的提议表示极大的疑虑，提议对英国方案作如下修改：一、公使团只须了解护路计划的细节，而非批准该计划；二、护路警察以中国人为长官，受中国政府管辖，外国官员只作为中国官员之顾问；三、财务和车务官员的任务只限于为护路警察筹集必要的经费，并保护铁路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四、该项计划不必涵盖所有铁路，而只应包括那些目前主要为外国人所利用的铁路。美国国务卿休斯（Hughes）基本同意日本的意见，认为英国方案走得太远，建议驻华公使团应有一致意见，避免提出不同的护路计划[76]。28日，驻京公使团再次讨论护路问题，将英国方案修改为：一、外国人任护路警察长官之副手，但中国官员应在重大事项上征求其意见；二、护路计划提交使团后不必得到批准，但使团仍然保留通过外交手段修改之权利；三、护路计划首先开始于津浦和京汉铁路，其他铁路稍后实行；对于铁路稽查和车务长问题则未得结论[77]。

列强的护路计划遭到中国社会各界及舆论的一致反对，认为此事"辱我国体，丧失主权，且此端一开，祸患将不可底止"。国会议员

赵正印等发表通电称："今英人乘我国内纠纷，以临城事变，应合各国，肆行要挟，破我国权，置国际正义人道于不问，……我全国上下，应同力同心，拒绝交涉。"[78] 由于舆论反应强烈，直系首领也表态反对列强的护路计划。曹锟表示，"中外行旅，既可完全保护，则外人实无再干涉铁路根本之理由"，因此"决然反对"列强之干涉铁路。吴佩孚多次指出，"共管中国铁路，即为共管中国之先声，如有一国敢提斯议，吾自有对付良策"。他还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表示"护路办法，关系我国主权，即使外交团循英意通过，亦万难承认，……请外交总长速向外国声明此意，对于护路一节极端拒绝。"[79] 9月24日，中国外交部答复公使团关于护路之要求，谓："护路一事为中国目前内政要举，应负之责未尝放弃"；中国将"自动改良护路之计划，决意极力进行"，于各路险要地点驻扎军队，改良特别路警，并于必要时聘用外国专门人才；但"对于外交团所拟提议之计划，义难承受"[80]。

虽然中国政府拒绝了列强的护路提议，但对列强加强铁路安全保卫的要求则不敢大意。10月1日，交通部召开铁路警务会议，提出"现在护路一事，已为我国上下共认为交通方面惟一之要图，即世界各国对于我国此举，亦均极为注意"[81]；决定成立铁路警备事务处及教练所，由交通部次长孙多钰任处长，王赓、梁上栋任副处长，聘曼德为总教练，并规定得用外人为视察及教练。10月15日，外交部复文公使团，表示对于他们的要求"虽难承受"，但"对外交团之关怀路警问题及其襄助之盛意深为纫感"，并表示"本国政府深信所采严厉之剿匪计划与夫新订之护路办法，定能使外人在中国内地旅行及居住之安全益臻巩固"[82]。10月27日，已经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的曹锟，任命唐在礼为铁路警备事务督办，扩大铁路警务处的事权。11月20日，曹锟令将铁路警务处直属于国务院，派出正规军二个旅担任护路任务，紧急时可由唐在礼调遣指挥。当日公使团开会讨论护路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就护路问题作出了若干决定，再经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疏通，公使团表示大体满意。将护路问题暂行搁置。

五、劫车案善后交涉的结束

在有关临城劫车案善后交涉的“赔偿”与“惩罚”方面，列强的态度一致，而中国政府虽基本认可“赔偿”，但对赔偿方式和数额则有不同意见；至于“惩罚”，中国不同意以此名目进行，但表示可以自行处理负有责任之官员。双方就此进行了一波三折之交涉。

8月10日，外国驻华领袖公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在“赔偿”方面，要求赔偿被劫者之行李物件损失及医药费，并按天数累进计算赔偿数目，对于死者家属应予厚重赔偿。此外，接济被劫者之一切费用均须赔偿；其他视各人情形有索取额外赔偿之权。在“惩罚”方面，照会援引《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派员前往若干省份实地考察，倘发觉地方官吏不能尽其职务，除处以处罚外，要求适用《辛丑条约》规定之惩罚（即“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亦不得别给奖叙”）；要求以“通匪嫌疑”、“事前疏忽”、“弹压不力”、“事后办理不善”等名义，将田中玉等即予免职，嗣后不得再任官职，并保留饬令在通商口岸租界内不得予以保护之权[83]。

中国政府收到列强的照会后，决定由外交、内务、财政、陆军、交通五部组织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理此案。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认为，“外交团采取的立场似乎是很严重的，因为这是整个外交团第一次联名照会”。但他同时认为，此事实为“偶然事件”，“并不是由中国国内哪一个排外运动引起的”，因此列强“要求所依据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外交团所提的要求是很不公正的”。他在处理此案时强调：“我们做事绝不应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不应违反或超越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法准则。”[84] 顾维钧的看法实际也反映了国内舆论对列强干涉的反对之声。8月25日，全国商联会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对列强各项条件，除赔偿外概行拒绝，并应公开中外往来文书，以使国民为政府交涉后盾，“对于外力干涉，应全国一致反抗”。上海国民大会发表宣言：“此事件应有该地方责任者负责，其有增加国民负担侵害主权者无论为直接或间接，俱非我国民所承

认。”[85] 社会舆论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起之作用，无论为正面或负面，自“五四”以后日渐增强，并已成为执政者可利用之“武器”，“临案”亦如此。

因为“惩罚”问题直接牵连直系大将田中玉，故直系亦借国内舆论的反对而自重，表示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吴佩孚提出，惩处事故负责官吏是中国政府的权限，与外国并无关系，“倒田是为一事，外交又是一事，万不可存幸灾乐祸之心，藉此为倒田运动。纵使田督军即应去职，亦不能于此事此时”[86]。田中玉因解职关系其个人利益所在，对列强照会的反应尤为激昂，声称“若必以外交方式为漫无等差之惩处，恶风一启，不逞之徒或以私仇或以政争随时随地皆可劫持戕害侨民，假乎外交推翻疆吏，势必使中国益增纠纷”。在田的鼓动下，山东各界有致北京国务院电和内务部请愿书，反对列强“用外交方式勒令如何如何，不复稍留余地，地方特任长官，侮辱至此，国家用人行政，主权侵夺殆尽。此种恶例一开，何以立国”；“我政府之处置已极允当，何得再谬引庚子条约，妄干处分大吏之权。且今日中国为内忧外患交迫时期，就国权言，绝对不能以督军田中玉之进退属个人关系，稍事让步”[87]。

本来，外交部已于8月13日草就对公使团照会的复文，但由于舆论反对和直系反弹，遂不得不将复文暂行搁置，在征求意见后，再加修改。28日，阁议讨论通过修改稿，随后派专人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由于中国的答复迟迟没有送出，9月21日，美国公使舒尔曼就此向顾维钧提出警告，但顾维钧告以他必须考虑中国的公众舆论，就像公使团在作决定时也考虑了外国的舆论一样[88]。24日，外交部正式将复文送致驻京外国公使团，首先辩明临城劫车案“并非排外运动，亦无特别仇视外人之表征”；接着针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进行答复：1．关于赔偿，因此事“实不能谓本国政府负有赔偿损失之责任，但鉴于外人被掳之情形暨所尝之艰苦，本国政府自愿本优厚之精神，给予公平之偿恤”，数字另议，但个人之“附带赔偿”“在性质上言似属

间接损失，或与本案无切近关系，或仅系影响所及者，本国政府碍难一并列为核计外人应得恤偿之根据”；2．关于“保障”，“本国政府碍难同意，深望外交团重加考量”；“引用《辛丑条约》实非正当或必要之保障。倘若坚持非特有牵动中国人民良感之虑，而于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亦无所增益也”；3．关于“惩罚”，有关官员“业经按照本国法律分别惩治及交部议处”，但“本国政府所不能允从外交团之要求者，实因按照条约，凡惩处中国官吏、人民，皆须由中国政府依照中国法律办理”。复文最后声明：“本国政府对于外国侨民在中国内地之安宁，素极注重。此次临城案发生之情形，实预料所未及”；“深信在华外人生命财产权利利益之安全，必能益受保障也”[(89)]。

公使团收到中方复文后很不满意，认为“中国政府似未领会本外交团关于此项紧要之点”，尤其英国认为“复文骨子太硬，不能满意”。9月29日，美国公使邀英、法、日公使会晤，讨论对中国复文的答复，决定考虑以不承认中国新政府的行动，压迫中国作出让步。10月4日，公使团再次提出照会，声明“维持八月十日联衔照会所注意之各点及办法，全部相应照请贵国政府仍按照上述照会所指定各项办法施行为荷”[(90)]。

公使团的态度使负责处理此案的顾维钧左右为难。他既要顾及中国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反应，也要注意不与公使团形成僵局，还要考虑曹锟上任后之对外关系，可谓瞻前顾后，势难三全。10月2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告美国国务卿休斯，顾维钧的处境很困难，尤其是对所谓非直接赔偿问题，因为与义和团的赔偿相似，很难同意。休斯却告施肇基，他不认为列强的要求不合理，因为这些损失实际是直接的损失，在任何法庭都会判决给付。施肇基又告休斯，中国政府不会挑动排外情绪，但公众舆论也是重要的因素，基于义和团协议的赔偿，顾维钧不可能接受。但休斯却坚持认为，此案应基于条约范畴加以解决，他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不应该考虑任何改变条件的可能性。休斯的态度充分说明了美国不以暂不赞成武装干涉而放弃自己

国家与国民利益的坚定立场。可是，尚未得知休斯态度的顾维钧还在3日电告施肇基，请求休斯的援助[91]。可以想见，顾维钧的请求不会得到他所期待的反馈。

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选”大总统。他在到北京上任前，已经考虑到驻京外国公使团是否在他就职时前来觐贺的问题，因为公使团觐贺与否，关系到列强对他的态度，如果列强不承认其政府，他的总统职位也坐不稳。所以曹锟还在未就任时，即派人到公使团接洽，而此举恰为公使团要挟中国接受关于“临案”之条件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所以舒尔曼自信，只要外国以中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而论事，中国政府势将与列强合作[92]。公使团在会商后放出风声，称“北方之现状及其发生之种种事件，悉皆由于官场漠视对外条约及义务而来。……而曹锟为此漠视对外条约义务辈之首领，故中国种种罪恶之由来，其首先应负责者，即为曹氏。渠虽被选来京，但其在外交上之身价，并不能因此抬高。”[93]据此，领袖公使符礼德告曹锟所派之接洽人，以各公使“未奉有本政府训令为词，不予觐见”[94]。果不其然，10月10日曹锟就职当天，外国公使均未露面，以他们的集体缺席给了曹锟严重的警告，即要曹锟从“漠视对外条约之义务”变为“重视对外条约之义务”，即“重视”列强在华利权，而在当时也就是解决临城劫车案的善后问题。

列强的态度不能不引起曹锟的重视，为了获得列强的承认与支持，曹锟只有牺牲他口口声声所要“保护”的国家利益。他首先在“赔偿”问题上松口，同意考虑列强的“间接赔偿”要求。而在最让他头疼的“惩罚”问题上，虽然田中玉是曹锟的拜把兄弟，而且为了曹锟贿选“报效”了数十万经费，但此时曹锟也不得不将其牺牲。10月13日，曹锟将田中玉召到北京，劝其顾全大局，自动辞职。田中玉不能当面违抗，却在事后去天津向曹锟之弟曹锐抱怨，并追索贿选“报效”之款，表示对曹锟的不满。为了敷衍田中玉的感受和面子，曹锐向其兄建议“奖惩两销”之法，即在免去田中玉职务的同时，升其为上将军，

以为安抚。其实如果真要论“临案”责任，作为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也免不了受牵连，如参议员张光炜等通电中所谓，“山东系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及巡阅副使吴佩孚属境，既拜兼辖之职，即负共同之责律，以首重从轻之意，断未有部曲获罪，反置长官于不问者也”[95]。如今曹锟成了大总统，却要田中玉当替罪羊，也难怪田中玉心有不服，如果因此而将其逼反，对曹锟以后控制部下亦非益事。因此，曹锟接受了曹锐的建议，以上将军的虚衔授予田中玉，同时免去田的督军职务，以对内对外都有交待。

负责办理外交的顾维钧一直在为外国公使觐贺事伤脑筋，“内迫于要人的敦嘱，外迫于使团的催问”。经过反复交涉疏通，公使团表示，只要中国政府承认“临案”照会的要求，他们准于10月15日前往觐贺，同时声明“非全部承认，不必答复”。待田中玉同意辞职后，列强的要求得以实现，顾维钧即草拟了二次复文，并将所拟稿本先行送交公使团征求同意，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此举如时论所谓：“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换元首怀仁堂的一握手。可怜轰轰烈烈的青年外交家，为维持中国国际地位而就职的外交总长，竟办成如此屈辱的外交！”[96] 15日，中国复文送达公使团，声明“为看重贵外交团意愿起见”，对“赔偿”问题，原则赞同个人“附带赔偿”，性质及数目留待以后讨论，并告知已将田中玉免职[97]。至此，公使团目的已达，驻京各国公使遂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总统府，正式觐贺曹锟“当选”总统。当日下午曹锟发布命令：山东督军田中玉迭电辞职，准免本职，特派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特任田中玉为上将军。

曹锟以中国的屈辱而换得外人的“觐贺”，但公使团却以中国政府令称田中玉因表示辞职而被免职，同时又升其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鼓励”，实为故意玩弄公使团，毫无诚意，故由领袖公使符礼德于16日下午提出质问，并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提升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如无满意办法，当另定对华态度。外交总长顾维钧因国家信用尽失，自己又首当其冲，处境尴尬，故提出辞呈，宣布自次日

起不再到部办公[98]。

对于公使团明目张胆之要挟，曹锟纵有不满，亦不敢稍有表示。为了挽回局面，他一面派外交次长蔡廷幹与公使团斡旋，解释上将军是有名无实的虚衔，田中玉是明升暗降；一面又召集部下磋商补救办法。大家冥思苦想，咸认即便同意列强的要求，但如果明令取消授予田的上将军令，实在是太不成话。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国务总理高凌霨提出补救之方，即向洋人解释，田中玉授为上将军，系属大选完成后照例之酬庸；他之免职，则为“临案”交部议处后之结果。一予一夺，为截然两事；而依原定发表之程序，升将令本在免职令前，由于经办人员未加检点，同时也为手续上方便起见，竟将前后两令同日发表，至引起误会[99]。为了敷衍洋人，他们索性假戏真做，由国务院以正式公文送至印铸局并抄送外交部，谓查阅本月15日政府公报及令单，误将田中玉叙升及免职两令列在一日，与原定发表次序不符，应即更正。此举演出了“临案”善后交涉中最为滑稽可笑之一幕。谁知公使团仍然不理这套把戏，非要撤销田中玉的升职令不可。曹锟最后走投无路，只得求告田中玉说：“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请其自动辞去上将军，总算了结了此案[100]。

临城劫车案虽然最后得以解决，但对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地位仍有显明之影响。时任国务总理的张绍曾认为，“此案决不能影响及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盖外人在中国者，今虽遇此不幸之事，而中国侨民之在外国者，亦何尝未遇此类不幸之事。……然中国初不因此而蔑视友邦自主之精神，故可知友邦亦必不因此而不尊重中国之自主精神也”。“临城案与撤废治外法权乃完全不相关涉之问题，故其解决亦裁判为两事，分别解决，不能混为一谈。尤有进者，中国国民今决不甘居外人之下，务必求得比较的平等待遇而后已，纵万一有一二国不欲以比较的平等待遇予中国人民，而设法使此撤废治外法权一事为无期之延期，全中国人民亦必以全力以争之，因此事乃至不平等之事也”[101]。此话不过是政客对舆论批评之虚应故事，临城劫车案影响于中

国国际地位及对外形象实非浅鲜。就列强而言，由于“临案”而认为中国不能承担所谓“国际义务”，因此提出若干干涉中国内政之要求（如由外人控制护路及路政），并放缓了华盛顿会议后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国际地位（如关税自主和取消治外法权）之步伐。就中国而言，临案反映出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遇有对外交涉，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由临城劫车案自发生至解决的全过程观之，可以认为，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长期弱势地位以及外交、内政、军事、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牵连到其弱势国际地位回升的过程必然是十分缓慢、有限而艰难的。同时，由于军阀割据造成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分裂，一方面虽然使当时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有相当程度的活动空间，并可根据国际外交准则和惯例进行一定程度的外交努力；但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与政府的分裂，也使对外交涉不易形成一致看法与统一声音，并给予对外交涉以有力的支持，从而使职业外交家的作用打了不少折扣，加以中国自身的实力所限，使他们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贡献只能是有限的。毕竟，弱国外交有其施展的空间和限度，无法太过超出其自身实力而作为。因此，对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以及职业外交家在其中所起作用似不宜估计过高。

三　京汉路工潮与“二七”惨案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亦逐渐成长，并于“五四”时期开始表现出其阶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工人阶级为其重要的阶级基础，开始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发展与政治动员，使得中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并在经济诉求之外，也表现出政治诉求，至1923年2月京汉路大罢工的发生，形成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京汉铁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自开通后不仅在客货运输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北京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为铁路系统的垂直管理特性，铁路工人较其他行业的工人更富于组织性与纪律性，从而也更便于在他们中间进行组织发动工作。从1921年起，在中共及其下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运作帮助下，京汉路各大站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后改称工会），短短一年有余，沿路各站均成立了工会，会员总数已达1.3万余人，超过全路工人总数的70%[(102)]，使京汉路成为中共“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103)]。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为削除长期垄断铁路利益的交通系及梁士诒的势力，对铁路工人运动暂时采取了默认态度，并高唱“保护劳工”的口号。中共借此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向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各铁路派遣密查员，以向政府提供情报信息为名，向铁路派遣工运组织、领导人员，结果得到了吴佩孚同意，中共遂派出何孟雄、张昆弟、陈为人等在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线担任密查员，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22年下半年，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活待遇，京汉路长辛店、京奉路山海关和唐山机车厂、粤汉路武长段、京绥路车务段、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京汉路局方面感觉到“工人之权势甚大”，“因其团体甚固，日久恐被推翻，且人多势众，亦无法限制”，因此通过京畿卫戍司令部侦察处长王广宇向总司令王怀庆提出“查办”要求，劳资双方的矛盾逐渐凸显[(104)]。

1922年4月和8月，京汉路工人代表先后在长辛店和郑州召开全路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选出了由中共党员史文彬、项德龙（项英）负责的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1923年1月5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各省市工会、社会团体及名流参加。1月15日，筹委会致函京汉路局，请求将1月28日的星期日假期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请给予京汉路北段代表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筹备工作的进行尚称

顺利。

京汉路工人成立总工会的举动并非秘密与非法地进行，而是公开与合法地进行，相关情况均由筹委会通报路局方面知晓，并经路局局长批准。但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本并不愿见到工会的成立，1月25日他致电吴佩孚称："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建议吴下令"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105]。一度标榜自己"保护劳工"的吴佩孚，也不愿见到工人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其中不仅有政治理念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因素，因为工人一旦集中在工会组织下，必定要求提高待遇，从而影响铁路收入，触动当局利益。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后，全路二万多工人每月加薪三元，每月影响收入六七万元，而京汉路收入又是直军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吴佩孚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兴起亟思压制。他先是嗾使其部下、京汉路南段段长兼湖北督军署副官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拉拢、分裂工人运动；同时派其学兵队员学习火车驾驶技术，以作为必要时顶替开车的准备[106]。曹锟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发展更是主张采取镇压行动。他电令吴佩孚："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果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禁止。并查拿该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107]。同时令吴佩孚增兵京汉路沿线各站，预为准备。

1923年1月29日，吴佩孚电令第十四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鹗等称，京汉"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道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会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令靳"预加防范，设法制止"[108]。靳即派兵分布郑州各街道，

阻止工人赴会。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亦奉命到总工会筹委会办公处，威胁筹委会负责人，但都没能使筹委会从命。30日，吴佩孚电召筹委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筹委会当即指派杨德甫、李震瀛、史文彬等五人赴洛，次日吴佩孚在接见工人代表时声称："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但他强调："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工人代表陈明总工会的成立并不妨碍军事机要，而且大会筹备工作都已就绪，各站代表与来宾已陆续到达，会期势难改动。但吴佩孚强硬表示："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109] 双方争辩多时而未达成妥协。工人代表随后连夜赶回郑州，向已到郑州的十六处分会的六十五名代表报告与吴佩孚的谈话经过，代表均认为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是我们的正当权利，决议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成立大会。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当时对吴佩孚的认识还不全面，在罗章龙询问李大钊有关吴佩孚的态度时，李告他："吴子玉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110] 从而未能预先就吴佩孚可能之镇压举措有所布置。

2月1日上午，工人代表及外地来宾分路向开会会场行进集合，当日"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111]。待参会队伍行至会场——钱塘里普乐园戏园附近时，被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军警包围，不能前进。代表与之理论多时不得解决，愤激之下，大家齐心协力冲开包围涌入会场。大会开始后，主席报告了总工会成立的宗旨和筹备经过，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杨德甫当选为委员长。大会进行过程中，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警察多人进入会场，声称奉吴佩孚令，"限五分钟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代表们不予理睬，坚持到下午4时才宣布散会。但大会结束后，军警已经封锁了代表和来宾们所住的各宾馆，监视代表行动，禁止出入。黄殿辰还指挥军警将大会收到的匾

额礼物及工会会所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行捣毁，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112]

面对军阀对工人运动的公然压制，京汉路总工会于当晚召集秘密会议，议决于4日午刻实行京汉路总罢工，同时将总工会移汉口江岸办公，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工人行动。2月4日，总工会发表宣言，谴责“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沄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宣言提出撤免赵继贤、冯沄、黄殿辰职务，要求路局赔偿工会损失，所有占领郑州工会会所之军队应立即撤退，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工会会所道歉等作为复工的最低条件[113]。罢工的决定与宣言的发表是总工会和工人代表出于对军阀横行的义愤所作的决定，但因为是仓促所为，因此对罢工实行后的后续动作与可能后果缺乏应有的估计，罢工宣言直接点出吴佩孚的名字，并予严厉谴责，也不利于分化与利用直系内部矛盾，更促使吴佩孚毫无顾忌地下令武力镇压。

2月4日中午，根据京汉路总工会的命令，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这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立刻停止了流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声明：“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惟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呼吁“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114]。直系军阀方面，对京汉路罢工预有布置，并调派了二万以上的军警分布于沿线各站，然而京汉路罢工实现时日之速，参加

人数之多，也大大出乎其意料，而且他们既担忧罢工背后有“赤党”指使[115]，又担心列强的“质问”[116]，为此表现出强硬态度。此时正值年关，旅客众多，铁路罢工于交通影响甚大，但吴佩孚毫无退让之意，他于5日致电湖北及京汉路当局称：“日来各路工人，受人煽惑，动以罢工要挟，此等嚣风，若不严加取缔，势将贻患无穷。除电沿线各军外，务希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117]有吴佩孚的命令撑腰，京汉路局及各地军政当局立即开始了对罢工的镇压行动。当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发表文告，对工人施以诱惑，加以威胁：“若你们只就一方面的肆意要求，不替铁路想想，到了那真真为难的时候，路局亦不能一味敷衍你们了。现为路局计，与工人们约限于十二小时内立即照旧上工，恢复交通，所有以前的事情，概不追究。假若有人强迫你们，阻止上工，自有军警保护你们，不要害怕。过了十二小时，不肯回来，是你们自己跟本路脱离关系，则本局只有另筹维持交通办法，另行找人做事了。你们工人可不要后悔啊。”[118]

京汉路局首先将解决罢工问题的重点放在北段。2月4日，京汉路局派员到长辛店，“慰问罢工工人”，“促令回复工作”，并提出先行分段通车，再讨论复工条件的要求，企图诱惑长辛店分会单独复工。此举遭到长辛店分会的拒绝[119]。5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上呈大总统黎元洪，称“此次长辛店工人与学生联络，竟敢公然开会运动罢工，显系有人主使，希图扰乱大局。若不迅速防止，诚恐于地方治安前途，将受绝大影响”，因派张国庆率骑步兵各一营，“驰往长辛店沿路一带，切实弹压，相机办理”[120]。6日下午赵继贤到长辛店，先令宛平县知事与长辛店商会会长出面，让分会接受其复工条件，分会代表当即表示：“总工会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外，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121]赵继贤闻听之下甚怒，遂令贴出布告，限十二小时内复工，声称对于罢工的领头人，要“严行查究惩办”，“工人如再不及时省悟，当一律解散，押令回籍，并追缴从前所有薪饷”[122]

。当晚，军警开始搜捕工会负责人及罢工积极分子，逮捕史文彬等十一人，转解保定军法处收监[123]。

直系军阀的镇压行动引起了长辛店工人的抗议，7日上午，长辛店数千工人手持“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标语，到第十四混成旅旅部示威。“相持不久，军队即向空中放枪示威，工人等大呼不退，于是此等赳赳武夫，乃举其杀贼之利器，向工人轰击”。致数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及被捕。随后，军警封闭工会，“工人见军人之忍心残杀，方相率逃去，或易服藏匿，或远走他村，以暂避目前之祸。自经此一场惨杀之后，长辛店全市更形凄惨，行人来往，不敢交谈。记者偶叩其何事如此，则谓一概不知。然其神色之间，未尝不呈一种悲愤之相也”。当日，长辛店工会发出通电：“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工人悲愤难堪，谅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124]当局同时令路局工人于8日起一律回厂工作，同时“出具甘结妥保及永不罢工之悔过书，呈与当局转送路局备案，并脱离工会”；“长辛店工会俱乐部既系与路局捣乱之机关，自应将该会一切文卷书札，由在会责任之工人一律汇齐缴销”[125]。自7日中午起，京汉路北段在军队“分段保护”，“携带全部武装，严阵以待”的监视下，恢复开行火车[126]。

因为京汉路总工会迁移汉口，因此武汉三镇是吴佩孚镇压京汉路工人罢工的重点地区。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吴佩孚的亲信，罢工开始后，吴、萧间日通电数次，谋划镇压。2月5日，萧耀南先以重兵包围江岸车站，然后派汉黄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总工会住地，强令交出京汉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负责人，在遭到拒绝后，张厚生即派部队占领机车厂及车站，与罢工工人对峙。当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对京汉路罢工的援助，若不达目的即举行同情罢工。6日，湖北各工团分别派出慰问团到江岸工会住地举行慰问大会，杨德甫报告了此次大罢工的前后经过，京汉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致辞，表示“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

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127]。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举行示威游行。同日，萧耀南电令下属，“京汉车均已开行。惟鄂境因工人坚持罢工，致断交通，妨碍商旅，应即均实劝告，否即以武力对待”[128]。

2月6日，吴佩孚致电萧耀南，令其工人“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129]。萧耀南接电后即着手调集军队行事，同时让张厚生在2月7日下午2时派人到总工会，声称“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工会负责接待的全权代表李震瀛等觉察来人态度反常，疑其中有诈，虽同意谈判，但未将代表名单交出。稍后，此人去而复来，说是请总工会全权代表于5时半在会所等候，张参谋长按时来会。其实，张厚生此时已在江岸设立指挥处，制定了武力镇压计划。5时许，总工会代表正准备去会所谈判，走到半路忽闻枪声大作，张厚生率领两营士兵分三路包抄总工会，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等候消息，躲避不及，三十余人当场被乱枪和马刀杀死，二百余人受伤，同时有六十余人被捕，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亦在其中。张厚生发现林祥谦后，即迫其下“上工”命令，被林严厉拒绝。张厚生立命将林祥谦斩决，并将其首级悬于车站电线杆上示众[130]。在江岸流血惨案发生的同时，2月7日下午，施洋律师在汉口寓所被捕。施洋为中共党员，多年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劳动界谋利益，劳动界视之如明星，倚之如保姆。所以军阀官僚资本家忌刻万分，久欲杀之而后快”。自1922年10月起，施洋先后担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出席了2月1日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为筹备总工会的成立以及罢工后的安排，费力劳神地给工人以不少帮助和指导，故萧耀南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将其逮捕，交湖北陆军军法处审判。“当经律师公会武汉商会各团体多方营救，卒未得当局之允可。军法处屡次审讯，均谓其迭次参加工团，公然运动

罢工，实有煽动行动，应……从重处以极刑，以昭炯戒，而儆效尤。萧督曾语人云，杀施洋湖北即无工潮之患。洛阳（吴佩孚）方面亦有电到鄂，将施洋就地正法，以清乱源”。2月15日上午，施洋被害，临刑时犹高呼“劳工万岁！”[131] 林祥谦与施洋遇难时都只有三十四岁。

在血腥镇压了江岸罢工工人之后，萧耀南发布了“特别戒严令”，派军队全副武装轮流梭巡，禁止民众和工人集会，禁止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禁止拍发“有关治安”之电报，晚11点后轮渡停航，晚12点后无点灯处不准通行，各旅馆不准收留无妥保者，等等[132]。他还下令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有工会，拘捕工会代表数十人及“平时热心工团之人物，通缉湖北工团联合会委员长等十七人，以为斩草除根之计。又仇视报馆，凡对工潮处置表示不满意者，则加以检查或封闭之”[133]。武汉三镇处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为解释其镇压之举，萧耀南在对外发表的通电中声称：“此次京汉铁路罢工风潮，原系奸人从中鼓惑，别有阴谋。前于支日据报汉口路工一体集会停业，当以工人等受人诱胁，情有可原。迭经责成驻在军警委婉开导，至再至三，迄无效果。虞日午后五时，适有南来列车，将次抵汉，当地匪徒，裹挟工人约共数千名麇集车站附近，势将拆毁轨道，阻止行车，军警长官向前劝说，讵匪徒暗藏手枪，突于人丛中直向劝说官长狙击，并扑夺军队枪支，一时秩序大乱，军警为正当防卫，维持地面起见，不得已开枪格斗，格毙匪徒多人，夺得手枪十余支，余匪惊散。所有工人以匪徒格毙，恢复自由，情愿照常工作，已于当晚开车，地方安静如常。”[134]

在京汉路中段重镇郑州，5日晚，靳云鹗宣布临时戒严，并派“郑埠军警绅商各界人士”，约京汉路郑州分会委员长高斌等到第十四师俱乐部，“提出严重质问”，令其即日开工。高等抗辩说：“除非惩办赵继贤、黄殿辰，赔偿损失，恢复工会”，否则不能复工。况且，“总工会已移至汉口，我们只听总工会的命令”。靳云鹗闻言，即命军警将

高等监禁，并逮捕罢工骨干，锁在车站票房门外风雪中示众，但并未能使工人领袖及骨干屈服[135]。6日与7日，靳云鹗继续令军士搜索工人，迫其上车服务，工人皆奔避，偶有被抓获者，也都拒绝开车。此时，吴佩孚派出的临时司机到郑州开行部分列车，但“南行至许昌，例须换水，而各站之水井，均被工人封锁，无处取水，只得中辍。其北开至顺德之车，亦因无法换水而止”[136]。在长辛店与江岸的镇压开始后，靳云鹗亦在郑州展开武力镇压行动，并在8日指使黄殿辰找人在普乐园召开“郑县国民大会”，制定若干以高压胁迫工人复工的条款，如对二十四小时内不复工者，一律驱逐出境，其生命财产军警不负保护责任，并断其供给，退租房屋；有窝藏者，以通乱党论，房屋充公[137]。

“二七”惨案以江岸、长辛店、郑州为主要发生地，但京汉路其他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驻马店、信阳等处亦有镇压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直接遇害及其后冤死于监狱或非命者共五十一人，其中汉口江岸三十五人，郑州八人，长辛店七人，彰德、顺德、高碑店各一人[138]，受伤者数百人，入狱及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人数更多。2月9日，北京政府议决，将罢工“首要”十一人“就近发交军法处从严审处”。同日，内务部向上海、天津、汉口、南京、济南等城市警察当局发出密电，要求“对于聚众讲演过激主义及煽动罢工、罢市等，务须随时切实查察，严密防范，以期消灭无形。如有劝导不服，甚或有轨外行动，应即依法取缔，严重办理，以弭乱萌，是为至要”[139]。11日曹锟致电各地方当局，“务请尊处合力协筹，于暴动工人严重对待。其有加入者，无论何人，一律以暴徒惩办”[140]。

在此等高压形势下，为保存元气以图再举，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于9日联合发出复工令，劝告工人暂时忍痛复工，“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

后的种种办法”。至此，规模空前、声势壮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失败而结束。影响所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的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只能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消沉期了”。但是，京汉路大罢工以及罢工工人为争取自身应有之政治经济权利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昂扬精神、壮烈气概将长留史册，如邓中夏所言：“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141) 而一向保守的《顺天时报》也在时评中认为：“此种运动非仅由他人煽惑所能发生，纵今一时因此发生，亦不得成为有力而且扩大，兹既为有力而且扩大，则其中必有其他原因。其原因为何，即世界的潮流工人之自觉是也。”“新式政治，则不宜仅以被治者阶级之幸福安宁为目的，更须满足其参与政治的欲望”；“现在之政治，须向此圆满时代之道程进行，须令其渐向此目标接近，凡与此相离远之政策，即宜认为时代逆转的政策，亟行敝屣而抛弃之，倘不准此而执行政治，纵握有如何权力者，终亦必败而已。”(142)

京汉路大罢工以其所处位置之重要、参加人数之众多、最后结局之惨烈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在罢工期间对罢工工人给予不少声援与支持，在罢工失败后则给予他们相当的同情与抚慰。“二七”流血惨案发生后，各地纷纷举行“二七”烈士追悼会，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保障集会结社自由，释放被捕员工，抚恤受害工人家属，严惩杀人凶手。直到3月下旬，北京各界千余人还在高师操场举行了追悼“二七”死难烈士的大会 (143) 。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向政府提出质问案称：“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汉路工人，组织工会，事非违法，何以该地军警横加摧残。而政府不经查办，以致激成罢工风潮”；“风潮既经扩大，政府即应有所觉悟，平心处置，何以荒谬糊涂，竟派军队前往威

吓”；“尤足骇人听闻枪击工人者，……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与否，原系双方对等条件，岂已能因条件未洽，即行残杀。假使政府与人民易地以处，其将如何？”[144] 2月11日，国会举行临时会议，向北京政府提出建议案，建议政府根据约法承认工会，释放此次工潮的被捕者，抚恤伤亡者，撤退增调弹压的军警。但只能听命于直系军阀威权的国务总理张绍曾却答称：对于释放、抚恤、撤兵等事，“须听各方长官依法处理”，“本人仅可以私函请其从宽而已”[145]。2月22日，黎元洪发出《大总统令》，对军阀镇压工人予以辩护，对死伤工人表示“痛惜”，以此敷衍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之声。令称：“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卒而罢工，又不服长官劝告，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殊深痛惜。查集会自由，为约法所特许，而罢工滋扰，亦为刑律所不容。况铁路所以利交通，一旦停止，国家、人民同受莫大损失。在路工人纵有被抑隐情，亦应禀候政府处置，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妨碍全路交通，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呈候核办，并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146]

“二七”惨案由于吴佩孚下令镇压而演成“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吴佩孚的“声望”由此而急剧下跌。吴佩孚曾经因其反皖“爱国”主张与“恢复法统”的高调而在社会各界和知识分子中颇有“声望”；第一次直奉战后他所高唱的“保护劳工”论调，亦引来不少人的好感；共产国际和中共一度也将吴列为革命阵营可以争取的重点对象。“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曾经环绕在吴佩孚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事实证明，在各派军阀中，吴佩孚不过是与其他信奉武力至上的军阀一样并无二致的军阀，在直系内部，拥吴佩孚的洛派与拥曹锟的保派也并无根本区别，他们对待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的态度如出一辙。社会各界对直系以及吴佩孚的观感从此一变，可以说，“二七”惨案是直系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开端。对京汉路大罢工以及“二七”惨案的全过程有大量报道的《晨报》这样写道：“此次京汉路发生风潮，本报曾据实记载，以告阅者。乃日来警厅方面颇有当局对于本报将有不利之警告。

记者天职，本在报告新闻，自不能以势力之加，改吾常度。但终因审慎从事，不能痛快直陈，致难餍阅者之望，或亦难免”；“若徒以防川之术，钳制舆论，恐非国家前途之福，抑岂高拱在位者所能长此安富尊荣耶。”[147] 其间蕴含之对当局及其后台直系的不满与批评明眼人一望便知，无须多言。

京汉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多为中共党员，尽管中共当时在京汉路工作的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余人，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担任了与罢工直接相关的领导工作。京汉路罢工的公开领导机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实际指挥机构则是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担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党团成员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项德龙（项英）、吴雨铭、李求实等均担任了京汉路各级工会的领导人，罢工中牺牲的二位知名人物——林祥谦与施洋也是中共党员。中共以其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而提升了自身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并得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罢工失败后，中共发表“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谴责吴佩孚“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予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148]。中共也由此加快了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军阀的进程。

第二节　黎元洪被逐

一　总统任期之争与倒阁风潮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以“恢复法统”为旗号，请出黎元洪复职，暂时解决了政治善后问题。但直系并无意让黎元洪在总统位上长期待下去，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推出曹锟当总统，使直系成为北京政坛的完全主人。曹锟则迫切想过把总统瘾，还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不久，据报曹锟即“拟乘此危急存亡之秋，占据总统地位，快其大欲。现在暗

中派心腹秘密来京，运动议员，联络报馆，苦心孤诣，务以达到当选目的。……闻各方面均已着手进行，并筹妥运动费五十万”[149]。曹锟的手下人为谋求个人及集团利益，也不断奉承曹锟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更加膨胀了曹锟的总统梦[150]。在这个问题上，直系内部并无分歧，只是在曹锟出任总统的时机方面，直系内部津保派与洛派有不同看法，津保派主张曹锟上任越早越好，以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而洛派“固推尊曹，但其始意并未积极拥曹为总统，颇欲利用黎名义，拖延选举时日，以完成其武力统一”[151]，建立直系的长久功业。据外人观察，“在津派之意，谓时机成熟不可再迟，故进行愈力。殊不知拥曹排吴为各方之政策，拥曹之事进一步，排吴之力亦进一步。现在曹吴恶感已深，决不能相处如初，……保曹攘夺总统之结果，或将为时局纷争之中心点”[152]。对津保派的拥曹之举，吴佩孚“极不谓然，以为首座改选，须俟全国统一告成方可，目下统一未成，遽易总统，必致时局益趋纠纷。而统一问题，愈难办到。若拥曹为局部偏安总统，不特于曹之身份名誉有碍，且于国事前途有关。故当审慎持重，不可轻举妄动，致予各方口实。而天津派另有用意，欲利用老师上登，以达个人做官目的，尤为卑鄙可憎”[153]。津保派和洛派围绕这个问题不断发生冲突，并在对罗文幹案的处理过程中集中爆发。津保派为了实现拥曹的企图，不断向曹锟进言称：“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154]结果导致曹锟就罗文幹案向吴佩孚发出公开警告，迫吴为了直系团体的利益而不能不后缩。吴佩孚为此专函致曹锟：“披肝裂胆，说明拥曹之诚，请转令左右万勿求进太急，招致反响，转误前程。又谓选举事，宜静待时机，水到渠成，不宜冒险取捷径，并有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苟有贰心，神明殛之等语。”[155]不过，吴佩孚也知道，曹锟必欲做总统，而且“统一”是遥遥无期的事，如果等“统一”以后再让曹锟当总统，恐怕他一辈子也干不成了，所以吴佩孚对“最高问题”渐持“不促成亦不阻止”的消极默然态度。

虽然如此，津保派与洛派在“制宪”与“选举”孰先孰后问题上仍有

不同看法。津保派主张“先选举”，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后再制定宪法，实际也反映了曹锟的意思，并得到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的支持。洛派则主张“先制宪”，俟宪法制定后再选总统。吴佩孚曾经表示，“应促议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总统选举”[156]。洛派的主张更多考虑到社会舆论对制宪的呼声以及选举总统的合法性，担心在现有法制框架及国会残缺的情形下选总统又将为反对派落下“非法”之把柄。国务总理张绍曾在对外通电中曾经表示，“制宪大权，本属国会，一俟法典告成，自应共同遵守。至一切政局纠纷，则当推诚协议，力图改进”[157]。毋宁说这也是吴佩孚和洛派的想法，如此则曹锟当选为“水到渠成”。但吴佩孚和洛派的意见既不为曹锟所喜，更不为急于拥曹上台的津保派所体认，事实上也无法阻止津保派拥曹上台的种种运动和策划，因为曹党担心“黎养成势力，转为贿选障碍，急欲去之”[158]。何况黎元洪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也主张先制宪后选举，图谋留任大总统，更成为曹锟上台的障碍，直系眼中的敌人，从而必欲驱之而后已。但是，“曹吴历史上渊源既深，合则存不合则亡，津（保）派于此存亡之关键，亦不能不从皇长子视吴，而征其意见”[159]。考虑到直系团体的利益，吴佩孚和洛派对于津保派策划的驱黎拥曹的举动不能也不愿明言反对。临城劫车案发后，接近黎元洪的国会议员动议“查办曹、吴”，更是惹恼了吴佩孚，吴的参谋长李济臣为此致电曹锟的参谋长陆锦称：“府派议员提出查办曹、吴两帅案，是何居心，不察可知。似此暗昧伎俩，而欲诬陷两帅，可笑已极。况铁路劫案一事，并非两帅应负之责，因中央向未付予两帅自由任免三省文武官吏及自由调动军队之特权，此时竟责成权力以外之事，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然我方可乘此机会，要求以之权力善后，凡任免三省文武官员，须由大帅保荐其使副署，我方可负一切之责任。否则，随意嫁祸，决不任其咎也。”[160]本来，在总统选举问题上黎元洪至少还可以利用吴佩孚的默认，先制宪后选举，但因黎之为人处事反而增添了吴佩孚对他的恶感，黎希望延续总统任期的图谋在缺乏实力支持的情况下自成泡影。吴佩孚改而拥护曹锟出任总统，表示“为北部同人计，惟有结合团体，力固中枢，仲帅（曹

锟）元老壮猷，袍泽重心，应速定大位，领袖群英，时不可失”[161]。所以有人说：“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拥护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他被人称为吴秀才，私生活甚严肃，自拟关岳，对曹锟始终不二。”[162]

为了拥曹锟上台，首先必须赶黎元洪下台，办法无非是“文”与“武”两途，这也是过往军阀曾经交替使用、娴熟于心者。所谓“文”法就是寻法理途径让黎元洪下台，而所谓“武”法则是以枪杆子逼宫，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让黎元洪走人。不过，由于黎元洪是被直系刚刚请出来复职的，骤然采用武力直接驱逐的方法即便是拥曹的津保派也觉太过突兀，因此“文”的方法成为津保派逐黎的首选。拥曹干将高凌霨曾经找政学会领袖李根源，请他向黎元洪传话，“最好劝告黎总统不要坚持先宪后选，如果坚持下去，对黎总统是不利的。先宪后选，对黎总统好，对大家也好”[163]。拥曹派以“文”的方式驱黎的切入途径就是黎元洪的任期问题。

根据1913年10月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任期为五年。自1913年10月到1916年6月，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其后至1917年7月由黎元洪继任，再其后至1918年8月由冯国彰代理，三人任职时间共计四年又十个月。自1918年10月到1922年6月，徐世昌担任大总统，惟因其由安福国会选出，故在第一次直奉战后被直系认为不合“法统”，因此请出黎元洪复职。但黎元洪复职后，其任期究如何则成为众说纷纭的问题，事实上悬而未决。为了给黎之复职寻求法理依据，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撰文认为：黎元洪的任期尚有一年三月有余，理由是：根据“约法”及“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在任期中的离职原因只有死亡、弹劾、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故从法律上立论，民国六年七月黎大总统之离职，推之法定三种原因，无一而当。是其离职，乃事实上之离职，非法律上之离职也。非法律上之离职，故不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离职无效，故冯副总统之代理，乃事实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无法律之效

力”。因为当时国会已被解散，因此无论是“离职”还是“代理”，都未经过国会通过的合法手续，因此都不为有效，现在“障碍既去，当然继续任职”[164]。而反对者则认为，冯国彰的代理是合法有效的，黎元洪复职后的任期仅能补足袁世凯称帝至死以及张勋复辟的两段时间，故其任期只有六个月。黎元洪本人及其亲信左右当然希望黎在总统位上多留时日，他们对上述两种说法都不满意，几经琢磨后提出，自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就背叛了民国，从而在事实上已不能视为民国总统，因此，自“新约法”颁布之1914年5月1日至袁死之日均应为黎之任期，这样算来，黎元洪的任期还有两年两个月，应任职到1925年8月期满。此等主张确实有些离谱，表现出黎元洪的恋栈心态，但也使津保派感觉夜长梦多，下决心从法理上剥夺黎继续任职的借口。1923年5月，拥曹议员向国会提出解释大总统任期案，提出黎元洪复职任期为补足自袁世凯改元洪宪至其死亡日的任期，总共是160天，而黎自1922年6月11日复职，到此时已有335天，超出其任期175天，应该立即退位，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同时从速组织大总统选举。此后，又有二十余起提案附和此议。黎元洪当然知道这些提案背后的拥曹背景，无力正面对抗，遂咨国会两院表示：“元洪复职之初，曾宣言法律问题听候国会解决。嗣两度咨请辞职，未承开议，补任期间，亦未解释。……现在尸素已久，岁序将周，虽议案尚无遵循，而法理究有限制。博考众论，固非一辞。假定长期，亦仅数月。念末日之大难，冀及时之有托。深望转告同人，查照总统选举法，注意准备”[165]。但黎元洪虽有这样的表示，却并无实际离位的举动，使得直系中的拥曹派决定对其施加更大的压力，逼其尽速离位。

拥曹的津保派逼黎元洪退位的第一步是制造阁潮，赶走总理张绍曾。因为张绍曾上台后在“统一”问题上与曹锟和吴佩孚的步调不一，早先在粤闽督理任命问题上得罪了直系，颇令曹、吴不悦；张绍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更是惹恼了津保派，认为他和黎元洪搞在一起，所以他们首先将攻击矛头对准张绍曾，企图驱张之后由保派组阁，再逼黎退位，准备大选，所谓“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张去而由

高、吴等主持内阁，操纵大选”[166]。

1923年3月张绍曾内阁复职后，国会拥曹议员随即提出不信任案，集中攻击张阁处理外交问题（如“金佛郎案”）的不是，责其“内政、外交着着失败”，“似此丧权辱国违法溺职之内阁，应早解职，以谢国人。乃犹恋栈复职，国家前途危险实甚，谨依法十九条，提出弹劾，敬候公决”[167]。4月11日，参议院以94票对2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对张阁的不信任案。但在该案循程序移送众议院审议时，张绍曾声称此案“违法”，并威胁将以解散国会作为报复，同时向议员大肆封官许愿，收买议员不支持此案。故众议院未与参议院同步行动，25日将不信任案退回，津保派通过国会倒阁的计谋未能成功。

津保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绍曾图以“金钱护阁”，津保派则以“财政倒阁”应之。北京政府的财政一直比较困难，张绍曾内阁同样为解决经费问题终日煞费苦心，难成正果，不仅许多机关、学校欠薪，即使表面威风凛凛的军警也时常不能按时领饷，津保派随即以此嗾使北京军警向内阁索饷，给张绍曾施加压力。3月间，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表通电，先称张绍曾对军警“置之不顾”，威胁“倘军警以无饷之故，不能维持其现状，而影响及于秩序之安宁”；继责张之施政“恋栈尤殷，忽东忽西”，“播弄手段，引诱政朝”，甚而指张“以揆席之尊严，而冶游于八胡同大森里之间，挟妓饮博”；表示“不避怨嫌，口笔诛伐”[168]。其后，王怀庆又于4月24日上呈黎元洪，请其“即日将怀庆本兼各职一律开去，另简贤能”[169]，以甩手不干而胁迫黎免张职。4月26日，张绍曾召开国务会议，王怀庆与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京师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等，率领团长以上军官八十五人到场，以军警经济窘迫为由，要求张绍曾立即筹拨一个月饷银以安军心，逼得财政总长刘恩源当场签发支票以解燃眉之急。当日，王、冯等发出通电，直指“北京政府为万恶之渊薮”，表示“用敢垂涕而道，露电请援，不避出位之小嫌，藉谋救亡之大计”[170]。第二天，参谋部部员数十人到财政总长刘恩源家

中索取两年之欠薪；第三天，参谋部次长蒋雁行等到国务院，居然当面责问张绍曾长期欠薪该当何罪。津保派步步紧逼的索饷举动，使张绍曾一时不堪其苦。就外界观察，“政局恶化，愈逼愈紧，北方战事已迫眉睫，而要以最高问题为导火线，有必然者。日来津保两派结合吴大头暨大部议员，有于一月内驱黎改选之决议。其条件为曹锟正，唐少川副，中山元老长，合肥副之，组织国会内阁，恢复奉张官职诸节。黎原拟联络张阁，改国会，藉此抵制，顾因张绍曾投诚保方，因包办最高问题为其固位之屏障，大招黎氏反感。黎已与国会合谋倒阁，并派李根源南下，冀与民党同盟打洛直派计划。其能否成功，固不敢必，然张阁既为各方所厌恶，决难达其摄行总统职权之野心，其必倒也殆无疑义”[171]。

张绍曾以筹款发饷而暂时躲过了津保派的倒阁运动，但津保派并不善罢甘休，随后又发动阁员拆台。张阁成员多数为津保派或亲近津保派的人士，5月3日内阁例会，津保派阁员以一些具体问题为借口给张绍曾使脸色，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扬长而去，表示不再出席内阁会议，使内阁无法正常工作。在此情形下，张绍曾不得不向津保派服软，并以任命保派人物张英华为财政总长而向津保派示好（因其前任刘恩源为免军警逼饷，坚请辞职），使内阁暂时得以维持。但随后在制宪经费问题上，津保派又与张绍曾纠缠不休。

自1923年初新一轮制宪工作开始后，制宪会议便常因出席人数不足而不能正常举行，参加制宪的国会议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表明所谓制宪在他们心目中实在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事。为此，有国会议员提出，对出席制宪会议的人员每次发放出席费20元。看上去这是为了推动制宪的进程，实则也不无以此自肥之意。提案通过后，如何筹款成了国会的难题，他们便向黎元洪求援。刚好黎元洪亦希望先制宪后选举，因为宪法“能由其一手促成，不无有多少之利益，直接则迎合多数心理，间接则缓和最高问题，一旦告成，于本身亦尚有奋斗之余

地”[172]。所以黎元洪即召集张绍曾等商定，从海关建筑费项目下每月拨17万元制宪经费，并转知总税务司照办[173]。津保派得知此事后，“以黎元洪此举为见好国会，欲运动蝉联总统”，由吴毓麟在5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发难，提出制宪经费不经国务会议议决，违背责任内阁精神。津保派阁员随声附和，指责黎元洪越权干政，财政总长张英华还以此为由阻止总税务司拨款，使张绍曾在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时颇为难堪[174]。黎元洪也被迫通电声明：“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175]津保派与张绍曾和黎元洪的关系愈趋紧张。

经过上述几次倒阁风波，张绍曾内阁已是风雨飘摇，难以维持，但如果张绍曾坚不辞职，而黎元洪也不免张职，津保派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达成搞垮内阁的目的，津保派又利用张绍曾贪权的欲望，对其表示，只要他同意辞职，则在逐走黎元洪后，立即迎他回京，循例摄行大总统职权。此时的张绍曾因不堪津保派的逼迫，又心存辞职后曹锟或许念其功而仍重用其的幻想，居然钻进了津保派设好的由其自行辞职的圈套，“堕其术中而不能自拔”。6月6日，张绍曾召开特别国务会议，高凌霨首先声称，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或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或以命令方式交院照办，违背责任内阁制精神；总统既不信任我们阁员，我们只有告退。吴毓麟、程克、张英华等立即附和高的意见，提出内阁总辞职。还不等张绍曾表示意见，高凌霨又接着逼宫：如果总理不愿辞职，我们就单独提出辞呈。事已至此，张绍曾只能说：我们内阁要采取同一步骤，要辞大家一起辞。高凌霨立即不失时机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辞职呈文和通电稿本，让与会者依次签名，随后发出。通电称：“责任内阁载在约法，今既责任不明，以后危险情形岂可言喻？绍曾等备员阁席，既不欲使一己蒙失职之咎，复不欲陷元首于侵权之嫌，惟有声请罢斥，解除责任。”[176]高凌霨还怕张绍曾辞职后留在北京不走，对他们此后的活动不利，又进逼说，我们既然决心辞职，应该离开北京退避贤路。而当张绍曾晚间上车离京时，国务院中只有秘书长张廷谔一人随从，名曰护送，实为押解。

张绍曾也无可如何，只得灰溜溜地往天津去了，从此被弃置闲散，谋复职而不得[177]。

“张内阁辞职，实为保派所迫去，去张即以去黎，亦即示威于国会也”[178]。对张绍曾的辞职，黎元洪当然知道其意味何在，即派其亲信、陆军次长金永炎等持其亲笔信“赴津谢过，分劝就职”。张答以：“此次政潮，苏酿极久，原因复杂，个人力难消弭，只得远避。”金见张“辞意坚决，无法挽回”，遂返京复命。黎元洪为了巩固自己的总统地位，急于组织新内阁。6月7日，他邀请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与政界名流颜惠庆、顾维钧等共商，有意请顾维钧组阁，但顾知此次津保派非逼黎下台不可，而且他预想的阁员名单中与津保派有联系者均不肯合作，“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原先张绍曾令张廷谔回京后将继任之空白命令办好送总统府，谁知张廷谔听从津保派的授意，将空白命令藏匿起来，黎元洪拿不到有张绍曾署名的空白命令，顾维钧的任命令实际也无法发表。其后，黎元洪又约颜惠庆面商，颜“初似肯相助”，但因“逼宫”潮起，亦“不敢担承”，组阁事终告搁浅[179]。

二　黎元洪被逐出京

张绍曾内阁既倒，中枢政事无人过问，北京形成无政府状态，津保派即组织军警索饷和“公民团请愿”，掀起了大规模驱黎风潮，以逼宫的方式迫黎元洪下台。6月8日，“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藉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各散去”。津保派为了增加对黎元洪的压力，又以“索饷不得，不能枵腹从公”为借口，策动北京警察“形式罢岗”。9日，“城郊警士一律罢岗，领袖公使来宅询问，天安门前复有数十人召开国民大会，散放传单，虚构罪状。新华门外及东厂（黎元洪）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队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至当晚7时，因驻京外交团质询，并有派外国兵队沿街巡逻的威胁，津保派在压力之下方令警察复岗。10日，

军警索饷队伍围困黎之官邸，表示非领得欠饷决不退出，黎欲招财政部官员来宅商议发饷事却被拒。下午，近千人的“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等“接踵围宅”。这些所谓“市民”实际是穿便衣的军警，他们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喻，均不见听。傍晚并推举军官代表廿余人，守索不退”(180)。黎急召北京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前来弹压，但不得要领。此后直到黎元洪出走，对黎宅的滋扰始终没有中断。对此，不仅外界人士多有批评，认为“津保之谋，实极笨拙，而犹自谓巧妙，真可叹也。”“直同儿戏，笑腾中外”(181)。即便是直系内部也有人不以为然，如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认为：“军警包围公府索饷，期达最高问题。此等不韪之事如何作得！定欲早选，即促两院速开选举会。足作此笨伯事，正不知何以善其后耶？可怜可叹！”(182) 何况如时人所论：“保方派别太多，故作事有同儿戏，所谓文派、武派、津派、保派无论已，即各派中亦多单独行为，军警索饷发于武派，公民团则张月笙（张英华）主之，即王兰亭（王毓之）并不赞成，而又不行阻止，岂非笑谈。”(183)

“逼宫”事初起，黎元洪还强作镇静，不愿下野。10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称：“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程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184) 或许，黎元洪私心还希望曹、吴能格于外界形象和舆论反应而训示部下有所收敛，但曹、吴对黎之电文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为了逼黎元洪从速下台，12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向黎递交辞呈，声称“呼吁既已无门，实呈待毙之势，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大总统俯赐矜全，立予罢斥，免致恋栈愈久，贻误愈深”。表示不负维持秩序的责任，并且进一步对外声言，“以后苟非饷项有着，不仅王冯辞职，全体军官亦当继其后也”(185)。这无疑是对黎的最后警告。黎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并加慰留，但王、冯拒不接

受。黎又不顾脸面致电曹、吴求情称："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186) 但曹、吴仍不置理。至此，黎元洪知大势已去，不可再在北京呆下去了。

6月13日，黎元洪与亲信会议后连发七道命令，准张绍曾辞职，任命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金永炎为陆军总长，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所属军队由陆军部直接管辖，以发泄对"请愿"风波背后操纵之曹锟、吴佩孚的不满与怨恨，同时通电全国声明："去年复职，历经咨催国会，遴选替人。但得宪法早成，于愿已足。若谓延长任期，竞争选举，匪特毫无是迹，抑且毫无是心。何嫌何疑，而相胁迫？个人自由横被侵夺，更何能执行职务。万不获已，权移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谊。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187) 下午，黎元洪在金永炎等几位亲信的陪同下，乘专车赴天津，行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共十五颗交其妾危文绣携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暂住。自上年6月11日入北京复职，至此时被迫离京出走，黎元洪在大总统任上又干了一年零两天。

黎元洪刚走，负责北京治安的军警长官王怀庆、冯玉祥、聂宪藩、薛之珩等即于13日下午在卫戍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维持治安、约束部下、拥护国会、保护外侨等项办法，以示恢复正常秩序。在保定的曹锟得知黎元洪离京后，也不再装聋作哑，于当天致电王、冯等军警长官："连日以来，内阁总辞，今又值元首离京，首都人心，益因此惶恐。国会为国家根本法律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以及人民治安，使馆侨民，一切交通秩序，均须极力维持，以重首都，而奠国本，是所至要。"(188)

在得知黎元洪出走的消息后，津保派人物却发现他未交印信，以为被黎随身带走，高凌霨即于13日下午打电话到天津，嘱直隶省长王承斌设法截留。曹锟亦电王怀庆，指示"所有总统印信及国玺，并希查询明确为祷"(189) 。王承斌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随带军警乘车至

杨村车站。3时许，黎之专车抵达，王、杨等上车后以军警监守，督车继续开行，并在开行途中向黎索取印信，黎“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示，乞未允交”[190]。王又得知黎离京前有致国会公函，说明因在京不能行使职权而移津，认为这表明黎无意真心辞职，对印信追索更急。4时半车抵天津后，王“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黎元洪气愤已极，拔出随带的左轮手枪欲自杀，为其随行左右所拦阻。黎元洪公子和英、美两国驻津副领事闻讯后赶到车站探视，但均被阻止与黎见面，“英、美领事愤甚，语人曰：中国军阀强暴如此，实为世界所创见云”[191]。王承斌要黎元洪“移往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诺”[192]。至晚10时许，在王承斌的逼迫下，困坐车站已数小时的黎元洪迫不得已，派人打电话到北京，嘱危文绣将印信交给国会。危氏因总统印玺关系重大，未得总统口谕，不能交出。于是黎元洪在军警重重监视下，到车站电话室与危氏通话，告其交印。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北京的消息，王承斌仍不许黎回宅，直到14日清晨张廷谔、薛之珩从法国医院取到印信。王承斌得讯后，又将以黎元洪名拟就的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通电交黎，强令其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193]。黎元洪被迫低头，在通电上签字，声明“本大总统现在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其后才被解除羁禁，释放回家，演出了此次“逼宫”案中“古今中外，皆所罕闻”的一幕[194]。一年前赶走大总统徐世昌、口口声声高喊“恢复法统”的直系武人，又以这样的方式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赶走了自己请出的黎元洪，在武力胁迫下北京政治的无序与混乱于此可见一斑，而其给外界留下的恶劣印象，更非短时所可消除，最终仍不利于直系对政治的有效控制力。白坚武认为：“津保措置失当，不守轨范，恐贻人口实，吴使徒唤奈何！”[195]

张绍曾内阁辞职，黎元洪被逼离职，津保派倒阁逼宫的图谋先后实现，但是，北京却出现了无政府的乱哄哄局面。内阁解体，政务瘫痪，尤其是国会停转，议员纷纷离京，根本凑不出总统选举需要的法

定人数，津保派原先设想在驱黎后立即进行总统选举的计划无法实行，只能又回过头来“补台”，先组织“摄政内阁”，图谋稳定政局后再进行选举。6月14日，留在北京内阁的津保派阁员以黎元洪被迫签发的辞职电为依据，甩开总理张绍曾（张绍曾想回京重掌政府，但被津保派所拒），召开特别国务会议。在原有九名内阁成员中，虽然只有内务、财政、司法、海军总长参加，但仍决定内阁复职，并通电声明由国务院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暂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同日，国会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196]，讨论黎元洪离职问题，拥曹议员提出由内阁“摄政”并选举继任大总统。而国民党所属议员认为：此次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国会为维护国家纪纲计，须有正当之表示。拥曹议员即“群阻其发言，哗躁叫嚣，秩序以乱”。会议未有结果。16日国会继续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197]，拥曹议员提议“应用快刀斩乱麻方法”处理黎元洪离职问题，动议自黎元洪离职出京之日起，其“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并“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结果在拥曹议员的鼓噪之下，该项动议以超过到会者的半数通过，“摄政内阁”据此而成“合法”[198]。但其“合法性”却遭到各方质疑，如论者谓：“公等作为，纯以私意为弃取，毫无法律之准绳，置人身于大海浮萍之上，虽无风波之起，亦难免于灭顶之祸矣。万一因此而引起天下之纷争，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至时之责任果将谁归乎？”[199]

当“摄政内阁”在北京紧锣密鼓地重张之际，被逼走天津的黎元洪也不甘心就此退隐。6月13日，他在去天津前曾发布“大总统令”称：“此次京师乱起，显有发纵指使之人。本大总统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毁法乱政，罪恶昭彰。举国官兵，当同义愤。扶危定乱，愿与天下图之。”14日，他到天津家中后，又发表通电称：“当此政象险恶时，一身去就，关系过巨，决不能率言辞职”；并声言：“现在印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摄政内阁”经国会“认可”之后，20日黎元洪发表通电，称其“离京”为“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因此

他“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自应一概有效”，“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200]。

为了表示他仍在大总统任上，黎元洪不断发布各项命令，如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未到任前由李根源署理），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第一路总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总司令，但黎元洪没有实力为后盾，各方实权派对其命令反应冷淡。为了给曹锟“当选”总统制造麻烦，黎元洪又筹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以发放出席费的方式，拉拢、利诱部分国会议员离开北京，以使国会不达法定人数，从而使选举自然流产。黎的做法与正在携手反直的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鼓动国会议员离京南下的主张有契合之处。其时“三角同盟”以发放旅费吸引议员离京，“连日各方来接谈者甚多”，“离京者不绝于途”[201]。但黎元洪希望议员在天津集会以为其壮声势的想法和“三角同盟”利用议员在上海召开国会以在政治上打击直系的主张不相吻合。后来，多数在津议员决定去沪，而无论此后的政局向何方发展，自武昌起义起始而“意外”跻身中央政治舞台的黎元洪都无能参与，只能成为政治的看客，两度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第三节　曹锟贿选闹剧

一　围绕总统大选的各方博弈

倒阁、逼宫、“摄政”步步告成，直系拥曹的津保派最终的目的是尽速进行大选，使曹锟早日坐上大总统之位，而曹锟本人亦迫不及待。黎元洪下台后，曹锟的参谋长陆锦即致函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称：“现在中枢无主，大位久虚，瞻望前途，危险万状。况彼党方在肆意鼓吹，捏造谣言，逞其阴谋，希图破坏。若不设法赶速进行，诚恐夜长梦多，变化无定。我兄成竹在胸，算无遗策，务望鼎力斡旋，

商洽同志诸君，一致进行，俾克早日观成，非惟国家安危所系，抑亦我辈荣辱所系也。”[202] 随后，曹锟亲笔致函吴景濂称：“比值政潮骤起，因应多艰，非得我公之识力过人，随机应付，政像将益不堪言，其中困难万端，弟固早已深悉，现在孝伯（王承斌）润丞（熊炳琦）并已到京，尽可披诚相商，从长筹计，幸勿有所蒂芥，转令同志咸抱不安。”[203] 但是，黎元洪被逼走后的北京政局却因“摄政内阁”的“合法性”、国会议员离京等纷扰而处在近似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摄政内阁”缺乏“合法”认同，而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总统选举根本无法进行。本来就对津保派急于劝进有所不满的吴佩孚认为：“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咄嗟立办，半月以外，恐拥段之声，纷扰南北，届时再图补救，事已大难。”同时表示：“办大选，须先由两院通过黎辞职书，法律上方有立脚点，否则希望不遂者，日后必借此掀起政潮，要挟我等。故正名定分，最为要务。”[204] 面对如此困局，即便是当初最积极主张驱黎拥曹的激进津保派人物也不得不思有所补救，以尽快稳定局势，尽早进行选举。

直系稳定局势的首要之图是组建完全内阁。黎元洪离职、“摄政内阁”成立后，实际在任的内阁成员不到半数，姑无论其是否“合法”，即就内阁本身而言，以不到半数的成员，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召开国务会议，作出相关决策。由于总统缺任，国会流会，加以各派系间的勾心斗角，直系原本希望组成对外充门面的“名流内阁”难产，为了使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直系只能勉力为内阁补充阁员，俾其凑够正常人数。

外交总长是除了内阁总理之外的首席阁员，对外交涉也是北京当局的重要任务，此时不仅临城劫车案、“金佛郎案”等需要外交总长出面交涉，而且总统选举问题也需要向列强疏通。早在4月间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黄郛因“金佛郎案”而下台时，知名外交家顾维钧即再度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顾表示：“只要罗文幹的案件一天不澄清，我就一天不任职。”[205] 此后，曹锟频频派人催顾上任，而顾因政局混沌

不清，屡屡往西山“避嚣”。7月20日，曹锟亲电顾维钧，请其就任外交总长。22日，吴景濂、高凌霨等约顾会商，催促他上任[206]。次日顾维钧就职[207]，为此他颇受反对派的埋怨，所谓“曹逆之必借重足下者，其意果安在乎？以万恶之军阀，见轻蔑于友邦，求为经济与同情之助不可得，乃欲假足下为介绍，奉送主权若干，利益若干，以交换金钱与承认是也”；“足下不外察国情，内审贼势，乃于此之时贸贸然就职”；“甘为非法之阁员，同人等百思不得其解。惟觉令誉顿减，信用浸失，为国家人才计，至可惜耳。”[208]按惯例，外交总长既为总理之下的首席阁员，在总理缺位时应代行总理职，主持阁务，但这届内阁的大任是操办总统选举等事，曹党自然不放心别人来办，而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也不屑办这样的事，故内阁仍由内政总长高凌霨主持，顾维钧只负责外交事务。

对负有解决财政困难并为大选筹集经费重任的财政总长，曹锟本有意由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出任。因为此时的财政“已陷于危境，确呈破产之象”[209]，何况还有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也要花大钱，而王克敏自命为“财神爷”，又担任国内最有实力的中国银行总裁，曾经自夸“几百万之款，几日间便能筹到”[210]，自然为曹锟所看重。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克敏对于筹款并无妙计可言，无非是对外承认“金佛郎案”，以获得外国银行团的支持，对内由中国银行印发钞票，而这又将引发舆论的反弹。所以，他的任命令在7月10日发表后，即遭各方反对，认为“金佛朗一案，事关切己，拟欲借此机会，为饥不择食之计，……如冒昧一试，必将集矢一身，曹陆前车，可为殷鉴”；而“各地中行股东函电交驰，交相劝阻。董监事联席会议，亦以地方固当维持，中行尤关重要，力劝暂勿转任”[211]。再加上王的任职出自保派推荐，而津派不以为然，王亦畏津派之反对。出于这些原因，王克敏不敢贸然上任，19日即上书请辞。其后，曹锟又在其弟曹锐等建议下提出张弧为财政总长，张弧是亲奉的前梁士诒内阁的财政总长，本为直系的冤家对头及直奉战后被通缉的“祸首”，但其长期负责盐务，自奉理财有方，为了应付时局，曹锟顾不得张与直系

的“历史过节”而命其出任财政总长，在8月中旬走马上任。张弧立即布置由王承斌、吴毓麟负责选举筹款事，“进行大选甚急”[212]。其后，“摄政内阁”在9月初又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未到任）。至此，除了陆军总长原由张绍曾兼任，此时不便再找人替而暂时虚悬外，这届内阁经过“修补”，总算是勉强成立，对外可以交代了。

直系稳定局势的又一招是提议从速制定宪法，缓和外界对直系干政、操弄选举、先选后宪的强烈批评。本来津保派一直主张先选总统，但因为国会议员人数不足，因此只好提出“先宪后选”，以参与制定宪法而留名于世诱惑议员回京。7月12日，王家襄等在与吴景濂、王承斌等策划后，提出“先宪后选，为吾辈自来之主张，……深望当局于此，能有彻底之觉悟，勿再漠视一切，专事选举运动。尤望停止选举运动，明白表示，以安人心”。一向主张“先选后宪”的高凌霨等立即回应称：“制宪大选，均为解决时局紧急问题，孰前孰后，众公自有权衡，我等不能过问。”[213]保派的高凌霨、熊炳琦（山东省长）等“欲改变方略，劝曹锟发一停办大选、促成宪法之电，以羁縻国会议员，勿使南下”。其时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去保定向曹锟请示以承认“金佛郎案”获得列强财政支持问题，高凌霨等即请其向曹锟提出此议。但津派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等“则仍主急进大选，上书曹锟，谓若发停选先宪之电，不啻自招口供，与项城取消帝制，如出一辙，必归失败等语。曹阅之颇为所动”。几经磋商，7月24日，曹锟发表通电，未提总统选举，却大谈“宪法一日不定，国家一日不宁。……盖根本大法先立，则枝叶从而就理，事势困难，皆得据法律为解决。一日宪法昭垂，全国遵守，固为我国家无穷之庆事，抑亦我国会制宪无上之光荣也。”同时声言“服务国家垂十年，民国肇建，未尝一日自逸。私人权利，夙不敢争。耿耿寸衷，惟知有国”，以对外明个人之“心迹”[214]。其后直系将领纷纷发电应声附和，提出“当此外交紧迫，内政纠纷，摄职既有限期，元首安可久缺。更望参、众两院诸公先行完成宪法，继以速办选举，定国家根本大计”[215]。曹党人物

还在与国会议员的接触及各种对外场合宣扬此等主张，大谈“尊重国会”，期望早日“制宪成功”，以显示直系并无“私心”。

为了缓和外界的批评声浪，迷惑舆论的视听，直系还对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伸出橄榄枝，故示友好，以达釜底抽薪之效。国会直派议员温世霖等率先提议“联孙”之计，“以打破孙氏与各派之会合”，“实行牵引中山下水之法”[216]。国会直派议员二百余人也发表通电，提出“北方实力派与南方民党首领宜实行结合，共谋和平统一，时局始有平定之望，政治始有刷新之机”。7月2日，曹锟通过在上海的孙洪伊向孙中山发电，表示上年“恢复法统”的主张，与孙“护法之初旨，不约而同”，“拟即依照先生主张，召集南北和平会议，聚全国名流于一堂，共商国事，将一切政治问题，讨论解决，俾国会得以从容言法，树国家万年不拔之基”。8日又致电孙洪伊转孙中山，恭维“中山先生与国家同其休戚，幸与所以为吾国为吾民为促进和平统一者不吝见教。琨虽不敏，窃愿闻之，当本中山先生之意，为国人进一解也”。孙洪伊曾任广州军政府内政总长、孙中山驻沪代表，曾衔孙中山之命，与直系商洽“和平统一”问题，此时又“觊觎国务总理一席，而又恐不见容于民党，乃倡为孙曹联合之说，以眩惑世人，并为之奔走游说孙文数次”，故曹锟发电经由孙洪伊转[217]。但是，在直系支持的沈鸿英军队当年5月兵败韶关时，查得各种函电文件，“证实犯粤之事，曹实主谋，遂与曹决裂”[218]。故此孙中山对曹锟并不信任。12日，孙中山电致孙洪伊代复曹锟，表示“前此我揭出和平统一之主旨，仲珊亦尝赞和。乃其见诸事实者，则乱闽祸川扰粤，以及种种行动，无一而不与和平为敌。今兹云云，其既有所觉悟耶，抑犹是前日之敷衍也？我与人以诚，不能逆億不信，然不直则道不见。主张武力，谁为戎首，咎有所归。徒务空言，天下其孰能听之”。实际拒绝了曹锟的“好意”。曹锟随后复电，亦只能以希望“双方推诚相见，务期贯彻始终，共谋国是”下台阶[219]。在曹锟作出“联孙”表示的同时，还派其弟曹锐向其北洋前辈段祺瑞疏通关系。7月中旬，曹锐在天津面见段祺瑞，态度谦恭地表示：我们弟兄俩过去都受过您的栽

培，大恩未敢忘报。前年直皖战争，因迫于形势，并非出于本意。现在仲珊进退两难，恳请您指点指点。段祺瑞答称：现在你们富贵已极，还想要求什么？我劝你们何不急流勇退！假若曹锟自以为有当中国总统的资格，并能行使总统职权，那么无论通过选举手续，或用武力，或使金钱及其他办法，尽可去做，如其不然，那就应该明白表示放弃！[220] 曹锐碰了个钉子，无以应答，拉段未成。曹锟还通过他人授意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到奉天向张游说，解释直奉之战是出于误会，表示愿意重修旧好，亦未得张作霖的回应。总而言之，曹锟和直系企图通过与孙皖奉表示通好的方法缓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做法没有成功。

不过，经过补充内阁成员和准备制宪的运作，黎元洪离职的混乱情势有所改观，但直系如此操作的最终目的仍是总统选举。有鉴于袁世凯称帝功败垂成的经验教训，曹党担心“此项最高问题之解决，速则易于观成，缓则恐生他变。盖两院罗汉至八百尊，其中党派纷歧，言论庞杂，若任其夜长梦多，势且横溢旁出，将演出种种卑劣手段”[221]。因此，自黎元洪离职后，直系之“宗旨确定，为国为民及我系前途之关系，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办理”[222]。此时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欲讨好于曹，迎合曹意”；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确想以开国元勋之资格，过过未成之总理瘾”；地方大员中，直隶省长王承斌企图在曹锟当选后接其直鲁豫巡阅使职，故对选举颇为积极[223]。即便是不主张速选的吴佩孚此时也认为，“时局纠纷，亟宜速结，务望进行，促成选举，以奠大局”[224]。在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总统选举势成必然。

为了钳制舆论，有利选举的进行，直系控制的京畿卫戍司令部“函请提署、警厅派军警赴电报、邮政各局检查邮电。凡关于某方及某要人之电报，暨与选举有关之电报，一律扣留”；“至若反对之言论，异此之消息，一为披露，即属大逆不道”。如《京报》有关人员被军警当局两次传唤，《国会议员通讯》不准在京发行，等等[225]

。一面又运动各界鼓吹具总统资格者“直鲁豫巡阅使曹公，其谁与归”？“请求各直省、各特别区域军民长官及全国父老昆弟一致主张，来电赞成，公推曹巡阅使出任临时总统，以奠国本，而安人心。一面仍俟国会定期正式选举”[226]。

要将曹锟“选”成大总统，关键在经过国会议员的“合法”投票。但是，驱黎之后国会停转，四分五裂，不少议员离京，如何凑足总统“选举”的法定人数，成了直系曹党最头疼的事。

第一次直奉战后，“法统重光”，国会在北京重开，国会中的议员即分为亲直派与反直派，国民党、安福系、政学系等党派议员多为反直派，与亲直派议员经常处在对立地位，令国会议事纷争不已。直系驱黎之后，反直派议员认为，“国会在北京此时政情之下，其机关已陷于被围状况，其信用已濒于破产地位”[227]。因此，由褚辅成、张继等发起，以国民党议员为主体的反直派议员纷纷离京。为了对付直系而形成的孙、皖、奉“三角同盟”亦借此机会，对直系开展“挖墙脚”的工作，以各种手段促国会议员离京，破坏直系原定的选举计划。据段祺瑞的亲信姚震告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连日来各方来接谈者甚多，将来收揽总数，约可得三百人。现在已商妥并领去旅费者，已近二百人。如无意外变故，两星期内外，可扫数离去京津。凡在我处领费者，均由各该政团首领负责，定期陆续南下，彼此以诚信结合，乃能有此成绩。北京三次开会未成（以制宪为名，欲使人数足额，令公民包围，胁迫选举），皆我方设计破坏（因前数日在京者，尚居多数，不能不用计临时破坏）。截至今日止，离京者不绝于途，拆台之事，或可办到。但闻对方有筹巨款买收之说，刻正思紧急对付之法。”但因需要付费拉拢的议员人数“较原额增多一半，则需再寄五万元以上”。“现决定催上海从速实行筹发岁费，并于常会开会后，另筹款项照补从前欠发之岁费。一面调查沪奉实存及由沪奉回京，可以再去上海之人数。如果因回京者太多，不足法定人数时，拟令上海一面准备开会日期，即由京再办成批议员，同时南下到沪，即行开会。

庶几不至因相持而误事”[228]。南方的孙中山派刘成禺持其手书北上，动员国会议员，“各尽所能，力持正义，其有以兵力、金钱图窃国权者，当以去就相抵抗”[229]。6月底，离京到津的国会议员已有近三百人[230]。

离京国会议员的第一站多为天津，他们到此之后便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希望利用他们为自己壮声势，再谋复职之机；但他的实力有限，不为一些势利眼的议员所喜，而且“三角同盟”各方也不以黎为能成事然。如时人直白所言：“黄陂此人，并非完全愚笨，在我方为利用废物，但不可为废物所利用。”[231]故此黎元洪很快便退出了争夺阵营，其后的争夺双方主要是筹划利用议员进行总统选举的直系和反对直系的“三角同盟”。

6月21日，到津的国会议员发表通电，提出因为国会在北京已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可暂移上海开会制宪。23日，皖系大将、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随即发表通电，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制宪。在卢永祥和张作霖的接济下，国会议员离京可以拿到一次性旅费500元及月费300元，从而吸引了一些“贪财”议员出走。他们既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又可对外表示自己的道德立场，不少人便纷纷离津到沪。7月14日，到沪国会议员二百二十余人集会，发表宣言称：“留京议员，陷于强暴，即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义，与各国订何项条约，磋商何种借款，吾国会概不承认。”[232]

驱黎之后的部分国会议员离京确实给直系围绕总统大选进行的政治运作带来了相当的困扰，对此，直系只能使出金钱计，开出较反直联盟更高的价码，同时提出尽速制宪的主张，内外并举，吸引国会议员留京或返京。6月20日，吴景濂在参众两院议员茶话会上表示，“宪法会议及选举总统应双方并进”；“岁费与出席费俱经国务会议通过，已有切实之保障，不至发生问题”；希望议员“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决不作法外举动。不受外界任何之压迫”[233]。曹党中也有人主张使用强硬方法，提议由在江苏当政的齐燮元照会上海领事团，

希望他们将在上海租界活动的国会议员驱逐出境，并对安福系议员“惩办一二”，以“惩一儆百，彼辈既有所顾忌，自不敢纷纷效尤，希图非分矣”[234]。在南下议员中，旋又有“民六”议员与“民八”议员之争，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刘楚湘等“民六”议员认为，“拆曹锟大选之台，当然以北京国会民六分子为主体。若国会移沪，即改变旗帜为继续广州国会，则留京议员即有所借口，不欲南下。如是南下同人，非为反对曹锟大选，而实促成之”。“南下议员多和刘说”。而“民八”议员自奉为“护法”正统，“否认宣言中称黎元洪为总统之句”。双方协商“迁延未决，内部渐有破裂。而北京吴景濂等，亦以上海开民八国会为辞，煽阻欲南下之议员。”加以离京议员中不乏唯利是图的拜金投机分子，既想领取反直派提供的旅费和津贴，又不愿放弃直系提供的国会出席费，“仅到天津骗取旅费，复到沪赚取月费，踪迹飘忽，来往无定”[235]。足可见当时不少国会议员之操守低下，与那些留京“卖身”的“猪仔议员”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此，留居上海、曾经在孙中山和曹锟间有所沟通的孙洪伊谓，“吾常责北方破坏人之道德廉耻，其反对者之破坏道德廉耻，亦何异于北方”[236]。负责对南下议员经费支持工作的奉系首领杨宇霆、王永江等都颇为失望，感叹说：“沪上国会，已成遗蜕，无可发展”；“即安置一二，而不满意者仍多，倘仍故态不改，撤之则愈益仇怨，终无善法。不如向总司令（即张作霖——作者注）说明，任其自由行动，不再干涉为妙。国会议员演至今日，已不堪言，似不如任其仍回北京活动为得计也”[237]。8月过后，国会议员出京的势头大减，回京的议员却络绎于途，在沪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集会议事，对于北京政治的影响力减弱，直系关注的焦点又转到如何稳定在京议员的多数，从速筹办总统大选方面。

二　贿选告成　法统中落

自黎元洪被逐出京后，围绕总统选举等问题，国会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所在。曹党的意图，是务须在10月10日国庆节前完成选举，让

曹锟走马上任。先是8月中旬，众院副议长张伯烈致函，责其“日以宪法会议为事，绝不提及选举总统。虽经两院同人纷纷提案催促选举，足下却置若罔闻。诚不知足下用意之所在”[238]。随之吴景濂即表示接受“民意”，在18日对外宣称：“阴历八月十五（即阳历9月25日——作者）以后，定要组织总统选举会，九月里可以选举总统。”[239] 8月19日，拥曹议员向吴景濂动议，提出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国务院摄行政务时，国会议员应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请速酌定日期，先开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资进行。”吴景濂随即表示：“此事极为重要，诸君即不提及，余亦早拟就商赶快进行之法。”[240] 但此时出京议员已多至近三百人，而留京议员中仍有不少人有离京动向者，如何稳定在京议员并吸引出京议员回京投票，使选举合乎法定程序及有效性，颇费曹党之思量。津保派头面人物在京数次集会讨论“维系在京议员，敦劝南下者回京之方法”[241]。他们起初动议对留京议员发放维持费或顾问费，可是又不放心议员的操守，担心他们领了钱不办事，而且也不能吸引出京议员回京。其后决定对出席国会会议的议员发放“临时”出席费，大约每人每月可得六百多元，超过南下议员所得津贴的一倍，另对南下议员回京者发给高额旅费。8月24日，国会举行议员谈话会，两院合计有一百五十余人出席，吴景濂提出“临时”出席费支给方法：一、两院每周常会，每位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中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议员凭支给证于次周一向会计科支取。对于吴景濂此等“公然行求贿赂，损害国家财产”，以金钱收买议员的提议，在场虽有议员以“违法”表示反对，但吴景濂仍然以“多数同意”宣布通过，自8月27日起实行，同时决定在9月13日前举行大总统选举。对此，留京国会议员中也有自爱者觉得领这样的钱烫手。29日众院开常会时，有人质问吴景濂据何法律而有此决定？吴无以作答，显见其亦自知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之举[242]。

对于离京的国会议员，曹党开出的价码更高，有发放旅费千元乃

至开出万元价码者，或者任满后还可给予其他差事，目的只有一个，只要他们回京参加总统选举投票即可。在那些离京议员中，不少人原本就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无所谓个人操守，而是为了领取旅费和出席费而离京，一旦曹党开出更优厚的条件，他们便再自然不过地登车回京，腼颜领钱了。

除了公然以金钱贿赂之外，曹党又提出延长国会议员的任期，以此拉拢议员，满足他们之中不少人的自肥分润心理。根据《国会组织法》，众议员任期为三年，此届议员任期自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之日起，虽经两次解散，但至1923年10月也到了期满之日。为了延续即将结束的任期，吴景濂在8月底提出："任期为一问题，解职时日又为一问题，个人地位事小，维持国家之体制事大。所望国家秩序早日恢复，大选早日观成，在新议员未集会之前一日，现议员不容轻言去职。"[243] 随后有议员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将众议员任期修改为：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也就是说，只要新的议员尚未选出，旧的议员就能无限期延任，而在当时情况下，何时能办新一届国会选举完全是未定之数，自然现任的议员便可以此为由赖在国会里不走，享受那些常人不能享的权益了。9月7日，众院常会以308人出席、261人同意的绝对多数票通过此案，引来舆论众口一词的批评，认为这是国会议员自说自话，恋栈自肥，希望参议院予以纠正。但是，为了使参院顺利通过此案，众院提案提议参议员的任期亦照此案实行，以便共同分赃。结果，9月26日的参院常会，此案亦以多数通过。不过，此案送交北京政府后，吴佩孚表示反对，北京政府格于外界的强烈批评，也不敢贸然公布。然而，国会两院议员却以此作为总统选举的交换条件，经多日争执，10月4日，北京政府将此案与众院议员改选令同时公布，以求平衡，并缓解外界的批评[244]。

尽管直系拥曹派在金钱、地位各方面尽力拉拢国会议员，但是一时间仍然无法凑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国会两院议员总数为870

人，选举总统须有超过三分之二者出席，即最少须有581人参加，否则即不合法，而“合法”是曹锟出任总统的底线。为了对外表示总统选举的“合法”性，直系拥曹派伤透了脑筋，最后只能祭出直接买票的险招。9月初，高凌霨、吴毓麟、熊炳琦、程克、边守靖等津保派中坚人物邀集国会议长、部分议员及政团代表连日会商，讨论总统选举问题，并提出以5000元为最低额，8000元为最高额，收买议员参加总统选举，但是先选后付担心议员不来，而先付后选又担心议员领钱后开溜，最后决定先开选举预备会议，俟得知确切出席人数后再决定发钱方式。9月8日和10日，国会召开二次选举预备会，参加者均不过法定人数，但在10日的会上，曹党找来书记员冒名顶替，并由吴景濂指使众院秘书长郑林皋命令专司稽核出席人数之责的众院秘书孙曜虚报人数，孙不从，郑又转令其他秘书虚报出席人数，使得当日出席人数“达到”了法定人数，遂决定在12日举行总统选举[245]。但是，9月12日到会的两院议员只有422人，曹党“用尽方法，卒以人数不足而流会，而同时黄陂南下，津派愈无办法”[246]。选举无法进行，曹党大为失望。

9月12日的总统选举未成，13日晚曹党主干人物在小麻线胡同吴景濂家中开会，讨论以后的大选进行办法，决定：派遣党徒分头疏通反对派，由国会常会再定选举会日期；电请各省督军、省长推定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专事推挽该省议员出席选举会；决定出席始给出席费；分派代表秘密南下，以特别待遇（金钱、入阁或优差美缺）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上述各种办法如进行无效，“则出于最后之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盖非硬达其成功之目的不止”。同日晚，曹党议员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集会，协商票款支付方法，到会者大多主张出席选举会的上午付款，领得款后议员即须集合一处，然后往议场投票。但是，办这些事的关键还在钱，“此种办法，虽经大体议决，惟须待今晚来京之王承斌到后，方能确定，且仍须看随带来京之孔二先生究有若干，方有把握也”[247]。

王承斌在曹锟贿选的过程中算是最积极的干将之一。他自出道后一直在第三师任职，因“功”而累迁至直隶省长，与曹锟之弟曹锐关系密切，是津派的中心人物。他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捧曹锟“选”总统，是盘算可以借此攀龙附凤，邀功请赏，在曹锟当上大总统后接其任直鲁豫巡阅使，过把“大帅”瘾。办理总统选举，尤其是需要拉人投票的选举，当然得要钱，不仅选举诸事离不开钱，最关键的是收买离京国会议员回京选举更需要花大笔的钱，而北京政府的财政不仅没有余款用于选举，就是对“各部署机关欠薪，及各军欠饷，近畿军警积欠，均已一筹莫展”[248]。总统选举事之所以在黎元洪离职后未能立即进行，其中原因之一也是需要筹措经费。曹锟信奉“有钱好办事”之言[249]，一生厚积钱财，本人经各种途径而聚敛的家产并不少，据说多达五千万元，但他生性吝啬，不愿破家财用之收买议员，而是要部下“报效”选举经费，如萧耀南、齐燮元、阎锡山各50万元，田中玉40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30万元，张锡元、陆洪涛各20万元[250]，等等，但仍有很大的缺口。正值此时，王承斌自告奋勇夸下海口，“所有一切应用款项，皆可向予一人索取”[251]。他的做法自然得曹锟的欢心，即令他到京主持选举等事。其实，王承斌筹款并无什么妙法，不过是以军阀武力为后盾，强迫各界捐资而已，其方法一是制造“金丹（鸦片）案”，勒索鸦片贩子；二是以借用军饷为名向各县绅商，“凡银行之分号代理店等皆每家二千，最少亦复数百”。王本拟将此项摊派推之于直、鲁、豫三省，“谁知鲁、豫两省非常反对，保、洛军官，皆怒发冲冠”，只能先在直隶实行[252]。因为王承斌的进京主持，拥曹派胆气复壮，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总统选举事项。

王承斌到京后，“知正式大选不易成功，有先宪之表示，拟先公布一部分，以和缓空气，但各方面仍持怀疑。至摄政非常等名目，曹使亦所不欲，目下实不易解决”[253]。经过与各方的讨论，王承斌主持总统选举的招数，先是“兼顾保、洛两方之旨趣”，“容纳研究系及反对派，主张先尽制宪完成为转圜之地步”。他与吴景濂邀国会两院领袖人物张伯烈、王家襄等及研究系人士协商，辩称“时局紧迫，尤盼

制宪于最短时期告成大法，而慰全国民望。惟选总统职在国会，挽回时局解决纠纷，实为重大之问题，敢请捐除成见，予其谅解，是某等所仰望者也”。“然反对者以天坛草案，不能不加以修改，纵使从权达变，尤应略予改定。且省宪一章，大有问题，尚未经三读会通过之手续，岂能望其如期告成等语。此一席话说得包办者无辞以对，卒无结果散会。”[254] 王承斌又在宴请反对派议员时直言：“此次选举总统，大家均认仲珊（曹锟）为理想候选人，并非出于私意，良以目下我国情势，非举一拥有最大实力者，使居元首地位，不足以资震慑而谋统一。故舍仲珊外，实无适当人物，愿诸君顾全大局，予以协助。”参加的议员则回应说：“我辈亦并非对于仲珊有何成见，唯因国会历时十载，宪法尚未制定，身为议员，深负疚戾，故主张此时宜专为制宪，不及其他。待宪法告成，再选总统，则对仲珊亦未始不可赞成。”[255]

拉拢不成，王承斌只能回到老路，两手并用，“秘密协议运动大选，外托宪选并进，为容纳反对派意见及其旨趣为依归，并以藉此为号召各政团之出席。其实际暗中沟通各派中坚，贿以巨款，及从优待遇之条件，敦劝其出席宪法会议。而以各省区实力派为促进大选之急先锋，加以国民团之请愿为内应，以临时动议改开总统选举会，即其选票不足成数，亦决爰照举袁先例，以决选产出之”[256]。他向参加选举者开出了5000元的选票价码，但须在选后支付；同时许诺助选团体头目以各等官职，结果这些人乘机漫天要价，“所提条件，无不竞争占据阁员之要席，次则要求省长、次长、各路局长、关监督及榷运局盐运使等，亦有请求京内外各部属厅长、道尹，甚至要求保障终身议员，无奇不有”。吴景濂更觉自己出力甚多，“要夺阁揆”[257]。尽管如此，愿意“卖身”的议员人数仍然迟迟达不到“法定”票数，兼以对能否领到钱款不放行，不少人持观望态度，还有人准备领钱但不准备投票。如议员某所言：“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要，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

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为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呼。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经到手，即当迁眷南下。”[258] 为了凑足投票人数，王承斌还派人“携款十万元赴沪运动南下议员回京，以便凑足其数”[259]。然如时人所论：“离京议员之拉回，固觉非易；拉回以后，欲其出席，又属非易；纵能出席，欲其投某方之总统当选票，尤属非易。多数回京议员，咸声明除宪会以外，其他各会，均不出席，且领到岁费即行南下者，颇不乏人。”[260]

为了拉拢国会议员的多数，曹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王承斌、吴景濂、熊炳琦、王毓芝等在甘石桥政团俱乐部，日日应酬议员。除已被收买诸议员仅须略给酒食金钱外，对于留京不出席的，则施尽‘容纳主张’、‘交换利益’、‘津贴巨款’等手段。尚虑人数不足，则又一面电令各省军民长官，迫离京在籍议员北上出席。一面陆续派代表南下，劝诱聚在上海的反直议员回京。此外，熊炳琦、王毓芝向议员担保批准众议院延长任期；高凌霨、吴毓麟向议员担保制宪，使各议员可以安心出席；吴景濂对人发表可以‘出席不选曹’的谈话；叶夏声电致国民党议员出席选孙，则又替反对派议员做一个面子，使易于离沪回京”[261]。

经过多方活动，当在京议员达到一定人数后，9月底，王承斌与吴景濂等商定，在10月初进行总统选举，并先以举行制宪会议为由确定参加人数。10月1日，曹党控制的甘石桥议员俱乐部开始向在京议员发放领款支票，票面注明：凭票交来人大洋五千元，此致某某银行。支票由吴毓麟、王毓芝等亲自办理，分别印有“孝记”（王承斌字孝伯）、“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字样，盖有“三立斋”图记，支付银行有三家，其中以边守靖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

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续，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如此规定，实际反映出买卖双方的彼此猜疑，“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尽可空手投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262]。支票发放当天，亲往领取者不过一百五十余人，其中还不乏由人代领者。议员高洪魁事后致函吴景濂表示，有人“屡欲代弟取回均婉言谢绝”，但当晚支票又被送到家中，“谓系由台端经手拿来者……乃决定由弟亲手交回”[263]。但也有人非现金不要，如吴派有人告吴景濂，谢某“坚持非现不可，弟再三转述尊意，而迄未有效也”[264]。

曹党办理贿选，虽是在私下进行，但如此大范围的行事，实际早已是满城喧哗，当时报界即有详尽的报道，何况还有反对派的推波助澜。但是，曹党并不以此收手，在消息传开后，反而无所顾忌，放手大干，所谓正义、公平、道德、规则等等民主政治的原则早就被抛到了脑后。他们迷信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支票发出，选举即可告成，可谁知还是有人不买账。浙籍众议员邵瑞彭得到支票后，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因运动曹锟当选为大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惩办”，不然“若夫选举行贿，国有常刑，不为举发，何所逃罪？”他还通电各省陈诉此事经过，并将支票正反两面拍成照片，作为贿选证据交各报发表。在直系权力的控制下，京师地方检察厅自然不能受理此案，邵瑞彭为避祸亦随即离京去沪，但他的告发却使总统贿选尚未开张即大白于天下，使曹锟及曹党处于千夫所指之境。而反曹派亦不甘示弱，他们开出更高的价码收买议员，“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265]；期使选举不合法定人数，只是因财力不继，他们“拆台”未成。时人论之为，“京方为贿选，沪方为贿不选”，“亦足见当时议员之信誉矣”[266]。

在直系曹党的重金收买之下，在京国会议员大体达到了进行总统选举的法定人数。10月4日国会召开制宪会议，在驱黎之后国会全体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四十四次之后，此次会议的到会者首次接近法定人数，再加上领票而未到会者，曹党认为选举已可成事，吴景濂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表通告，10月5日进行总统选举。4日晚，曹党聚集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作最后的布置，“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267)]。他们又在各出京车站和路口以便衣军警布控，防止领票议员开溜。

10月5日，国会正式进行总统选举。国会内外戒备森严，北京军警当局首脑王怀庆等都亲临现场指挥，会场可进不可出。不过原定上午开始的选举，因出席者迟迟不够数而不断延时，吴景濂“颇形忧虑之色，急派人分途拉拢。大抵皆由同乡议员及同系议员各一人担任邀请一名议员。大选中坚派议员出入频繁，但见其驱车而出，未几即挟一议员而归，亦可谓卖尽气力矣”。下午1时许，出席者总算达到了593人，超过了法定人数。吴景濂随即宣布开始选举投票，历二小时有余，至4时许结束。结果实际参加投票者590人，曹锟得480票，超过到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三，“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他还有27人共得98票，其中孙中山最多为33票，另有废票12张，内有孙美瑶一张，“五千元”一张，“三立斋”三张等。即便如此，据时人揭露，此次出席议员人数，“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镉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起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而“议员因已得贿款支票，恐是日选会不成，贿款无着，即有

知者，亦相约为之遮掩，故无人当场举发也”[268]。据姚震致杨宇霆函称：“此次选举，真正到场者，止五百三十九人，伪冒者六十余人（诈称到会五百九十七人），而尊处款项到后，即拆出四十人。若无此事，则彼方出席人数可得五百八十人，法定之数系五百八十三人，仅少三数人，无论如何，不能得其伪证矣。……不过由上海返京人数太多，我方面子上不甚好看，然于达到打破合法之点，因得尊处款项接济，幸得告成。”[269]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仅在此次选举是否达到了法定人数，而更在于即便是达到了法定人数，其贿买议员并且多数议员接受贿买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此次选举从程序到实质均难言合法，而只能以其不合法留名于史，声名狼藉，从而彻底败坏了所谓选举和国会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声名。

大总统“选”出来了，制宪亦匆匆走过场而成。10月4日，宪法通过一读，6日通过二读，8日通过三读。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自民国成立之日起历近十二年未能制成，此次经国会三次全体会议、实际只花了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即最后通过，速度不可谓不“快”，效率亦不可谓不“高”。

此次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北京政府时期制定并经国会通过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共分为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主要内容为：一、关于国家性质及人民权利，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非依法律，人民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住居不受侵入或搜索；通信、居住、择业、集会结社、言论著作等之自由，不受制限；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人民之自由权除规定者外，凡无背于宪政原则者，皆承认之。二、关于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由国家立法并执行者，为外交、国防、法律、币制、国税、邮电航空铁路、国债、专卖、文武官吏的任用等；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

者，为农工矿森林业、学制、银行及交易所制度、水利、移民及垦殖、警察制度、公共卫生、文物古籍保护等（省于不抵触国家法律范围内，可制定单行法）；省立法并执行或令县执行者，为省教育、实业、交通、市政、水利、田赋契税、银行、警察保安、慈善公益等。三、关于地方自治权，地方行政划分为省、县两级；省得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及国家法律相抵触；省设省议会，由直接选举产生；设省务院，执行省自治行政，由省民直接选举，任期四年，设院长一人，由省务员互选；省不得缔结有关政治之盟约，不得自置常备军，因不履行国法上之义务，经政府告诫仍不服从者，得以国家权力强制之；国体发生变动，或宪法上根本组织被破坏时，省应联合维持宪法上规定之组织，至原状回复为止；县设县议会，于县以内之自治事项有立法权，县长由县民直接选举。四、关于立法权，国会以参、众两院组成，行使立法权；参院由地方议会及其他选举团体选出，众院分区按人口比例选出；议员不得同时兼任两院，不得兼任文武官员，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三年；以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可弹劾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可对国务员提出不信任案；国会通过的法律，大总统须于十五日内公布，如有异议时，得请求国会复议，如两院仍执前议，应即公布之。五、关于大总统，大总统竞选人资格为年满四十岁以上、居住国内十年以上者；选举程序为国会三分之二以上者出席，其中四分之三以上者通过；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权限为公布并执行法律、任免文武官吏、统帅军队、经国会同意后宣战、缔约、戒严等。六、关于国务总理，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并对众议院负责；大总统所发命令，非经国务员副署不生效力；如众议院对国务员通过不信任案，总统或免国务员职或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七、关于司法权，司法权由法院行之，最高法院院长之任命，须经参议院同意，法官独立批案[270]。

与以往拟订的各种宪法草案相比，此次通过的宪法其最大特色是增加了“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作了划分，规

定国家立法并执行者为十五项，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者为十五项，省立法并执行或令县执行者为十一项；而原草案中“教育”及“生计”两章，则因时间所限没有讨论，也没有包含在最后通过的宪法中。就技术层面而言，这部宪法被认为“是一种联邦宪法”，因其给予地方较多的权力；同时，这部宪法的“精神仍是偏重于责任内阁制的”，有其一定的意义[271]。著名宪政学家张君劢认为：“此项宪法，比较合理。一笔抹杀，国民无此力量，不如赞成之，责以实行。”[272]但就其实质而言，该宪法存续的时间不过一年，“即在该宪存续的期内，该宪条文亦大都未及实施；盖当时直系军阀虽假借此宪以相号召，初无实现此宪的诚意；且该宪本文既无实行细则的规定——该宪公布后，国会亦从未另颁宪法实行细则——该宪中一部分条文，实际上或亦无从实施”[273]。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产生于曹锟总统“贿选”的大环境之中，无论其意义如何，都已湮没在声讨“贿选”的声浪之中，虽有若无，完全无法得到其应有之反响与实践。如时人论，这部宪法的通过，“今非其时，国人不特不颂其功，反因而反对声浪大起。且一部神圣的宪法，亦被议员先生所累，得到‘秽宪’两字的徽号了”[274]。曾任司法总长的知名法学家张耀曾感叹言之：“十年来苦心争持的宪法，竟在这样的时机和环境的里头宣布，真是宪法的大大不幸！这种宪法在当时有实权的人眼中完全等于废纸，那更不用说了。”[275]

国会“选”出大总统之后，吴景濂立即通告各方，并与张伯烈联名致电曹锟，肉麻地恭维他：“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276]吴佩孚亦有电致曹锟，赞其“名高海宇，功在国家，法统重光，遂作华盛顿之第二，共和有庆”[277]。曹锟循例在7日回电国会和内阁，故示谦辞，先说自己“不胜惊悚”，“实殷惶惑”，继又表示“改选之初，宜为慎始之计，陵坡知畏，孱力难胜，诸公伟略匡时，嘉猷素裕，敬希明教，以启愚蒙”[278]。当然了，谦辞是说给外人听的，费如此大劲张罗而成的总统是“不敢推辞”的。贿选告成之日，“保定街市满扎灯彩，各大旅馆均为使署所包

租”；“四面八方，京内外之官僚政客成群赴保庆贺，保定城内大有满坑满谷之势”[279]。

1923年10月10日上午，曹锟自保定浩浩荡荡地进京。北京前门火车站“各门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除公府人员及特任官外，均不得入门。持参观券者，亦只得在车站门外白吃秋风而已”。“前门至公府沿路即已断绝交通，小民中途被阻者亘二小时之久。清晨寒风侵骨，亦苦矣哉”[280]。随后，曹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在“就职宣言”中，以“贿选”而出任总统的曹锟，以“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的姿态，高唱“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他提出推重人才、整理财政、振兴实业、统一全国、维持治安、履行条约、敦睦友邦等政策主张，也多为大而化之的空洞言辞，无甚新意[281]。曹锟由此成为继袁世凯、黎元洪（二次出任）、冯国璋、徐世昌之后的又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锟以公然行贿的方式“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遭到了全国各界及舆论的一致反对与声讨。在非直系统治的各省，均有各种声讨活动及否认“贿选”总统合法性的活动。如孙中山所言，曹锟“选举之种种非法与贿赂情形，玷辱有教化之国家太甚也。……国民若默认此种行为，则不复能自号为有人格之国家以生存于世界，所以中国人民全体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之行为，必予以抵抗而惩伐之”[282]。反直反曹派更有人力图借力将此等声讨转为实际行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召集各要人会议，连日商洽各种议案”，讨论“组织政府，以为讨贼机关”；“实行各省联合讨曹”；“明令通缉附逆议员”等讨伐方案[283]。8日，孙中山以曹锟“贿诱议员，迫以非法，僭窃中华民国大总统，其背叛民国，罪迹昭著”为由，“申命讨伐，我全国爱国将士无问南北，凡能一致讨贼者，悉以友军相视，共赴国难，以挽垂危之局”。同日，孙中山又以参加投票的国会议员“贪污受贿，危害国家，法律

纪纲斩焉俱尽，不有严惩重罚，无以禁贪邪而儆淫顽”为由，“着护法各省区长官将此次附逆国会议员一律查明通缉惩办”[284]。张作霖有电严责曹锟贿选。卢永祥在10月12日通电宣布，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公文往来，以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但因反直“三角同盟”方面此时尚未有充分的准备与直系武力相向，反对曹锟贿选的舆论声讨未能转化为实际的讨伐行动。

曹锟“贿选”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使以国会制和内阁制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由此而声名狼藉，从而在实际上动摇了民国法统的政治基础。本来，民国成立后引入西式民主制度的不成功实践，已经使社会各界和舆论啧有烦言，认为弊端多多，但在此之前，人们对西式民主制度本身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而将其弊病归之于军阀作乱。然而，此次曹锟“贿选”的情况却有不同。论者曾有如此之疑问：“他们既已如此不要面孔，尽可直截了当的把曹锟抬到总统的椅子上坐了就是，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285]或许以曹锟为代表的军阀首领对舆论和其他方面的反应仍不无“敬畏”，因此孜孜以求“合法”之手续，以图安然延续“合法”之法统。但是，“贿选的目的在为北京政府找一个合法有道的基础，但结果使直系变成1919年的皖系一样，完全失去了合法有道的根据”[286]。

然而正因为如此，反凸显出国会制度的重大缺失，因为“大选而非本诸民意，微论产生无自，即令顺利产生，人民之反对，亦不为之少减。而为猪仔者，则有所弗计，以为既一产出，则五千元之代价，即不难满载以去，国人之唾骂，身后之恶名，曾何足动其一瞬”。故此国会议员的表现是此次贿选过程中最为外界所诟病者。如论者所谓：“议员之无耻，与其紊乱国政之罪，可谓至是而极。一般议员复不顾舆论之奚若，而抱定其金钱自金钱之主张，不稍顾虑。是则议员故意与人以不利之心颇为明显，国人对之，无再容忍之余地矣。”“曹锟利议员之可买，以窃大位；议员亦利曹以金钱，达拜金之目的。是

曹锟与议员，实系交相为用，其理殆同诸私人间之买卖交易。曹锟与议员之关系，既系如是构成，则凡因此种买卖，而发生之结果，当然亦只能认为私人间之一种交易。与国家人民，绝不能有何种关系。换言之，即国家人民，对于此种行为，并不能予以承认者也。”[287] 即便是“贿选”策动方直系的负责官员，私下里也对国会议员的人格颇为鄙视，认为他们“日日索津贴，要岁费，荐托私人，要求权利，为唯一之要索”。负责贿选的直系官员熊炳琦到了北京后，“至不敢有一定之寓所，日易其地，以为规避，其厌苦尤甚”[288]。直系首领吴佩孚私下里也骂，“国会如此行动，真是要不了的东西”[289]。国会议员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以钱换票，说明所谓议员的身份和地位，不过是他们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致时人对国会议员“人皆厌之，至视为炎暑中之蝇蚊，欲挥去之而后快”[290]。从此以后，时人皆以“猪仔”称呼国会议员，再没有人视国会为庄严的神圣的立法机关。“国会既已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291]。当下论者论之为：“国会议员在历经二次解散之后，锐气早已消磨殆尽，十年来南北奔驰，饱经患难，至此不免暮气沉沉，在时局上颇难有所作为。甚且，更有为己图者，欲藉此国会恢复之机，大捞一笔，好颐养天年。既为图谋一己之私，各党派在没有民意作后盾的基础下，只能各自依附具有实力之军阀，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吴景濂乃藉助直系的支持，以国会领导人的身份，恣意拉拢操纵。”“面对暮气沉沉，只谋私利的国会议员，舆论乃代之以嘲弄揶揄，议员之品格日趋低下，国会之威望亦随之下降，所谓的法统象征，也变得无足轻重，不再为人所重视。”[292]

作为西式民主制度基础之国会制的坍塌，也使本已逸出其创立者最初设计的民国政治运行轨道再为之而变，向着否定西式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着重统一集权的政治方向急行。此后，国民革命浪潮如狂飙突起，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亦因此而生发，并为多数国人所认同。由此而论，曹锟“贿选”于民国政治及其法统乃至军阀武人统治的影响都不可谓不大。自辛亥革命创立民国而成的民国既有法统，至此已经由

其实际运作的失范而无可挽回地处在中落的过程中；依附于民国法统而维系的北洋武人政治，也因此失道而走上衰败之途；直系统治虽经此贿选而达至其对北京政治短暂控制的最高峰，但也因此埋下了其失去民望、内部分化并在次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种因。凡此等等，均与此次贿选大有关系，只是在当时，其深远影响还没有充分表现于外在而已。

---

(1) 《吕海寰等致内务部公函》（1920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90—391页。

(2) 《曹锐等咨呈大总统》（1920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88—389页。

(3) 《胡源浚等致国务总理电》（1920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76页。

(4) 王小隐：《直奉三大秘密》，中国第一书局上海1922年版，中编第11页。

(5) 《董康之北京财政谈》，《时报》，1922年8月26日。

(6) 宗淹：《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东方杂志》第19卷第9号，第122页。

(7) 《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9卷第23号，第115页。

(8) 《民国以来一百七十九次之兵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第148页。

(9) 《河南增兵声中之兵变与匪警》，《时报》，1922年7月23日。

(10) 《宜昌驻军又哗变》，《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26日。

(11) 《民国以来一百七十九次之兵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第148页。

(12) 《郭树棠等致大总统呈》（1922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46页。

(13) 《九江公团痛陈兵变被害情形》，《时报》，1922年8月9日。

(14) 《豫有匪患之难除》，《时报》，1922年8月23日。

(15) 《水深火热之河南》，《时报》，1922年7月18日。

(16) 《浙东剿匪的计划》，《时报》，1922年8月27日。

(17) 《鄂属通山县失守详记》，《时报》，1922年7月1日。

(18) 《西报记鲁匪与日人之关系》，《时报》，1922年3月20日。

(19) “老洋人”外号的由来说法不一。一说是“因其身躯高大，黄头发、黄眼睛、深眼窝、高鼻子，貌似外国人，绰号‘老洋人’”；一说是“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洋人厉害，就气愤地说：‘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遂被称为‘老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1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页）

(20) 《西报之豫省匪乱经过谈》，《时报》，1922年12月24日。

(21) 《豫匪蹂躏河洛之经过详情》，《豫省匪患之难除》，《时报》1922年10月8日、8月23日。

(22) 《陕灵残破后之豫西匪讯》，《时报》，1922年8月25日。

(23) 《张福来到任后之豫局》，《时报》，1922年11月13日。

(24) 《豫匪惹起各国交涉》，《时报》，1922年11月19日。

(25) 《豫匪猖獗与外交团》，《时报》，1922年11月18日。

(26) 《剿匪声中之豫讯》，《时报》，1922年12月5日。

(27) 《老洋人也死了》，《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第7—8页。

(28) 关于“老洋人”的结局，一说是在战斗中身亡，一说是被其部下参谋长丁宝成刺杀，一说是自缢。《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1辑，第55页。

(29) 《临城案将如何了结耶》，《时报》，1923年5月19日。

(30) 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临城劫车案》，1996年版，第33页。

(31) 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1923年版，序言第1—2页。

(32) 《交通部致内务部咨》（1923年5月8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57页。被劫外国旅客人数诸说不一，二十余人为多数说法所认可。

(33) 独秀：《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向导》，1923年5月号。

(34) ［美］菲尔·比林斯利著，王贤知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35)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3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台北1979年版，第607—608页。

(37) 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序言第1—2页。

(38) 坚瓠：《国际共管》，《东方杂志》第20卷第11号，第1页。

(39) 参见《临案调查录》、《枣庄十日记》，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0) 《君山绥抚录》第1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1) 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after *FRUS*), 1923, Vol. 1, pp. 639-640.

(42)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8, *FRUS*, 1923, Vol. 1, pp. 642-643.

(4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June 1, *FRUS*, 1923, Vol. 1, pp. 650-651.

(44) 《君山绥抚录》第22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5) 薛城史志办：《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案》，《临城劫车案》，第251页。

(46) 《津浦劫案与曹吴之责任》，《顺天时报》，1923年5月10日。

(47) 蒋永敬：《临城劫案和文献》，《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第59页。

(48) 《临案调查录》第36—3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9)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50) 《临案调查录》第44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51)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52) 《临案调查录》第4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53) 《津浦劫案与曹吴之责任》，《顺天时报》，1923年5月10日。

(54) 《君山绥抚录》第1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55) 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9，*FRUS*， 1923，Vol．1，p．632．

(56)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5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607页。

(58) 《外交部致曹锟急电》（1923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16页。

(5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607—608页。

(6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607页。

(61) 《临案调查录》第38—39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62) 《临城劫车案》，第34页。

(63) 《临城土匪大掠津浦车》，《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第5页。

(64) 《田中玉致外交部等电》（1923年6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19页。

(65) 《君山绥抚录》第3—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66) 1923年12月19日，山东督军郑士琦指使苏皖鲁豫剿匪副司令张培荣以“杀人越货，罪恶贯盈”；“抗不遵令，自由行动，显露反谋”为由，将孙美瑶诱杀于枣庄。参见《郑士琦致国务院等密电》（1923年12月20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63、80页。

(67)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9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30页。

(68) 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4；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5，*FRUS*， 1923，Vol．1，pp．637，659-660．

(69) 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9；The British Charg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0，*FRUS*， 1923，Vol．1，p．661，673-674．

(70)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6，*FRUS*，1923，Vol．1，p．653．

(7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Charge，July 9，*FRUS*，1923，Vol．1，pp．675-677．

(72) 刘师舜：《关于临城劫案国民外交之一页》，《传记文学》第17卷第5期，第20—21页。

(7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uly 9，*FRUS*，1923，Vol．1，pp．677-678．

(74) 《外交使团致外交部照会》（1923年8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23—227页。

(75) 南雁：《铁路共管与护路警备》，《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5—7页；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1，*FRUS*，1923，Vol．1，pp．689-690．

(7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August 25，*FRUS*，1923，Vol．1，pp．690-692．南雁：《铁路共管与护路警备》，《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5—7页。

(77)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9，*FRUS*，1923，Vol．1，pp．692-694．

(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318页。

(7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211、275、322页；南雁：《铁路共管与护路警备》，《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5—7页。

(80)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9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27—230页。

(8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468页。

(82)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31—232页。

(83) 《外交使团致外交部照会》（1923年8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23—227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8—329页。

(8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293页；《临城劫车案》，第24页。

(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256页。

(87) 《田中玉致外交部电》（1923年8月14日），《山东省各界代表张思伟等请拒驳临城劫车案通牒以重主权致内务部总长高凌霨请愿书》（1923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22、233页。

(88)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8，*FRUS*，1923，Vol．1，pp．694-695．

(89)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9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27—230页。

(90) 《外交使团致外交部照会》（1923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31页。

(9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October 4，*FRUS*，1923，Vol．1，pp．702-704．

(92)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23，*FRUS*，1923，Vol．1，p．646．

(93) 《使团态度变化之经过》，《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20日。

(94) 《曹锟当前之难关》，《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14日。

(9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年1至6月份），第637页。

(96) 南雁：《临城劫车案的对外屈服》，《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第3页。

(97)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31—232页。1924年4月3日，驻京外国公使团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临案赔偿共计35万元。外交部认为这与中国的赔偿抚恤方案相差太大。22日复照公使团，要求共组委员会调查损失。6月

5日公使团覆函拒绝调查。其后，此案赔偿不了了之。

(98) 南雁：《临城劫车案的对外屈服》，《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第4页。

(99) 《曹锟辱国如此》，《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22日。

(100)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88页。

(101) 《张绍曾答美国记者问》，《临城劫车案》，第9页。

(102) 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期。

(103) 史文彬：《二七的精神是什么》，《中国工人》第6期。

(104) 《王光宇呈王怀庆》（1923年1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55页。

(105) 《吴佩孚致靳云鹗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第716页。

(106) 邓中夏：《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

(107)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北京1984年版，第243页。当过后中共领导人发现吴佩孚有镇压图谋时，有人又建议罗章龙找白坚武向吴进言，罗认为：“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因此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4期。

(108) 《吴佩孚致靳云鹗电》，《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16页。

(109) 《京汉工人流血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20页。

(110)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4期。

(111)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21页。

(112) 《长辛店分工会之两通电》，《京报》，1923年2月5日。

(113) 《京汉路罢工之起因》，《晨报》，1923年2月11日。

(114)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34页。

(115) 2月5日，河南督军署参谋处李炳之在给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陆锦的信中表示了这种担心。信称："此次京汉工人开会一节，固暗中有人主使，希图扰乱破坏，而各处与会来宾赠送匾额文词尤堪注意，其中有'劳工神圣'、'总会无敌'、'健者先进'、'前途胜利'等句。其最荒谬者，如谌家矶扬子厂工会送'赤焰辉煌'，武昌高等师范学生……送'大地赤化'各匾额，实具有赤党共产之恶思潮，如不严加制止，设法惩除，则邪说谮润，鼓惑工人，群焉骚动，渐及军警各界人士，则国家秩序曷堪设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河南督军署参谋处李炳之关于京汉路工人开会及地方动荡情况致陆锦函》（1923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57页。

(116) 在罢工高潮前后，"据外交界消息，公使团以各路罢工风潮，外商受绝大影响，昨已照会外部，质问有无消弭及取缔方法。政府已预备答复，其措辞大约以京汉工潮既经解决，交通即可恢复原状云"。《各路工潮未息中之各方面》，《晨报》，1923年2月12日。

(117) 《汉口警察厅之通传》，《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33页。

(118) 《京汉铁路管理局布告》，《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14页。

(119) 《京汉路罢工不难解决》，《益世报》，1923年2月6日。

(120) 《王怀庆呈文》，《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第24页。

(121) 《京汉路罢工风潮将不可收拾》，《晨报》，1923年2月7日。

(122) 《长辛店兵工之大激战》，《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53页。

(123) 《京师宪兵司令部关于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情况报告》（1923年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59—60页。

(124) 《京汉路罢工中之惨剧》，《晨报》，1923年2月8日。

(125) 《直鲁豫巡阅使参谋处关于解散长辛店工会应迅速办理函件》（1923年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66—67页。

(126) 《长辛店兵工之大缴战》，《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53页。

(127)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第20期。

(128) 《京汉路工潮之汉口惨剧记详》，《大公报》，1923年2月12日。

(129) 《汉口警察厅之通传》，《新闻报》，1923年2月9日。

(130)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第20期；《江岸惨剧》，《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12—215页；《京汉工人流血记》，《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466—468页。

(131) 《施洋遇难》，《施洋枪毙情形补志》，《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35、第251页。

(132) 《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42页。

(133) 《鄂萧惨戮工人之隐患》，《晨报》，1923年2月23日。

(134) 《萧耀南关于汉口镇压铁路工人通电》（1923年2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62页。

(135) 《京汉路罢工风潮之豫闻》，《新闻报》，1923年2月10日。

(136) 《请看郑州绅士不许工人饮水》，《京报》，1923年2月12日。

(137) 《郑县国民大会决议六条办法》，《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50页。

(138) “二七”惨案死难人数说法不一，此据平汉铁路各工会联合办事处事后调查所得之《平汉铁路“二七”事件死难工友姓名及事实调查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89页。

(139) 《国务院议决逮捕罢工工人交军法处从严处理密电》（1923年2月9日），《内务部关于严防过激党鼓动罢工罢市密电》（1923年2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64页。

(140) 《曹锟致阎锡山等电》（1923年2月1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32页。

(141)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103、105页。

(142) 《京汉铁路工人之罢工》，《顺天时报》，1923年2月8日。

(143) 《昨日施林及二七遇难工人追悼会》，《晨报》，1923年3月23日。

(144) 《京汉路工潮昨日之形势》，《晨报》，1923年2月9日。

(145) 《京汉工人流血记》，《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563

页。

(146) 《大总统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20页。

(147) 《京汉路工人在汉又遭惨杀》，《晨报》，1923年2月10日。

(148)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向导》第20期。

(149) 《王光宇报告曹锟暗派心腹进行贿选活动情形呈》（1922年9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05页。

(150) 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21页。

(151)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152)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3年1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23页。

(153) 愚公：《吴佩孚最近之态度》，《晨报》，1922年11月19日。

(154)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55)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8月8日。

(156) 《吴佩孚反对总统选举》，《晨报》，1922年11月3日。

(157) 《张绍曾通电》（1923年1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7页。

(158) 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190页。

(159) 《津派攫夺政权之因果》，《申报》，1923年8月7日。

(160) 《李济臣复陆锦密电》（1923年5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385—1386页。

(161)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

(162) 《亦云回忆》上册，第183页。

(163) 李根源：《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6页。

(164) 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第41页。

(16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48—149页。

(166) 李根源：《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7页。

(167) 《国会弹劾张绍曾内阁案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6页。

(168) 《王怀庆为北京军警薪饷积欠无着指责张绍曾内阁电稿》（1923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0页。

(169) 《王怀庆请准予开去本兼各职等情胁迫黎元洪去位呈》（1923年4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1页。

(170) 《王怀庆冯玉祥历数政府之罪意逼黎元洪去职电稿》（1923年4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4—1385页。

(171)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3年5月2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49页。

(172) 《制宪前途之一线希望》，《申报》，1923年5月24日。

(173)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3页。

(174)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1—162页；梓生：《北京的政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0号，第2—3页。

(175)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3页。

(176) 《张绍曾内阁为助曹倒黎集体辞职通电》（1923年6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8页。

(177) 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21页。

(178) 《田子琮致阎锡山电》（1923年6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56页。

(179) 《黎元洪关于被逼出走通电》（1923年6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1页。

(180) 《黎元洪关于被逼出走通电》（1923年6月7日），《中华民国史

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1页。

(181)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3年6月10日、11日，第249页。

(182)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6月9日，第421页。

(183) 《田应璜致阎锡山电》（1923年6月1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56页。

(184)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99页。

(185) 《〈京兆时报〉报导直系索饷逼黎元洪去职等情》（1923年6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6—1387页。

(186)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301页。

(18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7页。

(18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8页。

(189) 《曹锟查询总统印信及国玺致王怀庆密电》（1923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3页。

(190) 《王承斌报告在津向黎元洪追索总统印玺未果等情电》（1923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4页。

(191)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75—176页。

(192) 《王承斌报告在津向黎元洪追索总统印玺未果等情电》（1923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4页。

(193)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77页。

(194) 《王承斌等关于黎元洪被迫辞职赴津及办理总统印玺电》（1923年6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5页。

(195)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6月13日，第422页。

(196) 当时参众两院议员共有870人，而当日出席人数只有467人，不足讨论重要事项须有五分之三（522人）出席的法定人数，故只能开谈话会。

(197) 为了拉拢议员出席国会会议并疏通他们的意见，曹党决定向每位

议员致送端午节“节敬”500元，未领者派人送至其宅。

(19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86—188页。

(199) 《郭同反对黎元洪离京后阁员非法摄政函稿》（1923年6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9页。

(200)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74、205—206页。

(201) 《姚震信》（1923年6月22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202) 《陆锦就大选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7月7日），李家磷、郭鸿林、郑华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52页。

(203) 《曹锟致吴景濂函》（1923年7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367—368页。

(204)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65、569页。

(20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0页。

(206) 本来吴景濂有意“游说双方，令顾维钧组阁，保派不欲受骗，故未成功”。《田子琮致阎锡山电》（1923年6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56页。

(207) 据顾维钧回忆，他不就职是因为罗文幹案未解决，而游说者同意，只要顾就职，就释放罗文幹。顾表示他将在罗被释放的当天就职。最后双方达成妥协，顾先就职，接着由内阁批准司法总长下令放罗。顾当场同意，并于第二天到部视事。（《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9—260页）实际上，此时“罗案”已经解决，可能顾将此前关于“罗案”的争执误记于此。

(20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52、354、357页。

(209) 《伪阁将因穷拆台》，《民国日报》，1923年7月23日。

(210) 《王克敏登台包办伪选》，《民国日报》，1923年7月12日。

(211) 《各方面警告王克敏从速辞职》，《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7月17日。

(212)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8月1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90页。

(213) 《曹派伪选已绝望矣》，《民国日报》1923年7月16日。

(214)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94—295页。

(215) 《王承斌通电》（1923年7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0页。

(216) 《津函中之直派阴谋谈》，《民国日报》，1923年7月11日。

(21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00—303页。

(218) 《联曹说无稽之明证》，《民国日报》，1923年7月11日。

(219)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01页。

(220) 《段祺瑞与西报记者谈话》，《民国日报》，1923年8月14日。

(221) 《姚锡光筹组国民促进选举会以监督两院确保曹锟当选电》（1923年6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07页。

(222) 《王毓芝等致刘楚臣密电稿》（1923年8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1页。

(223) 《国会议员通讯》第78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43、1446页。

(224)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68—569页。

(225) 《国会议员通讯》第81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7—1458页。

(226) 《陆锦关于取缔北京公团联合会所发黎被逼出京等情与王怀庆往来函》，《孟效曾等推举曹锟出任临时总统快邮代电》（1923年7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00—1401页。

(22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10页。

(228) 《姚震信》（1923年6月22日、7月2日），《奉系军阀密信》，第67、70页。

(229)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00页。

(230) 《离京议员再揭曹派阴谋》，《民国日报》1923年7月6日。

(231) 《杨毓珣信》，1923年9月，《奉系军阀密信》，第83页。

(232)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6页。

(233) 《吴景濂在参众两院议员茶话会上的讲话》（1923年6月20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二），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553页。

(234) 《张书元致陆锦函》（1923年8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4页。

(23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48页。

(236) 《孙洪伊反对议员南行》，《申报》1923年7月9日。

(237) 《杨宇霆信稿》（1923年7月27日）、《王永江信》（1923年8月），《奉系军阀密信》，第74—75页。

(23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20页。

(239) 《起劲拥曹中之两吴》，《民国日报》，1923年8月25日。

(240) 《金钱支配之政客拥曹声》，《民国日报》，1923年8月23日。

(241) 《铜臭熏天之大选》，《民国日报》，1923年8月27日。

(242) 《彭养光告发吴景濂》、《臭气熏天的北京政讯》，《民国日报》1923年9月1日、2日。

(243) 《臭气熏天的北京政讯》，《民国日报》，1923年9月2日。

(244)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7—169页。

(245) 9月10日的预备会会后查明被冒签的议员至少在15人以上，被冒签的议员张瑾雯致函吴景濂，质问“此等伪造行为，实已入刑事范围，议长自不得辞其责任。且到会人数既发生伪造问题，若不切实查究表明事实，则当日人数多寡，已属不能确定，选举预备会勿得遽认为成立”。孙曜亦发表通电，揭露吴景濂预选舞弊之黑幕。曹党遂派警察监视张瑾雯和孙曜的活动，张被迫逃往天津，孙曜亦潜行离京南下。此后，吴景濂将众院议事科科长及两院管理签到之职员概行更换，代以亲信。对于反直派议员，“一为监视；二为迫害；三为保护。美其名曰保护，实为拘留形式”。《国会议员通讯》第70、78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3、1442页。

(24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9月1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93页。

(247) 《国会议员通讯》第7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3页。

(248) 《伪阁将因穷拆台》，《直系筹款借款之进行》，《民国日报》，1923年7月23日。

(249) 据时人言说："曹锟任直隶督军时，鄂籍某要人往贺。曹曰：'何足贺，谁有钱，谁做官。'"（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64页）由此可见曹锟对政治与金钱关系的理解。

(250)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0页。

(251) 《国会议员通讯》第8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49页。

(252) 《国会议员通讯》第7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5页。

(253)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9月1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95页。曹党曾有动议，如果国会选举实在不成，则拥曹锟以"合法"方式为国务总理，再以"摄政"名义出任总统，不过曹锟对此等过于盲干的方法并不认可，遂搁置不论。

(254) 《国会议员通讯》第8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0页。

(25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56) 《国会议员通讯》第81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5页。

(25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86页。

(258) 《国会议员通讯》第82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60页。

(259) 《拥曹派可以休矣》，《民国日报》1923年9月26日。

(260) 《国会议员通讯》第68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28页。

(261) 梓生：《大选与反对运动同时急进》，《东方杂志》第20卷20号，第2页。

(262)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96、399页。

(263) 《高洪魁就甘石桥分发支票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0月11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1—482页。

(264) 《陈子斌就贿选议员谢某坚持以现索酬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9月30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49—450页。

(26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2—403、414页。

(26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4页。

(26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5页。

(26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7—408、412、416页。

(269) 《姚震信》（1923年10月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96页。

(270) 《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347—360页。

(271)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71页。

(272)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273)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9页。

(274) 朔一：《宪法匆促造成后的反对声浪》，《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第7页。

(275) 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第74页。

(276)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9页。

(27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84页。

(2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488—

489页。

(279) 《攀猪附狗之热闹》，《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2日。

(28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51页。

(28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562—563页。

(282) 《致列强宣言》（1923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4页。

(283) 《大元帅对北方贿选之表示》，《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4日。

(28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494页

(285)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6页。

(286)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287) 《国会议员通讯》第7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7—1439页。

(288) 《留京议员之白头吟》，《申报》，1923年8月8日。

(289) 《国会议员通讯》第81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4页。

(290) 《留京议员之白头吟》，《申报》1923年8月8日。

(291)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7页。

(292) 管美蓉：《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205—206、248页。

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节　曹锟“当选”后的困窘之局

一　各方因应

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总统，但他在“就职宣言”中称自己“初无政治经验”倒是大实话，就曹锟起家的个人经历而言，他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还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武夫，在北洋派系中的资历与辈分也不算很高，对于北京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所须解决的种种难题，曹锟并无多少准备，也没有能力处理，在这方面，他甚至不如其北洋前辈段祺瑞和徐世昌。银行家卞白眉曾经在怀仁堂见过曹锟，他对曹锟近距离观察的印象是：“彼招众人坐，谈其发表对于财政等意见。东拼西凑，似是而非，然彼较介弟曹四（曹锐）先生似较真朴，比之张雨庭（张作霖）则逊其机警，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全在左右之待人否耳。”[(1)] 另据时人所论，“曹膺选后，对其左右谈话，固喜不可言，但及其大政设施，则自觉全无准备，不知总统应如何做法，大有手足无措之象。幸某方代表告以现为内阁制，一切由内阁负责，总统但择任总理，即可端居无事，曹始放心”[(2)]。“某次长对曹条陈时事，曹不纳，某言大帅连庸医多不请，如何医病”[(3)]。言外之意，对曹锟的政治能力表示严重的怀疑，这些都与卞白眉的观察大同小异。故此，当曹锟坐上总统之位后，尚不及体验个人的虚荣，却需要面对内外种种令其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难题。

以民国年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之弱势地位，得到列强的承认

是历任北京当政者上任前后不能不看重的重要环节，曹锟同样如此。他在到北京上任前，就考虑到外国驻京公使团是否在他就职时前来觐贺的问题，因为此事关系到列强对他的态度，如果列强不予承认，他的总统地位也不会稳固。当时，正值“临城劫车案”的交涉期间，列强即以此为由表示是否觐贺须视该案如何处理，给了曹锟一个下马威。在曹锟“忍辱负重”，对列强作出诸多让步之后，列强总算是没有再为难曹锟。10月15日，外国驻京公使集体前往总统府怀仁堂，正式觐贺曹锟“当选”总统（详见本卷第五章第一节）。

有关临城劫车案的对外交涉刚刚了结，“金佛郎案”之交涉又起（佛郎是法国货币法郎当时的译法）。“金佛郎案”的由来与“庚子赔款”有关，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协约国成员，因此对协约国的“庚子赔款”延期五年支付。1922年，“庚子赔款”恢复支付，但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其时佛郎已经严重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三分之一（佛郎当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因此如何赔付这笔款项即大有文章可作，关键在如何规定中法两国货币的兑换率。以当时的市场纸面价，中国货币1元可兑换8佛郎左右，而如果以其含金量换算则只能兑换2佛郎70生丁左右。因此，如果照其纸面价赔付，自于中国有利，而如照其所谓含金量赔付，则中国将吃大亏[(4)]。1922年6月，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谈到庚子赔款之各项账目和应付款项时，第一次出现“金佛郎实与纸佛郎有别”之语，从而埋下了其后中法双方争执的起因[(5)]。7月9日，中法订立协定，法方允将其应得之庚子赔款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办理教育事业、清偿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股金及作为中法实业银行远东存户存款五厘金券基金。但是，该项协定中提及佛郎时均写为“金佛郎”，显见法方有意为此埋下“伏笔”，而中方对此注意不够，未有明确回应。12日，法国公使傅乐猷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送照会，正式提出中国向法国交付的庚子赔款“仍以金佛朗计算”，并称这“不过纯系履行辛丑条约而已”[(6)]。如照法方的提议，则中法协定中的各项数字均自庚款而来，自应以金佛郎计算，中方估计损失将高达6500万元，这不

仅是将佛郎贬值的损失无理转嫁给中国，而且如果中国同意此案，则不仅所谓退款全成虚数，反要平白无故为此付出巨款，“似此增加中国经济上巨额之负担，实可骇异也”[7]。北京政府财政部经研究认为，法国的要求，“本诸辛丑条约精神，似亦不能谓为毫无理由，惟如果准予照办，则不但以佛朗计算之各国部分赔款，均须一律办理，即中政府所欠佛朗债款，亦难保不援例，要求以金佛朗交付，一出一入之间，关系国家利益颇巨”。为此，财政部将皮球踢给了国务院，表示“究竟如何核定办法之处，本部未敢擅决，理合呈候总理批示只遵”。国务会议讨论后，考虑到如果接受法方要求中国将受的巨大损失和各方的强烈反对意见，在12月15日议决，“以纸佛郎计算”[8]。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驻华公使，据理驳回法国方面关于“金佛郎”的各项要求。

但是，法方并不因中国的拒绝而退让，而是节节进逼，毫不放松。1923年2月，法方以其控制的东方汇理银行扣留盐余和拒绝参加关税会议相威胁，限北京政府于10日午前答复法方提议。中方部分官员尤其是与中法实业银行有密切利害关系的王克敏等人，主张接受法方要求，实则是以此谋中法实业银行早日复业（该行于1921年6月倒闭），图谋个人私利。在法方的压迫和内部妥协的态度之下，2月9日张绍曾内阁会议，认为如果不同意法方要求，则法国庚款不能退还，中法协定势必推翻，中法银行存户受损，缓付五年之款必须在五年内分期摊还（原定可以延期之1945年），故“斟酌各项情形”，决定同意法方要求，以金佛郎定案，经大总统黎元洪批“可”，并在法方限定的时限前照会法国公使[9]。消息传出，引起舆论大哗，在习见之爱国与“卖国”的舆论交战之外，“金佛郎案”也被直系津保派用以为倒张阁的重磅炮弹。3月间，比利时等国亦援法国前例，要求他们所得的庚子赔款改以“金佛郎”计算，中国如接受，损失更大，更凸显北京政府同意法国要求之轻率。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金佛郎案”在国会搁浅，北京政府也不敢再轻易应承法方，中法间的“金佛郎案”又成悬案。

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逐，7月曹锟任用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希望通过王这样的“财神爷”筹措总统选举经费。王克敏随即鼓动曹锟承认“金佛郎案”，如此则中法实业银行立可复业，他即可“报效”大选经费200万元，加之“东方汇理银行扣存三个月盐余约百余万元，可以放还”，大选自不成问题[10]。但在外界反对下，王克敏未能就职，“金佛郎案”仍然拖延不决。

曹锟“当选”总统后，法国以承认“金佛郎”为退还庚款及参加关税会议的先决条件，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联合英、美、日、意等国，多次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解决“金佛郎案”。10月3日，国会众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反对“金佛朗案”。11月，财政总长张弧因对此案消极而被免职，王克敏接任财政总长，他因为在中法实业银行的投资而与法国有密切关系，一直主张接受法方的要求。据舆论揭露，他上任后与法国公使就此谈判，双方达成默契，由政府绕过国会，秘密接受法国要求，为此，“法人所扣盐余，即陆续放还”[11]。其时正值吴景濂与高凌霨争夺阁揆，吴得知王克敏正与法方秘密交涉“金佛郎案”并将接受法方的要求，立即以此为借口，在国会对高阁发起猛烈攻击，责其“违约坏法，卖国营私”[12]。事情闹大后，全国舆论和反直派起而责北京政府及曹锟“卖国”，迫使政府不敢再有动作。12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向法、英、美、日等国公使递交照会，再次拒绝“金佛郎案”。1924年2月11日，法、英、美、日诸国公使再向北京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但慑于社会各界及舆论的强大反对声浪及压力，北京政府对“金佛郎案”始终未敢承认。直到曹锟因第二次直奉战争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李思浩担任财政总长，再与法国谈判，法方仍以解决此案为落实华盛顿会议对华各项决议的先决条件。在法方的压力下，1925年4月，中法签订协定，规定法国退还庚款时以金佛朗折合为美元，再以美元折合中国货币计算，总数约为7556万美元[13]。中国实际上还是变相承认了法国早先提出的要求，以中国之财，让法国之利，又一次说明了面对强势列强的中国外交之弱势和无奈。

曹锟当政期间唯一的外交“亮点”，或可谓“中苏协定”的签订及中苏邦交的恢复。1917年苏俄爆发十月革命，苏维埃新政权成立后即不断表示愿意放弃过去帝俄在华享有的各项特权，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中苏双方的交涉一波三折，迟迟未能达成结果。曹锟当政后，经过中苏双方的艰难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有关文件，规定废止中国与帝俄所订之条约协定，归还帝俄在中国的租界，放弃帝俄之庚子赔款，取消帝俄之治外法权，等等（详见第五卷第五章第二节）。“中苏协定”签订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邦交恢复，并升格为大使级。7月31日，苏俄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向曹锟递交国书，这也是近代以来外国派驻中国的首位大使。“中苏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外交取得的重要成果。尽管“中苏协定”在实际上对中国国家利益仍有维护不及之处，如默认了苏俄对外蒙和中东路的实际占有[(14)]，但“中苏协定”毕竟是中国与其他大国达成的完全平等的条约，较那些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所逼迫达成的不平等条约自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此前在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也是中外之间订立的平等条约，但因为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中德协约》的签订有其特殊性。“中苏协定”则是两个主权国家出于自主自愿原则而订立的平等条约，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更具示范意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打开的又一重要缺口，也是“五四”以后中国国家主权地位缓慢回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外交交涉因其专业性而有职业外交官群体应付，且在程序方面相对规范，尚无须曹锟亲力亲为，与之相比，内政方面更是问题多多，尤其是如何对拥戴他上台的亲信左右论“功”行赏，安排位置，实在是困扰着当政后的曹锟，使他不能不细加考量，躬亲过问，疲于应付。曹锟曾经自嘲说：“至北京后，一事未作，只终日下命令，某也将军，某也将军耳。”[(15)] 人事位置的变动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牵涉到各个派系集团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利益关系，其重新洗牌的过程，

就是各个派系集团为此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过程。直系内部的津、保、洛三派，原先是津保派合流，力推曹锟上台，位于舞台的中心，但曹锟上任后，津、保两派即互相争功，争夺位置，势成水火，洛派自居重要地位，形成津、保、洛三派鼎立、混战不已的局面。一时间，北京政坛闹得风生水起，争得不可开交。

10月15日，曹锟宣布封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为上将军，晋升令刚刚发布，便招来外交团对田中玉受封的质问，逼得曹锟只能劝说田中玉主动请辞，以敷衍外交团，好不狼狈。好在上将军不过是虚衔，并非实职，真正令曹锟费思量的是如何安排那些手下的实权派。

曹锟出任大总统后，他所任的直鲁豫巡阅使不能再由自己兼，循例应由副使吴佩孚递升，但是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却很微妙。一方面，吴佩孚是曹锟的头号大将，也是直系打天下的头号功臣，曹锟不能不倚重；但也正因为如此，吴佩孚对曹锟又难免功高震主之势，而且吴关心政事，干预人事，有其主见，给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之感，洛阳巡阅使署久有“第二政府”之讥，又使曹锟不无疑虑。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干政过勤。如中俄交涉方有端绪，彼竟通电反对，甚至海军亦问，萧珩珊（萧耀南）亦问。库伦则拟保都护使，西蒙则拟保屯垦专使，京畿卫戍总司令方欲更动，渠即来电保奖张子衡（张福来）、王孝伯（王承斌）、萧珩珊之遗缺。”[16] 加以吴佩孚自视甚高，为人自傲，比较清廉，在直系内部并不受待见，甚而有被同僚孤立之势，津保派对吴明面上敬而远之，内心里实图限制其发展，并不断在曹锟耳边说些吴的闲话，以引起曹的反感。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主张亲浙疏奉，准备未来对奉作战，津保派的多数则主张亲奉疏浙，目的是希望将吴的势力以对付皖系为名引向南方，减少其在北方说话的地位。因此，津保派不希望吴佩孚接任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而提议任他为粤桂滇黔川湘鄂经略使，移驻汉口，专事对南。不过，吴佩孚毕竟是直系当政的“功臣”和支柱，也是未来直系可

能与敌对各方交手时曹锟赖以为依靠的股肱之臣，曹锟不能不考虑疏远吴可能引致的后果，反复思虑，还是在11月11日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同日又任命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为直鲁豫巡阅副使。14日又晋升王怀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萧耀南、阎锡山为上将军。虽然曹锟煞费苦心，在晋升吴佩孚的同时，也安置了齐燮元、王承斌等人，但王承斌等并不满意。王承斌自认对于曹锟“当选”立有殊功，而曹锟确实也不想亏待他，本来内定由他接田中玉任山东督军，但由于山东将领的反对而未成。过后，王承斌虽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却是吴佩孚的直接下属，吴对他抱有戒心，吴的亲信左右也都听命于吴，不拿他当回事，使王承斌对吴佩孚心生怨言。在直系内部，冯玉祥本因河南督军问题与吴佩孚不睦，埋怨曹锟“不知礼贤下士，老者以为老而无能，少者以为缺乏学问经验，致使谗谀之辈，乘隙幸进，遮蔽聪明”[17]。齐燮元地处南方，自成势力，有意自立门户。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都对吴佩孚不满，在此基础上结成了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他们的结合影响到直系团体的稳固，成为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重要远因。

武人的安排之外，文官的位置也令曹锟终日不得安生。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位置，是各派系集团争夺的焦点。自张绍曾内阁垮台、黎元洪被逐后，北京政府总理位置一直空缺，而以“摄政内阁”的名义处理政务。曹锟上任后，“摄政内阁”于法理已不合，决定辞职，但前总理张绍曾又在其中搅局。因为张绍曾从未辞去其总理头衔，此时尚有复职的幻想，因此不愿在辞呈上署名，理由是“此回是摄政内阁辞职，不是张阁辞职，焉有我署名之理？实际上张阁于六月十三日即已中断，六月十三日以后之事，非我所得闻，我未就摄阁职，亦不用辞。否则我若列名辞职，是我已认曾遥领摄阁，而六月十三日以来，摄阁所干之勾当，均将由我负责，我岂有如此笨法？且我于三爷（曹锟）交情，并未丧失，我上辞呈，三爷必一度挽留，届时我不回来，对不住三爷，我若回来，又不成话说，所以我只有不署一法”[18]。

如此江湖语言，倒也表明张绍曾的“实在”。不过，张绍曾此时已是闲人，高凌霨等自奉曹锟亲信，哪里还有兴致陪他玩，所以干脆不理张绍曾，而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的当天径递摄阁辞呈，“摄政内阁”从此终止。

二　阁潮纷争

“摄政内阁”结束后，总理位置再不能空缺，但由谁出任总理却成了曹锟的头号难题，并由此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剧烈的拥阁与倒阁潮。

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自恢复法统后，即以包办曹锟大选为己任，……日与直系要人蝇营狗苟，以徼私利”[19]。他为的就是总理职位，而曹锟也曾表示，“如大选成功，余必借重阁下，秉政中枢”。再加有津派的全力支持，吴景濂因此而踌躇满志，内定阁员人选，筹措组阁经费，对总理职位势在必得，每每与人言：“恐怕免不了出来牺牲一下。”[20] 但是，“摄政内阁”存立期间一直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高自认对曹锟“当选”总统及处理国务有“大功”，对出任阁揆自然当仁不让。高凌霨不似吴景濂那般高调，而是暗中与亲近曹锟的保派要员勾连，采用迂回之法，向曹锟建议，“正式内阁，须容纳南北人才，以示无把持政权之野心。且于国会闭会期间，组织正式内阁，似有不尊重国会之意”[21]。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由高凌霨暂代总理，阻止吴景濂上台，再伺机扶正。

直系津、保两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态度一致，共同对外，但对于总统“选”出后如何组织新政府，却为了各自派系的利益而产生尖锐的矛盾，津派支持吴景濂，保派支持高凌霨，两派互不相让，使曹锟难以取舍。吴佩孚及洛派对津保派在总统选举一事上的操切之举向有不满，吴佩孚曾经拍案大骂王承斌、吴景濂等“陷大帅于不法，此一般非法劝进之徒，非严惩不足以谢天下”[22]。因此，吴佩孚“极为反对”吴景濂组阁，甚而批示云：如改吴姓（吴景濂）则不过问[23]，以示其决绝态度，以此给曹锟施加压力。吴佩孚还联合齐燮元、冯玉

祥等实力派，提议由职业外交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颜惠庆组阁，以解决外交、内政种种难题。

面对此等矛盾重重的派系纠葛，曹锟亦觉无奈，又难下决断，只能采取回避矛盾、维持现状的办法，在上任后于1923年10月12日令高凌霨暂代总理，作为新阁成立前的过渡。

吴景濂企望出任总理而未成，颇为不满。吴的左右认为，“非取得内阁大权直可谓之根本失败，前功尽弃而已。……苏洛两方对兄均无善念，而某派人运动反对为自取计者则尤力也”[24]。其实，所谓旁观者清，早有人告诫吴景濂，“曹家成功，兄未必能见容于直派，观高（凌霨）、吴（毓麟）、熊（炳琦）、王（承斌）之内讧，即可以测将来，兄势成骑虎”。[25]但吴景濂并不甘心如此，为达组阁目的，他利用自己控制的国会左右开弓，一方面散布如提名颜惠庆组阁国会决不通过的舆论，另一方面又利用“金佛郎案”等猛力攻击高凌霨。吴的做法引来高凌霨的反弹，他在保派支持下，“吸收反吴派诸议员，停止各小政团津贴，俾令窘迫来归”，并成立宪政党，由王毓芝任理事长，高凌霨等任理事，以入党者每人每月津贴200元的代价，诱惑议员参加，“主要目的，则在推倒吴景濂，使并议长而不可得，丧失国会之地盘”[26]。为了推倒吴景濂，保派议员还提出议长三年任期已满，应予改选，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吴景濂则依据新宪法提出，总统应在国会正式开会后七日内提出新任总理人选，逼曹锟表态。

津、保两派争斗愈演愈烈，令曹锟实在头疼。吴景濂已成众矢之的，仅仅是吴佩孚的反对，就难以起用；高凌霨和颜惠庆有吴景濂把持的国会作梗，也难通过。曹锟最后只能决定并弃吴、高而不用，在颜惠庆的推荐下，改请技术官僚、曾在袁世凯时代担任过外交和财政总长及代总理、时任税务督办的孙宝琦出任阁揆。孙与贿选及派系相争无关，长期浸淫政坛，资格老到，为人温厚，关系圆滑，对他的提名比较便于通过。10月30日，曹锟将孙宝琦组阁案提交国会，津、保

两派争斗的战场又因此而转到国会。

11月5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保派的意图是，拖延国会对内阁案的表决，尽量延长高凌霨的代理任期，再作打算。“因国会自身在众议院议长改选问题未解决以前，不能讨论总理同意案。故此案至于最后之可否决定，尚须经过相当时日，而曹、高亦并不切望孙宝琦之通过，即正式内阁成立愈迟，则高凌霨代理之局愈可继续维持现状也”[27]。吴景濂自然洞悉高凌霨的用心，便反其道而行之，令己派议员猛烈攻击高凌霨的劣迹，并同意孙宝琦组阁，俟搞垮高凌霨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天开会时，吴景濂提议投票表决孙宝琦组阁案，但反吴议员提出吴景濂的议长任期已满，要求先行改选议长。结果，反吴与拥吴议员均言辞激烈，直至演出全武行，吴景濂亲率院警参与殴击反吴议员，致会议无法正常进行。8日，“吴景濂求见曹锟，诉说其帮助大选之苦及始终拥护总统之诚，请曹设法清弭院内推翻议长之风潮，曹以院内事‘无权干涉’答之，吴悻悻退出”[28]。

此后，众议院多次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但皆以拥吴与反吴议员的激烈对峙而流会。12月18日，众议院再度开会，拥吴议员借“金佛郎案”猛攻高凌霨并提议通过孙宝琦组阁案，而反吴议员则认为吴景濂已失议长资格要求他退出主席位置，双方最后大打出手，吴景濂被投掷的墨盒击伤头部，反吴议员多人被院警拘禁并殴打。随后，反吴议员向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吴景濂，并要求高凌霨保护议员安全。还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院内屡次飞掷墨盒，意气用事，人人自危。请将议席所有墨盒尽行撤去，易以铅笔、硬纸，遇投同意票时，用点喝法令议员就国务委员席上写票，可以免去危险不少”[29]。19日，高凌霨下令撤换原派院警，另行派员接替[30]。吴景濂及其同党认为：“政府既下如此强辣手段，我方非谋最后办法，则同人已无在京立足之余地。”[31]遂于2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并通电声明“对于本院职务既不能行使，个人行动亦复失其自由，爰于本日往津调养，惟自出京以后，众院一切行为皆属非法”[32]。经过此番争斗，本已

因“贿选”而声名狼藉的国会形象更是江河日下，而吴景濂与高凌霨双方互相攻击，大揭老底，也可谓两败俱伤，形象与做派较为“超然”的孙宝琦得到多数国会议员的认可，1924年1月9日孙宝琦组阁案在众议院被通过，阁揆争夺在曹锟上任并历经三个月的激烈政潮之后总算暂告一段落。

孙宝琦上台后，在曹锟的授意下，组成以保派人物为中坚的内阁，并发表其政见为：一、以宪法统一中国，着手内政之清明；二、增加二五关税，以从事内债之整理；三、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增加国际之地位。但孙宝琦发起召开的“和平会议”，未得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反对派领袖的回应，所谓“宪法统一”自无可能；增加关税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均需列强点头，诚非短时可办，3月12日驻京公使团开会讨论中国财政问题，决议要求中国速行整理无担保及担保不确实之外债，迅速偿还逾期外债本息，在中国未整理外债以前不给予财政援助[33]。列强的态度对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孙宝琦提出的三项政见实成空文。

孙宝琦内阁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困难。北京政府的财政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无时不在困窘中度日，而直系当政时期的财政困难尤甚，借债无方，加税无术，只能靠临时借支和滥发钞票维持一时。曹锟上台后，“原欲军警及机关满发一个月薪饷作面子，讵筹划多日，今日支配军警十成，机关只二三成，大失所望，财源之竭，可见一斑”[34]。孙阁上任时恰逢1924年年关，官吏欠薪“无术支配发放”；军警饷项“现已积欠六个整月之久”；“他如各军来京索饷代表，仍困居旅馆，因川资告罄，均有不能出京之势也。猪仔两院议员岁费，经秘书厅及行政委员会推出索薪之代表，向中央屡次交涉，均归无着”[35]。就连一向筹款有方、号称“财神爷”、被曹锟寄以厚望的财政总长王克敏，对此等困境也无可奈何。他就任后，几项筹款计划均因内外反对而搁浅，财政只能靠借支和发钞解决。王克敏又与孙宝琦不甚睦，“连日孙请王发院费十万元，王无以应，孙不得已，拟自

向银行暂借十万，以盐余作抵，王亦不允，孙恐不能维持”[36]。结果，“因院中经费无着，诸事停顿，无法进行”[37]。双方的矛盾为阁潮重起埋下了根子。

王克敏缓解财政危机的招数是解决德发债票案。虽然孙宝琦慑于外界舆论反应，担心又有“卖国”的嫌疑，对此持有异议，而王克敏担心受孙宝琦和国会的掣肘，不能自主行事，固示辞职，又向曹锟“对于财政上尚有切实陈说，并虑及疆吏对彼之态度，及国会间感情之恶劣”。曹锟则担心财政问题不能解决，政府即不能维持，对王克敏表示支持，一方面派人向孙宝琦疏通，一方面对王克敏“慰藉之者甚至”，使王可以放手去作[38]。

德发债票是德国持有的湖广铁路、津浦铁路、续津浦铁路和善后大借款德国债票的总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拟将湖广、津浦、续津浦债票等作价赔偿战胜国中国，双方自《中德协约》签订后，即为此续有交涉，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中国要求德国赔款甚巨，德国所承认者甚少，因相差甚巨，当局者不肯负责交涉，致令久悬不决”[39]。王克敏就任后，希望通过承认德国的条件得到这笔款项，缓解财政困难，但国内舆论认为，此案“一为便宜德国，二为徒供军阀内争之用”[40]，表示异议。而且王克敏行事隐秘，对外不公开，对国会不报告，更引起国人过度的警惕，担心其间别有条件，又将使中国吃亏。国会不少议员以德发债票案“牺牲太大”，承办此案的德华银行代表菲格与王克敏关系暧昧为由，强烈反对此案，多次提出质问，认为“赔偿问题为我国对德取得债权，收回债票问题，为我国对德免去债务，皆为参战应享之权利。今政府交涉结果，所谓取得债权，既如彼所谓免去债务。又如此处置失当，万口莫辞。政府办理此事，类皆严守秘密，故无论损失至如何程度，人民无从得知。即有起而质问者，事非亲历，言之必不能详，政府即可拾一二与事实不尽相符之点，加以否认，以为搪塞之计。此种情形，皆政府对于国会无诚意之表现。事关国家前途甚巨，

议员等为维持民国利益起见，难安沉默，特提质问，希将所列各点，迅予答复，或将全案披露，以释群疑”[41]。眼见此案在国会难以通过，王克敏准备绕过国会，直接由政府签约。得知王此议后，国会于5月16日通过决议案：德发债票应依法先交由国会核议，政府不得擅与德国缔结关于本案之任何协约[42]。

正值围绕德发债票案的争执趋于激烈时，王克敏与孙宝琦的关系也在恶化。王克敏自恃有曹锟作后台，一手包办德发债票案，从来不向孙宝琦通报；及至出席国会时，王克敏又避而不往，结果使孙在国会大受责难。孙不肯替人受过，力主将德发债票案提交国会通过后再由政府签约，却遭到阁员的反对，但孙宝琦“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已暮年，不能作政治上之牺牲”。又称“此事与叔鲁（王克敏）无伤，不妨试演一番，以敷衍国会”。孙宝琦希望借此打压王克敏的气势，但却遭到阁中保派成员的反对，内务总长程克认为，“此例一开，则国会议员，将寻常事故，以生风浪，不但我辈危险，即总理亦时有受查办之虞”。因为孙宝琦与王克敏的矛盾，致曹锟对孙宝琦也日渐冷淡，乃至孙“入府晤曹，每不获见，白有要公，则答以且候电话，而候电话之结果，亦仅能会晤王毓芝，请其将事转达而止。孙以为一责任内阁总理，常请命于一府秘书长，一怏怏不快”[43]。一怒之下，5月29日和6月2日孙宝琦两上辞呈，对曹锟和阁员施加压力。曹甚不满，“谓其无能”[44]。但孙宝琦同时却又出席众议院，担保将德发债票案交国会核议。阁员们对他这种举动大为不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顾维钧领头，以“现在国务总理业经辞职，一切枢要无人主持”为由，跟随孙宝琦同时提出“共同引退，免误大政”。惟孙宝琦和阁员均非真心辞职，而在争德发债票案之责任。经过斡旋，6月3日内阁会议议决，将德发债票案向国会报告而不交议，由阁员出席说明政府办理经过，“希望国会与政府共同合作，俾得立时解决，以免被人破坏”[45]。并以事成后补发国会两个月岁费为钓饵，疏通议员勿再反对此案。

1924年6月7日，中德两国订立《解决中德战争赔偿及债务问题换文》（即“德发债票案”）及《结束放发中国扣留之德侨私人财产换文》、《解决德华银行事务换文》等文件[46]。据此，中国获得德国赔款4400万元，再加清理德侨财产及德商债务由德国政府代为清还，赔款总数约为8400万元，但实际所获多为债票、息票，现金赔款有限[47]。此事以中德双方各自让步而告最终解决，中国毕竟通过德国的赔款而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也为北京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财政经费，所谓“参战而后，未发一兵，未遣一夫，得此巨数赔偿，不可谓非意外。”[48]

王克敏以解决德发债票案提供财政经费见好于曹锟，却使孙宝琦以内阁总理名义承受国会议员的责难，两人关系因此而极度恶化，无法共事，致政潮再起。孙宝琦称病避居京郊私宅，王克敏也不到部视事，但两人都照常批阅公文，可见他们都希望赶走对方，而并无自己下台之意。内阁停摆，政务停滞，曹锟既对之不满，又颇感无奈，既不能偏王压孙，让好不容易组成的内阁垮台；又不能偏孙压王，放弃已经到手的金钱实惠，只能左右支应，撮合双方。在曹锟的授意下，内阁成员外交总长顾维钧、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教育总长张国淦于6月13日往孙宅见孙宝琦，调停孙、王之争。张国淦告孙宝琦：“主座慰留，实系诚意，某等奉喻前来，特请总理回京。府方对于叔鲁之所为，已大不满，但为大局起见，殊不便更易生手，仍望大家合作。叔鲁经各方之责备，亦已悔过，以后当到部负责办事，并随时出席阁议，某等担保，必可听总理指挥。”他们代表曹锟来此并有此言，也算是给足了孙宝琦面子。但孙宝琦却不买账，大发牢骚说：王克敏“决难共事”，因其“不到院不到部，实际上议员攻击责任内阁，而予为之作箭靶矣。最近如德发债票，若何重大，彼乃一手办理，事前毫不通知予等，及出席国会，彼反不往，令予一人负责。此种行为，施之友朋私交，尚属不可，而况阁员对于总理。予忝居揆席，以责任内阁言之，事事须负责，而叔鲁对于内阁，则适自视为局外之人。今后财政上之措施，一言蔽之，功在彼而过在我，我老矣，

岂能永作叔鲁之牺牲品乎”。因此，他强硬地表示：“非免我职，即免叔鲁职，斩钉截铁，言尽于此，此外若有所言，即画蛇添足矣。”[49]四位阁员闻此，颇觉尴尬，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也因此对孙有了反感，其实不利于孙宝琦在与王克敏的争斗中争取盟友。不过，在他们的极力说和下，孙宝琦总算是同意回城，却又坚持以王克敏到部视事及出席内阁会议作为双方和解的先决条件。16日，王克敏在城中设宴，邀集孙宝琦及阁员参加，意在缓和关系，但孙宝琦却未出席。王克敏以退为进，干脆在次日向曹锟提出辞呈，孙宝琦不甘示弱，也在21日向曹锟告假。

在孙、王相争中，吴佩孚认为，孙宝琦“比较的总算忠厚老成，确曾隐示拥护，王克敏则素非洛吴所喜”。当曹锟向他征求意见时，吴谓“主座于此若不秉公主持，殊无以白于天下”；并有电致孙，“语多称誉，仍劝即速回京视事”，表示推重[50]。吴佩孚的态度本对孙宝琦有利，但孙宝琦似乎不及王克敏的身段柔软。26日，孙宝琦面见曹锟，曹锟劝慰他，“担保王克敏到部视事，出席阁议，并奉承总理，在现在无适当继任人时，务请维持其一两月。且王筹款不无辛劳，德款甫决，似不便即挥之而去”。还说：“王当亲谒总理，说明一切，以后当无隔阂，我因此事近日颇为焦急，望以国事为重。”孙宝琦却不知进退之道，不仅没有答应曹锟所请，反而请曹锟准许他出洋，游说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增添了曹锟对他的反感[51]。同日，吴毓麟宴请孙宝琦、王克敏及内阁成员，调解孙、王矛盾，王克敏向孙宝琦当面致歉，孙则称“我对君个人并无恶感”，但这种表面的敷衍远不足以消除双方内心的芥蒂。事后，孙宝琦仍请总统府秘书长王毓芝转告曹锟，“如借重王克敏，请免予职，否则请准予假”[52]。其实，“府曹之对孙殷勤，本非诚意，徒以孙既不能走，又不能免，长此相持，财王反受其影响，……是以亟拉孙归，冀以化除财王之困难也”。孙宝琦则以为，“我看他人既必须叔鲁，叔鲁又恋恋不舍，则我亦何必过为已甚，贻世人以热中之诮。”[53]他这种执拗的态度使曹锟及其左右大为不悦，曹嘱人告孙：“请勿赶王克敏走，王走我亦走。”[54]

至此，孙宝琦知道自己这个总理实在干不下去了，遂于7月1日向曹锟提出辞呈。曹锟本拟照例慰留，其左右却乘机进言说，孙宝琦辞呈中“头晕目眩，肝胃不和，即明指元首不明左右蒙蔽，致内阁不和，曹一听大恼，遂曰王叔鲁非留不可！孙非免不可！不问其他”[55]。“府派早有去孙决心，难得其自行呈辞，即立准所请也”[56]。7月2日，曹锟准免孙宝琦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暂行兼代国务总理。时年方三十六岁的外交家顾维钧由此而第一次出任总理要职。

顾维钧代理总理，本为暂时性质，曹锟属意于由颜惠庆出组新阁，因为颜系老资格外交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过去曾两次组阁，具有行政经验，与保、洛两派关系良好，且颜与孙宝琦有亲戚关系，可以借他平息拥孙派议员的反对。但国会中的反对派议员仍然借此发难，声称“国务总理既经免职，其国务员之资格，当然因连带关系同时消灭”；何况“今孙已免职，既无总理，所代为谁？”“宪法未推行于全国，而先破坏于北京，同人本护宪之主旨，难安缄默”；要求曹锟“迅将违宪代阁撤销，并将所有孙阁阁员一律免职”[57]。他们还声称“非收回顾代阁令，不议颜阁同意案”[58]，结果形成政治僵局，顾维钧这一代就是两月有余。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各方疏通，国会才作出妥协，于9月12日通过了颜惠庆组阁案，顾维钧卸下总理职务，仍然担任外交总长[59]。

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反映了北京政府时期政治的典型生态之一——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时急时缓，时疏时紧，有时到了恶质化的程度，但基本上是党同伐异，而又你中有我，其间并无严格的政治分野，没有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集团自身利益的考量。自袁世凯败亡之后，北洋军系没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以地域、出身、教育背景等等为结合的派系崛起，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阁潮就是这种争夺的突出表现之一。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的职位，其实际职权究有多大是一回事，但其名义却关乎政治合法性的诉求，是各派

系集团都很看重的。再加上国会制度的设计，国会议员对内阁的同意权，成了看上去似乎在政治上无所事事的国会最具实效的权力之一，议员们自认为可以摆布阁员，在组阁问题上屡屡翻云覆雨，议员的态度也是与各政治派系集团结合的产物。然而，由阁潮所代表的国会政治，只是派系政治的结果，却与民众生活少有交集。当议员们在国会里慷慨激昂地论辩，甚而演成全武行时，民众对此却冷漠旁观，难有感动。不久之后，这个在民众眼中失去政治信用、在军阀眼中失去利用价值的国会就成了历史的过客与陈迹。

外交交涉或许是20年代北京政治中比较特殊的领域。派系集团的政治纷争与不稳定的北京政局，构成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职业外交家的活动舞台与政治背景。如顾维钧所言，在外交政策与实践方面，这一代职业外交家经常看法一致，即坚持维护中国主权，愿意尽最大努力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地位；有关主权问题，中国不应该屈从外国[(60)]。但是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理想与努力经常受制于派系纷争，“金佛郎案”和德发债票案都可为其中例证。受过西方政治文化熏陶的顾维钧等，对此深感不满而又无可如何。顾维钧坚持，“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到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61)]。然而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与现实政治作必要的妥协，仍是顾维钧等无法避免的选择。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顾及另一方面的事实，即在北京政治最为纷乱的20年代前后，是民国年间中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能发挥所长、从而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历史时期。他们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下，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运用自己的外交谋略，挽回了一些过往失去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当时北京政治的运作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政治的后台老板——军阀派系，更关心于他们生死攸关的派系间或派系内的争斗，而将外交事务留给了职业外交家们，从而使他们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曹锟曾对其亲信之一吴毓麟这样说：“老弟，你什么

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何况在当时情况下，自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外交家已经建立了相当声誉，任何派别当政，都不会忽视利用这样的政治资源。吴毓麟曾对顾维钧说：“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62] 正因为如此，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可以比较放手地处理外交事务，他们也真正懂得如何在时代环境下办理外交。同时，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的聪明之处也在于，他们抱定这样的宗旨：把非职业之外的事情“留给政客们去干，我们决不插手，以免被外界误解为我们属于任何军事集团或政治派系”；我们“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接纳我们”[63]。虽然顾维钧等无法完全避免卷入国内政治斗争，但是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超然于政治纷争之外，从而保证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活动空间。所有这些，发生于动荡不已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下，不能不令后人深长思量。

三　内外矛盾

与其他北洋军系相比较，直系的内部关系有其自身特色。在北洋三大军系中，奉系以张作霖为绝对领袖，说一不二；段祺瑞在皖系亦比较强势，基本可以控制下属；而直系在其形成期的领袖冯国璋即比较弱势又早逝，及至曹锟兴起，虽然被奉为直系领袖，但其能力和控制力又有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吴佩孚为其打天下，因此，直系的内部关系相对比较松散，形成了曹锟—吴佩孚的双核中心体系。曹锟有名义，吴佩孚有实权，又各有拥戴者，形成所谓保派（包括津派）和洛派之别。随着南方齐燮元力量的不断坐大，在直系中又隐然有新中心形成的趋势。因此，在曹锟出任总统之后，围绕各种权力与利益之争，直系不仅与外部同时也在内部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曹锟面对的

困窘之局很大程度上系出于此，并较其皖、奉对手更复杂难解。

曹锟到北京就任总统之职，吴佩孚则以直鲁豫巡阅使的头衔驻节洛阳。吴佩孚对于曹锟始终保持着下对上之礼，有相当之尊敬，并无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行动，这也是曹锟对吴佩孚比较放心，和吴佩孚之间维持着大体说得过去的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况吴佩孚也确实对于维持直系地位和实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并不说明吴佩孚对曹锟完全毕恭毕敬，相反，他倒是常常对曹锟的决策表示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政治决策方面。曹锟曾经在和冯玉祥谈话时发牢骚说："入京以来一事办不动，洛吴事事干涉，我派四弟曹钧赴洛，告诫子玉，四弟回京，谓子玉说生平对总统唯一忠诚，苟有献替，动关大局与元首人格，始终处于长子的地位，不认干政为错。"(64) 曹锟此语倒是反映出吴佩孚的某种真实心态和做派，即他自认对曹无二心，所以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但是，对曹锟而言，吴佩孚的做派毕竟使他不能自如地行使权力，感觉不舒服，甚而觉得自己处在有职无权的尴尬地位，再加上其左右时时播弄是非，恃骄争宠，曹锟不胜其烦。"吴屡为曹氏立大功，羽翼丰满，功名已驾曹之上，历来不世之功，震主之威，为一姓之主人所大忌，况复骄慢士大夫，屏绝政客，于是奔竞左右及失意不逞之徒，不得不另谋结合。闻有人献策直派组织新联合，虽未即明言防制洛吴，而此种新联合成功之日，则旧有之直派势力自必受一种甚大之打击，是则自然之理之势，不能幸免"(65)。因此，对于这个好不容易靠贿选得来的总统职位，曹锟其实当得并不十分愉快。据外人观察，当北京阁潮频发，"内阁摇动"，曹锟"忧闷，患滞食症"。曹锟与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经费问题"发生意见，曹派李彦青赴洛疏通，闻不得要领。又陆锈山（陆锦）与王兰亭（王毓芝）互相倾轧，不易疏解，曹忧闷不乐"(66)。

既然吴佩孚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对北京政府和各地长官动辄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干预他们的事务，从而常常引发与他们的矛盾，北京阁潮的剧烈，与吴佩孚的干政也不无关系。何况作为在

现实政治中活动的人物，吴佩孚对自身的地位也很敏感，对于他人的上升内心深处也不无嫉视，“吴派亦言吴常发牢骚，部下一当督理省长，即要胡为，奈何”[67]。

为了“统一军权”，更便于控制部队，吴佩孚曾经提议将直军各师改由陆军部直接统辖，各巡阅使、各省督理等一律不兼任师长[68]。曹锟出任总统后，北京政府先后下令免去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兼任的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谟继任；免去直鲁豫巡阅副使、直隶军务督理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免去陆军总长陆锦兼任的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继任；免去河南军务督理张福来兼任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继任；免去安徽军务督理马联甲兼任的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免去山东军务督理郑士琦兼任的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上述接任的师旅长多由本部下级长官升任，以防被接任者抗拒不交，乘机煽惑闹事。然而，军队和地盘是那个年代维持权力最重要的基础，自然也就是大多数掌权者都不愿意交出的，上述不再兼任师长者，多为吴佩孚可以直接控制的人。当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被要求辞去兼任师长时，都遭到他们的坚决拒绝，北京政府自然也没有实力强迫他们辞职。即便是吴佩孚自己，也没有辞去兼任的第三师师长职。

吴佩孚的骄横做派，在直系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弹，尤其是那些与吴佩孚本就在资历和地位方面不相上下之人，更是对吴佩孚打击别人而扩张自身势力的做法心怀怨恨并保持警惕。齐燮元和冯玉祥曾经联络发起“疆吏会议”，意在促成各派联合，打击吴佩孚的独断专行，结果因吴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接着，齐燮元与吴佩孚因“海军风潮”而矛盾再起，一度更发展为激烈的冲突。

海军因为其技术方面的特殊性，向为闽、粤、鲁等省籍人所把持，尤以闽系势力最大，而各派系间的矛盾甚深。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为闽系，因其时驻留南京，又与苏督齐燮元关系不错。原广东政府海军司令温树德在广东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中不安于位，经吴佩孚派

人运动，率舰六艘北归附直，1924年1月到达青岛驻留。因温树德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吴佩孚对其多方拉拢，提供经费，觅取驻地，并允诺将其部编为渤海舰队，独立于海军部而直属北京政府，实则企图建立自己在海军的势力范围，“以打破闽人独占海军之局面”。温树德及其部属多为鲁籍，在海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中比较受强势的闽粤籍人士排挤，如今虽然加盟北洋阵营，但也不愿受闽籍的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统辖，而且有吴佩孚的支持，自然也没有将杜锡珪太当回事。2月13日，温部海军陆战队二百余人携械强占烟台海军基地，杜锡珪闻讯极为恼怒，致电北京政府称：“查温树德此次率舰北归，是否自承归顺，似此行动，目无法纪，岂归顺者所应为？”要求政府“整饬纪纲”，“申斥制止”，并坚决反对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69]。杜锡珪的背后有齐燮元的支持，温树德又自恃有吴佩孚撑腰，事情便由海军内部之争演化为直系内部两大实力派吴佩孚与齐燮元的矛盾。

温树德与杜锡珪的矛盾初起，海军部为息事宁人，拟改任温树德为渤海防御使，既敷衍了杜锡珪的要求，又使温树德实际上仍可自主，“管制上仍受总司令节制，而事实上则归洛吴支配，使双方面子上皆可以过得去”[70]。但是，杜锡珪不愿就此收手，又致电国务院称：“该舰队粤居多年，毫无法纪，背叛是其习惯，野心难驯，罪无可逭，请严惩以遏乱萌”[71]。海军部不敢得罪双方背后各自的后台老板，对此也感棘手，不能轻易决断。

曹锟对海军内部原先的派系矛盾心知肚明，虽然他对吴佩孚运动温树德率舰北归表示满意，但也提醒吴，“须先与海军各方面接洽妥协，方可进行无阻。否则，粤舰北来，北舰又生枝节，反多不便”[72]。果如曹所担心，温树德率舰北归后，不仅横生“枝节”，而且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曹锟深知温树德与杜锡珪之争的背后实为吴佩孚与齐燮元之争，吴、齐都是他手下的大将，轻易也不能为左右袒，遂派交通总长吴毓麟南下，前往吴佩孚所在的洛阳和齐燮元所在的南京调解。吴佩孚极力袒护温树德，主张“杜防东南，温守北洋，划明界

限，不相侵越。特为顾全杜之名义起见，于舰队调动，可呈报总司令处备案，或遇重大战事，允听杜之调遣”。他还保荐亲信高恩洪为胶澳督办，以为温树德部筹谋饷需，并强硬表示：“政府绝不可心存瞻徇，必须照此办理。”齐燮元明面上表示他本人对此并无成见，却又支持杜锡珪提出：“海军系统编制不可破坏，使温自为统属，将来必影响海军军事前途。故温必须归本人节制。”同时提出“军饷分配，亦贵得平”，如温树德部得胶济路收入接济饷源，北京政府原允从盐余项下每月拨给杜部的40万元，“亦须按月付清，不得时有间断”，否则“本人不负维持之责”[(73)]。其后杜锡珪又两次致电北京政府，声称“如彼方不顾大局，锡珪对于所属舰队之行动，实不能负责”[(74)]。杜锡珪之举得到齐燮元和闽系海军人士的支持，齐燮元强提两淮盐余为杜部经费，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推出代表到北京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

虽然杜锡珪在齐燮元的支持下，对温树德表示了强硬态度，但是吴佩孚却毫不退让，坚持己见，逼使曹锟在吴、齐之争中作选择，而曹锟权衡利弊，还是不能不迁就吴佩孚。3月18日，北京政府任命高恩洪为胶澳督办，22日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吴佩孚大获全胜，齐燮元则大失面子，由此而加深了直系内部的裂痕。曹锟为此感叹说：“我为子玉，既得罪杜锡珪，又得罪齐燮元。”[(75)]

海军风潮刚刚平息，王承斌、冯玉祥的辞职风波又起。冯玉祥在驱黎、王承斌在贿选中都可谓有“大功”于曹锟，满心希望在曹锟上台后以“功”请赏。但是，吴佩孚对王、冯却一直心怀戒心，认为王承斌与奉系关系暧昧，“王籍隶奉天，为对奉主和中坚人物之一”；认为冯玉祥不可靠；故电请北京政府免去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职，使王失去了直接的武力支撑，即便王亲自出面要求将第二十三师仍归其节制，也被吴所阻止；而冯玉祥在担任河南督理后不久即被排挤，失去地盘，到北京当了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检阅使。王承斌和冯玉祥对吴佩孚满腹牢骚，认为曹锟“为人毫无定见”，“事事惟洛吴之马首是

瞻”。曹锟上台后，他们不仅未得回报，还屡屡遇到经费欠缺，部队催饷的难题，更是心怀不满。王承斌在贿选时为曹锟筹得经费甚多，曹锟上台后却不提返还之事，“王氏一再催促，政府方面简直无人理会，如何补偿更提不到”[76]。王承斌一怒之下，于4月底和5月初两次请辞。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向曹锟请辞，理由是“军饷积欠十七个月，个人私产及外边拉拢，已垫二十余万”[77]。王承斌和冯玉祥在直系内部都是有影响的大将，他们的请辞震动甚大，齐燮元亦提出辞职表示声援，甚而吴佩孚亦以“德不足服人，才不足任事”云云提出辞职，以退为进。为此，曹锟心烦恼怒，对亲信左右发牢骚说：“不如大家一齐辞职，我也不干。”[78] 话虽如此，曹锟还是不得不亲自出马，先是致电王承斌表示慰留，又允诺将王的亏欠之款如数归还；同时在总统府接见冯玉祥，表示“我不愿闻你辞职的事，你要走同我一同走”；“我之难处，你当谅解，况财政竭蹶，不限一隅，所望共勉，你饷当饬财部筹拨，不愿闻你辞字”[79]。当然，武人请辞不过是撒娇或者负气，谁都不会当真，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不过，这场风波以及此前此后发生的直系内部各种矛盾却反映出直系内部的政治生态。吴佩孚虽然坐拥大权，却也成为直系内部的众矢之的，吴佩孚对他人的颐指气使，成为直系内部离心倾向的催化剂。此等矛盾的发展激化，大不利于直系与其对手随后而至的决斗，“直系内部之不和，关系大局甚大”[80]。曹锟亦知此，所以他虽然对吴佩孚不满，但又不时替“吴佩孚排解”，甚而对部下言吴的所为是“子玉饮酒过量所致”[81]。但曹锟的排解和解释显有矫情不实之处，如舆论所言：“吴佩孚近年来囊括中原，声势煊赫，早为一般人所共知，然自海军北归，滇军投降，实力既重，嫉者甚多，且吴自信太深，每予人以可乘之隙，于是逐渐入四面楚歌之境矣。”[82]

在外部矛盾方面，直系需要因应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关系。

自第一次直奉战后孙、皖、奉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其内部关系

比较松散，同盟各方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及其应对未必一致，甚而是同床异梦，但面对直系“武力统一”的压迫，三方还是维持了大体合作的关系。进入1923年，先有京汉路工潮流血惨案，继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接着是曹锟贿选，直系被各方舆论所指责，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三角同盟”创造了联手反直的良机，三方互动也因此而渐趋活跃。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建立大元帅府，重新有了实力地盘，其后，粤、奉间互通信息，信使往还不断。4月12日，孙中山致电张作霖，希望张“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83)]。张作霖回复建议粤方派兵实行北伐，和奉军形成对直系的南北夹击之势。5月3日，孙中山派汪精卫持其亲笔信赴奉，表示张的主张“乃与鄙意不谋而同，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84)]，希望张作霖援助军费70万元。张作霖慨然应允，除了钱款之外，还拨出部分枪械，经海路运至广东。交通系要角叶恭绰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专为孙中山筹措饷费，而他与奉系渊源甚深，他在大元帅府任职，表明孙中山有意借重其人脉关系，与张作霖联络。与此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在同年7月入粤，充当孙段间的联络人，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曾毓隽、曲同丰、陈文运等和卢永祥的代表范毓灵、邓汉祥等都在频频活动，希望“三角同盟”在政治上更进一步。

与“三角同盟”内部的密切互动相对应的是，直系也在对“三角同盟”各方采取分化拉拢之策，其中主要又是对皖、奉两系的拉拢。因为直、皖、奉均源出北洋军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勾连一体，虽然屡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那也不过是利益之争，而无关政治理念，实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未必是那样你死我活。为了摆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被孙、皖、奉三方包围的不利处境，直系在无损本派利益的大前提下，对皖、奉两系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分化拉拢手法，其中曹锟主“和奉”，吴佩孚则主“和皖”。

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双方本就有亲缘关系，尽管在第一次

直奉之战中翻了脸，但曹锟还是希望能够重修旧好，缓和矛盾，减轻直系面临的压力。从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奉系是“三角同盟”中最具实力的一方，对直系造成的压力最大，离北京的距离也最近，如果能够与奉系缓和关系，无疑对直系在北京当政是最有利的，所以，曹锟坚持“和奉”比较而言在当时对直系应该是上策。

1923年夏，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曾任吉林督军和陆军总长、时正赋闲的鲍贵卿，受曹锟之托两度赴奉，向张作霖转达曹锟的和解之意。曹锟表示可以恢复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原职，今后组阁可征求张的同意，甚至在必要时奉军还可入关驻屯等等，并表示“我能为力者，无不尽力”。不过，这些在曹锟看来已经是委曲求全的条件，却被张作霖拒绝。贿选告成后，鲍贵卿与天津镇守使赵玉珂衔曹锟之命再度赴奉见张作霖，赵对张说：“我奉曹三爷（曹锟）之命，来奉请大帅帮忙，谋以后之统一。”张答：“前者他等调和，是为大选之事叫我帮忙。今大选已经告成，我不反对即是帮忙。今后调停系直奉之事，曹三爷已为全国之元首，以后对于直奉之争，当然与曹三爷无关。”张作霖实际婉拒了曹锟的和意。赵玉珂又通过吉林督军孙烈臣向张作霖表示，如果直奉和解，热河和山东长官可以由奉系的张景惠和鲍贵卿任职，企图以地盘利益诱使张作霖入彀，但张仍不理会。曹锟让步的底线是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因此，在未得张作霖应有回应的情况下，赵又告张：“曹三爷情愿大帅为副座（副总统）。”张的回应是：“全国有名望有才干者甚多，况副座乃出自民意，亦不是他给我的，亦不是我要的。”并明言：“直系能人甚多，此是先礼而后兵也。”[85] 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曹锟也没有完全放弃“和奉”的想法，但张作霖却始终不予回应，而是表示“纵然恢复官职，在予并不感谢”；“奉直和议，无何等考虑，纵或直隶派向予提示如何有利条件，予断袍决心，不与之应。实际上予亦认为无有与以接应之必要”[86]。作为武人首领，张作霖当然希望有地盘有地位，但是副总统这样的虚职，却未必能满足其完全掌控北京政治的“抱负”，在直系因为贿选而大失民心的情况下，张作霖已经看到了他重返北京当政的

希望，不会轻易对直系让步，而且因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关系，他对直系也不敢轻易信任，何况他与吴佩孚结怨甚深，知道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分量，担心即便是曹锟有意言和，也未必能得吴佩孚的首肯，因此，曹锟的“和奉”主张在张作霖不软不硬的态度前碰了壁，本来对直系是有利的“上策”却在复杂的派系政治博弈中未能成为现实。

“和奉”既不成，吴佩孚力主“和皖”。吴佩孚本就看不起张作霖，认为张是“胡匪”出身，上不了台面，而段祺瑞出身北洋正统，资历深厚，在北洋军人中比较有威望，再者皖系此时只控制着浙江，实力有限，而且与直系控制的核心地区距离较远，所谓远交近攻，结交皖系对直系当政的风险比较小。吴佩孚在曹锟“当选”后特意致电，请其对段表示尊崇，电称：“我公就职，政尚宽大，段合肥虽与我不合，然究为北洋耆宿，功高望重，不可掩没，应请特加优崇，并将其应得年俸，议定数目，从速支发，以示国家尊重贤劳之意。”[87] 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又转而“和皖”，向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发出和解信号。贿选告成后，曹锟在11月派人赴天津见段祺瑞，向段转达曹意：“曹仲三（曹锟）对于时局无正当之方法，惟有仰望督办（段祺瑞）出山，尚可维持大局”；“曹仲三、卢永祥皆为督办旧属，仲三欲以副座予之（卢永祥），因未得督办同意，故不敢擅专，对于外交之办法，亦惟督办之命是从”。但是，段祺瑞不接招，答称：“我现在为一平民，所有政治，无过问之必要。”给曹锟吃了个软钉子[88]。其实，曹锟对段祺瑞并不感冒。贿选结束后，曹党曾密查反直“三角同盟”的活动，向曹锟建议：“段氏非黎氏（黎元洪）可比，亟以严行监视。当请保定迅饬杨以德严密监视，因杨有地方之责也。”[89] 只是因为吴佩孚的坚持，曹锟不能不免允其请，而段祺瑞的拒绝，又使曹锟对吴佩孚有所不满，认其“和皖”主张为失算不智之举。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尊段”“此不过子玉一种策略耳，如属真诚，不但子玉对不起我，就是子玉自计，亦大失算。况我已告知子玉，如表面上有太过分处，我亦不能答应，不然，就请他先取消我的总统云云”[90]。

自1920年直皖之战段祺瑞下台后，已经离开政治舞台中心有年，手头可以依靠的力量不多，在以实力说话的年代，段祺瑞也知道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实际有限，与其从直系所请蹚浑水，用自己的“名望”为直系创造北洋和解的表象，不如静观待变，谋求将来更好的机会，所以他断然拒绝了直系的拉拢。但是，吴佩孚却并不死心，联段不成，他又主张尊段联卢（永祥），力推卢永祥为副总统，企图在皖系仅存的实力派大将身上打开缺口。他屡屡对人称：对于副总统，“惟有段合肥、卢子嘉（卢永祥字）二人足膺是选，但合肥资望过深，似不能屈就副座，以年龄资格才具论之，惟有卢子嘉合式耳。”[91]

吴佩孚的“联卢”之举，除了以“和皖”因应反直“三角同盟”的挑战之外，还兼有“制齐”之意。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坐拥江南地盘，颇具实力，为直系内部可与吴佩孚争胜的大将。为了拉升自己的人气和地位，齐燮元亦也有心谋副总统职。为了压缩齐燮元的上升空间，吴佩孚以卢压齐，声称副总统“与其属于新进，招各方之不平，毋宁畀诸老成人物，尚可以老面子维系局面”。并主张卢如任副总统，可以卢的亲信何丰林督浙，而何所遗之淞沪护军使职，“以不偏于齐、卢两方者继任”[92]。在吴佩孚的推举下，曹锟也不便表示反对，只是说：“子玉既有此项主张，我甚赞成，但此事由国会办理，如何选举，选举何人，以我之地位，不便发言。诸君依法办理可耳。”吴佩孚遂派人在1924年1月下旬去天津，向段祺瑞疏通，段声称：“我素不闻政事，今在病中，尤不愿多言，请与我左右商之。”而段之左右的答复甚妙：“合肥决不愿就副席，若对卢子嘉，此间亦未便代作具体之答复。然以意思想像得之，官不打送礼的。”[93] 随后，吴佩孚的代表在1月底到杭州，向卢永祥转达吴佩孚的推重之意，但卢亦表示拒绝，同时致函吴佩孚，表示“迩日盛传尊意，过为推重，以私谊言，固自可感，而以此为解决大局枢纽，则不但与素志相违，恐即以人格言，亦为高明所不取矣。”[94] 直系的“和皖”之策由此而告失败。

至于“三角同盟”中的孙中山一方，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之际，直系曹锟、吴佩孚曾经与孙有所联络。8月29日，曹锟、吴佩孚致电孙中山，对孙中山15日的宣言表示“敬领宏旨”，“倘承不弃，时惠教言。则谋国有老成，匪独一二人之幸也”。31日，孙中山在答“东方社”记者问时说：“北方武人与余之主张接近，确为事实，但余非知其诚意如何，决不与之联络。苟有诚意，不论为张作霖，为吴佩孚，均可引为同志，国会问题，余主张恢复民八国会，至对陈炯明，余必按宣言膺惩之。”9月3日，孙中山电复曹锟、吴佩孚，重申“化兵为工之策，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对曹吴“至冀守正不阿，一切依法解决，不为少数政客私见伪行所蔽。法统成立，纠纷自解，而国乃有可为”[(95)]。孙中山曾经希望在曹锟和吴佩孚之间打入楔子，予以分化，派人争取过吴佩孚，但吴佩孚认为孙中山太过理想，政策难以实行，尤其不满孙中山与俄国的关系，不愿与孙合作。吴佩孚曾经对孙中山的使者徐绍桢说：“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谓为中国之固有，无宁称为祖述泰西之为愈。……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标榜于外者，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彼不求传统之药方而强用辛辣强烈之俄国猛剂，其失亦甚。”[(96)] 直系与孙中山不仅有政治理念和历史渊源的重大差异，而且在实际上支持广东陈炯明和福建李厚基与孙中山对立，双方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

曹锟“当选”为大总统之后，内外纠葛不断，基本无所作为，而在种种内外矛盾之中，对直系当政前途最具影响和杀伤力的还是直系内部的矛盾。在直系内部，津、保、洛三派各据地盘，在政治上互争短长，以派系利益为至上，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直系最主要的军事领袖吴佩孚，在曹锟出任总统后，继任其直鲁豫巡阅使职，开府洛阳，主张武力统一，干涉北京政治，颇为人所侧目。直系其他各派，如以王承斌为代表的津派，高凌霨为代表的保派，地方的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等，对吴均有戒心，他们或极力发展自

己的派系力量，或令人在曹锟身边播弄是非，离间曹、吴关系，使吴在直系处孤立之境。吴佩孚本人心高气傲，对本派内部关系的处理不甚注意，尤其是夺去河南督军冯玉祥的地盘，使冯对吴衔恨甚深，实为吴的失策，也种下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背直联奉，致直系失败下台的远因。总而言之，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力量发展到其巅峰时期，独占北京政府，然而其后直系种种作为，不仅不能“一统天下”，反使其“声望”大跌，尤其是总统“贿选”丑闻，更成为直系发展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再加其内部矛盾纷繁复杂，各派争斗不已，又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不等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直系已是外强中干，其独霸北京政治的地位已然动摇。

第二节　江浙战争

一　江浙战争的由来

江浙战争是1924年秋发生在江苏实力派、直系军头齐燮元和浙江实力派、皖系余党卢永祥之间的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战争的结局不仅造成了江浙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皖系失去了最后的地盘，而且也使直系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孙传芳势力的兴起，成为直系集团后期最主要的支撑。因此，江浙战争在北洋时期的军阀战争中自有其重要意义，非一般地方军阀之争可比。

江浙战争的对立双方是齐燮元和卢永祥。齐燮元出身于北洋新军第六镇，一路升迁至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与吴佩孚和萧耀南同为直系中巡阅使级别的实力派大将，而且坐镇江南富庶之地，领有数省地盘，与直系中央的关系稍有疏离。卢永祥比齐燮元年长十八岁，在北洋军系中辈分甚老，清末已经当上了协统，“在北洋军人中，年龄历史，均居前辈地位，应与冯（国璋）、段（祺瑞）齐名，只因民二征蒙受挫，怏怏而归，遂致落后”[97]。1919年，卢永祥出任浙江督军，在浙江多年经营，根基深厚。在皖系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失

败后，卢永祥成为皖系仅存的保有地盘和军队的实力派大将。

齐燮元和卢永祥分别任职于江苏和浙江，地域相邻，经济相依，利害冲突自不可避免，“江浙军阀因地盘之冲突，双方秣马厉兵，已非一日”[98]，而引起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主要问题在于淞沪地区的归属。

淞沪地区一般指上海及其外围县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对外交往最重要的中心，从而也是重要的税源地，向为军阀所垂涎。就地理和行政管辖关系而言，淞沪地区归属于直系控制的江苏，但是，淞沪地区的实际主政者——淞沪护军使，却从袁世凯死后即为皖系军人把持（卢永祥即曾任淞沪护军使），他们自然听命于皖系中央，而对直系控制的苏省当局则不以为然，淞沪地区从而成为皖直在地方争夺的焦点之一。1919年8月，卢永祥接病逝的杨善德出任浙江督军，直系本想让第六师师长齐燮元接卢永祥职，但皖系却坚持由本系的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接卢为淞沪护军使。为此，双方一直冲突不断，并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期间几至兵戎相见。只是因为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外国公使团对在上海打仗屡有警告，直、皖双方才被迫收手，达成和平协议，维持了淞沪地区的现状。

直皖战后，卢永祥在浙江提倡“自治”，与孙中山和奉系联手，成立“三角同盟”，力图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齐燮元在江苏实力渐增，势力坐大，对淞沪地盘抱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心，与卢永祥形成矛盾冲突关系。反直“三角同盟”形成后，上海在卢永祥的荫庇下，成为反直活动的重要基地，各方势力都在此活动，更招致直系的不满。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逼出走，曹锟贿选之声甚嚣尘上，卢永祥通电坚决反对，并出资运动反直议员移驻上海，另开国会，从而引发与直系的尖锐矛盾。齐燮元遂联络直督王承斌、闽督孙传芳、皖督马联甲、赣督蔡成勋等，图谋发起对浙战争，彻底解决与卢永祥的矛盾。江浙绅商闻之纷起反对，担心战火破坏江南富庶之地的经济社会生活，他们组成“苏浙和平协会”，奔走斡旋，反对战争。

英、美、法、日公使也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表示淞沪地方外人有重大利益，“若发生战争，此项利益势不免受无限之损失”；中国政府对此“有不能诿卸之责任”；“如中政府或该省长官，保全此项利益有不周之处，所有一切损失，中政府应担负完全责任”；否则，“当采用一切适宜方法，自行保护侨居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生命财产及其商务”[99]。

直系内部对于卢永祥的态度并不一致。极力主张攻浙者主要是齐燮元，目的是夺得淞沪乃至江浙地盘，壮大自己的实力，“先取两浙，自建大功，而又成于吴氏（吴佩孚）取奉之前，以为驾吴而上之计”，成为东南各省的盟主，并可进而觊觎中央副总统位置。当时，吴佩孚和卢永祥都有出任副总统的传言，而齐燮元“对人表示，则副选一事为卢为吴，皆认为不宜，隐隐中有舍我其谁之意”。而吴佩孚对此实不以为然，反倒担心齐燮元的力量坐大后，成为自己的对手，所以，“齐欲去卢，吴则联卢，使齐攻浙之谋不得逞”[100]。“不得吴之同意，不独齐不敢擅动干戈，即曹亦不能遽下命令”[101]。因为直系内部意见不一，齐燮元不敢贸然行事，而且他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周全，在各方斡旋下，遂与卢永祥达成妥协。1923年8月20日，江浙两省军民长官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阳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签署《江浙和平公约》，规定“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致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102]。随后，江浙当局又在10月8日和12月6日与安徽、江西省当局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公约，满天的战争风云总算暂时消退了。

虽然江浙两省暂时握手言和，但齐、卢双方的矛盾依旧，“齐、卢早积不相能，其所以未开战者，因双方预备未周”[103]。11月10

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樑遇刺身亡，由谁接任再起纷争，齐燮元和何丰林都认为这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各自委派了接任者。为了解决淞沪之争，齐燮元还密电北京政府，要求调动何丰林的职务，并保举陈调元为淞沪护军使。但曹锟和吴佩孚都不主张此时对浙用兵，认为“现大局趋势，实以赶行收束西南各省为必要，对浙似应先之以和缓感情，继之以和平解决”；“不可衅自我开，遽生枝节”[104]。事情遂以何丰林胜出而告段落。

齐燮元几次谋浙都未成，对吴佩孚满腹怨气。齐燮元转而在直系内部勾连保派，向曹锟陈词攻浙如何有利，既可得浙江大笔钱款，并且表示吴佩孚不同意其计划，实未悉真相，此时正可乘势解决浙江问题，以防其与奉粤结合。1924年1月，“苏齐请白宫（曹锟）下令讨卢，何曹电洛吴征求意见，吴复电不主用兵，曹颇为难”[105]。3月，“洛坚执江浙不能开衅，齐力主中央下令讨浙，吴不能决，允回京请示”[106]。在齐燮元的大力游说之下，保派极力向曹锟陈情，还向吴佩孚疏通，以攻浙成功后浙督及省长保荐洛派人物作为吴佩孚支持攻浙的交换条件。考虑到和曹锟、齐燮元及直系内部的关系，吴佩孚的态度已有松动，又因为自己“和皖”的主张未得皖系回应而失望，遂对攻浙事不再反对，取听之任之之态。直系内部的对浙方针渐趋一致，江浙之间的战云密布。

江浙战争发生在江浙两省之间，其导火线却源于并不与江浙两省直接相关的孙传芳入闽和福建局势的变化。

1923年4月，孙传芳出任福建军务督理，但闽省军队派系混杂，互不相属，直系的闽北护军使周荫人据延平，皖系的兴泉永护军使王永泉据泉州，第十混成旅旅长臧致平据厦门，李厚基旧部王献臣据汀州，还有其他各支部队分据省内各地，皖系军队残余还有不小的力量，王永泉以福建军务帮办的身份握有闽省实权。孙传芳虽为闽督，然其坐困省城福州一隅，发展空间有限，亟谋另外的出路。他先是“处心积虑，不能忘赣”[107]，但赣督蔡成勋对之存有警惕，且为

同系，难以下手。孙传芳继而注意到浙江，一则其为皖系控制，便于在直系内部动员力量，一致对外；二则浙江为富庶之地，对孙传芳也有不小的吸引力。为此，他致电曹锟，提出“浙省反抗中央，已非一日，近更购械增兵，结合奉粤，待时而动，情迹昭然，失此不图，为患滋大”，并主动请缨，“躬率所部，自闽北进讨，以四省之兵力，共同迫卢，则其内讧立起，不出旬日，浙事自可戡定，使长江流域呵成一气”。曹锟令吴佩孚“酌核盼复”。吴态度谨慎，回以“为闽省计，应以先肃清厦门为是，遽议图浙，事实上亦非甚易，且东南大局，中外瞩目，由我开衅，是犯天下大不韪，而引起全国震动也”[108]。不过，吴佩孚向视福建为进攻广东之跳板，此时他仍然企图实现“武力统一”之谋，便暗中支持孙传芳、周荫人合力驱逐王永泉，统一福建，使福建成为直系稳固的南进基地。

在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后，孙传芳着手准备在福建生事。1924年2月27日，孙传芳忽然将其督理职交王永泉代理，自己离开福州去延平，并令驻福州的部下卢香亭、李生春旅同时开动。一时间，孙传芳的动向颇引人关注。孙传芳离开福州，王永泉以为孙是图谋向外发展，不料留守福州的周荫人却突然发难，3月5日派兵将王永泉新购的枪械扣留[109]，并将护械的王部官兵缴械。孙军卢、李两旅也于行军途中得令回师福州。在直军的突然攻击下，王永泉措手不及，3月7日逃往泉州。周荫人则以王永泉“操纵闽局，罪大恶极，命将其新械扣留，以消隐患”，而他自己则“迫于公谊，既无法两全，只得挥泪会师，以期绥定闽疆，维护大局”[110]。王永泉见大势已去，无意再行抵抗，12日将所部交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统领，自己离开泉州转道厦门前往上海。随后，曹锟在3月17日下令免去王永泉本兼各职，4月8日任命周荫人为福建军务帮办。

王永泉虽然下野，与王关系密切的臧致平、杨化昭部还有实力，因此而为孙传芳、周荫人所嫉，成为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4月中旬，臧、杨部队与孙、周部队在同安等地交战十余日，因实力不济，

节节败退，弃守厦门、漳州等地，5月间经闽西退入江西。福建的其他派系部队在孙传芳、周荫人的军事压力下，亦基本就范，闽局初定。

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江西后，因江西为直系控制，不能久留，遂与同属皖系的浙督卢永祥互通声气，继续向浙江进军。直系担心臧、杨所部与卢永祥结合，壮大皖系力量，吴佩孚有令赣督蔡成勋，调兵对臧、杨所部围追堵截，但蔡成勋虽不愿臧、杨所部扰乱江西，也不愿闽军借此入境，有碍自己的地位，故对臧、杨所部“并无阻截”，却以防止臧、杨所部“回窜”为由，要求闽军和赣军分在闽赣边界布防，各守其境，被孙传芳指为“似有疏敌防我之意”，“意在阻止我军出境”[111]。由于蔡成勋对臧、杨所部未穷追猛打，臧、杨所部突破赣军围堵，在6月初进入浙江境内，被改编为边防军，臧致平任总参议，杨化昭任司令，驻防闽浙边界。

臧致平、杨化昭部与浙江卢永祥部合流，不仅使久欲对浙动武的齐燮元找到动武的借口，即卢永祥收容臧、杨所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中防止客军入境的规定，而且使吴佩孚也大为不满，本来他还想说动卢永祥让步，遣散臧、杨所部，但卢永祥却答称：“臧、杨在闽，分属国军，闽、赣以十万之众，未能剪除，浙为自身安全计，为大局和平计，更无遣散之必要。”[112] 卢的态度更惹恼了吴佩孚，他认为“此两部军队不除，终必为皖、赣祸，令闽、皖、赣三省围击，勒尽缴械”[113]。福建方面，王永泉出走后，周荫人接任军务帮办，与闽督孙传芳产生了新的矛盾。为了化解孙传芳和周荫人的矛盾，5月13日曹锟任命周荫人为闽督，改任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令其屯兵闽南，准备入粤，支持林虎、洪兆麟等部攻击孙中山，“激励奋发，迅图进行，为林、洪一张声势，则粤事自易奏功”[114]。但孙传芳知道此举成败难言，并不热心，而在福建又不安于位，遂对攻浙十分热衷，以谋取浙江地盘。这样，齐燮元、孙传芳、周荫人在攻浙问题上达成一致，齐燮元意在淞沪，孙传芳意在浙江，周荫人可以避免

与孙传芳争夺福建的地位。如时人所论："孙传芳以闽督予周之后，无聊已极，亟思得一地盘，却好臧、杨情事发生，于是，于吴、齐两大之间，极力怂恿。而齐与卢恶感素深，已非一朝一夕，又难得闽孙首先犯难，愿为前驱，推波助澜，不谋而合。在洛吴早冀申涨势力于长江下游，无如东南和平，无机可乘。今有可乘之机，故对齐不惜以重兵为后援之举，使其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此次内容虽复杂，要之不外纵横捭阖，互有私心而已。"[115]

自1924年中起始，江浙地区形势紧张，战云密布，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战争。当时齐燮元属下的苏军计有五个师六个混成旅，近四万人，另有皖督马联甲出兵三个旅，赣督蔡成勋出兵一个师，孙传芳出兵六个混成旅，约有2.5万余人。吴佩孚又调豫军、鲁军一部至江苏填防，鄂军一部候调，以补齐燮元兵力之不足[116]。海军长江舰队和闽海舰队亦站在直方。卢永祥属下的浙军计有四个师二个旅及臧致平、杨化昭的边防军、何丰林的沪军等，约计6.6万人。就双方兵力的数量而言，江浙大体相当，"苏军有优点二，一则后援多，二则财政裕。闽、皖、赣既与齐取同一态度，而洛吴复为攻浙主动，则齐后援之多，自不待解说。至于财政方面，齐素有准备，江苏民政实际上即隶属于军政。频年以来，增加及吸取之军费实不在少。……至于军队方面，亦不无优点之可言，近来苏省军队多已更调，老弱均被淘汰净尽，……至齐之弱点只有一事，即少得南方舆论之同情"。反观浙江方面，地处直系各省的包围之中，与其盟友北方的奉系、南方的孙中山都远隔重重，"一则孤立无后援，二则财力不充。浙地理一面濒海，三面受人包围，军力粮饷须恃诸本省。粤省虽素有来往，然而自顾不暇；奉天虽利害相同，顾远水不就近火。本省精锐之师，在战争启初之时，固未必即弱于人，然若战事延长，则持久究非力所能逮。……至于其优点，则以浙省处包围形势之下，及上海向表示同情于南派，舆论较宁易得同情。军士战斗锐气或可较他方为强"[117]。就实际论，江、浙两方各有短长，然就大势论，浙方在战略上似处于劣势。战前江浙两方都在调兵遣将，力图以己之长克敌之短。7月

间，齐燮元电吴佩孚，讨论对浙问题，吴佩孚告，“分路同时动作，皖亦应附，可计日而决也”[118]。8月下旬，“苏浙形势日亟，吴使飞电促孙馨远迅速出兵，免有被各个击破之虞。抚万函电交驰，仓皇矣”[119]。皖系人物徐树铮、吴光新等以卢永祥胜败关系皖系实力存亡，“屡次密议，决定竭力援助浙卢”。他们在上海召集曲同丰、马良等皖系旧将会议，决定“各自暗中召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120]。战争的机器既已开动，则一发而不可止，中国最富庶发达的淞沪地区即将被笼罩在战火之中。

二　江浙战争的结局与孙传芳的兴起

1924年8月中下旬，江浙双方各自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争动员。江苏方面，齐燮元自任总司令，驻苏州指挥作战，下属江宁镇守使宫邦铎和江苏暂编第三师马玉仁部为第一路，以沪宁线为中心，自正面分左中右三路攻击上海；江苏第五混成旅陈调元部为第二路，驻宜兴担任对浙防御；安徽第三混成旅王普部为第三路，由皖南攻浙江吴兴；闽军孙传芳和赣军孟昭月、卢香亭、谢鸿勋部为第四路，自南向北进攻，对浙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21]。浙江方面，卢永祥自任总司令，坐镇杭州指挥作战，其部署为，何丰林、臧致平的第一军重点防守沪宁线；陈乐山、杨化昭的第二军自浙北攻苏南，力图拊苏军之背，断其后路；张载阳、潘国纲的第三军驻防浙南，阻击孙传芳部北进[122]。

8月下旬，江浙双方军队在前线对峙，沟通江浙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铁路交通动脉——沪宁、沪杭铁路运输中断，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将战争的责任推之于对方，双方循例在战争爆发前大打电报战。9月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称其“躬率三军，为民除暴，助我则友，逆我则仇。……倘其悍然不顾，甘为罪魁，则大局之破裂，地方之糜烂，正名定罪，责有攸归”[123]。3日卢永祥发表通电回应，声称“彼方已明白挑战，和平希望业经断绝，惟保境安民，责无旁贷，亦非空言所

能补救，自当整我军旅，为国锄奸。……推厥祸始，实由齐燮元为赞助曹氏贿选最力之人，故不惜残民以逞，助桀为虐，淫威所及，安有底止！”[124] 同时又发表讨曹通电，历数曹锟贿选卖国诸罪是“假共和政府之名，行武力专政之实”，宣传其“乱国之罪，事迹昭然，法所不容，义应申讨”[125]。4日齐燮元通电责卢永祥“反抗中央，招聚乱党”，浙军“先施攻击，希图掩袭不备，肆其凶残”，声称“苏省防御疆土，素守和平，今逆寇相逼而来，自应悉力捍御，以期达保安之宗旨”。6日，吴佩孚、齐燮元又联名发表通电称，卢永祥“包藏祸心，阴窃自主之名，隐行割据之实”，“在刑典为不赦，对全国为公敌”，要求政府“明令讨伐，同仇敌忾，歼此大憝”[126]。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赣督蔡成勋、鄂督萧耀南、豫督张福来、皖督马联甲、甘督陆洪涛、直督王承斌、鲁督郑士琦等直系高级将领也同声相应，先后发表讨卢通电，表示直系对外之同仇敌忾。9月7日，曹锟下讨伐令，以卢永祥、何丰林等“公然首先破坏治安，违背全国人民爱护和平宗旨”，“均著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127]。曹锟同时还任命齐燮元为讨逆北路总司令，马联甲为副司令；孙传芳为讨逆南路总司令，蔡成勋、周荫人为副司令。江浙战争终至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最发达富庶的江南地区，尤以沪宁铁路沿线为中心，以上海近郊及外围地域为作战的主要战场。9月2日，苏军袭占安亭，拉开战事序幕。3日，苏军猛攻沪宁线安亭、南翔间的咽喉要点黄渡，浙军则反攻安亭，战况颇为激烈，双方互有进退，战线形成胶着。与此同时，苏军于4日在上海西北的浏河开辟新的战场，以图收侧翼包抄之效。浙军兵力不足，退守待援。随后，苏浙双方均加派援军，在浏河战线续有激战，但历一周之久，两军均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而隔河对峙。与浏河相邻的上海近郊嘉定，也是苏、浙两军作战的重要战场。苏军力图拿下嘉定，遮断浏河与南翔间的浙军联络线，各个击破，浙军则要保守己方战线，苏、浙两军在此激战多日，战线并无明显变化。为切断沪杭线交通，切割上海浙军与浙江后方的

联系，苏军还向上海西南青浦一线发起猛攻，但浙军坚守不退。总体而言，面对苏军的大力进攻，浙军在沪宁线取守势，但在苏南方向则取攻势。浙军自浙北出苏南宜兴，进可以下常州、无锡，切断沪宁线，东向上海，西向南京，攻守自如；退可以拱卫浙江，呼应上海，具有战略的意义。9月上旬，浙军与苏军以宜兴城攻防为中心，发生激战，苏军不支，连连后退，后在援军支持下方得反攻，击退浙军，至9月中旬，苏、浙两军各守其防，战线大体稳定。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周边地区，对上海的社会生活有明显的影响，也引起列强的关注。8月下旬，驻沪领事团通过决议：一、请驻京外交团照会外交部，设防保护苏浙及上海一带外人生命财产；二、如决裂后，各国将自行派舰保护；三、沪宁路运兵设防阻止；四、临时维持上海治安，并召集商团外舰人员，为万一之设备。29日，驻京英、美、法、日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今得悉江浙间将有战事，恐危及各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故特郑重声明，如外人之生命财产因此战争而有受伤害及损失情事，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之责任。"[(128)] 30日，四国使节又访问外交部，主张上海周围30英里内划为"中立区域"[(129)]。自8月下旬起，英、美、法、日等国以"护侨"为由，纷纷调遣军舰至黄浦江及吴淞口海面游弋。9月2日，上海领事团举行会议，决定：一、通告江浙当局，不得将军队调入租界或作军事行动；二、严防败兵入界内；三、请万国义勇团下令，准备随时出防；四、请各国驻沪军舰编练、戒备。同日，各国海军组成联合舰队，推举英国人安特生为领袖总司令。各国还议定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会同租界外侨组成的万国义勇团，共同担负租界防卫。4日，驻京公使团训电驻沪领事团："吴淞附近，如有战事，各国舰队务实力制止。"[(130)] 由于列强的态度和干预，江浙战争终于没有发展到上海市内。

自9月初苏、浙两军开战后历半个月的时间，苏军得直系各省之助，前线兵力的数量超过浙军，但在各线战场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

破，反与浙军形成胶着局面。如时人所论：“苏齐历来轻视浙卢之实力，以为不足与己抗，故敢倡议图浙。今双方决战将迩，方知浙卢之实力亦不为弱。”(131) 究战略层面而言，江浙战争虽为地方战争，但却牵动直、奉、皖、孙（中山）各方利害，反直“三角同盟”在战争爆发后即行动员，孙中山在南面动作，牵制了江西直军，而奉系更是在北面大举动员，有入关南进之势，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在即，令直系不敢掉以轻心，不能出动更多的兵力支持齐燮元。在战术层面，浙江方面视此次作战为生死战，没有退路，不敢懈怠，使此次江浙战争不似过往多次军阀混战，“文战”更甚“武战”，而是真打实战，战况激烈，苏军对此明显准备不足，兼以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浙江后，因本无根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能不拼死抵抗，而苏军将领各有私图，都希望由别人出力作战，自己得胜利实惠，不愿牺牲自己的实力，为他人火中取栗。结果，战事发生后半月，双方的战线各有进退，但都没有根本的变化，战事成僵持状态。直到9月中旬，孙传芳率闽军自福建北进攻入浙江，战局才有急转直下的变化。

孙传芳因在福建不安于位，对浙江早有觊觎之心，因此对攻浙十分积极。江浙战争爆发后，淞沪附近成为主战场，吸引了浙军主力，南线浙军实力空虚，为孙传芳造成可乘之机。孙传芳指挥所部六个混成旅在闽北延平集结后，于9月初分兵三路攻浙，8日越过仙霞关，一路北进，16日占江山，18日占衢州，浙南重镇尽入孙军之手，杭州震动。与此同时，赣军和皖军亦自赣北和皖南入浙，协同孙军对浙军进攻。在浙军不利的局势下，浙江省城杭州的地方势力，以浙江省警察厅长夏超和警备总参议周凤歧为代表，图谋“浙人治浙”，开始与孙传芳秘密接洽对浙江未来的安排。面对对手的南北夹攻之势，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及后方不稳的不利局面，争取时间，等待局势变化，卢永祥主动在9月17日宣布将浙省交还浙人，“实行自治”，省长兼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亦同时卸职，省长职交夏超代行，浙江第二师师长职由周凤歧代理。9月20日，夏超和周凤歧致电吴佩孚、齐燮元等，报告浙江局势的变化，称“浙省素日服从中央，此次构兵非浙人志愿，现

卢永祥已离杭，张载阳亦赴沪就医。超等职应维持地方，力图善后。现已电令所有军队退回原防，扫境以待后命”[132]。同日，曹锟任孙传芳为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22日任夏超为浙江省长。22日，孙军进入杭州，25日孙传芳到杭州走马上任[133]。

浙江局势丕变，但淞沪战场的战事并未停止。9月18日，卢永祥一行抵达上海，宣布“现因鼓舞军队士气，将总司令部移至龙华”[134]。此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在北方爆发，南下援苏的直军部队正纷纷被调回北方，卢永祥召集下属会议，认为事尚可为，决定集中兵力于淞沪地区，以沪宁和沪杭两线为防御重点，固守待变，并可配合北方战局。其时卢永祥方面对淞沪作战已有不同意见。据苏方探报：“卢永祥在龙华开会议时，何丰林主张，我方兵力及后援均不易与苏军抗卫，且近日战斗亦不见得手，不如我辈少数人引退，静待时宜。臧致平闻之大怒，破口谩骂，欲饱以老拳，卢乃急起对双方求情，竭力排解，何、臧二人均悻悻怒目，遂无结果而散。”[135]

浙江形势的变化使齐燮元看到了胜机，他随即在9月19日下总攻击令，苏军及直军援军向沪宁线正面的黄渡、浏河、嘉定、南翔等地发起全线进攻，与卢军发生激战，卢军拼死抵抗，方才稳住战线。25日，卢永祥到南翔视察，决定以反攻遏止苏军攻势，两军战况空前激烈，伤亡惨重。战至9月底，两军均感筋疲力尽，一时无力再战，战事稍有沉寂。

就在沪宁线大战、两军胶着的同时，沪杭线战况却出现对卢永祥不利的变化。9月下旬，卢永祥调整部署，将原在浙北的第二军主动后撤至淞沪地区，孙传芳的军队则一路跟进，22日占湖州，25日占嘉兴。随后，孙传芳亲往嘉兴督师，孙军沿沪杭线节节进军，卢军则节节退却，10月7日，孙军进攻松江，并经激战于次日攻克松江，卢永祥在沪杭线的防线出现缺口。9日，卢永祥调何丰林到沪杭线，令其督率第三军恢复松江。但何丰林对此并无信心，前此当沪杭线军事吃紧时，“臧致平特为此与何丰林筹划补救策，但何已惊悸万分，诡与

臧云，现有病恙，军事方面任公一人主持，欲借此而卸责。臧听其语未竟，大怒拍案詈何，并以手枪向之，大叫以此与君共休戚。幸其时卢氏之军务处长范毓灵座，奋力夺下，其内部之紊乱于此可知”[136]。

卢永祥在上海两面受敌，缺少外援，形势不利。10日，苏军攻占青浦，又克嘉定，孙军进逼龙华，战线已推进至上海近郊，卢永祥部备受打击，军心不稳。据齐燮元称：“黄渡、嘉定、浏河各处之敌，连日复被我军痛击，昨晚今晨全线表示投诚，并派代表多人来输，恳切之意，当饬我军前线，一律停战，现正办理缴械给资遣散事宜。”[137]

面对不利的局势，10月13日凌晨，卢永祥召集臧致平、杨化昭、陈乐山等各路指挥官及幕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形势及应对（何丰林因在前线指挥而没有出席）。陈乐山提出，“目今子弹缺乏，粮饷不足，且将士苦战累月，恐难久持，目今即处于四面楚歌中，不如请卢公顾全地方大局，急流勇退，即日下野，以保留将士元气，亦即以保留卢公令名。述毕，列席诸人无不愕然。”臧致平、杨化昭等“均有激烈之辩论”，仍然极力主战，但“卒以第四师不愿加入作战，实力已去，无可挽回”。双方争论良久，卢永祥“亦以饷械告缺，与其坐守绝境，不如放弃淞沪，另图发展”。遂决意下野，即席拟通电，宣布“解除兵柄，放弃淞沪”。何丰林闻讯返沪，“与卢面商机密。结果何氏亦以大势已去，遂声明绝对服从卢氏，同时下野”。当天，卢永祥与何丰林将浙沪联军总司令及淞沪护军使关防交上海防守总司令刘永胜暂管，并委马葆珩为上海宪兵司令，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随后乘日本轮船“上海丸”号离沪赴日。临行发表通电称：“此次江浙用兵，齐为戎首，于犯众怒，曹实罪魁，义愤所致，遂动天下之兵。……现虽士气奋发如故，而子弹已罄，肉搏相持，复令师徒牺牲，心实不安。爰毅然放弃淞沪，洁身下野。……兹于本日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所部兵士谨均已付托有人，必能守秩序以完天职。”[138] 当日孙传芳

发电称：“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饬所属军部，在距上海十里外地方停止候令。传芳即日自带卫队进驻龙华，维持地方秩序。”[139] 同时派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办理地方善后事宜。

卢永祥、何丰林虽然通电下野离沪，但驻留上海的皖系人物徐树铮等对此并不甘心，认为卢、何不负责任，他们“尚有精兵三万，大可一战，何必仓皇如此”[140]。臧致平、杨化昭不愿就此收手，放弃其自身利益；陈乐山虽然曾表示不愿再战，但又拥兵自重，在与苏军接洽停战不得要领后，也不甘就此放弃权力。徐树铮遂集合他们的力量，决定继续抵抗，以待北方战局的变化，徐自任总司令。但他们在上海市内筑工备战之举有将战火引至市内的可能，严重影响租界的安全，为列强所不允，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动人马，于15日扣留并软禁在租界活动的徐树铮、陈乐山等人，“缴其卫士武装”，不许他们自由行动。21日，徐树铮和陈乐山被租界当局迫令登轮离沪，徐去香港，陈去日本，皖系最后的抵抗企图烟消云散。

卢永祥敢在苏、皖、闽、赣包围、环伺浙江周边的形势下，与直系诸省相对抗，最主要的支撑在于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支持。江浙战争爆发后，“三角同盟”立即展开行动。9月5日，孙中山发表《讨贼宣言》，宣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他还发表《告广东民众书》称：“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志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141] 但孙中山的援浙之举未待开始即因广州商团事变而中辍。

对卢永祥更有实质意义的援助来自奉系。张作霖的头号军师杨宇霆在江浙战争爆发前致函卢永祥，指出“军事问题，窃以为愈迟愈妙，盖彼方非战无以维系内部人心，且尤利在速战。故尊处若干发动，彼必先下手。届时动在彼方，而公之筹备，又必较目前为周。……目前但观各方接洽者，动作之情形如何，苟能有效，亦不妨临时

斟酌机宜。”其后又明白向卢表示：“若攻浙无异攻奉，必须加以援助。惟浙亦应有相当之抵抗，否则，直方主力未稍移动，而浙已不支，我虽欲助浙，亦不可得。”[142] 正因为有奉方的承诺，卢永祥才敢于向奉方表示，“决心坚决非干不可”[143]。9月1日，卢永祥之子卢筱嘉专程赴奉见张作霖，陈述江浙形势及浙方困难。他告张，浙方“陆战可操胜算，海上尚无把握，但苏齐亦不见有完密布置。以两军大势相较，浙方似占优势，但苏齐援军多，急遽间似难遂驱除之愿。”他认为，“战期延长，浙军将不免有四缺点：（一）不易得援军之力，前线军队日事转战，不得休息，将即疲老；（二）子弹仅足两月之用，战期延长，将告匮乏；（三）军费浩繁，开战后地方上不易筹拨，粮饷两事均足为虑；（四）齐得北京之飞机，借力不少，浙方飞机为数不多，恐不能敌，且人才缺乏，急遽间不易物色”。他“请奉天早日出兵，以作声援”，并对浙方贷给款项、供给军械、借给飞机。张作霖“一一首肯，并谓我必当出以相当协助，断无坐视之理”。次日，张作霖召集奉系高级将领“会议多时，均主张以实力援助”[144]。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实践前言，调集大军准备入关，向直系施加强大的军事实力，并最终导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但是，缓不济急，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未能坚持到最后，当他下野后不过十天，冯玉祥即在北京发动政变，北方战局出现对直系不利的重大变化，但皖系余党终于没能等到形势对他们有利的那一天。虽然奉系在北方最终战胜了直系，皖系首领段祺瑞依靠各方博弈又回到北京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的失败，却使皖系失去了最后的地盘，也因此而使段祺瑞在北京缺少实力的支撑，皖系重回北京政治舞台更像是回光返照的昙花一现。

江浙战争最有力的推手齐燮元，虽然也是这场战争的赢家，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淞沪地盘，看似如愿以偿；但是，齐燮元的部队在作战中并未显示足够的实力，而是依靠孙传芳出兵才勉强获胜，齐的“威望”因此而大受影响，并不利于他在直系内部的地位，加以战后在地盘分割等方面出现的内部矛盾，部将离心离德，齐燮元对下属的

控制反不及战前。因此，就实际而言，齐燮元在江浙战争中可谓是得不偿失。其后，随着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奉军南下，不出两个月，齐燮元就丢掉了苏督之职，接替他的正是他在江浙战争中的对手卢永祥（其间经过江苏省长韩国钧的过渡），齐燮元也因此而退出了直系实力派的队列。

江浙战争最大的赢家是孙传芳。本来不过偏处福建、实力有限的孙传芳，在此战中攻取浙江，控制了这块沿海富庶之区的地盘，又通过扩军和收编，使部队实力大大扩张，一跃而成为直系内部不容小觑的实力派。其后，孙传芳合纵连横，积极经营，又联合东南直系各省，成功地击退了奉军南下扩张的势头，成为东南苏、浙、皖、赣、闽五省盟主，也是直系后期最大的实力派。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枪炮的子弹纵横突飞，军队于决生死争地方以外，行有余力，则以抢劫，就地土匪，乘机大起，人民的生命财产真是不堪闻问了”。江浙战地“本来民物殷阜，为江南富庶之地，但经过这一次战争，已变成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的情形了。战事初了时，黄炎培等为救济的预备，曾巡行战区，其报告书中有一节说：‘……无辜良民，死于战时之炮火，已属可怜，困于战后之劫掠，尤为奇惨。其间如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流亡间有归来，无衣无食，垂涕悲号，全无人色，而骸骨转于沟渠，……妇女迫于奸淫……。’这种伤心惨目的情形，不仅以所举两地为限，战区各地，大抵如此，举一反三，殊可概见。……一揣想其惨状，当无不热泪横流而痛心疾首于杀人为快的两军首领！”[145] 正是因为江浙战争与随后而至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战事较前此的军阀战争为惨烈，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更大，所以更激起社会各界及舆论对军阀派系当政的愤恨与反省，从而为其后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推倒北洋军系的统治准备了舆论和民众的基础。

第三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端

江浙战争的爆发牵动各方利益，引起反直各派的强烈反应，国内政治局势陡然紧张，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实践前言，着手策划将反直军事行动付诸实施。因为孙中山受制于广东商团事件等内部矛盾，粤方未能出兵给予反直派以实际的支持，反直的主要力量还是张作霖统领的奉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

直、奉两系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早就积不相能，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实力较量，奉系失败，被迫退守关外，割据自保。奉系之败，“盖奉军在对直作战以前，尚未脱前清绿营气习，官佐起自马弁，兵士目不识丁，吴佩孚以秀才资格，稍知军学，军中人才，确非旧奉军所能敌”[146]。经此失败，张作霖不能不反思过往之失，“知兵在精而不在多，乃立改其计，务求精炼，一洗散漫无律之弊”[147]。他听从身边新派人物的意见，着手整顿军队，编练新军。

奉系内部早有新旧派系之争。旧派多出身行伍绿林，与张作霖共打天下，性相投习相近，传统守旧，如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新派则多出身国内外军校，年轻气盛，锐意进取，懂得现代军事，他们拥“少帅”张学良为领袖，核心人物为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包括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臧式毅等。因为旧派人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新派人物迅速崛起，成为奉系军队的中坚，也是张作霖整顿军队倚重的主要力量。张作霖在东北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伸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148]。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精干尤过乃父。盖以一身兼数职，凡事必躬亲，夙夜勤劳，刻无暇晷亟欲领袖青年派之军人成一劲旅，以作三省之模范”。张学良认为：“老将之无学识，不如新将官之多韬略，师编制不如旅编制之运用灵活，旧军制不如新军制

之组织完善。老军队之积习深，难于指挥，新军人之性刚猛，而易于策用。张氏（张作霖）深以为然，遂决定依此计划渐次实行。”[149] 张学良在张作霖整理军队、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2年7月，张作霖组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统一奉军指挥权，同时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编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张作霖又将原来的东北讲武堂加以扩建，他自兼堂长，张学良为监督，“是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机构”。其主要措施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副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经此整顿，奉军部队的各级军官老旧者被逐步淘汰，新进者多具有现代军事知识，军制统一，训练严格，在当时北洋军系中，达到了较高水准[150]。而且，张作霖比较注重新式军械的运用，“全军各师旅，均添招技术队，设立军事教导团，教授技术和掷弹、炸弹之使用，毒瓦斯之放射，火焰喷射器之用法，以备作战”[151]。

对于当时还属于新生事物的空军，奉系比较重视。1923年，张学良出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兼航空学校校长，主持奉系空军的编练。奉系空军成军后，拥有百余架飞机，装备较新，人员训练有素，实力明显超过老旧的直系空军。“奉方之飞机，外人常称其性能优良。张作霖致曹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之语，其以此自豪，可以想见”[152]。奉系还由航警处处长沈鸿烈主持，组建了海军，并通过哈尔滨和葫芦岛航海学校，培训海军人员。

奉系的军工生产也超过直系。“奉系首领张作霖之重视军火远在

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之上，而其获取军火的手段亦首屈一指”；他“几乎倾其全力来获取金钱和军火以扩充其军队，而用军队为夺取地盘和权力的工具”[153]。为了在军火供应上有充足的准备，少求于人，“张氏既购得大批军械，诚恐不足以杀进直系，且鉴于直奉战争之结果，决计自行供给军械子弹等项，将奉天兵工厂实行扩充”[154]。1920年，奉天军械厂被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陶治平、韩麟春先后任总办。全厂历经扩建，设施齐全，包括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兵器厂、火药厂、铸造厂等分厂，并得到日本的技术支持，可以生产各种口径的炮、枪、弹，年产炮150门，炮弹20万发，机枪1000挺，步枪6万支，枪弹1亿多粒，年经费超过百万元，“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不只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也为之侧目”[155]。奉军还尽量从外国采买军火，进口军工器材，雇佣外国军工人才[156]。东北相对发达的铁路交通网络，为奉军的军事调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奉系的财政经过整顿亦较为充实。1923年东三省的军事支出3600余万元，而当年奉天的财政还有820万元的盈余[157]。

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到第二次直奉战前，奉军共有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余人，还配备有一定数量的辎重兵[158]。“经过这样的整军经武，仅仅两年功夫，就改变了全军的面貌，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而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159]。

第一次直奉战后，与奉系结下怨仇的直系也不敢大意，在军事方面对奉系保持警惕，扩充军力，而且因为直系把持了北京中央政权，在获取整军经武的合法资源方面，有奉系所不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例如，直系可以利用北京中央政府的对外国家代表地位，向各国交涉购买军火事宜，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笔，是在1922年8月订购的价值564万元的意大利军火，包括步枪4万支，子弹30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48门，炮弹2.4万发[160]。只是因为直系财政困难，筹款不及，这笔军火迟迟未能交付，奉系为此还活动将其转售奉方，对直系

釜底抽薪。吴佩孚电曹锟称："查此事为直奉势力消长之唯一关头，倘为我方弃之而为奉得，资盗粮而长敌气，奉张死灰复燃，实有无穷隐患。"[161] 最后费尽周折，直系才勉强筹得款项，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得这批军火。再如，直系控制着关内汉阳、巩县、德县三大兵工厂，具有相当的枪弹生产能力。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曹锟通过总统府军事处，特别命令三厂提高生产能力，以应战时之需，并规定如能照数完成，技师工匠等可领奖，员司等"无实官者准予从优保官，有实官者准予从优进级"[162]。

直系的海军实力明显强于奉系，直系控制的长江和渤海舰队拥有巡洋舰、驱逐舰、炮舰、运输舰多艘，吴佩孚亦拟重点运用，自海上攻击并登陆包抄奉军后方，只是因为战局的变化，使吴佩孚此计不克实行。而对于陆地作战有重要帮助的空军力量，直系空军显然弱于奉系空军。直系空军共有四队，分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南苑，所用飞机老旧，数量不足，战力有限。1922年秋，吴佩孚在洛阳成立航空队，并将其规模扩大到三十余架飞机，但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还是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直系空军都不及奉系空军[163]。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军总数有二十五万余人，编为十三个师、二十七个混成旅、两个骑兵旅及其他单位[164]，与奉军兵力大体相当。但是，因为直系是第一次直奉之战的胜利方，直系的陆军在北洋军系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不太看得起出身旁门的奉系，因此，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后的整军经武方面，显然不及奉系有直接的动力，效果也就打了折扣。尤其是直系内部因为种种原因，又分化出各个不同的派系，有些派系有实力，但因资源分配的"不公"而对曹锟吴佩孚不满，有些派系贪污腐化，并无多少战斗力，但因其传承关系，又把持着不少资源，派系之间矛盾重重，上下失调，将帅失和，指挥难以统一，财政非常困难，难能支撑直系的军事，从而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实力。如时人所论，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经此大创，回去日夜筹划，练兵筹饷，预备复仇，而直军战胜而骄，以为从此无事矣。不但

不知防范，而吴亦不然其事。大将战胜而骄，为兵法所忌，况不闻不问耶”[165]。“这时直系的军队，实际上有战斗力而又完全听吴指挥的不过是少数的几师，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那种同仇敌忾、上下一心的气势，迥然不同了”[166]。然直系内部舆论尤其是吴佩孚等直系高级将领，仍然满足于前次战胜奉系的经验，以老眼光看奉系，认为“西南六省袒直，绝不助奉”，“皖系袒奉，无能为力”；“奉方旧日师旅长尽绿林出身，有勇无谋，不待论矣。”……新招目兵未经战事，就令训练有素，尚不适用，何况仓促成就者耶！“至于饷械，奉不逮直。直论饷有财、交部，有京汉路，有直豫鄂，并有他省接济。论械，有汉阳、德州、巩县三兵工厂。奉则何如乎？饷源仅恃东省，械须购自日本”。所以，直军上下盲目自信，认为“就种种方面推测之，奉军再战，必败无疑。”“无论何时再战，奉方万无幸胜之理。”[167]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奉直关系陡然紧张。支持卢永祥抵挡齐燮元攻击的动力之一，便来自于奉系可能的武力支援，而奉系也确实着手实践前言，开始军事动员，因为“奉方不速入关，诚恐直方再有增援，浙其危殆”[168]。9月4日，张作霖发表通电，痛责“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终，……卖国丧权，穷兵黩武，语其罪状，早为天下所不容”；声称“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169] 7日，张作霖邀见英、美、日、德等国驻奉总领事，声明：“近者北京政府欲贯彻其武力统一之迷梦，突命苏、赣、皖、闽四省联合攻浙，……观其行动，恐不能忘情于奉，奉为自卫起见，不得不作相当之抵抗。”“直方现举重兵，分路侵奉，奉为自卫计，决计举三省精锐，尽力防卫。事出万不得已，希予谅解，幸勿误会。”[170] 虽然奉系内部的旧派军人主张谨慎行事[171]，但新派军人的主战意见终占上风，张作霖决策出兵攻直[172]。

根据奉系的军事作战方案，奉军被编为六个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第三

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第五军，军长吴俊陞；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其中第一军和第三军约共6万人合编为联军，担任山海关方向的主力作战任务；第二军3万人担任热河作战任务；第六军近万人以骑兵为主，担任赤峰方向西北侧翼的策应任务；第四军万余人担任总预备队；第五军万余人，担任东北后方防务。空军三个大队，配属一、三联军和第二军作战，海军则以海岸防御为主。奉军总兵力约为25万人，参战兵力约12万人[173]。

9月15日，张作霖宣布就任“镇威军”总司令，对外公布军事将领的任命，并致电曹锟，口气强硬地声称：“四省图浙之举，弟曾切进忠言，兄复函力主和平，方深感佩，乃墨沈犹湿，而战令已颁，同时又向敝处分路进兵，榆关扣车，交通顿阻，甘为戎首，是何用心？”[174] 17日，张作霖前往锦州坐镇，主持军事行动，行前发表谈话称：“予此次出兵，非在报复往昔战败之耻，实为国人请命，要求曹锟退位，以谋南北统一，至于继任之人选，则以南北公意所推，应请段合肥出任巨艰。惟吴佩孚如尚拥其兵力而不释，则绝对不能赞许，故吾不能不以武力解决之。”“直既攻浙，已不啻间接攻奉，奉为遵守盟约起见，决不能袖手旁观也。”“吾必与吴佩孚一较手段，成败在所不计”[175]。

奉系态度明朗，奉军陆续南进，曹锟得到有关报告后，急令吴佩孚入京，准备军事因应。在未入京前，吴佩孚已经有所部署，重点在将分散的直军各部收缩集中，并在山海关前线抢占有利位置。他令直军南下援苏的第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立即回撤京畿，令第十五师等部立即进驻山海关一线，令第二十三师等部赶速向山海关、秦皇岛一线集结，中断关内外京奉铁路交通，成功地阻止奉军获得出发的先机之利。9月17日，吴佩孚乘专车自洛阳到北京，随即进见曹锟，讨论局势，“决先兵力对奉，南京暂取守势”[176]。曹锟即命吴佩孚主持对奉军事。18日，曹锟发表讨伐令，声讨张作霖“野心未戢，复乘东南

多事之秋，为扰乱中原之计。证以近日所传通电各方，益见破坏大局，蓄谋已久，实难再事容忍，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除派总副司令并分派各司令外，即责成各该将领督率所部，相机剿办，剋日肃清”[177]。

根据直系和吴佩孚的军事部署，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任副总司令，其编制为：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副司令王维城、董政国，下辖三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四万人，担任山海关正面作战任务；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下辖一个师一个旅及毅军等部，兵力约二万余人，担任热河东朝阳方向作战任务；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下辖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2.5万人，担任热河北开鲁方向作战任务；第四军，总司令曹锟，下辖一个师一个混成旅，兵力约万人，担任后方守备任务；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下辖十路部队，计六个师八个混成旅，兵力约七万人，主要部署在豫、鲁两省，随时准备增援前线。直军总兵力约25万人，参战兵力约十余万人，略少于奉军[178]。

直系主帅吴佩孚对于战胜奉军充满自信，“明白表示与张作霖决一胜负之决心，且更切实表示其确信必能战胜张作霖”。“极觉与所有主要反直派为最后的战争之时期亦至。……谈及张氏时，其语调顿变激烈，彼意盖以为除非东三省完全投降，彼绝无与张和解之余地，彼拟亲自指挥讨张军事，尽其全力，以观其最可恨之敌人被逐”[179]。19日，吴佩孚在北京约见中外记者，声称“张作霖乃藉故兴兵，截断京奉路，率兵攻击朝阳，事已至此，中央忍无可忍，所以命令予实行讨伐。然中央雅不欲穷兵黩武，贻关外人民以痛苦。最小限度，使张作霖解除兵柄，伊子学良出洋留学，三省服从中央命令，徐图办理善后”。时有路透社记者提问说，现在关外天气甚冷，出兵是否已晚？需多长时间可攻克奉天？吴佩孚颇为自信地宣称，“军士御寒衣具完全准备，天气无关”，并夸口两个月即可攻克奉天[180]。不过，以后战事发展的进程却表明吴佩孚说的是大话。即就吴曾信誓旦旦宣称

已“完全准备”的御寒衣具而言，实际情况则是直军士兵在口外的严寒中，多着单衣作战，各部怨声载道，战斗力大受影响，其间暴露出直系在此次直奉战争中的重大软肋——财政困难以及由此而致的后勤供应跟不上。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困难，而又以直系当政期间为甚，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借债应付。但是，因为偿还能力的问题，外债和内债都不易借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下降，原本还能救急的地方解款和银行垫借，也渐至于无[181]。1924年，北京政府借外债1620万元（其中还本付息1330万元），借内债530万元，银行短期借款18.5万元，再加上数目不明的银行短期垫款，估计可支配款项的余额不会超过2000万元[182]。而据总统府军事处的预算，对奉作战的军费至少需要2250万元，其中仅部队开拔费即需400万元[183]，其间的缺口可想而知。对直系而言，真可谓是山穷水尽，罗掘俱穷。曹锟在位多年，善于搜刮，据说其家族家产不下8000万，但曹氏个性悭吝，不愿散财，吴佩孚为此甚感头疼不已。为了让曹锟及其家族能够体恤前方官兵的急迫需求，吴佩孚特意提出由曹锟四弟曹锐担任兵站军需总监，“希望其先行垫款，以便赶制寒衣运往前线。以此曹氏得讯后，不敢遽决，连日踌躇，始行就职。但吴氏以曹军需总监者，以曹四长直时卖官鬻爵得贿甚厚，故特加以尊号使其垫办军饷”[184]。然就战争开打后直军后勤供应的实情而言，吴氏此招的效果似乎十分有限，直军的后勤供应始终跟不上前方战局的发展。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吴佩孚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后，留在京城，“迟迟未发，虽以后方尚待布置，实亦因军饷尚未筹足，催促至急”。他令素有“财神爷”之称的财政总长王克敏“每日须筹50万，解交总司令部，王氏至此更觉进退两难”[185]。“谓非无办法，但缓不济急，苟能再缓二个月打仗，则两千万可以筹到，但暴露于前线，集中于后方之军，非食不能动作，故决定先办短款，筹多少发多少”[186]。不过，他提出的若干筹款方案，均为缓不济急，无法解直系急

等用钱的急迫之用。白坚武抱怨说："大军陆续出发，而财部近尚塞绝一切财源，置他人于火炉之上，而促成二三私人富家翁之金佛郎案。军政不能合作，为害于军事前途，亦见内阁不得人。相不称职，将不能图功。"[187] 其后，经过与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再三交涉，北京政府方得以德国庚子赔款退还支付后的剩余款项为担保，于10月7日发行库券420万元[188]。虽然总税务司指定此款"只作京畿治安暨政费"，"明定不作战费"[189]，但仍被直系挪用。不过即便如此，此款拨放尚待时日，而山海关前线战事吃紧，九门口要塞失守，吴佩孚不能久留京城，而欲赴前线督战，为此，在吴的许可下，其幕僚谢宗陶于9日约见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和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强逼两行将未发行的新钞各200万元加印"军"字交付直军使用，但被拒绝。谢宗陶在降低勒逼数字仍被拒后厉声言："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则留，愿三思之。"[190] 直系就是用这样几近于扣人的逼迫手段，从中、交两行搞到了各60万元现金，至此，吴佩孚方能在当晚坐车离京赴山海关督战。故时人有论云："吴佩孚挟雷霆千钧之力，出而与奉张一战，决心已久，但自来都之后，前方军事，尚无进步，后方征调，煞费筹划，荏苒兼旬，尚不能出国门而临前敌，以现状测之，即可知此次作战，纵旷日持久，恐亦未必有结果也。"[191]

二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

1924年9月14日，奉军第二军首先在热河方向向驻守朝阳县的直军发起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战争的基本进程表现为，"直军主守，奉军主攻"，战场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正面京奉路沿线和侧翼热河方向。由于吴佩孚的预先部署，直军在京奉路沿线高度设防，奉军在开战之初未能占到便宜，两军形成对峙局面。而在热河方向，奉军的攻势却屡屡得手，使得原本是偏师侧翼的热河战线，在开战之初反成为直奉两军交战的主要战场。

担任热河战线作战任务的直奉两军，番号都是第二军。奉军第二

军由李景林指挥，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其后一直在黑龙江军中任职，1917年随许兰洲投奉军，参加过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奉军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直军第二军由王怀庆指挥，他比李景林大十岁，行伍出身，前清时期已经做到协统、总兵职，1918年帮办直隶军务，1920年任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是直军中的老资格将领，但他缺少实战经验，军才平庸，又长期住在北京养尊处优，对战事并无准备。及至战争爆发，王怀庆方才在9月19日仓促出京奔前线，作为热河方向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如何作战心中无数，甚而连像样的司令部都没有组织，随身只带着少数参谋及幕僚，以仪仗队开路，摆谱乘轿，大摇大摆，缓缓行进。所辖部队平日缺乏训练，装备陈旧，开拔时各项军需饷械都未领到，官兵士气低落，纪律松弛。“自出发到作战，王怀庆始终没有对官兵宣布为什么要打仗，开向什么地方去打，打的对象是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上了前线[(192)]。以如此老朽无能的将领指挥直军作战，可见直军准备不足，吴佩孚对侧翼战线重视不够，未及有更周密的筹划。

王怀庆领命担任热河方向的作战任务时，曾经大言不惭地拟订分兵五路攻奉的计划：“一路进攻新立屯，截断新民；一路急取九关台，进攻义州；一路经女儿河，进据锦州；一路出梨树沟门，截断榆关后路；一路令林西、赤峰毅军速行东开，为开鲁、绥阜后援。并令地方团警，保卫沿边，策应各路。”而在实际上，这些都是说给外人听的大话，他实则将后续战事全寄希望于外援，出发前即电告吴佩孚称，“度德量力，兵弹两缺”，“一旦猛攻，朝发夕至，即使拼命鏖战，子弹能支数日，而后方援军，非十数日决难赶到。全军存亡，在所不计，贻误全军，悔恨何及。战机紧迫，不得不报”。“除电饬热河沿边各军，严加戒备，暂取守势外，昨经呈明大总统，预备分路应援。查现在热河防务万急，所有援军出发，应行筹备一切事宜，不容稍缓，尚乞我公统筹全局，速示方略，至深祷盼”[(193)]。王怀庆的保守迟缓，正给奉军以战机。王的对手李景林认为，“敝军进攻之日，正热河电令调动军警团甲之时，倘再晚攻三日，不易为计矣。弟力持急进

猛攻之意，即预防敌人有此谋也”[194]。

奉军在热河战线的作战重点是热东重镇朝阳。第二军下属的第三旅张宗昌部、第二十三旅李爽垲部、第二十四旅邢士廉部，二万余人分兵三路会攻朝阳，而直军只有刘富有的第二十六旅和张林的热河第一混成旅及朝阳镇守使龚汉治的巡防营防守，兵力不及奉军之半，且准备不周，疏于防备，致奉军并未用大力，即于9月16日占阜新，19日又占北票，随后开始合攻朝阳。直军巡防营系属老旧部队，作战不力，拖累大局，刘富有和张林部见此情形，亦无心力抗，主动撤退，奉军遂于22日占朝阳，热河门户洞开。此战直军因“军队复杂，人各一心”，热河军队“向不守纪律，只除一意奔逃，不可制止”[195]。据奉方观察，“观吴之意，似仍其故智，以为一扑即下，故不注意于热河，而以全力注山海关。我但坚持，使彼三扑两扑，终攻不开。彼计穷，必悔其放弃热河之失计，自然意乱智穷矣”。“现在朝阳已下，热河东部险要，足为我军屏障。……倘能一鼓而下，进据喜峰口，则敌军左翼一失，榆关不攻而自破矣”[196]。

奉军攻下朝阳，“一着争先，全盘得势”[197]，遂乘势一路进击，扩大战果，29日攻占建平（叶柏寿），30日攻占凌源。直军节节败退，全无战斗力，王怀庆虽亲率部队往援，但亦未能挽回局面，只能退守待援。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认为，第二军“恐前缩后，涣散已极，影响本军士气甚大。民意军心，情现于此，拟请转请资深望重，素抱热诚之大员，予以大权，赶赴凌源，维持军纪，督催作战”。“第二军既退守凌源，倘再不设法维持，大局实不堪设想，惟有恳请转饬第二军王总司令，赶速前进，以便督饬各部，相机攻守”[198]。吴佩孚眼见王怀庆难当大任，遂改变指挥系统，免去作战不力的第二军前敌司令刘富有、副司令龚汉治职，在热河首府承德设前线司令部，由“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全权负责，将第二军、第三军全部交由王承斌指挥，并调第一军第九师董政国部增援热河，令王承斌发动反攻，扭转热河战局。然而第三军冯玉祥部却在离开北京后，以交通困

难、行进不便为由，徘徊于热河后方不前，并表示除非他部增援及猛攻当面之敌，“否则，敌众我寡，胜负之数，实不可知”[199]。由于第二军并未倾力参战，热河方向的直军面对奉军的攻势仍然不占优势。

奉军攻下凌源后，直奉两军在凌源附近接续有战斗，尽管王怀庆亲临前线督战，董政国师前往增援，但直军士气低落，不能持久，防线一退再退。王怀庆见不能抵挡奉军的攻势，无心恋战，索性退往平泉驻守，由此而致热河北境的赤峰态势孤立，面对奉军第六军许兰洲、吴光新部进攻的压力。10月初，直奉两军在赤峰周边及城下激战，死伤甚众，直军董政国第九师及毅军等部，难以抵挡奉军的攻势，最终弃城而退，10月9日奉军占赤峰（14日直军寻隙重占赤峰）。此时直军第三军冯玉祥等已暗中通款奉方，为了拉拢冯部，热河奉军未再向平泉进击，而将兵锋直指长城各口，直接威胁到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后路，战局重心由热河向山海关方向移动。

位于长城东端尽头的山海关，依山面海，地理形势重要，内有京奉铁路经过，外有天然良港秦皇岛，是连通关内外的咽喉要点。直、奉两方以此为界，各据关内外，平时相安无事，战时则为必争之地。奉军希望突破山海关要隘，长驱直进关内，直取北京，逐鹿中原；直军则希望在山海关正面坚守，辅以热河和海岸两翼包抄，歼灭奉军主力，奠定胜局。因此，直奉双方都在山海关战线投入重兵，战局发展左右战争的进程，对直奉双方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之初，吴佩孚就特别关注山海关战线，令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着重在山海关沿线布防，成功地阻止了奉军企图以突袭而致守军措手不及从而轻取山海关的企图。因为直军的严密布防，使得奉军不能不改取强攻战术，这就注定了山海关战役的激烈程度。

直军在山海关的布防阵地自北面山地逶迤而至南面海滨，部署了

三个旅的兵力，奉军则由第一军和第三军组成的联军担任主攻，其中第一军姜登选、韩麟春部攻直军左翼北线，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攻直军右翼南线。自9月中旬起，直奉两军已不断有火力接触，10月初直奉两军开始交火，7日奉军对直军发动全线总攻，“山海关战线有猛烈之炮火，历二十小时之久”，双方指挥官均亲临前线督战[200]。奉军利用炮火为掩护，猛攻正面直军阵地，直军亦利用炮火覆盖前沿，予奉军重大杀伤，奉军历数次冲锋，终未能突破直军防线。因为直军对山海关正面防线较为重视，事先已有周密防备，“防御工事，或依山势深挖洞，或修盖板壕沟，掩体工事做得极其坚固，特别是机枪掩体不仅坚固，而且遍布全线”[201]。而在战线北侧外围的九门口一线，山峦重叠，不及山海关正面地势平坦，本对守方直军有利，但担任防守任务的直军第十三混成旅非直军嫡系，旅长冯玉荣又非将才，“自到九门未至前线视察一次”。奉军利用山势，避开直军炮火，分进合击，取得突破，九门口告急。冯玉荣急电彭寿莘，“乞就近派队援助，乞今日赶到”。彭急调部队驰援，但等增援部队赶到九门口时，“即见大部队伍纷纷退却”，“且山上所设之炮完全弃去”，冯部全军正在溃败中，局势已难以挽回。9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其后，奉军继续扩大战果，驻守九门口至义院口一线的直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葛树屏亦向彭寿莘告急：“敌突进长城以内，致将职旅右翼及侧背包围，万分危急，请速派员抵御。”[202]奉军的进展势将威胁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安危，彭又急调陕军第二师张治公部往援。10日，奉军突入石门寨直军阵地，“势甚危急”，直军经苦战“始将原有阵地完全恢复”[203]。

直军在山海关前线表现不佳，而直军统帅吴佩孚却因为筹款问题在北京迟迟不能启程往前线，直到勒逼款项稍有眉目，又接到山海关前线的告急电，吴佩孚方才在10月10日晚离开北京，11日到达山海关前线，同时还带来了直军嫡系精锐部队第三师。吴佩孚到达山海关后，在列车上设立大本营，指挥作战，又在彭寿莘等陪同下视察前线，决定对九门口奉军发动反攻。然而，奉军的攻势步步紧逼，一点

不给吴佩孚面子。13日，陕军张治公部原非劲旅，在石门寨难以支持，被迫后退，14日石门寨失守，奉军距秦皇岛不过咫尺之遥，京奉路有被奉军切断的危险，直军后路受到严重威胁。彭寿莘与其参谋长李藻麟认为："奉军由沙河寨南行经安民寨，可直攻秦皇岛；如沿高山（塔山）西麓山沟经刺儿沟、魏家沟转东，出二郎庙西方山口，可以直捣山海关之背后，对战局影响极大。"[204]

吴佩孚原先的作战方案是在山海关正面吸住奉军主力，以冯玉祥部出击奉军侧后，威胁其后方锦州，然后以直军精锐主力海运在奉军后方葫芦岛登陆，三面合围奉军。"直军之目的，本欲以海陆军相连之势，一鼓而下绥中，聚军舰于葫芦岛，则朝阳奉军顾虑后路，当不战而退。今奉既为先发制人之策，愈引起直军之奋斗，遂以后方所有之实力，悉加援于此，此山海关战事之所由剧烈也"[205]。战局的发展迫使吴佩孚改变原定的反攻方案，首先部署稳定山海关前线的直军防线。10月15日，直军第三师到达前线，加入战斗，遏阻了奉军的攻势。其后，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展开反复的拉锯战，战事之激烈创北洋时期内战之最。吴佩孚"每日必亲赴前线督饬作战，往往直达火线之下"[206]。奉军将领韩麟春、郭松龄等也亲临前线指挥。前线炮火连天，两军死伤惨重[207]，阵地反复易手，但都未获突破，战事发展进入胶着状态。为了维持攻势，张作霖决定将奉军总预备队投入山海关前线作战，而吴佩孚则命令还在热河的第二军等部，"火速前进，以资牵制"[208]。19日直军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部反攻九门口，20日直军攻占刺山，21日奉军反攻夺回刺山，直军第十四师旅长王乔阵亡。"直军屡失前进时机，皆因军费不畅，接济不匀所致。"[209]

直、奉两军胶着于山海关前线，奉军第一军在山海关北线略占优势，而在山海关南线正面的奉军第三军，因攻击地域地形的限制，仍"处于不易发展地位"。杨宇霆根据"日人探报"，向第一军军长姜登选提议："敌军拟以有力部队，攻击榆关内北方高地，使石门寨处于孤立地位，故不若合我军关内外之有力部队，先行夹击榆关，俾三军

得进关内，与贵军联为一气，声势既大，敌即为之气馁。且榆关能否陷落，极为各方所注视，一旦归我占领，敌方内部之变化，即必随之而起，不但战略上可占胜利，且较稳妥。”[210] 随后奉军决定从第三军抽调一部，由副军长郭松龄率领与第一军会合，集中突破北线直军防线，然而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郭松龄在山海关正面毫无进展，现在改由九门口出击有邀功之嫌。郭闻言大怒，拂袖而去，并将部队撤回，致奉军的进攻计划延搁[211]。恰于此时，张作霖在10月22日接到段祺瑞的密电，称冯玉祥、胡景翼等直军将领，“明早入都……主持正论，并派人进据军粮城”，“合肥已告胡（景翼）部在唐山邀截”，吴佩孚“出重赏，反攻无进步，力已竭”[212]。未待奉军反攻，直军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战局遂进至转折点。如时人所论：“当吴佩孚未出京以前，群以吴氏一至山海关，必能大破奉军。及吴氏既至，直军亦仅能固守阵地，使奉军不再进步。盖直军昔以十三旅守九门口，一战而为奉军所夺，遂致山海关形势完全动摇。此实为最初失败之点。其后陕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功，在石门寨督战，失守阵地，又给直军以重大之打击。此一师一旅之失败，吴氏虽欲挽救阵势，逐奉军于关外，实力已有所不能。迨冯、胡返旆，停战令下，而山海关之直军，益岌岌乎其危矣。”[213]

第四节　北京政变

一　冯玉祥与北京政变

就在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激战之时，直军变起肘腋，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自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北京政局为之一变，直军后方成为他人地盘，前线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冯玉祥十五岁即入伍当兵，行伍出身，1913年三十岁刚出头就升至旅长，1921年升至师长兼陕西督军，成为方面大员。1918年，冯玉祥在担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南下参加北洋军与护法军的战争，

他违抗段祺瑞的命令，发出主和通电，结果被北京政府免职，后因曹锟从中缓颊，改为“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暂准留任”处分[214]，冯玉祥因此而成为直系成员，与吴佩孚“党系既同，私交固亦至相得也。及吴为直系之狄克推多，二人始因威望关系，发生龃龉”[215]。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自陕西率兵入中原，为直系战胜皖系立有很大功劳，随后驱走豫督赵倜，于1922年5月出任河南督军。但是，冯玉祥与开府洛阳的吴佩孚同处河南地界，“冯虽督豫，而吴固仍驻洛阳也。物莫能两大，况吴素性又颇傲慢，以冯久隶属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谘商，冯亦不愿一味仰承意旨，久之，彼此之间自难免各不愉快”[216]。还在冯玉祥刚上任时，吴即保举与冯积怨甚深的河南第二师师长、归德（豫东）镇守使宝德全任河南军务帮办，并保宝德全“向守服从，能负完全责任”，要冯“请勿疑虑误事”[217]。冯不满吴以此牵制其行事自由，遂以宝德全在冯军进入开封时“公然抗命”为由，于5月13日将宝德全公开枪决，如此决绝的举动自然惹恼了吴佩孚。对于吴佩孚保举到河南任职的人员，冯玉祥概置不理，同时不断扩充实力，增编部队。吴佩孚自认在直系中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冯玉祥不仅对其种种主张不买账，甚而屡屡给其脸色，让其下不了台，很没有面子，从而被吴佩孚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冤家对头。

1922年9月1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称，“冯督在汴，人地不宜，赶时调为热河都统，加以东蒙招抚使名义，以示优崇。如此，则北门有干城之选，中州无隐患之虞”[218]。所谓“干城”云云，不过虚语，热河地处偏僻，没有河南任职的实惠，吴佩孚提议将冯玉祥调往热河，实际表示他已视冯为“隐患”，担心其“不受指挥，深恐盘踞中州，尾大难制，是以密行计划，移调他处，另置心腹。一可借经济以牵制，二可便自己之方策”[219]。对此，冯玉祥自然心不甘情不愿，而又不能与势大力强的吴佩孚硬抗，只能“无论如何，吾定服从”，“取服从主义”[220]。曹锟既不能不给吴佩孚面子，也不愿让冯玉祥成为“怨妇”，为平衡冯、吴关系，决定将冯玉祥调离河南，安置在北

京，出任陆军检阅使。这个职位看似位高，实则“有虚职而无实权，其不能满冯之意可知”[221]。冯玉祥在豫督之位坐了还不到半年便失去了河南地盘，在直系中被边缘化，内心本已对吴佩孚十分不满，而其军队第十一师随他调到北京后，原本由吴佩孚承诺的河南每月协饷20万元，却被河南省当局以河南丁漕田赋“业经冯使任豫督时预征”，省银钱局现款也被冯“罗括一空”，财政十分困难为由，拒绝兑现，使冯部常常陷于饷械无着的窘境，更增添了冯对吴的怨气[222]。然“冯素深沉，时机未至，绝不少露词色，故逼宫夺印一出，冯仍任一重要角色，迨大选告成，禄仍弗及”。曹锟上台后，对“有功”部下一一封赏，而对在驱黎中“有功”的冯玉祥则未见有实质性关照，“诸将尽得遍沾实惠，独冯为吴氏所扼，竟不得丝毫实利。而逼宫恶名，复又归之，冯氏因之既怨且恨，而对于曹吴，常思所以报复之者矣”[223]。不仅如此，冯玉祥调到北京后，“非但地盘问题不得解决，且‘所部欠饷甚巨，既不稍有补贴，以后月饷曹又不肯发足’。冯因而对吴佩孚更为不满，对曹锟也大失所望，‘其愤激之情，殆不可遏’”[224]。这些都为其后直系的分裂埋下了隐患，“识者早知冯之不复为曹、吴用矣”[225]。

冯玉祥在直系内部郁郁不得志，便成为反直“三角同盟”的拉拢和争取对象。冯玉祥出身下层穷苦之家，笃信耶稣基督，具有为穷人请命的朴素平等情感，不满北洋时期的乱象，为粤方孙中山认为可以争取，以爱国和革命的名义，与其建立联系。还在孙中山刚刚开始护法不久，冯玉祥于1918年2月在前线发出主和通电，孙中山即致函冯称：“热诚护法，努力救国，不胜为民国幸。昨冬以降，南来国人，无不盛称执事为爱国军人模范，……徒以云海揆隔，不能时通声息为歉耳。……濒危之民国国脉，得以主持正义如执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则国民必感伟功于永久矣。”[226]不过，冯玉祥当时并无回应，直到1920年秋，冯玉祥才首次致函孙中山，表示“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我行我素，始终如一。”表示“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

合，固已有日，……乞多指示”。孙接信后，即派徐谦、钮永建为代表，携亲笔复函前往汉口看望冯[227]。从此，孙冯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系，“信使往还，络绎于途”[228]。孙中山热诚希望冯玉祥“用革命手段以救国”，且“能本此意与民党携手”[229]。为了呼应南方的革命运动，国民党人认为，“要革命彻底成功，便要实行中央革命，在北京发生一个大变化”[230]。冯玉祥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北方运动的主要对象。

1923年秋，孙中山命孔祥熙携其亲笔手书《建国大纲》转交冯氏，并指示马伯援专做冯玉祥的工作，马表示：“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西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中山表示：“这是一件大事，出诸你口，入于我耳，须去问问冯焕章的意思，他有没有这种计划与决心，若有，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革命。”[231]但是，冯玉祥当时身处北京，兵力有限，无力控制全部大局，而且形势也不明朗，不敢轻举妄动，便通过马伯援回复孙中山：“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有冒险行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232]此后，国民党人徐谦、王正廷与冯玉祥、于右任与胡景翼、张继与孙岳等都建立了个人联络关系，“所有孙先生的亲笔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项事情，通过以上这些代表随时代交或传达给冯、胡、孙三人”[233]。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黄郛系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渊源甚深，也在策动冯玉祥倒直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工作。

如果说，孙中山对冯玉祥的工作主要建基于道义与情感，张作霖和段祺瑞对冯玉祥的工作则主要建基于财政金钱的支持。张作霖和段祺瑞都曾通过私人关系与冯玉祥建立联络，进行拉拢[234]，并乘冯部财源困窘之机，施以援助，建立感情。“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默契，则极秘密，奔走者多皖人。张、冯两方，均以段合肥为中心”[235]。1924年2月，段祺瑞的谋士姚震致函奉方说：“二马（冯玉祥）接洽，亦待专款到后再办。”[236]3月，段祺瑞派人到奉天，取回张作霖开

出的奉天正金银行汇票200万日元，在天津正金银行兑取大洋162万元，交付冯玉祥。段祺瑞透露："这次的钱给冯玉祥一百五十万元，是三个月军饷用的。"[237]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冯玉祥毕竟是个现实主义者，需要考虑个人及其派系集团的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在直系内部的发展空间受限，自然难免对"三角同盟"的拉拢心动，寄希望于倒戈政变成功后可以有更多的个人政治施展空间，再加上从"三角同盟"方面还可以获得实际的金钱支持。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对直系的效忠已然动摇，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寻求合适的盟友，以达到个人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冯玉祥在直系内部寻得的同盟者，是其时驻守河南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和驻守河北的冀南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胡景翼和孙岳早年都曾参加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尤其是胡景翼，在陕西护法运动期间领导靖国军，与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人于右任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曾对孙中山表白附直"不过一时权宜"，对孙是"人远心近，始终如一"[238]。胡景翼和孙岳在直系内部非主流派，个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还在1923年直系筹办"贿选"时，"三角同盟"方面即与胡景翼有所联络，计划以大笔款项策动胡部倒直。皖方表示："接济款项一节，系分为两次。第一次系现在先给以数万元，为该师军官佐搬家之用；余则动手后再付。"[239] 但因胡军声明"非俟余款二十五万到津后不能实行（因移动军队、添办军需，无款可垫）"[240]，加以时机不成熟，策动胡军倒戈之举未成。胡景翼投靠直系，与冯玉祥督陕不无关系，双方也因此而有联络，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日近"。

当直奉关系紧张、战争阴云聚集之时，胡景翼特意在9月7日前往冯玉祥驻地，探询冯的意见。冯对胡说："前天我问总统有何预备，曹总统言，冯焕章、胡笠僧（胡景翼）二人拱卫京畿，不啻吾之二虎，即不预备，谁敢侮我？余曰虽有二虎，不与之食，其将何以噬人

也？”[241] 由此可知，冯已向胡透露其不愿为曹卖命的心态。9月10日，孙岳亦前往南苑冯玉祥驻地晤冯。冯对孙表示：“现今曹吴专政，国乱民愁，余本早下决心，为国除害，只以势单力薄，迄未敢下手耳。”孙岳提议：“胡笠僧（胡景翼）早已不满意于吴，可引为臂助，共图大事。”[242] 孙并自愿担任与胡的联络工作。经过冯、胡、孙三方的互通声气，取得一致意见，即利用直奉战争之机，发动政变，推倒曹、吴，然后请孙中山北上，解决政治善后问题[243]。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吴佩孚已经意识到冯玉祥的态度可能对直系的不利影响，特意致电曹锟的身边人王毓芝和陆锦，提出“鄙意只要冯使果敢有为，至时拟以东三省全权付托之。请密询其意向何如”[244]。但吴、冯心结已深，故在外人看来，这是“以画饼饵虎豹，欲求其唯命是听，吴之疏愚固极可哂”[245]。为防冯可能之变故，吴佩孚也作了相应的布置，令冯玉祥统领第三军出古北口，走北线经热河，自西北方向袭奉军后路，并令胡景翼部跟进，对冯部有所监视。此线路途遥远，地瘠民贫，离正面战场较远，或许吴佩孚认为可以减少冯部出工不出力对正面战场的影响，殊不知，吴此举反固冯倒戈之心，因为“行军千余里外荒寒之地，一不给钱，二不给弹，一旦遇敌，不战自溃，岂非故将我军置之死地耶？”[246] 而且胡景翼与冯玉祥已有举事的默契，令胡监视冯，无异使冯先就知晓吴之用心，对吴更增反感，亦说明吴佩孚太过自信，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变生肘腋，冯玉祥敢于倒戈相向。如时人论：“吴氏对于诸人，本不十分信任，故全行调至远地，以免发生后路之危险，一面希望从速克生张作霖，纵使诸人有不利之行动，势已有所不能。”[247] “推吴用意，对冯疑忌已久，胜不过与以吉林，割绝边地；败则必牺牲其队，更免后忧。冯亦早悟及此，故当令下即向曹婉辞，请另派大军前往。经曹力劝，始开拔北上。而吴不知冯、胡、孙间已有密契，且嘱胡、孙监视冯军，如有越轨行动，并可便宜行事。胡等尽泄于冯。”[248] 当胡景翼部奉命由河南作为援军北上经过通州时，特意将李虎臣旅作为总预备队留驻通州，以随时呼应冯玉祥的行动。

就在吴佩孚全心部署战事之时，“冯玉祥与其同志屡开会议，同时张作霖又与段祺瑞有所磋商，或于军队离京前，双方已具大体协定，虽未决其必然，但一大部之军队，未赴热河，逗留后路一事，确为事实。军队落后，名为筑路，实未前进，以便离京相近也”[249]。冯玉祥为起事作了周密的准备，他以京畿防务空虚为由，向曹锟建议任命孙岳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并将孙部一个团调进城内驻防，便于起事时里应外合，控制京城；同时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留住京郊，负责后方安排兼通消息；又将招募新兵编练的三个补充旅，以训练为名留驻后方，便于届时增加己方力量，控制局势。有意思的是，这些在曹锟和吴佩孚眼皮底下的准备行动，却没有引起曹、吴的相应警惕。

冯玉祥的部队因为冯的有意而迟迟其行，9月21日起方从北京陆续启程，23日冯亦离开北京。不过，冯部成一字长蛇阵，且行且止，逶迤前行，移动甚慢，每日行程不过数十里，9月底到达古北口以后即不再动，理由是筹措给养，实则是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冯令沿途各县“修理道路，以备行驶汽车输送军需”，保持道路通畅；又令部队每日演练行军，保持机动，便利随时行动；还派员严查当地向外发出的邮件、电报，“凡关于时事概不能涉及”，以免走漏消息[250]。在外部联络方面，冯玉祥与张作霖的使者秘密会见，表示“不拟与奉军作战”，“请奉军万勿入关”，并相约“于两星期内回信，在此期限内冯当按兵不动”[251]。冯玉祥与“三角同盟”的另一主角段祺瑞，则通过黄郛和贾德耀保持联络。段祺瑞曾有信给黄郛称：“大树（冯玉祥）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是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

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252] 此函实际是明白告知黄郛如何做冯玉祥的工作，也可知黄郛是冯玉祥举事过程中的深度参与者。段祺瑞的使者、时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的贾德耀与冯部一路同行，也在不断做冯的工作，冯玉祥向他表示“拟请段芝泉（祺瑞）、张敬舆（绍曾）诸位重出，维持大局”，请其“往天津疏通”[253]。10月18日，段祺瑞的另一使者宋子扬（曾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到滦州见冯玉祥，转告段意，“现在乃最须改造之时，若能办到，即当一共和国民于愿以足。”冯回应“若团结力量，可以为之”[254]。冯玉祥还利用王承斌对吴佩孚剥夺其师长职权的不满，将其计划告知王，“王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愿与冯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声明决不将冯的秘密泄漏给吴佩孚，仅只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谅解而已”[255]。10月9日，冯玉祥致电曹锟及直系各将领，指责曹锟、李彦青、王毓芝、王克敏等“朋比为奸，炀灶蔽明，致兵革遍于全国，人民沦于水火，欲靖国事，非将此辈小人一律驱逐不可”[256]。作为直系的大将，冯玉祥为何在此时以如此直白的语言发出此电颇堪玩味，是他希望以此透露某种信息吗？还是以此有意扰乱各方的视线？值得注意的是，此电并未发给吴佩孚，而对冯玉祥与己方立场如此背离的电文，曹锟和吴佩孚仍未有足够的警惕与因应。据说，电中指责的诸人见到此电后，李彦青谓：“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要这样同我们过不去。”王克敏云：“不是同我们过不去，他不过借我们发泄罢了。”曹锟看到电报后对他们说：“你们何以同他斗到这个样子，今天子玉又走了，这事怎么办呢？”吴佩孚“亦有所闻，颇为着急，然竟无完善办法以相对付。”[257]

10月11日，吴佩孚离开北京前往前线督战，同日冯玉祥亦将其总部北移滦平，摆出对奉进攻的态势，实则密切关注战局的走向，选择对发动最有利的时机，确保起事的成功与己方利益的最大化。此时，直奉两军在山海关前线反复厮杀，相持不下，直军渐有不支之势，尚未投入作战的冯玉祥部生力军成为直系取胜的重要砝码，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向冯发电，告“此间战事紧急，均由二、三军延迟不进所

致，倘仍逗留不发，大局不堪设想”[258]。由此而使冯玉祥判断战局已至最后关头，加以留守京城的蒋鸿遇向冯密报，吴佩孚的嫡系第三师已调至山海关，也使冯玉祥判断其部回师京城不至遇到有力的阻碍。因为“事情很显明，冯玉祥本有倒戈准备固是事实，但起始也不无观望之意。若吴佩孚能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得手，或者葫芦岛登陆成功，则冯的倒戈未必真能实现，甚至可以断定他不会实现。”[259] 至此，冯玉祥遂下定决心，倒戈相向，北京政变的大幕即将拉开。

二　北京政变与奉皖结合

10月18日及19日，冯玉祥连续召集部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行止，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等亦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前方的军事形势和倒戈政变的有关准备事项，冯玉祥正式宣布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倒曹吴的计划，得到与会将领的一致支持。随后冯玉祥令在大队后方密云的鹿钟麟旅回师京城，会同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旅控制北京；李鸣钟旅回师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路交通，稳固京城外围；在大队前方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旅回师京城接应；胡景翼部自通州进至军粮城、滦州方向，截断山海关直军的退路；孙岳在京城监视曹锟动向并作好内应准备；封锁北京至热河道路，切断两地电话通信联系，扣留吴佩孚派到冯部监军的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总监车庆云，以保持行动的隐秘性[260]。

10月21日，冯玉祥部根据计划开始行动。22日晚，鹿钟麟旅抵北苑，冯玉祥率刘郁芬旅抵高丽营，并在此与应约由北京城内赶来的黄郛会面，商讨政变后的政治善后方案。22日晚，鹿钟麟部已有一团进城，会同孙岳部于当晚12时占领电报局、电话局和火车站，切断了北京与外界的交通通讯联络。23日晨，鹿钟麟部主力入城，在孙岳部的接应下，依序控制了京城各要点。因为事发突然，曹锟完全没有准

备，在冯玉祥部队行动的过程中，局势平和，秩序如常，未发生武装冲突。曹锟的总统府卫队及直系其他留城部队被包围后解除武装，曹锟本人被留置在总统府，不能外出，形同软禁。曹锟的四弟、兵站军需总监曹锐和曹锟的亲信、公府收支处长兼兵站军需副监李彦青被捕（曹锐于11月30日服毒自杀身亡，李彦青于12月15日被处决），财政总长王克敏被冯部搜捕，但侥幸脱逃，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261]。

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于北苑会商政变诸项事宜。政变成功后，他们在当天联名发表致段祺瑞、孙中山、王士珍、岑春煊、唐绍仪、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大老名流及各省军民长官并报馆、社团等通电谓："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休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吾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262]冯玉祥还发表布告，强调"对于地方之秩序力予维持，而外人之生命财产，更当特别保护。倘有无知之徒，妄加揣测，生事造谣，希图煽惑，定当严密查访，重惩不贷"[263]。

冯玉祥发动政变，北京政治变天，曹锟被困总统府，外界无法得知其反应。据时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回忆："9月23日（此处似为颜惠庆记忆错误或译者翻译错误，应为10月23日——作者注），早7时，门房惊慌地将我叫醒，报称：街上不满士兵，据悉为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曾给警察局打电话，但是电话线已被切断，他深感事态极为严重，故前来通报。我以最快速度起床，试着与警察局、卫戍司令部及内阁同人分别联系。同时遣仆人出门打探消息。仆人从附近探询以

后，回来报告，冯玉祥将军回师北京，发表和平宣言，并包围了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同意他们的政见。此时，毋庸置疑，‘基督将军’已然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政变。这一判断迅速被证实，一位内阁同僚数小时后前来拜访，并希望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264] 颜惠庆还能做什么？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枪杆子决定他们这些笔杆子该做什么。

果不其然，当天上午孙岳前来拜见颜惠庆，“解释了冯将军回师北京的理由，称冯将军此举是为了国家利益，阻止不必要的流血战争，等等”。孙岳向颜惠庆“严厉要求：必须对吴佩孚大帅撤职查办”。颜惠庆“感到不妥”，认为应给吴体面的闲职。在随后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与会者对冯玉祥的“突然倒戈，甚为震惊”，但是“内阁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冯将军的全部要求”。因为“内阁会议尚在进行，突然闯进六七名冯军将校，催逼我们立即颁布命令，声言士兵长途跋涉三天三夜，已疲惫不堪，情绪甚坏，因而，任何的拖延不决，都将给大局带来更为不幸的灾难，枪炮已陈于公府门前，他们只能保证所控军队在下午两时以前不闹事，过此期限，他们不再认为部队还能保持京城的平静与秩序”[265]。颜惠庆还在24日专门入府，向曹锟“详陈一切，谓熟计利害，只有依允焕章之要求，下停战令与免吴子玉职”。曹锟回应称：“对奉作战，虽系子玉主张，予实成之，要办子玉，先办曹某。”继而孙岳到，向曹锟表示可以保其安全，并可通融给吴佩孚一名义下台，但命令必须发。曹锟无奈，只能对颜惠庆表示：“责任内阁，一切可负责办去，予听君等办理可也。”[266] 颜惠庆遂召集内阁会议，通过各项命令，请曹锟盖印发表，内阁亦向曹锟提出辞职。

10月24日，曹锟通电全国，声明“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获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逾。……兹特申令停战，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

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同时发布总统令：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应即撤销，所有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为青海垦务督办[267]。

关于政变的政治善后，冯玉祥根据其事先的筹划，在政变后即着手进行。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者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贾德耀等高级军官和政治幕僚。会议决定：一、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二、召开元老会议，解决国是问题，电邀孙中山、段祺瑞、王士珍、赵尔巽、田文烈、唐继尧等来京出席（其后又加入岑春煊、张謇等）；三、组织临时内阁，摄行国政；四、大政方针，决取新临时政府制，公推临时执政，再召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不承认国会，不承认曹锟宪法，对曹锟向国会辞职取不理态度[268]。次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致电段祺瑞称：“惟当军事时期，戎机重要，瞬息万变，督率指挥，宜立纲纪。谨先组织国民军总办事处以统辖，祥等勉从众望，分任总、副司令，专为布置各部队伍。本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时就职，命驾来京，表率一切，俾祥等有所遵循”[269]。冯玉祥还在25日发表通电，提出其所定建国大纲：一、打破雇佣式的体制，建设极清廉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谊为根基，扫除一切抢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270]。不过，冯玉祥的上述政治主张比较抽象，并无多少可行的内容，难以发生实际的政治效用。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动摇了直系统治的根本，反直“三角同盟”自然是欢迎的。26日，张作霖率先表态，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北京政府之收拾，当令段老当之。余将取消东三省之独立，与冯玉祥共辅佐段老”[271]。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贺其“义旗聿

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同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表示“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藉慰渴慕并承明教。”[272] 而各方属望的政治中心人物段祺瑞则态度谨慎，“据接近段祺瑞者云，段氏此时将自重，必待各省一致推戴，然后出山”[273]。直到29日段祺瑞才电致冯玉祥等，恭维其“所见远大，洞中机宜”，表示“非有彻底改革之决心，焉得民国本来之面目”[274]。

冯玉祥本为武人，此前并无多少高层政治经验，他的倒戈相向，虽不无政治理想与热情，也有对自身和集团利益的追求，但对于政治的复杂与派系的纠葛，他欠缺实际的体验，政治的本质在于利益的平衡与交换，故当政变后冯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做事的方法和内容都很难行得通。颜惠庆内阁提出辞职后，冯玉祥本意由颜惠庆留任总理，但提出旧阁中的直系成员不能留任，被颜“断然拒绝”。其后他属意的王正廷和张绍曾，也都担心在政治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出任总理将是吃力而不讨好，婉言谢绝。最后才由各方妥协，请与闻政变事的教育总长黄郛出面组阁。10月31日，黄郛组阁告成，黄自任代总理兼教育和交通总长，王正廷任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奉系人物王永江任内务总长，王乃斌任农商总长。但因为张作霖对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人事不满，王永江和王乃斌都未到任，内阁人事缺乏代表性，不过临时安排而已，其职权实际有限。

黄郛内阁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摄行总统职务，二是驱逐溥仪出宫。

曹锟自北京政变发生后即被软禁在总统府，不能与外界联络，只能听命在各种需要以总统名义发布的文件上盖印，扮演着傀儡总统的角色。不过，因为吴佩孚还在领兵坚持，新阁尚未成立，大局似仍处混沌之中，故曹锟没有立即请辞，仍表现出恋栈之意。而冯玉祥毕竟出身直系，曾受惠于曹锟，曹于冯有知遇之恩，故考虑到各种内外因

素及人言可畏，冯玉祥起初也没有下决心剥夺曹锟的总统职位。在直系内部，冯玉祥主要是对吴佩孚不满，视曹锟为“忠厚长者，但左右均群小耳”。“总统不看报，所以有人骂他亦不知也”[275]。冯玉祥在政变前对曹锟还没有完全打倒的决心。政变发动前夜，黄郛到密云高丽营与冯玉祥密商有关事项时，冯玉祥所拟之文告通电，“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黄郛认为：“国民军倘不过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276]然而这份黄郛所拟的通电文稿，也没有点出曹锟之名，可见冯玉祥还是为曹锟留有余地。23日政变发动之后，冯玉祥在个人署名发表的布告中，还称呼曹锟为“大总统”，称自己是“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起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和平解决，指日可待”[277]。直到形势发展渐趋明朗，新阁成立，特别是担心吴佩孚借曹锟名义继续生事，扰乱政局，冯玉祥方认为：“总统就任以来，除祸国殃民外，无可述者，今又为吴佩孚号召之资，已成将来乱源，是为人民与国家计，非将曹氏推倒不足救国也。”遂改变对曹暂不置理的态度。10月31日，黄郛内阁组成的当天，冯玉祥对王承斌言：“曹氏不去，吴终拥之以号召各省；吾作此事，明知未免逼曹太甚，论私交则有不安，然为救国救民，又不得不以公废私也。”冯玉祥授意王承斌往见曹锟，“请其宣言退职，内阁另行改组”[278]。

冯玉祥在政变后控制着北京，他对曹锟态度的变化，曹锟自不能不感知并遵从。11月2日，直军已经全线溃败，退到天津的吴佩孚难以支持，形势的发展已不容没有了武力支撑的曹锟继续赖在总统之位，曹锟才不能不向国会觍颜提出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称：“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竞竞，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请避贤路，以谢国人。”[279]此等辞职通电不过是例行公事文章，也根本没有经国会讨论，因为政变后的国会已经在声讨贿选的谴责声中失去其合法性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人还拿国会当回事，

冯玉祥已决定“不承认国会”，曹锟向国会提出辞职，只是为自己的下野寻求个人面子的合法性解释而已。但是，辞职下台并不能恢复曹锟的自由身，曹锟下台后与其妻妾、子女、仆役等全部移住南海延庆楼，由陆军部与京师警察厅派出军警严密监视，实际仍处软禁状态中，直到1926年4月10日重获自由。也就是说，曹锟花了大笔的钱财、靠着武力的支撑才当上的总统，结果因此而失去自由的时间比他当总统的时间还要长若干时日[(280)]。从上台到下台，曹锟在总统任上做了一年又二十四天，他也因此成为北洋时代最短命的一任总统[(281)]。曹锟的上台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贿选，他的下台仍是以武力为后盾的逼迫，枪杆子的支配性始终如一，不同的是，与过往拥戴总统上台和逼迫总统下台至少还是不同阵营所为相比较，拥曹锟上台和逼曹锟下台的，都是同一阵营的成员，说明北洋时代军阀政治无序化的恶性发展，曾经的派系忠诚和首领忠诚亦不复牢固，军阀统治的派系基础已然动摇。

曹锟辞职后，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务，在各派系尚未建立相对稳固的平衡关系之前，北京政府的地位亦不稳固，可做的事有限，新政府做成的仅有的大事，是驱逐前清废帝溥仪出宫。

民国成立后，根据清帝退位时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以废帝溥仪为代表的前清王室仍然留住北京紫禁城前清皇宫，继续保留宣统皇帝的尊号和小朝廷的威仪，各路遗老遗少络绎不绝来此对废帝顶礼膜拜，甚而演出过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的闹剧。冯玉祥入都发动政变后，为了凸显政变的“正义”与“合道”，决定立即驱逐溥仪出宫，以免段祺瑞“来后重生枝节”[(282)]。

11月4日，摄政内阁通过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一、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

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宫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283]。5日上午，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会同社会名流李石曾等，带同军警前往紫禁城，召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传达《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废除尊号，即日出宫。溥仪没有能力拒绝这些条件，只有全盘接受，于下午3时许在鹿钟麟等陪同下出宫，移居后海前清醇亲王载沣府邸。6日，摄政内阁决定设立由各界知名人士及学者名流和清室代表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石曾为委员长，负责清理接收清宫文物、档案、财产，以便以后“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重久远”[284]。

驱逐溥仪出宫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多数社会舆论表示支持，但也有清室遗老表示不满，并通过溥仪的洋人教师庄士敦向外国驻京公使团说项，意图缓和。驻京外交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与英、日公使遂于5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总长王正廷答称，政府将保护溥仪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津来人说，段祺瑞听到此事，气得将身边痰盂一脚踢翻，大骂摄阁不解事，将公开反对”[285]。其后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责以“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往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条件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冯玉祥复电辩称：“清室为帝制封建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存私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孽根，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详。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去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张作霖亦声言将会同提出此事，询冯真意所在，再定处置方针。11月8日，摄政内阁通电全国，说明原委，解释误会，电称：“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列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

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286]

驱逐溥仪出宫事虽然得以顺利进行，然而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质疑态度，却说明冯玉祥在反直阵营内部并无特别的权威，摄政内阁的地位并不稳固。11月14日，黄郛循例宴请驻京外交团，意图得其祝贺和承认，但除苏联之外的各国使节均未出席，致宴会不得不临时取消，也说明列强对北京政治的走向仍在观望之中。北京政变发生前，反直各派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变成功后，如何处理政治善后事宜，则各派各有其利益，各有其主张，对于这样复杂的政治局面，实际是本为武夫出身、军事实力尤其是政治实力有限、也欠缺政治经验与手腕的冯玉祥难以把握和控制的。

直系在北方的军事失败之后，张作霖一跃而为北洋军系中实力最强者，奉军收编直系部队，实力大增，而且违反与冯玉祥达成的不入关前诺，大举入关，控制了天津及北京周边地盘和交通线，实力超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并有向北京发展的强烈动力，因而对冯玉祥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只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张作霖暂时还无意直接走上前台，而是力推段祺瑞出山，执掌北京大权。作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主角之一，段祺瑞在直皖战后即长居津门，间或操弄政治，因为其军事实力有限（卢永祥刚刚在江浙战争中失败，使得段祺瑞更无可依凭的军事实力），段祺瑞主要是以其北洋资深经历和广泛人脉关系发挥作用，从黄郛和贾德耀在冯玉祥政变过程中的参与度，亦可知资历和人脉对政治运作的重要性。北京政变发生后，段祺瑞表面淡定，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欲望，而且故作姿态，向冯玉祥表示，“鄙人野居四五年，识见尤为不广，恐无补于时艰，希努力策划，以竟全功”[287]。但在实际上，皖系下野军人政客纷纷发出通电，推举段祺瑞“德望崇降，举国成钦”；“再造民国，万流宗仰”；“务望一致电催出山，速解纠纷，共谋善后”[288]。实则为段祺瑞复出造势。张作霖需要利用段祺瑞作为政治缓冲和过渡，冯玉祥需要借重段祺瑞在北洋军系的资望，即便是南方各省的直系部将，如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出

于因应变局、暂求自保的目的，也推崇段“勋望德业，久为中外所推崇，亟应恳请出山，以维大局，而定人心”，希望“段吴合作”，维持大局，而对北京摄政内阁则取不承认态度[289]。一时间，段祺瑞似乎成了不能不出山以解决时局的各方属望的中心人物。如时论所言：“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主动诸人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290]其因如上海日文《日日新报》所分析：“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拥兵数万，仅限近畿地方而无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早日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于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段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攻。而段则乘张冯之拥戴，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竞取权势。”[291]

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政治主张似奉鲁近合肥，冯胡孙近中山”[292]。孙中山虽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在北京政变成功后却被边缘化，只是受到表面的尊崇，实则并不能与闻北京核心政治。故孙中山在应邀由广州北上途中，在日本神户欢迎会上演说时曾表示：“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293]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似乎自然成为解决北京政局的中心人物，对此他一方面表示：“至余个人，纵令反直派全获胜利，余亦无违反平生素志，即入京指挥一切之意，世人往往传说，曹锟一倒，余必入京，是诚出于本人意外。”另一方面又表示：“惟是余亦国民之一分子，如中国舆情非要余出庐不可，余亦不辞为最后的牺牲，而与南北同志努力共图时局之安定，盖此实国民之义务。惟在今日遽行发表，似嫌尚早耳。”[294]显然，段祺瑞已经做好出山的准

备，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博弈则决定着段祺瑞的政治命运，不过至少在北京政变成功之初，段氏还是为张、冯两方共同接受的人物，然就段祺瑞而言，则又亲奉而远冯。据时人观察，“合肥对冯颇不满意，一时暂不入京，独守九门，对于冯代表曾发一问题，焕章此举是革命抑政变？冯代表不能答”；“合肥刻下态度外似旁观，实则积极进行”[295]。“奉恃胜而骄，嫉冯派据京发令，隐蓄入京排冯意。冯在津虚与委蛇，内已暗有戒备”[296]。张、段、冯三方在政变刚刚成功之时即已暴露出政治的裂痕。

11月10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段宅会议，讨论善后安排。段与张主张趋近，而冯玉祥原本在政治上并无坚持一贯的主张，摇摆不定，面对段、张联手，自己势孤力单，不得不放弃原先迎孙北上、孙段合作、召开和平会议等主张，改拥段祺瑞出山。1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与张作霖、卢永祥联名发表通电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虽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297]其后，张、冯、卢等又多次表示，请段入京，主持一切。经此一番周折，段祺瑞算是为自己挣足了面子，不再故作姿态，而是于21日通电全国，表示“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讵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斯维秩序”。至于其后之措置，则“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298]。

11月23日，摄政内阁辞职。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不设国务总理，由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召开国务会议议决即行。段祺瑞在就职通令中表示，将“刷新政治，整饬纪

纲，所望官吏士民，协力同心，共臻治理”；“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均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张作霖亦于当日入京，同时有大量奉军随同入京，使冯玉祥备受压力，他“要抵挡撤回的直军，周旋进关的奉军，和打隙的皖系。……三军各有弱点，而二三两军为其累多而助少，二军的纪律与欲望尤可议。对方乘其弱点，弄得国民军本身秩序渐乱”。因此，冯玉祥“从天津回京，闷不作声，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299]。24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平和可望，改革可期”，“宣告解除兵柄，决心下野”，以此暂时回避现实的矛盾，并对外表示发动政变并不为个人谋利[300]。至此，经过政变后的一番纵横捭阖，各方政治力量形成新的组合，奉系和皖系携手主导北京政治，张作霖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段祺瑞走上前台，孙中山被供为元老，冯玉祥退居幕后，也就是在这样的暂时平静之中，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战争。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终结与北洋军系的走向

10月23日冯玉祥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时在山海关前线的直军仍在与奉军作殊死战，并未得知消息。当天下午吴佩孚获悉政变消息时，“尚疑而未信，以为诸将皆在前敌，何此电自京拍来，定为他人所捏造，即电冯探寻真相”。冯玉祥回电云：“民六以还，战事迭兴，民生日蹙，国计日艰，揆诸事实，不忍再战，故有联衔通电，主和停战。惟为一时权宜计，事先未及电商，殊为抱歉云。于是吴氏之态度，弥为惶恐不安矣。”[301]

得知北京政变的实情后，24日，吴佩孚在秦皇岛直军总部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因应方略。吴佩孚对冯玉祥此举极为恼怒，决定亲率直军主力第三师及曹锟第二十六师一部火速转往天津，进行讨冯作战，并急电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等南方直军将领，调集直军增援北方；至于山海关前线作战，决定由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代理直军

总司令，部队采取守势，不主动出击，亦不主动撤退，俾拖住奉军，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吴佩孚的决策，与会将领不无异议，盖因当时直军与奉军经多日苦战，已显疲态，如果北京政变消息传开，而主帅又离队，则部队群龙无首，将致军心动摇，势将牵动全局，有失败之虞。负责山海关前线作战的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的参谋长李藻麟提出："在此危急关头，全军主帅万不可离开部队，应当集中兵力迅速将当前的敌人击溃，然后挥师南下，以天津为根据地，召集各省援军，以解决北京问题。"但吴佩孚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对冯玉祥倒戈的仇恨超过了对奉作战的急迫，在他的坚持下，诸将领对其作战方案卒无异议[302]。不过，此后战局的发展说明，吴佩孚此举确为导致直军在山海关前线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10月25日，吴佩孚在秦皇岛发表通电，声称曹锟"由京特派密使来岛，述同前情，并传谕语，冯玉祥已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受暴力围逼，完全失其自由，特命吴总司令佩孚，星夜率兵入卫，号召全国忠义会师讨贼，匡复京国。所有一切征讨事宜，均著吴总司令承制处分，便宜行事"。通电责冯"未闻遗矢相加，先已倒戈相向。朋友之交，犹耻二三其德，况以身所尊事之中央，法所产生之元首，视等弁髦，放肆幽迫，在国法为大逆，在个人为不义"；声明"奉元首密令，剪除凶逆，必不使艰难恢复之法统，合法建置之政府，任一二人颠覆以尽。所有冯玉祥之倒行逆施，反道败德，应与张作霖同科。爰一面激励前敌将士东讨外叛，一面分领大军，会师畿辅，清除内奸。"吴佩孚还以曹锟名义任命李景林为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督军，胡景翼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第三军总司令（此时吴尚不知胡也参加了政变），刘镇华为陕甘新巡阅使，王怀庆为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对于曹锟在北京所发停战令及免吴职等令，吴佩孚通电指"其为捏造，不辨自明。且该伪令首尾皆与程式不符，显由伪造者不明公式，尤不啻自逞供状。佩孚既奉元首密使传谕便宜行事，贯彻戡乱，对于此等伪令，理合声明，以彰逆迹"[303]。其实，曹锟所发各令，虽为被迫，却非"捏造"，事有各方资料回忆所证，倒是吴佩孚所言曹锟"密令"是

其自说自话，有“矫诏”之嫌，因为曹锟当时已在冯部严密看管之下，不可能再派密使外出传旨。

25日晚，吴佩孚率部离秦皇岛，26日午抵天津，在北仓车站设司令部，部署讨冯军事。不过，此时吴佩孚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兵少将，直军北方主力集中在山海关，南方主力距离遥远，他能够动用的兵力只有从山海关带来的第三师和第二十六师一部及临时征调的潘鸿钧第一混成旅，总数不到两万人。为了增厚兵力，准备决战，吴佩孚下令调驻保定的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北进驰援，同时令调江苏、浙江直军一师二旅沿津浦路北上、河南、湖北直军一师二旅沿京汉路北上。为了稳固直军军心，吴佩孚还致电直系各省，通报“此间前方战事连日极称得手，可勿顾虑。当经通电各省，一致申讨”[304]。

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不似吴佩孚预期的那般乐观。北京政变和吴佩孚离开山海关的消息传开后，山海关前线的直军军心涣散，阵脚大乱，奉军乘隙在直军后方发动攻势，胡景翼部配合奉军行动，奉军一路进展顺利，直军防堵失利，步步后退，26日奉军占迁安，28日入滦州，直军“弃械奔逃，全部溃散”。奉军控制了京奉路，切断了直军后路，山海关方向直军陷入重围，上下均惶恐不安，防守已有崩溃之像。

10月30日，奉军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在山海关前线发动总攻，直军官兵无心再战，丢兵弃甲而退。奉军由后路突破至秦皇岛直军总部，代总司令张福来率先登轮而走，山海关正面直军腹背受敌，防线土崩瓦解，彭寿莘等亦登轮出走。山海关战线的直军全线溃败，除了四千余人随张福来出走之外，十余万部队都被奉军缴械，状似“全然无指挥之乌合之众，将校兵卒均面庞瘦窭，形如饿鬼，步履不整，踉跄而行，睹其现状，令人追想其累日恶战苦斗，饥寒交迫之窘状，而为之心悸也”[305]。热河方向的直军更无战斗力，王怀庆早无心抵抗，将所部交奉军收编，自己只身下台去天津闲居。

山海关前线直军崩溃，奉军和国民军分路进迫天津，吴佩孚统率的驻津直军陷入两面夹攻，态势不利。前内阁总理张绍曾在27日到访天津吴佩孚总部，意欲调停，他对吴佩孚言："君与冯同为中国军人模范，且同为我亲家，万一冲突，必有一伤，殊非我所乐闻。且曹系无聊之徒，拥曹徒失人心，勿效妇人之仁，矧又师出无名。"曹锟之弟、第四军总司令兼二十六师师长曹锳亦主张言和。但是，张绍曾转达的冯玉祥停战条件是曹锟下台及吴佩孚率第三师赴青海任职，不为吴佩孚所接受，张绍曾的调停未果，吴佩孚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恩怨仍然只能交由武力解决[306]。

自10月30日起，直军与国民军在京、津间开始接战。31日，奉军及国民军向直军发动全面攻势，面对对手的四面围攻，直军力渐不支。吴佩孚调动的直系北上援军，因山东和山西当局态度的变化而无法赶到前线。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秘密勾连，背直而投奉、皖，他们出兵切断了津浦路和平汉路，分别堵塞了直系苏浙援军和豫鄂援军的北上通路。面对如此险情，吴佩孚虽图继续抵抗，无奈前方直军已呈瓦解之势，11月2日国民军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自海上后撤的通路也受到奉军威胁，曹锟已在前一日宣布辞职下野，列强驻津领事团警告吴佩孚不得在天津周边20里以内作战。国民军攻下北仓后，吴佩孚设在新车站的总部已闻炮声，"其部属各军官及参谋等均劝其逃，反为吴所申斥，大骂各人无用，并声宣无论如何，必不逃走，且定须见冯一面，纵被枪毙，亦所不惜云云。然而劝吴先行逃避再筹办法者，不胜之多。吴更怒不可遏，即向众人曰：'汝曹怕死可各自逃生，予不追究。'说毕即命总司令部所属之八大处各办事人员自行漫散。至晌午时候，仍留车中吴之作陪伴者，只有蒋方震及白坚武等十数人而已，其余所谓戒严司令部与各路之司令办公处等，皆一哄而散，门外所挂之牌照亦皆不翼而飞矣"[307]。

当吴佩孚处在危急状况时，11月2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

访吴，提议“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之援助。……段氏与吴将军本有师生之谊，吴将军为国家前途计，应一扫从来隔阂之感情，投入段氏之怀抱，以发现彼此之妥协点，请将军慎思之”。吴回应称：“若从贵总领事之言，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吉田茂又通过吴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劝吴避入日本租界，吴则答称：“战败而逃入外国租界，偷安一时，实与余平时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308)]。不过，吴佩孚虽有意坚持，无奈大势已去，无可再战。11月3日晨，吴佩孚被迫率直军残部数千人，转移至塘沽，下午登轮南下。“当吴佩孚离新站前，曾用电话召直军在津各重要将领，及杨以德（直隶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卞月庭（直隶商会会长）诸人，无一至者。车至老站后，又派人召曹锓（直军第四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六师师长）、靳云鹗（直军第十四师师长）、杨以德，均未至”[(309)]。于此也可见形势比人强，以吴佩孚之强势，最终也只能落荒浮海而逃[(310)]。其后奉军进驻天津，历时五十天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时移势易，第二次直奉战争奉胜直败的结局与两年前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结局正好相反，其首要原因当与冯玉祥倒戈直接相关，正是因为冯玉祥在直、奉两军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临门一脚，改变了战场形势及双方心态，将奉军送进了胜利的大门。冯玉祥此举背叛了北洋军系内部以地域、部属、出身、亲朋等关系划界而形成的派系分野，背叛了此前北洋军人对于本系统大体仍能保持忠诚的传统，模糊了系别的界限，也开以后北洋军系内部更为机会主义的派系分化组合之先河，从而为北洋军系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化。此固与冯玉祥个人经历与性格有关，也与吴佩孚的识人与因应有关。冯玉祥出身贫寒，历经戎马，具有强烈的个人进取心与对人事的个人好恶，并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而有权变之性格。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人固不可不忠厚，但太忠厚亦不能成功，盖战争之事不可以厚道待敌

也。”[311] 北京政变时期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那次政变是冯玉祥将军受个人野心驱使并掺杂了他对吴佩孚将军的某些宿怨而贸然作出的行动”；“像那时期中国所有的实力雄厚的军阀一样，冯玉祥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将军，极欲获得政权，以统治中国”[312]。诚为持平之论。然冯玉祥之倒戈亦表明，吴佩孚欠缺识人之明与用人之能，当冯玉祥已经与吴佩孚心存芥蒂、矛盾日深且并无明显变化之际，吴佩孚仍然令其统率大军、独当一面，并不说明其胆大心细、知人善任，而只能说明其自我膨胀、太过自信，因为他“认为战胜奉军如操左券，更以为其间纵有心怀异志之人，赖有曹锟德信维系，料无易动也”[313]。结果为此而受牵累致全军溃败亦不为过。

不过，在冯玉祥倒戈的过程中，最令时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何直系方面无论是曹锟还是吴佩孚事先未得任何警讯，致北京城一夜变天。据曹锟下属特工人员的情报：“据与段祺瑞有密切关系的人语，冯玉祥昨派密使赉亲书谒段，谓老师之言均铭膈肝，此次战争，全因子玉一人骄傲所酿，子玉不除，则北洋派团体难成。北洋派不团结，则中央政治根本不能确立。予际此机会，受公民之付托，愿率三军为讨伐吴子玉之先驱，惟此亦不易，需费甚多，前次李氏携来之款，不敷分配，拟请再备数十万分之，以应急需，……又胡将军（胡景翼）及王将军（王承斌）均以默然，再已奉闻。”[314] 于此说明，曹锟和吴佩孚事先应能够得知冯玉祥动向的有关情报。何况即便是冯玉祥刻意保守秘密，但事先的策划难免有所泄漏，而举事时数万大军历数日的行军，何以能蒙住多方的众多耳目，有待更多的资料释疑解惑。时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认为：“显然，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完全出乎意外。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大队人马从热河返回，内阁竟然没有得到卫戍司令的任何通报，冯军就已开进北京城。事后，卫戍司令（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聂宪藩）自称，他事前也全然不知，只是当日早晨起床后，在他家附近的墙上看到冯军士兵张贴的告示，才得知事变。他的情报系统就是这样的无能！”[315] 又如时任国会议员的刘以芬认为：“冯既失欢于吴，何以竟能使之不疑而重用之，及稍被

疑，何以又能使之，不加防范而纵任之，且由前线返京，全师移动，历时四日，曹、吴岂无耳目？何以能一手障天，漫无人觉，则冯之倒戈伎俩，亦可谓出神入化矣。”[316]

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除了冯玉祥倒戈之外，军事上的技不如人和战略战术的失误亦不在小。

据时人的分析，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奉两军人数“在前敌者两军大约相等”；军械“两方情形，均甚复杂”，“两方供给之能力，似无大差别”；奉厂“能力实出直军各厂之上”，“奉军能从大连输入日本军火，其便利亦非直军所能与比”；空军，直军“旧式小机为多，未必全能适用，其战斗之能力，或不及于奉军”；总体而言，“军队之训练，军械之供给，两军相等，后方组织之不备，侦探之不灵，两军亦相等，军饷之丰裕，直不如奉，统帅之威信，奉不如直，胜败之数，半在地势之利用，半在攻守之得宜”；“直军经济较窘，利在速战”[317]。此言大体不虚，直奉两军实各有优长，然据后人研究，直奉“双方对军备的重视显有差等，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奉军军火无论种类、数量及品质均超过直军”；“虽然军备问题并不是直系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无疑地它是直接影响了直军的战力”[318]。在军械供应方面，直军“不特枪炮诸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晋阎索得子弹六十万发”[319]。尤其是炮兵和空军，直军与奉军更有差距。当直、奉两军交战时，“讵料奉方炮队之精良，乃为吴氏梦想不到者”；“奉方炮队所以如此厉害者，因其射击力比直方炮队远一英里也”；“只见山崩地陷，血肉纷飞，一片火光，直冲霄汉。直军将士面如土色，勇敢如吴氏，一时亦手足无措”[320]。奉军用飞机向直军撒放传单，对于瓦解直军士气亦有成效。故杨宇霆认为，“飞机辅助作战，于必要时用之，效验甚大，兹在榆关、秦皇岛所用，即其明证”[321]。

如就纯军事作战的得失观察，“奉胜而直败，据参观山海关战线之外国武官所言：（一）奉张作战，纯采新式，吴佩孚仍用旧式战

法。（二）关于器械粮食，奉方皆准备于年前，均无断绝之虞，而吴佩孚皆临时采购。（三）奉军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之瞄准法，成三角形而射入直军战壕。（四）奉军所用之飞机，翱翔空中，声浪极微，所用之机关枪大炮均系新从俄、德两国购买，而直军多系中国汉阳兵工厂所制。（五）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皆在阵后掘小战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故直军死亡倍于奉军。（六）奉军人人耐寒，棉衣被囊一一齐全，而直军反之不能忍冻。有此六因，纵无冯玉祥之倒戈，直军亦殊难获胜云。”(322)

直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始终受困于经费困乏，后勤不继。“曹但知招吴出战，所有军需军械略无准备，一及战令齐下，各军出发，既无开拔之费用，复鲜补充之械弹，一视奉军之素有余财，又得外援，而甲坚兵利，士饱马腾者，不可同日语”；“吴来京二十余日，终日忙于筹款，徒生滋扰，无补拮据。正在焦灼间，而九门口军事失利之耗传来，总司令立须赴前线督战，苦于纵有萧何，关中亦实无饷可转”(323)。据彭寿莘报告，“军兴以来，视察沿途情况，一般农民，悉畏惧而逃亡，地方亦不出而帮助。究因于兵站，设未完备，粮秣不完，就地购办，设任非其人，则强派夺取，情所不免，仍属供不给求。而军队宿营，难望士饱马腾，势必四出搜求。兼之大车出口，道路困难，大车车卒，均不敷用，沿途拉夫牵畜，搜罗食物，种种情形，民不堪命，民心一失，前途何堪设想”。他建议“速派妥员，携带巨款，广设兵站，多备粮秣，以免军队之扰民”(324)。直军最后的失败亦说明军械及后勤供应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作为直军的主帅，吴佩孚确实曾经表现出北洋军人中难得的军事作战和指挥才能，而且讲究身先士卒，历经护法、直皖、援鄂、直奉等大小诸役的考验，并非浪得虚名。然凡事皆有两面性，正因为此前吴佩孚身经多战，胜多负少，也养成了他自信傲慢、刚愎自用的个性。如时人所论：“吴氏在直系中，虽俨然有首领之资格，操有支配全局之实权，本系诸将，皆屏息听命，不敢有所抗，然此特表面上之

情形耳。实则吴氏平日待人过严，常予人以极不堪，诸将中怨之者颇不乏人，惟以伏处积威之下，莫如之何。今兹直奉战事既再作，吴氏有不能兼顾之势，实天赐彼等以一修怨雪恨之好机会，因之群相连合，推冯氏为盟主，而向吴发难矣。”[325] 在战事进行的关键时刻，冯玉祥倒戈，吴佩孚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冯玉祥的仇恨压倒了对大局的把握，轻率地率部离开前线，分兵出击，导致直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且直军主力在山海关前线失去主帅，被各个击破，土崩瓦解。如果吴佩孚当时能应部下所求，在山海关前线收缩战线，坚持待机，或可赢得一定的转机。而且吴佩孚对于直军周边的大态势事先关注亦不够，及至战事危殆之时，直系甚而连近在咫尺的山东和山西两省都不能控制，致其出兵直军后方，切断直军后援通路。这也说明吴佩孚或许是不错的军事战术家，但不是优秀的军事战略家。

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评论是：致败之远因，因内部分裂，不谙远交近攻之方略，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之旨。“然使当时内部无失策之表现，山海关激战之结果，再有二三日直军一出关，而全局解矣。不幸而参谋长张方严告急二三军之电私行发出，自有此一电，而冯之倒戈意向始定，祸机一发，全局遂不可问。……实则当时战情并不如电所言，三军观望本意中事，视正面战事进退以为变化。设无此电以为制命伤，奉军损耗十有七八，再战二三日直军出关，则百无问题。功败垂成，斯非人谋不臧，抑或有天意存焉？当吴返节天津之时，全军实力俱在，前方藉使将领稍尽职责，即不能攻犹可言守，保持实力正有其法。乃吴返津数日，各将领俱擅离军位而逃，至使全军一溃而不可收拾，以是可窥直军乏新陈代谢之改革，内先自腐矣”[326]。吴佩孚的对手对吴的评论则是：“吴佩孚指挥作战的习惯是，如遇某部在战斗中受到挫折，必躬身驰往战场，调兵遣将，弥补缺陷，因之尚能补救于一时，制胜于一时，使战役稳定，转危为安。因此吴佩孚本人具有极强的威慑控御力量，受挫部队的官长仍能尽力整饬部队，听候使用，决不敢任意放弃职守，临阵脱逃。但这种指挥办法必须是他本人执行，若以他人代替指挥，断无此

等威望，势难驾驭；若一旦失利，局势便无法控制，最终导致失败。山海关战役，张福来代替指挥，正中此弊。张为人敦厚和蔼有余，而才干魄力则不足，至于威慑控御力量更是谈不到；是以吴佩孚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不肯采纳部属意见，转守为攻，反而轻率离开战场，致使几十万大军群龙无首，士气顿然涣散，一败涂地，全军覆没。”[327] 两方面的评论对吴优长与不足的分析大体相同，诚为持平之论。

不独吴佩孚，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直军将领，除了彭寿莘、冯玉祥等“有勇善战”，余“每多庸懦无能，不堪一击”。而且直军来自各个不同系统，临时调集行动，平时甚少协同训练，素质参差，“各有利害，皆不足恃”；“同床异梦，坐观风色。故而今日之事，惟期旗开而得大胜，尚可随处逢源，锦上添花，否则即将瓦解沙散，一败涂地”[328]。由此而观之，直军在此战中的表现恰似两年前的奉军，而与奉军两年以来的整军经武、力求精进、团结一致确有差别。如后来研究者所论，“在一系列的川、湘、闽、浙、苏、粤战争之后，直系是一支疲惫、穷困、内部分崩离析的军队，饷械和斗志都很缺乏”。“奉军的军械充足，装备训练都比较好，斗志也比较高，这是张作霖两年以来蓄意报仇的结果”[329]。

直系内部的凝聚力本就不及皖、奉两系，控制中央政权后，因为政治利益的分割不均，直系内部更是矛盾四起，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矛盾斗争不断，尤其是津、保、洛三派围绕在曹锟中央的周围，争权夺利，倾轧不已，内耗巨大，更有损于直系的团结和凝聚力，第二次直奉战前已呈败象。直系双巨头——曹锟与吴佩孚，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相互牵制，曹锟庸碌颟顸，吴佩孚自大跋扈，两人不能互补而形成合力，却因牵制而形成分离，不能构造直系强有力的稳定而统一的领导核心，不能有针对性地确立本系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分化对手联盟，无力控制和引导局势的走向，终至失控而败。白坚武认为：“北洋派之军事，犹如家族之传统，曹、吴之间，为主体

者既不明，所以成功，又无良相为之调和。吴爱惜名节，亦不肯揽大权于一身。平时则竭力倾陷，战期则故施以束缚驰骤，以如斯之形格势禁而遇大敌，揆之原则，万无成功之理。然吴之不肯，固也，纵令勉强图之，以北洋群帅之心地卑隘，目光浅近，知有身而不知有国，知近利而不知远虑，结果亦溃裂已耳。”[330] 而如后人所论：“曹锟的势力全在吴佩孚，吴佩孚的潜势力，全在他取得一部舆论的同情；自吴氏将顺驱黎贿选以来，他所取得舆论的潜势力已经完全毁灭了。他必定失败，已经很明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331]

在政治方面，如同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皖、奉两系被攻击为“卖国”，从而在政治上没有还手之力，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直系最大的政治软肋就是曹锟贿选，其所给直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直系声名狼藉，丧失民心，无论如何洗刷也难以漂白自身。再加上财政困窘、水旱灾害、临城劫车等等，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不仅没有为本系增添多少实力，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直系沉重的负担。

论及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优势，不能不提及的是奉系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向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而且还有其直接控制的关东州和其驻扎的关东军，摆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势。1924年5月，日本外务、陆军、海军、大藏省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提出“满蒙与日本的领土接壤，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方面，比中国其他地方，存在更深的特殊关系。值此之际，要确保帝国在该地域的地位和势力的扩张”；“对于现在东三省的实权者张作霖，应按既定方针，继续予以好意的援助，维护其地位。……必须使他认识到，他握有实权，毕竟是以日本在满蒙的实力为背景的，因此应使他以友善的态度来回报日本”[332]。而就张作霖而言，“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以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

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333]。日本和张作霖双方的互有需要，决定了双方的利益关系。

与第一次直奉战争在北京周边进行所不同的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主战场是紧邻东北的山海关—秦皇岛、长城沿线和热河地区，便利日本居地利之便对奉军的支持、援助和呼应，也不至于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应，这也是日本当时并不支持张作霖过于向关内扩张的原因之一。奉系可以利用此等地缘政治的优势，而直系却无法在中央层面获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实质支持。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1924年9月5日，日本加藤高明内阁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采取措施保护满洲方面，“无论战事开展至何种程度，决定以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为止，严守中立，不加干涉，至保护日侨，陆海军须有相当准备”[334]。10月27日，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在演说中称：“我国在满蒙之权利利益，为关系我国生存之要件，所以眼前之奉直战争，倘延及满蒙，侵迫我之权利利益，以致我国之生存要件竟受威胁时，我国不得不作相当之考虑。”[335]实际上，日本采取的对策是，表面不予干涉，采取中立态度，而又“不失时机地利用张在东三省完成称霸的心愿，或明或暗地支援和援助他，采取一种形影不离的态度，为帝国将来着想乃上策也”[336]。因此，就目前披露的史料看，日奉双方在战时确有种种私下的秘密勾连，主要是奉系向日本要求军事物资的支持和情报的提供。在军事物资方面，杨宇霆电致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告其“应增枪支，本在筹虑之中。已密派员向关东军司令官及儿玉长官方面设法通融，如有效，必尽先补充”。又电致第三军张学良军长，“借用旅顺重炮，未易办到，因此系该国军队现用品，不易外借。稍一不慎，恐惹起国内外之责难。容再从长与之计议”。“枪弹一节，除兵工厂每日可赶制十万粒以上外，刻仍向他方面尽力设法，必不使兄独任其难。”在情报方面，杨宇霆电致第一军军长姜登选，谈到“最近据日人探报”的种种情报信息[337]。正因为如此，奉系才能在开战时自信地声称：“去岁所购枪械、飞机等

物，皆陆续到齐。俄约已定，日谊亦密。金融粮食，均有持久之设备。”[338]

由冯玉祥倒戈而形成的国民军系脱离了直系，另成一派，占据北方（西北）；早先孙传芳在江浙战争中崛起，屯兵江南，虽被归于直系，而实亦自成一派；直系因此而分裂，传统意义的直系力量残留在鄂、赣、豫等中部地方。皖系在第二次直奉战后回光返照，不仅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执政，在南北地方似均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最后终因实力欠缺而成昙花一现，旋又退出政治舞台。惟有奉系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最大赢家，势力再度伸入关内，甚而一度发展到长江流域，故随后的北京政治亦可称为奉系控制时期。“然稍一潜心推究，要皆各个军阀递趋于灭亡之途，此则治民国史者所不容忽视也”[339]。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北洋时期动员规模最大、涉及地域最广、作战力度最烈的一次内战。此战对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破坏，令舆论痛责；冯玉祥的倒戈，为北洋军系传统的派别忠诚打上了重重的问号；直败奉胜的结局及其后的政治善后安排，不脱北洋武人政治的老套。经如此惨烈的战争，却没有为中国带来什么新的变化，这本身就使众多社会有识之士不能不反思军阀战争的意义和中国的出路何在，从而引致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新思考。著名报人胡霖认为：“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直系对国事之罪恶，在狃于皖直、奉直两役之利，欲以一系军人把持全国政权军权，而终之以贿选总统，诬蔑法律，其覆败固势所必至。虽然，彼反对者，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乎？吴佩孚在前此两役之

后，大增军队，广储军实，竭国家地方之财力以养兵。今变起萧墙，一朝瓦解，在吴固有必败之道，而国家数年来所受之损害，则已莫可挽回。而今兹诸人，或专制数省竭财练兵，迷信军权，等于吴氏；或则向与曹、吴共事，而今偶倒戈者也。假令无革新之诚意，徒为权势之竞争，则今后之事，可预卜以知。盖依然将争地盘，增兵队，或养成第二之曹吴，成为无数之具体而微者。然后再剥削国库，再武装竞争，再爆裂，再作战，然后再倒戈内讧，再兴衰易势。为此辈军人计，固极可危，而劫后之邦国，能再禁几度之摆布耶？”[340] 士人的思考，又将以各种方式传导到社会，引发社会各个层面对军阀武人政治的重新思索，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更新重组带来新的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前此的曹锟贿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北洋时代前此各次战争和政治事件所不具有的特殊意义。

北洋时代，自袁世凯死后，皖、直、奉系轮番登台，控制北京中央政治，然其终不脱四年周期的时间轮回，其因颇值得后人深长思之。“盖北洋派自袁死后，已成瓦解，其中若有一人思设法先统一北洋派，然后统一中国，其人必败。须知统一北洋派之法虽有两种，而实仅为一。即一种为调和，此路久已走不通，无待赘言，以设能调和，早不致分裂也。一种为并吞，吴所取者自为后一种，此种方法段祺瑞固已尝试而失败矣。其故乃由北洋派决不愿见其中有一人，势力特别强厚，将有支配全国之势，若为此兆，则必先群起暗中结合，谋有以推倒之。段之倒即倒于此，今吴之倒亦然。吾人明知此路不通，而吴犹坚欲一试，安得不以昏愚目之耶”[341]。曹、吴之后，张作霖又何能逃脱其败亡之宿命，事实说明，北洋武人经历多年争斗，其内部已无法产生新的因子，助其完成脱胎换骨的变化，改变自身也改变中国的命运。武夫治国，各以其派别为后盾，亦各因其派别而争斗，然又因种种内外因素，无论何派，始终不能成就一统天下之功业，后人思之，各持其说，惟以时人所论，“自民元以降之政团无不为北洋武人所牺牲。假令当日各政团领袖，不急功近利，始终接近民众，对政府则等于甘地之对英，坚持不合作主义，未尝不可减少政府罪恶。

在北洋武人，如果与各政团优秀分子，诚意提携，实际从事政治改革，亦不致腐恶丛集，造成革命对象。十五年内乱因果，军阀政客，均应分负其责，史实具在，宁可讳饰耶”[342]。只是如此具有理想色彩的评论，未必合乎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因为如果当时的武人和政客能有这样的认知，接近民众，彼此提携合作，诚意进行政治改革，内乱无序的北洋时代也就不存在了。不过，就在北洋武人因循旧路，仍然孜孜于你争我夺、混战不已之际，中国政治的新因素正在滋长，南方的新势力正在兴起，并且很快就将以席卷中国的气势而发动国民革命，改变军阀武人相争的现实。

---

(1)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4年4月19日，第290页。

(2) 赵晋源：《贿选记》，《北洋军阀》第4卷，第471页。

(3)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8月8日。

(4)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中国每月偿还法国庚款约98万法郎，约折合规平银30万至36万两；至法国提出偿还金佛朗要求的1922年，中国每月偿还法国庚款约120万法郎，约折合规平银11万至16万两。见《庚子赔款法国所得部分历年付款汇价对照表》，《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8—285页。由此可知法国要求偿还金佛朗的用意所在。

(5) 《外交部为法国公使要求以金元交付法国庚款致财政部咨》（1922年6月28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6) 《法国公使要求中国偿付庚款仍用金币致外交部函》（1922年7月12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65页。

(7) 《程锡庚认为法国要求以金法郎偿还赔款毫无理由意见书》（1922年11月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3页。

(8) 《财政部为法比等国要求以金法郎付还事致国务院节略稿》、《财政总长关于国务会议议决以纸法郎计算交付批示》（1922年12月15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4页。

(9) 《国务院及财政部关于法国庚款决定以金法郎支付缘由致各部院等电》，1923年2月1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92页。

(10) 《曹党自相倾轧记》，《民国日报》，1923年8月22日。

(11) 仲云：《王克敏长财与金佛郎案》，《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号，第7页。

(12) 《众议院指责政府对于金法郎案违背该院决议快邮代电》（1923年12月1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328页。

(13) 《各国庚子赔款说明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148—1149页。

(14) “中苏协定”规定，中苏双方在签字后一个月内开会讨论外蒙问题，并在会议开始后六个月内商订苏俄从外蒙撤兵的办法。但中国政局不久因第二次直奉战争而发生变化，苏联也一直没有履行其撤军诺言。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但中国未予承认。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2年版，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6)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7)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8) 《伪内阁问题解决难》，《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5日。

(19)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07页。

(20) 《伪内阁问题解决难》，《伪内阁问题迄未解决》，《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5日、16日。据顾维钧回忆：“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当时的政界人士都知道有这样的谅解，“待曹锟选上总统后，吴景濂就出任总理组织内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6页。

(21) 《伪内阁问题迄未解决》，《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6日。

(22) 《国会议员通讯》第8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49页。

(23)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10月16日，第442—443页。

(24) 《郭同为陈说组阁策略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0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9—490页。

(25) 《韩玉辰就包办大选、浮报两院代表人数及贿选后果事致吴景濂

函》（1923年9月11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9—490页。

(26) 谢彬（谢晓钟）：《民国政党史》，1925年上海学术研究会版，第115页。

(27) 《曹锟以孙宝琦为傀儡》，《民国日报》，1923年10月31日。

(2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98页。

(29) 《黄攻素为避免院内会议再次发生飞掷墨盒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2月19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527—528页。

(3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15—117页。

(31) 古蒓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67页。

(32) 《吴景濂从北京出走天津的通电》（1923年12月21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二），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643页。

(3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23、144页。

(3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11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0页。

(35) 《北京之一片哭穷声》（1924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一）第208—209页。

(3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3月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8页。

(37)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4月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10页。

(38) 《王克敏有下星期复职说》，《申报》，1924年4月30日。

(39) 《院交抄杨汝梅呈》（1923年2月24日）外交档案，引自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40) 《德发债票案之民意》，《申报》，1924年6月15日。

(41) 《国务院为议员质问对德索赔事致财政部公函》（1924年4月23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第275页。

(4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67页。

(43) 《孙宝琦突然辞职之前后》，《申报》，1924年6月1日。

(4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5月2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12页。

(45) 《孙阁员总辞职之内幕》，《申报》，1924年6月6日。

(4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2—450页。

(47)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第133—134页。对于此案较为详尽的研究，请参阅唐著第4章第2节。

(48) 《财政部、交通部关于中德战事赔款及债务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议案稿》（1924年6月3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第279页。

(49) 《四阁员劝孙之经过》，《申报》，1924年6月17日。

(50) 《王克敏呈辞之前后》，《申报》，1924年6月21日。

(51) 《国内专电二》，《申报》，1924年6月27日。

(52)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6月29日。

(53) 《孙氏归来态仍消极》，《申报》，1924年6月29日。

(5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2日。

(55)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5日。

(56) 《孙免顾代之一刹那》，《申报》，1924年7月5日。

(57) 《张益芳等反对非法代阁建议大总统收回成命提案》（1924年7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22页。

(58)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10日。顾维钧自认为，他出任代总理的原因，是他与国会的关系一直处得比较融洽（《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页）。国会之所以反对顾阁，非出于反对顾个人，而是对曹锟不满。

(59) 颜惠庆本意由自己兼外长，顾维钧则担任财政总长或农商总长，但曹锟坚持要顾维钧留任。曹认为，顾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并干得很好，没有理由调开。颜和曹一度均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当然是颜作让步，顾再任外长。《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页。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3页。

(6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254页。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8、265页。顾维钧与曹锟和吴佩孚均维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其回忆录中，顾“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具有领袖的品格”。同时，顾认为吴佩孚“是个第一流的军人。他执法严明，办事公正”；“操守廉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9页。

(6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6页。

(6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65) 《背道而驰之和平计划》，《北洋军阀》（四），第625页。

(6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12月18日、1924年1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4—505页。

(67)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8日。

(68) 当时也有人向曹锟献策，认为“疆吏之职务不应过多，督长两席，尤不应任意听疆吏兼任，盖军民分治，省长虽难免受督军督理之指挥，然职权一分，究可互制，而于中央提款一层，尤有莫大关系”。（《鄂萧津王辞去师长之内幕》，《申报》1924年3月3日）

(6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6日。

(70) 《调解中之海军风潮》，《申报》，1924年2月21日。

(71)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21日。

(72) 《曹锟致吴佩孚密电》（1923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3页。

(73) 《败兴归来之吴毓麟》、《海军风潮不易平息》，《申报》，1924年3月4日。

(74) 《海军鲁闽之争愈烈》，《申报》，1924年3月9日。

(75)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76) 《王承斌辞职续闻》，《申报》，1924年5月5日。

(77)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78) 《吴佩孚亦有辞职说》，《申报》，1924年5月15日。

(7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80) 《王承斌辞职与洛吴》，《申报》，1924年5月5日。

(81)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8日。

(82) 《团结直系之新政策》，《申报》，1924年2月21日。

(83) 《复张作霖电》（1923年4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315页。

(84) 《复张作霖函》（1923年5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23页。

(85) 《张华堂报告》（1923年10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一〇二四—82。

(86) 《张华堂给王怀庆呈文》（1924年8月7日），《张作霖之谈话》（1924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40—242页。

(87)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71页。

(88) 《张华堂报告》（1923年11月15日），二档，一〇二四—82。

(89) 《陆金圃致王怀庆禀呈》（1923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207页。

(90) 《曹锟口中之吴佩孚尊段解》，《北洋军阀》（四），第629页。

(91) 《筹办副选之内幕》，《申报》，1924年1月27日。

(92)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月27日。

(93) 《筹办副选之内幕》，《申报》，1924年1月27日。

(94) 《卢永祥致吴佩孚书》，《申报》，1924年2月18日。

(9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7、918、920页。

(96)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840页。

(97)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46页。

(98) 古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43页。

(99) 《外交部致内务部函》（1923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0页。

(100) 古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72—

273页。

(101) 《背道而驰之和平计划》，《北洋军阀》（四），第625页。

(102) 《张书元致陆锦等函》（1923年8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3页。

(103) 古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91页。

(104) 《总统府军事处致齐燮元等密电》（1923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4页。

(105)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1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8—9页。

(10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3月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9页。

(107) 《胡恩光致陆锦密电》（1923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4页。

(108) 《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孙传芳密电》（1923年12月17日、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6—147页。

(109) 据王永泉称，此项军械为“就军费节省项下备款，商由孙督理，电托苏皖赣齐巡阅使代购直存枪支，并由直鲁豫王副使呈准中央，填给海关及陆军部验发护照，以及大总统在巡阅使任内拨发之枪弹十万，炮弹五百颗，一同取道豫省运闽”。《王永泉致大总统等电》（1924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24页。

(110) 《孙传芳通电》（1924年3月10日），二档，一〇〇三—144。

(111) 《孙传芳致大总统密电》（1924年6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35页。

(112)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61页。

(113) 古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84页。

(114) 《陆锦复孙传芳签呈》（1924年5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50页。

(115) 《黄琨致王怀庆函》（1924年8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58页。

(116) 《吴佩孚致陆锦等密电》（1924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1页。

(117) 古蓿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03—305页。

(11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7月9日，第481页。

(11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8月25日，第488页。

(120) 《刘汉超探报》，1924年9月2日，二档，一〇二四—79。

(121) 赣督蔡成勋与齐燮元关系不好，蔡曾向曹锟抱怨“齐使意存倾陷，百计为难”。战事爆发后，吴佩孚令蔡“增兵助苏”，蔡表示“此次准备三旅，已属精疲力竭之势，……此外又无他队可以腾挪”，并以对粤为由，婉拒增兵。《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密电》（1924年9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75页。

(122) 《齐燮元致王毓芝等密电》（1924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0页。

(123) 《孙传芳通电》（1924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5页。

(12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336页。

(125) 《卢永祥通电》（1924年9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8页。

(126) 《齐燮元通电》、《吴佩孚、齐燮元通电》，二档，一〇〇一—78。

(127) 《政府公报》，1924年9月8日。

(128)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1日。

(129) 《外使对江浙问题之责难》，《申报》，1924年9月1日。

(130)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5日。

(131) 古蓿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94页。

(132) 古蓩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7—328页。

(133) 其时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退据浙东宁波、台州一隅，倡议“浙人自治”，企图实行地方割据，并敦请旅沪浙籍人士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等于10月初筹组浙江省临时自治政府，但在孙传芳的威胁利诱下，潘的割据企图未能持久，很快即告瓦解。

(134) 古蓩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6页。

(135) 《江苏督署参谋处报告》（1924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15页。

(136) 古蓩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8—329页。

(137) 《齐燮元致曹锟等电》（1924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18页。

(138) 古蓩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第336—337页。

(139) 《孙传芳致国务院等电》（1924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20页。

(140) 《江浙战史》第4册，第63页。

(141) 《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告广东民众书》（1924年9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5—17页。

(142) 《杨宇霆信稿》（1924年7月24日、8月26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48—149页。

(143) 《杨毓珣信》（1924年8月），《奉系军阀密信》，第150页。

(144) 古蓩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09页。

(145) 《战后的江南》，《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5页。

(146)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1页。

(147) 古蓩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3页。

(148)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页。

(14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5—216页。

(15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7页。

(151)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98—599页。

(152)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18页。

(153)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版，第195—196页。

(15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0页。

(155) 胡玉海：《奉系纵横》，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56) 据研究，第一次直奉战后，日本先是在“为应付直系的进攻而供给张作霖武器”的借口下，秘密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包括以京奉铁路、四洮铁路警备队的名义，“无税免减”地把大量武器运入奉天。而到第二次直奉战前，日本决定对华政策“要根据帝国利害关系适当加以调整，要继续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友好援助的既定方针，并支持其地位”。因此，日本人帮助奉系改组军队，采用新法练兵，帮助奉军构筑工事。战争爆发后，虽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公开宣布日本采取“不干涉”方针，日本军部与驻华官员则主张支持张作霖。陆相宇垣一成决定给张作霖“以优先和无形的相当的支持”。日本军事顾问在前线参加指挥奉军作战，提供军事情报。日本供给奉军步机枪弹药4000万发，炮弹10万发。（《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0—221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94页）但另据研究，列强自1919年5月起对中国实行军火禁运，影响到中国军火进口的数量。根据海关统计，从1920年到1923年，中国年均进口军火约59万两，其中德国最多，年均为69万两，日本其次，年均为37万两；从1920年至1928年，日本平均年输华军火33万两，占外国年均输华军火数的9%，其中大部分还是在华日军所需，显示奉系并未从日本得到大批军火。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67、172、197页。

(157) 郝秉让：《奉系军事》，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2页。

(158)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2—315页。

(15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7页。

(160) 《赵玉珂致曹锟电》（1922年8月30日），二档，一〇二〇—103。

(161) 《曹锟致吴毓麟电》（1923年1月27日），二档，一〇二〇—103。

(162) 《大总统府军事处函稿》（1924年9月16日、28日），二档，一〇〇三—546、552。

(163) 不过，据实地参战的外人观察，空军“是中国军队中一支全然新型的兵种，尽管已为它花费了大量金钱，但它并非是一支特别有实力的队伍。……双方军队都未能充分利用耗费巨资所建立的航空部队。虽有飞机，但对军队或百姓的士气来说，也未能起到任何鼓舞的作用”。《中国军队的军事力量——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四），第856—857页。

(164)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07—312页。

(165) 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纪》，《近代稗海》第4辑，第582页。

(166) 王维城：《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43页。

(16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32—233页。

(168) 《姚震信》（1924年9月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52页。

(16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16页。

(170) 《直奉军事亦紧迫矣》、《奉张表明对直态度》，《申报》1924年9月13日。

(171) 当直系了解到奉系内部的情况后，吴佩孚曾建议曹锟，“对奉策略，中央仍须主张容纳旧派，设法运用，以资和缓。”《吴佩孚致陆锦电》（1924年8月19日），二档，一〇〇三（2）—34。

(172) 据报，直奉战前，张作霖还曾派人奉手书见曹锟，表示“必去吴氏，关以东唯命是听。此等条件，强人之所以不能为，曹置而不复”。《东北战事之各面观》，《申报》1924年10月12日。

(173)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9—321页；《直奉兵力之比较》，《申报》，1924年10月9日、10日、11日。

(174) 《张作霖致曹锟电》（1924年9月15日），二档，一〇〇三—96。

(175) 《开战后之张吴态度》，《申报》，1924年9月24日。

(17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9月1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21页。

(17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19页。

(178)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6—318页；《直奉兵力之比较》，《申报》，1924年10月9日、10日第2张第5版。

(179) 《吴佩孚对中西记者之谈话》，《申报》，1924年9月24日。

(180) 《洛吴对中外记者之一席话》，《申报》，1924年9月25日。

(181) 1924年7月，新四国银行团在伦敦开会，认为“今中国统一未成，财政紊乱，武人割据，苟无几张条约及盐税关税监督，北京早无政府。今后投资仍趋严格的监视用途方针，勿使用于军费。苟违此旨，宁不投资”。（《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16日）直系也曾强令中国银行用公债及他行借款垫付直军军饷，但银行家们认为，“此事可议之点甚多。夫军饷非不可垫，然必实有余款，且手续完备也。直军缺饷应向部索，部中无款应由部商行垫，行视自身实力如何酌定允否，今暗输直军，不无左右袒之嫌，以金融机关冲而牵入政潮，殊为非福，……筹得款项不以济本行，而以输军饷，此政客之行为，非银行家之正轨”。（《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2年5月18日，第200页）正因为如此，直系向国内银行借款并不方便易行。

(18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2、27页。

(183)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28日。

(18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30页。

(185) 《军费之概算与筹划》，《申报》，1924年10月10日。

(186)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6日。

(187)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5日，第494页。

(188) 《吴佩孚出发前之北京》，《申报》，1924年10月6日。

(18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6日。

(190)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8页。

(191) 《东北战事之各面观》，《申报》，1924年10月12日。

(192) 李纶波：《王怀庆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7页。

(193) 《王怀庆致吴佩孚密电稿》（1924年9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58页。

(194) 《李景林信》（1924年9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3页。

(195) 《刘富有致曹锟电》（1924年9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67页。

(196) 《王永江信》（1924年9月），《李景林信》（1924年9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2—173页。

(197) 《杨宇霆信稿》（1924年10月1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4页。

(198) 《军事处转送彭寿莘为直军不设兵站致使军队沿途扰民等情给兵站总监部函稿》（1924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8—289页。

(199) 《冯玉祥致曹锟吴佩孚密电》（1924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7页。

(200) 《北方战讯》，《申报》，1924年10月9日。

(201) 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48—49页。

(202) 《彭寿莘致曹锟、吴佩孚电》（1924年10月8日），二档，一〇〇三（二）—35。

(203) 《张治公致曹锟等密电》（1924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92页。

(204) 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6页。

(205) 《甲子奉直战史》，《北洋军阀》第4卷，第907页。

(206) 《曹锟、张佐民、白坚武致王毓芝、陆锦电》（1924年10月20日），二档，一〇〇三（2）—37。

(207) 据报，仅在山海关、九门口两地，奉军伤亡就达1.3万余人，而开战以来的总伤亡约在2.5万人左右，实较直军伤亡为多。（《奉直战况之外讯》，《申报》1924年10月22日）

(208) 《吴佩孚致陆锦电》（1924年10月19日），二档，一〇〇三（2）—37。

(20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22日。

(210)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1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6页。

(211)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1页。韩麟春与郭松龄虽同属奉军中的新派，但韩是新派中的“士官派”（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郭则是新派中的“陆大派”（即毕业于陆军大学），双方对待旧派的态度大体一致，然其内部又存有门户之见，此亦为其后郭松龄起事反张作霖的远因之一。

(212)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22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91页。

(213) 《甲子奉直战史》，《北洋军阀》第4卷，第907—908页。

(214) 陈晓清：《从武穴主和到五原誓师》，《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第62页。

(215)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3页。

(21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1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2—353页。

(21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76页。

(219) 《刘汉超致王怀庆密呈》（1922年1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48页。

(220)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月14日，第506页。

(221)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22) 《刘绍曾致李彦青密电》（1923年3月26日），二档，一〇二〇

—74。

(22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4页。

(224)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22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26) 《致冯玉祥函》（1918年3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2页。

(227) 海振忠、井振武：《孙中山与冯玉祥的一段交往》，《津报网——天津日报》，2008年5月10日。

(228)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229) 杨雪峰：《国父给徐谦几封未见发表的函电》，《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

(230) 《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页。

(231) 马伯援：《民初人物印象记》，《传记文学》第44卷第3期。孙中山本人的说法印证了马伯援的回忆。孙在1924年11月12日广州各界欢送其北上的会议演说中说："这几年以来，那几位同志苦心孤诣，总是在北京经营。于六个月以前，便来了一个报告，说在北京布置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军队赞同的很多，力量也是很大，中央革命马上可以发动，要我先到天津去等候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大相信能够有这种事。只可对他们说，你们何时有事变发生，我便何时可以到北方去。但是在事变没有发生以前，我便不能前去。后来江浙战争发生，他们更催迫得很急，一定要我到北方去，说中央革命的机会已经到了，要我赶快去首先发动，才有好结果。我在那个时候，还是说要事变发动以后才能够去，还是不相信他们能够得这次的好结果。到了前十几天，他们果然有很大的变动，推倒曹、吴。"《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页。

(232) 徐锡祺：《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经过》，引自刘敬忠、田伯伏：《国民军史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33) 鹿钟麟等：《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页。

(234) 1923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张作霖特意派张学良往贺，联络感

情。

(235) 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236) 《姚震致李维一的信》，1924年2月10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12页。

(237) 于立言：《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0页。这笔钱的数字各人说法不一。据松室孝良回忆，张作霖对是否付款犹豫不决，后在日本顾问的鼓动下同意，并向“满铁”贷款，经三井银行汇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吉冈显作，由吉冈交段祺瑞，再由段派松室孝良等交给冯玉祥。因此，这笔钱实际上是由日本人提供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2页）据研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在1924年2月向东京密报冯玉祥有可能反吴佩孚的情报，随后，日本退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前往奉天，向张作霖游说拉拢冯玉祥，并在天津与段祺瑞商讨拉拢冯玉祥的具体方案。林弥三吉得知冯玉祥选定黄郛充当其政治谋士后，即派与黄郛熟识的铃木贞一和总统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手下的土肥原贤二与黄郛接洽，与冯居间联络。10月中旬，日本已得知冯玉祥即将发动政变的情报，因此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政策可以游刃有余。《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1—223页。

(238)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39) 《杨毓珣信》（1923年9月），《奉系军阀密信》，第83页。

(240) 《姚震信》（1923年10月20日），《奉系军阀密信》，第98页。

(241)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7日，第612页。

(242)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10日，第614页。

(243) 鹿钟麟等：《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页。

(244) 《吴佩孚请密询冯玉祥若果敢有为拟将东三省全权付托致王毓芝陆锦密电》（1924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58页。

(24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46)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21日，第619页。

(247) 《冯氏推翻政局之内幕》，《申报》，1924年10月31日。

(248)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北洋军阀》（四），第335页。

(249) 《冯氏推翻政局之内幕》，《申报》，1924年10月31日。

(250) 《京畿卫戍司令部侦察处长王光宇报告》（1924年10月），二档，一〇二五—135。

(251) 马炳南：《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5页。

(252) 沈亦云：《首都革命》，《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19页。

(253)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12日，第629页。

(25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37—238页。

(255) 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页。

(256)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87页。

(25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6—377页。

(25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8页。

(25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0页。

(260) 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14页。

(261) 这三人都对冯部请领的军饷军需“多方刁难”，甚而“虽有曹锟亲笔批示，他们依然拒不发给”，故冯玉祥“对他们早已恨之刺骨”，此次入京发动政变必欲索之。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14页。

(262) 《冯玉祥等通电》，《申报》，1924年10月28日。

(26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8页。

(264)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4页。

(265)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85—186页。

(26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0页。

(267) 《政府公报》1924年10月25日。

(26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2页。

(26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8页。

(27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2—683页。

(27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6页。

(272) 《致冯玉祥等电》，《致段祺瑞电》（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1—252页。

(27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6页。

(2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44页。

(275)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2月12日、9月2日，第525、608页。

(276) 沈亦云：《首都革命》，《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20页。

(27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8页。

(278)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31日，第641页。

(279)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3日。

(280) 《李寿金报告遵令监视曹锟情形呈》（1924年1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81页。

(281) 北洋时期历任总统在位时间，袁世凯四年有余，黎元洪两次出任共两年有余，冯国璋一年两个月有余，徐世昌三年八个月，曹锟不到一年一个月，故以曹锟为最短。

(282)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1月4日，第646页。

(283)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6日。

(28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786页。

(285) 《亦云回忆》上册，第205页。

(2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

773、786、799—800页。

(28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9页。

(288) 《刘镇华、陆洪涛、郑士琦等通电》（1924年11月5日、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5—1476页。

(289) 《孙传芳佳电》（1924年11月9日），二档，一〇〇一—88。

(290) 《北京政局的变化》，《东方杂志》第21卷第21号，第3页。

(29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50页。

(292) 《苏体仁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89页。

(293)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294)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1页。

(295)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1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142—143页。

(296) 《温寿泉等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1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153页。

(297) 《张作霖等通电》（1924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77—1478页。

(298)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1924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1479页。

(29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939、945页。

(300) 《冯玉祥通电》（1924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1页。

(30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8页。

(302) 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0—51页。

(30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9—390、419—420页。

(304) 《吴佩孚致阎锡山电》（1924年10月2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51页。

(305)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46页。

(30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92页。

(30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50页。

(308)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30—931页。

(30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50页。

(310) 吴佩孚登轮南下后，因为山东当局的态度变化，不能在山东靠岸，只能开进至长江口，再溯江而上先后到南京和汉口，进入直系控制的地盘。但是，吴佩孚建立“护宪军政府”的提议被苏督齐燮元和鄂督萧耀南婉拒，齐、萧等且有拥段通电发表，吴在手头无兵的无奈之中，复自汉口沿平汉路北上，辗转于郑州、洛阳等地，12月初到信阳鸡公山，对外宣称“避居鸡公山，不问国事”。《孙传芳致张树元电》（1924年1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3页。据两湖巡阅使萧耀南报告，吴佩孚抵信阳后，“鄂豫各军将领婉劝下野”，“综合各方情形，吴使已失指挥能力，鄂省军队严守武胜关，实行保境安民，不患客军侵入。唯鸡公山地方，关系鄂豫疆界，易生各方误会，为玉帅安全计，为地方秩序计，均觉上地非宜。前经电劝出洋，以玉帅倔强，不肯听许。现拟设法令离出鄂豫，先住庐山或迁居上海，以免存为目标。”《萧耀南致执政府军务厅密电》（1924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3页。

(311)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2月12日，第525页。

(31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6、336页。

(313)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4页。

(314)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引自刘敬忠、田伯伏：《国民军史纲》，第11页。

(315)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85页。

(31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7页。

(317) 《直奉兵力之比较》（四），《申报》，1924年10月12日。

(318)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189、195页。

(319)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6页。

(32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38页。

(321) 《杨宇霆信稿》，1924年9月24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59页。

(322)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28页。此处的得失分析，其第五点的意义不甚明确，何谓“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其如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待考。

(323)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5、148页。

(324) 《军事处转送彭寿莘为直军不设兵站致使军队沿途扰民等情给兵站总监部函稿》（1924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8—289页。

(325)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5页。

(326)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8页。

(327) 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76页。

(328)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4页。

(329)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33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7页。

(331)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9页。

(332) 车维汉、朱虹、王秀华：《奉系对外关系》，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333) 后藤新平：《日中冲突之真相》，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

日本》第7卷，第55页。

(334) 《日本阁议对江浙战事之态度》，《申报》1924年9月10日。

(335) 《日首相对华政变演说》，《申报》1924年10月28日。

(336) 胡玉海：《奉系纵横》，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337)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2日、13日、1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7、182、185、186页。

(338) 《杨宇霆信稿》（1924年10月14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3页。

(339)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54页。

(340)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北京政变后之时局》，王瑾、胡枚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8页。

(34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3—434页。

(34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80页。

第七章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一节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与起伏

一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

自民国成立后，兴办实业的风气盛行一时。1916年以前，北京政府曾制定了一些奖励与保护发展实业的法规、章程、条例等，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加上其他一些内外因素，中国近代工业自民国成立后，始终保持着上升的趋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工业的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机会。西方列强忙于战场上的厮杀，对华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均大大减少。由于进口量的剧减，国内市场陡然扩大，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扬，又使工业利润大增，刺激各界竞相投资。这样，长期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市场狭小和资金短缺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在这种有利环境下，国内资本投资踊跃，近代工业得到空前发展[(1)]。这个过程自1914年开始，前期较为缓慢，1917年后开始加速。虽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告结束，但列强在战后初期尚需喘息休整，再度东来需要时间，同时中国战时新增资本开始投产，工业企业自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因停战得以源源入口，新增生产力多在1918年以后方始发挥作用[(2)]，整个工业发展继续成惯性运动，速度较前更快。1918年—1921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

据估计，1913年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

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到1920年，近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工人总数56万人。即整个近代工业规模大体增长了一倍左右[3]。另据估计，中国近代工业1914年—1920年间的总平均增长年率为13.8%，其中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发展，轻工业发展速度更快，有的部门（如面粉、卷烟等）年增长率超过了20%[4]。应该说，无论是用中国自有近代工业以来的发展速度，还是同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作比较，这样的发展都是相当快的。

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也是大战前后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之一。战前，纺纱本为赔本生意。大战期间，由于进口锐减，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造成纱、布市价大涨，纱价上涨一倍，为所有棉纺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生产一包十六支纱，最高可获利润50两），几乎达到了无厂不盈的地步。突出的例证之一是，原已无法维持的宁波和丰纱厂，1919年竟然以90万元的资本获净利125万元，利润率高达139%[5]。如此厚利，使投资者趋之若鹜，纱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至1922年，华资新开纱厂三十九家，超过战前二十余年中外资本开设纱厂的总和（三十一家）。纱锭数每年以20万枚的速度增长，1922年达到151万锭，为1913年的三倍，同期布机数也由2016架增加到6767架[6]。1925年的棉纱产量比1915年增长了两倍以上。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导致进口棉纱数量持续下降，1925年大约只有战前的四分之一左右。长期高居中国进口货品价值前列的棉纱，1924年已退居到只占进口总值的3%左右，国内棉纺织工业用纱实现了大部自给，1921年棉纺织业消费的进口纱只占总消费量的20%左右，也即自给率达到了80%左右[7]。与此同时，1915年以前几近于无的棉纱输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924年达到了14.7万担，价值751万关两[8]。据统计，1920年全国有纺织厂475家，资本总额8275万元，工人36万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工业第一大部门[9]。

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二个重要部门是面粉工业。面粉在中国对外贸

易中向为入超，1914年进口220万担，价值914万关两[10]。欧战爆发后，进口来路断绝，1915年的进口量尚不及上年的十分之一，面粉又为西方各国主食，需求甚大，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供不应求，需要多方寻求进口来源，由此刺激中国面粉工业的飞速发展。1912年以前，国内面粉工厂不过三十七家，而1920年一年之内就成立了二十家。1921年，全国面粉工厂总数达到了一百二十三家[11]。尤以东北、江苏、湖北、山东设厂最多，哈尔滨、上海、青岛、汉口、天津、无锡等地的面粉工业较为发达，大厂的日产量已超过一万袋。从1918年起，中国面粉贸易连续四年大量出超，年输出均在200万担以上，最多的1920年，出口396万担，价值1825万关两[12]。

轻工业部门之一的火柴业有了较大发展。1914年以后，火柴进口不断下降，1923年的进口数量只有战前1913年的8%左右。尤其是以往进口量最大的日本火柴，受到“五四”以后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1923年的进口数量还不到1919年的3%。火柴工业市场扩大，利润增加，发展很快。1920年即开办火柴厂二十三家，资本184万元。中华、鸿生、燮昌等厂出品的国产火柴已开始在市场上居于优势地位[13]。

除了上述工业部门之外，缫丝、卷烟、榨油、针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有了长足发展。同时，一直是中国工业薄弱环节的重工业，在大战前后也有了一定发展。

钢铁工业，除了原有的汉冶萍公司之外，此一时期建立的铁厂中最重要的有两座，1917年建立的上海和兴铁厂和1918年建立的武汉扬子机器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前者有12吨和35吨高炉各一座，40吨平炉二座，年产钢3万吨；后者有100吨高炉一座，年产生铁3.6万吨。本在生铁生产中微不足道的机械炼铁，猛增到占生铁产量的58%。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41万吨，1921年的钢产量达到7.68万吨，成为1935年以前中国钢产量的最高峰[14]。受欧战影响，本来极为薄弱的中国钢铁工业，1918年的出口值居然达到了1673万关两，

位居当年出口货品前十名之列[15]。

采矿工业，煤炭工业向为中国采矿业的支柱部门，发展较快。1918年的产量比民国初年已翻了一番，1924年产量达到2578万吨，比1918年又增长了40%，其中机械开采已占到总产量的72%[16]。同期煤炭出口也在稳步增长，1924年为320万吨，价值超过2000万关两，已成为大宗出口物资之一[17]。铁矿石产量1924年达到177万吨，机械开采占70%左右，均比民初翻了一番[18]。由于战争使需求增加，有色金属开采中，云南的锡，湖南的锑、铅、锌，江西的钨产量均有较大增长。因为这些产品大多供出口，所以受国外市场影响较大，战后产量普遍回落，此后一直起伏不定。

水泥工业，作为重要原材料工业部门之一，水泥工业本有一定基础，大战前后更有较大发展。1924年七大主要华资水泥工厂的资本总额为1440万元，年产能力为316万桶，其中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一家资本就有880万元，年产能力137万桶[19]。

机器工业，中国资本机器工业可谓所有近代工业部门中最薄弱的环节。大战前后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以修理为主的机器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纺织业相关的机器制造与修理业务发展更快。上海民族资本开办的机器工厂，1913年为91家，1924年达到了284家，增长了两倍以上，其中一半左右已使用电力[20]。动力、纺织、缫丝机器制造都有较大增长，以前根本没有的工作母机制造工厂开始出现，国产车床还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由官僚资本开办的江南造船所的业务在此一时期有了相当进步，技术亦有所突破。1912年—1926年共造船369艘，计14.4万吨。1914年—1925年经营均有盈余，1921年的盈余更高达216.7万元[21]。在所造船舶中，千吨以上船已占到总吨位的一半以上。1918年该所接受美国政府订货，建造4艘14,750吨的大轮船，下水后引起中外关注。尽管这几艘船的主要技术与装备均来自美国，但它们的下水毕竟是中国造船史以至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可以说，无论在造船总吨位

及单艘船重上，江南造船所都不亚于当时在上海居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

相对于其他工业在大战前后的快速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对较慢，因为铁路建造与轮船航运均需要较大投资，而此时外国在华投资受大战影响有所减少，同时运输量的增长尚未达到大规模刺激投资的程度，因此这两业虽有发展，但在发展速度上略显逊色。1912年—1926年铁路共通车3723公里，年平均通车里程不到250公里，其中重要者有，粤汉路武昌至株洲段（1917年—1920年完成）、广州至韶关段（1914年完成），陇海路新浦至开封段、洛阳至灵宝段（1915—1926年完成），平绥路阳高至包头段（1914年—1923年完成），上述路段共1765公里，占此一时期总通车里程的近一半[22]。东北地方铁路建设在此一时期有了较大进展，建成了一千余公里，减轻了东北交通对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的依赖。虽然铁路建设的总体进展不够快，但它仍然是北京政府财政的摇钱树和交通系官僚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据统计，1921年的铁路盈余高达四千余万元，而当时北京政府的年收入不过四亿多元[23]。轮船航运业，中国资本拥有的轮船吨位虽然翻了一番还多，从1913年的八万余吨增加到1921年的十八万余吨[24]，但在总航运量中所占比例变动不大，自1916年—1924年，各通商口岸进出船只总吨位中，中国船只始终占不足四分之一的比例。

大战前后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仅在量上有了重要进步，在质上也有了一定变化。除了前述重工业及生产技术的某些发展外，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型工商业企业集团的出现。资本50万元以上的公司，1920年比1912年增长2.5倍[25]。这些企业集团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商界为应付战后经济危机而产生的保护性反应。荣家企业集团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代表。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面粉业起家，起初发展并不顺利，年年亏损。世界大战爆发后，逢此经年不遇之机，荣氏兄弟以超过常人的眼力、气魄与才干抓住了这个历

史机遇，他们采用欠款购机、分期付款、控制原料、提高代销佣金等手段发展面粉生产与销售，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1912年—1921年，荣氏企业的福新面粉一至八厂陆续开工，茂新粉厂也从两个厂增加到四个厂，面粉日产能力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几乎操纵了全国粉麦市场。1915年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创办申新纱厂，资本30万元，当年即有赢利。从此，申新纺织系统犹如滚雪球般发展，十年间成立了六个厂。到1922年，荣家企业集团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已拥有十二家面粉厂和四家纱厂（另有两家纱厂在建），自有资本1043万元，固定资产总值达到1959万元，为初创时的39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7%，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也为实力雄厚的外资及官僚资本企业所不及。而且荣氏企业的这种发展，是在内无特权，外有压迫的情况下取得的，由此也可见当时民族资本企业的活力与效益。1925年荣家企业集团拥有粉磨319台，年产能力2586万包，纱锭18.46万枚，年产纱9.7万件，布机1615台，年产97.64万匹，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与棉纱大王和首屈一指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26)]。除此之外，老的如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新的如郭乐兄弟的永安企业集团等大企业集团，在大战前后也都有了相当发展。大生纱厂一厂在1917年—1924年间新增纱锭5万枚，比自建厂到1917年的总和4万枚还多出1万枚。永安纺织公司的初创资本达到了600万元。这些大企业集团的出现，它们在管理与技术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二　中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西方列强都卷入了大战的旋涡，无暇顾及对华经济扩张，从而使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在大战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很久，资本的本性之一就是其扩张性，战后不久，曾经因为大战而放缓的东西方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又纷纷卷土重来，并且其广度与深度较之战前更有增加。

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卷土重来首先表现在商品贸易上。1928年以前，中国外贸入超最少的年份为1919年，当年外贸总值12.8亿关两，入超1619万关两，占外贸总值的1％略多。1920年外贸总值为13亿关两，其中出口54,163万两，进口76,225万两，入超猛然达到22,062万关两，较之上年猛增12.6倍；1921年外贸总值为15亿关两，其中出口60,125万关两，进口90,612万关两，入超则达到创纪录的30,487万关两。从1920年到1926年，中国外贸入超总计16.64亿关两，占北京政府时期外贸入超总数的70％，列强商品倾销势头之猛烈于此可见一斑[27]。海关税务司在其年度报告中认为，1921年“中国贸易大都不佳，实为商业史上最劣年度之一。上年所记之贸易颓败景象，本年开始，宛在目前。市场存货过巨，已为进口货流入之梗，而内地各大区域又复不宁，益以雨水时节，洪流暴发，出口货又复受制，于是购买力因而减少，观于存货日难脱售，即可了然。进口商人负累甚重，于战后最盛时所定之巨量货物，几于求其脱售，而能不受重大之损失，殊不可得”[28]。如此数量的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对本已苦于市场狭小、资金不足的中国工业无疑是重大打击，1921年以后中国工业发展的趋缓、停滞与危机与此有很大关系。外国商品对华输出依靠种种优越条件，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最典型的事例当推煤油输入。美国石油巨商美孚石油公司为了向中国推销煤油，在中国大城市设立了五个分公司，中等城市设立了二十个支公司，县城设立了五百个经销店，代销店则遍布城乡。通过这种全国范围的推销网，美孚公司得意地夸耀，“虽穷乡僻野向不知煤油为何物者，今亦无不需用吾人之产品矣”[29]。1922年，中国进口煤油的数量急剧增长到价值6344万关两，位居进口物品的前三位。在外国商人的强力推销下，煤油成为国人不可或缺的用品，美孚也因而成为煤油的代名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较之过去出现了两个新特点。首先，由于大战的影响，德国战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两国基本退出了在华经济角逐。旧有经济强国英国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对华经济扩张的速度有所放缓。而后起经济强国美国与日本

则咄咄逼人，成为对华经济扩张的主角。尤其是日本，挟其天时地利之便，开始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对华经济扩张的领头羊。20年代初，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与自华商品输入总值均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近30%，跃居各国首位，英国则退居第三[30]。从1912年到1928年，日本对华借款总数达到53,558万元，占外国对华借款总数的40%，超过英、法、美三国的总和[31]。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急速膨胀，不仅对列强在华势力格局与中外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国内政局与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皖系在北京政治中所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与日本的经济支持有不解之缘。

战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投资的迅速膨胀。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列强对外经济扩张的一般规律，资本输出更有利于就近利用被输入国的廉价原料与劳力，赚取高额利润，在中国更可以利用其特殊身份，避开此起彼伏的抵制外货运动的打击。如日本对华火柴输出，1920年代中叶由于中国抵货运动的打击，下降到不足最高年份的3%，但同期在华日资火柴厂的产量已接近其对华最高出口量。外资企业在华享受一系列特权与优惠，拥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所不具有的种种有利生产条件。如同样是20支纱，日本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为42日元，在华设厂则只需22日元，便宜近一半左右。因此，外资企业的利润率普遍较高。据统计，1914年—1922年外资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27%左右，高的如怡和纱厂可以达到65%[32]。在重利吸引之下，外资在华企业的发展相当迅速，1920年在华外资企业共有7375家，比1913年增长了近一倍，其中包括许多外国知名大公司。这些外资企业的总资本达到了166,746万元，占中国产业资本总额的70%，相当于华资产业资本的2.38倍[33]。英美烟草公司可作为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典型例证。1902年它刚成立时，资本不过21万元，职工170人，而到了1919年，其资本达到了12,479万元，十七年间增长了593倍，相当于每年增长三十五倍，其产品实际利润率超过50%，成为其资本能够如此大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它生产的香烟年销售三十余万箱，占全国总销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几乎垄断了中国卷

烟市场[34]。它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从烟叶的生产与收购、到卷烟的生产与销售，形成了庞大的全国性网络，一般华资企业很难与之竞争。1921年8月，北京政府更明文下令，外资企业只要交纳2.5%的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难怪身受重重税捐负担的中国工商企业家们为此而怨声载道。

在华外资企业中，以日资企业发展最快。1914年—1921年，日资在华设厂共222家，遍及各个工业领域[35]。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日资企业拥有的纱锭数量的增长比中国企业快一倍，日资日华纺织公司在上海有八个厂，内外棉纺织公司在上海有九个厂，青岛有四个厂，大连有三个厂。1925年日资纱厂已有纱锭127万枚（占全国总数的38%），布机7205台（占全国总数的35%）[36]。不仅如此，日资企业资本雄厚，效率高，成本低，出品优良。当时日资工厂每锭平均日产十六支纱1.25磅，缴费20两，同期华资工厂每锭平均日产十六支纱0.75磅，缴费30两[37]，两相比较，优劣自明，因此，在华日资棉纺织业的发展对华资棉纺织业的前途构成了相当的竞争压力，以至当时人惊呼："我之廉价工人，彼亦得而使用；我之丰富资源，彼亦得而购买；就地制成，旧地卖出，运费既省，关税无多，资本较吾雄厚，技术较吾高深，……言念前途，不寒而栗。"[38]在重工业行业，日本势力更大，尤其是重工业的核心部门煤铁业，从东北的抚顺、鞍山，到华中的汉冶萍，无一不在日本资本的控制下[39]。1919年，日资与中日合资煤矿的资本总数已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40]。

由于外国资本的不断对华扩张，1920年，外资企业的产值已占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业总产值的55%，中国许多重要经济部门被控制在外资手中。以中国近代工业中最为发达的棉纺织工业为例，1925年，全国纱锭数的44%和布机数的46%为外资企业所有[41]。重工业因为需要投资较大，因而外资所占比例更大。以1922年为例，中国机械采煤的78%、发电装机容量的71%、机械开采铁矿和生铁生产的100%，

由外资控制[42]。这些外资又多集中在一些大型企业，如中国年产100万吨的煤矿没有一家是华商独资；日资开办的鞍山制铁所，建有当时中国最大的400吨和500吨高炉各一座，经过不断扩建，到1936年年产钢能力已达到45万吨，成为中国以至亚洲的大型钢铁企业之一。上述种种，使得本已极为薄弱的华商重工业企业在外资的挤压下，仰给于人，发展更为艰难。现代交通的支柱铁路业，至20年代中期全国通车里程不过1.3万余公里，其中完全自主经营的只有区区8%[43]。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华商与外资之间的竞争是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外资企业不仅拥有许多经济方面的特权，而且更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排挤、打击中国民族工业，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更形艰难[44]。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由于其现代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不能完全由内资满足，外资的进入有其必然性。事实上，民国政府也曾提倡并鼓励外资进入中国，“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张謇在论及外资对矿业的影响时有言，“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既藉以发展地质之蕴藏，又可以瞻贫民之生活，其由钢铁而生之机械铁工厂，亦可听欧美人建设，于工业可省远运之资，于工学尤得实习之地，计所获益，良非浅鲜”[45]。外资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工业发展资金不足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式，提供当时国产工业还不能生产的货品，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的成长自有其意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当时中国还不能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与自主发展的情况下，外资的进入托庇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享受到一系列超国民特权与优惠待遇，一些外资企业还可以利用特殊的政治关系，得到中外双方政府的保护，从而使外资企业在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具有内资企业所不具有的种种有利条件，双方的竞争关系并非完全平等，所谓“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只是理想，而非实际。因此，华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外资亦为不争之事实。

就外国在华投资的收益而言，1914年—1927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为78,250万元（约合40,760万美元），政府借款为40,440万元（21,060万美元），总计为118,690万元（61,820万美元）；从中国获取企业利润为178,410万元（92,920万美元），债务本息为95,210万元（49,590万美元），总计为273,620万元（142,510万美元）。两相比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约为228%，政府借款的收益率约为235%，平均约为230%[46]。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外国资本之所以竞相涌入中国，由上述统计可知，其本质仍在于获利而已。

三　近代工业发展的起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工业较为迅速的发展，使全国工商界欣喜至极。正当大小实业家们准备进一步扩大投资，兴办更多实业之际，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再度陷于艰困之境。诚如时人所论："欧战既终，险象即生，九、十两年（即民国九、十年——作者注）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都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47] 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列强对华经济扩张、市场狭小与资金短缺，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还维持着全国统一的局面，在拟定法规、劝奖实业方面，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及至后袁时期，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各路军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霸一方，争权夺利，根本无心再去顾及工商业的发展，更不必说什么扶持了。北京政府主管经济的主要部门——农商部，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部长犹如走马灯般更换。从1916年6月到1927年

6月，在11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八任总长（包括兼代与暂署），平均任职时间不过七个月有余，其中时间最长者田文烈干了两年三个月，时间最短者章宗祥只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四天。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对经济的长远规划。“况农商当局，每每牵入政争漩涡，去留靡定，等职官于传舍，虽有贤者，亦往往以多种不幸关系，卒之无所建白以去”[48]。因此，这一时期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49]。当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50]1924年9月1日至15日，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实业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各省区商会、农会、渔会、矿业联合会以及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大商埠的实业界代表八十人，外交、内政、财政、交通、农商及税务处派出二十一人，以国务总理颜惠庆为议长，李士伟、穆藕初为副议长。此次会议为1913年全国工商会议后第一次召开有关实业发展的会议，会议提出议案一百七十余件，议决者一百五十八件。此次会后，本应在10月召开由各省区实业厅长参加的实业行政会议，但“因近时时局不靖，交通或多困难”，而暂缓举行。此次会议通过各案，本应提交行政会议，“分别咨询审核，再为施行”。结果亦束之高阁。难怪颜惠庆在闭幕词中说，多年来“内因时局之不靖，外受国际之竞争，实业界所受痛苦更在在皆是。其所以谋救济而图改进者，自既殷且切”；“惟言易行难，自古所戒。当此时局艰难，一切政事尤不能不酌分缓急”。他只能寄希望于“即使以一时事实上之阻碍难尽实行者，倘能朝野一心，通力合作，悬的以赴，继续努力，自必有能实行之一日”[51]。不过，颜惠庆言犹在耳，直系政权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垮了台，所谓“必有能实行之一日”，终成难有“实行之一日”也。

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现代经济基础薄弱、而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后发展国家，近代以来面临着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艰难过程，外有强势外国资本的压迫，内有封建经济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列强环伺、国力衰颓，既不能对外扩张，又没有充足资

本和统一市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发自生的发展路径，中国难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经济转型，所以政府在确立经济法制、开拓商品市场、保护内外投资、引导生产发展、调节市场秩序等方面的责任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而事实表明，北京政府的弱势地位及其政策导向，不能承担导引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责任。北京政府无法维护中国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主权，无法改变中国对列强的政治经济依附地位，而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北京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也无能无力制定合适的政策并督导进行，对于经济发展只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诚如时人所论，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对于工商实业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52]。

中央政府无心也无力关心工商业的发展，各地军阀更是把工商业视为财源。民国年间，战乱不已，军队众多，军费浩大，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无不滥征各种苛捐杂税，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当时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为3%，但每过一关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又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巧立名目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四川成都与重庆间相隔仅四百余公里，永久税卡却有近二十处，每担物品收税18元，加上临时收税，要超过20元，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53]。“昔日军队，各有防区，已属弊习，今尤变本加厉，一地而驻数种之兵，一地而供数种军之饷。或以原有税收为不足而增设特别捐税，或此军已收于前，彼军又收于后。或各就地设立关卡……障碍交通，妨害商旅，莫此为甚”[54]。如此盘剥之下，国货与洋货相比，自然失去了竞争力。军阀混战，更给工商业带来直接祸害。战争一起，交通阻塞，军队所到之处，筹款、拉伕，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如时人所论，“各省被兵害之区，皆聚匪之地，其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不可缕计。军民长官煌煌先令，对于所部曰保卫地方，对于土匪曰尽力

剿办，究其实际，匪则烧杀奸淫，绑票勒赎，兵则勒捐借饷，占住民居，派役拉车，藉端敲索。兵匪交乘，民何以堪”[55]。河南与安徽为小麦主产地之一，两地所产小麦本可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如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二两，且时间无保证，长者竟达一年之久。而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四钱，以至“商人欲求铁路货车运输原料小麦，此乃绝无仅有之事”[56]。江西萍乡煤矿在战乱中屡次受扰，最长一次交通断绝达八十天之多。仅此两例，可知军阀混战带给中国工业发展何等沉重的负担，更不必提那些赤裸裸的敲诈勒索了。

欧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经济扩张的势头更胜以往。铺天盖地的商品倾销，使原本有所扩张的国内市场再度缩小。与国货相比，洋货质高价低，竞争力处于绝对优势。北京政府不思保护民族工商业，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更使洋货处于压倒国货的优势地位。洋货入口只需交纳7.5%的关税与子口税，由于进口物价的上涨，实际税率较名义税率为低，最低的年份只有3%左右（1921），税负重重的国货自然无力与之抗衡。曾有人就国产与进口食糖的价格两相比较后，不无辛酸地说，国产食糖“陆运有厘金之恶税，海运又课二重之关税，与日本之糖相较，成本乃相悬殊。就令有爱国心者，亦未必能常食贵糖而不食贱糖”[57]。随着列强资本输出的扩大，在华外资厂矿越来越多，它们规模大，设备好，享有一系列特权，因而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更具威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给北京政府财政部的信中就曾抱怨说：“今则外商烟厂林立于内地，就地行销，俱无征税，……敝公司烟草既纳进口正税，复纳子口半税、杂捐、附加等税，负担既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难与外货竞卖。”[58] 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而英商开滦煤矿，吨煤成本为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仅占成本的17.8%。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的势力日渐扩张，华资工商业的发展日趋艰难。

以往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老问题这一时期仍然存在。列强的大量商品输入挤占了民族工商业的市场，余下有限的市场容量又因为军阀混战、土地占有不均、水旱灾荒连年发生而导致的农村萧条，农民购买力有限而大受影响。因为军阀割据，国内币制不一，且各地滥发通货，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已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59]。这种四分五裂的市场状况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不利。更严重的是资金缺乏。欧战前后一时的高额工业利润促使社会闲置资金流向工业，而工业萧条刚一露头，利润的下降立即导致这些资金的流出。虽然20年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颇为繁荣，但它们多出于投机心理，担心对工业的放款有去无回，操作较为谨慎，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已放出的贷款利率也较高，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对接受贷款者反而形成压力。为了得到周转和投资资金，一些厂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钱庄，然钱庄放款利率奇高，期限又很短，几近于高利贷，致使“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60]。向外资借贷，更是饮鸩止渴。1917年—1931年间，由于向外资借贷无力偿还，华商纱厂被外国债权人吞并了十八家，纱锭共76万枚，占1922年华商纱厂纱锭总数的一半[61]。工业资金的缺乏，并不完全是社会资金缺乏造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工业经营要担风险，利润得不到保证，因而大量资金流向商业、金融业与公债的投机，对原本缺乏资金的工业更是雪上加霜。当时人就说，“资本非不充也，无法律以拥护之，致使信用堕落。城市之资财，寄于外人；乡里之现金，藏于地窖。转令外人长袖善舞，而以重息折扣，剥夺吾人之脂膏”[62]。

由于上述原因，自1922年起，中国工业在经过前此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后，转而进入缓进与停滞时期，尤以前一阶段发展较快的部门为甚。中国工业的支柱部门棉纺织业首当其冲，1922年起纺纱已无利可图，次年更转为亏损，一包纱要亏十几两，以致“每纱一箱，须亏一箱之本；每纺一日，须负一日之累”[63]。1923年、1924年，申新各厂亏损高达131万元，许多在建厂高潮中开工的纱厂，刚投产即面

临亏损倒闭的风险。从1923年到1931年，华商纱厂新建扩建二十五家，同期出售、停工、出租者则多达五十二家[64]。聂云台集资280万开张的大中华纱厂，开业不久即售予他人。曾经占据中国棉纺织工业重要位置的大生纱厂第一、二厂，因负债额大大超过资本额，不得不在1925年被债权人接管。加之此时国内棉花生产减产，出口增加，形成花贵纱贱之局面，更加重了棉纺织业的困难。为了挽救棉纺织业的困境，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破天荒地在1922年12月议决，自12月18日起，三个月内停车四分之一，到期如仍不景气，再行续停四分之一。同时要求政府禁止原棉出口，豁免花纱税厘，以保障原料来源及利润，但并无结果。

欧战前后发展极为迅速的面粉工业，此时也到了“盛极而衰时期”。“出口之粉渐少，外粉又复侵销”，“原料缺乏，价格腾贵，而制成面粉为洋粉所牵制，不能随麦价俱增。营业困难情形，为从来所未有”[65]。面粉进口，1921年尚只有76万担，次年即猛增近四倍，达到361万担。1924年更达到创纪录的668万担，值3020万关两[66]。中国面粉大量出超的景况犹如昙花一现，1923年起出口每年均不足百万关两，还不到进口数的二三十分之一。面粉巨子荣氏兄弟于1925年9月向同业提出，面粉进口，“因外侨食品关系，例不征税，迨进口后，运销内地，在在免厘。年来麦价昂贵，交通阻梗，粉厂获利殊难；推销外洋，则税则繁苛，如运往日本，每包征收洋七角；……外粉输入则通行无阻，华粉输出则例须稽征，税则至不平等，莫此为甚”。因此，荣氏兄弟建议同业向政府要求采取优惠及保护政策，“洋货进口一律征税，外侨食品不得除外”；“洋粉进口，如须运往内地，一律征收落地税。”但亦未见下文[67]。

虽然经过大战前后较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业的一些固有弱点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不平衡。首先是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轻工业因投资少，见效快，市场大，发展相对较快，重工业则远远落后于轻工业的发展，从而无法形成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

业体系。以最为薄弱的机械工业论，多数厂家为修理、装配厂，规模小，平均每厂只有工人二十五人；设备简陋，平均每厂使用机床不到六台，使用五台机床以下的工厂占总数的74%；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工厂使用人力[68]。经济萧条开始后，为棉纺织业服务而开办的机器厂家纷纷倒闭，其中还包括像上海中国铁工厂这样拥有几十万资本与几百名工人的大厂。其次是轻工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棉纺业发展迅速，织布业虽有发展，但仍赶不上需求，每年进口的棉布都在六七千万关两左右，大致与战前持平或略有下降，仍居中国进口物品前列，同时也显示轻工业的发展还处于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阶段。第三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工业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尤以上海、天津、武汉、无锡等地为发达。1922年，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南通、青岛六城市拥有纱锭120万枚，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四，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2%[69]。广大内地工业发展则极为落后，极端的如云南、贵州、青海，迟至1919年尚无一家注册工厂。第四是大小发展的不平衡。由于资金短缺，中国工业向来以中小企业为主，1912年万元资本以下的小公司占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1920年仍占近三分之一。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1920年只有五十七家，只占工厂总数的3%左右[70]。相比较而言，外资棉纺织厂的规模一般要比华资企业大一倍左右，机器厂规模的悬殊则更大。小企业本小利薄，抵御各种风浪袭击的能力更差，一有风吹草动，只能关门了事。此外，中国工商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的落后，设备的陈旧，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等等弱点，几乎是其一出世就打下的印记，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根本改变。

从1922年起，中国工业的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速度趋缓，许多部门停滞不前，进入相对萧条时期。但对这种萧条的程度似也不宜过于夸大。应该看到，即使是1922年以后，也不是所有工业部门都停滞不前，有的部门保持了原有态势，有的部门还有所发展。棉纺织业尽管受影响较大，但1925年纱锭总数仍达到187万枚，布机11,121台，分别比1921年增长了50%和91%[71]。上海棉纺、缫丝、面粉、卷

烟四大工业部门的企业总数，1921年为109家，1924年增长为132家，1927年更达到315家，增长了近两倍[72]。1921年—1926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8%[73]，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工业经过几年的较快发展，实力有所增加，对各种困难的抵御能力也随之增强。一些大企业集团资力较为雄厚，暂时的亏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消化，最后仍能扭亏为盈。如荣家企业的面粉厂，1922年亏本50万元，但这只占荣家企业系统固定资产总值的2.5%。经过一番努力，次年即转亏为盈，1924年的盈余又达到了86万元[74]。大企业集团还借此时机兼并弱小企业，扩大自身实力，这种分化改组本身也是工业发展进步与活力的表现。二是此起彼伏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抵制外货运动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大有裨益，扩大了民族工商业的市场。1925年工业生产的短时高涨，“虽为时不久，然关系甚巨”，而这与当年五卅运动后抵制英日货的运动是紧密联系的。仍以荣家企业为例，申新各厂1925年的纱产量比1922年增长20.7%，布产量则大增1.7倍，福新各厂的盈余达到了244万两[75]。更突出的事例是卷烟工业，1924年上海华商烟厂为十六家，次年猛增到五十二家，最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24年的销售额为2521万元，次年一跃为3646万元，增长了45%[76]。因为“国人提倡用国货，热度日高。我公司近来销场过大，供不给求。各局索货万分急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77]。就连库存霉烟都一销而空。它的最大对手英美烟草公司，经此打击后，直到1927年的销售都未能恢复到1924年的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在民国成立后始终保持着上升态势，速度有快有慢，也有过停滞与困难，但毕竟还是在发展。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约为219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约为10.66亿元，占总产值的4.87%，工场手工业产值12.95亿元，占总产值的5.91%，两者合计23.6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78%，比清末民初提高了一倍左右，而制成品的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39.5%，超过了农产品的出口额[78]。这或可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在北京政府时期发展

的大致总结。

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停滞

一　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

自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即开始逐渐解体，商品化进程逐渐加速。这一方面表现在农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农家经营的商品化。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而且由于中国工业在欧战前后的较快发展，带来了对农产品原料的更大需求，促使这一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势头更为迅速，但外国列强的优越政治经济地位，使中国农村商品化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受着世界市场的支配。

据调查，20年代全国主要农产品的平均商品率已达到一半左右，其中华北、西北偏低，华东、华南沿海则偏高[(79)]。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江浙部分地区，农家生活资料一半以上购自市场，农产品的四分之三通过市场出售[(80)]。由此可见，农村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欧战前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经济作物的发展。

棉花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欧战前后，受国内棉纺织业发展及国外需求增加的影响，棉花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植棉之地，年有扩张”，棉田面积迅速扩大，产棉区域几乎遍及全国，以至“从前素不产棉之地，亦以产棉闻矣”[(81)]。其中直隶、江苏、湖北、山东等为产棉大省，美棉种植发展也很快，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五省的美棉产量，已占1921年全国棉花总产量的11%[(82)]。为了鼓励棉花生产，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了《植棉奖励条例》，设立棉业试验场与棉业督办。棉花生产除自用外，还可出口一部分。1918年—

1922年，棉花平均年产800万担，最高的1918年，产量达到1096万担，其中出口132万担，价值3811万关两，成为主要出口物品之一[83]。

大豆生产异军突起，发展十分迅速。20年代中期，大豆年产超过1200万吨，比十年前增长两倍以上，中国因而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84]。1924年，大豆、豆油、豆饼出口合计价值13,671万关两，比1916年增长164%，占出口总值的17.7%，在国际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并已取代生丝，成为中国第一位的出口物品[85]。大豆及其制成品生产的发展，使其主产地东北成为中国唯一的外贸出超地区，1920年—1927年，东北外贸出超高达54,600万关两，大连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贸港口[86]。东北大豆播种面积已占农田面积的30%左右，商品率高达80%，成为中国商品化比率最高的农作物。

花生从19世纪末开始种植，民国年间发展较快，产品大多供出口。20年代花生平均年产850万担，1924年花生及其制品出口价值3024万关两，已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之一[87]。烟草生产的发展与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英美烟草公司为推广美烟，1915年开始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试种美烟，因产量高，公司又采取优惠条件诱使农民种植，发展颇快，不久即占领了烟草市场。1915年美烟收购仅49万磅，1924年达到5780万磅，十年增加了117倍[88]。

与上述新兴经济作物生产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比，一些传统经济作物的生产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反而呈现衰落之势。茶叶本为中国传统出口产品，19世纪末起，受后起的印度、锡兰（今译斯里兰卡）茶的竞争，茶叶产量及出口量均趋于下降，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920年茶叶出口30万担，价值885万关两，只有1916年的五分之一左右。茶叶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最高峰时的50%跌落到2%左右，已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89]。生丝及其制品长期居于中国出口物品价值的首位，民国以来，由于日本生丝生产的迅速发展（产

量已超出中国一倍以上），以及人造丝的兴起，中国的生丝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年产量徘徊在1万吨上下，出口值虽有提高，但发展速度显然不及上述几种新兴经济作物。1924年，生丝及其制品（包括绸缎）出口价值12,921万关两，已从向来的第一位退居于大豆及其制品之后，在世界生丝及其制品市场上的占有比率也在不断下降[(90)]。

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一些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这也有利于技术的发展与产量的增加。如棉花生产集中在长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苏、湖北、河北三省，江苏南通地区的棉花产量占到全国总产的七分之一。大豆种植基本上在东三省，山东一省占了花生产量的五分之四，烟草生产主要在山东、安徽、河南，茶在安徽、江西、浙江，蚕桑在浙江、广东、江苏。

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有增长，大致达到了20%左右，但受经济作物发展的影响，粮食播种面积在下降，即便是“昔多稻作”的苏南常熟地区，也“已大都改植棉作”[(91)]。1920年代中期，粮食作物产值大约仍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全国稻麦杂粮的总产量约为二十五亿余担[(92)]。但中国人口众多，1920年代已超过四亿人，人均耕地只有三亩多些，加上城市化的发展和经济作物产区的扩大，使得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要，正常年景也需进口部分粮食，以补国内生产之不足。遇有天灾人祸，“粮荒”更频频发生。如上海的米价，欧战前只不过5元一石，1921年上涨了两倍还多。大米已成为中国第一位的进口物品，1923年进口数量2244万担，价值9822万关两。如再加上小麦和面粉的进口，数量高达3087万担，价值13457万关两[(93)]。此后，大米、小麦、面粉、杂粮等粮食及其制品的进口，每年总数都在数千万担以上，成为影响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问题。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质上仍受列强操纵的国际市场支配，既未解决国内民众的温饱问题，也未满足近代工业发展对于原材料的需要。相反，广大的中国农村仍是列强控制下的商品市场与原料基地。列强通过种种手段推销剩余产品，获取廉价原料。欧战

前后发展迅速的几种经济作物，大豆和花生五分之四以上供出口，棉花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供出口和外国在华企业所用。英美烟草公司直接插手烟草生产，更是列强操纵国内农业生产的典型例证。中国农业商品化生产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使其极易受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旋起旋落。茶生产的兴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广大农民的命运实际操纵在国际资本财团手中。

由于“剪刀差”的存在，中国出口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低于同期进口物品价格的上涨。出口物品的购买力指数，20年代平均比十年前下降了十个百分点左右[(94)]，列强因此以相同的代价，获取了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国内工业发展所需原料得不到保证，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即使是国内生产较多的棉花、小麦等也不例外。国产棉花本可大体满足国内棉纺业的需要，但每年出口在百万担以上，其中绝大多数运往日本，加上在华日资纱厂用棉，“几占全额的二分之一而弱”[(95)]。华商纱厂联合会曾于1922年底上书北京政府，说明国产棉花外运“源源不绝，原料乃愈见缺乏”，“循至棉花求过于供，其价日昂”，要求政府禁止棉花出口[(96)]。1923年初，北京政府决定，自3月1日起禁止棉花出口，但立即遭驻京公使团“抗议”，随后又被迫宣布放弃禁令。华商纱厂联合会数次要求恢复禁令，终不见下文。国内棉纺业不得不大量使用进口棉花，从1921年起，棉花进口每年都超过百万担，1925年达到181万担，价值6997万关两[(97)]，位居中国进口物品的前三名。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列强摆布的例证之一。号称以农立国的中国，国内工业所需农产原料，除“榨油之大豆，国内差堪自给外，余则几无一能完全脱离舶来品而独立者”[(98)]。事实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不利。

二　农业经济的凋敝

如果说，一战前后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的话，农业则连这一点都得不到。中国农民面对的外部环境，除了生产

力水平低下，频繁的天灾与列强的经济扩张外，更有军阀统治的横征暴敛，军阀混战的破坏摧残，与一战前后的工业相对高速发展相比，农业的发展速度仍然较慢，农业的凋敝成为无可逃避的现实。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的占有权始终是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不少军阀官僚出于置产的传统，都置有大量田产，大凡大军阀大官僚多是大地主，从段祺瑞、曹锟到张作霖、徐世昌等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占有的土地少则几千亩，多达几万、十几万亩，张作霖及其亲属在东北占有不下160万亩土地，他的亲信杨宇霆、吴俊陞也都占有一百多万亩土地[(99)]。军阀官僚占有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以权势低价购进，如王占元在山东只花二元钱就可买进一亩好地；更多的是强占，有枪便是王，谁也奈何不得。除了军阀官僚外，许多工商业者以及一般社会游资也都加入到土地买卖之中。因为土地被视为稳定的产业，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越是动乱年代，有钱人越不愿意进行工业投资，而是“争买田产”，以求资金安全。这既加剧了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也妨碍了迫切需要资金的工业发展。当时的大资本家张謇、聂云台等人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缺地少地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技术的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

与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相适应，实物地租仍是主要的地租形态，租率一般要占到收获物的近一半，变相加租、押租、预租以及种种额外勒索更是司空见惯。除此而外，农民还要忍受高利贷业者的重利盘剥。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的温饱尚成问题，购买力甚低。据估计，拥有20亩以上的农户可以略有剩余，其他农户只能靠家庭副业或手工业维持生计。许多农户没有耕畜，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中国的农业生产始终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循环往复，生产技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到20年代中期，稻麦杂粮的平均亩产量只有二百三十余斤，不仅低于清代的水平，甚而低于两千年前汉代平均亩产264斤的水平，实在是令人感叹不已。

军阀的横征暴敛与混战不已，是造成农村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之一。北京政府时期，各地大小军阀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军费支出，无不把搜刮的重点放在千百万农民身上。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纳税人无处逃避，向来是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从而也成为军阀的重要财源。北京政府时期，“田赋名称括以地丁、漕粮、租课三种。其征收机关，则县知事公署设总柜为总机关，四乡分设分柜，以科员或左理员董之，为分机关。从前胥役把持之弊渐次剔除，并通令各省区完纳丁课，概以银元计算，漕粮、兵米亦次第改征折色”[100]。田赋正税年约八九千万元，数量较为稳定，但田赋附加税则层出不穷，多数省份在十种以上，税额也年年增加，大多超过正税几倍。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少者几年，多者十几年，四川梓桐县1926年已在“预征”1957年的田赋，整整“预征”了三十年[101]。农民名义上要负担的税为七种，实际各种税负则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从人头税一直收到牛捐、狗捐。以河南为例，1926年田赋、厘金、契税等正杂税收入为1100万元，而田赋预征达1400万元，占总收入的41％，超过田赋正税收入的至少一倍以上[102]。由此可知，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名义上的田赋数，他们哪里还有余力去进行扩大再生产。军阀的横征暴敛主要落在自耕农身上，也促使自耕农向半佃农以至佃农的转化，从而又促成了农村经济的凋敝。

军阀混战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更是难以尽述。民国年间，大小军阀的混战经年不断，他们以军用票、军需券支付战争需要，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文明”之举了，更经常、更直接的是毫无一定之规的摊派与强占，无偿的征用民伕、拉走牲畜。“大军过境，米面柴草，均由各区供应，遂至谷物一空”[103]。而且一遇战争，胜方以抢掠为刺激士兵的手段，败方的逃兵溃将更是无法无天，“兵车所至，亦鸡犬一空”，“村舍荡然，流离载道”，所有灾难都是农民承受[104]。直皖战争时，皖系马良部在山东德县获胜，即“鸣枪入街，肆行抢掠三昼夜之久”。战后，据京兆所属各县初步统计，损失高达345万多元[105]。再如1924年的江浙战争，“战区内耕牛、农具损失极多，有至十分

之六者，少者亦十分之二三”；“棉田受损最巨，收获多者仅及六成，余则二三成左右”[106]。兵祸之外，伴以匪祸，许多地方土匪“横行乡曲”，搞得“赭垣斗立，鸡犬不闻”。说到底，兵与匪互为表里，都是军阀统治的产物。

天灾伴随着人祸，人祸又加剧了天灾。这一时期水旱连年，1920年至1921年间，北方的旱灾和南方的水灾都很严重，灾民数以千万。据估计，1920年—1921年的华北旱灾，波及317个县，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余万人[107]。大小军阀终日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无心顾及防灾救灾，各地水利废弛，围堤失修，以至小灾成了大灾，无灾也能成灾。更有甚者，敌对双方在军事行动中决堤放水，给无辜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如吴佩孚南下与湘军作战时，“决湘堤以灌之，淹没四县”，实乃人祸胜于天灾[108]。民国年间，为逃避战乱，大量农民或闯关东，或漂洋过海去外国，或流入城市，从事种种低贱职业。据当时日本人在苏、浙、皖、冀、鲁五省调查的结果，农村的平均流亡率为4.8%[109]。况且流亡者以青壮年劳力为主，他们背井离乡，造成大量土地抛荒，导致农村经济的恶化，而这种经济恶化又迫使更多的人流亡，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突破性进展，资本主义式的农牧垦殖公司和富农经济，只不过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农村传统经济的点缀。农牧垦殖公司一度有所发展，据八个省份的不完全统计，20年代初已有一百余家，尤以江、浙两省居多，但这些垦殖公司多为“招佃代种”，“坐收田租”，经营收入比重不大，甚而有的公司完全靠出租维持。张謇办的通海垦殖公司，占地10万亩，大部分仍分租给佃农，收取地租。富农经营占农业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未超过10%，而且规模也都不大，大致也就几十亩地，为了少担风险，还有不少人出租部分土地，坐收地租，少数人更进一步转化为地主。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都是艰难的，何况在农产品价格低、税负重、经营农业风险大，而出

租土地倒可以坐收高额地租的情况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

总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业，虽然经济作物有所发展，但农业中的现代经济成长十分有限。广大的农村既不能成为中国工业发展最广大、最稳定的销售市场与原料来源，中国工业化的进步自然也将是十分艰难的。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财政与金融

一　北京政府中后期的财政状况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财政，虽也相当紧张，但勉强可以维持。袁死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为削弱，群雄割据，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的中央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而支出尤其是军费支出不见稍减，北京政府的财政可谓捉襟见肘，度日如年。

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向来是一本糊涂账。1917年—1927年间，只有1919年编过正式的财政预算，并经国会议决，公布施行。“其余各年度，或以法定手续未能完备，或因时局影响造报未齐，均未成立”[(110)]。以1919年预算为例，经常岁入40,984万元，临时岁入8058万元，合计49,042万元，其中岁入最多的三项为（经常与临时合计，下同），盐税9882万元（占总岁入的20%，下同），关税9396万元（19%），田赋9055万元（18%）；经常岁出27,129万元，临时岁出22,447万元，合计49,576万元，其中岁出最多的三项为，陆军经费20,783万元（占总岁出的42%，下同），债款支出12,796万元（26%），内务经费4817万元（10%）[(111)]。根据这个预算，赤字不过534万元，占预算总岁出的1%略强，但所谓债款支出实际即为赤字，赤字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已为27%，而这也不过是纸面上的数字，其间缺漏甚多，实际亏空无疑大大超过预算数字。还以1919年为

例，因为“财源枯涸，入少出多，每月支款不敷已达千万元以上。外债既无可借，但恃国内华商各行号设法筹挪，还期之促，利率之高，所指抵押品之严重，实为历来所未有”[112]。因此，当年财政部计划发行国债2亿元，结果招致南方政府的抗议，英、法、日等国公使也反对以盐税为该项借款之担保。最后，北京政府决定改以田赋为该项借款之担保。

在所有政府支出中，军费高居首位。北京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军费开支平均为预算数的39%，“实支之额，犹远过于预算之数”[113]。1918年中央财政每月支出约1195万余元，其中普通军费570余万元，特别军费302万余元，边防及协款16万余元，合共888万余元，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三左右。即便如此，仍欠军费940万元，其中仅欠曹锟所部的军费即高达241万元[114]。这只是中央政府的支出，至于各地军阀的军费开支就更难于计数了。北京政府时期，兵连祸结，战争连年皆有，大小军阀们的军队需要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养着，财政部实际成了军阀们的后勤部。

与庞大的支出相对应的，是北京政府有限的收入。作为农业大国，田赋是稳定而又最为重要的收入，但此时这笔收入基本为各地军阀所把持，曾为中央专款的田赋附加自袁世凯逝后即“解者甚属寥寥”，不能不改列本省预算。清末以来多遭诟病的恶税厘金，数额不小，1920年—1922年，各省区实收厘金税捐13,410万元，年均4470万元[115]，但同样到不了中央手中。各省对中央的解款以及袁世凯时代曾颇为兴盛的中央专款（即各省代收但专归中央使用的税款，如烟酒税、契税、印花税、牙税等），年收曾达三千余万元，自袁死后，随着地方离心倾向的增强，解送中央的税款一天少于一天，至20年代初期，两项合计预算数额不过一千万元左右，实际解送数额则几近于无。这两项收入已是徒有虚名，不复存在[116]。实际上，北京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是关、盐两税。关、盐两税民初即已落入列强的控制下，税款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

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中国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即关余与盐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为列强的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京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税税额逐年增加，从1917年的4935万关平两，增至1925年的8974万关平两，增长82%。同期关余每年均在数百万关平两左右，其中最多的1924年为1752万关平两，约占当年关税总收入的22%。1917年—1926年，关税总收入为66,503万关平两，关余总数7225万关平两，约占总收入的11%[117]。盐税收入较为稳定，大抵在年收入八九千万元左右，最多的1922年为9680万元，1925年以后则有明显下降。盐税抵押借款较关税为少，因此盐余也较关余为多，最多的1918年为5280万元，占当年盐税收入的59%。1918年—1926年，盐税总收入为77,430万元，北京政府得到的盐余为30,920万元，约占盐税总收入的40%[118]，可算是一笔大宗收入了，但仍无补于浩大的支出。

在军阀们的压迫下，北京政府的财政毫无章法可言，为了满足军阀的需索，财政不是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但收入如此之少，支出又如此之多，如1918年，北京政府每月收入为422万元，只有支出的35.3%[119]。北京政府借以填补财政亏空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债，从外债借到内债，从发行短期国库券到向银行借款，可谓窘相百出。如时人所论，“民国三年以前，恃长短期外债；民国五年以前，恃内国公债；民国六年以前，恃日本债，历史昭然。迨八年以后，则各债之路俱穷，于是内国各商业银行之借款如云而起”[120]。

袁世凯统治时期曾经大借外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欧美各国由于战争因素及战后重建的原因，对华借款减少，而且北京政府缺少权威，财政收入有限，欧美各国亦不愿轻易借款，只有日本出于政治目的，在1917年—1918年间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1917年—1924年，北京政府实借外债46,409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

偿还旧债本息，对于缓和其财政困难于事无补[121]。

外债既无法弥补财政赤字，北京政府的日常开支实际主要依靠内债及银行借款解决，“几乎无一用款，不仰给借贷”[122]。内债自袁世凯时代开始发行，起初发行数量并不大。1917年以后，在收支差距日渐增加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把发行内债视为挽救财政危机的唯一办法，内债越发越多，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18年—1922年，发行公债48,827万元，占北京政府时期公债发行总数的五分之四，其中有三年的发行额超过了1亿元[123]。公债的滥发，最终造成债信大跌，偿还困难，不得不进行整理。1922年以后，长期公债已无人问津，发行额剧降为几百万元，北京政府只能靠发行各种短期借款，如国库券、盐余借款等维持。这些短期借款名目繁多，多不过一二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乃至几万元。为了应付急需，北京政府还不惜饮鸩止渴，向银行高利借款，或由银行短期垫款。“财政部每逢付息还本，即向银行商量借款，然往往不能如约清还，致银行拒绝再借。此种竭蹶情形，传播遐迩，政府信用日堕”[124]。这类借款条件苛刻，月息高达2分，借垫数在10万元以下的占这类借款总数的三分之一，最少的垫款只有千把元，可见北京政府的财政已困窘到山穷水尽，过一天算一天的地步了。所谓“短期借款，利重期迫，转瞬即须归还，军事各费，短欠既多，又须设法给付，左支右绌，周章万状”[125]。1922年10月，十八家银行共向北京政府垫款3144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为2795万元（占总数的89%）。1925年10月，二十家银行共向北京政府垫款3033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为2373万元（占总数的78%）[126]。中国银行已经成了北京政府的提款机。到1925年底，北京政府共欠国库券5911万元，盐余借款4411万元，银行短期借款3890万元，垫款3033万元，共17,246万元[127]，积少成多，总数仍然相当可观，等于北京政府时期公债总数的28%。此外，北京政府还借有大量无确实担保的内外债，至1923年，此类债务总数达39,300余万元，“借款户数竟有数百起，债权者之国籍，除本国外，亦有七国之多。至其债额，有达数千万元者，有仅数万元者。其债款之担保，或以税收，或

以产业，或用证券，或用期票，虽各不同，而不确实则一。所以到期本息无款可付，或临时罗掘，酌还一部；或另立合同，作为新借。以至债务愈积愈多，头绪愈变愈繁”[128]。北京政府为此多次提出整理内外债，但旧欠未还，新欠又至，在当时出大于入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不能根本解决债务问题，最多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而已。

在这样的财政状况下，北京政府的日常行政开支都难于维持，更不用说扶持工商，发展文教了。据统计，从1912年—1926年，北京政府所借外债总数为133,700万元，其中用于发放军饷、购买军械的费用占22.8%（1918年最高为近40%），而用于航运、电信、工矿等用途的费用只占7.8%[129]。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也曾筹备成立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和财政整理会，提出各种整理财政案，以讨论中央财政方针，整理全国财政计划，审核并研究整理内外债的办法，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预算[130]。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既无统治权威，也就没有整理财政与编制并严格实行中央财政预算的能力，所有整理财政的计划与方案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二　新式银行业的兴起

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发展迟至清末方才开始。民国建立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新式银行业也日渐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内工商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剩余资金与对资金的需求都急剧增长，银行业亦随之得到空前发展，其后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又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业的兴盛。1919年—1923年，每年新设银行数均超过二十家，1922年达到创纪录的36家。到1925年，全国共有银行一百五十八家，实收资本16,914万元，比1912年增长了五倍还多[131]。虽然这其中不乏旋起旋散的投机银行，但一批声誉卓著、资力雄厚的大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等开始崛起，它们当中既有民国以前成立的银行，也有民国年间成立的银行。中、交两行经几次增资，股本已超过1000万元。1925年，前十家大银行纸币发行量超过2亿元，其中中国银行12,709万元，交通银行4834万元，开始在关内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的存放款业务也有较大增长[(132)]。可以说，中国近代新式银行业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办银行的发展超过了官办银行。本来，中国的银行一直以官办或官商合办为主，1912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二十四家，实收资本1966万元，占全国银行总资本的70%左右。袁世凯死后，政局多变，以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不能不受影响，加上官办银行人员冗杂，经营不善，因此除中国、交通两行外，官办银行的发展趋于停滞，在全国银行业中的地位也有较大下降。1925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有二十八家，占全国华资银行总数的17.7%，实收资本7605万元，占全国华资银行总资本的45%[(133)]。与此相反，由于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资本赢利率急剧增加，多余的资金急需寻求出路，工商业的发展又带来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同时由于大战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外资银行的压力有所减轻，这些都大大刺激了商办银行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1925年新开业的商办银行达到87家，而同期新开业的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只有五家[(134)]。1925年，全国商办银行总数已达到一百三十家，实收资本9309万元，比1912年增长十一倍还多，超过了全国华资银行实收资本总额的半数，而同期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资本资本总额只增长了不到三倍[(135)]。著名的“北四行”都是在1915年—1921年间成立的，而发展最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1926年，资本增长二十四倍，存款增长五十五倍，位居商办银行存款前列，工商业放款超过了放款总额的四分之三。在商办银行中，工商业与金融界投资的比例在上升，即使在军阀官僚买办投资为主的银行里，工商业者的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以金城银行为例，1917年开办时，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到1927年已下降到50%。

一部分投资银行的军阀官僚下台后，亦逐步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家。以北京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的实力下降，商办银行尤其是江浙系商办银行的发展，不仅影响到银行业自身的势力格局，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银行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参与公债投机。1918年以后，北京政府为缓和财政困难，大发公债，短短几年即以数亿元计。这些公债利率少者二三分，高者达五分，加上各种折扣，“直接间接所获之利益固较任何放款为优也”。加之公债还可充作发行准备及借款担保，偿还有总税务司保管的内债基金，因而成为各银行竞相追逐的对象。20年代初银行业的繁荣与公债买卖的投机有很大关系。1921年—1925年，仅北京就有十七家银行开业[(136)]。作为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的北京，集中了如此多的银行，至少表明银行业的发展有着经济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时有的银行完全不事经营，专事公债投机，即使是历史较长、资力较为雄厚的中国、交通两行，也不能置身于公债投机买卖之外。银行的大量资金集中于金融投机，势必影响它们对工业以及其他事业的放款。不过，以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此可能不无夸大之处。实际上，承购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获利虽大，但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政局不稳，购买公债的风险也大，“往往基金流用，本息无着”，百元公债的市价最低时尚不足原价的四分之一，因此公债买卖被时人认为是“纸上富贵”。因此除一些企图乘机捞一把、旋起旋落的投机银行外，一般大银行对购买公债仍较为慎重。据已知二十八家银行的统计，有价证券的投资只占它们资产总额的6%—7%左右，不到放款总额的10%。即使是官僚投资较多的金城银行，对政府的财政放款和投资占其放款总额的比重，也从1919年的55%下降到1923年的22.3%，而1923年其工商业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38%。私人工商业者投资为主的浙江兴业银行，对政府的财政放款则只占其放款总额的4.7%[(137)]。

总之，1918年以后的中国现代银行业有了较大发展，而且这一发

展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对工商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估计，1925年二十五家主要银行的放款数已达到76,000万元[138]，如果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工商业放款，一年也可为工商业提供25,000万元的资金。但是，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样，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先天不足。大多数银行的资本薄弱，存款来源和放款规模都很有限。1921年—1925年新开业的商办银行中，实收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小银行为五十八家，占同期新开业商办银行总数的67%[139]。1925年，实收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小银行有九十四家，占银行总数的近60%，但只占资本总额的14%。1926年，二十四家主要银行的存款总数为91,767万元，而英资汇丰银行的存款即为61,607万元。正因为资本小，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力也很低，倒闭率很高。1921年—1925年，倒闭银行占到新开银行总数的55.6%[140]。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外资银行与旧式钱庄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1925年，在华外资银行有六十三家，中外合资银行十七家，资本总额大大超过华资银行。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除了办理银行的一般业务外，还承办借贷，管理关税，进行投资，垄断国际汇兑，控制对外贸易，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优势地位。钱庄经营方式虽然陈旧，但熟悉行情，信用好，周转快，为中小工商业者所欢迎，以至“商家不与银行往来者甚多，而不与钱庄往来者绝少”[141]。1912年—1924年，上海钱庄从二十八家增至八十九家，资本从149万元增至1926年的1876万元[142]。当时有人认为：“钱庄倘使全体停了业，的确可使上海的商界完全停顿，而银行停了业，恐怕倒没有多大影响。”[143] 1925年，在国内银行业实收资本与公积金总额中，外资与中外合资银行占44.2%，华资银行占37.5%，钱庄占18.3%。如果除去中、交两行及各省地方官办银行，则全国商业银行的资力与钱庄不相上下。商办银行本身资力有限，对工商业放款虽呈上升趋势，但比重始终不大，这就注定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对本国工商业的支持是有限的。

(1) 本节所称近代工业系指所有中国资本投资的工业，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工业。有关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发展情况，请参阅本书第二卷有关章节。

(2) 中国进口棉纺织机械的价值，1920年为690万两，1921年猛增为2670万两。《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4页。

(3)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56页。陈著关于资本总额的估计可能偏低。据吴承明估计，1920年中国产业资本总额已经达到七亿余元。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4)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

(5)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186页。

(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7) 吴承洛：《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5—106页。

(8) 工商部编：《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1928年版。出口量包括外资企业所产纱。

(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10) 工商部编：《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1928年印本。

(11)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92页。

(12)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3)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页。

(1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104、141页。

(15)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6)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2—104页。

(17)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8)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2—104页。上述钢铁和煤炭业的统计均包括外资企业。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20) 上海市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03页。

(2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111页。

(22) 周开庆：《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下册，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7页。

(23) 陈灿：《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71页。

(24)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227页。

(25)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19—120页。

(26)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265—266页。

(27)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1920年和1921年外贸入超的猛增，原因之一是战时对外订货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得以入口，而这又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因此对此种贸易逆差的影响尚需全面评估。

(28) 《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1276页。

(2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2页。

(3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77—178页。

(3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4页。

(3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46—847页。

(33)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41、127页。

(3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

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3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421页。

(3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77页。

(37) 李炳郁：《论日人在中国棉业之势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5卷第4期。

(38) 汪树磐：《华商纱厂与日厂之比较》，《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3卷第1期。

(39) 汉冶萍公司因为几次向日本借款，实际已沦为日本钢铁业廉价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自1912年到1927年，共运往日本铁矿石426万吨，生铁78万吨，而且价格被压得远低于一般水平，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武汉大学经济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2—1123页。

(4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32页。

(41) 《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42)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24、127、12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971页。发电装机为1923年的统计，机械开采铁矿为1924年的统计。所谓由外资控制，包括外资直接投资和提供贷款，因为外资一旦提供贷款给某企业，则其对该企业的生产运营就拥有了发言权。如1922年的机械产铁业总资本中，外资直接投资占29.2%，贷款占70.8%，故其100%控制在外资手中。1924年这两者的比例已成为78%和22%，这种外资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说明外资介入中国重工业程度之深。《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27、129页。

(43)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90页。

(44) 除了在金融、工矿、运输、贸易等方面的直接投资外，外国在华还有大量的间接投资—借款。这些借款很多名为实业借款，实际上是政治借款，是帝国主义操纵军阀政治的手段之一。详见本书各卷有关章节的叙述，本节不再详述。

(45) 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4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57页。

(47)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

(48) 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14页。

(49)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

(50) 《论上海丝厂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之办法》，《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1) 《颜惠庆闭幕词稿》（1924年9月15日），《全国实业会议筹备处呈》，1924年9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第172—174页。

(52)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论上海丝厂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之办法》，《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3) 曹鸿儒：《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三民学社1930年版，第180—181页。

(54) 《重庆总商会陈述全川兵祸请筹善后电》，《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1页。

(55) 《全国实业代表会议审查报告稿》（1924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888页。

(56)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84页。

(57) 《筹设商会统计案》，《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3—64页。

(59) 《中国工商业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

(60) 《华商纱厂联合会宣言》，《国闻周报》第4卷第19期。

(6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9页。

(62) 《欲恢复信用宜组织债务专律论》，《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63) 《为实业致吴季诚函》，《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

(6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7—188页。

(6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5页。

(66)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67)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6页。

(68)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304页。

(6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8—109页。

(70)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20—121页。

(7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7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73)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版。

(74)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7、171页。

(7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73、266、181页。

(7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254—255、220页。

(77)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46页。

(7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7页，《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72—73页。据另外的估计，1920年近代生产总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6.21%，近代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9.8%。（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目前尚缺乏1925年前后的统计数字，但有理由相信，其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较之1920年前后又有所增长。

(79)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0页。

(8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328页。据另外的估计，1920年农村的商品经济比例大致为38%左右。（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个估计包括粮食，如果不计粮食，则商品化程度为一半的估计大体可信。

(8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99页。

(82) 《商品陈列所撰中国棉业之状况调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60页。

(83) 《商品陈列所撰中国棉业之状况调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60页；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由于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进出口比价的原因，棉花在出口的同时，也有大量进口。1921年进口棉花达168万担。《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1296页。

(84)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81页。

(85)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86) 阿瓦林（苏联）：《帝国主义在满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09页。

(87)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96、198页。

(88)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第12页。

(89)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90)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9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11—215页。

(92)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39页。

(93)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94)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89页。

(9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85页。

(96)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50—153页。

(97)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98) 《我国工业原料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0号。

(99) 吉迪：《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100) 《1912—1918年各省区田赋情形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252页。

(10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577页。

(10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03) 《简鹤年等呈》（1920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104) 《山东省议会等通电》（1920年8月7日），《直皖战争》，第274页。

(105) 《京兆战后损失统计表》，《直皖战争》，第284—288页。

(106)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611页。

(10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108) 《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921年8月23日，第326页。

(109) 曹鸿儒：《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第86—87页。

(110) 《财政整理会暂编1925年度国家预算表》（1925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786页。

(111) 《1919年度国家预算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598—606页。

(112) 《国务院等通电》（1919年5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07页。

(113) 《民国财政史》，第13页。

(114)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78—192页。

(115) 《1920—1922年各省区厘税比额及实收数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486—1491页。此表1920年实收数1586万元系统计错误，实应为4583万元，此处据后数。

(116) 《民国财政史》，第10—12页。1918年中央财政除盐税以外的全部收入每月仅约72万元，每年不到1000万元，而1919年财政预算仅烟酒公卖、烟酒税、烟酒牌照税三种税收就列入3662万元。《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1919年度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

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78、600页。

(117) 《1912—1927年海常各关税收总数收支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338、1358页。据吴兆莘的研究，1917年—1926年，关税收入从6192万元增至11,927万元；同期关税收入总计为88,431万元，关余为5296万元，占收入总数的约6%；关余最多的1919年为2175万元，占收入总数的近30%。见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4—205页。杨荫溥所用数据与吴著相同，但他认为，由于北京政府发行内债时，“关余几尽数作抵”，“所以从1921年起，北洋政府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关余可收”（《民国财政史》，第7页）。这不过是统计方法的不同而已，因为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实际就是当年北京政府的收入。

(11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8页。据盐务稽核总所的统计，盐税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1918年—1926年间，盐税总收入为95,680万元；其中除1918、1920两年外，其余年份的收入均超过1亿元，最多的1926年已达12,276万元。《1912—1930年盐税收入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419—1425页。

(119)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80页。

(120) 《卢学溥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3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48页。

(12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40页。

(122) 《银行月刊》第一号，国内财经消息栏。

(12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124) 《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544页。

(125)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88页。

(126) 《李景铭报告》（1923年3月9日），《内国各银行垫款欠数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89、998—1000页。

(127)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1页。

(128) 《财政部整理内外债提案》（1923年7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189页。

(129)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40—242页。

(130) 《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章程》（1922年7月7日），《财政部财政整理会章程》（1923年8月10日），《临时执政交议整理财政案》（1925年2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9—269页。

(131)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2)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1986年版，第173页；《中国银行历年发行数额表》，《交通银行编历年兑换券流通额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2—555页。

(133)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4)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35)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6)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37)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8)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第114页。

(139)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40)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41)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6—67页。

(14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8、191页。

(143) 章乃器：《金融业之惩前毖后》，《银行周报》第16卷19号。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直鲁豫巡阅使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时期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奉天省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云南省政府档案，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蒋介石日记，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USA．

中文著作

《白坚武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李玉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 - 192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京出版社，1981

《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武汉出版社，1990

《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北洋军阀史论稿》，潘荣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北京，三联书店，1983

《北洋政府简史》，郭剑林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实甫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 - 1928）》，唐启华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卞白眉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委员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陈幹集》，陈隽、佟立容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陈炯明集》，段云章、倪俊明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陈炯明叛国史》，李睡仙、谢盛之、鲁直之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陈定炎编，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

《椿园载记》，罗章龙著，北京，三联书店，1984

《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帝国主义在满洲》，［苏］阿瓦林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第二次直奉大战记》，无聊子编，上海，共和书局，192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段祺瑞年谱》，胡晓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对华回忆录》，［日］东亚同盟会编，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美］迈克尔·谢勒著，徐泽荣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

《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自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奉系对外关系》，车维汉、朱虹、王秀华著，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奉系军阀密信》，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奉系纵横》，胡玉海著，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奉直战云录》，陈冠雄著，天津，新民意报社，1922

《福建财政史纲》，王孝泉编著，出版地不详，1936

《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稿本），彭昌鲁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革命文献》第51、52辑，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7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 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李培生著，广州艺苑印刷所，1921

《国父年谱》，罗家伦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9

《国民军史》，王宗华、刘曼荣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国民军史纲》，刘敬忠、田伯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胡适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胡政之文集》，王瑾、胡玫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湖南省宪法》，长沙，湖南省宪筹备处编印，1921

《湖南制宪报告书》，长沙，湖南省宪筹备处编印，1922

《湖南自治运动史》，王无为著，上海，泰东书局，1920

《护法运动史》，莫世祥著，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

《护法运动史料汇编》，汤锐祥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华盛顿会议小史》，周守一著，上海，中华书局，1923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金问泗等著，台北，文星书店，1962

《回忆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记者生活三十年》，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2005

《江南造船厂厂史》，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蒋百里传》，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1985

《蒋介石秘录》，古屋奎二编著，《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84

《今世中国实业通志》，吴承洛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近代稗海》，荣孟源、章伯锋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1987

《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徐勇著，北京，中华书局，2009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沈家五编，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5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陈志让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

《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何文辉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 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联省自治思潮研究》，谢从高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朋园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陈存恭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

《临城劫车案》，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出版地不详，1996

《临城劫车案纪事》，陈无我编，出版地不详，1923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1

《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北京，三联书店，1980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杜永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马君武文集》，莫世祥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玉贞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 - 1928）》，王立新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门户开放与中国》，李祥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秘笈录存》，天津历史博物馆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胡春惠著，台北，正中书局，1983

《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著，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凤岗及门弟子编，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

《民国时期的土匪》，［美］菲尔·比林斯利著，王贤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民国议会制度研究（1911 - 1924）》，薛恒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民国政党史》，谢彬著，上海学术研究会，1925

《民国政史拾遗》，刘以芳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直隶地方议会政治1912 - 1928》，刘建军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藕初五十自述》，穆湘玥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周开庆著，台北，京华书局，1967

《山东问题汇刊》，张一志著，上海，欧美同学会，1921

《山东问题始末》，谭天凯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吴沧海著，台北，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1972

《上海金融组织概要》，杨荫溥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海市机器工业史料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66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上海之工业》，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中华书局，1929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邵元冲日记》，王仰清、许映湖标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 - 1923》，严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双清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美］罗伯特·A·柯白著，殷钟崃、李惟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蒋中正著，南京，正中书局，1937

《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孙中山集外集》，王耿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986

《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叶遐庵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唐继尧评传》，谢本书著，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李家磷、郭鸿林、郑华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外交部编，北京，1923

《外蒙古撤治问题》，李毓澍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6

《外蒙主权归属交涉》，张启雄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

《王宠惠与中华民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伟大的开端》，李新、陈铁健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我的北洋军旅生涯》，李藻麟，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吴景濂与民初国会》，管美蓉著，台北“国史馆”，1995

《吴佩孚军略书牍全编》，上海，世界书局，1923

《吴佩孚先生集》，赵恒惕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吴佩孚研究》，唐锡彤、吴德运、蔡玉臻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吴佩孚传》，郭剑林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吴佩孚传》，陶菊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吴佩孚传》，章君穀，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1

《五四运动史》，彭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杨琥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徐世昌评传》，沈云龙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台北“国史馆”，2003 - 2006

《颜惠庆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叶遐庵先生年谱》，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编印，上海，1946

《“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张国淦文集》，杜春和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沈家五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张作霖》，常城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张作霖在东北》，［英］麦柯马克，毕万闻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浙江省宪研究》，林孝文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政海轶闻》，陶菊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直奉大秘密》，王小隐编，上海，中国第一书局，1922

《直皖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 - 1928）》，［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苏］贾比才等著，张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桢浩著，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苏］切列潘诺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国回忆录》，［苏］达林著，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卓遵宏著，台北“国史馆”，198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许道夫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章有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徐义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军事航空》，马毓福著，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

《中国棉纺织史稿》，严中平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 - 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张朋园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曹鸿儒著，南京，三民学社，1930

《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杨玉圣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商业史》，陈灿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中国输入、输出贸易指数表》，工商部编，北京，1928

《中国税制史》，吴兆莘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外交史》，傅启学，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3

《中国外交史（1911 - 1949）》，吴东之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彭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龚骏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中国议会史》，顾敦鍒著，台中，东海大学，196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中国政府》，陈之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中国政坛上的桂系》，［加］戴安娜·拉里著，陈仲丹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吴承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法统递嬗史》，王景濂、唐乃霈著，出版地不详，1922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编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4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0－1924），台北“国史馆”，1980－198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中华民国外交史》，张忠绂著，上海，正中书局，1945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程道德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宪法史》，吴宗慈著，上海，东方印刷局，1924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美关系史》，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

《中苏关系（1917－1926）》，李嘉谷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薛衔天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中苏外交的序幕》，王聿均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公直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刘彦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社编印，1922

中文报纸

《晨报》，北京

《大公报》，天津、长沙

《华北新闻》，天津

《华字日报》，香港

《京报》，北京

《民国日报》，上海、广州

《民信日刊》，上海

《南方周末》，广州

《群强报》，北京

《申报》，上海

《时报》，上海

《顺天时报》，北京

《团结报》，北京

《新闻报》，上海

《益世报》，北京

中文期刊

《百年潮》，北京

《北京档案史料》，北京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北京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

《东方杂志》，上海

《工商半月刊》，上海

《国会议员通讯》，北京

《国闻周报》，上海

《湖南筹备自治周刊》，长沙

《湖南文献》，台北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上海

《解放与改造》，北京

《建设》，上海

《近代史研究》，北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军政府公报》，广州

《历史档案》，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

《努力周报》，北京

《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

《少年中国》，上海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四川文献》，台北

《太平洋》，上海

《外交公报》，北京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贵阳

《先驱》，上海

《向导》，上海

《新青年》，上海

《新史学》，台北

《银行月刊》，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云南档案史料》，昆明

《政府公报》，北京

《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

《传记文学》，台北

英文著作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din，X．J．，North，Robert C．，*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Stanford，1957

Macleay，R．*China Annual Report*，1921

Whiting，Allen S．，*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New York，1954

Willoughby，W．W．，*China at the Conference：A Report*，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22

Wou，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Canberra，1978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格辽夫（А．Ф．Агарёв）

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

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

B

巴意开斯　见裴克斯

白坚武

白宝山

坂西利八郎

包惠僧

宝德全

鲍贵卿

鲍罗廷

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

贝　尔（Edward Bell）

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币原喜重郎

边守靖

卞白眉

卞月庭

C

蔡成勋

蔡和森

蔡巨猷

蔡廷幹

蔡元培

曹　锟

曹　锐

曹　锳

曹汝霖

曹士杰

曹铁林

曹仲珊　见曹锟

岑春煊

常德盛

常荫槐

车庆云

陈　策

陈　幹

陈　箓

陈　毅

陈炳焜

陈调元

陈独秀

陈公博

陈光远

陈广平

陈国栋

陈国志

陈鸿钧

陈嘉谟

陈嘉勋

陈嘉佑

陈竞存　见陈炯明

陈炯光

陈炯明

陈觉民

陈乐山

陈能芳

陈树藩

陈树人

陈潭秋

陈为人

陈文运

陈席儒

陈友仁

程　克

程　潜

褚辅成

D

达　林（С．А．Далин）

达夫谦（Я．Х．Давтян）

戴季陶

但懋辛

邓　铿

邓宝珊

邓恩铭

邓汉祥

邓晋康　见邓锡侯

邓泰中

邓锡侯

邓演达

邓泽如

邓中夏

邓仲元　见邓铿

刁作谦

丁宝成

丁宏荃

丁惟汾

丁文江

丁香林

丁燮林

董　康

董必武

董维健

董政国

杜锡珪

段合肥　见段祺瑞

段祺瑞

段芝贵

段芝泉　见段祺瑞

E

恩　琴（О．И．Угерн）

F

樊钟秀

范石生

范毓灵

范源濂

范振绪

方本仁

方声涛

费行简

冯　沄

冯德麟

冯国璋

冯焕章　见冯玉祥

冯玉荣

冯玉祥

伏日涅新斯基（A．H．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符礼德（Batalha de Freitas）

傅乐猷（Aime Joseph de Fleuriau）

G

冈野增次郎

高　斌

高恩洪

高洪魁

高君宇

高凌霨

葛树屏

宫邦铎

龚汉治

古应芬

谷日光

谷正伦

谷钟秀

顾品珍

顾维钧

郭　赫

郭　坚

郭　乐

郭松龄

H

哈　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

哈汉章

韩国钧

韩麟春

何丰林

何锋钰

何国亮

何厚光

何孟雄

何佩瑢

何叔衡

何应钦

何宗莲

贺耀组

洪湘臣　见洪兆麟

洪兆麟

胡　霖

胡　适

胡鄂公

胡汉民

胡景翼

胡笠僧　见胡景翼

胡念先

胡若愚

胡政之　见胡霖

黄　爱

黄　郛

黄大伟

黄殿臣

黄绍竑

黄申芗

黄士衡

黄炎培

黄志恒

霍尔瓦特（Д．Л．Хорват）

J

吉田茂

吉田显作

吉田伊三郎

汲金纯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

加里宁（М．И．Калинин）

加米涅夫（О．Д．Каменев）

加藤高明

加藤友三郎

贾德耀

贾青云

姜登选

姜桂题

蒋方震

蒋鸿遇

蒋介石

蒋梦麟

蒋雁行

蒋尊簋

蒋作宾

焦易堂

颉　见企德

金汉鼎

金晓峰　见金永炎

金永炎

靳云鹗

靳云鹏

瞿秋白

K

康纳尔（Cornell）

康有为

孔　庚

孔繁锦

孔祥熙

库达摄夫（Р．А．Кудашев）

L

赖世璜

赖心辉

兰德尔

蓝浦森（Miles Lampsen）

老洋人

黎黄陂　见黎元洪

黎元洪

李　纯

李　达

李　垣

李炳之

李大钊

李福林

李根源

李根沄

李汉俊

李厚基

李虎臣

李济臣

李济深

李继桢

李剑农

李景林

李烈钧

李麟阁

李梦庚

李明盛

李明扬

李铭钟

李求实

李少白　见李梦庚

李生春

李盛铎

李石曾

李士伟

李守常　见李大钊

李爽垲

李思浩

李四光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李希尚

李彦青

李雁宾

李易标

李友勋

李煜瀛

李藻麟

李震瀛

李宗仁

利奥尼德夫（Леонидов）

梁朝栋

梁鸿楷

梁启超

梁如浩

梁上栋

梁士诒

廖仲恺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虎

林　森

林葆怿

林俊廷

林弥三吉

林祥谦

林育南

林拯民

林正煊

林支宇

林直勉

铃木贞一

刘　骥

刘　湘

刘成勋

刘成禺

刘承恩

刘楚湘

刘存厚

刘恩源

刘富有

刘冠雄

刘镜人

刘揆一

刘仁静

刘文辉

刘显世

刘以芬

刘永胜

刘禹九　见刘成勋

刘郁芬

刘震寰

刘镇华

刘志陆

刘祖武

刘佐龙

柳　金（Рюкин）

龙济光

卢　焘

卢金山

卢香亭

卢筱嘉

卢永祥

卢子嘉　见卢永祥

鲁涤平

陆　锦

陆洪涛

陆荣廷

陆锈山　见陆锦

陆徵祥

鹿钟麟

吕　超

吕公望

吕宓筹

罗文幹

罗章龙

洛斯门（Joseph Rothman）

M

麻克类（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

马　济

马　良

马　林

马　素

马葆珩

马伯援

马格斯　见马克思

马君武

马慕瑞（MacMurray John Van Antwerp）

马克思（Karl Marx）

马联甲

马玉仁

马育航

麦喀士　见马克思

曼　德

毛泽东

孟昭月

米振标

莫　雄

莫荣新

穆藕初

N

内田康哉

尼科尔斯基（В．А．Никольский）

倪嗣冲

聂宪藩

聂云台

宁　武

钮永建

O

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dijk）

P

潘　复

潘国纲

潘鸿钧

庞人铨

裴克斯

彭　璜

彭　湃

彭程万

彭寿莘

彭允彝

彭兆璜

皮宗石

普来德

溥　仪

Q

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

齐燮元

齐耀琳

齐耀珊

企　德

钱能训

钱少卿

钱新之

乔巴山

丘渭南

仇　鳌

曲同丰

屈映光

R

任可澄

荣德生

荣宗敬

芮德克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S

萨镇冰

山梨半造

邵恒濬

邵瑞彭

绍　英

沈鸿烈

沈鸿英

沈荣光

沈瑞麟

施　洋

施肇基

石青阳

石陶钧

史纪常

史文彬

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斯托莫尼亚科夫（ТБ．С．Стомоняков）

寺西秀武

松室孝良

宋鹤庚

宋焕章

宋庆龄

宋毅夫

宋哲元

宋子扬

苏赫巴托尔

孙　科

孙　见孙中山

孙　曜

孙　岳

孙宝琦

孙传芳

孙丹林

孙多钰

孙光廷

孙桂枝

孙洪伊

孙良诚

孙烈臣

孙美瑶

孙美珠

孙祥夫

孙馨远　见孙传芳

孙逸仙　见孙中山

孙振家

孙中山

孙宗先

索科洛夫（К．Н．Соколов Страков）

T

谭浩明

谭平山

谭延闿

汤尔和

汤廷光

汤芗铭

汤玉麟

唐德昌

唐继尧

唐继虞

唐少川　见唐绍仪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式遵

唐在礼

陶治平

田颂尧

田文烈

田中玉

田钟谷

土肥原贤二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汪大燮

汪精卫

王　赓

王　瑚

王　普

王　乔

王伯群

王承斌

王宠惠

王都庆

王广宇

王怀庆

王家襄

王尽美

王克敏

王兰亭　见王毓芝

王亮畴　见王宠惠

王乃斌

王汝勤

王瑞俊　见王尽美

王士珍

王世杰

王叔鲁　见王克敏

王孰闻

王天龄

王天培

王廷祯

王维城

王文华

王献臣

王孝伯　见王承斌

王永江

王永泉

王毓祥

王毓芝

王占元

王正廷

王郅隆

危文绣

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

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В．Д．Виле-нский Сибиряков）

魏邦平

温世霖

温世珍

温树德

温宗尧

翁式亮

吴光新

吴笈孙

吴剑学

吴景濂

吴俊陞

吴佩孚

吴铁城

吴廷康　见维经斯基

吴新田

吴学显

吴雨铭

吴玉章

吴毓麟

吴子玉　见吴佩孚

伍朝枢

伍廷芳

X

夏　超

夏斗寅

夏寿康

向绍轩

项　英

项德龙　见项英

萧珩珊　见萧耀南

萧耀南

小幡酉吉

谢　持

谢国光

谢鸿勋

谢米诺夫（Г．М．Семёнов）

谢铁良

谢无量

谢英伯

谢远涵

谢宗陶

邢士廉

熊　斌

熊　略

熊炳琦

熊克武

熊润丞　见熊炳琦

熊希龄

休　斯（Charles Evans Hughes）

徐　谦

徐国樑

徐诺微夫　见季诺维也夫

徐绍祯

徐世昌

徐世章

徐树铮

许白昊

许崇清

许崇智

许兰洲

薛之珩

Y

阎锡山

阎相文

颜惠庆

杨　古

杨　晋

杨　森

杨　松

杨池生

杨德甫

杨化昭

杨坤如

杨清臣

杨庆鋆

杨善德

杨树庄

杨庶堪

杨希闵

杨仙逸

杨以德

杨益谦

杨宇霆

杨毓洵

杨毓珣

杨增新

杨子惠　见杨森

姚　震

姚雨平

叶　举

叶　荃

叶恭绰

叶开鑫

叶夏声

荫　昌

尹　骥

优　林（И．Л．Юрин）

于右任

余范传

余际唐

余日章

宇垣一成

袁大时

袁化南

袁金铠

袁乃宽

袁世凯

袁祖铭

越　飞

Z

载　沣

臧式毅

臧致平

曾毓隽

翟尔士

张　冲

张　弧

张　继

张　謇

张　林

张　琴

张　见老洋人

张　勋

张　贞

张伯烈

张方严

张福来

张光炜

张国焘

张国淦

张国庆

张国熔

张国信

张厚生

张怀芝

张嘉璈

张瑾雯

张景惠

张敬尧

张敬舆　见张绍曾

张君劢

张开儒

张克瑶

张昆弟

张培荣

张其锽

张绍曾

张树声

张斯麐

张太雷

张特立　见张国焘

张廷谔

张廷献　见老洋人

张维玺

张文生

张文通

张锡元

张学良

张亚东

张耀曾

张一麐

张英华

张雨亭　见张作霖

张月笙　见张英华

张载阳

张之江

张志潭

张治公

张子衡　见张福来

张梓芳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章士钊

章太炎

章宗祥

赵　杰

赵　倜

赵德朝

赵尔巽

赵恒惕

赵继贤

赵铁桥

赵炎武　见赵恒惕

赵又新

赵玉珂

赵正印

郑殿陞

郑林皋

郑士琦

钟景棠

周凤歧

周佛海

周鲠生

周孟容

周西成

周荫人

周钟岳

周自齐

朱尔典（John Jordan）

朱培德

朱庆澜

朱耀华

朱兆熊

朱执信

诸葛亮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卓伟民

邹　芬

邹　鲁

---

(1)　人名索引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五卷
(1924—1926)

罗志田 杨天宏 冯筱才 何艳艳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五卷

（1924-1926）

罗志田　杨天宏　冯筱才　何艳艳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黎澍先生曾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些方面追随“国民党观点”，表现为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1)]。实际上，追随“国民党观点”这一倾向在西方也多少存在（未必是有意的），在其民国史研究中尤其明显[(2)]。更广义地看，也许是受到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也可能是受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都相对更注重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简单一笔带过，或竟视而不见[(3)]。

这样一种研究倾向形成思维定式后，即使是最注重史料和讲究“客观”的史家，无意中受此影响，其重建出的史实反可能距原状更远。本卷的研究和撰写，特别注意到黎先生上述睿见，希望能对类似的“国民党影响”稍有突破；在布局上较既存研究更多论及北方的军政演变，特别是北洋体系文与武两方面的内在变化。整体而言，本卷重点梳理北伐前数年中国政治军事的变化，其核心内容是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而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与五卅事件为中转。

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当时大多数关注政治的中国人来说，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北南即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这也是那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然而，不少关于这一时段的既存中外研究，却较多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仿佛20世纪20年代一直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力量在进行斗争。实际上，国民革命运动内部的国民党派系之争和国共之间的斗争，只是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后才引起外间关注，到1927年武汉与南昌及南京的对峙明显后逐渐广为人知；此前既

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引起时人的充分注意。

只有对北洋和国民党（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双方的心态、观念、行为及其互动有比较深入而接近原状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转折有更为清晰的了解。而且，对失败的北洋军阀一方作深入的考察，予其以发言权，反可以对北伐如何发生、国民党何以能在短期内以弱胜强等问题得到更接近原状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历史上政治竞争的胜败是治史者研究和论述的对象，而不是其历史叙述的取舍标准；胜者固以其取胜而赢得在历史叙述中的一席之地，败者却不必因其败落而失去其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

因此，本卷的论述乃从当时的北京政治运作入手。在军人当政的时代，行政的变化、文武之间的关系及各类党派团体的具体政治活动，我们过去的通史相对较忽略；尤其是当年议会之中的政争，论者或以其“肮脏”、或以其受军人控制而无关大局，较少深入认真的探讨。然而马君武在北伐后感觉到：“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4)] 这类当事人的后见之明固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即针对国民党的新型政治模式而反思过去，仍值得后之研究者深省。本卷特设“北京政治”一章，以较多的篇幅论述时人关心的法统、政制以及国会的演化，惜对行政一方各部会实际怎样“执政”这一大领域几未涉及，将来仍需继续探讨。

不过，本书毕竟是断代通史的一卷[(5)]，且多少带有“一家之言”的意味，至少许多技术性的考虑应遵循总主编李新先生的设想。这样，对于这段历史不可不述的“国共合作”这一内容，本卷注意到也为李新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之《国民革命的兴起》一卷已用了八万字的篇幅论述同一主题[(6)]。因两书主编同为一人，凡与该卷见解相近的内容，本卷皆简略出之；而更多利用后出的原始资料，尽量多从国共两方面而不是从共产党一方面去考察，同时

较多侧重苏俄带来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对中国政治的整体影响。

如果说1924年至1926年见证了北洋体系的崩溃和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这一南北军政格局大转折，第二次直奉战争就体现了北方局势的逆转。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动员的兵力是此前战争的数倍，而实际伤亡数量则达数十倍；在作战的方式上，从兵员、装备的运输、使用武器的种类到战术的运用，都呈现明显的“现代化”，特别是海、空军实际参与作战的程度为前所未有。但是，正因战争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这些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这对掌握着全国和多数地方政权的北洋体系非常不利。

假若大规模战争的结果是一方取胜，预示着此后的相对安宁，则主政者或可为战争的正当性申辩，而民众虽勉强然尚可能接受这一代价。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确可以视为北方进行武力统一的最后一次尝试，却未能产生出一个明确的赢家，这就意味着战乱的延长并且可能进一步扩大，其自然的后果便是民心的不稳。吴佩孚督师北京之时，黄节曾赋《甲子中秋》一诗：“云意深阴失月明，始知兵气满秋城。十年北客唯伤乱，双柝南街不断声。”[(7)] 诗中实际描绘和隐喻兼具，表明士人已因当下致乱的“兵气”反思到十年来京城的不安宁，中央政府渐失其应有的权威，中国政治权势的空缺日益明显。

北方武力统一的失败提示出南北和平统一的可能，1925年的“善后会议”正可视为朝着这一方向的努力。以前对“善后会议”的研究明显受到后来国民党观念的影响（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其预设的负面评判常先于研究的结果，述及此事往往简单带过，认真具体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视其为南北和平统一的最后一次努力，则“评判”或会不同。盖后之北伐不论具有多强的政治正当性，大型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终属“生灵涂炭”。史家固不能自诩其所述为“千秋定评”，总宜多以其研究时段的人民为念，至少当尽量再现和平的可能性及各方为此付出的努力。

本卷第二章对“善后会议”的论述已可见对既存研究模式的明显突破，但仍有不少可以深入发掘的余地。重要的是，善后会议所包容的政治力量越广泛，对时任执政的段祺瑞就越有利，故其希望会议成功的动机及其为此做出的让步，似均超出既存的认知。而孙中山以病危之躯携国民党众多要员长途跋涉，当然也不会仅仅为了“揭露”北京政府的缺乏诚意，实具有为人民争安宁的苦心。从现存阎锡山档案的大量文献看，当时段、孙妥协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忽然弃世，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一些人的个人态度也不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终使这一和平努力未获成功。

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凸显出北洋体系在收拾政局方面已呈技穷之相，也使时人感觉到北京政府统治正当性的丧失[(8)]。在政治局势逆转的同时，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一个组成部分，外国在华势力的构成也发生了激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中方废除，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已经运作多年的“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实际上，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也确实推行着相对独立的中国政策，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9)]。

1921年5月，德国与中国在战后签订了平等的《中德协约》，这虽仅临时协定而非正式条约，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首个平等条约，也是中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的一次。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两个条约都是通过基本平等的谈判所缔结，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德、苏两大国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以及苏联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

由于条约性质的关系，德、苏两国在北京外交使团中的地位已与

前不同。更具象征性的是，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且因苏联派驻的是大使，而其他国家皆公使，理论上苏联应为外交使团首领。这样，驻华外交使团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已很难继续。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不复为一个整体，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两政府努力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不过，当年中苏条约的谈判进程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苏俄代表加拉罕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违背国际外交谈判常规的口号，却相当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进行外交谈判[(10)]。因此，中苏谈判不仅是一次外交活动，谈判进行中各方面的社会反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激进化已走得相当远，这样的世风必然影响到此后的政治运作。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上海的五卅事件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的规模，从参与的人数、波及的地域和持续的时间等方面看，都是前所未有。但更重要的新事物也许是运动的方式，即政党组织正式参与，既“发动群众”，更在运动进行中实际维持参与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以保障运动的进行[(11)]。同时，这一事件和运动所牵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外交涉及其对中国内部政治的影响都极为广泛，既可见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迸发，也可见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性运用，而中外交涉的成败又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政治的演变。

梁启超当时就指出：“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了）。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12)] 当时人所说的“共产党”，含义并不精确，

常常是包括（或根本就是指）左派国民党人及苏俄在华的影响。张君劢和蒋百里等，在民族矛盾与其本派势力及观念发生冲突时，显然更多顾及其利益与观念，而梁启超作为一国之士，却不能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

当时反对联俄的章太炎，其心态和见解与梁启超相近，他在给黄郛的信中说，“（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斯固大谬。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以争取交涉的胜利。他最担心的，一是“当局藉交涉为延寿之计，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13)]；二是“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由于整个事件中上下未能一致，中外交涉进展不大，“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真可恼亦可丑也”[(14)]。

章、梁两人都感到说不出口的“气人”和“可恼”之处，即明知五卅事件引起的群众运动中有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努力，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因此运动而得势，但作为“国士”，在中外矛盾之前只有义不容辞地站在祖国一边说话，结果等于间接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至为复杂，章太炎最不欣赏的“赤俄”同样希望将中国的反帝运动引向“专对英人”的方向，故太炎对中外“赤化”力量的无意识支持恐怕超出其所认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已看出，若对外交涉不成功，“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亦即中外矛盾的缓解或激化都可能引起中国内部政争的不同变化。

北京政府在对外交涉方面的无力表现再次凸显了其难以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给试图填补权势空缺的各政治派别提供了机会。本来中国民族主义就有对外抗议和民族国家建构的两面性，一旦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新兴的群众运动方式相结合（这一结合可以是但不必是人为推动的），又恰遇上前述中国政治权势的明显空缺，三个因素的关联互动，将使中国政治运作方式产生极大的改变。而中国政治运作的

变化本由从苏俄传承了政治动员和组织方式的国共两党所推动，它们显然表现出比北方更能适应变化了并仍在继续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情势。

这一发展趋势要稍后才变得明显，像梁启超那样能看到外交对内部政治影响的人尚少，更多的人此时看到也更关注的还是怎样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国共两党认为五卅事件的根源在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整体上确如章太炎所说，“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一向被认为不怎么反帝的胡适就提出，应“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一要求不仅是“极正当的”，“在理论上事实上”也都有必要，应尽快落实之。他认为全面修约不仅“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这部分因为“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是赞成的了”[(15)]。

胡适提到俄国恐怕是一种惯性思维，因为中苏条约一年前已经签订，此时“赞成”中国修订与他国之约正是苏俄反帝主张的一部分，然他表述的口吻则说明苏联政策和宣传的成功仍在继续。美国方面在五卅事件后确实有新表现，美国在华各教会团体及燕京大学全体教授都发表声明，指出解决中外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在美国国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Borah）于6月正式声明赞成尽快撤销治外法权。以传教士和教授为主的三百多在华美国人以署名电报和信函支持波拉，而汉口美国商会则对其声明提出抗议。波拉的反应是指出在华美国商会本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部分”，正是“目前中国动乱的真正原因之一”[(16)]。

可以看出，此时中国朝野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外关系的思考与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中外关系中存在不平等成分并表示愿意修订之，但各国之间以及各国政府内部对怎样修订及修订的限度等仍存较大的歧异。中国各政治力量及舆论界思想界对同类问题的观念歧异也不稍减，各方的共识大体上仅达到章太炎所说的“反

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至于怎样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则言人人殊。而中苏谈判时已出现的“国民外交”势头仍在增强，各社会团体和政治力量在中外关系方面的“参与意识”空前高涨。具体的中外交涉正是在这样纷歧的中外观念竞争下展开，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外交[(17)]。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列强于1925年9月照会中国政府，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治外法权”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挑战的严重性显然超过关税的不平等，当时中国朝野却相对更重视牵涉到直接和实际利益的关税会议；而列强明显更愿意在关税方面做出让步，对于治外法权的放弃则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双方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相同，其所重视的方面却截然相反。从10月到12月，关税会议通过以裁除厘金为条件给中国以关税自主后休会。次年2月复会讨论具体事宜仅一个多月，段祺瑞政府即被推翻，与其有关系的中国代表大半逃往租界，会议实际中止。后来虽有复会的尝试，但列强间并不能就具体条款达成一致，中国关税自主仍悬而未决[(18)]。

1926年1月召开的法权会议面临着更为动荡的中国政局，而各国的态度也明显更消极，只有美国比较认真，向会议提交了482项涉及美国在华权益的案例，英国只提出了很少的案例，日本则根本没有提交任何具体案例。会议决定5月间到中国各地调查司法情形，实际上调查委员们尚未出发，美国代表史注恩（Silas Strawn）已于4月16日基本根据美国的材料起草了一份报告纲要，后来委员会的决议报告即按此纲要写出，一向对外交条款斤斤计较的英、日外交官并未提出多少修改意见。报告更多是关于中国改革现状的建议，以此为列强取消治外法权的前提[(19)]。

两次会议虽然未能产生实际的结果，却揭示了列强之间的明显歧异，从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以来西方列强间合作共同对付中国的局面已被打破。同时，中国内政的不稳定也是导致会议流产的重要因

素，顾维钧稍后指出："对外交涉，固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言可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例如关税会议，各方久愿观成，迄今尚难就绪。推厥原因，无非借口于政局无常，号令不一之故。维钧口虽博辩，心实怀疑。"[20] 顾氏自己也"心实怀疑"一点尤其说明当时谈判的难度，中国之外交官恐怕也只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继续努力而已。

从中苏条约、五卅事件到关税、法权会议，处处可见内政与外力的纠结与互动，最能体现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方的联俄及此后的南北之争，皆与此关联密切。本卷最后一章的写法与前几章不甚同，它带有一些总结的意味，又不全是总结，既要叙述不少前面未曾述及的内容，又不时涉及前面各章已有所陈述的内容。不过后者不是"重复"，而更多类似章学诚所说的"互见"；前后所述不仅详略不同，有时所持见解也未必一致（对此后面还要论及）。

大体而言，1924年至1926年间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类似趋向也体现在北洋体系演化的地缘分布之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吴佩孚稍后复出，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段祺瑞虽出山，皖系也未能再起；北洋体系中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渐成政治军事的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其实先已奠定。

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反赤"旗帜之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与此同时，南方的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

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开启了蒋介石时代，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亲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

当时广东的权势竞争固然包括过去较重视的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而各类“土客矛盾”更相当严重，从英、俄两国到众多“客军”等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彼此相互缠斗，复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成分竞争，地方意识和国际冲突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至为错综复杂。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但权势争夺的表述却往往回避实质性内容，而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是为当日政治运作的特色。

从地缘角度看，唐生智武装盘踞湘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复与湘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对久乱思安定的中国社会颇具吸引力。适逢北京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失道”现象，反衬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遂为后来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以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我们对20世纪20年代人与事（特别是人）的认识仍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最多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尤其一般老百姓在干什么及关心什么）、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都还相当不足。

当时的社会变迁、集体心态和思想、学术等方面的演变，其实都与政治活动关系密切。民国前期政治参与者的更易，即商人和边缘知识青年在政治活动中的兴起，显然是以社会演变为基础的；而苏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的引进所带动的政治运作方式的变化，尤为醒目。这

些均为影响此后许多年中国政治行为的要素，也是理解国民革命何以能够得到支持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得到多少支持的重要面相。不过，为了不与整个《中华民国史》的体例和论述重心疏离，本卷对这些因素基本略过，偶有述及，也仅点到为止[21]。

就是在相对狭义的政治层面，本卷也有未写到或虽写而尚可进一步论述的部分。如联省自治运动以来地方意识的进一步兴起（北伐前“保境安民”口号的蜂起与此直接相关），就提示出中国政治的区域化走向，与希望统一的强烈社会要求相辅相成，到北伐之后一段时间仍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另外，对于当时试图填补政治权势空缺的各政治力量的努力，如影响较大的国家主义派和其他较小党派向往权力核心的活动，本卷也基本未能涉及。甚或郭松龄反奉这样影响重大的事件以及广州国民政府镇压商团的活动，所论也远不够详尽。

昔章太炎论著史说，读“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问题在于，“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22]。这真是卓见！历史上“事”的重要与否本不取决于其“大小”，且什么事“重要”，甚至事的“大小”本身，也都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的人，其眼中的大小轻重，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同代的研究者，其视野中研究对象的大小轻重，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所以至少相对而言，纪事愈多，则愈能兼顾事的大小轻重。本卷纪事或有明显的“遗漏”，这是必须向读者致歉的。

出现这样的情形，部分由于本卷是集体写作，各章作者对“通史”的写法显然有着自身的理解，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是否对其进行整合性的“通稿”，颇费斟酌。盖各章文风固异，识见亦深浅不一；若要“统一”，是“就高”还是“就低”？前者或势有所不能，后者恐情有所不甘。且本书不过是阶段性的研究结果，原不奢望为这段历史下定论。根本是盖棺也难论定，历史事件可以有边界有始终，而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述则似无涯之旅，惟期于茫无垠际间渐入佳境而已[23]。故

只要不涉及与史实相关的重要冲突，编者对各章陈述，基本不作大的处理。好在读者既知此为集体著作，则各有其特色反体现出史学表述的多样化。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通论性著作的撰写应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但20世纪中国新史学则可见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现象，即通史常领先于专题论著[24]。在新学术典范草创的初期，出现这样的现象可以理解；以后当如何做，似乎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答案问题。就像穷尽史料几乎不可能一样[25]，先完成“所有”的具体人物、事件的研究再进行通论性陈述固然显得更理想，在操作上实不可能；但如果没有相当数量具体研究的积累，便贸然进入通史的写作，一般人恐怕也难有所成。

我的想法，通史著作与一般专著和论文都不同，要尽可能充分容纳既存的学术成果，但又不能止于仅仅整合既存研究，因为它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性的工作，应当言人所未言，针对学界忽视或重视不足的面相写出研究者自身的见解，以补充、推进和发展现有的学术见解。对具体人物事件的表述，通史应尽可能铺陈那些基本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内容，但也不妨提出一些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思路，为有兴趣的读者或潜在的后之研究者提供思考的余地。

另一方面，通史的写作更要为读者考虑。陈训正以为，“纪事之作，要以文不亡质、朴不失陋为贵”。史作“为行远计，不可入俚语；为通俗计，不可使奥辞”[26]。这是针对非专业读者的美意，但从研究的角度言，若所及对象本身或常用俚语（如民众生活史或像元代这样的特定时段）、或习于奥辞（如治经学、小学及思想史、学术史），则回避俚语、奥辞的结果似可能造成后之史著与所述时代之人、事的疏离。故陈寅恪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27]。

为忠实于往昔之人与事，当尽量接近历史原状；但为读者特别是

后之读者计，又应争取超越撰史者所处之当世。今人不能离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必须强调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同时，任何著作都不能避免所处时代的印记，若放眼未来，多为后之读者着想，又似应从主观层面尽量争取少受研究者时代学术观念的束缚；比较理想的是在充分整合既存成就的基础上写出具有“跨时代”意味的历史叙述，以延长史书本身的生命力。这或者即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

本卷的作者是：前言、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为罗志田，第一至第三章、第五章第三至第五节、第六章为杨天宏，第四章冯筱才，第五章第二节为何艳艳。

本卷的前期编务，从章节设计到联络作者，我个人参与较多。此后的联络、推动工作，包括不少文稿的审订修改，则基本由汪朝光先生一手操办。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章节的写作迁延时日，此时撰写序言，颇感分寸较难把握：因为是集体合作，且个人在其中所占比重不甚大，自不能不代言各作者之成绩，似不应太过谦退；然自己毕竟是参与者，且比本卷多数作者参与时间更长，又不宜有较多的“豪言壮语”。上面若有“大言不惭”之处，敬祈见谅；所述若有违各作者之原意，自然由我负责。各位作者皆受到不少学术机构和学人的鼎力相助，谨申谢忱！至于具体的机构和学人，则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各作者在其所撰章节中业已鸣谢。

我可以说的是，每一位撰写者皆相当认真努力，但每一特定章节都不过是阶段性的尝试结果，不仅资料远未能穷尽，国外的相关论述参考明显不足，就是海峡两岸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我写此序言时已看到，也未及吸纳（本卷大部分章节完成较早，本次出版时未及再改），可以说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本卷若能真正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推动学界对这一重要转折性历史时段的关注和研究兴趣，相信参与者都会感到欣慰。

2010年10月谨序

---

(1) 黎先生的原话是："不充分地研究材料，人云亦云，国民党反对立宪派，也跟着反对立宪派，以领袖划线，以党派划线，不从历史实际出发。"引自耿云志：《回忆黎澍同志》，收入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2) 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3) 中国史学中早有不以政治竞争的胜负为叙述之取舍标准的传统，观司马迁对"灭秦"这一政治鼎革中陈涉、项羽和刘邦的处置，可知他在承认竞争结果的同时，更重视的是历史进程中各参与者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4) 马氏进而提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补充说，民初贿选，至少还看重和承认议员"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参见《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29年4月26日，第5册，第402-403页。

(5) 在章学诚看来，"通史"就是区别于断代史的。这里所谓"断代通史"，更多是区别于"专著"意义而言的通论性史著。

(6) 参见李新主编、萧超然等编著：《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7) 黄节：《甲子中秋》，转引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8页。

(8)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本卷第七章。

(9) 参见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20-21；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John Wiley，2nd ed．，1980，pp．105-107．

(10) 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二节。

(11) 从社会史角度重建各类“群众”怎样被动员，他们如何“运动”，特别是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平日的生活及具体活动等，似尚未见令人满意的研究。窦红玉的未刊论文稍微涉及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参见其《上海民众在五卅运动中的具体活动述略》，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3年5月。

(12)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5年7月10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8页。

(13) 章太炎致黄郛，1925年7月3日，收入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上册，第232-233页。并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26-227页。

(1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778-779、794-795、808-811页。

(15) 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胡适全集》（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16) 参见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p．20-28，68-94；Warren I．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121-131；Marian C．McKenna，*Borah*，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1，pp．233- 234．

(17) 曾在欧洲长期受教的国际法专家周鲠生，后来正式提出不按既存外交规则行事的“革命外交”口号，主张“利用民众势力”，以“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为外交的“要诀”，认为“流氓的方法，实在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政府最有效的外交方法”（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11页），大致即是这一趋势的自然发展。

(18) 参见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chapter 6；Thomas Etzold，“In Search of Sovereignty：The Unequal Treat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25-1930”，in F．Gilbert Chan and Etzold，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New Viewpoints，1967，pp．176-231．

(19) 参见Strawn to Kellogg，May 12，1926，the John V．A．MacMurray Papers，the Seeley G．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2，p．112；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 ，chapter 8．

(20) 顾维钧致张作霖等电报，1926年11月9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卷，第386页。

(21) 本卷的最初设计包括稍多思想、社会、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内容，但李新先生在1996年面示：本书只写政治，其余留给别的专史去论述。我的理解，李新先生所说的“政治”不是从文化、社会、思想、行为等视角进行观察的广义政治，乃将相关的五章尽行删去，今后或当以专书形式陈述之。

(22)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陈平原选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梁启超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关注大事，盖“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故纪事本末体“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34页。

(23) 章开沅先生多次说过：“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见《章开沅学术论著选·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4) 参见罗志田为其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所写的《编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这样一种由通向专的发展趋向在该卷的《史学学术编年》中可以清楚看到。

(25) 唐以前的古代史或能相对地“囊括”所有史料，宋以后到近现代史则少有人敢作此想。当然确有人不仅敢想，而且敢说，或不过体现其胆量过人而已。

(26)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第3页。

(27) 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第一节　变动不居的中央政相
　　一　中央政府及政制的更迭
　　二　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
　第二节　国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消亡
　　一　贿选之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及运作状况
　　二　实力派的政治决断与国会议员的抗争
　　三　民初国会制度消亡的政治语境
　第三节　直奉战后政治格局的变化
　　一　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二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三　外交与内政混一政治格局的形成
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一节　善后会议的由来及各方的立场
　　一　直奉战争“善后”问题的提出
　　二　实力派的态度及社会各方的立场
　　三　国民党方面欲迎还拒的姿态
　第二节　善后会议的召开
　　一　善后会议的筹备工作
　　二　善后会议正式召开及通过的主要议案
　　三　联治派在善后会议中的活动
　第三节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
　　一　善后会议面临的困境及最后结局
　　二　国民会议运动
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

第一节　国共合作局面的成立
一　“联俄”与“容共”实际步伐的迈出
二　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开展
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节　初期的国共合作与冲突
一　初期的国共合作
二　国共两党矛盾冲突的逐渐公开化
三　国民党组织的正式分裂
第三节　蒋介石政治立场明朗化及中共的反应
一　中山舰事件及其善后处置
二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三　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一节　五卅事件的发生
一　上海日纱厂二月工潮
二　顾正红案及反帝宣传运动的发起
三　5月30日的南京路事件
第二节　北京政府对五卅事件因应及交涉之经过
一　事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反应
二　外交抗议与初期交涉
三　北京公使团的分歧与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
四　“沪案重查”与交涉的悬搁
第三节　五卅运动的形成与扩散
一　上海“三罢”运动的发起
二　上海罢工工人的维持
三　运动在外地的扩展
四　运动的衰退与中止
第四节　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运用及走向
一　五卅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利用
二　民气可恃：国民外交的巅峰

三　革命与“反赤”：群众运动的影响
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条约体系与中外关系
一　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二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第二节　中苏建交谈判
一　加拉罕来华及中俄初期交涉
二　王正廷与加拉罕再度谈判
三　王加草案的签订及内阁的否定
四　国民外交的展现
五　中俄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双方的影响
六　归还俄使馆和中苏会议的召开
七　奉俄协定
第三节　关税特别会议
一　北伐前中国的财政状况
二　各国对关税会议的态度及“金佛郎案”的议结
三　关税特别会议的召开
第四节　法权会议
一　法权会议召开的背景
二　北京政府促成法权会议召开的努力
三　法权会议与《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第五节　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一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各国对华方针的调整
二　民族主义高涨和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北京临时执政府的垮台
第一节　浙奉战争与孙传芳势力的兴起
一　浙奉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二　战事发动与奉方应对
三　战事的进展与停滞
四　北方冯张妥协与孙传芳撤兵

第二节　北京临时执政府的终结
一　大沽炮击事件与中外交涉
二　“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
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第一节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第二节　北方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第三节　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第四节　南方新兴武装势力的整合
第五节　中山舰事件与广州政局的新陈代谢
第六节　南北统一的愿望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1924年春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的政治军事力量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曹锟以贿赂当选总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的统治地位得到加强。自是以还，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的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的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在中央的统治结束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试图利用军阀之间的暂时“均势”，对北洋体系从内部作一番整合。在此期间，中国政治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变化：由于段祺瑞在否定旧的“法统”和国会之后未能如愿召开国民会议，实现国会制度的新旧过渡，民元以来国人追求的议会民主制度寿终正寝。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亦呈现出弛张变化，既存政治力量中的“文治派”逐渐兴起，军人不得干政的呼声越喊越响亮，“武力中心主义”开始失去信仰。随着中央政权支配力量减弱，地方意识逐渐增强，中国政治呈现出区域化的明显特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中央政府曾做出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但事与愿违。由于段祺瑞政府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和平统一”失败，军阀间又重启战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的国内战争中基本上置身事外，致力于自身的建设及根据地的巩固，养精蓄锐，而北方军阀却因征战而彼此削弱，逐渐走上末路[(1)]。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的巨大成功，大致可以从这一阶段中国政治的变化中得到解释。

第一节　变动不居的中央政相

一　中央政府及政制的更迭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祸起萧墙的北京政变而告结束。政变之后，冯玉祥即按照北苑会商之法，筹组摄政内阁。但冯氏对于政治并无明确主张。政变之初，冯与英文导报主笔柯乐文谈话，曾表示发动政变系“革军权万能之命，非革政治之命，故曹总统之地位，吾并未推翻”[(2)]。在中枢无主的情况下，主张由现内阁摄政。但商之国务总理颜惠庆，颜不之许，且辞总理职。冯玉祥只好决定由与冯夙有联系的黄郛暂行组阁摄政，阁员包括黄郛、王正廷、杜锡珪、李书城、王永江、易培基、王乃斌、李烈钧等，仍以曹锟总统“任命”的方式发表[(3)]。以冯作后盾的黄郛摄阁显然只是政治上的短暂过渡。时人批评冯氏，说他“对付政局之手续，始终承认历年之法统”，故将政变之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4)]。奉张则自恃“百战入关”，对冯氏“未折一矢，……反占中枢，发号施令”表示不满，谋“有以挫折之”[(5)]。在奉张的压力下，黄郛摄阁成了名副其实的过渡政权，存在时间只有24天。曹锟在黄郛摄阁成立之后三日被迫辞职。取代曹、吴统治的政治形式是由“执反直同盟之牛耳”[(6)]，在当时最具实力的奉张在天津会议上操纵决定的。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曾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接到邀请，复电允即北上。但当时的局势似乎对段祺瑞更加有利。多数地方实力派都把收拾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段身上，造成一种“非段莫属”的政治气氛[(7)]。对于段祺瑞出山，冯玉祥与奉张也示以支持，不过用心颇为复杂。时论尝分析说：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只拥兵数万，且仅限于近畿地方而无支撑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号令天下，俾能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歼灭直系势力，不予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氏纠合长江势力，持拥段之态度。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巩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

用段以收战胜之全功[8]。因此，政变之后不久，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即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而张作霖、卢永祥以及镇威军各将领则联名发出通电，推段为联军统帅。

由于各方“拥戴”，段祺瑞表示愿意出山收拾局面，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遂云集津、沽，天津一时成为中国“政治重心”之所在。政制问题的讨论很快提上议程。1924年11月13日，天津会议召开，列席者有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李景林、吴光新、张宗昌、贾德耀、陆宗舆、王芝祥、陈宦、章士钊、段芝贵等四十余人。会议讨论了包括国会存废、战争善后等问题，但与会者首要关注的则是“将来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9]。

在这个问题上，各方意见分歧颇大。政变之初，北方国民党人徐谦等曾提出废除总统制，改行委员制的主张，得到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赞同[10]。唐绍仪也主张实施委员制，由各省区“各举一人，组织委员会”，然后由委员互选一人为委员长，主持政务，但其职权较总统为小[11]。与唐联系密切的章太炎从言论上予以配合，发表《改革意见书》，认为实施委员制，“以合议易总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有利于结束北洋派的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分立数国”的地方自治主义[12]。当时曾议及一旦实施委员制，当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若干社会名流，共同执政[13]。

段祺瑞、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则相反。天津会议上，段身边的人曾主张实施总统制，甚至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的意见[14]。推孙为总统虽未必出于真意，欲维持总统制则是事实。孙中山及南方国民政府亦主张实施总统制。早在反直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就曾与在段祺瑞身边担任联络工作的邓汉祥，为曹、吴倒后究竟由孙中山还是段祺瑞担任总统进行磋商。当时曾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孙中山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一是段任总统，孙任总理。邓汉祥的意见是“孙先生任大总统最为合适”，他曾承诺将国民党的意见转告段[15]。在孙命胡汉民起草的致段祺瑞的电文

中，有“国以内，兄主之；国以外，弟主之。在津候弟到，同入北京，商定国基”之语[16]，与段氏左右之言异词同义，可见南方国民党人亦主张总统制。

不过，两种政制的实施均有困难。总统制容易导致集权，与甚嚣尘上的自治思潮颇显枘凿，被滇唐等联治派称为国之“祸水”[17]。另外，在国会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合法”总统如何产生也是问题。一些国会议员召开非常会议，企图选举临时总统未能遂愿[18]，即表明了这一点。委员制的实施障碍亦复不少。由于国民党“联俄”政策已大白天下，冯玉祥与北京俄使馆人员的联系为人所知；而苏俄政府的组织形式，按照时人的理解，正是一种委员制[19]。于是反对该制度的人便利用人们畏惧“赤化”的心理，说主张委员制的人有“赤化”倾向。西方国家外交团出于反对苏俄的政治需要，亦如此认识问题，致使主张委员制的人士不敢坚持此议[20]。

政制问题的解决因此陷入两难境地。此时孙中山尚在北上途中，段氏为争取西南方面支持，曾作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表态[21]。但曹锟去位之后长江流域各督的态度，使政制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11月10日，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周自齐与蔡成勋、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杜锡珪等联名通电拥戴段氏。13日，该各督再次通电，声言中央政府已经中断，对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认。从而形成“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的局面。这就迫使天津会议必须尽快解决政制问题，以便建立为各方承认的中央政府。由于不慊于委员制，总统制又因缺乏国会，无由产生，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等人乃决定采取“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名目，以为过渡[22]，得到段祺瑞首肯。所谓“执政”，按照李剑农的说法，一方面是表示已废除崇高的大总统，一方面又表示不是委员制[23]。

段氏表示同意接受“临时执政”职，却不愿立即晋京就职，而是故作姿态，“不得全国一致之拥戴，决不率尔登台”。直到“拥戴之电文，如雪片飞来，迎驾之代表，亦联翩莅止”[24]，方于11月22日晋京。

晋京前一日，段祺瑞发表“马”电，标示政见。宣称曹锟贿选，已将“法统”破坏，无可因袭，惟有“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基于这一考虑，段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的主张[25]。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就职宣言中，段作出“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的表态。随即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国家政权由临时总执政、国务员、国务会议组成。临时总执政总揽军政、民政，统帅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务员由临时执政任命，分掌政府各部，襄赞临时总执政处理国务；国务会议由临时总执政召集，临时总执政发布命令及国务文书，由国务员副署。根据这一政制，段祺瑞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桑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另外，在宣布“革新政治，与民更始”的同时，还规定“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26]。

为筹备建设，厘定制度，段祺瑞就职之后，于12月4日下令设立临时法制院，任命姚震为院长。临时法制院由院长、评议、参事组成，内设事务厅及四处两股，负责有关法规命令的拟订，审查条议有关宪政的制度、典章及临时政府特交审议的事项，收受审定有关法制的条陈，以及保存临时政府发布的有关法规性质命令的正本，等等[27]。

1925年4月7日，段祺瑞召集国务会议，制定《临时参政院条例》，随后颁布《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规定了临时参政院的职能及“参政”的选举办法。临时参政院的权限主要有两项：一是议决权，包括省自治促成及国宪实施前规定省自治条例，善后会议及军事、财政两善后委员会决议执行事项，调停各省间及各省内部的纷争，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募集内外债及增加租税，等

等。一是建议权，将行使上述权限时所议决者，向临时执政建议，经采纳后交主管机关执行[28]。

段祺瑞就任执政之初所作政治建设，将民国肇建时所设政制中的府、院权力集于执政一身，体现了一定的集权倾向。段在“马”电中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收束局面的善后会议结束，自己就将“卸责”[29]。似乎也承认临时执政只是政治上的一种过渡。但就职将近一年，执政集府、院权力于一身的局面仍未改变。这使执政府招致许多批评，褚辅成等在善后会议上甚至提出《修改临时政府制》议案，非常国会亦频繁活动，企图恢复“法统”，给段祺瑞政府造成极大压力。

1925年12月下旬，迫于浙奉战争郭松龄倒戈后国民军控制直隶全省的形势，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恢复责任内阁的呼声中，为争取冯玉祥的支持，段祺瑞被迫宣布改组政府，修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国务会议改由国务总理主持，国务文书改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12月31日，段任命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国民党人于右任、易培基、马君武分别被任命为内务、司法、教育总长。由于孙中山去世前曾发布国民党人不得出任临时政府职务的命令，于、易、马等人未就职，许世英也不愿就任国务总理，只好由陆军总长贾德耀代理。此外，段祺瑞还指示国宪起草委员会拟订国会组织法、总统选举法和宪法。国会拟采参、众两院制；总统选举法规定以县为基本选区，由省选举会选举总统；宪法亦在国宪委员会三读通过[30]。

这次改制，恢复了民元以来府、院分立的政制，对于国会政治的价值重新予以承认并作出重建国会、实施宪政的姿态，民国政制史上短暂的没有分权制衡机制、被批评为“狄克推多”的政权形式似乎又出现了为“民主”政制取代的可能。但是，由于这次改制发生在执政府统治已经日暮途穷之时，很大程度上已被执政府当成应付统治危机的手

段，而导致危机的内外因素并没有排除。在政权生存已成为问题的情况下，改制措施的命运前途，可想而知。段祺瑞之后主政的颜惠庆、杜锡珪及后续内阁均受直、奉军阀左右，有职无权，且因时值非常，在政治上仍然只能起过渡作用，没有建树。

二　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

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倾覆之后，反直三角同盟不复存在。此时国内政治、军事力量形成相对独立的五支：一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二是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三是长江一线的旧直系残余，四是滇唐为代表的西南势力，五是孙中山领导的两广革命势力[31]。就相互关系而言，本来奉张、国冯及孙中山领导的两广革命势力系反直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与战败出亡的吴佩孚及其亟欲联络的长江各督处于敌对位置。但是就政治分野及派别的历史渊源而言，奉张、皖段、旧直系以及从旧直系分离出来的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均属北洋统系，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之间又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以及滇唐、湘赵、粤陈等“联治派”，则属于（或至少是被时人视为）“国民党系”[32]。两派相争具有政治上新、旧之争的色彩，但有时出于利益的需要，不仅新、旧内部发生分裂，即新与旧之某一部分亦可能暂时结成同盟，反对共同的政治敌人。这就使得中国政治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北伐之前，由于国民党人在事实上未能占居政治中心地位，加之民众尊崇正统的心理作祟，北洋势力依然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重心所在。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33]，即客观反映了这一政治形势。因而对段祺瑞而言，实现统一的基本前提，就是对早呈四分五裂之像的北洋集团进行整合，使之集于自己麾下，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和权势中心。这样，占据两广的国民党和僻处西南一隅的唐继尧等将不难对付。

为达到这一目的，段祺瑞作出的第一个表示就是摆脱安福系的政治窠臼，使自己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出而治世。安福、政学两系曾经是段祺瑞重要的政治力量，“段氏入京后，安福系、政学会等〈政团〉人物，集于其左右”[34]。段祺瑞曾多次电请安福系政治首领王楫唐来京，“倚王为东南锁钥”，并有由王氏组阁之议，后来又任王氏为安徽督办[35]。以致时论有“段派除以全力占领北京之各部署局所，以期恢复安福全盛之势而外，并无深合于人心之设施”的尖锐批评[36]。张作霖对此也深为不满。为摆脱政治窘境，段派要人在段就职后不久公开通电，作出取消安福系的表示[37]。

接着，段祺瑞开始以超党派政治领袖的姿态处理政务。首先是平衡各实力派之间的关系，避免冲突的发生。其中最麻烦的是处理国民军与奉张的关系。国、奉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派，均力图左右中央政治，使段深感棘手[38]。段氏曾向各方作出驻守原防，保土安民的要求。但奉张以齐燮元通电长江各省独立，且需护送倒直一役在江南发难有功的卢永祥南归就任苏皖宣抚使为由，力主沿津浦线南下，驱齐刻不容缓[39]。虽奉系内部“稳健派”如王之江等持“自重主义”，但“激烈一派”则主张“乘此机会，最少限度，亦须将黄河以北，收归奉天范围之内”[40]。国民军不甘落后，也借机向河南等地扩充势力。迫于压力，段祺瑞同意了奉张等提出的重新划定各方军队驻防区域的要求。其区划大致为：京奉线、奉天廊坊间、津浦全线归奉军守备；京绥线、京汉线、廊坊北京之间，则暂归冯、胡、孙各军驻守[41]。这就打乱了段氏最初的设想，为奉军沿津浦线南下山东、安徽、江苏，最终引发新的军事冲突埋下隐患。只因国民军控制着政治中枢北京，且军队数量已大大扩充，国、奉之间的平衡尚暂时维持着[42]。

在对待吴佩孚及长江各督的问题上，奉张、国冯均主张用武，以便彻底打垮曹、吴[43]。奉军在吴败退之后，仍不废军事布置，大举入关，即出于这一考虑。冯玉祥甚至悬出赏格，无论军民，凡活捉吴佩孚，赏10万元，击毙赏5万[44]。尽管在对待吴的问题上，奉张与

国冯曾有一段时间的“弃嫌结合”[45]，但段祺瑞却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由于尚未占据稳固地盘的国民军在力量上不足与奄有富庶的东三省作为根据地的奉张长期抗衡，国冯与奉张之间暂时的平衡势必很快被打破。在奉张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冯玉祥被迫三上辞呈，即平衡将打破的最初表征。在这种情况下，段不得不寻求新的政治平衡机制。另一方面，就个人的历史记录而言，冯氏曾数次反戈，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他的“拥戴”是否可靠在时人看来也成问题[46]，因而不能不加防范。此外，由于直系将领普遍将己方的失败归咎于冯“背信弃义”，坚持对任何人均可宽恕，唯独不宽恕冯的立场，冯在段氏身边的活动遂成为旧直系及吴佩孚承认中央政府的一大障碍。反过来说，冯提出辞职，也就向吴等提供了拥段的机会[47]。段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层，在冯氏数次递交辞呈之后，同意“给假一个月”，之后又尽量避免让冯氏身居要津，从而为接近吴佩孚及长江各督铺平了道路。

段祺瑞对付吴佩孚及长江各督的手法可谓刚柔并济。就职不久，段曾做出“强硬”姿态，令刘镇华、憨玉琨部“以兵逼吴”[48]。与此同时，段又“迭与吴佩孚信使往还”，主动进行联络。吴为保存实力，争取地盘，派代表进京请段将河南军政民政，交其掌管。段虽未应允，但派人向吴表示，“除地位问题外，举凡生命财产自由等，允为充分之保障”，且邀其来京，以面商善后。对于吴之过去，仅责以“拥戴非人”，而未及其他。段祺瑞的软硬两手，使业已穷敝的吴佩孚不能不暂时就范。11月24日，吴复电政府，表示“解决大局办法，当与芝老（段）共趋一致”[49]。而其他直系将领，慑于奉张之威，以为曹、吴虽败，北洋领袖尚有段在，可借以自存，又何必陪曹、吴同归于尽[50]？故苏齐（燮元）、赣蔡（成勋）、闽周（自齐）、浙孙（传芳）、鄂萧（耀南）、鲁郑（士琦）陆续表态拥段。尽管这些表态大多停留在口头上，但也加重了段祺瑞制衡奉张的政治砝码[51]。

完成“以直制奉”的部署之后，段亟须对付的是西南实力派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西南实力派力量小而分散，滇唐（继尧）、湘赵

（恒惕）、粤陈（炯明）在地理上彼此相隔较远，难以在军事行动上相互配合，“会师武汉”之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52]。孙中山穷于应付商团的敌对行动，且与陈炯明关系紧张，自顾不暇。纯粹从力量上分析，西南实力派受中央重视的程度应稍逊北方实力派。但西南方面注重打政治牌。滇唐、湘赵、粤陈极力鼓吹“联治”，与上海方面的唐绍仪、章太炎等在政治主张上同调[53]，政治影响力不小。孙中山在反直军事行动中虽作用不大，但毕竟是构成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加之曾任临时大总统，又有“三民主义”相号召，政治影响力实不在段祺瑞之下。这就使得段祺瑞不能漠视西南实力派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的存在。

应付西南的功夫是从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做起的。天津会议上，段祺瑞曾表示一切大政方针须待孙中山进京后共同商议决定。后因形势急迫而提前登上临时执政位置，在安排政府各部官员时，段亦充分考虑了孙派代表。在政府新设立的九个部当中，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有唐绍仪、杨庶堪、叶恭绰三人。李烈钧被任命为参谋总长，更是段政府对国民党作出的一种姿态。段氏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实施安抚，乃是出于争取西南实力派支持的考虑。时论曾明确指出：“惟统一西南事，须征中山意见，元帅推重中山以此；在中山未到津前，一切事未能决定，段颇为然。”[54] 这一做法的“示范”效果很快显示出来。当孙中山表示出与段“合作”的意向后，西南实力派的表态也都差强人意。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一度因内部分歧而呈现乱象，内部关系亟须整合，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亦因此削弱。段祺瑞遂将重点移至维系与滇唐及四川实力派的关系上。

与平衡各派势力相关的政治举措是大批疆吏的任命。围绕这一问题，各方明争暗斗异常激烈。执政府成立之初，张作霖曾声言，“对于执政府，不荐举奉系一人”。但实际上，其向执政府举荐之奉系官员为数不少[55]。冯玉祥不甘落后，也尽可能地举荐自己的人，主张胡景翼、孙岳等，“必尽先与以好位置”[56]。不过，由于多数省区表

示拥戴中央，执政府又颁布了“文武百官照旧供职”的命令[57]，故争夺范围主要集中在原先由直系控制的直隶、江苏、安徽、陕西、甘肃五省。

直隶屏蔽京师，在中国政治中地当冲要，历来都是政治家必争之地。该省在战前系由直系将领王承斌控制。王的督办位置虽系曹、吴安排，但王毕竟与冯玉祥一起发动了北京政变，系推倒曹、吴的有功人员[58]。但直省这样重要的位置，奉张不放心让王继续留任，加之王与冯关系密切，故奉张千方百计进行排挤。王对此不能没有感受，遂以收束军事为名，召集残部，驻扎天津，以谋抗争。正当王氏收编残部时，张作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兵压境，勒令王部缴械。王不安于位，于11月11日避入日租界，通电辞去本兼各职[59]。

王被迫辞职，对冯是一个明显信号。冯在日记中写道：“因张雨亭将王之军队解散，王即通电辞职。张之背约负友，其端已见，余亦寒心矣。”[60] 随后，奉张与国冯为直省督办一职展开了激烈争夺。本来冯玉祥之意，是要让孙岳接替王承斌长直，段似已同意，故有派人向奉张疏通之举[61]，但未得奉张方面同意。张作霖最初曾有以张学良督直之议[62]，后出于与国冯竞争的考虑，又打出“直人治直”的口号，企图以此作掩饰，将奉系骨干、时任奉军陆军第二军军长的李景林安置在直隶督军兼省长的位置[63]。段不得已而偏袒奉张，使李得补直督缺[64]。好在李与冯关系尚可，而奉张不知，故能接受这一安排。后来郭松林与国民军联合发动反奉战争，李倒向郭、冯一边，其与冯早有接洽，或即原因之一[65]。

安徽省长一职最初蚌埠诸将拟推倪道烺出任，但段不之许，而任命王揖唐担任，并以王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66]。段氏此一任命，用意甚深。盖王氏控制皖省军、民两政，可以为段在其家乡植一稳固地盘。且皖省位于苏、鄂之间，于长江统一前途，关系甚大。王与长江各督一向颇有联络，以王长皖，可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67]。这一任命没有遇到多大麻烦。但王任职不到半年即辞职，幸其后任吴炳湘仍

属皖系骨干，尚能贯彻段之旨意。

江苏军、民长官的任命相对棘手。先是卢永祥由奉军“护送”，以宣抚使名义南下驱齐，段对卢曾有苏督的任命。但卢表示不要地盘，且发表废督主张，故于苏省督办一职迟迟不就。至于省长一职，奉张早有以郑谦担任之议并征得段同意。嗣因郑一时难以南下，卢之左右遂联络苏绅，主张以卢代理[68]。直至段祺瑞以政府命令，敦促卢氏就职，卢方遵命兼办江苏军务。但在郑谦南下接替韩国钧任江苏省长之后不久，卢又辞去本兼各职。卢被时人视为“军人中之一政治家”，颇具时望，反直战争以来，注重调停奉张与皖段之间的关系，他的引退，使“此后可当疏通执政府与奉天间意见者，不复有其他适当人物”[69]。

8月底，执政府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孙岳为陕西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以填补卢永祥辞职之后形成的空缺，姜登选为安徽督办，以接替前任皖督[70]。加上早些时候作出的张作霖、张作相、吴俊陞等分任督办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以及李烈钧长赣、方本仁督赣等决定，段祺瑞初步完成了战后疆吏的人事调整。

段祺瑞对北洋体系“整合”的基本手段，是利用北洋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促成各派之间形成“均势”，并利用势均力敌造成各派力量之间的制衡，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段苦心为冯、张分配地盘，将苏、皖畀张，陕、甘畀冯，目的全在于此。在段的政治棋盘上，不能没有冯，否则无以制张；也不能没有张，否则冯将无法驾驭而对自己构成威胁。但又不能过于接近张、冯，近冯则长江方面将为之却步，如是，则统一将化为泡影；近张则难免为其傀儡，且可能与控制京师的国民军发生对抗，从而祸生肘腋。而长江、西南各方，也都成为砝码，被段氏用来搞政治平衡。段氏为维持各方关系，煞费苦心，但其效果，正如吴虬分析的那样：“俨比老妇分苹果饵，务求燕雀均衡，以免群儿相斗。谁知国库帑藏有限，疆圻究有肥瘠，虽予取予求，不敢瑕

疵，而馋吻并张，焉能悉偿其愿？”[71]

问题的症结在于，段祺瑞虽然得到多数省区实力派的通电拥戴，组成了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但其政治权势的中心地位并未形成。

奉张系反直三角同盟中“执牛耳”一方[72]，战胜之余，当然不愿听命他人。其表示“拥段”，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缺乏号召力，推出段氏，既有利于稳定局势，又便于奉方幕后操纵。国民军方面拥段，系感受到奉张的压力所致，联段则可造成国、奉之间的平衡，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在联段同时，极力渲染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关系，亦同出一种考虑。长江各督的“拥段”则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盖长江各督多属直系，曹、吴倒后处于难以自立门户又无所归属的游离状态。吴佩孚在白坚武的策划下，打出“护宪军政府”的旗号，企图将长江各督纠集在一起[73]。而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周荫人等，既不愿降服于奉张，又感到吴佩孚的实力已被抽空，不足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兼顾维持各方关系并能顾全面子的办法就是“拥段”。至于吴佩孚，以直奉交战故，视奉张为“公敌”，复以冯玉祥背叛曹、吴，反目倒戈，视之为“私敌”[74]，因国、奉两大敌对势力的存在，自然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待段。对段表示“拥戴”，可以借段之斡旋暂时避开奉张、国冯的军事压力，并借此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段的尴尬地位，与其手中缺乏实力有关。盖“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藉，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75]。可以说，蛰居复出的段氏，已近乎“手无寸铁”[76]。奉军将领何柱国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那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77] 所谓“罩得下”，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各方均能接受他；所谓“吸不住”，指自身缺乏实力的段祺瑞，已经不能臂使指应地调度指挥各路人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段政府成为袁世凯政府那样可以对全部北洋军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中心，几乎不可能。

国内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被段祺瑞维持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其中包括南下奉军与浙江方面的矛盾，国民军与奉军在京津地区的争夺，河南的胡、憨之争，西南的滇桂战争，等等。虽然这些军事冲突尚未严重到足以动摇执政府统治的地步，其中一些冲突，如河南的胡、憨之争和奉、浙之间形成的紧张局势，经斡旋与调停，也平息下来，但导致国内武装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浙、奉矛盾及国民军与奉军的矛盾，稍有处理不慎，就可能牵动全局。段祺瑞为平衡各方关系，绞尽脑汁，但收效甚微。

1925年10月，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以“拥段反奉”相号召，不顾段的调停，断然向奉军发起总攻击，浙奉战争爆发。国民军方面以为时机已到，开始与孙传芳密商反奉计划。不久又与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订约，建立反奉同盟，并暗约李景林加盟。奉张为对付国民军，决定暂弃前嫌，与吴佩孚结成直奉联盟。之后各派政治势力怀抱不同目的，彼此大动干戈，战场上的形势变化莫测，政坛局面亦波诡云谲。浙奉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努力的失败。建立在各方“均势”之上的执政府的生命，也因这场战争的爆发临近结束。

第二节　国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消亡

一　贿选之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及运作状况

1923年秋，曹锟以重金贿赂议员，当选总统。内幕揭开后，讨伐之声腾起，国会地位一落千丈，社会舆论中甚至出现了解散国会的声音。尽管全国范围盛极一时的反贿选运动未能改变曹锟当选总统的既成事实，但国会因此蒙受的损失却是巨大的[(78)]。

贿选对国会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其内部分裂。当贿选紧张进行时，参、众两院部分议员，鉴于北京已成直系的势力范围，发起“国会南

迁运动”，以为阻止直系操纵大选之计。于是国民党、政学系、安福系多数议员及民八护法议员，相继离京至沪，以上海湖北会馆为国会移沪集会筹备处，以“大寿第”为办事处，展开政治活动。反直议员本欲使北京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并以此阻止直系控制总统选举，但因南下议员人数有限，且一些议员南下之后复被拉拢北上，未能遂愿[79]。其在南方从事政治活动的初衷亦没能实现，因为江浙人士担心在上海从事反直政治活动，将招致战祸，出面反对，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亦不赞成在上海从事组织政府的活动。结果，“国会南迁运动”只是部分议员南下，没有获得预期成功[80]。

留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在曹锟贿选之后，继续其政治生涯。此时，由于曹锟控制操纵，国会内的政党及政治团体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变化的契机在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失势。在曹锟贿选过程中，吴景濂出力甚多，选举前曹曾有将第一任正式内阁总理许与吴氏之表示。但贿选成功之后，曹锟却幡然变计，提名颜惠庆与孙宝琦，令与吴斗。嗣又散布由孙洪伊组阁，助长王家襄、王湘、牟琳选任议长之空气，挑起吴派内争。与此相配合，保派党徒更于甘石桥组织宪政党，以推进实施宪法为名目，吸收反吴派议员，甚至采取停止各小政团津贴的办法，“俾令窘迫来归”。其目的在于推倒吴景濂，使之非但不能担任阁揆，且连议长席位亦不保，丧失在国会的地盘。吴派则拉拢政团协商会中各中立派别，不遗余力，如励治社之叶夏声、法治促进社之李载庚等，允力予维持。吴氏还有组织统一党之准备，力图形成与宪政党对峙的局面，但未著成效[81]。当时国会内的政党构成状况大致如下：

贿选之后国会内政党构成状况表

党派名称	领袖	关系人	政治关系分析
石驸马大街三号	吴莲炬、赵时钦	王毓芝	左列五团体与保派联系密切，系宪政党的骨干人

			物。
宪友俱乐部	王谢家	陆锦	左列七党团系保派极力接洽的社团。
报子街十八号	常　璋	王毓芝	
宪法学会	邓毓怡	刘梦庚	
化石桥五十六号	彭占元	刘梦庚	
漠南寄庐	诺门达赖	原属保派	
西北议员俱乐部	董士恩		左列各政党团体以保派为后盾，但因人数较多，欲独立撑持门面，不愿并入宪政党。
宏庙二十三号	李春荣	原属保派	
新民社	张伯烈		
颐园	黄赞元	原与黎元洪接近	
壬戌俱乐部	张汉、冯振骥		
政社	恒诗峰		
均社	钱崇恺	全民社分裂	
全民社	温世霖		吴景濂以民宪同志会为基本力量，左列党团系其可拉拢者。
宣外二百号	任焕黎		
观音堂十号	董庆余		
西河沿一百八十六号	景耀月		
香炉营头条十六号	易次乾		
西交民巷七十四	籍忠寅		

号		
诚社	骆继汉	
匡庐	叶夏声	后分裂为励治社
民治社	王湘	孙洪伊
南庐	杨诗浙	
顺城街三十三号	刘可均	

左列党团与匡社分裂后叶夏声新组建的团体联络。

说明：1．此表系据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92—93页所列1923年11月底党派变迁表改制。2．一些党团当时系以其活动场所为人所知，未见打出政党招牌。3．由于表内多数政党均在国会内占有席位，故可据此略窥国会内党派的构成状况。

除了表列各党派之外，尚有群治社、法治统一会以及由研究系分裂的小团体如适庐、乐园等，数不胜数。但因力量微弱，贿选成功之后，保系津贴停止，无法维持独立，不得不另谋出路。

不难看出，在贿选之后的国会内，吴派实力相对弱小。面对党派分化组合的新形势，吴景濂与内务总长高凌霨“各挟其财力，竞争组党，各党首领人物，认为奇货可居，狡猾者且向两方活动，一如市场之标卖底货，故其态度游易不定，最后仍看两派财力之贫富如何耳”[(82)]。不过吴派终难与有保派作后盾的宪政党抗衡，结果吴景濂不仅没有当上内阁总理，就连众议院议长之职，亦不被继续承认。1923年12月18日众议院召开临时会议时，反吴派借口议长资格问题，发难攻吴，演化成众议院内的大斗殴。内务部遂以众议院警卫受吴控制为由，下令强行解撤众议院警卫，逼走吴景濂。吴之出走，表明津派在政治上的失势。其后，众议院事实上已为保派支持的宪政党控制，众议院秘书厅也为宪政党接收[(83)]。

宪政党在国会中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使曾经存在于国会内的政

党相互制衡机制开始丧失。这对国会的存废影响甚大。因为在民初国人的政治理念中，国会政治应当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应为两党或多党在制衡的形势下共同维持的民主政治[84]。如果说民初国会政治尚能勉强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会内已初步形成两大对立的政党。袁世凯破坏国会，正是从取消反对党或将反对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能与政府党相互制衡开始的。梁启超等人捍卫国会政治，亦紧紧抓住保存反对党这一关键[85]。民初的“超然内阁”难以长期存在，其原因亦在于此。现在，经曹、吴操纵控制，国会内党派构成丕变，出现宪政党独领风骚而其他政党几无立足之地的局面。这不仅使国会的运作失去政党政治的必要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使“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政”在人员构成上连为一体，严重削弱了国会自身存在的基础。

1924年元旦，曹锟政府正式颁布下届众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初选于4月14日举行，复选于5月14日举行，蒙、藏、青海于5月20日举行[86]。改选令颁布后，不少议员回到原籍活动新一轮选举，本届众议院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参议院也因议长出缺，陷于无休止的纠纷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参、众两院对于政府的监督职能受到严重干扰，涉及政府监督方面的立法工作更是难以正常开展。以参议院的运作为例：从1924年1月1日到5月31日，将近五个月的时间，该院共召开临时会议十五次，院内临时委员会会议二十九次，发出公文四十九件，其中就政治、法律、外交等问题向政府提出的“质问文”二十六件。另外，参议院在这一时期还提出法律案十件，提议案五件，建议案五件[87]。兹将参议院这一时期在立法及政府监督方面所做工作择要著录于下：

（一）制定弹劾总统及国务员的审判程序，确立立法机构对于行政的监督制度。参议院弹劾总统及国务员的权力，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制定《临时约法》及《议院法》时，就有明确规定，曹锟当选总统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亦重申了国会这一权力[88]。国会有权弹

劾总统与总统有权解散国会，是立法与行政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以前《临时约法》只制定出国会对于行政领袖的弹劾权，未对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作出相应的规定，造成立法与行政权力失衡，曾遭到一些政治学者的批评[(89)]。《中华民国宪法》对两方面都作了规定，在法理上应为一种改善。但“宪法”与“院法”对于总统及国务员的弹劾及罪名认定程序均无明确规定。在不具备程序法的情况下，实体法亦无由生效。故当众议院对内务总长王克敏实施弹劾之后，制定审判程序的问题便提了出来。

1924年2月18日，由议员黄佩兰提出，并有三十六名议员连署的《参议院审判规则案》交参院审议。稍后，又有议员萧辉锦提出的《参议院审判委员会组织规则案》和议员何畏提出的《参议院审判法案》。三个法案对审查国务员的“特别法院”或“特别审查委员会”的组织、职能，被弹劾者的申辩权利，特别审查委员会的内部监督以及相关审判程序等作了规定[(90)]。虽然这些法案在交付法制股审查之后未提出表决，但参议院议员力图实施国会对政府监督的意图，却通过这些议案的提出，得以表露。

（二）提出《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案》。该案提案人为楚纬经，有二十一名议员连署。其基本理由在于，既有的省议会选举法系复选法，与宪法规定的直接选举法相抵触。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新宪法公布之后，制定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之“立法权”应属于中央抑或地方。宪法虽未对此作明确规定，但按照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各省得自制定省自治法”的规定，附属于省自治法之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自应由制定省自治法之机关制定。但提案人认为，多数省区并不具备组织自治法会议的条件，且各省省议会会期大多届满，无法制定省议会选举法，“而各省立法机关又不可一日中断”，故提出该项法案[(91)]。一些议员欲省自治法成立，甚至有恢复县议会的主张[(92)]。4月9日，参议院召开会议，会上展开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在立法权的归属上。意见未能统一。后经表决，议定将该法案交付法制股审查。

（三）反对政府对“金佛郎案”的处理，并就该案质问政府。“金佛郎案”在中国政坛早已激起波澜，在舆论的强烈谴责下，主张接受法国要求的外交总长黄郛被迫辞职[93]。曹锟当上总统之后，迫于列强压力，曾打算绕过国会，通过秘密谈判承认此案，因遭到国会议员的反对和质问，未能遂愿。1924年2月8日，各国公使联合驳复中国方面拒绝各国关于“金佛郎案”处理办法的照会，对北京政府进行恐吓与劝诱。曹锟为寻求各国支持，乃密电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赞成政府承认“金佛郎案”，并企图收买议员通过此案。结果遭到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反对和质问[94]。

国会议员从两方面对政府进行了抨击：一、指出政府若承认“金佛郎案”，“在政治上说，是卖国行为”；二、强调政府对国会要求总理及国务员出席国会会议接受质询置之不理，“在法律上说，是违法行为”[95]。为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国会议员坚持政府必须出席国会并就此问题接受质问，主张“以后本院开会一次，即咨催一次，非出席不可，……不能听政府始终如是之违抗宪法也”[96]。在国会议员的压力下，新任国务总理孙宝琦到参议院对政府行为作出解释，表示“绝无承认金佛郎之事”[97]，此案方暂时搁置。

（四）提出《片马救济建议案》咨达政府。片马问题是中、英两国外交上搁置多年的悬案。早在1894年，中英双方就开始为片马问题展开交涉。1911年，英国殖民者不顾成约，强占片马[98]。民国以还，中国政局动荡，片马问题虽经数度交涉，一直未能解决。参议院认为片马问题关系重大，故重提该案。提案人认为，解决片马问题须从外交和内政两方面入手。外交方面，片马交涉应根据光绪二十年中英续议滇缅条约第五款，向英方索还被强占的北丹、科干、孟连、江洪各地；滇缅界务须重新勘定，以保全领土主权。内政方面，主张设立边务督办，实施屯垦，以阻止英人由片马入藏；滇西各属土司宜改设县治；滇西应另设行省，省会设在大理[99]。议案提出后，得到多数议员支持。1924年2月18日，议案在参议院表决通过并咨达政府

[100]。参议院的议案，受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的重视和支持，加上当地民众武装抵抗，1926年英国被迫承认片马属于中国[101]。

上述议案的提出表明，国会议员特别是非政府派议员在曹锟贿选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为履行国会的立法监督职能，曾做出努力。一般而言，国会就外交问题发表的意见大多产生了一定效果。片马问题的初步解决和促成“金佛郎案”搁置就是显例。但国会就内政问题发表的意见则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会内部党派构成变化，主要派系已基本为政府控制，失去了原先的制衡机制，反对派难以继续对政府实施有效监督。《参议院审判规则案》没有顺利通过就明显受到这一因素制约。当时，参议院会议已表决将议案交法制股审议，但法制股多次召开选举委员长会议，均因人数不足而流会，该议案的审议因此搁置。据时论分析，这一结局的造成，与参议院弹劾国务员王克敏引起政府不满，支持政府派的宪政党议员多不愿出席有关[102]。

国会在内政问题上难以发挥立法监督作用，表明其职能已严重削弱。而国会议员自身的缺陷也在此时充分暴露出来。以参议院为例。由于内部没有约束机制，每次开会，都有众多议员迟到、早退、缺席。一些议员到会，只是为了领取“岁费”，报名之后，便提前退席。以致秘书厅不得不采取发放“出席证”和“支付证”的办法，以维持开会人数[103]。有时出席人数不足法定的三分之二，秘书厅做了手脚才使会议得以召开。社会舆论因此对议员的人格表示蔑视，一些正直的议员也深感痛心，主张取消“两证”。为此参议院多次开会研究办法，均因担心与会人数不足而不能决断[104]。国会运作到了靠支付“岁费”来维持的可悲地步，其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二　实力派的政治决断与国会议员的抗争

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之后，曹、吴政权崩溃，段祺瑞重新执政，国会的命运因此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直系的政治统治业已推倒的形势下，废除旧国会，对反直各方而言，本是顺理成章之

事，当时舆论也不乏这样的主张[105]。然而，在联合推倒曹、吴之初，反直各实力派领袖对国会存废问题，大多举棋不定。

冯玉祥在政变之初，曾打算将国会一举扫灭，故其第一次通电，并无参、众两院之衔。起事当天下午，冯派兵驻守两院之侧，跃跃欲试，做好了取缔之准备。嗣经商询王正廷、张耀曾等，究竟可否解散。王、张皆主慎重，认为此番班师主和，当以改良政治为立足点，不可自居“革命”地位，认为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将面临外交承认问题。如果对于政府只采取政治改良的姿态，对于政府所由产生的国会，自应保全。至于国会是否过期或是否合法，那属于法律问题。“如欲加以解散，无论如何借口，必须正式政府，始有此权力。否则只凭武力之强迫，则国民军无异自承为革命，此诚不可鲁莽轻率，致招外交上之烦扰也”[106]。冯氏闻之，认为有理，乃命将主和通电补送两院。后来黄郛代阁成立，仍经曹锟任命，而胁迫曹锟退位，亦令其向国会辞职，均系采纳王、张意见的结果。

段祺瑞对于国会问题最初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其左右多主“迁就法统之说”，并以此向段进言。段受其影响，表现出模棱两可的姿态[107]。段出山时之“马”电，有“法统已坏，无可因袭”一语[108]，表明段氏最初并不承认旧国会的合法性。但段氏在会见拒贿议员范熙壬、彭养光等时，又强调对国会问题“不偏于法律，须与政治相提并重”[109]。同时考虑法律与政治，表明段氏在国会问题上游移不定。段后来认定“革命、改造”四字，与张作霖极力主张否定法统有关[110]。在对待国会问题上，张作霖最有实力，态度也最为强硬。政变不久，他便主张将包办贿选的吴景濂捉拿归案，予以严惩[111]。当时报上多见“天津某强有力人物”反对恢复法统的记载，所指即张作霖。但段、张主张废除旧“法统”，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新“法统”，殊难据此得出欲根本废除国会制度的结论。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人大多倾向解散旧国会。孙中山北上途中，在回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对北京国会的感想”的提问时

说："余对于现在北京之国会主张解散，因年来所有战事皆为不良国会所酿成。非去此不良之国会，中国殆无统一之希望。"[112] 他在给徐谦的电文中指示："旧国会须解散，宪法须改订，革除弊政宜严，对待政敌宜恕。"[113] 孙氏认为，国会之所以不良，在于"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议员道德低下，只顾私利，不顾公利，闹出贿选丑闻，致使国民对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114]。因此孙极力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取代既有国会。

反直各实力派领袖虽未明确提出废除国会制度，但对既存国会所持否定态度及在国会制度应否继续存在问题上的暧昧表示，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旧国会和国会制度的未来命运。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国会参、众两院为维持自身的存在作了最后的努力。此时的国会实际上已分裂为留在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和因反对贿选而南下驻沪的议员两个部分。在举国上下对贿选的讨伐声中，拒贿议员为避免玉石俱焚，一方面极力与曹锟划清界限，一方面设法活动反直各方实力派，寻求支持。1924年11月4日，参、众两院拒贿议员吕复等八十余人，在聚会之后发出通电，声称曹锟贿选，"论法律则干犯国家刑章，言道德则破坏社会廉耻，此次擅开战祸，牺牲国家人民生命财产，更难数计，仅令退避，不足蔽辜，应行严加监视，依法诉追，方足以伸纲纪而正人心"[115]。10日，移沪国会议员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一、贿选分子及"伪会"应即驱除；二、在津速设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三、响应天津同志会电召，陆续北上[116]。23日，国会反贿选议员在北京召开非常会议，推章杭时、范熙壬、彭养光、张瑾雯、王家襄、韩玉宸为代表，谒见段、张、冯等，表示："当此政变之际，非有一民意机关，不足以维持一切。将来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之组织法，希望由非常国会制定，纵或不能，亦须经国会通过。庶政府一切行动，尚有轨范。"主张由非常国会"选段为临时总统"[117]。

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因涉嫌受贿，对自身命运更为关注。政变不久，众议院便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国会自卫”问题[118]。“议员为保持饭碗计，一方主张选议长，以固对外势力，一方主联络南派议员，在条件中互相迁就”[119]。11月5日，众议院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议员共301人，会议提出由两院院内行政委员会先行商定召开两院协商会的建议。因曹锟辞职文到院，讨论总统去留问题须合法议长主持会议，而吴景濂因躲避缉拿出走，会议讨论了议长问题，因内部分歧，无果而终[120]。次年1月中旬，众议院因拒贿议员领到400元补贴，而一般议员的“岁费”未能发给，遂推举代表向政府索取。其理由是，国会乃一国之最高机关，既然“未经明令解散，当然照各机关一律发款”，经交涉未获结果。由于政府未拨经费，众议院被迫“仿照参议院秘书厅一律自十四年一月一日停止薪俸，以期告一结束”。22日，众院职员、警卫、茶役等约四百人，包围秘书长李汝翼办公室，要求再与政府交涉。李遂致函财长李思浩，详陈各种艰难情形，要求拨给六万元经费，以作结束众议院秘书厅之用，未获照准[121]。

尽管国会作了最后的努力，仍回天乏术。1924年11月19日，参与天津会议的反直各实力派代表议决解散旧国会，决定“现在将办未办之选举，一律停止，并议剥夺第一届贿选议员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22]。与此同时，临时执政府司法部敕令逮捕贿选议员。11月30日，地方检查厅派出大批司法警察，分头会同各区巡警大捕贿选议员。受贿议员，人人自危，纷纷逃避。被出票捉拿者，共百余名，已有彭汉遗、陈家鼎等十余名议员被捕[123]。12月8日，地方检查厅检查官率同法警至众院搜索贿选证据[124]。12月14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正式作出推翻“法统”的决定，并拟就三项命令：（一）“去年十月所公布之伪宪法，兹撤销之”；（二）“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参、众两院除拒绝贿选议员，参与建国大计外，所有两院机关，应即消灭”[125]。

但上述命令未能即时发表，原因在于各方反对意见十分强烈。执

政府内亦有不少人感到事关重大，主张交由将来的国民会议解决，“不必由临时政府负此重大责任”[126]。12月15日，段祺瑞在吉兆胡同召集临时法律会议，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列席者有司法总长章士钊、财政总长李思浩、法制院长姚震、前司法总长朱深、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汤漪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等。所有列席者均发表了意见，分歧颇大。章士钊认为，“国会、宪法、约法三者，在现时革命政府之下，无一可以倖存。如稍持调停迁就说，或变相保留之说，则现在革命政府，失法律上之根据，非驴非马，徒与反对者以口实。故为巩固现政府地位起见，非首先打破法统不可。欲打破法统，则国会、宪法、约法三项，绝对不可存在。”李思浩力持异议，反对废除“法统”，认为现在的执政府系临时性质，“并非国家之主人”，譬若看房人，断无主人外出未归即越俎代庖，主动更改房内陈设布置之理。认为此事“须决之于国民会议，以免徒增纷扰”[127]。

在取消法统问题上，当时国内政治力量已形成“绝对主张公布与绝对反对公布两派”。段派要人王印川曾晋谒段祺瑞，“陈说利害，力谏勿发表此三项命令”。许世英在天津致函段祺瑞，反对公布三项命令。在天津的国民党人士，亦持此意见，彭养光甚至致电政府，阻止发表命令，并表示要进京面陈理由。其实，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不少人士所争只在约法是否废除。对于曹锟宪法，一般都指为“伪宪法”，应该废弃，自不待言。第一届国会早已届满，且多数议员参与贿选，不应继续存在，也无太大争议。但约法系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与政体的根本大法，若轻易废除，在反对派看来，则不仅“中华民国”四字不能继续使用，即根据约法产生的政府各部及国务会议等，亦不能继续沿袭。此外，考虑到国民党方面视约法为生存依据，曾数度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派担心若执意废除约法，势必再次激起运动，“则于时局收拾上益增一层困难”[128]。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调停派”，主张不明言解散国会取消约法宪法，“只以此次临时执政府，既由革命成立，则以前之行政权立法

权，当然失其效力立言”[129]。然而，由于政府内外反对公布者占相对优势，推翻法统命令的发表搁浅。直到1925年4月24日，因善后会议通过国民会议条例，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执政府才最后下令取消法统，明确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130]。约法既废，旧议员的法理依据不复存在，国会非常会议亦因政府压迫陷于停顿[131]。不久，参、众两院院址，由内务部接收，移交法政大学作为校址，随后又将参议院院址拨给女子大学作为校址[132]。

尽管如此，执政府的举措，也只在废除既存国会，并不具有废除国会制度的含义。段祺瑞在执政之初，曾宣告将通过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根本建设问题，并任命林长民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制定新的宪法。之后又设立了参政院，作为临时立法机构。1925年12月11日，国宪起草委员会以逐条表决的方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案》，并咨达临时执政府，提交国民会议讨论通过。由宪法草案可知，在未来的正式国家机关中，国会制度仍将保留。未来的国会“仍采两院制，然参议院颇近似与普通上院性质迥异之德国新宪法之联邦参议院”[133]。1926年以后，段祺瑞政府面临统治危机，国民会议没能如愿召开，新宪法无法通过，从而形成旧国会废除，新国会的产生没有法理依据的局面。“至是人琴俱亡，议会完全消灭，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一段落”[134]。

三　民初国会制度消亡的政治语境

段祺瑞曾有制定新宪法并依法重新组建国会的打算，其他政治家虽对旧国会持否定态度，却没有明确主张废除国会制度，只是由于段祺瑞政治统治面临危机，无暇他顾，国会制度才消亡于无形。从这一事实看，民初国会制度消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段祺瑞之后的北京及南京政府都没有致力于国会的重组工作，这样的事实能够为国人安然接受，其中又包含了国会制度不得不走向消亡的必然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当时一般国人对国会的认识与国会的存废关系最为密

切，它成了政治家可以任意处置国会的思想及政治语境。

贿选被揭露之后，国会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当时国人对国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腐败问题上，认为贿选乃国会腐败的露骨表现，因而对之大张挞伐。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建立之后，舆论对国会的攻击更呈现高潮。《国闻周报》当时曾发表社评，主张对受贿议员从国家和社会两方面予以制裁。“关于国家者，司法官厅于检查之后，自应次第逮捕，依法审判，分别定罪，褫夺公权，追缴所受之贿赂……。至于社会方面，则有更严之制裁方法：贿选议员徒刑期满，释放回里之后，凡社会上之各种公私团体，概不许其揽入，公共事业，概不令其参加。如是贿选议员在政治上社会上，乃绝无活动之地”[135]。上海总商会在其时局通电中指出，贿选议员，“长恶助乱，百喙难辞，应予按名诉追惩治，借伸法纪”[136]。北京公联会更是历数国会十大“罪恶”与“万万不能存立”之十大理由，主张此番推翻曹、吴之后，“国家所有政治事项，宜从根本着手，必须恰乎人情，当乎事理，庶足以收拾人心，完成伟业。国会既为祸乱之媒，最好乘此机会，任其消灭”[137]。

国会政治是一种民众普遍参与的政治，当多数本应参与其中的人形成国会“万万不能存立”之共识，国会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变得十分薄弱。民初国会制度消亡，此实关键因素。这种共识的形成，既与民初国会政治实验不成功有关，也与当时国人思想日趋激进，对于在中国仅仅试验了十三年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可期成效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有关。清季以还，国人思想日趋激进。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政治思潮大量涌入，让人目不暇接。于是“专制”变成立宪，立宪变成共和，向西方学习变成了“走俄国人的路”。当时国人急于向国外学习“最新最好”的东西，出现了被学者称为“新的崇拜”的思想及政治权势转移[138]。在此特定语境下，一切新的东西尚未发展成熟就被视为落伍陈旧而遭抛弃。

在国人从政治上追求“新事物”的过程中，1924年堪称重要的转折

点。这一年，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表示放弃帝俄时代所获得的条约权利，得到国人的极大好感。列宁在国人（至少是知识精英）心目中的地位一举超过威尔逊，跃居“世界伟人”之首[139]。与这一转变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国人在政治上对西方的疏离和向苏俄的接近。主张废除旧国会并且对国会制度消亡应负重要责任的国民党领袖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与苏俄接近并效仿其制度的倾向[140]。就是段祺瑞左右，亦不乏极力主张采纳苏俄制度者[141]。以后，在苏俄影响下，激进化的步伐越迈越大，“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越喊越响，以英、美作为样板的“西方的”代议制度的价值自然会被国人“重新估价”。

国人政治思想激进，在审视政治现象时，很容易简单地将人的问题当成制度的缺陷，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而不知道一种制度从建立到成熟完善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国会政治的弊端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政治史上，各国代议制的实施也都出现过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14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意识到有严重弊端，西方国家仍通过改良，保留并完善了代议制度。中国政治家和民众对议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人的道德这一层面，基本没有就制度的弊端作深刻分析，却率尔废除既有国会，并在事实上否定这一制度。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在当时便曾受到质疑[143]。

其实就是人的问题，也应具体分析，未便一概而论。揆诸史实，当时确有不少出卖道德良心，接受贿赂，甘当曹锟政治工具的议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议员，以为曹氏既无袁、段之凶，亦无袁、段之才，推为总统，有利于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并借此完成制宪，将国家带入宪政轨道[144]，其“选”与“贿”没有多少关系。在这些议员中，有一部分人系不满政府多年欠其“岁费”，希望有所补偿，将所得“行贿”经费当成了政府补发的“岁费”[145]。

国人因议员个人行为不端而对国会制度加以否定，明显暴露出对国会在近代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缺乏认识。顾维钧对此深有感

触，他回忆说："（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他特别就国人公开称议员为"猪仔"提出批评，将这种做法视为不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的例证[146]。顾氏所言，对于认识民初国会制度消亡的原因，应有所启发。

正是在一般国人对国会乃近代民主制度的"必要部分"缺乏认识这一思想及政治语境下，当时的政治家得以毫无顾忌地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处置国会，国会制度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消亡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力派考虑政治利益得失的结果。

从反直各方政治关怀角度观察，段祺瑞具有集权倾向，向来不喜欢国会捆绑手脚。担任临时执政之后，为解决财政困难并示好各国，段曾在答应法国要求的前提下解决"金佛郎案"并召集关税会议，但遭到国会议员反对。一些议员甚至反对段祺瑞担任执政，认为段氏执政"在国法上毫无依据"[147]。段氏最终决定以"革命"手段解决国会问题，议员的"不合作"应是重要原因。孙中山在经历长期"护法"之后，此时已放弃"法统"论，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寻求"根本解决"。孙氏之所以放弃"法统"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的人数已十分有限，国会议席对国民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无多少价值，而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则可用党团操纵的方法，对之加以控制[148]。因此，孙中山对国会持极力否定的态度。奉张则于此问题，素不十分重视，其看重的是实际政治权力，无国会可随心所欲，有国会亦可凭借实力实施操纵。反直三角同盟首脑的利益关怀，从政治上决定了旧国会的命运和国会制度的前途，而在舆论上对这一政治决策提供支持的，则是民众业已形成的国会当废的认知。正如国会议员刘以芬事后分析的那样："三角同盟之领袖，其态度既已如此，即令无贿选罪名，而国会能否保存，尚属疑问，况自贿选以后，又为全国所共厌弃乎？"[149]

不过在近乎举国一致的对国会的唾弃声中，也偶尔可以听到一些“国会改良”的议论。1924年初出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面对国会摇摇欲坠的形势，曾明确表示，“立宪国家断不能无国会”[(150)]。就连早就“逆知代议制度不适于中土”，认为“今国会恶名，播于远近，亦无再成之势”的章太炎，亦不以废除国会为是，而主张“改革国会”[(151)]。他们的主张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一些知识人士的思考。他们不满意无所作为、名存实亡的国会，但是又担心没有国会更不利于宪政，不利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所以主张改良国会而非废弃国会。

在当时国人有关“国会改良”的议论中，毛以亨的主张最具代表性。1924年11月，毛氏发表了《代议制革新议》一文。该文首先分析了代议制面临的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对其弊端进行了批评。指出：“代议制之在今日，已岌岌不可终日，革新之议大起。……代议制之见采于吾国，十数年于兹矣。民意既不能代表，徒为少数人捣乱政局之机关与夫升官发财之利器；遂令一般顽民，重兴故国之思，因以启复辟之祸。代议制之飘摇于风雨中也，有自来矣。”但毛氏并不主张废除代议制度。他认为，代议制日久弊生，无可讳言，但是代议制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其内容实质是民主政治。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上看，民主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它所体现的基本政治原则，“不容立异”。“苟欲废民主而返诸君主或采无产阶级专制则已；若仍欲保持民主主义也，则舍保留代议制外，实无它法可以代之者”。毛氏专门就人们仰慕的苏俄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苏俄的制度绝不可取。因为俄国的共产制度已告失败，现在实施的以无产阶级操纵政权，以政党机关代行议会职能的统治形式，不过是一种“狄克推多”制。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氏提出了他的议会革新方案：一是被选举人的资格宜加限制，以改变议会成员不良的状况；二是放宽选举人资格，使妇女劳动二界，均得参与；三是议会应按各种专门议员，分股组织，以便提高议事效率；四是设立立法行政委员会，以寻求两者之间的一致[(152)]。

毛以亨曾是北大学生并留学国外，和梁启超有一些接触，政治上受过梁启超的影响。刊登其文章的《东方杂志》在政治立场上相对“保守”，就是毛所推崇的梁启超，此时也因政治上“落伍”而不被看好。因此，毛氏的“国会改良”主张没有得到政治家和一般社会人士的重视。孙宝琦因曾任前清官员，其主张无人理会，自不待言。就是在舆论界有一定影响的章太炎，亦被多数政治上的新进视为古董，加之章以古代职官来代行国会议员职能的办法，不伦不类，因而其“国会改良”主张，也没有引起共鸣。而另一方面，国会自身的缺陷，国人急激躁进的政治要求，以及实力派的现实政治关怀却在当时的思想及政治语境中被格外凸显出来，形成对国会生存极为不利的政治条件。于是，仅断断续续在中国进行了十三年的国会政治实验也就被淘汰出局，而为内容和形式都截然不同的其他政治实验所取代。

第三节　直奉战后政治格局的变化

1924年初至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政治呈现极其复杂多变的状况。这期间，段祺瑞被推到权力中心的重要位置，又从政治的中心，再度推向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讲，段之显隐起落，成了这两年半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段氏个人在政治上的起落，事事关乎奉张、国民军及旧直系力量的消长，关乎北、南两方及各自内部的形势变化，关乎中央与地方关系及文武关系的变动。段祺瑞不能很好地处理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关系，而外国势力深深卷入中国政治，成为中国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又大大加深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凭借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仓促地结束自己的政治使命，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一　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在政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重文轻武、标榜文治的国家，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丰富了这一传统的内涵与底蕴。清季内忧外患频仍，国

人亟欲寻找应付方略，尚武倾向开始出现。甲午战争以后，国民性改造主张在中国兴起。在稍后的改良运动中，“鼓民力”开始与“开民智”、“新民德”一样受到重视，从而开启了20世纪初国人鼓吹“力本论”的先河。为找回国人丧失殆尽的尚武精神，梁启超专门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希望中国的武士“魂兮归来”[153]。此后二十余年里，中国人从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变化，尚武之风盛行，军人地位飙升。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为民间崇奉的关羽、岳飞正式被北京政府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同列。与此相对应的，是文人实际地位的下降。20年代初，鉴于文武关系变化的现实，于右任尝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154]

然而，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政治语境出现了新的变化，文武关系在清末民初走了一段脱离传统的“新路”之后，明显表现出回归传统的迹象。

首先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人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情绪。通常，战争的破坏程度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成正比。第二次直奉战争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而且规模宏大，给社会造成的灾难空前严重。《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揭露说：“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生命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斲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155]

其次是直系在战争中的失败使人们对“武力统一”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产生了怀疑，有了新的觉悟。当时有人这样分析：“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

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今且以一念之私，蹂躏东南，破坏东北，连天烽火，举国骚然。武力统一之妄想，为祸之烈，至于如此。袁世凯地下有知，当亦自悔作俑之罪也。”(156)

在这种语境下，文治主义思潮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语其渊源，则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标榜“军人不得干政”，遂使幕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157)。王士珍、徐世昌就被视为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158)。不过因为军阀实力过于强大，王、徐辈即便是在被推上总统和总理位置的情况下，也未能真正主政。现在，武力统一政策遭受重大失败的现实终于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实施“文治”的重要性，偃武修文的呼声由是再度高涨。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武关系的变化。不仅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明显壮大，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已经具有鲜明的“国民教育”特征，它在给学生传授现代科学及人文知识的同时，亦注重近代民主意识的培养。从观念更新的角度分析，军阀统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基于武力的政策，但由于思想意识领域“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也带来了相对理性的争论与宣传。大量的报纸杂志得以发行流通，民主政治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吴虬“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一语(159)，清楚说明了当时文武势力消涨变化的原因。

这种文武观念变化的特殊语境使军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避免给人造成“干政”的印象，主张由政治家来决定国家政治问题。例如，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

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160]。正因为如此，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议会控制下的文官政府这一努力的正当性”[161]。值得注意的是，军人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人都有类似表态[162]。

国人在观念上由一段时间极度“尚武”到“右文”转变或回归的趋势，从这一时期军阀的大量通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几乎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自己的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呼吁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兵、呼吁国家统一则成了军阀“电报战”的主题。美国学者拜耶（Lucian W．Pye）曾经对当时督军相互攻击的三百份通电、公共演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了分析统计，其中呼吁道德规范的有三十份（次，下同），拥护民主共和的有三十七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十九份，反对专制独裁的有二十六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十一份，呼吁文官政治的有十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三十二份，要求废督裁军的有二十七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三十八份，主张建立法律秩序的有三十七份，主张实践民权的有九份。总计可以划归“文治”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现了近三百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布告、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某些属于“文治”的政治主张[163]。

一般认为，军阀往往是赳赳武夫，穷兵黩武，然而一个颇为诡谲的现象是，此时军阀似乎更加注重“文斗”。每次对其他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战事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战事也不过月余，但如果从曹锟贿选开始算起，“文斗”的时间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攻击对手是为了“师出有名”，而这个“名”被落实在维护“文治”上，且经常出现“文斗”比“武斗”更加激烈、持续时间更长的现象，这就有些耐人寻味。它说明至少在观念上，被称为“军阀”的地

方实力派不得不以“文治”为国家政治的正常操作模式。

军阀在公开场合承认军人不宜干政，原因十分复杂。中国悠久的文治传统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些“军阀”毕业于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受到西方军政分途制度及观念的影响，亦有以致之。军阀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其是否真正愿意超越于政治当然存在疑问，但既已公开承认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文治主义”就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实际内容。

在地方层面，“文治”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湖南，赵恒惕为“澄清吏治，昌明内政”，在长沙举行县长考试。初试科目为宪法大纲、现行行政法令、设案判断、草拟文牍四项；复试由主试委员任意口试。特邀章太炎担任考试委员长。初试题目之一是：“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体现出明显的“文治”意图[164]。在四川，刘湘于1925年岁末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除军界人士参加之外，会议章程还规定四川148个县每县都有一个文职代表与会。会议最后通过的一项重要决议规定，省内实施文武分途、军民异治，军事领袖不能干预民政，并限制军人以各种借口对人民的自由权利横加干涉。会议虽然没能限制作为军人的刘湘本人对政治的“干预”，但至少对其下属作了某种限制，从而助涨了“文治”的空气[165]。就是在奉张当道的东三省，从1925年2月起亦宣布实行“军民分治”[166]。

中央虽然无力实施像省级政权那样的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但也尽量作出姿态，采取措施，恢复“文治”。1925年2月，执政府通饬各省长官严格考核吏治，规定按《县知事任用条例》，对县知事进行考试，以觇学识，表示“果能认真甄别，不难拔选真才。地方长官用人行政，本有专责，其他军事机关，非职权内所应管者，一概不得干预，以清权限”[167]。对于国家根本建设问题，段祺瑞力主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就是基于对文武关系变化的认识。他在一份通电中说：“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中心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

知其不可，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168] 旨在处理直奉战争遗留问题并谋求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之所以能召开，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在用人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军阀都比较注意网络知识人才，为其所用。例如1924年至1925年进占成都，担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兼摄民政的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169]。在浙江，孙传芳礼聘丁文江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之职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央，政府各部更是充斥着众多的专业人才。例如外交部，就几乎一直是由在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谙习外交事务及外交技术的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唐绍仪、黄郛等人主持部务。顾维钧能够在民初七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并能被不同的政治家接受，显然与他的“专业人才”身份分不开。顾氏记录吴毓麟对唐绍仪的一段谈话，用以说明顾氏自己，也大体适合：“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170]

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事务极其复杂，非单纯具有军事实力的人所能应付。曹锟在一次政治会议上反对吴毓麟等政府成员插手某驻外使节之任命时说：“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171]

不过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大多只是看重他们的一技之长，将他们当作“技术型”人才，安排在专业性很强的部门，而不大愿意让他们参与政治。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有意思的是，被军阀任用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却与军阀

对他们的看法相近。顾维钧就承认："这些年来，像我、王宠惠博士、汤尔和先生、罗文幹博士这样的人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172] 超出这一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当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时，孙传芳"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大体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设"大上海"的计划。但当丁向他提出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建议时，孙传芳却拒绝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173]

更有甚者，一些军阀在公开场合主张恢复文治，实际上仍牢牢操纵着政治的决定权。临时执政府建立之初，不断唱军人不干政高调的张作霖，在现实政治中始终是"外避干政之名，阴行干政之实"。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奉张虽宣言不干涉政治，但彼之意旨，又处处托卢（永祥）转达，请段依照施行，致段每生困难之感"[174]。因此尽管文人成为军阀延揽的对象，也能够被任用，但所从事的工作却难著成效。文人以超越政治的姿态去为政府效力，"并不能制止那些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的军事集团"[175]。而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为协调与军阀的关系，也尽可能地对他们实施优待。例如，1925年夏秋之际，政府财政困难，支出告竭，军人索饷风波迭起。中秋前，政府通过几家银行筹集到一笔款项用于支饷。在分配这笔钱时，政府部门只得到应得款项的40%，而军人则得到应得款项的70%[176]。

这种状况的存在，说明对这一时期文武关系发生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至少在军阀统治区域内是这样。在军阀统治区域内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即便是其中最优秀者如顾、王、丁、颜之流，也只不过相当于旧时官僚机构内"吏"的角色，而不是能够对政治作出最终决策的"官"，等而次之者则只能充当类似"幕僚"的配角。因而，尽管文武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弛张变化，文治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人提

出“以文吏驾武人”的主张[177]，但许多人仍不敢奢望通过政治家或通过国民会议的方式完全实施文治，因为武人在中国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仍十分突出。

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作“中国当今十二位伟人”（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问卷调查，结果侧身前十二名的人当中竟有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黎元洪等四位军阀出身的人。陈炯明排名第十五位，段祺瑞排名第十六位。进入前十二名的尚有孙中山、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蔡元培、张謇、胡适、余日章等八位文人及政治家[178]。这次调查表明，虽然国人在观念上已更加认同文士，但武人的地位仍不可低估。章太炎在给《癸亥政变纪略》一书写序时说：“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骄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179]这应该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这就提出了废督裁兵、实施文治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的问题。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分析，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军人干政的政治局面形成之后，有时军人暂不干政，政局尚有难以维持之虞[180]。另外，主张文治者提出“废督裁兵”，用意虽好，但被裁之“兵”通常都转变成匪。兵虽作恶，毕竟有所节制，若沦为匪，危害更大。尽管主张文治者提出了“化兵为工”的办法，但限于资金及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可操作性也不大。

于是主张文治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多少具有书卷气的军阀身上，企图通过这些介于文武之间的政治角色，达到实施文治的政治目的。在湖南，从20年代初开始，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三个秀才分别是指具有“秀才”和“军阀”双重身份的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181]。杨荫杭曾把尚文的军人称作“有力之优秀分子”，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182]。当时不少文人都在致力于争取“有力之优秀分子”，像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很明显就包含了这样的用意。甚至共产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下，在南、北分别做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工作。

而军阀也纷纷做出“文”的姿态，以争取得到社会舆论的青睐。张作霖、张宗昌等没有现代文、武学堂背景的武夫固然无法附庸风雅，稍有这方面背景者，都尽量表现自己。例如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之后，曾作《内感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表明政见及心迹，虽然遭到一些人挖苦嘲笑，但也赢得了慷慨赠送谀词、称之为“武人中之能文者”的个别捧场者[183]。

这种情况自然的逻辑结果，是中国政治出现了军阀、政客两相勾结，共同为恶的局面。《国闻周报》发表社评指出：“今蠹国之物有二，即军阀与政客是也。军阀已至末路……而政客之掀风作浪，尚未有已。政客依军阀为活，复乘军阀之弱，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而居中渔利焉。东南之事，自齐燮元投奔上海，本可暂告段落，孙传芳苟延浙江，亦不至遽敢兴戎，而彼辈政客，日事包围怂恿，……于是无端风浪，复起上海。人民罹难，政客实为之祟。……军阀政客，相依为命，我民苟能致力于推倒军阀，则政客亦将失所凭依，而欲速推倒军阀之成功，则政客毒物，尤当有以惩创也。”[184] 这段评论的提示性含义在于，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军阀的黩武政治，对于“文治”，也应当在内涵上有所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南、北两方在这一问题上已开始出现某些重要差别。在北方，在旧北洋系统的权力范围内，尽管文治呼声再度兴起，但文武关系并没有转变到政治可以由政治家来讨论决定的程度。然而在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内，情况却有异于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政治军事决策。正如任职北方的顾维钧所言：“作为对手的国民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文武双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党派的一部分。”[185]

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文武合流”这一变化的出现，使“文治”开始

有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已设法改变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一支承认中国文官政治传统，在体制上从属于文官政府的军队，将“武功”仅仅视为恢复“文治”的手段。为区别于军阀单纯的军事力量，“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郑重地提了出来。

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军人必须“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186]。李宗仁在九江牯岭与蒋介石讨论革命方略时，亦申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张“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187]。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革命军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虽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南方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如李宗仁所愿，由“党军”蜕变为“国军”，但“党军”较之同时代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

当然，国民党意识到这一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国民党一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从事军事行动。在“联俄”过程中，孙中山曾希望说服苏俄支持其在蒙古建立反对军阀的根据地，组织新军，但遭到苏俄拒绝。莫斯科甚至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军事斗争的失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福音”，要求孙中山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政治斗争”[188]。俄国的意见，虽然有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毕竟说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要害，是符合当时中国文武关系转化的特殊语境的。受苏俄影响，也鉴于单纯军事斗争一再失败的教训，国民党最终接受了苏俄的意见，在从事军队建设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党建设和“主义”的宣传。这一变化，使南北双方斗争的整体态势为之改观。

如果单就军事力量而言，广东国民政府方面显然居于劣势。但北伐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较量，在北伐的刀光剑影背后，还隐伏着一

场激烈的政治上的高下之争，这就是近代的“黩武主义”与传统的“文治主义”的较量。南方要想在军事力量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获胜，其克敌制胜的“法宝”显然只能到军事领域以外去寻找。在这方面，国民党人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一类宣传，不仅使国民革命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有主义”的军队形象，而且起到了动员民众的社会效果。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可以从南、北双方在这一问题的差别上获得部分解释。

二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清季以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家深感棘手的问题。清末实施立宪，地方成立咨议局议决地方事务，使乡土观念本来就很强的国人愈发看重地方利益。武昌起义发生后，各省以宣布“独立”的方式响应，事后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权，但各省的“独立”已显示出地方意识的潜滋暗长。民国肇建之初，因袁世凯北洋势力强大，中央积极有为，地方势力暂时受到压抑，没有多少表现自身意志的机会。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地方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自行其是，呈现出类似“五代”时期的分裂局面，而掌握中央权柄的军阀政客又不甘心政权虚设，极力奉行不同形式的“统一”政策，致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呈现极其复杂的局面。

1923年10月，曹锟以贿赂当选总统，使本来就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且不论不承认曹、吴统治合法性的奉张、浙卢、皖段和广东国民党政府（曹、吴将他们视为“地方”，力图将其纳入统治的范围；他们却自视为“敌体”，试图取而代之，根本就没有将曹、吴政权视为中央政府），就是暂时聚集在直系麾下的各省军阀，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使唤，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十分明显。

为了安抚内部，同时为了对付东北及西南等方实力派，就任之后，曹锟即“重以职权”，将酝酿多日未决的直鲁豫、两湖、苏皖赣三巡阅使分别让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担任，加上同年任命的热察绥

巡阅使王怀庆，闽浙巡阅使孙传芳等，直系的统治区域实际上已形成“列土分封”的局面[189]。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每个巡阅使都力图对中央行政具有一定的支配权，也就是说，他们都希望成为政权中枢的主体。但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又独自构成一个政治、经济及军事单元，彼此为发展势力而争夺，各自确定势力范围。1924年直系统治范围内的吴佩孚、齐燮元之争即凸显了这样的特征。《甲子内乱始末纪实》的作者分析说：“吴氏握有黄河流域，而扩其实力于长江上游，日为武力统一之计划，对西南做功夫，谋粤、谋川、谋湘，到底不懈。齐氏以后起之人，欲加吴而上之，故年来对闽对粤下功夫不少。前此王永泉在闽，齐为援助，今又谋利用孙传芳，而陈炯明方面齐亦与往来，匪伊朝夕者。其欲与吴平分西南之功业所不待言，而其对浙计划，则一面谋扩张长江上游之势力，以与吴抗衡；一面有以今之反直者为浙与奉，奉事吴任之，而急切不能下手且奏功较难，齐遂欲先取两浙，自建大功，而又成于吴氏取奉之前，以为驾吴而上之计。江西一隅既划入彼之巡阅区内，亦欲实行统一，以与吴氏属下之湖北划一鸿沟。此齐不甘居吴下之雄心，即吴之所大忌也。”[190]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曹锟统治被颠覆，段祺瑞在反直三角同盟的“拥戴”下登上临时执政的位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变化。这时，段祺瑞已丧失早先所具有的军事政治实力，拥戴他的各方也没有一方像吴佩孚对待曹锟那样有着至少能尽其“愚忠”的“臣属”的自我定位。所谓“非段莫属”的表态很大程度上乃各方相持不下时达成的妥协。因而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类似他人政治傀儡的尴尬地位。段具有政治抱负，当然不甘受人支配，曾竭尽全力确立中央政权的名份与地位。召开善后会议就是他整合北洋各派系使之重新纳入自身权力体系的一次努力，但未著成效[191]。此后段氏只得依靠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维持统治，这使中央政府进一步丧失了对地方政权的支配力量，形成中央权力弱小而地方权力偏大的政

治格局。

在此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政治权力重心发生转移，北京所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前。过去北京乃京师重地，是中国政治权力的重心所在，一切上升性的社会流动都指向北京。到北京去的人总不免怀着某种“朝圣”心态，历朝历代的“觐见”制度，就是利用臣民对于“圣上”和“京师”的敬畏而制定的。然而这种状况在几年间就变成了昔日的辉煌，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已经暮色笼罩，紫禁城更是夜色惨淡。唐绍仪1924年11月27日的一次谈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京所发生之事实，于全国无重大影响，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国，且不能统治全国。当今急务，在乎联合各省成就一种结合，庶日后渐能遵从合宜之当轴。历来北京政府从未为此，且亦未尝图及，不过推翻某某军阀，迎入某某军阀，以暴易暴，徒事激起内争而已。”[192]

与北京地位下降相对应的是地方在国家政治中发言权的扩大。其中东北地位的上升尤为引人注目。控制东北的奉系原先不过是直系旁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一跃成为最大的实力派。张作霖在战后虽曾表示，“既〈负〉助段氏出任以收拾时局之责，则三省之取消独立，服从中央，是当然之事”[193]，并作出返回奉天，避开政局中心的姿态。但他对中央政局的操纵控制是路人皆知的。首先是派奉军入关，并指示高维岳统帅的第七师进驻北京，名曰“拱卫京师”，实则要挟中央[194]。其次是对中央财政实施监督控制。先拟改组财政中枢，以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未成；又以东北“某案”为借口，提出收回巨额现款的要求，甚至向中央提出“彻查收支”的恐吓，迫使财政总长李思浩托曹汝霖“携带财政部帐簿赴奉”，说明情况，以求奉张谅解[195]。加上早先就已存在的对于中央的“司法独立”[196]，事实上出现了东北可以干预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反过来过问其境内事务的局面。邓如琢通电指责奉张“挟执政以令藩封”[197]，堪称言中窾要。

其他地区的实力派亦纷纷实行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

提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例如，孙传芳曾以“尊重浙人公意”为由，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作为地方建设的一部分，孙传芳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大上海计划”，要将租界之外的上海地区建设成一个可供其他地区效法的“模范城市”以及远离国内战火的“非战区”[198]。在四川，至迟在1926年，青年军人及知识界人士提出的“川人治川”口号得到了实现。“虽然不能说四川人完全统治了自己的省份，但至少那些掌权者都是四川人。自治理想已成为现实：四川出生的领袖确实掌握了本省事务，并且将这一权力行使近十年之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四川已从中国的国家政治中正式退出”[199]。担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此时亦积极致力于筹划地方建设，奉行“大西北主义”，力图将陕甘建成独立行使权力的区域[200]。一些地方实力派为寻求统治的稳定，要求各方严守疆界，公开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201]。更有甚者，由萧耀南、岳维峻等发起召开的旨在洽商“联防”的鸡公山会议，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居然被北京国务会议视为“宗旨正大”，主张“不必干涉”[202]。

作为中国政治区域化的重要表征，政治权力分配上的地域排他性也逐渐凸显，一些实力派人士提出的“由某省人督某省”的口号开始在较大范围内被接受。北京政变不久，陕督刘镇华即致电段祺瑞，请调河南，而以胡景翼督陕，其理由是自己为河南人，胡为陕西人。另外，李景林继王承斌督直，亦以其为直隶人。张作霖派张宗昌赴山东接受德州兵工厂，因张宗昌系山东籍，故张作霖决定以之督鲁[203]。这种观念甚至在孙中山身上也有体现。在与方本仁争江西时，孙派江西籍的李烈钧“回赣”主持军政，理由是李与“赣中诸将甚稔”[204]。这表明他多少认同（或是有意识地利用）了当时人们的地方意识。这种“由某省人督某省”的主张及其在政治中的实施，对旨在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因裙带关系而产生政治腐败的传统“避亲避籍”制度，是明显的突破，它有利于地方势力的增强，却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软弱无力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一些有“问鼎”之志的“地方政权”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更加剧了这一时期政治区域化的特点。广东是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的，虽然在此之前，它“没有明明白白与北京脱离关系”，实际上仍然处于“地方政府”的地位[205]。但是，广东政权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已经完全自行其是。此后直至1926年北伐之前，国民政府都一直致力于两广地区的建设，使该地区在事实上脱离了中央政府。顾敦鍒说，当时“不但独立各市，在事实上都脱离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以省政府为最高的监督机关，在法律上也进一步取得同样的地位”[206]。这种说法，可以通过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一年多时间里的政治状况，得到证实。

随着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力逐渐被抽成真空。此时，严格意义上的中央军权已不存在，掌握军权的是分散各地的实力派。陆军部和海军部不仅没有直接统辖的军队，对各省军队也没有调度指挥权。孙中山指示李烈钧不就执政府的参谋总长职而争江西地方职务[207]，充分说明中央军事职能部门在地方实力派人士心中的地位。

地方权力的分配也体现了实力派的操纵控制，争执异常激烈。像苏、直、豫、鲁、赣等省军民两政长官的任命，与其说是中央的安排，不如说是地方实力派意志的体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实力派无视中央，自我委任，陈调元宣布自任苏督，王桂林宣布自任江苏省长就是典型事例[208]。在财政方面，地方更是自行其是。1925年1月，段祺瑞通电各省，要求务于旧历年内酌解款项至京，以济中央要需。除了山西的阎锡山汇解60万元，山东的郑士琦承诺“即解数万”之外，多数省份对电令都置之不理[209]。不仅如此，地方实力派还纷纷截留本应交纳中央的税款，段政府虽甚为不满，却无计可施[210]。到了这年年底，财政部穷敝到了连“一百元之款亦不能开出”的可悲地步[211]。

中央政府处于虚置状态，国家政局遂以地方实力派的意志为转移，直接受到地方的支配。在北方，近两年的时间里政治的焦点都集

中在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关系上。冯玉祥为反张而运动郭松龄倒戈，同时欲与吴佩孚捐弃前嫌，共谋大计。出于“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的考虑，冯采取了包括政变在内的一系列“倒段”措施，殊不知却促成了奉张与旧直系的“合作”[212]。在南方，则有孙传芳起兵讨奉。这两起事件，使标榜和平统一的段祺瑞执政府威信扫地。萧耀南鉴于段不能继续利用，对于吴佩孚不再继续排拒，吴遂得以从岳州而至汉口，在查家墩设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借此东山再起[213]。之后，直系政客形成“拥曹”与“护宪”两派。吴派政客提出“大帅所在，即中央所在”之说[214]，使原先就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复杂化。吴佩孚采纳护宪之说，与张达成“吴不拥曹，张不戴段”之约[215]，于是形成冯玉祥和奉张都不再拥段的局面。显然，北京政变后两年的中国政局，都是在地方实力派的操作下发生变化。本应在政治上“执牛耳”的临时执政段祺瑞，此时只能依违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作需要他人驱动的木偶式的政治表演。

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在客观上有利于“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center oriented regionalism）[216]，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前具有的“中央方向”。这使政局呈现极为动荡不稳的状况。大局变化的周期由民国初期的三四年变成两年甚至一年[217]。段祺瑞很快陷入统治困境。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其与徐世昌相比，指出段氏“已入十年东海境地”[218]。时论也将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府”[219]。以后段的处境越发困难。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北京频频发生民众“驱段运动”，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南方国民党人开始利用时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220]。“三一八”事件之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统治更加穷途末路，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成为地方实力派的天下。1926年4月20日，临时执政府统治宣告终结。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被推倒之后，张作霖、吴佩孚暂时保留了临时执政府的统治形式。北伐前夕中国的政治格局，就派系而言主要有奉

张、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重新崛起的旧直系，以及占据两广的国民党系四支力量的对垒；就政权而言，除了由颜惠庆主阁、被奉张操纵的“中央”政府之外，尚有江苏的孙传芳政府、武汉的吴佩孚政府、湖南的赵恒惕政府，以及广东国民政府等多方政府、多种政治力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养精蓄锐，广东国民政府逐渐巩固了后方，力量壮大。而北方军阀则在频繁的战争中消耗了实力。南北对峙的局面再度形成。此时，北方政局之支离破碎，达到民国以来最甚程度，这为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盖不待北伐军起，北洋军人政府，已自行瓦解矣”[221]。

三　外交与内政混一政治格局的形成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形成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殊格局，外国势力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变化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上的关联。北京《远东时报》主笔当时所说的一句话，“如在中国的中心要开一枪，没有不射着外国的利益的”[222]，堪称这一政治现象深刻而又形象的说明。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列强新一轮争夺的场所。当时在华争夺的国家，“大抵英、美为一团，日、法为一团，俄国则异军突起，另造一特殊地位”[223]。日本与英、美利益不能协调，是当时列强在华争夺的症结所在。日本在经济上将中国东北三省作为根据地，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华南和长江流域它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北部“政治中心”地区则与美国是“死敌”。日、美两国在诸如移民问题上的矛盾，以及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年以来曾经有好几次的显露冲突，常引起世人所谓‘太平洋上之大战的幻想’”[224]。俄国则因革命后在政治上自成一体，与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

这种本属各国之间在华的外交争夺，很快就演化到中国的内政上。1924年9月发生的江浙之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曹锟贿选之

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江苏虽在直系支配之下，但上海却为日本支持的浙江军阀卢永祥控制。这显然是英、美和直系都不能容忍的[225]。卢永祥兵败之后逃到日本，随后张作霖入关与直系争雄，于是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与参战双方背后列强之间争夺的联系，中国共产党1924年9月发表的时局宣言指出："我们可以推定这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226]

事实上，不仅战争的结局会造成列强中的一方支配中国政治，在整个直奉战争中，列强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赵世炎的看法："北京事变明明是日、法帝国主义外交之胜利，是日、法与英、美两派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战争，继而因日、法援助张作霖军事而得胜利，结果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法妥协，弄成了现在的局面。"[227]作为战败的一方，吴佩孚辗转退到长江中游一带，最终也在英、美支持下，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对此孙中山分析说："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之后，退到天津，本是途穷末路，国民军本可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228]

事实表明，军阀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列强之间的争斗。时人批评中国军阀驱使士兵在战场上交锋"公然像'两国相争，各为其主'"[229]，言词虽稍嫌激烈，却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事实。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段祺瑞组建临时执政府时，外国因素的影响亦十分明显。政变不久，列强就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新政府问题"[230]。段祺瑞后来以临时执政身份入主北京，身后就有日本支持，英国方面也是默认了的。差别在于日本人所需要的是段祺瑞的"狄克推多"；而英国人则倡导"和平会议"，亟欲使"道威斯计划"在中国实施[231]。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的"外交承认"问题上，

列强插手中国内政的意图更加明显。曹段代谢本来只是政权转移，并非国体变更，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原无所谓外交承认问题。外交团所谓“承认”，是企图要挟中国对“金佛郎案”作出让步。恰恰孙中山此时应段祺瑞之邀北上，极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声望日高，形成在政治上压倒段祺瑞的优势。列强虽不愿失去要挟段祺瑞的机会，但更不愿孙中山掌握政权，于是本来准备采取拖延方式以要挟段祺瑞的“承认”问题，遂因孙中山宣传“反帝”而得到顺利解决。其间外国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十分明显[232]。

后来郭松龄反戈之“奉变”发生，在冯玉祥的主张下，段祺瑞拟修改临时政府制，设责任内阁，并做出准备“通电下野”的姿态。在此形势下，委员制呼声又起。因委员制多少带有“苏俄政制”色彩，列强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外交团对黄郛声明，如中央政府采用委员制，即下旗回国”[233]，致使委员制主张很快销声匿迹。就是直接导致段祺瑞政府垮台的“三一八”事件，也是因为列强在国民军与奉、直军阀的战争中，支持后者，引发大沽炮击事件，八国公使团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激起中国各界的愤怒，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所致[234]。

中国政治中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征，《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分析得十分透彻：“民国十三年，战乱相寻，杀戮无穷，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人但知由于军阀之攘权夺利，而不知尚有由于外人之竞争势力；但知军阀与军阀相争，而不知尚有某国与某国暗斗；但见国内军阀之此起彼仆，而不知尚寓有外国势力之互为消涨。……即如最近战事，说者谓江浙之役，促成于导淮借款，金佛郎案若成，曹吴之败，不至若是之速。北方局面之变换，无异于某国战胜它国。扬子江流域，以英人之势力范围，而竟成护宪政府之策源地。战事中，英美与日法新闻机关之针锋相对之宣传，无不显示列强对华外交方针之分歧。而内争中搀杂外交意味最浓者，亦当以此次为甚。外人既亲投火种于中国，致招焚如，则复转而科主人之责任，勒索其赔

偿，要挟其利权，既乘风打劫于烈焰之中，复多方刁难于灰烬之余。……民国以前之痛史，无不因内乱而招外侮，民国以来之痛史，则因外交而致内乱不戢，复因内乱而致外侮迭来。外交乎，内乱乎，国人固当知所注意，而今后政府之外交政策如何，尤当为将来内乱与否之关系所在矣。”(235)

外国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存在从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政治内涵的改变：一方面是外国极力干预中国政治，将列强的意志强加于中国政治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力量有限，中国政治家在实际政治中往往寻求外国的支持与帮助，南北皆然，于是造成外交与内政混一的奇特状况。《市声周报》时评结合郭松龄倒戈后日人助张抑郭，致使张作霖转败为胜一事，将此情状一语道破：“吾人以帝国主义存在，改革内政必无希望。盖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236)

这种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的特殊政治语境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使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反帝”对于中国命运前途的重要性。“五卅”前后一波接一波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即其表征。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反帝问题上表现最为激进。从发表《北上宣言》起，直到去世，孙中山北上途中所发表言论的基调几乎都是“反帝”，并明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变更外债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外债将中国置于“次殖民地之地位”等具体主张(237)。

由于外国势力对不同政治军事集团的支持，当时中国已呈现类似五代的分裂气象，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成为急务。于是“攘外”与“安内”或“废约”与“统一”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引出各种不同的回答。《国闻周报》社评指出：“近代国家，内政与外交常互相维系，不能分离。故善于谋国者，首务修明内政，然后折衷撙俎，乃有所恃而立于不败之地。”(238) 孙中山也主张先安内后攘外，这一权衡使他不惜在谋求统一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寻求外国尤

其是俄国和日本的援助。

章太炎一类思想家却选择了借“攘外”以“安内”政治取径，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攘外”，因为这一努力的成功有助于在国内建立统治威信。章氏很早就意识到，在列强环伺的形势下，中国国内处于角逐状态中的实力派不用说将列强全部打倒，只须战胜其中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239]。这一思想被章氏贯彻始终，但其“安内”的手段不是实现大一统，而是地方自治。“五卅”之后，章氏将“攘外”上升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以致为达目的不惜暂时支持自己并不拥戴的中央政府及段祺瑞。当唐绍仪与章太炎商量倒段时，章太炎态度十分明确：“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内争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240]

由于国民党方面在高扬打倒帝国主义旗帜的同时，积极从事“联俄”的工作，这就在“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讨论中派生出一场有关苏俄问题的争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中国究竟是应该“联俄”，还是应当在“反帝”的口号下将苏俄一并加以反对[241]。

苏俄很明显已深深介入中国事务。据学者研究，20年代初，苏俄对华外交经历了由重视吴佩孚轻视孙中山，到同时联络吴孙、争取二者合作，再到弃吴取孙的转变[242]。在谋求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与北京政府举行谈判过程中，苏俄曾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例如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外长顾维钧坚持要俄军立即撤出蒙古，否则双方不展开谈判。苏俄代表越飞利用洛派对北京的影响，向吴佩孚表示顾维钧是无法对话的谈判代表，要求吴对政府施加影响，撤掉顾维钧，“起用另一个更适合的部长去代替他”。与此同时，苏俄又利用中国的南、北矛盾，加紧与在广东开府的国民党方面接触，希望孙中山“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243]。双管齐下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作出不将苏俄从蒙古撤军作为谈判先决条件的重大让步。

这一事实，使章太炎等强调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有理由将苏俄视为“攘”的对象。由于当时不少人认为苏俄的“帝国主义”色彩是赤色的，故又引发了中国政治中“赤化”与反“赤化”之争。所谓“赤化”的内涵就是苏俄的“共产”制度，就是共产党正极力宣传的种种主义。由于国民党实施“联俄”与“容共”的政策，故国民党也沾上了“赤化”嫌疑。此外，同苏俄多有接触的国民军也被目为“赤化”。蒋介石与冯玉祥则被视为“南北二赤”，就连张作霖对他们的攻击也打着反赤的旗帜：“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并石敬瑭而不若”，“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信奉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244)]。

章太炎等人没有看清楚，其实“赤化”在多数国民党领袖那里，也不被认同。孙中山与越飞发表的联合宣言曾明确宣称，苏俄的共产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因而国民党的“赤化”，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国民党表面上的“赤化”，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构成对自身的伤害，故其自我保护手段之一就是为自己的“赤化”辩诬。但“赤化”的形象和色彩，又会对众多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不得志的阶层（包括南方下层社会成员及青年学子，以及北方的部分知识精英）产生亲和力，从而造成“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在党军旗帜之下”的局面，这是北方实力派及反“赤化”人士始料未及的[(245)]。

不管各方存在多大分歧和误解，在外交与内政混一局面形成，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反帝”已成为社会多数群体的共同认知，少有歧议。而对当时国内政治力量中的任何一方来说，仅仅依靠自身的微薄力量去实现“反帝”和“统一”都不现实。因此，如何在“反帝”前提下争取来自境外的支持，处理好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援这一矛盾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好比是一块政治平衡木，谁能在上面立住脚跟，谁就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军事角逐中获胜的一方。

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孙中山显得技高一筹。十月革命成功之

后，苏俄曾两次宣布将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外交宣言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京大学所作民意调查中，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被调查者心中的“世界第一伟人”，清楚显示了这一做法的效果[246]。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鲜明地打出了“联俄”旗帜。鉴于多数国人并不能将“联俄”的政治行为与军阀援引列强的举动加以区别，孙中山在实施“联俄”政策时十分小心。其具体做法是强调苏俄主张“废约”的一面，宣称苏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并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以此淡化“联俄”在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影响，同时又不至影响与苏俄的关系。

这一做法成效显著。众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苏俄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选择。苏俄谋求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借中国的外交承认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并向其境外推进“世界革命”计划。因此，苏俄愿意有条件地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孙中山准确把握了苏俄的意图，推出“联俄”政策，也就收到一举两得的功效，实现了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来援助的统一。

但对其他政治力量来说，在将苏俄排斥在一边的情况下，将面临两难境地：要想得到外国人的支持援助，便可能因不能坚持“反帝”立场而丧失民众支持；而坚持“反帝”立场，又难以得到期望的外国援助。即便不将“外国”看成一个整体，而实施联络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以反对另外的列强的策略，也同样会因为实际已丧失“反帝”立场而不能得到国内笃信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同情，在实现统一的民众动员方面居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反帝”口号作动员并因此得到民众拥护支持，又有苏俄经济、军事援助的国民党在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中占据优势，是不难预见的。

---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02页。

(2) 《冯玉祥与柯乐文谈话》，《申报》1924年11月8日。

(3)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02-203页；《袁良致褚辅成函》，《申报》1924年1月22日。

(4) 《易培基长教之由来》，《申报》1924年11月16日；《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1月13日。

(5) 尧日：《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

(6) 《东三省要人为张办寿》，《大公报》1925年3月6日。

(7) 如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炯明，西南方面的唐继尧、熊克武、石青阳、但懋辛、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甘肃督军陆洪涛，陕西的刘镇华，山东的郑士琦，浙江的孙传芳，湖南的赵恒惕，安徽的马联甲，热河的米振标，察哈尔的张锡元等，都电请段祺瑞出山。当时的一篇报道曾明确指出："此后可代曹吴政府之联合势力中心人物，除合肥之外，当无它属。此乃中外所公认者也。"（《段合肥与本报记者论时局》，《顺天时报》1924年10月24日）

(8) 《论段张冯的外交战》，《日日新报》（日文）1924年11月19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页。

(9) 《政治重心之天津》，《申报》1924年11月18日。

(10)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日。

(11) 《唐绍仪主废总统制》，《顺天时报》1924年10月31日；《唐绍仪对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5日。

(12) 《章太炎再发表改革意见书》，《申报》1924年11月15日。

(1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54页。

(1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1月13日。

(15) 详见季宇著《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16)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页。

(17) 《滇唐对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8) 《国会开非常会议之猛进》，《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

(19) 《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执政府与委员制》，《申报》1924年11月26日。

(2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54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第202页。

(22) 《张作霖等人通电》（1924年1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1478页。

(2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55页。

(24) 截止11月6日，已有21省区疆吏通电拥戴段祺瑞出山，奉张、国冯及其主要将领，亦通电敦促，造成在拥段问题上“全国一致”的形势。（尧日：《段祺瑞应时而兴》，《申报》1924年11月14日；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20-21页，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

(25)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1924年11月21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页。

(26)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1月25日。

(27) 《临时法制院官制》，《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2月3日；《临时法制院办事细则》，《北洋政府公报》1925年1月12日。

(28) 《临时参政院条例》、《修正领事参政院条例》、《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北洋政府公报》1925年4月14日，5月2日、4日。

(29) 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23页。

(30)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6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267页。

(31) 参阅诚夫《收拾时局与环境》，《国闻周报》第2卷11期，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14页。诚夫将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与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西南军阀视为一派，似不恰当。本书根据派系分野的实际情况，作了适当调整。

(32)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2卷7期，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第97—98页。

(33)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82-283页。

(34) 《奉张对中央政局之悲观》，《顺天时报》1925年1月18日。

(35)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2月26日。

(36) 《时局中之悲观》，《益世报》1924年12月4日。

(37) 《王楫唐通电取消安福党》，季啸风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38) 这一点，连冯玉祥自己也有所感受，他在日记中写道："段公上台对军事不敢以命令式指挥，所以他夹于两大势力之间，凡事均不好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7页）

(39) 《张学良对日记者团之谈话》，《申报》1925年2月13日。

(40) 《天津会议正讨论军事》，《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5日。

(41) 《王楫唐通电取消安福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册，第239页。

(42) 据丁文江统计，截止1925年9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已达8万，加上岳维峻及孙岳部下，全部国民军的人数，应不下30万人，而奉军8部，共计35万人，从数量上看双方已较为接近。（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407页）

(43)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4) 《捉拿吴佩孚之代价》，《顺天时报》1924年10月31日。

(45) 《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4日。

(46) 冯玉祥亦意识到张作霖对自己不放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吴佩孚与我为良友，我既将其推倒，张雨亭何能放心于我？若不放心，将来尚不知发生何事。"（《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59页）

(47) 《吴佩孚致冯玉祥书》，《申报》1924年11月29日；《冯辞后之

中国时局观》，《申报》1924年11月29日。昔日吴虽参与倒段之役，“然平居恒认段为中国唯一之当国人物”，其效忠曹锟，系束缚于旧礼教之缘故，而非敬重曹之才能。故只要冯辞职，其拥段是完全可能的。

(48) 《段对吴刚柔并施》，《晨报》1924年12月6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第274页。

(49) 《吴佩孚对于时局之表示》，《晨报》1924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第251页。

(50) 杜春和等整理：《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9页。

(51) 《最近的政局》，《中国青年》第54期，1924年11月。

(52) 诚夫：《西南大局之趋势》，《国闻周报》第2卷7期。

(53) 滇唐、湘赵等与在上海的唐继尧、章太炎等在联治问题上的呼应，可参阅汤志钧著《章太炎年谱长编》中收录的有关章氏的言论及时论，见该书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9—804页。

(54)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6日。

(55) 截止1925年1月上旬，奉张向段政府举荐之人有：于冲谟，荐为驻日公使；朱庆澜，荐为直省省长或京兆尹；王大中，周大文，所荐职官不详，然其受张推荐则属实。参阅《张作霖向段举荐之人员》，《申报》1925年1月10日。

(56)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月1日；《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45页。

(57) 《昨日之三道执政命令》，《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5日。

(58) 公展：《北京政变记》，《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册，第972—973页。

(59) 《北京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2日。

(60)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54页。

(61)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月1日。

(62) 《奉张无更易直督意》，《顺天时报》1925年7月20日。

(63) 《北京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2日。

(64) 《张宗昌督直与李景林长直》，《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4日；

《李景林就任直长》，《益世报》1924年11月18日。

(65) 《李景林作战之前因后果》，《市声周报》第4卷第1期，《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80—281页。

(66)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407页。

(67) 《新皖长王楫唐昨日抵京》，《顺天时报》1924年11月30日。

(68) 《苏长问题内容尚极复杂》，《晨报》1925年3月21日；《苏绅之拥卢电》，《顺天时报》1925年3月22日。

(69) 《卢永祥辞呈昨日送府》，《顺天时报》1925年7月15日。

(70) 《大批疆吏发表之经过》，《晨报》1925年8月31日。

(7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6页。

(72) 《西报论中国内乱》，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8页。

(73)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499页。

(74) 《旧直系之现在与将来》，《顺天时报》1925年8月19日。

(75) 随波：《段祺瑞入京前之津讯》，《申报》1924年11月25日。

(76) 《北京通讯》，《申报》1925年1月16日。

(77)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第28页。

(78) 管美蓉：《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230页。

(79) 《褚辅成等出京之宣言》，顾敦鍒 《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上海书店据苏州渎心正堂1931年版影印，第368页。

(80) 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09—210页；陈九韶：《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37页。

(81)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91—94页。

(82)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94页。

(83) 《内务部强制执行撤换众议院警卫》，北京《晨报》1923年12月

21日；《吴景濂昨日出京》，《顺天时报》1923年12月22日；《吴景濂出京》，《益世报》1923年12月22日。

(84) 宋教仁：《致北京各报馆书》，《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1页；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85) 杨天宏：《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异同论》，《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91—99页。

(86) 《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政府公报》1924年1月6日。

(87) 根据《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19册“议事录”、“委员会记事”、“速记录”、“公文”、“建议案”、“法律案”、“提议案”统计。

(8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议院法》中有关国会弹劾总统、国务员的规定，以及《中华民国宪法》对于议会这一权力的重申，见《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第682、707、737页。

(89) 梁启超：《同意权与解散权》，《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90) 《参议院审判规则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法律案”，第1—4页；《参议院审判委员会组织规则案》、《参议院审判法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6册“法律案”，第1—8页。

(91) 《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法律案”，第9—22页。

(92) 《张树枏议员之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法律案”，第9—22页。

(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页。

(94) 当时的国会文件表明：“参、众两院对于此事，均提有质问书，而国务院迄未答复。”《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31页。

(95) 《陈寿如议员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14页。

(96) 《郑江灏议员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16页。

(97) 《国务总理孙宝琦答国会质问》，《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

记录”，第32页。

(98) 《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页。

(99) 《片马救济策建议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建议案”，第1—8页。

(100) 《咨国务院送达议员何畏等片马救济策建议案文》，《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6册“公文”，第3页。

(101) 参阅刘培华：《近代中国外交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292页。

(102) 《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5页。

(103) 《议员潘江、陈铭鉴、郭步瀛等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19—22页。

(104) 《议员龚焕辰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29—30页。

(105) 诚夫：《处置贿选议员之我见》，《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106) 《冯玉祥对国会之措置难》，《申报》1924年11月16日。

(107)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25日。

(108)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页。

(109) 《段合肥对非常会议之意见》，《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7日。

(110) 《段祺瑞就职情形》，《申报》1924年11月30日。

(111)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4日。

(112) 《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0页。

(113)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9日。

(114)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3页。

(115)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139页；《国会议员请监视曹锟》，《申报》1924年11月13日。

(116) 《移沪国会议员昨日开会》，《申报》1924年11月11日。

(117) 《国会开非常会议之猛进》，《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

(118)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7日。

(119)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2日。

(120) 《众院紧急会议无结果》，《申报》1924年11月14日。

(121) 《北京电》、《众院向财部索薪》，《申报》1925年1月15日、31日。

(122)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9日。

(123) 《昨日大捕贿选议员》，《晨报》1924年12月1日。

(124) 《法庭昨日实行检查众院》，《顺天时报》1924年12月9日。

(125) 《执政府表示革命行为》，《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5日。

(126) 《推翻法统之三令尚难即下》，《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6日。

(127) 《取消法统命令已搁浅》，《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7日。

(128) 《取消法统命令已搁浅》，《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7日。

(129) 《取消法统令解决有待》，《晨报》1924年12月3日。

(130) 《政府公报》1924年4月25日。

(131) 《非常国会不能自由开会矣》，《晨报》1925年4月28日。

(132) 顾敦鍒：《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第407—408页。

(133) 《林长民之宪法起草谈话》，《顺天时报》1925年10月15日。

(134) 顾敦鍒：《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第407—408页。

(135) 诚夫：《处置贿选议员之我见》，《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136) 《总商会对于时局之两电》，《申报》1924年11月17日。

(137) 《北京公联会对于国会问题之通电》，《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38) 参阅罗志田著《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81页。

(139) 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在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得51票居第二。这一投票结果很能反映出中国思想及政治权势的转移。北大民意测量的情况参见上引罗志田书第72页。

(140) 例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1925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与拉菲斯谈话时，曾明确指出“君主制度”与“议会共和制”均不适合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人民专政”的政权统治形式：“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有点像苏维埃，但它所包容的阶层比苏联的苏维埃所包容的要多一些。”胡氏在国民党内属于政治立场偏右的一派，尚且如此，其他国民党人士可想而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766页）

(141) 《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42) 以选举为例，就是在代议制发展最为成熟的英国，也一度出现“贿赂公行”，选票“涨价”的现象。参阅邱昌渭：《国会制度》，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81-82页，第399—402页；（美）威尔逊著：《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5、130页。

(143)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44) 陈九韶：《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38页。

(145) 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191页。

(14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71页。

(147) 《汉口国会议员反对段祺瑞出任执政并对其私自与外国缔结之各项条约概为无效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82—1483页。

(14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60-661页。

(149)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8—49页。

(150) 《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28页。

(151) 章太炎：《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

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88-792页。

(152) 毛以亨：《代议制革新议》，《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17—26页。

(153)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1页。

(154)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页。

(155) 诚公：《国人对时局应具之感觉》，《国闻周报》第1卷第16期。

(156)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国闻周报》第1卷第10期。

(157)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72—273页。

(158) Wou 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p．83．

(159)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83页。

(160) 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494页。

(161) Lucian W．Pye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124，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

(162)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p．123-124；《张作霖关于政府主政人选问题主张军人不干政公开讨论为原则通电》，1926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502—1503页。

(163)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p．115-116．

(164) 《湖南考试县长之初复试》，《申报》1925年10月5日。

(165)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1-23．

(166) 《东三省实行军民分治》，《大公报》1925年2月16日。

(167) 《通饬各省长官考核吏治》，《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辑，第195页。

(16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辑，第141—142页。

(169) 《杨邓交恶之由来》，《申报》1924年9月3日。

(17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6页。

(17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8页。

(17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4页。

(173) 胡适：《丁文江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174) 《冯玉祥辞职之原因》，《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8辑，第1613-1614页。

(17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页。

(17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0页。

(177)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页。

(178)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January 6，1923．pp．224-226．

(179) 章太炎：《癸亥政变纪略序》，《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180) 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65—66页。

(181)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页。

(182)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601页。

(183) 《段祺瑞作内感篇》，《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第626-632页。

(184) 慎之：《军阀之崩溃》，《国闻周报》第2卷第3期。

(18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页。

(186) 引自曾宪林等：《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207页。

(187) 《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11页。

(18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322—324页。

(189) 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6页；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61页。

(19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72页。

(191) 参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详见本书第四章《善后会议》。

(192) 《唐绍仪与外报记者谈话》，《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93) 《张作霖关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9日。

(194) 《奉军将实行拱卫京师》、《奉军拱卫京师之实现》，《顺天时报》1925年5月13、24日。

(195) 《奉方监视中之中央财政》、《财部帐簿出关》，《顺天时报》1925年5月21、22日。

(196) 《奉天对北政府实行司法独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8册，第1069页。

(197) 《邓如琢通电》（1925年10月24日），《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61页。

(198) 胡适：《丁文江传》，《胡适文集》第7卷，第477页。

(199)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21．

(200) 《国民军欲夺陕西地盘》，《顺天时报》1925年9月7日。

(201) 《鄂督通电辟谣》、《姚震口中之时局形势》，《顺天时报》1925年10月2、10日。

(202) 《昨日国议内容》，《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503页。

(203) 《占领地盘之新标帜》、《刘镇华谋督豫》，《晨报》1924年11月13、18日。

(204) 《孙段电商赣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25日。

(205) 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2页。

(206) 顾敦鍒：《中国市制概观》，《东方杂志》第26卷第17号。

(207) 参阅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第106—108页。

(208) 《陈调元自称苏督说》，《益世报》1925年10月22日。

(209)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5年月18日。

(210) 《浙孙强截税款》，《顺天时报》1925年5月5日。

(211) 《冯玉祥派员来京接洽与奉合作》，《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9册，第490页。

(21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6页。

(213)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500-501页。

(214)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8页。

(215) 政之：《北京政坛蜕嬗纪》（下），《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355页。

(216) Harold Z. Schiffrin,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 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nent? Asia Quarterly: A Journal from Europe*, 3 (1975), pp. 196-197.

(217)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年1月16日。

(218)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4年1月7日。

(219)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2卷第8期。

(22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22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8页。

(222) 孙铎：《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向导》第29期。

(223) 政之：《世界大势之逆转与中国之国际环境》，《国闻周报》第2卷第2期。

(224) 士炎：《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第22期，1924年11月23日。

(225)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189页。

(226)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宣言》，《向导》第82期。

(227) 《冯玉祥配称革命么》，《政治生活》第20期，1924年11月7日。

(228)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40页。

(229)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22期，1924年11月23日。

(230)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22日。

(231)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第22期，1924年11月23日。

(232) 《外交团与临时政府》，《国闻周报》第1卷第21期。

(233) 《北京政局》，《国闻周报》第2卷第47期。

(234) 段永林：《三·一八惨案与执政府的垮台》，王维礼等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9页。

(235) 天生：《外交与内乱》，《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236) 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报》4卷2期（1926年1月3日），《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55—267页。

(237) 《北上宣言》、《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5、337页。

(238) 政之：《对内乎对外乎》，《国闻周报》第2卷第38期。

(23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25页。

(240) 章太炎：《致李根源书》（1925年7月11日），《近代史资料》

总36号，第144页。

(241) 参阅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42) 参阅杨雨青《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4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106、156—157页。

(244) 《张作霖宣言》（1926年12月6日），《北洋军阀》第5卷，第383—384页。

(245) 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

(246) 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调查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一节　善后会议的由来及各方的立场

一　直奉战争“善后”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失败、反直军事同盟的胜利而告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直系并非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政治上。若从单纯军事上观察，江浙方面卢永祥的实力，实不足与吴佩孚较量；东北的张作霖较之直系亦略逊一筹；而广东方面相隔遥远，且因陈炯明及商团叛乱，有后顾之忧，一时也难抽出多少力量北伐。直系之败实败在冯玉祥的倒戈上，而冯之倒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原因。直奉战争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宣告了“武力统一”的中止。随后，以政治手段谋求战争“善后”问题的解决提上了议程。

北京政变之后，反直军事同盟取得胜利，但直系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歼灭。冯玉祥入京后，段祺瑞念北洋旧情，对曹、吴的处置难免手软。盖段之对吴，本主不为己用，但得彼表示拥护即可罢手，“有谓段顾全北洋统系，欲抚直系残部为己势力，以图国力之均势者”[(1)]。故吴佩孚虽败走，但仍手握重兵，“长江势力未损秋毫”，不久即成卷土重来之势[(2)]。而奉、浙、粤三角同盟在对直军事结束之后，内部矛盾急剧上升。广东方面亟欲将统治区域扩大到江西等省，这与段祺瑞分割地盘的初衷相忤。奉系企图染指苏、浙，又与卢永祥的利益发生冲突。冯玉祥虽然控制北京，并推出黄郛摄政，但冯与奉张有着尖锐矛盾。国民军势力逊于奉军，这使冯处于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之

下；但国民军控制着北京，加之得到广东方面的响应，因而对奉系直接控制中央政权造成一定阻碍。冯、段之间也存在矛盾。“段于地方势力久已根绝”，“非冯之所重”[3]；而段则利用奉张与国民军的矛盾压制冯，黄郛摄阁为许世英取代，即为明证。被推到政治前台的段祺瑞与奉张亦存在利益冲突，所谓“张作霖与段干木貌合神离”[4]，应为符合两者关系实际的观察。段既与冯、张不协，又缺乏实力，只好“听信目光短浅之策士所谋，欲在‘冯、张均势’之下，维系中央体面，以图自保”[5]。虽然“冯、张均势”未必真正存在，但彼此制约则是事实。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任何一方要用单纯军事力量来解决时局纠纷，实现“武力统一”，均难操胜券[6]。

在武力自身不能统一的情况下，要实现武力统一自然成问题。而武力自身不能统一的原因，在于袁世凯之后陷于四分五裂的北洋派“决不愿见其中有一人，势力特别强厚，将有支配全国之势。若为此兆，则必先群起暗中结合，谋有以推倒之”[7]。是以主张“武力统一”之军阀，屡致颠仆。段祺瑞如此，曹锟、吴佩孚也是如此。武力统一政策失败之后，段祺瑞曾表示，“纷争既久，渴望统一，革命告终，宜有建设，亦即全国憬悟，心同理同矣。而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知其不可，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8]。冯玉祥亦有所觉悟，他在给段祺瑞的信中写道：“当代军人，非有真正之觉悟，不能祈向真正之和平，即无由措国家于治理。觉悟维何？即武力终不可恃，当艰苦卓绝，就民治痛下功夫是也。”[9]就是“野心甚炽”，暗中积极备战，“仍思继承吴佩孚之武力政策”的张作霖[10]，对于“和平统一”主张，亦不便公开反对。

从政治运作角度分析，倒直的胜利乃奉张、浙卢及粤孙三方联合加上冯玉祥倒戈的结果。此役既以数方合作而获胜，善后问题当然只能由各方共同协商解决。从段氏个人的处境来讲，他能够受到各方“拥戴”，除了再造民国“元勋”的旧招牌外，主要还在于他体验了“武

力统一”政策的失败，且已丧失实力，除实施“和平”之道外，别无选择。《申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写道：“段祺瑞之被推（戴）也，则以标榜和平之故。以各方信其前此武力之失败，足以醒其（武力）统一梦之故。则段之不能再谈武力统一，非独以道德信段，实亦于事实可以信段也。”[11]“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藉，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12]。失败的教训与无实力以为凭藉，使段不能不选择政治解决的方案。当时王士珍曾规劝段说：“君之得各省之拥戴者，以不拥兵也；国民军之受人民欢助者，以标榜和平也。长江及吴既尊重君，君宜摒除武力，则统一可期。”[13]此时已经“手无寸铁”[14]的段祺瑞，岂能不听从王士珍劝告。这是其召开天津会议，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直奉战争善后问题的重要原因。

善后问题在吴佩孚乘舰出走之后很快被提上日程。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一为收束军事，一为整理财政。军事问题虽因“均势”之出现而暂无在全国范围内重开战火之虞，但局部冲突仍难以避免。问题的关键在于未形成各方认同的权势中心，虽直奉战争结束，却未实现统一，重启战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财政问题更加棘手。1924年，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战争的费用也标志了一个分水岭。盖此前的战争，参战人数有限，敌对活动持续时间一般较短，且往往在战后有一较长的和平时期。但1924年以后，战争连续不断，规模亦不断扩大，军费支出急剧上升，在地方及全国岁入中所占比例已经高到国家经济不能支撑的地步[15]。然而，地方军阀割据称雄，各自为政，要解决如此拮据的财政问题，极为困难。盖各地军阀为谋自身的发展，均以扩军为手段。兵多，必致军费增多；而兵多则战事必频，战争费用亦必剧增。财政上“入不敷出举债养兵”的状况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是不可能解决的，故解决财政问题的先决条件为实现统一。

此外，执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国家的和平建设与发展，以及倒曹

之后新中央政权的外交承认等问题，在在需要及时解决。在此情况下，决定出山的段祺瑞，于入京之前发出“马”电，标举宗旨，提出召开善后会议的政治主张。电文如下：“共和肇造，十有三年，干戈相寻，迄无宁岁。驯至一国元首，选以贿成，道德沦亡，法纪弛废，诛求无厌，户鲜盖藏，水旱交乘，野多饿殍。国脉之凋残极矣，人民之困苦深矣。法统已坏，无可因袭，惟穷思变，更始为宜。外观大势，内察人心，计惟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会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16]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入京就职，宣言于一个月内，召开善后会议，解决与时局相关的一切重要问题。随即谕令临时法制院院长姚震草拟《善后会议条例》，并在吉兆胡同宅邸召开专员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议。会议就善后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展开多次讨论。其间经历反复，系因“天津方面之某实力派，对于草案之第二条所定委员资格一项，提出修改意见，拟将该条第二项（该项原文为‘民国十二年大选守正议员互选十人’）根本推翻，不承认拒选议员有列席之资格，并主张以此次讨伐贿选之各军首领，作为委员资格之一”[17]。最后达成妥协，在条文中取消了拒选议员的列席资格，但实际上仍准参加，其办法系由拒选议员互选十人，由执政聘任[18]。

与此同时，按照12月2日阁议，善后会议组织大纲须待孙中山同意后公布[19]，许世英遂将草拟的《条例草案》送往天津，呈孙中山“核阅”。孙未置可否。12月20日，经过修改的善后会议条例提交国务会议讨论[20]。23日，送交孙中山审阅的《条例草案》携回。当天下午五时，北京吉兆胡同段宅召集会议，与会者有善后会议筹备处长许世英与各部部长及林长民、汤漪、朱深、曾毓隽、姚震等。会议由段祺瑞主持，讨论修正《善后会议条例》，主要就善后会议权限及列

席代表资格进行磋商。

会议最后商定《善后会议条例》十三条。第一条阐明了“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之会议宗旨。第二条规定了会议之人员构成：“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及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第五条对会议“应行议决事项”作了如下规定：“一、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二、关于改革军事事项；三、关于整理财政事项；四、其他各案由临时执政交议者。”其它各条分别对会期、会址、议长副议长之选举、出席及投票之有效人数、秘书处之设置、议事细则等作了规定[21]。

12月24日，段政府以孙中山未表示反对为由，将《善后会议条例》明令公布。

二　实力派的态度及社会各方的立场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很快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善后会议“无一真正人民之代表议员，而为四种特殊阶级之会议。从实质言，以执政一人而有操纵此项会议之可能。以此项会议而不必有强制各派军事之能力，则所谓解决时局纠纷之意，或不幸而为时局增长纠纷，亦未可知耳”[22]。故《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初，社会各界“大半取静观态度，毫不表示，而咸料其不能有成”[23]。

地方实力派对召开善后会议之提议则反应不一，有反对的，有支持的，有抵制的，有“婉拒”的，也有抱着怀疑与希望，参与“尝试”的。大体言之，实力派中，奉张、滇唐，晋、鲁、苏、浙、皖、赣各省军政长官，以及四川之刘湘，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代理库乌科唐镇抚守使李垣等，对善后会议持赞成态度。其他实力派人物或依违两可，或表示有条件的赞成，或明确表示反对。

张作霖对善后会议最初不感兴趣，“以为此种组织，人数较多，彼之有力主张不易实现，而疑段之有意缩减其发言权”。但段以为“‘善后会议’四字，在就职前之马电，即已发表，不便自食其言”，坚持己见。于是出现了“六头会议”之插曲。所谓“六头会议”，即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五人，加唐继尧共同会议[24]。此议在12月10日之前，已即将实现。时段拟“以六头会议解决一切重要事件，而于善后会议为形式之通过，则所谓善后会议者，又以六头为预备会”。但此议发出后，孙中山首不赞同，唐继尧复通电反对，西山之冯玉祥，亦不愿参与。六头而去其三，所谓“六头会议”只好作罢。最后在条例组织法中加入第二项，将张、卢、冯置于其中[25]。

对此，张作霖显然并不满意。其左右曾为之力争，“谓张作霖在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上，固居第一功，而在历次有意义之战争上，亦未尝无功，故应将其列入有大勋劳于国家者”[26]。张氏亦公开表示不满。就在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张由京返津，“谒孙谒黎，且发出我系抬轿，任谁可抬之语”[27]，对段进行威胁。不过张作霖也不能无所顾忌。段系其领衔推出，在奉系力图控制段的同时，冯玉祥也十分注意与段的关系。若奉张过分与段为难，则段可能会倚重冯玉祥甚至孙中山，这对奉张显然不利。故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张作霖对段的安排也不得不稍事迁就。1月12日，即《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半月之后，张作霖致电会议筹备处，允派代表出席。与此同时，奉系另一核心人物杨宇霆致电许世英，称“善后会议东三省军民长官应派代表，日内雨帅回奉，即行会商遣派，准于开会期到京，特先奉闻”[28]。奉系表态支持，为善后会议的召开，创造了重要前提。

国民军方面态度则比较暧昧。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即提出各方会议，解决国是。后来费保彦纂《善后会议史》，站在拥段之立场，述会议颠末，冯玉祥曾为之作序，序文曰：“共和而无宪法，非国矣；宪法而不出于民意，非宪矣。客岁以不得已之苦衷，改组临时政府者，实欲得真正民意之宪法，以为遵循之正轨耳。盖国民代表会

议者，民意宪法之母；而善后会议者，又国民代表会议之母。兹幸以短少之时间，克成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无此是彼非之私争，有和衷共济之公德，不可谓非会议诸君之热心毅力也。”[29] 观此序文，可知冯氏于善后会议，并无不慊，且能像多数实力派人物一样，不将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摆在截然对立之位置。

但冯却不愿参与善后会议。尽管“段执政以特别请书致冯玉祥，邀其参与善后会议”，冯仍表示拒绝[30]。段曾嘱薛笃弼探其缘由，冯称：“此事吾不能与闻，吾今唯知五次六次以至十次之辞呈，向段执政辞职耳。”[31] 冯氏自1924年11月25日起，七上辞呈，并致电吴佩孚，请同时下野。究其原因，与发动政变之后冯之处境有关。盖政变之后，“社会上谅之者甚少”，而在天津会议上，“冯奔走段、张之间，其中殆有不可告人之苦痛”[32]。可见冯本人拒绝与会，系出于政治上另谋出路的考虑，而不是针对善后会议作出的表示。时论称冯氏在观念上与善后会议处于“不即不离之间”[33]，应为中肯之评价。后来冯氏派出陈金绶为代表与会[34]，证明冯于善后会议，并不根本抵触。国民军重要将领胡景翼派代表与会，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35]。

西南方面立场较为复杂，报载消息亦比较混乱。自段任执政以来，西南各省虽多持沉默，但滇唐代表王九龄始终未就教育总长之职，此中消息，可见一斑。故善后会议能否得到西南方面赞同，颇为各方关注。

为开成善后会议，段极力争取西南方面的支持，曾致刘显世“勘”（12月28日）电，请其表示同意。然刘之复电中，有“俟商取莫赓（继尧）、竞存（炯明）诸公同意，即行通电表示”之语[36]。嗣因陈炯明于“冬”（1月2日）日通电反对善后会议[37]，刘遂与唐继尧、谭延闿、熊克武四人联名通电，示以反对。“该电大意，以为善后会议不脱民六徐州督军团会议之形式，不足以代表民意，且此项会议，类多军阀代表，发言吐语之间，更无民治观念，应请当局，从速

召集国民会议，以定国是等语”[38]。《申报》亦载文指出：“滇唐反对善后会议，理由谓临时政府为少数军人所戴，一切尚待国民会议。今发号施令，究少根据。唐以国民会议方拥戴中央。”[39]

其实，西南各实力派的立场并不一致，一些人的表态甚至前后矛盾，声明与实际行动亦往往牴牾。据报载，西南代表曾在上海静安寺路贵州旅馆开会，商量赴京与会，列席者有云南、广东等省代表共十余人。陈炯明的代表刘亮称此次倒直成功，实南北统一之良好机会，现段氏召集善后会议，西南方面对此应竭力赞助，并声明“陈总司令对此会议，十分赞成”。云南方面的代表王竹村表示“绝对赞成此项会议，现在被邀之列，自当扶病出席”[40]。另据报载，四川的刘湘曾通电赞成善后会议，刘文辉则慷慨解囊，汇出四万元，以示赞助[41]。后来，包括滇唐代表在内的多数西南代表都赴京与会。但因步调不一，其与段、张立场难以协调，已露端倪。

与西南方面态度暧昧不同，晋、鲁、苏、浙、皖、鄂、直、闽、赣、湘等省实力派对善后会议大多表示支持。阎锡山、郑士琦、王揖唐、萧耀南、胡思义、孙传芳、卢永祥、杨以德、萨镇冰、赵恒惕、方本仁、龚积柄、韩国钧等先后致电善后会议筹备处，允将到会或允派代表出席。张学彦代表萧耀南致电段，表示“鄂萧对中央服从，善后会议解决时局”[42]。萧的慷慨解囊，更表明了对会议的支持态度[43]。尽管这些“支持”往往附有条件，有时甚至被当成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他们的表态，无疑壮大了善后会议的声势。

此时在政治上仍具潜在影响力的黎元洪、王士珍、唐绍仪、岑春煊等人的态度也受到广泛关注。黎对段祺瑞的邀请明确表示拒绝，但措词委婉，自称“坠露”，不必附丽“龙、凤之会”，在流露出政治上失落感的同时，力图表现其影响力犹在[44]。王士珍系北洋元老，与段关系甚深，曾亲临善后会议筹备处访许世英，允届时出席，这对段是很大的支持[45]。蛰居上海、被段政府委以外长职务（未就任）的唐绍仪则不愿北上赴会。段派员持亲笔函至沪敦请多次，唐均表示拒

绝，且对善后会议“用意不善”进行抨击[46]。曾经在政坛显赫一时的岑春煊，接到邀请后，致电段氏，主张“集各省区代表于一堂，雍容而议改定军制，裁兵理财”[47]。岑氏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反映了政学系的立场，有时亦倾向西南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故时人称之为“消极赞成”者[48]。

受“特聘”的会员有社会名流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三十人。章太炎拥护黎元洪的“法统”，政治上视黎之显隐为进退，此时固不愿意放弃拥黎，却同时站到了西南实力派的立场。1925年1月1日，段祺瑞致章“东”电，“以善后会议相招”。6日，李根源由天津来电劝进，章氏复函拒绝。在曾云沛前来为段说项时，章明确表示了与西南方面反对派一致的立场：“今之政府，本无法律根据，则与西南无异，西南、北京两政府乃敌体，而非主属，吾参与西南事已久，今日不能去一政府，就一政府也。”[49] 26日，章氏接善后会议筹备处邀其“速驾”之“宥”电后，再次复函表示反段、拥黎、支持西南反对派的立场，只是对西南一些人首鼠两端的做法，略示不满[50]。

胡适乃新文化健将、学界领袖，在政治上亦颇具影响力。以其对政治的理解，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并非方枘圆凿，故在受聘国民会议促成会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同时，又接受了段祺瑞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按他的说法，他是希望作一番和平解决时局问题的“尝试”，在给许世英的信函中他这样写道：“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毫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51]

梁启超曾经与段祺瑞合作，且有研究系背景，政治影响在章、胡之上。段召集善后会议，自然对梁期待甚殷。但梁氏归国后历尽宦海风波，壮志难酬，早已发表宣言，“毅然中止政治生涯”[52]，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此时虽议政癖好未改，但已不愿继续与闻政事。故对段之邀请，婉言谢绝。

尽管目的各不相同，响应方式与程度也有差异，但大体言之，多数受邀会员对善后会议都表示赞同，他们或亲自莅会，或委派代表参加，从而造成一定声势。段祺瑞政府对拟开之善后会议亦“颇抱乐观，盖因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53]。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态度与立场也就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三　国民党方面欲迎还拒的姿态

（一）孙中山应邀北上及其主张的变化

直奉战争开始不久，孙中山即起兵讨伐直系，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这表明此时国民党走的仍是“武力统一”路线。但是，要以武力完成革命大业殊非易事。由于军事力量薄弱，成败利钝难以逆料，加之广东根据地尚不巩固，商团的敌对态度，陈炯明的反目为仇，使国民党时有萧墙之虞、后顾之忧。国民党所处艰难地位，使之在实施武装革命手段的同时，也有谋求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对于段祺瑞政府拟议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党反应十分复杂且几经变化，并非一开始就走到对立面。据《许世英传略》记载，1924年，当反直三角同盟酝酿倒曹之初，段祺瑞曾密派许世英南下赴粤，在韶关惕园谒见孙中山，提出“先开善后会议，继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父）嘉公（许世英）忠恳，欣纳其言，谓如芝泉朝有电来，夕即北往”。黄伯度《笃行实践的许静仁夫子》一文中有许氏“秉承国父指示，对韶关晤谈约定之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竭力规划，务求实现”一语[54]，表明孙、许当初确曾谈及善后会议，且已取得共识，亦表明孙中山最初是赞成善后会议的。故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通电主和，邀请段、孙“入京主政”，孙中山很快表示“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55]。对于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孙中山虽未必能欣然接受，但其正式的表态则为：“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诸合肥办理。”[56]而段祺瑞对孙中山北上也寄予厚望，在天津会议上，曾明

确作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表态[57]。可见双方尽管有着潜在矛盾[58]，但最初的合作态势尚属良好。

孙中山决定北上之后，于11月19日发表《北上宣言》，明确表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59] 并就代表人选提出具体意见。孙中山此时不提善后会议，意味着对韶关之约，国民党已单方面作了改动。

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随即依“马”电之承诺，筹备善后会议，任命许世英担任善后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并谕令临时法制院院长姚震草拟《善后会议条例》，未理会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发表的政见。

《北上宣言》的发表和《善后会议条例》的拟订，使国民党与段祺瑞的分歧开始凸显。分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议的“名目”，即究竟是召开“善后会议”还是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二是会议的人员构成，即会议究竟是以“实力派”为主还是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

在会议名目问题上，段祺瑞坚持冠以“善后会议”。依其设想，善后会议可兼顾直奉战争军事及财政的后续事项处理和国民会议的组织筹备两方面，其职能范围应较单纯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宽泛。但国民党方面认为，既然段氏主张以国民会议“治本”，则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为之作准备即可，没有召开善后会议的必要。在会议的人员构成上，段祺瑞政府偏重实力派的参与。而国民党方面则偏重“人民团体”代表，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由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曹吴各军及政党九方面代表组成。尽管双方存在差异，但由于尚未看到《善后会议条例》草案，不清楚段祺瑞究竟将如何筹划善后会议，国民党方面最初只是正

面阐述国民会议主张，对善后会议未提出批评意见。

12月10日，段祺瑞派人将《善后会议条例》草案送交孙中山参酌。18日，许世英、叶恭绰等谒见孙中山，征询意见，孙仅对段政府“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外交保证表示不满[60]，未对善后会议提出异议。同日阅李烈钧带来的《善后会议条例》草案，作出暂缓入京的决定，但对条例内容也未置可否[61]。孙未就《善后会议条例》及时发表意见，可能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一时难以统一认识所致，也可能是碍于韶关之约，不便公开提出异议。富于政治经验的段祺瑞抓住机会，于24日公布《善后会议条例》，随后通电全国，宣布于次年2月1日正式召集善后会议，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国民党发现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局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敬告国民书》，说明解决国是须以人民团体广泛参与之预备会议为前提，用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随侍孙中山的在津国民党要员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张继等十一人亦召集会议，作出“一切善后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无必要另行召集善后会议”之决议[62]。12月26（寝）日，国民党通电反对段政府召集善后会议，表现出与段祺瑞政府分道扬镳的倾向。

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时，社会舆论更多是站在同情孙中山及国民党的立场。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各地成立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大多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对段祺瑞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国民党的主张虽然迎合了“民众”的心理，也符合“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却没有注意辨析两种会议的不同性质，也较少考虑政治操作的可行性。北京律师公会会长、法律专家陈炳堃曾发表通电，认为站在国民会议的立场批评善后会议，系未辨两种会议的性质所致[63]。从会议的性质上分析，国民会议主要解决制定宪法等有关国家根本建设的问题，有类美国的费城会议，具有“立法会议”的性质。而善后会议主要解决时局纠纷及直奉战争之后国家所面临的军事、财政善后问题，具有“行政会议”的性质。借用

《大公报》当时一篇评论的话来说，“善后会议从事实上谋收束，国民会议从法制上以图创造”[64]。两个会议性质互不相同，所欲解决的问题各有侧重，并不一定构成对立关系。

还有人从政治操作的角度对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虽然国人已经认识到国家混乱与军阀政治的关系，但在军阀未被彻底“打倒”之前，欲将其撇开，而以“人民团体”为主，召开会议，解决国是，未必现实可行。《大公报》一篇署名文章就提出质疑，认为若不屈就现实，先召开以实力派为主的善后会议，使实力派之间达成妥协，“岂国民会议以一纸决议，遂能强某某军阀裁兵若干万乎？遂能令某某各省不得截留中央款项乎？……遂能举军民分治之实乎？……遂能期废督裁兵之效乎”[65]？

段祺瑞政府对善后会议偏重实力派的原因曾作出与上引《大公报》评论类似的解释。当国民党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紧急召集许世英、林长民、汤漪、章士钊、屈映光、龚心湛、梁鸿志等开会，商量对策。会后汤、梁等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了以下意见：其一，《善后会议条例》未公布前一旬，段执政曾先后命李烈钧、许世英、叶恭绰赴津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彼时中山虽无赞成之表示，但亦无反对之表示，可见中山彼时实曾默认善后会议之条例，中山彼时既默认之，则此时实无提议修改条例之余地”；其二，国民党称段祺瑞派人送呈《善后会议条例》供斟酌时，孙中山因病不能考虑，故未发表意见，“然中山彼时对于李烈钧回赣一事，既能有所主张，则可见中山彼时尚能考虑，且确已加以考虑者”；其三，善后会议筹备多日，“已成将熟之饭”，断难另起炉灶，修改条例，将国民党所主张的九法团代表同时纳入会议成员之理。因此，段政府认为，若孙中山不能谅解，对善后会议固然是一种遗憾，“而责任固不全在政府也”[66]。段政府的强硬态度，当然无助于化解分歧，争论很快陷入僵局。

（二）善后会议背后的权力之争

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就其反复强调会议应当具有社会团体参与系本于民国应当“主权在民”而言，可以说具有某种“主义”之争的色彩。在不具备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以“主义”来邀结民心，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该党后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宣传[67]。

但是，如果仅仅从政治主张的异同去诠释国民党与北方实力派就善后会议所发生的争执，问题的研究将流于表浅。事实上，在围绕善后会议不同“主义”之争背后，有着十分尖锐表现却异常隐曲的利益之争。对于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利益，国民党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对“主义”的重视。当时一些揣测，有堪记录以备参考者：“或谓段本自恃不菲，安福系又欲大有为于将来，因中山在民众方面之势力不可侮，恐国民会议召集之日，即中山被推为总统而率其党员占领政治舞台之日，故殊不欲见国民会议之开幕。……至于反侧（民党方面），则亦有其计划。一则以段乃一军阀之领袖，在民众方面全无潜势力之可言。故国民会议之列席者资格愈泛，国民会议之任务愈重，则民党在会议席上即可愈得势。而未来之组织政府者，亦除却国民党而莫属。因之对于本问题，乃不惜力持到底，以博全国之同情，为将来挟国民作后盾，以组织民党政府之计。故双方目下之所争，质言之，乃争组织未来之政府耳。”[68]

从反直各方领袖的地位与政治影响来看，孙中山是最有资格在倒曹之后出任总统的人选之一。奉张虽于推倒曹吴有“武功”，且最具实力，但只一介武夫，缺乏政治号召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虽直接控制北京，但政治影响最多不过等同奉张；且因数次“反戈”，在操守上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69]，不至遽有总揽国家政治的奢望。黎元洪在反直军事行动中置身事外，虽有主张恢复“法统”的章太炎等捧场，但于善后事宜，亦基本无与。真正有资格与孙中山竞争总统者只有段祺瑞。段氏为“北洋三杰”之一，且有“三造共和”的声誉。如果曹、吴倒台系中国政治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变革的结果，当然孙中

山是最理想的总统人选；但如果仅仅是一次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则段祺瑞出而执政应当是合适人选。

当是之时，中国的政治统治已严重失序，呈现出“五代”式的分裂局面，寻求和平统一成为中国政治的急务[70]。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并未形成一切推倒重来的格局，北京政变之后的变化就只能是北洋军阀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局部动手术的方式，才可能将分散的军阀派系暂时维系在一起，尤其是使已经退到长江、企图卷土重来的吴佩孚表态“拥护”中央，不至重启战端。在当时，能够膺此重任者，非段莫属。孙中山在段就执政之职后说，整理时局之人，“除段祺瑞氏而外，无适当人物”[71]，应为审时度势的表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没有领袖全国和为国民党谋求参与全国政权的深谋远虑。在天津会议上，段祺瑞只是被推举出任“临时执政”，并未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其职责也仅仅是“善后”而已，故其“马”电中有“（善后）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一语[72]。孙中山对段的承认，也仅限于出任“临时执政”。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按照多数国人认同的程序，应根据国民会议通过的总统选举法由国民选举产生。段祺瑞当然想在就任执政之后顺利地登上总统位置，他极力将善后会议开成实力派控制的会议，并企图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这应当是原因之一。但如果以国民党设想的程序召开国民会议并选举总统，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则更有可能当选。

国民党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可能的机会。故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不久，广东方面便有不少人认为，孙中山这次进京，“一定可以握大政权”[73]，并对此寄予厚望。在天津会议上，段之左右也曾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的建议[74]，两者若合符节。

孙中山的公开表态则比较低调。针对他一定可以握“大政权”的说法，他表示说：“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握大政权，就是他们要我办，我

也是不能答应的。”[75] 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没有出任总统的想法。退一步说，即便孙中山没有为自己谋求总统位置的想法，作为国民党领袖，他也不能不为国民党的利益及前途设想。他之所以坚持以国民会议决定国是，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就是出于在政权问题上为国民党争一席之地的考虑。

其实不独国民党欲争未来合法政府的控制权，皖段奉张亦无不争。争乃政治斗争中的正常现象，不争倒才不可思议。对国民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争还是不争，而在如何去争才对自己有利。在“联俄”、“容共”的过程中，国民党积累了政党建设和民众动员的经验[76]。相对国内其他政党或社会团体而言，此其优势，当然会想方设法加以运用发挥。李剑农对此所作分析颇具启发性，他认为，说善后会议系以军阀实力派为主要成分，国民会议预备会则以公民团体为主要成分，这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骨子里面，中山是代表当时有严密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潜势力已经钻入各公民团体中，若依中山的组织，国民党用党团操纵的方法，这个会议便可由国民党宰制；执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实力派的军阀，对于各公民团体无深切的关怀，岂能容纳中山的主张”[77]？李氏所言，堪称切近事理。

国民党与段祺瑞的矛盾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的组建上，在地方权力分配尤其是地盘划分问题上，双方同样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自段祺瑞入京主政之后，各实力派便开始争夺地盘，并形成“临时防区”之协定[78]。对此，段政府分别给予了承认。孙中山作为三角同盟的一方，局促广东一隅，难纾抱负，故继续挥师北伐，亟欲夺得江西。但在北伐军进入江西时，段政府却致电孙中山，内有“南军师出无名”之语，请电令北伐各军停止攻赣，并任命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主持赣事。方素与国民党方面不协，曾四次发兵犯粤。孙中山对方受命督赣极为不满，在方本仁击退谭延闿所部北伐军，重新占据吉安之后，孙中山要求段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以抵制部分拒贿议员以方取代省长胡思义的企图，段未照允。孙旋命李烈钧回赣，与“赣中诸将”共同

应付局面，是即举国关注的“江西地盘之争”[79]。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要求李烈钧长赣受阻之后，国民党对段祺瑞政府及善后会议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段祺瑞与孙中山电商赣局是1924年12月17日的事。19日，孙中山即特派宣传员赴北方十三省区宣传国民会议，表示出欲自行其是的政治倾向。20日，国民党党员接到不得在段政府下取得任何职位之训令[80]。26日，国民党首次发出反对段祺瑞在京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这一系列非常举措均在段、孙电商赣局之后一周内发生，其间的逻辑联系清晰可见。对此，当时有人分析说：“善后会议问题，只可谓为表面的，实则孙文方面最重视者，仍为江西地盘问题也。盖孙中山曾要求执政府任命李烈钧长赣，执政府方面对之以目下情形，万难即允。执政府倘因孙之要求，即任命李烈钧长赣，势必遭方督之反对，且与方督有联络之陈炯明，亦必继起反对也。”[81]

（三）国民党内部分歧的表面化

尽管善后会议遭到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政府仍然争取到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并最终造成“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的局面[82]。在多数实力派已决定参与善后会议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若为会员构成及江西问题与段政府僵持，结果对自己并不一定有利。段政府方面则作出姿态，不将国民党的通电反对视为决裂的表示，再三邀请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左右分野再次凸显。

黄郛（膺白）称：“随中山先生北来的同志，其时亦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里从来少有如此多的同志，亦从来未有如此多的龃龉。”[83] 张继、孙科与汪精卫等“积不相能”，“愤然去津南下”[84]，即国民党内出现裂痕的例证。而孙中山病重不起又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85]。在是否出席善后会议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众说纷纭：“反对参加者以此会与真正民意无涉，吾党不宜参与；主张参加者以必须加入方可防止其包办国民会议，且对各省军事财政为报告之性质，亦

有益。”[86] 激进的左派人士主张对段、张强硬，坚决抵制善后会议，而温和派则希望维持与段、张之关系，参与善后会议。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最大的时局问题，就是本党是否加入善后会议。因为善后会议不久就要召开，所以本党是否加入的态度，应该要赶早决定。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和大元帅研究过，总是主张加入的多。”[87]

其实不仅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加入善后会议，就连孙中山本人对于段祺瑞亦不抱成见，“仍期贯彻段孙合作之旨”[88]。当孙进京时，一些国民党人在欢迎队伍中散发传单，鼓动“打倒某某”，孙获悉后，立即训令国民党北京党部严加制止，称此番进京，对于段、张、冯均注重保持友谊，“若对于友军人物不能以诚恳之辞互相勉励，良非本党应取之态度”[89]。后来孙身边的激进派人士又以江西问题、善后会议条例及段承诺遵守条约三事为口实，“颇多劝中山南回，中山则不谓然”[90]。孙科自京返粤后发表谈话，亦称其父坚持国是唯有通过“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段执政对此完全同意，并无异议”；至于善后会议，其父只是“因病体荏弱，不能活动参与”而已[91]。可见，孙中山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实有与段继续合作的倾向。

在国民党出现严重分歧的形势下，作为领袖的孙中山不能不作出最后裁决。孙是讲求原则性但更加务实的政治家。“主义”使他坚持政治原则，但党的利益又使他对于“原则”的把握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时论尝以“绝对不妥协，又不决裂”来概括孙中山的态度[92]，但最终孙中山还是为了不“决裂”作了一些“妥协”。1月17（篠）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表示可以接受善后会议，但提出如下先决条件：“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中国历来会议，人民无过问之权，故无良结果；此次善后会议构成分子偏重实力派一方面，忽略民意代表，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文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

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于国民会议。”[93]

20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对孙的“篠”电作了详细解释。要旨有二：其一，国民会议的构成，应以士、农、工、商为主，方可名副其实。故产生此国民会议之会议，不应均为军政界及执政府指派之人，至少须令少数法团代表参与其间。其二，无论整理军政或财政，皆与人民负担有关，既谋解决人民负担，即不可不征求人民之意见。“质言之，即谓欲中山赞成善后会议，则必先修正善后会议条例”[94]。

国民党的上述表示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因为尽管该党要求人民团体代表参加，却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因而即便获得采纳，未必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政、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决定的要求，则主要是为了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遭受打击而已[95]。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显然是一次重大让步。当时《申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评论说：“篠电所言，将预备会议与国民会议冶为一炉，实已迁就段氏，表示让步。在数十日【年？】笃信所抱主义之中山，向无所谓迁就者，今已有破觚为圆之意，洵属难得。”[96]

段祺瑞接到孙中山“篠”电后，连日召开会议，筹商办法。但此时执政府内也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一派以许世英为代表，为“调停派”，“绝对不欲段孙破裂”，主张部分采纳孙中山的意见，将各省垣教育会、农会、商会等“法定团体”的会长吸纳入会，而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因尚未成为法定社团，暂不加入。另一派以林长民、汤漪为代表，力持异议，认为这样做，会使加入善后会议的法团代表多达一百三十余人，占全部与会人数之半；这与善后会议偏重实力派以维持局面的做法颇形凿枘，势必引起“对于现在组织尚嫌人多”的奉张的反对[97]。由于两派背后分别有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支持，意见相持不下，只好采取疏通民党人士、寻求共同对手让步的办法。

在与国民党人士的晤谈中，许世英听取了汪精卫的陈述，发现并无转圜余地，遂将该党意见报告段，“请容纳孙意”[98]。21日上午，段祺瑞与许世英召集林长民、章士钊、屈映光、龚心湛、梁鸿志等开会，确定了“中山既有明白之表示，自不能不予以尊重；但中山之意见，固须尊重，而执政府之威信，亦必须保全”的原则[99]，并在激烈争论之后，最终采纳了许世英的折衷调和处理办法[100]。29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正式表达了21日会议的意见。段在解释了不便修改条例、延缓会期的原因之后，允聘各省及特别行政区议会、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四会长，以及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101]。同日，段政府通电各省区四法团，请迅速赴京与会。30日，下令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善后会议开幕之后，法团代表的“表决权”问题，也以替补缺席会员的方式，部分（或象征性地）得到解决[102]。过去论者多谓以“四法团”代替“九法团”，是对国民党要求的敷衍。其实，如果考虑到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段祺瑞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

段祺瑞政府作出的让步，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善后会议的社会基础，用当时汇丰银行主席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根据较从前所有之会议广大”[103]。但条例文本未改，允添四法团代表为专门委员与孙中山九法团代表作为正式会员的要求尚存在距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段未接受所提出的先决条件，遂于1月30日发表宣言，命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104]。2月10日，国民党再次发出通电，主张由人民团体构成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并号召由人民团体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105]。国民党的这些做法，完全否定了善后会议，孙、段合作至此结束。

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并未消除。后来，一部分“急欲接近政权”的国民党人仍然参加了善后会议。从有关善后会议的报道来看，实际出席者计有彭养光、冯自由、马君武、石青阳，以及熊克武的代表张铮、樊钟秀的代表唐瑞铜、杨希闵的代表卢启泰、范石生的代表邓之

诚、胡思舜的代表李岳渊等九人[106]。黄郛称："国民党议决该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实则温和派之不遵命而依然出席者，固大有人在也。"[107]所言大体符合事实。

在国民党就善后会议与段祺瑞周旋期间，孙中山已卧倒病榻。由天津到北京之后，病势更显严重，难以亲自过问政事。这使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益为明显，更难就善后会议达成共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临终留下由汪精卫等代拟、有亲笔签名的国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108]孙中山去世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左派"实际操持党务，继续实施抵制善后会议的政策。

就段祺瑞方面而言，尽管遭到国民党的抵制，但多数地方实力派的表态仍差强人意。到会议开幕前夕，各方所派或允派之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在全部拟聘会员中，段最为看重、认为最不可少的有七人，即代表国民党的孙中山，代表镇威军的张作霖，代表国民军的冯玉祥，代表西南联治派的唐继尧，代表旧直系的萧耀南，代表政学系的岑春煊，以及代表研究系的梁启超[109]。在这七人中，梁启超拒绝与会系已宣布脱离政治之缘故，并非故意与段为难，故于段氏方面并无影响。唐继尧虽曾表示不满，但因欲"平分政权"[110]，故仍允派代表出席。岑春煊虽不主动，亦能"消极赞成"。而且，"关于人的问题者，中山虽决计不加入，各方面虽亦未表示十分热烈之欢迎，而在目下，亦并无一人欲出积极之手段，以破坏之"。这说明时人虽颇怀疑会议的最终结果，但抱尝试而"乐观阙成"心理的人确实为数不少[111]。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终于可以抛开国民党，独行其是，按照

预定计划召开善后会议了。

第二节　善后会议的召开

一　善后会议的筹备工作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后，段祺瑞特派与之有“金兰之交”的许世英办理筹备善后会议事宜[112]。许受命之后，即在北京西堂子胡同设立筹备处，置总务、文牍、交际三股。各股设股长一人，下置主任、办事员及交际员若干，以张轸、费保彦、骆通、廖熙元、李其荃、邓子诚、李庆芳、乌泽声等八人为秘书。组织既定，乃召集职员会议，筹商一切，并编订筹备处章程七条，分别就筹备处的设立、隶属关系和权限、组织机构、文电处理、办事细则、竣会后器具之移交、章程实施日期作了具体规定。关于筹备处的隶属关系和权限，章程明确规定：“本处直隶于执政，凡一切筹备事务，由处长秉承执政行之；遇有重要事件，由处长呈请执政，派员会商决定后呈核实行；关于善后会议各种议案，应请执政指定主管机关，或派员办理；善后会议条例发生疑义时，由临时法制院解释。”[113]

筹备处成立后，即根据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开始邀请会员。最初拟定的会员合计一百三十二名，但因条例细则规定兼省长之督办及兼督办之省长等会员可派代表两名与会，全部应出席的代表为一百六十六名[114]。各军首领以及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大多派代表列席，特聘会员则亲自参会。

从政治关系上分析，善后会议列席者可分为四大派系：其一为安福系。这主要是段祺瑞系统的人，另外还包括段欲拉拢或借重的人，计有赵尔巽、王士珍、熊希龄、乌泽声、周学熙、胡适、周作民等十余名，时人称之为“准段系”。其二为奉天系。凡东三省、直隶、热河之代表，皆包括其中，总数约在三十人上下，领袖人物为张作霖的秘

书长郑谦及参谋长杨宇霆。东三省代表二十余人，与会前曾先在沈阳集合，召开预备会议，然后来京，足证奉天方面对此会的重视。其三为国民军系。包括察哈尔、绥远、京兆、河南省区代表，以及冯、胡、孙三部之军官代表，人数约有十八名，在三系之中势力较小。至各人之行动，则大体以薛笃弼为标准。其四为西南联治派之代表，约十余人，进退大体视唐继尧的立场为转移。其他各省区代表，皆不能团结一致，而往往附属于某一派。西藏的达赖喇嘛以及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以西藏地区行政及宗教领袖代表的双重身份应邀，虽无派系分别，也十分引人注目[(115)]。

依《条例》规定，“特聘会员”系由临时执政聘请或选派有特殊资望及学术经验者担任，且人数不得超过三十名，颇不易确定，直到1925年元旦才最后落实。三十人中，十人为拒贿议员，其入选系奉张与各方妥协的结果。其余二十人，或代表各实力派，或代表各政党，或为商学界之闻人[(116)]。

自1924年12月30日段政府发出致各军首领及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通电，“请躬自出席善后会议或派代表出席”，迄于次年2月1日，筹备处接各方派代表或允亲自出席之函电，“计有三百四十六件之多”，“函电答复到会及派代表与会者，共计一百四十八人”[(117)]。

经费的筹集是颇让筹备处伤脑筋的事。为使会议顺利召开，许世英于1925年1月26日，缮具善后会议经费概算书，呈请段祺瑞提交国务会议议决。经费指拨分开办费和经常费，两项概算约五十万元[(118)]。经费来源一为执政饬财政部拨放，一为各省协济。然而，筹备处最初仅收到财政部拨发的开办经费二万元，实收各省协款，亦只七万元。临近会议开幕，会员纷纷由各地赴京，车马食宿，所费不赀，“告贷频繁”。许世英“苦无以应”，再三呈文段执政，请饬部紧急拨放经费，但部拨经费一直难以落实。经筹备处与财政部反复筹商，最后谈妥拨款，但此笔部拨“的款”仍须俟交通部允为代垫，始能兑

现。在这种情况下，许世英只好让会计科向盐业银行“商垫”、“暂借”，以救燃眉[119]。

二　善后会议正式召开及通过的主要议案

经紧张筹备，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如期开幕。会场设在以前的总统府大礼堂。上午10时许，俄大使馆参赞伊凤阁、美国使馆参赞斐克、英国使馆参赞台克海、法国使馆参赞韩德威、德国使馆参赞师谋、日本使馆参赞岩持成见等二十余人，“各以私人资格至会参观”。另有英、日、法及中国新闻记者若干人赴会采访。10时30分左右，段祺瑞着大礼服莅会，随同与会的有侍从武官长卫兴武、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军务厅长张树元、编译处主任吴南如等。内务总长龚心湛、财政总长李思浩、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章士钊、外交次长沈瑞麟、教育次长马叙伦、农商次长刘治洲、交通次长郑洪年等先后到会，签到会员共八十六名[120]。

10时50分，善后会议正式开幕。西藏民政代表朱清华建议推举赵尔巽为临时主席，主持开幕式，获大会通过[121]。会议首先由许世英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段祺瑞及内务总长龚心湛分别致颂词。[122]颂词致毕，由主席赵尔巽致答词。上午11时零5分，开幕式结束。

同日，段祺瑞发表《建设宣言》，分发各会员并电达全国，提出“彻底改革中华民国之程序”。《宣言》重申“马”电提出的由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共谋和平统一，以及由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的主张；申论了辛亥革命的意义，革命延长导致的危机，制定国宪促成省宪，善后会议与统一，国民代表会议与制宪，以及建设责任等问题[123]。

2月3日下午，善后会议召开第一次谈话会，代表邵瑞彭建议先起草议事细则，再开正式大会。会议遂指定熊希龄、林长民、杨永泰、薛笃弼、汤漪、黄郛、胡适等七人为起草员，专司其事[124]。因善

后会议已开幕，而各省区军事行动并未完全停止，这与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的宗旨不相符合，经邵章提议，由与会74名代表签名，向政府提出意见书，请段执政于会议正式开议以前，“明令全国，所有各方一切军事行动，及其他敌对行为，均须完全停止。各方如有争执意见，均应由各方正式提出善后会议，听候解决，不得擅用武力，以滋纠纷，而长祸乱”[125]。

这次谈话会，与会代表仅七十七人。后经政府方面极力罗致，到9日召开预备会议时，列席代表达一百一十九人，已足法定人数（当时会员总数已增至一百七十人，三分之二法定人数为一百一十二人）。至13日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因国民党人马君武等到会，出席人数增至一百三十二人（会员总额此时已增至一百七十五人）。大会通过议事细则，推举赵尔巽为议长，汤漪为副议长。善后会议遂得以按照议程，渐次进行[126]。

善后会议从2月1日开幕，到4月21日闭幕，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多月。除去休会，正式会期为五十天。其间共召开大会二十二次，谈话会两次。会议共收到临时执政府提交的议案十四件，会员提议案二十五件，会员修正案六十二件，意见书三十一件[127]。正式列入议事日程的议案为十五件，其中两件在会议期间由提案人申请保留，三件被撤销。有关国民代表会议的议案和修正案单列，共十四件，列入“交付审查各案”一类[128]。会议主要对收束军事大纲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和整理财政案进行了讨论。

（一）收束军事大纲案

段祺瑞政府最初提出的军事方面的议案为《整理军事大纲案》，该案被列入2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大会议事日程。但是会议秘书处分发的提案仅为《最近全国岁入数目与军费支出之比较表》[129]，并无议案本身。陆军部次长贾德耀在呈表时称，向善后会议呈递此表之目的，是为了“定将来议案之范围，而为讨论之标准”，显然也未视之

为“议案”。故开议之后，即遭到林长民、张仁等代表非议。认为《整理军事大纲案》与该《比较表》，“标题与内容，完全不合，无从讨论”，且“观比较表之内容，多半根据民国八年之预算，而民九、民十一与民十三，三次皆发生国内战争，经此种变故之后，其军额军费两者之变动，当不可究诘，故此表仅可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准据”，建议将此“提案”暂时保留，俟政府提出具体议案，再付讨论。

因遭到非议，执政府不久又提出《收束军事大纲案》[130]。其纲要如下：（一）根据财政状况量入为出制定军费之标准；（二）依民国八年预算案以岁入三分之一之比例为军费；（三）暂定全国兵额为五十万人；（四）设立收束军事委员会，按上列各条，妥议办法，次第施行[131]。执政府以“理由书”的形式对大纲作了若干说明。关于军费标准之确定问题，“理由书”指出，各国财政收支，皆以量入为出为原则，中国财政状况恶劣，若不确定标准，将军费控制在一定范围，必然增加国民负担，窒碍难行[132]。

从3月3日召开第五次大会开始，与会代表就《收束军事大纲案》和朱清华提出的《整理现时陆军国防案》等议案展开讨论。到召开第七次大会时，部分与会者以“整理各案之手续”未能完竣为由，提议休会，以便利用一段时间，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此时会议进行弥月，原定会期已满，经研究决定休会两周，并延会二十天。

休会期间，与会代表改以谈话会形式继续就整理军事案进行讨论。鉴于执政府已提出军事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与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准备成立收束军事与整理财政机关，与会者认为下一阶段的会议只需讨论通过两委员会组织条例，“将来一切关于军事财政之案件，可由该委员会议决”，并建议将会员分为法制、军事、财政三组，分头进行。又因有关军事议案和修正案需相互容纳，谈话会决定由原提案人与修正者及自由认定之会员负责整理军事各案。

3月31日复会后召开的第八次大会集中讨论了有关军事各案。按

照议程，需要审查的议案包括执政府提出的《收束军事大纲案》、《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以及会员提出的议案及修正案共十七项。因议案众多，且交叉重复，张凤翙等建议将各案合并，分为两类，以执政府提出的《收束军事大纲案》、《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为“讨论之标准”，融汇各修正案。然而，讨论中意见歧出。西南代表反对将军事纲要并入军事善后委员会议案，但林长民等认为“会议有规定军事善后纲要，并有规定军事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之必要”。东三省代表对此不满，“相率退席”，致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为应付局面，许世英请王士珍出面调停，未能奏效。嗣由邵章提议将有关收束军事各案，作为“大体成立”，合并审查表决，终以多数通过(133)。

4月2日，大会召集军事专门委员审查大会讨论之相关内容，并指定11名委员组织特别审查会。3日，特别审查会将全案审查完毕。4日复开审查大会逐条议决审查修正理由。4月15日，召开第十八次大会，决定将军事各案合并讨论，将合并后的议案改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经逐条审查表决，条例获得通过。条例共十六款，确定了军事善后委员会的组织、应行议决事项、议事程序、会期、财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事务处的设立等。然而，究竟怎样确保军事善后委员会解决收束军事的问题，会议并未讨论。事实上，在与会各方各自为政、政治军事力量重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即便会议作出有关规定，也难以解决军事善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善后会议只是将军事善后这一难题，移交给了段政府拟成立的军事善后委员会，至于该机构能否完成会议赋予的使命，也就无暇顾及了。

（二）整理财政案

财政是执政府亟待整理解决的重大问题。因历经战乱，中央及地方财政已陷入严重困境。各省岁入之状况，由民国八年“全国岁入数目与军费支出之比较表”所列数据中，各省军费占了全国岁入之56．9%，财政入不敷出的省份多达十七个，可推知大概。中央财政状况

因地方截留等因，极显拮据。就在善后会议开会期间，据段政府方面透露，“各机关各军队新欠旧欠，统计已有七百余万元之巨”[134]。当时舆论批评政府“恃债为生”[135]，实则连债也无可依恃。为解决燃眉之急，段政府拟发行2000万元“十四年八厘公债”，但发行之时，却因担保、利息、折扣等问题，屡遭反对。最后通过强摊各银行勉强发行出1500万元公债，但可以用作政费的只有620万元[136]，而这笔款项尚不够还清政府的新旧欠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财政的问题提上了善后会议议程。

整理财政案在2月27日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开始提出讨论。最初的议案共九项，皆由临时执政提出。在第九次大会上，该九项议案被归并为《整理财政大纲案》与《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另外，会员熊希龄、李垣、任可澄、钟才宏、邢端、周钟岳等先后提出新议案或修正案七项，也一并加以讨论。财政总长李思浩到会接受质询[137]。初步讨论之后，议决交财政专门委员会审查。专门委员会在接到议案之后即开审查会，并依议事细则规定，指定七人开特别审查会审查。结果议定以段政府提出的两案为纲领，将各修正案中相关内容归并其中，其不能归并者另立一类，以免重复。会上各方争执不休，虽多次集议，均未获结果。

直到善后会议召开最后一次大会，才对这一问题作出裁决。鉴于讨论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时，系将军事整理大纲及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并为一案讨论，会议决定将整理财政大纲案，并入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会议对议案逐条讨论，最后将全案表决通过。所通过的《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共十六条，规定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委员会由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审计院长、税务督办、烟酒事务督办、盐务署长、各省区军民长官，以及由临时执政派充之“具有财政学经验”者十至十六人组成，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条例还规定了委员会的“应行议决事项”及议事程序。

被并入该案的《整理财政大纲草案》提出了整理财政的基本设

想，内容包括：（1）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就现实收入实数支配用途；（2）编制中央暂行概算，方针为：收入方面须专列属于中央的款项，支出除国债之外，以民国八年度预算为标准，所有各机关经费八年度预算已列者，参照该年度预算办理，其未列者按照现行实支数目分别核减；（3）调查各省区财政状况，作为编制新预算之预备；（4）公布历年财政状况，及临时政府每月实收实支状况；（5）筹划裁减军费；（6）筹备划分国家地方税收及国家地方之支出；（7）商定中央与各省区协解款项办法；（8）统一国库，整理币制；（9）整理内外债款，并宣布历年所欠内外债确数及用途；（10）筹备裁厘加税；（11）厘定财政暂行法规[138]。

从内容上看，善后会议通过的财政议案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指出了解决国家经济困难的关键所在。例如，议案特别强调财政之“公开”。这是针对民国以来“纷争不已，其重大原因，莫过于财政不能公开。握有财权者，事事不敢公开；希望握财权者，每借口财政不公开，为争权之利器。所以公开二字，实为整理财政之重要关键”的现实特别强调的原则，值得注意。

另外，条例规定财政善后委员会成员包括“各省区军民长官”，也十分瞩目。最初政府提出的议案与会员提出的修正案，均规定财政整理委员为“民政长官”。后来考虑到各省区财政之收入支出，均与军政有关，“既欲期整理财政方法通行，即不能不使军事长官与闻”[139]。然而民国以来中国财政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军政长官”所造成。要整理财政，从根本上说，就应改变军人干预财政的现状。善后会议无法改变这点，却迁就现实，寄希望于本不应该掌握国家财权的军人与之合作，自然事与愿违。

（三）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

国民代表会议是段祺瑞政府标榜用以制定宪法，解决根本建设问题的重要会议。按照段祺瑞的说法，召开善后会议只是为了治“标”，

而国民会议则是治“本”。故对于列入善后会议议程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与会者十分重视。但是，由于理念差异和利益争执，国民党在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宣布抵制善后会议，并号召国民组织召开国民会议以制宪，这就将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置于截然对立的位置。另外，已经参加善后会议的人，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及所代表的派系差异，在会上也都各执己见。这种政治上的差异在讨论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时充分表现了出来。

《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是由临时政府法制院起草，以段执政的名义提出来的[(140)]。会议进行中，不断有会员提出修正案。截至3月16日，已收到张凤翙、汪声玲、江亢虎、于宝轩、那彦图、王运孚、胡适、赵从轺、顾鳌等提出的修正案十二件[(141)]。从第二次大会到第二十一次大会，会员倾注精力对该条例草案进行讨论。在国民代表会议的权利是否应该受到限制，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各省区代表的名额，宪法应该是由政府指定的专门人员起草还是应交国民代表大会起草等重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

关于国民代表会议的权限，条例草案表述为：“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中华民国宪法及关于宪法实施之附则，为其职权。”《法制院呈稿》亦称：“国民代表会议，既以商定国是为主旨，则制定根本大法，自为其唯一之职权。至其他政治善后问题，应委之与善后会议，普通立法事项，胥让诸根据宪法产生之立法机关。”[(142)]但是在会议逐条讨论草案时，代表金兆棪认为，国民代表会议是为“国家最高的及无上的机关”，是国家的“主体”，应否对其加以限制，值得怀疑。即便应该限制，谁具有这样的权利，亦属问题。代表寇遐对限制国民代表会议职权从根本上持反对态度，认为共和国家根本主权在于国民，除了国民代表会议自身可对其职权加以限制外，其他任何人均无此权力。

金、寇二人的意见反映了西南联治派的立场以及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对于民主共和的理想观念。林长民则站在政府派立场及政治实践

角度反对金、寇的主张。他认为，宪法问题乃国家的根本问题，宪法实施之附则，应能包括一切问题，因而限定国民代表会议这一“职权”，实际上已规定了会议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与金氏所称国民代表会议系无上之机关，并不矛盾。林尤其不赞成寇遐的意见，斥之为“纯系一种理论”，认为事情若纯依理论研究，则会议可以不必讨论此案。事实上，要做到对国民代表会议的职权毫无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林氏举例说，“试思本案规定之会期三个月、名额若干人诸条文，若依此说绳之，何尝非限制之意”，如果依寇氏之意，此皆不必加以规定，“则一切条文，皆无准据”。因此，林氏极力主张维持原案[(143)]。双方就此争论不休。

宪法应该由政府指定的专门人员起草，还是应交由国民代表大会起草也是争论异常激烈的问题。在善后会议第十九次大会上，林长民提出增加“中华民国宪法案及实施附则之起草，由国宪起草委员会行之”的条文。遭到寇遐等人反对，寇等主张于条例草案第一条之后增加“宪法之起草，由国民代表会议互选委员若干人行之”。认为宪法具有一定的“民约”性质，应体现主权在民之意；而林氏之办法，系“假政府官吏之手，根本上即违反民与民相约之意”。林长民反驳说，宪法起草委员会虽由段执政及各省区军民长官推举，但宪法之最后决定权仍在国民会议，即便不妥，亦“有纠正之余地”。至于宪法的价值，应决定于其内容实质，而不是决定于“起草之机关”。但寇遐坚持认为，宪法系国家根本大法，其起草权应该操之于民，否则所产生的宪法只能名之为“政府宪法”或“官僚宪法”。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大会最后将各自的主张付诸表决，结果寇遐的主张被否决[(144)]。

国民代表会议的人员构成，各省区的名额及选举办法亦是会议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人员构成及名额，段政府最早提出的条例草案规定为京兆四人，各省区每道三人，内外蒙古八人，西藏六人，青海两人，华侨十六人，全国各大学区、各商业区、各实业区每区一至二人，拒贿议员之当签者及担任宪法起草委员者。其有关选举的规定

为，凡中华民国年满二十五周岁以上之男子，具备关于理智各条项，并无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情事者，均有选举及被选举为国民代表会议议员之权[145]。对于上述规定，会议提出众多修正案[146]，形成以省区和以人口划分国民代表会议名额两种意见。大体言之，“小省区之代表，咸主张以省区为单位；大省区之代表，咸主张以人口为比例。双方争执，纷扰不已”[147]。经反复讨论修改，会议最后以中国人口缺精确调查，邮政局的统计数据亦颇多不实不尽之处为由，否定了“人口主义”。但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对国民代表会议代表名额作了调整，其人数增加为534名，取消了有关大学区、商业区、实业区及拒贿议员单独配给名额的规定，黑、吉、闽、陕、甘、云、贵、桂、新等省选出十六人，其他省份所选代表自十八人至二十七人不等。选举方法实行单选复选制，各省区议员选举，以复选制行之；蒙古、西藏、青海、华侨的选举，以单选制行之，得票较多者当选。

1925年4月18日善后会议召开第二十一次大会，在此前对条例草案所作逐条表决的基础上，就业已修正之议案开“三读会”，并将全案付表决。结果，“全场起立，主席宣告全案成立，鼓掌之声雷动”[148]。至此，历经种种艰难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终于通过。

政府派副议长汤漪曾声明说，善后会议议案众多，但真正重要的议案只有五个：（1）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整理财政案，（3）整理军事案，（4）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5）联省自治案。在汤漪看来，“二、三两案较易通过，第一案虽多争议，亦有解决希望；惟第四案的进行，妨碍正式政府的成立，及宪法的产生；第五案则善后会议无权解决，须于将来国民代表大会时提出”[149]。经过会议各方努力协商，汤漪所列五项要案中，前三项至少在形式上已得到解决。这样，善后会议最为棘手的议案实际上只剩下与西南联治派相关的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和联省自治案两大议案了。

三　联治派在善后会议中的活动

善后会议期间，联治运动在西南实力派的鼓动下再度兴起。如前所述，西南实力派曾对参加会议持犹豫态度，他们之所以参加善后会议，唯一的理由在于会议可能向他们提供宣传实施联治主张的机会[(150)]。故会议开始不久，唐继尧、赵恒惕便发出通电，主张联治[(151)]。钟才宏、萧堃、郭同等随即在会上提出《确立联治政制为改革军财各政之标准以解纠纷而谋统一案》。该案由若干具体议案组成，其要旨有三：一、欲谋求国家的真正统一，亟应着眼于军政、财政，谋根本之改革；二、欲改革军财两政，“不可不先将中央及地方权限确定，以为标准，而欲划分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以吾国土地之广大，民族之殊异，除采用联治制，使地方得自由发展，而各区仍互相联结，以成复合之绝大共和国外，无他道也”；三、设立临时联立参政院，以各省区之“公意”，取代临时政府的“独裁”[(152)]。

与此同时，褚辅成提出了善后会议五个重要议案中的第四项议案，并征得费行简、周钟岳、彭养光、马君武等十二人连署，原案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顾鳌等提有修正案。该案之要旨，在于不满现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主张设国务院，执行国家最高行政权，并将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集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于一身的集权制，改为国务院所由构成的三十三位执政的“合议制”[(153)]。褚案与联治案可说是相互支持的议案，该案的提出，显系对段政府的挑战，其要害在于以分权取代集权。诚如《晨报》评论所言，褚案“使果实行，则现当局地位直从根本推翻”[(154)]。

议案提出后，联治派为谋求会议通过作了大量努力。褚辅成等在京联治派人士，除向善后会议递交提案外，还研究制定了实施联治的方法：（1）宣布提倡联治与政局攸关，所标名目，为确立联治政制及改革军财各政之标准。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谋全国统一，解除南北误会，共定国是。（2）所定联治方法，将来在善后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征得多数意见，方能表决实行。（3）联络各省会员时，先征求其对联治的意见，敦劝加入或赞助实施。（4）在征得九

省以上会员同意后，即在京召集联治讨论会，共同组织此项机关，以为急办联治之表示。（5）与各会员接洽妥当后，即向中央方面疏通[155]。与此同时，在京联治派与各地联治派密切配合，共谋进行。上海部分联治分子，就曾在“一品香”集会，提议以滇、黔、粤、桂、湘南五省区为联治试验区，与北方划界而治。试验期限为三年，如行之有效，即请东北加入，为西南东北之大联治。如行之无效，亦可免北伐南征阋墙相斫，以保国家元气[156]。

3月22日，因湖南省议会代表王克家来京，在京联治派代表沈钧儒、褚辅成、张耀曾、钟才宏、潘大道、朱清华、谷钟秀等五十余人聚会中央公园水榭，商议联省自治运动方法及组织进行事宜。议决组织“联治同志会”，并起草简章九条，以利进行[157]。与此同时，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根据省议会决议，发起组织“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合会”，嗣以“省联”名义，向善后会议提出以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纠纷促进全国统一的方案。3月24日，各省省议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随即开始政治活动[158]。

联治派虽力谋实现其主张，但内部亦出现裂痕，有所谓“军人派”与“政客派”之分。军人派有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政客派有唐绍仪、褚辅成、杨永泰等。二者利害不同，行为取径各异。军人派如滇唐、湘赵之代表出席善后会议，以及王九龄就中央教育部长之职，皆系向中央表示有合作之可能。“故彼等无推翻现政府之决心，只有未来之希望而已”。后者唯一的目的，在于设法掌握中央政柄，“故于现政府，当然采取攻击态度。思借此联治二字，以为武器”。两派标识虽同，目的实异，这直接影响到联治运动的发展[159]。

对于褚辅成的议案，政府派人士极为敏感，主张涉及改制问题，“与其由善后会议提出议决，不如由政府自动的拟一大纲，提交该会同意，借以表示善后会议不能有此提案权”。奉张对褚案亦不以为然。在善后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因褚案列入议程，东三省代表以不

出席会议加以抵制，致使大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召开，显然是贯彻奉张意志的结果[160]。《顺天时报》的文章称褚案为善后会议的“暗礁”，颇能揭示其间的关系[161]。在善后会议第十三次大会上，经政府派会员提议，按照议事细则第十六条之规定进行表决，结果褚案以超越善后会议权限而被搁置[162]。

对于旨在加强地方权力的自治运动，段祺瑞本无不慊，其就职时的“马”电，有“促成省宪”之语。段既赞成省宪，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地方自治[163]。惟此次联治案之提出者“均为西南实力派代表”[164]，也就引起了段祺瑞的警惕。

为对付西南联治派，段祺瑞及其同僚可谓煞费苦心。西南代表共计九人，若不将褚辅成算在内，则其代表只有八人[165]。其人数虽仅八人，“而段祺瑞视之，则不啻数千人，所以欢迎之者，较欢迎孙中山，殆有过无不及”。除饬沪宁、津浦、京奉三路特备专车迎迓外，并饬沿途军警加以保护。且令所过地方之长官如卢永祥、王揖唐、郑士琦等，于其经过之际，为之照料一切。同时并着齐岳英、沈成栻、任传榜与之同行，护送进京，以示优异[166]。

段祺瑞之所以“居滇黔桂代表为奇货”，据《申报》记者分析，原因有三点：第一，当时联省自治运动，发展迅速，虽在北京以政学会为中心的联治党，其背景不全在西南各省，然其运动之起点，则确以湘鄂粤桂滇黔川赣为之，其中最有可能被运动者，则为湘桂滇黔。为阻止联治运动进行，必须竭尽其力拉拢。第二，滇黔桂等省，位在西南极端，若不拥戴段氏，“则段氏虽有长鞭，亦不及马腹，驭之以刚，既非势之所能，则怀之以柔，情殊不能自已。今滇黔桂之代表，既应招联袂而来，自不能不加以異款，使其心悦而诚服”。第三，滇唐会师武汉之说，虽半含宣传性质，而鄂萧川熊联唐以解决坐镇武胜关的王汝勤之风闻，则不可轻视。故为阻止滇川鄂联络以倒王起见，亦不能不特别重视滇黔代表。“质言之，段之重视滇黔桂代表，半为打消西南各省之联治计划，又其半则为维持王汝勤之地位。打消联治

计划，乃为未来统一全国巩固中央政府权力计，而维持王汝勤，则为监视豫胡与鄂萧之联络，及鄂萧与西南之联络计也”[167]。

段祺瑞对联省自治的态度，从湖南省议会代表王克家在善会期间与许世英的一席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窥见。王问：“合肥对于联省自治的问题，意见到底怎样？”许答曰：“合肥对于联省自治四字，是很怀疑的。他的意思，说省自治可，县自治可，镇乡自治也可。惟于‘省’字头上冠一‘联’字，是不懂得的。怕的说联省，是省与省联变成兼并割据。怕的说联省自治，只管各省，不管国家，只管地方，不管中央。若说联省便是为国家，为中央，可以办到统一，这个当做注解，说明白，不若用联自治，反为好些。”[168]

不过与褚辅成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相较，联治案已属温和，对段政府构成的威胁亦相对较小。故段政府对于联治主张最初只是设法疏通。3月29日晚，许世英、姚震、章士钊、王九龄、段宏业、汤漪、陈宦、张树元等联名邀请联治派在绒线胡同“某宅”会谈，表示政府方面亦赞成联治主张，“但以兹事体大，未便在善后会议中解决，仍留待国民会议较为上策，以为缓兵之计”[169]。

30日，段祺瑞复电滇唐、湘赵，解释不在善后会议中讨论联治问题的原因：“联治之论，实获我心，此次政局改造，其唯一途径，在使国宪省宪，同条共贯。祺瑞于去年十一月来京就职，即经马电明揭此义。今年二月，于善后会议开会之日，复经郑重宣言，并条举促成省宪方法，期于次第实施，与来电主张，初无二致。但盼制宪机关，早日成立，根本大法，早日观成，吾辈协力改造之精神，亦早日实现。则长治久安之局，将从此奠其始基。否则纵横捭阖，所谓联治者，非形同割据，即互相侵扰，末流之失，变本加厉，亦所当防。”[170]

直接出面反对将联治案列入善后会议议事日程的是汤漪。汤氏素主联治，曾与张耀曾等发起筹组联治同志会[171]，但此时却站在段

政府立场。他在对电通社记者谈及此事时称："第五案（联治案）为本人民国十一年以来所主持者，自欲早观其成。但本人以为现在之善后会议，无权议决此案。须于国民代表会议时，提出讨论，较为得当耳。"[172] 汤漪虽未就联治案的内容加以评论，但其从会议权限角度提出的意见，对于搁置或否定联治案，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联治案遭到反对，除上述原因外，尚与吴佩孚有一定关系。吴迷信武力统一，对于联治，本不赞成。兵败之后，感叹夙志难以实现，不得不接受主张联治的湘赵等人庇护，以谋再起[173]。他曾明确表示："中国欲求治理，武力统一外，即联省自治之一法。"而联治派有感自身力量薄弱，极力联络南北军阀，作为后援。在军阀心中，联治乃割据之谓，担心自身地位不稳固的军阀，"既闻可以公然割据，岂有不赞许之理"[174]？双方一拍即合，暂时走到了一块。

然而，联治主张与张作霖不甘只作"关外王"的野心是冲突的。吴氏欲借重湘赵等联治派，谋求东山再起，更使奉张别无选择地站到与联治派对立的立场。而奉张的反对，则成为联治案在善后会议获得通过的最大障碍[175]。联治案提出不久，对该案持反对态度的奉、吉、黑、热及卢永祥方面的代表就曾公函赵尔巽，请勿提交大会议决，得到赵的支持[176]。加之国民党方面因唐继尧等借联治之名，"冀攘夺地盘，殊与民党主义背驰"[177]，亦持反对态度，使联治派感受到巨大的外在压力。

由于联治派内部军政两系的分野及外部反对，联治案虽经提出，其在善后会议通过的前景已十分暗淡。为改变窘境，西南代表竭力对政府方面进行疏通，但未见效果。在此情况下，西南方面提出联治问题未解决前，不能开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甚至提出以联治案与国民会议条例交换的计划，即以通过联治案为条件，换取联治派对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支持，否则将不投票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条例[178]。奉天及政府方面代表则合力反对，甚至不容联省自治案列入议事日程[179]，致使联治案未能在善后会议上获得通过。

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和联省自治案被否决，意味着西南联治派未能实现参与善后会议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联治派一方面电催唐继尧在滇组织联治政府，对执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以退出善后会议南下相要挟[(180)]。组建联治政府的计划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退出善后会议的要挟，因西南联治派的代表不过寥寥数人，即便全都退出，也不会对会议产生多大影响，故“政府方面对此并不十分重视”[(181)]。因而，对西南实力派来说，怀着推进联治的目的参加善后会议，无异参与了一场只会输不会赢的政治赌博。

第三节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

一　善后会议面临的困境及最后结局

善后会议在直奉战后国内政治军事力量暂时出现“均势”的形势下召开，所标榜的目的为解决时局纠纷，谋求国内和平统一，并为国民代表会议召开作准备。然而，善后会议的人员构成及段祺瑞政府宣示的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抵制，使善后会议尚未召开便蒙上一层阴影。另外，参加会议的地方实力派怀抱的目的也各不相同，顺其意则设法维持，拂其意则竭力拆台。这样，开幕伊始，会议便已遭遇重重暗礁，不用说通过会议解决直奉战争善后问题，就是善后会议能否自善其后，也开始让当事人怀疑[(182)]。

善后会议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停止国内军事行动。会议既以谋求和平统一为目的，因而结束国内军事行动成为会议成功召开的前提。为建立这一前提，会议开幕后的第一次谈话会，与会代表便向段祺瑞提出通电全国停止军事行动的意见书[(183)]。

当时国内已经发生战事或正在准备军事行动的计有浙江、河南和江西等处。浙江方面的战事系张宗昌奉张作霖及卢永祥之命，入

沪“办理肃清溃军及上海善后事宜”，与齐燮元发生冲突所引起；河南方面的冲突系胡景翼前往“驻防”与憨玉琨不愿回陕所引起；江西方面则因方本仁抵制广东的北伐所致。段祺瑞政府接到善后会议代表意见书之后，即发出通电，要求所有各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员前往浙江、河南等地调解。浙江方面的冲突，嗣因张作霖暂时不准备在东南用兵，加之驻上海外交团的干预，很快达成妥协。江西方面的冲突，因孙中山去世，国民党亟须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不得不暂时中止北伐而化解。这样，真正在军事上成为善后会议“暗礁”的，只是河南的胡、憨之争。

还在善后会议即将开幕之时，因胡、憨相争，河南便已战云密布[184]。其所以致此，与陕西督军刘镇华不无关系。盖豫省自吴佩孚下野入山之后，群雄逐鹿，各自为王，陷于纷乱状态。刘镇华恃其实力，为拓展地盘计，派遣憨玉琨、张治功两部入豫，收拾局面。并致电段政府，报告憨军克服郑州、洛阳情形。及段政府特令胡景翼、孙岳办理河南军务善后，不惟憨氏自恃“克服”豫西有功，不肯相让，即刘镇华方面，亦以曾奉政府密令讨伐吴氏，主张豫西防地应由陕军驻守。由此形成胡、憨相持之局面[185]。

段政府为平息事端，曾严令胡、憨两军各守原防，但未生效。2月22日，双方终于爆发战争。当时，双方各有军队数万人，虽然战场在豫西，却有牵动全局之虞。段祺瑞急派孙岳前往战地调停。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等也通电调停，劝告胡、憨双方停战议和。在荥阳激战之后，孙岳艰难地将双方聚集在偃师举行和谈。但因刘镇华支持憨玉琨继续与胡景翼对抗，调停失败[186]。此次调停，孙岳在段政府支持下，既利用了与胡、憨双方的私人关系，又采取了武装调停手段，甚至派出飞机前往战地向双方散发传单[187]，均未著成效。直到胡军攻入洛阳，憨军失利退出豫西，河南的紧张局势才趋于缓和。

由于河南战争发生在善后会议开会期间，故颇为各方关注，成为

检验善后会议能否“善”时局之“后”的试金石。3月10日召开第六次大会时，会员任可澄便对会议的作用表示怀疑。认为会议本为解决时局纠纷而召开，故开会伊始，即有息争休战之通电，“乃会议甫开，战事于起，荏苒既已经旬，各方殊无悔祸之意，执政府亦不闻有制止之方。似此矛盾情形，会议宁非虚设”？因而建议休会一周，以促各方反省。大会休会后于3月18日召开第二次谈话会，会员再次呼吁，“应设法使各战区之军事行动，一律停止”。若这种“与会议宗旨完全相背”的状况继续存在，则会议将没有价值[188]。

善后会议面临的另一困难为废督裁兵问题。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废督裁兵”至迟在1920年便已被关心时政的人士提出。善后会议召开后，国人似乎看到了实施这一主张的曙光，再次提出“废督裁兵”。1925年2月27日，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发出废督之“感”电，并主张首先在苏省实施。卢永祥的通电发出后，很快在善后会议激起反响。在3月3日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严端临时动议，由善后会议致电卢氏，表示赞同。并请执政府即日实行废督，以收束军事[189]。

3月13日，会员熊希龄正式提出废督裁兵案，主张先从江苏入手，废除督军，并由中央设立元帅府，以安置释去兵权的督军[190]。然而，要将废督裁兵主张付诸实施并非易事。陆军次长贾德耀解释不能照即办理的原因时说，废督裁兵，“兹事体大，非简单方法所能决，又非一二人同意，即能办理”[191]。后以废督裁兵属于军事性质，遂将熊希龄的议案并入军事大纲案和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一并讨论。但最后议定的《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仅规定委员会具有议决“缩减军队”、安置“溢额官兵”等权力，并未就废督裁兵作出相应规定，实则熊案已消匿于无形[192]。废督裁兵的主张未被采纳，表明段祺瑞政府没有能力消除军阀祸乱，而善后会议“善”时局之“后”的能力，也因之受到怀疑。

此外，善后会议还面临如何确定“专门委员”权限的难题。善后会议即将召开时，孙中山提议会议应有各法团代表参加。段祺瑞不便反

对，但又不愿改变已经拟订的《善后会议条例》，遂聘请各省议会议长、教育会会长、农会会长、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其职权为审查善后会议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没有表决权[193]。

然而，段祺瑞政府所定专门委员的聘任方式及职权范围从一开始就遭到各方批评。批评者认为，善后会议具有国民代表会议预备会性质，将为国民代表会议制定组织条例，若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具有“钦定”色彩，则会议将难以反映民意，也就没有资格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故反对专门委员由政府指定，要求工会、学生会等团体也有代表与会。另外，批评者认为，专门委员没有提案权和表决权，则其与会只具象征意义，而无实际价值，故开会之后，争取专门委员的提案权与表决权便成了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关于接纳工会与学生会代表为专门委员的问题，段政府以其尚未成为正式“法团”为由，加以拒绝，而专门委员的提案权与表决权问题则迭起风波。

先是与会专门委员欧阳振声等致函段祺瑞，请求以会员资格加入善后会议，取得提案权与表决权。段随即将该函咨送善后会议议决。会议经讨论表示不反对法团代表成为会员，但仍请段氏自作决定，实际上是将难题送还段氏。3月21日，执政府召集赵尔巽、汤漪、许世英、林长民、屈映光、陈宦及各阁员开会，讨论此事。由于“政府之意，始终不以法团加入为然”，加之会议已开月余，中途修改条例，殊为困难，故决定拒绝法团代表成为正式会员取得提案权与表决权的要求，并对之进行疏通[194]。但法团代表态度坚决，表示非加入会议取得提案权与表决权不可[195]。

这就使段政府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同意法团请求，则后一阶段的善后会议将更加难以控制；不同意其请求，则很可能招致拂逆民意的指责。最后采取敷衍办法，即在否定法团代表修改会议条例，取得正式会员同等权利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各法团于来京代表中，推举四人，以补充正式会员中“有特殊资望与学术经验者”未能全部到会的缺额[196]。由于僧多粥少，法团代表不愿接受这一决定。政府方面遂

采取分化法团代表的办法，同意法团中省议会代表的要求，作出省议会议长为拟议中的临时参政院当然成员之规定，使之独得其利。结果导致法团内部的争执，执政府渔翁得利，勉强渡过难关[197]。

善后会议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实力派从中作梗。例如军事议案，依段祺瑞之意，系以《收束军事大纲案》为整理军事之标准，但奉天代表极力反对段拟订的办法，甚至全体不出席，以为抵制，致使会议两次流会。后经顾鳌提出折衷办法，将《收束军事大纲案》并入军事委员会条例，而将军事整理委员会之“整理”一词，改为“善后”，示以不必马上对军事问题作实质性改动，以迁就奉方。“奉方代表因据以电告奉张，张复电认为可行，命代表即日出席，故该条例案之十六条条文得以通过。而其军队应如何裁汰，以及军额军费，等等，究应规定若干，则毫无下文。与段执政当初提案之原意，大相违背”[198]。

善后会议既面临如此多的困难，主持者自不敢对会议抱过高期望。汤漪曾表示，对会议收到的五项主要的提案，只希望其中的军事、财政、国民会议条例三项能通过。然而在政府人士心中，就是这三项议案能否顺利通过，亦没有把握。故曾提出最低限度的设想，“即于延期二十日内无论如何须将国民会议组织条例通过”，将通过三项议案的目标缩减为一项[199]。段祺瑞在会议弥月之际，面对提交各案无一议决的局势，不得不知难而退，将中央政府提交的议案，除正待集议者外，全部撤回[200]。

后经王揖唐、屈映光等多方疏通，奉天方面与政府派就军事整理案达成妥协，善后会议才出现转机。4月14日召开第十七次大会之后，出现了段、张联合控制会议以对付西南联治派的局面。从这一天起，善后会议先后通过了汤漪所说的三个主要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议程，正式宣告闭幕。这样，备受时人关注的善后会议能否自善其后的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可令段祺瑞政府释怀的结局[201]。

善后会议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政府实施和平统一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段氏整合北洋势力，以便建立权势中心地位的一次努力。对于善后会议，时人褒贬不一，从会议召开之日起，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评价。这与评论者的立场不无关系。一般而言，政府派人士对善后会议多褒扬，非政府派人士则多贬斥，而以反政府派人士为甚。

龚心湛在为费保彦《善后会议史》作序时称，善后会议将天下之大兴大革，悉付之舆论，深得民为邦本之义。会议五旬，议决众多议案。“自有代议制以来，未有若是之迅疾详慎者也”。叶恭绰称，善后会议，与民更始，“一时海内贤达之士，靡然向风，相与挟策，来会兹土，阅时凡五十日，而内政改造之方，国家大法之的，罔不具备。虽其间论见不无异同，大抵出乎探讨之意，谋国之诚，非徒向之借邀功利者可比也”。田中玉称，善后会议旨在“结束十四年来争法之嚣拏，复以国宪之成，责之行将召开之国民会议。所以继往开来，致我国于升平之域，开后世专法之基，固莫善于此也”[(202)]。

与龚、叶、王等“政府派”人士的认识及评价相反，非政府派和反政府派人士则对会议展开了猛烈抨击。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代表系由执政府指定，具有“御用”性质；二是善后会议不是国民会议的预备会，却要越俎代庖，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三是违反民主制宪的原则，将宪法起草权交与由各省军民长官推举之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四是所通过的议案对各方没有约束力，因而无法实施；五是派系之争激烈，致使会议难以自善其后。

平心而论，在直奉战争结束，国家百废待举的形势下，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图谋和平统一，应为顺应时势之举。作为武力统一的对立物，以会议的方式谋求国家统一，反映了当时多数国民及政治家的愿望。当时批评善后会议最主要的理由是，善后会议已经成为段祺瑞政府抵制国民会议的一种手段。其实国民会议在当时只是一种政治理念，是一种待证的假设，与善后会议一样，其可行性尚需政治实

践来证明。因而即便段祺瑞有抵制国民会议的主观意图，也不能简单的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作为一种改革现实政治的尝试，无论善后会议结果如何，均具有意义。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尝试，国家政治的发展路径才能逐渐确定。孙中山应邀北上，各方面人士的积极参与，都是抱着对和平统一的一线希望所作的积极的政治“尝试”。

从会议的过程及会后中国政治的实际来看，段祺瑞并没有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1925年9月，浙奉战争爆发，宣告段氏和平统一政治努力的失败。但这样的结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出，难以未卜先知。对会议能否产生积极建设性成果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却应聘成为“特聘会员”的胡适，就是通过“尝试”，看到善后会议并不能制止国内战争之后，才获得“此路不通”的认知，表示不愿意继续出席善后会议的。他在《割据》一文中写道：“今日善后会议至少也应该有全国停战的条件作开会的基础，若各方的争执仍须靠武力来解决，则是各方参加善后会议为毫无诚意。……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该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203] 胡适与会时所抱“尝试”想法以及“尝试”之后感受的失望，是当时社会心理较为典型的反映。

二　国民会议运动

善后会议面临的另一严峻挑战是当时蓬勃兴起的国民会议运动。

召开国民会议几乎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都曾提出过的主张。共产党从1923年起曾多次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实现统一及和平建设[204]。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放弃护法立场之后，也明确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国是的主张[205]。段祺瑞在酝酿反直时派许世英与孙中山联络，曾提议倒曹成功后，先开善后会议，继开国民会议，并将后者视为治本之策。就连吴佩孚，对国民会议亦主张甚力，表示召开国民会议是其“一贯主张”，反复倡导[206]。

但是在对“国民会议”内含的理解上，各方差异甚大，其中段祺瑞政府与国民党（包括正与之合作的共产党）的分歧最为明显。段祺瑞主张的国民会议，其组织法由善后会议制定，善后会议的会员又多由政府指定，未能真正容纳社会团体参加。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是制定宪法的最高机关，因而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预备会议亦应有众多人民团体参加，不能由政府操纵控制。尽管存在分歧，但各方均认同国民会议是解决国是的根本办法，这就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在善后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国民会议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天津、张家口、山东、湖北等地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女子参政协进会等召开大会，在对善后会议表示反对的同时，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时局宣言，发表函电，促成召开国民会议[(207)]。3月1日，由孙中山和李大钊等联名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到会代表共八十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208)]。大会揭露了善后会议由军阀操纵的“反人民”性质，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了决议。会议持续一个多月，于4月16日闭幕。

段祺瑞对社会各界发起的国民会议运动虽不以为然，但因标榜善后会议兼具国民会议预备会性质并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条例》，故善后会议闭幕之后，也就不能不将所承诺的国民会议提上政府议程。这与国民党及社会各界呼吁召开的国民会议构成了冲突，致使段祺瑞亟谋解决之道。

1925年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咨陈内务部，以“现在国民会议条例业奉临时执政明令公布实施，并已着手筹备。所有前项组织各团体，自难再任其成立，致滋纷扰”为由，规定“倘再有假借（国民会议）名义聚集开会情形，显系别有企图”，将“通令各警察署随时注意依法查禁”[(209)]。

在查禁国民会议运动的同时，段祺瑞开始了“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此事直接关系到段能否实现由临时执政到民选总统的政治过渡，因而政府方面异常重视[210]。1925年5月3日，段祺瑞任命许世英负责筹备国民代表会议事宜，不久又任命林长民筹备“国宪起草委员会”[211]。6月3日，段政府公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预定11月1日正式开会。10月30日，执政府发出命令，规定“国民代表会议议员应于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212]。

但是段祺瑞禁止国民会议运动的做法不仅使其尊重民意的表态信誉扫地，也为召开国民会议设置了障碍。会议尚未召开，反对的声浪已经高涨。

首先是拥黎派代表人物章太炎、唐绍仪表示强烈反对。8月5日，正当政府派人士开始为国民会议的前景感到乐观之时，唐、章二人发出通电，主张保存约法，反对国民会议。电文指出：“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皆已次第公布。按组织法乃善后会议所定，选举程序令则临时政府自为，二者皆非执法机关，无为民国制法之权，执事为此，与向之召集安福国会无异也。执事秉钧以来，十有余年，毁法丧权，疵累恐多。……执事果有靖谳之心，则宜保存约法，勿自创制。速将国民代表会议之伪法、伪令，一切取消。……他日盖棺论定，犹不失为瑕瑜不掩之人。若乘急难之时，以行劫制之术，万目睽睽，岂可尽掩。”[213]

其实在政治理念上，章、唐并不一定以国民会议为非，但出于拥黎的考虑，则非出此举不可。因为段氏是在否定旧“法统”的基础上确立临时执政地位的，其所以急不可待要召开国民会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借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章、唐既“主张拥黎出山，以正法统”[214]，当然不愿意看到段氏召开国民会议。

章、唐的通电反对得到了湖北方面的响应。10月12日，湖北省议会议员维杜发表通电，认为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国民议会为国民行使

主权之最高机关，应由国民自动组织，“非彼所谓善后会议所能代庖”。表示湖北为民国首义之区，该省议员受民意所托，“对于此种无法无据、于理未顺之国民代表会议，根本认为不能成立”，故特通电反对[215]。

其次是作为国民会议基础的地方议会选举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入秋之后，各地根据政府颁布的《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开始国民会议议员选举。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两阶段进行。然而，两个阶段的选举均因舞弊和各种丑闻被舆论曝光而招致反对，引发纠纷。例如南京于9月10日初选投票，运动当选人纷纷“密设机关，实行贿选”，有被查获证据，提起诉讼者，有被抓获扭送省宪，由郑谦亲自审讯者，甚至出现初选监督、户籍主任被控告，户籍事务所被砸毁的事件，公民要求宣告选举无效[216]。湖北的初选自王揖唐当选之后，已露出安福派从中操纵的痕迹。原定8日举行复选，但十八位代表的名单，不待投票，已先期揭出，且公然见诸文电。其具体办法，系由安福派驻京头领联络武汉军方及“省议会之某派”，共同成立“公司”，操办其事。所选者“均系某某官署之重要职员，并闻指定人各出银一万五千元为该包办人之交换费”。消息传出，全鄂震惊，选民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要求政府“彻查”。该省复选被迫展期[217]。江苏的复选因王景常以三千五百元贿选，引起诉讼及王的反诉，迫使选举监督郑谦宣布停止选举。而郑谦此举，复引来违反民会选举法的指控，弄得郑进退维谷，无以收场[218]。其他地区如河南、青海及华侨社团的选举，也因故展期[219]。

由于地方议会选举遭遇麻烦，临近国民会议开会，各省区选出的议员，尚未及应选人数的五分之三，奉命前往京师与会的各地议员，仅有五六十人。到京的议员要求先颁命令举行开幕式，筹备处以到会者不够法定人数，先举行开幕式不符合条例规定为由，未予应允，只同意安排招待处以接待来京代表及发放旅费。对此，一些代表强烈不满，表示非先举行开幕式不足以促各省选举之进行，“甚至有谓即使

段执政下野民会仍须进行，不能与段执政同时消灭者”[220]。执政府既不能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开会，又无法促成地方议员选举以凑足法定人数，国民会议的召开也就失却了起码的组织基础。

另外，一直站在后台操纵执政府的奉张态度移易，亦成为段祺瑞难以如愿以偿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地方议员的选举问题上，奉天方面曾因对国宪起草委员会持怀疑态度，迟迟不愿举行选举[221]。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国民会议难以成立，主要原因在于“奉方对于该会议之不甚热心故也”。9月，在政府派人士梁士诒前往疏通之后，舆论又认为由于奉张态度发生变化，对于国民会议如期召开“已无可虑之必要”[222]。当时舆论对于奉张态度移易的判断是否正确并不重要，惟其指陈的国民会议能否开成须视奉张的态度为转移，则是客观事实。这样，当奉张的态度果真发生不利于执政府的重大变化时，国民会议的召开也就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

奉张与段虽同为反直三角同盟成员，政治主张和利益却各不相同。两者最后分道扬镳系多种原因所致。先是郭松龄倒戈反奉，1925年12月3日兴城一战，奉军张作相部失利，张作霖施缓兵之计，称愿和平交出政权，段祺瑞不知有诈，拟命郭为奉天督办，触犯到奉张的根本利益。此事为段、张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次年1月5日，出于防止国民军与直系联合的需要，张作霖致电吴佩孚，主张恢复约法以解决国是。17日，张再电吴，称关内事请吴全权处理。此举不仅否定了段政府刚刚通过的宪法草案，否定了段氏所欲建立的新“法统”，而且在治权上蔑视了段的存在，使双方既有的关系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力图通过改变临时政府政制，设立国务院，以缓解矛盾。但双方关系已无法继续维持。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宣布与段祺瑞政府断绝关系。25日，张作霖召开会议，议决东三省独立，并就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223]。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按照《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增设的国务院，一开始运作即步履维艰。在许世英内阁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国务

会议上，于右任等国民党阁员坚持以段祺瑞下台为就职条件，致使许不敢待在国务总理位置上，结果以陆军总长贾德耀代理[224]。此时，段政府自身的继续存在已经成为问题，也就无暇顾及国民会议的召开。国民党和南方的国民政府虽然宣称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国民会议，但也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宣传。随着“三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的变化，段祺瑞下台，国民政府的北伐进入准备阶段，两种不同政治取径的“国民会议”均不再为人提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和平会议手段又重新为武力统一所代替。

---

(1) 《段祺瑞与张作霖意见之冲突》，《重庆商务日报》1924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8册，第1580页。

(2)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8页；《西报论中国内乱》，《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3辑，第749-750页。

(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8页。

(4) 古蒓孙：《乙丑军阀变乱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486页。

(5)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6页。

(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0-431页。

(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4页。

(8) 《重庆商务日报》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9辑，第141-142页。

(9) 《冯玉祥函段陈时局意见》，《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8辑，第655-656页。

(10)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11) 心史：《此后政府亦欲财政统一否》，《申报》1924年11月23日。

(12) 随波：《段祺瑞入京前之津讯》，《申报》1924年11月25日。

(13)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1月20日。

(14) 《北京通讯》，《申报》1925年1月16日。

(15)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等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6)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五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7) 《昨日段宅之特别会议》，《顺天时报》1924年12月24日。

(18) 《急起直追之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24年12月25日。

(19) 《时事日志》民国十三年12月2日条，《东方杂志》第22卷第1号。

(20)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称条例草案“几经讨论，几经修改，始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未言及23日段邸会议的修正。

(21) 《善后会议条例》，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5-27页。

(22) 《善后会议条例之一部观》，《益世报》1924年12月25日。

(23)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年1月16日。

(24) 《善后会议》，《东方杂志》第22卷第1号。

(25) 《善后会议前途之暗礁》，《申报》1925年1月4日。

(26) 《善后会议之前途》，《申报》1925年1月10日。

(27)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年1月16日。

(28) 《实力派之赞成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25年1月13日。

(29) 冯玉祥：《善后会议史序》，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

(30) 《外电之北京政局》，《申报》1925年1月8日。

(31) 《善后会议之前途》，《申报》1925年1月10日。

(32) 《冯玉祥辞职原因》，《申报》1924年11月13日。

(33) 《段派激进之善后会议》，《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5册，第70页。

(34) 《善后会议昨日公布之电文》，《大公报》1925年2月17日。案：冯氏先是派薛笃弼为代表，后因薛君“政武力殷繁，不能兼任，爰特改派陈君

金绶接充斯席”。

(35) 《胡郑龚虞与善后会议》、《又一批善后会议之各省代表》，《大公报》1925年1月11、16日。

(36) 《刘显世与唐陈一致行动》，《益世报》1925年1月7日。

(37) 《陈炯明反对善后会议》，《益世报》1925年1月7日。

(38) 《善后会议之进行空气》，《顺天时报》1915年1月8日。该则报导称：“闻执政府业已接到此项来电，以关系重大，决定暂不发表，秘而不宣云。”

(39) 《国内专电》，《申报》1915年1月7日。但据《顺天时报》载，唐继尧曾于1月11日通电，对善后会议“表示赞成之意”，史毓琨亦称“唐莫赓（继尧）赞成此项会议”。（《实力派之赞成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15年1月13日）

(40) 《西南与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15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88页。

(41) 《关于善后会议之消息》，《大公报》1925年1月12日；《筹备处所接之函电》，《大公报》1925年2月21日。

(42) 《面对善后会议之态度》，《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5册，第75页。

(43) 《萧耀南筹助善会经费四万元》，《大公报》1925年3月1日。

(44) 《辞谢之各电》，《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5册，第76页。

(45) 《善后会议筹备处消息汇录》，《大公报》1925年1月13日。

(46) 《唐少川对于善后会议之观察》，《申报》1925年1月10日。

(47) 《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2月5日。

(48) 《岑春煊致段祺瑞电》，《申报》1924年11月26日。

(49) 章太炎：《致李根源等书四九》，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卷5，第789页。

(50) 《章太炎反对善后会议》，《申报》1925年1月28日。章氏复函称：“往者黄陂复位，法统昭然，以暴人把持国政，西南不肯从其命令。今之执政府，依法律既无依据，铢两相衡，视西南未有高下。是中国之在今日，实已有两政府也。故欲开善后会议，当择两政府交界之地，如武昌、岳州

者，庶乎其可。若直开于北京，是乃曲一就一。纵西南诸省，或有一二卑屈者，亦非鄙人所敢附和也。”

(51) 《致许世英》，《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第354-355页。

(5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页。

(53) 《善后会议与国民党》，《大公报》1925年2月5日。

(54) 黄伯度编：《许世英先生纪念集·传略》，商会衡：《许世英书生本色》，黄伯度：《笃行实践的许静仁夫子》，分别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49集，第2、284、252页。

(55) 《致冯玉祥等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2页。

(56) 《与张作霖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51页。孙中山北上途中经过日本，谈及国内形势时亦称：“至于目下之北京政府，段祺瑞既出任执政，其资格良宜。予舍推崇之外，别无他存见也。”北京《晨报》1924年12月5日。

(57)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第202页。

(58) 在启程北上之初，孙已经意识到，自己到北京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90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69页。

(59) 《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4-298页。

(60) 《与叶恭绰许世英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00-501页。

(61)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30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96页。以下《民国日报》消息皆引自陈锡祺同书，不再一一注出。

(6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91页。

(63) 《陈炳堃解释善后会议之通电》，《大公报》（天津）1925年1月14日。

(64) 春木：《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大公报》（天津）1925年1月10日。

(65) 春木：《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大公报》（天津）1925年1月10日。

(66) 《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申报》1925年1月28日。

(67) 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37*，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vol．1，p．221，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8．

(68) 《段孙意见不同之点》，《申报》1925年1月6日。

(69) 《冯玉祥辞职原因》，《申报》1924年11月13日。

(70) Harold Z．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ld pertinent？Asia Quarterly：A Journal from Europe*，3（1975）pp．199-200．

(71)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24年12月22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82页。

(72)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3页。

(73) 《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5日、6日。

(7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1月13日。

(75) 《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5日、6日。

(76) 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pp．5-6，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Honolulu，1976．

(7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60-661页。

(78) 《天津通信》，《申报》1924年11月30日。

(79) 《孙段电商赣局》，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25日；《时事日志》1925年12月27日条，《东方杂志》卷22第2号；《赣局收拾之不易》，《申报》1924年2月9日；《李烈钧即日入赣》，《晨报》（北京）1924年12月21日。

(80) 于右任就曾遵命拒绝段祺瑞要其担任内政部长之请，详见许有成、徐晓彬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81) 《民党对执政府不满之内幕》，《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

第58页。

(82) 《善后会议与国民党》，《大公报》（天津）1925年2月5日。

(83)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44页。

(84) 《张继孙科南下之原因》，《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311页。

(85)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7，p．91．

(8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109-2110页。

(87) 黄昌谷：《大元帅不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尚明轩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657-658页。

(88) 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申报》1925年1月7日。

(89)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18日。

(90) 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申报》1925年1月7日。

(91) 《孙科之谈话》，《申报》1925年1月11日。

(92) 罗敬：《北方最近之政情》，《向导周报》第98期。

(93) 《孙中山先生篠电》，善后会议秘书处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公文·电三”。

(94) 《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申报》1925年1月28日。

(9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80页。

(96) 《段侧对中山篠电之办法》，《申报》1925年1月31日。

(97) 《段侧对中山篠电之办法》，《申报》1925年1月31日。

(98) 《善后会议增添会员问题》，《顺天时报》1925年1月21日。

(99) 《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申报》1925年1月28日。

(100) 当晚，记者采访许世英，问及执政府会议是否决定采纳中山意见，许答曰：“本日在执政府会议，对于中山之建议，大多数主张为相当之容纳”，并详述了容纳方法。（《许世英关于善后会议之谈话》，《申报》1925年1月31日）

(101) 《段祺瑞复孙中山之艳电》，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30-31

页。

(102) 《各法团代表之暗潮》，北京《晨报》1925年4月14日。

(103) 《汇丰主席论中国事》，《申报》1925年2月23日。

(104) 《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2月5日。

(105) 《国民党正式否认善后会议》，北京《晨报》1925年2月11日。

(106)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大公报》（天津）1925年2月3日；《善会预备会开会纪》，《大公报》（天津）1925年2月10日；《国民党决定出席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25年2月11日。

(107)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29页。

(108) 《国事遗嘱》，《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9-640页。

(109) 《善后会议之人的问题》，《申报》1925年2月5日。

(110) 罗敬：《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111) 《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1月10日。

(112) 黄伯度编：《许世英先生纪念集·传略》，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49集，第1页。

(113) 《善后会议筹备处章程》，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7-28页。

(114)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51页。

(115) 遏密：《善后会议会员一览》，《申报》1925年2月7日；随波：《正式开会中之善后会议》，《申报》1925年2月12日；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二章第五节“会员”，第37-44页。

(116) 时人曾将全部特聘会员的派系作了如下分析：（1）民党派三人（汪精卫，“新文化健者”；杨沧白、彭养光，拒贿议员）；（2）段祺瑞派三人（刘振生、乌泽声、潘大道，拒贿议员，潘为章太炎弟子）；（3）张作霖派三人（赵尔巽、杨宇霆；邵瑞彭，拒贿议员）；（4）冯玉祥派二人（黄郛、张绍曾，原系直系，后因失意，立于冯系旗帜之下）；（5）黎元洪派二人（李根源，原属政学系；饶汉祥）；（6）唐继尧派二人（王九龄；褚辅成，拒贿议员）；（7）熊克武派一人（李肇甫，拒贿议员，亦属政学系）；（八）研究系三人（熊希龄、梁启超、林长民，“准段系”）；（九）旧交通

系二人（朱启钤、梁士诒）；（10）政学系一人（杨永泰，拒贿议员）；（11）联治派一人（汤漪，拒贿议员，“准段系”）；（12）“西南名宿”三人（唐绍仪、章太炎、岑春煊）；（13）北洋名宿一人（王士珍）；（14）遗老一人（严修）；（15）学界一人（胡适，新文化健者）；（16）商界一人（虞洽卿）。（遏密：《善后会议之特聘会员》，《申报》1925年1月11日）

(11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37、51页。

(118)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45-49页。

(119)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49页；《善会之二月份经费》，《大公报》1925年3月2日。

(120)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1页。《申报》引东方社北京电文称与会代表共96名。（《北京善后会议开幕》，《申报》1925年2月3日）因费保彦氏为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所录应较为准确，故从其说。

(121) 赵之被“推举”虽以“年长”为理由，实则另有原因。赵世炎在分析善后会议与北方政局之关系时引用时人之议论说：“善后会议……虽是段祺瑞的御前会议，内幕亦有困难。溥仪的臣子赵尔巽之所以成为善后会议议长，便是老奸巨猾的段祺瑞对付张胡子的手段。当初要使奉派代表早出席，现在要使奉派代表肯服从。原来‘赵大人’是张胡子当初的上司，受招安的恩官。去年张来北京，即登门拜谒行三跪九叩礼。故现时善后会议在奉张虽觉纯粹成为段氏的御前会议，但也只好暂忍着。这话言人凿凿，虽觉偏僻，但善后会议之不能满张意是不可讳言的。”（罗敬：《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赵世炎选集》第231页）另外还有“段意甚希黄陂（黎元洪）被举为会长”之说法。（《善后会议明日行开幕式》，《申报》1925年1月31日）

(122) 段祺瑞的颂词曰：“群治循化，环若转轮，挈其机括，厥为平均。惟十四年，万象璘斌，涤瑕荡秽，咸与更新。济济一堂，全国缙绅，综合群议，开心见诚。譬植嘉木，萌芽于春，柯条万亿，根本在民。”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2页。

(123)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2-58页。

(124) 《善后会议谈话会记》，《申报》1925年2月9日。

(125)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8-59

页。

(126) 《善后会议开会》，《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

(127) 《善后会议议事日程》，《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84-1491页。

(128) 《善后会议议案总目》，《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92-1495页。

(129)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71-75页。

(130) 北洋政府筹备国会事务所等单位档案所藏《善后会议议事日程》中，同时列入了《整理军事大纲案》和《收束军事大纲案》，而所藏善后会议议案总目仅将《收束军事大纲案》列入，可见前者已被否决。详见《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92-1495页。

(131)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96页。

(132) 《收束军事大纲案》附“理由书及执政府秘书厅公函”，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19-120页。

(133)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09-110页；《善后会议之第八次大会》，《晨报》1925年4月1日。

(134) 《中央财政之现状》，《大公报》1925年3月9日。

(135) 《恃债为生之中央财政》，《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382页。

(136) 《目前财政上之两大案》，《顺天时报》1925年3月12日；《新公债条例昨晚明令发表》，《顺天时报》1925年3月17日。

(13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91、123页。

(138)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27—234页。

(139)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27—234页。

(140) 参阅《法制院呈稿》，载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87-89页。

(141) 《善后会议议案总目》（1925年3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92-1494页。

(142) 《段祺瑞与张作霖意见之冲突》，《重庆商务日报》1924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8册，第1580页；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88-89页。

(143)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70-173页。

(144)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99-205页。

(145)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有左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二、经证明为癫痴者，三、于本国日用通行文字，不能解说并写作者，但蒙藏青海及华侨依第四十二、四十五条有关规定，不受此条限制。

(146)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43页；《昨日善会要闻种种》，《大公报》1925年3月5日。

(14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12页。

(148) 《国民会议条例完全通过》，《顺天时报》1925年4月1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61页；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20页。

(149)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

(150) 《联治派与联治案》，《晨报》1925年3月30日。

(151) 《政府对于联省案之态度》，《大公报》1925年3月25日。

(152) 五个议案分别为：（1）《中华民国国权分配大纲草案》；（2）《各地方制宪规程草案》；（3）《临时联立参政院制草案》；（4）《临时军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5）《临时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具体内容详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74-185页。

(153) 《褚辅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10-119页；旨微：《所谓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益世报》1925年2月25日。

(154) 《执政府将自动的提出临时政府组织法》，《晨报》1925年3月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15页。

(155) 《联治派之活动》，《顺天时报》1925年3月30日。

(156) 《上海对联治运动之猛进》，《顺天时报》1925年3月29日。

(157) 《联治派昨开会》，《顺天时报》1925年3月23日。

(158) 陶菊隐著：《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106页。

(159) 《联治派在京之积极搏战》，《顺天时报》1925年4月3日。

(160) 《善后会议昨日大会流会》，《顺天时报》1925年4月5日。

(161) 《善后会议昨日大会流会》，《顺天时报》1925年4月5日。

(162)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63-164页。

(163) 《关于时局前途之联治问题》，《顺天时报》1925年3月26日。

(164) 《联治案在善会形势》，《晨报》1925年3月27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12页。

(165) 西南的九名代表为唐继尧的代表周钟岳、徐之琛、马骢，唐继虞的代表李华英，刘显世的代表刘燧昌，沈鸿英的代表岑德广，李德麟的代表严端，赵恒惕的代表钟才宏，褚辅成系自以会员资格赴京与会。

(166) 《善后会议与西南代表》，《申报》1925年2月27日。

(167) 《善后会议与西南代表》，《申报》1925年2月27日。

(168) 《段祺瑞怕联省自治》，《晨报》1925年4月13日。

(169) 《联治派与联治案》，《晨报》1925年3月30日；《政府仍疏通联治派》，《益世报》1925年4月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40页。

(170) 《段合肥复滇唐湘赵联治电》，《顺天时报》1925年4月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38页。

(171) 《联治同志仍开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24页。

(172) 《汤漪与联治案》，《顺天时报》1925年4月4日。

(173)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174) 《失意军阀利用联治政策》，《顺天时报》1925年4月1日。

(175) 曾经以记者身份采访善后会议的陶菊隐称："我在北京采访善后会议新闻，发现张作霖反对'联治'最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如今他又痛斥联治派为'地方分裂主义者'，指使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此后'联治建国案'如果列入议事日程，你们即以不出席为抵制。因此，善后会议出现了西南联治派与东北反联治派的斗争。"（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5-106页）

(176) 《失意军阀利用联治政策》，《顺天时报》1925年4月1日。

(177) 《联治案之现势》，《顺天时报》1925年3月28日。

(178) 《善会前途与联治案》，《晨报》1925年4月7日。

(179)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

(180) 《联治派之计划》，《顺天时报》1925年4月13日；《褚辅成之谈话》，《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66页。

(181) 时人在评论西南代表退出善后会议一事时说："惟闻政府方面对此并不十分重视，据其所计算会议中之确属联治派分子者，仅褚辅成周钟岳马聪等六人，即便全不出席，亦不生重大影响。"（《西南代表将退出善后会议》，《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50页）

(182) 参见《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

(183) 《赵尔巽等意见书》，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59页；《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2月5日。

(184) 《胡憨已入交战状态》，《申报》1925年2月27日；《疑云疑雨之胡憨战事》，《大公报》1925年2月23日。

(185) 《胡憨争潮之由来》，《大公报》1925年2月22日。

(186) 《孙岳鱼电》，《大公报》1925年3月8日。

(187) 《孙岳调停豫局之表示》，《大公报》1925年3月7日。

(188) 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98、105页。

(189) 《严端等提议由本会议去电赞成卢宣抚使感电并催执政立决照办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90) 《熊希龄提出废督裁兵案》，《大公报》1925年3月14日。

(191)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95页。

(192)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89-198页。

(193) 《善后会议条例》，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6、256页。

(194) 《法团代表加入善会问题未解决》，《晨报》1925年3月24日；《段邸昨日下午之特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25页。

(195) 《善后会议难关愈多》，《晨报》1925年3月29日。

(196) 《昨日国务会议之重要消息》，《顺天时报》1925年4月3日。

(197) 《各法团代表之暗潮》，《晨报》1925年4月13日。

(198) 《善后会议纪要》，《重庆商务日报》1925年5月7日；《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册，第556-557页。

(199) 《善后会议最近形势》，《晨报》1925年2月23日。

(200) 所撤回的议案共七项，计有：（1）教育经费独立案；（2）教育基金指定专款案；（3）小学教员应由国家补助薪金案；（4）规定各省区拨解烟酒税款办法案；（5）提议寓兵于工修筑全国道路案；（6）提议寓兵于工实行修治河道案；（7）声请保留之禁烟案。（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29页）

(201)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42-244页；《善会正式结束》，《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74页。

(202) 以上分别见龚心湛、叶恭绰、田中玉为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所写的序言。

(203) “胡适存件”第1643号，转引自白吉庵著《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胡适不再出席善后会议一事，颇受世人关注。北京《晨报》曾报道说胡适已辞去善后会议会员之职，胡适本人则对《大公报》英文部记者否认此事，称自己只是考虑到若不能结束战争状态，善后会议实无继续开会之必要，意指不出席并不意味着辞去会员资格。（《大公报》1925年3月7日）

(204)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先驱》第24号。

(205)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7页。

(206)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1、128页。

(20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5-15页。

(208) 《向导》第113期。

(209) 《京师警察厅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东团体咨陈》，《善后会议》第407页。

(210) 时论甚至认为：“自现政府之地位言之，大可以该会议之成与不成，以试验各省拥护段执政之程度。故现政府极力督促，以期其成立。”（《国民会议与时局关系》，《顺天时报》1925年8月21日）

(211) 《明令许世英筹备国民会议》，《顺天时报》1925年5月3日；

《筹备国宪起草委员会已定林长民为主任》，《顺天时报》1925年5月13日。

(212) 《命令》，《益世报》1925年10月30日。

(213) 《唐绍仪章炳麟主张保存约法反对国民代表会议代电》，《善后会议》，第415-416页。

(214)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1919-1936），第833页。

(215) 《湖北省议会维杜议员反对成立国民代表会议电》，《善后会议》，第416-417页。

(216) 《宁民会初选怪象百出》，《晨报》1925年9月12日。

(217) 《鄂人反对湖北贿选》、《鄂代表复选展期》，《顺天时报》1925年10月9日、12日。

(218) 《苏民会复选纠纷未已》，《晨报》1925年10月8日；《苏省民选纠纷》，《顺天时报》1925年10月12日。

(219) 《民会选举延期消息》，《顺天时报》1925年10月25日。

(220) 《民会来京议员昨日见许提出四项要求》，《顺天时报》1926年1月6日。

(221) 《奉天允办民选》，《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200页。

(222) 《国民会议有成立之希望》，《顺天时报》1925年9月29日。

(223) 《北洋军阀大事要录》，《北洋军阀》（1912-1928）第6卷，第266—271页。

(224) 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虽然其重要性最初并未彰显。国民党自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一直处于逆境之中。孙中山因屡遭挫折，开始向政治上并不完全认同的苏俄靠拢。苏俄出于国家利益及实施世界革命目标的考虑，亦改变以往支持吴佩孚甚至陈炯明的做法，开始做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工作，国民党的“联俄”政策由是开始形成。要“联俄”则不能不“容共”，从逻辑上讲，“容共”乃“联俄”自然的内涵延伸，而俄国方面也有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要求，因为苏俄希望通过向国民党内输入共产党人的方式来改变国民党的政治色彩和人员构成。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政治安排，也需要通过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来扩大政治影响，于是国共合作得以成为现实。这一时期国共合作最主要的成果是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国民革命因此逐渐形成新的浪潮，国民政府北伐的后方逐渐巩固。但是，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并不牢固。两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歧十分严重，即便孙中山在世时也是如此，因而在合作过程中，又时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第一节　国共合作局面的成立

一　“联俄”与“容共”实际步伐的迈出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是从“联俄”开始的。孙中山是一位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政治家，他从事革命的经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海外华侨（主要是美洲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从开始革命起，就将争取外援的重心放在欧美，其政治理念也基本是欧美式的。对于与广州毗邻的港英政府，孙中山亦十分重视，他任命伍廷芳

的儿子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就是因为他“需要伍朝枢来同英国人打交道”[1]。

正因为如此，在苏俄及共产国际谋求与国民党建立关系之初，孙中山态度十分审慎。在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孙中山强调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适合中国，并对中东铁路和俄国在外蒙驻军问题表示了严重关注[2]。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中国来行使其使命，并征询孙中山对实施苏维埃政权的意见时，孙中山曾向达林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教化的县。那里住的是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到那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制度。”[3]

孙中山在政治思想上与苏俄存在差别，致使酝酿已久的“联俄”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共合作一直没有实际动作。国民党及孙中山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走出关键一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直皖战争之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支持获胜的直系中央政权及其实施的武力统一政策，争取英、美方向的外援已经不再现实。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在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促使国民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半年内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期间里，美国在华中和华北的势力不仅实际上而且表面上都开始压倒日本的势力。曹锟（现在的中国总统）的当政得到美国的支持，它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的增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派系——直系的加强。这一事实迫使国民党更加迅速地表态和更加公开而真诚地联合苏俄。”[4] 共产国际作为极力促成国民党“联俄”的一方，其判断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从苏俄方面观察，十月革命之后该国一直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也亟须谋求中国的“承认”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苏俄并不因为英、美支持曹锟政

权便置北京政府于不顾，相反，在苏俄谋求建立的中苏关系中，北京的位置最初是远远高于广州的。对于北京政府，孙中山曾要求苏俄方面不予承认，但苏俄没有采纳其意见。因为在苏俄看来，“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因而将“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之事[(5)]。苏俄与北京政府的接触曾经引起孙中山的严重不安[(6)]。只是在与北京的谈判中，王正廷、顾维钧等坚持将解决外蒙撤军等问题作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与苏俄方面先建交后谈判解决两国间“悬案”的立场相忤，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广州的地位才因此而提高[(7)]。后来北京方面同意与苏俄妥协，正是出于阻止加拉罕南下与孙中山联系这一策略的考虑[(8)]。不过孙中山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是苏俄方面始料未及的。

在意识到广州的地位与作用之后，苏俄方面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几乎同时，孙中山派出其军队参谋长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苏俄对国民党的经费和军火援助问题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鲍罗廷是促进国民党联俄的十分合适的人选。他为人“谨慎周到，态度和蔼”，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且“与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9)]。他的到来，对国民党实施“联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率团访苏，获得的总体印象并不佳好，在外蒙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感受尤其如此。在归国之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蒋写道：

> 尚有一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之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10]。

蒋介石回国后向孙中山递交书面报告，并于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将访苏的结果向孙中山作了口头陈述[11]。

尽管对俄国有所警惕，蒋介石率团访俄期间形成的某些印象和所获得的具体成果却加强了孙中山“联俄”的决心：莫斯科对代表团最高级别的接待，为国民党培训军队干部协议的签订，以及关于俄国政权及军队强大和巩固的印象，关于红军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培训经验对国民党的重要性的认识，关于党和共青团的集中组织对组建有效国家政治结构的意义等，都增强了孙中山对于苏俄可引为中国革命之臂助，苏俄经验可以为中国革命参考的认知。

对于蒋介石的顾虑，孙中山有着自己的处置之道。据蒋介石称：“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宜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12]

真正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理论障碍是苏俄的共产制度。虽然孙中山常说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根据社会主义是共产

主义低级阶段的理论，民生主义当然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孙中山始终认为，共产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因此，尽管有“联俄”的现实政治需要，要与实施共产制度的苏俄实施联合，孙中山在认识上是难以融通的。加之当时共产制度被西方国家视为“政治瘟疫”，受此影响，国人避之惟恐不及，国民党自然要顺应舆情，注意与之划清界限。

但是，自从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共产制度”已不再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障碍。孙中山是通过马林的介绍获知俄国“新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他在致廖仲恺等的电报中称：“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主义，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13)] 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开始，一直实施到1927年，而孙中山在1925年便去世。也就是说，终中山之世，国民党都可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理由，为“联俄”的政治行为作出至少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

当然，孙中山更关心的是获得实际的经费及军火方面的援助。在这一点上，苏俄出手虽算不上慷慨，但对国民党而言却能收到雪中送炭的效果。1924年，苏俄在黄埔军校缺乏军火，难以开办的情况下，运来8000支俄式步枪，每支配有500发子弹，并资助现金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解决了军校的燃眉之急。1925年苏俄一次向广州运送了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分四批向广州运送军火，共计2．3万支步枪，90挺机关枪，1000把军刀，子弹1200万发，大炮24门，炮弹1000发[(14)]。

苏俄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有三个附加条件：其一是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其二是实施国共合作，其三是修改国民党的纲领。苏俄要求国民党改组的目的是想改变国民党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组织”的状况，使之“处在我们（苏俄）的影响之下”，“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5)]。国共合作是

苏俄改变国民党的一项重要措施，就像掺沙子一样来改变国民党既有的人员构成。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要“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6]。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经发出与国民党合作的指令。对于国民党，苏俄方面曾明确暗示，能否得到所期望的援助，取决于它与中共的关系[17]。至于修改纲领，则完全是要按照俄国人的意志来改造国民党。

很明显，这些条件如果被接受，完全可能将国民党改造成类似共产国际支部似的组织。对国民党提供援助的条件，苏俄态度十分坚决。当孙中山与马林就“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进行磋商时，马林明确表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18]

孙中山并非不愿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政治军事斗争的一再失败使他对国民党组织的散漫与无力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如果完全接受苏俄的条件，国民党是否会改变自身，甚至会成为苏俄的“工具”。围绕这个问题，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作为一个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经历的党的领袖，孙中山当然不愿意看到他所缔造的党发生分裂，不愿意失去自己对于全党的领导地位，降格成为某一派的领袖。但是，现实政治、军事斗争中一再失败的艰难处境，使孙中山不得不淡化在“联俄”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可能出现的组织分化，将争取援助这一功利主义的考虑放在首位。

直接促成孙中山联俄的事件是陈炯明反目。陈炯明是孙中山扶持提拔起来的，孙中山曾对之寄予很大希望，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前陈已升任广州政府陆军部长。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加之英国的支持，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走上海。在孙中山前往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上避难时，英国人竟以白鹅潭接近沙面租界，担心牵动外国兵舰为由，要求孙中山离开广东。部下反目为仇，英国人“助纣为虐”，给孙中山以强烈刺激，使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最终将目光转向苏俄。他在离粤赴港时对随行人员

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并让陈友仁转告达林说，他已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19]。由此可见，陈炯明兵变之后国民党的艰难处境是孙中山决定"联俄"并作出"容共"决策的一大关键。

作为被"容纳"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其多数领袖最初对国共合作尤其是"党内合作"并不赞成。陈独秀1922年4月6日致维经斯基的信对"党内合作"所持否定态度，反映了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多数人的意见。但由于共产国际在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20]。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不能不表服从。加之马林在中共内部作了大量说服工作，中共在西湖会议经过激烈争议之后，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但只同意少数共产党领袖加入国民党。直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罢工被镇压，鉴于血的经验教训，中共才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只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应由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因此，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大会还特别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与《宣言》相呼应，提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因此，中共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

革命之需要”[21]。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施国共“党内合作”，成为中共的重大决策。

可见，尽管有些勉强，国共双方毕竟都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令作出了配合或接受的决定，国共合作在酝酿多时之后，终于迈出实际的政治步伐。

二　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开展

国民党改组与“联俄”有连带关系，“联俄”又与“容共”有连带关系，既已同意“联俄”、“容共”，则改进国民党组织也就势在必行。

实施改组之前，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虽有近二十年的政治斗争历史，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但组织涣散，政治纲领模糊，内部派系分野严重，整个党全靠孙中山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来维系。“二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盖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做法，甚至一度使党带上秘密社会的组织色彩[22]。斯内夫利特曾撰文分析国民党的状况，认为“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他引用“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的话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23]所言大体符合改组前国民党的实际状况，并说明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23年10月6日，苏俄政府应孙中山邀请派驻广州的代表鲍罗廷（Borodin．Michael）到达广州。18日，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希望鲍罗廷用俄国的方法“训练吾党同志”。孙明确表示：“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习他的方法。”[24]不久，孙中山又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则公开将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表示：“将来引导中国国民运动以致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25]于是，国民党的各项改组筹备工作便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全面展开。

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24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胡汉民、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全面负责改组工作。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分别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说明国共已在政治上开始合作。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由廖仲恺主持，鲍罗廷在会上作关于改组和制定新的章程草案的报告，强调革命力量联合对于被压迫民族自由解放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改组计划。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力以赴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共议决包括全国代表案、国民党改组宣言案、党纲和党章草案、广州区党部和区分部案、筹办军官学校案等重要议案和决议四百余件，并决定于1924年1月5日在广东召开国民党“一大”[(26)]。

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发表三次演说，阐释国民党改组的必要和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主旨，表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之所以以苏俄为模范，是因为从俄国人那里可以学到政党组织的方法。“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27)]。孙中山强调学习俄国人的政党组织方法，却闭口不谈俄国党的主义，为国民党的改组定下了政治基调。

为推进改组筹备工作在各地展开，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胡汉民到上海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派李大钊在北京从事国民党党务改组工作。改组工作的重点在广州、上海两大城市。筹备改组的第一步是在各地进行党员登记。广州的党员登记尤为严格，同时开展

市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的组织建设，统一宣传机关，并将大本营党务处、大本营直辖委员会、广东宣传局裁撤，归并于临时执行委员会。为统一思想，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党务的意见，并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到1924年1月12日，广州成立了九个正式区党部、三个代理区党部、六十六个区分部、三个特别区分部，党员登记人数达8218人，两个月内增加党员4569人。在上海，截至1924年1月10日，总共正式成立一个区党部、三十三个区分部，此外尚有三个未编次序的区分部。上海的工、商、学界也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28)]。

在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做了大量的工作。1923年9月，李大钊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组织，清洗参加贿选的国民党党员，同时吸收“激进”青年加入国民党。据张国焘称，到11月，“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29)]。湖南原先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中央派覃振到湖南去筹建，在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夏曦、刘少奇等人协助下，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夏曦、刘少奇还受国民党中央之命，担任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筹备主任[(30)]。其他地区（如四川、山东）的共产党人也与国民党人相互配合，使地区国民党的改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

1923年11月下旬，中共在上海召开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各地贯彻党的“三大”有关国共关系决议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并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明确了“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决定将“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作为国民运动的“首要工作”，并确定了扩大国民党组织的三项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明确规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合作”中的关系：“一、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二、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

宜强行之。”[31] 中共中央的决议案，旨在促进国民运动的开展，但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党员的一切政治言论与行动，须服从共产党的指挥，又给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士提供了口实。

不仅如此，共产党人为“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还对国民党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对待军阀政策的批评。认为孙中山只注意在军阀之间周旋，而不敢提出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是一种政策性错误。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甚至宣称：“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32] 二、对国民党对工人运动态度的批评。认为国民党为避免“赤化”、“过激”嫌疑，无视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压迫，甚至为了避免激怒英国人，对吴佩孚制造京汉铁路惨案，亦“一声不响”[33]。三、对孙中山外交政策的批评。一是批评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不够热情主动；二是批评孙中山为争取外国援助而对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34]。

中共上述决议案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与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有关。该指示中一些关键性的政治表述，如共产党人应该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吸收国民党左派分子加入共产党等，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民党内以“秘密组织”形式活动的依据。一些国民党领导人得到了这份文件，深感不满。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吴荣新、林直勉、邓慕韩等11人联名向孙中山递交《检举共产党文》。邓泽如等人上书的主要内容与《向导》批评国民党所涉内容大体相同，而政治立场则截然相反。认为《向导》对国民党联络国内实力派共同反直的策略及对外政策的批评，目的在于使国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绝实力派之协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想利用国民党的躯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性质[35]。

孙中山接到上书后很快作出批复。针对邓泽如等人“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的说法，孙中山解释说：“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同时，孙中山再次阐明自己的立场。他认为，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批评，体现了“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组织”活动的现象，孙中山强调“彼等”既加入国民党，就必须“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关于联俄问题，孙中山因重视苏俄援助，故告诉邓泽如等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我党，故资本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但孙中山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斗争。那些“中国少年学生”确实曾经“竭力排挤而疵毁我党”，以便“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从整个批文的内容及口气上看，孙中山是在调和当时国共之间存在的对立情绪，因而他要邓泽如等人宽大为怀，捐弃前嫌，团结共产党人，不要因陈独秀等人“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36)]。

孙中山为国共合作所作的调解工作，为国民党改组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

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海内外代表总数为19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73人。中共代表为24人，比较著名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等[(37)]。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提出了这次大会的两项重要任务：“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

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38] 开幕会之后，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等五人组成主席团，值日主持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章程》、《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十一个重要决议案，并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种具体办法。新通过的国民党章程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完整的组织系统。党章规定在保留“总理”的前提下实施委员制。孙中山为国民党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无须选举产生。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有提起复议之权，对中央委员会决议有最后决定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但在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24人组成，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林森、邹鲁、谭延闿、于右任、叶楚伧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由17人组成，包括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执行委员会之外复设监察委员会，选出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察委员各五人，包括邓泽如、张继、吴敬恒、蔡元培、许崇智等。地方则各省设省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各县设县代表大会和县执行委员会，各区设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为基层组织，设分部党员大会和执行委员会[39]。

“一大”闭幕翌日，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调查部、军事部等机构[40]。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还决定在各地建立地方执行部，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实际建立的有北京、上海、汉口三个执行部。

经过国共两党共同筹划和努力，国民党组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发

展起来。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十二处，特别市党部四处，临时省党部九处，全国除云贵、新疆等少数省份之外，绝大多数省区都建立了国民党组织。1926年初，党员人数达到50万，正式登记的有20万。党员的构成也发生变化。以广东为例，1926年2月，省党部报告的党员人数已由九个月前的1．5万人增至4．8万人。其中农民占40％，学生占25％，工人占25％，商人占10％，军、政、法、报、自由职业和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很明显，经过改组，国民党不仅扩充了党员人数，而且改变了组织成分[(41)]。

“一大”经过激烈争论，在对诸如将大土地收归国有一类具有“共产”色彩的内容作了删改之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42)]。

《宣言》分析了“中国之现状”，认为自辛亥革命之后，军阀专横、列强侵略的形势日益加剧，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深渊。因此，进行国民革命，实施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对于“国民党之主义”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言》重新作了解释。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要实现前一目标，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要实现后一目标，就必须“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后，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民权主义旨在赋予国民更多的民主权利。规定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针对“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的情况，《宣言》主张，“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民权实施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之中，以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作为原则，以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民生主义的内容乃孙中山一贯主张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国家应制

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凡具有垄断或规模过大之企业，应“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及苏俄“指导”的结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经明确表示，三民主义将通过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所作解释，来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43]。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几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对国民党行动纲领作了十分重大的修正”，“实际上，（共产国际）向国民党推荐的纲领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这些坚持不懈的推荐意见表明，共产国际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中国的雅各宾党’”[44]。

尽管因联俄、容共立场的确立，《宣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较之以前有所不同，但国民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仍然没有变化。例如，以前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在主张实现民族独立自由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现在因联俄需要而将这一口号写进《宣言》，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与苏俄并不完全相同，它不包含“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内涵，最多只是过去指斥的“外国列强”的代名词；对于苏俄在中国推动“世界革命”，国民党也有所警惕。在民权问题上，以前对西方政治制度颇多赞词，现在虽然出现了指斥代议制度下民主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言论，却不主张用“无产阶级民主”而主张用超阶级的“平民”、“国民”的民主取而代之。这体现孙中山力图对西方近代政制进行改良的一贯立场。

《宣言》还明确规定了“国民党之政纲”，内容包括对外政策七条和对内政策十五条。对外政策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对内政策主张制定划分中央地方权限、实施省宪并制定具体政策，以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宣言》明确宣称，上述内外政策，为国民

党“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45]。

国民党“一大”取得的另一重要成果是通过改组方式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11%。当时共产党员总数不过四百余人，而国民党的人数仅广州一个城市登记注册的就有8218人，广东全省党员人数将近四万人。全国的总数未见确切统计，但即便没有蒋介石在苏俄考察时所夸张的60万人[46]，也应当不会少于十万人。若以十万计，则共产党的人数仅为国民党人数的4‰，但出席“一大”的代表则占了代表总数的11%。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不仅如此，在“一大”会议上，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党员的地位与作用也十分突出。李大钊是孙中山亲自提名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担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于树德担任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大会的各项组织领导工作。瞿秋白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并以此资格出席大会。

在“一大”期间，代表围绕是否允许共产党员“跨党”的问题产生争议。1月28日，在讨论党章修正案时，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发言，称“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如果这一提议得到通过，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必须退出国民党，要么必须脱离共产党。方瑞麟的提议得到十人以上附议，大会因此展开了讨论[47]。李大钊以章程审查委员的身份登台发言，并递交书面声明。他在发言中表示：共产党人是经过反复研究思考才决定加入国民党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为国民革命作贡献，而不是为了与国民党争夺小团体的利益。既然孙中山先生已允许共产党人“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则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时“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为了释疑，他特别表示：“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

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48]

叶楚伧、李永声等人对方瑞麟的主张也表示反对。而江伟藩则赞成方氏的提议，略谓凡加入国民党者，都应信仰党的主义，从事国民革命事业；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包含于民生主义，但实施途径相差太远，故反对“跨党”。对此，汪精卫不以为然，他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指出：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浦泉等人都曾以无政府党党员身份被接纳为国民党员，有此先例，国民党已无拒绝共产党加入的理由。他认为，国民党章程上订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因此，对于“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黄季陆表示相对赞成方瑞麟的提议，主张对于跨党“应有一种明文规定”，盖既入此党，又加入他党，若无“适宜之规定”，恐造成组织上的混乱。

廖仲恺在会上发言，反对方瑞麟的提议，认为只要对于国民党的主义能真正服膺，能彻底革命，则跨党应不成问题。对于加入国民党的人，只应问他是否诚意加入，其他皆不必多问。他特别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共产党“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胡汉民发言认为，大会争论的焦点，是担心跨党之党员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既然党内已有纪律专章，便不必在章程上规定取缔条文。随后，毛泽东提议将“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的意见付诸表决，多数人举手赞成，方瑞麟的提议遂遭否决[49]。

关于方瑞麟提议被否决一事，胡汉民后来有一个说明。他说当时孙中山不在会场，由他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如果反对“跨党”案通过，他将无法向孙中山交代[50]。这表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以及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决心，是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孙中山的作用不复存在，国共合作将面临严峻考验。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为国共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节　初期的国共合作与冲突

一　初期的国共合作

张国焘说：“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两党间的摩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的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的纠纷。”[51] 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之后，在大敌当前的特殊形势下，两党曾一度以国民革命的大局为重，求同存异，进行了一段卓有成效的携手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涵是极为广泛的，包括通过国民党改组实现的政治方面的合作；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讨伐刘、杨，东征陈炯明，以及筹划北伐而实施的军事方面的合作；通过支持和指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而实现的在发动并壮大工农群众运动方面的合作；通过争取冯玉祥及阎锡山实现的在北方的合作，等等[52]。其中军事领域的合作尤见成效，而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则是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成果。

1923年11月底，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提出并议决筹建军官学校。“一大”期间，孙中山将拟建的学校命名为“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该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选定了校址，并邀请苏俄军事顾问小组参与军校筹备工作。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是孙中山颇为信任的军事干部，他任校长后，亲力亲为，对军校的初期发展贡献良多，他也通过军校培养的军事干部及以

此为基础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掌控了国民党的军权，并因此而崛起，成为国民党新一代领袖人物。

为办好军校，孙中山制定了办学宗旨，并亲自为学校制定了校训："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驱，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53] 从此，以"主义"建军成为军校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演说中表示，创建军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的办法，以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54]。在黄埔军校的实际创建过程中，俄国人的"办法"通过蒋介石建议实施"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得到充分展现。

黄埔军校着重于初级军官的养成教育，因革命形势的需要，学制不过半年，故就军事教育而言，未必强于其他军校。但黄埔军校的最大特色是俄式政治工作制度，政治训练在军校教育中占有特殊地位。

军校创建之后，即按照苏俄的办法，设立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和宣传。曾以戴季陶、汪精卫、邵力子等为主任。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廖仲恺等要求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张申府向军校推荐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张申府推荐了周恩来等人[55]。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戴季陶等扈从至京，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后军校扩大政治部组织，分别设立前、后方政治部，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随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包惠僧为后方政治部主任，留校工作。由于前、后方政治部均由共产党人担任主任，中共对政治部的控制影响大大加强。1926年中共党员熊雄担任主任之后，为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又在政治部增设政治指导员，制定了《政治指导员条例》、《政治教育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等。出任过军校政治教官的有胡汉民、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于树德、高语罕等人，恽代英曾任政治主任教官。

军校的政治教育也因此带上鲜明的"国共合作"色彩，对三民主义

和马列主义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军校中的政治课程及出版宣传刊物，几乎都充斥着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内容。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程有二十六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国民运动》、《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内容涉及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众多方面。1925年10月27日公布的军校党代表训令规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56] 这使军校政治教育的马列主义色彩得到进一步加强。1924年11月和12月，香港报纸屡屡发表文章，称黄埔军校是"好战的布尔什维克老巢"，黄埔军是"共党布尔什维克赤色军队"[57]。这些文章虽有站在英国立场攻击中国革命的色彩，但也道明了黄埔军校建校之初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征。

党代表制经蒋介石提议之后，由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明确规定："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应管官长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照此程序"；"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58]。这一规定明显是对苏联红军建军原则的学习效仿。此制确立后，廖仲恺任军校第一、第二期党代表，汪精卫任第三、第四期党代表。党代表不仅在校一级设立，校属各部门也设立。军校内还建立了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学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以保证学员的组织性和政治忠诚度。军校所设国民党组织——黄埔特别党部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担任执行委员，其下设分部和小组。中共也在军校内建有黄埔特别支部，是秘密组织，在军校内秘密发展党员，隶属中共广东区委。

1926年3月，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统一其他军校，成立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

长，汪精卫任党代表。

在建立军校的基础上，国民革命军亦随之建立。1925年4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建立党军案。13日，廖仲恺提请中央下令将军校教导团第一、第二团组建成党军第一旅。不久，蒋介石受命为中央党军司令。7月3日，为统一军事，成立了国民党指挥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最高军务统辖机关，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主席，加伦为顾问。同时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改称国民革命军，并陆续组建了八个军，沿用黄埔军校的治军原则，“党军”体制基本确立。黄埔党军及部分原来的粤军所组成的第一军是其基干队伍。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李朗如、林祖涵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

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关于中共党员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军政工史稿》一书作了如下描述和分析：

> 中共分子由党部进入军校，既取得可为本党党代表的资格，深知当时本党缺乏此类人才，乃装出技术人员的姿态，借以冲淡政治色彩。在本党或军校的邀请敦促下，始勉为其难，加入军校政治部工作。在工作当中，又表现出几种态度：（1）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担任。（2）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3）不信任不休。对于国民党党员之为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者，恭顺备至，每有所使，必达成任务，对其职务内应办之事，则全神贯注，力求表现，以时间和事实来换取主官的信任，非至主官全无戒心全权信托不止。（4）看后不看前。前一段完全在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待取得主官完全信任后，则关键不放松，不顾一切地贯彻共党所指示的原则，达成共党所赋予的任务。如汪兆铭继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

即将党代表职务，交政治部代拆代行，事前不指示原则，事后不检查结果，其时政治部而正为共党分子把持包办，故（军校）三期以后的政治训练，几乎是共产党在主持。由军校渗入军队，从军校、党军至国民革命军，经第一次东征，讨伐杨刘，而至第二次东征，每次都有共党籍的政工人员参与，而且在作战中特别卖力，特别勇敢，尤其对于民众的策动工作，做得格外彻底。而每次领导前线政工，指挥政工作战的，好像都是周恩来，可说以共党分子为主体[59]。

1926年5月，张国焘在广州会晤鲍罗廷。在谈到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时，鲍罗廷说出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60] 联系上引书稿中"你不干我干"，"劳苦毁誉，在所不计"的客观评价，不难看出中共及其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孙中山说，国共合作之后一年国民革命工作的进展，可以抵得上此前十年之总和。1925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下设外交部、财政部、军事部，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分任部长，鲍罗廷为顾问。广州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其组成、人事、施政等均由国民党决定，"党治"精神由军扩大到政。这一政权的建立，使南方的革命力量表现出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气象和抱负。

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5年10月发动第二次东征，11月中旬解决盘踞东江的陈炯明部；同时发动南征，1926年2月中旬解决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部。孙中山多年苦心经营但始终四分五裂的广东实现了统一。1924年12月，经与广西的李宗仁等接洽，国民政府任命李为广西绥靖督办，支持其统一广西。1926年3月，国民政府与李宗仁商定两广统一办法[61]。此后，广西统一于广东国民政府治下，两广

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基地，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及其胜利进军奠定了基础。

二　国共两党矛盾冲突的逐渐公开化

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军阀这一国民革命目标下实现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并不稳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民主革命的目标虽与国民党国民革命的目标有吻合之处，但其进一步的奋斗目标是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强调阶级、国际、共产、专政不同，国民党标榜的是全民、民族、私有、民主。国民党从不认为自己仅仅代表哪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宣称自己是各个阶级共同利益的代表，因而它不主张实施某个特定阶级的“专政”，而主张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社会统治。在对外问题上，它所信奉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尽管孙中山意识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却不主张用公有制度取而代之，只主张对之进行改良，以救其弊而存其利。孙中山主张“联俄”时曾有一句名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62)] 之所以不言“主义”，就是因为在主义上双方差距太大，难以谈拢。当时《向导》连篇累牍地刊登批评孙中山的文章，正是导源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主义”的分歧。

在组织上，国民党“一大”虽然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但共产党始终强调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的党团活动。当时除居于中央位置的少数中共著名人士为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员之外，其他一般党员的身份，并不向国民党方面公开。国民党人只知其为国民党党员，而不知其同时为共产党员。这种“共产党居于暗处，国民党居于明处”的状况，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所不能容忍[(63)]。

一些共产党领袖也为跨党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两难选择感到无所适从。在中共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曾谈到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问题。“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

难题。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融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64]。

由于思想及组织上的分歧无法弥合，国共双方的矛盾冲突很快就发生了。

（一）谢持、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继国民党广州党部执行委员黄季陆、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制裁共产党活动的“检举案”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于1924年6月18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书指控说：“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弹劾书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共三届二中全会《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青年团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以及《新青年》、《向导》、《觉悟》刊登的一些文章。这些议决案和文章大多强调共产党和青年团成员在国民党内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如中共三大议决案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65]

弹劾书据此认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之后，仍然在从事“党团活动”，这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所作声明是矛盾的。弹劾书引证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时提出的关于共产党人加入

国民党的意见书："我党之加入本党，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诡计的举动。"弹劾书认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议决案规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的"党团活动"，与李大钊所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声明相互矛盾。

弹劾书最后提出了以下意见：（1）非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2）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个人；（3）完全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4）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纯系共产党在本党中之一种党团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弹劾书认为"非速求根本解决，不足以维持本党之存在及发展"。因而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66)]。

一周之后，谢持、张继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前往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东山的寓所，与之辩论国共合作的问题，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国民党内的派系分野问题。谈话中，谢、张质问鲍罗廷是否承认党中有党。鲍罗廷回答说："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谢、张称，共产党实际已将国民党视为"对相"，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视共产党团为国民党"本体上之大问题"。鲍回答说："无妨，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谢、张驳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君如认之为合理，吾不料所谓组织者竟如斯，直欺人之谭耳。"

二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问题。谢、张问共产党是否应该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鲍罗廷回答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谢、张质问说，既然称国民党为腐败的党，共产党是新生的党，两党性质不相容，分道扬镳岂不更好。鲍罗廷回答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者，则认为违反命令。”谢、张表示国民党不能容忍共产党在其党内的“党团作用”，鲍罗廷称：“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三是国民国革命的宗旨及国民党内是否有保留共产党组织的必要问题。鲍罗廷承认：“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假使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吾亦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广州耳。”谢、张说：“诚如君所言，在中国行共产主义，尚需待至一百年之后。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鲍回答说：“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之问题，时时有所主张，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鲍又曰：“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如此作。”(67)

这次谈话本来应是消除双方分歧及误会的一次机会，但却成了一次严厉的政治交锋。鲍罗廷在谈话中直言不讳地称国民党“已死”，说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党，并流露出由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意向。这无疑对谢、张一派国民党人士构成了感情伤害，双方没有达成任何谅解，会谈不欢而散。

（二）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的发表及廖仲恺遇刺

谢、张等人的弹劾案提出之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港澳

等地的国民党右翼分子纷纷响应，上书攻击“跨党”的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要求孙中山命令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对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予以纪律制裁。借此形势，谢持、邓泽如等又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共产党实施弹劾。

从7月3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孙中山没有出席会议，与会者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林森、张继、林祖涵、邹鲁、柏文蔚、谭平山等十人，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争论激烈。7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由汪精卫、邵元冲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这是一份旨在调和国民党内部关系的文件，反映了孙中山处理党务的一贯立场。首先，《宣言》强调国民党“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明确了国民党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次，《宣言》强调：“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根据；三民主义之革命，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途径。”重申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前提，《宣言》强调：“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与此同时，《宣言》对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提出规劝，指出：“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趋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68)

8月1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两天后，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弹劾案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谢持、张继以原提案人身份列席。张继发言重申了弹劾案的意见，提出国共“分立”，其主张得到覃振的支持。瞿秋白就监察委员所指控的“党团作用之嫌疑”问题作了答辩，指出：“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

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即以本党之纪律绳之。……如此次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之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69]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李石曾等也对国共“分立”表示不同意见，加上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的作用，反对“分立”的意见占了上风。8月2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议案。该两案在次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获得通过。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两案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训令》重申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训令要求党员以革命大局为重，加强团结，求同存异，将以前的争议，加以淡忘，共同努力，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70]。

《训令》的发表，使弹劾案风波得以暂时平息。从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国民党中央基本上采取的是调和国共关系的做法。即一方面指出主张国共“分立”如何“匡谬极戾”，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不变；另一方面，又采纳了张继、谢持等人的意见，在党内对共产党的活动实施种种限制、防范措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71] 为此，会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职责是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按照国民党“中派”的想法，该委员

会“应得到第三国际的所有指示，这样就可以切断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使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受到监视，并使中共的活动受到限制[72]。

但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努力未著明显成效。当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内围绕联俄、容共的斗争无日或息，以致发展到使用暗杀手段的地步，结果廖仲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廖仲恺是国民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曾担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他积极赞助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在国共合作中被视为“左派”领袖。国民党改组之后，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由于他坚定执行改组国民党及联俄、容共的政策，因而成了一部分人的眼中钉。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73]。

廖仲恺遇刺事件对国共合作是一次严峻考验。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廖案”及时局的处理。在“廖案”的处理上，蒋介石与汪精卫默契配合，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汉民），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倒许（崇智），同时从文、武两方面向自己的政治对手发起攻势。8月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两天后又就任新编组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9月1日，蒋介石控制的特别委员会决定对“廖案”严厉处置。20日以武力逼许崇智（时任国民政府常委、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出走上海，接过了许氏手里的“军权”。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常委兼外交部长胡汉民因与“廖案”有牵连，一度被蒋介石拘留，9月被迫“出使”苏联，离开了广东权力中枢。通过“廖案”的处理，被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势力受到一定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地位则明显提高。从前孙中山的麾下“三杰”，廖、胡二人一死一走，只剩下汪精卫一人。于是，蒋介石解决与汪精卫矛

盾的时机逐渐成熟。

（三）戴季陶对孙中山学说的阐释及有关论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失去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领导核心开始多元化[74]，对“三民主义”的“权威解释”也因此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在政治上及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更加激烈。所谓“戴季陶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在“一大”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被陈独秀等中共领袖视为国民党“左派”。但他对按照俄国人的意图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曾就“三大政策”与廖仲恺“争论累日”。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会后，他相继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连同当年5月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孙中山学说的一套解释体系。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自孔孟以来正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说：“先生的全部思想，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完全表明他，就是‘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也。’”根据“仁爱”是革命道德基础的理论，戴季陶对共产党信奉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社会生产不发达，尚未形成明显的阶级区分，现实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而是觉悟者与尚未觉悟者的对立。因此，他反对在中国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主张国民革命，认为通过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不能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实施全民政治，“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75]。他批评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

一个国民革命”[76]。

戴季陶学说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孙中山提出并经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联俄、容共政策，主张以他所解释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在组织上，他认为改组国民党，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统一的革命政党内形成互不相容的两个中心，这是造成国民党思想及组织混乱的根本原因。他根据“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的理论，认为不同的政党团体因缺乏“共信”，在组织上具有“排他性”，因而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提出：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放弃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改信三民主义，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不要“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予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77]。

“戴季陶主义”的产生，对国民党内反对联俄、容共的分子提供了理论支持，不少被视为“右派”和“中派”的人士纷纷聚集在“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下，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呼声高涨一时。

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共的警觉。戴季陶的小册子印行不久，陈独秀就在《向导》上公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从“理论”和“态度”两方面对戴季陶的“主义”展开驳斥。在“理论”上，陈独秀以马列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戴季陶“只看见民族斗争的需要而看不见阶级斗争的需要”，认为这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不从事“阶级争斗”，就不能促成工农群众力量的集中与发展，“民族斗争”也会因此缺乏社会基础。在“态度”上，陈独秀以具体事实驳斥了戴季陶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的指控。针对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因而必须分立的说法，陈独秀指出：既然国民党标榜自己是各阶级联合的政党，则于“共信”之外，应当有“别信”的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实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织成份之数量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

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78]。瞿秋白则撰文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要“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认为沿着戴季陶的路走下去，国民党将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79]。

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如何香凝）也对戴季陶的学说提出批评。一些地区党部（如江苏）曾根据共产党员的建议，对戴季陶的学说展开批判。广州、武汉、北京等地，甚至出现大量焚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的现象。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要求党员非经党部议决，不得发表关于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言论，表明了中央对于此事的立场。“戴季陶主义”的宣传因此偃旗息鼓。戴季陶事后感叹说：“在这一个小册子发行以后，果然生出很大的攻击和迫害来。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是必然的命运，也是当然的行动，无足怪的。然而国民党的当中许多被革命副产品的群众狂热醉倒，以及被对革命势力作投机运动的商业性迷倒的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一本小册子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的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80]

三　国民党组织的正式分裂

（一）共产国际及苏俄分化国民党的政策

政党内部总是难免出现因思想及政治立场歧异而导致的派系分别。国民党创建伊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两个因素淡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一是严峻的政治斗争环境，迫使党员求同存异，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孙中山作为全党领袖的崇高威望，在关键时刻能化解矛盾，有效维持党在组织上的统一与团结。

然而，随着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不断升级，国民党由政治思想分歧发展到了组织分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部分

国民党人士顽固反对国共合作激化了内部矛盾，一些共产党人在处理两党关系时表现的“左”倾幼稚的行为倾向，以及孙中山的去世使原有的内部矛盾调解机制不复存在之外，苏俄及共产国际实施的分化政策以及中共对这一政策的实践，应该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在国民党内区分不同派别。在国共合作期间，苏俄及共产国际涉及国民党的文件，很少笼统地称谓“国民党”，而大多是具体的将其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主要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国民党的成员大多属于中派和右派。鲍罗廷给苏共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中的一段话，清楚地体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即左派取胜以来，国民党右派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左派的运动，他们希望孙逸仙仍然忠实于同他们的老关系，帮助他们把不合他们心意的人驱逐出党。但是，孙逸仙自己反而越来越左倾，特别是当他确信，只有同左派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因此，国民党右派除了离去，别无出路。……当我们谈论中派时，必须注意到，实际上他们至少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方面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派分子。不能说中派分子已经完全转到我们方面反对整个右派。不，他们仍然希望同右派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是自己的思想敌人，而是不理解孙逸仙的真正主义的人和解，对这些人应当加以教育。”[(81)] 这些看法明显反映出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及其不同政策，即坚定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

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主要是对待苏俄及共产党的态度，及其对待帝国主义、军阀和工农群众的态度。其中对待苏俄的态度至为关键。鲍罗廷称方瑞麟为右派，理由就是方反对中俄1924年5月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左、中、右派区分出来之后，苏俄主张实施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以便通过左派来支配控制国民党。鲍罗廷曾表示，苏俄在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82)]。为此，他

明确主张“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83]，并将在国民党内建立左翼势力视为俄国人在中国的一项使命。1925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问题以及我方（苏俄）支持以孙逸仙为首的左派的必要性问题，在全会工作中占据突出位置”[84]。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坚持加强国民党左派（中派）的方针，因为右派正在加紧组织起来，并把国民党以外的反民族分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会可能迫使我们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85]

俄国人甚至企图改变孙中山的立场。孙中山本人虽然采行了联俄容共政策，但他的想法是丰富复杂的，他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内外环境的影响，反映出一定的摇摆性。这既使苏俄不满意，也让苏俄感到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影响甚至改变孙中山的立场，从而有利于苏俄在中国的长远布局，也有利于中共革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他自身的左派倾向”，并“利用他的左倾”，实现俄国在中国的目的[86]。

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乃是苏共及共产国际在其内部划分左、中、右不同思想及政治派别政策与实践的延伸。苏俄及共产国际为维持其政党的政治“纯洁性”，强调党内斗争，定期清洗门户。这种政策在中国首先延伸到中共党内，而当苏俄企图按照苏维埃路线改造国民党时，又自然延伸到了国民党内。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有反映。《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指出：“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生死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87]

在国际政治背景上，托洛茨基是鼓吹世界革命，力图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重要角色。在“赤化”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失败之后，共产

国际领袖转而谋求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发展。其目的在于通过瓦解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如果他们在中国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世界上又有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共产国际也就可以在斗争中成为赢家，并因此多少挽回在欧洲实施共产革命惨遭失败所失去的面子。而且，如果共产国际在中国推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对于斯大林也将是一大打击。因为斯大林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计划，主张先集中精力于本国，镇压或封锁自己的反对派人士，不让他们大量逃到中国去[(88)]。

中共显然已卷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政争。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决议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1917年以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89)]

在卷入苏俄及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过程中，中共早期领导人甚至在理论上还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发挥”。例如，早先尊崇托洛茨基的瞿秋白在翻译介绍斯大林的有关论著时，就采用“改译”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将斯大林并未点名批判的托洛茨基直接冠以“托洛斯基派”即“托派”名称，并将其作为列宁公开批判的对象。另外，瞿秋白以斯大林的理论为依据，反复强调列宁对托洛茨基“无间断革命论”的批判，并在自己的有关文论中，将其置于苏共党内展开的“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大战的政治背景中加以分析发挥。这“表明瞿秋白改变了原先尊仰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从此坚决站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内‘正统’派别这一边，不断地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等”[(90)]。

在国共合作的实践中，中共自觉地执行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政策。从1924年4月开始，共产党的舆论刊物《向导》登载文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划分，宣扬打击右派的政治主张。在一篇题为《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的文章中，中共人

士指出："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文章认为，虽然在实际政治运动未展开之前，国民党内还说不上有真的左、右派的意见发生，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91)]。实际上，无须"将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当时已经在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划分了。这年7月，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国民党内基本上只有"右派反共分子"，"左派"仅戴季陶一人，但也只是一个空头理论家，孙中山及其身边的人全是"中派"[(92)]。

次年5月，《向导》刊登了《何谓国民党左派》一文。文章认为，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现象"，这就是"党员群众之左倾"。文章表示，"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并且希望全体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文章提出了"左派"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标准：彻底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军阀、买办阶级；恪守孙中山确定的"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联携手的方针"；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裂；实施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政纲[(93)]。

当戴季陶出面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后，中共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加剧。迨西山会议召开，国民党正式分裂，而戴季陶因与西山会议派有瓜葛，他连同他的同情者均被指为"新右派"。陈独秀在《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中对国民党历史上的派系区分作了陈述。他认为，国民党内早就存在左、右派之分别，只是于今更甚罢了："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重新提出

了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在理想上，左派将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右派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左派在推翻军阀之后是要建立民主国家，右派则只是建立现代的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实施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保护农工权益的政策，右派则反对这一政策。文章最后表示，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右派”[(94)]。

孙中山及国民党内一部分领袖并不认同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政治派别划分。作为全党领袖，孙中山显然不能仅仅以某一派的首领自居。如果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相对居“中”或偏“左”，这是对的；但若说他是“中派”或“左派”，则很明显是对其思想政治立场的误解。其他一些国民党领袖为避免国民党组织上的分裂，也尽量在言论及行动上采取调和的态度。如蒋介石于廖仲恺遇刺之后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就明确指出：“我们学校里，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95)] 同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对党员发表演说，再次声称：所谓“左派”、“右派”都是“我们的同志”，表明了反对在党内区分左、右的立场[(96)]。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政治思想分歧虽日益严重，但左、右两派共同之处仍然不少。如汪精卫，当时被视为左派领袖，但骨子里仍然具有人们指斥的“右”的倾向，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宁、汉合流了。就是对于自己极力主张的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汪精卫仍然保有政治思想防线。他曾说：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生命定要发生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97)]。

尽管如此，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政策仍然发挥了相当明显的催化作用。在其他一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很快也有了左派、右派的说法。“左派”具有褒义，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右派”具有贬义，是打击的对象。而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也逐渐公开化、白热化。胡汉民访俄与拉菲斯谈话时承

认：在左、右分野日渐明朗化的形势下，“国民党不是把党内的右派分子看作在孙中山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同盟者，相反，是把他们作为叛徒看待。因此，国民党左派主张开除他们”[98]。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了国民党组织的分裂。

（二）西山会议与国民党的组织分裂

1924年10月，利用直奉战争之机，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直系统治崩溃。不久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乃宣言北上，途经上海、日本、天津，于12月抵达北京。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干部扈从者甚众，一段时间内，北京俨然成为国民党领袖聚集的另一个中心。而聚集北京的又多为被共产党视为“右派”的人士，于是反共活动得以迅速开展。

1925年1月中旬，冯自由、谢英伯、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他们上书孙中山，历数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内信仰不一、组织混乱的现象，并提出“挽救方法”七项[99]。与此同时，邹鲁、谢持等成立“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发出通告，公布弹劾共产党的宣言。该两个组织于3月8日召开合并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会者共二百余人，唐绍仪、章太炎等十六人被选为理事。俱乐部成立后，发表宣言，称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国民党的形势日益恶化。指责共产党“欺蒙总理，佯称归顺国民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自图发展，为祸本党。彼等接受俄国运动费，收买青年，欺骗劳工。彼等百计谋不利于本党，高唱放弃外蒙，作俄人走狗，阻碍党务，骂本党最大多数同志为反革命、非党人，以赤化本党”[100]。俱乐部成立于孙中山病危之时，明显表现出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左派”分庭抗礼的姿态。

针对这种情况，汪精卫等于3月10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将冯自由等三百二十名党员开除党籍。两天之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以后一段时间，“反共”的鼓噪暂时平息，左

派势力增长，国民党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6月3日，国民党中央声明，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并不意味着“赤化”。7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遂有“党国”之称。而在京的“同志俱乐部”则宣称：在共产党存在于党内期间，广东政府一切政令无效；在共产党问题未解决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职务，由同志俱乐部代理。

1925年11月23日，林森、谢持、邹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等八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等两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张继、谢持两名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大会”。因会议在西山召开，故又被称为“西山会议”，与会者及其支持者则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广东方面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委员及候补委员总人数为五十一人，而这次号称“全会”的会议只有十三人与会，未达到法定召开“全会”的人数，因而斥之为“非法”。

邹鲁对于会议是否够法定人数有另一种算法，即不将候补中执、监委员计算在内。他说，当时中执委共二十四人，胡汉民被放逐在俄，熊克武被捕在狱，不应计算在列；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等，因本身系共产党人，自不许列席。这样，实际委员只有十八人，而十八人中已有十人出席，故在中执委中，出席者已居多数。中监委共五人，已有谢持、张继出席。吴稚晖署名召集会议，并出席了第一次预备会议，担任主席，吴也称自己是“西山会议派”。邓泽如虽未到会，却赞助过经费。监察委员五人中，除了蔡元培在国外与会议没有关系外，其他人都与会议有关。他的这种算法，暗示会议是合法的，至少是得到多数中央执、监委的支持的[101]。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经过四十三天讨论，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及一系列决议案。《宣言》称：“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党团之作

用。”“共产党员忠于共产党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俄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斩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102]。为“彻底解决”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的“跨党问题”，会议作出取消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将他们开除国民党的决定。

对于联俄政策，会议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会议通过《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告同志书》，指出：对于“在国际上互以平等相待的国家”，国民党当然和他携手，“但是携手并不是卖身投靠式的”，而是以平等的地位相互协助。“若是苏俄采用帝国主义手段”对待中国，那他就是“本党的敌人”[103]。会议特别指控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溃”，提出并通过了解雇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议案[104]。

对于左派领袖汪精卫，会议作出开除党籍六个月的处分决定。有关“判决书”指出：“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判决书”列举了汪精卫“罪孚叛党，行同卖国”的九个方面事实[105]。与此同时，会议还作出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取消政治委员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移至上海，恢复孙中山逝世后因反共而被开除者的党籍，《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应由党审定决议发行等一系列决定。

针对这种情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授权国民政府全力制止“西山会议派”召开“二大”，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106]。共产党则通过《政治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批

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行。

1926年1月1日，西山会议尚未结束，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百七十八人。会议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持下，作出接受总理遗嘱，完全继承“一大”制定的政纲，修正党章，发布宣言，整饬党纪的决定。会议决定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龙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提出书面警告，责其改正。戴季陶以个人名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造成不良影响，由大会予以恳切训令，促其反省。会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除戴季陶继续当选之外，所有“西山会议派”成员都被剔除。在新当选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七人；在三十二名候补中执、监委中，共产党人有毛泽东、韩麟符、路友于、邓颖超、詹大悲、江浩、谢晋等七人。在新组成的中央党部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彭泽民任海外部长，汪精卫任宣传部长而以毛泽东代理，李大钊任北京政治分会主任。另外，与共产党关系甚密的陈公博、邓演达、徐谦、顾孟馀、甘乃光、宋庆龄、何香凝等也纷纷当选。很明显，经过“二大”，被视为“左派”的国民党党员及共产党人已经在“一大”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107]。

“西山会议派”则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抗衡。1926年3月29日，该派人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宣言，继续坚持反共立场，主张用“全民政治”取代共产党主张的阶级专政的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理论上无资本主义之立足点，即事实上亦无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故由资本主义形成之阶级，不复能显著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盖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

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108]。

西山会议以及广州、上海两个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在组织上的正式分裂。由于在人数上占多数，加之据有两广地盘，有地方政权及军权的支持，有俄国人作后盾，广州方面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仍然居于“正统”地位。

第三节　蒋介石政治立场明朗化及中共的反应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之初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成员。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很多言论都给人以积极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印象，而最能表现其“左”的倾向的是他在苏俄考察期间公开发表的大量言论。

1923年8月底至11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访问，以考察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访俄期间，蒋介石与苏俄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9月2日，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向蒋介石表示，国民党的精神与俄共（布）非常接近，希望两党、两国加强联系。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109]。11月26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的谈话甚至使人怀疑他的国民党员身份，或者怀疑国民党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蒋介石首先从主义上对苏俄表示认同。他明确表示，“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当前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虽然不是共产主义，但当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接着他称赞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表示国民党正在从事的国民革命“是进行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鉴于“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领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特别是领导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责

任”，他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110]。

虽然蒋介石在苏俄公开发表的言论十分激进，但他始终没有认同苏俄的政治制度。在后来回忆俄国之行时，他曾明确指出：“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111]

对于“联俄”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蒋介石也始终持防范态度。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至其（苏俄——引者）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112]

很明显，蒋介石在苏俄发表的大量具有“左”倾色彩的谈话并不能反映他的真实政治思想，至多只是在受到高规格接待的特定场合下，对东道主表示礼貌的赞美之词，而给廖仲恺的信才真实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一般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前后逐渐变化，思想由“左”转“右”，成为国民党内的“新右派”。实际上，蒋介石只是将其本来就有的防范苏俄和共产党的思想政治主张，由早先的暧昧，逐渐公开化、明朗化而已。

蒋介石思想政治主张逐渐明朗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一　中山舰事件及其善后处置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在容纳共产党的同时，对军校内的共产党员采取了防范措施。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蒋介石是“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立场偏“右”，他就可以放心地用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是接近汪精卫的“左派”，周恩来推荐共产党人鲁易担任党代表，就不为蒋介石接受，而将鲁易安排到第三师担任党代表，因为该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当黄埔军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后，蒋介石又授意反对派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113)]。

西山会议之后，国民党组织分化，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对“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举动表示反对，但排斥共产党的倾向也日渐突出。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时，他曾公开要求将所有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包括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人）的名单都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事关重大须请示中央为辞，暂时搪塞过去。后来蒋再次向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和黄埔军校，二者必居其一[(114)]。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及苏俄顾问季山嘉等人的矛盾也在此时露出端倪。先是因“廖案”缘故，胡汉民、许崇智迫于压力，一出走，一放洋，造成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国民党“二大”会议时，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身当政治冲要，使蒋介石开始面对如何处理与汪的关系问题。当时，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主要是因北伐决策而起，与汪精卫的矛盾则主要反映在对待苏俄顾问的态度上。

在“二大”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北伐主张，得到鲍罗廷的赞同。会后不久，俄军事顾问季山嘉却在军校会议上，极言北伐必败，以后又

不断对北伐军事计划表示反对。蒋与季的关系开始紧张。季山嘉与蒋介石会晤时，总是“语多讽刺”，但“又若甚疑惧公（指蒋）者”。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开始出现大量的反蒋舆论，甚至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蒋宣传”。当时蒋介石曾对人说：“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劫而心志益加坚强。”“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115]。作为应付之举，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的请求，未获批准。2月27日，蒋过访汪氏，谈论要事及对季山嘉的处理意见，力陈季氏专横，认为如不免去其职，“非惟危害党国，且必牵动中俄邦交”。提出如不准其辞职，则应令季山嘉返俄。3月8日，蒋再次访汪，表示“一切实权非可落入外人之手，虽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定一限度”。这两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居然很快为季山嘉“闻之”[116]。蒋介石由此获知汪精卫与俄国人关系甚密，不可共谋大事，汪、蒋关系也因此而紧张。

在蒋与汪、季矛盾斗争的背景下，共产党欲发动暴动的说法到处流传，气氛十分紧张。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其传达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117] 李之龙遂于19日晨将“中山”及“宝璧”二舰装足燃料，由广州驶至黄埔。适蒋介石不在黄埔，李乃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称不知此事。19日午，李之龙打电话给蒋介石，问是否可将中山舰开回广州。在得到蒋同意之后，李将军舰开回广州。20日，蒋介石以“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有“异动”嫌疑为由，宣布省城戒严，令陈肇英、欧阳格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多人，同时命令吴铁成率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住宅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中山舰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蒋介石于3月22日在军校召集官佐学生训话时

说："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行动，所以即刻派了兵登舰监视。"[118] 在4月21日对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训话时，蒋介石又透露："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119]

不难看出，事件从一开始就疑团重重[120]。李之龙是否"矫令"，是否真有"异动"嫌疑？有关研究表明，当时确实有人"矫令"调动军舰，但此人不是李之龙，而是欧阳格的侄子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3月18日下午，因"定安"号商船在虎门海域被海盗抢劫，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饬令军校管理科长赵锦文速派军舰一只前往保护，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因军校无船可派，即电请驻省办事处派一艘"输送兼巡弋之用"的"小军舰"前往黄埔，以应急需。欧阳钟便借此机会，前往海军局，以军校后方办事处的名义，"请即派有力战斗军舰两艘前赴黄埔听候差遣"。时李之龙因公外出，欧阳钟只见到作战科科长邹毅，邹面允请示李代局长，设法派舰。随后邹根据欧阳钟传达的命令，给李之龙留下一函称："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接黄埔邓教育长电，谓奉蒋校长面谕，命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交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龙舰可派，请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当晚见到该函，"恐黄埔或有别的意外事发生，急需用舰"，准备派"自由"舰前往，因该舰正在修理，乃派"中山"舰升火前往，并补签了调派"宝

璧”舰的正式命令[121]。

显而易见，所谓李之龙准备“异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如果说是蒋介石“主谋”了这一事件，也缺乏证据。不过蒋介石利用了这一事件则是事实，通过对事件的处理，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激烈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赢家。

首先，通过这一事件，蒋实现了排斥汪的目的。事件发生之后，汪精卫很快不安于位，但又不愿轻易放弃。他在与陈公博等人的谈话中愤愤不平地表示，自己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如此重大的事件蒋介石居然不向他汇报，这不是造反吗？他向陈等表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与历史，不是蒋所能轻易反掉的[122]。为维护自己的地位，汪曾寻求军方的支持。当时担任参谋部长的李济深回忆说：“汪精卫请我和朱培德及各军长谈话，说蒋介石迟早造反，希望大家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我们当时认为团结要紧，要请蒋介石来商量，因而不欢而散。”[123]汪精卫得不到军方的支持，只得出走。这样，汪、蒋矛盾就以蒋介石的胜利告一段落。

其次，通过这一事件，蒋介石打击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事件发生之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了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括季山嘉在内的部分苏俄顾问被辞退回国。同时，蒋以加强军人团结为由，下达《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解散了黄埔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又在军校宣布，将第一军党代表全部调回政治部再行训练。通过这些措施，共产党在军校及第一军的势力严重削弱，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军校及第一军。

不过，即便找到了借口，此时的蒋介石尚有所顾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蒋介石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率尔与苏俄及共产党决裂的程度。他的北伐计划，需要依靠苏俄的军事援助；既要接受苏俄援助，就不能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因此，事件发生不久他就上书军委，自请处分，做出与苏俄及共产党缓和关系的姿态[124]。事件发

生当天下午，蒋介石还向季山嘉派来询问事件真相的鄂利金表示，“一切都是违反他的心意的”，并对冒犯了苏联顾问“表示歉意”[125]。3月22日，当苏联领事问他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对人”还是“对俄”时，他回答说是“对人”，并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126]。同日，又表示，对李之龙的处置只涉及李个人，与共产党无关。他甚至派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及他个人的代表前往莫斯科，“表示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导”[127]。

对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也注意划清界限。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致电蒋介石加以“奖勉”，结果被蒋“大骂一顿”[128]。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对部分国民党“右派”实施打击。4月2日，他以“联合右派，不利于党”为由，下令逮捕欧阳格。4月5日，又指示吴铁城制止“右派”准备召开的广州市党部大会。对于事变之后由苏俄回到广州准备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胡汉民，蒋也不予理睬，迫使胡再度离粤。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谭延闿、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分别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中山舰事件的处置，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提高。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给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呈文中表示“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又声称“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而张人杰在获知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情状之后，“极称为天才”[129]。这是事件研究中十分值得玩味的史料[130]。

二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10日，鲍罗廷自俄国返回广东，多次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为“整军肃党，准备北伐”，蒋介石向中央提出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建议，得到采纳[131]。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整理党务的问题。会议期间，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和改善国共关系为由，与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宋子文、陈公博、甘乃光、伍朝枢、程潜、经亨颐、林祖涵等人，提出四份议案：其一是整理党务案；其二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其三是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其四是国民党全部党员重新登记案。

第二项议案是蒋介石单独提出来的，内容主要包括：（1）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2）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3）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4）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5）凡属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6）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7）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8）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9）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或依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10）为处理此项问题，设一联席会议，由国民党五人、共产党三人参加[(132)]。

在这次会议上，四项议案均获通过。会后，中共在国民党中央各部任部长者纷纷离职。组织部长谭平山离职后，其部长职务由蒋介石继任，不久又改由张人杰担任；顾孟馀继毛泽东之后担任代理宣传部长；甘乃光代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宣传部长由邵元冲继任；秘书长在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三人去职后，由叶楚伧担任。在新组成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蒋介石任主席，后因出师北伐，将主席职务分别请张人杰、谭延闿代理。在张人杰任组织部长期间，陈果夫任秘书，不久代理部务。时部中职员为二十九人，跨党党员有二十六人，其他各部及各级党部共产党员人数也不少。经陈氏按二中全会决议“整顿”，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的人数被严格限制在三分之一以内，各部部长则共产党人无与焉。

为了向党内外说明整理党务之目的，会议发表了《整理党务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大障碍，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制，而是“内部的冲突与纠纷”。为增强自身力量，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改组国民党，与一切革命势力合作，是孙中山具有“历史价值之决定”，它使国民党成为“中国最大之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军阀与帝国主义“散布谣言，以引起吾人内部之纠纷”，主要手段就是“宣称国民党为共产主义之集团”，致使国民党内部产生疑虑。若不消除疑虑，则国民革命运动将蒙受损失。因此，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接受整理党务案”，以消除疑虑，减少冲突与纠纷。宣言最后指出：“若帝国主义者、军阀与反动派对于此规定合作原则之整理党务案遽引为庆幸，实为大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深信此次决议案，决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为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以与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革命分子之团结愈坚固，即国民革命之力量愈增进也。”(133) 以后一段时间，国民党内部“冲突与纠纷”有所减少，但这是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式来实现的。

三　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苏俄与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十分明朗：一是将国民党视作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力量，并利用国民党领袖希望获得援助的心理，引导该党走上联俄的道路；二是不满国民党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希望通过与共产党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与组

织结构，使之最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三是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内部划分左、中、右的政策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实行分化甚至分裂国民党的政策，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壮大左派，使国民党成为实现苏俄在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目的的工具。可以说，至少在理念上，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中是偏向维护中国共产党的。

但从实践层面考察，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并没有袒护中国共产党，因为苏俄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由于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当国共两党发生冲突时，苏俄往往迁就的是更加可能在将来左右中国局势、相对有实力的国民党一方，而较少因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是苏俄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或不一致之处。

这种矛盾在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例如，“廖案”发生后，经过对与事件有牵连人员的清查制裁，右派势力受到压抑，左派势力抬头。当时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定在国民党“二大”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党籍，争取在选举中执委时，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并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驻上海的苏联领事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主意，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一道，去与参与过西山会议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谈判，结果达成妥协，表示中共没有包办国民党党务的企图，且通知各地党部多推举国民党人出席“二大”，不希望在中央委员的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当选人数，并要求孙科等回广州参加“二大”会议。以后，国民党中央同意戴季陶返回广州。而张国焘到广州之后，也反对共产党“包办”国民党左派，主张将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这样，当“二大”选举时，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七人，比计划的三分之一少了将近一半。在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八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绝大多数。会议虽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部分人士予以了处分，但妥协的倾向已十分明显。

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事件发生

时，鲍罗廷已离粤，陈延年刚从上海回来一天，在广州的共产党人陷入手足无措的状况。远在上海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张国焘等一开始甚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获得确切信息之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处理意见。只有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陈延年、聂荣臻等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并具体分析了反击的各种有利条件[134]。

但是，苏俄方面却有自己的认识及主张。穆辛在一份标记“绝密”的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提纲中承认，中山舰事件无疑是由“俄国同志即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促成的。他举例说，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速，政委制的过快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都加快了事件的发生并使矛盾激化[135]。罗加乔夫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也承认，突出共产党人的地位与作用，军队集中统一工作速度过快，忽视为蒋介石这样的军队将领“提供服务”的必要性等，是“我们的错误”[136]。这一切，无疑会影响作出反击的决策。

在广州的共产派力量弱小是苏俄不赞成反击的重要原因。苏联顾问季山嘉曾明确表示左派无力与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则担心与蒋介石对抗会影响未来的中苏关系，认为反击会“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并且为共产党“完全力所不及”[137]。尽管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无疑是一次针对苏联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半暴动”[138]，但他却认为事件处理并不过分，“无杀人之事”，共党方面并未“丧失任何一个重大的革命成果”，因而主张对蒋介石让步[139]。

苏俄顾问的意图，在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中表示得最为明白。他指出：“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

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我之所以赞成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我深信，迄今为止，我指的是近几个月，或更为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140] 既要准备将来除蒋，又要考虑当下的利益，这充分展现了苏俄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面临的矛盾。苏俄的这一决策，决定了国共合作局面的继续存在，也预示了双方关系必然彻底决裂的发展方向。

在苏俄的影响下，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继续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对此，张国焘解释说：“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141] 为执行对蒋妥协的政策，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广州。张到广州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广东区委执行。张在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142] 。这就在事实上接受了蒋介石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处理。

这种暂时妥协的策略直接影响到后来对待“整理党务案”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一月之后，鲍罗廷回到广州，很快同蒋介石达成三项协定：1．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建议；2．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3．鲍罗廷明确表示支持北伐战争。鲍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说：“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143] 有此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很难拒绝接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有关整理党务的决议，结果“整理党务案”“丝毫没有什么争执”，便获得通过[144] 。

不仅如此，中共方面还对接受提案的“正确性”作了一番论证。会

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整理党务案，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有所规定，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分子，对于此项议案并没有表示异议。所以没有表示异议者，因为共产党员以为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顾虑的。共产党员并不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共产分子的议决，包含着侮辱的意义。"[145] 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的函件中更是明确表示："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146]

不过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除妥协之外，也拿不出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周恩来记述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中共党团研究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问题。中央专门派去指导与会中共党团的彭述之引经据典，证明不能接受，但问他不接受又该怎么办，他却没有一点办法，只好让大家讨论。但讨论了七八天，仍然毫无结果[147]。尽管最后张国焘用了周恩来说的"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求大家签字接受，但与会中共党团成员拿不出适当办法应付局面，也是促使张国焘作此决定的重要原因。

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妥协态度，蒋介石对苏俄军事援助迫切的现实需要，以及出于这种需要所作出的承诺，使国共合作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内因共产党跨党并从事党团活动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表面上得到了缓解，这对解决当时国共两党共同面对的主要矛盾即两党与外国列强和北方军阀的矛盾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处理国民党内复杂关系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实力与地位得到上升，这虽然包含了最终消灭异党，实施集权专制的严重隐患，但客观上却有利于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的妥协对于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是有贡献的。正是在妥协换来的继续合作的

背景下，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出师北伐的决议。一年以后，国共两党的密切配合促成了北伐第一阶段的胜利。不过，在获取这一胜利之后，维系两党关系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

---

(1) 季诺维也夫等《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451页。

(2)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

(3)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1982年莫斯科第2版第86页，引自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6年版，第121-122页。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摘录）》（1924年1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564—565页。

(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5卷第84页，引自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17页。

(6)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07页。

(7)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后来冯玉祥发动政变，国民军成为中国政治中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显露出与苏俄友好的态度，苏俄曾一度将联络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放在冯玉祥身上。1926年初国民军遭受严重挫折之后，莫斯科才对起中国政策作出修正，“面向国民党及其在华南的力量的方针又上升到首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554页。）

(8)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第25页。

(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316页。

(10) 蒋中正：《与廖仲恺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8页。

(11) ［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5卷，台湾“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213页。

(12) 《蒋总统秘录》第5卷，第266页。

(13)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17页，引自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09页。

(14) 黄修荣：《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页。

(15)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414页。

(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437页。

(1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279页。

(18)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418页。

(19)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6页，转引自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5页。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77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6-148、165-166、169、171页。

(22)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12—613页。

(23) 孙铎（斯内夫利特）：《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523页。

(24)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8页。

(25) 《向导》第45期，转引自《国共两党关系史》，第33页。

(26)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事录》，广州1924年印本，第54-55页。

(27)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0—506页。

(28)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事录》，第54—55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12页。

(3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1页，转引自《国共两党关系史》，第36页。

(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32) 和森：《羞见国民的国民党》，《向导》第29期，第219页。

(33) 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第170页。

(34) 以上共产党对国民党批评的论述参见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296-299页。

(35) 邓泽如等人的上书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321页。

(36) 《批邓泽如等的上书》，《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

(37) 陈独秀因未办好入党手续未出席大会。毛泽东加入国民党之后很少在湖南从事公开活动，其国民党身份鲜为人知，故其被选为会议代表一事引起湖南籍国民党党员的异议。后经林祖涵、谭平山等斡旋，以“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为附加条件，准许出席大会。参见《蒋总统秘录》第5卷，第272页。

(38)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号），《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页。

(39)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91-101页。

(40) 中央党部的构成大致如下：秘书处：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组织部：部长，戴季陶，秘书杨匏安；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秘书，刘芦隐；青年部：部长，邹鲁，秘书，孙甄陶；工人部：部长，廖仲恺，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妇女部：部长，曾醒，秘书，唐允恭；调查部：部长，未定；军事部：部长，许崇智。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

284-285页。

(41)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参见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42)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

(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547-550页。

(4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280页。

(4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80-90页。

(46) 《有国民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34页。

(47)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号，《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48)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49)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号，《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50)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1984年版，第196页。

(5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13页。

(52) 有关国共合作积极成效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新近出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国共关系七十年》（黄修荣主编，两卷本，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可资参考。

(53) 《陆军军官学校训词》，《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00页。

(54) 《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0-300页。

(55)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56) 《汪代表训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57) 《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节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659页。

(5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59) 《国军政工史稿》上卷，第220页，转引自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编，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17页。

(6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19页。

(61) 《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议决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0-911页。

(62) 转引自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277页。

(63) 参阅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编，第111页。

(6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07-316页。

(6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7页。

(66)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3页。

(67)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4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577-580页。

(68) 《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0页。

(69) 瞿秋白：《对于监察委员弹劾案之答辩词》，转引自王功安等编《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10页。

(7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73-75页。

(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

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73-75页。

(7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及附录一《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517-523页。

(73) 行刺廖氏的主谋，迄今未能判定。有称廖氏系为“一些右派分子”密谋杀害的。被指为谋刺的嫌疑犯有林直勉、胡毅生、朱卓文等。因胡毅生系胡汉民的堂弟，林直勉素与胡汉民亲近，故胡汉民“有参加暗杀的嫌疑”（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向导》第130期），成了“假定嫌疑主谋者”。胡汉民自己在向汪精卫、蒋介石分析此事时提出三种可能：一是军阀作乱。认为被打倒的滇桂军阀不甘心失败，未被打倒的军阀又不安于位，遂以刺杀领袖的举动，以混乱粤局。二是“同志反共”，认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共党猖獗，盘踞党部，干预军政，一般同志，或疑仲恺亲共，愤激之极，故思有以对付之”。三是“自相疑忌”，认为党内有人受共党“催眠”，愤极难泄，作出蠢事，“而共党可以借此铲除异己，破坏革命”。蒋介石在听了胡汉民的分析之后表示：“胡先生的三点意见，我以为第一点尤属事实。办理这一案，对于军队反侧，不能不特别注意。”后来在处理涉嫌人员时，胡汉民未被处置，而仅仅是放洋出国，显然是因为对他的指控证据不足。而朱卓文的一段自我表白倒是可以让人看出其中一些缘由。朱氏在1936年创办《中山日报》，曾与报社编辑谈及廖案。据称：“国共合作后，共党包藏祸心，……维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憩。余蹴居其间，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众意为抽薪止沸计，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仑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袭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戒起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血气之俦，于东山茶寮中，竟将此谋泄闻于卫戍部某侦缉员，某急上闻。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严责顾全大局，切勿使伊为难，反复以公私情谊相劝止。余以事既如此，知不可为，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未稍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仑将军诸俄寇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等人，大骂还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于口头谩骂，初无若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瑞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币二百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蒋永敬编著：《胡汉民先生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2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7-345页。）

(74) 当时，国民党内实际存在着以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为首的三个领导集团，分别掌握着党、政、军大权。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委员制，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原先任广州军政府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则改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尽管如此，领导集团多元化的格局仍然没有大的变化。

(75)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2-418页。

(76)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72页。

(7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73—476页。

(78)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130期；另见任建树、张统模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5-916页。

(79)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80)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序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43-444页。

(81)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598页。

(82)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601页。

(83)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609页。

(8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619页。

(85)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1925年2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579页。案：引文中“左派”后面括号内的“中派”系原文注释。

(86)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433-487页。

(87) ［美］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88)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41页。

(89) 《中共“四大”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1925年1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609页。

(90) 参阅丁言模著《沉重的感情纽带——瞿秋白与斯大林》，收入孙淑等主编《瞿秋白与他同时代的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91)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第62期。

(92)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507页。

(93) 《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37期。

(94) 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13期。

(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第411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9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226页。

(97) 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之一幕》，《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册，第87—88页，转引自闻少华著《汪精卫传》，台湾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98)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谈话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755页。

(99) 这七项挽救方法是：（1）将中央党部及执行部的共产党员一律撤职；（2）停发与共产党有关之党内印刷所、新闻杂志、学校、宣传机关之津贴；（3）现在一切有关政治问题，由总理指定无共产嫌疑之纯粹党员三人以上，负责办理；（4）派至各省国民会议宣传员，其有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5）于最短期间内在北京召开二全大会，共产党代表不得出席；（6）由纯粹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对各地党员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进行裁判；（7）本党一切大小事权，以后不准外国人干预。

(100) 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编，第130页。

(101) 邹鲁：《西山会议》，《邹鲁文存》，北华书局1934年版。亦见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2-533页。按：既不算候补中执委，则出席北京会议的中执委只有前列8人，不知邹鲁说有10人出席的根据何在？

(102) 《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56—357页。

(103) 《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告同志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86页。

(104) 《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清党实录》，1925年12月9日；《顾问鲍罗廷解雇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58页。

(105) 《开除汪精卫党籍案》附《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之判决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58-360页。

(106) 《中国国民党对于上海伪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处理》，《政治周报》第8期。

(107) 《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名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72页。

(108)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403页。

(10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282-283页。

(110) 《有国民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30-338页。

(11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5卷，第207页。

(112) 蒋介石：《与廖仲恺书》，《蒋介石年谱》，第167页。

(113)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118页。

(114) 马维政：《中山舰事件前后》，王维礼等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事本末》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382页。

(1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547页。

(116) 《蒋介石年谱》，第540页。

(117)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321页。

(118) 《蒋介石年谱》，第549页。

(119) 《蒋介石年谱》，第576页。另外，蒋介石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曾收到一封据罗加乔夫判断是伪造的由李之龙署名的信，信中建议蒋介石在三天内通过政府把广东企业收归国有，并威胁说，如果蒋不这样做就逮捕他，把他流放到俄国去。罗加乔夫认为，右派利用了这封信，促成了事件的发生。见《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232页。

(120) 李之龙拿不出下达的令状，蒋介石要说他“矫令”，他确实难以为自己辩解。但如果他真的准备“异动”，为何他到黄埔后要向邓演达报告？又为何要请示蒋之后才将军舰驶回广州？如果他真准备“异动”，为何中山舰回到广州后，他要回家睡觉，而不留在停泊在省河里的中山舰上坐镇指挥？但如果没有矫令异动，为何事后他要写“悔过书”？如果他是真心“悔过”，为何几年后他写事件经过时，又会改口指责蒋介石的“阴谋”？这些问题，至今未能找到合理解答，成为悬案。

(121) 《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附件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7页。

(122)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0页。

(123) 《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第36页，转引自王功安等著《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30页。

(124) 蒋介石：《呈军事委员会文》，见《向导》第148期。

(125)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版，第492页。

(126) 《蒋介石年谱》，第548页。

(127) 参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28) 邹鲁：《西山会议》，《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35页。

(129) 《蒋介石年谱》，第550-551页。

(130) 关于中山舰事件及其前因后果，请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1) 在1926年5月22日会议闭幕时，蒋介石说：“此次会议本为予所提议召集，但予之提议，系党员的资格，决不是以军人、以有带兵的资格来干涉党政。如果存心以军人的威力而来提议的，则完全失了此会议之意义。所以予实系以党员的资格，鉴于时间及环境之需要，而有此提议。”（《民国日报》（上海）1926年5月31日）

(132) 《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233-234页。

(133) 《整理党务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228-231页。

(134)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卷，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135) 《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13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233页。

(137)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163页。

(138)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58页。

(139) 致中：《依文诺夫斯基对本报记者之谈话》，《向导》第158期。

(140)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177-178页。

(141)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105页。

(142)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106页。

(143)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导言〉》，《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18期。

(144) 赵世炎：《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向导》第157期。

(145) 《政治周报》第14期。

(146) 《向导》第157期。

(14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张作霖、冯玉祥支持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并随即召开善后会议，试图解决时局之纠纷，并为国民会议的举行作好准备。但是善后会议刚结束不久，国民会议还未及开幕，“五卅惨案”便突然发生，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外交与政治事件以及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此为契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历史亦有了一个大转折。

第一节　五卅事件的发生

一　上海日纱厂二月工潮

所谓“五卅事件”一般系指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公共租界巡捕开枪射杀中国平民、学生及相关案件，其直接原因则是当年2月开始的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及“顾正红案”。

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封闭后，上海的工人运动趋于低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吴佩孚镇压，中共的工人运动工作更是陷于沉寂状态[(1)]。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即成立农工部，下辖工人运动委员会，进行工人运动宣传[(2)]，并以组织工友俱乐部、开设平民学校等形式发动工人[(3)]。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该会决议强调“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此次会议通过

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特别指出“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4)]。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立三、项英等人来沪，旨在加强工会运动。8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成为中共发动工运的重要基地。

1925年1月11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东方部派维经斯基（Voitinsky，Grigori）出席，会议就工人运动的方针与策略作出决议。2月，中共中央及其上海地方委员会开始组织罢工委员会，成立指挥机关[(5)]，开始发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二月罢工的缘起，据共青团上海地委之报告，本为（上海日商内外棉厂第八厂）“资本家开除男工以养成工替换”，而“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工人，对于此次罢工煽动实颇有力”[(6)]。罢工于2月9日先从内外棉东西五厂与七、八、十二厂开始，后波及内外棉其他各厂及其他日商纱厂，到19日，已有二十二个日商纺织厂，3．5万余名工人卷入了罢工运动[(7)]。各厂罢工工人均提出了罢工要求，从六条到九条不等。其内容各厂大致相似，其中都提到“不准打人”、“每人工钱按照原数加十分之一”、“罢工期内工钱照常发给”等[(8)]。而沪西工友俱乐部号召工人罢工传单中所提要求更有“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增加十分之二”，较各厂所提条件高出一倍，同时又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应属于政治性要求[(9)]。

罢工一开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领导下，纱厂工人组织纠察队、“打厂队”等，以暴力手段扩大罢工范围[(10)]，招致日纱厂业主的怨恨，事态亦趋于严重化。2月10日，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和十四厂有十六个日本人在与工人冲突时受伤[(11)]。15日，在丰田纱厂更发生工人殴伤日人案，七名日人受伤，其中一名日人原田于3月1日死亡，引起重大反响[(12)]。上海的外国媒体多肯定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其实得到了工厂较好的待遇，而对共产党势力煽动操纵罢工表示不满[(13)]。

应日商之要求，日本外务当局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上海纱厂罢工已“暴动化”，并且“已非专对资本家之单纯劳动争议，而带有排外之性质”。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罢工，保护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14]。同时，日政府准备派遣日驻沪海军陆战队上岸[15]。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亦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教唆煽动罢工之团体”。在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给公共租界当局的信函中，日商更认为“此次工潮之全部过程，证明其为具有周密计划之运动之第一步，该项运动系在苏俄以及与苏俄保持密切联系的国民党过激分子之影响下”[16]。租界当局则表示对罢工已给予“严重关切”[17]。26日，因罢工工人冲击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逮捕了五十多名所谓“煽动分子”和“胁迫分子”（邓中夏亦在内）[18]。

在日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外交部于2月21日致电上海特派交涉员陈世光，要求认真查办此次纱厂工潮案[19]。淞沪警察厅随即下令，自17日起对罢工煽动者实施逮捕政策，并在二天内逮捕十六人[20]。罢工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由于形势对罢工不利，自20日起，一些罢工工人开始自动回到工厂上工。22日，在罢工运动趋于疲软的情形下，罢工工人与各路商界联合会代表集会商讨，准备让步[21]。25日，大康纱厂罢工工人绝大多数已自动复工，裕丰纱厂、同兴纱厂也先后开工，多数内外棉纱厂工人也来厂登记[22]。25至26日，日本纱厂主代表与工人代表在总商会谈判，交涉员陈世光与警察厅长常之英出席，最后议定条件四项[23]。27日，纱厂工会开始动员工人复工，罢工遂告结束。

此次日本纱厂罢工，中共原将其视为“生死关头”[24]，因此作了各方面的部署动员。尤其邓中夏、李立三等人负责的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的发动与组织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这次罢工运动评价甚低[25]。然而，经由此次罢工，中共在工运中的影响扩大了，尤其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得到锻炼，为此后上海工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　顾正红案及反帝宣传运动的发起

二月罢工后，中共一方面在上海健全各厂基层工会组织，筹组纱厂总工会；另一方面则在酝酿新的罢工运动[26]。在沉寂了几个月后，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运动于5月初再次爆发。

先是青岛日商大康、内外棉、隆兴等各纱厂工人在有中共背景的秘密工会领导下，于4月中旬相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优待工人。既是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青岛与上海的罢工运动遂密切相连。4月17日，沪西工友俱乐部派江银卿到青岛了解情况，随时向上海报告[27]。4月24日，青岛工人派出代表到上海，寻求上海工人的罢工支援，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刘华在工人集会上呼吁如果青岛罢工事件不在五一节前解决，上海工人应以罢工相援助[28]。不过，由于其他几位工运领袖均赴广州出席5月1日开幕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29]，因此，刘华等人似乎想等到15日从广州回来后再决定是否罢工，暂时赞成采取轮流怠工的手段以打击厂方[30]。

4月30日及5月1日，内外棉十二厂、七厂工人因厂方推迟发放工资而停工抗议。在随后的几天内，内外棉八、三、四、十五等厂及同兴纱厂、日华纱厂等厂工人因为工资发放制度及工人解雇等原因而有分散的怠工与罢工行动，罢工工人与日商间的对抗渐渐升级[31]。然在5月8日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留在上海的工会领导人李立三认为，基于时机及他种原因，当时“无相当罢工之必要”[32]。因此沪西工友俱乐部力劝罢工工人回厂上工[33]。10日，内外棉三厂、四厂与十五厂的罢工工人均复工。就在这一天，青岛纱厂工人经调停也复工。

上海日商纱厂主断定罢工运动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背后操纵，决定对受其影响的工会采取强硬态度[34]。日商在沪各纺织会社相互约定，凡关于工人与公司间纠纷，决不与工人以外的人交涉。7日，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决定不承认“不纯之劳动组合”，同时表示如因此

而引起罢工，则立即关闭工厂，并要求工部局与中国官方严厉取缔工会活动[35]。

5月14日，内外棉第十二厂复有七名工人被解雇，引起工人骚动，该日夜班工人以怠工表示抗议[36]。内外棉厂方即贴出通告，称自15日夜起至16日，第十二厂与第七厂停工。但15日晚，仍有工人五六百名到厂门口要求上工，否则应领取半数工资，遭厂方拒绝。这批工人遂开始捣毁机器间与厂门，与厂方人员及维持秩序的日、印巡捕发生冲突，日人开枪，工人伤七人，其中重伤三人[37]，第七厂工人顾正红因伤势过重于17日晨在同仁医院死亡[38]。是为影响深远的“顾正红案”。

顾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委即接到报告，同时作出三点决议：一、控告东洋人致死工人二名，提起诉讼；二、发宣言；三、宗旨以不扩大罢工为要。先以东洋人惨杀工人问题，要求群众各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39]。次日，上海地委又召开三十五个团体集会，决议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40]。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二、由各团体发起，筹募捐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运动”[41]。

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向全国各地党团员发出动员令，号召发动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要求“各地应即邀CY组织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42]。在当天举行的中共党团宣传联合会议上，李立三并提出，应“极力宣传运动，联合各学校，各团体作一有力的运动，作一大示威运动”。会议就此作了相应的初步部署[43]。

不过，由于当时发现已有的宣传“未能冲动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担心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大活动”会招来政治压迫，并恐无法控制群众的情绪致酿事端，22日的会上决议取消游行大示威[44]。

基于二月罢工失利的经验，李立三等人在五月工潮来到时，主张缓进，“以免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的恐慌”[45]。“顾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及上海地委主要的计划似是先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引起各界同情，以争取经济与政治上的援助。宣传的主力则是各校学生，同时与国民党密切合作[46]。而对于已罢工之工人，则以分发“罢工维持费领取证”的形式，先稳定其心理[47]。

为扩大宣传，5月24日，中共以内外棉厂工会的名义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警务日报》称参加者在五千人以上[48]。淞沪警察厅、奉军第一军、闸北保卫团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区、四区、五区、九区、妇女部及各分部均有代表参加[49]。

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上海日商纱厂工潮发表宣言，“对于日人在中国境内无理由枪杀中国人民之暴举，表示严重抗议”，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等[50]。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党部拟与沪西工友俱乐部合作，并向工人宣传罢工运动已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支持[51]。姜维新亦在回忆中称：“顾正红案”发生后，国民党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开过一次几百人的会，内容是动员上海各校学生支援工人斗争[52]。其他以积极行动表示对“顾案”声援的还有中华救国十人团前团长唐豪、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前会长周霁光、奉记玻璃厂经理陈翊庭等人[53]。

到26日，形势似乎较前几日有利，中共决定发动学生在6月2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54]。27日，共青团宣传部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召集宣传委员会会议，与会委员均系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学生，会议决定援

救罢工工人及被捕学生，并着重提出反对工部局“三提案”，以争取工商界对工人、学生广泛的支持[55]。

“三提案”是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提请纳税外人会讨论通过的修正印刷附律案、增收码头捐案、交易所领照案。此三项提案与取缔雇用童工案也合称“四提案”。修正印刷附律案中规定：凡印刷或发行任何报纸、小册、传单等新闻、宣传纸类者，需向工部局或其本国领事注册姓名、住址；并将印刷者之姓名地址载明于页首末，否则处以300元以内罚金或者三个月监禁等。增收码头捐案规定：租界内之人，如将货物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转运，需抽捐，捐数以该货关税3%为限。交易所领照案则规定：凡华人在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均须向工部局登记领照，否则不许营业[56]。工部局提出这些提案，其目的可能是在增加收入，并加强对租界舆论的控制。由于宣传自由度的关系，中共对印刷附律特别反对。上海学联在4月间曾与上海市民协会等团体曾组织“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并组织了演讲队[57]。而工商界由于经济利益所系，对“三提案”及限制雇佣童工案等纷纷表示反对。于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成了党派与工商团体共同反对的对象。而中共与国民党方面亦抓住此一时机，利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机关媒体及其他形式积极发动宣传运动[58]。4月15日的纳税外人年会因外界反对声浪剧烈，加之法定人数不足，未能成会。但是工部局仍在筹备召集纳税外人会临时特别会议[59]。矛盾趋于激烈化。

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将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发动各校学生上街演讲[60]。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开始动员各校学生进行募捐支持罢工工人[61]。

一般认为，“顾正红案”的消息被租界当局有意封锁，外界不知情，当工人向学生请求援助时，学生便开始募捐演讲[62]。但征诸史实，“顾案”发生后，5月16日至19日，上海几大报纸连续几天有相关

报道，“顾正红中四枪毙命”亦被列为标题以引起读者注意[63]。不过，由于驻沪军警因贩卖鸦片产生严重冲突，以致发生炮轰海关巡艇、奉军军官开枪哄斗等要案，这些消息便成为同一时间内上海各报关注的大新闻[64]。因此，当时各大报纸的版面被“烟土案”占据大半，而日纱厂工潮案无形中便不大被人所关注。在此情势下，中共党团组织为引起群众对工潮的注意与同情，便集中主要精力发动学生上街演讲[65]。而当时上海华界实际上处于江浙战争之后的过渡性无政府状态[66]，所以中共党团的发起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没有受到当局多少干扰。

正如古鸿廷所指出的，尽管顾正红的死在中国工人与日本工厂经理的冲突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在中共党支持下的群众干部，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它发展成了一个要求日本经理作出许多让步的大运动[67]。

三　5月30日的南京路事件

5月30日上海学生到公共租界演讲，既是出自中共的决定，亦与30日前发生的其他几项重要事项相关联。

（1）援救被捕学生。5月23日，文治大学学生施文定、谢玉树因在租界为救济罢工募捐而被捕。次日，又有两位上海大学学生因参加顾正红追悼会，持旗路过租界时被拘捕。30日正好是会审公廨开庭审判被捕学生之日[68]，所以，到公共租界演讲及去“新衙门”声援被捕学生为学生上街的重要原因之一[69]。

（2）呼应上海各界对工部局“三提案”的新一轮抗议浪潮。4月底经工部局的活动，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决定于6月2日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印刷附律、增收码头捐、交易所领照及取缔童工四提案，引起上海华人社会各界的抗议。自5月29日起，报端便可见到许多团体公开抗议工部局“三提案”的消息，特别是总商会与纳税华人会、各马

路商界总联合会均有函电反对[70]。因此，学生上街与当时上海正在形成的抗议租界当局“三提案”运动有重要关系。后来在宣传中，学生也是将反对“三提案”与抗议“顾正红案”，援救被捕学生等要求合在一起，其目的在增加宣传的效力，以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同情支持[71]。

（3）声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工人。5月25日，青岛大康、内外棉、中日各纱厂七千多工人因当局下令解散工会而全部怠业，并拒绝出厂。驻济南日本领事要求地方当局取缔此项行动，山东督办张宗昌即以“工人恃众妄动，已属妨害治安，法所必惩，况与外营业安全有关”，下令严厉处置。29日派海陆军警同时前往，以武力压迫，将该厂工人驱逐出厂，工人持械抗拒，军警当场击毙工人一名，伤十余人[72]。中共决定发动学生示威运动，与青岛罢工工人处在紧急情势之中应有一定关系[73]。

（4）除响应中共的决定外，学生上街似与上海国民党人的幕后运动亦有关系。马超俊即称，上海学生的上街是由他在获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与上海各工团干部商讨，并与上海各绅商团体协商，决定于30日发动各校学生与工人商民等合组宣传队，揭发日工厂枪杀工人暴行[74]。实际上，当时上海各校学生中，国民党员占多数[75]，许多学生对国民党的力量较为看重，如5月24日发生学生被捕情事后，林钧等人便去找叶楚伧想办法[76]。

30日，按照规定的计划，上海各校学生共三千多人到租界，手持“反对越界筑路”、“实行经济绝交”、“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抵制日货”、“援助被捕学生”等字样的旗帜传单，以“上海学生会”的名义，沿途分发演讲，张贴传单[77]。按照公共租界当局1923年8月公布的法令，政治性集会是被禁止的[78]。所以演讲一开始，租界巡捕便予以干涉，学警间的冲突随之发生。

30日下午1点钟左右，演讲已在南京路附近到处举行。三人一组，一人演讲，两人在旁挥动旗帜分发传单[79]。当演讲者与挥旗者

被租界巡捕扣押送至巡捕房时，其他学生则随之跟进，要求一同被关押，这是指挥者特意安排的，目的是使租界警务当局无法应付[80]。到2点45分左右，形势愈趋严重，一名英国巡捕在试图驱散人群时受到攻击，随之有六名中国人被捕，而大批人群又涌进了巡捕房的审判厅。当警方好不容易将人群驱赶出去，外面的人流拥堵在永安公司附近，混乱中，又有两名巡捕遭到攻击，甚至有人试图抢夺他们的手枪，巡捕则开始用警棍与警棒为自己开辟一条路回到巡捕房，他们称有中国人已在叫喊“杀死外国人”。英籍捕头爱活生（Everson，Edward William）在此种情形下，遂下令开枪，以恢复秩序。当场打死四人，多人受伤。在六名送到山东医院的伤者中，又有三人不久死去[81]。

在随后的几天内，事件继续恶化。5月31日，继续有学生成群结队地到租界南京路上分发传单，呼吁店铺主响应总罢市总罢工。6月1日，复有群众到南京路，租界当局声称有人在攻击警察并破坏汽车与电车。尤其在南京路与浙江路的交叉处，人们掀起了路石，扔向正在努力驱散人群的警察与消防队员。巡捕遂又开枪，当场打死一人，十七人受伤[82]。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2日，又有人在柏克路与“新世界”附近与商团队员发生冲突，两名美国商团队员受轻伤，巡捕遂开枪，又致一名华人被击中死亡。其他示威群众与租界巡捕及外人间零星的冲突则不断发生[83]。4日，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被工部局警务处封闭。形势异常严峻。

第二节　北京政府对五卅事件因应及交涉之经过

一　事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反应

“五卅事件”发生前夕，执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段祺瑞解

决“金佛郎案”的办法引起舆论的广泛抨击；教育总长章士钊因对北京学潮之强硬处理被全国学界攻讦而自请辞职；宣传已久、饱经挫折的“关税会议”之召开又似遥遥无期；5月28日，张作霖因对“金佛郎案”的处理不满，通电带兵入关，意在改造政府。舆论多认为执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中，似已无法继续其统治，如何维持其政权诚属疑问[(84)]。然而，“五卅事件”的突然爆发却给了执政府一个极佳的可以继续维持其统治的机会。

5月30日事发当天，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即向北京报告[(85)]。执政府对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其措施对内主要是安抚民众的激动情绪，避免因攻击外人而导致事态的恶化，同时将上海已形成的罢工局面尽量设法导入控制轨道；对外则以强硬态度表示抗议，并藉“民意”作后盾，以迫外人让步，而获内部转机。

6月2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沪案，通过四项决议案：一、各阁员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多表示愤慨，认为有辱国体，要求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二、当即向驻京使团领袖意使表示严重抗议；三、速派曾宗鉴、蔡廷幹等赴沪查办；四、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扶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86)]。

6月6日段祺瑞发布执政令，对国民宣告政府对五卅事件之态度：“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自徒手奋呼，乃垒遭枪击伤杀累累。本执政闻之深滋痛惜。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经过事实，期作交涉之根据，而明责任之所属。政府视民如伤，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爱国国民率循正轨，用济时艰。本执政有厚望焉。”[(87)]

对上海罢工工人安顿问题，段祺瑞似乎倾向于依靠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料理[(88)]。虞氏此时正在北京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之会议。段祺瑞在接获“沪案”消息后，即派虞以“淞沪市区会办”的名义

返回上海调处。为协助虞处理“沪案”之交涉与善后，段又命令在教育部精选职员数名，6月1日随同虞洽卿乘专车南下[89]。

北京公使团认为，“沪案”发生的关键在于上海地方无负责之高级长官，以致“毫无毅然处置之法”，因此要求执政府派重要官员前往弹压，或派兵前往上海[90]。6月5日，段祺瑞向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Cerruti，Vittorio）表示，以前正是因为上海有军事长官及军事设施，所以内争频生，故最后宣布裁撤；但他同时表示，要陆军总长吴光新考虑办理派兵一事[91]。不过，由于江苏和上海当时实际是奉系的势力范围，所以派兵的主动权最后落到驻节天津的张作霖身上。11日，张作霖派其子张学良率奉军赶赴上海[92]。13日，张学良带领“东北陆军教导团”二千二百余人抵沪。此前，江苏省长郑谦已奉段祺瑞与张作霖命令到达上海。

为表示对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沪案”发生后，北京政府一些要员甚至也参加群众游行，或者吊祭五卅牺牲者的仪式[93]。据英国方面的情报，学生的四处串联宣传活动得到政府免票待遇[94]。正如索克思（George Sokolsky）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的动机从总体上来看无疑是有政治用意的，只要罢工与混乱还在继续，北京的现政府便能暂保其统治，因为没有谁愿意来处理这种乱局[95]。不过，对此时的执政府来说，其行动更多的是维持各种势力间的平衡，以从中得到实际的政治利益[96]。

二　外交抗议与初期交涉

“五卅事件”对北京执政府而言，正是增强其声望的良机。值此中外关系的危机存在之际，执政府的地位便于无形中得到巩固，而当外交谈判进行时，政府的威望可能会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滋长扩散而提高，因此，段祺瑞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对此一事件的恰当因应而增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97]。

在1925年年初几个月内，执政府外交部一直在与驻京公使团代表讨论条约义务的法理承认问题[98]。5月28日，外交部还照会外交团，要求训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废除“治外法权”[99]，敦促有关国家考虑讨论条约修改问题[100]。但中方的呼吁并未得到列强的实质性答复。南京路枪杀事件爆发后，北京政府以此为契机，似乎有望在外交方面获得某些进展。

5月30日南京路枪杀案发生后不久，即有学生到江苏交涉公署，向特派交涉员陈世光报告事件经过，并要求陈氏出面交涉。陈即偕同交涉公署科长杨筱堂赴领袖领事馆，表示口头抗议，并至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31日，陈奉江苏省长电令向驻沪领袖领事递交了第一次抗议书。6月1日，因枪击案仍在继续，陈再次递交抗议信。此后，陈世光因病恳请辞职，段祺瑞即任命许沅为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赶赴上海处理对外交涉[101]。

6月2日，北京外交部送出第一次抗议照会，表示对此事“至深骇异”，认为“该学生等，均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烈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相当之要求”。照会要求北京使团“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地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102]。6月4日，外交部不等外国公使团之答复，又因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发生枪杀案，提出第二次照会，谴责租界当局“蔑视人道”，应对其开枪行为及其后果完全负责[103]。两次照会均对学生行动表示维护与支持，对租界当局开枪镇压之举予以谴责。

6月5日，段祺瑞接见驻京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称他感到“至深痛苦”，认为“上海巡捕如此对待学生，使中国对于国际地位攸关体面”[104]。8日，外交部长沈瑞麟在会晤英国代理公使时，亦明确表

示："此次各地市民激以爱国热诚，毫无排外性质，执政日前所颁昭令，劝慰国民已有率循政轨之语，余看沪事现时最紧要者，莫过于恢复市面平时原状，即如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巡捕之武装，释放一切被拘人等，发还被封或占据之各学校房屋，只要租界当局有所觉悟，措置公道，公愤自易平息"[105]。

此四项实际上即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十七条"之先决条件[106]，由该会于6月7日面交刚抵上海的特派交涉专员蔡廷幹、曾宗鉴等人，蔡、曾等人即以全文电告外交部[107]。外交部对"十七条"，初拟分层次处理："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永远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两条因关系中外已签条约，故决定不提出；而先决条件四项，及惩凶、赔偿、道歉等项则在沪提出；撤消公共租界工部局"三提案"及制止越界筑路、收回会审公廨等由外交部催办；至于"代工部局投票权"一条另与外人定洋泾浜章程；其余各条视情形"相机提出"[108]。

是故，沈瑞麟在10日会见法使时，又重提四项先决条件，认为如能做到，上海秩序或可恢复[109]。使团方面则要求执政府命令学生返校，静候政府解决。沈对此屡次表示拒绝，认为"政府断不能以压力禁阻学生"[110]。11日，中方发出第三次照会，声明对于"五卅"及"六一"惨案，上海租界官员应负责任，再次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四项先决条件全部提出[111]。

6月4日，公使团在对中方第一次照会的答复中，否认上海租界捕房当局应负沪案责任，认为中方照会内所述并不完整[112]。两天后的第二次复牒，仍认为中方所得报告不甚完全，同时又照会中方，公使团已组织调查委员团，并决即派赴上海调查[113]。10日，该委员团抵沪，开始调查工作。中国外交部亦即令曾宗鉴对沪案中伤毙华人情形作"精确详尽"之调查，以备提出要求之依据[114]。

13日，国务会议讨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之四先决条件，同意先由外交部上海特派员向领事团提出。不过，在上海的蔡、曾、许等

人似乎觉得“十七条”中有些条件“太过火”，经政府同意，上海总商会托谢永森修订“十七条”，政府方面亦同意在仔细斟酌的基础上照此提出。随即，蔡廷幹与曾宗鉴又电告北京，总商会已与工商学联合会“商议妥协”，决由其另提修正案交交涉员提出。外交部即电令许沅等修正案商定，再提出[115]。可见，执政府有意借民众团体提出对外交涉条件，并在暗中直接介入“十三条”之形成过程。而学界多将“十三条”视作是由上海总商会或者虞洽卿个人擅改十七条而提出，实未了解其中之内情。

此时，就地尽速了结此案表面上视之似乎是中外交涉双方的愿望[116]。6月13日，使团方面在接到赴沪委员团之初步报告，对工部局的观感趋坏，决定不让领团参加，而授权委员团就地与中方交涉[117]。15日，北京公使团电令在上海之六国委员团，正式组织沪案委员会，与中国委员迅速开议。执政府即任命郑谦、蔡廷幹、曾宗鉴、许沅、虞洽卿等人为谈判代表，授与就地交涉之权，与六国委员接洽开议[118]。

6月16日，沪案交涉会议在江苏交涉公署举行，列席使团参赞六人，中国则有特派员蔡廷幹、郑谦、曾宗鉴、许沅等四人参加[119]。17日，中外委员开始第一次谈判，中方即以“十三条”为交涉根据，但祁毕业则表示“中国政府向使团抗议，仅提出四项问题为本团所知，其余均未知悉，无从商量。……当请示使团后方可开议”[120]。不过，当天双方仍就中方所提条件稍作讨论，第二天仍就此继续磋商。当时六国委员似乎设想在赔偿牺牲者，同时将华界中国负责警长与租界捕头爱活生撤职，终止罢工与撤去外国军队几项条件基础上与中方达成初步的解决方案[121]。但此方案显然与中方要求相距甚远。

18日，六国委员因奉使团训令，限三日内讨论完毕，故将其所拟往来函稿交中方代表，作为讨论之基础，其中尤其强调“五卅事件”盖由于华界警察怠于职务之故。而中国委员经讨论表示不能接受，认

为“十三条”中许多条均为事件之肇因。六国委员表示仅能讨论外交部所提四条，遂完全取消前议，交涉遂告中止。六国委员发表宣言，声明中国要求条件在该委员团职权范围之外，随后他们即返京[(122)]。上海交涉遂告破裂。

19日，北京公使团就“沪案”谈判破裂发表宣言，表示“应以正谊与公平为基础，将沪案速行解决，至中国委员所提上海公共租界改组，及收回界内行政事件，应由中国要求关系国代表，再向各关系国政府要求”。为重开谈判留下了余地。同时，驻京公使团会议决议，将“沪案”移京办理，并以意使翟禄弟、法使玛太尔、美代使迈尔为交涉专员。21日，蔡廷幹、曾宗鉴等人回京复命。

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公使团：一、“沪案”移京交涉，正式提出十三条为交涉根据；二、提议依公平主义修正中外条约[(123)]。美国外交官迈耶（Mayer）在给本国外交部的信中认为，中国政府此种举措实一石两鸟，既欲藉此来强化中国的国家尊严与地位，亦表示准备在尊重国际法的友好态度下开始条约修改的谈判，而淡化激进的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宣传[(124)]。26日，意使翟禄弟代表公使团答复外交部照会：一、“沪案”十三条请派专员分别办理；二、修改不平等条约表同情，惟须候各国政府训令。同日，执政府公布“外交委员会条例”，成立外交委员会，任孙宝琦为委员长，颜惠庆等十八人为委员[(125)]。次日，正式发表以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办理“沪案”交涉。7月1日，颜提出所谓“治标治本”说，对“五卅”一案，决定分阶段办理[(126)]。

上海交涉破裂后，“速了”之愿望既无法实现，而列强因内部意见不一，谈判重开亦遥遥无期，执政府方面转而采取长期交涉的计划。29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告诫防范假爱国名义实行破坏主义，表示在沪案交涉停顿后，政府开始转变对群众运动之运用策略。实际上，挟“民意”与列强周旋正是当局用心采取的政治策略。而当时局变化，策略亦随之发生改变。如据李健民之分析，政府的一部分外交行为其

实并非自动自发，心甘情愿，如政府因为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便照会外交团，请求“修正”不平等条约，但同时亦向外交团人员暗示不要太认真了[127]。7月15日，北京政府再次训令民众，保持平静，以利交涉进行，各省官员均应制止任何不法举动的尝试。

对初期“沪案”交涉的失败，多有人认为是与上海总商会擅改“十三条”，与“十七条”形成两种意见，而让外人发现国人的不团结，影响其态度[128]。但丁应求的研究表明，交涉中止其实与此关系不大。丁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外人明了中国内部的混乱，即使他们发现两种要求之间的悬殊差异，他们也不会重视，因为第一次谈判时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已使他们十分惊骇。外人对中国的全盘性要求，事先全然没有准备。华人欲把握此一机会，扫除经年累月引起其愤怒的外人特权，但外人却将协商的范围限于纯粹的“五卅事件”，是故谈判无法继续[129]。曾宗鉴在事后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则根据所得情报称，六国委员态度突然变化，是由于“英、日以汉、浔、镇江交涉纷起，认为不宜退让，电召参赞回京，并谓伦敦态度强硬，将向中央通盘交涉”[130]。可见谈判破裂的主因实在于外人一方。

上海总商会提出交涉条件十三条，实已包含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之意见在内[131]。张国焘在回忆中亦称，中共方面为了以免“联合战线”的破裂，对总商会修改的十三条确已表示同意，虽然在工商学联合会中，此种妥协态度亦曾遇到激烈的抗议[132]，各团体内部的争论亦一直存在[133]。但上海谈判失败后，尤其是19日上海总商会决定21日开市时，运动出现了重大的裂痕，中共开始谴责总商会的妥协政策，其中“反对总商会篡改交涉条件”便是改组后由左派学生控制的上海学生联合会重要的口号之一[134]。他们似乎欲藉此打击总商会，而影响其开市的决定。对“十三条”，民间倒有一些舆论表示不满，认为北京当局“太不注意外交战略了”，“外交部只等于邮政箱传话机”[135]，十三条“毫无价值杂乱无章”，“反使各国疑虑”。所谓由特派员、交涉专员、外交部构成的“三重外交”，各层次之间往往不能协

调，显示出中国外交当局的步骤混乱[136]。

三　北京公使团的分歧与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

“沪案”发生后，各国反应并不一致。而在具体交涉过程中，各国间的分歧更趋明显，这一方面使中国的外交策略能获一定成功，另一方面亦迫使英国方面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

英国在事发后力图拉近与各国的关系，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英国外长张伯伦在6月30日接见葡萄牙驻英大使时曾表示，中国正在发生的运动不是什么单独反英、或者反葡、反日的运动，而是一个排外运动。因此他认为各国政府应该诚意地合作以保护外人在华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站在一起来面对这些混乱[137]。但其他列强并不愿意帮助处在困难中的英国，以维持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

日本在交涉中取双重政策，一方面，面对中国国内民众运动的高涨，与英国联合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另一方面，则以其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单独解决日本纱厂案[138]。当时日本正处于“币原外交”时期，非常清楚中、美两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变革[139]。因此，当时日本外交路线似有对华缓和之倾向。事发之初，日人曾有袒护租界工部局之意，但是在10日左右，日政府即训令其驻华公使及上海日领事，要求对沪案暂持旁观态度，而对于日纱厂案，则准备单独解决[140]。

美国方面，认为“五卅事件”牵涉到列强在华共同利益，故取与英、日两国协调的政策，不想单独行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其态度较英缓和得多[141]。而法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中国的态度较为缓和，法公使玛太尔自“沪案”开始，其态度即较友好[142]。

6月2日，工部局会审公廨对5月30日及以前被拘学生进行审判，结果法、美法官均宣告学生无罪，引起英人之不满[143]。13日，六

国委员团在调查时发现一份1919年以来即已存在的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制订的秘密动员令，使得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委员对租界工部局的观感顿时趋坏[144]。是故有15日北京公使团排斥上海领事团参与中方交涉之电令。而中国方面则利用“英捕射杀无辜学生”的宣传，采取有效的分离策略，使英国孤立化[145]。

6月19日，北京使团曾经发表意见，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其余的条款，英国代表将不能担任谈判委员会的主要负责者。但是在华英人认为其他列强想牺牲英国的利益来谋求与中国的和好，日本亦不同意其在北京代表的意见，表示不参加交涉委员会。而中方则立即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委员会与各国谈判[146]。

23日，六国委员在返回北京后，将调查结果撰成报告书并经使馆会议通过，但英国恐报告书的发表将证实其责任，极力阻止公布。然法国公使玛太尔仍将报告原文寄往巴黎公布，引起英国的不满[147]。7月6日，在使团会议上，意、日、美等国公使均同意对中国稍作让步，遂根据六国委员之报告，通过三项决议：一、上海工部局总巡麦坚应即免职；二、工部局董事会应严加谴责；三、开枪之捕头爱活生应依法严办。并即以使团名义训令上海领事团饬公共租界工部局即日实行，否则“得解散董事会，予以相当处分”。但英外长张伯伦获悉后表示强烈反对，并力阻其实行。在7月9日的使团会议上，英公使为工部局尽力开脱，且对法使公布报告表示不满。于是法使玛太尔遂藉工部局不听命令表示辞去交涉代表一职，使团分裂遂公开化。此前，英政府曾经草拟了一个“九国宣言”，请求各国签字，以对中国的事态表示一致的意见[148]，但是没有成功。即使是英方提出的第二步替代方案，即请美、日两国与他们一起发表这个宣言亦没有实现。

集中目标于英国似是执政府外交当局在交涉之初便已采取的策略。6月10日，英国方面即发现“排外运动变为专门排英运动，日渐蔓延”[149]。13日，外交部致英国代使的照会亦暗含单独对英交涉的意味[150]。汉口事件与沙基事件发生后，单独对英的呼声更高[151]。

正如外交部调查“汉案”专员邓汉祥所称，单独对英，一、可使范围缩小，易于持久；二、能使英人直接感受痛苦，不难就范；三、政府与人民亦能趋于一致，政府对外既坚持到底，不稍退让，则人民自然谅解，乐为后盾；四、利用外交生政治作用者。政府人民能沟通一气，亦无间隙之可乘[152]。

使团分裂后，“单独对英”之主张遂由外界之呼吁正式成为执政府运用的策略[153]。据英使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抗议照会称：“上海县告示抄录政府电令内有英国系沪案唯一负责之人，对于其他各国，人民不得扰搅等语，此项用意无异告知华人，得与英人为难。”外交部对此消息并不否认，只是对上海县知事将政府电文录入告示表示要查办[154]。形势似乎正如瞿秋白所说，“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155]。

日外交当局在“五卅”事发后即有将“顾正红案”与南京路巡捕枪杀案分开讨论的企图[156]，而中国外交部在外交程序上一开始亦将两者分开处理[157]。奉命返沪调处沪案的虞洽卿一回到上海，强调要将日本纱厂问题与英租界开枪事件分开处理[158]。6月8日，蔡廷幹与曾宗鉴二人访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希望日纱厂问题早日解决[159]。10日，执政府亦曾通过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章宗祥向日方表示，如内外棉纱厂能尽早将顾正红等死伤者的抚恤费交付，则“顾案”即可告结束[160]。上海谈判失败后，日纱厂案单独解决之舆论更炽[161]。不过，6 月下旬具体谈判开始后，当事者内外棉纱厂及日本在华纱织同业会似乎态度较强硬，但在日外务省努力斡旋下，日本纺织同业会于7月21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作一定让步。中方即提出解决条件，经双方反复会议磋商，执政府为尽速解决此案，同意贴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三个月共15万元[162]。8月12日，解决条件签字。25日后，日纱厂先后复工[163]。

当时执政府集中对英之政策，不仅在日纱厂案中可以看出，亦能

从其处理苏俄逮捕中国驻俄使馆职员一事中看出。7月26日发生了莫斯科中国使馆馆员彭昭贤等四人被苏俄政府违反惯例逮捕之事，而中国外交部与驻京俄使馆则极力否认，盖欲隐藏事实以利当时之对英、日交涉以及中俄会议之举行[164]。

四　“沪案重查”与交涉的悬搁

英国既然对六国委员之调查报告表示不能接受，遂提出司法重查之主张，认为对工部局之处理属于法律问题，应由司法手续来解决。但在8月初的两次使团会议上，法国公使对此仍表反对，并宣告退出会议。而中国朝野的反对声浪更烈。7月31日，北京政府公开表示反对沪案重查[165]，9月1日又由驻英代办公使朱兆莘向英国外交部声明反对。6日，外交部又训令驻外各使，表示我国誓不承认沪案司法重查，英方如邀请参加，则将断然拒绝，要求各使向各驻在国政府切实声明[166]。

9月9日，在英国公使的要求下，使团会议终于议决“由英美日三国先行派遣司法官组织委员团从速实行调查，沪案开议须俟司法调查后始能举行”。三国司法委员并不由使团派出，而是由各该国政府指派[167]。15日，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W．R．Oudendijk）照会中国政府，正式提出重行司法调查，希望中国亦能予以赞同，并派代表参加，中方即复照表示坚不承认，但使团决定司法重查仍然进行。

10月3日，日、美、英三国法官均到沪就任，司法调查委员会遂组成[168]。调查自10月12日开始，于11月10日结束。使团方面本想三国委员能联合提出报告，但他们的意见相差甚大，故报告于12月23日分别发表，英、日两国委员的报告仍强调工部局行为正当合理，开枪乃形势所迫，爱活生没有责任。但美国委员约翰逊的报告则认为，“直至开枪瞬息之前，均不信所谓暴徒有损害人身财产之意”，并指责“捕房未于预知有事变之后，增加在职巡捕以图防止之”，“一部分西捕对群众不能行充分的人道”，“总巡麦高云既深知当时情形，不应

离职三小时”。该报告同时认为在华外人，多没有认识到近十多年来中国人对政治及个人权利意识的进步。在其提及的二十五点事件爆发的原因中，强调日纱厂案与“沪案”的重大关联[169]。

司法调查报告发表的同一天，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致函许沅，表示：“各委员之判决书，多数不归咎于捕房，然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业已辞工部局职务，工部局为谋此案早日解决计，亦决定加以核准，惟对于该两职员以往之劳绩，表示感忱而已。工部局并欲对五卅遭难者更表示惋惜之意，谨奉七万五千元支票一纸，烦转递中国交涉员，俾得散给各被难者家属，以作抚恤之费。”[170]

重查报告的发表及工部局的通函，从其立场看，似乎意味着沪案交涉到此结束。但执政府方面，对此结果则不予承认。接获许沅之报告后，外交部乃训令许氏将工部局之支票退回，认为这仅是工部局之单方面意见[171]。此后，五卅事件的交涉便成为悬案，虽然在1926年4月执政府结束之前，还有几次催促开议的照会给使团，但最终除了会审公廨的谈判与工部局华董问题有所进展外，其余条件便多湮没于累累的外交公文之中了[172]。

第三节　五卅运动的形成与扩散

“五卅事件”发生后，上海即有规模空前的“三罢”运动举行，而在全国范围内，也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帝情绪弥漫各地，民族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似达到一个高峰，此即通称的“五卅运动”[173]。

一　上海“三罢”运动的发起

5月30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并决议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同时与中共上海地委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以统一运动的领导[174]；工人、学生的

发动工作则由相关负责干部进行。下午4时，刘华、陶静轩等人即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工会代表开会，号召工人起来为被枪杀的学生报仇[175]。恽代英在上海市学联以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的身份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议各校自次日起一律罢课，并要求全市工商界罢工、罢市[176]。

是晚，国民党方面叶楚伧、马超俊、刘庐隐等人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支援惨案办法”[177]。6月2日，又有约十五名“右翼”国民党员在居正住宅开会，讨论办法[178]。其他团体，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各工会、市民对日外交大会等均有会议召开[179]。国民党人指导下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对“三罢”运动之发起也起到一定作用。6月1日，上海工团联合会曾聚集二十余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3日该会又成立临时专门委员会，应付时局变化[180]。在多方动员下，上海的“三罢”运动很快实现。

（1）罢工

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无疑是罢工运动发起的主要力量。正如郑超麟所说：比屠杀和罢市更出人意外的，就是次日忽然出现一个“上海总工会”向全上海工人发施号令了。……它成了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181]。南京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经紧急筹备，便在次日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6月1日公开登报。同时该会发表告全体工友书，“从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182]。

6月2日，罢工首先自公共租界之外国企业开始，罢工人数超过5万，随即范围扩大。5日，租界之服务性行业工人亦加入罢工行列，罢工人数日益增多。华资企业工人自5月31日起在中共党员的发动下亦渐有罢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恒丰纱厂等，因此规模益加扩大。到6月8日，已罢工之外国工厂及机构共一百〇八处，计十三万余人，加上华资企业，罢工总人数达15．6万之众[183]。据《五卅运

动史料》所统计，五卅运动期间上海罢工、停工案共二百〇六起，涉及工人201，978人，其中华商三十五起，共33，868人参加罢工[184]。

（2）罢课

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致电各地学生会，并派人到北京等处动员，同时规定次日学生出发到大马路，要求罢市[185]。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议决，自6月1日各校一致罢课[186]，并继续发动罢市及工部局华捕罢岗运动[187]。6月1日，全国学生总会在恽代英领导下成立[188]，并即通电各地学生会及各团体，号召学生罢课演讲，举行示威运动，致力于将罢课运动扩展到全国范围[189]。16日上海学联又通告各学生会，强调“在沪案交涉未了以前，各校一律不准上课”[190]。18日，因各校为避免引起事端，多有提前放假之举动，全国学生总会为此特致函全国各学校校长，希望各校本期免放暑假[191]。上海参加罢课的学生人数据称有五万多人[192]。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因参加罢课及运动，该校校长遂宣布放假一周，后以发生卜舫济校长禁止学生集会升旗，并夺走学生手中国旗之情事，因此，该校学生及附属中学学生多声明脱离该校[193]。

6月2日，因租界戒严，中共决定不再组织学生到租界演讲，而是将运动扩展到全国[194]。全国学生总会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代表计划分八路去作宣传募捐工作，每路三名学生[195]。不过，6月中旬后，上海各大中学校负责当局多宣布放暑假，罢课遂在无形中结束了。

（3）罢市

三罢运动中，难度最大的便是罢市，因为此举与商人利益攸关。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即决议次日发动学生上街动员商人罢市

[196]。31日上午，学生们便在租界中心区域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店员们打烊，但应者寥寥。下午3时左右，学生、工人等一千五百余人，聚集上海总商会要求宣布办法[197]。男女学生把总商会会所包围起来，会所礼堂里亦挤满了学生与工人等，并在台上不停地发表演说，高呼罢市[198]。正在三楼出席总商会会议的会董看到群众愤激的情形，多数退场，明显表示出消极反对之意，剩下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与会董邬志豪两人应付场面。直到方椒伯被迫签字同意次日即罢市，群众才散去。在当时的情形下，方如不签字，似乎无法下台[199]。

群众大会后，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即印发总罢市通知[200]。晚间，谢永森代表上海总商会紧急约见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解释方椒伯是受民众胁迫在宣布总罢市决议上签字的[201]。但是上海租界当局认为方椒伯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所以并不相信方氏在宣布罢市后的报告[202]。方本人也拜见工部局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声明总商会并无排外之意，总罢市完全是强迫与威胁的结果，并保证对运动不会同情[203]。

相似地，6月4日晚，上海法租界商联会在议决不罢市后，即有数百人立即闯进商联会会长叶贶辰所开商店打砸一通。次日法租界各商店亦只有罢市[204]。可见在当时情形下，一些不愿停业的商人实际上已失去行动的“自由”，而不得不考虑外界的威胁。上海银钱业在各业罢市后仍照常交易，后来由于“外界压迫”，方宣告停业。但还是有人指责钱业交易实际上仍未停止，而英商银行亦依靠钱业的接济而渡过挤兑期[205]。

罢市之后，如果有商家开门，即使是食品店，亦会遭到袭击，而不得不闭门。江苏交涉公署交涉员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上海“各街道皆有流氓附和，每一店关门则拍手欢声四起”[206]。在此情形下商家欲不罢市势所不能。6月1日，公共租界华人开的商店都上起了排门板，不过多数店家仍然通过门洞继续营业[207]，彻底的罢市在上

海从未实现。

上海三罢运动的实现既与中共的号召有关，亦有国民党及各团体力量的介入。像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闸北保卫团、南市保卫团、店员联合会，甚至一些地域性的社团，中共均有联络，而这些团体在三罢运动的发起中似乎亦起到一定作用[(208)]。运动中一些恐怖手段的频繁出现，似乎暗示帮会势力在其中的作用[(209)]。如当时便有人以“铁血团”的名义对反对罢市者实施恐吓[(210)]。“锄奸团”则散发激进的传单，表示要“干掉”不肯罢工的人以及无视民众意见的卖国贼、工贼等人[(211)]。而罢工运动中，上海工团联合会似乎亦在扮演一定的角色[(212)]。

另外，三罢运动的形成，执政府及地方当局在开始阶段并未干涉[(213)]，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也与“军阀袖手旁观”有一定关系[(214)]，此不能不是运动得以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上海罢工工人的维持

在上海的三罢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且影响波及全国的是罢工，因此，罢工工人之维持关系到整个运动的走向。

上海工人罢工之维持费用数目甚巨。事后虞洽卿曾称：“自五卅事起，所有接济工人之费，总商会经募者，凡二百二十余万，学生联合会及济安会方面经募者，六百余万元（注：似为六十余万元之误）。”[(215)] 9月底，虞又称：“昔以全民之力，坚持抵抗，需费三百万，坚持四阅月。”[(216)] 英文《中国年鉴》报道：总共各方面的罢工基金，合计有五十万至一百万的银元[(217)]。而据《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统计，自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上海总商会经收的捐款共二百四十余万元[(218)]。李键民经多方考证，认为上海得到的募捐款项总额大概在三百余万元，这其中，多数用于罢工工人维持经费之开支[(219)]。

罢工维持费的发放是关系到罢工运动能否坚持的最关键因素[220]。上海罢工实现后，罢工工人每天可以领到二角钱的维持费，其发放或者是半月一次，或者一月一次，也有五天或十天发一次的，但发放标准基本一致[221]。如果担任“纠察”或做“工会代表”，则另外领取薪水[222]。但如果工人不去报到则要扣钱[223]，有时罢工工人还可以领到馒头等食物[224]。据工人回忆，罢工前女工每天工钱也就是二角多钱，做了几年才能有三角多钱一天[225]。男工每天可拿三角一分或三角二分[226]。1924年英国“商务官”布雷特（Brett）的调查显示，上海纺织工人日平均工资在三角到四角之间[227]。因此，罢工期间歇业工人所得维持费约相当于70%的正常工资。

罢工维持费的来源广泛，但商界之募款及垫借无疑最重要。当时在上海指挥运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上海的总罢工和其他地方的部分罢工有十分之九的经费是靠资产阶级提供的。”[228]上海总商会是五卅期间罢工经费筹募的主渠道[229]。由于其在国内商界及社会上的信誉与号召力，所以各地商界、学界多将筹集到的捐款汇寄到上海总商会。运动初期，外人曾对上海十多万罢工工人是否能保持镇静而不引起混乱表示怀疑。然段祺瑞对此则表现得很有信心：“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230]这点显示上海总商会之维持罢工经费，似得到执政府的认可。

在商界的捐款中，海外侨商及本国企业的捐助尤其引人注目。虞洽卿曾承认，“捐款中以南洋华侨所助之款为最巨”[231]。而在本国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232]。运动开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布捐献一万元作罢工基金，并将该厂工人在运动期间加班劳动所实现的利润，移交罢工工人[233]。此种利润，大约为每天一千元[234]，南洋公司还另外向总商会捐十万元，表示其支持态度，有时该公司还直接将款项给总工会，以解决经费支拙的难题[235]。上海工团联合会给工人发放罢工维持费，亦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支持[236]。

在罢工维持费无法发出时，商界的垫款便异常重要。7月1日，总商会秘书徐可升曾在总商会会董会上表示，罢工维持费只能维持一二天，是次会议决定向各华商银行借款10万元，待各地汇款寄到即归还[237]。正因为商界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所以英国方面因无法结束罢工而攻击上海总商会，指责总商会胁迫自愿复工的工人[238]。英国驻沪领事巴尔敦（Barton，Sir S·ney）则指斥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排英运动的第一号祸首。至八月间，美日英三国领事甚至报告公使团，虞氏该负起此次上海罢业及对中外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之一切责任[239]。

执政府的经济支持亦值得一提。据李健民统计，北京政府财政部前后共汇拨上海25万元[240]。如7月12日，报载消息称财政部汇款5万元给上海总商会，并指定发给受伤华人与死者家属，此点经租界警务处查证属实[241]。7月30日，上海已收到北京政府汇来的10万元罢工维持费，半数交总商会，半数交工商学联合会[242]。英《泰晤士报》亦称“罢工能持久，由于中国政府拨款资助，邮电路中外雇员已奉交通部通告，每员以每月一日之工金捐助上海罢工，此为中国政府力助排外举动之确证。”[243]此消息系指交通部电政司6月26日要求“交通界同人，各捐本月份薪水之三十分之一”之饬文。英使为此特照会外交部表示抗议[244]。

值得注意的还有苏俄的经费援助。据现有资料，1925年6月-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从苏联国库寄给上海的经费是20万卢布[245]。6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246]，并决议开始为中国工人募捐。6月1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再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补充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247]。8月5日-7日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重又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

者支配”[248]。另外，据称俄总商会亦有3万金卢布汇给上海总商会[249]。而以冯玉祥等人的名义及广州方面的捐款似乎亦与苏俄有些关系[250]。在国际赤色工会的号召下，据称德国柏林工会募集到5万金卢布，而法国工会则汇给上海工人4万法郎及5000卢布[251]。

由于罢工工人众多，因此罢工经费的接收与发放便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亦直接与工人秩序之维持相关连。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主要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总商会、学生联合会会、总工会，以及由上海各慈善团体组织的临时济安会。6月4日，由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四团体组成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为工、商、学三界联合办事机关。6月10日，上海总商会设立“五卅事件”委员会，以专门办理沪案之相关问题，尤其是罢工工人救济。上海学生联合会设有筹款部，主要负责募款收支管理工作。上海总工会则有经济科负责此事，但其经收的捐款与会费并不作区分[252]。临时济安会成立于6月9日，上海各慈善团体发起，主要负责工人救济款项的给发[253]。

三　运动在外地的扩展

陈叔谅将五卅事件后的民众运动按形式分为四种：宣传、罢工、抵制英日货、济工[254]。相似地，李健民亦将反英运动概括为三个部分：反英宣传；罢工及抵制英货、提倡国货；募捐运动。三者彼此运作，形成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255]。据统计，至1925年底，中国各处因“五卅案”而发生同情罢工者，共一百三十五起[256]。至于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运动的人数，刘少奇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左右[257]。

5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起来响应，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反帝运动[258]。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宣言《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指出“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号召民众起来“打倒野

蛮残暴的帝国主义”[259]。在地方的响应上，中共地方党团组织及其控制下的学生联合会及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团体扮演主要的推动作用。北方运动发起的重心在中共北方区委，而中共上海地（区）委下属支部的活动则是江浙一带运动高涨的重要诱因[260]。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规模较大的示威运动出现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而引起严重交涉及后果的则主要有汉口事件、沙基事件及南京、九江、重庆、镇江等地发生的冲突案。

“五卅事件”消息传至汉口后，民众情绪便趋激烈。自6月2日起，学生开始罢课游行，并动员工人罢工及商人罢市。6月11日，汉口码头工人2千余人因前一天“太古”轮船管栈印捕殴伤码头工人一名，结队游行，向该公司理论，湖北地方当局即派军队维持秩序，群众向租界奔避，英国租界义勇队及海军陆战队即开机关枪，毙八人，伤平民十一人，以及巡士十三名。扰乱中有日商店数家被毁，日商水谷洋行业主水谷邦次于混乱中被殴打重伤致死[261]。次日，汉口租界戒严，外舰陆战队登陆防守，中国当局亦派兵保护街市。

5月31日，中共广东区委接获中共中央来电，并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实行办法[262]。但当时由于广州正发生刘杨战争，故群众运动无法发动。不过，中共方面仍派邓中夏、杨殷及李森、刘尔崧等人分赴香港与沙面开始发动工人罢工[263]。刘、杨战事结束后，6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即发表启事，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并致函香港各工团，要求立即罢工。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的发动下，全港工团联合会得以成立。该会并派人到广州接洽，得到了广东政府的全力支持[264]。19日，在中共指挥下的香港海员、电车及印刷等行业工会首先宣布罢工，洋货业、装卸业、煤炭业及其他各业工人亦相继罢工。前后15日，香港工人全部罢工，并有工人开始分批返回广州[265]。21日，广州沙面英租界华工也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一致罢工，退出沙面租界。省港罢工完全实现。

23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发动下，广州工、农、学、商、军各界共五六万人举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会后列队游行，并有飞机散发传单[266]。经过沙基租界时，对岸沙面英、法等国外兵，突向人群开枪，继以机关枪扫射，英法等国军舰亦发炮射击，当场死伤群众近百人[267]。

在镇江，则因为6月5日学生及其他各界人士之游行示威，而引起租界内不稳之迹象，界内游民与工部局之职员发生冲突，而英人担心发生“排外暴动”，将所有妇孺送上轮船，地方驻军亦开进租界进行弹压，故风潮未致酿大[268]。6月13日，九江因工人与租界巡捕冲突，英、日驻浔领事馆受到冲击，久已歇业的台湾银行亦突然起火，经地方军警维持，秩序始靖。南京下关则发生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被枪杀案[269]。

运动中，亦出现激进者，如主张暗杀外人、练学生军、对英宣战的都有[270]。有地方甚至出现了“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得进入中国公共场所”的标语[271]。骚动中，外人死伤的消息亦不时出现[272]。

四　运动的衰退与中止

上海交涉会议开始后，群众运动实际便开始步上衰退之途。

对上海总商会而言，罢市之举既是出于被迫，而亦有做交涉后盾之考虑[273]。但罢市给上海商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274]。加之，端午节即至，商家按惯例需结清账务，因此一些大的商家希望尽早开市。基于此，上海谈判失败后，商界随即决议开市。6月19日，即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的次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七十六个团体集议开市日期[275]，决定自6月21日起开市。同一天，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与英国的谈判须于6月24日前结束[276]。但各商家或由于怕外力干涉，或由于想回避债务，对21日开市的决定，

响应者寥寥[277]。而上海各团体外交后援会则公开反对[278]。为了早日实现开市，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终于决定26日开市[279]。

驻扎淞沪地区的奉军对运动的态度亦与上海谈判密切相关。6月18日，交涉还在进行之时，张学良曾发布通告，称："公众所提各项要求已提交谈判会议，务望各位静候和平解决。凡假借某工会或联合会所赋予权力，扰乱治安或危害外侨生命财产者，均将依法惩办。"[280]该布告似乎是应上海外人的要求所发，目标直指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9日，《警务日报》消息称，张学良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已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281]。22日，张学良离沪，由奉军第一旅旅长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邢抵沪后即发布布告，称"嗣后无论何种团体，务须认清题目，沪案交涉为一事，而利用机会自便私图者，又为一事，总之题目以内之事，行动不加干涉，题目以外之行动，即属越轨"[282]。

同时，公共租界当局亦采取措施对罢工运动施加压力。7月4日，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以工人罢工电力缺乏，通告各大工厂六日起停给马达电力。7月6日，工部局决定中断租界区域内华商纱厂之电力供应。据称仅中国工厂因电气供应中断，而陡增失业工人四五万人，而自来水断绝之传言更让民众惊慌[283]。

中共在工会运动中曾利用青帮力量，但这种关系到7月底趋于破裂[284]。以"各省旅沪公民会、五卅救国同志会、上海工界自卫团"署名的传单《揭破上海总工会的黑幕》亦被人大量散发，攻击上海总工会与李立三[285]。6月26日，又有2千多名"浦东的失业工人"到总工会要钱，当总工会拒绝发钱时，即开始抢劫附近的商家，殴打总工会职员[286]。这些人似乎不是真正的工人，公共租界警务处与淞沪警察厅均怀疑他们与青帮有关系[287]。27日，继续有四五百人以工人身份去总工会领罢工维持费[288]。9月18日，上海总工会

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289]。

上海领导运动的团体内部亦出现问题。首先是学生联合会发生分裂，上海学生联合会本身因国民党的分化而存在左右两派[290]，运动发起后，他们之间便出现了矛盾与斗争。6月22日，上海法政大学与浸会学院的学生为抗议上海学生联合会“贪污成风”断绝与联合会的关系。据称支持运动的七十五所学校中后来有三十五所退出。到7月初，上海学生联合会裁员30%[291]。恽代英称“五卅运动”发展到后期，学生自身亦存在种种缺陷，直接影响到学生会的力量[292]。邓中夏则指出，学生放假，纷纷回籍，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期结束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便毫无力量表现了”[293]。

7月中旬，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亦出现分裂，部分会员指责邬志豪因为贪污罢工维持费而积累了大量财产。浙江路、云南路、吴淞路等十五路的代表，“鉴于该总联会已不再代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观点”，决定与其脱离关系，并成立一新的总联会——淞沪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294]。

导致运动渐渐进入低潮的更重要原因，在于罢工经费无以为继。在7月初，临时济安会的一些人便希望停发罢工维持费[295]。7月5日，临时济安会因王一亭等人以办事棘手辞职，该会遂停止工作。8日，在总商会的推动下，复由该会与总工会、学生会等团体重新组织，以作为工人救济之总负责机关[296]，然经费问题仍未有妥善解决办法。7月30日，刘贯之在上海总工会的会议上称手头已无救济款，而接下来半个月的救济金尚需要40万元，不知如何筹措[297]。到8月初，工人似乎已开始衡量继续罢工与复工间的利益大小。一些工人已开始放弃总工会的领款甚至退回工会发的钱，自动复工[298]。虽然总工会有重新发动总罢工的企图，但工部局估计已不可能成功

[299]。在28日上海总工会会议上，代理委员谢文近表示救济金已将告罄[300]。尽管在群众会议上，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仍在尽力为工人鼓气，表示有许多新的罢工经费来源[301]。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上海总工会似乎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302]。实际上，此时日本纱厂案的解决与总工会所遇到的罢工经费困难有莫大关系[303]。

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正式提出改变罢工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复工条件，至于全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工商学界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继续奋斗[304]。同时，上海总工会提出九项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律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305]。这九条不但比起“十七条”是大让步，而且比上海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亦要低调得多，但这些条件因种种原因最后亦未能实现[306]。

上海交涉中止后，执政府对苏俄之有意“赤化”亦甚在意。7月2日，与外交部关系甚密的中华工会负责人孙宗昉、朱锡麟等人在给沈瑞麟的信中表示：“中英交涉无论胜利或失败，将来尚有挽救之时，若赤化问题一经传染，祸更烈于洪水猛兽。”[307] 24日，北京政府内政部密令各地“严防共产运动”[308]。8月底后更日趋于妥协。基于其对10月份即将开幕的关税会议的期望与交涉的停顿日久，而民众运动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影响下日益膨胀，8月20日，执政府通电保护工业，取缔煽惑罢工[309]。18日，执政府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同时奉军开始对上海的各激进团体采取措施。9月19日，段祺瑞发布命令，宣布总

工会为非法团体，应予立即解散，并通缉李立三等人[310]。至此，执政府对“民气”的战略运用因目的基本达到而告一段落。

不过在9月5日，上海总商会还在发起“中华爱国募金大会”，以救济仍在罢工之工人，但成效有限。其实，该运动的发起，更真切的原因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及虞洽卿等人为“五卅”一案垫款甚巨又无处得到补偿，而欲藉此得些经济上的弥补[311]。

第四节　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运用及走向

一　五卅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利用

正如丁应求所论：“五卅事件”并非外人在华所引起的第一次华人流血案，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以其抵抗规模为最大，大部分的外国人不了解为何罢工发生于日英纱厂，而不是工作条件更为低劣的华人纱厂[312]。其实一个历史事件及群众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发动者宣称的理由真的非常充分，而主要是看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相关各方面对此是如何反应及利用的。“五卅事件”发生后，中外各方面的反应意义重大，盖它们从各个方面塑造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貌[313]。

（1）苏俄

“五卅事件”一发生，即有人指出此案与苏俄关系密切。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报告中提到，5月31日苏联驻沪领事馆曾召开会议，决定向莫斯科请求指示，并指示利用此事进行宣传，鼓励工人全面罢工[314]。6月10日，英大使馆参赞告诉中国外交部，该馆“已得确实报告，证明俄国驻京大使正从事煽动”，要求中国方面设法制止[315]。英国伦敦《每日新闻》甚至称，英国对华抗议暴动之照会，应直接交递莫斯科，不宜照会北京政府[316]。对运动背后苏俄势力的存在，英人似乎掌握了相当的证据[317]。中国国内亦有类似舆论，如江亢

虎在事发之初，即直称“此事起因与内幕，全由俄共产党人向学界、工界煽动而起”[318]。

苏俄在中国的宣传，无疑是“五卅事件”发生的背景之一，特别是在日本纱厂罢工运动中，其角色异常重要。但是如果认为苏俄在上海刻意直接煽动而发生“五卅事件”，似还缺乏明证[319]。3月21日至4月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只是指出被压迫国家的共产党如果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那么他们是有着“巨大可能性”的。然而正如郭恒钰认为的，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有着决定意义的[320]。“五卅事件”发生后，苏俄针对“五卅运动”拟订策划宣传纲领，在宣传上推波助澜；在军事上则加快对南北亲苏军事势力的援助，以达到改变中国政治现状之目的，则是不争的事实。故鲍罗廷说“我们未曾造成五卅惨案，而五卅惨案乃为我而造成”[321]。

苏联学者认为：“据现有文件判断，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爆发毫无关系，该运动对它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322]但俄共与共产国际在了解已经形成的局面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25日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采纳斯大林“务必推进，不要害怕加剧”的指示，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的形式进行中国革命运动。同时莫斯科建议中共提醒运动的所有参与者，不要采取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行动，又命令所有在华苏联工作人员言行要格外小心谨慎，不要显出苏联参与中国事件的痕迹。指示中建议对“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张作霖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同时要求对执政府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直至把它“驱散”，并且建立“有国民党人参加、依靠冯玉祥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新政府”[323]。

“五卅”罢工的结束，更直接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命令相连。7月底，在接获中共关于运动衰退情形的报告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无论如何要把罢工斗争与召开中国社

会团体全国会议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有在近期即8月初召开全国会议的情况下，才能把罢工拖延到会议召开前结束。”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来自中国的报告及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既然“运动正在走向低潮”，那么“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要提出据以可能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324]。

因此，尽管维经斯基与加拉罕等人认为，在当时“前景可观”的情形下，“想把上海的罢工运动尽可能地拖下去，以期出现进一步扩大和高涨的局面”[325]。但是在接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后，他们即制订了一个将上海与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的行动纲领，要求中共放弃全国性口号，转而采用地方性与经济性口号，为与外国企业主的谈判和缩小罢工规模创造条件。他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保存已经发展起来的上海工会组织，亦即在运动的低潮时期如何组织退却，否则可能会走入一条死胡同[326]。同时鲍罗廷亦在1925年9月22日的广东政治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中止省港罢工运动[327]。

（2）中共

1925年的上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对民众运动的竞争，后者显然已占据优势地位。国民党除马超俊在上海建立的“孙文主义学会”有些活动外，其重心系在广州[328]。但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重视程度并不够。维经斯基在4月22给加拉罕的信中，曾抱怨鲍罗廷最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的通报，对在中国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几乎未曾注意到[329]。然而，“五卅事件”为共产党人提升自己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330]。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就是陈独秀撇开国共党内合作而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小团体发展为在全国有政治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331]。

事件发生后，中共从多方面开始其宣传运动，争取运动的领导

权。筹备中的“国民通信社”及“热血日报”被提前成立[332]。许多学生被派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宣传活动，中共与青年团组织都在酝酿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亦从莫斯科赶来上海参加领导工作[333]。在苏联学习了许多工运经验的何今亮则从海参崴赶到上海，主持上海总工会的工作[334]。

运动一开始，中共强调“五卅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在6月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中，认为这次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的铁血镇压政策。”[335]到了运动后期，如在8月18日的宣言中，中共则直接了当地将运动与中共的领导联系起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宣言还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公开宣告于世人：“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336]

不过，中共中央在南京路事件发生后，对民众运动的突然高涨亦有点感觉意外。张国焘回忆说，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既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唯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但又认为，如果口号提得太激进，对普通民众而言，则可能适得其反。所以直到6月5日，中共才发表告民众书，但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张认为这个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局限性[337]。

（3）国民党

“五卅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反应常被人忽视，然而在一些地方

的群众运动中，其角色实不容忽视，而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利用亦有相当之成果[338]。

如论者所注意到的，国、共两党在上海虽有摩擦，但“对外反帝则目标一致”[339]。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五卅事件”发表宣言，称：“国民党愿助全中国之爱国爱平等自由之民众，对此惨无人道之行为及其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奋斗，伸张主义，恢复国威。”[340] 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议，要求惩罚暴行巡捕，抚恤死伤，表示谢罪，保证此后永无此等至无人道之行为”。并呼吁“凡我党员应一致援助国民，以与英帝国主义相搏”[341]。4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第二次沪案宣言，吁请国民根据公理要求赔偿，惩凶以及取消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未达目的之前，举国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以示我国民主张之坚决[342]。7日，又有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广东省长”的名义代表南方政府发表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并攻击张作霖之“倚赖帝国主义”，亦为“造成此次暴行之原因”[343]。

据当时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邵华之回忆，当时学联的活动亦主要是受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之指导。尽管中共在“暗中操纵”，但“公开号召，都是用国民党名义”[344]。在上海三罢运动进行之初，广州方面似亦派人到沪活动。京师警察厅情报称，蒋介石曾派军官学堂秘书刘翔恕来沪，携有款项，有鼓动学潮之性质[345]。在北京6月10日的雪耻大会上，国民党重要人物李石曾、于右任、顾孟馀、朱家骅等人均担任主席台主席，对民气尽力鼓动[346]。“五卅运动”之形成，与国民党之关系实为深远。

6月4日，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在广州对国民党军发动战事。到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讨平刘、杨之乱”。次日，国民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议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将建国军及党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3日，“沙基事件”发生，国民党发起反

英、法帝国主义之运动[347]。26日，蒋介石在致加伦函中称："在沙面开炮射击事件尚未发生以前，余即曾拟具计划书。刻下与英国人奋斗一节实为必要之举。余于计划书中关于军事建筑所提各节据现在大局观之亟应即日实行……政府方面亦应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将一切军事预备妥协，以便与英国人为武力上之奋斗。"[348] 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9月，国民政府派林森、邹鲁、徐谦、陈友仁等人为北上宣传代表，组织各界代表三十余人赴北方宣传，一路反响甚大[349]。

国民党"右翼"的活动也值得关注。戴季陶在"五卅事件"发生后，便试图将此作为实践其"纯粹三民主义"的机会。7月，戴便发表《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希望能够对"国民革命运动起指导作用"[350]。而林森、邹鲁、谢持、叶楚伧等人在赞同反帝口号的同时，更以此机会加快其党内反共势力之联合[351]。

除共产党与国民党外，"五卅"案发生后，中国青年党等其他党派亦趁机发展组织、公开活动。武汉则有国家主义团体"国铎社"四出活动，公开揭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口号。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湖北团部亦宣告成立，以吸收信奉国家主义学说之青年加入[352]。

（4）国内各军事派系

"五卅事件"爆发后，国内各军事派系要人对此多不能无动于衷，或者通电声援，或者在强调秩序至上的名义下，对趋于激烈之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对当时运动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是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

如前所述，张作霖在5月28日通电入关，宣布检阅京奉沿线奉军，其背后则是为"金佛郎案"，要求改造执政府。张刚抵天津，上海便发生南京路枪杀案，张在事发时曾有电报抗议南京路的枪击，并有1万元捐助给罢工工人[353]。但是如论者所指出的，这是显示他支持

运动的唯一证据。他事后曾对外国顾问表示，在此时他不能置之事外，而把展现民族大义的机会全让给他人[354]。

由于当时苏、沪皆在奉军的势力范围之下，故张作霖对上海的秩序非常关注。接获消息后，张派江苏省长郑谦赴沪“严重交涉”，11日复派其子张学良率东北陆军教导团，以“卫国卫民，和平处世”为名，赶赴上海“帮同郑省长办理”交涉[355]。在上海交涉破裂后，张作霖更调奉军第一旅到淞沪实施戒严。6月29日，晨报有消息称奉军前后增兵，使上海的驻军人数达到2万余人。奉系此举，起初虽有为上海交涉压阵的意味，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藉机加强其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356]。

奉张也在利用“五卅”一事来和列强拉近关系。张作霖曾经派兵保护北京的使馆区，又在上海六国委员中止沪案谈判时，派兵送他们返回北京。奉张派兵上海得到旅沪外人的热烈欢迎[357]。张曾反复向英国表示，冯玉祥正在幕后操纵运动，请求英国支持他[358]。有消息称，张实际上已从香港与上海的外国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贷款。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此举无疑得到了张作霖的命令，且与英人之要求有关[359]。几乎同时，张宗昌在青岛镇压工潮，封闭青沪惨案后援会，枪决《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及工会领袖李慰农[360]。不过，张作霖对苏俄乘机扩展势力亦极感不安，其压抑民众运动与此有相当关系。而民众在反英的同时，渐趋反奉，并且声势愈来愈大，在此情势下，张曾经流露出非常悲观的情绪[361]。

在各派系中，冯玉祥无疑表现最为激烈。“五卅事件”发生后，他即发表对沪案宣言，称：“卫国保民，责无旁贷，……与其忍气吞声受强权之宰割，何若同心戮力，为最后之奋争，……惟有枕戈待命，剑及履及，为政府作后盾，为国民平积愤，肝脑涂地在所不辞。”[362] 冯并且在其军队中多次作反英演讲，并指示部下排演有关“五卅

惨案”的戏剧，向士兵宣传英帝国主义的残暴[363]。运动中，冯曾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在绥远创办了一所军校，并招收了六百至一千余名学生，其中有近三分之一倾向于国民党[364]。在运动高潮时，冯玉祥还没收了英国商人的2．7万头羊[365]。冯的激进态度不但引起国人之瞩目，亦为英人高度关注[366]。“五卅”以后，冯玉祥虽然表达了对外国人强烈的敌意，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谢里登指出的，冯的这种敌意是有选择性的。冯在5月初正面临奉张的威胁，当时张作霖宣布要驱逐国民军，保卫首都[367]。为巩固势力，他正在一面争取苏俄的援助，一面向日本示好[368]。

冯的反英表现既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好感，更重要的是让苏俄方面增强了对他的信任，加快了对冯大规模援助的计划。4月中旬，俄共中央政治局已在考虑向冯提供军火援助的方案[369]。29日，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在冯玉祥、岳维峻及广东三方设军事小组，并准备将大量军火运送到冯手中[370]。6月5日，中国委员会又决定在蒙古境内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371]。“五卅运动”期间，正是苏联答应给冯玉祥的援助大量兑现的时候，而冯玉祥在运动中的一些表示，可能亦受到苏俄指令的影响[372]。

相似地，8月初，吴佩孚在汉口亦趁机向英国提出，如果英国政府不向他援助400万元，那么他将乐意看着中苏联盟的实现，而一个反英政策亦将随之而来[373]。孙传芳的表现，显示出其对群众运动的政治性运用。孙在6月2日致电段祺瑞表示。参加群众爱国运动乃民众应尽之天职[374]。5日，孙又向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捐款1000元，表示支持态度[375]。10月，孙传芳在发动驱奉战争时，更以奉系在沪镇压民众爱国运动为出兵的理由[376]，但孙氏到沪后，也立即对高涨的民众运动采取高压手段[377]。

其他各省军人对运动的态度多类似，都知道既不得罪“民意”，又要极力维持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统治秩序。对他们而言，“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于政治之中”[378]，似已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常识。湖北的

萧耀南一面打电报表示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亦镇压罢工运动以向英国政府示好[379]。湖南的赵恒锡一面严厉镇压群众示威运动，一面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380]。运动之初，张宗昌通电表示声援，并着奉军上海司令部及淞沪警察厅垫款2000元交总商会救济罢工工人[381]；但张氏在青岛对本地日本纱厂罢工工人的镇压则严厉异常。

二　民气可恃：国民外交的巅峰

中国外交在1920年前后开始有重大变化。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向与会列强提出归还租界、撤消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及取消其他外国特权等要求。论者提出："五四"前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以"软弱外交"名之，无论是对无约国人民在华必须遵守中国法令的命令，还是中德平等条约的签订、废止中日军事同盟、反对英日同盟续约等等，均显示中国外交领域出现的新趋向[382]。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便是政府开始在对外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气"，所谓"国民外交"亦勃然兴起。"五卅运动"时期，这种趋向似乎达到一个高峰。

5月10日，临时执政段祺瑞曾为前一天北京学生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一事，下令斥责学生，并责成教育部严申告诫，嗣后学生务应专心向学，勿得旁涉他务[383]。然而，"五卅事件"爆发后，执政府在开始阶段（尤其是上海谈判破裂前）对学生运动却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据说教育部甚至"给予学生乘车免票，四出鼓动"[384]，以致英国政府坚信，执政府与排外运动的煽动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关税及法权问题，是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只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相关会议未能及早举行，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列强的诚意；中国方面有意造成有组织的排外运动，以逼迫列强无条件地放弃在中国的权利与利益；如果中国国内正在蔓延的危及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煽动性运动还在继续，双方的合作便不能尽快实现[385]。

6月16日，段祺瑞在接见英国驻北京公使白慕德时，曾表示列强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时，以前多没有将中国全体民众考虑在内，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公众舆论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忽略的[386]。交涉开始后，北京政府并未提出具体条件，只是“把群众的话承转到敌人”罢了[387]。20日，外交部长沈瑞麟在回答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时称：“十三条件，为上海工商联合会所提，换言之，即上海各界之全体意思，亦即与我国有重大关系之条项，政府当然据理力争，无论如何，非与国民一致坚持到底，非达到目的不止，使团方面，如果秉公承认，政府当有关于主权之办法，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划。”[388]有研究认为，交涉初期，北京政府之外交受到民众运动的影响，甚至“以民意为依归”[389]。汤尔和则称：“头脑最不冷静的，就是政府。自从沪案发生到现在，没有看见他们有一定的步伐，只看见他们顺着群众‘打民话’（不是打官话）。很好的机会，睁眼错过，跟着潮流，漂到那里是那里。”[390]但这种“无步伐”的背后却深藏着“以外交生政治”，策略性运用民众运动的一面。

“五卅事件”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势，多有人强调其“国民外交”的一面。对此，外人无法不面对，但未必有妥实的办法来应付。刘大钧将6月17日上海谈判前的中国外交称为“国民外交的时期”，并指出此种“国民外交”已取得三个胜利：中国国内民气“激昂万分”、“举国一致”，迫使一些重要的英政府官员考虑对华政策及手段的变化；国际上亦出现了同情中国民众，甚至表示声援的舆论浪潮；北京的外交使团与日本政府的态度亦有所缓和[391]。林语堂强调：“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要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办法，及其他外交问题须在国民群众中解决，不在外交官解决。在于唤醒民众作独立的有团结的战争，不是靠外交官的交换公文。”[392]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亦表示：“此次中国各地所起之运动，与从来之暴动，性质迥异。其真因乃在中国一般国民之觉醒，可称为巨大之国民运动。”[393]美国法官约翰逊在“沪案重查”报告中称：“近十年来华人对于公民常识颇有进步，并对于政治原则及个人

权利均有较明了之理解，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大相悬殊。……旅华外人对于该辈自己输入外国并充满中国全土之自由与独立原则未曾重视。”[394] 外人这种反应在此前似乎并不多见。

按照华盛顿会议所签订之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第二条，关税特别会议应于该条约实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指定日期、地点、在中国开会。1925年8月8日，美国预先通告执政府，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将在下个月的5日被该国政府签署，要求中国政府确定一个日期，以便开始关税会议的谈判[395]。18日，北京政府即照会各国，请其派员参加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396]。26日，英代使告中方，奉其政府令赞同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关税会议。意、荷、比各使亦向外交总长口头表示赞成。30日，日使亦表赞成。于是关税会议的召开终于将演成事实。8月21日，公使团告中国外交部，拟先议上海会审公廨与工部局加入华董两项。9月17日，公使团决定再次召开上海谈判，就“十三条”分为两部分解决：对与司法无关者，先行开议；至于具有司法性质之各项内容，则俟调查完成后再协商解决。

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是中国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而迈向独立自主的重要里程碑[397]。虽然北京临时政府并未能因外交上的局部胜利而稳固其政权，反而因“五卅事件”而招致了北方军阀的大混战[398]，执政府亦因此而宣告结束。但是“五卅事件”带来的外交遗产并未因此而消失。10月26日，关税会议举行。11月19日，与会各国公开宣布，承认中国自1929年1月1日起可以享受关税自主[399]。1926年8月31日，江苏省代表与驻沪领事团签订《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基本收回了久为国人诟病的租界会审公廨的主权。1926年1月，召开法权调查委员会。藉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开始露出端倪”[400]。

“五卅事件”后，中外条约体制开始发生变化。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无疑标志着条约口岸时代纪元结束的开始”[401]。列强突然发现，

它们正处于守势，而不是处于攻势[402]。英国由于“五卅事件”的刺激而被迫考虑修改其对华政策[403]。8月底，上海英国商会及英国中国会社支部会员联席会议，议决赞助实行华盛顿会议议决案，工部局加入华董和中国收回会审公廨案等，并主张向中国表示友善，获得英国政府之默许。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等呼吁逐渐放弃对上海的控制权[404]。1926年12月，英国政府公布《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十六条，向中国示好[405]。

“五卅运动”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国人而言，无疑亦是精神上与心理上的一次重要胜利[406]。此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得益于“五卅运动”及其交涉的力量不少[407]。继之兴起的所谓“革命外交”亦能因此而大行其道，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功，与“五卅”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策略实有某种贯通性[408]。

三　革命与“反赤”：群众运动的影响

“五卅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无疑带来了许多历史后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409]。当然，不同的人物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江亢虎在“五卅事件”发后曾对段祺瑞说，“天下将从此益多事矣”[410]。胡愈之则敏锐地指出，“五卅事件”是“近年政治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和中华民族命运最有关联的事件”。5月30日这一天，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开始的日期[411]。在上海英国总领事巴尔敦的眼里，“五卅事件”发生时，公共租界是“文明”对抗“野蛮”的一个前哨站[412]。但比较起来，“五卅事件”最为重要的一面则在于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国民革命及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自20年代中期广泛流行。但正如张国焘所指出的：“五卅运动”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到了实际行动的边缘[413]。唐心石（译音）在运动一开始，即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信》上撰文，将其视为“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信号”[414]。1925年6月17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19期上发

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国民革命》一文，指出："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415] 1926年，苏联中山劳动大学副校长米夫曾著有《上海事件的教训》，强调"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开端[416]。潘公展认为"五卅事件"最能代表近世中国民族运动的伟大精神，是"近世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开端"，亦是中国民族运动与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潮流结合的发端[417]。

据郑超麟回忆，当时共产国际即有人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418]。瑞典学者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曾在他的书中引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表述此种意思："就如欧洲史上的巴士底监狱事件般，1925年5月30日是远东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尤氏认为："五卅运动开启1925至1927年的狂飙阶段"，"使中国革命由原本无序的不满情绪发泄，转变为有目标、有组织的行动"[419]。

"五卅运动"中，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精神评价尤高，认为："在此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占领导地位，且开东方各国革命史中一种空前的发展之动力"，并预言：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中国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指挥者和领导者"[420]。维经斯基当时即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几天里进入了这个广大国家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一个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向帝国主义发动新决战的阶段[421]。共产国际主席季维也诺夫认为，这个事件使得中国工人认识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血腥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现在，中国工人成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事件会对东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其他殖民地国际和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国际产生巨大的革命作用"[422]。斯大林亦因此认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423]。

"五卅运动"使共产国际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国际对年青的中

国共产党的信任“大大”增加了，共产国际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在有利的条件下将成为“整个中国伟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424]。即使在8月底运动进入低潮后，共产国际亦没有降低它的积极评价，并不认为运动已经失败[425]。1926年2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季维也诺夫高度评价了中共所取得的胜利：“我们到一九二五年才第一次发现中国有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可以说这是始料所不及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进攻力量正在加强，一个震撼整个中国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成熟”；“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思想对于中国事态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426]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对“中国问题”不仅表示了很大的关注，而且还作出了《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其原因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5年取得了巨大的、出乎共产国际意料的胜利[427]。

正如苏联学者所分析的，中国1925年的事件加剧了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之后[428]。而这种改变对20年代的中国来说，实具关键性影响。因为，“国民革命”亦不再仅仅是党人的口号，而真正具有颠覆既有政权及武装势力的能量了。“五卅”后，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称：“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以生存，本党已与绝交，嗣后唯有根据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全功。”[429]国民党与北京政府间已无联合的可能，而与其他“军阀”联合亦不再出现。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在苏联的援助下，苏俄大量军援与经援的输入壮大了国民党的实力，而能不再依赖与“军阀”的联盟。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实际就是五卅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430]。

对中共而言，“五卅”后的时局，极有利于其发展。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当时“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膨胀，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431]也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中共“四大”之后，中共在组织上

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一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九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432]。如张国焘所说，在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共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33]。

革命运动取得的胜利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地位[434]。但是，与中共的壮大相伴而来的更直接问题，则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趋于尖锐化与公开化。“五卅运动”爆发前夕，共产国际远东部已认为“国民党看来在走向正式分裂”[435]。上海二月日本纱厂罢工时，国民党“右派”便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等名义散发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436]。“五卅运动”发动之后，国民党内防范和遏止中共的倾向更趋明显。1925年7月底，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强调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应该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437]。他对“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上的余地”之现象深表不满[438]。戴氏的言论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弹，陈独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企图加强自己力量，以便控制无产阶级，转向反动的标志[439]。

“五卅”运动后中共的迅速发展亦伏下国民党清党之机[440]。居正曾称：“我党本主张为号召，以主义为依归，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从未有以清党闻。有之自民国十四年冬始。”[441]他所指是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一名委员公开其反共态度，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决议案。虽然“西山会议派”的行动在当时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谴责，但实际上是1927年国民党大规模“清共”、“分共”的先声。

在社会上，由于苏俄势力渗入中国政治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尤其是以实力援助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势力，在一些人眼里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五卅运动”后期，在“联俄”舆论盛行的同时，“反赤”亦成为知识界保守一派中的一股潮流[(442)]。1925年10月，陈启修便称当时“各新闻上反俄反共产的宣传，多于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者数倍”[(443)]。“反赤”论者如章太炎，发表通电主张讨伐“与俄通款”的冯玉祥，提出“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444)]。

此后，“反赤”不但是在知识界流动的某种思潮，而且成为军阀们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口号。由于“五卅运动”中冯玉祥等人倚苏俄力量而壮大，故反冯者便以讨赤名义与其作战。孙传芳、张作霖等人亦大揭反赤旗帜。虽然后来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推进，一些反对赤化的军阀势力纷纷崩塌，但是北伐还未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则公开其反共政策，放弃“联俄”方针，其实与“反赤”潮流合二为一了。

---

(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8页。

(2) 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之报告，1924年5-6月份工农部主要工作是为工人党员开设特别班，教授政治经济常识、劳动常识、工会组织法、合作浅说等课程，以及平民学校之教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一般类，439．2/1；参见俞昌时：《五卅运动与恽代英同志》，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1985年编者印行，第135页。

(3)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4)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192

页。

(5)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罢工委员会之组织参见《杨之华同志关于上海大学师生参加二月罢工的片断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64页；《五卅运动中的中共上海地（区）委》，《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96页；又参见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2页；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56页。有消息称该举得到苏俄方面3000元之救济金，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上海纱厂罢工之内幕》，《顺天时报》1925年2月22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部分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6) 《共青团上海地委关于小纱渡杨树清日商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经过情形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20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3辑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187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8) 其中内外棉工厂罢工宣言中所提者，共有七条：以后不准打人；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以后两星期发工钱一次，不得迁延期；以前所有储蓄金，扫数发还工友，储蓄赏算为工钱，按期发给；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04-318页。

(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02-303页。

(10) 关于工人以暴力“打厂”促使罢工实现，可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3页；《五卅运动》第1辑第3页，第2辑第2-3页、10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3页。当时在内外棉工厂做工的工人陈良元也于回忆中称“摇班（即罢工）的时候，东洋人进来就用筒管打，不过不能让日本人看见，工人都是躲在车弄内砸他们。”《陈良元同志回忆之工厂史记录》，

1959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11) 《五卅运动》第2辑，第510页。

(12) 据外交部上海特派员陈世光报告，2月15日的丰田纱厂骚乱中，日人有八人受伤。实际上当时受伤者七人，其中重伤三人，一名叫原田的日人则因伤势过重，不久死亡。执政府对此非常注意，唯恐日方藉机提出要求，但当时日外务省似无表示。（《收上海陈特派员（世光）电》，1925年2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第410、41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五卅运动》第2辑，第550-551页）。关于此事，亦可参考《时事新报》与《字林西报》的报道，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10-312页。1925年8月6日工部局公报上关于五卅事件的警务报告亦对此事有详细记载，认为这次是日纱厂工潮冲突中“第一次流血”。（《五卅运动》第3辑第34页）该案在上海日商及日本国内均引起了重大反响，可参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54页、357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辑，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1925年版，第25—26、73-74页。

(13) 如《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25年2月18日社论《布尔什维主义在纱厂》称：“罢工的整个过程证明，罢工是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制造出来的，而且，虽然可能并没有俄国的直接影响在起作用，但是根据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含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肯定是有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25年2月27日社论《纱厂罢工的教训》称：“在一天之内，不下于二万七千名的纱厂工人参加罢工的景象，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侵入中国，那是决不会在实际政治领域里出现的。”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1925年2月12日社论《纱厂罢工的重要意义》称：“工人是煽动经分子煽动起来的，这些煽动分子一部分据了解是从广州来的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国人，一部分是那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温床-所谓上海大学-的学生。”（《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79-386页）据外人观察，五卅前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待遇，其实比华商纱厂工人的待遇要好。而像童工问题，日商纱厂主多主张坚决取缔，华商则多持反对态度。参见Rigby，Richard W．*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0），pp．9-10；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p．13-14．

(14) 《收日本使馆节略》，《收部长会晤日本太田参赞问答》，1925年2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0-411页。

(15)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41-343页。

(16)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公布〈上海纱厂罢工之内幕〉》，《顺天时报》1925年2月22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8册，第87页。

(17)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44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51-352页。

(1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9页。

(19) 《发上海交涉员（陈世光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2页。

(20)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0-32页。

(2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页。

(22)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26页。

(23) 即：一、工人一律照常优待，如有虐待情形，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二、工人能回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三、储蓄奖金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而被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还；四、工资每两星期发一次。另有不列入条件之要求“被捕工人均可释放”则由总商会设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5-416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29页）

(2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6页。

(25) 当时直接领导罢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事后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汇报中则表示：“罢工是一种无组织的造反，由于这次工人没有取得胜利，他们还不很信任工会。”是故，加入中共的罢工工人亦仅五十余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592页）邓中夏也表示二月罢工的最后解决条件对工人来说是“完全失败”。（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62页）

(26) 《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197-199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35-36页。

(27) 《五卅运动》第2辑，第55、57-58、61页。

(28) 《五卅运动》第2辑，第59页。刘华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沪西工友俱乐部委员会宣传委员及教员，实际上担任俱乐部日常负责工作，其对外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90页。

(29) 《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201页。出席广州劳动大会的上海工运领袖主要是邓中夏、刘贯之、孙良惠、陶静轩、张佐臣等人。

(30) 《五卅运动》第2辑，第73页。

(31) 据工部局警务日报记载，5月8日上午有三名日本人遭到工人袭击，而同时刘华亦在沪西俱乐部报告有几名工人遭到日本人殴打。（《五卅运动》第2辑第71页）

(32) 《五卅运动》第1辑，第12页。

(33) 《五卅运动》第2辑，第64-71页。

(34)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17-118页。

(35)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21-122页。

(36) 《五卅运动》第2辑第511页。据说这七人可能是工会代表。参见《内外纱厂工潮酿成血案》，《申报》1925年5月16日。

(37) 事发后，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急电北京："十五日晚，租界内日商纱厂工匠与日人冲突，被枪伤工人一名，刀棍伤六名，内重伤三名，已送医院，光派员赴院查明，并知照警厅对于华界各日厂特别注意，以免风潮扩张，谨先电陈。"（《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9页；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513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60页）

(38) 据称，时年二十岁的顾正红是江苏阜宁人，1921年入内外棉七厂夜间部做工，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在二月纱厂罢工风潮中曾参加工人纠察队，是"把口子"、"打厂子"行动的骨干成员，并在工潮结束后加入了中共。（《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第109-1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说顾正红之中共党员身份是其死后追认的。参见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39) 《五卅运动》第1辑，第13页。

(40) 《纱厂工潮昨讯》，《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陈企萌：《"会审公堂"上的斗争》，《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45页。

(41)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42)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页。

(43)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

196-198页。

(44) 《五卅运动》第1辑，第16页。

(45) 《五卅运动》第1辑，第13页。

(46) 5月19日，在中共中央的33号通告中，规定“此项演讲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页，民校即指国民党）同日，中共上海地委宣传联合会议决议，应“运动国民党应努力宣传，指导作种种援助运动”；“运动国民党宣传队及各团体露天演讲”。（《五卅运动》第1辑，第14-15页）

(47) 杨之华也在5月20日的工人集会上向工人宣布，学生不久将为工人进行宣传和募捐。（《五卅运动》第2辑，第83页）为维持罢工工人的生计，5月19日开始，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始向工人分发罢工维持费领取证，但是换取现金的时间似乎要到一周以后。（《五卅运动》第2辑，第80、84页）28日，刘华承诺“沪西工会已搞到足够款项，将于六月五日向罢工工人发还”。（《五卅运动》第2辑，第94页）

(48)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32页。

(49) 《追悼顾正红纪》，《申报》1925年5月25日。

(50) 《国民党对沪日纱厂工潮表示》，《民国日报》1925年5月28日。

(51) 《五卅运动》第2辑，第83-84、86页。

(52) 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85页。

(53) 《五卅运动》第2辑，第76、78、80页。

(54) 恽代英：《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页。这个时间与当时中共对商界的估计有关。

(55) 《五卅运动》第2辑，第93页；萧楚女：《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第56-57页，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33页。

(56)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6页。

(5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9页。

(58)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7-523页。

(59)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24-525页。

(60)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

199-200页。据李立三1935年的回忆，30日的反帝示威是由蔡和森提出的，蔡并主张同时反对四提案与支援沪西工人罢工。（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0页）但是据参加会议的黄旭初回忆，陈独秀认为上海党团员不足二百人，宣传应与反对四提案结合起来，才能广泛发动各阶层参加。（联文：《访五卅前夕一次重要会议的参加者》，《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7页。）

(61) 《五卅运动》第2辑，第89、91页。

(62) 胡愈之：《五卅事件记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6页；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6年版。

(63) 如报上的下列报道：《内外棉纱厂风潮扩大》，《民国日报》1925年5月17日；《内外棉纱厂风潮扩大（二）》，《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追悼顾正红大会》，《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内外纱厂工潮酿成血案》，《申报》1925年5月16日；《内外纱厂工潮之昨讯》，《申报》1925年5月17日；《内外纱厂工潮三志》，《申报》1925年5月18日；《工人顾正红伤毙之检验》，《申报》1925年5月19日；《追悼顾正红纪》，《申报》1925年5月25日。

(64) 如《民国日报》的下列报道：《各团体反对华界卖土》（5月20日），《反对中之华界卖土》（5月21日），《各界反对华界卖土》（5月22日），《各界反对卖土渐弛缓》（5月24日），《反对中之华界卖烟》（5有26日），《又有军人公然劫土》（5月27日），且有连续数天为本埠消息之头条新闻。

(65) 联文：《访五卅前夕一次重要会议的参加者》，《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8页。

(66) 自江浙战争结束后，1925年1月，北京政府宣布裁撤淞沪护军使一职；将上海兵工厂改成商业工厂，由总商会接管；上海永远不得驻兵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0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当时背景亦可参考冯筱才《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67) Hung-Ting Ku，Urban mass movement：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on Shanghai，*Modern Asian studies*，Vol．13，No．2，1979．p．211．

(68)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3页。

(69) 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第138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00页。当时上海民众称当时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为“新衙门”。

(70) 《各团体抗议工部局三案》，《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各团体力争工部局三要案》，《申报》1925年5月30日；《商总联会致交涉署函》，《申报》1925年5月30日。又见上海31个商业团体反对四提案之广告。（《申报》1925年6月2日）日人分析总商会其实亦在利用学生会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1页）

(71) 《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631-632页、653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07页。当时在《向导》工作的郑超麟在其回忆中便称：“这次惨案发生得很巧，恰好触发了积聚下来的火药。并非惨案能爆发革命，比此次更惨的案，历史上还多呢，但并未爆发革命，革命能借1925年5月30日的上海屠杀而爆发，一者因为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对租界当局赌气，资产阶级成了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一般著述均写成是抗议“四提案”，但查阅当时史料，笔者发现“取缔童工案”多不在抗议的范围之内，因为该案吻合人道主义原则，不好加以反对，虽然工部局是将“四提案”一并提交纳税外人会审查。

(72) 《发山东督办、胶澳督办公署电》，《收山东张督办电》，《收胶澳温督办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9-430页；《特约路透电》，《申报》1925年5月30日。

(7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65-1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7页。

(74) 中国劳工福利社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378页，引自丁应求《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92页。

(75) 以上海大学为例，中共支部的人数为120人，占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但是国民党支部人数在300人以上，占四分之三弱。（《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1925年10月，《五卅运动》第1辑第96页）

(76) 《上海大学史料》，第136页。

(77) 《昨日学生演讲之大风潮》，《申报》1925年5月31日。

(78) 《费信惇的证词》，1925年10月25日，《五卅运动》第3辑，第58-59页。恽代英亦称“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恽代英：《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页；另参见《郑超麟回忆录》，第102页）

(79) 分发传单与旗帜似有专人负责。（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86页）当时参加指挥的上海大学学生黄旭初称：“指挥部设在望志路（兴业路）永吉里三十四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由恽代英、侯绍裘负责指挥。高尔柏则坐镇在环龙路上海执行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有三十个学生用自行车担任交通，传达命令与传递消息。”（《上海大学史料》，第139页）

(80) 对此，李立三曾有具体回忆：“五卅指挥部（秘密的）设在二马路一个旅馆里。三十日工部局一抓人，我们就号召跟上去，一下子把老闸捕房围起来了，要求释放被捕者，巡捕房用自来水枪也冲不散，就开枪，这样就造成了五卅惨案。”《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

(81)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41，174；《南京路发生惨案后之昨日形势》，《申报》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第2辑，第98页。据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先后死11人。死难者姓名职业如下：陈虞钦（南洋附中学生）、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唐良生（电话局接线生）、王纪福（裁缝）、姚顺庆（漆工，一作“姚福庆”）、谈金福（食品店伙计）、陈兆富（厨役）、邬金华（新世界员工）、石松盛（电器行商人）。（国际问题研究会编：《五卅事件》，第21页，国际问题研究会1927年版；《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720-721页）又据《申报》事后披露，5月30日因枪击而致死者尚有陈兴发（包车行车匠）与徐落逢（洋货业商人）等二人。《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721页。

(82)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0页。

(8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0-111、118-119、122-123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24-344页。

(84) 《内外时评——临时政府的延长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7号，第1页；颂皋：《奉张入关与北京政局》，《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第3页；《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2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6页。

(85) 陈电云：本日下午二时余，南洋、法政、同济、复旦、上海等大学学生因工人受伤、学生被捕两事，在公共租界散布传单，被捕四十余名，人数愈聚愈多，捕房开枪击毙五名，伤八名（据续电登毙命者四名，又赴医院查明受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十七名，已死三名）。（《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6页。）

(8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1页。蔡廷幹当时是财政部税务处督办，曾宗鉴则是外交部次长，两人均被认为是亲英派。*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I，Vol．29（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175；*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p．86．

(87) 《临时执政令》，《政府公报》第3299号，第1页。

(88)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段曾对翟使说："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9页）

(89) 《公共租界罢市之第二日》，《申报》1925年6月3日；《临时执政令》，《政府公报》第3299号，第2页。

(90) 《刘秘书（锡昌）赴义馆会晤义翟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4页；《总长会晤法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5页；《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91)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92)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93) 《朱兆莘为沪案与安格联辩论电》，1925年7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94) 《朱兆莘关于英外相谈论中国现状电》，1925年7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1页。

(95) Woodhead，H．G．W．，ed．，*China Year book*，1926-1927（Tientsin：Tientsin Press），p．1001．工部局警务处已有情报来源称北京政府的存在要靠目前的排外运动长期持续下去，运动已形成反对

内讧的强烈舆论，而没有领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向此种情绪挑战。（《五卅运动》第2辑，第362页。

(96) 里格比认为执政府是处在学生、冯玉祥、张作霖以及列强等势力之间调停的位置上。（*The May 30 movement*，pp．86-87．）

(97) *The May 30 movement*，p．87．

(98) *The May 30 movement*，p．85．

(99) 《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第15页；*The May 30 movement*，p．85．

(100) *The May 30 movement*，pp．150-151．

(101) 《政府公报》，第3294号第1-2页。许在此前似乎已担任该职务较久时间。（*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39．）

(102)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第17-18页，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5．由于31日是星期日，各国驻京公使馆休息，故第一次照会上虽书“六月一日”，但送出该照会已是第二天。（《五卅事件》第51页）

(103) 《五卅外交史》，第19页；《五卅事件》，第51页。

(104)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7页。

(105) 《总长会晤英白代使问答》，1925年6月8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54页。

(106) “十七条”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及十三项正式条件，内容如下：先决条件四项：一、立即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13项，主要内容如下：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高级巡捕；八、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其各条之下多有细目说明。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20-22页。

(107) 《新闻报》1925年6月8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

279-280页；《收上海交涉员（沅）电》，6月12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0页。

(108)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6页。

(109)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5年6月10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4页。

(110) 《总长会晤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12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3页。

(111) 该照会指出："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之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五卅外交史》，第23-24页。

(112) 所谓不完整即指中方照会中"仅言英捕击伤若干华人，并未提及日本人为华人掷于沟中，及新世界枪伤美商团之事。"《刘秘书（锡昌）赴义馆会晤义翟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4页。

(113) 该调查委员团由法国驻华公使馆参议祁毕业（S．Trebier）、英国头等参赞魏礼克（G．G．M．Vereecur）、美国头等参赞顾尔霖（E．Grewy Graene）、日本头等参赞重光葵、比利时二等参赞于兰斯（J．Ullens de Schootun）、意大利参赞斯嘉图（G．Seaduto Mendola）组成，以祁毕业为主席委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236页；《五卅外交史》第21页，《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75-76页。

(114) 《发上海曾次长（宗鉴）函》，《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3页。

(115) 《发上海许交涉员（沅）电》（一）、（二）、（三），1925年6月13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5页-476页。

(116)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一开始中方准备由特派交涉员与上海领事团商办解决此案，而工部局亦在6月5日向上海总商会提议各派代表协议善后办法。蔡廷幹、虞洽卿等人曾拟定初步交涉条件为：惩办开枪巡捕、工部局道歉、 抚恤死伤者、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等，与工部局交涉，要求工部局先道

歉并开除开枪西捕，即开市上工，再商议其他问题。但是工部局主张以先开市上工为谈判之前提。结果双方辩论后无果而散。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五卅痛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五卅外交史》，第26页。

(117) 《执政接见义翟使问答》，《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0页；《发上海许特派员（沅）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1页。

(118) 对执政府来说，最开始派蔡廷幹、曾宗鉴二人到沪，其使命限于慰问和调查。后来忽然令其在上海就地交涉，据胡愈之分析可能出于奉方的主张。（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19页）此处提醒我们要注意奉张与段政府间差别，而不能将政府决策完全视为执政府自主制订的产物。然据笔者对外交部来往文电的分析发现，政府态度改变，主要还是与使团之决策变化有关。参见《发上海许特派员（沅）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1页。

(119) 虞洽卿以总商会会长职务关系，后来未就交涉代表。《五卅外交史》，第28页。

(120) 《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57页。

(121)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

(122) 《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4-265页；《京师警察厅关于交涉中断外委返京密报》，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63页。

(123)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I，Vol．29（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p．131-132．

(124) *The May 30 movement*，p．89．

(125) 《顺天时报》1925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6页。

(126) “治标者，系就沪案而言，似即执政钧令内指明之交涉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办法十三条是也。治本者，系就修正条约而言，可以息嗣后一切

纷纭之变，似即钧令内指明之善后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修正条约是也。”《颜王蔡何故为变相之辞职？》，《晨报》1925年7月3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79页。

(127)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2页。

(128) 如《五卅外交史》第34-35页；《五卅事件》第34-35页；方椒伯：《回忆“五卅”罢市》，《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92页。

(129) 丁应求：前引文，第136-138页。丁在此指出谈判失败的原因有三点：上海特派员的步调与外交部不一致；外人坚持华官应负维持治安之责；上海中外人民对交涉员所施加的压力。英国官方认为上海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抗拒民众的压力，而将一些与公共租界地位有关及其他额外的条件放在谈判桌上。（*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7．）实际如丁应求指出，六国委员团亦受到上海外人舆论的包围，而感受到重重压力，其态度的突然变化与此关系甚大。

(130) 《曾宗鉴致沈瑞麟电》，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5-266页。

(131) 参见上海总商会五卅委员会1925年6月12日第三次会议记录。《五卅运动》，第3辑，第439页。

(1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37-438页。从某种角度来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甚至比中共更加激进，工商学联合会亦未必完全受中共的指挥。《革命文献》第18辑，第3289-3292页。如瞿秋白在6月8日第5期《热血日报》上发表《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对该会提出的要求条件表示不能满意；12日他又发表《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133) 《收上海许交涉员（沅）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0页。

(134)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4页。

(135) 《晨报》1925年7月1日，引自《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74-75页。

(136) 《收黄增生函》，1925年月14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2页。

(137)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p．142-143．

(138) 九国公约第二条曾有规定：不得彼此单独或联合任何一国或多

国，订立条约协议、谅解，足以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实业机会均等）。但是中国先与日本协议解决日本工厂罢工问题。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92页。

(139) 丁应求认为“币原外交”所宣称的主要内容是：中日共存共荣、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合理的立场；对中国国民之努力，以同情、忍耐与希望的态度观望之，中国若要求友好协助，则尽量提供之；根据机会均等主义，图谋日中的经济提携。丁应求：前引文，第64-65页。

(140) 《五卅痛史》，第89页。

(141) 丁应求：前引文，第142-143页。

(142)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5年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5-437页。当时的外交总长沈瑞麟是留法出身，似乎与法使间关系更加密切。

(143) 《五卅痛史》第89页。

(144)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9，39．

(145)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p．39-40．

(146)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

(147) 《五卅外交史》，第38-39页。

(148)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6．

(149) 《黄秘书宗法接见英馆台参赞谈话记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5页。

(150) 该照会称：“此次上海各校学生因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实施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既非越轨举动，且未携带武器，乃捕房总巡Everson氏遽行发令开枪，伤毙华人多名，至再至三，贵国在公共租界既处特别地位，而首先发令开枪又为捕房总巡，此案现定在上海就地商议办法，相应照请贵代理公使查照，电饬在沪贵国官吏，对于华官所提各条务以公允态度容纳，俾得早日商结，是所至盼。”《发英白代使照会》，1925年6月13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8页。

(151) 关于汉口事件及沙基事件，参见本章第三节。

(152)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61-662页。

(153) 事发之初，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提出缩小范围的主张。如6月3日，江亢虎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宣言，反对全体罢市罢工罢课，而主张“对外人尤其英人所设立之学校公司银行工厂，一律停止交通”。（《本埠各团体之函电》，《申报》1925年6月4日）6月8日，邵飘萍在《京报》提出“与英国单独交涉”。（《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54页）北京大学校方似乎并不赞成学生发起反日运动。（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5．）戴季陶亦公布其单独对英的主张，呼吁“大家要彻底认识英帝国主义是中国一百年来的国仇，抗英是中国的国是，才是承继中华民国创造者意思的真正爱国者，也才不是暴虎冯河的盲汉。”他希望日本人民“回东方来”。（戴季陶：《中国独立运动的基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版，第2-3页、6-7页、插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21页）冯玉祥则是单独对英提倡最力者。6月28日，冯玉祥的代表在总商会会议上要求与会者把仇恨集中于英国人身上。（《五卅运动》第2辑，第253页；《冯玉祥主张专抵制英国》，《顺天时报》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7页）冯此种主张，可能既与其当时对日联盟的政策有关，亦与正在向其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的苏联的态度有关。据韦慕庭的观点，苏联当时恐英日联合以对付其本国以及中国革命，所以最好的策略便是分化帝国主义阵营，孤立英国而暂时放过日本。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54-155，290；Martin C．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45-47；参见刘珍编著：《国耻史纲》，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200页。）

(154) 《发江苏省长（郑谦）电》，1925年7月7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07页。

(155)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第10页。

(156) 《总长会晤芳泽公使问答纪略》，1925年6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42页。

(157) 《发日本芳泽公使照会》，1925年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9-440页。

(158) 《虞洽卿在6月7日上海总商会临时会董会议上的发言》，《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078页。亦可见虞氏给日本上海总领事的信。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 ，1925-1931，p．16．）

(159) 《总长会晤太田参赞问答之附件》，《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7页。

(160) 中村隆英：《五·三〇事件と在华纺》，《近代中国研究》第6辑，引自丁应求：前引文，第179 页。6月20日，内外棉纱厂将一万元请日驻沪领事转交中方交涉员许沅。丁文中称抚恤费是“美金一万元”，似有误。确数应是中国大洋一万元。参见《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7、556-557、560、562页。

(161) 《日纱厂案将先解决之倾向》，《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30页；《上海事件筹备续开谈判》，《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

(162) 《收江苏省长（郑谦）代电》，1925年8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59页。

(163) 《五卅外交史》第87-96页；丁应求：前引文，第180-181页。条件共包括正式条件6条，附议3条，全文如下：一、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二、罢工期内之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良善工人因长期失职所受困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三、各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四、工资向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付以大洋，赏金登记工摺者亦付大洋；五、工厂日人平日入厂当然不带武器；六、工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并留意优待工人。（附则：各厂自有电机者，一律先行开工，其余复工须在工部局送电开始以后。）又正式条件外三项：一、内外棉纱厂抚恤伤亡洋一万元，由日本总领事署送交江苏交涉公署收转，交由上海总商会支配给发；二、内外棉纱厂职员元木等二人由该厂自行撤换，将办理情形禀由矢田总领事转函许特派交涉员备查；三、罢工期内各厂应给工人补助金，其总数约洋十万元左右，至如何分配发给，手续另商。（《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61-562页）

(164) 一谔：《含羞忍辱之中国外交》，《国闻周报》第2卷，第30期。

(165)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5页。

(166)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

年），第4764页。

(167) 《五卅外交史》，第55-56页。

(168) 司法调查团由日、美、英三国选派法官组成，日本为须贺喜三郎、英国为戈兰（Henry Gollan）、美国为约翰逊（E．Finley Johnson）。此前租界工部局总巡麦高文已应日美两国的要求先行辞职。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21．

(169)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97-606页；《五卅外交史》，第69-70页；《五卅事件》，第66-68页。

(170) 《五卅外交史》，第70-71页。

(171) 《五卅事件》，第70页。

(172) 1928年底，上海总商会又致电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等人，重提五卅惨案交涉，要求政府与有关系各国从速交涉，达十三条要求全部履行之目的；并有“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等团体呈文呼吁；国民政府外交部覆函承认此案“已为中英间悬案之一，本部对于该案正在积极整理，以备严重交涉”。但当时仅留于空文，而发起者的目的也似在向政府申请抚恤款项，最后财政部为此特拨款5万元。（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0620．01/1044．01-01，“五卅惨案”，第2、5、7、12-13页；《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代表胡长生等代电》，1929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204页）1930年2月，工部局将抚恤金增加一倍，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认为“前总商会所提五卅惨案十三条要求，大部已履行，如收回会审公廨，增设华董等，英人态度，似已改善。现为表示合作，该项恤金，当予受领”。由此观之，该案似乎最后经由民间途径不了了之。（《五卅惨案代价以十五万元了事》，《大公报》1930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02页）

(173) 陈叔谅称：“五卅运动系指全中国民族援助五卅事件（包括各处惨杀事件）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决不是一部分人的一时的反抗行为。”陈叔谅编：《五卅事件》，国际问题研究会1927年版，第4页。

(17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4-25页；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第16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75) 《五卅运动》第2辑，第99页。

(176) 俞昌时：《五卅运动与恽代英同志》，《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38页。

(177)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年9月，第170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8页。不过当时国民党之工会运动者，似乎正在倾其全力于港粤大罢工之发动及支持，中共在上海方面则趁势占据主动地位。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08页。

(178) 《五卅运动》第2辑，第120页。

(179)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29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98、112页。

(180) 《五卅运动史料》第2册，第112-115页；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册，中国劳工运动编纂委员会编印，第344页。转引自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3年6月，第376页。

(181) 《郑超麟回忆录》，第103页。上海总工会是5月2日由中共影响下的24个行业工会开始筹备的，在向地方当局呈请立案文中宣称已于18日成立。参见《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225页。不过，按照李立三1960年的回忆，上海总工会是在5月24日左右成立的。（《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在5月1日-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的《上海问题决议案》对成立“上海工会之总联合机关”曾予以特别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182)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5页。

(183)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55-364页。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06页；《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61-65页。

(184)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70页。

(185) 《五卅运动》第1辑，第21页。

(186)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6-117页；《五卅事件》，第30页。

(187) 《五卅运动》第2辑，第98-99页。

(188) 刘珍编著：《国耻史纲》，第200页。

(189)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5页。

(190) 《南京路惨案开始交涉》，《申报》1925年6月17日。

(191)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8页。

(192) 阮渊澄：《五卅惨案》，大成出版社1948年版，第16页。

(193) 《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声明脱离宣言》，《申报》1925年6月4日。

(194) 《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95) 八路包括：津浦京奉线、长江线、杭甬线、闽广线、沪宁线、沪杭甬线、京汉线，另一路似是西北线。或者将南洋线包括在内。《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57、166-169页。

(196) 《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97) 关于31日晚总商会集会人数，说法不一，此据6月1日公共租界《警务日报》，《五卅运动》第2辑，第101-105页；又参考《执政府秘书厅为上海巡捕枪杀学生情形致内务部函》，6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20页；《南京路发生惨案后之昨日形势》，《申报》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33页。

(198)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46-747页。

(199) 方椒伯：《回忆五卅惨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9-20页。

(200) 各马路商联会用总商会名义发布传单号召罢市。《五卅运动》第2辑，第105、107页。

(201) 《五卅运动》第2辑，第105页。

(202) Nicholas R.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n, New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

(203)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3, 192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5, Volume 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0), pp. 648-649；又《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753

页。

(204)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03-204页。

(205)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00页。

(206)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26页。

(207)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3页。小商店此种营业方式似乎持续到6月26日开市。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225页。

(208) 《五卅运动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97-201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47、150、158、166页。

(209)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其研究中强调帮会在“五卅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她指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裴氏因此认为“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16-117页，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李立三等中共干部依靠青帮发展上海工运之记载，可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页；《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8页。亦可参见《顺天时报》8月14日新闻：“上海三日路透电云，据报告称，以犯罪人阶级为主所组成之两处秘密结社，已与华界之罢工煽惑者提携合作，华工方面凡著名之罢工首领，悉皆加入，据闻其目的系在胁吓华商之贩卖洋货者，与洋人之雇佣华人者。”（《上海秘密机关》，《顺天时报》192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291页）当时的公共租界警务处对此亦似有情报。警务处的报告称：“‘青帮’、‘红帮’这两个秘密组织现已与闸北工人煽动分子沆瀣一气，并向臭名昭著的工人领袖李立三效忠。现有理由担心，这两帮人的意图是，向经营英、日货店铺、商行以及为这两国侨民工人而挣大钱的华人进行绑架勒索。众所周知，‘青红帮’大部分会员是犯罪分子。”《五卅运动》第2辑，第369页。

(210) “铁血团”曾经向各洋行买办寄恐吓信，并在虞洽卿寓所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五卅运动》第2辑，第146、148页）

(211) 《五卅运动》第2辑，第173页。

(212) 《五卅运动史料》第2册，第112-115页。

(213) 不过，5月30日下午，上海华界地方当道对罢市将发生之传言表示担忧，曾致函总商会及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请劝导商界。《张寿镛等致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函》，《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77页。

(214) 《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3页。

(215) 《爱国募金团成立大会纪》，《时报》1925年10月11日；《国庆日爱国募金大会成立纪》，《申报》1925年10月11日。

(216) 《讨论爱国募金之大会》，《申报》1925年9月28日。

(217) *China Year Book*，1926-1927，p．1005．

(218) 《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875页。

(21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68页。

(220) 刘少奇于1925年9月10日在英国工厂代表会议上曾承认，“罢工就得有救济费，无救济费就难实现罢工，就是很明了的”。（参见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人民出版社1967年印本，第71页）当时纱厂老工人也回忆道：“不是党的领导，罢工是罢不起来的。工人都穷得厉害，一天不做工就是一小荒，两天不做工就是一大荒。党、刘华向各方面去募捐。我们那时罢工期间，开始每月发六元，后来发三元，最后钱没有了，把中国厂里的黑布白布发给我们。”《周高升在退休老工人座谈会上的发言》，1960年2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1) 《访刘龙标有关五卅运动》，1960年2月21日，王光荣整理；《卞小妹在退休老工人座谈会上的发言》；《上海国棉二厂部分退休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0日；《正红里老工人座谈会》，1960年3月2日，王克礼回忆；《访问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2日；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又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174-175、184-186、189页。

(222) 纠察每天可拿到16个铜板（1角钱可换30个铜板）。（《访问杨阿巧同志记录》）一说1角钱可以换11个铜板。（《徐书林谈五卅前后情况》，1960年2月15日）工会代表每天可领到120个铜板。（《正红里老工人座谈会》，1960年3月2日，万阿珍回忆）

(223) 《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1日，《大革命时期情况》

（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4) 《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9日，陈翠珍发言。

(225) 《访问杨阿巧同志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6) 《徐书林谈五卅前后情况》，1960年2月1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7)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1编劳动状况，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43页。

(2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54页。

(229) 李立三曾说："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147页。

(230)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231) 《虞和德来电》，1925年8月10日，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63页。

(232) *The May 30 movement*，p．145．

(23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53页。

(234) 《五卅运动》第2辑，第195页。

(23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2页。6月20日，南洋公司送6万元到总工会，盖后者正因当天无法发放维持费而将发放日期推迟一天。《五卅运动》第2辑，第222、225-226页。

(23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60-261页。

(237) 《五卅运动》，第264、268-269页。但此案由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反对似乎并未能实现。《五卅运动》第2辑，第326-327、362页。

(238) *The North China Herald*，Aug．1，p．135．

(239)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58．

(240)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58页。

(241) 《五卅运动》第2辑，第306页。

(242) 《五卅运动》第2辑，第361页。

(243) 《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1页。

(244) 《英国使馆关于交通部电政司所属人员募款接济上海罢工工人事致外交部照会》，1925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8页。

(24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46页。不过从4月到10月，苏联向中国冯玉祥及国民党等势力提供武器的经费是460万卢布。

(24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2页。关于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的汇款，亦参见北京《晨报》6月12日及6月14日电。（《五卅痛史》，第121页）

(24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35页。沪西工友俱乐部6月22日曾在向9000名工人发放罢工维持费（每人1元）时，同时分发标题为“俄国工人对中国同事们的慰问”的传单，似乎证明该款与全俄工会有关。（《五卅运动》第2辑，第232页）

(24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8页。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曾在6月5日对五卅事件有声援性质的宣言发表。参见《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201-202页。

(249) 《五卅痛史》，第121页。不过，在7月16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感谢俄商会捐款时，数额只有62944．6元。《五卅运动》，第318页。

(250) *The May 30 movement*，p．77．《五卅运动》第2辑，第198、253页。冯玉祥前后送过2万元，但同时他得到苏俄大量的军费援助。（《五卅运动》第2辑，第367、383页）

(251)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58页。

(252)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45-151页。

(253)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304-305页。

(254) 《五卅事件》，第39-40页。

(255)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1页。

(256)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劳动运动，第448页。

(25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8页。

(258) 禤倩红：《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58页。

(259) 《五卅运动》第1辑，第25-29页。

(260) 江浙一带的支部直属于上海地委（后改为区委）的指挥，如杭州、嘉兴、宁波、温州、南京、苏州等地。《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地委改组为区委及中央指派区委委员的通告》，1925年8月22日，《五卅运动》第1辑，第55页。

(261)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29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697-698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03页；《外交部为汉口惨案向英公使单独提出之抗议》，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54-655页。

(262) 禤倩红：《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58页。

(263) 1925年5月19日，本来参加广东政府之刘震寰桂军及杨希闵滇军乘党军东征之机，在广州对政府发动军事进攻，并占领电报局与火车站等要地。战事一直继续到6月12日，回师的东征部队方将刘杨部队击溃。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2页。

(26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5-257页。

(265)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6页。

(266) 《省港大罢工资料》，第133-135页。

(267) 据《五卅外交史》一书，当时调查统计死亡者有44人，受伤者51人，具体名单见该书第44-45页。一说死52人，重伤170余人。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8-259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16页。

(268) 《五卅惨史》，第41-42页。

(269) 《五卅事件》，第27-29页。

(270)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9-20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42页。

(2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6页。

(272) 《五卅惨史》，第15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241．

(273) 方椒伯1964年曾在回忆中表示“当时我是竭诚希望罢市成功的，因为如果罢市不成，首先暴露出商界不能团结一致，贻笑外人，对交涉前景不利，这是中国商人对外交涉的第一炮，不能不打响”。方椒伯：《回忆五卅惨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20页。

(274) 当时，马寅初即认为上海不宜继续罢市，他表示“虽然罢市可暂而不可久，况上海为全国金融之中心，商业之枢纽，一旦罢市，不啻全国罢市，影响于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至深且大。马寅初：《上海不宜继续罢市》，《晨报》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58页。

(27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1页。

(27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0页。因为25日即是端午节，按惯例商家须于此前结清账务。

(277)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5页。学生联合会与沪西工会曾向商家寄恐吓信，反对21日开市，据称天津路某钱庄便收到47封恐吓信。《五卅运动》第2辑，第241页。

(278)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9-230页。该委员会似有国民党右翼支持之背景，且与广东商人以及南洋公司有关。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189-190、197、204、209-210、254页。

(279)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5页。李立三及林钧等人均出席该次会议，他们的让步似是在得到上海总商会每天给总工会拨款3万元救济罢工工人的承诺后。《五卅运动》第2辑，第244页。

(280)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8页。

(28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5页。

(282) 《驻沪奉军镇压罢工团》，《顺天时报》1925年7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06页。

(283) 松涛：《五卅事件的北京交涉》，《东方杂志》第22卷第14号，第1页。

(284) 《五卅运动》第2辑，第335-336页。

(285) 《五卅运动》第2辑，第350-353页；沈移元：《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我党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28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48-249页。

(287) 《五卅运动》第2辑，第248、第250页。

(288) 《五卅运动》第2辑，第251页。

(289) 《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布告》，《申报》1925年9月19日。

(290)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32-233页。

(29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3-234、283-284页。

(292) 恽代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指出："一般学生会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帐，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页。

(29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33页。

(294) 《五卅运动》第2辑，第313-314页。

(29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83页。6月份已发40万元。

(296)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426-428页。

(297) 《五卅运动》第2辑，第362页。当时商会向会董强制捐款未能兑现，而招商局与南洋公司每月5万元的捐款，亦只收到一个月，故是次会议有准备向华界房客强制收取半数房租的计划。

(298) 《五卅运动》第2辑，第381页。

(299) 《五卅运动》第2辑，第380、385页。虽然英日商公司的码头、货栈的罢工在8月10日实现，然而在两天后，由于罢工维持费的发放可能出现阻滞，上千名码头工人开始冲击上海总工会与总商会，并在南市等地区抢劫商店。（《五卅运动》第2辑，第397-400页；《上海罢工团之激烈行动》，《顺天时报》192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93页）8月15日，临时济安会发表《告码头工人》，表示已无钱可发。

(300) 《五卅运动》第2辑，第438页。

(301) 如李立三在7月31日的上海各工会代表会议上称，工商学联合会驻北京代表已建议政府开办彩票，每月可得百万元；另外将江南制造局房屋抵押中国银行，可得300万元。而且俄国的劳工领袖已到沪，表示将尽力援助罢工工人；英国工党亦将给予其协助，等等。《五卅运动》第2辑，第364-365页、391页。

(30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45页。

(303) 《收江苏交涉员（许沅）代电》，1925年8月11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57页。

(304) 《向导》第125期。

(305) 《总工会最近之宣言》，《民国日报》1925年8月12日。

(306) 英国海员罢工由于广东当局控制了海员工会，亦由于虞洽卿个人能从罢工中获得利益而继续支持，得以维持更久的时间。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30．

(307) 《收上海朱锡麟等函》，1925年7月11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21页。孙、朱等人曾试图调解顾正红案，但最后失败。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299页。

(308)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第259页。

(309)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54页。

(310) 《五卅运动》第2辑，第481-482页。

(311) 《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122-123页。

(312) 丁应求：前引文，第135页。刘少奇曾说“华商纱厂对于我们工人差不多比帝国主义者还要厉害”，参见刘少奇《在上海召集各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5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第69页。

(313) 执政府对五卅事件的运用及在运动中的角色，前节及下节均有述及，本节主要讨论其他势力对运动的利用及效果。

(314) 《五卅运动》第2辑，第109-110页。

(315) 《黄秘书宗法接见英馆台参赞谈话记录》，《中日关系史料——

排日问题》，第466页。

(316) 《五卅痛史》，第104页。

(317) 《收驻英朱代办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7页。

(318) 《江亢虎污蔑五卅爱国运动函》，1925年6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319) 曾有传言称30日学生包围老闸巡捕房是28日由在上海的苏联顾问安排的计划，该计划是冯玉祥与莫斯科及国民党为打击张作霖与北京政府，激起外国干涉，以使北京转为“三头统治”的整个大谋略的一部分。（*The May 30 movement*，p．76．）

(320) ［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李逵六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5页。

(32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1页。

(32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50页。

(323) 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67号、68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32-637页。

(32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3页。

(32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5页。

(32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6-647、653页；M．C．贾比才：《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79页。据说，李立三等人在运动发展绝望的情形下，曾欲鼓动工人发动武装起义，而被维经斯基等人制止。（《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79页）

(327)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政治类，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摄影，京师警察厅编

译会1927年版，第18页。

(328) 丁应求：前引文，第81页。

(32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辑，第607页。

(330)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13页。

(331) 姚金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32) 《郑超麟回忆录》，第105页。

(333) 叶人龙：《浦东CY组织在斗争中成长》，《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43页。

(334) 《郑超麟回忆录》，第106页。

(335)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1页。

(336)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1925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445-446页。

(33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40页。

(338) 在当时一些地方的国民党党部中，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控制。所以一些活动虽是挂“国民党”招牌，但实际却是共产党在起主导作用。不过，我们仍需注意所谓“国民党右翼”的表现。

(339)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第383页。

(34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0页。

(34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79页。

(34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5页。

(343) 《广州革命政府宣言》，《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88页。

(344)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第383页。

(345)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15页。

(346)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宣传》，第28-29页。

(347) 《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359页。

(348)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7-8页。有趣的是，据租界之《警务日报》，在此前一天，李立三在沪西工会对工人发表演讲时，告诉大家“广州的学生军和工人军已在沙面同外国人开仗，后者败北投降，并同意和广州当局进行谈判。广州军政府已将上述情况电告沪西工会，并说他们将于一周内派工人军和学生军前来上海支援此间工人。”《五卅运动》第2辑，第243-244页。

(34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宣传》，第41页；邹鲁：《回顾录》，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170-175页。林森等人北上亦有廖仲恺被刺案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及鲍罗廷驱除“右派”策略之背景。然却促成国民党反共派的加速联合及西山会议的举行。参见邹鲁《回顾录》，第169-172、176-179页。

(350) 罗苏文：《“五卅”期间的戴季陶主义》，《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1期第37页。

(351) 邹鲁《回顾录》，第171页。

(352)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增订本，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版，第188页。

(35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98页。

(354) *The May 30 movement*，p．78．

(355)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第160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87页；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2页。

(356) 《上海开市与奉军调沪》，《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5页。

(357) *The May 30 movement*，p．79．

(358) *The May 30 movement*，p．79．

(359)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63．

(360) 参见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青岛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青岛惨案史料》，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50页。

(361)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4页。

(362) 《五卅惨史》，第70-71页。

(363)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p. 172-173.

(364)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p. 168. 不过这所学校因学生思想激进，几个月后便被关闭。

(365)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 157.

(366) 《收驻英朱代办（兆莘）电》，1925年6月11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9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 p. 177. 英国舆论认为中国"现政府在冯势力范围下，而冯与学界联合，且与俄过激党通"。《收驻英朱代办（莘）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3页。

(367)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 179.

(368) 冯在1925年7月，表示欢迎日本人来帮助他开发西北。并表示要派10000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学习。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p. 154-155, 290.

(36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02-604页。

(37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23-627页。

(3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0-631页。

(372) 如9月24日，联共政治局便授权加拉罕（Karakhan, Lev Mikhailovich）采取措施，让冯玉祥公开表示支持上海工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82页〕当时在开封的岳维峻也有通电主张"收回英国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惩办肇事外人，以绝祸根。"为又一较激烈者。不过，岳的国民军第二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正接受苏俄之军火及军费援助，在其军中且有苏联顾问小组，可见其态度实际上仍是反映苏俄的观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24页。

(373) *The May 30 movement*, p. 82.

(374) 《五卅惨史》，第65页。

(375)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922-923页。

(376) 《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时事日志，1925年10月11日。

(377) 《五卅运动史料》，第723-724页。

(378) 关于此点，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379) *The May 30 movement*，p．82．

(380) *The May 30 movement*， pp．83-84．赵曾通电对“在沪学生再遭惨劫”表示悲愤。《五卅惨史》，第66页。

(381) 《五卅惨史》，第68页。

(382) 参见丁应求：前引文，第31-32页。

(383)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17页。

(384) 《朱兆莘关于英外相谈论中国现状电》，1925年7月23日，《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1页。

(385)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94，240．1925年7月7日，Mr．Chilton 在给 Mr．Grew 的信中，便直接表达了英国政府的意见，即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将排外运动平息下去，否则关税会议等均无从谈起。*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6．

(386)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240．

(387) 梁启超：《答北京大学教职员——谁说沪案单是一个法律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42，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1页。

(388) 《外陆两长对学界之表示》，《顺天时报》1925年6月2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13页。

(38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2页。

(390) 汤尔和：《不善导的忠告》，《晨报》1925年 6月27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5页。

(391) 刘大钧：《经济战争和武力战争的比较》，《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8页。

(392) 林语堂：《丁在君的高调》，1924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34页。

(393) 《日田中总裁之中国运动观》，《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3页。

(394) 《收美日英三国委员调查沪案报告》，《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98、601页。

(395) *The May 30 movement*，p．94．

(396)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81-682页；《颜惠庆自传》，第143页。

(397) 丁应求：前引书，第188页。

(39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51页。

(399) 丁应求：前引文，第144页。

(400)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94-195页。

(401) *N．R．Clifford*，op．cit．，p．71．

(402)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p．1．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7页。

(403)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p．33-34．

(404)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5页。

(405)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3页。

(406) *The May 30 movement*，pp．168-170．

(407) 《五卅事件》，第87页。

(408) 按周鲠生的提法，革命外交的特点首先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即不必太考虑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以及条约的束缚，其次便是利用民众势力。周认为近世外交已由宫廷外交，政府外交，进于国民外交，而不是全靠外交家折冲工夫。拿民众运动做对外的武器。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6页。

(409) 李健民将五卅后反英运动对政治的影响归结为：一、协助广东统一；二、引起军阀大混战；三、赞助国民革命成功；四、伏下国民党清党之机。（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1-181页）

(410) 《江亢虎污蔑五卅爱国运动函》，1925年6月3日，《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10页。

(411) 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1-2页。

(412)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6．

(4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5页。

(414)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4页。

(415) 《瞿秋白年谱长编》，第169页。

(416)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86-87、91-92页。

(417) 国际问题研究会编：《五卅事件》“序”。

(418) 《郑超麟回忆录》，第165页。

(419) 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页。“狂飙”一说在华冈的《中国大革命史》及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著作中均有采用。

(420)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第50、55、106、107、108、110、139、138、274、278页。

(421)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4页。

(422)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5页。

(423)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5-116页。

(424) 语出季维也诺夫，此观点亦见唐心石：《中国工人是中国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国际新闻通讯》第124期，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6-117页

(425)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7-118页。

(426)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55页。

(427)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56页。

(4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545页。

(429)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20页。

(430) 阮渊澄：《五卅惨案》，第28页。

(431)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6页。

(432)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页。

(434)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9页。

(43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48页。

(436) 《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3页。

(43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编，季陶办事处1925年印本，第3-4页。

(438)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编，第50-51页。

(439)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册，1985年版。

(440)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0页。

(44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清党实录》，江南晚报社1928年版，第1页。

(442)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4页。

(443) 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137页。

(444)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90-291页。

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条约体系与中外关系

要理解北伐前几年的中外关系格局，首先要对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一最体现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特征的背景有所认识。过去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区的是特定的“反帝”活动）。然而，不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取向还是区域研究领域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1)]，都提示着应当更注意被侵略区域的当地因素。同时，任何侵略至少是两个或更多落实在特定地域上的文化、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在重视这些体系所在空间因素的基础上，还要从时间视角去认识其多元互动的过程本身。另外，至少在中国，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传统强项在经济层面，而文化层面相对薄弱[(2)]。下文主要立足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及的中国当地条件，更多从文化视角考察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进程，大致形成一个中外关系的认识框架，并据此简析1921年-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中外格局的变与不变，以为后面的叙述略作铺垫。

一　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近代西潮东侵，中国士大夫多以为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迄今仍常被引用的名言当然不甚符合史实，却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即不少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入侵的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3)]。用今日的话说，这个“天

下”就是中国文化；西方入侵者的目的主要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全面控制中国[(4)]。

从根本上言，帝国主义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最关键的实质问题是对被侵略地区的全面控制。只要能达到实际的控制，是否直接掠夺领土是次要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侵略，但具体的侵略方式则千差万别。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有效抵制[(5)]，再加上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这些因素迫使列强逐渐认识到全面的领土掠夺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其退而采取一种不那么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的间接控制[(6)]，同时寄希望于文化渗透[(7)]，以为长久的经济利益铺路。

近代中外条约基本是武力威胁的结果，故所谓“间接控制”并未改变其帝国主义性质。而条约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条文上，首先就体现在其主要反映战胜者的意志这一基本精神上。早期的帝国主义研究较多侧重实施侵略的一方，但恐怕更多是被侵略所在地的现实条件，而未必是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制约甚或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特性。如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所说：“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8)]

从入侵者视角看，在中国实施“间接控制”是依据实际情形最可行也是效益最高的取径。在被侵略方面，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若返回当时人的认知，我们今日注重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近代传入的西方观念对晚清中国人似不十分要紧，他们更看重的恐怕是基本的纲常礼教和政治体制这一“国体”仍依其旧[(9)]。这个重要因素的意义是多重的：

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要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一

般是以贬低、打压甚至清洗等方式破除本土文化。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西方更需要不仅在物质上，恐怕更多是在文化上表现其优越性，以建立起文化权势。同样，西方既然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直接地破除中国的本土文化，只能采取间接的渗透方式来获取文化控制。故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西人对此是有备而来，且有着特别针对中国纲常礼教的持续努力[(10)]。

另一方面，恰因上述因素的影响，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抵制通常较殖民地人为轻。国体的持续和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和文化清洗，中国士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故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都远比殖民地人要主动得多[(11)]。更由于中国士人未能认识到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轻视了文化竞争的严重性，有些人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日渐主动地破除自身的传统，实际成为西方打压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不自觉。

再者，正是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这一点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到，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义和团这一民间异端力量来对抗外国势力，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12)]。当孙中山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帮助。詹森（Marius B．Jansen）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13)]。

若从文化视角看条约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简言之，即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

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这才是最深层的也是最根本的不平等之处。早年中外谈判中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14]。此后的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然而，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战争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多半需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

对清廷而言，每次条约修订，基本是外国利益的增强和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失，故其甚少主动提出修约。不过，费正清认为，这主要反映出所有的中外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朝野皆不断提出修约以回收主权。这表明中国人已逐渐接受西方思维，注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远胜于往昔的“国体”；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承认条约这一形式的重要性，也试图以西方外交的常规方式来进行修改[16]。

但条约体系确立的中外交往方式即使以西方常规价值观念看也不平等，故中国在谈判桌上的成功极其有限。到中国战场上已在使用飞机的北伐之时，北方首次以废除的方式终结中国与比利时的条约，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更以武力为基础收回部分租界。或许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

从更深层次言，条约缔结方式和维护方式的不平等确立了西方在东亚外交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章太炎就注意到，西方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17]。只有在坚持欧洲文化优越观的基础上，才可以对“劣等”民族实施不同的准则而不觉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18]。如柯亭（Philip D．Curtin）所指出的，对非西方地区采取例外法则

（exceptionalism）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差不多所有分支的共相”[19]。

类似的心态和行为在中国租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或可说已形成一种“租界行为”或“租界意识”。自己游历过欧西又久居上海这一租界集中地的王韬深有感触地说：“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颐指气使之慨，殊令人不可向迩。”[20]

这样的“租界行为”表现出的“租界意识”，不仅对中国一方有所谓“东方主义”式的偏见[21]，其对西方基本价值观念也未必全面体认，实际已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人虽是西方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代表，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22]；若以“租界意识”的产生地域看，指导这些西方代表行为的准则甚至可以说是“非西方”的[23]。

王韬尝解读“租界行为”说：“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24] 这的确是近代在华外国人一条共享的“常识”，类似“武力是中国人唯一能理解的术语”这样的表述不断重复出现。据米勒（Stuart C. Miller）的研究，许多传教士不仅赞同这一观念，且他们自己在此观念的形成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25]。主张学西方的郑观应承认传教士到中国意在“传教济人”，但以“救世之婆心”而造成大量教案，更常借条约和炮舰之“势力”以压官民，则“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也未必合于“上帝之心”[26]。

传教士之所以能不顾基督教反暴力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认同于炮舰政策，部分因为传教的最终目的正是精神征服，更主要还是其有西方文化优越观的支持，故能公开支持使用武力而不觉于心不安。传教士在意识层面未必都认同帝国主义，不少人来华传教确出于善意，但当中国士人对此好意反应冷淡甚而抵制时，传教士的文化优越感使其

不能接受这样的态度。有传教士以为，中国人视西方为夷狄的作法是公开违背了“爱你的邻居如你本人”这条戒律，西方有义务“说服”中国人走到更加“符合其权力和义务”的方向上来。如果说服不生效，就必须强制[27]。似乎中国人“犯规”在先，西方人也就可以不按其自身“规矩”对待中国人[28]。

一旦基督教爱邻如己的准则成为动武的基础，传教士也就走到其教义的对立面了，可知他们有意无意间也分享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外法则。另一方面，在后来不少中外冲突中，传教士和构成租界主要成分的商界又常常有着不同的主张；正因部分西人、特别是其文化先锋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的方略[29]。这当然只是一种日后的理想型诠释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整体“西方”事先就预定有这样清楚的谋略。不同国家不同的人可能根据不同的时势采取不同的对策。很多时候，强制和说服只是偶然地互补，而非事前预谋。

实际上，在华列强之间也有相当激烈的竞争，既为经济利益，也为势力范围，以及含义宽泛的文化“影响”。正是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潜伏着列强间分裂的隐忧。盖欧洲列强才真正分享着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不但日本常被排斥在外，就连俄国甚至美国有时也带有不够正统的意味。当自由主义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告诉胡适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时，胡适感觉到这对其自身信仰有些不够“忠恕”[30]。实行于英国的制度可能真不适合于俄中两国，但罗素的主张仍隐约可见“例外法则”这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子[31]。

几年后，进步主义思想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将“东

方”视为英、法、俄、美四个“西方帝国”纵横捭阖的场域[32]。 这位著名的帝国主义批判者将社会主义的苏联纳入批判对象，却未包括正挑衅甚或颠覆东方既存格局的日本；他所批判的实际是一个作为侵略者的白种西方，而另一边则是作为受害者的黄种东方。日本在日俄战争击败沙俄之后便希望自己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33]，但东西文化差异及其伴随的歧视一直妨碍日本被西方强国真正接受，这样一种连批判对象都不计入的“不平等”待遇或者出于善意，却触及到也揭示了日本长期对西方的不满之所在。

在处于中国这一文化悠久的异国时，列强或更容易感到上述潜在的文化隐忧；作为共同的外来者（outsiders），它们似较别处更强调团队精神和相互依赖性[34]。这就进一步促成了东亚（时人多遵欧洲习惯称为“远东”）在国际政治中那特殊的“例外”之处：在欧洲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在亚洲却可以联合贷款给中国，这一现象被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35]。 换言之，由于列强和中国这一似乎更明显的“区分”，在欧洲的敌对关系到了亚洲即因此而暂时化解。这还只是出于谋利的主动一面，当条约体系面临中国挑战之时，列强为捍卫这一体系更容易联合在一起。

二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大转变，列强势力因战局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世界地位的机会。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出现，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新俄国虽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倡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故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36]。

国际秩序的新观念由威尔逊和列宁来提出，体现出西方范围内正

统衰落、边缘兴起的态势，即原处边缘的美国和俄国向原居中央的西欧挑战。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范围言，至少在思想上，说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大致是不错的。但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正因为以条约体系为表征的帝国主义体制以非正式的间接控制为主，其帝国主义性质相对更隐蔽；更由于西方在中国推行例外法则，西方通行的处事方式并未全用于中国，在华帝国主义一直有其特异之处，故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结束”并未迅速触及中国。

相反，尽管中国在巴黎和会没什么进一步的具体损失，至少在认知的层面，对中国人来说，和会结果提示的是帝国主义更明显的存在。在中国人心目中，帝国主义不仅未曾“结束”，实有加剧之势。威尔逊和列宁提出的国际秩序新观念对被侵略各国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关键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37]。对中国受众而言，威尔逊正是在这里开始输给列宁。这一转折影响中国思想甚大[38]，与本文相关的直接后果是苏俄的反帝主张特别容易为中国人接受。

为解决巴黎和会关于东亚的遗留问题，1921年-1922年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国际会议。美国长期提倡的门户开放，包括尊重中国的完整，被正式写入《九国公约》，在法律上成为列强认可的原则；《公约》也正式否定了在华“势力范围”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但不追溯既往），在法理上使列强不得增强旧势力范围，也不得谋求新势力范围；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权并可以赎回胶济铁路的所有权，取消了外国邮政电信，关税虽未自主，但可有提升，列强并同意考察中国司法状况以决定是否取消治外法权[39]。

这样的收获在近代中外条约史上可说是前所未有，在一定程度上对积弱的中国有所保护。以中国当时的国情，取得这样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但中国在会上将各条约的不平等处尽行提出修改，却大部分均未实现。这就体现出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列强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因而也就低估了

民国代清以来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

民初的中国局势确实继承了清季混乱多变的特征，其变化的突然和急剧并不比前稍减。而列强间一个传统的看法是中国应先实施内政特别是法律改革，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社会秩序，然后才谈得上考虑条约的修订[40]。华盛顿会议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这样的基本见解，其惟一的新意是要求列强予中国以安宁（即不以威胁方式扩充帝国主义权益），以便其实施内政改革[41]。

然而，正如前文所引“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所揭示的，入侵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秩序紊乱的主要造因之一[42]。更关键的是，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改革必然意味着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当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时，复因其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实行双重标准，列强自身也是按西方标准不那么“正常”的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必然要涉及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此时列强是继续扮演改革推动者的角色？还是转换为既存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当列强要求中国实行内部改革时，其依据的“国际准则”源自常规的“西方”；而外国在华存在本身行为的指导原则，又往往是类似租借意识等非常规的“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非正式方式支撑了东亚国际秩序的“例外”或“特殊”，而隐伏于其间这一观念和利益的既存冲突也造成了列强身份的困窘和错位；后者复使不同国家在特定具体场合可以采取未必一致的政策，预示了列强间合作的难以维持。

在列强方面，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变的东亚国际关系。过去西方的研究对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应该说，20年代以中国为场景的列强国际关系是典型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而合作更多是在防卫和限制的一面，即每逢中

国方面向条约体系挑战时[43]，列强便易合作；实际上，不少次列强的“合作”原本旨在遏制列强之一采取“过分”的行动以扩大某一国的势力[44]。

同时，“华盛顿条约体系”并未充分体认到外国在华势力构成所发生的激变：德国和苏联未曾参与华盛顿会议，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基本独立的中国政策，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45]。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中国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中德两国在1921年5月以新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德国放弃原有的条约权利，而中国则予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使其仍享有他国所具有的利益。没有了治外法权保护，德国人在中国不仅比他国人安全，且成功地恢复了不少在一战期间失去的经济利益，复因放弃条约权利而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为其后来与国民党建立密切关系打下了基础[46]。

战后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意识形态和具体作为都使其对条约体系的挑战更明显也更具冲击性。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苏联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和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此前的中德条约多少是战争的遗产，中苏条约基本是通过平等的谈判所缔结，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一次，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47]。

这样，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苏联向中国派驻大使级驻华代表更凸显出这一象征性变化的实际意义：此前各国所派使节皆为公使级，按照外交惯例，在华使节中层级最高者应为外交使团的当然领袖，这就意味着苏联大使将成为驻华外交使团的代表。结果，所谓“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很难再集体行使其惯性权势[48]，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已不复为一个整体，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奠

定了此后南北两政府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中国与德、苏的新条约意味着已经运作多年的在华“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49]，同时也反映出中外关系可调适的余地甚大。德国人在中国的经历说明外国人无须治外法权的保护而生活得很好，经济上也能获利[50]。凭借其建立的平等新关系，苏联可以在中国公开鼓吹和支持反帝运动[51]，然其通过中苏条约以及此后的奉俄条约实际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具体利益。后者提示出中国方面的修约要求可以是有限的和非常灵活的：中国朝野寻求的是主权，有时甚至可以是象征性的主权，而在具体利益上则可以做出较大的让步[52]。

在一定程度上，既然多数列强（日本除外）渐已放弃直接掠夺中国领土的取向，中国获得至少象征性的主权而列强基本维持其实际利益大致符合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但一向被认为最重实利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似乎迟迟不能认识到中国修约要求的灵活性，恰揭示出中外交涉方面的文化意义有多么深厚。

列强对领土掠夺的放弃使外交谈判的重要性大增，涉及具体利益时，任何列强都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然所谓“有利”，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imaginary advantages），20世纪上半叶中外交涉的大量史实证明，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列强也不轻言放弃。由于许多条约“利益”已是想象多于实际，中外修约谈判中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利益的得失，而更多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文化因素的影响虽深远却不甚明晰，各国外交更直接受到本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在西欧和美国，政治体制比较稳定，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外交有着明显的限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强烈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许多时候外交策略的思考其实是在因应国内的

党派政治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旧政治体制已去而新政治体制尚未充分确立的状况。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动荡程度，动荡的社会反过来又为形成中的政治秩序增添了变数[53]。

在这样的社会里，新思想的产生更少限制，其发展有着更广阔的空间，但不同思想观念的竞争也通常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超常规和非常规的主张和行为很容易出现，而相关职能机构按常规制定决策和推行其策略反不时被忽视甚至颠覆。本来任一大国的内部政治激变都会影响到其所在地区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20年代的东亚，不仅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政治大变动之中，横跨欧亚的苏俄也尚未结束其内部政治秩序的调整，这就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而中国的乱相又特别明显，不仅政治和社会的“革命性”（主要指既存规范的失效）超过日、俄两国，甚至不时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效中央政府。当时中国各军政力量基本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扩充自身势力甚至统一全国，与历代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差别。但是，这一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竞争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背景下进行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这样复杂的局势困扰着中国思想界，杜亚泉在1918年已虑及外国势力可能不容中国平静地改革，他在讨论中国新旧势力之争时说，“武人官僚，倚仗旧势力，以斫伐国家生命，惟恐其勿尽”；同时可能“将有外来之势力，加于吾国之上，以绝吾国之生命；不能更有机会，容待吾国发生新势力，以营代偿作用[54]。今日一般视为“保守”的杜氏在“五四”学生运动前已观察到“武人官僚”、“旧势力”和“外来势力”的关联及相互支持的一面，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年中国思想

界的确趋向激进。

这也说明，一些中国读书人对那时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已有较清晰的认知。陈独秀在未成马克思主义者时已注意到因交通发达而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55] 当时的“全球化”程度与今日相比所差甚远，很可能是外国在华势力深入中国权势结构的现象让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就思考到“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变更与“世界”的关联。

当中共于1922年发出反帝为主旨的“二大”宣言时[56]，胡适撰文回应说，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改变，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故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且“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若国内政局纷乱，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57]。

胡适的主张相当接近华盛顿会议的精神，但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即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他自己稍后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58]，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极深，已全面“介入”到中国权力结构之中。故有人明确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59]

中共方面随即由张国焘发表长文对胡适进行系统反驳，张氏也注意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已由19世纪的武力为主转变为经济侵略为

主，后者“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但他认为经济侵略比武力侵略更危险，因为列强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已造成一种“相互竞争的侵略”。且帝国主义是军阀政治的后台，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若不“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足以改造国内政治”[60]。

不论先反帝还是先实施内政改革，双方的共同点是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方式有所变更，而中国的内政与外国在华存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双方的分歧更有相当的代表性，体现出中国社会或思想界对“外国在华存在”那双重身份的困惑：胡适等人或者更多看到其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一面，而从杜亚泉到中共这些人则明显将其视为中国既存秩序的维护者[61]。

要求中国先改革内政然后考虑条约修订的“华盛顿会议精神”反映出列强仍更多看到中国的乱相，却未能仔细观察和认真考虑与此相伴随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疾速变化[62]，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那御外和内部整合并存的两面性（许多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既要求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愈来愈强烈地希望中国完全掌握自己的主权）[63]。中国政府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必须先给人以“得道”的形象，然后才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并整合离散中的社会秩序。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主权恰是“得道”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渐成必需的步骤[64]。

这样，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虽颇有所获，但已不能满足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那些收获因法国以“金佛郎案”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而名至实未归，使中国方面的外交成就感日益淡薄，对列强的不满却与日俱增[65]。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协调不合作阻碍了华盛顿会议精神的落实，并进一步打击了巴黎和会后已大为削弱的中国“自由主义派”在国内政治上的发言权，此派言论的缺乏说服力当然也就使中外关系方面更为激进的主张得以扩大影响[66]。

北伐前夕中外关系就是处于这样复杂多变的混乱格局之中，在此情形下，列强间的合作既难以维持，任何外国也很难有多么具体的政策，尤其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长远政策。正如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限定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一样，中国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幻莫测的局势，各国只有不断调整其原有的政策原则，故当时主要列强的具体对华政策与中国局势颇相类似，也以多变为特征。

第二节　中苏建交谈判

20世纪20年代，苏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扶植中国革命力量推翻北京政府，建立亲苏政权；但在这个目标未实现以前，同北京政府及地方军阀进行谈判，以恢复中俄之间由地缘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苏俄陆续派出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巴意开斯代表团、越飞代表团赴中国进行接触和谈判。其中越飞代表团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在华活动极为频繁，与中国各界人士密切接触，虽然未能与北京政府就恢复国交达成任何协议，但越飞在华期间与当时中国的军事领袖吴佩孚和政治领袖孙中山保持了密切的书信来往。一方面他极力促成孙吴之间的联合，另一方面他就中俄之间最重大的两个问题，即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同孙、吴交换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越飞是成功的，他基本上说服了孙、吴支持他的立场，并借孙中山之口进一步申明苏俄的谈判立场。

苏俄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大特点：一、由重宣传转向重实利。正如苏俄外交委员会所强调的：“我们当今的政策具有更少的宣传性质，而更加务实。”在对外谈判时特别关注“每一寸苏维埃土地、每一个苏维埃卢布”，决不轻易向其他国家“让一分利”。在1923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其对华政策的这一特征更为明显[(67)]。二、苏俄对华政策往往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自身力量的消长，随时

改换策略，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各种关系之间的矛盾与纠葛，采取灵活多变的手段去达到外交目的。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很激烈，苏俄力图使中、日互相牵制，越飞即肩负着同时与中国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的双重任务。他在与北京谈判进展不大的情况下，转向日本，进行日、俄长春会议，长春会议破裂后，转而又谋求与北京政府谈判。在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军阀分立、南北对峙，苏俄即利用各种复杂关系，造成对苏俄有利的局势。突出表现就是越飞在华时一面联络吴佩孚，一面联络孙中山，寻求他们对于苏俄谈判立场的支持，最终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无望的情形下，与孙中山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68]。

加拉罕作为越飞的继任者，其任务是继续越飞未完成的使命，因此其交涉循着越飞的路线进行。此时中俄复交的时机较为成熟。中国方面已派王正廷督办中俄交涉事宜，加拉罕作为1919年、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签署人，在华有良好口碑。更重要的是，越飞在华所作的大量工作为加拉罕的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1923年秋天加拉罕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了对华谈判。

一　加拉罕来华及中俄初期交涉

1923年6月下旬，驻京苏俄代表团接到越飞奉调回国，代理外交人民委员长加拉罕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的训令[69]。加拉罕时年三十七岁，是苏俄1919年、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的签署人，非常熟悉远东情形，被称为“远东通”。他的名字在中国早就广为人知，舆论普遍认为加拉罕对华抱有好感，故对他的来华寄予厚望[70]。加拉罕一行于8月12日抵达满洲里，13日抵达哈尔滨，18日到奉天，所到之处，“其欢迎盛况，为从来所未有”[71]。

对于中俄间最为关注的中东铁路问题和蒙古问题，加拉罕在各种场合解释了苏俄新立场。早在1923年8月初，加拉罕与驻莫斯科东方通信特派员谈论中东路问题时就表示，由于中国对当初俄国所发出的

第一次、第二次对华宣言没有作出回答，现在国际形势变了，所以俄国不能受宣言的拘束。对于中东铁路问题，俄国应尊重铁路沿线中国的主权，但是铁路的权利应归俄国掌握[72]。8月15日加拉罕在哈尔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对于中东路问题更明确提出“俄权在路，中权在土地”的说法[73]。加拉罕还说：“俄国对于中东路之权利，乃无可疑，中国之优秀分子对此深为明了，且不能予以反对。”对于俄国以往所发表的对华宣言的有效性，加拉罕认为仍持续有效的是宣言的基础与原则，但中东路之重要利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苏俄都不能抛弃，并且中国方面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74]。当有人指责苏俄占据外蒙时，加拉罕说：“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他提出外蒙撤军的条件是：“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75]

加拉罕的这些说法表明了苏俄政府在这两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即不能完全兑现苏俄在1919年、1920年宣言中所作的许诺。其理由：一是苏俄的许诺不能无限期的有效，当初的许诺是以苏俄方面一系列的让步为条件的，但中国不仅没响应苏俄的呼吁——恢复中俄关系，签定条约或协议，而且对当时的照会也未予理会，所以苏俄“不得不极其慎重地，有保留地对待我们的许诺”；二是“中国目前没有巩固的政府，因为中国政府不是中国局势的主人。而且，任何一个与中东铁路有关、保障我们利益的协议，非但不能指望其实现，甚至都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信任”，故苏俄不能放弃中东铁路[76]。

加拉罕此次来华本负有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使命，但在8月15日当俄记者问他各国多不承认北京政府，与之缔约是否有效时，加拉罕回答说他将与之缔约的是中国人民，既然是与人民缔约，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当然应该承认条约的有效性。翌日，加拉罕在哈尔滨各地方团体的招待宴会上重申了此点。加拉罕这种面向人民大众的外交手法，虽然不甚符合国际外交惯例，却相当适应五四运动后“人民外交”呼声高涨的中国政治环境，这样的方式他在以后还有多

次运用[77]。

在与中国各界人士应酬之际，加拉罕与奉天方面就东路地亩、中俄边境各悬案以及外蒙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8月19日张作霖为加拉罕所开的欢迎会上，加拉罕有三项声明：（一）他此次来的任务是进行中俄会议，而东三省与俄国土地接壤，关系密切，希望能互相提携，承认苏俄。（二）切实商议东三省与俄国通商问题。（三）与奉天当局商议中东路问题并请当局承认在东三省管理下主要都市，设置俄国领事馆[78]。加拉罕在此已明确提出以奉天当局为苏联的谈判对象。他虽然在奉天逗留了两周之久，也与奉天当局进行多次秘密磋商，但最终双方未达成谅解。而中俄交涉事宜公署督办王正廷派专人赴奉迎接加拉罕来京，加拉罕遂于9月1日起程赴京[79]。

1923年9月2日加拉罕抵京。9月3日，王正廷与加拉罕会晤，加拉罕表示中俄问题“实有不容延搁之处”。但当王正廷建议“早定日期开议”时，加拉罕表示“一则须略事休息，二则须将种种问题加以研究方可办理”[80]。

9月4日加拉罕对报界发表声明，这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81]。这次宣言与前两次对华宣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宣言除重申1919年、1920年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是苏俄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外，明确声明“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其不放弃的理由是因为这些利益“并不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并且这些利益“很容易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协调一致起来”。

（二）将各国对华政策与苏俄对华政策作了对比，更以临案通牒一事[82]，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情绪。

（三）提出中国政府数年以来“每月有对俄施以非友谊措置之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敌视苏俄的外国列强操纵、施加压力，有时是直接使用暴力的结果，并不真正反映中国民意，从而将人民与政府区

别言之[83]。

同日下午，王正廷在北海养心斋第一次招待加拉罕。席间王正廷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例，希望苏俄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加拉罕立即反驳说，俄国才是首先完全放弃庚子赔款的国家，各国不过追随俄国之后而已。他表示："俄国决不追随美国，更决不签署某一牒文若临城通牒者，俄国决不要求治外法权及强迫订约，或在中国组织司法行政机关。凡损及中国主权之种种利益，俄国皆愿放弃，俄国与中国将建设绝对平等之关系。"[84] 联系加拉罕在同一天所发出的对华宣言可以看出，加拉罕一开始就放弃了诸如庚子赔款、治外法权，以及在中国组织司法机关等权利，苏俄在华利益应得到保留的部分主要集中在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

9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加拉罕，加拉罕告知其此番是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之资格而来，其委任状过几天就会送达外交部，并询问中国现在有没有总统，委任状应呈递何人？顾维钧回答说，送到后再行通知办理的方法[85]。9月9日，加拉罕致顾维钧节略，通告其已于本日就职，并附送国书副本。

9月14日，王正廷与加拉罕第一次正式会晤，双方即出现分歧，加拉罕坚持首先恢复两国国交，而后解决悬案；王正廷则坚持先谈判解决重大悬案，再正式承认苏俄。双方均坚持己见，不肯让步。后来王正廷作了让步，同意只要在会前签订一个解决悬案的原则性协定，两国即可恢复邦交。加拉罕要求王正廷详告具体提议，以便请示政府。9月24日王正廷因病入院，中俄交涉延搁[86]。

加拉罕到京后广泛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酬酢往还了解情况。这中间既有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及黄郛等人，也有众院议长吴景濂，还有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等。此外，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外交同志会、京师总商会、中华西北协会等北京各团体或开会欢迎或设宴招待，一时中俄亲善的空气相当浓厚。大家除了一致表示希望中俄速复

邦交外，各方面还有自己关心的具体问题。冯玉祥谈到自己身负西北边防督办一职时，加拉罕表示中国边境“决不至受俄方之压迫”。吴景濂则表示希望中俄两国携手抗击侵略主义国家，并说中国国家虽然不统一，但是外交上则是一致的，而外交当局也不能不尊重多数民众的意志，加拉罕对此表示赞同。教育界提出将俄国退回庚款充作教育基金。学生们则主要表示应与苏俄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商会代表一致表示中俄之间商务关系极为重要，并质问加拉罕华侨在俄受虐待的情况。加拉罕表示，“环顾中国，愿与俄国了解者，不独北京一隅，全国各派皆具此意”，因此他对中俄问题更具信心[(87)]。

9月10日，国民外交同志会设宴招待加拉罕，国会参议员雷殷专门提出蒙古问题，“中俄两民族希望亲善之心虽切，而终未能成为事实者，则因俄国兵队尚驻扎外蒙古所生之障碍也”。雷殷说帝国主义惯于利用武力作为外交的后盾，中俄之间讲亲善就应排除以武力为后盾的嫌疑。加拉罕则称，俄国政府派兵入蒙，乃出于不得已的自卫之举，其目的一为防卫俄国之安全，二为保障中国之主权。俄国无侵略蒙古之野心，驻外蒙的俄军人数很少，只有三百余人。他进而指出“中俄两国人民亲善之障碍，亦不在外蒙之驻兵，而在中国政府四周之空气也”[(88)]。

在9月18日的各团体招待会上，加拉罕对于中东路问题有详尽的叙述。他指出，白党盘踞中东路对俄国安全造成威胁。最近白党又公然请求外人干预中国收回东路地亩处[(89)]，因此苏俄认为列强对中东路有共管的野心。加拉罕认为，“中东路只应由中俄两国共谋解决，并以为此乃应首先解决之问题”。俄国要将中东路改为商业性质，使其成为沟通中俄文化及增进两国友谊的工具。对于蒙古问题，加拉罕坚持申明俄方驻蒙之目的在于清剿白党，并提出撤兵条件“一俟中国对俄有充足之保证，俄兵即可退出蒙境”。此外，加拉罕认为中俄交涉阻滞的责任并不在俄方，而在于中国外交部追随帝国主义，想以承认问题压服苏俄。苏俄已答应中国提出条件的十分之九，只须将两国

关系签订条约使其具体化，则两国之间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加拉罕表示中俄正式国交恢复固然可喜，然而更为可喜的是中国国民可持此项宣言与列强斗争，从而博得自由与独立。他强调“在此奋斗中，能协助中国者，唯有苏维埃政府”[90]。

与此同时，加拉罕还积极与孙中山联络。9月8日，加拉罕致电孙中山，说明他此次来华是希望实现两国的共同利益，并使之建立在牢固坚实的基础上，期待孙中山能给予帮助[91]。9月16日和17日，孙中山连续发出电报和信函给加拉罕，指责北京政府为“不独完全不能代表民意，且已失去国家政府的外貌之政治团体”，其外交政策“实际上仰列强之鼻息，远甚于根据独立自主的中国之利益”。因此，孙中山建议加拉罕到广州同他的新政府进行谈判[92]。10月6日，加拉罕写信给鲍罗廷，他说孙中山提出的关于在广东进行谈判的建议“为时尚早”，并希望鲍罗廷能寻求孙中山对中东铁路问题的支持。此外他还流露出不信任王正廷的情绪，称王正廷“已开始摇摆并在日前居心不良地试图挑动我召开正式会议”[93]。

10月2日，加拉罕致函上海国会代表，表达其对北京会议的看法：“我既不确知何时开议，也不确知我们能否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结果。”他再次重申俄国公开外交的原则，指出“即使中国有某些当权者迫于外来压力想同中国人民交恶，并准备把类似中国与其他列强签订的那种条约强加于中国人民，那么诸位也可以放心，你们在那个条约上也绝找不到我们的签字，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苏联代表的签字”。加拉罕并再次承诺放弃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94]。同一天外交部颁给王正廷全权证书，指派王正廷为全权谈判代表，与俄代表开议协商所有中俄间一切悬案，其权限为“有以中华民国国家名义商议议决之权”，但其议决事项须由政府批准，“将来议决事项如经本政府准其签字批准，必予施行”[95]。

10月6日，曹锟当选总统，批准李家鏊为驻俄外交代表[96]。在莫斯科，苏联外交委员会对中国政府派李家鏊任驻俄代表表示欢迎，

但指出鉴于两国邦交未成立，苏俄不能以外交代表之资格而只能以正式代表之资格接待李家鏊，并指出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加拉罕呈递国书一事受到阻碍[97]。

10月13日，王正廷向加拉罕提出中方十三点草案。17日加拉罕对之几乎全部驳回。双方分歧最严重的集中在外蒙问题与中东路问题。对于外蒙问题，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间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对于中东路问题，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中方要求苏维埃政府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一并完全归还中国，俄方同意将铁路所有权移交中国，但中国必须出资赎买，关于赎路的具体事项须待将来召开会议商定。在此之前，苏联保留其在铁路上的一切权利，1896年中俄密约和合同继续有效，只是在铁路路区内尊重中国政治上的主权，并同意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铁路行政管理[98]。

11月初，加拉罕以王正廷企图在恢复邦交前解决所有悬案为理由，不接受草案，并拒绝将中国提案报告莫斯科政府[99]。中俄交涉陷入僵局，随即加拉罕公开表示不信任王正廷，声称王正廷所出示的大纲并非中俄会议所依据的真正原则，而真正的条件已从东交民巷传出，所以加拉罕认为王正廷以前的接洽都是“故意派人刺探，非出诚意”[100]。苏俄对华的宣传机关华俄通讯社称：“中俄交涉诚有种种障碍，但若归咎王君，殊属不当，盖障碍之势力，较王君之能力为大也。”[101]《晨报》称：“今日中俄间之障碍，不在东堂子胡同，亦不在退思堂，又不在居仁堂，实在东交民巷。”[102]中共机关报《向导周报》也称，中俄交涉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在于：中国现在未有统一的政府；北京政府的外交受东交民巷太上政府的拘束，不能实行独立的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外交政策[103]。在列强干预中俄交涉一点上，中国舆论与苏俄观点接近。

王正廷则于11月9日赴洛阳与吴佩孚协商，且拟赴日本征求意见[104]。11月21日王正廷致函加拉罕通告他赴日之事，并表示希望加

拉罕能决定正式会议开会日期，以便他回来后，双方可以进行有效的磋商[105]。加拉罕于23日复函，指出中国政府对于苏俄代表递交委任状问题迄今未答复，可由此判定，中国政府认为“中苏复交的时机未到”[106]。由于中俄意见相去太远，加拉罕退回到一开始的立场，即先恢复邦交再开会谈判。

王正廷于11月28日复函，认为以往双方交涉已经就“恢复邦交应与其他悬案大纲一律在会解决”达成一致认识，除了中东铁路问题外，双方其他意见已趋于一致。而中东铁路问题，双方的分歧在于苏俄仅承认中东铁路所有权属于中国，交还及管理该路的条件，应在大纲签订后，再行讨论；而中方则主张中东铁路问题应与其他问题一并解决，不应被排除在外。王正廷认为加拉罕的做法“反使已渐接近者转而趋远，于中俄两国均无所利”[107]。

加拉罕在两天后复函，申明他的观点并强调这也是苏联政府的官方观点。首先，加拉罕声明苏俄坚持在开议前恢复两国关系，是因为“恢复苏中正常关系将是中国真挚友好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对苏政策的最好证明，也将是会议取得成功和圆满结果的最好保证”。其次，加拉罕指出中俄之间的实质性分歧，“不在于我们对某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在于您建议在初步协定中立即解决一切问题，用协定偿还中国对苏联的承认。我要求恢复两国间的正常关系，而不要付任何专门报酬”。再次，加拉罕申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可能说中东铁路的一切权利皆归中国所有。”他声明中东铁路作为商业企业，所有权应归苏联；中东铁路问题，“应在会议上解决，而不能在您建议我签署的那个协定中解决”。最后，加拉罕将1919年、1920年勘正后的宣言附本，送交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公署，正式否认了1919年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文字[108]。

苏俄驻京代表团随即公开对报界声明，路透社所发表关于苏俄1919年、1920年宣言英译本是伪本，应以俄国政府公报所载为准，并全文公布了两次宣言。其实国内报纸所登载的译文与俄文原本译

文，就1920年宣言而言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实质并无差别；而1919宣言国内各报所载均有苏俄抛弃中东铁路一节，华俄社所发稿中并无此节。华俄通讯社略去内容如下："劳农政府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而恰克等贼徒与从前俄国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109)

11月30日，王正廷离京经沈阳赴日，其官方使命是调查旅日学生华侨在日本9月1日震灾中受害情形(110)。至此，中俄交涉完全陷入停顿的局面。

从9月3日至11月30日，王正廷与加拉罕之间共计有八次谈话，双方已达成一致的问题有：（一）俄国放弃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庚子赔款。（二）俄国承诺以平等相互的原则订立通商新约。（三）根据以往宣言，重新勘定疆界。（四）所有在中俄公界之河湖并其他流域及下海处，由中俄船只行用。（五）恢复中俄正式邦交，并将俄国使领馆屋由中国交付苏俄。（六）禁止凡有仇视各该政府之机关或团体在各对方境内存在。（七）彼此不为与两国公共秩序或与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

双方仍存争执的问题主要是：

（一）会议手续问题。中方本坚持将一切悬案均由会内讨论解决，俄方坚持两国先恢复邦交，然后开议。双方折中的办法，是先开会讨论解决悬案大纲所依据的原则，协定签字后，立即召开正式会议，协商细目。双方本来就此点，已达成谅解，但加拉罕在11月底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他反复强调说"我要求恢复两国间正常关系，而不要付任何报酬"。

（二）取消旧约问题。王正廷表示凡系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订立之一切条约、公约、协定、议定书等概行无效，另由双方本平等、相

互、公允之原则及1919与1920年苏俄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加拉罕赞成取消旧约，但有关中俄界务者应除外。

（三）外蒙问题。加拉罕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并将在外蒙所驻俄国军队撤退，但对于王正廷所提议六个月内撤尽，还在犹疑。

（四）赔补及偿还问题。王正廷要求苏俄政府赔偿中国人民因为俄国政变所受的损失，加拉罕对此项要求提出限制条件：仅限于中国人民；限于中俄断绝邦交期内；此项损失须系因违犯苏俄法令而波及者。

（五）中东铁路问题。俄方在1919年宣言中曾允将该路无条件交还中国，现在则坚持由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此路，赎路的条件及手续应在大纲协定签字后，开会讨论。在此之前，苏俄政府保留对该路的一切权利，并且1896年章程继续有效。中方为了谋取双方谅解，已放弃要求俄方无条件交还的主张，答允估价赎回中东路，并且王正廷提议发行国库券，以中东路财产作担保，在中国未赎取国库券前，俄方享有债权者之权利。双方在中东路问题上争执最为激烈[(111)]。

王正廷于12月底归国后，留在上海。到1924年1月9日，王正廷致函加拉罕，指明中国官方所收到1919年宣言与加拉罕11月30日所抄送的宣言前后不符，认为“自应以本国政府所收到者为准”。并对加拉罕执意以中俄恢复邦交为先决条件，“殊不敢赞同”。继而指出俄兵驻扎外蒙，可见苏俄对于中国“尚未完全尽其诚意”，中国人民不能满意苏俄的态度：即急谋恢复邦交而缓图解决悬案[(112)]。

1月17日，加拉罕复函重申了双方的分歧。对于1919年宣言前后文本不一致，他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指责北京政府在苏俄1919年宣言发表后，以武装干涉的方式拒绝了苏俄的建议，而五年后，又坚持以昔日拒绝的宣言作为争取某些权利和要求的根据。此外加拉罕列举

了诸多“事实”，如中国武装干涉苏俄；将庚子赔款付给白匪组织；庇护保皇党和白匪组织控制俄国公使馆、领事馆以及中东路；迫害在东北及铁路地带的苏维埃公民等等，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无权向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无权批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无权谴责苏维埃政府没有诚意。因为“在苏维埃政府的行动上是不可能找到一件仇视中国人民这类事实的”。在他对蒙古问题以一贯的口径作了解释之后，甚至发出武力威胁说：“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113)

二　王正廷与加拉罕再度谈判

1924年2月初英、意相继无条件承认苏俄，世界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苏俄国际地位急速上升。受此影响，中国国内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呼声再度高涨。《晨报》发表社论，呼吁中国无条件承认苏俄，中俄之间的局部问题，如中东路问题、外蒙古问题，“尽可于承认之后，从长磋商。万不可抄袭帝国主义外交之蓝本，以此为卖买”(114)。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等四十七人致函顾维钧、王正廷，要求即行恢复中俄国交(115)。国会参议院议员雷殷，众议院议员胡鄂公等提出议案，主张无条件承认(116)。奉张方面也主张从速承认苏俄(117)。2月27日，青年国民俱乐部、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北京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六团体致函王正廷，促其承认苏俄。熊希龄分别访问顾维钧、王正廷，主张英意承认于前，我国应追加承认于后(118)。

这一时期国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南方广州政府已在苏俄帮助下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舆论要求承认苏俄的空气日益浓厚之时，俄代表团方面传出加拉

罕将南下游历的消息，又有奉张应俄国劳农政府的要求于2月15日在奉天与俄代表开始松花江航权交涉的消息[119]。

2月19日王正廷与加拉罕会晤，双方集中讨论了中东路问题。加拉罕声明苏俄不能放弃中东铁路，其理由是“因敝国之势力在贵国不愿比他国较弱故也”。他表示“关于东路财产不能与贵国平分半数，但管理东路董事会会员中俄各派其半数，惟财产一层未赎回以前全归敝国所有”。此外，加拉罕强调俄国给予中国之利益“无论何国皆办不到”。王正廷反驳加拉罕说：“至东路问题，不但贵代表上次之意见书允中国赎回，甚至于1919年宣言书中并有无条件归还中国之语。退一步言，照中东铁路公司章程满三十六年后准中国赎回，现距三十六年尚有十余年之期，届时想贵国必尊重国信，履行前约。”王正廷并举胶济铁路为例证明中国有能力维持东路秩序。最后加拉罕答应在开会时解决赎回中东路问题。在未开会以前，照该路之现状归中俄合办，将在该路服务之白党人员更换成苏俄政府所派的人员[120]。

2月22日王正廷与加拉罕再度会晤，双方讨论中东铁路未赎回时的管理办法。加拉罕明确提出：（一）由于中东路由俄国出款造成，所以中东铁路局局长由苏俄委派，并且局长归董事会节制，不受督办直接管辖。（二）中东铁路路局现有之章程保持不变，即维持现在中俄两国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状态。（三）苏俄保护它在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不干涉中国主权，至于中国要求归还中东路主权，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苏俄不能实行。王正廷试图为中国争取利益，如要求由督办管辖局长，要求苏俄归还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加拉罕态度十分强硬，对王正廷要求置之不理[121]。

2月25日，在王、加会晤时，王正廷提出了中方解决悬案大纲草案暨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双方主要就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再作讨论。关于中东路局局长问题，加拉罕要求局长归俄政府委派，并且有实权；王正廷则认为局长可由俄方派，副局长要由中方派，督办由中国政府派，俄方派会办，且该路正副局长须受督会办指挥（以前

督办仅有监督权）；关于铁路预算决算问题，加拉罕要求铁路预算决算只能由俄政府批准，王正廷则坚持预决算由理事会通过后，请两国政府备案；关于铁路旧有章程问题，加拉罕坚持东路现有章程不能变更，要将白党改换成苏俄政府人员，其实质是苏俄力图派人取代白党控制现在掌握在白党手中的中东路，而王正廷则始终坚持督办有指挥权；关于东路股票及赎路款问题，加拉罕认为，对于东路实价应改为赎回该路之价，并且赎回时只能用中国本国之款。关于蒙古问题，加拉罕只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退兵及取消俄国与蒙所定之条约，须在开会时再讨论[(122)]。

3月1日，双方再度晤谈时，加拉罕提出了俄方的最后修正案。在解决悬案大纲中，双方就两国恢复使领关系，开正式会议解决悬案，互相不为反对对方之宣传，达成一致。其他如中方提出的废弃中俄旧约、勘定疆界、江河航行问题、抛弃庚子赔款问题、取消领事裁判权和赔偿损失问题，俄方只承认在大纲签订后的正式会议中解决。此外，双方分歧较大之点在于：

（一）蒙古撤兵问题，中方提出“苏联政府因视外蒙为完全中国领土内之一部分，现已准备将一切军队立即尽数撤退，并声明与外蒙所订各项协约等等概行废止”。而俄方则提出“苏联政府视外蒙为完全中国领土内之一部分，并声明撤兵之条件（即期限及制止白党之担保）一经于会议中商定后，即将一切军队尽数撤退”。苏俄一方面对于废弃俄蒙间条约避开不谈，一方面提出俄军撤退是有条件的，即中国政府应担保制止白党，撤兵期限应于会议中商定。

（二）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所应依据的原则，中国要求苏联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所有股东及债权者负一切完全责任，并在会议中制定详细办法。俄方只承认对1917年2月革命以前的中东路股东及债权者负完全责任。在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中，加拉罕坚持添设俄人占多数的监察局，以使俄方在理事会与监察局联席会议时占有优势，并坚持中东铁路的预算决算应由理监联席会议核准，同时加拉罕对王正廷

提出督办有指挥局长之权的要求置之不理[(123)]。

三　王加草案的签订及内阁的否定

3月1日双方会晤之后，王正廷缮备公文四份，分送总统府、国务院、外交部、交通部，报告与俄代表谈判经过，并请示最后办法[(124)]。3月8日，中俄问题第一次提交阁议讨论。王正廷报告其与加拉罕会谈结果：对于外蒙问题，王正廷认为中国“所不放心者为俄不撤兵及不废弃苏蒙协定”，而俄方则担心红军撤出外蒙后白党重新占领。至于苏蒙协定，苏俄表示可公布苏蒙协定，蒙古问题应由中蒙商量，“无论何种规定，苏联必然尊重而不加干涉”。王正廷得出的结论是：“总而论之，蒙古问题为双方相信问题也。”对于中东铁路问题，王正廷报告说由于俄国已否认1919年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提法，我国不得已提出估价收回的办法，而加拉罕只允许在正式会议内由中国备价赎回，且赎回必须用中国自己的资本，最后双方仅确定了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所依据的原则。王正廷认为，加拉罕提案“乃该政府最后之修正”，虽然与中国提案有较大出入，但本国已经收回不少权利，“故主张容纳之，因恐迟则生变也”。并且担心此次如不接受俄国提案，苏俄会进而要求无条件承认[(125)]。

3月8日晚，王正廷与加拉罕会晤，对于王正廷提出的租界、领事裁判权、退还庚款充教育费等问题，双方略加讨论后，即达成谅解。但涉及两国的旧条约问题，双方讨论颇久。对于俄蒙协定，加拉罕态度强硬，声明，“在中俄及中蒙关系未确定以前，欲取消俄蒙协约尚不可能”。加拉罕劝告中国，“俄国既已承认外蒙为中国完全领土之一部分，可不必再虑其他矣”。对于俄国与第三者所订关于中国的密约废止问题，加拉罕认为可用函声明废止，但他否认俄国与他国订有反对中国之约，指责中国与第三国反而订有反对俄国之约，并举中日密约为例[(126)]。对于中俄间旧约废止问题，王正廷坚持即时废止，而加拉罕坚持在会议中废止，其理由是：“所有旧约若在会前废止，则

将来会议中必无好希望，因中政府除贵督办外，其余各部长将提出无限之要求，且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经过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双方允废止旧约，并根据一九一九及一九二零年两次宣言在会议中订立新约代之，苏俄政府声明在未订新约以前，旧约中有违反一九一九及一九二零年两次宣言及有损中国主权者，概不实行。”对于中东路督办问题，加拉罕对于王正廷所提出的“在双方理事不能同意解决时，由督办加一表决权”表示不能同意。对于铁路预决算，双方决定仍归理事会监察局联席会议核准[(127)]。

3月11日，王正廷出席阁议报告与加拉罕商议之最后情形。关于废弃旧约问题，经过力争，加拉罕已同意废弃旧约。关于俄蒙条约问题，“俄国除承认外蒙完全为中国领土内一部分外，可尊重中国主权，即全苏联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协约等有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亦可以换文形式声明作废”。关于撤军问题，陆军部主张于本约签字后三个月内，将所有在外蒙境内各种军警全部撤尽，其撤兵接防手续，由中俄主管人员预先协商，王正廷认为这一点也许能办到，答允再与加氏商议。国务总理孙宝琦表示大体可以照此决定，条文一层，可再斟酌[(128)]。

3月13日，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致牒外交部，指出道胜银行所拟关于中东铁路的“种种手续”，“如不取得道胜银行之许可，不得有所变更”；否则“必为法国公使馆或其他代表中东路各股东与其债权人之他国使馆所抗议。同时，各项债权之要求，及其他关于利息上损失之要求，必相继而至，则中国财政状况将愈趋于纷乱”[(129)]。法国的声明使中国政府所处境地更加困难，此后苏联一直以此作为指责中国政府没有自己外交政策的藉口。

3月14日内阁开会时，内阁坚持废除苏俄与第三者所订之条约。对废止中俄之间旧约试图作补充，规定如下：“为免除日后误会或争执起见，苏俄政府声明：如有与第三者订定了一切条约、协定、合同

等等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此外，内阁除了坚持对外蒙撤兵的条件进行修正，还坚持苏俄从外蒙撤兵的原则。对相关条款则拟修正如下：“苏俄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声明将一切军队尽数撤退，其撤兵之时期及其关于双方边界安宁之问题，于会议中商定。”(130)

王正廷未奉内阁的最后决定，即于14日晚在中俄协定草案上签字(131)。3月15日晨，王正廷将草案分别呈交总统府和国务院。当日内阁开会，阁员对于草案中的俄蒙条约、外蒙撤兵、中东路估价，以及交还在中国俄国教堂的动产与不动产问题，认为不能满意，理由如下：废止旧约中涉及的苏蒙条约问题，苏俄只废止有害中国主权的部分，其余部分须等到正式会议讨论；蒙古撤兵问题，俄国虽已承认分期撤退，但附有条件，内阁认为不妥；中东铁路只订了估价赎回原则，但估价范围未定，内阁担心双方将来意见会有很大出入；声明书中同意归还俄国在中国的教堂动产与不动产，而各国教堂所占土地原属于租借权性质，这无异于表示苏俄政府在中国内地有土地所有权，如果其他国家援例要求，中国无应付办法，且动产与不动产范围太广，此项义务在履行上有极大困难。但是对于第三条，因为当初没有提到中东路估价范围，所以这一条可以留到正式会议时讨论，对其他三条应该坚持。王正廷认为草约已经签订，不能反复，所以拒绝内阁的主张，不肯再与加拉罕谈判。16日避往汤山(132)。

3月16日下午，加拉罕向王正廷发出第一次限期签字照会：“本代表自本日起，限期三日，候中国政府在此期内承认双方同意之协定。如过三日，本代表对于该协定所规定各节，不受若何之拘束。”同时声明：“倘因双方交涉决裂，协定破坏而发生一切事项，本国政府认为应由中国政府担任完全责任。”(133) 王正廷于当日将照会转外交部。而苏俄外交委员长齐契林立即邀请李家鏊晤谈，声称苏维埃政府认为局面异常严重，请李家鏊向北京政府转达苏俄政府的严重抗议，并警告北京当局苏维埃政府之忍耐并非无限制(134)。

3月17日内阁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加拉罕照会，并于当日复函王正廷，认为中俄商议未结束，王正廷未奉令签字而俄代表忽然发出限期签字的照会，“不特与彼历次宣言力谋亲善之旨不符，且反足为促进中俄邦交之障碍，政府实深诧异”。对于俄代表来函，“我国碍难承认”。内阁还声明，交涉破裂的责任应该由俄政府来负。此外内阁要求王正廷将政府意见转告俄代表，并照阁议最后的条件，再与俄代表切实磋商[(135)]。王正廷则认为，内阁将应在会议中所讨论之问题，提前于协定大纲时规定，前后态度反复，坚决不愿再进行磋商[(136)]。

3月18日，王正廷对来访的《晨报》记者表示，中俄交涉现状“不能谓为绝望，亦不能谓为有望”，加拉罕的限期答复“属加氏片面意思，当然不能拘束我国”。并且强调他确实曾与内阁商定交涉方针，且商定的范围与草案“完全相符”，对于为何在商定方针后，内阁又提出三点，王正廷认为责任在内阁，并且内阁所坚持的三点，“俟将来会议讨论，似亦无妨”。此外王正廷坚持认为草约不过是议定，外间所传闻的签字是错误的，并且认为即使已经缔结的条约还有修改的余地，更何况仅仅是议定的草约。王正廷特地提醒中国不要以战胜国的态度对待俄国，“吾侪对俄，不宜以城下之盟相待，此所宜注意也”[(137)]。

与此同时，华俄通讯社的声明表明了苏俄代表团的态度。苏俄代表团除了坚持认为双方已经签字的协定，中国政府应予以批准外，对于王正廷已签字的草约认为无修改或讨论的余地。对于中国政府拒绝签字的原因，认为“中国政府自不竟行暴露，故引蒙古问题为藉口，实则法国及某某数强国之压迫，以及中国阁员中有虑道胜银行倒闭者，即问题破裂之真因”[(138)]。

3月19日是加拉罕限期签字的最后一天，加拉罕再次致函王正廷，认为协定“不过为将来会议之一种根据而已”，苏联也认为其中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些解决而未得圆满结果的问题，但苏联

愿意将这些问题放到将来的会议中解决；比较中俄协定与其他国家所签之协定，中国与任何第三国所签的协定都没有获得这么多利益。对于国务院所说苏俄限期三日违背了以前宣言宗旨，苏方称“中国政府在道德上、政治上、事实上皆无责备我苏联政府之权”，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苏俄最亲善之提议竟答以助推翻苏俄政府及扼制俄国国民自由独立之举动……用种种方法援助白党，容纳白党在三省存在，且任其侵略苏联领土”。加拉罕进而对中国人民表示，尽管苏俄对中国政府取消一切交涉之结果表示愤懑，苏俄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之罪恶，并未要中国人民负其责任，而仍旧将以前允诺放弃的利益让与中国，并且订入大纲。他指出，华盛顿会议虽同意组织委员会审查治外法权和增加关税，但由于法国未批准条约，这些权利中国至今并未真正获得。而苏俄在这次协定中不但抛弃领事裁判权，规定中俄平等协商关税，且对于蒙古问题，苏俄“切实声明尊重中国主权，并准备一俟在会议中商定期限及保障即将军队撤退”；对于中东路问题，苏俄“所让于中国政府者，较中政府所能正当要求者实多”。加拉罕声明，苏联政府认为谈判已终了，拒绝继续讨论3月14日协定，并提出3月14日所签之协定不能拘束苏联，中国要想谈判，必须先承认苏联，同时警告中国政府，“勿铸成不可补救之错误，勿破坏已告成之协定”[(139)]。同一天，加拉罕照会中国外交部，重申以上声明。

3月20日，北京政府颁发大总统令，由外交部取代王正廷办理中俄交涉事宜[(140)]。此举一是因为王正廷越权签字，已无法再任谈判代表；二是因为苏俄态度强硬，中国欲借更换谈判代表以图转圜。同一天，国务院发电向各省通报与俄代表所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并申明政府之所以坚持这三点的理由：

关于俄蒙协约，政府主张将俄蒙协定立刻废止。俄代表只答应废止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条约等有伤中国主权者，对于苏俄与所谓“独立外蒙”所签条约不肯明白取消。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对这一重要问题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让步；并且苏俄在外蒙驻兵派使的行

为，显然与苏俄所声称的尊重中国主权相抵触。

关于撤退外蒙俄军，中国政府主张外蒙俄军即行撤退，俄代表则坚持要在正式会议中确定撤兵条件即限期及制止白党办法后，才能撤军。中国政府为变通起见，提出先声明一切军队应尽数撤退的原则，至于撤兵期限及关于双方边界之安宁办法于会议中商定。在顾维钧看来，苏俄坚持这一条款的第一层含义是中国承认苏俄撤军是有条件的，这样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苏俄则可以以中国所提条件无法接受为由拒绝撤兵；其更深层含意是中国承认苏俄在蒙古驻军是合法的，并且承认苏俄有权提出撤兵条件，故中国政府坚持确定苏俄应从外蒙撤军的原则。

关于移交俄国教堂财产，中国政府担心的是其他各国援此例要求在内地置产，因为以往的条约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并且中国政府也无法确定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所拥有土地的数目及位置，因此履行这一义务有困难[(141)]。

中俄谈判中争执最多的中东铁路问题，却未见政府对其提出修正意见，实际上当时内阁对此问题曾多次讨论。1924年3月8日王正廷出席国务会议报告说："中东路问题，查一八九六年协定只规定股票为五百万卢布，惟实费七万万。其铁路之现值实价约在三万万卢布左右。我国本依1919年宣言要求无价收回，被苏方拒绝，我国不得已提出估价收回，加氏仍不肯，只允备价赎回，较中国主张出入甚大，并要求用中国资本赎回。"[(142)] 报纸报道也称，王正廷对内阁说，"中东路问题，议定由我国备价赎回自办，加氏先索价一万万，后减为七千万，我国方面只承认估价三千万。接手后之铁路管理人，加氏主张将全路之二十一个正区长，十五个副区长（俄人）完全保持地位，我国方面主张中俄各半，并须将中东路与俄政府缔结之条约，根本撤消"[(143)]。当时就有阁员提出，为了避免今后有反复，中东路赎回问题应将"备价"赎回改为"估价"赎回，因为"'备价'二字，字义本不明了，不如用'估价'较有标准，盖'估价'可由该路现有之财产估出总价，

其价格中俄两方当不止有异外之差异”[144]。到3月12日特别阁议开会时，阁员对中东路备价收回问题又讨论良久，对于“估价”二字虽已决定，而有的阁员进一步主张先将估价价格定入大纲，但讨论结果，多数阁员认为，由于事情过于复杂，不能立刻估定的话，恐怕发生变化，故决定留待将来组织专家委员会估计[145]。

至3月15日，阁议席上阁员对中东路又提出：“赎回原则虽定，而如何估价则一字不提。估价须有一定范围，若就东路公司所费之资本而言，则包括移民开垦、建筑市街等项费用，我国如何能依此价格赎回？故最好能明定依铁路自身建筑费估价，则界限既定，争议自息。”后经争议，阁员认为由于当初对于估价范围没有提及，故不便重新提议，只得留待将来会议时再说。政府对于中东铁路的大体意见是：中东铁路赎回办法，应以现时估价为标准；中东铁路暂时归两国共同管理；至于中东路理事会议决事项，如遇可否同数，应用仲裁方法解决之。其他事项均等到中俄正式会议开会时详细讨论。由此可见，时人将解决中东铁路的希望完全放在不久将召开的正式会议上。故最后政府的修改意见由四条改为三条，即只坚持对交涉中的废止苏蒙条约问题、蒙古撤兵问题，以及归还俄教堂财产问题必须作出修正[146]。

外交部接收办理后，外交总长顾维钧于3月22日答复加拉罕的照会，对苏俄所称谈判已完结“深为诧异”，对于限期承认“尤难承认”。他指出，王正廷签字草约事先未请示政府，所以中国政府认为商议并未终了，并提醒加拉罕检阅王正廷的全权证书。顾维钧并进一步说明，中俄交涉不受他国干涉，表示希望继续商议，“总之，中俄间关系极为重要，中国政府仍不变更愿与苏俄恢复邦交之诚意，深盼迅速继续谈判，俾得早日解决”[147]。

3月25日加拉罕答复顾维钧，重申“此项交涉于三月十四日既已告竣，……本全权代表不得已声明断然拒绝上项交涉之任何进行”[148]。同日下午，孙宝琦在国务院招待两院议员，说明政府对中俄交涉的

意见，王正廷也出席了，但他坚持认为内阁所提出的三点是在交涉完结后提出的[149]。

中俄交涉暂时中止后，王正廷在3月21日发电，报告交涉经过并为自己声辩。王正廷认为，13日阁议给出的二项修改条件为中俄旧约应先行废止、将外蒙撤兵条文中制止白党之担保改为双方制止白党之办法。他本着这两项条件与加拉罕磋商，得到加拉罕的同意后，因为“案经久悬，英意两国既承认于先，诚恐迁延贻误；且国人亦同声主张从速解决；外察大势，内审国情，觉此案不能再事迟疑”。所以将议定草案双方签证，以便报政府批准后，再正式签字[150]。

两日后王正廷继发“梗”电，对政府“号”电中所列三点逐一反驳：（一）废弃俄蒙协约问题。王正廷认为由于此项条约未经中国政府许可，苏俄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苏俄尊重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所以俄蒙条约的废弃属于“原始无效”，政府的做法“反若先已承认苏俄与外蒙所订条约为有效，而今日始议废弃之也”。（二）外蒙撤兵问题。王正廷认为政府的主张既非“从速”，又非“无条件”，“不过是文字上的推敲颠倒，对于撤兵的缓急实际上并无丝毫影响”。（三）对于俄国教堂财产问题。王正廷认为俄国教堂属其国家所有，两国邦交恢复后，所有国家财产当然应该移交。政府担心的他国援例在内地置产的想法“殊为过虑”，其理由是只有俄国教堂是国家拨款建筑的，其他国家的教堂不是国家拨款修建的，不能援俄例向我国提出要求，即使其他国家援例向我国提出要求，我国也可以以俄国为例向他们提出要求。王正廷着重指出：“此次中俄协定之例，先将领事裁判权取消，关税规定平等，租界、租借地，庚子赔款概行抛弃，旧约之损害我国主权及利益者均行废止，而各国与第三国所订立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协定等项一概无效。”如果各国真的援例要求，我国正是“欢迎之不暇，又何必鳃鳃过虑也”[151]。

3月28日王正廷发表第三次通电为自己表白，他认为中国已收回领事裁判权，规定关税平等，这是中国所获得的大利益。中俄如果早

日复交，中国可以进而推翻各国对中国的压迫，使中国与各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此举关系之大，非特中俄两国邦交之恢复，抑亦吾国解除世界压迫之枢机。吾国于此即稍有牺牲犹当暂忍一时，以易此空前国际上之大利”。由于政府诸公没有看到苏俄给我国的重大利益，反而于小节上斤斤计较，所以导致中俄交涉事败垂成[(152)]。王正廷与当时大部分人的心态是一致的，即认为外交部所坚持的三点乃是小节，并对外部能否较现在取得更优越的条件缺乏信心[(153)]。

此时外间传闻政府迫于压力，将照原协定签字，并普遍怀疑外交部能否较王加协议草案为中国取得更大利益[(154)]。3月27日内阁开会制定办法如下：（一）中俄交涉应由外交部全权办理，设法进行。（二）对加拉罕照会，暂时持冷静态度，等外交部有具体办法后，再进行讨论。（三）向各界人士分别解释误会，免得被外人挑拨。（四）请曹锟致电各省疆吏说明情形，请他们不要再发电报干涉外交[(155)]。

此时外交部派李家鏊接洽莫斯科政府的努力遭到拒绝[(156)]。政府还尝试通过非正式途径寻求对中俄问题的解决，国务总理孙宝琦请议员何雯、饶孟任、陈铭鉴、张益芸任调解人。四人于28日拜访加拉罕，饶孟任对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国会对内阁的支持等情况详细向加拉罕作了解释。加拉罕在解释他所发出的三日限期签字照会时说：“予并非以外交战胜国对战败国，为权利之要求，今俄国乃系放弃权利者也。然予今亦觉此办法不甚和平，又此协定为他人从中破坏，予仍当遵守俄国历次宣言，及政府训条办理，将来会议本此进行。”对于原来的协定，加拉罕说两国订约本来各有不足之处，如中国在会议中提要求争权利，俄国也可以提要求争权利；中国政府对于白党态度为苏俄不满，苏俄在外蒙派代表，也无可掩饰，今后俄国会撤回代表，另定办法[(157)]。加拉罕口气中已有松动迹象。

四　国民外交的展现

在中俄交涉濒于破裂的时候，国内各界纷纷作出反应。1924年3月18日，《晨报》发表社论，讨论补救中俄间僵局的办法，认为三方对交涉破裂，均应负相当责任。加拉罕限期答复“于国际礼仪上，殊欠慎重”，而王正廷“明知内阁意见尚未一致，擅行签定草约”，因为王加草约对俄蒙条约应即废弃，外蒙撤兵应有明确期间两条没有规定，对声明书中交还俄国教堂动产及不动产问题规定而未作修改，所以《晨报》认为内阁所提出的三点“皆极正当办法”。但是目前的局势是协定已经签字，俄国认为中国全权代表既然已经签字，条约当然不能随便取消，而王正廷则以他所处的地位关系认为不能再与俄代表磋商，内阁则认为草约内容诸多不妥，不能通过。对于中俄交涉的僵局，《晨报》建议：“我国可以无条件先行承认，但于照会中声明恢复邦交后一切问题，如何解决，请俄国速派大使前来磋商（照英国办法）。而王加草案暂行保留，一切悬案，悉待会议解决，不必先议原则。俄国方面得我好意的承认，当可照办，否则其曲在彼矣”[158]。

3月18日，吴佩孚发电，催促政府签字协定。他说：“详绎草案各条，大体均尚妥适，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伏恳当机立断，原订各条件，早日妥为缔定，以利国交，而敦睦谊。”吴佩孚认为：“外交最重时机，时机一至，稍纵即逝。以此次对俄交涉而论，中东路一项，在先俄方本宣称无代价交还，外蒙撤兵及边境各问题，迟速先后之间，亦有难易损益之不同，今既得相当公平结果，往者已不必说，来者犹可直追。”[159] 20日吴佩孚又发电催促签字，“此事关系国信国权至巨，深望毅力主持，仍本原旨，将协定即行签字，勿扰浮誉”[160]。24日吴佩孚发电，批评政府，“为推敲文字中无关轻重之点，而引起停顿，权衡得失，可惜孰甚”，表示了对政府能否较王加草案取得更多利益的疑虑[161]。吴佩孚的态度也体现了直系内部的保洛之争。在曹锟派出专人劝解后，吴佩孚的态度逐渐平和，不再就此事发表通电[162]。直系其他干将，如齐燮元、萧耀南、张福来、刘镇华等均发出电报，均催促内阁迅速签字。《晨报》对这种现象评论说：“疆吏对于外交问题，本鲜研究，而此次居然态度一致，诚堪令

人注目。”[163] 驻美公使施肇基也致电政府，催促迅速承认苏俄，“免失时机，倘各国均承认后，则我国更难得美满之协商”[164]。

3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干事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各团体联合会等二十余团体联名致函加拉罕，希望他采纳民意，延长期限，以便这些团体警告北京政府早日承认苏俄。与此同时，各团体又各派代表一人访问加拉罕，加拉罕表示其“拟日内即行出京，与贵国各地国民一亲良晤”。代表们劝加拉罕暂缓南下，留在京中，“视国民督促政府如何，再定行止”[165]。

3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中俄交涉一事时，学生代表意见大体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联合各团体和市民，举行一种积极的表示，敦促政府从速批准协定。一派则主张郑重考虑，因为俄政府并未抛弃侵略主义，其所作所为与1919年及1920年宣言前后矛盾。双方争论颇久，最后表决如下：（一）以公函警告顾维钧，勿作外交团之傀儡，为批准协定之障碍。（二）用公函警告俄代表加拉罕，勿以战胜国态度自居，而视我国为战败国。（三）发表宣言，表明下列各要点：说明中俄邦交急宜恢复之重要；揭破外交团从中阻碍中俄恢复邦交之黑幕；说明现内阁阁员不明中俄恢复邦交之益处。（四）组织演讲团在各城演讲中俄关系[166]。在随即发出的警告顾维钧函中，学生们态度极为激烈，他们指责中国外交“内听一二不肖政客之指使，外受法美各国之播弄，致失外交独立之精神，并以贻误国是”。因此该会决定，只要“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167]。上海全国学生总会也派代表与会，决定与北京当地学生联合，督促当局承认苏俄，表示“上海方面学生界新闻界工界皆一致主张承认苏俄”[168]。

3月21日，北京教育会、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青年国民俱乐部、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各团体联合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中俄协进会九团

体发布正式宣言，指责当局“追步帝国主义国家之丑行，以市侩论斤较两之需索，为两国亲善友好之卖价”，认为当局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外力压迫及当局私利之争执。这些团体呼吁全国同胞及各团体努力：“（一）反抗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外交之压迫，（二）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169] 北大教授亦发出宣言：“除一方警告我国办理外交者，立为无条件之宣告承认，一方要求俄代表仍行保持十三日之协定为中俄正式会议之根据。”[170]

在中俄交涉陷入困难的时候，国会议员们纷纷活动，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中俄交涉发表看法，其中有一部分人欲借外交问题作为党争的武器，掀起阁潮[171]。议员们对于中俄交涉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法治共进会为代表，主张政府对于协定速予批准。指责政府对草案态度“咬文嚼字，多所挑剔……虽坐失时机，亦所不惜”[172]。另一派以议员俱乐部为代表，主张政府不应贸然订约，因为王正廷与加拉罕所订条件有损国权。20日，该派议员八十二人提出质问书，指责王正廷与加拉罕私订草约，无签字之权而擅行签字，所以其责任“重于伊犁事件之崇厚”，而政府默认王正廷的所作所为，“纵容属吏，大权旁落，铸错误国”，其责任“重于同光间之清廷”[173]。

3月22日，《晨报》发表社论讨论政府的责任。社论指出，内阁应负之责任在于没有一定政策，最初分部签注，后又各自修改，举棋不定，致失全局。王正廷应负之责任在于身为代表，在内阁所提条件未议妥以前，轻率议定，其失职行为也无可争辩。加拉罕身为外交家，对于订立协定的手续，应该极为明了，但其在中俄协定议定之后，立即报告莫斯科政府说已签字，致使苏联举国庆贺。这一误报的结果，致使苏联政府在得知中国拒绝批准已签字之协定时，非常愤慨，所以训令加拉罕发出限期签字的照会。苏俄这一照会类似哀的美敦书，不符合两国谈判修好的本意，同情苏俄的人尚且对这一照会不满，反对苏俄的人就更找到了反对的借口。况且照会中限期三日签

字，事关两国体面，终于造成今日相持不下之局面。对于俄国只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并尊重中国主权，不肯明白声明废弃1921年俄蒙密约一事，社论认为："我政府之坚持此点，甚为正当，而俄国之始终拒绝，殊欠理由。"社论最后忠告中俄当局："双方仍宜开诚相见，从长磋商，断不可因小小误会，影响及于未来邦交。"(174)

3月24日，《申报》发表文章讨论中俄交涉破裂的内幕，指出阁议中所争三点只是表面文章，其中内幕，一是顾维钧与王正廷对俄主张不同，"王主张一定大纲后即予承认，再开正式会议，议定细目；顾主张俟时机成熟，再行开议，不必亟亟承认"，顾王之间有私利之争。二是以财政总长王克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欲借中俄交涉达到推倒孙宝琦内阁的目的；由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均想将外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故陆军总长陆锦在外蒙撤兵问题争执最力。三则为教育界与加拉罕关系密切，其声援加拉罕的举动，"大为军阀财阀官僚所疑忌，盖恐智识阶级赤化，不利于若辈也"。此外加拉罕宣言中抛弃的庚子赔款规定用于教育经费，军阀财阀官僚多不乐意。四是北京外交部的外交"向系他动的而非自动的，此人所共见。此次反对承认苏俄的阁员，辄称交民巷空气不佳"(175)。

但是也有人站在政府立场说话，陈霆锐发表《外交形势论》，指出目前的局势是"王与顾分裂，府与院分裂、疆吏又与政府分裂"；而我国的一部分国民"反以客体之口吻责备政府为苏俄助张声势"的举动实在是"可异"，我国对外应团结一致，才能"壮使者之胆而寒敌人之心"。他认为我政府对中俄交涉应当"坚持勿为所动"(176)。

《盛京时报》于3月25日发表社论《中俄会议观》，集中批评俄人对华的蛮横态度。该报认为"苏俄驻兵蒙古，毫无情理，应立时完全撤退，以示中俄邦交之接近"。因为外蒙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义，何用声明"。至于苏俄指责中国袒护白党更是"荒谬绝伦之议论"，原因是"无论事实上白党已无活动之余地，即令白党蠢然有所活动，而以中国现时兵力，制止彼辈，尚觉绰然有余，

何用俄人过虑”。苏俄只不过允许中国以中国资本赎还中东铁路。其他旧条约之废止，俄蒙密约之存在，都未获真正解决。故北京政府的态度“审慎考虑，未为不足”。而加拉罕的态度“傲慢无礼，一至如此”，其之所以采取这种无礼的态度，目的在借口取消苏俄1919年、1920年之宣言，故俄方应对交涉破裂负责[177]。

一些议员也发表宣言要求撤换俄代表。3月29日，群治社议员雷殷、刘哲等开会讨论，认为国人对外应取一致态度，无论王正廷与加拉罕所签草约内容如何，无论内阁所坚持的三点能否取得胜利，无论现政府是否使人满意，但俄国限期签字之通牒，“俨然战胜国之哀的美敦书”，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中国内部虽然“连年内争，四分五裂”，北京政府对外还是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名义。现在一部分人和舆论“必将其信用完全毁灭之，使世界咸知中国仅有疆吏而无政府然后快意”。恐怕中国今后之外交“将由北京而移诸各省，因是而豆剖瓜分，至亡国将由斯始矣”。一致主张通电中央，请求向苏俄政府提出撤换加拉罕的要求，另派代表继续开议[178]。

由于苏俄在中俄交涉中持强硬立场，而中国外交部则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各界对政府的谅解，中国一部分人士对于加拉罕的态度产生反感。3月2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中国政府固然对中俄交涉破裂负有责任，而俄代表限期签字，亦大失国际礼仪。此外对俄方坚持保留俄蒙密约和移交俄国教堂地产的立场他们表示遗憾。他们希望，“俄代表千万不可误会者，吾人对于中国之督促，并非为俄人之后援，乃希望中俄两国早日恢复邦交而两国国民早日得其亲善携手之利益也”[179]。一些地方团体也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哈尔滨团体联合会及滨江道区自治协进分会、自治协进支会、自治励行会分别致电中国政府与加拉罕，要求政府不可放松交涉，劝告加拉罕不要一味图谋优胜[180]。浙江民生协进会、杭州青年协进会、芜湖青年进德会指责北京当局不顾大局，挟私嫉功，听任外人干预中国内政[181]。4月2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讨论中俄问题，有人主张发

电报给加拉罕，促其反省。有人对此次交涉的有效性表示疑问，有人主张不要滥发议论，取静默态度，如非发表意见不可，要郑重研究。最后表决结果，多数人主张致电俄代表加拉罕，请其勿过意骄横，致伤两国人民感情，应该退让，依法签约，并通电全国各界作一致表示[(182)]。

4月1日，中国对俄发出最后照会，表示对于内阁所坚持的三点可以王加草案为基础而加以修正，只须附加换文声明，即可签字。《晨报》认为，外交部此种态度“诚为至当”，“为今日转圜之唯一机会”；并进而指出，俄国如果仍然坚持不让步，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先与华人以不可磨灭之恶印象；而俄尊崇正义，服从公理之心，亦无以自白于天下。恐窃笑于后者，不独怀抱帝国主义之国家已也”。俄国是否让步已成为“中俄交涉能否实行互让平等公正原则”的检验石，俄国是否有诚意，在此一举。“俄若一味以外交上之空言来相诘责，则吾侪同情于苏俄者，亦不能不怀疑苏俄之诚意矣。愿苏俄政治家其三省之”[(183)]。

加拉罕对于这个照会，始终不作公开答复。俄国试图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和部分舆论界对俄的好感，以及吴佩孚等疆吏的签约主张，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方面作出让步，所以苏俄表面上始终持强硬态度，而暗中则多方活动，积极进行局部接洽。苏俄派鲍罗廷联系广东当局，派达夫金、伊万诺夫与奉天当局接洽，而对于新（疆）俄局部通商条约也加紧进行。与此同时，日俄交涉也在不间断地进行，其目的都是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以便保留更多的苏俄在华利益。北京政府则一面积极与加拉罕接洽，解释政府立场，一面派驻莫斯科代表李家鏊与莫斯科政府直接交涉，对于各地疆吏则派人疏通解释。在这种情形下，苏俄代表团派达夫金回国报告中俄交涉全过程，请示最后的办法，莫斯科政府也派出陆军次长安德诺夫来华调查情况[(184)]。

五　中俄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双方的影响

中俄交涉的破裂实与双方的本意不相符。俄方于草约签证后，立即向莫斯科政府报告交涉成功，而莫斯科政府立即向外发布这一消息，致使各国驻莫斯科代表前来道贺。此后又有加拉罕限期签字的照会，这都是为了造成一种声势，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交涉而不是破坏交涉。中国方面在尽量维持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也为两国交涉的成立作出了种种努力。因此交涉双方表面上虽然相持不下，实际上均在等待机会，以图挽救[(185)]。

在这一时期，外交部与俄代表团之间仍有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在顾维钧的秘书和加拉罕的秘书之间进行[(186)]。直至5月下旬，双方加紧谈判，往返磋商不下二十余次，最后对修正各点与商议条件达成一致认识。5月30日，顾维钧出席内阁会议报告交涉结果，阁议一致通过。5月31日，顾维钧奉大总统命令，作为正式全权代表，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上签字。国务院随即通电各省交涉成立，同时照会俄代表，说明两国邦交，即日恢复[(187)]。

这次交涉的特点在其秘密性。对照王加草案与正式的《中俄协定》，可以看出《中俄协定》对于草案第四条有修正。草案中，中国方面声明：所有“中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苏联政府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而苏联政府仅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协定条约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并无现任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对等声明，故《协定》取消了中国这一单方面声明，而修正表述为“中国政府对于俄国自帝俄政府以来凡与第三者所订定之一切条约协定等等，其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无论将来或现在，均不承认为有效”。中国政府认为，“所谓‘帝俄政府以来’，即包括俄临时各政府及苏联政府而言”。但从字面上看，俄蒙协定的废弃问题并没有解决。政府却认为“如此措辞与我国所争之国际平等，相互主义及拥护蒙疆主权之宗旨，均属

相符，就此照允”。关于外蒙问题，《中俄协定》中仅将原协定中“蒙古撤兵之条件”改为“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之军队问题”，并没有规定俄军即行撤退之原则。关于移交俄国教会在中国的动产不动产问题，《中俄协定》中规定按中国内地有关置产之规定办理，至于须先行移交的俄教会房屋及地产则指明了具体的地点是在北京和八大处。

总而言之，北京政府在3月20日号电所坚持的三点取得了大部分成功，但俄代表也提出两项条件：（一）鉴于法国对汉口俄租界提出要求，为了防范第三国或外国组织，侵占俄国所放弃的租界，苏俄对《大纲》第十条作出补充规定，中国政府不将苏联所抛弃的租界及各项特权转移给第三国或任何外国人组织的团体。（二）苏俄担心其放弃的庚子赔款被挪作他用，双方商定，除了将该项赔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外，余款全部拨作教育基金[188]。

《协定》签订后各方的反应热烈，正如顾维钧指出，新闻界和广大公众对这一结果喜出望外[189]。国会议员胡鄂公等一百三十多人发表宣言，认为此次中俄协定“匪特应视为中俄永久关系之要纲，且应视为中国外交之砥柱”。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应本此公平之原则，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夺回同等之权利。且“帝国主义者一日不觉悟，一日不倾倒，吾等反帝国主义之精神，亦必一日不止息”[190]。上海闸北市民也发出通电，认为协定为中国外交开一新纪元，并提出此时一方面要一致庆祝中俄邦交，另一方面要向帝国主义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在中国内地的外国军队，谋求中国独立[191]。《晨报》认为，《协定》“虽将中俄邦交正式恢复，然签字者仅其大纲，而有待于会议之事项尚多”。该报指出：“我国之当局能否诚意办事，吾侪可于将来之会议是否顺利而不致于延长期间断之。”并且“愿俄国能一如其宣言者忠实履行，使我国民有以致其信用也。”[192] 唐绍仪认为《中俄协定》“中国所得甚多，俄国自未始丝毫无利，而其比例殆六与四耳”[193]。

广东当局及奉天当局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协定》作出了不同

的反应。孙中山在与“广州新闻社”记者谈话时表示，苏俄与他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非常和睦，不需要诸如承认这样的形式”。他的政府不会以“专门的、形式上的承认”来恢复与苏俄的关系，是因为他的政府“实际上已毫无条件地承认了俄国”。对于北京政府承认苏俄，他表示“南方政府将欢迎这样的承认”[194]。7月中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发表宣言，主张对俄国“当感其厚意，此后两国人民益当互相了解，以共同努力于互尊主权互助利益之途”；对北京政府则“此后益当以国民之力锄而去之”[195]。

谈判还在进行中，奉天当局的几个重要人物在不同场合对中俄交涉表示了意见。中东铁路督办王景春表示，中国收回权利已不少，应早日签字[196]。中东铁路护路司令、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朱庆澜表示“中俄交涉，东三省当与北京取同一之步骤也”[197]。曾被奉张派为东省参与中俄交涉之代表的杨卓认为：“奉省与北京当局政治上久无关系，独以中俄交涉关系甚巨，对外理应一致。……奉方对于王加议定之协定，当然赞成，并无反对。”[198]由此可知，奉天方面对中俄交涉持赞成态度。

《协定》签署后，据说张作霖父子认为受到顾维钧、加拉罕的愚弄，在《协定》签字前没有告知他们，所以他们的态度由原先的赞成变为反对。王永江、王景春、袁金铠等人均认为：“此项协定，断送东省利权太大，曹锟为图固位，欲藉苏俄为外援，遂将东省权利让与俄人，藉以买好。”所以他们对中俄协定力加反对[199]。6月14日，东三省省议会、教育会、商务会、农务会发表通电，表示东三省人民对于中俄邦交，并不反对，但具体到《中俄协定》，因为北京“既不知三省边界与俄毗连之利害得失，又不知东路航权与我国关系之重要。凡关于我之利权，皆置之于将来不可知之委员会，而独于东路利于俄人者，竟签字即欲实行”。故“为三省及国家权利计，举财产生命皆可牺牲，独此项协定，断难承认”[200]。后经中央政府派人对张作霖进行疏通，奉天对《中俄协定》大体上表示赞同，但坚持在开中俄

会议时对于东三省有关的中东路及中俄划界问题应采纳奉天的意见[201]。

外国报纸对此事的反应相当歧异。《字林西报》认为，苏俄已放弃其在华一切大事物，如治外法权、租界及拳乱赔款，而仅得一空洞之承认。《大陆报》认为，《中俄协定》其中有利益交换之处，俄国几乎抛弃一切，以换得外交承认和中东铁路之主有权。而《大阪每日新闻》则猜测，《中俄协定》中可能藏有中国方面日后向英、美、日有所要求之伏线，提示了列强对《协定》的关注和担心之所在[202]。

《中俄协定》究竟给予中俄双方哪些实际利益呢？这需要仔细甄别。《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无疑是中国自与他国通商以来所签定的最好的条约，条约中基本上采取了平等及相互让步的原则，对中苏关系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当时普遍认为《中俄协定》中最令中国满意的条款有以下五点：（一）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放弃租界。（二）中俄两国规定新关税税则时采取平等及相互让与的原则。（三）中俄两国声明采取平等及相互让与的原则，重新缔结条约及废止旧约。（四）将中东铁路化为商业铁路。（五）抛弃庚子赔款以补助教育。在这几点中时人尤认为以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和租界以及关税平等为获得利益。

毋庸讳言，收回领事裁判权及关税平等确是中国自华盛顿会议以来一直努力争取的外交目标，因此苏俄放弃这些权利，一般民众皆认为从《中俄协定》中得了大恩惠。但实际上，自从1920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停止旧俄使领的待遇后，俄国侨民已归于中国法权之下，领事裁判权已自动归于消灭。1921年-1924年俄国并无正式驻华外交代表，旧俄的租界自然也已收归中国政府。关税平等双方亦只定了原则，其细则并未订立。至于俄帝国与中国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1917年旧俄帝国灭亡之后，这些条约已不再为中国所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较难使中国

继续承认条约的有效性。此外中东铁路的警备权1917年已由中国方面收回，庚子赔款俄国部分早已停止付给，因此苏俄政府纵使仍不肯放弃这些权利，也无法在中国享有这些权利[203]。

《中俄协定》中于中国不利者有两点：（一）中东铁路管理权由白党手中转移到苏俄政府手中。对于中东铁路财政的管理，如预算决算，《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必须由理事会和监事会联席会议核准。但理事会人员组成中俄各五人，监事会都是俄三中二，俄人占多数，当然于中国有所不利；中东铁路日常事务的管理由中东铁路路局负责。中东铁路路局设局长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长两人，华俄各一，俄人仍占多数。此外对于中东铁路人员，规定由中俄两国人民平均充任，但第七号声明书中对此作了补充规定，说“各项位置，应照谋事者之能力、技术及教育资格补充”。俄人管理中东路既久，其人员素质显然高过中国人员。这条规定实际上推翻了铁路人员平均充任的原则而维持俄人对中东路的操纵状态。

（二）苏俄撤退外蒙古驻兵问题仍旧不能得到解决。加拉罕空许中国政府在两国会议时解决撤兵问题，而对会议又采取拖延战术，最终的结果是，1924年6月13日，即《中俄协定》签订后不足半个月，外蒙古当局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直至1925年3月，苏联政府照会北京政府，“苏联政府已进行撤退外蒙红军，并现时已完全撤尽”[204]。

《中俄协定》给予俄方的利益体现在对其承认上。当时苏俄亟欲获得中国的承认，以便加强其在远东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在大纲签订后即行实现，两国恢复了使领关系互派大使，并移交了旧俄使领馆。同时通过1924年9月的《奉俄协定》及其后中东路的改组，苏俄终于控制了中东铁路。

大纲中规定有关两国悬案的解决办法将召开正式会议具体商定，将要在会议中解决的问题有：废除前俄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所订的

一切条约及重订新约；苏联从外蒙古撤军问题；划定疆界问题；两国边界江湖及其他流域上的航行问题；中东铁路的赎回问题；订立商约问题；讨论赔偿损失问题；对俄国教会房屋及地产的处置问题；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之后苏联在华人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协定条款要在中苏正式会议中落实，而这一会议本应于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开完。但延至1925年8月26日中苏会议才举行开幕式，此后时断时续，到1926年10月，会议无果而终[205]。

六　归还俄使馆和中苏会议的召开

《中俄大纲协定》第一条规定："两缔约国之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中国政府允许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206] 1920年9月，中国政府停止旧俄代表的使领待遇，当时柯达次夫公爵托九国公使代为保管俄公使馆及其财产，而中国政府亦有照会致九国公使，请暂行代为共同保管，现在中俄邦交成立，俄使馆自然应该交还新代表。1924年6月，《中俄大纲协定》刚签订，北京政府外交部即照会外交团，要求将九国公使代管之俄国前公使馆及其附属财产交给苏联驻京代表加拉罕[207]。6月11日，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复文，对交还俄使馆提出条件，即只有等到各关系国承认之俄国正式驻华外交代表直接向使团提出交还的要求，使团才会考虑交还。使团的这种态度实际等同于拒绝交还[208]。

加拉罕对使团的这种态度非常愤慨。6月13日加拉罕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在中国派驻大使的要求[209]。李家鏊亦报告外交部，苏俄外长齐契林曾当面催促两国立即互派大使。外交部一方面不愿意拒绝苏联政府的好意，一方面又怕引起国际间之纠葛，所以向各国提议将各国驻华公使升为大使[210]。

外交团对于苏俄要求派大使一事反应强烈。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后，势必成为使团领袖，让一个与自己的

体制不相容的国家代表来领导外交团，是列强不愿看到的。6月23日使团开会的结果，共同推举日本尽快与中国接洽，赶在苏俄之前派出大使，这样日使将充任使团领袖，以抵御俄大使之地位。之所以推举日本，因为日本距中国路程最近，国书可以最早寄至北京[211]。

6月17日，外交部答复荷使欧登科11日的照会，指出“使馆地界虽照辛丑和约尽归使团管辖，乃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俄馆地址虽在使馆界内，亦不受他国代表之管束”。中国政府要求将俄馆交给苏联并愿意在这一问题中“居间设法”，不过是“对友邦尽国际上应有之礼遇予以便利”。照会“切望贵领衔公使设法照办，否则不独中国政府欲照国际习惯予友邦代表以种种礼遇与便利之志愿，难以贯彻，即他国在中国领土上派使驻节之权利‘除应得中国政府之允许外不受他项条件’一层，亦将有所侵损焉”[212]。

外交团在接到此项照会后，7月1日开会时态度已有所缓和。在意大利等国公使的坚持下，外交团对拒绝交还俄使馆照会中的激烈措辞进行修正。7月12日，使团第二次照会送达外交部，提出四点要求：（一）八国公使认为中俄两国政府间缔结的种种协定，“决不能挫抑或侵害中国对八国中之各个或全体早已约定担负之各项义务”。（二）使馆所在区域及其各项房产，均隶属于一种特别地役权制度之下，并提醒中国外交总长注意此项国际地役权的范围与性质。（三）现在各国代表不得不将此项房产，交还于俄国政府之代表，但首先该代表应该保证维持使馆区域之各种规章。（四）目前各国政府中，仅有两国承认苏维埃政府，其余各国政府，只能委托与俄建交的中国政府向其通告情况[213]。

由于各国对升公使为大使事犹疑不决，而苏联政府却屡屡催促，7月14日外交部照会加拉罕，认为“互派大使一节，政府认为可行”[214]。翌日，加拉罕正式照会外交部通告其被任命为驻华全权大使，并请求向中国总统呈递国书[215]。外交团本以为中俄交换大使必定要等外交团与中国政府达成谅解之后才能实现，但中国政府此次采取

断然措施，外交团才开始急起直追。日本决定不管其他国家态度如何，率先升公使为大使，自1925年4月起开始实施。其不立即实施的原因是升公使为大使必须追加使领经费，此项预算案已来不及提出特别议会讨论，所以要等到第二年通常议会开会时讨论通过。日本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担心中国人的同情心全都倾向苏联，对日本商业上有所不利，同时也不愿在博取中国人好感上落后于其他国家[(216)]。

7月20日，与加拉罕关系很僵的荷兰公使欧登科离开北京，赴日避暑，陷于僵局的俄使馆问题出现转机。公使团推举美国公使任使团领袖[(217)]，24日，加拉罕与美国公使舒尔曼在顾维钧家里就交还俄使馆问题正式会见。加拉罕的身份是驻京苏俄代表，舒尔曼的身份是签字于《辛丑条约》之外交团代表，双方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晤。舒尔曼代表外交团的同僚，要求加拉罕接受使馆区内原有的体制，并保证将遵守有关规定，如保卫、纳税、自治权等。加拉罕则指出苏联政府决不会抛弃他们在条约中（1901年《辛丑条约》）得到的权利和利益，苏联作为《辛丑条约》连署国的地位仍然继续。他表示希望进入使馆区并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遵守共同的规章，并且承诺一旦他的政府决定放弃条约中的权利，将按国际惯例通知其他各国，红军将不进入使馆区。加拉罕同时表示，其他缔约国无权为他规定条件，他的陈述仅作为其个人意见的表达，不能认为是迎合其他国家提出的前提条件[(218)]。

此次会见名为调停，实际已进入不完全的直接交涉阶段。中国外交部由当事人退居介绍人之列，不过外交团与加拉罕之间的函件往来还需顾维钧从中传递。此时加拉罕实际上已接受使团条件，而使团中人“态度也大为缓和”[(219)]。7月26日，加拉罕致函舒尔曼，正式请求归还俄使馆。至此使团所提条件均已满足，归还一事已到无可推托的地步。7月下旬，中国政府任命刘镜人为第一任驻俄大使，未到任前，由现驻莫斯科代表李家鏊代理。7月29日，加拉罕致外交部函件

已改用苏联大使名义。31日，加拉罕晋见曹锟，呈递国书，两国使领关系正式恢复[220]。

1924年8月1日，公使团在美使馆开会，各国均主张交还，但还须请示本国政府。8月8日，日本政府训电首先到达，其他国家政府的训电也陆续到达。8月11日，使团开会决定答复加拉罕照会，实行交还俄使馆[221]。

8月18日，新任使团领袖、日本公使芳泽将交还俄使馆照会交给加拉罕，同时交给加拉罕的还有美国的附加声明书，内容是："承认交还俄使馆之行动，并不能解作含有美国政府承认苏俄政府之意。"[222] 翌日，加拉罕退还美国附加声明书，并指责日本未能拒绝美国委托。加拉罕引用国际法及国际习惯解释日俄交涉说，"敝使亟望若苏联政府承认日本政府及日本承认苏联政府之时，不至解作含有苏联政府承认日本资产阶级之资本主义统治或日本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主义统治之意义"[223]。日本对苏联的指责深感不快，此后双方为此事往返磋商，交还俄使馆事无形延搁。

8月25日加拉罕照会英国公使麻克类，催促移交俄使馆，并表示"目前意见之歧异，不至阻碍订立俄大使馆与各国使馆间在使馆界内之临时办法"[224]。使团此后连开会议，对辛丑条约国所怀疑之各点，向加拉罕提出质问。9月10日八国公使照会加拉罕，仅简单声明八国公使已一致愿将旧俄使馆财产移交于加拉罕，并未向加拉罕有所质疑或争辩，美使声明书问题亦不了了之[225]。9月24日加拉罕迁入俄使馆，10月5日苏联大使馆举行升旗仪式[226]。

加拉罕迁入东交民巷俄使馆后，使团又对加拉罕是否能列席使团会议和是否为外交团当然领袖有所讨论，决定如下：因为使团目前认为加拉罕仍然为辛丑条约国代表，所以加拉罕可以参加使团会议并可以参加辛丑条约国会议，但是因为加拉罕为不能贯彻辛丑条约精神之苏联政府代表，所以他不能为使团之当然领袖，而仅于外交宴会上承

认其为使团领袖，若正式会议时，仍照旧例轮流推举各使主持一切[227]。

归还俄使馆本来是中苏两国为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采取的必要步骤，但是却引起了东交民巷外交团、中国政府和苏俄代表团之间的外交较量，三方各有得失，最终的结果是加拉罕入主俄使馆并成为外交团领袖而旧外交团逐渐走向解体。在这一事件中，苏俄对华外交重实利的取向非常突出，加拉罕为了谋求与外交团的妥协，自称其为《辛丑和约》签字国之一员，并且坚持不放弃他们在《辛丑和约》中所得权利，这是明显与中俄协定精神相违背的做法。

《中俄协定》第二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于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订一切悬案详细办法，并认为会议应于六个月内开完[228]。外交部为会议的举行作了一系列准备，专门设立中俄会议办事处，并任命刘镜人为中俄会议办事处秘书长，还训令李家鏊向齐契林催促速开会议[229]。而苏俄对中国履行协定的能力始终持怀疑态度，认为俄领馆交还问题久延不决，互换大使一事也未解决，所以借口莫斯科政府所派之代表尚未抵京，不能开会。会议最终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召开[230]。

1924年7月30日，苏联政府所派的商务、法律等七位专门委员已由莫斯科出发。外交部闻知此消息，于8月5日致函加拉罕，表示希望苏联政府所派专门委员抵京后，立即召开中俄正式会议。加拉罕于第二日答复外交部，要求延期开会，其理由为一切布置尚未就绪。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不能开会的理由是因为中俄协定未经苏联委员会批准，不能发生效力[231]。中国外交当局迭催加拉罕开会，而加拉罕藉口推宕，措词虽然很委婉，但事实上不能不引起中国对于苏俄诚意的疑虑。此时苏俄暗中积极进行奉俄协商，自然不急于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同时苏俄又借口遣送俄旧党，发还俄使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对会议采用拖延战术[232]。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加拉罕也抓住时机与奉天当局签定了《奉俄协定》（详后）。10月，中东铁路管理当局改组，苏联政府派出的新局长伊万诺夫取代了旧局长渥斯特罗马莫夫，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利益得到了落实，对中俄会议的召开更加不以为意。

进入11月，外交部委派严鹤龄筹备中俄会议，加拉罕亦派其秘书向外交部声明已着手准备审核中俄往来文件及档案，与中国政府开议。同时又声明道胜银行问题，不能于中俄会议中解决，因该行现不在俄国掌握之中，加拉罕无权讨论此事[233]。其后中国方面决定设专门委员会讨论划界、赔偿、蒙事、中东路、松黑航行问题，并认为委员会应采取一切平等的原则，由双方派同等委员组织，如果委员长派华人，则副委员长派俄人，如果委员长派俄人，则副委员长以华人充任，务必求得最善之结果[234]。此时中国国内政局不稳，直奉战后成立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外长未就职，加拉罕乘此机会表示希望中俄会议从速举行，李家鏊亦报告俄政府希望速开会议之意。而中国政府只能一面作开议的各种准备，一面等候外长到任[235]。

1925年1月，日俄交涉成立，俄国在远东的地位益臻巩固，其与中国解决悬案之心更加迁延。2月26日，加拉罕照会中国代理外长沈瑞麟，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愿开中俄会议，并请指定日期。此后中国政府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会议督办，设立中俄会议督办公署，于5月准备就绪后，外交部照会加拉罕，提议于6月1日开议[236]。加拉罕对这一提议迟迟未答复，其暧昧态度无非在于有意延宕会议，希望中国对于各问题让步，以减轻在基本协定中俄国所许诺担负的各项义务[237]。

直至1925年8月26日，在王正廷的反复劝说下，加拉罕才答允在外交大楼举行中俄会议开幕仪式，但此后中俄会议仅仅是若断若续的进行，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1926年10月，在北京政府已受到广东北伐军威胁的形势下，中苏会议最终不了了之[238]。北京政府欲借此会议解决中苏之间悬案的希望落空，而中苏大纲协定的实际作用

也仅剩骨架，几无内容。

七　奉俄协定

在中俄大纲协定签订后不久，1924年6月13日，加拉罕晤见外交总长顾维钧，曾提出“对东省用兵力恫吓为军队之集中，俄国方面亦行同样之示威”，以及“拟与东省另缔结关于中东铁路及一二其他次要事件之协定”两个方案，试探北京政府对于奉俄局部接洽的态度。而顾明确表示反对，“中国于内政上或有分歧，而对于外交则属一致，往事可征。故本总长对于能得奉省了解一层，颇为乐观，至于奉省另缔协定一层，实不以为然”。加拉罕则辩白说“如不得已，在奉另签协定时，本代表仍认在京签字之协定为有效”。同时表示奉俄协定“其内容亦与业已知晓者大略相同”。加拉罕进一步指明奉俄协定与中俄协定的关系“除关于黑龙江及松花江航行事件外，并无甚出入。即关于黑松两江航行事件，亦将与条约相同。至关于中东路之修改，实无关轻重”[239]。7月7日顾维钧会晤加拉罕时，仍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奉俄另签协定，“贵代表倘一日不杜绝与奉省另缔协约之门径，即一日不能解除履行协定之困难。即现时余仍未失望，倘苏联政府之政策仍以与奉天另签协定为可以赞成，则迟缓实行中俄协定之咎，不能归诸中国政府”[240]。

7月下旬东三省设立外交处，29日正式任命丁干青为处长，自8月1日起，开始办理东三省外交事宜[241]。中央政府派人向张作霖解释中俄协定，但收效不大。8月10日，顾维钧继续劝告加拉罕：“与奉天别开会议与事无补，反添纠纷。所有此项事件，中央政府即经尽力及注意，协定之履行惟有任由中央政府办理为最妥。”[242] 12日，加拉罕晤见顾维钧时，通报奉俄之间约文已定，只待签字，苏方暂不签字以静待北京政府的疏通结果。加拉罕说：“倘贵总长赞成在奉签字，即请声明赞成，无任感荷，盖如此则协定之签字，系贵长所与知焉。”顾维钧回答说“余意凡有趋向与地方订约之举动，均足使中央政

府难以履行中俄协定。……如贵使一日继续存有缔结另约之希望，则中国政府一日不能易于履行协定。”加拉罕说：“本使以为此项协定当可允许，只须北京政府与闻耳。”顾维钧则声明，奉俄之间缔约开启国家可与地方办理外交的恶例，“盖此项地方协定之缔结，无异表示，关乎中国之外交贵使可径与地方官办理，而开不良之先例”[243]。8月19日，外交部秘书朱鹤翔在会晤加拉罕时，加拉罕主动提出将中东路赎回期限减少二十年，并表示其让步目的是为了帮助顾维钧与奉方解决关于中东路上双方的分歧，而不是以之作为促进履行中东路暂行协定之代价[244]。

1924年9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20日《奉俄协定》告成。9月24日，外交部令李家鏊向苏联政府口头抗议。第二天，外交部正式照会加拉罕，对奉俄协定表示严重抗议：“查张作霖背叛中央政府，已明令申讨，乃忽于此际，贵国代表与之签订协定，诚所骇诧；况各省对外一切协定或契约非得中央政府事先核准，不能有效，因是本部对于上项传闻之协定，如果确有其事，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否认。”[245] 加拉罕对外部照会不予理睬，而对报界声明苏联与奉天订立协定的理由：（一）是顾维钧允许苏俄与奉天方面交涉，以使奉天承认中俄协定；（二）是政府与奉天接洽久无结果；（三）是中国内部发生战乱，为了防止法、美等国干涉中东路[246]。

9月26日，奉天任命鲍贵卿为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以袁金铠、吕荣寰、刘哲、范其光为理事[247]。10月3日中东铁路董事会成立，苏联派伊万诺夫为局长。同一天法国驻华代办、华俄道胜银行向中国外交部抗议奉俄协定[248]。10月11日，外交部为奉俄协定事向加拉罕再提严重抗议。加拉罕对此仍然未作回答，华俄社的声明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的态度，声称由于“北京政府势力未能管辖东省，《中俄协定》中与东省有关之部分不能实施，始有缔结奉俄协定之必要”。对于《奉俄协定》的性质，华俄社认为：“纯为地方性质”，因

为“东省当局以省当局资格订定此项协定，亦至属明显”。对于协定的内容，华俄社认为：“奉俄协定不独未抵触中国主权，且对中国主权完全尊重。……协定内容，并提及中俄协定，益可证明该协定乃随中俄协定而生。即奉天当轴，亦未尝目之为独立协定。”[249]

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联合皖系控制北京政府。1925年1月19日，张作霖将《奉俄协定》呈送段祺瑞政府，称“在前《中俄协定》虽经北京签字，惟关于东路航权各部分尚多遗漏，当由东省另订奉俄协定以资补救，业于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签字批准”[250]。中俄会议会务处开会讨论此事后，认为《中俄协定》与《奉俄协定》，条文本旨“大致相同，且奉协条文中数处似更觉进步，将来开会时根据进行，不无裨益”。所以决定将《奉俄协定》归并于《中俄协定》之中，以示中央与奉天一致对外，并提交外交部、交通部讨论[251]。3月12日，临时执政府发布第三百四十六号指令，将奉俄协定追认为中俄协定之附件，并于18日将此事照会加拉罕[252]。

在《中俄协定》之后不久签订的《奉俄协定》，其内容是否较中俄协定有更多的进步呢？分析可知，两者不同之点在于：（一）《奉俄协定》是奉天当局以东三省自治省政府名义与苏联政府所签的协议，规定中东铁路由奉俄双方会商解决。而《中俄协定》则是中国与苏联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协议，规定中东铁路由中俄双方规定解决。（二）关于东省铁路的赎回期限两协定有较明显的差异。《奉俄协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俄历八月二十七日）订立之建筑经营东省铁路合同第十二条内所载之期限，应由八十年减至六十年。此项期满后，该路及该路之一切附属产业均归为中国政府所有，无须给价，经双方同意时，得将再行缩短上述期限即‘六十年’之问题提出商议。”《中俄大纲协定》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苏联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第三项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订会议中解决赎路之款额及条件暨移交中东路之手

续。”而《奉俄协定》规定：“自本协定签订之日起，苏联方面同意中国有权赎回该路。赎时应由双方商定该路曾经实在价值若干，并用中国资本以公道价格赎回之。”

一般认为这一点《奉俄协定》较中俄协定实有进步。但仔细考察可知，这一款前半部分规定，将中东铁路赎回期限由八十年减为六十年，并可将六十年期限再提出讨论，确实为俄国的让步，但这一条款的后半部分，却将本应在正式会议开会后即解决的中东路赎回款项及手续问题推延到赎路时再进行讨论，在这一点上《奉俄协定》有所退步。同时，苏俄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财政状况，坚持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路，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日本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据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交际处长张国忱事后回忆，当时张作霖主要想利用谈判达到要挟苏联不再援助冯玉祥的目的，而苏联谈判代表库质臬佐夫也口头答应了这一条件，因此张作霖与苏俄签订了这一协定[(253)]。俄方的目的则在接收中东路，《奉俄协定》成立后不足半个月，10月3日中东铁路就进行改组，逮捕了旧局长渥斯特罗乌莫夫与旧地亩局局长关达基等多人，任命伊万诺夫为局长，中东铁路控制权由旧董事旧督办之手移交于新董事新督办。10月13日中东铁路专门委员会改组成功，中俄协定成立四个月后仍不能解决的中东路问题告以解决。由此可以看出，《奉俄协定》签订的重要性不在协定本身有何进步之处，而在于苏俄与奉张达成一致后立即进行的中东路改组行动[(254)]。

加拉罕此时的身份是苏联驻华全权大使，他在与各国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订立了《解决两国悬案大纲协定》后，又以国家名义与反抗中央政府之东三省自治政府订立协定，是苏联对中俄协定的公然违背。国会议员们认为，加拉罕的做法“认东三省为独立国，蔑视中国主权已达极点”[(255)]。苏联这种言论与行动大相违背的做法，逐渐引起部分中国人的警惕，1925年10月在《晨报》副刊上展开的联俄与仇俄的大讨论，就反映了这部分中国人的心态。

综观1923年-1924年间中苏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苏联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其在华外交体现出重实利的取向。一方面，苏联最先放弃了其他国家都还在坚持的领事裁判权，并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华盛顿会议后中国民众力争收回这些权利而终未如愿的心理，实际上也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同时，在与中国的实际谈判过程中，加拉罕一如既往地运用苏俄外交政策中的“制衡政策”和“分离主义运动” 的策略[256]，力图利用中国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以获得对苏联权益的落实。

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期间，加拉罕曾与孙中山积极进行联络，以获得孙对苏俄谈判立场的支持并以与孙签订协定给北京政府施压，但最终因孙中山未取得实际权力，加拉罕认为与他签订政治协议无异于一纸空文，所以打消了这一念头。为了切实落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利益，在《中俄协定》签订不足四个月时，加拉罕以苏联驻华全权大使的名义，又与东三省地方当局签订《奉俄协定》。这样一种单独与地方政权交涉的方式，实等于把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并列对待，相当不符合外交常规，但当时中国舆论对此并无太大的异议，很能揭示中国政治氛围的特殊之处。

应该指出，东交民巷公使团对于中国政府外交的影响多少是存在的，但在中苏建交谈判过程中，这种影响被苏俄作为宣传手段多次使用。到中俄交涉的紧要关头，在法、美、日等国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致牒表明立场后，苏俄更加认定列强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是导致中俄交涉破裂的根本原因。当时中国社会舆论也普遍如此认为，各界人士多因此指责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国内社会舆论与苏俄的观点相呼应，使北京政府的谈判地位愈形困难。

更重要的是，加拉罕一开始就提出“与中国人民缔约”的口号，在谈判中多次采用将政府与民众区别对待的新型外交手法。他在宣传对华友好的口号下，实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沙俄留下的在华利益。这种做法虽不符合外交惯例，却相当适应那时中国较为激进的社会心

理，“国民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呼应了苏俄的新外交方式。包括知识精英和学生群体在内的“民众”积极要求参与外交自然是爱国表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外交谈判的正常进行，尤其当“民众”的立场恰与政府的谈判对手接近时，就给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增加了难度。不过，在这种不符常态的外交环境下，历来被指为“卖国”的北京政府，尤其是外交部，虽然实际只为中国争取了平等解决中苏两国关系的若干原则性规定，但在当时国家贫弱、民众情绪“激进”、外交不甚符合常态等种种不利情况下，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努力，仍应给予足够的肯定。

第三节　关税特别会议

一　北伐前中国的财政状况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不仅政治失范，而且财政经济也异常紊乱。由于政治上未能真正统一，地方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政令往往不出京城范围，地方财政税收多被地方实力派截留，不上缴中央，致使国家税收锐减。加之军事行动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陷入极度困境。

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关税和盐税。这三项税收中，田赋系传统税种，其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例自清季以还便逐渐减少，20年代中期约占全部税收的20％左右，基本上被地方截留。盐税系一相对稳定的税种，其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例与田赋大体相当。1913年以后该税种开始为外人掌握，作为外债抵押。抵押所余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其中一部分归中央，一部分归地方。如1918年至1928年这十一年间除1923年缺乏具体数据外，其余十年共征盐税6．4亿余元，其中中央政府所得为3．3亿元，地方所得为3．1亿元。关税则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全部税收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1918年，中国海关税收为5960余万元，1926年则上升为1．192亿元，1917年至

1927年这十一年内，中国的海关收入合计达9．93亿元，平均每年0．9027亿元。关税收入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比例1916年为15%，1919年为19%，到1925年则上升为26%，已经超过盐税和田赋，居于国家各项税收之首[257]。

但是海关税收并不能支撑国家财政，北洋时期，海关税收除大约20%留作“关用”即海关经费之外，大部分都被用于偿还内外债务，尤其是外债。有关数据清楚显示了这一点：1923年，中国关税总收入为98，706，234元，外债偿还额为56，991，960元；1924年两者分别为106，905，885元和55，283，832元，1925年分别为108，331，789元和82，209，421元，1926年分别为119，272，387元和75，413，315元，1927年分别为108，779，232元和81，612，925元。总计五年内关税总收入为541，995，527元，其中用于外债偿还部分为351，511，453元，占这几年关税总收入的64．85%。偿还外债并将一部分留作关用之后，所剩寥寥无几。在1912年至1927年之间，北京政府仅得到“关余”1．3亿元，只占关税总额的18%[258]。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债务压力一度有所减轻。原因在于中国应协约国要求参战，得到庚子赔款往后暂缓五年，至1922年11月之后再行续交的交换条件。由于加入协约国，与德、奥构成交战国关系，该两国战败后，中国所欠赔款自然取消。另外，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自愿放弃尚未偿还的庚子赔款。这三项赔款占庚款总数的49%。总计1917年底至1928年这十余年间，中国缓付和停付庚款达2．1096亿两，财政负担得以暂时减轻[259]。

尽管如此，地方和中央财政仍十分困难。1924年底，财政入不敷出的省份多达十七个。中央财政状况因地方截留等因，更显拮据。就在善后会议开会期间，据执政府方面透露，“各机关各军队新欠旧欠，统计已有七百余万元之巨”[260]。据1922年的《中国年鉴》报告，当时中央政府每月所需军政各费为920万元，全年所需经费约为一亿零八百万元，但当时实际月收入却远远低于这一数字[261]。

1912年至1927年中央可以用作政费的全部关税收入仅1．3亿元，1918年至1928年（1923年缺乏具体数据）中央政府所得为3．3亿元。据此推算，作为中央政府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平均每年只有3381万元，仅及所需经费总额的31．3%，但支出却有增无已。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预算严重不足。1919年，财政预算尚能大体维持平衡，收入为4．9041亿元，支出为4．9576亿元，收支额差仅535万元。但到1925年，政府预算岁入只有4．7164亿元，岁出则高达6．3436亿元，出入额差高达1．6272亿元[(262)]。为弥补预算不足，北京政府采取大量借债的办法。其借债方式繁多，有政府正式发行的公债，有短期的国库证券，有向各银行、银号举借的短期借款。借款中又分盐余借款、内国银行短期借款及各银行垫款三种。据统计，民初十五年间，北京政府总共发行了27种内债，预计总额达876，792，228元，实际发行额为612，062，708元，其中1924年至1926年三年共发行35，600，000元[(263)]。

由于缺乏财力，也无足够信誉，在国内发行公债时，北京政府不得不将本可用作政府各项财政支出的停、缓赔付庚款用做担保基金。据统计，在北京政府举借的十八次有基金担保的总额达3．5亿元的公债中，以庚款或关余做担保的有九次，国库券六次，两者债额达2．3亿元。其中仅1922年至1926年发行的公债就有123，834，910元[(264)]。这样，从1917年开始停缓赔付的庚款，对于北京政府就有了双重意义：它既使政府的外债压力得以减轻，又可用作举借内债的担保，取得内债收入，使关税、庚款、内债和财政构成连锁关系[(265)]。

除了内国公债之外，北京政府还大量举借外债。据财政部和交通部报告，截止1925年，北京政府所欠外债已高达22亿元，这些外债多数是向日本借贷，其次是向英国借贷，再其次是向美国借贷，其中一部分有担保，一部分没有担保。

但举借债务也面临严重问题：外债以海关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外债越多，中国的关税主权丧失就越严重，收回就越困难；而内债靠关余和缓付庚款作为担保，也容易给外国人干预中国经济提供方便，形成外国人不断通过关税来强化控制中国财政的恶性循环。

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所借内、外债大多不能用于经济建设，而是被用作军费。在所借外债的使用上，军政费占60%，铁路用费占35%，其余的用于工业。当时的舆论批评政府“恃债为生”[(266)]，实则连债也无可依恃。1925年，段祺瑞政府拟发行2000万元“八厘公债”，以解燃眉之急，但进行之时，却因担保、利息、折扣等问题，“屡触种种暗礁”[(267)]，遭到内外反对。最后通过强摊各银行勉强发行的1500万元公债，政府可用作政费的只有620万元[(268)]，而这笔款项尚不够还清政府的新旧欠款。1926年底，财政部已穷敝到连“100元之款亦不能开出”的艰难地步[(269)]。时人尝忧心忡忡地指出：“吾国所兴之债，大半用于军事之途，非特不能生利，而军队日益增多，为祸将无底止。甚至借债还利，层层加重，势非举全国所入，尽充债款利息不止。如此则破产之祸，岂俟数年后哉？”[(270)]

在财政极端困窘的形势下，关税会议自然对政府当局产生了吸引力。

二　各国对关税会议的态度及“金佛郎案”的议结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成立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1924年3月，北京政府外务部分别致电与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公使及驻京外交团，正式提出召开关税预备会议的要求，遭到各国拒绝。“法国谓本国尚未批准华府条约，故认此时尚非可开预备会议之时机。意、比两国谓，……中国政府未允解决金佛郎问题，……他日如开正式关税会议，本国自当参加，但此时则并无开预备会议的必要。英、美、日、荷等，则谓本使无反对关税会议之意，但因法国尚未批准华会条约，手续未臻完备，故不能开会，如法国加以批准，则固不必待商榷，即

可开正式会议也”[271]。关税会议的召开因此再度推迟。

1925年4月8日，段祺瑞政府向法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希望法国政府批准华府会议公约，使关税特别会议能“克期召集”，“至于解决（金佛郎）赔款问题，系另属一事，与本案绝对不能牵连”[272]。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还向各国递交了迅即召开关税会议的照会。

对于段祺瑞政府的请求，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态度不尽一致。

（1）美国　对中国邀集各国召开关税会议，美国并不反对。如前所述，华盛顿会议是在美国的策划与领导下召开的，会议成立的条约大抵以美国的提案为基础。关税会议召开的依据系华会有关协定，美国自然要促成这一会议召开。对于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要求，美国有时也能表示同情理解。《纽约时报》社论指出：美国愿意“于拟议中国关税会议之中，扩充议程，使包括其他议题，或将有继续华府会议之举。华人领袖亦知其欲完全摆脱外人干预之愿望，将得美国人之赞助，且知一俟有撤销外人特权之时机，美国将运用势力，使其有成”[273]。但美国对华政策的立足点仍然是自身的利益，在实现这一利益的过程中，与英国形成明显的竞争关系。1925年夏发表在报章上的一段评论，颇能说明这一点：“美国甚愿取得中国经济政治之利益以消灭英国优越之权利，英国借不平等条约之力取得之利益甚多，美国现财力雄厚，欲利用时机取消不平等条约，取英国之地位而代之。英国有多数殖民地及岛屿，与美国有密切之关系。美国因财源兴旺，又有巴拿马运河之联络，极希望利用此时机，以取得种种利益，近来对于中国自然竭力相助，但将来对于中国更较他国为危险，因其资本之大、机器之良，更优胜于他国。”[274]

（2）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美、日势力增长，英国力量相对削弱，国际地位有所下降，其在华权益亦受到美、日两国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在广泛掀起的反帝运动中，老牌的在华拥有特权最多的英国成为中国民众反对的主要对象。

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同年6月23日发生的“沙面事件”，更是激起普遍的反英浪潮。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护自身利益，缓和中国民众与英国的敌对情绪，英国政府需要提出关于中国关税问题的新方针。正如英国首相张伯伦所言：“要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好是召开关税会议，增加税率，使中国财政有办法。”[275] 中国海关监督、英国人安格联也主张在关税等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基本上，有关列强应该了解，数十年来用武力造成并维持的地位，已不再能由渐缩的声明保持。……欲恢复秩序，条约各国应该召集一个会议以修改条约，并且列强应有做大让步的准备。……取消1898年的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应有华代表，关税应增加。”[276]

（3）日本　就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而言，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战后日本不仅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且对华贸易有了极大的发展。从1919年到1925年7年内，日本对华外贸输出额在其全部输出额中所占比例平均每年为29．76%，而美国只占到4．6%，英国只占到2．17%。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关税税率变化对于英、美两国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但是对于日本却关系重大。日本的商品输出大国主要是美、中两国。1924年东京大地震之后，日本对外贸易严重入超，但其对华贸易常有巨额出超，因而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意义重大。从经济角度分析，日本是反对中国关税自主、不满美英两国在中国关税问题上妥协的。但是从政治上看，日本十分担心中国政局不稳会损害其在华利益。日本币原外相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仔细观察中国时局发展，不能不考虑近来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假使忽视中国情况的变化，将是很大的错误。军人可能随着战乱起伏不定，但国民自觉一旦发生，却不容易消灭，如果受外方压迫，将会愈发强烈。中国国民自觉的要求之一即为恢复关税自主的渴望，我们应该特别觉察这种情势。”[277] 如果因为关税问题导致中国政局不稳，日本在华利益会受到直接损害，因此，币原主张基于中国政局稳定的大前提，来考虑是否给予中国关税自主权。

此外，日本在作政治决策时，还必须顾及美、英的立场及相关利益。在“五卅事件”之后广泛开展的反帝运动中，英国首当其冲，但日本也是中国民众反对的重要目标。这种利益关联使日本在英日同盟终止之后，仍然要与英国在对华问题上协调。因为如果英国在“五卅”之后陷入孤立，其在华租界或其他特权丧失，在华拥有十二个租界的日本也会受到连带影响。对于美国，日本已与之形成竞争关系，不愿意美国独立实施为中国人欢迎的政策，独享其利，因而在对华问题上具有与美国持相近立场的可能性。不过日本对华立场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关税税率变动所涉及的日本的经济利益，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基于政治作出的表态往往让位于经济的考虑，其对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立场也因此表现出复杂性与多变性。

（4）法国　在关税会议问题上，中、法之间的最大障碍是“金佛郎案”。如前所述，曹锟通过贿赂当上大总统后，因各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以金佛郎偿付法国赔款，曾打算通过秘密谈判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但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出后，各界反应强烈，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歧，国会议员纷纷对内阁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曹锟政府被迫照会有关各国，回绝了以金佛郎偿付法国的要求。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此时，列强为促使段祺瑞履行“外崇国信”即继续履行条约义务的诺言，表示愿意按照华盛顿会议决议，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实现二五加税，帮助段政府解决各种困难。而段政府为增加关税，缓和财政危机，亦准备召开关税会议。但是，由于法国尚未批准《九国公约》，关税会议因此无法举行。法国批准《九国共约》的先决条件为中国承认“金佛郎案”。为达到这一目的，法国政府提出愿意退还比、意、西、法四国扣留的两年关余和盐余。以此为前提，中法两国举行了秘密谈判。1925年4月11日，段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该案并于次日与法国签署协定[(278)]。协议成立后，法国国会两院于同年7月7日和10日先后批准《九国公约》[(279)]。关税会议召开的外部条件因此具备。

段政府在发布的通电及有关文件中，对该案的解决作了如下解释：1．中国对外经济政策，首在保全华府会议精神，华府会议除收回青岛及对德取得各项优越条件之外，其于中国利益最关重要者，尤在关税会议，此案不解决，法国拒绝批准九国公约，关税会议不能召开；2．关税会议不开，二五附加税不能实行，仅此一项，中国每年至少损失2400万元，而法、比、意、西四国所扣关余一千五百余万元也不能收回，且将继续扣留，致使一切财政计划无法执行；3．法国方面作了按照1905年所用电汇方法计算的让步，等等[280]。

段祺瑞政府的决定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旅津、沪、汉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宣言，表示对“所有段祺瑞发布之伪法令及私自缔结之对内、外一切契约，同人概不承认”。北京国会亦发表通电，反对“金佛郎案”，认为政府此举是在“欺骗国人”，所谓新协定，不但不能挽回中国的损失，反而会使中国“损失更多”[28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浙江、湖南等省议会，均发表反对“金佛郎案”的通电，北京各界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请愿。中共也通过《向导》周报，分析议结“金佛郎案”对中国的危害，指出政府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为奉张筹备战费，此案朝解决，奉张与国民军之大战夕就要爆发”，号召国民“立即起来反抗”[282]。由于各界强烈反对，北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提出检举案。6月17日，总检察厅指派检察官翁敬棠从事调查。10月2日，翁提出检查理由书，指控财政总长李思浩、外交总长沈瑞麟在“金佛郎案”交涉中触犯刑律，应“侦察起诉，以彰国法”；司法总长章士钊“越权揽办”，“促成其事”，应并案办理，以肃法纪。此事迁延数月，李、沈、章等人虽未受到起诉，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十分巨大[283]。在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各界坚决反对下，“金佛郎案”虽经段政府与法国正式签订协议，却未能付诸实施。

总之，各国对于中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态度，与其自身利益及“五卅”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有密切联系。由于列强普遍认为，中国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要求各国兑现华盛顿会议维护中

国主权承诺的一种表示，因而仍然愿意按照华盛顿会议的逻辑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关税会议最终得以召开的重要原因。

三　关税特别会议的召开

（1）会议的召开及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

法国政府批准《九国公约》，使关税会议召开的最后一道障碍不复存在。1925年8月5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国代表在华盛顿交换1922年2月6日所签各约的批准书，华府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从速召开关税会议。8月18日，段祺瑞政府照复各国，宣布关税特别会议拟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邀请各国政府派代表与会[284]。关税会议进入筹备阶段。

关税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传出之后，国内舆论很快出现反对和赞同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上海因直接受“五卅事件”影响，舆论较为激进。上海学生联合会获知关税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立即发表宣言，指出关税会议是“五卅事件”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政策”，认为这次会议“于外国债权者有利益，于武人政治有利益，绝无丝毫补益于国民”。宣言明确表示：“一国之关税，主权所有，岂容外人置喙其间而逞其损人利己之私欲。职此理由，无论关税会议是否要借端议及共管，关税会议即以纯然有利于中国为目的，吾人亦绝端反对。”[285] 但北京的舆论却不同于上海，虽然也有一些反对意见，但赞成者似乎更多。《关税会议专刊》刊登的一篇讲演稿曾这样评论关税会议：“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在北京可以说是最漂亮不过，大家喜欢听关税会议——不只是学校里的学生喜欢，医生、女学生、老年人，社会上的各种人——也都喜欢。”[286]

在多数情况下，国内政治家、民众、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人组织赞成召开关税会议，但却主张通过会议实现关税自主，不赞成以“二五增税”为中国与会之目的。中国驻外各使节联名来电指出：“历年海关

统计，输入远过输出，工艺衰落，商业永无起色，皆此苛则悬为厉阶。此次会议应以自主为要，应由我自定税率，不能听他人以五改七·五。倘囿于目前之小利，祸必延及子孙。”[287] 华侨组织神阪中华会馆致书段祺瑞，指出：“关税束缚，亘八十年，主权生计，两被侵剥，今幸关会开幕，务乞劈头要求完全关税自主，克日收回。二五加税，终属枝节。若以条件交换，则直售主权耳。……恳据理力争到底，毋稍退让，侨胞誓为后盾。”[288] 一些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及思想家也发表文电，宣示主张。赵恒惕在一份通电中强调：“关税自主，为独立国家应有之主权，亦即行政完整所必争。……现会议即开，就对外言之，进行之步骤，固可协商，自主之精神，不容稍损。……深望我国委员，努力壇坫，毋轻受外国之欺以欺我国人也。”[289] 陈独秀在《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五卅以来参加民族运动的民众，对于此次关税会议，应取何种态度呢？会议是定要开的了，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的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下要求加税。”[290] 显然对会议抱有一定的希望。

与关税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商会组织对关税会议亦普遍赞同，但强调必须坚持关税自主立场。例如，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指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中国应有“自主之精神，以拥护国体之尊严”，绝不能“仅以二五税开议”，希望政府坚定立场[291]。上海银行公会在致段祺瑞及财、外等总长的电文中，提出包括“关税定率应力争自主”在内的四条建议[292]。上海总商会王晓籁、劳敬修、陆伯鸿、闻兰亭等列席关税会议，他们带有上海总商会的提议案及各种文件，宣称“此行目的，即在达到关税自主。倘此次关会结果，仅得增收二五率，而不能贯彻自主，则同人誓当力争”[293]。华商纱厂联合会甚至主动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关税会议能“加入全国纺织工业参议三四人”，结果政府同意聘该会推荐的代表担任关税特别会议顾问[294]。

在舆论影响下，北京政府决定“以关税自主并裁厘为确定政策”[295]，如期召开关税会议，并为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首先是就中国出席会议代表作组织安排。9月5日，段祺瑞特派沈瑞麟、梁士诒、颜惠庆等十二人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10日，执政府议决，十二个委员中，由沈瑞麟、颜惠庆、蔡廷幹、施肇庆、黄郛、梁士诒等七人为出席会议代表。不久又决定分为三组：1．关税自主组，梁士诒任主任；2．裁厘加税组，颜惠庆任主任；3．税款存放及其他问题组，黄郛任主任。作为段政府拟任命的关税自主组主任，梁士诒为段祺瑞拟订的关税修正提案丝毫不涉及国人最关心的关税自主问题，遭到国人强烈反对。10月22日，段祺瑞以素主关税自主的王正廷替换梁士诒，并对中国政府的提案作了修改[296]。10月24日，北京政府公布《关税定率条例》，宣布进口货物除烟酒外最高税率为40%，最低为7．5%。同日又公布《烟酒进口税条例》，规定烟酒进口税率为50%—80%。所有外国货物进口均按“本条例所定课税办法征收进口税”[297]。这两个条例，系北京政府抛出的自主关税即国定税则条例的标准。北京政府这样做，既是对国内舆论的积极响应，也是试探各国反应的一种手法。

1925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居仁堂正式开幕。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为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庆、蔡廷幹，秘书长为严鹤龄，汪大燮、胡惟德、林长民、罗文幹等三十九人为高等顾问，张竞仁、虞和德、胡筠、马素等十五人为参议，唐在章、陈恩厚、贾士毅等七十三人为专门委员。其他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分别为：美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马慕瑞·司注恩；比利时，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华洛思；丹麦，驻华特命全权公使高福曼、北京丹麦公使馆参赞狄礼慈；法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玛德；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麻克类、上校皮乐、曼彻斯特商会会长史图德；意大利，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翟录弟；日本，特命大使日置益、驻华特命公使芳泽谦吉；荷兰，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欧登科；挪威，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米赛勒；葡萄牙，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毕安祺；瑞典，驻

日本与中国特命全权公使艾维娄福、驻北京公使参赞雷尧武德；西班牙，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嘎利德。除了全权代表之外，各国还派有专门委员与会[298]。

会议由中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主持，段祺瑞代表中国政府向各国代表致欢迎词。在欢迎词中，他阐述了“我国民全体之希望”，重申了中国政府坚持“关税自主”的立场，强调关税会议系根据华府会议精神召开，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希望关税会议成为实现《九国公约》的机会[299]。段祺瑞致词毕，沈瑞麟以中国外长身份致词，着重强调了外交上“因时制宜”的原则，主张条约规定可以而且应该随着“变更之情势”，“随时修正”。明确指出：“中国协定关税制度，创始于八十年前，原为适应彼时之情况而设，现在该项情况既已消灭，则此种制度实属不合时宜，自不应任其存在”，希望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设法改善中国关税诸问题，俾中国得以早日行使其关税自主权”[300]。

段、沈致词完毕，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王正廷宣读《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关税自主之提案》，郑重宣布：鉴于1922年1月5日远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宣言讨论中国实施关税自主的“适当机会”已经到来，中国政府特根据《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之精神，拟定除祛现行条约上税则上各种障碍，推行中国关税定率条例与实施关税自主之办法五条：1．与会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2．中国政府允将裁撤厘金与国定税则条例同时施行，但至迟不得超过1929年1月1日；3．在未实行国定税则条例之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4．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行征收；5．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301]。

中国政府虽大体是在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原则框架内作出

上述表示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所突破。第一，各国并无在关税会议上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的打算，而中国政府却在承诺中国裁厘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第二，中国主张过渡时期普通商品附加税加增5%，超过各国认可的2．5%的标准一倍；第三，过渡时期奢侈品附加税大大超过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5%的标准。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作为在谈判桌上向各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2）有关关税自主与裁厘问题的争执

10月27日，关税特别会议会务委员会在居仁堂召开第一次会议。王正廷任会务委员会主席，会议对中国政府为支配会议程序于事前拟订并送呈各国代表的议事日程进行了讨论[302]。由于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加之自会议决定召开以来国内民众要求关税自主呼声高涨（10月26日会议开幕当天北京各大、中学校即举行大规模的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给各国代表造成一定压力[303]，各国代表被迫同意将（甲）关税自主问题，连同（乙）过渡期间之临时办法，以及（丙）与关税会议相关事项一道，列为会议“应行讨论之问题”，并组织关税自主、过渡办法、有关事件三个委员会，分别处理相关事宜，另成立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会议文件。

10月30日，关税自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王正廷首先重新宣读中国代表团在26日大会上提出的关税自主议案中的五项条款。他特别申明中国政府欲通过会议，修改华盛顿会议所定国际条约具体内容的立场，强调：“中国在华会固与各国订有条约，中国虽无蔑视条约义务之意，然现今情势变迁，前订条约，大有不得不请修改之势。”他指出，华府条约之精神，值得赞赏，但华府条约的“条件”却难以为中国接受，“盖华会之精神与其条约上之文字或条款迥乎不同”，希望各国尊重中国国情民意，促成中国关税自主[304]。

对于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各国态度不尽相同。日本代表日置益

认为中国可以自行“创制适用于一般之国定税率”，但国定税率的制定“不得妨碍中国与各国之通商关系”。外国对于中国的财政及司法上的“片面束缚”虽然应当解除，但外国强加给中国的这些东西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中国“本国之缺点”，如果“不先除去其原因，纵如何欲纠正其结果终属徒劳”。基于这一认识，日置益主张中国效法日本1894年与各国改订条约“至签约五年后方发生效力”的做法，推迟实施关税自主的时间。主张废除旧约和实施国定税率均须通过“一定之程序”，反对“列国即时并无条件的放弃现有条约上之权利”[305]，不主张中国立即实施关税自主。

美国代表司注恩表示，关税自主是主权国家的权利，当实施关税自主“与其本国人民之权利及其有约外国人民之权利俱无抵触时”，中国“自得享有关税自主”。美国政府愿意促使这一时机的早日到来，但在时机成熟之前，美国只能按照华盛顿条约的规定行事。司注恩特别强调关税自主与裁厘增税的“连带关系”，表示中国“如不将关税自主何时及如何实行与厘金是否裁撤及如何影响有约各国明白见示，仅由各国分别声明愿将中国所希望之关税自主让与中国”，美国方面将不会感到满意[306]。

英国公使麻克类更是极力主张将裁厘作为中国实施关税自主的前提。他指出，中国现在是两种税率同时并行，其一为海关税率，尚有若干限制；其二为内地税率，随时变更，任凭课税当局之意，毫无限制，致使“外人商务极感困难”。在此情况下，“尽裁厘金实为讨论恢复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重要关键，盖如照通义，承认关税自主为国家主权，则不能承认各省施行完全税率自主，亦为其主权也”。

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丹麦、比利时等国也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国关税自主，承认这是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但同时强调，“此项权利并非谓可以蔑视与其他各国所订之各条约也”。在中国国家主权受到不平等条约严重侵害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以不“蔑视”中外条约的方式去获得充分主权，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对于中国政府提出

的会议议程，各国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不赞成将关税自主（第一项议程）与裁厘（第二项议程）分别讨论，认为“裁撤厘金与关税自主乃相连之问题，故视裁撤厘金应在完全关税自主之前”，要求中国政府将“裁厘之确实计划”向大会说明[307]。

在当时，裁撤厘金是一个相当敏感又极为困难的问题，因为中国并无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治权的中央政府，段祺瑞也仅仅是“临时执政”，中国就政局而言，已形成南北对峙、军阀割据的态势。由不能有效实施治权的中央政府裁撤厘金，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列强即便没有以裁厘来阻碍中国实施关税自主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为中国要求关税自主设置了障碍。

在11月3日召开的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美国和日本就关税自主、裁厘及过渡办法等分别正式提出议案。日本的提案要点有二：其一，中国在裁厘之后，始得实施国定关税条例；其二，在实施国定税率准备期内，中国与关系国订立取代现行关税条约的新约，须与国定关税条例之实行同时。日本的议案表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实则故意与中国为难。因为若日本真承认中国能实行国定税率，则不当要求中国在准备期内先定新约；既要求协定税则于前，复同意国定税则于后，于情于理，均属不当。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国定税率条例须与新协约同时实行，如果中外互惠协定不能成立，中国的国定税率岂非永无实施希望？因而，日本的提案，无异以片面的协定、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强加于中国，根本谈不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美国提案条件较日本为多，表面同意中国关税自主，实际上对中国要求关税自主亦甚刁难。美国提案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为原案第三条第四款。该款将中国大部分内地税视为厘金，要求废除，这就大大扩展了厘金的范围，使中国实施国定关税的前提条件更难具备。此外，美国提案第三条第五、七两项规定了中国增收关税的用途，此事本应由中国自行作主，美案作此规定，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其第十项规定召集缔约国代表会议审查厘金是否业已裁撤，又构成一种新的约

束，足令外人遇事要挟，以展缓中国关税自主之实行[308]。

13日，关税会议第二（过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国委员将中、日、美三案胪列说明，表示对该两国提案不能满意。英国代表在比较中、日、美三案的基础上，提出十三条“节略”，表面折衷，实际偏向日、美，强调附加税问题，“有将自主问题无形打销之势”[309]。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代表王正廷在次日会上，提出三点声明：第一，关税自主应明白规定于条约内；第二，裁厘系中国改革内政的主动表示，并非关税自主的交换条件；第三，中国参与会议，意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裁厘纯属中国内政，将二者相提并论，中国碍难承认[310]。

实行关税自主之前过渡时期应行筹备事宜表[311]

筹备事宜			开始筹备日期	筹备工作完成期限
一、附加税之支配	甲、整理债务		1926年4月1日	1926年7月31日，共计四个月
	乙、发行债券（为抵补裁厘及整理债务并建设事业等用）		1926年8月1日	1926年11月30日，共计四个月
	丙、分配中央及地方抵补金		1926年12月1日	1928年2月29日，共计十五个月
二、裁撤国内通过税	甲、调查时期		1925年12月1日	1926年5月31日，共计六个月
	乙、讨论及决定时期		1926年6月1日	1926年11月30日，共计六个月
	丙、实行裁撤时期	第一期、裁铁路货捐	1927年1月1日	1927年2月28日，共计两个月
		第二期、裁常关及50里外及内地税	1927年3月1日	1927年6月30日，共计四个月
		第三期、裁厘金及正杂税捐含有通过税性质者	1927年7月1日	1928年2月29日，共计八个月

与此同时，中国代表提出实行关税自主之前过渡时期应行筹备事宜具体方案，以证明中国政府能够在两年内完成裁撤厘金的工作（见上表）。

在中央与地方利益不能协调一致的情况下，要使裁厘工作顺利展

开，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向地方政府提供抵补金。为此，中国代表王正廷提出如下设想："厘金既为各省进款大宗，为裁厘计，自不能不筹一宗款项，以抵补各省因裁厘所受之损失，故中国政府一方面欲详查征收厘金各局卡之数目，而他方面欲筹一宗款项，以抵补各省一年间之损失，而实行裁厘亦在此年内举行，庶若干厘卡一经裁撤之后，所有各省在厘金项下之收入得由此筹备款项内抵补，过此时期以后，应由关税项下拨出一部分以抵补逐年厘金之收入。"[312] 基于这一设想，中国代表表示，中国准备在1928年2月底之前分两期完成裁厘，对于各省在裁厘后财政上遭受的损失，在第一时期由增收关税附加税项下划出一部分，作为抵补；在第二时期，即已经实现关税自主之后，直接由关税项下拨付。

对于中国的立场，英国代表皮乐极力表示反对。皮乐强调，由于"宪法惯例之拘束"，与会各国代表并无宣布废除中国所受条约束缚的权力，所有有关中国享受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均需各国代表团"向各该国政府建议"，订立条约，方可成立。在新订条约中，须写明"中国国定关税税率条例应于裁撤厘金时实行"，坚持以裁厘为中国享受关税自主权力的先决条件。美代表马慕瑞附和英国代表的主张，表示如果会议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议案，不但超越了美国代表团作为议约人的权力，"即美国行政元首亦无权办此。唯有大总统咨询上院并经其同意后方能行此权力，因此，本代表团万难依提出程式赞同此案"。会议形势顿时对中国不利，第二委员会亦因此出现"无限延会"的局面[313]。

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代表欧登科出面调停，建议会议"于中、英两案以外，另拟条文，其首句当能尽如中国之意，而一方面至少可祛除某某代表团因宪法上理由所表示之困难"。与此同时，王正廷以主席身份提出组织"小委员会，试为融合各种意见，再行提交本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丹麦代表高福曼及其他国家代表的赞同。于是决定在第二委员会中设立"小委员会"，抛弃各案，另行起草具体方案。当

即指派王正廷、欧登科、司注恩、麻克类、日置益等五人为小委员会委员[314]。两天后，小委员会开会草拟关税自主条文，英国仍坚持诸案并列以无形取消中国关税自主要求的态度，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最后采纳美国代表的折衷提议，仍以中国所提原案加上日本代表团的方案，提交第二委员会讨论。

11月19日，关税会议召开第一、第二委员会联合会。在比、法、意、西等国声明赞同但须报经本国政府批准的前提下，一致通过中国关税自主并裁厘的议案："参与本会议各国代表，议决通过下列所拟关于关税自主条款，以便连同以后协定之其他各项事件，加入本会议将来所缔条约以内：除中国外各缔约国兹承认中国有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力，应允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条约内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中华民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应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同时施行，并声明于民国十八年1月1日（即1929年1月1日）实行裁厘。"[315]

此项议案基本接受了中国方面的主张，它的通过，是中国朝野一致力争的结果。颜惠庆在其《自传》中指出，协定关税严重伤害中国主权，中国虽曾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先后提出交涉，但列强不加理会。"现在国内舆论对此种国际无理压迫，既然表示愤慨，而政府中主持外交的人员，对于国际法的认识，又远较过去清楚正确，同时兼具勇气和决心，敢于与帝国主义挑战，指责其昔日束缚中国的阴谋，违背正义，必须改变态度。故此次我国代表在关税会议中的战略，不似过去华盛顿会议时，仅凭过去的条约加以修正，而系跳去往日的樊篱积极的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无论如何，我国关税自主，在原则上，既于此次会议中得着列强的共同承认，虽实行之日期未经确定，但不难依法推动，以求能于短期内实现。一百年来，我国财政和经济上，在关税方面所遭受列强不公平的桎梏，现在总算得到解除。"[316] 关税自主议案的通过，系关税特别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取消协定关税的

条约规定提供了国际协约的依据。

（3）关于过渡时期加增附加税的问题

关税会议第一项议程即有关中国关税自主的讨论以上述议案的通过告一段落，但有关过渡时期加征附加税问题的谈判却一波三折，极为艰难。

关于“附加税”问题，早在1900年准备与列强谈判修约时，清政府便已提出以“裁厘加税”为基本内容的主张，参与谈判各国原则上接受了这一意见，只因税率未能达成一致，谈判无果而终[317]。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问题成为中远东问题之重心，中国代表先后两次向国际社会公开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实现关税自主。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要求自1922年1月1日起，将名义上的5%的协定关税率提高到12．5%，并在承诺取消厘金的前提下，征收附加税，作为实现关税自主的第一步。然后制定税则，最终恢复关税自主权。但会议通过的决议只同意使税率达到切实的5%，并同意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裁厘加税问题，在中国废除厘金之前（即过渡时期），准许对一般进出口货物增收2．5%的附加税，对奢侈品增收5%的附加税[318]。这就是关税会议讨论“附加税”问题的由来。

按照会议议程，11月6日，关税特别会议召开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附税增加和税率提高问题。王正廷主持这次会议。中国代表颜惠庆在会上提出《中国关于进口货物临时附加税税率的提案》及附属文件，主张在实行国定关税税率条例之前，中国海关税则在现行的值百抽五之外，普通进口货物加征值百抽五的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的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化妆品、丝织品、珠宝等）加征值百抽二十的临时附加税。蔡廷幹宣读了中国政府关于过渡时期征收各种附加税及税率的理由书，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普通进口货物加征值百抽五临时附加税，理由书指出，华府条约规定中国税率加征2．5%，系四年前的规定，现今中国财政枯

涸之状况，已远非华府会议时所能比。对于华府会议，需要贯彻的是精神，而欲贯彻其精神，则“非暂行加税，俾裁厘易于进行，债务得就清理，建设可有的款，政费得所补助不可”。（2）关于奢侈品的税率，理由书指出，从国际贸易的现状看，各国无不对奢侈品课以重税。以烟酒为例，日本的烟税为值百抽三百三十五，意大利为值百抽三百，英国烟叶值百抽四百六十，烟丝值百抽五百，白兰地酒值百抽八百，就是中国各省征收本国烟酒税也有值百抽八十以上者。中国现行烟酒进口税率，较之日本仅五十分之一，较之意大利仅四十分之一，较之英国仅八十分之一，较之中国本国所产烟酒也仅十分之一。中国税率之轻，“甲于天下”，致使外国烟酒“运销内地，通行无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适当提高税率，无可厚非[319]。

中国增加临时附加税的意见，遭到日本代表强烈反对。早在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数日（即10月30日），日本公使重光葵就向颜惠庆表示，解决中国政府财政危机有3000万元便已足够，无需加征附加税。颜惠庆当即予以严厉驳斥[320]。当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宣读《提案》并申述理由之后，日本代表表示反对并提出如下主张：（1）华盛顿会议规定中国在实施国税法之前的过渡时期只征收2．5%的临时附加税，此一税率为与会各国政府承认，若提高税率，须另立协定，窒碍难行；（2）实施高于2．5%的附加税“必致扰乱中国与各国之贸易关系，而影响日本之工商业为尤甚”；（3）征收2．5%的附加税所得款项，连同其他来源所得税款，已“足以使本会议能筹划一可以实行之计划，以应付中国之需要”，并“促进中国财政之总行善后也”；（4）附加税之用途应限制在抵补裁厘、整理债务及各项行政经费范围；（5）中国债务整理应将“外债一并整理”，筹款偿还之法为“发行联合债券，以关税为抵押”[321]。日本的用意，实际上是想维持其对华贸易的有利地位并将附加税之一部分划出，以偿还诸如西原借款一类无担保借款。

其他各国也分别就附加税的用途及税率问题发表看法。美国代表

认同中国代表团作出的3000万元不足以抵补裁厘损失，实际需要不下7000万元的估计，但不赞成中国政府提出的税率标准，主张突破华盛顿会议划定的二五附加税范围，“以五厘为最低税率，十二·五为最高税率”，中国政府可在此范围内将各种货物分别登记征收关税，认为照此办法，“大约中国每年立可实收一万万元之谱”。但中国应“申明陆海边界须有划一税率之必要”，并规定“凡由实行此项规定所增收之关税，应由海关存储”，以用于“指定之用途”[322]。英国代表皮乐赞成美国方面的意见，认为美国的方案“程式最臻完备”，“可为讨论最良之基础”，并提请中国代表团“将提案之各部分汇集”，使之与美国提案“程式”相同，以“调和会议开始时所必有的各项异议”。丹麦代表高福曼表示，在中、日、美三国方案中，美国的方案最为完备，丹麦对“该项方案之原则表示完全同情”。意大利代表翟录弟表示，在中国国定税率实施前的过渡期内，应给予中国相当之附加税，以足供清理借款、抵补厘金及民政费用，“其税率应高于华盛顿条约第三条所规定值百抽二·五及抽五之税率也”[323]。

美、日、中三国提案有共同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原则分歧。在临时附加税问题上，日本坚持华盛顿会议二五税率，美国虽主张突破这一限制，但却提出以十二·五作为最高税率。对于增收之关税，美国主张应由海关存储，美、日两国均主张将所得关税用于“指定之用途”。这与中国政府的期望差距甚大。

为寻求讨论的共同基础，根据会议代表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在11月13日召开的过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中日美三案比较表》并发表了四个重要文件：（1）中国代表团对于临时附加税用途之宣言；（2）拟征进口洋货附加税收数表；（3）临时关税附加税基金委员会组织大纲；（4）中国代表团对于美日两提案之见解。会议就中国代表所提四个文件涉及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王正廷态度强硬，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会议将无限期推迟。但日、美等国代表丝毫不愿让步，会议因此出现僵局。

11月21日，第二、三委员会继续就此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由王正廷换成了曾宗鉴和蔡廷幹[324]。11月23日，关税会议税率小委员会开会，中国代表提出附加税率具体方案，大略为普通商品值百抽五，年约三千万元，甲种奢侈品值百抽三十，年约三千二百万元；乙种奢侈品值百四十，年约五千万元。中国代表提出的这一方案，“普通品增加税率较之华会原议增加一倍，奢侈品附加税率增加四至六倍，各国以此项税率过高，未肯赞同”[325]。关于普通商品，英日主张仍以华会二五为限；关于奢侈品，各国大多反对中国的主张。为使主张获得通过，在开会的同时，中国代表频繁展开会外活动，约见各国代表，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及人民的立场，说明关税问题解决对于中国国家命运前途的意义。中国代表的努力收到一定成效，如意、法两国代表就表示不赞成利用关税会议来解决债务问题。但在税率问题上，各国均坚持原议不改，美国代表特别强调债务须有担保，附加税的一部分须用于此[326]。

就在会议紧张进行的11月22日，北京三十余团体发起“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大会”，决议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列国若不承认，即解散关税会议，自行宣布废除一切关税条约，实行关税自主，与会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关税会议形势，顿受影响。与此同时，各地“反奉倒段”运动高涨，北京政局动荡，中国委员常不到会，各国借此机会，“更力持华会二·五附税之议”，形势急转直下，会议遂呈无形停顿之势。为扭转局面，段祺瑞政府作了新的人事安排。12月2日，特派龚心湛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24日，又特派陈锦涛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越三日，复任陈为全权代表[327]。与此同时，北京政府通过私人接洽途径，极力向各国疏解，“冀双方接近妥洽”。

在此期间，日本委员佐分利回国磋商日本政府对关税会议的政策后返回北京，提出以订立中日互惠条约为条件承认加增二·五以上附加税方案。其主要内容为：（1）关税会议完竣时，即承认加税；（2）加税货物分七种，税率由附加二·五至二十五；（3）日本输华之棉

纱、棉布、砂糖等类重要商品，只允征二五附税，加工制造之棉布可酌增若干；（4）日本撤回延期支付案；（5）税率提高后，中国每年约增加七千万元，以四千万元还内外债，二千至二千五百万元作裁厘基金，五百万元为政费；（6）中国要求增加税金修筑铁路，日本不予承认[328]。日本这一方案，将其主要输华商品列入仅加增二五附加税的范围，其余商品虽可加至二五以上，因其非输华商品之大宗，中国从中获利甚少，不能达到拟定的附加税增收标准。但该案毕竟突破了华盛顿会议的税率标准，故中国表示可以商议。美国、法国见此，亦向中国提出订立互惠条约的要求[329]。嗣因中国政治形势变化，这些互惠条约均未议定。

1926年2月18日，关税会议重新开会，继续讨论附加税问题。中国代表在小组委员会开会时提出新的税率，“主张分七级税率，最高二成七分五厘，最低二分五厘”，将最初提出的最低值百抽五、最高抽三十的附加税增收标准适当下调。对此，各国大致没有异议，“惟级数主少，英提案主三级，美案日案均主五级”，所争已不带实质性[330]。28日，关税会议过渡办法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颜惠庆代表中国再次就附加税总额和分配比例提出议案，主张临时附加税预计增收之数，应在九千万至一万万元之间（较上年11月23日提出的方案减少一千二百余万），全部增收关税按照3：3：3：1的比率，分别用于抵补裁厘、整理无确实担保之内外各债、建设事业费和紧要政费。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还提出《整理债务办法》，以示诚意[331]。对于中国的方案，与会各国代表经多次讨论，并改定税率，重分货类，最后初步达成妥协，“允将附加税增至七千余万元至九千万元”[332]，但外国代表不赞成将预计增收的附加税数额载入议案[333]。尽管尚未完全实现中国代表预期的增税目标，关税会议能够在附加税问题上初步形成大大突破华府会议决定的倾向性意见，应该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成果。

不过这一意见并未成为会议正式决议，原因在于“此项税率超过

华会税率范围，须俟各国批准方能实行”，而要得到各国政府批准并付诸实施，按照中国关税委员估计，至少要等到次年春季之后[334]。在未获批准实施之前，如果仍用值百抽五旧率，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而二五加税系华会条约的规定，无需再经各国政府批准，只要关税会议议定具体实施办法即可。因而会议在就中国代表提出的新税率及增税总额大致达成妥协之后，又专门就二五加税的实施展开讨论[335]，并决定由英、美、日、法、荷、中六国代表组成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协商审核议案。

1926年3月12、18两日，关税会议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召开第四、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征收二五附加税议案。对于开征附加税的时间，英、法等国代表以货运费时为由，坚持主张“自本议案签字日后三个月起”（即自7月1日起）施行。中国主张自4月1日起征收二五附加税；奢侈品再加二五，不超过6月1日起征收，以便编制奢侈品表。荷兰代表出面调停，主张改为6月15日，未有结果。对于所征税款的保管问题，中国的提案为“暂由海关保管，不受一切干涉，其用途与条件由本特别会议议决之”。日本代表日置益提出“但书”，主张所征税款应“存放各保管银行”。法国主张“各项附加税之税收应存放于保管银行，由中国海关税务司负责管理，其用途与条件由本会议议决之”。美国的提案与中国类似，但当发现其议与日本相左时，又依违模棱，表示“日本草案美国亦可赞同”[336]。但各国代表大多认为“保管银行”易生歧义，主张将日本提案的措词改为“应存于银行，以便保管”，或干脆将“保管”二字删去，只云“应照……方法存放于各银行”。对于日本的“但书”及某些国家代表的附和，中国代表极力反对，提出《对于日本代表团提出但书之修正案》，因日本及其与国坚持其议，讨论没有结果[337]。

嗣因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及国民军与奉军之间发生战争，国内局势动荡，关税会议时断时续。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倒台，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逃离北京，一些与会的外国代表相继回国，关税会议被

迫停会。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划时，当立即继续会议”[338]。以后，中国方面曾作出复开关税会议的积极努力，但因政局进一步变化，始终未能如愿。

第四节　法权会议

一　法权会议召开的背景

领事裁判权是列强在近代中国建立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撤废领事裁判权过程中，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2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法权会议是北京政府为撤废领事裁判权所进行的一次重要努力。

早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就为废除领事裁判权进行了交涉。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的《中国希望条件说帖》明确表示，中国将在1924年以前颁布五种法典，完善法律及司法制度，以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要求各国届时一并放弃领事裁判权[339]。在稍后的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交了关于撤废领事裁判权的议案。1921年12月10日远东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议决案》，以中国司法制度改良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先决条件，决定在华盛顿会议闭会之后3　个月内成立专门委员会，以调查中国司法现状，并根据调查结果，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中国是否具备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条件。因中国政局不宁及译印各种法律文件需时等，法权调查迟迟未能展开[340]。

“五卅运动”爆发后，国人郁积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得以释放，反帝运动空前高涨，召开法权会议的条件逐渐成熟。

1925年5月30日，张作霖抵达天津，欲意对中央政权重新洗牌，北京临时执政府危在旦夕。就在这一天，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

发。5月31日晚，段祺瑞召集许士英、姚震等商议对策。与会者均谓“接上海电，民气激昂已极，无论如何，此事理直气壮，交涉可望胜利，政府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正可借此机会，以搏国人同情”；“段深然之”，“遂决定对沪案取严重态度”[341]。北京政府外交部在6月1日至6月11日连续发出三次抗议照会，并派蔡廷幹、曾宗鉴等会同交涉员许沅办理沪案。张作霖“虽明知段方之用意，然其目的固不错，殊亦无法以应之”，遂“自行决定稍缓数日，再定行止”[342]。

突如其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临时执政府有如天降良机，使之既可暂时扭转在国内政争中处于劣势的局面，还可以外交为突破口，重塑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343]。1925年6月24日，正当“沪案”紧张交涉之时，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外国公使团发出照会，正式提出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照会指出：不平等条约“是在特种情形下，未曾有充分自由之机会，以讨论规定中外间应守普通永久之原则”，故“不能继续有效”。今日中国“环境业已大变，而外人所享受政治经济之非常特权，依然永久存在，实与现法不合”。照会最后指出：“中政府深信非常权利一经消除，不仅各国权利利益更得好保障，且中外友谊也必能日益进步。为彼此利益计，甚望贵国政府重视中国人民正当之愿望，对于中政府依照公平主义修正条约之提议，以满意之答复。”[344]这是继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之后，北京政府又一次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废除领事裁判权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与北京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国民党（包括一部分共产党人士），主张采取强硬手段应付局势。惨案发生第三日，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中国全国人民，一致抗议，要求惩罚暴行巡捕，抚恤死伤，表示谢罪，保证此后永无此等至无人道之行为。凡我党员，应一致努力援助国民，以与英帝国主义相搏。”[345]6月4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宣言指出：“此次上海之惨剧，乃英帝国主义者，泛用强权威胁而得之不平等条约……之缩小写真”，提出“应以取消中国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为赔偿此次死伤污辱与损失之最低代价”。

稍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又致电英国下院，指出“沪案”不过是“外人在中国各地假治外法权实行残酷行为之无数显例中之一端而已，此实为吾人被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存在之自然结果”[346]。6月22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宣言，“主张全体国民应一致督责北京临时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仿照前年中俄协定之例，另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惠）主权条约”[347]。国民党提出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口号独具特色，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一面鲜明的旗帜，对民众颇具吸引力。

知识界对此也迅速作出反应。临时执政府6月24日递交“修约”照会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立即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学者纷纷就不平等条约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发表看法。马寅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不平等条约中影响我国经济最大的是（1）领事裁判权，（2）对外贸易取缔权”，两项特权若不废除，中国的现状难以改观[348]。上海著名律师姚公鹤撰文指出，“因不平等条约造成租界，复因租界而不平等条约之势力愈扩张”，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应从修改不平等条约入手[349]。学者们还对如何交涉“修约”提出了看法。此时已退出政界，仅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活动的梁启超在上政府书中主张，目前对外交涉“沪案”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了结本案；第二步，防止同样事件再发生。对于第二步他又提出“治本办法一条：定期开改正条约会议”；“治标办法三条：（1）上海公共租界内纳税华人应有选举权；（2）收回会审公堂；（3）租界内外之工厂，宜遵守中国之劳工律并受监督”[350]。梁启超的意见在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时人普遍认为，“沪案”解决后，中国应收回上海公审公廨，最后通过“修约”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含领事裁判权）的目的。总之，“五卅惨案”发生后，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士都支持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谈判修约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不赞成以对外宣战一类极端手段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盖“今日中国，自非义和团之流亚，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之徒，必不应为开战之选择”[351]。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事件的处理虽有“修约”、“废约”两类主张，政治行为大相径庭，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思想主张及政治行为已形成明显的互动。对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当时一位“观察者”著文指出：“所谓自动宣布废约，宣布之任由谁当之。唯革命势力握有政权而无虞乎本国之分裂与牵制时，始克举此痛快之改革，也唯自身拥有号令统一之军队，遇必要时有不辞一战之决心与准备，而后始可制对手国之顽抗。若在中国，政权军权，均感割裂破碎之痛苦，如宣布而不执行，固何贵乎宣布；反之若竟自动收管各项已失之主权，则力不讲理之列强，且不必以坚甲利舰驱我，只须结合部分之藩阀，与之缔结新关系，已足陷我于困境矣。故中国今日恢复国权之运动仍不能不借径于通常方式之外交。”但这位“观察者”也意识到：“民众要求，虽或过分而发之必，以其真。然也唯其为真情之流露，故不遑有周至之考虑。此在因应外交者神明利用，不拘一格。一方面不必以贪恋虚誉与权位之故，而对群众作不负责之诺言；他方面则当竭力使群众激昂之情形，畀对手方以充分之认识，更须慎密观察民众表示与外国态度变迁之关系而善为因应。”(352)

事实上，无论是“北京大学教授宣言”、“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梁启超等宣言”，还是“章炳麟等通电”，“皆不过欲为政府外交后盾”(353)。就是国共两党看似激进的主张及行为，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北京政府的对外交涉。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卅”之后中国社会在与列强关系问题上已达成前所未有的一致，这为开展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

二　北京政府促成法权会议召开的努力

在“五卅”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列强不得不考虑适当改变对华政策，法权会议召开的外部条件渐趋成熟。1925年9月4日，各国驻华公使正式照会北京政府，表示愿“将华会第五议决案所规定之委员会派遣来华，庶几可冀该会调查成绩，或可为有约各国之

一指南，以便对于领事裁判权或逐渐取消或以它法之放弃，应否当时进行及如何设法进行之问题，得所决定”[354]。北京政府接到照会，立即委派代表，任命全权，划拨经费，开始了法权会议的筹备工作。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政府拟于明年（1926）二月二十日请各国委员在华聚集”[355]。但驻美公使施肇基不同意这一安排，他电告政府：“据密告，美既得各国同意，早日开会，则中国应指定日期答复九月四日照会。现各国几已全数派定开关税会议代表并令参加调查司法委员会，最好由中国定耶稣圣诞节前为调查司法委员会开会日期。似此，则该会实行开始办事当至明年一月矣，二月二十日似为期太晚。”[356]随后，施肇基奉命与美国方面就开会日期进行磋商，并电示外交部：“葛洛（亦译凯洛格）决邀各国赞同于十二月十八日召集调查司法委员会于北京，并问上述日期大部能否合意，乞即示复。葛氏先提十二月十一日，基云太早。遂改十八日。”[357]后因“中国国内战争，铁路不通，有数国委员不能依期到京”，会议推迟到次年1月12日召开[358]。

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北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早在1920年11月6日，北京政府便公布了《法权讨论委员会条例》，设立法权讨论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讨论收回法权的准备实行和善后事宜。讨论问题有需特别调查的，委员会得指定专员调查。讨论完毕，应提交报告书，分送外交总长、司法总长认可后施行。华盛顿会议后，北京政府又于1922年5月20日颁布《修正法权讨论委员会条例》，规定法权讨论委员会直属外交部。当中外就法权会议召开初步达成协议后，北京政府于1925年12月8日公布《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章程》，成立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以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外交总长、司法总长、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为委员。另置办事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秘书十二人，分置总务、编译、接待、议案四股办事[359]。王宠惠任出席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

北京政府还在全国政府机构进行广泛动员。1925年8月27日，司

法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咨行各省长、都统，要求各地改良司法，以达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目的[360]。9月，司法部颁布命令："为令行事，各国派员来华调查司法，为期不远。本部有督促整饰司法事务之责，所有与举事宜，在此短期能举办者，着参事厅及各司科各陈所见，详具说帖，由部务会议讨论进行。"司法总长杨庶堪特咨各省民政长官，希望"同念收回国权至关重要，转饰财政厅将法庭监所经费，按时发放，以策进行"[361]。

司法调查委员来华前夕，北京政府决定对司法环境进行整饬。为此，临时执政府电召王宠惠回国担任修订法律馆总裁。9月18日，法权讨论委员召开专门会议，司法总长杨庶堪、次长王文豹、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张耀曾及法部各司长均到会，会议议定："未公布之法律，决由修订法律馆整理条文，先行公布。""刑法商人条例民刑诉讼及民法物权，本已实行，其他民法部分，业已编成，惟以尚未经过国会通过，搁置至今。政变以后，自不必拘泥，决由法部呈请执政公布。""关于各省各级司法衙门监狱改良事宜，由法部主管各司，通令切实办理。"另外，杨庶堪还"拟设一法律编译会，聘请曾在欧美研究法律专家，对司法行政文件，大加整理"[362]。这些措施虽系应急，但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法律编译会编译成英、法文的中国法律文件被提交法权会议，成为中国司法改良的重要证据。

为重塑形象并表达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决心，临时执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展开宣传。在国际上，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对华会议为媒介，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及公众表达了自己的要求。此次会议于9月17日召开，参加会议者包括美国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议题有三项：（1）中国现在情形；（2）中美邦交；（3）美国对华外交方针。由于美国各界知名人士之言论足以影响一部分美国舆论，故中国方面十分关注此会。驻美大使施肇基应邀莅会，同时被邀请者还有中国"民间"代表郭秉文，留美学生代表以及美国华侨商界代表数人。施肇基在会议发言时告诫列强，中国"于列强之对华政

策，注意尤切；而其对于他国乘机漠视其权利与正当利益之希图而致愤慨”。“今日中国现状之所难解释者，就直接关于外邦者言之，其主要有二：一则列邦人民之侨华者，藉逼迫中国定立之条约，与条约所许范围以外之扩张，致其地位，就大体而言，超出于中国法律及可管辖之外”。施氏要求霍普金斯大学对华会议“应以异常之审慎，考察当时列邦强加此种限制之环境”，进而“考虑此项特殊情形，今日是否应依然存在，以及此项条约规定今日是否仍属公允；倘其不然，则此类条约，应有若何修改”[363]。郭秉文的发言显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警告列强，如不满足中国之要求，将产生下列影响：（1）现在风潮，势必加长增高；（2）中国的稳健派必被激烈派融化；（3）中国如被压太甚，则恐铤而走险或竟开世界大战之局；（4）排斥外货，转前更甚[364]。

施、郭两人的演说直接影响到美国舆论，《申报》转载的一则美国报刊评论指出：“施氏代表政府，郭氏代表人民，凡所发言，总必出之有因，故不能轻视。国家主义已深入中国人脑海中，当国家主义最盛之时，即感情冲动最高之时，其势滔滔，不可制止。譬如洪水逆行，则泛滥中国，其影响于世界和平，显而易见，故不能轻视。”[365]

三　法权会议与《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1）会议开幕及大会对中国法律文件的审阅

1926年1月12日，法权会议在北京南海居仁堂开幕。计有美国、英国、中国、法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挪威、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与会。中国参加开幕式的政府官员为全权代表王宠惠、国务总理许世英、外交总长王正廷、司法总长马君武及其他官员。按照议程，法权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1月12日至5月13日，为京内审查中国法律条文阶段（实际上3月中旬已基本结束）；5月13日至6月中旬，为京外实地考察各省司法状况阶

段；7月中旬至9月16日，为起草会议调查报告书阶段。

开幕式前，围绕会议主席一职，中外即发生分歧。中国方面坚持按国际惯例，由东道主担任会议主席。列国代表认为，此会议系由美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条约发柬召集，主席理应由美国担任；另外，此次会议性质为调查中国司法状况，并非一般国际会议，不宜援东道主担任会议主席之例。中国方面作出妥协，同意由美国代表可托恩担任主席。为敷衍中国面子，会议特设名誉主席一职，由中国司法总长马君武担任[366]。

法权会议的权限是各界首先关注的问题。发表在《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吾人以此种办法（指在华盛顿会议划定的范围内讨论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引者），徒费时日，无裨事实。我之法律内容如何，司法制度如何，监狱现状如何，皆为各国所昭知，若云调查，则不查已明，奚必多一会。各国果有撤废之诚意，则兹会一面调查事实，一面磋商撤废办法，同时并进。何必坚守华府议决案之范围，借此以为拖延之口实邪？领判权之必须即日撤废，已无讨论之余地。"[367] 基于这种认识，社会舆论强烈主张改变会议性质，扩充会议权限："法权会议者，并非与中国谈判之机关，不过为各国准备撤废领判权之一种步骤而已。吾人谋速达撤废领判权之目的，非要求各国扩充该会议之权限，授以与我国谈判缔约之权，则所谓收回法权者，不知尚须经过若干次之调查委员会，始能贯彻。第一次只调查尚且历三年之岁月，始获成会；第二次三次，乃至十次八次，恐非拖至二三十年，彼必不肯轻轻抛弃也。"[368]"省会议联合会"通电全国，主张扩充范围，改为国际会议，解决收回法权一切程序问题[369]。"法权自主协进会"于2月15日召集会议，司法、外交两部也派代表参加。会议认为，"各国对于扩充范围一事，据云尚未有答复，足证明其无诚意，则将来调查报告，危险实甚"。会议最后声明："于最短期间内开国际会议，修改此项片务条约。"[370]

社会各界要求"扩权"的呼声，正中政府下怀。早在法权会议开始

前的1925年9月，北京政府就曾电示施肇基：“政府对于该会范围意欲加以扩充。即委员会权限不仅限于报告意旨。”[371] 11月，北京政府照复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本国政府提议该委员会范围应请加以扩充，即委员会权限不仅限于报告建议，应议定一实行废止之办法。故我国特派全权代表。应请贵国政府向有关系国政府提商，对于所派委员，予以全权，俾此项委员会得有相当效果。”[372] 北京政府在交涉召开法权会议过程中提出“扩权”，表明其对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期望，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高。但北京政府的“扩权”努力遭到列强拒绝。美、英、日、法等国在提议召开法权会议时，已决定有关中国领事裁判权事项严格按华盛顿会议议决案进行，此时自然不愿更改，北京政府在法权会议上的第一次抗争遭到重创。

“扩权”失败后，在法权会议整个法律审察及司法调查阶段，北京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极力证明中国司法已取得较大改进，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条件已经具备[373]。1926年1月至5月为法权调查委员会审查中国法律阶段。1月15日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时，王宠惠将已译成英、法文之各种中国法律文件悉数提交各国代表团审阅。译成法文者有：（1）刑事诉讼律；（2）民事诉讼律；（3）商律；（4）暂行新刑律；（5）大理院判决例辑要（第一二两卷）。译成英文者有：（1）商律；（2）刑事诉讼律；（3）中国大理院判决例；（4）暂行新刑律；（5）民事诉讼律；（6）中国监狱制；（7）关于司法行政之各项法令规则；（8）商标法；（9）中华民国约法及附属法令；（10）中华民国宪法（附中文原文）；（11）大理院民刑案件统计比较表；（12）刑事案件统计报告；（13）民事案件统计报告；（14）森林法；（15）修改国籍法（附中法原文）；（16）华洋诉讼程序及审理案件数目表；（17）中国现在司法情形之大概说明；（18）民国十二年司法所属北京及各省司法机关之司法经费表[374]。

北京政府司法部为表示中国正努力改善司法，还在法权会议期间废除、颁布了一些法令。所废法令中最引人注目者为《惩治盗匪

法》。该法案于1914年11月27日由袁世凯命令颁行。其中规定“强盗及匪徒犯本法中所规定特别重罪者，得处死刑”，“高级军官于所辖军队之驻在地内，发现该法所规定之犯罪时，以具备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为限，得自行审判之：一、驻在地与审判厅或兼理司法之县知事之所在地相距百里外，而交通不便者；二、事机紧迫，恐酿重大变乱，或有劫囚及脱逃之虞者”[375]。对该法案的弊端，马君武认为，“此种条例，若不取消，各地方之有权者，凭之以滥杀人命，而反谓为依据法律”[376]。因此，他曾特拟提案递交阁议，要求废除，并称：“法权会议，各国委员正在审查调查之中。若不呈请废止，则暂行新刑律强盗罪之规定，将永远形同虚设。其影响于领判权撤废者至大。”[377]北京政府新颁法令有：1926年1月26日司法部订定公布的《法官考绩条例》、《地方检查厅法官员缺序补规则》；9月3日司法部制定公布的《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第一、三、五、二十九等条文。这些努力，为中国谋求通过法权会议废除领事裁判权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截至3月26日，法权会议共开全体会议十二次。会议审查中国提交法律文件的方式为：各国委员先研究各种法律文本，开会时把一切疑问，逐一提出质询，王宠惠为之解答。若遇较复杂的问题，则由有疑问之各国代表以书面形式提交王宠惠，王宠惠仍以书面为之解答。审查中国法律阶段，各国委员对中国法律文件只提出一些疑问，并未指出存在的问题。中国方面对审查法律表现出充分的自信，马君武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法权会议讨论的并“非法典问题，乃是政治问题。外人对我国各法典，尚无不满意之处”[378]。实则外国委员对中国法律及司法制度现状的认识，与马君武的乐观估计，尚存在很大距离，接下来的法权调查及其报告，即证明了这一点。

（2）调查法权委员会对中国司法状况的调查

法权会议的第二阶段为对中国部分地区司法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外方代表比较看重法律的实际应用而不是法律文本本身。史托恩曾对

记者表示："惟现时最宜注意者，即该项法律应如何施行是也。盖有法律而不能施行，或施行而未尽完善，而仍不免有觖望。"[379] 为配合调查委员会赴各地调查，北京政府作了精心准备。审查法律文件未毕，临时执政府即电示拟被调查各省督办及省长："调查法权委员会外国委员限定本月中旬出京，分组往各省参观法院监狱。到时希酌量接待，其旅舍及车辆等项，并希饬妥为预备。"[380] 要求电令各省特派员及交涉员，"其有法院请求协助事件及应由该交涉署筹备一应各项，仰克悉心计划，勿稍大意，并随时就所闻见报告本部及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为要"[381]。

3月23日，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对于在中国治外法权现在实行状况之意见书》，认为所有"损伤中国之主权与完整、违背华盛顿（会议）之精神"的治外法权，均应列入考察范围。意见书分八个方面逐条阐述了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实行，指出其后果"不啻于一独立国之主权中发生无数独立国之主权，实于中国主权损害甚大"。各国代表经讨论，决定同意中国意见书所列前四项，对后四项，多数国家代表反对列入调查范围[382]。26日，王宠惠代表中国提出《补充意见书》，坚持法权会议必须讨论并调查中国所提方案的全部内容，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4月初，各国代表分为若干组，拟赴各地进行法权状况调查，因北京临时执政府垮台、北京政局动荡而延期。5月10日，各国代表离开北京前往各地。5月13日法权调查团到达武汉，展开调查。随后调查的地区依次为九江、南昌、芜湖、安庆、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青岛、奉天、长春、哈尔滨、吉林和天津。上述地区，驻留时间长短及考察详略不一。其中，武汉、南京、上海、奉天、哈尔滨五处停留时间较长，考察较详。调查方式为参观各省法院、监狱、高等地方审检两厅及中国司法制度之实行情况。兹以调查团在武汉的工作日程为例，将调查情况略为展示：

5月13午前一时，由京汉铁路到武汉；午后三时全体委员谒吴佩

孚；午后八时吴设宴款待全体委员并发表演说，司法调查委员屠僧代表全体委员致答词。

5月14日午前十时，视察湖北第一模范监狱；正午十二时全体谒见督理兼省长陈嘉谟；午后一时，陈嘉谟宴请全体委员并发表演说，英国委员特那致答词；午后三时视察高等审检两厅、武昌地方审检两厅及看守所。

5月15日午前十时，视察英领署会及英租界巡捕房；午前十一时，视察洋务居留所；午后三时，视察法租界巡捕房；午后三时半，视察夏口地方审检两厅及看守所。

5月16日午后九时半，全体委员（比利时委员除外）乘瑞和轮离汉[383]。

其他地区的调查日程亦大抵如此。不过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计划并未全部实施，其原因在于：1．广东国民政府通令抵制。国民政府对于法权调查持根本反对的立场。曾于法权调查即将开始的4月10日，通令国民政府外交部及司法行政委员会转电各埠交涉员暨各级法庭，对此次调查法权外国委员来粤，决定不予接待。[384] 2．“太原、张家口、归化、包头及宁夏各处，均因政潮不定及交通不便，不能前往”[385]。6月中旬调查结束，全部调查工作历时一月有余。

在法权会议开会期间，美国代表史陶恩与其他国家代表进行了非正式晤谈，认为中国政治及法律均存在严重问题：1．中央政府虚有其名，仅数个省份承认。2．军阀掌控中央政府各部门，而军阀间恶斗不止。3．法律荡然无存，律令实行，全凭执政当局之好恶存废。4．缺乏胜任或训练有素的法官，司法受制于政军界的影响。5．中国财政混乱，没有条款承担司法事务的合理补偿。他们认为，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各国在治外法权方面作出让步，不仅会使各国在华侨民的人身财产陷于危险，对中国人亦极为不利，并将

因此延迟中国人民呼吁的司法事务完全自主的时间。基于这一认识，外国代表确定了法权会议的基本方针，即反对在当时的状况下废除治外法权[386]。

在法权会议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审查中国法律条文阶段和京外司法调查阶段，各国法权调查委员并未对中国司法状况表示不满。“自出京调查以来，途中从未发表意见，以至好劣令人莫测。惟在奉天演说席上微露意见”，也基本是在称赞[387]。这给北京政府和舆论界造成一种幻觉，即调查委员对中国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设施等印象不错。对于在京审查法律文件的结果，北京政府和国内舆论界的感觉是各国委员“均表满意”。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将各国委员会上言论汇总的结果[388]。法权调查团在京外司法调查期间，在对一些地区司法设施进行考察后发表的只言片语，也使国人相信调查团已认同中国的司法制度。在南昌考察时，“英委员致答谓南昌司法成绩优美，足以代表全国”[389]。在奉天，调查团对该省拥有十六个审判厅及十六个改良监狱表示称赞，仅对监狱中罪犯之刑具和卫生，不太满意[390]。

各国法权调查委员之所以在审查中国法律文件及调查中国司法制度与其实施状况阶段尽量沉默，不明确表示态度，是因为法权会议的召开很大程度上是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回应，目的在于缓解国人的反帝声势。法权调查委员的任务是把调查程序完成，若一开始就对中国的法律条文、司法状况表明其真实态度，将得不到北京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合作，最终势必草草收场。这是列强所不愿看到的。法权委员会在中国的调查活动之所以进行得较为顺利，和它自始至终得到北京政府、多数省区军事集团首领及社会有关团体的协助密不可分，因为他们对通过司法调查来实现废除领事裁判权寄予厚望。

但是在反映调查最终结果及调查委员真实意见的《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里，人们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对于中国法律制度及司法状况的表述。

（3）《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指陈的中国法律及司法状况

1926年6月中旬，当结束在天津的考察并稍事休整后，法权调查进入第三阶段——起草调查报告书阶段。所拟报告书长达数万字，分四编：第一编为报告书序言，包括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实施现状等章节，第二编为中国之法律及司法制度，第三编为中国施行法律之情形，第四编为委员会之建议。

报告书首先指出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客观存在并承认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曩者，因中外法律及司法观念之根本不同，设治外法权制度，原为一种临时办法，以调和中外关系，俟中国法律及法律观念逐渐演进后，始不适用。由历史方面观之，治外法权之制度，其与一国主权之关系，前后之观念不同，现在则视为限制该让与治外法权国之主权。故中国近年以来，非常注意，亦由此观念而发生。其原因多由于中国国民国家观念之发达，及与外人之关系日渐增加，遂使此制度之奇异状态，格外显著，可无疑也。"

报告书承认中国政府为改良法律制度作了切实努力。明确指出："中国为实现1902年及1903年条约中所表示的愿望，晚近以来，于司法制度之发展及法律之草拟，努力进行。本委员会在详细评论中国法律之前，不能不加以赞美也。其努力之成绩，业已昭著者，即法院之组织，民刑诉讼条例及其它实体法之制定是也。委员会对于此种法律中之普通原则，甚为满意。"

在承认中国法律制度有所改良的前提下，报告书以大量篇幅指陈了中国法律及司法制度的缺陷。关于法律制度，报告书首先指出中国没有"根本法律"即宪法。虽然民国肇建以来曾颁布若干宪法性质的文件，显示了这方面的进步，但"此项进步因内国战争大受阻碍。此种内国战争，民国成立后不时发生，自1924年以来，各种宪法悉行废弃，中央政府之权力因之减缩。在上述情形之下，中国人民之权利义务，立法、行政、司法官吏权限之分立，及立法、行政、司法权之本

体，现均无稳固之宪法以为根基。结果所至，立法权及司法权恒为更易频繁，听军人之行政官吏所蹂躏。同时，人民尊重法律及司法行政之心为之减少。更进一步而言，军事法令及军事审判机关声势日彰，以苛刻之罚则及程序，取民事法令及普通法院而代之”。

关于刑法及相关条例。报告书认为，中国于1909年公布的《暂行新刑律》虽冠以“暂行”字样，但已实施十五年之久，其缺陷“为众所公认”。即将公布的第二次修正案虽然纠正了《暂行新刑律》的缺陷，但仍有不少具体条规欠完备。具体表现为：“对于逮捕及保释之规定，似应修改，使稍从宽大，而又分别情节，为确切之规定；对于轻微罪犯可处罚金者，及犯人有固定住所者，此种案件，尤应从宽。至于受六十日拘役判决之案件，不准上诉，略嫌过当。……依《处刑命令暂行条例》之规定应处五等有期徒刑之案件，亦得以命令处刑。被告人虽有于接受处刑命令之日起七日内得声明异议之权，究于被告人之利益，未能予以充分之保障。”等等。

关于民法、商法及相关条例。报告书指出：“从前中国立法家不以刑法、民法判然分离为必要，大清律例并合民律、刑律于一法典，即其例也。中国采用新司法制度垂十五年，尚未制定民法典。其已经公布者，只有少数关于民事之法令。关于商法，其情形亦同。”“业已公布之法令，多有预行援引尚未产生之法令者。例如1914年所公布之公司条例，述及破产之处颇多。但该条例公布后已历十二年之久，而破产法尚未颁行。”此外，各种自治法令“均以无实行细则，未能施行”。

尽管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大量新法律，但有关法律仍不完备。报告书指出：“中国仿照泰西法规修订法律，虽进步甚速，而与人民之权利义务有密切关系之法令，尚付缺如者仍属不少。欲使司法收效较多，则下述缺而不备之法令均在必须修订之列：（1）普通在民律中规定之事项如总则、债务、物权、亲属、继承等；（2）普通在商律中规定之事项如票据、银行、海商及保险等；（3）破

产；（4）专利之特许；（5）药业；（6）人事注册；（7）精神病；（8）土地测量；（9）公证人；（10）土地收用。”虽然民律、商律（票据法及海商法部分）及破产法草案已经修订，等待公布，但与第四至第八项相关的法律，“即草案亦仍复缺如”。可见法律仍不健全。

报告书特别指出了中国新旧法律同时适用造成的混乱状况：“中国施行新法令为日尚短，故国民与新法令融化之速度，实不及于立法之速度。职是之故，司法制度有两种紊乱之现象：1．旧法律、旧法理继续有效，与新旧法律同时适用。因此，新法律中一部分之法理及优点，为旧法律所淹没。大清律例中多数条例如娶妾、卖子等关于人事之条文，及授县知事以大权之规定等，虽与新法律之精神相违背，然亦继续有效，其一例也。惩治盗匪法授军事长官以极广之权，审讯盗匪案件，不依普通审判条例，其例二也。2．多数新法令之适用于其条文、或适用之区域加以限制。例如民刑诉讼条例、完全适用之区域以新式法院为限。即就此项新法院而言，亦当时适用与诉讼条例中新法理相违背之追加法令，如拘押民事被告人暂行章程等。至若可处五等有期徒刑之案件，得以命令处刑，则更予诉讼条例中之新法理以限制矣，……与新式民刑诉讼条例之字面及精神，均不堪符合也。”

报告书在详述中国司法制度之后，就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看法：“大体言之，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及法律制度），照原定计划，本以欧洲大陆及日本制度为模范，本意甚善。但自新制度成立后诸多变更，遂使司法与行政之界限，及初审管辖与第二审管辖之界限，渐欠清晰。”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行政官管辖及处理司法事务”，如“省长以行政官支配省内之司法事务”；二是“上级法院兼理下级管辖案件”；三是“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行使行政官不应掌管之司法职权”，“现在中国诉讼之大部分，仍受此等县知事公署之管辖，故此种现状亟应改良”；四是县司法公署系一种临时的过渡性质的法院，“自不能视为妥善”；五是海陆军军事审判机关的权限缺乏限制；六是警察官署的处分不能上诉，警察在中国占有特殊地位，其职

权“较各国之警察为大”；七是接受不服违法行政处分陈述的平政院难以兼顾全国，“人民对于行政官之违法行政处分，如有不平，颇难补救”；八是无领事裁判国人民诉讼适用“各种特别法令”。

关于监狱制度。报告书指出，“中国为改良监狱制度起见，自前清末年，即已开始设立新式监狱，1912年司法部成立后，对于监狱益加注意。……自是年起，截止现在，此种监狱（新式监狱）已设六十三所，其旧式监狱仍存六百余所”，“新式监狱及看守所之组织、监所职员考试及选择之方法及监犯管理规则，大致是属妥协。如评判亦只能对于其实际上之行政，不能对于其制度上有所臧否”，“但新式监狱及看守所，不过为中国全数监所之小部分”，虽堪为模范，但不能代表全部。

关于中国“施行法律之情形”。由于中国政纲紊乱，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结果导致司法行政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一是政权操于军人之手，军人则凭借实力，操纵行政、立法与司法事务，“几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有失其界限之倾向”。二是国库空虚，司法及警察官吏的薪俸往往不能发放。三是不承认中央的地方政府自立法律自设法院，法律与司法系统渐受破坏。四是阻碍新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发展完善。

报告书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军人对司法的干涉。指出：“现在中国普通法律之施行，其重要之障碍，军人干涉政府机关，其一端也。此等军人之领袖，常统率所属军队，从事于国内战争。对于其所管地方内之人民生命、自由、财产，几操有无限之权。除少数特别机关，例如海关，委托外人管理者外，其余中央及各省机关官吏之任免，军人得直接或间接为之”。“军人干政及于司法，以致司法独立为之危害。此种异常举动，常借戒严以为口实。但戒严每不依戒严法所规定之手续，有时并不宣告戒严，而公然为之。此外政府财政权为军人所握，法院经费遂不能不仰给之矣”。“依中国法律，军人在法律上之地位，不受普通法院之管辖。事实上，则因其势力则无何等法院足以管辖

之。此种不受法律制裁之特权，旁及于军人之朋友。……军人往往犯罪，而逍遥法外”。“军人与警察官吏对于应归普通法院裁判之案件越权受理”。

报告书列举法权会议在北京开会前后，各地“处人死刑及其他事情而不依通常法律”的大量案件，证明军人对司法的干涉与破坏。这些案件包括山东高等审判厅长张志在家被“军政长官”命令逮捕，谓有“通敌”嫌疑，“不经审判程序，立予枪毙”的案件；有徐树铮被杀，现役军人陆承武承认以报杀父之仇为由杀徐，而“官厅对于该案并无查究，且未缉拿凶手，亦无向法院告发等事”一案；有《京报》记者邵飘萍被警察逮捕，移交军事机关即被枪毙，司法机关并无调查一案；有北京卫戍总司令不经过法律程序即告示凡商人操纵军用票，一经拿获，即依戒严令“立予枭首”一案；有韩得凝案、朱铁夫案、林白水案、成舍我案、德人阿图汉孙案、俄人鄂斯特罗乌莫夫案，等等。

此外，报告书还就法律与适用、司法经费、司法制度及实施情形、监狱制度及实施情形、警察及“其他可议之点”提出了意见。

根据以上意见，报告书提出若干具体建议：（1）普通人民之司法事项须归法院掌管，但法院须有确实之保障，不受行政或军政、民政机关不正当的干涉；（2）中国政府须采纳报告书提出的计划，改良现有法律、司法与监狱制度，完成及公布民法、商法、刑法第二次修正案、银行法、破产法、专利法、土地收用法、公债人法等，确定并实行划一的法律制定、公布与废止的制度，推广新式法院、监狱及看守所，以裁撤县知事审判制度与旧式监狱及看守所。（3）在上述各建议实行至相当程度之前，如主要部分已经实行，“关系各国应中国政府之请求，可商议渐进撤消治外法权之办法，或分区，或部分，或以其他方法，可由双方协定”。（4）在治外法权撤消之前，各国政府应容纳报告书第一编的意见，改良现行的治外法权制度及习惯，内容包括：（甲）适用中国法律；（乙）华洋诉讼案件原则上归中国新式法院审理，会审公廨的组织与程序，应在租界“特别情形”允许的范

围内加以改良，使之与中国司法制度渐趋一致；（丙）享有治外法权国应革除华人所有之商业或航海业受外人保护之流弊等；（丁）中国与享有治外法权各国及各该外国之间，应协定办法，司法互助；（戊）治外法权未撤消之前，关系各国人民对于中国政府该管机关，依法定程序公布法令之捐税，经关系各国认为适用于其人民者，应负纳税之义务。

1926年9月16日，法权调查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参加法权会议的各国代表均在《报告书》上签字。但中国代表尚有保留意见。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时特别声明："署名于本报告书不能认为对于第一、第二、第三编所载各节悉表赞同。"在正式签名之前，王宠惠发表宣言书，表示对各国未能即时放弃领事裁判权"殊形失望"，声明中国政府将继续改良司法，"即调查法权委员会建议内所列诸项，大致亦在改良计划之中"，认为《报告书》建议取消条约以外所发生之不良惯例，及其他改善中外关系的办法，"为关系各国善意之表示"，希望各国在中国实行司法改良计划时，"即行商定撤消治外法权之确定办法"，使中国"正当之愿望"，"能早日实现"[(391)]。王宠惠的宣言书被列为《报告书》附录。以《报告书》的通过为标志，法权会议宣告结束。

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愿望，没有通过法权会议的召开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权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尽管如此，为促成会议召开，中国政府做了大量改良法律制度的工作。在法权会议上，中国代表向世界表达了强烈的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正义呼声。而各国参与司法调查，有助于国人清楚认识中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状况。这一切，为后来中国政府彻底废除领事裁判权奠定了基础。另外，法权会议未能实现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目的，使中国外交家认识到，以"万国会议"的交涉办法去争取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很难成功的。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到关税及法权会议，中国与众多条约关系国聚于一室，谈判修约，形成各国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多数会议都以牺牲

中国利益为结局。这使中国外交家产生了以“国别谈判”方式进行对外交涉的设想，并在推行“修约”运动期间作了一些积极尝试，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就采用了“国别谈判”的方式[392]。

第五节　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一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各国对华方针的调整

1917年初，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德国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战之时，梁启超受刚从欧洲回国的张君劢影响，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认为中国欲争取独立的地位与资格，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参加对德战争实为千载难逢的机会[393]。梁启超设想，中国若能像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卡富尔那样具有外交远见，以参加英、法对俄战争换取国际社会对意大利独立的支持与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大大提高。盖“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力”[394]。在梁启超等人的说服及美、日等国极力鼓动下，中国国会通过了对德宣战案。中国也因适时参战，很快与协约国伙伴一道，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严重的外交失败，未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收回，而让日本揽尽外交成果，但中国政府毕竟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较完整地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表达了要求民族独立自主的愿望，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有所提高。1921年及1922年国际联盟两次大会，中国均当选理事国，派代表出席国联理事会[395]。正因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问题成为拟议中的远东问题之重心，中国代表遂有机会再次向国际社会公开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议案，并获与会各国代表比较详细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美国代表提出的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

与行政之完整”为主旨的四项原则[396]，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

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成为世界强国，遂致力于远东势力的发展，以后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扩张其在华势力，力图造成独霸亚洲的局面，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力量均势。对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中国已有所认识，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日本，其手段是终止英日同盟。当中国代表团启程之时，中国外交部曾以“宙字第一百三十一号极密电”指示中国与会的主要目的，其中第一条即是：“我国今日自卫力之薄弱，已属无可讳言。欲防止侵略，不外将他方结合先行解散，由我另组团体。……惟英日同盟仍得以继续，则中日之接近，不易达到，自应竭力设法，先将该同盟解散为第一步办法。”[397]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看，英日同盟也不宜继续维持。英国鉴于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已威胁到自身利益（例如，在对华商品贸易方面，如果不将香港计算在内，英国已经落在日本后面），开始重新考虑自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缔结以来实施的“联日制俄”这一远东政策。美国此时也感受到日本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菲律宾的安全，不赞成英国继续支持日本侵华的政策和行动。中、英、美三国对日外交方略的接近，致使维持了近二十年的英日同盟最终废除，这是华盛顿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成果[398]。

英日同盟终止的影响很快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反映出来。虽然日本坚持以强硬态度对待中国，中国复因顾虑英、美的立场，没有将构成中日间最大争执的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提出会议讨论，而是接受英美调停，改由中日两国在会外“直接交涉”解决。但在这次会议之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秘密协定，“事实上已取消了其中的十七条”[399]，这应该是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积极收获。

当然，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外交所得距离国人的期望尚相距遥远。美国提出的四原则仅仅是原则，至于中国提出的具体要求，列强多藉词延宕或加以修改，致无多大结果。例如，对于中国提出的关税

自主要求，由于日、英表示反对，结果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税率会议，并由中国与各国组织“关税特别会议”，筹备裁厘，增抽2．5%的附加税，但海关行政，无庸改变。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会议决定须经特别会议委员会考察中国司法现状之后再定办法。大会决定，关税、法权两特别会议在各国批准及大会闭幕之后三个月内召集。虽因“各国批准”未能如期获致，关、法两会被迫延宕，但华盛顿会议无疑为后来条件成熟时召开这两个会议，铺设了道路。

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是中俄邦交新局面的出现。苏俄在十月革命之后，为摆脱西方国家的孤立政策，急于寻求中国这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承认；而中国为反对列强侵略，也亟须寻求外来支持。双方一拍即合。1923年8月，加拉罕来到北京，宣称其目的一为订立平等条约，二为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派王正廷与之谈判。1924年5月，中俄恢复邦交，正式成立友好协定。通过这一协定，苏俄宣称将帝俄时代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一律取消，将中俄邦交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中俄协定缔结之后，苏俄政府为表示尊重中国国际地位，特派加拉罕为驻华大使。加拉罕是外国派驻中国的第一位大使，中苏协定是中国第一次以和平方式与欧洲强国订立的对等条约[(400)]。

中外关系发生的上述变化导致了远东关系新格局的出现：一方面，英日同盟的终止暂时遏制了日本在华势力的恶性膨胀，使远东国际关系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得以重新调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拓展势力破坏了的各国在华力量“均势”，现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另一方面，中国与苏俄的接近则在“帝国主义”国家和“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造成某种力量制衡。这种新的“均势”，使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保持了近十年的安宁。

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1923年以后再度下降，国联第四次大会之后，中国每次都落选，失去了列席联盟理事会的资格[(401)]。 相应地，列强对华政策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性：随

着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转移，各国对北京政府的亲疏亦不时发生变化，有的甚至游移于南、北两政权之间。另外，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浪潮，尽管已经意识到有改变既存条约体系的必要，但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华方针都仍然以保护其在华利益为前提。

总之，华盛顿会议闭幕之后几年，各国对华外交方针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调查部在华调查时作了如下概括："一、各国对华条约已预备为深远的变更；二、各国认中国目前无单一的政府，与中国谈判颇感困难；三、各国于必要时将用武力保护在华利益。"另外，有不少美国人认为，召集中国南、北两政府代表与美国谈判条件已趋成熟，美国方面的积极努力可使中、美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402]。但中国力图改变既有中外关系的努力又与列强的在华利益发生新一轮冲突。在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五卅事件"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事件发生和处理中坚持强权政治立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帝"运动持续高涨。以此为凭借，北京政府展开了颇具规模的"修约"活动，延误已久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得以召开，这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由于北、南政府对关税会议、法权会议有不同的政治认知，前者主张在既存条约体系下进行"改良"，后者强调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革命"，思想主张及政治行为的歧异，耗散了中国对外交涉的能量，加之段祺瑞政府未能稳固自身的统治，就中国方面而言，会议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但从历史影响上看，由北京政府积极参与的这两次会议，却为极力反对关税和法权会议的南方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开展废约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　民族主义高涨和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四运动掀起了以反对列强侵略、捍卫国家民族主权为内涵的民族主义第一波浪潮。1925年的五卅运动，则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人的民

族主义情绪乃是列强激发出来的。1925年6月，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演讲，当讲到“五卅”惨案之后中国的“排外”运动受到六国使团的攻击时，他略带感情地表示：“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403] 胡适的演讲，道明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产生的外在原因。

“五卅”之后不久，中国发生了著名的省港罢工，同时各地广泛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及非基督教运动。这些运动均凸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五卅”之后全面高涨可以从时人所编《文献期刊读者指南》提供的统计数据得到证实。1924年，该“指南”中国项下尚未列出“民族主义运动”的分类标题，但是到了1925年，该书中国项下不仅设置了“民族主义运动”栏目，而且开列的有关文章目录已多达一百五十五篇[404]。这些文章目录广泛取自各种期刊，就连一向以稳健甚至保守著称的《东方杂志》，也推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登载大量揭露英国人暴行，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留下了相关的目录记载。

在20年代中期如日中天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政党的作用开始变得突出，其中国、共两党扮演了关键角色。对国民党领袖来说，不平等条约是其作出外交决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日本威胁变得严峻之前，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未向任何一个条约国家寻求援助。1925年-1926年间，蒋以联俄为其外交“全局中心之著眼处”[405]。与苏俄决裂后，蒋则向当时唯一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的大国德国寻求援助[406]。与国民党处于联合战线中的共产党对民族主义运动也贡献良多，以致几乎所有激进的“排外”思想和行动，都被戴上“赤化”的帽子。国共两党的协同努力，有力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在民族主义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北京政府亦表示出对不平等条约

的强烈不满，加之抵制广东国民政府政治影响的迫切需要，北京务实的外交家很快作出切实努力，力图通过修改而非废除中外条约的方式，取消有关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条约规定。北京政府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从顾维钧就任国务总理之后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窥见。与会者一致认为："内审国情，纷纭多故；外察友邦，趋势日非"，若不顾情势，"昌言废约"，势必引起列强的"重大反感"，招致联合干涉。因此，政府的外交方针应该"重在将来新约结果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内容"[407]。这一外交方略虽然迟至顾氏组阁时才明确提出，却是北京政府自巴黎和会之后处理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修改中外条约。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却为召开旨在修改中外条约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作了铺垫。

除了积极筹备召开关、法两会，为修改并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付出艰辛外交努力之外，个别情况下，受高涨的反帝废约运动鼓舞，北京政府亦果断作出单方面废约的外交决定。废止《中比通商条约》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

1926年初，《中比通商条约》第六次届临十年期满。同年4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国驻华公使，示意中国将终止旧约，以便在平等基础上缔结新约。27日，比公使复牒中国外长，援据条约第四十六条规定，称条约可以修改，但仅比利时方面享有"修改条约之权"，且旧约修改须待"中国政局稳定"以及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结束之后，方可进行[408]。

在随后展开的正式谈判中，比方不仅坚持单方面的条约修改权，主张修约期间旧约继续有效，而且以诉诸国际法庭谋求列强干涉相威胁。中国为寻求问题的解决，提出"临时办法"五条，内容涉及彼此承认关税自主，缔结新约时应废弃领事裁判权，现行的领事裁判权可以"暂予容受"，但临时办法的实施期限为六个月[409]。中国方面提出临时办法的意图，是想通过六个月的外交磨合，双方能顺利完成缔

结新约的谈判。这已经是一种妥协了，但比方却表示“完全不能接受”，主张“临时办法”必须原则上“维持旧约”，在新约缔结之前，比国将仍旧享受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410]。中国方面则坚持旧约到期失效，新约须在六个月内订立，最惠国待遇应该双方共享，领事裁判权另议[411]。而比方10月26日提出的备忘录则企图通过无限期延长“临时办法”，维持旧约特权。由于双方均坚持各自的立场，交涉历时半年，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比利时方面在作外交决策时并没有正确估计所处的内外形势。英、美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虽有物伤其类的担心，却对实施联合干预是否明智表示怀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国实业界对其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解决中、比争端也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会给比国的在华企业带来“悲惨恶果”。显然，这种形势并不利于比国正在进行的对华交涉。

而中国外交却有自身的凭借。当时，上海总商会发出通电，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宣告废约”，以“内保国威，外御强侮”[412]；全国商联会复电上海总商会，协商与比国“经济绝交”的办法[413]；孙传芳复电总商会，对所作“化私斗于阋墙，作干城于卫国”的呼吁深表赞同，表示对比国交涉，中国“宜作破釜沉舟之谋”[414]；以孙传芳为首的东南五省军政首脑还发表通电，力主利用“群情激愤”的形势，“单独宣布废约”[415]。其他“各实力派首领，亦迭次电促单独宣告旧约失效”[416]。全国学生总会在中比条约到期这天发表宣言，呼吁“全国朝野上下，敌忾同仇，步伐一致，对于本日期满之中比商约，以不妥协之态度，宣告无效”[417]。《国闻周报》甚至发表时评，正告政府当局不得以“过渡”名义对比国妥协：“若擅与商定过渡办法，无论措词如何，均与卖国同科。”[418]中国驻美、日、英、法、意、葡、比、荷、瑞士、日内瓦公使及代办均致电本国外交部，支持政府的立场。

与此同时，海外华侨尤其是旅比华侨掀起一场颇具声势的废约运

动。提出废约运动大纲，成立废约后援会，并联络旅欧各国华侨，组织废除中比条约代表团，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中比条约期满这天组织游行示威。比国警方出动警力，逮捕参加废约游行的学生三十余名，造成流血事件[419]。

国内广泛开展的废约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北京政府的对比交涉，而比利时发生的流血事件则激起社会舆论的极大义愤。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外交当局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在比约期满后的首次谈判中，中国外长顾维钧与比国驻华公使华洛斯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判，逐条驳斥了比方的无理要求。尽管华洛斯理屈词穷，无法反驳中国方面提出的意见，但仍然不同意中方限期订立新约的主张，企图通过无限期推迟新约订立的办法，维持旧约特权[420]。11月5日，华洛斯面见顾维钧，递交拒绝限期修约的备忘录，并表示要将中比争端上诉海牙国际法庭[421]。

比方的态度，使中国除单方面宣布终止旧约，已别无选择。备忘录递到之后，中国外交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草拟废约文件。次日经阁议，决定以摄行大总统令宣布中比条约失效。顾维钧很快向张作霖呈交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谈判原委和终止旧条约理由的总统法令草稿。1926年11月6日，张作霖发布终止中比条约法令。同日，外交部发表终止中比条约宣言。宣言指出，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即抱一种果决愿望，使中国在国际团体中得与其他各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使其得尽一部分能力”，但“近百年来，中国受压迫而订立不平等条约，于中外人民之间造成歧异不同之待遇，至今日实为对于各国种种不满及胶葛之原因”。宣言指出，中国自巴黎和会以来，“屡次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同时坚持新约订立必须“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否则“概不允订”。依此原则，中国政府“对于现行各约大概得于期满时通告终止者现正努力设法改订，俾于各约期满时，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陈旧之条款不使复见于新约”。因此，中国政府对于中比通商行船条约，“经先期六个月之通知，予以终止”[422]

。

宣布终止中比商约之后，北京政府内务部着手筹备接管天津比租界。不久，又公布《管理无治外法权国人民民刑案件审判条例》（修正案），要求各省交涉署关于比人案件适用这一新条例，并准备停止比国领事在上海会审公堂的陪审权。

中国方面的决定，触动了比国在华的殖民特权，比国政府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之外，复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起诉。12月13日，海牙国际法庭通知中国驻荷公使王光圻出席答辩中比条约交涉案，声称“如不到庭答辩，将受缺席裁判”[(423)]。中国方面经研究，决定拒绝海牙应诉，认为此项案件“应照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提出于国际联盟大会”解决，比方则反对中国提出的解决办法[(424)]。

不久，由于中国国内反帝废约形势高涨，比国被迫作出妥协，表示将中止海牙诉讼，并将天津比租界的特权交还中国，海牙国际法庭也应比国请求撤消了控诉中国案。以后，由于北伐成功和中国政权更迭，中比谈判搁置下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比重开谈判缔结新约。因中方实施“妥协的政策”[(425)]，比国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并未完全废除。但北京政府废除中比条约引发的有关交涉，终因新约的缔结画上句号。

终止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一重要事件。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专电指出：“外交界视取消中比条约为中国多年来最重要之事。”[(426)] 参与这次对外交涉的顾维钧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427)]

比利时条约的废除确实开了一个先例。中比条约宣布废除之后四

日，北京政府又照会西班牙驻华公使，要求修改1864年签订的《中西和好贸易条约》。不久中国驻西班牙公使又照会西班牙政府，修约期限为六个月，中西之间应废止旧约，另立新约。1927年11月10日，当中西条约到期时，北京政府毅然决定废止1864年条约[428]。在北伐前和北伐时期，北京政府还采用大体同样的方法，与日本、墨西哥等国开展了修改条约的谈判，并向各国驻北京公使馆提出天津各国租界应收归中国管理的问题。1927年4月22日，中、英两国就天津租界问题签署了一个类似《中英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的协定，呈请本国政府批准。此外，继与德国签订中德协定之后，中国又与一战战败国奥地利订立新约。不久中国又与芬兰签订《通好条约》。这两个条约都取消了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规定。另外，北京政府还分别与法国、西班牙等国就终止越南商约进行交涉。这些交涉尽管未能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果，却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决心，使北伐前几年间，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

(1) 参见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2) 参见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3卷，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7版。在西方，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解一直是解释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取向，特别反映在牵涉到传教的题目上。由于这一趋向通常隐含了西方文化优越的预设，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反对。但从文化视角诠释中外关系这一取向基本未在中国生根，不论是从前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冲突说”还是新近得到提倡的“现代化取向”（隐喻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都更侧重经

济和政治因素。

(3)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

(4) 清季士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和表述，他们认识到，此前也有异族入侵，然皆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传统的华夏文化，即昔人所谓"窃学"；但近代入侵的西人则不仅无意"窃学"，根本有"灭学"之图，欲尽可能打压或铲除中国文化。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9-69页。

(5)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一类表述已渐成套话，但在这里的意义非常实际具体，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近代中国朝野抵抗外国入侵的有效性。一般多见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战屡败，或忽视了中国朝野持续抵制外国入侵的效力。正像宋朝虽被蒙元所灭却是世界范围内抵御蒙古入侵时间最长者一样，从世界范围看，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印度等都大致具有和中国一样的地大物博特点，却未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处境，足以反证出中国虽屡败而不亡，且失地不甚广，主权基本保持，已是相当有效的抵抗了。从这一视角看，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在抵抗侵略中的作用和效能还可进一步深入探索。

(6) 这里的讨论受到"非正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由John A．Gallagher和Ronald Robinson在1953年提出，参见其合作的论文"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5-191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I：1（Feb．1953），pp．1-15．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参见William R．Louis，ed．，*Imperialism*：*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后来Robinson自己又有所发展，见其"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with or without Empire"，in Wolfgang J．Mommsen and Jurgen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Allen and Unwin，1986，pp．267-289．不过这一理论主要着眼于经济层面，很少涉及文化。

(7) 萨义德（Edward W．Said）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指出了文化因素对帝国主义扩张以至构成帝国主义概念那不可缺少的作用。参见其*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Knopf，1993（本书有中译本《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particularly pp．267-268．

(8) 参见Ronald Robinson，"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引文

在p．273；并参见其“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in R．Owen and B．Sutcliffe，eds．，*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London：Longman，1972，pp．117-140．David Fieldhouse从另一取向强调帝国主义行为实际发生作用地区的重要性，参见其*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London：Weidenfield & Nicolson，1973．

(9) 由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西方观念不过新近才传入，近代中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个过程，时人更看重的恰是今日中外研究皆不那么重视的纲常礼教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维持。晚清政治文献中一个频繁出现却难以精确译成西文的“国体”一词，就很能反映甚至代表中方的主要思虑。今日不少以中文为思想和表述工具者，也甚感难以界定“国体”一词，恐怕即因为这些人的思维和想象能力（或其使用的概念工具）已部分被“西化”了。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如果不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则不论发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被“发现”的或仍是带有异国眼光的“历史”。

(10) 从晚清到今日，试图淡化西方入侵之帝国主义性质者每强调西人来华意在“通商”，若以之与掠夺领土并论，这大致不甚差；但叶德辉已指出：“通商之士，一其心以营利，不能分其力以传教。”西人对后者的注重揭示出其目的不仅在于“通商”，而是远更广泛（叶德辉：《郎园书札·西医论》，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郎园全书》版，44页）。并参见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9-111．

(11) 近代中国与一般殖民地还有一大不同，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往往是留学生领导，很多时候运动的领导中心正在所谓宗主国之内，与帝国主义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间接联系；而中国的反帝运动除早期与日本有着较密切的关联、一度中心也在日本（但同时更反中国政权）外，大部分时候是相对“独立”的（其思想资源主要是西方的，但运动本身与西方的联系则少）；在20世纪20年代虽与苏俄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但当时苏俄的地位相对特殊：它在中国仍然维持着某些沙俄的帝国主义利益（例如中东路），然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又有着巨大的差别。

(12) 关于清政府支持民间异端力量，参见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收入其《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2页。

(13) 詹森：《国际环境》，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页。

(14)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

(15) 参见John K．Fairbank，“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idem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57-275．晚清中国官民当然也有过修约的想法，或以修约为抵御西方进一步要求的权宜之计，然基本未成为一项有意识的国策。附带地说，费正清此文应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可以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的早期尝试；这说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研究模式与“中国中心观”未必势不两立，只要更加凸显“反应”的一面，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

(16) 王韬早就指出，治外法权“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他认为这是有“忠君爱国之忱”的“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且“必屡争而不一争”，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具体的争法，则“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除额外权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横排本，第73-74页。不过王氏未曾理解到条约的不平等也体现在缔结和修改的方式上，很多时候“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未必有效。

(17) 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16号，第7页。

(18) A．E．Campbell，“The Paradox of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Case”，in Mommsen and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 ，pp．33-40，particularly pp．35-36．陈垣已见及此：《资治通鉴》卷286载后汉天福十二年契丹军克相州后，“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陈先生以为，此“非必其生性残忍也。蔑视之甚，故以非人道待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第十六》，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6页）。盖战争之残酷固易导致敌视而影响人的行为，然以杀婴为乐殊过分，那些胡人只有不视汉人为“人”，始可出此“非人”之举。

(19) Philip D．Curtin，“Introduction：Imperialism as Intellectual History”，in idem，ed．，*Imperialism* ，New York：Harper & Row，1971，p．xiii．

(2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传教下》，第54页。

(21) 关于“东方主义”，参见Edward W．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

(22) 反之，近代来华西人所接触的中国人所表现的或者也非纯正之“中国”，至少在传述中国上层文化方面不够正宗。柳诒徵指出，西人来华所接洽之华人，“或呫毕腐儒，或无赖名士，或鄙俗商贾，或不学教徒”，经由这些人“传译”的中国学术，“最易失真”；但西人却认这些言说“为华人自信之真义”，恐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商榷》（1924年），《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23) “租界行为”的持续性非常明显，到20世纪20年代，曾留学日本、美国而久居上海的杨荫杭观察到：西人“凡曾受教育者，皆讲求礼仪，言动无所苟”。但其“一旦移居东方，则视人如豕。偶不如意，即拳足交下。其意若曰：‘此乃苦力国也。殴一苦力，与殴一人类不同。’于是积习成性，居中国益久，离人道益远。此不特未受教育者为然，即在本国曾受教育者，亦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有西人为余言：凡久客东方者，归时多不为国人所欢迎；以其性情暴戾，异于常人也。”（文载《申报》，1923年5月8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42页）可知租界意识和租界行为确类一“染缸”，久居便被同化；这一同化对西方而言则为异化，故异于西方之“常人”。不过，正如萨义德反复指出的，作为“他人”的殖民地之存在既区别于宗主国的“自我”，却也是构建宗主国“自我”认同的要素（参见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由此视角考察租界意识和行为的异化于西方常规，可更深入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复杂一面。

(2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传教下》，第54页。

(25) 参见*Chinese Repository*，III：9（Jan．1835），p．413；VI：10（Feb．1836），p．446；IX：1（May 1840），p．2；Stuart C．Miller，“Ends and Means：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in John K．Fairbank 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49-282．

(26) 他说，依基督教本义，即使教士因卫道而受辱，也当“如耶稣所云‘披左颊，转右颊向之可也’。苟能含忍包容，人心自服，又何必力为较量”？但列强对传教事业恰是“合举国之权力以庇之”，结果是“庇之愈甚，而冀传教之广播愈难。何则？传教先贵乎化导，化导在身心，不在乎势力也”。

参见郑观应：《传教》（先后两篇），《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412页。

(27) *Chinese Repository*，III：8（Dec．1834），p．363．

(28) 关于传教士方面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

(29) 这一概括在观念和句式上都受到著名的Gallagher-Robinson formulation的影响，他们曾提出“informal control if possible，formal rule if necessary”一说，参见Gallagher an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5-1914”，*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I：1（Feb．1953），p．13．

(30) 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26年10月17日，第394页。

(31) 罗素稍早曾赞扬胡适那本英文的《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起着典范转移作用，并说胡适具有像美国教授一样的良好英文表述能力，这恐怕也是褒中略带贬义，多少体现出看不起美国人的传统英国心态。参见罗素为胡适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32) Charles A．Beard，“Introduction，” in idem，ed．，*Whither Mankind*：*A Panorama of Modern Civilization*，New York：Longmans，Green，1929，p．5．

(33) 这样一种不平的情绪长期存在于日本是其不断发动战争的一个潜在但不可轻视的因素，参见Marius B．Jansen，*Japan and Its World*：*Two Centuries of Chan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此书有中译本：《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柳立言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4) 关于列强作为“外来者”的一面，参见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不过，西方以及日本卷入中国的程度，特别是其通过条约体系直接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及其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留下的更带永久性的印记，都提示出这些外来者已部分内化成“近代中国”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了，其一个明显表征就是当时中国反帝者所秉持的思想资源基本是西来的。说详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35)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88．

(36) 入江昭就认为，华盛顿会议后，以美、英、日三国合作为基础，列强试图在东亚建立一种不那么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新秩序，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

(37) 参见N．Gordon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美、俄两种民族自主的观念在中国都甚得人心，不过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要讲的是欧洲（理论上当然可放之四海，惟其真正的关怀是欧洲），而列宁的民族自决却更多讲到了亚洲。威尔逊能在巴黎和会放弃支持中国，部分也与其实际关怀所在相关。当时的中国人或未必已在这个层面理解和认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但明确感到他不能实行自己的诺言。

(38) 说详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5页。

(39) 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4-234页；叶遐庵（恭绰）述，俞诚之笔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自印本，香港，1970年，179-277页；Roger Dingmen，*Power in the Pacific*：*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1914-192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Thomas Buckle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0；Noel H．Pugach，“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XIV（June 1977），pp．67-86．

(40) 这一思维也被正式纳入中外条约之中，较早的表述见于1902年订立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第十二款指出：中国愿意“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而英国则“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即允放弃治外法权（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0页）。

(41)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12．

(42) 连一向“温和”的胡适在“五卅事件”后也说，列强对中国的排外运

动“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因此，不平等条约就是“一切冲突的祸根”。参见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册，第723页。

(43) 中国方面的挑战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中央的和地方的以及有意的和无意的，如1923-1924年的广州关余事件对列强而言乃是地方政府的作为，而1923年的“临城事件”则明显不具备挑战条约体系的主观意识，列强处理这两次事件皆颇能合作。

(44) 与前引入江昭的看法不同，普嘉锡（Noel H．Pugach）和孔华润（Warren I．Cohen）等认为华盛顿会议后列强间的合作仍比较有限，且更多体现在相互限制的一面，参见Noel H．Pugach，“Anglo-American Aircraft Competition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1919-1921”，*Diplomatic History*，II（Fall 1978），pp．351-71；Roberta A．Dayer，*Bankers and Diplomats：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Totowa，N．J．：Frank Cass，1981；Warren I．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51-70，97-119．

(45) 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0-21；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John Wiley，2nd ed．，1980，pp．105-107．

(46) 关于中德谈判及德国恢复其在华经济利益，参见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23-28；Robert T．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Macmillan，1933，pp．100-104；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13．

(47) 不过，当年中苏条约的谈判却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进行的，苏俄代表加拉罕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违背国际外交谈判常规的口号，却相当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实际得到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谈判中让步。参见何艳艳：《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述论》，四川大学历史系未刊硕士论文，1999年5月。

(48) 例如，“五卅事件”后的中外交涉中，英、日、法、美、意、比形成

一个临时性的“六国集团”共同行动，最能说明原有“外交团”的常规集体行为基本不复存在。

(49) 这一体系的缺陷也包括对华武器禁运的突破，国民党正利用了这一缺陷，先后从俄、德两国获得主要的军事援助。

(50) 实际上，治外法权对外国人的保护远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有效，北伐时期的经历更说明这一条款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连象征性保护能力都不具备：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唯一在中国活动频繁而又没有人员伤亡的主要列强就是在一次大战后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德国。

(51) 当然，列强也会利用意识形态来认识和处理苏俄在华行为，参见Martin Mun-Loong Loh，“American Officials in China，1923-1927：Their Use of Bolshevism to Explain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Anti-foreignism”，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4．

(52) 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已开先例，即日本在政治上从山东退出，但涉及实质性利益的日本势力仍留在山东（中国以为期15年的国库券向日本赎回胶济铁路，在未清偿期间用日本人为车务长、中日各一人为会计长）。但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让步是在列强压力下做出，而中苏条约中的让步却是在内部“国民外交”压力下做出，更能说明中国外交的灵活性。

(53) 关于日本，参见Jansen，*Japan and Its World*；Jean-Pierre Lehmann，*The Roots of Modern Japan*，London：Macmillan，1982；关于俄国，参见Hans Rogger，*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1881-1917*，New York：Longman，1983；Roberta T．Manning，*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n Russia：Gentry and Gov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Adam B．Ulam，*The Bolsheviks：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New York：Macmillan，1965．

(54) 杜亚泉：《中国之新生命》（1918年），《杜亚泉文选》，田建业等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55)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第4页。

(56)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排本，第3-16页。

(57)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亚东图书馆1931

年8版，128a-128i页。

(58) 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43页。

(59) 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转载于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60) 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6期（1922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45-50页。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

(61) 这是近代中外交往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西方给中国带来许多可借鉴的新思想资源，但其既然以入侵方式进入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接受这外来的思想资源。同时，外来者的双重角色也使得在中国的“西方”不能不“分裂”。（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日本在这中间的地位相对特别：在西方思想资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自身也可以说是新思想资源的提供者；然而在处于社会、政治秩序大调整中的日本国内，主张采取直接领土掠夺政策的一派始终活跃于政界和军界，故日本对以间接控制为表征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也存在挑战的一面。

(62) 部分可能因为其自身仍处革命后社会、政治秩序的大调整之中，苏俄显然更能领会中国内部激变那突破常规一面的革命性意义，其提出以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主张非常具有想象力，与那些试图维护既定秩序的西方列强相比，体现出相当充分的“思想解放”。

(63)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收入其《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第104-128页。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本文所说的“民众”和“大众”通常不出城镇的范围，即使在城镇中也更多指的是多少识字且对“国是”保持兴趣的一部分，其实际数量可能不甚大。

(64) 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裴克（Willys R．Peck）稍后观察到，“在政治中引起民众关注的最简易、最保险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排外，所有的中国政治派别都以此策略来“确保民众的支持”。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eck and Wellesley，Dec．9，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41，893．00/7981．

(65) 加拉罕在1924年就提醒中国：华盛顿会议关于审查治外法权和增加关税等权利，“以法国之反对”，迄今未能实行。（加拉罕致王正廷，1924年3月19日，收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在1925年也已注意到法国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对列强利益和中外关系的损害（MacMurray to Hughes，Nov．17，1925，John V．A．MacMurray Papers，Seeley G．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66) 前述“保守”的杜亚泉与激进的中共观点相近，就极具启发性。一般不视为激进的张君劢就说，巴黎和会后，“我心中大为不平，觉得协商国政治家之所谓正义人道者，皆不过欺人之词；因而想及所谓国际法者，实等于国际的非法”。由于对其所研究的国际法失望，他不久即放弃修习国际政治。参见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改造》，4卷5号（1922年1月），1页（文页）。张氏自己后来在中苏谈判期间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晨报》，1923年9月11日，6版）再后来留学欧洲专习国际法的周鲠生提倡流氓式的“革命外交”，（参见周鲠生：《革命的外交》，收入其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11页）其潜在造因大概也源于此。

(67) 引自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第49—51页。

(68) 参见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497—509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9—218页。

(69) 苏俄代表团致中国外交部节略，1923年6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署会务处编：《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140页，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以下凡出现此书仅引书名、页数）

(70) 朔一：《加拉罕东来及中东路地亩交涉》，《东方杂志》，第20卷，第15号（1923年8月10日），第10-11页。

(71) 《盛京时报》1923年8月14日、15日、17日，均为第2版；8月18日、19日，均为第4版；《晨报》1923年8月17日第3版。

(72) 《盛京时报》1923年8月7日第2版。

(73) 《盛京时报》1923年8月19日第3版。（这一提法与《民国日报》1923年8月24日第6版记载有出入，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92-193页，《民国日报》未见此种提法，时间亦记为8月16日）；《盛京时报》1923年8月19日第4版。

(74) 《晨报》1923年8月23日第3版。

(75) 《盛京时报》1923年8月22日第4版。

(76) 参见林军：《苏俄政府在归还中东铁路问题上口径的变化——加拉罕给越飞的信》，《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引文均转引自第38-40页。

(77) 《晨报》1923年8月21日第3版。

(78) 《晨报》1923年8月22日、23日均为第4版。

(79) 《晨报》1923年8月29日第4版。

(80)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3年9月3日，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8-199页。（以下凡引自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不再注明）

(81) 这一声明曾在中国报界代表中广泛散发，登载于《晨报》、《京报》、《时报》、《顺天时报》，1923年9月5日。

(82) 临案通牒指1923年5月6日在山东临城车站发生了劫车案后，英、美、法、日等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抗议照会。

(83) 宣言内容译自《苏俄对外政策文件集》第6卷，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3- 196页。

(84) 《晨报》1923年9月6日第3版。

(85)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3年9月6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9-200页。

(86) 详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0页。

(87) 《晨报》1923年9月8日第3版、第6版；9月10日第6版；9月13日第2版、第6版；9月16日第3版；9月18日第6版。

(88) 本段与下段，《晨报》1923年9月11日第6版。

(89) 中东铁路地亩交涉，指张作霖因不满中东铁路地亩处的作为，派张焕相为地亩局局长于1923年8月1日接收地亩处，而俄铁路局局长渥斯特罗乌莫夫与地亩处处长关达基拒不交代，并运动当时驻哈的英、美、法、日四使出面干涉。

(90) 《晨报》1923年9月21日第3版。

(91) 加拉罕致孙中山博士的信，1923年9月8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532页。

(92) 孙中山复加拉罕电，1923年9月16日；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1923年9月17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辑，第532-533页。

(9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辑，第296页。

(94)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6卷，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7-198页。

(95)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全权代表王正廷全权证书，1923年10月2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3页。

(96)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0页。

(97) 《晨报》1923年11月3日第3版。

(98)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1-83页。

(99)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3页。

(100) 《晨报》1923年11月3日第2版。

(101) 《晨报》1923年11月6日第2版。

(102) 《晨报》1923年11月6日第2版。

(103) 仲平：《中俄交涉的近况》，见《向导周报》第45期，1923年11月7日，第344-345页。

(104) 《晨报》1923年11月14日第3版；11月15日第2版。

(105) 《晨报》1923年11月16日第2版。

(106) 译自A．伊文：《中国和苏联》，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4页。

(107)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月14日第6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5页。

(108) 译自A．伊文：《中国和苏联》，第111-115页，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7-209页；加拉罕此函登于1924年1月11日《晨报》第3版。

(109) 《晨报》1923年12月3日、5日，均第3版；《关于中俄交涉重要公文及舆论》，《东方杂志》，第21卷，第8号，1924年4月25日，第125-132页。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问题的探讨，参见朱正：《解读一篇宣言》，《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212-223页。

(110) 《晨报》1923年11月15日第2版；《晨报》1923年12月8日第2版。

(111)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节略，1924年9月3日至11月30日；译自A．伊文：《中国和苏联》，第111-115页，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5-209页。

(112)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月24日第六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4页。

(113) 苏联驻华特命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函，1924年1月17日，译自《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4-225页；《晨报》1924年1月19日、20日、21日均为第3版。

(114) 渊泉：《英国无条件承认苏俄》，《晨报》1924年2月3日第2版社论。

(115) 《晨报》1924年2月16日第2版。

(116) 《晨报》1924年2月16日、20日均为第2版。

(117) 《晨报》1924年2月18日第2版。

(118) 《晨报》1924年2月28日第2版。

(119) 《晨报》1924年2月12日、14日均为第3版，2月17日第2版、第3版。

(120)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2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8-229页。

(121)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2月22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9-231页。

(122)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2月2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31-236页。

(123) 中国提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924年2月25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苏联最后修正案，1924年3月1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1-8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12-217页；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3月1日，第236-241页。

(124) 《晨报》1924年3月4日第2版。（注《晨报》3月7日第2版，又说四份中有一份为呈内务部而非交通部）

(125)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出席国务会议第一次报告，1924年3月8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1-242页。

(126) 中日密约即指1918年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27)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3月8日晚九时，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2-249页。

(128)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出席国务会议第二次报告，1924年3月11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9-250页。

(129) 《晨报》1924年3月15日第2版；《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3月17日第3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87-288页。

(130) 阁议拟补充第四条声明书，阁议拟修正第五条协定，北洋政府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22、23页，见《中苏

国家关系史资料会编（1917-1924年）》，第250页。

(131) 王加草案具体签字时间说法很多。《晨报》3月16日报道为14日夜十一时左右；顾维钧说是在14日上午8时；加拉罕在3月16日，19日两次照会都称签订协定时间为14日午前；华俄通讯社所发表的王加协定大纲所署日期为14日；而3月20日《晨报》又称孙宝琦检阅交涉记录的结果是王正廷于13日签字；林军的《中苏外交关系》称双方谈判签约时间从13日晚8时至14日清晨4时。（参见《晨报》1924年3月16日、20日、22日，4月10日均为第2版；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致国务院咨呈，1924年3月16日，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函，1924年3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3-256页；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9页。）

(132) 《晨报》1924年3月16日、18日均为第2版。

(133)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致国务院咨呈，1924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24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1页。

(134) 《晨报》1924年3月19日第2版。

(135) 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2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3页。

(136) 《晨报》1924年3月18日第2版。

(137) 《晨报》1924年3月19日第2版。

(138) 《晨报》1924年3月19日第2版。

(139)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函，均为1924年3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3-256页。

(140) 大总统令，1924年3月20日，北洋政府《政府公报》，1924年3月21日，第2873号，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9页。

(141) 本段和下三段，国务院致各省通电，1924年3月20日，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7-258页；并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34-335、第396页。在号电发出之后，国务院续发哿电，将加拉罕19日照会中所提的五点声明向各省再作通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1924年3月2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

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40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8-259页。

(142) 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2页。

(143) 《晨报》1924年3月9日第2版。

(144) 《晨报》1924年3月12日第2版。

(145) 《晨报》1924年3月13日第2版。

(146) 《晨报》1924年3月11日、13日、18日、4月10日，均为第2版；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8日第2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0-251页。

(147) 外交部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节略，1924年3月2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31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9页。

(148)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节略，1924年3月2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32-3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60-263页。

(149) 《晨报》1924年3月26日第2版。

(150)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通电报告交涉经过，1924年3月21日，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67-268页。

(151) 本段与下段王正廷三月二十三日对国务院号电自辩通电，《东方杂志》第21卷，第9号，1924年5月10日出版，第133-134页。

(152) 王正廷的第三次通电一覆各省的最后通电，见《东方杂志》，第21卷，1924年5月10日，第9号，第134-135页。

(153) 参见仁静：《中俄交涉杂评》，《向导周报》，第60期，1924年4月2日，第479页；《晨报》1924年3月28日第2版。

(154) 《晨报》1924年3月26日第2版。

(155) 《晨报》1924年3月28日第2版。

(156) 《晨报》 1924年3月22日第2版。

(157) 《晨报》1924年3月29日第2版。

(158) 《晨报》1924年3月18日第2版社论。

(159) 《晨报》1924年3月21日第2版。

(160) 《晨报》1924年3月23日第2版。

(161) 《晨报》1924年3月28日第2版。

(162)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41页。

(163) 《晨报》1924年3月23日、25日，4月1日均为第2版；《申报》，1924年4月5日第6版。

(164) 《晨报》1924年3月29日第2版。

(165) 《晨报》1924年3月20日第2版。

(166) 《晨报》1924年3月21日第2版。

(167) 《晨报》1924年3月22日第3版。

(168) 《申报》1924年3月23日第7版。

(169) 《晨报》1924年3月22日第3版。

(170) 《晨报》1924年3月22日第3版。

(171) 《申报》1924年3月20日、21日，均为第7版；《晨报》1924年4月4日第2版。

(172) 《盛京时报》1924年3月21日第1版。

(173) 《盛京时报》1924年3月23日第1版；3月25日第7版。

(174) 渊泉：《中俄交涉破裂之责任者》，见《晨报》于3月22日第2版社论。

(175) 《申报》1924年3月24日第7版

(176) 《申报》1924年3月25日第4版。

(177) 召召：《中俄会议观》，《盛京时报》1924年3月25日、26日，均为第1版。

(178) 《晨报》1924年3月31日第2版。另据《晨报》4月2日第3版，群治社中潘乃德，黄金声、黄伯耀、陆竣云、郑宗荣等未曾到会，对列名之事不予承认。

(179) 《晨报》1924年3月29日第2版。

(180) 《晨报》1924年3月30日第2版；《申报》1924年4月1日第7版。

(181)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3月23日、27日均为第7版，4月3日第6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97-298页。

(182) 《申报》1924年4月4日第13版。

(183) 渊泉：《忠告苏俄政府》，见《晨报》1924年4月1日第2版社论。

(184) 张梓生：《中俄复交之经过》，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3号（1924年7月10日），第41-42页；朔一：《中俄协定突然签字》，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号（1924年6月25日），第3-4页。

(185) 《申报》1924年3月23日第7版；3月25日第4版。

(186)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46-347页。（关于这一秘密谈判的过程未见档案资料的记载。）

(187) 大总统令，1924年5月31日；国务院及外交部致各省区通电，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政府公报》1924年6月1日，第2944号，6月2日，第2945号，《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79-281页；《晨报》1924年6月1日第2版。

(188) 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国务会议的报告，1924年6月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80-281页。

(189)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47页。

(190) 北京议员维持中俄协定宣言，见《向导周报》第71期，1924年6月25日，第571-572页。

(191) 上海闸北市民庆祝中俄邦交恢复之通电，见《向导周报》第71期，1924年6月25日，第570-571页。

(192) 《晨报》1924年6月1日第2版。

(193) 《盛京时报》1924年6月17日第4版。

(194) 孙中山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24年3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08-710页。

(195)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7月22日第3版，见《中苏国家关系

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86-287页。

(196) 《晨报》1924年4月1日第2版。

(197) 《晨报》1924年4月5日第2版。

(198) 《晨报》1924年4月2日、3日，均为第2版。

(199) 《申报》1924年6月11日第6版，6月27日第10版。

(200) 《盛京时报》1924年6月17日第4版。

(201) 《盛京时报》1924年6月28日第1版。

(202) 《申报》1924年6月4日第7版；《晨报》1924年6月11日第2版。

(203) 曾友豪：《中俄协定给与中国之利害》，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1924年10月25日），第27-34页；《中俄协定之正式公文》，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3号（1924年7月10日），第139-146页。

(204) 曾友豪：《中俄协定给与中国之利害》，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1924年10月25日），第27-34页；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99-100页。

(205)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8-119页。

(206)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七）中俄部分，第709-71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71-272页。

(207) 《晨报》1924年6月5日第2版。

(208) 《晨报》1924年6月13日第2版。

(209) 《晨报》1924年6月15日第2版。

(210) 《晨报》1924年6月20日第3版、7月12日第2版、7月14日第3版。

(211) 《晨报》1924年6月22日，7月1日均为第2版。

(212) 《晨报》1924年7月1日第2版。

(213) 《晨报》1924年7月16日第4版；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美国国务卿的信，1924年7月12日，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24年I卷，第445页。

(214) 外交部发全权公使衔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电，1924年7月14日，

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00页。

(215) 《晨报》1924年7月17日第4版。

(216) 《晨报》1924年7月18日、21日均为第3版。

(217) 《晨报》1924年7月20日、27日均为第3版。

(218)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国务卿的信，1924年7月25日，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24年I卷，第448-449页。

(219)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国务卿的信，1924年7月25日，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24年I卷，第451页；《晨报》1924年7月30日第3版。

(220) 《晨报》1924年7月26日，8月1日、12日均为第3版；《申报》1924年8月5日第7版。

(221) 《晨报》1924年8月9日、11日、13日均为第3版。

(222) 《晨报》1924年8月19日第3版。

(223) 《晨报》1924年8月20日第3版。

(224) 《晨报》1924年9月4日第3版。

(225) 《晨报》1924年9月6日、7日均为第3版，9月12日第2版。

(226)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9月26日，10月6日均为第1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06-307页。

(227) 《晨报》1924年10月8日第2版。

(228)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七），中俄部分，第709-71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71-272页。

(229) 北洋政府《外交公报》，第39期，第1页；驻俄李代表晤齐总长问答——中俄问题事，1924年8月1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转引自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7页。

(230) 《晨报》1924年7月14日第2版。

(231) 《晨报》1924年8月6日、7日均为第3版。

(232) 《晨报》1924年8月16日第3版。

(233) 《晨报》1924年11月5日、10日均为第2版；11月13日第3版。

(234) 《晨报》1924年11月19日第2版。

(235) 《晨报》1924年12月3日第2版，12月5日第3版。

(236)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8页。

(237) 幼雄：《中俄会议难产》，见《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1925年7月10日），第5-6页。

(238)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8-119页。

(239) 北洋政府筹办中俄事宜公署：《中俄会晤录》，转引自林军：《中苏关系（1917-1927）》，第105-106页；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4年6月13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5页。

(240)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4年7月7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6页。

(241) 《晨报》1924年7月16日第3版，8月6日第4版。

(242)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1924年8月10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6页。

(243)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1924年8月12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1917-1924年）》，第316页。

(244) 外交部秘书朱鹤翔会晤苏联大使加拉罕，1924年8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7页。

(245) 外交部发全权公使衔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电，1924年9月24日，9月2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2-323页。

(246) 《晨报》1924年10月5日第3版。

(247) 《晨报》1924年10月4日第3版。

(248) 法国驻华代办致中国外交部照会，1924年10月3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向中国官署递交抗议书，1924年10月3日，《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0月6日第1版，均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4-325页。

(249) 外交部发全权公使衔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电，1924年10月11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2-324页；《晨报》1924年10月14日第2版。

(250)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致临时执政段祺瑞函，1925年1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5页。

(251) 临时执政府秘书厅致外交部公函，1925年1月19日后；中俄会议会务处说帖，请商交通总长应否将奉俄协定归并中俄协定并通知苏联大使由，1925年2月3日；交通部致外交部函，1925年2月2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6页。

(252) 临时执政指令第346号令外交总长沈瑞麟，交通总长叶恭绰，1925年3月12日，北洋政府：《政府公报》1925年3月13日，第3214号，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6-327页；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1925年3月18日，见《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1925年4月25日），第150页。

(253) 张国忱：《张作霖父子对苏关系和中东铁路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6-867页。

(254) 奉俄协定内容《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七）中俄部分，第734-744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7-322页；中俄协定内容见《有关中俄交涉的重要舆论与公文》，《东方杂志》第21卷，第13号（1924年7月10）日；同时参见《奉俄协定与中东路改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号（1924年10月10日），第10-13页；《晨报》1924年10月15日第2版。

(255) 《盛京时报》1924年10月9日第1版。

(256) 参见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第503-507页。

(257) 1925年中国盐税收入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比例为21％，田赋所占比例为19％。参见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204—20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贾士毅《民国财政简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97页附表。

(258)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204—20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案：关税总收入不包括常关税，外债偿还额包括庚子赔款在内。

(259)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1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4页；陈向元：《中国关税痛史》，台北学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06页。

(260) 《中央财政之现状》，《大公报》1925年3月9日。

(261) 台北党史研究会编：《革命文献》第8辑，第125—126页。

(262)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3—15页。

(26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页。

(264)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页。

(265) 参阅马振举：《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关税与财政》，《南开学报》1987年第4期，第38页。

(266) 《恃债为生之中央财政》，《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五册，第382页。

(267) 《目前财政上之两大案》，《顺天时报》1925年3月12日。

(268) 《新公债条例昨晚明令发表》，《顺天时报》1925年3月17日。

(269) 《冯玉祥派员来京接洽与奉合作》，载《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

(270) 贾士毅：《整理外债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5号，第6页。

(271) 《八使拒开关税预备会》，《申报》1924年6月12日。

(272) 《北京政府未关税特别会议致法国公使照会》（1925年4月8日），载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8页。

(273) 《驻英朱代办致外交部电》（1925年7月18日），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关税特别会议档案（以下简称“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15—（2）。

(274) 转引自《李代表赴俄外部与齐外长会晤问答》（1925年7月31日），“关档”，03—25／9—（1）。

(275) 杨幼炯：《近时国际问题与中国》，第191页，转引自李光一《1925年至1926年的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讨论文集》（中国现代史第二次学术与教学讨论会，1981年），辽宁师范学院铅印本，第280页。

(276) 转引自李健民著《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184页。

(277) 币原平和财团编：《币原喜匆郎》，东京币原平和财团出版，昭和30年，第278页，转引自韩姜文求《从关税特别会议召开的背景看其失败的原因》，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第91页。案：本节涉及各国对关税会议的态度部分参考并利用了姜文求先生论文和资料。

(278)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1．法国政府承诺将法国部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用于促进于中法两国有益之事业；2．中国政府承诺将“上项应付而已退还之赔款余额，按照1905年所采用之电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或有之盈余，一并折合美金，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与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办），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债之担保。”见《外交总长致法国公使文》，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9号，第133—135页。

(279) 《法国批准华会公约》，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5号，第7—8页。

(280) 《段祺瑞通电》（1925年4月21日）、《北京政府财政部请求批准金佛郎案呈文》（1925年4月11日），见《北洋军阀》（五），第152—155页。

(281) 《国会议员宣言》（1925年4月1日）、《国会议员致法公使及法政府宣言》（1925年4月）、《北京国会反对金佛郎案电》（1925年4月），见《北洋军阀》（五），第157—160页。

(282) 和森：《卖国备战的金佛郎案》，《向导》第110期，1925年。

(283) 《检举金佛郎案犯罪理由书》，见《北洋军阀》（五），第166—178页。

(284) 《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派员参加中国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8月18日），见《北洋军阀》（五），第78—79页。

(285) 《时事新报》1925年8月12日，转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779—780页。

(286) 《关税会议与出口税》，载经济学社编《关税会议专刊》，收入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编第43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1页。

(287)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6页。

(288) 《神阪中华会馆致外交部》（1925年10月17日），见“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7—（1）。

(289) 《湖南赵省长电》（1925年11月7日），见“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8—（1）。

(290) 陈独秀：《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向导》周报，第131期，1925年9月25日。

(291) 《民国日报》1925年8月14日。

(292) 《民国日报》1925年10月8日。

(293) 《总商会出席关税会议代表赴京》，《新闻报》1925年10月22日。

(294) 《纺织时报》1925年9月28日、10月19日。

(295) 《驻英朱代办电》（1925年10月4日），见“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3—（2）。

(296) 完颜绍元：《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297) 《关税定率条例》（1925年10月24日）、《烟酒进口税条例》（1925年10月24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33—35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1）。

(298) 《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各国代表团衔名录》，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6—21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1）。

(299) 《关税特别会议第一次大会议事录》，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2—23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1）。

(300) 《中国外交总长沈瑞麟致词》，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3页。

(301) 《中国政府代表王正廷提案》，《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4页。

(302) 陆宇光：《民国史要》，民国十六年版，收入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丛刊》三编，第2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3页。

(303)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2页。

(304) 《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0月30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47—50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1）。

(305) 《日本代表日置益君演词》，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8—29页；《特约路透电·关于中国近事之外电》，《申报》1925年11月5日，第5版。

(306) 《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0月30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52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1）。

(307) 《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0月30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52—56页。

(308) 武育幹：《中国关税问题》第四章《特别关税会议与中国关税自主运动》，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9页。

(309)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册，第102页。

(310)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311) 《裁厘说帖》，《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56—57页。

(312) 《裁厘说帖》，第57页。

(313)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14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32—134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2）。

(314)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14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35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2）。

(315)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19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36—138页；《外交公报》第54期，专件，第17—18页。

(316) 《颜惠庆自传·都门万象》，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317) 商约谈判中，中国代表主张“将进出口货一面照时价核估，扯平修改，一面专指洋货援照洋药税厘并征办法，于核估时价值百抽五后，并连子口半税二五，统加厘一倍，共总值百抽十五（即正税加子口半税等于7．5%，再加7．5%的厘金，即等于15%），俱在海关并征。”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尝极力支持这一办法，认为这是“财政改革的开端，是中国复兴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在稍后中外进行的商约谈判中，各国所议“皆以加税免厘一事为主脑”。可见在裁厘加税问题上，中外并无原则分歧。但由于各国在税率上各持己见，庚子之后的商约谈判未能就裁厘加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参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硃批盛宣怀等折，转引自罗玉东著《中国厘金史》第一册，第137页，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12册，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式印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卷9，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7页。

(318) 《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1922年2月6日），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220—224页。

(319) 《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公布文件》，外交部编《外交公报》第54期（民国十四年12月）专件，第1—7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57册，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320) 上海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321) 《日本代表之声言》，《外交公报》第54期（民国十四年12月），专件，第11—13页。

(322)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义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81—83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2）。

(323) 《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86—92页；《义代表宣言》，《外交公报》第54期（民国十四年12月）专件，第14—16页。

(324) 这一重要的变动很可能与王正廷的南方背景有关。完颜绍元对此有如下分析：王氏之所以被换，是因为（1）浙奉战争已经以奉系势力被驱逐出东南地区宣告结束，国民军乘机反奉倒段的态势已相当明显，以冯玉祥为后台的王正廷自然没有增加附加税为执政府开辟财源的积极性；（2）国民党已经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声望日隆，作为与国民党关系深远的王正廷不能

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利用供职外交委员会之便，以调查沙基惨案为名，将孔祥熙派往广州，已很明显是在为自己谋求后路；（3）尽管关税自主案获得通过，但中国政府“自动”声明裁厘以谋求关税自主的做法，仍旧不为要求无条件实行关税自主的激烈舆情所谅解，而附加税问题不妥协则难以达成协议，妥协则非王氏所愿。参阅氏著《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325) 《中国关会委员通电报告会议经过情形》（1926年5月11日），《晨报》1926年5月13日。

(326) 1926年1月8日，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邀请各国专门委员开茶话会，表示关税用途按税率统计每年增收九千万元，计划以三千万元还债，三千万裁厘，二千万用于建设，一千万为紧要政费。详见上海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287页。

(327)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2页。

(328)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30页。

(329) 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465—466页，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85辑。

(330) 武育幹：《中国关税问题》，1926年版，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331) 颜惠庆：《关税会议之始末》，见《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60页。

(332) 《中国关会委员通电报告会议经过情形》（1926年5月11日），《晨报》1926年5月13日。

(33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大事记》第12辑，第33—34页。

(334) 《中国关会委员通电报告会议经过情形》。

(335)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474页。

(336) 美国的议案原文如下：“又议决所有由征收各该附加税所增收之税款，应由海关保管，不受一切干涉，以备日后照本会议议决或本会议商订条约内规定之用途与条件支配之。”见《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1926年3月18），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348—350页，“关

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21—（2）。

(337) 美国的议案原文如下：“又议决所有由征收各该附加税所增收之税款，应由海关保管，不受一切干涉，以备日后照本会议议决或本会议商订条约内规定之用途与条件支配之。”见《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1926年3月18），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348—350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2），第348—357页。

(3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页。

(339) 《中国希望条件说帖》，北京政府司法部档案，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页。

(340) 外交部档案：《法权讨论委员会议决案第二号》、《收驻美施公使电》（1923年5月31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案卷号：03-34 ／ 3-（1）。

(341) 随波：《国内要闻·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6月10日。

(342) 随波：《国内要闻·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6月25日。

(343) “至于此次政府对外交涉，总算敏捷强硬，一洗向来濡迟怯弱之弊。外交部为五卅事件于十天内连续提三个抗议，措辞都极强硬，在中国的外交习惯上，倒是不多见的”。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7页（注：以下简称《大事记》）。

(345) 《中国国民党通电》，《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46) 《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47) 《大事记》，第11辑，114页。

(348) 马寅初：《不平等条约于我国经济上之影响》，《东方杂志》，第22卷16号。

(349) 姚公鹤：《上海空前惨案之因果》，《东方杂志》，第22卷15号。

(350) 《梁启超上段执政书》，《申报》，1926年6月29日。

(351) 天生：《不平等条约如何废除乎》，《国闻周报》，第2卷24期。

(352) 布雷：《中国今后之外交》，《国闻周报》，第3卷8期。

(353) 《重要函电汇录》：《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54)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第56—57页，转引自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355) 台北中研院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发驻美施公使电》（1925年9月9日），编号：03-34/4-（1）。

(356) 外交部档案：《收驻美施公使电》（1925年9月12日），编号：03-34/ 4-（1）。

(357) 外交部档案：《收驻美施公使十一日电》（1925年9月12日），编号：03-34/4-（1）。

(358)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纪要》（初稿），第800页，

(359)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页、177页。

(360) 《大事记》，第11辑，152页。

(361) 《京法界收回领判权之准备》，《申报》1925年9月21日。

(362) 《召集调查司法委员会之筹备》，《申报》1925年9月19日。

(363) 《国外要闻·美国通信》，《申报》1925年10月31日、11月1日、11月2日（连载）。

(364) 《国外要闻·美国通信（三）》，《申报》1925年10月19日。

(365) 《国外要闻·美国通信（四）》，《申报》1925年10月21日。

(366) 《法权会议开幕之预讯》，《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9日。

(367) 《领判权与警权及课税权》，《晨报》1926年1月13日。

(368) 《法权会议之重要前提》，《晨报》1926年1月12日。

(369) 《省联会对法权会议之主张》，《申报》1926年2月5日。

(370) 《法权自主会招待当局》，《申报》1926年2月25日。

(371) 外交部档案：《发驻美施公使电》（1925年9月9日）。编号：

03-34/4-（1）。

(372) 外交部档案：《大美国特命驻扎中华全权公使马为照会事接准》，编号：03-34/5-（1）。

(373) 将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与改良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在主张由来已久。早在1902年9月5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第一次在条约中有条件地表示将放弃其在华领判权。“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列，以期与各国律列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列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1903年10月8日，中美间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也有类似的提法。从此，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与中国司法“皆臻妥善”联系在一起了。引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9页。

(374) 《外交公报》第55期，第5页。

(375)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19—820页。

(376) 《马君武关于司法观事件之谈话》，《大公报》（长沙）1926年2月11日。

(377) 《法马撤废惩治盗匪法之提案》，《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25日。

(378) 《马君武对法权会议之谈话》，《大公报》（长沙）1926年2月11日。

(379) 《调查法权会议议长史托恩之谈片》，《晨报》1926年1月17日。

(380) 外交部档案：《会稿》，编号：03-34/6-（2）。

(381) 外交部档案：《代拟外交部致各省特派员及各埠交涉员》，编号：03-34/6-（1）。

(382) 这八个方面分别是：1．临时裁判权；2．华人与享受领事裁判权之外人案件之审判；3．享受领事裁判权之外人与无领事裁判权国之外人及与中国无条约关系国之外人案件之审判；4．会审公堂；5．外人房屋及船舶内之庇护权；6．给予外国国籍证书于中国人；7．外人免除租税权；8．租界、租借地、北京使馆界、铁路附属地等特殊区域。见《法权委员会报告书》附录。

(383) 令文曰："国民政府唯一之职责，在奉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其最先着手，即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当然收回，无须由外人调查。故对于此次调查法权外国委员来粤，决定不予接待。"外交部档案：《法权委员团在鄂参观各厅监所程序》，编号：03-34/7-（1）。

(384) 《中华民国史纪要》（初稿），第314页，1926年4月10日条。另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0号，第5页。

(385)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纪要》（初稿），第802页，

(386) Form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 on Ex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China，Apr．16，FRUS，1926，Vol．I，p．973．

(387) 《司法调查之演说》，《盛京时报》1926年6月8日；《司法调查之经过》，《盛京时报》1926年6月9日。

(388)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34-837页。

(389) 《法权委员赴赣经过》，《晨报》1926年5月29日。

(390)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56、868-869页。

(391)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76—877页。

(392) 参阅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393) 毛以亨：《一代新锐梁任公》，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394) 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载《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3页；《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1页。

(395) 周鲠生：《中国的国际地位》，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第7页。

(396) 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四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20页。

(397) 《外交部致施、顾、王三代表宙字第131号极密电》，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四卷，第615页。

(398) 阎沁恒：《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中对于处理几项有关中国问题之态度》，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五），台北1985年再版，第60—69页。

(399) 《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五），第68页。

(400) 胡秋原著：《近百年来中外关系》，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2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171—175页。

(401) 周鲠生：《中国的国际地位》，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第7—16页。

(402) 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调查部：《外人在华利益的调查》，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年4月10日出版），第32页，倪文宙节译。

(403) 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谢》，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3页。

(404) 林霭：《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高等教育：1924—1925》，载章开沅等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405) 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22日，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1936年版，第978页。

(406) Cf．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38-53．

(407) 《外交部致驻比王公使电》（1926年10月28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三九（6），案：以下涉及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所引北洋政府档案均转引自习五一著《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兼评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82—201页。

(408) 《外交总长胡惟德致比华使照会》（1926年4月16日），《比华使复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1926年4月27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顾维钧已指出，比国的做法，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来讨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内容，这本身就是极为荒唐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8页。

(409) 《临时办法》（1926年8月2日中国外交部提出），《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

(410) 《外交部收驻比王公使电》（1926年9月7日），《北洋政府档

案》一〇三九（5）。

(411) 《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0月23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

(412) 《沪总商会再争废比约》，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7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92页。

(413) 《商联会主张以经济绝交为废约之后盾》、《商联会筹划对比经济绝交》，《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393-396页。

(414) 《中比商约问题：孙传芳陈陶遗电复总商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394页。

(415) 《东南五省当局主废约》，《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425页。

(416) 《比约岂真须延长九月耶》，《益世报》1926年11月5日。

(417) 《全国学生总会废除中比商约宣言》（1926年10月27日），《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11月6日。

(418) 政之：《生死关头之废约问题》，载《国闻周报》第3卷第41期“时评”，1926年10月24日。

(419) 《外部令王景歧对比严重抗议》，《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423页。

(4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55—357页。

(421) 《比方答复修约节略比使昨日面交外顾》，《顺天时报》1926年11月6日；《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1月5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

(422) 《外交部对于交涉终止中比条约之宣言》（1926年11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外交，第962—966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57页；《政府宣告比约失效》，《晨报》1926年11月7日；《以大总统指令昨竟宣布中比商约失效》，《顺天时报》1926年11月7日。

(423) 《东方杂志》第24卷第3号，第111页。

(424) 《我国对比提议提交国际联盟大会》，《晨报》1926年11月20日；《政府驳复比使照会认比约不应提出国际法庭》，《益世报》1926年11

月20日；《比国反对提国际联盟》，《晨报》1926年11月29日。

(4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 359—360页。

(426) 《申报》1926年11月8日、27日。

(4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 357—558页。

(428) 《中国与西班牙关于修约交涉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28页。

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北京临时执政府的垮台

第一节　浙奉战争与孙传芳势力的兴起

江浙战争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江浙和平并未能持久，导致1925年内先后发生了第二次江浙战争和浙奉战争。尤其是浙奉战争后，孙传芳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东南半壁，国内政治格局亦发生巨大的改变[(1)]。

一　浙奉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后，奉系势力大大扩张，张作霖有意让奉军南下，占据富庶的江浙地盘，而刚刚在江浙战争中败北的皖系卢永祥则企图借奉军力量重出，双方由此有了合作的契机。张作霖决定让卢永祥打头阵，先通过他驱逐直系苏督齐燮元，再谋江苏。12月11日，在张作霖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罢免苏督齐燮元，裁撤江苏督军，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此举虽受到江苏地方士绅的抵制，但齐燮元为暂避其锋，遵令解职去沪。卢永祥随即于1925年1月10日入宁，奉军亦沿津浦线大举南进。

奉系的举动，自然引起浙江实力派孙传芳的高度警惕，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不被奉系侵吞，孙传芳决定出而反击奉系。1月11日，孙

传芳联合齐燮元发表通电，组织江浙联军，反对奉军南下。而卢永祥也在南京备战，任奉军军长张宗昌为总司令，战火一触即发。上海为繁华都市，地方士绅为免战火之袭扰，倡议中立，双方都不在上海驻兵，得到段祺瑞的首肯，段以孙传芳续任浙督，以安其心。在段祺瑞和奉系的软硬兼施之下，孙传芳态度软化，对军事行动趋于消极，齐燮元势单力孤，军事失利，28日自上海东渡日本。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在沪上签订和平协定，双方同时从上海撤军。第二次江浙战争以齐燮元失败，孙传芳和奉系各有所获而告终。

战后，卢永祥以督办江苏军务的名义驻苏，郑谦为省长，与浙省间尚能保持一定的和平局面。孙传芳亦派人赴北京与段祺瑞修好，表示拥戴之意 (2) 。但是对奉系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终究不能释怀。据孙传芳身边重要人物杨文恺回忆，1925年四五月间，孙曾派他到张家口、开封与冯玉祥、岳维峻会面，表明攻奉之决心，商议合作计划 (3) 。

“五卅事件”的爆发使得江浙一带的均势渐被打破。事件发生后，由于列强认为中国政府在上海缺乏镇慑力量，故段有派兵到沪的拟议。6月13日，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带领“东北陆军教导团”二千二百余人抵沪 (4) 。后来，张学良又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 (5) 。张学良离沪后，即由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 (6) 。

奉张此举，虽然主要是为应列强要求压抑上海工人运动，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藉机加强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 (7) 。奉军抵沪后，上海海口便操于奉军之手，孙传芳之军械接济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后来，邢士廉旅在沪扩编成第二十师，对浙孙而言，威胁更甚。

另一方面，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

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即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三团体后经人疏通重新启封，但到9月18日，上海总工会终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8]。奉军的举动无疑引起中共及当时对国民革命运动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共产国际的不满。

“五卅事件”后，奉张在北方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国民军间的对抗态势无疑加大。6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即有决议，认为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斯大林提出要“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并有“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革命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计划[9]。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在沪指导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张作霖准备在从天津到上海的整个沿海地带采取军事行动，急于在其军队驻扎的各个地区，而首先是在上海着手镇压工人运动，因为上海在作战期间将会起突出的作用。”[10]在此情形下，中共便在全力鼓动各地的反奉运动。而孙传芳为稳固其地位，对南方国民党以及苏俄方面亦有意加以联络[11]。

同时，因“五卅事件”及对外交涉的运用，英、美、法等国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的要求。但是对于直系而言，关税会议的举行，将使得奉张有可能得到大笔新的收入，而执政府亦会藉此而更趋稳固[12]。8月18日，执政府已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会期最终定在10月26日。浙孙在此前发动战事，无疑便暗含破坏关税会议的意义在其中。

但以上均为远因，而引发浙奉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则是苏皖二省易督问题。

1925年7月13日，卢永祥北上调停段祺瑞与张作霖之意见发生严重冲突，未有成效，即宣布辞去苏皖宣抚使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职务

[13]。8月3日，执政府以江苏省长郑谦暂兼苏督。29日，段祺瑞特任奉军总参议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同时，有奉军大举南下，准备就绪后再图进占闽浙的消息，奉系势力似有席卷东南之趋向[14]。

在此情形下，浙孙乃积极运动，他派两浙盐运使王金珏作为全权代表到张家口再与冯玉祥会面，同时探听各省消息。复派代表分赴其他各省联络反奉，晓以利害，并表示愿为前锋之意。9月6日，孙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军事会议，主守与主战者皆有，于是孙表示等王金珏回杭再定。是月下旬，王返浙，陈明与冯氏接触经过及各省对奉态度，并称杨宇霆督苏已成定局。其他各省代表返回，表示对反奉多表支持，并愿意签约组成联盟[15]。孙传芳感到时机已迫，不得不先发制人。

9月14日，杨宇霆、姜登选南下分别到江苏、安徽就任[16]。22日杨正式接任苏督后，向外界竭力表示和平，并默认浙军对松江四县之占据。姜登选也致电孙传芳，称杨宇霆决无犯浙之意，请孙传芳宣布态度，以安人心[17]。孙传芳于是暂撤一部分驻松部队，作和平表示。但到9月22日，因奉军南下消息传来，苏浙战云又趋紧张。同时，传皖督姜登选亦有三师部队拟由皖经浙边过宜兴，直达南京，归杨宇霆节制的计划，浙军遂积极在长兴布防[18]。孙传芳、夏超等一面发布安民公告，一面调兵运械，积极准备[19]。西北方面的消息表明此时孙氏已下定驱奉决心[20]。

杨宇霆督苏也引起江苏本省军人的极度不安。杨宇霆到苏后，传将对苏军实行裁并改良，所以白宝山、马玉仁等均不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而南京、镇江等地的驻军，与奉军也多不能相容或者抱警戒态度[21]，对孙之反奉则表示欢迎并愿意配合。广东方面，因陈炯明正四处联络，准备攻击广州，所以国民革命军苦于应付，据说鲍罗廷有“对粤取守势，以休养实力，另出奇计以促他方之内战”之计划，所以也愿意支持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22]。而正得到苏联大量军援的岳

维峻部与孙氏无疑有配合的承诺[23]。

但对执政府而言，显然不愿意在关税会议即将开幕前看到内战再起。10月7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以苏省已决定撤回驻沪各部，电令孙传芳各部各回原防。8日，陆宗舆奉段祺瑞命南下赴苏、浙。劝孙传芳、杨宇霆各自谅解，并欲促进苏、浙、皖三省重订和平公约。他又派陆宗舆南下，向杨、孙等人游说和平。陆氏先到南京与杨宇霆协商，正准备启程赴杭。不料浙之动员令便已下达[24]。

二　战事发动与奉方应对

1925年10月初，英、美、日三国“沪案”司法调查委员抵达上海，准备对“沪案”重行司法调查。唐绍仪通电主张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段祺瑞以吴景濂、张英华等人在汉口“谋乱”，着令褫夺官勋，缉获法办，引起直系之反弹；而南方蒋介石正在率队出发东征。这些表面看来琐碎无关的事情，其实均为孙传芳发动战事酝酿了一个较好的时机。

10月5日，孙传芳在杭州其督办公署召集重要军官开军事会议，议决一切作战计划。7日，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在杭州复开会议决五省联盟，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拥段反奉”，分兵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五路司令周凤歧，定名“浙闽苏皖赣联军”[25]。

10日，孙传芳即以准备秋操为由，下动员令。其公开发表的致各军电表示：“此次校阅，调动队伍，专为举行秋操，可以此意宣示人民，以免误会为要。”孙并通知省署，谓“兹因陆军第四期教育终了，照例应行校阅，以觇成绩，特定于日内举行秋操”。同时，以财政厅名义向杭州总商会借100万，以为作战经费[26]。

孙氏为了给自己的反奉军事行动制造藉由，11日，通电指斥奉军压迫上海罢工工人复工，听任各国重行司法调查，反对关税会议之召集，赞成唐绍仪关税自主之通电[27]。但此时浙方并不对执政府直接攻击，意在留有余地[28]。同时，孙开始向前线输送部队，到14日，长兴与松江两方面，兵力集结已达一个师以上。孙致电奉系的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沪不驻兵，早见明令，贵部久驻沪江，用意何居？"限邢部24小时内退出淞沪[29]。15日，浙方多数部队已完成部署[30]。

奉系方面，当邢士廉接到孙的最后通牒，乃急电杨宇霆请示。杨令邢部撤退至苏州，并取消淞沪戒严司令名义，以免除"破坏淞沪不驻兵"之舆论攻击[31]。15日，驻沪邢士廉部奉命率部开往苏州，通告将戒严司令部取消[32]。杨此种安排无疑是形势所迫。当时在苏奉军仅驻沪邢士廉之第二十师与驻宁丁喜春第八师，总兵力只有二万余人，且部署于宁沪一线，抵抗力甚弱。而苏军对奉军多有不满，尤其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部态度暧昧，实际上与孙早有约定，故奉军若不快速撤退，"为苏浙包围，非便不能战，可能全军均覆"[33]。杨宇霆曾表示，在当时，"集中关内奉军扼守山海关为上策，保守直鲁与联军在徐州相持为中策，与孙传芳在苏皖浪战为下策"[34]。北京亦有外国武官认为"退徐与奉军实力毫无损失，既与后路相联，是为上策，若主守苏则下策"[35]。对于奉方来说，"在保全山东安徽直隶及晋省之阎锡山，其视北方，实较保留南方狭长地带为重"[36]。

是故，奉方对孙之挑战不作应答，只是一味高调表示为和平退让之诚意。杨声言"决不衅自我开"[37]，张作霖则在沈阳表示，"每次内战，为首领者必先吃亏，为戎首者必先败，予不受挑衅"[38]。外间舆论似以为如果奉不回应，孙也"不敢冒中外之大不韪，甘为戎首"。14日，奉命南下调停的陆宗舆告段祺瑞"和平有望"，孙要求将上海附近奉军撤退，而杨宇霆已表示"只要中央下令，必照办"[39]。所以执政府在奉军撤沪后，认为"大局可从此转危为安"[40]。

对奉军的退让，孙传芳并不理会，盖出师是否有名此时已无关紧要。浙方也清楚主动撤退是奉军作战之策略，故决定于其抽调未完成前，迅速发动攻击[41]。15日，正当邢士廉部撤退之际，孙传芳通电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下达总攻击令，令第一、二路军向上海，第四、五路军向宜兴进发，对奉军发动袭击[42]。

在南京，杨宇霆正召集奉军姜登选、丁喜春、郑谦等人开紧急军事会议，决令邢部快速退回镇江，丁喜春之第八师则开出南京，免为苏军所困，计划集中两师于浦口、蚌埠一带[43]。16日，联军之第二路谢鸿勋部由松江进占上海。奉军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部宪兵第一营，未及撤退，被全部缴械，常亦被扣留。孙传芳委严春阳为淞沪临时戒严司令。第四军卢香亭部则占领宜兴。

同时，孙传芳、夏超等公开通电讨奉，指斥奉张“以江南为私有，拥政柄以自恣”，违反淞沪永不驻兵之规定，以至“喋血贩烟，腾笑中外”，并宣称“万恶实由戎首”，“惟彼祸首张作霖一人是讨”[44]。段则在北京发布通令，表示邢部既已撤退，要“孙传芳所部应即回原防，以符本执政爱护和平之心，慰东南人民之望”[45]。但是并无效果。

17日，浙军暂编第七混成旅杨镇东部及陆军第二师师长李俊义部，开抵苏州，奉军第六十九团，则急速撤退[46]。按照约定，江苏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江宁镇守使朱熙等苏军将领通电响应孙传芳反奉，表示“全苏将士愿听指挥”[47]。19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也随后通电响应。湖北督军萧耀南并率全省军官电请吴佩孚出山领导反奉。

浙江方面，15日，孙传芳令宁台镇守使孟昭月由宁波到杭州担任省防治安，任卫戍司令一职，后又兼全省警备总司令。自17日起，宣布全省戒严。孟以骑兵团长高建勋所部为守备军，与省署之保安队，负责治安。同时，闽军之一部已抵杭，加强防守[48]。宁台方面，由

第十混成旅第一团韩光裕部负责。各县则要承担代募夫役及招募新兵的紧急任务[49]。

由于苏军公开反奉，18日，杨宇霆离开南京，并令奉军第八师北返。驻宁之陈调元、郑俊彦等部立即发动攻击，未及撤出之奉军第八师部队被其全数解除武装，师长丁喜春，旅长田得胜等被俘[50]。孙军第二路谢鸿勋部在苏军陈调元部的配合下，占领镇江。奉军第二十师，则在丹阳遭到孙军之堵截，损失较重[51]。

20日，孙传芳抵南京，令联军第二军渡江追击奉军。而奉方对孙之通电及进军，仍表示“不变更政策”，“决不因少数未及退尽之兵被缴械，而穷天下之兵”[52]。诚如时人所云：“孙之入苏后一泻千里，实非战争之力，盖对方之杨宇霆决计自行退兵，故孙军如入无人之境。”[53]

三　战事的进展与停滞

10月20日孙传芳等通电，特设“讨贼联军总司令”一职，推吴担任[54]。21日，吴佩孚乘舰至汉口，通电全国，受十四省推戴，任讨贼联军总司令，通电讨奉。继而任命萧耀南就任鄂军讨贼军总司令。稍后又任寇英杰为鄂军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并决定假道河南会攻徐州。萧耀南、白宝山等人复通电推齐燮元为讨贼联军副司令。而江西邓如琢在九江就赣皖联军前敌总指挥，准备入皖助皖军攻姜登选部奉军。浙奉战争有发展成为第三次直奉大战的趋势。25日海军杜锡珪亦通电讨奉，海军第二舰队集中南京，接受孙传芳指挥。

奉系对大江以南既决定放弃，准备集中姜登选部与张宗昌部于蚌、徐之间，等待时局之变化。然21日皖军倪朝荣部由泗县开至临淮关，电告姜登选部，已与孙传芳取同一行动，要姜自动解除武装。23日，姜登选率部离蚌埠北上。张宗昌则率师抵徐州，以白俄军加奉

军，共十万人，分三路备战，东面守邳县，西面守砀山，南面置于宿县、夹沟一线。张作霖旋任命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杨宇霆抵奉后，即召集军事会议，决派四师二混成旅进关，守京奉、津浦两路。而以吉、黑两省军队集中奉天，以十至十五师兵力分十七队应敌[55]。

北京方面，和平的呼声仍未中断。21日，赵尔巽、王士珍及临时参议院发表和平通电[56]。赵并分电孙传芳与张作霖，想作个人调停。孙提出只要张作霖率军出关，即可息战[57]。而张在复电中则斥孙“名为对奉宣战，实则与国为仇”，“祸国之中，实含有卖国意味，蛛丝马迹，线索可寻”。似乎暗指孙传芳与苏俄之联络[58]。对立如此，赵尔巽的调停便无甚希望。

10月22日，孙传芳渡江督战，联军司令部移浦口。31日，孙传芳进临淮关，对奉军发动总攻击令。战事在南宿州附近开始。但因奉军主力在南宿州夹沟中间，两军屡进屡退，没有进展。

11月1日，孙传芳急电河南岳维峻，催促其下动员令，协攻徐州[59]。但是岳维峻并没有按照约定加入，暂时表示中立[60]。对吴佩孚表示要假道河南会师徐州，岳更不允，传闻战事初期有“浙孙攻其头，豫岳攻其腰，西北攻其尾”的计划[61]。但是到徐州之战爆发，此传闻并未证实。吴佩孚在汉口除了发布一些空头任命外，没有办法筹措到军费[62]。在一筹莫展之际，外界便有吴佩孚赴南京坐镇指挥联军之说，但孙传芳可能不大能真正同意，故吴最终未能赴宁。在此种情况下，徐州之战最后便成为孙传芳之联军与张宗昌率领的奉鲁军之间的对抗了。

11月2日，联军与奉军在固镇发生激战，孙军截断张宗昌之白俄车队，奉军第一军军长施从滨被俘，解至南京斩首，奉鲁军退据乾山、鹤口、夹沟一带。3日，在津浦路一线，两军复有激战。5日孙传芳下第二次总攻击令，联军迫夹沟，两军复有大战。奉鲁军方面，兵

力主要有四混成旅及白俄军千人，张宗昌亲出督师。联军第一、第五两军为右路，第二军为左路，第四军及第三军之一部，直冲正面。激战经一昼夜，奉鲁军之防线被联军冲断，遭其优势兵力合围，遂大败，被俘者约三千余名[63]。随后，张宗昌部队所退守之宿县也失去。张宗昌下令奉鲁军全部撤回山东。11月7日，五省联军第一军即陈仪部兵不血刃攻占徐州。

11月9日，孙传芳进驻徐州，即召开军事会议。当时奉军正向韩庄、兖州方向退却，联军决定以五万人正面攻击，而请豫军进攻曹州、兖州奉军后路。但由于国民军冯、岳两部态度均不明朗，岳维峻部迟迟没有出兵，前线军事便开始呈现停滞。而北方的和平运动则正在加紧进行。

四　北方冯张妥协与孙传芳撤兵

浙奉战争一开始，便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指出“战事的范围不仅止于江浙，主力的决战亦不必为孙、杨两军，这是明白形势的人都能知道的”。认为战事胜负的关键实际上操于冯玉祥之手[64]。第二次直奉之战后，国民军与奉军虽然有和平协议，但是两者在北方利权与地盘的争夺始终没有停止，而国、奉开战的谣言亦一直在坊间流传。

孙传芳在发动浙奉战争前，在与广东方面联络的同时，与冯玉祥、岳维峻等人曾再三接洽[65]。事实上，孙之举兵后来亦似乎成为苏联在中国极力推动的反奉运动的组成部分。10月22日与2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两次决议，先后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子弹300万发[66]，给予孙传芳反奉战争直接的军火援助。10月底，冯玉祥在张家口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H．M．沃罗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三名代表等举行了一次绝密的军政会议，表示要“从政治上来实现它们同直隶盟军的军事联系”，对孙传芳和萧耀南进行援助。然而冯把苏联方面想加以联络利用的吴佩孚仍看作敌人，不同意与吴建立联系[67]。冯的坚决反对也许是吴后来没

法动作的根本原因。

但是，冯玉祥无疑在观察当时的风向，选择最佳时机加入战争。孙传芳与奉鲁军作战时，冯玉祥正在与郭松龄等人谈判从内部合作倒奉的更为惊人的计划[68]。所以，冯在此际，一面向外界表示对浙奉双方力持中立，一面准备利用浙奉战争的时机同张作霖达成暂时的妥协，逼迫奉张对国民军自动作重要让步。

而沈阳方面的军事会议上，奉系首脑已明白“此次反难者虽长江直系，但国民军已加入”，所以奉张派代表与冯玉祥协商，“许以极优厚之条件”，准备将热河、山西、京兆之统治权交冯支配，但奉方的要求是冯必须通电与张合作，并且拒绝吴佩孚与岳维峻部联络，给奉系在军事行动上提供便利[69]。在此情形下，冯表示愿意与奉方合作。19日，冯电张作霖，表示自己“惟盼和平”，请其主持中原各事[70]。21日，冯玉祥又向外界表示希望和平，依段祺瑞所请，电张作霖、孙传芳调停战事。24日，张作霖派代表到包头向冯疏通。冯也派人到奉天，双方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谈判。

冯、张之和谈与段祺瑞政府中和平派的竭力劝说亦有一定关系[71]。1924年底，段祺瑞出山时，其政府中人即分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派，武力统一以奉军规取江浙，国民军规取豫鄂；和平统一派以善后会议治标，以国民会议治本。浙奉战事发生后，和平派遭到武力派猛烈抨击。但仍未放弃努力，并且得到段本人的尽力支持[72]。段请双方息战，当然也有不愿当时各派的势力均衡被打破的企图，而“谋使临时政府长久站立在各派均势的三脚架上”[73]。11月1日，在段系和平派之工作下，张作霖、冯玉祥、岳维峻三方各派代表同段政府之姚震等在北京开会磋商和平问题。国民军代表在会议中提出会勘两军现有防地，避免冲突；奉军自保定、大名等地撤防等条件。

会议进行的同时，张作霖为防御计，亦开始作战争准备。6日，任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司令，警戒近畿及直隶南部；张宗昌为第二

方面军团司令，警戒徐海经砀山至曹州一带；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司令，警戒京通及直隶口北一带；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司令，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第二方面；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司令，警戒热河西部至古北口一线。

11月12日，张学良奉动员令入关。但当日夜，张作霖忽令张学良收回动员令，在天津的奉军军事会议中，有撤兵之决议作出，与李景林、郭松龄态度变化有密切关系[74]。13日，段祺瑞下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并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张作霖、李景林等人解决兵争[75]。15日，张、冯、李等电段，表示服从命令，李景林并报告已撤退京汉路一部奉军。孙传芳代表亦表示可以和平[76]。16日，奉、国两军签订八条和平协议，以免除战事为宗旨，并合组北京办事处。当时舆论猜想，冯、张可能是均从关税会议着想，不愿因战事而使关会停止，收入没有希望。而且冯因去年倒戈在国人眼中声誉极坏，也不想再与奉军作战[77]。但从后事来看，实际上冯此时是以退为进，只等郭松龄先起事了。

徐州攻下后，孙传芳集中徐州附近的联军统计不下七八万人，包括第一军司令陈仪部，第二军谢鸿勋，第三军孙总司令，第四军卢香亭，第五军周凤歧，炮兵张国威，苏军第一支队陈光祖部，皖军第四混成旅高世读所部等[78]，做好三路攻奉之准备，能否大战，则视北京冯、张妥协能否成功[79]。另一方面，孙传芳亦向岳维峻表示愿助其协攻山东，以为东南屏障[80]。

但冯、张既趋向和平，互相撤兵，孙传芳之战略随之发生变化。联军乃以徐州为界，不再进攻，同时将徐州以南军队，抽调三分之一于宁、沪、松、杭等地，以巩固江浙。徐蚌一带由邓如琢负责，山东战事则准备交岳维峻军负责[81]。除冯、张妥协外，据说孙之自动转圜亦与段祺瑞承诺苏督一席将任命孙氏有关，而章太炎分析孙可能是怕广东蒋介石入闽[82]。但从当时战情而言，事实上与孙军江浙后方受到奉军攻击也有密切关系。

10月28日，张宗昌之东路军邢士廉部与海军合作由山东曾攻入江苏海州，联军第六军白宝山部疏于防范，败退大伊山，邢士廉部及海军占领海州，直攻清江浦，苏沪震动。海军方面，东北海军沈鸿烈部镇海舰队自10月底起，南下攻击苏浙沿海。先是炮击吴淞，“连续轰击，威力颇巨”，驻沪港之南方军舰“应瑞”、“建康”两舰未出来迎战，仅通电淞沪军事机关准备。11月初。沈鸿烈部开到浙江洋面舟山附近，10日再至临近杭州之乍浦，刚好浙江兵轮海靖、超武两舰在此备战，两军即接火，沈部击沉海靖轮，复重创超武舰。据沈鸿烈报告，“现浙海无船可守”，准备运兵自吴淞乍浦登陆，“俾敌军后方动摇”[83]。奉军对联军之后方攻击，无疑使孙传芳感到不安，而急急于调兵加强防守了。

11月15日，岳维峻至徐州，与孙传芳暗商军事，讨论国民军第二军出兵及换防事项。当天，孙传芳即抽调徐州前线浙军一部回防沪杭。16日，岳军出兵，北路占直隶邯郸，中路已过大名，东路过曹州、济宁。随即，国民军第二军北路与李景林军发生冲突，李军退让，国民军占保定；东路王为蔚部开抵徐州，接替孙传芳部队担任向津浦路正面攻山东。

21日，孙传芳通电即日由徐州过宁回杭州，前线委总指挥卢香亭、白宝山担任，徐州防务委陈仪担任。次日，奉军郭松龄部发动兵变，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冯玉祥亦趁势向奉军发动攻击。北方局势发生剧变。但孙传芳却已回到南京，将视线转向其内部，准备先消化其胜利成果了。临时执政段祺瑞承认孙传芳获胜的既成事实，11月25日任命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当月底，孙传芳在南京宣布出任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北洋时代后期新崛起的控制东南，实力与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和退居长江中游的吴佩孚等比肩的军阀派系首领。

第二节　北京临时执政府的终结

一　大沽炮击事件与中外交涉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统领的国民军成为北方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苏俄的支持下（苏俄希望利用国民军的力量平衡亲日的奉系并稳定蒙古边境的形势，向国民军派出顾问，提供了数量不菲的军事援助），利用各地反奉倒段运动高涨的形势，到1926年初，国民军的力量发展到鼎盛，数量达五个军30万人，以西北为中心，控制或影响着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绥远、热河等西北和华北省份（这也是以后以国民军为中心演变而成的所谓西北军的由来）及京津地区。此时，国民军开始与国民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国民党政工人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部分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共也认为国民军表现“进步”，开始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以冯玉祥为北方地区可能的合作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民众运动在国共两党发动下日渐高涨。奉军将领郭松龄因奉系内部矛盾，抑郁不得志，乃利用高涨的反奉形势，与国民军联络，率部倒戈。郭松龄属奉系新派将领，该派在第一次直奉战后渐渐取代老派在奉系的地位，郭松龄在其中风头甚劲，并与张学良关系甚笃，手中掌握着奉军的精锐部队。冯玉祥利用奉系内部矛盾，疏通与郭松龄的关系，许其利益，促其倒戈。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发出倒张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继任奉系领袖，随即督率所部大举出击奉天，势头甚猛。25日，冯玉祥通电呼应郭的主张，但未按事前承诺及时出兵支援，反而部署所部攻击郭的盟友、驻津奉军李景林部。面对郭军的攻势，张作霖手足无措，奉军无力抵挡，只能以出让东北权益，乞求日本援助。在日本驻东北部队的干预和支持下，郭军反胜为败，郭松龄被捕，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同被处决。郭松龄起事的失败对冯玉祥颇为不利，冯部虽然通过驱逐李景林在华北尤其是京津地区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却在郭失败后受到强势奉系的挤压与威胁。

北方形势的发展，使直奉各派军阀感到“赤化”的威胁，而国民军及其首领冯玉祥则被视为重要“祸源”。直、奉之间曾两度发生战争，吴佩孚与张作霖结怨甚深，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实败于冯玉祥倒戈，因而吴仇冯更甚于怨张。而张在浙奉战争中惨败，几至覆没，亦与冯玉祥暗中联络郭松龄倒戈有关，故张对冯亦极为仇视。对冯的共同仇恨以及对“赤化”的一致担忧，加之各自力量严重削弱，迫使吴、张走上“释嫌修好，合力对冯”的道路[(84)]。1926年1月，奉张、直吴化干戈为玉帛，达成谅解，开始联合对付国民军。

为暂避奉直联盟之锋镝，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请辞本兼各职，通电下野。9日，执政府通令派冯往欧美考察实业，任张之江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职。但张作霖和吴佩孚均不原谅冯玉祥。1月中下旬，张作霖的奉军、吴佩孚的直军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分三路向冯部发动攻击。3月初，国民军在河南失败，丢失开封、郑州，18日，直军又进占石家庄。与此同时，直鲁联军突破马厂，逼近天津。3月初，奉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舰五艘、商船八艘运送张宗昌部，企图在大沽口登陆，随即袭击北塘。这两次军事行动导致了国民军与奉直军队的直接军事冲突[(85)]。为防备奉军军舰从海上进攻，3月9日晨，国民军“敷设水雷十个于河口，完全将河口封锁”。奉鲁军舰则于当日驶近海岸，向大沽炮台开炮，国民军起而应战，“该地全然化为战场，轮船航行极感危险，交通杜绝”[(86)]。同日上午，驻津英、日总领事会商，决定向鹿钟麟提出抗议，鹿表示只须奉舰退出，“所埋水雷，即可起出”。驻津英、日总领事复致电两国驻奉领事，“嘱其向张作霖交涉，劝张即日撤回军舰，俾交通得以恢复”。下午4时，毕庶澄因北塘陆路战事不利，“知事不可为”，率舰队离开大沽，返回青岛[(87)]。10日，驻京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交抗议书，抗议国民军封锁大沽口，抗议奉军与国民军在天津至秦皇岛一带交战，致使“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拆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北京政府“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抗议书威胁道：“设中政府未能进行完成此种目

的，以符《辛丑条约》之规定，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讨论权。”[88] 当天，鹿钟麟通告在津各国领事，大沽河口所埋水雷已全部起出[89]。

3月12日，国民军致电北京国务院，对封锁大沽口的原因作了以下解释：“查国际惯例，对交战团体，素以平等待遇为主。近乃迭据报，敌军每倚畀外人，在天津沿海地方，对于国民军有种种危险行为，甚至外舰运兵，由北塘上陆，外交团迄未加制止。国民军迫不得已，暂将海口封锁，以为自卫之计。”[90] 国民军同时表示：“为尊重邦交条约起见，将以自动的开放大沽口岸。”但提出三项条件：“一、外轮通行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二、外船出入必须悬持其本国国旗，不可混淆；三、入口轮中之华人，须经国民军一度检查，方许通过。”[91]

同日，日本驻天津领事与鹿钟麟交涉，称日本第十五舰队驱逐舰“藤”号行将入港，请转饬驻防塘沽之国民军，得到鹿氏同意。鹿并电饬炮台驻军遵照放行。日领嗣派驻塘沽的日总领事馆员藤井书记生于12日午前（7时）协同驻大沽的日本陆军运输部员杉本少佐前往塘沽炮台接洽。国民军则派军官一名前往日舰具体交涉。双方商定了入港的时间、旗号，并约定入口时须先停靠某地，入口后须缓行，以便炮台士兵辨认。下午3时40分，日舰“藤”号与“吹雪”号驶近大沽口，该两舰“俱悬有日本军舰旗及鹿钟麟所预定之暗号C旗”，但炮台士兵认为舰数不符（认为只谈妥“藤”号一艘入港），时间不对（认为商定的入口时间为上午10时），且入口时又不暂停，“乃发空炮警告，令其停止，盖炮台守军深恐另一舰系奉舰尾随其后，若任其驶入口内，必酿成重大事变也。讵料日舰以机关枪应战，致炮台愈形恐慌，惧有或种企图，不得已亦用实弹还击。日舰见炮台强硬禁止，始退出口外”[92]。此次双方炮击的结果，国民军方面受伤十余人，日军受伤四人。

事件发生后，鹿钟麟即电告外交部，嘱令速向日本公使提出严重

抗议。外交次长曾宗鉴乃于当晚7时派秘书沈觐鼎赴日本使馆，向芳泽公使口头提出抗议。17日，发表《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详述事件经过，宣称这次事件“日本应负完全责任”[93]。日本方面对事件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炮击事件发生次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军舰进入大沽口，是为了“保障船只航行之自由”，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最有效之手段”，“遏止这种不祥事件之再发”[94]。16日下午4时，日本联合英、美、德、意、荷等《辛丑条约》签字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一、停止自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一切战斗行为；二、拆除该区域内的所有水雷、地雷及其他障碍物；三、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保证不再发生妨碍轮船航行之行为；四、所有作战船只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轮船的行动；五、除海关官吏之外，对外国船舶的一切检查，均应停止。上述各条，限中国方面在3月18日正午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95]。同日，驻津各国海军司令向国民军和奉军发出警告，“限于一二日内，设法保证外轮在白河航行之自由，若届期无何答复，则将采取自由行动”[96]。与此同时，各国军舰二十余艘，结集大沽口，进行武装恫吓。中外关系顿行紧张。

八国通牒发出次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各国公使，一方面表示将按《辛丑条约》规定，设法“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另一方面又表示，在中国正致力解决问题之时，各国公使“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公使“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勿取激切之措置，以重亲睦之邦交”[97]。北京政府的立场，是在《辛丑条约》框架内谋求问题的解决，但民众却不愿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很快展开。

二　“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

大沽炮击事件及八国公使的最后通牒，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应，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很快在各地展开。大沽炮击事件发生次日，北京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3月16日，即最后通牒发出当晚，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召开宣传会议，决定在3月18日中午最后通牒期满前，召开国民大会，督促段政府严厉驳复八国通牒。会议决定由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登报发出召开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的通知，商量抗争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各界投入抗议斗争，鉴于组织活动尚未公开且中共党员已加入国民党，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这场运动。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一百五十余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商定次日上午10点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国民党人徐谦、顾孟馀、黄昌谷、丁惟汾，共产党人李大钊以及学生总会、总工会、总商会代表共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后，与会代表除留十五人筹备国民会议之外，其余代表分两路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98]。

赴国务院的代表未能如愿见到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反而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大门外与卫兵冲突，多人被打伤。赴外交部的代表几经周折，见到外交次长曾宗鉴，并通过曾联系上贾德耀，随后前往贾宅交涉。贾出示政府驳复八国通牒的文稿，代表认为过于软弱，不能承认。离开贾宅时已是18日凌晨5点，交涉未果。两组代表返回国民大会筹备处之后，相互通报情况，一致认为政府已不足依靠，不动员民众的力量，断难获得外交胜利。遂决定倾全力开好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推举徐谦、陈日新、陈资一三人为游行总指挥[99]。当天清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外交代表团等一百八十余团体在《国民新报》上刊登紧急启事，决定当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此帝国主义

第二次八国联军之暴行”[100]。

上午10点，各方人士渐集天安门前，与会者有北大、师大、法大、女师大、女大、中大、朝大、艺专等八十余公私立大中小学校学生，以及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数十团体代表共五千余人，其中多数是学生[101]。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昨日在国务院门前被卫兵打伤的杨伯伦的血衣，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两条横幅，群情激动。10点多钟，大会开始。先由徐谦说明会议宗旨，继由徐季龙、顾孟馀演讲抗议理由。徐、孟俱言《辛丑条约》是列强压迫中国的工具，各国要求中国遵守，但日本援助奉军在山海关内与国民军作战，各国默不作声，表明列强“已默认辛丑条约无效”。现在各国反过来以大沽事件为由，指责中国破坏条约，并提出最后通牒，实属无理之尤。因而号召国民群起反对[102]。接着辛焕文、赵晋三等报告17日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的经过。最后，大会宣读并通过大会议决案八条[103]。

当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时，贾德耀正召集政府要员开国务会议。会议进行中，贾派往天安门“慰问”的代表潘某回国务院陈述天安门情形，谓国民大会议决解散执政府卫队、驱逐八国公使等。贾德耀感觉事态严重，当即会同财政总长贺得霖电话询问李鸣钟是否已派兵弹压。贺得霖表示若无法维持秩序，则内阁唯有总辞职，李鸣钟亦同此议。午前，有学生代表六十余人赴院请愿，面呈答复外交团通牒之请愿书一件。国务会议遂将请愿书会同17日王一飞等所提意见，一并在会中讨论。关于如何答复外交团之通牒，“众意可以由外交部提出”。关于如何应对前来国务院示威的群众，与会者“佥谓去年学生至吉兆胡同数次，皆经鹿总司令派兵居间不使接触，未酿成大事，此次仍可照办”。按照此议，贾德耀即与贺得霖电催李鸣钟派兵并接洽答复使团抗议之事。国务会议很快结束[104]。

中午，天安门国民大会议程完毕，主席宣告游行示威开始。因游行总指挥徐谦称“痔疮大流血”，提前离去[105]；顾孟馀、黄昌谷等

领袖亦接踵而去，游行总指挥一职遂由广东外交代表团团长王一飞接替[106]。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北京《时报》作了如下报道：当时，在王一飞的带领下，游行群众约两千余人，“狂呼口号，散发传单，直趋铁狮子胡同”。行至国务院，已是下午1时20分。众推丁惟汾、安体诚、陈公翊等五人为代表，要求入见总理贾德耀。卫兵见群众至，即将栅门紧闭，“群众立门首大呼见贾德耀，卫队长官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惨剧遂开幕矣”。此乃第一次开枪。“时应弹而倒者数人，群众大扰，纷纷后退”。“群众既退，乃有人在后大呼‘不要散！’”群众又重新回到国务院门前，且愈聚愈众，渐逼栅门。“遂又与卫兵发生冲突，卫队复开枪，弹丸纷飞，有如雨下”，群众“遂纷向东门狂奔逃避”，“而卫兵枪弹向群众继续轰击至十余分钟之久”。“一时国务院门前及东门口外，血花飞溅，陈尸累累”[107]。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此次惨案，当场死亡二十六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陆续死亡二十一人，共计四十七人，伤约二百人。死亡的四十七人中，有三人系混杂在游行队伍中被误杀的警宪，三人系中流弹致死的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其余三十六人为游行请愿者[108]。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段祺瑞政府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当晚，即有二百余团体在北大一院召开联席会议，公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广东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负责办理善后事宜。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抗议执政府暴行。22日，全国学生总会致电北京卫戍司令李鸣钟，要求“迅即扣留京案首犯段祺瑞及其爪牙章士钊，以凭尽法惩办”[109]。23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北大三院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到会近千人。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

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伤者家属。2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宣布段祺瑞“十大罪恶”，主张“所有此案，政治责任，应由段祺瑞一人担负，听从国民处分；其刑事责任，应由法庭分别首从，依法审判”[110]。25日，参政院提出《为惨案质问贾德耀意见书》，要求贾德耀到院就事件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111]。同日，清华大学包国华等350名学生对贾德耀及全体国务员提起诉状，并要求京师检察厅对全体国务员，“不问自然人为谁，一并提起公诉”[112]。北大学生也就惨案向段祺瑞、贾德耀等提起诉状，由著名律师潘大道草状，认为段、贾诸人，均应同负“造意杀人之责”，要求检察厅对之提起公诉[113]。与此同时，北京各界成立“起诉委员会”。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也参与其间。例如孙传芳就曾致电总检厅，要求检举证据，依法对“凶犯祸首”提起公诉，“以平民愤”[114]。

也有人对徐谦等国民党“左派”在事件中的表现提出批评。周传儒在《三月十八案之责任问题》中引用“外间传闻”说：事变的发生，是“群众领袖”早就料及并渴望者；天安门大会时，主持人曾告诉群众，卫队已解除武装，去国务院游行示威，毫无危险，有欺骗群众的嫌疑；事变既出，领袖无一人受伤，亦无一人自首者。本来，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以群众运动作为手段亦无不可，但须谨慎从事。特别应当有牺牲精神，“果实临阵上前，遇难留后，与一般人共生死，则责言自少矣”[115]。梁启超也提出类似意见。事件发生时，梁正生病住院，在他隔壁的病房里，“就躺着一个半死的青年，胸膈间中着子弹”，尚未取出。在病房里，梁启超听参加请愿的学生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对段祺瑞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他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同时，他认为，“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是惨祸发生的“一个关键”。认为这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井”。如果自命领袖的人能“领袖到底，同生同死，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临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又听说那位主席先生的报告是根据李鸣钟的一封信。假定那封信是真的，那就

是相信人造谣陷害的责任；若不是真的，那主席的责任就不可逃”[116]。对此，被批评一方以徐谦的女儿及李大钊等均参与游行，进行辩解[117]。

政府方面亦很快作出反应。惨案发生后，因事件异常重大，贾德耀于当日下午3时在吉兆胡同段宅召开紧急会议，并邀李鸣钟出席。段祺瑞亲自到会，力言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讨论结果，大家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者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118]。3月19日，国务院发出“临时执政令”，通电缉拿徐谦等人。电文如下：

>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发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见，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119]

但政府的说法与京师检察厅侦查取证得出的结论不能吻合。事件发生当天下午，京师检察厅即派检察官前往案发地点勘察取证。获取大量警方人员的供词：内左四区巡长赫长山19日供称：“昨日我在国务院门前石狮子旁边指挥，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同日侦缉分队侦探赫良玉供称：“我从天安门跟着学生赴执政府，混在学生队伍中间，只见学生拿着喇叭、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我们是随学生去的。”巡警赵德顺、聂森、尹文海，巡长孔忠秀、张纪宽及保安队排长张辅臣

的口供，亦复相同。“之数人者，皆属警察官员，或系在场照料，或系沿途探察”。另外，写真新闻馆摄影师陆世益供称：“那日，我没看见学生有手枪，放火的东西亦绝对没有。我在学生卫兵中间，往来照相看得很清楚，那日秩序，亦甚整齐。”关于死伤情况查验，检察厅指出：“查验断书所载，仰面枪弹伤痕，多系皮肉向外，足见从后身穿入者居多。此项枪击行为，似不生防卫问题。”虽然执政府20日函送手枪、木棍等“凶器”到厅，但“据前述在场弹压之警察官员等供述，学生方面除木棍所粘旗子、号筒、传单外，别无凶器及放火物件。反复质询，众口一词”。据此，检察厅在致陆军部的公函中作出如下结论：

> 总之，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120]。

20日，贾德耀内阁因惨案发生，事关重大，“联带引咎”，向段祺瑞提出“总辞职”。24日，段祺瑞令贾德耀等妥筹善后，不允辞职。但政府的行政职能已难继续发挥。

在事件的发生和善后处理问题上，国民军的态度至为关键。前已述明，国民军因接受苏俄的援助，曾遭到激烈的“赤化”攻击。为了自身利益需要，1925年7月13日，冯玉祥曾通电所部防范“赤化”，以避开舆论批评。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将国民军指挥权交给张之江。3月6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和贾德耀，希望设法制止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以整顿学风。3月18日国民大会召开时，担任代理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师警察总监的国民军高级将领李鸣钟曾致函为17日的事件向群众道歉，表示今后将尽保护之责。但国民军并没有履行诺

言。惨案发生后，李鸣钟又曾张贴告示，禁止群众集会。国民军的做法，遭到各界的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当惨案发生时，国民军正与奉军及直鲁联军展开激烈战斗。奉军李景林部在天津部署进攻北京，国民军表示要固守京畿，决不放弃。奉军及直鲁联军围攻北京不下，乃以飞机向城内抛掷炸弹。形势对国民军不利，国民军遂提出罢兵求和并于3月20日通电撤兵。在国民军将领中，鹿钟麟反对和奉，认为与直系和解较为有利。国民军第三军将领何遂亦主张和直并为之作出努力，但吴佩孚反应冷漠。何与第三军其他将领“佥以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而张绍曾的策士张延谔则以“倒段释曹”劝鹿，谓如此即可动吴，即或不能，亦可借曹锟、张绍曾之力，缓和吴氏。此外，段祺瑞以北京警卫司令一职为诱饵，诱使唐之道脱离国民军，以及将担任执政府卫队长的戴光升调回北京准备对国民军采取非常手段的传闻，对国民军亦是一大刺激。在此情况下，国民军逐渐形成“倒段和直”的政治谋略[(121)]。

奉、直两方的态度对形势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3月29日，张作霖抵秦皇岛，召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等会议，讨论形势与对策。对于中央政权，张作霖主张推王士珍为总统，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形式上仍由吴佩孚主持改造政局，以符合直奉同盟协定[(122)]。4月8日，奉军与直鲁军在黄村与国民军交火，国民军败退，奉军与直鲁军占领南苑三间房和长辛店等处，进逼北京。同日，吴佩孚派蒋百里赴奉，磋商国民军求和问题，吴提出的媾和条件主要包括：一、恢复约法；二、释放曹锟；三、国民军全体改编，将领由吴任命；四、以王士珍为临时海陆军大元帅；五、限五个月内召开新国会，七个月组织大选会。对此，张作霖表示大致赞同[(123)]。

在奉、直两方均主张“改造”中央政权，而国民军又希望通过迎合奉直以改变自身处境的情况下，段祺瑞执政府的命运，可想而知。4月9日，北京发生政变。是日夜，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及

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卫队被鹿钟麟改编。10日，鹿钟麟发布警备司令部布告，称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迫不得已采用严正办法严行制止。一面恢复曹公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

尽管国民军作出倒段放曹的非常举动，吴佩孚并未改变对国民军的成见。11日，吴致电张学良、张宗昌：“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照原定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13日，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联名通电，指斥鹿钟麟“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124]。在奉直两方巨大的军事及政治压力下，国民军被迫于4月15日撤出北京。国民军撤离之后，段祺瑞回到吉兆胡同私邸并于17日宣告复职。18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开进北京。同日吴佩孚表示，段祺瑞毁法，包庇“赤化”，无可维持，决定委任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并命令拘留安福系人士，监视段祺瑞。20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改组，段祺瑞被迫下野离京。临行前下令准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下令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胡“未敢奉命”。26日，吴提出由颜惠庆“摄政组阁”的主张。5月1日，曹锟依吴佩孚之意，宣言“下野”。13日，颜惠庆内阁在北京怀仁堂复职，颜复就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但奉方则反对颜惠庆等人以“复职”方式到任。这使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愿或不敢就职，国务院政务无法正常进行。6月22日，颜惠庆获准辞去国务总理兼代外交总长职，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8月15日，张宗昌致函吴佩孚，指责杜锡珪无能，推荐孙宝琦继任内阁总理。10月1日，北京政府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之后一段时间，北京又先后产生了靳云鹏、潘复两届内阁。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洋时代的末代统治者。

(1) 关于浙奉战争的主要研究文献有：张安庆《浙奉战争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杨同慧：《孙传芳与五省联防》，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5-918页。

(2)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3)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81页。

(4)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张此次目的亦有调解此前上海发生的奉军军官哄斗及为沪案上海谈判助阵的意味。

(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5页。

(6) 《驻沪奉军镇压罢工团》，《顺天时报》1925年7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06页。

(7) 《上海开市与奉军调沪》，《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5页。

(8) 《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布告》，《申报》1925年9月19日，第13版。

(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7页。

(10)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689页。

(11)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87页。

(12) 《孙传芳复赵尔巽等电》，《申报》，1925年11月1日，第5版。

(1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77页。

(14)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52-253页。

(15) 《浙孙作战之由来》，《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16)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766页。

(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77-378页。

(18) 《战谣中之浙省军事行动》，《申报》1925年10月15日，第5版。

(19) 松涛：《战事发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1925年10月25日，第1-3页。

(20)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21) 《江苏军事之近状》，《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22)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这种传闻与已经披露的前苏联档案记载相吻合。10月2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子弹100万发的决议，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工人运动合法化。但是与孙合作的计划应在此前便已由其在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等人向莫斯科汇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25页。

(23)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2日，第9版；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61页。

(24)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25) 《浙孙作战之由来》，《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26) 《浙省军事行动消息》，《申报》1925年10月14日，第6版；《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3卷1期至3卷50期），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0页。杭州商界后来勉强承认50万。

(27) 其政治表态，也是在与各方约定的一个步骤。按照孙传芳与各方的约定，以反对关税会议为题目，第一步，孙示威；第二步，孙洪伊在津发电；第三步，唐绍仪在沪发电；第四步，章炳麟在汉发通电，并计划豫浙同作。但孙示威、唐发电后，应者寥寥，故孙只有自己发电。《孙传芳反对关税会议电》，《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4版；《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3版；《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3卷1期至3卷50期），文海出版社，第369-370页。

(28) 松涛：《战事发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1925年10月

25日，第1-3页。

(29) 《奉军消息》，《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9版。

(30)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3版。

(31) 《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3卷1期至3卷50期），文海出版社，第370页；《奉军消息》，《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9版。

(32) 《邢部昨日开拔情形》，《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9版。

(33) 《江苏军事之近状》，《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34)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35)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3版。

(36) 《浙方军事行动之外讯》，《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6版。

(37) 《战谣中之苏杨言动》，《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4版。

(38)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5日，第3版。

(39)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5日，第3版。

(40)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41) 《昨日浙方军事行动之严重》，《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9版。

(42)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3版。

(43) 《江苏军事之近状》，《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44)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693-694页。

(45)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8日，第4版。

(46) 《浙军抵苏情形》，《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47) 《江苏陆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等为响应浙军会师浦镇驱逐奉军通电》，1925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78-379页。

(48) 《浙军抵苏后之浙讯》，《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5版。

(49) 《浙军抵苏后之浙讯》，《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5版。

(50) 《郑俊彦等关于解除南京奉军武装及杨宇霆郑谦潜逃暂由陈调元维持秩序等情通电》，1925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80页。

(51) 《要电》，《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3版。

(52)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3版。

(53) 公展：《东南风云与全国大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54) 《孙传芳等通电》，《申报》1925年10月26日，第4版。

(55) 张安庆：《浙奉战争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第101页。

(56)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57) 《孙传芳关于举兵讨奉问题复赵尔巽等电》，1925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91页。

(58) 《张作霖复赵尔巽等电》，《申报》1925年11月1日，第5版。

(59)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2日，第9版。

(60)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61页。

(61)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62)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63) 《孙传芳击溃张宗昌占领徐州通电》，1925年1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93页。

(64) 《昨日浙方军事行动之严重》，《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9版。

(6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3号记录，1925年10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19页；《浙孙作战之由来》，《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6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25-727页。

(67)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11月11日。《联共（布）、共

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35页。

(68) 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71、275页。

(69) 《东南剧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7日，第5版。

(70)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第193页。

(71)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72) 《东南战起后之段方政策》，《申报》1925年11月4日，第5版。

(73)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74)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70-271页。

(7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5年9月-11月，第531-532页。

(7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5年9月-11月，第531-532页。

(77) 《冯张两方隐忍言和之原因》，《申报》1925年11月19日，第5版。

(78) 《联军攻奉之最近消息》，《申报》1925年11月19日，第6版。

(79) 《联军三路攻奉之形势》，《申报》1925年11月18日，第5版。

(80) 松涛：《时局的转变》，《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1925年11月25日，第1-4页。

(81)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17日，第13版。

(82)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17日，第13版。

(83) 《奉舰窥伺淞乍之告捷电》，《申报》1925年11月19日，第6版。

(84)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见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六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85) 《北塘方面昨日续战》，《顺天时报》1926年3月10日；《塘沽大

战与国际交涉》，《益世报》1926年3月10日。

(86) 《国民军水雷封锁大沽口》，《顺天时报》1926年3月10日；《奉军各队上陆均被阻》，《晨报》1926年3月10日。

(87) 《塘沽大战与国际交涉》，《益世报》1926年3月10日。

(88) 《驻京外交团为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致北京政府抗议书》（1926年3月10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第178—179页。

(89) 《大沽河口水雷昨日已启出》，《顺天时报》1926年3月11日。

(90) 《国民军致国务院急电》（1926年3月12日），《京报》1926年3月14日。

(91) 《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京报》1926年3月14日。

(92) 《大沽口炮击事件真相》，《晨报》1926年3月14日；《大沽事件之经过详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4日；《日舰炮击大沽炮台》，《晨报》1926年3月13日。这次冲突，日本方面认为炮台守军首先实弹射击，击伤日军数人，并非空炮警告。参见《日本公使为大沽口事件抗议书》，《时报》1926年3月19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也声称“确由炮台先射击”，日舰主计上尉“当场……负重伤”，日舰“不得已，乃行还击”。详见《大沽事件之经过详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4日。

(93) 《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

(94) 《日本公使为大沽口事件抗议书》（1926年3月16日），《时报》1926年3月19日。

(95) 《八国通牒》（1926年3月16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7日。

(96) 《驻津各国司令官向国奉双方警告》，《顺天时报》1926年3月16日。

(97) 《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1926年3月17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9日。

(98) 《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另参阅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99) 陈日新时为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归国代表团总负责人，国民党

员，“三一八”事件之后加入共产党；陈资一时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员。

(100) 《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紧急启事》，《国民新报》1926年3月18日。

(101) 关于集会人数，段永林《三一八惨案与执政府的垮台》一文说是两万多人（见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而《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一书则称仅有三千人（见前引该书第118页）。两说俱未提供资料来源。不敢引为依据。五千人说见《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02) 《徐季龙、顾孟馀演说词》，《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

(103) 其内容包括：一、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二、通电各国，一致反对八国进攻中国；三、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四、将署名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驱逐出境；五、宣布《辛丑条约》无效；六、驳复八国通牒最后的要求：1．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2．立即撤退驻在京津及各地之外兵外舰；3．惩办大沽口肇事祸首；抚恤大沽国民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为死亡将士建立纪念碑；在被难将士出殡日，八国驻华各机关下半旗志哀；各国政府向中国道歉。七、严惩17日执政府卫队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八、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载《京报》1926年3月19日。

(104) 《贾德耀关于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20日），《顺天时报》1926年3月21日。

(105) 徐英：《我的父亲徐谦》，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4页。

(106) 《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107) 《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08) 参见《三一八惨案死亡人数和党团员牺牲人数考证》，载《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三一八烈士墓表”及“烈士名单”记载死亡烈士为三十九人，加上误伤者八人，全部死亡者为四十七人。详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27页。

(109) 《全国学生总会致李鸣钟请速扣段等罪犯电》（1926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23日。

(110) 《国会非常会通电宣布段祺瑞十大罪恶》（1926年3月24日），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98—100页。

(111) 《参政院为惨案质问贾德耀意见书》（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00—101页。

(112) 《清华大学学生控告贾德耀及全体国务员诉状书》（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01—102页。

(113) 《北大学生对惨案诉状书》（1926年4月6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09—112页。

(114) 《孙传芳致总检厅请检举电》（1926年3月29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13页。

(115) 周传儒：《三月十八案之责任问题》，《清华周刊》第25卷第5号，1926年3月26日。

(116) 《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徐志摩记），《晨报》1926年3月31日。

(117) 李灿辉：《是不可不辩》，《清华周刊》第25卷第6号，1926年4月2日。

(118) 《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19) 《政府公报》命令第3570号，1926年3月20日。

(120) 《京师检察厅公函》（1926年4月3日），《京报》1926年4月3日。

(121) 政之：《北京政坛蜕嬗纪》（上），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第343—349页。

(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页。

(12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第63页。

(12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第67页。

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1924年至1926年三年间是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方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即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李济深（李济琛）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树立其地位，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政府领袖地位的蒋介石，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知。如果在1923年底综论中国军政局势，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而当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这些新兴军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两年中因确立实际控制的地盘而得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防区，张宗昌那半独立的鲁军及稍后的直鲁联军，唐生智的盘踞湘南，李、白、黄的掌握广西而成为“新桂系”，以及国民党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广东（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大多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当时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后来回忆说：“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

度。”魏氏本人在“这一年中间的变化也是极为复杂剧烈的”，其所辖部队在一年之内先后五次转换隶属关系：在这年的1月，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的魏部退出了奉军，在山海关接受“国民四军”的番号；到3月间又改组为半独立的“正义军”；再到5月间又投到吴佩孚“讨贼军”的麾下，随后即参加了打国民军的战役；到这年年底，又因北伐军的胜利而参与国民革命，转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十军[1]。

如果不计“军阀混战”的定义[2]，魏氏所述大致不差。而且除“正义军”那次改组外，魏部每次转换隶属关系都是倒戈转向敌对方面，这样一种“离合拥拒的形势”的确已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如此曲折复杂，显然值得专章讨论。而所谓军政格局，主要指因军事的发展演化而导致的相对宏观的政局转变，故下面的具体讨论将以军事为主。在北伐前后的数年之中，北伐前一年和北伐第一年的局势变化又可以说最为剧烈，本章仅侧重考察北伐前一年的情况，北伐第一年的变化将在下一卷里讨论[3]。由于内容的特殊性，本章的表述方式与结构与先前各章叙述的风格或有所不同，相对偏重分析，但所有分析仍会落实在叙述之上。

第一节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中国传统“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甲午为日本所败，国人为矫文弱之弊而大声疾呼“尚武”；但民国后的共和制却导致军阀割据，国人乃“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又大声疾呼曰“文治”！不过问题不在是否应该尚武，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4]。文武关系的转变，尤其军人地位的上升，是近代中国较大的变化之一，而“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确是北伐前许多国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虽然有“教而后战”的古训，不过更多是指一般参与作战者；同时也有所谓“出将入相”的传统典范，理想的读书人应能“上马杀贼下

马做露布”，但通常似不以为军人非读书不可。关羽燃烛读《春秋》的形象画面能够长期流传，正反映出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因此，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大致是近代从外国传入的新知，多少带有把“教而后战”的古训缩小范围而直接落实到带兵者身上的意思。

在清季“兵学”大兴的影响下，军官须受系统教育的观念日益普及，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的各类速成军事培训机构遍及全国。近代多数西方事物引进到中国后都有所调整改变，从清季到民国建立的保定军官学校及其配套教育系统的产生，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保定生入学前要求五至七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毕业后随营实习半年到二年），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5)]。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官学校毕业，不计随营实习也有七至九年的在校军事教育（若加上陆军大学系统历时更长）。尤其正规军事教育从“小学”阶段（当然和今日的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6)]。虽然具体的年限在执行中或有缩短，足量完成设计学制的或并不多，仍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

不过，与多数近代中国的改革相类，越是成系统而健全的设计就越不适应当年各方面变化皆剧烈而频繁的时代特征。从清季开始的北洋军事教育体系，其设计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这样长久的训练，待稍具规模初见成效时已是进入民国十年以后，北洋体系本身也已接近崩溃，实非草创者始料所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教育体系之设计虽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北洋军事领袖的发展恰反之，后来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这只是就北洋最上层的发展倾向言，同时当然也有一些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在兴起）[(7)]。

通常所谓“北洋军阀”中，最早一批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毕业于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约188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他们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主要操控者，此后才是保定北

洋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培训的军人，再后又有民国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但北洋内斗的结果，在小站系统和保定系统之间出现了某种断层，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到20年代新兴起来一批基本未受过教育的特殊军人，不仅行伍出身的老北洋曹锟做了总统[(8)]，更有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新兴者。这与晚清从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科举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以当年标准言）；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竟基本不识字，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9)]。

这样的情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早期的北洋军事首领虽多受过西式或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实际掌握军权者多数并未接受“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曾任保定军校队长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回忆说，“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而北洋派系争斗也直接影响到保定军校的命运，民国保定军校历任校长多是日本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直系控制局面，改派北洋老武备出身的张鸿绪为校长。据说因张氏排挤士官派激起风潮，“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钱大钧和黄奇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何本人即后者中的一个，而保定军校自身也在次年即告结束[(10)]。

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的两广及湖南，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系统的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11)]。这样一种体制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是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契机。前述钱大均和黄奇翔稍后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黄埔军校许多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而湖南的唐生智，广西的黄绍竑和白崇禧也都是保定军校

毕业生，另一广西主要军事首领李宗仁则是陆军小学堂毕业，他们的主要干部队伍即是在既存体系中受到排斥的“四校”系统毕业生（详后）。

不过，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歧性，北洋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身处南方的北洋孙传芳部将领马宝珩就强调，孙军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各部重要军官，多是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12)]。据何柱国观察，东北军中也有以日本士官生杨宇霆为首的新派，“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即整军经武，“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与其他北洋军中军校毕业生多只能作幕僚不同，奉军中“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13)]。

孙传芳军，特别是奉军，在后来北伐战争时期都是北洋方面以能战著称的部队。相比之下，有些北方军队则大不同。据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观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里，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将军和军官一个也没有，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这几个人中，鹿钟麟将军和唐之道将军的军事知识出众。总的来说，冯军军官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军事知识。他们都不会独立研究作战方针或制定战斗计划，因此总是同意那些从军校毕业出来的参谋人员的意见”[(14)]。最后一语可能还需要界定，所谓“总是同意”大概仅指狭义的“制定战斗计划”而已，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计划”常常不起作用，勃拉戈达托夫自己便经常抱怨这一点。

在实际作战中，行伍出身的指挥员往往回避其所不擅长者，有时甚至对其有利的条件也不加利用。例如，当时许多军队中炮兵的作用

便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部分或即因为炮兵官长“须略具军事学识”，行伍出身难以胜任，故各部炮兵官长皆军校出身[15]。尽管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均已较多使用大炮和机关枪，甚至飞机也用于投弹[16]，但重兵器的使用与否及是否得法，很多时候仍视指挥官而定。直到北伐时，汉阳湖北守军的仓库里放着“十二门连同全份炮弹的日本坂野炮（七十五毫米）”，这样的重火力竟然并未用于作战，在汉阳失守后被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全数缴获。极有意思的是，这批大炮同样没有用于北伐军稍后进攻武昌的战斗[17]！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到北伐前夕，已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那时保定毕业生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便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18]。但这更多是各军队的中高层，最上层则不然；在有些军队如国民军中，连下层也不然。需要说明的是，军队首领的“出身”未必就决定了其所辖队伍的行为，比如“绿林之剧盗”领导的奉军就是北方装备最好可能也是军事观念最“现代”者（即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作战观念），实际战斗力大概也最强[19]。但北洋体系老成凋谢、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人的兴起，终意味着行为准则的转变。

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关于二张详后）。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几乎所有的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自己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刚到中国的苏俄顾问“感到奇怪的是，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冯玉祥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将军，然而却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同中国人民的公敌张作霖签订了协议，反对自己的上司吴佩孚”。这位顾问发现，“冯经常在琐事上耗费精力”，他“不仅经常出尔反尔，而且还像罗马的太阳神一样耍两面手法”。因此，“任何时候你都说不清楚他明天会有什么举动”[20]。

这样的行为方式可能为当时变动剧烈的时局所促成，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军政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还比较适应当

时变化频仍的军政格局。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本来缩居山西一隅而进退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阎锡山在北伐结束时地位和影响都明显上升，一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另一类型的例子。

这一变化若置于北洋内争发展史中考察当更为清晰，简单回顾北伐前数年各地军阀，特别是北洋体系内部的争斗历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北洋内斗较前远更激烈。以前北洋军阀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杨荫杭在1920年即注意到，当时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实是“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21]。西人稍后亦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22]。但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则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作战的方式也更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也是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23]。

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出现了民国政治史上一个崭新的现象，即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军阀战争中正式站在其中一方（直系）的立场上。当时吴佩孚要求内阁在其司令部召开办公会议，并在会上对政府总理和部长随意指示，使与会的部长顾维钧得到“一番新的阅历”[24]。这个现象的表面含义是中央政府对派系政争态度的转变，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直系以中央名义讨奉，乃使中央政府从虚悬在各派系之上的象征性权威移位到为一派所利用，大致类似于古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或增强了这一战争的正当性，实际却从根本上损毁了中央政府自身的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25]。

在整个北洋体系的发展之中，自有派系产生，皖系早败而奉系后起，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参与竞争北洋控制权的大派就是直系。从字面意义看，北洋体系本诞生于直隶，直系的形成虽较皖系为后，实际是

最“正宗”的北洋嫡派。皖系需要自创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奉系则基本自建于边远地区，若以狭义论恐怕算不得北洋军，两者不同程度上皆具边缘挑战正统的意味[26]。同时直系领袖的代际传承也较为成功，产生出吴佩孚这样的后期领袖，在当时军阀中的确可以说是文韬武略兼具的佼佼者。直系打败皖系后又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期并不居劣势，其利用海军攻奉的战略也相当有见地，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也许直系真能统一中国，亦未可知，至少或能统一北洋控制地区[27]。

假如直系后来真能统一全国并控制之，则其统一可以说在战前已开始。如果从直系最终失败的角度看，则其失败即始于破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袁世凯去世后逐渐形成的在地方割据基础上维持“虚”中央政府这一北洋体制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已经崩溃了。以前中央政府能相对独立，即因其不全为一派势力所造成。而1924年时中央政府已公开为一派所造成并控制，行事既没有以前那么多顾忌，其名义上的合道性也不复存在，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因冯玉祥的阵前倒戈而以直系失败告终，但整场战争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反呈现出北洋体系的崩裂之相：以冯玉祥部为中心的国民军体系的形成和稍后奉系主力郭松龄部的倒戈反奉，使奉系战胜的意义大打折扣；奉系乘战胜之机向东南扩充的努力并未成功，然张宗昌、李景林部却因此而形成实际的半独立状态（不久联合成为直鲁联军，北伐将结束时张宗昌部欲退入东北而为张学良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直奉双方冯、郭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率大部队倒戈而试图组合成新主流的尝试虽未成功，却有力地揭示出北洋体系中强烈的不稳定因素[28]。

对北洋体系来说，没有确定赢家的结果或可说是毁灭性的，即北洋内部对于一个有力军人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基本丧失。孙传芳稍后曾说：“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

过。”[29] 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30]，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仍有统一全国的雄心[31]。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北京政府既已失去实际的统驭能力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北洋体系实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结果，各地中小军阀也频繁互斗，使北洋体系进一步分裂，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32]。有些军阀并不想争独霸之地位，但也不能让别人有此地位（直奉战争后渐成多数军阀的共同心态）。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33]。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1926年观察到，“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34]。如许氏所具体指出的，“谁也不崇拜谁”的心态主要存在于各大小头目之中[35]。

这样的风气形成后，相互的猜忌甚于合作。结果是乱象更甚，而竞争各方又都受到这种混乱局势的影响。证以前述魏益三的回忆，1925年-1926年间军事局势的确变化极快，各势力之间的分与合有时真是仅以日计。那时一般所谓军阀似乎相当盛行先联合共除一敌，旋即内斗；其间又有分合，又重组一联合体共除一敌，再继续争斗。其联合时期或反复的周期都不长，且临阵倒戈现象相当频繁；每一力量均思随时利用当下局势以利己（退则自保，进则扩充自身实力），而不甚考虑自己五分钟前的立场。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而合作不成的过程，就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比较典型的表现（详后）。

这是一幅均势已去，故任何一股力量均可影响大局的典型图像。在北洋体系控制了全国多数地区而南方（西南）在全国事务中渐无足轻重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皖直或直奉两极均势既予以各中小军阀依附一派的便利，也给予其在体系中不时转换立场或保持相对中立的实际选择，局部的争夺即使诉诸战争，也不一定会危及整体局势。一旦均势开始崩溃，一支小部队的立场转换就可能发挥影响全局的大作用。

比如，江浙战争的导火线即是驻闽军臧致平、杨化昭不足万人的残部投奔占据上海的皖系卢永祥，而本可视为直皖之争余波的江浙战争随即引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国民党当时即注意到这一变化，其1925年5月的时局宣言在指责“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后说：“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中央之大军阀，从事挞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革命政府根据地、受帝国主义者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36] 这样一种试图区分大小军阀并拟采取不同对策的努力恰反证出北洋军阀的分化，也意味着“小军阀”作用的增强。

对民国前期的实际作战情形而言，直到北伐时每一具体战役所涉兵员多不过数万，战斗规模并不甚大。故那时只要有万人甚至数千人的军队且敢战肯战，就是非常重要或至少不可忽视的力量[37]。这大概是卢永祥不惜冒战争风险而收编臧、杨余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名义属国家的军队已出现向区域化甚至个人化发展的趋势，万人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有自己控制的“地盘”以养育和补充队伍；如果没有，则只能投靠已有地盘的更大军阀，否则就不得不尝试以武力开拓自己的地盘。在当年的军政术语中，“地盘”算得上一个关键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北洋军阀的各大派系本身即依地域命名，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的后期演化，或能有较前更深入的认识[38]。

第二节　北方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民初交通已成为军事要素，地理分布对军事的重要因此而凸显，交通不甚便之西南（指四川、云南和贵州，非时人口中的“西南”）、

西北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基本未入北洋主流。西南之中，最接近中原的四川向有“军阀混战”最剧的不良声誉，表面上的特征之一是军队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而几乎足不出蜀，更实质性的缘故则因川省久为南北双方所持续争夺，川军间错综复杂的内斗往往不过是南北各方之争的反映，结果整体的四川或南或北的认同始终不那么明显[39]。而热、察、绥和西北则因与中原接近，通常成为北方无地盘而有实力者首先争取的地区，从地域言也可说很早就有一个据边缘以挑战中央的意思。

当时热河、绥远、察哈尔一方面成为中央用以安插无地盘者之处所，同时也是各类无地盘者欲借以发展的基础；如徐树铮、冯玉祥等皆先后试图以热、察、绥为基地，冯在得察、绥后又致力于陕甘，终获得“西北军”的认同[40]。这一趋势既可说是边缘挑战中央，也可说是礼失求诸野，就看从哪方面立言。北伐后实际留存的北方军队除较特殊的阎锡山晋军外，恰即所谓东北军和西北军，提示着这一地域发展趋势似还值得思考和探索。

实力不甚强却能长期维持其地盘者，派系不明朗的山西阎锡山是个典型的成功代表。尤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失败、冯玉祥下野、张作霖出关那段时间，阎锡山成为北方唯一的不倒翁，其重要性可见明显的增加[41]。山西距北京甚近，阎锡山多次坐观他人争斗的结果是自己的地位逐步提高，到1926年初已大致达到几乎可据京师的程度。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地理优势，承平时作用不明显，乱世则可能有大用。后来阎锡山甚晚参加北伐方面，却成为四大集团军之一并首先进据北京，实非偶然[42]。

这一特殊的战略性地理优势在冯玉祥军队崛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最初不过是偶然形成而已。1922年冯玉祥被取消河南督军，授陆军检阅使，包括冯本人在内的一般人皆视为吃亏，然冯部因此而驻北京南苑，稍用其兵力即可挟制中央政府，造成了超过其军事实力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影响，对国民军以至“西北军”的崛起帮助实大。这从

一个侧面体现出那几年北洋统治的急速崩溃实超出多数人的预料，盖局势大体稳定时很少有人会考虑一支有力部队驻扎京畿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此前较出格的政治军事行为多是倪嗣冲、张勋这样的旧军人所为，北洋军人自有其行事准则，当时的主政者恐怕也低估了冯玉祥挑战北洋传统的胆略[43]。

这样，冯玉祥军队实创北洋新典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却几乎没有自身的地盘，复因其驻扎区域的战略性地位而获得意料之外的回报。当然，冯部寻求地盘的愿望和努力是持续的，也是促使这一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因，其最终成为“西北军”尤说明固定的地盘意识并未因国民革命这样的政治鼎革而改变，而是相当持续有力（“西北军”认同的取得在北伐前夕，而其确定则还在北伐结束之后）。简单回顾冯部从直系到国民军再到“西北军”的兴起进程，应有助于了解北伐前北方军事格局的突破性演变，这一进程又与原处西北的各军事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冯玉祥早在1914年随陆建章第七师入陕西，后升第十六混成旅长于1916年率部入川，到1921年再入陕西时已是第十一师师长，任督军约一年，收编的陕军编成胡景翼、田维勤、曹士英三个混成旅，1922年夏冯督豫时带入河南，然三人皆有部属留陕。故冯部与陕西本有较深的渊源。继冯玉祥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本豫人，1918年率所部镇嵩军入陕，任陕西省长，然陕西驻军复杂，刘之权威常受挑战，故其势力增长后反欲回乡督豫。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刘部受吴佩孚命出入陕、豫，甚为活跃，直系战败后刘又借驱吴之名进兵河南，但作为战果的河南地盘却为国民第二、第三军所得，于是形成镇嵩军与国民军第二、第三军争夺河南、陕西的持续战争[44]。

二次直奉战后，冯玉祥在1924年11月的天津会议上分得向京汉铁路沿线发展的权益，但由于奉军实力太强，终迫使他将主要发展方向定在西北。1924年12月，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称号[45]，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1925年初，段祺瑞复任命孙岳为豫陕甘剿

匪司令。这些任命显然不会是执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顺应国民军方面的意思。不久冯部先后得察哈尔、绥远，并使之纳入“西北边防”辖区，冯玉祥乃移驻张家口，国民军渐被称为西北军[46]。此后陕西的争夺主要在镇嵩军和国民军第二、第三军之间进行。段祺瑞任执政之时，国民军常能迫使中央颁布对其有利的命令，其在陕西初胜后即曾试图罢免刘镇华而由孙岳继任陕督，因张作霖反对而未果（但冯部向陕西开拓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奉方的鼓励或容忍，因为国民军第三军原驻直隶的保定、大名，若无处发展便不会“让防”）[47]。

由于山西与陕、豫临近，阎锡山又是执政段祺瑞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晋阎在双方的争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双方也都努力争取山西的支持。阎一方面与国民军胡景翼互派代表联络，并表示“赞成晋豫两省携手合作”[48]；但基本站在刘镇华一方，不仅代其向执政府说项[49]，且以子弹接济，盖阎自认“与陕联合，自属胜着”，惟对镇嵩军进一步的参战要求，又以“无中央命令不好出兵”而推托[50]。

阎部晋东盐运使马骏当时分析陕豫之争说：“刘胜则中央可将陕付吴（新田）、孔（繁锦），败亦可付吴、孔。如能乘胡疲竭时中央明命鄂皖鲁苏陕各省以讨其破坏大局，一鼓歼之，最好。上策即以豫畀冯。胡胜后颇可虑。”[51] 按马氏较有战略眼光，其实就是希望刘、胡两败俱伤，给山西一个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其最后提到的“各省”讨胡竟然不包括晋省，甚能得阎锡山不主动干预外事之宗旨。且胡本陕人，若胜而据豫又兼领部分陕地，则对山西形成夹击态势。战事的结局正是马骏所忧虑的，不过胡景翼新胜据豫后，本可大展宏图，却于1925年4月因病身故，使时局发生相当大的变化[52]。

陕豫间的战局刚告一段落，奉军于1925年四五月再次入关，张作霖到京，确定“政局商定后再讲地盘”的方针，试图“先恢复国务院，以新旧交通系为阁员”。段祺瑞虽“态度消极”，仍不能不勉予同意。而冯玉祥则“一味退让，希图保存”[53]。实际上冯玉祥大体仍在实施其主要向西北发展的既定政策，故在“商定政局”的同时，基本维持着奉向

东南发展而冯向西北开拓这样一种各忙其事的态势。不过，奉系在东南的发展最初虽较顺利，迅速取得数省地盘，却遭遇到远更强有力的抵抗，盖东南久为北洋所据，其对手皆驻扎于此的正统北洋部队；而西北本未入北洋主流，国民军所遭遇的主要是北洋边缘部队，相较而言，国民军的西北开拓更具实际成效。

胡胜刘败后陕西的结局确如马骏所料，段政府准战败的刘镇华辞职，以吴新田继任督办。惟吴部实力不够，始终未能真正控制陕西局面，不久陕西也为国民军第三军所得。1925年8月执政府正式任命孙岳为陕西督办，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在名分上和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冯部在西北的地位，惟陕西之外的西北“地盘”还须继续开拓[(54)]。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北有察哈尔、绥远，形势看上去甚好，但其并未集中全力于巩固在西北的地位，而是更有所图，其拓展方向又回向山东和直隶，甚至可能包括山西。

因奉系对东南的占据显现出较大野心，引起各军阀不快，终推动新据江南五省的孙传芳与其余直系剩余力量的联合，吴佩孚乃乘间而再起，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攻奉[(55)]。孙传芳讨奉时，国民军第二军曾参与攻鲁；战胜后的徐州会议，岳维峻也曾出席。这就使国民军和奉军终难共处，国奉之间战争很难避免。同时，整个国民军与山西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盖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察、绥，北京也有驻军，在地缘分布上已置山西于其夹击态势之下；不论其在山东、直隶的进展如何，国民军若图将地盘连成一片，最容易也最可能的下一兼并对象就是山西。晋阎欲图自保，就只能联奉。在国民军又将李景林逐出保定、大名后，奉张决定联吴佩孚打击冯玉祥。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驻汉口吴佩孚处的代表报告说：“奉派某要人来汉协商解决〈国民〉第一军，此间令其先行攻击。”[(56)]

且国民军内部并不团结，前引晋东盐运使马骏将国民军之冯、胡二部分别看待，并非无因。冯玉祥就曾自别于国民军第二军，他致电阎锡山说，“二军分子复杂，唯利是图，久为世人所诟病”，与冯氏自

己“十数年心血教练而成”的第一军不可同日而语；并力辩自己不仅未参与国民军第二军对山西的军事行动，且曾屡次劝阻之[57]。另一方面，胡景翼、孙岳皆曾参与同盟会反清革命，自视与纯北洋出身的冯玉祥不同，反与也曾加入同盟会反清的阎锡山同属“民党”。就在国民军与奉、晋开战前不久，国民军第二、第三军的代表谷仲言曾与阎在北京的代表联络，对“山西与冯合作而不与民党之二、三军携手，深致不满”。他强调，第二、第三军的“军队虽极复杂，军官确系民党主义，以主义与之拉拢，必可奏效”。故“山西应以民党关系，脱开冯方，与二、三军切实合作”[58]。

可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之间的关系确不十分和谐，而胡景翼去世后接掌国民军第二军的岳维峻与“民党”无瓜葛，他不仅联孙传芳讨奉，且亦公开列名于拥戴吴佩孚出山的通电之中[59]。这样，国民军内既不和，外将面临与奉、晋、直三方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形势相当不妙。恰在此时，奉军郭松龄于11月22日（即阎锡山得知直、奉联合的当天）正式发出反奉通电，此举对国民军的存亡有重大意义。据勃拉戈达托夫对国民军第二军的观察，该军“只能对付土匪”，实“无力同正规军作战”。若与奉军战，恐难取胜。“多亏郭松龄采取了行动，才将部队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60]。这一观察或许有些过分，第二军中李济才、李云龙部皆甚有战斗力[61]；且如冯玉祥所言，国民军第一军的战斗力应超过第二、第三军；但总体上国民军并不具备同时多方作战的实力。

尽管郭松龄反奉对国民军非常有利，冯玉祥仍拒绝了苏俄顾问提出的以骑兵援助郭松龄的建议，认为郭“自己完全能应付”。此时国民军的所有军事行动均涉及地盘：国民军第一军出兵接管了热河，这还算是对付奉方地盘；同时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又联合进攻支持郭松龄的李景林“地盘”，这一“违约”行为导致李部由支持郭而转向“中立”，继则转向支持张作霖而向冯宣战。勃拉戈达托夫认为冯玉祥“没有充分利用”郭松龄反奉的“有利局面”而在作战上“及时援助郭松龄”，

冯后来也承认“他低估了自己敌手李景林的力量”，竟将一半的军队留在远距离的后方[62]。

其实冯玉祥和苏俄顾问所认知的大到战略利益小到“有利局面”皆不一致[63]，冯恐怕恰是在“充分利用”他眼中的“有利局面”，试图占领与自己最接近的地盘，以解决其兵多地少的矛盾。从冯部与奉军终不能不一战的战略眼光看，若冯玉祥真出大力援郭而推翻张作霖，则不论是郭松龄拥张学良主政或其自主，皆必致力于巩固东北，暂无暇顾及关内，国民军在华北的地位会相当优越。直鲁联军南有孙传芳虎视眈眈，是否能自保尚成问题，不能对国民军构成太大的威胁；此时以优势兵力再图直隶地盘不迟，并挟中央政府以与势力尚松散的吴佩孚战，胜负实难逆料。

不过，冯玉祥那时仍在强化其对西北的控制。1925年8月执政府刚任命他兼任甘肃督办，冯即派主力之一的刘郁芬师出征甘肃[64]。10月间，阎锡山派往冯部的代表观察到，“冯军连日向西开军队甚多，向东开只昨日有骑兵二连”[65]。究竟冒险逐鹿华北还是确立其对西北的控制，这恐怕才是冯玉祥面临的最大战略抉择。郭松龄不过奉军之一部，其反奉能迅速取胜大概很少会在时人事先意料之中，故真正援郭反奉可能需要倾国民军全力以赴，而胜败尚难逆料，具有相当的冒险性；若进兵西北则所遇对手实力相对较弱，且冯具有中央任命的督办职务，可以说是在自己属地进行“内部清理”，以当时军政运作规范言，颇具正当性。比较而言，在其他主要军事力量竞争华北甚至东北之时，倾全力以控制西北，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

然冯玉祥计不出此。他不援郭或因其对全国性战略地位竞争的冒险性考虑较多，但他又不想放弃当时华北的有利局面，也没有真正全力西进。也许他想让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则一面巩固西北，同时抓住可乘之机在华北据地（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之间的矛盾及各自意图的不同，此时或也不完全能由冯决策）。这一战略选择的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郭败而国民军不得不面临奉、直两系

的夹击，而且还加上新近转向的阎锡山。山西的总兵力并不甚强，却最接近国民各军的实际地盘，具有非常直接的威胁；阎的出兵随时可将国民军在华北前线和陕西、河南的部队分隔开来，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对付奉、直任何一方，而不得不同时分别与奉、直、晋三方作战。国民军处于这样的劣势，很大程度上实因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时缺乏战略眼光而太顾及眼前地盘利益所致[66]。

在郭松龄兵败被杀的1925年12月24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联合进攻李景林取胜，并占领天津。次日，段祺瑞循冯玉祥之意任命孙岳为直隶督办，据说引起国民军第一军内部不满，数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移居平地泉，拟赴苏联考察[67]。勃拉戈达托夫多次表述了对冯玉祥在部队面临奉、直夹攻而最吃紧时宣布脱离军队远赴苏联一点不理解，然冯或自有其算计，他认为“吴佩孚和张作霖是‘死敌’”，不可能有认真长久的合作；他显然希望这两个“死敌”面对面的接触会导致实际利益的冲突，从而爆发战斗，自己则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后再回来收拾残局[68]。这也不无所见，但当时奉直双方恐怕都已视冯为更可怕的敌人[69]，如果不是北伐这一新因素的迅速改变局势，直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多半只会爆发在冯部被基本“解决”之后。

对国民军尚有利的，是奉、直、晋三方内部也有类似国民军的自身困难，其相互配合显然不足。先是李景林由中立转而通电讨冯后，阎锡山即连电其驻汉口代表探询吴佩孚是否真与奉方结合，不久即得“津李、鲁张、汉吴、苏孙确已联络对付国民军”的确信。阎锡山于是提出，冯李既然开火，“玉帅非速动不可，否则张（宗昌）、李（景林）不支，更无办法”。但他很快发现吴佩孚其实指挥不动其名下的军队，尤其实际控制湖北的萧耀南与吴之间“感情日恶”，萧并不实际支持吴的对北作战[70]。不过，这一障碍因萧耀南在1926年2月中旬突然因病逝世而解决。

更直接的困难是已表示接受吴统辖的岳维峻在河南不动，盖当时

欲谋豫督地位者众，在岳氏看来，“战之胜败，豫之地盘均非所有”，故不欲北上。“吴对岳极悲观，无办法。吴之鄂豫旧部以岳失信，欲以兵力压迫，吴不允”[71]。这一困难竟由国民军无意中代为解决：那段时间段祺瑞几次试图下野不成，执政府益受占据京津的国民军操纵；在萧耀南病逝后，吴佩孚任命了临时继承人，段则循冯意另任卢金山、刘佐龙为湖北军民两长，并正式下令卢、刘讨伐吴佩孚，命岳维峻等“督饬部队会同进剿”[72]。此前吴佩孚的部队“借道”河南北上不成，直接攻打岳维峻又显得正当性不足，此时反有直取河南的理由了。

在各方的夹击攻势下，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皆边打边谈，在作战的同时尝试与各方和平解决的联络始终不断，景象相当奇特[73]。1926年3月中旬王士珍等北洋大老提出和平息争主张（详后），冯部将领迅速在3月20日通电表示接受，愿意“将所部队伍撤回原防地，专力开发西北，不欲内争”[74]。国民军并于4月上旬在北京逐段祺瑞而释曹锟，希望获得吴佩孚谅解；直系内部也有主张容纳冯部的主张和实际的努力，但遭吴拒绝。此时军事上集中于消灭冯玉祥已成为直奉晋三方高层的共识，阎锡山连电吴佩孚，主张迅速合力灭冯，他说：“合肥既去，政治上不成问题。鄙见根本上歼敌计划，总应贯彻到底。极盼转电雨帅，迅电前方各军，戮力同心，灭此朝食。”在得到吴、张“所见相同、主张一致”的确讯后，阎一面指出“敌虽狡猾善变，必无幸存之理”，一面更强调“彻底灭敌，务绝根株”的必要性，希望吴佩孚“旌麾北上，就近指挥，于战胜攻克，收效尤大”[75]。

4月中旬，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但各路军队围剿国民军的战斗并未停息。稍后张学良到京，再次“向齐燮元陈述目前先急军事，政治后题”的方针[76]。5月17日，冯部将领又一次宣言表示愿意保境安民，努力开发西北[77]。次日却以晋军阻断其退路为由，分六路大举攻晋，占据了晋北大部分地区，至6月在雁门关一带与晋军形成相持局面[78]。5月底至6月底，直奉双方分别罢免了各自内部倾向于联合

国民军的靳云鹗和李景林，吴佩孚和张作霖于6月底在北京会晤，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南口一线直奉联军与国民军的决战。至8月底，国民军全线溃退，各军星散[79]。

就在国民军前途堪忧之时，北方不甚重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却取得了超出多数人预料的迅速进展，结果不仅冯部未能彻底消灭，直奉集全力于北方战事的方针反成为战略上的败笔，确非先前所能逆料。国民军充分利用了南军北伐的机会，在败退中尚能肃清甘肃，保存了再起的基础；尽管直奉夹击之下的国民军主力出陕使刘镇华复起占据陕西大部，国民军李云龙（字虎臣）、杨彪（字虎城）仍能固守西安，直到北伐开始后冯玉祥从苏俄返国，1926年9月誓师五原，新的国民联军逐渐重新据有陕甘[80]。

细核国民军1926年春夏各通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即其一再表示愿致力于“开发西北”。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有了自己后退的“地盘”，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了他们的区域认同——当时的谈判和各方往来电报中，不仅国民军自身以“西北方面”自称，他方也多以“西北军”称之，报刊舆论亦然。在陕甘再起的冯部虽一度自称国民联军，不久且正式并入国民革命军，后来一般仍称其为“西北军”，就是其自身军人也如此[81]。

简言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倒戈促成吴垮台后，段虽出山，皖系并未能再起，北洋中后起的奉系成为大主角；而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也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阎锡山的晋军也在这段时间日益活跃。吴佩孚的复出未能挽救正崩解中的直系，此时中原争夺的主要角色是奉军（北伐后改称东北军）和国民军（形成中的西北军）。北伐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东北军、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三部分，在北洋系统内可以说皆非正统。故北伐结束后所发生的情形其实早已形成势头，说此后十年的军事格局大体奠定于此时，或亦不为过。

第三节　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在此混战期间，“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尤其奉军利用“五卅事件”这一机会进驻上海，破坏各方原先达成的上海不驻兵的协议，凸显了奉方觊觎江南的野心，是江浙反奉战争的直接起因之一，也使北方在“反赤”旗帜下实行非武力整合的希望相当渺茫。不过，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渐成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倾向。杨荫杭在1922年就注意到，“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各派军阀所发文电在“攻击他党”时，便常指责对方“卖国”[(82)]。由此视角看，“反赤”至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口号[(83)]。

1925年12月4日，正与冯玉祥争夺京、津地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其“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84)]。这里“赤化”与“纲常名教”的对立更多隐喻着中外矛盾，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85)]。此后各军阀的通电中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者便日见增多。

那时“反赤”舆论在北方也确有一定的威慑力，国民军就一方面努力从俄国获得武器弹药，一方面试图淡化其“赤色”。国民军第二军的岳维峻在1925年底对苏俄顾问斯卡洛夫说：“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原文如此，盖表执笔者之疑问态度也］，这对工作是有害的，会使敌人借口同以我和冯为代表的‘赤色危险’做斗争来网罗反对派。”若说岳维峻本非民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也对俄国顾问说，我“不能让你们到部队中去，因为人们可能猜疑我这个直隶督军同情红党。你们是不是最好去北京”？他明

言："我们在思想上是朋友，但现在不是表露这一点的时候。"故孙岳也曾拒绝出席苏联驻天津领事的宴会，并对苏俄顾问利沃失解释说"这是因为不想让敌人找到攻击我们亲近的借口"[86]。

有时"讨赤"似有助于反国民军各方的军事整合，据说直奉晋等各方5月10日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各派驻一全权代表，以"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87]。由于直奉双方基本认可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故军事整合相对容易，而政治整合就困难得多了。先是段祺瑞政权因与国民军过于密切的联系而渐失直奉两方的拥戴，尽管本来也更多是名义上的，张作霖在1926年初已正式宣布不受命于执政府，实行东三省自治[88]；在段祺瑞在2月下令讨伐吴佩孚后，吴氏也于3月通电讨伐段祺瑞和冯玉祥。但真要达成政治解决，段祺瑞的政治地位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国民军自己驱段释曹，为各方的政治解决扫清了一个障碍。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和政治背景下，北洋元老王士珍等在3月中旬曾出面发起全国和平会议，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各军停战后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各不驻兵。处于劣势的国民军一再表示接受响应和平通电，但张作霖要求国民军还直隶、热河于奉，方可停兵。由于各方反应并不理想，国务总理贾德耀率阁员于3月25日再次通电主和。这一通电经王士珍等修改后发出，有意思的是内阁通电初拟递达者有冯玉祥而无吴佩孚，电文中并有"雨帅焕帅，国家柱石"等语。王士珍等认为冯已下野，不应列名，吴则应加入，遂改电文为"雨帅玉帅，国家柱石"；原电说"执政委托聘老诸公主持和议"，亦以免除"其他误会"为由删去"执政委托"四字[89]。

一日之间的电文更易，最足见当时势力消长盈虚之瞬息万变。冯、吴的一退一进，直接反映出军事形势的异变。而贾德耀本出身皖系，王士珍等却有意要切断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关联；尤其贾氏不久前曾附署讨伐吴佩孚的通电，今忽又通电改称其为"国家柱石"，不仅贾氏个人甚感难堪，当时"内阁"之几无地位亦可见一斑。

王士珍等和平息争的主张终因各方实际利益冲突太甚而收效甚微，这批元老只是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到新内阁成立期间起到了维持治安的作用。且“其他误会”也未能免除，段祺瑞的影响虽被删去，吴佩孚又猜测和议是出于冯玉祥的主张，以为“聘老言和，系受赤党所包围，非其自由主张”[(90)]。的确，在直奉晋三方联合讨冯之时提倡北方息争，当下的实际受益者首先是国民军，吴佩孚有此认知实不足怪；但这也可能只是他拒绝息争而不正面对抗王士珍等大老的推托之辞而已。

直奉双方对政治问题也一直在讨论，但在“护宪”还是“护法”这一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政治解决的达成相当困难[(91)]。当时的政治情形相当复杂，直系主张“护宪”，即承认曹锟时所颁布的“宪法”，然可以接受让曹退位，即所谓“旧法新选”；另有不少人主张以更早的“约法”为国家基本法（当然也就不承认“宪法”），是谓“护法”；两者都进而牵涉到已不存在的国会问题[(92)]。奉系先前曾“讨伐贿选”，现在若承认曹锟宪法，则与此前的行为有冲突，故张学良对阎锡山的代表“面称护法不护宪”，致后者得出“政局恐一时难有办法”的结论[(93)]。

昔日的老民党章太炎此时也颇致力于“恢复法统”，试图拥黎元洪复位。盖黎氏为武昌首义正宗，又是当选副总统，其复位后再据《约法》新选国会，最能体现“法统”之恢复。从这个角度言，太炎与不赞成“护宪”的奉系主张相对接近。他曾于1926年4月下旬函杨宇霆商拥黎事，杨复函支持，但不愿公开主张，仅欲“观成”。太炎以为即此也足，故觉“甚为满意”[(94)]。其实黎元洪能否重新出山正取决于究竟有无实力派的真正支持，在直系明确主张“护宪”之时，奉系虽主“护法”，其仅欲“观成”的态度显然不足以恢复黎元洪的地位，结果吴佩孚坚持的以颜惠庆内阁摄政获得成功。

颜内阁摄政虽然只是个过渡性的安排，仍表明直奉双方在政治上确实有所合作。在北京地区奉系军事实力远大于直系的形势下，奉系

在政治方面对直系显然有所退让。的确，若将南方发展中的变化计入长远考虑，北洋系统此时真能携手，其实对大家都有利。但那时北方尚少有人认真顾及南方军事格局的变化，他们的眼光仍多关注于北方，且各方成见皆已较深而相互信任不足，其大致共同之处，即集中全力先消灭国民军。

章太炎反对颜内阁摄政而未果，其设想的由黎元洪任命一新国务总理在南方摄政也不为北方有实力者所接受，但他仍强调继续反赤的优先性，以为国内各事可于“南北二赤次第荡定”之后徐议之[95]。盖太炎以为，中外矛盾大于国内政争，“今日国内问题”，已不在什么护宪护法，“而在注意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宜？】引人注意。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96]。

到1926年四五月间，章太炎与各类在野士绅组织起“反赤救国大联合”，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从“赤化”角度看，当时本存在所谓“南北二赤”，即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党，后者“赤化”的程度远超过前者。当时直奉之反赤者地域意识甚强，更多瞩目于“北赤”；太炎与这些北方军人最不同之处即在于他将“南北二赤”共同看待，实际越来越更看重“南赤”上升中的力量[97]。

或许预见到其“拥黎”的努力难以成功，章太炎从1925年末就提出，处于“赤化时代”的中国大势“宜分而不宜合”，故“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分别反赤[98]。他在1926年初解释“恢复法统”之义说，“吾所主者，不在去段一人，而在否认北京之政府”。自袁世凯以后，“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渐成北京政治常态，“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本来“总统国会，法之所当有；而非法之总统国会，则法之所不许。故暂缺中央政府者，所以尊法，非违法毁法也”。只要大家都反赤，实行区域分治或者比有名无实的统一更有效率[99]。到1926年5月，章仍主张：“以事势观之，吴（佩孚）处果能退让无过，

暂缺中央，任王士珍等维持治安，即所谓三分之局也。若南北二赤果尽解决，彼时或再有可议尔。”[100]

这样一种先解决“南北二赤”再及其余的主张与奉直双方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在思路上有接近之处，但许多实际掌军权者并未接受“先反赤后内争”这一次序，他们在落实“先军事”之时甚至可能藉“反赤”之名而争夺地盘。太炎认为，吴佩孚坚持颜惠庆内阁摄政，就是置内争于“讨赤”之先，他电驳吴氏说：“方今赤党犹存，军事未了；山西有累卵之危，湖南有舐糠之急。为将帅者，不以此时戮力救国，同恤简书，而欲树置官僚，宴安鸩毒，吾辈当责其根本之误。”稍后他又痛责颜惠庆道：“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救国，非以营私。今赤军在郊，而种种借款政策，授赤党以有词；种种揽政行为，开赤军以生路”；实已构成“误国之罪”[101]。

既然中央政府也以讨赤而“营私”，则讨赤之不能成功地整合北方，已可见一斑。故反赤运动不仅没有让太炎得出需要统一的认识，反成为他主张分治的新理由。不过，即使各地分别“反赤”也需要较大规模的跨省跨派系军事行动，这与区域分治多少有些矛盾。随着“反赤”的重点逐渐从言论口号转向实际的行动，这些问题迅速凸显出来。到北伐军已占据江南、直逼北方后，奉直各方的关注开始越来越转向南方，直到吴佩孚在湖北大败于北伐军，所有剩余的反赤力量才真正开始联合起来；但反赤方面联合的一个重要基础，倒未必是章太炎所期望的“以夏攘夷”，恐怕更多是中国国内的南北之分[102]。

若简单总结1924年-1926年间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共产党人瞿秋白稍后即认为那次战争表现出军阀“开始分化和崩溃”，而北方国民军的形成则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

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因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103]。

前面说过，在北洋两大派系相持的均势下，各中小军阀虽不断转移其立场，却无伤大局；同理也适合于南北双方的均势。冯玉祥和郭松龄的先后倒戈直接导致了北方均势的瓦解，到两极体系中一方优势明显时，居弱势的一方会在体系内外有意识地努力寻求（长期的或暂时的）同盟，以取得平衡或优势。同时，危迫的局势也可能促使居弱势的一方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方式。惟政治规则即使在对付敌手时也不宜随意“突破”，只要开了先例，则对敌之方略也可能随时转而对己。

南方固然曾试图在北洋体系中寻找可以联络的对象，北洋人也可能往南方寻求支援。在直系倒段祺瑞时，吴佩孚等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南方军阀的力量，这就在北洋体系的内争中引入了外力，增加了北洋内斗的复杂性。后来直系占优势时，奉、皖两系也联络在南方开府的国民党孙中山系，同时吴也曾试图联合与孙对立的陈炯明[104]。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毁掉了北洋体系的元气，此后新主政的段祺瑞和张作霖不得不将国民党视为重要力量而加以联络，邀请孙中山北上谈合作，使当时所谓“三角同盟”进入实际运作层面。外间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认真注视，多半自此始（国民党以东征确立其在广东的军政控制，还在此后）。此时南北虽仍对立，但已互相援引利用，南北均势已逐渐是名义多于实际了。

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参见本卷前面各章的讨论）。国民党1925年5月发表的《时局宣言》说：“总理既怀与人为善之诚，躬自北行，与之商决国事。倘使北京临时执政肯以诚意与本党合作，接受总理所提倡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原则，本党敢信，不但中国之政治的统一早已实现，

而国民革命进步，亦必以一日千里之势克底于成。”[105] 孙中山的逝世可能是这次和平统一努力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06]，没有南方参加的善后会议本已大减其影响力，而会议始开，河南镇嵩军和国民军已经开战，自然很难再谈什么和平建国。于此益可见那时原较边缘的“西北”对大局的影响。

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不仅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也更使时人感觉到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的丧失，故后来的北伐军在长江流域取得出人意料的大胜后，不少读书人便产生出“有道伐无道”的想法[107]。同时，北洋新陈代谢的结果和南北既对立又互相利用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北伐前夕的一般舆论所说的“北方”实与前已有较大的差异，而“南方”的变化或者还更大，至少是更明显。可以说，北伐前数年的“南北”双方都有些今非昔比，下面就考察一下南方军政局势的发展演变。

第四节　南方新兴武装势力的整合

南北军事系统的一大差异是对军校毕业生的态度有别（此仅就倾向性的态度大体言之，具体到特定军队则各有异同）。前面说过，北洋系统（包括南方一些“旧军阀”）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体制和实际需求的疏离，即现代军队需要训练有素的带兵者，而军校毕业生实际又受到排斥。但许多北洋体系的“弃才”却为南方各新兴军事力量所充分利用，北洋系统自身不甚重视的军事教育实际起到了为南方培训军事骨干的作用。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保定军校的作用，1916年夏，孙中山在上海与任职滇军的革命党人李宗黄谈话，希望李氏将保定军校学生组织起来，由他们练成一支劲旅来推翻北洋军阀。李介绍说，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中学等学生多文武兼资，且不少向往革命，入民国后更经保定军校系统培训，必堪大用，而北洋军阀则对军校生嫉视和排斥。孙

乃提出可将陆军小学、中学和预备学校学生一并包括在内，于是李宗黄开始筹组“陆军四校同学会”，后于1918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该会主要的发展却不在北方而在西南各省[108]。

在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而有所谓“三角同盟”期间，段祺瑞派前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到广州联络，李宗黄在广州四校同学会（成立于1923年3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北洋政府以十一年的时间和大量人力财力，训练出六千余名军官，但由于北洋军阀对保定生不予重用甚至排斥，而孙中山却对他们信任关怀，结果这些学生泰半投向革命阵营，以与北洋军阀战，真是莫大的讽刺[109]。“泰半”或不必是准确数字，但保定生在北洋体系中少得重用而在南方却能迅速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大致不差，且李所指出的北洋斥资训练大量军官而自身不用，反为对手所用以与己战，虽带讽刺意味，的确有据可立。

苏俄顾问勃拉戈达托夫稍后即注意到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北伐军中的影响，他发现，“由于保定军校的关系，第四军同第七军互有来往。新建的第八军加入了这一派”[110]。鲍罗廷在1926年5月也承认，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保定派”[111]。第四军主要是许崇智、李济深等指挥的建国粤军改编而成，据李宗黄观察，其“团以上的军官，几于无一不出身陆军四校”。第七军即“新桂系”部队，从军长、纵队司令以下，“所有的团、营、连长，一律全是四校同学”。而第八军则为湖南唐生智部，其军官也从上到下几乎全是四校同学。这些新兴军事力量皆非黄埔系统，是北伐的主力。其实黄埔军校不少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且在黄埔系统的第一军中，上级军官也“俱为四校出身”，只有中下级干部才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112]。

不过，上述军校学生带领的南方新兴武装也大多是在与当地既存军事力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1925年-1926年间，仍居正统的北洋体系在内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因久战无胜者而有人提倡内部息

争讲和；在基本处于“争天下”地位的南方，似更流行以新兴者挑战既存势力为特征的武力整合方式。北洋军既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亲近的粤军乃能从容以新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等新桂系以武力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后，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适唐生智在湖南驱逐赵恒惕，虽未得全省也占有湘南，并与两广势力联合。结果，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并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113]。

这一北分南合的趋势是后来北伐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南方”自身权势转移的结果。从地理视角看，民初北洋的对立面有一个从“西南”向“南方”转换的过程，这一应该说是显著的转变过去却不十分受人注意。若仔细考察，稍早的“西南”称谓实际地反映了其实力的构成，即以滇、黔、桂三省的军事力量为主（四川部分因为其与滇黔驻军的矛盾，稍后起者更多偏于北洋一边），而国民党所在的广东虽然也在“西南”集团之中，却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范围内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东地盘的进一步划分），实在只是所谓“西南”的外围而已[114]。

上述粤、桂、湘三省的军事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军政格局，基本统一的两广和湘南三者都拥戴国民党的新领导核心，大致成为一体，并于1925年击退滇军的进犯，意味着“西南”之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兴起[115]。最能追随时势的舆论之表述即明显可见在“西南”范围内由西向东移动，逐渐以“南方”代替“西南”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三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都由当地层次相对偏低而又较“新”的力量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此前的“西南”无论怎样与北洋系统对立，其上层人物与北方仍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新兴的“南方”少壮领袖与北洋较少瓜葛（两广尤少），南北军政联系远不如前，利于战而不利于和。下面即简单考察导致南方局势转折的湘、桂、粤三省军事整合进程。

1920年湘军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下驱逐皖系张敬尧，实现所谓湖南自治。谭延闿短暂掌权后于年底被部下赵恒惕所迫出走，由赵接任湘军总司令，实际控制湖南直到1926年初，赵又被其部下唐生智迫走。两次权力转移的共同特点是最具军事实力的部下迫走上司而自己基本以和平方式接任。这样一种相对和平的权力转移大概因为20年代前期的湖南主要为湘人自治，省内各地则实行半独立的防区制，各镇守使在其防区内握有大权，省最高领导的易位对各防区实际控制的转换影响较小[116]。

这段时间湖南权势争夺情形比较复杂，其中当然包括参与者政治观念的差异；且湖南虽然“自治”，仍一直受到南北两大势力对峙格局的影响（湖南提倡“自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成为南北交锋的战场）；同时流亡在外的老革命将领程潜也不断纵横捭阖其间，遥控其所属派系参与竞争。可以说湖南省内的权力争夺主要在程潜、谭延闿和赵恒惕三派军人中进行，尤以曾同属一派的后二者势力较强，其间的斗争也更激烈。

当事人赵恒惕后来回忆说，“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117]。此说大致不误。时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李品仙也说军官分新旧两派，“高级的将领以旧派居多，拥谭就是这批人物。新派大部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多数担任旅、团、营长”，都是拥赵的。盖赵恒惕为部下信赖，湘军军官多是“经他手里训练乳育起来，旅团长以下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拥戴他的”[118]。

另一位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龚浩的回忆稍不同，赵、李所说的“旧派”在他看来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而新派又可细分为二：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恒惕的学生”。保定派和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龚浩特别指出，保定派“当时已有十六个团长，

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而拥谭派则“部下官佐素质较差”[119]。若不计细节的差异，当时湖南军官有新旧之分，且新派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是大家的共识。

赵恒惕以为，当年“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1923年谭延闿受南方政府命由粤入湘，旧派谋拥谭重握政权，唐生智等新派中坚认为，“如以旧派军官为中心，拥谭出任省长，则新派军官必遭排除”。事实上“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也”。后两派终开战，是为“护宪战争”或“谭赵之战”，由于“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战争以新派获胜结束，拥谭的鲁滌平等退出湖南撤到广东[120]。

此次战争后湘军重新整编，由二师扩为四师，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赵恒惕似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省内的各项建设，主要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军事方面未曾继续“扩充部队，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增购”。但唐生智则不然，他先已在龚浩建议下联络全省十六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结拜兄弟，所有同谱兄弟家庭无论本省外省都由他接济，已形成以唐为领袖的团体，“有举足轻重之势”。此时更致力于军队的训练和充实。整编后湘军各师均辖二旅，独唐生智的第四师辖三旅，“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师几乎多一倍”；其他三师各只有枪七八千支，而唐部有枪一万多支；再加上驻防衡阳，“防地广、财源足（军饷有廿多万，其他各区不过十几万）”，又尽量从各处添购武器，终“成为湖南最大的势力”[121]。

赵恒惕已指出新派军官“学识较胜于旧派”，而唐部军官更是“清一色保定同学”，并因此与保定前校长蒋方震（百里）结下长期的联系，蒋百里本认为“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对唐生智也特别看重，因唐的关系而成为“湖南新力量的指导，大家奉之若神明”。实际上唐生智还真求助于神明，他“在军队中宣扬佛法作为精神教育，并令全体官兵一律入教”，尊奉顾和尚为师。长期任其参谋长的龚浩对此很不

以为然，他认为“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以巩固其对军队的控制[122]。

湖南地处南北之间，不仅北方的冯玉祥成为效法对象，南方的两广也成湖南模仿的榜样。为打破湖南的防区制，时任赵恒惕参谋长的龚浩“建议仿照广西办法，将军财统一”。赵表示只要唐生智赞成就可以办。于是龚浩找到唐，得其同意后召开会议，“决定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并仿行广东革命军的办法，请刘文岛为政治部主任。税收方面，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起由省收税发”[123]。

龚浩本是唐的谋士，拟请来的刘文岛亦保定毕业生，曾受过唐的馈赠，后来更任唐生智驻广东代表。当时赵恒惕已有让位于唐的表示，若唐接位，这些“军财统一”的措施也对他控制全省有利，但赵唐之间的互不信任已较强，唐在会议之后又违反前言，两人之间的冲突乃无法避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即唐已和两广、特别是广西新政权有了较密切的接触。

先是赵恒惕派旅长叶琪于1925年冬访问广西，意在居粤之湘军程、谭两部，希望进则助广西攻广东，顺便消灭在粤湘军，退亦求广西在以后湘粤交战中保持中立。但此时广西已正式加入国民革命阵营，故一面以各种“新气象”予叶琪以深刻印象，一面四处散布叶琪是代表唐生智来商谈湘粤桂合作的消息[124]，并拉叶琪参加广西方面在梧州为国民政府代表汪精卫、谭延闿举行的欢迎会，最后叶还与谭一起访问广州。叶琪也是保定军校学生，此行本带有唐的书信，一些人大概也就弄假成真。其实在1926年2月中旬，唐生智自己也秘派代表至粤，与国民政府联络。不久唐正式电请广西方面在他进兵讨赵时派兵遥相呼应，并得到广西的允诺[125]。

赵恒惕外受南北压力（在双方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形下湖南要保

持“自治”并置身事外越来越困难），内为强势部下之“兵谏”所迫，乃于1926年3月初下令任命唐生智代省长；但长沙随即出现国民党推动的要求废除省宪、彻底改造湖南政局的市民游行。游行的举措提示着两广的新兴政治方式已传入湖南，也表明唐生智不接受“不彻底”的安排[126]。赵恒惕终不得不辞职出走，唐生智于三月中旬入主长沙。在下旬的军事会议上，唐生智逮捕第二、第三师师旅长等五人，杀其中三人，终导致湘军其他师的军事反弹。复因唐生智公开联合广东政府（3月25日两广代表白崇禧、陈铭枢已到长沙公开活动），反唐湘军得到吴佩孚的军事支持，唐生智在夹击下迅速败退，在广西援军的支持下才立足衡阳，保持其对湘南的控制直至北伐[127]。

当时广西全境已在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控制之下。李是广西陆小毕业，黄、白皆保定军校毕业，三人在旧桂系军队中仅至营连长级，不甚得志。后李、黄各带千余人的小部队起家，两次结合，其部军官以陆军四校同学为骨干，作战能力强，发展壮大较快。其势力兴起的转折点在1923年，先是黄绍竑部于1923年春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受任为广西讨贼军，是年冬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两者名义上都以广西全境为目标，气魄上已非小区域割据之主。当年末，两军在驻防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支持下消灭陆云高部，控制邻近广东的西江上游地区，成为沈鸿英和陆荣廷两大势力外的广西第三大力量。1924年春，陆荣廷和沈鸿英为争广西而战，李、黄、白等采取联沈倒陆的策略，乘陆、沈激战于桂林方向时一举占据南宁，不久肃清陆荣廷残部，正式组成统一的定桂讨贼联军，据地颇宽，在广西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128]。

然而孙中山在北上与段祺瑞会谈前于1924年11月任命在粤桂军将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其率部返桂。李、黄、白等派胡宗铎赴广州向代元帅胡汉民表示强烈反对，黄绍竑也于11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胡汉民乃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实际上，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不仅使广州政府

号令不行，名实不副，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刘震寰和杨希闵两部是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州的主力，故与孙关系密切，但他们与少壮新领导的关系就相对疏远。胡汉民告诉胡宗铎，对刘震寰的任命“不过是名义而已。我们不让他去，你们不让他来，就行了”。而驻扎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本是李、黄、白的后盾，刘虽有图桂之心，却不能越李部而过，于是一面联络沈鸿英，一面邀约云南唐继尧。

唐本有意出兵广东解决（征服或收服）当地滇军，更思在孙中山北上后控制大元帅府，遂决定进兵广东，曾数派代表与李、黄、白部联络“借道”之事，并许以厚报，未得同意。沈鸿英则于1925年初主动向李、黄、白部发起进攻，反被后者于2月中旬攻占桂林。3月中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通电就任广东政府副元帅，号称要到广州视事。先期入广西的滇军龙云部已于2月下旬不战而据有南宁。至4月下旬李、黄、白部基本肃清沈部，乃回师攻击龙云，经昆仑关激战后将南宁包围。此时滇军唐继虞部又逼近柳州，李、黄、白部主力转向柳州迎击，于6月4日在沙埔血战，击溃唐部主力。滇军兵力虽众，然两路不能结合，终被各个击破；到7月下旬滇军全部退出广西，至此广西全境为李、黄、白部所控制。

“新桂系”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少胜多、屡破强敌而统一广西，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广东方面此前除粤军李济深部对“新桂系”的军事行动一直予以实际支持外，大约并未十分认真对待这支力量[(129)]。广西统一后，湖南赵恒惕和贵州袁祖铭的代表迅速到达广西，广东也于1926年1月派出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谭延闿、甘乃光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到梧州“慰劳”，与“新桂系”领导人会谈。这次“梧州会议”外间传言甚多，各人所见不同，李宗仁等散布叶琪代表唐生智来谈合作的做法虽较成功；但在广东方面看来，这恰证实了“新桂系”倾向联省自治的印象（据说叶琪随汪、谭到广州后还因鼓吹联省自治与

三民主义的共性而遭其保定同学邓演达面斥）[130]。

在叶琪和非国民党势力看来，这样的讲话应代表着湘、粤、桂三省合作的意向，而在邓演达等广州国民党人看来，这显然意味着不够革命的妥协倾向。的确，广西新当局在1925年曾专门派副官长吕竞存到北京联络段祺瑞，李宗仁也多次坚持要求“督办”的头衔，这都让广州的少壮国民党人感觉其与旧式军阀的接近[131]。但“新桂系”也确有其“新”，如叶琪对广西的群众运动便甚感新颖，尤其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获得热烈掌声和欢呼，使他颇受感动，体会到了什么是“革命运动”[132]。可知当时从“旧军阀”到激进的革命“新军人”之间有许多层次，在广东革命军人眼中仍偏“旧”的“新桂系”，在湖南军人眼中已相当新奇了。

“新桂系”之“新”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即各级军官以军校毕业生为主，注重军事训练和战术运用。这是他们与旧桂系最大的区别，也是广东方面一些人从很早起即对其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李、黄、白在广东的主要支持者是李济深部粤军，尤其是其中的保定等四校同学[133]。李宗黄说，白崇禧等最初到广州谒见孙中山，“从事前的联络，届期安排，一切都由四校同学会为之代办”。广西驻粤代表陈雄便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也是广州四校同学会会员[134]。邓演达在黄绍竑部初下梧州时即向孙中山报告说，该部“虽原有基干仅千余人，而其干部均系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目沈鸿英、林廷俊【俊廷】等人直为土匪流氓而不肯与为伍”[135]。

这样的身份认同和强烈的“正邪之分”感觉固因其所接受的新型军事教育，也源自旧桂系对他们的排斥。正因此，“新桂系”在推进军队新陈代谢方面有着较强的主动感，他们还在与滇军作战时就多次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领导，要求以军事手段取缔在粤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并表示愿抽调军队入粤助战。后广州的杨、刘之役出乎意料的在数日内顺利解决（详后），广西军队又协助广东以武力解决了由湘西转入广东的建国川军熊克武部[136]，并积极参与对粤南邓本殷和

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之战，协助以少壮派为主的新广州政府确立对广东的全面控制[137]。

在此基础上，白崇禧和黄绍竑在1926年初先后到广州谈判，终于在3月中旬达成协议，正式对外公布了两广的统一，使刚刚获得对广东真正控制的广州国民政府管辖范围扩大到两个省。两广的统一与北方的混战适成鲜明对照，其实也是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广西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军事、党务、政务的基本独立，但其希望与广东实行财政统一借以“沾光”的设想也被否决，同样不得不“自理”。后者使广西方面相当失望，因广西的天下基本是他们自己打下的，现在拱手“送”给中央，所得回报甚少。被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的李宗仁后来认为，迫使广西财政自理的先例使“国家法度全失”，此后经济丰裕的省份如湖南等在纳入国民政府治下时也循例要求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竟是中央政府自己[138]！其实党政等自理对以党治国的国民政府“法度”至少是同样的挑战，李氏晚年的总结更多反映出其当年失望极深，也伏下“新桂系”后来与中央疏离的潜因。

在各自都外临强敌的情形下，两广的统一对双方的自保都有明显的好处；从南北对峙的视角看，两广统一对外的象征性威慑作用尤其不可低估。不过，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预计到不久后国民政府北伐能迅速取胜，所以广州未必具有充分的中央政府心态，仍更多关注广东一省，而广西也并不完全服从和依赖其拥戴的中央。在正式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广西方面也在努力与云南唐继尧修好，并联络自1926年春实际执政贵州的周西成，在湖南则“因唐方多是同学”而明确支持唐生智[139]。广州的新政权也正在努力巩固其对广东的控制，这一控制的取得主要通过两次东征陈炯明及肃清杨、刘等客军。

在过去明显受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作战都是以“革命”讨伐“反革命”为基调的；其实从陈炯明到刘震寰、熊克武等，皆从同盟会时代就参加“革命”，杨希闵也从“二次革命”时便进入革命阵营，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其革命资格并不算浅

[140]。与“新桂系”在广东革命者和湖南将军叶琪的眼中的新旧差距相类，这些“反革命”力量虽不时与北洋方面联络，然在外间特别是北方人看来，恐怕还是“革命”的一面偏多。杨、刘等以客军身份驻扎广东，时常不免因资格老势力大而以客凌主，且其治军方式偏旧，故若将东征、杨、刘事件，驱逐熊克武，讨伐邓本殷等一系列作战合观，其一个共相便是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的新兴军队以武力取代旧式军队，或也可视为南方革命阵营自身的军事新陈代谢。

国民党在1923年末改组联俄以后，军事上最大的变化是在苏俄顾问的提议和资助下开办了黄埔军校，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在此之前，从同盟会时代以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要采取的是“运动”会党和既存军队的方式，并不十分成功。蒋介石在1923年8月以为，中国革命“不能藉今日南方之革命军为主力军”，因为这些军队“囿于一城，已成为地方军队，不惟无革命之精神，而且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流弊至极，其障碍革命之为害，实甚于北方军阀之抵抗吾革命”[141]。孙中山也分享着既存“革命军”不可靠的观念，他稍后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中国革命十多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尽管“现在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并不少，他却“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142]。

孙中山决心通过黄埔军校的开办“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他特别指出，作革命军“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盖“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的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孙承认，就军事因素言，黄埔军校不能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比，故要战胜北洋军阀，“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精神”，而革命精神之“秘诀就在不怕死”。人人都要作“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视死如归，立舍身成仁之志，就“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定中国”。这样的革命奋斗，“是古今

中外各国兵法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

这的确是黄埔精神的鲜明写照。黄埔生多系各地主动投军的热血青年，并不要求入校前的军事教育，入校后只半年就毕业，其在校半年间学习也不十分正规，故其特有的素质正体现在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也是黄埔军与其他军队的重大差别。民初社会变动甚剧，当兵“吃粮”已成为一条生活的重要出路。但当兵既为“吃粮”，则作战时必以自保为目的。以北伐前后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言，尤其在多数领军作战者常怀保存实力之心时，“不怕死”常是决定胜负的第一要素，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来的“能战”之名往往能够起到使对手“闻风丧胆”的作用。黄埔校军首次作战即1925年初的第一次东征，正是在那次战斗中树立起了不怕死的名声。

陈炯明在孙中山北上后有意重返广州夺权，广州大元帅府决定主动实施东征。作战开始前孙中山尚在世，杨希闵素得孙信任，其所部滇军实力也最强，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担任左路进攻，桂军刘震寰担任中路，而许崇智部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路军。因左、中两路并不积极，实际作战主要在右路进行。正像那时多数人没有预料到“新桂系”能以少胜多击败军威甚壮的唐继尧军一样，东征时大概也很少有人想到小规模的黄埔校军和部分粤军竟能大破陈炯明军主力[143]。

参加东征的黄埔校军仅两教导团及学生队约三千人，据文公直观察，官兵皆“怀抱为主义而奋斗之决心，以为能杀敌，虽死亦不足计”。尤其在2月15日冒死进攻淡水，一战闻名，“黄埔两教导团能战之名自此始”。香港《华字日报》也说：“此次蒋介石督率学生军二三千人，长驱攻入潮汕，观者皆叹学生军临阵骁勇，而不知淡水、揭阳两役，学生军葬身枪炮之林者，已逾千人。盖蒋每次作战，皆驱学生军打前锋，故死伤独多也。此等少年军人若确自动的为主义而死，本来值得褒赞。惟闻其中十之六七，皆强迫入伍者。”[144]该报亲陈炯明的倾向明显，虽欲否定学生军是“自动的为主义而死”，终不能不承认学生军“不怕死”这一事实[145]。从1月下旬到3月下旬，右路军连

战连捷，基本控制了东江地区，蒋介石被任命为潮汕督办，是为国民党中央真正“染指”的第一块“地盘”。黄埔校军也正式扩编为国民党“党军”第一旅，何应钦升任旅长。

杨希闵和刘震寰长期以来对陈炯明部采取的是养虎自重策略，故多次参与讨陈而屡不积极。然而这一策略的要点是“虎”的存在，一旦陈部受重创而虎威不再，则杨、刘本身的存在价值也就锐减。东征初胜，以黄埔校军和粤军结合的右翼东征军声威大震，适孙中山逝世而“三角同盟”废，继任的国民党新军政领袖不仅与北方的军政联系剧减，其与驻粤客军的关联也相对疏远，乃挟战胜之威，回师攻击杨、刘。后者本是1922年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东的主力，孙若在世或不致决裂；反过来，杨、刘自恃功高势强，孙在世时已呈尾大不掉之相，对孙之继任者更不放在眼里。其东征之役采取引而不发之势，已是无视大元帅府之举；更重要的是在唐继尧表明入粤夺权之意后，刘震寰公开表示了对唐的支持，希望能借此返桂掌权[146]。

本来杨、刘对唐继尧入粤夺权态度不同，杨希闵是滇军顾品珍的部下，原与唐继尧对立，且解决杨部恐怕还是滇唐入粤的重要动机。然而在国民党内部却始终担心杨部会与刘震寰部一起在广州以政变方式夺权，然后配合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统治广东，对杨、刘有着整体的不信任。本可分而对付甚至使杨、刘对立的局势却未加利用，也表明国民党新领导群在东征初胜后自信上升。在4月底的讨论中，蒋介石和廖仲恺都主张与唐继尧妥协，让其入主广州，而将革命根据地东迁至粤东，以巩固新获得的地盘（蒋明确指出让已得地盘的将领离开防地去打一次无希望的仗非常困难），并向闽南发展。待唐继尧与留驻广州一带其余客军和粤军发生内讧时，再回来收复广州。但鲍罗廷反对这一计划，主张在唐继尧逼近广东前倾全力击溃在粤之滇桂军。蒋、廖被说服后，许崇智又反对，仍主向福建发展。但鲍罗廷的意见最后获得通过，并确定了此役由蒋介石指挥[147]。

正像杨、刘讨陈不积极而丧失其地位一样，许崇智对讨伐杨、刘

的消极态度成为其后来失去军事指挥权的重要潜因——蒋败自然无话可说，许既得地盘也保留了与各方斡旋的余地；若蒋胜则功勋与声誉俱增，局势就将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各方皆预计唐继尧会轻易消灭广西军队并迅速抵达广州。可知“新桂系”击败滇唐大军是整个南方局势至关重要的大逆转，它决定了北洋的对立面由“西南”向“南方”的地域转变，促进了广东新兴力量解决杨、刘的决心并确保其在没有外敌威胁的形势下完成。到5月初，范石生发回的电报表明广西军事发展与所有人预料的相反，“新桂系”正取得胜利。在唐继尧的威胁不复存在后，苏俄顾问及其支持者提出肃清客军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实现广东人统一广东的口号，以区域意识和物质利益为讨伐杨、刘的驱动力[(148)]。

鲍罗廷注意到粤籍军政人物中一个长期流行的观点，即“广东人的广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孙始终考虑全国问题，而陈则侧重广东一地，主张先把广东建成模范省，然后再考虑其他地区[(149)]。蒋介石更早在1924年即看出，“今日驻粤客军，日谋抵制主军，以延长其生命，跋扈之势已成”。对此“如不谋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为吾党制命伤者”。故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国民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治内之艰”。他那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对策与陈炯明的先内后外取向实相近，即“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150)]。既存此见，蒋此时自能赞同利用广东地方意识讨伐杨、刘之策。

蒋、鲍二人确有所见，6月初开始的讨伐杨、刘之役顺利得出人意料，实际战斗不及十天就以大元帅府方面的完胜结束[(151)]。杨、刘两部本身未必行动一致应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意识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黄埔校军的宋希濂观察到，广州市民久受客军盘剥，闻其败而奋起，“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身逢其事的滇军将领李宗黄更形象地描述说，广州市民因“近几年了受够了客军盘踞欺凌压榨的恶气，一旦有了可乘之

机，无不怒眉横目……揭竿而起，但知泄忿雪耻，见到了戴红边军帽的滇军是一拥而上，挥刀猛砍，甚而至于用牙齿一口口咬死人”[152]。

杨、刘的覆灭使广东军政局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党军利用杨、刘溃散后的兵员军械，一举由一旅扩编为两个师。有此基础，大元帅府随即要求统一广东民、财两权（即要各军交出其所控制的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并正式决定成立掌管全国政务的国民政府、废除地方军称号而改组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于7月1日正式成立，得到苏俄顾问支持的汪精卫担任主席，对讨伐杨、刘不积极的代元帅胡汉民退居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然已失去实际统兵权。数日后成立了由八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仍是汪精卫[153]。以具有正式国家政府名义的国民政府取代临时性的大元帅府当然有其长远的建设性意义，但在当时恐怕也是着意于告别“大元帅”体制的一种权宜举措——“大元帅”体制既然不复存在，唐继尧欲以副元帅入主广东之正当性也随之而逝。

不过，统一财权对参与讨伐杨、刘各军来说意味着原来用以作为驱动力的税收等物质利益落了空，而杨、刘的消失使作为另一驱动力的地方意识也转换了针对目标，因为“客军”的定义可以是广泛的，与其讨伐对象陈炯明粤军相比，黄埔军本身也不脱“客军”意味，只是没有其他客军那样鲜明的地域色彩罢了[154]。未曾参与讨伐杨、刘的许崇智已基本失去兵权，他和梁鸿楷、魏邦平等原在孙、陈之间亲孙中山的本地土军将领都具有危机感，遂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下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再次东征陈炯明并不积极（这也可能是师法杨、刘“养虎自重”的策略），甚至不排除与陈炯明部联合的可能，因陈部亦土军也[155]。

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般史学论述中主要视为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就与土客军之争发生了密切关联，而争夺的核心利益正是消灭杨、刘之后如何支配广东的“财权”。当时就敏锐地注意

到这一“土客矛盾”及财权问题的鲍罗廷说，梁鸿楷等粤军将领为实现“广东人的广东”，自消灭杨、刘后即“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财权上。政治委员会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但“客方”在这一次的权势争夺中显得更高明，他们利用许崇智和胡汉民两位粤人的矛盾，以放逐胡的方式换取许对解除粤军梁鸿楷部的默许，于1925年8月成功地将梁部缴械[156]。

梁鸿楷部有上万人的兵力，是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粤军中最强者。与此同时，黄埔军在李济深部粤军的配合下，将东莞郑润琦部、石龙莫雄部、广州梁士锋部粤军缴械；梁、魏等被捕，失去基础的许崇智被迫出走。党军利用粤军力量再次扩编一个师，不过数月的时间，黄埔军从东征开始时的两个团扩充为三师九团[157]。许、梁、魏等的失势意味着广东驻军的新陈代谢以激烈的方式又迈进一大步，当地军事形势完全改观。梁鸿楷部等被缴械后数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五个军，党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除李福林军之外的粤军组成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这两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1925年秋，以第一、第四两军为主进行了二次东征，至年底完全占领东江地区，陈炯明余部溃退入福建。其间国民政府在新桂系军队支援下首先解决了熊克武的建国川军，10月，又以朱培德第三军、第四军陈铭枢师和谭延闿第二军一部组织南路军和广西军队一起讨伐邓本殷，至1926年初南征结束，国民政府第一次真正控制广东全省。不过，黄埔军在某种程度上是地域色彩不明显的“客军”这一点并未改变，也意味着其走出广东的潜在必要性。稍后包括黄埔军在内的所有“客军”皆参与北伐，先后离开广东寻求发展，多少也受到上述土客矛盾的影响。

以两次东征为核心的一系列争战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转折点，最能体现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从地域视角看，它代表着地域

色彩明显的“客军”从广东军政事务中淡出（余下的区域“客军”基本不具备挑战政府的能力，多半也无此愿望，但图自保而已）；从军事角度看，它标志着黄埔军声誉的确立和一批军校训练的广东少壮将领的兴起[158]。就国民党及其主导的整体革命事业言，它见证了孙中山时代的结束（这一结束是广泛的：孙本人的弃世及国民党新领导层的形成是一方面；更直接的转变是孙的最大挑战者陈炯明势力的终结以及与孙陈相争有关的一系列反陈军人、包括粤军内部的许崇智和客军的杨、刘，皆随之退出权势争夺第一线）和后孙中山时代的开始。所有这一切转折中的新兴因素都与蒋介石多少相关，他不久即在国民革命事业中疾速上升，显非无因而至。

东征结束后不久，陈潜、李宗仁、唐生智部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六至八军，各军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意味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告一段落，随着各地新兴少壮军人的崛起，过去的“西南”色彩也基本褪去；广西已无旧桂系，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主要是湘军，然后来也均逸出广东，且因与唐生智有约在先，皆未能染指湖南）。粤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许崇智所属各部除一直亲黄埔的陈铭枢旅成建制地转入第四军扩充为第十师外，余多被“消化”，反倒是非核心而实力有限的李福林部保存较久[159]。

大体而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中，广西和湖南的军事领导人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且作用明显。广东也有相当数量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发挥实际指挥作用，但作战方面的作用或相对不那么明显，或较少为当事人所述及[160]；这里除黄埔军校的作用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有苏俄军事顾问在起作用[161]。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的新陈代谢也围绕着新领导中心之确立在进行，苏俄顾问和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仍有不少超出国民党左右之争和国共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162]。

第五节　中山舰事件与广州政局的新陈代谢

孙中山的逝世和广东两次东征的胜利加速了国民党内派系的新陈代谢，更早的转折点是1923年末开始的联俄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1916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也大体上在运动之外[(163)]。其在地域上既未能偏安于一隅，思想上亦基本疏离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164)]。正是1923年-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转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尤其联俄一点恰是胡适等一些西化自由主义者肯定国民党之处，知识精英的认可使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部分汇合[(165)]。

国民党的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也因改组而有较大的改变。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知识青年的重视，在接受共产党集体加入的同时成功地吸收了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166)]。由于国民党元老大多反对联俄容共，故主动或被迫逐渐疏离于党的权势核心。结果在广州出现一个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的新领导核心：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和邓演达均是孙的文武幕僚，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则是孙的亲属。在联俄容共之前，这些人除资格较老的胡、汪外大多不过是孙中山身边工作人员而已。其在党内的地位，多因与孙的关系而致。

广东的局势有其特殊的复杂之处：毗邻的香港在经济上与广东已渐成一体，然港英当局又提示着帝国主义的具体威胁；苏俄的顾问和援助是外国势力在广东的直接体现，并带来明显的“世界革命”意味。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沙基惨案”影响了广州的政局，外患的深化增强了“一致对外”的必要性，促使国民党的权势竞争尽快达成一个结果[(167)]；两次事件促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有助于国民党权力争斗中偏于激进的一派掌权——反帝的要求愈迫切，苏俄援助的重要性

就愈得到凸显[168]。另一方面，大量边缘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广东这一革命基地固然增强了国民党的全国性，也使前述广东“客籍”成分林立的状况进一步复杂化。这么多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的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纠缠争夺，使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他人之战场，凸显出外来者的“客籍”共性，又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因素产生了矛盾。

当年的“土客矛盾”中隐伏着一个潜在但至关紧要的大问题，即究竟哪一方面才具有统治广东的正当性。大元帅时代的广东是所谓非常时期，可以不言法度。而国民政府却正式举起“国家中央政府”的大旗，以中央政府名义而号令不过刚及广西，且因不允广西在财政方面“沾光”而自失“国家法度”（前引李宗仁语），其统治的正当性原本有限。当时又是各省“自治”主张流行的时代，广东人的地方意识决不弱于他省。国民党曾利用这一地方意识讨伐客籍的杨、刘，但当其需要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时，广东地方意识却成为其统治正当性的一个强力障碍。

蒋介石1925年7月在军事委员会分析当时的局势说，全国整体上有南北之分，在南方有革命军与反革命军阀之分，在广东内部还有真革命军和假革命军之分。帝国主义惯用其买中国人打中国人之策，当时已“愈用愈精了，不但是他们买北军来打南军，买反革命的军阀来打革命军，还要买假革命军的军队，来打真革命军”[169]。从国民党立场言，这一分析对各种力量的划分可以说相当清晰，却未曾述及至关紧要的土客因素（也可能是正式演讲中不便言及）。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大半年中，广东权势演变的大趋势即以国民党和黄埔军为核心的新型“客籍”势力击溃相对偏旧的“客军”和本土军，用蒋介石的词汇表述就是“真革命军”打垮了“反革命军”和“假革命军”。

然而这一权势转移实在太快，数月间权力核心的人事更迭和军事将领的新陈代谢频繁得使人眼花缭乱，其一个直接社会后果即造成大量从政者和军人突然“失职”，尤其是军官（数万客军和数量相近的粤

军在短期内“消失”，积累下来的“闲散”军官为数甚众）。许多客籍军政人士本避难于粤土，不易返回故地；更重要的是不论本土还是客籍，这些人鲜有其他谋生特长，主要的希望就是以某种方式“复职”。更因“世界革命”落实在广东一隅，港英方面非常乐于以各种方式支持这批“失职”军政人员，以扰乱甚至威胁新兴的国民政府，后者支持的省港大罢工直接影响着香港经济，且有着鲜明的共产革命色彩，在港英当局眼中多少代表着苏俄利益。

这样，后孙中山时代的广州政局并不稳定，1926年初南征结束后的几个月间，广州一直处于相当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持不同观念的各种团体或派系的关系至为曲折，而其分合也常常转瞬即变；主要特征是各方都既联合又斗争，每次联合或斗争多是相机而动，未见十分明显的持续性。这里当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即“主义”的分歧和冲突，这也是过去史家关注较多者；但左、右两派的主义之争并不能涵盖当时权力斗争的全部，有时甚至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关键是新从杨、刘和陈炯明等手中夺来的广东仅一省之地，而各方皆欲染指，或试图掌握全部权力，或至少分一杯羹；不仅失意或失职者力图恢复昔日的地位，新兴者或仍在努力想要兴起者为数并不更少。

这些权力斗争的一次大爆发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已较深入[(170)]，但整体上都相对忽视那些不能以“左右之争”来涵盖的因素，比如前述的“土客矛盾”及以此为基础的“蒋李交恶”，便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171)]。当年京沪各报如《晨报》、《时报》和《申报》上常见关于蒋介石和李济深“交恶”的报道，其具体的陈述或时有误差（特别是因对广东复杂的派系关系认识不足而区分双方的“敌友”失误）[(172)]，惟“蒋李交恶”之事大致是存在的[(173)]。

两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地位有了根本的提高，他自己说，东江打下之后，“从前许多学生敢来规劝我、责备我的，现在都没有了，当作我是一个特殊阶级看待。所以我想以党来做中心的，而今反以我一个人来做中心；所谓团体化、纪律化的方针，完全做不

到，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大家要晓得，我们革命党的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是大家不赶紧觉悟，仍旧是认人做中心，那末，校长一死，这中心就失掉了”[174]。这一新出现的“个人中心”最初主要还是在党军系统之中，在整个广东党政军体系中，蒋的资望实不够。不过，每次清洗掉一些老资格，他的地位就提高一次，到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实际居于第二位，这样的快速窜升引起许多人的侧目[175]。

其实李济深也是新近才疾速窜升为粤军领袖的。广东久为革命根据地，本土革命军在此长期奋斗；尽管粤军自身的争斗不断，但各次内斗主要是将领的兴衰，下层的兵员仍多在内部“消化”（讨伐“反叛”粤军时往往有另一部粤军参加，通常比他部更易接收本土溃兵），特别是与许崇智长期不和的李济深，其部在讨伐杨刘后历次解决“反叛”粤军（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都积极参加，所获最丰，实力陡增数倍，已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兵力最强的一军。李氏以广西人而任职粤军，在粤军内部多少也有些“客”的意味，但在粤军与中央政府的“土客”竞争中，李济深此时已成长为本土军的代表人物。再加上李因其广西人的关系长期支持新桂系，广西统一后屯兵西江上游的新桂军反过来又成为李氏的有力后盾，更强化了其在广东的地位[176]。

作为东征主力的黄埔军和粤军，在联合中也有竞争，取胜之后权力分配问题更日益凸显。国民党新中央真正控制广东后，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都提出“统一”的要求，这对基本据有防区全权的粤军是直接的“侵犯”；过去中央政府和梁鸿楷等的矛盾再次出现，不过这次落在李济深身上了。东征后何应钦以军功升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被任命为革命军总监，军事“统一”对他有利，当然支持；蒋既身处中央，其余的“统一”他也不能不支持。有时李济深等既得权力受到的挑战并不直接来自蒋，但也往往被认为与蒋一致。比如宋子文试图“统一财政”，意味着李部交出驻区财权，就并非蒋欲得利[177]；又如汪

精卫任全军总党代表，并命令各军一律由中央党部派任权限甚大的党代表，也是蒋表面支持而暗中头痛的问题[178]；而南征后原邓本殷的地盘现为李济深掌管，中央所派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以“统一政治”之名撤换李所任命之县长而代以新人，甘本亲汪，从派系言也更多反映汪的扩充势力而已[179]。

军事方面的蒋李之争，蒋也不很占先。尽管李济深在东征时曾为蒋之下属，据说他对蒋被任为总监颇感不服和不满，谭延闿、朱培德也不表态支持蒋[180]。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在于，黄埔军虽是国民党之党军，其他各军利益也不能不考虑。曾负责参谋团的苏俄顾问罗加乔夫分析说，“为了所有其他军的利益，就不能允许蒋介石搞独裁”。他特别指出，各军之中最需要顾及的是“由广东人组成的第四军”，盖在广东人眼中，“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都是北方人”。故中央政府在推行“军事集中管理”时相当注意“土客矛盾”和平衡各方利益，军事委员会即在这样的原则下调整：参谋团改为参谋部，李济深任总长；升军需监为部，朱培德为部长；谭延闿则自许崇智离粤后即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他们担任中央级职务后皆仍兼军长，独蒋基本为空衔（总监虽预示着可能改为总司令，然其职责及管辖范围当时并不明确），仅兼广州卫戍司令。罗加乔夫承认，蒋在此前一直受到俄方特别优待，这次的安排却“使蒋介石权力受到削弱”[181]。

有报道说，“蒋李交恶”的一个原因即蒋认为参谋部隶属总监，而李则认为两者平级[182]。实则只要没有隶属关系，即使蒋的总监等级更高，也因不直接带兵而多少有些失势的感觉。这样的“军事统一”显然使蒋不满，他一面设法扩大卫戍司令部规模，希望以此为基础改编为总监府（此虽报纸传闻，大致可信。2月6日，由粤军改编的黄埔教导师改称第二十师，划归卫戍司令指挥）[183]；同时于1926年2月9日辞去黄埔校长外一切军职，正式表达其不快。但蒋以辞职表抗议的方式未得预期反应，其辞呈被汪精卫留中不退[184]。2月22日，蒋介石又单独呈请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这或有暗示李济深的南

路总指挥亦不必存在之意，同时又似乎意味着前之总辞职已部分取消，仍可以总监身份执事[185]。

2月24日，国民政府与广西达成两广统一事项，在原有的六个军的基础上，留出第七军名义，而改编广西军队为第八、第九军[186]。此时广东方面若组建第七军，以卫戍司令部所辖第二师和第二十师为宜，两师皆有较大的粤军成分，则以本为粤军出身的第二师师长兼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王懋功任军长似较顺理成章。但在外间纷杂的传言中，王懋功已被卷入“蒋李交恶”的漩涡之中。有说李济深部下师长陈济棠反蒋甚力，曾拟联合王懋功部反，因谭延闿、朱培德中立，李不肯发；有说王联络何应钦欲反，被周恩来告密[187]。更复杂的是王懋功同时还牵涉到国民党和黄埔军队内的左右之争，以及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季山嘉的矛盾。

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就指责汪精卫和季山嘉试图诱王叛蒋[188]。其实汪等试图拉拢扶植王懋功大约是实，然看不出有倒蒋之意。就王本人而言，他较早参与黄埔军校事务，从入伍生总队长做起，其后颇得蒋信任，屡膺重任。王本许崇智部下，时人多认为他积极参与倒许，他自己也承认蒋在倒许前“曾一度见商”，他“力劝慎重，并言须得政治同情”，可知确曾出谋划策[189]。以此背景看，那时若在蒋、汪之间选择，他未必肯定站在汪一边。不过，有实力的部下“叛上”已成当时南北军界的流行模式，王虽未必有意背叛，外在诱惑力若增强，难保其不受影响。同时王在第二师内部也坐不稳，那时该师内孙文主义学会反王倾向很甚，已导致部队的不安定[190]。重要的是黄埔军主力在东征后仍留潮汕，仅王懋功率领的第二师留驻广州。蒋当时已辞广州卫戍司令职，虽未批准也未不准，身份尴尬，而王以参谋长身份理论上还可指挥最近划归卫戍司令属下的第二十师。

在这样的情形下，王懋功一身实为许多不稳定因素的结合点，尤其黄埔第二师和卫戍司令部是蒋在广州唯一可依靠的力量，也是蒋继续发展壮大其势力的凭借，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若去王，则各种

可能致乱的因素皆散而难聚。蒋介石于2月26日断然撤去王之第二师师长职，以副师长刘峙接任，次日即将王押送上海。蒋在将王懋功押送上海后自认："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憧忧，至此略定。"[191] 其实这一"要着"只是稳定本阵营的预防性措施，它并未使外在的"纠纷不解自决"，但毕竟为蒋采取进一步行动奠定了基础。

蒋的另一预防性措施也与防止"叛上"相关，即落实何应钦的态度。以潮梅绥靖委员身份率第一军主力驻防东江的何应钦那时也算获得了"地盘"，一定程度上面临与李济深等相类的问题，他恐怕未必欣赏"统一"民、财两权的措施。当时各报言反蒋事扯上何应钦的不少，何对蒋个人态度虽不必与李济深等同，从那时起多少有些若即若离则不差。时任何部秘书长的李仲公说，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曾密电何应钦，说广州有要人联合重要方面反对他，欲避而无容身之地，愿何赐教。何乃誓言忠诚，为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192]。这一密电往来恐不像李仲公诠释的那样两人"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蒋对何不放心，两人之间的关系已到需要"核实"的程度[193]。

逐去王懋功及何的表态为蒋可能采取的行动增加了安全系数，后防基本稳定的蒋介石当时可以有多种选择，首先他可以进一步联俄。苏俄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影响有目共睹，同时意味着当下和以后源源不断的物质援助，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指导正使中国与欧洲的新战术"接轨"[194]；更重要的是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革命必须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援乃是后者最鲜明的体现。此前蒋一直被认为是联俄最积极者之一，其部所得到的俄援也最多。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前夕就认为蒋不但左，甚至可说"极左"。反之，李济深长期驻扎西江地区，不仅个人显露头角稍晚，且显然与苏俄顾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致鲍罗廷到1926年2月似乎根本不知有此人，他在一份重要报告中两次把李济深说成是另一粤籍将领吴铁城[195]。

但蒋若强化联俄，需要苏俄方面也有类似意向的"配合"，季山嘉

在苏俄顾问内争中的胜出基本断绝了这一可能性。与久在欧洲帝国主义阵营里进行革命的鲍罗廷不同，季山嘉倾向于苏联红军那种更加直接的处事方式，且在与鲍罗廷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而蒋最能接受的加伦先已离开广东[196]。当时苏俄明显在加强对谭延闿和朱培德之第二、第三军的工作，这意味着物质援助的分享，蒋对此也不满意[197]。联系到上述军事委员会的人事安排，1926年初苏俄工作的整体形象是对黄埔军的重视较前降低，而更注重其他各军。在这样的情形下，进一步联俄显得不那么切实可行，何况还有蒋与季山嘉的个人恩怨横亘其间。

然而，在一般人眼里，蒋介石又恰是联俄的主要象征之一。在3月20日行动相对准确的消息披露之前，京沪各报关于蒋捕王懋功的传闻大都说王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可知蒋被外间视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面。也有说陈济棠联合李福林、吴铁城、何应钦等通电要求蒋宣布反赤宗旨、召回胡汉民、裁削赤俄军官实权、释放反赤政治犯等。甚至有报道说蒋拟辞职赴港，而俄籍军官和军校学生劝蒋以武力解决，蒋为所动，乃在黄埔设行营，集中各处党军准备采取行动[198]。这些虽为传闻，多少也事出有因，尤其最后所述蒋几乎赴港事，陈立夫曾多次述及，视为秘闻[199]；要么蒋类似的反复有多次，要么此事在中山舰事件前早已外传，故为报人所探知。这一传闻说蒋之几乎出走是为右派所迫而得到左派及俄方支持，相当能体现广东以外地区对蒋介石政治倾向的认知。

外在的认知当然有来自广东本地的渊源，既然鲍罗廷也视蒋为极左派，在李济深等人眼里，统一财政等强化中央权力的举措多少与蒋相关，也较正常。当时广东关于“蒋李交恶”的谣言颇盛，到3月上旬已出现第四军的讨蒋文电，兼及李济深部下师长陈铭枢（据说陈与李不和而亲蒋），至少以传单或揭贴形式在广州一带散布，上有第四军主要军官姓名，李济深本人未署名，然在广州政府说李部通电是挑拨时，李初不表态。后经汪精卫调停，同意李部所辖西江和南路之财政

行政暂不“统一”，仍由李支配，李部党代表由其荐任等。陈铭枢本人也到广州面见李济深，李遂表示要通电辟谣。此意甫露，《广州民国日报》立即以社论方式宣布蒋、李或李、陈“交恶”乃失职军人之谣言。数日后李济深正式率第四军将领（包括陈铭枢）通电，电文历数一、四两军的友谊，宣称“只知有革命反革命之分，并不知有军与军之别”[200]。

“蒋李交恶”的化解当然只是表面的妥协[201]，此事的产生、发展及“解决”却透露出不少当日政治运作的消息：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和权势争夺，后来的妥协也侧重于此；但其表述却基本回避实质性的内容，而是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在思想上与当时北方的“反赤”运动隐相呼应（作反蒋宣传者与北方实际的联系或不能说没有，然更多仍只是观念上的借鉴）。苏俄及其“赤化”的外国特性被有意渲染，提示着以香港为基地的港英舆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赤化”既是外来的，联俄也就随之带有不够“独立自主”的潜义，后一观念的兴起却是在中国鼓吹反帝的苏俄所促成。这样，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土客矛盾”因俄、英的卷入而国际化，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更加错综复杂，而其解决似也不能不与外国在粤存在相关[202]。

现在尚不清楚汪精卫对李济深的让步是否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从后来蒋指责汪“离间各军感情”看[203]，汪的处置显然让蒋不满，尤其在他渐悉广东出现“反蒋运动”之时。还在送走王懋功的次日，蒋即注意到“忽又发生一件戒心事，无法解决，最后决用强制手段，否则为害于党国，不可名状”。此事究何所指尚待考证，观其次晨即“与邓演达议处置军械办法”，则多半与军事相关[204]。现虽不清楚蒋拟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什么，但他此时应已准备做出较大的举动。3月7日，蒋从刘峙和邓演达那里得知“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作反蒋宣传，此心反得安适”。这应非故作镇定，此前数日他曾感自身处境如“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后两三天他发现，“近日反蒋

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205]。则其心“反得安适”或是弄明白了反蒋者究为何人之后的感觉。

这样，2月底那件“戒心事”有可能指各方的“反蒋运动”。今日不少史家多据蒋介石后来的叙述，似接受这些反蒋宣传来自中共方面[206]。其实由上文可知，应基本来自粤军方面。而广州更早就出现过指责蒋左倾的“倒蒋口号”，更可能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207]。有意思的是蒋从“反蒋运动”中认识到，从前在政治组织方面不曾用心，“完全信任同志”，如今始知“事事非精明审虑，皆为人之傀儡”[208]。这时他已有“上当”的感觉，且其不满并非指向反蒋者，却是让他作“傀儡”的汪精卫。这一思路预示着他后来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处置“反蒋运动”，即先不直接反击“作反蒋宣传”之人，而是釜底抽薪，使反蒋者不再能攻击他亲俄左倾。

由于黄埔系统内左右矛盾日益尖锐，在季山嘉主政的前提下，进一步联俄对蒋又不够现实（这也意味着他无法依靠中共），在当时的状态下他就不能不向右派靠拢了。鲍罗廷后来也说，夹杂在左派、中派和右派之间的蒋介石那时处境“极为困难，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派或对共产党人采取措施”[209]。研究北伐的朱丹以为，中山舰事件时蒋若不出而站在右翼一方发挥领导作用，则年轻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会照样动手，甚至可能连蒋一起扫除[210]。按朱丹未作进一步分析，亦未引证材料，似有些夸大孙文主义学会的力量，然其大致把握到当时那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景[211]。

这样一种紧张的态势部分是人为所造成。从杨、刘之役到梁鸿楷部等粤军解散后之失职军人甚众，成为出产谣言的温床。广州当局在中山舰事件前就已采取措施，大量拘捕失职军人，并将非粤籍者押登沪轮，递解出境。唯利用和传播谣言造势似已成为当时广东政治的一个特色，邹鲁就曾告诉陈公博，中山舰事件前蒋对汪的猜疑是伍朝枢有意编造谣言所促成[212]。其说未可全信，但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

造谣传谣是当时广东政治运作的一种流行方式。到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与蒋介石再次合作，仍感觉有必要就此达成协议，“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根除有人经常在省内散布恶毒谣言，以破坏政府的威信、稳定和财力的现象”。其具体做法就包括逮捕吴铁城和驱逐伍朝枢，这或者是伍朝枢始料未及的[213]。

蒋介石在事后认为，汪精卫“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214]。这里最核心的两点就是“各军感情”已不佳，而蒋与“某党”的关系也可能出问题。蒋并正式指责说：汪在三月初旬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员训话时，曾说“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功，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道”[215]。杨奎松以为，“不得不出于自卫”一语“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216]，确有所见。

一方面来自各方的压力确实很大，另一方面蒋也做了采取行动的准备，中山舰的调动乃成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既存的研究已不少，尤其近十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对史实的了解进一步深入[217]，但现在仍不能确证究竟是谁发动了这一事件。看来事件因误会而起的可能性极大，然既不排除确有针对蒋的某种阴谋存在[218]，也不排除蒋介石利用中山舰的调动以发难[219]。事从海军而起似也有些前因，据陈洁如回忆，她处理的蒋介石密信中有一函称，对蒋的“快速窜升”取敌视态度的人中，以海军司令部之人为最。海军曾由苏俄人员直接管理，在被中国军官替换后又是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斗争冲突最激烈的场所之一，从3月上旬起海军主要领导更迭频繁，与“蒋、李交恶”一起成为各报最关注的两个焦点[220]。

3月20日事件过程各家叙述已详（并请参阅本卷三章三节），此

不赘。当时上海各报对事件的认识进程却值得关注：《申报》到3月30日（据3月23日港讯）仍说事件乃李之龙试图组织工人政府失败[221]，次日发表毅庐发自3月21日、23日、25日三封长篇通信，算是了解到事件乃是“民党左派分裂”，蒋介石转变了信任共产派态度，依靠左派打击极左派[222]。《时报》之报道则仍说何应钦和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并联络李济深、朱培德、谭延闿等欲采取行动，蒋为其所迫，乃派兵搜索各右派要人住宅。但因党军中本有两派，出发后各派均借机搜捕对方（故实际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左派和苏俄顾问的行动，皆被说成是孙文主义学会矫令行事），及搜得之文件表明左派将在北伐开始后发动政变夺权，“蒋氏察悉共派阴谋，态度复立变”而转为反共[223]。这些本非“事实真相”的叙述说明，对一般外人而言，要接受一贯亲俄左倾的蒋介石突然反共，实在相当困难，故不得不努力搜集各方传言，以圆其说。

事稍平息后，3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224]。这是一个妥协的决定，最后查办“不规军官”一条至少部分是针对包围苏俄顾问团等行动，它既可为逮捕李之龙的行为正名，也为后来逮捕欧阳格埋下了伏笔[225]。从国民党改组以来，蒋介石的一贯态度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应尽可能妥协[226]，尤其黄埔系统内左右双方都是他借以兴起的部下，俱难轻易舍弃。蒋在3月21日即觉“人才缺乏，实无改造一切之工具，孤苦伶仃，至于此极，可堪痛心”。二十天后，他仍感“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因为这牵涉到“以后政治方针究应如何决定”。但蒋也认识到，自3月20日的行动后，“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焉。二年心血尽于此矣”！这应是发自内心的老实话。团体已分裂的现实迫使蒋不得不在二者中选择依靠其一，鲍罗廷以为，蒋在采取了3月20日行动后就“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反共”，这一观察大致接近真相[227]。

此前苏俄推动的军事改革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这一次蒋也借中

山舰事件削弱苏俄在军内的实际控制权。对此苏俄方面基本接受，苏共中央代表布勃诺夫到广东后承认，中山舰事件的确有苏俄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设置参谋部、军需部和政治部等“军事集中管理搞得太快”，引起军官上层暗中反对。他认为，上述三部及党代表和顾问就像“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当俄国（即外国）顾问对中国将军表现专横时，等于提醒中国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去曾发生让中国主官或军校校长在队列前向俄国顾问报告的情形，实在过分，简直是“反革命行为”。布勃诺夫强调，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228]。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后来也同意，“蒋介石将军的3月30日行动是由我们军事顾问们的错误引起的”[229]。

在这样的认识下，苏俄方面自然希望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一度担任广州苏俄临时负责人的索洛维约夫从北京到广州前已与加拉罕取得共识，“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他注意到，蒋在3月20日态度不很合作，但在24日得知布勃诺夫使团要走而鲍罗廷尚不知何时返回后，主动表示要与布勃诺夫面谈。谈话的结果强化了上述共识，尽管“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约夫却以为，既然错处主要在苏俄方面，“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这需要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威望”，只有鲍罗廷具有这种威望，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信任他，他能胜任这个任务”[230]。

索洛维约夫反映的是不少在粤苏俄人员的共识，美国记者索克思恰在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到广州，他在舞会上与俄国人交谈，后者以为一切都完了，中共党人多藏匿或逃逸，反共势力兴高采烈，扭转局势的唯一可能是鲍罗廷返粤[231]。鲍罗廷受命立即从北方返粤，这意味着他在与季山嘉的竞争中最后胜出。4月29日鲍罗廷抵达广州，未

见中共而先往见蒋。张国焘闻讯到鲍府等候，显然不满鲍罗廷的态度。数日后鲍罗廷告诉张，蒋介石和孙中山都是国民党中派，且都有较强的反共意识。若孙中山在，也会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张国焘发现，鲍罗廷最关切的是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及苏俄是否会因此被迫离开广东，而视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地位等为次要问题。鲍罗廷并确信自己有维持与国民党关系的办法，那就是他手中有钱[232]。

在以往蒋介石与在粤各军的资源争夺中，鲍罗廷始终支持黄埔军，后者是俄援的主要接收者[233]，这是蒋、鲍关系尚好的基础。同时老革命家鲍罗廷算计甚深，他带回了久已离粤的胡汉民[234]。胡在莫斯科时屡有相当激进而左倾的表述，若蒋介石不与苏俄妥协，鲍罗廷也可尝试拥胡汉民任领袖；若蒋逼俄退出而使国民党右转，他本人将立刻面对资望高于他的胡氏，后者本国民党右派代表，在反左派方面尤具“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同时，包括物资弹药和军事技术的俄援是黄埔军力量的重要支柱，失去俄援则黄埔军力量顿减。而中共和左倾的青年军人在黄埔军中的潜势力仍不可小视，宋子文、谭延闿等新老中间派均持调和态度。这样，不论文斗武斗，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均无独自胜出的把握，除联俄外也别无出路。

其实蒋介石在逐王懋功后与汪精卫谈季山嘉专横时，已“料其为个人行动，决非其当局者之意”。3月22日，当苏俄参议来问蒋中山舰事件的作为是“对人”还是“对俄”，蒋“答以对人”。俄参议表示“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并称要将季山嘉等遣送回国[235]，结果双方很快达成继续合作的协议。

蒋介石与苏俄的妥协当然不仅着眼于权势之争，他是那时较少认真考虑了帝国主义威胁和攘外与安内关系的国民党领袖。如果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甚至正面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任何一个革命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蒋介石早在1925年7月就认为，沙基惨案的发生表明“英帝国主义者与我实际上盖

已入于交战状态”，故“我政府亦惟有认英帝国主义为当前之大敌”[236]。在面临帝国主义近在咫尺的直接威胁时，革命事业也有邻近的大国援助这一象征作用并不低于物质的和军事技术的援助。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本较强，他在1924年谈及联俄时就对一些“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表示不满[237]。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既可针对俄国人，也可针对任何外国人。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他自1925年以来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收回主权的激进主张颇令各国担心，美国亦其一。1926年初，美国《国民》杂志记者根内特（Lewis S. Gannett）在广州采访蒋介石，蒋在得出根内特尚属“真诚”的结论后，宣称要告诉根内特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中国有思想的人恨美国更甚于恨日本。”因为美国人是两面派，虽然甘言笑脸，却和日本人行动一致[238]。由于蒋介石至少认为他自己是中国有思想的人，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

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对蒋的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239]。到1926年6月，精琦士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蒋就是“广州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不管来自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精琦士认为，蒋与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暂时联盟不过是为了得到军火和资金。但他也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指出，蒋本人恰以“排外而特别是反美”著称[240]。《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朋德（Hallett Abend）后来回忆：“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著称的。”[241]这或能反映那时多数外国人对蒋的观感。

蒋的表现与五卅事件后全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外在大环境非常合拍，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日渐流行的倾向。1926年初即有人指出：“郭松龄打张作霖便是打日本。无论中国怎样一个军阀，敢和外国抵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不幸抵抗外国而失败，是我们十分惋惜的。”[242]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得民心，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那时北方一般军阀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明显更敏锐的政治识力，已意识到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

据报载，1926年2月，广东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对峙之势，在决策会议上，蒋介石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外国对粤用兵甚难，未必因此即以武力为后盾。就令用武，而广东全省新胜之兵，不下六七万；且有俄员之指挥，俄械为之接济，大可以拼命而战。若幸而战胜，则东方第二土耳其，匪异人任矣。若不幸而败，极其量亦不过将广州政府退移于韶州。外兵人地生疏，万不敢深入国内，终须退出。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谭延闿和孙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若谓藉一战以博取国人之同情，则将来之价值未必得，而目下之地盘先不保，岂非以大局为孤注"。陈公博和谭平山等支持蒋，而李济深、伍朝枢、宋子文等则附和后一见解。汪精卫初偏于蒋，后"为谭、孙所战胜，亦表赞同"。结果会议决定向海关税务司妥协，蒋即"突然辞职，宣言不问政治"[243]。

这一会议的情形目前虽仅见于报纸，但与蒋介石那时的一贯识见相通，他更早就认识到攘外可以安内，主张在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蒋在1925年7月初上书国民政府说，"中国革命，其浅近目标，固在军阀。舆论皆谓内政不修，无以对外。实则内政之坏，大半由于军阀得帝国主义强力之助，方敢肆行无忌。"故"今后革命目标，应注重此点，认定帝国主义为当然大敌，誓与奋斗。盖必先杜绝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之途径，则军阀不攻而自倒。故今日革命，以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的，而对军阀不过为一枝叶问题耳"。他特别指出，与英帝国主义战，"无论胜负谁属，皆足引起全国及全世界革命群众之注意"[244]。

到7月下旬，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讲演中进而阐述说，打倒帝

国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即使英帝国主义真与我们开起战来，我们据大陆与他相持，他未必能离开海岸线制胜我们。”英国所恃为军舰大炮，只要离海岸线一百里，军舰即失作用；除铁路沿线外，中国一般道路狭小，大炮难以移动，其余军用品也输送不便，只要再离开铁路，英军便难取胜。有意思的是蒋的表述中也有一些晚清观念的“再生”，他列举的英军可以战胜的原因也包括吃面粉的英军不能在吃米的南方持久，以及英军“穿不惯草鞋，走不了山路蹊径”等[(245)]，大致是当年夷狄离不开大黄，腿直不便走山路等说法的现代翻版。

在蒋看来，中国革命“是今日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吾党革命目标，与其革军阀的命，无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擒贼先擒王，所以吾党革命当自打倒帝国主义始”。只有“我们能打倒帝国主义，才为革命的真成功；我们敢同帝国主义作战，方为革命的真起首”。他说：“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北方军人必有爱国者，西南军人亦必有爱国者。”若大家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共同救国”，就可以逼迫帝国主义“本国自己的军队直接来同我们打仗”，革命军就是“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来打一仗”！到“外国与我们革命军开仗的时候，我们革命军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因为，无论中国“哪一省一处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世界革命一起，帝国主义再没有幸存的道理”。

从这些言论看，前述报载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中蒋介石的发言基本符合其一贯主张，他的确希望通过与帝国主义直接开战而获取全国的支持。并且他也认为，如果在中国内地打持久战，帝国主义未必不可战胜。苏俄带来的“世界革命”观念进一步武装和提升了蒋介石的思想，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战，则中国任一军队与帝国主义开战，不仅可以博得全国同情和政治支持，更能点

燃“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这就意味着世界革命基地苏俄的卷入和参与。由此看来，国民党领导的革命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蒋介石此时不与苏俄决裂，所思虑者应较为深远[246]。

若前述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属实，则不仅与中山舰事件有所关联，且反映出广州当时权势之争的某些面向，尤其各类人物的分野值得注意。在讨论中支持蒋的谭平山和陈公博皆粤籍少壮新锐，谭乃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仍未失势（直到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才与其他共产党一起退出政府）；而陈也是前共产党，他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蒋介石让邓演达找到他，“说要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因为一面要防备右派，一面限制共产党，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其成员有十二人，蒋、邓、陈外，还有谭延闿、朱培德、何香凝、陈果夫、邵力子等，并在何香凝家里开过一次会[247]。

不过这一“左派核心”还缺少当时广州政治中一个重要团体，即作为孙中山亲戚的宋氏家族。不久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陈洁如多年后仍记得蒋对此大感兴奋，表现得非常激动，盖其“从未想到”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名流共餐，真是“妙得难以置信”。蒋告诉陈，“这些年来我与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一直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密切”，现在终有机会接近他的亲属；与宋氏家族的亲近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建立“重大功业的开端”[248]。此事若与前引陈公博说蒋组织“左派核心”的聚会共观，则其重要性更高，两次聚会都参与者确有一直左倾的何香凝。从陈洁如对当时气候甚热的描述中，可知这次吃饭应在前次“左派核心”的聚会之后。在旁人看来已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尚乏充分的自信，他也相当清楚广州的实际权力核心在哪里。

若把中共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同情者作为左派，则陈公博所说的“左派核心”加上宋氏家族，恰好是那时广州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249]。可见此时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已隐居主流，中山舰事件后正是这些人出来收拾局势，调解各方。其中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三人是那段时间几乎每份关于广东局势的苏俄文件都要提到的人，既说明

三人的活跃，也无意中印证了苏俄对第二、第三军的持续关注。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中，那段时间他也不时与谭、宋、朱三人议事。在3月26日蒋又一度辞职出走时，就是宋子文漏夜赶往虎门将其挽留[250]。这里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第四军的李济深，他在苏俄文件中仅偶尔被提到，在蒋的记述中更几乎不及李济深，偶尔碰面也只说点场面话，体现出“蒋李交恶”其实余波未息。

不过，上述温和而偏左之人虽已显出结合之势，其思想观念和实际利益等各方面都差距甚大，更群龙无首。正因此，蒋才得以倚靠此派力量分击左右两派，同时将此派逐渐置于其控制之下。周恩来后来总结说，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和加伦均离粤，陈独秀也不在，左派除汪精卫外群龙无首，当时各方军政力量皆不欲蒋得势，惟无人牵头，致蒋坐大，并击败左右两方，其权力基础乃得以巩固[251]。此说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凸显出汪精卫临阵逃避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蒋介石早就感觉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有着与“旧势力”瓜葛太深和魄力不够等“书生”缺点。事发后汪隐匿不出，蒋即认为“此种不负责任之所为，非当大事者之行径也。无怪总理平生笑其为书生”[252]。不过，汪精卫那时也有其困窘之处。索洛维约夫一面指出汪有遇事不够理智的性格弱点，同时也承认，在汪已感觉在蒋介石面前丢脸之时，苏俄向蒋让步更使汪感到受委屈，尤其循蒋之意召回汪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觉受了侮辱，故而隐匿不出[253]。

汪精卫在3月20日当天曾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254] 蒋在4月给汪的信中也承认：“一年以来，吾兄对党对国之功绩，为总理逝世后之第一人，此不论何人不能否认。”[255] 关键在于当时广东政治行为模式已大变，党内的“历史”早已不那么受重视，基本被当下的事功所压倒：不过几个月前，是否积极参与东征决定了杨、刘的命运，是否积极参与讨伐杨、刘更决定了胡汉民、许崇智等几位在党内同样有“地位和历史”之人的退隐。汪本

人正是在这讲究事功而轻视党内“地位和历史”的趋势中上升到党政军第一的位置。然若论那段时间的具体事功，汪似不如蒋，其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俄的支持。一旦苏俄据事功之需而定取舍，失去支持的汪精卫自然也难以仅靠革命“历史”以维持其地位。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作为似乎也不能完全视作个人争权，对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来说，蒋确实代表着国民党改组以来相对蓬勃向上的少壮力量，而且是那时位居前列又不具地方色彩的领导人当中唯一的军人。蒋介石并不欣赏的罗加乔夫就看到了蒋的独特之处：“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他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故应该“为国民革命运动留住蒋介石”[256]。尽管苏俄方面一直注重对第二、第三、第四军的工作，他们仍然清楚，论及与孙中山的关系，谭、朱、李均不能与蒋竞争，而汪、胡则缺乏军事素养。在“革命”主要意味着武装夺取政权时，军事知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鲍罗廷敏锐地观察到，“对蒋介石来说，北伐是他3月20日行动的基础。他指责汪精卫反对北伐”，以此为“汪的主要罪状”。在看见蒋“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鲍罗廷也只能一面指出北伐的不易成功，一面表示将给蒋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助其北伐成功[257]。1926年初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将北伐列为最近就要实施的要事恐怕还可推敲，但这无疑有助于使军事总监变为总司令。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事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政略，就必然大大增强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包括对财权的整体支配。这就牵涉到当时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文武之争，在这方面蒋介石和李济深利益基本一致，故李在事件中既不支持蒋，也不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自己就发现，事前并不赞成他对苏俄顾问采取行动的谭、朱、李各军长，在3月22日获悉他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的处理后，“皆赞成余意”[258]。这里各军长赞成的大概就包括前述限制党代表权限的内容。其实蒋、李之争仍在继续，蒋对握有军权的“地方主义”也不能

不有所让步。他在4月11日呈请设置中央军校副校长，以李济深兼任。同日日记中便“深思广东现局甚难处置，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之间固难调融，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259]。这里很明确地将“地方主义”作为比左右派分裂更难解决的困难，非常能呈现他内心关注之所在。

不过，蒋至少在文官方面成功地打击了广东的“地方主义”，经过3月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一般认为向右派妥协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实际的结果是：张静江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为江浙籍且曾参与西山会议的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参与广州政权的领导工作；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关系密切的广东人伍朝枢、吴铁城等或被逐或被捕，孙科在表态与这些人分手后才免于放逐的命运（当然也因为他是孙中山之子）。用朱培德的话说，以广东人为主的既存政治“重心”已失。鲍罗廷更明言：“除少数例外，广东人不适合作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东本地人排除在外。”[260]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中山舰事件事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左倾的汪精卫被驱逐，右倾的胡汉民一度返回广州又失意离去，在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偏右领导人后，国民党有竞争力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广州“消失”，蒋的地位明显提高[261]。1926年4月，谭延闿致信蒋介石商量军事预算问题，蒋复函说：“本月预算似应确定，请由吾公主持一切，不必事事商量，使弟更不安于心。”但蒋随即“贡献”了三条具体处置意见，虽然他最后又说“未知尊意如何？请与益之、任潮二公核定，弟无不遵照决议”，然前面三条口气相当直接，并无太多商量余地[262]。可知蒋此时已大权在握，代理汪精卫的谭延闿宁愿“事事商量”（几天后蒋才于4月16日正式当选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当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到5月下旬，蒋自己也忍不住说：“我近来听许多同志谬奖说，黄埔军校已成为党的重心。”[263]黄埔军校与蒋的个人关联众皆知晓，“近来”二字尤说明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中山舰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开启了蒋介石时代，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不久前获得正式领袖地位的胡、汪转瞬即淡出权力中心是非常重大的代际转折，后来所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此时皆开始出现在前台；他们中除蒋介石外皆能说英语，故能与仍处权力核心的鲍罗廷直接交流，孙科和陈友仁以同样原因此时至少与宋、孔一样重要，邓演达则能操德语故可与苏俄顾问中高阶的铁罗尼对话，也是权力核心的成员，凸显了俄国顾问的势力仍相当强大[264]。这些皆是孙中山的幕僚和亲戚，绝大部分相当年轻，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他们基本偏左[265]。

但蒋介石掌权的道路还不平坦，鲍罗廷观察到，蒋提出“整理党务案”，本希望“使军队保持平静，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则要求蒋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限制共产党；蒋“成了他们的俘虏”，以“保持军内团结”为由要求军内共产党人退党，以国民党身份工作，于是共产党更怀疑他右倾。蒋介石“每天都向我抱怨，说什么共产党人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266]。其实蒋在与鲍罗廷达成妥协后，即以捕吴铁城逐伍朝枢并公开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表明其已再向左转，鲍罗廷的回报是承认蒋所获取的权力并支持北伐。

此时新败于湖南的唐生智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外在形势的变化促使北伐进入实施阶段。盖唐部若被消灭，则两广将立刻受到北军威胁；唐如果退入广东或广西，这一新增的“客军”会使当地形势更为复杂。从全国看，北洋军正倾全力攻冯玉祥，在南方的兵力较弱，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这些因素都使本可安居广州以巩固其地位的蒋介石做出迅速进兵的决定。如前所述，战事既然成为主要政略，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即大大增强。蒋在6月5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个月后即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正式确立其领袖地

位。

尽管广东政局仍不稳定，但局势最不利时蒋也可率军打出广东另谋发展。不过在北伐之初，蒋并未让黄埔军出击[267]，而是派出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广西第七军先行[268]。素以不怕死著称的黄埔第一军并未安排在北伐第一线是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它提示着蒋介石一直鼓吹北伐或不过希望借此营造一种引而不发的态势，或并未充分认识到战机已至，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在广东的领袖地位，然后再定是否北上[269]。大体而言，北伐虽然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和计划，其最后的决定更多因为唐生智的突然加盟，并非完全是谋定而后动的有计划的作战。而且，对那时国民革命阵营各方面言，北伐本身有着颇不相同的意义。

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分析说，对蒋介石而言，北伐有利于其大权独揽；而“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在广州，不同的人围绕着北伐都有着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直到派往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使团6月返回，其“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270]。

以北伐求生存乃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个长期存在的思路，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故不得不“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有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271]。中共中央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即主张广东政府“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272]。蒋介石自己在许多年后也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273]

。双方所认知的在广州的危险虽迥异（一为“反动势力”，一为“俄共”），其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则相同。且其忧虑的重点，都在革命阵营自身[274]。故北伐的发动，实亦有不得不为的苦衷。

在国民党对外宣传中，北伐是以统一全国为号召的，然而所有上述具体思虑没有一种与“统一”相关，当时国民革命阵营中恐怕很少有人真以为近期即可统一。李品仙后来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275] 李氏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276]。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当时已分析说：“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的因素。”[277] 若不仅仅看兵员装备，则北伐军能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制胜因素，恐怕恰是国民党长期坚持对武装统一的正面提倡，适应了久乱思安定的社会需求。

第六节　南北统一的愿望与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尽管武力统一在北方已被表述为破产的“迷梦”，对久乱的中国来说，统一又是代表着许多人愿望的广泛社会要求，成为温和、保守与激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故对统一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全社会的时代要求，并影响着此后数年以至许多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278]。

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宁静安定的生活乃是一统局面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来自“兵”或“匪”方面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中共在1922年就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

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279)

到北伐前两年，以北洋内斗为主的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方式也日益现代化，故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和中部省区。结果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受战争之创伤也最重，民生被严重扰乱。胡政之在北伐开始后得出与中共几年前的见解非常接近的看法，他分析说，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各行业之人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结果“全社会之态度一变”，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280)。

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且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促进了全国性思想言说的形成，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

时人对怎样获致统一怀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武人当政是造成民初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故文人多倡“弭兵”；但要想统一，历史上最常见也有效的方式正是使用武力，这又可能意味着武人当政的延续。一些读书人或仍主“弭兵”，而厌乱者已思能以任何方式统一之人。杨荫杭在1920年已提出，若能统一全国，军阀也可接受：“使段家将而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他分析说：“不战而能统一者，上也；战而后统一者，次也；既不能战，又不能和，而

苟延残喘者，下也；既不能战，又欲强战，战线延长，民不聊生，又其下也。”[281]

对不少人来说，久乱之后，目的渐重于手段，统一是否以武力达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武力统一的主张在北方不得人心，更多是因为持此论者无此能力。力既不足，在此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如前所述，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其后的善后会议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尝试的余地和成功的机会。

北伐前既有统一愿望又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恐怕只有国民党：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引进了苏俄式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政党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也提示了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未必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反帝的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282]。

前引国民党《时局宣言》已指出：“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稍后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又说：“中国军阀，凭藉帝国主义之后援，割据自雄；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283] 可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都是能够迷惑国人的口号，由于北伐实质上仍是一种“武力统一”，广东当局既要针对带有“西南”特色的“联省自治”（介乎于蒋介石所说的“反革命”和“假革命”之间），又要区别于北方的“武力统一”，故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284]。

北伐出师前，国民党“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说：“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285] 蒋介石也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286]。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287]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从实用层面看，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鼎革造成整体性的制度转换，加上传统的崩坏，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结果是各种新兴的“主义”起而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并出现各类西方主义以中国为战场的现象。[288] 当年比较成功的军阀，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与思想界多采西方观念不同，军阀中除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外，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289]。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模仿三民主义，提示出国民党运用“主义”的成功。

这的确是那时南北双方治军方略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答曰否。伍乃“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何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张学良知道后，“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290]。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试图学习南方的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

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291]。除了“主义”的有无，南北军队另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南方有仿苏式的国民党组织，这一新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复杂化，同时对整合军队也起了较大作用。蒋稍后解释“为什么要有党”说：“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292] 党的存在，有助于消弭当年南北皆存的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起到整合文武双方的功用，促进了南方的军政结合，使北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293]。

不过，主义、政党一类新因素的效力当时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国民革命的“合道性”很大程度上毋宁是由北洋方面的“失道”所反衬而成。前面说过，伴随着北洋体系老成凋谢和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阀兴起的，是行为准则的转变。特别是张宗昌、张作霖等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294]。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不论此事究竟该由哪一部分军警负责及其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295]，若将其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便体现着某种类似而连续的行为模式。

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学生运动是民国的新事物，中央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杀学生前所未见，连江南的北军孙传芳也认为政府应为此负责。他和陈陶遗联名通电说：“政府早日既疏于化导，临时又过于张皇，枪杀多命，演成惨剧。谁无子弟，能不痛心！”且“年来政府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憝”。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日益热心政治的学界当时已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势力，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试图利用而使“是非淆乱”，故“邪说异端，相因而至”；这一次就是因为“兵争不戢，驯至与学子为仇”。孙、陈希望“当局诸公，早知改图。平时教督

防护，当负相当之责任；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勿徒以一纸空文，涂饰耳目”。若处置不当，则可能导致“上下乘【乖】离，祸至无日”的结果[296]。

孙氏等对学生运动的主使一方也主张实行惩罚，多少还站在北洋体系的立场上。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虽已相当严厉，毕竟仍承认既存中央政府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故必须“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297]。这已露出否认执政府之意了。上海商界表述得更直接，其致全国公电明言：“自段氏窃据首都，述其所为，对外则一味奉承，对内则动辄压迫；今竟听令卫队惨杀爱国运动者至百余人之多，如此媚外残民，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亦法律所不容。除即应驱令下野外，我全国人民宜急起监视其行动，或设法拘禁，以待国民会议之公判。”[298]

梁启超与上海商界的表述虽稍异，其观念大致相类，即基本否定执政的段祺瑞，然尚大致承认民国这一法统。北京国家主义派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过去的“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唆使和利用国奉的战争等等事件”已证明，“段祺瑞和他的爪牙媚外卖国，残民以逞”。此次更“穷凶极恶，用枪炮大刀将无辜民众杀死了这样多，这种样人不但是毫无法律，简直是毫无天良”！该派明确宣布：“我们不去希望法律式的制裁——固然被难的家属们仅【尽】可以去告状，——因为法律对于军阀早已失了效力；并且法律式的解决究使生出效果，也不痛快。”[299]

此次事件本因外国军舰封锁大沽口而起，孙传芳和陈陶遗已注意到外侮与内争的关联，他们就认为这次“外侮之来，亦由内争所召”[300]。重要的是这使一些人将此次惨案与不久前的五卅事件相比，结果更凸显出北京政府的失道。梁启超评论说：“试想去年五卅的血案还是现鲜鲜的放着，那时我们全国人民怎样一致的呼吁反抗，我们也取得国际间一部分真挚的同情。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

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这正当各国调查法权的时候，我们这国家此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讲，什么脸面见人？”[301]

北京国家主义派更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302]。当时正被国家主义派攻击的中共，其见解也非常相近，中共告全国民众说，“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这样“杀人的卖国凶犯”当然应该讨伐[303]。

爱国者死于本国政府之手，且其惨烈更甚于帝国主义，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对北洋统治合道性的打击实在太大。梁启超等还希望依靠既存体系的法律制裁，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对立，却皆得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结论。这两个政治团体在当时都没有足以将造反落实到行动上的军事力量，结果这一局势最有利于正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后者不仅有自己的军队，且已取得区域性的政治控制。

北洋政权的“失道”行为从反面衬托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使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汤武“革命”那种“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当年一些知识精英的态度颇能提示出国民党在几年间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分享着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他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甚为感叹，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到当年11月张氏已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对北京政局的影响相关；不久他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304]。

张彭春或因当时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而感觉共产主义

将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的部分“成功”——即学界中有人已接受冯部“赤化”的宣传），故预为适应“新朝”作准备。但国民军之得势带有回光返照的意味，其很快就败退西北，倒是更加“赤化”的南方国民党愈来愈显现出“得道”的趋势。倾向自由主义的胡适在1922年尚与人共同表示：“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他后来却承认：“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305] 胡适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那时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306]。

对相当数量的新老知识精英来说，20世纪20年代实未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他们此时的心态，大约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形容。据沈刚伯回忆，胡适1926年秋在英国大说国民党的好话，即因为他本人虽“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307]。

最初反对后又转而支持北伐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也分享着类似心态，他认为，“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陈氏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至少可以结束战乱的局面，为一个“民主的中国”打下基础[308]。

简言之，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有增无减，实处分裂的南北双方虽皆主张南北应统一，其实自身也很难统一。当时的情形是谁能先统一内部，始可言统一全国。苏共中央考察中国状况的布勃诺夫使团总结其对中国的观察说，北方（包括华中）和南方“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政治局势”：南方“已经度过了某些中国军阀（军事买

办）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时期”，日益强化的国民政府在发生作用；而北方的情形正“与此相反”，那里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仍接连不断”[309]。这一观察基本看到了北分南合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两广和湘南的结合已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而其政府的领导作用也强过北方。

当然，南方的军事政治整合虽皆取得一定成效，仍尚不足以结合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北伐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能够提出并付诸实践，正因国民党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后来北伐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此时南北双方又一区别在于，北方共同的“反赤”较多停留在口头上，而南方共同的北伐却进入实际操作；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皆相对而言）；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易，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本章所使用的一些资料，承汪朝光、谢国兴、杨奎松、王奇生、冯筱才指点，特致谢忱！也非常感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万仁元馆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特别是馆长马若孟教授）、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特别是庄素华小姐）、中研院史语所图书档案馆的热情帮助！中研院近史所张淑雅教授的研究助理林志菁小姐拨冗协助复印资料，极为细致周到，亦甚感激！

---

(1) 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51辑，215页。

(2) 比如1929年-1930年间中原大战的主要人物也曾被称为“新军阀”，那次大战动员的人数就远超出这一次的混战，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

(3) 关于北伐，也可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225页。

(4) 1920年12月24日《申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5) 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收入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径引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下面关于北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多本此文。

(6) 陆军小学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体制中士官学校前的初级军校，这一点承徐勇教授指教。

(7) 也有人认为“拔差弁为军官”是袁世凯有意为之，盖其以为“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2页。

(8) 据说曹锟189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页），也有人说曹锟早年曾任塾师，而顾维钧则以他的亲身经历婉转印证曹锟是文盲的说法（《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页）；大概曹所受军事教育不够系统，故本文暂采用“行伍出身”的一般说法。

(9) 1920年12月29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73页。

(1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页；直系要员白坚武稍后在总结直系失败原因时也表示，他即曾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927年8月补录1924年日记，第498页。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4-35页。

(11) 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拟设四所：一北京清河、二西安、三武昌、四南京，然西安实未办），入民国后各地陆小停办，已办的陆军中学改为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再加上保定军官学校。这“四校”皆清季开始创立的新式军校系统，注意其有意识地区别于各地讲武堂、武备学堂一类军事培训机构的自我认同，其实讲武堂等也是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的产物。

(12) 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70页。

(13)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6页。并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第53-54页。按当时军中分新旧两派的似不少，湖南亦同，详后。

(14)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5页。

(15) 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94页。

(16) 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15-132、180-199页。

(17)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203页。按唐生智不使用这批大炮或许出于保存自己力量的考虑，或许因为进攻武昌的战斗由蒋介石指挥，唐无意配合，当然也不排除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唐氏也并不重视炮兵这一因素。

(18) 《晨报》1926年3月26日，第2版。

(19) 然而，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张钫观察到，吴佩孚“有着浓厚的北洋陆军正统观念，一向把张作霖不当作北洋正统”。在这样的正统观念影响下，别人“对他说张作霖如何延用人才，精练军队，他都不相信，说张胡子懂得什么练兵”。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2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48、52、55页。

(21) 《申报》1920年8月27日、11月12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95、126页。

(22) Ethel A．Munphy，“Celestial Opera Bouff，” *Travel Magazine*（Floval Park，N．Y．），40（April 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霭（Arthur N．Waldron）教授指点。

(23) 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5-141，此书有中译本，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27-134页。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除本卷第一章外，并参见Arthur N．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91-118．

(24)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74页。

(25) 章太炎稍后即指出，“自袁世凯以后，北京久无政纲。财政操于外人之手，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但他也注意到，起初政府也还“微有主权”，后来则黎元洪被逐，曹锟被囚，而段祺瑞被软禁；这些主政者的法律地位虽有真伪之别，其受军人凌犯则同。“是北京之有政府，只为乱人俎上肉耳”（“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仅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46-848页）。有势力的军人干预政治甚至操纵中央政府是袁世凯之后北洋政象的一个常态，且愈演愈烈，但在军队司令部由军人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仍可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后来军人自己执政，复出现囚曹锟释曹锟、拥段祺瑞驱段祺瑞的现象，大致也是逻辑的发展。

(26)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其作者增订本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第293-306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10-12页。由于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北洋体系的实际主持人，也有学者认为“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47页）。“资格最老”自然无问题，“势力最大”或主要是从其控制中央带来的综合实力着眼，若以军队特别是当年极重视的“地盘”言，皖系显然一开始就不如直系。虽然西北和东南沿海一些省份之军政领袖被视为皖系，然其真正的嫡系，如所谓“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和傅良佐，除傅良佐短暂据湖南外基本无其“地盘”，且徐、曲二人的主要带兵经历也限于参战军。作为北洋体系的整体领袖，段祺瑞本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性，但一方面他明显感觉到无自身实力则地位不稳固，同时他试图建立自身军事派系的努力也削弱了其作为整体领袖的超脱性，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只能另文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北洋六镇自然扩展产生的军队相比，“参战军”是后起的新事物；从历史渊源看，两者的正统和边缘地位大致可立。

(27) 按：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各家所述颇不一致，文公直的叙述似乎自始至终都是奉军在取胜（《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91-199页），来新夏等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北洋军阀史》，第802-811页）。丁文江的叙述稍更平实，指出了直军的准备不足和初期作战不利，然承认在冯玉祥倒戈前战局已成胶着状态（《民国军事近纪》，第321-327页）。近年林

霖对战争前期的论述所见又不同，他以为冯玉祥倒戈前直系更具战略优势，参见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pp．115-118。林霖所见不可谓无据，奉方傅兴沛的记述是在奉军在热河一线取胜，但在山海关主战场则形势对奉军不利（傅兴沛：《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35-37页）；直方李藻麟的结论是“自十一月上旬起，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战场上基本上打成了对峙局面”（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争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9页）。且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报告也认为直系此时形势占优，若冯玉祥一线进兵则直系可能胜利攻入满洲（引自林霖书117页）。应该说吴佩孚的战略计划似较高明，后来郭松龄反奉，文公直即认为其“似有与前岁奉直战争时之直军敷设同一计划”（文公直书第三编，第209页）。郭部兵力远逊于直军，且无海军支援，而能一度取得超过直军的胜利，似提示着若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取胜的可能性也较大。本卷第一章的叙述较中立，可以参看。

(28)　吴虬已注意到北洋“纲纪”不再，“倒戈”已成流行的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参其《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84页。

(29)　《晨报》，1927年7月20日，第3版。

(30)　“九一八”后某次蒋介石到北平，各界的欢迎会上有吴佩孚，并请吴佩孚讲话，他说，“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51页。

(31)　比如，后来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作霖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则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北伐时及北伐后的不少军事领袖可以说都曾有“问鼎”的机遇，但他们大多数与张作霖一样仍偏于地方意识，并无太大的“野心”，故往往不能充分利用其所遇到的崛起时机。他们在时势运会所推之时，一度也曾有主持全国之念，但正因其在很多方面缺乏为此而做的准备，因而所措多差。北方的阎锡山、南方的李宗仁便有类似经历。在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里，两人都是所谓“带艺投师”，代表着非正宗的国民党势力，也都有在国民政府体系内争取“独立”的愿望和努力，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但确实少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愿望及为实现此目标的准备。李阎的第一次“合作”在北伐后的中原大战期间，差一点推翻蒋；第二次合作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李任代总统而阎任行政院长，一度真正成为国民政府的主持人。对于后者，过去一般皆从蒋实际并未放权来认识这一“过渡阶段”，故未见深

入有力的研究。其实观李阎的实际举措，的确缺乏主持全国事务的气度和能力，毕竟还是没有“问鼎”的准备。

(32) 古蓨孙在1924年出版的《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中已描述当时情形为“一系之中分为数派，一派之中分为数党；各私其私，无复有国家观念”。该书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33)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长S．P．Waterlow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参见William 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1971，p．110．

(34) 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7版。

(35) 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这些拥有地盘者又相对缺乏自信，故一些基本失去武力也无地盘者反可能受到表面的拥戴，如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拥段祺瑞出山，北伐前孙传芳等要讨奉时竟有十四省共举吴佩孚为总司令。对段、吴二人言乃其一生地位最高的时段，但真正的权力皆不如以前，两人的实际操控能力均有限，尤其涉及被指挥者自身权益的时候就更有限；拥戴者主要是尊其历史形成的名位，希望其更多作“虚君”式的“共主”。

(36)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37) 张国焘从另一侧面观察到，尽管旧官僚仍“盘据中国政治舞台”，但他们当时已“不是政治上的真正有力成分”。而是军队“把中国的政治夺在手里”，有时“一个拥有万数并无战斗力的军官便能在政治舞台上横行”。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1922年12月6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98页（以下所引该刊页码均汇刊本页）。

(38) 齐锡生已注意到那段时期地理与军事政治的关系，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pp．143-149，中译本，135-140页。

(3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407-428页。关于四川在南北之间的地位，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29页。

(40) 岑春煊于1924年11月21日和25日两电段祺瑞等，主张以“移军殖边”和“军工筑路”为解决裁兵废督的方式，并明确建议雨亭、焕章“分任东、北两方开拓富源大任”；而吴佩孚则让其实行移兵实边的素志，以“开拓西北”任之。岑春煊致段祺瑞等，1924年11月21日、25日，《申报》，1924年11月23日、26日，均13版。东三省固久为张作霖所据，这一建议很能体现热、察、绥这类边缘地带在解决军政问题中的用处，而“西北”尚可供重新布局，也得以凸显。

(41) 当时已无兵力的段祺瑞一度想组织一支第三势力，而以阎部为首，参阎锡山档案，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径引档名），微卷7，第548页。

(42) 按阎锡山能确保其地位当然与其无意参与外在竞争有很大关系，同时其治晋也确有特色。据文公直说，山西是当时全国唯一实行按人口定额之征兵制者，即实行“寓兵于农”的所谓“乡兵制”，每年“向各县征募，同时按年编老兵入后备。军械则与时俱增，储之库中”，故战时能用之兵较多。同时“阎锡山对于军队教育，素极注重”。不仅“以孔教部勒军队，更使全军学生化，所有士兵均须补习国民教育，以二年为期，毕业后，再授以普通科学及军事教育”。若文公直的观察不错，山西是少数真正贯彻实施儒家“教而后战”思想的区域。实际上，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的确给山西人带来差不多二十年的和平，这在北洋时期是非常罕见的。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124-128页。关于阎锡山的研究，参见Donald G. Gillin，*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1年，后者使用了前引阎锡山档案，惜所用不多，所论也不详。

(43) 到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班师回京改变中央政府这一新举措后，许多人才领会到驻军京畿的作用，此后各大军阀关于划分实力范围的谈判中，京兆不驻兵成为一个常见的条款。

(44)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James E. 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96-110页。这段历史的基本轮廓似已清除，然其中各方面曲折复杂的相互关系，还有不少需深入探索之处，拟另文探讨。

(45) 《冯玉祥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46)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44-45页；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7) 李庆芳（山西驻京代表）电阎锡山，1925年3月22日（本文电报日期均取发报人所署日期，这样更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也更能与电文相符合。然因电报为二十四小时发出，半夜发出者电报局已署次日日期，且有时写完并未马上发出，到实发报时日期或也有变，故电报局实发日期或稍异），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623页。按段祺瑞有对刘镇华不利的政令也不完全因冯玉祥的压迫，时在陕西的中央第七师吴新田部大致属皖系，实力虽不足，亦久欲督陕，刘去则利吴也。

(48) 胡景翼电阎锡山，1925年3月5日、1925年3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1300、第1351页。

(49) 阎锡山电温寿泉（山西驻京代表），1925年2月9日、1925年2月1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716、764页。

(50) 阎锡山电马骏（晋东盐运使，时驻翼城，常与陕方联络），1925年2月27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924页。实际上“中央”即使内心偏向镇嵩军，也不可能明令支持；相反，正如瞿秋白指出的，“照理段氏应当下令讨伐憨玉琨，因为胡景翼是他正式任命的河南督办”。但执政府对这样明确挑战其权威的军事行动却“只说调停”，充分体现其对局势已失驾驭能力。参见双林（瞿秋白）：《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106期（1925年3月14日），第884页。

(51) 马骏（晋东盐运使）电阎锡山，1925年3月1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985页。

(52) 国民二军的新首领是非胡系的岳维峻，与直系的关系尚好，也非民党出身，但他在军内并不具备胡的威信，似也不如胡那样敢作敢为，故其后来使山西及其他方面“可虑”的并非有多少特别进取性的作为，而是其态度的犹疑不定。

(53) 钱桐（孟材）电阎锡山，1925年5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645页。按本卷第一章认为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主持国务会议是迫于国民军控制直隶全省的形势，段祺瑞为了争取冯玉祥的支持而被迫如此。国务院究竟是张所要求还是冯所要求，抑或两人均要求，尚可探索。

(54)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59-61页。

(55) 吴佩孚再起，段祺瑞立刻感到威胁，其子段骏良说，虽“杨文恺日前来电谓吴只讨奉，决不反对执政，万勿信挑拨等因。但吴屡次通电均带护宪彩色，此话亦难遽信”。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1点40分发，阎锡山档案，微卷9，第441页。这里所说的“护宪”，指的是曹锟任总统颁布的宪法，从法理上当然针对着段的“临时执政”之正当性。有意思的是，段的支持者吴新田和刘镇华余部柴云陞、张治公两师也联名通电参与讨奉：“我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由孙总司令统率首先发动，义旗一举，薄海歌呼；桴鼓之声，万方同应。新田等屯兵秦陇，夙赋同仇，愿竭驽骀，共脆凶逆。”（吴新田等讨奉通电，1925年10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1938-1940页）。吴新田此举未必代表段祺瑞态度，但多少反映出许多军阀对奉系的不欣赏，一因张作霖出身“胡子”，二因其与日本明显的关系。

(56) 汉口曹步章（倬云）、梁汝舟电阎锡山，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26页。一般多说张作霖因郭松龄反戈而与吴佩孚联合，看来双方的联合要更早也更主动。

(57) 冯玉祥致阎锡山，1925年3月7日，阎锡山档案，转引自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第110页。

(58) 温寿泉、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9，第421-422页。但当时不久就有“陕县敌军约近一师，刻以山西军务长景梅九名义密印安民布告”（马洪电阎锡山，1925年12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1964页。按马洪似为茅津县知事，确否待考）；旋有属于国民二军的樊钟秀大举攻晋，而景梅九、樊钟秀亦皆老“民党”，故阎锡山此时对这类历史联系不能有太多的实际考虑。另一方面，尽管国民二、三军的主官皆出身同盟会，理论上应与南方更亲近，但在苏俄眼里（或许也反映部分国民党人的观念），却是比一军更不可靠的部队。莫斯科一度相当担心广东方面北伐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驻华武官处的特里福诺夫曾问加拉罕，“一旦广东军队向北推进”，他是否确信国民“第二军和第一军不会进行抵抗”？加拉罕认为，当有着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和张作霖时，至少国民一军和广东军队“会找到共同语言并创造一些因素和条件，使他们能够避免发生这样的冲突”。但北伐军与国民二、三军相遇，则“可能发生误会”，也许需要像解除许崇智粤军武装那样将二、三军缴械。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第90页。

(59) 按冯玉祥也暗中与孙传芳联络，赞成其反奉，然自己不出兵，参见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04页。

(6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88-90页。

(61)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第360页。

(62)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90、99页。冯玉祥虽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双方的合作却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实即因打李此举。这一点冯玉祥自己也承认，他后来也说这次进攻友军是“反友为敌，以私演公，开出了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41页，转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15-116页，关于冯玉祥不援助郭松龄而打李景林，参见《国民军史》第108-115页。

(63) 郭松龄反奉一事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过去一般多注意日本在此次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其实郭松龄反奉大概也与苏俄有关，据北伐前夕被任命为驻日使馆代办的白思多夫斯基说，远东司长梅尔尼科夫1926年4月告诉他，郭松龄的妻子是哈尔滨贸易学院（俄办？）的学生，加拉罕曾许诺支持郭松龄。后郭军事吃紧时加拉罕要求苏俄出兵齐齐哈尔以逐吴振中（音）回沈阳，得到梅尔尼科夫支持，因政治局怕触怒日本而不批准。张作霖逮捕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时，加拉罕又要求苏俄出兵哈尔滨，并得到伏罗希洛夫支持，兵已发至中苏边境，但齐切林在征询了驻日大使意见后，估计日本会立即占领长春并派兵至哈尔滨，政治局乃决定撤军。参见Grigory Bessedovsky，*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Tr．，by Mathew Norgate，Reprint ed．，Westport，Conn．：Hyperion Press，1977，pp．123-124．到1926年5月，驻日大使卡普（Kopp）也告诉白氏，苏俄支持了郭松龄反奉及其与冯玉祥的联合，参见《国民军史》，第134-135页。

(64) 曹之杰：《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21-23页。

(65) 孙焕崙（道尹）电阎锡山，梅焯敏参谋电阎锡山，1925年10月21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2452页。

(66) 即使不从战略角度而仅从地盘角度看，由于郭松龄失败后其残部魏益三军转为国民四军，必须有地方安置，冯玉祥反不得不将保定一带让给魏益三部，使原已不够的地盘更加吃紧。且魏部无论在对直对奉的战事中都未必能起实际作用，也未必愿意卖力拼命。

(67) 冯的战略眼光似较其一军部属为高，盖国民军即将面临各路围攻，若此时多顾一军利益，必影响其整体团结，难以共同对敌。退而言之，此时直隶乃众矢之的，直接面临各军之锋矢，能否守得住还是个问题。真能稳

据，孙岳也不能不倾其全力，则国民一军很有可能从甘肃入据陕西；若战而不胜，孙岳本曾隶属于直系，似较易解决善后问题，受损失的也是国民三军。三军的何遂曾说，他和孙岳早就认为直隶、河南皆四战之地，乃各方争夺的焦点，三军实力不足以据之，而“甘肃以西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易于发展，故拟定了向西北发展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与冯玉祥自己的西北计划冲突，盖“冯把甘肃当作他发展势力的地区”，反对三军向西北扩张，故力促孙岳重返直隶。后来国民二、三军皆瓦解，结果使“国民军变作冯玉祥的西北军”。参见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73-75页。

(68)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09页。并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10-114、125-131页。

(69) 据说吴佩孚和张作霖由敌手变为同盟并全力灭冯，即因吴从郭松龄联冯反奉这一“叛乱相寻”现象看出反叛上司已成北洋趋势，乃提出与奉方对反叛者“共张挞伐”。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1971年，第83页。李剑农也有类似记载，参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73页。

(70) 阎锡山电汉口曹步章，1925年12月6日、1925年12月9日，阎锡山电贾济川（镇嵩军师长，时在运城），1925年12月9日，汉口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65、1967-1968、1974、2000-2001页。当然，萧虽不欲实际支持作战，大概仍希望吴能离鄂北上，免除其对湖北的辖制，故其对吴之北向作战，恐怕是取一种“半肯半不肯”的态度。

(71) 汉口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2000-2001页。

(72)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434页。

(73)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52-167页。这段时间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的谈判和文电往来以及直奉晋三方自身的文电往来未必仅限于当时当下的实际利益，更揭示出各“军阀”对实际政治军事及更一般的政治军事“规则”的一些常规认知，还可深入挖掘，特别是两方文电中对第三方的描述（因“第三方”随时在转换中，可资对比处极多），非常有提示性。

(74) 张之江等通电，1926年3月20日，原载《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45页。

(75) 阎锡山电吴佩孚，1926年4月13日、4月1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323、334页。按一旦国民军与直系或奉系和解，则热河、直隶、河南皆将归奉、直，山西靠近察、绥和陕西的地盘很可能成为各方与国民军妥协的筹码，晋阎大概也了解这一可能，故如此积极也。

(76)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5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206页。按钱氏的报告中也说到“直方甚不满意”，但此“直方”或齐个人意见，盖吴佩孚正有类似主张，而齐则已无兵力，自多着眼于“政治”也。

(77) 《西北将领之宣言》，《申报》，1926年5月20日，第4版。

(78) 苏联方面认为国民军进攻山西有物质利益或地盘方面的动机，因为从战略上言，“向山西进军只会促进中国反动势力的结合”，加拉罕曾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劝说冯玉祥的外交代表唐悦良，希望能“放弃这次进攻”。但“丧失富饶都城地区的国民军的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迫使它不顾各种劝告”仍然进军山西。参见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30页。按直奉双方皆有主张与国民军妥协的一派，国民军攻晋有可能得到其默许，徐新六1926年6月报告说：“西北军事当有一番表示，终恐仍归于和。大概大同入于西北之手，京绥在握，暂行实做‘西北’二字，对方恐亦只能就此了事。”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卷10，件5，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按此系徐从上海到天津搜集消息后的报告，或者更多反映与孙传芳较接近的主张。

(79) 参见《国闻周报》第13卷12-31期关于这段时间战局的综述，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32-345页；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75-181页。

(80)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203-249页；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1008-1015页。

(81) 如冯部的凌勉之和孙桐萱在后来回忆中原大战时，对已成国民革命军一部分的冯玉祥部，皆以“西北军”称之。参见凌勉之：《中原大战之前的冯玉祥》、孙桐萱：《韩复榘叛冯投蒋纪略》，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34-140、141-150页。

(82) 《申报》，1922年2月26日、12月21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530、696页。

(83) 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即

有人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转载于《北洋军阀》第5卷，第300页）。1925年的"五卅事件"向国人提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存在，本有助于正在中国大力鼓吹反帝的苏俄；但苏俄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强调反帝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北方舆论对国民党和国民军的联俄予以较前更多的关注。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1-288页。据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观察，反赤是在1925年春兴起的，他注意到反赤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几个月前由帝国主义者、军阀和部分中国民族主义分子（买办分子、国民党右派和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青年）发起的大规模反赤色运动现在几乎销声匿迹。"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45页。非常有意思的是，具有阶级分析思想武器的维经斯基把"买办分子"算作"中国民族主义分子"的一部分，而一般中国人眼中，买办显然是个最不具民族主义的社群。

(84) 《李景林讨冯通电》，1925年12月4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19-320页。

(85) 《郑孝胥日记》第4册，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75页，李电录在第2075-2076页。

(86) 孙岳并对苏俄顾问允诺，"等我们打败了敌人，我们在北京举行一个盛大宴会，庆贺我们的友谊"。有意思的是，河南督军岳维峻甚至对苏俄顾问说，"等战事结束以后，俄国顾问就能够开展工作"。这是单纯的往后推托还是真认为俄国人将来在非军事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待考；但他们都不愿张扬其与苏俄的关系，认为这会招致攻击的意思则非常明显。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71、104-105页。

(87) 《申报》，1926年5月12日，5版。这是该报引东方社电，机构名原译为"赤化讨伐各军联合办事处"，与当时通行中文不顺，故改。按《申报》本身在此前后并无相关报道，疑此机构即使存在，也最多是联络性质，不具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88) 张作霖通令（大意），1926年1月25日，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400页。

(89) 《晨报》，1926年3月26、27日，均2版。按段祺瑞在1925年12月

底已被迫改组临时执政府，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负责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而其善后会议系统中有军事善后委员会，王士珍即任职其间，这一委员会也成为这段时间主和的主要推动机关。

(90) 吴佩孚电阎锡山，1926年4月4日支，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09页。

(91) 关于这段时间北京政局的演变，胡霖（政之）当时有较仔细的描述，参见政之：《北京政局蜕嬗记》，原刊《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43-368页。

(92) 关于这方面的背景及一些具体运作，参见本书第一、第四两章。据说吴佩孚本不赞成曹贿选，吴再起时已被释放的曹有意复位，吴却要求其主动辞职，王士珍即指出，“这个门楼虽然破旧，可是，一经拆除，再想盖起来就不容易了”（李炳之：《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68页）。按王有识见，曹锟任总统虽出于贿选，至少名义上是选举出的总统，多少有其象征意义。此后直到北伐统一，北京政府再无总统名目。到1927年6月，张作霖开府北京，任海陆军大元帅。郑孝胥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149页。

(93)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149页；李庆芳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165页。关于当时的“护法”与“护宪”之争，还有许多可深入探索之处，其中也包括明显的国际影响，法国因“金佛郎案”、日本因西原借款等案，皆牵涉到实际利益，故不欲倾向直系的政府上台。参见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丁文江档案，卷10，件5。

(94)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7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64页。

(95)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6页。

(96) 《申报》，1926年1月3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9页。

(97) 章太炎这段时间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即非常强调“反赤”的重要性和优先性，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8-295页。

(98)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

（1978年1期），第146页。

(99) “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6-848页。按太炎所谓“政府即近畿军阀之差遣”其实是稍晚近的事，至少当在徐世昌被迫退位之后。关于在中华民国名义下可以“割据”一语，部分也可视为太炎的雄辩之辞，实际他后来也劝孙传芳应回避割据之名。

(100)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4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8页。

(101) 致吴佩孚电，1926年5月9日，致颜惠庆电，1926年5月18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66、870页。

(102)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3-203页。

(103)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此时仍将国民军视为“军阀”的一部分，实际上他对国民军的正式表态是否代表其“衷心”尚持怀疑态度。

(104) 吴佩孚与陈炯明的“联合”究竟到何种程度，还可以深入探讨。陈炯明特别提倡联省自治，而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两人在政治观念上有根本的冲突。陈炯明在1924年5月对吴稚晖说，当时的军事形势，国民党“本来具有与敌对抗之局势及其能力（即反直派大联合，最少限度亦以西南奉浙为主干）。惜孙先生不取，必以广州局面而当之，不独徒劳无成，行且同归于尽。孙先生及其谋者如果觉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陈炯明答吴敬恒书，1924年5月13日，收入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7-1158页）。似乎三角同盟事本陈所提出，孙初不赞成，后来才接受。无论如何，陈炯明此时仍提倡“反直派大联合”则不误。

(105)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118页。

(106) 从阎锡山档案中的许多文电看，段孙妥协当时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已逝世，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不少人的个人态度似也更不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关于“善后会议”请参见本卷第二章，该章论述已有明显的突破，似仍有可深入发掘的余地。

(107) 详后，并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1、214-215页。

(108)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324-328页。按：孙中山重视军校学生的一个例证是，当时广州大总统警卫团的三位营长薛岳、叶挺和张发奎皆四校同学。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3页。

(109)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二），第333页；《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6页。

(11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0-191页。

(111) 他将新加入的贵州袁祖铭部也算入此派之中。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1页。

(112)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8页。李宗黄注意到，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就较少任命四校同学。这四个军并非北伐主力，战斗力较弱且组织方式也相对偏旧，可知当时北伐军内部的新旧之分也是很明显的。

(113) 这主要是指发展倾向而言，即南方比过去呈现出更集中的态势，而北方则明显较前更趋于分裂。其实南方内部自不免矛盾重重，而北方也不乏“集中”的因素。从表面看，北方形成了各辖有数省地盘的几大势力集团，且各自的兵力多胜过整合后的南方全部；然奉系甫经郭松龄反叛的打击，直系吴佩孚虽受拥戴而号令难行，新兴的孙传芳部看起来最具朝气，惟其外来征服者的“暴发户”意味太明显，辖区内的地方军队与其貌合神离，后来成为致其败落的重要因素。重要的是，北方此时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名号，理论上正应号令行于天下，若号令不行则罅漏立显；而南方虽也自诩正统（许多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论述实际也如此叙说），时人一般仍多视其为“造反”者，地位完全不同，其整合的成功处反易为人所见。同样，我们不能据国民党的后见之明把冯玉祥部视为“南方”势力之一部，时人当然已注意到“南北二赤”的共性，然冯部固北洋正宗（其正统性还超过奉系），也一直被视为“北方”之一部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直系内一直有“收回”冯部的主张）。可以说，冯玉祥部对北洋体系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大战正是北方“分裂”最明显的表征。

(114) 陈训正描述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说：那时广东不仅有正宗的革命党，“凡富有革命性或与革命领袖有渊源之军队，亦相率而来此土；甚至假

革命反革命之部队，亦冀暂图生存，徐谋发展，揭革命之旗帜而来，混迹其间。以故同一区域，同一革命队伍，乃竟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及鄂军、豫军等等不同之旗帜”（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卷二，第35页）。这一概括已相当形象，实际情形还更复杂，在这些以地域命名的客军中，来自同一地域者也常有不同系统不相统辖的军队，如驻粤湘军便有程潜系和谭延闿系两部。后唐生智加入则北伐军中湘军凡三部，各立一军，因唐拒绝程、谭部入湘，乃不得不令此二军指向江西。

(115) 这一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来在“西南”中最活跃也最具军事实力的云南因唐继尧、顾品珍内部争权之战而实力大损；在联省自治运动兴盛而“西南”各省纷纷宣布“自治”时，云南也曾有类似宣告，此虽无实质性的约束力量，多少也使其干预他省事务不那么名正言顺；当然最关键的转折还是1925年的滇桂之战。关于联省自治，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版；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116) 参见姚大慈：《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45-156页；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113页；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7-164页。

(117)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第23页。

(118)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时在湖南任记者的陶菊隐也回忆说，“当时论者认为，谭派军人多为师长或镇守使级”，而“赵派军人多为旅团长级”。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5页。

(119)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第7期（1996年6月），第89页。

(120)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赵恒惕先生档案”，第24-25页。

(121) 本段与下段，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8-59页；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89-91、103页。

(122) 按唐生智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其军队号称“大慈大悲军队”，有“佛化省政府”、“佛化省党部”之说，曾引起教育会和通俗报馆等

机构的反弹，此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9-62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卷三，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第1589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2月27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

(123)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91页。

(124) 这一宣传大致是成功的，《申报》1926年3月5日9版一篇署名铜驼的广州通信（2月24日）就说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陶菊隐即说当时“我们在长沙所闻，叶琪确系唐生智的秘密代表”。参其《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8页注二。但叶琪的访问和所谓梧州会谈都比李宗仁所述更为复杂，后面还会论及。

(125)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276-284、290-292页。李宗仁并说，复起于湖北的吴佩孚对唐生智讨赵也持默许态度。以蒋百里与唐的特殊关系，当时又任职吴之总部，应能撮合此事。关于唐生智秘派代表至粤，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620页。

(126) 《赵恒惕出走前之湘局》（3月10日长沙通信），《申报》，1926年3月15日，9版；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9-113页。不过，蔡和森则认为，国民党提出废除省宪的口号不但没有帮助唐生智，反而可能将唐“推向反动派方面”。参见蔡和森：《在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日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0页。

(127)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66-7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92-295页。关于白崇禧、陈铭枢在长沙的活动，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版，第1-9页；《各公团欢迎陈、白两代表盛况》，《大公报》（长沙），1926年3月29日，第6版。

(128)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165-272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63页；尹承纲等人的多篇回忆文章，收入《新桂系纪实》（《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第18-132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63-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35-105页；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43-63；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p．284-285．

(129) 蒋介石在1925年4月27日即认为，由粤入桂与唐继尧军作战的滇军范石生部将“全军覆没。唐可能取胜。范军残部有的将投诚唐继尧，有的将四处逃散。李、黄二将军的队伍，其命运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士兵有的将解甲归田，有的将加入土匪群”。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径引书名），第670页。

(130)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35-37、49-50页；陈雄：《新桂系形成时期亲历忆述》，《新桂系纪实》上册，第95-96页。

(131) 尽管黄绍竑已在1924年11月亲赴广州参加国民党，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在1925年初仍视其为军阀，他的军事报告说，“广西东部为两个军阀所瓜分，一个在西江以东，一个在西江以西，双方对广州都持友好中立态度”。这“两个军阀”即是李宗仁和黄绍竑。加伦：《军事政治形势》，1925年1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36页。

(132)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78页。

(133)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新桂系纪实》上册，第18-20页。

(134)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7页。

(135) 邓演达致孙中山，1923年7月29日，转引自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54页。

(136)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5年4月底广东国民党核心圈子的讨论中，老同盟会员熊克武率领川军入粤被认为是唐继尧图粤的第五纵队。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78-679页。

(137)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58-261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45-47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67-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

桂系史》第1卷，第106-113页。鲍罗廷充分肯定了广西军在南征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广西援助，“结局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凄惨的”。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1页。

(138)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1-57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289页。

(139)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62页。

(140) 曾济宽当时即说：“我曾记得我们做留学生的时代，也曾听见熊克武、余际唐这一般忘〔志？〕愿陆海军的人，抱匡时救国之志，加入推倒满清之同盟会。曾几何时，自许为革命军人之熊、余，遂以反革命之罪名见弃于国民。即如今日大多数之军阀，曷尝不是当日高唱爱国的志士，何前后竟判若两人！”曾济宽：《读过了日本东京寄来一封信后的感想》，《国民革命汇刊》，孙文主义学会编，第1卷（1926年1月），第99页。曾氏的出发点虽不同，其所云却表明这些人本是“革命军人”，不过最近才成为“见弃于国民”的“反革命”。

(141) 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员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以下简作蒋中正档案），档号2010．10/4450．01-001-1。

(142) 本段与下段，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1-299页。

(143)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233-252页（下段引文在第234-235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125-292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70-425页。

(144) 《蒋介石招学生军之内幕》，《华字日报》1925年3月23日，转引自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第888-889页。

(145) 按东征一役，黄埔生（一至三期）2327人中战死者即达217人，约近十分之一。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11页。

(146) 本段与下段，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pp．285-287．

(147) 本段与下段，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69-691页。

(148) 过去国民党及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叙述多称杨、刘“叛乱”，实际上讨伐杨、刘的决策早在4月初已制定，实在杨、刘有“叛乱阴谋”之前，此役更多可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和权势转移。蒋介石当时说：打倒杨、刘，“岂止为他们把守地盘，把持财政，最要的原因，他最大的罪恶，还是因为他们联络北方军阀段祺瑞、勾结云南土酋唐继尧，还要与香港政府勾通，甘心做卖国奴，服从香港帝国主义者命令来推翻我们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贾伯涛编《蒋中正先生演说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版，第100-101页。其实主要是因为杨、刘不听命于新政权，刘震寰也有配合唐继尧夺权之意，再次则确为把守地盘和把持财政。其余两项是今日多数史学论著关于此事的基调，然而香港不过为这些人开会的地点，联段则孙中山比杨、刘有过之而无不及，谈不上多大“罪恶”。

(149)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08-110页。按鲍罗廷是个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他虽然认为实行“广东人的广东”这一口号是“堕落”，但并不影响他利用这一口号来吸引粤军参与打击杨、刘（参见前引加伦的叙述）。

(150) 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均收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8、242页。

(151) 参见《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14号的各项文件，收入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1969年，第12册，第6549-6748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298-301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29-451页。

(152) 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96页；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112页。按李宗黄时任滇军范石生部参谋长，留守广州。因范石生部主力在广西参与对抗唐继尧之战，李部本身未受打击，但李还是在事变后随即避难上海。毛思诚所编书也记载了类似情形，黄埔军本也结红领带，因避民怨株连乃不得不取消。蒋介石对此甚为愤怒，与宋希濂基本以赞扬的口吻叙述此事态度相当不同，他

或许已感觉到广东地方意识同样可以延伸到针对黄埔军。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51页。

(153) 关于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组建的一系列相关法令均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号（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秘书处编、文官处印；并参见陈公博：《苦笑录》，李锷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22-29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41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301-303页。

(154) 陈独秀在解释广州讨平杨、刘之战并非“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的“误解”时举例说，这次“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1925年7月，原载《向导》，收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889页）。此语实已明确了黄埔军的“客军”性质。

(155) 本段与下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08-116页，下段引文在第111页。

(156) 尽管廖仲恺亦粤籍，但他此时更多代表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利益，亦即在“土客矛盾”中站在“客”方一边。

(157) 关于土客矛盾及解决粤军，并参见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98-104页。

(158) 北伐时期粤军出身的名将如邓演达、陈铭枢、张发奎、叶挺、薛岳等在东征时为旅团长级骨干，然皆未见于丁文江叙述到1924年底的《广东军事纪》（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第431-458页）。

(159) 最缺乏“革命”性的李福林部从未得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信任，从1925年讨伐杨、刘之前开始，长期被列入拟缴械消除的名单之中，然因其实力太有限，每次都因重要性不足而暂予保留，直到北伐仍存在。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1925年9月（罗按：据内容看，写作时间应为6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97-20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同前书上册，第109页。

(160) 前引广西、湖南两省军人的回忆录基本是一开始就叙述旧军队与军校生的矛盾，但党军体系的军人则较少述及其与四校的关联（其实蒋介石

也有保定渊源，而早期党军高级将领也多四校同学），或因北伐及其后具有“天子门生”认同的黄埔系与其他系统军人之间的持续矛盾致使其历史记忆的无意识压抑，当然也不排除有意不述。

(161) 具体有多大作用尚待考，盖作为东征主力之一的粤军似较少得到苏俄顾问的具体指导，但整体的作战部署有苏俄顾问参与是无疑的。孙科在很多年后认为，当年苏俄援助的顾问（咨询参谋）作用超过其军火及货币的物质支援（这是孙科在1966年一次采访中对研究北伐的美国学者朱丹所说，参见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p．302，note 6）．

(162) 尽管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当时言说中和后来的研究中都是非常习见的标签，但在当年苏俄、中共和国民党本身三方的认知中，包括领袖层次在内的“左派”和“右派”的人员构成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在承认其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使用这类术语尚须谨慎。同时还要认识到，那时的“左”和“右”本身就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即使在特定一方的认知中，通常“左派”和“右派”的内部也都还可有进一步的左右之分。

(163)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97-98页。

(164) 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那时也拟对时局“取消极态度”而“暂不过问”。参见孙中山致孙科、汪兆铭致梁士诒，均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第22页。

(165) 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33-238页。

(166) 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20世纪20年代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强而数量有限，工农人数多而参与意识不甚强）。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237页。

(167) 陈独秀当时就注意到，革命阵营内对讨伐杨、刘之战有不少“误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持此主张者并进而“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

府讨伐杨、刘”。他解释说，“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杨、刘等“在内的敌人”却“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果“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只有平定杨、刘，“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故此时说“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这样费尽周折地陈述“攘外必先安内”，恰凸显出“一致对外”口号在那时造成的压力。参见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89-891页。

(168) 蒋介石对此有充分而清晰的认识，他在1926年初论联俄的意义说，“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故“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由于“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故联俄就是“联合世界革命党”。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第13-14页。

(169)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00页。

(170) 关于中山舰事件，参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5月，《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10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58页；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24页；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0-5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57-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489-526页。相关专题论文有Tien-wei Wu（吴天威），*Chiang Kai-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 PD'etat of 1926*，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7（May 1968），pp．585-602；蒋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第159-184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2期；裴京汉：《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和汪精卫出洋的原因》，《民国研究》第4辑（1998年6月）；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杨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6期；相关著作较多，主要有Leang-Li T'ang，*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E．P．Dutton，

1930，pp．241-249；Harold R．Iss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91-96；Chung-gi Kwei，*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1922-1949*，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0，pp．37-42．本卷三章也从国共合作的角度述及此事，可以参阅。

(171) 黄埔军和粤军之间的“土客矛盾”一直延续下去，1927年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粤方委员”支持张发奎所致，此后1930年蒋介石在南京扣留李济深解除其兵权，终造成李济深在1933年末联合粤籍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以及1936年陈济棠反蒋的两广事件，多少都与此相关。这一矛盾直到抗战爆发才在外患的压力下缓解，但日渐边缘化的粤军那不平之气仍未熄灭，可参见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年。

(172)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晨报》和《时报》的报道相对近真，《申报》的则参差不齐。当年沪报的外埠通讯员各色人等都有，有的确实能获悉当地内情，有的不过据道听途说以为谋生之计，且某地通讯员未必即驻当地，如驻汉口者即可能兼顾湖南、四川（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27-28页），故所报消息未必准确。如《申报》一位署名铜驼的虽专言广东事，其人似乎并不在广州，语多隔膜，他于3月21日首次报道中山舰事件时仍不清楚蒋介石同时针对俄人，到3月25日的通信虽已改述为左派和右派之争，仍说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参见《广州政局骤变之内幕》（铜驼3月21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8日，7版；《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铜驼3月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10版。但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至少可告诉我们当时传言如何，这也同样重要。同时，《申报》也有一些通讯员的报道大致准确，基本经得起今日后见之明的检验。

(173) 沈雁冰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对蒋持强硬态度，其依据之一即第二至第五军“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2版，第342页。从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摘录的蒋日记看，蒋对李济深其人印象相当不佳：1926年2月21日，与李济深谈两广统一事，“客去，惝恍殊甚。既而曰：‘人惟在于自强。安乐难共，乃人情之常，吾何怪彼哉’”（按次日李济深就被正式任命为参谋总长，这次很可能谈及此事）。同年4月4日，“黄绍竑、李济深来辞行。公谓：用人难，察言尤难。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察狡诈人之言更难，吾为之惧”。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0-621、642

页。按此句原稿为“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听狡诈人之言更宜注意，否则未有不为所败者，吾为此惧”。则原稿对李之猜忌更加明显，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下径引书名，按本书是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稿本，以下凡内容相同者仍引正式出版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页。

(174) 蒋介石：《黄埔同学会成立纪念训话》，1926年6月27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第123-124页。

(175) 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有多次述及蒋的快速窜升以及他人的敌视态度，参见Chen Che-yu，*My Memoirs*，*collected in the Chang Hsin-hai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pp．259-260，278-279，294-296．这一回忆录有中译本，名为《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6年，相应内容在第167、179、191-193页）。该书“出版说明”称此书是从得自陈洁如女儿的英文原本全文译出，然前面的中文书名却很可能是译者妄加，中译本的内容与我所用的英文本偶有不甚同处，不排除是另一文本，但有些几乎可肯定是有意的（也许是善意的）修改，如回忆录中将邓演达和徐谦误忆为黄埔学生（第258-259页），中译本将students译为“助手”，并将young men径译为“人”而略去“年轻”二字（中译本第165页），译者大概是希望这样更接近“历史真相”，却反使“回忆”本身异化了。

(176) 在两广统一的谈判中，原定广西组建两个军，后改为仅组一军，部分或亦因“蒋李交恶”，广西力量大则意味着李的后盾强；前之谈判无蒋参与，而后一次谈判则蒋的影响非常明显。参见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4页。

(177) 罗加乔夫稍后认为，“把从军队手中接管的整个财政机关移交和集中到财政部手里”这一措施受到商界的欢迎，并以对广州政府“给予全面的支持”作为回报。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5页。但此举显然使新获得“财权”的李济深等军人极为不满。

(178) 鲍罗廷后来发现，蒋介石削弱党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军官的支持，因为“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对蒋介石的行动感到“非常高兴”。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1-282页。

(179) 又如实行军民分治，很可能就反映先后主持广州市政的伍朝枢和孙科支持之意，仍与蒋无关。所有这些矛盾参见执中：《粤省蒋李交恶之因果》，《晨报》，1926年3月25日（3月12日稿）；执中：《蒋李交哄与粤局》，《晨报》，1926年3月28日（3月15日稿），均第5版；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在军政、民政、财政统一等“革命之形势进展”下，“失败军人和无聊政客”等反革命派深感不幸，乃制造蒋李交恶的谣言以“挑拨离间”。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2版。可知上述矛盾的主要渊源正是军、政、财的“统一”。

(180)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

(181)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3-234页。按参谋团改组时撤换了过去直接担任长官的俄人，蒋介石将此作为他主导的一项措施记录在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9页），但从蒋、李竞争看实际获利的是李济深。在中俄关系方面，由于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以顾问身份掌握着总部各部门，苏俄方面对此无强烈反应。并参见执中：《粤军界四头争雄》，《晨报》，1926年3月18日（3月4日稿），第5版。

(182) 《粤省北伐声中之暗潮》，《申报》，1926年3月16日（木庵3月9日通信），第6版。

(183) 《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版。

(184) 蒋介石对其辞职未得到他所期望的关注和反应耿耿于怀，且辞职后身份尴尬，倘不管事非其所愿，继续管事又似乎不那么名正言顺。他在3月9日即发现，“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页）。稍后在其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再次指责汪对其辞职“滞迟延搁，既不批准，使弟不能辞责引退；而又留中不发，使弟又不能负责整理。卒之军纪废弛，整顿无方，以致三月二十日之事，一发而不可收拾”。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185) 本段与下段，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21页；《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

版；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79-81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488页。

(186) 关于两广统一议决事项，参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124号（1926年3月19日），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7号，第23-25页。

(187) 关于王懋功与何应钦相关而不稳等说法，可参见《时报》1926年3月12日“本馆专电”之香港3月9日电，第1版；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3月10日铜驼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第9版。

(188) 蒋介石在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举例十项指责汪精卫受季山嘉影响而不能自主，其中两项涉及拉拢王懋功叛蒋，一是预留第七军长一缺以为报酬，一是更改军事委员会议决的经费预算，从黄埔军校经费中减去三万元而拨给第二师，当蒋提出质问时汪则顾左右而言他。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稍后在对第一军党代表的演说中，蒋又不指名地重复了这两项指责。参见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1926年4月20日，收入《蒋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论》，北京民社1926年版，第20-22页。

(189) 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60页。

(190) 鲍罗廷即注意到孙文主义学会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与一些团、营长相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王懋功自己也说，孙文主义学会曾劝说他入会，王未允，该会“继则散布非学会份子不能指挥第二师之言”，与其极为对立。参见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60页。

(19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1-622页。

(192)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08页。

(193) 按据蒋日记，他在3月19日确曾“准备回汕休养”，半路上想到“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又决定回去采取镇压行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这说明

蒋介石大致信任何应钦，但在路上想到“容身无地”而折返，仍有些耐人寻味。

(194) 勃拉戈达托夫考察国民二军河南军校时发现，学员们进行军事训练所依据的规章还是辛亥革命前制定的，“很明显，这些规章都是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规章翻译过来的，因此，它们没有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83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中国军校训练的确特别受日本影响，而日本基本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也就缺少直接的“经验”，更多是间接获得欧洲新的军事观念。恰好中国此后较多依赖自身的军校，于是连间接的新军事观念也接受较少。遍观当年苏俄军事顾问的回忆录，一个最显著的观点即中国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式基本仍受日本过去的影响，在战术上已落后于欧洲；相反，在改造沙俄旧军队基础上组建的苏联红军则充分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型战术，故苏俄顾问所带来的训练和作战方式的确更“先进”。

(195) 鲍罗廷1926年2月说，放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后，广州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16页；关于鲍罗廷把李济深说成是吴铁城，参见同一文件，第113、141页。按鲍罗廷等对蒋的认知不能说是“受蒙蔽”，蒋那时思想上确实左倾，1926年3月初，当邓演达表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吾军惟有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时，蒋“亦以为其判断之有所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4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页）。另外，当时为争取苏俄信任（其潜在因素当然包括俄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革命性”方面竞争渐成常态。苏俄的穆辛即担心“极左倾向不仅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而且也可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人士中存在”，后者实际上“多多少少已有表现”。他观察到，“国民党左派首领经常热衷于玩弄左的和极左的革命词藻，似乎试图以此来表明自己在‘革命性’上超过中国共产党”。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3页。其实岂止“国民党左派”如此，一般认知中的“右派”胡汉民在莫斯科主动提出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更是显例。

(196) 可以认为鲍罗廷在1926年初的北上（原拟回国述职，后因中山舰事件返回广东）是为季山嘉所迫，后者在1926年1月自称近来与鲍罗廷“很少

争吵，因为他在我的强大攻势下认输了，基本不再干预我的工作”。但他仍以为鲍罗廷能力已尽，“以后会跟不上事态和形势的发展”，主张将其撤换。古比雪夫（季山嘉）：《给叶戈罗夫的信》，1926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5-16页。而鲍罗廷自己则拟回国寻求支持，他强调，尽管当时的实际工作的确已军事为主，但还是应该有“一个人为全部工作负责”。他在行前明确对汪精卫保证，谁是苏俄在粤领导这个问题会在一个月后得到比较确定的解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2-144页。按苏俄在粤顾问的内斗牵涉至为宽广，非本文所能详述。它首先与苏联驻华使馆中加拉罕与武官处之间、再往上则更涉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念歧异。大体而言，尽管加拉罕和鲍罗廷也有不少矛盾，他们仍共同代表着一个从“世界革命”即国际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取向，其一个代表性的表述即加拉罕指出的，当土耳其的凯末尔枪杀共产党人时，苏联仍对其提供物质援助，因为凯末尔正在反帝；也应该以同一思路来处理中国问题（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69-70页）。根据这一思路，广东不如北方重要，国民革命军不如国民军重要。这一取向为苏共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首肯（虽然布勃诺夫尽量采纳了从使馆武官处到驻粤军事顾问团的主张），也大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这是莫斯科一再反对广东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北伐非常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而在国民军打败后又可能妨碍苏联正与张作霖进行的谈判（这可以从前书整个“第一部分”的一系列文件中看出，参见第13-297页）。关于莫斯科反对北伐，并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74-78页。

(197) 过去俄援基本为黄埔军所垄断，蒋介石明显不愿他军多得。斯切潘诺夫曾说季山嘉负责时苏俄曾秘密帮助云南、广西，并保守秘密不令蒋介石知，然终为蒋所悉，并以此责备季山嘉反对北伐。按此若指杨、刘，时间稍早，且与其他文献所述冲突，疑翻译有误，大概是指对朱培德军等帮助较多，待考。参见斯切潘诺夫：《关于三二〇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98) 《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铜驼3月10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9版；《晨报》，1926年3月12日、3月17日，均第2版。

(199) 最近一次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52页。

(200) 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社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第2版，相关报道在第3版，李之通电全文载该报1926年3月15日3版。并参见《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第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粤省军界暗潮续闻》（木庵3月11日通信）、《粤省军界暗潮又趋和缓》（毅庐3月15日通信及铜驼未署日期之通信），《申报》，1926年3月18、21日，均第9版。陈铭枢可能叛李之事又是那时南北皆流行“叛上”行为模式的一例，不论陈是否有意，当事人及解读时局者多会有此想。此事当时流传较广，俄人勃拉戈达托夫也提到蒋介石试图拉拢“右派”陈铭枢。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0页。

(201) 如前所述，黄埔军和粤军时隐时显的矛盾至少持续到抗战爆发。

(202) 部分由于“世界革命”直接表现在广东一隅，当时广东政治的“国际化”已深入不少人的思维之中。从蒋介石在那段时间的日记、演讲以及他人对蒋的观察可以看到，他相当关注法国大革命和不久前的土耳其革命，不时借助这两次外国革命的现象对比和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详另文。

(203)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

(204)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0-541页。据当时任海军民生舰舰长的舒宗鎏说，该舰在中山舰事件前确曾受命到黄埔将大宗苏俄援助的军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枝和俄式重机枪二百挺）搬运上舰，蒋介石亲往察看，并指示无其本人命令不得交给任何人。这大概即此前蒋与邓演达所议之事。参见覃异之：《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54-55页。

(205)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7日、5日、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8页。

(206) 曾庆榴是少数持不同看法者，他认为“这类传单不可能是中共方面散发的”。参见其《广州国民政府》，第343-344页。

(207) 王懋功在1926年3月给张静江的信中说，孙文主义学会曾拟鼓动军人武装游行，反对国民党二大选出不少中共党人，同时“广州市内发现倒蒋口号”。时东征刚结束，蒋尚未回到广州，王以师长兼代卫戍司令部事，乃奉蒋、汪命采取“严重制裁之手段，解此危难”（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59页）。从王信

看，此“倒蒋口号”当然是指责蒋左倾，大致应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按：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前活动确实非常积极，尤其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但该学会起初本未必具有反共性质，与其对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也不是纯“左派”组织。当时情形相当复杂，以黄埔学生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本是面向驻粤各军的讲武堂学生，原来所针对的大概是“四校同学会”那样的组织（后来成立的黄埔同学会也因实际停办的四校同学会试图复起而不得不解散），蒋介石自己最初也很支持，后来黄埔生中又有孙文主义学会产生，鲍罗廷说其一个主要领导人（编者注说可能是贺衷寒）曾八次申请加入共产党，皆遭拒绝。鲍罗廷向中共询问原因，也没有获得令他满意的答复。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如果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会对这个学会产生另一种影响，然而他却被拒之门外”。可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演变成左右冲突有一个过程。参见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页；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69、18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

(208)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09)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

(210)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p．40．又朱丹相当看重省港罢工在国共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共视罢工委员会为基地以与国民党争，故这是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pp．35-39）。此说或无意中受索克思影响，后者认为十万有组织、有政治理念并被中共领导的工人已成为广东具有控制性的政治力量，中共常利用此力量来操纵广州政府（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p．334-335）。但目前所见中共领导人关于此事件的论述，似未将省港罢工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后之革命史史家亦然。

(211) 对蒋来说威胁更大的恐怕仍是各军不稳的传闻，主要的当然是李济深部的敌视传单，同时也包括李福林和吴铁城等粤军拟以武力支持反赤，以及广西李、黄屯兵梧州阴助李济深等（参见前引京沪粤各报的通讯）；与作为“北方人”的黄埔军相比，所有这些军队都带有本土性，这样的一致性在“土客矛盾”尖锐化时更会得到凸显。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黄埔军内部

的“统一”就更为急迫了。

(212) 陈公博：《苦笑录》，第77-78页。按邹鲁之说的核心是关于蒋介石访俄事，此事现有蒋介石日记及其致汪精卫书等众多材料，可证明邹说不确，至少漏洞颇多。

(213) 《广州市之弭谣办法》（铜驼3月18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6日，第9版；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5页。

(214)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关于“利用教育长陷害”一事尚不清楚，既存研究中山舰事件各家对此也语焉不详，待考。

(215) 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不知蒋介石是否熟知苏联对凯末尔的政策是即使杀共产党人也要支持，若已知，则其所为正可检验苏俄是否对中国也如此；若不知，则他实在是“歪打正着”，后来的发展表明，苏俄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样政策。

(216) 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连载，我看到的是作者的原稿，谨向杨先生致谢。

(217) 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前引杨天石、裴京汉和杨奎松的研究。

(218) 陈洁如说事前陈璧君多次打电话确有其事，使蒋介石感到有阴谋。Chen Che-yu，*My Memoirs*， pp．300-301；中译本，第193-195页。而陈公博的叙述提示着陈璧君确有嫌疑，因为汪精卫虽然身体不好，但3月18日晚还表示不会请假休息，次日却因陈璧君不肯放其出门而不再办公。这正是事件的前一日，即汪的突然不出门还在蒋采取行动之前，多少让人怀疑。后来蒋介石明确对陈公博说汪精卫那次是要谋害他，陈不久“将此事面质汪先生，汪先生愕然了半天，只能答：‘公博，你信不信？’”如果这是汪的全部回答，似不能像陈自己那样理解为“极力否认”。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58-59、72-73页。

(219) 尽管陈公博试图暗示蒋介石策划和“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所举出的依据并不能证明其假说。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73-76页。

(220) Chen Che-yu，*My Memoirs* ，pp．278-279；中译本，第179页。并参见前引京沪各报的通讯报道。实际上关于海军的纠葛还有超出左右之争的复杂因素，它牵涉到黄埔系统这一陆军试图控制海军的努力以及久已自成

系统的海军对此的抵御，这些问题只能今后再详考了。

(221) 《广州政局急变之内幕》（3月23日港讯），《申报》，1926年3月30日，第9版。

(222) 《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毅庐3月21、23、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版。按毅庐明确了李之龙是在睡梦中被捕，可知消息来源相当可靠。

(223) 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1版。有意思的是当时各报刊载关于中山舰事件之内容甚众，独此一篇被全文收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五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第247-249页）之中。按：此文所说党军各部矫令行事也非全然无据，蒋介石自己就承认，“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24)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25) 两人后均释放也说明中山舰事件偶发的可能性甚大，即使真有“阴谋”或“预谋”，不论出自哪一方，应都不在海军和中山舰这一层次。

(226) 蒋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就对孙中山进言：“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236页。

(227)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4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9页；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按蒋介石稍后对汪精卫说，黄埔出身之军官对共产党行为固多不满意，“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拆〕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其自杀也”。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这话在那时不能认为是虚伪，蒋确实希望黄埔学生能超越于国共之上，以收鱼与熊掌兼得之效，他后来要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退党而以国民党左派身份继续效力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但早已不满的共产党方面决不会接受这一方式，尽管蒋与中共的合作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的矛盾却不能不以决裂告

终。

(228)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68-172页。按这里所说的参谋部原书译为“司令部”、军需部原书译为“后勤部”，据内容看应是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部和军需部。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6-187页；苏俄内部相反的观点则见于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5日，同前书，第222-225页。关于布勃诺夫使团对事件的看法，并参见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376页。

(229) 除季山嘉等的过火行为外，俄方承认的“错误”还包括在黄埔军校讲授马列主义而不讲授三民主义。这些行为造成的“满腔怒火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蒋介石这时就成了他们的客观工具”。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32页。类似的见解也见于穆辛在关于中共在广州任务的提纲，参见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同前书，第210页。

(230)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77-179页。索洛维约夫的意见得到布勃诺夫使团的确认了，参见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8页。

(231) 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p．336．

(2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12-515页。按：物质援助的确是任何国民党主政者之所必需，不过以此为基础的关系，其延续性也视双方在供需上的相互满足而定，一旦鲍罗廷的钱不足国民党所需或其找到足以取代的财源，这样的关系便未必能持久。

(233) Vera V．Vishnyakova Akimov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5-1927*，tr．by Steven I．Lev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20．

(234) 据伴随胡汉民的朱和中回忆，莫斯科最初打算将胡汉民召回苏联，是鲍罗廷决定将其带回广州。但胡汉民在广州日子并不好过，观望月余，其外交部长职也被陈友仁代理，遂于5月11日避走香港。蒋永敬：《胡汉

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版，第373-378页。

(235)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2月27日、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第8页。陈洁如则说，事发后俄方曾有人来问蒋介石此举是针对汪精卫还是针对苏俄，蒋介石答是针对汪精卫。Chen Che-yu，*My Memoirs*，pp．302-303；陈洁如：《陈洁如回忆录》，第195-196页。

(23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页。

(237) 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44页。

(238) Lewis S．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The Survey*，L（May 1926），pp．181-182．根氏后来成为名记者，当时虽尚未成大名，已初具影响。他与蒋的谈话发表在颇有影响的《概览》杂志1926年5月的东西方专号上，自然不会不引起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的重视（实际上此文正收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在1926年1月7日曾接见美国记者，谈约两小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基督教之虚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94页），或即指此次见面。

(239) 参见Jenkins to Kellogg，Mar．27，Apr．7，May 19，May 25，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39） 893.00/7358，/7400，/7469，/7473；MacMurray to Kellogg，May 4，1926，SDF 893.00/7439。此后的几个月中，精琦士对蒋介石的观感仍维持摇摆不定的状态。

(240) Jenkins to MacMurray，June 11，1926，SDF 893．00/7522．

(241)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p．20．

(242) 杨汝楫：《奉告东省同胞》，《现代评论》，第3卷56期（1926年1月2日），第19页。

(243)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执中：《粤战未起前之局面》，《晨报》，1926年3月16日（3月1日稿），第5版。两则报道内容相近，后者较详。

(244)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465、468页。

(245) 本段与下段，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99-112页。

(246) 到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大部之后，一方面其控制地域的广阔使得苏俄物质援助显得数量渐少因而也就不那么重要（同时国民党也开始从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以各种方式直接摄取钱财），另一方面列强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竞相做出亲南方的政策转变，致使实际层面的“帝国主义威胁”大大减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乃能决定与苏俄以及中共决裂。详另文，一些初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311-335页。

(247) 陈公博：《苦笑录》，第66页。按邵力子似与鲍罗廷同时于4月29日抵粤，则此会召开应在此后。

(248) Chen Che-yu，*My Memoirs*， pp．305-318，引文在pp．305-306；中译本，第197-208页。

(249) 在穆辛当时的分类中，就视蒋介石为一方，而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为另一方。他虽认为双方的关系已破裂，但仍将两者皆看作“国民党左派”，主张“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以团结包括汪、蒋在内的整个左派。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0-211页。但穆辛认知中双方关系的“破裂”显然有误，破裂的只是蒋、汪关系，蒋成功地维持了与其余诸位的合作关系。

(250)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6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9页。

(251) 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第119-121页。

(252)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3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9页。反之，蒋自己早在1924年尚未得势时就表示，他“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参见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页。

(253)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178页。并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

(254) 陈公博：《苦笑录》，第60页。

(255) 但蒋同时又指出汪的“优柔寡断”使其“大权旁落，竟使事事陷于被动地位”。蒋介石致汪精卫，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25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4页。

(257)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69页。

(258)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据蒋日记，谭延闿在3月20日明确对他的举动不以为然，蒋则认为这是其“书生浅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0日，同前刊前页。

(259)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4月1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毛思诚所编书改为“广东现局，右派与共产两者之间显树敌帜，土匪与地方主义常伏暗礁，深用焦虑”。《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45页。

(260) 邵元冲等的回到中央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妥协的后果之一，当邵受命担任国民党青年部长、戴受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大多数“国民党左派”试图抵制，而许多共产党人则因略知真情而先有了思想准备。参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2-278页。按本段所说广东，原件均译为广州，疑为误译，径改。又孙科一度被派往浙江联络孙传芳，蒋介石告诉未及与闻此事的谭延闿，此事“是弟提议，彼即赞成，并催其速行”（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0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6），但在驱逐伍朝枢后得以继任其遗下的广州市长。

(261) 关于蒋介石这段时间的作为，还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

(262) 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1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7。

(263) 蒋介石：《中执委全会闭会演词》，1926年5月22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第81页。

(264) 李宗仁于1926年5月到广州，仍发现那里崇俄风气仍甚，“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李宗仁回忆录》，第322页）李宗仁的观察相当敏锐，实际上这个权力核心本身也是一个不随意开放的社交圈子，得以参与其中确实有助于政治竞争的上升，参见前引陈洁如所述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使蒋大感兴奋事。

(265) 相对而言，这些人中只有孙科通常被认为是右派，然孙科多次主持广州市政，在民、财两权的“统一”方面主要是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且，在所谓右派之粤籍人士中，向有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之分，两者势同水火。“太子派”的聚会地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南堤俱乐部，胡汉民派不敢入内，而廖仲恺和宋子文倒是常客。可知少壮的“太子派”本相对亲近左派。参见赖泽涵：《孙科与广州市的现代化》，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7辑，第97-98页。

(266)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

(267) 第一军的第一、第二两师作为总预备队留在蒋身边，这既增强了蒋的安全感，也削弱了军长何应钦直辖的力量。何应钦只能率领第一军余部驻守其潮汕地盘，同时防备可能来自福建方面的攻击；后因北伐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整体格局激变后改为向福建、浙江方向主动进攻，是为北伐的东征军。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年，第10-15页。

(268) 据李宗仁的回忆，第四军先出兵是在他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而其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了不禁“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李宗仁回忆录》，第310页）。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

(269) 这一方略后来证明对蒋介石相当不利，他大约未曾预料到湖南作战取胜会那样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急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去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

(270)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20-321页。

(271) 孙中山致蒋介石，1924年9月9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01页。

(272) 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273)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168页。

(274) 勃拉戈达托夫从另一侧面观察到，“所有的人都把北伐看成是缓和广东紧张的经济局势的机会”，这仍是一种借北伐以解决其他问题的思路。（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8页）

(275)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83页。

(276) 北洋方面即因不重视南军北伐而错过了战机，文公直认为，吴佩孚在北伐初起时“藐视革命军，轻离其根据地之武汉，率其比较能战之直系旧军北上而攻南口，舍己耘人，其愚孰甚”（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255-256页）。文氏本站在南方立场上写作，无意中却说出了吴氏“舍己耘人”的真相。

(277)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1917-1927*，multi-volumes，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Challener for each volume，New York：Garland，1978，vol．26，p．11821．

(278) 自袁世凯弃世后出现的分裂局面，北伐前大约有两三次真正实现统一的机会，主要因各方面“存异”的实际考量超过了求同的愿望而错失（有时也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然而统一的社会要求始终存在。从长远看，北伐的进行以及此后的蒋、桂战争和蒋、冯、阎大战恐怕都是袁世凯弃世后为填补中央权势空缺的各军政势力较量的继续。这其间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影响了竞争的进程，一是国民党在改组后成为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

型政治力量，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入侵造成外患压倒内忧的大格局。

(279) 《本报宣言》，《向导》1期（1922年9月13日），第1页。

(280) 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281) 1920年6月14日、1921年8月25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7、393页。

(282) 过去许多中外研究，尤其是西方的中国研究比较重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面相，而说到民族主义时则多想到其因抵御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一面；自北洋时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局面后，中国民族主义这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

(283)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1925年8月1日，均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120、41页。

(284) 当时一位热血青年曾广棻看到“中国现时专凭武力以征服敌人，不是以武力扶持正义，以致世道人心只知趋附强权而蔑公理”，乃决定弃医改学军事，希望今后能“以武力扶持正义”，大致体现了社会上对武力正当性的某种期望。参见曾广棻致曾济宽，约1925年秋冬，引在曾济宽：《读过了日本东京寄来一封信后的感想》，《国民革命汇刊》第1卷，第98-99页。按：曾广棻应为四川人，是郭廷以在河南念中学时的同学，关于曾从日本读士官回来后的经历，参见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182-186页。

(285) 《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2辑，未著出版机构，1956年，第51页。

(286)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8-589页。

(287) 《蒋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革命文献》第12辑，第56页。

(288)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289) 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54-56，95-100，115；唐生智事详后，余可参阅《晨报》，1927年5月6日2版，6月15日2

版，6月16日3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

(29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9页。按何柱国并非信口开河，北伐时奉军方面确曾提出“爱国党主义”，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12页。

(291)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9页。

(292) 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文砥编，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99页。

(293) 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303页）。并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

(294) 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胡适的日记》，1921年6月27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6页）。此语很能表明几年前的民国政府大体尚秉承着历代朝廷对读书人的“忍让”，与此时直接捕杀的行为方式大不相同。

(295) 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当时即提出，“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故“冯系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该会注意到“在此事发生前一星期，冯系军人张之江曾有‘整顿学风’的通电；所谓‘整顿学风’，实即防止赤化，取缔共产的修辞。该电由章士钊转段祺瑞，冯系军人李鸣钟亦表示赞成，愿以军警为后盾，故段氏始有屠杀民众的决心”。参见《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原载上海《商报》1926年3月25日，收入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页。今人刘敬忠、王树才也认为国民军此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对“三一八”惨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参见其《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05-106页。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李健民：《北京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6期（1987年6月），第297-319页。

(296)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1926年3月23日，原载《益世报》，1926年3月26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216页。

(297)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原载《晨报》，1926年3月31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按梁启超当时正住院治病，他也审慎地指出了其评论和判断是据其听闻而出。

(298)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全国各公团电》（1926年3月22日，原载《申报》，1926年3月23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4页。

(299)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原载《国魂周刊》第10期，1926年3月25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9-210页。

(300)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页。按这一判断与胡适、丁文江等的观念接近，或受丁之影响。

(301)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

(302)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0页。

(303)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原载《向导》147期，1926年3月27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43页。

(304)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27日。

(305)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期（1922年5月14日），1版；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两刊皆用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本）。

(306) 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26-238页。

(307) 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664-665页。

(308) 陈独秀：《革命与武力》（1926年11月），原载《向导》，收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44页。

(309)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6年5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46-247页。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台北

丁文江档案，中研院史语所藏，台北

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台北

蒋中正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阎锡山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赵恒惕先生档案，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台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南京

中文著作

《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黄嘉谟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

《白坚武日记》，杜春和等整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美］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北伐战争在湖南》，顾群、龙秋初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北洋军阀史》，来新夏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北京，三联书店，1983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实甫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任建树、张统模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陈定炎著，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

《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著，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第四军纪实》，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编，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奉系军阀密稿》，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冯玉祥自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

（1914-1924）》，吕芳上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广州国民政府》，曾庆榴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国共关系七十年》，黄修荣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国民军史》，王宗华、刘曼荣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国民军史稿》，李泰棻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记者生活三十年》，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近代稗海》第5、6辑，荣孟源、章伯锋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87

《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李振华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沈云龙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蒋中正先生演说集》，贾伯涛编，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

《蒋校长演讲集》，蒋介石著，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编，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

《苦笑录》，陈公博著，李锷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老圃遗文集》，杨荫杭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李品仙回忆录》，李品仙著，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李宗黄著，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著，南宁，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罗志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民国军事近纪》，丁文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民国政史拾遗》，刘以芬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著，香港，龙门书店，1965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

《上海大学史料》，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上海工人运动史》，沈以行、姜佩南、郑庆声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汪敬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李玉贞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6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五卅痛史》，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五卅运动史料》，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85

《吴佩孚传》，陶菊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新桂系史》，莫济杰、陈福霖主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饮冰室文集》，梁启超著，北京，中华书局，1989

《章太炎政论选辑》，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张作霖和奉系军阀》，王鸿宾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杨天宏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杨奎松著，台北，东

大图书公司，1997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王亚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王宗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美］齐锡生著，杨云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苏］A．B．勃达戈拉托夫著，李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

《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王健民著，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黄季陆著，台北，198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苗建寅著，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苏］切列潘诺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中国税制史》，吴兆莘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华民国大事记》，李新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季陆著，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第68册，季啸风、沈友益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万仁元、方庆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4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五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薛衔天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王聿均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63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沅等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直公著，台北，文星出版社，1962

中文报纸

《晨报》，北京

《重庆商务日报》，重庆

《大公报》，天津、长沙

《国民新报》，北京

《华字日报》，香港

《京报》，北京

《民国日报》，广州、长沙、上海

《申报》，上海

《时报》，上海

《市声周报》，武汉

《顺天时报》，奉天

《益世报》，天津

中文期刊

《政府公报》，北京

《参议院公报》，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国闻周报》，上海

《近代史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民国研究》，南京

《南开学报》，天津

《文史丛刊》，台北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武汉大学学报》，武汉

《向导》，上海

《新青年》，上海

《政治生活》，北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

英文著作

Abend，Hallett，*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

Akimova，Vera V．Vishnyakov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5-1927*，tr．by Steven Lev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Buckley，Thom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0．

Chen Che-yu，*My memoirs*，collected in the Chang Hsin-hai Paper，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7．

Chung-gi Kwei，*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1922-1949*，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0．

Clifford，Nicholas R．，*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n，New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1991．

Dingmen，Roger，*Power in the Pacific：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1914-192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Fairbank，John 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Fitzgerald，John，*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Geertz，Clifford，*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

Gillin，Donald G．，*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x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Iriye，Akira，*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Issacs，Harold R．，*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Jordan，Donald A．，*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Honolulu，1976．

Kapp，Robert A．，*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Kirby，William C．，*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Lary，Diana，*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Levin，Gordo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Loh，Martin Munloong，*"American Officials in China*，*1923-1927*：Their Use of Bolshevism to Explain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Anti-foreignism"，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4．

Louis，William R．，*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1971．

Miller，Stuart C．，*Ends and Means*：*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Murphey, Rhoads, *The Outside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ye, Lucian W.,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Praeger Publisher, Inc., 1971.

Schiffrin, Harold Z.,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 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ent?"* Asia Quarterly: A Journal from Europe, 3, 1975.

Sheridan, James 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Sutton, Donald S.,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192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E. P. Dutton, 1930.

Ulam, Adam B., *The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Waldron, Arthur 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Wilbur，Martin C．，*“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37”*， 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Vol．1，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8．

英文报刊

Ku Hung-Ting，*Urban mass movement：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on Shanghai*， Modern Asia studies，Vol．13，No．2，1979．p．211

Pugach，Noel H．，*“Anglo American Aircraft Competition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 1919-1921”，Diplomatic History，II，Fall 1978．*“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XIV，June 1977．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爱活生（Edward W．Everson）

安格联（F．A．Aglen）

安体诚

B

白宝山

白崇禧

白坚武

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

柏文蔚

包国华

包惠僧

鲍罗廷（M．M．Бороди ' н）

弁　琳

勃拉戈达托夫（A．B．Благодатов）

布雷特

C

蔡成勋

蔡廷幹

蔡元培

曹　锟

曹汝霖

曹士英

岑春煊

陈　复

陈　潜

陈　仪

陈　宦

陈炳堃

陈调元

陈独秀

陈公博

陈果夫

陈嘉谟

陈金绶

陈锦涛

陈炯明

陈铭鉴

陈铭枢

陈世光

陈叔谅

陈树人

陈延年

陈友仁

程　潜

褚辅成

褚玉璞

D

达　林（С．А．Далин）

戴季陶

邓汉祥

邓慕韩

邓如琢

邓演达

邓颖超

邓泽如

邓中夏

邓子诚

丁惟汾

丁文江

丁喜春

丁应求

杜锡珪

杜亚泉

段宏业

段祺瑞

段芝贵

F

樊钟秀

范其光

范石生

范熙壬

方本仁

方椒伯

方瑞麟

斐　克

费保彦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冯国璋

冯玉祥

傅汝霖

G

甘乃光

高建勋

高语罕

龚　浩

龚积柄

龚心湛

古鸿廷

古应芬

谷钟秀

顾　鳌

顾孟馀

顾维钧

顾正红

郭秉文

郭松龄

H

憨玉琨

韩德威

韩国钧

韩麟符

韩玉宸

何　雯

何叔衡

何香凝

何应钦

何柱国

贺得霖

胡　筠

胡　适

胡汉民

胡景翼

胡思舜

胡思义

胡惟德

胡翊儒

胡愈之

黄　郛

黄伯度

黄昌谷

黄季陆

黄佩兰

黄绍竑

J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季山嘉（Н．В．Куйбышев，Кисанька）

加　伦（В．К．Блюхер）

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

贾德耀

江　浩

江伟藩

江银卿

姜登选

蒋介石

蒋梦麟

金佛庄

靳云鹏

经亨颐

居　正

瞿秋白

K

柯乐文（Clark Grover）

孔庆睿

寇　遐

寇英杰

L

劳敬修

黎时雍

黎元洪

李　垣

李大钊

李富春

李根源

李济臣

李济深

李家鏊

李剑农

李健民

李景林

李朗如

李立三

李烈钧

李鸣钟

李其荃

李庆芳

李汝翼

李石曾

李书城

李思浩

李维汉

李永声

李岳渊

李之龙

李宗黄

李宗仁

梁鸿楷

梁鸿志

梁启超

梁士诒

廖熙元

廖仲恺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钧

林　森

林伯渠

林长民

林建章

林语堂

林直勉

林祖涵　见林伯渠

刘　华

刘　亮

刘　湘

刘　哲

刘庐隐

刘少奇

刘文辉

刘显世

刘震寰

刘镇华

刘治洲

龙　云

龙定一

卢启泰

卢香亭

卢永祥

陆伯鸿

陆建章

陆兴祺

陆宗舆

鹿钟麟

路友于

吕荣寰

罗　素（Bertrand A．W．Russell）

罗宾逊（Ronald Robinson）

罗加乔夫（В．П．Рогачёв）

罗文幹

骆　通

M

马　骏

马　林

马　素

马超俊

马君武

马联甲

马叙伦

马玉仁

毛以亨

毛泽东

茅祖权

孟昭月

穆　辛

N

倪朝荣

倪道烺

倪嗣冲

聂荣臻

O

欧登科（William J．Oudendijk）

欧阳格

欧阳振声

欧阳钟

P

潘　复

潘大道

潘公展

彭汉遗

彭养光

彭泽民

Q

齐燮元

齐岳英

钱大钧

覃　振

屈映光

R

饶孟任

任传榜

日置益

S

萨镇冰

邵　章

邵力子

邵元冲

沈定一

沈刚伯

沈钧儒

沈瑞麟

师　谋

施文定

施肇基

施肇庆

石　瑛

石青阳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宋庆龄

宋希濂

宋子文

孙　科

孙　岳

孙宝琦

孙传芳

孙洪伊

孙中山

孙宗昉

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

T

台克海

谭平山

谭曙卿

谭延闿

汤　漪

汤尔和

唐继尧

唐瑞铜

唐绍仪

唐生智

陶静轩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汪精卫

王　韬

王　湘

王承斌

王宠惠

王法勤

王怀庆

王家襄

王景春

王九龄

王克家

王克敏

王懋功

王乃斌

王士珍

王晓籁

王一飞

王揖唐

王印川

王永江

王永泉

王正廷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维　杜

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

卫兴武

魏益三

闻兰亭

乌泽声

邬志豪

吴　虬

吴炳湘

吴长植

吴光新

吴景濂

吴敬恒

吴俊陞

吴南如

吴佩孚

吴荣新

吴铁城

吴玉章

吴毓麟

吴稚晖　见吴敬恒

伍朝枢

伍廷芳

X

夏　曦

项　英

萧楚女

萧辉锦

萧耀南

谢　持

谢　晋

谢鸿勋

谢英伯

谢玉树

邢士廉

熊　雄

熊克武

熊希龄

徐　谦

徐世昌

徐树铮

许　沅

许崇清

许崇智

许世英

薛笃弼

Y

严春阳

严凤仪

严鹤龄

阎锡山

颜惠庆

杨　森

杨匏安

杨庶堪

杨文恺

杨希闵

杨以德

杨荫杭

杨永泰

杨宇霆

姚　震

叶楚伧

叶恭绰

伊凤阁

伊万诺夫

易培基

于方舟

于树德

于右任

余日章

虞和德

虞洽卿

袁金铠

袁世凯

岳维峻

越　飞

恽代英

Z

曾云沛

曾毓隽

曾宗鉴

翟禄弟（Vittorio Cerruti）

詹　森（Nelson Johnson）

詹大悲

张　继

张　謇

张　仁

张　勋

张　轸

张　铮

张伯伦（Chamberlain，Austen）

张福来

张国焘

张鸿绪

张瑾雯

张竞仁

张静江

张彭春

张浦泉

张秋人

张人杰

张绍曾

张申府

张树元

张学良

张耀曾

张益芸

张英华

张知本

张治功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章杭时

章士钊

章太炎

章宗祥

赵尔巽

赵恒惕

赵锦文

郑　谦

郑超麟

郑洪年

郑俊彦

郑士琦

钟才宏

周恩来

周凤歧

周学熙

周荫人

周自齐

朱　深

朱　熙

朱培德

朱清华

朱锡麟

朱兆莘

邹　鲁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

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六卷
(1926—1928)

杨天石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六卷

（1926-1928）

扬天石　主编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所述，大略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时间约两年多。其间，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对敌到彼此刀兵相见，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由撑持半壁江山到终于覆灭收场。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扬的时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因而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时期。

北伐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愿望。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和支持下，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面。孙中山为了完成从兴中会开始的未竟之业，备经困顿，屡蹶屡起，不幸赍志而殁。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正是这位先行者和许多英烈未竟事业的继续。它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小军阀集团。由于它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心所向，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并有苏联援助，因此进展迅速。在8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克两湖，下江西，平定福建、安徽、浙江、江苏，先后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西南、东南的小军阀们纷纷望风归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然而，北伐又是在相当复杂的矛盾和背景中进行的。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振兴中华，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北伐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权、方针、政策、思想理论以至北伐的时机等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又存在许多分歧。北伐前夕，发生中山舰事件，反映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领导权的尖锐斗争。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以退让求团结，支持蒋介石达到了他前此未曾达到的权力高峰，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在北伐开始后，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中共中央又感到对蒋介石策略的不当，企图限制和削弱他的权

力。为此，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已经军权在握，左派和中共的胜利并不巩固。

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权益，因此，一直关注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列强逐渐感到，单一的武力镇压未必可行，也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他们倾向于软硬兼施，怀柔与威胁并用。在次要权益上，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在主要权益上，则竭力加以维护。在他们逐渐看清了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两派的分歧后，便企图利用矛盾，施展各种手段，分化、软化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由于实力下降，不得不逐步后退，日本由于实力上升，日渐发展为侵略中国的头号力量。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特征。北伐期间，爱国官兵，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当时统一战线内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复杂。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反对群众运动，部分人并因运动中群众的失序与过火而仇视群众；另一种是全盘肯定群众运动，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与过火现象不能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纠正。1927年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部分地区的农村革命由减租减息突然跃进到重新分配土地。这一跃进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扩大和加深了本已存在的各种分歧和裂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本来就是顾虑重重的，当群众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的时候，他们便转而向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寻求保护。

国民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在1927年春演变到了白热化阶段。在列强的诱迫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暴力“清党”，随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接着，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中共则在南昌发动起义，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

党统治的道路。曾经并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令人为之扼腕的变化。“清党”和“分共”的结果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农群众，国民党内的专制与腐化现象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群众运动、军队政治工作、部分国民党地方党部中取得了领导权或支配地位，为前期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共当时正处在幼年时期，还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下，右的、“左”的错误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还需要历史的长期磨炼。

国共两党分裂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宁汉对立与合流等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北方的张作霖集团也粉墨登场，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王朝。1928年，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派系获得暂时妥协。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日本帝国主义不愿中国顺利统一，悍然出兵济南，蒋介石下令部队忍辱绕道，继续北进。此时，张作霖集团已经成了孤军，被迫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解决办法”，退出关外。1928年6月，日本侵华激烈分子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同月，北伐军和平进入北京和天津。自1912年袁世凯上台开始，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自此，中国历史即进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时期。

为了写好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尽可能地收集、研究了这一时期各方面、各种类型的公私档案和文献，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英国的、前苏联的，只要我们力所能及，都加以收集、利用。我们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记述、揭示历史的客观运动进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解释、分析以至评价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客观的史实只能有一个，解释、分析、评价却可能多种多样。写历史要尽量减少主观性，力求最大限度地符合实际。历史学家要为读者，特别是后代的读者、研究者作出正确结论提供必要的条件。基于此，我们将清理、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第一任务。我们不指望读

者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希望本书所阐述的史实能经得起各个时代、各种读者的推敲和质疑。我们的写法是以叙述为主，适当加以分析、评论，有时则只叙事实，不作评论。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的政派和人物尤为复杂。中国戏曲常常喜欢将人物脸谱化，忠奸分明，美丑立判。社会生活里也往往有类似现象，扬之则上九天，抑之则入九渊。历史学不能采取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而要从历史真实出发，写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姿多彩的特点。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固不足取，对反面势力、反面派别、反面人物所做的好事，视而不见，一概骂倒也不可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为正道。北洋内阁是为军阀处理内政外务、治民理财的机构，本书在指出它的这一特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在“修约外交”中的作用。对北洋系人物维护民族利益的言行，本书也如实作了叙述。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仍然是应该提倡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忠于史实，言所当言，既不为权势所屈，利害所动，也不为派别所囿，风向所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学家写的虽然大都是过去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笔时总不能不有所避忌。距离现实愈近，这种避忌也就愈多。例如：过去讲共产国际，只讲其正确，不讲其失误，所有的板子都打在陈独秀等人身上。又如，对1927年的南京事件，只讲帝国主义炮轰，不讲此前中国士兵（包括北伐军散兵）对外人在宁机构、人员的抢劫，而在中国军民死伤人数上，又采用当时为了宣传而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如此等等，例子不少。这样的写法，自然很难成为信史。

既要充分掌握史料，又要善于运用。史料常常有片面性，甚至虚假不实，轻信就会走向谬误。因此，我们在写作中，力求参稽、比较各方面的史料，加以淘筛分析，以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譬如报刊，既读革命一方的，也读北洋一方的；既读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也读东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方的；既读国民党的，也

读共产党的；既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总之，史料掌握得多一点，全面一点，片面性就可能少一点。有些史料，真伪混杂，就更加细心地考订鉴别。1927年，张作霖集团查抄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后将所得文件汇编成书。其中有篇文件，被海外的有些历史学家视为共产国际指使中共制造暴乱和排外事件的铁证，但是，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件可疑。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已经查明：此文是根据张作霖的指示伪造的，其他文件的翻译虽不可靠，但并非赝品。苏联政府当时否认全部文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一种姿态。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文学是人学，历史学也是人学。两种“人学”有共通点，也有相异点。其共通点是都要求“人”有性格，有血肉，其相异点是：文学家可以集中，可以想象，可以夸张，使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即鲁迅所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只要生活中可能有，而不必求其实有。历史学家则不能像文学家那样自由，他所写的一切，连细节在内，都必须是历史上实有的。历史学家要把人写“活”，只能依靠历史人物自身实有的思想和行为。本书努力这样做了，但远未能将人写“活”。比之中国古代的某些史学名篇来，我们于惶愧之余也有一点困惑，在当时的条件下，古代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掌握那些使人物“活”起来的资讯的？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讲求文采。我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书能写得生动一点、活泼一点。但是，我们主张无一事无来历，而且必须是可靠的来历。我们决不做因文伤真，以文害意的事。我们不敢以想象来填补史料的空白，不敢想当然地猜度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机，不敢编造细节来塑造人物，渲染气氛，那种以牺牲真实性来换取可读性的做法，不是严格的历史学的方法。科学和文学有别，不加区分，会造成历史学的灾难。

写战争，可以从军事学的角度写，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写。前者着重兵力配备、作战过程和战略战术的运用，后者着重战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战场上的人物活动。本书企图将这两种写法结合

起来，在大的政治背景中表现北伐战争的各主要战役。是否有当，尚祈读者鉴定。

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内政坛的风云变幻常常和国际舞台声息相关。为了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列强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在研读日本外务省文书、美国国务院档案、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和内阁档案上下过较多功夫，因此，本书的相关论述也就多一点，希望它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外交机密。

唐人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修史如同磨剑，不能急就。本书从准备资料到定稿付印，已经超过十年。当然，其中插进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大部分执笔者在完成初稿后也都离开了编写组，但是，我们用在这本书上的时间仍然是不算很短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一定会存在某些疏漏和讹误。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台湾大溪和前苏联的档案，我们是乐意进行一次大的修订的。

本书各人执笔章节如次：

杨天石：前言
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部分）、第三目；第三节；第四节第一目、第二目（部分）、第三目；第五节第六节第一目、第二目（部分）
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一目（部分）；第四节（部分）
第三章第六节
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二目（部分）、第三目第六节
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牛大勇：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五节
第四章第二节；第五节第一目、第二目（部分）
习五一：第二章第二节

第四章第四节
第五章第四节
徐　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部分）、第二目；第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周兴旺：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目（部分）、第三目、第四目
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部分）、第二目；第四节（部分）
张学继：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任建树：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目（部分）
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目、第四目

杨天石拟订纲目，主持全书编写，整理、修改各章初稿，对其中若干章节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或补充。李新审阅全书。王学庄参加设计过纲目草案。王贤知提供了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目和第五章第三节第二目的初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韦慕庭（C．Martin-Wilbur）、狭间直树、汪荣祖、顾廷龙、方行、万仁元、陈兴唐、陈铁健、李玉贞、薛衔天、杨奎松、吴永清、柴寿安等学者的各种各样的帮助，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一节　北伐的决策与出师
　　一　南北形势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
　　二　叶唐之战与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入湘
　　三　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第二节　攻克两湖
　　一　占领长沙
　　二　长沙会议与汨罗江会战
　　三　汀泗桥、贺胜桥大捷
　　四　攻克武汉
　第三节　江西、福建之战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二　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
　　三　福建战场
　第四节　苏、浙等省的自治运动
　　一　浙江夏超独立
　　二　上海自治运动与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三　陈仪自治
　第五节　国民联军在西北的崛起
　　一　五原誓师
　　二　西安解围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成立
　第六节　西南军阀的归附与分化
　　一　泸州、顺庆起义
　　二　四川军阀的归附
　　三　黔系军阀的分化

四　“二六”政变与唐继尧统治云南的结束
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一　迎汪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二　迁都之争
三　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第二节　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一　杜锡珪、顾维钧内阁的交替
二　天津会议与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三　奉鲁军南下与吴佩孚集团的分化
四　顾维钧内阁的改组
五　奉吴河南战争
第三节　北伐军东下与工人占领上海
一　东进决策与占领浙江
二　收复安徽与攻克南京
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四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与市政府的诞生
第四节　各地群众运动的高涨
一　农民运动
二　工人运动
三　妇女运动
四　学生运动、商民运动、华侨运动
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一节　二十年代列强的对华政策趋向
一　列强角逐的新格局
二　列强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
第二节　北伐战争发动前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　“五卅”惨案后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二　对南方国民革命阵营的窥测
第三节　省港罢工的谈判与收束

一　中英省港罢工谈判及其中断
二　英国的胁迫与罢工排货的收束
第四节　北伐进军中列强对革命阵营的分化
一　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
二　维护重要权益与分化革命阵营
第五节　汉浔英租界事件与列强的两手政策
一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与英国的对策
二　列强的两手
三　南京事件与汉口“四三”惨案
四　列强对蒋介石的诱迫
第六节　蒋介石发动政变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一　赣州惨案与南昌、九江、安庆事件
二　蒋介石等在上海策划清党
三　汪蒋会谈与汪陈联合宣言
四　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变方略
五　“四一二”政变
六　四川、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地的拥蒋反共活动
七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八　“二期清党”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一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政
一　财政经济措施
二　司法改革与文教事业
三　土地委员会工作经过
第二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
一　武汉国民政府前期的外交
二　宁案交涉与分离英日政策
第三节　汉宁对峙下的北伐军事
一　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活动与决策北伐
二　唐生智率军北上与冯玉祥东出潼关

三　阎锡山易帜
四　吴佩孚势力的败亡
五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
第四节　奉鲁军阀组建安国军政府
一　查抄苏联使馆与镇压革命党人
二　安国军政府的成立
三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与东方会议
四　胶州事变与苏鲁前线的拉锯战
第五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一　列强对宁汉分裂的态度
二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政策调整
三　中共“五大”的召开
第六节　汪精卫集团分共与中共发动武装起义
一　杨森、夏斗寅叛乱与武汉政府的平叛军事
二　马日事变
三　江西遣送共产党人
四　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蒋冯合作
五　汪精卫集团分共
六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一节　蒋介石下野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一　苏皖溃败与蒋介石下野
二　孙传芳反攻与龙潭之战
三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第二节　宁汉粤之争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讨奉军事
一　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二　宁粤之争与广州政变
三　冯玉祥军与南京北伐军会师徐州
四　阎奉之战
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一　蒋汪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
二　中共广州起义与汪派的挫败
三　蒋介石复职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四　蒋介石整顿内部
五　奉军反攻与国民党军合力北进
六　济南惨案
第四节　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一　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
二　奉军北撤与皇姑屯事件
三　北伐军进入京津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附录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一节　北伐的决策与出师

一　南北形势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在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广东国民政府的争取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首的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希望从广东方面得到财政支援。2月间，两广几经磋商，达成统一协议。拥兵近四万的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连同广东方面原有的9万军队，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余人。两广的统一和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中国南部的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

同年初，国内其他地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变化。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北方的国民军趋向进步，并开始与“联合讨赤”的奉系和直系军阀作战。2月间，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在直、鲁、豫失败，退往陕西，但是仍牵制着吴佩孚的部分兵力。4月间，国民军主力撤出京、津，退守察、绥，抵御吴佩孚、张作霖和阎锡山三派的联合进攻。国民军在北方作战，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配合作用。

全国各派军阀经过多年混战和内部分化，到1926年初，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数省。此外，还有些军阀，控制一省或一省内某些地区。

奉系军阀张作霖集团控制东北、山东和京、津地区，拥兵约三十五万人，内部比较巩固，是这一时期实力最强的军阀集团。其中，山东督办张宗昌和直隶督办褚玉璞的直鲁军则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直系军阀吴佩孚集团控制鄂、豫两省和直隶、陕西的一部分，拥兵约二十万人。吴佩孚虽以直系领袖自居，并受西南和东南地区军阀表面上的拥戴，但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这一集团已元气大伤，所部多系地方部队拼凑而成，内部不稳。吴佩孚还在察东、陕西对国民军作战，在南方与国民政府敌对，处于多面受敌的不利境地。直系军阀孙传芳集团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省和上海，拥兵约二十万人。由于孙传芳集团从吴佩孚统辖下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不久，控制东南地区的时间仅一年多，其自身基本部队不多，所部多系刚刚依附的东南各省的军阀部队，因而统治地位也很不稳固。

除了上述三大军阀集团外，地方系的各个军阀集团都以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为目的，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持观望和投机的态度。自辛亥革命后一直割据山西的阎锡山集团拥兵约十万人。阎锡山既同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又同国民党保持联系。长期想称霸西南的军阀唐继尧集团割据云南，拥兵约六万。唐继尧虽仍与两广敌对，但因为1925年进攻广西兵败，部属又在积极酝酿倒唐，已不能掀起大的风浪。四川和贵州境内的军阀多达十几个派系，各自拥兵万人到数万人不等。他们对内互相争斗，对外则政治态度游移，大都在吴佩孚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伺机投靠。

国内的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中小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长期实行封建割据，相互间又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内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早日实

现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和平，因而欢迎国民政府的北伐。各军阀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为国民革命军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各军阀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总的形势对北伐有利，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

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赶走了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打击并限制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个人权力。6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掌握了党权。5日，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至关紧要的军权。其后，蒋介石又陆续取得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升到了此前从未达到过的权力高峰。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但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范围，进一步提出新的反共要求。5月27日，他在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中，宣称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员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同时，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以便“集中革命势力”[(1)]。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但他同时声称，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统一革命势力的“唯一的党”。他并称：为了“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小党就不能不暂时牺牲”；因此，他再次要求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免得中国国民党同志的猜忌、猜疑”[(2)]。8日，他向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能跨党。”[(3)] 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完全违背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鲍罗廷继续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的方针，力劝

共产党人接受《整理党务案》。他认为："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4)] 当时，中共内部虽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已经同意鲍罗廷的方针。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为《整理党务案》发表宣言，认为"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5)] 6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强调联合战线的重要，说明现时中国革命势力，实在危险至于极点，两党共同的职能，在于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函件表示：《整理党务案》与中共的合作政策并无根本冲突[(6)]。

在宣布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同时，中共也通过陈独秀致函蒋介石，批驳他的关于中山舰经过事实的讲话，说明共产党并无"倒蒋阴谋"，"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乞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舱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信件反驳蒋介石所称国民党内不能有两个领袖、两个主义的说法，说明国民党是多阶级合作的党，除"共信"之外，应该容忍有多阶级的"别信"[(7)]。陈独秀此函算是表达了中共方面的一点微弱的抗议。

陈独秀长期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想不通。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合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会议否定了陈、彭二人的建议，认为这一主张"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但会议同意将建议提交共产国际考虑。其后，共产国际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8)]。会议认为，当时国民党有四种力量：共产派；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以汪精卫、甘乃光为代表的左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新右

派）。会议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积极进攻的局势，但认为其原因是此前指导国民党的方式有包办代替等错误，因此提出今后应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会议提出；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必要时还要扶助中派。会议同时提出，今后“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9)]。但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议并没有提出在这一形式中取得领导权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始终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会议也未能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方针。会议认为，当时的紧要任务在于开展反右斗争，通过斗争，使中派与右派隔离。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В．К．Блюхер）请周恩来转问上海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10)]

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抵制，因此，他不得不貌似公正地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7月26日，发表《留别本校全体官长学生书》，提出以后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员亦不得有排斥共产党之态度。他声称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不变。无论退出CP，而为纯粹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都“一视同仁，无分畛域”[(11)]。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邵并带着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要求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12)]。

以蒋介石为一方，以中共党人为另一方，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是，蒋介石已经权力在握，而共产党人则还在纸上谈兵。这样，北伐战争的形势就变得分外艰难、复杂起来。

二　叶唐之战与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入湘

1926年春，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统治被推翻，为国民政府的北伐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在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夏曦就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到湖南办理党员登记，于4月间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夏曦为委员长。湖南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省党部内起了领导作用。1925年5月，国民党第一次湖南省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举行，成立以夏曦、李维汉、李荣植三人为常委的省执行委员会。会后，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在全省发动反帝爱国运动，部分掌握了由省内各界团体组成的雪耻会。1925年底，又掀起要求驱逐赵恒惕的运动，使得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省内赵恒惕反动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1925年底至1926年初春，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和省内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赵恒惕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骤然激化。

赵恒惕自1923年驱逐谭延闿取得湖南统治大权后，由于自身缺乏基本部队，对省外一向标榜联省自治的中立政策，借以阻南拒北；对省内则依靠几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并在他们中间维持平衡。他把湘军编为4个师，以贺耀组、刘铦、叶开鑫、唐生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师长。第一师贺耀组部驻扎在益阳、常德一带；第二师刘铦部驻扎在华容、澧县、慈利一带；第三师叶开鑫部驻扎在湘潭、邵阳一带；第四师唐生智部驻扎在衡阳、郴州一带。除唐生智拥兵三个旅外，其他各师均只有两个旅。他们各自把持驻地的政权、财权，在省内形成几个独立王国。其中，第三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比较认真地听命于赵恒惕，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利用控制水口锌矿，财源丰厚的有利条件，大力购置武器，扩充军队达两万多人，使第四师成为省防军中人数最多，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

唐生智实力增强后，滋长了取代赵恒惕的念头；同时，赵恒惕也

加紧了对唐生智的防范和限制。唐生智感到，省内群众运动高涨对他驱逐赵恒惕有利，因而在他控制的湘南地区对民众团体的活动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1925年底至1926年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派夏曦和王基永，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秘密与唐生智联络，要求唐在政治上与广东政府一致，和省内人民共同驱赵（恒惕）反吴（佩孚），唐生智表示大体赞成[13]。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第四师官兵一律摩顶受戒，皈依佛教，企图以佛教教义加强对部属的控制。他还同南北两方都进行联络。一面私下向吴佩孚表白，不想改变原湖南省当局的政治态度，以求吴不干涉他驱赵；同时又秘密向广东、广西当局表示他倾向革命，希望两广方面予以援助。1925年底，和唐生智关系十分密切的湘军第二师旅长叶琪以省亲之名回到广西。次年1月27日，以唐生智代表的名义出席广西当局和各界民众的集会，会后又赴广州参观，从而使唐生智倾向广东政府的态度公开化[14]。

1926年2月2日，长沙发生英国人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事件。同月10日，中共湘区委员会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发动各界成立“湖南人民反英讨吴委员会”，要求驱逐英国领事，通电讨伐吴佩孚，并吁请广东国民政府北伐。3月2日，反英讨吴委员会三千余人在长沙集会，会后举行游行，并到省长公署呈递警告赵恒惕书[15]。面对这种形势，唐生智认为倒赵时机已到，马上动员全师部队出动。3月6日，致电赵恒惕，声称湘南米贵，给养困难已极，特调所部第十五团移往衡山就食[16]。3月8日，唐部三个旅分三路自湘南向北推进，前锋直指长沙。

自1926年2月起，赵恒惕即多次派人赴衡阳疏通，说明省长任期即将届满，自己无意蝉联，拟帮助唐竞选成功，和平移交。2月下旬，蒋方震应赵恒惕之请，并受吴佩孚之命，前往衡阳，重申前意，并劝止唐和广东的联系。蒋是唐在保定军官学堂读书时的校长。唐生智在他的老师面前信誓旦旦，表示绝不利用外力，扰乱湘政[17]。3月8日，唐生智出兵后，赵恒惕再次派人到衡阳商谈。唐生智却回答

说："要么我来，要么赵去。"毫无通融余地[18]。

为了配合唐生智武力倒赵，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3月9日在长沙举行有3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谴责赵恒惕祸湘的罪恶，通过24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有：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省议会、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请国民政府北伐、恢复被赵恒惕封闭的一切团体、改良农工待遇、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19]。会议决定组织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举王基永、周以栗、酆述庭、张唯一、缪伯英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最初，赵恒惕企图以强力镇压。3月10日布告称：要"严密缉拿，尽法究办"，并恶狠狠地称："倘竟恃强抵抗，准军警当场格杀。"[20] 但是，赵在长沙只有卫兵2000人，拥赵的湘军第三师的实力远不及唐的第四师，驻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又态度不明，赵恒惕虽有镇压之心，而无屠戮之力。3月11日，他向省议会辞省长职，推举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职务。13日，赵恒惕离开长沙，经武汉转赴日本。14日，唐部第九旅旅长何键率部抵省。16日，唐生智进入长沙。

唐生智进入长沙之初，态度极为谨慎。他邀请湘军师长贺耀组、刘铦、叶开鑫和各旅长到长沙共商湘政，表示自己只是暂来维持省会安宁，不就代省长之职，仍拥护"省宪"，一切政务，萧规曹随。3月18日，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及各团体向唐生智请愿，周以栗（中共党员）要唐生智对24条签字表态。唐称：湖南有特殊情形，自难一步登天。但他又表示：要"走完十万八千里路，决不向后转"[21]。他一面派人赴汉口向吴佩孚解释，驱赵乃迫不得已，自己并无反吴之意；一面又向两广联系，希望必要时能给予支持。

吴佩孚虽得到唐生智的解释，但仍然十分担心他倒向广东政府。3月18日，再派蒋方震赴湘，动员唐生智"讨赤讨粤"。唐对他的昔日老师仍然虚与委蛇。22日，蒋电吴报告说："唐极愿与大帅携手。"[22] 3月25日，长沙各界为大沽口事件及"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参加者达四五万人，群众要求立即出兵讨吴，并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

表示："所请各条，将来必促其实行。"[23] 同日，刘文岛偕广东政府代表陈铭枢和白崇禧到达长沙。陈、白都是唐生智保定军官学堂的同学，二人向唐提出：请湖南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指挥之下，出兵讨吴；承认国民党在湘自由发展，且须绝对保护人民自由[24]。陈、白表示：广东革命政府愿意提供支援；保证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不进入湖南。唐生智同意陈、白所提要求，表示服从国民政府。陈铭枢随即电广州报告称：唐生智"对于政府意思，完全接受"，"结果之佳，出于意想之外"[25]。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决定采取激烈手段，控制湘局。当晚，唐生智正式宣布就任湖南省代省长之职，还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赶到长沙的第二师师长刘铠、第二师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萧汝霖、第三师旅长刘重威、原省府高级参谋张雄舆逮捕，随后又将刘重威、张雄舆、萧汝霖处决。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其部下何键旅向驻扎在岳阳的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进攻。叶开鑫迅速率部退向湖北，正式投附吴佩孚。3月27日，何键部占领岳阳。

当时，吴佩孚还是庞然大物，唐生智决定以卑词恭礼为缓兵之计。3月29日，致电吴佩孚，说明湘事为湖南内部问题，湘军决不出境[26]。4月1日，派警察厅长欧阳任等携函赴汉，声称湘省保境息民，决无联粤北伐之事，所有赵恒惕与吴所签各种盟约，一律有效[27]。当时，吴佩孚正要北上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还不想以主力南下，他限唐生智于24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并于次日派军舰到岳阳示威。唐遵命惟谨。3日，何键旅撤回长沙。其后，吴佩孚的态度愈来愈傲慢，要求唐生智回驻衡阳，让叶开鑫回任湘西督办，恢复赵恒惕出走以前的状态。同月，吴佩孚派谭道南到长沙谈判，逼迫唐生智接受吴的任命，讨伐广东，至少也要发表一项"反赤"通电，表示心迹。唐生智愤然拒绝说："吴子玉不要小看湖南，他如进攻长沙，我就直取武汉。胜则饮马长江，败亦不住租界！"说毕，掏出手枪，激动地说："我唐生智的命运，就交给它了。"[28] 至此，谈判完全破裂，吴佩孚遂决意对湖南用兵。他一面接济叶开鑫部，委任叶开鑫

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组为副司令，利用投附他的湘军打头阵；一面又调集自己的部将宋大霈、余荫森、孙建业、王都庆及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的部属唐福山部、陈炯明的旧部粤军谢文炳部，组成“援湘军”，以李倬章为总司令，在湘军后面跟进监督，并策应支援。4月19日，叶开鑫通电声讨唐生智。同日，率部进占岳州，并分路向平江、湘阴进攻，吴佩孚派来的军舰数艘也进入洞庭湖助战。4月21日，叶开鑫通电就任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叶唐战争就此开始。

由于叶唐战争不仅是湖南的内争，而是旧北洋军阀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的进步力量之间的战争，国共两党在湖南省的组织大力支持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后，有限制地允许各进步团体活动。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仅4月份一个月即在2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为支援唐生智作战和后来支援北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4月21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长沙5万市民举行反吴示威大会，夏曦演说，号召全省人民援唐反吴，“一致合作为政府后盾”[29]。大会推选夏曦、缪伯英（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张汉藩、邱维震等十余人组成湖南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会后，委员会组织讲演队、慰劳队、救护队、工人运输队等支援唐生智部。唐生智在民众团体的支援下也提高了应战的决心。4月23日，唐生智发出对叶开鑫的讨伐令，同时布告省民，声称“誓以身家性命，保此河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30]。他随将所部三个旅投入汨罗江一线，迎击叶开鑫的进攻。

叶唐之战开始时，唐生智部原有的三个旅，加上4月中旬投附唐生智的鄂军混成旅夏斗寅部，总兵力虽号称五万，实际上不足三万人，少于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的总数。这时，驻在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的态度，成为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对于唐生智控制省政和驱赶叶开鑫的第三师，湘军第一、第二师开始持中立观望态度。叶唐之战开始后，唐生智为拉拢湘军第一师，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组为湘军总指挥，贺耀组见叶开鑫势力强大，不肯接受，

反而组织“护湘军”，于4月27日通电讨伐唐生智，并向长沙进兵。与此同时，湘军第二师也驱逐唐生智派来的师长叶琪，由澧县向东推进，参加讨唐。4月25日，唐生智部在湘阴、平江、浏阳一线击退叶开鑫部，但是，湘军第二师和叶开鑫部北撤时留在湘西的第六旅邹鹏振部已经出动，邹鹏振旅并于4月28日攻占宝庆，威胁唐生智的后方衡阳。同时，赣军唐福山部也向湘东醴陵一线进攻。面对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唐生智于4月30日下令放弃长沙，全军南撤醴陵、湘潭一线。他一面急电广西当局求援，一面派刘文岛为代表赴粤，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前驱，请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兵。

5月2日，叶开鑫率“讨贼联军”进占长沙，随即向湘潭、株洲追击。唐生智率军后撤衡阳，并于5月6日向抄袭衡阳的叶开鑫部邹鹏振旅反攻，一举夺回宝庆。唐军撤退时，中共湖南区委派出夏曦、何叔衡、郭亮、王基永、熊亨翰、曾三、曹羽仪、凌炳组成的八人代表团随军南撤，以八人代表团为主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唐生智本人也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一面在唐军官兵中进行政治鼓动，一面通过湘南地区的国共两党组织动员民众支援唐军。因此，唐军撤退途中虽有部分倒戈、逃亡，但是基本保全了主力退到湘南。

广东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援唐，但对于出兵问题，各军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程潜主张暂不出兵，坐观唐生智失败。蒋介石、李济深则主张出兵援唐。李济深并表示愿派第四军独立团先行出发，随后再派出第十、第十二师。5月11日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白崇禧等出席，新自广西来粤的李宗仁和湖南请援的代表刘文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出兵入湘[31]。其后，又陆续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宜及第八军军长等职。北伐战争的序幕逐渐揭开。

叶唐之战开始后，李宗仁即命第八旅钟祖培部向湘桂边界的黄沙

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向桂林集中。5月12日，第八旅第十五团尹承纲部赶到衡阳，正值衡山前线吃紧，唐生智马上将该团调往衡山参战，巩固了涟水前线的阵地。吴佩孚得知广东政府出兵援唐后，增派鄂军三个旅入湘作战，并调拨大批枪械弹药支援叶开鑫部。5月20日，唐生智部反攻湘乡、湘潭，叶开鑫调集援军由宁乡向湘乡包抄。23日，唐生智部被迫向衡山、宝庆撤退。叶开鑫部和吴佩孚的援湘军随即再度向衡山一线进攻，遭唐生智部和广西援兵抵抗，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叶开鑫指挥下的原粤军谢文炳部和赣军唐福山部共六个团向唐生智部的右翼攸县、长岭一线包抄进攻。由于当地守军只有六个连，难以抵御，唐生智的湘南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严重威胁。29日，叶开鑫部又攻占衡山，向唐生智部的主要基地衡阳推进。

5月20日，正当唐生智亟需援助之际，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担任广东政府援唐北伐的先遣部队，奉命出动[(32)]。

第四军独立团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1925年11月组建于广东肇庆。起初番号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团共有2100人。团长叶挺、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团参谋长周士第和大部分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它虽属第四军建制，在作战上归第四军指挥，但是团内的干部都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调配，并建有中共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该团由于从建团起就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官兵关系并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独立团出发途经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鼓励独立团“饮马长江”，“武汉见面”[(33)]。5月27日，独立团越过南岭，进入湖南。

5月31日，叶挺率独立团进抵湘南永兴。同日，因原粤军谢文炳部已迂回到攸县，唐生智电催独立团赴援。6月1日，独立团改以强行军前进，次日赶到安仁。3日，叶挺率团主力进入渌田、龙家湾前线。该处守军兵力薄弱，在北军六个团的进攻下已丢弃阵地后逃，因

此，独立团刚进入阵地，第二、第三营即遭北军包围，激战至天黑，给北军以大量杀伤。北军进攻连连受挫后，发现守军是广东政府的援军，且战斗意志十分顽强，深感震惊，慌忙于午夜撤退。4日拂晓，独立团向逃敌发起猛烈追击，北军仅作了轻微抵抗即逃向茶陵、攸县。5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武装引导支援下占领攸县。

此役为北伐军出师的第一战，第四军独立团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仅以63人伤亡的代价，即取得了胜利。

在衡阳正面战线上，援湘的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会同唐军何键部也于6月1日反击叶开鑫部，在金兰寺一带激战获胜。6月3日，唐军刘兴、周斓部继起反攻。叶部退守涟水以北。

先遣队初战告捷，不仅稳定了唐军湘南战线，也提高了广东方面各军首领出师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三　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举起北伐旗号，1925年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34] 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称：敌人"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35] 两天后，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声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36] 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37]。

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38] 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

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39] 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4月10日，国民政府复函冯玉祥，表示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40] 其间，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41]。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垧。同月20日，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联络唐生智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42] 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29日，李济深、陈铭枢催请出兵。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来，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宗仁也积极主张迅速出师。29日，李宗仁又面见蒋介石，批评"北伐出师迂缓"，而蒋介石则认为李宗仁"不识政治复杂情形"[43]。当日，军事委员会开会，李宗仁、刘文岛再次强烈要求出师北伐，会议决定先拨给广西军费20万元，命第七军克期出发援湘。

尽管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确定。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决定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协助他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即为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44]。二届二中全会后，由蒋介石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各种权力的局面已经形成。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商量总司令人选问题，张、谭二人推蒋，蒋则推谭，谭自然不肯应允。蒋介石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介石“勉担艰巨”，并称：如蒋不出任，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45]。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组建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其他人员为：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处长马文车、参事局长钮永建、政务局长陈公博、审计处长徐桴、军法处长戴任、训练处长严重。

6月23日，蒋介石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战事期间，“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不准他们自由”。同时，他并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46] 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37次会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47]。这样，蒋介石就建立起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军事独裁体制。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他在1月11日日记云：“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48] 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49]。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声称“继承

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命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50]。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集中于永丰、衡山、攸县一线，相机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化，防备江西，以第一军何应钦部集中衡阳，为各方策应。

7月4日至6日，根据张静江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有：一、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因足疾请辞，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代理。二、承认蒋介石任党的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三、补选何香凝、彭泽民、于树德、顾孟馀、李济深、王法勤、丁惟汾7人为常务委员。此外，会议讨论并大体通过了《出师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等文件。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及北伐誓师典礼。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各界参加者五万余人。据报道，“欢声雷动”，“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军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51]。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称：“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52] 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蒋介石并称：“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类于军阀之行径，则凡我将士咸得举发其事实，中正甘受党与政府极严厉之制裁。”这一时期，蒋介石如愿以偿，春风得意。25日晚参加中央党部欢送宴会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演讲略带骄矜之色，戒之！”[53] 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部第二组人员离开广州，赶赴韶关。

尽管北伐已经见之于实际行动，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

仍然不一致。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当时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54]。这一时期，由于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人主张首先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陈独秀则主张趁吴佩孚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以阻止其南伐。为此，他多次致电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详陈此计。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认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他说：北伐“必须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文章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问题是防御吴佩孚南伐，防御反赤军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文章并批评广东国民政府“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以及“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55]。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认为“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56]。

陈独秀的文章引起了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竟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告，指责该文“有碍革命前途”，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8月13日，张静江根据国民党中央第六次政治会议决议，致函陈独秀，提出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先着”，批评陈文对北伐军出师“加以投机权位的恶名”，将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张函并称：“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57]蒋介石对陈独秀的文章也很反感，他于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58] 24日，他致电国民党中央：指责陈独秀“反对本党北伐”，“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值此严紧时期，发此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他要求中共中央负责答复[59]。9月13日，陈独秀发表答辩文章，说明北伐成熟的标准，一为“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

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文章特别提出，孙中山“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60]

北伐是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长期以来的要求，陈独秀对实现这个要求的迫切性估计不足，因而，对北伐未能持鲜明的支持态度，这是一个错误，但是，陈独秀提出仓促北伐的危险则又是有见地的。

第二节　攻克两湖

一　占领长沙

广东国民政府在委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同时，又积极给予物质支持，送去军费毫洋10万元[61]。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就职。所部共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教导师和鄂军第一师，由何键、李品仙、刘兴，周斓、叶琪、夏斗寅分任师长。同时，唐生智还受命统一指挥在湘南作战的第四、第七、第八军的部队。

6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广州出发。其后，各部陆续北上。这时吴佩孚正以主力在南口方面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对北伐军的实力估计不足，因而他命令叶开鑫的湘军和李倬章的援湘军在湖南暂取守势，确保两湖。叶开鑫部自衡山，渌田作战失利后，即以主力沿涟水、渌水布防，抢修工事，并以部分兵力袭扰北伐军两翼。当时，叶开鑫、李倬章指挥下的各色部队还有十多万人，但是内部派系复杂，湘军各部都力图自保。援湘军和原粤军等部又想乘机占据湘南地盘，统一调度指挥十分困难。而且，北军大都已欠饷数月，其后方又有中共组织领导的工农群众进行袭扰破坏，加之北军抓夫抢粮，造成民众逃避，各部供应困难，军心动摇，士气十分低落。

6月下旬，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主力已集结到湘南前线。

计有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第七旅胡宗铎部和第八旅钟祖培部，以及第八军的6个师，总兵力约六万余人。各军将领因大敌当前，还能够互相协助。第四、第七、第八军训练有素，经初战告捷，士气高涨。湘南地区山峦起伏，湘粤间的运输主要靠肩挑人抬，给北伐军的供应造成很大困难。在中共湘粤两省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两省的工农群众掀起支援北伐的热潮。广东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湘南各县也发动数万农民挑担运输，终于使北伐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保障。和北军比较，北伐军的战斗力已明显占有优势。

为了乘当面之敌内部混乱，吴佩孚主力远在南口之机尽快夺取湖南，唐生智于6月21日提议，不待各军全部到达即发起总攻，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等人表示赞同。经蒋介石同意后，自6月29日起，湘南的北伐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前沿推进，7月5日发起进攻，主攻目标直指长沙。

攻势开始后，第七军和第八军一部组成的左路军向娄底一线进攻。当时洪水猛涨，涟水江面船只又被北军控制，左路军得到当地民众提供的30艘木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于7月6日攻占娄底。以第八军主力组成的中央军向潭市、湘乡一线进攻。因该处地形复杂，又为叶开鑫部的中心防区，中央军何键师进展缓慢。在刘兴师的增援下，终于在7月9日突破敌军防线，占领潭市、湘乡，叶开鑫部纷纷向湘潭、长沙败退。

右路军由第四军组成。7月9日，进攻由赣军唐福山、粤军谢文炳部据守的渌水防线。张发奎率第十二师主力在右翼主攻醴陵，叶挺率独立团在左翼泗汾镇助攻。同日晚，独立团向泗汾桥守敌唐福山部一个团发起突袭，当地农民武装同时袭扰敌阵和后方。经激烈夜战，于10日晨夺取了泗汾桥和泗汾镇。独立团随即向醴陵追击，沿途又击溃敌军两个团。同时，第十二师主力攻占楚东桥。此际，中共湘东地方组织动员的运输队、侦察队、向导队、救护队、疑兵队纷纷参战，株

（洲）萍（乡）铁路工人则破坏湘赣交界处的铁路，断绝赣军唐福山部的后援。面对北伐军的正面进攻和工农武装的后方袭扰，醴陵地区的北军迅速陷入混乱，于7月10日下午放弃渌水防线，向东北方向撤逃。叶挺率独立团急追30里，于当日下午占领醴陵。

北伐军突破涟水、渌水防线后，北军主力虽因撤退迅速而未遭歼灭，但其内部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原归附于叶开鑫的贺耀组、邹鹏振、林拔萃等率部退往益阳、常德一带，赣军唐福山部逃回江西萍乡，吴佩孚所派的各部援湘军先行撤到湘东北。叶开鑫率所属部队撤入长沙，也无心据守，溃兵在市内大肆抢劫，造成城内一片混乱。

为了迎接北伐军和保护长沙市民，中共湖南区委领导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迅速组织起一千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在市区缉拿溃兵，维护治安，并动员民众欢迎北伐军。这些使叶开鑫部更为惊恐。7月10日夜间，离城北逃。工人保安队控制了市区。11日晨，北伐军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在工人保安队和市民的欢迎下进入长沙。同日，第八军追击部队在长沙水陆洲将叶开鑫下属的第二旅包围缴械，俘虏旅长刘雪轩以下两千余人。第七、第八军随即分兵向北追击，至7月12日，占领浏阳、宁乡、湘阴、益阳等城。

7月14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和长沙工会、农会、教育会和学联的代表赴湘潭迎接北伐军将领入城。16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举行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有二百多个团体，五万多群众参加。唐生智和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等将领也参加了大会。会议高度评价湖南各界人民支援北伐的功绩，胡宗铎说："唯以此次经过情形而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叶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62)

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任主席兼军事厅长，宣布废除赵恒惕主政时期的省宪法，解散省议会。同日，湖南人民讨吴委员会恢复。8月3日，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唐生智的呈请，任命了省政府的

其他成员：民政厅长冯天柱、财政厅长刘岳峙、教育厅长周鳌山、建设厅长邓寿铨、秘书长修承浩。8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通过了扶助工农运动的宣言。在当选的29名执、监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夏曦、周以栗、易礼容、熊亨瀚、谢觉哉、何叔衡等十余人。

唐生智看到工农运动的巨大威力，想借助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势力，公开表示支持省内工会和农会的活动，并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进步要求，同时还请中共向第八军派遣政工干部。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民众，“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使北伐更多具有革命的意义”[(63)]。根据通告精神，中共湖南区委利用省内的有利形势，加快开展工农运动。在以郭亮为委员长的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湖南省内迅速组织起有十余万工人参加的76个工会联合会。中共湖南区委又继续派出农运特派员深入农村各地，大力组织农民协会。从7月下旬到9月上旬，湘中、湘南和湘北各县农民协会发展迅速，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到四十余万人，能够直接领导农民200万以上。

中共湖南区委在开展工农运动时，把支援北伐战争作为重要内容。为了支持北伐军向湖北推进，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五批运送队，供北伐军差遣，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也组织有数千人参加的运输队、铁路破坏队和侦察队，随北伐军一起向武汉推进。在北伐军尚未到达的湘北地区，当地农民协会也组织起宣传队、慰劳队、向导队、运输队、暗探队、疑兵队、破坏队等，积极准备迎接北伐军，并对北军的后方进行袭扰破坏。工农群众对北伐的大力支援，为下一期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　长沙会议与汨罗江会战

入湘告捷坚定了广东国民政府首脑们的胜利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政府和北伐军的声望。原先游移于南北之间的西南各派地方势

力，这时的政治态度迅速发生变化。6月下旬，贵州军阀袁祖铭、王天培派代表赴粤，与国民政府洽谈，声言愿加入北伐。7月27日，袁祖铭致电国民政府，正式表示愿出发湘、鄂，效力党国，讨伐吴贼。随后，接受国民政府委任的左翼军总指挥职务。袁部彭汉章、王天培也分别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军军长之职，统归袁祖铭指挥。同月，驻赣南的赣军第四师赖世璜部正式投附国民政府，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湘军贺耀组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等也派人和国民政府联系，表示愿参加国民革命，并于8月13日通电讨伐吴佩孚。

长沙既克，下期作战方略成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思考和辩论的主题。7月16日，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致电蒋介石、李宗仁，分析形势，建议迅速进取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态度[(64)]。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唐生智、李宗仁主张同时进攻鄂、赣，胡宗铎仍坚持原议。会议通过唐、李主张，随即电告蒋介石，并草拟意见书，派专人送蒋[(65)]。

7月27日，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加伦和行营参谋长白崇禧等总部人员由广州出发，赶赴北伐前线。8月3日，抵达湘南郴州，一路受到民众和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鞭炮毕剥之声联珠裂帛，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以湖南为最有成绩"。[(66)] 8月5日，蒋介石与加伦、白崇禧等会议，研究下期作战计划。加伦顾虑到武昌时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67)]。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担任洞庭湖以东之线，为主攻，以第十军担任洞庭湖以西之线，为助攻，仅以少数兵力监视赣西[(68)]。10日，蒋介石会见来访的李宗仁，觉得李是一位"血心军人"，与他结为把兄弟[(69)]。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伦、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的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的

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蒋介石重提攻鄂、攻赣先后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仍依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70]。

在长沙期间，蒋介石先后发布进攻训令及《讨吴宣言》、《对外宣言》等文件，号召军民各界“奋我戈矛，挞彼国蠹；牺我生命，救我民生”。同时，要求各国“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革命”[71]。一场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8月14日，蒋介石检阅第七、第八两军。当检阅到第八军时，乘骑受惊乱跑，将蒋介石摔到地下，使蒋非常难堪[72]。15日，蒋介石又专程到株洲，检阅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一、第二两师。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排挤，该军取消了政治工作，入湘途中拉夫骚扰，军纪极坏。蒋介石对此烦恼之极，曾于7月26日致电指挥官王俊等人，要求严肃行军纪律，但并无效果[73]。在株洲，蒋介石作了长时间训话，以至“喉为之哑”。

蒋介石到长沙后即企图掌握湖南各方面的权力，他向唐生智表示：“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都要由党来决定。”[74]当时，唐生智正盛气十足，岂肯向蒋介石低头。自此，蒋唐矛盾日深。后来在武昌攻城战期间，蒋唐之间更闹到不能并立的地步。

唐生智的第八军迅速扩充至六个师，共二十多个团。为了制约唐生智，重振第一军，蒋介石一度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表示，希望维持第一军，维护总司令威信，并招请被迫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回去工作。8月25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称：“能与帝国主义者对抗的，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75]当时，中共中央采取的态度是：“现时对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迫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76]

根据长沙会议决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北伐前线各军编为左翼军、中央军、右翼军和总预备队，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战斗序列如下：

左翼军：由新归附的黔军编成的第九、第十军组成，袁祖铭任总指挥，受命从湘西常德一带向鄂西宜昌、沙市进攻。

中央军：由第四、第七、第八军组成，唐生智兼任总指挥，全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受命从湘东北汨罗、平江一线向岳州、蒲圻进攻，然后向武汉推进。

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和新归附的赖世璜的独立第一师、第五军的第四十六团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受命警戒江西方面。

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第二师和第六军组成。

进攻开始后，由于孙传芳坐山观虎斗，右翼军8月间未进行战斗。左翼军方面，黔军将领袁祖铭、彭汉章等拥兵观望，只有编为彭部第一师的湘西地方武装贺龙所部作战努力，于8月15日攻占临澧。在汨罗江前线担任主攻的中央军，事实上成为这一阶段作战的主要力量。

北伐军中央军当面之敌为叶开鑫、李倬章指挥下的湘军和护湘军，连同吴佩孚派来的各路援军，总兵力号称10万人。北伐军攻占长沙虽使吴佩孚感到震惊，但是因南口战事紧张，吴佩孚一时难以抽调主力，只调出豫军、鄂军各一部南下增援。北军以汨罗江为第一道防线，以羊楼司、五里牌、云溪为第二防道线，并以汨罗江北岸的平江城作为第一道防线中的核心据点。虽然北军在汨罗江一线经营工事达一月之久，但是因接连战败，又受驻地民众的敌视和袭扰，士气十分沮丧。北军内部派系复杂，相互不能很好联络，无法形成统一有力的指挥，与北伐军相比，已明显居于劣势。

8月19日，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在汨罗江前线向湘北发起总攻。第八军在左翼担任牵制助攻，先行于白水至新市一线强行渡河，以吸引北军。第四、第七军在右翼担任迂回主攻，总攻开始后即分别向平江和牛车铺、桃林方向进击。为了配合北伐军，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大批工农群众参加运输支前，并在敌后开展广泛的破坏活动。

在平江方向，北伐军以第十、第十二师和独立团共一万余人发起攻击，守敌为援湘军第五十旅旅长兼平（江）通（城）防御司令陆沄所部和桂军韩彩凤部，共计6个团，总兵力也有一万余人，第五十旅又系湘北守敌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8月19日拂晓总攻开始后，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缪培南部在平江以南发起正面进攻，因守敌顽强抵抗，未能突破阵地。同日上午，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得到中共平江地方党组织派遣的民团队引导，突破敌军阵地，迅速迂回到平江城北，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也在农民向导队协助下，突破汨水，和独立团会合，包围平江城。同日中午，叶、黄两部发起进攻，经一小时激战，占领全城。黄琪翔率军直捣敌司令部，敌主将陆沄仓皇自杀[77]。与此同时，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蔡廷锴部也在汨水上游的三眼桥渡河，占领平江东北的中洞岭，并夺取了当地敌军兵站。至此，第四军在兵力、火力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攻击精神和农民武装的协助，仅以一天的时间和官兵173人伤亡的代价，就夺取敌人中心据点，击溃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俘敌一千五百余人。随后，北军残部溃逃途中又被平江农会组织的农民武装杀毙二百余人。平江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北军防线的右翼，形成了包抄汨罗江沿线敌军并予以歼灭的有利态势。

第七军以第一、第二路共四个旅八个团在8月19日发起进攻，于黄塘、浯口市渡过汨水。在进攻中，第七军也得到当地农民武装的大力协助。李宗仁电称："敌人曾在阵地前埋伏地雷甚多，我军得农民引导，悉数将其破坏，故得安全通过。"[78] 第七军渡河后，在第四

军的左侧向前推进，经激战后攻占将军山。第四军攻占平江后，北军纷纷后撤，第七军即以第八旅为前锋向堤头方向追击。

第四、第七军突破汨罗江右翼防线后，第八军当面的北军叶开鑫、宋大霈部面临被包围的威胁，慌忙于8月19日晚炸毁汨罗江桥，向岳阳方向退却。20日，北伐军第八军主力在唐生智指挥下渡过汨罗江，沿武（昌）长（沙）铁路向北追击，于当日夜间占领黄沙街，21日占领桃林街。北军的汨罗江防线至此全线崩溃。

汨罗江败后，北军试图在岳州、五里牌、通城一线固守，但是官兵已无斗志，内部更加混乱。北伐军根据预定计划，以右翼第四、第七军向通城、蒲圻追击，准备断敌退路，再会同沿武长铁路追击的第八军，将北军歼灭于黄盖湖以南地区。

8月21日，第四军以第十师为先导，向通城、蒲圻发起追击，第七军则向南冲、长安桥追击。与此同时，第八军主力向岳阳发起进攻。叶开鑫的湘军和宋大霈等部援湘军见正面和侧后都受到威胁，慌忙向临湘、蒲圻实行总退却。是时，各路北伐军全线猛追，“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而逃”[(79)]。

湘鄂边界多崇山峻岭。第四、第七军官兵来自南方，习惯于山区作战，又有当地民众送水送饭和引路，因而前进迅速。北军官兵大都不习惯山区环境，当地民众因历年来受北军烧杀淫掠之祸，到处袭击溃败的北军。北军感到四面受敌，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8月22日，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攻占九岭高地和通城，切断北军退往湖北的重要通路。然而，由于北伐军各部在进展中联络困难，第七、第八军将领又急于争先抢功，任意发展，未能和第四军很好协调，结果，第四军因孤立突出，兵力不足，未能封锁通城至羊楼司之间近百里的空隙地带，溃败的北军大部由此逃走，全歼敌人于黄盖湖以南的计划因而未能实现。

8月22日，北伐军第八军占领岳阳，并以一部追击至五里牌、羊楼司。鄂军宋大霈部抢夺火车北逃，一小部分被截阻后投降。未能抢到火车的叶开鑫部湘军一部乘船逃向洞庭湖西的华容、安乡，一部向第八军投降。至8月23日，汨罗江会战基本结束。

在历时五天的汨罗江会战中，北伐军击溃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主力，俘敌七千余人，吴佩孚的势力基本上被逐出湖南，进军湖北的大门由此洞开。

三　汀泗桥、贺胜桥大捷

北伐军取得汨罗江会战的胜利后，前锋直指吴佩孚的统治中心武汉。刚被吴佩孚重新任命为湘军首领的赵恒惕和吴佩孚留守两湖的部将陈嘉谟、李倬章接连致电吴佩孚，报告败绩，并说："非帅座亲临，万难挽回。"[(80)] 吴佩孚和张作霖自8月14日联合攻占南口，打败国民军后，正围绕着北京政权问题进行势力争夺，得知湖北告急后，吴佩孚被迫于8月21日离长辛店南下，只在该地设留守司令部，留齐燮元主持北方事务，将北京城让给了张作霖。吴佩孚的精锐刘玉春、陈德麟等部也南调湖北。8月25日，吴佩孚到达汉口，翌日召开将领会议，决定以宋大霈、董政国率前线退军固守汀泗桥一线，以刘玉春等部随后赴援，必要时准备开掘金口大堤，水淹北伐军。同时，吴佩孚又电催孙传芳由江西出兵湖南，攻击北伐军的右翼。

北伐军根据长沙会议确定的直捣武汉的目标，于汨罗江会战胜利后迅速向北进击。8月23日，第四军在通城截获吴佩孚密电，知其已率部南下增援。同日，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党代表廖乾五等在通城召集第四军各部指挥官开会，一致认为应乘敌主力未到前抢占天险汀泗桥。会后，叶挺率独立团作为第四军前锋，于8月25日抢占中伙铺车站，将乘火车向北撤退的敌人一个团截住，俘敌四百余人。蒲圻方面之敌因后路被截断，被迫向尾追的第七、第八军投降。同日晚，第四军主力赶到汀泗桥当面。全军经过七天连续作战，在崎岖山间追击

四百多里，官兵已十分疲劳，为了不失战机，全军未经休息即于8月26日拂晓向汀泗桥发起攻击。

汀泗桥为粤汉铁路上的重镇，距武昌约六十公里，西北端是湖泊，因夏季水涨，其外围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又是崇山峻岭，仅有百余米的铁路桥从镇西南的河面上穿过，因而成为武汉以南最险要的门户。当北伐军赶到汀泗桥西南端时，宋大霈、董政国已纠集湘鄂军残部和来援的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多人，占领汀泗桥东北的险要地段，并抢修了工事。宋大霈被吴佩孚任命为总指挥，设司令部于贺胜桥，统一指挥前线守军。

8月26日白昼，北伐军第四军分路进攻汀泗桥正面阵地，因地形险要和敌军火力猛烈，均未得手。傍晚，陈可钰到火线视察，感到正面攻击夺桥困难。当时，敌军援兵很快就要南下，情况紧迫，独立团团长叶挺和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建议夜袭，经陈可钰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等研究决定：陈可钰率主力利用夜色由正面攻击，张发奎率独立团和炮兵营由东侧迂回，插向敌后重镇古塘角。

当日午夜，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一部偷渡过河，迅即以猛烈的冲击，夺取敌中央阵地赤岗亭等处制高点。至27日拂晓，第二十九、第三十团也由正面突入敌军阵地，和反扑之敌反复争夺。此时，独立团由右翼迂回，插入敌军侧后。汀泗桥前线吴军因前后受敌，很快发生混乱，第三十五团乘机于27日上午7时半冲过汀泗桥铁桥，攻入汀泗桥镇街区。吴军各部丢弃阵地，纷纷向北溃逃，其间因混乱拥挤，许多人落水。逃窜不及者则纷纷向北伐军投降。

27日上午9时，叶挺率独立团攻占敌后重镇古塘角，因溃逃的吴军大部已越过该处，沿武（昌）长（沙）铁路北窜，独立团遂跟踪向咸宁方向猛追。张发奎要求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里，叶挺在追击中发现，汀泗桥至咸宁一线地形险要，铁道两旁均为水淹，如不迅速追击，待敌在此狭路上组织防御，将会给攻击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叶

挺率独立团冒险前进，在两小时内追击30华里，于上午11时占领咸宁，俘虏城内尚未撤退的吴军。这一见机进取的果敢行动，事后受到陈可钰和友邻部队的赞扬[81]。

第四军在吴佩孚主力南下前，以万余人的兵力向数量占优势的汀泗桥守军进攻。两日之内，夺占汀泗桥和咸宁，并毙敌千余人，俘敌二千四百余人，缴获大炮4门，步枪三千余支、自身仅伤亡379人。这一胜利，打开了武汉以南鄂境内最险要的门户，为北伐军在贺胜桥同吴佩孚主力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军在汀泗桥战斗时，第七、第八军也在其后沿武长铁路推进。第七军于8月27日占领崇阳，28日占领蒲圻，并前进到咸宁和第四军会合。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于8月26日至28日在岳州下游的临湘地区渡过长江，占领新堤。第八军下辖的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也继何键部之后渡江。当时，吴佩孚集中兵力于武汉以南，长江左岸兵力空虚，吴军在长江中的舰只也撤往武汉附近，因此，第八军渡江部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顺利由江左湖泊地带向汉阳推进。

北伐军占领汀泗桥、咸宁之后，前锋已接近贺胜桥。贺胜桥西濒黄塘湖，东依遍布蒿草丛林的杨林塘，四周为波状地和小湖沼，不便于作战双方发扬火力，但对攻击精神旺盛、擅长于短兵相接的北伐军是有利的。吴佩孚因汀泗桥天险已失，只得选择贺胜桥作为决战战场。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其精锐第十二、第十三混成旅、军官团和刘玉春的第八师、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主力，分乘火车赶到贺胜桥，又纠合汀泗桥败退下来的宋大霈、董政国等部，总兵力号称十万人，并配有铁甲列车和野炮、山炮数十门。吴佩孚命所部配置两道防线，根据丛林港汊的地形抢修工事，同时布置刘玉春、陈嘉谟各备大刀队在前线押阵。吴自己乘坐竖着“吴”字大旗的专列巡行督战，“限三日夺回汀泗桥”[82]。

8月27日，蒋介石到达蒲圻车站。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建议尽快乘

胜进攻武汉三镇，蒋介石表示赞成，随即下令进攻贺胜桥。28日，唐生智赶到咸宁，要求乘吴军阵地未巩固之前，迅速行动。经与前方将领商讨，最后决定：第四军一部沿武长铁路，一部在铁路左侧，为主攻；第七军在铁路右侧助攻；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八军第八团为总预备队，确定8月30日凌晨开始总攻。

总攻开始前，第四、第七军进行了热烈的政治动员。部队因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纷纷求战。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的担架队、运输队，中共湖南区委组织的武长铁路工人交通破坏队等络绎赶到前线。当地农民因连日遭到北军抢掠，愤而为北伐军充当向导。北军虽有吴佩孚本人督战，但败退下来的各军已无斗志，新调来的部队则为北伐军的威势所震慑，十分恐慌；内部的派系又难以协同。因此，第四、第七两军的攻击部队虽然只有二万多人，但战斗力则远优于吴军。

8月29日，第四、第七军攻击部队向贺胜桥敌前展开，吴军也以一部自阵前出击。下午，第七军前卫第八旅钟祖培部进至袁家铺时，与吴军遭遇，吴军依靠铁甲车作掩护反攻。钟部得到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增援，击退吴军。

同日下午，第四军以第十二师和独立团为前卫向横沟桥推进，晚七时，进至吴家湾、大路廖一线，遭到吴军火力阻击，被迫停顿。到午夜时，吴军仍持续猛烈射击。张发奎、叶挺分析敌情，认为久滞不利，决定利用夜色和地形复杂的情况，展开部队，坚决进攻。8月30日拂晓前，第十二师和独立团迎着吴军的密集火力，全线发起冲锋。由于夜暗和通讯设备落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和指挥十分困难，只能各自为战。官兵们以高昂的斗志自行向前方目标猛冲。与此同时，第七军在第四军右侧发起全线冲击。当面的吴军本已十分恐慌，夜暗中又难以协同和指挥，在火力阻击无效并遭到北伐军猛烈冲击后，各部纷纷自行放弃前沿阵地，向后溃逃。至8月30日拂晓，第四、第七军突进到吴军第一线主阵地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等地。

吴佩孚见第一线主阵地危急，于8月30日拂晓集中其精锐第十三混成旅、第八师和第二十五师一部，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反扑。突进到北路学校附近的独立团首当其冲，一时三面被围。独立团在叶挺指挥下顽强抗击，顶住了吴军的反攻。第四军指挥官根据独立团当面的敌情，以预备队第十师投入火线。双方在阵前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第四军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很快杀退了吴军，于上午7时许冲破铁路沿线吴军的第一道防线。

吴佩孚见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急令刘玉春、陈嘉谟率卫队制止所部后撤，违者格杀勿论。同时，出动铁甲车沿铁路线攻击北伐军。此际，铁路工人组织的交通破坏队冒着吴军炮火，破坏铁路，使吴军铁甲车被迫后退。第四军各部乘势冲击。上午9时，独立团首先抢占杨林塘，随即在第七军出击部队的策应下，直逼吴军第二道防线的主阵地桃林铺。攻击中，独立团第二营营长许继慎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部队前进。吴佩孚见主阵地受到威胁，命刘玉春率精锐第八师再次反扑。叶挺所率的独立团因冲在最前面，又一次遭到敌优势兵力的三面攻击，但独立团官兵就地防御，顽强地顶住了吴军的反扑。第四军第二十八团在蔡廷锴率领下随即赶来增援，其余各团也向吴军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同时，李宗仁指挥第七军主力攻击贺胜桥东侧的石南山、余家坪，并以一部插入吴军侧后，攻击南桥。在第四、第七两军的猛烈攻击下，吴军各部无心再战，纷纷向贺胜桥铁桥及其以北地区溃逃。上午10时，吴军第二道防线崩溃。

吴佩孚在贺胜桥铁桥上督战，见各军蜂拥后退，怒不可遏，命督战队、大刀队在桥上截杀。他并手刃退却的旅长、团长十余人，在电线杆上悬首示众。但是各部已不听命，溃兵们纷纷射击督战队、大刀队。一时互相混杀，吴军更形混乱而无法控制。北伐军第四军先锋乘势冲到贺胜桥铁桥边，弹中吴佩孚所乘列车。吴急令开车，向武昌逃跑。此时，数千吴军官兵正拥挤在铁路桥和桥北端一带，火车从人群中碾过，大批官兵被压死或被挤落水淹死，桥上、桥下积尸累累，许

多未逃过铁桥的吴军被迫向北伐军投降。第四军随即冲过铁路桥，完全占领了贺胜桥主阵地。

第七军在石南山、余家坪一线的进展较为迟缓，经反复冲击，至30日黄昏仍未攻入余家坪。入夜后，第七军当面吴军因贺胜桥主阵地已失，遂向武昌、金牛镇撤退。同日，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八军第三、第四师奉命向贺胜桥推进，未及到达，夺桥战斗已经结束。

8月30日下午1时，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到达贺胜桥，为扩大战果，陈可钰发出追击命令。因第十二师和独立团伤亡较重，暂留贺胜桥休整，以第十师沿铁路线向北追击。同日晚，第十师进抵绛仙桥。

8月31日晨，贺胜桥一带的吴军已全线溃逃。第四军第十师和第七军第二路向武昌追击前进，第七军第一路向金牛镇追击前进。同日晚，第四军第十师进抵武昌城郊的洪山。吴军沿途丢弃枪械弹药，一部逃入武昌城，一部逃过长江，贺胜桥战斗至此结束。此次战斗中，吴军死、伤、被俘和逃散的官兵总计在二万人以上，北伐军仅伤亡830人。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两湖战场上一次决定性的会战。通过会战，吴佩孚军阀集团受到了致命打击，北伐出师时预定的首先打倒吴佩孚的任务接近完成了。

四　攻克武汉

8月30日，吴佩孚由贺胜桥逃回武汉。31日晚，北伐军第四军进抵武昌城郊，攻取武汉的作战就此开始。

武汉是华中的政治经济中心，拥有全国著名的汉阳兵工厂，是吴佩孚统治华中的重要据点。31日，吴佩孚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坚守武汉三镇。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鄂军将领刘

佐龙为湖北省省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命陈嘉谟、刘玉春率贺胜桥败退下来的吴军精锐一万多人守卫武昌，刘佐龙率其所部鄂军第二师一万余人守卫汉阳，高汝桐、宋大霈等部守卫汉阳。同时，在长江和汉水水面布置军舰和炮艇。吴佩孚本人坐镇汉口查家墩司令部。为了加强兵力，吴佩孚并决定放弃保定地区，将驻守当地的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各部抽调南下。此外，吴佩孚又电催孙传芳尽快出兵湘鄂。

北伐军第四、第七军主力于9月1日抵达武昌城下，第七军第一旅于9月2日进抵樊口、鄂城，切断武昌守敌与外界的陆路联系。同时，第八军主力由长江左岸逼近汉阳。为配合北伐军，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武汉工代会发动各行业工人群起策应。铁路、轮船工人破坏和阻碍吴军交通。汉阳兵工厂工人于9月1日开始总罢工。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还秘密策动湖北地方系将领刘佐龙归顺北伐军，刘佐龙也表示愿在北伐军抵达汉阳时反正。武汉三镇中，只有武昌守军兵力较强。武昌城墙高厚，城内又有蛇山居高临下，宜守不宜攻，因而夺取武昌的任务倍加艰难。

北伐军抵达武昌城下后，城上的吴军一面不断向北伐军射击，一面抢修环城防御工事。9月2日，出师以来一直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也赶到武昌城下。同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武昌城外的余家湾召集李宗仁、陈可钰等将领开会，决定乘吴军防御工事未固和孙传芳援军未到，迅速攻城。当日深夜，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十师、第七军第二师各奋勇队奉命向城下隐蔽运动，准备用长梯爬城。9月3日凌晨3时左右，第一军第二师在忠孝门附近开始架梯，然而因事先准备不周，从居民中临时征集的梯子大都过短，登梯士兵无法爬上城堞。守城吴军发现北伐军爬城，立即以步、机枪射击并投下大量手榴弹和燃烧物，使第二师官兵在城下伤亡累累。与此同时，第四、第七军隐蔽接近城下的部队也被吴军发现，遭到密集火力的攻击。吴军还以蛇山上的火炮和长江中军舰上的舰炮向武昌城外的北伐

军射击。北伐军因掩护火力不足，无法压制吴军。天亮前，暴露在城墙下的攻城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

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伦等人乘车到达余家湾，随即至洪山麓视察城墙及城内敌情。蒋介石自恃有惠州攻城的经验，对唐说：明天拂晓，第一军第二师将“带头冲锋”，要求各军“跟着冲上去”[83]。当日，召集各将领紧急会议，蒋介石未仔细分析敌情和了解攻城的困难，就下令再度强攻，确定由李宗仁、陈可钰担任攻城正、副司令。唐生智对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已丧失信心，坚决要求蒋介石将该师调赴江西，蒋介石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84] 他训斥刘峙说：“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望奋勇拼死，维持尔等光荣之历史。”[85]

9月4日晚，第一、第四、第七军仓促准备。各师都挑选奋勇队300至500人，配备云梯、手枪、手榴弹、绳索等，作为攻城部的先导。9月5日凌晨3时，蒋介石颁发第二次攻城计划，指示各将领“肉搏猛冲”[86]。北伐军炮兵当即向武昌城内和城墙上的吴军阵地开火，攻城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向城墙下冲击。第四军担负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一线的攻城任务，独立团第一营作为奋勇队进攻宾阳门。该营营长曹渊（共产党员）指挥部队迎着城上吴军的火力，涉过护城河，冲到城脚下，挂梯多具，奋勇攀登。但是吴军火力密集，第一批爬城官兵全部牺牲，后续人员仍前仆后继，爬梯攻城。20分钟内，独立团第一营奋勇队几乎全部覆灭。营长曹渊指挥所剩十余人坚持战斗，也中弹牺牲。同时并肩攻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伤亡二百多人，第十师奋勇队伤亡过半，进攻被迫停止。

第七军以第二路的两个旅向中和门、保安门和望山门发起进攻。当地因城外民房靠近城墙，第七军奋勇队大都将云梯架于民房之上，然后登梯爬城。城上的吴军准备了许多炸药包、燃烧罐和手榴弹，这时一齐抛下，城外民房一片火海，第七军奋勇队随即后撤。第一军第

二师进攻忠孝门至武胜门一线，其奋勇队虽几次冲到城墙下，都被城上守军的密集火力击退。师长刘峙唯恐其他部队已攻城得手，为抢夺头功，竟通报称，第二师第六团已攻进城内[87]。第四、第七军得讯后，调动预备队再次进攻，结果又付出许多伤亡。9月5日天亮后，第四军已冲到城墙下的奋勇队在敌军火力下进退不得，只得暂伏于城壕之中待天黑撤出，后续部队因无法再攻，暂时退向安全地带。在城墙下牺牲的官兵遗体，也无法收取。当日上午，蒋介石得到第二师入城消息，信以为真，非常高兴。后从白崇禧处得知，消息不确，“愁急不知所为”[88]。

北伐军两次攻击武昌失利，伤亡二千余人。9月5日，蒋介石和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前线视察后，也感到硬攻无望。6日，蒋介石和各军将领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少数兵力在城外对敌保持警戒，主力撤到城外较远的地区集结整顿。

武昌攻城战虽受挫折，但唐生智的第八军却以四个师迅速攻下汉阳、汉口。9月3日，第八军逼近汉阳城郊，守敌刘佐龙召集鄂军第二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归顺革命军。5日，鄂军第二师调转炮口，轰击汉阳龟山上的吴军高汝桐师的指挥所，北伐军第八军第一师何键部乘势冲进汉阳城。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汉阳工人武装也起而响应，解除汉阳兵工厂内吴军的武装，并用厂内的武器向吴军阵地射击。吴佩孚忙令守卫汉口的靳云鹗率兵过汉水向汉阳反扑。不料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的司令部又遭到刘佐龙部的炮火袭击，吴佩孚惊恐之下，立即乘火车北逃，汉口、汉阳的吴军顿失指挥，陷入混乱。9月6日晨，吴军高汝桐师放弃龟山阵地，渡汉水向汉口逃窜。由于溃兵在浮桥上和渡船上混乱拥挤，上千人溺水淹死。同日，北伐军第八军完全控制汉阳。当晚又强渡汉水，攻入汉口市区，吴军各部纷纷向城外逃走。7日上午，北伐军完全占领租界区以外的整个汉口。长江中的吴军舰船不得不向下游逃遁。至此，武昌城内吴军与外界的联络完全被切断，陷入四面被围的困境。

吴佩孚从汉口逃走时，命令陈嘉谟、刘玉春在武昌固守待援，随后又设司令部于武汉以北的孝感，急调北方援军南下准备反攻。为了不使吴佩孚站稳脚跟，9月8日，唐生智命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第四师刘兴部和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进攻孝感。9日，吴佩孚将司令部移往河南信阳，第八军随之向鄂北追击。14日，第八军进抵广水以北，击退吴军以铁甲车为掩护的反扑，于15日进攻鄂豫两省之间的交通要冲武胜关。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第八军以一千二百余人伤亡的代价，击毙吴军七百多人，俘虏五百多人，缴获铁甲车三列，攻占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鸡公山一线，吴军残部逃往河南。

北伐军主力向武汉进攻时，北伐军左翼战场上的袁祖铭、彭汉章等黔军将领仍拥兵观望，只有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作战积极，于9月上旬在湘西慈利、澧县一带击溃湘军叶开鑫、刘铦在当地的部队。9月13日，北伐军左翼贺龙、吕超、杨其昌各师由澧县誓师出发，向鄂西的石首、公安推进。14日，贺龙部击溃吴佩孚属下的鄂军王都庆部，占领公安。9月下旬，贺龙、杨其昌部又在沙市以南击退吴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所率第二十六师于学忠部和王都庆部的反扑，于28日攻占沙市，卢金山率部退往宜昌。作战中，当地民众积极支援北伐军。贺龙在报告中称：此次作战“竟能以少胜多，固由于士卒猛勇敢战，而农民暗中援助，如报告敌情，向导追击等，收效亦宏”[(89)]。左翼北伐军攻占沙市，从西侧掩护了北伐军对武昌的围城战。

9月上旬，北伐军第七军第二路占领鄂东数县，使固守武昌的吴军更为孤立。同月15日，为了迫使守城吴军尽快投降，北伐军发布封锁令，禁绝武昌城内外的一切水陆交通，同时，北伐军还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两架飞机连续向武昌城内吴军营地投弹并散发传单。其间，因北伐军开辟江西战场，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二师相继调往江西，围城任务由第四军、第八军一部和刘佐龙部编成的第十五军担任。17日，蒋介石任命邓演达为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另设湖北临时政务会议，主席由蒋介石自兼，入赣期间，由唐生

智代理。同日，蒋介石离开湖北前线，将该省军事交唐生智办理，同时升任陈可钰为攻城司令。

在北伐军围困下，自9月中旬起，武昌城内开始出现粮荒，吴军士兵在城内挨家搜掠民粮，各商号存粮也被封作军粮，不许市民购买，武昌市内20万居民大都靠树叶、草根充饥。陈嘉谟、刘玉春却遵照吴佩孚的命令，坚持顽抗。为了保存力量和争取时间，陈、刘二人又通过武昌文华大学的美国人和武昌商会作为中间人，向北伐军交涉，要求暂停攻城，允许守城军领饷20万元后携带武器，整队撤退。北伐军坚持要求守军无条件投降，磋商没有结果。

9月21日，北伐军再度向武昌城发起试探性攻击，吴军的抵抗仍很顽强。北伐军随即挖掘坑道，以爆破攻城。第四军独立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六团等部在赶到前线的安源矿工和黄埔军校工兵营的协助下，在通湘门、宾阳门和武胜门外多处挖掘坑道。经旬日顽强挖进，至10月1日时，各坑道都已接近城墙。

9月25日，孙传芳军队一部于鄂东黄石港登陆，向大冶前进。刘玉春闻讯后立即组织奋勇队，企图乘机出城，破坏坑道，抢粮，并和孙传芳部取得联系。10月1日清晨，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吴军精壮二千余人分别由通湘门、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第四军各部当即予以迎击。经过一上午激战，独立团将通湘门冲出的千余名吴军消灭大半，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也将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的吴军大部消灭，残余吴军逃回城内。10月3日，吴军再度冲出城外，仍被击退。5日，进犯大冶的孙传芳部乘舰东逃，武昌守军苦守待援的希望破灭了。这一时期，北伐军的飞机连续轰炸吴军司令部、电台和蛇山炮台，加之城内缺粮，民众反抗日增，吴军军心动摇日甚，各部多自行向北伐军洽谈投降。

10月7日，北伐军攻城司令部向守城吴军提出条件，限于10月10日开城，由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收编。对此，守军大都表示同意，但

刘玉春却阻止各部接受这一条件。吴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等遂单独与北伐军接洽，于10日凌晨4时打开保安门。于是，唐生智、陈可钰指挥第四、第八军各部同时向武昌城发起总攻。攻城部队以一部冲进保安门后，为了不误战机，还从多处城墙用绳梯攀登而入，随即打开中和门、通湘门，后续部队纷纷涌入。守城吴军因惊恐和饥饿，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刘玉春率其第八师的部分部队，在蛇山一带继续抵抗。

第四军独立团由通湘门冲入城内后，首先向蛇山发起进攻，第四军主力随后也赶到蛇山脚下。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独立团首先冲上山顶，吴军纷纷投降。

第四军破城时共俘虏吴军军官740人，士兵9495人。武昌守城主将陈嘉谟、刘玉春化装潜逃，由于北伐军搜索严密，陈嘉谟在准备出城时被第八军查获，刘玉春被第四军搜出。至此，历时40天的武昌攻城战结束。同日，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召开国庆纪念会。会上，宣布武昌克复的消息时，群情沸腾，据郭沫若记载："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90)] 次日，邓演达率总司令部行营人员进入武昌，救济灾民。

从北伐出师至攻克武昌，第四军一直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官兵作战英勇，被人民誉为"铁军"。其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战功卓著，团长叶挺、黄琪翔被破格授予少将军衔[(91)]。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极大地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久，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由广州移到武汉。

第三节　江西、福建之战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为富庶之区，孙传芳于1925年11月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便提出“保境安民”口号，一以杜外人觊觎，二以迎合东南资产阶级的愿望。还在北伐军入湘前，孙传芳就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92]。北伐军入湘后，孙传芳又于1926年6月12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不加入任何漩涡”[93]。吴佩孚曾派人到宁，要求孙传芳援湘，但孙企图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占领两湖，坐收渔人之利。7月27日，孙传芳接见国闻社记者时，以一付悲天悯人的姿态说：“循环无已之战争，国人孰不痛心？天下无可以杀尽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论，治军必先爱民。”[94] 28日，孙传芳命亲信、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杨文恺赴长辛店，向吴佩孚进言，将北方之事完全交给奉方主持，刻日南来，对付湘粤。但吴佩孚正热衷于指挥南口之战，完成包围国民军的计划，无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孙特别设法，加强“讨赤军”的团结，对湖南战事“多为帮忙”，“量力予以相当之接济”[95]。对此，孙传芳的答复是，“无力遥顾湘战”[96]，他仍然要求吴佩孚“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然后“回师南下，坐镇长江”[97]。当北伐军节节前进之际，孙传芳却在南京优哉游哉地修明礼乐。8月6日，举行投壶新仪，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98] 同时，又组织修订礼制会，聘请章太炎、沈彭年、汪东等一批名流为会员，以章太炎为会长。孙传芳称：“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99]

当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其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则企图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100]。8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101]。11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七项，其要者为：

一、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二、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三、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共作和平运动；四、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102]。9月8日，全浙公会常务董事会紧急会议，公推蒋尊簋、殷汝骊、沈田莘三人赴宁，向孙传芳请愿。13日，又决定派蒋尊簋、魏炯二人赴汉口，和蒋介石接洽。其后，江苏派出袁观澜、黄炎培、赵正平，福建派出方声涛、史家麟，安徽派出许世英、王龙亭，江西派出徐鹤仙等人，参加和平运动。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和平组织纷纷涌现。有一个名为“五省和平祈祷会”的组织，甚至致电张天师，邀请他莅沪“设坛醮醮”。[103]

进步力量企图以和平运动牵制孙传芳出兵，乖巧的孙传芳则将和平的口号接过来，作为阻拦北伐军的口实。8月11日，他复电各商会，声称：“逞能肆态，驰骋角逐，以较一日之胜负，残民、蠹财、溺国，芳虽愚，绝不为也。”他表示：“金革之声频惊，不能不稍事整备，俾固疆圉。”[104] 9月10日，他在会见全浙公会代表时说：“破坏和平，在蒋不在我”，“只须蒋中正将入赣境之部队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赶一步”[105]。20日，会见江苏、上海和平代表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三项条件：一、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争；二、组织内阁，各方自由推戴人选，取决多数；三、召集南北和平会议，划分军区，匀配财权[106]。

尽管孙传芳故作从容，高谈和平，但是，北伐军的进军脚步毕竟不能使他平静，特别使他系念的是势力范围之内的江西。早在7月上旬，就传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长王普率部援赣。不过，由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拒绝，王普迄未接到动员命令[107]。邓虽然是五省联军成员，但始终依违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间，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7月31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会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援赣。自8月17日起，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陆续出发。19日，孙传芳通

电称：此举纯系防御性质，“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108]。20日，谢鸿勋部抵达九江，由邓如琢指定，驻扎赣北修水、铜鼓两县。其后，陆续到达赣境的孙军有卢香亭第二师、周凤歧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师八旅，约十余万人。月底，孙传芳任命原浙江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援赣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洲；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109]。9月2日，吴佩孚所派告急使者到宁，孙传芳爽快地表示：“即日电令各军火速出发，实行进攻湘、粤。唇亡齿寒，智者皆知。”[110]

部队虽然出发了，但孙传芳仍然在观察风色。他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1925年12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111]。次年2月、5月，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7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112]。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113]。8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114]。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濬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具体条件也”[115]。何成濬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8月下旬在南京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濬提出：一、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二、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

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表示：“停战未始不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116]。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北伐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则要求孙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117]。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118]。对何成濬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蒋又派张群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愿保持和平与中立。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其内容为：革命军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119]。

除代表之间的磋商外，孙传芳、蒋介石等人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9月6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已命部队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120]。7日，再电限24小时退回粤境[121]。蒋介石则提出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要求孙传芳撤退驻赣各军。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122]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9月7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南京。王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8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123]。9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124]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11日接踵而至。靳于8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建议张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

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125] 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13万大军进驻江西。11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126] 14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等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127] 16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内的军事，鲁方决不干预[128]。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初具雏形。9月19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129]。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9月14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130]。15日，英国公使麻克类（Sir 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因此仍持观望态度[131]。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21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发表谈话说："余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

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132] 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

二　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

北伐最初的战略是各个击破，集中力量首攻吴佩孚，因此军中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8月12日，长沙军事会议再度肯定了在攻克武汉后乘胜入赣的方针，决定以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监视江西，防御后方。但会后不久，蒋介石即企图改变这一决定。14日，电告何应钦、赖世璜、谭道源第二期作战计划，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133]。26日，再电何应钦，声称“武汉或不日可下”，催促赖世璜速占赣州[134]。27日，电告程潜，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先取赣州[135]。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于31日和加伦商量，加伦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136]，因此有犹豫之意，但蒋介石则决心已下[137]。9月2日，命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

这一决策的改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孙传芳出师援赣。孙军谢鸿勋师、杨镇东旅入赣后，即向赣西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进军，其目的在于进扰浏阳、平江、通城等地，威胁国民革命军的侧背，阻止其进取武汉。

其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长沙军事会议后，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29日的日记说：“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138] 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

其三是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猜忌。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

有记载。8月20日云："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图，以为倒蒋之伏线。"[139] 他觉得，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必须"奋斗自强"[140]。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他另图表现的决心。

当时，第二、第三军集中醴陵，第六军集中通城。为了加强力量，蒋介石并调第一军第一师至浏阳，为总预备队。9月2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在他本人未入赣以前，第六军暂归朱培德指挥。5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邓如琢本来和孙传芳有矛盾，又新遭父丧，曾于8月20日致电吴佩孚、孙传芳辞职，吴、孙不允，孙并授以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于是邓便"墨绖"出师。他采取诱敌深入策略，节节撤退[141]。9月6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军占领萍乡。7日，赖世璜部及谭道源师收复赣州。11日，第六军占领修水。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于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142]。

由于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不过六百人左右，因此，程潜决定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抢在朱培德之前奇袭南昌。苏联顾问康奇茨（Н．И．Кончиц）劝他等一等，与朱培德协调行动[143]，但程潜本来和朱培德有矛盾，不愿受其指挥[144]。他听从总参议杨杰的建议，命令十九师星夜兼程前进，抢先占领南昌[145]。

9月19日，第十九师便衣队二百余人潜入南昌，在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响应下，向邓如琢的骑兵团发动攻击。同时，第五十六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讯后越墙逃跑。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齐奏中跃马入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22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到会一万余人。当时，正值中秋前两天，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劳军。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传队，挂起煤油灯在街头演出，南昌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场景。

继第十九师之后，指挥总预备队的王柏龄也率领部分人员进入南昌，同时向总部报功。朱培德指挥的第二军、第三军本已离南昌不远，因听说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息了一天[146]。

按程潜原计划，当第十九师奇袭南昌之际，王柏龄所率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应向城西南浔铁路上的牛行车站急进，夺取该站，向北警戒。但直至20日晚，第一师仅有两营到达。次日，进攻牛行站，守敌为维持交通线，顽强抵抗。第一师战斗力不强，几乎无法支持，倚靠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的支援，至22日才逐渐得手[147]。

邓如琢获悉南昌失守，即由丰城回师。卢香亭也命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约两万人，由九江南下驰援[148]。孙军以优势兵力、火力反扑。王柏龄在进入南昌后，就进入妓院作乐，军中无主[149]。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23日晨，在万河一带被邓如琢部包围。经苦战，24日突围，渡过赣江，在万寿宫附近收容残部。其间，王柏龄及一军党代表缪斌不知去向，程潜因失去部队掩护，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倚靠江西老表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事后，白崇禧讥笑程潜的这次遭遇为“曹孟德潼关遇马超”[150]。此次战斗，第六军第十七师、十九师、第一军第一师损失了大部分兵力。

邓如琢军入城后，闭城大抢三日，任意杀人，以杀取乐。因为学生曾欢迎北伐军入城，所以凡学生装打扮者，均有性命之忧。据记载：“数龄小儿，亦被其砍作多块，满挂街衢”[151]。

第六军首攻南昌失利，但是第七军李宗仁部、第三军朱培德部却接连在箬溪和万寿宫两地奏捷。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江西萍乡。此前，他虽然早就下了亲自指挥赣战的决心，但还是于9月3日到了武昌城下。在进攻武昌过程中，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二师的腐败暴露得更加明显，他本人和趾高气

扬的唐生智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他于8日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日记云："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152] 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25日，指令李宗仁率第七军由兴国乘虚猛攻九江，断敌归路，并设法与程潜取得联系。但李部遵命进入赣境后，却不知第六军去向。李宗仁感到如继续向九江进军，将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中。他决定改变战略，舍弃九江，移师南向，找寻第六军。苏联顾问马迈耶夫（И．К．Мамаев）坚决反对，声言"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但李宗仁执意不变，结果，在箬溪与孙军谢鸿勋部相遇。9月30日，李宗仁下令全军出击，鏖战近一日，谢军全线崩溃。李部俘获二千余人[153]。谢鸿勋受重伤，不久在上海死去。谢本人是孙传芳的心腹，谢部是孙传芳的精锐，此役为国民革命入赣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3日，第七军乘胜进攻德安。德安位于南浔路中心，是敌人补给要站，有重兵驻守，且构筑有坚固工事，经激战后于当日攻克。

第三军自第六军退出南昌后，即驻扎于万寿宫附近。朱培德与程潜等会议决定，各军后退，诱敌前进，相机聚歼[154]。9月30日，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一万余人挟南昌战胜余威，向第三军阵地进攻。朱培德以第七师王均部任正面防御，以第八师朱世贵部迂回敌后，攻击侧背，并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激战至10月2日，占领万寿宫。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由于近在樟树，坐视不救，被孙传芳于10月3日撤职，以郑俊彦继任[155]。

第七军、第三军先后告捷，蒋介石估计歼灭孙军约过半数，便于10月中旬，以自湖北调来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

第二军原处赣江西岸，与驻守樟树的邓如琢部隔江对峙。9月底，各部陆续渡江。30日，蒋介石亲赴清江督师。10月5日，第一军第二师占领樟树[156]。6日，占领丰城。9日，第一军第二师与第二

军第五、第六两师到达南昌城下，敌军退入城内固守，使守城部队达到五六千人之数。为了使北伐军在城外失去进攻屏障，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等赏洋2万元，命令工兵营在城外纵火，延烧了两天。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不少繁华地区成为焦土，名胜滕王阁也在这次大火中被毁。12日晨，各师同时开始攻击，第六师各团并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架梯登城[157]，守军在城上以火力防守，进攻受挫。同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于夜12时爬城。

当夜，第二师第六团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六团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便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浮桥渡江，退往西岸[158]。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宁息"[159]。混战中，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160]在损兵折将的严酷现实面前，蒋介石多少表现了一点自我责备的意思。

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孙军小胜。10月15日，孙传芳的联军总部参谋处通电称："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161]。紧接着，孙传芳、吴佩孚等纷纷通电庆贺，声称"伫看楼兰将灭，痛饮黄龙"，他们忘记了这条消息只是"俘虏及百姓均称"，并未核实，就匆匆忙忙地宣传起来了。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同时，决定调第四军及贺耀组的独立第二师来赣。

这时，蒋介石的威望更为降低。唐生智多次向苏联顾问铁罗尼（Теруни）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162] 10月中旬，加伦亲赴武汉求援，说明江西战场的失败将威胁湖南、广东，北伐甚至可能因此垮台[163]。中国共产党人也极力向各方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164]。结果圆满。2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武昌乘轮东下。蒋介石得到有关消息后“如获至宝”[165]。

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之际，第七军又在赣北打了一次胜仗。攻克德安后不久，孙传芳命卢香亭等以重兵反攻。第七军因补给中断，并探悉敌人有包围之势，为避免腹背受敌，于7日退至箬溪休整。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宗因此被升为第六方面军司令。10月12日，李宗仁在王家铺一带发现皖军陈调元部。陈部依山布守，第七军自下仰攻，进展艰难。李宗仁考察地形后，改取中央突破，反扑两侧办法，又经第一军第一师增援，于次日攻克王家铺。

第七军入赣后，三战连捷，屡次击败强敌，对于江西战场形势的转变，有很大作用。后来，陈调元曾表示佩服，称之为“钢军”[166]。

除王家铺之役外，江西战事一时处于沉寂状态。

早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利之后，孙传芳便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10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要求孙传芳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史家麟、赵正平、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167]。加伦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一、浙江归国民革命军；二、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

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三、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168]。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要求孙传芳首先确定撤兵日期，限于11月1日前答复[169]。11月1日，蒋介石读到蒋方震复葛敬恩函。当时，蒋方震正在孙传芳军中参赞军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敷衍油滑，是诚军阀走狗不若矣，其人之肉不足食也。"[170]同日，战事再起。

国民革命军自放弃南昌后，主力集结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同时，白崇禧、加伦、蒋介石等积极制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在兵力配备上则分为三路：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等组成，朱培德任指挥。中央军，由第六军组成。左翼军，由第七军及新近调赣的第四军与独立第二师等组成。此外，另设总预备队，由第一军及炮兵团组成，刘峙任指挥。总攻击时间订为11月1日拂晓前。11月2日，第二军第四、第五两师从东、南两面进逼南昌郊区，陈兵城下。

右翼军左纵队以蛟桥为进攻目标。3日，第二军第六师、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等联合攻占该地。4日，攻瀛上、牛行。孙军自乐化来援。5日，第三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命补充第四团、警卫团加入战线，仍感不足，又致函程潜、刘峙，调第二师增援，加伦认为不必要。在加伦的镇定面前，蒋介石"甚惭自信力薄弱"[171]。果然不出加伦所料，阵地迅速稳固下来。7日，占领瀛上、牛行，切断南昌地区孙军主要退路。

中央军以乐化为进攻目标。11月3日，占领芦坑车站，并将铁道破坏。4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李宗仁等，指出涂家埠为敌军主力所在，要求他们迅速南下，与第六军一起夹击孙军。当晚，第六军在

总预备队第一、二两师与炮兵团支援下，占领乐化[172]。5日晚，第六军与南下的第七军联合攻占涂家埠，残敌向鄱阳湖畔的吴城溃退。6日，第二师追击至吴城。

左翼军以德安、涂家埠为进攻目标。11月2日，第七军逼近德安，与孙军第六方面军三千余人发生激战，占领该城。同日，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在德安北部的马回岭与孙军交火。马回岭驻有重兵，战况激烈。在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第七军第一旅增援下，于3日占领马回岭。4日，孙传芳乘决川舰赴武穴，意在促使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173]。5日，贺师乘胜北上，占领九江、瑞昌。孙军见败局已定，失去斗志，于6日鼓轮东下，返回南京。周凤歧部不战退回浙江，陈调元、王普部退回安徽。

至此，南浔线及南昌城郊的孙军已全部被击溃，城内仅余唐福山等残部二三千人。他们表示要归方本仁收编，企图迁延时间。11月8日，蒋介石下令攻城，城内残敌投降。革命军入城后，“民众欢腾，往日萧条寂寞景象陡变为热闹市场，男女老幼，拥挤道途，争相瞻仰革命军旗帜之飘摇”[174]。同日，白崇禧率领由第二、第三、第七各军组成的追击部队，进至滁槎以东的汊口附近，孙军主帅郑俊彦只身逃走，下辖旅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请降[175]。

11月9日，蒋介石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歼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据朱培德电称：仅7、8、9三日，右翼军即缴获敌枪三万余支，各种大炮二十余门，机关枪三十余挺，俘获师长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3人，团长以下官兵5万人。左翼军、中央军在建昌、吴城方面缴枪二万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大炮数门，俘虏2万人[176]。至此，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但是，国民革命军也损失严重，下级干部牺牲者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团长牺牲者占半数，士兵伤亡约1．5万人[177]。

江西之役是国民革命军继两湖之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它使湘鄂得到屏障，同时打开了向长江下游进军的大门。

三　福建战场

当国民革命军在赣西北初次与孙传芳军接触时，在福建的周荫人接受孙传芳指示，积极企图进扰粤边。9月5日，周荫人宣布就任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15日通电称："即日誓师南下，为国除奸。"[178] 17日乘舰抵达漳州，召开军事会议，声言陆军将于23日攻粤，海军则联合陈炯明由潮汕进攻广州[179]。当时，国民革命军驻防潮州、梅县一带的军队，仅有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第十四师冯轶裴部、独立第四师张贞部等，计枪6000支，炮8门，而周荫人动员的部队则有第一师张毅、第三师李凤翔，第十二师第二十四旅刘俊等部，计枪三万余支，机枪六十余挺，炮二十余门[180]。双方力量悬殊，因此，蒋介石确定作战方案时，力主稳健，要求采取攻势防御，不可急切进攻。9月13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其对周荫人声明："如闽不派兵侵粤与赣，则闽、粤仍敦睦谊。"[181] 但是，何应钦则认为，由于北伐军在鄂、赣节节胜利，周军士气已馁，又多为北方人，不善山战，更兼竭力搜括，闽民恨之入骨，因此，致电蒋介石，详细罗列周军弱点，要求率师入闽作战。何的要求得到蒋介石同意，福建战役于是开始[182]。

周军的南犯计划分三路。东路第一师张毅部由福建漳浦、云霄、平和地区出动，企图进攻广东北部的饶平；中路第十二师第二十四旅刘俊等部由福建永定，经峰市进攻广东松口；西路第三师李凤翔部由汀州、上杭向粤北蕉岭推进。周荫人采取声东击西策略，公开的目标为饶平，而其攻击中心则为松口。在这三路中，西路和国民革命军有联系，国共两党均曾派人去活动。中国共产党所派为李清泉[183]，国民党所派为孙祥夫[184]。经过活动，有起义可能。因此，何应钦决定东路由独立第四师张贞部采取攻势防御，而将主力集中于中路。

其布置为第三师谭曙卿部驻扎松口，第十四师冯轶裴部及第五十八团驻扎于高陂附近。9月28日，何应钦由汕头到达高陂，设立大本营。30日，至三河坝，与电约输诚的周部李凤翔师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代表协商，得悉敌人的作战计划，作了相应部署。

10月5日，周荫人率卫队千余人到达永定，设立司令部，下令全线总攻。6日，周部主力到达闽粤边境的峰市。7日，占领松口，周荫人喜出望外，永定防备因而松懈。何应钦判定永定为薄弱点，决定以主力首先击破该地之敌。8日，曹万顺、杜起云在蕉岭起义，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一师、第二师师长。由于曹、杜起义，进犯闽粤边境的周军就失去了犄角之势。9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师与敌孙云峰部在永定城南接触，经激战后，敌退入城内。10日，敌由峰市来援，第三师几乎不支，何应钦亲率总预备队参战。当地人民由于痛恨周军，自动割电线，破坏交通。周荫人与各部失去联络，于当日下午率亲信十余人越城逃跑。余部竖白旗请降，北伐军入城，俘虏官兵一千四百余人。

永定既克，何应钦决定迂回敌后，歼灭松口之敌。11日，占领峰市，随即以谭曙卿师为右纵队，冯轶裴师为左纵队，将军队展开于大岭、狗尾岭一带。这样，刘俊部即处于前后被夹击的境地。12日，开始攻击，右翼先胜，左翼在右翼支援下，继获胜利。13日拂晓，两翼协同进攻，双方反复冲锋、肉搏，刘俊部逐渐不支。适值国民革命军第八团到达，当即加入火线。同时，第九团于拂晓从松口上游渡河，进击松口附近之敌。刘俊部不得不向松源溃逃，进入福建后又遭到新起义的第十七军堵截。刘俊仅率二百余人逃出，至连城，被民军击毙。刘俊所属的第十二师系袁世凯时期以模范营为基础编成，据说大小十余战中，从未战败，至此全部被歼。

综计永定、松口之役，生擒敌师长李宝珩，击毙击伤敌军官兵千余人，俘敌四千余人，缴枪约四千支，炮十余门。国民革命军伤亡亦达千余人。

由于何应钦将主力集中于中路，东线兵力薄弱。10月12日，张毅部攻占诏安、饶平[185]。但因周荫人兵败，张毅下令退却。独立第四师张贞部迅速追击，粤东境内肃清。

福建初战告捷。10月15日，蒋介石电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18日，指示何应钦乘胜平定闽南。同日，何应钦通电就职，移驻大埔。19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告以和加伦研究结果："如我力能胜张毅，则速进取，否则暂守边境，以待赣局发展"，但蒋介石表示，相信以第一军之力，"必能胜周克闽，新开东南之局"[186]。20日，三电何应钦，认为"此刻对闽作战，我已处于主动地位"，要求何"相机处理"[187]。何应钦接电后，即积极计划，做入闽作战的准备。

兵败如山倒。周荫人逃出永定后，退驻龙岩，所部已不能成军，再退永安。10月下旬，联络汀州李凤翔师，调集延平等处军队，在湖塘至龙岩的铜鼓山一带掘壕布防。不久，第十七军杜起云师进占龙岩，周荫人率卫队退往延平，重设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部，企图保守闽北[188]。11月，致电孙传芳乞援，孙已自身难保，复电称："实难兼顾，倘有余力，决不坐观失机，请固守勿攻，待时再举。"[189]

李凤翔师因曹、杜两旅起义，元气大伤，退守汀州。下旬，曹部奉何应钦命沿汀江两岸进攻。此际，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因已取得赣南，奉蒋介石命派谢杰师入闽协助作战，也已到达汀州城下。两师协同围攻。29日，占领汀州，李凤翔部弃城，逃向清流、宁化。

张毅部是唯一未遭严重打击的部队。在退往漳州途中，何应钦派人与张接洽，拟改编张军。张也虚与委蛇，派人与何谈判，且谈且走。到漳州后，确定一面佯守，一面与何谈判，以便争取时间，相机行事[190]。11月中旬，周荫人拟退往浙江，命张毅退驻福州。19日，张毅召集各界谈话，声称："漳州余不啻视为第二故乡，决不坐令赤潮侵入。"[191]但会后不久即退往泉州。11月8日，冯轶裴师不战而取漳州。21日，占领泉州。

张毅继续采取且谈且走策略。11月19日，派总参议许仁寿到同安会见何应钦，要求收编。何应钦提出照党军编制，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等6项条件，限22日答复，张以“过苛”为理由拒绝[192]。下旬，张毅部进抵闽江下游地区，受到海军的截击。

在国民革命军不断取胜，北洋军阀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闽系海军不能不考虑出路问题。当时，海军总长杜锡珪避居上海，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会商之后，决定由杨树庄出面，与广东国民政府驻上海的代表钮永建联系[193]。在此期间，闽系海军首领、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也与何应钦信使往还，达成归附革命军的协议。原海军陆战队的团长林志棠、林寿国被何应钦委任为东路军新编第一、第三师长。陈季良一面与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联系，表示愿全力确保福州，不许张毅部窜扰，一面出动舰艇及海军陆战队防堵。11月底，张毅部窜抵闽侯地区的乌龙江南岸，受到海军炮击，改由闽清方向北进，在瓜山地区为何应钦尾追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包围。12月9日，势蹙请降。张部一万余人被分割改编，张毅本人因纵兵扰民，残杀俘虏，被何应钦软禁，不久解往汕头，因企图逃跑，被枪决。

李生春和周荫人有矛盾，中共福州地委通过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进行活动，12月2日，李生春表示接受福州保安司令一职。3日，新编独立第三师入城，东路军兵不血刃地收复福州[194]。

为了消灭闽北敌人，原在江西的第二军第六师戴岳部于11月下旬奉调入闽，占领闽西北的建瓯[195]。12月初，赖世璜部攻占建阳、顺昌、将乐。在此情况下，周荫人于12月3日致电孙传芳表示：“环境受迫，孤军支撑极危，拟赴浙江与戎帅联成一气”[196]。孙传芳也命周“避免冲突，保全实力，相机撤往浙西”[197]。周接电后，即率残部经松溪、政和逃入浙境。

周荫人督闽期间，福建民军蜂起，聚集各处者近万人。其主要者为闽北指挥卢兴邦部、第二路指挥高义部、第五路司令叶定国部、第

二路司令陈国辉部、第一游击司令陈烈臣部、第二游击司令罗伟部、第三游击司令林志民部、第四游击司令林朝冠部、第五游击司令吕渭生部等。国民革命军入闽前后，各地民军纷纷前来联系。为了统一指挥，何应钦要求各路民军各派一人，组成参谋团，悉同动作，协助国民革命军作战，福建战场之所以进展迅速，和这支活跃在敌后的民军不无关系。

12月14日，蒋介石电告何应钦："李生春应根本解决。"[198] 18日，何应钦进驻福州，随即调集各路民军，编为新编第一军，以谭曙卿为军长。李生春于次年1月奉调率部北上，半途被缴械。

第四节　苏、浙等省的自治运动

一　浙江夏超独立

1926年9月初，国民党中央根据吴稚晖、钮永建、叶楚伧三人的建议，决定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以侯绍裘、吴稚晖、何成濬、朱季恂、张静江、叶楚伧、钮永建七人为委员[199]。其后，钮永建即到上海工作。他商请驻沪全浙公会负责人褚辅成等协助，企图利用浙江省长夏超和上海工人等方面的力量，在东南地区打开局面，截断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后路[200]。

夏超一向主张"浙人治浙"，不满意外省人统治浙江，对孙传芳委派的浙江总司令卢香亭尤为反感，因此，他利用自己长期在浙江警务部门工作的便利，积极扩展警察总队，企图形成一支可以和卢部相抗衡的力量。1926年春，孙传芳拟将夏超调至江苏，此事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矛盾[201]，促使夏超向国民党方面找寻出路。他一面派人赴广州联系，要求派军事干部来杭[202]，一面通过其驻北京代表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洽谈。9月，北京政治分会派许宝驹赴广州报告，同时派马叙伦回杭州进一步协商。马叙伦和夏有旧谊，很快取得信任，

作为夏超的代表前往广州，和张静江议定，委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事宜[203]。10月初，马叙伦偕许宝驹返浙，途经上海，和钮永建会商，决定由夏超提供10万元，作为上海起义经费，夏超在杭州发动起义后，即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也支持夏超独立。中共中央主张在北伐军占领两湖后，继续进取河南，长江下游则促使各军阀分头独立，形成纷乱局面，使帝国主义无法一致对付，并使民众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204]。中共中央计划在起义胜利后，由沈钧儒出面组织浙江省政府，沈雁冰为秘书长[205]。

当时，浙江地方武装分三部分：一是夏超的保安队，约八千人，分三个总部，由其亲信吴殿扬、章燮、章培分任团长；一是陈仪的第一师，驻防徐州；一是周凤歧的第三师，大部分随孙传芳出征江西，少部分留驻南京与杭州。周凤歧和夏超关系比较密切，在开赴九江前，与夏超有过秘密协议，约定如孙传芳在南浔路不稳，周即通电回浙[206]。周凤歧开赴九江后，夏超又派人以劳军为名，赴江西与周凤歧商量起义计划及撤军回浙日期[207]。10月12日，夏超致电周凤歧，声称由于褚辅成的多次斡旋，“与蒋方已无若何隔膜，拟即乘时举事”[208]。夏超并要周凤歧和陈调元共策进行，同谋倒孙。14日，第三师在南京的留守部队奉周凤歧命离宁回浙，在赣部队也曾计划横渡鄱阳湖东返，但旋即变卦[209]。其原因，固在于孙传芳监视极严，也在于当时江西战场形势一度不利于北伐军，周凤歧又观望起来。与此同时，陈仪派乃兄陈威到宁，向联军参谋长刘宗纪表明心迹，声称“所部驻徐，为江苏保门户，即为浙江保门户，决不移动。”[210]这样，浙江地方武装的两支主力部队都无法寄以希望了。

10月15日，杭州军政当局及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律师公会等在前省长张暄初（载阳）宅召集会议，决定致电孙传芳，要求允许第一、第三两师刻日开拔回浙，以卫桑梓[211]。当日，中共杭州地委通过杭州学生联合会和杭州总工会，在街上组织突击宣传，高呼“打倒军阀孙传芳”、“拥护北伐军”等口号[212]。16日，浙江各界在省长

公署紧急会议，议决浙人治浙，随即将孙传芳在杭卫队及宪兵数百人缴械，资遣出境。同日，夏超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民政长职务，并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言“斟酌情形，暂行组织委员会，处理政务”[213]，其人选有张暄初、夏超、周凤歧、蔡元培、戴季陶、朱家骅等。17日，夏超派章燮率第二总部2000人进军苏浙边境的枫泾，准备袭取上海。

孙传芳很快得知夏超独立的消息，立命驻防南京的孟昭月部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前往镇压。夏超因已得知周凤歧的在赣部不能如约返浙，留驻杭州的第十团又不愿出战[214]，先自气馁。他命章燮退守嘉兴，命章培率第三总部前往增援，同时致电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声称应商民要求，仅派少数保安队在浙境以内巡缉，要求宋军退回龙华，表示浙中绅士已派陈其采赴沪谈判。但丁文江答称，宋梅村系奉“联帅”命令移防，要夏超直接和孙传芳交涉[215]。在致孙传芳电中，夏超声称此举纯为维持治安，“然轻举妄动，实为惶愧之至”。这一切自然都不能遏阻宋军前进。20日，宋部进占嘉善。21日，双方交火。同日，夏超亲率吴殿扬的第一总部赴前线作战。由于夏部均为警察，缺乏实战经验，战况不利。夏超晕倒咯血，被随从接上火车，驶返杭州。保安队见主帅已离，纷纷溃散。章燮诡称受伤，逃至嘉兴避匿；章培独力难支，于同日下午返杭，夏超要他收拾残部到富阳、桐庐待命，所部仅剩500人。

夏超败退杭州之后，召集紧急会议，说明前线失利情况，意图再举，但与会诸人均劝夏超离杭暂避。夏知大势已去，交出省长印信，请张暄初维持地方秩序，于当夜出走。22日午，宋军进入杭州。

孙传芳当时正在江西与北伐军苦战，夏超独立，宛如刺向身后的一把刀子，其恼怒是可以想见的。20日，孙传芳任命陈仪为浙江省长。22日，通电指责夏超“不忠、不仁、不义”，宣布“罪在夏超一人，他无所问”[216]，但悬赏缉拿者除夏超外，仍有马叙伦、许宝驹、宣中华等人。夏超本拟在富阳一带收拾残兵，未成，即拟赴沪，

转道赴日。10月23日，在西湖附近被捕，旋被杀，孙部对外则声言被击毙[217]。

二　上海自治运动与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江浙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阻挠孙传芳出兵江西并援助吴佩孚，自北伐军入赣和孙军交火之后，这一运动已失去意义，继之而起的是自治运动。参加自治运动的社会成分同样复杂，目的也有很大不同。

上海自治运动的酝酿始于1926年9月。当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首次讨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我们应提出“人民自治”口号，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会议决定加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各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从虞洽卿一直【到】工人都去联合”[218]。6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毁弃孙传芳、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建立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区委并向上海市民提出了16项斗争要求，如：租界内的居民应一律有平等的参政权；南北市的市政府由民选的自治机关管理；保障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等[219]。此后，中共上海区委即通过汪寿华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虞洽卿等联系，相约在孙传芳江西败绩，不遑回顾之际，即发动工人罢工、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树起自治旗帜，从而推翻孙传芳的统治[220]。由于孙传芳的主力已进军江西，驻防上海的只有步兵1000人，警察2000人和内河小军舰两艘。这就为上海自治运动和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海国民党当局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等都支持中共上海区委的计划。

北伐战争的胜利诱发了部分上海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负责人推翻孙传芳统治，获取政权的要求。虞洽卿自1923年起担任上海总商会

会长。1926年7月，总商会改选，亲近孙传芳的傅筱庵（宗耀）当选会长。虞洽卿的上海商埠市政会办被孙传芳取消，南北市保卫团也被解散。因此，虞洽卿极力联络共产党，表现左倾[221]。

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主张由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动作”，表示事成后，国民政府“当然保护工人”。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多次分析、研究有关情况，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区委认为：“资产阶级虽急欲获得政权，却时时动摇与畏缩”，企图坐待孙传芳溃败，乘机以最小限度的暴动取得政权。他们既要利用工人罢工，又不愿工人有武装的组织和暴动。但是，区委又认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还不强”，“不便猛烈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因此，决定“一步步”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以便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政权之下，达到三项希望：“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

区委提出，现在“不宜在上海一角之地，即时拿出国民党的旗帜。即以后北伐军主力到达上海，亦不能反对市民自治运动和拒绝商人参加政权”。区委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商人合作”，“在中小商人中发展左派的势力，以牵制大商虞和德（即虞洽卿）等将来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过分的妥协。”[222] 区委表示，对此次武装起义并不抱“奢望”，只当作“初步暴动的尝试，不拿政权，得到自由”[223]。

区委关于上海资产阶级的认识符合实际，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商人合作”的意见也正确，但区委的领导权和政权观念却很模糊。相反，钮永建等倒很明确。钮在上海并没有多大实力，不得不承认起义的“根本势力在工人、学生”，但特别强调起义“须受党部指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吴稚晖不赞成区委提出的自治口号，主张用“上海和平维持会”的名义掌握政权。这些，区委都同意，只要求少数工人、学生加入和平维持会即可[224]。“不拿政权，得到自由”，在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奢望”。

在筹划起义过程中，钮永建与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密谋，由夏在适当时机宣布浙江独立，向上海进军；钮在上海组织暴动，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10月16日，夏超宣布独立。17日，派人率保安队2000人，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夏超的独立，加快了上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夏超向上海进军的当日，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决定，提出“上海市民自治”、“上海市民武装自卫”、“组织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等口号[225]。同日，国民党市党部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上海总工会虽在当年6月被淞沪警察厅查封，但仍坚持斗争，召开工会代表会议，表示全市工人为实现自治，“愿为前驱”。全国学联命上海学联统率全体学生“切实参加”自治运动。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表示要“联合上海各有力团体，组织淞沪和平维持会，谋自救之策”[226]。

18日，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由罗亦农作武装起义的动员报告。确定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罗亦农、赵世炎和李震瀛。20日，区委再次发布《告上海市民书》，谴责孙传芳的罪恶统治；批判全浙公会等团体要求孙、蒋“先行停战”，是在军阀宰制下的“幻想”，是“为孙传芳维持势力的和平运动”。区委指出，上海市民“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只有一条路，即是市民自己武装起来”，“推翻一切军阀政权，建立市民政权。”[227]

孙传芳不允许后门失火。18日，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迎战夏超：任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李宝章为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率部进驻龙华、松江。22日，孙传芳部占领杭州，夏超独立失败。

夏超的失败使上海武装起义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形势。23日，区委

得到消息，但又得到误传：“九江已克服，叶开鑫部已倒戈”。[228]于是，仍决定起义[229]。当日下午5时，下达动员令，约定以同情革命的一艘军舰开炮作起义的信号。

24日清晨三四点钟，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但是，军舰却始终没有开炮。闸北区的工人队伍四五十人，因为没有听到炮声，自动解散。浦东区因消息泄露，起义尚未发动时，领导人陶静轩、江元青等六人即被捕。南市区约有三十多人袭击二区警署的一个派出所，但因其他地区的起义均已失败，区委立即通知他们“赶快停止行动”[230]。至于钮永建的队伍，在徐家汇整队向高昌庙进发时，被警署发觉，立即逃散。埋伏在南洋大学的队伍，也因被发觉而逃跑[231]。总之，这次起义，除了在南市闹了一下，其他各区都没有发动起来。在起义中牺牲的有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陶静轩（化名陶鑫元）和南市区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化名李左人）等十余人，被捕者百余人。

起义失败后，区委于24日、25日连续召开会议总结。区委认为，起义失败主要有以下三条教训：一、起义时间选择不当。夏超独立后的第一二天，敌人的力量还没有集中，是发动的良好时机，但区委“态度犹移”；待夏失败后，各方面情况都不利时，区委反而“模糊决定”举行起义[232]。二、过于看重资产阶级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初以虞（洽卿）为中心，后以钮（永建）为中心。”虞在起义前，“革命情绪很浓，结果到暴动将发时”，“不干了”[233]。钮永建也没有实力，“买空卖空”[234]。三、没有广泛地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也缺乏训练。起义前，预计工人队伍有350人，国民党方面有千余人，而实际参加起义的，工人不过二百多人，钮永建的队伍也仅一二百人。

区委认为，这次起义“只架了一个势子”，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235]，但得到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识到今后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都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其他阶层人士共同进行。

区委表示，“要利用这个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236]。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自治运动有过短暂的沉寂，但是，随着孙传芳在江西战场的失败，自治运动再度活跃起来。

北伐军平定江西以后，没有立即东下追击，孙传芳需要重整部队，也无力反扑，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休战期。中共上海区委鉴于北伐军离上海较远，决定暂不发动起义，即使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也只作准备，抓紧恢复经常工作，“做一和平的自治运动”[237]。当时，张宗昌正以援助孙传芳为名，准备派大军南下，乘机扩充地盘。因此，自治运动的任务，较第一次起义时所提出的，又增加了一项：“拒绝奉鲁军南下！”

11月9日，上海区委提出，国民党工作应注重联络市民团体，鼓动与组织中小商人，“要他们都起来要求孙传芳‘下野'，反对奉鲁军南下，主张自治的通电与宣言，总要使每天报上连续不断的揭载出来，造成全上海极浓厚的自治空气”，在此基础上，准备新的武装起义[238]。同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告民众宣言》，号召“合二百万市民之力，本市民自决之精神，以上海市政还诸上海市民，拒绝奉军南下，永远脱离军阀之统治”[239]。

上海各界响应号召，迅速行动。11月10日，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举行紧急会议，发表宣言，提出三项要求：1．划上海区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2．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3．拒绝奉鲁军南下[240]。14日，沈钧儒、黄炎培、褚辅成、许世英等五十余人组织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通过沈钧儒起草的简章和通电。简章规定，该会“以人民直接负责，速行实现民治为目的”。通电要求：划皖、苏、浙三省为自治区域，一切政治应即由人民分别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参加处理。通电并要求“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应即日停止”[241]。该项要求初

稿为："三省军事当局，应即请其停止一切战争行为"[242]，是对当时统治皖、苏、浙三省军阀，而修改稿则包括一切方面，连北伐军的东进也在反对之列了。

三省联合会的成立得到了新苏公会、安徽民治协进会等团体的拥护，但是，它笼统号召停止"三省以内军事行动"的主张也受到了批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党部联合致函质疑说："党部等固愿北伐军以守株待兔之精神，以俟公等之和平主张得以实现民治，然吴、张之军连袂南下，则未识公等将以何辞反对北伐军之入境？"[243] 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则指出，欲实现民治，"必先除民治之障碍"，"首当拒绝奉鲁军之南下"[244]。三省联合会很快接受了这些意见，将自己的行动纳入了各进步团体的共同轨道。

江西战败后，孙传芳于11月18日秘密赴津，参加张作霖召集的蔡园会议，觍颜卑词地向宿敌乞援。会议决定由张宗昌率直鲁军15万人，携带军用票1000万元，南下援孙。三省人民大为震惊，军用票尤使商人闻之失色。23日，三省联合会发表通电，声明孙传芳以后的行动与三省无涉，三省既已声明划为民治区域，"此后主体即为人民，奉、直、鲁首领如有对三省军事行动，即为对人民作战，吾三省人民誓以民意抵抗之"[245]。28日，三省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商总联会、学联等四百余团体联合召开上海市民反对奉鲁军南下大会，蔡元培慷慨陈词：号召市民起而组织"人民政府"[246]。蔡元培没有参加三省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后来被推为委员，他表示"责任所在，自当勉任"[247]，勇敢地走到了斗争的第一线。在会上演讲的还有褚辅成、杨杏佛、杨贤江等。会议通过的宣言号召上海人民武装自卫，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宣布上海自治。会后，由总工会纠察队作前导，举行游行示威。当天晚上，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30日，发表公开启事，表示将"率领全沪工友，追随各界之后，参加自治运动"[248]。

五卅运动中，上海曾有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12月3日，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代表集会，商谈恢复该组织问题，但经过讨论，议决组成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249]。6日，市民公会成立，选举沈钧儒、王晓籁、林钧、汪寿华等11人为常务委员。中共上海区委旋即在市民公会里建立了党团，以加强领导。12日，召开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如不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市民自治，即以不纳租税相抗[250]。会议决定由市民公会筹备组织上海特别市政府。蔡元培再次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呼吁“有助于市民之军队”起来“驱逐横暴之军阀”[251]。这实际上是在号召武装起义。

当时，浙江自治正在加紧进行。12月16日，市民公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一、致电孙传芳，请其即日解除军职，否则即有严重之对付；二、通告各界，积极筹备罢工、罢学、罢市、罢税；三、公请唐绍仪、褚辅成、王正廷、蔡元培四人向外交及军政各界接洽，筹组淞沪特别市政府[252]。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企图以此将自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但是，上海资产阶级主张和平进行，对罢工、罢市态度消极，市民公会开会时经常不足法定人数，无法正常工作。倒是三省联合会由于内部较为一致，仍然相当活跃。12月中旬，孙传芳向外商密购军火，三省联合会即致电驻京各国公使，严正抗议[253]。同月，英国代理公使欧马利（Owen St．Clair O'Malley）在北京公使团会议上提出《英国对华变更案》，拟允许中国海关征收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二五附加税”。三省联合会于12日再次致电各国公使，说明中国北方被军阀控制，“断不能与以财政上之便利，以助长动乱”[254]。24日，通电谴责孙传芳镇压浙江自治，号召三省人民“一致奋起，铲除摧残自治之暴军，以期人民最后之胜利”[255]。

当自治运动猛烈展开的时候，鲁军南下，接防津浦线，联军驻防阵地收缩，以守沪宁线为主。孙传芳多次命令淞沪戒严司令李宝章、警察厅长严春阳，严加防范民众运动，“提倡自治即是赤化”。于是上

海总工会再次被查封。12月26日，孙传芳在上海《申报》刊登启事，指责“沪上有人假借苏、皖、浙三省公团名义，希图破坏三省之安宁，离间芳与三省父老昆季之感情”。启事恶狠狠地宣称：“军法所在，绝不宽贷。”[256] 三省联合会不为所屈，在《申报》、《民国日报》连续登载《启事》，宣称本会“光明磊落，天日俱昭”，要求孙传芳明白回答：“所谓有人假借，人系何人？假借何事？”“所谓少数奸人，系何姓氏？”启事并针锋相对地以“否则民意所在、绝不宽贷”作结，末列三省联合会委员32人的名字。这一行动表现了蔡元培、沈钧儒等人的凛然正气[257]。

由于孙传芳不仅以刊登启事相威胁，而且下令缉拿蔡元培等五十余人，“格杀不论”[258]，因此，蔡元培等不得不暂时走避。1927年1月8日，市民公会被孙传芳查封。

在孙传芳的高压下，上海自治运动再度沉寂，但是，地火仍在运行，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准备条件，酝酿新的起义。

三　陈仪自治

浙江自治的酝酿晚于上海，其发动者也和上海明显不同，它是浙江军阀陈仪和各派力量合作的结果。

夏超独立时，陈仪被孙传芳委任为署理浙江省长。11月1日，到杭接印视事。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陈仪很为难。当时，有人曾询问陈的施政方针，陈答：“为政以静。”[259] 但是，国民革命军正在步步向浙江省境逼近，孙传芳也正调兵遣将，力图加强对浙江的控制，陈仪根本不可能“静”下来。11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王均、薛岳两师进至浙江常山。12月9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迅速率师入浙。11日，从江西战场撤退、辗转回浙的周凤歧师在衢州起义，周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的委任。与此相对，孙传芳于1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将卢香亭、彭德铨、白宝山、冯绍闵、孟昭月、李宝章、王

淼、李俊义等八个师的兵力约七八万人，集中于宁、沪、杭三角地区，同时命孟昭月、白宝山、冯绍闵等率部入浙。孟昭月的司令部就设在松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杭州的变化。

陈仪到任后，征得孙传芳的同意，逐渐将第一师自徐州调回浙江，分驻于宁波、绍兴等处。他表面上仍然拥戴孙传芳，但暗中却频频和国民革命军联系。早在江西战事初起之际，他就派参谋长葛敬恩偕徐培根赴鄂、赣了解情况，安排退路。10月26日，葛敬恩在江西奉新会见蒋介石，蒋同意陈暂取中立态度，并在致陈的亲笔信中，“勉其道义在国家，忠于个人非道义”[260]，意在动员陈摆脱对孙传芳的个人关系。11月，陈仪再派陈其采与蒋介石磋商。蒋介石表示；“若不表明态度，行见日被侵逼，恐非混沌所能解决。”[261] 12月，葛敬恩再度赴赣，要求给以“名义”。17日，蒋介石电任陈仪为第十九军军长，要他和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联络一致，共赋同仇”[262]。但是，陈仪始终没有公开表明立场。他当时的企图是，竭力避免战事，以自治的名义争取撤销孙军在浙江的司令部，既拒孙，也拒绝革命军。

陈仪的态度受到浙江部分士绅的拥护。12月9日，省议会、杭州总商会分别致电孙传芳、蒋介石、周凤歧。致孙电称：“我公视浙为第二故乡，爱护之忱，定必始终如一，乞筹避免兵戎之策。”致蒋电要他命令革命军“仍驻赣边，以待商榷”。致周电要他“坚阻婉商”，阻止革命军入浙[263]。对上述电报，蒋介石的回答是：“舍加入革命合作，无他途。”孙传芳由于军队战斗力不强，力图利用自治的口号阻挡革命军，因此答复得极为豁达，声称：“但得避免兵祸，芳无不乐从”[264]。在陈仪向他请示时，他更表示：可以“便宜行事”，“只要党军不入浙，自治可，独立可，即将联军撤出浙江亦无不可”[265]。

为了反对孙传芳和奉鲁军南下，在革命军到来之前形成缓冲地区，中国共产党赞成“苏人治苏，浙人治浙”的口号。11月30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即提出：“我们要设法使浙江独立。”[266]

因此，浙江自治运动中也有一部分中共影响下的急进团体参加。12月9日，由浙江学生联合会发起，邀集杭州各团体筹组浙江各界联合会，学联代表李庄甫称："敝会历受军阀政治之压迫，誓愿摆脱此恶劣政治，实行人民自治。"[267] 向会议提出的《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以联络各界，实行真正人民自治为宗旨"[268]。10日，推省议会议长沈钧业为联合会主席。13日，联合会通过致省长函："无论齐楚，均不迎事。凡为浙江人所反对之军队，一概不得驻入。"函件要求陈仪"俯顺舆情，克日脱离孙氏，宣布自治"[269]。同日，陈仪召集军队长官、法团代表及绅商领袖六十余人紧急会议：陈仪称："现在衢州方面党军不再前进，则松江方面联军亦可不再进，此时正为浙江人民实行自治之好机会。"他并称："只要双方军队不来，鄙人以为集全浙人材以谋自治，成绩当有可观。"[270] 会议一致决定实行省自治，同时决定一面派代表赴南昌，请蒋介石退兵，一面请浙江总司令部参谋长冯家骏交卸。

沈钧业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后，于12日与中国银行行长金石顺、兴业公会会长王钧荣赴沪邀蒋尊簋回省。14日，浙江各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68个团体的代表二百余人，选举蒋尊簋、沈钧业等人为委员。

19日，杭州各界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蒋尊簋草拟的《浙江省政府组织大纲》，选出蒋尊簋、陈仪、周凤歧、蔡元培、褚辅成、黄郛、周承菼、陈其采、张暄初等九人为省务委员会委员，以陈仪兼民政部长，蒋尊簋兼军政部长。会议通过《浙江各界联合会第一次宣言》，提出自治"最低限度"条件六项：一、浙人治浙，组织真正的人民自治政府；二、反对任何军阀假自治美名，从事割据；三、所有政治均须公开，不得再由少数官僚绅士垄断把持；四、浙省现有师旅，均须隶属浙江省自治政府之下，服从指挥；五、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六、废除一切苛税杂捐[271]。它由学联起草，在当时是相当急进的纲领。20日，联合会召开第五次委员会，通过致全

国及全省电文两则。致全国通电称："从此境求自保，民冀相安，以自决之精神，行真正之民治。凡浙省以外问题，任何方面，绝不参加。一俟国是奠定，中央政府足以代表人民利益，即当仍归统治，与全国同胞，共图进步也。"[272]

正当蒋尊簋、陈仪准备于元旦就职之时，孙传芳急不可耐地下手了。对浙江自治，他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宽容，而在暗中却盘马弯弓，准备"鞭指湖杭"[273]。12月14日，孙传芳任命孟昭月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要他在浙江政情发生变化的时候，"疾调大军，迅往前方迎堵"[274]。16日，孟昭月在嘉兴就职。22日，浙江代表周承茨抵宁，商请孙传芳撤退嘉兴一带联军，孙传芳信誓旦旦地表示："本人决不破坏浙省自治。"也就在这一天，孟昭月发表通电及布告，指责自治诸人"捏造民意，胁迫士绅，阳托自治之名，阴行攘夺之实"[275]，表示要"誓本联帅讨赤精神，躬率将士，彻底讨伐"[276]。随即悍然进军杭州，包围省政府，收缴第一师驻杭部队枪械，陈仪仓猝间无以应付，下令部队不予抵抗。25日，陈仪被押赴南京解释"隔阂"。当时，陈部部分官兵集中绍兴，与孙军对立，孙传芳企图利用陈仪收抚这一部分军队，移驻扬州，因此将其释放。1927年1月6日，陈仪携眷迁居上海。

浙江自治失败前，上海学联曾致函浙江各省联合会，指出孙军徘徊嘉、宜，有直捣杭州之势，希望该会准备实力遏阻，否则，"强暴横来，则壮志未遂，而祸难已将生临"[277]，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第五节　国民联军在西北的崛起

一　五原誓师

为了学习革命办法，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于1926年3月16日由山西平地泉启程赴苏。23日，抵达蒙古库伦。4月5日，与鲍罗

廷、于右任会见，详谈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问题[278]。鲍罗廷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对他说："公之救国大策，如有优于国民党者，敝等当离国民党以援公；倘竟无之，请公速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与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之大成。"[279]同月，徐谦到达库伦，也劝冯加入国民党，并随冯赴莫斯科。

5月9日，冯玉祥等到达莫斯科。苏联政府特派曾任加伦参谋长的乌斯曼诺夫（Усманов）为顾问，为冯讲解辩证法唯物论。冯玉祥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兵营，特别留心考察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其间，还分别会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苏联政府主席加里宁（М．И．Калинин）以及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托洛茨基（Л．Д．Тродкий）、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К．Б．Радек）、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等。冯玉祥初步认识到要革命成功，必须有"旗帜鲜明之主义"及"正确革命党为之领导"[280]。同时，共产国际也委派刘伯坚做冯玉祥的工作，逐渐取得冯的信任。冯要求"介绍CP与之谈话"[281]。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即派蔡和森去冯处，向冯及其随行将领作了三天报告。不久，蔡和森又派中山大学中共负责人朱务善等为冯讲解中国革命问题。冯玉祥表示，对"中国CP五年来之主张非常满意，对CP更深一层的认识"[282]，声称要走十月革命的路，要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红军学习，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后来蔡和森曾写信向李大钊报告，冯玉祥在苏联"进步甚大，颇可乐观"[283]。其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填写了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并于随后谕令国民军全军加入国民党。

6月初，谭延闿、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邀其赴粤会谈。11日，冯复电提出：武汉为南北枢纽，"戡救国难，军队非速会师武汉不可。"[284] 17日，冯派李鸣钟、刘骥二人为全权代表赴广州接洽。在致蒋介石、谭延闿手札中，冯称：在莫斯科每日考察政治、经济、军事等项，"与平素所服膺之三民主义相印证，愈为佩仰"，表示愿"与诸同志

联合战线，共同奋斗”[285]。刘骥抵达广州后，与国民政府商定：冯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从北方协助北伐；国民政府给予国民军以巨额接济[286]。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任命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刘骥等的南行使命虽然完成得不错，但北方国民军的处境却日益不佳。7月，奉直联军加紧进攻南口。为了解救被困的国民军，策应广东方面北伐，李大钊决定派于右任赴苏敦促冯玉祥回国。于右任到达莫斯科后，“觉冯思想更进步”[287]。他向冯转达李大钊的意见并与之商定了具体计划。

冯玉祥归国之前，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和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季诺维也夫（Г．И．Зиновъев），要求提供援助[288]。其后，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决定为冯提供40万人的军事装备[289]。8月17日，冯玉祥离开莫斯科回国，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随行。途中，冯玉祥接受刘伯坚建议，亲笔致函陈独秀，表示对中共的“敬慕”，称赞中共的理论“非常正确”，主张“极其持平”，“越想越佩服”。冯玉祥要求中共帮助物色人才，到国民军中办政治画报，并任择两地，开办报馆，作为国民军的宣传机关。信中，冯玉祥并表示，希望中共以后能不断来信，指导工作[290]。

9月16日，冯玉祥抵达五原。当时，国民军自南口败退已一个多月，境况极为困窘，官兵服装褴褛，面有饥容。除驻甘肃者外，不满五万人；驻五原者，不过四五营人。官兵听说冯玉祥归来，欢欣雀跃。17日，冯玉祥被推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各军。同日，举行就职誓师授旗典礼，宣布国民军“与国民党结合为一”[291]。冯玉祥发表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宣言，自称“走到苏联，看到了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宣言并称：“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当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表示将遵奉孙中山遗嘱，实行三民主义，接受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进行国民革命[292]。19日、20日，

连续召开军事、政治、经济各项会议，提出三个口号：一、全军政治化、革命化；二、打倒官僚式之军队，建设同志式之军队；三、拔除虚伪恶根。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任命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以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同时并选派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军内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及民众等方面的工作。9月27日，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开幕，成立特别党部，选举方振武、刘伯坚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等五人为监察委员。30日，阅兵，行授旗礼。冯玉祥接过国民党党旗后再次表示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词毕，冯玉祥向众高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众答："我们是为革命服务！"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大有气壮山河之概。"其后，冯玉祥接受乌斯曼诺夫的意见，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冯玉祥每天集合各部讲话，又命政治部编了许多有关三民主义的歌词，教育士兵。刘伯坚每日工作18个小时，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0月，制订《国民联军政治工作大纲》39条，提出"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重要的事上"，规定军和独立师以上设政治部，要使每个士兵懂得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293)]。自此，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逐渐制度化、正规化。同时，冯玉祥并颁布了若干纪律条文，以严明军纪。鹿钟麟、宋哲元亲自带队巡查，防止扰民。方振武部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没有给钱，即被方查实枪毙[(294)]。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并支持冯玉祥重建国民军的工作。10月18日，李大钊主持制订了《北方区对于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认为"冯之左倾"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提议选派"得力的同志"去建立"得力指导机关"[(295)]。11月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的决议》，共12条，从政治宣传、政策掌握、工作态度、活动方法等多方面，对如何争取冯玉祥，改造国民军提出了细致、具体的意

见。9日，又致信刘伯坚，要他十分谨慎地工作。信称：“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296] 本来，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有一百七八十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又从北方区委和莫斯科、广州、上海等地抽调了邓希贤（小平）、李林、王炳南、刘志丹、阎揆要等四十余人到国民军中工作。

五原誓师标志着国民军的新生，自此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它牵制北方反动势力，呼应广东北伐，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促进了北伐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　西安解围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成立

南口战败后，国民军退据绥远、包头、五原等地，东零西散，濒于瓦解。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得到整顿，旧部陆续来归，战斗力大为提高。当时，国民军有两条作战路线。一条是由南口进攻北京，一条是进攻陕西而后东出潼关。由于西安已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包围达8个月之久，军民都处于极度的窘困中。粮食吃光，大量市民靠豆饼为生，后来豆饼也成了珍品，市上甚至出现出卖人肉现象。冯玉祥每天都收到求援电。这样，援陕就成为摆在新成立的国民联军面前的最为紧急的任务。其间，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研究，主张冯部入陕，直扑潼关，一可以阻断吴佩孚败退之路，一可以解西安之围[297]。中共中央同意李大钊的意见，认为冯部占领陕西后，进可东下河南，与北伐军联为一气，退亦暂可自保[298]。10中旬，李大钊派人送去密信，建议出西安会师郑州。这样，冯玉祥遂决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取道甘肃，兵分七路，迅速进解西安之围[299]。

甘肃原来是国民军刘郁芬所部的地盘。1926年4月南口大战期间，吴佩孚委任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援甘总、副司令，命二人进攻兰州。当时，国民军驻甘部队仅有孙良诚的第二师和张维玺的第十三师，总计不过万人。刘郁芬不得不缩短战线，退保

兰州，以深沟高垒对付敌军围攻。6月下旬，吉鸿昌旅自绥远来援，国民军士气为之一壮。8月15日，张维玺奉命反攻，于19日占领天水，将孔繁锦逐出甘肃。21日，孙良诚部率师进攻张兆钾部，于30日攻克平凉。陇东、陇南各县，次第收复[300]。在这一过程中，吉鸿昌旅以其突出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301]。

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所部三个师在南口兵败后为阎锡山部商震收编。10月初，冯玉祥即通过商震，向阎锡山表示“合作救国”之意[302]。10月8日，冯玉祥、刘伯坚亲赴包头，将韩复榘等三个师收回建制。11月18日，离开包头，转进甘肃，解除了阎锡山的戒心。晋军曾参加“讨赤联军”，对国民军进行围剿。两军关系的改善消除了冯玉祥入陕的后顾之忧。

西安守城军分三部分：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李虎臣的国民二军第十师和卫定一的陕西陆军第四师。杨虎城为了团结李、卫两部共同对敌，统一指挥，主动提出一律称为陕军，公推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自任副总司令。他在中共西安地委负责人魏野畴的支持和帮助下，领导西安军民坚守城池，顽强抗击镇嵩军。

10月上旬，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以下各路司令依次为弓富魁、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榘等。孙良诚统率前方各军，由邠州大道，向西安攻击前进，驻天水的张维玺师进取陇县、汧阳（今千阳），掩护大军右翼。11月4日，国民第二、第三军将领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于右任被史可轩（共产党员）等推为陕西国民二、三军联军临时总司令[303]。同月17日，冯玉祥致电孙良诚，声言“西安之围一日不解，余心便一日不安”。他悬赏10万，要孙“斟酌情形，有机可乘，即猛烈进攻”[304] 18日，又致电子右任、邓宝珊，要求“陕中各部，即每人只有二三粒子弹，亦应帮同进攻；虽投石呐喊，亦可助威。”[305] 23日，孙良诚部进抵兴平、醴泉一带，围攻咸阳，敌闻风远遁。援陕军随即兵分三路：方振武为左路，向泾阳进发，攻击西安城北之敌：马鸿逵为

右路，向鄠县东北进发，攻击西安城南之敌；孙良诚自任中路，由咸阳进攻长安[306]。敌集中力量进攻中路，孙良诚部一度处于危急状态，适值刘汝明、孙连仲部开到，分由左右两翼攻击镇嵩军后背十里铺、临潼、蓝田等处。26日，全线总攻。镇嵩军发现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27日，西安围解，蓬头垢面的市民们欣喜若狂，纷纷跪迎国民军。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乘胜前进，12月8日，刘汝明部追出潼关，一直进抵河南阌乡（今灵宝）。

此次西安解围战役，国民联军共俘获镇嵩军3万人，缴枪二万余支。

1927年1月1日，国民联军驻甘总司令刘郁芬参加国民党，同日组织特别党部。9日，他通电全国，宣布“自今以后，勉励自矢，与我全国同志一致奋斗，贯彻中山先生之一切主张。”[307]

西安之围既解，国民军得到了一块发展基地，百废待兴。但是，冯玉祥、于右任之间却产生了矛盾。冯不愿权力分散，对于右任就任国民二、三联军临时总司令不满。因此，西安解围后，于右任隐居耀县药王山[308]。中共西安地委不愿使冯玉祥成为西北的唯一霸主，想以于右任来制约冯玉祥[309]。12月3日，西安召开市民大会，议决《对陕局宣言》等电文，充分肯定于右任的功绩，认为“靠死不觉悟的军人拥护是错误的见解，只有民众联合起来拥护才是真正的拥护”。会议致电于右任，要求他速来西安，“治理一切”，同时要求冯玉祥迅速来陕，与于右任合作，解决陕局[310]。同月22日，于右任接受拥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任副司令。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等一批共产党员分别在总司令部里担任重要职务，实际发挥领导作用。驻陕总部设民政、教育、司法、建设等厅，成为事实上的省政权。

于、邓就任后，旋即提出整顿陕西军事政治计划12条，包括宣布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扶助并发展工农及各种人民组织，循序废除苛捐杂税、改革法律等内容。计划特别提出“军人不得干预民政”[311]。1927年1月21日，国民党陕西全省代表大会与列宁纪念会同时在由皇城改名的红城举行。会议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于右任报告称：列宁“本人虽死，主义却没有死，而且他的主义将特别的进展到世界。”苏联顾问谢夫林（А．Лапин）以“列宁党的同志”的身份欢迎大会参加者，表示要按照列宁“不要忘记东方革命”的遗嘱进行工作[312]。刘伯坚代表冯玉祥参加了会议，他提出，单纯军事运动不能成功，必须使士兵政治化、民众化、党化；党的责任在于引导贫苦的落后群众[313]。同时他宣布，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直接指导国民联军区域内的党与政治工作。会议选举邓宝珊、史可轩、魏野畴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组成省党部。其中，共产党员十一人。在此前后，共产党人还“包办”了不少机构和国民党县党部。会议特别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规定农民协会有直接参加地方行政，协助政府铲除恶霸、劣绅、土豪、土匪之权，要求各地政府惩办贪官污吏，扶持农民组织的发展，明令保障农民协会及武装团体[314]。会后，陕西各地的工农运动逐渐展开。

中共北方区委不同意西安地委的原定策略。还在12月5日，李大钊即致函魏野畴，指出“国民军此时必须诚意合作”，“统一于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之下”，“不可号令歧出不相下”[315]。后来，共产国际代表和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人也坚持以冯为西北的唯一军事领袖，而以于右任为陕西政治和党的领袖。1月26日，冯玉祥抵达西安，受到军民的盛大欢迎。他在会上目睹“旌旗蔽日，戈矛森严”的盛况，发表演说称：“感激之余，更加十分的胆怯。我们要怎样地战战兢兢，努力我们的责任，为民众谋利益。”[316]同月30日，召开军事会议，取消原来的一、二、三、五各军名目，统一编制，指定防地。1927年2月，制订并公布《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规定一切军政设施，对内对外，一切政务，均由联军总司令统一并主持，从

而确立了冯玉祥在西北的最高地位[317]。同月22日，冯制订诰诫十条，通令军政人员警惕“数千年专制遗毒及仕进恶习”，不可向长官馈送礼物，不可互相请托，不可随便宴会，不可需索财物，企图建立新的机关风气。此后，在共产党人推动和支持下，陕西各项工作蓬蓬勃勃，颇有生气。

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以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李子洲等为委员。3月14日至17日，在西安召开陕甘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中共陕甘区委认为，西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帝国主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没有树立封建军阀和右派的基础，充满了革命的主力农民，易于开展革命工作，因此，准备造成“革命的西北”[318]。

3月初，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召开政务会议，由魏野畴报告，重点研究农民问题。同月，先后颁布保护工人利益的《临时劳动法》，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的《新公安法原则》。后来，还制订并通过了《陕西暂行婚姻条例》和《陕西暂行婚姻条例细则》。此外，驻陕总部在铲除贪官污吏、惩办土豪劣绅、禁止缠足、革新吏治、实行强迫教育、推广白话文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出现了不少新气象。3月4日，西安全市开展清洁运动。冯玉祥“手推大土车一辆，运输污秽，来往甚忙”；于右任“抱长帚一柄，沿街扫除”[319]。民政厅长因开会迟到、工作拖拉，两次受到公开申斥。

为了培养干部，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于3月10日创办中山学院，以刘含初为委员长，刘伯坚、杨明轩、李子洲、薛子良等为委员，设立军事训练、组党、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教育人员养成等训练班。同月31日，又成立中山军事学校，以史可轩为校长，邓希贤为政治处主任，李林为教务处主任。该校重点培养军事人才和军队政治工作骨干，曾被誉为“第二黄埔”。

这一时期，于右任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冯玉祥以国民

军西北总党代表和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宰一切，于右任虽是国民党元老，但只能屈居冯下，受冯牵扯。3月12日前后，矛盾激化，于右任一度想撒手不干。中共陕甘区委认为必须“维持冯、于合作，使他们本革命的精神合作”，经中共劝说，于对冯迁就了事[320]。

尽管于、冯间存在矛盾，但是，这一时期，二人的革命热情都很高。于亲书“一切权力属于党，一切利益归民众”十四个大字，刻石嵌入省党部大门墙壁；又亲录《列宁主义的战术》十八条印成小册子到处送人。冯也经常发表拥护工农利益，进行世界革命的言论，不少话使共产党人也感到“过于激进”[321]。自3月8日至5月30日，西安共召开大型群众会议20余次，标语满城，连商品包装纸上都印着革命口号。当时，西安尚红，不仅皇城改为红城，钟楼四壁涂以红色，而且影响所及，连警察的帽顶和指挥棍都改为红色。冯玉祥云：“政治化即革命化，革命化即流血化，血色赤，故政治即赤化。”[322]一时之间，几乎使人感到西安成了“赤都第二”。但是，西安也患有那个时期许多地方都存在的通病：轰轰烈烈，却华而不实，完全经不起风雨的吹打。

在西安围城之役中，军民饿死、病死、战死共五万余人。1927年3月12日，西安各界在红城举行革命大祭，将死难士兵、人民葬于两个大冢中，与祭者负土成坟，同时决定建立革命亭、革命纪念馆、革命公园以为纪念。

第六节　西南军阀的归附与分化

一　泸州、顺庆起义

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原为西山会议派掌握。1926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吴玉章提议，决定进行改组[323]。与此同时，中共中

央批准在重庆成立地方委员会，以杨闇公为书记。3月，吴玉章回到重庆，临时省党部改组工作完成，以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为常务委员。在全部执行委员中，除两名左派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由于该党部在重庆莲花池办公，因此被称为莲花池省党部；西山会议派分子石青阳等另行树帜，成立四川特别临时党部，在中营街总土地办公，被称为总土地省党部。

1926年4月，中共重庆地委开始在川军中进行工作。同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提出，在民主革命中，中共“应该参加武装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的武装势力”[(324)]。会后，吴玉章、刘伯承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发动部分川军起义，建立左派武装的初步设想。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致函中共中央，报告四川军阀动态和军事工作情况。同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重庆地委，同意发动四川军阀倒戈，借以“分裂军阀的势力”，“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但又指出，不可希望过高，过于信赖，应借此机会扩大民众运动，插入军队中从事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中共中央同时提出：“我们自然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队伍。”[(325)] 此际，重庆地委对川军的策动已有成效。9月10日，地委委员童庸生专程赴沪，报告中共党员秦汉三、黄慕颜所掌握的武装和袁品文等左倾队伍的情况，提出争取广东政府的政治力量，集中左倾军队，在顺庆（今南充）起义的初步计划。中共中央同意这一计划，认为“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的可能”[(326)]。其后，重庆地委即派出三十余人，深入川军工作。

吴玉章、刘伯承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即前往广州。8月21日，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应仿照湖北之例，组织四川特务委员会，从事支援北伐及策动川军等工作[(327)]。吴玉章当时的想法是：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川军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境，北出西

安，接应冯玉祥的军队，配合北伐[328]。同日，政治委员会根据吴玉章函请，任命李筱亭、刘伯承、吴玉章为特务委员会委员[329]。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又根据吴玉章建议，任命刘伯承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全面负责四川的军事运动。

在深入川军进行工作的基础上，杨闇公于9月28日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在顺庆和泸州发动起义。会议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各路总指挥，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11月中旬，重庆地委成立了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军委经多次研究，确定由驻防顺庆、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响应，到川北汇合，组建成军，策应武汉或西北国民军。其后，刘伯承即前往合川，对黄慕颜部作具体部署，确定于12月5日起义。11月25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至12月4日闭幕。杨闇公、刘伯承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军事报告。会议选举杨闇公、朱玉阶（朱德）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共产党员仍占多数。

就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起义被迫提前爆发。

泸州、顺庆都是军阀赖心辉的地盘，当地驻军有第二混成旅李章甫、第四混成旅袁品文、第十混成旅陈兰亭等部。其中，李章甫是赖心辉的心腹，袁品文积极准备起义，陈兰亭则左倾。赖心辉对袁、陈的情况已经察觉，计划将袁品文旅调防江津，使之与陈兰亭旅隔离，然后分而治之。袁品文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心提前发动起义。12月1日，袁品文与陈兰亭合作，借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之机，捕杀李章甫，派兵进攻驻泸各部。2日，起义军占领泸州，陈兰亭、袁品文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第五路司令。

顺庆驻军为第五师何光烈部，下辖秦汉三、杜伯乾等三个旅。秦、杜原拟12月5日趁何光烈举行例行检阅时将其生擒，但何事前得悉，取消检阅，通知各军官于12月3日午后到师部紧急会议，企图将

秦、杜等一网打尽。当日午后4时，秦汉三、杜伯乾率部进攻何光烈的师部，击溃其卫队，于4日占领顺庆。何光烈纵火烧城，乘机潜逃。8日，秦、杜二人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二、第三路司令，宣言赞扬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等功绩，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四川省党部[330]。

顺庆起义的第二天，秦汉三、杜伯乾即急电莲花池临时省党部报告，同时催促合川黄慕颜部来顺庆汇合。12月5日，黄部起义。其间，刘伯承兼程赶到合川，率领黄部于9日到达顺庆，与当地起义部队汇合。10日，召开誓师大会暨军民联欢会，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就任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指挥。

四川军阀这时虽然正竭力向广州国民政府“输诚”，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川军发生内变。12月8日，邓锡侯命驻广安的川军第一师师长罗泽洲、驻遂宁的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刻日戡定”。起义军和罗泽洲等部相比，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13日，刘伯承决定撤出顺庆，东进攻击军阀刘存厚部，按预定计划向川陕边境发展。但是，杨闇公送来密信，声称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火速到顺庆汇合；秦、杜两部又恋乡恋家，力主坚守。15日，双方激战。李家钰借秦部某连倒戈之机，冲入顺庆。16日，起义军决定东移。22日，到达杨森防区的开江，原来八千余人的部队仅剩2000人。同月26日，莲花池省党部致电杨森，希望杨协助解决粮秣、驻地[331]。杨森则于次日复电，表示“当益尽力”，自此，顺庆、合川起义军即驻防开江。

在顺庆起义军东移的过程中，莲花池省党部曾于12月19日急电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说明秦、杜等部“现为本党系统下之部队”，希望倾向革命的部队加以援助，并望各方停止军事行动[332]。同时，杨闇公急派李嘉仲前往武汉，争取武汉国民政府支持，并向中共中央汇报。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尚未正式迁来，由先期到达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办公。临时联席会议认为四川各军将领都已归附，彼此同属革命旗帜之下，于29日致电刘

湘等，要求双方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333]。同时派吴玉章入川调解。1927年1月3日，刘湘回电称，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川军“一轨同趋”，问题不难解决[334]。因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命吴玉章停止入川。

杨森当时正积极表现其进步。12月24日，邀请刘伯承到万县面商，同时邀杨闇公等到万县主持党务，又派人赴武汉请朱德回来工作。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决定刘伯承去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

泸州起义军始终不肯到顺庆集中。为此，重庆军委派陈毅专程到泸州工作。但是，绿林出身的陈兰亭迷恋当地的盐税收入，不愿离开。袁品文及莲花池省党部多方设法，均无济于事。其间，赖心辉以师长的位置为饵，企图诱使陈兰亭叛变，消灭袁品文部。刘伯承到泸州后，首先撤消原来的第四、第五路联合办事处，成立总指挥部。接着，整编部队，增调政工人员来军工作。同时，刘伯承又大力整顿财政、税收、治安，地方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3月18日，在泸州文庙举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刘伯承发表演说，鼓励大家发扬公社精神，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顺庆、泸州两支起义军虽然都暂时保存下来了，但是，四川军阀仍然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消灭这两支革命力量。

二　四川军阀的归附

四川军阀派系复杂，人数之多，甲于全国。北伐战争初期，川军有7个首领、44个师、30个混成旅、19个独立旅、16个司令、1个汉军统领，号称50万人以上[335]。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森、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成勋、刘存厚等。他们内则互相排挤，钩心斗角；外则趋南附北，有奶便是娘。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后，除老牌的武备系军阀刘存厚抱残守缺，始终挂着督军行署的招

牌，以五色旗偏安于川东绥定（今属达州市）一隅外，其余军阀目睹革命形势的发展，纷纷看风使舵，陆续“左”转，换汤留药地投靠革命。

杨森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同学，故称速成系。但他与刘湘互争雄长，各不相容。他以万县为中心，据有上至长寿下至巫山的沿江二十多个县，拥有十师兵力，顺流而下可直趋武汉三镇。约在1926年5月间，杨森派秘书到北京，会见李大钊，表示愿参加国民革命[336]。李大钊决定派彭泽湘赴万县谈判。彭到万县后，与杨森签订协议：国民革命军到达湖南时，杨即出兵进攻鄂西[337]。同时，杨森又派陈抱一为代表，到广州向国民政府表示，允许国民党在他的军队和辖区工作，并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338]。7月中旬，陈独秀建议朱德到杨森处工作。朱德和杨森是护国军时期的同事，他欣然接受任务。8月11日，朱德抵达万县，但杨森不听朱德劝告，反于同月15日通电接受吴佩孚委任，就四川省长职。其间，陈毅也受李大钊委派，到万县工作[339]。

自1926年6月起，英轮在万县等地多次荡沉中国木船。8月29日，英国万流号轮船在四川云阳江面荡沉中国木船3只，杨森部押运饷款的官兵58人及民夫十余人被淹死，银元8．5万元及枪弹等失落江中。事后，万流号逃之夭夭。8月30日，在朱德、陈毅鼓励下，杨森扣留英轮万通号及万县号，要求英商赔偿损失。同时，致电英国驻重庆领事抗议。9月4日，陈毅与中共万县地下组织一起，组织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提出不供给英人油盐米炭，不与英人贸易往来等“六不主义”，同时又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大要求”[340]。5日，英军实行武力劫轮，遭到杨森部士兵还击，英舰即炮轰万县南津街、李家花园杨森总部及万县中学等处，并发射燃烧弹。朱德指挥杨森部炮兵开炮，英舰被击中起火后逃跑。事后调查，军民死亡604人，伤398人，被毁房屋上千间，财产损失约计2000万元。全国人民纷起抗议，形成强大的反英浪潮。

万县事件为杨森赢得很大荣誉，连中共中央都认为杨“有一点中古时代爱国英雄的感情”[341]。但是，杨森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却不很顺利。彭泽湘在万县和杨森谈妥后，即携带协议书赶赴广东，通过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办理。张静江等怀疑是共产党的“把戏”，也怀疑杨森的诚意，准备联合刘湘打击杨森，因此，不予置理[342]。8月，杨森再派傅振烈（子东）为全权代表前往广州谈判[343]，也未达成协议。9月中旬，朱德自万县赴鄂，对邓演达称：杨森“说干就干，颇与革命军相近”。邓演达遂向蒋介石建议，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以朱德为党代表[344]。同月24日，邓演达派出20人的宣传队，随朱德回川，企图对杨森部进行政治改造。

但是，杨森为人投机善变，反复无常，谁给钱和枪弹便投靠谁。8月15日吴佩孚攻下南口之后，杨森认为“粤蒋甚危”，同时又得到孙传芳给的百万发子弹，即准备联孙[345]。8月下旬，汀泗桥战役打响之后，吴佩孚急电杨森，火速“援鄂”。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14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贺龙所部占领公安，直逼荆州、沙市。吴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一再败北，致电杨森乞援。杨森既历受吴佩孚扶植，又企图攫取鄂西。当时，部分川军将领正倡议组织川康联军，参加北伐，推刘湘、杨森为首。杨森即借此机会，以参加北伐为名，组成援鄂川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自9月下旬起，陆续派兵沿江东下[346]。10月中旬，进抵湖北荆州、沙市，随后又进至监利；与此同时，吴系卢金山、于学忠、关得胜、张福臣等部也由沙洋进至潜江。双方配合，组织川鄂联军，企图偷袭武汉[347]。

在一段时期内，人们摸不清杨森的真实意图。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分别指示鄂区区委和重庆地委：“对杨森政策须十分谨慎”，“杨东下究竟和哪一方面合作，须有切实消息。”[348] 同月上旬，中共中央致函在蒋介石身边的加伦，要他劝蒋，不可对杨“峻拒不纳，逼他无可通融”，只要杨表明态度，即可给予自新之路[349]。同月15日，

杨森在万县致电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就任党代表[350]。但是，一直拖到孙传芳江西兵败，杨森才于11月21日在宜昌通电就职，宣称自此以后，要“以党义为依归，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351]。24日，在当地设立川鄂边防司令部。

邓演达向蒋介石推荐杨森，本为牵制鄂西的卢金山、于学忠等吴佩孚余部，杨森在东下前也向北伐军方面表示，要解决卢、于等部，但不久邓演达即发现杨、卢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10月19日，邓演达致电卢师谛、朱德，要他们就近催促杨森：“扑灭卢、于，否则无以塞人之口。”[352]但杨森始终与卢、于等部和平共处。11月18日，蒋介石电令唐生智酌留第八军一部防守武胜关，以其余各师，并从第十五军中抽调一师进取鄂西，同时电令袁祖铭率兵协助唐生智。杨森坚决反对北伐军进兵鄂西。11月下旬，杨森先后派曾述孔、朱德去武汉，为卢金山等要求“名义”，企图保存卢金山等部[353]。卢金山也派员向蒋介石“输诚”，表示愿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夹击在湖北的刘玉春等残部。武汉方面一面要求杨森等退出荆州、沙市，鄂西行政、财政完全由湖北省政府支配，一面决计向鄂西用兵。

12月6日。唐生智指挥各部队分由长江两岸进攻。7日，卢金山通电，声称愿解甲归农[354]。9日，蒋介石致电唐生智称：“只要击破其一点，其余皆不难解决。对杨、卢、袁仍须运用政治方法，以扶助军事之进行。”[355]在北伐军的锐利攻势下，杨森害怕归路被截断，于14日率部逃回万县。15日，刘佐龙部克复荆、沙。17日，第十军王天培部与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克复宜昌。张福臣、何金鳌、魏楷等部相继溃逃万县。21、22日，王天培部占领秭归、巴东，鄂西肃清[356]。

杨森于12月19日返回万县后，即忙于改头换面，命各军更换党军旗帜及符号，并命所辖各县知事，赶制青天白日旗和革命口号标语，张贴大街小巷。21日，致电莲花池省党部，声称“奉政府令返万，努力革命工作”[357]。接着，又派人到重庆迎请省党部执行委员杨闇

公、邓劼刚赴万县主持党务。24日，邀刘伯承到万县会面。1927年1月初，多次致电武汉方面，请党代表朱德回万，并增派政工人员，同时撤回驻北京代表刘英[358]。此后即整编军队，筹设特别党部，规划政治训练，似乎真要弃旧图新了。

杨森的这些做法，蒙住了不少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命正在万县的刘伯承调查，刘于1927年1月9日回电报告说："子惠近来认识较明"，"各事均节节进行"云[359]。

刘湘在四川军阀中，资格最老，所部驻扎重庆，防区狭小，所辖地盘一度仅巴县、璧山县，被讥为"巴璧虎"。他亲近皖系的段祺瑞，对吴佩孚常存不满。1926年5月，吴佩孚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办、杨森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康督办、袁祖铭为川黔陆军检阅使，对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则未加任命。同年6月，准备调刘湘到北京临时执政府任参谋总长，削弱他在四川的势力。在四川内部，邓锡侯与杨森联合，企图迫使刘湘下野。因此，刘湘一度企图反吴，其叔父刘文辉曾加入过国民党，刘湘即指使其接近广东国民政府[360]。

8月初，刘湘与刘文辉及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赖心辉一起，派代表张伯常[361]到长沙，与唐生智商谈合作，同时致函蒋介石，表示愿共同反对吴佩孚，出兵参加北伐[362]。13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联名通电，声讨吴佩孚祸国乱川，坏法乱纪，表示今后北京政府一切措施，均认为无效[363]。9月6日，刘文辉等又派傅岩为代表到广州，与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廖划平（共产党员）等会谈，签订六条协定，规定川军将领加入国民党，出兵参加北伐；国民政府则给予川军将领以相当名义，并予以充分的援助与接济[364]。

其后，部分川军将领推刘湘为北伐川军总司令，呼吁出川参战，但并无实际动作[365]。10月21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告

以杨森与刘湘等不睦，关于刘湘等人的任命，暂缓发表，看杨森以后态度再定[366]。11月26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分别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职。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以刘湘为主席[367]。刘湘嫌国民政府给的职务小，没有达到总管四川军民两政的目的，继续沿用北洋政府加委的“川康督办兼四川军务督办”的名义。直到杨森进犯武汉失败，国民政府责成刘湘的驻武汉代表返川查询，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又以大义及利害相责时，刘湘才于12月17日宣誓就职。

刘湘一度表现得很革命，就职后即召集政治讨论会，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电邀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在莲花池省党部和总土地省党部的对立中，刘湘支持左派省党部，用武力解散右派组织，逮捕了该党部执行委员王岳生等人[368]。同时解散的还有军人青年团、武士会、国家主义研究会等。不仅如此，刘湘还查封了《长江》、《江洲》、《中山》等右派刊物。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的工作和组织日益发展，而总土地国民党省党部则日形冷落。

刘文辉部驻扎成都、叙府、荣县、乐山等地。他与邓锡侯、田颂尧同为保定军官学校学生，故称保定系。他一面联合邓、田威慑刘湘，一面利用和刘湘的叔侄关系牵制邓、田。邓时任四川清乡督办，所部驻成都及川西、川北各县。他善观风向火色，被称为“水晶猴”。田时任四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所部驻绵阳等地，被称为“田冬瓜”，两面滚。1927年12月，刘文辉电邀驻潼川的田颂尧到成都，同邓锡侯一起商量，决定成立三部联合办事处，以刘文辉为处长，邓、田二人为副处长。同月27日，联合办事处宣告成立[369]。

邓锡侯、田颂尧一面酝酿三部联合，一面派原保定军官学堂教员刘鸿逵（介藩）向蒋介石乞求军长职务，因四川特务委员会不同意，拖延未成。12月9日，邓、田再次派人到蒋介石处请求委任[370]。24日，刘文辉也致电蒋介石称：“我公包举宇内，何所不容？”[371]

次年1月1日，刘文辉在成都就任第二十四军军长职。邓锡侯、田颂尧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委任，于3月1日联名通电，分别就任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军长。自此，保定系联合到一起，刘文辉实力大为增强，其防区以成都为中心，遍及川南、川北、川西，与以重庆为中心，盘踞上、下川东地区的速成系军阀刘湘一起，并立而为左右四川的两大军事集团。

三　黔系军阀的分化

黔系军阀分兴义系和桐梓系两大势力。1926年以后，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取代以袁祖铭为首的兴义系，统治贵州。

1926年5月，川军杨森部赶走占据重庆的黔军。6月，袁祖铭率部退至贵阳。贵州省长周西成唯恐出现一山二虎的局面，一面对袁优礼有加，一面解囊相助，送袁20万元旅费，送袁部20万元军饷[(372)]，怂恿袁“问鼎中原”。袁祖铭以投靠吴佩孚起家。他采纳周西成的意见，遂以“吴玉帅有援湘之命，湘人亦自动表示欢迎”为由，于7月派主力部队进入湘西[(373)]。实际上，袁祖铭离川时，即曾拟定“援湘”办法，派人呈递给吴佩孚，要求吴给予装备补充。但吴对袁已失却信任，批示道：“大江南北，兵至百万，足供讨冯，所请率兵援湘之处，暂勿庸议。”[(374)]当时，直军在湖南一败涂地，惯于见风使舵的袁祖铭转而投向国民政府，派代表张其煦到广州“输纳款诚，恳予收容”[(375)]。

当袁祖铭还在四川的时候，吴玉章即对袁进行工作。袁派代表到广州谈判[(376)]，国民政府随即派人联络[(377)]。北伐开始时，蒋介石对西南军阀的战略主要是：与四川、贵州的军阀合作，以防止唐继尧扰乱后方。袁部有彭汉章、王天培、何壁辉三个军、李燊师和第六七、第六八等直属旅，号称十万之众[(378)]。7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彭汉章、王天培为第九、第十军军长。8月初，彭、王分别在湘西就职，通电讨吴，王自任由荆州、沙市进攻[(379)]。同时，国民政府委

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领第九、十两军赴前线作战。然而，黔军始终停留湘西，“中立观望”[380]。

8月中下旬，吴佩孚南下武汉，布置反攻湖南。袁祖铭即恢复黔军番号，将所部重编为20个师，设五路总指挥，分驻湘西及湖北荆州、沙市地区。同时，派代表与吴佩孚勾结，企图配合吴部直取长沙、岳阳，截断北伐军后路[381]。10月，又串联杨森、唐继尧，组织川、滇、黔联盟，准备分途进攻湘、粤等地[382]。直至吴佩孚败局已定，袁祖铭才于12月3日在湘西辰州（今沅陵县）就左翼军总指挥职，表示要“驰赴前方，努力工作”[383]。

不仅如此，袁祖铭还在驻地常德开设烟土公司，独霸鸦片特税，拉兵派款，私委官员，引起湖南党政当局不满。12月16日，唐生智电告袁祖铭，要求袁部从速退出湖南，进取湖北荆州、宜昌[384]。袁祖铭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将贵州的部队调入湖南，要求将湘西税收的五分之三划为黔军军费[385]。

袁祖铭的作为迫使唐生智以武力解决。1927年1月30日，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商业研究社设宴，邀袁祖铭等黔军高级将领联谊，暗中布置武装，将袁祖铭及其参谋长等人诱杀。教导师各团按预定计划突袭市内袁军各部，部分黔军被歼或缴械，部分退向桃源、澧县等地[386]。

吴佩孚南下武汉时，彭汉章公开“声明附吴”。武汉被北伐军攻克后，彭徘徊于荆州、沙市地区，同吴佩孚、孙传芳“往来不绝，且有异图”[387]。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曾与王天培相偕在鄂西与吴佩孚残部卢金山等作战。2月6日，彭汉章在汉口被捕，押解至长沙受审。8月，唐生智通电申斥黔军祸害湘西的罪行。不久，彭汉章被处死，所部由师长李燊率领，移驻鄂西宜都。

在兴义系中，王天培比较“左倾”。1926年春，吴玉章在袁祖铭军

中活动，王天培即接受影响，自此积极主张归附国民党[388]。9月21日，王天培由湘西进抵鄂西津市，同时派周仲良、阎崇阶为代表驻粤[389]。此后，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打过一些仗。

周西成在礼送袁祖铭部队出境后，即着手解决省内问题。当年，贵州大旱，经济凋敝。周西成一面收编、剿灭各地土匪，稳定社会秩序，一面整理财政。8月7日，下令成立财政厅查案委员会，彻查该厅历年积弊。其后，周西成采取裁并各地局卡，加重鸦片税的征收，加强货币管理等多种措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390]。同时，注意兴办实业。1926年10月，兴建全省第一座发电厂[391]。1926年以前，贵州交通依靠古驿道和人行小路，周西成主政后成立路政局，兴修公路。此外，并设立矿务局，发展采矿业，兴办造纸厂、造币厂、印刷厂、玻璃厂；架设电话，开办无线电通讯等。至1926年底，全省财政收入达到990万银元，其中田赋仅56万元。

周西成虽注意整顿和发展经济，但政治方面却异常保守。7月12日，蒋介石派李仲公赴贵州招抚周西成[392]。同年12月18日，周西成在贵阳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通电称："敬当整饬师徒，听候驱策。"[393]但是，周西成尽量不让国民党染指贵州，既不许设省党部，也不设党代表[394]。同月，国民党中央派遣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等到贵州筹办党务。次年春，周西成借口张、李不肯交出密电码，将二人拘捕，严刑逼供，最后将李益之暗杀[395]。后来，国民党中央续派王度、黄乾坤为贵州省党部筹备委员，再到贵阳，周西成仍然加以阻止，声称："贵州一切未上轨道，地方秩序尚待整顿，若即时筹组党部，麻烦更多。"他表示每人可赠大洋200元作旅费，"如无异议，即此结束"[396]。

周西成对军队和官吏的控制也极其严格。各营部队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一个护卫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临时调拨；凡任命局长以上官员，须周西成目测审定。至于高级文武官员，则非桐梓人不用，"有官皆桐梓"的嘲讽流传一时。

四　“二六”政变与唐继尧统治云南的结束

滇系唐继尧在西南军阀中势力最大，自称“东大陆主人”，他对国民革命军的迅速推进深感不安，适逢吴佩孚派刘震寰携函来滇，推举其为西南的最高元帅，要求他派兵直下两广，夹击国民革命军。当时，唐继尧也正有此意，便派王九龄、张淮翰等为代表，分别与吴佩孚、孙传芳联络，企图再次颠覆广州国民政府[397]。8月12日，唐继尧复电吴佩孚，表示对其“讨赤”计划的赞佩，声称愿与吴“相与戮力神州”[398]。其后，唐即迅速召集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但当时控制滇军实力的是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和大理镇守使李选廷，他们对1925年进攻广西失败一事记忆犹新，不愿再为唐继尧卖命。唐大失所望。10月，蒋介石通过何应钦与唐继尧的代表王绳祖联系，国民党中央并准备任命唐为国民政府委员，但唐要求给以“总制”的头衔，没有结果[399]。

多年来，唐继尧一直标榜国家主义和民治主义，特意重金聘请国家主义分子到滇，组织人员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创办、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刊物《滇事旬刊》。1926年12月25日，唐继尧借护国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之机，成立民治党，声称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内谋统一，外谋独立”相号召，签名入党者有两千多人。他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卖国政蠹”，企图仿效德国的独裁者俾斯麦（Bismarck）和土耳其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400]。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费并满足穷奢极欲的挥霍，唐继尧军阀集团以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滥发纸币、统运大烟等手段搜括百姓，使得云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1926年，唐继尧命云南富滇银行增发纸币3860万元，省府借用2940万元，造成币值跌落，金融混乱。为摆脱金融危机，唐继尧又强制发行地方公债。其范围包括盐税、锡税、铜税、茶税、厘金、田赋等，一律以原征数为准，加一倍征收。初定加征两年，以后逐年发还一成，20年还清。这种并非志愿认购的公债，

省府文件中也承认实际是预征借款。当预征钱粮课税案提交省议会讨论时，部分议员反对，但唐继尧强令照办，引起省内各界人士不满。

此时，滇军内部在职位升迁、财源分配方面的矛盾日愈激烈。滇系实力派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人的兵权都被削弱。各级军官的例行收入和空领兵饷等生财门路被唐继尧以明定缺额、点名发饷等方式堵塞，但唐继尧本人则通过亲信，控制金融、税收，随意收支，大烟税、烟酒税均有一部分交进唐继尧的私库。只要是亲戚、同乡，唐继尧不论资历、功绩，大加提拔。这就使非嫡系的军内外官员对唐继尧的不满日趋严重[401]。

早在1926年春，胡若愚、张汝骥就密谋反唐。二人于夏、秋两季同龙云反复磋商，龙云表示同意。10月3日，云南迤西各界要求联县自治，推举龙云、胡若愚主持军、民两政[402]。在广西的原滇军将领范石生见形势可为，便一面和龙云、胡若愚的代表秘密接洽，一面发表讨唐宣言，招募兵员，组织定滇军，准备回乡[403]。当时，蒋介石正专注北伐，劝范“暂时忍耐”[404]。

1927年初，云南民众反对唐继尧统治的斗争日渐高涨，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云南内部力量自行倒唐。以李鑫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和以李伯东、张若谷等五人为委员的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相互合作，加紧策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人。2月6日，士兵索饷，龙云趁机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门要道，密电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及驻省各军围逼，一面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见唐继尧，提出与国民政府联合等十二项条件。同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人联名通电，指责唐继尧“全出独裁，势同专利”，表示愿“外应潮流，内顺舆情”，拥护国民政府。通电邀各界代表至宜良协商善后，改组省政府，改良政治[405]。唐继尧自知大势已去，被迫答应交出政权，改组省政府，查办宵小，解散民治党。史称“二六”政变。

2月28日，四镇守使提出：改省长制为委员制，要有一个民意机构产生委员会；唐继尧不进委员会，但要予以安排。3月5日，有各界团体和有关人士参加的各界联合会，推举唐继尧为省务委员会总裁，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为省务委员会委员；顾视高、吴锡钟、尹守善、彭加猷、杨西敏为监察委员会委员。8日，云南省务委员会集体宣誓就职，推举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厅长。唐继尧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他在云南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自此结束[406]。不久，唐继尧“忧愤吐血”，“偃卧月余”，于5月23日不治身死。

---

(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1937年版，第74—75页。

(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30日。

(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79页。

(4) 《鲍顾问演词》，《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7日。

(5) 《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7) 《向导》周报第157期。

(8) 《革命的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冲突》，《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店1983年版，第73页。

(9)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75—176页。

(10) 《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1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53—54页。

(12) 列兹尼柯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40页；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4—185页。

(1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4) 《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276—284页。

(15) 《长沙最近之市民游街大会》，《申报》，1926年3月8日。

(16)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9日。

(17) 《蒋百里述调停湘省赵唐之经过》，《申报》，1926年3月12日。

(18)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19)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5日。

(20)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1日。

(21)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9日。

(22) 《申报》，1926年3月26日。

(23) 《申报》，1926年4月1日。

(24) 《湘省输诚国民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4日。

(25) 《申报》，1926年4月2日。

(26) 《申报》，1926年3月31日。

(27) 《申报》，1926年4月8日、9日。

(28) 《申报》，1926年4月26日；参见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6页。

(29) 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2日。

(30) 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4日。

(3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32)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33)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3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未刊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35)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36)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37)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4—6页。

(38) C．M．Wilbur and J．L．How，*Report o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rmy and the Kuomintang*，Early 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613-614．

(39) *Problems of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Japan*，*Leon Trotsky on China*，Monad Press，New York，1976，pp．107-108．

(40)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第71页。

(4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9日。

(42) 《赴湘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回粤》，《申报》，1926年4月28日。

(43)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44) 斯切潘诺夫报告，张国忱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线装本，第36—38页。

(45)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46) 《战时工作会议之第三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47)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4日。

(4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49)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关于军事委员会的开会日期则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88页。

(5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页。

(51)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16日。

(5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7—18页。

(53)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54) 《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55)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

(56)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第163期；《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65页。

(57) 《向导》第171期。

(5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5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21页。

(60) 《向导》第171期。

(61) 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7页。

(6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7月30日。

(6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68页。

(64)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79辑，第77页。

(65)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2日），《近代稗海》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66)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日。

(6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5日。

(68) 《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6日），《近代稗海》第14辑，第64页。

(6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0日。

(7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81—83页。

(7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02、109页。

(72) 蒋介石日记云："到湘初次阅兵，有此玩失，未免愧惶也。"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4日。

(73) 蒋介石8月10日日记云："本军精神堕落已甚，恐难救药。"

(74)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集》总10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75) 《黄浦潮》周刊第3期，1926年10月17日。

(76)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1—72页。

(77) 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78) 《申报》，1926年8月26日。

(79) 《湖南民报》，1926年9月6日。

(80)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1日。

(81)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邓演存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82)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3日。

(83)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总103辑，第177页。

(8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4日。

(8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4页。

(8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5页。

(87)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8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5日。

(89) 《贺师长进攻荆沙之又讯》，长沙《大公报》，1926年9月29日。

(90) 《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91) 《第四军叶、黄团长晋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2日。

(92) 《孙传芳抵沪后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93) 《孙传芳又开军事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94) 《孙传芳在南京发表之谈话》，《晨报》，1926年8月1日。

(95) 《杨文恺将出京赴宁》，《申报》，1926年8月1日。

(96) 《孙传芳仍持保境安民态度》，《申报》，1926年8月6日。

(97) 《孙传芳致吴电之真相》，《申报》，1926年8月4日。

(98) 《孙传芳提倡之投壶新仪》，《申报》，1926年8月2日。

(99) 《江苏修订礼制会成立纪详》，《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0) 张曙时、侯绍裘：《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油印本；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本。

(101) 《各商会关于时局通电》，《申报》，1926年8月9日。

(102) 《各团体运动和平》，《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3) 《各公团呼吁和平》，《申报》，1926年9月5日。

(104) 《孙传芳复各商会电》，《申报》，1926年8月13日。

(105) 《全浙公会奔走和平之趋势》，《申报》，1926年9月12日。

(106) 《南京和平会议消息》，《申报》，1926年9月22日。

(107) 《何成濬致谭延闿等密函》（1926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芜湖快信》，《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8) 《苏省援赣之先声》，《申报》，1926年8月21日。

(109) 《孙传芳世电》，《申报》，1926年9月19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9页。

(110) 《孙军第一目标在浏阳》，《晨报》，1926年9月7日。

(111)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2月3日。

(112) 《苏粤代表会晤》，《晨报》，1926年8月1日。

(11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7页。

(11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7日。

(115) 《蒋介石致何雪竹电》（1926年8月18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1987年6月30日版。

(116)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7)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8) 《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

(119)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0) 《东南局面将有大发展》，《晨报》1926年9月9日。

(121) 《南京孙传芳通电》，《申报》，1926年9月9日。

(122) 《蒋介石复张群书》，《申报》，1926年9月12日。

(123) 《孙传芳联张讨蒋电》，《申报》，1926年9月12日。

(124)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3日。

(125)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7日。

(126) 《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1926年9月15日。

(127) 《孙传芳出发有待》，《申报》，1926年9月18日。

(128) 《苏鲁合作问题》，《申报》，1926年9月20日。

(129) 《杨文恺、张学良先后抵济》，《申报》，1926年9月22日。

(130) Foreign Office Archives，Public Records Office，London，405 Series，*Further Correspondence*，*China*，以下简称*FO*，405，Vol．252A，p．218．

(131) *FO*，405，Vol．252A，pp．218-223．

(132) 《孙传芳三爱主义》，《晨报》，1926年9月27日。

(13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89页。

(13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8编3，第130页。

(13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33页。

(136)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68页。

(13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1日。

(13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9日。

(13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0日。

(14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3日。

(141) 参见《孙传芳鱼电》，《申报》，1926年9月9日；《浙中所得卢香亭捷电》，《申报》，1926年9月28日。

(14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29页。

(143)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页。

(144) 蒋介石1926年9月5日日记云："少顷，程潜又来辞职，以不愿受益之指挥，且入他人萋菲【斐】耳。"

(145) 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解体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4页。

(146) 方之中：《回忆北伐——南昌之役》，《天津文史资料》，第14辑，第46页；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1页；《中央局报告》（10、11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8页。

(147) 程潜对蒋介石的报告，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198页。

(148) 马葆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和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149)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8页；韩梅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5页；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6页。

(150)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8页。

(151) 《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政治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9日。

(15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

(153) 《李宗仁回忆录》第26、27章，第392—396页。

(154) 雄鸷：《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6日。

(155)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0月5日。

(156) 《第二师刘师长报告》，《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10月8日。

(157) 萧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179页。

(158)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9页。

(15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1日。

(16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3日。

(161) 《孙军总部捷报》，《晨报》，1926年10月19日。

(162) Document 44，Wilbur and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145．

(163) 《张国焘回忆录》，第12篇第1章，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53页。

(164) 《中央局报告》（10月、11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16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166)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820页。

(167) 《特立同志由汉口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16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3日；参见《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9、117页。

(16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9日。

(17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1日。

(171)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5日。

(172) 《呈报攻克芦坑、李庄、乐化作战经过状况文》，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1931年版，第69—70页；《蒋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7页。

(173)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91页。

(174)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175)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3—44页；下册，第828—829页。

(176)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177) 《飞同志报告》，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第34页。

(178) 《闽粤军日内开始大战》，《晨报》，1926年9月18日。

(179) 《闽周水陆进攻计划》，《晨报》，1926年9月22日。

(180)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记略》，汉口武汉印书馆1930年版，第19页。

(18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32页。

(182) 《国民革命军东路战史纪略》，第21—22页。

(183) 温长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在上杭》，《闽西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按：李清泉（1884—1959），原名振坤，北伐时改名清泉，三十年代改名木庵，湖南省桂阳县人。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经历详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8卷。

(184)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第101—102页。

(185) 《张毅致九江联军总司令部电》，《申报》，1926年10月16日；参见阮镇秋：《北洋军阀张毅》，《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71页。

(18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187)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8页。

(188) 杨廷英等：《周荫人事略》，《福建文史资料》第9辑，第48页。

(189) 《申报》，1926年11月11日。

(190) 阮镇秋：《北洋军阀张毅》，《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72页。

(191) 《申报》，1926年10月29日。

(192) 《张毅亦有与何默契说》，《申报》，1926年11月26日；参见《我军克复福州之经过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2日。

(193)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第59页。

(194) 《福州昨晨有党军入城》，《申报》，1926年12月4日。

(195) 萧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80页。

(196)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2月11日。

(197) 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19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35页。

(199)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记录》（1926年9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200) 杨一民：《北伐期间浙军第一、三师起义和战斗始末》，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01) 宣中华、丁济美：《浙江政治党务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16日。

(202) 刘劲持：《夏超独立失败记》，浙江文史资料未刊稿。

(203) 《谭延闿报告》，《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记录》（4），油印件；参见《易培基出京抵汉》，《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6日；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

(204)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2页。

(205)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206) 杜伟：《回忆夏超的独立》，《浙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45页。

(207) 章培：《我所知道的夏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08) 《陈调元、周凤歧将继夏超而起》，《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1日。

(209) 樊崧甫：《二十六军成立前的周凤歧》，《浙江文史资料》第7辑，第83页。

(210) 《南京快信》，《申报》，1926年10月24日。

(211) 《浙省各团体致孙传芳电》，《申报》，1926年10月18日。

(212) 江天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活动和斗争》，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13) 《夏超卒附粤》，《晨报》，1926年10月23日。

(214) 虞元伯：《夏超出兵时的浙军第三师第十团》，《浙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91—93辑。

(215) 《丁夏往来要电》，《申报》，1926年10月22日。

(216) 《九江来电》，《申报》，1926年10月24日。

(217) 关于夏超之死，诸说歧异，此据章培：《我所知道的夏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参见《九江来电》，《申报》，1926年10月20日。

(218)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原件，上海市档案馆藏。

(219)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20) 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件。

(221) 《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222) 以上引文，均见《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10月17日），《教育杂志》第2期，油印本，1926年10月25日。

(22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22页。

(224)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12页。

(225) 《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75页。

(226) 《申报》，1926年10月18日。

(22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33页。

(228) 克服九江是11月5日，叶归顺国民政府是1927年3月的事。

(229)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33、47页。

(230) 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23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4页。

(2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页。

(2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53页。

(234)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页。

(2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5页。

(2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1页。

(23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89页。

(238) 《中共上海区委通告》（第86号），《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84页。

(239) 《市党部告上海民众宣言》，《申报》，1926年11月10日。

(240) 《各路商联会昨晚开紧急会议》，《申报》，1926年11月11日。

(241)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正式成立》，《申报》，1926年11月15日。

(242) 《皖苏浙三省将组联合会》，《申报》，1926年11月12日。

(243) 《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

(244) 《各团体发表时局意见之昨闻》，《申报》，1926年11月16日；《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

(245) 《三省联合会二次委员会》，《申报》，1926年11月24日。

(246) 《昨日公共体育场之市民大会》，《申报》，1926年11月29日。

(247) 《浙皖同乡已推出三省联合会委员》，《申报》，1926年11月22日。

(248) 《上海总工会公开启事》，《申报》，1926年11月30日。

(249) 《各团体讨论恢复工商学会》，《申报》，1926年12月4日。

(250) 《昨日各团体代表大会纪》，《申报》，1926年12月13日。

(251) 《市民代表大会决定上海自治》，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3日。

(252) 《市民公会昨晚之紧急会议》，《申报》，1926年12月17日。

(253) 《防止孙传芳购军火入口》，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6日。

(254) 《三省联合会阻止助军阀款项》，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3日。

(255) 《反对孙传芳破坏浙自治》，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5

日。

(256) 《孙传芳启事》，《申报》，1926年12月26日。

(257) 《皖苏浙三省联合会启事》，《申报》，1926年12月28日。

(258) 《孙传芳密令拿办团体领袖》，《申报》，1926年12月25日；《孙传芳密令逮捕之人员》，《申报》，1926年12月30日；《孙传芳通缉令原文》，《申报》，1926年12月31日。

(259) 《陈仪接浙省长篆》，《申报》，1926年11月2日。

(26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6日；参见葛敬恩：《大革命时期的陈仪》，《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6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98页。

(26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6、52—53页。

(263) 《党军入境后之浙人表示》，《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4) 《浙局紧张中实行自治运动》，《申报》，1926年12月14日。

(265) 《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2月20日。

(266)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1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77页。

(267) 《杭州各界联合会成立》，《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8) 《杭州各界联合会成立》，《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9) 《浙江各界联合会三次筹备会》，《申报》，1926年12月15日。

(270) 《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2月20日。

(271) 《浙江正式宣布自治》，《申报》，1926年2月21日。

(272) 《浙江各界联合会通电》，《申报》，1926年12月23日。

(273) 《孙传芳铣电》，《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0月20日。

(274) 《孙传芳军实入杭州》，《晨报》，1926年12月24日。

(275) 《孙传芳军实入杭州》，《晨报》，1926年12月24日。

(276) 《联军大兵开杭记详》，《申报》，1926年12月25日。

(277) 《学联会电》，《申报》，1926年12月22日。

(278) 《冯玉祥日记》（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279)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版，第355页。

(280)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281)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282)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283) 《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84) 《冯玉祥致谭延闿、蒋介石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6) 《谭延闿致蒋介石函》（1926年8月20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4页。

(287)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288) 陈天秩：《共产党对冯玉祥的影响》，《河北文史资料》第12辑。

(289)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0—201页。

(290)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91) 《各军将领推冯公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6日。

(292) 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初稿》第33章附录。

(293)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294)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页。

(295)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96)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297)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

(298)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0页。

(299) 《我的生活》，第495页。

(300) 《刘郁芬之两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1日。

(301) 《国民军入甘战史》，第23—24页。

(302) 《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96页。

(303) 《于右任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

(304)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卷13，上海军学社版。

(305)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卷1。

(306)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7—98页。

(307)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15日。

(308) 《宋嘉禾关于西北军事财政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1990年版，第2页。

(309)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陕西党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7页。

(3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9日。

(3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4日。

(312)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2日。

(313)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5日。

(314)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9日。

(315)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316)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30日。

(317) 《国民军政报》第1号。

(318) 《宋嘉禾关于西北军事财政给中央的报告》，《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10页。

(319)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5日。

(320) 《西安地方目前工作计划》（3月至5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第16页；《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陕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8页。

(321)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党务报告》，《陕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39页。

(322) 《国联总部各级政治代表大会之开幕式》，《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9日。

(323)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

(32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7页。

(325) 《中央政治通讯》第2期，1926年9月8日。

(326) 《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27)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47页。

(328) 吴玉章：《顺泸起义和杨闇公同志》，《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329) 《第十次政治会议议事录》，油印件。

(330) 《新蜀报》，1926年12月2日。

(331) 《新蜀报》，1926年12月29日。

(332) 《国民革命公报夕刊》，1926年12月27日。

(333) 《国民公报》，1927年1月13日。

(334) 《新蜀报》，1927年1月7日。

(335)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8日；《四川军阀纷争之原因及其现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3日。

(336) 据《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称：杨森“妙想天开”，竟“请求加入共产党”，见中共四川党史资料丛书：《泸顺起义》，第32页。

(337) 彭泽湘：《自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338) C．M．WiLbur and J．L．How，*Summary Report by“Seifulin”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anton in May 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20．

(339) 陈毅：《早年回忆》，聂元素等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340) 《万县各界抗英之激昂》，《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日。

(341) 《中共中央听童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2) 《中共中央听童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3) 《第十一次政治会议议事录》，油印件。

(344) 《粤区军事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9期，1926年10月25日；参见邓演达：《致杨森函》，《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国民公报》，1926年12月10日。

(345) 《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6) 《万方出川部队已开拔》，《新蜀报》，1926年9月26日。

(347) 《唐总指挥肃清鄂西总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9日。

(348) 《中共中央致鄂区信》（1926年9月27日）；《四川工作》，《中央政治通讯》第6期，1926年10月7日。

(349) 《中央给加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1926年10月13日。

(350)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8日；《中央军事特派员一飞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351) 《新蜀报》，1926年11月25日。

(352) 《新蜀报》，1926年10月24日。

(353) 《新蜀报》，1926年12月16日。

(354)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4日。

(35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21页。

(356) 《王天培克复巴东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1日。

(357) 《新蜀报》，1926年12月23日。

(35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359)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360) 《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泸顺起义》，第32页。

(361) 唐生智的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同学，且有私谊。

(36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7日、30日

(363)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292页。

(364) 《粤区关于四川军事运动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1926年10月13日；参见《川省代表傅岩同志抵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8日。

(365) 《本周国内军事政治概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6日。

(36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4页。

(367)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4日。

(36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369) 《新蜀报》，1927年1月1日。

(37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371) 《新蜀报》，1927年1月6日。

(372) 《王文华、袁祖铭、周西成以及李燊的兴起和覆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17页。

(373) 《袁军五路入湘》，《晨报》，1926年7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4日。

(374) 《国民公报》，1926年6月25日。

(375) 《时事新报》，1927年2月15日。

(376) C．M．WiLbur and J．L．How，*Summary Report by“Seifulin”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anton in May* 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20．

(377) 《袁祖铭来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378) 《吴佩孚经营黔省方略》，《晨报》，1926年8月1日。

(379) 《王天培大告奋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1日。

(380) 《最近全国政治形势》，《中央政治通讯》第2期，1926年9月8日。

(381)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

(382) 《川、滇、黔新联盟》，《晨报》，1926年11月5日。

(383) 《出师讨贼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0日。

(384) 《唐生智压迫袁祖铭》，《晨报》，1926年12月29日。

(385) 长沙《大公报》，1926年12月17日、26日。

(386) 长沙《大公报》，1927年2月12日。

(387)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412页。

(388)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页。

(389)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5日。

(390)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59页。

(391) 张肖梅：《贵州经济》，第12章11节，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铅印本。

(39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8页。

(393)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8日。

(394) 周素园：《贵军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95) 王家烈：《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

(396) 黄乾坤：《贵州军阀桐梓系》，未刊稿。

(397)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398)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1日。

(39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12页。

(400) 《民治党成立日省长演说词》，《云南公报》，第1275册，1927年1月20日。

(401) 谢崇文：《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云南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

(402)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19日。

(403) 《范石生将率川桂黔军攻滇》，《申报》，1927年1月1日；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7日。

(40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6页。

(405) 《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会布告》，《云南公报》第52册。

(406)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一　迎汪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此后，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日渐涣散，蒋介石的权力则不断膨胀。为了抵制并改变这种情况，左派及其影响下的群众迫切希望汪精卫销假回国。5月25日，彭泽民在中常会上提议：汪精卫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1)]。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归国，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2)]。7月9日，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党权、政权、军权集于一身，左派的迎汪要求因而更为迫切。8月19日，何香凝在中常会上临时动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对各方通电作出答复，并将有关函电转交汪精卫[(3)]。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4)] 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借以实现迎汪打算。9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决定

于10月1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此后，左派即决定开好这次会议，顾孟馀自任联络北方左派，拟派吴玉章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的宣传原则是：一、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二、口号为："巩固左派与CP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厉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5)]。

蒋介石对迎汪运动愈来愈疑惧不安。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请汪精卫、胡汉民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6)]。但这不过是故意作出来的高姿态。事实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即武断地认为其目的在"倒蒋"[(7)]。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中云："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8)] 这尖锐地刺激了蒋介石的神经，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9)] 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10)] 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无能和进攻武昌失利，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硬不起来。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势力[(11)]。蒋介石这里所指"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12)] 同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各县知事及驻防军与土豪劣绅所控制的民团相勾结，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压抑民众自由，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有三条路可走：

一、迫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采用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第三个办法进行起来有很多困难；比较好的是第二个办法[13]。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攻下武汉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汪回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一、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14]。当时，蒋介石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赴鄂商谈。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15]。但吴廷康和张国焘赶到湖北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

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9月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16]。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17]。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18]，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他又怎么能远涉重洋，去向汪精卫“劝驾”呢？

对于蒋介石的意图，张静江心领神会。还在联席会议筹备期间，他就千方百计阻挠迎汪问题的提出。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馀等7人。从9月14日至

29日，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做主席，声言“请汪复职”就是“拥汪倒蒋”，“誓以去就争”[19]。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20] 这样，终于迫使议案起草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开幕，28日结束，共开会12天。出席者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务必“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21]，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左派占四分之一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四分之一。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中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22] 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23] 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此，对之持反对态度[24]。会议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25]。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并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26]。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四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27] 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声势浩大，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何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28]。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五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29]。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30] 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教育、行政、军事、妇女待遇、工业家、商人、学校教职员、各机关职员及雇员、农民、工人、军人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实际上规定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内外奋斗目标。如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等

[31]。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的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之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上，左派认为叶、邵二人虽有申明，但已超过期限，并系为到粤做事，不能相信，经共产党人转圜，未予议处[32]。石瑛等八人因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33]。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P”[34]。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则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护反革命[35]。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36]。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

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定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辩。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完全无力抵抗的地位。但是，由于未能改组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权力结构，因而，左派的胜利只能停留在书面上。很快，陈独秀就慨叹：“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顾忌[37]。

二　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38]。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顾问铁罗尼（Теруни）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铁罗尼提出：“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或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39] 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徐谦来[40]。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奎吾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41]

。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以调查各省党务、政务为名，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并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42]。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Schwartz）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中国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43] 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武汉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的策略，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成为泡影[44]。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45]。次日，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46] 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47]。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48]。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一、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二、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

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49]。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曾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50]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51]。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52]。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府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53]。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54]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这使他很不高兴。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以反对"左稚病"，维护"联合战线"为主题。《政治报告议决案》称：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益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益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55]。陈独秀

认为，当时“左稚病”有六种表现：一、看不起国民党；二、包办国民党；三、包办民众运动；四、否认左派存在；五、误解党的独立；六、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56]。这次会议的中心口号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其办法主要是：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改善我们和国民党之关系”，“扶助左派势力的发展”，“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首领的文人政府”，确定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等[57]。其中最核心的是扶持和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会议在《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我们必须从上、中、下三层“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其内容为：一、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二、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左派的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三、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和下层群众间之链锁[58]。

应该承认，支持和扶植左派的想法并不错，问题是：第一，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的动摇不定的左派，或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放在左派身上，必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有必要的应变准备。

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和鲍罗廷有分歧。当时，鲍罗廷主张以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作为识别真假左派的标准，陈独秀不同意。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取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中央特别会议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观点，把土地问题列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决议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59]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以徐谦为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一致，但是，特别会议没有讨论临时联席会议的有

关问题，显然，不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没有估计到，由此会引发一场剧烈的争论。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馀、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张静江等自广州出发。同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出席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馀、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60]。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61] 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五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谎，武汉大局必受影响"[62]。7日，鲍罗廷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63]，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64] 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65] 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将临时联席会议

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对武汉左派的意见置若罔闻。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馀、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了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在人海旗林的群众集会上，或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中，便免不了出现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到武汉，“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他并说：“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了一封长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他指责鲍罗廷“跋扈横行”，声称：“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66] 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67] 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各代表发言中，“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

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68]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濬、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濬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69] 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提出驱逐鲍罗廷。21日、22日，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照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70]。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71]。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不能不派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72] 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73] 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2月8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是，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俄。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以后。

在经历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是谭延闿等三人数日内即可莅鄂。20日，南昌各界召开了欢送党、政府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了。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一、结束联席会议；二、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74]。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三　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为了改变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情况，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即拟提出恢复党权问题，但由于张静江的抵制，未能成功。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因有恢复党权运动的展开。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电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量，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75] 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馀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76]。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77] 13日，湖北省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且有一种独裁的趋势"[78]。会议通过"恢复党权，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等党务宣传四大要点。14日，颁布全省民众欢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全体迁鄂口号，其中提出的要求有："提高党的威权"；"打倒党内、党

外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反对个人独裁，实现党的民主化”；“实行清党运动”等[79]。15日，湖北省党部发表《为欢迎谭主席迁鄂告民众》，内称：“如有不受党的指挥，违反党的政治，以及一切不利于党的腐化分子，我们要努力的铲除他；如果有使汪主席不能复职的障碍，我们要尽力的消除他。”[80] 同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出席邓演达、顾孟馀、张太雷、叶楚伧等三十余人，由顾孟馀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七、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81]。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第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82] 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总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83]。继孙科之后，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84] 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2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通过于树德提议，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即日以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委员如期到会，推徐谦、孙科、顾孟馀、宋子文、吴玉章、陈友仁七人为提案委员会委员。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

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85]。次日，武汉三镇1．5万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台下群情激昂，大呼打倒张静江口号[86]。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二人，携带徐谦等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议案大纲》前往南昌，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并邀请他到武汉参加会议。函件表示，相信蒋介石“在此军事上屡建奇功之时，定能体现总理建党之意与北伐将士为党效死之决心，使本党威权普及于军事势力所及之地。”[87] 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昌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88] 两天后，他在南昌再次发表演讲，声称：“现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有冲突的”，“就是现在汉口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89] 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秘藏的杀机，预示了他将要采取某些行动。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撤回鲍罗廷[90]。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

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91]。28日，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92]。他要求展期一星期开会。同日，武汉方面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旧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93]，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94]。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五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95]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96]他终于没有到会。

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受到伫立在滂沱大雨中的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当日到执、监委员25人，以孙科为临时主席。首由谭延闿报告南昌方面情况，声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97]。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98]徐谦报告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99]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

英、顾孟馀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100] 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101] 谭延闿再次发言，声称："南昌要求展期之理论上固不足，可是事实上亦须顾到。""延闿不愿党有裂痕，南昌之请求，请大家须注意！"[102] 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认为，须中央委员19人出席方可，徐谦则认为到会中央委员16人，已足法定人数。谭称："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吾人即以此驳斥之，请注意！"谭延闿的话受到吴玉章的强烈反对，他质问说："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还是人数的不对？（谭插话：人数亦不对。）今日会议绝对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至此，会议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这使会议的气氛更形紧张。休息后，徐谦提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孙科提议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全体提案审查会，10日开全体会议，得到通过。会议同时选定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馀五人为主席团，陈其瑗为秘书长。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103]。6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补充革命学识，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

3月10日，会议正式开幕，詹大悲、经亨颐、谭延闿、恽代英、谢晋、丁惟汾、孙科、周启刚、朱霁青、徐谦、夏曦、宋庆龄、于树德、毛泽东、陈其瑗、王法勤、吴玉章、丁超五、林祖涵、董用威、宋子文、陈友仁、顾孟馀、邓懋修、何香凝、李宗仁、陈公博、彭泽民、江浩、邓演达、许苏魂、王乐平、柏文蔚等33人到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18人，候补中委11人，候补监委4人。左派占压倒优势。会

议至17日闭幕，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104]。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的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105]。孙科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106]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四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107]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全体常务委员及全体会议选出之执行委员6人组成，并指定其中7人为主席团，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108]。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前者9至13人，后者6人，其中7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109]。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条件；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110]。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在正式省政府未成立前，各省财

政主管人员由财政部选任，对财政部完全负责；非经财政部许可，各省不得征收新税、改变税率、组织新银行、发行新公债、新钞票[111]。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通过了由彭泽民提出的《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112]。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与“纠纷”，一直未能召开。会议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规定：该项联席会议“须立时开会”，但其目的则与前迥然不同，旨在“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共同指导”农民与工人运动[113]。《决议案》实际上否定了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限制，达到了使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及各种政治组织、民众组织的预期目的[114]。《决议案》表示，本党应第三国际之邀请，应即派代表三人出席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决议案》甚至提出，应由第三国际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北伐出师之后，群众运动有了迅猛的发展。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115]。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116] 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令农民放胆去做”[117]。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十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

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赋予区乡自治机关管理粮食出境的权力等[118]。《对全国农民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119]。《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馀、邓懋修、毛泽东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

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批准了董用威（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15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120]。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并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其结果为：

常务委员九人：汪精卫、谭延闿、顾孟馀、徐谦、蒋中正、吴玉章、陈公博、孙科、谭平山。

中央各部长：组织部部长汪精卫、宣传部部长顾孟馀、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部长陈其瑗[121]、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青年部部长孙科、海外部部长彭泽民。

政治委员会：宋子文、宋庆龄、王法勤、林祖涵（伯渠）、陈友仁、邓演达。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馀、徐谦、谭平山、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冯玉祥、唐生智、程潜、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朱培德、张发奎、谭延闿（以上为军人）、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顾孟馀、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徐谦、谭延闿、蒋中正、邓演达、唐生智、程潜。

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程潜、孙科、李宗仁、黄绍竑、徐谦、蒋中正、宋子文、朱培德、李济深、唐生智、冯玉祥、陈友仁、顾孟馀、谭平山、孔庚、杨树庄、柏文蔚、钮永建、何应钦、彭泽民、经亨颐、宋庆龄、王法勤、吴玉章、陈调元。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

根据上述名单，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则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誓词为："余敬谨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并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122] 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使它成为一大、二大以后国民党史上又一次充满革命热情和气氛的会议。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第二节　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一　杜锡珪、顾维钧内阁的交替

北洋政府内阁生存的关键是必须得到军阀实力派的支持。随着吴佩孚军事上屡屡败北，势力日衰，替他支撑政局的杜锡珪内阁日益凋零，难以继续。实力雄厚的奉系虽有谋求北洋盟主宝座的意愿，但认为直接出面问鼎中央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促成了顾维钧内阁的产生。

8月中旬，国民革命军渡过汨罗江，进逼湖北。21日，吴佩孚从长辛店匆匆启程回鄂。他命齐燮元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北方军事；命田维勤等部扫数南下。同日，刚上任两个月的国务总理杜锡珪通电辞职。8月底，北伐军勇克汀泗桥、贺胜桥，吴军溃退武昌，从此一蹶不振。9月4日深夜，张宗昌突然颁布北京戒严令，吴佩孚委派的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被迫出走，卫戍军被缴械。张作霖指派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为卫戍司令，直系完全失去控制北京的权力。接着，吴军搜括军饷的重要地区保定、大名也落入直鲁联军手中。张作霖早已垂涎于吴军控制的保定、大名地区。17日，张作霖密令张宗昌、褚玉璞：“时机已至，亟应依照原定计划，相机前进。”[(123)] 25日，张、褚以援鄂为名，令直鲁军分六路向保定、石家庄一线出兵。吴佩孚派人前往交涉，仅得到维持现状，暂缓增兵的允诺。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吴军败退河南。三日之后，褚玉璞指挥约四个师兵马

开抵保定。保、大地区的行政权、税收权全部转落褚氏囊中。

吴佩孚军事上的惨败加重了杜锡珪内阁的信誉危机。以借债度日的内阁几乎告贷无门。为应付中秋节关，财政总长顾维钧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当时，“民九内债”行将期满。海关偿付该项内债的年例为1100万元。北京内阁计划以此款为担保，发行“十五年公债”2500万元。这一计划立刻遭到列强的反对。8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V．A．MacMurray）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民九内债”还清后的款项，应用以偿还积欠已久的美债，中国政权“无权”利用此款作新内债的担保[124]。数日之后，英、法、日公使相继表示抗议。北京内阁无奈，决定缩小公债的金额及用途，改名为“秋节库券”。为此，顾维钧专门宴请银行界巨头，进行推销，但众人因总税务司安格联（Sir F．A．Aglen）不允担保，不肯承募。9月16日，财政部硬着头皮宣布，发行“十五年秋节库券”300万元。该库券一反惯例，没有总税务司提供的保管基金，不经银行承销，而作为现款支付中秋节军政费。历来节关，财政部至少要筹到三四百万现款。但这次除难以兑现的库券外，仅仅筹到现款一百余万。怎样应付各方的索薪索饷，度过节关，成为杜锡珪内阁焦虑的中心。

之后，果然发生了军警闹饷的风波。9月18日，国务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中秋节军政费分配方案。顾维钧提出，由于所筹现金有限，各机关薪饷只能发现金四至七成不等，不足之额，以国库券凑数。正在磋商之际，京畿宪兵司令王琦率领大批军警到会索饷。他声称，节关已届，京师军警须开饷80万，并坚请财长面洽。持枪荷弹的军警们把国务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吵大闹，要支全薪。交通总长张志谭、内务总长张国淦自愿出面斡旋。二张往返周折，巧言相劝，但军警们一口咬定只要现金，不要国库券。僵持到夜深，全体阁员“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俱无”[125]。顾维钧踌躇再三，勉强应允筹足警饷，阁员们才得以脱身出院。

虎视眈眈的军警们紧随顾维钧回寓，守候财长签发支票。顾维钧

请杜锡珪出面疏通，恳求周转时间，但武夫们仍不肯通融，扰攘不休。20日，杜锡珪搬动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交通银行副总理卢学溥出面解围，决定由中、交两行开库兑现，当场签发支票75万元、国库券25万元，军警们才悻悻而去。

财政部罗掘到的现款一多半被京师军警强行索去，余额扣除必须支付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三处协饷若干万元，所剩无几。以此分配各行政机关政费，仅敷一二成。连京官的度日费用都难以支付，北洋内阁的财政确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

这场军警索饷的劫难，使早萌退意的杜锡珪决定立即辞职。他几次三番劝说顾维钧出面收拾残局。顾维钧先派人赴沈阳探问奉系意图。奉系主要谋士杨宇霆、郑谦主张对中央不取虚名，专收实权；对各省得寸进尺。张作霖采纳此议，表示对中央政治仍守盟约，不便过问。顾维钧又派人与吴佩孚商量。吴佩孚正当兵败之余，听说接替人选是与直系素有渊源的顾维钧，自然没有意见。

10月1日，北京政府再次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顾维钧代国务总理。顾维钧对原内阁进行了局部更动，外交部：原总长蔡廷幹“对南方局势的进展甚为敏感”，以入院就医表示决绝[(126)]，顾维钧兼任外长。财政部：特任张宗昌保举的潘复署总长，潘复未到任前，派财政次长夏仁虎暂行代理部务[(127)]。顾维钧对人说，以潘应付直鲁联军，以夏交涉奉系，“如两无办法，政府亦可告无罪”[(128)]。内务部：总长张国淦因节关发薪，大受部员纠缠，坚辞不干，任命顾维钧的密友汤尔和署总长。其余人选未动。当时的北京内阁，各方都视为无足轻重的摆设。只因它维持外交，对内藉以筹饷，所以一息尚存。

顾维钧决定出马接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修约交涉已进入关键时刻，不容政府中断。顾维钧在就职演说中说：“现在外交格外困难，既有要案当前”，“不得不勉为支撑一时”[(129)]。当时，清政府同比利

时、日本、西班牙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满期。北京内阁的外交官们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解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束缚。

在期满各约中，《中比通商条约》首当其冲。该约签署于1865年，规定每十年可修改一次。到1926年10月27日，时届第六次十年期满。当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曾照会比利时政府，声明旧约到期失效，要求缔结平等新约，但交涉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顾维钧主阁后，于10月17日召开国务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提出废约，可能引起列强“重大反感”，促使它们联合干涉。因此，政府应“重在将来新约结果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内容”；修约期间可以实行“临时办法”，同时限期订立新约，以免殖民特权无限期延长[130]。北京政府随即照会比利时政府，要求6个月内订立新约，但比利时政府立即拒绝，声称“临时办法”的有效期必须延至新约实行之日。比方声色俱厉地威吓道：如遇不测，比国将以《辛丑条约》及华盛顿会议签字国资格，对华“继续维持旧状”[131]。10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最后修正案，比方迟迟不予答复，双方交涉告危。其焦点最后集中于是否限期订立新约。比方企图延宕新约订立，继续维持其殖民特权；中方力求限期订立新约，废除比方在华特权。

在北京政府的外交家们苦心竭虑，从事秘密外交的同时，民众的废约运动日益激昂喧腾。率先奋起抗争的是以比利时华侨为首的海外同胞。10月20日，旅居德、荷、奥、比等国的侨民代表53人集会比京，决议组织旅欧华侨废除中比条约代表团，召开旅欧华人废约代表大会。代表团呼吁全国同胞“于比约期满之日，即实行示威、抵货，并督促政府执行国定税则，收回法权”[132]。27日，中比条约期满，代表团及旅比侨胞在布鲁塞尔举行游行示威。比利时当局派出大队武警，拳棍交加，横加拘捕，但侨胞们前仆后继，英勇抗争。

比京爱国侨胞游行的同一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废除中比商约宣言》，号召全国朝野上下，敌忾同仇，以不妥协之态度，宣告条约无效[133]。3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议决“旧约须完全作废”，“新约草

案须彻底公开”，“反对临时协定”[134]。31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声明“北京政府与比公使秘密交涉，希图延长”，“誓不承认”[135]。一时间，各界民众团体函电交驰，群情激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大量报道、评论民众废约运动，同时抨击北京政府外交方针“一味秘密”[136]，“软弱无能”[137]，“丧权媚外”[138]，“欺骗国民”[139]。就连以稳重著称的《晨报》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否则“将为国家之罪人”[140]。

在形势逼迫下，北京外交官们的态度渐趋强硬。10月30日，外交部训令驻比公使，对比利时当局镇压侨胞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同时针对比方久不置复的延宕策略，议决作最后催促。11月4日，照会经阁议通过，当日送达比使馆。外交部秘书奉命声明：“如一日之内无答复，或答复不能满意，中国当自行宣布条约失效”[141]。翌日，比利时公使特访外长顾维钧，面递拒绝修约的备忘录，宣告“中止”谈判，将争议提交海牙法庭[142]。这样，北京政府就被逼上了梁山。

外交部接到比方备忘录后，立即紧急行动，草拟废约文件。外长顾维钧等通宵达旦，彻夜未眠。6日上午，内阁开会，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以摄行大总统令宣布中比条约“失效”[143]，并将中比交涉案一系列主要文件公布于众。随后，北京内阁陆续颁布了一批法令，废除比利时在华特权。但是，这些措施基本上是纸上谈兵，摇摇欲坠的北京内阁已无力付诸实施。

废止中比条约成为轰动一时的要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不顾另一缔约国的危言恫吓，毅然决定废止一项旧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专电报道说：“外交界视取消中比条约为中国多年来最重要之事。”[144]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焦虑不安，主张干涉。他认为，北京政府“实际上开始撕毁条约”，条约所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将“如同废纸”。他建议，国务卿以个人身分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制止”废约运动[145]。马慕瑞的态度在列强驻华使节中很有代表性，反映了殖民统治者对即将丧失侵略特权的恐惧

和恼怒。英国官方则公开表示不满。外交次长蓝普森（M．W．Lampson）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称根据中比条约，“中国政府无提议修改该约之法律上权力”[146]。日本外相币原虽然拒绝对中国提出强硬的联合抗议，但仍然希望国际联盟能发挥制裁作用[147]。可见，顾维钧废约之举确实触及了列强的痛处。

中比《通商条约》虽然废除了，但是，修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却毫无成效。该约签署于1896年，至当年10月19日期满。当月16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拜访顾维钧，探询中方意向。19日，北京政府举行国务会议，讨论谈判原则。与会者认为：旧约的关税法则、领事裁判权、航权等项条款，未能互惠平等，应于期满失效。双方应依据邦交平等原则，即日商定新约。会议原则通过外交部拟定的废除期满旧约的照会。翌日，外交部官员一再润色文稿，力求措辞委婉。

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提议“根本改订”两国商约，在六个月修约期内，“如新约不能如期成立，中国政府保留对于旧约表态之应有权利”[148]。对此，已经取得在华重大经济权益的日本当然不肯轻易让步。29日，芳泽夜访顾维钧，提出质询。11月上旬，北京政府宣布“终止中比条约”，并设立以顾维钧为会长的外交部条约研究会，专门研究修改不平等条约。10日，芳泽照会外交部，声明日本政府同意开始修约谈判，商议改订税率及某些通商条款，但拒绝对条约进行根本修正，否认中国政府的保留权。次日，北京政府将中日双方照会公布于报端，以期唤起公众舆论的声援。

然而，日本政府已将谈判眼光转向南方。11月底，日本内阁派外务省条约局长、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的代表佐分利出京南行。12月1日，佐分利在上海邀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中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各青年团体代表，征询政见。

面对强国日本的冷遇，北京内阁束手无策，中日修约谈判被搁置

一旁。与此同时，中国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修约交涉均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废除中比条约和修约外交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交叉影响与相互制约的产物。顾维钧等人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不赞成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交的孱弱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与国民革命倡导的废约运动有区别。但是，他们的修约活动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在北洋政府残破不堪的困境下，他们折冲樽俎，努力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去的民族权益。应该承认，这是爱国主义的行为。

二　天津会议与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的力量迅速扩张，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奉系觉得有机可乘，一面暗中和广州国民政府联络，希望假手北伐军打击吴佩孚和孙传芳，一面以“反赤”为名，作出援助姿态，力图抢夺吴、孙二人的地盘。

1926年7月，奉方向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石曾等人提出：“粤中宜采远交近攻之法，与奉联合。”[(149)] 同时，谭延闿也派杨丙赴奉联络。1922年至1924年期间，孙中山曾和张作霖、段祺瑞等缔结反直同盟，杨丙到奉后重提旧事，希望建立新的联盟，声称“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150)]。8月17日，蒋介石又派蒋作宾赴奉谈判。奉方表示：“绝不援吴”，“绝不援孙”，“无论如何，不使孙全部力量对北伐军作战”[(151)]。9月下旬，蒋作宾南归，杨宇霆、张作霖分别致函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等人，追述奉粤合作历史，声称“时事益棘，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国本”[(152)]。一时间，奉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似乎再次热络起来。

奉系联络广州国民政府的话说得虽很甜美，但提出的条件却很苛刻：一、南北将领联合拥戴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二、粤、

贵、川、黔、湘、鄂、闽、赣、浙、滇十省归粤，苏、皖归奉；三、川、滇由蒋介石自由解决，冯玉祥、吴佩孚由奉方自由解决[153]。这些条件中，取消国民政府，听任奉系解决冯玉祥都是广州国民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也认为该条件“十分奸险”，主张一面拖延时间，一面增兵入赣，迅速解决孙传芳之后再与奉系谈判；后来又建议：1．在奉系势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2．奉方如不进攻国民军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不反奉。3．江苏、安徽地盘归属问题，视哪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于奉方[154]。谈判久拖不决，双方都虚与委蛇，希望争取时间，实现各自的计划。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吴佩孚已一蹶不振。11月初，孙传芳又在江西大败，狼狈逃回南京。在吴、孙都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张作霖于11月11日入关，抵达天津，邀请北洋各派代表聚会津门，商讨对策。13日，张宗昌应召到津，谒见张作霖，提出“援孙”、“援吴”应当双管齐下。14日，张宗昌、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吴俊陞、汤玉麟等奉鲁系将领及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的代表出席，到会者二百余人。张作霖主持会议，声称“北赤虽灭，南赤未除”，我辈“仔肩尚未能尽卸”[155]。15日，奉鲁要人二十余人在蔡园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南方军事，直鲁联军援孙，奉军援吴，但出兵之前应征得吴、孙同意；西北军事，协同阎锡山，箝制冯玉祥军队在甘、陕的活动；中央政局，仍采取不干涉主义。会议表明，奉系对待时局的方针仍是先军事，后政治，而其军事重心，自国民军从华北败退后，已转向南方。虽然张宗昌等人对南下扩张地盘早已跃跃欲试，可是张作霖感到，北伐军气势逼人，奉鲁军不宜与吴、孙残部硬撞，自伤元气。他采纳杨宇霆等人的建议，以联合抗敌为号召，兼并北洋各派。因此，天津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是争取吴、孙对奉鲁军南下的赞同。

吴佩孚在天津的代表有三四人之多，但张作霖觉得他们不足以决定大事，于是，一面致电吴佩孚，要求迅速派全权代表来津，一面集

中主要精力，规劝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杨文恺携有孙传芳的亲笔信，经过济南时首先拜会张宗昌，表示“请效帅同心合力，加以援助”[156]。到津后，立即拜见张作霖，说明孙传芳实力尚存，“目下所需，首在饷械，不在兵力”；倘若反攻无效，再请予以实力援助[157]。可见，杨文恺的使命是借饷不借兵。天津会议开始后，奉鲁系将领气焰嚣张，杨文恺见此，知道奉鲁军南下已如箭在弦上，不敢再拦，便以讨论南下手续为题进行商谈，同时，密电孙传芳，请速择高策。

18日晚，孙传芳轻车简从，微服抵津，立召杨文恺同赴蔡园，拜见张作霖。当时，张宗昌等人也在座。张作霖与孙素未谋面，张宗昌与孙虽曾互换兰谱，也始终没有见过。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一座皆惊。一年前，孙传芳曾在江南发动反奉战争，对此，孙传芳首先表示歉意，向张作霖深鞠一躬，表示“对不起大帅”[158]。接着陈述说：“党军势日猖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此次北上，一方面系当面负荆，自承贻误大局有负诸公之罪；一方面请诸公彻底解决，尽力对南。”他表示，愿督率士卒，与党军决一死战[159]。在讨论军事部署计划时，孙传芳婉言提出：苏、浙、闽、皖尚有大兵二十余万，希望奉鲁在饷械上予以充分接济，以便反攻[160]。孙的意见遭到张宗昌的强烈反对，张称：“敌已升堂，若待其入室，则事不可为。鲁军因合作关系，义难坐视，应出兵援助，戡定长江。”[161] 孙传芳见势难再挡，退步答道：“如果鲁军决定仗义南下，本人当率所部，暂退回浙，庶鲁军可以事权统一。”[162] 这时，张作霖转圜说：“鲁军南下，系善意之援助”，“只能担任后方应援，不能为苏军担任前线。否则鲁军宁可不动，以免误会。”[163] 孙传芳解释说：“本人对于鲁军南下十分谅解。惟因军权上指挥统一起见，故请鲁军到苏独当一面，本人率部在浙江独当一面，以收协攻之效。”[164] 此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他提议就此表决。但张作霖不愿当场拍板。拦阻说：“效坤勿性急！大举动员，尚应从长商议。鲁军南下，地理不熟，只能担任二线，第一线仍请苏军任之。”[165] 最后，张作霖劝孙立即返回南京，迅速布置，奉鲁大军将随之南下。孙传芳告辞后，奉鲁首领连夜开

会，商议出兵办法。张作霖电召杨宇霆来津，参与最后决策。

20日，再次在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又一次当众引咎自责，声称本人决不回任，将浙江委托陈仪，江苏委托卢香亭，安徽委托陈调元，“此后东南大计，悉听雨、效两帅主持。”[166] 张作霖假惺惺地拍案起立说：“吾辈同心讨赤，系道义结合，岂肯利人之危，图得地盘！”[167] 张宗昌也随声附和。接着，孙传芳提议，“联合讨赤”不能群龙无首，应推举张作霖为北洋首领。张作霖故作谦虚，但众将领一致拥护。会议决定，公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联合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决议先派人征求吴、阎的意见，再发通电。关于奉鲁军南下问题，会议决定：津浦线，由张宗昌、褚玉璞担任，张宗昌率队行先南下，赴宁坐镇，布置作战上一切计划，鲁军一二日内即行发动；京汉线，请吴军从速向前反攻，奉军由韩麟春统率，陆续南下援助；海路方面，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国民革命军外援[168]。

至此，天津会议暂告段落，张宗昌于22日回济南调兵南下，孙传芳借口养病，留滞津门。此次，他亲自北上乞援，拥奉为主，被奉鲁将领夸为“能屈能伸，识时务之俊杰。”[169] 其实，他也有难言的苦衷。孙传芳败回南京后，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的代表到南京聚会，企图策动“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170]。会议上，段、吴代表相互攻讦，结果不欢而散。这样，他才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

正当张宗昌得意洋洋调兵遣将之际，杨宇霆应召到津。他认为，南下出兵必须十分审慎。其理由：第一，仅由津浦路出兵，孤军深入皖、赣，侧翼有被袭之虞，非同时由京汉路进兵不可。然而，吴佩孚对奉军假道京汉线尚无赞同表示。吴系大将靳云鹗、田维勤等态度更为暧昧。如果强行由京汉线南下，恐怕引起意外。第二，即使能由京汉线进兵，京汉、津浦两路相距太远，战线过长，以现在奉鲁军的兵力、财力，难敷分配。因此，以休养兵力、相机进取为上策。第三，

奉鲁军进取过急，东南联军将领为自身利害计，可能有意外变化。第四，阎锡山骑墙已是众人皆知，奉方应有相当的防备[171]。25日、26日，各方接连在蔡园会商。张作霖、孙传芳一致同意杨宇霆意见，决定鲁军负责保守安徽及长江北岸，孙传芳克日回宁，严守苏、浙两省。深夜，张作霖急电张宗昌，南下鲁军以浦口为止，切勿渡江，并命他迅速来津，指授方略。27日，鲁军前锋渡江，开到南京下关。28日，又遵命撤回浦口。这样，孙传芳不仅保全了苏、浙两省，而且暂时保全了皖南，为说服皖军南撤，留下了缓冲余地。奉系主要谋士杨宇霆的参与，重新调整了孙传芳与奉鲁军的关系。孙传芳对联合作战的积极性顿时高涨。他决定积极进行捧张作霖为北洋盟主的效忠活动，以换取奉系对自己的真心援助。

29日，张宗昌返回天津后，蔡园会议继续召开。关于联军名称问题，杨宇霆认为，“讨赤”二字，范围太狭，建议改称“安国”[172]。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都表示赞同。于是，由孙传芳草拟推戴电稿，分电各省。奉鲁将领及孙传芳的部将纷纷复电赞成，但是，吴佩孚及部下各将领，除寇英杰派代表星夜赴津签名外，均置之不理。张作霖见此，有些犹豫。孙传芳、张宗昌二人交口劝进，张作霖便点头应允。30日晚，孙传芳领衔通电，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该电声称：“赤逆披猖”，“邪说横行”，“仗义讨贼”，“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挈领之效”云云[173]。电报上列名的还有：吴俊陞、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刘镇华共16人。被列名的将领并非全是竭诚的推戴者。以投机善变著称的阎锡山，正在盘算押宝的方位。商震、陈调元、陈仪等人也都各有打算。

12月1日，张作霖在蔡园举行就职仪式。他身穿礼服，向天跪祷，由郑谦宣读“告天文”，随即启用印信，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并于当日发表就职通电称：“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诛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夙志”[174]。通篇没

有“讨赤”字样，显然采纳了杨宇霆的建议。但是，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把杨宇霆的主张奉为神明，张宗昌返回济南后，在就职通电中就说，“当克日兴师，协力讨赤”[175]。孙传芳也在南京就职演说中发誓：“虽有一兵一卒，亦当讨赤到底！”[176] 数日之后，张作霖也感到自己的就职通电语义含糊，便于6日发表宣言，声称：“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177]。一时成为军阀们的“名言”。

安国军是军事联盟，可张作霖却摆出了一副问鼎政府元首宝座的架势。12月10日，安国军总部发表总司令部组织机构和人事名单，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下设三厅八处。这个庞大的机构，俨然像是只待挂出招牌的军政府。

张作霖认为，若要再高升一步，应当争取列强的支持。于是派出代表与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频频接触。16日、17日，安国军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吴晋接连访问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吴表示：张作霖不赞成民族主义者撕毁条约的企图。“他认为，根据现实条件不应该完全废弃外国人在华特权”，仅须作某些修改。张作霖希望“列强以公道、诚恳的精神对待他”[178]。然而，尽管这位安国军总司令极力向帝国主义邀宠，但是，列强对其统治能力却越来越表示怀疑。就连一向支持奉系的日本也认为，“奉天派卤莽无谋，只知扩张势力”，财政穷窘，政治腐败，危机四伏[179]。因此，列强公使团仅对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表示了有限的善意。

张作霖在争取列强垂青的同时，尽力拉拢圆滑世故的阎锡山和高自标榜的吴佩孚，以便真正造成北洋各派“共戴一尊”的局面。12月8日，张作霖宣布特任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180]，阎锡山表面上声称愿追随张作霖，复电表示：“俟令文奉到后，即行就职。”[181] 实际上，自此即无下文。

对于吴佩孚，张作霖没敢贸然请他屈就副司令，而是特派张景惠

为专使，前往郑州商谈。奉方提出三种方案，请吴佩孚择一而行：一、统兵反攻武汉；二、出兵援助陕甘；三、赴京主持中央政局。吴佩孚表示：反攻武汉，自己任前敌总司令，请张作霖担任后方总司令；援陕军事应责成阎锡山出兵；北京政局听凭奉系主持[182]。但是，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染指河南。12月9日，他致电张作霖，祝贺他荣升，表示自当竭力之所及始终合作，丝毫没有归顺安国军麾下之意[183]。张作霖无奈，只好暂时听任吴佩孚独扛“讨贼联军”的旗帜。

其实，吴佩孚“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头衔早已徒有虚名。与天津蔡园会议同时，吴佩孚也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除嫡系将领王为蔚和主张联奉的寇英杰等人外，盘踞河南的主要实力派靳云鹗、魏益三等人均借故不肯出席。当时，河南境内已四分五裂，各派拥兵割据，心怀异志。头号实力派靳云鹗与魏益三串通一气，早在九十月间就与北伐军秘密联络。11月间，武汉方面两次派代表到信阳谈判，因靳云鹗坚持以索取有利地盘为归顺条件，未能达成协议。其后，靳云鹗又与陈调元暗通声气，企图组织第三势力，相约“取同一步调”，“对付南北双方”，共同抗拒奉鲁军南下[184]。当时，靳云鹗想进一步占据河南全省。但是，在没有与国民革命军达成正式协议并取得饷械援助之前，他不敢过早地行动。所以在表面上，仍与吴佩孚、张作霖虚与委蛇。整个河南，战云越来越密，终将导致硝烟再起。

通过天津会议，北洋将领在“安国军”旗号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张作霖登上盟主宝座，向着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一“联合”并不巩固，由于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张作霖升任大总统的“好梦”一时还难以实现。

三　奉鲁军南下与吴佩孚集团的分化

天津会议使北洋军阀中两个主要实力派——奉鲁军与孙传芳联军实现了联合。从此，北洋军阀纠集在安国军的旗帜下，开始了覆灭前

的最后挣扎。

为实施天津会议的南下方针，筹措军费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政务。秉承张作霖、张宗昌的旨意，北京政府财政部先后决定印发奉天军票、直鲁军票各1000万[185]。以贪婪残暴著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趁机在直隶、山东两省横征暴敛。在直隶：一、发行善后公债1000万元，其中长期600万元，由各县摊派，短期400万元，由各银行、公司、盐商分担；二、举办第六次公债600万元，向各县派销；三、预征明年钱粮400万元；四、按亩抽“讨赤”特捐400万元；五、令开滦公司代筹军费100万元。以上五项，共达2500万元[186]。在山东更是征税机关，林立如麻；催租之吏，不绝于途。仅在丁、漕两项中就附征“讨赤特捐”1600余万元[187]。同时，强行向各县摊派盐税国库善后公债2000万元[188]。这样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财，在北洋诸军阀中也不多见。

按照天津会议议定的军事部署，奉鲁军兵分两路。东沿津浦，西顺京汉，向中原、江南扩展。津浦一线，在天津会议期间已经出动的直鲁联军，暂以浦口为限，继续南下。由于孙传芳的合作，直鲁联军主力约六万余人顺利开抵皖北。

直鲁军南下，引起了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当天津会议中有关消息刚一传出，江浙各团体便纷纷集会、通电反对。孙传芳于一片抗议声中返回南京，宣布就职后，立即召集苏、浙军政要人会议，再三强调与奉鲁军合作的必要性，下令浙、皖、苏三省各筹款50万，资助奉鲁军。他并且颁布军令十三条，规定凡阻止奉鲁军南下者，以“赤党”论罪[189]。

最令孙传芳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安徽总司令陈调元。陈惯于看风转舵，素以倒戈将军著称。奉鲁军南下，安徽首当其冲；北伐军东进，安徽也是必争之地。面对南北大军压境的局势，他不得不力谋自保。11月23日，陈调元致电张宗昌，表示“听候驱策，一致对敌”[190]。

同时，又派参议唐养吾携带亲笔信赴九江向北伐军输诚[191]。孙传芳为控制皖军，电召陈调元到南京参与军事会议。陈不敢不来，但绝口否认正在与北伐军联络，声称愿与北洋派合作，并命蚌埠皖军向芜湖撤退，以示欢迎奉鲁军诚意。

就在孙传芳千方百计牢笼陈调元之时，浙江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发动在即。孙传芳感到江南时局日趋紧迫，自己顾此失彼，力难从心，便邀请张宗昌速至南京，商议对策。12月18日，张宗昌抵宁，与孙传芳共同召集军事会议。陈调元、卢香亭、许琨等将领出席。经过数日磋商，决定陈调元部开往皖南，截断北伐军在赣、浙两省的联络线；直鲁军由皖北进驻芜湖、安庆；孙传芳军以全力对付浙江。张宗昌还贪心不足地要索沪宁路，被孙传芳拒绝[192]。尽管张宗昌口头上天天叫嚷进攻北伐军，实际上只等孙传芳失败，乘机抢占江浙，坐收渔人之利[193]。

在津浦线上，直鲁军南下一帆风顺。而在京汉线上，奉军主力的进展却遭到阻碍。

战争时期风云多变，天津会议接近尾声时，西北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军胜利解围西安，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退。12月3日，国民军越过潼关，进入豫西。国民军向中原挺进的消息使奉系首领大为震惊。6日，再次在蔡园举行军事会议。奉军将领一致认为，时局严重，万难坐视，决定将驻守保、大地区的褚玉璞军全部调往徐州，在北京一带的奉军即行南下，相机入豫[194]。南下奉军以荣臻部为先锋，以于珍部为续进，任命韩麟春为总指挥。自8日起，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奉军精锐第三、第四军团相继开拔，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

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入豫。12月6日，他致电奉方说："奉军入豫增援，将领主张尚不一致，当再事疏通，借图圆满。前敌虽紧迫，尚堪支持，勿劳过虑"[195]。张作霖为尽量避免与吴军冲突，决定奉军

暂缓入豫，改派于珍任总指挥，将重兵集结于直隶、河南交界的磁州。至此，直隶全境都被奉军占领。

吴佩孚退守河南后，四面受敌，特别是豫西，警报频传。豫西安危关系中州全局，吴佩孚不得不在郑州召集会议，与寇英杰、齐燮元、王为蔚、田维勤等商议援陕问题。12月14日，吴佩孚下令，派田维勤为援陕总司令，命他率领王维城、王为蔚等部火速西援；同时责成靳云鹗、魏益三等防守豫南[196]。命令发布后，各军皆置若罔闻。当月6日，靳云鹗公开发表《上吴佩孚书》，大谈“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197]。此时，连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王为蔚两部也声称，必须发放军饷才能开拔。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整顿军纪。25日，他在郑州总部再次召集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将领密议，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派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率部，星夜驰赴信阳明港一带，包围靳部，迫其缴械[198]。28日，吴佩孚宣布其罪名是：“使总前敌，时将两月，进取无闻”，“故鸣穷困，诉诸途人，足懈军心”[199]。但是，最令吴佩孚愤怒难容的还是靳云鹗与北伐军关系日密，正谋划归顺南方。24日，吴佩孚致电齐燮元说：“豫南靳军甘图附逆”[200]，这才是吴佩孚下决心解决靳部的真正原因。

早在11月中旬，靳云鹗就对左右说：“消极而言保存，积极而谋发展，皆有与党方携手之必要。”[201]此后，他一面优礼唐生智派来的代表，一面派代表去汉口，磋商条件，准备在适当时候抗奉反吴。12月5日，李大钊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202]李大钊建议，中共中央去函汉口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然而，靳云鹗此时还不愿意以本人的名义公开反对吴佩孚。他接到免职通电后，于12月29日复电称，愿遵令交卸，归省老母，“从此优游事外”[203]。但是，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背地里，靳云鹗指令心腹猛将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等人密谋反抗。30日，高部第二十七旅旅

长刘培绪率先发难，通电河南全省，号召“共举义旗”，驱除吴佩孚、寇英杰[204]。其后，第十师任应岐所部第十九旅发动突然袭击，一度攻占郾城。面对反叛四起的局势，与寇英杰同赴豫南，执行缴械任务的田维勤中途告辞，表示中立。企图借机扩充军权的寇英杰反倒陷入困境，被迫退避襄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1月14日，与靳云鹗相从甚密的魏益三致电吴佩孚，要求与北伐军“暂为议和”[205]。吴佩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令王维城部南下，协助田维勤等部，解决魏益三。魏益三则公然调兵遣将，站在靳云鹗一边，与吴军相抗。

吴佩孚对靳云鹗、魏益三大动干戈，加速了靳、魏向北伐军的靠拢。靳云鹗通电卸职后，便秘密潜往武汉，要求“接济饷械”，以便联合魏益三，“肃清吴佩孚”，“直捣幽燕”[206]。随后又赶赴南昌，与蒋介石密谈驱吴反奉计划。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一直对策反北洋将领十分热衷，曾任命靳云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任命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靳云鹗志在取得河南，不愿困守豫鄂边境，因此只受命，不任职。吴、靳冲突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靳部师长任应岐于1月10日正式通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公开标榜愿“追随蒋总司令”“讨灭国贼”[207]。靳云鹗返回豫南后，加紧同魏益三、任应岐、高汝桐等人密谋策划。不过，表面上仍只是声讨寇英杰，并无一字攻讦吴佩孚。

这时，整个河南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各找出路，官吏幕僚纷纷准备逃亡。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杨云史有感时诗云：“西风摇落日，吹角闭孤城。举国催筹饷，诸侯但拥兵。乱山围客梦，残月带鸡声。道路皆归计，萧萧我北征。”[208]确实，赫赫一时的吴佩孚的势力已经分崩离析，离末日不远了。

四　顾维钧内阁的改组

顾维钧内阁是以杜锡珪内阁代理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没有取得北洋军阀主要实力派奉系的切实承认之前，它难以安居其位。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仅一个月，便于11月9日致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等，表示难以支撑，愿即引退，请各方“共发宏谟，早戡国是”[209]。11月28日，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联名通电总辞职。19天之后，再次通电辞职[210]，这一时期，北洋政权更形衰败，连装饰门面的内阁会议都难以凑集。

由于吴佩孚已明确表示，中央政权听凭奉方主持，因此，张作霖认为，组建新内阁责无旁贷。12月22日，蔡园会议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内阁成员以奉鲁系为主干。张作霖之所以选中“儿女亲家”靳云鹏，除了靳与奉系素有渊源外，主要是想利用他拉拢其弟靳云鹗。靳云鹏提出，以北方各将领联电公推的形式产生内阁，而不由安国军总司令直接任命。张作霖对此也不反对，因此，靳云鹏兴致勃勃地拟定就职宣言，列举《施政大纲》十六条[211]。他声称：“苟能出山，则当彻底的发挥国家主义。”[212]

不料平地起波澜。12月27日，张作霖由天津抵达北京时，得知靳云鹗已被吴佩孚免职，利用靳氏兄弟牵制吴佩孚的计划成为泡影。他一时“心乱如麻”，电召杨宇霆入京，讨论改组内阁问题[213]。杨认为，目前时局的关键仍在军事而不在政治，主张“继续维持顾内阁”，“以表巩固与吴佩孚方面提携之意”[214]。张作霖的想法与杨宇霆不同，他属意于梁士诒，希望由梁出任内阁总理。然而，梁始终不肯出任。他向张作霖献策说：“若事机未臻纯熟，袖手且处旁观，亦未尝非制胜之道。”[215] 最后，奉系决定采纳杨宇霆的建议。1月7日，张作霖通电表示维持顾维钧内阁，并且劝顾：“缺席阁员，补充足额，积欠政费，设法通筹”[216]。8日，吴佩孚致电赞成。这样，顾维钧内阁得以蝉联。

奄奄待毙的内阁出现了一丝生机。顾维钧经杨宇霆再三劝驾，开始张罗改组。他认为，北洋各实力派均应派代表入阁，以便协调政

局。他首先请奉方推荐阁员，奉方表示无此必要，请他自行接洽。此时，署理陆军总长蒋雁行来电辞职，顾维钧认为，陆军总长本为奉系代表张景惠，决定请张复职。最令人头痛的是财政总长一席。张宗昌的赌友潘复觉得筹款实在艰难，要求转任交通总长。顾维钧只好另觅财长。他先同罗文幹商议。罗文幹认为“筹款毫无把握，且年关在即，尤觉不易”，因此坚决不干[217]。顾维钧再向其密友汤尔和求援，经再三敦劝，汤勉强应允。汤尔和调任后，内务总长出缺，顾维钧请阎锡山的代表田应璜补缺。不料，田以年老体弱为辞，坚决拒绝。顾维钧知道不可强求，便改派胡维德。其余五席原封不动，即：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杜锡珪、司法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任可澄、农商总长杨文恺。七拼八凑，新内阁班子总算凑齐。

1月12日，停顿了一个月之久的内阁终于重新开议。顾维钧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一连发布了五道命令：“准免”颜惠庆内阁阁员职；“准免”杜锡珪、顾维钧两届代阁阁员职；“特任”顾维钧新内阁阁员职；“准免”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顾维钧“兼署国务总理”[218]。从法律上讲，原顾内阁系代理杜内阁，杜内阁又系代理颜内阁，而颜内阁是依据曹锟时期的宪法复职的。对曾副署过讨伐奉系命令的颜内阁，张作霖一直心怀芥蒂。顾维钧改组内阁时，罗文幹主张彻底撇开颜内阁法统，奉系自然乐从。毁阁、造阁的命令同时发表，可见阁员们期望建造一个新壁垒，能得到奉系的真心支持，使此届内阁长寿。

其实，在奉系首脑心目中，支持顾维钧内阁改组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便自己登台执政。为培植奉系的政治势力，杨宇霆提出：“新旧交通系及银行界宜为一致团结，标榜主义，共助安国，其余不妨多延陪客，以示宽大。因南方有主义，得多助，北方亦应站在拥护国权与资本线上，俾使资产界助我”[219]。这一意见深受张作霖称许。1月20日，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国务院：表示为“礼罗耆硕，集思广益”，“赞助政府挈领提纲”，特设立外交、财

政、政治三个讨论会，聘孙宝琦、陆宗舆为外交讨论会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正副会长，梁士诒、曾毓隽为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220]。三会共聘委员65人，“由杨宇霆、赵欣伯等多次商议，开列名单，请张作霖圈定”[221]。所罗致的人员，以新旧交通系、安福系为骨干，其他分子从金融老板、外交名流到民党右派，五光十色，莫不齐全。多数人愿意为奉系捧场，少数委员，如：京津银行巨子张嘉璈、外交名流王宠惠等人，事先并未与闻，事后也不到会。三个讨论会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拉拢各方”，并不切实议事[222]。

实际上，为奉系办理外交和筹措军饷的政府机关还是顾维钧内阁。内阁改组的当天，便以大总统令的名义宣布：自1927年2月1日起，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即普通进口货“按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按值百抽五”[223]。北京内阁不再等待遥遥无期的关税会议的批准，独自决定开征附加税，此事引起了列强的争议。当时，美国正在酝酿赞同英国的建议，提议由列强驻华公使联合声明：“立即无条件允许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224]。但是，日本政府强烈反对此议。1月24日，它警告美国政府：“此声明将意味着华盛顿条约的废弃”。“日本政府反对未经华盛顿条约规定的谈判，便同意中国实施附加税的提议”[225]。

1月31日，就在列强为协调政策，勾心斗角之际，北京内阁宣布将总税司安格联免职，改派易纨士（A．H．F．Edwards）代理[226]。这道突如其来的罢免令，是由于安格联拒绝通过海关，为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所引起的。南方国民政府成功地征收新关税后，北京政府便开始筹划在其控制区内，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他们认为，“时机已至”，既然英、美愿后退一步，日本也未必肯孤军抵抗[227]。至于征收办法，顾维钧内阁认为，如果设立专职机构，容易被地方各省控制，不如通过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统一征收[228]。但是，一向专横的安格联坚持认为，“海关不能征收未经条约列强批准的外贸税”[229]

。他向财政总长再三声明，除非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列强一致批准，否则，“无论政府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海关都必须独立孤行”[230]。其后，他竟离京南下，与武汉政府频频接洽。当他在汉口收到北京内阁征收附加税的指令后，立即回电表示“不能从命”[231]。对于安格联这种倨傲固执的态度，顾维钧内阁“极为愤慨”。他们认为，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安格联“无权使自己处于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232]，当时，张作霖急于用附加税增补庞大的军费开支，赞同顾维钧内阁采取强硬手段。他对日本公使芳泽解释说，征收附加税是“为讨伐南方”，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万不得已之手段”[233]，在政治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并当众表示：“安格联为中国官吏，不服从命令，故我赞成将安免职”[234]。就这样，赫赫有名的总税务司安格联被革职了。

安格联免职令的发表扳倒了一位操纵金融、左右财政的洋巨人，是总税务司任用外国人以来的头一次。《晨报》评述说：“安格联向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既握海关全权，又负保管内外债之责，操纵金融，左右财政，历来当局，无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联之允诺，可以生死内阁；安格联之言动，又可以高低公债。虽安之滥用职权有以致此，而官僚、财阀迷信外人，实为主因。举国人心之愤慨，已非一日。此次当局毅然罢免，无不痛快！”[235]

罢免安格联的命令使列强驻华公使大为震惊。英国公使蓝普森闻讯后，四处奔波，先后拜访顾维钧、张作霖和税务处新任督办罗文幹，极力迫使北京内阁收回成命，但毫无成效。于是，他便转而怂恿列强公使联合行动。

2月4日，列强公使与匆忙赶回北京的安格联一起商议对策。安格联再次重申不能奉命的理由，同时强调说，1月21日，他在汉口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已经收到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的严令，后者当即警告说：如果海关遵命征收，那么国民政府“将视其为战争法案，并将竭尽全力摧毁海关机构”[236]。与会公使一致认为，“海关

机构的完整濒于危险”[237]。根据英国公使的建议，会议决定向北京内阁递交联合抗议照会。7日，荷兰公使欧登科（W．J．Oudendijk）以领袖公使身份与英、美、日、法、意使节联袂拜访顾维钧。照会称：未经所有列强的一致批准，命令总税务司执行征收附加税，“将对海关机构的存在和职能构成威胁，从而影响所有外国商业贸易，并损害中国契约债务的担保”[238]。起初，顾维钧态度强硬，答复说：“中央政府能处理这种行政琐事，不必大惊小怪。”但他得知安格联所称国民党人的态度后表示说，北京政府极愿维持必不可少的海关，内阁将重新考虑全部问题[239]。

在英国公使策动列强联合干预的同时，英籍总税务司把持下的海关继续抗命。易纨士不仅迟迟不肯出马接管新职，而且以总税务司主任秘书的名义，威胁财政窘困的北京政府。他致函税务处宣称：“如果南方口岸停止向中央金库付款，在北方控制下的口岸将拖欠外债达550多万海关两。”[240]

迫使北京内阁重新考虑的另一个巨大压力来自国内金融界。罢免安格联的命令公布后，各项公债暴跌，靠经营公债发财的银行家们如坐针毡。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等立即拜访顾维钧，声称这个“前所未闻的行动，在全国金融市场，特别在上海，孕育着严重的后果”。他警告顾维钧：“中国银行界的意见是，如果政府不准备有效地应付局势，最好是辞职。”[241]同时，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也致电北京，要求内阁“收回成命”[242]。

在内外交加的强力压迫下，北京内阁意识到，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从速解决这场危机。顾维钧与罗文幹商议后，决定请王宠惠出面斡旋。2月8日，王宠惠以政府调停人身份拜访英国公使，表示：“虽然内阁确实不能撤回罢免安格联的命令，但是它渴望找到办法，摆脱它造成的使海关难以继续其职能的困境。”[243]英国公使欣然接受调停。因为他一直担心，持续不决的僵局可能会激怒北京内阁，导致它任命一个非英籍的总税务司。在蓝普森的安排下，安格联直接参与谈

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2月9日，双方达成协议："政府不强迫海关执行征收附加税的命令。"[244] 同时，以税务处名义致函安格联，嘉奖其任职期内的"劳绩"，准假回国，一年内仍予以总税务司待遇[245]。于是，安格联向易纨士移交工作。在第二天召开的关税会议上，顾维钧报告说："目下外交、内政因此事转多纠纷，不得不变通办理。"[246] 会议决定另立征收附加税处，附设于海关内，由海关与财政部会同办理[247]。

2月11日，安格联正式将海关总税务司职权转交易纨士。一场来势汹汹的危机，轻描淡写地结束。

维护现存海关制度是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对于列强，海关是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之一，进可操纵财政金融，干预政治，退可确保条约赔款，强索各项债务。对于北京政府，关余是其苟延残喘的主要财源之一。双方都不希望破坏海关的现状。北京内阁在颁布罢免令的时候，就特别声明："所有以关税作抵之借款、赔款，应各依原条约合同照旧履行"，各项"国债券还本付息事宜"，"继续原案，妥慎负责办理"[248]。这一训令意在向中外宣告，此次人事变动决不伤害现存海关制度。当它发现这场海关危机有可能成为南方革命势力摧毁现存海关制度的导火索时，便动手掐灭了自己点燃的火头。

五　奉吴河南战争

1927年初，酝酿已久的奉吴河南战争终于爆发。

以南下抗击北伐军为名夺取河南，是奉系的既定方针。1月26日，张作霖在北京召集奉鲁军高级将领密议，决定分兵两路南进，一路派褚玉璞由陇海线进攻开封，一路派张学良、韩麟春为"援鄂军"总、副司令，沿京汉线渡河，攻打郑州。命令下达后，奉鲁军相继开拔。5日，鲁军先锋孙殿英率第三十五师开进河南东部的归德（今商丘）。6日，奉军前锋荣臻率第十七军进占河南北部的彰德。

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奉军主力兵进河南，企图实现三个战略目的。第一，与沿津浦路南下的张宗昌部队互相策应。第二，牵制国民革命军东进，减轻东南战场上孙传芳部队的压力。第三，避免河南落入国民军手中。2月8日，在奉鲁军两路进入河南后，张作霖通告称：吴佩孚自任反攻之责，但时过半年，豫军尚未进展一步，以致北伐军势焰日张，他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已命部队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云云[249]。同时，他又致电河南主要将领寇英杰、米振标、田维勤、靳云鹗等人，声明此行“专为讨赤”，所有河南将士，只要宗旨相同，就一视同仁，“从前地位军号，一仍其旧，并望协同动作”[250]。

张作霖又打又拉的策略加速了吴佩孚军队的分化。一向亲奉的寇英杰率先归顺，为沿陇海线西进的直鲁联军敞开了豫东大门。2月初，寇英杰以迎母回鲁扫墓为名，轻车简从，抵达徐州，先后会见褚玉璞、张学良，表示欢迎奉鲁军入豫，愿率师前驱[251]。其后，又转途入京，拜会张作霖，恭维奉军入豫，帮助吴佩孚“讨赤”，“实属大义昭然”[252]。在寇英杰的影响下，驻军归德的豫东镇守使郭振才，占据开封的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先后通电宣布与奉方“合作”。张作霖随即任命米振标为第十八军军长、郭振才为暂编第一师师长。2月14日，鲁军先锋部队未经一战，抵达开封。

正当鲁军在侧翼战场顺利伸展之时，正面战场上的奉军主力也已将战线推至黄河北岸。奉军入豫后，在彰德收编了齐燮元的部队，又在新乡缴了王为蔚军的械。2月13日，奉军完全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14日，齐燮元在郑州通电下野，宣布自行开除讨贼联军副司令职责，“决不复问国政”[253]。

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靳云鹗等被迫抉择，以武力抗拒奉军的兼并。2月12日，魏益三领衔通电，公推靳云鹗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统帅各军反奉[254]。在推戴电上列名的有：骑墙观望的田维勤、吴

氏嫡系王维城、靳军猛将高汝桐等九人。靳云鹗自己也陆续通电，指责奉军“此次出动京汉，名曰合作讨赤，实则野心勃勃”。他声称：“河南为联军根据之地”，“岂得被他人攫占”！[255]

靳云鹗的抗奉得到了北伐军的支持。蒋介石任命靳为河南方面北伐军总指挥[256]。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号召河南各界人民支持豫军的反奉战争，先后拨款数十万元[257]。

靳云鹗在积极运动豫军将领联合抗奉的同时，极力疏通自己与吴佩孚之间的僵局。他密电吴佩孚，表示愿继续拥戴，建议吴与国民军捐弃前嫌，和北伐军订立两不相犯的条约，同时联合晋阎、皖陈，开创新局面，中兴直系[258]。此时，吴佩孚虽坐镇郑州，但手下可用之兵已不多。他要求张作霖速令奉军停止前进，警告说：奉军入豫，若“以威力行之”，恐“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逞，绝友先见”[259]。张作霖自然不听这一套。吴佩孚于无可如何之中，不得不听任靳云鹗出面，组织抗奉的“新局面”。

2月15日，靳云鹗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19日，通电谴责张作霖“破坏统一，蔑视中枢，谋复帝制，密约卖国，蹂躏民权，摧残同胞”等六大罪状，正式向奉军宣战[260]。列名的有：河南保卫军副司令米振标、田维勤、魏益三，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建国军总司令樊钟秀，军长王为蔚、庞炳勋、陈文钊、梁寿恺、王维城、于学忠、任应岐、贺国光、陈德麟、贾万兴、张治公、柴云陞、王振等26名将领。除铁杆降将寇英杰等人外，河南各路首领均列名其间。就连宣布接受奉方委任的米振标也榜上有名。张牙舞爪的奉军使河南将领人人自危，靳云鹗反奉既得到吴佩孚的首肯，又得到北伐军的支持，因此，能在短短数日之内，将一向矛盾重重、号令难一的河南将领连为一体。

正当靳云鹗树起河南保卫军旗帜之际，北伐军利用军阀内讧，长驱直入，开进杭州。2月20日，张作霖召集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

等人密议，决定奉军专负解决河南之责，直鲁军集中津浦线，全力南下，援助宁沪[261]。会后，奉军武汉卿旅进驻开封，接管陇海线战事，鲁军孙殿英部奉命由汴赴徐南下。2月27日，奉系首脑再次聚会，商议入豫军事部署。与会将领一致主张迅速进军，由京汉、陇海两路双管齐下。同时，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入关策应[262]。

为了抗御奉军渡河，深入河南腹地，靳云鹗率师北上，将嫡系高汝桐、任应岐等部布防于荥泽、郑州、新郑一带，意在与奉军相拼[263]。他公开表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264]

正是这种危亡感推动吴佩孚与靳云鹗站在一起。2月25日，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靳云鹗任北路，守京汉线，巩固黄河；田维勤任东路，由陇海路进展；王为蔚任后方，策应两路；魏益三任南路，维持信、郑间交通；张治公任西路，严守陕洛[265]。3月1日深夜，靳云鹗微服抵郑，在吴佩孚面前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表示"愿以一死报大帅"，但他声称"行军在统一指挥，目下我军兵械既弱，若再不能团结，前途实鲜乐观"[266]。在吴佩孚的准许下，靳云鹗改编河南直系各军为16个军，自己仍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以魏益三为副司令，王为蔚、田维勤、张治公等分任各军军长。这样，就形成了吴佩孚全军与奉军决战的态势。

奉军在军事行动之前，首先以电报展开政治攻势。2月17日，张学良率先领衔声讨靳云鹗"负恩叛上，纵敌误国"[267]。20日，褚玉璞接着指责靳云鹗"阴结赤党"，"盘踞中州，翻令赤贼猖炽，屠毒长江"[268]。3月3日，奉系老将张景惠、张作相、吴俊陞联名警告吴佩孚，"勿袒靳云鹗，以妨合作"[269]。6日，张宗昌又单独电劝靳云鹗"悬崖勒马"[270]。一时间，电报满天飞，大有先礼后兵之势。其实，奉军迟迟未动，主要是想争取阎锡山协同作战。为此，前敌主将韩麟春亲赴太原游说，但阎已看准方向，准备择机易帜。因此，韩麟春游说无效。3月5日，他复电张作霖说："冯玉祥、蒋介石、靳云鹗、阎锡山共同一气。奉军此时若入豫，晋军将由娘子关冲出，断我

归路。必须分前队一部守石家庄，以防晋军。”[271] 韩麟春使命的失败，标志着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的完全崩溃。

争取盟军的计划落空后，奉军只好单独作战。3月5日，张学良奉命抵达卫辉，召集前线军事会议，研究渡河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三路：东路为荣臻第十七军，自阳武渡河，进攻阳桥、惠济桥一带；西路为赵恩臻第十一军，自修武渡河，进攻虎牢关；中路为于珍第十军，在黄河铁桥北岸集结，相机渡河，直扑郑州[272]。7日，下达总攻令，张学良亲临前敌指挥。东路因米振标的合作，进展顺利，中路、西路均遭到吴军的抗击。中路战事尤为激烈。战斗打响之前，驻守黄河铁桥的吴氏嫡系王为蔚军，奉命将铁桥拆毁，并在南岸构筑工事，严阵以待。7日，于珍指挥中路大军搭浮桥抢渡，被吴军的猛烈炮火击退。张学良立即调上重炮部队，狂轰吴军阵地。两天过去了，只闻奉军炮声隆隆，不闻吴军回击枪响。张学良推测吴军已后撤，下令于10日晚乘夜色偷渡。奉军渡至中流时，突然南岸枪炮齐鸣。在探照灯扫射下，居高临下的吴军炮无虚发，打得奉军舟洞人溺，损兵折将达3000人。11日晚，天色突变，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而来。张学良再次下令冲锋渡河。军至半渡，吴军故伎重演，奉军再次溃败，死伤又达3000人[273]。

败报传回北京，张作霖等人决定，中路暂缓急进，集中兵力向东路发展[274]。于珍以前敌总指挥身份，率军驰往东路。3月11日，东路奉军自阳武渡河，冒雪挺进，13日攻占中牟，威胁郑州。黄河铁桥北岸的吴军担心后路被断，弃阵撤退。14日，中路奉军在张学良、韩麟春的指挥下，乘势渡河，向郑州追击[275]。16日，西路顺利渡河。在三路大军合围的形势下，郑州无险可守，吴军只能弃城出走。17日，荣臻第十七军占领郑州。吴佩孚逃往巩县，靳云鹗率部退往新郑。

正当奉军摆酒庆功之际，靳云鹗开始集结队伍反攻。

3月16日，正当奉军围攻郑州之际，已经投降奉军的米振标所部突然由前方自行撤退。张学良急令驻开封的三个混成旅火速赴前线应敌。奉军当即与靳军主力高汝桐、任应岐两师接火，激战约6个小时，靳军诈败。奉军穷追不舍，至白沙车站附近，误入靳军所设的地雷阵。奉军二名旅长、三名团长当场阵亡，士兵损失达两千余人。靳军乘机回戈反攻。奉军纷纷溃退，行至开封车站，侦探报称，魏益三军绕道由朱仙镇攻来。正在此际，米振标的毅军又在中牟响应河南保卫军。在靳军、魏军、毅军的合围进攻下，奉军残部沿陇海线退往归德。战斗中，于珍负伤。17日，靳军完全占领开封[276]。

东路反攻获胜后，靳云鹗力主乘势反攻郑州，魏益三则坚持不能孤军行动，必须配合北伐军，共同作战[277]。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靳云鹗决定独自率军反攻。他下令以高汝桐为前敌第一路指挥，任应岐为第二路指挥，全军连夜出发，于20日开始总攻。

郑州反攻战前后持续五天。双方在郑州以南小李庄车站东西一带激战。靳军数次突破，逼近郑州，都被奉军拼力击退，双方均伤亡惨重。24日拂晓，靳军再次发动凌厉攻势。前敌总指挥高汝桐亲率敢死队，乘装甲车三辆，从正面冲锋，同时命步兵自两翼出击。奉军亦以铁甲车出战。因车行太猛，无意之中车前挂钩将靳军铁车挂上，一时无法拆开。双方都开足马力猛曳。奉方急中生智，对靳军铁车开炮，平射贯入，洞穿三车，靳军机车被毁。奉军将车拉回。靳军中锋失利，两翼接连败退[278]。事后，奉军开车检查，方知高汝桐亲自在车内指挥，已中弹身亡，参谋长沈其昌等人奄奄待毙。张学良对此十分感慨，特地为高召开追悼会，致挽联云："陷胸断脰是男儿，死非其所，痛矣；沐雨栉风先士卒，事不得人，惜哉！"[279]

高汝桐是靳云鹗所倚重的心腹勇将。高阵亡后，靳军群龙无首，全线溃退。奉军乘胜追击，连克重镇。其后，靳云鹗又组织过几次反攻，但都没打出声色。奉军渐次控制河南干线。3月26日，于珍部在直鲁军的配合下，复克开封，打通陇海线。31日，荣臻部占领许昌。

4月中旬，南下奉军抵达漯河，与入豫的北伐军对峙。

奉吴河南战争是北洋军阀史上最后一次较具规模的混战。战争的挑动者奉系打着“讨赤”的旗帜，兼并异己，争夺地盘；战争的另一方，河南直系将领的状况虽较复杂，但仍未能脱出军阀的窠臼。保卫军主将靳云鹗基本上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旧式军阀，对于北伐军委任的军职，只肯暗中受命，不肯公开就职。直到最后被迫与奉军决战时，为争取国民政府的援助，才宣称“彻底改革，厉行民治”，“以三民主义为信条”[280]。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靳云鹗从未实施过任何改革，依然横征暴敛，欺压民众。这也是河南保卫军不可能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

河南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崩溃。吴佩孚的直系残余自此土崩瓦解，从军阀的行列中消亡；奉系虽然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和利用吴军裂隙，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受到了重创。战争的结局使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解体，奉系成了孤家寡人，同时使南北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奉系必须与北伐军刀枪相见了。

第三节　北伐军东下与工人占领上海

一　东进决策与占领浙江

按照北伐出师前的决策，打下武汉之后，本应北上河南，与国民军会师。对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共中央为避免和英帝国主义发生剧烈冲突，主张使该地区“成为纷乱局面，各军阀分头独立，帝国主义无法为一致的对付”，使北伐军能专力于向北发展[281]。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守住武胜关以南，不轻易与孙传芳开衅，也不轻易进入河南，而以主要力量统一西南，准备进攻奉系之军力[282]。11月8日，蒋介石与加伦商量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加伦认为：“如果现在继续向安徽、江苏前进，这事现在不是时候，并且危险。”加伦

建议：利用夏超、周凤歧占领浙江，使江苏、安徽成为缓冲地[283]。11月9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讨论，决定改变攻克江西后不再东下的意见，主张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284]。但是，这以后，中共中央的主张仍然动摇不定。

1927年1月1日至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邓演达认为此举是蒋介石“欲在东南别开局面的政治问题”，因此持反对态度。加伦也表示：“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285] 但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决定对河南吴佩孚部暂取守势，对浙江、江苏、安徽的孙传芳等部取攻势。会议同时决定将北伐军分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第一、第十四、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六等军，分为六个纵队，分由闽、赣入浙。以主力进至浙西，一部集中浙南，进取上海，夹攻南京。

中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右军、江左军两路。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下辖第二、第六军及独立第二师等三个纵队，由赣东北进取南京（第六军由赣东入浙西，协助东路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下辖第七、第十、第三十三军三个纵队，由鄂东北进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第四、第八、第十一、第十五军等四个纵队，主力集中于鄂北及京汉路南段，一路集中于鄂东北，牵制河南方面敌军。

另以第三军为总预备队，主力集中于南昌，一部集中于九江附近，留守江西，策应全局，指挥官为该军军长朱培德。

首先告捷的是东路军。

东路军的作战部署是：在浙西，以主力由钱塘江西岸向杭州及余杭之敌进攻；另以一部在浙东由处州、温州方面消灭闽军周荫人残部。

还在1926年12月中旬，起义不久的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即奉命由衢州向富阳推进，以掩护东路军主力进入浙江。同月29日，孟昭月因镇压陈仪自治有功，被孙传芳任命为浙江总司令。他一面率领3个师向富阳逼进，一面派兵越过钱塘江，进攻第十九军陈仪余部；自福建败退浙江的周荫人则率领残部从处州进驻金华策应。当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主力尚在福建，在优势敌军进攻下，周凤歧部作战失利。1927年1月5日，被迫放弃富阳，退至龙游、衢州。同月，第十九军余部与周荫人等部作战不利，于14日在宁波附近突围，辗转向温州集结。

衢州位于钱塘江上游，扼浙、赣、闽、皖四省交通要枢，是浙江通向闽、赣两省的门户。1927年1月中旬，孟昭月等部分三路向兰溪、龙游、衢州方向推进，企图围攻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孟昭月亲到严州（今建德）督战。为此，东路军入浙部队不得不电请总司令部迅速增援。

何应钦接获浙中作战失利、敌军乘势西进的报告后，即电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告以须待2月初旬，肃清福建残敌后才能进军浙西，在不得已时，可退守浙、赣边境仙霞岭之线，在江山、常山一带择要固守，待本部主力到达后，再采取攻势，以免为敌各个击破。当时，白崇禧已进抵江西横峰县南的河口镇，接电后即令前方各部集中龙游、衢州之间，后续的第四、第二十一师集中于常山附近。同时复电何应钦，请速率在闽各部队进兵浙江[286]。

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在浙各将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敌军节节进迫，已深入金华、兰溪、龙游地区，衢州无险可守，为使东路军安全集中，必须占领严州以西地区。如久处衢州附

近，坐等闽中部队到达，不免坐失良机；而且，众多部队云集，给养负担日益沉重，也非久计。会议期间，蒋介石来电告知：皖南陈调元、王普已表示与我合作，侧背威胁减轻，尽可全力对付当面之敌[287]。蒋介石还表示：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白崇禧自决[288]。

为此，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决定：不待由闽入浙部队集结，即转守为攻，分兵三路，以一部沿衢江南岸，而以主力沿衢江北岸，攻击金华、兰溪方面的敌军，将其主力包围于兰溪、寿昌地区间消灭，进而占领浦江、严州。

1月27日，进攻开始。中路第一军刘峙部第二师占领衢江南岸的龙游。29日拂晓，三路同时动作。右路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攻占汤溪；中路第一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占领衢江北岸的洋埠、游埠；左路第二军鲁涤平部则在永昌、诸葛、寿昌之间与敌军形成胶着状态。2月1日，中路军先遣部队占领兰溪。2日，周凤歧部占领金华。同日，白崇禧亲率第一、第二、第二十一师增援左路军，守敌退却。3日，各军相继占领浦江、严州，淳化、桐庐等地，向杭州推进。

孟昭月由兰溪败退杭州后，整饬部队以谋反攻，孟本人亲至富阳督战。11日，分两路向东路军反击，一路进攻桐庐，一路进攻诸暨。经五昼夜激战，孟昭月部误以为内部反戈相向，故“向后崩溃，自相践踏”[289]，纷纷向富阳方向溃逃。16日，中路军击败孟昭月部，进占富阳。与此同时，左路鲁涤平部进占临安、余杭，右路周凤歧部占领诸暨、萧山。此役俘虏敌军八千多人，并缴获大量军用品[290]。

富阳、余杭、诸暨等地相继被东路军占领，杭州失却了保护屏障。孟昭月从前线逃回后，勒索钱款三百余万元。17日晨，同周荫人、孙传芳的总参议王葳桐、代理浙江省长蔡朴率万余人仓促撤离杭州，退往松江、嘉兴一带[291]。18日，东路军克复杭州[292]。

浙江战事紧张进行之时，何应钦指挥东路军第四、第五、第六3

个纵队由福建进入浙江，分左、中、右三路向江山、处州（今丽水市）、温州进兵。第四纵队于2月17日抵达江山。第五纵队于17日进抵金华，继续向诸暨推进，协同第二十六军占领绍兴。第六纵队于2月12日进抵温州，随后，又到达台州、奉化。21日，占领浙东水陆交通中心宁波[293]。

至此，浙西、浙东之敌基本上被消灭。东路军仅用了约二十天时间，即占领整个浙江。孟昭月等部主力的被打垮，使孙传芳联合奉、鲁，以浙江为基地实行反攻的计划彻底粉碎，为北伐军进攻江苏、安徽，夺取上海、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即已议决于浙江设立临时政治会议，并任命张静江、周凤歧、韩宝华、陈其采、经亨颐、宣中华、蒋梦麟、蔡元培、褚辅成、戴任、马叙伦等11人为委员，以张静江为主席。张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未到任前，由蔡元培代理[294]。1927年1月3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宁波成立，因孙军进袭宁波而暂时疏散。东路军克复杭州后，各委员陆续抵达。3月1日，通电各界，宣布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开始执行职权[295]。

二　收复安徽与攻克南京

东路军占领浙江后，孙传芳以其残部二万余人部署于松江、青浦及吴兴、宜兴一带，企图守住江苏，与国民革命军作最后较量。奉军、直鲁军为确保上海、南京，也兼程南下，增援孙传芳。张学良亲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2月23日，张宗昌抵达南京，与孙传芳商定：孙部担任松江前线防务，直鲁军以3万兵力进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防守沪宁线西段，协同孙军扼守淞沪，并设安国军苏鲁联军总司令部于南京[296]；张宗昌另命直鲁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舰队到上海，以增强防卫力量。

2月25日晚，孙传芳、张宗昌在苏鲁联军会议上决定：孙军已苦

战数旬，士卒劳苦不堪，即日起调回后方休整，由直鲁军担负淞沪前线防务[297]。27日，孙传芳、张宗昌同赴松江前线视察，商讨苏、鲁军反攻事宜[298]。

当时，孙军内部已呈严重不稳和分裂状态：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于2月20日在徽州起义，就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职；第六师师长陈调元、第三旅旅长王普在皖南加紧同北伐军联系[299]，上海防守司令、第九师师长李宝章派员赴杭州输诚，接受第十八军军长的委任；驻沪海军宣布与孙传芳脱离关系，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300]。这种情况，说明孙传芳军阀集团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于2月23日到达杭州。同日，北伐军占领嘉兴。25日，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等人出席。与会者认为，苏、鲁军云集沪宁线，恃铁路运输之便，可以东西照应，因此应首先截断沪宁线，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并造成北伐军东可攻上海、西可袭南京的有利态势。基于上述分析，会议决定：一、以白崇禧所属第一、二、三各纵队沿沪杭路，攻取上海；二、以何应钦所属第四、五、六各纵队及拨归东路军指挥的中路军第二军，自浙江长兴进入江苏，进攻沪宁线上的常州、丹阳，然后以一部东攻无锡、苏州，以主力西向，与江右军会攻南京[301]。

3月10日，何应钦赴浙、皖边境的泗安督师。孙军郑俊彦、白宝山部在江苏宜兴、溧阳等地布防。16日，东路军第四纵队冯轶裴部占领溧阳。17日，第五纵队赖世璜部攻克宜兴。21日，占领常州，切断沪宁线，同日，何应钦命赖部东攻无锡、苏州，会合白崇禧所部进攻上海；命冯轶裴等部西攻南京。

当东路军节节胜利之际，中路军也势如破竹，顺利进展。

2月中旬，中路军江左、江右两军同时东进，分别向皖南、皖西进军，其战略目标是：夺取安庆，攻略芜湖、合肥，会攻南京。

江右军按原计划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由程潜兼任，下辖第六军的第九、第十七、第十九各师；第二纵队指挥官为鲁涤平，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各师，暂归东路军指挥，由赣东攻击浙江，会攻沪宁线。第三纵队指挥官贺耀组，下辖独立第二师。

江左军也分三个纵队。分别由李宗仁、王天培、刘佐龙兼任指挥官。

2月15日，江右军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分别自九江和景德镇出发。20日，江右军推进至安徽至德（今并入东至县）祈门一线。同日，江左军的第七军自鄂东抵达皖西的太湖。两路军队都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陈调元和孙传芳貌合神离。安徽名义上属于五省联军统治，而实际上自成体系[302]。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陈调元即向北伐军方面谋求出路。1926年11月24日，陈调元密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接洽[303]。1月27日，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向革命军输诚。革命军入皖后，刘即于2月20日在徽州率部起义，被任命为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安徽形势的变化引起张宗昌的惶恐和不安。2月28日，张与孙传芳商定：孙军撤往江北，以后前线军事由直鲁军负责；命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郑俊彦为安徽总司令（未到任前由直鲁军第七军军长许琨代理），以加强该省军事防务[304]。3月1日，张宗昌、孙传芳因陈调元、王普两军态度不明，将陈在浦口、蚌埠的部队缴械。4日，陈调元、王普、叶开鑫相继易帜，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分别就任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第二十七军军长及新编第五军军长等职，至此，长江北岸重镇安庆及皖南大片地区不战而定[305]。

芜湖、当涂系皖南交通枢纽，通往南京的要道。3月6日，程潜指挥第一、第三纵队由水陆两路进攻芜湖。当日下午4时许，前锋抵达芜湖附近，直鲁军未敢阻击，即向当涂方向撤退，江右军占领芜湖[306]。15日凌晨，程潜继续指挥第一、第三纵队进攻当涂，直鲁军第四军第五师孙宗先部三个旅八千余人扼河防守。16日，程部水陆并进，迅速肃清当涂外围据点。17日，直鲁军败退，江右军占领当涂，打开了进入江苏的大门。

与此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推进到皖中，控制津浦南段及合肥、六安、蚌埠等城市。

这样，东路军、中路军从苏南、皖南、皖北方向直接威胁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当时，张宗昌正在徐州、蚌埠间指挥作战，坐镇南京的孙传芳见形势危急，将其总部移往扬州，由第六军军长褚玉璞指挥直鲁军十万余人及白俄兵一团守卫南京[307]。

东路军和江右军共同担任会攻南京的任务。3月20日，程潜命令所部发起总攻。21日，贺耀组部攻克秣陵关、陶吴镇；第一、第二纵队分别攻占江宁镇与龙都镇。22日，第二纵队攻占淳化镇。同日，东路军占领镇江[308]。至此，南京外围各重要据点的敌军基本肃清，兵临石头城下。

23日，程潜率江右军各纵队乘胜围攻南京城。第二纵队第四师进迫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击溃将军山、牛首山、韩府山之敌后，向武定门、通济门进攻。第一纵队占领雨花台后乘胜进逼中华门[309]。褚玉璞眼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敢再行抵抗，决定放弃南京。当日中午时分，直鲁军由下关抢渡，撤往浦口，遭到北伐军截击，死伤甚多。由于混乱拥挤不堪，许多官兵堕水溺毙。直鲁军大刀队在溃退时，沿途砍杀居民，将头挂在电线杆上，惨不忍睹[310]。同日午后6时，第六军第十九师突破中华门，冲入南京。次日晨，程潜指挥第二、第三纵队占领南京全城，俘虏直鲁军四千余人，缴获步枪三万

余支，大炮、机枪约百门、挺[311]。

南京攻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24日通过吴玉章、林伯渠的提议，成立江苏省政务委员会，推举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11人为委员。

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上旬，北伐军制订出对长江下游的作战方针。东路军由赣东、闽北进入浙江，攻打沪、杭；中路军由长江两岸进攻皖南、皖西，而后会师南京。中共上海区委为配合北伐军，于2月16日开始，积极准备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起义，健全和充实职工运动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以加强对工运和民众运动的领导。17日，北伐军进逼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租界当局和防守司令部加强戒备，从下午6时起实行戒严，节日期间民众燃放鞭炮也被禁止。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为总同盟罢工的通告》：宣布经代表大会决定，于19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通告》宣称："此次总同盟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故在此次行动中，绝对不能有经济要求之提出，同时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即希将此意通告全体工友为要。"[312] 19日，下达总同盟罢工令，要求全市工人在"令到之时，即刻行动，须有秩序、有组织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313]。同日，总工会又发布《总罢工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等17项最低限度的总要求。

19日晨6时起，总同盟罢工开始。当天罢工人数约15万以上。20日，增至27．5万余人。21日，增至35万人。22日又增加万余人。罢

工人数达到36万人以上。

据施英（赵世炎）记载：“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盛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场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统治阶级由恐怖而愤怒了，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314)] 上海防守司令布告：“遇有煽惑罢工或阻止上工以及扰乱地方秩序者，一律格杀勿论。”[(315)] 华界和租界到处军警密布，李宝章的大刀队沿街梭巡，任意搜查行人，滥捕滥杀，将被斩决者悬首于电线杆上，或暴尸于地。浦东小贩口呼“卖饼”，兵士误听为“打败兵”，即用刺刀乱刺。这时的上海，一面是以工人为主力的广大市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奋不顾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一面是封建军阀疯狂挣扎，杀人如麻。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又一次在十里洋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这次总同盟罢工并未由中共上海区委正式决定，而是上海总工会自行宣布的，也没有把这次罢工作为“暴动的开始”[(316)]。因此，罢工开始以后，没有指明这就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甚至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317)]。有整整两天，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在街头横遭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余人。

屠杀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罢工的第三天（21日），工人区里的工人自发地同军警展开搏斗。也就在这一天，区委才决定“积极准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318)]。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罗亦农、赵世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周恩来也参加了暴动的领导工作。起义的时间约定为22日晚6时，由海军先开炮，浦东工人上船拿取枪械，然后攻打兵工厂。正午12时，区委宣布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四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强。

22日下午5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江边的建康、建威两炮舰开炮20余响，但因准备不周，没有几人去舰上拿取武器。在闸北和南市区，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了零星的战斗。

区委在发动罢工时，号召全市罢市，但遭到商界的拒绝。小商人害怕，大商人虞洽卿“一方面表示勇敢，一方面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319]。国民党党部也没有力量，至于三省联合会的那些知名人士这时已躲的躲，逃的逃，不见踪影。只有工人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然而，工人本身的组织与团结也不够，罢工后有许多工人回家去了，而敌人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总之，各种迹象表明，第二次武装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

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复工宣言明确地指出“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骚动不安，“更大的争斗”即将呼啸而起。

四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与市政府的诞生

当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时候，东路军节节前进，于2月23日占领嘉兴，先头部队抵达松江附近。张宗昌和孙传芳急令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部南下，驻防沪宁线。毕氏的陆战队因受到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驻沪舰只的阻挠，未能到达上海。3月初，驻防安徽的联军将领陈调元、王普等倒向国民政府，安庆、芜湖一带归入北伐军范围，联军内部瓦解，致使直鲁联军不能大批南下。9月，张宗昌、孙传芳共同委任毕庶澄为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部让防，开往江北通州。其后，因铁路工人罢工，毕氏在沪宁线上的部队首尾不能呼应，防务相当虚弱。

此间，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增派军舰来沪。到3月中旬，黄浦江停泊外舰多达39艘，官兵8200余人[320]，随时准备登陆，以加强租界

的殖民统治。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于下令复工，结束第二次起义的同时，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扩大并充实市民公会，并宣传市民政权”。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成立了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也称特务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五人宣传委员会[321]。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心再接再厉，借助于北伐军进军上海的声势，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因此，第三次起义依然沿用了响应北伐军这一口号。

当时，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等都保持着警惕。罗亦农认为：“北伐军一来，江浙两省必有绝大反赤局面。”[322] 蒋介石、白崇禧“一定要特别联合所有大资产阶级、银行买办、流氓、政客等攻击CP”[323]。因此，怎样防止将来的“反赤局面”，怎样对付“已成为反动势力的中心”的蒋介石，是共产党人在推翻封建军阀政权时所面临着的另一严峻课题。上海区委认为，现在如果公开倒蒋，蒋必益发反对CP[324]，因此，应“不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CP与KMT的争斗，无论在任何争斗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而且共产党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现在“只能在口头上宣传”反蒋，“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325]。陈独秀认为，“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争斗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具”[326]。总之，共产党希望尽力团结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实行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北伐军一踏进上海，便面临着既成的革命局面，从而遏止蒋介石的反动。可见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含有互相矛盾的双重任务，即既响应北伐军，又防止蒋介石、白崇禧所率领的北伐军反赤。后一任务隐蔽在前者中，统一于当前的推翻孙传芳统治这一中心任务。

特别委员会是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的最高决策机关。从2

月24日至3月30日，它先后召开了31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分析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军阀部队的兵力部署和对敌策反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迅速地制订出政策和策略，然后分头贯彻。

26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他说：现在“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和“群众的开代表大会”具有同等意义。陈独秀认为：“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陈独秀还针对上次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未迅速转入武装起义的缺点，指出应该“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一旦开始起义，“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枪】，一支二支都夺取”。根据这些意见，特别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327]。

关于市民政府问题，陈独秀在28日的特别委员会上又指出：“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的选举工作……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政府。”[328] 陈独秀并提出，在市民代表会议里，“起码一半工人代表”。周恩来提出：“各产总都要派代表，且组织党团。”[329] 中国共产党决心要在市民政权中争得它的领导地位。有关市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市政府委员的人选，都是由共产党提出初步方案，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的。

在拟定市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时，区委与上海国民党当局发生了争论。国民党人士认为“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代表大会”[330]。即使选举代表，也应“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反对以职业为单位的选举法。他们惟恐“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共产党主张市民代表会议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的关

系”，“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331]。两种不同意见，反映出了国共两党对市民政权领导权的争夺。经过反复协商、讨论，由于共产党的方案已在着手实行，国民党的一些负责人才勉强同意了。

3月7日，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制订市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市代会分市、区两级组织。无论市或区代表均须由各工厂、各手工业工会、各店员大会、各农会、各商店、各学校、各自由职业团体直接选出。“非职业团体，均不得选派代表”。市代表会议的职权为：议决特别市市制；选举市执行委员；议决市捐税、预算、决算等事项。市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总揽全市政务：执行市代表会议议决案，并分局办事”。区代表会议的职权为：选举区执行委员会，“议决本区一切应兴应革事件”。区执行委员会选出区常务委员，组织区常务委员会，处理全区事务[332]。

12日，上海市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二百余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推举孟心史、汪寿华、林钧等为大会主席。大会首先议决：“凡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学阀、洋奴土贩以及曾效忠于帝国主义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均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然后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大会宣言称：本会“受国民政府之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市民之意旨，接收上海政权”。本会对于反革命分子必“为民除害，决不宽容”[333]。

在市代会召开前后，南市区、浦东区、沪东区等也相继召开了区代表会议。

市代会的成立，不啻是对现政权的否定。但市代会若成为真正的政权机关，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并有雄厚的武装作支柱。因此，在广泛宣传市代会的同时，上海区委还在夜以继日，或公开或秘密地准备武装起义。

这些工作有：

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充实各级工会的领导力量，为武装起义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区委将全市产业工会划分为17个产总，加强统一领导。到3月中旬，有组织工人又增加10万人，新工会可成立150个。

建立上海总工会纠察委员会，统一领导纠察队的扩充和训练工作，教育队员明确起义的政治目的；训练队员应具备的条件，如随机应变、坚守任务、态度镇静、动作敏捷等；掌握巷战技术，如怎样联络、冲锋、缴械；懂得各种武器的使用及效力等等。到第三次起义之前夕，纠察队员发展到约五千名。

秘密购置枪械弹药。

联络商界保卫团和帮会势力，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各区制定详细的巷战计划。

建立宣传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区委通过四百个演讲队[(334)]、《区委每日通讯》和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秘密地或公开地向工人、市民讲解革命形势，宣传党的任务和政策。

迅速地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自1月10日到3月14日，上海市共产党员从3075名猛增至4400名[(335)]。

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壮大左派队伍。

千头万绪、繁重异常的起义准备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分工领导下进行的。5日，周恩来向特别委员会汇报，武装起义的“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随时随地夺取武装”。但究竟哪一天起义，对此，特别委员十分慎重，多次讨论。最后，由陈独秀归纳了三条：“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今汇丰路）与北站兵向苏州撤退。三条有一条就决定发

动。”武装起义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指挥[336]。

19日午后1时，北伐军进逼松江，武装起义时机成熟。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越发感到北伐军来后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陈独秀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介石【的】，民众是CP【的】……现在我们只有工人群众，尚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等很多群众未发展。我们如果有很大多数的民众对他示威，他也或许能够让步。所以我们在这一礼拜以内要特别发展国民党员”，以便“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337]。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开展”。又称：我们在民众政权中，“应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338]。

同日下午3时，罗亦农召集各部委、产总负责人联席会议，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等。

20日晚，北伐军占领近郊龙华镇，奉令停止前进，期待直鲁军投降。

同日午夜十二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罢工。各工会“因准备之长久，宣传之普遍，工友之觉悟”，在接到命令以后，于短暂的3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工人不下80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339]。

工人罢工以后，立即拥向街头，租界里的工人迅速进入华界。武装工人在前，徒手工人随后，按既定的作战方案，勇猛地冲向各敌占据点。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起义在7个区同时举行。南市区：以法商电车公司和铁路工人为

主，以救火会的钟声为信号，首先打下警察厅，再攻南火车站，然后集中力量攻打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虹口区：首先由电力、纺织与金属工人发难，夺得警署及枪械，继而镇压捣乱的流氓。浦东区：各厂工人群起响应，先扑攻残害工人的第三警察署，然后扫除游巡队，收缴由前线溃败下来的鲁军枪械。吴淞区：由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和纱厂工人围攻溃逃的毕庶澄败兵。在沪东区、沪西区、闸北区，也都以工人的队伍为主，他们首先攻打的也是各区的警察署。

在巷战中，市民积极支援工人。或直接参加战斗，或主动借木板、砖头、布袋，与工人一起构筑街垒。小饼店店员做馒头供应工人。当天晚上，7个区的警察署都被工人拿下，俘获2000名警察。这时，只有闸北区的敌人尚在负隅顽抗。于是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纷纷向闸北集中，进行支援。

闸北区的敌人是正规军，武器配备齐全，有机枪、大炮、装甲车，还有一支精于作战技术的白俄雇佣军，伙同军阀部队固守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三个据点。北火车站的南面是公共租界，由帝国主义军队把守，工人无法从正面进攻。附近的民房也被敌人烧毁，工人在进攻时没法得到掩护。这时，周恩来将总指挥部迁到闸北第五警察署的所在地，亲临火线指挥。他针对三个据点采用不同的战术。对北火车站，暂取守势；对商务俱乐部，围而不打；先解决天通庵的敌人。22日下午4时，工人先后攻克天通庵和商务俱乐部，然后集中全力，猛攻火车站。到下午6时，终于拿下了火车站，约二千名鲁军逃入租界，后被缴械遣散。经过28小时的激烈巷战，上海工人全部占领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的起义也同时取得胜利。

22日上午9时，当闸北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开会，“出席代表非常拥挤”，“到会团体千余，代表四千余人，公推王晓籁、汪寿华、林钧三人为主席团”。会上由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白崇禧、杨杏佛、虞洽卿、罗亦农、汪寿华等19人为市政府委

员，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汪寿华在会上提议“请北伐军火速来沪，剿灭直鲁溃军”。当日下午2时，上海市民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到会50万人，公推代表赴龙华，请白崇禧火速派出部队[340]。白崇禧按兵不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自动请缨，但当薛岳部队到达闸北时，巷战已接近尾声。

23日，市政府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选出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时发布第一道命令：除武装工人纠察队外，24日上午10时全沪工友一律复工。

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在巷战中诞生，是上海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在这个政权机关里不能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地位。十九名市政府委员中有九名是共产党员。它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上层）的联合政权。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及市政府的诞生，都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直鲁军败北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取得的。这种情况，一方面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变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资产阶级还比较积极，他们有夺取政权的热情。但北伐军越逼近上海，他们的态度便越冷淡，认为大局已定，犯不着再去冒起义的风险。钮永建称：“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341]。中小商人的团体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议董也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342]。南市商会告诫称：“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343]有些人“不敢【做】市代表”[344]，认为如果要做代表，也得“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345]。他们认为市民代表会议“是CP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因此，有的当上了代表，也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346]，心里既高兴，又害怕，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共产党既然决心发动武装起义，而且所推翻的是封建军阀政权，所以资产阶级也就附合共产党的主张，但他们三心二意，左顾右盼，不时地把视线转向北伐军。

起义胜利以后，工会拥有一支两千四百多人的武装纠察队，这使资产阶级不禁毛骨悚然。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公会等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347]。武装起义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于是，资产阶级对市政府采取拆台手法。他们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和国民党人士钮永建、杨杏佛等先后有七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或执行委员的职务。

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沪上商界表示对蒋氏“一致拥戴”，“希望蒋氏对于商业有维持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要求蒋氏实现关税自主和取消厘金。至于劳资问题，“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348]。总之，资产阶级把他们对外对内的要求都寄希望于蒋介石。共产党在发动起义和筹组市政府的过程中，曾试图拉住资产阶级，而现在资产阶级却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29日，临时市政府召开成立大会，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当到会代表正在讨论“召集盛大之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案”的时候，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信，内称：“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前，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349]蒋介石的恐吓和资产阶级的拆台，使市政府各委员“不能实行职权”[350]，市政府完全瘫痪，动弹不得。

武汉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上海市政府的合法性，但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武汉国民党中央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如有希图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者，即以反革命论，但鞭长莫及，无济于事。上海工人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乔装打扮的“友军”，内有资产阶级叛离，外无农民群众援助，又一次地陷入孤立的困境。上海工人用生命换来的市政府，当它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便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人认为：“在此时期，决难避免冲突。”我

们“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351]。工人纠察队孤守在湖州会馆，严阵以待，面对着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势力。

历史前进的步伐，有时缓慢呆滞；有时迅疾猛烈；有时迂回曲折。1927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局正处于变幻多端、扑朔迷离之际。为时不久，上海就发生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

第四节　各地群众运动的高涨

北伐期间，群众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发展起来。它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反过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又大大推动了全国群众运动的高涨。

一　农民运动

国民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

北伐战争开始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贫、雇、佃农，只占有耕地的百分之六；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一的中农，占有耕地的百分之十三；仅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四的地主、富农，却占去农村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一[352]。封建地主凭借土地，残酷剥削农民。田租额极为苛重，全国各地都不少于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竟达到百分之七十或八十。遇到灾荒，农民往往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租。同时，农民还受着庞杂的捐税剥夺。1926年时，河南省钱粮已征到1929年，陕西征到1931年，四川省竟征到1933年[353]。加之兵灾频繁，军阀除直接酿成战争，祸害百姓外，更滥发军用票、金库券以至勒种鸦片，加以剥削，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

发动农民革命，必须首先改变极不合理的租佃制度，减轻农民所

受的剥削。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中共建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严禁对农民之高利贷”、“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等意见[354]。大会还决定在农民部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作为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以毛泽东、林伯渠、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萧楚女等九人为委员。同年7月，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会议制定的《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百分之五十”；“限制专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355]。8月17日，在中共领导下，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议决目前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为：经济方面，田租至少减去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杂捐苛税均须废除，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废除佃业一切不平等契约。政治方面，乡长由乡民大会公举；县长暂由政府指派，但人民有撤换权；凡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能再有别的武装团体成立。

广东国民政府对发展农民运动持积极态度。9月7日，发表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保证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当遵先总理之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务使农民能自由使用田土，同时政府当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以免除不合法之盘剥。政府复当援助农民反对贪官污吏，参加乡村统治权，以改善农民之政治状况”[356]。10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政纲》中，对农民经济斗争中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共22款。主要有：减轻佃农田租25%，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遇饥荒时免付田租，禁止先收租；禁止重利盘剥，利息不得超过20%；“禁止预征钱粮”、“禁止包佃制”。《政纲》并规定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的自由，保障农会的权力、农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自由等[357]。1926年底至1927年初，湖南、江西、湖北、广东等省

农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府，先后都通过了减租问题的决议案，或颁布了减租条例。

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1月在上海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阮啸仙、彭湃等七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到任后，即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强调除广东外，应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为重点，同时在安徽、浙江、陕西等七省展开，并建议在武汉设立农委办事处。此后，农民运动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工作。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在广州开办过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至9月，又在广州番禺学宫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毛泽东为所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每月提供五千余元办学经费。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共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大多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教员23人，其中16人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人陈其瑗、陈公博、甘乃光也在所里任教。此外，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汪精卫、何香凝等都先后到所作过报告。为了开展调查研究，农讲所将全体学员按省区分成13个研究会，引导学员研究各地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重视学员写的材料，选出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出版发行。在序言中，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358] 他主持农讲所期间，共编辑出版了52种《农民问题丛刊》。此外，在黄埔军校师生的帮助下，学员们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在萧楚女等人带领下前往

韶关、海丰等农村参观。这些学员毕业回省后，绝大多数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毛泽东又倡议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积极支持这一倡议，并联络湖南、江西两省省党部，提议联合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359]。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武汉办公后，决定将它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该所共招收900多名学员。此外，各地、各省也办过不少农运讲习班。其中举办最早、影响较大的是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韦拔群、陈伯民开办，完全按中央农讲所的模式教学，为右江十几个县培养了近六百名既有农运经验，又懂农运理论的骨干，使东兰农运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锋队。

这一时期，还专门培养了一部分农运武装人员。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中共在广东开办北江农军学校，培养出农民武装斗争干部259人，毕业后担任乡、区、县的农民自卫军干部。4月1日，湖北省农民自卫军养成所在武昌设立。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合办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学员达300人。

通过上述农讲所等培养出来的学员，迅速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据统计，1927年3月，仅湖北省就有2106名农运特派员在全省41个县工作，领导各级农协的建设。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许多省份的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北伐战争前，广东农民协会会员为64万余人，到1926年9月，增加到83万人。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农运迅速发展。1926年12月末，已成立和正在成立的县农协组织34个，会员28．7万人。1927年3月4日至

22日，在武昌召开了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841人，代表36个县农协的有组织的农民81万余人。会议通过了铲除封建势力等议案，全省农运形成高潮。到5月前，全省69个县中，组织农协的有54个县，会员总数250万人以上，平均每天增加5000人。

河南虽然还处在军阀统治下，农民运动也在暗暗发展。1926年4月18日至20日，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在省会开封秘密召开，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人，参加农民自卫军的约10万人。1927年3月15日至21日，在武昌又召开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出席69人，代表45个县40万武装农民。4月底，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100万人。当时，红枪会正在直、鲁、豫等省发展，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专门为此作出《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指出要团结、争取他们，共同反抗军阀。

据1926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报告，江西十多个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全省农协会员在6000人以上。1927年2月20日至28日，在南昌召开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54个县的农民代表141人，正式成立江西省农民协会。方志敏等人当选为负责人。大会通过26项决议，提出各县农协与县政府、县党部和民众团体共同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组织农民自卫军；“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地主不得任意收回租地”。6月，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38．2万人。

湖南省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1926年11月，全省75个县中已有58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下属463个区农会，6867个乡农会，会员人数达136．7万余人。同年12月，在长沙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70人，宣布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中共湖南区委向大会提出了湖南农民目前最低限度的28项要求。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到1927年3月底，全国已有5个省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在武汉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农会组织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浙、闽、苏、直、鲁、桂、热、察、绥等17个省，有组织的农民达915万人。有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农民部计划，决议组织全国农民协会。邓演达在会上报告，再次提出“中国革命，即是农民革命”，并重申要武装农民，他说：“农民能够打倒劣绅，各县农民便都要武装起来。”[360] 30日，邓演达在武昌主持召开湘、赣、鄂、豫4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彭湃、方志敏、毛泽东、谭平山、张发奎、孙科、谭延闿、徐谦、唐生智、易礼容、陆沉、萧人鹄等13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并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会总干事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工作。

各地农会成立后，农运如火如荼，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革命在湖南等地掀起。

首先，各地农会积极支持北伐。这一方面，蒋介石、李宗仁和不少国民党军官都有好感。

农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起来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根据其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吃大户）、强迫劳动、审问、戴高帽游乡、打屁股、送入县监狱、驱逐、没收、枪毙等办法惩治。1926年12月22日，湖南旅省各界反土豪劣绅大联合向省党部、省政府请愿，要求用革命手段肃清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次年1月4日，成立由谢觉哉、易礼容等人组成的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28日，省党部通过《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自此，惩治土豪劣绅运动遂普遍展开。在运动中，由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土豪劣绅有宁乡杨致泽，岳阳周嘉淦，华容傅道南、孙伯助，浏阳邱少瑞；由农民围住县政府，强迫县长交人，直接

枪毙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审枪毙的有长沙叶德辉、黄道生、俞诰庆、徐国梁，湘潭张茂钦，浏阳杨凤韶、萧绍荣；公审后被农民用梭镖刺死的有常德杨仲达；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有宁乡刘昭，湘潭汤峻岩。这一时期被处决的土豪劣绅还有华阳县张柞荫，汉寿县梅实，省议员周嘉淦、夏炎，长沙县保产党头目朱葆生，衡山县非法组织假农会、杀害民众的反动分子单化民、单姬南等。原赵恒惕省政府的军务司长、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的主谋李佑文也于4月5日被判处死刑。据调查，常德地区土豪劣绅被镇压的18人，游斗的134人，关押的7人，罚款、罚粮的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的39人，约占当地地主豪绅总数的82%[361]。慑于农民的强大声势，土豪劣绅们纷纷外逃，没有逃的则只能在乡里向农民投降。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在湖南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农民已完全获得胜利，一切乡村政治都归到农民手里”[362]。

经济上，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规定实行二五减租；湖南衡阳的田租减到五成以下[363]。桂阳农民由交租六成减为五成[364]。醴陵、浏阳、永兴等县实行二五减息运动，年利由七八分减到四五分。湖北黄冈规定利息不得超过2%。农会势力强盛的地方，不仅旧债要减息，甚至连原本也不能追还。浏阳、岳阳等县的减押运动，攸县、醴陵、宜章、安乡等县的减税运动也取得了成绩。此外，湖南各地还普遍地开展了平粜和阻禁谷米运动，以解决荒月贫农缺粮和粮价暴涨的问题[365]。各地农会建立了平粜局或平粜委员会，规定本乡谷米外运，必须有区、县农会命令，还在码头、车站等交通要道设专人检查，严禁地主将谷米运往他乡，搞粮食投机，牟取暴利。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吃饭问题，有的地方组织“民食委员会”，实行粮食平粜，以乡为单位调查谷米数量，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粮食。有的地方则开仓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封门没收其财产。湖北黄冈县就分了大地主刘维贞的3万担谷。

为了斗争需要，各地农会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湖北省农协在

全省有枪两千多支，但更多是以刀、矛、梭标等武装起来的梭标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县形成了制造梭标的热潮。1926年冬，仅湖南湘乡就有梭标10万支。1927年4月中旬，湖南省农民协会通令各县成立农民自卫军，湘潭、平江、岳阳、宁乡、邵阳、汝城以及长沙远郊农会，纷纷夺取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枪支，组织起数百以至上千的农民武装。衡山县农民纠察队达到2万人，有枪五百余支。农会力量强大的县份，如湘中、湘东各县，已经摧垮了封建统治。县衙里的公事，都取决于县长和以农会为主体的群众团体联席会议，县长唯农会意见是听[366]。凡破坏农会的行为，均予以严厉制裁。湘潭县马家河有几个劣绅勾结起来，收买打手，冲击农会，绑架干部。马家河区农会立即组织一两万会员进驻他们的宅院，收缴武器，打开谷仓，分给农民。劣绅们不得不赔礼认罪，用红绸扎轿，将绑架的农会干部送回。醴陵有个大土豪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农会势盛时，拼命巴结农会，送谷送猪，还送了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字匾。

在文化方面，许多地方办起农校和夜校，免费吸收农民学习。同时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妇女们摆脱了“三从四德”等旧思想的束缚，放足、剪发、争取婚姻自由，有的还走出家门，参加农会。

有些地方的农会还建立了农民银行，并发行货币。1927年1月，湖南济阳县东郊左港、高坪等六个区的农民协会联合设立浏东平民银行，发行临时兑换券12万元。湖北成立了许多信用合作社，发行流通小票，信用很好。孝感县农会成立饥民借贷所，使农民免受高利盘剥。

农会的发展激起了反动派的强烈仇恨。不少地方的农民被残害。湖南安化县一地被杀戮的农民就有200人之多[367]。1927年2月23日，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包围县城，搜杀农会会员及工会干部，用煤油活活烧死省农会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人，将县党部抢劫一空，造成阳新惨案。2月底，湖南湘阴县土豪劣绅煽动六百多名农民围攻县农会，残杀农会会员。其后，各地陆续出现枪杀农会干部、

捣毁农会和打死农民的事件。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还成立了许多反动组织，从事破坏活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暗地组织“左社”，与农民运动抗衡。

农民运动得到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保护。1926年8月，湖南省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宁乡县土豪劣绅杨致泽、刘昭等人破坏农协，杀戮农会委员等问题，要求政府严惩土豪劣绅，并发表宣言表示：“吾湘全体同志均须下一决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均须拥护农民利益。凡摧残农民者，即以反革命论。”省党部、长沙市党部查封“左社”，将刘岳峙等开除出国民党，省政府并通告缉拿左社分子。3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丁超然报告阳新惨案详细情况后，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会同省党部、农民协会等共同处理。会议同时批准湖北省党部呈报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由省党部函请省政务委员会即予公布，通令各县县长、司法委员一律遵照办理。解决阳新惨案委员会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处决了首犯朱仲炘等反动分子[368]。

为了批驳反对派的各种议论，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发表过一批文章。毛泽东经过32天的调查，于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满腔热情地讴歌正在三湘大地上开展着的农民运动，认为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历史的使命”，“乃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他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乃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农民在几个月内挥动他们的铁锄，挖去了这个墙脚，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369]。这就有力地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保护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但是，这篇文章完全否认农民运动中有“过份”问题，全盘肯定农民在乡村中的各种作法，将“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

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一律视为“革命先锋”[370]，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未能从无产阶级的战略高度，指出掌握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这就影响了农民运动中存在问题的及时纠正[371]。

当时有一种说法：“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有的地方把凡拥有50亩者一律当作土豪，将穿长衫者视为劣绅[372]；处分又常常不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和审核，而是诉诸群众的情绪。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373]。据统计，到4月中旬，湖南农民直接枪毙的土豪劣绅约在30人以上[374]。有些人，虽有劣迹，但学术上有贡献，以不杀为宜，例如袁世凯时期湖南的筹安会会长叶德辉等。有的地方，对北伐军军官家属、亲戚的土地和财产，也不加区分地没收，对他们同样实行逮捕、游街。即使普通士兵寄回家的少数钱款，也往往被农协没收。许多农民协会还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375]。

农协在改革社会风俗中禁赌、禁鸦片，这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说：“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凡有农民协会之地，鸦片与赌博均行绝迹；江西赣县、大庾等县并禁绝娼妓。”[376]但是，不少地方，禁止唱花鼓戏，禁煮酒熬糖，限制喂养猪畜鸡鸭，禁杀牛，禁止吃笋、海带、南粉，禁买南货斋果，禁止请春客，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宴席。某地有家娶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们涌进去，把席面“搅得屎烂”。这些，就都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此外，农协在反对迷信的斗争中也有过分行为，如围攻、拆毁设在乡镇的福音堂，勒令教士当众悔过；砸佛像和祖宗牌位，往素食的斋公口里灌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争取社会广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27年初，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精神传到中国，中共部分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从主张减租减息跃进到主张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左派中也有部分人受到影响。同年3月，

孙科在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的分配。"[377] 同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认为"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邓演达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378]。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开始工作。

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民逐渐不满足于减租减息。1927年3月，在湖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汉川、黄梅、黄安等县农民代表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罗田、阳新等县农民代表赞同。中共湖北区委表示支持。会议强调指出："现在横在农民协会面前的有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土地不受地主支配。"[379] 大会宣言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充分发挥农民协会作为乡村政权的职能；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大力武装农民。"4月3日，中共湖南区委发表宣言称："农村中革命斗争的发展，已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程序的第一项。"[380] 同月10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运的目的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381]。随后召开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委会建议省党部，将所有土地没收归公，分配给农民[382]。从此，农民运动迅速进入要求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阶段。

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首先行动。长沙霞凝乡农民以人口为标准，每个成年男子可分得产8石谷的好田，未成年的依年龄大小给予产谷4至6石的土地。浏阳则以平均每人分6石谷田为标准[383]。湘潭、醴陵等县也有类似情况发生[384]。此外还有其他几种斗争方法：一是平均佃权，由佃农互相将租种的田亩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二是清丈田亩，农会清查地主为多收租虚报的田地面积，改照实际面积纳租。三是插标占田，将田地耕种权重新分配。如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都有此类做法。

湖北农民提出土地问题虽早，但斗争规模不及湖南。黄安县城关区牌坊店农会“分种良田”，没收了大地主李严谋的9石良田。黄梅县蔡山农会烧毁地主的田契债约。其他有的地方干脆不付租息。黄冈等县有的地主向农会献出全部土地，乞求保全生命。省农会规定，已没收或自愿交来的土地，由原佃耕种，向政府交纳百分之二十五的租税。

此外，赣西一带的农民也开始行动[385]。

上述情况表明，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已进入了新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

农民运动的发展深刻地震撼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土地革命的发展更空前地加强了震撼的力度，前所未有地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要顺利地推进土地革命，不仅需要革命阵营内部思想上的一致和细致的政策、策略和干部的准备，而且必须有巩固的政权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保证。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分歧，国民党内部在要不要实行土地革命和如何实行土地革命，何时实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在这样一个时刻将农民运动推进到土地革命阶段，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国民党左派和中派支持农民减租斗争，赞成以和平的方式实行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一般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斗争，更不赞成以斗争方式夺取地主的土地；国民党右派则仇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随着农民运动的激烈化和土地革命的发展，国民党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右派一边，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二　工人运动

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9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99个工会组织，会员达124万余人。

为准备北伐战争，进一步发动群众，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刘少奇、苏兆征分别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和关于省港大罢工的报告。会议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等决议案。会议提出“拥护革命军北伐”和“拥护国民政府”两个口号，并专门起草请愿书，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国民政府请愿北伐[386]。会议同时提出，政治上争取最低限度的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经济上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和最高限度的工作时间的规定。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的新的执行委员会。7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

广东工人带头响应号召。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北伐运输队特别委员会，动员3000名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广州铁路工人组成工程队、电讯队；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饬令粤汉、广三、广九、株萍铁路工人联合组成北伐交通队。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停止封锁宣言》，表示为“尽全力援助北伐，求得最后胜利与获得人民胜利”，决定停止对香港的封锁。11日，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在广州海关附近共设一个征税机关，以所征“二五附税”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至此，坚持达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结束。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拥有十多万会员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发动全省工人大力支援北伐军，组织三千余工人分批随军出发，供北伐军差遣。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委员长郭亮致书北伐军称：“敝会率领所属工会工友参加讨吴工作，以尽工人阶级应尽之责任。值此战争正烈，输送重要，特组织大批运送队，以备军需。”运送队并带有宣传品，沿途散布[387]。北伐军在湖南境内几次大的战役，都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援助。长沙战役中，一千多工人臂带“工人保安团”或“国民革命军”的袖章，在郭亮的指挥下，用炸弹、斧子、大刀、梭标和溃军丢落的枪支守卫城内外重要街道、路口，维持秩序，使长沙城区免受蹂

躏，并且缴获了五千七百多条枪[388]。铁路工人则四处拆毁铁轨、割电线、阻截敌军列车，破坏北洋军的行动。安源矿工和水口山矿工成批参军。围攻武昌时，安源工人组成“工兵大队”，日夜不停地挖地道，一直挖到城脚下。

北伐军进入湖北后，继续得到工人的有组织的援助。湖北工人纷纷组织运输队、铁路破坏队、随军爆破队和武装纠察队。北伐军进攻武汉时，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实行总罢工，不为吴佩孚制造枪炮。汉阳克复后工人们立即复工，为北伐军生产。

北伐军所至之处，工人获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受军阀赵恒惕、叶开鑫摧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和新化锡矿山工会先后恢复。8月26日，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389]。12月1日，在长沙召开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75人，代表会员32．6万人。1927年初，又发展到四十多万人，仅长沙市就有工会一百三十多个。

武汉总工会成立于9月14日。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的同一天，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北全省总工会[390]。12月12日，武汉总工会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工会干部。1927年元旦，召开湖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当时工会会员发展到三十多万，工会组织由北伐前的12个发展到340多个（一说200个）。

北伐军占领江西后，南昌总工会筹备处和73个行业大会迅速成立，发展会员四万多人。11月，赣州总工会成立。1927年元旦，南昌总工会成立。2月23日，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成立江西省总工会。

为了适应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刘少奇、李立三奉全国总工会之命，于9月17日在武汉成立办事处。1927年2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到武汉。20日，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全国工人阶级目

前行动总纲》等文件。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代理委员长，秘书长由刘少奇连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分别为袁大石、邓中夏[391]。到1927年二三月，全国总工会会员已由北伐战争前的120万人增加到二百多万人[392]。

各地工人群众在工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政治、经济斗争。

1926年“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时，上海工人、学生6万人举行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6月27日，淞沪警察厅以“调停工潮不力”为借口，悍然封闭上海总工会。次日，上海总工会发表紧急启事，宣称“本会为上海30万工人托命所在，责任重大”，“仍本我工人阶级谋福利之初衷继续奋斗”[393]。7月11日，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决定向市政当局要求启封总工会，同时提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最低限度总要求11项。会议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宋林（汪寿华）等为常务委员。8月4日，日轮万里丸水手殴杀中国小贩陈阿堂，引起公愤。18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各工人区举行追悼大会，抵制日货。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随即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加以领导。同日，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罢工令，13家日厂相继罢工。9月7日为《辛丑条约》签订日，当天，上海总工会联络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各团体召开市民大会，纪念国耻，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394]。通过这些活动，上海工人得到了锻炼，为三次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万县惨案，四川工人反应尤为强烈。9月9日，重庆总工会代表所属38个工会及11万工人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工人及同胞奋起抗争。28日，重庆为英人工作的工人二千余人全体罢工。10月20日，成都受雇于外侨的工人六百余人声明：“不能再给仇人做工，立即自行解雇。”[395]次日，公布《罢工公约》，宣称：“罢英国人的工，如我们向英国人安设大炮。”[396]

在北伐军占领区，工人运动的规模、次数都大为增加。自1926年

8月下旬湖南全省总工会成立至12月中旬，湖南工人参加政治运动235次，参加人数三十三万余人[397]。9月25日，长沙工人和各界人士三万余人为万县惨案举行集会，通过对英经济绝交办法5条：一、不买英国货；二、不坐英国船；三、不为英人做工；四、不供给英国人粮食；五、不供给英国人制造原料。10月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共为反英之运动”[398]。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人民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遭到英水兵袭击，死伤三十余人。6日，英兵又在九江枪杀中国工人。此举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两地工人和各界人民团结一致，掀起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16日，为声援汉口、九江人民，湖南工人联合各界，组织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2月9日，英国水兵在长沙登陆行凶，追击在河岸值勤的工会纠察队，打伤8人。湖南总工会立即组织10万人进行反英示威。28日，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增兵中国，全国有7个省、二百多万工人，响应全总号召，在同一时间举行了一小时罢工。其他一些省份也举行了盛大的反英示威运动。

在斗争中，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成了工人纠察队。湖南省工会规定纠察纵队的任务为：“巩固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399] 纠察队下辖三个大队，分驻长沙、益阳等地。此外，并成立了一支女工纠察队。武汉工人纠察队最早的负责人为朱菊和，其后为蒋先云、项英、李立三等。在吴玉章、林祖涵、邓演达等人支持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拨出部分枪支交付纠察队使用。至1927年四五月间，武汉工人纠察队有队员五千余人，枪两千余支。

除工人纠察队外，湖南、湖北还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吸收12至16岁的男女青年工人、学徒、艺徒及工人子女参加，其宗旨为“教导劳动儿童，予以劳动阶级的知识及各种游技，养成团结生活的习惯，训练勇敢奋斗的精神，替劳动阶级服务”[400]。其口号为“准备起来，一致团结，努力工作，勇敢向前”。1927年夏斗寅叛变时，武汉市内

军队都调往前线作战，劳动童子团参加维护市内治安，每天出动400名左右团员在街道站岗警卫。北伐军进攻河南时运回伤病员五千余人，童子团员承担了看护任务。

上海是我国工人运动中心。上海工人不仅走在政治斗争的前列，而且也走在经济斗争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6至9月，上海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抗议资本家虐待工人，举行夏季罢工133次，参加人数达21．3万人次。这些罢工主要是经济斗争。7月11日，上海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最低总要求11条中，即包括每月工资不得低于15元，每日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不得打骂工人，滥罚工资等内容。但是，由于当时上海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这些罢工只有部分得到胜利。

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北伐军占领地区，工人经济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较多：1926年8月下旬至12月中旬，湖南工人举行经济罢工108次，获得胜利的工人147，090人，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五十[(401)]。同年10月以后，武汉地区爆发罢工三百余次，参加者数十万人，持续数月之久。湖北省总工会会同国民党省党部、总商会等组成湖北省解决劳资问题临时委员会，与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等一起，共同调解了110起劳资纠纷。结果，废除了资本家随意打骂、开除工人的权利；每日工作时间减少到8—10小时；每人平均月工资增加5元，部分人增长一倍左右[(402)]。

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某些错误倾向。如湖南、湖北地区的有些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擅自抓人，拘捕厂主、店主，随便断绝交通，擅自封店，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封闭涉外企业[(403)]。在经济上提出过分要求，如“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等[(404)]。在不能如愿时，有的地区和行业即举行罢工。武汉地区由于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有的月份开工只有十四五日。还有些工人，不遵守必要的厂纪店规，不服从资方的正当管理，相互斗殴。

1927年1月初，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湖北省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注意解决工人运动中的过“左”倾向。2月6日，中共湖南区委通告称：“工人的经济要求，不能超过现在商人（包括厂主、店主等）的经济能力所能担负的范围”，“须知不顾客观的情势而一意孤行，则商人必被逼而反动，工人更有失业之虞。”[405] 其后，武汉店员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相继作出了整饬纪律的规定，反对轻率罢工，自由行动，任意打人抓人、绑人游街等现象[406]。

工人经济上的过急、过高的要求，工厂开工的严重不足，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使生产额大幅度下降。根据国民党中央工人部1927年3月的调查，申新纱厂生产额比1926年9月降低百分之三十，第一纱厂降低百分之五十五。商业的凋敝则更甚。据1926年6月统计，营业额与过去相比为一比十五[407]。为纠正偏差，1927年2月下旬，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未将国民政府管辖地区和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加以区别，在工资、工时、工会、罢工、劳资等方面提出同样要求，影响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偏差的纠正[408]。

三　妇女运动

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成立后，至1927年3月上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19个省、特别区、特别市陆续成立了妇女部，妇女运动逐渐展开。

（一）动员广大妇女支持并投入北伐战争。1926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领导下组成北伐女子救护队和北伐女子宣传队，随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她们受过政治训练，“对于工作颇肯努力，深得军士之信仰”[409]。同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妇女部组织的女子北伐工作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从桂林出发，一直北上到安徽。国民部湖南省党部组织的“行动委员会”，下辖50个宣传队、14个慰劳队，有许多妇女参加。武汉中央政治军事

学校先后招收210名女生，成立女生队，宿舍门前写着“斧钺纲常”四个大字，表达了女兵们与封建礼教决裂的信念。武汉民众收回英租界时，中央军校女兵和湖北省总工会女工纠察队上街演讲、演出，散发传单，湖北省妇女协会徐全直带人划木船驶向停泊的英国兵舰，将英文抗议传单撒到军舰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印书馆的女工和纱厂女工积极担当侦察、运送军火，宣传、救护等任务。“即十余岁之女童工，亦直立街心，高呼口号，以壮声威”[410]。

（二）培养妇女干部。1926年9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意见，区委妇委书记蔡畅和妇委委员邓颖超联合向何香凝建议，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以中央党部妇女部的名义，在广州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9月15日，讲习所开学。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兼任所长，蔡畅为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恽代英、邓中夏、彭湃、周恩来、邓颖超、谭平山、陈其瑗以及鲍罗廷夫人都曾到所讲课。全所学员一百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籍学员最多。除学习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常识，交流工作经验外，学员还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斗争，援助当地妇女运动。10月11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也与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共同开办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邓颖超担任所长。招收学员60人，白天在原单位工作，晚间学习，3个月毕业。周恩来、何香凝、恽代英、萧楚女、邓颖超、陈其瑗先后到所作报告或授课[411]。同月，广州市妇女部举办妇女运动养成所。1927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开办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招收学员一百多人。以宋庆龄为主任，刘清扬主持日常工作。该班宗旨是使妇女“了解革命意义及世界趋势，养成革命实用妇女人材，备充各机关及党部工作职员之用”[412]。此外，李大钊领导下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于1926年9月在北京由郭隆真、张挹兰主持创办了缦云女校，该校实际是国共两党团结各界妇女、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三）建立和发展妇女组织。北伐战争中，妇女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广东女界联合会由女校、女团体、女工会等六十多个单位组成。

其中，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有分会三十多个，会员五千余人，以农妇居多，其次为女工[413]。其他如车衣、解丝、火柴、电话局等行业，都有专门的女工会；解丝女工会有会员万余人。湖南有五十多个县成立女界联合会。1926年12月，湖南劳动妇女大会开幕，到会团体35个，二千余人。次年1月26日，湖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两次会议都要求加强劳动妇女工作，建立各阶级妇女的联合战线，为完成国民革命尽责。湖北有妇女协会236个，会员8．7万余人。3月8日，湖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53个县和各机关团体的代表五百余人出席会议。蔡畅作了《中国妇女运动状况》的报告。共产国际妇女部代表向大会授旗，旗上写着“妇女不能解放，则革命不能成功”[414]。其他如四川、广西、福建、浙江、河南、江西、山东、北京等省、市，也都有各界妇女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女界联合会、妇女之友社一类组织，但人数不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艰难。

（四）提出妇女解放要求。1927年3月8日，广州4万多名妇女集会，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列队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政治分会请愿，要求迅速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及妇女劳动法、保障女子享有财产继承权和受教育权，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禁止童养媳制等。同日，武汉各界20万人在汉口举行纪念会，有10万妇女参加。会议提出湖北妇女总要求13项，要求国民政府制定男女平等法律，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订婚姻法，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以及从严禁止买卖人口、蓄婢纳妾，废除娼妓，严令各地官吏禁止缠足等。会议又提出湖北劳动妇女目前总要求13项，如：男女工资平等，产假两个月，在工厂附近设儿童寄养所，给妇女哺乳时间，设立农村妇女补习学校等[415]。会后，群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处请愿，都得到满意答复。当时，中国不少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还饱受缠足之苦，因此，湖北省妇协把发动放足、剪发，作为妇女解放的一项内容。同日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特别通过了放足决议。3月23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公布

《取缔女子缠足条例》，命令各县县长同各县党部妇女部、妇协，在三个月内劝导妇女放足，15岁以下要立即放足。其后，成立了全省放足委员会，开展大规模的放足运动。武汉市接受放足者每天不下千余人，至当年5月，放足妇女已达十分之九。

帮助受婚姻迫害的妇女争取婚姻自由，是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斗争的重要内容。湖南浏阳全吉区女界联合会支持一个17岁的女孩子解除了同60岁丈夫的婚姻关系。湖北省妇协明文宣布取消“敬节堂”。在西安妇女协进会的推动下，陕西制订《暂行婚姻条例》和《暂行婚姻条例细则》，规定结婚由男女双方自行决定，有配偶的男女双方均不得再行结婚，妇女受虐待或受重大侮辱者可提出离婚，离婚后女方可以收回自己的财产。

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已超出以往女权运动和女子参政运动的水平，形成具有一定群众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广大妇女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运动的主体由女学生向女工和农村妇女发展；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组织广泛成立。这些，都是此前运动中不曾出现或很少出现过的情况。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也被团结到革命洪流之中，如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广东女界联合会等团体等。但是，这一时期，始终未能建立全国性的妇女组织。1925年4月在北京成立的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已经停顿，各地妇女组织名目不一，各树一帜。1926年6月，中共中央妇女部为统一全国妇女运动，曾提出召集全国妇女团体联席会（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组织中国妇女运动（或团体）联盟。同月，由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出面倡议，但因基督教妇女团体抵制和右派反对，会议一直未能开成[416]。

四　学生运动、商民运动、华侨运动

“五卅”运动后，学生运动发展迅速。至1926年6月止，全国已有16省成立学联，所属市县学联320多个，刊行《中国学生》、《上海

学生》、《北京学生》、《湖北学生》等刊物30多种。当年7月23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八届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17省代表54人。会议通过《统一学生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民众运动，完成中国学生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自身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会议同时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7月26日，全国学联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北伐。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成立青年部，甘乃光、邵元冲先后出任部长。1926年7月19日，丁惟汾继任。出版机关刊物《革命青年》。为了加强对各地学生组织的领导，青年部会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订立学生会党团组织条例，8月28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此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陆续指派人员到广州、上海、北京、南京、武昌等地，指挥当地学生会党团工作[417]。各地学生会陆续建立国民党党团组织。不过，正像其他群众运动一样，各地学生运动实际仍由中共领导。

万县惨案发生后，全国学生总会与上海学联分别通电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严重抗争”，根本取消英国在华权利；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对英实行经济绝交[418]。9月12日，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发出紧急通告，呼吁各地各界开展收回航权运动，坚持对英经济绝交[419]。18日，重庆学界和各界十余万人一起举行水陆游行示威大会，提出惩凶、赔款等6项要求。9月28日，全国学生总会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向各地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动员全国商人、劳动者、学生于10月5日一律休业，举行大规模示威；自10月5日至12日为反英运动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厉行抵制英货[420]。同月3日，上海各团体代表18人在全国学生总会开会，筹组万县惨案后援会。孙传芳出动军警包围会场，以“现值军事戒严期内”为由逮捕与会代表及新闻记者。10月5日，悍然封闭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的会所，但“学总”不畏强暴，仍然积极进行活动，领导青年运动的开展。

在皖、苏、浙三省自治运动中，东南地区的学生也英勇地站在斗

争前列。自11月8日起，上海学生每天出动250个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反对孙传芳的统治，号召上海人民组织市政府。5天之内，共散发传单70万份。1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函上海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要求农工商学各界一致行动，逼迫孙传芳交出三省的军政与民政。26日，再次在全市进行大规模演讲，反对奉鲁军南下。12月9日，杭州市学生联合会邀请杭州各界领袖讨论江浙时局，决议组织杭州各界联合会，以实现人民自治之宗旨。1927年1月26日，上海学联发表宣言，代表4万名上海学生，提出了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争取参加爱国运动自由等28项要求[(421)]。2月20日，上海大夏大学学生陈骏、陈亮等在沪西演讲，被大刀队逮捕，英勇就义。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复旦大学等校组织纠察队，和工人纠察队共同进攻闸北。

武汉、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学生的积极支持。全国学生总会派出代表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三省联合会等团体接洽。主张“全国联合，一致厉行排货救亡之策”[(422)]。不久，该会又致电英国自由党、工党及英国民众，表示在英国未改变其侵略政策之前，中国人民为求生存，“自当继续采取合理手段，厉行经济绝交”[(423)]。

北京学生总会在“三一八”惨案后被北洋政府武力解散，但各校学生代表不屈不挠，积极图谋恢复。1927年3月12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全国学生总会应各地学生联合会请求，于1927年3月迁到武汉。4月1日，各团体在湖北省党部开会，庆祝该会在武昌开始办公，到会各界代表二千余人，唐鉴委员在演说中声称，中国革命以农工为主力，学生运动须与农工及被压迫民众相结合，方有成效，他勉励学生“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

国民革命期间，有不少青年学生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军队或投身工农运动。在武汉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招收学员810人，其中青年学生约四百人。在广东工农运动中活跃的风云人物阮啸

仙、刘尔崧、周文雍等都是学生出身。有不少人，还为国民革命献出了生命。

商民运动是国民革命期间新起的一项群众运动。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着手开展商民运动，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策略，进展缓慢。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八条。其中指出："商民为国民之一份子，而商民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直接之压迫较深，故商民实有参加国民革命之需要与可能。"[424] 同年7月，中共中央第一个商民运动决议案曾特别指出："我们商人运动之对象，正是中小商人的群众，他们是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中一重要成份。"[425] 自此，商民运动逐渐受到重视。

国民党在各重要省市党部设有商民部，并在商民中发展党员。据1926年的统计，汉口有商民党员600人，北京有商民党员二千余人，占党员数的百分之十五[426]。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陆续成立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并出版《商民运动》旬刊。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有一定积极性。8月20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日人惨杀小贩陈阿堂案，全体罢工，呼吁各界声援。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起而响应，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声明此案"非特辱我国体，抑且藐视人道。鄙会等膺市民付托之重，不得不严与交涉，以求公理之伸"[427]。9月4日，英舰驶入广州省河，并在西堤码头强行登陆，激起广东各界强烈愤怒。6日，决议组织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14日，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广州市市商会、广东商会联合会会同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共同布告，不买英货。22日，召开广州商民大会，决定在上述四商会基础上，成立广东商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428]。

万县惨案也在商民中激起了强烈波澜。9月7日，重庆匹纱绸缎同业公会及糖帮业全体为万县惨案致电上海同业，要求“严禁购运仇货”[429]。次日，重庆商民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入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实行对英经济绝交。19日，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电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就万县惨案向英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一、惩办凶手；二、赔偿损失；三、保障将来无野蛮举动；四、向吾国政府道歉[430]。10月4日，南京商会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要求“放胆力争”，表示“愿为后盾”[431]。

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商民们普遍表示赞成。9月1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临时会议，议决对与各国签订的商约，凡期满者，一律声明无效。会议并推派代表，分头研究中法、中俄、中美、中日、中荷、中英、中比各条约[432]。16日，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夏布公会等21个商人团体集会，要求北京政府迅速照会日本等国，废除旧约，另订平等新约[433]。11月13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评议会第六十一次例会时，就比利时在重订新约问题上的蛮横态度，通电国际法庭，请求维持公理。会议并致电各省区总商会、商联会事务所及上海21个公团，要求一致声明，如比利时仍固执不悟，则应与其经济绝交。电报并提请国人注意日本对于中国修约照会的恶劣态度[434]。

广大商民不仅对外争取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还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2月12日，上海商民同工界、学界一起，举行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大会，反对奉鲁军南下，要求“自治”，成立特别市[435]。当时，孙传芳征用招商局商轮9艘，其中江永轮被毁，招商局要求发还船只，赔偿损失，孙传芳不予理睬。1927年2月2日，招商局以全部停航的办法表示抗议[436]。当孙传芳命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镇压工人、学生时，华界商人便举行局部罢市，表示反对。

上海市党部商民部积极在商民中工作。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傅

筱庵与孙传芳关系密切，支持孙的统治。上海市党部商民部联络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商民组织，计划打倒上海总商会，另行成立“左派的商联组织”。1927年3月23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联合总商会以外的19个团体，成立亲国民党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但该会不久即倒向蒋介石一边。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不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而且在发展生产、活跃经济、促进产品流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严重的妥协性，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如何正确掌握团结和斗争之间的关系，这在国民革命时期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1926年10月20日，广州总商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召开代表会议，联合致函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反映当时广州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8条改进劳资关系的意见。内称：“近来工人运动对于商民资本阶级动辄宣传打倒，引起劳资间之冲突及仇恨，以致两方情感被其离间。”函件要求“设法促进劳资协作，使工商联合，一致救国，以图发展”[437]。同月，陈其瑗、简琴石向会议提出《商民运动提案》，重申“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本党保护”[438]。该案有孙科、毛泽东、邓泽如等联署。10月23日，毛泽东提出“重订适合一般商人利益之商会法”，得到通过[439]。会议在《最近政纲决议案》中并规定：“设劳资仲裁委员会，以调处雇主与雇工间之冲突。”同年11月，上海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批评汉口工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之后，“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希望委员会能使工人“勿趋极端，为实业家稍留余地”，从而出现“劳资两利”的局面[440]。但是，这一问题在以后并未能很好解决。随着工农运动的日益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北伐战争也得到了素有爱国传统的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

国民党中央设有海外部，专门从事华侨运动。1926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设立侨务委员会，以李禄超为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最近政纲决议案》中特别提出：一、设法使华侨在居留地得受平等待遇；二、华侨子女归国求学，须予以相当便利；三、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务须予以特别保护。

祖国关怀华侨，华侨支持祖国。

国民革命军誓师的第二天，华侨协会召集驻广东各华侨团体，成立华侨北伐后援会，确定该会的主要任务为：筹款接济北伐军饷；宣传北伐意义；慰劳前敌将士。日本、古巴、墨西哥等地的华侨闻风响应，到当年9月，共成立后援会达524个，会员约一百万人。

7月24日，国民政府首先收到了澳大利亚普扶地区华侨社团汇寄的第一笔捐款。其后，华侨中的富绅巨贾、店员、教师以至小贩、车夫，都踊跃捐输。到1926年底，北伐军共收到海外华侨捐款一百余万元。各地华侨还捐献了大量军用物资，如枪支弹药和救护物品等。越南西贡几个华侨集资捐购一辆铁甲车，支援北伐军。暹罗华侨陈公侠，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汇成《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并在报上连载。许多华侨还毅然返回祖国，入伍从征，建立华侨炸弹敢死队、北伐军海外工作团、华侨特别宣传队等组织。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李海涛担任叶挺独立团第八连连长，在攻取武昌战役中率部冲锋在前，不幸牺牲。

为培养海外党务活动骨干和华侨运动的积极分子，国民党中常会第六十五次会议还通过了海外部建议，决定在广州开办中国国民党党立华侨运动讲习所[441]。讲习所所长由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彭泽民担任，中共党员张航声任教务主任，教员大部分来自农讲所。当年12月开学，共招收学员70多人。学员除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外，还到广东省华侨协会去听取各地开展华侨工作的经验，研究海外华侨工作的有关问题。他们还经常去华侨团体进行宣传，激励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

支援北伐战争。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549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575、586、590、599、600等页。

(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35页。

(4)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页。

(5) 《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1989年版，第321页。

(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71页。

(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0日。

(8)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

(1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

(11) 《中央给广东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25页。

(12) 《蒋介石最近对于我们的要求》，《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13) 《中央致粤区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14—316页。

(14) 《中央给广东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25—326页。

(15) 《中央给广东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61—262页。

(16)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27日。

(17)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9月29日。

(1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5页。

(1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20) 《陈果夫回忆录》，见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05页。

(21) 《中央通告第17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11页。

(2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22页。

(2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55页。

(24) 《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8页。

(25)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录》，油印件。

(26) 《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

(27)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28)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29)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30) 《中央致粤区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17页。

(31)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32) 《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647页。

(33)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34)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

(35) 《警察特别党部会议议事录第八分部提案》。

(36)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

(37) 《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1页。

(3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5页。

(39) Wilbur and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Document 44，pp．413-421．

(40)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41)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79—482页。

(4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60页。

(43) 《革命军日报》，1926年12月1日。

(44)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44页。

(45) 《中央致粤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71页。

(46)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15页。

(47)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页。

(48)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2月6日。

(49)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2月7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18页。

(5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15页。

(51) 《蒋总司令12月3日复武汉各界团体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

(52) 《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3月17日。

(53)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月24日。

(55) 《政治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9页。

(56) 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2—565页。

(57) 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5—568页。

(5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75—576页。

(59) 《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80页。

(60) 《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

(61) 《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第67页。

(62) 《徐谦等为政府不迁汉消息暂宜秘密致蒋介石等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63) 《鲍顾问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1927年1月（上），抄本。

(64) 《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记录》。

(65) 《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

(66) 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67) 《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68) 《蒋总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69) 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台北1981年6月30日。

(70) 《省党部代表大会欢迎中央政府迁鄂》，《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7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72) 《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29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73) 《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74) 《中央党政府电告开扩大联席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日；《党政府扩大联席会议纪》，《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1927年3月8日。

(75) 《吴玉章回忆录》，第141页。

(76)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参见《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25页。

(77) 希俨：《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

(78) 《省市两党部昨日党务问题之重要会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79) 《全省民众热烈欢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全体迁鄂》，《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8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5日。

(81) 《中央宣传委员会通过之党务宣传要点》，《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82) 《苦笑录》，第73页。

(83) 《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

(84)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8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86) 《武阳夏党员大会庆祝示威大会之热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8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蒋介石书》，《国民军政报》，1927年4月12日。

(8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89)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90)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1927年2月26日。

(91)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3日。

(92)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

(93) 谢宣渠：《国民政府迁都侧记》，《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46—48页。

(94) 《苦笑录》，第75页。

(95) 《蒋总司令欢送党政府迁鄂》，《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96) 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台北版，第107页。

(97)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3页。

(98)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4页。

(99)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6页。

(100)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8页。

(10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8页。

(10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9页。

(103) 《陈铭枢告四军十一军将士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

(10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6页。

(105)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756页。

(106)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09页。

(10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38页。

(10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6—317页。

(10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21—324页。

(11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9—320页。

(11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8—319页。

(11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26页。

(113)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7—318页。

(114) 《徐谦在武阳夏党员大会上的演说》，《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11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06页。

(116)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30页。

(11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45页。

(11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28—330页。

(11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08—311页。

(12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38—339页。

(121) 后改选王法勤。

(122) 《国民政府委员前日就职》，《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3月22日。

(123) 《张作霖致张宗昌电》，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4页。

(124) U．S．Dept．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26，Vol．1，Washington，1941，p．959。

(1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1页。

(12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6页。

(127) 《政府公报》第3767号，1926年10月7日。

(128) 魏元晋：《曹锟贿选前后北洋政府财政状况》，广东政协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8辑，第250页。

(129) 《申报》1926年10月6日。

(130) 《外交部致驻比王公使电》（1926年10月18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6。

(131) 《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0月26日），《北洋政府档案》，1001（2），1435。

(132) 《旅欧华侨废约代表团宣言》（1926年10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30日。

(133)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8日。

(134) 《晨报》，1926年10月31日。

(135) 《上海总工会废除中比商约宣言》，《申报》1926年10月31日。

(13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要》，《国闻周报》第3卷第42期，1926年10月31日。

(137) 《大公报》，1926年10月26日。

(138) 《商报》，1926年11月3日。

(139) 《中南晚报》，1926年11月1日。

(140) 《晨报》，1926年10月25日、31日。

(141) 《时报》，1926年11月10日。

(142) 《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1月5日），《北洋政府档案》，1001（2），1435。

(143) 《政府公报》第3796号，1926年11月7日。

(144) 《申报》，1926年11月8日。

(145) *FRUS*，1926，Vol．1，pp．996-997．

(146) 《申报》，1926年11月27日。

(147) *FO*，405，Vol．252A，p．148．

(148) 《东方杂志》第23卷第23号，第144页。

(149) 《陆山致畏公（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0) 《杨丙致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1) 《蒋作宾致蒋介石函》，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5册，台湾大溪档案。

(152) 《杨宇霆致张静江等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台湾大溪档案。

(15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19、478页；参见《张静江、谭延闿致蒋介石函》，1926年9月10日，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5册，台湾大溪档案。

(1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08、419—420页；参见《张静江、谭延闿致蒋介石函》，1926年9月10日，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5册，台湾大溪档案。

(155) 《晨报》，1926年11月16日。

(156) 《晨报》，1926年11月15日、18日。

(157) 《晨报》，1926年11月15日、18日。

(158)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11页。

(159) 《晨报》，1926年11月21日。

(160)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1)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2)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3)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4)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5)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6) 《新闻报》，1926年11月25日、26日。

(167) 《新闻报》，1926年11月25日、26日。

(168) 《顺天时报》，1926年11月22日。

(169) 《新闻报》，1926年11月26日。

(170)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10页。

(171) 《晨报》，1926年11月28日。

(172) 《新闻报》，1926年12月6日。

(173) 《晨报》，1926年12月2日。

(174) 《北洋政府档案》，1039，8。

(175) 《北洋政府档案》，1039，8。

(176) 《时事新报》，1926年12月6日。

(177)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8日。

(178) *FRUS*，1926，Vol．1，pp．685-686．

(179) 《关于奉天派进入江北的对策文件》（1926年11月26日），《关于中国时局的对策文件之二》（秘密）1926年底。均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80)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10日。

(181) 《申报》，1926年12月13日。

(182) 《新闻报》，1926年12月12日。

(183) 《吴佩孚致张作霖电》，《世界日报》，1926年12月11日。

(184) 《北京政治分会关于军事、政治、外交之最近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00页。

(185) 《申报》，1926年11月27日、12月9日。

(186) 《商报》，1926年12月6日。

(187) 《向导》第177期，第1840页。

(188) 《申报》，1926年11月30日。

(189) 《申报》，1926年12月6日。

(190) 《陈调元致张宗昌电》，《新闻报》，1926年11月24日。

(191) 《时事新报》，1926年11月28日。

(192) 《晨报》，1926年12月23日；《申报》，1926年12月23日、25日。

(193)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11—1012页。

(194) 《申报》，1926年12月11日。

(195) 《吴佩孚致张景惠电》，《申报》，1926年12月10日。

(196)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17日。

(197) 《靳云鹗上吴佩孚书》（1926年11月7日），《大公报》，1926年12月6日。

(198)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29日。

(199) 《吴佩孚再免靳云鹗职通电》，《大公报》，1926年12月30日。

(200) 《吴佩孚致齐燮元电》，《晨报》，1926年12月31日。

(201)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00—1001页。

(202)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203) 《靳云鹗解职通电》，《益世报》，1926年12月31日。

(204) 《刘培绪讨吴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205) 《晨报》，1927年1月19日。

(20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207) 《任应岐致蒋介石、唐生智、邓演达、鲍罗廷等电》（1927年1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208) 谭志清：《我所知道的靳云鹏和靳云鹗》，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244页。

(209) 《顾维钧致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电》，《顺天时报》，1926年11月10日。

(210) 《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辞职电》（1926年12月17日），《晨报》，1926年12月19日。

(211) 《新闻报》，1926年12月23日。

(212) 《大公报》，1926年12月24日。

(213)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19—1020页。

(214) 《杨宇霆接见日本记者谈话》（1927年1月7日），《顺天时报》，1927年1月8日。

(215) 《梁士诒致张作霖电》，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504页。

(216) 《张作霖致各方电》，《益世报》（北京），1927年1月9日。

(217) 《顺天时报》，1927年1月13日。

(218)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3855号，1927年1月13日。

(219) 《申报》，1927年1月24日。

(220) 《安国军总司令部致国务院函》，《益世报》（北京），1927年1月21日。

(221) 《新闻报》，1927年1月24日。

(222) 《时事新报》，1927年2月6日。

(223) 《政府公报》第3855号，1927年1月13日。

(224) *FRUS*，1927，Vol．2，p．374．

(225) *FRUS*，1927，Vol．2，pp．377-378．

(226)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3874号，1927年2月1日。

(227)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496页。

(228) Stanley F．Wright，*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1843-1930，Shanghai，1938，p．618．

(229) *FO*，405，Vol．253，pp．10-11．

(230) *FO*，405，Vol．253，pp．10-11．

(231) *FO*，405，Vol．252A，p．447．

(23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06页。

(233) 《申报》，1927年1月19日。

(234) 《新闻报》，1927年2月8日。

(235) 《晨报》，1927年2月8日。

(236) *FRUS*，1927，Vol，2，p，458；*FO*，405，Vol．252A，p．447

(237) *FO*，405，Vol．252A，p．465．

(238) *FRUS*，1927，Vol．2，pp．459-460．

(239) *FRUS*，1927，Vol，2，p，461．

(240) *FO*，405，Vol．252A，p．448．

(24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07页。

(242) 《顺天时报》，1927年2月12日。

(243) *FRUS*，1927，Vol．2，p，462．

(244) *FRUS*，1927，Vol．2，p，462．

(245) *FO*，405，Vol．252A，p，468．

(246) 《顺天时报》，1927年2月12日。

(247) 《海关进口附加税征收章程》，《政府公报》第3890号，1927年2月19日。

(248) 《大总统训令第一号》（1927年1月31日），《政府公报》第3874号，1927年2月1日。

(249) 《张作霖致孙传芳、阎锡山等电》，《顺天时报》，1927年2月10日。

(250) 《张作霖致寇英杰、米振标、田维勤、靳云鹗等电》，《顺天时

报》，1927年2月10日。

(251) 《晨报》，1927年2月13日。

(252) 《世界日报》，1927年2月20日。

(253) 《齐燮元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0。

(254) 《魏益三、田维勤、王维城等通电》，《大公报》，1927年3月3日。

(255) 《靳云鹗通电》，《顺天时报》，1927年2月18日。

(256)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15日。

(257) 《大公报》，1927年2月28日。

(258) 《顺天时报》，1927年3月14日。

(259) 《吴佩孚致张作霖电》（1927年2月10日），《新闻报》，1927年2月16日。

(260) 《靳云鹗等致张作霖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261) 《顺天时报》，1927年2月22日。

(262) 《晨报》，1927年2月28日。

(263) 《益世报》（北京），1927年2月28日。

(264) 《晨报》，1927年3月2日。

(265) 《晨报》，1927年2月27日。

(266) 《时事新报》，1927年3月14日。

(267) 《张学良等通电》，《顺天时报》，1927年2月23日。

(268) 《褚玉璞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0。

(269) 《张景惠、张作相、吴俊陞致吴佩孚电》，《顺天时报》，1927年3月5日。

(270) 《张宗昌致靳云鹗电》，《顺天时报》，1927年3月9日。

(271) 《韩麟春致张作霖电》，《申报》，1927年3月8日。

(272) 《晨报》，1927年3月8日。

(273) 《新闻报》，1927年3月21日；《晨报》，1927年3月12日、13

日。

(274) 《晨报》，1927年3月12日。

(275) 《张学良、韩麟春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1。

(276) 《申报》，1927年4月8日；《新中州报》，1927年3月18日；《晨报》，1927年3月18日。

(277) 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50页。

(278) 《张学良、韩麟春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1；《顺天时报》，1927年4月11日；《益世报》（北京），1927年3月31日。

(279) 《益世报》（北京），1927年3月31日。

(280) 《靳云鹗通电》（1927年3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281)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版，第150页。

(282)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6—337页。

(283) 《加同志报告》，《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28—29页。

(284)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41页。

(285) 陈铭枢：《我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中央》半月刊，1927年6月15日。

(286) 《北伐战史》（二），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618—622页。

(287) 《北伐简史》，台湾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05页。

(288)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50页。

(289) 《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

(29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381页。

(291) 国闻周报社辑：《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57页，上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292) 《白崇禧电告收复杭州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293)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382—384页。

(294) 《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第89页。

(295) 《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第89页。

(296) 《晨报》，1927年2月24日、25日。

(297) 《晨报》，1927年2月28日；《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314页。

(298) 《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第109页。

(299) 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光东印务局1931年版，第104页。

(300) 《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第107页。

(301)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385页。

(302) 《安徽省政治及党务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

(30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88页。

(304) 《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第90页。

(305) 《蒋作宾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4—45页。

(306) 《北伐战史》（二），第648—649页。

(307) 《北伐行军日记》，第110页。

(308)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下），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99页。

(309) 《北伐行军日记》，第109—110页。

(310) 《革命军占领南京之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311) 《第六军进攻南京经过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北伐行军日记》，第110页。

(31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313) 施英：《上海同盟罢工的记录》，《向导》第189期。

(314) 施英：《上海同盟罢工的记录》，《向导》第189期。

(315) 《申报》，1927年2月19日。

(31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54页。

(31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1页。

(31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2页。

(319)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10页。

(320) 《申报》，1927年3月18日。

(32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6、137页。

(322)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9日。

(323) 《民校（指国民党）扩大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9日。

(324)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9日。

(32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0、122页。

(32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1页。

(32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91、192页。

(3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27页。

(329) 《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8日。

(33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0、304页。

(33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7、328页。

(332) 《申报》，1927年3月8日。

(333) 《申报》，1927年3月12日

(334) 据1927年2月29日和3月6日《区委每日通讯》所载数字统计。

(335) 《中共中央、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15日）。

(3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1—282页。

(337) 《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17日。

(33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9、322、323页。

(339) 《申报》，1927年3月22日。

(340) 《申报》，1927年2月23日。

(34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9页。

(342) 《各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

(343) 《申报》，1927年3月6日。

(344)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日。

(345) 《各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3日。

(346) 《特别委员会议记录》，1927年3月15日、16日。

(347)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193页。

(348) 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1页。

(349) 《申报》，1927年3月30日。

(350) 《时事新报》，1927年4月4日。

(35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9页。

(35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页。

(35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54) 《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

(35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43页。

(35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第42页。

(35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及决议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7年印行。

(358)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35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36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6日。

(361) 常德县农民运动调查办公室：《常德农民运动史略》，油印本，

1980年版。

(362) 《全国农民运动现状报告》，油印本，1927年3月。

(363) 《湖南的农民运动》，《向导》周报第181期。

(364) 《桂阳县农民运动报告》，《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0期。

(365) 《湘乡县农民运动纪略》，第28—30页；《浏阳农民运动史纪略》油印本，第47页；《长沙县、省会近郊区农民运动史略》，第18—20页。

(366) 《湘乡县农民运动纪略》，第26页；《浏阳农民运动史纪略》油印本，第42页。

(367) 罗难：《农民运动与反宣传》，《战士》第31期。

(368) 《解决阳新惨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油印件，1927年3月16日。

(369) 《战士》第35、36期合刊。

(370) 《战士》第35、36期合刊。

(371)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2页。

(372)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2页。

(373) 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1年4月25日。

(374) 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战士》第41期。

(37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32页。

(376) 《全国农民运动现状报告》，油印件，1926年3月。

(377) 《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重要演说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7日。

(37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37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380) 《中国共产党湖南区为召集省民会议之宣言》，《战士》第39

期。

(381)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版1988年版，第256页

(382)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版1988年版，第725—726页。

(383) 《浏阳农民运动史纪略》，油印本，第54页。

(384) 《湖南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38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8页。

(386)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387)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388) 参见湖南总工会等编印：《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1984年版，第218页。

(389)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6期，第166页。

(390)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8期，第14页。

(391) 《湖南民报》，1927年3月20日。

(392)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8期，第72页。

(393)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6月28日。

(394)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8日。

(395) 《四川教育公报》第10期，1926年10月。

(396)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397)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622页。

(398) 《工人之路》特号，1926年10月20日。

(399) 《纠察队组织大纲》，《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391页。

(400) 《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大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41页。

(401)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622页。

(402) 参见《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403) 参见1926年11月14日湖南《战士周报》第24期；《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页。

(404)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405)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464—465页。

(40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3月9日。

(40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49页。

(408)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1921．1—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365页。

(409) 《中央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1926年5月15日至1927年3月10日），油印件。

(410) 《申报》，1927年3月22日。

(411) 《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27日、30日，10月14日。

(4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1日。

(413) 《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年7月——1927年2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页；参见邓颖超：《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510页。

(41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41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10日。

(416) 《中共中央妇女部通告》第16、22号，《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86—490页。

(417) 《中央青年部过去之工作及今后进行计划》，油印件，1926年10月。

(418) 《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419) 《国民公报》，1926年9月12日。

(420) 《中共中央通知——钟字第19号》，《万县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421) 《教育杂志》，第19卷第1期。

(42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42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5日。

(424)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一分册），第77页。

(4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219页。

(426) 《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年2月1日至10月15日），油印件。

(427) 《时报》，1926年8月21日。

(428)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23日、10月4日；《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年2月1日至10月15日），油印件。

(429) 《国民公报》，1926年9月10日。

(430)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

(431) 《申报》，1926年10月4日。

(432)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16日。

(433)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19日。

(434) 《时报》，1926年11月18日。

(435) 《时报》，1926年12月11日、13日。

(436) 《东方杂志》第24卷第3号。

(437) 油印件。

(438) 油印件。

(439) 《联席会议议事录》第8号，油印件。

(440) 《纺织时报》，1926年12月13日。

(44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4日。

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一节　二十年代列强的对华政策趋向

一　列强角逐的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侵华阵容发生重大变化。沙俄已被本国人民推翻。德、奥等国丧失了从前攫取的权益，被挤出争霸中国的竞赛。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损失惨重，在列强的侵华角逐中已力不从心。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限。只有日本实力猛增，后来居上，且占地利之便，遂与英、美在远东形成鼎足之势。它们既争夺又联合，力谋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协调行动，结成联合战线，以对付中国革命，建立侵华“新秩序”。

英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地位下降。巨额的战费开支严重地削弱了它的财政力量，在远东的传统势力范围又遭到美国和日本的渗透，丧失了原有优势。但英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强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着广泛而牢固的财政金融网络，掌握丰富资源，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中国国民革命所要实现的一切对外目标，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收回外国租界和租借地、恢复海关管理权、撤消会审公廨等等，几乎都与英国侵华特权有关。因此，国民革命兴起之初，英国本能地采取支持北洋军阀，敌视广州阵营，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可是，事与愿违，铁血镇压非但未能扑灭国民革命，反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抗，使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华南是英国利益最集中的

地区，保全这些利益的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同当地政权沟通关系。而南方阵营已露端倪的裂痕，令英国当局产生新的希望。1926年1月，在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素持强硬方针的驻华公使麻克类认为："我们最聪明的方针是就此住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占优势。"[(1)] 这种意见体现了英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最多而损失最小，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它控制着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黄金储备，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它还拥有一支在大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海陆军。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并力图在对华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

战后美、日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力图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凭藉经济优势完整地控制中国。英、美两国在中国的竞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它们之间互相利用的需要更多一些。英国需要美国援助以实现经济复兴，美国向世界扩张也需要英国财政金融网络的大力协助。面对日本在东亚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英、美都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必须予以遏制。于是，美国纠集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拆散英日同盟，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暂时抑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恢复了若干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华的局面。美国在华既得利益比英、日少得多，没有独占性势力范围和租界地，所以其对华政策便从长远的扩张利益出发，除在一定限度内用武力维护其重要权益外，其政策重心一般放在政治诱导、经济渗透、文化传播等方面。国民革命高潮涌现后，美国统治阶层普遍认为，不宜出面实行武力镇压，而应尽量用"温和"的方式加以消弭。1927年1月4日，即中国民众冲占汉口英租界的第二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特（Stephen G．Porter）提出一项议案，力主美国应援助和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能够有效地统治全国各地。议案特别提出，为了防止四亿中国人民放弃传统的中庸之

道，转而崇尚暴力，“实有必要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现存的误解和不满的根源”。议案吁请美国总统采取“独立于其他列强的行动”，立即同有权代表全体人民发言的中国政府谈判，商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2)]。这项议案在美国众议院以42票反对、262票赞成的压倒优势获得通过，充分显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动机。

日本抓住欧美列强陷入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天佑良机”，加紧侵华，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东亚。它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运动，也同英、美侵华利益发生抵牾。日本由于在贸易、资源和国际信贷等方面要仰仗美、英的扶持，不得不在华盛顿会议上妥协，接受了否定其在华独占地位的九国公约，退出在山东的大部分的权益。20年代，日本经济发生慢性萧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关东大地震又给日本造成严重灾难。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日本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有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日本藩阀官僚政治暂趋衰落，“政党政治”繁荣一时。某些政党内阁力图用和平方式扩大国外市场，缓和同英、美的紧张关系，也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于是，它们暂时收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奉行的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实行与欧美各国协调，推行经济扩张与政治怀柔并重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因其得力推行者而被称为“币原外交”。

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币原喜重郎第一次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潮流高涨。他一再宣称日本对华方针是：第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保全，对其内争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第二，期望两国共存共荣，经济提携；第三，对中国国民的合理愿望持同情与善意，协力助其实现；第四，对中国现状尽量持忍耐与宽容态度，同时尽量用合理手段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3)]。“币原外交”的实质是，尽可能用较为隐蔽的“软性”手段瓦解中国革命，保障日本在华经济权益的顺利扩张。

这一时期，军部势力仍在日本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时同外务省协调行动，有时则自行其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务省

往往只能追随军方的行动。例如在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和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战争中，币原不仅不能约束日本军事当局的武装干涉，而且还要出面为其进行掩饰和辩解。因此，国民革命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双重外交”。这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特有的现象。

二　列强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

列强对华政策的原动力是其经济利益。

经过世界大战和整个20年代的角逐，各国在华投资此消彼长，变动显著。从1914至1930年，英国对华投资增长70．5%，其数额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31．3%，略升为33．2%，但其座次却从对华投资大国的第一位降到第二位。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投资增长388．3%，从原来的第四位跃居首位，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2．8%升至38．8%，来势凶猛。美国对华投资增长183．6%，速度超过英国而逊于日本，但所占比例并不大，仅从4．6%升至8%，在对华投资大国中的座次，因俄、德出缺而从第六晋至第四。法国这时期的对华投资始终多于美国，但已呈停滞之势。德国因战败，元气大伤。（参见本书附录表一、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列强对华投资的比例与增长速度虽能表明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却不足以说明中国在它们的对外扩张中的重要性。判断中国在某一强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中所处的地位，主要应依据该国的在华利益在其海外全部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列强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而日本则不然。

20年代，美国对华投资仅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1%左右。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很小的一个份额。而且这份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传教布道和开办医院、学校等，注重在思想文化领域播下久远的影响。

1914—1930年，美国海外投资增长330%，而同期对华投资额仅增长183．6%。两相比较，中国投资场所在美国对外经济扩张中的地位相对降低了[(4)]。

英、法两国20年代的对华投资总额在其海外投资总额中约占5%—6%左右[(5)]。比重不算大，但政府借款在其对华投资中占了相当份额，企业投资也多为铁路、矿山、工厂等难以转移的不动产[(6)]。这些特点决定了英、法两国政府同中国统治集团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场所，对英、法两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只有一个国家的在华投资对该国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这就是日本。日本在华投资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90%左右，其中仅在中国东北的投资即占70%。它还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矿产量，这是其现代工业迫切需要而其本土又极为缺乏的资源。这部分投资的丧失，对于日本尤如人之断血。尽管这时的日本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大债务国，但它对中国的投资、借款额却在突飞猛涨，1927年在华投资总额便已高达25亿日元。因此，人们将之喻为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投资[(7)]。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

国民革命兴起后，英国及其殖民地香港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对华贸易迅速下降。日本对华贸易反而乘机扩大，挤占了英国在华南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市场，成为中国商品市场上最大的外国盘剥者。英国本土对华贸易额虽小，但若将其附属地印度和香港计算在内，仍能紧追日本之后，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对华贸易发展平稳，没有大起大落，在中国贸易市场上占居第三位，但其贸易额同英、日两国相比，尚有相当差距。这是它在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时总不愿打头阵的重要原因。法国、意大利等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同英、日、美三强相比，差距更大，它们在对华政策上也往往追随三强行动。（参见附录表三）

这一时期，中国在英国海外商品市场上的地位具有相对的重要

性。20年代，除1925年和1926年因中国民众抵制英货而情况特殊外，中国一般都能排进英货输出对象国的前十名。棉纺品是英国最大的出口货，中国在其输出对象国中占第二位；钢铁是英国第二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十位上下；机器为英国第三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六位上下。毛纺品是英国第四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四位上下[(8)]。这说明，中国是英国轻纺工业的重要市场之一，在其重工业品的海外市场中，也有一定地位。但是，英货在出口总额逐年增长的同时，对华出口额却呈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此时已失去在华经济扩张的势头。（参见附录表四）同时，英国的主要商品市场是欧洲和美洲，而在亚洲的主要市场是印度及缅甸，中国市场对英国商品输出的重要性毕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当英国在华利益受到中国革命风暴的猛烈袭击时，劳师远征的武装干涉究竟效益如何？应控制在什么程度上才值得？能否找到比简单的“炮舰政策”更好的手段来应付这场危机？这些都是英国统治者不得不苦心谋算的问题。

1922—1926年间，美国对华出口额仅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3%左右。（参见附录表四）在美国的各项出口货中，只有香烟一项大部倾销中国。但香烟在美货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此外比较值得留意的便是石油。这期间，美国对华出口额略有增长，但其对外出口总额增长更大，四年间增长25%，因此使对华出口额在其对外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这说明，美国虽然继续对华扩大商品输出，但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相对地位却在下降。据美国官方统计，20年代美国对华进出口额仅占其同期进出口总额的2．9%，不及美国对日本进出口额的一半，在美国对亚洲的进出口额中也只占六分之一[(9)]。结合上述美国投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在中国的既得经济利益并不大，中国尚未成为美国的重要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但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广阔扩张领域，比较注意在精神文化方面施加影响，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经济实力，自信只要能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就能最终取代英、日而在中国称霸。由于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小，长远野心大，当它面对

汹涌的国民革命高潮时，自然感到武装镇压弊多利少，得不偿失，而设法分化革命，诱导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走上反共道路，才是其最佳选择。

日本对华贸易情况与英、美等国大不相同。它的各项主要出口货都以50％—99％的高比例向中国倾销。对华出口约占这一时期日本出口总额的30％。国民革命兴起时，日本对华贸易正呈扶摇直上之势。（参见附录表四）据当时日本官方统计，1925年，日货对香港和东北以外的中国地区的输出额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约为4．6亿日元，1926年仍保持在4．2亿日元的高水平上[10]。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的情况下，对华贸易却始终出超[11]。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对日本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另一方面，20年代日本外贸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大，出口货约40％以上输往美国，进口货25％—32％来自美国，所以日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12]。“币原外交”正体现了日本资产阶级在稳定环境下既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又要取得美国支持与配合的需要，是日本在侵略中国与敦睦美国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在日本“称霸亚洲，争雄世界”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可以观望于一时，终不能坐视太久。当北伐战争迫近日本利益范围，迅速加剧其经济危机时，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抛弃以“不干涉”相标榜的“软弱外交”，再次走上以强硬手段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武力征服中国的老路。

第二节　北伐战争发动前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　“五卅”惨案后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英、日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斗争纲领。在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英、日、美等国纷纷调整其对华政策，以图缓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情绪，迎

合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民族要求，稳定北洋军阀“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从而维护其在华利益。

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列强目标相同，但手法各异。

美国政府于1925年7月抢先提出“准许中国完全关税自主”、“逐步放弃治外法权”两项主张，吁请各国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速派代表召开拖延已久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同时组织考察治外法权问题委员会。除兑现华盛顿条约的诺言，批准中国对进口货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以外，还应制定允许中国关税自主的方案，提出逐步废除治外法权的建议[13]。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称：“我相信这类行动会比任何事情都更能有效地缓和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然，我不打算说立即宣布无条件放弃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对于我们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各强国若不愿作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14] 列强对此心领神会，两会遂于1925年10月26日及1926年1月12日先后在北京举行。

日本在“五卅”惨案后采取了回避锋芒、甩开英国、争先脱身的方针，诱使北京政府同日本单独解决上海事件。6月20日，日方先赔偿伤亡工人1万美元。7月25日，又付给日厂罢工工人每人10美元补偿损失，解雇了两名民愤很大的日本职员，允许以后按照北京政府颁布的条例，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建立工会等[15]。于是，日本纱厂的罢工宣告解决，中国人民的斗争矛头集中到英国身上。英国对日本此举深感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接着，日本又在关税问题上争取主动。关税特别会议刚一开幕，日本代表团就按照币原外相精心策划的方案，率先声明，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愿马上予以“友好的考虑”[16]。币原本人透露，日本担心的是：中国青年一代目前普遍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此次会议若不能打开解决这一问题的通道，段祺瑞政府将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迅速垮台，文武官员无人能继其后，中国必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中国和

各国都有害，“故目前以中国政局的安定最为紧要”[17]。基于上述考虑，关税会议终于在11月19日作出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18]

英国由于制造了一系列侵华暴行而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尤其是以省港大罢工为核心的华南排货运动，严重打击了英国利益，迫使英政府不得不考虑新对策。1925年8月，英国外交部驳回了伦敦“中国协会”[19]关于武装封锁广州的建议，指出此举将促使整个中国一致反英，排货将进一步扩大[20]。英国政府还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促其交还会审公廨，允许华人董事加入工部局。公共租界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1926年一二月间，英外交部围绕对中国革命的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反共军阀、向苏俄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而且难于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是：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切实可行并富于“建设性”[21]。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远东司高级官员蓝普森和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极力赞成怀柔政策。韦尔斯利宣称：“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国民运动，努力将其引上正路。”[22]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也反对一切拟议中的行动，支持对广州继续忍耐，等待反共情绪发展和国民党“温和派”得势。于是，英国外交部就倾向于采取软化、分化政策，待机观变的方针了[23]。

这一时期，英国在关税会议上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它主张承认北京政权已无力统治全国的现实，同意中国立即征收二五附加税和“关余地方化”（即由各口岸海关征税后将关余直接交给控制该口岸的地方当局支配），企图以此保全由英人操纵的海关机构，促使各地裁撤不利于英国贸易的厘金和地方税，换取广州政府解决省港罢工。1925

年12月31日，英外交部将这一新立场通知其关税会议代表[24]。次年5月28日，又照会美国政府，说明“英国最关心的是关税会议的某些行动应给中国公众留下良好印象，使反外情绪及由此派生的现存反英情绪不再增长”。因此，“应立即准予征收附加税”，否则，“可能造成非常危险的形势”[25]。

列强在试图软化中国革命的同时，并未放弃以武力保护基本权益的原则。例如日本对于在东北、华北的既得权益，始终采取强硬手段加以保护。1926年春，冯玉祥国民军封锁大沽口，以抵抗奉鲁军进攻，日本军舰带头挑衅，日、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一同提出以武力为后盾的最后通牒。在华南，英、美军舰到处游弋，不时威胁和干涉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的这些手段并不能瓦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不能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垮台，张作霖、吴佩孚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一时无法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南方国民革命势力却日渐强盛，广州国民政府的权威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列强，尤其是在华南有较大利益的英、美两国，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越来越感兴趣，并企图加以利用。

二　对南方国民革命阵营的窥测

国共合作以后，列强根据国民党人对反帝和联共的不同态度，将他们大致划分为左、右两派，通常称前者为“激进派”或“极端派”，后者为“温和派”或“稳健派”。列强认为，国共合作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国民党与苏俄结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联姻，因而国民革命阵营存在着裂痕[26]。

日本在广东的利益相对少些，因此对这里的政局不多插手。它一面标榜“绝对不干涉”甚至“同情”国民革命，一面抓住广东民众排斥英货之机，大量倾销日货，挤占英国市场。但是，它也对国民党内

的“温和派”予以一定关注。1926年2月，日本外务省已看出国民党“温和派”将来有可能支配全中国，特意告诫陆军省，约束土肥原等人勾结北洋军阀的活动：“帝国军人无论如何不可有同我对华不干涉政策背道而驰的举动。”[27] 在此之前，陆军省已派佐佐木到一常驻广州，窥探军政情况。佐佐木很快就同蒋介石建立了个人联系。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力主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并著书宣扬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和蒋介石的真面目[28]。

英国对华南革命阵线内部的动态一向十分关心。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英国外交部即认为其权力结构呈三元制衡状态，即以汪精卫为首的政府，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当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29]。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出现，公开要求蒋介石反共。这种情况给了英国政府以希望，开始考虑蒋介石成为“温和力量”的可能性，期望他能恢复广东全省的秩序，严厉对付省港罢工委员会，甚至“清除俄国势力”[30]。

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在研讨对付中国革命的政策时，曾有过同蒋介石谈判解决省港罢工的设想。为此，特意询问驻北京公使麻克类，有无可能通过谈判或京沪国民党右派的影响，使蒋介石同共产党人分裂；又询问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是否仍然存在蒋介石镇压罢工委员会和共产派的机会。英国外交部所得答复都不乐观。不过，杰弥逊还是提到：“蒋可能不久就会出于自己的意志同布尔什维克争吵。”[31] 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夕，英国情报机关便已侦悉，广州不久可能发生军事政变[32]。事变发生后，英、美政府很快判明这场政变的反共性质，深感欢欣鼓舞。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公开宣称：蒋介石已采取反措施，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政变将促使排货告终[33]。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认为：“蒋不再要俄国顾问了”，“政府中的温和派看来支持蒋，他们似乎期望采取更保守的政策”[34]。

然而，广州的形势并未如列强想象的那样急转直下。蒋介石出于

种种考虑，没有立即同苏俄、中国共产党决裂，也没有抛弃国民革命的旗帜。他先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利用左派的妥协来抑制右派。帝国主义虽难免有些失望，但通过这次事变，对国共统一战线中的深刻裂痕和蒋介石的特性，毕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中山舰事件至北伐前夕，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基本立场和两面策略，判断大体准确，情报比较灵通。而英国当局则感到对革命营垒的情况若明若暗，蒋介石的真正面目时隐时显。

美国总领事詹金斯4月7日向国务院报告："现已证明，政府中的保守派尚未强大到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足以轻而易举地处置俄国人和共产党人的地步"，"蒋介石已发觉，自己的部队出乎意料地倾向于过激，蒋将军不得不首先处置军内，然后才能支持政府再次发动反俄国人的政变"。这位多情的外交官甚至担心蒋介石再次行动的准备时间过长，使共产党人得以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35]。4月14日，他在致马慕瑞公使的公函中再度表示了这种忧虑，同时又满怀希望地宣称："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如果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一旦获得完全统治，整个形势将大为改善。"[36]

詹金斯对国民党"温和派"和蒋介石寄以厚望是有根据的。当时，蒋介石等正在谋划进一步排斥共产党人的方案，同美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记者"索柯尔斯基（George Ephraim Sokolsky）[37]来到广州，企图拜会蒋介石。蒋连忙托人秘密点拨这位冒失的记者：蒋本人目前不宜接见外国记者，因为这会造成他"正在同帝国主义勾结"的印象。不过，两个月内他将平定本地局势，届时一定"很高兴地请索柯尔斯基来会见他"[38]这份宝贵情报立即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案头同时飞向北京美国公使馆和大洋彼岸的白宫。美国官方还探悉：国民党将于5月份召集特别会议，"那时将提出从国民党中驱逐共产派的问题"[39]。直至6月初传出吴铁城被拘，伍朝枢离粤的消息后，美国官员仍认为："蒋中正就是广州的政府，他既不能容忍温和派，也不能容忍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目前蒋中正与共产派和俄国人携手共

事，但可以相信，这仅仅是因为他需要俄国人提供的军火和金钱”[40]。美国还注意到“温和分子”张静江的崛起，获悉他出任国民党领袖是由于蒋介石的影响，蒋希望张静江采取同自己的计划和思想一致的政策[41]。

这一时期美国最为关注的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开幕前两天，为蒋介石和温和派效力的美国人柯亨（Morris Cohen）[42]向詹金斯交底：“有一切理由希望，温和派在即将来临的同共产派和极端激进派的斗争中获胜。”[43] 5月15日，全会刚一召开，美国海军当局便将当日情况逐级报往华盛顿。电文强调：“温和派得到蒋介石和军队将领的支持，已通过严斥党内共产派的议案。虽然将有人事变动，但政府现行政策不会改变。”[44] 詹金斯随后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逐款报知美国政府，兴高采烈地欢呼“蒋中正将军似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共产党人表面上似有妥协，因而未遭驱逐。但是，如果国民党切实贯彻蒋将军议决案中的具体条件，两党便简直不能继续和睦共事”[45]。5月下旬，詹金斯建议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和温和派“稍加鼓励”，“伴以多少慷慨一点的财政和军火援助”，使其同共产党人彻底决裂[46]。

当年春，广东部分地区出现过群众自发占据美国教会机构情况。詹金斯曾于4月向美国政府提议，若想有效地干预，就应尖锐警告，必要时甚至以武力胁迫国民政府，出面反对共产派和激进分子所“煽动”的此类行为[47]。马慕瑞公使对此颇感踌躇，他觉得难以判断的是，靠强化炮舰政策能不能使广州派“醒悟过来”？会不会反而激怒广大民众，致使美国武力保护伞外的侨民受到危害？因此他没有力主使用武力，而是建议派公使馆参赞麦耶（Ferdinand L. Mayer）前往广州考察，一面与当地美国官员磋商，为美国政府提供参考意见，一面相机劝告广州政府的官员们改善对美国人的态度[48]。国务卿凯洛格批准麦耶立即南下，并叮嘱：“如果难题仅涉及外国人开办的医院或学校，则应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在此类问题上使用武力所可能引起的

后果。”[49] 这表明美国决策者对实行武装干涉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担心此举会影响复杂微妙的中国政局，不利于美国。

麦耶于6月11日到达广州，很快探知，蒋介石等只是“在同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经费的那些人做游戏”，因而十分愿意同蒋一晤，但经试探后，马上意识到这种要求“未必合适”，遂放弃同蒋直接联系的打算，转而同国民政府各要员广泛接触。谈话中，他时而追述“美国对中国从未间断过的同情态度”，时而倾诉传教团体的慈善动机，又将话锋一转，指向两广人民“袭击”美国教会机构的事件，表示“难以理解广州政权为什么会容许这种事态的存在”。詹金斯则称：“最重要的是广东当局与美国官方之间的气氛应该是最友好性质的。”当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希望和解后，麦耶指责广州政府被罢工工人“操纵”，别有用心地询问：究竟是广州当局控制罢工工人还是相反？陈友仁希望美国暂持忍耐态度。麦耶不失时机地示意：“忍耐是有明确限度的。”美公使称赞麦耶的这些活动，“其价值在于给广州政权造成印象，必须或至少更愿意考虑美国的权益”[50]。

6月17日，麦耶取道香港北返，五天后出现于小城汕头。驻扎当地的何应钦立即倩人求见。麦耶听说他是“蒋介石将军的亲密战友和朋友”，欣然赴约。何应钦向麦耶表白：“国民党不是‘赤党'，没有同苏俄人牢不可破地连在一起”，“虽然共产主义可能是政治家们的玩物，但它在军队中的势力小得很”。他并举蒋介石清除黄埔军校留下的121名共产党员为证。麦耶则表示，尽管非常乐于倾听何将军及广州各位官员表示的对美友好感情，“但坦率地说，我们想要的是具体成果，是这些感情的实际运用”[51]。

麦耶在汕头还了解到，国民党所说的废除条约并不意味着立即全部废约，而只是要求列强方面采取步骤，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完成对华条约关系的调整，尤其希望美国能带头。麦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其他列强一道，按实际情况部分地调整条约关系，要待中国出现一个“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后，才能作根本性调整。他又针对国民党接

受苏俄援助一事警告说："玩火是危险的！"麦耶由于发现可以同何应钦"相当坦率地谈话并产生良好的效果"，遂介绍何同美国驻汕头副领事张伯伦（Culver Bryant Chamberlain）建立了"私人关系"[52]。

麦耶离开汕头之后到了上海，由索柯尔斯基牵线，会见王正廷和伍朝枢。伍向美国乞援，麦耶含蓄地答道："我们政策的既定部分是不站在任何政党或派系一边，但是当然另有一些援助中国人民的合法办法。"[53]

美国决策当局显然不愿意操之过急，揠苗助长。他们继续观察革命营垒的内部矛盾以至整个中国政局的发展，要待"尘埃落定"之后，再对确能统治全国的政权承担明确的义务。美国对蒋介石和温和派的政策是，既不号召他们放弃反帝、反军阀的旗帜，也不公开表示对其反共事业的支持与期望，而试图通过各种迂回的途径同他们联系，不露声色地推动他们反共。北伐前夕，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称："蒋介石将军几乎使自己成为那里的独裁者，并当上激进集团的领袖"，"尽管苏维埃政府及其政治原则不可爱也不可信，倒也不难诱使蒋将军和国民军首领接受其援助，因为那个政府乐于施舍。受益者当然自信能在自己所希望的任何时候摆脱苏维埃的桎梏"[54]。

相比之下，英国表现出较多的困惑和反复。

英国外交部在中山舰事件后期望蒋介石彻底反共，但并不相信蒋的实际意图是驱逐共产党人。3月底，关于蒋介石政变真相及其意义的情报和传闻纷纭而至，各执一说，外交部只能认为广州的形势仍像以往一样模糊不清[55]。4月中旬，外交部承认，"广州形势仍很混沌，不像我们最近估计的那么乐观"，"据信广州共产派与温和派势力的冲突近在眉睫"[56]。5月间，英国新任驻广州代总领事白利安（J．F．Brenan）、香港总督金文泰（C．Clementi）先后多次向国内报告广州情况，但英国政府只能判断"蒋介石将军打算当广州的铁腕人物"，其他均不甚了了[57]。

7月初，为了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解决省港罢工和排货问题的正式谈判，英国外交部全面分析了广州阵营内“温和派”和“极左——共产派”的情况，认为在对外，特别是对英关系方面，两派都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都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但温和派私下里或许准备接受“公道的、渐进的让步措施”。英国外交部认定：“在变幻不定的政治局势中，蒋介石的影响是最有力、最卓绝的因素。”“我们如果希望他们打发俄国人走路，也许不得不准备为广州办点事。”“例如，过去当广州有所请求时，我们曾拒绝由香港向广州提供帮助。但将来如果广州派要求技术性借款，我们应重新考虑我们的态度”[(58)]。

大量事实表明，北伐战争前夕，列强虽然在认识的深浅程度上有差异，但是都已知悉国民革命阵营内客观存在的深刻裂痕，并注意到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政治立场。如何利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已成为列强探索的问题。

第三节　省港罢工的谈判与收束

一　中英省港罢工谈判及其中断

持久的罢工和排货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经济上，据英国官方估计，1925年的对华贸易额比1924年减少21％，香港对大陆的贸易额减少近23％；同期英国和香港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合计损失32％[(59)]。政治上，数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对香港构成直接的威胁，英国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威发生动摇。因此，英国和香港政府把解决罢工和排货列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希望通过谈判化解这场风暴。

罢工和排货提高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地位，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因此，广东国民政府中的左派支持罢工，对罢工工人有好感。但是，罢工对广东的经济也有不利影响，长期资助罢工

工人更成为广东财政一大负担。左派又觉得，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纠察队是“第二武装”，加之右派拨弄，政府与工人间渐生鸿沟。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担心英国借机制造事端，进行武装干涉，骚扰后方，因此，希望以谈判解决罢工。

罢工委员会鉴于五卅怒潮已趋低落，省港罢工呈孤军奋斗之势，罢工工人生活困苦，斗争环境日趋险恶。长期封锁香港，排斥英货，固然重惩了英帝国主义，然而对广东经济也有不利影响。商人贸易不自由，农产品销路堵塞，工人与农民、商人的关系渐趋紧张，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加上为了全力支持北伐，罢工委员会也愿通过谈判，在一定胜利条件下结束罢工。

港英当局首先伸出触角。从1925年9月开始，香港的中国商人代表即在港英当局指使下往返奔波于省港之间，谋求谈判解决。广东四商会也于11月派代表团赴港接洽。罢工委员会当时的立场是，政治条件可另觅途径去争取，只要香港当局解决经济条件即可复工[60]。港英当局的对策却是，不接受罢工委员会的任何条件，也不同罢工委员会磋商，只要求同广州政府谈判，以图借广州政府之手压迫罢工组织，平息工潮，解除封锁[61]。当时的广州市长伍朝枢迫于罢工工人的强大压力，答复港商代表称：香港政府须与罢工工人磋商，广州政府只能“居间调停”[62]。尽管如此，广州国民政府同港英当局间的“非正式磋商”却从此开始明来暗往地进行起来。

12月间，港督金文泰委托廖仲恺的妹夫、香港名医杜应坤往见汪精卫，转交一封邀请信，请汪派高级官员赴港一晤。汪精卫立即派宋子文去香港。12月19日，宋子文与金文泰初步会商。次日，港督又派代表陪宋返粤，继续同国民政府磋谈。港方完全回避政治条件，在经济条件方面，则回避罢工赔款问题，拒绝恢复罢工工人原在香港的工作，而向国民政府抛出“借款”诱饵，声称愿意帮助国民政府兴办对省港贸易有利的实业，使组织在革命旗帜下的罢工工人分散就业[63]。国民政府在此诱惑下，立场有所松动，表示欢迎借款，也可代工人组

织磋商政治条件，但香港方面仍应考虑赔款问题；若能补偿罢工者工资，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放弃复职的要求；若港方能答应赔款、复职两项要求，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早日结束罢工[(64)]。当时英国殖民部给香港的300万英镑借款尚未生效，香港中国商人怵于年关清账，愿以30万元赔款换取事态了结。12月30日，8名华商代表经香港政府允许，到广州同罢工委员会讨论赔款事宜。伍朝枢却通知港商代表：有关沙基惨案的政治要求极为重要，必须由香港政府与罢工委员会直接谈判此事。香港政府坚持原来的立场，港商代表无功而返，谈判中断[(65)]。

此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严查一切入口货物。港英当局也进行反扑。经过一番密谋，粤海关英籍税务司卑路（F．Hayley Bell）借口罢工纠察队扣留数只未经海关查验的货艇，使他不能执行职务，悍然于1926年2月22日命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卑路采取这种强硬的行动，目的之一是迫使广州政府干预罢工工人的活动。这一着果然奏效。国民党左派大骂罢工工人不对，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通告，不许工人干涉海关职权。纠察队遵令将扣留的船货交还海关。卑路遂于26日开关[(66)]。

封关事件使国民党要人深感震动，决心加快谈判进度，早日了却罢工排货这桩心病。2月23日，汪精卫致函香港政府代表周寿臣等人，邀请他们到澳门与广东省交涉员傅秉常秘密会谈。3月2日，双方代表会面。傅秉常表示，汪先生派他来，是为了“努力消除一切误会，找到解决当前工潮的办法”。他承认，若听任罢工纠察队走向极端，对广州是很危险的。广州政府在自己希望的时候一定能控制住罢工者，但不想对他们过于严厉，因为这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全国性运动。傅还暗示，港方若肯付出适当赔偿，广州政府将放弃政治要求。周寿臣却声明：香港当局从未在原则上同意赔款，香港华商现在也未必还肯拿出钱来。傅再度退让，表示虽要求赔款，但对此不抱多大期望。他要求港府提供“铁路借款”，声称“香港对广州修建铁路、

公路的实际援助，将导致友好关系的重建，无疑比香港付给罢工者财政赔偿要好”。他还透露，罢工工人的全部条件都是自己拟定的，广州政府事先并不知情。港方代表认为这一点值得重视，在以后的谈判中对罢工委员会的要求概不理会。傅还透露了罢委会面临的经济困境，保证只要港方提供数额适当的金钱，汪精卫就能够平息罢工风潮。傅并称：汪精卫愿意在广州会见参加此次会谈的香港政府代表，“以便亲自同他们彻底讨论，能以何种方式协助达成满意的解决。”港方则表示非常感谢傅的“友好行为”[67]。

经过这次秘密接触后，汪精卫与港督金文泰之间信使往返，频频磋商。这时省港大罢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英国对香港的贸易贷款已发生效力，“输血”后的香港经济开始稳定，商人们顺利度过了年关。随着“五卅”运动的退潮，英国在华北、华中的贸易状况有所改善，在华南也找到了许多同广东贸易的秘密渠道。港商不再愿付罢工赔款。罢工委员会在香港发动二次罢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卑路事件中又受到压抑。香港当局一面不时施放武装干涉的空气，一面顽固地坚持苛刻的谈判条件，如：不以罢工组织为对手，不赔款，借款的前提条件是完全取消排货运动和罢工委员会，由港方控制和监督借款的用途，以确保其用于兴办实业，而不分给罢工工人[68]。汪精卫一再妥协，终于决定将罢工委员会撇在一边，答应由国民政府出面，直接同香港当局举行正式谈判[69]。

3月20日，即发生中山舰事件的同日，港督密使携函到达广州，会见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汪精卫。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港督来函，并由汪精卫签署了回函。汪托来使捎去口信说：“正式谈判应在广州举行”，“罢工结束时工人应获赔偿”[70]。24日，金文泰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所鼓舞，急电伦敦，力陈现在正是取代俄国影响的机会，请求授权讨论借款。英政府迅即回电，授权他在广州政府结束拒货和担保用途的前提下，从香港资金中拨款，援助广州市政改良。香港当局内定借款数额为一千万元左右。

省港罢工委员会坚持以获得适当赔偿为收束罢工排货的最低条件，发起广东工、农、商、学联合运动，促使革命气氛再度高涨[71]。在这种形势下，广州政府既不能向英方彻底屈服，又担心在正式谈判中争执不下而公开破裂，便一再要求先进行“非正式磋商”。4月上旬，港督代表明确表示，香港当局不仅不同罢工委员会谈判，不付赔款或罢工费用，而且也不允许香港英、华商人作出这类赔偿[72]。由于在赔偿问题上毫无妥协余地，省港间的正式谈判只得无限期推迟。

此后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一直期待着国民党温和派在广州进一步得势。英国外交部认为，最终解决的前景“将取决于温和派与共产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发展，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真诚地希望取得解决”[73]。金文泰甚至相信，一旦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圆满成功，共产派罢工委员会将不复存在，排货运动会自行停止[74]。当然，广州形势的变化并未使他们如愿。由于温和派一时受到抑制，港英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步对策。

正在这时，前广东交涉员、省港谈判的重要人物傅秉常于6月2日逃往香港，向港英当局透露：蒋介石本人希望一举解决省港间的纠葛，但共产党人不赞成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收束。尽管现在许多右派已经离开广州，但国民政府仍可能尽量设法，解决这场纠葛，因其持续时间太久，给政府造成极大麻烦和开销。傅并称：蒋介石独到的策略是，先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以便能够最终在全中国实行他所信奉的政策。只是因为需要苏俄的援助，蒋才同鲍罗廷妥协，但“蒋介石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党人分裂”[75]。港英当局了解上述内情后，更加不肯让步，坚持诱迫国民政府收束省港罢工。

陈友仁于1926年5月底就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6月4日、5日，他分别通知白利安和金文泰，表示准备与英国和香港当局公开谈判罢工事件，请英方派出全权代表。陈向白利安强调，罢工排货的起因在于英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必须以赔款作为解决前提。白利安避而不谈赔款，却表示香港政府愿为广州建设省港互利的项目提供

1000万元借款，条件比一般情况宽大，但将以分期付款和监督的办法来保障其用途。陈友仁提出，若以借款取代罢工赔偿费，则将用于军事项目，而且不能接受外国监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76]。

英国驻北京公使麻克类反对同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的国民政府谈判，认为这将损害吴佩孚等北洋将领的利益。参赞欧马利却认为，从解救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出发，“与广东谈判是最迫切、最紧要之事，不应服从华北、华中变幻不定的形势”。金文泰指出，吴佩孚、张作霖的表现很令人失望，而广州政权的支配者是蒋介石。谈判很可能出于蒋的要求，蒋需要钱，也需要解除广州工人纠察队对其基地的威胁。因此，金文泰主张立即与广州方面正式谈判[77]。英国决策部门也将解救英国利益和分化革命阵营作为主要考虑，期望“随着排货的解决，英国与华南的关系将得到全面而显著的改善”，“罢工组织被解散”，“保守、温和分子们得到加强，俄国的影响相应地减少”[78]。6月11日，张伯伦下令参加谈判。他授权英方代表酌情提出三项反要求，以拒绝广州方面为沙基惨案遇难者和罢工者提出的赔偿要求，但他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实业借款。17日，张伯伦训令驻华使领官员：“解决排货必须是我国政策的首要目标。”[79]

谈判开始前后，广东工人和各界民众连续集会，表达实现罢工要求和支持、监督政府外交的意思。6月19日，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工人将团结一致，以反对英帝国主义，直到罢工工人提出的解决条件为港府接受为止。22日，农工商学联合会决定，支持罢工到底[80]。罢工领导者之一、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批驳英方的各种狡辩和谬论，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提供论据[81]。舆论界也广泛认为，应以沙基惨案五项条件和省港罢工各项条件为解决问题的根据，不容修改[82]。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和民众的多方支持，国民政府代表才能在谈判桌前，以较为坚定的立场同强悍的英帝国主义相周旋。

7月15日，国民政府与英港政府的正式谈判在广州举行。国民政

府全权代表为陈友仁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馀。英港政府全权代表为白利安、香港律政司凯普（J．H．Kemp）、华民政务司哈利法克斯（E．R．Ha1ifax）。16日，陈友仁宣读了一份关于排斥英货运动原由的意见书，指出排货是华南人民有组织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原因是沙基惨案，间接原因是“五卅”惨案，两案皆为英国参与制造。香港政府先对广东实行封锁，尤为激起和延长对英杯葛的有力辅因。19日，英方代表书面答复，为“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辩护，并称香港先行封锁广东是“自卫政策”。当日，陈友仁邀白利安到另一房间进行“私人谈话”，要求香港政府从财政上帮助广州政府解除“失业者”负担。白利安称，无论是以赔偿罢工者的形式，还是以可充军费的自由资金形式，香港绝不会付一分钱。中方若坚持这种要求，香港政府宁愿同排货对抗到底。但他表示：为使广州政府能够在人民面前不显得完全失败，并为恢复省港友好关系，香港当局可借款帮助广州的建设性项目。陈友仁则重申，拒付赔款将使解决难以实现[(83)]。

7月21日，第四次会议，陈友仁逐条驳斥英国代表19日的答复意见书，提议由两方协力分任：一、为使沙基惨案不致重演，整顿沙面海陆军，限制英舰停泊内河；二、赔偿惨案受害者；三、筹款解决“失业”问题。英方声称：只有中方采取充分措施保证外国居民安全，英方才能变更防卫措施。同时明确拒绝后两项要求，并暗示保留赔偿英方损失的反要求。中方表示：排货是沙基惨案的直接产物，既然英方不承认先射击的责任，则应进行国际调查。在此之前，由国民政府与香港政府共同借款给“失业”工人。将来如英方在国际法庭胜诉，香港政府负担的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中方胜诉，则国民政府负担的借款，由香港政府偿还。英方代表反对这种办法，口头提出以港方实业借款换取立即结束排货的反建议。双方均以考虑为由推至下次再议[(84)]。

7月23日，第五次会议。中方就国际调查沙基惨案责任问题提出

详细意见书。英代表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遭到中方代表驳斥。英方代表表示须向政府请示。随后英代表团提出借款意见书，声称愿为开辟黄埔商埠、接通粤汉、广九铁路或其他省港互利的用途提供约一千万元借款。条件是此后广州政府所辖地区应完全停止排斥英货及其他反英活动，并须雇用英籍总工程师及总管账各一人，以保证这笔款项的“正当支销”与偿还。中方代表也以请示为由，未置可否。谈判至此宣告无限期休会[85]。

列强根本不把广东政权放在眼里。国民党人在广东建立政权以来，没有同外国开过平等的正式会议。只是因为省港大罢工和排斥英货运动的发生与坚持，英港政府才不得不派同等权责、同等数目的代表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

为了使谈判早日成功，国民政府作了许多让步。它放弃了从前提出的英方为沙基惨案道歉、惩办有关长官、撤退兵舰、交还沙面等要求；也不再坚持罢工工人历次所提各项条件，仅要求赔偿惨案受害者和限制英舰；至于罢工赔款，则表示愿谋变通办法筹集。然而，英国政府仍不愿改变立场，省港谈判陷于中断。

谈判中断后，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封锁香港的斗争，新补充2000名纠察队员，在各海口要道增岗加哨，严密盘查往来船货，严厉处置走私违法活动。工人群众并上书国民党中央，说明罢工及一年来的奋斗，都是为民族求解放，前途不外乎三端：“一、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耶？二、抑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其实业借款条件耶？三、或不甘屈服而继续奋斗，以求最后胜利耶？”[86] 对于这么尖锐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没有正面答复。

二　英国的胁迫与罢工排货的收束

省港谈判中断后，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1926年8月初，伦敦中国协会向外交部转呈一份英国在华工商巨

头会议的报告，指出中国市场的复兴，是解决英国面临的贸易衰退和失业问题的重要出路。英国应与日、美联合行动，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维护在华根本利益。“英国各界宁肯面对中国公众舆论暂时仇视的后果，也不愿对极端派实行和解政策”[87]。

英国外务副大臣、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韦尔斯利认为，当国民革命在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下迅猛兴起之际，采取简单的炮舰政策是极其危险的。英国没有足够的陆海军力量对付如此众多的中国民众，若与列强联合行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或许可收一时之效，但终将引起致命恶果。正确的政策是暂时观望，寻得修订条约的时机和方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一、英国人生命面临紧迫危险；二、保卫英国利益[88]。

广州和香港的英国官员就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寻找解决排货运动的新途径。他们通过前一阶段的接触和窥测，看准了国民政府同罢工工人之间的分歧，摸透了国民党人怕乱、怕民众运动的心理，于是决心以军事行动直接遏制罢工工人，胁迫国民政府收束罢工排货运动。

这种策略，在6月下旬梧州事件中已经预演并取得成效。当时，英国驻华南的西江舰队司令费慈（J．U．P．Fitzgerald）率三艘英舰溯江而上，“查处”一英人被害事件。途经广西梧州，索要引水员，遭到工会抵制。费慈向梧州当局施行恫吓。梧州当局遵照广西政府指示，说服工会允许英舰雇人引水。工会又要求加倍付薪，费慈便向广西省政府主席及梧州交涉员发出最后通牒。广西及梧州当局接受了费慈的条件，但因引水工人未如期到舰，费慈竟于6月24日封锁梧州港，直至引水工人到舰才罢休。

8月中旬，港督金文泰召集驻港英军将领，研讨武力解决省港罢工的行动方案，并进行了实地考察。英方顾虑没有足够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对华战争，也没有把握取得其他列强的合作，如果武力行动激起

全国规模的反英排货运动，英国得不偿失。因此，英方决定尽可能控制冲突的规模，以有限的武装行动，实现“解决排货”这一主要目标。

港英陆军当局提出可用100人突袭罢工委员会总部，但如果国民政府将此举视为战争行动，出动政府军对沙面实行反击，香港英军将难以应付。费慈则根据梧州事件的经验，提出可依次实行的五条行动方案。其中，第一是扣押并毁坏一切罢工纠察船和其他罢工者使用的船只；第二是将炮舰停靠于罢工检查站和罢工委员会总部，使罢工组织陷于瘫痪。费慈认为，实行这两条方案，不须登陆作战，甚至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可破坏排货运动。如果行动时向有关方面说明，这完全是针对罢工者采取的，效果更佳[(89)]。白利安向英国使馆和政府力荐这两个方案，并提出补充意见：一、设法说明我方只攻击罢工委员会，不攻击广州政府；后者出于对北伐战事的考虑，可能除提出抗议、诉诸报端之外，不会采取其他行动；二、采取只打击罢工委员会的行动，会得到广州商人们的支持，其他列强也无异议；三、广州政府正与吴佩孚、孙传芳作战，北方发生反英报复的可能性很小；四、可从香港派一两艘空船到广州进行非法贸易，诱使纠察队干涉，英国便可以此为借口，采取上述“报复行动”[(90)]。

借口终于有了。8月28日晨，英人利利克拉（Lilicrap）、美国人班伯理（J．W．Banbury）及一个白俄雇员驾汽艇从广州岸边偷运中国乘客上港轮，为纠察队截击，被迫折回海关。利利克拉逃走，班伯理和白俄被押往罢工委员会，经交涉后旋即获释。英方闻讯，立即派两艘炮舰开抵现场，夺回被纠察队扣押的汽艇，纠察队退避。港英当局不甘罢休，要借此机会实施费慈方案。

几乎与此同时，吴佩孚的下属川军杨森部因英轮万流号荡沉中国木船，致使数十名中国士兵和乘客及大笔饷银没入江中，遂在万县扣押另外两艘英轮万通号、万县号，监困英舰科克查夫（Cocksharer）号。

英国政府立即批准在广州和万县分别采取武力行动，挽救英国的侵略权益。8月31日和9月1日，伦敦连续电令驻华南海军，扣押并毁坏一切纠察船和罢工排货用船，避免陆地作战，尽可能争取美国海军合作[91]。9月3日，又令万县方面英国官员自行处理局势，可将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92]。

为了收到分化效果，英国官员特意在行动之前向广州政府说明，英方将要采取的行动完全是针对罢工纠察队的。8月28日，白利安赴陈友仁的晚宴，于觥筹交错之间表示：不理解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设法谋求英国的同情和支持，打消敌意。他警告说：纠察队在省河里操船弄枪，太放肆了。鉴于今晨发生的事件，英方不能再容忍，将以炮舰制止这类事情。如果英方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压制省河中的纠察队时，希望陈友仁了解，英国矛头所向是“海盗组织”，不是广州政府。英方希望尽可能与广州政府友好相处。陈友仁答以政府将努力约束纠察队，避免发生严重事件[93]。这就使英方对原来最担心的问题摸到了底。

国民政府对英方即将采取的行动感到紧张。9月2日，再度答应制止纠察队在河中开枪[94]。这时，英方的作战训令已经下达，白利安正按训令争取美国的合作。美方拒绝参加[95]，英国遂单独行动。

9月4日9时许，费慈指挥两艘英舰突然闯入省河，驶向广州西堤。纠察船已有警觉，纷纷走避。英舰强泊于西堤的两个码头，炮口指向工商检查站，水兵上岸，逐走执勤的纠察队员，捣毁验货棚。国民政府没有动用军队，只派来警察“维持码头秩序”，防止工人和民众同英兵冲突。下午，另一艘英舰开抵检查站旁，放走全部待检的货船，不许任何船只靠近检查站。又有英水兵五十余人携机枪数挺登岸，占据省港澳码头。次日，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撤走英兵、英舰。英方害怕的是国民政府出动正规军队实行武装反击。现在看到不至于发生这种可怕的后果，便迟迟不退。罢工领袖苏兆征当天即将英舰暴行报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但政治会议没有采取有力

措施。此后数日，英兵不断行凶挑衅。汕头英舰也于4日采取了类似行动。

9月5日晚，英舰威警号、嘉禾号从长江上下游两个方向同时突袭万县，威警号同被困在万县的科克查夫号悍然炮轰万县，成为英国20年代在中国制造的最大惨案。面对英舰的无理挑衅，杨森部自卫还击，三艘英舰远遁[96]。后来，英国当局因兵力不足，担心四川民众对英侨实行报复，不得不暂停行动，恢复谈判[97]。杨森在英国武力威胁下，终于按北京政府的旨意释放了被扣英轮，惨案不了了之。

武力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效毕竟是有限的、暂时的。为了达到解决排货的目的，英国需要利用武装干涉的气氛，继续向广州政府施加压力。9月10日，白利安连向陈友仁提出两项照会，一是要求立即命令长江前线北伐军司令官，制止射击英国船舰，一是要求澄清广州市长孙科最近的反英演说是否代表国民政府政策[98]。

9月11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英国已用兵舰政策，党和政府应设法破坏其计划。政治会议决定从宣传、民众运动、谈判三个环节反对，但特别强调“极力避免冲突”[99]。政治会议同时议决：“政府人员发表外交上言论应极慎重，演说词尤需先经审查，不得同意而各报自由发表，应严行取缔。”[100] 据此，广州国民政府虽对英舰强泊西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又同英方达成谅解：今后由中国警察巡逻保护省河及码头，防止破坏“公共秩序与和平”。英方认为，“这意味着不允许罢工纠察队在码头与河道执勤”，驱逐纠察船和破坏排货封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另一方面，英方惧怕岸上居高临下的攻击，特别是广州政府军开来反击，因而决定顺势下台。白利安通知陈友仁，英国海军暂时停止最近采取的行动，但如果上述谅解未得兑现，或解决排货的谈判未于适当时间内恢复，英方保留重新采取行动的权利[101]。12日，英舰撤走。

广州国民政府继续缓和局势。9月16日，陈友仁书面答复白利安

提出的两项照会，称孙科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国民政府将电告蒋介石，制止射击长江中的外国船舰[102]。白利安得寸进尺，接连胁迫道：英政府的忍耐已到极限，正在考虑处理局势的措施。如果陈友仁不能在一两天内作出解决排货的令人满意的书面表示，就将会发生某种后果十分可怕的事情[103]。

17日，陈友仁紧急约见白利安，告诉他政府已同罢工委员会商妥，将在10月10日或此前结束排货封锁，同时对各国货物平等征收一项特别产销税，以供收束之用。税额与华盛顿会议允许的附加税相等，出口货和进口普通货加征2．5%，进口奢侈品加征5%。该项税收不要求英政府正式同意，只要求不反对即可[104]。次日，陈友仁又按白利安的要求，正式发函证实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105]。

这时，是进一步扩大武装干涉，甚至公然援助北洋军阀呢？还是继续实行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力促广州阵营发生分裂呢？英国的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呼吁英政府进一步打击“激进派”。金文泰数周前还在请求英国对广州政府予以适当承认，现在却力主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广州政府立即制止辖区内的一切反英宣传，否则便用炮舰封锁广州[106]。

北洋军阀集团也把挽救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英国的武装干涉上，接二连三地向英国乞援。9月10日，张作霖请英、法干涉北伐，支持自己充当“反赤领袖”和外国利益保护人[107]。12日，孙传芳的密使求见英国驻沪总领事巴顿（Sydney Barton），吁请英国给予“任何方式的援助”，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他“甘冒奉军滞留长江一带及被指责为把祖国出卖给外国人的风险”。两天后，北洋政客梁士诒拜访麻克类，请求英国援孙反粤[108]。9月20日，吴佩孚的密使访问英国公使馆，表示愿以盐税担保取得英国借款，与总税务司协商发行新的海关债券，以购买军火，甚至乞求英国以帮助清朝镇压太

平天国的同样方式来帮助吴佩孚镇压“赤党”，至少立即援助军火和金钱。这位密使宣称吴对英国一向友好，此时英国若帮吴解决燃眉之急，吴为英国“做什么都行”[109]。

英国驻华外交官们一面将北洋军阀的求助信息报往伦敦，一面向乞援者表示，英国政策是严守中立，不介入中国内战，在广州、万县等地动武，仅仅是为了保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任何一方的攻击，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行动。麻克类公使建议英国政府修改“不干涉”政策，在南方实行金文泰拟定的武装干涉方案，在北方给孙传芳以物质援助，并直接向一切广州派和国民党的敌人供应武器、弹药和金钱[110]。

了解广州内情的白利安坚决反对公使和港督的意见。他认为，“孙、张并非我们的真正朋友，为使他们的统治长存而进攻国民运动，只能使中国人长久地怨恨我们”。白利安称：就广州方面的情况而论，英方9月10日的两项照会已得到满意答复，广州政府遵守了不让纠察队干扰河道、码头的协议，香港轮船已能够运送客货进出广州，纠察队也已撤走了封锁沙面的哨卡，广州报纸上充满了拥护收束的宣传。他又称：陈友仁向他私下保证：国民政府不支持反英鼓动，防止任何“非法行动”，但又不得不谨慎从事，因为经年历久的反英热潮不可能在一天内平息。关于产销税的征收，陈友仁也表示愿与海关合作。白利安还探听到：蒋介石害怕英国骚扰后方，曾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排货；政府其他领导也觉得罢工委员会权力过大，有最终取代政府的危险，因而想力图取消这个组织。他指出：通过强泊西堤，已达到迫使广州政府处理罢工委员会，停止排货的目的；至于收束的方式，以表面上由中国当局自愿解决为好。若英方一味恃强用武，使广州政府无法避免对英彻底失败的形象，则后者即使为了面子也要战斗到底。英国并没有从华南消灭国民党的有效措施，向广州宣战，只会使国民党和其他中国人重新聚集到极端派一边。白利安估计，今后还会存在反英宣传，“这是无法用战争制止的事情，只能用耐心和圆滑

的举动克服它”。因此，白利安主张，英国必须审慎地兼用软化与耀武政策。他相信，对付华南“反英煽动”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国民党及广州国民政府之手加以平息。白利安宣称，他已经发现，有可能同广州政府达成妥协，平息所谓的“煽动”[111]。

强泊西堤前，英国曾将计划采取的行动分别通知美、日、法等国，并请美国“协调行动”，遭到美方拒绝，日、法当局也表示爱莫能助。强泊西堤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又于9月9日正式答复英国政府：“来照所述英政府正在采取的行动，本政府不准备参加。”[112]日本外务省人士也声明：不偏向中国任何党派、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迄无变化[113]。英国的陆、海、空部门反复研究了在广州动武的可能性和金文泰方案后，主张维持帝国国防委员会3月份作出的结论，即：使用武力的唯一现实办法是实行封锁，这就需要事先取得国际上的同意；一旦封锁失败，势将引起同中国的大规模战争，这绝非英国独家力量所能进行。就目前情况看，不可能获得国际合作[114]。另外，英国国防委员会咨询机构认为，即使取得国际谅解，也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最近一次稻米收成很糟；二、能在全部三角洲及海滩巡逻，用炮舰封锁西江；三、反工人阶级的广州商人阶级正在掌权[115]。这些条件当时都不具备，所以英国政府认为，没有扩大对广州武装干涉的可行方案。

英国政府还考虑到，支持孙传芳或其他北洋军阀，等于推翻不与中国任何冲突中的派系结盟的政策，可能会“引起深远而危险的后果”。中国军阀长期以来升降沉浮，变幻莫测，如果孙传芳等失败，英国将处于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116]。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外交部驳回麻克类、金文泰的建议，重申“英国政府的政策是避免卷入大规模地干涉中国事务，尽可能实行忍耐与怀柔政策”，“武装行动应限于防卫对英国人生命财产和利益的袭击”[117]；对广州国民政府，则继续实行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方针。9月22日，英国外交部授权白利安，可正式照会陈友仁，欢迎广州政

府关于10月10日或此前结束排货的保证。另嘱白择机口头表示：在完全取消排货，对一切外国货平等征税这两个先决条件下，“特别产销税”将得到英政府的默认。但如果允许罢工委员会重新进行“非法”活动，英国政府则可能要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行动[118]。

英国赖以进行威胁的“必要行动”，究竟是什么法宝呢？说来很可笑。英国政府经反复研究，其结论是：万一10月10日以后广州不停止排货，香港海军司令提出的武装封锁方案仍不可行，除已采取过的针对纠察队的措施和在广州湾武装示威外，并没有什么“有效措施”。英国政府最后决定，让白利安按上述已发之训令，采取自认为最佳的办法，继续努力，促使广州方面取消排货运动[119]。10月上旬，白利安通知陈友仁，产销税显然破坏了现行条约，英政府在表态之前将等着看排货被取消的程度[120]。

10月10日，广州集会，正式宣告结束对香港的经济封锁和排斥英货运动。历时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到此告一段落。英国政府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在广东受到的压力和打击有所减轻，初步实现其政策的“首要目标”。

以征收产销税来代替封锁和排货，广东国民政府也取得了一定收获，但是，毕竟未能取得本来能够取得的成果，更远远没有满足广大爱国民众和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这笔税收本应用于津贴罢工工人，但只发了两个月，国民政府北迁后，广东当局便将这笔津贴扣发了[121]。

第四节　北伐进军中列强对革命阵营的分化

列强的对华政策，经过一番调整，逐步形成软硬兼施、相辅相成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软化、分化中国革命与武装保卫重要侵华权益。帝国主义决策者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烈火面前，不以武力保卫重要权益，侵华基业必遭焚毁；但若一味强硬，甚至亲自出马镇压革命力

量，又会火上浇油，适得其反。“五卅”以来的历次暴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己经过仔细盘算也确认了这一点，于是，软化、分化便成为其政策的主要倾向。他们想方设法诱引中国革命走向改良，一再表示，愿意经过谈判放弃某些不甚重要的在华权益；在征收附加税、归还会审公廨、华人董事加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等问题上也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他们坚决不肯在革命的压力下立即放弃在华享有的投资、贸易、航行和海陆军驻扎等重要特权，在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等问题上，也不肯作较大、较快的让步。因此，列强又需要在维护自身重要权益的限度内使用武力威胁，向中国人民表明，存在着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企图以此削弱以至抵消共产党的影响，便于“温和派”取得领导地位，从而将这场民族、民主革命控制在世界资本主义运行的轨道内。为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从中国革命阵营中诱出那些既愿意妥协又有实力“维持秩序”的人物。北伐战争发动以后，列强审慎而狡黠地在上述两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行动。

一　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

随着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列强逐渐意识到国民政府已不可忽视，将来有可能统治全国，而北洋军阀腐败没落，四分五裂，一直不能按照列强的希望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效而稳定地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1926年春以来，广州发生一系列事件，列强燃起了对那里的温和派和“铁腕人物”的希望，认为不必继续死守支持北京、敌视南方的旧政策。同时，列强为了维护自己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的既得利益，也需要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和交涉。于是，列强摆出“中立”、“观望”的姿态，开始逐步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它们陆续与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实际交涉关系，并以“承认”为饵，诱其放弃和压制反帝斗争。对1926年4月段祺瑞垮台后频繁更替的几届北洋短命内阁，列强则一直未发正式承认照会，只作为“事实政权”与之交涉。

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因其统治权尚未扩展至全国，为防止列强分

裂中国，暂时没有要求各国给予正式承认，只要求各国仿照民国元年、二年间的先例，实行就地交涉；在中国统一政府未建立以前，不得承认任何盘踞北京或各地的军阀政权[122]。

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就曾设想，承认广州政府为某种“事实政府”，以此作为怀柔措施的一部分，后因认为时机未到而搁置。同年夏，港英当局与国民政府为解决省港罢工从私下接触走向正式谈判。这时，如何对待国民政府地位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

为提高国民政府的外交地位，国民政府新任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于6月初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攻势。他首先裁撤广东省交涉署，迫使各国领事馆直接同国民政府外交部办理交涉。接着于6月4日郑重通知英国代总领事白利安，要求英方复函时将其称为“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随后他又要求各国领事官员今后来函一律用这一头衔。他解释此事不等于要求各国承认国民政府，但是希望在不承认期间得到官方联系待遇[123]。当时英国在华南的官员白利安、欧马利、金文泰等都主张放弃北京存在一个能处理全国各地事务的“中央政府”的假想，改变只同北京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方针，承认国民政府为地区性的“事实政府”，与之直接交涉[124]。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支持这种主张[125]，但偏爱北洋军阀的麻克类公使主张继续静观发展，等待北京“中央政府”的出现[126]。

英国政府基本上赞成白利安等人的意见，确信“在最近的将来，北京无力继续控制像广东这样遥远而动乱的省份。”因此其立场是，对于当地重要问题，准备通过总领事与广州现政府交涉，但只承认它是广东省行政机构。这一态度将“保持到环境要求我们变更为止”[127]。英国外交部任命白利安为省港谈判正式代表之一，授权他在给陈友仁的公文中采用“广东代理外交部长”这一称谓，同时又另函说明：“此举必须不含有任何变更英政府对于承认问题的政策的意味。”[128]

美国驻华官员也在考虑如何调整同国民政府的关系。1926年2

月，詹金斯建议美国政府以谨慎的态度同广州政府建立联系[129]。6月初，马慕瑞公使指示詹金斯，可用美使馆给北京现政权发照会同样的形式向广州政府发照会。同月中旬，詹金斯得知英国同僚的上述举动后，马上也在照会中称陈友仁为“代理外交部长”，另具专函声明此举纯属“礼貌与善意”，不意味着承认广州政府。马慕瑞随即予以批准[130]。随后，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仿效。

北伐战争开始后，各国对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又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7月3日，列强停开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有意观望形势。7月中旬，北京政府财政部向列强申请每个月从关余中拨款5万元，供政府“行政开支”之用。各国使团一致拒绝[131]。

美国使馆参赞麦耶南行归来后，建议美国采取不承认北京存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同时以“特别的措辞使广东派理解，我们采取这一政策，其明显度系于意识到对华南美国人及其利益的态度将立即发生变化”。这说明美国政策的主要意图是要诱使广州政府改变反帝立场[132]。马慕瑞根据麦耶的考察报告，于七八月间一再向美国政府说明：北京政府业已丧失对中国各地的统治权，形同虚设，应公开宣布不承认北京“中央政府”的存在，直接同各地方当局交涉，鼓励它们负责保护美国利益[133]。7月中旬，国民政府获悉吴佩孚、张作霖要求重开关税会议，以利于筹集经费，立即向美国公使馆发出抗议照会，促其阻止[134]。詹金斯主张借此机会表白美国政府对关税会议和广州政权的态度。马慕瑞果然公开答称，美国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内得各地支持、外获列强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关税等问题上，美国无意为个别军阀或派系谋利，对陈友仁外长的照会表示“珍重”。接着，他又在北京采取行动，声言美国并未承认北京现政府，“愿为中国全体谋利益”，等等[135]。这些行动立即为华盛顿认可。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把国民政府当作中国政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来

对待，企图以更灵活的姿态，为在华长远利益寻找新的支柱。1926年10月，美国务卿凯洛格通知英国政府，美国的政策是："随时准备与任何表现出有能力代表中国履行其所负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并进行谈判。"[136] 11月，它又通知意大利：美国尚未考虑承认广州政府，但是，如果那个政权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美国无疑要考虑承认[137]。

日本对华南政局持观望态度，在华北和长江流域积极进行经济扩张，在中国东北地区则继续推行逐步殖民化的政策。它强烈反对一切可能加强中国东北与内地联系的政治军事行动，既不允许关内势力染指东北，也不希望奉系向关内发展。段祺瑞倒台后，它对素有反日情绪的吴佩孚不感兴趣，认为吴可能很快被消灭。对于张作霖试图控制北京并"组阁"一事，日本也不热心支持，反而一再警告他，克制武力扩张倾向，专力于东三省的整顿[138]。

北伐战争开始后，日本军方深恐"赤化革命"波及其势力范围，企图进行干涉。1926年8月初，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提议：一、日本单独或与列强共同"劝告"中国各方停战议和；二、警告张作霖，应速与吴佩孚、阎锡山达成谅解，停止进攻国民军，专门致力于东三省的内政整顿，保境安民，并同国民军中的"稳健派"妥协；三、日、美、英协力促成张作霖、吴佩孚结盟，成立新政府，各国予以承认，重开关税会议，从精神上物资上援助新政府；四、日本协助北洋政府进驻库伦，切断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通道[139]。

日本外务省同意协助军方，劝告张作霖收兵出关，致力于东三省的"保境安民"，但它认为，英、美、法等国都采取"冷静旁观"的方针，中国各方目前也不可能停战议和，因此，其他事情难以办到[140]。外务省主张不要公开干涉中国革命，而应打着"中立"的旗号，多方联络能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实权派。9月5日，币原外相训令长江沿岸各日本领事馆："随着北伐军的推进，中国局势正在发展，我方必须遵守不偏向中国一党一派的既定方针，在此关头保持更冷静的态度，注

意政局的变化，适当与各地方实力人物保持接触。”[141]

同美、日相比，英国对华外交的步调在北伐之初有些紊乱。麻克类公使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已为极端派控制，英国应采取不承认、不谈判、不借款的方针[142]。他对北洋军阀集团仍抱有较高的期望。6月中旬，他催促颜惠庆设法调和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利益，使他们捐弃前嫌，成立政府，“造成新开端”。6月下旬，由于迟迟不见成效，麻克类又派使馆武官和秘书到保定同吴佩孚面谈，促其尽快解决同张作霖之间的分歧，消灭或诱降国民军，建立联合稳固的“中央政府”。吴佩孚表示同张作霖已有所谅解，很快就能消灭国民军，然后他将负责对付广州派[143]。与此同时，法国公使也对张作霖作了同样的劝解[144]。

港督金文泰总是从香港利益出发，六七月间多次建议“事实上承认”或“法律上承认”广州国民政府为地方政府，甚至不惜抛弃北洋集团，公然向广州提供顾问、军火和资金，武装援助蒋介石，换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解除排货封锁，驱逐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外交部没有同意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方案[145]。7月26日，驻北京公使馆的“中国通”台克满（Eric Teichman）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正处于无可挽救的政治解体过程中，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各省。段祺瑞倒台后，英国已自动撤销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现在也不必予以承认，只须静观时局发展，同时与各省，包括北京当局交涉他们力所能及的事[146]。

英国外交部对台克满备忘录比较赞赏。外交部顾问、中国问题专家普拉特（John Pratt）指出，外交部与驻京公使的基本分歧在于后者倾向于支持北方军阀，反对广州。这是1918年以来就存在的倾向，也是英国在华南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广州国民党人有可能在全国树立支配地位之际，这种态度尤为危险[147]。于是，外交部决心继续保持“中立”观望的姿态。它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公然宣称中国不存在所谓“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对北京政府一直没有再予以正式承认；

对于已将统治区扩展到长江流域的国民政府，英国由承认其为“广东省行政机构”，调整为承认它是“控制着独立于北京政府区域之外的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148]。在巨大的铁的事实面前，英国再也不能紧闭双眼了。

二　维护重要权益与分化革命阵营

1926年秋冬时节，国民革命凯歌行进，北伐战争席卷江南。面对中国政治格局不可逆转的急剧变动，列强加紧拉拢国民党“温和派”，分化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他们对由北伐引起的涉及自身侵华利益的事件，采取硬中有软、软中带硬的策略，既维护重要权益，又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让步，避免同革命阵营发生大的冲突。

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后，蒋介石、唐生智等为保障战事顺利进行，于八九月间先后下令禁止中外船舰夜间穿行战区，白天须按信号在指定地点停航受检后才可放行，违者将遭炮击。美国就此向广州政府声明：限航令破坏了外国船舰“自由航行”的条约权利，美国军舰不能遵行，但除紧急情况外，将尽量遵守其中限制夜航的规定。至于美国商轮，若其自愿遵令受检，美国政府不加干涉[149]。日本、法国、意大利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英国则在坚持其内河航行特权的前提下，表示可让军舰在指定地点停航，接受中国官员的“礼节性拜访”[150]。在这一时期，英、美、日、法等国军舰都曾因为穿行战区而遭到北伐军的射击，它们有时还击，有时遁避，但都不准备为此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151]。

濒于绝境的吴佩孚试图请美国保驾。8月30日，派人到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乞求美国海军在他同北伐军作战时派舰助阵，并在吴军舰艇陷入困境时给予军事援助。美国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 Lockhart）断然拒绝，宣称美国海军当局只关心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152]。10月5日，吴佩孚密使拜访英国公使麻克类，“近乎乞讨般地哀求给予财政援助”，结果同样遭到拒绝[153]。

各国侵华海军所奉训令几乎都是“尽一切可能保护本国生命财产”。9月间，武汉地区战事吃紧。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向这里增调军舰，派兵登陆，同外国侨民组成的义勇队一道保卫租界。这时，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北军溃兵惯有的劫掠。当北军被歼，国民革命军控制局势后，它们便将登陆水兵撤回舰上[154]。

作为软化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的一个步骤，上海领事团于9月下旬公布了同江苏当局达成的归还上海会审公廨的协定，9月下旬公布，次年1月1日生效。中国方面收回了一部分上海公共租界法权。

当国民政府决定自行对进出口货征收产销税后，自10月7日起，列强驻北京外交代表数次开会讨论。美国驻华公使和参赞都主张纠集列强，共同采取海军行动，强行制止国民政府破坏“条约义务”的举动。但美国政府没有同意，仅令他们通过外交途径抗议此税“违约”，然后听任事态自然发展[155]。日本一直坚持以偿还西原借款等无担保债务为中国征收二五附加税的必要条件，因而强烈反对广州政府自行变相征收这笔税款，力主列强一致抗议。但它也不愿为此使用武力，而采取了劝其国民在抗议后纳税的方针[156]。

英国连抗议也不愿提，因为对它来说，“高于一切的考虑是结束排货”。既然产销税税率相当于华盛顿条约附加税，那就同英国关于立即准许中国各地当局征收二五附税的主张没有矛盾。以对一切外国货物征收不算苛重的附税，换取停止排斥英货和恢复省港贸易，这是英国可以接受的代价。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只反对而又不准备使用武力，广州政府可能另立征税机构，导致英人把持的海关瘫痪；更有甚者，“国民党人业已出现的可喜变化”可能停止下来，“向更友好关系发展的整个趋势可能发生严重倒退。”[157]因此，英国力主有条件地默认，并希望由海关征收。美、日等国坚决反对默认产销税，海关也拒绝征收。英国为了“协调一致”，于10月末训令麻克类，可以参加联合抗议，但须同时单独发表声明，全面澄清英国的真正立场。但麻克类只参加了11月间的联合抗议，没有另作声明[158]。英国政府只得另

找机会阐明其政策。

11月5日，驻广州“领袖领事”致函陈友仁，声称奉驻北京的“领袖公使”之命，抗议广东政府对国外贸易征收产销税，“完全违反条约”[159]。11月8日，陈友仁退回抗议原函，声明：“领袖公使之存在，本部长以其欠缺法律上之根据，未便承认。”他进一步声明，现在中国国家大权与权威，早已不能在北京行使，而已由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及建设势力移交给国民政府执掌，各国倘能明了此中关系，国民政府即愿马上与之讨论[160]。从此，国民政府不再接受所谓领袖公使、领袖领事的外交文件。

11月下旬，列强得到消息：汉口海关的中国职工酝酿罢工，国民政府准备将广东的产销税施之于汉口。这次，英、美决定不顾日本反对，不再提出抗议，而力图说服海关征收此税。它们拒绝用武力保护海关免遭罢工纠察队的封锁，试图将广州的经验运用于汉口，诱使国民政府压制罢工。张伯伦训示：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挽救海关，但这只能靠正确的政策，而不是使用武力。所谓正确的政策，就是“尽一切努力用在广州成功地运用过的办法挫败罢工。”[161]

正当列强苦心探寻破坏国民革命的良策之际，被它们看作是国民政府中的“实权派”、“独裁者”的蒋介石公开向列强输诚了。8月20日，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认列强为友邦。宣称：“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162] 24日，蒋介石向外国记者表露，自己是国民党员，不是布尔什维克。他身边曾有俄国顾问15人，因为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但是一到武昌，他就立即把他们清除出去[163]。9月10日，他又通过湖南交涉员向英国长沙代理领事琼斯（G．Jones）透露：“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同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天性本不相容。”[164]

蒋介石的表态，使列强意识到革命营垒内部裂痕正在扩大。于是，它们各显神通，进一步前来探测国民政府的底蕴，施展各种分化

手段。

1926年9月下旬，美国公使马慕瑞到达广州，进行“非正式访问”，成为国民政府在此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公使。他同陈友仁、宋子文等国府要人“连日酬酢极欢”[165]。陈友仁向他说明：国民政府认为，欲摆脱帝国主义之羁轭，初不须与列强从事武力战争，深望以谈判及协议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的一切问题[166]。陈友仁还表示，恢复中国主权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国民政府无意单方面废除条约[167]。在此前后，曾发生多起北伐军和民众进占美国教堂、医院、学校的事件，国民政府一接到美国抗议，便力促军队、民众退还。8月26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保护美国教会、医院的三条措施，当即得到通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再将这一精神通知各地执行。马慕瑞通过亲自接触，看出国民党人真心实意地想采取同列强和解的政策，同时又很机警地试探能使列强作多大让步。广州政府把宣传反帝作为鼓动民众政治热情和取得民众支持的有效手段，但政府要员在同他私下谈话时却很“通情达理”。马慕瑞一行还发现“广州派有信心有能力在自己所希望的时候摆脱俄国监护人”[168]。回到北京后，马慕瑞于11月19日以长电致国务卿，报告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在于：“更稳健、更富于建设性的分子们”打算走日本、泰国式的资本主义改良道路，这正是美国所要鼓励的。然而很不幸，由于“苏维埃破坏性影响”，“召集了很大一群拥护第三国际政策的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必须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马慕瑞称：中国目前正处于“渐进”与“革命”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学说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论为中国还是为自己，都有责任作些措辞友好的警告”[169]。

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阵营采取反复考察、逐步接近、软硬兼施、伺机分化的政策。11月下旬，美国再度拒绝北洋内阁重开关税会议的要求。国务卿凯洛格告诉马慕瑞，如果广州当局控制了中国大部地区，美国将考虑与之订立条约，在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下放弃关税控制权[170]。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美国再次派遣麦耶前去探访

[171]。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当局频频直接同国民政府联系，要求它保护所辖地区的美国利益[172]。11月间，长沙当局向美国领事保证：只要军事行动一结束，政府就将镇压工人和学生组织的“反外非法活动”[173]。

在拉拢、软化国民政府的同时，美国外交当局还密切注视着蒋介石的动向及其权势的增长。8月间，他们发现蒋介石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蒋将军的总司令部发布通告，军事非常时期一切军事民政机关均须服从总司令命令。政治会议（最高行政机构）随即通知总司令，虽然一切军政要务确实由总司令部执行，但该机构之命令须经政治会议批准。”[174]注意到这种矛盾之后，美国当局一面同国民政府拉关系，一面又常与蒋介石办外交[175]。即使在10月底，接到国民党中央关于集中外交职权于政府外长之手，政府不受蒋介石等将领私订的外交协议约束的通知后，美国依然找蒋办理交涉，蓄意分化革命[176]。11月下旬，为了深入了解这位独裁者的身世，美国当局甚至派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收藏的蒋介石犯罪记录[177]。

日本政府认为，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形势大致对标榜政治革新的南方派有利”，尤可注意的是：“南军在其势力增长的同时，态度逐渐缓和。”外务省决定同南方“要人”广泛接触，探寻对策[178]。11月4日，孙传芳托驻日公使汪荣宝向币原外相求援。币原婉言相拒，称日本为将来在华永久利益计，绝对避免支持一党一派，“对蒋介石，日本也无敌视之理由”[179]。

岂止“不敌视”。日本当局已试图推动他镇压工人运动。11月间，不堪忍受日本雇主压迫的汉口劳动群众举行同盟罢工，日本驻九江领事奉命急请蒋介石“尽量设法，严命负责官宪紧急取缔罢工”。蒋介石这时还不敢公然站到帝国主义一边反对民众运动，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180]。

北伐军步步前进，上海日本资本家感到“经济地位有根本颠覆之虞”，劝告日本政府“讲究对国民党左、右派的适当方法，并确定将来的方针”[181]。

11月间，币原外相派其心腹佐分利贞男南下，同国民党各派要人接触。12月中旬，佐分利赶到武汉，同陈友仁会谈。他发现，国民党人的公开讲话同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一致，他们实际上希望以“充分合理的方式”修订不平等条约，而不是全面废约[182]。经黄郛牵线，他在南昌会见了蒋介石，感到蒋是国民党中“最好打交道的人”[183]。这位特使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颇有收获。他认为：“南北之间，并无绝对歧异之点”，而国民党“党内两派之轧轹，不但意见相左，实利也不一致，今后裂痕恐不免益显”。他还认为，在中华民族已经觉醒的情况下，列强为了软化和分化革命，必须以某种“公道合作”的姿态，调整不平等条约关系[184]。经过一番紧张活动，佐分利同国民政府达成了若干秘密谅解。其主要内容有：日本在华严守绝对中立；国民政府支配大部分地区或在北京设立政府时，日本予以承认；只要不危害日本在满洲和远东的地位，日本就不干涉俄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国民政府不危害长江流域日本工商业，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既得权益[185]。

英国政府不甘落于美、日之后，积极谋划进一步软化国民革命的措施。麻克类公使坚决反对伦敦对华政策设计者们的两个假定，即国民党终将统治中国并摆脱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不断要求支援这个或那个军阀以抵抗北伐。伦敦的“中国通”感叹道：“使馆在中国骑错了马”，此时“他们根本无权骑马”[186]。由于麻克类固执己见并一再抗命，外交部决定更换驻华公使。

这一时期，尽管蒋介石已通过不同渠道向列强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是，白利安更倾向于认为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是个人野心家。这一看法得到驻沪总领事巴顿的赞同。避居上海租界的伍朝枢向英官员诉说：蒋介石是一个独断专行，容易冲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人，具有强烈的排外倾向[187]。因此，英国当局对蒋介石集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把交涉与分化的重心放到北迁武汉的国民政府方面。

10月13日，英国驻武汉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托人向兼任国民政府湖北交涉员的陈公博表示，对革命军怀有好感，希望停止反英宣传，并问有何提议，愿为尽力。陈公博迅即回答，希望英国新公使能与陈友仁外长会谈，考虑对国民政府的承认与修约问题。葛福一面表示同情，一面强调以工人运动相威胁很不明智，并立即将国民政府的上述意向飞报伦敦[188]。英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次日便奉命在中国协会年宴上声明，英政府对中国人民抱深切同情，认为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由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治理国家，英国对目前中国时局严守中立，但有责任保卫在华权益[189]。

11月上旬，当陈友仁退回列强对产销税的联合抗议，表示不承认所谓“领袖公使”制度时，英国代表力阻外交团对此再行反驳。11月19日，张伯伦授权驻汉口总领事，在国民政府提出承认要求时可表示：“一旦国民党建立充分名实相副的政府，并对前政府的一切条约和其他义务负全责时，英国政府准备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190]为了制造缓和空气，张伯伦于11月间一再训令英国驻国民政府辖区的官员，“尽量以同情友好的精神同中国各地现有的国民党事实政权打交道”[191]。这时，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应奉军当局要求，逮捕了14名国民党人，经英公使批准引渡给奉方。英外交部电示英使馆：逮捕为非法的，不能事后追认其合法，无权拘押这些人或将他们引渡[192]。但是这纸训令为时已晚，未起作用。

陈友仁11月中旬离粤北上前曾告知英国外交代表：国民政府希望被承认为中国政府，愿同英国订立新的商务协定和取代治外法权的司法协定[193]。英国新公使蓝普森来到中国后，鉴于迅速变动中的形势，决定在去北京赴任之前，先往汉口面晤国民政府领导人，试探有无可能“达成友好谅解”[194]。英方旋于12月5日通知临时主持国民党

中央和政府工作的谭延闿[195]。自12月9日至20日，蓝普森与陈友仁进行了7次非正式会谈，中心议题是外交承认和不平等条约问题[196]。

英国虽然将国民政府当作“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无意承认它是区域性的或全国统一的政府。英国认为，前一种承认，将要承担分裂中国的责任，并将得罪存在于中国的其他政权；后一种承认，则“不被实际情况证明为合理”，因为国民党政权尚未在全国或中国大部分地区建立持久而有效的统治。另外，英国担心国民政府会拒绝继承旧政府的条约义务。在就条约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无论哪一种承认，都可能意味着英国放弃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原条约权利。因此，尽管陈友仁一再让步，甚至答应取消反英运动，仍未能使英方有所承诺[197]。

关于条约问题，蓝普森主张只“修订”旧条约的某些条款[198]，英国政府则考虑作较大让步。12月15日，张伯伦电告蓝普森：英政府原则上“对陈氏取消旧条约，谈判一个全新条约的方案没有异议，只要将旧条约的效力保持到新条约谈成为止”[199]。可惜陈友仁未再坚持原案，而希望以“更改”（Alteration of）旧条约来求得妥协。经验丰富的蓝普森仍未让步。在离汉赴京前，他向陈友仁表示，将再度亲来或派首席参赞欧马利来继续协商。他并赠言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英国政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甲、国民政府在汉口和其他已控制或将控制地区内获得成功的程度；乙、它们对反英煽动所能够控制的程度。”[200]

在蓝陈会谈的同时，欧马利于12月18日在北京外交团会议上宣读了《英国对华政策声明》，吁请各国对强有力的国民运动予以“同情”和“谅解”。《声明》称：“一俟中国人自行组成有权之政府时，即与之谈判修订条约及其他悬案”；此前也应顺应形势变化，尽可能迎合中国人民的正当愿望；“一俟中国自行制订并颁布新的国家税则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当前宜“放弃为枝节问题一味提出无效抗

议的方针，而将抗议保留至重要权益濒于危险之时，以共同行动使其生效”。《声明》还提出，立即无条件允准中国各地华盛顿会议许诺的附加税，税款由各地中国当局自行支配[201]。英国这时抢先发表这样的声明，主要是想进一步软化、分化国民革命，助长“温和派”力量，造成英国是列强对华“宽大”政策带头人的形象，借以摆脱在中国革命洪流中首当其冲的困境[202]。但是，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多数口岸仍在军阀控制之下，因此，英国提议立即准征二五附加税，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203]。

英国继续探寻分化革命阵营的途径。蓝普森看出：国民政府一面企图利用工人运动逼迫英国让步，一面又担心局势失控，希望同英国早日和解；也看出武汉资产阶级存在着不满情绪。12月下旬，蓝普森建议英国政府迎合国民政府的愿望，继续谈判，因为这至少可以促使国民政府抑制民众的反英运动。他准备亲自或派欧马利、台克满赴汉口，讨论陈友仁最后一次提出的承认国民政府方案，条件是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只有经过谈判才能改订现行条约，谈判期内制止反英宣传。如能达成某种协议，将会增强温和派反对极端派的力量[204]。蓝普森催促英政府快作决定，改变政策总是落后于事变的被动局面。他警告说：“我们正面临南方全面废约的现实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迫使我们作出选择的局势，要么用武装行动保卫重要权益，要么放弃它们而向广东派完全投降。”[205] 葛福这时也称汉口形势危急，温和派“希望继续与我们合作”，而极端派“倾向于采取排货、罢工等无情的政策”。“我们如果想使温和派分子得势，就必须迅速行动”[206]。

他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政府还未来得及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迈出，中国人民便已行动起来，向英国侵华权益发起了英勇冲击。

第五节　汉浔英租界事件与列强的两手政策

一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与英国的对策

1926年末，北伐战争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华中地区的人民反帝斗争迅速高涨。英、美、法、日等国纷纷在汉口、九江等地租界置沙包、布电网、设路障、架机枪，不时派兵登岸，企图以武力威慑，遏制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维护租界和其他特权。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民众连续欢庆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汉，集会游行，盛况空前。3日中午，有宣传员数人在汉口江汉关前临近英租界的空地上讲演，听众极多，肩背相接，但秩序井然。英租界工部局深恐民众进入租界，马上动员巡捕和侨民义勇队荷枪持械，沿街布防。又于12时30分急请驻汉口的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J．S．Cameron）派兵支援。卡梅伦陆续将英水兵和陆战队全部调派上岸，试图驱逐中国民众。积愤已久的民众奋起抗争，被英兵刺伤数人，内二人重伤，被称为“一·三”惨案。当时民众越聚越多，毫不畏缩，以砖石抗暴。卡梅伦见事态严重，下令英兵除救命所需外不得开火。英总领事葛福三次打电话请求中国当局速派军警前来“平息骚乱”，“驱逐暴民”。

事件发生时，武汉联席会议正好开会，陈友仁认为如果要求双方同时撤退，未免示弱，应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徐谦主张以军队包围租界，先使群众散退。鲍罗廷则力主先劝群众散去。会议最后按鲍罗廷提出的办法议决：一、立即推定徐谦、蒋作宾去向群众说明：政府将在24小时内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并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二、外交部立即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撤退武装水兵，保障秩序安全；并对英方切实声明，如不撤退水兵，政府不负保障英人安全责任[(207)]。下午5时，国民政府派来大批军警试图维持秩序。公安局长要求英方先将水兵、义勇队等撤到路障后面去，然后又劝民众后退。在此过程

中，愤怒的民众动手拆除了租界边缘的路障工事，后在国民政府代表和军警的劝阻下，未入租界而散。当晚，陈友仁召见葛福，告以英人若不检束，则民众将使英租界成为无价值之物，并要求从速撤退水兵。

1月4日上午，葛福和卡梅伦分别同陈友仁和汉口市公安局长会晤。中方保证：如果英兵完全撤走，国民政府可保租界安全。双方达成协议，英方撤兵上舰，中方负责维护租界临江地区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当日中午，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在汉口总商会议定8项对英办法，如要求英界巡捕缴械，由政府管理英租界等。旋又派代表要求武汉政府据以向英领交涉，限于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即请武汉政府封锁并收回英租界，收回关税，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208)]。中国共产党赞同各团体联席会议所提条件，主张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合作，绝对制止对外国人个人的暴行以及侵害外国人住宅、商店，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209)]。下午，英兵撤离后，愤怒的民众自发涌入租界，拆毁沿街路障。租界巡捕自动放弃职守。傍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全部接受各界代表要求，并应英方之请，加派军警开入租界，维持秩序。国民政府代表随即向人民团体代表宣布了上述决定，希望民众整齐步骤，共争最后胜利，民众遂逐渐散去[(210)]。

5日，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对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指挥。大会一致议决，自即日起严厉禁止买卖英国货。又强调："民众应一致团结，服从政府，谨守秩序，誓为政府后盾。"[(211)]会后游行时，虽然李立三宣布不进租界，但群众再次冲入[(212)]。英工部局巡捕及公务人员逃避一空，租界顿呈混乱状态，英方只得将治安管理事宜交国民政府负责[(213)]。联席会议遂决定设立以陈友仁为首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的行政治安。当日下午4时，天降大雨，民众散去。英方忙将妇女、儿童撤上兵轮，男侨集中于亚细亚火油公司。事后，国民政府努力恢复秩序，安定人心，但英侨和其他外侨已

如惊弓之鸟，纷纷关闭在汉口的银行、工厂、商店，抽走资金，准备离汉[214]。

紧接着，九江人民也占领当地英租界。

1月3日下午，英人控制的九江海关扣押中国小船，引起民众愤慨。民众冲开与海关相连的英租界铁丝网，虽因英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中国军警阻止而散，但九江的气氛由此紧张起来。汉口英租界事件的消息传来后，英人更加不安，5日，将妇孺撤上英轮。6日下午，英海关人员打伤阻止英人雇工搬运行李上舰的罢工纠察，民众再度冲开英租界铁丝网。江中英舰发两响空炮示警，留在租界的侨民极为恐慌，纷纷逃上英轮。中国民众闻炮更加愤怒，群起涌入英租界。英水兵和中国军警、工人纠察队协力阻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经过九江，应英国领事请求，出面到堤岸上劝解民众，并命驻守九江的贺耀组部派兵“平息骚动”。宋向英方许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汉口的“暴乱”不重演于九江。次日，租界发生抢劫，大部分系贺部乱兵所为。英领事和水兵撤上军舰，请贺耀组负责看管租界财产[215]。国民政府随后派人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予以接管。

英国当局一反常态，未放一枪就撤离两地租界，原因很多，武汉、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下，在国民革命胜利形势鼓舞下，民族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敢于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进行如此英勇顽强的反抗，这是一贯骄横的英帝国主义者始料不及的。前一阶段，英国方面在软化革命的政策支配下，从伦敦主管部门到现地文武官员，对汉、浔人民反帝风暴的骤然降临，缺乏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对扩大武装干涉的后果，也顾虑重重。

早在1926年11月下旬，英外务大臣张伯伦即不赞成增调英军赴华，认为这可能被看成是对国民党明显的不友好举动。他还认为，租界遭公开进攻的危险性很小，至多有些反英宣传和工潮[216]。11月

29日，汉口人民示威时，英水兵在租界登陆布防，结果激起武汉地区反帝运动更猛烈的发展。张伯伦连电嘱咐驻华官员，宁肯暂时中断英国在汉口的贸易，也不要武装干涉反帝运动，“煽动集团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造成英中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任何进一步武装冲突的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217]。这时，恰逢长江枯水季节，大型军舰不能开到汉口。尽管蓝普森、葛福等人曾请求增兵加舰，以防不测，但在上述指导思想和客观条件限制下，直至汉、浔事件发生，英国在汉口仅泊有三艘小型军舰，可用于登陆的士兵一百余人，侨民义勇队不足二百人。在九江则只有小舰两艘，可登陆的水兵五十余人[218]。

这一时期，英国有关使用武力原则的训令，也是尽量避免同革命力量尤其是国民党军发生大的武装冲突，留有必要时撤离租界的余地。12月6日，英外务次官蒂雷尔（E．G．Tyrrell）电示即将访问汉口的蓝普森：“英政府和其他列强准备支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唯一目标是保护英人和外人生命，保卫外国租界和居留地不受攻击。”[219] 然而五天后海军部却重申其常效训令是：“对英国国民生命财产的保护，应限于有预先估计采取撤离措施的必要时，向他们提供在轮船上避难的地方，用舢板将他们从岸边救出。只有当他们实际上处于不能用其他办法控制的暴力危害之中时，才诉诸武力干预。”[220] 张伯伦也再三强调，只能把武力用作保护外国人生命的最后手段，而避开了财产和租界问题[221]。蓝普森访问汉口时，曾指示葛福和卡梅伦：如果广东政府军有组织地进攻租界，我方唯一的办法是撤离；如果是“暴民”冲租界，则应毫不犹豫地派兵登陆，坚决对付，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222]。

在汉浔英租界事件中，英国现地文武官员都判断中方有预谋、有组织，“极端派”希望激英兵开火。他们认为：兵力单薄的英军如果开枪，势必激化矛盾，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和军队会从四面八方冲入租界，英人将遭到可怕的屠杀，租界外和长江中上游各地的英侨也将受

害。在取得国民政府官员关于只要英兵撤走，便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的承诺后，英官员认为不放一枪撤离租界，是避免更大灾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英外交部、驻华海军总司令和蓝普森先后肯定了他们的处置[223]。

当然，英国当局决不会善罢甘休，它要另寻应付危机的良策。蓝普森提议，只要不引起国民政府军参战，就应立即派出足够的兵力夺回租界。1月6日，伦敦训令蓝普森："租界的撤退已经确定地改变了局势，在没有对整个态势作进一步认真考虑之前，不应采取强硬行动。"[224]

英政府也考虑过以武装夺回租界，结果认为，在长江枯水季节，无法调集重型军舰和足够的兵力到汉口作战；即使能够夺回，也没有力量长期坚守；即使能够长期坚守；也不能挽救因中国民众的封锁、排货而造成的贸易瘫痪。英国在华经济活动毕竟不能只在租界警戒圈里进行，更何况英国在租界之外的投资贸易额早已远远超过租界，汉口英国的主要公司也大都设在租界之外，英军无论如何无法对之加以有效的保护。总之，英国决策者认识到，此时武力解决不了经济困难，只能促使中国人民更加"过激"[225]。

另一方面，英政府认为更值得一试的是，保持同国民政府的接触，通过谈判，继续软化革命，拉拢"温和派"。它企图以在租界行政管理权上的让步，来迎合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合法愿望"，诱使国民政府明确保证，今后不经过谈判协议手续，不以任何方式变更租界地位和其他不平等条约特权。同时，它还企图以汉口为试验场所，检验国民政府有无"能力与诚意"制止民众运动，兑现维护秩序的诺言，最终摆脱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影响[226]。

1月6日，英国外交部专家按照制订《英国对华政策声明》时的设想，拟出了修订英中条约的方案。该方案建议通知中国南北政府：英国方面将立即采取步骤，调整在华治外法权和租界治安权问题，其中

将通过地方协定，把九江、镇江、厦门英租界的治安权完全交出，天津、汉口、广州英租界的治安权则在一定条件下交出[227]。

同日，英驻华使馆头等参赞欧马利和汉文秘书台克满离京赴汉口谈判。蓝普森命他们通知陈友仁："在任何政治性会谈前，必须把租界的完全控制权归还英国。"但英国外交部同日发给蓝普森的训令，却表示不妨同陈友仁讨论包括租界地位在内的调整条约关系问题[228]。1月8日，张伯伦进一步训令欧马利同国民政府谈判放弃汉口、九江英租界事宜[229]。外交部专家还拟定了方案，认为租界已成过时之物，由中国人接管其行政和治安责任，对所有人都更好，但上海公共租界例外[230]。

汉浔英租界谈判就是在这一情形之下进行的[231]。

二　列强的两手

英国被迫放弃了汉口、九江的租界，但是，却决心保卫它在上海的利益。当时，上海居住着3万外国侨民，公共租界的外国资产总值近2亿英镑，其中英国资产为六千三百余万镑，约占英国在华资产总额（除香港外）的三分之一。如果英国从上海撤退，不仅既得利益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其东方殖民体系将产生灾难性的连锁反应[232]。英国政府宣称，各国应从汉浔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果中国当局不能或不愿控制暴民，暴民一旦失控，国民党军队就会和他们一道行动"，"在其他租界也如法炮制"。英国政府鼓动列强以行动表明：现地外国军队兵力不仅足以"控制暴民"，而且足以对付汉口那样"以武装部队作后盾的暴民"[233]。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英国的鼓动自然易于获得响应。

还在北伐军主力向长江下游进军，上海工人阶级起义响应之时，列强便加紧筹划上海租界防卫问题。1926年12月8日，在有领事团和英、日、美、法、意五强驻华海军最高长官参加的会议上，上海公共

租界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提出，一旦北伐军到达，各国必须协力环绕租界设立防线，为此须调来4000名援兵[234]。美国总领事和海军长官持不同意见，认为此时耀武扬威地向上海调集大量外军，并非明智之举。国务卿凯洛格也不赞成同北伐军发生冲突，特意下令："本政府不准备使用驻沪海军保卫租界完整"；又称："本政府行动目的是保护上海美侨生命财产。"[235]英国决定提供1300名海陆军部队，增调3艘巡洋舰，但陆军及巡洋舰暂留香港待命。张伯伦担心陆军赴沪将引起中国"广泛而严重的反应"。他指示驻华使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可能建立永久性政权，但外国贸易却不可能长久地在外军警戒圈内进行，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同上海未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融洽的关系[236]。日本外交当局密切注视着"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并接待了国民党"温和派"派到东京的密使，听其解释国民党的政策，决定暂不出兵上海[237]。

汉浔英租界事件后，列强深恐自己在上海的巨大利益遭到同样的命运，英、日、美、法驻沪总领事立即达成协议，共同调集四五千兵力保护上海租界，其中日兵1500名、美兵1400名，英兵1300名，法兵250—500名[238]。不过，他们在登陆时机和保护范围等问题上有分歧。英国支持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请求，立即派兵登岸，并越出租界设置防线。美国总领事认为不到"骚乱"迫在眉睫，不宜令外兵上岸，否则，"将被这里的鼓动家抓住把柄，作为煽动更大的反帝舆论的口实，演成星火燎原之势"。美政府也再三重申前令，不肯对租界防线和其他外侨的安全承担明确责任。日本同意与英国分守租界防线，但认为派兵登陆为时尚早[239]。法国拟调两连越南兵驰援上海，防守法租界，但暂不登岸，也不准备抵御来自"暴民"之外的军事进攻[240]。

尽管有以上分歧，美日仍按协议调兵赴沪。1927年1月7日，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C．S．Williams）上将奉命从马尼拉赶赴上海，并陆续将所属舰艇调入中国水域。至2月末，美国到沪水兵达

850名，陆战队300名。另有1500名陆战队正从关岛等地开赴上海，3艘巡洋舰和500名陆战队在檀香山待命，1540名陆战队在菲律宾待命。美国摆出这种引弓待发的架势，用马慕瑞的话说，是为了“使国民党领导人确信，外国列强的忍耐已达极限”。他坚信，“唯一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办法，是公开作好使用武力的一切准备”[241]。为使这种威慑政策发生效力，麦耶于1月20日通过秘密渠道，再次怂恿蒋介石等：“我们要的是行动，不是辞令。国民党人在我们眼中恢复名誉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具体行动，证明他们愿意并能够在其控制区内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242]

日本除原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和300名陆战队外，又在佐世保、横须贺等地准备了十几艘军舰和1200名陆战队，陆续开往上海，同时在中国东北、华北、台湾及朝鲜等地集结重兵待命。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汉口帝国租界的文件》，决定不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压力下放弃汉口租界[243]。文件要求当地日本总领事就治安问题同中国有关当局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并且要让国民政府领导人了解：“万一中国官方和民众，依照收回英租界的经验，采取轻视日本租界、危害租界宁静的盲动”，日方决心“采取断然处置”。文件还制定了汉口发生“群众运动”时，防卫租界和疏散侨民的若干具体对策，例如以领事馆警察和陆战队专任保护侨民，命上游各地领事立即撤侨，在上海增加相当兵力等。阁议通过前，币原即迫不及待地将这一文件的精神，通知了驻沪总领事高尾亨，随后又通知他：汉口等地若有紧急事态，可从上海调兵[244]。这就为日后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口“四三”惨案埋下了伏笔。

英政府却认为原计划已经过时，防卫上海租界将不仅针对“暴民”和北军溃兵的骚扰，完全可能要抵御国民政府正规军的进攻，因此只派海军陆战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增调大批陆军，才能防止汉浔事件重演于上海。英国军事当局重新研究了新形势下的上海公共租界防卫计划，认为至少需要一个师的兵力，才能遏制国民党军可能对租

界发动的进攻，但这个师最好是以日本为首的国际部队，英军只占三分之一[245]。

英国政府虽然考虑到大举出兵可能引起的诸种不利后果，如中国举国一致的反对，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等，但为利益所驱使，权衡之后，仍决计出兵。对不利后果，则另图补救。1月17日，英国内阁批准调一个陆军师赴上海。由于说服日、美参加的希望不大，英国决心独力承担上海防卫，从印度、地中海和本土各派一个旅，加上辅助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共约1．6万人[246]。此举构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海外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月下旬，英国外交部继续努力，争取列强合作。日本首先拒绝了派一个旅团赴沪的请求，也不肯保证在万一发生紧急事件而英远征军尚未到达上海的情况下，先派足够的兵力保卫公共租界[247]。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发表演说，声称英美对华政策有所不同，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没有自己的租界，保护美侨不须调遣大批军队[248]。然而，日、美两国并未停止增派海军部队来华。

日、美政府拒绝追随英国向上海调派陆军大部队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各国在华利益不完全一致，英国一贯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日则一直企图削弱这个竞争对手的地位，因而此时除以必要兵力维护自身利益外，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249]。第二，各国国情不同，美国国会和舆论此时仍保持孤立主义传统，强烈反对在海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是制约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日本占有地利，其陆军随时可从本国、朝鲜和我国东北、华北、台湾等地开到上海，不必像英国那样提前兴师动众[250]。第三，美、日政府得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关于不以武力收回租界、负责保护外侨的保证后，权衡各自在华利益，认为派海军部队便足以遏制“暴民骚乱”。若再以国民党军为假想敌，派遣大批陆军赴沪，不仅可能导致同国民党人不必要的对抗，而且势必激起中国人民更汹涌的反帝怒潮，使自己在上海以外地区的利益遭受更大损失[251]。第四，美、日皆已洞悉

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正在激化，将“维持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温和派”身上，因而尽量避免采取使他们难于得势和妥协的行动[252]。

英国还请法国提供必要兵力，保卫上海法租界，并同上海英军合作，保卫共同利益。法国答以将在“中立”、“不干涉”原则下，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法国利益，当危险来临时，将与英国及列强合作，但现在尚不必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也不打算脱离列强，单独追随英国行动[253]。

列强虽然在出兵种类与数量、登陆时机、保护对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武装保卫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尽管美军总司令威廉士宣称：仅奉命保护美侨，不负责保卫租界完整和抵抗国民党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进攻，但当2月下旬，国民党军逼近上海，工人阶级准备再次起义时，美军仍与英、日分工合作，在租界内负责镇压“骚乱”，使英、日部队得以集中兵力守卫租界防线[254]。

帝国主义列强一面挥舞大棒，一面又频频摇动橄榄枝。1月17日，英政府内阁会议在批准派遣大军去上海的同时，决定“向国民党人作出宽大让步”，以补救因出兵而带来的不利后果[255]。

1月27日、28日，英国政府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出备忘录，表示准备作单方面的让步，对治外法权、租税、租界管理、教士购地等条约权利，进行七点具体修改[256]。一二月间，张伯伦和首相包尔温（S．Baldwin）等头面人物也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称出兵上海只是为了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和英国利益，此外没有其他目的。而且这也只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英国不改变“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放弃同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妥协的努力。张伯伦甚至扬言：准备帮助陈友仁先生和其他任何表示有意以政治家和解方式处理问题的中国当局[257]。

英国政府坚持实行“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仅是为了缓和国内、国外舆论对它大举出兵的强烈抨击，也不仅是为了平息中国各界的反英声浪，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贯彻其分化革命阵线，拉拢国民党温和派的战略意图。

英国政府此时已经获悉，去年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从而表明了对蒋介石的不满[258]。但国民党中央在北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却下令压制工会和纠察队的活动[259]。1926年末至1927年初，国民党温和派人物及其同情者不断向英方密报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260]。英国驻华官员之间也广泛讨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问题。意见虽有不同，但主要倾向是，认为国民党的性质不同于共产党，它有自己的主义和社会基础，出于一定的目的而利用苏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未来的统治者，虽然不能断定这一天到来时是右派还是左派掌权，但这两派间存在着斗争和分裂的可能性。一些对国民党了解较深的官员力主同国民党和解并给予适当鼓励，至少应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右派，以此削弱共产党人的影响。同时应将武力作为不许其损害英人生命财产的最后武器[261]。

英国政府这时也关注蒋介石的动向，但情报不够灵通。2月上旬，外交部获悉蒋介石两个多月前发表的将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讲话，判断蒋“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的控制”[262]。同月中旬，驻华公使在呈送外交部的《中国名人录》中，认为蒋“内心里不是共产主义者”[263]。3月4日，伦敦得到来自上海的机密情报：“蒋介石的公开演讲使他颇像一个极端共产派”，“但可以料想，他不得不说一些鲍罗廷及苏俄同伴硬塞给他的词句”。情报称蒋介石对汉口的局势厌恶极了，尤其憎恨工会“无法无天”的活动[264]。五天后，蓝普森进一步报告：蒋介石“现已显示出国民党温和派领袖的本色。看来他和他的朋友们终于走到挫败极端派及其俄国顾问的转折点”。蓝普森认为这是英国长期坚持分化政策产生的果实，

所以应“尽我们的力量增强这些温和分子”[265]。但是，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基于过去从白利安和伍朝枢等处得到的情报，仍然不很信任蒋介石，继续将国民党武汉集团作为分化的重点[266]。汉浔租界协定签字后，台克满继续以英国公使代表的身份留驻武汉，以示对国民政府的重视[267]。

3月中旬，蒋介石集团进占上海前夕，曾派伍朝枢同英国领事馆秘密谈判，英官员旋即劝告上海报界，小心避免对蒋介石有任何批评[268]。同月20日前后，诺曼（Robert Norman）、柯亨等人也受蒋介石集团派遣，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介绍蒋介石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详情，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介石某种支持的保证”，可是这份重要情报4月30日才到达唐宁街[269]。美国则在继续分化武汉政府的同时，积极和蒋介石集团发展关系。

英国提出《对华政策声明》后，美国不甘落后，也打算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愿在关税和法权等问题上让步，并准备在重开关税会议之前，便允许中国各地立即征收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附加税[270]。武汉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得到消息后，于12月29日紧急约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暂缓发表这项声明，武汉政府将于48小时内电告华盛顿一份重要宣言，坚决反对目前实行华约附税，因这等于向北洋军阀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军费[271]。美国政府显然考虑了国民政府的要求，从声明稿中删去了有关文句。汉浔事件后，凯洛格国务卿赶紧于1月27日抛出这项对华政策声明，并特意补充了两点重要内容：美国准备单独与中国各方协议任命的共同代表谈判修约；美国海军驻华系履行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的基本义务[272]。

1月23日，美国驻福州领事普赖斯（Ernest B. Price）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主要干将何应钦，探听虚实。何应钦为福州刚发生的反帝事件“由衷道歉”，透露已处决了一批肇事者，撤换了一批共产派官员。普赖斯乘机以撤侨相要挟，怂恿何“通过赔偿过去，保障现在的具体行动，毫不含糊地表明国民党当局对美国人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

的态度”[273]。

为免遭汉浔英租界同样的厄运，美国还力图实现上海租界“中立”方案。凯洛格原拟分别照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陈友仁，请他们保证上海租界及附近地带为非军事区。恰在此时，传来消息：蒋介石已向美国驻沪领事馆建议，各方皆不派兵开入上海，以防发生中国内地美侨和传教士正面临的那些危险[274]。这正好符合美国的心意。原来，王正廷事先征得蒋的意见，于1月26日与美国驻沪代总领事高斯秘密会谈。双方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报。王正廷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可以不进驻上海地区，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在设法收买守卫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将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王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人和学生。”[275]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向美国交了底。美国政府下令，将要求支持上海租界中立的正式照会改交蒋介石和张作霖二人，以示器重，而只将抄本送陈友仁等[276]。

2月6日，罗赫德向蒋介石委派的武汉行营参谋长朱绍良递交了这份照会，朱当场保证立即电告蒋介石[277]。不难看出，在提高党权运动高涨之际，美国当局这种违反外交常规的行动，从精神上、政治上鼓励并支持了蒋介石。

陈友仁接到照会抄本后，严厉谴责美国当局直接同蒋介石联系的做法“极不正当”，是故意分裂国民政府外交，助长军事独裁[278]。国民政府拒绝支持上海租界中立，命令蒋介石制止王正廷的非法活动[279]。蒋借故推诿，拒不执行[280]。朱绍良经国民政府追查，不得不将美国照会呈送外交部，但旋于2月7日暗赴南昌，向蒋汇报[281]。鉴于国民政府已公开驳回美国的建议，蒋介石暂不便表态，但他的嫡系部队一开入上海，就宣布要严惩扰乱租界的“不法之徒”，终于履行了先前的诺言。

蒋介石出于反共的政治需要，也急于同美国政府建立联系。2月15日，蒋介石的亲信柯亨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向詹金斯诉说，蒋介石同鲍罗廷已严重不和，造成两人间“几乎是永久性的破裂”，“列强若想将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现在就应与蒋将军建立明确的联系”。柯亨强调“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列强肯承担俄国人正在做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制止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282]。3月初，蒋介石的美国朋友诺曼又向美国官方表示了同样的意向：“除非美国和其他列强能以某种方式重新确立国民党内温和分子的自信心，俄国在华势力将强大到可能多年无法消除的地步。”[283]

美国驻华代表迅速将蒋介石的这些信息转报华盛顿。马慕瑞公使等一再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正在酝酿中的政变和武汉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严重裂痕[284]。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谨慎而圆滑地处理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既不放松对国民党武汉集团的分化拉拢，又特别注意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而这一切又都在“中立”、“不干涉”的外衣下，不露痕迹地进行。

3月中旬，为进一步笼络武汉国民党人，美国政府拟仿英国先例，委派麦耶为“公使代表”常驻汉口。马慕瑞权衡利弊之后指出：此举会被看成美国“有意支持和鼓励激进派亲苏分子，反对温和派及几乎注定正要同集结于汉口的极端势力分道扬镳的民族主义者”。美国政府顿时省悟，欣然收回成命[285]。

与此同时，何应钦、伍朝枢等人正秘密同英、美等国驻沪领事馆联系，以求避免蒋军到上海后同列强发生冲突。至于怎样才能确实保障这一目标实现，高斯用外交辞令指出：“相信随着国民党军到达上海，对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真正考验也将来临。”[286]

除美国而外，1926年冬至1927年春，日本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的

关系也有相当深入的进展。

日本政府根据前述各方面的情报和建议，决心利用革命阵营“内部萌发的暗斗”，继续“选派有志奔走者”进行分化活动，劝说蒋介石和以奉系为中心的北洋军阀妥协，实现“和平统一”[287]。一时间，日本政客、军官、浪人纷至沓来。1926年11月，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他们回东京后鼓吹：日本“当以平等之友谊对待南北两方及各有势力者”[288]。前首相清浦奎吾也于这年冬天到武汉窥探，公开主张日本“对于南方势力应予相当之考虑，本此意义，对华政策须大革新”[289]。众议员大内畅三则南北奔忙，于1927年1月向国民党驻北京的代表李石曾提出中日妥协的六条纲领，并企图促使南北合流[290]。二三月间，日本最大在野党政友会的议员山本条太郎和森恪等人游历上海、南昌、汉口等地，遍访鲍罗廷、陈友仁、孙科、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探查底细[291]。蒋介石向山本表示，要“坚决贯彻三民主义”，希望“日本朝野人士对革命军的真意善加谅解和同情”，并流露出期望日本援助之意[292]。

1月18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称：“南军向长江沿岸进军，高揭以政治及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旗帜，使中国内战的性质为之一变。”他表示，日本“同情中国人民的合理愿望，协力助其实现”，但是，他又同时表示，将尽力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293]。

蒋介石感到要抛弃同苏俄的联合，镇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与日、英两国“首谋谅解”，因而决计委托戴季陶赴日，为他作“转风试探”[294]。1926年底，蒋介石特邀与日本颇有瓜葛的换帖兄弟黄郛南来相助。黄郛和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相识，彼此对中日关系见解相投。在北京关税会议期间，黄又与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过从甚密，引为知己。当佐分利奉币原之命，于1926年末到长江流域考察时，黄郛充当了他同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295]。

1927年1月，黄郛奉蒋介石派遣，到汉口进行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活动。他向日本总领事高尾亨通报了蒋介石的反共真实意向，表示“对日本的方针十分谅解”。他还代表蒋介石向日本保证：“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承认：“在发生汉口这样的不良事件的情况下，日本派陆战队上岸保护本国人是必要的。”(296)

日本军部势力也在积极设法破坏中国革命。陆相宇垣一成认为，中国如果赤化，日本将陷于困境。因此特于1926年底命令久留米步兵联队大队长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铃木先到汉口找老朋友黄郛商量，黄立即通过蒋的总参议张群，安排铃木到九江同蒋介石会见。铃木转达了宇垣对蒋的希望：“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介石当即保证：“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请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297)

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也于1月底来到庐山，探询蒋介石的立场。蒋再度保证：“我们不欲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如果由于工人跋扈，造成国际关系危机时，我们可能采取紧急措施。”他告诉小室：“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又称：“苏俄不可能重现于中国。”“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将乐于同日本携手。”(298)

蒋介石既同日本军部的势力联络，又同日本外务省接触。1月25日，他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他通知日本外交当局：将派戴季陶为代表，去澄清“革命军的真相”。他表示相信：“通过各种了解，日中亲谊毫无疑问。”(299) 从1927年2月14日至3月31日，戴季陶受蒋重托，在日本到处宣讲国民革命的“真义”。2月26日，他拜访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300)。

2月中旬，币原的特使佐分利回到东京，他断定蒋介石是温和派。币原以前曾认为蒋介石是“理论上的极端派，实际上的温和派”。听取佐分利的汇报后，他将这一看法作了少许修正。3月1日，币原告诉英国大使，他现在认为蒋介石是温和派，如果共产党人做得过火，这位寡言的将军将进行干预[301]。

以上大量事实表明，列强此时都已不同程度地获悉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和蒋介石可能采取反共行动的情报，因而在武装保卫重要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同时，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它们各以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来拉拢软化国民党上层势力，分裂国共统一战线。

这时发生的南京事件，成为列强与蒋介石等进一步结合，破坏革命的契机。

三　南京事件与汉口“四三”惨案

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排外抢劫。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违反国际公法，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侵略暴行，使中国军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事件经过如下：

3月23日，中央军江右军攻抵南京，直鲁联军战败后退入城内，大肆劫掠，然后逃往下关，争抢渡江工具，未能渡江的溃兵当晚又折回城内抢劫。不过，此时除两名在街上走动的外侨及两所外侨已撤走的空房之外，各国领事馆及其他侨民住宅并未遭抢[302]。24日凌晨，江右军各部开始入城。他们沿途鸣枪搜索，认真清查了英、美、日领事馆附近的街区，并曾进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至7时许，江右军所属第二、六、四十军主力部队未经激烈巷战，便顺利占领了全城及下关[303]。此后不久，忽然发生大规模的排外抢劫，从上午8时延续到下午5时，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及外国教堂、商店、学校等都遭抢劫，下关趸船上的外侨也被抢[304]。据江右军将领和某些人士报告，抢劫者为残留城内的直鲁溃兵和地痞流氓，并疑有反

动分子煽动[305]。可是各国驻南京领事馆人员和绝大多数外侨却从抢劫者的口音、军服和抢劫发生的时间、规模等方面判断，抢劫者是湘、粤、赣籍国民党军士兵及下级军官[306]。据中国记者事后前往调查，主要肇事者是江右军各部违纪乱兵[307]。

当23日晚直鲁溃兵劫掠时，即有外侨见到许多有组织的工人到各处去制止骚扰[308]。24日排外抢劫发生后，江右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共产党人萧劲光曾赶到日本领事馆，逐退正在抢劫的乱兵，布置卫士保护领馆，又贴出布告："外侨住所，不准入内，如有侵犯，立予枪决。"[309]某政治部接到美国领事馆求助的消息，也立即派多名政工人员，持书面命令前往美孚油行，竭力劝阻正在抢劫的违纪乱兵，但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控制局势，自己反遭乱兵洗劫[310]。

英、美、日驻南京海军当局早有应付"排外骚乱"的合作方案，3月7日又制订了《南京联合警备计划》，相约"彼此协力进行部署"。他们估计可能发生以下几种情况：北军败退时，会有危及外人生命财产的掠夺；南京变成战场；南军占领南京后，鼓动"排外热"。因此他们计划逐步撤侨，在军舰和领事馆之间设立视觉通信装置，组织登陆分队，必要时联合行动，夺门入城，掩护外交人员和侨民撤出[311]。

各国驻南京的海军官兵共267人，有英舰绿宝石（Emerald）号，美舰诺亚（Noa）号，普雷斯顿（Preston）号，日舰榛、桃、桧、滨风等。3月21日战事迫近南京后，英、美、日皆派出小股陆战队携枪弹、电台等潜入城中，到领事馆等处进行戒备[312]。可是，24日发生的排外抢劫之大，完全出于他们的意料。他们更没想到，江右军主力入城后有许多军人参加抢劫。他们认为，在此情况下派兵冲城，将导致同中国正规军队开战，由于兵力悬殊，因而未敢实行原计划。下午3时许，英、美军舰按照逃到美孚油行所在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John K．Davis）的信号，炮轰南京[313]。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一面采取措施制止抢劫，一面托红卐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

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开炮一个多小时后停射，抢劫风潮至下午5时基本上平息。据各方调查，中国军民在外舰炮击下死39（一说36）人，伤数十人，房屋财产被轰毁十几处[(314)]。在抢劫风潮中，英国死2人，日、美、法、意各死1人，英、日各受伤2人，美伤3人，财产损失无算，另有一英水兵在炮轰南京时被还击的江右军击毙[(315)]。

日本政府虽然也有在“必要场合”以武力护侨的政策，但南京日侨普遍害怕从前武装干涉苏俄时发生的尼港事件重演，再三泣请日本领事和海军长官不要开炮，避免城内的日本人全部遇难。日本现地官员接受了这个请求[(316)]。然而十天之后，日本水兵却在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大打出手，制造了又一起杀害中国人民的血案。

自中国人民占领汉口英租界后，日本政府便担心汉口日租界遭到同样命运。1月14日，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汉口帝国租界的文件》，决定不放弃汉口租界，并制定了具体的对策[(317)]。

经武汉政府调查，“四三”惨案经过如下：

> 据住居日租界市民等佥称：日人自本政府收回英租界后，对于我国民众时有挑衅之事。当惨案发生前三数日内，侨汉日人稍有重资之家及妇孺等辈，均搬入军舰，似早已有所准备。适4月3日午后4时半，车夫刘丙戌即刘炳喜，引空车至日租界燮昌小路，突有日水兵两名硬欲共乘其车。丙戌以违背警章不允，该水兵一人将其车踢翻，一人即抽刺刀猛刺其胸倒地，血流如注，顿时晕绝。群众见状，义愤难遏，大呼日兵杀人，集者渐众。除凶手中之一人由租界副巡捕长姜柄瀛、12号巡捕徐利常扭送入警署，交副署长小川要之助看管外，余一凶手逃往日本小学校内潜匿，由日警署部长鹭山赶入，未知如何下落。当时因日水兵陆续赶到，形势汹涌，群众冒死徒手擒获日水兵6名，并嫌疑者4名，其余日人分赴日领署及军舰报告，日水兵蜂涌登岸，从大新街、

新新街及江岸各口均布满，初放步枪，继放机关枪，群众闻枪奔避。该日兵等越界追杀，其日界侨商军警，凡有手枪、猎枪者，亦争先出门射击。故被杀之地，不只一处，枪声亦至6时半始息。兹以死伤地点论，如刘丙戌系在燮昌小路被杀；熊四元、刘亨惠之身死，陈海子之中枪，均在同仁医院侧；张泽文、李寿堂及不知姓名之一人等身死，均在本愿寺侧；杨海清、江心海之身死，在大正街；王秋生中枪，在华界三元里茶馆内；刘志元即刘之元、周勇伢、杨文藻等中枪，均在华界铁路孔。地点不一，相距甚远，而三元里、铁路孔均在日租界范围以外。该日人如非故意挑衅，蔑视中国国权，何至越境杀人？对于徒手民众，何故开枪射击？时间何以许久？此皆证明其确非登岸时误会者可比[318]。

据此项调查统计，日本人在“四三”事件中，打死中国民众9人，打伤8人。死伤者年龄在17岁至42岁之间，均为男性。

四　列强对蒋介石的诱迫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京事件相继发生后，英、日、美、法、意等国政府更为恐慌，分别训令驻华南各地的领事馆，进一步“劝告”本国侨民，迅速全面地撤出国民政府辖区。同时，它们加紧向上海等地增调大批援兵和军舰，保卫租界，威胁革命。据当时调查，至3月下旬为止，列强在上海已集中重兵约二万人，军舰近六十艘[319]。3月21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宣布戒严，将全部“防卫计划”付诸实施。同时，列强仍在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以各种方式诱迫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温和派”动手反共。

蒋介石等也加快了和帝国主义结合，发动政变的步伐。3月22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到上海，就派人会见美国总领事高斯，邀请他于次日来访，但高斯却不肯与白见面，他请来人转告说：“武装的工人、煽动家和学生正在实行恐怖统治，中国当局却没

有采取措施恢复秩序和控制局势的任何迹象。”他要求白崇禧“毫不拖延地行动”，声称“一旦形势变为和缓，法律与秩序得到维护，我很乐于有机会会见白将军”[320]。次日上午，英、日、法等国领事在上海总商会长陪同下访问白崇禧，法国总领事弦外有音地问：商会业已开市，“惟罢工不知究于何日始能恢复原状？”白崇禧答：“余意明日当可复工。”各国领事听后，“均露满意之色”[321]。

白崇禧到上海前，便已发出布告，声言要严惩“假借名义、藉端煽动”的“不法之徒”。他要上海工人阶级“认清楚时势和环境”，“在这军事时期，第一是不要破坏秩序，妨碍军事进行”[322]。得知高斯等人的意图后，白崇禧便命令罢工工人复工，并开始收缴部分工人的武装[323]。

3月24日上午，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接到南京出事的消息，即警告前来回访的白崇禧：“希望该事件不要波及本埠，阁下应以全力维持目前的秩序。”白崇禧连称：“一定维持上海治安。”[324]当晚9时，正在芜湖的蒋介石派代表向当地日本代理领事藤村表示：关于南京事件善后问题，蒋亲自负完全责任，请转告英、美当局停止炮击。藤村立即将此事转报矢田和日本驻沪海军司令。11时，蒋听说有南京日本领事馆人员在芜湖，又派人重申上述意向，许诺将亲赴南京解决这一事件[325]。次日凌晨，正在南京的美国长江分舰队司令豪夫（Henry H．Hough）也收到蒋介石的口信，称蒋将赶到南京，负责控制局势，保护一切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英、日、美驻华海军总司令一致决定：“尽可能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直至蒋介石将军有机会履行他为所有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诺言。”[326]

3月25日中午，蒋介石乘舰抵达南京。他没有登岸，只在舰上接见了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将领，令其追查南京抢劫的责任[327]。下午2时许，程潜派第十七师师长杨杰，陪同前来交涉的日本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司令吉田，到日本领事馆视察实况。杨杰竟对日本领事

说："此次事件诚为遗憾，但这决不是党军干部的意思，而是军队内部一部分不良分子与共产党南京支部成员串通谋划和组织进行的"，"已下令解散南京党支部，并以诚意交涉善后措施。"[328] 这番毫无根据的诬词，为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合谋反共提供了借口[329]。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乘舰抵达上海，旋即住进上海交涉公署。法国租界当局马上派黄金荣等人与蒋联系，并与公共租界当局一起给蒋颁发了"特别通行证"，准其自由穿行租界[330]。

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到沪的前一天接悉两项重要情报：一、柯亨再次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解释蒋介石与汉口激进派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蒋急于知道，若与鲍罗廷决裂，可从列强方面得到什么支持。柯亨促请美国政府"看清时局真相"[331]。二、白崇禧将要袭击被民众武装占领的警察署，但他并没有流露将采取强硬而严厉的措施的迹象[332]。3月26日，美国国务院获悉蒋介石关于南京事件的口信，随即又收到驻福州总领事的报告："控制军事部门的温和派与控制政治部门的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裂已在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报告以大量事例证实，已开入上海的蒋系东路军是一支反共并能认真保护外国利益的军队。国务院对于在关键时刻收到的这份报告极为欣赏，赞扬它"有特殊的帮助"，"好极了"[333]。于是，美国继续以圆滑的伎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

3月26日，上海领袖领事奥尔（N．Aall）受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之托，往见白崇禧，以有"工人纠察队将袭击租界"的流言为由，要求白制止可能危害租界安全的行动。白当即保证："国民党军无论如何无意进攻租界"，"已下令严禁任何人携械或送枪进入租界"。他还通过奥尔宣告："极愿尽力维持秩序，且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对国民党和工会"负完全责任"[334]。

这时，美国舆论主张除保护美侨生命财产外，不宜采取将会导致

战争的强硬措施。美国总统柯立芝于3月26日表示，目前再向中国增兵没有什么好处[335]。3月29日，他又宣称，中国迄未发生对美国人有组织的军事进攻，但时而发生零散袭击，这绝非出于任何“郑重当局”的唆使，纯系“暴徒”所为[336]。

同日，日本外相币原命矢田设法劝告蒋介石：日本朝野对南京抢劫均感意外，同情南军的日本舆论已有发生巨变之兆，英、美两国也说不定将采取“非常手段”，事态颇为严重。蒋应尽早处理此事，自动实行令各国满足的解决[337]。矢田当夜即与黄郛联系，次日会面时向黄转达了币原的劝告。黄郛告诉矢田：蒋介石急来上海，就是为了承担南京事件的交涉，同时决心集中全力维持上海的秩序[338]。黄郛与蒋商讨后，又于27日晚上答复矢田：蒋已接受忠告，28日即派代理交涉员到各“被害国”领馆道歉，一俟查清事件真相后，便负责进行处罚和赔偿[339]。

币原3月27日获悉杨杰的诬告后，决心进一步利用“宁案交涉”来促使蒋介石镇压革命。3月28日，他训令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命他与各国公使商量条件，协调推进有利的共同交涉[340]。当天下午，币原又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通报：“南京暴行是广东派中企图使蒋介石丧失信誉的激进派造成的”，“日本已提醒蒋介石，他和广州政府的前途有赖于维护秩序，镇压暴乱。如果维持不住秩序，便意味着蒋介石和广州政府完蛋。”他表示相信，“蒋介石既愿意也能够维持秩序”，“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压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会帮助蒋介石的敌人，并使广东派中的激进派能够取得广州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341]

与美、日不大一样的是，英国力图以武汉作为交涉重点。3月24日晚，台克满接到南京急电后，立即会见陈友仁，要求国民政府马上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南京外国人的安全，并在汉口提供保护，维持秩序。次日，他再访陈友仁，威胁称：若不尽最大努力保障南京外侨撤出，英国将再次开炮；如果英国对国民政府维持汉口秩序的保证感到

怀疑，将自行采取措施[342]。驻北京的蓝普森于28日拜会日、美公使，磋商解决宁案办法。蓝普森称：陈友仁听到台克满转述的南京事件消息时，“表现出真诚的不安和震惊”，尽管他不相信这是南军所为，但答应调查，并承担政府应负的责任。他建议，关系列强派代表同武汉政府联合调查，以便“给国民政府一个表示诚意的机会”。日使芳泽反对同武汉政府交涉。他转述了杨杰的诬告和矢田对蒋的工作，认为“可以期望蒋介石方面对于惩办肇事者采取令人满意得多的迅速行动”。三国公使商定，向蒋介石提出通牒，随后又将法国和意大利公使拉入行列。通牒草案要求蒋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书面道歉并保证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还拟定由各国总领事通知蒋介石：列强将限定时间；逾期不办，列强将保留“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的权利。对此，蓝普森主张写明期限是几天，美、日公使都认为留有余地为好。但他们一致认为：“各关系国政府应下狠心贯彻这些要求。”[343]

美、日政府都赞成借“宁案交涉”之机，要求蒋介石迅速处理局势，但它们又都不愿意逼得太紧，所以反对通牒草案中有关限定时间的提法[344]。英政府决策层意见不一，有人力主制裁，也有人主张适当照顾蒋介石的特殊处境，避免危害他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前者的意见略占上风。英内阁通过了上述通牒草案，决定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实行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封锁长江和广州，禁止汉口、南京的铁路渡口通行，扣押国民党军舰等[345]。法国倾向于美、日，意大利追随英国，于是，列强间进一步磋商。

3月28日夜，黄郛密访矢田，诉说上海的“共产派”工人、学生已夺得武器和粮食，如果蒋介石目前发表为南京事件“惩凶”和赔偿的声明，就会给他们一个发动反蒋暴动的良好口实，希望列强谅解蒋介石的“苦衷”[346]。30日上午，矢田到上海交涉署与蒋秘密会谈。矢田称：“今日实为千钧一发的重大关头，弥漫着某些细小事端都可以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性。”他要求蒋“深刻考虑”上海的“治安问题”。蒋介

石回答："业已谅察尊意，一定严加取缔。"[347]

30日晚，币原训令芳泽公使：日本政府同意和英、美、法、意联合向蒋介石发出"宁案通牒"，迫其接受四项条件，但应删除有关限期照办的措辞。训令称：蒋介石目前正处于困境，列强若持强硬态度，正迎合了武汉共产派的倒蒋计谋。"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之手维持中国治安"，让蒋介石等"健全分子"有施展身手的机会[348]。

实际上，日本当局对蒋介石反共的决心与能力并不完全信赖。驻华武官本庄繁认为：日本固然希望蒋介石与张作霖携手，镇压共产党，"但从时局对帝国的重要性着想，不应依赖这种不确实的事"。他建议日本立即采取"积极自卫政策"，派陆军进驻中国各枢要地点，派海军夺取扬子江上的制航权[349]。币原本人也认为："蒋氏对于取缔共产派的跋扈缺乏决心，惧怕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了解我方的苦心"。共产派搞垮蒋介石的意图现已甚为明白，上海和其他地方都有同南京事件类似的"阴谋计划"。"现已到了决定国民军自身和蒋介石及其一派命运的重大关头"。"蒋今欲取得内外普遍信赖，只有成功平定时局之大业。"3月31日，币原命矢田向蒋转达这些意见，促蒋"深刻反省与决意"[350]。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做好了与各国共同实行武力镇压的另一手准备。外务省与海军达成协议：决定分三期进行战争准备：第一期，暂不提出限时通牒，争取时间从汉口上游撤侨；第二期，提出限时通牒，同时从长江中下游和广东、福建撤侨；第三期，限期一过，便与列强联合行动，占领上海、汉口等地。海军方面特别提出：鉴于长江上游水量至4月中旬才能通行炮舰，所以采取强硬行动前，绝对需要两三周的余地，完全同意删除通牒中的时限[351]。

4月1日夜，矢田向黄郛传达了币原3月31日训令的精神，黄称明晨即转告蒋介石。他解释说："蒋之诚意不必怀疑，唯其实行能力尚可疑虑。"蒋目前需要断然处理的紧急事务为：紧急解决南京事件；

解除上海工人武装。但是蒋“唯忧虑汉口共产派”，希望列强将关于南京事件的第一次正式抗议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并向汉口集结军舰，加以威压。共产派正在对英、美炮击南京作夸大宣传，给蒋加上帝国主义走狗的恶名，蒋必须考虑以什么方法解决，才不至于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攻击口实。黄郛透露，蒋介石“特别注意解决工人武装的时机和方法”[352]。经过这番推心置腹的恳谈，币原充分了解到蒋介石的策略考虑，一切疑惑都消失了。4月2日，币原令芳泽劝说英、美公使，将通牒提出的时间推延数日，以等待蒋介石方面采取行动[353]。英、美公使虽感到遗憾，但还是同意了[354]。

同日，英国驻日大使奉命与币原磋商“宁案通牒”和制裁问题。币原称：日领矢田正在劝说蒋介石自动声明，承认惩凶、赔偿、道歉、保障等四项解决条件。如果这时列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强硬抗议，蒋就只有或屈从或拒绝这两条路可走。如果屈从，便完全破坏了蒋的立场，将使他被逐出国民党。因此蒋势必拒绝列强的强硬抗议，而列强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裁手段。何况实行武力制裁只能摧垮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能使共产派和“暴民”屈服，不如用“和平”的方法，通过蒋介石去收拾时局。英大使询问，列强可否给蒋介石等稳健分子提供物质支援。币原认为，那样就太露骨了，蒋会因此被斥为“卖国奴”而引火烧身[355]。三天后，币原又将这番谈话的要旨转告美国驻日大使[356]。

就在4月2日夜间，黄郛通知矢田：“蒋已下定决心整肃国民政府内部，刻下正召集将领仔细商议”，“一俟准备就绪，即当断然实行，其时间当在四五天以内。”黄郛还透露，蒋介石的大致计划是：由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对武汉派发难，公开排斥共产党。而在这之前，“第一件事是解除工人武装”。在整肃共产党之后，便着手解决南京事件。蒋打算仿效土耳其的凯末尔，驱逐鲍罗廷。并称：今后希望日本援助云云[357]。

日本政府得知上述信息后，决定不再催促蒋介石发表接受列强宁

案四条件的声明。同时，币原同意英国的意见，下令将“宁案通牒”也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以施加“重大压力”[358]。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借端寻衅，疯狂杀害中国民众。日本当局先后调集十余艘军舰到武汉示威，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租界”[359]。

美国驻华官员提出了许多制裁方案[360]。马慕瑞力主向京津地区和上海大举增兵，准备封锁华南一切港口[361]。威廉士提议，必要时以炮轰江阴要塞和南京军事要地为报复手段[362]。4月初，美陆军参谋长萨莫拉（CPSummerall）在专备应付中国“紧急事件”的《黄色方案》基础上，拟定了依次从菲律宾、夏威夷、旧金山派遣大批陆军驰援上海和天津的计划。但他不主张立即实行，认为“我国目前在中国带头增加外国军队，尤为不智”[363]。美国政府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实不值当”，遂令马慕瑞在必要时撤出外交人员和侨民[364]。

美国政府只想用通牒的方式来敦促蒋介石迅速行动，而不愿实行武力制裁。4月2日，凯洛格接连训令马慕瑞，同各国一道向蒋介石和陈友仁分别提出不带时间限制的通牒，要求他们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面，同时通知蒋介石：“如果他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他打算迅速答应这些条件，关系列强将不得不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措施。”训令强调：“本政府不希望该通牒含有最后通牒式的限定时间的措辞”，“美国政府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保留意见”。凯洛格随即向马慕瑞和英、日等国说明，上述保留意味着美国不承担实行制裁的义务，甚至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365]。

英国政府在美、日政府同意以武汉政府为“宁案通牒”的主要对象后，试图继续说服美、日，在原则上赞成通牒要求被拒绝时，就实行武力制裁。4月3日，英国纠集列强驻华海军最高司令官在美舰匹茨堡号上开会，讨论制裁问题。由于美、日将领事先没有取得政府的授权，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英、美、法海军将领先后提出的制裁措施有：炮轰吴淞炮台、江阴炮台、汉口兵工厂和其他某些军事要地，

扣押南军舰艇和中国商船，封锁长江，没收上海关税收入。到会的日本海军将领表示保留意见。美、日政府都没有批准上述方案[366]。

英国政府不甘心放弃制裁，但也不愿伤害蒋介石。4月5日，又向美国表示："有理由相信蒋介石正在努力组织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极端派相对立的温和派核心，这个核心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希望。目前不适当地使蒋介石受辱是违背列强利益的。"所以英国力主向武汉政府提出正式通牒，而将抄本交蒋。但是，"万一国民政府最终拒不满足要求，列强原则上赞成实行制裁，根据此种理解，英国政府同意省略前方案（即通牒草案）B款中的时间限制"[367]。凯洛格立即电训马慕瑞：英、美政府间根本不存在上述谅解，"美国政府不承担实施制裁的义务，也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对此不容有丝毫含糊"[368]。

在美、日政府的共同抵制下，英国虽不愿放弃必要时实行武力制裁的主张，但更不愿联合阵线发生破裂，于是不再坚持原议。4月7日，英、日、美、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联合向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分别提出不带时限的通牒，要求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势[369]。9日，五国公使训令各自驻汉口和上海的总领事，务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分送"宁案通牒"，同时发表由美国公使马慕瑞起草的一项声明，宣称列强关于南京事件的各种要求是针对"中外之一种势力"而发[370]。

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拒收联名通牒。五国总领事于4月11日分别向陈友仁递交了同文通牒[371]。蒋介石的代表白崇禧在上海不仅接收了五国联名通牒的抄本，而且通过郭泰祺向日领矢田保证："上海时局可望顷刻之间彻底安定。"[372]

果然，通牒送交后不到十小时，蒋介石集团就发动了政变。

第六节　蒋介石发动政变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一　赣州惨案与南昌、九江、安庆事件

由于迁都之争，武汉国民党和蒋介石之间形成对立；恢复党权运动使这种对立进一步尖锐化。武汉左派们企图以群众大会、通电宣言、决议等约束蒋介石，而蒋介石则以暴力相回答。3月6日，新编第一师师长倪弼下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蒋介石开始镇压革命力量的讯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896年生[373]。辛亥革命后考入江西陆军讲武堂学习。曾参加“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队。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东南雄总工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同年7月，自动申请回江西工作，以配合北伐[374]。曾策动赖世璜起义。10月，调任赣南党务及民众运动指导员，同时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11月，在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随即发动罢工，要求“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获得胜利。不久，又成立工人纠察队，使赣州的工人运动名盛一时[375]。但是，运动中也出现了“左”的倾向，如捕捉店主，捆绑游街，要求增资十几倍等现象[376]。

赣州工人运动的发展遭到敌视。12月30日，洋货业店员工会几个店员因去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看文明戏遭拒，在墙上涂写污辱妇女的字画，该校校长、国家主义派分子欧阳魁等在县党部支持下，借此召开各公团联席会，要求解散洋货业店员工会，激起工人反对，大批工人包围县署。据说，县党部主席筹备员、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被殴[377]。1927年1月3日，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致电蒋介石，声称“连日发生工潮，扰乱秩序，捣毁县署，属会无力维持，请示办法”[378]。同日，赣县县党部筹备处也致电蒋介石，指责店员工会“罢工捣乱，破坏党务，殴辱党员，摧残女界”，要求“严办工贼”[379]。其后，所谓赣州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教育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纷纷电

蒋，指责陈赞贤等“纠合工友，目无法纪”，“恳请严惩”[380]。事后，工会方面处分了个别工人，但欧阳魁等仍不满足，勾结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准备镇压工人运动。倪原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赣州后，即接收贿赂，为商会说话[381]。1月26日，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召集各团体负责人开会，倪弼企图乘机捕杀陈赞贤等，陈事前获悉有关消息，化装离开赣州，赴南昌请愿。倪弼等即议决，以“私藉工会团体，扰乱秩序，危害国民革命，以谋其个人大利”的罪名，呈请拿办陈赞贤等，“由人民组织审判委员会，讯明议处”[382]。会后，倪弼派兵至总工会捕去办事人员。倪的举动遭到第一师左派军官的反对，230人联名致电总司令部，要求将倪撤差严办。31日，倪弼与师长张与仁召集干部会议“解释”，结果，适得其反，倪弼被殴。会后，倪弼赴南昌“控诉”，张与仁则在致蒋介石电中表示：“乞示办法，死所不辞。”[383]

倪弼到南昌后，在蒋介石面前哭诉，蒋大骂说：“你有脸来见我，有本事回赣州去！”[384]同时，陈赞贤秘密率领的工人请愿代表团也到达南昌，他们在总司令部等候了半个月，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的接见，最终只等到了一个批示：“该案交总政治部、省党部工人部会同新编第一师张师长办理。”[385]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支持赣州工人，他要求蒋介石将倪弼调开，蒋口头答应而始终不实行[386]。

在倪弼离开赣州后，经新编第一师团党代表周学昌调解，劳资纠纷已接近解决。倪回到赣州，赣州商人立即变卦，大批开除工人。2月21日，商人彭益三等杀伤工人十余人。随后，省党部工人部特派员贺其燊跟踵而至，命令陈赞贤停职，并要求新编第一师及县署拘捕陈赞贤。此时，陈赞贤已在江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但他没有开完会就回到赣州。3月1日，在赣州总工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陈赞贤表示：“坚决与反动派势力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利益。”6日，陈赞贤被骗到县署开会，倪弼等限陈在三分钟内签

字解散赣州总工会，为陈严词拒绝。倪称：“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枪毙你！”倪的左右即向陈开枪。陈身中十八弹，英勇牺牲[387]。

还在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期间，就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表示不满。杀害陈赞贤，说明他已由不满发展为仇视。

在陈赞贤被害之后不久，左派掌握的南昌、九江市党部、安徽省党部等先后被捣毁。

南昌市党部拥护武汉左派们提出的恢复党权运动。3月6日，召集全体党员大会，议决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宣传大纲，敦促汪精卫复职，从速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388]。14日，右派掌握的江西省党部即决议解散南昌市党部，通缉该会执、监委员。15日，南昌市党部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召集有2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提出“提高党权”等口号。当时，蒋介石在场，立即责问：是谁提出此种口号？会场应声云：“群众公意。”蒋介石愤愤地说：“我有我的口号，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谁反对江西省党部，就打倒谁。”[389]当夜，蒋介石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召集流氓、警察及部分党员，沿途高叫“打倒左派”、“打倒赤化”、“打倒鲍罗廷”、“拥护蒋总司令”等口号，冲入南昌市党部，逢人便打，遇物便毁[390]。随后即封闭学生会、济难会及左派创办的《贯彻日报》，宣布解散工会、农协。23日，右派在南昌召开了所谓“江西民众拥护中国国民党示威运动大会”，议决组织“江西民众拥护中国国民党大同盟”，反对武汉中央[391]。

蒋介石离开南昌后，16日到达九江。17日，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农协、《国民新闻》社等处即被手持刀械的几百个流氓捣毁，当场杀害九江市党部职员三人、总工会干部一人、工人十余人，抛河致死者十余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工作人员九人[392]。工人纠察队要求解除暴徒武装，蒋介石却派卫队掩护暴徒出市，并

命第六军留守唐蟒为戒严司令官，禁止工人罢工[393]。

安徽临时省党部在恢复党权运动中也很活跃。当时，该党部正流亡于武汉，曾先后发表《最近宣传大纲》等文件，谴责“昏庸老朽分子”宰割中枢，垄断党务，呼吁“救党”[394]。国民革命军进军安徽后迁回安庆，公开活动，迅速组成省、市总工会、省农协筹备处、妇协筹备处、省学联等群众团体。但是，安庆也存在着一个由右派组成的省党部，它用收买地痞流氓等办法，也成立起总工会、农协、商协、妇协一类组织，与左派势力相抗。3月20日，蒋介石抵达安庆。当日，左派省市两级党部联合召开万人欢迎大会，宣言称：“我们热诚地欢迎总司令是因为总司令始终站在革命战线上，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奉系、直系、安福系等进攻不息。”宣言号召打倒“在革命旗帜下活动”的西山会议派、伪党部和安福系余孽[395]。他们怎么也料不到，这位被欢迎者两天之后就下了毒手。21日晚，省市两党部宴请蒋介石。席上，蒋介石声称安徽“派别多，不团结”，要求各方合作，成立省党部，左派周骏当即表示：“我们要健全国民党的组织，必须纯洁队伍，我们决不能把西山会议派和帮会头子都吸收到党内来。”气得蒋介石未终席即离去[396]。

3月22日，国民党安徽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同日，总政治部命令伪总工会停止职权，听候审查。该会抗不服从，他们在总司令部特务处副处长温建刚指挥下，蜂拥到设在省长公署的总司令行营前，要求蒋介石接见。蒋居然表示同情说：“你们受了压迫，本总司令要秉公办理。”[397]适值省党部常委光明甫等来见蒋介石，暴徒们遂一拥而上，将光明甫殴伤。事后，蒋对闻讯赶来的郭沫若说：“你以后对于民众团体的态度总要不偏不袒才好。”又敷衍光明甫说：“好啦！好啦！我警诫他们一下好啦！”[398]

事实上，蒋介石“警诫”的是左派。3月23日，安庆反动分子以省农协、总工会、商协、学联、妇协等五个团体的名义召开“市民大会”，欢迎蒋介石。事前，出钱收买流氓，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

队。会后，在总司令部参议刘文明、西山会议派张秋白和青帮头子杨虎率领下，捣毁左派省市党部和省教育会等群众团体，殴伤职员及出席国民党安徽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数十人[399]。“所有家具杂物，无一留存”[400]。有一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到省党部开会，被暴徒们剥去外衣，打得半死不活之后拉去游街，诬指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说这就是共产公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401]。暴徒们沿途高呼“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把被打伤了的人拖到总司令部门前一哄而散[402]。当日，李宗仁为此事去见蒋介石，蒋仍然假托民意，声称：“是民众打了的，我有什么办法呢？”[403]

蒋介石一口一句“民意”，事实真相如何呢？1928年，温建刚有一封致张静江的信很能说明问题，该函说：“去春在南昌，以徐谦、邓演达等劫持中央，危害本党，首在介石先生前建议，扑杀共逆，免滋燎原。由九江而安庆，而南京，奋斗不遗余力。”[404]原来，这是在南昌时期就已经确定的预谋。

3月24日，蒋介石乘船离开安庆。临行前擅行委任了28名安徽政务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其中右派占绝对优势。

二　蒋介石等在上海策划清党

上海是蒋介石的旧游之地。在这里，他外可以争取列强支持，内可以得到江浙资产阶级的援助，还可以利用黑社会充当打手，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优势。因此，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召见白崇禧，面示清党决心[405]，随即夜以继日，紧张筹划，准备政变。

首务是确定清党反共方针，组成反共营垒。

在国民党二大所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右派占多数。因此，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在南昌时的建议，企图通过这一组织提出清党反共方针[406]。3月27日，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及邵元冲、

马叙伦、蒋梦麟等迁入龙华交涉公署，吴稚晖提出，为保密计，在清党明令未公布前，均不得外出[407]。同日，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吴稚晖主张，“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摇动后方及卖国之行为”，“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至于“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则“听候代表大会裁判”[408]。

28日，继续讨论，当日会议情况，据《邵元冲日记》所载为：“介石谓湘芹（指古应芬——笔者）处已去电促其速来，而李德邻（宗仁）、黄季宽（绍竑）、李任潮（济深）日内皆先后将至，故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409] 同日，李宗仁应蒋介石之邀到达上海。

在武汉时，李宗仁就认为两湖地区的群众运动“越轨”，以致“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买不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410]。到上海之际，又适逢工人向白崇禧请愿，途为之塞，更增加了反感[411]。他和白崇禧都认为“上海一团糟”。白崇禧说：“现在不仅上海工人行动越轨，第一军也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企图取国民党而代之。如不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见过了白崇禧，李宗仁便去见蒋介石，建议蒋“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提出将第七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不稳部队等设想，蒋介石表示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412]

当日晚，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413]。首由吴稚晖报告“共产党谋叛情形”：“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提议纠察，实行所谓“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附议，要求“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李石曾则表示，“护党救国运动”乃是向前革命之性质与决心，以与变相之帝国主义专制政体奋斗，并非退后或保守之运动，如共产党所诬加于国民

党者[414]。这次会议后来被视为清党反共的发端，实际上，一切在27日的会上已经决定，此会不过是过场而已[415]。

继李宗仁之后，李济深、黄绍竑也于4月1日自广州抵沪。二人此行极为秘密，为此黄绍竑登程时甚至剃去留了六七年的胡子。4月2日，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会议，蒋介石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个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416]但是，他又表示，自己手中所指挥的军队，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共产分子，不服从调遣，若着手清党，恐怕激成剧变，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即刻回奉化去[417]。

与会诸人都反共。李济深叙述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就无法维持了。"

黄绍竑也对广西东兰的农民运动不满。他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他表示："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报告了南京事件的情况，他把事件的责任加到共产党人的身上，说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对上海工人纠察队最反感。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

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完了。”他指责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驻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418] 他表示：“你们让我先在上海动手，把共产党窠巢肃清之后，各地自好办了。”[419]

吴稚晖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他满口无锡话，别人不大听得懂。

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反共清党”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了。

当日晚，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黄绍竑、李宗仁等举行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吴稚晖4月1日提出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吴称：“现在共产党在各地已公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之标语，去年武汉所发之印刷品，亦公然有推翻本党及卖国之言论。我辈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对此自应急行断然之处置。”他并说：“至于叛逆分子，因其有危险行为，故必须先行看管，以待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判决。”[420] 接着，蔡元培提出了一份《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计有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压迫工人等四项[421]。会议根据吴稚晖的建议，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分为三类：甲类，纯为本党忠实分子，计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等31人；乙类，态度可疑之分子，计恩克巴图、经亨颐、王法勤、屈武、吴铁城等8人；丙类，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计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

安、恽代英、毛泽东、许苏魂、陈其瑗、夏曦、邓演达、董用威、邓颖超、詹大悲、顾孟馀等79人。此外，并开列了中央监察委员及各省党员179人，与丙类同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422]。会后提出了一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423]。4月8日，吴稚晖等继续举行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9日，由邓泽如领衔，黄绍竑、吴稚晖等8人联名的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完成，该电指责武汉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的种种措施和决议，认为有“不合者二”，“可痛心者”十一。电文称：“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6人。尽管吴稚晖等举行的所谓全体会议并不足法定人数，但清党反共的“法律”程序总算勉强完成。蒋介石准备采取的措施虽然是中世纪的野蛮的屠杀，他仍然力图掩盖在“合法”的外衣下，做到尽可能符合组织原则。历史在进步，新旧军阀们不能不跟着转换手法。

在确定清党反共方针的同时，蒋介石力谋得到列强的谅解和支持。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双方都力图利用这一事件。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声明这一事件的煽动者是直鲁军的宣传队长何海鸣等人[424]，而在背后，却通知日本方面，事件系共产党人所为，企图转嫁责任，使列强明确支持他镇压共产党。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不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拉拢、诱迫他打击共产党人和急进力量，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3月26日到4月2日期间，通过黄郛和日本驻上海领事之间的密切接触，蒋介石和日本政府之间就反共问题达成了默契。

为了发动政变，蒋介石必须拥有充裕的经费，因此，又竭力拉拢江浙资产阶级。早在南昌时期，蒋介石就和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之间

有过协议，到上海后，又一再甘言蜜语，以取得资本家们的欢心。3月26日，蒋介石在接见虞洽卿时表示，“抱维持资本家主张”[425]。28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迎见蒋介石，蒋介石再次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显。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426]蒋介石的表态使上海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和放心。月底，蒋介石以总司令部的名义任命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5人：主任陈光甫，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委员虞洽卿，时任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钱新之，“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吴荣鬯，中国银行总文书；秦祖泽，钱庄业代表；汤钜，交通银行代表；顾履桂，面粉业代表；王晓籁，闸北商会会长；徐国安，盐商和纱厂业代表；陈其采，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通过这个组织，蒋介石将江浙资产阶级紧紧抓在手里；这个组织也积极为蒋介石筹措经费，当时，蒋介石以“前方军需紧急”为理由，要求该会迅速筹款1000万元。4月4日，通过陈光甫、陈其采的活动，以二五附税作抵，银行公会提供借款200万元，钱业公会提供借款100万元，月息7厘[427]。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并向蒋介石的军需处长徐桴表示，自动认捐500万元，“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428]。此后，江浙资产阶级继续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大量经费，保证了蒋介石的需要。

上海黑社会是蒋介石的理想打手。开埠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庇护下，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流氓、帮会阶层。其成员盲从、拼命，适宜于供驱使。蒋介石到上海后，即指派帮会分子董福开、张伯岐等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工部局警务处4月2日情报称：“蒋介石正在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目前的上海总工会的活动，其成员均为蒋介石的党徒。”[429] 3日，该会挂牌出笼[430]。同时，蒋介石又指使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成立中华共进会，积极准备向上海工人阶级进攻。工部局警务处情报称：“闸北及高昌庙上海总工会武装工人的非法活动，已经在蒋介石

的参谋人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共进会正准备突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解除其中人员的武装。突袭将由青帮分子进行，便衣士兵协助”[431]。这一情报显示，蒋介石等已经制订出周密而细致的行动计划。

当时，驻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为第一军第一师与第二师。第一师驻扎闸北，师长薛岳左倾。上海总工会为表示欢迎，开过几次联欢会，士兵和工人的关系比较融洽。白崇禧不放心，即将第一师调往南市，另调刘峙的第二师进驻闸北，以便严密监视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刘部进驻后，上海总工会继续以联欢会的方式，联络第二师士兵。4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第一、第二师全部调离上海，并令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于6日起到上海接防。周凤歧的队伍刚刚脱离军阀营垒，执行反共任务自然较为可靠。

至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部署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选择恰当的发动时机了。4月6日，蒋介石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在上海的派出机关，攻击以邓演达为首的总政治部“淆惑军心，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革命军势力，破坏国民革命军战线”。同日，开始检查新闻，下令自即日起，所有来自武汉的电报、函件、报道，总政治部的各种“反宣传广告”，一律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故意违抗，即按戒严条例惩办。蒋介石的这一行动既出于钳制舆论的需要，也显示了他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抗。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等15人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统揽全市军事、政治、财政、党务各种权力。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为武汉中央所承认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为政变作出了又一项准备。

三　汪蒋会谈与汪陈联合宣言

正当蒋介石积极准备政变之际，汪精卫于4月1日到达上海。

尽管迎汪运动喧腾一时，但汪精卫却因病滞留欧洲，迟迟不能动身。3月8日，他由德抵俄，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方面得到了全力支

持他的保证[432]。4月1日，回到上海，即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3日，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邵元冲、吴稚晖等12人在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开谈话会。会上，蒋介石等提出“赶走鲍罗廷”与“分共”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同时希望他留沪[433]。吴稚晖则怒气冲冲地声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故只任通知，而非商榷。”[434]汪精卫对吴稚晖的态度极为不满，他对蒋介石说：“总理改组国民党，便是我与你同着仲恺三人，最深知之。”[435]又说：“我们不能说反共，反共即是和张作霖、孙传芳一样。”[436]“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437]他并自任前往武汉，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双方激烈争辩。吴稚晖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共产党破坏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亟谋破坏租界”，“引起外交纠纷，造成大恐怖局面”，“情形急迫”。李宗仁、黄绍竑则以和缓的态度转圜，“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438]。在此情况下，汪精卫提出了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其内容，各种记载多有不同，据李济深等人的电报为：“1．共同负责通告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级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者，在汪主席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制裁。”[439]这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后来在报上公布时，又变为四条，增加了“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自开展迎汪运动以来，汪精卫声望日隆。为了欺骗舆论，笼络汪精卫，蒋介石于3日通电称：“汪主席在党为最忠贞之同志，亦为中正生平最敬爱之师友。”他表示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

央”[440]。蒋介石一生善于做作，此电即是一例。

4月3日会议前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次长谈。据蒋介石称，汪精卫当时说：“介石，这一回东南同武汉开战时，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从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国民党就要恢复民国十三年以前状况，要是恢复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左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441] 这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汪精卫当时的心态：既不满共产党，也不满蒋介石，企图在夹缝中走自己的路。在和吴稚晖、胡汉民等人谈话时，汪精卫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不满情绪有更多的流露。例如，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442] 这段话，也反映了汪精卫的真实思想。

4月3日会谈后，汪精卫即会见陈独秀，质问吴稚晖等提出的共产党准备“打倒国民党”及冲入租界等事，陈力称纯属谣言，遂由陈起草，以汪、陈二人名义共同发表联合宣言[443]。该宣言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又称：“中国国民党及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宣言表示，所谓“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以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等说法，均系谣言。宣言称：“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相同，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间而入也。”[444] 在蒋介石等人策划清党反共之际，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澄清对共产党人的

造谣和恶意中伤，强调两党团结、合作，这是必要的。但是，蒋介石等人明明已在磨刀霍霍，却还为之粉饰，说什么“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实在是自欺欺人。

宣言发表于4月5日。当天，汪精卫、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甘乃光、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再次举行谈话会，吴稚晖对宣言强烈不满，当面质问汪精卫：“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汪解释说：“全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但吴稚晖仍然不满意，絮絮叨叨地表示：“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出了友谊的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他并对汪精卫说：“我相信你终有一天来同我们相对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马上加入我们这一边来。”[445] 当日会议不欢而散。

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初，曾致电告知武汉国民政府。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汪精卫，通知他已被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工作重要，务请立来鄂担任。时局严重，切勿稍延”[446]。谭延闿、孙科等23人也联名电汪催促。同日，汪精卫从宋子文处得知，李宗仁主张将他软禁起来，以免“放虎归山”[447]。于是，匆匆于当晚秘密登轮。6日，启程赴鄂。在船上，他分别致函蒋介石、张静江、李石曾三人。致蒋函称：“改组之精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又称：“以铭之愚，一线生机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南京。”[448] 致张函说明离沪去汉的目的，在于争取“多数同志之同意”[449]。致李函则重申他的两项基本主张：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450]。由于汪精卫企图以纪律来约束蒋介石等人，后来右派曾讥之为“党纪先生”[451]。该函末称：“左派

何在？谁是左派？我将寤寐以求之，旁皇以觅之。”风浪即将大作，而汪精卫却迷茫失路，连“左派何在”都不知道了。

汪精卫的归国和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使上海出现了和缓气氛。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汪精卫“政治观念很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又说：蒋介石本已下动员令，因汪来即收回[452]。上海临时市政府通电称：“行见革命领袖，同心戮力，一致进行。”[453] 杨杏佛也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会议上说：“党务前途，如拨云见日。”[454] 天真的人们以为，蒋介石策划中的政变可能受到制约，至少也会推迟。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一再电催陈独秀赴汉，于是，继汪精卫之后，陈独秀也匆匆离开了上海。

四　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变方略

在很长时期内，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们一直担心蒋介石抵达东南后，会和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大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因此，也力谋控制南京、上海，进一步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3月21日，上海发生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方案。会议决定派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赴沪；又指定孙科、顾孟馀、陈友仁、宋子文、徐谦为外交委员会委员，以陈友仁为主席，研究上海方面的外交策略，派郭沫若为上海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导员。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程潜等11人组成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其中共产党人和左派占绝对优势。27日，武汉政府电令上海各机关，所有江浙财政均须经宋子文办理，否则概不承认。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武汉政府对南京、上海地区的控制，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不理睬武汉政府这一套，继续任命行政、外交等方面的人员，并且干涉武汉政府的用人权。3月28日，孙科在政治委员会会上提出：上海方面交通部派员不能接事，一定要总司令委派才可以。会

议决议，由国民政府电令各省军事机关，嗣后不得干涉用人行政。4月1日，鲍罗廷提出："现在反动分子自由委派重要官长，损伤党权。"于树德提出："军事领袖擅自拜访各国的外交官是否合法？"孙科说："现在越闹越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455] 会议根据鲍罗廷和孙科的提议，将二届三中全会统一外交、财政各决议案通知蒋介石以及各军，"饬令遵照，并警告不得违反，否则以反革命论"[456]。武汉政府很天真，以为蒋介石还会按照它的命令行事。蒋介石也在某些方面麻痹武汉政府，不仅于3月30日发电请示军事、外交进行方针，而且同时呈报安徽省政务委员名单，要求委派钮永建为新编第七军军长。这一切也给了武汉政府以错觉，似乎蒋介石还准备听它的话。4月2日，孙科提出：蒋总司令到上海后，即被反动势力包围与利用，形成反动中心，建议立刻训令蒋介石，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专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会议决定命令蒋介石离沪，声称"同志在沪，已有不能团结革命之表征，徒为外人所乘，于此紧急之外交形势殊属不利，必同志离沪，中央始可对上海之严重形势指挥自如，而负完全之责任"。决议要求蒋介石"对于外交未得政府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457]。武汉政府以为，只要蒋介石离开上海，就可以使他摆脱反动影响。鲍罗廷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458]

4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废除总司令，改为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总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蒋介石、冯玉祥分率军队，于最短期间消灭张作霖。但是，这两道命令对蒋介石都不可能有制约作用。

武汉政府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武汉政府的基本策略是以党权限制军权，幻想党纪、命令、舆论可以制服蒋介石。但是，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不是党权。

此外，武汉政府还准备了一手。

3月下旬，武汉政府草拟了一道候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子上，准备交给程潜执行，同时责成第二、第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3月27日，林祖涵将密令缝在衣缝内，以代表国民政府慰劳前方将士的名义东下[459]。同时，张国焘则以机密方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就近予程潜以协助[460]。2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命林祖涵为驻宁办事处主任，林未到任前，由李富春代。

武汉政府将希望寄托在程潜身上，但是，程潜却并不愿意执行命令。林祖涵东下之际，程潜正与何应钦一起应蒋介石之召，赴上海商谈。到沪后，程潜力主调和，并表示愿意去武汉劝说[461]。此外，程潜还和李石曾、吴稚晖作了交谈，了解到他们正准备“清党”。程潜担心自己被蒋介石软禁，便于30日离沪返宁。当晚，林祖涵也到了南京。程潜得悉交给他的任务后表示：“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中山先生。”[462]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世璋以形势危急相劝，告诉程潜：“蒋介石已经把何应钦派进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高地，恐怕来意不善。”程潜却满不在乎地说：“不要怕！”[463]

程潜的态度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是，逮捕蒋介石的时机也已失去。南京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乘舰过宁，没有上岸。这以后，他一直处在重兵的护卫中，要逮捕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林祖涵也没有其他办法。在南京期间，第二、第六两军都有人表示对蒋介石“深致怀疑”，“希望中央早日讨伐”。林祖涵只能含混地回

答。4月1日，程潜下令，除渡江部队外，其余概行集结南京，同时，以全体官兵名义通电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即随林祖涵返汉。他将军长职务交杨杰代理，将卫戍南京任务交贺耀组负责。程潜自以为万无一失，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杨、贺二人的政治态度都已经发生变化[464]。

程潜离宁后，蒋介石即一道接一道地下令驻守南京的第二、第六两军于4月6日全部渡江，沿津浦路北上，同时命何应钦的东路军火速向南京集中。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Благодатов А．В．）曾向蒋介石建议，第六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复元，应该暂留南京，为蒋拒绝[465]。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左派曾向第六军进言，为巩固革命的新根据地，发展革命势力起见，不可轻离南京[466]。第六军密电程潜请示，程复电不得渡江。不幸，程电被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截获。其间，鲁涤平也知道二期北伐尚在计划中，蒋介石此举，必系排除异己，别有他图，急电武汉请示，但未能打通。这样，第二军和第六军的大部分都被派北上，留守的少数第六军战士被包围缴械，南京完全落到了蒋介石手中。

武汉政府虽然下了逮捕蒋介石的决心，但是，并不感到政变迫在眉睫，还在准备北伐，并订于4月5日誓师，同时庆祝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和沪宁克复。4月1日，军事委员会对全体将士训令称："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切的任务，便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467] 4月4日，程潜到汉，报告了上海方面准备"清党"的情况，李富春也密电陈述蒋介石、何应钦即将来宁建立政治组织的消息。这样，武汉政府才紧张起来。当日以"筹备尚未就绪"为理由，宣布将北伐誓师典礼展期[468]。4月7日，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势力之新发展及应付目前革命之需要"，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南京，迁移日期另行决定。会议指定顾孟馀、邓演达、谭平山三人负责迁都的宣传工作，下令军事委员会制订以南京为中心的作战计划[469]。当夜9时，军事委员会开会，决定军事进行计划。

武汉政府决定迁都的理由，据孙科、谭平山等人所述，基于五个方面：一、对付帝国主义。武汉政府认为，英、美帝国主义正联合日本，准备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封锁上海、南京、天津等口岸。武汉政府必须先发制人。迁都南京，坐镇南京，帝国主义就不敢明着进攻。二、统一外交。武汉政府感到，地处武汉，不便于“对付长江下游的外交”。三、掌握财政。长江下游是富庶之区，迁都有助于控制下游财政。四、团结下游革命力量，控制蒋介石[470]。五、沿津浦路北伐。武汉政府认为，京汉路北伐有确实把握，必须将注重点转移至津浦线。在上述五项理由中，最主要是第四项。8日，常务委员会听取孙科的说明。孙科慷慨激昂地表示：“帝国主义与残余军阀勾结，将革命转为反革命，所以为应付外交，要下一决心，拼命移至南京。”“全体送去受压迫，看蒋介石有无决心？”[471]孙科的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议决定接受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当日，举行了东下的誓师典礼。

武汉政府这次确实准备行动了。

据吴玉章等人回忆：当时，武汉政府已决定派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去加强南京的防御，支持上海的革命力量。军队中迅速作了动员，运输的船只和粮秣枪弹都已准备就绪。4月9日，第四军登轮，准备东征。同时武汉方面命令第六军留在南京，不要听命于蒋介石。又命令已进至长江北岸的第二军回师南京，协同第六军卫宁反蒋。但是，就在此刻，有人提出，不应该把铁军调到南京去。理由是：一、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二、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一定要扣留汪。（事实上，汪精卫已于6日启程来汉。）参加会议的共10人。瞿秋白、邓演达支持吴玉章的意见，加伦将军也表示：“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但是，与会者大多数不同意吴玉章的意见。第四军登轮的当天，就得到在船上待命的通

知。11日，又得到命令退回原地[472]。第四军、第十一军东下的计划就这样搁浅了，迁都南京的决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吴玉章说："假使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调去南京，长江下游左右派的力量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但是，事实上，第四军东下的决定也已为时过晚。在武汉政府作出有关决定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政变。在一场紧张的争夺时间的赛跑中，武汉政府落到了后面。

武汉国民政府的动摇和共产国际有关。当年3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在莫斯科报告称：只要蒋介石暂时尚未变节，"能积极的进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473]。同月31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发表文章称："国民党内的分裂和工人阶级与革命军士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在目前绝无可能"，"像蒋介石这样的一位革命家不会去和反革命的张作霖合作行动。"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称："既然我们有多数，既然右派听从我们，为甚么把右派赶走？只要有用场，农民连一片疲蹶的老马也需要，他不把它赶走。我们也一样，等到右派对我们没有甚么用场，我们就把它赶跑。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它有的是能干的人，这些人尚率领军队且指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474]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对中国革命作出正确的指导。

和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共产国际比较，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上海区委，对形势的认识要清醒一些。

3月25日，陈独秀在特委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

作。”[475] 26日，罗亦农在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476] 同日，蒋介石来到上海，区委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指出“蒋来别有用心”，“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账”[477]。这些地方，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晰地看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3月下旬，陈独秀、彭述之、周恩来、罗亦农等研究以后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周恩来并提出，薛岳很可能站过来。但是，陈独秀不敢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要求彭述之去武汉和共产国际代表及多数中央委员商讨。4月初，彭述之过宁时，召集李富春、李世璋及南京市委书记谢文锦等会议，会上，一位苏联顾问从军事力量上作了分析，大家一致要求立即向蒋介石进攻，并要彭述之代表中央下攻击令。彭述之答称：“这个问题太重大”，“必须中央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决定。”[478]

这一时期，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采取的第一项对策是扩大反帝运动，实行总同盟罢工，收回上海租界。3月26日，陈独秀在区委会议上提出：“号召反英，要蒋反英”，“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479] 同日，区委在活动分子会议上部署：“所有华租各界一切工厂办事人员都罢下工来，要使租界死寂，不能不交还租界。”[480] 陈独秀等幻想以激化民族矛盾的办法缓和阶级矛盾，迫使蒋介石追随群众斗争。他认为，倘使蒋介石镇压工人，将完全失去群众的信仰，政治生命也将结束。27日，汪寿华根据区委指示，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工会今后在政治上的责任，其第一条即为收回租界[481]。但是，陈独秀等并不敢贸然实行。28日，陈独秀又提出，罢工先决条件是“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482]。29日，汪寿华在欢宴北伐军将领时声明，收回租界“应由民众组织的国民政府来解决，决不是我们工人的意旨如何就如何的”[483]。此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学联等团体都曾为收回租界做过舆论准备。3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号召“对英经济绝交”[484]。4月3日，上海对南京惨案

各团体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反英帝国主义大同盟[485]。这个大同盟在10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已是政变的前夜了。

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采取的第二项对策是保存工人武装。区委决定将工人纠察队的大部分兵力集中于闸北湖州会馆与俱乐部，严阵以待，以防御战对付右派军队的进攻。罗亦农说："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486]即指这一计划。3月31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采取退却方针，电报说："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487]罗亦农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强烈不满，愤怒地将电报摔在地下。4月6日，他在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488]。罗亦农的态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宁折不弯的英勇斗争精神，但是，蒋介石拥有压倒优势的武装力量，少数工人纠察队不可能守住几个孤立的据点，更无从防止政变。在报告中，罗亦农还提出了一个"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的计划，主张"尽力拉住商人，积极帮助工人"，"使学生明了争斗的意义"，准备罢工罢课，"如果蒋介石来缴纠察队的械，所有工人都罢工，到华界来援助，缴蒋军的械"[489]。这一计划自然比死守据点，被动挨打略胜一筹，但是，以群众的血肉之躯和武装军队对抗也并不现实。报告中，罗亦农还提到："如果上海的工人能与江、浙、武汉左派势力联合，一致把新右派势力打倒，则中国革命运动前途将大放光明，而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490]这不失为正确的方针。但是，要执行这一方针，必须和武汉国民政府统一步伐，做大量的工作，也已经为时过晚了。

中共上海区委曾企图寻找联盟力量。军事方面，区委决定挽留薛岳师长驻上海，选派工人参加薛师，并将薛岳选入闸北区政府和上海临时市政府。3月24日，上海总工会致电蒋介石，表示对薛师他调无任骇异，要求命其"坐镇沪上"[491]。随后又召开5000人的集会，并

组织群众代表200人向白崇禧请愿[492]。区委企图以此和薛岳在军事上建立同盟。此外，周恩来还出面做过刘峙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人的工作。

政治方面，区委企图以上海临时市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联盟力量。3月20日，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拿住”市政府，有人辞职，即尽量以小商人加入。“造成工商政府，由CP操纵”[493]。4月1日，区委提出，市政府“无论如何要办事”。3日，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议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请其即日电饬上海市政府委员，立即办公[494]。4日，上海市政府委员召开第二次会议，补选王晓籁、孙科、汪寿华为常委，王晓籁为主席，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上海临时市政府于8日通告，“依法行使职权”[495]。10日，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政纲107条。中共上海区委的意图是“以市政府与蒋冲突”[496]，但是，上海临时市政府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并不足以和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为了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建设，显示保卫这一支工人武装的决心，上海总工会于4月6日举行纠察队授旗典礼，罗亦农发表演说，指出“现在上海不少反动分子从中捣乱，工人纠察队须一致起来，消灭一切反动派”[497]。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敬告全上海市民书》，声明“对此区区之工人武装，实有绝对拥护之必要”，同时表示，“本会之纠察队，可以使商人得不少之利益”，力图使上海资产阶级放心[498]。7日，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议决倘有破坏本会纠察队的行动，“全上海工人当起而一致拥护（纠察队），以群众之行动制止之”[499]。与总工会相呼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于9日议决，凡背叛、破坏革命原则，助长帝国主义势力，为反动派张目者，誓以革命手段，严讨而歼灭之[500]。

武装的政变必须以武装的军队或武装的群众来制止。上海总工会等团体的上述会议、措施，可以争取群众，振奋精神，但都不足以制止政变。

上海的形势日益紧急，远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自然缺乏切肤的感受。4月上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连续三次会议，讨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大约是在10日的会上，维经斯基认为蒋介石“有办法”，罗易也认为蒋介石“还有办法”，主张国际代表团中一人去上海会见蒋介石[501]。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声称如果这样做，“我们一定把他禁锢起来”。会议最后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决定沪区工作计划，报告中央。4月13日，罗易又致电蒋介石，声称“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表示“将乐于访问南京”[502]。而在这前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

五　“四一二”政变

上海工人阶级做好了战斗和牺牲的准备，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阴谋和欺骗。

蒋介石到上海后，多次肯定工人纠察队的合法性。3月27日，蒋介石对记者称：“他们如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己。”[503] 28日，在会见上海总工会代表时又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504]。30日，又对日本记者表示，纠察队“系工人自卫上所必要者”[505]。4月6日，工人纠察队举行授旗典礼，他赠送“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示鼓励[506]。蒋介石企图以这些做法麻痹中共和上海工人阶级，同时，则磨刀砺刃，准备动手。4月8日晚，蒋介石觉得一切就绪，便离开上海，前往南京，让白崇禧放手行动。

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颁布《战时戒严条例》12条，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和周凤歧为正副司令。11日，杜月笙派人持帖邀请汪寿华到杜公馆赴宴，商量“机密大事”。当夜，汪寿华被害。同日夜，杜月笙亲自拜见工部局董事费信惇，为流氓、打手取得了通过租界的许可。12日晨，各处流氓、军队按照预定计划同时动作，向

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

上海总工会会所设于闸北湖州会馆。当日4时，约有六十余名便衣，臂缠工字袖章，向会所放枪。工人纠察队被迫抵抗。不到10分钟，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到，缴去所有便衣的枪械，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热情招呼士兵入内吃茶抽烟。第二十六军团长邢霆如邀请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去师部商议解决办法。行至半途，邢团长突然变脸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于是，士兵立即卸下了顾顺章及随行队员的枪械。邢团长随即要求顾顺章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员缴械，遭到拒绝。邢团长便改令纠察队将枪架好，后退三步，并用机枪瞄准。纠察队员无奈，只好照办。至此，总工会即被占领。

商务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地。5时20分左右，有身穿党军服式，臂缠工字符号的二三百人向俱乐部冲锋，击毙纠察队副队长杨凤山。工人纠察队奋勇抵抗。8时许，第二十六军派第五团前来，携函称："贵处与某方发生误会，此种不幸之事件，应即双方停战（吹号为记），敝部特派第五团邢团长前往调停，如有某一方面不服从调停者，即解决某一方面，调停时间以11时为限。"邢霆如要求纠察队派代表前往总工会交涉。正谈判间，周恩来赶到，表示可负全责，即随邢至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507]。在那里，周恩来严词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在此期间，邢霆如回到俱乐部，召集工人谈话，宣称第二十六军系"民众之军队"，保证不缴纠察队的枪，要求派一连徒手士兵与纠察队徒手游行，"表示切实联络"。在纠察队出发游行时，该团即乘机入内，占据俱乐部。

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是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当日5时，有六名便衣手持盒子枪自租界出来，向印刷所冲击。正在双方对射之际，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来，大喊："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随即令守卫开门谈话，一拥而入。

除上述地点外，闸北天通庵路栖流所、南市华商电车公司、三山会馆、浦东、吴淞等处的工人纠察队，也都受到流氓、军队的围攻，陆续被缴械。总计当日纠察队牺牲120多人，伤180多人，被缴步枪3000余支，机枪20挺，手枪600余支。事后，白崇禧、周凤歧等张贴布告，诿称工人械斗，为保障“地方安宁秩序”，“不得不严行制止”，企图以墨写的谎言掩盖真相。但是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师长伍文渊当时就对《新闻报》记者承认，此次行动“系因白总司令奉蒋总司令密令”[(508)]。1933年，白崇禧在一次演说中交代了其中底细：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了“清党”任务后，即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他之所以派便衣队暗藏短枪，假扮工人进攻，是为了“出其不意”[(509)]。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上海总工会立即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声明“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本会至此，惟有宣告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本会所领导八十余万工友，誓死奋斗”[(510)]。同时，通电全国，说明有关情况，电文沉痛地说：“此等举动在帝国主义军阀为之，吾人亦视若寻常，今乃竟由革命之北伐军对于革命之工人纠察队为之，实为国民革命之污点，吾工人甚为耻之。”[(511)]

当日上午，由济难会发起，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市民大会，提出交还纠察队枪械，肃清工贼、流氓及一切反动派，保护工会等五项要求。会后，工人齐往湖州会馆，要求交还总工会会所。“不顾性命，号哭冲进”。同日，原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迎汪复职大会也临时改变主题，由主席团提议去龙华向白崇禧请愿。白崇禧托词公务忙碌，由秘书主任潘宜之接见代表，数万群众则鹄立于门外。在群众浩大声势的压力下，潘宜之接受了代表们提出的部分要求，实际上不过是虚与委蛇，旨在欺骗群众散去[(512)]。这一天，浦东、沪西工人因参加南市大会被阻，只能分头开会，决议罢工。

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由于军

队沿途堵截，仅闸北工人到会，但人数仍达10万人左右。赵世炎、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会后整队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发还枪械。行至三德里附近，突有兵士多人从各里弄内冲出，向群众开枪，旋复用机枪扫射达十五六分钟。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士兵们在街上横冲直闯，如疯如狂，逢人即打，遇旗即撕，群众当场伤毙约百人[513]。

事后，刽子手们为了掩饰罪行，将上次俘获的直鲁联军俘虏数十名押解游街，前导大旗，指为总工会通敌证据，声言工人及直鲁军围攻司令部，士兵不得已而自卫。但是，这种欺骗同样不能遮住人们的眼睛。郑振铎、胡愈之、周予同、李石岑等人当时住在闸北，目睹惨剧，于次日致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三人，愤怒抗议："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三一八'案段祺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郑振铎等要求：一、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士兵，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二、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三、在中国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郑振铎等沉痛表示："党国大计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观此次率兽食人之行为，则万不能苟安缄默。"[514] 15日，《时报》以《闸北居民致政治委员会函》为题，刊登了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

屠杀后，白崇禧即派兵重占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下午3时，工界联合会的董福开等人赶来，殴打并驱逐原总工会职员，霸占文件、印信，宣布奉白崇禧面谕，将上海总工会与工界联合会一律取消，成立上海工联总会。4时，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也再次被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其他进步组织、团体纷纷被取缔。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封，十余名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被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被陈群、潘宜之、吴倚沧、罗家伦等武装接收；学联、各界妇女联合会被改组；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被关闭；中国济难会被占

领……

“四一二”政变立即了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欢呼。4月14日，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联名通电，宣称：“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域，干净之土，蒙此秽污。同人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产凶魔，以免遗害子孙。”[515] 日本报纸发表文章称：“上海政变固然意味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之决裂，同时亦意味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一目的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孙传芳与蒋介石一派，除此问题以外殆无相争之理由。”[516]

六　四川、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地的拥蒋反共活动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四川、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广西各地先后发生拥蒋反共活动。它们既加强了这一政变的声势，又是这一政变的实际组成部分。

（一）重庆“三三一”惨案与刘湘进攻泸州起义军

刘湘在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一军军长后，有一段时期，和重庆莲花池左派省党部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左倾姿态很迷惑了一些人。川康督办衙门前经常有无数民众结队请愿，男女学生们更直接称他为“刘同志”。但是，刘湘担心左派会挖他的“墙脚”[517]，当他摸清楚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有左右派之分时，就迅速和右派勾结起来。

自1927年1月起，刘湘和蒋介石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刘湘派往蒋处的有军法处长李子骏，蒋介石派往刘处的有川康政治宣传员黄明豪和一批黄埔学生。黄向刘湘传达了蒋介石对四川将领的希望，刘湘则表示“愿效前驱”[518]。3月5日，右派卢师谛密函张静江、蒋介石，声称“川中党务，全操共派之手，三民主义已失领导群众之权与地位，惟今犹可救，缓则无及”。他要求张、蒋二人“毅然断然，忍痛一

割”，自称“尚能以川省多数之力，为诸兄后盾”[519]。16日，蒋介石所派四川宣慰使吕超和四川党务特派员向育仁（传义）到渝，和刘湘“商洽一切”。23日，蒋介石再派戴弁到川。通过这些往来，刘湘得悉蒋的反共意图，待机而动。

当时，正值南京事件之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并游行示威。消息为刘湘得知，立即密报蒋介石，蒋电复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520]。3月30日，团阀曹燮阳约集江北、巴县、綦江、南川四县联团首领及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密商反共[521]，同日，刘湘指使师长罗仪三恫吓杨闇公，要他取消预定的大会。次日晨，又派人利诱：“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音。”[522]这些，都遭到杨闇公的拒绝。

31日，会议按计划在重庆打枪坝广场举行，参加民众、学生约二三万人。在会议即将开始之际，王陵基和曹燮阳等预伏在会场里面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刀枪并举，“对着那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小孩子，杀，打，射击”[523]。总计，当场被打死、踩死者约达五百多人，其中身穿童子军制服的小学生约二百余人，工人代表五十余人[524]。有些女学生被打死、踩死后又遭到侮辱。亲历者记述说：“于是他们又动起手脚来了，几撕，几拉，几翻，几跌，居然就把她们剥得精光”，“他们狞笑着，踢弄着，好似别饶风味。她们的阴户，有被贯入石子的，有被贯入甘蔗头的。”[525]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反动派们却感到兴奋。有一封报告曹燮阳的信说：“将乱党打死七八十人，带伤者不暇计及。内中惟学生占多数，甚有女生衣裤多被撕毁，竟成裸体者。似此惩创，实系痛快！”[526]反动派们就是这样地丧失人性。

当日，刘湘和王陵基出告示说：“本日市民大会，工学冲突，已派兵弹压矣。”

在打枪坝实行疯狂屠杀的同时，刘湘又派人到莲花池省党部、省

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中山、中法等学校进行搜剿。左派陈达三、冉钧等先后被杀，漆南薰的尸体被砍成数段，扔在路旁。杨闇公于4月3日启程赴武汉报告，4日被捕。刘湘、王陵基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共同审讯他，杨闇公坚毅不屈，表示："我头可断，志不可夺。"6日，被割舌，挖去双眼，剁去双手，连中三弹，壮烈牺牲。

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联名通电，指责武汉国民党中央："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也。""所谓统一势力者，统一于异党，而非统一于本党也。"电报称："值此是非未明，群言淆乱之际，尤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国救党之运动。"[527] 自此，四川再度沦入黑暗统治之下。

同月13日，刘湘组织川黔联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用28个团的兵力进攻泸州。20日，刘伯承和起义军各路司令致电武汉政府，呈请讨伐刘湘，表示"愿率所部，报命前锋"[528]。同时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5月上旬，在吴玉章等的推动下，武汉政府任命泸州顺庆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以刘伯承为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但这并不能解决起义军的任何实际问题。5月12日，刘湘自任总指挥，增调军队，加紧进攻。泸州起义军至此已坚守一个多月，弹尽粮绝，陈兰亭、袁品文等也发生动摇。16日，刘伯承等三人缒城撤离，辗转奔赴汉口报告。23日，起义军乘夜突围，泸州陷落。6月初，起义军到达贵州桐梓，陈兰亭将队伍拉出，投奔杨森，袁品文等余部为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

（二）杭州"三三〇"、"四一一"与宁波"四九"事件

正像许多地方一样，浙江省也存在着两派工会组织。

杭州总工会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拥有产业工人约二十万。但是，杭州还有大量职业工人，如泥水、木匠等。1927年春，

蒋介石派陈希豪等将这部分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职工联合会，也达到四万人之众。他们大部分是东阳人，后来，温台帮工人也参加进来，声势更大[529]。该会负责人张浩原是旧国会议员，后依附陈果夫。其他负责人不是官僚、旧军人，就是讼棍、鸦片鬼。当年3月，张静江从南昌回到浙江，通知陈希豪等已决定“清党”，并给予陈等以经费支持[530]。

3月28日，浙江省党部函请省政府转令公安局解散职工联合会。29日，政务委员会决议接受省党部要求。30日，职工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到火腿、柴炭、泥水等33个工会，号称10万人。会后游行，一路毫无阻碍，显然事先得到军警当局的默契。行至杭州总工会门前时，突然有一部分人手持木棍，闯入捣毁。因总工会已有戒备，双方对敌，受伤五十余人[531]。事后，职工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又围攻了浙江省党部。次日，杭州总工会、杭州学联、各界联合会、总商会等团体决定罢工、罢市、罢课，发动10万人游行请愿。途中，巡警及驻军开枪阻止，捉去工友三四十人。当晚，工人派代表向省政府、省党部请愿，提出撤换公安局长章烈、解散职工联合会、发还纠察队器械、惩凶等五项要求[532]。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杭州留守主任罗为雄派队到总工会，收缴纠察队的铁棍、长枪、刺刀等物，出告示称：“该工会纠察队，行为横暴，秩序因之紊乱，实属扰乱后方，应即解散，以维公安。”[533] 4月1日，被拘工友陆续释放。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

4月10日，章烈自沪返杭，奉密令，查办各机关“反动分子”。11日，全城戒严。职工联合会“工人”会同士兵进入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搜捕查人伟、丁济美、戴学南等，押出游街，一路高呼“打倒把持政权的跨党分子”等口号[534]。当日，共捕32人。宣中华避至上海，在车站被第二十六军捕杀。同日，总工会及纠察队均被解散。

杭州发生政变的同时，宁波也发生类似事件。

4月9日，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下令戒严，派兵分头驻守宁波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及民国日报社，同时传讯报社经理庄禹梅。宁波市政府、党部、总工会、商会等派代表质问王俊，王竟将代表扣留。当夜，王派出武装士兵将党部、总工会、农协等团体一律解散。10日，铁路总工会、海员工会等组织宣布罢工、罢市、罢课，召集市民大会。王俊派兵向到会工人及纠察队开枪，击毙三人，重伤二十余人，捕三十余人。同日，王俊也召集所谓市民大会，但到者仅一二百人，当场宣布：改组市党部；将总工会改为工人同盟会；组织“人民裁判会，审判被捕诸人”[535]。

宁波事件是蒋介石直接操纵的结果。行动前，王俊曾赴沪向蒋介石请示[536]；事后，又致电蒋介石报告：宁波“反动派”鼓动总罢工，“图行暴动”[537]云云。

（三）福州“四三”与厦门“四九”事件

国民革命军入闽后，左右派都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左派掌握着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民众运动委员会、福州学生联合会、店员总工会，以《民国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省党部筹备处宣传部主任委员马式材、工人委员会主任李培桐、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徐琛、《民国日报》编辑主任潘谷公等。右派掌握着临时政治会议、福州市县党部筹备处、福州总工会，以《求是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政治委员会委员黄展云、前独立第三师师长林寿昌等，此外，右派并形成了独立厅同志社、参谋团，青年奋进社、晶社、国民党青年俱乐部等小组织。1927年3月4日，在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共产党员戴任主持下，东路军各级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和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负责审查民众团体备案，解决民众团体纠纷等事宜。左派的这一决定堵塞了右派假群众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路子，因此，遭到强烈反对。

3月8日，在方声涛、冷欣等人策划下，福州总工会集会并游行，

要求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解散店员总工会等左派团体，驱逐马式林、李培桐、潘谷公、徐琛等“四凶”。同日省临时政治会议分会议决，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职权及马式材等人职务。右派的这一决定也遭到左派的强烈反对。9日，店员总工会联合四十多个团体举行拥护党权大会，公推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主持会议，呼吁各界支持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要求省临时政治会议解散福州总工会。会后游行时，林寿昌等指使暴徒数十人，持枪械冲击，殴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共产党人江削五。此后，右派即连续秘密会议，派遣周一志、冷欣、方绍美等人赴各地联络，策划反共。

4月3日，福州右派总工会等团体，召开拥护蒋介石及护党运动大会，方声涛任主席。会议议决16条，主要为：一、拥护蒋介石在军政时期行使全部职权；二、肃清跨党分子；三、取缔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策之口号、标语、传单、出版物；四、惩办破坏福建党务，“扰乱北伐后方”的戴任、马式材等人；五、改组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六、收回《福建日报》。会议还决定组织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公举谭曙卿、方声涛、林寿昌等为委员[538]。会议进行中，新编第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等五人挺身而出，登台指责会议“淆乱群众听闻，实为西山（会议）派捣乱北伐后方”。方声涛恼羞成怒，命人捆缚方毅威，宣布“反动派应枪决”，台下哄然举手。混乱之间，四人逃走。右派总工会的纠察队在方毅威的背上插上纸旗，大书共产党三字，于散会后拥令游街，在行至万寿桥时，用手枪击毙，抛尸江中[539]。当夜，谭曙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全省戒严，以谭为全省戒严司令，张贞为福州戒严司令，同时议决派出侦探、军警进行搜捕。6日，由福州市党部筹委会主任、右派黄展云出面兼任省党部筹委会主任，《福建民国日报》被迫停刊到9日，改名《福州民国日报》。

面对右派的凶焰，中共福州地委曾于3日晚商讨对策，决定于次日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声讨右派。4日上午在店员总工会集议，计划

召集工人游行，被谭曙卿派部队解散。随后，福州地委书记徐琛、宣传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长陈兴钟三十余人先后被捕。

继福州之后，厦门于9日发生政变。

8日夜，方声涛、谭曙卿密电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令其逮捕共产党员和工、农、青、妇等团体领袖。9日，由“建筑总工会”出名召开拥蒋护党大会[540]。会后，林国赓即派军警搜查厦门总工会，逮捕正副委员长罗扬才、杨世宁，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逮捕该会主席黄树埔（以上三人均为共产党员）。当日晚，有四五百人到海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罗、杨等人，被林国赓下令驱逐。11日晨，军警手持“扰乱公安，格杀无论”的旗帜，游行街市。

（四）南京“四九”、“四一〇”事件

江右军攻克南京后，蒋介石即委派温建刚任公安局长，杨虎为特务处长，帮会头目、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陈葆元为特务员，加紧准备镇压革命力量。同时，中共上海区委也力谋协助国民党左派掌握南京，发展革命形势。南京成为双方必争的要地。

3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上提出：“南京非常重要，省党部赶快迁去。”[541] 4月2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自上海迁宁，与左派南京市党部计议，加紧党务、政治各方面的工作。5日，省、市党部在金陵大学召开党员大会，通过拥护武汉中央，拥护三大政策等21项议案[542]。即在此时，东路军入城，有人称奉蒋总司令命令，另组市党部。第六军政治部当即予以查封。同时，又有所谓劳工总会出现。该会系陈葆元等以每人两块银元的代价收买流氓所组织。第六军政治部接受省、市党部要求，准备查封，但温建刚即出面保护，声称劳工总会是真正的工人团体，总司令准许组织的[543]。6日，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举行筹备会议，推选李富春、李隆建、张曙时、侯绍裘四人为筹备委员，决定于4月11日成立省政府。同日，农

协开会，但公安局随即布告，各界如集会，须经公安局核准，否则即予取缔[544]。

左派们感到了局势的严重。4月8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及少数军人到场，第一军无人参加。会议决定严厉处置伪市党部和劳工总会。当日下午，省党部宴请各军、各机关长官，侯绍裘与温建刚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训话。侯称："现在反革命派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当秉总理遗训，继续工作。"温称："如有发现违背三民主义及妨碍革命工作者，当以权力手段，扫除一切障碍。"[545] 同日深夜，侯绍裘召集省党部常委和监察委员会议，提出要作好准备，防止蒋介石的突然袭击[546]。9日，原订召开欢迎汪精卫复职大会，因蒋介石于当日到宁，临时改为欢迎大会。下午开会之际，陈葆元率领劳工总会的流氓，口称"奉蒋总司令命"，先后捣毁省、市党部及总工会，将戴盆天、黄竞西、张曙时、高尔柏等二十余人绑架，送入公安局。正在开会的群众得到消息，决议到总司令部请愿，要求保护省、市党部及南京市总工会，封闭劳工总会。10日，江苏省党部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提出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委员会审判、武装工人纠察队自卫、释放张曙时等7项要求。会后整队到总司令部请愿，派刘重民等六人为代表同蒋介石交涉。自上午10时至下午3时，群众在风雨中等候了五个多小时，代表出来报告说，交涉毫无结果，蒋称："此时皆是民意，无所谓有真伪。"[547] 下午5时多，突然拥出一批流氓向群众大打出手，同时警卫用排枪射击，便衣匪徒以短枪响应，计打死请愿群众数十人。当夜，省市党部、市总工会等团体的共产党主要负责干部集会，商议应变措施，突遭包围，侯绍裘、刘重民、谢文锦、陈君起等被捕。蒋介石企图以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收买侯绍裘，侯严词拒绝，被活活戳死，装入麻袋，抛入秦淮河。刘重民及女共产党员张应春等同时遇难。

（五）广州"四一五"大逮捕

上海反共会议召开后，李济深、古应芬诸人即匆匆回粤。4月14

日，李济深、古应芬、徐景唐、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陈孚木等议决，于15日戒严，搜捕共产党人，收缴工会纠察队枪械。同时，任命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督同公安局长邓彦华处理一切。

15日凌晨2时，广州紧急戒严。钱大钧首先派出军队控制电报、电话，随即包围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等地，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等地则由公安局派保安队搜索，总计逮捕二千一百余人。以工人占多数，其次为学生，仅中山大学一校就捕去学生四十余人。逮捕者并不熟悉被捕者的情况，邓彦华不得不致函孙文主义学会、机器工会等右派组织，要他们派人前来指认。结果，发现其中居然有“极端信仰总理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工友”在内[548]。黄埔军校是李济深的清党重点。事前，他对方鼎英说：“黄埔已经共产化，要用武力解决。”方担保不会出问题，可不必动用武力。当日学生队紧急集合，宣布共产党人名单，按名逮捕，其中不少并非共产党员，最后共逮捕近五百人[549]。

同日下午，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等会同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组织特别委员会，执行广东党务、政治、军事最高权力，以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为特别委员，黄居素为秘书长。当日决定成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军政督察委员会及宣传委员会。据称：民众运动委员会的任务为统一民众运动，使一切民众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军政督察委员会的任务为侦察并惩治一切反动分子；宣传委员会的任务为主持一切宣传事项，检查报纸及一切书籍、印刷品。会议通令各级党部限三日内将共产分子检举，同时限令CP及CY分子于十日内到军政督察委员会自首。会议并决定以古应芬代理财政部长及广东财政厅长，以原中央银行副行长黄隆生代理中央银行行长，派陈孚木接管《广州民国日报》，曾养甫接管《民国新闻》。16日，钱大钧宣布：“所有一切集会结社，非得本司令许可，不得擅自开会。”[550] 17日，省农民协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妇女协

会、全国总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被改组。

广州的大逮捕、大检举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军政督察委员会下令组织工人检举委员会。黄埔军校也组织了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凡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的，“平时吵嘴闹事的”，均被视为共产党员，属于检举之列。有些非军政机关，任意逮捕人民，擅自讯办，迫使公安局不得不出面禁止。22日，刘尔崧、李森、萧楚女、何耀全、毕磊、沈春雨、刘剑雄、邓培、容保辉、陈辅国、熊锐等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其中，何耀全被装进麻袋，投入白鹅潭。

继广州之后，汕头也于16日发生政变。当地驻军武力接收市党部、总工会等27种组织，封闭岭东日日新闻社，同时下令逮捕杜国庠、李春涛、杨石魂等四十余人。

政变之前，在广州的中共党人有一定警觉。4月1日，中共海员工会党团书记陈郁专程到上海，向陈独秀提议，组织以南方海员工人为主的总同盟罢工，然后号召全国其他行业工人响应。陈独秀认为这样做“会把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551]。此后，中共曾准备组织黄埔学生教导团、军官训练班、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进行抵抗，“背城一战”[552]。4月13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全市党团负责干部紧急会议，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提高警惕，准备战斗[553]。14日，李森、刘尔崧、何耀全又在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召开各工会领导人特别会议，决定发动总罢工，组织工人自卫队[554]。但是，政变“来得太快，无从集中力量”[555]，只有奉命进抵西郊的农军和部分铁路工人进行了抵抗，因寡不敌众而失败。22日，在陈郁和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的领导下，广州部分工人举行政治总同盟罢工，抗议广州当局逮捕、杀害革命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海员工人们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的横幅在中山路等地游行[556]。23日，广州当局处决了散发传单、鼓动罢工的周翼华等五人。报载：“三男犯不发一语，且无畏惧之色，而两女犯皆属妙龄少女，装束时髦，毫无瑟缩之态，且沿途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种

种口号。”[557]

广东清党之后，往日蓬蓬勃勃的气象消失净尽。6月13日，陈可钰致胡汉民函称：“当事者往往不择手段”，“劣绅土豪以为是他世界”，“今日之现状，如以十五年眼光观之，是开倒车也。”[558]

（六）广西清党

上海反共会议之后，黄绍竑本拟和李济深一起回南，但蒋介石认为有李济深就够了，李宗仁也邀黄协助在第七军中清党，于是，黄绍竑便留了下来[559]。他打电报给广西黄旭初（第七军参谋长兼旅长）、黄剑鸣（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黄华表（省党部委员，代宣传部长）、朱朝森（省政府秘书长）等四人，要他们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组织清党委员会，可以权宜行事，不必遇事请示。同时，命刘日福旅派兵全力进攻东兰韦拔群所领导的农民武装[560]。

黄旭初接电，立即组织九人清党临时委员会。其成员为黄旭初、朱朝森、黄华表、黄剑鸣、伍廷飏、吕竞存、蓝呈琪等，又指定龚杰元、黄华表、伍廷飏、黄同仇等为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的分区代表。

4月12日，黄旭初等开始行动，逮捕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梁六度、雷沛涛、曾天壮、陈立亚、周仲武，国民党南宁市党部委员冯荫西、邓哲等。7月，黄华表提出，要在全省洗监，将在狱的人全部杀光，因伍廷飏等反对，决定择要处决。9月1日，雷沛涛、邓哲、梁六度、雷天壮、陈立亚，周仲武、梁西园、冯荫西、梁砥等13人牺牲[561]。当时广西共产党员很少。据黄绍竑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凡是过去反对政府的，只要不是容县人，不经过审讯就杀害了。”[562] 7日，在梧州逮捕一百余人，在南宁杀害12人。10月9日，邓匡等14人牺牲。

（七）云南内争与龙云“清共”

“二六”政变后，云南形成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联合统治的局面。

政变后，云南先后成立了三个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设立于法政学校内，被称为“法政党部”；右派设立于圆通街，被称为“圆通党部”；龙云舅子李培天成立的省党部设立于议会大楼，被称为“舅子党部”。5月7日，龙云派兵查封左派省党部及省农协，逮捕共产党人、省农协主席李鑫、省工会负责人黄丽生及国民党左派王复生等人。

在四镇守使中，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长的胡若愚自认资历较深，首倡倒唐，对龙云占据昆明不满；龙云年岁居长，其兵力达3万余人，实力在各镇守使之上，对只获得省务委员会委员也意有未足。二人矛盾日深[(563)]。6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之际，胡若愚派兵包围龙云住宅，逮捕龙云，囚禁于铁笼中。史称“六一四”政变。7月1日，胡若愚宣布云南“易帜”。

龙云虽然被囚，但其部队依然存在。龙云的表弟、亲信旅长卢汉等人乘夜逃出城外，集结部队，并请出滇军老将胡瑛暂代第三十八军军长，率军东下反攻。双方在祥云县清华洞、云南驿一带激战，胡若愚、张汝骥部不支，败守禄丰。卢汉攻城，旬日不下。胡瑛乘机率部直指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龙云撤离，到达昆明东郊大板桥时，将龙云释放。胡部南退至昭通，张部绕道退到曲靖。

8月13日，龙云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同月，蒋介石派李宗黄以中央驻滇代表身份到达云南。1928年1月17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同日，龙云成立清共委员会，大规模地镇压云南共产党组织。

七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政变之后，紧接着的节目就是在南京召开中

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蒋介石的这一目的虽然部分达到了，但是，情景却相当冷落。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期订在4月15日。14日，开预备会，以胡汉民为主席。15日，因人数太少，改称谈话会。萧佛成提出八项主张：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汉口伪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五、通缉捣乱分子；六、恢复十五年七月所订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七、以武力征讨奸党；八、通电报告。当日，并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致电中央常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克日赶赴南京[564]。17日，根据胡汉民建议，另换名目，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柏文蔚、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石曾、蔡元培九人出席，以吴稚晖为主席。他声称："自南昌、武汉间发生中央地点问题以后，武汉以中央自居，其决议案及命令中发见多量危害国民革命之行动，因此经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举发案以后，确认南京有继续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之必要。"[565] 蒋介石称：总理北上时，因北京时局紧张，曾加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数人，在北京开会。现在武汉之中央同志未来，北伐方在进展，客观的需要与总理北上时相同，请加派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9人为委员。吴稚晖又称：应时局之需要，国民政府应即开始办公。本席提议国民政府于本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议决通过。

会议决定：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以吴稚晖暂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并以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为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指导员。

同日，召开第七十四次会议，到陈铭枢等11人，以胡汉民为主席。会议决定组织以吴稚晖为首的中央宣传委员会，胡汉民为首的组织委员会。同时通过吴稚晖起草的《奠都南京宣言》、蔡元培起草的《接受监察委员会宣言》。会议并通过李石曾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

[566]。开过这两次会议，算是从法理上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原江苏省议会为办公地址，即在议会门外举行成立典礼。台上横额称："建设民主政治"，两旁对联称："人民平等，世界大同。"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接着，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党权"大会。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李石曾、蒋作宾、蒋介石等相继演说。胡汉民称：建都南京，是为实现总理的精神和意旨，"在国民党之下，无论何人，须服从党义，认定党以外无党，而党以内更不能有其他之跨党分子捣乱"[567]。会议通过八项提案，有"请中央执、监联会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请全国国民一致打倒谋害三民主义的、欺骗无产阶级的、扰乱北伐后方的共产党"等，显示出这个新成立的政府将反共列为首要任务。会后，举行了游行和阅兵式。

当日发表的文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以及蒋介石的《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告全体民众书》等。这些文件除宣称"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造成新世界之唯一工具"外[568]，主要篇幅均用于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不惟自绝于党国，抑且自绝于世界"[569]。《奠都南京宣言》称："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凡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蒋介石《告全体民众书》称："政治不是群言庞杂，莫衷一是可以解决的，必须有一般艰苦卓绝的人，抱一种审慎考虑适合国家情形的主张，统一坚强的意志，作联合的战线，才可以产生出一点良好的结果。"[570]这就说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以"建设民主政治"相标榜，但上述言论显示，蒋介石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不要"民权"，而由少数寡头专政的政府。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人，命令称："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

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

20日，杨树庄、何应钦、白崇禧等在南京举行陆海军将领会议，议决六项，主要者为“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恢复党权”，“打倒破坏国民党及国民革命之共产分子及一切叛卖党国之党员”，“陆海军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等。会后，由杨树庄领衔通电，表示“誓以忠诚，求其实现”[571]。没有军人刺刀的保护，就不会有南京国民政府，杨树庄等人的迅速通电显示了军人在这个新政权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

在举行成立典礼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个空牌子。1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这个政府算是有了两个成员。20日，任命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行使教育部职权。同日，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21日，蒋介石电称，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开始办公。4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以胡汉民、丁惟汾等九人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至此，这个政府才粗粗地搭了个架子。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符合列强的愿望，但是，列强暂时还不准备承认它。民国以来，中国政局派系林立，统治势力更迭频繁。在这场动荡不安的战乱之中，南京政权究竟能够存在多久？它是否具备统一全国的能力和前景？它会不会超越列强所能容许的速度和范围去实现自己的民族要求？这一连串的问号，都有待时间来作出回答。在国民革命阵营大分裂后，没有一个国家决心把自己的在华利益和前途押在南京政权身上。谁也不急于同这个政权解决南京事件，进一步发展关系。各国都在维护自身主要权益的前提下，耐心观望局势变化，同时与中国各地事实上的统治当局打交道。

八　“二期清党”

“四一二”政变前后，蒋介石等人在各地逮捕并杀害了一批共产党人，但是，在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政策以后，大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积极工作，成为各级组织中的骨干，其力量，其影响，都是巨大的。这种情况，自然使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党当局难以安枕，因此，力谋进一步肃清共产党人。

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通过由胡汉民、吴倚沧起草的《清党原则》六条。17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萧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七人，以邓泽如为主席委员。其后，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浙江各地陆续建立清党委员会，海外华侨和军队中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6月1日，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限定清党日期为6月1日至8月31日，各地清党委员会须于9月30日呈报结果。

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其职责为：“秉承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肃清党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572)] 但实际上，所清者完全为“共产分子”。这一点，胡汉民说得很老实。他说：“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573)] 由于它有别于“四一二”前后各地发生的政变，因此，蒋介石称之为“第二期清党”，他说：第一期清党为“紧急处分”，目的在于“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第二期清党为“根本整理”，其范围“遍及一般跨党分子”。蒋介石认为，后者较前者更加困难，是“本党真正生死关头”，必须“以至大至久的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574)]。

《清党原则》、《清党条例》等规定：在清党时期中，停止入党；所有党员经过三个月之审查再发党证；各党部于接到清党文告之日起，限令所属党员于半月内填就审查表，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党员须每半月将其工作向所属区分部报告，然后逐级呈报当地清党委员

会；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加以警告，三个月不报告工作者取消党员资格[575]。但实际上，这些大都是具文，各地清党委员会的真正兴趣和主要工作均为逮捕并审判共产党人。为此，专门成立了清党审判委员会。5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各行政机关遵行《清党条例》："遇有反动分子捣乱本党，阻碍清党进行者，当地清党委员会得直接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严行缉拿。"[576] 6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训令军、政、司法各机关，"严查所有各地之共产党余孽，机关悉数解散，并分别逮捕共产党分子，毋稍宽纵，以绝乱源"[577]。这就说明，所谓"二期清党"仍然是暴力清党。

"四一二"政变后，陈群、杨虎二人在上海滥捕、滥杀，使得某些坚决反共的人士也表示不满。5月8日，张静江致电蒋介石，认为"除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要求严令陈、杨二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578]。6月1日，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批评自清党运动以来，上海一隅"任意逮捕杀人"[579]。但是，这些意见和批评都未能动摇蒋介石对陈、杨二人的信任。6月中旬，杨虎亲自率队破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逮捕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吴稚晖立即致函，吹捧杨虎为"天人"，要求将陈"明正典刑"，"寒通国共党之胆"[580]。21日，蒋介石应宁波商会之请，派陈、杨赴宁波清党[581]。二人甫抵甬，即处决了共产党人王鲲、杨眉山、胡蕉琴、陈良义、吴德元、甘汉光六人。当时，曾有人向陈群询问处刑标准，陈答："入共产党满六个月者杀，国民党员跨党者杀。"[582] 同月29日夜，陈群在上海连破四个中共机关。次日，秘密处决十余人[583]。陈延年大概即就义于此时。7月19日，著名共产党人赵世炎被害。在二期清党中各地被害的共产党人还有王宇椿、郑采臣、何赤华、李征凤等，究竟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在此期间牺牲，目前尚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

在杀害之外，南京国民党当局也采取"自首"、"自新"的办法诱惑少数意志不坚分子。6月21日，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通告称，对"盲

从走入歧途之分子，准其来本会自首，予以从宽发落”[584]。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则经南京中央清党委员会批准备案，成立了“反省院”，这一措施后来为国民党当局长期沿用。

由于南京国民党当局实行滥捕，大量无辜者受到牵累。6月15日，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庭，受审十一人。其中三人“实无共产证据可寻”，宣告无罪；五人“均系无知愚民”，交保释放；另三人“系过路受累，无证可指”，即予开释[585]。由此不难想见当年捕人的轻率。

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各地土豪劣绅不得不蛰伏一时。南京国民党当局实行清党，各地土豪劣绅纷纷蠢动。5月初，江阴即有人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清党后，土豪劣绅乘机报复，地方行政长官有扶助土豪劣绅恢复旧势力之倾向”[586]。同月，浙江长兴土豪蒋玉麟指使暴徒捣毁县党部，逮捕常务委员等人，所有文书印章搜卷殆尽[587]。6月，温州国民党员蔡雄被诬指为共产党人，擅行枪决[588]。其他诬告、陷害之类，更比比皆是。

对于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清党方针及措施，广大国民党员态度冷淡，不少人拒填所谓“党员审查表”和“半月工作报告表”。南京市清党委员会于8月下旬通告承认，将表格“送缴本会者，仍属寥寥”[589]。该委员会威胁说，对此类党员将以不愿受审查论，清除其党籍，但这也无济于事。

清党的结果是，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的精英，新旧官僚、政客、投机腐化分子乘机聚结，国民党的腐化现象日益严重。8月22日，白崇禧沉痛地说：“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其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之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怒声载道。上海是舆论中心，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590] 9月1日，规定结束清党的日期已届，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

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岁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东流。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591] 白崇禧和上海清党委员会道出了一个使他们难堪的事实——国民党已失去人民的信仰，这是有勇气的。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发生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

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现以时局影响，交通阻滞，各省市多有不能依期竣事者，自应延期，继续办理，以利进行。”[592] 这一通告既宣告了“二期清党”计划的失败，也宣告了南京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将长期延续。

---

(1) *FO*，371，Vol．11621，F513/1/10，Appendix 10．

(2) U．S．Dept．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27，Vol．2，Washington，1942．pp．341-343．

(3)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原书房1979年版，第91页。

(4) U．S．Dept．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Washington，1975，p．869；《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第28—33页。

(5) 高平叔、丁雨山：《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5—16页。

(6) G．Clark，*Economic Rivalries in China*，Yale University，Press，1932，pp．18，45，66．

(7)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35—336页；高平叔、丁雨山：《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5—16页。

(8) *FO*，405，Vol．253，p．91；B．R．Mitchell，ed．，*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305．

(9)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pp．903，906．

(10) 日本商工省商务局贸易课：《本邦及本邦海外重要相手国贸易统计》，1927年9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战争への道》，第1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4页。

(11) 日本东亚研究所：《列国对华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东京1941年10月版，第238页。

(12) Nobuya Bamb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 ，Minerva Press，1985，pp．381-386．

(13) *FRUS* ，1925，Vol．1，p．767-768．

(14) *FRUS* ，1925，Vol．1，p．849．

(15) Nobuya Bamb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 ，p．244．

(1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76页。

(17)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82页。

(18) 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公报》第54期，专件，第17—18页。

(19) 中国协会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华利益集团的组织，1889年成立于伦敦。

(20) *FO* ，371，Vol．10947，F4053/194/10．

(21) W．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Clarendor Press，Oxford，1971，pp．129-130．

(22) *FO* ，371，Vol．第11620，F119/1/10．

(23) *FO* ，405，Vol．250，pp．188-200；*FO* ，371，Vol．11620，F378/1/10；Vol．11621，F513/11/10．

(24) *FO* ，371，Vol．10925，F6117/2/10；*FO* ，405，Vol．248，p．459．

(25) *FRUS* ，1926，Vol．1，Washington，1941，pp．755、757．

(26) *FO* ，371，Vol．10279，F387/387/10，F1074G/387/10，F2390/387/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Microfilm Publication，

Microcopy NO．329（以下简称RDS，NA，M329），893.00/7388，893.00/7400，893.00/7416．

(27) 《木村致陆军函》（1926年2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8) 《冈本致田中电》（绝密，1928年5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佐佐木到一：《南方革命勢力の実相と其の批判》，北京，极东新信社1927年3月版。

(29) *FO*，371，Vol．10949，F5013/194/10；Vol．10950，F5564/194/10；FO，405，Vol．148，p，576．

(30) *FO*，405，Vol．250，pp．253-256；FO，371，Vol．11620，F67/1/10，F241/1/10，F395/1/10，F403/1/10，F408/1/10；Vol．11621，F513/1/10．

(31) *FO*，405，Vol．250，pp．235-236；*FO*，371，Vol．11620，F67/1/10，F241/1/10，F395/1/10，F403/1/10，F408/1/10；Vol．11621，F531/1/10．

(32) Canton：*Events and Current Rumours*，March 3，5，13，1926，广东省档案馆藏：《粤海关档案全宗》，1587/52。

(33) *Parliamentary Debates*，Vol．193，pp．1645-1646；*The Times*（London），March 26，1926，p．13．

(34) *FRUS*，1926，Vol．1，p．701．

(35) *RDS*，NA，M329，893.00/7400．

(36) *FRUS*，1926，Vol．1，p．705．

(37) 美籍犹太人，中国通。此次访穗前，曾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磋商，到穗后即与詹金斯取得联系。美驻华公使、参赞同年南下广州考察，往返途经上海时，都曾移樽就教于索氏。

(38) *RDS*，NA，M329，893.00/7403．

(39) *RDS*，NA，M329，893.00/7403．

(40) *RDS*，NA，M329，893.00/7522．

(41) *RDS*，NA，M329，893.00/7473．

(42) 美籍犹太人（一说加拿大人），曾为孙中山工作。孙中山去世后，

他为孙科、蒋介石、孔祥熙等奔走效劳。见*RDS*，NA，M329，893.00/7713，893.00/8427，893.00/8502，893.00/7465，893.00/7416．

(43) RDS，NA，M329，893，00/7465．

(44) RDS，NA，M329，893，00/7409．

(45) 见*RDS*，NA，M329，893.00/7469．

(46) 见*RDS*，NA，M329，893.00/7473．

(47) 见*RDS*，NA，M329，893.00/7407．

(48) *RDS*，NA，M329，893.00/7403，893.00/7407．

(49) *RDS*，NA，M329，893.00/7407．

(50) *RDS*，NA，893.00/7413．

(51) *RDS*，NA，M329，893.00/7413．

(52) *RDS*，NA，893.00/7713．

(53) *RDS*，NA，893.00/7713．

(54) *RDS*，NA，M329，893.00/7513．

(55) *FO*，405，Vol．251，p．119；*FO*，371，Vol．11623，F1312/1/10；Vol．11624，F1397/1/10；Vol．11625，F1874/1/10，F2097/1/10．

(56) *FO*，405，Vol，251，pp．17，34．

(57) *FO*，405，Vol，251，pp．121，146．

(58) *FO*，405，Vol．252A，pp．17-18．

(59) *The Times*（London），Nov．8，1926，p．13．；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Baltimore，1933，p．111．

(60)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0页。

(61) 《工人之路》第218期，1926年1月31日。

(62) 《工人之路》第216、217期，1926年1月29日、30日。

(63) *FO*，405，Vol．251，pp．57-69．

(64) 《工人之路》第216、217期；*FO*，405，Vol．251，pp．57-69．

(65) 《工人之路》第216、217、218期；*FO*，405，Vol．250，pp．186-187，415；Vol．252A，p．19．

(66) 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省港罢工概观》，1926年8月31日出版；*FO*，405，Vol．251，p．5．

(67) *FO*，405，Vol，251，pp．57-68．

(68) *FO*，405，Vol．251，p．61；Vol．252A，p．19．

(69) *FO*，405，Vol．251，p．71．

(70) *FO*，405，Vol．251，pp，69，121-124；*FO*，405，Vol．252A，pp．13，19-21，69，174；*RDS*，NA，M329，893.00/7489．

(71) 《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FO*，405，Vol．251，69；*RDS*，NA，M329，893.00/7439，893.00/7473．

(72) *FO*，405，Vol．251，pp．17，69．

(73) *FO*，405，Vol．251，p．17．

(74) *FO*，405，Vol．251，p．53；Vol．252A，p．22．

(75) *FO*，405，Vol．252A，pp．73-76．

(76) *FO*，405，Vol．252A，p．13．

(77) *FO*，405，Vol，252A，pp．23，25，71-73，77-79．

(78) *FO*，405，Vol，252A，p．20．

(79) *FO*，405，Vol，252A，pp．20，28-29，31．

(80) Canton：*Events and Curret Rumours*，June 18，21，22，23，1926．广东省档案馆藏：《粤海关档案全宗》，1587/52。

(81) 《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参见《广州评论》第2、3期合刊。

(82) Canton：*Events and Current Rumours*，Ju1y 17，1926．

(83) 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13页；*FO*，405，Vol．252A，pp．173-174．

(84) 邓中夏：《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1926年7月印行；*FO*，405，Vol．252A，pp．81-82．

(85) 《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FO*，405，Vol．252A，pp．81-82，193-194．

(86)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录》，1926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38页。

(87) *FO*，405，Vol．252A，pp．86-93．

(88) *FO*，405，Vol．252A，pp．162-167．

(89) *FO*，405，Vol．252A，pp．233，235．

(90) *FO*，405，Vol．252A，pp．233．

(91) *FO*，405，Vol．252A，pp．189-190，199-200．

(92) *FO*，405，Vol．252A，pp．214-215．

(93) *FO*，405，Vol．252A，pp．260-261．

(94) *FO*，405，Vol．252A，p．199．

(95) *RDS*，NA，B329，893.00/7631．

(96)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目。

(97) *FO*，405，Vol．252A，pp．214-215，224．

(98) *FO*，405，Vol．252A，pp．217，219，272．

(99)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九次政治会议议事录》。

(100)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九次政治会议议事录》。

(101) *FO*，405，Vol．252A，pp．216，260-261，429，431．

(102) *FO*，405，Vol．252A，pp．227，250．

(103) *FO*，405，Vol．252A，pp．227，429．

(104) *FO*，405，Vol．252A，pp．227，430．

(105) *FO*，405，Vol．252A，pp．227，430．

(106) *FO*，405，Vol．252A，pp．216-217，225，228-230．

(107) *RDS*，NA，M329，893.00/7626．

(108) *FO*，405，Vol．252A，pp．218-219．

(109) *FO* ，405，Vol．252A，p．458．

(110) *FO* ，405，Vol．252A，pp．218-219，239-240．

(111) *FO* ，405，Vol．252A，pp．227，246-247，257，428-430，449．

(112) *FO* ，405，Vol．252A，pp．199，272，312-313；*FRUS* ，1926，Vol．1，pp．726-727．

(113) *FO* ，405，Vol．252A，pp．319-320．

(114) *FO* ，405，Vol．252A，pp．222，249，273．

(115) *FO* ，405，Vol．252A，p．222．

(116) *FO* ，405，Vol．252A，pp．223，249-250，273．

(117) *FO* ，405，Vol．252A，p．250．

(118) *FO* ，405，Vol．252A，pp．242-243．

(119) *FO* ，405，Vol．252A，pp．262，274-275．

(120) *FO* ，405，Vol．252A，p．275．

(12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18页。

(12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563—1564页；*FO* ，405，Vol．252A，p．71．

(123) *FO* ，405，Vol．252A，pp．22-23，71，79，83，137，199；*RDS* ，NA，M329，893.00/7550；蓝裕业：《省港罢工交涉之经过及其现状》，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4—545页。

(124) *FO* ，405，Vol．252A，pp．25-26，137，79．

(125) *FO* ，405，Vol．252A，p．93．

(126) *FO* ，405，Vol．252A，pp．139，183，24．

(127) *FO* ，405，Vol．252A，p．31．

(128) *FO* ，405，Vol．252A，pp．83，86．

(129) *FRUS* ，1926，Vol．1，pp．691-693．

(130) *RDS*，NA，M329，893.00/7550．

(131) *FO*，405，Vol．252A，p．578．

(132) *RDS*，NA，M329，893.00/7713．

(133) *FRUS*，1926，Vol．1，pp．712，671-680．

(134) 《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28—29页。

(135) *FRUS*，1926，Vol．1，pp．846-84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三次会议议事录》，1926年7月29日。

(136) *FRUS*，1926，Vol．1，p．855．

(137) *FRUS*，1926，Vol．1，pp．684，859．

(138) 《日本陆军省档案》，14679；*FO*，405，Vol．252A，pp．86，235-236。

(139) 《松井个人意见》（1926年8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40) 《对中国各军队和平劝告的有关文件》（1926年8月），《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41)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12月），卷2，《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142) *FO*，405，Vol．252A，pp．24，126．

(143) *FO*，405，Vol．252A，pp．141-142．

(144) *FO*，405，Vol．252A，pp．141-142．

(145) *FO*，405，Vol．252A，pp．132-135，271．

(146) *FO*，405，Vol．252A，p．183．

(147) *FO*，371，Vol．11658，F301/10/10．

(148) *FO*，405，Vol．252A，pp．276，450，476．

(149) *RDS*，NA，329，893.00/7661，893.00/7814，893.00/7832．

(150) *RDS*，NA，329，893.00/7792，893.00/7899，893.00/7698．

(151) *RDS*，NA，329，893.00/7652，893.00/7655，893.00/7661，893.00/7873，893.00/7893；《申报》，1926年8月23日，9月2日、4日、18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5日。

(152) *RDS*，NA，M329，893.00/7730．

(153) *FO*，405，Vol．252A，p．278．

(154) *RDS*，NA，M329，893.00/7596，893.00/7597，893.00/7630，893.00/7657．

(155) *FO*，405，Vol．252A，pp．364-365，373；*FRUS*，1926，Vol．1，pp．863-871．

(156) *FO*，405，Vol．252A，pp．275-279，445，505，572．

(157) *FO*，405，Vol．252A，pp．247，254，274，284-287．

(158) *FO*，405，Vol．252A，pp．278，287-288，350-351，370-373，445，446．

(159) 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35页。

(160) 《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4—35页。

(161) *FO*，405，Vol．252A，pp．595-598，609，613-614．

(16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版，1926年8月20日。

(163) 《长沙邮政分局邮务总办致北京邮政总局函》，1926年8月27日，《北京邮政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4) *FO*，405，Vol．252A，p，459．

(165)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27日。

(166)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4页。

(167) *RDS*，NA，M329，893.00/7981．

(168) *RDS*，NA，M329，893.00/7981；*FRUS*，1926，Vol．1，pp．868，899．

(169) *FRUS*，1926，Vol．1，pp．999-1000．

(170) *FRUS*，1926，Vol．1，pp．855-860．

(171)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60页。

(17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事录》，1926年7月—10月。

(173) *RDS*，NA，M329，893.00/7976．

(174) *RDS*，NA，M329，893.00/7603．

(175) *RDS*，NA，M329，893.00/7660．

(176) *FRUS*，1926，Vol．1，p．683；1927，Vol．2，pp．66-68，238．

(177) *RDS*，NA，M329，893.00/8005．1926年11月29日，美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高斯报告称，工部局档案中至少藏有三份关于蒋介石的逮捕状。其一签发于1914年7月22日，指控蒋在小沙渡地区犯罪。其二签发于1917年10月13日，指控他1910年参与谋杀住在租界内的一位“中国著名人士”。其三签发于1918年7月25日，指控他参与1917年10月18日西华德路1421号武装抢劫案。

(178) 《关于中国时局的对策文件二》（1926年末），《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79) 《币原大臣与汪荣宝公使会议要旨》（1926年11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80)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1927年12月），《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181) 《矢田致币原电》（1926年12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82)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of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New York，1969，p，120．

(183)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Richard．Burns and Edward M．Bennett，*Diplomats in Crisis*，*United State-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1919-1941，Santa Barbara，California，Oxford Press，1974，p．212．

(184) 《申报》1927年4月5日。

(185) 《币原收内田电》（1927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

S16153；参见*FRUS*，1927，Vol．2，p．349。

(186) *FO*，405，Vol．252A，pp．573-574．；*FO*，371，Vol．11635，F5223/1/10；Vol．11661，F4964/10/10．

(187) *FO*，405，252A，pp．459，446-447；*FO*，405．Vol．252，p．302．

(188) 陈公博：《湖北外交报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FO*，405，Vol．252A，pp．270，279．

(189) *FO*，405，Vol．252A，pp．277-278．

(190) *FO*，405，Vol．252A，pp．523，584，585，600．

(191) *FO*，405，Vol．252A，pp．523，584，585，600．

(192) *FO*，405，Vol．252A，p．629．

(193) *FO*，405，Vol．252A，p．612．

(194) *FO*，405，Vol．252A，pp．611-612，619，628．

(195) *FO*，405，Vol．252A，p．629．

(196)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

(197) *FO*，405，Vol．252A，pp．623，628，630，636-643，699．

(198) *FO*，405，Vol．252A，pp．631-632，646-648．

(199) *FO*，405，Vol．252A，pp．670-671．

(200) *FO*，405，Vol．252A，pp．628，523，619，648，699-700．

(201) *FO*，405，Vol．252A，pp．687-691．

(202) *FO*，405，Vol．252A，pp．601-605，623-624．

(203) *FO*，405，Vol．252A，pp．652，681；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5—36页。

(204) *FO*，405．Vol，252A，pp．700，707-710．

(205) *FO*，405．Vol，252A，pp．701，708，710．

(206) *FO*，405．Vol，252A，p．701．

(207) 《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记录》。

(208) 《时事新报》，1927年1月9日。

(209) 《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1月。

(210) 《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211) 《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212)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213) *FO*，405，Vol．252，pp．60-61，222，271-272，853-358；*FO*，405，Vol．253，pp．45-47，117-118，28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4、16—19页。

(214) 《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

(215) *FO*，405，Vol．253，pp．174-183；《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第25—32页。

(216) *FO*，405，Vol．252A，p．553．

(217) *FO*，405，Vol．252A，pp．586，598．

(218) *FO*，405，Vol．252A，pp．580，598-599；Vol．253，pp．4547，174-183．

(219) *FO*，405，Vol．252A，p．619．

(220) *FO*，405，Vol．252A，p．633．

(221) *FO*，405，Vol．252A，pp．586，598；*FO*，371，Vol．11661，F5099/10/10，F5134/10/10．

(222) *FO*，405，Vol．252A，p．648．

(223) *FO*，405，Vol．252A，pp．60-61，222，271-272，341，353-358，463；Vol．253，pp．4547，174-183．

(224) *FO*，405，Vol．252A，p．61．

(225) *FO*，405，Vol．252A，p．698；Vol．252，pp．70，176，179，212，271；Vol．253，pp．44，353-355，383，385．

(226) *FO*，405，Vol．252，pp．41-42，61，70，176-180；Vol．253，pp．48-49，94-95，219-220，354，382-383．

(227) *FO*，405，Vol，252，pp．1242．

(228) *FO*，405，Vol，252，p．62．

(229) *FO*，405，Vol，252，pp．297-298；*FO*，371，Vol．12398，F231/2/10；Vol．12456，F181/181/10．

(230) *FO*，405，Vol．252，p．86．

(231) 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一目。

(232) *FO*，371，Vol，12449，F351/156/10；*FO*，405，Vol．252，pp．86，161162；Vol，254，p．56．

(233) *FRUS*，1927，Vol．2，pp．56-58．

(234) 《矢田致币原电》（1926年12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35) *FO*，405，Vol．252A，pp．649-650．

(236) *FO*，405，Vol．252A，pp．698，703，705．

(237) *FO*，405，Vol．252，pp，211-212．

(238) 《英国对华出兵经纬》（1927年2月），《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39) *FRUS*，1927，Vol．2，pp．46，51，56，59，61，65，78-81．

(240) *FO*，405，Vol．252，p．79．

(241) *FRUS*，1927，Vol．2，p．47．

(242) *RDS*，NA，M329，893.00/8339．

(243) 《日本陆军省档案》，14679．

(244) 《英国对华出兵经纬》，《币原致高尾电》（1927年1月12日、2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45) *FO*，371，Vol．12398，F/188/2/10；Vol．12457，F317/264/10；*FO*，405，Vol．253，pp．44-47．

(246) *FO*，371，Vol．12449，F351/156/10，F304/156/10，F363/156/10；F449/156/10；*The Times*（London），Jan．18，1927，p．14；《英国对华出兵经纬》；《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1月26），《日

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47) 《英国对华出兵经纬》；《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FRUS*，1927，Vol．2，p．57．

(248)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American l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7，p．270．

(249) *RDS*，NA，M329，893，00/8337；《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250) *FRUS*，1927，Vol．2，pp．61，65，73；*FO*，405，Vol，252，pp．112，361-362；Vol．253，p．342．

(251) *RDS*，NA，M329，893.00/8014，893.00/8021，893，00/8118，893.00/8151，893，00/8219；*FRUS*，1927，2，pp．59，61，66-67；《币原致松井电》（1927年2月9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英国对华出兵经纬》，《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252) *RDS*，NA，M329，893.00/7981，893，00/8110，893.00/8184，893.00/8160，893，00/8166，893.00/8170，893.00/8182，893.00/8219；*FRUS*，1927，Vol．2，pp．56，60，61；《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币原在枢密院的报告》（1927年2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53) *FO*，405，Vol，252，pp，123-125，145-147，234-235，290．

(254) *FRUS*，1927，Vol．2，pp．7579．

(255) *FO*，371，Vol．12399，F749/2/10；Vol．12449，F600/156/10；Vol．12459，F472/472/10，F484/472/10．

(256) *FO*，405，Vol．252，pp．311-313，398-400．

(257) *FO*，405，Vol．252，pp．129-133，176-179，220-227，234-235．

(258) *FO*，405，Vol．252A，pp．624—625．

(259) *FO*，405，Vol．252，p．152．

(260) *FO*，405，Vol．252A，pp．134-129，156，301-307．

(261) *FO*，405，Vol．252A，pp．194-207，237-238．

(262) *FO*，405，Vol．252，pp．135，238-139，217．

(263) *FO*，405，Vol．252，p．253．

(264) *FO*，405，Vol．252，p．349．

(265) *Lampson to Chamberlain*，Mar．9，1927．*FO*，800，Vol，260．

(266) *FO*，405，Vol．252，pp．134-139，302；*FO*，371，Vol．12464，F597/580/10．

(267) *FO*，405，Vol．253，pp．61-62．

(268) *RDS*，NA，M329，893.00/8405，8406．

(269) *FO*，405，Vol．253，pp．113-115．

(270) *FRUS*，1926，Vol．1，pp．130-940．

(271) *FRUS*，1926，Vol．1，p．93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5—36页。

(27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2—475页。

(273) *RDS*，NA，N329，893.00/8148．

(274) *FRUS*，1927，Vol，2，pp．60-61．

(275) *RDS*，NA，M329，893.00/8336，893.00/8564

(276) *FRUS*，1927，Vol．2，pp．66-68．

(277) *FRUS*，1927，Vol．2，pp，68，70．

(278) *FRUS*，1927，Vol．2，pp．70-71．

(27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1日。

(280) 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1927年3月12日），黄埔军校政治部：《蒋校长最近之言论》，1927年5月版，第32页。

(28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13日。

(282) *RDS*，NA，M329，893.00/8502．

(283) *RDS*，NA，M329，893.00/8360．

(284) *FRUS*，1927，Vol．2，p．2；*RDS*，893.00/8312．893.00/8335，893.00/8342，893.00/8351，893.00/8360，893.00/8367，893.00/8411．

(285) *FRUS*，1927，Vol．2，p．2；*RDS*，893.00/8408，893.00/8420．

(286) *FRUS*，1927，Vol．2，p．2；*RDS*，893.00/8405，893.00/8406．

(28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1月9日、1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88) 《向导》第180期，第1882页；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91—92页。

(289) 《向导》第180期，第1882页，1926年12月5日出版。

(290) 《李大钊主持之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1927年1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8—1029页。

(291) 《时报》，1927年3月1日、2日、14日、16日。

(292)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293)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88—91页。

(294)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页。

(295)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3页。

(296) 《亦云回忆》，第259页；《币原大臣在枢密院关于中国时局报告纲要》（1927年2月2日）；《高尾致币原电》（1927年1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97)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土肥原秘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第9页。

(298) *FO*，405，Vol．252，pp．431-433．

(299)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300) *RDS*，NA，M329，893.00/8541．

(301) *FO*，405，Vol．252，pp．436-437；Vol．253，pp．77-78．

(302)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国民革命军宁垣特派员章杰关于南京浦口一带秘密工作情况敬告民众书》，《国民政府档案》（1）57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FO*，405，Vol，253，p．32．

(303) *FRUS*，1927，Vol．2，p．153；《时报》，1927年3月29日；《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04) 《申报》，1927年3月26日；*FRUS*，1927，Vol．2，pp．146-165；《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05)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4辑，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602—606页。

(306) *RDS*，NA，M329，893.00N/121；H．G．W．Woodhead，*China Year Book*，1928，pp．723-726．

(307) 《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308) 《时事新报》，1927年7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4月29日。

(309) 《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10) *FRUS*，1927，Vol．2，p．156．

(311)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6日；《南京事件始末》，（日期缺）《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B．D．Cole，*Gunboats and Marine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19251928，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3，pp．93-94．

(312)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6日；《南京事件始末》，（日期缺）《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B．D．Cole，*Gunboats and Marine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19251928，pp．93-94．

(313)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6日；《南京事件始末》，（日期缺）《日本外务省档案》；*FRUS*，1927，Vol．2，pp．153-159．

(314) 《革命文献》第14辑，第606—607，612—615页；《南京市总工会关于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1927年4月，南京市档案馆藏。

(315) 《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FO*，405，Vol．253，pp，20-21；《时报》，1927年3月30日、4月6日。

(316)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原书房1975年版，第108—109页；《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17) 见本节第二目。

(318) 《汉口“四三”惨案调查委员陈廷璧（司法部）、张善孚（总工会）、谢冠生（外交部）调查报告》，原件，1927年4月12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141—142页。

(319) 育干：《列强驻华海军之现势》，《东方杂志》第24卷第6号。

(320) *RDS*，*NA*，*M* 329，893.00/8722．

(321)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4日。

(322)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23) *FO*，405，Vol．253，p．434．

(324)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5日收），《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25) 《藤村致币原电》（1927年3月2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26) *FRUS*，1927，Vol．2，p．147．

(327) 《时报》，1927年3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328) 《森冈致币原电》（1927年3月25日）；《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29) 关于杨杰这时候的政治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光东印书局1931年6月印行，第113—115页；李世璋：《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福建事变的情况》，《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1981年第12期；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

(330) 《时报》1927年3月27日；*RDS* ，NA，M329，893.00/8906．

(331) *RDS* ，NA，M329，893.00/8427．

(332) *RDS* ，NA，M329，893.00/8430．

(333) *RDS* ，NA，M329，893.00/8444．

(334) 《矢田致田中电》（1927年4月2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时报》，1927年3月27日。

(335)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New York，p．318．

(336) *FRUS* ，1927，Vol．2，p．97．

(337) 《币原致矢田电》（1927年3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38)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39)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40)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3月2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341) *FRUS* ，1927，Vol．2，p．164．

(342) *FO* ，405，V01．253，pp．290-291．

(343) *FRUS* ，1927，Vol．2，pp．165-166；《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3月28日、29日），《南京事件善后交涉纲要》（1927年3月3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4) *FRUS* ，1927，Vol．2，P170．

(345) F．O．371，Vol．1240 3，F2939/2/10，F2990/2/10；Vol．12454，F2938/156/10，F3085/156/10；Vol，12476，F2974/1530/10，F3006/1536/10，F3043/1530/10，F3085/1530/10，F3130/1530/10，F2938/1530/10．

(346)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9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

PVM27。

(348)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3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9) 《本庄繁致上原勇作函》（1927年4月5日），《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439—440页。

(350) 《币原致矢田电》（1927年3月31日）；《南京事件善后交涉经过要领》（1927年3月3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1) 《木村亚洲局长与海军军务局长的协定》（1927年3月3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2)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3)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4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4)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5) 《英国大使就南京事件访问币原外相文件》（1927年4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FO*，405，Vol．253，pp．165-166．

(356) *FRUS*，1927，Vol．2，pp．183-184．

(35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8)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4月4日、4月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9) *FRUS*，1927，Vol．2，pp．277-278，283．

(360) *FRUS*，1927，Vol．2，pp．90-94，97，167；*RDS*，NA，M329，393．11/506，893.00/8481，893.00/8547，893.00/8601，893.00/8722．

(361) *FRUS*，1927，Vol．2，pp．95-96，99-100，104-105，167．

(362) *FRUS*，1927，Vol．2，p．167．

(363) *FRUS*，1927，Vol．2，pp．102-103．

(364) *FRUS*，1927，Vol．2，pp．107-108，171．

(365) *FRUS* ，1927，Vol．2，pp，175-177，181-183．

(366)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1927年4月1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PVM27；*RDS* ，NA，M329，893.00/65．

(367) *FRUS* ，1927，Vol．2，p．180．

(368) *FRUS* ，1927，Vol．2，pp．181-183．

(369) *FRUS* ，1927，Vol．2，p，185；《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70)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1927年4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42—1043页。

(372)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73) 关于陈赞贤的生年，诸说不一，此据1927年印行的南康《陈氏族谱》。

(374) 刘少奇：《论陈赞贤在赣被害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375) 刘鼎福：《江西工人运动先驱陈赞贤同志》，《江西工人运动史研究资料》第9辑，第25—27页。

(376) 刘勉玉：《陈赞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16页。

(377) 《赣州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主任呈文》，《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月2日。

(378)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由》，抄本。

(379)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由》，抄本。

(380)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由》，抄本。

(381) 《赣州各工会请愿团的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2) 《新编第一师政治部等呈文》，《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月2日。

(383) 《赣州张与仁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384) 《赣州各工会请愿团的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5) 《赣州各工会请愿团的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6)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387) 《陈烈士赞贤事略》，赣州各界追悼陈烈士赞贤大会印行。

(388) 《黑幕重重之江西党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389) 《蒋介石竟反对恢复党权》，《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日。

(390) 《南昌之白色恐怖》，《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391) 《赣省来电两则照录》，《申报》，1927年4月2日；参见《中国国民党执委会第二届常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00页。

(392)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3页。

(393)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35页。

(394) 《安徽省党部之救党主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7日。

(395) 《安徽欢迎蒋总司令大会》，《申报》，1927年4月5日第9版。

(396) 周新民（即周骏）：《回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建立及其进行的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84页；参见周范文口述：《关于1922年至1928年安庆革命斗争情况》，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0页。

(397)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24—126页。

(398)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24—126页。

(39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400) 《皖党部被毁见闻》，《申报》，1927年4月3日。

(401)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37页；参见李亚男、林世良：《蒋介石亲自策动的“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9页。

(402)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37页：参见李亚男、林世良：《蒋介石亲自策动的“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9页。

(403) 《革命春秋》，第138页。

(40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405)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北版，第73页。

(406) 陈果夫：《十五年到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台北1971年版，第109页。

(407) 李书华：《吴稚晖先生生平略述》，见《吴敬恒述传》，台北世界书局1987年版，第3479页。

(408) 《邵元冲日记》，1927年3月27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

(409) 《邵元冲日记》，1927年3月28日。

(410) 《李宗仁回忆录》，第435—436页。

(411) 《李宗仁回忆录》，第453页。

(412) 《李宗仁回忆录》，第435—436页。

(413) 《革命文献》第17辑，台北版，第128—129页。这次会议不久即改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414)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录》。

(415) 这次会议是否真正开过、实际参加人员，均有疑点。

(416) 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417) 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南宁民国日报》，1932

年4月12日。

(418) 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419) 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4月12日。

(420) 《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详纪》，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1日。

(421) 《共产党祸党证据》，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

(422)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

(423) 《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第18页。

(424) 《上海商业联合会听取虞洽卿会见蒋介石等情议事录》，《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425) 《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6页。

(426) 《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迎见蒋介石新闻稿》，《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8页。

(427) 《上海钱业公会讨论为蒋介石筹垫300万元饷款等情会议录》，《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51页；参见该书第53、57—58页。

(428) 《徐桴致俞飞鹏电》，《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71页。

(429) *Police Intelligence Summary*， April 2，1927．

(430) 《工界联合总会已开始办公》，《申报》，1927年4月5日。

(431) *Police Intelligence Summary*， April 2，1927．

(432)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 ，Renaissance Publishing Company Bombay，1938，p．70．

(433)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106页。

(434) 《邵元冲日记》1927年4月4日。按：应为4月3日。邵元冲这一阶段的日记系追记，故误。

(435) 吴稚晖：《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台北1969

年版，第861页。

(436) 《陈其瑗同志报告蒋逆叛党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7日。

(437) 《武汉分共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第106页。

(438) 《邵元冲日记》，1927年4月4日。

(439) 《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支电》（1927年4月4日），见《汪主席及中央执监委员在沪决议整理党务之重要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另陕西省档案馆藏李济深等1927年4月5日致谭曙卿电，内容亦同，惟详略及文字有异。

(440) 《蒋介石专心军旅之通电》，《申报》，1927年4月4日。

(441) 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第五次纪念周中的演说词》，《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442)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录》，1927年4月2日。

(44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录》。

(444)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申报》，1927年4月5日。

(445) 《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卷9，第858页。

(446) 《汪精卫来往要电汇录》，《申报》，1927年4月8日。

(447) 《陈璧君狱中交代》，抄件。

(448) 转引自吴稚晖：《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卷9，第860—861页。

(449) 《汪精卫致张静江书》，《时报》，1927年4月30日。

(450) 《寄李石曾的一封信》，《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67页。

(451) 吴稚晖：《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卷9，第869页。

(452)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7页。

(453) 《市政府拥护汪蒋之歌电》，《申报》，1927年4月6日第13版。

(454) 《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纪》，《申报》，1927年4月7日第14版。

(4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

(45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

(457) 《明令蒋总司令离沪赴宁电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45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459) 程潜：《对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的订正和补充》，《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31页。

(460) 《张国焘回忆录》，第3章。

(461) 程潜：《对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的订正和补充》，《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31页。

(462)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463)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464)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465) 《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69页。

(466) 《张曙时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2页。

(46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468) 《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筹备处紧急通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46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决议录》。

(470) 《在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报告》，《湖南民报》，1927年4月18日。

(4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472)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3—144页；黄霖：《八一起义前后的几点回忆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

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7页；朱雅林：《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101—102页；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293页；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34页。

(473) 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国际评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71页。

(474) 转引自伊罗生（Harold R．Isaacs）：《中国革命史》中译本，上海向导书局1947年版，第183—184页。

(475) 《特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476)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页。

(477)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6页。

(478)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6页。

(479)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480)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8页。

(481) 《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纪》，《申报》，1927年3月28日。

(482)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8页。

(483) 《总工会昨晚欢宴北伐军将领》，《申报》，1927年3月30日。

(484) 《市党部昨开党员大会》，《申报》，1927年4月1日。

(485) 《发起反英帝国主义同盟启事》，《申报》，1927年4月6日。

(486)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页。

(487) 曼达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参见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法文本，第56页。

(488)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第449页。

(489)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8—449页。

(490)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8页。

(491) 《总工会挽留薛师永留沪上之函电》，《申报》，1927年3月26日。

(492) 《民党大会挽留薛岳》，《申报》，1927年3月27日。

(493)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15页。

(494) 《市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记》，《申报》，1927年4月4日。

(495) 《市政府消息》，《申报》，1927年4月9日。

(496)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19页。

(497) 《总工会纠察队昨行授旗礼》，《申报》，1927年4月7日。

(498) 《申报》，1927年4月6日。

(499) 《总工会昨开代表大会纪》，《申报》，1927年4月8日。

(500) 《市党员昨开迎汪复职大会》，《申报》，1927年4月10日。

(501)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502) 《中国新闻》，1927年4月14日。

(503) 《申报》，1927年3月27日。

(504) 《蒋总司令与总工会代表讲话》，《申报》，1927年3月29日。

(505) 《申报》，1927年3月31日。

(506) 《总工会纠察队昨行授旗礼》，《申报》，1927年4月9日。

(507) 《淞沪工人纠察队昨被缴械》，《申报》，1927年4月13日。

(508) 《“四一二”大屠杀纪实》，《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509) 《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4月12

日。

(510) 《蒋逆铁蹄下之东南》，小册子。

(511) 《蒋逆铁蹄下之东南》。

(512) 《各界市民为解除工人武装大请愿》，《申报》，1927年4月14日。

(513) 群众牺牲的人数，没有确实统计，作新《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纪实》称在三四百人以上，见《向导》第194期。上海总工会报告称："当场受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可计数。"见《蒋逆铁蹄下之东南》，第43页；《时报》4月14日报道称：连行人死伤者共约20余名；联合社调查称：工人死30人，工人及民众受伤56人；士兵死12人，受伤5人（含浦东地区），见《纠察队缴械之死伤者》，《时事新报》，1927年4月18日。此据郑振铎等《致政治委员会函》，《时报》，1927年4月15日。

(514) 《文史资料选集》第70辑，第1—2页。

(515) 《时报》，1927年4月14日。

(516) 《上海のク—デタ—》（上海政变），《东京日日新闻》，1927年4月14日。

(517) 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518) 《重庆川康政治宣传员黄明豪2月11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19) 卢师谛：《致张静江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520) 《吴玉章回忆录》，第168页。

(521)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522) 吴玉章：《忆杨闇公同志》，《吴玉章回忆录》，第168页。

(523)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念特刊》。

(524) 周非：《重庆三三一惨案亲历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525)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念特刊》。

(526)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323页。

(527)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52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5日。

(529) 陈希豪：《陈希豪、张静江利用杭州职工联合会的一幕》，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30) 《民国十六年浙江清党资料》，陈立夫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陈希豪：《致张静江书》，1927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据该函，从当年3月至4月中旬，陈希豪共从张静江处取得2．9万元，大部分用于职工联合会。

(531) 《杭州之大工潮》，《申报》，1927年4月3日。

(532) 《杭州工会冲突续闻》，《申报》，1927年4月5日。

(533) 《杭总工会纠察缴械》，《申报》，1927年4月3日。

(534) 《杭州之党潮又起》，《申报》，1927年4月11日。

(535) 《宁波总罢工之风潮》，《申报》，1927年4月13日。

(536) 《宁波党潮之大风波》，《申报》，1927年4月14日。

(537) 《宁波总罢工之风潮》，《申报》，1927年4月13日。

(538) 《福州各界拥蒋大会通电》，《申报》，1927年4月7日。

(539) 《闽垣最近之政潮》，《申报》，1927年4月11日。

(540) 《厦声报》，1927年4月14日；参见《厦门戒严后整理党务》，《申报》，1927年4月11日。

(541) 《特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7页。

(542) 《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

(543) 《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

(544) 《南京快信》，《申报》，1927年4月7日。

(545) 《宁垣之两欢会》，《申报》，1927年4月15日。

(546) 《南京省市两党部被捣毁之沪讯》，《申报》，1927年4月16日。

(547) 南京市党部代表郑旺华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48) 《粤省举行清党活动之情况》，《申报》，1927年4月23日。

(549) 《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6册，第41页。

(550)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551) 周焱、王景泰等著：《陈郁传》，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552) 《广州四一五惨案之真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553) 《刘尔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第183页。

(554) 林健柏、李致宁：《李启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00页。

(555) 广东代表韩麟符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本。

(556) 《陈郁传》，第65页；参见《广州清党运动改期举行》，《申报》，1927年4月24日。

(557) 《广州共产党阴谋再举》，《晨报》，1927年5月10日。

(558) 胡汉民档，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

(559) 黄绍竑：《“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24页。

(560) 黄绍竑：《“四一二”事变关于广西方面资料的补述》，《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44页。

(561) 杨赐章：《缅怀英烈，忆“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在南宁的大屠杀》，《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53页。

(562) 《“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26页。

(563)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5页。

(564) 《致各中央常务委员电》，1927年4月15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湾版。

(565) 《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22辑，总4211页。

(566) 《革命文献》第22辑，总4213—4215页。

(567)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盛典》，《申报》，1927年4月22日。

(568) 《奠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

(56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2号。

(570)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

(571)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

(57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5月17日。

(573) 《清党之意义》，《革命文献》第9辑。

(574) 《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中央》半月刊第1期。

(575)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编：《清党运动》，第3—4页。

(576)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4号。

(577) 《（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6月14日，油印本。

(578) 《上海张人杰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79) 《五河白崇禧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80) 《共党巨憝陈延年正法》，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581) 俞霭堂：《大革命时期宁波商会残害共产党人之罪行》，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82) 金臻庠：《长兴清党见闻》，《浙江文史资料》第2期，第82页。

(583) 《上海陈群陷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84)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1日。

(585) 《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七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0日。

(586) 《（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27年5月10日，油印本。

(587) 《（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记录》。

(588) 《（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记录》。

(589) 《宁市清委会通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23日。

(590) 《军事委员会纪念周纪》，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26日。

(591) 《清委会发表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日。

(592)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9日。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一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政

一　财政经济措施

财政是国家或政团的命脉，一个政权要存在并发展，必须实行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否则，绝对无法支持长久。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于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此前的湖北财政又是个烂摊子，因此，财政经济问题始终困扰并威胁着武汉政权。为解决这一生死攸关的难题，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作出了巨大努力。

湖北原有地方金融机构湖北官钱局，在军阀控制下，长期滥发纸币。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伊始，即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央银行，办理国民政府所属各军民机关的存款与汇兑。同时决定，自1927年1月1日起，发行整理湖北财政公债与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前者总额为通用银元1500万元，6年以内，只付利息，自第7年起，用抽签法分5年还清；后者总额为通用银元2000万元，以每年6月30日、12月31日为给付息金之期。两者均可随意买卖、抵押[(1)]。发行公债所得除用于收回湖北官钱局纸币，偿还此前债款外，尚余2600万元，均用于军政费。同月25日，财政部又决定发行国库券900万元，年息6厘，6个月

后由国库付给本息[2]。

当时，湖北地区流通的票币种类不一，为统一货币，由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发行兑换券。财政部于1月19日规定：湘鄂赣通用大洋券，在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幕日起兑现使用；湘鄂桂三省通用毫洋券，待湘鄂桂三省中央银行分行成立后兑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发临时兑现券，另行收兑。财政部并规定，严禁故意抑勒中央钞票，倘有此类情事，定即拿办。20日，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业，以宋子文为行长，陈行为经理。宋子文讲话称："本行为国家性质，非专以营利为目的，应注意流畅国库金融，防止国际资本主义之侵略。"[3]该行声称有现金准备500万元，已发行兑换券400万元。宋子文保证，决不滥发纸币："今后再发行兑换券时，以中央银行所有现金之相当额为度。"对于早就在湖北地区流通的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宋子文表示，因为上述各行均有相当准备金，而且基础巩固，因此，国民政府不加干涉，准其自由营业[4]。

中央银行号称有现金准备500万元，实际上并无此数，仅靠以湖北金融公债向汉口各商业银行抵借，得到现款316万余元[5]。以此为保证，发行兑换券400万元。后来钞票发行到3600余万元，完全没有现金保证，成为武汉经济生活中的恶性肿瘤。

为了加强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的地位，3月4日，财政部致函湖北政务委员会，按照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办法，汉口分行代理国库、省库，各属税收机关收入税款，应随时汇解汉口分行，收入国库；本埠各税收机关，应逐日交存该行。倘有存放其他银行、钱号及发生危险等事，各该征收员及出纳保管人员，除负责赔偿外，并应惩处[6]。为了加强国币的地位，3月17日，财政部又公布《取缔外币条例》，规定除外贸外，外国货币只准在市上银钱号或兑换店兑换、买卖，所有市面直接交易，概用国币。如有违反，一经查明，即将该项外币没收[7]。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国民政府所发行的"中央票"的流通地区日益扩大，有报道说："凡曾经军阀摧残各地，币制紊乱，金融停滞，如

江西、湖南及湖北之鄂西，均有非大宗中央票前往不可之势。”[8]

税收通常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临时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国家税与地方税暂不划分；同时决定筹划公平税则，在此之前，暂时维持现行的各种“苛细杂捐”，“俟筹得良好之代替税则后再行取消”[9]。1月9日，财政部发表征收田赋布告，规定每地丁1两，征收银元1元4角；漕米每石征银元2元8角。12日，公布《征收内地税条例》，规定中国各省或外国商品，无论为出产或运销，一律征收暂时内地税，其税额照现海关或常关所征税率加征半数，奢侈品则加征一倍；如不照章纳税，除将货物充公外，处以3年以下之监禁，或处以该项货物所值10倍之罚款[10]。随后，财政部又统一卷烟税，规定“值百抽12元5角”，通令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实行[11]。4月初，公布《湘鄂赣征收煤油特税暂行简章》，规定凡煤油输入商须呈请特税局转呈立案，方准营业；煤油税率为每10加仑纳税1元[12]。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武汉国民政府的辖区不断扩大。1927年3月至4月，武汉国民政府先后任命宋子文兼江、浙两省财政处长，于右任为甘肃、山西、陕西三省财政专员，钮永建为安徽、浙江视察财政专员，同时并准备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分行，以便整顿各地财政。在一段时期内，部分省份的收入情况曾有所改善。例如1927年3月，湖南省收入140万元，江西省收入160万元，湖北省收入400万元，广东省除留省部分外，协饷400万元。但是，武汉政府开支浩繁，入不敷出的情况日益严重，仅军费一项，1926年12月为564．5万余元，1927年4月激增为1189．4万余元[13]。

为了开辟财源，掌握长江下游的财政，宋子文于3月29日到达上海，设立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他随身携带湖北金融公债票券500万元，企图推销，结果分文都没有卖出[14]。他又多次会见银行界人物，要求借款300万元，但上海银行界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其政纲及保护金融业之方针”，同时表示借款用途仅限于江苏省[15]。宋子文在上海的唯一收获是从苏联远东银行取得了50万元借款。这当然只

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方面对武汉实行经济、金融封锁，进一步加剧了困难。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工商业主纷纷转移资金。财政部则“库空如洗”，“常被军需人员包围”，濒于绝境[16]。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根据鲍罗廷提议，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苏兆征五人为委员，决定采取特殊办法渡过难关。

战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项措施是实行现金集中。17日，公布《集中现金条例》，宣称“现值出师北伐之际，首在巩固财政”。除重申完纳国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所发汉口通用纸币及中国、交通银行所发之通用钞票为限外，特别规定：一、凡持有现币（硬通货）或其他商业银行纸币者，得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及各邮局随时兑换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二、纸币每元法定7钱1分，不得自由增减；三、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条例》并规定：凡拒收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或收买现币，或抑勒纸币价格，或抬高物价者，经人民告发，查明确实者，按律严办[17]。《条例》的核心是由武汉政府控制并掌握硬通货，作为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信用。为了保证《条例》的执行，武汉政府并派出军队和纠察队对各银行进行监视。18日，各银行一律停止兑现。

战时经济委员会的第二项措施是发行国库券和有奖债券。4月，发行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900万元，付息6厘，分3个月发行，自发行月起满足6个月，由国库照付[18]。5月，决定以庆祝北伐胜利为名，发行有奖债券500万元。每张金额银元5元，奖金最高2．5万元，最低10元。中奖者凭券付奖，不另还本，未中奖者自开签之日起，3个月内向有奖债券局兑换整理金融公债或用以承购逆产。

战时经济委员会的两项措施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集中现金条例》公布后，封存各银行现金共400万元，但是，汉口立即成为纸币

世界，物价上涨百分之五十，米价由每担10元涨至20元，而且每人每次仅限购一斗。据报道，米店前“叫嚣凌乱之状，直如群犬争骨”[19]。为拒用纸币，人们纷纷以高价购买铜元，甚至竞相购买邮票保值。不少商店关门歇业，转为黑市交易。19日，财政部召集银钱商会代表讨论维持办法，决定组织金融讨论会，由汉口商会推举5人，银钱公会各推举3人，中国、交通两行各推1人，加上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共15人组成。该会于4月20日成立。23日会议决定，由该会暂行办理汇兑，中外商人在沪或在沪采办货物需要现银或现洋，可由该会指定之汇兑机关如期照兑现款；商人倘能确实证明赴某地采办货物，可持护照携带现金出境。其后又议决：洋价最低定3200文钱；限令征收机关筹备铜元，以备无限制兑现；禁抬物价；汇兑交中国、交通两行活动。这些措施，缓解了现金集中后出现的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汉政府面临的经济危机。

上海等地的金融资产阶级强烈反对武汉政府的现金集中《条例》。4月18日，上海银行公会致电蒋介石，指责武汉国民政府“破坏金融，贻害社会，显系实行赤俄共产政策”。电报宣称：“本会各行为保全金融大局，维持人民生计起见，即日停止武汉往来。”电报要求蒋介石采取措施，“应如何挽回制止之处，出自鸿裁”[20]。同日，又致电北京、天津各地银行公会，通知这一决定。北京等地的银行公会早就指示武汉各行“收缩”，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也立即决议，与上海银行公会采取同一态度[21]。28日，蒋介石发出布告，规定凡有汉口地名的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不得在他省兑现。次日，南京政府通电，禁止长江下游各地的现金运往武汉，同时禁止汉票在各地行使[22]。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使武汉政府的经济困难犹如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的公债也乏人承购。5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机关职员薪俸搭发国库券，100元至200元搭1成，200元至300元搭1成5，300元至400元搭2成，400元以上搭3

成。这实际上是在强迫摊派。至于有奖债券，虽然奖金不低，但也未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据孙科6月15日报告，100万只卖出了十余万。武汉政府的月支出约需一千多万，但1927年5月的月收入不到180万，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得武汉政府透不过气来，以致纸币都发光了。武汉中央银行曾向美国订印大批纸币，运至上海时被扣[(23)]。5月2日，财政部代部长张肇元说："我们只有一千四百万纸币，都发完了，既无现洋，又无纸币，还有什么生意？"[(24)]

除了财政赤字，武汉的煤荒也日益严重。武汉用煤一向依靠日本，"四三"事件后来源断绝，不得不改为依靠萍乡，但汉冶萍公司已长期停工。4月20日，孙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上提议，将汉冶萍暂时收回，由财政、交通、劳工三部组织委员会管理。同时，武汉政府并决定，对武汉用煤实行计划分配。此外，由于湖南农民协会禁止大米出口，米荒也不时困扰武汉政府，以致北伐军的军米不得不到上海采办。5月2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劳工部、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四机关的名义组织食米采办委员会，函请湖南开放米禁。

上述措施，都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汉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

除财政外，交通是武汉政府注意的另一重点。

交通部是最早迁鄂的四部之一，于1926年12月29日开始办公，内设秘书、邮政、电政、航政、国道、无线电管理七处。它在整顿交通、电报线路、收回邮政、航政主权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自中国兴办邮政之日起，邮政大权即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国民革命兴起后，各界群众特别是工会方面积极要求收回邮权。孙科对此表示积极支持，认为是"极正大应办之事"。向例，各省邮务长均由北京邮务总办委任。交通部于1927年2月命令湖北邮务长转知北京邮务总办，所有国民政府辖下各省邮务长，均须呈由本部委任，否则概不生

效；外国邮务人员，只能任为顾问。其后，又命湖北邮务管理局转达北京邮务总办，将民国十五年全年邮政盈余详细列明数目，全部解部核收，不得再由北京政府提取。孙科并宣布，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时，将收回完全管理权，并将由该部完全行使邮务行政权[25]。在航政方面，孙科也力图收回部分主权。他声称："内河航权让之外商，本为世界各国所无，而我国独有，诚为怪事。"但他又认为，当时不平等条约尚未完全撤销，以前外人商船，可暂允在内河航行，但须遵照中国的管理章程，向交通部注册缴费；凡未在交通部注册领照的轮船，均不能在国民政府所辖地方河道行驶。

现代战争中，电讯有重要作用。北伐开始以后，广州、福州、汕头、武昌各地的无线电台均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员管理，商业使用受到影响。经协商，改归交通部管理。1927年2月，交通部制订整顿全国电政计划，决定将革命军辖下各省暂分三区：两粤、长江一带、此外各省，要求认真修葺原有路线，迅速增设新线，同时命令各地整顿修理无线电台[26]。交通部并计划在全国添设电台44座，南昌、南宁、西安、重庆、长沙、杭州6台先行动工，4个月建成；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建立大电台一座，以便与欧美直达通报。此外，交通部并计划建立无线电机制造厂。

粤汉铁路自1906年开工，当时尚有二百余里待建。交通部决定三年完成，其后，兴建西北干线（将陇海路延展至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地）与西南干线（连贯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诸省）。孙科乐观地宣布，革命统一后，不藉外力，国民政府每年将建筑铁路一二千里。三十年内，完成十万里[27]。

为了与粤汉路南段相接，交通部决定自1927年3月起兴建自江西赣州至广东韶关的公路。

1927年1月，中央政治会议在江西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以孔祥熙为部长，兼代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先行在粤成立，然后根据

情况迁往中央政府所在。同月29日，孔祥熙在广州回答记者，声称“欲抵制列强之经济侵略”，“第一当从改良生产入手”。他主张集中群众余资，建立股份公司工厂，使工人一律投资，劳资不分界限[28]。不过，孔祥熙并没有使这一主张付诸实施，他也没有到武汉就职，实业部一直未能成立。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曾准备在汉口召开全国银行实业界大会，讨论发展全国经济与实业诸问题，未成[29]。7月4日，武汉国民政府根据孔祥熙的呈请，公布《实业部组织法》，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二　司法改革与文教事业

武汉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推动者是徐谦。徐谦于1926年随冯玉祥访苏，考察了苏联司法状况，萌生按苏联模式进行司法改革的念头。8月归国，任广东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暨大理院院长。他于9月7日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十七次会议提出司法改良意见，要求对现行司法制度实行“根本改造”，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他认为，司法机关必须与政治方针相统一，司法人员应受政治党务训练，现行法规、法律与革命精神相反，须全部审查，做根本修改，因此，主张从司法观念、司法人员和司法法规三方面进行革新。他尤其反对“司法独立”、“司法官不党”等提法。他说：“观苏联之政治组织，立法行政，固属合一，即司法机关，亦非独立，此即打破司法独立之新制也。”徐谦建议在国民党中央领导下，吸收地方党政、司法机关及各群众团体代表，组织司法制度改造委员会，拟定方案[30]。9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徐谦意见，议决司法行政方针为：“实行党化、革命化司法，夺回军阀官僚及存留乡村封建势力所操纵之司法权，并以司法为工具拥护农工利益及保护被压迫之妇女。”[31]此后，徐谦的司法思想遂成为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司法改革的主导思想。

11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徐谦为司法部长。同日，在广州召开改

造司法制度委员会，徐谦任主席，通过改造司法制度案。同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司法改革要点，其主要内容为：一、改用法院名称，采二级二审制，即设最高法院于国民政府所在地：设控诉法院于各省省城，此为中央法院；设县市法院于市或县，设人民法院于镇或乡村，此为地方法院。二、废止法官不党之法令，非有社会名誉之党员兼有三年以上法律经验者，不得为法官；三、废止厅长制，组织行政委员会处理院内行政；四、撤除检察厅，酌设检查官，配置于法院内执行职务；五、采用参审陪审制；六、减轻诉讼费、状纸费，征收执行费。[32]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北迁。月底，在武汉召开司法会议，司法改革逐次展开。

（一）废除旧法律。北洋时期的《惩治盗匪法》，规定可由军人审问处罚“盗匪”；《新法律补充条例》、《暂行新刑律》等规定禁止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否认卑幼对于尊亲的正当防卫权，承认纳妾，认定和奸无夫妇女为犯罪等条文：司法会议均决议废止。1927年1月27日，宣布废除北京政府所定继承法，规定财产继承以亲生子女及夫妇为限，如果没有上述继承人及生前所立合法遗嘱，则将其遗产收归国有，作普及教育之用。

（二）建立新法院。1926年12月27日，临时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决定设高等法院于武昌，将广东大理院改为最高法院广东分院。12月，国民政府派刘芬、余恺湛、戴修瓒为湖北法院筹备委员，筹划改造事宜。次年1月1日，将湖北高等审、检两厅改为湖北控诉法院，武昌地方审、检两厅改为武昌县法院，夏口地方审、检两厅改为汉口市法院。同时，电令广东照改。其后又陆续向湖南、广西、福建、江西等省派出筹备委员，对当地司法机关进行改革。为了审判守城顽抗的陈嘉谟及刘玉春，1月17日，临时联席会议推举徐谦为人民裁判委员会主席。

（三）制订新法律。司法会议期间，还来不及起草并制订新法律，仅作了一些大体规定，如：工人问题，议决适用广东政府的工会

条例；地主及佃户问题，议决应以不违背现存经济社会制度为原则，对于佃农加以保护；婚姻问题，议决应根据婚姻自由原则斟酌社会情形办理等。其后，司法部委派潘振亚、戴修瓒等为委员，编订新法规，曾根据形势需要，陆续制订了一些法律或条例。其重要者有《反革命罪条例》、《处分逆产条例》等。

当时，已经发生人民群众自发处分土豪劣绅的情况。1927年2月7日，临时联席会议议决：一、禁止人民自由直接处罚；二、训令各法定机关对于广大民众所公认之反革命犯及土豪劣绅等严予惩罚；三、惩罪必须由政府执行。17日，通过由司法部提出，经于树德、林祖涵、徐谦审查的《反革命罪条例》17条。该条例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政府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认为反革命行为，其首魁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执重要事务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帮助实施者处无期徒刑至二等有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该条例特别规定，在反革命势力之下利用官绅势力，对于革命运动或工农运动，曾有积极压迫行为者，处一等以下有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其有杀伤行为者，依俱发罪之例处断[33]。

《处分逆产条例》公布于同年5月，规定："凡与国民革命为敌者，或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者，或压迫人民以巩固封建制度社会者，或侵吞国家地方收入，剥削人民生活利益，以饱私人贪欲者，或操纵经营以动摇革命势力者，例如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其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没收之。"所谓"合法发觉"，据条例解释：一、由革命战争显然发现者；二、广大群众或民众团体所证明者；三、由个人具合法文书报告经查明确实者；四、由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依审判程序发现者[34]。

除自订条例外，司法部批准各省分别情形，规定惩办土豪劣绅条例，设立人民审判委员会进行审判。据此，湖南、湖北、陕西等省都制订了部分法律条文。

1927年1月15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过《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共20条，规定赃款未满500元者，处三等有期徒刑，并科以1000元以下的罚金；赃款在3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35]。同月28日，通过《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共10条，规定凡凭借政治、经济力，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团防）在地方有下列行为之土豪劣绅者，均依本条例惩治：一、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二、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三、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四、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五、压迫平民因而致人有死伤或损失者；六、苛索民财，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七、擅理民刑诉讼，或包揽词讼压迫平民者；八、破坏或阻挠地方公益者；九、侵蚀公款者。条例规定，凡犯上述各条者，除分别处以徒刑、死刑、罚金、没收财产外，一律终身剥夺公权；本党党员加一等处断[36]。

继湖南之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分别于1927年3月、4月制订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惩治贪官污吏条例》。

陕西在制订法律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1927年3月，颁布《临时劳动法》，规定实行9小时工作制，将来“须采取8小时”，“幼年工人7小时”；“禁止雇佣14岁以下之童工”；女工给予产假16周等[37]。同月，颁布《新公安法原则》，规定公安局的任务为保护工会、农民协会、学生、妇女组织；保护人民革命团体及一切革命群众集会；禁止一切反革命团体及一切反对新政府之言论[38]。4月，陕西法制改订委员会决定起草《婚姻法》。其后，陆续完成《暂行婚姻条例》和《暂行婚姻条例细则》。前者共五章四十条。它规定：“男年满16岁，女年满14岁者始得缔结婚姻预约，男未满20岁，女未满18岁者不得成婚”；“结婚由男女决定之”；“当事人无结婚意思，婚姻无效”，又规定：“订立婚约或已成婚双方，自愿离异，可听其自由”；还规定：“妻子成婚时所有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除自愿交夫管理使用收益外，夫不得干涉”；“离婚后妻得收回特有财产”。这

就从各方面保障了婚姻自由和妇女的经济权益，在武汉政府辖区内是仅有的[39]。

（四）建立参审陪审制度。2月7日，临时联席会议通过司法部提出的参审陪审条例，规定人民法院设参审员，参与法律及事实之审判；县市法院及中央法院设陪审员，参与事实之审判。如党员、农民、工人、商民或妇女诉讼，分别由人民法院所在之党部、农民协会、工会、商民协会、党部妇女部推选参审员或陪审员参审[40]。2月8日，通令各省司法机关执行。

（五）训练司法人才。广州国民政府期间，曾举办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聘请苏联顾问及国民党人讲授司法革新知识。迁鄂后，该班在武昌继续招生，于1927年3月6日开学，6月19日结业。

（六）改造律师制度。1月28日，司法部通令各省司法机关，律师承办案件除照章收受公费外，不准另受酬金。2月，公布《律师章程》，规定：无分男女均得充当律师；律师必须是党员；律师公会废止会长制，改用执监委员制；严定免试资格；曾有反革命行为者，剥夺律师资格。同时公布《律师复验章程》，要求以前律师于6个月内按照新章复验。

（七）华洋诉讼统归法院受理，拒绝观审。旧例，中国人为被告，由中国地方官审判；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为被告，由该国领事审判，并相互派员观审。1月19日，司法部提请临时联席会议议决，夏口县公署停止审理华洋诉讼，改归夏口市法院审理，拒绝观审。

（八）减轻诉讼费及状纸费。司法部认为，北洋时期所收诉讼费、状纸费过高，“无产阶级无力负担”，通令将诉讼费减少50%，状纸费减少60%[41]。

北洋政府的法律基本上沿袭清末旧章，不少条文源于日本和德

国，有着严重的封建专制色彩；加上当时司法界腐败日甚，积弊日深，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造的地步。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司法改革以剔除旧法律的封建部分和祛除司法界积弊为目的，制订了一些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新法律，因此，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徐谦等人笼统地反对司法独立的原则，提出建立所谓“党化司法”，这又为党、政、军等当权者干涉司法和破坏法制等活动开辟了极大空间。

在文教事业方面，武汉国民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

广州国民政府期间，教育行政委员会曾制订过不少法规，如《教科书审查规程》、《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学校立案规程》、《三民主义教科书审查规程》等。国民政府迁汉后，继续制订了若干法规。1月7日，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中学规程。其总纲规定：中学教育以根据三民主义，完成小学之基础训练，并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以适应民族生活之需要为宗旨；初级中学实行普通教育，高级中学分设普通、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务科；采用选科制、学分制；初级中学定为180学分，高级中学定为150学分，每上课1小时，或实习2小时为1学分。2月7日，通过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设文、理、法、医、农、工、商、师范、美术、音乐等科；设有两科以上者，方能称为大学；单设一科，称为某科大学；同时规定，大学可以设立研究院、专修科及函授部、推广部。同月，公布《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党化教育不但要革命化和民众化，而且要科学化和社会化”，同时要求：“以最短时间实行义务教育”，“学校的课程与训练须适合社会的需要”，“指导学校毕业生到民间去”，增设军事训练并注重体育训练[(42)]。

“党化教育”的口号始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这一口号的提出，有对抗封建教育、殖民主义教育的意义，但是，它过于狭隘、片面，后来国民党更借此在教育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为了集中办学力量，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

学、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法科、医科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武汉国民政府在文教方面的突出成绩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创立。

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在各省设立军事政治学校。16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武昌成立政治训练班筹备处，以包惠僧为主任。同月22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建议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的政治科移设武昌，并于11月2日任命邓演达为主任。12月，原在黄埔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陆续迁到武汉。1927年1月9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以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由于蒋、汪当时都不在武汉，以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馀为代理党代表。张治中任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及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蓝腾蛟任军事总教官。先后在该校任政治教官的有李达、沈雁冰、许德珩、李汉俊、吴文琪、陈启修等。2月12日，分校与总司令部学兵团联合在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学。同年3月，武汉、南昌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化。为了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防止蒋利用军校实行独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军校须确立于党的指导之下；改校长制为委员制。2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吴玉章提议，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谭延闿、徐谦、恽代英、邓演达、顾孟馀为军校委员，恽、邓、谭为常委。在这三个人中，谭延闿挂名，邓演达忙于总政治部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军校实际由恽代英主持，完全处于中共领导之下。同年5月，陈毅被派到军校，与恽代英、施存统共同组成中共军校党委，陈任书记。

军校最初有学生2900名。4月21日，在武昌南湖设立军校二部，将总司令部南湖学兵团改编为军校入伍生队。至5月间，发展至3700

人。全校设学生总队，下设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另女生200人，设政治女生队。

军校实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军事科加紧政治训练，政治科加紧军事训练”[43]。在教学上，强调多留时间，使学生发问或发表意见，同时强调学生须实际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反帝斗争和支持湖北农民运动中，军校的宣传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提高党权运动和反蒋斗争中，军校的大多数学生也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武汉政府方面。5月中旬，夏斗寅偷袭武汉，军校五、六两期学生奉令成立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作战，为平定叛乱、保卫武汉政府作做出了贡献。

军校中同样充斥着左右派的斗争。3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召开宣传会议，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军校少数右派学生闯入会场，非法拘捕四名工人。12日，军校方面议决，派代表赴总工会道歉，同时决定调查肇事分子的事实确据，以便提交惩办。4月9日，军校方面宣布，开除党籍、学籍，通缉归案者13人，开除党籍、学籍，撤差拘留并通令官署以后不得任用者15人，开除党籍、学籍者18人[44]。“四一二”政变后，军校又开除、惩处过少数学生。这是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在军校中的反映。

汪精卫集团决定分共的当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军校学生到洪山进行野外演习，被唐生智派部队秘密包围。叶剑英当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当参谋长，劝张接受这一支武装力量。7月18日，军校第五期学员毕业，大部分派入第二方面军所属叶挺和贺龙的部队。第六期学员等被张发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军校之外，各种讲习所、训练班以及各类工人学校、农民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发展迅速，其中著名的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45]、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人运动讲习所、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训练班、湖北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等。

随着武汉成为政治中心，它也迅速成为新闻中心。新的报刊不断出现，原在广州、上海出版的《中国工人》、《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商民运动》、《中国学生》、《海外周刊》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纷纷迁汉出版。至1927年上半年，武汉地区有报纸30余种，刊物60余种。

武汉地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是《汉口民国日报》。该报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0日。经理董用威（必武），总编辑最初为宛希俨，1927年3月改为高语罕，4月以后再改为沈雁冰，均为共产党人，因此，这是一份实际由共产党掌握的报纸。

其他重要报刊有：

《革命军日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1926年8月创刊于湖南衡阳，同年10月迁汉。1927年1月，由共产党人潘汉年出任总编辑。

《革命生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刊。1927年2月12日创刊，由共产党人袁澈、陆更夫等编辑。

《中央日报》，武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27年3月22日创刊。社长顾孟馀，主编陈启修，副刊主编孙伏园。

《一周时事述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创刊于1926年12月。

《武汉评论》，周刊，创刊于1926年春，武汉克复后成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

《群众》，周刊，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机关刊物，创刊于1926年11月1日。

武汉地区之外，湖南、江西、福建、陕西等省的新闻事业也有所发展。湖南地区的重要报纸有《湖南民报》，江西地区的重要报纸有南昌《民国日报》、《贯彻日报》，陕西地区的重要报纸有陕西《国民日报》等。

随着汪精卫集团的日益右倾，武汉地区的文教事业日渐失去生气。7月18日，董用威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职务，由汪精卫集团派人接收。《向导》、《革命生活》、《楚光日报》、《武汉民报》等被迫停刊。

三　土地委员会工作经过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23日，布哈林在报告中声称："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它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党对农民问题注视得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46] 30日，在讨论中国问题时罗易也认为："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尽量明确地提出土地革命问题"[47]。同日，斯大林发表演说，认为"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48]。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谭平山接受了布哈林的批评，承认"还未制定出明确的土地纲领，这是我们的主要缺点"。[49] 12月16日，会议通过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认为"惧怕资产阶级中某一部分势力会不坚决、不真诚地合作，而拒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里把土地问题提到显著地位，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共产党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50]。会后，罗易受命前来中国，共产国际的观点逐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接受。"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面临重重困难，左派们愈来愈多地把希望寄托在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上。

1927年2月，罗易与谭平山到达广州。3月底，在长沙考察农民

运动。4月2日，到达武汉。当日，邓演达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提出：要革命真能成功，非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拥护不可。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51]。会议推邓演达、徐谦、顾孟馀、毛泽东、谭平山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该会的任务是“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52]。

当日，召开首次会议，邓演达宣称，中央现在决心解决农民目前的迫切问题——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革命不能成功。”“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到农民问题，亦即集中到土地问题了。”他要求会议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定的方案来”[53]。第二次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顾孟馀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然扰乱，耕种停顿，恐发生饥馑，更加上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封锁，恐将成不了之局。”[54] 谭平山则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有推翻封建制度与保护革命势力双重意义，他特别说明：“现下财政问题已达到最危险时期，要度过这个难关，也要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把问题说得极为简单、明了，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55] 由于觉得问题重大，土地委员会又于4月19日至5月6日期间，举行过六次扩大会议，有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直隶等15个省区的代表及国民革命军部分将领参加。此外，还组织了审查委员会，审查各种议案。

会议最初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一次扩大会上，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对此作了阐述，他认为，革命正面临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56]。夏曦、彭湃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补充，顾孟馀也改变观点，认为必须有农民政权，把土地问题解决了，才有利于抵抗国际财政资本[57]。经过讨论，会议确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为：一、解

放农民；二、增加农业生产力；三、保护革命；四、打破整个的封建制度及推翻帝国主义的基础；五、促进中国工业化；六、提高文化[58]。会议本拟由毛泽东起草一篇详细文字，但毛因病未能完成。

会议紧接着讨论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标准问题。第二次扩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没收土地问题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59] 会议推选邓演达、毛泽东、苏联顾问岳尔克（И．С．Иолю ）及陆沉（湖北农协代表）、易礼容（湖南农协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没收分配标准。4月22日，该专门委员会向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土地调查》及《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两项文件。《草案》共八条，其第一条规定："凡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由区乡土地委员会没收，并分配于土地不足之农民。"第二条规定："农民分配土地以每户人口为标准，每人所得土地之数，又以年龄为差等。"[60] 邓演达作了说明。他认为，现时农民的力量尚未十分充实，因此，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立即宣布土地国有，只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政治的解决，"把政治上的仇敌扑灭，把他们经济上的特殊利益打毁"；第二步经济的解决，达到最终目的——土地国有[61]。《草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徐谦认为仅仅"政治没收"不够，他说："为唤起农民革命，只没收逆产是不够的，现在必须连大地主的一并没收，始能得分配与需求符合。"汪精卫认为"政治的没收，似嫌笼统"，他说："所谓耕者有其田，是否今日即须做到，如没有明确规定，即可用政治的没收其名，而做经济的没收其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以加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夏曦主张：百亩以上无偿没收，百亩以下政府与以债券，年年付息。彭泽湘则提出"无条件的没收"。会议决定由夏曦、徐谦、汪精卫、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岳尔克、邓演达、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何键、李品仙等为审查委员，进一步对该草案进行审议[62]。

第一、第二次扩大会上，都有人提出士兵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唐生智表示："对士兵必须有个办法"，"无办法，则兵士必感极大不安"

[63]。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谭延闿进一步表示："军人多来自田间，他们必念及他们本身的利害，长官纵如何鼓励他们，如事实上他们失了利益，亦实无效。"[64] 何键声称："没收士兵的土地可动摇兵士作战的精神，因兵士及官长有许多是有土地的，本军便有这种情形，此种实在情形是应注意的。"[65] 于是会议委托谭平山、何键、徐谦三人起草了《保障革命军人土地条例》。其主要内容为：政府对于军人现有土地，应予以特别保障；其无土地者，于革命战争终了时由政府给以土地，资其耕作[66]。

第四次扩大会上提出了保护佃农问题。当时，谭延闿提出："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恐事实做不到，不如通通没收还实在些。"[67] 汪精卫称："现在须决定要不要佃农，如不要佃农，则已经没有地主了。"针对谭、汪的意见，陆沉提出："现在没收的只是军阀、土豪、劣绅、反革命派的土地，并不是所有一切的土地，佃农当然存在。"[68] 会议委托谭平山、徐谦、顾孟馀起草《佃农保护法》，其主要内容为：佃农缴纳租税等，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如遇岁歉、战事等，佃农有要求减租或免租之权利；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租权[69]。对于这个条例，徐谦表示："给地主百分之四十的田租实在是太不公平。"[70] 邓演达提出："可减至百分之三十或三十五。"谭平山提出："要使佃户得到良好的生活，非减至仅纳百分之二十不可。"对此，毛泽东解释道："所谓百分之四十，不过最高的数目，应由各地方的党和政府按照地方情形酌量减少。"[71]

为了解决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的分歧，会议委托徐谦起草《处分逆产条例》，邓演达起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

《处分逆产条例》确定了政治没收的原则[72]。《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规定了经济没收的原则：一、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土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二、为使土地问题得以

解决，必须使农民有充分的力量以取得政权及保障政权，因此国民政府应援助乡村农民对大地主及其他一切封建势力之斗争。同时，《决议》还规定了实行办法，其主要者为：一、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二、各省、市党部应从速会同各省农协，斟酌各该省实际状况，拟具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法则，呈请中央党部核准后交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执行。三、由各省党部、省政府农民协会等人民团体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严厉处分土豪劣绅及一切妨害人民利益之反动分子。四、凡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兵器制造机关，应以出品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供给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五、国民政府应从速调查各处气候、水土及收获数量，确定小地主之标准，大约沃壤每人不过50亩，瘠壤不过100亩，在此限度之内，得享有地权[(73)]。

上述决议均在第六次扩大会议上通过。

尽管在解决土问题的意义上，会议的参加者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对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又自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顾孟馀提出："现在我们规定小地主的土地不能没收，大地主则没收，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亦不没收，办法是很好的，不过乡村里头到了分配斗争时，能不能驱使农民遵守此种规定，甚成问题。"他说："要注意使农民协会服从纪律，否则革命必生危险。"[(74)] 徐谦忧心忡忡地说："这样的土地法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汪精卫和徐谦怀着同样的忧虑，但他声称："火已经烧了，我们要使这把火烧向敌人，不要烧向自己。"[(75)] 这种忧惧感决定了委员会通过的各种决议只能是一纸空文。鲍罗廷和陈独秀应邀参加了第五次扩大会议，他们也不认为已经具备了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鲍罗廷说："必有强健的农村自治组织，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他建议，首先由农政部规定农村自治条例，建立农民政权，同时成立专门机关，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提交省民会议，议决后施行[(76)]。陈独秀也认为："国民政府下应有

详细的办法，与敌人的地方不同，不能卤莽去做。”[77]

5月9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土地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谭延闿提出：“《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公布之后，不但不能安抚武装的同志，反而使普通人看了可以反证非革命军人的土地就不受保障。”[78] 会议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决定先行公布《处分逆产条例》与《佃农保护法》，而将其余两案留交第二十次会议讨论。第二十次会上，在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时，陈友仁说：“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又说：“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不利。”他提出：“湖南已经实行了的，就让他去实行，对于全国应当有点不同。”[79] 结果，表决时，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三人赞成通过而不公布，谭延闿、王法勤、孙科、徐谦、宋庆龄、陈公博、汪精卫、陈友仁八人都不举手，只好决定暂时保留。对《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则一致决定：通过而不公布。

在土地委员会最后一次扩大会上，邓演达曾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他说：“解决土地问题，已有了原则的决定。目前两湖、河南皆可准此原则次第实行，这一次会议在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上，都会有重大意义，使革命得到新的出路。”[80] 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不久，毛泽东、谭平山在报告中即称：“如果说，土地委员会确实具有‘历史意义'，那仅仅是在一个方面具有意义：它出色地证明，国民党在真正伟大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国民党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全部怯懦性，它完全张皇失措了。”[81]

第二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

一　武汉国民政府前期的外交

迁都武汉以后，国民政府的外交目标是更正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承认；主要策略是分化帝国主义阵线，力求各个击破。具体言之，就是拉拢日本，中立美国，集中力量进攻英国。至于进攻的方法，虽然国民政府在民众运动造成的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取得了收回汉、浔英租界行政权的成就，但是它更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

12月9日，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刚到汉口，就同先一日抵达的英国新公使蓝普森进行会谈，要求承认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的政府。蓝表示：中国大部地区尚不归国民政府控制，这一要求不合实际，一旦国民党建立名副其实并对前政府的一切条约和义务充分负责的政府，英国即准备承认；在此之前，英政府尽量以同情、友好的精神同中国任何地区的现存国民党事实政权打交道。蓝普森解释道，英国现未承认中国南北任何一方，国民政府至少须承认现行条约，取消反英运动，才能谋求承认。陈友仁答称，这两点皆可办到，能让英方满意。蓝普森对此颇感惊讶，将信将疑。接着陈友仁强调，今后绝不同列强集体谈判承认和修约问题，将取单独交涉的方针。蓝普森暗示英国愿拔先筹[(82)]。

10日、12日，陈友仁与蓝普森进一步讨论承认和条约问题。陈对9日提出的方案作了修改，要求英国在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建立以前，承认国民政府为代表现有及即将控制地区的政府，而不得承认其他任何中国政府。蓝普森表示，英政府不能接受这一约束。陈友仁指出：国民政府为目下代表全国的唯一政府，已统治多数省份。若在未统治的省份举行总投票，该区域人民亦必赞成归向国民政府。英国在华主要利益集中于华南和长江流域，为自身利益计，英政府也应立即同国民政府谈判。今日中国正当革命时期，英政府应以远大目光度量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赢得民族主义中国的好感。英政府若与国民政府谈判关于全国的问题，就不能同时与北京政府进行此类交涉。蓝普森听后似有所动，但仍坚持不受上项约束。

关于条约问题，陈友仁提议：双方以平等、互惠原则为基础，另订新约，取代现行的不平等条约，同时国民政府负责在其控制区内减弱反英情绪，并于谈判无结果之前，保持旧约有效。蓝普森宣称：英方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是修订现行条约中的某些条款，而不是废除全部条约，另订新约。陈友仁指出：必须取消旧约，代以新约，但可经双方协商，将旧条约中的部分条款保留在新条约中。陈氏又称：汉口劳工运动在中英会谈期间暂趋平静，如果会谈破裂，恐怕工人会突然生变。蓝普森认为此话隐含威胁，希望国民政府保持秩序。会谈至此陷入僵局，双方各自请示训令[83]。

12月1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陈友仁报告，鲍罗廷提出：一、赞同外交部现在与英使的协商，以求探知英政府对本政府的态度，并使其知道必须在修正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承认本政府；二、若英方坚持以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或接受北京政府所任一切义务为基本条件，方能承认本政府为全国政府或区域政府，则切不可与之协商；三、训令外交部依上述方法进行协商，俾不致与英发生破裂，并可保证，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英人的生命财产可得到安全保障；四、外交部应速将此次协商向人民公布，以披露英国现时只改变其态度，未改变其政策，其目的只在保障其特权及发展其商业，实无何等实质上的让步。中英人民的相互利益将因英政府拒绝达成谅解而发生危险[84]。

这些策略，除宣传成分外，要旨在于尽量维持同英国的协商对话不致破裂。为此，谈判基调从历来主张的“废除”或“取消”不平等条约，降为“修正”或“更正”，把要求承认自己为全国政府，降为要求承认自己为“区域政府”。但是，英政府这时只准备在修约问题上让步，还不愿承认国民政府为全国或区域性政府。12月5日，外务大臣张伯伦电告蓝普森：原则上对陈氏“取消旧条约，谈判一个全新条约的方案没有异议，只要将旧条约的效力保持到新条约谈成为止”[85]。

在此关头，国民政府方面未能坚持原来的立场。15日，双方第四

次晤谈。陈友仁主动询问，可否用“更改”一词代替原提案中的“取代”一词。蓝普森答应考虑[86]。在随后两天的会谈中，除“更改”条约问题外，他们还讨论了附加税问题。蓝使10日即向陈透露，英国打算立即无条件地批准中国各地征收华盛顿条约所允二五附加税，请国民政府同意由海关收税。陈友仁强烈反对，指出北洋军阀将因此获得大笔经费，但他表示，只要国民政府辖区内的海关服从国民政府统治，国府便负责维持海关机构。他还告诉蓝使，国民政府将依广州先例，在汉口征收“产销税”。蓝普森对此不表示反对[87]。

12月20日，双方最后一次晤谈。蓝普森代表英政府表态：一、对坦率会谈极为满意；二、尚不能提出有关承认国民政府的方案；三、英方正在研讨修订条约之事，蓝使将离汉口去别处考察。陈友仁答以如果会谈中断，将对民族主义舆论产生可悲的影响，本地形势会立即恶化。他提出新的妥协案，希望蓝使留在汉口继续协商。此案为“英政府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有资格代表其已统治或将统治的领土谈判立即更改中英条约的政府当局”，即不明文约束英政府不得承认中国其他政府。蓝普森未置可否，婉辞而去。他声称，绝对无意破裂，决心再度亲来或派首席参赞欧马利来协商[88]。

接着，美国代表麦耶、日本代表佐分利也分别会见陈友仁，探问国民政府外交政策。陈友仁告以更正不平等条约，按照平等原则缔结新约，为国民政府目下外交的主要目的。其中如租界、治外法权、关税等项，俱为目前所必须立即从事更正者。美、日代表未作任何承诺，但陈友仁认为两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尚属良好”[89]。

至此，国民政府与列强的和平谈判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可是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及英帝制造的汉口“一三”惨案，却遽然将打破不平等条约体系，收回租界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武汉地区久已孕育着反帝尤其是反英的风暴。早在一年前的“五卅”运动中，英水兵就在汉口开枪打死、打伤中国民众数十人，造成

震惊全国的“六一〇”惨案。北伐军光复汉口后，英租界如临大敌，遍设电网、沙包，水兵与义勇队轮流布防，多次阻止北伐军穿行，几致冲突。英人报纸不断诋毁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各国领事联名向武汉当局抗议租界华人仆役的罢工，要求立予取缔。英水兵经常干涉甚至逮捕租界内的罢工工人。11月下旬，天津英租界当局悍然逮捕国民党人，并引渡给军阀张作霖。12月中下旬，英国又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公然提议列强立即准许中国各地当局征收二五附加税，这将使当时尚控制全国大部分海关收入的北洋军阀有可能获得巨额资金。凡此种种，无不使武汉民众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蓄久必发。中英会谈中断后，反英斗争迅即走向高潮。

12月20日，湖北全省农、工、商、学各界联合会在汉口开成立会，许多代表发表强烈的反英演说，通过了反英议案。22日，鲍罗廷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中提议加强对民众和军队的反英宣传，并考虑应否采取对英经济绝交等报复措施。他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井，革命即须打破此陷井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90)] 26日，在李立三、刘少奇、董必武等共产党人领导下，汉口、武昌各界民众分别举行了有20万人和1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91)]。当天又传来英国油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水面撞沉一艘中国商船，淹死四百余中国乘客的消息，武汉人民的反英情绪益形高涨。

然而，这时国共两党领导机关的意图都是以民众运动为后盾，尽量用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以避免英国借口发动武装干涉。当北伐军初下武汉时，中共中央即认为“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更须十分小心，不可有过分的急进举动，因为现时国民政府的实力，尚不能单独与英抗”。主张一面争取英国工人和在野党牵制英内阁，一面缓和与日、美的冲突，并极力避免军事冲突和造成国际共同干涉的借口[(92)]。12月5日，中共中央仍主张国民政府的外交“当按照全部斗争的形势审慎

的进行”[93]。鲍罗廷12月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拟定的宣传报告中也指出：“加紧促进对英斗争，但须避免武装冲突。”[94]直到次年1月2日，鲍罗廷仍在强调：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武力对英国等开战，只有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才能强迫帝国主义者同我们坐下开谈判，重订平等的条约，不用费一兵一将[95]。冲占汉口租界之举，实为英国水兵制造的“一三”惨案所激成。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后，如何引导民众情绪，维护胜利成果，同时又保持和发展必要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就成为摆在武汉国民政府面前的外交难题。

1月6日晚，陈友仁造访英国总领事，声明民众运动是反对英水兵的屠杀暴行，对英国侨民绝无仇视之意，不必自相惊扰，总工会虽有对英总罢工之警告，但现在已不致任便实行。听到英、美侨民纷纷离汉的消息后，陈友仁又约美国总领事及重要美商谈话，着重声明，国民政府当始终切实保护在汉美侨及各国人士，望各安各业，照常工作。7日，国民政府命工人纠察队完全撤出英租界，另组警务处，颁布暂行规则，不准群众在英界停留，不准以石击人、窃取物件和殴击外人，违者严惩，并将英界内的各种反英标语洗除。当日，联席会议又致电九江卫戍司令贺耀组转告各界：对英交涉由外长负责办理，民众运动应避免直接冲突。联席会议还通电所辖各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96]。

中国共产党和民众团体号召民众严守纪律，拥护国民政府，同时也督促国民政府在对英交涉中依靠民众，保持坚定立场。1月7日，湖北省总工会发布紧急通告，命令工友服从军警维持，不得聚集英租界，“码头工友，尤不得在租界上叫闹”；中外各厂工友，“均须安心上工”[97]。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假意退出，并迫国民政府来保护他们，抵御群众的愤怒”。宣言要求：民众帮助国民政府并自己努力争取胜利，国民政府也要依靠民众，坚持到底[98]。

英国迅即于1月6日派代表赴汉口谈判。国民政府十分希望通过谈判使英方接受既成事实，并进一步改善相互关系，以至承认自己为中国唯一政府。为此目的，国民政府试图限制民众运动。外交部于1月10日通告，“暂停一切反英、反教运动”[99]。通告发表后，引起各界质问。陈友仁一周后出面解释：“查此项通告，系转译之误，原文之意义，并非停止反英运动，乃指避免一切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之行动。”[100]

1月11日，英公使代表欧马利偕秘书台克满抵达汉口。次日，开始与陈友仁及秘书吴之椿谈判。起初，欧马利要求国民政府退还英界，恢复以前状态。陈友仁告以如此办理，将引起民众的罢工和拒货，使租界无法生存。国民政府想同英国重建友好关系，已电告各省停止反英运动，引导人民支持政府同英国达成解决。现在若恢复租界原状，国民政府将丧失声誉甚至垮台，不可能再控制愤怒的民众，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因此，现在双方的交涉，只能以新的状况为根据，国民政府的意向是仿照前德、俄租界的先例，改为特别区。陈友仁要求汉口英国银行立即开业。欧马利则要求武汉政府约束罢工，陈答应尽力避免[101]。

自1月21日起，会谈进入关键阶段。欧马利宣称：英政府的政策是与任何响应其12月18日对华政策声明精神的中国当局交朋友，绝不向中国任何一方的暴力和武力屈服投降；已增派海军来华，英中关系正处于紧要关头；既然国民政府一再宣称保证英人生命财产安全，那么目前形势就是对国民政府的信誉和意图的一个考验。22日，陈友仁发表《国民政府宣言》，指出英政府12月政策声明的出发点是以国际共管的态度来对中国略施恩惠，民族主义中国的主要目的则是恢复被英国等列强剥夺的完全的独立与自由。宣言重申，国民政府深望不通过武力，而“以谈判及协议之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的一切问题，表示愿与列强中的任何一国单独开始谈判，讨论修改两国条约及附属问题。英国代表虽得到了所希望的允诺，却明确拒绝陈友仁的意见，表

示只愿协商解决租界问题，为进一步谈判廓清道路[102]。

经过反复谈判，英方终于同意将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由国民政府颁行新市政局章程。特别区管理机构为中英人士联合组成的市政局董事会，市政局长兼董事长由中国政府选派。一切管理事项皆由董事会以过半数议决，交局长执行。局长在董事会表决持平时有决定权，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董事会议决案有最终否决权。英方还同意过渡期间由中方负责租界内的治安、工务、卫生事宜，但坚持此期内先恢复英市政机关，由它尽快召集租界纳税人年会，通过年度预算，解散英市政机关，授权将租界行政移交中英合组的新特别区市政机关。该区将实行英方草拟的经国民政府同意的章程。该章程保障外国人的承租房地权，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富有居民在选举中的优越特权，保证外国纳税人能够有效地监控特别区的市政、财税和立法。陈友仁起初主张过渡期间不能恢复英市政机关，过渡期后英租界即应无条件地归国民政府控制，但在英方坚持下，出于政治上的种种考虑，终于同意英方上述要求，只是删除了协定中提及恢复英市政机构的词句。协定发表时含糊地称："英国当局将按照土地章程，于3月1日召集纳税人年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103]

英国继续用软硬兼施的双重政策对付中国革命。1月24日，英国宣告将调遣三个陆军旅开赴上海，组成"上海防卫军"。27日，欧马利向陈友仁递交特别区市政章程的草案，同时递交英国政府备忘录，宣称愿作单方面让步，对不平等条约权利作出七点广泛的修改。欧马利声明：如果汉、浔英租界问题圆满解决，国民政府并能切实声明，除用谈判手续外，不许以任何方式变更在华英租界及国际居留地，英政府准备"承认中国国民党对于英国大部分之要求"[104]。陈友仁表示这两点都可予以满足。28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听取陈友仁关于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后，决定由外交部长继续与英代表磋商，完成收回租界的手续[105]。29日，陈友仁向英方提交一份声明，对向上海调集军队提出抗议，同时说明国民政府虽对英国修改若干条约权利的计划

不能满意，但愿视为同英国圆满合理解决各项事件的基础；前提之一是谈判须完全脱离英国调集军队所造成的恫吓气氛[106]。当日双方紧张工作后，敲定了协议和各附件文本。

这时，武汉政府有些成员表示须进一步研究协定条款。30日，陈友仁通知英方推迟签字[107]。次日，鲍罗廷将陈友仁、宋子文召至寓所商议，认为就军事、财政而言，以早签字为有利，但英国一面谈判，一面陆续调兵来沪，在此情形下签字，似为受其胁迫而屈服，人民将对此发生怀疑。因此，不能立即签字。当天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108]。2月1日，陈友仁会见英代表，将29日给英方的声明加以修正，声称不能在英军继续集中上海的情形下签署协定。随后发表了这一声明。

在此后的谈判中，陈友仁要求英国不再派更多军队赴沪，公开宣布已赴沪英军的目的仅在保护租界内的生命财产。英代表则要求国民政府明确保证，不用也不支持用武力实际变更租界地位，并在英方作出相应保证后立即签订汉、浔英租界协定。双方代表皆答应满足对方要求[109]。

英国方面认为：国民政府多数成员一直希望与英政府达成协议，而极端势力却一直企图阻止国民政府同英国接近[110]。为了缓解极端派的反英宣传，消除温和派和国民党军方的疑虑，取得国民政府的妥协，张伯伦2月10日在下院宣布：英国出兵上海，仅在于对付“暴徒之蠢动，军队之骚扰，或其他武力袭击”，“保护其侨民之生命利益”，绝不打算用作此外之行为。赴沪英军对中国内争严守中立，“除非有严重事变发生，必不越租界之范围而行动”。张伯伦并称：如果国民政府签订汉、浔租界协定，承受有关保证，则除已从印度开赴上海的英军之外，其他英军将在香港集中，除非另有重大意外危险，将不再赴上海[111]。

陈友仁问清按此演讲将在上海登陆的英军数额之后，向英代表声

明：国民政府将此事视为英方的一种让步，此项让步足使汉口英租界协定有签订的可能，但国民政府仍将对英方登陆驻扎上海公共租界提出抗议[112]。

2月19日，双方代表准备按各自政府的授权，签订交接汉、浔英租界协定，但欧马利却突然拿出一份备忘录，宣称由于孙传芳防线的崩溃，上海租界面临战乱，英政府可能在近期内在沪登陆更多的军队，并将其一部开出租界驻防。备忘录保证，继续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面对英方的突然变卦，陈友仁十分气恼，但不愿再拖延签字，他建议英方先签订协定，再递交备忘录。欧马利同意。双方当即签署了交接汉口英租界的协定及有关换文。交接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也于19日签订，但署期为20日，内容为：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国民政府将负责赔偿因政府官吏的行动或重大疏忽而造成的英侨损失[113]。

英代表签字后即递交上述备忘录。陈友仁告诫说，此事必将激怒中国公众，事态可能发展到国民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步[114]。数日后，陈友仁又专函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告诉英方，目前不打算公布这两个文件，以免激起新的事端[115]。

从2月21日起，双方继续讨论九江英租界问题。最后英方决定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地移交国民政府办理。此后英人即不再干预该区市政管理[116]。

3月15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正式收归武汉国民政府之手，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胜利，也是武汉政府外交上的一大成果。这对以后中国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浔英租界谈判期间，国民政府还借助民众反帝斗争的声势，通告收回汉口领事区华洋诉讼案的领事观审权[117]。3月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命外交部交涉收回牯岭外侨居留地的管理权。4日，又着外交部迅速交涉收回汉口法、日租界及广州沙面英、法租界[118]。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外交部长发表宣言，要求撤退上海外兵，用谈判方法磋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119]。同年六七月间，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分别收回了牯岭外侨居留地和镇江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120]。

然而，由于在谈判中武汉政府一再作出束缚自己手脚的承诺，加之政治形势急剧逆转，致使它在外交方面未能取得更大胜利。武汉外交的高潮在汉、浔英租界协定签订后很快就结束了。

蒋介石集团的分裂活动严重损害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权威，武汉政府不得不努力应付这一形势，维护统一、集中的外交领导权。

早在北伐发动后不久，国民政府就发现列强接连不断地越过自己，直接同蒋介石发生交涉关系。蒋介石每到一处，也都要发表对外讲话、宣言，同外国记者或列强领事及代表接触。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议将外交职权集中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之手，并即将这一决议通知列强[121]。但是列强同蒋介石之间的明来暗往有增无已。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一、本党党员对于外交方面，有擅自发表变更本党外交政策之主张，或直接间接向帝国主义列强接洽任何条件者，以违背党纪论，应予除名处分。二、政府职员，非外交当局或未受外交部长之委托，私擅与帝国主义者为外交的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者，一经发觉证实，应即免职查办。三、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地区，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地方政府及军事长官不得再有任免交涉员之事"[122]。但是，拥兵自重的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民众运动中盲目排外的自发倾向也愈演愈烈，逸脱了国共两党的控制和领导，发生许多违反政策的事情，给武汉外交造成很不利的影响。1927年2月上旬，陈友仁曾向联席会议报

告："外交部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中国工人与外国人间之争执问题上，致许多应办之重要外交事件，无暇进行。"[123] 实际上，调解外国银行、工厂、商店、航运业此伏彼起的罢工纠纷，恢复财经贸易的运营，已成为武汉政府外交部的一项主要工作。

二　宁案交涉与分离英日政策

南京事件发生后，日、美等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逐渐形成默契与配合，国民革命阵营迅速分化，武汉政府的外交从此陷入困境。

3月24日晚，上海方面电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在宁英舰炮击狮子山，恐上海市民与英兵冲突，催陈友仁赴沪主持外交[124]。25日，英、美总领事到武汉外交部，陈述南京发生攻击外国领事馆、抢掠外人住宅，造成生命损失等事。英国并为此提出抗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随即电令江右军总指挥程潜，详细查复肇事者究系何种军队，并详查外国兵舰开炮情形，同时令其保护南京外侨及房屋[125]。

3月31日，陈友仁根据江右军前敌各将领的报告，召见英国代表，声明南京袭击及劫掠外国领馆和侨民的事件，实为反动派及反革命派煽动逆军余孽及地方流氓所造成，国民政府对此"深知痛恶"；对外侨伤亡及英国领事受伤，表示"甚深之歉意"。另一方面，也对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之举提出严重抗议[126]。但列强坚持认为，南京抢劫系国民党军所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处置。列强又以这一事件和民众运动中的盲目排外倾向为口实，在国内和侨民中大肆煽动危机感，乘机向上海增兵遣舰，并从长江流域撤退侨民。它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施加重压，竭力诱迫中国革命阵营中的"稳健分子"转向。

武汉国民政府在与帝国主义抗争的同时，急谋约束蒋介石分裂外交、勾结列强的活动，并设法制止民众中的盲目排外倾向。

在3月30日和4月1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陈友仁力陈，汉

口屡次发生抢掠日侨财产等事，殊于外交不利，应即设法消灭。他还报告说，蒋介石等在上海擅自进行外交活动[127]。为此，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等文件正式通知蒋介石，警告他再有违法行动，就免职除名[128]。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决定训令蒋介石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不得擅自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通牒。会议还决定将蒋介石私委的上海交涉员郭泰祺永远开除党籍，着国民政府明令拿办[129]。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对蒋介石发生作用。

面对危急局势，武汉政府力图避免列强的武装干涉，并将日本拉出帝国主义联合阵线。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接到宋子文上海来电，说是英、日联合，上海危险很大。鲍罗廷提出，分离英、日，使帝国主义者分化。他赞成保护日侨和其他各国侨民的意见，同时建议加强对日本民众、英国民众和工党的宣传，并向世界人民发表宣言。会议通过鲍罗廷提议，组织专门委员会起草各种宣言[130]。4月2日，陈友仁召见日本总领事，介绍佐分利来汉谈判情形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说明南京事件后，中日两国颇有谅解可能，日本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不必恐惧。接着，又准备起草争取日本谅解的宣言[131]。

陈友仁的工作没有任何效果。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行凶杀人，造成惨案。日本驻汉口的军舰和登陆部队遵命武装保卫租界。日侨也关闭在汉的工厂商店，撤上轮船。武汉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武汉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湖北省总工会于惨案发生当天即发出通电，号召“全体民众一致奋起，誓死力争”；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正想藉口实行武力干涉，反动分子也企图乘机捣乱，要求工友们严肃团结，为政府外交后盾，不得“自行主张，妄作妄为，致陷交涉于不利”[132]。4日，省总工会又派出宣传车多辆，高树标语旗帜，要求“各安所工”，“静候政府解决”。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即

刻撤退日本水兵，收回日租界，凶手交中国法庭严办，赔偿死伤损失，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担保以后不得有同类事件发生等[133]。

武汉政府颇感外交方面应付之难。惨案发生当天，政府即派军警赶赴日租界外围维持秩序，对各特别区和华界内的日人商店、工厂也一律加以保护。外交部致函省总工会，请将民众在惨案中冒死捕获的10名日本人解送卫戍司令部看管。省总工会遵命照办，但在信中叮嘱："在交涉未完全解决以前，望贵处万勿轻于释放。"[134] 另一方面，外交部也派员去日本领事馆抗议，要求立即撤退登陆水兵，并声明国民政府保护日人一切安全，倘日水兵仍在陆上示威，激起民众愤慨，发生事端，则由日本方面负完全责任[135]。

武汉政府仍然企图维系联日方针。4月4日，陈友仁再次会见日本总领事，声明前日谈话所示对日态度不变[136]。5日，外交部将被拘日本凶嫌中的4名商人送还日方[137]。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再次研讨对日政策。鲍罗廷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欧美各国要联合起来，压迫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种状况下，最适宜的莫过于中、日联合起来反对英、美的联合。陈友仁提出，还有6名日本水兵关在卫戍司令部，主张在领事裁判权尚未取消的情况下，照成例送给日本领事处置。会议决定在预审之后，送给日本领事[138]。

为了进一步缓和对日关系，陈友仁受命于4月9日拟出对日宣言书。其大意为："一、日本从前虽然也是行的侵略政策，但现在有放弃这种政策的趋势；二、同佐分利谈话的结果，知道中日现有谅解之可能；三、在中日未真正谅解之前，认日本为友邦；四、由南京事件可以证明日本有为中国友邦之诚意；五、虽然有日租界事件发生，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改变态度；六、将来如有事件发生，有随时解决之必要。"[139] 由于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宣言始终未有适当时机发表，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武汉当局对日本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4月10日，日本政府与英、美、法、意共同派代表到武汉政府外交部，要求次日递交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牒。陈友仁当即表示，如果取共同通牒的形式，接见是办不到的，如果不是联合通牒，可以逐个接见，但接见不能认为是接受的解释，也不能作为后来的成例。次日上午，五国代表分别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同文通牒，要求迅速处罚南京抢劫责任者，赔偿外人损失，国民党军总司令作出书面道歉并保障今后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照会声言，上述条件若得不到满足，各国政府将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140)]。同日，列强驻沪总领事也向蒋介石的代表递交了同样内容的联合通牒。

4月14日，武汉政府分别答复五国通牒，大意为准备赔偿南京外国领事馆所受一切损失；对于外侨所受伤害及损失，国民政府也准备在合理及必要的范围内给予赔偿，但经切实证明为英美炮击或敌军及挑拨者造成的损失除外；至于惩罚与道歉两项，应待调查后再解决；国民政府对南京事件“深为抱憾”，重申不能容许任何人侵害外人生命财产，答应令国民革命军主管当局作出书面担保并以有效办法保护外侨。同时，国民政府也要求取消致乱的根本原因，即不平等条约。在给日本的答复中，国民政府特别表示，希望日本谅解中国民族主义势力，派代表根据平等互惠原则，同国民政府谈判，以期保证日本合法利益，改善两国关系。在给英、美、法的答复中，国民政府则要求一并调查解决英美炮轰南京案、英法沙面屠杀案和英国制造的上海五卅案、炮击万县案，等等[(141)]。

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防止列强协以谋我，武汉政府的分离英、日政策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思路。但是，武汉政府对币原外交的实质认识不足，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力量也估计不足，不久，币原内阁垮台，推行对华强硬路线的田中内阁上台，武汉政府的分离英、日政策也就彻底失败了。

第三节　汉宁对峙下的北伐军事

一　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活动与决策北伐

汪精卫在4月10日到达武汉。

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避居国外之后，就不断有人主张迎汪回国，以抵制蒋介石日益增大的影响。在1927年春天的“恢复党权”运动中，迎汪的口号更喧腾一时。人们对蒋介石愈不满，对汪精卫的期望也就愈殷切。现在，汪精卫终于回来了。

4月13日下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在开会，得到蒋介石的通电，要求中央各执、监委员在14日以前赶到南京开会，随即又得到上海市党部的来电，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汪精卫当即表示：“这件事比南京会议还要严重，简直是反了！”[142] 会议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查办事件的责任者，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电文称：“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143] 随后，汪精卫又在湖北省市两党部的欢迎宴会上说：“反革命派已经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已经把真正革命同志的血献给军阀、帝国主义了，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变做讨赤联军副司令了。”他表示，“我现在什么嫌疑也不怕了，非为这些工人复仇不可！就如有一批数十年的老师友，像吴稚晖，现在就都该杀，杀了来填几十个工友的命。”[144] 当日在会上演说的还有徐谦、何香凝、孙科、高语罕等人。何香凝说：“现在蒋介石却公然摧残工农了，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照廖先生说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14日，武汉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处分蒋介石、张静江；取消蒋介石一切本兼各职，开除党籍，由国民政府将其撤职查办。

15日，汪精卫手书《对三大政策之解释》：“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145] 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

惩蒋问题。参加者28人，列席者鲍罗廷、唐生智、张发奎3人。主席徐谦。先后发言的有董用威（必武）、邓演达、潘云超、詹大悲、高语罕、彭泽民、孙科、林祖涵、江浩、吴玉章、顾孟馀、何香凝、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普遍态度强烈，要求改变既往的迟疑态度，作出决定。董用威说："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彭泽民说："如再犹豫，不是蒋氏自杀，是我们自杀。"孙科则要求与会者一一表态，他说："蒋介石是革命敌人，尤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敌人，无论对蒋介石有无私人感情，今日皆不能缄默的。"[146]在如何对待蒋介石上，会议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免去职务，明令讨伐，以邓演达为代表。另一种意见以顾孟馀为代表，认为对一个人只有惩办，不必用讨伐。会议最后同意顾孟馀的意见，一致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147]。该项决议至18日以国民政府命令形式发表。

18日同时发表的文件还有《为惩治蒋中正训令全体党员》，历数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种种表现："凡此种种，皆为极端反革命行为，既不能感之以诚，复不能喻之以理。似此罪大恶极，是已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本党为前途计，不能不决然毅然执行党纪，加以严厉之惩治。"[148]

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馀、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唐生智、邓演达、宋子文等40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等行为。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毁于蒋介石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149]上述种种，都是对蒋介石一种政治上的谴责，较之武汉政府以前的态度，是坚决、鲜明多了，但是，政治上的谴责不能代替军事上的打击，这方面，武汉政府仍然顾虑重重。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在慷慨讨蒋的高调

声中，也时时可以感到这种低调的存在。詹大悲说："今日中央应行决定，失败是不必顾虑，更不应该顾虑。"邓懋修说："纵败犹荣，终有胜利之一日。"吴玉章说："如果是革命的，是不怕强力，不怕武力的。"这些语言诚然是壮烈的，但却反映出武汉政府的领袖们缺乏斗争胜利的信心。何香凝说得很坦率："我对军事上、财政上很是担心。"[150] 正是这种担心，使武汉政府回避马上和蒋介石决战。

奉吴河南战争中，张学良、韩麟春率奉军主力第三、四方面军团倾巢南下。4月3日，奉军占领许昌，靳云鹗三次反攻，都被奉军击退。4月中旬，奉军继续占领京汉线上的重要城市临颍、郾城、西平、遂平等地。下旬，前锋进至驻马店附近，威胁湖北[151]。4月底，传说张学良将联合吴佩孚残部贾万兴等，兵分三路，进窥武汉。这样，就使武汉政府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军事方针陷入动摇不定中。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东征讨蒋，一种主张北伐讨奉。两种方针各有利弊。向东讨蒋吧？担心奉军南犯；向北讨奉吧？蒋介石打过来怎么办？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于武汉政府领导人之间，也表现于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中。

当时，鲍罗廷认为，东南地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共同对付革命，广州、上海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共应该和国民党一起北伐，会合冯玉祥，并且打通苏俄通道。鲍罗廷的设想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向西北发展，对东部和东南地区则只从政治上发展"，在六个月或者更晚些时候，再到东南去"奠定基础"[152]。罗易则认为：新的军事行动对革命有害。"它的目的是增加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以便摆脱群众的影响。""政府必定以战争为借口，呼吁后方的安宁。这样，将给予反动派以时间，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并且采取攻势。"罗易建议，在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推行土地革命，以加深它的社会基础。他提出：一、消灭农村的反动力量，即地主、高利贷者和乡村绅士；二、向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扩

展实力；三、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向南调动在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军队[153]。4月14日，鲍罗廷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声明：国民党已原则上决定北伐，他已表示支持；如果会议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罗易认为鲍罗廷的声明等于提出最后通牒，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154]。在激烈的争辩中，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16日，中共中央通过一项《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155]。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只能采取占领河南省南部、安徽西部等“防御性的军事行动”。问题汇报到莫斯科，莫斯科调和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既主张北伐，又主张同时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发展革命[156]。这样，中共中央便于4月18日作出决议，同意立即派军队北上。大约在此期间，李宗仁也派参谋长王应榆赴汉，向武汉政府领导人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和平会议解决党内纠纷。武汉政府领导人接待了王应榆，表示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157]。关于东征还是北伐的这一艰难的决策过程，邓演达回忆说：“往东——打南京——往北的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卒之为如下之理由取决往北去，把张作霖在河南的队伍肃清，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于京汉路线上责任托付给他，我们的队伍专力于东南的肃清。”[158]当时，冯玉祥队伍号称30万人，确是一支可以和奉系匹敌的力量。此外，还有个阎锡山，号称有军队十余万人，武汉政府认为，有可能倒向自己方面。因此，毅然决策北伐。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并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据称，与会团体一千五百余个，约五十余万人。典礼以北伐誓师为主调，但带着浓重的讨蒋色彩。誓师词宣布此次出师目标在于讨伐“最淫暴、凶残的奉系军阀”，“凡与张作霖勾结者，不论他过去行为若何，都是民众的敌人”。誓师词豪迈地声称：“我们要消

灭敌人的武力，使敌人片甲不回；就是我们一时不利而打败仗，我们也要自己片甲不回，直与敌人奋斗到最后一粒子弹，最后一把刺刀为止。”但誓师词也同时宣布，“凡是压迫农工、损害农工利益者，不管他过去行为若何，也都是本党的敌人”，这就将矛头指向了蒋介石。在演说中，汪精卫则更明确地宣称：“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必须要打倒本党的内奸蒋介石。”(159) 次日，各军开始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

尽管武汉政府的领导人这时唱的是响入云霄的高调，但是，高调中仍然可以觉察出细微的低音。这就是武汉政府处境很困难。4月27日，徐谦说：“是要往北，才能打出一条生路。”(160) 5月13日，汪精卫说：“如果外交形势变换，我们应该与西北革命军同心协力，将大陆拿到手内，这也是革命的唯一出路。”(161) 所谓外交形势变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干涉的委婉说法。可以看出，汪精卫视为“出路”的正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

武汉政府寄希望于冯玉祥和阎锡山，没有想到，这两个人都靠不住。武汉政府既失去了东征的时机，北伐也中途夭折。

二　唐生智率军北上与冯玉祥东出潼关

南湖誓师的第二天，武汉国民政府军队陆续开拔，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待命出击。武汉政府的计划是，以唐生智的第一集团军由京汉路北上，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由陇海路东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则自正太、京绥两线进攻。

4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党部欢送北伐将士。30日，唐生智、张发奎进抵驻马店，各军分左、中、右三路北进。中路军以第三十六军刘兴部组成，担任正面作战，自广水出发，沿京汉路前进。右路由张发奎部第四、第十一军及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组成，经汝南、上蔡，进取开封。左路由第三十军及豫中靳云鹗、贺国光、

梁寿恺、魏益三、庞炳勋等部组成，沿京汉路西侧进攻。第三十五军何键部为总预备队，继第三十六军之后推进。除李品仙的第八军卫戍武汉外，唐生智的第一集团军全部投入了。总兵力约十余万人。5月13日，下令总攻击。

当面之敌为张学良、韩麟春所率奉系三、四方面军团。该军团以遂平、西平、上蔡为据点固守。其第十七军荣臻部集中郾城、漯河，沿沙河北岸据险固守，配置骑兵和铁甲车，往来游弋，河东、逍遥镇、邓河、周家口，皆有奉军精锐布防。

第三十六军首战的任务是拿下遂平与西平。当时，东双河、柳林一带为红枪会盘踞，威胁北伐军后路。刘兴先命第二师唐哲明部由信阳回师，红枪会闻风四散。后顾之忧既解，刘兴遂于5月14日挥军北上。以地理位置论，遂平在南，西平在北，应先攻遂平，但刘兴却出人意表，以第三师的部分兵力看守遂平之敌，以第一师为主力绕道进攻西平。奉军凭险顽抗，并利用大炮及铁甲车轰击。激战两昼夜，北伐军伤亡很大。苏联顾问建议刘兴撤退，刘却故意入睡，以镇定军心，终于在17日将西平攻克。西平既下，遂平奉军不攻自撤[162]。第三十六军乘胜追击，5月20日再克漯河。奉军沿沙河、澧河布防，企图固守郾城。刘兴将所部分为左中右三路渡河，合围郾城，奉军因险要已失，退走临颍。5月21日，第三十六军攻克郾城。

右路军首战的任务是拿下上蔡。5月14日，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朱晖日部在上蔡卧龙岗一带与奉军第十一军第十二旅富双英部遭遇，将富部击退。15日，第十二师缪培南部在上蔡城北十里铺也取得胜利。16日，张发奎命令部队向驻守东洪桥、西洪桥的奉军主力第十一军赵恩臻部发起进攻。赵部为奉军精锐，有常胜铁军之称。国民革命军经过苦战，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取得胜利，占领华陂及扶台集之线，使困守上蔡城内的富双英部成为瓮中之鳖，不得不献城请降[163]。17日，余敌溃退，据守沙河北岸的逍遥镇[164]。23日，独立第十五师贺龙部自邓城渡河，向逍遥镇攻击前进。当时，奉军第八军据守沙河

北岸，防御严密。北伐军几次强渡，均未成功，于是，避实就虚，以少数兵力自南岸佯攻，而以独立第十五师之第四团迂回敌后，攻其不备。奉军没有料到这支部队会从背后出现，惊惶溃退。贺师跟踪追击，经过激烈的巷战，当日下午攻克逍遥镇。25日，张发奎、邓演达抵达逍遥镇，布置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按原定方案，右路军应继续北上，进取开封，由于中路溃退之敌集结临颍，奉军第十军王树棠部又自郑州来援，因此，张发奎奉命改变计划，引军西向，协助第三十六军进攻临颍，消灭奉军主力。

临颍为许昌屏障，是奉军固守的战略要地。东、西洪桥之战后，奉军集中精锐于临颍城东，计有第八军万福麟一部，以及赵恩臻的第十一军、汲金纯的第十五军、荣臻的第十七军、李镇亚的第十九军等，约3万余人，凭漯河天险，抗击北伐军正面，同时在临颍附近修筑坚固工事，阻挡北伐军左翼。为确保该地，张学良亲赴前线，痛哭誓师，并处决了自西平、漯河退却的军官数人。

第三十六军攻破郾城之后，于27日进逼临颍。第一师的前卫部队第一团在攻城时遭到巨大损失。同日，张发奎命副军长黄琪翔指挥，以第十二师及第二十六师攻击临颍城东、北两地区，以独立第十五师攻击临颍城南地区，自率第二十六师为总预备队，随正面攻进。双方在在七里头一带展开激战，奉军倾所有兵力据壕固守，相持终夜，未能突破。张发奎乃命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部开赴辛庄，抄敌左翼，命第十二师第三十四、三十六团任正面，第三十五团任左翼，于拂晓全线进击。奉军兵力数倍于北伐军，双方交互冲锋，形成混战状况，北伐军伤亡惨重。抄敌左翼的蒋先云部也受到巨大损失。蒋先云身中数弹，负伤后仍在辛庄死力支持，因伤重牺牲。张发奎、黄琪翔均亲到前线指挥，同时调在鄢陵方向警戒的第十师蔡廷锴部增援，奉军阵地摇动，弃城退走。当日，北伐军进占临颍，打开了通向郑州的大门。此役，奉军伤亡逾万，被俘千人，北伐军也有很大损失。第四军、第十一军伤亡达3000人。张发奎承认，北伐以

来，“战斗之烈，伤亡之大，实以此役为最”[165]。

蒋先云，湖南新田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曾任北伐军总部秘书。迁都之争后离开蒋介石，到武汉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队长。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惋惜地说：“蒋先云是个将才，这是革命的损失！”[166]

临颍战后，张学良本拟在郑州、开封一带作第二次顽强抵抗，因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已占领洛阳，与第一集团军形成两面夹攻之势，决定退出郑、汴。行前，张学良留函刘兴，说他留下了许多军用品相送，末尾表示也要参加革命[167]。

奉军的主力部署于京汉线，武汉北伐军为击溃奉军主力付出了巨大牺牲。总计，第四方面军各部在西平、上蔡、漯河、临颍一带伤亡达1．4万名之多[168]。而东出潼关的第二集团军由于没有遇到强敌，仅伤亡四百余人，进展也顺利得多。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取得陕西作为地盘，东出潼关的任务便逐渐提到面前。

1927年2月8日，李大钊致函冯玉祥，介绍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的兵力和驻防情况，说明奉军“将出兵河南”，建议国民军“出长安，会师郑州”[169]。2月底，冯玉祥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开始对将士进行动员。3月11日，发布《讨奉布告》，要求各界同胞“共同参与革命战争，以期一举歼敌，完成全功”。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军与晋军长期存在仇隙，冯玉祥要东出潼关，必须要进一步改善和阎锡山的关系。

1月30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问候起居。2月1日，冯玉祥复电，在客套中略露“同志辅仁，至希予助”之意。9日，冯玉祥到潼关

慰问将士，阎锡山特派崔廷献为代表，赶到当地见冯。冯玉祥对崔表示：国家大事，非与阎锡山合作不能成功；革命是曲线的，未便直进，只好渐进，山西环境不同，自有因时因地之机。冯并绘一小画赠阎，题诗云："铁练捆缚全地球，重层压迫世人愁。列宁主义行天下，解放人类得自由。"崔临别前，冯声言接济困难，要求阎的兵工厂协助制造子弹[170]。2月21日，阎锡山又派南桂馨赴陕，与冯玉祥会商[171]。南表示，当劝告阎锡山，"以爱国为重，速行出兵"。3月下旬，冯派李兴中到晋。其后，双方在赵村成立国晋联合办公处，双方合作有了具体形式。但是，阎锡山仍然害怕冯玉祥假途灭虢，一再坚持，在唐生智率部北伐，冯玉祥率部东进，抵达洛阳后，才自正太、京绥两路出兵[172]。

尽管冯玉祥无法消除阎锡山的戒心，但是，国民军与晋军的关系毕竟已从敌手变为盟友，冯玉祥便大胆东进了。

冯玉祥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任命后，即于5月1日在西安红城召开军民纪念大会，同时宣誓就职，表示愿在"国民党指导之下，誓死为中国贫苦工农解放而奋斗"，"并为全世界贫苦工农及被压迫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冯玉祥、于右任并联名致电第三国际，声称："国民军的一切努力，就是祝贺工人们胜利的忠实礼物。我们已经望见五一节的红光，从第三国际的中心地方映射到全世界！"[173] 会后，任命石敬亭为参谋长，同时通令全军，将西北所有军队重新编制，改名换旗，冯自领中央军，以刘镇华领东路军，岳维峻领南路军，宋哲元领北路军，孙连仲领右路军，徐永昌领左路军，号称30万人。在上述各军中，刘镇华根本靠不住，徐永昌尚在阎锡山麾下，岳维峻不听指挥。冯玉祥用以进攻河南的主要是中央军，下辖方振武、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冯治安、刘汝明、韩德元等部，共6．1万人，拥有枪4．1万支，炮80门，机关枪300挺，迫击炮107门，子弹每个士兵不过50粒[174]。5月5日，冯玉祥命令中央军由阌乡东进。

5月7日，冯玉祥赴潼关督师，途次渭南，以四事电告驻陕将领，

要求他们拥戴于右任，特别提出，在军队中提高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权力，极力援助地方党部及各种社会团体的发展[175]。冯玉祥亲书口号，制成胸章："我们是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所有官长士兵一律佩于胸前右方。这时，正值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杀害，冯玉祥闻讯，特在潼关开会追悼，并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开展追悼活动。

西安围解后，刘镇华部退据豫西，曾接受冯的驻豫军总司令的委任，但他并非真心归附，仍然依违于阎锡山、张作霖等诸种势力之间。冯军中央军东进后，进展顺利，先后占领河南西部的灵宝、陕州、卢氏、洛宁、渑池各县，刘镇华部退据铁门、新安，构筑工事，预备作最后挣扎。22日，冯军围攻新安，刘镇华部缴械投降。23日，方振武率部挺进磁涧，奉军万福麟率众5个旅，汇合原镇嵩军张治公部约4万余人，在娘娘庙一带设立防线三道，方部攻击未下。26日拂晓，孙良诚、石友三等部赶到，发动总攻。万福麟部沿铁路东逃，张治公残部遁入终南山中。同日，冯军攻克洛阳。

洛阳攻克后，冯玉祥即令孙良诚率部沿陇海路向郑州进军，方振武率部由登封向禹州进军，协助武汉北伐军队，同时命石友三部由洛阳，经孟津、偃师向郑州进军。27日，石友三部占领孟津。28日，过偃师，奉军增援部队凭借黑石关之险竭力抵抗，企图抢运当地兵工厂机械。在冯军猛烈攻击下，激战终日，奉军退走，兵工厂得以保全。30日，冯军占领孝义。奉军四面楚歌，向东北溃退。31日，石友三部占领郑州，骑兵旅追至黄河南岸，因铁桥被炸，遂在南岸警戒。

冯军东出加强了武汉政府的北伐力量，奉军两面作战，形势不利，阎锡山的态度又迅速变化，随时有加入对奉作战行列的可能。6月1日，奉方发表声明，宣称"战线太长，且东南两路军队苦战累月，亟待休养"，"为保存实力，相机攻守起见，不欲作重大之牺牲，决计变更战略，退守河北。"[176]同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刘兴部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6月2日，张发奎、加伦、邓演达到汴，并行骑马入

城。

三　阎锡山易帜

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晋军拥有十余万兵力，因此，南北各方都极力争取阎锡山。有一段时期，聚集太原的各方代表竟达三四十人之多。为了割据自保，阎锡山则以“严正中立，保境安民”相标榜，观望风色，多头应付。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进抵长江流域；在北方，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再度崛起。阎锡山看到这些情况，权衡形势与利害，不得不逐渐修改自己的航向。

还在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时，李大钊就曾致函阎锡山，劝他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后，李大钊又以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名义，询问阎锡山的驻京代表温寿泉，希望知道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177]。阎经过二十多天思索，表示决与国民党合作，将待机行动。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北洋军阀各派代表会议，以“霸主”姿态规划军事，指挥一切。为了解决“西北问题”，他电令阎锡山：消灭绥远、包头一带的国民军；进攻甘肃、陕西的国民军；如一、二两项做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给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锡山答以愿接受第三项，同时向李大钊报告，声称冯玉祥军“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使晋方为难”。为此，李大钊于同月24日复电阎锡山，首先肯定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绩，次述阎多年来“事齐事楚”、“卑身屈节”的艰难，勉励他认清时机，投身国民革命。电称：“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178] 同电中，李大钊并告诉阎锡山，冯玉祥已离包头，赴平凉督战，不必担心。

在张作霖咄咄逼人的气焰下，阎锡山被迫命归化都统商震将大部分晋军撤回山西，将绥远让给了奉系。为了抵御奉系的进一步胁迫，阎锡山不得不向国民党方面求助。11月26日，阎锡山致电温寿泉，命

其转告李大钊等称："本号与田君（国民党）同行，早下决心。"[179]其后，张作霖调动奉军占领京绥线，决心进攻为国民军占领的五原，阎锡山担心牵及山西，再电李大钊等报告，要李和李石曾及北京政治分会商榷。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经讨论后决定，认为五原决不能放弃，晋军应集中正太路，防止奉军进攻太原，在奉军前进时，应监视并准备作战，"待河南局势发展，即向大同方面进攻，以击奉军之背"[180]。事后，李大钊又致电阎锡山，告以奉方此举，目的不仅在于取得五原，而且还要威胁山西，"此时山西不必露出何种行动，但须准备一切枪〈械〉，必要时行动"[181]。阎锡山同意李大钊等人的意见，但要求联络陈调元、靳云鹗等，自成势力，由他组织一个不属于冯玉祥国民军系统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李大钊、中央中央、共产国际远东局都同意阎锡山的要求，中共中央致函北方区委，告以已要求鲍罗廷和加伦"切实向国民政府建议"[182]。中共中央称："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与奉张反动军阀的斗争，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中共中央并指示："阎锡山现在联南的态度，若尚动摇，则我们当催促他迅速发动，与奉反脸；如他联南态度十分坚决，则我们可授他以阴谋，此时仍虚与奉张敷衍，不使奉张对阎起一点恐怖疑心，俟奉军精锐南下后，再突出保定，截断他的归路。"[183]其后，阎锡山又派孔繁蔚到北京，面见李大钊，详陈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和进攻奉系的计划，建议在北伐军攻下浦口时，由陈调元、靳云鹗首先发难，占据陇海路，截断津浦线，同时，北伐军、国民军分别自武胜关、潼关出击，进攻郑州，山西方面则出兵截断京汉、京绥两线。李大钊赞同阎锡山的计划，建议阎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革命军总部"发生密切关系"，通盘筹划，听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184]。

阎锡山一面与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李大钊、李石曾等联系，一面派赵丕廉秘密南下。12月1日，赵丕廉抵达南昌，向蒋介石转达阎锡山的意见，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一俟国民军、北伐军入豫，或北伐军进抵津浦线，即起而响应[185]。同月28日，赵再到南昌，对蒋介石称："（山西）被军阀包围、环伺，非至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

露。”[186] 1927年1月31日，蒋介石根据预定安排，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此项呈请，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于3月11日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3月16日，阎锡山收到委任状后复电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孔庚等，表示“此间已准备好，一俟西北军发动，当即一致动作”[187]。此后，阎锡山即跨出了易帜的步伐。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以南桂馨为政治部主任，武汉特派员罗任一为副主任。同时，着手改组省政府，示意军人及各方人士加入国民党。5日，致电在汉口的赵丕廉，告以本日已下动员令，并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但是，这一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彼此间正在准备进行一场生死斗争。6日，赵丕廉密电阎锡山，告以“此间内部分化，局势骤变”，北伐将会延缓，山西不能独当劲敌，要阎“相机审度”[188]。这样，阎锡山易帜的步伐又放慢了下来。

“四一二”政变后，出现了武汉、南京、奉系三大政治势力鼎立的局面，各方都加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5月4日、12日，王法勤两次提出，山西方面，奉天、蒋介石都派了人，我们赶紧也要派一两个代表，因而，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孔庚为山西特派员[189]。孔庚与阎锡山同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长期与阎共事，交谊很深。武汉政府派他赴山西，是很恰当的任命。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序列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很高的位置，但是，这一时期，阎锡山已决心倒向蒋介石一边。4月25日复孙传芳电云：“赤党嚣张，争夺为心，虽蒋尚且不容，足征其不能与人合作也。”[190] 5月6日，又致北京温寿泉电云：“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191]。他多次密电其驻北京代表，劝说张作霖，和蒋介石等各方妥协，“一致讨赤”[192]。6月初，又两次致电张学良、韩麟春，劝其取消安国军，改组为河北国民革命军，

联络南京及各方，组织讨共大同盟[193]。

阎锡山和武汉国民政府及冯玉祥之间本有成约：晋军负责自正太、京绥两线进攻奉军，一俟唐生智率军北上，冯玉祥出潼关经洛阳东进之际，晋军即可发动。5月下旬，奉军在河南战败。26日，冯玉祥军攻占洛阳。次日，唐生智军攻占京汉线侧的军事重镇临颍，两军会师在即。但是，阎锡山并没有践约出兵。同月底，奉军放弃郑州、开封等地，撤至黄河北岸，阎锡山才于6月2日派部队进驻娘子关外的东天门及河北井陉、获鹿等地。3日，在石家庄设立正太铁路护路司令部。但是，阎锡山的这些举动以防御为主要目的，并无立即进攻奉军的企图。6月13日，汪精卫在总结武汉军北伐状况时曾埋怨说："所不足的是第三集团军爽了约，如果当奉军由郑州后退的时候，第三集团军出兵断其后路，我们早已到北京城了。"[194] 不过，尽管如此，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举动仍然引起了奉方的深刻猜忌。

奉军的北撤象征着这个曾煊赫一时的军阀集团已经转入劣势，阎锡山觉得时机成熟，决定走完易帜步伐。6月5日，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山西省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工人代表联合会等团体名义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电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等决议。会议既"推举"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同时又自拉自唱，通电拥护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会议并"电请"省党部清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赤化"，会场标语一律用蓝色纸书写。会后，由大会主席团代表赴总部，请阎锡山就职。据报道，阎"再三谦让始允"。当晚，总部通知：全城挂青天白日旗；军官须将旧式领章、肩章取消，换用青天白日新帽花；学生须穿新制服。一时之间，各成衣店利润陡增数倍。

6日，阎锡山举行就职典礼，派出飞机抛撒就职宣言。在宣言中，阎锡山除炫耀同盟会的老资格外，特别着意为自己辩解，声称因环境恶劣，强敌环伺，他过去14年中，"为保留此大河以北之革命势力"，不得不"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宣言称："一切反革命

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早日实现。”[195]

阎锡山就职后，将所部分为10个军：各军司令官分别为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汝钧、丰玉玺、张荫梧（副）、谭庆林、郑泽生、李维新，阎锡山自兼第七军正司令[196]。同时下令裁撤山西省长、镇守使、道尹各职，以南桂馨、李鸿文、赵丕廉等分任民政、财政、农工各厅厅长。

阎锡山长期实行高压专制统治。当年3月，右派苗培成、杨笑天等操纵“山西工人代表总会”捣毁太原总工会，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立即组织工人义勇队包围右派大本营平民中学，捉拿并公审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右派韩克温。阎锡山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禁止私行集会、结社、散发传单，所有五一、五四、五七、五九各纪念日，一律禁止举行活动，违者拘送卫戍司令部惩办[197]。当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即因此未能举行。5月9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以西北革命同志会、太原学生联合会等左派组织名义，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召开李大钊追悼会，贴有“拥护武汉政府”、“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标语，阎锡山即派兵包围学校，先后捕去共产党人张勋等六人。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原是左右派的联合组织，在九名执行委员中，国民党员占五席，共产党员占四席。阎锡山易帜后，即遵照南京方面的命令，成立国民党山西党务改组委员会，开除在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以南桂馨、苗培成、韩克温，温寿泉、梁永泰、杨笑天等为委员，又成立清党委员会，登报通缉山西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颜昌杰、崔锄人、王瀛、薄书存（一波）等32人。不久，又要求各县设立清党宣传会，集中精力，肃清“跨党分子”[198]。国民师范、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等校并开展清校运动，驱逐左派和共产党员师生。6月底，逮捕山西法学院进步教授胡遽然。9月5日，原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王瀛及其夫人自武汉回山西，在崞县

被捕。10月11日，王瀛被害。

为了加强和蒋介石的联系，争取蒋的支持，阎锡山在易帜前即派温寿泉南下，与宁方接洽。易帜后，再派南桂馨赴宁。6月8日，南桂馨途经北京，向奉方解释出兵井陉等地，目的纯系“自卫”，劝奉方与宁、晋合作，组织“讨赤”三角同盟。但奉方强烈表示了对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不满，张作相公开指责晋方：“表面上虽日言合作，实际上则增兵直境如故，尤失合作之真义。”[199] 在此前后，阎锡山又派人赴宁，表示“准备出兵”攻奉。他向蒋介石献策：“先奉后共，灭奉则有八分把握，灭奉以后灭共亦有八分把握。”[200]

6月中旬，蒋介石派刘芙若、何澄（亚农）、彭凌霄三人到晋视察，受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等的热烈欢迎，但姗姗来迟的武汉代表孔庚则受到了分外的冷遇。

孔庚因交通阻隔，于6月17日才到达太原。阎锡山称：“本预备出兵的，因为北伐军不曾过河，兵力很单薄，不敢冒昧；再则有两个政府，也不知道何所适从。”又称：“据一般人的观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阎锡山并称：“山西人听说要实行共产，也很害怕。”[201] 18日，山西省党部等纠集了一部分人要求驱逐孔庚；太原街头贴满“打倒共产党走狗孔庚”一类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漫画。19日，孔庚被送离山西，武汉国民政府争取阎锡山的努力彻底失败。

易帜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宣布过一些改革方针，如建设廉洁政府，严禁收受贿赂，裁撤闲散机关，禁止高利盘剥，提高工人、农民生活，实现男女平等之类，但大都是具文。只有在实施“党化教育”以及加强社会控制方面，倒是做了不少工作。

在宁汉对立中，阎锡山公开拥蒋对武汉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自此，武汉政府更形孤立。同时，阎锡山易帜对奉系也是一个严重的

打击，昔日的盟友化为腰背附近的尖刀，使之无法自安。6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坦率地承认："奉军因背后有阎锡山军队之牵掣，自不得不后退。"[202] 这说明，阎锡山易帜对奉军北撤，以至后来退出关外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　吴佩孚势力的败亡

在奉吴河南战争中，吴佩孚的残余势力再一次受到打击。

3月16日晚，吴佩孚仓皇率队退至巩县孝义镇兵工厂。次日，奉军占领郑州。19日，阎锡山致电其在吴部的代表梁汝舟，建议吴暂驻洛阳，以观变化。阎锡山并应允接济吴佩孚每日所需给养600元。23日，他又亲自致电吴佩孚，劝吴到山西休养。张作霖在狠狠地打了吴佩孚一拳后，也装腔作势地邀请吴佩孚入京，"或在豫代为指挥敝军军队"[203]，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时，吴部在巩县粮食给养发生困难，奉方大将韩麟春派人送去米、面、现洋，表示欢迎吴回郑，愿与吴合作到底。河南各种部队牌号复杂，其中一部分人仍然效忠于吴，因此，奉方企图依靠吴的力量收抚各部，稳定豫局。吴佩孚当然不愿上钩，但他也不愿投奔阎锡山门下。同月26日，梁汝舟复阎锡山电云："玉帅刚毅成性，但能支持，决不作退一步想。"4月14日，张学良亲赴巩县，迎吴回郑，遭到拒绝。吴表示："本人决无返郑或来京之意，如必要时，返回蓬莱原籍，闭门读书，不问理乱。"[204] 其间，阎锡山派人到巩县邀吴到太原，也被吴以"此间军事无人负责"为由加以拒绝[205]。

但是，吴佩孚并不能在洛阳一带安居。4月下旬，吴佩孚得知冯玉祥即将东出潼关，召集镇嵩军将领王振、柴云陞及张治公等会议，磋商抗击。与会者各怀异志，意见分歧。5月10日，被冯军战败的张治公到郑州乞援，奉军决定西进，因此，吴佩孚在巩县也难于立足。

当时，吴佩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于学忠、张联陞两部，一驻豫西，一驻鄂西，不过三四万人。5月12日，吴佩孚离开巩县，经嵩山、方城到达南阳。途经嵩山时，曾拟削发为僧，为部下所劝阻[206]。26日，张其锽电称："大帅本拟引退，不问军事，复因将领恳切陈词，不得不暂时维持，以顾危局。连日磋商结果，将领意见分歧，多请大帅勉为其难，竭诚调解，大帅仍本初衷，支撑危局于一时也。"[207]可见当时吴部分崩离析的状况。

南阳地方偏僻。5月30日，吴佩孚致电孙传芳称："党军猖獗，战局突变，外传纷纷，真相莫明，究竟大势如何，殊觉沉闷之至！务请详示近情，以释鄙怀。"[208] 其间，吴佩孚曾有与奉鲁军合作的打算，陆续派殷嘉祥、马开礼等人赴济南，会见张宗昌，要求接济饷弹。[209]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取得了河南的统治权，一面分兵北上、东进，一面派方振武、岳维峻、樊钟秀等部进攻南阳、邓县的于学忠军，以便消灭吴佩孚的最后一支力量。6月25日，吴佩孚离开南阳，企图向张联陞借道，经鄂西入川。[210] 30日，在灰店铺遭到土匪袭击，吴的参谋长张其锽被击毙。张为湖南人，与谭延闿为同年进士，民国初年在谭手下当南武军统领，后以湘军代表名义做吴的座上客，与吴结为异姓兄弟。张的被击毙，使吴丧失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

张联陞是吴的旧部，但1926年12月已被唐生智改编为独立第九师[211]。1927年6月又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吴佩孚自南阳出逃后，武汉国民政府即命张派兵堵截。张随即封锁由老河口至襄阳的河道。7月2日，吴佩孚企图在竹筱铺一带偷渡襄河，在中流受到张部袭击。吴佩孚指挥卫队冲击过河，率百余人向南漳逃窜[212]。至此，曾经纵横中原、煊赫一时的吴佩孚军阀集团遂彻底被消灭。

7月13日，吴佩孚逃到巴东，受到杨森代表的欢迎。杨指定夔府为吴的驻地，吴的旧部陆续来归。杨森对外声称，已将吴佩孚卫队武

装解除，放置绥定。12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杨森严拿吴佩孚，解宁惩办。30日，杨森复电称：吴佩孚已闻风逃向陕边，该处已无吴佩孚踪迹[213]。实际上，吴佩孚一直处于杨森的庇护之下，但已掀不起什么风浪。

五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

孙传芳、张宗昌败退江北后，仍拥有兵力约20万人。其中孙部约5万人，张宗昌、褚玉璞部约15万人。他们乘着蒋介石清党反共之机，陈兵江北，积极准备南犯。

孙军的首攻目标是里下河的门户泰州。4月5日，周荫人、郑俊彦部以优势兵力自如皋来攻，守军独立第十二师张中立部迎战，因寡不敌众退往江南。10日，孙军袭占苏北重镇扬州，第十七军曹万顺部受到重创，狼狈退往镇江。这样，东起南通，西至扬州的广大地区就完全被孙军占领。孙传芳除在瓜州、都天庙构筑炮台，射击长江南岸外，又在扬州十二圩等地试图强渡，准备重占江南。

张宗昌部的首攻目标是滁州。4月8日，滁州失陷。12日，第三军程国瑞部、第七军许琨部3万余人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守军独立第五师马祥斌部与独立第四旅王金韬部死守待援。随后，张宗昌以白俄铁甲车直薄浦口，同时进驻和县、巢县等地，企图割断芜湖、合肥之间北伐军的联系，进取安庆。16日，直鲁军炮击南京，蒋介石的定都之地受到威胁。

孙传芳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一直若断若续。4月中旬，蒋介石任命陈仪为江北宣抚使，企图通过他收抚孙传芳。陈仪受命后，即请张君劢拟稿，劝孙发布宣言，与蒋合作。在“反赤”这一点上，蒋、孙已经有了共同语言，但孙不愿与蒋共同北伐。5月1日，谈判破裂。[214] 3日，孙传芳通电，指责蒋介石“藉共产党之势力以破坏敌军，沪宁既下，乃捕杀共产党人以释天下之疑”，“利之所在，虽仇必亲；利

之所去，虽亲亦仇”。通电表示：“（传芳）虽三战三北，而耿耿此心始终不懈者，诚以此贼不除，国家断无幸存之理。”[215]

孙蒋谈判既破裂，蒋介石乃于5月1日制订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夺取淮、海；第二路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南京附近渡江，进攻津浦路南段；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攻津浦路侧面，救援合肥被围守军。在这三路中，重点在第二路；第一路军暂在沪宁线集结，待二路、三路得手之后再行出击。

在南京受到威胁的状况下，蒋介石被迫作出继续北伐的决定，但是，他视为心腹大患的还是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5月7日，他在南京发表演说称：“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要求各将领“一星期内扫清江北的北洋军阀”，打下徐州、济南，“再回来同共产党作战”[216]。蒋介石的这一演说表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他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变化。

白崇禧指挥的第二路军分三个纵队，分别以贺耀组、杨杰、陈调元为指挥官，以陈调元兼前敌总指挥。5月11日，第三纵队陈调元部自马鞍山渡江。12日，攻克和县。13日，第二纵队杨杰部由江宁镇、慈湖镇渡江，进占乌江镇，浦口之敌不战北撤。15日，第一纵队贺耀组部由下关、大胜关之间渡江，未遇抵抗即进占江浦。17日，三个纵队同时告捷，分别占领全椒、东葛。18日，第二纵队杨杰部克复滁县。19日，继克沙河集等地。张宗昌因直鲁军节节失败，下令总退却，至蚌埠、临淮关一带集中。至此，原定第一阶段的计划顺利完成，津浦线明光以南之敌肃清。

第三路军分五个纵队，分别以叶开鑫、夏威、胡宗铎、王天培、柏文蔚为指挥官，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另以王普为总预备队指挥官。自5月5日起陆续在芜湖、大通等地渡江。13日，攻克含山、柘皋。15日夜，张宗昌军得到蚌埠方面的援军，由第十五军军长马济指

挥，夜袭梁园，许琨、程国瑞等都亲自临阵，马济并调动白俄骑兵千余人冲锋。第三路军以为敌军新败，解甲安卧，被迫仓皇应战。同日夜，被围于合肥的马祥斌、王金韬部得悉援兵接近，下令出击。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十军王天培部、第二十五军王普部等包抄敌军后路，张宗昌军不得不向西北溃退，被困一个多月的合肥因此解围。18日，第一纵队进至明光附近，张宗昌亲至临淮关督师，命津浦线南段的军队退守定远一线。19日，夏威、胡宗铎部攻克定远，马济殒命。20日，攻克临淮关、凤阳。21日，攻克蚌埠。远在北京的张作霖企图为直鲁军打气，致电张宗昌称："皖蚌为全军枢纽"，要求张集结兵力，作破釜沉舟之战[(217)]。张宗昌尽管已败退徐州，却还要大言不惭地吹嘘："一俟布置就绪，仍当驰赴前方"，"昌平生身经百战，类从千钧一发之危机，收最后五分钟之胜利。"[(218)]

第一路军分四个纵队，分别以曹万顺、赖世璜、刘峙为指挥官，何应钦自兼第四纵队指挥官。由于第二、第三路军进展顺利，何应钦便于5月13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提前渡江进击，得到同意。20日，各路陆续渡江。协同自浦口东进的第二路军第一纵队贺耀组部横扫孙传芳军。孙军自退守江北后，粮饷困难，子弹缺乏，士兵患病者十有八九，普遍厌战，加上苏北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因此，何应钦部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21日，占领六合。22日，占领仪征。23日，第十七军第二师进占扬州。

蚌埠、扬州既克，蒋介石于5月24日下达追击命令，要求以主力进攻徐州、砀山间之敌，以一部进取海州、台儿庄，直逼鲁南。

孙传芳军于扬州失陷后，即分两路退却。一路沿运河退守淮阴，一路自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退守海州。将领之间攻守分歧，愈形涣散。孙传芳曾通电各将领"巩固内部团体，消弭意见"，"严守各地阵线，以待时机"[(219)]，但无济于事。5月26日，何应钦部第三纵队进占南通。28日，第二十一师陈诚等部经激战后克复邵伯。6月1日，攻克高邮。孙军第八师崔景桂、第十师郑俊彦、第十三师刘士林等部望

风披靡。6月5日，攻克淮安、涟水，孙军彭德铨部第三团缴械投降。

第二路军的任务为协助第一路军自皖北进攻苏北重镇淮阴，并以部分兵力由津浦路以东地区向徐州攻击前进。6月2日，击败直鲁军第三军程国瑞部，占领灵璧。其后，陆续占领宿迁、洋河。9日，占领海州，俘敌六千余人。孙军第十七师冯绍闵部、第十师郑俊彦部被歼，第五师白宝山残部投降，第十二师周荫人残部退往山东的滨海城市日照，第二、第四、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各师则退据桃林、红花埠、劳沟一线，企图顽抗。10日，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协力进攻，孙军精锐丧失殆尽，残部经临沂向胶济路退却，第二路军克复剡城，进入山东境内。第三路军在攻克蚌埠、临淮关之后，以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整顿待命，以第四纵队沿津浦路北进，第五纵队攻取六安。5月25日，六安攻克。28日，张宗昌因接到张作霖缩短战线的命令，节节后退。第三路军顺利突破张宗昌部在浍河流域固镇等地的防线，连克蒙成、颍上、阜阳、宿县等地。29日，蒋介石进驻蚌埠。31日，张宗昌弃城北走。6月2日，第四纵队兵不血刃地占领徐州。

第四节　奉鲁军阀组建安国军政府

一　查抄苏联使馆与镇压革命党人

吴佩孚、孙传芳集团先后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日益陷入困境，列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准备发动反共政变的蒋介石。奉系军阀为振作残局，不得不高举“反赤”旗帜，极力向列强邀宠。

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加入国际反苏阵线。[220] 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非法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同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

抗拒布尔希维克主义”[221]。不久，即命奉系军警制造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奉系第二次入关后，疯狂制造白色恐怖，迫使国民党工作转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的一个废弃的兵营。这一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并一起鼓动奉系军警采取行动[222]。于是，奉系军警立即“购线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顾维钧，顾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4月4日，领袖公使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dijk）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223]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4月6日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224]。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不得拦阻[225]。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计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

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彼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226]。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7点。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227]。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228]。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事件发生的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229]。对于这种抗议的"正义性"，连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都心怀异议[230]。至于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231]

7日清晨，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ЧерныIх）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232]。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233]。为了打破列强建立国际反苏阵线的企图，苏联政府的抗议比较克制。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234]。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235]。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236]。张国忱心领神会，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N．Mitarevsky）“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编造，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237]。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极大震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奔走营救。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238]。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239]。

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未能遏制一意孤行的奉鲁军阀。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240] 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与此同时，军阀残害革命者的气焰越来越烈。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241] 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242]。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243] 他在《狱中自述》中慷慨陈

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244] 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宣布，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织军事特别法庭。28日，宣判对李大钊等人处以绞刑，立即执行。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但是李大钊始终神色不变，视死如归[245]。一代英豪，壮烈捐躯，终年仅38岁。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揖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奉系查抄苏联使馆、镇压革命党人的主要意图是向国内外表示，北洋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246] 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247]

奉系的暴行是国内外反苏、反共逆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股逆流的恶性发展。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248]。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加紧迫害本国进步人士，形成了东西呼应的局面。

二　安国军政府的成立

1927年初夏，奉系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拉开了北洋政权历史上的最后一幕。

当年春夏之交，奉系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力谋以政治手段挽救军事败局。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力主“南北妥协”，“共同反赤”。6月，杨宇霆、张学良联名复电南京方面称：“弟等信仰三民主义，已非一日”，目前“吾人惟有一致服从先总理主义，同心协力以救中国之危亡”[249]。杨宇霆多次与阎锡山驻京代表李庆芳接洽，谈判“由三民主义解决国是”的具体途径[250]。张学良则亲笔致函阎锡山，表示“赞成三民主义”，请阎向宁方斡旋[251]。新派将领希望以此稳住奉系残局，但旧派将领反对和谈。黑龙江督办吴俊陞、吉林督办张作相等主张将奉军撤往关外，实行保境安民。

面对新旧两派的分歧，张作霖一如既往采取倚重新系，兼顾旧系的办法。6月6日，吴晋代表总部发表谈话说：“此次奉方讨赤，原在消灭过激之共产党，并非与国民党为难。”“现蒋介石既反对共产党，并对于过激党徒极力取缔，是其主张已与雨帅主张相同。阎百川现既出任调停，而蒋介石在最近又有与雨帅合作之表示，雨帅自无不赞成。”[252] 同时，奉方又极力摆出一付强硬的姿态。同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再三强调，宁奉议和，“须蒋真能反对共产主义，且能将俄人逐尽，并完全脱离过激赤化主义。”又称：“若三民主义真以国利民福为宗旨，则予亦自赞成。若徒以国利民福为假面具，而实质上仍行共产主义，则予辈固将竭力以声讨排斥之。”[253] 张作霖企图表明，宁奉和谈，并非是奉方屈从宁方的三民主义，而是宁方归顺奉方的“讨赤”旗帜。

此时，阎锡山已经易帜，正将斡旋宁奉议和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筹码。6月8日，阎锡山特派政务处长兼警察厅长南桂馨为议和专使抵京，偕同李庆芳拜访杨宇霆。晋方提出，宁奉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奉方易帜，除赞同三民主义外，应悬挂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254]。张作霖期望对等议和，晋方提出的条件自然难以接受。6月9

日，奉系首脑会议决定可以容纳三民主义，但不挂青天白日旗，更不能放弃安国军的旗帜。会议认为：当前首要问题在“共同讨赤”，晋方既主张“奉晋宁三角同盟”，应速各派军队“会剿赤化军”，希望晋方将开入直隶境内的军队，即日移向黄河北岸一带。至于国家大局，俟“赤化敉平”后，召开国民会议从长计议。[255] 当晚，杨宇霆与韩麟春将奉方决议转告南桂馨。由于差距太大，南桂馨只得放弃原订由京赴宁的计划，折回太原。

奉系的态度虽然强硬，但并没有关上政治解决的大门。为了与南方抗衡，张作霖竟然提出了“四民主义”的论调。6月14日，吴晋发表谈话说：“雨帅的意思”，“中国为礼义之邦，自来对道德异常重视。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沦亡”，“拟于三民之外，增加民德一项，共成四民，以维国本。”[256] 同日，张作霖宴请应召北上的张宗昌、孙传芳及吴俊陞、张作相、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潘复等人。席间，张作霖建议在座诸将领，除张学良外，“重换兰谱，以明合作到底之精神”[257]。当即各开年庚，确定长序。众人议定，政治上决不易帜，安国军应于“三民主义之外，添一民德主义，以固邦本”[258]。

16日，奉系首脑会议进入关键时刻。杨宇霆强调：为抵御北伐军，各派军队应统一于安国军旗帜之下，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立即表态说：“军事与政治系联贯的”，“即政治方面，亦应受总司令之支配”[259]。吴俊陞也表示，应请张作霖高升一步，“藉以振动军心”。于是，有人主张拥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人主张仍用临时执政的名义。会议最后决定，即日由孙传芳领衔通电，拥护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将从前直鲁军、苏军、镇威军、吉军、黑军等名目，一律取消，统称安国军，由张作霖重新编制。同时决定“在大元帅之下设一内阁”，“特任潘复正式组阁”[260]。在北洋残余各派军阀的一致推戴下，张作霖终于在名义上登上了国家权力的巅峰。

同日，张作霖通电称：“此后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

敌，将来亦可为友。”[261] 奉系企图在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同时，再次向南方伸出和谈的触角。

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宣言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262] 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七条，其主要者为：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二、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之权利。三、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四、国务员为：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五、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根据上述命令，军政府之上，没有任何代议机关或民意机构，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不对任何机构负责，所有国务员均由大元帅任免。因此，这是一种任何障眼法都不要的军事独裁制度。尽管张作霖长期垂涎于总统的权位，表示总要“干它一下”[263]，但实行军事独裁的“大元帅”制，显然更适合他的需要。

由于前线军事形势严峻，18日晚，孙传芳、张宗昌南下，声明“不荐阁员”[264]。19日，张作霖以大元帅资格召集会议，商议组建内阁。会议气氛出奇地冷清。新派将领张学良没有出席会议。韩麟春虽然与会，但一言不发。旧派首领张作相、吴俊陞也默默无语。在讨论内阁人选时，推辞者有，竞争者无。以阎锡山为背景的胡惟德，当然不肯出任内务总长。孙传芳的幕僚原农工总长杨文恺，也再三电请开去原缺。就连奉系政客郑谦，也不愿充任阁员。相对独立的外交系名流，也放弃了因袭外交部长的传统，拒绝执掌外交部。左商右议，才勉勉强强凑够了内阁大员。

20日，内阁名单发布：以王荫泰为外交总长，何丰林为军事总长，沈瑞麟为内务总长，阎泽溥为财政总长，姚震为司法总长，刘哲为教育总长，张景惠为实业总长，刘尚清为农工总长。潘复兼交通总

长。这个内阁班子除沈瑞麟、姚震两人外，其余均为纯粹奉系人物。

整个官场冷淡的空气由上及下，一般官吏纷纷递交辞呈。举家出京者络绎不绝。安国军政府成立前夕，驻法公使陈箓即领衔代表驻欧各使馆致电北京，声称“流为饿莩，即在目前”，如不设法解决，将停止办公，全体回国[265]。7月初，北洋政府派驻国际联盟的代表朱兆莘发表宣言，公开声明“脱离北京政府关系，此后代表国民政府”[266]。这种惨淡的局面，预兆着日益逼近的北洋末日。

安国军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严重的外交信誉危机，争取列强的承认，成为它奋斗的首要目标。

张作霖在宣誓出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就亲自出马，约请各国公使到外交部举行茶话会。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谈判方式修改条约。”[267] 但是，张作霖的殷勤并未能挽回列强日益冷却的心意。各国公使收到请柬后，十分踌躇。他们担心贸然出席，会给人造成觐贺新元首的印象。经再三讨论后，一致认为，该请柬系张作霖以个人名义于就职前签发，可以回避承认新政权。为避免节外生枝，各国公使穿便服前往参加。数日之后，他们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回答了外交部关于大元帅就职及新内阁组建的正式公文。在简短的收据式的外交照会中，列强公使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任何承认新政府的词句”[268]，其冷淡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届北洋政府的遭遇。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喜七郎和大阪每日新闻社拍来贺电。

安国军政府外交信誉的危机，是与国内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消长演进密切相关的。“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铁血手腕和宽和外交姿态，对列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就连与奉系素有渊源的日本政府，也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田中首相在接见英驻日大使蒂利（John Tilley）时明确表示：“非常希望蒋介石能成功地组建其政府。”[269] 在这种状况下，北洋政府的地位自然每况愈下。美国驻华

公使马慕瑞向国务卿报告时，指责张作霖“抛弃法律”，“不顾宪法程序”，“行使军事独裁者的权力”[270]。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虽然对张作霖不乏私人敬意，但他刚一听说英国企业家梅杰·内森（Major Nathan）计划向张作霖贷款500万英镑时，立即极力劝阻[271]。

如果说，外交危机是安国军政府难医的外痈，那么财政危机便是其致命的内伤。

由于连年内战，经济凋残，北洋政权的统治区越来越小，但军费开支却有增无减。大大小小的军阀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整个财政面临“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的危境。安国军的高级幕僚曹汝霖毫不隐讳承认说：“税目愈繁而收入益形其短绌，搜括愈甚而国用弥觉其不敷。”[272]为解燃眉之急，张作霖请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出面向天津银行界借款。各银行纷纷以闭门停业来应付。开源无路，只好设法节流。6月24日，潘复宣称将对于中央官制大加革新，“以期节省靡费”[273]。他引荐其友人阎泽溥为财政总长，请他主持规划裁员减政方案。阎提出各部院官吏限额1800人，中央政费每月不得超过80万元。据此，财政部每司只留20人，盐务总署只留十分之一，内务部至少须裁员三分之二。此方案立刻激起强烈反对，大批被裁人员群起攻击潘复和阎泽溥，吓得潘复每日上班都要派“宪兵净街警卫”[274]。

内外交困使奉系难以继续作战，只好又把和谈作为中心议题。6月25日，张作霖发布“和平革新令”。同日，通电全国，除强烈指责“过激分子”，表示坚决讨伐“甘心赤化者”外，特别提起1922年、1924年与孙中山建立反直同盟一事。电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信使往还，物质援助，彼此精神契合，始终如一。”电报再一次向南京方面表示；“凡属中山同志，与真正三民主义不相违背，平时为共产党徒胁迫，无可赴诉者，仍当本中山合作之初衷，一律友视。”[275]28日，张作霖致电阎锡山称：“非停战不可以救民，非议和不足以歼赤”，要阎继续“斡旋南北，议和罢兵”[276]。同日，派遣卫戍司令邢士廉为特使赶赴太

原。同时，张学良也致电阎锡山，解释前次南桂馨来京受挫，乃系奉方内部“有一二人未明世界潮流趋势”所致。电称：“现征得各方同意，甚愿息事宁人。”[277] 29日，邢士廉抵达太原，但阎锡山托病不见，指派其总参议赵戴文及参谋长朱绶光代为接待。邢士廉虽再三表示奉方议和的诚意，但仍不肯允诺以“悬挂青天白日旗及改称国民革命军”为先决条件[278]。一连三日，邢士廉始终没有见到阎锡山。其后，张学良又分别派人和蒋介石、冯玉祥联系，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之意，甚至表示愿“让出关内”[279]。

奉系的“和平”呼吁得到了蒋介石的响应。“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反赤”上和奉系已经一致。7月初，蒋介石为稳住苏鲁防线，以便西征武汉，陆续派李征五等人北上，与张宗昌、张作霖谋和[280]。在致张宗昌函中，蒋介石表示：“讨共宗旨，大体既同，自无不可商量之处。”[281] 同月16日，阎锡山再派南桂馨赴京，力劝奉方改旗易帜。29日，何成濬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途经北京时，和张学良、杨宇霆进行了会谈。杨宇霆表示：奉方与国民党各自成一团体。国家大政可以合作，内部之事彼此不必过问。国民党不自居正统，奉方亦不以中央自居。杨宇霆同时表示：先军事后政治。第一步商停战办法，第二步商合作方案[282]。奉方所提条件，是和蒋介石搞对等合作，何成濬未作负责表示，不过谈判气氛则相当融洽[283]。不久，直鲁联军在皖北大胜，奉方又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分治[284]。因蒋介石已兵败下野，奉蒋和谈中断。

在山穷水尽之际，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登上元首宝座。

三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与东方会议

币原的外交方针受到日本军部和某些利益集团的攻击，被斥为“软弱”和“辱国”。驻华武官本庄繁在4月5日即向军部首脑提出：蒋介石能否压住共产党，同张作霖携手，尚属疑问。日本应采取“积极自卫”政策，在中国各要地驻兵，同时用海军封锁长江[285]。陆相宇

垣一成也于4月7日警告日本政府：帝国在长江流域培植多年的利益和企业已全部萎缩，日侨长年努力而获得的权利和资产也被迫放弃。如果继续袖手旁观，共产运动迟早会波及直隶和满蒙。日本必须变消极雌伏之态为积极雄飞之姿，引导列强协力包围共产派，出兵占领从山东到广东各沿海要点，阻断苏俄的军火输入，由列强向南北稳健分子供应军费和武器[286]。4月中旬，在国内政潮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币原随若槻内阁一起倒台。强硬派推出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并兼外相。

田中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政局正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对此，日本决不能漠视不顾[287]。不久即悍然出兵山东，扩大侵华。

5月中旬，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先后出兵继续北伐。奉鲁军节节败退。山东是日本侵华势力密集的地区，其投资总额仅次于东北。田中内阁认为，战争继续北进，不仅会损害日本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而且将危及东北，决定动用武力。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派遣驻东北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开赴青岛。次日，田中内阁发表宣言，声称此次出兵，旨在“保护侨民”[288]。6月1日，日军2000余人在青岛登陆，强占军事要隘，张贴布告，宣布将严厉镇压对侵略军“表示敌意”的反抗者[289]。7月5日，田中内阁进一步决议，命日军由青岛侵入济南。田中希望，此举能中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以便趁机向张作霖诈取某些垂涎已久的权益。

日本出兵山东，立即在我国激起愤怒的浪潮。6月1日，武汉、南京、北京三个鼎足对抗的政权分别提出抗议。武汉政府的抗议书指出，日军入侵山东，无异于“二十一条”密约的复活[290]。与官方再三推敲的外交公文相比，民众的抗议呼声更为激昂。尽管南京政府一再密令，“力避冲突”，“不得迳行有罢工及排货之举”[291]，并向日方表示，将“极力设法阻止”民众激烈的抗议运动[292]，但仍无法遏止人民愤怒的烈火。上海工、商、学各界人民团体发起对日经济绝交

运动，组成委员会，制定并实施种种措施，使日本对华贸易受到巨大打击[293]。

日本出兵山东后，为了进一步研究并确立新的对华政策，从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亲自主持召开“东方会议”。这次会议的具体策划者是著名的强硬扩张主义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应召出席的有：外务省、驻华各使领馆、关东厅、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的首脑人物。会议共举行11天，但只留下5天全体讨论会的议事记载，其余6天均为小型秘密会议，至今仍不知其详情[294]。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森恪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等主张以武力为后盾，急进扩张；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主张慎重行事。在田中义一的支持下，森恪等强硬派明显占了上风。会上，森恪提出4点建议：一、为维护日本在华权益，不论是中国关内地区还是“满蒙”区域，均应出兵；二、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必须坚持该区域的治安秩序；三、东三省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的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使“满蒙”与中国分离，另立政权。

7月7日，田中义一宣布会议最终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共8条，前4条基本上是外交辞令，后4条是侵华方针的实质所在。第5条规定：“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6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对此，作为接壤邻邦之我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7条规定：“在东三省实力派中，对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第8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与权益之虞时，均应加以防护。”[295]可以看出，纲领完全采纳了森恪的建议。

为了落实“东方会议”的对华强硬方针，同年8月中旬，日本政府

又召开“大连会议”，由森恪主持，召集日本驻华使节、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等，进一步研究侵略东北、蒙古的具体步骤，策划“武力治安”、“获取商租权”、“扩大‘满铁’权限”、“修建铁路”等议题的实施方略。

“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制定的扩大对华侵略的强硬方针，导致日本与美国等在远东地区矛盾的激化，埋下了此后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

“东方会议”之后，中国的战局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反攻徐州失利，宣布下野。直鲁军与孙传芳的残军接连发起反攻，把战火又推回到长江沿岸。日本内阁于8月24日决定撤兵，并于30日发表声明称，此次出兵是“成功”的“自卫”之举[296]，为再次出兵山东埋下了伏笔。

四　胶州事变与苏鲁前线的拉锯战

1927年6月下旬，蒋介石统军进攻鲁南。山东是张宗昌的老巢，命脉所在，自然要孤注一掷，全力防御，但退入鲁境的孙传芳残军，却与鲁军貌合神离，军心涣散，不战自退。不少高级将领主动向南军暗送秋波。因此，除临沂屡攻不克外，南京北伐军未经激烈战斗，即相继占领日照、莒县、枣庄、滕县等地。

孙传芳见部队无意替鲁军看守门户，托病赴津就医，将兵权交给彭德铨代管。彭受命后，于6月14日派代表向南京白崇禧输诚，要求“予以相当机会”[297]。不久，彭被委任为第十九军军长。同月22日，周荫人表示“无法节制所部”，将兵权交给驻扎胶州的第十二师师长陈以燊，旋即通电辞职[298]。　周荫人没有想到，此时，陈以燊正与冯玉祥暗通声气，密谋倒戈。

6月28日，张宗昌召集孙传芳、褚玉璞等高级将领，在济南开

会，决定：东路暂取守势，将退守胶州、潍县地区的孙传芳军主力调往津浦线作战；中路，令鲁军方永昌部继续固守临沂，遏制南京军队北进的锋芒；西路，全力反攻，以直鲁军主力集结于兖州，以孙传芳军为援军，沿津浦线反攻，夺回徐州[299]。鲁军悍将第六军军长徐源泉自告奋勇，担当突击主力。张宗昌立命拨款30万元，作为攻克徐州的赏银。

6月底，南京北伐军在鲁南战场捷报频传，西路沿津浦线推进到滕县。张宗昌为挽救危局，下令将胶州一线孙传芳军主力西调。陈以燊认为机会已到，便与驻守高密的陆殿臣共谋。7月2日，陈、陆联名通电，宣布分别就任国民联军援鲁总司令兼第三十九军军长及第四十军军长职务，“追随蒋、冯二公之后”，加入北伐行列[300]。陈以燊一面派重兵驻守胶济路，掘毁路轨，截断青岛、济南间的交通[301]，一面通告青岛鲁军将领祝本祥，胁迫该部一致行动。

7月4日晚，张宗昌召见孙传芳，怒气冲冲地加以指责，孙传芳则指天誓日，说明实不知情，表示愿率部前往迎击。随后，孙指使联军将领郑俊彦出面调和[302]。张宗昌同意先以和平方法调停，如不奏效，再以武力解决[303]。6日，郑俊彦率联军二师出发。张宗昌不仅命鲁军总参谋长李藻麟指挥白俄军、骑兵、炮兵、铁甲车队督阵同行，而且迅即委任褚玉璞为安国联军东路总司令，以郑俊彦为副司令，限令“即日剿平”[304]。7日，孙传芳抵达胶州事变前线潍县，连电劝诱陈以燊取消军长名义，撤去青天白日旗，并命郑俊彦派代表与兵变部队谈判。但陈以燊态度倔强，要求划出青岛、胶东一带为防区[305]。孙传芳只好下令武力解决。

胶州事变，异军突起，但是，冯玉祥军尚未进入鲁南战场，蒋介石又忙于收缩北伐军事，抽调兵力西征武汉，未能采取相应支援措施。于是，日本政府以周荫人旧部倒戈，出现“混乱状态”为理由，乘机出兵。

7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命派遣军进入济南。翌日，田中义一将阁议上奏天皇，获得批准[306]。随后，已在青岛盘踞月余的日军第三十三旅团立即向济南进军，驻扎大连的第八旅团则开往青岛增援。对于日军扩大出兵山东，张宗昌明忧暗喜。7月7日，他通电表示“严重”抗议[307]。但暗地里则命济南督察长及宪兵司令等人到车站“招待”抵济的日军[308]。日军一面限令双方不准在胶济沿线作战，一面在城阳、白沙河附近严密布防，与青岛鲁军在城阳设置的防线，恰成犄角之势。陈以燊原企图乘东线空虚，攻占青岛，至此，遂不敢轻动。8日，陆殿臣突然宣布与陈脱离关系，并将陈军驻守车站一部缴械。陈以燊自觉孤掌难鸣，立刻率少数嫡系潜逃，退往日照。余部推举代表向孙传芳“输诚”[309]。胶州事变至此平息。

此际，西路反攻的直鲁军正与南京北伐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7月初旬，南京北伐军按照蒋介石回师西征的指令陆续南撤，仅将第十军王天培部留置津浦铁路正面，扼守临城。王部本非精锐之师，此时又值“士兵闹饷，纷纷鼓噪”[310]，军营内外盛传武汉军队已深入安徽，南京危急，因此，军心动摇，士气颓靡。这样，就为直鲁军的反攻造成了可乘之机。

7月4日凌晨，直鲁军突然发起反攻。第三、第五、第六军在铁甲车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由界河分三路沿铁路两翼出击[311]。蒋军只略微抵抗了几下，便一败涂地，丢盔弃甲，退至运河南岸。直鲁军轻而易举地战领滕县、临城，于6日至8日相继抵达运河北岸，架炮向对岸轰击，南京北伐军竭力反击，隔河炮战，但因南岸河堤较低，又无掩蔽，受敌俯射，伤亡惨重。王天培见防线岌岌可危，电请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设法应援。贺复电相约同时渡河，协力反击。7月9日拂晓，北伐军反击战打响。双方激战至午后，直鲁军不支，开始溃退，蒋军乘势攻占韩庄。次日，再经苦战，又克临城，基本恢复了原防。此役血战两昼夜，第十军自旅长以下，伤亡达2000人，残部已不足以设防，但第四十军仍奉命南撤，于同月19日向徐州集中。

南京北伐军陆续南撤之际，直鲁军再次反攻。7月19日，褚玉璞指挥第六、第七两军，分三路向临城猛攻。北伐军阵地先后被突破，被迫弃城后撤。20日，退至运河南岸，部署未竣，直鲁军即跟踪迫近，双方隔河对峙。直鲁军一面以重炮轰击对岸，一面分兵渡河，进军苏北，袭击南京北伐军侧背。22日，南京北伐军前线总指挥王天培下令向徐州撤退，固守待援。途中，不断遭到红枪会等地方武装袭击，兵心慌乱，草木皆兵。到徐州时，立足未稳，直鲁军便衣队便潜入东车站，乘机扰乱，大街小巷，枪声四起。各部队自相惊扰，争先恐后，夺路而逃。24日，苏北重镇徐州落入直鲁军之手。

西路失利，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东路自临城失守后，陈以燊率胶州兵变的残军，逐次南移。直鲁军尾随跟进，占领日照。第一路军退守青口镇、沙河镇一线。中路进攻临沂的白崇禧所部于7月22日撤围西援，退守郯城、马头镇一线。至此，费时一月攻克的鲁南要地，丧失殆尽。

第五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一　列强对宁汉分裂的态度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一面厉行反共清党，一面同列强联系，寻求支持。武汉国民党集团也开始动摇和分化，逐步滑向反对人民革命的道路。列强面对风云突变、宁汉分裂的中国政局，开始探寻新的对策。

英国驻外使臣们四处游说，希望五强一致驳回武汉政府对“宁案通牒”的答复，联合实行武力制裁。4月14日，英国公使蓝普森奉命请美、日、法、意驻京代表协商：一、是否接受陈友仁的答复？二、制裁的性质是什么？三、限制对方接受通牒条件的期限为多久？他表

示，如果各国意见不一致，“英国保留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行动的自由”[312]。15日，五国公使再次讨论，认为武汉政府正为共产主义势力所支配，陈的答复“万难接受”。他们建议各国政府再次共同提出更强硬的通牒，宣称第一次“宁案通牒”所提各款，“不是供讨论的建议，而是各有关强国决心实现的基本要求”，“国民党当局若不迅速明确地宣布打算全部履行所提各项条件，各关系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迫其屈从的必要措施。”[313]

然而，英政府已经接到北军即将反攻到长江北岸及蒋介石已发动政变的消息，感到应继续向武汉施加压力，同时避免可能危害蒋介石集团的措施[314]。4月19日，外长张伯伦电示北京英使馆：“我们的打击应指向国民党极端派，而不是蒋介石。”他命令各地使节继续同日、美磋商适当的方式，设法将他们拉入制裁行列[315]。英国外交部希望日、美政府同意发出驻京公使们起草的第二次通牒，哪怕删掉最后一句会导致实行制裁的话也行。远东司和英国军事部门则认为制裁时机已经失去，转而考虑今后采取“即时报复”和重占汉口英租界的问题[316]。

日本政府业已获悉：武汉政府仍想“联合日本”，决心取缔民众的“动乱”；刚到汉口的汪精卫极为赞同这一方针，当地情况将随着他的到来而逐步改善。4月13日，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向日本政府建议，利用武汉方面煞费苦心企图解决南京事件的机会，依靠“稳健分子”来实现中国统一。他强调，应把武汉政府同共产派过激分子绝对区别开来。如果列强一味嫌恶和压迫武汉政府，就会使共产党更加活跃[317]。币原同意高尾亨的意见，随即训令芳泽公使和矢田驻沪总领事：陈友仁企图分离日本与英、美。列强利害相同，应依各国协调之办法，达成维护我国权利之目的。英国主张强硬制裁，我方正应利用参加共同交涉的机会予以缓和。币原要他们向陈友仁表示，日本政府对国民运动抱满腔同情，希望国民政府自行抑制和清除“黑暗面”，迅速承认列国要求，表现出自己有诚意、也有实力解决南京事件[318]

。

币原下台后，田中兼首相、外相于一身，上台伊始，便于4月20日宣称：日本对中国的共产党活动，不能不关心，必要时将与各国取一致行动[319]。26日，田中新内阁拒绝英国关于共同向京津地区增兵的建议，但赞成列强联合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不过，田中认为，武汉政府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即使以制裁相逼，也无力贯彻列强的要求。因此，田中主张各国在适当时机，抛开武汉，转而以南京为交涉对手。但田中又认为，目前不必急于要求南京政府解决宁案，而应给蒋介石以“精神上的援助”，俾其巩固政权，平定南方局势，方可满足列强要求[320]。

为了把美国拉进第二次共同通牒，田中指示将原草案中的过分强硬的措辞加以删改[321]。英国也同意暂将制裁与否搁置不议，先由五强共同向陈友仁发出通牒[322]。

英、日再发通牒之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四一二”当天，美国政府便获悉蒋介石政变的情报[323]。美国外交官认为：武汉国民党内的反共力量正在日益增强，将试图像上海、广州那样镇压共产党[324]。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柯立芝收到上海商业联合会某负责人的密电。电文说明：“蒋介石将承担南京事件的完全责任”，“重要的是请美国人民对蒋介石将军完全信任”，“不要让外国军队介入目前的形势”[325]。这些情况，使美国政府更为确信，目前列强的一切强硬措施都是蛇足之笔，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激化中外矛盾而不利于中国革命阵营分化的举动。4月18日，副国务卿格鲁（Joseph C. Grew）答复前来探询的法国使节称：“美国总的来说完全反对实施任何制裁”，“我们觉得这种行动只会给中国的排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局势更难收拾”[326]。

英、法、意政府都同意不应妨碍蒋介石“维护秩序”，但认为应对武汉政府实行制裁。它们批准各自的驻京公使与美、日一道向武汉政

府提出第二次通牒[327]。美国公使马慕瑞也催促国务院尽快批准这一行动[328]。显然，这是一种打击武汉、支持南京的办法。但美国政府仍不为所动，决心贯彻分化武汉、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时避免过分地疏远、压制武汉和露骨地亲近、支持南京。

4月20日，国务卿凯洛格训令马慕瑞：美国不参加第二次通牒，因为“稳健派正作出努力，将激进派逐出国民政府中枢”。训令还透露美国准备单独同武汉政府交涉[329]。同一天，凯洛格又通知英国大使：美国内阁会议普遍赞成国务卿的意见，认为“此时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势将驱使蒋介石和温和派投入激进派怀抱”；“今日之计，莫如对陈友仁的复照暂不作答，静观发展”。“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制裁问题”[330]。

马慕瑞强烈反对美国自行其是，认为这将使美国丧失在列强对华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凯洛格解释道：“领导地位本来既存在于温和行动之中，又存在于武力行动之中。国务院觉得你应代表温和行动施加影响。国务院不相信美国在华商业利益要靠列强的武力才能获得”。“外国凭借武力占领中国领土或保持贸易特殊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331]。

鉴于日本催请再提通牒，凯洛格于4月25日向日本大使松平指出：据美国情报，武汉政府正在动摇，形势马上会有变化，聪明的办法是稍等一时，静观发展[332]。松平大使承认美国的政策很“明智”[333]。

4月25日、26日，芳泽公使在北京连续邀集英、美、法、意同僚磋商日本的修改稿。日、英、法、意公使最后同意：如果美国执意不从，就由四强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再得不到满意答复，便对汉口实行制裁，并开始与蒋介石政权交涉[334]。凯洛格闻讯，立即询问松平，日本到底对制裁抱什么态度？松平称，日本政府没有授权芳泽赞同制裁原则并讨论制裁汉口的问题，只是主张各国共同提出第二次

通牒，然后暂停交涉。凯洛格重申美国不赞成制裁，也不同意提出第二次通牒[335]。

日本驻外使节步调上的不和谐，反映了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中的矛盾和紊乱。田中终于同意了美国的方针，下令暂缓向汉口再发通牒[336]。

为使分化政策进一步生效，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于4月23日出面敦促陈友仁："应立即采取各种步骤，挽救当前的混乱局面，此事刻不容缓。否则，所有美国商人实际上将在一周或十天内出港。"陈友仁急忙约见美商代表，详细阐明国民政府最近已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恢复外资工商业，解救经济危机。罗赫德立即向白宫报告：由于蒋介石、张作霖、杨森、李济深的四面包围，以及本地工商金融的瘫痪，武汉政府已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政府官员们正以全部时间和精力争取中外人士的普遍支持"[337]。

然而，对于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影响的武汉政府，美国的政策是继续分化，而不是支持。它要支持和鼓励的是彻底同共产党决裂了的南京政权。4月25日，柯立芝总统亲自出马，宣布美国在华目标就是帮助和鼓励一切谋求自由、统一和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合法愿望。美国深信："动乱终将平息，某种形式的政权终将出现，该政权无疑准备对我们所遭遇的错待予以适当解决。"[338]

为了向列强证明自己就是能够作出"适当解决"的政权，南京政府特意任命同美、英关系密切的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蒋介石集团完全明白，南京事件是他们改善同列强关系的最棘手的问题。列强将坚持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南京政府又不敢过分屈从，因为这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339]。于是，南京政府多方伸出外交触角，谋求各国的谅解与协作。

4月16日，黄郛告诉日本领事矢田：蒋介石有意负责解决南京事

件[340]。同月21日，郭泰祺又奉命向矢田探询田中新内阁对华强硬政策的内容等问题，矢田指出：南京政府的政策基础在于保护外国利益和取缔共产党，如能充分实行，列强自然愿同“有充分权力和实力的人”交涉[341]。郭泰祺随后表示，南京政府欢迎列强可能施之于汉口的任何制裁[342]。蒋介石还于4月25日通知日方，已决定派与田中义一有旧交的蒋方震、刘厚生秘密赴日，向田中介绍情况，寻求谅解和援助[343]。

蒋介石集团在长江下游站稳脚跟后，立即设法处理南京事件，清除与列强建立正式关系中的障碍。4月末，武力解除留守南京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的武装，下令通缉林祖涵，以图进一步嫁祸于共产党[344]。5至7月间，南京政府分别同美、日、英、法等国代表进行非正式会谈，基本接受五国宁案通牒的条件。南京政府要求英、美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但不必赔偿；还要求各国放弃不平等条约。其代表向美国外交官解释，这两项要求都为了应付中国舆论，并不指望得到赞成的答复[345]。

5月12日，田中接见了蒋方震等人。经过恳谈，对蒋介石及其计划有了“亲切了解”[346]。20日，田中训令驻华外交代表：“蒋介石的真面目就是逐步消灭共产党，努力维护秩序。我方宜酌情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帮他们实现政治计划。只要蒋介石一派向武汉进兵，张作霖等北方派就应避免在侧面妨碍蒋的行动。望你们共同促进南北妥协。”[347]

在日本的斡旋之下，蒋方震与张作霖的代表张厚畹在东京秘密谈判。双方一致同意：负责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消灭共产党；由各方代表召开政治会议，然后再召集国民会议，实现统一。但是，蒋方要求以陇海铁路为线划分势力范围，奉方则要求以长江为界，而且反对将来的统一政府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及实行一党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没有成功。日本撮合南北妥协的计划又一次破产[348]。

在日、美都不愿制裁国民政府的情况下，英国对集体制裁已不那么热心，更不愿损害蒋介石和国民党“温和派”，于是，打算单独派兵夺回汉口英租界。4月21日，英驻华海军派遣两艘巡洋舰开赴汉口，停泊在原英租界岸边[349]。英内阁也于27日作出决定：从“上海防卫军”中抽调两个营或更多兵力去重占汉口英租界[350]。但是，这一打算遭到包括蓝普森公使在内的外交官和军界人士的广泛反对。他们指出：此举在政治上将激怒中国人民，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同极端派一样大，还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军事上只能坚守到11月的枯水期前，不可能在武汉常年维持足够的兵力，更不可能保护英租界外十倍以上的英国利益；经济上势必引发中国各地对英国贸易的长期抵制，得不偿失。5月2日，英国内阁决定放弃这一打算，不实行制裁，因而也没有必要向武汉发送通牒[351]。

5月9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讲话，声称“南京事件已经促成国民党阵营酝酿已久之分裂”，“真正的肇事者，即共产派煽动家们，已遭国民党人自行惩处”。“汉口国民政府已丧失统治地位，现仅徒有其名”。“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正在南京组成”。他说：“列强对待南京事件的态度改趋缓和，主要为一个愿望所鼓舞，即不要使该政府或其他任何新政府在其统治区内建立秩序时感到为难”。他还宣布，出于同样考虑，英国目前放弃对宁案的制裁和第二次通牒[352]。

作为对上述决策的补充，英政府于5月11日决定不再反对英国民间给张作霖等军阀提供借款，但英政府不用武力或其他手段保护借款利益[353]。同日，英海军部授予驻华舰队更大权限，对英人生命财产所遭攻击可当即进行报复[354]。

随后，英国又采取了两个外交行动，一疏一亲，态度鲜明。5月17日，一个月前刚刚接替台克满的英公使驻汉口代表牛顿（B．C．Newton）照会陈友仁，声称“鄙人驻在地之政府，完全缺乏实践文明国家责任之能力”，随即离汉[355]。此前一天，英公使离京赴沪，名义上是同当地英国文武官员“磋商形势”，暗中则通过王宠惠，同南京

政府交换解决宁案的意见[356]。

此后，武汉政府外交上困境愈深。

二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政策调整

自国民政府迁鄂起，财政困难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它。“四一二”政变前后，财政困难更有了恶性发展。这种困难逐渐波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首先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至4月下旬，武汉失业工人已达30万。其次是煤荒、米荒。有一段时期，汉口存米仅有8万担，只能维持11天。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会，颁布《集中现金条例》，禁止现金出口，但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采取反措施，对武汉实行金融封锁，武汉地区的经济因而更为艰难。

困扰武汉政府的还有群众运动中的“过火”倾向问题。

南京事件后，湖南民众宣布对英罢工，同时接收青年会，封闭正大煤油厂，湖南省政府为此向武汉国民政府请示外交策略。汪精卫、谭延闿等觉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太自由了，适足以逼得他们形成一条联合战线”，又责怪湖南省政府“未得中央的许可，擅自任由民众处理外交的事件，不加阻止”。他们推汪精卫起草电报加以告诫，内容是：“关于外交的事，省党部同省政府应先向中央请示，不得擅自处置；民众如有对外交的运动，应先向当地的党部及政府商议，不能自由行动。”4月13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追认上述告诫并通告各省党部。会上，陈友仁转述了美日侨民想维持或恢复营业，但因劳工要求过高，进行抵制、恐吓，难以营业的种种抱怨。孙科大怒说：“这简直是自杀，把一些工厂都逼得关了门，政府又没有几多钱来救济，试问他们吃什么？”他要劳工部长苏兆征下令，要工人“不得故意同外国人为难”。陈还报告，现在日本人一出来就要遭打，“这种排外的方法也是不对的”。会议最后通过汪精卫的提议，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

陈公博、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外交部长陈友仁组成委员会，处理劳工涉及外交的各种问题[357]。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日趋险恶严峻的形势下，鲍罗廷不得不提议实行战略退却。

4月20日，鲍罗廷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明："自从东南的反动气焰高涨，增加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的力量"，"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他说："他们凭武力而施压迫的唯一理由，就是说在国民政府之下，外国的侨民不能继续经商。而我们自己的民众也常常误解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以为打倒了一家洋行，或打倒了一家商店，就是整个的帝国主义授命之时。"他指出汉口失业工人的数目正逐日增多的事实后又说："这一个退却的政策，一方面是要减少我们失业工人的数目，苏解失业工人的困苦；一方面要使帝国主义者无所藉口，他们的人民不至于赞成他们的政府对于我们的武装干涉。"[358]

汪精卫等人支持鲍罗廷的提议，认为"退却真是有利益，退也是可以的"。会议决定：一、中央指定政府及工会人员组织一委员会，其目的是在工人之中，特别是在外国商店工人中执行革命的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一个惩戒委员会，检查与处罚一切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二、政府立即与主要外国商店及银行协商，使之能在各地公开贸易，并由政府与职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协商结果。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的同意外，外国商店与银行内之工人不得罢工。四、政府应尽快规定一切必需品之最高价格。政府与银行协商规定铜元价格。五、立即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359]。同时，国民党中政治委员会还决议委托工人部去指挥外国银行的罢工者让步，以使外国银行复业。又针对军队的习惯做法和民众反教运动中的倾向，作出决议，外国学校及教堂等房产均受国民政府法令保护，租借与否，悉听外人自愿，无论何人不得强行占据[360]。

随后，国共两党领导人举行联席谈话会，汪精卫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鲍罗廷、罗易，中共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出席。会议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一是积极北伐，二是肃清东南的反革命派。至于外交方面，则不妨暂时退却，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恢复外人商业。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去湖南、江西宣传对外方针。会议也讨论了恢复商务和交通问题，认为恢复商务最重要的是汇兑，决定由外交、财政两部会同中外财政专家讨论“完美的办法”，交通则由外交部、交通部分别与太古、怡和、招商、三北等公司接洽，并由国民政府明令保护长江航运业。此外，会议认为，武汉失业工人已达30万之多，须寻找办法解决[361]。

鲍罗廷还在战时经济委员会中提议：由政府召集英美烟公司劳资双方协议复工办法，凡在国民政府区域内的中外各工厂应予切实保护，所出产品一律自由行销，不得抵制；同时决定组织大规模的中外合资公司，专营出口，资本500万，争取由英或日商投资五分之二。此前，湖南人民曾于4月12日没收美孚公司煤油，组织人民煤油公卖委员会。对此，鲍罗廷提议，应由中央电令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立即取消人民煤油公卖办法；嗣后凡关于外人商业和财产事项，绝对不得由省党部或省政府决定办理，应报告中央听候解决[362]。

在4月30日举行的“大局讨论会”上，鲍罗廷进一步提出，应利用美、英、日各国的内部矛盾，实行不同的对策。据他分析：美国、英国有财政资本派和商业资本派的不同，日本有军人派和工商业资本派的不同，前者主张武装侵略，后者主张和平经商，因此，应该联络商业资本派，允许他们的工商业在国民政府之下有合法的发展[363]。

方针既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努力落实。4月23日，陈友仁特意接见美国驻汉总领事和美商代表，绝对否认外人所传摧残外商在华营业为国民政府政策之说，宣称政府现正解决长江流域的特殊经济问题，决定恢复商务和使外人可以安心营业的各种计划，并声明工人现已自己决定实行革命纪律，协助政府策略的实施[364]。外交部还

积极同亚细亚、美孚、怡和、太古、日清等公司商讨复业、复航问题。本来在反帝运动高潮中，外交部曾拟定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五项具体办法，为了贯彻“退却”原则，决定通告司法部：“照此条款办，但不必发表”，实际并未贯彻执行[365]。

4月25日，陈友仁与日本驻汉总领事就“四三”惨案商定6条办法：1．日方撤退水兵、撤除防御武器；2．日商复业，发给华人工资；3．中方撤退军警和纠察队；4．工人服从政府命令，决不仇视外人；5．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日人财产；6．“四三”案保留，俟适当时期再开谈判[366]。5月下旬，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道歉、抚恤日本受害侨民，赔偿损失，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要求。陈友仁答以应由双方组织委员会调查事实之后再议[367]。“四三”惨案就这样搁置起来[368]。

4月下旬，经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干预，武汉外国银行的中国职工结束罢工，银行方面接受了工人部分条件，但对罢工期间的工资，只允许付给一半，另一半由国民政府津贴了事[369]。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端，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主张武汉不搞“五一”游行，最后议决限定游行路线，不入租界，并派大批军队随同纠察队弹压[370]。中华全国扩大对英经济绝交会拟开代表大会，呈请国民政府拨给两万元经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不仅未给经费，而且决议：“此会无设立之必要。”[371] 中央青年部与湖北省及武汉市青年部都主张收回武汉青年会，改成国民党青年俱乐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因顾虑对美国的外交，也决定暂不办理此事[372]。2月28日发生的汉口农民与日商三宜洋行冲突，该行被毁一案，一直未得到解决，5月初也由国民党中央决定“通融办理”，以赔偿日商5000元了结[373]。

为了将“战略退却”方针推向湖南、江西，4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林祖涵、陈其瑗分赴两省进行传达与指导。湖南省党部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但请示说：湘省民气素称激昂，“未便抑之

过甚”，“应如何处置始能两得其平”[374]？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答复是：“外人商业应照常保护”；“长、岳两关由财政部派人接受”，湖南人民接受关税委员会应“速办移交，并以后不得再行收税”；准许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回湘复业[375]。5月12日，湖南代表熊亨瀚向武汉中央报告：除坚持煤油由政府管理外，其他涉外问题皆服从中央命令；省党部已与中共湖南区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经济委员会，制定工商业保护法，添课遗产登记几种新税；以后逮捕土豪劣绅须经告发；同时决定，组织革命纪律裁判所，宣布九条戒令，违抗者以反革命罪论。熊并称，湖南现在所行的只是政治没收，绝对保护革命军人的家属同财产[376]。

江西方面，在陈其瑗到达南昌后，立即于5月5日召开省市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完全接受新的外交、经济政策。6日，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决定“缓和”政策七条，如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不妨害小地主”（自耕农）等口号[377]。

战略退却的实施，在争取部分外侨复业，缓和严重经济危机，减轻列强的联合干涉压力等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陈友仁4月27日报告说：“日租界的情形现在好得多。日本水兵业已撤退了一部分”，“商店已开门，交通也恢复了。”[378] 英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对陈表示，要去长沙复业。外国轮船公司恢复长江航运问题也有进展。

但是，武汉政府的战略退却并没有使列强萌生改善关系的诚意。4月下旬，日本田中内阁通知武汉政府：日本继续保持与各国一致行动的立场。随后，田中认为武汉政府“无实力”，“不负责任”，开始考虑以南京政权为交涉对手[379]。5月9日，英国外长张伯伦公开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存在及其统治权力[380]。同月17日，英国公使代表牛顿奉命离汉。此后，列强驻汉领事官员虽继续同武汉政府保持联系，但目的是诱迫武汉国民党集团压制民众，保护各国利益。武汉政府的外交活动已难有所作为。

与外交上“战略退却”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在内政上推行一系列新政策，其重点在于联络工商业者（武汉国民政府称为“小资产阶级”），纠正工农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动。5月9日，汪精卫说：“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农工商非联合起来不可，如果农工只顾农工的利益，国民革命一定要失败的。”[381] 从5月份起，武汉国民政府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训令。

5月9日，公布徐谦草拟的《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执行死刑条例》，规定判处死刑应报告政府核准，如审判机关不报告则执行者，解散该审判委员会，另行组织；各地民众团体拿获反革命派，或劣绅土豪等，即交政府严办，不得自由枪决。

5月14日，公布《取缔擅行逮捕令》、《禁止擅行没收人民财产令》。前令规定，逮捕须由司法机关，或武汉公安局奉上级机关命令执行，当场拿获的现行犯，须交政府之机关审讯。后令规定，凡不依《处分逆产条例》而擅行没收人民财产者，政府予以严厉制裁；其为团体行动者，解散团体，处罚负责个人。

5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各级党部，批评长江流域农工团体“忽视共同作战之工商业者同盟者”，如，“常向雇主提过度之要求，甚或以武装纠察封闭厂店，强迫雇主行不可能之条例”，认为其结果，“徒使农工孤立而入自杀之途”，“要使国民革命之基础，日益摇动”，因而，特令国民政府执行以下决议：一、制定劳资仲裁条例；二、制定劳动法，三、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四、严禁工会或纠察队对店员或厂主恐吓罚款及擅自逮捕；五、外人在华经营工商业者应由外交当局根据上列四项原则办理。训令称：凡属党员如有违反及不执行者，各级党部应加严厉之制裁；各级党部如不能领导民众服从上项决议，中央予以相当惩戒。

同日，训令湖北省总工会，声称“工人于参加国民革命中取得其本身之利益，同时须要不忘其同盟者工商业者之利益，否则，工商业

者将离国民革命之战线，而使其本身与农工两败俱伤，危及革命之前途”。训令共三条：一、工人有违反纪律者，该工会得加以制裁；二、违反纪律之工人，如情节重大时，仍应交政府机关办理；三、除对工人以外，工会不得有逮捕、罚款及其他压迫之情事[382]。

5月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关于“纠正农运”的训令，略称：“剥削农民与压迫农民必须行迹显著、证据确凿者，始得交由法定机关依法惩办，至乡里公正及丰裕之户不反对国民革命者，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训令声言：“其有藉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于反革命。”

同日，颁布“制裁越轨行动”训令，声称中央已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指导，切实执行中央决议。

5月24日，武汉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分饬所属各机关，一律严禁侵犯军人土地财产，凡已被分割者，务须清查发还[383]。

5月3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各县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如再有自由逮捕、惩罚人民情事，定将该县党部解散。

6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发出训令，要求：一、对党员之选择，务须严格，决不可使投机分子乘间而入，已经厕名者务须淘汰；二、注意对党员进行主义之认识，政策之运用，服从纪律之习惯等方面的训练；三、对民众应先注全力于宣传党义；四、注意克服各种民众运动的幼稚举动。

6月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决议案：“在过渡时期，设置县、区、乡自治筹备会，在国民政府农政主管机关特派员指导下，筹备县、区、乡民会议及政务委员会，代行职权”，“以杜民众之幼稚及不合于中央训令之行动”。

任何革命都不能超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同样，任何健康的群众运动也都必须接受一定的政策和策略的指引。那种以为群众运动具有天然合理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加以限制的观点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的工农运动中确实存在着“过度”或不讲政策、策略的“左”的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上述训令旨在纠正这些倾向，不能认为完全是错误的。但是，真正的力量存在于工农群众之中，因为工农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就否认发动群众的必要性，不要群众，其结果必然是孤立和削弱自己；如果因此而敌视以至镇压群众，那只能促使自己走向反面。不幸的是，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正是逐步走上了这条道路。

自5月中旬起，武汉国民党中央陆续惩处了汉阳县党部等组织和团体。当月11日，汉阳县公署根据汉阳县党部的要求，逮捕汉阳商会会长周文轩等，没收八处工厂，罪名是破坏党部、组织机器工会与十人团，同蒋介石通电等十一条。汪精卫认为：“当现在极力联络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汉阳县党部居然不呈请上级党部，擅行逮捕，显系违背中央的政策。”[384] 鲍罗廷并提出，解散汉阳县党部。他说：“革命最注重的是纪律，汉阳县党部近在咫尺，竟敢违背中央保护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则离中央较远的地方，更要不服从中央的命令！”[385] 孙科说：“今天跑一个店东，明天跑一个工厂主，都是增加失业工人数。试问不联合小资产阶级、革命如何能够成功？”[386] 会议决议：严重警告汉阳县党部，如再违法，即行解散；令武汉公安局将查封财产发还，释放周文轩、周仲暄；由司法部重新审理此案。

同月3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议，河南各级党部、各农民协会、各妇女协会均应停止活动，听候调查。孙科并提出，湖南农民协会也要全体停止活动[387]。

6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黄冈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5月下旬，黄冈团风烟酒公卖分处处长罗永泽控告“黄冈农民铲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汪精卫得知此事后，愤愤地说：“他们简直要饿

死靠烟酒吃饭的人，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倒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孙科则更进一步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他们比蒋介石打来还要凶！”[388] 孙科的话，把敌视群众的感情表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武汉的战略退却和政策调整只实行了很短一段时期，便因国民革命阵营内“左”、右两种倾向的冲击而迅速改变了性质和初衷。一方面，国民党武汉集团在严峻形势下日趋右倾动摇，将有原则的退却变成无原则的退却；另一方面，民众运动中盲目排外等“左”的倾向也加重了武汉外交的困境，使战略退却无法实行下去。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未能得出统一而正确的结论。曾以左派自居的大多数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则以民众运动失控为由，走向取缔和镇压民众运动的道路。同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则利用民运中的“左”倾现象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分化革命。当年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中共负责人刘少奇十年后深刻批评了这一时期的种种“左”倾错误，指出“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389]。

三　中共“五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25年1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中国革命到了一个紧要关头，部分共产党人要求迅速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陈独秀和彭述之感受到了这种情绪，计划将会议推迟到1928年，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对拖延，主张马上召开[390]。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等80人，代表党员57，963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国民党代表谭延闿、孙科、徐谦、汪精卫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组织报告》。他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的形势发展，认为北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的结果，“四一二”政变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革命，但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了巩固。关于小资产阶级，陈独秀称：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称：过去党限制了农民运动，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但是，他又提出，“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关于军队，陈独秀称：当时国民政府的军队是由旧军阀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军官是地主子弟，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主张“改组军队”，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使军队革命化。关于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认为，在汪精卫回国之后，它“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向革命民主专政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陈独秀又说：这个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陈独秀并称：“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391)]

陈独秀报告后，有38个代表要求发言，讨论了好几天。代表们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退让策略，认为中共中央“企图缓和城市及乡村中阶级的冲突；企图减弱，或甚至于完全拒绝中国无产阶级底阶级的独立的发动”[(392)]。瞿秋白、任弼时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瞿秋白还在会上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

5月4日，罗易向会议解释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决议案。会议在短暂的讨论后，未加修改就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相应决议："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做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方面进行。"(393)

汪精卫参加了当日的会议。他非常注意地听了罗易的讲话，讨论时头一个发言，慷慨激昂地宣称："国民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没有人能够指责国民党支持资产阶级利益。相反，国民党正遵循一条革命的道路。"(394) 同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介绍了会议情况，并将决议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对照，他说："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国民党的政纲可以互相帮助，并无冲突"，"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395)。

罗易是中共五大会议的明星。他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反对鲍罗廷的"战略退却"和工人阶级的"自我约束"，主张加强阶级斗争，加深革命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因此，他提出，当时的任务是：一、进行土地革命；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三、建立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五、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军队(396)。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部分地反映了罗易的观点。

会议认为："五卅"运动以后，党只注意了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提出："本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

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在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退出后，国民

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的主要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397] 《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案》则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

会议还认为：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该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398]。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现在的革命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该议决案中的《农民政纲》提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外，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毛泽东曾向会议提出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提案，但在陈独秀影响下，大会拒绝讨论。

会议还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批评先完成北伐而后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的主张，提出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

会议提出：当时“职工运动的新方针”是：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收归国有[399]。会议还提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要使军队革命化，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等。

领导权问题涉及党权、政权、军权等许多方面。北伐期间，中共长期以在野党自居，自外于政权、军权，“五大”在这两个问题上有进步。但是，不管是陈独秀，还是罗易，都还没有充分感到形势的严峻，也没有感到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正在急剧地向右摆动，因此，会议仍然没有提出解决领导权问题的具体方案。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秘书长。由于陈独秀作了部分自我批评，会议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继续选举他为总书记。这样，就使得以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策略未能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当时商业凋敝等问题严重困扰着武汉当局，徐谦参加了五大后，曾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上表示：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固然对，但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理论尽管不错，还要有方法。他要求具体解决“保护小资产阶级的问题”。5月13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若干规定，如：在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劳工部颁布劳工法；调和店员过分要求；商民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等[(400)]。5月22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共同讨论，就改良店员待遇、店员工作时间、工商界线、劳动童子团、用人、营业收歇、营业管理、工商谈判、抑平物价、工商联合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方面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在实行鲍罗廷的“战略退却”。

中共五大之后，很快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两项事件。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两个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爆发了又一次争论。鲍罗廷作了长篇发言，其大意是：一、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二、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

题。三、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或者推翻国民党中央，不是决裂，便是政变。应该攻击党内的这种危险倾向。四、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五、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公布的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罗易的意见与鲍罗廷针锋相对，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已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实行工农民主独裁。同时，他提出，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的反对工农运动、保护封建制度的反动法令。蔡和森对二人之间分歧的印象是："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401] 在"原则"和"办法"的分歧面前，这次，中共中央选择了鲍罗廷的"办法"。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湖北省委草拟的《工人政治行动决议案》，规定政治停工须得总工会令，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非得政府令，商店不得停市；又规定：工会无政府令，不得拘捕、审判非工人。同日，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提出："乡村中的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为，必须依本党的力量，切实矫正。"文件并称：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在建立乡村政权之后才能解决。

同日，鲍罗廷与陈公博、谭平山赴湘处理马日事变。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还不能立即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应该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会议决定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同时，会议也决定，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工人、农民，并将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政治局还具体提出了多项应变计划，如：建立党的秘密机构，隐藏工人、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用派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扩大叶挺和陈嘉祐的部队，掌握第二军和第六军，同时在占领郑州之后，鼓动第四军和第十

一军回师南向，收复广东等[402]。政治局并决定，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要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在马日事变的血的教训面前，中共中央对形势不能不有所警觉，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应变计划执行不力。

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农民运动策略大纲》，认为当时贫农与地主之间急剧的冲突，是革命发展的当然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在既无靠得住的军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的情况下，冲突的继续发展，将危害全国的革命形势和联合战线。政治局要求：迅速执行“五大”的农民政纲——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和财产；在秋收，即在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清楚，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再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纲》批评当时农民运动中的“无组织的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罚款、用强迫手段禁烟禁酒等，认为这种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平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403]。

维护统一战线，纠正群众运动中的不符合于政策与策略的行为，将群众运动引入正确的轨道都是必要的，但是，陈独秀和鲍罗廷不懂得，一味退让并不能维护统一战线，更不能制止武汉政府已经向右转动的车轮。

在退却与进攻两种策略并存的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后期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形势。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农委，以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瞿秋白、陈独秀等组成。30日，毛泽东与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农协“采用新政策”。6月7日，再次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规定。

两次训令都作了部分政策调整，如：要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建立亲切的革命同盟；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不可操切从事；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以及尽可能使谷米流通，活跃农村金融，等等。但是，上述训令也要求：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解除土豪劣绅武装，用以武装农民；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方面，体现了继续进攻的方针。6月13日，第三次发表训令，要求各级农协一致请求国民政府命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的反动派。训令同时号召各级农协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6月19日至21日，湖北省农协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坚决反击土豪劣绅的方针。此后，农民运动逐渐“上山”，转入武装反抗。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也存在退却与进攻两种因素。

5月20日至26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在汉口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中、苏、日、美、英、法、朝鲜、爪哇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3人出席。中国代表团由中共代表瞿秋白，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刘少奇、李立三，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项英、林育南，上海总工会代表郑复他，中国国民党代表陈公博等15人组成。会议由苏兆征主持，李立三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会议通过“联合世界各工会，对中国时局加以援助”等多项决议。6月19日至2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20人，代表29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为中心口号。通电称：“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农工之屠杀及农工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404] 汪精卫和陈独秀参加了28日的会议。当日，代表临时提议：请国民政府禁止停止工农运动；明令朱培德恢复工农运动，迎回被迫离赣的政治工作人员；全体代表向国民

政府请愿，立刻出兵讨蒋[405]。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认为工农运动“过火”的说法是大资产阶级煽动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必须坚决予以驳斥。但是，决议也表示，要“纠正过去非组织的行动”[406]。会议选举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向忠发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陈为人等20人为候补委员，以苏兆征为委员长。

两次会议增加了武汉政府后期工人运动的声势和色彩，但是，它们都无法挽救已经形成的颓势。6月28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声明：“自动停止纠察武装，请政府保护，以示拥戴之诚意。”[407] 6月29日，国民党军占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机关。自此，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逐渐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不少人认为讨伐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出路。7月初，武汉地区各团体纷纷请愿，要求东征。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再一次出现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7月3日，华侨协会在武汉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推彭泽民为主席。会议决定呈请国民政府速下讨蒋令[408]。7月6日，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至15日闭幕。出席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四省代表57人，推经亨颐为主席。会议通过拥护三大政策、请求明令讨伐蒋介石等通电及“巩固工商联合战线”等议案[409]。

7月15日至20日，全国学联在武汉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1人。会议邀请汪精卫、孙科为名誉主席，但是，二人都已无到会兴趣。郭沫若在会上演说称：“在四面楚歌之中，此刻我们应当团结我们的力量，打出一条生路来。”[410] 会议认为中国革命仍在高涨，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讨伐蒋介石，支持农村革命。同时，号召学生“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411]。这是北伐时期革命群众团体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

7月30起，武汉人力车工人连续罢工三日。向忠发企图在8月1日

发动总罢工，未成。武汉国民党中央旋即派人接收湖北省总工会[412]。8月初，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加剧，学总工作人员纷纷逃避。同月上旬，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下令学总停止活动[413]。至此，北伐时期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群众运动遂画上了休止符。

第六节　汪精卫集团分共与中共发动武装起义

一　杨森、夏斗寅叛乱与武汉政府的平叛军事

“三三一”事件是刘湘决心公开反对革命的标志。4月4日，刘湘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声言：“联俄容共，虽为总理遗策，然宾主之间，固已明定界说；跨籍党员，亦有其应守之分际，今则喧宾夺主，渐走极端。”他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严定范围；一致拥护蒋介石[414]。8日，川军将领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出兵进攻武汉，公推杨森为总指挥。[415] 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七人联名通电，攻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所谓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电报同时攻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表示“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党国之运动”[416]。至此，曾经竞相归入北伐军麾下的四川军阀都亮出了反共旗帜。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本欲立即进兵武汉，但为江北的孙传芳、张宗昌军所牵制，不得不先行渡江北击。于是，他便竭力怂恿西南军阀进攻武汉，分别任命刘湘、周西成、邓锡侯为第五、第六、第七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默许杨森进入武汉后，控制汉阳兵工厂。25日，刘湘密电蒋介石：“闻钧座决心以武力制裁，川省亦公决向鄂出兵，听候钧座调遣。”[417] 5月4日，通电就第五路总指挥职。刘湘的如意算盘是，以杨森为先锋，自万县出兵，同时联络邓锡侯、周西成，由襄樊、湘西分道进兵，会师武汉[418]。但是，西南军阀矛盾重重，并不肯按刘湘的指挥行事。只有杨森利

令智昏，又受西山会议派石青阳、黄复生、卢师谛等人鼓动[419]，在和刘湘谈妥条件之后，决定出兵，刘湘答应拨兵5000人，接济饷款5万元。

蒋介石在南昌时，杨森即在当地派有常驻代表。5月2日，杨森所派代表陈维新到南京，和蒋介石再度取得联系[420]。同时，杨军的政治部主任段远谋也受蒋之命返川，面交蒋手谕及开拔费10万元[421]。5日，杨军自万县东下。8日，第七师范绍曾部突袭宜昌，驻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不战而退，双方旋即达成反共协议，决定分由长江南北岸进军。9日，范部占领荆州、沙市。同日，杨森通电讨伐武汉政府[422]。25日，杨军占领仙桃镇，逼近汉阳。

继杨森之后，夏斗寅也公然叛乱。

夏斗寅原驻鄂北应山，自以为有功，一直觊觎军长职务，经常命令部下招兵，扩大编制。应山民众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时，夏斗寅读遗嘱至不能成句[423]。1927年初调驻宜昌，因仇视工农群众，并与唐生智有矛盾，通过蒋作宾与蒋介石发生联系，蒋要他协同反共。同时，旅沪、旅宁的部分鄂籍绅商也几次派人凑款，要夏举事[424]。4月底，何键、李品仙等密谋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同时反共，夏斗寅不仅应允参加，而且态度最为激烈[425]。杨森叛变后，夏斗寅即在沙市召集部将计议，决定一面致电武汉军事委员会请援，以便抽出武汉驻军，削弱防御能力；一面致电杨森，要求停止进攻，共同反共；又致电蒋介石，以占领武昌为信号，请何键、刘佐龙部在襄河沿岸和鄂东开始行动。会后，夏斗寅派参谋长蓝文蔚前往宜昌联络杨森[426]。

夏斗寅原计划在部队集中沙市后，乘长江水涨之势，偷越岳阳附近的城陵矶，然后在金口登陆，突袭武昌，但夏顾虑危险太大，改在嘉鱼登陆，以便进攻不成可以向鄂东撤退。5月13日，夏斗寅发表《讨共通电》，声称湖北地区“商叹于市，农怒于野，百业萧条，游

民日众，四境骚动，皇皇然如不可终日”，是所谓“有史以来未有之奇变”，通电说：“我父老昆季之环泣于斗寅等之左右者，亦几户限为穿。”[427] 其实，夏斗寅的所谓“父老昆季”，不过是被农民运动打击得丧魂落魄的地主和部分商人。14日，夏斗寅为了表示反共决心，枪杀了与自己有旧交的武汉政府代表任剑若。同日，夏军乘舟东下，由嘉鱼上岸，进占岳州，捣毁武昌至长沙间的铁轨。16日，进入咸宁，进逼武昌。一路解散党部，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屠杀农运工作人员，抢掠、奸淫，无所不为。

杨森、夏斗寅叛乱时，第二十五军周西成、袁祖铭残部、第四十三军李燊、吴佩孚残部于学忠、张联陞也纷纷蠢动，企图响应。其时，何键已经入豫，李品仙、刘佐龙等因不满杨森与于学忠、张联陞合作，又摸不清唐生智的态度，决定暂不介入[428]。

武汉政府对杨森、夏斗寅的叛变完全缺乏思想准备。4月9日，刘湘等发表反共通电后，武汉政府组织专门委员会，处理四川问题，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吴玉章、孙科等七人。18日，武汉政府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命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查办刘湘与赖心辉，同时任命高语罕为杨森的第二十军党代表及四川特派员。高在赴川途中，才发现杨森已经举兵。至于夏斗寅叛变，是在电讯不通经过调查后才得知的。当时，武汉政府的军队已经大部入豫，因此，风声鹤唳，浮言蜂起，武汉居民纷纷他迁，或避入租界。大批人拥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挤兑，大小米店关门停业，不收政府纸币。

武汉政府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企图对夏斗寅采取绥靖政策。邓演达召见包惠僧，要他去说服夏斗寅，应允将夏的队伍扩充成军[429]。5月15日，包惠僧衔命西上，行至嘉鱼时即被软禁。

面对严重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与李立三提议，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迎击[430]。17日，李品仙宣布戒严，所有驻军及武装纠察队，均归节制。同

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中央建议，急派叶挺率所属七十二、七十五两团奔赴武昌南面的纸坊，阻遏夏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也在恽代英倡议下，组成中央独立师。其第一团随叶挺赴前方作战，第二团卫戍武昌，女生则组织宣传救护队，随军活动，谢冰莹在此役中写作的《从军日记》曾轰动一时。

18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夏斗寅“称兵谋叛，罪状昭著”，下令“褫职拿办”[431]。19日，武汉三镇召开讨夏大会，号召各阶层人民“认清我们在严重局面的责任，要一律武装起来，帮助革命的军队”[432]。武汉总工会也发出通告，号召工人武装，4小时之内，应征者即达千人左右。同时，湖北农协则供应军需，并为革命军担任运输、侦探、向导等工作。

19日晨，双方在纸坊遭遇，激战后夏军溃退。平叛军乘胜追至土地塘，包围夏军。夏军死力抵抗，叶挺亲临前线，枪决怯战士兵，传谕全军，如有临阵退缩者，以此为例。全军士气大振，夏军畏惧叶挺英名，闻风丧胆，平叛军夺回土地塘车站。21日，平叛军进抵咸宁。夏斗寅留函称：“本人并非反抗中央”，“完全是要驱逐武汉的赤化分子”，“希望武汉方面自己有觉悟，不使党成赤化”云云。同日，平叛军追过汀泗桥，武汉解严。

夏军最初向鄂东南的崇阳、通山溃退，其后经阳新、大冶，至黄石港偷渡长江，逃窜鄂东。溃退途中，继续捣毁党部、农协及人民团体，土匪、青红帮、地痞等闻风而起。在罗田，夏军将剪发妇女用绳索穿乳，游行示众，又用刀剥削皮肉，擦以砂石，并曝晒石上，至死方罢[433]。6月10日，夏斗寅在蕲水接受蒋介石任命的新编第十军军长职务。其后，蒋介石并派朱怀冰前去劳军，命其由安徽太湖移防安庆。

平夏战斗取得胜利之后，武汉政府即着手解决杨森问题。5月25日，下令讨伐杨森，随即以程潜为总指挥，以第二军为主力，第六、

第八军各出一部组成西征军，前往兜剿。29日，第二军鲁涤平部戴岳师与李云杰师进攻襄河杨军。6月4日，第六军占领天门。6日，杨部分三路自仙桃镇、潜江、天门进攻，拟截断京汉路，途中与西征军相遇，双方激战于仙桃镇。9日，杨军败退，其前敌总指挥范绍曾受重伤，杨森本人匆忙中拉了一条毛驴，仓皇逃命[434]。据报道，杨军所过之处，“十室十空，惨不忍睹”[435]。15日，西征军占领沙市。

正当杨森仙桃镇惨败之际，刘湘以出兵助战为名，派人率兵进驻万县，攫取杨部防地，企图拒杨于夔门之外。同时，唐生智也派代表到达成都，策动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乘机袭取重庆、万县[436]。一时，上川东战云密布。6月23日，刘湘电杨森告急。26日，杨森率范绍增及军部人员逃回万县，保住了下川东大部防地，但与重庆邻近的江北县已为刘湘所占。

二　马日事变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激起了城乡反动派的强烈仇恨。1927年5月21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乱，因为这一天的电报代号是“马”，史称“马日事变”。

这年三四月间，第三十五军正在汉口整装待发，准备进军河南，不断有从湖南逃出的土豪劣绅向该军军长何键诉苦，参谋余湘三乘机进言：“非用大刀阔斧，不足以斩祸根。”[437]但何键顾虑唐生智反对，不敢轻举。5月初，余湘三返湘，串联驻长沙的许克祥，阴谋蠢动。12日，何键密派黄某，携款游说第八军师长张国威，要他以便衣枪兵团“剿灭共匪各机关，拘杀共匪首领”，约定两湖同时并举。张国威以所属部队已开往湖北为理由，答以力不胜任。在此情况下，何曾考虑回师单干。他对李品仙说：“湖南已给共产分子闹得天翻地覆，如果不把他们铲除，我们自己的命也要被他们革掉了。”李品仙劝他忍耐一时，先赴河南作战，待回师后，三个军一致联合，向唐生智表示“清共的愿望和决心”。[438]李品仙并提出，届时他可以去找唐生

智的法师顾和尚，要他一起请愿。5月13日，何键率军北上。

何键虽然北上了，但湖南的反动派仍在加紧准备。

5月21日晚，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夜12时，许团士兵分三组出发，进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机关团体。除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逃亡外，省农协牺牲10余人，省工会牺牲4人，党校牺牲2人，工人运动讲习所死伤6至7人。所有农工纠察队均被缴械，所有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均被抢掠一空，省特别法庭被捣毁，监狱人犯均被释放。至22日上午止，共封闭机构七十多个。当日，许克祥派蔡翊唐取道广东，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

同日，许克祥假惺惺地缮写报告，声称“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命，理应自请处分”，请求湖南省主席张翼鹏转报唐生智。[439] 许并要求张出示安民，张当即照办，但许又认为张所出的布告“态度暧昧”；改用团部名义出示。在许克祥的压力下，湖南省政府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攻击农民自卫军“授以武器，转成跋扈”，诬指共产党人“近复有命令全省自卫军集中近省各县，肆行屠杀之确耗”。电报声称：19日夜，省城纠察队分三路进攻第三十五军留守处；20日夜，分两路袭击兵工厂及第八军教导团；21日夜，纠察队分途进攻第四、第八、第十五、第三十五各军留守部队。明明是许克祥等猖狂进攻，屠杀革命人民，但是，在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中，却成了纠察队进攻军队，颠倒黑白，一至于此。[440] 次日，又致电武汉中央党部及驻马店唐生智等处，认为造成“马日事变”的原因在于“工农运动操之过激，忍无可忍，遂致酿成武装同志起而自决自卫”，要求“准予全体辞职，严重处分”。[441] 24日，发表省政府布告：“嗣后工农团体，务须严守革命纪律，不得有越轨行动，并应受各该当地县长之指挥监督，倘敢凭借团体鱼肉人民，一经查觉，轻则即予拿办，重则即行正法。”[442] 在致部队、各县县长的电报中，更明确宣称：“对于工农团体及其自卫队，务须严加监视，不为暴徒利

用，倘有越轨行动，即当令同驻军及挨户团严加围剿。”[443]

许克祥发动叛乱时，靠的是武力。迟至24日，才成立起所谓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成员为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五人。许等随即通电称：“现在钱荒、盐荒、米荒，到处见告，厘税、盐税概无收入，公私破产，救济乏术”，同时宣布“幡然改图”的四条方针，其一为：“本合作之精神，使农工商为平均之发展，亲密之联合，不蹈畸轻畸重，相倾相轧之覆辙。凡从前未经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释放；未经政府核准之没收，一律发还。”[444] 27日，召开所谓救党扩大联席会议，到会二百余人。由张翼鹏、许克祥报告事变经过，诬称共产党人拟于“五卅”运动之日举行大屠杀，并抢劫军队枪支。会议决定成立救党委员会，领导省政，推定唐生智、张翼鹏、萧翼鲲、彭国钧、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陈其祥、张敬兮、仇鳌等15人为委员。负责拟定“全省清党、组党一切办法”。会议作出的其他决议还有：“取缔暴徒分子大本营的各学校”，请政府明令悬赏通缉暴徒首领，格杀勿论，私藏暴徒首领者同罪等[445]。会上，许克祥提出，鲍罗廷等已于昨日下午到达岳州，他们“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匪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当时，一致决定将鲍罗廷就地枪决，张翼鹏未表态，其余各人均表示赞成，许克祥并要有跨党嫌疑的仇鳌主稿，张翼鹏领衔。仇、张二人处于被包围的状况下，只好照办[446]。29日，救党委员会发表就职通电，诬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宣布要厉行清党运动，“彻底开除冒牌的国民党员”[447]。

马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河南和武汉。

何键本是事变的策划者，但却装作并不知情。他一面通电指责两湖农民运动令“军中不安”，要求拿办乘机捣乱后方的“暴徒”，以期从舆论上配合事变，对唐生智和武汉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一面则自誓“效忠党国”，“至诚服膺”总理主义及三大政策，力图掩盖自己和事变的关系，以便待机一逞[448]。

唐生智的最初反应是：电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派员赴湘疏解；派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回汉口，向中共中央请示办法；同时致电张翼鹏，要求他打消辞意，妥筹善后，其办法为：一、长沙各军统归张翼鹏指挥，维护治安，非有命令，不得有任何举动；二、召集军官会议，由各部队联合张贴拥护三大政策等标语。三、饬令各部队照标语意旨切实执行，收缴枪支，一律发还[449]。26日，唐生智电告张翼鹏，决定派叶琪、周斓两副军长克日返湘，要张“以刚毅不挠之态度镇慑一切”[450]。此后，他多次发表谈话，声称“反共产就是反革命”。“本军拥护总理农工政策到底，决不会压迫农工群众。现在派员查办长沙事件，对受蒋逆运动的军官，决不宽容”[451]。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唐生智的这些训话不过是唱高调。他的实际处理与此大相径庭。

武汉国民政府接到唐生智等的有关电报后，于24日夜电告长沙，要求军队维持治安，同时要求农工纠察队严守秩序，不得报复。25日晨，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汾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代表中央驰往查办。汪精卫要他们“谋一个根本的解决”，“对于民众既得的利益，要加以保障；过度的行为，须加以制裁”[452]。26日，特别委员及鲍罗廷出发。2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发表训令，要求消除误会，纠正错误，杜绝反革命的挑拨离间，各团体及个人间如有纠纷，应向党部及政府陈述意见，“不得各逞愤怒，轻启衅端”[453]。同日，鲍罗廷等一行抵达岳州，随即得知许克祥要求军方枪决鲍罗廷等人的消息，不得不中止赴湘，返回武汉，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就这样结束了。

夏斗寅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指示各县，农民自卫军遇到攻击时，须予以抵抗。5月20日晚，省委会议决定，夏曦、李维汉、郭亮等几个公开负责人分路转移，另立秘密临时省委。次日，推郭亮代理省委书记。事变后，郭亮、柳直荀等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队进攻长沙，反击许克祥。不久，听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派人到

湘调查，并解释误会，认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修复”，又决定停止进攻[454]。5月31日，浏阳农民自卫军因未接到新指示，仍按原计划扑城，但旋即失败。

同日，汪精卫、谭延闿致电张翼鹏，声称：“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当，中央早思制裁”，“对于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从此统一党的威权，对于农工运动加以严格训练、取缔，未始非湘省前途之福”，实际上对马日事变表示容许和肯定[455]。电报宣布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前来宣慰军队，要张发电表示欢迎。6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听取陈公博代表特别委员会所作报告，会议决定：一、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由中央体察情形，决定改组办法；二、湖南省党部及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三、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周斓指挥；四、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活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五、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456]。

6月6日，周斓随带军队一团抵达长沙，在欢迎宴会上，周斓表示：“湘省农工运动不良，原属无可讳言，以致前方武装同志及一般均感受极端不安状态。”他说：“对方如仍抗命啸聚，不服中央处理，则惟有严切剿办。”[457] 7日，召开军事联席会议，许克祥等参加，决定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一概停止活动；各地聚集农工全体解散，各归原地[458]。

6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并表示愿亲自到长沙一行，以和平的方法改组农协，实行农政部所提出的乡村自治条例。军事委员会决定，责成唐生智全权办理此案。当日召开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湖南请愿代表团报告了事变情况，对中央还没有下令讨伐许克祥表示失望。汪精卫冷冰冰地表示：“悲愤之余，还是要用慎重的手段。”[459] 由于张翼鹏已于6月7日致电唐生智辞职，因此，会议决定以周斓代理湖南省

主席及军事厅长。

当日，湖南请愿代表团三百余人整队到中央党部请愿。6月15日，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表示："绝不能以农工运动发生幼稚行动，对整个的农工运动发生怀疑，我们对于总理之三大政策，应始终拥护。"他并称："许克祥未奉长官命令，擅行屠杀革命民众，不但违反党纪，并且违反军纪。"[460] 18日，唐生智致电湖南，要求所有驻湘部队悉听周斓指挥，"内清奸党，外御寇贼"[461]。同日，三十五军军长叶琪受唐生智之命回省，催促周斓就职，他表示："唐总指挥前在河南，对于湘民如何痛苦，暴徒如何挟持，均已明了。"并称："湖南马日事变，因暴徒分子肆意蹂躏，武装同志忍无可忍，起而自决自卫，唐总指挥已极谅解。"又说："从前农工团体组织不好，不能因噎废食，仍然一律恢复，不过改良组织，注意人选。"还说："西皮分子在湘，至多不过二三百人。以最少数人行动，使湖南三千万人备受痛苦，实为不平，唐总指挥决心改正。"[462] 同日下午，周斓就职。他说："此后执行职务，自当遵守中央命令及唐总指挥意思，中央命令如有不合湖南情形，必定拼命去请求改善变更。"[463] 叶琪也散布，唐生智绝无惩戒许克祥之意，相反，却嘉奖许的"大无畏精神"。20日，唐生智致电许克祥，声言："士兵起而自卫，自是正当，该副师长秉性忠直，因知实有苦衷"云云[464]。其间，唐并致电周斓与叶琪，声称："容共虽为本党政策之一，不可遽行抛弃，但湘省党部改组，决不使共派参加。"[465]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无出路"，等候唐生智也一样，"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周恩来提出在湖南举行暴动，集中力量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强的地方则"到各乡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自治之临时委员会"[466]。陈独秀同意这一计划，并表示经费问题已可解决。会议决定派周恩来、邓中夏先后赴湘。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未能实行。

6月26日，唐生智抵达长沙，随即公然改变既往态度，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说："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堤流溃决，迭呈恐怖"，"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决自卫之谋。"他提出："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表示系"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请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467]。电报到达武汉中央后，于右任曾表示，对许克祥未免处置得太轻了，但汪精卫表示，只要唐生智"能镇压下去，可以照准"[468]。唐生智未到长沙前，救党会曾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但唐生智一到长沙，救党会即作鸟兽散。27日，湖南省党部、市党部、省学联、省农协以及各工会在城厢散发传单，主张恢复事变前的革命状态，严办许克祥，唐生智下令从严究办，28日，曹树生等四人被枪决。周斓布告称："倘再有前此事情发生，则为有心扰乱后方安宁秩序，一经拿获，无论首从，定予军法从事。"[469]

6月2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唐生智的意见，任命周斓、刘兴、赵墨农、冯天柱、李荣植、黄士衡、谢晓钟、曹伯闻、唐生智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唐生智为主席，同时任命周斓、李荣植、雷孟强、李毓尧、曹伯闻、黄贞元、尹松乔、冯天柱、唐生智九人为湖南省党部委员。随后，唐生智召开湖南省党部成立会，自述态度变化经过，声称自回湖南之后，"各方面调查考察，才晓得是全体民众不安，军队不能不起来解除全民众之痛苦"。他说："湖南以前种种惨劫，完全是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他同时要求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自行报明"，否则，一经查出，一定加以严厉处分[470]。

许克祥与周斓有旧交，在周返湘之初，曾到周家探询来意，不得要领，随即潜赴湘潭，不久又率军移驻湘乡。唐生智到长沙时，派叶琪带亲笔信到湘乡见许，要他赶回长沙，共商"军国大计"，但许托病坚辞。唐生智回武汉后，下令将许团改为第二师第九团，任命许为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限一星期内开到宝庆，听候改编。其时，许克祥接

到蔡翊唐从广东来电，说是蒋介石对马日行动“极表关切”，委任许为独立第二师师长。7月初，许克祥率部队转移湘桂交界的酃县（今炎陵县）[471]。

三　江西遣送共产党人

“四一二”政变前后，江西政局变化剧烈。

蒋介石离开南昌使右派失去靠山。3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议决，派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傅惠忠、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八人为改组江西省党部筹备员，筹备改选，代行省党部职权。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李烈钧等人的江西省政府委员职务。30日，任命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张国焘等人为委员，以朱培德为主席。这样，就建立起以左派为核心的政权。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这一形势，决定对反共组织AB团进行一次打击。在与国民党左派首领商讨后，取得一致意见。

右派感觉身陷险境。3月下旬，程天放赶赴安庆，向蒋介石报告，建议迅速决策，与共产党分家。蒋介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要程暂时忍耐。程天放无奈，于月底回到南昌[472]。

4月1日夜，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学联、军官教育团的代表方志敏等人集会，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次日，南昌各界召开反AB团大会。会后，组成2000人的队伍，由共青团省委书记袁玉冰和省委组织部林修杰指挥，冲击右派江西省党部，将其捣毁。随后，又去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等七名首要分子处，将其抓获。各民众团体随即发表宣言，认为这是“用革命手段来制裁反革命分子的一日”[473]。

4月3日，南昌市各界群众三万余人集会欢迎朱培德改组江西省政府及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会上，斗争了程天放、罗时实等人。当工人纠察队将他们押入会场时，“打倒反革命，枪决反革命”的口号声

大起，程天放吓得跪在台上求饶。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程天放等被押着游街。

除程天放等人之外，段锡朋于4日化装潜逃，辗转到达南京。李烈钧也于同日逃往上饶，在当地另立江西省政府。

“四三”事件使江西的右派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是，左派的内部也存在着隐患。

宁汉对立期间，朱培德虽站在武汉方面，仍和蒋介石集团保持联系，并力图做调人，双方信使不断。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即致电朱培德，“劝他不可自毁历史”，并要他负责保护程天放等人[474]。胡汉民也致书称：“国民党须提高本身的党权，而不应任人操纵，任人支配，且任人捣乱、破坏。”[475] 5月1日，朱培德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四、第八、第十一各军集中河南驻马店，已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进驻洛阳，预料黄河南岸不难肃清，倘宁方军队同时进军江北，则会师幽燕，为期不远。朱并通知蒋，已派处长刘体乾为代表赴宁[476]。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雷光藩到赣，在雷的斡旋下，朱培德电邀李宗仁来赣会晤。

5月12日，李宗仁自芜湖到达湖口，双方在船上见面，一直谈到14日。会谈中，李宗仁声称，武汉的行动并不是要真正的北伐，乃是要讨伐长江下游[477]。但他表示：“南京国府已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之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他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缓图解决”[478]。朱培德则声称：一、根本与共产党不能合作，惟须避免激烈举动；二、目前双方均受敌人压迫，彼此应努力击破奉鲁军后，再将两湖共派妥为解决。他担心蒋介石的军队自广

东、福建方面进攻江西，因此提出："为使汉方全力向奉军作战起见，盼粤、闽部队切勿入赣，以免入豫军心摇动[479]。他并称：目前军事紧张，如果粤，闽军队向江西前进，汉方必定铤而走险，回兵进扰两粤，势必两败俱伤。他不忍置大敌不顾，互相残杀，只能率队回滇。李宗仁同意朱培德的意见，双方协议："上下游军队均一致北伐，后方则中止军事行动，以免误会自残。"[480] 5月16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建议将入赣之兵撤回粤、闽边界，避免和朱培德冲突[481]。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复电朱培德，要求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保证。于是，朱培德即派人往武汉劝说，其主要精神为："内部一经发生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必致使已倒之军阀复兴，而革命同志非同归于尽不可。"[482] 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打到北京，不谈政治。"[483] 这样，宁汉双方就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将彼此的分歧搁置起来，先行北伐。5月20日，朱培德派刘体乾、杨冰、厉式鼎三人随雷光藩赴宁报告。他并建议，刘驻宁，雷驻赣。

朱培德一面和李宗仁、蒋介石联系，一面积极贯彻武汉国民政府的"退却"与"和缓"措施，并筹划"分共"。

5月4日，陈其瑗到达南昌，召开一系列会议，宣布武汉政府新的外交、经济政策。同时决定暂缓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暂缓执行程天放的死刑，组织工商联欢会，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等口号[484]。17日，朱培德在南昌召开省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议决八条：不准非法捕人；严禁妨碍工人运动；不准自由没收财产；保护庙宇；保护正绅；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信仰自由；非法杀人抵罪[485]。20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中央特派员李松风、李尚庸，省政府主席代表朱克靖，委员刘一峰，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刘九峰，全省工农商学团体代表方志敏等三百余人出席。会议决定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AB团反革命案件。会议提出的口号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合作万岁"等[486]。29日，会议闭幕。

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仍然是左派的胜利。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朱培德以召开全军政治工会议为名，请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去谈话。朱培德不出面，由第三军参谋长代表，说是江西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做政治工作的几位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请那几位暂时离开江西，以免引起不好的后果。会上，有人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成为僵局[487]。当夜，驻南昌的第三军第七、第九两个师忽然连夜出动，撕毁各处革命标语，代以“欢送共产党离赣”、“凡共产党员请赶快离赣，免得费力”等口号。30日，第三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142名被遣送出境。

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组织江西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主席。

走出第一步以后就是第二步。6月5日，朱培德下令释放程天放等人。同时，继续遣送省、市党部及农工左派代表人物刘一峰等20人，并且出动军警，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市党部、学生会、农民协会、《贯彻日报》、《民国日报》等处。6日，朱培德布告称：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个人之身体财产，政府当负责保护；省内一切农工运动着暂时自行停止，听候中央指导；各民众团体及民众对于共产党及农工运动之人，不得寻仇报复，有胁迫强暴行为，并不得轻以共产党员名目诬陷他人，违者以军法从事[488]。9日，朱培德致电何应钦，声称赣省不动声色，已勒令共产党出境，以后政治问题当易解决。电文表示，欢迎何应钦所派参谋潘某来赣[489]。10日，再电李宗仁等，声称郑州、徐州相继攻克，为大局计，建议宁汉双方“宜并力一向，乘胜逐北，荡取燕京”；关于党内纠纷，朱培德表示，“尽力由政治上从容解决”，“共产分子完全退去本党”，“但使两方意见得以和衷商榷，武汉方面似乎无成见可言”[490]。

朱培德遣送共产党人出境之后，担心共产党人会以“暴动”来反对他，因此竭力说明：“农工运动系本党重要政策之一，暂时停止系欲于方法上有所改善，不久中央即有方针指示，仍当积极进行，切不可

误会为反对农工运动。”又称：“本人绝对拥护中央，誓与武汉国民政府同生死，共存亡。蒋逆摧残农工运动，非打倒不可。”[491] 6月7日，朱培德致电武汉中央，要求迅派党务及农工下层人员40名赴赣指导一切，同时要求派陈公博、何香凝、朱霁青三人赴赣处理善后。他主动采取措施，安定人心。6月13日，他一面下令恢复农工活动，撤走驻守农会、工会的军队，一面向武汉政府请辞特别委员会主席一职。武汉政府赞许朱培德在江西的行为，陈其瑗向武汉中央报告说，朱培德“为人很忠实”，“这次的事件，是他苦心孤诣在为大局着想，不然，江西会闹得长沙一样”[492]。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慰留朱培德，并派陈公博赴赣指导党务。当时，全国总工会准备对江西政局有所表示，武汉政府决定制止。18日，朱培德派黄实到汉口，会见被遣送的第七、第九三师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歉意，声称“他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要他们重回江西帮忙”[493]。7月7日，何应钦密报蒋介石：“共产分子仍在浔大活动”，“拥护三大政策及打倒新军阀等标语随处皆有”[494]。

7月8日，南昌总工会代表大会决议恢复江西全省总工会和南昌市总工会。尽管形势险恶，但江西群众仍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

四　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蒋冯合作

宁汉对峙，冯玉祥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双方都竭力拉拢他。

冯的基本态度是调和宁汉，共同北伐。他认为：“目前正是军事紧急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495] 当时，唐生智在冯部的代表汪某主张“倒蒋”，潼关一带贴满“倒蒋”标语，冯对此均不赞成，质问说：“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意是什么道理？”“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496] 5月31日，毛以亨到潼关。毛携有蒋介石及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亲笔函

件，内称：“经济一端，极愿于此克复江浙之时，竭力救济。”[497]见冯后，毛称：蒋允每月接济50万元。冯当即表示：蒋介石是“始终合作之革命同志，不受任何方面所转移”，希望蒋“早复徐州，俾陇海可以联络”[498]。

武汉政府不了解冯蒋联系的情况，急于拉冯反蒋。当时，唐生智一再电请“负责同志赴前方指导政治军事”[499]，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移樽就教，派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馀、孙科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到郑州与冯会商，并先期派邓演达到潼关相迎。

邓演达到潼关后，冯即召集会议，邓演达通报武汉政府的意见，大意有三方面：一、蒋介石叛变和蒋叛变后的形势；二、郑州会议的时间与内容，包括团结革命力量讨伐蒋介石等；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饷项装备问题。冯对前两个问题不感兴趣，对第三个问题“发言特多”，“几乎到了大发雷霆的地步”[500]。6月9日，冯玉祥抵达郑州，汪精卫、徐谦等均到站迎接，头、二等车厢均不见冯氏踪影，正狐疑间，出现了下列颇有戏剧性的场面：

> 忽然看到铁篷车内，钻出一个大汉，军服褴褛地扛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军用水壶，招呼汪、徐等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大家一看，原来就是冯氏[501]。

郑州会议于6月10日举行，参加者除前述汪精卫等人及冯玉祥外，武汉方面有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等，西北方面有于右任、鹿钟麟等。

会议首由谭延闿致词，赞扬冯打出潼关，对于加速北伐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希望冯“今后在军事上对北方担起更大的责任”。汪精卫继称：“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502]冯玉祥对反蒋仍不表态，仅称：万不可分散革命力量，授敌以离间我之机会[503]。会议决定：一、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均

为冯玉祥防地，豫东、豫北之敌由其肃清，唐生智等部回师武汉，巩固后方。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委员会，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撤销原北京、西安政治分会，成立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馀、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及原西安分会委员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冯玉祥任主席。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七个方面军，以孙元良、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任总指挥[504]。至此，冯玉祥不仅掌握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实权，而且部队已发展至四五十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

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人和冯玉祥谈过两湖情况，认为“许多方面，看不下去”，“以商业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徐谦、孙科二人说，他们曾在衣铺定做两套衣服，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何键则称：湖南“糟成一团”，“兵们带了3元、5元、或10元、20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505]。汪精卫等人所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冯玉祥。在陕西时，冯就对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幼稚”做法不满，这时就进一步发展为恶感了。

郑州会议只开了两天，汪精卫等即接到朱培德电报，声称蒋介石要窥取江西。6月12日，汪精卫等草草结束会议，留徐谦、顾孟馀在汴指导政治，其他人均匆匆返汉[506]。

会议过程中，冯玉祥曾告诉汪精卫，蒋介石给他打过几次电报，劝他不要出兵，待第四方面军歼灭河南奉军之后，再会师中原。冯并称，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之东西了”[507]。然而，事实是，郑州会议开幕的当天，冯玉祥就给蒋介石打过一个电报，建议迅速攻下济南，使黄河南岸俱无敌踪。电称：“上游方面决不与我兄为难，弟可负其全责也。”[508]郑州会议甫一结束，冯玉祥

又立即派毛以亨赴徐州，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和蒋介石会见问题。16日，冯玉祥再电蒋介石：“专候我兄晤谈种切，未知大驾现到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面倾渴想。”[509] 17日，蒋介石偕李鸣钟、方本仁由南京抵达徐州。同日，冯玉祥三电蒋介石，声言即来徐州，接洽北伐，表示将和阎锡山联络奋斗，“均惟吾兄马首是瞻”[510]。为了保密，他精心设计了行车计划：先命铁路局备车往西，及至车头发动，突然下令东行。

蒋介石接到冯玉祥来徐的电报后，即派方本仁、何成濬等西上迎冯。19日晨，蒋介石又亲率在徐将领专车西上，到徐州前一站——郝寨迎接。“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于是，再次演出了与郑州类似的戏剧性场面。布衣、敝履、腰束布带的冯总司令与革履佩剑、光彩耀目的欢迎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11]。蒋的远迎使冯备受感动。他觉得蒋介石“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来”[512]。冯玉祥即在车站演说：“西北军整个加入革命，一致北伐，极愿与蒋合作，共同奋斗，以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目的。”[513] 当夜，蒋介石为冯玉祥接风，冯在答词中又说：“曾忆张作霖攻南口时有言：勿使南北两赤结合；勿令冯蒋携手。今吾等竟得以结合而又携手，北伐之胜利可预卜矣！”[514]

徐州会议的日程极为紧张。20日晨5时，冯玉祥即赴蒋介石行营与蒋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谈。下午，冯玉祥与李烈钧谈话，建议：一、联晋制奉，援助阎锡山，牵制奉张；二、消除内部隔阂，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夜10时，召开第一次特别会议，出席者有张静江、蒋介石、胡汉民、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李鸣钟、何其巩、冯玉祥、蔡元培、钮永建、李石曾、李烈钧、黄郛、吴稚晖15人。议题八项，其主要者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问题等。胡汉民发言称：“共产党欲藉寄生我党来支配我国”，“毁灭吾党实力，使永无作为”。冯对此表示“极能了解”

[515]。21日上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冯，声称："如武汉军东下，请派兵直捣武汉。"冯答以绝无此事[516]。当日续开第二次会议。冯称："自陕出，不知一切，所见止京报。应宁汉合一。""赴郑后更明了"，"至徐方知可合"，"所难合者因共（产党）托国（民党）行恶"。冯并称："鲍（罗廷）太骄"；唐生智主张"自（己人）不杀自（己人）"[517]。冯还转述了他从汪精卫等人口中听到的湘鄂地区"店员打店主，农人打地主"的情况，吴稚晖听得高兴，自愿为冯起草致汪精卫、谭延闿等人通电，但冯认为吴稿"不像调停者的口气"，又作了修改。通电复述了郑州会议时冯玉祥与汪精卫诸人分头谈话时的意见，认为武汉地区"社会根本摇动，国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一是设法使鲍罗廷回国，一是"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电报称："宁方同志闻之，无不悲喜交集，一致欢迎，现在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电报要求汪精卫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同时要求唐生智调集所部于郑州，协力北伐[518]。冯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519]同日，蒋介石、冯玉祥还联合通电全国，声称："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使命而后已。"[520]该电宣告，冯蒋合作局面正式形成。

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每月协济冯玉祥所部军饷200万[521]。21日下午，冯玉祥带着第一批50万银元登车西去[522]。

22日，冯玉祥回到开封，即命令省政府"严防共党"[523]。26日，集合政工人员讲话，要他们"认清主义，勿受共产党所诱惑，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524]。28日，致电河南、陕西、甘肃省政府，要他们与南京一致行动，1．不准跨党；2．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3．在国民革命时期，不

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525]。7月7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526]。但是当240名政治工作人员集中以后，冯又对他们诉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冯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大刀队将全部人员押送到武胜关，强迫遣散[527]。

徐州会议是蒋介石的一个重要胜利，对武汉国民政府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此，力量的天平倒向南京一边。7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全市党员报告会上说："现在中国政治重心，在南京国民政府，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又称："从此一切权力不久将完全归于我们的党了，我们的党也愈臻稳固了。"[528]有了冯玉祥撑腰，蒋介石真是高兴之至。

五　汪精卫集团分共

汪精卫早有在适当时期和共产党"分家"的打算，到武汉后，受到徐谦、顾孟馀、谭延闿、陈公博等人的影响，右倾日益明显。但是，罗易仍然对汪精卫怀有好感，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领导人"，力图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领袖，从而挽救日益迫近的危机。为此，他一面致电莫斯科，要求重申对汪精卫的支持，一面向汪精卫提出了一项计划，其内容是：召开地方代表大会，制订国民革命纲领，选举紧急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紧急代表会上通过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排除那些不能无条件赞成国民革命纲领的

人。汪精卫同意这一计划，但要求迅速兑现必要的帮助[529]。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向会议提交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认为武汉政府是“空架子”，主张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24日，斯大林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认为“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他没有发现武汉政府正在发生的变化，仍然认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主张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530]。30日，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决议批评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摇摆现象”，“对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批评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而对群众运动的发展，有时流露出某些惧怕情绪”[531]。会议期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对土地革命态度不坚决，要求迅速改变，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共产国际还提出，要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发动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土地。此外，共产国际还给鲍罗廷和罗易二人打了一份电报，通称为5月指示，内容为：

>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
>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的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

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532]。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533]。

上述指示在6月初到达中国。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了，但仍想在这关键时刻，去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恢复汪精卫的信心[534]。同月5日，罗易邀请汪精卫谈话，向他传达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并且将副本交给了他。汪读了之后，非常吃惊，觉得“严重的时期已到了”，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535]。次日，汪精卫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5月指示。陈独秀逐条分析，认为无法实行。他说：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未开代表大会，怎样增加领导成员；建立军队问题，不是言过其实，就是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也行不通[536]。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即陷于意见分歧和摇摆不定中。

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易提出：“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支持罗易，主张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陈独秀主张：“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应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537] 会议推罗易起草宣言及政纲，同时通过罗易提出的两

点建议：一、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二、发表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要求罢免朱培德的职务，讨伐朱培德[538]。

罗易计划在汪精卫回来之后，宣布一天的总罢工，三镇的全体工人集会听国民党领导人发表演说，在讲坛上，共产党的代表要求按照党的决议行动，如果国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就监禁他们，以之作为起义的信号，汉阳兵工厂附近的工人立即占领工厂[539]。鲍罗廷得悉这一计划后，极为生气，谭平山也大骂罗易“左派幼稚病”。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瞿秋白表示：“我们进攻应是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冒然进攻是无益的。”[540]会议接受李立三的意见，将示威罢工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6月13日，汪精卫等自郑州回到武汉。15日，武汉各界召开欢迎第二期北伐将领及武装同志凯旋大会，议决讨伐蒋介石，恳请中央拿办许克祥，抗议江西驱逐农工领袖等多项。会后，各团体向武汉政府请愿，湖北总工会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同意，散发了反对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喊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等口号。汪精卫怀疑共产党人联络军队反对他，流泪切齿地对鲍罗廷、陈独秀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541]

鲍罗廷认为，只有东征才能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郑州会议之后，鲍罗廷即企图动员唐生智东征。他一再申言：“我们箱内还有草，他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542]汪精卫也主张东征，对人说：“郑州下后，肃清内部，蒋为死敌。”[543]他一面在部分将领中宣布共产国际的5月指示，要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决议，努力奉行。同时要求唐生智先行率部东征，推倒南京政府。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根据军事委员会报告，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下辖两个方面军。以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为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以第四、第十一、暂编第二十军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以黄琪翔为第

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以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徐州会议蒋冯合作的消息传来后，汪精卫非常震怒，更加大力宣传反蒋[544]。7月6日，汪精卫提议，命令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筹议东征计划。他说："现在集中兵力、财力，比北伐还有把握，一定可以打胜仗。大家要鼓起勇气，一致来对付东南的叛徒。"[545]

但是，当时唐生智及其将领中的分共情绪已日趋强烈。多数人主张以分共为东征的先决条件[546]。唐生智提出："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汪精卫受到军方的压力，曾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表示："被人强奸"，担心"不能在武汉立足"[547]。6月下旬，汪精卫与谭平山谈话，要他和苏兆征立即上呈，退出国民政府。27日，何键发表宣言，内称："两湖地方民众团体时常发现越轨行动。而湖南各县闹得更是极糟。"宣言否认所谓"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的说法，认为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宣言并诬称，共产党决议：凡年满25岁未入彼党者，一律屠杀。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548]，随即出动军队占领并捣毁五金业、木船、染织业等工会。同日，李品仙出动军警查封全国总工会、农民协会、工会纠察队，看管苏联顾问，准备遣送出境[549]。

对于突然发生的情况，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都缺乏必要的准备。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为基础"，形成左派队伍。周恩来提出"东南讨蒋"。陈独秀提出，在国民政府中提高唐生智、于右任的地位，反攻谭延闿、顾孟馀等取消派，准备与国民党谈判[550]。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罗易提出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鲍罗廷认为"国民党还是致力革命的"，主张在两党政治、群众运动的控制、工商业等三个问题上让步，否则，"与国民党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鲍罗廷特别提出，"土地问题不要再提了"。陈独秀主张将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反对农政部掌握农民自卫军，认为"国民党会把这看作是对它的权力的威胁"。罗易反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认为那

样将只能帮助反革命。他主张加速国民党的阶级分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在国民革命基础上与我们合作时，共产党就越过国民党领导人，向其广大党员揭露和谴责这些领导人是国民党党纲和国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551] 会后，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电共产国际，声称国际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是，“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电报声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552]。28日，中共中央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报告说，何键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军。

此际，中共中央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且企图以不断让步来争取汪精卫等人继续革命。29日夜，汪精卫在鲍罗廷住处抱怨：“CP似不与之合作。”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作函答复，解释“误会”[553]。同日，谭平山在武汉英文报纸《人民论坛》上发表启事，声称由于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引咎辞职[554]。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称：“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陈独秀认为，第一条路“不正确”，第三条路“行不通”，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555]。会议通过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556]。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认为唐生智或者有决心解决何键，陈独秀认为何键与冯玉祥、蒋介石一致，唐生智与左派一致，会议决定“拥唐反蒋”[557]。

当鲍罗廷、罗易争吵不休，陈独秀一心一意“让步”之际，共产国际迅速对有关问题作出了决定。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

央，批评谭平山的离职决定是“错误的”、“怯懦的”，认为武汉政府已经“转到工农的敌人的阵营里”，“共产党人必须示威地退出国民政府”，但“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改组其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电报并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代表会议，“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558]。10日，布哈林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批评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559]。同时，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明确指出：“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560] 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中央决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武汉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不能抛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561]。同日，谭平山、苏兆征联名发表态度强硬的辞职书，宣布辞去民政及农工两部部长的职务。

14日，汪精卫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会议；二、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联，讨论切实联络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声称：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又称：“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562] 陈友仁代表宋庆龄发言反对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563]

15日，汪精卫继续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从罗易处读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经过，认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利【厉】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说：“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孙科、顾孟馀积极支持汪精卫。孙科愤愤地说：“第三国际放一个屁，也要说是香的！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顾孟馀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的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会上，谢晋、经亨颐、詹大悲、何香凝等沉默不语，于右任、彭泽民婉转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于右任说：“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现在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阎锡山都有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的混了，要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彭泽民说：“本党中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564] 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三项办法。

7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在公布三项办法的同时，公布了《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及《保护农工之训令》。前者宣称：“有对于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身体自由，诬指他人为共产分子，意图陷害者”，“依法严办”[565]；后者宣称：“不因限制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566] 19日，发表《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对时局宣言》，声称中共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的最大表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567]。17日，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接管《汉口民国日报》。自此，连续发表《共产党的无望》、《我们的回敬》、《国民革命唯一之路》、《夹攻之奋斗》等反共文章，号召人们走第三条道路。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

发出通知，定于8月15日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568]。同日，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各军将领尽快查明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劝其脱离关系，并禁止秘密会议[569]。

汪精卫集团确定分共政策之后，反动军官、土豪劣绅们大为活跃。据孔庚报告，发生捣毁党部、残杀党员的县已有35次之多。第三十五军团长段某在一个镇上枪杀了二十几个党员；第十五军一个团长不仅捣毁了汉川的工会、农协和妇协，并强押妇女裸体游行[570]。7月19日，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布《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指责汪精卫集团“屠杀民众”，“已经同南京政府走上了一条路”。汪精卫读后大发雷霆。25日，他在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这样毫无道理的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他气势汹汹地表示：“应该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闹，莫怪我们翻脸了。”[571]。会后，陈公博即根据汪精卫提议，起草并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要共产党“自憬”，“如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就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572]。同日，通令各省党部、省政府、军部，严防共产党活动。

27日，鲍罗廷回俄。至此，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均被破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彻底失败了。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激起了左派人士的愤怒，邓演达决定出走。他要谭平山转告中共中央，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并称“何键一定开刀无疑”[573]。6月29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30日，留书武汉国民党中央说：“我始终认为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斥，政治工作

如果被威胁，则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结果。”[574] 7月3日，他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号召人们“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其间，邓演达曾和苏联顾问铁罗尼一起同张发奎进行过一次谈话。邓称：汪精卫、唐生智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建议张率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回广东，重建革命基础，重新开始一切。张答以此事需与和汪精卫商量[575]。邓再和汪精卫谈话，汪不为所动[576]。其后，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8月16日到达莫斯科。

宋庆龄长期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而奋斗。7月14日，她发表了在8日即已拟就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说：“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然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失去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577] 随后，宋庆龄即离开武汉。到上海时，蒋介石曾派何应钦前来游说，企图引诱宋庆龄到南京去，为宋拒绝[578]。30日，她会见合众社记者，明确表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以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579] 岁寒而后知松柏，在滚滚的政治寒流中，宋庆龄表现了伟大的革命气节。8月22日，再次发表声明：“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580] 随即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

六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反共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日趋严峻，中国共产党人决定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

当时，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唐生智任总指挥的第一方面军

反共情绪强烈，而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则和中共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其中，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暂编第二十军贺龙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部等，或为中共所掌握，或受中共影响较大，因此，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于7月中旬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同时，联合张发奎，将有关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7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率领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贺龙等部组成东征军，一路由九江、湖口攻安庆，一路由赣东攻浙江，一路由鄂东进入皖北。三路并进，准备直取南京。在此前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陆续进入江西。叶挺部、贺龙部驻九江，李汉魂部驻马回岭车站。

7月19日，李立三等奉命到达九江，在第四军、第十一军中展开活动，为部队移师广东做准备工作。次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及先前到达的中央军委前敌书记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李立三等认为：张发奎虽然反对唐生智，但深受汪精卫影响，正在执行汪的分共指示，要求叶挺等高级军官退出军队或脱离CP，因此，以张为领袖的“回粤运动”很少成功可能，必须“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581]。九江会议决定，赶快集中军事力量于南昌，运动贺龙的第二十军，使之与中共掌握的部队一致，在南昌举行暴动。九江会议的意见得到正在庐山休养的瞿秋白的同意，并由他将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决定。23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征询他对起义的意见，贺表示赞同。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继续会议研究，决定于28日举行暴动。同时，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582]会后，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

中共中央常委完全同意李立三等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建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领

导。会后，周恩来等即奔赴南昌，进行起义准备。7月26日，加伦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上报告称：与张发奎谈话，张表示："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583] 同日，共产国际来电称："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经过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鼓励[584]。

同日，准备参加起义的贺龙、叶挺部队相继开抵南昌。次日，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因准备工作来不及完成，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至30日。

张发奎一直停留在武汉。他向汪精卫报告，开往江西的部队内部发生纠纷。7月28日晚，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赶赴九江，得知第二十军贺龙部已自动开赴南昌，九江街头遍贴"反对武汉政府"，"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等标语，当地报纸《国民新闻》也在指责武汉政府。29日，汪精卫下令封闭该报。30日，召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由汪精卫说明"分共"必要，并出示种种"证据"。当日，久候叶挺、贺龙二人未到，张发奎即判断有异[585]。

同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电文为据，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586]。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认为张发奎已明显右倾，不可能再争取他支持革命。会议争论数小时，没有结果。31日晨，前委再次召开会议，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按原计划起义。这时突然接到张发奎来电，声言"准1日到南昌"。在这种形势下，拖延就意味着失败。张国焘被迫转而同意举行起义。当天中午，前委作出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

当时南昌城内中共可掌握的军队大致有：叶挺所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蔡廷锴的第十一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全军，朱德领导的

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共计二万余人。忠于武汉的第三、第六、第九各军在南昌市内和近郊的力量比较薄弱，共有六个团约六千余人。

31日晚，朱德以宴请、打麻将为名，软禁了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团长。9时许，发现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告密。前委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举行。

8月1日1时许，起义的枪声打响。战斗主要在鼓楼、贡院街、天主堂等地发生，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全歼守敌，胜利占领南昌城。

同日中午，在聂荣臻发动下，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部及七十四团、七十五团部分军人举行起义，向南昌开进。行抵德安时，张发奎、李汉魂乘车追来，聂荣臻下令开枪，张发奎等跳车逃走[587]。次日，七十三团等开进南昌。

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在江西省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推宋庆龄、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七人组成主席团，又推宋庆龄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参加起义，兼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如谭平山、林祖涵、恽代英、周恩来、张国焘、叶挺、李立三等，也包括一些当时不在南昌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等，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则是张国焘提议加进去的。会议宣告，将于最短期间确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继续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而斗争[588]。

同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等22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谴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

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表示，将坚持国民党“革命的正统”[589]。2日，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任命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林祖涵为财政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等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兼代总指挥，黄琪翔任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代），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前由副主任章伯钧代）。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贺龙兼军长，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叶挺兼军长，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朱德为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就职），党代表朱克靖。总兵力为三万余人。江西省政府也进行了改组，免去朱培德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姜济寰为代理主席。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按照原定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开始了艰难的南征。从南昌撤出后不久，蔡廷锴的第十一师即脱离起义队伍，其他部队也有部分人员离队，起义力量遭受一些损失。部队到达临川后，进行了整顿，纪律得到加强，部队面貌逐渐好转。

起义的当日，张发奎即自九江指挥部队进攻南昌。2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褫贺龙、叶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命张发奎督饬所部赶紧进剿，逮捕所有“扇乱附逆”的共产党员；命朱培德指挥第五军在赣东、赣南兜截；命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590]。3日，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致电何应钦、白崇禧等，表示愿“通力合作，歼此祸国殃民之败类”[591]。7日，张发奎军占领南昌。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人党籍。

张发奎军占领南昌后，叶剑英即向张献计：不追，让共产党到东江，李济深就要调兵去打，这样，第二方面军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广东[592]。张发奎采纳了叶的意见，因而，起义军得以顺利南进。

起义军进军广东，李济深大为恐慌。他生怕起义军会威胁其势力范围，积极出兵，准备在赣粤交界处堵截起义军。桂系的黄绍竑为了笼络李济深，结成粤桂联盟，并趁机将桂系势力向江西扩展，也积极出兵援助李济深。8月8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粤北重镇韶关成立。黄绍竑亲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率两个师开赴赣南作战。北伐前蒋介石留驻广东的钱大钧部此时也奉命协同李济深作战。一时间，形成粤桂蒋三方联合对付起义军的局面。

8月底，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南部的瑞金、会昌时，与钱大钧、黄绍竑等部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三战三捷，相继攻克瑞金，会昌。9月初，起义部队折入福建，准备由汀州经上杭进入广东潮汕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海上援助。同月中旬，起义军进入广东，占领大浦、三河坝地区，随后分兵，朱德率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进军潮州、汕头。下旬，占领潮汕后，再次分兵，以一部留守潮汕，而以主力西取惠州。

与此同时，钱大钧、黄绍竑等在得到三个多师的增援后，利用起义部队一再分兵，力量零散的机会，以优势兵力包围起义部队。9月28日，贺龙、叶挺率领的西进部队进至揭阳县汤坑地区，与陈济棠部遭遇，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伤亡两千余人。30日，被迫撤退。同日，驻守潮州的起义部队也在黄绍竑部两个师的进攻下撤退。10月1日，前委主动撤出汕头。次日，钱大钧部三个师进攻三河坝，朱德所率留守部队激战两天两夜后转移。

起义军在南昌所建立的政权是以共产党员占多数，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到瑞金后，认为国民党的名义已为工农所唾弃，继承“国民党正统”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梦幻”，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到汀州后，考虑到应付外交，避免帝国主义干涉的需要，又决定仍沿用国民政府名义，并决定以谭平山为主席，陈友仁等为常务委员。但在汕头失守后，又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593]。

由于战场形势急剧恶化，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有前委及其他军政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周恩来、李立三、彭湃、叶挺等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决定武装人员突围，非武装人员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分批从海上撤退。会议还宣布今后要打出红旗，分田地，继续战斗。

会后，起义领导人相继离开潮汕地区，起义部队约千余人突出重围，转至海陆丰地区，成为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主力。从三河坝撤离的起义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于赣粤山区，1928年进入湘南，举行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序幕，在中国人民中树起了坚持斗争的旗帜，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南昌起义军艰难地进行南征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湖南、江西为中国革命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1927年8月7日，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代表二十多人。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Б．Ломинадзе）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准备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安源等地的湘赣地区组织起义。同时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政负责人组成，易礼容为书记。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

事负责人会议，确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分三路在安源、修水、铜鼓发动起义，然后攻占醴陵、平江和浏阳，再对长沙采取包围态势，相机进攻长沙。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首先暴动，二团、三团继起，但在敌人围攻下都失败了。19日，各路起义部队约1500人退到文家市。毛泽东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已无占领中心城市的可能，应该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条件较好的农村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20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南下途中，遭朱培德部袭击，总指挥卢德铭战死。9月底，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将原来的三个团整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确立支部建立在连上的制度，整个部队由中共前委统一领导，在部队基层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废除烦琐礼节，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部队改编后，面貌大为改观。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在长期退却途中开始酝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和当地的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部汇合。

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李宗仁与唐生智，张发奎与驻粤桂军之间相继爆发战争，井冈山又位于湘赣两省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形险要，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利用有利的时机和地形，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革命实力，进行军事割据。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攻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工农兵政府，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以宁冈为中心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使国民党统治者大为震惊。1928年2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重兵，占据宁冈新城，迫近根据地的中心地带。2月28日，工农革命军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反攻，全歼进入根据地的新城守敌五百余人。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站稳脚跟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也在发展起来。3月上旬，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湖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特委代表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湘南的农民暴动。3月下旬，湘南暴动失败，部队重新返回井冈山。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汇合湘南部分农军，辗转到达宁冈砻市，与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初，朱德、毛泽东的两支部队正式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六个团，全军约万余人。1928年5月，在宁冈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随后，又打垮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三次占领永新县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再次命令红军向湘南冒进。7月中旬，红军大队进攻郴州失败。9月26日，重回井冈山。在此期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趁红军主力远离之机，占领大片根据地，并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大举进攻。驻守井冈山的红军部队虽不足一营，但据险抵抗，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九十月间，红军又连续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同年10月，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红军盲动导致失败的教训，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案。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形成了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冲突，因此，“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594)]。会议还选举了边界第二届特委，谭震林当选为书记。

毛泽东所创建的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在当时还不为人们所注意，然而，正是这条道路，指引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许多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1927年9月，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分别领导沔阳、公安农民举行起义，随后在洪湖地区展开游击斗争。同月，广东农民先后攻占陆丰、海丰县城。11月，成立苏维埃。同年9月、11月，中共在湖北黄安、麻城两次领导农民起义，失利后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战。这一年爆发起义的地区还有海南岛、河南确山等。1928年又先后爆发了江西弋横农民起义、湘南起义及陕西渭华起义等。这些起义，遍及12个省140多个县。它们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1) 《银行周报》第11卷第2号。

(2) 《银行周报》第11卷第4号。

(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4) 《宋子文谈国民政府财政方针》，《申报》，1927年1月28日。

(5) 《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56页。

(6) 《一切税款须存放中央银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4日。

(7)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8) 《国民政府积极整顿各省财政》，《一周时事述评》第14期。

(9) 《财政部征收田赋之布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10)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 余捷琼：《民国十六年武汉的集中现金风潮》，《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4期，1936年12月。

(14)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审查报告》（四），第57页。

(15) 《申报》，1927年4月16日；《晨报》，1927年4月17日。

(16) 《张肇元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8—79页。

(17) 《武汉政府组织战时经济调查委员会》，《晨报》，1927年5月3日。

(18) 《国民政府最近经济政策》，《一周时事述评》，第19期。

(19) 《武汉政府集中现金经过概况》，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28，863；参见《金融市况》，北京《银行月刊》第7卷第6号。

(20) 《上海银行公会致蒋介石电稿》，《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21) 《北京银行公电》，上海工商联档案，其173—1—61；《武汉金融孤立》，《晨报》，1927年4月21日。

(22) 《上海商业联合会资料》，第78页。

(23) The Maritime Custome：*Decennial Report* 19221933，p．558．

(2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7页。

(25) 《国民政府交通部报告书》，《汉口民国日报》，3月14日、17日、24日、26日、28日。

(26)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9日。

(27) 《孙科之交通计划谈》，天津《大公报》，1927年1月1日。

(28) 《实业部长孔庸之与记者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9日。

(2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5日。

(30) 《徐季龙对改造司法之主张》，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

(31) 《国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工作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

(32) 《国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工作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

(33)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0日。

(35)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18日。

(36)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29日。

(37) 长沙《大公报》，1927年3月8日。

(38)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1日。

(39) 《陕西司法公报》，1927年第11、12期。

(40) 《大公报》，1927年2月25日。

(41) 《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

(42) 《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3月1日。

(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6日。

(44) 《革命生活》，1927年4月9日。

(45)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4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8页。

(4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4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49)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50)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5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14—915页。

(5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14—915页。

(53) 《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

(54)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录》。

(55)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录》。

(56) 《土地委员会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57) 《土地委员会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58) 陈克文：《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59)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记录》。

(60) 《土地委员会会议记录附件》。

(61)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2)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3) 《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64)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65)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66)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67) 《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

(68) 《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

(69)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70)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1)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2)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73)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附录》。

(74)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75)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76)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7)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8)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30页。

(79)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50

—1151页。

(80)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81)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两个共产党员关于土地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82) *FO*，405，Vol．252A，pp．627-628．

(83) *FO*，405，Vol．252A，pp．631-632，646-648；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1页。

(84) 《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

(85) *FO*，405，Vol．252A，pp．670-671．

(86) *FO*，405，Vol．252A，pp．672-673．

(87) *FO*，405，Vol．252A，pp．632，682，684．

(88) *FO*，405，Vol．252A，pp．698-699．

(89)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9—160页。

(90) 《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记录》。

(91)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92)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8页。

(93) 《中央局报告（10、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91页。

(94)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139页。

(95)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96) 《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

(9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7日。

(98) 《向导》，第183期。

(9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1日。

(10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8日。

(101)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3页；*FO*，405，Vol．252A，pp．335-336，339，340．

(102) *FO*，405，Vol．252，pp．341-342，350，369-370，399-40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8—43页。

(103) *FO*，405，Vol．252，pp．342-343，350-352，369-373．

(104) *FO*，405，Vol．252，pp．398-34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46—48页。

(105) 《联席会议第十九次会议记录》。

(106) *FO*，405，Vol．252，pp．401-402．

(107) *FO*，405，Vol．252，p．403．

(108) 《联席会议第二十次会议记录》。

(109) *FO*，405，Vol．252，pp．403-404，415；Vol．253，pp．131-133．

(110) *FO*，405，Vol，253，pp．133-136．

(111) *FO*，405，Vol．252，pp．224-227；《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50—51页。

(1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113) *FO*，405，Vol．253，pp．59-62，135-136．

(114) *FO*，405，Vol．253，pp．60-61，136，146．

(115) *FO*，405，Vol．253，pp．70，136，146．

(116)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录》，1927年3月2日，油印件；《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59—60页。

(117) 徐谦：《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1927年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附件。

(118)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录》，油印件，1927年3月4日。

(1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75页。

(120)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8-9、11—12页。

(121) *FRUS* ，1926，Vol．1，p．683．

(122) 《国闻周报》第4卷第12期。

(123) 《联席会议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2月9日。

(12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81页。

(125)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83—984页。

(12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12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七、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93、1005页。

(12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09—1010页。

(12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08—911页。

(13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005—1008页。

(13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9日，油印件。

(13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3) 《一周时事述评》，第17期。

(1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

(13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

(13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23页。

(13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

(14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42—1043页。

(141)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62—66页。

(14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57页。

(1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4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4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14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47) 《革命生活》第58期，1927年4月19日。

(148)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14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15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151) 《晨报》，1927年4月22日。

(152) 《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纪要》，1927年4月；参见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Bombay，1938，pp．56-57．

(153)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56-57．

(154) 《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纪要》，1927年4月。

(155) 《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156)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597．

(157) 《李宗仁回忆录》，第467页。

(158) 《中国革命最近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在莫斯科的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3期。

(159)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160) 《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北伐将士大会纪要》，油印件。

(16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62) 《三十六军奋战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6日；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84页。

(163) 《第四军讨奉作战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24日；参见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续辑本，第151—156页。

(164) 《十一军战史》，《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165) 《第四军纪实》，第167页。

(166) 《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167) 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81-82页。

(168) 一说牺牲两万余人，见李汉俊报告，《晨报》，1927年7月7日。

(169) 于志恭：《关于冯玉祥吊李大钊诗》，《人物》，1980年第4期。

(17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29页。

(171) 《冯玉祥日记》，1927年2月21日。

(172)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6页。

(173)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1日、3日。

(174) 《冯玉祥令刘骥呈汉口国民政府电》，《北洋军阀》（5），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页。

(175) 《国民军革命史》，第292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9日。

(176) 《奉军扼守大河北岸》，《晨报》，1927年6月2日。

(177)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178)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179) 《北方区关于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给中央通讯之二》，《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1926年12月9日。

(180) 《陕西最近军事状况》，《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1) 《北方区关于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通讯之一》，《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2)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3)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4) 《李大钊主持之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25—1027页。

(18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3、8、44页。

(186)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18页。

(187)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35页。

(188)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1页。

(189)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八、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0、1149页。

(1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5页。

(1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6页。

(192)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7页。

(193)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51—752页。

(19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0页。

(1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196) 《时报》，1927年6月22日。

(197) 《时局扰攘中之晋局》，《晨报》，1927年4月24日。

(198) 《雷厉风行之晋省清党运动》，《晨报》，1927年6月22日。

(199) 《张作相昨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晨报》，1927年6月11日。

(20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58—760页。

(201)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89—1290页。

(202) 《张作霖招待日本记者团谈话》，《晨报》，1927年6月9日。

(203) 《张作霖致阎锡山电》，1927年3月23日，《民国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38页。

(204) 《吴佩孚将向蓬莱》，《晨报》，1927年4月22日。

(205) 《吴佩孚不愿赴太原》，《晨报》，1927年4月25日。

(206) 吴佩孚离开巩县时间，诸说不一，此据蒋雁行电：《吴佩孚再出马》，《晨报》，1927年5月4日。

(207) 《吴佩孚贯彻终始》，《晨报》，1927年5月28日。

(208) 《晨报》，1927年6月2日。

(209) 《吴佩孚密使到济南》，《晨报》，1927年6月27日。

(210) 《吴逆逃亡之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

(21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0日。

(212) 《张联陞陈报围剿吴逆详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8日。

(213) 《时报》，1927年1月8日。

(214) 《张嘉璈日记》，未刊稿。

(215) 《孙传芳痛诋蒋介石》，《晨报》，1927年5月7日。

(216) 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259—260页。

(217) 《晨报》，1927年5月28日。

(218) 《晨报》，1927年5月27日。

(219) 《晨报》，1927年5月30日。

(220) *FO*，405，Vol．253，pp．333-334．

(221) 《申报》，1927年3月31日。

(222) 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我所了解的张作霖及其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经过》，《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35页；参见《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9月7日，未刊稿。

(223) *FO*，405，Vol．353，p．334．

(224) *FO*，405，Vol．253，p．336．

(225)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226)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为遵饬抄办俄使馆旁庚款委员会等处情形报总监呈文》，1927年4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27) 《首席公使欧登科致外交部照会》，1927年4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28) *The China Press*，April 10，1927．

(229) 《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照会》，《晨报》，1927年4月8日。

(23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64页。

(231) *FO*，405，Vol．253，p．105．

(232) 《苏联驻华使馆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1927年4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33) *FO*，405，Vol．253，p．336．

(234) 《外交部致驻苏代办郑延禧电》，《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1039．12。

(235) 张国忱：《编译〈苏联阴谋文证〉经过》，柴寿安记录整理，政协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未刊稿。

(236) 《习五一等访问张国忱谈话记录》，1983年10月31日，未刊稿。

(237)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第1册，摄影目次12。

(238) 《晨报》，1927年4月11日、13日。

(239)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5页。

(240) 《侦缉处为解送莫同荣等请讯办事致京师警察厅呈》，1927年4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

(241)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4页。

(242)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4页。

(243)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244) 稿本，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245) 《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8月26日，未刊稿，天津政协藏。

(246) *FRUS*，1927，Vol．2，p10．

(247) 《张作霖致田中义一函》，日本山口县文书馆藏。

(248) 《益世报》，1927年5月28日。

(249) 《杨宇霆、张学良复电》，《时事新报》，1927年6月13日。

(250) 《李庆芳与记者谈话》，《晨报》，1927年6月8日。

(251)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

(252) 《吴晋谈话》，《晨报》，1927年6月7日。

(253) 《张作霖接见记者团谈话》，《晨报》，1927年6月9日。

(254) 《南桂馨与电通社记者谈话》（1927年6月9日），《世界日报》，1927年6月10日。

(255) 《张作相与记者谈话》，1927年6月10日，《世界日报》，1927年6月11日。

(256) 《吴晋对新闻记者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6月15日。

(257) 《世界日报》，1927年6月16日。

(258) 《晨报》，1927年6月16日。

(259) 《晨报》，1927年6月18日。

(260) 《晨报》，1927年6月18日。

(261) 《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4。

(262) 《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宣言》，《政府公报》第4008号。

(263)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21页。

(264) 《晨报》，1927年6月21日。

(265) 《驻欧使领各馆致外交部电》（1927年4月6日），《时事新报》，1927年5月6日。

(266) 《大公报》，1927年7月9日。

(267) *FO*，485，Vol．254，p．174．

(268) *FRUS*，1927，Vol．2，p．18．

(269) *FO*，405，Vol．253，p．457．

(270) *FRUS*，1927，Vol．2，p．17．

(271) *FO*，405，Vol．253，pp．459-460．

(272) 曹汝霖：《报告讨论财政集议经过情形并附呈财政整理计划大纲》（1927年8月），《北洋政府档案》，1027，167。

(273) 《潘复接见中外记者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6月25日。

(274) 《申报》，1927年6月24日。

(275) 《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4。

(276) 《大公报》，1927年7月1日。

(277) 《新闻报》，1927年6月30日。

(278) 《邢士廉对新闻记者谈话》，《晨报》，1927年7月6日。

(279) 《洛阳孔祥熙寒日来电》（1927年7月14日），又，《洛阳冯玉祥来电》（1927年7月18日），均见《蒋介石收各方电稿》；参见《葛光亭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7月27日。

(280) 《张宗昌致潘复电》（1927年7月15日），《世界日报》，1927年7月16日；《李征五谈话》，《晨报》，1927年8月1日。

(281) 《晨报》，1927年8月5日。

(28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0期。

(283) 何成濬：《八十回忆》，第28—29页。

(284) 《杨丙致蒋介石等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5) 《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3月版，第439—440页。

(286) 《宇垣一成日记》第1册，东京みすず书房1968年版，第568—570页。

(287) 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544—548、569—570页。

(288) 《田中内阁出兵声明》，《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89) 《日军派遣军司令官乡田布告》，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130—131页。

(290) 《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日本政府抗议书》，《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1) 《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江苏省政府密令》，1927年7月23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2) 《上海外交交涉员郭泰祺回复驻沪日代理总领事清水》，1927年6月23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3) 《上海市市长黄郛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电》（1927年7月16日），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91页；《满铁调查时报》，1927年7月25日。

(294) 正式会议记录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41，第176—407页。

(295)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1—1945）》下册，第101—102页。

(296) ［日］参谋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37—40页。

(297) 《彭德铨致白崇禧函》，《新闻报》，1927年6月25日。

(298) 《申报》，1927年6月26日。

(299) 《晨报》，1927年7月5日。

(300) 《陈以燊、陆殿臣通电》，《时事新报》，1927年7月7日。

(301) 《晨报》，1927年7月7日。

(302) 《晨报》，1927年7月12日。

(303) 《牛渭麟致王华电》（1927年7月7日），《新闻报》，1927年7月22日。

(304) 《晨报》，1927年7月9日。

(305) 《晨报》，1927年7月9日、10日

(306) ［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632—633页。

(307) 《张宗昌、林宪祖致北京国务院外交部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5。

(308) 《申报》，1927年7月13日。

(309) 《张宗昌通电》，《世界日报》，1927年7月10日；《李藻麟致王琦电》（1927年7月8日），《晨报》，1927年7月9日。

(31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124页。

(311) 《张宗昌致潘复电》，《世界日报》1927年7月7日。

(312)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1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RDS*，NA，M329，893.00N/81。

(313)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1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14) *Cabinet Papers and Conclusions*，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以下简称*CAB*，23/54。

(315) *CAB*，24/186．

(316) *FO*，371，V01．12478，F3834/1530/10，F3795/1530/10，F3756/1530/10．

(31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18) 《币原致矢田、芳泽电》，1927年4月中旬，《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3—1084页。

(320)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21) 《田中致松平电》（1927年4月23日）；《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22) *RDS*，NA，M329，893.00N/99．

(323) *RDS*，NA，M329，893.00/8655，893.00/8662，893.00/8691，893.00/8701．

(324) *RDS*，NA，M329，893.00/8802．

(325) *RDS*，NA，M329，893.00/8801．

(326) *RDS*，NA，M329，893.00N/94．

(327) *RDS*，NA，M329，893.00N/94，893.00N/108，893.00N/97，00N/97．

(328) *RDS*，NA，M329．893.00N/97．

(329) *RDS*，NA，M329，893.00N/84．

(330) *RDS*，NA，M329，893.00N/98．

(331) *RDS*，NA，M329，893.00N/110．

(332) *RDS*，NA，M329，893.00N/154；《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

(333) *RDS*，NA，M329，893.00N/154；《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

(334) 《芳泽致田中电》，1927年4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35)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RDS*，NA，M329，893.00N/115．

(336) 《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8日；《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5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37) *RDS*，NA，M329，893.00/8783，893.00/613．

(338) *RDS*，NA，M329，893.00/8802．

(339) *RDS*，NA，M329，893.00N/135．

(340)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1927年5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1) 《矢田致外务省电》，1927年4月2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2) *RDS*，NA，M329，893.00/8780．

(343)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

(344) 《革命文献》第14辑，第615—616页。

(345) *RDS*，NA，M329，893.00N/202．

(346) 《大臣会见录（六）》，1927年5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7)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

(348)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研究俄国对

华问题的几点主要考虑》，1927年6月10日；《松井少将关于中国时局的演讲纲要》，1927年6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36。

(349) *FO*，371，Vol．12478，F3744/1530/10．

(350) *CAB*，25/54．

(351) *CAB*，23/54；*FO*，371，Vol，12479，F3964/1530/10，F4098/1530/10；Vol．12480，F4336/1530/10；Vol．12435，F4119/67/10，F3913/67/10；Vol．12404，F3599/2/10，F3784/2/10．

(352) *FO*，405，Vol，253，pp．218-219．

(353) *CAB*，23/55．

(354) *FO*，371，Vol．12504，F4580/4068/10，F4118/4118/10，F4580/4118/10．

(355) *China Year Book*，1928，p．75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356) *FO*，405，Vol．255，pp．254-260．

(35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53页—1056页。

(35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1075页。

(359) 《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页。

(360) 《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页。

(36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9—1081页。

(362) 《战时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363) 《武汉大局讨论会第一次会议速记录》。

(364) 《时报》，1927年4月29日。

(36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6页。

(366)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106—107页。

(36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195页。

(368)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接受日方上述要求了结此案，见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A1 106。

(36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7—1099页。

(37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0页。

(37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36页。

(37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7—1099页。

(373)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1页。

(37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3—1106页。

(37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3—1106页。

(37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1—1144页。

(37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5—1148页。

(37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0页。

(37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4页；《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80) 《国闻周报》第4卷第18期。

(38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55页。

(38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38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6日。

(38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0—1165页。

(38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0—1165页。

(38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5页。

(38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5—1127页。

(38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389)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390) 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7页。

(391)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392) 米夫：《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第950页。

(39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394)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395)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16页。

(396)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397)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06页。

(398)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399) 《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74页。

(400)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17—118页。

(401) 《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7页。

(402)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38—139页。

(4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56—163页。

(404) 《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团为大会开幕通电》，《晨报》，1927年6月30日。

(405)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厅通报》，《晨报》，1927年7月8日。

(406)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5页。

(40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3日。

(40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409) 《汉口民国日报》，7月9日、15日。

(4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6日。

(4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21日。

(4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5日。

(41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12日。

(414) 《刘湘对党国之意见》，《申报》，1927年4月25日。

(415)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416)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417) 《殷汝耕转刘湘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418) 《殷汝耕转刘湘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19) 《杨森九十忆往》，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第104页。

(420) 《杨森代表赴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421) 《杨森回忆录》（三），台湾《中外杂志》第13卷第6期，第80页。

(422)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360页。

(423) 《昨日三镇讨夏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424) 天津《益世报》，1927年5月25日。

(425) 何键：《在马日铲共纪念会上的演词》，《大公报》，1933年5月23日；参见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页。

(426) 蓝文蔚：《我是怎样策动夏斗寅叛乱的》，《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第75页。

(427) 《夏斗寅出师讨共之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428) 参见《湖北清党促进会刘鸿逵报告》，南京中政会第一一一次会议记录。

(429)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430)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431) 《国民政府令》，《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432) 《讨夏告民众书》，《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433) 《夏逆张部又扰罗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4日；《白色恐怖下之罗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434) 程潜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参见马宣伟、肖波：《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97页。

(435) 《沙市沙洋相继克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436) 《重庆刘湘来电》（1927年6月21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37) 余湘三：《马日铲共之始末》，湖南《国民日报》，1930年5月21日。

(43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81页。

(439)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

(440) 《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1) 《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2) 《湖南省政府布告》，《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3) 《湖南省政府敬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4) 《长沙之救党大运动》，《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

(445) 《救党委员会之组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446)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

(447) 《湖南救党委员会唐生智等通电就职》，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8日。

(448) 《何军长漾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何军长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2日。

(449) 《唐生智致湖南省政府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450) 《唐生智电》，《申报》，1927年6月4日。

(451) 《唐生智在西平对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之训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唐生智在郑州召集军官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452) 《中政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03页。

(453) 《中央执委会沁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参见《中共中央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5月27日。

(454) 柳直荀：《湖南马日事变之回忆》，《布尔什维克》第20期。

(455) 《中央汪、谭两主席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5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457) 《长沙军工冲突事件》，《晨报》，1927年6月20日。

(458) 《讨共军包围中之湖南》，《晨报》1927年6月22日。

(45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5页。

(460) 《唐生智对湘请愿代表周表示许克祥背叛党纪军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7日。

(461)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2)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3)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4) 《湘人讴歌什么》，《晨报》，1972年7月6日。

(465) 《湘人讴歌什么》，《晨报》，1972年7月6日。

(466)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

(467) 司马璐：《1927年的国共分家》，香港自联出版社1977年版。

(46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81页。

(469) 《湘省共产党又遭迫害》，《申报》，1927年7月5日。

(470) 《唐生智在湖南省政府纪念周演词》，《湖南省政府公报》1927年7月5日。

(471)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

(472)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1968年版，第73—74页。

(473) 《南昌民众党部之大争潮》，《申报》，1927年4月12日。

(474)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第76页。

(475) 《胡主席致朱培德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476) 《九江朱培德冬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47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478) 《李宗仁回忆录》，第468—496页。

(479) 《芜湖李宗仁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0)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1) 《芜湖李宗仁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2)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3)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5—1148页。

(485) 《江西之革命纪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486) 《江西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48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6页。

(488) 《韶州钱大钧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参见《蔡熙盛电告朱培德肃清江西共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489) 《朱培德实行清共》，《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18日。

(490) 《徐州李宗仁来电》，1927年7月3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91) 《朱总指挥最近之演说》，《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49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7页。

(493) 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66—67页。

(494) 《扬州何应钦麻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95)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4页。

(496)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4页。

(497) 《南京中政会第七十五次会议记录》，1927年4月19日。

(498) 《潼关毛以亨来电》（1927年6月3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参见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244页。

(49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

(500) 马文彦口述：《回忆潼关会议》，陕西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01) 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502) 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1页。

(503) 《郑州冯玉祥来电》（1927年6月1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50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0—1231页。

(505)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57—558页。

(506)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232页。

(50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230页。

(508) 《郑州冯玉祥来电》（1927年6月1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509) 《冯到徐前致蒋总司令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0) 《冯到徐前致蒋总司令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1) 《李宗仁回忆录》，第475—476页。

(512)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61页。

(513) 《冯玉祥抵徐谒蒋续讯》，《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4) 《各报通讯记录》，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编：《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9页。

(515)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6页。

(516) 《冯玉祥日记》1927年6月21日。

(517) 《徐州特别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1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519) 蒋介石：《对于上海全市党员之报告》，《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0页。

(520)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521)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

(522) 黄绍竑口述：《徐州会议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23) 《冯玉祥日记》。

(524) 《关于清党措施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25) 《冯玉祥日记》。

(526) 《冯玉祥日记》。

(527)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528)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0页。

(529)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68-71．

(530)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9、267、275页。

(53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第1辑，第328—329页。

(532)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作“必须根除不可靠的将军们”。

(533)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32页。

(534) *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72-73．

(5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3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英

文。

(53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538)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1页。

(539) *My Experiences in China*，p．67．

(540)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1—82页。

(541)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6页；参见米夫：《中国革命》，莫斯科1932年版，第81页。

(542)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5页。

(543)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

(544)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545)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318页。

(546) 《李品仙回忆录》，第90—91页；参见《郭廷以与李将军问答记录》，未刊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547)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八七会议》，第60—70页。

(54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6月28日。

(549) 李品仙晚年回忆称：他的行动系出于汪精卫密令，见《李品仙回忆录》，第91页。

(550)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记录》。

(551) 《罗易赴华使命》，第332—338页。

(552) 《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

(553)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554)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莫斯科油印本。

(555)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记录》。

(556)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557)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记录》。

(558)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559) 《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

(56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13页。

(56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80—183页。

(56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63) 《吴玉章回忆录》，第150页。

(5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56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

(56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

(56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9日。

(56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

(56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

(57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25日，油印件。

(5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25日，油印件。

(572)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中国共产党书》，《革命文献》（16），总2832—2834页。

(573)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4页。

(574)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575)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pp．276-277．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576) 吴玉章：《八一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577) 《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页。

(578)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27年7月26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79) 《晨报》，1927年8月3日。

(580)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581)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

(582)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583)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第69页。

(584)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信》，《南昌起义》，第67页。

(585) 《李汉魂日记》，未刊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586)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587)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588) 《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联席会议宣言》，《南昌起义》，第20页。

(589)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59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3日。

(591) 上海《新闻报》，1927年8月9日。

(592) 《叶剑英谈南昌起义二三事》，《南昌起义》，第227页。

(593)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88—96页。

(594)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页。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一节　蒋介石下野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一　苏皖溃败与蒋介石下野

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宁汉双方已无根本冲突，于是，冯玉祥便积极出面调停。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曾希望冯玉祥能出兵进攻武汉，但是冯玉祥的兴趣在北伐，不愿意为宁方打内战。7月7日，孔祥熙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到达洛阳[(1)]。冯对孔称："我不能攻武汉。"[(2)] 7月12日，冯玉祥电告汉、宁，要求停止攻击，联合北伐，声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3)]。14日，又会同徐谦、孔祥熙，通电提议在开封召集紧急会议，"所有本党领袖，除共产党跨党者外，宜共同集合，专讨论党的问题"，"会议所公认负咎之人均服从决议，各自下野"[(4)]。宁方也表现出合流的愿望。18日，胡汉民、吴稚晖、钮永建复电冯玉祥，要冯转告汪精卫，停止东征，如能"幡然携手尤善"[(5)]。冯接电后，于22日再发一电，提出四点意见：一、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除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二、统一国民党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三、各领袖在开封开预备会，决定此次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第四次中央执

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任免。四、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6]。

除冯玉祥外，孔祥熙、居正、宋子文等也都在宁汉之间斡旋。汪精卫集团同意合流，但表示必须以自己为正统。7月24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联名致电冯玉祥称：一、分共及解除鲍罗廷职，均已实行。二、中央迁都南京，中央早已决定。三、中央会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四、如有和平统一方法，自不必出于一战。同时，汪精卫声称，他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7]。对于此时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反共已经输给南京方面，“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自然成了必须力争的生命线。不过，汪精卫也感到，自己身上存有易被南京指责的疮疤，不得不作出某种表示。8月3日，汪精卫等再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的进退，无关重轻[8]。6日，汪精卫发表《错误与纠正》一文，声称“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称：“如今不是引疚的时候，而是补过的时候。”[9] 所谓“补过”，自然是加紧反共。

汪精卫集团一面表示接受冯玉祥等人的调停，一面仍在积极准备东征。汪精卫等深知，宁方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是正统，而武汉方面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也非东征不能解决。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四条关于时局的决议：一、提高党的威权。二、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三、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四、党员全体动员，组织民众，训练民众。29日，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10]。8月9日，唐生智通电，声称“长江各省之痛苦，皆中正所造成；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反将红帽子扣到了蒋介石头上。他要求海内同志，共起“平乱”[11]。随即指挥东征军向南京推进，大有与孙传芳军形成夹击之势。

宁汉对峙，为北洋军反攻提供了机会。

7月24日，徐州为直鲁军许琨等部攻陷后，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纷纷自鲁南撤退，南京震动。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徐州不保，诸事棘手。"[12] 在高级将领会上，李宗仁建议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但蒋介石力主及时夺回徐州，并决定亲自率部反攻。行前，蒋介石声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13] 25日，蒋介石率嫡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抵达蚌埠，会同第六、第十、第三十三、第三十七、第四十、第四十四军发起反攻。27日，蒋介石复电冯玉祥，保证一星期内成功。电称："宁失宁粤，不愿委弃徐州，以断我两军之联络也。"[14] 他要求冯玉祥尽快从豫东派部队夹击。

宁方的许多将领看到宁汉对立和宁方内部蒋桂矛盾的加剧，都力图自保。王天培（第十军）、赖世璜（第十四军）、叶开鑫（第四十四军）、曹万顺（第十七军）、周凤歧（第二十六军）、谭曙卿（新编第一军）、贺耀组（第四十军）等纷纷请求武汉方面加委。这样，在前线的部队自然更不愿积极作战。冯玉祥的东路指挥鹿钟麟因受直鲁军和红枪会牵制，一时也无法逼近徐州。 孙传芳、张宗昌见此，故意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步步后撤。8月2日，宁方军队接近徐州城垣，孙传芳、张宗昌突然发起反攻，从右翼迂回到宁方军队侧后。蒋介石因事出意外，一时指挥失措，各军陷入混乱，自8月5日起纷纷向南撤逃。蒋介石也于当日乘车逃到蚌埠，下令全军退守淮河一线，持久防御。可是各军只顾退却，根本无法组织有效防御。8月6日，蒋介石率先逃回南京，各军无心恋战，纷纷自行南撤。8月12日，孙传芳军全线渡过淮河。17日，南京军事委员会鉴于前线部队已不堪再战，下令撤至长江南岸，修整部队，扼险固守。尾追的孙传芳军随即进抵浦口、六合、扬州一线江岸。从8月5日到18日这13天中，宁方北伐军从徐州至浦口溃逃了七百余里，成为北伐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败绩。

蒋介石反攻徐州前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情绪更趋强烈，从“和平分共”转向暴力镇压。

7月30日，武汉人力车工人发生罢工。8月1日，谭延闿称：“我们对付CP并没有破脸，现在他们鼓动罢工、罢市，是他们先破脸，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陈公博称：“我们应当一面抓他们的领袖，一面设法避免军警同工人的冲突。”[15]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集团的情绪更为激昂。8月5日，汪精卫咬牙切齿地说：“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同时，他表示：“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16] 8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会上再次表示：“现在说是容共的，就不算得是人！”当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的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等开除党籍并免职；三、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通缉拿办；其他跨党党员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同时，决定《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17]。讨论时，于右任称：“要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你也发表，我也发表，恐怕报纸还没有许多地方登载。”不过，于的发言并没有使与会诸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湖北省党部及各人民团体；湖北全省党务，暂时一律停止进行，各人民团体，着即停止活动。

汪精卫集团既坚决反共，桂系便企图拉拢汉方，合力排斥蒋介石。

8月8日，李宗仁领衔致电汪精卫与谭延闿，声称读了汪精卫8月3日致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喜极而涕”，共党既已退出，则国民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当前大计在于北伐，要求武汉方面及早到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该电将白崇禧、何应钦排在联署人的第二、第三位，而将蒋介石排在第四位[18]。10日，汪精卫等复电李宗仁等，重申武汉的中央党部及政府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但表示可以通过中央全会解决“个人责任”、“机关改组”和“统一全国之政府”等问题[19]。12日，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讨论。此际，李宗仁称：“请总司令自决出处。”白崇禧也称：“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20]当时，蒋介石曾表示：“我完全服从监察委员会，愿与中央监委同进退。”蒋的意见立即遭到反驳：“总司令应大权独断，何以须随监委为进退？”[21]

在内外交困，和既不成、打又不能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下野。8月9日，蒋介石下令扣押王天培，后又扣上与唐生智勾结、擅自退却、扣饷等罪名予以枪决。12日晚，蒋介石将军事交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负责，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宣言埋怨“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一身”，声称“今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宣言向宁汉双方指出三点希望：一、武汉同志克期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二、分驻湘、鄂、赣各地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国民革命；三、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22]。

8月13日，胡汉民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与吴稚晖、蔡元培等商定，去上海挽留。但胡等人赶到上海时，蒋介石已转赴奉化。胡汉民挽蒋不成，决定与蒋共进退。14日，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辞职，要冯玉祥“一柱擎天”[23]。接着，蒋介石的盟兄、上海市长黄郛也通电辞职。蒋系人物纷纷撂挑子，南京政府无人负责，立即陷入瘫痪状态。8月14日，

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蒋“一身系党国之安危，为民众之救主”，敦促他“克日返宁，主持大计”。冯并称：如蒋一意坚辞，他本人也只能“一同退伍”[24]。15日，南京方面召开军委、党务联席会议，推李烈钧为主席。李称：“万不任劳苦功高、革命中心之蒋总司令引退”，也不能任胡汉民等“党国柱石”“洁身远引”。何应钦、李宗仁也表示，应一致挽留蒋介石[25]。然而，蒋介石却故作姿态，于16日致电南京，声称“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不仅要求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且要求“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26]。17日，南京政府复电蒋介石，劝其“不避劳怨，勉任艰巨”。[27]次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致电蒋介石，劝他“照常供职，勉成大业”。电报并称：“所请开去总司令职权，重治失职之处分，应毋庸议。”[28]这样一来，蒋介石的身价反而增高了。

除南京、开封外，广州李济深也反对蒋介石下野。9月4日，广州召开大会，主张挽留蒋介石及胡汉民、张静江等五委员。13日，李济深发表时局宣言，要求“武装同志平心静气，认定蒋为此时此地最优最适之军事领袖”；主张请蒋即日复职，请汪即日赴宁，从速召开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李称：“继续北伐，乃宁汉合作之真目的，汪蒋合作，乃宁汉合作之真精神。”[29]

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蒋介石是使用以退为进策略的高手。他的下野，一方面使武汉方面失去东征借口，从而减轻了宁方所受的军事压力；一方面使南京政府群龙无首，陷于瘫痪，不得不再次请他出山。

二　孙传芳反攻与龙潭之战

蒋介石、胡汉民相继辞职后，南京方面于8月15日召开军委、党务联席会议，决定每周召开中央党部各机关联席会议，讨论大计；行政事务归国民政府办理；军事方面，在蒋介石未回任前，一切军政、军令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部队由军委会统一指挥。17日，军委会命令江北部队全部撤往江南，凭江扼守，于是，孙传芳的军队全面

占领江北一线。同日，孙军前锋抵达浦口江边，开始攻击南京，与狮子山守军隔江互相炮击。21日，武汉东征军占领安庆，南京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孙传芳部徐州反攻后，张作霖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全盘计划，决定“暂以恢复江北为止，俟党军内部变化，再乘机进取江南”[30]。据此，他劝孙传芳不要匆忙渡江，以免逼迫过紧，后防空虚，发生其他危险[31]，但孙传芳认为，“沪宁一带，自蒋去后，形势已非”，决意搜掠民船，乘胜渡江，进攻南京。

面对两面受敌的形势，桂系与何应钦所属蒋系不得不保持合作，支撑危局。蒋系主力第一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全力投入沿江防务。

桂系为了安定上海局面，寻求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决定由白崇禧出任上海卫戍司令，以白的参谋长张定璠任上海市长。8月18日，白崇禧召集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请求商界解决财政困难。在虞洽卿等人支持下，获得部分现款[32]。22日，白崇禧公开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蒋介石所领导的“第二次清党”，声称“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33]。这种情况，反映出桂系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反映出桂系争取人心的努力，当日，杨虎、陈群畏罪潜逃，杨部警备队被改编。

与此同时，桂系继续积极争取同汪精卫集团和解。8月12日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的进程随之加快。8月15日，李济深、黄绍竑通电各方，主张武汉政府即行迁宁，以“消除分裂之局面”[34]。16日，李宗仁再电汪精卫催促，要求中止东下之师。同时，李并派胡宗铎赴汉口迎接汪、谭等人到南京“柄政”。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汪精卫提议迁都南京[35]。19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正式通过迁都宣言。汪精卫并提议：撤销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人开除党籍的处分[36]。会后，汪精卫、谭延闿邀李宗仁赴九江商议合作具体办法。22日晚，李宗仁与汉方中委汪精卫、谭

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在九江举行会议。李宗仁称："南京自蒋氏离京后，党、政府人员全已解体，津浦路军事亦颇紧张，非中央即日迁宁，不足鼓舞诸同志的精神，安内攘外。"[37] 他要求唐生智的东征军停止于安庆附近，使宁方军队得以专心应付孙传芳军[38]。唐生智、程潜不赞成此点，仍主张东进，"共同御敌"。唐生智并主张将部队开至芜湖。经过讨论，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二、9月15日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三、为了使宁方军队放心，谭延闿、孙科偕李宗仁东下；四、东进视此后情形决定[39]。23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由九江赶赴南京。汪精卫等汉方中委继续留在九江，准备东迁[40]。至此，宁汉达成谅解，宁方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全力对付孙传芳。

宁汉两方酝酿合作期间，孙传芳积极准备渡江。8月22日至8月24日，孙军自浦口炮击南京，以此吸引宁方主力，孙军主力则分别秘密地向南京上游和下游集结。24日拂晓，孙部乘木船在大胜关上游兔耳矶附近偷渡，被守军第十九军第一师发现，开炮还击。适值李宗仁等人乘舰下驶，陈调元乘舰上行，路经该处，命令舰上卫队参加战斗。孙部被迫退回江北。25日夜，孙军先在八卦洲、十二圩等处向燕子矶及镇江等地偷渡，吸引宁方军队注意，继则以主力在南京以东的乌龙山、栖霞山、龙潭一带强渡。当夜浓雾，又值北风，孙军左右两翼渡江部队虽被击退，但乌龙山方面强渡成功。宁方部队被迫后撤。8月26日，孙军突然向宁方第一军第二十二师进攻，占领栖霞车站、龙潭车站及栖霞山、乌龙山部分阵地，截断沪宁交通线。

情况紧急，白崇禧自上海赶到镇江指挥，会同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火速调桂系的第七、第十九军匆忙赶到南京以东，协同第一军作战。8月27日，第七、第十九军经反复争夺，攻占栖霞山，第一军第十四师卫立煌部夺回龙潭车站。但孙军不断增援，龙潭再告失守。此际，集结于龙潭一带的孙军已达10个师，4个混成旅，五万余

人，分别据守龙潭以西之黄龙山及南面之青龙山、虎头山，北面之大石山等险要。孙传芳并亲至龙潭水泥厂督战。28日，宁方军队败退到南京城边，城内各党政机关一片混乱，要人们纷纷出逃。南京危急。

29日，李宗仁、何应钦迅速整顿南京城郊部队，命白崇禧率第一军自东面进攻，命第七军第一、三两个师及第十九军第一师由江边及沪宁路沿线，向龙潭西北攻击，何应钦自率驻扎南京的第一军一部从南面攻击。另电第四十军迅速开进南京，作为总预备队，同时命海军派舰游弋于八卦州、划子口、大河口、乌江镇等处。8月30日，宁方自三面向龙潭发动反攻。

此次孙军反攻江南，采取孤注一掷的战略。官兵渡江后，船只悉数开往北岸，以示有进无退，加之孙军据守青龙山、黄龙山、虎头山、七星洞等高地，凭险顽抗，所以战斗异常激烈。南京国民党军循环冲锋，旋退旋进。当日下午5时，克复龙潭，孙军仓皇向江岸溃退。因天色已黑，宁方军队未便穷追。孙传芳收拾残军，准备再次反攻。

8月31日晨5时，孙军猛攻龙潭水泥厂及龙潭车站。当时，何应钦、白崇禧已在龙潭会合，即令第一、第七、第十九等军协同反击。孙军除一部由柴洲等地渡江北窜外，其余均被缴械俘虏。

龙潭之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5万之多，成为北伐以来的一场恶战。此役宁方俘获孙部官兵三万余人、高级军官数十名，缴械四万余支。孙部死亡及溺毙约万余人。

龙潭惨败后，孙军慌忙渡江北撤。孙传芳化装成士兵，仓皇逃到扬州，率残部约五六千人退往徐州。9月2日，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肃清江南残敌，同时命第十八军军长杨杰、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等分头渡江北追，并命海军派舰游弋于和州、采石、南京、镇江、江阴、南通一带江面，掩护陆军渡江。

三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宁汉合流，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最初是宁沪合作。

1927年春，吴稚晖到上海策划反共，西山会议派骨干之一邹鲁闻讯后，立即找吴商讨“合作清党”问题。吴表示，当时尚不能断然表明废弃联俄容共政策，但与西山会议派的“一致合作，不过时间问题”。[41] 西山会议派感到与蒋合作有望，提出统一党务的四条办法：一、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粤、沪两方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施行职权；三、沪、粤两方中央党部分别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四、沪中央党部宣告清党目的已达，自行结束。[42]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一面命白崇禧查封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的中央党部，一面指派林森、石瑛、沈定一等为改组委员及清党委员，实际参与清党工作。6月6日，胡汉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宣布，以后不容有“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7日，根据张静江的提议，恢复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人的党籍[43]。接着，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又联名致函沪方，邀请西山会议派分子到南京，以瞻望孙中山墓地为名，与宁方密议党务统一办法。这时张继正好由日本回到上海，遂代表沪方赴宁，与胡汉民等洽商。7月7日，西山会议派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与南京中央协议统一，双方推举同数委员，组织筹备委员会，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并推举张继、覃振、刘积学三人为接洽委员，负责与南京方面商量[44]。会后，张继等赴南京，与胡汉民、吴稚晖等商定，只待蒋介石从徐州前线回来，征求他的意见后，即可实行。

在宁、沪秘密商洽统一时，西山会议派又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进行接触。8月初，许崇智派人到汉口，经孙科介绍，与汪精卫见面。汪随即复函许崇智，提出两点意见：一、汉、沪同志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汉方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请西山会议

派同志加入工作[45]。西山会议派同意召集预备会议，但不同意由汉方开四中全会，另以与宁方商洽合作的各项办法提出与汪协商。汪精卫表示无法接受，理由是，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关。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的障碍已去，合流条件基本成熟，但是，由于龙潭之战，宁方转危为安，实力增强，态度便转趋强硬。

在接洽过程中，汪精卫和汉方处处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对此，宁方与西山会议派自然强烈反感。8月21日，张继致电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等，主张“统一汉、宁、沪三党部”。电称：“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但电报同时提出，汪精卫“对内对外皆失信仰”，宜“暂避要路”。[46] 9月1日，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召集省市各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蒋作宾、王伯群、钮永建等依次演说，声称在南京建立中央是“全国忠实党员和一般民众之公意”，宁汉合作是“忠实同志团结一致”，并非“投降武汉”[47]。会议通过“电促汪精卫彻底觉悟，即日内下野，以谢党国”等九项议案[48]。会后即致电汪精卫，指责汪“早已自绝于国人，信用人格，两俱丧失”[49]。接着，浙江政治分会、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陆续通电应和。9月5日，谭延闿、孙科专程到沪，邀胡汉民等回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谭延闿对胡汉民解释说：“宁汉均有过，请谅解。”胡以反共“先进”自居，闻言后立即离座，声色俱厉地说；“余无过，汉方各人实有过。”他指责汉方与共产党合作，致成今日局面，声称谭延闿等“均应负责”。胡并声明：“四次全体会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裁判，安有资格列席？”[50] 彼此不欢而散。

同日，汪精卫偕顾孟馀、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抵达南京。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汪精卫发表演说称：宁汉双方同志均应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一切党国大计取决于第四次中央全会[51]。桂系不愿汪精卫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南京，因此，一面欢迎，一面又

在南京街上遍贴反汪的无头告示，“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使汪精卫非常难堪[52]。8日，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宗仁提出：如欲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委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宁汉合作的精神[53]。汪为表示“诚意”，只得同意亲往上海“劝驾”。9月9日，汪精卫到沪，自认过错，但胡汉民、吴稚晖拒不见面，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虽然见了面，但都不同意汪的主张。他们以“法统”问题刁难汪精卫。张静江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武汉方面所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是联共会议，也是非法的。又称：汪精卫根本没有召开四中全会的资格和理由。如果汪确有诚意，就应放弃这一主张，衔接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共同召开三中全会。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并扬言：若开第四次会议，他们决不到南京[54]。接着，汪精卫又专访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许崇智等人。他们也同样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而向汪精卫提出，组织“特别委员会”，合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于一炉，以实现三派的“大团结”。

9月10日上午，在法租界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举行非正式会议，宁、汉及西山会议派均参加。汪精卫为迁就沪方，提议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沪方仍然反对。汪精卫只得放低调子，同意在上海召开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宗仁、李烈钧、张静江、叶楚伧、蔡元培、程潜、褚民谊、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王伯群、杨树庄、覃振、居正、于右任21人，推谭延闿为主席。会上，汪精卫再次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群起反对。为了打开僵局，孙科提出一项折衷办法，即避开三、四次全会之争，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孙科的提议得到宁方和西山会议派的赞同。汪精卫也未表示反对。经过激烈争吵，共同商定：

（甲）关于党务：一、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织之；三、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最迟于十七年一月一日召开；五、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由三方共同提出；六、中央各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乙）关于政府，宁、汉两政府之合并及改组方法并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丙）统一宣言推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

12日，推定特别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汉方推出特别委员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候补特别委员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宁方推出特别委员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枢、李烈钧；候补特别委员褚民谊、缪斌、叶楚伧。沪方推出特别委员林森、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邹鲁；候补特别委员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出特别委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55]。

13日，公推特别委员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五人代行监察委员会职权。

上海谈话会确立了宁、汉、沪三方平分秋色的调子，从而否定了汉方的正统地位。这是宁、沪两方策划的一个偷梁换柱的阴谋。开始，汪精卫不明底蕴，未表示反对。会后，孔祥熙宴请宁方委员时，陈公博大谈特别委员会“违背法统”，成立特别委员会是“自己取消了执行委员会”，暗示此举将使武汉集团失去控制国民党中央的地位[56]。经陈公博点破，汪精卫才恍然大悟。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

集汉方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开秘密会议，讨论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谭延闿、孙科力陈舍此“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馀则坚决反对，主张不参加。经过一场激烈争吵，无结果而散[57]。汪精卫知已无法挽回，决定消极抵制，当夜潜赴九江。行前通电称：对共产党“防制过迟”，只因“时局未定，应先补过，不宜遽尔卸责，故隐忍至今”，表示愿“及时引退，听候处分”云云[58]。接着，汪派骨干分子徐谦、顾孟馀、陈公博相继宣布引退。

9月14日，宁、汉、沪三方委员专车赴京。次日，宁、汉两方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在中山陵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组织特别委员会议案及人选名单。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宣言通告：“从前峙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特别委员会将一面继续清党，一面继续北伐[59]。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又于16日、17日、19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议决如下各事项：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一人统理部务。二、推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宠惠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推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为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三、10月1日以前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地分会。

20日，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布六条施政方针：一、继续北伐，削平军阀，完成全国统一；二、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三、肃清共产党；四、建设革命秩序，厉行革命纪律；五、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之建国程序；六、扫除文武官吏贪污腐败之积习[60]。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中央分崩离析的局面，使其归于统一，但是，它是由国民党各派系七拼八凑起来的，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一，在国民党党章上没有法理依据，为反对者留下了借口。第二，宁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都没有参加特委会，对它持消极态度。第三，汉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极力反对特委会。基于以上几个原因，特别委员会根本无法行使中央职权。它不仅未能消除国民党内各派的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和纠纷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第二节　宁汉粤之争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讨奉军事

一　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出笼，剥夺了汪精卫“合法领袖”的地位，使他继续执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的希望成为泡影。正如李宗仁所说：“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61] 对于在宁汉合流中的失败，汪精卫感到非常“痛心”。他说：“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62]。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在九江表面上闭门读书，暗中却操纵唐生智和正在回粤途中的张发奎，企图从湖北和广东两地分头发动，反对特别委员会[63]。

握有重兵的唐生智也极为不满。当时，唐生智利用东征的机会，部队已进入安徽。9月6日，刘兴的第三十六军由大通入驻芜湖，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由安庆北上合肥，向蚌埠推进。在唐军的逼人威势前，宁方驻皖部队步步后退，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也退到芜湖以东布防，并

向南京求援。9月8日，唐生智抵达安庆。当日宣布：“以前蒋中正所委命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均应无效”，“听候中央改组”。[64] 11日，唐生智由安庆赴芜湖视察，因获悉冯玉祥、靳云鹗发生冲突，即于当日由芜湖折回汉口，出任调停。

唐生智由安徽返回汉口后，利用宁汉暂时停止军事行动的机会，整顿后方，解决两湖境内几支非唐系的武装力量，扫平宋鹤庚部，赶走许克强，驱逐湖南的粤军与湘西的黔军，完全控制了两湖地区。14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重要军官会议，决定暂缓北伐，以巩固湘、鄂、皖三省防务。由唐生智担任三省联军总司令，何键、刘兴、周斓为副司令。

为了与控制特别委员会的桂系抗衡，唐生智需要利用汪精卫的招牌以壮大自己的声势。9月19日，唐生智派人上庐山见汪，邀汪赴汉口共商要事。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汪、唐一拍即合。21日晚，两人商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便控制两湖与安徽，与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当即通电称：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8月22日训令，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宁以后，在武汉设立政治分会，指定唐生智、顾孟馀、陈公博、孔庚、邓寿荃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日，又在武汉政治分会下组织财政委员会，以孔庚、邓寿荃、王祺三人为委员。

南京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曾决议取消各地政治分会。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后，特别委员会便据此通令取消。唐生智置之不理，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作出反应，向特委会挑战。于是，国民党由宁、汉、沪三方合流再次转化为宁、汉对立。

9月22日，汪精卫在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委婉地提出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是“迁就事实”的“权宜措置”[65]。25日，汪精卫又通电声称：本人“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今后仍当“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66]。27日，汪精卫回庐山继续“休养”。同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任命何键为代

理安徽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各厅厅长，将安徽完全收入自己囊中。28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称：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且为将来破坏党的组织者开一恶例”。通电表示：在党的合法机关未恢复职权以前，可以将特别委员会产生的政府视为事实政府，进行有限合作；但不承认特别委员会关于党务、政治的决议[67]。

桂系拥汪本是权宜之计，其真实意图是要将汪精卫拉过去，孤立唐生智，乘机打垮或吞并唐部，控制两湖，使之与广西连成一片。唐生智盘踞安徽，觊觎南京，桂系更感到如芒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

谭延闿与唐生智之间有宿怨。8月24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自九江赴南京时，即策动谭延闿反唐，谭当即表示支持李。到南京后，在谭延闿的牵线下，李宗仁、白崇禧积极策动程潜参加讨唐战争，保证成功后，由程潜率第六军回湘主政。李并当面向程潜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68] 程潜为桂系的许诺所动，自愿充任“讨唐先锋”[69]。桂系还通过谭延闿、程潜的关系，与江西的朱培德、驻鄂西的鲁涤平以及唐生智部下何键、张国威取得联系，从内部分化瓦解唐军。

龙潭战役结束后，南京政府已无北顾之忧，讨唐计划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宁、汉、沪三方的政客们正在为争夺国民党大权而喋喋不休时，桂系即开始筹划西征。

西征前，宁方首先展开政治攻势。10月2日，南京特委会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十余人赴庐山“劝汪复职”。宁方代表提出：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二、武汉军继续北伐；三、恢复中央党部。汪精卫也提出三条相答：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由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并可允许其继续存在，但不能取代中央常务委员会，而要与其划清职权范围；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

限。双方最后同意，以承认特别委员会作为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交换条件。关于军事问题，宁方提出：一、新编军队须经军委会批准。唐部扩军太快，以后不能自行扩军；二、汉阳兵工厂所出军用品，应由军委会统一分配，各军不能自行提取；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唐生智、程潜应统率部队，同时北伐；四、何键、刘兴两军退出安徽，安徽省政府、省党部改组。

宁方提出的条件，涉及唐生智的切身利益，汪精卫不能替他做主。10月10日，汪精卫偕孙科、伍朝枢等到汉，与唐生智磋商。11日，汪、唐等与特委会代表会谈。唐生智表示：赞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合法的党的机关，组织合作政府，对特委会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但他坚决反对改组安徽省政府和交出汉阳兵工厂。在汪精卫的斡旋下，最后双方达成政治协议十一项、军事协议三项。政治协议主要内容有：追认9月15日特委会议决案、恢复监察委员会、中央各部改部长制、于必要地点设特别分会、设国民政府主席等。军事协议则只有厘定兵额，核实兵数，各军不得擅自增减以及统一各地兵工厂等笼统条文[70]。上述协议，反映出汪精卫企图恢复领袖地位的良苦用心，但无奈特委会只是借会谈制造舆论，并不诚心与汪精卫合作。因此，汪精卫的努力只能是徒劳而已。

10月13日，孙科、伍朝枢等携带协议回南京复命。同日，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通电，表示赞同协议，要汪精卫等来宁开会，以11月1日为期。电报并诈称："一、三两路军队已络续渡江，集中津浦路，大举北伐，专候驾临主持一切。"[71]正当汪精卫洋洋自得，以为"事已大定，党务军事均可转危为安"时[72]，南京讨唐准备也已就绪。

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会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随即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分由长江两岸进攻安徽唐军。同时密令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在江西策应；何应钦、白崇禧则分率第一、第二路军，在津浦线上对奉鲁

军取守势，掩护西征。

南京政府讨唐得到两广与冯玉祥的响应。10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李济深等，要求饬令范石生、方鼎英各部火速向衡阳、醴陵进攻，牵制唐军[73]。次日，广州政治分会即命李福林率第五军先行开赴韶关，并调回东江各军陆续北上。河南的冯玉祥也致电南京，支持讨唐。22日，孙连仲奉冯玉祥命，进迫武胜关，与驻守该地的鄂军开火。驻防鄂西的第二军鲁涤平部与川军杨森、黔军李燊合组西路讨唐临时军事委员会，推杨森为主席，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击。贵州的周西成也派兵进窥湘西。一时间，形成了对唐生智四面围攻的态势。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四军即以追击为名回粤，当时已到达广州。汪精卫预感战事将不利于唐生智，便于10月21日离开武汉，转道上海赴广州。但是，唐生智仍决心对抗到底。10月21日，通电斥责南京特委会是“政客官僚之集合体”，宣称要“谨奉总理遗教”，打倒“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74]。同日，武汉政治分会宣布与南京特委会断绝关系。

战争发动后，唐生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各个击破，决定对内集中全力解除湖北境内非嫡系部队武装，对外则“弃皖防赣，固守两湖”[75]。10月24日，唐军放弃安庆，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八军一部共八万余人集结于鄂皖交界地区，准备与西征军决战。但是，由李宗仁指挥的西征军第三路军进展迅速。11月5日，突破唐生智在广济附近的防线，向鄂东田家镇、蕲东发起进攻。同时，由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和朱培德指挥的第五路军自赣北向鄂东南的咸宁一线推进，威胁唐生智部沿武（昌）长（沙）线回湘的归路。第二军鲁涤平部则由荆州、沙市继续沿江东下。冯玉祥也派樊钟秀、吴新田部向鄂北挺进。武汉处于四面被包围的困境。

在不利局面下，唐生智所部出现分崩离析局面。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第四师在安徽境内向程潜投诚。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秘密接

受程潜委任的第八军军长职务。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暗中派人向白崇禧接洽，准备在唐生智下野后与刘兴共管武汉。11月9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决定缩短战线，命何键、刘兴两军退守黄州，准备以武昌、咸宁为集合点，与宁方决战。何键因心怀贰志，命所部放弃抵抗，径直后撤武汉。刘兴部受其影响，也只得放弃黄州西撤。唐生智见武汉不保，准备退回湖南。但这时夏斗寅部正窥视长、岳，粤桂军进入湘南，黔军又由湘西侵入，唐生智感到大势已去，便于11日晚在武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唐生智表示："各方队伍都要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对付，我只好暂时离开部队到日本去。"[76] 他并对善后作了安排，决定由何键、刘兴、李品仙共同负责，将部队撤回湖南，保存军队实力和湖南地盘[77]。会议结束时，他又将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勒毙。会后，唐生智即发表下野通电，乘日轮东渡。

11月12日午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彭振国暨湖北省党部及商会开会，议决吁请宁方息兵言和。13日，宁、汉双方同时下令停战。西征军陆续进驻武汉等地。14日，南京特委会宣布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任程潜、李仲云、王世杰、张肇元、甘介侯为委员，以程潜为主席。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19日，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知本、熊斌、张难先、石瑛、王世杰、胡宗铎为省政府委员，以张知本为主席。同时任命胡宗铎为清乡督办、陶钧为清乡会办，在湖北实行白色恐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

二　宁粤之争与广州政变

在宁汉对立的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宁粤之争。

中共在南昌发动起义后，张发奎极为愤恨。8月2日致电李济深称，他本人希望有机会回粤，与广东方面"共同奋斗"，"前后夹击"叶挺、贺龙部队[78]。李济深致电蒋介石请示，蒋本有策反张发奎的打

算，于是，李济深即派原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携款赴赣[79]。陈可钰到南昌后，张发奎所部军官对于“广东政治均表示不满”，对于李济深“亦多有微词”，张发奎甚至表示要拥陈代李[80]。陈可钰力陈不可，张发奎只得作罢。但张发奎表示，必须支持汪精卫，陈称：李济深对此不会反对[81]。在得到汪精卫同意后，张发奎即将第四军、第十一军余部交给黄琪翔，命黄以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南下，本人则与陈可钰取道上海，南下香港。9月21日，黄琪翔率部抵达广州，所部分驻广州近郊和石龙、韶关等地，同月27日，张发奎自香港到达广州。

张发奎回粤，并不仅仅是为了觅得一席休整之地，而是要依赖广东，为汪精卫取得重新起家的地盘。9月22日，张部发表《凯旋宣言》称：“感觉到真正革命的势力太单薄了，感觉到改头换面的反革命势力日加扩大了，感觉民间的疾苦不特没有解除而且日益增加，感觉到党国的前途不但没有光彩而且日益暗淡。”宣言表示拥护汪精卫，“建设革命的新广东”[82]。不久，张发奎即与陈可钰商定，由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为公安局长，张发奎为代理军事厅长兼省党部组织部长，谢婴白为军事厅参谋长，李济深均表示同意。

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在威胁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统一。9月下旬，南京特委会电令李济深撤销广东政治分会。李济深等为了维持广东的半独立状态，复电要求收回成命，同时要求增设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10月5日，南京特委会决定，政治分会应即取消，是否增设军事委员会分会一案，交国民政府核办。10月11日，广州政治分会议决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以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可钰、陈济棠等为委员，指挥政治分会境内陆海空军及一切军事机关。10月12日，南京特委会再电李济深，要求依前令取消政治分会，但李济深等仍然不加理睬。14日，广州政治分会决定以李济深为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可钰为参谋长，黄绍竑、张发奎为副参谋长，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18日，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

其间，张发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陈公博为民政厅长，以邹敏初为财政厅长，以朱晖日为军事厅长，李济深的亲信一一被排除，张发奎逐渐控制了广东省政府。“新委的县长，完全由陈公博决定”，“李济深事前不知道，事后也不能过问”[83]。李济深感到极大威胁，积极邀请在福建的蔡廷锴部队回粤“休养”，企图以之抵制张发奎。蔡部脱离南昌起义部队后不久，即在福建恢复第十一军编制，仍拥陈铭枢为军长。张发奎和陈铭枢之间早已水火不相容，和蔡廷锴的关系在南昌起义后也已经恶化。李济深此举加剧了和张发奎之间的矛盾。在此情况下，陈可钰出面调停。他一面劝张发奎出洋，一面向李济深献计，将张发奎部移驻潮汕[84]。张发奎表面上同意陈可钰的意见，暗中则在加紧策划。

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计划是一面控制广东，一面支持唐生智出兵南京，共同反对特别委员会。10月6日，张发奎发表演说称：西山会议派的人多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现在居然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以无党籍之人而主持本党政务，党纪何在”[85]？同日，张发奎通电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主张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正式打出了“拥汪护党”的旗号。李济深不知是计，表示同意迎汪回粤。10月7日，李济深、张发奎在广州召开迎汪回粤大会，要求汪回粤“主持党国大计”。会后并派人到汉口迎接。10月20日，南京特委会宣布讨伐唐生智，汪精卫决定“应召回粤”，“于国内求一立足地”，然后再图“恢复中央”[86]。

10月29日，汪精卫到达广州，即向报界重申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恢复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等主张[87]。30日，汪精卫、李济深、何香凝、李福林、陈树人、陈公博、甘乃光等集会。会后，即由汪精卫、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发表通电，宣布第四次执、监会议在粤召集，望各委员克日到广州开会；在全体会议未成以前，中央执行、监察两常务委员会及秘书处均照常办公，“庶党之中枢不致动摇”[88]。当晚，在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的联合宴会上，汪精卫发表演

说，猛烈指责中央特别委员会“背党非法”，表示要“为挽救本党危亡，恪守本党纪律而反对特委会”[89]。何香凝这时还不能认识汪的本相，也发表演说，表示“有特别委员会即是亡国，愿追随各同志努力救党”，1972年11月1日。[90]。11月1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履行最高机关职务。二、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三、由常委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一切争端[91]。这样，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等就公开在广州树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大旗，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

当时，在粤国民党中委只有六七人，因此，李济深不赞成汪精卫等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他认为，特委会在党章上“实有不合的地方”，“但是我们反对人家不合法，应该自己要合法”[92]。他主张和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撤废特委会，重开二届四中全会[93]。11月3日，汪精卫致电广西的黄绍竑，征询他的意见。黄复电主张在南京开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裁判各方是非；讨唐军事，既已爆发，可以不问[94]。黄绍竑的回答，不合汪精卫的心意。同时，李济深一派还扬言：“汪为党之中心人物，处广东之边陬地，实非所宜，望速归宁，以为全党尽力”[95]，暗示不欢迎汪久居广东。陈可钰甚至当面对汪说：“先生于此时回粤，有两不可：一则激起两广之纠纷；一则酝成第四军之分裂。”汪精卫听后，非常尴尬地说：“余诚为不祥之人矣。”他表示，将离开广东；到日本去[96]。至此，汪派与李济深、黄绍竑已格格不入。

面对汪精卫在广东的挑战，宁方委员谭延闿、孙科、吴稚晖、李石曾、胡汉民、戴季陶、褚民谊、蒋作宾、张继、邹鲁等15人在上海开谈话会，讨论应付办法。与会诸人认为：在粤召开四中全会，难以达到法定人数，不足为虑；粤方内部分歧，不会长久。据此，桂系主张整顿粤局，把汪精卫、张发奎从广东排挤出去。

桂系的主张正合李济深的心意。因此，他努力在宁、粤间斡旋，

企图以开四中全会为名，将汪派中委送出广州，然后再寻机解决张发奎部。在李的斡旋下，宁方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并以出国考察为名，将许崇智派往日本，又任命张继、居正为驻日代表，令其赴日，为停止特委会作准备。11月1日，宁方通电，敦促粤、汉各方中委到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97]。但是，正在日本访问的蒋介石却突然于此时联汪反桂。

蒋介石于当年9月28日赴日考察，11月8日回国。其间，陆续派人回国，与汪精卫联系，表示只要汪派驱逐了李济深，蒋介石就回广东，“再办黄埔，再练兵”[98]。11月2日，蒋介石以吊唁李济深母丧为名，派宋子文赴粤。此时，宋子文已经投入蒋介石营垒，他的实际任务是与汪精卫等密谋，建立蒋汪联盟，反对特别委员会。11月4日，汪精卫、李济深、陈公博、宋子文等在粤中委联名致电宁方，同意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但主张先在广州或上海开预备会。同时，立即取消特别委员会，或宣布停止其职权[99]。此电说明，宋子文的广东之行已经取得了具体成果。

谭延闿、孙科等不赞成变更会议地点，于11月6日复电粤方，希望汪精卫速到南京开会。8日，宁方又致电汪精卫等，声称特委会是根据上海协议正式成立，取消或停止职权，都不是“同人等权力所及”，只能等待中央全会解决。谭、孙并提出，预备会议地点以上海较为适中[100]。9日，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四人应汪精卫电召，抵达广州。当晚，汪精卫约集在粤中委陈树人、何香凝、甘乃光、李济深、李福林、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璧君等在葵园会议，讨论开会地点。李济深主张在上海，陈公博等坚决主张在广州，两派互不相让[101]。次日会议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上海来电，邀请汪精卫、顾孟馀等赴沪，商量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电称：“若欲使本党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102] 汪精卫接电后，喜出望外。会议决定放弃在广州开会的主张，推汪精卫、李济深二人为代表赴上海，与蒋介

石接洽。会议并议决三条作为谈判基础：一、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03]。同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现在本人对蒋同志非常原谅，本人深悔当日之过举。但本人勇于改过，以后仍当与蒋同志益加团结。"[104]汪精卫忽而反蒋，忽而联蒋，毫无政治原则可言。

汪精卫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加快了驱逐李、黄的步伐。张发奎建议，召开有李济深、黄绍竑参加的会议，将其逮捕。汪精卫不同意，自己设计了一个方案[105]。11月16日，汪精卫以赴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为名，挟李济深北上。同时，为了麻痹黄绍竑，张发奎声言决定出洋，离穗赴港[106]。李济深动身前，电召在广西的黄绍竑到粤，将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及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交黄代理。16日晚上，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的代表及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在葵园密议驱桂。17日晨，第四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师联合发动，将黄绍竑驻广州的桂军缴械，同时包围第七军驻粤办事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新编第四军军部，以及黄绍竑住宅，分别缴械，宣布全城戒严。广州街上遍贴"打倒侵略广东的黄绍竑"、"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打倒桂系"、"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黄绍竑因事先得知有变，化装潜逃香港。桂系部队匆忙向广西边境撤退。

事变当天，张发奎即由香港回广州坐镇指挥。在粤的汪派中委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李福林、潘云超等联名致电汪精卫，指责黄绍竑"企图延长非法特别委员会生命，阴阻第四次执监全体会议，擅调七军集中西北两江，又复挑拨粤中部队"等"罪行"[107]。18日，广州政治分会会议，增补张发奎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朱晖日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加派黄琪翔、朱晖日、范石生、方鼎英、陈济棠、冯肇铭为临时军委会委员，以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为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在李济深回粤前，由张发奎代理军委会主席职务。会议同时议决褫革黄绍竑军职，开除党

籍，通缉究办[108]。随后又任命顾孟馀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汪派完全控制了广东。

三　冯玉祥军与南京北伐军会师徐州

冯玉祥自陕西出兵进军河南后，收编了原直系吴佩孚属下的靳云鹗部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杂色武装，总兵力号称30万人。1927年6月12日，冯玉祥将豫、陕、甘三省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分别以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为总指挥。不久，又将河南的镇嵩军刘镇华部编为第八方面军，即以刘镇华为总指挥。以上各部，除冯玉祥的嫡系外，入豫后新收编的靳云鹗、樊钟秀等仍割据一地。靳原系吴佩孚部大将，投冯后不满于只得到河南郾城、漯河一带的小块地盘，暗中与孙传芳、张宗昌勾结，企图利用红枪会，寻机发难。8月中旬，宁方北伐失利，孙传芳反攻南京，靳云鹗以为时机已至，遂与孙传芳、张宗昌约定，于中秋节（9月10日）共同夹击冯军。商定：成功后，江苏、安徽归孙传芳，河北、山东归张宗昌，北京归张作霖，河南归靳云鹗[109]。此外，在冯玉祥的后方，还有陕军麻振武部和甘肃的张兆钾部等地方势力抗命骚扰。因而，冯玉祥不得不集中精力整顿内部。

7月中旬，冯玉祥命张维玺、刘汝明剿灭据守陕西大荔的陕军麻振武部。同月26日，张、刘所部攻克大荔，麻部被基本消灭。同时，冯玉祥又命宋哲元清剿流散于陕甘地区的张兆钾余部。宋采取奇兵追袭和不降则屠尽俘虏等手段，至10月间，基本上扫平了陕、甘两省抗命的地方势力。9月6日，冯玉祥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7日，冯玉祥指挥孙良诚、孙连仲、郑大章等部由南北两面夹击，相继克复许昌、临颍、郾城等地。靳云鹗只身北逃投靠张作霖，所部或降或俘。冯玉祥随即以孙连仲接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另以东路军为第九方面军，由鹿钟麟为总指挥。

尽管国民军内部和后方屡生变故，但与直鲁军的激战仍在继续进行。当时，南京政府正酝酿讨伐唐生智，无意大规模北进。冯玉祥便约阎锡山共同行动。双方代表往返磋商后决定：直隶境内以北各地区归晋军担任，山东方面及陇海、豫北等线归国民军担任；10月9日同时发动。

9月，奉军以主力进攻山西。27日，阎锡山命北路商震提前发动。为配合阎锡山，冯玉祥也提前动作。10月4日，冯玉祥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要求宁方在津浦线上的军队从速进兵，“以收夹击之效”(110)。同月9日，冯玉祥下达进攻令。然而，奉命由大名进攻德州的孙连仲部被奉军牵制在豫北，奉命由考城进攻济宁的刘镇华部内部不稳，未能及时发动，只有第一路军鹿钟麟部五万余人，准时在商丘以东的陇海线上投入战斗。

鹿钟麟部发起进攻时，褚玉璞已指挥10万直鲁军在其当面展开。10月11日，直鲁军依仗优势兵力和铁甲车掩护，沿陇海路向西反攻，一举突破冯部第一路军的阵地，随即向其右翼包抄。13日，鹿钟麟率部后撤至豫东归德。此时，冯部第二路军姜明玉、梅发魁、憨玉珍等部突然在豫东倒戈，擒获冯玉祥委派的第二路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将其送往济南，并联合直鲁军第十二军刘志陆等部，包围鹿钟麟部。鹿钟麟率部激战5天，才陆续突围，于19日撤至兰封附近。

直鲁军获胜后，张宗昌、褚玉璞等命令所部沿陇海路继续向开封进击，企图一举摧毁河南的国民军。冯玉祥急忙调集石友三、韩复榘等部，连同鹿钟麟部，共集中10万兵力，由自己亲自指挥，迎击直鲁军。冯玉祥鉴于敌军的优势在于有白俄军驾驶的铁甲车掩护，精锐也集中于铁路沿线，决定采取口袋战术，诱其深入，一举全歼。10月下旬，直鲁军沿陇海路节节西进，逼近开封。30日，冯军开始全线反击，主力向铁路沿线的直鲁军两侧出击，并以骑兵插入直鲁军后方截断其交通。直鲁军因战线拉长，缺少后备队伍，战斗精神又逊于冯玉祥军，在遭突袭后立即全线动摇，各部争相东撤。因后方铁路线已被

冯玉祥军截断，褚玉璞不得不丢弃铁甲车，率部徒步突围东逃。冯军乘胜追击，于11月6日进抵砀山，褚玉璞率败军退守徐州。冯军共俘虏直鲁军三万余人，缴获铁甲车五列。

冯玉祥在陇海路豫东段作战获胜后，何应钦所率南京北伐军仍停留在蚌埠，观望不前。徐州有直鲁军重兵据守，冯玉祥不愿单独进攻，于11月6日起，陆续将主力撤回豫东兰封一线，诱敌深入，力求在野战中消灭直鲁军。当时，阎锡山因受奉系大军压迫，已于10月18日退出石家庄，并于11月6日全线总退却，扼守井陉、怀来至雁门关一带要隘。11月13日，冯玉祥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请求抽调西征唐生智的部队北伐，以便合力猛进，解救阎锡山，同时迅调大军，打下山东，使南北革命势力得以“联络一气，长驱燕辽”[(111)]。随后，又分电何应钦、李宗仁，均无结果。冯玉祥仍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与直鲁军决战。

张宗昌在豫东战败后，于11月6日在济南杀死冯玉祥部将郑金声泄愤。随后，他见冯军突然后撤，误以为冯部可能有内乱，于是又从山东调集援军，会同后撤下来的原有各军，共12万人以上，统由褚玉璞指挥，再度向豫东进攻。直鲁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分三路并进，先锋于11月19日又推进到兰封、考城一线。然而直鲁军内部关系复杂，各部因前次受挫，大都心存观望，相互协同极差。冯玉祥根据直鲁军的弱点，决定各个击破。11月24日，冯军集中兵力，攻击进至考城一带的直鲁军主力刘志陆、潘鸿钧部，翌日即将其包围。因直鲁军其余各部不积极救援，战至11月26日，冯军就将被围的直鲁军大部消灭，击毙潘鸿钧，俘虏二万余人，只有少数人突围逃走。至此，直鲁军再度向东撤退，冯军乘胜以一部沿陇海路向东追击，以一部攻占鲁西南各县。

12月3日，冯军前锋进抵徐州西郊。张宗昌纠合直鲁军残部，连同由津浦路南段撤下来的孙传芳部，向徐州城西郊反攻。冯军与张、孙两军在徐州附近进行了反复争夺。何应钦自11月16日攻占蚌埠后，

即顿兵待机。孙传芳见徐州告急，慌忙于12月初自宿州一线沿津浦路北撤，宁方北伐军乘势北上。15日，宁方北伐军进抵徐州南郊，张宗昌、孙传芳为免遭两面夹击，于12月16日放弃徐州北撤。宁方北伐军率先进入徐州，与冯玉祥军会合。

冯玉祥部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争夺战，最终攻占徐州。在此期间，冯军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歼灭了直鲁军的大部精锐，使军阀张宗昌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打击，自此一蹶不振，从而为后来津浦路上的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　阎奉之战

阎锡山易帜后，仍与奉系张作霖信使往来，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6月14日，张作霖致电阎锡山，劝其表明态度，提出以奉、晋、宁三方出兵讨赤为妥协先决条件。接着，又派参谋处长于国翰到太原，劝阎与奉系合作。阎均婉言谢绝，声称他是坚决反共的，表示改易青天白日旗，不一定要与张作霖决裂。张作霖见劝说不成，又以安国军政府的副元帅职相诱。阎不为所动，反过来劝张作霖取消安国军，“与蒋介石携手，以三民主义为合作之标帜，共同反共”，抑制冯玉祥、唐生智势力的北进[(112)]。

8月中旬，孙传芳反攻徐州获胜。张作霖见形势有利，决定放弃与蒋介石、阎锡山言和的打算。同月21日，奉鲁军将领联名通电，威胁阎锡山卸下国民党旗帜，让出京汉线，以便奉军南下对冯玉祥作战。25日，张宗昌派李凤山到山西商谈，表示奉方可以承认晋方易帜，希望晋方撤防石家庄，允许奉鲁军自德州、保定等地通过，进攻河南的冯玉祥军。阎锡山表示让防一事可以办到，下令自石家庄撤防。同时，阎又向南京政府和冯玉祥求援。8月底，宁方龙潭大捷，冯玉祥也表示愿意配合阎锡山的行动。阎见加入国民党一方对自己有

利，奉军对晋军又疏于防备，遂准备在10月间对奉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占领京津地区，约冯玉祥届时一起发动。

9月27日，张作霖派参议于珍为检阅使到丰镇检阅军队。晋军第一军军长商震疑为奉军向晋北进攻，即拆毁京绥线柴沟堡附近一段铁路，切断京绥线，扣押于珍，收缴大同以西奉军的枪械。29日，阎锡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誓师讨奉。电文指责张作霖“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尊荣，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兹不得已，随诸同志之后，誓师讨伐”[113]。晋军随即兵分两路，右路由阎锡山亲自指挥，左路由商震指挥，分别由京汉、京绥路进攻。

奉军因事起仓猝，准备谋和。9月30日，张学良致电阎锡山，要求释放于珍，停止军事行动，将晋军撤回原地，修复拆毁路轨。阎承认两军冲突起于商震误解，但不肯接受奉方的全部要求。

阎奉之战发生后，张作霖急电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韩麟春、张宗昌等到京商议，决定讨伐阎锡山，10月2日，张作霖发表通电，指责阎锡山“被人利诱，甘为戎首”，一切均由阎一人负责。张保证：“但期歼厥渠魁，决不穷兵黩武。”[114] 奉方将领连续通宵会议后决定：一、津浦线由第一方面军扼要防守，暂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宗旨；二、第二、第七两个方面军依照原定步骤，努力向开封、郑州发展，以断冯、阎之联络；三、京汉线由张学良、韩麟春担任指挥，先取守势；四、京绥线由张作相、汤玉麟担任正副指挥，亦先取守势。4日，张作霖正式下讨伐令。随后，张作相赴京绥，张宗昌返济南，张学良、韩麟春赴保定，分别指挥战斗。张作霖并命吴俊陞为东三省边防总司令兼黑龙江督办，驻守奉天，代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权。奉军全部入关，参加对阎战斗。

战争初起，奉军因事出意外，兵力一时难以集中，慌忙全线收缩。至10月6日的一周内，晋军左路连克丰镇、柴沟堡、张家口，并以一部绕北京以北，出击古北口，威胁奉军后方京榆路；右路克正

定、石家庄，包围保定。阎锡山本人也赶到正定以北，督促右路军迅速攻下保定，争取尽早会师北京。为了配合阎锡山的进攻，冯玉祥于10月初将其主力分为三路，开始进攻徐州、济宁、大名地区的奉系直鲁军。南京政府也于10月4日正式下令讨伐奉系。

对于阎锡山的突袭，奉系极为恼怒。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阎通电，并于同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南北两路同晋军作战，以张作相为北路总司令，汤玉麟副之；以韩麟春为南路总司令，张学良副之。同时，又急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入关，使其在京汉、京绥两线兵力达到17万人。奉军依仗其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经集结整顿，便于10月7日开始反攻。晋军见突袭已不能奏效，南京政府和冯玉祥又都不发兵北上，便采取保全兵力的办法，迅速收缩。奉军随后追击，至10月17日为止，奉军夺回了正定、石家庄、宣化、张家口、柴沟堡等地。晋军基本上退至发起突袭前的原有阵地。

奉军当时进攻的重点是冯玉祥军，加上山西易守难攻，因此，决定适可而止。10月18日，张作霖下令称："阎锡山首难殃民，罪有攸归。倘有悔祸之诚，本大元帅亦不愿过为已甚。"(115) 奉军随即停止攻击，和晋军形成对峙。

自10月中旬以后，涿州攻守战成为晋奉两军作战的焦点。涿州地处北京、保定之间，控制京汉铁路，是一处军事重镇。阎锡山进攻石家庄的同时，将傅作义第四师8000人改为挺进军，命其经由人烟稀少的河北蔚县以东山区，星夜兼程，限期占领涿州，10月11日，傅部前锋便衣队抵达涿州城南。当时，正值驻防涿州的奉军换防，守备不严，傅部混入城内，突袭奉军。后续部队旋即开到。12日，晋军占领涿州。14日，傅作义率全师入据城内，依托高厚坚固的城墙，布置坚守。晋军袭占涿州，切断奉军南北交通，威胁其后方安全。因而，奉军势在必争。

自10月15日起，奉军集中兵力三万余人，在第八军军长万福麟指

挥下，连续两天，向涿州城垣发起猛烈冲击，均无成绩。自10月19日起，张学良亲自指挥奉军第八军、卫队旅和邹作华炮兵团，对涿州发起五次总攻。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奉军集团冲锋，晋军依托城墙，以步、机枪和手榴弹还击。奉军用铁斗车装炸药炸城墙，架云梯强行爬城，用坦克冲锋，在地下潜挖地道，在空中用飞机掷弹。这种攻城方法，当时被称为“上中下三层战争同时并进”，“实为旷古所未有”[(116)]。傅作义指挥晋军，沉着应战，采取许多反措施，保住了城墙，并击毁奉军参战六辆坦克中的三辆。晋军还在城中加修防御工事，防火防炮，自制地雷、炸药，加固守备，至10月30日，奉军不得不暂停地面进攻。

张作霖见涿州屡攻不克，严厉谴责万福麟等，并决定使用毒气。11月28日，奉军向涿州城内发射毒气弹五百余发，然后以步兵攻城。但奉军所用毒气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物资，效力不大，晋军又采取了防毒措施，因而未造成多大伤害。奉军攻城再次被打退。同时，奉军在城外挖掘的地道也被晋军发现，不得不自行炸毁。至12月初，奉军停止攻城，转入长期围困。

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极大地牵制了奉军，涿州守城战在战术、技术上的许多创新也引起关注。12月6日，南京政府致电傅作义嘉勉，电称：“该师长力撑大局，固守斯城”，“敌不得逞，民有所归，弥著功勋，实深喜慰。”[(117)] 然而，南京政府和阎锡山都无法给予傅作义以实际支援。

奉军的长期围困，使晋军和城内居民的处境日益恶化。奉军围攻涿州三个月，向城内发射炮弹7万发。“全城民房十之八九皆成灰烬”[(118)]。12月初，全城粮食基本耗尽。晋军和维持会将酒厂酿酒的红高粱取出，按城内6万居民人数分配；后来，又将酒糟分配给居民，每人一日只许领半斤。12月14日，妇孺数百人环跪于晋军第四师司令部外，乞求尽快结束战局。守城士兵由于缺粮，许多人也已浮肿，纷纷要求罢战。此时，北京派出的红十字会、山西同乡会的代表及傅作

义的故旧也到涿州调处。傅作义见外援无望，涿州又已失去战略作用，遂于12月30通电求和，宣布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119]。同日，奉军攻城主帅万福麟宣布停止攻城。1928年1月2日，张作霖派郭瀛洲为专使，进入涿州谈判。傅作义坚持军队出城，至多接受点验一次。奉方主张改编时解除武装，改编后再给械移防。由于互不妥协，双方未能达成协议。6日，傅作义只身出城，与万福麟相见，随即同赴保定见张学良，商定议和条款。1月13日，守城晋军全部撤离涿州。根据条款，出城晋军被编为第三十六师，规定该部作为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随后，张作霖将该部调往中苏边境满洲里一带，不久被遣散。傅作义被留置在保定。1928年4月，秘密逃往天津。

涿州之战，傅作义以不足8000之兵固守涿州孤城三个月，被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迹。傅作义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一　蒋汪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

蒋介石辞职下野后，在奉化的雪窦寺住了一段时间。表面上如闲云野鹤，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将手伸向各地，通过自己的原班人马直接、间接地操纵和影响时局。一位到过溪口的外国记者写道：“如果说蒋将军是在隐居，毋宁是一种神话。”[120]

为了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以便东山再起，蒋介石决定暂时置身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之外，出访日本。9月28日，蒋介石一行十人自上海启程。10月3日，蒋介石到神户，即与宋子文赴有马温泉见宋母，征求她对自己与宋美龄婚事的意见。宋母表示同意。据当事人回忆：蒋介石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对旅社老板娘说：“老

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121] 蒋宋联姻，是蒋介石这次日本之行的重要收获。

10月23日，蒋介石到达东京。同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称：“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122] 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田中表示：“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希望。为此，在国际关系允许的条件下，或在不牺牲日本利权等条件下，对您的事业，将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123] 蒋介石则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124] 田中听到蒋介石说到志在统一全国时，脸色为之一变，他建议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对于“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125]。蒋介石不想和田中辩论，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所以排日，是“因为日本帮助张作霖引起的”。田中则表示：“日本绝对没援助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资，就是替张作霖说话等也从未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对此，蒋介石含糊其辞地说：“如果日本支持他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运动当可绝迹”[126]。

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11月8日，蒋介石归国。10日，到达上海，加紧策划，为复出掌权多方活动。

蒋介石要重新上台，必须首先扳倒特别委员会。9月27日，由蒋介石亲信控制的江苏、浙江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联合通电，指责特委会“破坏党的系统，破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万难承认”[127]。同日，山东、奉天、直隶、绥远、吉林等省及北京特别市党部

等也发表宣言，否认特别委员会。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大会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赞成者与反对者当场发生冲突。赞成者指反对者为共产党，反对者指赞成者为西山会议派的走狗。黄杰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不应存在的理由。当日，市党部逮捕持反对意见的左元白、黄杰、曹明焕、逄化文四人。第二天，由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一哄而起，捣毁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将四人释放。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演说，大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台下随声呼和[128]。会后，由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前导，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进至秀山公园附近时，军警出面堵截，勒令解散[129]。谷正纲出面交涉时，军警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一布店学徒和一浴堂工人，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受重伤，五日后不治身亡；另打伤数十人。史称“一一二二惨案”[130]。

惨案发生后，置身幕后的蒋介石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谈话。蒋称：“此等举动，在革命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不特前所未有，且为革命历史之污点，只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命令军警开枪屠杀请愿之民众，万不料革命政府下之军人亦悍然为此惨案。倘不能将应负责者加以适当之惩戒，则革命政府与反革命军阀毫无区别。”[131] 11月25日，蒋介石在接见中央党务学校代表时更公然表示：“如办理不当，我来领导你们革命。”[132] 同时，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单位组织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王昆仑、谢持等为主使犯，潘宜之、居正、高方、张贞、沈竞、任西萍等为惨案凶手，要求国民政府严惩[133]。

西山会议派分子本与此案无涉，不愿背负恶名，邹鲁、谢持等一面发表声明，诬指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破坏行动，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真相，“拿办凶犯和煽动之人”。谭延闿深知此事内幕，对邹鲁等人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

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办必纠纷愈多。”[134]

在蒋介石的明暗操纵下，反对特委会的活动不断升级。

11月28日，中央党务学校党员学生抬着袁大煦的尸体和伤亡民众的血衣游行。并在特委会门前“陈尸请愿”。李烈钧被迫接见游行者，并向死者敬礼[135]。他对学生表示：“当严办凶手，以谢国人。”[136] 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并以“待罪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身份发表声明：“这惨案的负责者之罪，应十倍于‘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应百倍于‘五卅'惨案之英帝国主义者。”“负责究竟是谁，自然是政府，尤其是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员！我们三个人良心上决不愿有所推诿”[137]。这样一来，特委会组织的国民政府就完全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蒋介石在指使亲信制造事端的同时，又继续联合汪精卫派，以共同对付特委会。11月16日，蒋介石在上海市党员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因汪精卫力促，由日返沪，与汪合作不成问题[138]。18日，汪精卫到沪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争取蒋的支持。19日，汪对记者称：“商洽结果，颇为圆满，会议前途，可卜乐观。”[139]

汪精卫此次到沪，携带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等提案多条，本希望顺利实现汪蒋合作，推翻特委会，但风云突变，广州政变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内各派集矢的对象。李济深怒不可遏地发表谈话，声称粤变“纯系共产党阴谋”，指责顾孟馀、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发动叛变。同时，吴稚晖、张静江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李石曾、张继等人也蜂拥而起。吴稚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汪精卫“说话太甘，手段太辣”，声称汪精卫反对特委会是“借打破酱油小碟子，来做分家当的理由，只有乡下婆娘才开得出口的”[140]。西山会议派甚至发表通电，骂汪入粤为“重张艳帜于珠江”[141]。11月25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力辩广州事变“并无共产党关系”，声称对于特委会，“兄弟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

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不妨采用；否则，不能不出于激烈了”[142]。汪精卫的辩护，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召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执、监委员有谭延闿、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经亨颐、孙科、丁超五、伍朝枢、何应钦、褚民谊、周启刚、王乐平、李济深、王法勤、朱霁青、甘乃光、蒋介石、于右任、汪精卫、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吴铁城、缪斌、李宗仁、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张静江、邵力子、吴稚晖、潘云超33人，徐谦、白云梯因有共产党“嫌疑”被拒之会外。会议由蔡元培担任主席。一开始，蒋介石即联合汪精卫以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会议议决，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关系人员。在审判前，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十人即行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会议并命汪精卫、戴季陶、丁惟汾、伍朝枢、谭延闿起草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4日，开第二次预备会议。由汪精卫主席。首先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吴稚晖提出，汪精卫“曾参与特委会，不应反对”。汪答：“本人谅解特委会产生经过，但反对其代行中执会职权。”谭延闿提出特委会“时效已过”，可以取消。当日会议议决：一、特委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关于第四次会议地点，粤方委员赞同在南京，但须有保障；二、组织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三、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会上，宁方委员再次提出广州事变一案，但为蒋、汪所拒绝。会议决定粤案“于四次大会上解决”[143]。

预备会议上，蒋、汪两派一致行动，宁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打破这种局面，谭延闿、蔡元培、孙科、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李石曾十名宁方委员决定拒绝出席5日的预备会议，改在南园李济深寓所开谈话会，商讨应付汪蒋联盟办法。谈话

会决定集中全力对付汪精卫一派。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三人与共产党的关系。12月8日，开第三次预备会议。由蒋介石任主席。会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馀、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停止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144]。李济深也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145]。

宁方的提案刺中了汪精卫的痛处，汪精卫于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声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已被特委会取消，无权作出决议或提出议案。他表示：对吴稚晖等人的提案，将“置之不理”[146]。两方态度激昂，引起激烈争吵。在乱哄哄的局面中，蒋介石以调人身份出现，他在《致中执监委员诸同志书》中称：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南京特委会与粤变等纠纷均可迎刃而解。他提出：“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惟一忏悔之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147]蒋介石这番貌似不偏不倚的意见，增加了汪精卫等人幻想。12月10日，在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何香凝、王法勤等11名粤方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提案声称：“如此则应付时局，负责有人，而关于根本方法，亦得于会议中从容讨论，期于至当。”汪精卫个人并附带声明：如此案实现，“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的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148]。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会议通过。会上，蒋介石并提出对俄绝交案。他认为：“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必须加以封闭；待“革命成功”后，再设法恢复邦交。会议作为一项秘密议案加以通过[149]。会议随即议决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党务、军事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预备会议至此结束。

提出请蒋复职，是汪精卫玩弄的一个“拥蒋自救”的小花招。对此，李宗仁看得很清楚。他后来说：“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振党权。”[150] 然而汪精卫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后，他的处境就更为狼狈了。

二　中共广州起义与汪派的挫败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又在广州领导了一次重大的武装起义，即广州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两广、闽南等地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于8月11日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同时，决定以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月20日，张太雷向广东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筹备暴动。9月1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倡议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政治的尸首”，决定在以后组织群众革命斗争时，不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同时决定，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要在广州、长沙等地成立苏维埃[151]。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改由张太雷任书记。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失败的教训。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每个地主（包括小地主）的土地都必须没收。改用红旗。名不虚传地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152]。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提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称号，改称工农革命军，“尽死力鼓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以之充军饷及救济贫苦工农”[153]。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诺伊曼（Heinz Neumann）[154] 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南方局委员，周恩

来、张太雷、黄平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22日，张太雷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广州暴动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张太雷的计划仍偏重于军事，未能以农民作为暴动主力，决定另作计划。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撤销南方局。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等决议案，认为当时正处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无间断革命”，“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要求在各地城乡鼓动革命，“造成总暴动的局面”，“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决议案》并称：“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会议并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没收地主的土地，耕地农有，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等口号[155]。会后，张太雷即留在上海，参加研究广州起义计划。

“四一二”政变后，广东海丰、陆丰两县农民曾在中共领导下三次起义。11月13日、18日，在彭湃主持下，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通过没收土地，杀尽反动派，改良工人、士兵生活等议案。海陆丰起义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等行动，成为广州起义的先声。

广州起义是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时爆发的。11月17日，在汪精卫、张发奎等人支持下，由黄琪翔出面，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同日，黄绍竑经香港逃回广西，在梧州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广州，粤桂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散驻广东各地的李济深所部也准备会同桂军进攻，广州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当时，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向各地调兵遣将，准备迎战，广州城内只留有五个团，约五千人的兵力，力量非常空虚。

广州事变的同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认为广东政局的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工农群众利用政变，“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156]。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发动广州暴动，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担任委员，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

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度重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发动和组织工作。该团一度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中共在该部队中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组织，是一支可信赖的武装力量。对新编第四军警卫团，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做了许多工作。此外，还成立了领导广州工人赤卫队的五人委员会，由周文雍担任总指挥，受其领导的广州工人赤卫总队共三千余人。

筹备起义过程中，国际代表诺伊曼主张通过黄琪翔与张发奎对话；张发奎为抗击李济深、黄绍竑，也希望与共产党协商，怎样“共同保卫广州”。他并要求会见中共“最高负责同志”[157]。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公开提出六项条件，要求先予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立刻武装广州工人”等[158]。其间，恽代英曾在黄琪翔宅与张发奎见面，但未能谈出结果[159]。

12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下达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动员”，“准备暴动”。7日，张太雷主持召开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名单，决定在12月13日举行起义，接着广东省委也召开会议，讨论苏维埃政纲、宣言以及行动部署。

在上海的汪精卫时刻注意广州动态，于12月初派陈璧君回广州调

查。同月9日，汪精卫致电陈公博、张发奎等，声称“黄琪翔兄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令黄退休。又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要求“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160]。10日，张发奎下令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搜捕共产党人。前敌总指挥黄琪翔连夜从粤桂前线赶回广州，商议镇压计划。同日，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米店被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形势变得十分紧急。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已，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凌晨。

10日晚11时，叶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等人来到教导团驻地，召开誓师大会。张太雷作动员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3时半，教导团开始进攻广州各重要军政据点。警卫团的部分官兵及工人赤卫队也同时行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在黎明前，位于珠江北岸的广州市区大部分为起义军所控制。11日上午6时，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苏兆征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在上海，由张太雷代），其他成员包括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等。

苏维埃政府甫告成立，便发表宣言和政纲，宣布“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要求“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消灭一切债务”。苏维埃政府并号召广东农民即刻暴动，“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与富农”[161]。

起义后，广州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起义军虽然占领了珠江以北的大部分市区，但珠江以南仍控制在李福林的第五军手里，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逃入李的辖区。起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奏效。12日凌

晨，李福林所部分两路渡过珠江，攻击江北起义部队。各国驻粤领事会议决定，调英军2000人、法军400人、日军300人防守沙面，并派遣军舰掩护国民党军过江。同时，从粤桂战争前线调回的国民党军队也纷纷赶到，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广州。当天中午，国民党军猛烈进攻位于市区北面，由起义军占领的制高点——观音山，双方激烈争夺，阵地几度易手。起义军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国民党军并曾一度迫近指挥部，叶挺、叶剑英沉着应战，指挥教导团和工人反击，转危为安。午后，张太雷乘车赴大北门指挥战斗，遭伏击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主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叶挺和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了不利形势，决定撤出广州，以保存有生力量。由于当时广州处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下，通讯工作难以保持正常，大部分起义部队在得到撤退命令后离开了阵地，但仍有一些分散作战的赤卫队员及小股部队没有接到通知，未能及时撤退。

13日凌晨，国民党军集结近五万兵力围攻广州。9时许，观音山阵地失守，国民党军冲入市区。下午，各路国民党军向广州苏维埃政府总部合围进攻。下午3时许，广州重新落入张发奎手中。张随即进行大规模屠杀。从13日至19日，广州共有五千余人遭到杀害，其中有参加起义的朝鲜革命者一百余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А．И．Фасис）在幕后指挥起义，被捕杀；领事馆被查抄。另有越南革命者24人被捕[(162)]。

同日，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等急电汪精卫、蒋介石等，宣称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要求“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163)]。次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撤销对驻各省苏联领事的承认，勒令在华苏俄商业机关停止营业。

起义失败后，从广州撤出来的部分起义队伍，约1200人集中到花县，经过短时间休整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赴东江，同海

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汇合。撤出广州的另一部分队伍约一百多人，退往广西左右江一带，继续进行斗争。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由于众寡悬殊，政策过“左”，起义未能取得成功。当时，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要占领作为统治中心的大城市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广州起义在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触发了国民党内的又一次权力斗争。李济深及桂系势力抓住这一事件，联合其他反汪力量，乘机向汪精卫发难，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并称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13日，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等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张发奎“正和共产党作殊死战”，“那些以勾结共产党诬张发奎等并以诬我们的是绝对的不确”[(164)]。但这并不能平息事端。14日，浙江省党部致电蔡元培，声称汪精卫的逆迹已彰明昭著，要求不准其参加四中全会。同日，旅宁粤人召开“讨共救粤”大会，要求缉办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张发奎、黄琪翔等人。15日，上海总商会发表宣言，谴责汪精卫指使张发奎、黄琪翔“盲目内讧”，“致共产党得一绝好之机会”，以至“酝成此次之巨变”[(165)]。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等粤方中委。查办令称：“汪精卫、顾孟馀、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公博、何香凝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预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本政府为整饬纪纲维护治安起见，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复。在查办期间，汪等居住所在，应责成军警注意，监视其行动。”[(166)] 当夜，汪精卫秘密登轮，离沪赴港，偕同黄琪翔赴欧。临行前，通电声称不再参与政治。

汪精卫、黄琪翔被逼出国后，广东内部两派势力开始火并。李济深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及在桂的第十五军等，分路向广州出击。12月20日，李济深系统的粤军首领在汕头开会，议决在汕头设立大本营，由陈铭枢任总指挥，向张发奎部发动攻击。21日，南京政府通过决议，授予李济深返粤整顿粤局的全

权。李济深旋即回到广东，亲自指挥对张发奎部的攻击。张发奎等见势不妙，离开广州，让第四军军长缪培南指挥作战。缪培南决定率部离开广州，向东北方向撤退。结果，与李济深部在五华、岐岭一带相遇，展开激战。第四军虽号称铁军，但自江西返粤以来长期行军作战，士气低落，在李部与桂军的联合攻击下，连遭失败，被迫放弃抵抗。李济深及粤桂势力又重新控制了广东。

三　蒋介石复职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宁粤相争，结果两败俱伤：先是西山会议派分子声名狼藉，特别委员会被宣布取消；继而汪精卫逃亡，汪派中委溃不成军。12月31日，邓泽如、古应芬将查办汪精卫等九人的结果报到南京政府，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独参与逆谋，实为发纵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要求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蒋介石故意拖延处理，以袒护汪派。这样一来，激怒了胡汉民。他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决定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与孙科、伍朝枢二人以赴各国考察政治、经济为名，离开上海远游。

只有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顿失重心，各派系长期纷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得不单独对奉系张作霖作战。蒋介石自日本归国后，冯玉祥即频频致电蒋介石，拥蒋复出。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电蒋称：“为今之计，惟盼吾兄东山即起，主持一切，使各方军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167)] 12月2日，冯又致电阎锡山，约其一致拥蒋。阎锡山在奉系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难于支持，赞同冯的意见。12月11日，冯、阎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复出主持军政。电称：“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负弩前驱，愿听指挥。”[(168)] 20日，蒋介石嫡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会同徐州前线各将领也联名通电，吁请蒋介石“以党国为重，总领师干”[(169)]。26

日，上海市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发表宣言及通电，表示“竭诚拥护蒋氏复职”。在一片拥戴声中，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濬、陈立夫等人由沪赴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1月6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南京特委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出席的有陈树人、丁超五、白云梯、朱霁青、朱培德、王乐平、何香凝、经亨颐、黄实、谭延闿、于右任、褚民谊，陈肇英、宋子文、王法勤、缪斌、丁惟汾、何应钦、蒋介石、李烈钧、周启刚、柏文蔚、戴季陶等中央委员23人，列席会议的有潘云超、张静江、蔡元培、李宗仁、邵力子、郭春涛、李石曾、陈果夫等人。蒋介石在开会词中称：二届四中全会是“本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和方法”，“务要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遗害中国。”(170) 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为会议定下基调。

从2月2日至7日，会议历时六天，共通过有关党务、政府和军队组织等各方面议案二十多项。主要内容如下：

（一）整理党务。《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在登记期间停止征求党员；各省及等于省之党部，由中央指派七至九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党务整理及登记等事宜，并代行该地执行委员职权；党员曾经加入本党以外之政治团体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各委员依次递补案》决定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和已故朱季恂、李大钊等人的党籍和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徐谦的职务，保留党籍；候补中委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邓演达及已故的路友于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陈其瑗停止职务。中央

监察委员高语罕、候补中央委员江浩开除党籍，邓懋修、谢晋停止职务。以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绍竑为候补监察委员。大会还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规定“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171]。《审查宁汉两方决议案》规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应一律无效”[172]。《整饬党纪之方法案》规定：凡属本党党员，无论何人，必须绝对遵守党纪；违反党纪者，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处分；凡属党员非经中央党部之许可，无论党内党外，不得自行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凡属党员不得有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各级党部不得违犯党纲、党章之决议；凡属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下级党部必须绝对执行上级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各地政府与党部有冲突时，须分别呈明各上级机关，共同处理；凡党员绝对不准以个人名义代替党发表宣言[173]。

（二）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会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顾孟馀、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甘乃光、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刘守中、萧佛成、孙科、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缪斌、吴铁城、陈肇英为候补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黄绍竑为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推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改组中央党部案》决定：取消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部；以戴季陶等九人为委员，李石曾、经亨颐、朱霁青、何香凝、陈果夫为常委。《政治委员会改组案》规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可以继续存在，各分会“专理政

治，不兼管党务”；广东、广西属广州分会；湖南、湖北属武汉分会；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其他省份，“概由中央政治会议处理”[174]。

（三）改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五人至七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七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五院一局三会。会议推选丁惟汾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主席。

会议还通过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委员人选案》、《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席人选案》等决议案。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选举于右任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阎锡山、谭延闿等12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为主席。

（四）准备继续北伐。会议宣言称：“军阀之命运多一日苟延，即统一的大计迟一日实现，而民众实际之痛苦稽一日解除。”因此，“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于右任向大会提出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提议由“大会决议，下令全军，责成各总司令、各总指挥，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肃清残余军阀，布告人民息兵”。提案由会议通过，并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统筹全局，从速遵办”[175]。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彻底推翻了国民党“一大”、“二大”和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各项政策，自此，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会上唯一的胜家。不仅“四一二”政变以来的各种行径得到肯定，而且将政敌一一剪除。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进一步实行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

四　蒋介石整顿内部

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准备继续北伐，但当时的国民党派系林立，两湖、两广的内讧尚未结束，后方还很不巩固。因此，蒋介石复职后即集中精力，整顿内部。

蒋介石的第一步棋是剥夺何应钦的军事实权。何应钦统率的第一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总指挥何应钦与蒋介石若即若离，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为了切实控制嫡系部队，蒋介石于1928年2月9日偕总参议何成濬悄悄前往徐州，采用汉高祖“入壁夺符”的办法，下令撤销何应钦的职务，并下令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卫队。此时，何应钦在外打猎未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后，蒋介石电召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的妻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何应钦的亲信）及贺耀组、陈调元等到徐州开会。蒋对李仲公称，他之所以撤销何应钦的职务，一是因为何与白崇禧联合逼蒋下野，二是何迟迟不发拥戴电，支持蒋介石复职；三是桂系在外散布蒋介石已不能指挥黄埔系的言论。蒋称：“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176) 蒋介石说这番话，是希望通过李仲公向何应钦提出警告，不许在嫡系中另立山头。蒋介石先发制人，何应钦只得表示服从。

2月11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声称第一路军辖十余军之多，战线绵亘数百里，运输联络均感不便。请蒋介石改订第一路军编制，并就近指挥，自己则专力于后方事务。蒋介石接电后，即于2月13日下

令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三个纵队。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编为第一纵队，以刘峙为总指挥；第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编为第二纵队，以陈调元为总指挥；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三军、第四十军编为第三纵队，以贺耀组为总指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兼，参谋长由原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王绳祖升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77)]。通过改编，何应钦的实权均被剥夺。何认为面子丢尽，即称病告假两个月，避居上海。蒋介石却又安抚他："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178)]在蒋介石的安抚和各方劝说下，何应钦于3月7日宣布就任总参谋长职。

蒋介石的第二步棋是进一步拉拢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实力集团。在整顿第一路军的同时，蒋介石电邀冯、阎到徐州参加军事会议。由于冯、阎只派代表出席，蒋介石只好移樽就教，前往开封与冯玉祥相会。2月16日，蒋介石、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在开封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三集团军。会议并商定以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路作战，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担任京汉、京绥路作战[(179)]。2月16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蒋、冯商定的北伐计划。阎并表示，一俟津浦、京汉线发动，山西方面即"同时由京绥、紫荆关、京汉路三路反攻"[(180)]。17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到郑州检阅部队。18日，蒋、冯互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181)]。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帖子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帖子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182)]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29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三步棋是整顿两湖。桂系联合程潜西征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旧部退往湖南，但仍保留第四集团军的名义。1927年11月21

日，李品仙、刘兴、何键等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在长沙开会，决定：一、暂时保境休养，听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二、在长沙设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以李品仙、刘兴、何键、周斓等七人为办事委员；三、第八军驻湘中，第三十五军驻湘西，第三十六军驻湘南；四、推张开琏为代理财政厅长，月筹军费70万，并设财务委员会，推周斓等21人为委员[183]。会后，即以第四集团军名义扩充第十二、第十七两军，分别以叶琪、周斓为军长。总兵力达到12万人左右。

对于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蒋桂两派都想收为己用。桂系的白崇禧见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遂向李宗仁建议，“确切控制两湖（湖南、湖北），以便紧靠两广后方，把两广两湖打成一片”[184]。1927年11月25日，李宗仁派李品仙之弟李品芗偕袁家谱赴长沙，与李品仙、何键、刘兴等接洽和平改编。主要条件是：一、取消第四集团军名义，仍存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军；二、通电服从中央；三、承认程潜率第六军，任省政府主席，并于三个军中抽调两个军北伐[185]。这时，正在酝酿复职的蒋介石也有意将唐部拉过来，以牵制桂系势力的扩张。蒋介石密遣使者前往湖南，向唐部许诺湖南省长由唐生智部将中推举，不派兵入湘；唐部改编为四个军，军饷由中央政府接济。两相比较，唐部将领决定拒绝桂系的和平改编要求。1928年1月2日，唐部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静候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186]。

桂系见和平改编不成，决心武力解决，以除肘腋之患[187]。在李宗仁、程潜等人的催促下，南京政府于1928年元旦起实行征湘动员，并以白崇禧为征湘总指挥，到武汉统一指挥。1月15日，征湘军分东、西、南三路向湖南展开全面进攻。东路由白崇禧指挥，率第七军、第十九军、第六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四军等进攻平江、岳州；西路由鲁涤平的第二军和李燊的第四十三军组成，进攻津市、醴州；南路由朱培德指挥，率第三军和第九军进攻株洲。1月17日，征湘军占领岳阳。18日，程潜由武汉赶到岳阳，召集第六军、第四十四军各

将领开会，会后即饬令向汨罗追击。19日，第十七军占领平江，唐部退往汨罗江以南。正当征湘军乘胜向南追击时，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倒戈反桂，在岳阳地区与湘军李品仙等部配合，猛攻程潜第六军侧面，第六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白崇禧一面调兵围攻叶开鑫部，一面命令桂军主力第七、第十九军猛攻长沙，以切断唐部后路。21日拂晓，第七、第十九军渡过汨罗河，与李品仙部在江边激战，大败李品仙部。第七军乘胜追击。25日，征湘军占领长沙，湘军残部分向株洲、衡阳逃遁。至此，唐部已失去抵抗能力，被迫接受改编。3月11日，程潜、白崇禧将唐军残部改编为第八、第十二、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四个军，以李品仙为十二路总指挥，节制第八、第十二、第三十六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而以第三十五军何键部留驻湖南。刘兴则由程潜委为高等顾问，令其出洋。同日，程潜、白崇禧等湘桂将领联衔通电，宣告“两湖军事已告结束”[188]。

征湘军事结束后，南京政府准备重建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以统辖两湖。在人选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最初决定以谭延闿充任，以此作为蒋介石、白崇禧、程潜之间的“缓冲”[189]。但谭延闿在两湖只有鲁涤平一军，难以驾驭拥有雄厚兵力的桂系和湘系的程潜，而且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极力反对。2月25日，蒋介石约李石曾、谭延闿会商两湖军事及党务。28日，由谭延闿、李烈钧出面，宣称：湖南军事结束，已无成立第四集团军的必要。两湖参加北伐部队，由李宗仁担任总指挥，隶属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下[190]。同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赴武汉，收束两湖军事，筹备北伐[191]。李宗仁在动身赴汉前，与蒋介石会晤，达成以下妥协条件：一、粤省政府担负北伐军费一部分；二、桂派与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三、蒋与汪精卫在政治上脱离关系。可以保持汪之体面，但不予汪以政治权力；四、蒋系军队不侵入桂系势力范围[192]。蒋介石并接受李济深的建议，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与蒋介石妥协后，即于3月28日偕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抵达汉口，29日转赴长沙，与程潜、白崇禧接洽。

4月2日，李宗仁、陈铭枢、程潜、白崇禧等在长沙开会，商定两湖军队组成五个纵队，由李宗仁率部北伐，白崇禧留守武汉，程潜坐镇长沙。4月6日，白崇禧托陈铭枢带亲笔信交李济深，请其转呈蒋介石。除叙述湘鄂近况外，白崇禧表示“服从命令，一致北伐”[193]。在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保证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于4月8日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北伐需要巨大的军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月收入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却需要1100万至1600万元，因此，不得不依靠发行国库券过日子。1927年5月，发行第一次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次二五附税国库券2400万元。1928年1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财政部长。上任第一天，在张嘉璈宅宴请上海银行家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人，计划发行第三次二五附税国库券1600万元。11日，有关条例出笼，但推销成绩并不理想。2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声称“中正受命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无论如何困难，务希办到，以应急需”[194]。在此前后，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偕中国、交通两行行长到南京商量推销国库券一事。张此前已多次提供财力支持，深知此事难办，态度消极。3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沪召开会议，指责张嘉璈“阻挠北伐”，“勾结桂系、奉系”，张静江并提出，要接管中国银行。蒋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及纸烟捐国库券各1400万，当场通令中国银行月垫五六百万元[195]。6日，张嘉璈召集中国银行在沪董、监事会议，一致认为：“一旦决裂，金融风潮即起。”会后，张嘉璈决定垫款600万元，分三个月交清[196]。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帮助，蒋介石再次度过了财政难关。

在整理军事、筹措军费的同时，蒋介石又力图掌握国民党中央党务大权。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执行委

员会政治会议及政治分会两项暂行条例。《政治会议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一切法律问题、重要政务均须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分会条例》规定：“政治分会依照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于其特定地域内，指导并监督最高级地方政府，但不兼管党务。政治分会于不抵触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范围以内，得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未经明白或详细规定之事项，为因时制宜之处分。”[197]

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山西政治分会主席。至此，蒋介石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且又安抚了地方实力派，在蒋、冯、阎及二李之间保持一种权力均势。13日，国民政府又特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改任参谋次长。在李济深未到任以前，由何应钦代理。1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北进战区内的民众、财政、外交、司法、交通等事项，由蒋介石亲信蒋作宾任主席。至此，北伐的组织准备大体就绪。

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4月1日，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等四篇文告。在《告前方将士书》中，蒋介石要求前方将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自动归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6日，蒋介石又将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纵队改为军团，仍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总指挥，并改冯玉祥部第十一路军为第四军团，以方振武任总指挥[198]。合计第一集团军18个军2个独立师，约29万人；第二集团军25个军，约31万人；第三集团军作战部队11个军，约15万人；第四集团军作战部队16个军，9个独立师，约24万人

左右[199]。

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200]。随即下总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由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

五　奉军反攻与国民党军合力北进

正当宁方筹谋北伐之际，奉系也在力谋对策。

当时，奉系安国军在军力和财力上已明显弱于南京方面的联合力量。据报告数字，安国军总兵力为60万人，共编为七个方面军，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陞、褚玉璞为军团长。其中张宗昌、褚玉璞的第二、第七方面军团系原来的直鲁军，大多由土匪编成，军纪废弛，且在陇海路上与冯玉祥部作战中受到巨大损失，因而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第五、第六方面军团张作相、吴俊陞所部因编组不久，装备和训练也较差。只有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和张学良、杨宇霆指挥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团军事素质稍好。然而孙传芳部在龙潭战役中损失大半，虽经大力募兵，张作霖也拨款支援，但尚未恢复元气。安国军方面的财源也极其困难，山东、河北两省频经战乱和奉鲁军的搜括，经济已接近破产的地步。东三省的财力也明显不如国民党各派控制区。在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面前，奉系立即陷入难以招架的窘境。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1928年2月，奉系将领在北京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各个击破，对京汉、津浦路取守势，对山西取攻势。3月底，奉系发现各路国民党军的总攻在即，又决定由张学良指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沿正太路和京汉路展开攻势，以求首先打败阎锡山和冯玉祥，再集中力量打败蒋介石。奉系的这种战略安排便利了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的推进，结果，正太、京汉两线相持不下，在津浦路线的安国军即已崩溃，奉系不得不全面败退。

山西战线：奉军分三路进攻晋军。3月底，张学良、杨宇霆亲到邯郸，与戢翼翘、于学忠等会商。4月1日，奉军主力第三、第四方面军一部在河北平山、获鹿一线开始进攻。主要目标是夺取晋东门户、正太铁路上的要隘娘子关，在晋北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安国军张作相部则采取牵制性的攻击行动。4月5日，奉军占领井陉，向晋边推进。双方在井陉以西的雪花山展开血战。雪花山为由井陉进入山西的孔道，形势险要，晋军在此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据险扼守。战事发动后，奉军军长荣臻、胡毓坤亲自督师，企图一举攻下雪花山阵地。晋军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多次打退奉军进攻。激战至4月底，奉军在娘子关、井陉这一主攻方向只有微小进展，在晋北方向也未能打破相峙局面。奉系首先击败阎锡山部的计划未能实现。4月19日，阎锡山离开太原赴娘子关前线指挥，晋军转守为攻，冲出娘子关，进取石家庄。

豫北战线：4月5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主力在豫北进攻冯玉祥部。奉军攻击的重点是京汉路上的重镇彰德，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属的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部依托彰德附近的既设阵地实行防御。张学良亲临前线指挥进攻，奉军的炮兵主力和航空兵也投入了彰德前线。尽管奉军在火力上占优势，但冯部作战意志比较顽强。双方在彰德城下反复争夺。冯玉祥多次致电李宗仁，请求支援。李宗仁派叶琪率部到河南漯河，接替韩复榘军防务。韩复榘军则星夜北调，于4月16日集中到彰德以南，参加鏖战。直至4月28日，奉军一直未能突破这一线阵地。

进攻彰德的同时，安国军第七方面军褚玉璞部又于4月9日进攻直隶大名的冯军刘镇华部。褚玉璞部虽军事素质较差，但刘镇华部归附冯玉祥后一直心怀贰志，不愿为冯玉祥卖命。在褚玉璞部的攻击下，刘镇华军连续后撤。冯玉祥不得不命第二方面军孙连仲部增援。4月22日，褚玉璞部攻占豫北南乐，对孙连仲部阵地造成威胁。同日，上一年归附冯玉祥的豫军樊钟秀部二万余人在洛阳以东叛变，截断陇海

路，与在陕西叛冯的李云龙相呼应。冯玉祥急调石友三、宋哲元两部夹击，又吁请李宗仁调兵由京汉路北上增援。

在将近一个月的争夺战中，安国军损耗很大，山东方面蒋介石的部队又已推进到济南一线，威胁豫北奉军的侧翼，因此，张作霖不得不于4月28日下令停止对豫北的进攻。冯玉祥乘机展开反攻，奉军全线溃退。5日，冯军收复大名。

山东战线：张宗昌部几经打击，实力大减，由原来的49万人缩减到6万人左右。孙传芳部经整训扩充，也只有三万余人，而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则达二十多万人之众，并有航空兵掩护，兵力、装备都处于绝对优势。4月7日，宁方北伐军开始总攻后，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刘峙部向兖州推进，第二军团陈调元部由郯城一线向临沂推进，第三军团贺耀组部和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在微山湖以西向济宁推进。同时，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也由菏泽向济宁推进。4月8日，张宗昌离开济南，到韩庄督师。10日，第一军团第九军顾祝同部等占领台儿庄。12日，包围临城。同日晚，张宗昌下令全军撤退。4月14日，顾祝同部占领临城。16日，进攻界河。张宗昌曾耗资50万，费时半载，聘请德国人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的防线。18日，第一军团第一军占领界河。

在张宗昌部一触即溃之际，孙传芳部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微山湖以西的宁方北伐军，然后侧击徐州。4月12日，贺耀组的第三军团在鲁西南推进至鱼台一线时，突遭孙传芳部反攻。第三军团内的第二十七军夏斗寅部和第三十三军张克瑶部均系归附宁方不久的杂色武装，战斗力很差，一遭孙军反击，即慌乱不堪地后撤，贺耀组自身指挥的第四十军陷入包围，只得乘夜突围。4月14日，孙传芳部占领丰县，并以一部骑兵突袭沛县，威胁第一集团军的后方基地徐州。

蒋介石在徐州得知丰县失守，急电冯玉祥，调石友三部自兰封由陇海路东进，反攻丰县，又调其嫡系第一军由临城前线撤回徐州，会

同贺耀组的第三军团各部阻止孙传芳部继续前进。在孙传芳部向南攻击时，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也在鲁西南向济宁进攻，于4月15日攻占巨野，孙传芳的主力李宝章部全军覆灭。次日，包围济宁。孙传芳见济宁告急，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急率5个师北撤。4月17日，石友三部东进占领丰县，第一集团军西翼出现的危险至此方告消除。孙传芳部北撤后，于4月17日反攻济宁，与孙良诚部展开激战。孙良诚部诱敌深入，同时以骑兵袭击孙军后方，于4月19日占领兖州。与此同时，方振武的第四军团、贺耀组的第三军团也北上参加进攻，孙传芳军在济宁附近陷入包围圈。4月20日，孙军向北突围。由于转战多日，极端疲惫，又遭到北伐军各路的围攻和截击，孙军在突围中大部溃散，被俘甚众。4月21日，孙良诚部占领济宁，孙传芳率残军向泰安、济南退却。

宁方北伐军在鲁西南的战斗是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东进部队为主体完成的。此役粉碎了孙传芳的安国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从而为第一集团军向北推进扫除了最大障碍。此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未遇激烈抵抗，即顺利地沿津浦路向济南推进。在临沂方向作战的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均系归附不久的杂色武装，斗志不强。4月中旬，在临沂城下和张宗昌部形成对峙。鲁西南会战结束后，该军团才以一部穿越沂蒙山区，向莱芜方向推进，于4月22日占领蒙阴。25日，进占莱芜。张宗昌部未经抵抗便纷纷北逃。

4月23日，蒋介石抵达兖州，决定乘孙传芳主力被歼、张宗昌部已趋崩溃之际，迅速北上，占领济南。24日，第一军团刘峙部沿津浦路向北攻击前进，当面的安国军稍予抵抗，即纷纷北逃。27日，蒋介石自徐州前往兰封会晤冯玉祥，会商进攻济南战略。28日，第一军团进占泰安。30日，由济宁方向北进的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占领长清，逼近济南；由莱芜方向北进的第二军团陈调元部也切断济南以东的胶济路。孙传芳、张宗昌见局势已不可挽回，决定北撤德州。5月1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放弃济南，向黄河以北撤退，并炸断黄河上的津浦

路铁桥。同日，宁方第一集团军的第一、第四军团各以一部进占济南。

5月2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济南，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

六　济南惨案

当蒋介石统军进入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侵略者却于此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打乱了南京方面北伐的部署。

蒋介石1927年访日，本意在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与田中义一会晤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201] 但是，蒋介石上台后，仍然硬着头皮推行亲日外交路线。2月8日，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外交部长。3月6日，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应邀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发表谈话称："我敢断言日本国民对于北伐，不特不加阻害，必更进而望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更确信日本政府今后亦必不为损人不利己之举。"[202] 4月2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表《告友邦人士书》，保证"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203]。18日，南京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量避免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兵干涉的可能。

日本政府不理睬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善意表示。4月16日，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日本政府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204] 17日，田中义一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商定出兵山东。次日，召开内阁会议，议决：一、由天津派步兵三中队至济南，由国内派兵至青岛；二、海军须于青岛等地严

为警备，并须火速派军队保护胶济铁路；三、即刻发表出兵声明[205]。19日，即由首相田中奏请天皇批准。同日，田中训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转告蒋介石，要北伐军绕避济南。声称："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206] 20日，日本正式发布出兵山东声明书，诡称"在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复濒于重大危险"，帝国政府"不得不取自卫的措置"[207]。21日，日本从天津派出的三个中队首先到达济南。随后，由日本熊本开来的第六师团在福田彦助中将率领下也陆续在青岛登陆，向济南推进。福田到青岛后，即发表声明，蛮横地表示："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208]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面抗议，一面交涉。4月21日，黄郛照会日本政府，指责其将"公法条约蹂躏殆尽"，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山东派兵[209]。30日，蒋介石派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名义赴日，企图劝阻日本出兵。同时，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要求将日军由济南移驻青岛，由蒋介石担任所需军费[210]。对此，日方均置之不理。自5月1日起，日军陆续开进济南，在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5月3日上午8时，驻济南代理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拜会蒋介石，假惺惺地称赞革命军军纪很好，很守秩序，并诈称已派到济南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所以，他和宪兵司令特地前来辞行[211]。在日方的蒙骗下，蒋介石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上午9时，贺耀组第四十军一名患病士兵在送往医院途中，为日军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发生争执。日军当即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士兵和夫役各一名，并包围医院。此处枪声一响，驻济南各处的日军乘机制造流血事件。驻在牌税局的一个营，被日军包围，勒令缴械，全营均被俘虏。日军"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212]。

蒋介石仍然不准备抵抗。5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

圣贤所戒。”[213]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在城外的中国部队于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214]。同时，急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日方态度异常傲慢，毫无诚意，强迫黄郛在日方提出的文件上签字，承认济南冲突是因中国人抢日本人的东西引起的。这一无理要求为黄郛拒绝，日军就将黄郛扣留18个小时。3日晚9时，日军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搜查，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公署人员一一捆绑起来。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自己的身份，并对日军无礼行为表示抗议。疯狂的日军竟割去他的耳鼻、挖掉他的舌头和眼睛，然后枪杀。其他人员，除两人逃脱外，也全部遇难[215]。接着，日军又闯到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部长黄郛事先避去，日军遂焚烧了办公处。

5月4日凌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三点无理要求：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津浦两路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华里以外。熊式辉不敢签字，以“事关重大”，“须向总司令请示”为由返回。下午，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并请示应付方针。同时，由黄郛再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射击，并立即撤退驻兵，一切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216]。在英、美两国驻济领事出面调停后，日军稍有收敛，济南形势“渐趋和缓”[217]。日军师团长福田并派高级参谋到北伐军司令部见蒋介石，声称“昨天的事情，是他们部下冲突，他们误会了”，表示以后可以设法调解。蒋介石赞成“不使冲突扩大”，希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投掷炸弹[218]。但到晚上，日军又由青岛派兵增援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及居民，并将中国驻济警备军一千余人悉数缴械拘禁。贺耀组部死伤近六百人。

当晚，蒋介石在济南召集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

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议，决定为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5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一、令各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并令湘鄂加派主干军队兼程北上；二、济案令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严重交涉；三、切实宣传，唤起军民团结及奋斗[219]。会后，电复蒋介石，我方应特别“持重”。

6日晨，蒋介石、朱培德、杨杰、熊式辉等离开济南，退驻近郊党家庄。济南城内仅留第一军第一师李延年部及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团邓殷藩部，约三千人，作为卫戍部队。蒋介石致函福田称，中国军队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城内仅留相当部队，维持秩序，希望日军立即停止“一切特殊行动”[220]。

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5月6日，日军第三十六旅团由青岛调至济南，第二十八旅团和海军一部调至青岛。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向第六师团发出电令，要其切莫“使当前的猎物中国军队逃掉”[221]。7日，福田向部队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下午3时，福田提出五项条件，限蒋介石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刑。二、对抗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出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以上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当晚8时，蒋介石在泰安拟定六项对案：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但当时日本军队有同样行动者，亦应按律处分。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三、胶济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铁道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

序。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应派相当武装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222]。8日凌晨，熊式辉与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携蒋介石答复条件赶往济南，与福田交涉。同时，蒋介石以贺耀组“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免去其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委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毛炳文代第四十军军长。蒋介石的上述对案与做法，已经作了巨大让步，熊式辉与福田又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福田态度傲慢，言语横蛮，“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223]，声称已经逾期，拒不讨论蒋介石所提对案。福田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224]

同日凌晨4时，日方不待答复，再次用大炮猛轰济南。6时20分，东京电令福田，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的行动”。7时，福田即以最后通牒限期已过，未获答复为借口，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守军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同日，日军占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向党家庄攻击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平民。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攻击在该站休整的第三军第八师。9日，日本第十一旅团长斋藤浏率所部进攻济南西城门，与李延年部激战。同日，蒋介石再派何成濬与福田交涉，告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业经免职，同意济南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福田坚持蒋介石必须完全接受他提出的五项条件，并须于日军之前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10日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行让步”，全部退出济南。李延年、邓殷藩等部遂于11日晨突围出城，在城外，又遭日军伏击，死伤数百人，未及退出者，悉被日军屠杀。

济南陷落后，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升挂太阳旗，并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据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225]。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提出四项对日主张：一、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二、请中央先与日断绝国交。三、致电蒋总司令，与日本严重交涉，不作丝毫让步。四、对日经济绝交。同日，南京各机关团体代表在金陵大学集会，宣布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请求中央组织青年救国军、电请蒋总司令驱逐日军出境等多项议案。抗议运动迅速从上海、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千方百计压制和防范民众运动。5月6日，蒋介石通令称：济案应“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他要求各地随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勿以一朝一忿，而乱大谋”[226]。5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也通电称：“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希图煽动，利用罢课、罢工及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要求各界“恪守纪律，各安职业”，“听候中央处理”[227]。

从惨案一开始，蒋介石就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5月7日，蒋介石电令张群迅速晤见田中首相，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8日，张群拜会田中，田中称：不袒护奉方；北伐将完成时，当相助统一中国；不妨害北伐进行。但他又表示：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由福田负责；其他交涉，统由双方外交当局办理[228]。蒋介石得到张群传达的信息后，非常高兴，于10日致电黄郛表示，如日方能“不妨碍我津浦路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他并称：“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229] 随后，蒋介石又致黄郛一电，要黄以自己的名义转告日方，不要用他的名义。

蒋介石也曾寄希望于英美。5月9日，他致电李济深，要他派人赴

港，以“优先经济利益”为条件，与英方共筹制止日本侵略的策略[230]。但英美都明确表示了不介入的态度。蒋介石无奈，只好仍命黄郛交涉，声称如惩办高级长官以贺耀组部为限，解散军队亦以贺部为度，“则解散军队亦可允许，甚至中正道歉亦所不辞”[231]。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日本军方之所以一再刁难，目的是给蒋以下马威，好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5月17日，黄郛致电东京特派员殷汝耕，要他和田中义一商量，免除蒋“现处地位之困难”，不伤蒋“对国内之威严”[232]。但日本政府则竭力维护军方，声称“总须顾及福田面子”[233]。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安国军政府递交备忘录。内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故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之处置。”[234]同时，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又将日本政府对备忘录的说明书出示黄郛，询问南北和平谈判有无可能，如不能，则对奉系采取下列办法：1．不战而退，准予出关，但不许南【军】追；2．战败而退，须先向日军缴械，始能出关，然仍不许南追；3．张（作霖）出，不准再进。一切说明，日本侵略者准备动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进入东北。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日方备忘录后，于5月20日召开外交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黄郛等出席，会议决定：一、同意日方要求，由前方速派代表办理临时协定。二、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避免冲突，引以为歉为辞。三、简单答复日方，大意为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口头表示，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235]。会后，黄郛拟偕张静江赴前线与蒋介石商量。

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5

月19日，蒋介石到郑州会晤冯玉祥，对冯称："膺白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236] 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要求他"暂辞"外交部长。不久，改以王正廷接任。

"济案"交涉成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与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签署《济案协定》。中国方面既没有追究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责任，也没有提出赔偿、道歉等任何要求，反而说济案使"中日两国俱复损害"。协定声称："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课军事行动的责任。"在南京政府保证保护日侨的前提下，日本允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日军。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所蒙受的巨大牺牲，就这样被南京政府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第四节　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一　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

奉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争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又不愿完全听其摆布，双方在勾结、利用中潜存着矛盾。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日趋强硬，对奉系的需索增多，压力加强，同时，奉系内部的不满与民族主义情绪也有所增长，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发展。

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首相立即将对华强硬方针付诸实施。1927年7月20日，田中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命他以坚决态度，迫使"东三省方面深思反省"，以便阻止奉方"违反条约"的"非法措施"，进而谋取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237]。吉田茂接到训令，立即以奉天省长莫德惠为谈判对手，展开了一连串的强硬外交攻势。

7月23日，吉田向莫德惠递交备忘录，抗议东北当局的"非法措施"：一、自行集资修筑海吉线（海龙至吉林）、打通线（打虎山至通辽）铁路。这些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将严重损害日本在东北的经

济权益。二、临江地方官宪与各界民众坚决抗拒日本在该地设立领事馆；三、东北海关效法南方国民政府，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四、禁止销售日本人出版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在会晤时，吉田严斥莫德惠“毫无承担责任的诚意”，蛮横地要求他“作深刻反省”[238]。25日，莫德惠回访吉田茂，吉田限定奉方于四五日之内作出书面答复，并威胁说，如果奉方置之不理，“帝国政府将不得已采取适当措施”[239]。莫德惠对吉田的危言恫吓非常反感，没有按期给予答复，并拒绝了日方再次会晤的要求。8月4日，吉田向奉天当局送交强硬通告，声称日本将立即“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240]。与此同时，驻朝鲜日军应吉田的请求，在临江对岸的中江镇举行军事演习，对奉方实行武力威胁。

吉田茂的强硬交涉，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民族主义倾向的敌视加剧，其咄咄逼人的态势，更超越了国际间正常的外交常规。这种赤裸裸的高压殖民政策，立刻激起了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反日运动的高涨，抗议电报犹如纷飞的雪片[241]。不仅如此，以亲日著称的奉系首领们，对日方的强硬威逼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7月29日，张作霖召见日本驻华武官本庄繁，警告说，如果日方强行在临江设立领事馆，将遭到中国民众的暴力反抗[242]。8月6日，本庄拜访杨宇霆时，声称“由于满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日方对张作霖的诚意加深了怀疑”。杨宇霆毫不示弱，再次指责吉田的强硬交涉。他明确表示：“因为你方威胁，要阻止京奉线的军用列车通行，我方将单独修建铁路。”[243]四天之后，杨宇霆接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义贵，逐条驳复吉田的“抗议”照会。第一，吉林省政府1926年即自行筹款修建吉海铁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理事松冈洋右已放弃权利，现在日方又提出异议，令人奇怪。第二，南方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早已开征“二五附税”，为什么日方执意反对北方征收？第三，《盛京时报》屡次公开指名抨击张作霖，张本人可以不予追究，但奉天地方当局则要求彻底加以取缔。第四，日方

未能提出充分理由说服奉天地方当局，却企图单方强行开设临江领事分馆，以致出现中日双方激烈对峙的局势[244]。同时，张作霖、杨宇霆也不断暗示对方，如果日方能放弃这种威逼强索的高压政策，中方愿意同日本谋求权益上的妥协。

奉系这套软硬兼施的战术果然生效。芳泽公使、堀义贵代理公使、本庄武官都纷纷上书政府，反对吉田交涉。就连素来强硬的关东军司令部也认为，吉田采取这种强硬策略为时尚早[245]。日方旅顺会议决定，约束盛气凌人的吉田，日奉谈判改在北京，由芳泽向张作霖、杨宇霆进行交涉[246]。8月下旬，芳泽返京后，立即会见张作霖、杨宇霆，要求逐项解决日方的议案。奉方以推诿拖延战术相抗。张作霖把谈判的责任推给杨宇霆，杨宇霆则表示交涉的地点应在奉天[247]。

就在杨宇霆巧言搪塞之际，各大报刊不断披露日本企图强行扩大满蒙侵略特权的种种消息。在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东三省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这次波及东北各地的反日运动，起源于拒绝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的斗争。自1923年起，日方即向奉方交涉，企图在临江县设立领事分馆，但屡遭拒绝。1927年7月下旬，日方通告临江县公署，将“采取武装”强设分馆[248]。临江人民闻讯，聚众上万，要求政府誓死抵抗，表示愿“拼十万头颅，一腔热血，与彼野蛮日人周旋于鸭绿江边”[249]。在民众的推动下，县知事袁葆真命令所属警甲严阵以待。

临江官民拒日设领的斗争得到奉天朝野各界的有力支持，省政府认为，日方“竟拟率兵入临，强设领馆”，“殊属恃强无理”，决定一面饬令县知事“妥为阻止”，一面急电北京外交部，向日使严重交涉[250]。同时，省议会以“部分同仁”的名义，于8月2日发起组织东三省外交后援会。同月10日，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后援会正式成立。该会进一步要求“撤废二十一条”，“撤废领事裁判权”，“反对东方会议议

决事项及田中内阁之满蒙积极政策”[251]。9月4日，奉天各界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同日，吉林省各界民众团体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成立“吉林国民外交后援会”，决心以“数千万之铁血头颅”，“为最后拼抵之利器”[252]。此后，反日运动迅速在东北各地发展。

东北地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震动了日本官府。9月7日，芳泽公使奉田中首相命令，向张作霖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彻底“取缔”。张作霖担心运动失控，危及现存的统治秩序，于是，立即电令奉天省长莫德惠，设法阻止定于10日举行的反日示威大游行[253]。训令称：“如文武官吏奉行不力，滋生意外枝节，惟各该长官是问！”[254]莫德惠立即遵令严行禁止商民游行，并传知各报馆，限制登载“激烈标语”[255]。杨宇霆并亲自回奉，督察政情。于是，发起反日风潮的中枢奉天省总商会日趋软化，东三省的民众运动渐次低落。

奉方一面严厉收敛民众运动，一面加紧修筑铁路。

奉方自行集资修建铁路，始于1924年。当时，东北爱国官绅和民族工商界要求强烈自办铁路。同年5月，张作霖宣布，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省长联袂出台主持，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256]。交通委员会为抵制日本借修建铁路扩张侵略势力的企图，拟订了以民族资本自建东北铁路网的规划。1925年，奉天聚集地方官商资本，率先破土，修筑奉海路（奉天至海龙），并以京奉路的盈余，铺设打通支线。接着，黑龙江、吉林两省乘势跟进，分别募集资本，相继兴建呼海（呼兰至海伦）、吉海两线。东北当局首期目标是，将三省省会连为一气，进而逐渐伸展，东西平行，南北相接，构成与南满铁路相抗衡的独立的交通网络[257]。

奉方自建铁路，将对日本以南满铁路为核心的殖民资本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一开始便遭到日方的百般阻挠。除呼海线，日方企图借此向中俄共辖的中东路地区渗透势力，给予暗中支持外，奉海线、打通线、吉海线均举步艰难。日方或借端刁难，或表示“断难默认”，

不许奉方“擅自”修建[258]。东方会议后，日方抗议的调子再次升级，竟以严词威吓，勒令奉方立即停工。

东北地方当局面对日方的阻挠刁难，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推搪，一面采取速战速决的施工方针，以既成事实堵塞日方抗议之口。奉海路凿山架桥，日夜兼程，于1927年8月提前竣工通车。其后，奉方集中全力突击修筑打通路。此路“与南满铁路平行直下，有互相争雄之势”[259]，被日方视为眼中钉。奉方置日方的激烈抗议于不顾，日夜抢修，于10月全线告竣。不久，与京奉（北京至奉天）、四洮（四平街至洮南）、奉海、吉海等线相继实行联运。

东北地方自建铁路网的伸展使日奉经济权益的对峙日渐尖锐，政治关系也随之恶化。

9月21日、24日，日本政府在田中官邸召集有关军政要员会议，决定要求张作霖、杨宇霆为反日运动向田中首相表示歉意，趁机重开“满蒙交涉”。会议认为：二五附加税、临江设领等非重要议案，可以“采取互让的态度”，对“东三省方面热望修筑的铁路”，也应酌情“容许”，但应力争全部承认东方会议所决定的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260]。

根据这个方案，田中义一命令回任的本庄武官向张作霖传递口信，“中国方面对我方简直是采取了欺人太甚的态度”。他危言告诫张作霖：“此次运动给东三省播下祸种，如不及早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剿灭，恢复当地治安，结果必然导致南方以及俄国方面对阁下问鼎轻重。”[261]田中的危言恫吓迅速产生成效。张作霖以未能制止反日运动为名，撤换奉天省长莫德惠，调其进京改任农工总长[262]。其后，又命杨宇霆为代表，正式向日方道歉。

为了进一步打开和奉系谈判的僵局，田中一面训令驻华公使芳泽在北京进行官方交涉，一面委派满铁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为私人

代表，与张作霖展开“民间”交涉。

山本于10月10日抵达北京，直接与张作霖举行秘密会谈。事前，他曾命助手町野武马（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江藤丰二（中日实业公司常务理事）多次与奉方要员接触。江藤奉命向张作霖透露，交涉成功可先预支300万至500万元[263]。这笔丰厚的现洋对为筹措军费殚思竭虑的张作霖，产生了相当的诱惑力。在日方的频繁敦促下，张作霖表示可以进行铁路方案的“协商”[264]。

11日至13日，山本接连三次秘密会见张作霖，要求修建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洮南至索伦、吉林至五常、延吉至海林、齐齐哈尔至黑河、新丘运煤线等七条铁路。张作霖表示；齐齐哈尔至黑河一线，“因情况不明，容调查后再议”；新丘运煤线，因奉方已铺设轻便线，“故难予同意”；对其它五线同意修筑[265]。接着，双方进一步商议“满蒙新五路协约”的大纲。双方议定：一、委托满铁承建这五条铁路；二、日方同意中方修筑吉林至海龙、打虎山至通辽两线，将来与满铁路实行联运；三、五路的总建筑费预定为一亿四千八百万元，日方同意新路获利前，延期支付利息；四、日本委派工程师、会计，并监督营业；五、“协约”签字后，立即商订各条铁路的承办合同[266]。双方最后相约“绝对严守秘密”。在此期间，山本与杨宇霆就利率问题举行会谈。由于杨宇霆斤斤计较，“交涉颇费周折”[267]。大纲确定后，山本即回国复命。

14日，町野、江藤两人携带“协约”文件，“直接要求张作霖签署”。在场的杨宇霆对文件条款多所指责，声称“此事非大元帅所能专断”[268]，迫使满铁代表同意删除在新路干线上“开设商埠”与“营业监督”两项。次日，张作霖在文件抄本上亲书“阅”字，作为“同意之证据”[269]。

张作霖对“协约”的签署表明，久拖不决的“满蒙铁路交涉”似乎有了重大进展。日方获准修筑的五条铁路，均具有重大军事、经济价

值，尤其是敦图路。该路系吉会线（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建成后，以朝鲜的罗津港作为出口港，将大大加快东北物产输向日本的速度，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多年宿愿。

日本发动的“满蒙铁路交涉”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就奉方而言，除了巨额金钱的诱惑外，还有其他因素。其一，交涉以私人密谈方式进行，万一将来时局对奉方不利，可以借口无官方法律程序，推翻“协约”。其二，山本在索要铁路修筑权时，曾提议缔结日奉经济合作及满蒙治安协约，类似于军事经济同盟。因此，奉方当即欣然赞同，并立即与日方正式换文。

尽管张作霖已经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然而田中义一对此仍忧心忡忡。田中认为，张作霖缺乏“诚意”，“签有‘阅'字的协约，亦系无充分诚意的文件”[270]。他指令芳泽公使，要他迫使张作霖向日本公使送交“请求谅解”的交换函件[271]，以期将山本与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协约”，改换为政府之间的正式协定。芳泽公使对山本越权订约甚为不满。他竭力支持田中的主张，再三向奉方施加外交压力。

日方不放心张作霖的承诺是有原因的。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崛起，争霸称雄，常常需要借助日本的强大实力。然而，他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求索，又深感头痛。于是，便采用了一套随机应变的江湖战术。“如果认为有利用日本的必要时，即不惜任何牺牲，允许日人所提条件。迨事过境迁，感到对他不利时，则又坚不承认或借故拖延，不肯履行诺言”[272]。日方有鉴于此，便步步紧逼，力图彻底落实“协约”。

正当日奉双方为交涉程序唇枪舌战之际，又传来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美国摩根公司准备向满铁贷款3000万美元。“这笔贷款将由日本政府担保”，用以“开发满洲”[273]。这一消息震动了中国朝野内外，谴责抗议之声此起彼伏。北京政府外交部连续致电驻美公使施肇基，命他向美国政府表示异议，告诫对方这笔贷款“不啻助长日本侵

我满洲，且将引起华人对美恶感”[274]，与此同时，张作霖又派遣私人特使两次拜访美驻华代办麦耶，表示“极为欢迎美国资本在满洲寻求适当投资”，并愿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但奉方声称：如果“美国政府赞成直接贷款资助日本政府开发满洲”，“这只能有助于日本控制满洲”，“对弱小的奋力挣扎的民族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如果这项贷款被通过”，奉方将与美国“一刀两断”[275]。

随着满铁将获得美国巨额贷款的消息越传越盛，奉方的抗议也由私下交涉转为公开指责。11月29日，杨宇霆接见外国记者时，一面矢口否认张作霖曾与山本议定“满蒙铁路协约”，一面对美国向满铁贷款，表示“大为愤懑”[276]。同时，南方各界也群起反对。1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致电美国国务卿，反对美国向满铁贷款[277]。

南北两大政治集团的抗议使美国政府感到，如果它批准该项贷款，将会产生“助纣为虐，帮助日本侵略南满，剥削中国”的恶劣政治影响[278]。美国金融界人士也纷纷表示，支付这项“显然使远东政治复杂化”的贷款是不明智的[279]。向满铁贷款3000万美元的意向书终于被搁置。

奉系的公开谴责使日方大为恼火。11月29日晚，芳泽刚一获悉杨宇霆接见美、英记者的谈话内容，“立即以私函向杨发出攻击性质问”[280]。对此，奉方也不示弱。次日，张作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本庄时，对日方的质询表示“大为激愤”[281]。同时，张作霖指责日方泄露与山本谈判的内容，使“本人处境极为困难”。他说：“南方对本人不断发动攻击”，“社会舆论风传本人已成为日本的傀儡，东三省已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样，实使本人处于自取灭亡地步”。在此时刻，日方坚持要求履行与公使交换函件的手续，这无异于为“宣传提供材料”[282]。他表示：“如定必索取”，“除通过外交部别无它途”[283]。

张作霖将皮球踢向没有实权的外交部。日方无奈，决定作些枝节

性让步。田中电训芳泽公使，同意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函田中外相。12月5日晚，张作霖命人向日方送交了一封措词含混的短函，作为“诚意”的表示[284]。

张作霖究竟有几分“诚意”，在进一步的谈判中便表现了出来。1928年初，山本条太郎携带合同草案抵京，要求立即签订“满蒙五路”的承建合同。1月9日，双方开始具体磋商。

张作霖率先提出谈判前提条件：“政治上要取得联系”；谈判“要严守秘密”；交涉不要五路并举，先从一二条线“逐步着手”[285]。接着，他又要求日方立即兑现“预付款”。对于前提条件，日方口头上表示赞同；对于预付款，日方明确答复，非办完备案手续难以应允[286]。

与此同时，张作霖指定其心腹重臣张作相为奉方全权代表。2月7日，江藤与张作相举行会晤。张作相表示，修建铁路，“事关重大，须待战争结束，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后，才能签字”。日方要求先选定谈判代表，“研究合同”。张作相当即回答“碍难应允”[287]。江藤与本庄请张作霖干预。张作相又生出一条对策，推说遴选代表，“必须召请代理省长、交涉署长钟毓前来，但钟氏正在守丧，非到下月上旬不能来京”[288]。日方无奈，只好三天两头催请钟毓来京，张作相却抛下日方代表，径自“前往战地”。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不但钟毓未能到京参加谈判，吉林方面又推出一位反对派、吉林督办参谋长熙洽。于是，日方代表又请张作霖劝说熙洽。直到4月底，钟毓仍不见踪影。张作霖又提出，请江藤去吉林交涉。吉林是当时反对签订《满蒙铁路承建合同》的中心。因此，山本电告江藤：“请设法务必在北京签字。”[289] 这样一来，地点又成为谈判的首要议题。

至此，日奉签约谈判已拖延四个月之久，毫无进展。日方代表天

天“陷于张作霖制造的麻烦与纠葛之中”。同年5月3日，侵华日军悍然动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方乘机秘密警告张作霖，如能迅速签订满蒙铁路合同，将有助于奉系摆脱困境。张作霖再次燃起依靠日本实力度过危机的欲望，同意立即解决铁路签约问题。

尽管张作霖已经满口承诺，但奉系内部的反对派依然异常坚决。5月6日，姗姗来迟的钟毓会见江藤，声明：“我尚未经张作相授与正式签字的资格。因此，虽有大帅命令，也不能签字。”江藤见钟毓如此强硬，便向张作霖提出更换谈判对手，改由代理交通总长常荫槐签字。不料常闻讯后表示，“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290)]。为达到迅速签约的目的，日方再次要求重择签约代表。双方议定，由国务院总理潘复出面签署。潘复虽愿意从命，但表示无法取得常荫槐手中的交通部部印，只能用私章。签约的难题最后集中在如何完备法律程序。

日方再次施加压力。山本命江藤转告张作霖，“假如目前不能尽快签字，对大元帅恐将成为值得忧虑的事情”[(291)]。5月13日，满蒙铁路合同签订仪式终于举行。由于交通总长常荫槐避走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张作霖只得命航政司长赵镇以交通次长兼代部务的身份在敦图、长大两路合同上签字用印[(292)]。张作霖自己在洮索、延海两路合同上亲笔书写了“阅，准行”等字样，并许诺吉五路（吉林至五常）合同“保留到罢免张作相之后签字”[(293)]。

满蒙五路承造合同虽然签署了四项，但在法律程序上都存在疵病，敦图、长大两项合同虽有官方正式手续，但签署人赵镇在合同签字后第二天才被任命为代理次长，获得兼管部务的法律资格。洮索、延海两项合同，依然是以张作霖私人名义签署。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合同的落款处，竟没有写上日期和姓名[(294)]。日方代表只能在事后补填上日期及“张大元帅阁下”字样。显然，奉方故意疏漏，以留下日后悔约的口实。

与此同时，奉方要人又开始秘密策动反日运动。张作相与钟毓密电吉林省议会，希望各界立即联名通电反对签约。抗议电报应声飞向北京。电文尖锐指出："将铁路建设权给与外人，将留下大患。"[295]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也在密谋举行联合抗议活动。

日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触发。

二　奉军北撤与皇姑屯事件

南京北伐军进入山东后，进展顺利。5月初，张宗昌自济南仓皇出逃，鲁军向山东北端的德州溃退。张作霖眼看着津浦线上的败局即将危及京津地区，下令收缩防线。京汉线上的奉军主力第三、第四军团放弃彰德、邯郸，退守保定。京绥线上张作相统率的吉军放弃大同、张家口，撤至怀来，以期与鲁军共同构成拱卫京津的外围屏障。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民族义愤。上海、北京的工商团体纷纷致电张作霖，吁请"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296]。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王士珍等，以及以陈箓为首的北洋政府驻外公使们，也都通电呼吁"息争御侮"。同时，奉系内部也发生变化。

5月5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会见安国军政府军事部次长于国翰，要求奉军不得反攻济南，此事激起了常荫槐的愤慨。同日，常致电在石家庄的张学良和杨宇霆，内称："似此无理干涉，既对南军宣战，又来北方牵制。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他要求张、杨二人电请张作霖通电表示，"速息内争，一致对外"[297]。6日，张、杨回电，对济南事件表示愤慨，声称"弟等虽属军人，究亦同为国民，爱国之心岂敢后人；且事关国家荣辱，讵容漠视不问！"但二人表示，身为统兵大员，不宜轻易表态。张、杨要求常荫槐相机向张作霖"陈明"。二人并提出，通电"既须表同情于国人，又

须获好感于友邦”，“万勿昌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298]。7日，常荫槐再次致电张、杨，要求二人回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299]。5月9日，孙传芳在天津致电国务总理潘复称：“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他表示不能再负责前线军事：“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300]潘复随即向张作霖报告，劝张顺应潮流，停战言和。同日，张作霖接受常、张、杨等人意见，通电宣称：“特将彰德、正太战胜之兵停止攻击，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断不作无谓之坚持。公是公非，听诸舆论。”通电特别提出，要“慎重外交”[301]。12日，奉系首领通过北洋外交名流顾维钧，请美、英等国驻华公使出面，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响应”张作霖的停战通电[302]。16日，又派直隶省省长孙世伟赴南方商谈。

张作霖通电言和，主要是为了保持华北残局，但是，日本政府却企图乘机迫使奉系退出关外。

自二次北伐战事再起，田中内阁即决定乘机进一步向张作霖逼索满蒙特权，同时强迫奉军出关，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乘胜推进，扩展至东北地区。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决定“绝对阻止南军进入关外”，至于奉军，如能主动“向关外撤退”，则“不必解除其武装”[303]。17日，芳泽公使奉田中首相之命，深夜向张作霖递交备忘录。同时，芳泽并以“个人名义”再三劝告奉军立即自动撤回东北[304]。对此，张作霖十分愤懑地说：“若非本人在京坐镇，恐北京且沦于赤化。今日本乃与南方唱同调，欲迫本人失败，殊不合理。”[305]他向芳泽表示，奉军将固守现在的防线，进行自卫对抗[306]。双方各持己见，至凌晨时不欢而散。

为了确保在东北的既得权益，日本军方迅速做好了行动准备。5月17日，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刚一收到备忘录，就立即以解除南北两军的武装为目标，策划军事部署，准备明令关东军出兵锦州，并将

司令部由大连迁往奉天。村冈并致电参谋本部称："当前如不动兵，则将失掉时机，有使帝国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之虞。"[307] 但是，当时关东军司令的权力仅限于在"满铁"附属地内调动日军，村冈计划中的行动必须得到天皇的"敕命"。20日，铃木庄六参谋总长会见田中首相后，电告关东军，"敕命"预定于21日下达[308]。村冈随即命令关东军主力迅速向奉天集结待命，并率司令部全班人马迁入奉天。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中将也积极策动列强，赞同日方关于将防区由租界扩展至京津、京奉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的议案[309]。

然而，侵华日军焦急等候的"敕命"并没有下达。由于中国南北两方和国际舆论的反对，田中义一对于立即大规模地动用武力是否适宜，一直犹豫不决。

日方备忘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方，郑重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310] 同日，又以政府名义发表对外宣言，指责日方违反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完整等原则[311]。29日，南京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内称：日方备忘录"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312]。同日，指令上海交涉员向矢田口头声明："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举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313]

美英等列强也不愿日本独吞中国东北。在日方备忘录发表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就电示驻华公使，美国将不参加日本政府为向东北扩展而策动的"联合行动"[314]。他并公开向新闻界重申："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315] 5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的提案向芳泽提出质询[316]。次日，美、法、英等国公使分别指令本国驻军司令，反对日本"扩大防区"的议案。24日，各国驻军司令联席会议以超越自卫为由，一致否决了日方的提案。

显然，列强不愿让日本在侵华的角逐中，强恃武力独占鳌头。各种不祥的信息不断反馈到田中首相的办公桌上。他一面电令驻美大使亲赴国务院疏解，声称日本绝无独吞东北的野心[317]；一面再三拖延下达出兵的“敕命”。31日，田中决定搁置军方请命出兵的议案。

日方悍然出兵的方案虽然被搁置，但是，奉系也已无力继续对南方作战。在日本武力恫吓和北伐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奉系内部主张谈和撤军的新派势力终于占了上风。

当时，在奉系将领中，极力主战的是其旁系鲁军首领张宗昌。他为了夺回失去的地盘，不惜引狼入室。5月17日，他接见日本记者时公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京、津。他甚至表示，反对张作霖的息争通电，决心拼命再打，把南军赶到黄河以南[318]。第三、第四军团长张学良和杨宇霆则主张有条件地言和撤兵。二人对建川美次说：“冯、阎两军业已进逼，此时奉军若退，彼方必尾蹑而至，危险至极。”“若日本能与南方交涉，保证不追，则奉方甚愿退兵。”[319] 他们一面与南方使者秘密接触，一面轮番向张作霖进言。张学良称：“民族自相残杀无意义，我们可回东北。”[320] 杨宇霆称：“张宗昌、褚玉璞不可靠，一旦他们切断京奉路，回东北就困难了。”[321] 其间，奉方与晋方代表孔繁蔚已开始谈判，进展迅速。

终于，一直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的张作霖作出最后抉择。5月30日，安国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潘复等军政要人出席。会上，张作霖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与列强公使话别。2日，通电宣布：“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322] 它实际上宣告了奉系对北洋中央政权控制的结束。

6月3日，一再延期的张作霖专列从北京发出。4日凌晨5时23分，专列行至沈阳近郊皇姑屯时，突然一声巨响，黑烟飞腾，张作霖

所乘铁甲车被炸毁，同车的黑龙江督办吴俊陞登时气绝身亡。张作霖身受重伤，奄奄待毙，被扶入汽车送回帅府，数小时之后，不治身死[323]。

炸车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勘察”现场，声称发现“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书信残片及炸弹。6月12日，日本政府陆军省发表公报，断言皇姑屯炸车案的制造者“为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324]。

然而，流逝的岁月终于冲散了阴谋者施放的烟幕。二十多年之后，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供认：“我杀死了张作霖。”[325]

当时，田中义一主张，“继续与张作霖合作”，“行使武力为威胁”，迫使其完全傀儡化[326]。而有些军政要人，特别是关东军将领，则主张乘机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327]，河本大作就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人。他提出：“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328]

策划暗杀张作霖的不只河本一人，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均曾参与其事。这件谋杀案的另一个主要策动人是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村冈对一再拖延下达出兵“敕命”非常不满。他最初计划假手天津驻屯军在北京杀害张作霖，密遣竹下义晴潜往北京，与日本驻华武官建川取得联系。竹下临行前，在河本的追问下，向其泄露了村冈的密令。河本表示，执行谋杀计划由他一手承担，要竹下负责侦察张作霖的行踪，及时密报[329]。这样，关东军内部酝酿的两个谋杀计划，最后合二为一了。

河本周密布置了整个谋杀方案。6月4日，河本亲临现场监控。事后，日军按预定方案，迅速伪造了现场。由亲手按动爆破电钮的东宫铁男大尉发表“目击谈”，指控国民革命军为炸车案主谋。

皇姑屯炸车案是河本阴谋计划的第一步。他的整体方案是：“先杀掉张作霖，再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最后出动

关东军。”[330] 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案件[331]。政治流言伴着炸弹声四起。一时间，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制造傀儡政权之说“甚嚣尘上”[332]。与此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当时报刊尖锐地评论说：“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333]

面对险情四伏的危局，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表。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334]。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335]。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336]。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发丧。

与此同时，为稳定局势，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并要求日方严格取缔浪人扰乱社会治安。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国民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337]。

奉天当局的镇静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扩张阴谋。6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否决白川陆相要求授权关东军出兵的议案。其理由为，根据东北政府现状，没有必要使用武力[338]。

这样，谋杀张作霖，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借机出兵，实现侵占东北的全盘计划，仅仅开了个头，便中断了。

三　北伐军进入京津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一、第二集团军在山东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国军。5月9日，

阎锡山统率的第三集团军东进占领石家庄、正定。11日，冯玉祥统率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也北上抵达石家庄，两军会师。5月13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声称“今日唯一方略在速占北京”，要求阎督率所部，努力前进[339]。5月19日，蒋介石从徐州抵达郑州，与冯玉祥会商进军京津的方略。双方拟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线以西、京汉线以东地区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兵分两路，北面由京绥线向东，南面由正太线向东，转京汉线北进。各军主力于5月25日之前集结待命[340]。但是，冯玉祥认为阎锡山曾关照过他：彰德以北的事不须管，因此，命令所部停留于石家庄、阜城、武强一线待命[341]。25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调动兵力围攻第三集团军，使孤军深入的晋军在定县、清风店一线受挫。阎锡山要求前线部队坚韧抵抗，并调兵增援，才转危为安。28日，第二集团军攻克方顺桥，迫近保定。

二次北伐开始前，桂系一直忙于征湘军事，和程潜矛盾日深。征湘军事结束后，桂系的部队一直滞留在武汉及河南南部。为了动员桂系加入北伐，5月21日，蒋介石再赴新乡，同冯玉祥及北上的白崇禧会商。蒋介石当面向白崇禧允诺，第四集团军的粮饷与其他各军同等待遇，两湖北伐部队由白崇禧指挥[342]。同日，李宗仁在武汉突然扣押奉命前来开会的程潜，并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声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要求免去程潜本兼各职[343]。桂系的这一举动本是为了排除异己，独霸武汉政治分会，但蒋介石竟采取容忍态度。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免除程潜本兼各职，着其听候查办。其后，李宗仁便立即宣布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正式任命白崇禧为北伐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北进。26日，第四集团军叶琪等部抵达石家庄，加入北伐。

蒋介石在命令阎锡山加速进军的同时，力图用政治手段实现京津易帜。

张作霖发表“停战息争”通电后，蒋介石即于5月12日密电谭延闿

表示："北方宣布停战，如其果确，则中正以为可允其全部集结关外，以固东北国防。至一切国是，当俟国民会议解决，并允奉方参加国民会议。即唯一条件，要求奉鲁军退出关外。"[344] 同日，蒋介石又指令吴忠信和孙世伟磋商。22日，蒋介石将其拟定的"奉军退出关外，京津由晋和平接收"的方案，电告谭延闿，在取得谭的同意后，随即电令阎锡山进行，限奉军一星期内全部退出关外。同时，又致电冯玉祥，声称"我方如对京津力战，日必强加干涉"，希望冯表示赞成由阎锡山接受京津，听候政府处置，以使敌人无从离间，加强内部团结[345]。在北伐军的四个集团军首领中，晋系阎锡山与日本和奉系的关系都较好，由阎执行和平接收京津的使命，可望得到日本及奉方的谅解与合作。

为使这一方案得到北伐军各路将领的赞同，蒋介石不辞辛苦，四处游说。5月27日，他与北上徐州的谭延闿进一步敲定实施方略。29日，奔赴新乡，与冯玉祥会商。两天前，冯玉祥刚刚以第二集团军特别党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声明："讨伐张逆"，"无丝毫妥协之余地"，"如有敢持异议者，愿与国人亟起攻之。"[346] 但是，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解决的主流，冯玉祥只得附议。二人当即商定了进军部署。30日，蒋介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石家庄，与阎锡山面议。他当面允诺，将由晋系推荐京津及河北省的行政长官。阎锡山欣然接受使命。6月2日，蒋介石风尘仆仆地折回新乡，向冯玉祥通报阎锡山决定受命的消息。冯玉祥眼见木已成舟，致电阎锡山称："万恳以党国为重，幸勿稍事谦抑。"[347] 于是，阎锡山兴高采烈地忙碌起来。与奉方的和平谈判也由地下转为公开。

5月28日，北伐军根据蒋介石部署开始总攻。29日，蒋介石电令各集团军"于击破当面之敌，进抵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后，停止待命"[348]。30日，奉军下令总退却。次日，蒋介石发布追击令，敦促各军乘机推进。6月初，北伐各集团军相继抵达京、津市郊。第一集团军经沧州进抵静海。第二集团军攻克肃宁、永清、

固安，进据南苑。第三集团军占领保定后，沿京汉线开进长辛店。各军沿途虽与奉军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没有发生激烈的恶战。

随着军事上的缓慢推进，和平移交北京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阎锡山委派的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奉方代表张学良、杨宇霆频频接洽。双方议定：一、奉军撤离北京，退往榆关，北伐军不进行追击；二、成立以北洋元老王士珍为首的北京临时治安会，主持过渡时期的政局；三、奉军暂留鲍毓麟旅在京执行勤务，待北伐军入城后即行撤退，国民政府负责担保鲍旅完璧归奉。6月1日，谭延闿复电孔繁蔚表示："国府议决，赞成张意"，批准了双方议定的条件[349]。3日，谭延闿致电北京方面，内称："该将领等深明大义，殊堪嘉尚。仰该将领等退出津、榆一带，不得扰乱治安，有妨民生，一切听候后命。至京、榆一带，已令第三集团总司令阎锡山办理。"[350]同时，谭延闿专电杨宇霆，表示慰勉。奉方首领接电后，决定组织撤退。

6月4日，国奉谈判再次举行。张学良提出，请第三集团军先行入城，双方举行和平交接仪式，然后奉军冠冕堂皇地撤离北京。张并要求保留河北永清、遵化等10个县为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屯兵区域。孔繁蔚当然不能轻易允诺这些优惠条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东三省必须悬挂青天白日旗；二、服从国民政府命令；三、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必须接受改编。双方相持不下，谈判出现僵局。当天夜晚，这一僵局便被意外的转机打破了。张学良获悉其父在皇姑屯遇害的消息，连夜出京，同时下令长辛店、卢沟桥一线第三、第四军团主力火速向滦河撤退。其后，北伐军第二、第三集团军顺利进入京郊。

同日，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通电各方宣告成立。6月5日，治安维持会与孔繁蔚商定，派专人赴保定欢迎阎锡山入京主持政务。8日上午，鲍毓麟旅自朝阳门撤出。稍后，第三集团军在前敌总指挥商震指挥下，以孙楚部为先导，自广安门鱼贯入城。全市高悬青天白日旗，各界均派代表前往欢迎。当晚，维持会议决，将警厅及宪兵移交警备

司令部节制。次日，该会通电宣告“解散”[351]。

就在和平移交北京的工作即将顺利完成之际，却发生了一起意外的风波。8日，奉军鲍毓麟旅按照协议撤退出京，各界名流及列强使节均送至朝阳门外。不料，该旅行至通州，却遭到第二集团军冯治安部的阻拦，被迫折回。当日深夜，第二集团军以重兵包围鲍旅。次日清晨，该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亲自出马，将鲍旅缴械[352]。治安会闻讯后，派汪大燮等人前往说项，韩复榘仅将鲍毓麟一人放出，其他人员全部俘送南苑[353]。治安会再请商震出面斡旋，韩复榘答称，此举系“奉冯总司令命令”而行[354]。消息传到东交民巷，领袖公使欧登科立即偕同英、美、日三国公使，前往南苑与韩复榘当面交涉。韩复榘矢口否认曾接到准许鲍旅安全撤退的命令。事情迅速反映到南京和阎锡山处。10日，冯玉祥电令所部开抵京津近郊的各军，撤至固安、静海待命。韩复榘在撤军之前，仅将鲍旅中东北籍官兵遣返归奉，其余则予以收编。

在二次北伐中，第二集团军屡经鏖战，战功居各集团军之首，但蒋介石却将京、津分配给阎锡山，这自然会引起第二集团军官兵的不满。鲍旅事件不过是一次小小发泄的而已。

除鲍旅事件外，和平接受北京的工作大体平顺。相形之下，北伐军进占天津要棘手得多。

盘踞在天津的残余军阀各怀异志，战和不一。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早与阎锡山的代表南桂馨暗通声气，屡次公开言和。6月3日，孙通电宣布辞去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团长之职，一切听凭“国民公决”[355]。其部将李宝章、于学忠等五军长也联名通电罢兵；只有张宗昌依然主战。6日，张宗昌登门拜访在天津作寓公的段祺瑞，请其出山为首领，藉以号召残兵败将，遭到婉言“谢绝”[356]。于是，张再访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扬言要据守天津，作最后一战[357]。

蒋介石为迅速瓦解天津残敌，于6月8日密电冯玉祥，力促其北上一线，指挥各军，加强军事压力。电称："兄如不进，军队散漫，进退不一，危险万分，弟惟有告罪，以谢党国。"[358] 同时，他又指令在津人员加紧策反工作。当时，各集团军纷纷向天津派遣特工人员。蒋介石系统的卢和生、张璧，阎锡山的全权代表南桂馨，冯玉祥的特派员丁春膏均是活跃一时的人物。

在强大的策反攻势下，孙传芳残部争先改换门庭。郑俊彦向第三集团军代表南桂馨接洽投降。阎锡山曾计划以该部兵力接管天津，但遭到各方反对。该部又派马宝珩为代表，赴京与阎锡山直接面洽，达成协议，将该部改编为四个军，任命郑俊彦为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359]。

与此同时，直鲁联军内部也发生分化。6月7日深夜，卢和生以直隶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密见徐源泉，徐源泉同意联合郑俊彦等通电息争[360]。蒋系另一位特派员张璧与天津著名绅商联络，合谋推荐徐源泉担任过渡性的保安司令，然后将政权移交晋方。张璧将此议转告南桂馨，南表示赞同[361]。6月10日，第六军军长徐源泉通电辞去直隶军务帮办一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天津临时保卫总司令"，"暂维持天津治安"[362]。

张宗昌自知天津难以再守，企图以主动让城换取优惠的撤军条件。11日，张宗昌、褚玉璞派贾济川、关麟书为代表，与晋方代表南桂馨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直鲁军撤出天津的协议。随后，南桂馨请出原安福系亲日派政客姚震等人，争取新井龟太郎赞同。南桂馨表示，主要依靠当地宪警接管，晋军不会大批开进天津。新井见无可挑剔，只好表示同意[363]。次日，阎锡山将双方协议条款，电告南京，请求核准。该项协议要旨为：一、直鲁军自动退出天津，交晋军维持治安；二、该军撤军时，无论何方，不许追击、抄袭；三、如有违约追剿者，晋方负责阻止；四、过渡时期的治安，留直鲁军一部维持，以地方民意团体主持之[364]。

6月12日晨，张宗昌、褚玉璞率直鲁联军残部撤离天津，退往芦台、宁河。徐源泉也通电辞职，命令所部全数撤出。同日，傅作义宣布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布告安民。不久，徐源泉接受了阎锡山改编，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

虽然将领们已协议言和，但结局仍出现动乱。傅作义上任第一天，直鲁残兵持枪荷弹，四处抢劫。警察厅长常之英仓皇出逃。阎锡山应傅作义的请求，命孙传芳旧部陆殿臣、何绍南两个旅开抵天津增援。14日，暴乱的残兵被击溃，退往西郊。15日，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分派一个团兵力，由北京驰赴天津，协同维持治安。16日，天津城内秩序渐趋安定。

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实现第二期北伐的最终目标。国民政府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海内外宣告北伐成功。6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宣布“结束军事”，“开始训政”，公布“励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蠲免苛税”、“裁减兵额”等五大施政方针[365]。15日，国民政府又发表“对外宣言”，宣布：“中国统一告成”，为“建设新国家”，对外关系应另辟“新纪元”，解除八十余年所受的“不平等条约之束缚”，签订“相互尊重主权”的平等新约[366]。

随着京、津地区的易帜，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全国的政治中枢，开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中国的新时期。

---

(1) 《洛阳孔祥熙蒸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参见*The Reminiscences of K'ung Hsianghsi*，p．6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 《冯玉祥日记》，1927年7月10日。

(3) 《冯玉祥日记》，1927年7月12日。

(4) 《宁洛汉互商合作之要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8日。

(5) 《宁洛汉互商合作之要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8日。

(6)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下册，第516—517页。

(7) 《宁洛汉互商合作之要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8日。

(8) 《国闻周报》第4卷第30期。

(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6日。

(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9日。

(11) 《唐总司令讨蒋讨共》，《汉口国日报》，1927年8月10日。

(12)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13)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482页。

(14) 《蚌埠总司令感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1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6)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8) 《革命文献》第17辑，总3104页。

(19) 《革命文献》第17辑，总3104—3105页。

(20)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10页；参见吴稚晖：《弱者之结语》，《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第44页；《蒋总统秘录》第6册，总1487页。

(21) 蒋介石：《致中央执监委员书》，《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78页。

(22) 《蒋总司令为促成宁汉合作下野宣言》，《革命文献》第15辑，总

2567—2572页。

(23) 《一周间国内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

(24) 《劝蒋中正勿萌退志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民国史料编辑社1933年版。

(25) 《首都要人前晚之重要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17日。

(26) 《蒋总司令向国民政府辞职铣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19日。

(27) 《国民政府公报》，1927年8月，宁字第12号，第99页。

(28)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6册。

(29) 《李济深之时局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9日。

(3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

(3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

(32) 《申报》，1927年8月19日、20日。

(33)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16日。

(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17日。

(36) 《东南各执监撤销处分原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22日。

(37) 《陈公博谈主席团与李宗仁在浔会晤详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25日。

(38)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344页。

(39)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344页。

(40) 汪精卫：《宁汉合作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第92页。

(41) 《邹鲁致吴稚晖函》（1927年4月20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影印版，第757页。

(42) 邹鲁：《回顾录》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初版，第222页。

(43)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6月7日。

(44) 《（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60页。

(45) 邹鲁：《回顾录》第2册，第228页。

(46) 《张继致宁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27日。

(47) 《首都各团体代表大会详记》，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8日。

(48) 《首都各团体代表大会详记》，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8日。

(49) 《致汪精卫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8日。

(5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5期。

(51) 《汪精卫委员演说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8日。

(52)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22页。

(53)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3页。

(54)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3页。

(55) 《宁汉沪三方同志接洽统一党务之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6)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04—105页。

(57) Tang LeangLi，*The Int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295-299．

(58) 《汪精卫通电高蹈》，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5日。

(5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487页，

(60) 《国民政府宣言》，《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50—2851页。

(61)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26页。

(62) 《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3页。

(63)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 k'uei*，p．303．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64) 《唐总司令在安庆各机关团体欢迎席上讲演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1日。

(65) 《宁汉合作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第93页。

(66) 《汪主席径日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7日。

(67) 《武汉政治分会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9日。

(68) 程潜看了谢慕韩的文章后所作的补充，见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31页。

(6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0月19日。

(7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2期。

(71) 《中央要人电促汪精卫来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0月21日。

(72)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8页。

(73) 《粤军决三路讨唐》，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0月25日。

(7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75)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397页。

(76) 《晨报》，1927年11月2日。

(77) 刘兴遗稿：《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84页。

(78) 《张发奎致李济深电》，转引自《广州李济深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79) 陈可钰：《粤变之内幕》，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第106页。

(80) 陈可钰：《粤变之真相》，《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61页。

(81)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 k'uei* ，p．295．

(82)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13—16页。

(83) 凌仲冕：《“张黄事变”前后的粤局》，《广州文史资料》第2辑。

(84) 陈可钰：《粤变之真相》，《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61页。

(85)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19页。

(86) 《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9—350页。

(8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8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89) 《汪主席演说要点》，《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日。

(90) 《何部长演说之要点》，《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日。

(9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92) 《李济深在南园之报告》，《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页。

(93) 陈公博：《苦笑录》，第114页。

(94) 《黄绍竑自述粤变经过》，《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65页。

(95)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96) 《陈可钰之谈话》，《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

(97) 《中央委员致粤汉各中央委员东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日。

(98) 陈公博：《苦笑录》，第114页。

(99)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7日。

(10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5期。

(101)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26页。

(102) 《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第198—199页。

(103) 《要闻》，《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4日。

(104) 《汪主席昨日赴黄埔训话》，《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1

日。

(105)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 k'uei* ，p．304．

(106)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8页。

(107) 《留粤中委电报处置黄绍竑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8日。

(108) 《政治分会第七十一次议决案》，《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1日。

(109) 《告刘镇华免靳云鹗职详情电》，《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下册。

(110) 《请军委会速攻徐州电》（1927年10月4日），《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下册。

(111) 《呈军事委员会条陈北伐军事四端电》，《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下册。

(11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11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9期。

(114) 《奉方昨晚发讨阎通电》，《大公报》，1927年10月3日。

(115) 《政府公报》，1927年10月，第126页。

(116) 《涿州战后视察记》，《国闻周报》第5卷第4期。

(117) 《国民政府公报》，1927年12月，第4183号。

(118) 《涿州战后视察记》，《国闻周报》第5卷第4期。

(119)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期。

(120)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0年版，第112页。

(121)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台北“中日日报”社1976年版，第218页。

(122)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123)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24)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228页。

(125)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26)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27) 《苏宁浙三党部联名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8日。

(128) 《南京血花公园前之大流血》，《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9日。

(129) 《南京血花公园前之大流血》，《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6日。

(130) 《特委会在宁屠杀之伤亡调查》，《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8日。

(13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1月22日。

(132) 《宁代表谒蒋介石》，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7日。

(133) 《屠杀民众真相》，《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6日；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83页。

(134) 邹鲁：《回顾录》第2册，第209页。

(135) 《南京惨案之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7日。

(136) 《特委会门前陈列之血尸》，《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0日。

(137)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7日。

(138) 《申报》，1927年11月17日。

(139) 《申报》，1927年11月20日。

(140) 严勖哉编：《汪精卫与吴稚晖的论文集》，上海新时代书店1928年版，第33、48页。

(14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7期。

(142) 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91—94页。

(143) 《国内外一周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8期。

(144)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9日。

(145)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9日。

(146)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9日。

(147) 《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78页。

(148) 《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原文》，《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79—2880页。

(149) 蒋介石《对于时局之谈话》，《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84页。

(150)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44页。

(15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69—370页。

(152) 《八一事变的经过失败原因和前途》，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153)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十四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54) 诺伊曼，也译作罗曼、牛曼、纽曼。

(15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52—459、523、529页。

(15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77—78页。

(157) 《张太雷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广州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参见《广东政治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02页。

(158)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会号召暴动宣言》，《布尔什维克》第9期。

(159)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pp．308-309．

(160) 《革命文献》第17辑，总3124—3125页。

(161) 《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广州苏维埃宣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20—125页。

(162)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参见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163) 《申报》，1927年12月15日。

(164)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4日。

(165) 《上海总商会对于时局之宣言》，《申报》，1927年12月15日。

(166) 《国府查办汪精卫等令文》，《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

(167) 《请蒋中正速出山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

(168) 《与阎锡山会衔请蒋中正出山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

(169) 《鹿钟麟何应钦等将领上中央请蒋总司令复职完成北伐电》，《革命文献》第18辑，总3179页。

(17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页。

(17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26页。

(17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26页。

(173) 《革命文献》第17辑，第195页。

(17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19页。

(175) 中央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纪录》，文华印书局1928年版，第52、157页。

(176)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12页。

(177) 《蒋总司令为编组第一集团军上国民政府电》，《革命文献》第18辑。

(178)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14页。

(179) 《开封会议之内容》，《时事新报》，1928年2月23日。

(180) 《阎锡山铣电》，《时事新报》，1928年2月23日。

(18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591页。

(182)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3页。

(183)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

(184) 程思远：《白崇禧与蒋介石》，（北京）《传记文学》1987年第1期。

(185)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

(186) 《晨报》，1928年1月16日。

(187)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83页。

(18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11期。

(189)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7期。

(190) 《国府两要人之谈话》，《时事新报》，1928年2月29日。

(191) 《国府慰劳西征军》，《时事新报》，1928年2月29日。

(19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12期。

(193) 《白崇禧函蒋介石》，《时事新报》，1928年4月7日。

(194) 《申报》，1928年2月28日。

(195) 《张嘉璈日记》，稿本。

(196) 《张嘉璈日记》，稿本。

(19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9期。

(198)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30页。

(199)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484页。

(20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4月7日。

(201)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230页。

(202) 《中央日报》，1928年3月10日。

(203)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台北，第100—101页。

(204)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第22页。

(205) 日本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42—44页。

(206)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1981年版，第36页。

(207) 《日本出兵山东声明书》，《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88—1289页。

(208)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73页。

(209)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32—333页。

(210)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第38页。

(211)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革命文献》第19辑，第1373页。

(212)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13)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第26页。

(214) 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54页记载，济案发生前，蒋介石曾训令部队："一、不与日军构争，保护侨民，系为国家之政。在个人无论有何如事，亦须忍受；二、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三、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四、若遇有事，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王书未注出处，录以备考。

(215) 据蒋作宾报告，遇难者共17人，即主任蔡公时，参议张鸿渐，科长谭显章，科员周惠和、姚成仁、张麟书、袁家达、熊道存、姚成义，书记刘文鼎，勤务员王立泰、张德福、陈普远、黄继曾、陈瑞成、傅宝山；一人姓名不详。

(216)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下册，第369页。

(217) 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215页。

(218)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革命文献》第19辑，第1378—1379页。

(219) 《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93页。

(220) 《蒋总司令为改道北伐致日军福田师团长函》，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215页。

(221) 日本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97页，

(222) 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154—155页。

(223) 《熊式辉回忆录》，打字本，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24)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42页。

(225) 关于济南惨案伤亡人数有几种统计。此据济南惨案代表团的调查，见蒋永敬：《济南五三惨案》，第88—89页。另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人，见《革命文献》第19辑，第1330-1334页。济南教会也于当年的5月17日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称中国军民死伤均在2000人以上。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中国军民被日军杀害者达4704人，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5月11日。

(226) 《蒋总司令饬各军保护外侨电》，《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96页。

(227) 《国民政府为济案正由外交解决民众应守秩序严防共党煽动电》，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219—220页。

(228)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下册，第385页。

(229)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46页。

(230) 黄郛档（缩微胶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31)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51页。

(232) 《电殷特派员》，黄郛档（缩微胶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33) 《殷特派员来电》，黄郛档，（缩微胶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34)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53页。

(235)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54页。

(236)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603页。

(237) 《外务大臣田中致驻奉总领事吉田的训令》（1927年7月20日，第90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940—943页。

(238) ［日］猪木正道著，吴杰等译：《吉田茂传》，第358页。

(239) ［日］猪木正道著，吴杰等译：《吉田茂传》，第359页。

(240) ［日］猪木正道著，吴杰等译：《吉田茂传》，第361—362页。

(241)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297，217—219，383—391页。

(242) 《日驻华武官本庄繁致参谋次长南次郎电》（1927年7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149—154页。

(243) 《日驻华武官本庄繁致参谋次长南次郎电》（1927年8月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245—257页。

(244) 《驻华代理公使堀义贵致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电》（1927年8月10日，第879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237—244页。

(245)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141—143、149—152、220、245—249、298—301、326页。

(246)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13，第701—705页。

(247) 《东方杂志》第24卷第20号，第108—109页。

(248) 《临江县知事袁葆真等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电》（1927年7月27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15。

(249) 《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案》，4312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250) 《奉天省公署致北京国务院外交部电》（1927年7月27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15。

(251) 《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号，第134页。

(252) 《吉林省国民外交后援会通电》（1927年9月），《北洋政府档案》，1001（2），1413。

(253) 《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号，第130页。

(254) 《奉天制止排日之电文》，《盛京时报》，1927年9月16日。

(255) 《莫德惠致杨宇霆函》（1927年9月），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第245页。

(256) 《奉天省公署档》，第1988号，辽宁档案馆藏。

(257) 参见《东北年鉴》，1931年，第374、390—391、425、432、435页。

(258) 《驻奉天代理总领事蜂谷辉雄致张作霖照会》（1926年12月28日，第861号），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880页。

(259) 《东北年鉴》，1931年，第391页。

(260) 《关于解决满蒙悬案问题》，《田中外务大臣致驻华公使芳泽函附件甲号》（1927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514—521页。

(261) 《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522—527页。

(262) 《政府公报》第4118号，1927年10月2日。

(263) 《芳泽驻华公使致田中外务大臣函》（1927年10月1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47—52页。

(264) 原安三郎：《山本条太郎传记》，第564页。

(265)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省次官电》（1927年10月13日，第61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3—29页。

(266) 原安三郎：《山本条太郎传记》，第578—580页。

(267)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省次官电》（1927年10月13日，第61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3—29页。

(268)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大臣电》（1927年10月1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64—71页。

(269)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大臣电》（1927年10月1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64—71页。

(270) 《田中外务大臣致芳泽驻华公使电》（1927年11月7日，第49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

(271) 《田中外务大臣致芳泽驻华公使电》（1927年11月7日，第49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

(272)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页。

(273) *FRUS*，1928，Vol．2，p．483．

(274) 《外交部致驻美公使施肇基电》（1927年11月17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19。

(275) *FRUS*，1928，Vol．2，p．482，487488．

(276) 《时报》，1927年11月30日。

(277) *FRUS*，1928，Vol．2，pp．490-491．

(278) *FRUS*，1928，Vol．2，p．483．

(279) *FRUS*，1928，Vol．2，p．492．

(280) 《驻华武官本庄致参谋次长电》（1927年11月30日，第711

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193—198页。

(281) 《驻华武官本庄致参谋次长电》（1927年11月30日，第711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193—198页。

(282) 《芳泽驻华公使致田中外务大臣电》（1927年11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驻华武官本庄致参谋次长电》（1927年11月30日，第711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08—211页。

(283) 《芳泽驻华公使致田中外务大臣电》（1927年11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

(284) 《张作霖致田中外务大臣函》（1927年12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14页。

(285)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6)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7)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8)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9)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9—970页。

(290) 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0—972页。

(291) 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0—972页。

(292) 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页；参见赵东凡：《吉会铁路签约经过》，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79—80页。

(293)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974页。

(294)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974

页。

(295) 《吉林省议会等致张作霖电》（1928年5月1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77．6192，第2711—2716页。

(296) 《上海总商会致张作霖电》（1928年5月6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18期。

(297) 《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8) 《张学良、杨宇霆致常荫槐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9) 《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0) 《孙传芳致潘复电》（1928年5月9日），《申报》，1927年5月17日。

(301) 《张作霖通电》，《晨报》，1928年5月10日。

(302) *FRUS*，1928，Vol．2，p．147．

(30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政协编译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54页。

(304) 立坚信之：《昭和军阀·勃兴篇》，东京讲谈社1963年版，第57页。

(305) 《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06) 《顺天时报》，1928年5月19日。

(30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55页。

(308) 参谋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121—122、620—626页。

(309) *FRUS*，1928，Vol．2，pp．223-224，232-234．

(310)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11) 《北京政府对外宣言》，《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12)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2号。

(313)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356—357页。

(314) *FRUS*，1928，Vol．2，p．225．

(315) *FRUS* ，1928，Vol．2，p．231．

(316) *FRUS* ，1928，Vol．2，pp．232-234．

(317) *FRUS* ，1928，Vol．2，pp．227-228．

(318) 《申报》，1928年5月26日。

(319) 《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20) 赵东凡：《吉会铁路签约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80页。

(321) 鲍毓麟、温守善：《东北易帜的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页。

(322) 《张作霖通电》，《申报》，1928年6月3日。

(323) 参见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30—131页；鲍毓麟、温守善：《东北易帜的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23页。

(324) 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第404页。

(325) 《河本大作笔供》（1953），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页；参见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日］《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326) 日本每日新闻社，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判书》，第271页。

(327) 朝日新闻社：《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第304页。

(328)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日］《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32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58页；立野信之：《昭和军阀·勃兴篇》，第60—62页。

(330) 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王家骅译：《满州事变》，第35页。

(331) 臼井胜美：《炸死张作霖的真相》，《知性》增刊《被掩盖的昭和史》。

(332) 《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

(333) 《时事新报》，1928年6月17日。

(334) 辽宁省档案馆藏：《张作霖专档》，23号。

(335) 张怀英、张怀卿：《回忆我父亲张作霖二三事》，天津政协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38页。

(336) 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炸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32页。

(337) 《申报》，1928年6月12日。

(338) [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957页。

(339) 《北伐简史》，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265页。

(340)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354页。《北伐简史》，第270页。

(34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601—602页。

(342) 《申报》，1928年5月24日。

(343) 《李宗仁致国民政府电》（1928年5月21日），《申报》，1928年5月23日。

(344) 《蒋介石致谭延闿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1981年版，第195页。

(3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01页。

(346) 《第二集团军特别党部通电》（1928年5月27日），《申报》，1928年5月29日。

(347) 《冯玉祥致阎锡山电》（1928年6月2日），《申报》，1928年6月4日。

(348) 《北伐简史》，第271页。

(349) 《谭延闿致孔繁蔚电》，《申报》，1928年6月4日。

(350) 《谭延闿致孔繁蔚电》，《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

(351) 《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通电》（1928年6月9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

(352) 《申报》，1928年6月21日。

(353) 《商震致阎锡山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1—6月卷，第1047页。

(354) 《申报》，1928年6月21日。

(355) 《孙传芳通电》（1928年6月3日），《申报》，1928年6月5日，

(356) 《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

(357) 《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

(358) 《蒋介石致冯玉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04—205页。

(359) 《军事杂志》1928年，第2期，第12页。

(36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753页。

(361) 《国闻周报》第5期第23卷。

(362) 《徐源泉等通电》（1928年6月10日），《中央日报》，1928年6月12日。

(363) 辛公显：《“七七”事变前天津便衣队暴乱真相》，《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9页。

(364) 《阎锡山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1—6月卷，第1084—1085页。

(365) 《国民政府公报》第67期，第1—3页。

(366) 《国民政府对外宣言》（1928年6月15日），《申报》，1928年6月16日。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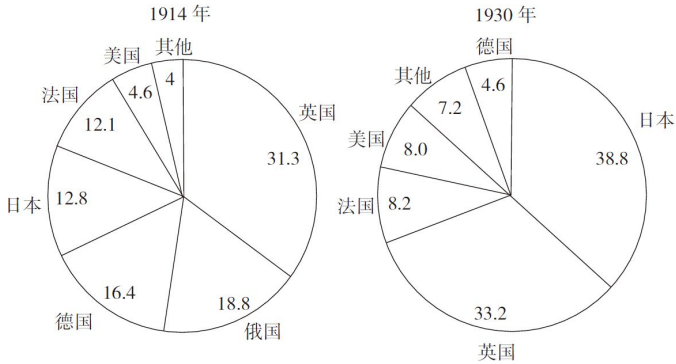
表一　1914—1930年各国在华投资趋势

（单位：美元百万元）

项目 / 年份 / 国别	企业资本		房地产投资		借款		投资总额	
	1914	1930	1914	1930	1914	1930	1914	1930
合　计	1000.3	1977.1	225.3	726.1	1120.5	1070.1	2346.1	3773.3
英　国	336.3	641.3	141.3	411.1	257.6	201.0	735.2	1253.4
日　本	199.5	892.2	22.5	175.1	78.2	398.5	300.2	1465.8
美　国	36.0	163.2	24.0	68.4	47.1	72.1	107.1	303.7
法　国	56.0	85.3	22.5	65.5	206.5	161.2	285.0	312.0
德　国	136.0	75.0	15.0	6.0	234.7	93.6	385.7	174.6
俄　国	236.5	—	—	—	203.7	—	440.2	—
比利时	未计	41.0	—	—	28.5	48.4	未计	89.4
意大利	未计	4.4	—	—	32.5	74.7	未计	79.1
其　他	未计	74.7	—	—	31.7	20.6	未计	95.3

资料来源：据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页152表二、页155表三、页173表八、页186表十五编算。房地产只计英、日、美、法、德五国，其余国家计入该国企业资本内。借款系中国各年结欠额，包括财政借款与铁路借款。

表二　1914年和1930年各国在华投资比例图



资料来源：据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本表承日本创价大学亚细亚研究所武澎东先生协助制作。

表三　1923—1927年各国和地区对华直接贸易额

（单位:海关两）

	1923 年		1924 年		1925 年		1926 年		1927 年	
	贸易总额	%	贸易总额	%	贸易总额	%	贸易总额	%	贸易总额	%
英国	163,604,359	9.8	176,261,876	9.9	140,780,962	8.2	172,105,202	8.7	133,063,563	6.9
香港	423,879,705	25.3	417,082,283	23.3	291,026,056	16.9	218,274,704	11.0	382,272,655	19.8
英属印度	67,570,288	4.1	50,263,920	2.8	61,586,544	3.6	95,113,114	4.8	64,587,433	3.3
日本(及台湾)	409,541,643	24.4	435,937,789	24.4	486,092,648	28.2	548,650,330	27.6	502,632,570	26.0
朝鲜	42,236,071	2.5	42,360,830	2.4	44,814,925	2.6	58,927,820	3.0	75,573,056	3.9
美国	281,251,423	16.8	291,711,353	16.3	285,666,549	16.6	337,760,189	17.0	288,546,348	14.9
菲律宾	5,341,727	0.3	7,602,116	0.4	10,095,847	0.6	12,150,721	0.6	10,636,182	0.6
法国	47,126,313	2.8	55,656,176	3.9	78,516,270	5.9	85,162,415	7.8	66,137,489	5.4
法属印支	22,451,376	1.3	13,858,556	0.8	22,748,905	1.3	70,229,479	3.5	38,513,179	2.0
德国	44,370,785	2.7	54,636,642	3.1	48,938,136	2.8	63,438,010	3.2	59,708,899	3.1
意大利	13,203,272	0.8	15,221,030	0.9	15,978,696	0.9	22,416,108	1.1	21,217,943	1.1
其他国家、地区	—	9.2	—	11.8	—	12.4	—	11.7	—	12.8
总计	1,676,320,303	100	1,789,995,145	100	1,724,217,881	100	1,988,516,024	100	1,931,551,286	100

资料来源：据H．G．W．Woodhead ed.：*China Year Book*，1929—1930，（Tientsin, 1931），pp．158—164编算。贸易总额为进出口额之和。

表四　1921—1926年英、美、日对外及对华出口贸易数据

	1921 年			1922 年			1923 年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英国	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	%	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	%	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	%
出口总额	703.0	33.0	4.7	729.0	29.0	4.0	767.0	25.0	3.3
棉纺织品	137.1	13.5	9.8	142.4	13.5	9.5	138.3	10.0	7.2
毛纺织品	35.9	2.1	5.7	36.8	2.4	6.5	39.7	3.9	9.7
钢铁及其制品	63.6	3.2	5.0	60.9	1.9	3.2	76.2	2.2	2.9
机器	74.6	4.8	6.4	51.5	3.8	7.4	44.5	1.8	4.0
美国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
出口总额				3765.1	126.7	3.4	4090.9	134.7	3.3
谷物				515.9	12.9	2.5	311.3	28.2	9.1
烟草				146.0	11.0	7.5	152.3	11.4	7.5
香烟				23.8	19.4	81.5	23.1	19.0	82.2
棉纺织品				673.2	3.5	0.5	807.1	4.2	0.5
精炼矿物油				312.6	26.5	8.5	326.6	24.8	7.6

（续）

	1921 年			1922 年			1923 年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纯铜				89.0	5.8	6.5	110.5	4.8	4.3
机器				239.1	11.8	4.9	287.9	5.1	1.8
日本及库页岛①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出口总额②	1252.8	424.1	33.9	1637.5	470.8	28.8	1447.8	395.4	27.3
棉织品	203.7	128.8	63.2	222.1	137.5	61.9	234.8	126.5	53.9
棉纱	80.6	67.6	83.9	114.7	91.6	79.9	78.5	53.9	68.7
精糖	15.8	14.9	94.3	19.1	19.0	99.5	14.7	14.6	99.3
煤	37.8	19.1	50.5	23.5	13.9	59.1	21.5	15.5	72.1
水产	14.6	12.4	84.9	16.3	14.1	85.5	19.9	17.9	89.9
纸	18.9	15.5	82.0	16.1	13.2	82.0	15.2	12.2	80.3
铁制品	9.1	5.8	63.7	10.3	6.1	59.2	11.4	6.8	59.6
机器及其零件	12.9	10.7	82.9	14.4	13.0	90.3	9.3	7.8	83.9

①日本1922年、1923年的某些出口货的统计数据不够完整，因横滨的一些贸易档案在打地震中遗失。

②该总额包括再出口货。其他分项数额为日本国产货。

（续）

	1924 年			1925 年			1926 年①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英国	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	%	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	%	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	%
出口总额	801.0	29.0	3.6	773.0	20.0	2.6	652.0	20.0	3.0
棉纺织品	153.4	12.6	8.2	150.6	7.5	5.0	116.1	6.8	5.9
毛纺织品	40.2	4.8	11.9	35.3	2.8	8.0	31.8	3.2	10.0
钢铁及其制品	74.5	2.2	3.0	68.2	1.6	2.3	55.4		
机器	44.8	1.2	2.7	49.1	1.2	2.4	45.5		
美国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②	%
出口总额	4497.6	135.0	3.0	4818.7	113.6	2.4	4711.5	129.0	2.7
谷物	433.7	16.0	3.7	351.8	7.4	2.1			
烟草	163.0	17.8	10.6	153.4	19.6	12.8	136.7	20.5	15.0
香烟	19.4	14.6	75.2	15.0	9.3	62.0	17.9	12.1	67.6
棉纺织品	950.6	4.3	0.5	1059.8	6.5	0.6	814.4	13.3	1.6
精炼矿物油	392.0	29.0	7.4	422.3	26.6	6.3	494.9	21.5	4.3

①英美两国1926年为初步统计数字。

②此项栏目皆为近似额。

（续）

	1924年			1925年			1926年①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至各国	至中国	比例
钢铁及其制品	221.0	8.4	3.8	223.6	6.4	2.9			
纯铜	138.3	8.4	6.1	140.2	1.9	1.4	121.2	1.1	0.9
机器	317.0	5.0	1.6	384.8	4.2	1.1			
日本及库页岛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出口总额	1807.0	500.0	27.7	2305.6	643.7	27.9	2044.7	574.4	28.1
棉织品	326.6	172.8	52.9	432.9	234.1	54.1	416.3	220.8	53.0
棉纱	109.6	65.5	59.8	123.1	74.9	60.8	70.7	35.0	49.5
精糖	28.9	28.8	99.7	32.3	32.0	99.1	34.0	33.2	97.6
煤	22.4	18.0	80.4	33.2	27.7	83.4	31.0	23.5	75.8
水产	22.5	19.9	88.4	22.7	18.4	81.1	22.7	17.4	76.7
纸	15.6	12.4	79.5	20.2	16.3	80.7	19.0	15.3	80.5
铁制品	12.8	7.7	60.2	14.7	7.4	50.3	13.0	6.9	53.1
机器及其零件	9.6	8.5	88.5	9.7	8.7	89.7	8.7	7.7	88.5

资料来源：The Letter of Mr．E．F．Crowe to Mr．Gwatkin，May 31，1927，Appendix，*FO*，405，Vol．253，pp．358—360．表中英国历年至中国的出口额，包括至香港、澳门、威海卫；美国和日本至中国的出口额，包括至香港和东北。

表五　国民革命军序列（1926年7月）

总司令　蒋介石

军事总顾问　加　伦

前敌总指挥　唐生智

总参谋长　李济深

总参谋次长　白崇禧

总政治部主任　邓演达

总政治部顾问　铁罗尼

总预备队　指挥官　王柏龄　参谋长　叶剑英

　第一师师长　王柏龄（王　俊代）　副师长　王　俊

　第二师师长　刘　峙　副师长　陆树荣

　第二十师师长　钱大钧

第一军军长　何应钦　党代表　缪　斌

　　顾问　切列潘诺夫　副军长　王柏龄

　　参谋长　蒋伯诚

第三师师长　谭曙卿　副师长　顾祝同

第十四师师长　冯轶裴

独立第四师师长　张　贞

第二军军长　谭延闿（鲁涤平代）　副党代表　李富春

顾问　杰卜罗斯基　副军长　鲁涤平

参谋长　岳　森

第四师师长　张辉瓒　副师长　王捷俊　党代表　李六如

第五师师长　谭道源　副师长　成光耀　党代表　方维夏

第六师师长　戴　岳　副师长　朱耀华　党代表　萧劲光

教导师师长　陈嘉祐　党代表　石陶钧

第三军军长　朱培德　党代表　朱克靖

顾问　马赤利克　参谋长　黄　实

第七师师长　王　钧　副师长　张近德

第八师师长　朱世贵

第九师师长　朱培德（李明扬代）　副师长　李明扬

第四军军长　李济深（陈可钰代）　党代表　廖乾吾

顾问　帕　罗　副军长　陈可钰　参谋长　邓演存

第十师师长　陈铭枢　副师长　蒋光鼐

第十一师师长　陈济棠

第十二师师长　张发奎　副师长　朱晖日

第十三师师长　徐景唐

独立团团长　叶　挺　参谋长　周士第

第五军军长　李福林　副党代表　李朗如

顾问　波尔特宁科　参谋长　刘　敏

第十五师师长　李　群

第十六师师长　练炳章　副师长　王若周

第六军军长　程　潜　副党代表　林伯渠

顾问　康奇茨　参谋长　唐　蟒

第十七师师长　邓彦华　党代表　陈雁声

第十八师师长　胡　谦　党代表　李隆廷

第十九师师长　杨源浚　党代表　张振武

副师长　王邦吉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顾问　库满宁　参谋长　王应榆

第一旅旅长　夏　威

第二旅旅长　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　伍廷飏

第四旅旅长　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　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　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　吕焕炎

第八军军长　唐生智　党代表　刘文岛

顾问　奥依尼其　参谋长　张一鹏

第二师师长　何　键

第三师师长　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　刘　兴

第五师师长　叶　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　夏斗寅

教导师师长　唐生智（周　斓代）　副师长　周　斓

航空处长　林伟成　党代表　张静愚

兵站总监　俞飞鹏

表六　国民革命军序列（1927年3月1日）

第一军　军长　何应钦

第二军　军长　谭延闿

第三军　军长　朱培德

第四军　军长　李济深
第五军　军长　李福林
第六军　军长　程　潜
第七军　军长　李宗仁
第八军　军长　唐生智
第九军　军长　朱绍良
第十军　军长　王天培
第十一军　军长　陈铭枢
第十二军　军长　任应岐
第十三军　军长　白崇禧
第十四军　军长　赖世璜
第十五军　军长　刘佐龙
第十六军　军长　范石生
第十七军　军长　曹万顺
第十九军　军长　陈　仪
第二十军　军长　杨　森
第二十一军　军长　刘　湘
第二十二军　军长　赖心辉
第二十三军　军长　刘成勋
第二十四军　军长　刘文辉
第二十五军　军长　周西成
第二十六军　军长　周凤岐
第二十七军　军长　王　普
第二十八军　军长　邓锡侯
第二十九军　军长　田颂尧
第三十三军　军长　柏文蔚
第三十五军　军长　何　键
第三十六军　军长　刘　兴
第三十七军　军长　陈调元
第四十军　军长　贺耀组

新编第一军　军长　谭曙卿
新编独立第一师　师长　卢兴邦
独立第二师　师长　刘　峙
独立第四师　师长　张　贞
独立第十四师　师长　夏斗寅
独立第二十师　师长　钱大钧
独立第二十一师　师长　严　重
独立第二十二师　师长　陈继水
中央第一混成旅　旅长　贺对廷

表七　二次北伐序列（1928年4月）

总司令　　蒋介石
总参谋长　　何应钦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
　总参谋长　　杨　杰
　第一军团总指挥　　刘　峙
　第二军团总指挥　　陈调元
　第三军团总指挥　　贺耀组
　第四军团总指挥　　方振武
　总预备队总指挥　　朱培德
　炮兵集团指挥　　陈　诚
　后方警备部队司令　　钱大钧
　航空队司令　　张静愚
　铁甲车司令　　屠金声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冯玉祥
　总参谋长　　刘　骥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孙良诚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孙连仲

第八方面军总指挥　　刘镇华
第九方面军总指挥　　鹿钟麟
骑兵第一军　　郑大章
铁甲车集团司令　　刘自珍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
总参谋长　　朱绶光
右翼军总指挥　　徐永昌
左翼军总指挥　　商　震
中路军总指挥　　商　震
海军总司令　　杨树庄
参谋长　　李　景
第一舰队司令　　陈季良
第二舰队司令　　陈绍宽
练习舰队司令　　陈训泳
鱼雷游击司令　　曾以鼎

表八　吴佩孚“讨贼联军”序列（1926年4月）

讨贼联军总司令　吴佩孚
湖北督理兼第二十五师　师长　陈家谟
湖北暂编第一师　师长　宋大霈
湖北暂编第二师　师长　刘佐龙
湖北暂编第三师　师长　孙建业
湖北暂编第四师　师长　陈德麟
湖北暂编第五师　师长　张联陞
第十八混成旅　旅长　于学忠
汉黄镇守使　杜锡钧
陆军第十八师　师长　卢金山
陆军第八师　师长　刘玉春

第十八混成旅　旅长　余荫森
武卫军总司令　马　济
陆军第七师　师长　王都庆
湖北第二混成旅　旅长　夏斗寅
卫兵旅　旅长　董政国
湘鄂边防督办　李济臣
第九师　师长　寇英杰
河南暂编第一师　师长　郭振中
河南暂编第二师　师长　阎日仁
第三师　师长　吴俊卿
河南暂编第一混成旅　旅长　袁家声
河南暂编第二混成旅　旅长　薛传峰
河南暂编第三混成旅　旅长　李鸿翥
河南暂编第五混成旅　旅长　袁家骥
河南暂编第六混成旅　旅长　王相贤
新编混成旅　旅长　李　鹏
第二十四师第一补充旅　旅长　安锡嘏
豫军第一混成旅　旅长　张继武
豫军第二混成旅　旅长　刘正芳
豫军第三混成旅　旅长　张锦标
豫军第四混成旅　旅长　米国贤
陕潼护军使兼第二师　师长　张治公
浚滑游击司令　王献臣
陆军第十三师　师长　苏运昌
第九师炮兵团　吴德芳
骑兵支队　马德凤
陕西讨贼军总司令　刘镇华

表九　孙传芳五省联军序列（1926年4月）

五省联军总司令　孙传芳
第一师　师长　陈　仪
第五混成旅　旅长　杨赓和
第六混成旅　旅长　彭德铨
第七混成旅　旅长　杨镇东
第八混成旅　旅长　颜景宗
第九混成旅　旅长　张中立
第十混成旅　旅长　孟昭月
炮兵团　司令　张国威
第十师　师长　郑俊彦
第四师　师长　谢鸿勋
第三师　师长　周凤歧
第五师　师长　白宝山
第七师　师长　冯绍闵
浙江总司令兼二师师长　卢香亭
浙江省长兼警备司令　夏　超
安徽总司令兼第六师师长　陈调元
第一混成旅　旅长　倪朝荣
第二混成旅　旅长　马祥斌
第三混成旅　旅长　王　普
第四混成旅　旅长　刘风图
江西总司令兼中央第一师师长　邓如琢
暂编第一师　师长　蒋镇臣
江西第一师　师长　唐福山（后改岳思寅）
江西第二师　师长　杨如轩
江西第三师　师长　刘宝题
江西第四师　师长　赖世璜
江西第九混成旅　旅长　张凤岐
江西第六师　师长　杨池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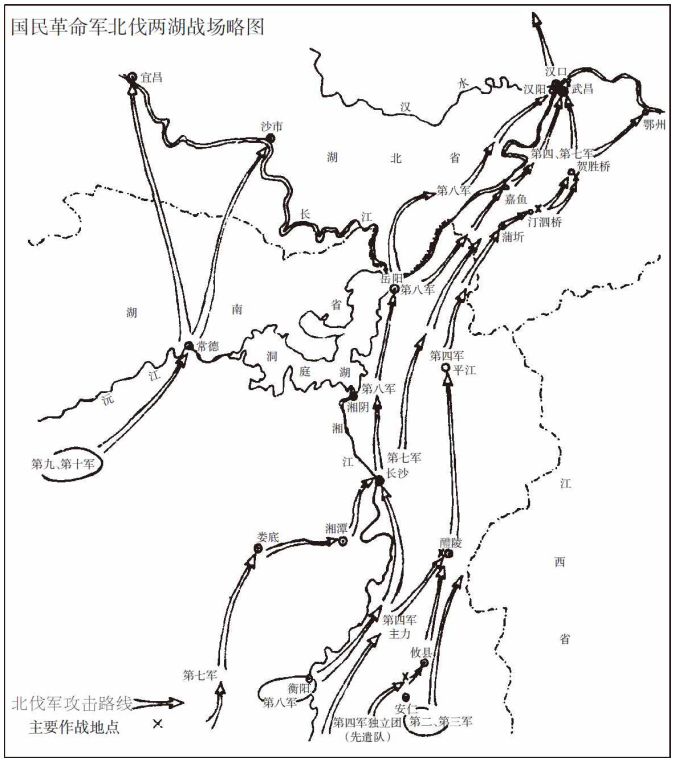
福建军务督办兼第十二师　师长　周荫人
福建第一师　师长　张　毅
福建第三师　师长　李凤翔

表十　张作霖镇威军序列（1926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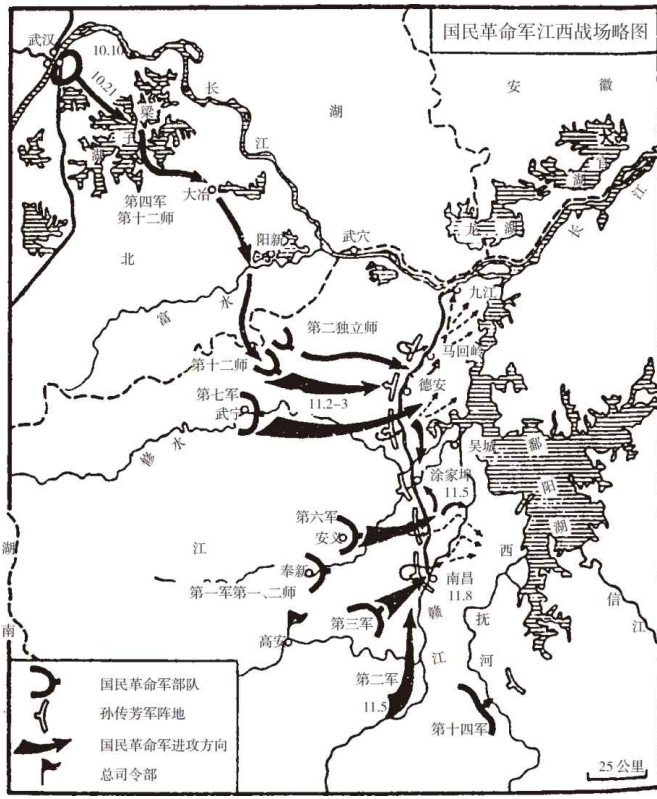
镇威军总司令　张作霖
第二方面军团指挥官　张宗昌
第三、四方面军团指挥官　张学良　韩麟春
　第八军　军长　万福麟
　第九军　军长　高维岳
　第十军　军长　于　珍
　第十一军　军长　赵恩臻
　第十七军　军长　荣　臻　胡毓坤
　炮兵司令　邹作华
　工兵司令　柏桂林
　辎重兵司令　牛元峰
第五方面军团指挥官　张作相
第六方面军团指挥官　吴俊陞

表十一　张作霖安国军序列（1926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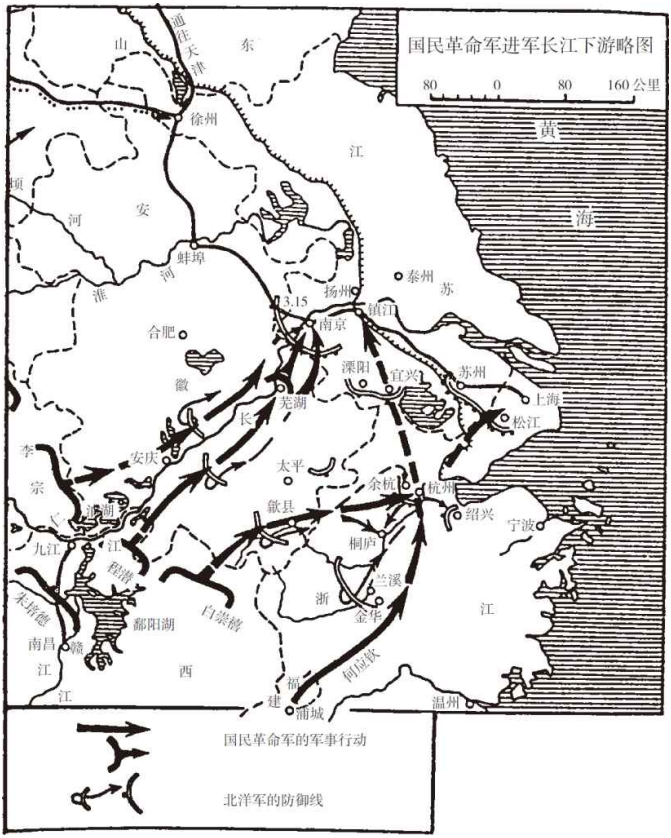
第一方面军团长　孙传芳
第二方面军团长　张宗昌
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长　张学良　韩麟春
第五方面军团长　张作相
第六方面军团长　吴俊陞
第七方面军团长　褚玉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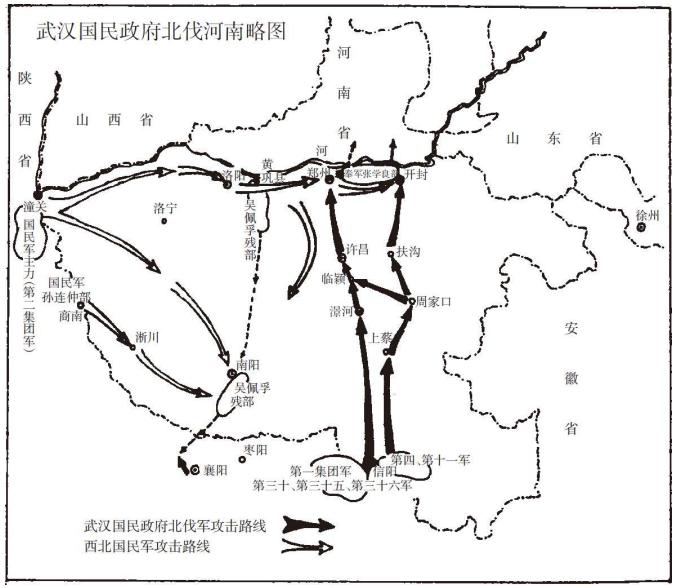
图一　国民革命军北伐两湖战场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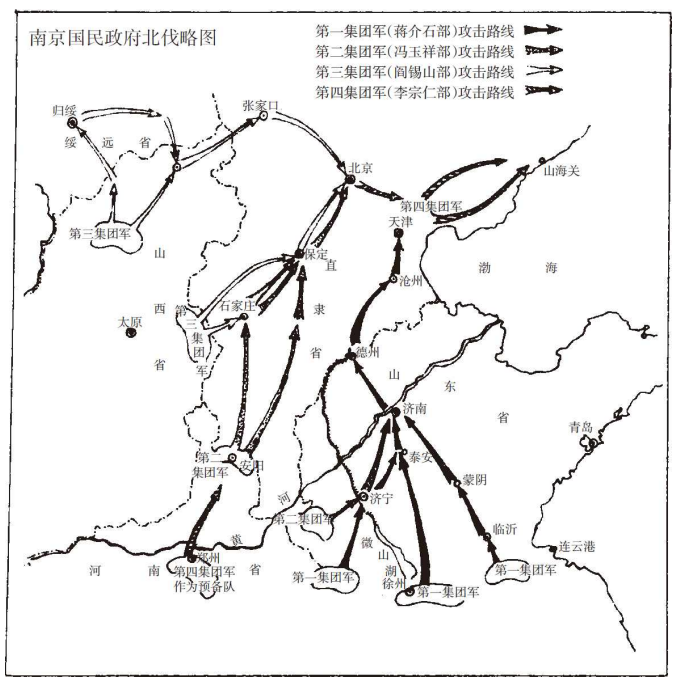
图二　国民革命军江西战场略图



图三　国民革命军进军长江下游略图



图四　武汉国民政府北伐河南略图



图五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略图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北京邮政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陈立夫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冯玉祥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奉天省公署档，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各党团会议记录，藏地不详

顾维钧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广州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胡汉民档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波士顿

京师警察厅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

李汉魂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文史资料未刊稿》，全国各地政协藏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藏，上海

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吴稚晖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武汉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熊式辉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张发奎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张作霖专档，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张静江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共南京地区委员会档案，南京市档案馆藏，南京

《安徽省政治及党务报告》，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陈璧君狱中交代》，抄件，藏地不详

《大局讨论会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藏地不详

《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中央妇女部，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关于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南京市总工会编，南京市档案馆藏，南京

《郭廷以与李将军（品仙）问答记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1927，油印件，藏地不详

《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张曙时、侯绍裘，油印件，藏地不详

《蒋介石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解决阳新惨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民校（国民党）扩大党团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全国农民运动现状报告》，1927年3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韩觉民，油印件，藏地不详

《徐州特别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狱中自述》（稿本），李大钊著，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北京

《战时经济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

《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10月7日），天津市政协藏，天津

《张蒙璇日记》（1927—1928），稿本，藏地不详

《浙江党务报告》（1926年10月16日），宣中华、丁济美，油印件，藏地不详

《（中共上海）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事录、决议案》，1926，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速记录、会议录、决议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927年3月，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会议录及会议文件》，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速记录、议事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书》，1929，铅印件，藏地不详

《中央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1926-1927），油印件，藏地不

详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及会议文件》，广州，1926，藏地不详

《中央青年部过去之工作及今后进行计划》，1926，油印件，藏地不详

《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联席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中文著作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

《爱国将军冯玉祥》，郭绪印、陈兴唐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八七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八一革命》，吴玉章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白崇禧传》，程思远，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

《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蒋永敬，台北，传记文学出版

社，1993

《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美］丹尼尔·雅各布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蒋永敬，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张注洪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北洋军阀史稿》，来新夏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杜春和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北伐简史》，“国防部”史政局编，台北，正中书局，1968

《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李恩涵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蒋永敬编，台北，正中书局，1981

《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1988

《北伐行军日记》，欧振华著，出版地不详，1931

《北伐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台北，1967

《北伐战争史》，曾宪林等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北伐战争史稿》，范忠程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81

《北伐阵中日记》，《近代稗海》第1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北洋军阀》，中国史学会编，武汉出版社，1990

《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变迁》，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北京，三联书店，1959

《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张伟垣、许林森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布哈林政治传记》，［美］斯蒂芬·F·科恩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孙常炜编著，台北，1986

《长沙工人运动大事记》，王亚文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长沙县、省会近郊区农民运动》，长沙市农民运动调查办公室，1980，油印本

《常德农民运动史略》，常德县农运调查办公室，1980，油印本

《陈布雷回忆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

《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陈独秀传》，任建树、唐宝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陈公博传》，闻少华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陈果夫的一生》，吴相湘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陈果夫先生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影印版

《陈烈士赞贤事略》，赣州各界追悼陈烈士赞贤大会印行，1927

《陈氏族谱（南康）》，出版地不详，1927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陈毅的早年回忆和文稿》，聂元素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陈郁传》，周焱等著，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程潜传》，陈利明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1968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念特刊》，邓士英等著，出版地不详，1927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事》，重庆市政协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陈崇桥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著，台北，1973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大革命时期的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84

《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党史概要》，张其昀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第四军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86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出版社，1989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曾宪林、谭克绳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邓演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邓演达年谱》，丘挺编，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邓演达生平与思想》，丘挺、郭晓春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杜月笙正传》，徐铸成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对华回忆录》，［日］东亚同文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俄蒙回忆录》，毛以亨著，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醴陵县农民运动史略》，醴陵县农运调查办公室，出版地不详，1980

《冯玉祥的一生》，薛立敦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冯玉祥将军》，高兴亚著，北京出版社，1982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上海军学社，出版时间不详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与国民军》，［苏］维·马·普里马科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民国史料编辑社，北平，1933

《冯玉祥传》，简又文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冯玉祥自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奉系军阀密电》，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1986

《奉系军阀密信》，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浮生简述》，王东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

《福建文史资料》，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革命春秋》，郭沫若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革命文献》，罗家伦主编，第12—22、25辑，台北，正中书局

《共产国际大事记》，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郭恒钰著，北京，三联书店，1985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杨云若、杨奎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杨云若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向青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共产国际历史新编》，王礼训等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共产国际人物传记辞典》，［法］布兰科·拉兹齐等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西］费尔南多·克劳丁著，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黄修荣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孙武霞、许俊基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广东文史资料》，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广西文史资料》，广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林锦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广州起义资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广州平社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高承元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

《广州现代化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941）》，张富强等译编，广州出版社，1993

《贵州经济》，张肖梅著，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时间不详

《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王功安、毛磊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国际评论》，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张同新编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史》，文公直著，上海，新光书店，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史》，王云五、李圣五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在上杭》，温长添著，《闽西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记略》，汉口，武汉印书馆，1930

《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韦显文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陈训正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革命史》，邝德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5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革命史》，李守孔著，台北，1965

《国民革命史》，黄修荣著，重庆出版社，1992

《国民革命战史》（第2部），蒋纬国等，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国民革命之危机和我们之错误》，陈公博著，出版地不详，1928

《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初稿》，蒋鸿遇著，朝报社代印，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军史稿》，李泰棻著，出版地不详，1930

《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台北，1964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外交部编，出版地不详，1929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河北文史资料》，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贺龙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衡山农民运动史略》，衡山县、衡东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南党史大事年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湖南省总工会等编，出版地不详，1984

《湖南军事政治概况》，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出版地不详，1926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湖南文史资料》，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黄埔军校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黄绍竑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黄庸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回忆冯玉祥将军》，丘权政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

《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周国强编，上海人民出版

社，1959

《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北京出版社，1982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回忆恽代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回忆张太雷》，丁则勤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吉田茂传》，［日］猪本正道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济南五三惨案》，蒋永敬编，台北，正中书局，1978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纪念黄琪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纪念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

《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加伦在中国》，［苏］卡尔图诺娃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剑桥中华民国史》，［美］费正清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江西党史讲义》，中共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出版地

不详，1984

《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地、时间不详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谢本书、牛鸿宾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蒋介石先生历史及北伐之言论》，新中国社，出版地不详，1927

《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美］柯伟林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蒋逆铁蹄下之东南》，小册子，出版地不详，1927

《蒋先云烈士传略》，蒋忠文执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蒋校长最近之言论》，黄埔军校政治部，出版地不详，1927

《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2册，台北，1986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

《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0

《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九一八事变》，［日］林久治郎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黄逸峰等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军绅政权》，陈志让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

《苦笑录》，陈公博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老兵忆往》，黄杰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李春涛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李大钊的军事活动》，肖裕声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李大钊生平纪年》，韩一德、姚维斗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李大钊先生传》，张次溪编，宣文书店，出版地不详，1951

《李济深诗文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李立三传》（第2版），唐纯良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李烈钧文集》，徐辉琪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李启汉》，林健柏、李致宁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李石曾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1

《李宗仁的一生》，申晓云、李静之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林伯渠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刘少奇革命实践和思想研究》，冯毅著，天津，历史教学社，1988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浏阳县农民运动史纪略》，浏阳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不详，1981

《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王芸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2

《龙云传》，江南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龙云传》，谢本书著，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泸顺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泸州顺庆起义》，陈石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罗易赴华使命》，［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旅广手记》，巴人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马日铲共回忆录》，许克祥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

《马日事变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满铁史资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满洲事变》，［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吴孟霞著，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1992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郭荣生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周开庆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民国人物传》（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北京，中华书局，1978—199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著，出版地不详，1937

《民国史论集》，李国祈著，台北，南天书局，1990

《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杨恺龄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杜恂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南昌起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钮惕生（永建）先生遗札选集》，杨恺龄编，沈云龙主编《近

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26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美］伯纳德·科尔著，重庆出版社，1986

《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彭述之著，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

《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彭述之选集》，香港，十月书屋，1986

《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瞿秋白年谱长编》，姚守中等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瞿秋白思想研究》，丁守和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1

《清党实录》，居正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清党运动》，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1928）》，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9辑，出版时间不详

《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乐炳南著，台北，1988

《日本关东军覆灭记》，［日］岛田俊彦著，沈阳，辽宁教育出

版社，1991

《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日本外交史》，［日］信夫清三郎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日本政治史》（第4卷），［日］信夫清三郎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任弼时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阮啸仙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凤冈及门弟子编，上海，联合书局，1946

《山西文史资料》，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中央档案馆编，199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周尚文、贺世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上海工人运动史》，沈以行等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上海史》，唐振常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上海总商会史》，徐鼎新、钱小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沈阳文史资料》，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省港罢工概观》，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出版地不详，1926

《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邓中夏著，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出版地不详，1926

《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美］巴巴拉·塔奇曼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顺泸起义》，匡珊吉等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双山回忆录》，王凡西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956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四川党史人物传》，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四川军阀史》，匡珊吉、杨光彦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宋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张国忱编，北京，1927

《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谭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祢津正志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土肥原秘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

《托洛茨基评传》，李显荣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外交工作的回忆》，金问泗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美］威罗贝著，北京，三联书店，1957

《外人在华投资》，雷麦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高平叔等著，重庆，中华书局，1944

《万县九五惨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汪精卫评传》，蔡德金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汪精卫言行录》，时希圣编，上海，广益书局，1932

《汪精卫与吴稚晖的论文集》，严勖哉著，上海，新时代书店，1928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杨云若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美］史沫特莱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文史资料出版社版，出版时间不详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我的生平》，［苏］托洛茨基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我杀死了张作霖》，［日］河本大作等著，台北，聚珍书屋，1982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文化供应社，出版地不详，1949

《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马伯援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我与日本七十年》，张群著，台北，1981

《我在六十岁以前》，马敦伦著，北京，三联书店，1983

《我走过的道路》，茅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湖北政法史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

《武汉国民政府史》，刘继增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编辑组，出版地不详，1986

《武汉文史资料》，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

地、时间不详

《吴敬恒述传》，汤承业著，台北，世界书局，1987

《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吴玉章文集》，重庆出版社，1987

《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吴稚晖先生全集》，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台北，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

《西北从军记》，简又文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先驱者的足迹》，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

《湘乡县农民运动纪略》，湘乡县农运调查办公室，出版地不详，1980

《湘潭县农民运动史略》，湘潭县农民运动调查领导小组，出版地不详，1981

《萧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编，出版地不详，1927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陈寿恒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血花惨案》，金平欧、林木艺编，南京，1928

《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杨天石著，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杨森》，马宣伟、肖渡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叶挺研究史料》，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叶挺传》，卢权等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王观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家》，司马璐著，香港，自联出版社，1977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朱其华（雅林）著，新新书局，出版

地、时间不详

《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存粹学社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社辑，上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日本每日新闻社编，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岳阳县农民运动史略》，岳阳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不详，1980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印，昆明，出版时间不详

《云南文史资料选集》，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朱道甫口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苏］克利莫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詹森与中美关系》，张贵永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张静江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2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傅虹霖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张学良文集》，周毅、苑红编，香港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张岳军传略与年谱》，中日关系研究会，台北，1981

《张肇元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张宗昌》，吕伟俊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张作霖》，常城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张作霖和奉系军阀》，王鸿宾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张作霖与日本》，陈鹏仁译，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

《张作霖在东北》，［英］加文·麦柯马克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浙江工人运动史》，浙江省总工会编，单建元执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中共福建地方史》，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989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中国帮会史》，周育民、邵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大革命见闻》，［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大革命史》，华岗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中国大革命史》，王宗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大革命史论》，曾宪林等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苏］巴库林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的军阀政治》，［美］齐锡生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中国革命纪事》，［苏］勃拉戈达托夫著，北京，三联书店，1982

《中国革命史》，［美］伊罗生著，上海，向导书局，1947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瞿秋白著，莫斯科，出版时间不详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贾比才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于俊道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革命最近严重局势之由来》，邓演达著，莫斯科，1927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赵生晖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王健英编，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中国国民党大事典》，陈兴唐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议决案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出版地不详，1941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出版地不详，192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及决议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印，出版地不详，192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史纲》，彦奇、张同新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01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苏］切列潘诺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回忆录》，［苏］达林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4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中国近代纸币》，戴建兵著，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中国农民运动纪事》，高熙著，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中国土地改革史》，赵效民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张秉均著，台北，三军大学印制厂，1977

《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王全营等著，郑州，中原农民出版

社，1989

《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于学文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召唤我》，陈丕士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杨志本主编，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中华民国建国史》（第3编），台北，1989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史论集》，张其昀等著，台北，“国防研究院”，196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1928），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1982

《中华民国史文集》，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出版地不详，198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1926—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北京，中华书局，1984、1985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程道德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台北，1981

《中间地带的革命》，杨奎松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邵玉铭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57

《中苏外交关系》，林军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82

《郑超麟回忆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士第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周雍能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朱德传》，金冲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朱蕴山》，李正西、洪啸涛著，合肥，黄山书社，1988

《株洲农运史略》，株洲市、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不详，1980

《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店，1974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公直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中文报纸

《晨报》，北京

《大公报》，天津、长沙

《革命军日报》，武汉

《广州民国日报》，广州

《国民军政报》，西安

《国民公报》，重庆

《国民日报》，湖南

《汉口民国日报》，武汉

《湖南民报》，长沙

《人民日报》，北京

《民国日报》，上海

《陕西国民日报》，西安

《商报》，上海

《申报》，上海

《盛京时报》，长春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世界日报》，北京

《顺天时报》，天津

《厦声报》，厦门

《新蜀报》，成都

《新闻报》，上海

《新中州报》，郑州

《益世报》，天津

《中南晚报》，上海

《中央日报》，南京

中文期刊

《布尔什维克》，上海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纺织时报》，上海

《革命生活》，武汉

《工人之路》，广州

《广州评论》，广州

《国民公报》，重庆

《国民政府公报》，广州、南京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

《国闻周报》，上海

《黄埔潮周刊》，广州

《湖北政府公报》，武汉

《湖南省政府公报》，长沙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长沙

《江西工人运动史研究资料》，南昌

《教育杂志》，上海

《近代史资料》，北京

《近代中国》，台北

《军事杂志》，北京

《陕西党史资料选辑》，西安

《陕西司法公报》，西安

《四川教育公报》，成都

《外交部公报》，北京

《外交公报》，北京

《向导周报》，上海

《一周时事述评》，上海

《银行月刊》，北京

《银行周报》，上海

《云南公报》，昆明

《战士》，长沙

《政府公报》，北京

《政治周报》，广州

《传记文学》，台北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中国工运史料》，北京

《中国农民》，广州

《中南晚报》，上海

《中外杂志》，台北

《中央半月刊》，上海

《中央政治通讯》，武汉

日文档案文献

日本外務省文書，日本外交史料館

日本外務省文書，縮微膠卷，美国国会図書館

田中義一文書，日本山口県文書館

陸海軍文書，缩微膠卷，美国国会図書館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1840—1945），原書房，東京，1979

日本商工省商務局貿易課：本邦及本邦海外重要相手国貿易統計，1927

中野雅夫編：橋本大佐の手記，東京，1963

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東京原書房，1975

宇垣一成日記，東京みすず書房，1986

芳澤謙吉：外交六十年，東京，1958

佐佐木到一：南方革命勢力の実相と其の批判，極東新信社，北京，1927

松岡洋右：《動く満蒙》，東京先進社，1931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東京乾元社，1956

日文著作

山上金男：浙江財閥論，日本评論社，1938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慶応通信発行所，1980

日本东亚研究所：列国対支投資と支那国際收支，東京，1941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朝日新聞社，1963

（日本）参謀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変出兵史，岩南堂書店，1971

中西功、西里竜夫：武汉における革命と反革命，民主評論社，1948

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86

户川猪佐武：昭和外交五十年，学芸書林，1973

立野信之：昭和軍閥，东京講談社，1963

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時代，東京塙書房，1971

波多野乾一：中国国民党通史，大東出版社，1943

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73

狭間直树編：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

原安三郎：山本條太郎伝記，東京，1942

高倉徹一：田中義一伝記，东京原書房，1981

鹿島守之助、上村伸一等：日本外交史，東京，1958

野沢豊編：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青木書店，1974

野沢豊、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国近現代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

横山宏章：孫中山の革命と政治指導，研文出版，1983

藤井昇三、横山宏章編：孫文と毛沢東の遺産，研文出版，1992

日文报刊

東京日日新聞，1927

英文档案文献

United Kingdom，Foreign Office（F．O．），Series 228，*Consula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 — — — — — F . O . Series 371 , *General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 Public Record Office , London

— — — — — — F . O . Series 405 ,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 Public Record Office , London

— — — — — — F . O . Series 800 , *Private Papers of The Rt . Hon . Sir Austen Chamberlain* , Public Record Office , London

— — — — — — Cabinet : *Cabinet Papets and Conclusions* , *Serieses* 23 , 24 , 25 , Public Record Office , London

— — — — — — Parliament : *Parliamentary Debates* , Series 5 , Public Record Office , London

— — — — — — Parliament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 *China* , 1926 , 1927 , Public Record Office , Lond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partment of State :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 1910-1929 , Micro copyNo . 329 (M329) , National Archives , Washington , D . C . , 1960

— — — — —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1910-1929 , M339 , National Archives , Washington D . C .

— — — — —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 , 1910-1929 , M341 , National Archives , Washington D . C .

— — — —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 1925 , Vol . I ; 1926 , Vol . I ; 1927 ,

Vol . II ;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 Washington D . C . , 1940 , 1941 , 1942 ,

— — — — —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Bureau of the Census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 Washington D . C . , 1975

Butler , Rohan , et a1 . eds .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 1919-1939 , Series 2 , Vol . VIII ,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Office , London , 1960

Canton Custom Office : *Events and Current Rumours* , 1926 , 1927 , Guangdong Province Archives

Commager , Henry S . :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 Prentice-Hall , Inc . , New Jersey , 1973

Julie Lieng-Ying How ,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 ,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 East Asian Institute , Columbia University , New York , 1970-1983

Kuo T'ing-yee , and Morley , J . W . , ed . ,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1862-1927 ; A Checklist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 New york , East Asian Institute , Columbia University , 1965

Mitchell , B . R . ,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2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 *Police Intelligence Summary* , 1926 , 1927 ;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Trotsky，Leon，*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Monad Press，1976

Uyehara，Cecil H.，Comp.，*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okyo Japan，1868-1945，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Congress，Washington，D.C.1954

Woodhead，H.G.W.，*China Year Book*，1928；1929-1930，Tientsin

Young，John，comp.，*Checklist of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Navy，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1868-1945，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59

英文著作

Ash，Robert，*Land Tenure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Kiangsu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ondon：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76

Bamba，Nobuy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New L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1924-1929*.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Kyoto：Minerva Press，1972

Bianco，Lucien，*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Bissom，Thomas Arthur，*Japan in China*. New York：Macmillan，1938

Boorman，Howard L．& Howard，Richard C．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5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

Borg Dorothy，*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Macmillan，1947

Brandt，Conrad，*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Brandt，Conrad，Schwartz，Benjamin and Fairbank，John 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Allen & Unwin 1952

Bubite，Russell D．，*Nelson T．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1925-1941．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8

Burns，Richard Dean and Bennett，Edward M．eds．，*Diplomats in Crisis：U．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1919-1941，Cali．：Santa Barbara，Oxford Press，1974

Carlton，David，*MacDonald versus Henderson：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econd Labour Government*．London：Macmillan，1970

Chan，F．Gilbert and Etzold，Thomas H．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 and London：New Viewpoints，1976

Chapmen，H．Owen，*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6-1927，London：Constable，1928

Cheng，Tien-fang，*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Washington：Public Affairs Press，1957

Chesneaux，Jean，*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Chi，Hsi — 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Chu，Pao-chin，*V．K．Wellington Koo：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1912-1966．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ress，1981

Clark，G．，*Economic Rivalries in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2

Clunin，V．I．，*The Comintern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7，in 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9

Cohen，Warren I．ed．，*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Cohen，Warren I．，*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

Coox，Alvin D．and Conroy，Hilary eds．，*China and Japan；A Search for Balance Since World War I*．Santa Barbara：Clio Press，1978

Davies，John Paton，*Jr．，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

British , Japanese ,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 London : Robson , 1974

Dayer , Robert Allbert , *Bankers and Diplomats in China , 1919-1925 :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 . London , Totowa , NJ : F . Cass , 1981

Dreifort , John E . , *Myopic Grandeur : the Ambivalence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 , 1919-1945 . Kent :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Eastman , Lloyd E . ,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 1927-1937 . Cambridge , Mass .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4

— — — — — — , Jerome Chen , Suzanne Pepper , Lyman P . Van Slyke ,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 1927-1949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llis , L . Ethan . , *Frank B . Kellogg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1925-1929 . New Jersey : New Brunswick , 1961

Eudin , Xenia Joukoff and North , Robert C . ,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 1920-1927 : *A Documentary Survey*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7

Fairbank , John K . ed .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 Cambridge , Mass .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Fairbank , John K . , Edwin O . Reischauer , Albert M . Craig , *East Asia :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 Boston : Houghton , Mifflin & Co . , 1965

Fairbank , John K . , ed ,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 Cambridg , Mass .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4

Ferrell , Robert H . , *Frank B . Kellogg ; Henry L Stimson* (Vol . 11 of*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 ed . R . H . Ferrell) . New York , 1963

Fizgerald , John ed . , *The Nationalists and Chinese Society 1923-1937* : *A Chinese Symposium* . Parkville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1989

Fung , Edmund S . K . ,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 1924-1931 . Hong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Gillin , Donald G . , *Warlord* :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 1911-1949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7

Glunin , V . & Grigoryev , A . :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Far Eastern Affairs* (*Moscow*) , 1989 No . 2 , pp . 78-96

Griswold , A . Whitney ,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 New York : Harcourt , Brace , 1938

Harrison , James P . ,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1921-1972 . New York : Praeger , 1972

Hobart , Alice Tindale , *Within the Walls of Nanking* , London , 1928

Holubnychy，Lydia，*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for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Hofheinz，Roy，Jr．，*The Broken Wave*：*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Hsiao，Tso-liang，*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City vs．Countryside*．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ress，1970

Huang，Philip C．C．，*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Orga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nglish ed，1925-1935

Iriye，Akira，*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Harcourt Brace J．Inc．，New York，1967

——————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Jordan，Donald A．，*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

Kapp，Robert A．，*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Lary，Diana，*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Leong Sow-theng，*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6，Honolulu：Univercity of Hawaii Press，1976

Liu，F．F．，*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Louis，Willam Roger，*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

Macnair，H．F．and Donald F．Lach，*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New York，1955

Martin，Brian G．，*The Green Gang and the Guomindang Polity in Shanghai*，*1927-1939*．Papers on*Far Eastern History*，Vol．42，1990，pp．59-96

McCormack，Gavan，*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China*，*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McDonald，Angus W．Jr．，*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Misselwitz，Henry Francis，*the Dragon Stirs*：*an Sketchbook of China's Kuomintang*，1927-1929，New York，Harbinger House，1941

Nathan，Andrew J．，*Modern China*，*1840-1972*：*an Introduction to Sources and Research Aid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1

Noble，Dennis L．，*The Eagle and the Dragon*：*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 China*，1901-1937．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0

Morton，William F．，*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0

Nish，Ian，ed．，*Anglo-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North，Robert C．*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Stanford Univ．Press，1953

Pollard，Robert T．，*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Macmillan，1933

Powell，John B．，*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1945

Pye，Lucian W．，*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1971

Ransome，Arthur，*The Chinese Puzzle*．London，1927

Remer，Charles F．，*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Baltimore，1935

Sokolsky，George B．，*The Tinder Box of Asia*．New York，1932

Sheridan，James．*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Stemski，Richard，*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Taipei，1979

So，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Hong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Tang，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1930

Tang，Peter S．H．，*Russian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59

Trotter，Ann，*Britain and East Asia*，1923-1937．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Tung，William L．，*China and Foreign Powers*．New York：Oceanic Publisher，1970

Tyau，Min-Chien T．Z．，*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

Shanghai：Kelly & Walsh，1930

Ulyanovsky，T．A．，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9

Valone，Stephen J．，*A Policy Calculated to Benefit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1919-1929．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1

Vishnyakava-Akimova，V．Vladimirovn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Wheeler，Gerald E．，*Prelude to Pearl Harbor*：*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Far East*，1921-1931．Columbia，Mo．，1963

Wilbur，C．Martin，*A Different Kind of Missionary*：*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in the 1920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1988，Vol，21，No．4，pp．3-31

Wilbur，C．Martin，and How，Julie Lien-ying，eds．，*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London：Octagon Books，1972

Wilbur，C．Martin，and How，Julie Lien-ying，eds．，*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Harvard University，1989

Wilbur，C．Martin，*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From Canton to Nanking*，*1923-1928*，*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hap．12，pp．527-720

Wilson，David Clive，*Britain and the Kuomintang，1924-1928：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Official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in Britain and China*．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for Ph．D．，May 1973，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Wright，Stanley F．，*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1843-1930*．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8

Yeh，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a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英文报刊

The Times，London，1926，1927

China Weekly Review，Shanghai，1926，1927

North China Herald，Shanghai，1926，1927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26，1927

North China Star，Tientsin，1926，1927

New York Times，New York，1926，1927

People's Tribune，Hankow，1927

Shanghai Municipal Gazette，Shanghai，1926，192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6-1927

Peking Leader，Peking，1926，1927

俄文档案文献

Акатова Т．Н．，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Революция 1924-1927гг．СБ．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Наука”，1966．

КазаНин М．И．，В штабе Блюхер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одов．“Наука”，1966．

Калялин А．Я．，По незнакомым дорогам．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М，1969．

Кончиц Н．И．，Китай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1925-1926гг．“Наука”，1969．

Крымов А．Г．（Го Шаотан），Историко-мемуарные запис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Наука”，1990г．

Курлюков И．Ф．，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57гг．СБ．документов．“Наука”，1959．

Титаренко М．Л．（Отв．ред．），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Наука”，1986．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д．ред），Сунь Ятсен 1866-1986．К 12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СБ．статей，воспоминаний，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Наука”，1987．

俄文著作

Березный Л．А．，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Китае в период революции 1924-1927гг．Изд-во ЛГУ，1957．

Бродский Р. М., Первый этап китайской нов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1927гг. Моск. унт., 1959.

Глунин В. И.,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Кукушкин К. 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Наука”, 1980.

Делюсин Л. П., Аграрно-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КПК 1921-1928гг. “Наука”, 1972.

Делюсин Л. П., Костяева А. С.,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 в Китае. Проблемы и оценки. “Наука”, 1985.

Жуков В. В., Китай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10-20-е годы XX в. “Наука”, 1988.

Каретина Г. С., Чжан Цэолинь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Китае в 20-е годы XX в. “Наука”, 1984.

Картунова А. И., Политик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рабочем вопросе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гг. “Наука”, 1983.

Костяева А. С.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Союзы в Китае (2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Наука”, 1978.

Малухин А. М., Кита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гг. “Наука”, 1974.

Мамаева Н. Л., Гоминьдан в китйском гражданск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1923-1927гг.), “Наука”, 1991.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гоминьдан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20-30-е годы). “Наука”, 1990.

Осетров А．Ф．，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друг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Китаю（1924-1927гг．），“Наука”，1967．

Писарев А．А．，Гоминьдан и аграрно-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е в 20-30-е годы．“Наука”，1986．

Сапожников Б．Г．，Перва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в Китае．1924-1927гг．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4．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Отв．ред．），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н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1917-1967гг．“Наука”，1968．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Гл．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1917-1927гг．“Наука”，1983．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Гл．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1928-1949гг．“Наука”，1984．

Юрьев М．Ф．，Ролъ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армии на первой этап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ГУ，1952．

Юрьев М．Ф．，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в Китае．“Наука”，1968．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安格联（F．A．Sir Aglen）

奥　尔（N．Aall）

B

巴　顿（Sydney Barton）

白宝山

白崇禧

白川义则

白利安（J．F．Brenan）

白云梯

柏文蔚

班伯理（J．W．Banbury）

包尔温（S．Baldwin）

包惠僧

鲍罗廷（M．M．Бородин ）

鲍毓麟

贝祖贻

本庄繁

俾斯麦（Schonhausen Bismarck）

币原喜重郎

毕　磊

毕庶澄

波　特（Stephen G．Porter）

勃拉戈达托夫（А．В．Благодатов ）

薄书存　见薄一波

薄一波

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 ）

C

财部彪

蔡　畅

蔡　朴

蔡　雄

蔡和森

蔡廷锴

蔡翊唐

蔡元培

曹　锟

曹　渊

曹伯闻

曹明焕

曹汝霖

曹树生

曹万顺

曹燮阳

曹羽仪

柴云陞

常荫槐

常之英

陈　诚

陈　骏

陈　亮

陈　箓

陈　群

陈　铁

陈　威

陈　仪

陈　毅

陈　郁

陈阿堂

陈蔼士　见陈其采

陈葆元

陈抱一

陈璧君

陈伯民

陈达三

陈德麟

陈调元

陈独秀

陈孚木

陈辅国

陈公博

陈公侠

陈光甫

陈国辉

陈果夫

陈海子

陈季良

陈济棠

陈嘉谟

陈嘉祐

陈炯明

陈君起

陈可钰

陈克文

陈兰亭

陈立夫

陈立亚

陈良义

陈烈臣

陈铭枢

陈其采

陈其祥

陈其瑗

陈启修

陈树人

陈为人

陈维新

陈文钊

陈希豪

陈希圣

陈兴亚

陈延年

陈以燊

陈友仁

陈赞贤

陈肇英

成子英

程　潜

程国瑞

程天放

池田长康

出渊胜次

褚辅成

褚民谊

褚玉璞

崔锄人

崔景桂

崔廷献

村冈长太郎

D

大仓喜七郎

大和久义郎

大内畅三

戴　弁

戴　任

戴　岳

戴传贤　见戴季陶

戴季陶

戴维斯（John K．Davis）

戴修瓒

戴学南

邓　匡

邓　培

邓　哲

邓宝珊

邓鹤鸣

邓劼刚

邓懋修

邓如琢

邓绍汾

邓寿荃

邓寿铨　见邓寿荃

邓文辉

邓希贤　见邓小平

邓锡侯

邓小平

邓演达

邓彦华

邓殷藩

邓颖超

邓泽如

邓中夏

蒂　利（John Tilley）

蒂雷尔（E．G．Tyrrell）

佃信夫

丁超然

丁超五

丁春膏

丁济美

丁惟汾

丁文江

东宫铁男

董必武

董福开

董用威　见董必武

董政国

杜伯乾

杜国庠

杜起云

杜锡珪

杜应坤

杜月笙

段祺瑞

段锡朋

段远谋

E

恩克巴图

F

樊钟秀

范鸿劼

范绍曾

范石生

方本仁

方伯务

方鼎英

方尔灏

方绍美

方声涛

方毅威

方永昌

方振武

方志敏

芳泽谦吉

费　慈（J．U．P．Fitzgerald）

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

丰玉玺

酆述庭

冯家骏

冯绍闵

冯天柱

冯轶裴

冯荫西

冯玉祥

冯肇铭

冯治安

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 ）

福田彦助

傅　岩

傅秉常

傅存怀

傅道南

傅惠忠

傅汝钧

傅汝霖

傅筱庵

傅振烈

傅子东　见傅振烈

傅宗耀　见傅筱庵

傅作义

富双英

G

甘布克

甘汉光

甘介侯

甘乃光

冈田启介

高　方

高　斯（Clarence Edward Gauss）

高　义

高汝桐

高维岳

高尾亨

高语罕

格　鲁（Joseph C．Grew）

葛　福（Herbert Goffe）

葛敬恩

耿炳光

弓富魁

龚杰元

古湘芹　见古应芬

古应芬

谷正纲

顾履桂

顾孟馀

顾视高

顾顺章

顾维钧

顾祝同

关得胜

关麟书

光明甫

郭　亮

郭春涛

郭隆真

郭沫若

郭瀛洲

郭振才

H

哈利法克斯（E．R．Halifax）

哈西斯（A．И．Фасис ）

憨玉珍

韩宝华

韩彩凤

韩德元

韩复榘

韩克温

韩麟春

韩麟符

豪　夫（Henry H．Hough）

何　澄

何　键

何　来

何壁辉

何成濬

何赤华

何丰林

何光烈

何海鸣

何金鳌

何其巩

何绍南

何叔衡

何松林　见汪寿华

何香凝

何亚龙　见何澄

何耀全

何应钦

河本大作

贺　龙

贺国光

贺其燊

贺耀组

黑田周一

侯绍裘

胡　瑛

胡公冕

胡汉民

胡焦琴

胡若愚

胡惟德

胡愈之

胡毓坤

胡宗铎

黄　爱

黄　郛

黄　杰

黄　平

黄　实

黄道生

黄复生

黄华表

黄季宽　见黄绍竑

黄剑鸣

黄金荣

黄居素

黄丽生

黄隆生

黄明豪

黄慕颜

黄琪翔

黄乾坤

黄绍竑

黄士衡

黄树埔

黄同仇

黄旭初

黄炎培

黄展云

黄贞元

J

吉鸿昌

吉田茂

汲金纯

戢翼翘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

加　伦（В．К．Блюхер ）

加里宁（М．И．Калинин ）

贾万兴

简琴石

建川美次

江　浩

江董琴

江藤丰二

江心海

江元青

姜济寰

姜明玉

蒋方震

蒋光鼐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先云

蒋雁行

蒋玉麟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尊簋

蒋作宾

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

金石顺

金文泰（C．Clementi）

靳云鹗

靳云鹏

经亨颐

居　正

瞿秋白

K

卡梅伦（J．S．Cameron）

凯洛格（Frank B．Kellogg）

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

康奇茨（Н．И．Кончиц ）

柯　亨（Morris Cohen）

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уская ）

孔　庚

孔繁锦

孔繁蔚

孔祥熙

寇英杰

堀义贵

L

拉狄克（Радек，К．Б．）

赖世璜

赖心辉

蓝呈琪

蓝普森（M．W．Lampson）

蓝腾蛟

蓝文蔚

雷光藩

雷孟强

雷沛涛

雷天壮

冷　欣

黎元洪

李　达

李　林

李　铭

李　森

李　燊

李　鑫

李宝珩

李宝章

李伯东

李春涛

李大钊

李德邻　见李宗仁

李殿臣

李定魁

李凤山

李凤翔

李福林

李富春

李海涛

李汉魂

李汉俊

李鸿文

李虎臣

李济深

李家钰

李嘉仲

李俊义

李立三

李烈钧

李隆建

李禄超

李明瑞

李鸣钟

李培天

李培桐

李品仙

李品芗

李清泉

李庆芳

李任潮　见李济深

李荣植

李尚庸

李生春

李石曾

李世璋

李寿堂

李松风

李维汉

李维新

李筱亭

李选廷

李延年

李彦青

李益之

李佑文

李毓尧

李云杰

李云龙

李藻麟

李章甫

李震瀛

李镇亚

李征凤

李仲公

李仲云

李庄甫

李倬章

李子骏

李子洲

李宗黄

李宗仁

厉式鼎

利利克拉（Lilicrap）

梁　砥

梁六度

梁汝舟

梁士诒

梁寿恺

梁西园

梁永泰

廖划平

廖乾吾　见廖乾五

廖乾五

廖仲恺

列　宁（Ленин，В．И．）

林　钧

林　森

林拔萃

林伯渠

林朝冠

林国赓

林寿昌

林寿国

林修杰

林育南

林志民

林志棠

林祖涵　见林伯渠

铃木贞一

铃木庄六

凌　炳

刘　芬

刘　骥

刘　俊

刘　湘

刘　兴

刘　锠

刘　英

刘　昭

刘　哲

刘　峙

刘宝题

刘丙戌

刘炳喜　见刘丙戌

刘伯承

刘伯坚

刘成勋

刘存厚

刘尔崧

刘芙若

刘含初

刘亨惠

刘鸿逵

刘焕臣

刘积学

刘剑雄

刘九峰

刘清扬

刘日福

刘汝明

刘尚清

刘少奇

刘士林

刘守中

刘体乾

刘文岛

刘文辉

刘文明

刘雪轩

刘一峰

刘玉春

刘郁芬

刘岳峙

刘震寰

刘镇华

刘之元　见刘志元

刘志丹

刘志陆

刘志元

刘重民

刘重威

刘宗纪

刘佐龙

柳亚子

柳直荀

龙　云

卢　汉

卢德铭

卢和生

卢金山

卢师谛

卢香亭

卢兴邦

卢学溥

鲁涤平

陆　沉

陆殿臣

陆更夫

陆沄所

陆宗舆

鹿钟麟

路友于

吕　超

吕竞存

吕渭生

罗　伟

罗　易

罗赫德（Frank P．Lockhart）

罗家伦

罗米那兹（Б．Ломинадзе）

罗绮园

罗时实

罗为雄

罗文幹

罗扬才

罗仪三

罗亦农

罗永泽

罗泽洲

M

麻克类（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

麻振武

马　聪

马　济

马宝珩

马伯援

马鸿逵

马开礼

马克思（Karl Marx）

马迈耶夫（И．К．Мамаев ）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马式材

马文车

马祥斌

马叙伦

麦　耶（Ferdinand L．Mayer）

毛炳文

毛以亨

毛泽东

茅祖权

梅　实

梅发魁

梅杰·内森（Major Nathan）

孟　潇

孟心史

孟昭月

米塔列夫斯基（Металевский ）

米振标

苗培成

缪　斌

缪伯英

缪培南

莫德惠

莫同荣

N

南桂馨

倪　弼

聂荣臻

牛　顿（B．C．Newton）

钮永建

诺　曼（Robert Norman）

诺伊曼（Heinz Neumann）

O

欧登科（W．J．Oudendijk）

欧马利（Owen St．Clair O'Malley）

欧阳魁

欧阳任

P

潘　复

潘谷公

潘汉年

潘鸿钧

潘宜之

潘云超

潘振亚

庞炳勋

庞人铨

逄化文

彭　湃

彭德铨

彭国钧

彭汉章

彭凌霄

彭述之

彭泽民

彭泽湘

彭振国

普拉特（John Pratt）

普赖斯（Ernest B．Price）

Q

漆南薰

齐尔内赫（Черных ）

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 ）

齐燮元

钱大钧

钱新之

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 ）

秦汉三

秦真次

秦祖泽

覃　振

清浦奎吾

琼　斯（Jones，G．）

邱少瑞

邱维震

仇　鳌

屈　武

冉　钧

任弼时

任可澄

任西萍

任应岐

荣　臻

荣宗敬

容保辉

阮啸仙

若槻礼次郎

S

萨莫拉（Summerall，C．P．）

森　恪

山本条太郎

单化民

单姬南

商　震

商文立

邵力子

邵元冲

沈　竞

沈春雨

沈定一

沈鸿慈

沈钧儒

沈钧业

沈彭年

沈瑞麟

沈田莘

沈雁冰

施　英　见赵世炎

施肇基

石　瑛

石敬亭

石青阳

石友三

史华之（Schwartz）

史家麟

史可轩

矢田七太郎

司卑路（F．Hayley Bell）

司凯普（J．H．Kemp）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

松　平

松冈洋右

宋　林　见汪寿华

宋大霈

宋鹤庚

宋梅村

宋庆龄

宋哲元

宋子文

苏兆征

孙　楚

孙　科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宝琦

孙伯助

孙传芳

孙殿英

孙伏园

孙建业

孙连仲

孙良诚

孙世伟

孙祥夫

孙馨远　见孙传芳

孙元良

孙云峰

孙中山

孙宗先

索柯尔斯基（George Ephraim Sokolsky）

T

台克满（Teichman，Eric）

谭道南

谭道源

谭平山

谭庆林

谭曙卿

谭延闿

谭震林

谭植棠

汤　钜

汤尔和

汤峻岩

汤玉麟

唐　鉴

唐　蟒

唐福山

唐继尧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希忭

唐养吾

陶　钧

陶静轩

陶永立

滕代远

藤村义朗

藤田荣介

田颂尧

田维勤

田应璜

田中义一

铁罗尼（Теруни ）

町野武马

童庸生

土肥原贤二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

W

宛希俨

万福麟

汪　东

汪大燮

汪精卫

汪荣宝

汪寿华

王　度

王　均

王　俊

王　鲲

王　淼

王　普

王　祺

王　瀛

王　振

王柏龄

王炳南

王伯群

王宠惠

王东原

王都庆

王尔琢

王法勤

王复生

王荷波

王怀庆

王基永

王金韬

王九龄

王钧荣

王昆仑

王乐平

王良田

王陵基

王龙亭

王秋生

王人文

王绳祖

王士珍

王世杰

王天培

王葳桐

王为蔚

王维城

王晓籁

王一亭

王荫泰

王应榆

王宇椿

王岳生

王占元

王枕心

王正廷

威廉士（C．S．Williams）

韦拔群

韦杵未

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

维经斯基　见吴廷康

卫立煌

魏　炯

魏　楷

魏野畴

魏益三

温建刚

温寿泉

文志文

乌斯曼诺夫（Усманов ）

吴　晋

吴德元

吴殿扬

吴季严

吴敬恒　见吴稚晖

吴俊卿

吴俊陞

吴佩孚

吴平地

吴荣鬯

吴铁城

吴廷康（Г．Н．Войтинский ）

吴文琪

吴锡钟

吴新田

吴倚沧

吴玉章

吴蕴斋

吴之椿

吴稚晖

吴忠信

伍朝枢

伍廷飏

伍文渊

X

西田畊一

奚佐尧

熙　洽

夏　超

夏　威

夏　曦

夏　炎

夏斗寅

夏仁虎

向传义　见向育仁

向育仁

向忠发

项　英

萧楚女

萧佛成

萧劲光

萧人鹄

萧汝霖

萧绍荣

萧翼鲲

小川要之助

小室静

谢　持

谢　杰

谢　晋

谢冰莹

谢承常

谢夫林（А．Лапин ）

谢鸿勋

谢觉哉

谢文炳

谢文锦

谢晓钟

新井龟太郎

邢士廉

邢霆如

熊　斌

熊　锐

熊本开来

熊亨翰

熊式辉

熊四元

修承浩

徐　琛

徐　桴

徐　谦

徐国安

徐国梁

徐鹤仙

徐景唐

徐培根

徐世昌

徐世英

徐特立

徐永昌

徐源泉

许　琨

许宝驹

许崇智

许继慎

许克祥

许仁寿

许苏魂

宣中华

薛　岳

薛笃弼

薛子良

严　重

严春阳

阎崇阶

阎揆要

阎锡山

阎泽溥

阎振山

颜昌杰

颜惠庆

颜景宗

晏容秋

杨　冰

杨　丙

杨　度

杨　虎

杨　杰

杨　森

杨　殷

杨爱源

杨闇公

杨凤山

杨凤韶

杨赓和

杨赓笙

杨海清

杨虎城

杨景山

杨眉山

杨明轩

杨匏安

杨其昌

杨石魂

杨世宁

杨树庄

杨文恺

杨文藻

杨西敏

杨贤江

杨笑天

杨杏佛

杨宇霆

杨镇东

杨致泽

杨仲达

姚　彦

姚　震

叶　琪

叶　挺

叶楚伧

叶德辉

叶定国

叶恭绰

叶剑英

叶开鑫

易萃轩

易礼容

易培基

易纨士（A．H．F．Edwards）

殷嘉祥

殷汝耕

殷汝骊

尹　宽

尹承纲

尹守善

尹松乔

英　华

于　珍

于国翰

于树德

于学忠

于右任

余恺湛

余湘三

余荫森

俞飞鹏

俞诰庆

虞洽卿

宇垣一成

袁　澈

袁葆真

袁大石

袁大煦

袁观澜

袁家谱

袁品文

袁世凯

袁玉冰

袁祖铭

岳尔克（И．С．Иолю ）

岳思寅

岳维峻

恽代英

Z

曾　琦

曾　三

曾华英

曾天壮

曾养甫

曾毓隽

查人伟

斋藤浏

詹大悲

詹金斯（Douglas Jenkins）

张　璧

张　继

张　群

张　毅

张　贞

张　轸

张伯常

张伯华

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张伯伦（Culver Bryant Chamberlain）

张伯岐

张道藩

张定璠

张发奎

张凤岐

张福臣

张国忱

张国焘

张国淦

张国威

张汉藩

张浩原

张厚畹

张淮翰

张嘉璈

张景惠

张敬兮

张静江

张克瑶

张联陞

张茂钦

张难先

张其锽

张其煦

张秋白

张汝骥

张若谷

张曙时

张太雷

张唯一

张维玺

张效坤　见张宗昌

张啸林

张雄舆

张暄初

张学良

张耀曾

张揖兰　见张挹兰

张挹兰

张翼鹏

张荫梧

张应春

张与仁

张泽文

张兆钾

张肇元

张知本

张志谭

张治公

张治中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张柞荫

章　烈

章　培

章　燮

章太炎

赵　镇

赵戴文

赵恩臻

赵福生

赵恒惕

赵墨农

赵丕廉

赵世炎

赵欣伯

赵正平

赵自选

郑　谦

郑　异

郑采臣

郑大章

郑复他

郑俊彦

郑培明

郑延禧

郑泽生

郑振铎

钟　毓

钟祖培

周　斓

周鳌山

周承荧

周恩来

周凤歧

周佛海

周嘉淦

周启刚

周荣光

周士第

周寿臣

周文轩

周文雍

周西成

周学昌

周一志

周以栗

周翼华

周荫人

周勇伢

周予同

周钟岳

周仲良

周仲武

周仲暄

朱　德

朱葆生

朱朝森

朱怀冰

朱晖日

朱季恂

朱霁青

朱家骅

朱克靖

朱培德

朱绍良

朱世贵

朱绶光

朱务善

朱兆莘

朱仲炘

竹下义晴

祝本祥

庄禹梅

邹　鲁

邹敏初

邹鹏振

邹作华

左元白

佐分利贞男

佐佐木到一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七卷
(1928—1932)

曾业英 黄道炫 金以林 等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七卷

（1928-1932）

曾业英　黄道炫　金以林　等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记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历史，主要反映国民党“二次北伐”告成后，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由互争正统和派系利益到联合统治基本确立的过程。上起1928年6月，下迄1932年3月蒋介石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计三年又八个月。

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二次北伐”，6月进占北京，结束了盘踞北京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随后，新疆杨增新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新疆各界议决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以归统一。张学良也于半年后的12月29日，与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等人发表联名通电，表示东北自即日起改易旗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西南川、滇、黔等边远省份的地方军阀如杨森、刘湘、刘文辉、龙云等则早在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发北伐以后即已陆续内附南京国民政府。至此，除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建立的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外，全国已形式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形成了国家的统一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新的中央政权。

尽管这一局面的形成，特别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对蒋介石此后的政治前途意义重大，但并不等于蒋介石已就此确立和稳定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相反，由于国民党“清党”以来的血腥屠杀政策，在严重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重创了国民党自身，蒋介石不仅未能与党内原有派系，如“西山会议”、元老等派系弥合裂痕，又新添了如“第三党”、“改组派”，以及在“二次北伐”过程中形成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内部政治、军事竞争对手，更对其最高统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依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宣言“军政时期”即告结束，此后将进入“整顿与建设”新国家的“训政时期”。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与胡汉民合作，组成五院制政府，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在内政方面，他召开财政会议、经济会议，采取裁军、减少军费支出，统一财政、军政等措施。在外交方面，他由联俄倒向英美，改采与列强妥协的“修订新约”外交政策，而对苏联则不惜唆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发边境战争，遭致全面失败。

蒋介石在国家满目疮痍，人民啼饥号寒之际，提议裁军缩编，减少军费支出，本是应社会需要，得民心之举。但是，他却私心自用，打着“中央”旗号，将国家军队视为私家军，并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急切“横柴入灶”，强力推行损人利己的编遣计划，企图借此削弱同样参加过“二次北伐”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军事集团的实力，因而遭到后者的武力抗争。1929年4月，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首先揭开反蒋战争的序幕。随后，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为求自保也前仆后继，先后起兵。1930年4月，更爆发阎、冯、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阎、冯等不但投入全部兵力，在陇海、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与蒋介石所部展开激战，还与“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依靠职务和资源上的绝对优势，以及“联甲倒乙，拉丙图甲”的策略与攻防结合等战略战术，蒋介石虽然取得讨桂、讨冯、讨张（发奎）、讨唐（生智）和“中原大战”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曾遭其“清党”沉重打击的共产党，在毛泽东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指引下，竟奇迹般地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创建了新型武装——红军和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还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建立了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已成

燎原之势。为此，蒋介石在1930年10月“中原大战”获胜后，随即剑指各地的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他连续三次调集重兵，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不过，此时的中共已不是蒋介石当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时的中共，红军更非阎、冯、桂系等反蒋派的军队可比，蒋介石的三次军事“围剿”，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继续操弄政治，压服异己，就在蒋介石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之时，他又一次亲手为南京国民政府制造了新一轮的政治危机。1931年2月28日，因立法院长胡汉民坚决反对他接过北平“扩大会议”的旗子，假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的名义，进一步个人集权，垄断政权，蒋介石居然罔顾法制，将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总司令部，并于5月5日按期召开所谓“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再次激起国民党内乃至全国舆论的普遍不满，并由此促成国民党内以粤籍人士为主导的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的大联合与限令蒋介石“引退”的局面。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再次向蒋介石汹涌袭来。5月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整顿、扩充武装力量，准备对蒋宣战。7月21日，粤方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9月1日，下达出师讨蒋总动员令。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介石公开宣布粤方反蒋各派系的军队为“叛军”。宁粤之战，一触即发。后因突发“九一八”事变，才意外改变了这一走势。

“九一八”事变，暴露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随之而起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迫使本已剑拔弩张，一心想在战场上一决高低的宁粤双方，不得不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坐到了和平谈判桌前。谈判的焦点是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与统一问题。

经过双方代表一个多月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会谈和讨价还价，11月7日终于在上海达成以下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以示统一；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四届一中全会处理；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由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广州“国民政府”于中央政府改组后“当然取消”；前拟定蒋介石表示下野通电“原稿无须发表”等。依据此项协议，国民党四全大会先后在南京、广州和上海（由广州汪精卫等分裂成员组成）三地分别召开，随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为粤方所逼，不得不辞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让位于新的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所谓“统一合作”政府。

但是，孙科上台后，既未能求得蒋介石的合作，也无法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很快就在“焦头烂额”中倒台。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以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议“接受”孙科辞职，推定汪精卫为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在战时首都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国难当头，各政治、军事派系不得不相互妥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纵横捭阖，再次重掌国民党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被逼下野之耻。

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较为稳定地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联合统治的局面。

本卷主题与梗概，大致如此。所述内容，虽也涉及军事、外交，但只是为了说明相关政治问题，并非专业意义上的军事、外交史研究。因此，总的说来，本卷所述仍基本属于政治史范畴。我们所以如此取舍，一是为了与以记述政治史为主的民国史总体设计保持一致；二是为了尊重历史，因为这一时期历史本身所呈现的主要表征就是政治史；第三，还与我们对政治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

识有关。或许因为前一时期历史学界的研究过于集中于政治史的缘故，有不少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人类文明史、社会生活史、风俗习惯史等方面的研究。衣食住行、祭祀、礼仪、庙会、茶馆、宗族、士绅等等成为一些研究者竞相追逐的时尚，而政治史则明显受到一些人的冷落，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其清除出中学历史课堂，倡导历史教学不要再讲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其实，针对以往历史研究过度突出政治史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改变和侧重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纯属正常现象。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何况历史学家如何选择研究方向，也是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将此类研究与政治史研究对立起来，变成非此即彼、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问题，意欲人为地将政治史从历史本身中抹去，让人误以为没必要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则政治史是客观存在，不是人为抹去得了的；二来平心而论，政治虽属上层建筑，不如经济基础那样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事实早已证明，其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试想，哪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和政治密切相关，不是政治大变动的产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政治史研究，更无理由轻视政治史研究。这可说是我们选择主要写政治史的思想根源。

作为历史著作，自应有一定的学术追求。结合本卷历史特点，我们在编写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学术指导原则：

一是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原则。迄今为止的历史著作，大体可区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即作者对过去的事实本身的记录，一般都比较客观、公允；另一类是作者个人眼中的所谓“事实”，即作者对过去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一般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对历史本身存在或多或少的曲解；第三类是既有对过去事实本身的记录，也有对过去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因而二者的优长和不足皆兼而有之。我们追求的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二

者。为此，本卷对历史本身进行了一些新探索，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张学良“东北易帜”写了张学良对东北军团体利益的维护和追逐；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写了这一事件对国民党自身的重创；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写了地方制度的重建；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写了“赤白对立”；等等。

二是以时间为序的原则。历史的基本概念是时间，今天的事实还暂时不是历史，而前天、昨天的事实就是历史了，可见没有时间概念就没有历史。历史长河中的事物，通过时间概念而定格在一定的水平上，于是就有了事物的发生、发展等变化，有了前因后果的关系。比如，没有蒋介石强推损人利己的编遣计划，就不会有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大规模内战。没有胡汉民的被扣，就不会有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宁粤双方突由准备兵戎相见转向和平谈判，等等。没有时间概念，一切发生、发展皆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因果关系。因此，编写历史，必须严格把握时间概念，否则就不能准确解读历史，就可能出现逻辑混乱，甚至倒果为因等严重背离事实的错误。我们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对本卷总的主题的阐释，还是对各相关问题的阐释皆遵循了这一原则。

三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掌握事实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实际很少有如愿以偿的；实践的结果，往往根本不是先前所预期的，或者不完全是先前所预期的。以本卷所述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为例，其预期目的无疑是希望借此取代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但实践的结果，不但未能如愿以偿，最后反而出人意料地促成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巩固了以蒋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历史运动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力量在行动，而是参与其中的各类人群综合力量的结果，各类人群的力量有大小，但都将对历史运动的最后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而且每种力量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会发生作用力度不同的变化。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欲

取得预期目的，就需克服国内蒋系势力的阻力、内部分裂势力的离心力和国外势力不同方式的干扰，更不能违背一定时期国内民心的取向，等等。在如此众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前后变化不定的条件下，其预期的目的未能如愿以偿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的总和，仅靠单方面的甚至个别的事实是难以掌握真正的真相的。本卷对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事件及其他问题的记述，可说大体遵循了这一原则。

四是揭示历史变迁成因的原则。可能不少研究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聆听学术先进的治学经验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教诲：“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意思是说不仅要研究事物是什么样子，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具体过程怎样等等较为表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轨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具体过程等等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要研究形成这个样子、这个发展轨迹和这个过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是有道理的。主要是研究深层次的原因，难度相对大，解决难题，方显功力，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价值远远超过表象性的研究。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更不是为“宣传”，为贤者讳，为尊者荣，当然也不是为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之类，而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增长智慧，减少盲目，避免失误，以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国家繁荣富强，民众幸福安康。就此而言，研究历史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显然较仅仅作历史表象性研究的价值大得多。所以，我们十分重视学术先进这一教诲，尽可能对“为什么”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本卷各章节中皆有所体现。如不但写了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中央根据地及发展壮大的概况，还特地阐述了何以能在这里发展壮大的原因；又如，不但写了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的种种表现，还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种种原因；等等。

五是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原则。编写历史，与文学创作不同，不能靠“灵感”，任何记述皆须有充分的而且是靠得住的史料的支撑，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想当然。因此，尽可能搜集、研究、利用第一手资料，就成了编写历史著作的基本原则。这是研究者无人不认可的理论共识。为此，我们相对广泛地阅读了这一时期的人物文集、日记、档案汇编、相关文献及各种背景的报刊，其中有国民党办的，有共产党办的；有国民党当权派办的，有国民党在野派办的；有民间人士办的，还有由不同国家为背景的外国人办的，等等。特别是开放不久的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政府档案、陈诚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还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和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国民政府外交档案，以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收藏的档案等未刊资料，均纳入了我们的视野，为本卷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以上是我们编写本书时思考较多，或者说比较在意的一些问题。虽说主观上对这些原则的确有所遵循，但只代表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追求，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并不表示我们做得很好，已无改进必要了。

事实上，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本卷还是有不少疏漏和遗憾的。如在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初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权，实际上也在财政、金融、交通、法制、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出台过一系列政策，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本卷主要写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政权结构及其演变，而对这些政策和措施却基本没有反映。在布局谋篇方面，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畸重畸轻，彼此失衡情况，有些篇幅明显分量不足，有些篇幅又过于臃肿。在资料运用方面，有些地方剪裁不够，略显堆砌，有些地方太过依赖资料说话，缺少应有的解释和分析。在文字表述方面，除了存在时下集体著作风格不一的通病外，还相对缺乏对语言大众化、通俗化和生动化等可读性的追求。虽然，历史著作实证性要求很高，不能不引用史料，更不能以牺牲真实来换取可读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追求和认定无法

追求可读性的理由。事实上，学术著作也同样可以写得生动、活泼，关键在作者是否有此追求。有两个实例，大概可以佐证，一个远在天边，那是法国自然科学家法布尔（1823 - 1915）写的十卷本科学巨著《昆虫记》。此书本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法布尔却把它“写成了优美的散文，让人们不仅能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更能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广学语）。法布尔也因此成了文学家。另一个近在眼前，那就是本所范文澜、蔡美彪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其简洁、隽永、行云流水般的清新文风，是今日众多历史著作无法比拟的。可见，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可读性这个目标也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不过，需在这里向读者致歉的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尚不在此，而是因为付梓在即，对于这些疏漏和遗憾，虽有弥补之心，却已无暇了却，只能留待他日，看是否有机会了。

本卷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京内外、国内外和海峡对岸不少科学文化机构和学者的无私帮助，因所涉机构和人数众多，恕不一一列名了，仅在此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本卷各章节的作者如下：

前　言　曾业英

第一章　曾业英

第二章　王奇生（第一节），黄道炫（第二、第三节，第四节第一、第二、第三目），陈蕴茜（第四节第四目）

第三章　黄道炫（第一节），杨奎松（第二节）

第四章　贺渊（第一节），曾业英（第二节），黄道炫（第三、第四节，第五节第一至三目），金以林（第五节第四目）

第五章　黄道炫

第六章　金以林

第七章　黄道炫（第一节），金以林（第二、第三节）

黄道炫于撰写相关章节之外，还缀辑过某些篇章，搜集、提供了本卷相关图片，编制了人名索引，并做了许多联络协调工作，对本卷的编写和出版，贡献良多。曾业英通读了全部书稿，对本卷主题定位和章节安排及标题作了较大调整和修改，补充、修改了若干章节的部分内容；所撰前言则仅征求过个别作者的意见，未经作者集体讨论；所有这些，如有不妥，均由修改、撰写者负责。

2011年3月20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新疆的归顺
　　一　杨增新率先宣布新疆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二　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第二节　直鲁残军的肃清
　　一　蒋介石决心武力解决直鲁残军
　　二　白崇禧东征直鲁残军的经过
　第三节　“东北易帜”的实现
　　一　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
　　二　张学良未能兑现七月“易帜”的承诺
　　三　蒋介石双十节“易帜”希望的落空
　　四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
　第一节　国民党的蜕变
　　一　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二　国民党组织规模与基础的变化
　　三　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四　社会对国民党的观感
　第二节　“训政”体制与五院制的建立
　　一　“训政”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二　“训政”体制的建立
　　三　国民政府的组成
　　四　五院制的建立
　第三节　地方制度的重建
　　一　省制和省政改革

二　市制和特种地方军政制度的建立
三　县制的改造和创建
第四节　蒋介石巩固最高统治权的努力
一　整顿内部与编遣计划的提出
二　编遣会议的召开与流产
三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四　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外交
第一节　初期外交政策与“修约”外交
一　转向与列强妥协的外交政策
二　寻求各国承认的活动
三　与列强“改订新约”的交涉
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和中苏边境之战
一　中苏关系恶化与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二　中苏交涉的破裂与中断
三　中苏边境之战的爆发与收场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杯葛与争战
第一节　反蒋派自立门户和“人权派”的集结
一　第三党倡言“平民革命”
二　“改组派”以“改组”国民党相号召
三　“人权派”直击国民党的“党治”
第二节　征讨桂系的战争
一　“湘变”与讨桂战争的爆发
二　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与武汉之战的胜利
三　攻防结合与征桂目标的实现
第三节　征讨冯、张、唐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一　蒋、冯矛盾的发展与两次讨冯战争
二　征讨张发奎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三　平定唐生智、石友三之变
第四节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与失败

一　蒋、阎矛盾的加剧与激化
二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
三　陇海、平汉、津浦各路战况
四　北平“扩大会议”的召开
五　东北军入关与阎、冯、桂系的惨败
第五节　争战不断的西南、西北地方割据势力
一　龙云入主滇政及对南京中央的态度
二　贵州桐梓系军阀统治的兴衰
三　四川军阀内战不断与南京中央的倾向
四　甘肃雷、马之变
第五章　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第一节　中共以工农武装割据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一　中共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武装革命
二　中共“六大”的召开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
第二节　苏区的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一　土地革命的开展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二　国共接合部的“赤白对立”和两党的不同态度
三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与红军的壮大
一　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围剿”的发动
二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剿”和失败
三　其他苏区的反“围剿”及中央苏区的壮大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
一　蒋、胡矛盾的发展与胡汉民被扣
二　国民会议的召开与主要议决案
第二节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一　反蒋派系的再度大联合
二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　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二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方针
四　东北军民的抵抗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第二节　宁、粤和谈与合作分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宁、粤为和谈讨价还价
二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三　国民党合作分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与重组
一　蒋介石下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二　“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
三　蒋、汪合流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1928年6月中旬，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奉系军阀退出关外，盘踞北京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新的中央政府。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所取代的仅仅是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北洋军阀残部直鲁联军还在津东滦河一带负隅顽抗，奉系军阀大本营东三省的地方政权仍掌控在“少帅”张学良手中，新疆等省也还挂着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国旗。因此，尽快实现各省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统一，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一节　新疆的归顺

一　杨增新率先宣布新疆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新疆是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以后，第一个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归顺的省份，而做出这一选择的关键人物是时任该省督军兼省长的杨增新。

杨增新，字鼎臣，1864年3月6日（清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云南蒙自县一个官宦之家。1889年中进士，以知县用签派往甘肃任职。1907年被新疆巡抚联魁调入新疆，先任阿克苏兵备道、道尹，后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辛亥革命后，由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自此以后，不管杨增新的官衔名称怎么变化，他始终是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前后主政十七年。

杨增新这时选择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

需要。所谓历史原因，就是他认同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来重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侵犯中国主权。辛亥革命后，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皇俄国的煽动下，于库伦宣布外蒙“独立”，并派兵攻占科布多，威胁阿尔泰特别区。杨增新认为“阿存则新疆可保，阿亡则新疆难以独全”，毅然往援科布多，终于保住了阿尔泰[(1)]。俄国十月革命后，数万被苏俄红军击溃的白俄军及其随军“难民”，窜入新疆伊犁、塔城、喀什等地，杨增新严守中立政策，运用外交智慧，迫使白俄败兵就范，同时与苏联保持和谐的外交关系，订立平等商约，收回种种已失利权[(2)]。对于国内中央政府，杨增新始终抱定“认庙不认神”的态度。袁世凯称帝时，他表示新疆“以拥戴中央为天职”。袁氏垮台后，北京中央政府屡易其主，不管中央当权者是何人，他都表示承认。此外，杨增新还一贯主张政治改良，反对“共产党鼓吹平民革命”。所谓现实需要，就是杨增新这时的恋栈之心，仍不亚于当年。他虽已年过六旬，“塞外皇帝”也连续当了十七年了，虽说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27年就已将子女夫人等家眷送回内地大连，有了一旦在新疆混不下去，就回大连做寓公的打算，但高官厚禄仍是他放不下的情结，“1928年5月间，他派教育厅长刘文龙假道苏联去内地察看风色。后来他看到一些北洋军阀如阎锡山等人归顺了南京，依然保持住旧日的地盘，这就加强了他拖下去看看的念头”[(3)]。这些条件，决定了杨增新除了归顺反共起家的南京国民政府外，很难做出第二种选择。

在南京国民政府方面，首先打新疆地盘主意的是冯玉祥。1927年下半年，冯玉祥控制豫、陕、甘等省以后，就计划向新疆发展。大约1928年2月间，又通过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派赵淼川、徐之赞两名使者，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联络杨增新。但是，杨增新这时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尚不觉得有什么危机，加上当时国内外皆有中国“赤化”，尤以冯玉祥“国民军为甚”的传言[(4)]，杨增新对冯玉祥向新疆发展的企图并不示弱。他“一面封锁边界；一面赶装五百架白布帐篷，架设在星星峡驻军之营房附近。而冯氏中计，按星星峡驻军情况分析

情报，判断新疆有相当兵力，更加以长途戈壁，大军行动不易，乃根本打消向新疆发展的计划”[5]。冯玉祥派往新疆的使者，也一进入星星峡，便被杨增新“软禁起来，秘密解进省城”。冯玉祥如此直接谋求进入新疆的计划受挫后，又转而采取通过南京国民政府达其控制新疆的目的。6月5日，大规模的北伐战事刚刚告一段落，他便迫不及待地在河南开封电陈中央三事，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新疆问题早日解决。这个呈文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冯玉祥驻军西北，不难想象，新疆问题一旦提上议事日程，执行任务的，在他看来，舍我其谁？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人意料，不等南京国民政府拿出解决方案，杨增新就抱持“认庙不认神”的老原则，公开表态服从国民政府了。6月16日，他致电南京，首先解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疆没有“望风响应”，是因该省不仅民族复杂，“苟意见稍有不同，则国防因之动摇”；而且地处边陲，与外蒙、苏联、阿富汗等国接壤，“措置稍有不当，则外邦乘虚而入，后患何堪设想”。后经十余次会议的讨论和研究，齐称新疆地处极边，民气宜静而不宜动，仍以维持现状，保境安民、巩固国防为第一妥当办法。“俟国民政府革命成功，新疆当然一致服从等语。众论佥同，增新未便独异。”最后，他表示：现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新疆各界当经开会议决“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帜，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禀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6]。20日，杨增新又派教育厅长刘文龙亲往南京陈述一切。刘在呈文中，除介绍新疆地理环境、政区划分、民族构成等一般情况外，着重强调了杨增新主新期间的内政、外交政绩，并最后挑明：“民国改元，内省纷扰，无岁无之，杨主席主治新省至今，阅十有七年，以保境安民为职志，苦心维持，领土尚未丧失，各族并庆安局，似乎在上可以对国家，在下可以对人民，并以呈明，想国府诸公当为谅解也。”[7] 显然，杨增新此举的目的，也是为了争取南京政府对他的信任，继续维持他在新疆的地位。27日，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归顺的诚意，同时也借此造成人事安排上的既成事实，杨增新再次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新疆省政府已于“六

月二十日组织成立，以增新、金树仁、徐谦、刘文龙、阎毓善、张正地、樊耀南、屠文沛、李溶为委员，并由增新充任主席，金树仁兼任民政厅长，徐谦兼任财政厅长，刘文龙兼任教育厅长，阎毓善兼任建设厅长，张正地兼任司法厅长，樊耀南兼任外交署长，屠文沛兼任秘书长”。7月1日，杨增新召集地方官绅开会，正式宣布新疆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督办公署改为新疆总司令部，由他本人出任省主席兼总司令职。他在讲话中说其实新疆早就实行三民主义了。他要求大家承认南京中央政府，同时也要承认新疆省政府，他“打个比喻说，比如一个商店，买卖亏了本，破了产，以后把商店的招牌换了，货还是货，买卖还是要做，我们就不能因此不承认这家商店了”[(8)]。听者心里都明白，实际就是要大家承认他的店主身份。4日，杨增新呈明南京中央政府，新疆地方行政已将旧有八道改为八个行政区，分设五十五县、十一分县，县知事改称县长。10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七十八次会议，“决议任命杨增新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理新疆边防事宜”[(9)]。

二　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10日作出的这一决议，事实上只是一项过时的决议，因为杨增新早在三天前就遇刺身亡了。7月7日上午10时，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修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杨增新和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樊耀南、民政厅长金树仁、迪化道尹李溶等及其他“军事长官同莅观礼”。典礼仪式结束后，除金树仁以“簿书旁午”，“即行回署办公”外，其余官员均出席了学校举办的大型午宴。宴席上，杨增新“因国民政府现在实行统一，我新已表示服从，于省于国，皆可乐观，意态甚喜，遂畅饮”。正与李溶猜拳行令之际，“忽闻枪声，一刹那间”，已击中杨增新头部，李溶“即大声呼救”。杨增新副官及侍卫“未及来救”，即被击毙，杨也连中七弹，当即气绝。随后，樊耀南率领二十余人，冲入省政府，占据机要重地三堂，力图控制局面。而“不及与宴”的金树仁闻讯后，又以“锄暴靖乱”为名，调集军警，包围省政

府，“激励兵士，勇猛围攻”樊耀南等人所占三堂，并于下午7时将樊等二十一人捕获，处以极刑[10]。这就是新疆历史上的“七七”政变，因为发生在民国十七年，又称“三七”政变。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新疆法政学校校长、地方审判厅长。辛亥革命后，回到北京国务院任职，1917年被黎元洪任为阿克苏道尹，再次进疆。起初，杨增新怀疑他奉有“相机赶他下台”的使命，曾一度冷落他。但由于自1922年起，他便以迪化道尹之身，同时兼任外交公署署长，1926年又兼任军务厅长，因此，在一般人眼里，樊又是杨增新“手下最红的人”[11]。樊耀南虽说“为人谨慎小心”，但免不了也会对杨增新的所作所为发点牢骚。据当年参加过西北科学考查团，并与樊有过不少接触，关系不错的徐旭生说，樊耀南参加杨7月1日宣布新疆易帜会议后，曾于5日在其寓所抨击杨增新“虽换旗帜，然名为主席而无委员会”，不过是想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保住他的地位，并说“此间隐忧恐未有艾”[12]。金树仁，字德安，1880年（清光绪五年）出生于甘肃省导河县（原名河州，今改称临夏），是杨增新督办甘肃学务时的门生。1917年经杨“约往新疆，襄理边局”，初授“邑令”，1927年“调省使长民政重任”[13]。樊耀南和金树仁十余年来同在新疆为官，又都是杨增新的高级同僚，却因杨展开了一场震惊各方的拼杀。

杨增新为什么这时被杀？或者说谁是这次事件的主谋？当时有三种推测，一是“共产党的阴谋”。南京国民政府就是这样散布的，李烈钧在7月16日国民政府纪念周上说，杨增新“归顺国府，而忽遭意外，我想此事恐又为共党造乱”[14]。日本人也趁机造谣说“杨之受害，系俄党所为”。樊耀南的儿子樊筠青为洗刷其父的责任，更是顺水推舟发表声明，说“必为共党所为，移祸家父”[15]。第二种推测是“内地人的主使”。所谓内地人，实际指的是冯玉祥。这种推测一直延续至今[16]。第三种推测是“新疆省政府的委员争权”。樊耀南及其追随者已于政变当天晚上被金树仁全部处决，当然不可能再对谁是刺杨主谋

问题开口说话了，而最后的胜利者金树仁则一口咬定杨增新“系樊耀南所杀”，但也“有人疑为金氏所为”。对第一种推测，不要说今天，即使当时也没有人相信它有何真实性可言。8月7日，一个署名寄萍的北平师大青年学生就公开发表文章指出，要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我很大胆的说一句，绝对是不会发生的事”。至于第二、第三种推测，虽有点影子，如前所说，冯玉祥的确有染指新疆之心，樊耀南也确在政变前夕向人表示过对杨增新的不满[17]，而金树仁在政变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更难免不让人生疑，但动机和推测毕竟不能代替证据。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也还是个谜。

8日，金树仁以“民政厅长兼临时主席总司令”名义，宣布关闭四门，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得自由出入。9日，他致电南京中央政府，报告杨增新被“乱党”樊耀南戕害经过，并说他“万不得已”，已循军政绅商各界所请，勉就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职，“恳乞速示机宜，以维边局”。而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哈密、吐鲁番回部亲王百数十人，还有迪化商会及各王公各公团各机关，则在这一天分头通电全国各报馆或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中央政府俯顺舆情，速颁明令，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18]。这些电报，显然是金树仁精心安排的，因为集中起来，它们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促使南京政府尽快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马上满足金树仁的要求，这是因为：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完成北伐大业，善后之事，千头万绪，无暇顾及。其次，与出人意料的新疆归顺一样，这次杨增新之变也“是陡如其来的”，难以“在问题当前处置自如”[19]。第三，对金树仁和新疆的了解也尚需时日。南京国民政府于15日首次接到金树仁的电报，17日举行第八十次常会，对金树仁的电报，“曾讨论良久，佥以杨之被刺，内容定必复杂。若照金树仁来电所云，已将乱首伏法，至其刺杨真相，及处决樊耀南之罪状，只字未提，竟取杨之权位而代之，其中不无有蛛丝马迹之可寻”，因而议决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就近

查明真相后再议[20]。至于新疆省的人事安排，经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认为杨增新被刺问题既未查明，自宜暂从缓议。刘郁芬本是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将领，而新疆又如前所说是冯玉祥瞄准的目标，7月上旬，冯还曾对来访的旧部张耀曾说过："我对新疆事早有筹划，不久将请马福祥赴新一行。"[21] 刘郁芬当然不可能成为金树仁猎取权力的支持者。果然，8月22日，刘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说："杨督旧时军队，约在八万以上，省驻约两千余人，由杨直接统带"，"金某本一文吏，肩此重任，而才力复远逊于杨。此后新省多事，内外棘手，恐非金某所能维持……是故今日欲言治新，必须中央派遣才学兼优，声威素著之大员前往，方有建设新新疆之可能。如此种人选一时不易，以目前情形而论，似不如派一老成稳练与负清望之人物，前往收拾，较觉相宜。"[22] 加上如前所说，社会又盛传金树仁也有刺杨嫌疑，金的"转正"要求，自然也就更难落实了。26日，南京国民政府虽给金树仁发了电令，但仅准其以"暂行代理主席"名义，处理善后事宜，维持地方治安。

金树仁对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给回电，本来就"颇为焦急"，曾多次发动蒙、回王公致电南京"请求任命"，指使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为其"刺杨嫌疑"辩护，表示维持新疆治安"非金主席莫属"，要求中央政府"慎勿为奸人谰言所摇惑"。现在回电虽然盼来了，可竟是"暂代主席"，自然更加窝火。他一怒之下，将已受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宣慰使的刘文龙从邮局寄来的这一中央政府"布告"，统统扣下封存，不准"发表"[23]。

金树仁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纠纷渐趋表面化之后。冯玉祥日益明显的经营西北以抗蒋的意图，最终导致了蒋介石放弃拟派马福祥带兵入疆的打算。10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议决以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命金树仁、王之佐、徐谦、刘文龙、阎毓善、李溶为委员，金树仁为主席。随后，又增补陈继善、屠文沛、鲁效祖为委

员，并先后任命屠文沛为秘书长，王之佐、徐谦、刘文龙、阎毓善分别兼任政务、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陈继善为外交部特派迪化交涉员。金树仁的总司令一职，虽然延至三年之后的1931年6月6日，才正式任命并改称边防督办，但就新疆归顺来说，总算暂告一段落了。

新疆地大物博，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看，其归顺的意义，都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节　直鲁残军的肃清

一　蒋介石决心武力解决直鲁残军

张宗昌、褚玉璞直鲁残军，是和平接收京津的遗留问题。1928年6月12日，直鲁残军“约有六七万人”，遵约由天津撤往汉沽至滦县一带，大本营设在唐山裕丰饭店，称直隶军务督办行辕，褚玉璞就驻在这里；王琦任唐山临时警备总司令兼警察厅厅长；许琨任前敌总指挥，“驻在芦台；袁振青驻在开平，于世铭驻在迁安或滦县守备”[24]。

蒋介石对直鲁残军，虽曾于7月15日下达过讨伐令，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负滦河方面军事全责；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负热河方面军事全责；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负责策应左右两路军。但由于平（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北京更名“北平”）奉铁路沿线有英、日等国驻军，张宗昌又得到日本的暗中支持，9月以前实际上并没有采取真正的军事“追剿”行动，而主要依靠和促使已于7月1日表示“决无妨碍统一之意”的张学良将其“收束”出关，以避免发生第二个“济案”。8月5日，蒋介石指示陈调元：“山海关内之直鲁残部处分问题，已点编，克日率领出关，故所有军事行动，即时停止。其东征各军，可暂集中原定地点，以待后命。”[25]

在蒋介石看来，这样做，对张学良是否真心拥护统一，也是个检验。

但是，张学良实际并不希望张、褚直鲁残军退往关外。他屡次拒绝张宗昌请升任其为黑龙江省督办的要求，便说明了这一点。张学良深知张、褚直鲁残军只是奉系的外围部队，军纪一向不佳，而且张宗昌又是个桀骜不驯、难于驾驭之徒，令其退到关外，无异于引狼入室，难保不发生肘腋之变。他认为较为理想的办法还是就地和平编遣。

为此，7月29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表示愿负编遣整理张、褚残军全责，请白暂停东征。白崇禧复电接受张的要求，但希望他能在五星期内解决问题。随后，张学良“电招【召】张宗昌到奉讨论一切，张旋即派褚玉璞到奉与议，经议决第一期暂将该军号称七万众者，遣散两万，其余五万，内有枪者不过二万”，限于四个月内裁至仅存此二万人为止，并当即发给褚玉璞遣散费现洋25万元[26]。但褚玉璞回到唐山后，并未依议行事，直到8月中旬，白崇禧仍未见到直鲁残军的任何编遣迹象。白随即致电张学良，指出张、褚失信，所部盘踞如故，延未改编，要求张学良履行前次承诺，严加督责。张学良于是再次电召张、褚赴奉磋商编遣办法，张宗昌仍拒不出席，仅褚玉璞一人到奉。参加这次会商的还有先期到达奉天的白崇禧代表何千里。据何后来回忆说，褚玉璞曾私下请他转告白崇禧，“能不能约定各守地界，互不相犯”，何当即意识到这是“要和白划界自守，免去后顾之忧，好向奉方讨价发展”，而拒绝了褚的要求[27]。张学良为了说服张、褚接受编遣，表示“此次裁兵，非只限于直鲁军队，即予三省军队，亦决于近期内裁去四分之三，所余军额只御外人不侵凌，及捍卫省境为度”，并允诺可适当追加部分编遣费。他要求直鲁军“裁编为四师，老弱不驯者，悉行淘汰”。希望褚玉璞、张宗昌“交出兵柄，俾呈请国民政府予以其他名义，以为身体自由之保障”。至于他们的个人花费，表示“奉天可以供给”。最后，张学良会同何千里与褚玉璞议定：褚部直军“全部分别遣散，克日实行”。大致办法是增拨褚玉璞

遣散费现洋15万元，按军官每人50元，士兵每人10元分发。计滦河以西“遣散者约一万八千左右，余部再开到滦河以东，陆续裁编，前后结束，留至三旅为止”[28]。从协议中只字未提张宗昌鲁军怎样遣散可以看出，张学良与褚玉璞实际仅达成遣散褚部直军的第一步计划。

为表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诚心拥护，8月21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等北平有关人士，对未能如期速办收束关内直鲁残军一事表示“甚为愧怍”，同时通报他这次与褚玉璞所议定的编遣计划，请白崇禧派监视员二人赴奉会同监督执行。白在与张学良的往复商讨过程中，要求张宗昌、褚玉璞“将芦台、宁河驻军先行撤退，以表诚意”，并派徐承熙、钱承德二人前往奉天监视一切。张宗昌本来就对褚、张所定编遣协议不满，现在又要求他们先从芦台、宁河撤退，自然更加窝火。他与褚玉璞表面复电张学良，“承诺”撤退，而暗中却在节外生枝，借口道路泥泞，大队人马行动困难，要求展限，“期于十日内撤尽，务请健兄（白崇禧字健生）转令所部，俟彼军撤退以后，再行接防，以免赓续跟追，致生误会”。张学良一心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难题，随即转电白崇禧，表示张、褚所请，“尚在情理之中，似颇出于诚意”，“请予谅解”。30日，又分别致电傅作义、何成濬、方本仁等人，并通过何、方转陈蒋介石，称白崇禧所派监视员9月1日可到，一俟双方会同点验后，张、褚直鲁军“即可撤退滦河以东，是此事不日当可告一段落”。请求蒋介石、傅作义等人也能循张、褚所请，展限10日[29]。但是这一次，南京国民政府已没了耐心。31日，白崇禧复电张学良，“大意谓本人奉令担任肃清关内军事，月余以来，停师未进，即因奉方对张、褚残军，允负责收束。讵一再迁延，张、褚仍无悔祸之意。应即撤退滦河以东，听候解决，宽限一层，决难承认”。张学良迫不得已，即电白崇禧，表示“不复过问”张、褚之事，促其从速进剿。张宗昌获知展限10日被拒后，又径自“派代表郑大伟至津”，“图接洽缓攻”，同样是无功而返[30]。

南京国民政府这时转而坚持强硬态度，据白崇禧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驻平办事处长杨杰说，其原因有以下四点："（一）平津华洋杂处，平奉要道，常任一隅之寇，为之梗塞，殊属妨碍国际观瞻；（二）平津食粮，多来自关外，平奉交通断绝，则平津粮食，终有断绝之虞；（三）张学良对所扣车辆，确全放回，但因道梗阻，无法交割，而影响国计民生，殊为重大；（四）以一隅之寇，致数十万大军，常驻平津附近，亦多不便。故白总指挥对张学良之展期要求，不能接受。"[31] 杨杰所讲第一点从中外关系立论，当时平津两地，外国侨民较多，所谓"妨碍国际观瞻"，无非是怕外人因直鲁残军问题久拖不决，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能力失去信心。第二、三点是讲直鲁残军横亘平奉铁路沿线，不但张学良久已答应交回的当日奉军出关时所扣铁路车辆无法通过，影响平奉及其他各铁路的运输，而且平津所赖以生存的关外粮食，也因平奉交通断绝而有告竭之虞。事实上，除了粮食，平津的用煤也是个大问题。据当时舆论指出，平津用煤，受交通、军事之累也很大，"如开滦煤阻于铁道，抚顺煤则又扼于海河，而山西煤产更苦无法运出。查开滦公司本自有机车车皮，专供运煤之用，只以畏惧军队截留，不敢开出。日前曾由平津卫戍总司令部通令沿路驻军，不许截留开滦车辆，然津东未克，车不能通，故开滦之煤，终不能运"。怎么办呢？"根本办法，只有速决津东问题，打通平奉铁路，收回关外车辆"[32]。第四点实际是说，如不尽快解决直鲁残军问题，平津一带数十万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将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因为8月一过，京津地区，寒冬即至，且不说给养问题，即气候一项，也让许多来自湘、桂等南方地区的部队难以适应。

杨杰所言，当然都是实情，但并不全面，尚有几个重要原因，被其有意无意忽略了。首先，南京国民政府这时决心对直鲁残军动武，表明蒋介石对张学良编遣直鲁残军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白崇禧对此有明确说明，他说："直鲁残部，分子复杂，迁延数旬，尚未就范，恐张汉卿难以收拾。若任长此盘踞，殊非得计，故最近（中央及蒋总司令）迭次电催，从速进兵解决。"[33] 其次，还和蒋介石当时所极力

推行的裁军政策有关。京津和平接收后，蒋介石认为统一告成，开始要求各北伐集团军裁军。但直鲁残军一日不消灭，各集团军就有拒绝甚至继续扩军的理由。据当时报载，河北各地云集北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约计五六十万”，“平奉路上有白崇禧部，保定一带有商震部，津东前方有徐永昌部、郑大章部、高桂滋部、陈调元一部，北平附近有张荫梧、方振武部……这些军队所到的地方，仍有强迫招兵，征发给养，且有师旅长委任县知事的”[34]。为打消各集团军的招兵借口，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尽快消灭直鲁残军。最后，也是北方民众，特别是津东地区民众，强烈要求的结果。由于直鲁残军横征暴敛，靡无底止，欲借津东之地，作困兽之斗。因此自7月初起，就不断有津东各县民众，或呈文平津军事当局，或投书各言论机关，请求速即派兵进剿：“（一）于最短期间肃清津东残余军阀。（二）早日完成革命，全国统一。”[35] 以天津《大公报》为代表的平津言论机关，除经常报道直鲁残军的暴虐和民间疾苦外，也不断告诫南京国民政府不可不重视津东问题，甚至说：“近来肃清关内之说，业已搁置不谈，而残军败将盘踞津东者，又迄未闻关外有具体之收拾办法，此方东征各军之刁斗相连者，不进不退，亦足令地方苦于供应，凡此皆可使地方益陷于绝望悲惨之境，适予煽动勾串者以运用之资，此诚北方之大隐忧，其性质严重，未必亚于南方，特觉察之者尚少耳。”[36] 再次，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的需要。蒋介石接受了代表他和白崇禧前往奉天与张学良谈判“东北易帜”问题的方本仁的建议，暂时搁下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问题[37]。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武力解决直鲁残军的抉择。

二　白崇禧东征直鲁残军的经过

白崇禧奉命东征直鲁残军后，迅即将所辖各部分为左翼、右翼及中央三军，左翼以第四集团军李品仙、叶琪、廖磊部为主力，由李品仙任总指挥，沿平榆大道前进，自玉田、遵化进攻丰润；右翼以第三

集团军部队为主力，由徐永昌任总指挥，自北塘沿平奉路前进，直趋唐山；中央一路原由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担任，后因该部追剿樊钟秀建国豫军，奉调南下豫、陕，改由第一集团军范熙绩部担任；后方总预备队由第二集团军刘镇华部负责，分驻宝坻、武清、杨村、廊坊、落垡等地。为避免平奉铁路沿线的外国驻军及侨民节外生枝，再次制造“济南事件”之类的外交问题，白崇禧于9月1日偕少将参议鲍观澄、外交部驻平交际科长刘乃藩，遍访荷兰、美、英、日、意、法、德、葡、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公使、代办，告以此次特访各位公使、代办，除为国际上友谊的拜访外，主要在陈明奉命出征直鲁残军的有关事宜。他着重解释和承诺了以下三事：一、武力解决直鲁残军，已刻不容缓。“关内直鲁残部，军纪不良，骚扰地方，妨碍交通，破坏统一，不独为中国人民之患，即各国寄居天津及平奉线上之侨民，亦不能安居乐业……故最近迭次电催，从速进兵解决”。二、对直鲁残军，有必胜把握。“就军事上而论，直鲁残部，号称四五万人，枪枝不过三万，该军之战斗力，不问可知。故对此次军队之解决，极有把握……最多不出一月，必可肃清，届时津榆交通，必可恢复，此当为中外侨民所共盼望者”。三、当全力保护各国侨民利益。“本军经过各地，对于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自当一体竭力保护，应请转告贵国侨民，安居乐业，毋相惊扰”[(38)]。各国公使及代办对白崇禧的承诺普遍表示“满意”，有的甚至答应“派遣武官随军前进，遇事妥商”。白崇禧运用外交手腕，取得了“免外人之阻碍”的预期效果[(39)]。

9月2日夜，白崇禧出发东征，由北平抵达天津。4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一、右翼徐永昌所部，务于7日以前占领芦台、杨家泊之线后，以主力与中路军联络，由铁路以南地区进攻唐山、开平之侧背，破坏敌人后方铁路，断其退路；奏效后，即向乐亭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二、中路军范熙绩所部，务于7日以前占领宁河、丰台之线后，与右翼军联系，进攻胥各庄与唐山正面之敌；奏效后，即沿铁路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三、左翼李品仙所部，务于8日以前占领丰润至大鹿河之线后，以一部进击榛子镇，

向沙河驿、迁安方面警戒，以主力进攻唐山、开平敌之右侧背。奏效后，即由铁路以北地区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四、第二集团军郑大章、第三集团军孙长胜所部骑兵暂归李品仙指挥，由铁路以北地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警戒我军左侧方，准备袭击向迁安、冷口逃窜之敌。五、各军对于外侨所驻之地及其生命财产，宜保护安全。六、总预备队暂驻天津附近，候军事进展后即向军粮城、芦台前进[40]。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在规劝无效的最后关头，电令胡毓坤部扼守滦河，与白崇禧共同夹击张、褚残部，阻其肆扰出关。

在白崇禧的强大军事压力下，9月6日，直鲁残军纷纷自丰台、宁河、芦台等地退守老庄子、韩城、胥各庄一线，在丰润、唐山等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负隅顽抗。8日拂晓，李品仙督率左翼军魏益三、刘春荣部进攻丰润，激战数小时，逐次击破城外之敌，由东北、西南两门攻入城内，上午10时，占领丰润，残敌向东南方向退却。9日，右翼徐永昌指挥所部占领唐坊、胥各庄，连夜绕袭唐山，守敌惊惶退往洼里、古冶。10日，左、中、右三军胜利会师唐山，白崇禧随即在此召集前敌各重要将领会议，商讨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李品仙指挥西路，进攻滦河，徐永昌指挥东路，攻乐亭”[41]。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张宗昌。11日夜，中、右两军同占开平、榛子镇，12日晨占洼里、古冶。白崇禧亲临前线督战，命令各军乘胜前进，夺取滦州。下午1时，徐永昌部骑兵第三旅首先攻入城内，李品仙部则在城外雷庄车站与敌激战。与此同时，范熙绩部也加入作战。是日夜，滦州完全克复，残敌大部东渡滦河，向东北逃窜，小部分南北两路退往迁安、乐亭，滦河西岸基本为白崇禧东征军所占领。

张、褚残部渡河东窜后，白崇禧因奉军未加阻拦，曾电责张学良失信，违背了当日“夹击”诺言。张学良内部也议论纷纷，困惑不解者有之，大为不满者也有之。为此，张学良一面电复白崇禧，解释这是“因前线见有张宗昌眷属车东开，不便阻止，故尔放行，其部众乃乘机挤过。但奉军现决以武力解决，已命杨宇霆赴前方督战，负责执

行编遣”[42]。一面召集奉天省垣各机关各法团负责人至总司令部，演说他这次准予直鲁军渡河的经过及最后决心。他说：鉴于直鲁军“野蛮性成”，他曾电令胡毓坤军长“扼守滦河”，“嗣据胡军长电询，如张之家眷因败退渡河，可否令渡？本总司令以其末路可悯，复电准予放行，不意该部竟于列车内，满载武装军士，冒充家眷列车。渡河后，立将奉军守桥之一部分军队缴械，并向驻守奉军开枪反抗。胡军长当即返奉面陈经过，并谓张宗昌曾云，可以凭借某种军队，夺还直鲁，恢复当日地盘，汝（指胡）可随我取一致行动等语。本总司令以此冥顽，终难同化，予对彼决不瞻徇私交，贻误大局，此节决请安心。即以现事证之，便可了然，前因江（指黑龙江）省督办一席，张（指张宗昌）自以资格较万（指万福麟）为深，屡请畀伊，予始终未允其请，盖恐其匪军所至，至酿成第二之山东耳，此可见本总司令对张之态度矣。且张部之恶暴，举国共恨。此次决计彻底铲除，只为国家削除大患，预计一星期内可完全解决。请转告商民，俾知此次战事之真相，勿滋疑惧，是为至盼”[43]。张学良一如既往，对这次武力铲除直鲁残军，仍表示要由奉军独力担任。当他得知白崇禧东征军，已有部分部队渡过滦河，追击张、褚残部时，曾不止一次致电白，提出奉军已在石门寨等地与张宗昌残部接火，不日即可肃清，请白电令所部不必过河，由他自行解决。白崇禧有感于张学良已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自应以“新奉天视之，解决直鲁残孽，是奉方立功国家之绝好机会。吾人既不以旧日眼光看奉方，故乐将此种机会与彼”；另一方面也因东征军内部有少数部队（主要是所属冯玉祥第四集团军）与“奉军颇隔阂”，怕引发不必要的“误会”；再加上北戴河、秦皇岛、榆关等地均有“外军屯驻，关系复杂”，万一因此引起“外交纠葛”，更是他担当不起的，于是当即电令各部：未渡河之师，“俱陈兵滦河岸，架桥待渡”，已渡河之师，就地待命，暂勿前进，“河东之事，暂听张学良负责”[44]。

张宗昌见奉方与直鲁军似已无多少调和的余地，失望之余，于9月14日发表抗奉通电，指责张学良“视余等为敌寇，勾连赤贼，向南

请和”，“实背先人（指张作霖）之遗训”，故“不得不还师向奉，与奉军兵戎相见”，并假借名义，将奉军汲金纯、胡毓坤、于学忠等军长列名其中，企图挑拨奉军内部和张学良、白崇禧之间的关系。张学良也针锋相对，于是日通电奉军各军官予以驳斥，指出奉军“对南妥协”，实为“尊重民意”，“避免战争”。“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对于屡次议定之收束（军队）办法，延不实行，及国军进迫，反率队渡河，退踞我军战地。初不解其用意所在，今接来电，始知效坤本意，实欲牵率我军入于漩涡，以偿其拥兵之志愿，及我军不受愚弄，乃一转而为攻奉之谋。其尤可笑者，电尾署名仍将我方军长牵连加入，实则汲、胡、于各军长现正着手将该军解缴武装，何至有列名之事？”但他最后仍幻想通过他与直鲁军之间的个人旧谊来消除战祸，因而委婉表示：“效坤果能觉悟来归，友谊自当如故”，学良“日来所取断然之处置”，“实具不得已之苦衷”[45]。9月17日，张学良还特地发表劝告直鲁将士一文，表示他与直鲁将士“袍泽多年，久同患难”，“对于该军意在保全，并非歧视，该军如能恪遵命令，解缴武装，将来改编以后，仍当留用，即编余之将校，亦悉照募待军官章程办理”[46]。但是，张学良的“个人友谊”，丝毫没有打动张宗昌的心，奉军与直鲁军的战事仍在继续进行。

由于奉军准备不足，白崇禧东征军又应张学良之请暂未加入作战，奉军在战事最初的几天里，明显处于不利地位。9月20日，杨杰向报界记者透露：“关内奉、鲁两军之激战，迄十八日止，奉军确受挫败，张、褚残部作战殊猛，奉军曾一度退北戴河，秦皇岛闻炮声隆隆不绝，一时奉军几有出关之势。”[47] 张学良也不否认这一事实，据当时报载，张学良致白崇禧巧（18日）电，“对安山奉军初战之失利，亦承认不讳，并自述其种种苦心，称为向所未遇之困难”[48]。实际上，9月12日，驻守滦河东岸的奉军胡毓坤部就被直鲁军包围了。据白崇禧此前派往奉天监视改编直鲁残军，并随杨宇霆亲至滦东视察战事的徐承熙当时告诉记者：9月11日夜，直鲁残军在白崇禧东征军的追剿下，纷纷向滦东奉军防区溃退。起初，他们佯称：“将空

车放回滦东，情愿受编，胡毓坤信以为实，未加戒备。后该项空车，到距滦河桥约二里之米各庄车站停车，而东面六列车所藏者，均为作战兵士，并纷向安山附近布置战壕，胡毓坤部遂陷于重围状态。迄十二日上午，张、褚各部完全渡河，并向两翼布置防御，胡毓坤部一时被直鲁军截为三段，无集合之能力，胡毓坤亦被张、褚所包围。胡无法，乃承认与张、褚合作驱张学良，并对张、褚通电签字。”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胡毓坤“列名”张宗昌9月14日抗奉通电的由来。但是暗地里，胡毓坤仍在“安山谋集中攻击（直鲁军）。事被张、褚侦知，以胡合作既无诚意，乃令全军于十三日拂晓向胡军猛烈攻击，胡军第十四师几全军覆没。胡在安山附近之司令部，即被直鲁军重围。旋第八军李振唐部向安山东方增援，亦被直鲁军击溃一旅之众……十四日拂晓，张宗昌亲率所部由大李店绕到安山北方，褚玉璞亦上阵督师，当时势焰颇大”[(49)]。白崇禧见奉军形势吃紧，不忍坐视，除命令原在滦东的陈调元部两师采取必要行动外，又于9月15日调李品仙一部渡河加入滦东作战，夹击直鲁残军。张学良一面命打虎山王树常全军火速入关参战，一面从榆关、昌黎调兵增援。16日，杨宇霆亲临北戴河，督率胡毓坤、于学忠、汲金纯、李振唐等部自东向西发动全面反攻，富双英部自芦龙向南进逼。白崇禧东征军则配合奉军在滦河东岸截击，对安山一带直鲁残军主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经过两日激战，18日，奉军占领安山，直鲁残军完全丧失斗志，纷纷改换门庭，自寻出路。19日，褚玉璞亲至安山，向杨宇霆请求停战，听候改编。21日，张宗昌化装村野匹夫，自朱各庄向滦河东岸下游潜逃。

退守滦东的直鲁残军总计九个师，情愿重新渡河而西，投奔白崇禧东征军者为姚钰、王恩贵、于世铭、祝祥本、张骏、刘振邦部，袁振青部愿归附奉军，方永昌、王琦两部已先在秦皇岛被奉军缴械。为尽快结束战事，白崇禧原拟暂予收容姚钰等六部，准其于9月21日携械渡河。经蒋介石批准，他权委姚钰、王恩贵、于世铭为暂编师长，祝祥本、张骏、刘振邦为副师长，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指定于世铭部驻开平、胥各庄，刘振邦部驻古冶、洼里，王恩贵、张骏部驻雷

庄，祝祥本、姚钰部驻滦州。但很快又发现各该部“军装缺乏，形同乞丐”，本部军队，尚虞饥寒，安有余力供其给养？加上各该部“野性难驯，军纪不良”，渡河以后“又有不稳风传”，特别是蒋介石当时屡以扩军为厉禁，收编乃是蒋系以外各军一大忌，便于22日在滦州召集范熙绩等前线将领开一军事会议，决定于23日晚将各该部悉数缴械遣散，并规定：“兵士每名给资五元，上士十元，尉官二十元，校官五十元，将官二百元。议既定，遂于二十三日晚各处同时包围缴械。当缴械时，张骏、王恩贵两部无甚抵抗，祝祥本部亦尚服从，惟胥各庄之于（世铭）部及古冶、洼里之刘（振邦）部等，抵抗甚烈……胥各庄二十三晚八时开火，十时始平复，国军亦死伤约二百人。”[50] 与此同时，袁振青部也于21日在安山附近被杨宇霆缴械。24日，白崇禧、杨宇霆会晤于滦州桥上杨的专车内，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并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一、各自向上级报告此次战事经过；二、滦州东西的防务问题；三、奉军交还被扣机车车辆问题。至此，白崇禧肃清张、褚直鲁残军的津东滦河之役宣告胜利结束。

第三节　“东北易帜”的实现

一　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

东北三省本是奉系军阀的大本营，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稳固后方。由于张作霖在退守东三省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取而代之成了东三省的新首领。自“京津易帜”以后，如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开始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就社会民众而言，无论关内还是关外，无疑都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大战连年，灾荒频仍，长城内外，满目疮痍；大江南北，民不聊生，人民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了。天津《大公报》为东三省问题所发

的一篇“社评”，可说是这一民情的反映。它说：“全国人士立待正式罢兵，其尚未能者，仅以东省问题未决之故……吾人由人民之地位上，希望东省易帜，及早实现，先使天下罢兵，再办政治善后。”[51] 而另一篇“社评”则更明确指出：“张作霖已逝，目标既失，更无专用兵力之必要，此固人人得而知者。”[52]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里，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领袖和政治领导者，早在“京津易帜”前，就表达过在和平解决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同时，也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5月22日，他指示吴忠信：“奉军如能先行自动出关，则此间不惟不加追击，而且必有推诚相予之表示。”[53] 30日，奉命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孔繁蔚、尹扶一，在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等人达成“奉张出关”等三项协议后[54]，蒋介石、谭延闿回电表示认可，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政务由国民政府处理，奉方要员可加入国民政府”。6月1日，蒋介石见安国军已有必退之势，立即派于济川前往奉方传达三点意见：一、不使东三省为日本保护，致我中国失地；二、从速退出关外，勿守滦河，以免内战；三、如张作霖能下野，则中正本不重权利，亦可下野。又亲笔致函张学良和杨宇霆，吁请“‘爱国革命’，拥护国家统一”[55]。“京津易帜”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意识到张作霖这个奉方内部的最大和平障碍毕竟不复存在了，因而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更加充满了信心。6月26日，他指示阎锡山：“对奉计划，剿抚并施，甚为同意”，原则是“东省政治必受中央派员监督与指挥”[56]。蒋虽说“剿抚并施”，但重点显然在“抚”，“剿”只是为了促“抚”。

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除了上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外，政府方面还有于右任等人[57]；而军队方面则还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阎在“二次北伐”中，就曾与蒋的谋和活动，采取过配合措施[58]。6月中旬，又与白崇禧、商震等人在北京多次会议，“对东北时局，决定采取以政治手段解决”[59]。7月1日，更向蒋介石明确

表示："遵照中央策划，用政治手腕解决东省事。"[60] 李宗仁因社会流传他力主"乘胜出关，完成北伐"，特于6月12日发表通电，全面阐述他的对奉主张："此次奉天炸弹案发生地点，密邇省城，虽动因如何，未得真相，而东三省因此发生极大变故，则无待言。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若再穷追，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故此时如能于军事外别以政治手腕解决，自必有当人心，事半功倍。而奉军经此巨创，度亦无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果其服从党义，效顺中央，似不妨优予包容，即就该地组设政治分会，以整理地方，从事建设，更由中央善为指导，使就范围。既可缩短军事期间，及早完成统一，而举全国人一致对外，尤可团结民族精神，以实现总理遗教。"[61] 李宗仁深刻分析皇姑屯事件对奉军是一次"巨创"，东三省将因此面临严峻的形势："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在此形势下，奉军大体不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倘若继续采取穷追出关，武力解决，不给出路的政策，则"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因此，他主张"别以政治手腕解决"，既得人心，又"事半功倍"。作为李宗仁的主要干将白崇禧，也早在6月11日便已向社会公开表示过：东三省之事，"希望张作霖部下将领自行觉悟，只要服从主义，自可避免战祸"[62]。当然，李、白如此主张，也有不便明言的隐忧，生怕政治解决的结果，奉军这支武装力量又成了蒋介石的"私家军"。7月17日，李宗仁复张学良，隐约透露了这种心情。李宗仁的复电，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现代国家，内政动关外交，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已不适用"；二是"服从三民主义即是自谋生存，与服从个人势力迥然不同，势力之结合属于形式，主义之服从属于精神，属于形式者可暂不可常，属于精神者乃历久不敝"[63]。征诸此前此后，蒋、李多有明争暗斗，李宗仁所言，显然是在暗示张学良切不可效法"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仅为服从蒋介石"个人势力"。

反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主要来自军队和国民党党部两

方面，军队方面主要是冯玉祥及其部属。冯在“二次北伐”中，由于历史的积怨，一直对奉持强硬态度，不但对张作霖所发“息争”通电不以为然，常常斗志“激昂”，对撤退中的安国军“肆意追击”[64]；而且在张作霖离京出关后，仍命所部“为除恶务尽起见，务必乘胜追过京津间一段铁路，向天津东北芦台、宁河一带截击，使敌片甲不归，永绝后患”[65]。所以，奉、蒋代表磋商“京津易帜”步骤时，奉方所提“唯一之要求，即为冯玉祥军队中止北进，以免冲突”[66]。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的武力解决主张几乎始终不变，即使和平大势已定，不便再公开反对时，也没有放弃之意。7月初，日本东方电通社记者问他：“目下东三省问题，当如何解决？”他表示：“对此问题，或武力解决，或政治解决，或与张学良所派代表作妥协交涉等，均非余所能知，一切当服从南京政府之命而行。”又问：“如与东三省妥协，是否以改悬青天白日旗为绝对条件？”他仍拒绝正面回答：“此事亦待国府之命，予并不能言明。”[67] 实际是在外交辞令下，表达他对蒋所持和平态度的不满。而其所部鹿钟麟同时期与另一记者的谈话，虽也因对蒋有所顾忌，说得相当委婉，但毕竟直率多了。记者问鹿钟麟：外间传言东三省问题，“有政治与军事两种办法，究竟如何？鹿答以此事如全用政治手腕，恐怕不行吧。记者问以如全用军事手段，有无窒碍？鹿答我意东三省问题，军事到相当程度时，始以政治手段解决之。”[68] 显然，冯、鹿看重的不是“政治手腕”，而是“军事办法”。在国民党党部方面，主要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国民党奉、吉、黑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迄至7月12日，他们还专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严厉责问：东三省问题，“近忽闻有政治解决之消息，敝会等实大惑不解，不知诸革命伟人，是何心理？论奉系军阀之罪恶，为吾党革命最后之目标。吾党革命四十年，牺牲几许同志之头颅，最后竟与万恶军阀谋妥协，何以对地下诸先烈？更何以自解于国人”？他们表示：“为保全自己之人格，为保全吾党革命之真精神，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69]

但是，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毕竟是

他人无法比拟的。他的决策，虽然常常遇到挑战，却是难以动摇的。对东三省问题的决策也是这样。事实上，皇姑屯炸弹一响，蒋的和平统一方针，就已成竹在胸了。而且，早在6月上旬，他就通过其派往北京的谈判代表孔繁蔚，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了。当有记者问："东三省问题，将用何法解决，用武力耶？抑用政治方法耶？"孔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政府预定计划，以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但张作霖被炸后，东三省已失去一大领袖，继任无相当人物，将来数领袖如张学良、杨宇霆等管辖三省，彼均为奉方之新派。在此外交紧急之中，在政治上恐有合作之可能，惟须服从三民主义，受国民政府节制。倘彼有如此之觉悟，即可不必再藉武力以解决。"[70] 不难想象，孔繁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没有蒋的授意，是不太可能发表这类事关大局的言论的。代表南京联络奉方的参议何成濬当时曾对人说过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6月24日，"奉方有电约彼赴奉，彼未奉命令，不能自主，故未往也"[71]。何因未接到蒋的"命令"，便不敢自作主张，应约前往奉天接洽，孔繁蔚不经蒋授权，就敢于自作主张向记者公开国民政府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大政方针？可见，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早在6月初就确定了，并且一直不为异议所动。

蒋介石如此坚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首先是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正如阎锡山所说："国府之所以欲求避免以武力经营关外者，只为顾虑外交关系之下，并非力有不逮。"[72] 阎所说的"顾虑外交关系"，虽未明指为何国，但当时举国皆知，就是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早就公开声明过，东三省有其特殊利益，北伐战火不能扩大到关外，而且还有"济南惨案"的先例。对奉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只因中日、日俄战争的历史关系，日本在"彼有数万万之投资，二十万之侨民，其政府运命，且往往系于是焉"[73]，蓄意把它变成了对日问题，蒋介石自然有所顾忌。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成员署名文章，对此也有清楚的说明："对奉的正当办法自然是用军队去讨伐，但是我们一用军队去讨伐，日本一定又

要出兵来捣乱。”“因为要避免那疯狗一样的日本政府的凶焰，不得不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东三省政局。”[74] 其次，也是为了贯彻国内施政方针的需要。6月12日，“京津易帜”刚刚实现，蒋介石就审时度势，提出了包括裁军在内的五大施政方针。既要裁军，当然就不便再坚持武力解决了，否则非但裁军不可能，且势必引起新的募兵热潮。诚如当时舆论所言：“若再用武力讨伐，则当此高唱裁兵之时，又未便复作旷日持久之大举。”[75] 最后，关内外民众一致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能不说也是影响蒋介石决策的因素之一，尽管不是主要的。

6月中旬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消息，或公开或秘密地通过各种渠道，纷纷传到张学良的耳边案前。6月16日，阎锡山在京津卫戍司令部召见奉军留京代表邢士廉、于珍，“并面交亲笔函一件，令转达张学良氏。函内大意，力劝奉军将领宜顺应潮流，勿再固执偏见，使地方糜烂”[76]。18日，国民政府委员钮永建也以私人资格致函张学良、杨宇霆，指出：“吾党本先总理之遗教，以建立全民政治为旨归，同是中国人民，苟能幡然憬悟，服从主义，笃守党纲，莫不兼收并致，咸与维新。武力征讨，事非得已，往事俱在，可以复按。执事与部属……若能及时表示，翕然来归，此千秋之业也。如复徘徊歧路，坐昧先机，成则使三省为朝鲜之续，败则致一身蒙覆亡之祸，计虑之拙，孰逾于此，夫岂智如执事者所应出耶。”[77] 此外，蒋作宾、何成濬、方本仁等人都通过不同方式，对张学良做过类似工作。但张学良迟迟没有任何响应的表示。6月20日，他虽然为就任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发表过一个纲领性的施政宣言，却只字未提赞成和平统一与否。诚如当时《盛京时报》的评论所说：今吾读新任奉天军务督办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号日通电，除了已故关外王每次因战败而回，郑重申明其保境安民之志愿，如停止军事，息事宁人；如交邻亲善，共存共荣；如整饬戎政，兵农实边；如实事求是，尊重民意等由来已非一次的“同样之宣言”外，对于“将以如何方法，对待南方势力”这个人人所欲知的问题，仅有“非自他方危

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一语。“至于是否容纳实行和缓他方侵害的危险性之手段，绝不言及。质言之，将绝对否认三民主义到底乎，抑或容认而悬青天白日旗于辽水之滨乎”[78]。岂止如此，他在同日复钮永建电中，甚至将钮的劝导，视为“威武之力”，颇不以为然地说：“今日全师而退，保我乡邦，虽永怀此厌战之心，而亦不甘屈于威武之力，但有正当之解决，自亦无不愿闻。”[79] 可见，张学良此时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并不十分主动，仅愿听听“正当之解决”而已。

张学良暂未对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表态的原因，主要是张作霖被炸后，“内部布置须经时日”[80]，此其一。这虽是邢士廉等谈判代表，对张学良“迟迟”未与蒋介石“接洽”的解释，带有几分开脱之意，倒也大体符合事实。首先，他要及时采取措施，如为张之死保密、部署军事善后、统一内部意志等，以稳定东三省局势，使之不致因张作霖之死而发生动乱。其次，也要为自己回到奉天后的政治出处作出安排。第三，更要考虑与日本的关系问题。第四，还要观察南京国民政府究竟谁能坐稳第一把交椅，“因彼等宗旨随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81]。所有这些，都是“须经时日”的[82]。

其二是不满于蒋介石以武力促和的高压态势。“京津易帜”之前，张学良确曾力主停战议和。据说，5月15日，他还为此特地从前线赶回北京，与“孙传芳、褚玉璞等之强硬论”者“舌战通宵”[83]。但也须指出，和他父亲一样，也是强烈坚持以北伐军停止前进，实行对等的和平为先决条件的。5月中旬，张学良复上海总商会和北京银行公会两电，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两电中，对北伐各军的“弯弓而射之成心”，颇有怨恨地说：“所可慨者，今人日詈军阀，乃口则骂之，黩武穷兵，变本加厉。故非有同等之觉悟，断无实现之和平。”“若同根萁豆，必不相容，则非学良等之所敢知也。”[84] “京津易帜”以后，他在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宣言中强调，只有“他方危害”不“侵及生存”，才“不轻言战事”，而只字不提奉方是否也放弃或和缓侵及他方生存

的“危害”。他在复钮永建电中表示，“不甘屈于威武之力”，都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和延续。

其三是东三省的政治权益，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6月16日，阎锡山让邢士廉、于珍转告张学良的条件是：一、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二、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政府派委员加入；三、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四、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85]。一切大权，操自于我。而张学良向蒋作宾所提出的要求却是以张学良主席政治分会，杨宇霆主席奉天，张作相主席吉林，吴泰来主席黑龙江[86]。两相比较，差距之大，可以想见。正因如此，一向沉稳的张学良，竟在五天后与路透社访员的一次谈话中，表现出情绪失控。据媒体报道：“张氏对国民政府态度能谅解，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根据于平等之和平条件，但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一部分，彼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张氏决定以全力破坏此图谋。”[87]

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另订新约，日本感到要想拒绝南京国民政府修改中日通商条约的要求，并达到“满蒙特殊化”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张学良施压，促其自立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阻止蒋介石和平统一计划的实现。于是，6月25日，田中外相通过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传话给张学良：“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接近态度。”[88] 29日，再命林久治郎转告张：“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甚至警告道：“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89] 但是，张学良毕竟是中国人，而且生来吃软不吃硬，想到晚清以来的亡国之惧，和不久前皇姑屯杀父之仇那一幕，田中的强硬态度，反而促使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7月1日，张学良急电蒋介石等人，说：“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一面以

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90] 张学良此电，尽管也有前提条件，要求蒋也要以大局为重，“同时收束军事”，并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但毕竟首次向蒋介石表达了赞成和平统一之意，说明张自此与蒋达成了共识，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国家根本大计，而正式确定下来了。

二　张学良未能兑现七月“易帜”的承诺

张学良是个说干就干，不尚空谈的人。7月2日，他电告北平何成濬，由他亲自指派的全权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正在大连候船赴平面谒蒋介石，请知会平津军警加以保护。这表明张学良已以实际行动，正式启动东三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谈判。但他同时又是个宁折不弯，不轻易屈服于人的人。3日，蒋介石为“祭告总理，收拾北平军事，解决奉天问题”[91]，邀约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尽早北上到达北平。同日，张学良宣布就任早在6月27日，便已由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选举产生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职。张早不宣布晚不宣布，偏偏在蒋抵平后的同一天宣布，是历史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征诸王树翰等人抵平后，向新闻界公开发表谈话说：“东三省目前确成整个的状况，一切由汉卿指挥，此次赞成统一，亦系各方与汉卿主持，只要事确【实】上不发生困难，定可从容接洽。”[92] 显然，张学良是要借此向蒋介石及世人表明：他现在已是东三省说话算数的“整个”领袖，即统一领袖，不是可以随便轻视的。

其实，蒋介石早就摸清了张学良的心态，所以历来都很照顾张的面子。还在6月中旬，他就通过孔繁蔚表过态，“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绝不会“以征服者待奉军”[93]。7月3日，又通过李烈钧向报界公布“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的三项基本原则，以表达其对奉方宽大为怀之意：“（一）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二）对三省新旧

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三）以公正办法处理东省政务军事。”[94] 张学良全权代表王树翰等人抵达天津后，蒋先是派漆英赴津看望，后又派张品哲促其早日赴平。10日下午抵平时，命方鼎英等百余人前往东站迎接。12日，又在碧云寺先与阎、冯、李等人单独会见[95]。13日，更在中外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当时报界各种有损张学良及奉军尊严的言论，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制止。他说：“刻下奉天代表已来平。自从张学良东电（指7月1日电）发表后，有谓奉方求和，有谓奉方投降，其实这一类的话，皆能引起不好的感想。要知道我们不是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是用主义统一国家的，无论奉方派代表来，或是通电表示，我们为国计民生计，均不能再战，只要大家服从三民主义，同在主义下努力就行了，并不像国际战争，有所谓求和、投降等名词。以后请各位对于奉方代表和通电，不要随便登载，引起他们的恶感来。”[96]

为排除各方干扰，确保和平统一谈判顺利进行，蒋介石刚到北平就推出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实行新闻控制，不许本国新闻媒体随便报道谈判内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办公厅根据蒋的面谕，分函北平新闻界：“关于东三省问题，正在秉中央决定妥善之处置，外人传说纷纭，用意多不可问，本国新闻界对于此问题，宜格外慎重登载，免惑观听。”[97] 他这样做的目的，当事人邵力子曾坦率告诉记者：东省问题，“已嘱各报不必登载，尤其是接洽内容，各报即有所闻，亦不可披露。因日本人正拟设法以【从】中作梗，假使将内容随便揭晓，则日人必大使捣鬼之伎俩也”[98]。蒋介石推出的第二项措施是由蒋亲自主持对奉谈判事宜，他人不得插手。蒋先于7月11日在北平汤山会议上，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提出此项动议，迫使向来主张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冯玉祥不得不承认：“关外的问题，由蒋总司令主持办理。”[99] 然后于13日电告南京谭延闿：“奉方事现由中（正）负责接洽，如有该处代表来京商承者，请转知国府各委员一概拒绝，以免纷歧。”谭随即复电表示：“一切请公主持，专电已示同人，极为赞成。”[100] 蒋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处理东

三省问题的最高主持权。

张、蒋此次和平统一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张学良7月1日通电中提出的“速开国民会议”问题。王树翰等谈判代表抵平后公开声明：这是张学良易帜的前提条件，“前提决定，以后一切自易协商”，并表示他们将按张学良7月1日通电“述明”的“接洽范围”办理[101]。张为何提出这一前提条件呢？首先，国民会议是孙中山1924年北上宣言中首次提出，后又成为其遗嘱中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列的一大政治主张，以此为“易帜”的前提条件，或许不致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其次，张学良行事，向来标榜“尊重民意”，用王树翰等谈判代表的话说：“张总司令年来一切措施，纯以民意为依归。”[102] 国民会议，乃是民意最高机关，“易帜”与否，一旦议决，谁好反对？可以借此让“易帜”反对者闭口。第三，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对“易帜”尚有一层顾虑，诚如他自己所说：“因对外则有某方（指日本）窥伺，对内则新遭大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但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全国一致解决。”[103] 张学良此言，除了表明他希望东三省“易帜”，能经过国民会议这样“一重正式手续”，以示其尊重民意，不给日本干涉以借口外，还透露了他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这样一层心思。怎样才能使“易帜”进程不致“太骤”呢？国民会议自然是最佳选择。因为依据孙中山的设计，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尚须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如此一来，“易帜”进程还快得起来吗？至于张学良何以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征诸后来的事实，可以肯定和他所要求达到的条件不无关系。或许正因如此，张学良这一先决条件，才自始不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受。蒋介石还在北上途中即已宣布：“召集国民会议，不可急剧从事，在第五次中全会当有决定。现在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尚非其时。”[104] 7月4日，阎锡山也表态说：张学良对“三民主义只有服从，无所谓妥协。张请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东三省问题，尤属误会，因全国统一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并非以国民会议来谋统一”。邵力子完全赞成阎的意见：“国民会议须俟统一后召集，非开国民会议后始能统一。”[105] 此后，国

民会议便没了下文，可以肯定是张学良已意识到此路不通，彻底放弃了这一要求。

由于张学良不再坚持速开国民会议为“易帜”的先决条件，谈判随即转入“易帜”条件、何时“易帜”等具体问题的磋商阶段。尽管张学良代表声称“余等此次来平接洽，本无条件”；蒋介石也公开宣布：“现在我们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挂青天白日旗，我们也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明了主义，我们是要他们知道国家有统一的必要，否则名义上虽然统一，而实际仍不统一，是无用的。”[106] 但事实上，条件还是有的，甚至少不了讨价还价。张学良除通过王树翰等人在北平直接与蒋介石接洽外，还在奉天亲与蒋所派代表参谋厅长刘光、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之子张同礼周旋。综合奉天、北平两地所谈，涉及“易帜”条件的问题，总体而言，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四、撤退关内全部奉军。张表示均可办到，但也提出一反要求，“国民革命军不进往关外，东三省兵力照比例裁撤”。分别而论，主要是：一、指示外交机宜问题。张学良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全力办理对日交涉，东三省外交方面由国民政府指示机宜，声称：“只要国府对外交有把握，东北易帜不成问题。”蒋表示：“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二、设立政治分会问题。如前所说，张学良此前就向蒋提出过，“易帜”后须在东三省设立政治分会，并由其亲任主席。对张学良这次旧话重提，蒋同意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并表示“对东北人才特别延揽”。为防口说无凭，张要求蒋明复一电，以安部下之心。三、组织国民党党部问题。张学良以东三省人民未经训练，希望暂缓组织国民党党部，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蒋则拟请周震鳞、田桐、王乃昌、戴季陶等前往指导党务。四、暂停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张学良借口难保不引起全局误会，恳请蒋介石暂停进兵热河，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但遭到蒋的拒绝。7月15日，蒋任命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五、肃清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蒋介石本拟“依照政府计划”，早日肃清关内直鲁残军，张起初也曾同

意由蒋“负责处理”，但后又“声明中央若予以犹豫期间，彼方能设法将该项军队解决”。蒋“为息事宁人计，准予所请”，但限定须于五星期内一律改编，且“仍准备军事，以防不虞”。六、恢复交通和放还铁路车辆问题。蒋要求张学良尽快恢复平奉路通车，并速还平汉、津浦、平绥各路车辆，以利交通。张复电告以代表赴平时，就“曾嘱提议及此……如或虑有不便，亦可分段开车”。至于所扣车辆，也“确允放回”，但又有消息称，“张学良愿还其半，蒋则要求全还”[107]。由此可见，张学良“易帜”，的确“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诚如当时社会舆论所指出：张学良“须以确定东三省地位为前提，决非为三民主义而牺牲一切者”[108]。

对于“易帜”时间，蒋介石当然希望张学良能在其留平期间“立即改帜”[109]，以便借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也为他争夺国民党内部统治权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但张却认为东三省情势特殊，“不能不斟酌环境状况，循序进行”，希望蒋也能据此“斟酌一最快捷最完美方法，俾对内对外均无遗憾”[110]。显然，他并不以立即“易帜”为然，只是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与其达成了热河先于7月19日宣布“易帜”，东三省再于20日发表“易帜”通电的协议[111]。19日，热河都统汤玉麟倒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如期宣布热河“易帜”了。但东三省却未能于20日兑现“易帜”的承诺，原因是19日发生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外相之命，再次警告张学良不可“易帜”事件[112]。为此，21日，张亲电蒋介石，痛呈愧疚：“日方警告情形，迭请代表转达，谅荷察及……通电易帜，弟已承诺在前，独以顾虑桑梓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愧疚实极。”同时表示：“弟此后行动，一以兄为依归，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东省行政方针，当本先总理训政方略，亦步亦趋，为不拘形式之统一。”希望蒋能体谅他暂不“易帜”而为“精神之信徒”的苦衷。为进一步消除蒋对其未能践约的疑心，张还建议蒋于离平返宁途中指定一会面地点，以切商此后进行方法，并表示他“决不惮此一行”[113]。但蒋急需的是“形式之统一”，而不仅仅是“精神之信徒”。他一面以“东

北治安极关重要”，婉言拒绝了张学良的求见之请，表示“俟时局平定，再图嘉会”[114]；一面通过何成濬、刘光转告张：“东三省之存亡，即全中国之存亡，系乎先生今日之举措，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无论如何困难，必以毅力排除，勿稍瞻顾，致误事机。”因为“日人此等举动，非仅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惧别生枝节而犹疑不决，以后将永远受其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国领土，先生亦岂能更有立足之地？若不受其恫吓，毅然易帜通电而以独立之精神出之，则东省为全中国之东省，全国皆将深致崇敬，为先生后援，且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日人未必敢遽肆吞噬。即彼真占据东省，吾人必以全力对日，援助先生，真爱国之英雄，决不患无用武之地也”[115]。在蒋介石的再三催迫下，张学良不得不又一次答应22日为“易帜”之期（后延至24日）。蒋满以为这次总可以如愿以偿了。殊料7月24日，他在寝食不安中苦苦等来的张学良之电却如是说：“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116]至此，蒋已意识到他期盼中的东三省“易帜”是绝无可能在北平看到了，于是一面复电安抚张学良，东三省“惟兄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117]；一面怀着失望和不安的心情于25日离平南下返京。他在日记中写道：“东省未定，关内未清【靖】，而来京开会，汗颜而已。”[118]就在蒋介石离开北平这一天，张学良将东北暂缓“易帜”的决定，告诉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表明他已完全放弃了7月“易帜”的计划。

东三省未能如蒋所愿在其逗留北平期间宣布“易帜”，张学良强调是日本压迫的结果，“如我方不听劝告，（彼）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他信誓旦旦地要蒋相信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弟之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请询君实（刘光字君实）、小岱[119]即可尽知。如再怀疑，并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还说他接到了东京的情报，日本“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于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内政，此种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益立于不

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涉”。这一切都表明田中首相的地位已“行将动摇，我倘于此时予以借口，彼转可借对外问题以延长其政治生命，故为大局计，似不必急此一时”[120]。他详细向蒋报告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所讨论的对付日本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121]。由此看来，张学良暂缓“易帜”也不全是消极的表现，而是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为有利的时机，待坚持强硬对华政策的田中下台以后再行“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诚意不容置疑[122]，诚如其谈判代表所说：固然“不能因日本一纸警告而中止其固定计划，但奉日接壤，关系较切，亦不得不与国民政府及海内贤豪商榷一番”；况且张学良“为东三省之责任人，稍一不慎，未必不演成第二济南惨案，人方寻隙，我当镇静，理势然也”[123]。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暂缓“易帜”也远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单一、纯情。7月23日，他对某报记者的一句真情告白便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易帜“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或当藉日本警告便诚心地进一步与国府早谋妥协”[124]。原来，日本的警告，在张学良眼里，其实也并不那么重要，既然断不会因日本的警告而终止“易帜”，说明他并不那么惧怕日本，既然不会“藉日本警告”，“与国府早谋妥协”，说明他也不那么依赖南京国民政府，更非不少研究者所过分强调的那样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易帜踌躇再三、裹脚不前，还有一个不愿示人，或者说不愿他人发现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同样是左右他抉择“易帜”时机的重要标准，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因为他很明白，他愈是重视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他在该集团内部所获得的支持率就会愈高。

张学良暂缓“易帜”后，其谈判代表随即在北平向新闻媒体声

明："东北此次毅然主张赞成统一，系鉴于中国频年内乱，国将不保，确有速谋团结之必要，并非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此种主张系诚恳的、一致的，外传张辅臣（张作相字辅臣，也作辅丞）、万寿山（万福麟字寿山）颇不赞同，皆离间挑拨文章，别有用意……易帜一事，因精神一致之倾向，迟早总须达到目的。"[125] 意思是要人们相信张学良不是为了"个人地盘与权利"而暂缓"易帜"的，三省内部对"易帜"也没有分歧。这是不打自招，恰恰说明与"个人地盘与权利"有关。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一事所反映的真实意图，一在缓和社会各界对其迟迟不宣布东三省"易帜"的不满情绪，如张学良、汤玉麟派往北平的交涉代表金鼎臣所说："张总司令因外间对彼'易帜'迁缓多持异议，遂决命热河先行'易帜'，以示促成统一之决心。"二在掩饰东三省内部所存在的新旧派系之分。用金鼎臣的话说就是："汤司令及张叙五（张景惠字叙五）、张辅丞与张雨公（张作霖字雨亭）为数十年之患难交，时人号为奉方之旧派。今汤既听张（指张学良）命，服从国府，可见东北对服从国府并无新旧之分。"[126] 而张学良派往北平的一位谈判代表则说得更加坦诚、直率："现热河汤玉麟业已'易帜'，可证东北新旧派之说无稽。"[127]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说，7月15日，蒋已下令进军热河，且部队也已开始向热河前进了。显然，宣布热河"易帜"，不过是阻止蒋介石进军热河，保证这块地盘不致落入南京国民政府之手的应急措施。这是整个东三省"易帜"谈判中，张学良始终坚持不放的条件。据金鼎臣说，他此次赴平所负首要任务，就是向有关方面说明"热河既已换旗……希望国府以同化者看待，勿再对热进兵"[128]。如此看来，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其实不过是个借此巧妙控制热河的骗局。而且，还是个早在张学良派出王树翰等四人赴平谈判之前就已设计好了的骗局。据徐祖贻说：他们赴平谈判之前，在张学良召集的一次对策协商会上，张作相就提出了这一策略和建议："当力促关内汤阁丞（汤玉麟字阁丞）先服从国府，以示真诚。"[129] 这是张学良此时放弃东三省"易帜"计划的根本原因，说穿了就是还有太多的内

部矛盾需要时间来协调，还有太多的包括他本人的权利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需要时间来维护。正如当时一个自称“彬彬”的《中央日报》记者所说：“小张所虑青白（指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一挂，委员之任命，党部之组织，均由中央主持，己之权力，势将剥夺，非将此层说妥，得有相当之保证，未肯高悬青白，皈依党国。”[130] 可见，张学良暂缓7月“易帜”计划，固然有日本警告的客观原因，而张学良“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原因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张学良在当时的中日两国三方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竟敢如此大胆地向蒋讨价还价，不能不说与他对中日两国三方格局的正确把握和对蒋介石、日本田中义一方面的细微体察是分不开的。他清醒地看到，他与蒋及田中之间虽然存在利害冲突，但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蒋介石企图实现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要求张学良从速“易帜”，这是矛盾的一面。但是，东三省问题，实际又是个对日问题，因为日本在此拥有许多不愿放弃的特权[13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自知得罪不起日本，要想解决东三省问题，便不能不寻求张学良的合作，于是他们之间又有了相互依赖的一面。用蒋介石的话说：“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如一开，将不可收拾矣。总理所谓和平统一，吾必以至诚，力促奉军将领觉悟，欣然而来归也。”[132] 为此，当张学良派代表赴平“表示诚心服从中央及国府”时，蒋则答以“如能乐意服从本党，统一中国，甚佳。如系勉强，仅形式统一，不如待瓜熟蒂落”[133]。张学良从中感悟出，蒋介石是在暗示他东三省“易帜”必须自觉自愿，“欣然来归”，不要让人觉得“勉强”，是他人逼出来的。而蒋这样做的目的又在于告诉田中：东三省“易帜”是张学良的“觉悟”，非我所逼，你日本不要借口挑起“东亚战祸”。隐隐透出蒋介石对日本干涉的几分惧怕。正是这种惧怕和期待，使张学良意识到，在蒋介石面前，他并不处于绝对弱势，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日本对蒋的牵制，转化为强者。

至于田中义一的心思，张学良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如前所说，蒋介石在追求统一的同时，又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势必就要威胁到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他既然赞成东三省“易帜”，自然就和蒋介石一样，也成了田中的对立面，诚如当时的日日社记者所论：“日人之阻止奉方易帜之内幕，实虑国府外交政策行之于东省，深恐于日本所得之特殊权利，有若何之损失。”[134] 但是，张学良也了解，田中这时的目的，毕竟还只限于维护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7月16日，林久治郎便亲口向他表示过：如果他愿意遵守有关铁路和其他日本权利的条约条款，那么即使他加入了国民政府，日本也会保证支持他[135]。很明显，他与田中虽有矛盾和争斗，但同样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而且，张学良还亲身体验到，田中这时对东三省“易帜”，虽然气势汹汹，态度强硬，却又在挑拨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要蒋相信他没有向张施压，东三省未能践约“易帜”不是他的责任。用他自己对蒋的话来说就是：“日方近来手段对东则施以压迫，对尊处则又极力掩饰，既以淆乱欧美之耳目，又以离间我辈之交情。”[136] 这一事实，让张学良意识到，田中对东三省“易帜”的干涉，也是底气不足的，他在维护奉系军事集团的地盘和权利方面，不仅有利用日本的必要，而且还有利用的可能。这就是张学良敢于以弱势之方，与蒋较劲的动力。

三　蒋介石双十节“易帜”希望的落空

蒋介石7月“易帜”计划受挫，田中大受鼓舞，自觉其压张逼蒋让步的政策，已初见成效，于是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利用张学良为其父举办葬礼之机，加大对张的施压力度。8月4日，他所派特使林权助男爵，衔命到达奉天。6日，向张递交所携田中信件，田中在信中明确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与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137]。张作霖葬礼结束后，林权助又两次会晤张学良，重申田中的强硬态度。特别是9日的会晤，尽管张学良小心翼翼地“致谢此次吊丧盛意，并表示此后奉日关系益亲，愿本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实现东三

省和平经济政策”。但林仍然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即发言道：“屡次传达帝国政府对南北统一反对意志，谅已谅解日本意向所在。总之，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既得权利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今劝汝暂观望形势为妥，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此刻请汝毅然决然，行其所是，勿为浮言所动。”与林权助一起会晤张的林久治郎甚至恫吓说：“简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奉方与国府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请为三思。”[138] 张学良虽未当场示弱，表示其不能背弃三省人民的心愿，而自行其是，但权衡再三，还是不顾7月31日刚刚向蒋介石承诺过：“弟将丧事（指将于8月7日举行的其父的葬礼）办完，自必对国府有表示，决不有负我兄之意也。”[139] 经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讨论、议决，于10日再次派代表刘哲通知日方，东三省“易帜”继续延期，并且不是一般的延期，而是长达“三个月”[140]。

张学良一再延期“易帜”，给蒋介石和他本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蒋方内部，如前所述，本来就存在一股主张武力讨伐，反对政治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这股反对势力即使在蒋、张7月“易帜”谈判的蜜月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7月15日，他们以东三省特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声称“本党誓师北伐，志在消灭军阀，铲除一切反动势力，建设三民主义国家”。可是，“近者张逆学良，杨逆宇霆，复拟定由三省保安联合会，产生东三省军政长，由三省硕学鸿儒会，产生东三省民政长，总管三省军政民政，添设兵工初级高级中学，招收吉、黑土匪，从事扩充军备。观其目前之布置，断无归附之诚心，所派来平之代表，完全以探索实况为主衷。亟望本党忠实领袖，勿为所惑，致铸百年大错，并语专事投机，到处拉拢之革命伟人，息其欲念，免为本党遗臭，设对誓与本党为敌之军阀而可言和，则何人不可妥协？”[141] 矛头直指张学良和蒋介石（所谓“革命伟人”）。张学良宣布暂缓“易帜”，似乎验证了他们的预见，自然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武力讨伐立场。据当时电通社消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

曾向有关方面“报告与奉方磋商统一之经过，蒋声言奉派确有诚意，遂将其所带南下之张学良等亲笔手书若干通，同时披露，一部分人员，悉已谅解。昨尚有认为不能满足者，谓须具备下列三条件，方可承认其有诚意：（一）要求张学良即日通电遵守三民主义；（二）改悬党旗，实行组织政治分会，人选不能限于东三省籍人；（三）表示排斥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及安福系、交通系等”[142]。

至于社会舆论的指摘就更不绝于耳了。当时的新闻媒体，特别是京、津两地的民间报纸，多不以张、蒋的表现为然。8月8日，北平的《京报》就曾公开表态说：本报“不赞成蒙头盖脸之张学良已有诚意，不日即可解决的空头宣传”[143]。它们认为张派邢士廉等人到平与蒋、阎、李（宗仁）等要人晤谈，“虚空之成分为多”。对他将延缓“易帜”的责任，通通诿于日人极为不满，“苟有服从国府诚意，则对于日方不相干之劝告，本可不惜意”，如“放还车辆，此与外交无关，不能诿为日人不许，而完全为张学良权力所及者也”[144]。它们认为张学良此举，不过是“假日本提出警告之机，以泯其毁约之迹”，是“躲在外交幌子之下，谋与国府及日本双方之谅解而生存”[145]。它们揭露“自中央决定对热河用兵后……汤则电请张学良派兵援助，张乃派遣于芷山、戢翼翘两军先后来热。于军驻平泉，戢军驻凌源，准备在古北口外，以图抵抗国军”[146]。指证“吉（林）、黑（龙江）两省当局曾向张请示应否易帜，张答以暂缓。又三省可以易帜空气传播后，颇有从事活动者，张特通令各县，如有组织党部者，可以共党论，均随地正法”[147]。对于蒋介石7月初所采取的新闻控制政策也多持异议，如北平《京报》就公开说过：“本报一向谅解政府慎重之苦心，但可声明者，例如邢士廉等到北平，其时当局即传谕各报勿登载，实则邢等来平，既非军事，又非外交，本无何等关系。其结果外报尽行发表，而禁华报登载……凡此办法，概为未当。至日本林权助到奉，张学良任用何人之新闻，亦被抽除（八月六日本报空白），则尤使爱国者大惑不解者也。”它坚决主张：“党国之新闻纸，一不必讳言日本田中内阁侵略之政策，二不必讳言奉天军阀内部之问题，苟并

此而亦讳言之，是蔽聪塞明，而自谓革命已成功也。”[148]

但是，不管内外政治压力多大，无论蒋还是张都没有动摇和平统一的信念。蒋虽然不满意于张学良迁就日本，拖延“易帜”，警告他：“如对日作进一步表示之电，此乃无异卖国而说价也，当慎重注意，勿自惶惑。”[149] 还拒绝了张所提停止热河军事行动的请求，指示白崇禧：前方部队中止前进的底线，是张学良让出热河[150]。但这一切并没影响他在南京继续会见张学良所派代表吕荣寰，也没影响他指派方本仁、何千里为他和白崇禧的代表，前往奉天与张学良继续进行“易帜”谈判。而张学良虽则仍然坚持“东省情形较异，（易帜）不能不稍俟迟徊”，甚至向8月3日刚刚抵达奉天的方本仁表示，东三省“易帜”须分三步走，“第一步停止热河、关内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收编给饷；第二步，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第三步，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成立”[151]。但却频频致电蒋介石等人，解释“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不过是流言蜚语，说他“年未三十，来日方长，为政治人格前途计，岂肯自丧其信行”，表示“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152]。且采取实际行动，无罪释放了四五月间在保定、石家庄一带拘捕的“国民党员及国军便衣队等嫌疑者”钟少梅、白国庆等13人，主动命令热河前线与蒋军发生冲突的奉军“向后移动”，等等[153]。这些情况，足可说明张学良同样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之意。无怪乎北平的白崇禧、何成濬等人，在接到方本仁、何千里与张学良接洽的有关报告后，会认为“当有继续维持政治手腕解决东省问题原议之可能”了[154]。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蒋介石派往奉天的代表，一直在探求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他们发现实际就在热河问题上。据林权助访奉时奉蒋之命赴奉了解情况的郭同说，他先后接触过军界如杨宇霆、孙传芳等，绅界如袁金铠、刘尚清等，吉、黑省议会议长如孙鹤皋等，张学良之左右如郑谦、朱光沐等，政客如罗文幹、孔昭焱等，以及东北大

学之教职员和商会会长之类的人物，感到张学良现时确能统一东三省，惟其左右对南隔阂犹存，多主保境待机[155]。这也证实了当时新闻媒体的传言不虚，在东三省内部的确存在新旧派之分，而这些人几乎又都是张学良的父执，也就是新闻媒体所说的旧派。据方本仁、何千里报告，恰恰是张的父执们多昧于大势，对方振武左路军进兵热河和张学良不能谅解。他们责备张学良亲南，令张苦于应付，惟以攻“热区”为目标的左路军暂停前进，始能释然。为此，方本仁建议蒋介石，对于热河问题不宜操之过急，纵张学良允诺让出，其内部也必生怀疑，于统一不无妨碍。当前要务是“实现易帜统一当较热河问题为重，以军事而言，则解决直鲁残部较热河问题为先”[156]。方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况且直鲁残军的解决也须张学良的协力和配合。征诸后来的事实，蒋介石显然是接受了方本仁的建议，将原拟热河问题与直鲁残军问题一揽子解决的计划一分为二，暂时搁下了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被热河问题困扰多时的张学良的响应和协助。

细察张学良在南京国民政府征剿直鲁残军战事中的表现，诚如台北学者司马桑敦所说：“不但参与了，而且负责打了一个硬仗。”[157]需要略作修正的是，如前文第二节所说，这个“硬仗”并不是奉军单方面“负责”打的，而是与白崇禧东征军共同打的，至于滦河西岸各役，则根本与奉军无关。张学良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仅仅是个无法控制事态发展的配角。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计划不是他提出和决定的，承诺“夹击”直鲁残军完全是他的和平编遣计划破产的结果，最后的“硬仗”更是张、褚公开攻奉逼出来的，他惟一主动想做的，就是由他独负解决直鲁残军全责，阻止白崇禧东征军东渡滦河，控制事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关内直鲁残军解决后，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即将来临，如果张学良能在此之前宣布东三省“易帜”，不但会给即将于“双十节”开始“训政”新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平添几分喜庆色彩，还将使蒋介石的“统

一”心愿得到最大的满足。为此，9月25日，蒋再次向邢士廉提出尽快“易帜”，且希望能在“双十节”以前宣布。尽管当时的南北舆论，仍对张学良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充满不信任，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是否诚意服从国府》的署名文章，说张学良声称服从国府，乃迁延至今，“易帜”尚未实现。“而张氏最近的种种行动，尤足令人怀疑”。对张氏近日行动，该文列举了包括某些不尽符合事实的传闻在内的五种：一是始终要维持汤玉麟在热河的地位，“以保存他在热河方面的势力”；二是几经交涉，仍拒绝交还“关内各路的车辆”；三是自直鲁残部解决后，白崇禧等人屡次提出“奉方军队应即全部退出关外，滦东各地应由国军接防”，却“始终无具体答复”；四是听说还借参加解决直鲁残部有功，索要报酬，“请将关内昌黎等数县划归他做地盘”；五是听说邢士廉在活动“张氏加入国府会议为委员”[158]。北平的《京报》也发表评论说，张学良以张、褚为“节礼”，送与国府，“吾人之意，终嫌其太菲。盖北方唯一不冻之秦皇岛，北平唯一建瓴的屏障之热河，尚须声明归奉方所有，而不肯以为节礼，毋乃太吝乎”[159]？但是，为了如期实现统一夙愿，蒋介石还是在10月8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七十三次会上，提出了加推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动议。他加推张为国府委员的理由是：“东三省乃中华民国的领土，并非国际间特别的地方。过去的一切，追求【究】无益，便不必追【究】。目前张委员对于中央，已经一再输诚，实在因为有困难，所以形式上极难有所表示。中央为顾全统一，为使当事人不能再有所规遽【避】躲闪，为给国际上一个明白的表示，不能不马上把东三省看得和其他各省一样，以公正的态度，统一的精神，加推委员入国民政府。”蒋的提议，遭到中央政治会议中不少人的反对，“有人怀疑：张委员是否同志？张委员对于中央，目前形式上固然不够，但是精神上是否已够？有许多为党国努力多年，劳苦功高，政治上的资望能力，俱属不弱，足为国府委员的人，皆未经加推，而独加推张委员，似乎说不过去。应该郑重从事，严格考求，以表现国府委员的地位如何重要，人选如何精确，然后政府的威信才能彰著。又有人主张张委员虽可加推，但宜先令其形式上有所表示，

然后在中央方面，庶几有辞可借”。如此讨论几个小时，仍不能决定。后经主席谭延闿解释这是“蒋同志”的主张，并电请蒋介石立即赴会，作了如下说明后，才取得大家的谅解，表决通过：“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乃统一之中所必须有的。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我们要问：统一的中华民国中，究竟包含不包含东三省的地方在内？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指日本）少一些借口；要使东三省的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一般同志，见不及此，暂时的不谅不满，是一定难免的。但是这件事的关系很大，久后一般同志对于事情的本身如果明白了，对于我们目前的如此决议，一定也会谅解的。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并且现在只该问这件事应不应当实现，如果应当实现的，中央自有中央的权衡，径自决定去做好了；如果不应当，便决定不做，不必犹豫狐疑，更不必打电报去征询意见作种种的先容，中央惟有取至公至诚的态度而已。”(160) 可见，蒋介石在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的过程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他不依不挠，力排众议，坚持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一方面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宣言，“我们确已统一”，使日本“少一些借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消张学良的“观望心思”，逼其尽快“易帜”。在蒋看来，既已是国府委员，便没了“回旋的余地”，想“规避躲闪”，也不可能了。万一不行，他也还有一手，“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其良苦用心，的确非一般人所能见及。这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

张学良被加推为国府委员后，蒋介石当日即告诉了张，定于“双十节”举行受任礼，请同时受任，惟“易帜”一事，只字未提。第二天，张学良复电表示：“届时请加列贱名，宣布就任。”(161) 这样，张学良就在事实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东三省只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东三省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只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了。蒋介石意识到事态正沿着他预设的方向发展，随即

向张提出了“易帜”问题：“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162] 但是，张学良也清楚，国府委员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空头衔，南京方面很多人实际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早在9月1日，白崇禧的前敌参谋长王泽民就公开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说过：“至东三省问题，鄙人为贵国设想，宜同国民政府及国民全体协议，不可同一二人私议。譬如到人家办事情，不同主人商量，而同两三个管家的商量，恐怕是办不好的。比如到铺子的【里】买货物，不与管事讲价钱，而同二三徒弟讲价钱，买不好的。张学良不过国民一分子，他即能代东三省全体作主，就是作主，亦不能算数。”[163] 现在国府委员的任命虽已发表，不是照样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属的某某区党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吗[164]？加上因解决直鲁残部搁置下来的热河归属等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他觉得委员可以接受，“易帜”则尚待时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事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学良）决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165] 因此，10月10日，他复电蒋时，并未正面回答“双十节”是否“易帜”的问题，仅含糊表示：“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详情业请方耀庭（方本仁字耀庭）兄转达。承电示谓已派张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赴日解决此事，不知彼方论调如何，未蒙示及。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同时又提出两项要求，其一是“政治分会，五次会议（指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其二是“关于军队服装，中央当有规定，事虽微细，惟观瞻所系，必须整齐划一，拟求将前项服装图样及公文程式手续已经颁布者，每种各备数份，派员交下，以资仿效，而归一律”[166]。谁都看得出来，所谓划一“军队服装”，不过是张学良拒绝接受受任、“易

帜”同时举行的托词，实际是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的人事安排影响了他宣布易帜。蒋介石的“双十节”“易帜”希望又落空了。

四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何以拒绝“双十节”“易帜”，却欣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原因之一是经过数月观察，他已认准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统治地位确已巩固。此前，他一直担心蒋介石坐不稳第一把交椅，和平统一方针难保不发生变化。而且，他宣布延期三月“易帜”，也有借此进一步观察南方政局发展趋势的意思，连日本人都看出了此中奥妙，认为“张学良此种犹豫，固为静观南方政团之建设事业如何而决定”[(167)]。现在五院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蒋介石又新任为国民政府主席，他当然踏实多了。原因之二是他看到国际形势，对南京国民政府愈来愈有利。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受。张学良是赞成“修约”的，早在7月23日，他就旗帜鲜明地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说：“关于对日本修约问题，余之意见，以为缔结条约，需缔约国双方合意之后，方能成为条约，否则专以片面的意见为前提而缔结之条约，即为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历来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均属此种，故今后约满后，凡与日本或其他各国缔结新约，自当以双方合意为条件，而努力达此平等目的。”[(168)]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宣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响应和赞同，仅到这时才开始逐渐获得日本以外的众多国家的认可，如英国在8月13日正式公布的《中英宁案协定》中明确表示，英政府将委派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17日中德《关税条约》在南京签字。21日古巴外交部照会中国驻古巴公使馆，赞同中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169)]。其次，8月27日，美国驻华代办照会外交部，告以美、英等十五国《非战公约》，已于是日在巴黎签字，并请中国政府加入。张学良向来认为“美国对我态度如何，实有莫大关系”，且建议过蒋介石参加《非战公约》，以遏制日本的干涉[(170)]。现在美国主动出面邀请中国加入，由此想到南京

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的上升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次延缓“易帜”，也非毫无心理准备，因为10月7日，作为张学良代表的邢士廉，就在上海答大中社记者问时，公开表示过，“易帜”“在目下形势，双十节恐难实行”[171]。正因如此，当张学良婉言拒绝“双十节”“易帜”之后，他才能继续耐着性子对张说：“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尤无可藉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而对张学良所提要求，虽明言不同意设置政治分会，但又以东三省情形特别，表示可另筹妥善办法。至于各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人选，则请张先行保荐[172]。较为大度地向张表达了只要实行“易帜”，其他条件均可商量之意。但是，日本田中与蒋介石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张学良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便又在“易帜”的道路上向蒋介石靠拢了一步，加上昭和天皇加冕庆典在即，需用“某种外交收获向公众宣示，藉以扩大政党声势”，因而坚决要求林久治郎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张学良答应其土地商租权和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的要求[173]。针对这种情况，10月16日，蒋介石指示张学良：“田中特派要员来京谈商租权问题，弟已口头允其由中央直接商决，不使兄为难，兄也以此复彼，万不可再与其局部交涉，以中其分拆之计也。”[174]既明确了外交问题由中央统一办理的原则，又减轻了他的日本压力。当然，也打消了他继续拖延“易帜”的借口。

蒋介石的表态，大大鼓舞了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中的“非办不可之事”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日本的要求，他采取了一“推托”，二“尊从”的应付手段。所谓一“推托”，就是往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推，如10月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条件，交换东三省的土地商租权时，他除了极为自信地指出：日本自动废除领事裁判权，“虽属美举，但必要时，中国自能撤废，原无待于日方此刻之示

恩”；同时又表示：“奉天不能蔑视国民政府之意向，若不与国民政府充分接洽，纵然解决，亦恐他日再起纠纷。”又如11月5日，南满铁道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往访张学良，要求解决延长吉敦铁路问题，张也“以外交问题完全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处理相推托”[175]。所谓二“尊从”，就是尊从民意，即以尊从民意为辞，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谋求延长吉敦铁路消息传出后，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东三省各界民众，随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争路运动。林久治郎怀疑这是张学良“秘密指使”其秘书、东北大学校长刘风竹煽动起来的。事实真相如何，今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学良曾利用这一运动，来拒绝日本的要求，却是确凿无疑的。据林久治郎说，他有一次与张学良交涉铁路问题，张的回答便是：“不幸的是，现在这一谈判（指延长吉敦铁路谈判）已在各地传开，许多社会公团以及学生们提出了抗议；特别是当事地区的吉林省已发生了学生反对运动。为了尽量求得问题的圆满解决，应该等到学生运动缓和以后再作处理，目前只好暂且等待一下。”[176]如果这样的回答，尚略显含糊其词的话，那么当有记者问他：“吉会、长大两路，近日民众反对甚烈，司令意见如何？”其回答便再明白不过了：“余一人民公仆耳，当然以人民意旨为指归。”[177]不过，为避免过度刺激日本，张学良在支持反日爱国运动的同时，也要求民众遵守秩序，勿为轨外暴动，以免授人口舌。11月12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演讲中就说过：“各地学生群起抗争，自系爱国热情，吾之椎心泣血关怀乡邦，并不落于学生之后。惟爱国运行须有一定程序，不可有轨外暴动，使当局办理外交诸多棘手……诸君宜听吾之劝解，安心向学，以备异日之用，勿为意外举动，致吾进退两难。”[178]正是蒋介石的外交支持和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挫败了日本延长吉敦铁路等图谋，而成就了日本压迫下的张学良的“非办不可之事”。

为办理“易帜”谈判中的“未了事件”，张学良自“双十节”后直接间接地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10月中下旬，他或单独或与杨宇霆、罗文幹一起，在奉天数次会见蒋介石代表方本仁、张其

宽、缪定保和白崇禧代表叶琪，商讨热河政府改组、关内奉军撤防、放还被扣车辆、恢复平奉交通、统一对日交涉责任、宣布“易帜”时间等问题。蒋介石向来要求东三省尽快“易帜”，“愈速愈妙”，此次协商期间，又特地致电张学良，促其“将关内撤防、热河改组两事先行解决”[179]。但协商的结果，却不尽如蒋所愿，仅达成如下协议：放还车辆及平奉通车，决先提前解决通车事，双方暂以山海关为交界终点；奉军于本月底陆续撤退，平东防地由白（崇禧）部接防；“易帜”时期，须俟省政府组成方能实现，对热河愿以和平方式处置；中日外交由中央完全处理，东北当局决采一致方针[180]。由此可见，恰恰是热河政府改组和“易帜”时间两大问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待省政府组成后方能“易帜”，除了表明张学良此时尚未明确给出“易帜”的时间表外，还说明他在等待蒋介石对各省省政府人选的任命。至于愿以和平方式处置热河问题，本来就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现在蒋介石竟也同意照此办理，说明不是张向蒋让步，倒是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因为此前他是坚持要张学良让出热河的。为此，29日回到北平的白崇禧代表叶琪，在汇报此次与奉方接洽经过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因有杀父之仇，故立志服从国民政府，对关内野心确已放弃，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181]

10月30日，张学良应蒋介石之请，派邢士廉、王树翰为全权正式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一切。11月10日，邢、王由沪抵京，下车伊始，便由邢士廉向记者公开了张学良的态度和要求：“东北唯中央意旨是从。东北系中国领土，希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182]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邢的谈话并非信口开河，张学良从这时起，的确以实际行动，加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11月2日，张派人前往北平，资助白崇禧东征军军费十余万元。4日，命令关内吉军万余人即日撤回原防。12日，由奉天开往北平的列车缓缓启动，停顿七个月之久的平奉铁路正式恢复通车，四百多铁路车辆也陆续拨交平奉路局，平津等北方地区所急需的食粮、煤炭供应开始得到缓解。16日，他通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肃清关内直鲁残部后，即与韩麟春、

杨宇霆尊人民公意，力践裁兵宣言，定期召集军缩会议，撤消军团部、军部、师部，将现有步兵四十余师旅，缩成十五个旅，四十余万奉军官兵，裁汰二十余万，留编为十五万。12月2日，张又致电蒋介石，密呈东三省“近忽发现传单多种，内有‘打破国民党同东三省之合作’，并有‘打倒卖国贼之国民党’种种口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现已一面密令军警以全国（面）侦查逮治，一面开导学生，劝其勿为利用。至于组织党部，东省已选定多人学习，俾明了真正党义，与政府合力建设。”[183] 所有这些，都说明张学良的表态是认真的。

那么，他这次陈述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他希望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尽管今天暂无公私档案可稽考，但只要看看他怎样回应蒋介石所提易帜日程安排的过程，就不难理解了。11月10日，邢、王抵达南京，与何成濬、张群等人初次接洽后，蒋即明确提出了12月29日易帜、1929年元旦庆祝的日程表[184]。但张学良并没有立即给以肯定的答复，直到12月12日，邢、王回到奉天，在听取了他们的全面汇报，并见到了由他们带回来的蒋介石亲笔函之后，才于13日召集保安委员会，大致议定1929年元旦实行易帜。张学良为什么早不答应，非拖到这时才答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直到这时，蒋才满足他早在7月北平谈判期间就提出过的要求，以手谕形式明确允诺：“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185] 蒋介石的信虽未明言“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的省份，是否也包括热河在内，但从后来汤玉麟的地位实际没有丝毫变动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见，张学良这次所提根本要求，归根结底还是先前那两条，即热河划归东三省及各省人事维持现状。现在蒋介石以手谕的形式满足了他的要求，“易帜”当然就不成问题了。不少论著认为张学良此时兑现“易帜”，是“日本的阻力无形消解”的结果，理由是张学良所派昭和天皇加冕大典庆贺专使莫德惠，探知田中在美、英等国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已默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不致再起干涉[186]。这一信息，对张学良把握“易帜”时机，或许不无作

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1月中旬，张已接获莫德惠的信息，却仍对蒋的“易帜”安排无动于衷，恰恰是长达一个月之后的12月中旬，得知蒋对其要求明确表示让步之后，才迅速作出响应的。一慢一快，何其鲜明和悬殊。显然，张学良这时决定“易帜”的关键是蒋的全面让步，而不是日本阻力的“无形消解”。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两大关键要求，特别是热河归属问题，采取了最终让步的态度，除了统一大局的需要外，主要还是出于内争的考虑。如前所述，由于热河“完整，无外交关系”[187]，又是通往关外的门户，而且汤玉麟“在热，措置失当，人民对汤，舆望异常恶劣”[188]，因此，蒋介石自始就坚持张学良必须无条件交出热河。但是，自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解决后，他便发现国府内部不少人都对热河问题极感兴趣，诚如当时《京报》载文所说：“国军之中图入热者，亦颇不乏人。”[189] 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后投蒋任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的方振武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个。10月以来，他不止一次在对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将热河问题抬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极力鼓吹以解决热河问题为首要任务。他说：“热河问题，于国防上、外交上及北方之大局上，均有极重大关系。目下黄河以南，济南一带，为日军占领，黄河以北，受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压迫，革命之力量，极为薄弱，故为党务上，为军事上计，解决热河问题，实为先急之务。热河解决，北伐事业始巩固，并得使河北省之防务，得永久安逸。热河乃国民党之属地，并非奉方之属地，若于热河有反政府行动，当立即加以讨伐。目下第四集团军（应为第四军团），因为此起见，分右路喜峰口，中路古北口，左路白马关，三路皆以承德为目标，再起军事行动。其先锋已在北山谷附近，与高维岳部对峙中。”[190] 其他如阎锡山、白崇禧等人也都在暗打算盘。蒋介石从中意识到，阎、冯、白等完全有可能利用他与张学良的争执，达到占有热河的目的；而与其看着热河落入这些政敌之手，还不如留在张学良治下更为安全可靠。于是，他开始答应张以和平方式解决热河问题。10月15日，通过何应钦复电阎锡山、方振武，“谓介公之意，国军应

暂取监视态度，因正向张学良交涉热河问题，并称预料热河方面，必能与奉方一致服从中央也。究竟是否用兵，尚有所待”[191]。12月又进一步同意了张学良将热河归入东三省的要求。仅就蒋介石个人立言，他的这一抉择是明智的，有远见的。

张学良见所有“未了事件”均有了圆满结果，蒋介石也于12月17日来电，请电告各省委员名单，以便与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副司令张作相、万福麟等军事人员同时发表[192]，便于24日召开重要军政人员会议，决议遵循蒋介石之意，29日东三省同时宣布“易帜”。同日，张密电奉省各官员，东三省将于本月29日同时改悬青天白日旗，希即按所告旗帜尺寸，“查明制备，届时悬持”，并嘱：“惟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193] 28日，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正式批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主席及各厅长任命名单[194]。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此间“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195]。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为奉、吉、黑、热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准，东北不再设立政治分会，由原保安委员会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十五人为委员。1929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张学良为主席。“东北易帜”终于峰回路转，宣告谢幕。

---

(1) 陈宁生：《杨增新》，娄献阁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0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5—116页。

(2)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民国元年—民国十七年），台北“国史馆”印行，1993年4月，第285页。

(3)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11

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5) 盛世才：《新疆十年回忆录》，转引自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五），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1980年，第2655—2656页。

(6) 《新疆实行易帜》，《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自6月29日起至7月5日止），《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1928年7月8日。

(7) 《杨增新治下的新疆》，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9日—20日。

(8) 《新疆五十年》，第112页。

(9) 《第七十八次国府会议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1日。

(10)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石印本，不著印行时间和页码。考其内容，当属事发后数月所印。

(11) 《新疆五十年》，第104页。

(12)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册第3卷，第103页；“附录一”，第8页；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1930年9月初版。

(13)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

(14) 《新疆杨增新被戕情形》，《申报》，1928年7月18日。

(15) 《新疆刺杀案关系重大》，北平《益世报》，1928年7月18日。

(16) 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

(17)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卷，第103页。

(18) 《公电二》，《申报》，1928年7月21日；《公电》，《申报》，1928年7月22日。

(19) 《一个学生口中的新疆问题》（续），北平《新晨报》，1928年8月8日。

(20) 《国府处理杨增新被害案》，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7月19日。

(21) 《马福祥再赴新疆》，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7月13日。

(22) 《新疆现状之报告》，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30日。

(23) 《新省党部为金树仁辩护》，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卷，第114、142页。

(24) 《流民诉苦记》，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28日。

(25) 《直鲁残军的处置》，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2日。

(26)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6日。

(27) 何千里：《1928年我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28)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1日；《肃清关内终赖武力》、《关内褚部解决办法》，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22、23日。

(29) 《津东肃清不远》，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日。

(30) 《白离平时之光景》，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3日；《一周间的大事·军事》，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9日。

(31) 《对直鲁军将下总攻击令》，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3日；《津东解决在三五日内》，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日。

(32) 《社评·平津燃眉之急的两大问题》，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30日。

(33) 《白崇禧访公使团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4) 《直鲁余孽未解决前的河北》，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5) 《旅津同乡吁请东征》，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36) 《社评·时局之隐忧》，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20日。

(37) 《白崇禧呈蒋总司令佳电》（1928年8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笔者收藏未刊打印稿。以下凡转引自该论文的资料，均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不再注明，谨此说明。

(38) 《白崇禧访公使团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9) 《杨杰报告津东战事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7日。

(40)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第1562—1563页。

(41) 《各将领决定第二期进剿计划》，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3日。

(42) 《滦东军事舞台一转》，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5日。

(43)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6日。

(44) 《徐永昌谈国军何以暂不渡河》，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7日；《杨杰报告津东战事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7日；《杨杰谈滦东军事》、《滦东军事舞台一转》、《滦东军事尚未解决》，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1、15、17日。

(45)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周毅等人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46) 《张学良劝告文》，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9日。

(47) 《杨杰谈滦东军事》，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1日。

(48) 《滦东军事将结束》，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0日。

(49) 《奉方解决直鲁残部经过详情》，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5日。

(50) 《东征军事完全终了》，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6日；《直鲁军缴械遣散的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日。

(51) 《东三省之善后》，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18日。

(52) 《全国商民速发起裁兵协会》，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6日。

(53) 《蒋总司令致吴忠信养亥电》（1928年5月22日），《第二期敌情概况与我军战略》，第45—46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4)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

1928年6月15日。

(55)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6) 《蒋总司令致阎锡山宥辰电》（1928年6月26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7) 《于右任谈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58) 《南北和议问题与蒋冯阎之态度》，《盛京时报》，1928年5月29日。

(59)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60) 《阎锡山呈蒋总司令东申电》（1928年7月1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61) 《第四集团军移驻南苑》、《李宗仁电陈时局意见》，《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由此看来，《张学良传》（张魁堂著，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认为，李宗仁和冯玉祥一样，也是“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的。《张学良年谱》（第291页）称李宗仁是“经王树翰等四代表赴平陈述东北情况，反复洽商”以后，才“转而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之主张”的，均与事实不符。

(62) 《阎白访问记》，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14日。

(63) 《李宗仁致张学良电》（1928年7月17日），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19日。

(64) 《京汉线奉军实行反攻》，《盛京时报》，1928年5月19日。

(65) 《令鹿钟麟等乘胜追敌过京津电》（1928年6月6日），《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军略》上，民国史料编辑社1933年版，第81页。

(66) 《王士珍任维持京师治安》，《盛京时报》，1928年6月5日。

(67) 《关帝庙中冯总司令之谈话》，北平《京报》，1928年7月10日。

(68) 《鹿钟麟司令访问记》，北平《京报》，1928年7月6日。

(69) 《东三省问题绝对不容政治解决》，北平《京报》，1928年7月13日。

(70)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71) 《东三省问题如何处理》，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5日。

(72) 《东三省问题如何处理》，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5日。

(73)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对日政策》，天津《大公报·社评》，1928年8月11日。

(74) 彭学沛：《对奉问题和对日问题》；《解决东三省政局的最低条件》，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3日、16日。

(75) 彬彬：《东三省归附问题近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6日。

(76)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77) 《钮惕生致张杨电》，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8日。

(78) 青白眼：《读张学良督办号日通电》，《盛京时报·论说》，1928年6月26日。

(79) 《张学良复电》，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8日。

(80)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81) 《张学良谈新政治纲领——对路透社奉天访员谈》，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3日。

(82) 以往学者对此已有精彩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详见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1页；［美］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9页。

(83) 《奉方决计先战后退》，《盛京时报》，1928年5月19日。

(84)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0、91页。

(85)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86) 《蒋作宾呈蒋总司令铣电》（1928年6月16日），《东北易帜》，第1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87) 《张学良谈新政治纲领——对路透社奉天访员谈》，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3日。《张学良文集》编者将此段媒体报道，改成张学良本人的直接谈话，收入书中，曰："吾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决以全力破坏此图谋。"（见该书第93页）此种编辑态度，似不可取。

(88) 《田中外务大臣致奉天总领事电》（昭和三年6月25日），外务省

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2卷，东京平成二年12月，第203页。

(8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90)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4页。

(91) 《蒋谭在纪念周重要报告》，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92)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93)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6日。

(94) 《李烈钧谈对奉问题》，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5日。

(95) 《王树翰等尚未见蒋》，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2日。有关论著均谓蒋7月10日已会见张学良四代表，皆误。

(96) 《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97) 《蒋总司令所望于本国新闻界者》，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3日。

(98) 《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99) 《冯总司令昨晚离北平》，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5日。

(100) 《蒋总司令致谭主席延阎元电》（1928年7月13日）；《谭主席致蒋总司令盐电》（1928年7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01)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102) 《与某外人谈时局》（1928年7月17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6页；《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03) 《宋渊源呈蒋总司令冬电》（1928年7月2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04) 《蒋总司令五大政见》，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3日。

(105) 《阎对张学良电意见》；《邵力子对奉事谈话》，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6日。

(106)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107) 参见《中华民国大事记》1928年7月条；《刘光张同礼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7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张学良所提条件》，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9日；《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又有第三者奔走直鲁军问题》、《杨杰谈直鲁军亟须解决》、《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8月6日、9月2日、8月19日；《关外易帜问题》，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8日；《奉系接洽投诚的近报》，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8日。

(108)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第37页；《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评坛》，1928年8月8日。

(109) 《致国民政府代表祁暄电》（1928年7月1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5页；《宋渊源呈蒋总司令铣电》（1928年7月16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10) 《复叶恭绰电》（1928年7月28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0页。

(111)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指出：张、蒋“最初商定东北‘易帜’的时间，是七月二十日”。

(112) ［日］林久治郎著，王也平译，邹念之校：《林久治郎遗稿》；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张学良易帜与日本干涉经纬》，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50、830页。

(113)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7页。

(114)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1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1—852页。

(116)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99页。

(11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5页。

(118) 王宇高等编：《省克记》第2卷（1928年），第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19) 疑为张同礼，因为正是他与刘光一起被蒋介石作为接洽代表派赴奉天的。而张同礼是张弧之子，张弧字岱杉，故张学良称其为“小岱”。

(120) 《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页。

(121)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4页。

(122) 王正华：《蒋中正与东北易帜》，第16页。

(123)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8月19日。

(124)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7页。

(125)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26) 《张学良确有诚意？》，《汤玉麟撤回古北口军队》，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17日。

(127)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28) 《汤玉麟撤回古北口军队》，北平《京报》，1928年8月17日。

(129) 《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8月19日。

(130) 彬彬：《东三省归附问题近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6日。

(131) 彭学沛：《对奉问题和对日问题》，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3日。

(132) 王宇高等编：《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七月）》，第473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33) 《蒋谭在纪念周重要报告》，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134) 《林权助在奉行动的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7日。

(135) 《林久治郎致田中电》（1928年7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转引自《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第43页。

(136)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1页。

(13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0页。

(138) 《林权助以石敬瑭视张学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

(139)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1页。

(14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3页。

(141) 《东三省特委会主张以武力彻底讨伐奉逆余孽》，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5日。

(142) 《东省问题之新审查》，北平《京报》，1928年7月31日。

(143) 《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44) 《东省问题之新审查》、《军事结束中之试验》（上），北平《京报》，1928年7月31、29日。

(145) 《时局中三大问题最近趋势》、《东省政情鸟瞰》，北平《京报》，1928年8月5、2日。

(146) 《东北声明服从中之消息》，北平《京报》，1928年7月30日。

(147) 《时局中三大问题最近趋势》，北平《京报》，1928年8月5日。

(148) 《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49) 《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七月）》，第497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0)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2页；《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八—九月）》，第521页；《白崇禧呈蒋总司令江电》（1928年8月3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1) 《致何成濬阎锡山电》（1928年7月25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9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9页。

(152) 《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4日）；《致何成濬阎锡山电》（1928年7月25日）；《致王树翰邢士廉电》（1928年7月26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99、100页。

(153) 《张学良释被捕人员》，北平《京报》，1928年7月27日；《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2页。

(154) 《张学良确有诚意？》，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55) 《郭同呈蒋中正函》（1928年8月9日收到），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6) 《白崇禧呈蒋总司令佳电》（1928年8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7) 《张学良评传》，第60页。

(158) 《中央日报》，1928年10月6日。

(159) 《节礼》，北平《京报·评坛》，1928年9月25日。

(160) 《胡汉民解释国民政府和五院的组织法——在十五日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161) 《致蒋介石电》（1928年10月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2页。

(162) 《蒋总司令致张学良佳巳电》（1928年10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63) 《王泽民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谈话》（1928年9月1日），北平《京报》，1928年9月3日。

(164) 《胡汉民解释国民政府和五院的组织法——在十五日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165) 《致驻京代表赵志白函》（1928年11月），《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34页。

(166) 《致蒋介石电》（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3页。

(167) 《管理三省财政》，北平《京报》，1928年8月20日。

(168) 《与某记者谈时局》（1928年7月2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页。

(16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1、866、867页。

(170)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25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7页；《张学良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8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1) 《邢士廉谈东省问题》，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9日。

(172) 《蒋总司令致张学良文二电》（1928年10月12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3) 《林久治郎遗稿》，《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867页。

(174) 《张学良呈蒋总司令元电》（1928年10月13日）；《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十月），第59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5)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5、314页。

(176) 《林久治郎遗稿》，《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865—866页。

(177) 《同奉垣某记者谈对日外交》（1928年11月），《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6页。

(178)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5—126页。

(17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0页。

(180)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7页。

(18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1页。

(18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11页。

(18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4、905页；《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7页；《复孙科电》（1928年11月19日）、《报告东北军队缩编经过通电》（1928年11月16日）、《致蒋介石电》（1928年12月2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9、128、134—135页。

(184)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8页。

(185)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25页。

(186)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东北易帜》，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7页。

(187) 《热河民众反对妥协》，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8日。

(188) 《滦东事了热河问题将发动》，北平《京报》，1928年9月21日。

(189) 《滦东事了热河问题将发动》，北平《京报》，1928年9月21日。

(190) 《方振武对热河问题的演说》，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7日。

(19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94页。

(192) 《王树翰、邢士廉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12月14日）；《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十二月），第724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93) 《致翟文选等电》（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40页。

(194) 《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12月），第747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95) 《东北易帜通电》（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42页。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

第一节　国民党的蜕变

一　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7年的清党中，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2)。这等于提醒那些尚

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用制造冤案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对手的问题。另一方面，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又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3]。国民党所说的“腐化”分子，实际指的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所谓“恶化”分子，实际是“共产党”。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磨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

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4] 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共产分子”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5]。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6]

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

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大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7] 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8]。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9]。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10]。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11] 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

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清，“腐化”代兴。

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12)]。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13)]。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借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二　国民党组织规模与基础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一般会呈现出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三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五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其中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清党，据1929年10月的统计，国民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其中国内普通党员不足27万。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战争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

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三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二名是军人。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抗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弛散漫。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设想如何让涣散的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像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60%以上时，蒋的“军队党化”和“党军队化”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数逾百万的军队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登记入党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以至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完全可以将其军队党员剔除在外。

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1927年4月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一场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14)]。十年间仅增加了30万普通党员，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

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更加清楚地显示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远低于同时期苏联、意大利等一党制国家中党员与人口的比例。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实在太小。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1926

年10月统计，两广（含广州）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近70%，两湖（含汉口）约占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上是吻合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布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抗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据1935年8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党员占16.8%，湖南、湖北（含汉口）、江西、安徽、河南、福建六省党员合计占27.6%，两广（含广州）党员占31.1%，其他省区共占25.5%。据此观之，抗战前南京政权之核心的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即使再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六省，其党员人数合计亦未过国民党党员总额的半数。另外，抗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国民党党员总数近三分之一。抗战前国民党显然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

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扩张其党势的高潮？

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举办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15)]。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一大”实行直接吸收制以来，在党员吸纳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二至五个月，并非随时征求[(16)]。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

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程序晋升为党员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制度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仅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

按理，作为一个掌控丰富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在入党限制不严的情况下，其组织规模会急速膨胀。而国民党除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与年俱增外，普通党员规模一直处于低幅滞长状态。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数量指标，严饬各地方党部加紧努力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按期如数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指标[(17)]。

抗战前国民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还和以下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松弛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由于党组织涣散无力，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在给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指出：“各地党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18)]。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党的组织来源因之枯竭。

抗战前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滞后于地方政权的建设。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四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19]。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八千人，经过十八、十九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六千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份，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20]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至9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员。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21]。直到抗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未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抗战前已成立县党部的地区，其组织运作情形如何？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22]。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停业整饬[23]。安徽一些县党部空有招牌，并无实际活动。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陈少书在安徽实习调查时发现，安徽

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书记各一人。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24]。

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表面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党部组织，而暗地里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三　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

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员被要求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服从、忠诚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员手则”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

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25]。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十五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26]。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作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六项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径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27]。这意味着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原有的社会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后，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抗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主要有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抗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国民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28]。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5%。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表明执政以后的国民

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教育“党化”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二是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广东省国民党党员比例在1926年10月统计时，农民约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政及自由职业者甚少。到1929年3月统计时，农民占17%，工人占11%，学生占9%，商人占12%，教师占11%，党政军警占16%，其余及不详占24%[(29)]。

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出现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与农工乖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国民党官方统计中的农工党员，已不是北伐时期“扶助农工”概念中的“农工”。这个时期国民党所称的“农”和“工”，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分野，也不完全是职业的分野，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划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如“农界”、“农业”的分类中，既包括地主（“业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工界”、“工业”的分类中，既包括资本家（“厂主”），也包括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雇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30)]。这意味着该省战前党员中，真正的农民和工人甚少。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31)]，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抗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亦反映出来。大约有近一半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近40%的党员受过初等和私塾教育，未受过教育的党员不到10%。以20世纪30年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为

例：家有良田三十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五十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二百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32]。以此衡量，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家有恒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以上社会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像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抗现存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现存体制的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反对现存体制的对立群体以及与现存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而游离于国民党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仍占大多数。

四　社会对国民党的观感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虽不如共产党，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33] 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在追求社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尽管如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

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34] 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35] 《北华捷报》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36] 《时代公论》更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37]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

恼。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38] 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39] 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40]。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41] 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42]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体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

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43]。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44]。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45]。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46]。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国民党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47]。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

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六十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48]。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但在县党部以下，“党棍”的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49]。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50]。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借党争权利[51]。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52] 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

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患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第二节　“训政”体制与五院制的建立

一　“训政”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第二次北伐告成，奉张政权倒台后，国民党依照孙中山《建国大纲》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国民党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际是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

训政源于约法之治。早在1906年孙中山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53)]。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的目的是建立民权。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如何才能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孙中山认为，这中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的膨胀，不致抑制民权的发展[(54)]。孙中山规定军法之治为期三年，约法之治为期六年，以期能循序渐进，步向民主。

1914年7月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55)]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寄希望于提高党权来约束军权，

最终实现民权。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仍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且规定：“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56]

三时期的划分，是孙中山总结民初国民党失败教训后提出的。民国初建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认为王朝覆灭后，中国立即可以进入宪政时代，实行政党政治。孙中山主张中国政党之间应展开竞争，一党在朝主政，一党在野监督，“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57]。但是，国民党人的政党政治主张遭到袁世凯等专制势力的强烈阻击，未能取得政权的控制权，中国进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代。孙中山由此坚信在向民主政治迈进的过程中，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即所谓军政与训政两时期，以“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58]。在此时期中，应“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59]。

训政时期始于“一省完全底定之日”。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推行县自治，“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即为宪政开始时期”[60]。训政的目标是进到宪政，是为宪政顺利实行打基础的预备阶段。孙中山构想的宪政模式是五权宪法。国家大权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就是民权，治权就是政府权。首先是人民有权。所谓人民有权，表现为人民有对官吏的选举权、罢免权，对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这些权利通过县自治和国民大会得到制度保障。国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县自治基础上由每县选举代表一人组成，行使国家层面的民权。其次是政府有能。所谓政府有能就是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五院共同组成中央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实行五权分立的五权宪法，五院各施其责并对国民大会负责。五权宪法是以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分治说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训政就是要为人民学会熟练使用直接民权、组织国民大会做好各种准备。总体上看，孙中山的建国三时期和五权宪政理论，在20世纪初中国改造代议政治思潮中，是最为完整的设计方案。就政体来看，五权宪法论主张在县自治和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人民支配的、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主张权力协调、直接民权、行政优先等，这一理论基础虽源自西方政治理论，但与三权分立体制的分权制衡有很大不同，五权分立强调的不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集权下的分工，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孙中山的上述政治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体制的设计和形成有着极大影响，其训政理论与实践均渊源于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胡汉民、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要人虽然在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有着共识，但在“二次北伐”完成时，对政府权力运作、国家控制方式等具体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如李石曾等基于孙中山的均权理论，强调地方分治，这和国民党要求加强中央权威的主流舆论就不协调。平津克复后，舆论虽已提及“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但训政究竟从何时开始，至何时结束，国民党中央也尚未作出正式宣示。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提出：“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凭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61)] 基本显示了国民党思想分歧的现实。全会作出的“组织理论审查委员会”的决议，则体现出加强政治思想统一的愿望。

1928年8月7日，蒋介石在审查二届五中全会提案时发表《今后贯彻革命实行主义之主张》的谈话，鲜明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提出“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的所谓“四化论”，要求军队党化同时，“党员与行政人员社会民众皆使一一军队化”[(62)]。蒋希望以三民主义的精神改造军队，再以军队严明的纪律改造党、行政机关和社会民众，由此建立一个有组织、

有纪律、有效率、有责任的新国家。8月9日，蒋又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各方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列。"(63)

作为两次北伐的最高指挥者，蒋介石此时虽然享有很高声誉，但他的言论更多还被看作军人的发言，其军队党化、党军队化的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主流观点也不尽一致。相比之下，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具有理论素养的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后，正在巴黎的胡汉民、孙科等联名致电谭延闿、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政实力派首领，提出《训政大纲草案》，提议改组国民政府成为五院制的政府，"以实现五权之治"。胡汉民等在《训政大纲草案》中提出了如下原则："一、以党统一，以党训政、培植宪政深厚之基；二、本党重心，必求完固，党应担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应担实行训政之全责；三、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最后之完成。"(64) 胡汉民、孙科本为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的合作者，蒋介石重新上台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后，与其继续合作实属顺理成章，因此他们的提议得到南京方面的积极响应，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讨论训政开始后的军事、政治诸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改组政府的决议中原则提出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在国民政府内设立五院。

二届五中全会召开时，胡汉民、孙科尚在由欧洲回国途中，未能参加会议。8月28日，胡汉民抵达香港，随后北上赴上海、南京。9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加推胡汉民为常委，负责制定《训政纲领》，筹划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随后，胡汉民依据其所提出的《训政大纲草案》及《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对国民党的统治理论和体系进行了具体的梳理。

胡汉民坚定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念，强调："夫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夫以党治国

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使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褓姆自任。”[65] 在胡汉民设计的党国治理框架中，党治之下党、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行政上，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交由政府完成。具体而言：“就党与政府之关系言，党必求其以完固之重心，政府必求其有适宜之组织；就权与能之关系言，党为训政之发动者，须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为训政之执行者，须有执行训政之全责；就党与政府二者在训政时期与人民之关系言，则党之目的在以政权逐步授诸全国之民众，政府之目的在于逐步受国民全体直接之指挥与监督。此三者，为训政时期建设制度者所必须周顾之根本原则，缺一不可。”[66]

和孙中山强调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一样，胡汉民认为“训政”时期，国民党之所以有资格代表人民行使政权，训导人民走向宪政，在于国民党是一个拥有革命主义作指导的政党。因此，“以党治国”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以党义治国”，用主义和政策来“训政”：“政治完全是由党而来，而党的主义也就完全靠政治去实施，所以今后事实上政治如果没有革命的主义，便不成其为革命的政治，而党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便不成其为革命的党。政治与党既是一事，而非二事。那么，政府中同志在政治上所担负的一切工作，当然就是党所给予的；而今后政府一切施政的标准，对与不对，首先就该问到是否遵照党的主义了。由此看来，方今全国统一，训政开始，不但应该说‘党外无党’；并且应该说‘党外无政，政外无党’。”[67] 胡汉民特别对以党治国与一党专制和阶级专政作了区分，认为：“一党专政与阶级专政，其精神与目的，皆以政权专于一党或一阶级为归宿。本党训政，则其精神与目的实以党权付诸国民为归宿。前者为专制的，后者为民主的。其趋诣盖正相反也。”[68] 总起来看，训政的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知识、能力，使其足够行使民权，管理国家，成为真正的民国”[69]；“训政是实现宪政，完成革命的最重要的阶段。训政工作的良窳，可决定整个革命的成败”[70]。不过，胡汉民或许没有意识到，训政理论本身其实使国民党在专制和民主之间陷入巨大的冲突之中：党作

为最高权威，提高党权是训政的应有之义，而这肯定会和发扬民权，扩大政治参与的训政目标相冲突；反之，如果对党权实行限制，则所谓以党训政则又成了无源之水。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理智抉择，如何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保持平衡，这恐怕是一个成熟的政党都难以把握的。对一个刚刚脱胎于专制社会、依靠武力征服获取政权的政党，要如胡汉民所想顺利走上民主之路，未免有点过于天真。

胡汉民构想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训政期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汉民回国前，二届五中全会讨论中央政治会议时认为："政治会议既不能对外发生直接关系，以之为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似非所宜。同时，政治会议在党与政府之间，具有相当之效用，亦不必遂议取消。"[71] 因此，会议将1928年3月颁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一切法律问题及重要政务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国民政府执行"，改为"凡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72]。胡汉民不赞成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指导国民政府，主张将中央政治会议建设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间又一决策机关，形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国民政府三驾马车的局面。其中，中执会是全党最高指导机关，中政会是训政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是训政执行机关。

胡汉民、孙科回国前给国民政府的电报中就突出政治会议的作用。其拟订的训政大纲第一条即为政治会议，规定："以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之范围为："（甲）建国大计。（乙）施政方针。（丙）对内对外应取之政策。（丁）政府各院委员、各部部长人选问题。（戊）军事大计。（己）各政治分会决议之审查。"[73] 在随后提出的《训政大纲说明书》中进一步指出："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之发动与指导机关"，"政治会议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之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所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换言之，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为党与

政府间惟一之连锁，党于政府建国大计及其对内对外政策，有所发动，必须经此连锁而达于政府，始能期其必行”。“国民政府在发动政治根本方案上，对政治会议负责；但法理上仍为国家最高机关，而非隶于政治会议之下也。”[74] 10月2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根据胡汉民的主张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全文共十三条，条例规定了中政会的性质等：“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全责”，其各项决议可“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政治会议不直接发布命令及处理政务”。中政会讨论和议决的事项包括：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国民政府委员及五院院长等政府官员的任命等。“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为政治会议当然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亦为政治会议当然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得推定其他政治会议委员，其人数不得超过前条当然委员之半数”[75]。中政会采取主席制。中政会由此从一般政治指导机关变为训政的最高指导机关，具备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基本特征。1929年5月、1930年3月，国民党中央又两次修改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之下设政治组、经济组、外交组、财政组、教育组及其他专组，“分别担任审查与设计事宜”[76]。

在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中，五院制政府的建立当在宪政时期，训政时期究竟以何种形式建立政府并无详细论述。胡汉民主张训政时期中央政府由五院组成，设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院，国民政府立于其上作为总枢纽，五院委员为政府委员，以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分任五院的主席，合五院之组织，总称为国民政府。此时设立五院，旨在以其为雏形，令其在训政的保护下，逐渐发育，在政体上实现由训政到宪政的有机过渡。因此，训政时期的五院制与宪政时期正式的五院制是不同的，训政时期的五院“彼此只收联络之功，而不应有对抗之势”，五院统一于国民党的党权之下，即“国民政府是五院的集体，每一个院是国民政府的一体，彼此间并立而不对立，没有相互连锁的关系；对外又同受党的指挥，对于政治会议的决议统一要绝对地遵守”[77]。

胡汉民反对训政时期颁布一部类似于宪法的根本大法。根据他的意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著作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从正面堵住了订立约法的可能。胡汉民制定的立法方针是："第一方针应谋社会的安定。第二方针应谋经济事业之保养与发展。第三方针应求社会各种实际利益之调节于平衡。"[78] 将安定社会秩序视为第一需要，因此，他对部门法的兴趣远远胜过宪法。1929年11月，他在《编纂法典是革命建设的基本工作》一文中，正面解释了私法重于公法的理由："我们却觉得要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非专靠公法所能成功。尤其推进民主，改良社会，私法的力量，更较公法为大，在日常生活中，人民与私法的关系，也较公法为密切。所以先定私法，以规范人民的生活，比较更为重要。"[79] 客观看，胡汉民这一立法思路未免陷于褊狭，私法的重要固不待言，但公法原则的确定是一切私法得以制定和成立的基础，而这不应该是个人论著可以代替的。

胡汉民等提出的《训政大纲草案》和《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后来除个别有所修正外，其基本精神成为国民党训政期间政治体制的指导原则，尤其是"训政褓姆论"和五院政府主张，成为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国民党一党政权的政治方略。

二　"训政"体制的建立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训政时期"实行五权之治"，即建立五院制国民政府的主张。会议关于《训政开始应否设立五院案》的决议中强调："训政时期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应逐渐实施。"[80] 在关于《政治问题案》的决议中并规定"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工商、农矿八部，及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其他特种委员会"[81]。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前后，制定约法的要求颇具声势。上海四十

八个商业团体联合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十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是“颁布约法”。《大公报》也发表文章，呼吁制定约法，指出：“今全国统一，时移势易，非有齐一之规模，不足以坚民众之信仰。而国民之权利义务，中央地方之权责范围，党政国政之关系连络，均须根据国民党之理论，制为党义的结晶之新约法。既符以党治国之旨，又正为事实之所急需。所应注意者，此项约法一经制定之后，即应严格实施，从上彻下，悉受部勒，不得再有旧约法时代违法玩法之敝。”[82] 国民党内对制定约法有相当共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法制局分别向会议提出制定约法的建议。会议提案审查小组合并审查了朱霁青、南京市党部、法制局制定约法的建议，并作出结论：“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此次全会，应即组织中华民国约法起草委员会，限期完成，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赶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呈请通过公布。”[83] 会议通过决议：“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84] 李烈钧在会后曾对此作出说明：“世界各国，无论其为君主国家、民主国家，均有一定根本大法。我国因军事方定，人民知识尚浅，宪法至今尚未颁布。然在此根本大法未经颁布以前，不能不有一种法规使民众共求政治之发展，故会议结果决组起草委员会从事着手进行。”[85] 这一决议在胡汉民回国后因胡反对制定约法而被搁置，胡汉民认为：“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86] 对此，当时蒋介石为寻求与胡合作曲予优容，但却由此种下了日后蒋、胡冲突的导火索。

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七次会议和中央常务会议第一百七十二次会议先后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同时议决《训政纲领》六条。纲领主要内容如下：（一）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三）

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训练国民逐渐行使；（四）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五）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执行，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之[87]。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议决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同时通过决议，任命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同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公布行政、立法、司法等院组织法。12日，通过并公布考试、监察两院组织法。1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副院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会会长，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部部长。24日，国民政府任命行政院各部部长，特任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长，古应芬为国民政府文官长。

10月1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国民政府各委员也同时就职。蒋介石等政府委员宣誓就职后，五院先后建立。最早建立的是行政院（10月），其次是司法院（11月）和立法院（12月）。考试院成立于1930年1月。监察院长蔡元培坚辞不就，1929年8月，国民党中央准蔡元培“辞职”，由赵戴文继任。赵亦未到任。1930年11月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推选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故监察院一直拖延到1931年2月才正式成立。

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宣布：“在此由军政时期向训政时期进展之际，中国国民党本其历史上

所负之使命，适应国家实际之需要，代行政权，而以治权授诸国民政府。”训政开始时期进行一切建设之先决条件为裁兵节饷与整理财政，同时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教育建设，“实际建设之进展，必恃一强固有能之政府，以为其原动机，故政治建设，乃其他一切建设之首脑。国民政府五院之设立，实为政治建设之创始，今后之努力，则以是为训政之中心，实行建国大纲所指示之直接民权之训练与五权宪法之完成”[88]。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除通过“总理主要遗教为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外，还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国民党、国民政府、人民在行使政权和治权过程中的权力分界线，不允许互相超越。具体内容主要有：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培植地方自治之社会基础，宣传训政方针，开导人民接受四权使用的训练，“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有权“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二、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县自治的一切原则及训政的根本政策与大计并对中执委会负责；三、国民政府：实行县自治，执行有关训政的根本政策与方案，对中政会负责；四、人民：“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89]。国民党有权，国民政府有责，人民既无权亦无责，只有“服从拥护国民党”的义务，以这样直截的语言解读这一决议案，似并不为过。

1929年6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三届二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之规定案》，决定“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90]。同时通过《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强调政府各机关的权限和职能，主要对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提出要求，规定：“一切法律案（包括条例案及组织法案在内）及有关人民负担之财政案与有关国权之条约案，或其他国际协定等属于立法范围者，非经立法院议决，不得成立；如未经立法院议决而公布施行者，立法院有提出质询之权，

其公布施行之机关以越权论，立法院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人民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其非经合法程序而剥夺者，司法院及其所属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在考试院成立以后，一切公务人员之考试权，皆属于考试院，其不经考试院或不遵守考试法所特定之办法而行使考试权者以越权论，考试院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在监察院成立以后，一切公务人员之弹劾权，皆属于监察院，凡对于公务人员过失之举发，应呈由监察院处理，非监察院及其所属不得受理；其不经监察院而公然攻讦公务人员或受理此项攻讦者，以越权论；监察院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91)]。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计八章八十九条。这是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体。《约法》包括中华民国的国土、主权、国旗、首都，人民的权利、义务，国民生计，中央与地方权限，政府组织等条款。《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政府主席、委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约法》的解释权也由国民党中央“行使之”。《约法》同时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与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到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国民政府应即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92)] 该《约法》此后即成为国民党统治全国的法律依据，1948年国民大会制宪完成后废止。

三　国民政府的组成

国民政府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机关，由国民政府主席和全体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统率陆、海、空军，行

使宣战、媾和、大赦、特赦等权，公布法律，授予荣典等。训政时期，委员会人选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

国民政府委员会体制屡有变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仿照广州国民政府的做法，实行委员制，不设主席，以胡汉民等四人为常务委员，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以会议形式集体处理。宁、汉合作后，由特别委员会推举产生了新的国民政府。自1927年9月至12月，国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大致延用二届三中全会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不设国民政府主席一职。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南京政府组建后的第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十一条，行直接党治、委员合议制。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产生。从委员中推举五至七人为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处理政务以会议行之，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执行之”[(93)]。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职权为“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94)]。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开始训政时期。10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共七章四十八条，该法规定了试行五权制度的具体方案，包括国民政府及五院的组织与职权。主要有：一、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十二至十六人。国民政府主席是国家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任国务会议主席，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家事务采合议制，由国务会议处理。公布法律与命令，需由主席会同五院院长共同署名。二、国民政府设置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各院长、副院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国民政府委员当中选任。各院彼此独立，凡院与院之间不能解决的事项，由国务会议议决之。三、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职权以及组织法要点[(95)]。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三级中央政制：国民政府主席、政府委员会（或称国务会议、政府会议）及国民政府直辖机关；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

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所属的各部、各委员会。此时国府主席的实际职权，大体同其他五院院长相当，仍采取委员合议制，但该法第九条规定：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获得法定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此时，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同时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可谓大权在握，国民政府主席实际已超越其他委员之上，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领。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最主要的变更有两项：一是删去了原法第十一条“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一句，并将国务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而以原“行政院会议”取代“国务会议”。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会议”的职权，仅是议决“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而不再是处理国务的最高机构。此项修改实质上否决了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采取的委员合议制。此后，国家行政完全由行政院长负责。第二项大的修订是第十三条，规定：“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96)] 根据该条规定，五院院长对于颁布法律及命令不再负有共同的连带责任，而只对其主管事项负责，此时的国府主席职权已高于五院院长。公布法律、命令，无须经国务会议议决。当时即有学者评论道：“严格地说起来，经此修正而后，国民政府的组织，已自形式上的合议制成为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权之制。”[(97)]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依据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提出的《约法草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有关中央制度一节中，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署名行之”[(98)]。6月14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十章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有权主持政府委员会议，兼任陆

海空军总司令和其他官职；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不需五院院长副署，直接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实施；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各院、部、委员会官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国民政府委员由十二至十六人扩充为十六至三十二人，且五院正副院长为不在此列当然委员。国民政府在组织形式上彻底放弃了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主席权力大大提高，国民政府会议由于人员的扩充及不再管控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已完全流于形式，无任何实权，国民政府的合议制变为主席集权制。新组织法成立后，三届五中全会选任蒋介石为国府主席，张静江等三十二人为国府委员。随后，蒋以国府主席名义提请蒋介石、林森等分任五院院长，蒋以主席而兼任行政院长。从此大权独揽。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爆发“约法之争”，广州于5月27日宣告另组国民政府，宁、粤发生权力之争。后经双方妥协，同年12月25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议决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其要点有：第一，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任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取消主席提请任免五院院长及指挥五院之权。第二，国民政府委员定为二十四至三十六人，国民政府会议改称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行政院会议复称行政院会议。第三，立法院、监察院委员之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其选举法另定”[(99)]。这一规定后来并未真正实行，立法、监察二院委员实际仍由各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任命。第四，淡化政治会议功能，强调：“在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国民政府委员、五院院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100)]。组织法修正后，由于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大权。

此后，《国民政府组织法》又经六次修改，前四次均无重大变更。第五次修改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

理之。第六次修改的要点在于，恢复主席负实际责任的制度，并规定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采取合议制，以国务会议处理政务，行使职权。1928年10月，五院制建立时国民政府会议称国务会议，负责统率陆、海、空军，行使宣战、媾和、大赦、特赦等权，公布法律，授予荣典，解决五院之间不能解决的事项等。国务会议位于五院之上。1930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后，将行政院会议改为国务会议，原来的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改称国民政府会议。1931年12月后，再将国民政府会议改称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地位和影响明显下降。

国民政府的直辖机构有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文官处掌理国民政府一切文告之宣达，印信、关防、勋章、奖章之铸发及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暨其他机要事项。参军处掌理典礼总务及宣达命令，承转军事报告事宜。主计处掌管全国岁计、会计、统计事务。国民政府各机关编制预算后，送主计处审核、签注意见报送国民党中政会审查，然后再由主计处根据审查意见编成总预算案送国民政府转行政院提交立法院核议。

30年代前后，国民政府直属专门性机关主要有：建设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财政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中央研究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等。

四　五院制的建立

五院制是孙中山对民国政制的重要设计。五院制并非五权分立，而是平行五院之间的分工。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逐次设立五院。10月10日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首次明确五院建制，宣告五权制度开始实行。在此前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后通过《行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司法院组织法》、《考试院组织

法》和《监察院组织法》。10月20日，由国民政府将五院组织法正式公布实施。

五院制度实行之初，国民政府委员兼任五院正副院长，1931年修正组织法后，国民政府委员不再兼任五院正副院长。五院对各自主管事项的一切重要措施，都要送请国民政府核议或备案，国民政府在审议时可予更正或驳回。五院之间不能解决或相互争议的事项，由国民政府的会议议决处理。

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于192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由行政各部署及各委员会组成。行政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行政院本身的组织有行政院会议、秘书处、政务处等。

行政院会议主要议决如下事项：一、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预算、大赦、宣战、媾和、缔约案，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二、荐任以上行政、司法官吏的任免；三、行政院各部会之间不能解决之事项；四、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的事项。行政院院长可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各部部长、次长，各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及委员。

行政院成立后，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交通、铁道、卫生等部，建设、劳动、禁烟、蒙藏、侨务等委员会。后陆续设立教育部、海军部，农矿、工商二部取消，改设实业部。抗战爆发前，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铁道、海军、教育九个部，蒙藏、侨务两个委员会，另有非经常性的赈济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

立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于1928年12月5日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立法委员任期两年，1928年10月规定人数为四十九至九十九人，1932年12月修改为四十九至一百人[(101)]。1928年

至1935年，共产生四届，人数分别为四十九人、六十二人、九十人、八十六人。抗战爆发后，立法委员停止换届。

立法院的职权主要有：一、制定法律；二、议决预算；三、议决宣战、媾和、缔约；四、质问。此外，立法院院长还有如下权力：一、提请国民政府任免立法委员；二、主持立法院会议；三、指挥监督院务及其所属机关；四、国民政府颁布有关立法院主管事务之命令，须由院长副署。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原则，一切法律案提出后，都要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各种法律案，除秘密政治、军事、外交等法案外，政治会议先交立法院审议，立法院审议后，再送政治会议最后决定。政治会议所定的原则，立法院不得变更，政治会议对立法院的决议可以修改。由于各院均对国民党中央负责，立法院在行使质询权时无强迫他院答复之权，更无答复不满意时的制裁权。所以，立法院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既没有对立法原则的实际决定权，也没有保证立法原则得到有效实践的监督权，其职权经常处于有名无实的状况。

为便于审查各种法律案，立法院可设立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军事等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由立法委员分别担任，每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院长指定。院内的日常事务由秘书、编译两处管理。

立法院成立后，院长胡汉民秉持“要以自治来提倡法制，而逐渐代替了人治”[(102)]的理念，领导立法工作得到有效推进。从1928年12月到1930年10月不到两年时间内，“共会议一百一十五次，共审议案六百三十九件”[(103)]。到1931年已经制定了民法各编及民事诉讼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土地法、自治法、工厂法、工会法、工商法、商会法、劳动法、出版法等多部法规，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六法体系的基础。继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认为，立法院“以

过去的工作成绩来说是五院之中最显著的，已为一般国民所承认。大家努力的结果，使一切法规都具备了，最重要的基本法规如民法等等，都由本院同人在胡院长领导之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议决公布，成绩是很可观的了”[104]。

司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司法机关，于1928年11月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司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司法院所属最高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及行政法院等机关分别执掌司法审判、公务员惩戒及行政审判。

在国民政府五院中，司法院的职能变动最多，1934年前总的趋势是强调其司法审判权。1928年10月颁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职权”。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修改的组织法在其职权中加上“司法审判”[105]，其司法审判权被强调。1931年6月公布的组织法则将其余几项职权删去，规定其“掌理司法审判之职权”[106]。12月，国民政府再次修正组织法，司法院定位由“最高司法机关”明确改为“最高审判机关”[107]，司法院院长、副院长直接掌理审判。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规定“最高法院院长得由司法院院长兼任”[108]。司法院成为审判机关后，根据1931年12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司法行政部由司法院划归行政院管辖。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再作修正，规定“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109]，次年，司法行政部又重新划归司法院。随后，1936年10月修正公布之《司法院组织法》规定：司法院不仅是最高审判机关，也是“整个的最高司法机关”[110]。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审判制度基本沿袭清末新政以来实行的四级三审制。到1935年7月1日，将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分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级。最高法院为全国终审审判机关，对于民、刑诉讼事件，依法律行使最高审判权。高等法院分设于各省或特别区，地域辽阔者可设分院。地方法院则分设于各县、市，其区域

小的，可以几个县市联合组成一地方法院。另特设行政法院为全国行政诉讼审判机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置政务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处理政务官违法违纪事件。司法院成立后，改称官吏惩戒委员会。1931年3月，立法院通过决议，将“官吏”改称“公务员”，官吏惩戒委员会也随之改称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根据1931年6月公布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掌理一切公务员的惩戒事宜，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种。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管荐任以上公务员及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的惩戒事项。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设于各省及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掌理各有关省市委任职公务员之惩戒事宜。中央、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行使惩戒权时，对于荐任以上的公务员，须经监察院成立弹劾案后，方能移付惩戒。

考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考试机关，独立行使考试权，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1930年1月6日，考试院正式成立。设正、副院长各一人，综理全院事务。内部机构设秘书、参事两处。下设考选委员会与铨叙部两机关，分别掌理考试、铨叙事务。

考选委员会主要负责文官、法官、外交官、其他公务员及专门技术人员的考选。设秘书长一人，总揽会内事务。具体的考试组织另设典试委员会及试务处，分别办理试政与试务。典试委员会掌理考试科目的命题、考试成绩的评定，及格人员的录取。

考试分为高等文官考试、普通文官考试、特种考试等。典试委员长由主考官兼任。普通文官考试的主考官由国民政府简派；高等文官考试的主考官由国民政府特派。典试委员由考试院提请国民政府简派。从考试院创立到1948年6月，分别通过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及特种考试者为4069、6738、154620人[(111)]。他们中许多人进入到政府体系中，“分布在国民党中央的各院、部、会，各省市政府，遍及绝大部分的行政机关和专业部门。一般是担任科长、荐任秘书等中级

职务，其中担任县长的有一百多人，担任中央及其派出机关的高级人员如简任秘书、参事、司长、处长、局长的约四十人”[112]。考试制度的实施，使“各部人员中经过考试的越来越多，部长能够控制的职位越来越少，大家渐渐承认部中工作人员（至少是某种人员）需要相当的学历”[113]。相对公平和超然的考试选拔制度，对现代文官体制的建立是有益的。不过，由于当时考试设计并不针对具体职位，因此考试合格后得不到适当任用者也大有人在，胡适1934年曾批评道：“考试院举行了两次考试大典，费了国家一百多万元的经费，先后共考了两百余人，听说至今还有不曾得着位置的。国家官吏十多万人，都不由考试而来，只有这两百人，由正途出身，分部则各部会没有余缺，外放则各省或者不用，所以考试制度，至今没有得着国人的信仰。”[114]另外，在缺乏公开机制的背景下，考试制度覆盖性仍然有限，官员任用的公正性无法充分保证，曾任湖南泸溪等县县长的李惕乾回忆：“有人介绍我到薛岳那里……在他的长官部当了几个月的食客，忽然下了一张条子，连我一起任命了十几个县长。”[115]这样的任命方式很容易使考试成为形式。

铨叙部掌理全国文职公务员及各人事机构人员的铨叙事项。包括公务员调查登记及任免之审查，公务员升降、转调审查，公务员资格审查，考试专门技术人员分类登记，成绩考核登记等。内设总务、登记、甄核、考功、奖恤五司及铨叙审查委员会。作为地方自治的核心，铨叙部高度重视对县长的审查，从1931年7月到1935年9月，共审查县长1154人，合格者881人，不合格者272人，不予审查者1人[116]。不合格者报送政府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的主要职务为弹劾、审计、调查、巡察、监试、纠举、建议等。该院先成立筹备处，1931年2月16日正式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监察委员人数时有变更，成立时定为十九至二十九人，后多数时间在二十九至四十九人之间，并分区设区监察使及审计部。院内设秘书、参事两处。

1929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弹劾法》规定，监察委员如发觉公务人员有违法失职的事实时，可以单独提出弹劾。用书面形式把被弹劾人违法的事实详细开列，并附以证据。监察院接到弹劾案后，即派其他监察委员三人从事审查。审查的结果，经多数认为应付惩戒时，则将被弹劾人移付惩戒，但是监察院本身并无惩戒权。

监察院在全国设立监察区。1931年3月，监察院颁布《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规定监察院院长可提请国民政府特派监察使，分赴各监察区巡回视察，行使弹劾权，其地位与监察委员相同[117]。监察院会议议决将全国划分为十四个监察区，1934年6月改为十六个。1933年2月，监察院第一次提请简派晋陕、热察绥两监察区之监察使，但尚未在监察区内建立常设之监察机构。1935年10月，监察院公布《修正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规定："监察使于所在监察区内设监察使署。"[118] 监察使署负责将监察区内各官署及公立机关设施事项、各公务员行动事项、人民疾苦及冤抑事项报告监察院，督促改善。

为保证监察委员行使弹劾权，1929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监察委员保障法》，予监察委员行使职权以特别保障，规定："监察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监察院许可不得逮捕监禁"；"监察委员行使职权时所发之言论对外不负责任"[119]。

监察院成立后，到1936年6月底，共处理弹劾案件772件，被弹劾者1337人[120]。初期提出一些颇引人注目的弹劾案，包括弹劾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违法逮捕《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南京市长魏道明、财政局长齐叙等伪造收据舞弊吞款，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民政厅长王尹西违法失职，北平市长袁良滥用职权，外交部长王正廷背党溺职，丧权辱国，司法行政部长朱履龢违法失职，铁道部长顾孟馀渎职等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1932年对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弹劾案。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萧佛成等监察委员以汪"对于此次上海停战协定，不交立法院议决，遽行签字"[121] 为由，联名弹

劾。此弹劾案背后包含着国民党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派系、权力争斗，非单纯的违法违纪弹劾可比，但其牵涉的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间的权力互动，仍然颇具意味。最终此弹劾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上海停战协定，系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此项决定既非媾和条约，应准外交部所拟办理，俟办理完竣，再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报告在案”为由，决议“应毋庸议”而退回。中央执行委员会出面否决监察委员的弹劾案，充分体现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在训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行政院、立法院还是监察院，都更像是国民党中央权威下的执行机构，如此的五权分立和相互监督难免流于形式。所以萧佛成等在接到国民党中央处理报告后认为这是“在职中委自行袒庇”[(122)]，虽不一定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却道出了此种体制下极有可能孳生的弊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抱怨：“只见监察委员求情舍罪，而未见有一参革声罪之举，所以主席不能不负责，参人押办任怨也。”[(123)] 其实，体制如此，监察委员也难当责任。

国民政府最初行使审计权机关为审计院。监察院开始筹备后，审计权归属监察院，以审计部属之。1931年3月9日，审计部正式成立。审计部负责审核、监督国民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预、决算的执行，国民政府岁入、岁出总决算，稽查全国各机关财务行为。其职权的行使以审计为中心，采取合议制。审计官行使职务，与法官办理审判事务的性质相似，其职务也有特殊保障。

审计部行使职权的对象，为全国各政府机关，并包括国营事业机关在内。为工作便利，在各省市设立审计处或审计办事处，负责处理各省市的财务、审计。

第三节　地方制度的重建

一　省制和省政改革

“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省级行政区域作出调整。1928年6月20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京兆区取消，并入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以北平、天津为特别市。9月5日，因孙中山手订的《建国大纲》中仅有省治，而无特别行政区的规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决定青海（1929年1月建省）、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特别行政区均改为省（1939年1月1日正式建省）。10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九次会议决议析甘肃旧宁夏地区成立宁夏省（次年建省）。“东北易帜”后，1929年1月28日，将奉天省改称为辽宁省。至此，中国共有二十八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西康、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1930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依据《建国大纲》，决定废除民初以来实行的道尹制及行政委员等名目，明确地方行政制度采用省、县两级制。和传统中国行政体系比，少了府一级行政体系，在省境辽阔的状况下，省直管县，对地方行政控制力提出重大挑战。从此，民初以来开始的缩省讨论逐渐高涨。1928年宋渊源等发起改革省区运动，缩省讨论在当时形成相当影响，有人根据山川、气候、语言、人口、面积、耕地与矿藏等情况，提出缩省的具体标准上呈国民政府[124]。

1930年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中委伍朝枢、陈铭枢等提议缩小省区，提案得到胡汉民、孙科、林森、戴季陶、吴稚晖、张静江、何成濬、陈立夫、刘峙等联署，可谓阵容强大。提案强调：“吾国现行省区，一省之大，几同一国，有军队之捍卫，有操纵财政之权力，遂成产生军阀之根基。若省区缩小，省权减轻，则军阀虽有盘踞之心，而无可盘踞之地矣。又省区过大，则省长对于各县自治之监督，不易周密，县之地位过低，则地方行政，因多方转折，而

行使不便。地方行政不能尽量用之于县自治之建设。省区缩小，省权减轻，则自治易于完成矣。”[125] 大会据此通过决议：“省区应重行划定，并酌量缩小，至如何区分，及其实施办法，交由中央政治会议组，组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拟具方法案，送请中央常会，以备提交全国代表大会或国民会议决定之。”[126] 缩省在当时对于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加强省县间的联系，应该有其积极意义。如时人所言：“我国省区辽阔，管辖难周，确为事实。以统治数十或百县以上之权授与文人，既虑力难顾全，授与武人，尤恐割据一方。避割据，求易治，则缩小省区实有至理。”[127]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审查员，对缩省展开专门研究并提出对案。1931年2月底，初步提出设想：“将各省天然界限，或以旧道，划为两省至三省，而毗连之地，可由甲省划归乙省。全国将分为六十余省。”[128] 国民会议即将召开前，缩小省区草案拟定“划分全国为六十九省”[129]。此方案在国民党中央讨论时，鉴于各省经济发展条件不一，重新划定区域范围牵涉太广，未能通过，失去由国民会议决议实施缩小省区的良机。此后，由于宁、粤对立及“九一八”事变发生，缩省在国民政府面临诸多急于处理的难题背景下，无法提上日程。

1932年12月，伍朝枢等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缩小省区案》，并经会议通过决议：“催促政治会议从速办理。”[130] 但缩省牵涉甚为广泛，在内外危机频现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难以下决心毅然办理。且主张缩省甚力的伍朝枢等并非实际主政者，因此此一决议基本是徒托空言。1933年6月，内政部以国内已出现行政督察公署等组织，可以“辅助省政府权力之所不能及”，而重划省区“恐市虎杯蛇，易启猜疑”[131] 为由，婉拒缩小省区提案。热闹一时的缩省讨论就此基本终结。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8月公布《省政府组织法》。1928年4月、1930年2月、1931年3月数作修订，1931年修订后持续影响

时间较久。最初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之下，奉国民政府命令，综理全省政务”[132]。1931年《修正省政府组织法》将之修改为：省政府“依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及中央法令，综理全省政务”[133]。党治色彩有所淡化。

省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设省政府委员七至九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省政府主席由国民政府就委员中指定。省政府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厅长由行政院提请国民政府任命。

《修正组织法》特别提出：“现任军职者，不得兼省政府主席或委员。”[134] 民国以来，军人把持省政现象屡见不鲜，为防微杜渐，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军民分治之法，任命一批文职官员任省政府主席，如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张群为湖北省主席，吴忠信为安徽省主席，张难先为浙江省主席。但在战争频频的中国，这一做法不可能持久。根据国民政府任命命令的统计，南京政府从1927年至1949年对全国三十五个省共任命省主席253人次，其中军人为190人次，占总数的75%。

《修正组织法》详细规定了省政府委员会和省政府主席的职权。应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事项为：对于省行政事项发布省令或制定省单行条例及规程，撤销省政府所属机关发布的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的命令或决定，关于地方行政区划之确定及变更，关于全省预决算，关于处分省公产和筹划公营事业事项，关于咨调省内军警等绥靖地方事项，关于所属全省官吏的任免等。省主席的职权是召集省政府委员会并担任会议主席，代表省政府执行省政府委员会的决议和监督全省行政机关职务的执行，处理省政府日常及紧急事务。

从《组织法》的条文看，省政府委员会掌握省政，主席实际权力有限，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情形不一，如果担任省政府主席者具有较高的政治军事地位且施政方式强势，则一般委员很难与之抗衡，因省政府委员名义上虽由国民政府决定，实际多由省主席保荐，或在正

式任命之前先征得省主席的同意，省主席往往可以通过人事关系控制省政府委员会。加上省政府议政一般不采取表决方式，而是讨论协调，省政府主席作为强势一方更易操控会议，名义上的合议制完全有可能被操作成长官制。相反，如果省政府主席相对弱势而政府委员强势，则极易形成省政议而不决、相互扯皮的现象，影响行政效率的发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直在探索加强地方行政效率的方式方法，曾有过将省政府主席制改成省长制的动议，但迄未实施。合署办公制度是其企图解决省政府机构庞杂、多头并行、效率低下弊端的尝试。北京政府时期，中央各主管部直接在各省设立只对中央负责、不受省行政干预的厅；国民政府时期虽不再采纳这套制度，但省政府所属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厅仍要接受中央相应主管部门的命令，并对其负责，省厅和县局（科）既要对省县两级政府负责，又要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这样的多头控制，显然不利于行政的有效展开。1933年10月，在蒋介石就省政府组织办法改革事宜征询意见时，湖北省主席张群首先提出推行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省府各厅处，似可于现制之下，先行合署办公，一切文书，皆以省政府名义行之，各厅处主管事项，由各厅处长副署。则各厅处上对主管部省政府，下逮各县及各厅处，相互间往来层转文件悉皆省去，准此推之，人员经费，自可节省其半。"(135)

张群的意见提出后，蒋介石把张群的建议和自己对合署办公的一些看法，分别电豫、皖、浙、苏、赣等省政府，征询各省看法。各省回复态度不一，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赞同此提议，认为："合署办公集结各厅于一整个省府之内，则在任何制度之下，均能收统一简捷实效，本省刻正计划进行。"(136)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声称于1934年5月1日起开始实行合署办公，达到了节省经费和"提高行政效率"(137) 的效果。河南省主席刘峙、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则反对合署办公，陈果夫明言合署办公制度"裨益殊鲜"(138)。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甘肃省主

席朱绍良在回复中模棱两可，声称合署办公在精神不在形式，利弊互见。细究起来，各省的回复中，不难看出派系纠葛的影子。

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对实施合署办公态度积极，他明确指出："我国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政府机关都仿照俄国采行委员制，所以各省省政府按照国府所订省政府组织法，也采用委员制。委员制自然有他的特殊价值与优点，但是根据多年以来实行的经验，其最大的优点，亦就往往变成了最大的缺点，即因权力不集中之故，各委员彼此牵制得很厉害。省政府一切政务，都取决于省府全体委员所组成之省政府会议……凡有一案提出，必发言盈庭，很难折衷一是，而左牵右掣，欲求政令之顺利推行，每不可得。"(139) 杨氏此言，避开了为防范地方坐大而实施委员制这一背景，强调要加强省权，提高效率，道出合署办公的实质即改变省行政权不集中，以提高省主席权力。

既要吸取清末民初以来的教训，防范地方坐大；又要加强省级行政权，提高行政效率，南京政府对此一直左右为难。合署办公只是形式上加强了省政府的统一行政，并未真正提高省主席的权力，其效能难有成算，但风险相对较小。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在各省予以实施。1934年7月，蒋介石在给豫、鄂、皖、赣、闽五省省主席的电文中，提出现行省制的几点弊端：第一，就现制本身来看，为"头重脚轻、基础不固。论组织则省庞大而县缩小，论经费则省极巨而县极微，治官之机关太多，而治民之机关太少，伴食高官之人员太多，而深入民间之人员太少"。因此，需要缩小省府编制，扩大县府组织。第二，就横向观察，各厅、处并肩而立，各成系统，各固范围，各私则用，涉及两厅以上事务，往往迁延不决，权则相争，过则推诿，"欲革除今日省政之弊，惟有打破各厅、处并立之分割局面，而并为整个一体之省政府"。第三，从纵向观察，"省政府与各厅、处，县府与各局、科，均截然形成两级，中央部会往往认省之厅、处为其直属机关，彼此直接行文"，导致省府与县府间存在层层节制的流

弊，因此，必须使整个省府对中央院、部负绝对责任，整个县府对省府负绝对责任[140]。蒋介石所言，是当局从行政角度考虑采取省府合署办公制度的动因。

与蒋介石电文同时，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颁布《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这一制度先在江西、湖北、河南、安徽、福建“剿共”战争最激烈的五省试行。办法大纲共十四条，明确实施省政府合署办公的目的是“力谋地方政务之推进、保持省府意志之统一及增进一般行政之效率”，规定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保安处均应并入省政府公署，至少应先并入民政厅及保安处。省政府合署办公后，一切文书概由省府秘书处总收发，“省府所属各厅、处上对中央院、部，下对专员、县长或市长及其所属之科或局，均不直接往复文书，概以省政府之名义行之”[141]。1936年10月，行政院公布《省政府合署办公暂行规程》，通令全国一体实行，规定省政府的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处应一律并入省政府公署内合署办公。如房屋不足，至少须先并入民政厅及保安处，同时扩建省政府公署，以使各厅并入，省政府所属机关，除上述各厅处及呈准行政院特许设置者外，应分别裁并或尽量缩小，节余经费应悉数拨增各县行政费。

从行政效能角度看，合署办公不失为减少开支、提高效率的一种具体方法，合署办公推行后，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各厅处的会计、庶务等统一于省政府，政府采用集中统一的财务收支计划，有利于控制经费的支出和合理使用。各厅、处的会计、庶务人员裁减，可以节省部分开支，广西省合署办公后经常费减少10%，办公费减少28%[142]。湖北省政府合署办公后，省府及各厅、处裁员达二分之一以上[143]。但因国民党是由多种政治势力混合的政治集团，政府各机关分别为小集团所把持，不少省份虽奉命实行合署办公，而人员并未裁减，经费亦减不下来，相反由于规定各厅处均要搬进省政府集中办公，便兴建土木；又由于文书集中到秘书处总收总发，秘书处事务空

前繁忙，不得不增加员额及经费，弄得经费不减反增，事务也更形集中。事实上，当时蒋介石就曾提出合署办公的几点问题："省府与各厅处间，依然各地办公，其散漫无约、混淆不清……殊无足称"；"集各厅处之文件，悉由省统收、分办之后，概须主席核行，厅长副署，一人之精力时间有限，能否肆应裕如，亦属疑问。"[144] 事实证明，蒋的担心不无道理，合署办公制度很容易走向创制者愿望的反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时期未对成立省民意机关作出筹划。直到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不断有参政员对此提出意见，国民政府才决定各省设立省临时参议会，于同年9月26日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须具有下列两种资格之一：甲、具有本省籍贯并曾在省内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两年以上著有信望者；乙、曾在省内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两年以上著有信望者。各省临时参议员名额不等，多者50名，少者20名。省临时参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各县可在本县居民中根据前述两种资格中的甲项，按规定名额遴选出候选人交省政府。省政府与省党部可在本省文化团体和行政团体中根据前述两种资格中的乙项，按规定名额的一倍遴选出候选人。各省政府将上述两种候选人名单呈报行政院，转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省临时参议会设正副议长各一人，由行政院从参议员中提名，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由参议员的产生办法可以反映出省临时参政会并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

二　市制和特种地方军政制度的建立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分别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首都、人口在百万以上者及其他有特殊情形者，依国民政府之特许，可设立特别市，"特别市直辖于国民政府，不入省县行政范围"[145]。到1930年1月，全国共设立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广州七个特别市。《市组织法》规定人口在20万以上的都市可经国民政府特许设市，"市直隶于省政府，不入县

行政范围”[146]。

1930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的《市组织法》。该法在民国时期施行较久，影响较深。《市组织法》将市分为行政院辖市与省辖市两种。院辖市的条件是：“一、首都。二、人口在百万以上者。三、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147] 省政府所在地即使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仍应归省管辖。根据这一规定，全国当时确定南京、上海、天津、青岛、汉口五城市为院辖市。北平、广州等城市人口虽符合院辖市条件，但当时为省会所在地，故根据规定为省辖市。不久，河北省会迁天津，北平恢复为院辖市。1931年6月，国民党中政会议决汉口市改隶湖北省而为省辖市。到1931年11月，全国有行政院直辖市四个：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青岛市[148]。1933年，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以陕西长安为陪都，改名西京，为院辖市。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陪都，升格为院辖市。到1947年，院辖市增为九个：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西京、重庆、哈尔滨、大连。

新的《市组织法》规定，凡人民聚居地方有下述情形之一者，设省辖市：一、人口在30万以上者；二、人口在20万以上，其所收营业税、牌照费、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总收入一半以上者。省辖市地位与县相同。省辖市虽为数不少，但仍有不少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因不符以上要求而被宣布废市改县，如苏州、无锡、烟台、郑州、福州、芜湖、南宁等。抗战爆发前，经国民政府核准的省辖市有杭州、广州、汉口、济南、成都、武昌、重庆、贵阳、昆明、南昌、长沙、包头、连云港等，尚不具备规定条件但已设立市政委员会或市政筹备处的有无锡、烟台、郑州、开封、桂林、福州、厦门、九江、衡阳、芜湖、汕头、南宁、兰州、自贡、韶关等。

市的行政机构为市政府，市长下设各局、科分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警察、卫生等项事务。市政府设市政会议，每月开会一次，议决提出于市参议会的议案、市政府所属机构办事章则、市政府所属各机构间不能解决事项、市长交议事项等，并不具有实际决策权

力，市政大权主要掌握在行政首长手中。

市的民意机构为市参议会。根据1932年8月公布的《市参议会组织法》，市参议会为“全市人民代表机关”，市参议员由市公民直接选举，市参议员的名额在人口20万之市为15名，超过20万者，每5万人口增加一名。市参议员不得兼任本市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公务员。市参议会每两个月开常会一次，所作决议市长应当执行；市长如认为决议不当时可送交市参议会复议，如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而市长仍认为不当时，应即提付市公民依法复决之。将议会与行政的争执诉于全民公决的这一项规定，不同于省议会与省主席的争执由行政院“核办”的规定，凸显出市为自治单位的地位。市公民对市参议员得行使罢免权，对市参议会的决议得行使复决权。事实上，由于民主环境及保障机制的薄弱，这些反映市公民意愿的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落实起来仍然十分困难。

南京国民政府依据孙中山地方自治原则，地方行政制度采用省、县两级制。在推行过程中，由于各省区域辽阔，再加上交通不便、战乱等因素，省管县实际力有未逮，对政府政令推行和有效管理形成相当阻碍。30年代初，长江流域各省出于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的需要，纷纷在省县之间增设特种行政组织。1931年6月，蒋介石提出在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自兼委员长[(149)]。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四十三县划分为九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150)]。7月，蒋介石通令各“进剿”部队“关于宣传事项，应由党政委员会指导施行，俾收统一之效”[(151)]。党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党务、民众自卫及赈济三方面工作：“关于党务方面，即筹划及指导剿匪区域内党部及民众团体之组织及活动宣传训练等方法”；“关于民众自卫方面，即指导督促剿匪区域内保甲制度之实施、户口之编查、自卫团队之整理与扩充及招集流亡、训练自治等”；“关于赈济方面，即筹划剿匪区域灾民之赈恤、田地田赋之整理及产权之确定、农村之恢复等”[(152)]。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授权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粤赣闽三省“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处理所属区域“党政事务”[153]。江西省政府决定在省县之间设置行政区，划全省为十三个行政区，在省政府指导监督下“综理辖区行政及保安事宜”[154]。在此前后，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机关设置，包括安徽的首席县长制、江苏的行政区监督制、浙江的县政督察专员制等。

1932年8月6日，鉴于现有省、县行政结构难以满足管理需要的实际状况，行政院正式公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在全国推行。与此同时，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也于同日公布《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首先在豫、鄂、皖三省颁行。以上两个条例的公布，标志着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的初步确立。

《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的颁布机关是以汪精卫为院长的行政院，行政院作为国家机关，《条例》必须考虑和立法原则不相冲突，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孙中山关于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省、县两级制的遗训，因此《条例》在变通的意旨下，力图将其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该《条例》规定，省政府在离省会较远地方，因有特种事件发生，可指定数县为特种区域，临时设置行政督察专员。行政督察专员由省政府就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县长中指定一人兼任，于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辅助省政府督察特种区域内地方行政，于某项特种事件办理完毕后撤废；行政督察专员之设置，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并由省政府将设置理由及督察区域，咨请内政部转呈行政院决定行之；专员得于原领县政府内附设办事处，该办事处亦得于本督察区域内流动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对于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市政府地方行政，有随时考察及督促、指导权；专员对于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市政府行政人员，认为有应行奖惩之必要时，得随时呈明事由，密报省政府及主管厅核办；专员“因维持治安之需要，对于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市之警察保卫团可节制调遣之”[155]。

《行政督察专员组织条例》的颁布机关是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豫

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其对新制的要求更急迫，所颁布的《条例》更着重于新制的有效性，以利该制的推行。《组织条例》规定：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依各省“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酌划一省为若干区，各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56]。公署直隶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并受省政府指挥、监督，综理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行政督察专员由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委派，并由省政府加委，兼任驻在地之县长。行政督察专员可随时考核辖区各县、市长及其所属员兵成绩，并呈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及省政府，知照主管厅、处分别奖惩或其他必要之处分；如遇有紧急处分之必要时，专员可先行派员代理被撤职之县长等；专员对于区内各县县长之命令或处分，认为违法或失当时，可命令停止或撤销；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承全省保安处长之命，管辖、指挥该区各县之保安队、保卫团、水陆公安警察队及一切武装自卫之民众组织。

1932年9月，根据《暂行条例》，浙、赣两省率先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同月，据奉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之令，豫、鄂两省同设该制。1932年10月，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要求在各省普遍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强调在督察区内实行军民二政统一，行政督察专员制有向常设机构发展的趋势。11月，安徽省将首席县长制取消，按《组织条例》改行行政督察专员制。1933年3月，江苏省依据《暂行条例》开始在全省推行该制。9月，河北省亦依据院颁条例首先在滦榆、蓟密两区推行该制。

1933年1月，在为“剿共”军事配合而推出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基础上，南昌行营进一步改组江西各地专员公署，扩大专员公署权力，专员一律兼任保安司令，并须逐渐兼任专员公署所在地县长；同时，为专员公署增加经费，配设技术人才。1934年“福建事变”后，又在福建推行专员公署制度，将全省分为十区，设置专员。

1934年7月，南昌行营颁布《各省行政督察专员职责系统划分方法》，规定新任县长应赴该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请训，接受指导；省

政府奖惩县长，依该管专员之考察报告为重要依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可检查县财政，承转省县行文。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省县政府间又一层级的地位更加明确。到1935年，山东、四川、湖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也相继推行该制。

1936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兼办军法事务暂行办法》。3月25日，行政院颁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10月15日，行政院又修正公布该暂行条例。新条例明确宣布1932年颁布的《暂行条例》和《组织条例》均告废止，取消行政督察专员制设置时带有临时性质的特别限制，明确规定“行政院为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增进行政效率起见，得令各省划定行政督察区，设置行政督察公署”[157]，专员公署为介于省县之间的“省政府辅助机关”。除原有职权外，条例进一步扩大专员公署职权，包括审核及统筹辖区内各县、市行政计划或中心工作，审核辖区内各县、市地方预算、决算及单行法规，处理辖区内各县、市争议事项，于不抵触中央及省之法令范围内得订立单行规则或办法，受军事委员会委派兼办军法事务，核考辖区各县市长及所属行政人员业绩等。此后，行政督察专员制进入快速推广阶段，据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工作报告称：“现在全国各省已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者，计为江苏省十区，先设八区，浙江省九区，安徽省十四区，江西省八区，湖北省八区，河南省十一区，福建省七区，贵州省八区，陕西省七区，甘肃省七区，四川省十八区，广东省九区，湖南省先设四区，山东省先设三区；最近又增设四区，河北省原设二区，现已裁撤。各行政督察区所辖之县，自四五县以至十三四县不等。行政督察专员，对于所辖各县市行政，随时督察指导，自无鞭长莫及之憾。”[158]

专员公署的建立健全，在省、县之间增加了一级有相当行政权的督察机关，对改变交通不便状况下，省管县鞭长莫及的弊病有相当作用。不过，专员公署制度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江西方面就有反映，

县与专员公署同地设署者，双方往往“权限不清，非事之代庖，则事事推诿”[159]。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特殊形势下，曾设立一些特别的行政机关。1922年，中国收回中东铁路主权，因地方中俄杂居，管理困难，决定将中东铁路沿线划为特别行政区，管理区内行政、外交、军警、司法事务。“东北易帜”后，内政部曾向东北政务委员会征询对东省特别区的改组意见，东北政务委员会称该区地位特殊，请暂予保留，随后国民政府决定保留东省特别区建制。特别区直属行政院，管辖范围以哈尔滨为中心，南至长春，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

1930年10月，中国从英国政府手中收回被强租三十余年的威海卫军港。1931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设威海卫管理公署，直隶于行政院，“掌理行政及监督地方自治事务”[160]。管理公署设专员一人，政务由专员召集行政会议议决执行。1945年10月，威海卫行政区被撤销，改为省辖市。

1931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划广东省琼崖全属为特别行政区，直隶行政院，设行政长官。1932年3月1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制定《琼崖特别区政府组织条例》，赋予特别区政府“管理全区行政事务监督全区行政机关职务之执行”的权力[161]。后因陈济棠暗中阻挠，改建事宜未能实施。抗战胜利后，1947年8月，行政院院务会议通过以琼崖改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隶属行政院，1949年4月正式成立行政长官公署，派陈济棠为行政长官。

蒙古、西藏因情况特殊，不设省，为中央政府管理下的两地方。

1932年，应“围剿”工农红军的需要，军事委员会先后成立“剿匪总司令部”四个，分别为1932年4月成立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5月成立的“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任总司令）、1935年10月成立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

令）、12月成立的“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宗仁）。“剿匪总司令部”除主持本地区的军务外，还总揽所在地区党务和政务，对重大问题有便宜处置之权，性质上属于临时性地方军政机构。

三　县制的改造和创建

根据孙中山的政制设计，“县为自治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162]。县在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县行政制度及自治制度多有创制。

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次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令各省遵照执行。1928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规定省政府按所属各县“区域大小，事务繁简”[163]依次分为一、二、三等。1929年6月，国民政府重订《县组织法》。上述两法确立了国民政府县制的框架，基本思路是为实现县自治打下基础。循着这一方针，国民党“三大”有关决议案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164]

国民党中央认为：“训政时期，重在进行地方自治之工作，故县长人选比诸任何官吏为重要。”[165]在《县组织法》中，规定县长的资格一由考试取得，包括县长考试、高等行政人员考试及经其他考试而获得考试院复核及格者；另一由学力及经历取得，包括在教育部认可之院校研习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学科毕业者、曾任荐任官三年以上或最高委任官五年以上经甄别考试及格者、现任县长曾经内政部呈荐者等。这一规定对学历和资历的认定非常严格。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规定，曾于中华民国有功劳，或致力于国民革命七年以上有成绩证明属实者，也可担任县长[166]。这就为军人当政和淆乱规

制开了方便之门。

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试署期满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实授以三年为一任，三年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任等级较高之县（1929年修正组织法将任期改为两年）。但在实施过程中，保荐之风盛行，县长往往因人而任，又因人而免，多数县长不等任满三年即已离职。1930至1934年间，福建更动县长289人，平均每个县长任期只有284日，最短的只有四天[(167)]。多数县长任期在半年至一年间。这样频繁地更动地方官，使其无法真正了解、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权力更多落入士绅和胥吏手中。

1933年6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县长任用法》，规定县长在任期内不得调任，非依《公务员惩戒法》应予停职或免职者外不得停职或免职。同年7月，内政部又咨文各省，凡各省未按《县长任用法》规定自行任命的县长，应一律作为代理县长，限一个月内由各省政府检齐其履历证书送考试院铨叙部甄别其资格，领取甄别合格证书，再按《县长任用法》正式任命。

国民政府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安徽为17.6%，比例最高；其次是浙江、湖南两省，分别为11.5%、12.4%；江西、江苏、湖北、河南分别占3.2%、2.7%、1.2%、0.3%，陕西、福建、贵州、甘肃、热河、青海、绥远等省均为零[(168)]。考试并未成为县长出身的主要途径。1935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长考试条例》，规定在全国广泛采用考试这一法定程序，县长考试在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下分省每三年举行一次。

县政府设有若干局或科。局为县政府的外部行政组织。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县设公安、财务、建设、教育四局，必要时可设卫生局与土地局。局受省主管厅和所在县县长双重指挥与监督。科是县政府内部行政组织。1928年的《县组织法》规定一等县

设四科，二等县三科，三等县二科。科秉承县长意志办理日常行政。1929年修正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设科减为一至二科。

县的民意机关为县参议会。1928年的《县组织法》中规定县参议会“以县民选举之参议员组织之，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169]，但各地并未建立这一机关。1932年、1933年、1934年国民政府一再行文，催各省成立县参议会，应者仍寥寥无几。

根据《县参议会组织法》和《县参议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县参议会为“全县人民代表机关”[170]。每乡（镇）可选举一名参议员。由职业团体选出的参议员不能超过全县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三。参议员任期二年，连选得连任。县参议会可议决县自治、预算、单行规章、县财政、县公债、县民负担、县有财产的经营及处分、县长交议事项等，并有建议县政兴革事项，听取施政报告及向县政府询问等权。县参议会的议决事项交县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如县长延不执行或执行不当时，县参议会可呈请上级机关核定之。如县长认为参议会决议不当，应具明理由送参议会复议，如全体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坚持前议，而县长仍认为不当时，“应即提付县公民依法复决之”[171]。

《县组织法》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弊病，主要是县属各局名义上由县政府管辖，实际均听从省政府相关各厅处指导，形成各局在县政府之外自行其事的局面。针对此一状况，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通过“县政改革案”和“地方自治改革案”，进一步加强县长权力。要求县政府一律以设科为原则；科或局均合并于县政府内办公，实行县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只以县长名义对外行文；县政府为行政管理兼自治机关。

在地方行政制度中有一个与县同级的特殊行政组织，名为“设治局”，设立在边远省份一些特殊地区。这些地区或因政治经济落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或因民族杂居，关系复杂，或因民众文化知识程度较低，不能设立县治，又需要有相当机关加以治理，以往在这一

类地区设立了与县治相等的特殊组织，如新疆、贵州的“分县”，东北、西北的屯田局、云南的“临时行政委员”，广东的“化徭局”、“化黎局”等等，名目极多。国民政府为统一行政，于1931年6月颁布《设治局组织条例》，规定在尚未设置县治地方，“暂置设治局，至相当时期，应改设县治”[172]。设治局虽与县同级，其机构较县政府简单，《设治局组织条例》规定设局长一人，置佐理员并酌用雇员。设治局不设自治机关，因为设治局仅是过渡组织，在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开发后，可改设县治。截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在云南、四川、新疆、黑龙江、吉林、甘肃、宁夏、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等省共设置过六十个设治局，其中有云南砚山等二十多个局陆续改县。

在“剿共”战争期间，政府和军事机关在一些地形较为偏僻，“平时政治力量，已有鞭长莫及之患”[173]地区，本着“适应剿匪需要，增加行政效率”[174]的原则，加设特别行政区，就近控制。1933年7月27日，南昌行营在江西设置特别行政区，以崇仁、宜黄两县交界的一部分治地为凤冈特别行政区，永丰、乐安、吉水三县交界的一部分治地为藤田特别行政区，同时设立新丰、龙冈特别行政区（旋被裁撤）。10月、12月，行营又分别在宜丰找桥、宜春慈化和安福洋溪、井冈山大汾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设政治局，隶属于行营和江西省政府，负责“处理全区一切行政事务。政治局对各级机关之关系，与县政府同”[175]。

理论上，县自治应为南京国民政府完成训政、推进宪政的中心工作，县级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并不尽然。仅以经费而论，据统计，1933年度，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县政经费分别为109.1万、88万、95.7万、113万，平均到每县河南为9830余元、湖北为1.26万余元、安徽为1.57万余元、江西为1.38万余元[176]。以一县之大，每月平均区区千元经费除维持政权最基本的运转外，确难指望其有开创之举。蒋介石自己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

人才。”[177] 另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设立固然强化了政权的垂直控制能力，但在省县之间添加具有行政层级意味的一级机关，无形中削弱了县级行政机关的重要性，对国民政府理应推进的地方自治实际不无阻碍。

1928年9月的《县组织法》规定县以下机构为区—村（百户以上乡村）、里（百户以上街市）—闾—邻共分四级。1929年6月公布《重订县组织法》，改村为乡，改里为镇。每区由二十至五十乡镇组成。1930年再修正时，改为每区十至五十乡镇，并规定每乡镇不得超过一千户。

县以下设立区、乡、闾、邻多级体制，难免叠床架屋，推行也不得力。到1932年，江西全省八十一县只有二十一县着手实行，实行地区也是“省、县、区、乡、闾、邻之间，脉络阻滞，遂致精神涣散，形式差池”[178]。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定，县以下之区、乡、闾、邻各组织，由各省自行决定存废，但不得少于二级或多于四级。1934年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改进地方自治原则》，规定“县地方制度采用两级制，即县为一级，乡（镇、村）为一级，区在情况特殊的地方也可以设置，但是例外的情形”。这项规定把以往的县—区—乡（镇）三级制度改为县—乡（镇）的两级制。

《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乡镇可根据自治办理程度选举或由县长择定乡镇长，选举监察委员，正副乡镇长和监察委员为“无给职”，“因情形之必要得支办公费”[179]。乡（镇）民意机关为乡（镇）民代表会，由每保选举代表两名组成。乡（镇）民代表会须在全县范围内均完成了健全机构、编查户口、整理财政、设立学校等自治事项，经省政府派员调查确实，报请内政部核准，才能设立。因此，30年代乡（镇）民代表会并未得到认真实施。

国民党中央原规定训政为期六年，1935年为完成地方自治时期，但直到1935年春，自治法规尚未确立，训政的三个阶段（自治扶植阶

段、自治开始阶段、自治完成阶段）中的第一阶段也仅只开始。以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江苏为例，30年代中期，这里自治机关尚仅“到县为止。区以下之乡镇公所，多未设立完备。即呈报设立，亦不过为纸上空文”[180]。至于自治的成绩，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报告坦率承认：“进展颇多窒碍。”[181]具体而言，“办理地方自治之经过，能达到预定之成绩者，实不一见。即就办理较优之省市而言，则各省自治机关组织完成之后，自治之事业既难推进，人民之信仰亦未增加。盖所谓自治机关，本为民众自身结合所以谋本身之福利，而结果乃纯变为下级行政机关负传达公文及征发之任，于其本身所负之责任，亦渺不相涉。故有时观其步骤虽甚合，考其实质则全非。驯至人民因办理自治而负担日重，怨望日增”[182]。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都表现出对孙中山政制设计亦步亦趋的特点。问题是，现实永远比理论更复杂、更生动，教条化地对待理论的结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第四节　蒋介石巩固最高统治权的努力

一　整顿内部与编遣计划的提出

北伐军占领京、津后，为表示军事结束，功成不居，1928年6月9日，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军事会委员会主席职务；12日，又宣布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务。蒋的辞职，本身就是故作姿态，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文、武大员自也心知肚明，纷纷凑趣电蒋，一片挽留之声。张静江、吴稚晖等则以“东三省问题，尚未解决”[183]为辞当面相留。14日，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相继复函蒋介石，告以：“大业一日未成，即责任一日未尽，仍当始终其事，奠安大局。”[18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议派蒋赴北京祭告孙中山，一则以祭奠孙中山为蒋提供打消辞意的台阶，二则以此凸显蒋介石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至此，蒋介石算是工夫做足，表示将继续负责。

6月12日、15日，国民政府分别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北伐告竣，统一完成，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此后将从事整顿与建设，务求完成建设新国家的目的。对内宣言提出五大施政目标：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匪盗、蠲免苛税、裁减兵额[185]。此时，蒋介石认为军事已定，开始谋划党务、建设等多项事宜。6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与稚、静二老谈天，研究政治现状，决开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令余与冯、阎、李为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分区整理，派胡、汪为公使，余总觉不甚彻底也。党事无办法，则一切皆无办法，如何能使党务统一也。汪、胡、共、无四派，如何能调剂其间；张、宋、孙三者如何能使其息疑，和衷共济；冯、阎、白三者如何能使其推诚无争也。"[186] 次日，又在日记中计划："将统一思想，整理党务，收束军事，设施政治诸端，草定方案。对于国民会议及外交政策亦计及之，以告国人也。"[187]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内乱，国家终得基本统一，元气的恢复尚待时日，整顿与建设，更是千头万绪。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谈到此时最急要任务有三："一要裁兵，整顿军务"；"二要整理财政"；"三为对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188]。可以说道出了全国大部分人民的心声。1929年2月，蒋介石记下其此一阶段施政计划，大致可看出当时蒋介石处理内外问题的基本思路："六月二日奉安以后之政策：一、改良农村，奖励农产与森林，确定以农为立国之本。令内政、农矿二部限本年内将全国各省之田租与农民生活状况第一期调查完毕，以定二五减租实行之步骤；二、改良教育，强迫普及，注重小学与职业教育；三、发展电气与铁道事业，务期于廿三年以前增加一万英里铁道，并于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利用水力扩充电气，尤注重于西北交通之发达，以期国防与经济同时发展也；四、减轻出口税，增加工作时间，以求工商业之发达；五、定三年以内，即至民国廿一年六月底止，以有计画有次序禁绝鸦片之吸种；六、导淮以五年为准，完成计画，但同时进行修治运河与黄河之准备；七、继续执行国军编遣会议之决议，必使其切实完成；八、调查户口，以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底止完

竣，由内政部负责执行，同时执行乡村自治××（按：两字无法辨认）完成；九、丈量地政，至民国廿三年底全国地图第一期测量完竣。十、已经开办之矿产，准于继续所有权，但以十年为限，并科其相当之税率。其他依照实业计画依次实行，必使三民主义于最短期内见诸实行，不落口头空谈也；十一、统一币制，以为整理金融之基。十二、稽核盐务，精炼白盐，杜绝偷漏，调节盐价，减轻加斤，以副民生之实；十三、对外则以全力收回治外法权，与各邻邦限期画定国界，以保国权。”(189)

蒋介石的计划基于对全国的通盘考虑，各地也有自己的努力目标。6月底，河北省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提出准备实施的十四项任务：一、建设廉洁省政府；二、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三、没收逆产，救济难民、伤兵；四、减收地租25%以利农民；五、组织农工银行，救济失业农工；六、设立合作社，以裕民食；七、取消苛捐杂税；八、整理交通；九、铲除官府式教育制度；十、组省经济委会，清理省库；十一、铲除土匪；十二、实行妇女解放；十三、实行征兵制度(190)。由出自不同层级的上述两个计划，基本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对未来施政的设想。

经过长期的内战，国家困穷已达极点，挽救经济、整顿财政是政府亟待着手的问题。1927年8月，各省区商民协会函呈国民政府，要求“召集经济会议，容纳关于经济团体，如农、工、商、学与劳资两方等代表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交专家为委员，讨论议决新税税制及关税管理、保管、征收等重要问题，并创制一切关于经济之法案”(191)。国民党“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后，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统一工作加紧展开。6月20日至30日，由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全国各大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主要职员，实业界领袖、经济专家及有关官员一百二十人出席。宋子文提出会议需要讨论的“财政上重大问题”：金融、公债、税务、贸易，要求与会者充分贡献意见(192)。会议支持宋子文提出的裁减兵员、限

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等各项财政措施，通过提请政府裁兵、统一财政、改革税收、保护关税、整理交通及公债等提案。会议高度关注当时对经济发展和财政统一有着决定意义的裁兵问题，讨论了军队数量、军费限制、裁兵方法、步骤、被裁官兵的安置等，通过裁兵通电，提出：裁减军队，全国留五十师，每师1万人；军费全年总额1.92亿元，占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二；组织裁兵机关，中央设全国兵工建设委员会，各省设分会。希望政府“于三个月后，将全国裁余军队之数额，化兵为工之成绩，公布天下”[193]。会议决定组织裁兵促成会筹备委员会，选举虞洽卿、杨杏佛、冯少山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

1928年4月，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以“议定机关费、事业费及划分国地两税、征解中央税款”和“救济金融、划一币制、整理旧债、推行新债各事”[194]。7月1日至10日，全国财政会议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主持会议，财政部、各省政府、各集团军代表百余人出席。会议目标为谋求“财政之统一，税制之革新，国家地方收支之划分，预算决算之厉行，金融制度之改进”[195]。着重讨论统一全国财政问题：限制军费开支，编制全国预算，统一币制。会议通过《筹备关税自主裁撤厘金案》、《整理盐务案》、《确定全国预算宜先确定大政方略案》等多个提案，决定统一全国财政，废除厘金制度，“一律裁撤厘金，所有物资课税、节节设卡之积弊，绝对涤除”；划分国地税，地方不得截留国税或任意增加新税；设立中央银行，废两改元，统一币制；1929年1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这次财政会议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会议响应当时掀起的裁兵声浪，要求把每年军费开支压缩到1.92亿元，建议发行特种公债，筹措裁军费用[196]。

8月10日至18日，全国交通会议举行。各省市代表一百二十人参加，交通部长王伯群主持会议。鉴于全国交通事业千疮百孔、濒于破产的境地，会议提出分三步整顿全国交通的任务：第一步恢复交通常

态；第二步提前筹办急需事业，如完成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修筑沪杭甬钱塘江至曹娥江段、陇海线灵宝至兰州段，健全全国无线电讯网，筹备航空运输，准备接管海事行政等；第三步为未来事业从速建设，如规定全国铁路路线，整顿扬子江等。会议通过交通整理设计方案一百四十余件[197]，决定取消中美、中日无线电合同，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实行官商合办。

无论是全国经济会议还是财政会议，裁军都是讨论的重点，这确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必要前提。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北伐时，仅约十万人，到1928年底已发展到四个集团军，总兵力二百余万人。其中，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50万，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42万，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30万，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亦在30万左右[198]。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成为压在国家社会头上的沉重负担。据统计，全国军队共计84个军270个师，常年经费约需5.46亿元，临时经费9600万元，共计约需六亿多元，实发数目3600万元，而国民政府当时全年预算总收入仅4亿元，加之新办的各种税收，亦不过4500万元[199]，即使将全年收入全部用作军费，“而不敷甚巨”[200]。中央如此，地方也不例外，以湖南省为例：“湘省军费，月需二百五十余万之多，尚系指在湘部队而言，开出湘境以外作战者，尚不在内。以湖南地方之小，民力之敝，何能担负月需二百五十余万之养兵费……在军队因四折发饷，实有不能充饥御寒之苦，在公家因民力已尽，亦有负担不起之虞，对公对私，均感困难。”[201]

庞大军队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国民政府财政的统一。由于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无法足额拨发部队经费，欠饷更是司空见惯，这种状况在各个集团军均存在：第三集团军情况最好，有山西田赋盐税作保证，出入不大；第一集团军每月应付军费银1260万元，实际上“仅发给半数”[202]；第四集团军“军饷仅能对折发给，每月通常不敷一百万元”；最惨的是第二集团军，军队数量多，开支大，国民政府每月只给200万元的军火供应，其他全靠地方，而第二集团军辖区地瘠民

贫，收入很少，1927年底，“每军士及总指挥每人各发现银五元，临敌之际有时赏发每军士一二元不等”[203]。由于军费不足，各集团军常常在所辖区域截留税款，发行军票，强行向地方民众索款。川、滇、黔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在辖地内任意发行钞票，征收税捐，使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军费一日不能确定，则精确之预算即一日不能成立”[204]。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对既有军队实施编遣，裁汰老弱病残，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必由之路。

北伐占领北京前后，蒋介石等国民党军事领袖开始认真思考和筹划实施裁兵。攻克北京之前，国民党内裁兵呼声已起。1928年5月23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三电，在致内政部及江苏、安徽、浙江省政府主席电中，提出：“北伐如成，则裁兵在即，江浙皖三省，至少每省须消纳五万被裁之官兵，以为生产之用。”[205]致刘纪文电中强调大规模军事结束后，“整顿军队不可稍缓……第一集团军总员共裁至廿万人”[206]。致何应钦电则明确提出其裁兵主张：“第一集团军急须乘时检阅整顿”，“军队如不裁减，万无整顿之望，即政治亦必随之破产。全国军队，固当待会议解决，而我中央基本部队则应早以行动为表率。”[207]电文初步提出了编遣第一集团军的基本构想：先从第一、第二、第三军团开始整顿，改编十至十二个师，每师三旅，每旅二团，完备骑、炮、工、辎重、特种、航空等各兵种，首先裁汰官兵约15万人。对被裁官兵拟充任警察，组织护路队、警备队与筑路队等；组织裁兵委员会，具体研究各军应裁减的数目及编配；组织编制委员会、抚恤委员会；等等。5月30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指出：“现急需办者：一、军事收束筹备会。二、裁兵安置筹备会。三、营房设计会。四、军队改编委员会。此四者以裁兵安置为最要而最难，其法不外分区裁汰安置。第一期以四个月为限，江浙皖三省政府负责筹设安置冗兵各一万五千人，每期可裁汰四万五千人，一年之间可裁十三万五千人。中央则设各种学校如警察、宪兵、路工、交通、电气、测量、浚河、航空各种人材养成所，每种多则三千人，少

则三百人，约计可安置官兵五千人之数。其费用则由政府预筹，可发行公债三千至五千万元。”蒋在电文中进一步强调：“革命后之建设，能否实行，全视裁兵计划能否成功，而尤在于吾辈能否切实进行也。革命之建设能否实行，全视裁兵计划能否成功。”[208]

蒋介石的裁兵主张，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全力支持。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对部队“化兵为工，力谋收束”。6月23日，蒋向国民政府呈文，提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以使“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并提出以张之江为裁兵善后委员会会长[209]。6月26日，国民政府第七十四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设立“裁兵委员会”的议案[210]。7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规定裁兵善后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负责设计裁兵后军队的收容方法。

在蒋示意下，南京中央所属部队将领纷纷表态响应裁兵主张。6月13日，钱大钧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裁兵一举，自为目前不可缓之要务”，国家建设要正常展开，“舍裁兵外，无以节省多数之费用”[211]。6月下旬，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致电军事委员会，提出：“请先由职军开始裁编。”[212] 6月30日至7月1日，何应钦主持第一集团军所属各军师长召开军缩会议，通过“国防海防各军分配办法”[213]，决定先将第一集团军部分军队兵额压缩三分之一。何应钦在讲演中以日本维新为例，要求各军事领袖效法日本藩王，将军权交还中央。具体而言，整军“第一步先党化军队，然后将个人军队化为国有，一切用人行政，都听从政府的命令”；“第二他的驻在地，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第三军需要独立，长官不能干涉”；“第四军事教育要统一”[214]。

面对国民政府的裁兵决议以及颇具声势的裁兵舆论，冯、阎、李等军事领导人不敢沉默，纷纷表态支持，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6月14日，李宗仁致电谭延闿、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意见：一、以政

治手段收复东三省；二、召集各方领袖开军缩会议，分期裁减兵额，裁余之军队，集中军权，统一训练；三、统一财政，制定建设方案；四、废除不平等条约；五、统一党的意志；六、酌定国民会议开会日期[215]。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密电蒋、冯、阎、李，严禁收编反动军队，酌量裁减原有军队，其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进驻北京后大力收编当地武装的阎锡山。对此，冯、阎、李等的反应颇具深意。阎锡山立即复电，表示："锡山裁兵节饷，夙具此心。十七年来，但有缩减之方，从无扩张之举。"同时就所谓收编武装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凡遇自拔来归者，均酌予收编，然亦均系禀明蒋总司令，得其允准者也。"[216]李宗仁的复电一方面表示"亟宜实行兵工政策"；另一方面因其自身也收编有大量部队，而极力为收编事开脱和打抱不平："有时因环境关系，暂予羁縻，亦势所难免。应请严令各军，如有特别情形，必须呈候军事委员会核办。军政完全统一，自易着手。陈义过高，无裨事实，恐转失中央威信。"[217]李济深则由其总指挥部秘书长出面表态："军事结束后，此时正须裁兵减政。"[218]相比之下，冯玉祥表现得更加诚恳："如何裁减兵额，如何化兵为工，固玉祥寤寐向往，尤馨香以祷其早日实现也。"[219]

对于裁兵，冯、阎、李其实各怀心思，反应也都出自自身利益，但在舆论和环境压力下，对裁兵之举表面上都不能不表示赞同，而且调门愈唱愈高。6月23日，阎锡山再次发出通电，力主裁兵，强调立国大事，"裁兵尤为要中之要"，"当此军事结束，训政开始之时，真正全民视线，惟集中于裁兵之点，能裁兵则能建设，能讲民生；不能裁兵，则建设民生都是空文。且能裁兵，则今日北伐完成，武装同志，都是有功国家；不能裁兵，则今日拥兵之多，难免不变为后日民众之罪魁"[220]。阎锡山此电，以民众意向为依归，可谓字字属实，句句在理，虽不一定是其肺腑之言，却切中肯綮。阎电发出后，白崇禧马上致电响应。7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主张统一军政，彻底裁兵，废除各集团军，各军事领袖常驻首都参加中央工作。军事将领的表态，一个比一个陈义更高，其中虽多有言不由衷之处，

但毕竟加入了全国裁兵舆论的大合唱，为裁兵编遣计划的推出作了铺垫。

二　编遣会议的召开与流产

1928年6月26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北平。此行任务一是到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二是与冯、阎、李等人协商军事善后问题。7月3日，蒋介石抵达北平，5日发出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人的通电，宣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凡我同志，必当以真正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221] 蒋介石以公开通电的形式，将倡导裁兵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中。

7月11日、12日，蒋介石召集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陈绍宽等讨论整理军事方案。13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蒋将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达成的共识——《军事整理意见书》向社会公开，作为实施裁兵的基本方案。《军事整理意见书》首先阐明裁兵的必要，强调"裁兵能否实行，军政能否切实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意见书详细阐述了编遣的具体方案：决定召开编遣军队的"特别军事善后会议"，由会议议定军队复员、裁兵具体办法，以及军政统一后的军制、军额、军费等问题，会议结果呈报国民政府公布，由军事委员会执行。同时对具体编遣提出八条意见：一、实行兵工政策，扩大警察编制，设立各种研究班，安置被裁士兵；二、由财政部印发3000万至5000万军事善后公债，筹措裁兵经费；三、组织裁兵委员会或编遣委员会具体负责裁兵问题；四、根据军费占国家收入一半的原则，确定全国年军费为2.5亿元，兵额为50万；五、军队编制以师为单位，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六、妥善安置军长以上级别的军官；七、实行军区制，全国划为：苏皖赣、闽浙、两广、两湖、四川西康、云贵、陕甘、鲁豫、燕晋、热察绥、东三省、

新疆十二个军区，每军区驻兵四万至五万人，军区长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八、抚恤伤残军人[222]。

7月14日，蒋介石进一步整理出《军事整理案》及《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具体裁兵计划。《军事整理案》规定设立国防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直隶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负责统帅军政全部责任。同时制定了编留军队的整理计划：一、设立编遣委员会，由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参谋次长加上中央委员三至五人组成，直隶于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成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各集团军总司令一律取消，各军均听编遣委员会的编遣。二、由中央统一各部队的编制、训练、经理及军械的分配、补给，取消各集团军总司令，所有节制、调遣、人事权收归中央，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及习惯。逐渐实行征兵制。三、国军平时以师为最大单位，军事委员会在各集团军及后方部队选拔精良部队，归中央直辖，先编成六十个师，再求精简为五十个师。编制、训练、经理、枪械以及节制调遣均听编遣委员会的命令。四、统一军事教育，各师下级干部轮番入中央军校补习教育。五、着有战功及资深学富的将领，由编遣委员会审定，一律补官给俸，军长以上级别者调军委会任职，愿出洋者给以旅费。六、各师、团易兵而教，相互参合[223]。《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规定了被遣士兵的安置计划：一、在编遣委员会里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警保设计部、兵工设计部、屯垦部。二、精选编余官兵及各地警察，编成宪兵20万，直隶中央。三、从国军及宪兵编余部队中，再选若干编为警察与保安队，直隶于省政府。四、兵工设计部研究兵工技术及管理方法，选择最急、最要、最易者先行。五、以冗兵开垦边荒，充实边防[224]。

蒋、冯、阎、李等国民党军实力派人物7月北平会面，为1929年1月国军编遣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是编遣会议筹备酝酿中的第一个重要阶段。7月25日，蒋介石离北平回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五中全

会。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举行。决定结束军政，开始训政时期，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设立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会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案》和《政治分会存废案》，要求各地政治分会限1928年年底前取消；修改政治分会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各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会议通过《统一党的理论案》、《民众运动案》等多项议案[225]。《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案》确定划分国家、地方税收的原则，设立预算委员会核定收支。会议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举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孙科、胡汉民为常务委员。

确立军事整理方案是全会重要使命之一，全会通过《整理军事案》，内容为：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三、统一军事教育；四、裁军为整军理财的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226]。决议还决定将提案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六人进一步规划，然后由国民政府核定施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向着召开编遣会议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蒋、冯、阎、李7月在北平讨论编遣计划时，曾议定军队分三期编遣：第一期为自裁自编，第二期为召开编遣会议进行统一编遣，第三期则在第二期统编基础上再把全国军队缩编为50万。自裁自编于1928年7月即开始进行，至1928年12月中旬，四个集团军均宣称已基本完成任务。经过整编，各集团军分别拥有的步兵数额为：第一集团军十二师二旅，第二集团军二十师数混成旅，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十二师左右[227]。从数字上看，第一集团军编遣力度较大，但究其实，主要是编制的压缩，人数裁减实际有限。自裁自编的效果正如何应钦所说，许多人给他写信反映“裁兵不过是一个美妙的名词，实际上绝没有那回事”[228]。这样的结果，朝野各方自然也都了然于

胸，这一段时间实际是各实力集团为应对裁兵而留下的准备期。自裁自编到期后，召开全国统一编遣会议便提上日程。

12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简章》，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筹备会，任命何应钦为筹备主任，正式展开编遣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26日，蒋介石决定编遣会议提案要点：一、取消集团军。二、军政军令在编遣期间，皆由编遣会议决议执行。三、不得自由调动部队[229]。

在会议筹备的同时，南京中央继续发动广泛的裁兵舆论宣传。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举办“整理军事宣传周”，召开民众大会宣传裁兵，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胡汉民、戴季陶等纷纷出席演讲“裁兵”、“编遣”。上海特别市党部把12月19日至22日定为上海宣传周，召开大会、发表通电，强烈呼吁裁兵。国民党上海六区党部联合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将领参加编遣会议，直诋与编遣相左的行为为“反革命”。同时，各地亲政府乃至中立报刊也大量发表文章、评论，支持编遣会议。

经过半年的酝酿、准备，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5日，编遣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大会通过吴稚晖起草的“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宣言，作为编遣委员会必守的信条。蒋介石发表讲演，以日本为例，强调“削藩”，要求把军权收归中央。直截了当地表示：“要造成现代式国家的条件是什么？即是（一）统一。（二）集中。”蒋以日本倒幕运动成功后，各藩化除藩兵、军权收归中央为例指出：“国军的基础树立，反动势力镇压下去——全国统一，才能名实相符，中央政府才能着手改良一切政治。”蒋一再阐述军事财政统一的重要性，强调：“要造成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要件的军权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今后能否统一，能否集中，全在我们同志一念之转移。”[230] 希望各军事领袖开诚合作，站在中央、统一的立场上，以国家为重，达成军事、财政的统一。

继第一次大会之后，编遣委员会又于1月8日、1月11日、1月17日、1月22日召开第二至第五次大会。第五次大会推选吴稚晖、谭延闿、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宋子文、张学良为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大会闭幕后组织编遣委员会常务会议，定期开会，讨论决定编遣的有关事宜。编遣委员会负责拟定国军兵额，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军费，规定现有各部队官兵裁留标准，接管现有各军队程序，校阅全国现有陆、海、空军，筹办编余官兵分遣安置等事宜。编遣委员会委员长由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设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主任。委员会下设编遣区办事处，为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负责该区内军队之编制、遣置、点校及编遣期内之训练、绥靖、兵器器材整理统计等事宜。

1月25日，编遣委员会第六次大会后，举行闭幕典礼，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相继致词，并发表闭会通电。编遣会议历时三个星期，讨论了三十多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为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大纲》全文共十七条，主要有六方面内容：一、国军编遣委员会已经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之后，设编遣区，各编遣区办事处承编遣委员会之命，于编遣尚未完毕前，负责一切。这就等于取消了冯、阎、李等人对所辖军队的合法统帅权，军权收归中央。二、各编遣区内从前解拨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的军费及各区截留的国家税收，一律移交财政部管理，再由财政部拨交编遣委员会经理部，经理部再转发各部队。现存之军实及一切军用品，存放指定之储藏库统一保存。各兵工厂之制造，一律停止。三、全国现有军队分六个编遣区编遣：即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各设一个编遣区，东三省设一个编遣区，川、康、滇、黔为一个编遣区。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四、全国陆军步兵不得超过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总兵额约80万人，军费为1.92亿元。军费缩减至全

国总收入的40%为止。各编遣区编留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五、各省区依地方财力及必要，可由编遣会核准，将编余官兵改编为地方警察、保安队，人数以3000至6000人为限。六、现有军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的命令不得移动[231]。

大纲最大的看点是编遣区的划分，这是影响各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是各方斗智斗力的结果，其中包含有很大的奥妙。从表面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是平等的，各设一个编遣区，因此所裁士兵人数也基本相等。实际则不然，方案中规定中央直辖部队的编遣，为蒋介石留下了一个活口，由于握有中央大权，蒋可以把第一集团军兵员转移到中央编遣区编留，实际比冯、阎、李多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编遣区，编遣的结果自然会比冯、阎、李保留更多军力。在各集团军自行缩编过程中，蒋的用心已经暴露。缩编前第一集团军有四个军团及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总计官兵50万人。在自行缩编时，蒋介石把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改由中央直辖，改成中央缩编部队。在缩编过程中，中央直辖部队又都由第一集团军兼办。编遣区办事处的组成也是如此，何应钦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朱培德为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项雄霄、葛敬恩、贺国光则分别兼任两个编遣区办事处的总务局长、军务局长、处置局长，两个编遣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操作的空间巨大。

当然，中央直辖部队的提出，也并非毫无根据，以后来编成的中央直辖部队十二个师成分看，这些多属北洋或地方部队："如河北徐源泉、郑俊彦，皖北岳维峻，鲁境任应岐、刘珍年、谢文炳、刘志陆、刘桂堂、福建张贞、卢兴邦等部"[232]。他们在北伐大潮中卷裹进南京政权中，和各实力集团均没有历史联系，由中央统一编遣说起来尚属名正言顺。又如福建、山东部队不属于指定的六个编遣区范围，将这些部队放进中央直辖编遣，也应是比较好的选择。事实上，

这些部队编遣后，相当一批人员并没有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中，如福建张贞、卢兴邦部分别编为暂编第一、第二师，岳维峻、谢文炳、刘志陆、刘珍年、刘桂堂部分别编为新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这些部队基本还是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直辖部队十二个师中半数以上不为蒋介石所掌握。郑俊彦、徐源泉、任应岐部分别编为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师，相对而言，这部分部队蒋可以调动。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本为第一集团军析出，不过方振武部曾经归属冯玉祥，只是“二次北伐”时才归第一集团军指挥，陈调元部远在豫鲁，和白崇禧有附属关系，将其归属中央直辖，既在情理之中，也可以理解为偏私之举。无论如何，这样一个编遣区的存在，使蒋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这是蒋拥有中央权威的天然优势。

其实，编遣中的空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十分清楚，从保存实力的目标出发，虽然表面上他们不能不附和裁兵主张，但实际上私下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编遣方案的通过后面就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勾心斗角过程。早在“二次北伐”完成，裁兵宣传声入云霄时，冯玉祥就提出，裁兵“不可令各集团军比例裁汰”，其公开理由是“军队系国家所有，非各军事领袖总司令所得而私”[233]，实际则是因为冯部人数较多，如按集团军比例裁撤，则冯部裁撤最多，实力受损最大。会议筹备时，冯玉祥授意石敬亭等向蒋介石提出：“此次编遣军队宜用‘下楼’办法，而不宜用‘跳楼’办法。所谓‘下楼’办法，乃先编遣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部，过半年再编遣各方面军总指挥，再过半年编遣各军，如此仅一年即可编遣至师部。此种按步下楼之办法，虽缓慢而较安全。跳楼办法则为从集团军至师部均一次编遣。”[234] 这一建议很明显是希望由各集团军自身主导编遣进程。冯进而提出有利于己的裁留标准：“强壮者编，老弱者裁；有枪者编，无枪者裁；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裁；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裁。”[235] 按照这一标准，保留最多的当然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裁遣最多的则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收编了十几万降军，势力膨胀最快；阎锡山因为大量招降纳叛，扩充实

力，实力大增，成为众矢之的；白崇禧在前线也收编了一些降军。惟独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出力多实惠少，冯玉祥对此愤愤不平，所以曾多次提出裁兵重在不收兵的主张。

冯玉祥的裁留标准当然为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所不满。蒋介石见有机可乘，在编遣会议上鼓励冯玉祥提出自己的裁兵方案。冯玉祥拟定的方案为：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部队共编八个师。冯玉祥的方案，把自己划到与蒋介石并列的第一序列，而把阎、李置于第二序列，显然对阎、李不利，激起阎、李二人对冯的不满。1928年12月26日编遣筹备会上，冯玉祥的方案遭到阎锡山、李宗仁方面的激烈反对，李宗仁公开表示："余意裁兵愈多则前途愈有可为，惟须合于中庸之道，各方被裁兵额，务求平允方可。"[236] 蒋介石则不置可否。阎锡山趁此与蒋介石、何应钦等联络，提出一个与冯氏不同的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到八个师，余下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阎锡山的提案加进了中央编遣区，明显对蒋介石有利，而其本身并无实质利益。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主要欲借此拆散他最担心的蒋、冯联盟。蒋介石在阎的提案基础上，又提出增加一个东北编遣区。

编遣会上，蒋介石把冯、阎两个方案分别提交会议讨论，冯、阎立即为此发生冲突，李宗仁看到阎案有离间蒋、冯的性质，也表示倾向阎案，冯玉祥陷于孤立。局势的发展正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在阎案已占上风的情况下，他顺水推舟，也表示赞成阎案：会议最后确定的方案正是以阎案为基础的，蒋巧妙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使各方无话可说。

总体而言，作为拥有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蒋以中央编遣的名义，在此中得到事实上更多的份额，尚不能算是过分。其挟中央政府的权威，利用广大人民渴望裁兵的心理以及冯、阎、李之间的矛盾，召集编遣会议，期望用和平的政治手段，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

仁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进而剥夺他们的军权，也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但蒋求治太急，对地方实力派逼迫太紧，会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编遣会，以焕兄报告最实在，任潮最支吾……今日形势，编遣事非强制执行似不为功，应与焕章接洽之。"[237] 强制推行编遣的意愿非常急迫。在其本身并不具备消灭地方实力派的足够力量的背景下，招致反弹几乎不可避免。对蒋介石高举中央大旗欲消弭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实力于无形的计划，冯、阎、李当然不肯听从。冯玉祥拟定的方案受到攻击后，即表示消极，不再出席编遣会议。李宗仁经过几次电报催促，才于12月28日到南京，抵触心理非常严重。

编遣会议一闭幕，冯、阎急忙返回防地，李宗仁则留在南京观察动静，各方面都积极做战争准备，以便在战场上一决高低。蒋介石花费半年精力酝酿、筹备编遣会议，在会上尽管达到了目的，却也种下无穷后患。会议进行过程中，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军阀习惯性成，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思之但有郁闷而已。"[238] 他把责任归之于地方实力派对权位的把持。而冯玉祥的观感则是："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239] 区区一个编遣会议及几个决议，不可能真能使几大军事首领轻易就范。尤其是蒋、冯离心，蒋、冯同盟破裂，更埋下无穷祸根。冯氏1928年10月13日抵京，就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职，几大实力派中，最能表现与蒋合作诚意，而蒋一开始也希望与冯结盟，1928年8月8日的日记中曾规划"焕章入府"[240] 为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条件之一。但是，编遣决议实际已使蒋、冯间的良好气氛化为无形。会后不久，2月5日，冯氏向蒋"面请短假返汴休养"[241]，由此开始了蒋、冯间的长期对立。冯玉祥离心，蒋对全国的统治主动权大为削弱，李宗仁、阎锡山乃至冯玉祥，都有了向蒋启衅的决心与可能。

三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6年国民党“二大”后，时局急剧变化，国民党经历了异常剧烈的分化重组。蒋介石地位继续上升，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足鼎立的局面仍得到延续。1928年1月，蒋介石经短暂下野后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复出，这次会议胡汉民、汪精卫均未参加，胡汉民到土耳其考察党政关系，汪精卫也离国赴欧。“二次北伐”完成后，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虽然汪精卫和胡汉民均未到会，但在训政等诸多政治及理论问题上，会议采纳了胡汉民的主张，意味着蒋、胡合作拉开帷幕。会议通过决议，决定1929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42]。8月底，胡汉民、孙科等回国。9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补选胡汉民、孙科为常务委员。随后，胡负责起草《训政纲领》，经10月3日第一百七十二次中常会通过。此《纲领》基本原则是国民党总揽政权，“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执行之”；又由国民党独揽治权，五项治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243]。这些，为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人数急剧减少，据统计，至“三全大会”召开时，已登记持有党证的党员为26万人，较清党前的百余万大幅度下降。至1929年10月扩大登记，党员总数为63万，其中1926年入党者40%，1927年入党者40%。以广西为例，清党前党员人数约五万人，“自清党后，尚有二万人。最近经训练整顿后，只得万余人，前后相差约五分之一，再经最后之登记完竣，实数仅存六千余人”[244]。长沙的情况更为夸张，“马日事变”前，全市30万人口中，“党员有十九万人之多”，事变后，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实行登记“审查合格党员只一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学生六二五，教员三七三，政界三二一，党务七六，军界五九，工人四四，商人六，其他八，农人无”[245]，国民党在民众中的组织基础丧失殆尽，其代表性也大受影响。

为壮大自身力量并清除党内异己分子，南京中央决定“整理党

务”，通过组织手段，对党员进行“特种登记”、“总考查”，以“彻底改组各级党部”[246]。“特种登记”限于登记同盟会至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党员，以此恢复一批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失散党员的党权，增加国民党老旧分子的比例。这些措施，遭到许多地方党部的抵制，登记工作进展缓慢，原计划三个月登记完（1928年4至6月），直到12月仍未完成，其间地方党部与中央党部，下级党部与上级党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一百七十九次会议通过“三全大会”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此办法规定代表“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中央指定全额之半”，这就等于剥夺了党员的一半选举权；同时还规定“未办完登记未正式成立之省特别市党部之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由中央指定之”[247]，登记截止期为1928年年底，中央包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上述决定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急于包办“三大”，独揽党权的野心。对此，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首先发难，反对“指派”代表，指责：“将党员之选举权完全剥夺，本党改组之意义完全消失。”他们的矛头隐隐指向胡汉民，认为：“立法院委员既不由党员选举，亦多不合中央所定之标准。既夺党员之权而集之于中央，再多中央之权而付之政治会议，违反民主政治之精神”[248]。在遭到国民党中央警告后，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提出总辞职，并尖锐指出：“现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谣言，更畀久为本党大敌者以高位，覆辙故蹈，失败堪虞”；“三次代表大会为期将届，大会重要议案迄未依法公布，所议决代表大会及登记各案，有违民主法治精神，渐入多头政治途径。”[249]南京各区党部及区分部召开的党员大会明确反对中央指派半数代表及进行特种登记的做法，指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中央指定全额之半，当时因各省市情势不同，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选举殊多困难，故不得不有此权宜办法，此类比例，既不适用于二次大会，何能拘束于三次大会。”“十三年改组时，或改组后，凡未履行登记之分子，依例应失去党员资格。”[250]南京市党部的抗议，引起强烈反响。何香凝发表通电，认为中央指派代

表“无异于将本党民主制度完全摧毁”，并强调：“总理十三年改组本党，其意谓中国有治人，无治法，欲求治法，先从本党做起，改组后将党归全体党员，即欲党完全采取民主制度。”声明：“本人此次绝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希望当选，并先行辞去中央委员，以明本身不能匡救中央之责。”[251] 上海、江、浙、皖等省市党部也对指派代表计划提出抗议。丁惟汾在北平、天津及整个华北掀起抗议风潮，并指名驱逐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出中央。

汪精卫系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失势后，汪派陈公博、顾孟馀分别主办《革命评论》、《建设》两个杂志，揭露南京国民党中央独裁、腐败，提出改组国民党的纲领和办法。1928年9月两刊虽被查封，但为改组派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蒋介石对汪派的陈公博等也未采取赶尽杀绝做法，为日后可能的合作留下余地。1928年年底，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国民党二届中执监委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于上海，奉汪精卫为领袖。改组派提出“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实际并非恢复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和三大政策。他们指责“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蒋介石”，是“党皇帝、党诸侯、党大夫”集团，比历史上任何军阀“更狡黠、毒辣、凶狠”。改组派在反对南京中央包办国民党三大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为缓和矛盾，11月16日，国民党第一百八十三次中常会决定，“三大”延期至1929年3月召开，代表产生办法另定。17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谈话，强调：“党员对党应当服从，而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决议有不满意时，亦只有在党的范围内建议，建议无效，亦应服从，决不能因此诋毁某一中委个人。”[252] 20日，胡汉民、戴季陶等召集到南京请愿的苏、浙、皖、沪、宁等省市代表训话，解释第一百七十九次中常会决议，希望“谅解”。12月7日，中常会临时会议对代表产生办法作了修改：一、凡省或等于省之党部，于1929年2月15日以前正式成立，经中央审查认为组织健全者，其代表得完全由党员选

举产生；二、1929年2月1日以前，省或等于省之党部未正式成立者，其代表由省依中央规定之选举法，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定加派人数，由省代表大会选举之；三、县市以下之下级党部，组织尚未健全之省（或等于省）其代表由中央指定之。[253]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各县市代表比例名额作出规定：党员200人以下者选代表两名，200至400选三人，400至600选四人，600人以上选五人，以五名为限。县市代表再参加省代表大会选出正式代表，各省或特别市代表至迟须于1929年2月底以前选出。修正的选举法规定结束登记，建立党部的省市由中央核准后可以选举代表，到11月底，已结束登记者有六个特别市（宁、沪、穗、汉、平、津）、六省（苏、浙、粤、桂、晋、豫）、三路（平绥、沪宁、津浦），还有十九个省市未完成登记或完成登记者未正式建立党部，这样有相当数量的省市无法选举代表[254]。据一百九十九次中常会透露，全国仅有宁、沪、穗、粤三市一省选举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的有苏、浙、鄂、晋、桂、甘、汉口、天津八省市，河北、四川、湖南、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北平等十九个省市以及特别党部代表均为圈定和指派。当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指责“中央主张指派，违反了民主精神”时，胡汉民却理直气壮地表示：“中央是由健全的民主产生的集权机关，难道对于下级还未能民主的机关反而不能指派代表吗？”[255]

为笼络、分化改组派和党内的反对力量，争取更多支持，1929年2月3日，蒋介石发表《本党最近的几个重要问题》，对国民党政策变化作出解释，同时表示，下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必须具备对本党主义有真切的认识，在本党有相当历史，有奋斗成绩三个条件，强调汪精卫在党内拥有深长的革命历史，其被推为中央委员，“我敢保旧日同志，也一定推重他的”[256]。但是，改组派并不罢休，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等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南京中央与北洋军阀无异，“党已不能代表民众”，“百分之八十的代表为

中央所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257]。3月14日，南京市党部召开大会，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亲蒋分子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多人受伤。军警包围会场，逮捕七人。

1929年3月15日至3月27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代表共466人，其中除54名上届中央委员为当然代表外，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87人，选后圈定的代表122人，其余208人由中央圈定或指派[258]。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不到总数的19%。开幕时出席正式代表210人，中委20人，列席者38人。不到会者除汪系、桂系的代表外，还包括冯玉祥、白崇禧、于右任、林森、陈铭枢等军政要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胡汉民致开幕词，赋予代表大会以重大责任：“在训政时期中，国民大会的政权乃由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所以凡政治上一切最高的方针与原则，无论是外交的、财政的、军事的、内政的、教育的……都有待于大会决定。”胡汉民认为：“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备，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这一点各位同志都要注意。”[259]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着重对国民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理论问题作了阐释，指出：“（一）本党所代表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二）三民主义之为社会主义，总理在其遗著和演讲中，已经反复说明。因为三民主义的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而且包含社会革命。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就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方法；社会革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中国之不能采取阶级斗争，固由总理再四说明了，然而决不因为三民主义不赞成阶级斗争，便说三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有些人竟把三民主义中间的社会革命性抹煞，这也是明白的违反总理的三民主义。”[260]会

前，蒋介石在有关文章中更明白地解释了国民党工农政策的改变的理论依据："我们要知道，社会经济是整套相连的一个体系，我们一方面要运用政权，在不妨碍发展生产的条件下，谋分配的平均和满足，同时并应该使生产者在增加生产品的产量上，获得生活条件的增进。三民主义的主张阶级联合，而不主张阶级斗争，就是因为以政治力量解决经济，是有把握的。我们在北伐出发以前，积极的唤起农民工人自动的起来奋斗，因为那时候农民工人确实是被压迫的，农民和工人的奋起足以促成革命的进展，及至北伐成功以后……如果我们还要奖励农工的反抗意识，则其结果，必定是农民工人，反过来压迫地主和工厂主。"(261)

会议进行过程中，蒋介石、谭延闿、何应钦、陈果夫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监察报告。大会通过决议案二十五起，主要内容是：

（一）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大会通过了《训政纲领》"追认案"和《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乃在政治的知识和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婴儿的中国国民之母，党员有"保养"、"教育"、"训练"成年之责，因此，训政时期，"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以治权付托于国民政府"，"此其以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这样，国民党一百七十二次中常会所提出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通过"三全大会"得到确认。决议还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262)。

（二）"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最高根本法"。会议通过决议重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

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263]。决议案指“本党过去数年党之一切理论、法令、规章，为共产党之反动思想所搀混”[264]，由此否定国民党改组后的政纲理论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三）修正《党章》，严密党纪。大会认为：“自清党以来，党员对于党纪，每多忽视。”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树立党组织的权威。修正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共十二章八十七条，其中有三条纪律规定，要求“严守党的秘密”；“不得于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党内各问题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后即须绝对服从”；“党员不得有小组织”等。规定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权力机关应接受上级机关之命令，并执行其决议，但在执行上有困难时，得用书面陈述意见，若上级机关仍令遵照执行时，应即服从执行”[265]。

（四）组成以蒋介石、胡汉民为核心的中央党部。会议追认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开除二届中执监委中跨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的决议。开除改组派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党籍，对汪精卫书面警告；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籍。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谢持、邹鲁、居正等人党籍，形成蒋、胡与“西山派”合作的局面。会议选出中执委三十六人，候补中执委二十四人，中监委十二人，候补监委八人。三届一中全会又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九人为常委。蒋兼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叶楚伧为宣传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长，陈立夫为中央党部秘书长。

大会通过军事、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决议。强调“军令”、“政令”权属中央，“务求军令绝对统一”，消除“割据相循”[266]。外交报告决议案中，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维护国民党统治相联系，强调废约的必要条件为“全国人民之思想必须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物质建设迅速进行，国民经济日臻巩固，而后国力充实，外交上方有胜利可期”[267]。

蒋介石是国民党“三大”的大赢家，“三大”之后其向掌控党权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但仅凭一次代表大会，尚不足以彻底改变国民党长期历史形成的体制和秩序，因此蒋在选举后感叹：“于此选举得一经验，乃知党员幼稚，不顾政治之现实而徒凭一己之理想，对选举则只顾个人而不顾大局。可知党政非有十分把握，会场非有十分预备，不易举办也。”[(268)] 蒋介石欲令整个国民党唯令是从，尚难达到。次年初，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的总结是：“余追思去年经过之错误，其祸根皆伏于第三次全国大会不能贯彻我混合选举第一、二次中央忠实同志委员为中委，而竟陷于偏面。其次为行政院无人负责，以致对俄外交失败而不可收拾。第三，不能预防冯之叛乱，偏于一方而使编遣不成，因此改组派假革命乃得乘机而起，而陷国家社会于不安至今。惩前毖后，可不痛改，如固执不化，则为害于党国，其盍有既极！”[(269)]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整套与第一、第二次大会相左的方针政策，外交上放弃反帝旗帜；内政上假“训政”之名，实行一党专政，将民生主义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政策束之高阁，维护乡村地主豪绅的强势地位。改组派的陈公博更指出了三全大会的致命问题，由于全会代表多由南京中央指派，“南京所喜欢的人才有被派的资格，南京所不喜欢的人，当然会被排斥。这所谓凭一己之好恶以用人，而人亦只有阿其所好。从前帝皇时候，单凭着一己喜怒以治天下，还有亡国之忧，何况民国成立，民智已渐开明；又何况国民经几次反专制的奋斗，若果代表不采选举方法，有志和有识之士怎肯参加。所以这次大会光是指派代表，实是软性和慢性亡党一个方法”[(270)]。蒋介石和陈公博都提到了国民党三大对党国的危害，只是双方的取向完全不同，一个是抱怨尚未完全达到操控大会的目标，一个则强调操控大会使党完全丧失民主精神和活力。孰是孰非，只有依靠此后的历史来检验了。

四　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

孙中山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孙中山生前遗愿，决定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灵柩一直暂厝于香山碧云寺。1928年8月8日，国民党结束“二次北伐”仅仅两个月，便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匆忙决定1929年1月1日为孙中山安葬日。11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出林森等人为迎榇专员，前往北平迎榇南下。由于南京中山陵园迟未建成，灵柩奉安日期不得不几经变更，初延至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最后定为6月1日。1929年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蒋介石亲任主席，开始具体筹办孙中山灵柩南迁事宜。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被尊为国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纪念孙中山成为各级政府及机关学校的常态化仪式。早在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就通过决议，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月12日，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的具体执行办法作了详细规定，明确每周周一上午8时为纪念周活动时间，举行纪念周的目的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271]。1930年代，纪念周程序中又增加向“党、国旗”行礼的仪式，以强化参加者对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认同。奉安大典和纪念周一样，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最隆重的孙中山纪念活动，虽然也反映了全国民众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无限敬仰的共同心声，实际也是服务于强化国民乃至政权内部认同国民党和当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蒋介石这一最终目标的。

奉安大典的组织者是国民政府，宣传方针是要向全国人民宣传总理遗教，整个奉安仪式与宣传无不体现严格的权力规范性与统一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统一的宣传大纲、标语与口号，宣传孙中山一生的事业是“领导中国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国民革命运动”。大纲反复强调三民主义是立国之本，而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领导国民建设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党，因此要求国民“拥护本

党、赞助本党”，将中国建设成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新中华民国”[272]。国民党试图通过奉安大典在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化宣传和教育运动，向广大民众强势灌输其意识形态。所发布的标语与口号纯属典型的政治话语，充斥着强烈的国民党权威意识。

奉安宣传特别重视面向普通民众，强调宣传品“内容不可复杂，文字须雅俗兼通”[273]，宣传形式应简明、直观，统一规定宣传方式为：“一、编发各种宣传品。二、讲演总理革命之伟大精神及史略。三、演放有关总理革命之各种影片。四、奏演哀乐及留声机之总理演说片。五、张贴各种迎榇图画、照片”[274]。

为扩大影响，奉安之前，国民党专门开通迎榇宣传列车，规定“车停各站时，任人围观”[275]。1929年5月10日，宣传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经过滁州、蚌埠、徐州、泰安、济南、天津等地，5月21日到达北平。宣传列车过站时，均作停留，“以资演剧、放电影、表演魔术种种宣传”，“一路散发传单，并摄影放活动电影”[276]。所经之地，国民党党部均召开迎榇纪念宣传大会，参与民众达数十万之多，仅济南一市即有十余万人参加[277]。济南党部为扩大迎榇影响，还特地制作了一枚“济南各界迎榇宣传纪念章”。

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江浙、南京地方党部又组织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由杭州开往上海、南京，沿途停靠，进行宣传。24日，沪杭宣传列车抵达杭州后，举行各界代表大会，浙江省党部组织表演歌舞新剧、发表演说，全场民众达一万多人[278]。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在江苏昆山、苏州及无锡表演“天下为公”剧目，各地均有数万人参加[279]。国民党动用铁路资源，精心策划和操作宣传列车的沿线造势，“由游戏之中将革命之意义刺入民众之脑际”，取得了部分预设的宣传效果[280]。

为烘托仪式的气氛，加大宣传力度，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制作和出版发放大量须知、纪念册、画刊等宣传品，让民众充分了解奉安

大典的重要性与神圣性，中央宣传部出版《总理重要宣言合刊》。这些纪念书刊图文并茂，将奉安大典的影响扩展至全国各地。

国民党不仅要求各省市党部与政府派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大典，而且还要求各大学派一至三名代表、各专门学校派一至二名代表，各省派农民，各省各特别市派工人、商人、学生团体及妇女三至五名代表至南京参加这一活动。各代表由当地党部或政府甄选和介绍[281]。国民政府颁布《总理奉安赠赙及纪念办法》和《总理葬仪赠送纪念树木办法》，鼓励各界捐建建筑、捐送树木等[282]。同时，要求奉安前后全国下半旗[283]。这些宣传动员，为奉安大典的举行奏响了最强音。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柩从北平启运南下，28日抵达南京。奉安大典虽然在首都南京举行，实际上是一个从北平肇始，途经冀、鲁、皖、苏四省，迄于南京，全国各地普遍参与的空前的国家圣典。这一圣典由奉安大典的前奏与正式仪典组成，前奏主要是奉移与迎榇两大仪式的链接和组合。整个奉安大典的路线图是：自碧云寺至北平站，再由北平至天津，经济南、徐州抵达南京。其中，自北平碧云寺至浦口全程均为奉移仪式，而由浦口至中央党部礼堂则是迎榇典礼。奉安委员会严格规定了由北平碧云寺至浦口的奉移程序。

灵车从北平东车站开出后，党政官员及各界民众均齐集沿途所经各站，设祭致奠，大站如济南、泰安、徐州等地，迎榇仪式规模更为宏大与隆重。济南早于5月中旬即着手准备迎榇，扎有松柏牌坊与演讲台，全城街道均悬标语。27日，蒋介石亲自至蚌埠恭迎，增添了奉安大典的隆重性[284]。大站迎榇场面热烈，小站同样人山人海。如孟子故乡邹城以及临城车站，迎榇民众成千上万。5月28日，灵榇抵达浦口，奉安大典的迎榇仪式开始。仪式按国民党颁布的《迎榇礼节》，由浦口至中央党部依次举行，之后举行公祭。6月1日，孙中山灵榇奉安中山陵，完成了一场隆重的国家典礼。

自北平移灵至南京奉安，沿途经过了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五省地方党政首脑及数百万民众参与了这场奉安活动。一些地方政府事先举行总理奉安纪念大会筹备会，地方党政首脑等主持研讨和规划有关举办纪念会事宜。早在5月11日，上海江湾党政部门就着手筹备，并议决要案多项，届时印发各种宣传品[285]。14日，山西省党部成立总理奉安纪念大会筹备会，向南京的纪念建筑赠款，同时准备瓷制总理民元莅晋留影、总理民元在晋遗像3000份[286]。天津也筹备召开奉安纪念大会，“决议立纪念碑及多印总理遗教等小册子，藉以唤起民众”[287]。

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的同时，各地均举行奉安公祭仪式。6月1日，江西南昌各界在体育场公祭总理，三万余人参加祭仪。奉天举行全省公祭大会，全市停止娱乐。青岛、江苏镇江、徐州、淮阴、无锡、松江、南通、常州、丹阳、扬州，安徽安庆、芜湖、蚌埠，福建福州、厦门，湖北汉口，山西太原等地均举行隆重的奉安公祭仪式，一般都有数千或数万人参加。厦门举行公祭仪式时，外领、外商、外校亦下半旗志哀，政府动用飞机悬坠黑布于两翼在空中盘旋，晚上戒严[288]。上海全市举行各界奉安公祭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还自行组织公祭仪式，各商铺、娱乐场所停止营业[289]。山西太原有两个奉安公祭会场，一处在中山公园，约一万人到场，另一处也有数千人参加[290]。浙江杭州在西湖公共体育场举行公祭大会，十余万人参加，会后分组演讲，各界民众均可参与。同时，组织演讲队，深入城镇及郊区宣讲，并有汽车队绕行全市，分发传单[291]。广东作为孙中山的故乡，奉安纪念仪式更加隆重。早在5月下旬就颁布“总理奉安日志哀办法”，要求各商店悬挂蓝字纪念灯笼，正午工厂、兵舰同时鸣放汽笛，电力公司开启电灯，所有党员自备黑纱缠左臂[292]。

孙中山奉安大典体现了民间与国家的有机融合，而且通过民间强化了对孙中山的纪念。最典型的基层祭仪是福建省建瓯县奉安纪念大

会，会场设在县党部“总理纪念堂”。据亲历者回忆：这次奉安纪念大会，是本县前所未有的、最隆重、规模最大的仪式，游行队伍雄壮整齐，全市最热闹的街道国旗飘扬，屋檐上空全部遮上长条白布，整条街如同白色世界。游行队伍由一对大锣鸣锣开道，接着是鼓手队、军乐队，一路吹奏，四名穿着白衣裤的扛夫抬着一座像亭，亭的四角，扎了白彩球，亭中供孙中山遗像及香炉、烛台等，后面跟着的是一队穿白长衫黑马褂、臂带黑纱的官员，暨各界代表人物，并有士兵保护。之后是工、农、商、学各界队伍，共一千多人，浩浩荡荡[293]。

宗教纪念仪式也融入奉安纪念。中国佛教会专门呈文奉安委员会，请求准予派代表四十八人参加奉安大典，并通告全国佛教各寺庙及佛教团体于奉安日举行祈祷大会[294]。各地寺院及佛教徒积极响应，如上海各寺庙及宗教团体，召集全市僧众居士，齐集首刹留云寺，举行总理奉安祈祷大会，有僧侣数百人参加。中国佛教会还编辑《中国佛教会纪念总理奉安特刊》，其中收录《佛教徒参加总理奉安典礼的意义》等文[29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禅为奉安大典撰写祭文，缅怀孙中山的伟大功绩[296]。中华道教会也召开奉安纪念会，基督教总主教亲自参加南京奉安大典，上海基督教各教堂联合举行奉安纪念仪式[297]。

由于国民党的强势和广泛宣传，使奉安大典的影响迅速传播全国各地。许多人虽然未能亲历大典的场景，但却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感受到大典的隆重悲壮的气氛，从而被不自觉地纳入奉安大典的活动之中。1929年6月1日，远在昆明的聂耳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预料中，理想着今天定要天晴——因为是奉安纪念，少不了青天白日照耀在总理的柩前。”然而，昆明依然下着小雨，但他仍去“总登记处开纪念会”，在聂耳看来，这是“天为总理而流泪”！[298] 闻一多也曾参加武汉大学的奉安典礼纪念会，并撰写祭文，高度赞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并称国民党将“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299]

。许多奉安大典直接参与者终生难忘这一盛典。沈松林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护灵”，几十年后依然记得“人们见到孙中山遗容时，失声痛哭，频频挥泪”[300]。

奉安大典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一手承办的国家仪式，既具备旧式帝王葬礼的崇隆，又超越了旧式帝王葬礼在时间、空间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局限。它利用民众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人格魅力的尊崇，成功透过国家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功能，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党政权力，动用公帑十六万多银元及各类资源[301]，营造了一场有广泛代表参与的国家仪式，自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奉安大典一方面强化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象征功能，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国民党执政后的党国权威，在意识形态层面强化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当然，不可否认，在当时蒋介石最高统治权并不稳固的历史条件下，也在相当程度上夹杂了蒋介石的个人私货。据曾任过蒋介石随从秘书的黄埔系骨干将领曾扩情数十年后披露：“蒋介石自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即以孙中山先生的唯一继承者自居；尤以1928年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更为热中【衷】于此。为了赚取人们以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情感意识来信仰他，特把孙中山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函数十件精印成册（用优质的宣纸，长约尺余，宽可六寸），广为传送。是年10月，蒋介石特派我到四川，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本册子分赠各军军长，如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并指出其中孙中山先生对胡汉民、汪精卫两人有所批评的一函，强调地对我说：‘从这一件函的文句，可以看出孙总理在世时，对胡、汪两人并不重视和信任；以他两人意志薄弱，不足以胜任繁剧，更不足以担任革命重责，只能在一般的政治交往上当当代表，应付场面而已。望向川中各军领导人，对此加以恳切说明：不要指望胡、汪两人对国家大事有何决定性的作用。’这毫无疑义地【的】是：假孙中山先生的大帽子，来压倒他平日视为主要政敌的胡、汪两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意图博得四川军人对他的特别信仰。”[302] 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与曾扩情所说

蒋“特把孙中山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函数十件精印成册，广为传送”一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

(1)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中央日报》，1928年3月15日。

(2) 洪瑞坚：《浙江之二五减租》，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68—69页。

(3)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第12号，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2日。

(4) 《一周间的大事》，《中央日报》，1928年4月1日。

(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丙）233—241页。

(6)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2月12日。

(7)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中央日报》，1928年3月15日。

(8) 《湘指委会防止土劣压迫青年》；《反动势力压迫下的湖南石门县》；《中央日报》，1928年5月27日、6月15日。

(9)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中央日报》，1928年3月2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

(10) 《一月来的广东》，《中央日报》，1928年4月7日。

(11) 蒋永敬编：《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4页。

(12) 蒋介石：《整理党务计划案》，《中央日报》，1928年2月12日。

(13) 《河南省党务概况》，《中央日报》，1928年3月15日。

(14)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第93页。

(1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63页。

(16)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载《中央党务月刊》（三届三中全会特号），1930年3月。

(17)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68页。

(18) 《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中央党务月刊》第97期，1936年8月。

(19)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丙）233—241页。

(20) 程天放：《河南省之党务》，《中央党务月刊》第33期，1931年4月。

(21)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22) 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20日，“党务”专栏。

(23)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82页。

(24) 陈少书：《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1935年），萧铮主编：《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66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3717页。

(25) 中国国民党党歌和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1编文前插图。

(26)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584页。

(27) 《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中央党务月刊》第95期，1936年6月。

(28) [日]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

(29)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广东省国民党党部编印，1926年10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

(30)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34年11月，第21页。

(31) 《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及其没落》，第397页，作者及出版时地不详。

(32) 参见王奇生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33)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

18日。

(34) 引自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5) 《北华捷报》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引自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36) 社论：《论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务》，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30日。

(37) 孙佐齐、平凡、杨公达：《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时代公论》第13号，1932年6月。

(38) 蒋介石：《讨逆胜利后本党之重要关头》（1930年10月2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

(39) 引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2页。

(40)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能和建设工作的方法》（1933年11月14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9页。

(41)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00页。

(42) 蒋介石：《如何创造党国的新生命》（1935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04—605页。

(43)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44)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45) 金铨：《厘定党政军官职俸等级表刍议》，《人事行政》1942年第1期。

(46)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

(47)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30期，1939年3月。

(48) 《苏省各县党务状况》，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20日。

(49) 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24

期，1939年1月。

(50)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51)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52) 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53)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298页。

(54) 《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290页。

(55)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56)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页。

(57)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页。

(58)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59)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60)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8页。

(61) 《统一革命理论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35页。

(62) 《今后贯彻革命实行主义之主张》，《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第61页。

(63) 《蒋对时局意见》，《大公报》，1928年8月10日。

(64) 《胡汉民孙科为拟订训政大纲致谭延闿等电》（1928年6月3日），《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65)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页。

(66)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85—586页。

(67) 胡汉民：《党外无政政外无党》，《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第213页。

(68)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85页。

(69) 胡汉民：《怎样使全国妇女能行使女权》，《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1189页。

(70) 胡汉民：《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设国家的础石》，《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第615页。

(7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第60页。

(72) 《中央政治会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43页。

(73) 《胡汉民孙科为拟订训政大纲致谭延闿等电》（1928年6月3日），《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74)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86—587页。

(75) 《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2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896—897页。

(76) 《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2页。

(77) 胡汉民：《立法工作的二种意义及其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813页。

(78) 胡汉民：《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801—802页。

(79) 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51页。

(80) 《训政开始应否设立五院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43页。

(81) 《政治问题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

册，第536页。

(82) 《新约法与五次全会》，《大公报》，1928年8月12日。

(83) 《关于约法案之审查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8月13日。

(84) 《训政时期颁布约法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43页。

(85) 李烈钧：《在国民政府第四十六次孙中山纪念会上的演说》，《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66页。

(86) 胡汉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第241页。

(87) 《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国闻周报》第5卷第39期，1928年10月7日。

(88) 《国民政府宣言》，《银行周报》第12卷第42期，1928年10月30日。

(89)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9页。

(90) 《训政时期之规定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759页。

(91) 《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96页。

(92)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0—81页。

(93)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2期，1928年2月。

(94)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2期，1928年2月。

(9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99期，1928年10月。

(96) 《国民政府抄发“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训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27—28页。

(97)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4页。

(98)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0页。

(99) 《一中全会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申报》，1931年12月27日。

(100) 《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19页。

(101)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条及四十八条条文》（1932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44页。

(102) 胡汉民：《一年以来立法新制的试行》，《革命文献》第2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0年版，第523页。

(103) 《立法院第一第二两周年立法工作概况》，立法院秘书处1930年编印，第3页。

(104) 孙科：《担任院长经过与今后的希望》，《中央周报》第242期，1933年1月23日。

(105) 《国民政府抄发“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训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29页。

(10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37页。

(107)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33页。

(108)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七条条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26页。汇编将此文件时间标为1930年3月，有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1932年3月召开，5日的第二次会议决定，对组织法第三十七条加以修改（可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65页）。另1931年6月的组织法公布前，第三十七条均属于考试院内容，6月版本始在司法院范围，该条修改时间不可能早于1931年6月。

(109)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五款及第三十五条

三十六条条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43页。

(110) 转见罗志渊：《中国宪法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241—242页。

(111) 《考选部工作概况表》，1948年；转见肖如平《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

(112) 金绍先：《戴季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11页。

(113) 《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114) 胡适：《公开荐举议》，《大公报》，1934年3月4日。

(115) 李惕乾：《从旧时县政府看国民党的吏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页。

(116) 《考试院工作报告》，国民政府考试院1935年编印，第38页。

(117) 《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1931年3月30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50002，台北“国史馆”藏。

(118) 《修正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318页。

(119) 《监察院弹劾法及监察委员保障法》（1929年8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50001，台北“国史馆”藏。

(120) 董霖：《战前之中国宪政制度》，转见皮纯协等《中外监察制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121) 《监察院对上海停战协议及违法者提出弹劾》（1932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8310001，台北“国史馆”藏。

(122) 《监察院对上海停战协议及违法者提出弹劾》（1932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8310001，台北“国史馆”藏。

(123)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24) 关于改划省区提议，2—109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见翁

有为《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125) 《改定省行政区案》，《申报》，1930年11月15日。

(126) 《全会昨开第二次大会决议省区应重行划分并酌量缩小》，《申报》，1930年11月15日。

(127) 陈冰伯：《今日之县政》，同文图书公司1933年印行，第125页。

(128) 《缩小省区案》，《申报》，1931年3月1日。

(129) 《缩小省区草案》，《申报》，1931年4月21日。

(130) 《三中全会昨决议明年召集国民参政会》，《申报》，1932年12月20日。

(131) 《内政部为报对缩小省区等提案研讨意见事致行政院密呈，1933年6月29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43页。

(132) 《省政府组织法》（1927年6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297页。

(133) 《修正省政府组织法》（1931年3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25页。

(134) 《修正省政府组织法》（1931年3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25页。

(135) 《张群原电》，《大公报》，1933年10月22日。

(136) 《鲁涤平电南昌行营陈述改革省制意见》，《大公报》，1933年11月21日。

(137) 《马鸿逵电蒋中正自五月一日实行政府合署办公》（1934年6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167106，台北“国史馆”藏。

(138) 《电豫甘陕皖浙赣鄂各主席转告陈果夫所陈研究省府合署办公问题之复电》（1933年10月2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3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339页。

(139) 《我们应该怎样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杨永泰先生言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140) 《训令豫鄂皖赣闽五省政府》（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456—460页。

(141) 《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第464—469页。

(142) 莫寒竹：《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的综合研究》，《汗血月刊》第9卷第1期，1937年2月。

(143) 张景瑞：《各省合署办公之实施及其成效》，《汗血月刊》第9卷第1期，1937年2月。

(144) 《省政制度将有变更》，《大公报》，1933年10月13日。

(145) 《特别市组织法》（1928年6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25页。

(146) 《国民政府公布之市组织法》（1928年7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82页。

(147) 《市组织法》（1931年5月20日），《立法专刊》第3辑，立法院秘书处1930年编印，第150页。

(148)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内政方面》，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7年版，第43页。

(149) 《蒋中正任定何应钦等为剿赤匪军前敌总司令官并设行营党政委员会自兼委员长》（1931年6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37025，台北“国史馆”藏。

(150) 《党政委员会组织成立呈报中央文》（1931年7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500009012，台北“国史馆”藏。

(151) 《通令各剿匪部队嗣后关于剿匪宣传应受党政委员会指导》（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第419页。

(152) 《李德钊剿赤谈》，《申报》，1931年9月2日。

(153)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三次常会决议》（1932年6月23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14，台北“国史馆”藏。

(154) 《江西省政府为设置行政区长官事致行政院呈》（1932年6月7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454页。

(155) 《行政院公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令》（1932年8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02页。

(156) 《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1932年8月25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14，台北“国史馆”藏。

(157)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492页。

(158)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内政方面》，第328—329页。

(159) 《检阅临川崇仁宜黄南丰南城黎川六县清乡善后事务之总讲评》，《军政旬刊》第26期，1934年6月30日。

(160) 《国民政府公布之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1931年4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31页。

(161) 《琼崖特别区政府组织条例条文及各司处组织条例》（1932年3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063，台北“国史馆”藏。

(162)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8页。

(163) 《县组织法修正》（1928年9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07，台北“国史馆”藏。

(164)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38页。

(165) 三届三中全会通过《注重县长人选案》决议，《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9页。

(166)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民国丛书》第1编24辑，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93页。

(167) 《县政调查统计·福建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1期，1935年5月。

(168)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民政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32—838页。

(169) 《县组织法修正》（1928年9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07，台北“国史馆”藏。

(170) 《县参议会组织法》，《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665页。

(171) 《县参议会组织法》，《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667页。

(172) 国民政府公布《设治局组织条例》（1931年6月2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535页。

(173) 《筹设找桥慈化洋溪三特别区政治局案》，《军政旬刊》第11期，1934年1月30日。

(17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办法江西特别区政治局组织条例》，《西路军公报》第11期，1934年5月15日。

(175) 《江西省特别区政治局组织条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南昌行营1934年编印，第28页。

(176) 《训令豫鄂皖赣闽五省政府》（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第457—458页。

(177) 《训令豫鄂皖赣闽五省政府》（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第458页。

(178)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16页。

(179) 《乡镇自治施行法》（1929年9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12008，台北“国史馆”藏。

(180) 戴建标：《改进地方自治之根本问题》，《地方自治》创刊号，1936年3月。

(181)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内政方面》，第229页。

(182) 陈冰伯：《今日之县政》，第72页。

(183) 《中央要人一致留蒋》，《申报》，1928年6月12日。

(184) 《国民政府与中央政治会议慰留令》（1928年6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515页。

(185) 《国府对内宣言》，《申报》，1928年6月13日。

(186) 蒋介石日记，1928年6月11日。

(187) 蒋介石日记，1928年6月12日。

(188) 李烈钧：《在国民政府第四十次孙中山纪念会上的演说》（1928年7月10日》，《李烈钧集》下册，第654页。

(189) 蒋介石日记，1929年2月27日。

(190) 《河北指委会对时局宣言》，《申报》，1928年6月30日。

(191) 《各省区商民协会为召集经济会议讨论经济法案及关税税则呈》（1927年8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192) 《经济会议昨日开幕》，《申报》，1928年6月21日。

(193) 《经济会议请求裁兵之通电》，《申报》，1928年6月30日。

(194) 《国府秘书处奉准由财政部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并抄送原提议函稿》（1928年4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43页。

(195) 《1928年全国财政会议部分文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44页。

(196) 《全国经济财政会议要案汇存》，《国闻周报》第5卷第26期，1928年7月8日。

(197) 《全国交通会议纪》，《银行周报》第12卷第33期，1928年8月28日。

(198) 《蒋介石关于全国各军缩编为师并组织整理委员会分期进行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27页。

(199) 何应钦、刘纪文：《建议分期缩减全国军备以纾财力案》，《申报》1928年7月4日。

(200) 《经济会议请求裁兵之通电》，《申报》，1928年6月30日。

(201) 《鲁涤平对军缩财政之谈话》，《申报》，1928年10月9日。

(202)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1页。

(203)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41页。

(204) 《财政部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出之财政部工作报告》（1929年3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

（一），第534页。

(205) 《电内政部暨江苏、安徽、浙江省政府主席》（1928年5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399页。

(206) 《蒋总司令致刘纪文处长为北伐将终指示整顿军队之急务电》（1928年5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61页。

(207) 《电何应钦、朱绍良》（1928年5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404—405页。

(208) 《蒋中正电何应钦等军事收束以裁汰安置为最要最难》（1928年5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100023006，台北“国史馆”藏。

(209) 《蒋介石关于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请委张之江为会长给国民政府呈》（1928年6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9页。

(210)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一至八十次会议速纪录》（1928年6月—7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46100018，台北“国史馆”藏。

(211) 《钱军长谈裁兵问题》，《申报》，1928年6月13日。

(212) 《曹万顺军自请裁编》，《申报》，1928年7月1日。

(213) 《第一集团军缩会议》，《申报》，1928年7月2日。

(214) 《何应钦讲演缩减军备》，《申报》，1928年7月5日。

(215) 《李宗仁电谭延闿蒋中正条陈对奉及军队与政治外交党务等意见七条》（1928年6月14日），国民政府档案，002090102011028，台北“国史馆”藏。

(216) 《阎锡山复中央政治会议密电》（192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8页。

(217) 《李宗仁复中央政治会议密电》（192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8页。

(218) 《李济深对时局之态度》，《申报》，1928年6月22日。

(219) 《冯玉祥复中央政治会议密电》（192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8页。

(220) 《阎锡山再电主裁兵》，《申报》，1928年6月24日。

(221) 《蒋中正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各总指挥申论非裁兵无以救国》（1928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1009234，台北“国史馆”藏。

(222) 《军事整理意见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625—636页。

(223) 军事整理案，《自反录》第二集卷一，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500008006，台北“国史馆”藏。

(224) 《编遣部队之裁减办法》，《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641—645页。

(225) 《政治分会存废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4页。

(226) 《整理军事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38—539页。

(227) 《各军现有步兵额》，《申报》，1929年1月21日。

(228) 《何应钦在总部纪念周之演说》，《申报》，1928年10月31日。

(229) 蒋介石日记，1928年12月26日。

(230) 蒋介石：《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24—54页。

(231) 《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发布大会宣言暨裁兵及统一财政等历次决议通电》（1929年1月5日—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627—630页。

(232) 《蒋介石关于全国各军缩编为师并组织整理委员会分期进行的报告》（1929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641页。

(233) 《冯玉祥歌电全文》，《申报》，1928年7月9日。

(234)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7年版，第103—104页。

(235) 《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236) 《李宗仁之编遣会谈》，《申报》，1929年1月7日。

(237) 蒋介石日记，1929年1月8日。

(238) 蒋介石日记，1929年1月5日。

(23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1页。

(240) 蒋介石日记，1928年8月8日。

(24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67页。

(242)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日期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542页。

(243) 《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国闻周报》第5卷第39期，1928年10月7日。

(244) 《黄绍雄在粤报告广西状况》，《申报》，1928年11月5日。

(245) 《长沙市之党员统计》，《申报》，1928年12月24日。

(246) 《革命文献》第17辑，第190页。

(247) 《中央常务会议》，《申报》，1928年10月26日。

(24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45期，1928年11月18日。

(249) 《京市指委辞职理由》，《申报》，1928年11月4日。

(250) 《京市下级党部态度》，《申报》，1928年11月5日。

(251) 《何香凝电中委抗议》，《大公报》，1928年11月14日。

(252) 《徐州会见各报记者》（1928年11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第390页。

(25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第514—515页。

(254) 《全国办理总登记概况》，《申报》，1928年12月16日。

(255) 胡汉民：《怎样免除一切纠纷及怎样进行一切建设》（1929年3月11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辑，第12—13页。

(256) 《蒋中正三日宣言之全文》，《大公报》，1929年2月5日。

(257) 《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1929年3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一）200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8)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央委员出席一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87—706页。

(259) 《开幕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16—619页。

(260)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9年3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第379—380页。

(261) 《蒋中正三日宣言之全文》，《大公报》，1929年2月5日。

(262)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8—659页。

(263) 《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4页。

(264) 《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3页。

(265)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63—676页。

(266) 《中国国民党年鉴》，1929年宣传篇，第781页。

(267) 《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2页。

(268) 蒋介石日记，1929年3月27日。

(269)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7日。

(270)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35—136页。

(271) 《总理纪念周详解》，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1929年编印，第3页。

(272) 《总理安葬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50期，1929年5月20日。

(273) 《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页。

(274) 《总理奉安之纪念与宣传》，《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324—328页。

(275) 《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352—353页。

(276) 《迎榇宣传列车抵徐》，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3日。

(277) 《济南各界之迎榇宣传纪念大会》，《中央日报》，1929年5月20日。

(278) 《两路宣传列车在杭工作》，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27日；《沪方各界敬谨参加大典》，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30日。

(279) 《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在苏锡之宣传》，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6月1日。

(280) 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奉安实录》，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281) 《参加奉安大典人员及代表名额之规定》，《河南教育》第1卷第19期，1929年。

(282) 《总理奉安赠赙及纪念办法》、《总理葬仪赠送纪念树木办法》，《浙江财政月刊》第2卷第8期，1929年；《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2卷第8期，1929年。

(283) 《令所属各机关各学校：令知总理奉安全国一律下半旗及志哀七日》，《上海特别市教育局教育周报》1929年第2期。

(284) 《总理灵榇昨日下午三时奉停中央党部今日起公祭三日》，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29日。

(285) 《总理奉安典礼筹备讯》，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2日。

(286) 《晋省党部筹备纪念奉安》，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5日。

(287) 《津市筹备迎榇宣传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5日。

(288) 《各地举行奉安公祭》，《申报》，1929年6月3日；《镇江各界举行总理奉安公祭》，《申报》，1929年6月3日；《总理奉安日公祭典礼纪》，《无锡县政公报》1929年第5期；《地方通信》，《申报》，1929年6月3日。

(289) 《前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申报》，1929年6月3日。

(290) 《各地纪念奉安》，《中央日报》，1929年6月3日。

(291) 《杭州各界公祭总理大会》，《申报》，1929年6月3日。

(292) 《总理奉安日志哀之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5月26日。

(293) 张士英：《六十余年前孙中山奉安纪念在建瓯》，《建瓯文史资料》第16辑，政协福建省建瓯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49—52页。

(294) 《中国佛教会致奉安委员会呈》，《中国佛教会公报》第1期（1929年7月），“呈文”第1页。

(295) 《前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申报》，1929年6月3日。

(296) 《蒙藏委员会迻译班禅为孙中山奉安所撰祭文致总理奉安专刊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297) 《今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申报》，1929年6月1日。

(298)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文化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214页。

(299) 张烨编：《闻一多诗歌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300) 沈松林：《中山先生奉安典礼追忆》，杨炳、洪昌文主编《孤山拾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页。

(301)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经费》，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1931年编印，第2页。

(302) 曾扩情：《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06页。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外交

第一节　初期外交政策与“修约”外交

一　转向与列强妥协的外交政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经历了从容共到反共的巨大调整，政治理论和权威的合法性都面临重大挑战，为了尽可能减少冲击，争取正统，在一段时期内，其政策宣传仍然沿袭既有的观念和做法。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名义发表宣言，在强调劳农政策的同时，对外政策仍举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声称“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1)]。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也未放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并声言要延续联俄政策，表示：“讲起苏俄的问题来，现在我们实在并没有反对过他。我们对于总理所定下来的联俄政策，到现在还是没有变更过。我们对于苏俄联合战线的政策，仍旧是一个样子的。”[(2)]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等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1927年5月10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7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

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

南京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各妇女团体、各学校代表会议，组成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要求南京政府与英方“据理力争”[(3)]，并通电全国，提出撤退列强在华的海、陆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发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蒋介石出席杭州的市民大会并发表演讲。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发表的宣传大纲声称：“我国民政府已经握有对日之绝大威力，日本若一意孤行，而不及早觉悟，立即撤兵谢罪，我国民众必扩大反日运动，与日本经济绝交，未及与日本兵戎相见，已可致日本之死命也。”[(4)]

南京国民政府虽有上述反帝举措，但其更重要的发展趋向则是逐渐调整对外政策，降低对外宣传的调门，尽力与东西方列强寻求妥协，这是其赢得东西方列强的支持，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早在1927年3月31日刚刚抵达上海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就明确表示：“国民政府所定政策为不用武力和任何群众暴动以变租界之地位。凡愿意平等待我之国家，即为吾人之友，纵使从前曾压迫中国，吾人也愿与之合作，与之联合。”[(5)] 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信号。

“宁案”处理是列强相当看重的一个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解决“宁案”十分重视。1927年5月初，外交部长伍朝枢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表示准备尽快谈判解决“宁案”。7月13日，南京国民政

府向美方提出解决“宁案”办法六条：1．国民政府负责解决这一事件；2．国民政府将把对与该案有牵连者的处理情况告知美国政府；3．道歉，并严禁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采取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4．成立一中美联合委员会，调查美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然后予以赔偿；5．希望美国政府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6．废止中美间现行条约，并立即缔结平等互利新条约[(6)]。这一办法同时也适应于“宁案”各相关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实际承认中方应对“宁案”负有责任，相当程度上照顾到了列强的利益，这是其打开与列强交涉大门的重要步骤。但由于国内气氛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国内政局中的地位、处境都使其无法对列强作出过多让步，因此在所提解决办法中也提到英、美应对炮击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伤亡事件道歉、赔偿，并要求修改现行不平等条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的微妙转向，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列强的理解和回应。5月3日，美驻北京公使馆一等秘书戴伟士向国务院提出：“现在同最能代表所谓民族主义运动的蒋介石派别建立良好关系是十分可取的。”[(7)] 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声明说：“南京事件促使民族主义者阵营内部久悬未决的分裂公开暴露出来……到三月份，它发展到直接把矛头指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共产党对他的权力是很嫉妒的。南京暴行的组织者们似乎曾经有一个企图，那就是把蒋介石卷入到同外国列强的冲突中去。”他最后强调列强处理南京事件的“缓和态度”是想不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秩序”方面“感到为难”[(8)]。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党后，宁、汉双方“殊途同归”。虽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曲折透露出其亲善愿望，使英、美等国对其抱有相当期望，但在蒋介石尚未显示足够实力，尤其是英、美在华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时，英、美的态度有很大保留，英国政府坚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必须先行彻底“清共”，根除排外势力，方可解决“宁案”。同时又以“南京惨案”未得到“合理解决”为由，对南京国民

政府不予承认。正如英国政府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给其公使蓝普森的电文中所指示的，英国对待南京新政权的态度：一取决于该政权事实上在中国行使权力的范围，二取决于该政权本身满足列强愿望的程度[9]。

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一个月后汪精卫也宣告引退。中英谈判未及正式开始，“宁案”也被搁置。其后蒋介石采取了联汪制桂的策略，于1928年1月复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复职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地位有所加强，外交上力图有所突破，其倾向东西方列强的态度更为明显。在复职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蒋急切呼吁“急迅改定”外交方针，称“我们既然要对俄国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10]。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宣言，一方面表示：“吾国民革命之努力，唯一之根本目的在于民族之平等与国家之独立，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则为达此根本目的之具体的方案”，同时更强调：“吾国民须知，一起反帝国主义之运动，惟有以实际的建设为真正手段者，乃得实际之效果……生聚教训，为独立自强之始基；独立自强，为平等地位之根本。”[11] 暧昧的语言中传递出的真实含意，是要淡化国民革命时期留传下来的反帝色彩。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进一步向着温和的方向倾斜，1928年2月21日，取代伍朝枢出任外交部长的黄郛发表对外宣言，不再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称：“按照外交手续，与各国厘正不平等各约，期获得中国在国际上应有之平等地位……同时，国民政府亦必须依照国际法，十分努力，以尽其国际上应尽之合法义务。”宣言还提出南京国民政府今后与各国交往准则：一、切盼最短期内，得与各友邦开始商订新约，以平等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二、在新约未订前，国民政府准备与各友邦维持并增进其亲善关系；三、国民政府当按照国际公法，尽力保护居留外人之

生命财产；四、今后各地方与外国政府或公司订立的任何条约或契约，经国民政府参预或认可的均认为有效；五、对于重要悬案，国民政府准备适当时期，以公平及互谅之精神设法解决；六、对于干涉中国内政，或破坏中国社会组织之外国，国民政府为保全本国生存，不得不采取并施行最适宜之应付方法 (12) 。随后，外交部立即着手办理“宁案”，派何杰才、金问泗、袁良三司长分别与各国驻沪总领事接洽。二三月间，英使、美公使先后抵沪。

关于宁案的谈判，首先在中美间进行。通过何杰才与美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的接触，美国政府首先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谈判解决“宁案”的共识。2月26日，黄郛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开始讨论。3月30日，中美双方就解决“宁案”达成协议，互换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照会中将这一事件归责为“共产党于国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动而发生”，但国民政府“仍负其责”。照会“以极诚恳之态度”向美国政府表示歉意，保证“决不致再有同样之暴行及鼓动”，并“惩办肇事兵卒及其他人”。照会同意“依照国际公法通行原则，对美国在宁领馆人员及美侨所受生命财产上之损失，担任充分赔偿。为此，国民政府提议组织中美调查委员会，以证实美人从有关系之华人方面所确受之损失，并估计每案中所应赔偿之数目” (13) 。美国政府在同日的复照中表示同意照中方所提道歉、赔偿、惩办“肇事者”三点解决“宁案”，在照会中特别提出，“并信所有该事件各犯，尤以亲身负责之林祖涵一名为最要，其惩办一层必能依照表示，从速完全履行” (14) 。

南京国民政府急于与列强就“宁案”达成妥协，旨在于寻求列强承认及在修约问题上取得突破。因此，黄郛在随后发出的致美照会中特别强调：“南京事件发生之问题，业经本日换文解决”，希望两国“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修订现行条约，并解决其他悬案” (15) 。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修约愿望表示同情，肯定：“美政府希望当时所以必须载在旧约各条款之情形有以改善，俾得随时遇机将所有不需要及不妥当之约章得经双方同意，正式修改。” (16) 中美就南京事件解

决及谈判修约问题达成共识，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其逐渐获得列强的重视和承认，国际空间有所拓展，同时反过来对其国内统治权威的树立也有正面影响。而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做出友好姿态，与日美太平洋争霸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正如南京国民政府有关报告中所谈到的："美国因与日本太平洋上势力之冲突，当遇事与之声援，故国人心目中引以为友者首为美国。然此为政治外交上之事而已，国防上则在我军备未完以前，不能得美国实力之援助。"(17)

继中美达成协议之后，1928年8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达成解决"宁案"的协议，互换照会。其条件与中美解决"宁案"相同。英国对中国方面在照会中提出的修约要求，也予以同情，表示："本国政府对于中国修约之要求，认为根本合理……兹为对于中国素常维持之友谊与同情的态度作进一步之表示起见，准备依相当程序，由依法委派之代表与贵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英国政府之意，决不因南京事件变更以前对华之态度，而认为该事件与修约政策无关系之另一问题。"(18)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二次北伐"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统一，因此，较之美国方面的表态英国更加肯定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态度也更为积极一些。继英、美之后，同年9月24日和10月1日，中意、中法也都按照美、英条件解决南京事件。只有日本因"济南惨案"，迟至1929年5月2日始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解决"宁案"协议。

二　寻求各国承认的活动

"宁案"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又占领平津，各地方实力派均宣布"归顺"，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获得各国正式承认。作为一个一再声称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党及其政权，在修约问题上取得某些突破是其与列强建立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列强鉴于国民革命后中国政治、民气出现的不可忽视的变化，虽表示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修约，但正如美方在给中方的照会中强调的："美政府

希冀贵国有代表贵国人民之政治施行实权，俾得诚实履行贵国一方面关于修改约章所有应尽之义务。”[19] 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中国在首先承担“义务”的前提下展开修约，是“修改”而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会晤访欧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时也表示，英国准备与中国修约，但必须通过和平谈判完成，而不是单方面宣布无效。为此，“二次北伐”完成后，南京国民政府连续发出宣言，表明政府的立场，强调国民党的外交决不同于共产党，将循外交常轨和国际公法正常进行，遵正当之手续重订新约。对“友邦”以平等原则，依合法手续所负之义务，必相信守。对共产党，亦必不容其存在。对此美国政府率先表示欢迎，1928年7月美国在尚未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时与其签订关税条约，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将之解释为：“美国政府于当年7月27日同南京政府签订新的关税条约，从技术上讲已构成美国承认南京政府这一事实。”[20] 11月5日，凯洛格正式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8月17日，德国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新约时承认国民政府。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等也相继承认。英、法两国动作较慢，但也先后于12月20日、12月22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随之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联取得合法地位。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是为南京国民政府加入的第一个重要国际条约。该条约又称《白瑞安—凯洛格公约》或《巴黎非战公约》，1927年法国外长白瑞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倡议发起。1928年8月27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签订，1929年7月25日生效。《公约》包括序言和三条正文。主要内容是：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任何签字国如用战争手段谋求利益，即不得享受公约给予的益处。

《非战公约》酝酿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要求中国驻美、法外交官探询可否由美国政府邀请中国作为发起国加入，未获成功。《公约》签字当天，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出加入邀请。9月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先后决议同意加入。9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代办，表示："我国人民对贵国等所倡之非战运动，求世界之永久和平，自始即深表赞同，现既订成公约，我国政府极愿与诸国一致行动，正式加入此项公约，共同促进世界之文明。"照会同时不忘重申中国的修约立场，强调："本国政府深信，各国必将依据本约之精神，使数十年来中外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侵犯中国主权之事实，如驻扎外兵于中国领土等行动，皆能于最短期间，以公正之方式一一废除。"[21]

在中国与各国的交涉中，对日交涉进行得最为困难。日本对侵占中国早有野心。1927年6至7月召开的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武力进取的"积极政策"，会后日本公开出兵山东，企图对华武力干预。日本的种种作为，使一向标榜对日本素怀"亲厚之情"，有意与日本发展关系的蒋介石，也无法向其靠拢。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曾将寻求日本支持作为其重要目标。8月24日，蒋介石致函黄郛，表示："弟决先赴日本，兄在沪主持一切，而弟预备做一年环球之游也。"[22] 最初，他计划往日、德、英、美、法、意等国遍游一番，实际只访问了日本一国。9月底，他抵达日本后发表的简短谈话是："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且余以友人居日者甚众，欲乘此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相晋接。"[23] 很显然，蒋介石对日本之行怀有浓厚的期望。日本是蒋留学的旧地，也是他内心曾经向往的地方，他指望从这里获得外交上的支持，为日后的外交乃至整体政策定下蓝本。

然而，日本之行给蒋带来的更多是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对华之误点，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尤其不能

确保满蒙权利；二、中国南北分裂，可以从中操纵；三、利用无智军阀，压制民众，彼之政治家远不如俄国矣。”[24] 在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的会谈中，尽管蒋介石一再向田中强调：“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的同志，早日完成革命，消除国民的误解。”指出：“如日本借口有碍列强关系，不得给予中国任何援助，这是抹煞中日关系的论调”，但收效甚微[25]。田中要求蒋介石以“解决长江以南问题为当务之急”，反对继续北伐，并在援蒋问题上裹足不前，使蒋深为不满[26]。日本的不信任及不合作态度使双方关系坚冰重重。此后，蒋介石积极寻求向英、美靠拢，期望取得英、美的支持，1927年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在会见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上将时提出：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地“抵御”日本和俄国，“太平洋就会爆发大战”；美国应该提供援助和技术顾问，帮助中国统一，并防止爆发这种大战[27]。

1928年“二次北伐”期间，由于北伐军进兵山东，威逼京津，与日本竭力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发生冲突，日本军方意图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4月19日，田中内阁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案”。次日，日海军在青岛登陆，陆军也奉命出动，陆续向济南开进。日军出兵山东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一方面提出抗议，要求日方“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28]，另一方面则积极和日方谋求妥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完成北伐计，应以全力避免不利益之行动。”[29] 4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黄郛、张群等，表示：“观察情形，田中必助奉挣扎，其势颇急，拟请岳军兄速赴日，与田中面说以公私关系。只要其不妨碍北伐，不损失中国国权与中日邦交，则其他如招商投资与汉冶萍等，当无问题，即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如常保护……此虽明知无效，以个人关系一试之。”[30] 同时他屡次申诫前方将士，要求“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31]。

中方的忍让并没有使日方有所收敛。5月2日，日军开始在济南设防，派铁甲车巡逻城内外。当天，北伐军与日本领事就日军驻兵一事

展开谈判。3日，日军驻济南部队向中方寻衅，开枪向中国军民射击，中国军民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冲突发生后，蒋介石仍然竭力退让，他自己事后说："当时我就下命令给各师长，要他们各师的军队约束自己部下，不许出外面去，并且听候命令，不要同日本人来冲突。"[32] 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日军开炮，隆隆不绝，事情扩大，余限各军于下午五时撤离济南。各军照撤。"[33] 4日，谭延闿、张静江等致电蒋介石，强调："日兵挑衅，意欲逼我于忍无可忍，资为口实，勿堕奸计。前敌武装同志力持镇静，总司令部不宜与日军逼处太近，似可慎择老成持重之将领，在济妥慎应付。"[34] 当日夜，蒋介石下令除留少数部队继续在城内卫戍外，其余部队均撤离济南，准备渡河北进。

5日，蒋介石致函福田，表示："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35] 同时他本人也离开济南，次日抵达党家庄，与从河南赶到的冯玉祥会晤，确定绕过济南，继续北伐的方针。蒋介石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日军的善意，日军的逼迫日甚一日。7日，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中国军队撤退、惩处中国军官等五项无理要求，并限12小时以内答复。蒋介石派熊式辉、罗家伦连夜赶赴济南与日军交涉，日方又谬称期限已过，拒绝谈判。8日拂晓，福田下令重炮攻城。9日，蒋介石向福田提出六点答复："（一）第四十军长贺耀组因不听我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二）胶济路沿线及济南周围二十华里以内，华方暂不驻兵，济南城内概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其在城内现有驻兵，撤退时得安全通过；（三）本军治下地方，为维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传，亦已切实取缔；（四）辛庄、张庄之部队已奉命开拔北伐，该两处暂不驻兵；（五）本军前为贵军所缴之枪械请即交还；（六）八日贵军立发重炮袭击我军部队，为维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请立即停止军事行动。"[36] 这六条，实际完全答应了福田的要求。

由于蒋介石刻意忍让，日军虽然仍处处寻衅，耀武扬威，但也无

法再起纠葛，而且由于南京方面绕道北伐，日军毕竟尚不具备全面干预北伐的决心与能力，因此只能继续在济南地区武力示威。据不完全统计，济南事件中，中国军民死伤达四千多人。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日军肆无忌惮的蹂躏，日军一见中国穿制服或成群民众，即开枪射击，“凡留西发、穿皮鞋、系皮带及带中央角钞，中山装、学生装，以及平顶、光顶而有帽痕者，均指为革命党，获住必杀。有一卖糖小孩，持有中央角钞竟死于日兵枪刺之下。女子剪发亦不能免，且先割去两乳，然后用刺刀屠割全身，至气绝而后已”[37]。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虽蒙受莫大耻辱，还是向日军完全屈服，绕开济南北上。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于5月10日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第二项，召开理事会会议，“知照日本，停止日军暴行，并立即撤回山东军队”[38]。12日，谭延闿又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请求调解。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出访英、美、法，争取同情和声援。

日军在济南的侵略行径，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面对社会各界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南京国民政府于5月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指示各地党部切实“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如商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及与日商有交易往来之各行商联合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之一切事宜”，“对日经济绝交之期间，由全国抵制仇货委员会根据外交之形势规定之，但各地务须一致，不得先后参差”[39]。10日，再次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五三惨案宣传方略》和《宣传大纲》，要求民众“应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作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日运动”，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用外交手段解决“五三”惨案，以帮助北伐早日成功[40]。“一切封闭商店、检查及烧毁存货、罢工罢市之无益行动，皆徒损国家元气，而伤国民之富力，宜极力避免”[41]。

1928年5月7日，依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二十一个民众团体代表会，率先宣布成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随后，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也纷纷成立同样性质的反日组织。7月21日至27日，全国反日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浙、苏、皖、湘、鄂、赣等十五省百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通过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全国反日总会，“以团结全国民众作有系统之组织，本革命之精神，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2)]。反日会的成立，在全国各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日浪潮。

日本出兵山东以“护侨”、“护路”为词，本为一场有限的军事行动，加上南京国民政府曲意容忍，中国民众反应强烈，日方再无扩大事态的借口和决心。5月14日，日本决定“不扩大战事，并循外交交涉收拾事态”，但提出四个先决条件：道歉、处罚有关人员、赔偿损失及保障今后日人的“安全”。延至1928年7月18日，日本方派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赴南京开始谈判。8月12日，王正廷与矢田在上海接洽交换意见。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张学良之间关于“易帜”的谈判正在进行，日方竭全力阻止，对解决济案谈判并不热心，谈判无结果告终。“东北易帜”宣布缓期三个月后，9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司长周龙光访矢田，再提交涉“济案”、“宁案”之议。日本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中将来到济南与张群、王正廷交涉。

10月1日和3日，张群在日本与首相田中交涉。19日，矢田到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及周龙光开始正式谈判。中方坚持解决“济案”须以日本军队全部撤出山东为前提，日方则不同意把撤兵作为解决“济案”的先决条件，企图将其作为谈判中的筹码。交涉陷于僵局。10月24日，谈判暂告结束。

11月7日，矢田再赴南京谈判。中方又提出撤退山东日军、恢复津浦铁路交通、交还胶济路沿线20里以内的行政权等要求，并保证保护日侨的安全。日方反对以撤军为先决条件，并要求中国严厉取缔反

日运动。会谈再告中断。由于英、美各国都已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田中内阁的强硬政策在日本国内遭到质疑，处境不利，为避免在华权益受到他国排挤，其对“解决”“济南惨案”、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积极态度。1928年11月，日本政界要人床次竹二郎来华，先后与张学良、蒋介石会谈，表现出希望共谋打开僵局途径的态度。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双方达成默契，以“解决”济案作为日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条件。

“东北易帜”后，日方派芳泽谦吉来华谈判。芳泽来华前，曾声明将竭尽全力谋求中日交涉的圆满解决。中国方面则在12月30日和1929年1月14日的交涉中，提出日军必须先允撤出山东方可再议其他。1月25日，王正廷与芳泽开始会商。日方同意中国的撤兵条件，且于1月30日通过中日关税协定，但田中在2月4日的训令中却推翻成议，尤其是反对原议中对等赔偿和互相致歉的条款，使谈判再度中断。延至3月，在中方作出双方各自“调查”损失情况取得一致再定赔偿的让步后，田中内阁方同意再行协商。

日本政府在“济案”及“修约”等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1928年12月，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过《民国日报》、《申报》发放问卷针对对日问题进行民意调查，回收的万余份问卷中，对于应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手段，除抵制日货外，选择“不合作”的6340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5.1%；选择“卧薪尝胆，准备一战”的2792人，占24.3%；选择“振兴实业”的1520人，占13.2%；选择“运用外交手腕”的243人，仅占2.1%[(43)]。可见由于日本的压迫，民间主张对日强硬的呼声相当高。1929年3月初，全国反日暴行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最低限度必须做到日本道歉、惩办责任者、赔偿及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种事件和撤退驻华日兵，否则将宣布与日本经济绝交。

1929年3月24日，中日双方重新谈判。3月28日达成最后协议，并于当日在南京、东京同时以芳泽与王正廷互换照会及声明书、议定

书的方式发表。日方在给中方的照会中表示："山东日军撤去后，国民政府以全责保障在华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则帝国政府拟自关于解决本案互换签字之日起，至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全部撤去"；"关于日军撤去前后之措置，应由中日两国派委员就地商议办理"。声明书称双方对去年5月3日济南所发生之不幸事件"悉成过去"，期待"两国国交益致敦厚"。议定书宣布设立"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双方任命同数委员，实地调查事件中"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44]。由于中国方面已私下接受"对等赔偿"的秘密协议，所谓调查不过是欺人之谈。"济南惨案"中，中方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实际死伤人数在1.1万以上。而日本侨民死伤仅各15人，财产损失中方亦较日方巨大，达2.4亿余元[45]，如此"对等赔偿"，实际是中国方面作出巨大让步。

协议签订当天，蒋介石致电冯玉祥报告交涉情况："济案交涉经甚多周折，现已得一结果。芳泽今日来京签字，日军亦自今日起撤退。即请转告良诚兄准备接收。"[46] 3月31日，中方接管济南，山东省政府发布布告，宣布"日军即行撤退，一切军政事宜，概由我方接管"[47]。日军此后开始准备撤出，5月12日全部离开济南，开赴青岛，5月20日全部撤离山东回国，由中方接防。

"济南惨案"交涉完成后，3月29日，中日双方开始着手解决"宁案"。由于此前已有英、美等国交涉先例，关于"宁案"的交涉进行较为顺利，4月1日开始会谈，15日达成协议，16日双方又就1927年4月3日汉口日租界事件达成协议。5月2日，王正廷与芳泽互换照会，就南京事件向日方"道歉"并承担赔偿损失。由于日方要求赔偿数额过高，南京政府于1930年7月20日提请日方核减。延至1931年3月24日，有关南京、汉口两事件赔偿问题的换文始由蒋介石批准，距达成协议已过两年。

1929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举行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日人头山满、犬养毅等以国宾身份参加典礼。6月3日，日本宣布正式承

认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芳泽谦吉为驻华公使，芳泽于当日递交了国书。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表示与日本“修和”，先于4月24日下令取消反日运动，继于6月8日将全国反日会改名为全国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不过，在内心中，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仍有很深的戒心，1929年6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外方针，亲美联英，排俄拒日，此其大致也。”[48] 1929年国民政府拟订的国防计划则判断：“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将来与我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预想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经营满蒙为日本三十余年来积极进行而无稍变更之政策。山东撤兵，虽已议定，而其政治、经济上之势力仍盘踞于胶济一带，有机可乘，则再进兵乃意中事。旅顺、大连在甲午战后，因俄、德干涉而交还矣，卒又成今日之局，乃其先例也。日本占领山东，其直接为图在华北之势力，而间接则为巩固其经营满蒙之政策者。中国一日不自强，则日本一日不舍弃山东、台湾。台湾为我东南之门阈也，乃日本据之，我今日虽无收回之力量，然为将来之大问题。”[49]

三　与列强“改订新约”的交涉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晚年对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国民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在全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影响下，北京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曾与列强谈判修订不平等条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修订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外交纲领。修约的主要内容为取消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以及收回租界、租借地、铁路、邮政及海关等，试图通过与列强的谈判，达到废除旧约、改订新约的目的。

南京国民政府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大类，预定修约外交分五期进行：第一期恢复关税自主权；第二期取消治外法权；第三期收回租界；第四期收回租借地；第五期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

易权等。按王正廷的设想，“要在1928年内完成与各国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而于1929年和1930年为进行撤废领事裁判权之期；1930年与1931年为着手收回租界主权与撤销外国驻军之期；1932年则拟自外人手中收回内河航行权与沿海航行权；1933年则拟收回各国的租借地，恢复中国固有的全部主权”[(50)]。无论是哪种计划，关税问题都被放在第一位。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将恢复关税自主权作为首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因为现行的协定关税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也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它既可作为政府外交得分的宣传，有助于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也可增加政府收入，解决财政困难。

1927年7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声言协定关税有碍国家主权，宣布在当年9月1日实行1926年关税会议时各国提出的新税率，加征附加税并取消内地厘金及货物税。但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尚不稳定，在与北洋军阀的作战中遭到挫折，加之有关国家进行武力威胁，调集军舰分驻中国各海关。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在8月29日自找台阶，宣布关税自主原则上仍于9月1日实行，但增征关税和裁撤厘金等实际措施“暂缓举办”[(51)]。

同年11月2日，伍朝枢再次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一）凡从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无存在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以废除。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更应即予终止，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改订新约。（二）各种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52)]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对现行条约既不能“自行废除”，又无法取得各国之“谅解”，所谓无效云云，实系空谈。

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6月7日发表宣言，宣称在军事时期终结，整顿与建设工作即将展开之际，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的诸种束缚使建设工作极难收效，因此，“另订新约，以适应现今时势要求，实属无可再缓”[(53)]。15日，更发表对外宣

言，宣称："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新订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宣言承诺重订新约后，将进一步促进"中外邦交之亲睦，人民友感之增加，国际贸易交通之发展，外侨生命财产之保障"[54]。7月7日，外交部发布订约三原则，宣布条约期满者当然废除；尚未期满者则以相当手续解除而重订；旧约满期新约未定者，由中国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7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规定在此期间，"在华外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凡华人应纳之税捐在华外人应一律照章交纳"[55]。

南京方面在修约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军事上的进展和国家的基本统一，国民党内部要求以更加强硬态度面对列强的呼声高涨。1928年7月，何应钦在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中明确认为："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非运用本党之革命外交，无由实现。如以软弱求怜之方式，期得帝国主义者之谅解与同情，自动废止对华侵略之依据，实为痴人梦想。"强调："外交之措词与态度，均应以强硬不屈之精神出之，一洗前怯懦嗫嚅之劣习。外交至短刀相接，战争虽力应避免，然革命民众之行动，实可为革命外交之后盾也。"[56] 与此同时，冯玉祥、李宗仁等也公开要求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力矫以前之软弱，以达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57]。8月2日，谭延闿、蔡元培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外交问题提案，要求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国民政府为贯彻废约之主张，现在正当而有效的办法，为即时向列强分别开始废约的谈判；要求在一定之期限内（自现在起半年以内），依平等互惠的原则订立新约。如列强拒绝谈判，或限定之期间已过，而新约尚不能成立，则政府宣言，以无约待遇此等国家。"[58]

国民党上层不断呼吁废约，来自基层的呼声更为强烈。上海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公开呼吁："我们深深地尝着了不平等条约的苦滋味，因此决定要把此卖身契完全销毁，我们当然不是希望卖身契中的

条件的改善，我们也并不愿意仅把卖身契中的文字的修正，我们只是希望从根本上把整个的卖身契作废，把整个的卖身契宣告无效，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赞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根据。”[59] 1929年初，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上海市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达到总数的95%，只有3%的人主张修改，要求废约者占据绝对多数[60]。这些建议和呼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不造成影响和压力。

对中国的修约主张，各国反应不一。美国政府率先表示愿与中方接洽，1928年3月30日，美国驻华公使在答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中表示：“美国政府及其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欲使其国家生存日趋稳固，并实现其不受特种义务限制之主权之愿望，深表同情。”[61] 6月间，驻美公使伍朝枢与美国务卿凯洛格开始会商，财政部长宋子文则在北平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接洽，美方答应“中美条约不必俟诸期满始议修改”[62]。7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希望委派代表与中国谈判修约。美国随后宣布以马慕瑞为全权代表“对于中美间条约与关税之规定，即时商议”[63]。25日，宋子文与马慕瑞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应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条约》同时规定，两国“在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64]。在列强尚在中国享有关税及其他特权背景下，这一规定保证了最早签订条约的美国实际得到的利益并不较其他国家有所减损。不过，美国同意中国所提关税自主的原则，并派遣代表和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仍然对中国外交打开局面有着重大帮助。外交部长王正廷在给美国公使的复照中表示：“贵国政府及人民与中国政府及人民推诚相与，将使两国历久之友谊，其基础愈趋稳固而愈为光大。”并期望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于最短期间完成新约，以开两国外交上之新纪元”[65]。南京《中央日报》认为：“中美关税关系条约，是中美两国

有约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中国修约运动的最初成功。”[66] 相比之下，蒋介石在日记中显得比较冷静，记道：“美国与我国签关税自主之约，其实为平常应有之事。”[67]

在美国率先签约的影响下，8月7日，德国代表向中方递交一份条约草案，内容包括“保证双方在关税和有关方面不相互歧视”[68]。17日，中德签订关税条约，内容是中美关税新约的翻版。条约期满的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法国召开圆桌会议，商订对策，除日本坚决反对修约外，其余多愿顺水推舟。法国驻华代办于7月13日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表示：“法国政府对于1886年4月25日在天津订立之中法陆路通商章程，1887年6月26日在北京订立之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及1895年6月20日在北京订立之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允予修改。”[69] 9月12日，王正廷分别照会挪威、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五国，请求开始谈判关税问题。

英国政府是协定关税的始作俑者，且为在华权益最多的国家，对废除此项特权向持观望态度。中美关税条约签订后，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英国态度也转向积极。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本国政府对于中国修约之要求，认为根本合理。英国政府对于中国素常维持之友谊与同情之态度作进一步之表示起见，准备依相当程度，由依法委派之代表与贵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70] 12月10日起，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开始面谈关税自主问题。20日，正式签订《中英关税条约》。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规定“现行条约内所有限制中国任意订定关税税则权之各条款，一律取消”，但又在附件中规定，中方只能采用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中所拟税率，至少一年内应为对英国货物所征最高税率。条约要求缔约双方对对方人民实施互惠原则，“不得有何借口，使其完纳之关税、内地税或其他税项，异于或较高于各本国或其他各国人民自同一产地所运货物完纳之税项”[71]。此外，中国还答应设法废除厘金、常关税、沿岸贸易税、通过税、落地税等。比之中美关税新约中国实施关税自主无任何规范性的限制

条款，这一条约确实苛刻得多。

在对英交涉同时，1928年11月至12月底，王正廷连续与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法国、西班牙九国签订关税条约，允准中国关税自主。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除确认中国关税自主外，还涉及领事裁判权问题。五国答应于1930年1月1日后，允许取消其在华所享领事裁判权，但条约同时规定，各该国侨民与中国侨民均可在对方内地取得土地财产、居住、经商之自由权。至此，只有日本未与中国缔结关税新约。

南京国民政府在开始交涉关税自主权的同时，也提出颁布和实施临时国定税率的问题。1928年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作为关税自主后征税的标准，宣布从次年2月1日开始实施，以一年为有效期。这一税则对进口货物规定了货值7.5%至27.5%不等的税额，自晚清被迫开关以来实施八十余年的“值百抽五”单一税率至此将告终结。由于此时有关关税自主的交涉尚在进行之中，为减少阻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由日、英、美三国委员所提出的七级差等税率为基础制定过渡期的国定税率。由于暂行税则基本内容曾得到列强同意，且税额提高幅度也不大，因此其虽由中国自主颁布，列强多无反对意见，只有日本提出异议，于第二天退回照会，表示不能承认。在关税自主问题上，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障碍。

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关于修约的交涉和整个谈判同步开始。1928年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指出中日条约展期将到，“国民政府自应本7月7日宣言之主张，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商定新约。在新约尚未订立以前，当按照本国政府所颁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成前之临时办法，宣布实行，以维持中日两国之政治、商务关系”[(72)]。对此，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加以拒绝。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见英、美、法、意等国驻日使节，通报日本对修约问题的立场，表示日本不承认中国可单方面宣布终止条约，

声称日本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日本权益。31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答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节略时，表态可以接受日方“认为适当之改订”，但声称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所颁布的七条临时办法为交涉标准，“为清理解释上或国际惯行上所不应有之事，且为蔑视国际信义之暴举，帝国政府万难容忍”，强硬表示：“帝国政府为拥护条约上之权益，将有不得已出于认为适当之处置。”[73] 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答复中驳回日本政府所谓1896年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条约有效期为十年，期满后六个月内若未声明更改，则条约继续有效十年，因中方并未在条约期满后六个月内要求更改，因此中日商约仍然有效的说词，指出1896年的中日商约至1926年7月20日又届期满，中国政府已向日本政府提议改订，故对日方的主张“歉难同意”。同时，针对日方所谓“暴举”说指出：“国际间彼此情势，既有变化，断无可以永久适用之条约。因而依据情势变迁之原则，使其效力废止或中止，准之法理，按之先例，本政府此举，绝无蔑视国际信义之嫌。”日本节略中“竟有此外交文件素不经见之字样，本国政府深为惋惜”[74]。双方几度交涉，日方坚不让步。

美国与中国签订关税新约后，日本的强硬态度始有所松动。中美关税条约的签订，对有关各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加强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修约外交中的地位，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感受到了中国民众情绪的变化。他在7月30日报告中说：“已出现（对美国的）感谢之情一转而成对我国的憎恶怨恨的现象。”[75] 芳泽公使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也指出，英、美两国对于中国关税自主及实行暂行国定税率的问题已经达成共识，日本必须意识到它在这一问题上迟早要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可以在声明条约继续有效并保留这一主张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始商讨修约[76]。

1928年9月10日，田中首相致电驻沪总领事矢田，要求他尽快会见蒋介石或张群，表达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情，并期待它取得成

功的态度。同时要求中方暂缓公布新税率，以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时间。当时，由于与各国商讨关税自主进展顺利，南京国民政府计划10月1日公布新税率，自192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对此，日本意识到独力阻止中国政府实施这一税率颇为困难，遂准备有条件地同意接受这一税率。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驻沪总领事矢田在9月开始了多次会谈。中方为向日方示好，提议以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由日、英、美三国委员所提出的七级差等税率作为中国关税自主后基本税则的过渡办法，但日方并不领情，坚持反对中国于1929年1月1日实行关税自主。11月13日，王正廷与宋子文联合向行政院提出颁布实行新的进口税则的提案，为向日方表示善意，将新税率生效时间由原定的1月1日改为2月1日；同时中方承诺新订国定进口税则后，每年于新增收的关税收入项下拨出500万元作为整理担保不足的内外债之用。此后，中日之间的谈判气氛有所缓和。日本意识到在税率问题上一意用强并非上策，因而决定稍作退让，接受现实。12月3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签订中日关税条约。1929年1月25日日本派出前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为全权代表，与王正廷在南京开始正式谈判，交涉“济案”的解决。与此同时，王正廷又与日本领事上村达成协议，日本以换文形式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税则。

1929年3月7日，王正廷、宋子文与日代公使重光葵在上海就修订中日商约展开正式谈判。日方在谈判中一再要求与中方订立一个长期的关税互惠协定，实际上是要使中国对日货的关税在实现关税自主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仍保持在低税率上。12日，中日双方签订《中日关税协定》草约五条。5月6日，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在中国方面接受日方条款后，中日终于订立了新的《关税协定》。该协定规定：“凡在中日两国境内关于货物进出口之税率、存票、通过税、船钞等一切事项，完全由中、日两国彼此国内法令规定之。”双方还在换文中确认废除陆路边境优惠税率。中方除答应不歧视日货外，同意在三年内维持日本输华棉织品、海产与鱼产品、面粉等的最高税率。中方承诺，在最短时期内废除有碍于在华贸易发展的厘金、常关税、沿岸贸

易税、通过税及其他类似各税。中方还确认以每年从关税中提存500万元作为担保，并召开债权人会议整理债务[77]。

1930年1月1日，即依照中英关税条约附件规定税率实行一年期满时，中国海关颁布新税率，由8%升至10%，2月1日又宣布用金本位制征收进口税。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修订颁布《海关进口新税则》，于1931年1月1日起实行。新税则按物品性质分为十二等级，税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分别课征货值5%至50%的进口税，比暂行税则几乎提高了一倍。1932年12月1日起，宣布征收10%的海关附加税，次年6月降至5%。1933年5月中日条约所定期限已满，对日本主要货物进口税作了大幅度提高，最高达80%。关税自主实施后，中国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1.3亿元增至1930年的3.8亿元，其后因东北沦陷，降为3亿元。

关税条约修订成功，使国民政府在修约问题上信心大增。1929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告国民书，宣称将在三年内完成修约。同年6月14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于最短期间内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工作，如撤销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等”[78]。蒋介石饬令行政院及外交部“从速制定履行此案之方案……切实执行”[79]。外交部在呈文中称：协定关税一项已办，“本部现正从事于撤废领事裁判权工作，期于明年1月1日实行”；其余租界、租借地、沿海内河航行权及外国驻军设警“各项亦均已准备于最短期间内视各国对我之形势采取有效方法分别予以废止”[80]。

废除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在修订关税条约时，正在争取的又一主要目标。中国与条约期满国家之间的交涉首先取得进展。在中国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签订的商约中规定，“此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应受彼缔约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然而，这种放弃也是有条件的。如中比两国外长的换文约定：“比国人民应于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弃是项特权时，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81] 而意、丹、葡、西等国的承诺是，当华盛顿

条约的各签字国取消领事裁判权后，这些国家的在华人民将与各签字国人民一同受中国法律和法院的管辖。

欲废除领事裁判权，最为关键的是条约期未满但有着重大影响国家的态度，而英、美等国在这一问题上都消极以对。1928年9月10日，中国代表在国联吁请修改不平等条约时，法国等国就以成约不得自行解除为由竭力反对，使此议毫无结果。1929年4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美、法、荷兰、挪威、巴西六国驻华公使提出照会，说明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危害和不适当性，称中国代表早在巴黎和会时就提出废除对中国司法主权所加之限制的愿望，华盛顿会议时，中国代表又要求“解除政治上、司法上及行政上种种束缚”，华盛顿会议表示同情，设法促进在案。中国现已统一，中国政府希望将中国司法制度所受的限制予以解除 (82) 。对日本、墨西哥、瑞典、秘鲁四国则望另订新约时明文取消。对此，各国的反馈不佳。美、法、英等国认为废除治外法权应为渐进式的，只愿考虑对领事裁判权加以修改，声称中国尚未有独立之司法制度，还未实行1926年9月16日法权会议上十三国代表组成的“调查法权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因此，领事裁判权应该逐渐放弃，外人生命财产才有保障。英国8月10日复照中，进一步要求中国法典必须具有西方法律的原则。荷、挪、巴则称将与他国一致行动 (83) 。

7月12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对记者表示，自1930年1月1日起，中国将取消各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 (84) 。9月6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有关国家，要求各国立即派出代表与中国代表磋商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并谓中国已与其他数国议定1930年1月1日废除领事裁判权。11月1日，英、美、法等国在复照中虽同意谈判，但除美国在11月中下旬与中国开始谈判外，其他各国均借故拖延，和美国的谈判也无进展。对此，中国政府于25日分别致电驻美、英公使，表示英、美如再延宕商讨，中国将于1930年1月1日起，自行宣布废除列强在华特权。但英、美等国仍未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鉴于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国公使蓝普森、驻美大使伍朝枢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谈判未有结果，决定由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要求自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85]。

从内容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特令，显然是一个单方面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重大举动，其中不存在需要与有关国家协商的意味。这一举措对美、英、法等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特令颁布的当天，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便对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表示，美方希望从1930年1月1日起，采取步骤来逐步废除领事裁判权，任何无视这一原则的行动，将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极端遗憾和强烈反对”[86]。法国声明无法接受中国片面取消法人领事裁判权。在此之前，英国外相亨德森已于12月20日给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发出备忘录，针对南京国民政府一再申明将于新年废除领事裁判权指出：英国无法承认中国片面废约的武断解决方式，但愿意对中国撤废治外法权采取开明与同情的态度，同意以1930年1月1日作为“逐渐废止领判权”[87]的起点。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发出措辞严厉的命令，但这更多是为自身此前作出的强硬姿态圆场。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软硬兼施下，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令发布仅仅两天后，外交部又发表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宣言，重述特令的内容后表示，中国政府深信各国“对于现由政府准备之办法，如有意见，亦愿于相当期内，与之审议。故国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命令，实系一种步骤”[88]。同时口头向外国记者表示，此命令在与有关各国谈判获得满意结果前，将不予执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做的明显妥协，实际意味着次年元旦并不是立即无条件地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是从此开始与列强会商废除这一特权。

1930年1月，英国公使蓝普森与王正廷就撤废治外法权开始第一次会谈。随后，蓝普森还与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接

触，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4月，中国国内爆发中原大战。中外关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九十月间，英、美先后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各自的草案。两国方案仍旧保留了在区域和法权种类方面的限制：如在上海等地继续保留领事裁判权，设立特别法庭，外交官、领事官有废案权，领事裁判权撤除以案件之民事、刑事与个人身份之不同类别为顺序，逐步实施等。

对英、美提出的草案，中方无法满意。12月7日，王正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对案，强调所有在华美国公民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方面都应服从中国的管辖权。中方同意成立特别法官议事室，聘用外国法律顾问，但这些法律顾问不得干预法官的判决。17日，王正廷以外交部名义向蓝普森发出备忘录，要求英国应于1931年2月前解决治外法权问题，强调："英国政府所提逐步撤废在华治外法权的各项建设，经过中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之后，发现是无法接受的；中国政府仍然相信（此问题）不需要另外采取其他的行动方式以达其目的。"[(89)]

1931年初，英、美陆续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如同意放弃移审权等，但仍未能满足中国方面的基本要求。1931年5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法权交涉停顿，同日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自1932年1月1日起实行。该《条例》规定：所有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均应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在沈阳、天津、青岛、上海、汉口、广州、昆明等十处地方法院设立专庭，受理外国人为被告之民刑案件。不在上述十处法院管辖之内者可申请移转管辖。专庭可设中外法律咨议若干人向法院书面陈述意见，但不得干预审判。外人的逮捕及其房屋或办公室的搜查均应依中国刑法典规定执行。外国人可聘请外国律师[(90)]。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会议议决"函请国民政府应定期限向各国交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经"国民政府会议决议交行政院议复"[(91)]。13日，国民会议又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宣称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国民政府应在最短期内实现中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

由。但未明定废约期限。在中国的压力下，此后，有关领事裁判权问题的交涉步伐明显加快。数月之中，中国与英、美之间先后达成了大致类似的妥协，1931年6月5日中英草约签订，7月，中美也就局部问题达成协议，中方同意将英美在上海的领事裁判权保留十年，将英国在天津的领事裁判权保留五年，英、美则将其他各地的领事裁判权立即取消。

正当中外交涉进入关键之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形势的骤变，迫使中国外交的中心随之转变。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成为当务之急，修约之事降到了次要位置。1931年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命令，宣布“兹因本年各地天灾变故，所有应行筹备事项，尚未就绪，该项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应暂缓施行”[(92)]。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就此暂时停止。

对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王芸生曾批评道，南京国民政府“采修约之步骤，以求逐渐改善对外关系，实亦应循之途径。惟须以光明磊落之态度出之，使天下灼然共见，若避难就易矣。而乃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充此一念，以致法权交涉，步步皆伪，扫兴而终；以欺于国民者，转为外人所欺，弄小巧者成大拙，此其鉴矣”[(93)]。

与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同时，1929年5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国发出照会，要求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租界临时法院是由原租界会审公廨改组而成。1926年8月，作为解决“五卅惨案”的一部分。江苏省政府与英、美、法等十四国领事签订《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这一章程恢复了中国在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的部分司法管辖权，但仍保留了不少有损中国司法主权的内容。南京国民政府照会发出后，各国均保持沉默，后经外交部多次交涉，1929年12月9日，各国代表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南京开始谈判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经过多次的往复折冲，包括征求六国以外的比、丹、意、日、葡、西、瑞典等国驻华代表的意见，1930年2月17日，中国代表徐谟与英、美、荷等国驻华公使及代办终

于签署《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确认中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廨演变而来的审判机关。该《协定》规定：中国得在公共租界内设立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分院各一所，依照中国法律审理民刑案件；高等法院之判决，均得依中国法律上诉于中国最高法院，废止领事观审及会审；废除外国书记官长制，由中国任命检察官负责起诉；诉讼一方为外国人时，得聘请外国律师充任其代表。《协定》虽在司法主权上取得很大进步，但仍未彻底解决。如关于司法警察问题，外国代表以法警问题事关租界的行政权力为由，坚持不肯让步。《协定》于1930年4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1933年2月8日又延期三年，并规定可继续顺延。1931年7月28日，中法代表签署《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取消了上海法租界内的会审公廨。

收回租界和租借地，是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当然内容。自1843年英国在上海开埠以来，总计有八个国家在十个通商口岸开辟了二十二个专管租界，其中英国六个，日本五个，法国四个，德国、俄国各两个，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各一个。另在青岛等五个城市划定租借地。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改订新约运动后，在收回租界方面投入相当精力，效果却并不显著，虽然收回几处，但主要是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承诺而未兑现的。北京政府时期，因中比通商条约逾期失效，中国宣布予以废止，相应地其天津租界也应归还。1927年比利时宣布愿意交还天津租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比利时再度声明愿意交还天津租界。1929年1月，双方开始会商交还租界问题，8月31日，签订收回天津比租界协定。作为补偿，天津比租界工部局所负债务津平银九万多两由中国政府在协定生效后六个月内，偿还比利时政府[(94)]。1929年3月，中英正式谈判镇江英租界问题，10月31日，英国正式换文交还镇江租界。实际上，早在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镇江后，群众举行庆祝游行时，英租界当局为避免发生冲突事件，已自动撤掉租界巡捕，改由中国警察入内维持治安，并将工部局改为公安局，中国已非正式收回镇江英租界。这一谈判更多是对现实的承认。

中英关于交还威海卫租借地的谈判早在北京政府时期即已开始，1924年议定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二十九条，后因“北京政变”发生，双方未能正式签约。1929年1月，王正廷向英方提出谈判交收威海卫。五六月份，双方展开多次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1930年1月，谈判重启。4月18日，中英签订关于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英国同意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同年10月1日中方正式接收威海。在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中规定1898年7月1日所订租借威海卫专条，即行取消。所有威海卫全湾沿岸10英里地方，以及刘公岛与威海卫湾内之群岛交还中国。英国在威海卫区内所有财产赠与中国[95]。由于英国海军坚持要继续借用刘公岛设施十年，在附件中规定将刘公岛内房屋借与英国政府作为英国海军消夏疗养之用，十年为期，期满可续借。每年4月初至10月末之间准许英国军舰到刘公岛海面抛锚[96]。

收回厦门英租界的谈判进行较为顺利，1930年9月17日中英双方依照收回镇江英租界的前例签订交还厦门租界协定，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照会中声明，“所有1852年关于将该处租予英国政府之换文，亦一并作废”[97]。

虽然中国在此期间的交涉中收回了部分租界，但比较重要的港口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地的租界及北平的使馆区均未交还。九龙租借地英国根本拒绝讨论。法国虽在1922年1月31日在华盛顿会议中即声明放弃广州湾租借地，可是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10月广州失陷时也未交还。至于日本的租借地——旅大地区就更无讨论余地。1930年9月19日中国司法院长王宠惠曾向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探询日本对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态度。日本一口回绝，外务省声称旅大租借权、满铁沿线的驻兵权等绝对不放弃。

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尚无结果，原定下步进行的内河航行权及外国军队驻扎中国问题交涉更无实现可能。所以，南京国民政府除向有关各国试探态度外并未实际着手进行。收回铁路权也遇到障碍。“关税自主”虽然原则上实现了，但总税务司仍由英国人梅兹担任。海关中

的外籍人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从1929年的230多人增至1488人。南京国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和中苏边境之战

一　中苏关系恶化与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国民党能够迅速登上全国的统治地位，和苏联在国共合作时期的支持、帮助密不可分。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和苏联分道扬镳，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大有视若寇仇之势。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

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卷入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大为不满。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称，广州事变"皆由共产党借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发令指示之地"，命令各省对苏联领事"一律撤消承认"，"对苏俄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98)]。限令苏领馆、商船和商务代办处在一周内撤退，逮捕汉口的苏联领馆人员并将其驱逐出境。因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北方和东北地区，因此苏联政府在东北地区的驻华使领馆得以保留。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继续对苏联予以抨击，宣称苏联"踞民族统治之榻，而枕共产之梦，继帝俄南侵之野心贪欲，而变其策略"[(99)]。会议通过决议，"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100)]。

“二次北伐”结束后，1928年8月，蒋介石曾提议“对苏俄外交应加以研究”，遭到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的反对，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他当时的反应：“以为不应有此想念，认余为联俄之萌，顿时表示不信之状。呜呼，如此国家与政府，而对俄不准研究，是何心耶。”[101] 许多国民党人还未从联俄的旧事中摆脱出来，不能分清联俄和对俄开展正常外交的区别，这是清楚政治、外交的实用性的蒋介石所以遭到批评的原因。不过，12月“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亦未再要求尚留驻东北的苏联领馆撤离。正因此，1929年初，中苏关系一度有缓和的趋势，苏联政府甚至试图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曾对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表示，中苏交恶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前次误会应尽快了结，并许诺称：苏联使领馆人员若宣传共产，中国可严厉取缔；俄人俄官如有参加，照华人一律办理。蒋介石这时虽然不认为中苏已经可以复交，但同意双方可以就此接洽商谈，批示：“对俄复交未至其时，至少须待国内政局稳定，秩序恢复方可也。但雨岩（蒋作宾，字雨岩）与之接洽则可继续进行，不必拒绝，亦不必中止。”[102] 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拟订的外交政策谈到：“对于俄国之外交，对于苏俄联邦政府仍抱自立、自卫、和平、亲睦之旨，与对于列国无相歧异。”[103] 不过，由于刚刚经历一场不愉快的分手，加上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双方互信薄弱，关系的重建相当艰难。蒋介石在1929年6月2日曾写道：“对外方针，亲美联英，排俄拒日，此其大致也。”[104] 对苏联的抵制心理非常强烈。正是在此背景下，加上中东路所处地理位置重要，中苏“共管”的体制矛盾多多，而南京国民政府又存在严重的形势误判，终于导致了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中东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以苏境内赤塔为起点，以海参崴为终点的一条铁路，全长2186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是由满洲里到绥芬河的干线长1484公里，以及由哈尔滨到长春的支线长241公里。1903年由沙俄出资建成通车。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原支线的长春至大连段为日占有，改称南满铁路。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

方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及同年9月20日苏联与张作霖签订的《奉俄协定》均规定该路由中苏两国共管。但是，苏方实际上并未认真履行相关协定，对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营业项目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并未交付中方。铁路管理局也由苏联单方面控制。在二千七百多名职员中，中国人只占四百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路局机关行文，除呈理事会公文及路局会议决议系中俄文并行外，其余均为俄文。一切财政结算也以卢布为准。铁路自1922年起盈利陡增，仅1925年便盈余1682万卢布，虽然自1924年至1929年的五年中，中国也分得4850万金卢布[105]，但利润的使用和分配权却完全由苏方把持。东北地方当局对中东路这种状况早已心存不满。

中东路事件之前，张学良曾于1928年12月22日强行接管中东路哈尔滨自动电话站，又于1929年1月封闭了苏方《群众之声》报馆。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以清查共产党活动为名派军警搜查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拘捕在馆人员三十九人，其中多系苏联国家经济机关及驻中东路人员，还查抄领馆一批文件，“证实”苏领馆与“中国共产团体”有来往。据东北地方当局事后宣称，此举缘于流亡东北的“白俄”分子通风报信，称苏联驻哈领事馆内即将秘密举行共产宣传大会，与会者多为中东路沿线苏联管理下各路站、工厂、商船局、煤油局、贸易局等机关或职工会负责人，因此出动搜查。

事件发生后，苏联外交部于5月31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驻苏代办夏维崧提出抗议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对此态度强硬。他一面去电东北，要张学良派员将查获文件迅速秘密送至南京外交部，以凭会商办理，一面复电夏维崧要求后者拒绝接受苏方抗议。夏维崧得电后还没有来得及向苏方远东司转达，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已经正式发出措辞严厉的抗议函，要求中国政府“从速释放在领馆内被逮之人，发还被搜之公文及掠去之物件钱财”。同时通知中方：“因中国政府之行为已证实不愿并不知介意公认之国际公法，则

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106)

对于中苏在东北的冲突，蒋介石态度复杂。蒋介石这时在国内政治上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住正蠢蠢欲动的各个反蒋派别；一是如何牢牢地抓住像张学良这种封疆大吏，使之为己所用。就前者而言，蒋深信苏联唯恐中国不乱，必会支持共产党并利用反蒋派，于己不利，故反苏防苏是蒋的基本方针之一。就后者而言，蒋深谙以攘外促安内统一，用外争压抑内争的策略，故颇愿看到出现某种举国一致的对外冲突局面，从而不仅使张学良等非依靠南京不可，而且迫使其他异己势力屈服于举国对外的压力之下就范于南京的号令。因此，张学良反苏的举动，蒋不仅高度肯定，而且有意推动其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当然，注意到苏联公开威胁不再承认中国驻苏各使领馆享有治外法权，南京外交部这时多少有点担心。王正廷4日电告张学良这一情况后，特别提出：“形势紧张，亟应妥善应付。”并询问张：若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希即妥筹详细电复(107)。张学良这时对此显然还不以为意。他随即回电，态度轻松，说：“服务地方，守土有责，奉安期间，自由集会，中央迭有禁令。兹苏驻哈领事馆，召集共党秘密开会，不但扰乱地方治安，且违背中俄协定，不得已将领事馆搜查。”(108)

进入6月初后，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频繁调动军队，而中东铁路苏方员工亦以罢工等形式向东北当局表示抗议。张学良的反应，一是派兵增防边界地区，一是准备夺回中国本应享有的控制在苏联路局局长手中的中东路那一半管理权，不得已时不惜强行撤换局长。张学良所以要紧接着采取这一措施，也是预先就有所策划的。因为，负责中东路权交涉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和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等早就忍无可忍，5月间即曾向张学良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同时提出了强行夺取管理权的主张。6月6日，张学良明确批准了这一行动。电告张、

吕："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109)

蒋介石这时对东北方面搜查苏领馆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决以强硬对苏俄。"(110) 因此，包括中东路问题，其意也主张强硬解决。相比较而言，张学良解决中东路问题的办法，仍拟以遵守1924年中苏及奉苏协定为前提。即使强行解除苏方管理局局长职务，也只是以苏方局长违反协定关于中苏双方权限均等的规定为由，并非准备一举整个夺回中东铁路。而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态度则并非如此。王正廷的想法很简单，中央正在实行"革命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正好可以把中东路问题当与蒙古、新疆等问题一并向苏交涉解决。蒋介石这时虽未提出同时解决蒙古、新疆问题的想法，但他明确认为，应当趁机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大不了与苏彻底绝交。为了统一认识，张学良于7月6日专程赶赴北平与蒋介石和王正廷会商。10日的商谈中，蒋介石态度很清楚："决定收回中东路以防止苏俄赤化也。"(111) 他鼓励张学良坚决清除东北的"共产主义势力"，并允予全力支持，表示中央可出兵10万，支拨几百万元军费。蒋介石的支持，坚定了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信心，蒋张达成驱逐所有俄籍管理人员，之后争取收回整个中东路的一致意见。当日，张学良命令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要他们强行收回中东路权。

11日，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接连发出命令，通知中东路苏方职员，以中东路沿线电话线超越铁路专用规定，实属侵权为由，实行将该电话线完全收回。哈尔滨特警处亦依据长官公署令，以中东铁路各职工会，以及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联合会等苏驻哈机关宣传赤化为由，一律解散或予以查封。当日傍晚，特警处更进一步宣布将苏驻哈代理领事及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等五十九名苏方人员驱逐出境。

吕荣寰于次日公开发表宣言，指责苏方“把持全力，侵害华方权宜之处，日甚一日。其荦荦大者如关于正副局长权限平均用人等项，均未遵照协定履行”；“苏俄重要路员，皆系宣传赤化分子，一面假路员之地位，作宣传之工具，一方假工会之势力，把持路权……显有图谋危害驻在国家之行动”[112]。表示他奉政府令遵照协定，从事执行，以便防止赤化宣传，保持《奉俄协定》精神，并宣布中东路管理局局长暂由中东路华方理事范其光暂代。

13日，苏方迅速做出反应。苏联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宣称中方此举严重违反中苏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所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同年9月苏联与东三省自治政府所订的协定。指责中方对1929年2月2日苏方提出的谈判解决争执问题的提议不予答复，擅自改变现状。建议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东路的问题，解除中方命令及释放苏方人员，限中方三日之内答复[113]。

收到苏联政府的照会后，蒋介石除了电示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本原定方针，妥慎处理，持以镇静”[114]以外，对苏方的威胁并不以为意。其他政府要员，如铁道部长孙科、立法院长胡汉民等，亦相继出面发表谈话，声称苏方照会实为恫吓，不足为虑，强硬表示中央将坚决贯彻对俄策略，绝对不为苏联政府的照会所动。16日，中方复文宣称，此次东省搜查哈尔滨俄领馆，及对于中东路之处置，“本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勃发为目的”。因“苏联东路局长及该路重要职员，对于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及中东路暂行管理协定，自始即未能切实执行。数年来，该局长等种种违法越权事实不可胜指，至使中国人员欲按照协定执行职务而不可得。尤甚者，苏联人员辄借该路机关作险诈违犯中俄协定之宣传。因此种种原因，该省对于东路不得不有此处置，是违背中俄协定及东路管理协定其责不在我方，至为明显”。中俄关系各事件及东路问题，中方当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回莫斯科与苏方商榷，以谋合理合法之解决[115]。

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尚未解决，张学良继以武力夺取中东铁路，南

京国民政府又拒绝苏方照会，早就准备采取相当办法的苏联政府随即宣布对华断交。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116]。

接到苏联政府断交照会后，蒋介石当即与胡汉民等密商对策。因苏方的举动在南京当局意料之中，故蒋、胡均不甚在意，且估计苏联不敢用兵，胡汉民公开对记者声称："俄二次通牒态度早已料到，仍系恫吓，不致发生战事。"[117] 18日，蒋在日记中表示："接苏俄绝交复牒，即命驻俄使领回国。其末句有苏俄政府声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订协定之权利，是其意在保留，是无派兵保护之意，其或不敢用兵；如其用兵，则必以全力赴之，内政或易解决也。"[118] 蒋介石特地致电阎锡山、张学良，为其打气称："中东路事件，赤俄迄无觉悟。铣日向我通告，召还驻在我国之使领及中东路俄员，断绝中俄铁路交通，并请我国召还在俄使领。赤色帝国主义者充分表现其蛮横之态度，本无足异。且中俄绝交已非一日，苏俄至今宣告等于滑稽。况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战。中央对于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国际情势复杂，尤须郑重应付，免致造成协以谋我之局……尊处准备有素，当不至稍有疏虞。"[119]

19日，苏联驻华各地使领馆人员开始下旗离境。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宣言发表，并正式公布从哈尔滨苏领事馆搜获之文件。其中包括苏俄破坏"中国统一"，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组织暗杀团"、"秘密破坏军"炸毁中东路的"文件"[120]。南京国民政府第三十六次国务会议就苏联宣布正式绝交问题做出相应决定，即："所有苏俄驻华使领馆人员一律护送出境，我国驻苏俄使领馆人员一律召回本国。旅居苏俄华侨托由驻苏俄德国使馆代为保护，令外交部负责办理。"[121] 中

苏两国自此彻底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

二　中苏交涉的破裂与中断

对东北地方当局7月10日强行夺取中东路之举，苏联政府在此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采取两手策略，一面争取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一面积极备战，向中方施加军事压力，以恢复中东路事发前的原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手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断交前以“和”为主，断交后便转向以“战”促“和”了。

至于中方，由于苏联宣布对华断交后，即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空气，张学良首当其冲，感到压力不小。他致电蒋介石、王正廷说：苏方现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122)]。而蒋介石则继续坚信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开战。7月19日早8时，苏军开始在绥芬河一带向中国守军开枪开炮，并扣留行进在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他仍断言：“详察国际形势，俄无开战可能，昨日绥芬飞机与炮声是其仍以恫吓性质，我军前方部队须以极镇静态度处之。”[(123)]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很明显，就是绝不向苏方示弱，坚决不与苏联直接交涉。他注意到《非战公约》7月24日将正式生效，其主倡者美国政府又对中苏冲突格外“关切”，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借助国际的力量，迫使苏方承诺不诉诸武力，承认中方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对于蒋的这一主张，20日夜从青岛赶回南京的王正廷不大赞同。他在次日凌晨见蒋时表示：俄国未加入国际联盟，故无要求联盟调停必要。对非战公约组织，也只能限于将中国政府的态度通知签约各国而已。毕竟外交全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124)]。因此，他主张应当对苏联政府的绝交照会做出正式答复，以寻求直接交涉。对此，蒋介石断然反对，严词道：“彼已决绝如此，余决不复，兄必欲复，请以兄私人名

义复之可耳。”[125]

这时，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所谓“革命外交”，与列强各国紧张谈判改订新约的关键时期，东北地方当局武力夺回中东路的举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蒋介石以为苏联宣布断交并在边境实施武力威胁，必将激起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正可利用这一民气，提升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望，并彻底抑制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的权力挑战。7月20日，蒋发表致全国将士电，声称：“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126] 他一面坚持对苏采取强硬态度，一面要求东北地方当局对苏方的军事挑衅力避冲突，其基本策略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推动英美等国主导下的非战公约组织和国际联盟出面调停，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但是，列强各国并不是可由蒋介石任意摆布的棋子，他们的算盘比蒋介石打得更精。这时，除了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签署《中德条约》已取消在华特权外，其他大国在中国均享有条约特权。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和东北地方当局武力夺取中东路的实际行动，深深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他们乐见苏联利益受损，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中方急欲以强制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极为反感，惟恐在他们之间出现中东路事件的重演。在此共同立场的支配下，加上苏方坚决反对第三国介入其事，美英等国竟作出了令南京国民政府大失所望的反应。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朝枢明白电告外交部：此次中国攫夺中东路，美英等均印象不佳，法国亦然。美国国务卿明确表示，正因为世界舆论不赞成中国的作法，故苏联的态度已转强硬。中国此举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借口防止俄人宣传共产，目的是要占领中东路。由于顾虑到美英等国的态度，南京政府外交部自21日起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突出宣传：此次夺取中东铁路，纯“因哈埠事件发觉东路重要职员及其他机关经理委员均经参加”，出于取

缔宣传共产的目的不得已而出此，“此后该路问题及关系各事件均先由中俄商洽解决。”[127] 王正廷更强调“今日之驱逐俄员，不是要抢夺铁路，是自卫国家。”[128] 这些言论，不但暗示南京政府此后将寻求中俄直接交涉，且无异于公开承认此前的夺路行动的错误。

7月21日，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电告外交部称：俄大使托人来馆表示，俄方不喜欢列强以拥护《非战公约》为辞出面干涉，故甚望中俄能直接交涉，自行解决。“特询我方意旨，倘得双方同意，即可设法转圜云云”[129]。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高层更加确信：“俄国绝不轻用兵，绝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130] 虽然两日后，蒋作宾就报告苏联大使已向他表示，该国政府已经否定了他的建议，坚持“非中东路恢复原状不开谈判”。但南京政府内部这时对收回中东路仍旧充满着乐观的看法，甚至认定各国论调已为之一变，无有以俄为是者。“俄人之不敢用兵，即此可以断定”[131]。

张学良这时的想法明显与南京方面不同。这个时候大多数东北军政要人均对张采取如此行动来解决中东路问题抱强烈怀疑态度，张前此的强硬态度在东北高层当中已颇为孤立。苏联不顾刚刚签订的《非战公约》的条文约束，以侵扰中国领土领空相要挟，亦清楚说明苏联绝不会听任中方夺回中东铁路。这更加印证了多数怀疑论者的观点。张学良这时已清楚地了解到，以东北之力，绝不足以停止苏军的进攻。如要对抗苏军，必须引入中央军。但若照蒋介石拟订的方案，将中央军引入东北协防，则内部反对必更强烈。且如此一来不仅东北自主之地位将不保，日本关东军也势必会激烈反对，甚至实施干涉行动。因此，张学良此时已开始深信，将中东路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依据条约解决问题，最为适宜。

鉴于外交部21日肯定夺取中东路为“权宜之措施”，且国民政府的宣言也明确提及1924年中俄条约的规定，故力主妥协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积极推动与苏联驻哈总领事梅里尼可夫的接触。他注意到梅里尼可夫并未拒绝与东北当局进行交涉。张学良马上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他不仅亲自出面，通过与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谈话，解释东北当局绝无破坏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单方面收回中东路的想法，此次之事不过俄方利用中东路宣传赤化所引起，而且立即指示蔡运陞交涉员与梅领事具体接洽。在张作相和蔡运陞等人的坚持下，张学良很快批准发出致苏联代理外交人员委员加拉罕的专函一封，提出四项具体交涉办法：一、双方各派代表定期会议，解决东路问题；二、苏政府另派正副局长；三、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由俄正局长、华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四、被拘苏方人员可以释放，苏联拘留之华人亦须一律释放[132]。为了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张学良特意致电蒋介石，作了详细说明，并强调涉及中东铁路以外的各重要问题，自当仍由中央进行交涉，而“中路本为局部问题，不如先由地方径与商洽，即一时未能解决，亦尚有回旋余地”[133]。

张学良此举，让蒋介石倍感恼火，在日记中忿忿然称：“苏俄离间中央与地方感情，运动张作相提议条件，恢复其权利。而二张既恐苏联开衅，又怕日本趁机，故议和惟恐不及，而毫不权轻重利害，以动摇中央之方针。外交至此，又得一深刻教训，不仅对外关系复杂，须思虑周到，即对内亦不能只知以外交为团结之机，而其结果或相反也。”[134]但是，张学良地位太过特殊，蒋为牵制关内冯玉祥、阎锡山，非与张携手不可，因而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复电一方面肯定所谓“先由地方以为接洽回旋余地”的说法，同时提醒张应“防俄利用中央与地方之分，彼乃从中挑拨取利”，“使我中央与地方对俄方针分歧，步调不一，致外交失败，反为其所操纵。故凡既经由中央接手之外交，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认定中央为交涉对手，以保国家威信”。最后，蒋建议张务必修改给加拉罕的四条件，即保留原条件中之一、四两条，二、三条并为一条，即“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135]。言外之意，不能允许苏联继续有权管理中东路，且应为收回中东路留有余地。

因事涉外交，张学良不好独断专行。但张深知不请苏联再派正副局长，苏方必不能答应，故其虽依蒋意将四条改为三条，却仍将原有二、三两条作为附件提出，以符苏方之意。随后，他电蒋表示："俄另派正副局长一节，准情酌理。为先发制人计，不得不容纳彼方意见。至会同签字办事一层，实系我方提出，如能办到，于将来会议时亦属有益无损。上述两端仍须于函末附带声明，并未列入正式条文之内。"[136] 对此，蒋介石复电严厉指示："附件不可加入，务请设法注销。"[137] 在蒋介石和王正廷的再三督促下，张学良最终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的这轮交涉所以破裂，根本原因是南京中央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在要不要立即收回中东路权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坚信暂时无此可能，他的目标是能依据条约规定，允许苏方另派正副局长，争取实现双方平等享有管理权，即算大功告成。但南京方面却坚欲设法废止这项规定，使苏联不能操纵中东铁路。针对张学良忧虑苏联可能再出重拳，王正廷力劝张不必过于担心，"万一接洽决裂，窃度彼方虽严整战备，然亦为签字《非战公约》之国，必不敢以世界为敌，实行宣战。"[138]

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的交涉破裂后，蒋介石一面为张学良打气："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如正式开战，乃正彼所忌。"鼓励张学良"能多一时之忍耐即增多无穷之国威，且表现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139]。一面暗中电示与张私交甚好的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令其为政府代表前往沈阳，表面"辅佐汉卿主持交涉"，实际是监视张学良，"使暴俄无所使其伎俩"，并要何成濬与张"切商军事准备，以防万一"。说："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140] 8月14日，蒋介石与胡汉民、王正廷、戴季陶、古应芬等会议决定，仍本预定方针行事，至少对中东路管理权"决谋收回"[141]。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暴俄野心毕露，必待其侵略虚伪之行动暴露，

社会主义国家之虚伪、共产主义国家之侵略行动显著，方得暴露其恶劣、蛮横，而后世人之迷梦方醒，青年之妄想乃消。吾人以革命之立场，决不屈服于暴力之下，与其不战而亡，以污我民族光荣之历史，宁借城背一，同归于尽，保我国民革命之光荣。”(142) 蒋介石的政治高调不可尽信，其中所言也未必尽是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其可能有的思路还是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边境面对可能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张学良感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他致电南京中央强调：“东北与俄接壤之处，绵亘千里，现在防御所能及者，仅在东路两端，即绥芬河及满洲里，而近来俄人来衅，率由陆路交界处节节进窥，顾此失彼，极感困难，此防不胜防者一。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平时尚未敢发动，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强烈要求南京中央速决办法，以期早日解决。15日，张学良下达作战动员令，增派6万大军分兵两路奔赴中苏边境，以抵御苏军犯边。16日又发表声明宣布苏方若再进逼则是甘为戎首。

张学良按照蒋意向中苏边界大规模调兵遣将，没有起到丝毫阻吓苏军的作用，这进一步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紧张。但注意到苏军此一轮进攻仍是打了就走，并未以消灭守军和攻占中方领土为目的的蒋介石却依旧要张保持镇静。其17日即电告张学良称：“暴俄仍为恫吓，行动不敢深入我境也。”他对张派兵6万驰援满洲里和绥芬河，及发表声明宣示决心极为满意，声称：“如对俄问题，兄与中正能取一致行动，则未有不操胜算也。”(143)

18日，蒋作宾电告德国外长建议中国政府想一变通办法，表面上满足苏联要求，实际上收回中东路主权。一直以来，蒋介石坚持强硬对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非如此无法达到最终迫使苏联放弃中东路的目的。接受苏联方面的先决条件，哪怕只是同意其改派局长，都等于继续认可中东路原有的状态。纵使照张学良的意见，加上双方局长会签的规定，使双方在管理上实现权利均等，也离收回中东路管

理权乃至全部收回中东路的初衷相距甚远。德国外长的建议，终于让蒋介石看到了达成目的的一线曙光。因此，一直认为对苏交涉尚不到时机的蒋介石，接电后当即通知王正廷："准由德人居间调停。"[144]

经数日磋商，蒋作宾与德国外长于22日初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内容四点："（一）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由现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俄籍中东路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约》第六条规定。（二）双方立将五月一日后为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三）双方愿按照《中俄协约》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按：即中国有权赎回该路之规定），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四）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国代表会商决定。"[145] 这一解决办法以《中俄协约》为基础，而强调协约早已名存实亡，坚持中东路问题必须根本解决，是南京国民政府这时对苏交涉的基本策略。因此，该办法不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受。

26日，蒋作宾来电对所拟办法作出解释：南京对原提解决办法顾虑的关键，其实在第四条"现状"二字之解释，只要指明此"现状"是指纠纷发生后而言，若双方开议后俄不允赎路，我即可据此解释否认变更现状，结果自然可以继续管理该路。此点确定，则其他各条当不成问题[146]。对蒋作宾的解释，蒋介石表示满意，指示王正廷复电蒋作宾照此办理。27日，外交部正式通知张学良、阎锡山等有关政要：中俄交涉自地方接洽停顿后，现已经过德人从中斡旋，商定四项办法。王正廷并解释道：若开议后俄不允我赎路，我方可反对变更现状，"使理事会不能成立，局长亦不能委派，而现状一日不变更，我方即可继续管理"[147]。

然而，苏联方面并没有像南京方面希望的那样轻易就范。30日晚，王正廷得到蒋作宾转来苏联29日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不仅坚持任命新局长必须与中苏开始谈判的宣言一并发表生效，且要求苏方如需任命新局长，中方亦必须同时撤换中东路理事会的中方理事长，否

则须去掉局长前面的“新”字，一切恢复原状[148]。

苏方的态度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令蒋无法接受。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通过决议，要求蒋作宾继续接洽，力争苏联接受原案。王正廷因此声明：“国民政府不能发见何种理由撤换现任东路理事长。”[149] 9月6日，有外电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式发表声明，宣称：中苏交涉办法不照苏方意思修改不能再开谈判，苏方的让步条件是：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允换局长。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也从侧面作出反应称：外电所传恐有错误，实际上前此交涉中，经德国方面转述苏联方面的要求中，并无此项要求。而对苏联政府针对中德商定的办法所提修改意见，亦与德方此前所转述的意见不符。故中方怀疑苏方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150]。

9月19日，蒋作宾报来苏方答复意见称，苏方强调，苏联政府对中方提议解决办法之修改意见，乃绝对必要之最小限度的修正，且此修改均系依照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北京、奉天协定。故此修正案之实行为两国开议前之必要条件，亦是苏联政府始终所主张者。中国政府坚持否认苏联政府立即委派局长，不啻自行撤回其提议，而不欲以妥协方法解决争执。若因此导致冲突扩大，中国政府应负全责[151]。苏方这时的态度很明确：“苏联政府自始即主张恢复原状，而同意最低限度以中国委任中东路新理事长为委任俄籍新正、副局长之交换条件。倘令中国拒绝此最低限度之条件，即中国无和平解决冲突之意。”[152]

鉴于苏联方面坚不让步，列强各国又袖手旁观，再加上这时国内反蒋势力大有蜂拥而起之势，蒋急需张学良率部入关支持，被迫决定对苏让步。24日，蒋电告何成濬：“对俄外交决计让步结束矣。”[153] 注意到柏林交涉因德人居中转达，致使自己的判断发生误解，因此蒋介石一改过去坚决反对东北地方当局直接交涉的态度，在要求蒋作宾准备作出让步的同时，更试图再通过东北地方当局方面去与苏联接洽。要求外交部派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前往沈阳，授权东北地方当局直

接向苏联寻求和平解决，不必拘泥于中央交涉。但张学良此时也是束手无策，其复蒋电称："至俄事由东北直接交涉一节，由于边境战祸发生以来，交通阻绝，不但对方原任谈判之人早已遄返，无由接洽，即使函电传达，亦苦无法可通。所以实无术再事转圜。此事当初既由中央完全担任，已数月之久，彼外交当局对本案应付计划，自必筹之已熟，今虽有小波折，亦应别图良策，以善其后。"(154)

至此，中苏交涉再度陷入困境。尽管王正廷极力否认有所谓苏联政府通知各国驻莫斯科大使，经德国调停之交涉已告中止之说，但事实上，苏联方面确已不再通过柏林与中方进行接洽了。

三　中苏边境之战的爆发与收场

如前所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一直采用和平与武力相威胁的应对策略，7月17日宣布与中国断交后更是重点转向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准备。自19日起，苏军便开始采取一些零散的试探性的军事行动。8月6日，根据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苏联决定将当时驻扎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合并组成"特种远东军"，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布留赫尔（加仑将军）为司令，主要兵力由三个步兵师增加到五个。11日，苏军越过边境线，在满洲里与东北军激战两小时，迫使东北军后撤。12日，苏军三百余人在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又向松花江边的绥东县发起进攻，占领兆兴镇。13日，苏军与东北军在兆兴镇激战5小时，继而占领满洲里附近的闹尔屯。14日，东线苏军占领密山。苏军的凌厉攻势，有效促使蒋介石于18日批准了蒋作宾"准由德人居间调停"的提议。

9月下旬柏林交涉中止后，中苏围绕中东路的冲突继续升级，苏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边境的军事示威行动。10月初，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联领事馆案，更是最终引发了苏军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连续不断的大规模进攻。10月12日，同江战役爆发。苏军大举出动，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

全军覆没，苏军夺取同江县城，中国守军被迫退守富锦。对于苏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除了推动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外，几乎帮不了备受苏军打击、损兵折将的张学良什么忙，而其自身因受到张发奎、俞作柏、李明瑞、唐生智，乃至冯玉祥等部联合反蒋势力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向张学良索要重炮营以为奥援。这种情况连蒋介石自己也觉良心不安了，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三解释说："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与德国斡旋之计，均置之不理，且声言概不承认与德国有所接洽云。如此情状，我方求速，而敌方反益延缓，使我前方将士与东北同志困难倍增，此心歉然，莫可名状。"但又说："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长，不能速了。"表示这是他不能不请张学良帮助的原因所在[155]。

苏联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蒋介石一直不甘示弱，苏方恢复中东路原状的目标未能达成。为改变其被动应付局面，掌握战略主动权，认为有必要加大军事逼和的力度；二是国际、国内时机对苏有利。这年10月，苏英宣布复交，西线已无后顾之忧。而东西方各大国特别是日本又明显表现无意直接介入苏中冲突。在国内则素主对华强硬的斯大林取得了党内斗争的胜利，有助于联共（布）统一事权，集中指挥，协调行动，为军事行动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156]。就其打击对手而言，主要是让苏联看到了蒋介石此时已陷入列强袖手旁观、内部反蒋烽火连天的难以招架的困境，对苏联取胜十分有利。蒋介石虽然再三催促外交部抓紧寻求解套办法，可王正廷也表示无计可施。他在21日电告张学良：德国出任调停一层已被俄拒绝，中央亦无法可想，东北应设法自了。随即，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通告中俄交涉破裂的情况，希望各国能够提供帮助和意见，但各国政府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态度依然如故，相信中苏两国可以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

10月30日，已后撤的苏军再度进占同江县城，并派海陆空军侵入

富锦江岸，于当晚夺占富锦县城。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又大举展开进攻，兵分东西两路，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据张学良报告：“十七晨敌飞机廿七架，联合步骑炮兵三万余人，坦克车二十余辆，向满洲里、札兰【扎赉】诺尔同时进攻。”[157] 19日，扎赉诺尔失守，守军第十七旅七千余人损失“逾三分之二”，旅长韩光第战死[158]。20日，苏军攻占边境重镇满洲里，东北军旅长梁忠甲及所部数千人尽为苏军俘虏。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苏军此次大举进攻，仅几天时间，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扎赉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在苏军进攻下，东北军军心动摇，战线崩溃，士兵们成排成连地缴械投降，极大地打击了东北军的士气，动摇了东北边防。对此，南京国民政府除要求驻外各公使向列强各国通报苏联侵略情形，并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出控诉，要求各国共同制裁苏联外，只剩下转托德国政府照会苏联，要求苏方顾念《非战公约》规定，接受中方建议，各自从边界后退军队三十英里之一着可想[159]。

当然，张学良对南京方面的努力已不抱希望。还在海拉尔沦陷前，张学良就已经命令蔡运陞立即设法与苏方人员进行接触，谋求东北地方与苏联方面直接交涉。20日，蔡经过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库库林和聂嘉夫向苏联当局递交了一封正式文件，声称希望立即开始就中苏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当日，库库林前往海参崴，得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复函于25日返回哈尔滨。苏联政府条件依旧：（一）中方承认根据俄中协定恢复东省冲突以前之状态。（二）对于苏联方面根据协定所推荐之正副局长，即行恢复其职权。（三）因纠纷逮捕的苏联人员即行悉数释放。苏联方面并声明，中方对8月29日由德国转达之先决条件未履行前，不能开始谈判。张学良27日电告阎锡山和何成濬称：得此复函后，“良即召集寅僚从长讨论，佥以认外

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东省人死万余，财产损失约数万万，不能不设法了结。良查蒋主席暨外部从前均有电来指定三策，令由地方自了，遂于宥日致电俄外部，对前项三条件大体同意”。据此，张学良还直接去电蒋介石，要求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缓提国联”，以免节外生枝[(160)]。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直接接触，蒋介石曾大表不满：“晚接汉卿电，已与苏俄直接交涉，声明仍请中央委任交涉人员。惟昨日决议以暴俄侵略中东路，满洲里与札兰【扎赉】诺尔事，通告非战公约国与联盟会，而奉天则直接与之谈判，如此大事，政出两歧，惹笑中外，惟汉卿电俄措词尚含混，未得谓之完全屈服，然其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致四月辛苦，尽付东流为可惜也。”[(161)] 但蒋和南京方面并没有办法处理此一问题，只能任由东北方面与苏联谈判。28日，莫斯科公布了张学良同意接受苏方先决条件以开谈判与苏方的来往信件。对此，外交部只能矢口否认外电关于东北当局已经承诺恢复中东路原状的说法，但它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莫斯科公布的消息亦并非全无根据。其29日分别电告各公使，解释说：“俄事近由辽宁与俄商洽，昨已接有张长官详细报告，惟商洽内容与中央意旨相合。”“俄事如能直接交涉固中国政府所深望。”东北方面“如与喀氏有所商洽，在张长官答复范围内自不妨酌量进行”。且“最近俄向辽宁提议三条仍不外喀氏主张，已由张长官答复，可由彼推荐正副局长，余待会议解决”[(162)]。

12月4日，莫斯科传出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就双方开始谈判一事签署的会议纪要，其中主要的妥协就是：蔡运陞代表东北当局宣布中东路理事会理事长吕荣寰撤职；西门诺夫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在吕荣寰撤职后，苏联政府将推荐新正副局长以代替原正副局长，惟保留委派原正副局长任中东路其他职务的权利。双方约定在共同遵守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中苏之间围绕着中东路所发生的一切冲突[(163)]。对此，东北当局很快即予证实，并声称南

京中央已经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而外交部却仍旧再三对外表示尚未接到报告。实际上，王正廷一直在暗中与张学良密切联络。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所以会将苏方原提第二条内容，即苏联原正副局长恢复职务，改为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推荐新正副局长，就是外交部坚持苏联原局长复职一节“关系重大，实难迁就”的结果[164]。

6日，张学良正式致电李维诺夫，对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商洽的结果，表示同意。他同时亦向南京方面作了通报，说明双方代表已达成解决办法三项，即：（一）中东路由苏方重新推举正副局长，并保证旧局长任该路他职；（二）责任问题由双方派员调查，无须第三国参加；（三）中苏纠纷由中苏双方会议解决，请国府决定并派大员正式谈判。张坚信：“如此解决既不背中央迭电饬办之意旨，而默察内外大势均非迅速自了无以善后。”故他已自行决定，派蔡为代表，与俄代表定期开议，讨论各项实行以及关于正式会议各问题[165]。次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三院长及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讨论张学良6日致李维诺夫电，对俄事如此解决虽不能满意，但亦承认在此时只能忍痛，故决定对张电意见完全采纳。

随着7日吕荣寰被免职，中苏预备会议得以召开。21日，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了预备会议记录。其要点为：（一）恢复1929年7月10日以前中东铁路状态；（二）双方释放自5月27日以后拘捕的对方国家的人民，苏方释放被俘的中方官兵；（三）恢复7月10日以后一切被革除的苏籍员工及雇员的职务，并补发欠薪，同时革除冲突期间雇用的白俄人员；（四）立即解散白俄武装并将其组织者驱逐出东三省；（五）立即在东三省恢复苏领馆，并在苏联远东各处恢复中国领馆，东北当局保证予苏联领馆以按照国际公法和习惯所应享有之权利，中俄全面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问题留待中苏会议讨论；（六）立即恢复东三省境内所有苏联商业机关，两国全部之商业关系待中苏会议讨论；（七）切实保障遵守协议与双方利益之问题留待中苏会谈中解决；（八）中苏会谈将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开议；（九）

双方下令撤兵并恢复边境和平[166]。

26日，蔡运陞携苏联新任中东路管理局正副局长回到哈尔滨。随即于次日赶到沈阳，28日见了张学良。东北政务委员会30日发表任命莫德惠为中东路督办，次日苏新任局长回到哈尔滨，经理事会正式任命后，开始到局视事。双方当天分别开始公开释放被拘和被俘人员，中东路管理权之争至此告一段落。1930年1月1日，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到沈阳谒见了张学良，双方声明两国军队同时开始撤兵。中苏之间因中东路问题所发生的军事冲突，至此亦告停止。

然而，随着伯力中苏预备会议草签记录稿送至南京，国民党高层中原本就对张学良的妥协处置有所不满的党政要员立即开始发难。孙科公开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演中主张根本否认伯力会议所签草约的效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更通过决议，决定不承认伯力会议草约。王正廷据此电告张学良，伯力会议草约超越范围，必须修正。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既无力改变战败的现实，又不能真正对张学良形成约束，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对俄外交，决取强硬态度，拟决议以蔡允【运】升逾越职权且辱使命，故伯力协定书不得批准。惟中东路问题，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准其派员赴俄交涉，但中东路以外，如通商、复使领馆等问题，是为中俄复交问题，不在中东路范围之内。当俟苏俄派全权代表来中央直接交涉，方得解决也。否则虽至决裂，或张作相反抗时，亦必坚持到底，以保革命威信也。"[167] 虽然表面坚持所谓"强硬"，但同意张学良全权办理交涉，实际是对已有结果的承认，再次谈判更多是为维护中央权威而作的一种姿态而已。2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据此发表宣言，一方面提出伯力协定内容有"中国代表无权讨论者，中国代表实属超越权限"；同时又肯定"伯力记录中关于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业已实行"，表明并无改变现状的意图，只是要求两国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168]。

始料未及的是，外交部发表宣言不过两天时间，阎锡山竟揭旗反

蒋。随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各反蒋势力一致携手，另立国民政府，并推举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而引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双方各自动员了上百万兵力的大规模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半年时间，直到10月底才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受此影响，中苏正式会议只好一再推迟，直至10月11日才得以正式举行。而基于双方在对伯力会议草约问题上各持己见，会谈刚开即告停顿。而后虽两度复开，仍拖数月而无结果。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于日本之手，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方面此后再没有机会就中东路事件的善后问题进行谈判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北，赎路问题成为悬案。随着日本侵略威胁的加剧，两国复交问题成为中苏之间亟待商讨的问题。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联即通过莫德惠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恢复邦交，表示：“现今日本觊觎满蒙，国境方面中日紧张。当此时机，中国政府何不重订对苏对日政策，采对俄亲善方针而使本国能专心对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国之对日实力必占优势，而造福于今日之中国。”(169) 对此，南京国民政府虽屡经讨论，终以双方意识形态不同，拒绝苏方提议，断言：“苏俄对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国。苏俄狡猾，断无轻弃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对莫代表所转告之各种建议，我绝不许可，并应予以反驳。”(170) 9月底，为应对“九一八”事变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在此问题上开始采取弹性态度，强调：“对俄复交事可进行但不必立刻实行，以保留与欧美交涉之作用并为有条件之交涉。”(171) 此后，由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益判断的变化，中俄关系曲折发展，但总体上开始向着缓和的方向迈进。

---

(1)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第283页。

(2) 《详述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之事实》（1927年4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第309页。

(3) 《女界对英兵暴行之愤激》，《申报》，1927年6月5日。

(4) 《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传大纲》，《申报》，1927年6月14日。

(5)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6) *FRUS*，1927，Vol．2，pp．224-226；转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7) 《戴伟士致凯洛格》（1927年5月3日）；转见伯纳德·科尔著、高志凯等译《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8)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的声明》（1927年5月9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05—406页。

(9) 英国外交档案，FO，371/13169；转引自申晓云《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10) 《蒋介石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词》，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11)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514页。

(12)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发表的对外宣言》，《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3—414页。

(13)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关于解决南京事件致美驻华公使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6—417页。

(14)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复外交部长黄郛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8页。

(15)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致美使马慕瑞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9页。

(16)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复外交部长黄郛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20页。

(17) 《国民政府拟：国防计划与外交政策，1929年4月》，《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5页。

(18) 《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25页。

(19)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复外交部长黄郛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20页。

(2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Mac-Murray*），FRUS，1928，Vol．2，pp．190-191．转见仇华飞《美国与中国关税自主》，《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21) 《南京国民政府赞同加入非战公约致美驻华代办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54—455页。

(22)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第262页。

(23) 《时事新报》，1927年10月1日。

(24) 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11日。

(25)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26)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第511页。

(27) 伯纳德·科尔著、高志凯等译：《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第136页。

(28) 《外交部长黄郛为日本出兵山东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照会》（1928年4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0页。

(29)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日本出兵山东事件之应付方案》，《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30) 《蒋中正电黄郛田中必助奉拟请张群赴日与其面说不碍北伐不损国权》（1928年4月26日），蒋中正档案002020100020007，台北“国史馆”藏。

(31) 《蒋总司令令各军对日本勿使冲突电》（1928年4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4页。

(32)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济南五三惨案》，台北正中书局

1978年版，第2页。

(33)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3日。

(34) 《谭延闿、张人杰、蔡元培致蒋介石告以中央对济方针电》（1928年5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7页。

(35) 《蒋介石为改道北伐致日军师团长福田函，1928年5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7页。

(36) 沈亦云：《亦云回忆》下，第369页。

(37)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济南惨案记录》，1928年6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38)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日军在济南启衅通告国际联盟秘书长要求国际调查公断电》，1928年5月1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39页。

(39) 《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0) 《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五三惨案宣传大纲》，《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1) 《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五三惨案宣传方略》，《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2) 《全国反日会昨日之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7月27日。

(43) 《反日民意测验结果》，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月6日。

(44) 《行政院为报告济案交涉情形的呈文》（1929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08—309页。

(45) 《济南惨案死伤及财务损失统计表》，《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43—447页。

(46) 《电冯玉祥》（1929年3月2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311页。

(4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13期，1929年

4月7日。

(48)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2日。

(49) 《国民政府拟：国防计划与外交政策》（1929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3页。

(50) 《东方杂志》第26卷第21期，1929年6月10日；参见李恩涵《九·一八事变前中英撤废临时裁判权的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8年版，第160页。

(51) 《国民政府为增加关税暂缓的布告》（1927年8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10页。

(52) 参见洪钧培著《国民政府外交史》，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235页。

(53) 《统一告成国民政府对外宣言》（1928年6月7日），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中正书局1983年版，第435—436页。

(54) 《国民政府废除旧约宣言》（1928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3—34页。

(55)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3号，第132、133页。

(56) 《何应钦等为请厉行“革命外交”的呈文》（1928年7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5—40页。

(57) 《粤政会复李宗仁电》，《申报》，1928年7月25日。

(58) 《关于外交问题提案》（1928年8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3页。

(59) 陈德征：《废约特刊弁言》，《申报》，1928年9月13日。

(60) 《市训练部民意测验总报告》，《申报》，1929年4月14日。

(61) 《马慕瑞转达美国务卿关于与中国缔订关税条约照会王正廷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1页。

(62) 《美使对修约之表示》，《申报》1928年7月13日。

(63) 《马慕瑞转达美国务卿关于与中国缔订关税条约照会王正廷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2页。

(64) 《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76页。

(65)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复美国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7月28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77页。

(66) 《中央日报》，1928年7月27日。

(67) 蒋介石日记，1928年7月25日。

(68)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许琳菲、孙善豪译《德国外交档案——1928至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年版，第16页。

(69)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修约问题致法国驻华代办照会》（1928年7月3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60页。

(70)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4号，第114—115页。

(71) 《中英关税条约》（1928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80页。

(72)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4号，第115—116页。

(73) 《日本驻华公使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节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64页。

(74)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日本驻华公使节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66页。

(75) 《矢田七太郎致田中义一》（1928年7月30日），《日本外交文书》，第638—640页，转引自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76) 《芳泽谦吉致田中义一》（1928年8月18日），《日本外交文书》，第655—657页。

(7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98—805页。

(78) 《二中全会第二日会议》，《申报》，1929年4月15日。

(79) 国民政府训令，第503号，1929年。

(80) 外交部王正廷呈行政院文，1929年11月16日。

(81) 《中比友好通商条约》及附件（1928年11月22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642—643页。

(82)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04—505页。

(83)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10—513页。

(8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27期，1929年7月14日。

(85) 《国民政府令》（1929年12月28日），《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案》，国民政府外交部1931年编印，第2页。

(86) 《美国国务院致中国公使馆》（1929年12月28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9年第2卷，华盛顿1943年版，第666页。转引自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87) 《领判权问题中英互换牒文》，《申报》，1930年1月4日。

(88) 《外交部关于废约的宣言》（1929年12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2—53页。

(89) 转引自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196—197页。

(90) 《法权谈判停顿》，《申报》，1931年5月5日。

(91)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行政院函，第4510号，1931年。

(92) 《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公报》第963号，第1页。

(93) 转见李恩涵《九一八事变前中美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6年版，第368页。

(94)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87—488页。

(95) 《收回威海卫案》，《申报》，1930年4月20日。

(96)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93—499页。

(97)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99—503页。

(98)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136页。

(99)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09页。

(100) 《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26页。

(101) 蒋介石日记，1928年8月1日。

(102) 《古应芬致蒋主席电》（1929年5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第2册，总112号。

(103) 《国民政府拟：国防计划与外交政策》（1929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6页。

(104)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2日。

(105) Покуменмц внешней пощмики СССР．Т．R．Mockba 1967．c．490．转引自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校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46页。

(106) 《夏维崧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6月1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36页。

(107) 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8页。

(108) 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7页。

(109) 《致张景惠吕荣寰电》（1929年6月6日），《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191页。

(110)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10日。

(111)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10日。

(112) 《吕荣寰之宣言及布告》，《申报》，1929年7月13日。

(113) 《苏俄通牒原文》，《申报》，1929年7月18日。

(114)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7月1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18045171。

(115) 《外部昨电令驻俄代办转达中国对苏俄希望》，《大公报》，1929年7月17日。

(116) 《苏俄绝交牒文》，《大公报》，1929年7月19日。

(117) 《苏俄昨宣布对华绝交》，《大公报》，1929年7月19日。

(118)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18日。

(119) 《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7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9页。

(120) 《国府公布苏俄扰乱中国证据》，《申报》，1929年7月20日。

(121)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40—545页。

(122) 《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自沈阳报告苏联政府调动军队迫近满洲里、绥芬等处请中央预定方策电》（192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初版，第221页。

(123) 《蒋介石致张汉卿电》（1929年7月20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32 - 35页。

(124) 《美国建议调解中俄争端以后》，《大公报》，1929年7月22日。

(125)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21日。

(1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20页。

(127) 《外交部致驻各国公使电》（1929年7月21日）；《外交部致驻英国陈代办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 - 09，0175，1836。

(128) 上海《时报》，1929年7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3号，1929年7月。转引自《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66页。

(129) 《柏林蒋作宾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39页。

(130) 《南京赵部长致太原阎总司令电》（1929年7月2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36 - 2138。

(131) 《南京赵部长致太原阎总司令电》（1929年7月2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34 - 2135。

(132) 《呈国民政府电》，《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214页。

(133) 《张学良、张作相致蒋介石电》（1929年7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51页。

(134)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27日。

(135) 《蒋主席致张学良司令长官指示对俄交涉应注意事项对喀拉罕提议改正各条文电》（1929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0 - 241页。

(136)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自沈阳报告业将所定三条原文用个人名义函达喀拉罕电》（1929年7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1页。

(137) 《蒋主席致张学良司令长官指示致喀拉罕原文三条之外附件不可加入电》（1929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2页。

(138) 《王正廷致张学良电》（1929年8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2 - 73页。

(139) 《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7，82 - 84页。

(140) 《蒋介石致北平何成濬军长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6页。

(141) 《蒋王会议主收回管理权》，《大公报》，1929年8月15日。

(142) 蒋介石日记，1929年8月14日。

(143)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89页。

(144) 蒋介石日记，1929年8月18日。

(145) 《蒋作宾致介石电》（1929年8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97页。

(146) 《上海宋子良译呈蒋主席电》（1929年8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3页。

(147) 《外部对俄宣言全文》，《大公报》，1929年10月26日三版；《南京外交部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8月27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18 - 2220。

(148) 《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29年8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4页；《苏俄所改宣言内容》，《大公报》，1929年9月1日。

(149) 《王正廷声明否认妥协》，《大公报》，1929年9月2日。

(150) 转见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180378。

(151) 《蒋作宾致王正廷电》（1929年9月1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

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11页。

(152) 韩信夫、姜克夫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9页。

(153) 转见《何成濬致阎锡山电》（1929年9月2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50。

(154) 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第401页。

(155)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8页。

(156) 参见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53页。

(157) 《赤军蹂躏满札等处》，《申报》，1929年11月21日。

(158) 《张学良电告满札失陷经过》，《申报》，1929年11月26日。

(159) 《外部方对俄提议调查，忽传已承认恢复原状》，《大公报》，1929年11月29日。

(160) 《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1月27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96 - 2297；《张学良致何主任电》（1929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18936218。

(161)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27日。

(162) 《外交部电》（1929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 - 09，0299，0301。

(163) 《蔡运陞回辽复命》，《大公报》，1929年12月5日。

(164) 《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2月1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314 - 2315。

(165) 《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2月1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314 - 2315。

(166) 《中俄议定书内容》，《申报》，1929年12月25日。

(167)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31日。

(168) 《外部发表对俄宣言》，《申报》，1930年2月9日。

(169) 《东北政治委员会致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电》

（1931年7月6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1.0.5；转见鹿锡俊《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70) 《刘尚清致张学良等电》（1931年7月9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6.1.0.5。

(171)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1次会议记录》（1931年9月30日），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杯葛与争战

第一节　反蒋派自立门户和“人权派”的集结

一　第三党倡言“平民革命”

国共分裂后，一些参加过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突遭惨败的震惊之下，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不满意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对政权的垄断及其内外政策，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同时又从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得出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错误结论，主张走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1927年革命失败前夕，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和共产党个别领导人之间，就曾有解散共产党，再次改组国民党，另组第三党的酝酿。这个主张被中共拒绝。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去苏联，后又到欧洲考察。1927年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该会的职责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 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组织。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第三党形成后最早采用的名称。该党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归国。8月召开十个省区负责干部会议，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通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的决议。邓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该党经过一番整顿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第三党积极进行反蒋活动，特别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政治主张》是第三党的纲领文件。它的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它所规定的对外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新约；在“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前提下，与苏联恢复邦交；同各弱小民族结成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是：改良工人的生活，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罢工的权利，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第三党十分注意农民的土地问题。它的土地政策是：“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是：由国民会议制定土地法，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国家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有土地和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同时将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将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第三党提出了进行“平民革命”和建立“平民政权”的主张，具体怎样进行呢？它的领导人设计的基本方案是：被压迫人民经过各种职业（农工商业）及准职业（学生、妇女、兵士、警察等）团体团结起来，“自动去开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2)]。但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统治面前，要实现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的。邓演达也曾提出建立“平民革命军”的问题，但他并不是从革命群众中去建立，而是寄希望于那些“潜伏在国民革命军内面而忠实于农工平民大众的分子，必然的能了解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而与新起

来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装——平民革命军”[3]。也就是说要凭借邓演达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把蒋军军官拉过来，去组织“平民革命军”。

值得注意的是，邓演达一生对于孙中山及其思想表现得比较审慎，很少长篇大论，从他不多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待孙中山思想采取了一定的扬弃态度。

邓演达在公开场合始终坚持三民主义的立场。1927年7月他发表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这是大革命失败前他的唯一一篇专门谈论三民主义的文章，其中提出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他的理论是完全具体在孙总理所手著的三民主义上面”。“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4]。“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到了莫斯科，发表宣言，坚持三民主义立场，并因此而与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产生了分歧。由此可见，他拥护孙中山的政治态度是明确的。他自称是“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并将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奋斗目标。1930年9月，他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全是适应上述的环境（按：指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而生的产物。”表示“我们的争斗目的，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5]。但对当时有些人不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实含义，依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胡乱解释的现象相当不以为然。1929年3月间，他给季方与严重的私人信件中，曾经表露了自己的基本态度。他说：“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以为愈少愈好，因为多则有冲突及附会的嫌疑和误会。”[6] 而在给严重的信中，则更为尖锐地说：“中国只有保守主义和前进主义（革命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已经变成《太上感应篇》和三姑六婆的符咒，你来信还要引它，这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无聊。”[7] 回国以后，邓演达在提到孙中山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回避三民主义这个称呼，而改称为“革命的孙中山主义”，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显然，他对于三民主义的冷淡，主要是针对当时国民党

统治集团将三民主义庸俗化而发。

在国情的分析上，邓与孙中山的估计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将来的发展方向的预测也基本相同。从根本上说，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是复杂的，中国社会一切问题源于封建专制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互相勾结，以及中国经济上的落后贫穷。孙中山投身于革命后，一直坚持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将“国穷民贫”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他以为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极不明显，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是求得民族解放、民权实施、民生幸福的国民革命。晚年，他更明确地提出：“吾党主义，析言之固为民族、民权、民生；至其致用，实是一个整的，而非三个分的。”(8) 孙中山的上述观点，对邓演达坚持三民主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30年9月，邓演达撰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一文，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9)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邓演达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也有自己的特点。商业资本带有寄生的高利贷性质，受官僚资本及军阀政权的“保护”，很难承担民族解放与工业革命的双重任务。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由于无地或缺乏土地，深受地主的剥削，同时又承受着来自国家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之下，农村经济趋于破产，广大的农民面临着背井离乡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政治权力更是无从说起。而工人及店员等来自于农村，他们工资极低，还面临失业的危险。另外，自由职业者与教育工作者的生活也是不稳定的，且

薪水不足。上述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形成一个“平民的阶级”，有着强烈的要求解放的愿望。这个阶级在求自身解放的同时，还负有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责任。所以，又称为民族的平民阶级。其中工农所受的压迫又较其他人为深且重，所以成为领导核心。

邓演达关于“平民阶级”的界定，模糊被剥削了的各个阶级各自具有的特性。他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以至与中小资产阶级一视同仁，从而和孙中山关于“大贫”、“小贫”的认识相近。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共产主义的理论只适合西方发达国家。

在土地问题上，邓演达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也无二致。邓演达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强调两个原则：第一，反对采取无条件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法。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共发动的土地革命，邓演达不以为然。他认为共产党使用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只是一种极端情感的爆发，带有无政府主义者“否定”的色彩。他认为经济制度的转移，单纯地用消灭的方式是难以奏效的。“要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进展”[(10)]。尤其在中国，以小农制度为主，农村内部相当复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集中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简单地没收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结构，会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

其次，“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必须由革命的政权机关去实行”[(11)]。对于土地耕者所有的实施，邓演达设想是在平民掌握政权以后，由省、市、县、乡各级会议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与管理，着重运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没收的方式。所谓政治的手段，就是平民掌握了政权后，使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实际上，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土地问题或“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最终因为平民政权没有建立而停在口头上。

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导致了中国农业的破产，抑制了民族

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还使中国的内战加剧。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说明，他们不会允许中国强大，不会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乐于培养与自己竞争的力量。二是现代世界的技术发展，已经不可与英、美、法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比，中国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

因此，邓演达于1927年8月在莫斯科发表的一份宣言中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12)]。同时并存的三种革命，是由三种革命对象同时并存决定的。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于前两者而生的高利贷盘剥的资产阶级。三民主义因此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演达根据自己的认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经由“平民”政府实现直接民权。中国国民党在《一大宣言》中宣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13)] 1924年“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北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即由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直系的各军，以及各政党选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建立一个各阶级各阶层联合的政府以取代军阀政权。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有识之士的支持，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孙中山的民权思想，由此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即由过去所设想的建国三程序，转向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初步思考。孙中山过早地离去，他的设想失去了深化的

机会。可以说，邓演达发展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

邓演达认为只有广大的人民直接投身于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在1930年提出："政治制度是政治争斗的结晶"，"如果不是有强大的群众，强大的争斗力量，代表着被压迫者的要求去反抗统治者，则决不会有民主政治"[(14)]。因此，平民组织的组成应该是在斗争的最初，而不是在斗争以后。改变政治制度的革命，必然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发动组织群众的同时，也要武装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

其次，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是孙中山从开始提出三民主义时就已经明确的。邓演达接受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上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强调了下述的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节制资本"，他突出了"以集体的力量构成'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一面使生产力加速度的发展，一面使分配向平均的路途——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15)]。具体地说，平民政权应运用手中的权力，掌握一切关键产业（比如钢铁、机器、造船等行业），特别是独占性的产业（如铁路、运输、开矿等），使之由国家专营，从而利润完全由国家掌握而不被私人瓜分，以有利于从事有计划的生产。因此，平民政权下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集中调控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首要的是重要产业集中于国家。同时，邓演达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认为与土地的小农所有制要存在一段时间一样，工商业的小私有企业也将存在一个时期，国家将利用自己拥有的集中的金融机关和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进行干涉，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膨胀，并逐步将它们导向社会化。邓给予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比孙中山的设计要狭窄得多。

再次，他将反帝的民族主义糅入民生主义之中，主张收回外资银行和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基础。他认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

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一切产业机关由极少数的大银行控制，国家政策也由大金融家支配，他们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支配人们的生活。作为落后的中国，国内的金融机关部分被封建的钱庄和当铺掌握，另一些则受制于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因此平民政权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机关，必须分别收回，以构成国有金融机关的基础”[16]。

从孙中山逝世到邓演达被杀，前后不过六年的时间，然而，中国政治和社会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北洋军阀的统治被推翻；国共分手；国民党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并将中国引向一个所谓“党治”的时代，在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旗帜下建构了新军阀的独裁统治。要在这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认清形势，理顺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演达在这个时段，运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为方法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参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规划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远景；最终以孙中山晚年的激进思想，也可以说是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内核。他的政论既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又结合现实斗争有所创新。

由于邓演达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被蒋介石视作眼中钉。1931年8月邓被逮捕，11月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的遇害，使第三党受到极大打击。此后第三党的成员，除一部分投靠蒋介石外，其他人继续坚持斗争，但在蒋介石高压政策下，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圈子内进行隐蔽的活动。

二　“改组派”以“改组”国民党相号召

“改组派”的全称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一个时间短暂的国民党内部的在野反对派。它由国民党二届中委陈公博发起成立于1928年冬，其中央总部设于上海，以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郭春涛为中央“常委”，王乐平负责“组织兼上海指委”，潘云超负责“训练”，朱霁青负责“民运”，顾孟馀负责“宣

传”，施存统任“秘书长”（后改梅哲之）[17]。地方支部遍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七八个省市及法国、日本、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员达一万余人。1931年1月自行宣布解散。

陈公博这时为什么发起成立“改组同志会”？1928年5月他在上海办《革命评论》杂志时，曾公开说过：“第一，凡一个党，尤其是革命党，经过若干的期间，必须检阅和另定新的训练方法。中国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到了十七年，已是五年，非重新检阅，必将腐化。何况中国国民党经过汉、宁的分立，若不再提出新的纲领，必将不适社会革命的要求。第二，党经破碎以后，必须另定团结方法，但经过这几年斗争，谁也有过磨擦的历史，骤然空泛的说团结么，过去的历史，谁也不能忘，如西山会议派哪，大同盟哪（按：即山东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主持者为丁惟汾、路友宇等），新中哪（按：即河北的“新中革命青年社”，主持者为童冠贤、马洗凡等），实践哪（按：即河北的“中山主义实践社”，主持者为李寿庸、许孝炎等），（参）加过共产党的分子哪。虽然各人或者有痛苦的经验而感觉非再度共同奋斗不可，但要洗去过去的痕迹，非得改组而有新的纲领不为功。第三，过去共产分子有组织，右派的分子有组织，蒋系的分子有组织，独是左派有空的名义而无实的集团。若党内无问题，有没有组织，影响不深，可是蒋中正的罪恶，日益暴露，非有组织，无论宣传政治、军事种种运动，都感觉不能一致。因为要倒蒋，更非有组织不行。”[18] 陈在这里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声明他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是为了“检阅”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历史经验，提出“新的纲领”，以适应“社会革命的要求”；二是要通过组建新的组织，使国民党人忘了以往党内分裂的“痛苦”经历，重新“团结”起来，“再度共同奋斗”；第三是为了“倒蒋”，要“倒蒋”，非有组织不行。前两条都是官样文章，惟有最后这条说了真话，“倒蒋”才是他们成立“改组同志会”的真正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推翻垄断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的统治。

“改组派”的成分十分复杂，上层分子皆为国民党二届中委，几乎都进入了“改组派”的中央领导层，尤其是汪精卫，更被拥为领袖。一般人称其为汪派，而他们自诩为国民党“左派”，其实大多是些不甘忍受蒋介石权力集团的排挤，而自认为可与之相抗衡的国民党要人。他们试图利用二届中委的特殊身份，通过“改组”国民党的途径，否认蒋介石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另行筹备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捍卫自己的合法的“党统”地位。至于下层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蒋介石“清党”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真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无辜者，二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严重不满，而又不乐于接受中共的革命政策，曾经投身过国民革命的人士，这两部分人皆以青年学生居多。总的说来，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改组派基本是个书生集团。对此，汪精卫等人不无遗憾地说过：“他们是书生，懂党，认识主义，倒不一定于登台时会治国的。”[19]

1928年五六月，陈公博、顾孟馀在上海先后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宣传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提出：“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窃，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窜改……”[20] 国民党党员堕落有之，失望有之，组织小团体有之，投靠第三党有之，加入共产党有之，整个的党支离破碎，只有招牌，而无“灵魂”，国民党已到了不得不改组的地步。如何改组国民党呢？陈公博提出：要“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促现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人的独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21]。施存统著专文论述“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主张复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的”国民党[22]。其政见则体现在汪精卫在《夹攻中之奋斗》中所说的既反共又反蒋上。

为了改组国民党，他们以为首先必须正本清源，端正党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中共的介入以及右派的反动，将国民党的理论，尤其是

三民主义思想搞得很混乱，具体表现在：一、国民革命的真正涵义模糊不清；二、国民党的政策除三大政策外仿佛别无政策；三、国民革命的方法除中共的群众运动以外，就是军事发展，别无他法；四、国民党究竟以谁为基础，是否要阶级斗争，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究竟有几条？如此等等都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否则“理论愈辩而愈模糊，政治愈动摇而愈空幻，如果非重新建设一种理论，必无以巩固党基，更非在统一理论之下，将党重新改组，必不能领导整个的中国国民革命”[23]。“改组派”上述观点理直气壮又似是而非。他们自己尚且理论混乱、组织散漫，又何来“改组”国民党的能力？不过这些声明的确代表了当时寄希望于国民党的一些人的想法——找寻一条既不同于中共发动群众又不同于国民党高层统治军事挞伐的“国民革命”的道路。

其次，要求恢复党的民众基础。他们以为国民党以工农小市民或工农小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但是，现在国民党差不多没有了民众的基础。施存统以下这段话道出了中产阶级对南京政权的失望：“国民党不但没有给予民众一点利益，没有解除民众一点痛苦，而且有些地方因为恐怖共产党而恐怖民众压迫民众，摧残民众了！民众运动下令停止或禁止了！政纲上明白规定的初步的政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实际上也被剥夺了！许多腐化分子把持了党，不许革命的民众入党了！”他们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在分共的同时，将民众也分给了中共。这样的结果，导致“一个是对于国民党的反抗性，一个是消失国民党的革命性”[24]。

对如何重塑工农小市民的基础，“改组派”作了一些设想。陈公博提出在国民党的组织中，增加工农的成分，同时，国民党应该有一个工农业发展的计划，晓谕工农，使之与党“同心同德”。另外还要恢复民众组织，开展民众运动，包括建构工会、农会和商会等民众组织。他关于恢复农工运动的纲领有如下特点：第一，将工会、农协置于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第二，调和劳资之间的关系，做到“泯除三个阶级（指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会生产的一员”[25]

；第三，以职业组织的方式，部分奠定全民革命的基础。“改组派”认为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公道的，但他们的所谓“严切指导”不免有“利用工农”之嫌，而其调和政策只是空口白话，所以需要上述设想来完善。

第三，“党的统一”是“改组派”的最强呼声。他们舍不得扔掉的国民党支离破碎不可名状。尽管施存统和陈公博一个认为国民党不断地清党，把革命的分子清洗了出去，以至于目前质变，另一个则认为由于中共的把持，使国民党各地组织涣散，但是，他们一致批评小组织林立，意气之争取代了“党性”的现象，提出打破一切一切的小组织，除了党的改组，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要求实现“党的专政”，做到“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改组派”和胡汉民虽然存在政见分歧，但在“党的专政”、“以党治国”、“党外无党”一类的政治设计上是互相靠近的。这类设计是他们试图抑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一件武器。

最后，他们以为党的专政，还必须真正树立党的权威。党内以中央党部为首，不能受地方政府的压迫。他们以政治会议为例，以为政治会议本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但现在却在中央党部之上。政治会议与各地方政治分会都应该撤消。政府要接受党的政策。中央之政务官应当选择有奋斗历史的党员担任。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听从党部的指导。各级党部对于各级政府有最小限度之监督权以对抗军权。更为重要的是实行“以党治军”。目前应该确定党部与政府、军队间的界限，限制军队、政府干涉党务。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中央应随时互相调换军事长官；不设置军区长，由中央指定驻军地点与数额并可随时换防；军人不得干预党务，不得任地方党部委员等，从而达到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目的。颇有意味的是，他们的这种设计不仅指向了蒋介石，也指向同样强调党权、党义的胡汉民。他们企图将胡依托于政治会议的党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陈公博等人的“改组”主张问世后，立刻受到了舆论的关注。面对怀有各种反蒋动机要求将“改组”付之于行动的人，陈公博却推诿

说："没有革命的基层干部，改组还没有到期，下层干部还没有接受统一的理论，改组也还没有到期。"这个掀起改组运动的"先锋"面对被他煽动的人们，反过来劝说："没有充分的准备，必难得充分的改变。我们更不愿因急躁而牺牲了党。"[26] 实质上，他们也根本没有还魂之术。

"改组派"自称他们的信条是"相信以民生史观解释三民主义是最正确的解释，反对唯心派及其他似是而非的解释"；"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须与经济革命相辅而行"；"相信实现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的。"总之，"相信三民主义是指导革命之最高原则"[27]。事实上，他们对"最高原则"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不过在某些敏感的特别是可以和蒋介石集团争夺理论资源和政治资本的问题上，却有自己特殊的认识。

首先是关于民生主义。陈公博认为应该这样把握民生主义：一、民生主义决不是自由政策而是国家的干涉政策。二、民生主义决不止消极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其积极方面还要建设国家资本。三、民生主义决不是解决个人伦理问题而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四、民生主义决不是从形而上来建设，而是从形而下来建设。上述四段，旨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发展以国家干预的形式进行，同时发展国家资本，强调国家的调控作用；二是反对以故弄玄虚的态度对待民生主义，只从衣食住行的实际建设着手。

陈公博的国家干涉政策似乎包括以下思路：一、力求和平地进行经济建设，互相让步的方式，调和劳资的关系，以党的专政消灭阶级，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他设计的步调是谋求三个阶级的协调（指工、农与"小资产阶级"），团结三个阶级的革命力量，最后是泯除三个阶级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会生产的一员。具体措施是：在农村开展合作事业，实行减租；在工厂以红利的方式让工人入股，强迫工厂主为工人负担部分保险金，国家干预增加工资；对商人有所限制，并让他们部分地参加地方合作事业，以便与工人沟通。二、扶

持“小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以便稳定经济，他还曾要求实行“新经济政策”，希望国家以行政干预的手段，奖励商人投资，在电气水利方面，目前实行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的原则，但给予年限。从陈的具体论述看，他界定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指包括工厂主和商人在内的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改组派”正是由于这类政见而得到了该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支持。至于陈关于民生主义是解决经济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等说法，显然将矛头指向了戴季陶等人所谓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之类。陈曾表示：“只承认由经济的变动，影响及于哲学的变动，决不能由哲学的变动，影响及于经济的变动。因此我很感觉，要树立民生哲学的基础，先要建树于形而下学的衣食住行，决不能将民生哲学基础树于形而上学的忠孝节义。”[(28)] 他这些观点一方面批判了戴季陶思想之颠倒因果，缺乏依据；一方面声言目前对三民主义哲学基础的探究时机未到，戴劳而无功，从而更明确了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但“改组派”理论家的这些政见带有满足资产阶级政治心理的投机性，他们并没有发展经济的具体方案，更没有开展建设的实力。倒是在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上，他们在维护既成农业生产关系的观点较少掩饰，而与《新生命》派趋向一致。

他们认为土地问题并不是农民问题中唯一的和突出的问题。首先，在土地的占有上，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大地主，土地没有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反而有逐渐分散的趋势，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三。其次，在阶级关系上，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不是类似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而近于一种资本家与工人劳动者的关系。前者是主人对农奴的“封建权利”，后者是地主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同时，由于土地价值的流动化，地主与农民之间身份可以随意改换；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并不是截然可以划分的两个阶级。上述经济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地主在政治上不起左右时局的决定作用，只有在与官僚勾结时才起作用，他们也不具备反抗的能力，只有忍受政府的苛捐杂税。总之，中国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封建大地主阶级。其三，某些“改组派”成员根本不承认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

事实，说什么西北一带还有许多荒地，连年兵灾、水旱和盗贼，使许多原本肥沃的土地大量荒芜。他们要人们不要尽在耕地上你争我夺，应该开发地力，有效地使用土地。

“改组派”断言，农村土地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改组派”的暴动二原则很能说明问题，他们以为：“第一，以暴动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是可以的，以暴动来没收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是不可以的。”由于中国不存在大地主，所以没收土地政策不可行；暴动没收土地，只是以暴易暴，农村的土地私有制根本没有触动；“第二，以一次的暴动来没收土地是可以的，以无数次的暴动来没收土地是不可以的”[(29)]。他们认为暴动所损害的不是地主而是自耕农的和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中国经济基础，还是建筑在农村里，一旦破坏了这基础，新经济基础一时未能确立，社会上必遭极大骚动和重大的损失；这个损失是整个社会的，不单是地主”[(30)]。他们以民族危机国家破碎为由，表示要先夺得国家的主权再言及其他。他们还以农民愚昧、落后、私有欲强为由，提出只有先实行民权，农民有能力发展生产，才能促进民生的进行。

“改组派”不时显示出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赞赏，以为“土地国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无论是龙鼎还是黄汉瑞、顾孟馀抑或陈公博，他们都不希望农村有巨大的变动，不希望触动现有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政治立场导致他们理论上的诡辩，否认农村存在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事实。

其次，以民生主义反对土地革命，以民权主义反对南京国民党政权，是“改组派”的基本手法。1930年7月，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过了党政七项基本条件，包括：（一）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法（即约法）；（三）另开三全大会，否认南京三全大会的合法性。

召开国民会议是汪、陈“改组派”反蒋的一着棋。汪精卫宣称：“国民会议最大的作用，是要使封建势力的环境，变成民主势力的环境。”“国民会议虽可由党发起，而完成国民会议却要靠全国民众的力量。”[31] 所谓“全民的力量”，指目前的民众团体，包括总工会、商会、农协、妇协、学联、教育会、大学及反蒋各军。汪声称国民会议的方式，能够充分表达人民的意愿，创造一种民主的氛围，这种氛围可以杜绝军阀再生；而且只有实行国民会议制度，才能有效地实行党治。

从根本上说，汪精卫认为党与人民、国家的利害是一致的。汪说：“党员是为党，党是为国的，党员不得借党图自身之利益，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32] “依总理北上宣言所示，本党政纲政策，希望在国民会议通过。盖若不经国民会议通过，事实上仅为本党一党之政纲政策，反之，如经国民会议通过，则为国民全体之政纲政策”。即使国民党的政纲为大会所拒绝，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国民党在这一个政纲上“失败了”，而“国民可在国民会议得到各项权利与自由”[33]。如果撇开汪氏赖以展开其政治活动的阶级基础——与南京政权争夺权力的地方军阀及其依附于他们的投机政客而言，汪的这番话是颇为动听的，也是抓住了反蒋要害的。因为他所阐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通过国民会议得到“名分”的问题，而是主权归属问题，即主权是归国民还是属于党，或更确切地说属于借用党的名声的个人。

实行地方自治是“改组派”的第二步棋。汪精卫在《扩大会议宣言》中说：“所谓训政不外训练民众行使职权，此一义也；欲训练民众行使职权，必先于其所关系密切之地方，植深固之基础，地方自治乃为训政之第一着手，此又一义也……夫地方自治而不使民众参加，则自治无意义，地方自治而不见之施行，则民主亦无可言。”他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宣布训政以来，地方自治全然未行，更有甚者，解散民众组织，以中央党部代替国民会议，以各级地方党部代替

各级地方会议，破坏民意机关，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他表示扩大会议成立后，“当按照建国大纲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使由县而省而国，以完成训政之作，而领导国民入手宪政时代”[34]。从理论上讲，或依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思路，实行地方自治的确是在全国实行宪政与民主的第一步，但汪回避了实行地方自治的前提，即对于社会结构和人民被压迫地位的必要变革。只要看一看当时被称为“模范”的山西村治实际上是强化了阎锡山军阀统治的事实，即可明了这类“自治”的实质。故汪精卫的地方自治声明，其蛊惑性远远过于其实践性。

总之，汪、陈“改组派”在这一时段特别强调实施民主制度的立法原则，宣传如果他们上台，将经由国民会议、约法、自治和立宪来恰当划分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实现与民主主义并行的民权主义。法治和民主，是“改组派”理论宣传的一大特点，也是这个派别与南京国民政府争夺民众的工具。如此，他们以极强的功利心来倡导、宣扬经过他们解释的孙中山思想，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陈公博）还宣称相信唯物史观，标榜自己是工农的代言人，关注工农运动及其组织。他们将种种理论资源拼凑在一起，尽管谈不上理论创新，但编织了一种颇为诱人的政治方案。汪、陈为代表的“改组派”上层人物的人格固不足道，但经由这类方案，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部分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意愿。这批人要求政治民主，社会稳定和现成经济结构的和平的变革。他们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更恐惧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苏维埃运动，希望寻找一条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汪、陈在1928年后的一个短暂时段内，能凭借如上宣传在沿海沿江及北方一些地区策动起一个颇有声势的“改组”运动的原因。

三　“人权派”直击国民党的“党治”

1928年10月，国民党公布了《训政纲领》。在训政名义下确立起来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是少数人对政治权利的极端贪婪

的垄断。胡适、罗隆基等领悟到党治之下的社会并不是他们期望的“新月”；一方面“人权被剥夺到几乎没有丝毫余剩”[35]；另一方面，“现在我国人民只有暗中的不平，只有匿名的谩骂，却没有负责任的个人或团体正式表示我们人民究竟要什么”[36]。于是，他们集结在上海新月社的旗帜下，以1928年3月10日创办的《新月》杂志为阵地，讨论政治问题，宣扬自己的主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党治”。

最先由胡适在《新月》二卷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国民党没有“保障人权”，提出“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接着罗隆基在《新月》二卷五号上发表《论人权》一文，提出要发动一个“人权运动”，“争回人权”。主张“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民应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之类。罗隆基还提出所谓“专家政治”。他说“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37]。他把“国家一切行政官吏的选用，应完全以才能为根据”，列为“必争的人权”之一项[38]。

1929年12月，胡适写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发表在《新月》第二卷第十号上。该文是经过集体讨论，作为表达人权派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而发表的。他们声称“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也称“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都“不在内”。新月派标榜：“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如何建立这样的“新国家”呢？他们主张走“演进的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他们反对“有主义的革命”、“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说革命只能是“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因此，他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

针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只制定部门法而不谈立宪，他们明确自己要求立宪的理由是由宪法的性质决定的，从根本意义上说：“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而部门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39] 宪法是根本代表人民意愿的，是民意的集中体现。因此，宪法必须或由人民制定，

或得到人民的默许，如果人民不同意，可以通过一定的手续加以修正。他们责问所谓总理遗教、中山全书、《建国大纲》，是经过“什么一种法定手续，成为今日中国的宪法，成为我们全体人民应遵守的大典章，这是根本问题”[40]。从而质疑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以总理遗教和《建国大纲》为宪法的合法性。

其次，他们认为，宪法应该高于一切，是国家中一切组织与人民和政府共同遵守的根本大法。因此，不但要有守法的人民，更要有守法的政府和守法的政党。他们十分尖锐地指出，对于他人自由的干涉和侵犯，不受约束的政府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个人或团体；同时，他们称：“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的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41]

他们认为法律与人权是相辅相成的。罗隆基赞同卢梭“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罗说：“人权先法律而存在，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这是人权的原则之一。”简单地说：“法律为保障人权产生的。法律为人权所产生的。第一项，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项，指法律的来源。”宪法既保障了人权，现时，也要依赖于人权来保障自己。也就是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人权，保障宪法。革命也是人权，而且是不可能被剥夺的人权。他说：“这是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的最重要的一点。”言语中含有浓浓的火药味。因为他们看到：“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虽然干的是‘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勾当，其影响所及，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42]

他们所要求的宪法是保障人权的宪法。他们所谓的“人权”为何？罗隆基的《论人权》一文，对此有一个概括：“（一）维持生命；（二）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三）发达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43] 他提出自己主张的人权，不是抄袭于欧美的陈旧之物。

因为，人权是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1929年中国人所要求的人权为何物呢？他提出了三十五条。包括国家的主权在全国人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国民直接或间接的许可，不得行使国家的威权；法律未经全民直接或间接承认，不具有权威性；政府、官吏应对全体国民负责；人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有充当官吏的权利，任何个人或家庭包办政府多数官员，即是违反人权，等等；要求财政公开，司法独立，军政分开，文武官员民选，拥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等等。针对中国的现状，特别强调了对于军人的约束。

其三，宪政的实现与宪法的颁布不是同一件事。有了宪法，人民当小心地呵护自己的权利，达到真正的宪政。因此，“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无‘告成’之时”[(44)]。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人民应享有的自由究有几何？’这个问题是全靠人民自己解答的”[(45)]。

其四，他们对于“党治”理论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阐述最为自由，无拘无束，因为他们不必扛着孙中山这面大旗，相反对于孙中山的思想他们认为错误的同样进行了批判。比如，孙中山称人们在认识的能力上分成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胡适等人则论证这种划分是错误，认为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党治理论的出台，使国民党能够以“保姆”自居。

另外，胡适还对于“知难行易”说展开批判，提出“知固不易，行亦不易”观点，尤其政治方面，行与知更当并行不悖。指出孙中山将“知行”过于分立，论证他的划分是没有理论意义的，且在实践上，起到了不好的作用，至少有以下两个消极的后果：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而不觉得“知”难。于是有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倾向。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此招牌“以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扛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

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46]。其实，建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专门家对此进行不懈的研究，无论是知还是行，都离不开专家。他们主张由专家来治国。

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中，指出一党专政，和孙中山提倡的民权主义是相矛盾的。民权主义，主张人民是主人，是皇帝，民主的国家“应树立在国民的全体，不在某特别团体或某特别阶级身上”[47]。现在，国民党天天拿民权来训导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榜样，手段与目的如此的背离，造成了国民党政治的混乱。他揭露在国民党的专制之下，人民所拥有的权力，甚至于不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和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国民党剥夺了人民的公权，事实上是将中国3.999亿的小民视为罪犯和叛逆。而且，种种操作证明，国民党也不是行“党义治国”，完全是以“党员治国”，腐败在所难免。

“人权派”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制定宪法，以此让人民控制政府、管理政府，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他们否定了训政的必要性，也就否定了党治的合理性。他们全盘接受了自法国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统，仍然坚持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等原则，理论上没有多少新意。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却是十分可嘉的。

反共是胡适、罗隆基等人议论的主题之一。1930年12月罗隆基发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提出所谓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的主张。罗隆基说：国共相持的结果，只会造成“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亡国”。“为中国人民求生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然而国民党剿共工作的成败，有待于他们的策略”。罗认为，军事的胜利，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剿共铲共的策略”，是“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他说，只要做到两条：“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那么，“共产学说”在中国就不能立足，共产党也就“不剿自灭了”[48]。

总之，“人权派”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的同时，他们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求允许他们自由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实现专家治国的目的，在政治体制上建立欧美的民主制度。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不如说是对于国民党“党治”旗帜之下专制独裁的控诉。他们的上述言论，因其正义而具有煽动力，当然也就难容于“党治”的天下。1930年11月，罗隆基一度被捕。胡适的言论也曾受到国民党的指斥。1931年，《新月》杂志被迫停刊。

第二节　征讨桂系的战争

1929年2月19日，以李宗仁为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本兼各职，任该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并派兵将鲁逐出湖南。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分兵进攻武汉，正式爆发了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战，即通常所说的“蒋桂战争”。

一　“湘变”与讨桂战争的爆发

讨桂战争爆发，原因复杂，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历史恩怨为其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上旬，桂系趁蒋介石北伐落败之机，逼其下野，可说是蒋与桂系结怨最深的一次。当时，蒋因在徐州被直鲁军击败，表示要引咎辞职，他“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49]。在桂系诸将与何应钦的坚持下，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这件事在蒋介石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因此，当他复职后，就主“即解决何应钦兵权，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50]。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动武的意思，而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

和平“削藩”策，即冯玉祥所说的蒋介石“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的编遣全国军队的办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北伐战事刚刚结束，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普遍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稳定民生，任何人于此时此刻发动新的内战，都将是自召民怨的不智之举。因此，如前所说，早在1928年7月12日，蒋介石就在北平提出了《军事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整军方案，并迫使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三大军事集团领导人在文件上签了字。而李、冯、阎等人肯于在文件上签这个字，也是因为他们懂得“现在人民恶战事甚于恶蒋”[51]。“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后，蒋介石于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经过激烈争吵，17日终于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十七条。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二十二个师的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多不过十一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一半。据训练总监部部长何应钦说，截至1929年3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军中的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三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团，约24万余人；中央直辖部队共编为十二个师、两个步兵旅，约22万人，总计46万余人。而缩编后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却只有十三个师，约23万人，刚好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二分之一[52]。由此看来，蒋介石的和平“削藩”策，正在稳步推行。桂系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决心武力抗蒋。

1929年2月19日，桂系不顾全国编遣会议刚刚通过的《程序大纲》的有关规定，利用行将裁撤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改组所辖湖南省政府，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涤平、谭道源所部武装。21日，武汉政治分会如实电明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各委员，由于鲁涤平对所属武汉政治分会的“指导监督”“任情阻抗”，经该

会常会议决，已免其本兼各职，所遗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该省政府委员何键继任[53]。同日，李宗仁托词治疗目疾，秘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入湘桂军夏威部李明瑞旅、叶琪部杨腾辉旅进驻长沙，鲁涤平率部走平（江）、浏（阳），后退入江西。22日，叶琪率部攻常德谭道源部，李明瑞、杨腾辉旅移师浏阳、醴陵，追击鲁涤平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对于“湘变”，蒋介石事前是有所闻的。据当时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鲁涤平出走情形：二十日夜半，鲁接下游电告，谓湘局已无法维持，请其速即通电下野。鲁得电后，即通知省府委员暨湘省军事长官，定于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召开紧急会议；一面令驻省所部，预备开拔。七时许，鲁率马弁多人，由南门外祝威岗私邸，赴省府会议。旋闻李（明瑞）、杨（腾辉）部队已距省垣甚近，形势紧急，乃中途折回，径率师部直辖部队，及戴岳旅全部，仓皇出走，由东屯渡向浏阳退去”[54]。此报道应该说是可信的，有鲁涤平自己的谈话为证：“在上月二十日下午已接到武汉方面进兵警报，当时部下群情愤激，余以湘省几经蹂躏，剀切晓谕……并表示欢迎何键来省主持湘政。二十一日七时，武汉兵到，本人即率所部两团退出南门，即假水道来京。”[55] 两相比较，说鲁涤平事先接到了“电报”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一说“二十日夜半”，一说“二十日下午”；前者直说电报来自“下游”，后者未明言。至于鲁涤平接到电报后，未组织抵抗便主动退去，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蒋介石虽事前知道了武汉的“进兵警报”，但并未要求鲁涤平组织抵抗，而是要他“通电下野”，主动撤退，采取了先礼后兵的隐忍态度。

“湘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湖北此举，破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56]。但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央当以最大努力，避免军事行动”[57]。冯玉祥也证

实“自湘事发生，中央宽大为怀，促其反省，当时曾迭电垂询玉祥意见”[58]。2月24日，蒋介石偕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亲赴上海，与李宗仁会商解决办法，希望李与中央保持一致，李也答应了蒋的要求[59]。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一百七十七次会议，讨论武汉政治分会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案。会议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此举与“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及编遣会有关决议相违，应派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国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核办；至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为顾全大局，会议还对武汉政治分会前次所议略予迁就，议决湖南省政府主席暂由何键代理，并于3月2日发表正式任命令[60]。会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李济深，促其即日赴汉彻查“湘变”缘由。3月7日，针对社会纷传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决意用兵一事，蒋特地致函李宗仁，解释说：“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为防范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于威信不失，则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61] 这封信清楚表明蒋介石虽然在备战，但还是为和平解决“湘变”留有空间，他强调“调度军队”，目的在“防范”，是为了“正当护卫”，他“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中央威信不失，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也就是说，如果桂系“能具‘就事论事’之精神，以中央决议为最后之判断者”[62]，能给蒋介石中央政府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起码也可暂时避免。

对于和战问题，“湘变”之初，桂系内部的意见不尽一致。李宗仁虽反复声明他“始终为拥护蒋主席完成统一之一人”，表示当与中央一致，但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武汉政治分会“处置鲁（涤平）部，实出于拯救湘民、安戢地方之至诚，毫无个人权力杂于其间”[63]，何况这类“整顿内部，消除隐患”之事，其他各集团军已早“有不少先例”，极力为“湘变”辩解[64]。他公开指责蒋介石为“湘变”这样的“局部细故，劳师动众”，甚至将裁兵公债移作战费，并于3月8日宣布辞去国府委

员一职[65]。他还大拂蒋意，极力阻止李济深前往南京[66]，显然属于主战派。白崇禧远在平津，但据蒋介石情报系统“确报：一、湘事未发生前数日，由奉开来北平机车十数辆，现集中唐山；二、唐山部队束装待发，开拔费已支给；三、据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该部通过济南之消息”[67]。由此看来，“湘变”的发生，并非白崇禧后来信誓旦旦所说：“今天当真主面前可说我毫无所知。”[68]否则，何以解释他在“湘事未发生前数日”，便采取了调集机车十数辆，集中唐山这类遥相呼应的举措？不过，“湘变”之初，由于对蒋和战态度判定不明和自我准备不足，他暂时没有采取积极主战的态度，可说是个“‘谋定而后动’者”，“主张桂系应该镇静处之，不可冒动”[69]。3月5日，他复电李宗仁说：“对介公所提条件……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受】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第一条件则不成为重要问题，概可承认。至于第四改组两湖省政府，应须得我方同意，亦无不可。请迅速表示，以免夜长梦多，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70]直到3月8日，李宗仁公开通电辞去国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决心与蒋一战时，他才改变态度，开始与李宗仁等谋划对蒋作战的军事部署，表示：“将来我方主力似应用大江南岸，进可以直取江宁，退亦足以占领湘赣，与粤方紧为衔接。”[71]至于“湘变”的实际发动者胡宗铎等人更是表现强硬，毫不让步，不但明确表示他们对湘事的处理，与政治分会条例没有抵触，而且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下达的双方军队各回原防，不得自由行动的命令。3月4日，以上命令已下达五天，入湘桂军叶琪部仍在益阳继续进击谭道源部，并于5日进驻清水潭。13日，又过了九天，叶琪部还在攻击前进，占领常德，迫使谭道源退守湘西桃源、大庸等地[72]。但是，3月16日，胡宗铎等人却致电胡汉民、李济深，专责蒋介石调集皖、赣境内各师，向长江上游进兵，“显无和平诚意”，并请示胡、李二人，如蒋军“窜入湘鄂境界，职部是否应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之处”[73]。其对抗到底的决心，暴露无遗。

蒋介石看到胡宗铎等人已不把他视为“中央”政府的代表，知道战争已不可避免，其“发电之日即密令动员之时，日内必实行向中央各师袭击，而冀以迎头痛击之词诬指中央为戎首”[74]。他一面命令叶琪等“迅即遵令停止军事行动，克日退回原防，毋得故违，致干法纪”[75]；一面加紧部署军事，令所部各师迅速完成战前准备。3月26日，蒋介石最后下达讨伐桂系令，称“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76]。讨桂战争正式爆发。

二　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与武汉之战的胜利

蒋介石虽一度希望和平解决“湘变”，但丝毫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因其一贯的策略就是“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77]。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甚至更希望或者说更习惯于战争解决问题。2月26日，“湘变”发生不过六天，蒋就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所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驻徐州）、第二师师长顾祝同（驻蚌埠）、第四师师长缪培南（驻山东兖州）、第八师代理师长朱绍良（驻庐州）、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驻新蒲）、第十师师长方鼎英（驻南京）、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驻芜湖）、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驻江苏泰州），准于3月3日前完成出师准备[78]。次日，又亲电朱绍良，命其注意探访开封政治分会所辖“鲁（山东）省府行动”，出师所需挑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79]。蒋介石的秘密备战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3月2日，蒋确定讨桂军由他亲自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第一军军长为刘峙，辖第一、第二、第九十三师；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为朱绍良，辖第八、第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前敌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辖第四、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八各师；总部直辖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为第六、第十、第四十八师及炮兵团。次日，电令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

日起开始为出征部队征夫。15日，蒋介石为表示严守编遣会议决议，通电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赶速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并严令“勿必通电，以照缩编会议决议案，各总司令、指挥及其集团军名称须于本日取消也”[80]。

为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自始就严禁出征各部队拉夫扰民、诈欺钱财，更不许其假借罪名，滥杀无辜。3月6日，他电饬各师团长：“各部队拉夫并严禁之，否则，即应由各师长完全负责。近闻杭州、扬州竟有拉夫事实，以败坏本军名誉，殊出意外。此次各部出发应如在粤出发时以不拉夫、不住民房为革命军之标识，万勿自坠名誉，失却国民同情也。”[81] 3月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曹万顺等师确有不守军纪现象，除再次予以制止外，还提出了由南京市政府统一解决各部所需挑夫问题[82]。对民间助逆嫌疑者的处置，蒋介石也坚持要有事实，不能捕风捉影，鲁莽行事。3月22日，刘峙电告总司令部，鄂东人民自卫团有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他复电指示：如确有助逆行动者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83]。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对良好军纪在争取人心，夺取战争胜利方面的意义与作用，的确是十分清楚和重视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作为他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一个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特殊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做“侦探、间谍”，蒋亲笔“训示”这个组织的“要素，约有数端：一、极端秘密；二、迅速灵敏（无论调查、报告）；三、忠实勇敢。必如此方能尽其责任，亦方能为本会之会员也”[84]。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

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85]。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86] 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87] 李济深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仍按计划于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88]。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89]。21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3日，他电北平李石曾："闻白剑【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汉，确否？请代探询其复。"[90] 16日，电示驻奉天（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91] 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92] 17日，再电何成濬："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也。"[93] 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启用下野年余的昔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94]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二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秘，外人鲜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95] 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96]。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司令；（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97]。此外，发放军饷也

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濬停发白部军费”[98]，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99]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濬1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100]。在唐生智、何成濬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于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101]。20日，唐生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3月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102]。而蒋介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18日才密令何成濬“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103]。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了李宗仁[104]。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戈，叛桂拥蒋”[105]。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106]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

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指冯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明。"[107] 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五十万元"[108]，为阎锡山50万元[109]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110]。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张学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3月19日前已向蒋表明了拥蒋讨桂的态度[111]。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3月22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3月29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112] 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认为自己"令官兵为民挖渠……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113]。

正因如此，所以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又对冯采取了一

定的防范措施。3月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之命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兖州驻防”[114]，蒋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濬设法阻止[115]。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师增派专探，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一带，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说：“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务盼兄时刻注意。”[116]稍后，为防止冯玉祥所部自平汉路南进，又密令何成濬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一”[117]。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118]。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119]。同时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达瑞昌”[120]。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启用昔日劲敌张发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正）可负责担保也。”[121]一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希照办。”[122] 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一、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

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二、第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三、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前进，限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四、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123)]。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逻、黄陂。4月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即进取武汉为要”[(124)]；一面电告宋子文：“哲生（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早飞来，如候至虞日（7日）则无用矣。”[(125)] 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武汉市市长）如愿来，亦不拒绝。”[(126)] 4月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并于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127)]。紧随其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

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4月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128]。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全军顷刻土崩瓦解[129]。胡、陶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月5日，蒋介石“兵不血刃，时不兼旬”[130]地占领了武汉。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

三　攻防结合与征桂目标的实现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还有更高的军事目标，即彻底消灭桂系的军事实力，夺取其最后的根据地广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直捣其巢穴”[131]。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以根本铲除桂逆”[132]，其中湘军为讨逆军第四路军，由何键任总指挥，粤军为第八路军，由陈济棠任总指挥，滇军为第十路军，由龙云任总指挥，并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4月12日，他电召何键到武汉“面商攻桂及编军问题”，决定“约编三师，以吴尚、周斓、刘建绪为师长”。[133] 14日，又命何键选派所部二十个团以上兵力，于月底集中桂边，5月1日开始攻击。15日以前占领桂林，然后向柳州前进；命龙云选派所部十二个团以上兵力，限5月20日以前集中广南、剥隘一带，30日以前占领百色，向龙州、南宁前进。对于粤军，因其内部意见分歧，陈济棠主暂取守势，而蒋光鼐、陈策等人力主积极进攻，蒋介石密电陈铭枢：“粤中将士征桂既不一致，强之反召分

裂，可只可缓和，以资团结。但须知此种心理，即为亡粤之根性，并知桂题不决，则粤必亡。此时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不容稍缓。”他告诉陈铭枢，他已“与湘何键、滇卢汉面定计划，决于本【月】底湘滇兵力集中桂边，桂逆必知，待其移兵防备湘滇之时，粤当出兵协同海军，以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如粤中真不能出兵，则决以朱绍良、方鼎英、李明瑞、杨腾辉各师由海道运粤而加之，以蒋光鼐等忠勇之师协同陈策海军直捣其巢穴，亦绰有余裕……如伯南（陈济棠字伯南）反对此举，则事先不必与其明言，届时彼当赞同也”[(134)]。而对陈济棠，蒋介石要求他选派十八个团以上步兵，加上海军、空军，于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5月1日出发攻桂，15日以前占领梧州。为满足龙云解除贵州周西成扰其后方的要求，早在4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贵州籍人士、交通部次长李仲公“速电周西成，请其即日表明态度，共同讨桂，并派员来汉协商”[(135)]。后来，又要求新任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以川军赖心辉部协助龙云监视周西成的行动[(136)]。4月23日晚，蒋介石为攻桂问题亲赴湖南长沙，与何键作最后部署，决定将湘、粤、滇三路攻桂时间分别延后五至十天。5月3日，他电令陈铭枢、陈济棠“如期攻桂，以免后患”，并告知“中央决定调黄绍竑来中央候用，而先以吕焕炎为广西特派员，伍廷扬【飏】代省府主席，视其以后内部如何变化也……总预备队如必要时，则可调李明瑞南来”[(137)]。其所派代表邱文、廖武郎也于同日抵达广州，以所携蒋之密令促陈济棠速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扫除征桂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对退守鄂西的桂军残部更是穷追不舍，毫不放松。当时，退守鄂西的桂军尚有胡宗铎、陶钧、程汝怀三个师，叶琪师的一个旅，夏威师李朝芳、尹承纲旅各两个团，张义纯师的两个旅，另外是警备旅、特务团等，实力并未削弱多少，李宗仁、白崇禧盼望他们能够渡江取道湘西回到广西去[(138)]。而胡、陶、夏内部也有人建议“将军队扫数渡江，进驻湘西，与广西联成一气……以待大局之转变，转败为胜”[(139)]。这是蒋介石预料到的。为阻止胡、陶等部渡江转进，蒋于4月5日抵达武汉

当天，便在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未到任前由刘峙暂代）、刘文岛为武汉市长的同时，命令刘峙按原计划攻击前进，务期消灭逆军，以除后患。4月8日，又致电四川刘湘："能速派一师以上兵力东下更好，但须集中荆（门）、沙（市），截击溃逆，万勿在宜昌停留，使残逆漏网也。"[140] 9日，再电何键速命湘西谭道源率所部至石首、公安、松滋一带截堵武汉方面溃军。10日，指令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朱绍良、副司令官夏斗寅率所部自天门、仙桃镇向荆门、沙市追击；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方鼎英率所部自武汉、嘉鱼溯江而进，不得有误。11日，电令门炳岳率所部会同谭道源阻止桂军渡江南窜。其间，他还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对已经反正的门炳岳、危宿钟各旅长"照委原职"[141]；一面致电胡、陶，声明"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对兄等不加追究，如将所部交所属统领，对兄等行动更不加束缚，居汉出洋皆可"[142]。随即派出行营参谋主任贺国光、孔庚为谈判代表，奔赴荆门、沙市胡、陶军中接洽有关事宜。

在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压力下，4月12日，程汝怀等人致电贺、孔，表示桂军各部已在荆、宜（昌）停止待命，请速到沙市会商一切，并请转陈蒋介石命令前方部队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未加理睬。陈绍宽继续率海军攻击前进，13日在马家寨与桂军展开激战。14日，蒋介石命令朱绍良、张发奎等务于15日占领荆门，17日以前占领沙市。15日，川军刘湘部东出巴东，到达宜昌附近，蒋再电朱、张所部和陈绍宽海军加速西进，以与刘湘收夹击之效。同时命刘湘以重兵扼守巴东，严防桂军西逃；谭道源部限22日前赶至长阳、五峰，阻其南渡。胡宗铎等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表示输诚。16日，蒋指示行营总参谋长贺耀组复电孔庚，桂军须即日退出荆门、沙市，所有部队开至建阳驿、半月山、鸦雀岭等处，接受点验、改编。次日，他踌躇满志地电告刘湘："胡、陶等来乞降，愿听命改编。彼自愿离队出洋，刻已派员谈判中。我军昨已占领沙洋，荆门亦于今日可占领。已令朱（绍良）师长由荆门出当阳，与庚师在宜昌附近联络矣。"[143] 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联名通电下野，鄂西战事暂告一段

落。

鄂西战事虽暂告结束，但蒋介石仍要求各路追击部队对胡、陶、夏所遗桂军严加戒备。29日，他一面电令方鼎英部“暂驻原地，一俟新编各师（指胡、陶桂军）调遣完毕，再行移动，于此休息期间请竭力整顿部队”[144]；一面指示谭道源：“胡、陶、夏已离职出洋，荆、宜各师皆已就范待编，可勿进攻。惟仍须严密戒备，由宜都至巴东一带须择要配备警戒，以防疏虞，并与海军陈（绍宽）司令切实联络。刘湘部唐式遵师长已占领巴东，亦请联络，与其分配警戒任务。”[145] 5月3日，蒋介石听说“吕超、潘宜之、戴天民尚在宜昌播弄是非，并怂恿各师入川扰乱”，随即令贺国光“切实查明，并限令宜昌部队将吕、潘、戴等解京惩办”[146]。8日，他甚至电饬刘峙：“鄂西各师移防，限元日（13日）以前开拔完毕，不得延缓，并派队严密监视。如届期不移，则应以违抗命令，用武力解决之。”[147] 至于夏威及其所部欲回广西，就更不是蒋介石所能容忍的了。据蒋说“夏威所带军队六团【四月】廿三日以前本想由宜都经黔东回桂，后经阻止乃夏威始与胡、陶廿四夜同船东下”，并于5月1日到达上海[148]。他还曾电令何应钦以“不著痕迹”，且极为“优待”的方式，与“令其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从速离桂出洋，最好不与外人知”的动听之言，暂留夏威于上海，“盖恐其回桂报告鄂情也”[149]。5月3日，夏威行将离沪，蒋电令陈铭枢等人务于香港阻其回桂[150]。在蒋介石的坚决阻止下，夏威及其所部终于未能回到广西。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蒋介石自以为已胜券在握，于5月初正式发动了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第二期“讨逆”作战。湖南何键依据蒋介石的部署，“以主力经永州、全州，径攻桂林，以一部由右翼经西延、六峒、义宁绕攻桂林之侧，一部由左翼经灌阳、栗木、恭城，直取平乐”。其部队被编为四个纵队，以周斓师为第一纵队，“集中新宁、武岗，向义宁”；以刘建绪师为第二纵队，“集中永州、东安，向全州、兴安”；以吴尚师为第三纵队，“集中道县、宁远，向文

村、灌阳”；以范石生师为第四纵队，“集中江华、永明，向恭城”；以罗藩瀛师为总预备队，“集中衡州、永州”。5月5日，各纵队及总预备队如期集中完毕，开始分途出击[151]。云南龙云早在4月24日便已决定出师讨桂。5月3日，他命所部分三路入黔，先助李攻周西成，然后向桂之柳州前进[152]。广东陈济棠也于5月6日就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率所部香翰屏、陈维远、蔡廷锴旅和陈策海军各舰队沿西江西进，集中肇庆，准备进攻梧州。

但是，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蒋介石预设的方向发展。首先，龙云所部滇军就“始终未入桂境”[153]。其次，尽管何键所部如期对广西发动了攻势，却没有出现蒋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面：桂军因此“移兵防备湘滇”，粤军趁机“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原因是桂军这时已与冯玉祥秘密商定了一个联手抗蒋的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冯玉祥的任务是由河南进攻武汉，威胁攻桂蒋介石中央军的后方，而桂军的任务则是“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154]。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后改称“护党救国军”），自任南路总司令，命附桂粤军“徐景唐部由石龙向广州东部进攻”；桂军“分两路向广州西部进攻”，黄绍竑指挥第一路“由现地经肇庆、三水向广州进击”，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四会向广州进击”[155]。这一形势，是蒋介石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估计不足的[156]。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势，蒋介石首先指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封锁消息，不让外界了解黄绍竑、白崇禧提师东进的真相。5月7日，蒋致电熊说：“两广战争消息，不准各报登载。”[157] 接着，为抵御桂军的进攻，他先后两次电示陈济棠，一次是要求陈立即破坏某些失控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如飞机“亦不听命，则请即刻派队烧毁，不可犹豫。军事惟有决心，此时万不能再信政治手段解决，否则反中逆敌缓兵之计也……虎门长洲炮闩，从速拆卸，勿延”[158]。另一次是要求陈密切注意敌军动向，“严防其最险一着，即出小北江，以断粤湘联络之道”，并“巩固内部，凡内部稍有可疑之部队，应从速解

决，或至不能妨碍我主力进行。而与逆军隔绝之处，万不可犹豫不决，临时仓猝，反陷其计也。此时我主力，第一，当先肃清内部，第二，在巩固后方。即先占领石龙、石滩，与虎门联成一线，为我根据，以待中央海陆军之增援；一面设法占领惠州。而广州一时之得失，无足重轻，只要能保存实力，则恢复省城绝非难事。李逆（指附桂李务滋部）已占领石龙，则我军更应回兵扫除后方障碍也，此乃上策。次则以陆军一部与海军扼守河口，而以主力向北江肃清可疑之部队，然后应付西北江之桂逆，是为中策。如固守省城，以待东、西、北江逆军之逆军（衍文）来围攻，是为下策。请兄抉择。”[159] 此外，蒋介石还指示何应钦命何键根据新的敌情，改变主攻方向，由原先以主力“径攻桂林”，改为“乘虚急袭平乐”。后因何键坚持桂林、平乐方向同时用兵，蒋又亲电何，果断命其“应以一部趋桂林，主力速转向平乐，务于五月十八日以前达到该处后，直趋梧州，并以范（石生）部出连山，向广宁、四会前进”。5月13日，何键所部第四纵队占领平乐，对攻粤桂军后方形成包抄态势[160]。

但是，蒋介石很清楚，从战略全局看，桂军攻粤，即使得逞，也毕竟是局部问题，而河南冯玉祥攻汉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武汉一失，不但前功尽弃，且湘、粤攻桂各军，也势必腹背受敌，直捣桂巢，焉能有望？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抵御桂军攻粤的同时，同样重视甚至更加重视防冯攻汉这一战略大计，并当即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武汉坐镇指挥。

如前所述，蒋介石原本一直在联冯讨桂，即使有所防范，也是为了逼冯讨桂，但事实上，蒋对冯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长期采取既拉又防的两面政策。早在3月1日，蒋为四川内乱，就曾致电冯玉祥，促其率部平川[161]。其真实目的，冯玉祥一看便知，“盖蒋欲本军平川，彼则专力对桂，且恐我与桂合也”[162]。4月初，因“冯、韩……无出兵确期”，蒋介石一面电令何应钦明白告诉尚留在南京的鹿钟麟，请他催促韩复榘“速以主力出武胜关，我第二路正面主力，必待

其入关与我切实联络后，方能开始攻击”；一面又命其严加注意冯、韩动向，“瑞伯（鹿钟麟字瑞伯）态度、行动，亦请留心”[163]；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屯兵石家庄，牵制冯南进。挑拨冯、阎（锡山）关系，以阎制冯。4月7日，蒋电何应钦说：“请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兄驻宁之秘书长或参谋长来汉一叙。如徐声钰回京，可将冯与其面谈之计划关于先攻晋一段，与百川兄有关系之人面谈之，使百川兄知冯对其之怀抱也。”[164] 可见，冯玉祥斥“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165]，并非凭空捏造。又如扣留外购军事装备之事，4月7日，蒋电示宋子文：“凡在外国所购枪炮、钢铁、飞机等件，非有中正命令，无论其任何机关护照，作为无效。非正式留存于海关，但不明说扣留也。”[166] 其实，此举也是冲着冯玉祥而来的，因为他所购的飞机随即便在上海被扣[167]。再如展缓驻济日军撤兵问题，4月9日，蒋电示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接收胶济，须迟一个月方可实行，最早亦须迟至本月杪。其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不可私相授受），否则政府不能负责也。”[168] 所谓“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为防止日军撤走后的山东落入冯玉祥之手。此中奥妙，早在3月4日已为人窥破，并向冯作了报告：“日人虽急欲解决济案，惟蒋又恐鲁归我方，故迟延不决，是其过不在日而在蒋也。”倒是冯玉祥不太情愿往这方面想，3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八点起，段其澍来，言外间谣诼繁兴，王外长不愿解决济案者，恐鲁省落于二集团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识大体也。”[169] 但很快就被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妇人之仁。4月17日，蒋给何应钦连发两电，前电言犹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则请政府以明令责成孙良诚（冯玉祥部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后电又到：“前计是被动时万不得已之举，今既可缓和（指日允展期撤退），自当专心平桂也。”[170] “万不得已”才同意孙良诚接防，其防冯之心，显而易见。

在蒋介石的多方掣肘下，冯玉祥自觉再“不可不图生存之道”了。4月15日，他指示秘书长魏书香、参谋长陈琢如：“山东事已如此，可

速电路局预备火车，以便运输军队回豫。”25日，电示南京鹿钟麟：“大局不佳，可设法归来。”28日，“电孙良诚速将兵由山东撤回开封”。5月6日，面谕所部“可于夜间在武胜关潜埋地雷，敌来即发，一面深沟高垒，勿使得前”，并请邓飞黄“起草讨蒋宣言”。12日，表示要“通电宣言护党救国”[171]。16日，授意所部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发表通电，促蒋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从而公开挑明了联合桂系共同抗蒋的态度。

随着冯玉祥联桂抗蒋态度的明朗化，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标是讨桂，敌人只有一个，即李、白、黄桂系集团。因此，不管冯玉祥对讨桂如何消极，他始终坚持以“和缓”为主的单纯防御策略，以免树敌过多。4月13日，他在致何成濬、唐生智的电报中，对此有专门交待：“此时鄂西残逆，尚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故决先征桂，而对其余，应至和缓。但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运于石庄以北，务须保持秘密，并不可逾石庄以南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请兄弟（此‘弟’字似为衍字）务照鄙意，不可稍有参差也。”[172] 即使冯玉祥决定自图“生存之道”，从山东撤退之后，也仍不改初衷地电示何成濬：“冯放弃山东是恐我方进攻，乃为避战计，决无攻汉之理。此等大事，当有一定方针，请兄万不可如此主张，否则必误大事也。各部不必移动。”[173] 并电告朱培德说：“近日鲁孙（良诚）撤军豫西，鹿钟麟亦擅离南京，冯方各种行动，令人莫解。但中（正）只注重政治，决不用武力，以静观其变也。”[174] 就当时军事形势与任务而言，蒋介石这一策略无疑是可取的，因为蒋毕竟尚无足够的军事实力，同时应付所有的地方反对派。但是，随着冯玉祥态度的急剧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月4日，他致电武汉贺国光、刘峙说：“冯未必用兵，但应准备，速将现已计划武汉临时阵地限期构成为最后防线。次将武胜关阵地侦察，亦筑防御工事，暂取守势为要。”[175] 到了5月9日，蒋介石“闻冯决攻汉”，当即

要求刘峙对冯所辖河南省的“防御须赶速完备，盖恐其出我不防也”[176]。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从此便由单纯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了。

为保卫武汉，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编为新编各师的仍集结在鄂西长江北岸的胡、陶旧部。他认为：“冯之所以企图攻汉者，以仗胡、陶旧部为之应援也，故必先解决其声援或可消除其野心。”[177] 为此，5月9日，他致电驻守沙洋的朱绍良：“冯有攻汉之决心，恐与胡、陶旧部联络。中（正）意如其各该部能如期开动、分散各处，然后再定去留为上。否则必须用武力根本解决之，先清肘腋再对外敌。请兄本此意旨，切实施行。”[178] 次日，又进一步要求朱：“刻已令巴东唐式遵部、宣都谭道源部于删日（15日）前切实准备，对宜昌监视。如新编各师不能遵令如期移动，则最迟须于删日一律缴械。请兄督促缪（培南）、夏（斗寅）各师，并确定日期，共同进剿，以免参差。倘其移防经过荆门、沙洋时，亦应临机缴械，不使其窜豫也……万一正在进荆，而尚【未】解决以前，冯方先来攻汉，则兄亦督促各部先消灭胡、夏残部，然后与武汉夹击其攻汉部队可也。”[179] 同时指示夏斗寅：“新编各师确与冯方沟通，约期攻汉。如其果不遵令移防，则速照逸民（朱绍良字逸民）兄计划切实施行。否则彼方以乡谊来联，恐陷其毒计，请兄严防而解决之，以免贻两湖后患也。”[180] 5月12日，何应钦到达汉口，依据蒋介石的指示，随即“召集各师长会议”，诱骗胡、陶旧部新编各师长赴汉与会，由豫接密令“可不必到会”的谭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机将其所部全部遣散，从而彻底解决了鄂西胡、陶旧部对两湖的威胁[181]。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所部必须对河南实行攻势防御，积极做好对豫作战的准备。由于当时鄂西胡、陶旧部尚未全部遣散，他再次强调该计划必以解散胡、陶旧部为先决条件，以免冯部占领襄樊，联合胡、陶旧部，攻我武汉。5月11日，蒋致电何应钦等人说：“闻四日前信阳集中兵力有四师之众，现在未知去向，其必开往南阳、唐县无疑。证诸李纪才报告[182]，更可确信其必逼近襄樊，或占领襄樊，

使鄂西胡、陶旧部发生变化，然后进取武汉，或其占领襄樊后，先派一部压迫荆、沙，与胡、陶残部会合，再攻武汉，故我军对此必先解决胡、陶旧部为惟一要着。”对刘峙所部“正面武汉主力”，他认为宜“固守孝感、应山之线，暂取待机之势，不宜到花园以北。但如其武汉【胜】关守兵不多，则我军可派遣一得力部队占领之，然主力应仍在孝感也”。他电告何应钦等人：“刻已令第五路移驻济宁，方（振武）部移驻徐州，刘镇华及晋军三师集中石家庄、顺德，约哿日（20日）前可以集中完毕，以时间计之，或尚能策应，武汉不致失机。”为有效防止冯玉祥“果先攻鄂”，他认为“第五路应由津浦路运至徐州入陇海路较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应钦等人将“武长路之钢甲车速运来津浦路候用”，“并令李纪才将襄樊各路汽车速集中花园，勿稍留滞”[183]。

蒋介石防冯进攻武汉的第三个措施是收买冯玉祥部将为内应。早在4月10日，武汉刚刚克复，蒋介石就在汉口召见过韩复榘。据冯玉祥说，蒋召见韩时，“张口向方（韩复榘字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184]。5月8日，冯玉祥攻汉风声骤起，蒋介石立即电示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钱大钧字慕尹）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185]或许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过于性急和不顾后果，因此，紧接着又补发钱大钧一电，表示宜嘱石友三不可过早暴露自己。他说：“石友三派李明志来京接洽，刻已派其回汉见兄，请托前任石部秘书现为总部参议某君，与李同访友三，并再接济其五万元，由经理处领支可也。嘱石将冯之最近计划与命令抄寄报告，并嘱其久驻南阳，非至其长上有反抗中央命令时，不可露泄其真实之举动，盖过早恐于大局反不利也。此意应口授，不可形诸文字。”[186]蒋介石这一招还果然屡试不爽，5月22日，韩、石二人便通电“拥护中央”，给了

冯玉祥重重一击。仅仅过了五天，5月27日，冯玉祥即宣布下野，这已是后话了。

当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4月23日，他就对人说过，蒋介石在“设计谋我”。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蒋氏视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至于怎么“设计”，怎么“处心积虑”，他解释说：“蒋令晋阎出兵豫西，刘峙直捣汴、洛，又利用杂牌军队攻我南面，是对我军取包围法也。”(187) 这一观察与前述蒋介石的防冯部署大体不差。也正因如此，冯玉祥虽表面上与广西李宗仁等人遥相呼应，令所部通电拥护其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并无攻汉的实际行动。相反，为了自保待变，自4月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为本军计，当退守潼关以西”，以免“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所谓“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指的就是“晋阎”即阎锡山“出兵豫西”。5月1日，冯又指示魏书香：“我军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无敌之师也。”(188) 到了5月15日，更命令豫南韩复榘、张允荣部炸毁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脱离武汉前线，全军收缩西撤。

随着冯玉祥全军西撤，武汉形势缓和，蒋介石迅将注意力转向两广战场。当时，粤军李扬敬、香翰屏部及海军中山、江大等舰正在广东清远、芦苞一带，与白崇禧亲自率领的吕焕炎、王应榆、黄旭初部对峙。5月18日，陈济棠下达总攻击令，命香翰屏部沿广三路进攻，陈章甫、李扬敬部直逼芦苞，海军各舰自马口发起攻击，戴戟部及教导队向军田增援。21日，粤军大获全胜，先后收复芦苞、白泥、大塘、清远等地，桂军损失数千人，王应榆被俘，黄旭初受伤，残部向四会溃退。与此同时，何键也命令各纵队协同粤军夹击梧州。为增援粤军，5月19日，蒋介石命令李明瑞、杨腾辉率所部两师南下，先后于25日和28日从湖北经上海海运抵达广东。30日，李、杨沿西江挥

师西进。6月2日，与湘、粤联军共克梧州。6日，李明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拒绝接受黄绍竑、白崇禧所派代表请其收编黄、白桂军的要求。12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17日，俞作柏命李明瑞等人三日内攻克桂平。18日，各部开始总攻，李明瑞、杨腾辉部由藤县攻江口，范石生、许克祥部由大湟山绕攻桂平之侧，海空军也投入战斗。桂军不支，纷纷请降。23日，李、杨进入桂平。白崇禧、黄绍竑自知大势已去，随即将残部交吕焕炎、梁朝玑统带，先后取道龙州、越南，逃亡香港。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7月15日，俞作柏在南宁宣布正式成立广西省政府，就任省政府主席之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以夺取桂系根据地广西为目标的第二期作战的最后胜利。

第三节　征讨冯、张、唐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一　蒋、冯矛盾的发展与两次讨冯战争

如前所述，蒋、桂战争中，冯玉祥的态度、处境都极为微妙。冯玉祥兵强马壮，拥有河南、陕西、山东数省之地，这些地区，又与蒋、桂拼争的战场相邻，他的动向，对蒋、桂双方胜败影响至大。如冯出兵助李，则冯、李携手，可在西、北、南形成一条牢固的战线，对东南及南京构成强大威胁；如冯与蒋介石联合，则北可使白崇禧部悬成孤军，南可对两湖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桂系将难以幸胜。所以蒋、桂冲突爆发后，双方都竭力拉拢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为特使，许冯以“行政院院长及两湖主席”[(189)]，引诱冯氏出兵助己；李宗仁也派代表见冯，晓以利害，提醒其防止被蒋各个击破。

从利害关系说，冯玉祥作为地方实力派，当然更倾向桂系一方，私下里他也对桂系表示支持、同情。但桂系制造“湘变”、惹起事端，

首先输了道理，加之蒋介石以中央相号召，冯玉祥也不想公然与其对抗，而且两湖地区毗连其陕、豫基本区，又是鱼米之乡，他也不无攘为己有的私心。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如有机会，宜向湖北发展。按中国历史，不能得湖北便不能守河南。至陕、甘根据地，无论如何不可轻易放弃。倘能将陕、甘、鄂、豫四省守住，便可管毂南北东西。"[190] 冯玉祥的如意算盘是，坐山观虎斗，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法，坐观蒋、桂相争，削弱实力，待时机成熟时，进兵两湖，将势力范围向华中拓展。因此，蒋、桂冲突爆发后，蒋介石要拉拢、利用冯玉祥，而冯也愿意被利用，蒋、冯之间上演了一出勾心斗角的好戏。3月初，南京方面电冯商讨对桂问题时，冯回电说："（一）胡部（指桂系的胡宗铎）行动已派员密查；（二）原驻兖州之第四师如果调往江南，则拟派刘镇华军接防。"[191] 在桂系问题上含含糊糊，但对接防兖州则毫不推辞，既不贸然开罪桂系，也不反对中央用兵。冯玉祥自以为圆滑，但其用心其实尽在蒋、李二人眼中。

冯玉祥用心深长，蒋介石也将计就计，佯装不知冯氏出兵的目的，尽力促成冯玉祥加入战事。3月下旬，南京方面公开发表冯氏致蒋电报，内称："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前经迭电声明，已有准备。至于出兵路线及作战方略，统祈主席指授机宜，庶免歧异。"[192] 此举意在使冯再无反水借口。28日，蒋介石连续致电冯玉祥，请其"令韩总指挥所部限于4月2日以前经过襄阳武胜关，微日以前须到达武汉西部及其南部，兜击武汉，以与我下游诸队收协击之效"[193]。同日，委任韩复榘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韩部接受委任后，屯兵于豫鄂边境，虽然桂系与冯心照不宣，在"武胜关无兵驻防"[194]，韩部仍逡巡不进，坐以观变。直到4月5日蒋介石抵武汉并命韩部"在现地停止待命"[195] 后，冯玉祥方才着忙。同日，他致电蒋介石报告："前方已在襄樊之间与敌接触甚为猛烈，沿平汉线各部因车辆缺乏不免稍迟，业经电令催现正星夜前进中。"[196] 7日，蒋介石再次分别致电冯玉祥、韩复榘，令其在原地

停止待命，而冯、韩也对蒋5日电装聋作哑，连电向蒋“报捷”，称已占领武胜关，并向广水追击，弄得蒋介石“以韩部装聋，不听命令，甚疑”[197]。直到4月8日，冯、韩见大局已定，武汉尽收蒋介石囊中，方在广水一带被迫止步。对韩的行动，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4月8日他致电何应钦，告以：“自支日起电令韩复榘约十余通，迄无一复，昨日忽入武胜关，铁甲已过孝感，幸此间已严防备，勿念。”[198]

蒋、桂一战，冯玉祥虽然机关算尽，却毫无所获，桂系出乎意料的快速失败，使他无法及时作出反应，结果是客观上既充当了蒋介石帮凶的角色，而在蒋面前又丝毫没能讨好。3月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焕章电文总无作战明确之表示，不能不令人疑虑也。”[199] 占领武汉后，蒋在日记中已公开表现出对冯的愤恨：“焕章将余四日至今之电置之不闻，而派韩复榘今突入武胜关，且到孝感附近，其来电可笑，视人人为小孩可欺。而其心劳日绌，如见其肺肝然矣，取巧投机之徒，必自杀也。”[200] 这段日记，虽或为蒋故意作态，但其对冯不留情面的态度已可窥见一斑。

桂系败走，唇亡齿寒，冯玉祥不由得深自戒惧。1929年4月初，冯玉祥一方面两次发出通电，声讨桂系，指责其在北伐前后的自私行为，试图以此缓和与蒋关系；同时他也深知此举未必会有效果，因此作出一系列部署，准备应付“祸变之发生”[201]。4月下旬，冯在开封召集师以上军官集会，加力调整军备，将驻山东、河南一带部分兵力回撤，收缩防线，集重兵于豫陕交界的潼关一带，扼要拒守，摆出一副准备确保原有基本地盘的哀兵姿态。

冯玉祥对蒋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蒋介石虽一再拉拢冯氏携手对桂，但对冯始终保持高度戒备。东线军情紧急时，他密令所部对陇海线冯军“严密预防”[202]，防止冯军乘乱直捣南京后方。冯玉祥依违两可的态度，他洞若观火，各地也不断送来有关冯、桂联络的密报，鲁涤平甚至向他报告，桂系作战命令有“左翼冯玉祥”[203] 字样，对

这一切，当时他都不动声色。但桂系之乱平靖，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便开始与冯玉祥算总账。4月，蒋介石制定对冯作战计划，规定："为防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中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204] 同时，蒋镇压桂系兵变后，还特招从武胜关南进的韩复榘到武汉，优礼有加，褒奖备至，并馈送巨款，竭力加以笼络。韩复榘平时在西北军中，冯玉祥对他和其他将领一样，呼来喝去，很少顾及个人尊严。蒋氏此举，使韩复榘感激涕零，对冯氏渐生二心。

5月初，蒋、冯冲突日渐明朗。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冯部人员全部离京，用具皆出卖殆尽，检得其文电，准备向潼关好退却。如此自扰，诚以国家为儿戏，何能革命！"[205] 8日又记有："检得冯电，其攻汉准备甚急，是诚无信罔义之人，为反革命之尤者。"[206] 15日，刘郁芬、孙良诚等冯部将领公开通电，揭起反蒋旗帜，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总司令"。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针对蒋邀其进京面商、消除误会的说法，反唇相讥："李任潮曾为蒋公前参谋总长，以息事宁人入京，旋即遭禁。李德邻、白健生均与蒋公久共患难，军事甫定，因忌生变。李、白诸公且如此，其余可知。"[207] 断然拒绝蒋的邀请。同时，冯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将山东、豫东驻军全部西撤，集中陕西、豫西待命。

冯玉祥摆出一副收缩防御的姿态，蒋介石虽阳示宽柔，多次发出通电，劝告冯玉祥及西北军及时罢手，私下里却加紧备战。他调集朱培德第一路军集中于开封、徐州之间，刘峙第二路军屯扎于信阳、襄樊一带，唐生智第五路军分布于洛阳、郑州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对冯部形成包围之势。5月8日，蒋电告刘峙等："豫方已积极备战，且已委石友三为南路总指挥……我方应积极准备作战，万勿延缓。"[208] 11日，确定对冯战斗序列，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代总司令，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军总指挥刘峙，前敌总指挥顾祝同；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前敌总指挥张发奎。当时蒋刚刚经历对桂战事，南方一

带尚不安靖，因此他虽有趁平桂之势再定西北的雄心，但又无足够信心全面与冯对垒，军事重点放在防御地位。5月17日，他致电在北方活动的何成濬，告以："此时决不主张用兵，仍求政治解决，兄当依此进行为盼。"[209] 基本可以反映他当时的真实态度。

依靠掌握中央的优势，蒋介石再施惯伎，加紧用官位、金钱收买冯部高级将领，从内部策反西北军，此前与蒋已有往还的石友三、韩复榘等成为重要策反对象。5月8日，蒋介石致电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兄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探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210] 蒋介石亲电冯部大将韩复榘，极尽拉拢之能事，自称："前在汉埠握手倾谈，备极欢洽，比承赐教，益佩公忠。"[211] 对韩虚下以待。5月18日，任命建制隶属冯玉祥的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对刘予以利诱。21日，刘镇华部率先脱离冯部，致电蒋介石，宣布就任蒋任命的"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刘、冯之间早有嫌隙，此前2月间，刘就曾致电冯氏，告以"万勿因政争而兵争"，"倘再起战祸，人心向背，遑待龟筮"[212]。因此，刘之离冯就蒋，尚属顺理成章。

给予冯玉祥致命一击的，还是韩复榘等心腹将领的倒戈。5月22日，韩复榘突然在洛阳发出通电，宣布"维护和平，拥护中央"[213]。接着，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等纷纷起而响应，冯玉祥的几十万大军，数日间，就被弄得七零八落，尤其是韩复榘的叛离，更令冯玉祥极为痛心。既扰乱了他的军事部署，也动摇了他反蒋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蒋对韩的叛冯如获至宝，当得知韩叛消息后，得意地判断："截留韩复榘致石友三电，乃知其廿二日已发通电反对冯逆，拥护中央。是冯逆军阀命运已至末日而尚不觉悟乎。"[214] 同时立即电告韩复榘："贵部集中洛阳，给养必感困难，刻令汉口中央银行发给一百万元以为接济各师饷需之用，希即派员往领。"[215]

此时，粤方对桂系残部的战争也进展顺利，受到有利形势鼓舞，蒋介石不再像争端初始那样阳示退让。5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开除冯玉祥党籍，并革除其本兼各职，授予政府讨伐全权。次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冯玉祥，对冯玉祥紧逼不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民书更是历数冯玉祥的“罪行”：“当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之际，冯逆一面与徐谦邓演达等，勾结为奸，极意挑拨；一面复阳作调人，主张集会开封，以显其举足轻重之劳。二次北伐之役，师行在途，攘功争名，百般要挟。洎乎汤山会议，初则迟迟其来，继则觖觖而去，凡以矫示矜武，无所不用其极。”(216)

冯玉祥呈现崩溃之象，蒋介石步步进逼，此时阎锡山态度至关重要。早在蒋、冯军事之争初起时，冯玉祥便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而蒋介石为拉拢阎锡山，也一再表示：“对冯方针，请兄就近观察，妥定缓急，和战皆以兄意为准。如果作战，则一切计划，亦由兄决定。”(217) 阎和冯共处北方，不愿看到冯过于壮大，影响自身的生存，所以在蒋、冯之争中对冯构成重大威胁，是冯始终不能不担心的侧背之患，当时冯的担忧，可以从其日记中窥知大概：“蒋以我军压迫桂军，以晋阎压迫我军，又以奉军压迫晋阎，其计诚狡。”(218) 不过，阎锡山并无吃掉冯玉祥的把握和雄心，因此从维持南北实力平衡、防止南京独大目标出发，他又担心冯被蒋消灭，所以阎游走于蒋、冯之间，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5月26日，在冯玉祥败象已显时，他致电冯氏，表示愿负疏解之责，劝冯“解除兵柄，还之中央，同适异国”，称其本人愿“解除一切，随兄远游，去则同去，来则同来”(219) 。阎锡山此举，不无一箭双雕之意，既压迫冯玉祥离开西北军，达到削弱冯玉祥的目的；又避免战事发生，防止西北军被消灭，蒋实力进一步壮大；同时所谓与冯共进退的表态，含蓄向蒋暗示冯阎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盟友的可能，堵住蒋介石兴兵进攻西北军的通路。

阎锡山的表态，对蒋介石形成相当制约。同时，限于实力，在拿

下桂系后，蒋介石对彻底消灭西北军并无把握，也希望在震慑冯玉祥后，顺势和平解决事变。5月25日，蒋致电冯玉祥，劝其："如愿涉历海外，增益新知，或优游休养，重辟新路，中正当为婉曲代陈于中央，必有以成全兄之志愿，保障兄之安全……至兄所部，原为国家之军队，兄如远离，则中央必爱护倍至，更何论乎一视同仁。"[220] 在南京中央强大压力和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下，27日，为保存实力，避免打一场已无取胜把握的战争，冯玉祥宣布退隐下野，通电表示："洁身引退，以谢国人。自五月廿七日起，所有各处文电，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221] 蒋介石取得与冯较量第一回合的胜利。

冯玉祥宣布退隐后，为消除其在西北军中影响，蒋介石坚持迫冯出洋。6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其攻冯部署："余决以东路军为主力，攻潼关南路；左翼由荆紫关攻西安；岳、杨、高、刘各部由秦晋北攻西安，或以岳、杨由襄樊入荆紫关。"[222] 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表示冯玉祥如能到晋，南京中央可发放西北军欠饷，但冯必须履行"离开西北地盘出洋"诺言[223]。同时，蒋任命阎锡山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出兵配合讨冯。11日，阎锡山电蒋称："如焕章能践约，则山必须偕行，以全信义；倘其爽约，北路军事山当尽力负责。"[224] 12日，蒋在日记中写到："接百川电，犹信冯逆出洋为诚，此殊可叹也。但余以愿以五百万金促其出洋，不知其果允否。拟以此款交百川，一面电告冯之部下，准备此款，只待冯到晋即可分给一月之饷。"[225] 希望通过金钱诱惑达到让冯玉祥出洋的目的。同日，蒋介石两电阎锡山，佯装不知道阎为冯缓颊的意图，坚持对冯部用兵以迫其出洋，强硬表示："焕章出洋之说，似已绝望，请兄毅然决绝，从速进战。"[226] 并明确其进攻部署："此间即拟调韩石二部到皖鲁，而以东路集中洛阳，南路集中南阳、襄樊。"[227] 16日，发布对西北军作战命令，规定对西北军第一期作战计划："为平定西北之目的，先以主力于豫省东、南两方面，取包围姿势，压迫逆敌至郑州以西地区。北路军主力乘机由晋南出清化、济源、陕州各道渡河，

与陇海线各军协取虎牢、泗水、洛阳，务在潼关以东地区将敌包围而歼灭之。”[228]

蒋介石坚持压迫冯玉祥的做法，令阎锡山不无戒惧，同时也从中觅到可乘之机。6月12日，阎锡山、唐生智、何成濬等在太原商定对冯处置办法：冯服从中央，于十日以内外游；国民政府于冯出游时取消通缉令；冯西北军归阎指挥，俟时局安定后，由中央改编。同日，阎派李书城到陕劝冯入晋。

在蒋高压姿态下，为保全西北军，使蒋无进攻借口，冯玉祥势不能再留在西北军中，阎锡山成为其可以依靠的惟一退路，双方特使频相往还。6月初，冯妻李德全赴山西运城与阎妻会面，展开夫人外交。9日，冯在日记中表示“决到运城见阎”[229]。两人的共同朋友李书城到陕后，极力劝说冯氏赴晋，与阎锡山结盟，互同进退，待机反蒋。李书城的邀请，正中冯玉祥下怀，既解了燃眉之急，又可借机与阎氏及各反蒋派联合。正如蒋介石所预测的：“以中测之，彼之来晋，实为挑拨之计居多。如挑拨不动，则再出洋。”[230] 6月21日，冯玉祥离陕赴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期许：“此后二、三集团，应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到底。”[231]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为坚阎锡山内向之心，决定任其为“西北宣抚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232]。24日，阎锡山亲到介休迎接冯玉祥，25日冯到达太原。

冯玉祥肯来太原，关键在于他深知阎锡山也具反蒋之心，希望由此结成反蒋联合阵营，阎锡山此时也竭力宣称其将遵约与冯共同出洋，以坚冯玉祥赴晋之心。25日，冯、阎联名发出出洋通电，并呈国民政府请辞本兼各职。同时，阎锡山致电何成濬，内称：“弟之出洋，已成不可易之事实，弟等出洋则国定，主座出洋则国乱。”[233] 明显与蒋拉开距离。

冯、阎在太原会晤，并约同出洋，激起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不能不慎重对待。虽然他致下属电中称其为“冯阎联合之谣”[234]，但

内心其实非常担心冯、阎联手。6月23日，蒋介石离宁北上赴北平，专程处理冯阎问题。25日，到达北平。同时，蒋通知各方发出电文挽留阎锡山，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各省政要及部队将领纷纷发出挽留通电，给足阎锡山面子，竭力拉拢阎站到自己一边。30日，阎锡山抵达北平，蒋、阎两人在北平会晤，蒋对阎备加笼络，许阎以全国陆海军副司令之职，极力向阎氏示好。蒋的另一手段是馈送重金，25日，蒋致电张寿镛，令其与中央银行交涉“筹五千万元速汇平候用”[235]，虽然这笔钱没有显示去向，但此时要求如此巨款，和对阎笼络或不无关系。阎锡山在名利双收后，逐渐软化其所谓与冯玉祥共同出洋的坚持，蒋在会谈后致陈立夫的电文中如释重负地谈到：“百川意已稍转，可望不坚决求去。”[236]

阎锡山接纳冯玉祥，本意就是要以其要挟蒋介石，蒋氏就范，则可从蒋处得益，如若不然，即联冯反蒋，以壮声势。蒋介石既然肯委曲求全，互惠互利，阎锡山对冯也就不再客气。7月3日，阎称病住院，4日退掉去日本的船票。同时，蒋介石为阎铺设台阶，5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对冯玉祥的通缉令，声称：“前因豫鲁撤兵，行为越轨，政府为申纲纪，不得不加以制裁。近据调查情形，冯玉祥养病华山，深自怨艾，遵令解除兵柄，愿即出洋游历，政府追念前劳，允宜曲示宽大。”[237] 9日，蒋介石、阎锡山和刚从东北赶来的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举行会议，决定由阎锡山全权处理西北军善后，阎利用蒋、冯之争渔利的目的达到。随即，阎锡山将冯玉祥诱骗到山西五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自己送上门的冯玉祥成为他灵活运用的一个筹码。

一心想联阎反蒋的冯玉祥，反而做了阎锡山的人质，恼怒之余，不得不善筹脱身之策。他一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潜心读书，对前来探视的晋军将领徐永昌总结说：自己落得今日下场，都是因为不读书的缘故[238]。同时暗中活动，授意西北军将领与蒋互通款曲，以从侧面对阎施压。此时，恰好西北军旧将熊斌应蒋命联络西北军诸将

领，欲趁冯氏被软禁之机以饷弹笼络、收编西北军。冯氏遂将计就计，令部将与蒋氏加紧联络，双方在南京展开谈判。据熊斌回忆："双方条件已大致谈妥，即陕甘两省地盘不动，西北军接受改编为十二个师，官兵粮饷被服一律比照中央部队待遇。"[239] 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刘郁芬、薛笃弼等频繁往来京中，蒋介石与西北军关系骤然热络。

蒋介石与西北军关系拉近，阎锡山顿时又大生恐慌，如果西北军果真投蒋，则他视为奇货的冯玉祥变得毫无价值，而且他本人也成孤家寡人，必为下一个"统一"对象无疑。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再次显示出蒋介石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强烈意向，对实力未受损的阎锡山构成巨大威胁。8月6日，阎锡山投石问路，呈请南京国民政府，辞去山西省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旋于10日发布命令，任商震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为河北省主席。蒋、阎这一试探和反试探，显示双方已在暗暗较劲。

精明的阎锡山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向冯玉祥示好，先是向冯表示："反蒋运动，本人可在暗中帮忙，绝不出名，且不赞成国民党左派办法。"[240] 接着又于9月30日亲与冯见面。据西北军将领石敬亭回忆，他去山西见冯玉祥时，"冯表示山西不宜久居。适何成濬自奉天来晋，往傅公祠，朝夕过从，相谈甚欢。而南京又派贺耀组率点验人员至西安。贺遣高级人员携函来邀余返陕，商洽部队编遣事宜。函中附中央银行二十万元支票一张"。南京与冯部将热络互动，令阎锡山大为不安，"深感奇货顿失。遂于八月中秋夜设宴于晋祠，与冯公同赏月色。阎语冯曰：'大哥，倒蒋之期已届。'即出示布告、通电二纸，且邀冯至五台山小住，以避耳目，使余回陕西发动，推阎为首领"[241]。阎锡山的反蒋表态，正是冯玉祥一直等待的佳音，他立即表态同意，双方约定，由冯部先发难，晋军随后响应。

冯、阎中秋前夜之会后，冯玉祥西北军立即中止与蒋介石的谈判，积极筹划武力反蒋。1929年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刘

郁芬等联名发出通电，历数蒋介石六大罪状，包括把持中央，专制独裁，用人惟亲，待遇不公，制造内乱等，指责蒋“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242] 随后西北军约20万人共组织九路军，兴师讨蒋。冯玉祥在幕后指挥，宋哲元代任冯玉祥总司令职，孙良诚任前敌总指挥，兵出潼关，分三路向河南进军。

冯玉祥西北军来势凶猛，不久前还准备不战而取的蒋介石不得不再启干戈，“对冯部决定痛剿”[243]。10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对宋哲元进行讨伐。13日，蒋介石出动四路大军共二十多个师，以方鼎英、刘峙、唐生智、刘镇华分任第一、第二、第五、第十一路总指挥，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各率所部及飞机队按照指定地点向平汉路及鄂西分别集中，准备将冯部“歼灭于潼关—荆紫关—白河以东地区，直驱长安，一鼓而荡平之”[244]。派何应钦、张治中分任开封、汉口两地行营主任，就近指导战事。

同时，蒋介石竭力拉拢阎锡山，阻止其与冯部合力出兵。为了拆散阎锡山、冯玉祥同盟，10月13日，蒋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汇阎百川特别费二百万元”[245]。随后派方本仁赴晋，全力活动阎锡山倒向南京。10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加委阎氏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在蒋、冯冲突一触即发时，阎锡山再次表现出首鼠两端的特性，将与冯联合出兵的承诺置诸脑后，保境安民，静观时变，对双方作出不偏不倚姿态。

10月下旬，蒋、冯在河南展开激战。冯玉祥西北军分左、中、右三路，左翼为第一路石敬亭、第二路孙良诚、第三路庞炳勋、第四路宋哲元各部，属冯军主力，入潼关沿陇海路东进。中为第五路刘汝明、第六路冯治安、第七路孙连仲各部，出荆紫关进逼南阳。右翼为第八路张维玺、第九路田金凯各部，出白河窥视襄樊。

10月26日起，冯玉祥西北军开始全线攻击，初期进展迅速，连克

洛阳、巩县、偃师、淅川、老河口等地，逼进郑州、南阳。面对冯玉祥西北军的主动进攻，蒋介石针对冯玉祥西北军给养、指挥均难以久持的弱点，避敌锋芒，待其师老兵疲再行反击。同时，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冯玉祥西北军主力集中左翼，遂令所属第五路第八、第九两军固守黑石关、登封一带阵地，以掩护主力部队之集中；第二路军对荆紫关、白河方面暂取攻势防御，主力集结于花园附近待机出击。29日，蒋致电刘峙，指示："此次我豫南各军对陕南逆部取攻势防御，利在固守以老逆部，故凡可守之城池，从速准备，闭城守御，不惟南阳襄樊，即邓县新野二城，亦速备守城之具，待敌之疲敝而后决取攻势时，则积极进展。如逆军闭城固守，则我不攻其坚城，派最小部队以监视城逆，而以主力照原定目标越城进取。"[246] 31日，蒋介石转道抵武昌后赴河南前线督师。时人回忆："此时，蒋总司令处境艰苦，四面八方事故层出不穷，人心浮动，有些部队又未尽可靠。他亲到刘黑七部驻在地禹县和刘春霖驻在地白沙，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刘黑七向总司令说：咱是老粗，只知服从总司令，不晓得别的。总司令送他六挺机枪，一万银圆。于是刘黑七安定了。蒋总司令又由刘黑七处突然来到刘春霖部，该部最为动摇，蒋总司令的突然莅临，出乎刘春霖的意料，刘大骇，遂决心服从听命。蒋总司令至郑州，下车站后走半里多路到刘镇华司令部……总司令镇定如故，若无其事。他到郑州走了这一趟，立即使郑州的人心跟着他跑了。"[247] 蒋介石此时指挥虽在战略指导上多有干预，但对前线将领尚能放手，多次指示："前方情形时刻变化，当由前方高级将领独断，不必事事请命。"[248] 表示："中不遥制。"[249]

与此同时，冯玉祥西北军的总司令却仍被阎锡山拘留建安村，指挥战事的宋哲元和孙良诚之间，又素有隔阂，难以协调，极大影响冯玉祥西北军战斗力的发挥。30日，唐生智指挥第五路军全线反攻，冯玉祥西北军攻势遇挫。

11月3日，一直保持观望的阎锡山与专程赶到太原的何应钦会

面，在蒋200万元的重金拉拢下，阎表态“极愿协助主座讨逆，以求实现统一”[250]，同时电蒋愿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5日，阎锡山正式通电就职。随后，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山西公开站到南京一方。4日，南京方面乘势组织总攻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杨杰、何成濬、刘兴分任左、中、右路指挥，向冯军发动全线反攻，冯军顽强抵抗，蒋军虽有进展，但未能很快击破冯军防线。蒋介石日记记有：“河南作战地形最多为断绝地，而寨堡俨然如城池，数里或十里一寨，敌人以此为据点，以图持久抵抗，是甚难处置。”[251] 11月12日和17日，蒋军又两次发起总攻击。蒋冯两军在登封、临汝一带短兵相接，激烈搏杀，冯玉祥西北军终于难以支持，16日、17日两日，蒋军先后占领登封、临汝。蒋介石通电全国报捷，宣称：“逆军经此两役，精锐既尽丧失，内部尤多携贰，我军乘胜追剿，当不难指日荡平。”[252] 20日，蒋军攻入洛阳，“俘虏一万三千余人”[253]，冯军已呈崩溃之势。22日，蒋致电阎锡山，极力劝说阎出兵邀击冯部以断其归路，并以冯部溃败之混乱状况相诱：“其退却部队之零乱，未有如此之甚者。”[254]

11月下旬，冯玉祥西北军不得不将主力回撤到潼关以西，据关自守，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告失败。是役，冯玉祥西北军败状惨烈。参加讨冯之役的刘茂恩回忆，西北军溃退时，丢弃大批车辆，“败兵感到终日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还要日夜疲于奔命，看到长官们还有汽车可坐，在这种怨恨的情况下，于是群起拦阻汽车，甚至有以枪向长官射击，藉以发泄愤懑的情绪，而乘坐汽车的将领也只有弃车随众步行了。”[255] 不过，冯玉祥西北军的骁勇善战也给在前线指挥战事的刘峙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役看到对方刘汝明部，于石花街之役，败退之余，犹能极力抵抗，无论战况如何惨烈，精神如何疲困，还能以手榴弹大刀肉搏，沉着应战，若非平时训练有素，阖能臻此。”[256]

二　征讨张发奎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1929年，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三大”，给了“改组派”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一记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经过多次挫败，他们深切感到军事反蒋的重要，于是在上海总部成立军事委员会，积极准备从军事上与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一些地方军人在蒋的政治压力下，也深感自身缺乏政治号召力，希望利用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治声望对抗蒋介石，因而派代表常驻上海，与“改组派”总部取得联系，共同反蒋。

1929年5月，“改组派”总部集结一些地方实力派代表十余人及各种反蒋小组织一百多个，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革命大同盟”，发起所谓“护党”运动。6月，陈公博到香港，策动军事反蒋，决定成立“护党救国军”。随后，陈公博留香港策动广西的俞作柏与鄂西的张发奎；上海总部则与华中、华北的实力派联络。

张发奎部于1927年退出广东，奉调北上，参加“二次北伐”的后期进军。1928年8月在泰安整军，张发奎部被缩编为第四师。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又被蒋介石启用，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桂系失败后，张发奎率部进驻鄂西宜昌、沙市。张发奎曾长期追随汪精卫，在政治上效忠于汪，当汪通过“改组派”组织反蒋运动时，张积极投身其中，强烈主张反蒋运动“在此局面之下，不用军事恐不易成功”[257]。

9月初，蒋介石以贯彻编遣实施会议决议为名，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与新一师曹万顺部换防。9日，他致电刘峙，部署两师换防事宜：“规定自删日起开始输送，限本月内各师输送完毕……其接防地点在陇海路东段，自徐州至海州，或先集中皖中，但与第四师务必言明。”[258] 接下来，蒋介石在有关电文中吞吞吐吐，11日，蒋电刘峙，令其派干员往沙市、宜昌等处，“将我接防部队到达时刻及何旅何团之队号及第四师乘船东下启程时刻，与某旅某团所乘何船，确实调查，随时电报于兄及南京总部，其通电密码可将靖密电本改名京密，发给该员，则与京与汉皆可通用”[259]。动作鬼鬼祟祟，可见其

不无谋张之心。事后海军战报也称："职部于九月初间，闻张逆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有密谋叛变情事。当于月之三日，调咸宁舰由沪开宁，准备一切，以便荆河行军之用。并于七日，增调'威胜'舰由沪赶宁，添装煤粮毕，于九日向汉口出发。计咸宁、威胜两舰，于十、十一两日，先后驰抵汉口，以便护送驻汉陆军，前往荆河防备。"[260] 张发奎本就对桂系兵败后仅任第四师师长怀有不满，又对蒋将其部队调离宜昌真实意图抱有疑虑，因此拒不从命。派出使者与广西及汪精卫接触，密谋间道湖南入广西，与俞作柏会合，然后合攻广东，在广东东山再起。9月17日，张发奎将开到宜昌的曹万顺新一师缴械，改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番号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并发出通电，宣布三项主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违法乱纪，稍有党的认识者类能言之……应请立即解散，再行依法召集"；"继续反帝反共的工作"；敦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完成革命"[261]。19日，蒋介石日记记有接到张发奎通电后的感想："正午接张逆发奎筱电，叛变本为意中事，惟恐牵动大局，心甚不安。惟照预定计划进行而已。"[262]

张发奎起兵之后，率部渡长江南下，进入湘西石门、慈利、常德、大庸一带。蒋介石一面令刘峙率部追击，一面急电何键予以阻截："张发奎师集中长江南岸枝江、宜都一带，似有窜常德、湘西至广西模样。请兄速派得力部队在湘西严密防范，如其过境，应节节痛击。"[263] 为尽快击垮张发奎部，蒋高额悬赏："俘获连长一名，奖一千元，营长五千元，副旅长、团长一万元，旅长、副师长二万元，师长五万元。"[264] 许诺："张逆如果得早歼灭，则百万之数，中正可以负责拨付。"[265]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罢免张发奎职务，令粤系将领黄镇球接任第四师师长[266]。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何键亦来电，截击张逆，刻闻湘边已开火，心始稍安。以后调遣军队，斟酌稳妥，或可无患矣。"[267] 不过，何键虽然宣称全力堵截张发奎部，并俘获张部副旅长、团长及"士兵二千余名"[268]，但并不愿过多消耗实力，当张发奎部选择南下广西与俞作柏等会合时，

其堵截行动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蒋桂战争末期，南京政府扶植俞作柏、李明瑞控制广西，广西形成俞作柏主政、李明瑞主军事的局面[269]。1929年8月1日，俞作柏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270]。俞作柏、李明瑞虽然在蒋桂战争中靠拢蒋介石，但并不真心拥蒋，历史上和汪精卫关系密切，因此，其当政后，广西很快出现与蒋离心的趋势。当张发奎部南进途中，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与俞作柏密洽，望俞作柏、李明瑞与张部合作攻粤，开创新局面，双方很快取得默契。9月24日，汪精卫联合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二人在香港通电反蒋，为俞、张联合行动造势。汪精卫等在通电中号召武装扫逆，声言："此次对蒋中正之抗争，在本党方面为组织及纲领之所关，在国家方面则为民主与独裁之所系。委员等所致讨者为个人，所争取者为政制。应使此次抗争之结果，依党治而深植民主之基础，使专制独裁永不复现。"[271]

对俞作柏在广西采取激进措施及靠拢"改组派"，蒋介石早有风闻。5月初，何应钦就报告，冯玉祥准备拉拢与汪精卫"有关系之部队唐生智俞作柏等"[272]，俞的政治倾向应非秘密。对此，蒋曾电俞，要派吴铁城去广西调查，或由俞亲到南京解释，但俞都加以拒绝。9月9日，蒋介石致电李明瑞称："闻健侯（俞作柏字健侯）兄好用反对中央之人，并为人所惑，以为中央失败在即者。若不根据事实，调查真相，恐为反动派买空卖空者所误。"[273] 张发奎南下后，蒋判断其"必连桂俞"[274]，为防范广西方面与张发奎联合行动，蒋明令俞作柏、李明瑞到南京听训。同时，着手准备撤换俞作柏。

9月23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商讨撤换俞作柏事："撤换俞作柏时，最好直委吕焕炎为主席，率队进驻南宁。否则亦须其担任第八路副总指挥，以指挥驻桂各部，俾可从速解决桂局。"[275] 26日，蒋介石在致酆悌电中告以："桂俞不可信，但杨腾辉与吕焕炎效忠中央，如其有异常，必能一举扑灭之。但其至今无表示，中央只待其变耳。"[276] 在蒋压迫下，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发表通电，响应

张发奎反蒋行动，俞作柏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并表示欢迎张发奎回桂。

对俞作柏的反蒋，蒋介石早有应对预案，采取收买吕焕炎等，中立李明瑞，专对俞作柏的策略，企图分化广西反蒋势力，“不用兵而定桂局”[277]。10月2日蒋介石下令免俞作柏本兼各职，任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编遣分区主任，又委李明瑞的嫡系将领为独立第五师师长。同时，陈济棠遵蒋的命令，调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沿西江进入广西；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也率部开往广东配合陈济棠部作战。吕焕炎、杨腾辉本为李宗仁、白崇禧旧部，对俞作柏背叛桂系早存不满，此时乐于向蒋靠拢。吕焕炎发表通电，欢迎粤军入桂，杨腾辉等也现不稳之势，致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服从命令”[278]。

10月4日，粤军香翰屏、余汉谋部进抵梧州，广东海军在陈策率领下进入广西境内。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免去李明瑞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陈济棠）、杨腾辉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黄权为第十五师师长。9日，陈济棠令粤军发起总攻，李明瑞、俞作柏所部纷纷投降，13日，吕、杨进入南宁。

吕焕炎虽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但并无控制广西的实力，转而希望李宗仁、白崇禧等回桂收拾局面，黄绍竑回忆：“吕焕炎虽也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只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领导全部，因此他虽受了南京的任命，实际上仍旧受我们的指挥。”[279]“改组派”在广西策划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也主动与黄绍竑等联络，表明双方重归于好，共同反蒋。汪精卫与黄绍竑在香港会晤，决定桂系与张发奎联合，东下进取广东。于是，张发奎率部南下，在湘西受到李抱冰、陈渠珍等部截击，10月底，突破湘军防线进至湘粤桂边。11月22日，张发奎到梧州与黄绍竑会面，商定实现军事合作。随后，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先后回到广西，召集旧部，按李宗仁的说法，当时情况是：“惟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

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民国十八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280)

11月上旬，李宗仁在南宁宣布组织“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桂系复振声势。同时，张发奎也率部进入广西。24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商定成立桂张联军，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张发奎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第八路军总司令，两军联合共进广东：“四军由广宁、四会、清远入花县、崇化，担任左翼。七军、十五军由西江经肇庆，攻击军田粤汉路正面，并分兵一路，攻击三水。”(281) 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玉林、贵县至南宁之线。11月下旬，桂张军分别从横石、洲心圩渡过北江，攻击前进。

对张桂部队的反攻，蒋介石、陈济棠早有布置。12月4日，专程到粤组织广州行营的何应钦下令谭道源、余汉谋、陈继承、香翰屏、李扬敬各师兵分五路向桂张军发起反击，蔡廷锴师留守作预备队。同时，蒋介石令何键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8日至13日，两军在新田、安里及军田一线展开激战，双方战场达80华里。张桂军如蒋介石所言“同床异梦，各不愿牺牲”(282)，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经过激烈战斗，张桂军失败，退回广西，“大部即退桂林，一部分退柳州”(283)。

张桂军退回广西后，粤军追击至广西境内作战，19日攻占梧州。接着，南路陈济棠第八路军进攻南宁，北路朱绍良部进攻桂林。22日，留守后方的吕焕炎在玉林发表讨桂通电，桂系陷入前后夹攻之中。此时，北方唐生智反蒋，蒋的应付重心转向北方，广州行营撤销，何应钦返回武汉行营主持，桂系压力稍有减轻。张桂军得以全力

平定吕焕炎之叛，迫使吕逃往广州。

1930年1月中旬，张桂联军在平乐一带击退陈济棠进攻。15日，李宗仁在平乐对张桂联军进行整编，恢复第四、第七、第十五军番号。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张发奎第四军、杨腾辉第七军、黄绍竑第十五军。

1930年2月，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及张发奎的第四军与粤军主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鼐三个师在北流一带决战，激战三昼夜，据陈济棠密电所言战况为："我八路部队自寒晨，在北流与逆敌黄绍雄【竑】所率梁朝玑、许宗武、封赫鲁等部、张发奎全部接触，激战三昼夜。本早，敌以六团兵力来攻，势极猛烈，战至正午，经将敌全线击溃，夺取步枪约三千杆，俘虏二千余。毙敌尸骸遍野，我军亦伤亡颇多。"(284) 就在这时，粤系首领胡汉民因与蒋介石爆发冲突，被软禁于南京汤山，粤、桂达成休战协议，粤军撤兵。第二次粤桂战争（又称桂张攻粤之战或两广战争）结束。

总起来看，1929年下半年，南北各地正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各地以反蒋为中心的暴力冲突层出不穷。但由于力量分散，各怀心思，这段时期，蒋介石可谓无往不胜，而反蒋派则屡战屡败。对此，陈公博评论道："倘若冯焕章、阎百川、唐孟潇一齐动作，我们逆料立刻可以成功；但阎百川是不愿意冯、唐发动的，因为冯、唐胜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长的地位。唐孟潇也不愿意冯单独成功的，因为冯据有中原，唐便不能作军人的新兴领袖。因此冯起而唐击之，唐起而阎又蹑之，结果使蒋先生逐个击破。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285)

三　平定唐生智、石友三之变

1929年4月蒋、桂武汉之战大获全胜及5月的蒋、冯对峙不战而胜后，蒋介石信心高涨，重提年初被中断的编遣计划。7月18日，蒋

介石呈请国民政府，提议“召集各编遣区办事处正副主任委员及各编遣特派员”[286] 于8月1日续开编遣会议，以完成编遣实施计划。

7月23日至31日，参谋总长朱培德主持召开编遣会议筹备会。8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未出席会议。在重创桂系、压服冯系的背景下，蒋介石完全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仅用六天即告结束。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实施编遣奖惩条例》、《陆军编制原则》、《点验实施规则》、《安置编余官兵实施法》、《裁兵协会章程》等十六个文件，规定各编遣区军队数量压缩到七个至九个师，每师1.1万人，比原规定少两个至四个师。全国的军队编成的总数由原来现定的五十个师扩增到六十五个师，总人数由50多万增加到80万。编遣期内，军费为1300万元。会议正式撤销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第四编遣区，在郑州、汉口、长沙、南京、开封五处设置直属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分区办事处和经理分处，对冯、桂所属之河南、两湖、广西等部队实施改编，脱离了冯玉祥的韩复榘的部队列入中央直辖分区改编。会议通过的《编遣区修正案》打破了这年1月编遣会议上确定的四个集团军按比例编遣的原则，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控制的编遣区增加，实力膨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力量被大大削弱。

8月6日，编遣委员会发布《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明确表态：“要把现有的部队大裁大减，这不是求治缓急的问题，简直是我们救死的问题。”[287] 《宣言》列举了国内对编遣会议的种种疑虑和批评：其一，编遣军队能否实施当视政府的权威如何，政府有了充分的权威，中央决定的办法就能施行，若是政府权威不足，纵再三会议也无济于事；其二，现有的军队，至少当达200万人以上。应遣置者占60%，未免求治太急；其三，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若无准备，就想编遣，把数万冗官、百万冗兵悉令遣散，到处流而为匪，恐

社会之损失更大；其四，编遣实施会议只注重集团势力均衡，不注重部队素质，蹈了国际缩军的覆辙。对国内这些疑虑和批评，《宣言》一一作出批驳，关于政府权威问题，强调："民主与集权是连缀一贯的，是缺一不可的，这是现行政制最高之原则，亦即本党组织唯一之生命。"关于求治太急问题，指出即使按照裁减的兵员数额和军费开支也要达到世界的最高率，"竭我们的国力，只能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皆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的缩减，这就表示毫无能力"。关于裁兵安置问题，认为："照现在的国家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麻，即行裁遣。"关于集团势力问题，《宣言》辩解编遣"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互相质剂，尚无不得其平之虞。况一经编成之后，皆直辖于中央，更不必怀挟集团成见"[288]。《宣言》对批评意见的列举和反驳，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在编遣问题上的是非纠葛，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实施者也有实施者的道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诉诸武力外，很难相信当事各方能作出其他的选择。何况武力解决本就是蒋介石心仪的方案，1929年，当幕僚向他建议"于此半年至一年之间，专与反动派奋斗，然后再谈建设"时，蒋介石极为欣赏："引为知己，先获我心。"[289]

1929年年中的编遣会议，蒋介石挟胜利之威，在编遣上施以雷霆之势，不仅使冯玉祥、阎锡山等拥有一定实力的军事集团首领深感威胁，还使一批不属于蒋介石亲信的高中级军事将领人心惶惶。这一时期，各地有高中级将领多次举起叛旗，令蒋应接不暇，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唐生智、石友三及张发奎的反蒋事件。

在蒋介石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战争中，唐生智、石友三先后投到蒋一方。唐生智在蒋、桂战争期间协助蒋分化桂系在华北的部队后，被委以第五路军总指挥，又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度享有尊荣地位。石友三在蒋、冯战争中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虽然

因为利益关系，唐、石与蒋结合，但蒋介石和唐生智等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利用，不是真正的合作。8月编遣会议后，南京中央削弱地方实力派趋向愈益明显，使唐、石等痛感自身出路渺茫，不甘坐以待毙，唐生智、石友三最终起而反蒋和这一背景直接相关。正如冯玉祥所言："唐生智、陈调元、刘镇华等反对，表面是反对三全大会，实则因为编遣以后，总指挥、军长名义全行取消，军人又不准兼省委。"(290)

唐生智的政治倾向本为拥汪反蒋，北伐期间，其与蒋介石之间有很深的嫌隙，两人难有交集。蒋、桂战争中，为对付桂系，蒋起用唐生智，唐也借此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双方貌合神离。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步步打击，更使唐生智为之自危。1929年7月，冯玉祥日记提到："唐现已觉悟，两次派代表来，均甚诚恳。"(291) 唐生智的反蒋之路有迹可循。

1929年10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名义，积极策动各地的反蒋运动。分别委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李宗仁等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至第八路军总司令。受到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鼓舞，唐生智积极联系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各地大小实力派头目共同反蒋。唐与阎且达成协议，推阎为首领，阎为唐提供50万元军费，唐先发动，阎即通电响应。

石友三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将领，投蒋叛冯是为得到蒋许诺之金钱和安徽省主席的高官。1929年10月16日，为在对冯战争中争取石友三、韩复榘的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11月24日，蒋介石亲到安庆出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的就职典礼。此时，两广地区反蒋力量实现大联合，汪精卫与黄绍竑于11月在香港晤面，捐弃前嫌，约定张发奎部与桂系联合，共同抗击陈济棠的粤军。随后，黄绍竑与白崇禧、李宗仁相继潜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

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李宗仁自兼第八路军总司令，张发奎任第三路军总司令，两军会合，向广东发起反攻。

为支援粤军陈济棠部，11月2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协助指挥对桂战事，派第三、第八师南下，声援粤军。同时，趁出席石友三就职典礼之机，动员石部南下应援广东。万耀煌回忆，蒋介石“想选派一能战的部队守广州，使守广州的第八路得能出击广西。熊式辉建议派石友三部一师去广州，说石部可守能战。石友三也自告奋勇，愿全军南下”[292]。蒋介石动员石部南下之举看起来获得成功，蒋介石在致唐生智电中称：“中刻抵安庆，晤石汉章，愿率全部援粤，中已照准。两粤得此劲旅，当不足平矣。前方诸事，请兄以敏慎断行，不必顾虑一切也。”[293] 同时蒋又致电宋子文，令其“速雇外国公司海船十二艘到浦口待运”[294]。

蒋介石令石部南下，虽不无分割石与韩复榘部联系，以消除其隐患的目的，但广东军事紧张确是事实，在南京空虚情况下，更不可能如某些回忆所言欲在浦口解决石部。对石友三而言，蒋甫任其为安徽省主席即调其南下，使其不能不怀疑蒋是否真有予以皖省的诚心，而南下长途跋涉，更难防蒋包藏祸心。因此，南下的动议，不能不引起石友三的疑虑。加之当石部按照命令于浦口集中分乘木船经沪转换大轮赴粤时，“改组派乘机造谣，说上船后将被解散，石听了后很起疑心。恰巧蒋总司令又在此时打来电话催促石部赶快登船，石更害怕起来”[295]。仓皇之下，石友三决定揭旗反蒋，密电约唐起兵，以石部从浦口攻南京，唐部由郑州南取武汉，协同反蒋。

1929年12月2日，石部于浦口起兵炮击南京，通电公布蒋之罪状，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各方武装同志，共起图存”[296]。3日，于滁县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宣称要“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297]。17日，在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

蒋介石拉拢唐、石，本为借助他们的力量搞垮桂军和冯玉祥西北军，对投靠他的唐、石，并没有予以充分信任。但石友三、唐生智迅速举起反蒋大旗，仍在相当程度上出乎其意外。11月18日，在击败冯玉祥西北军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唐生智还大加赞赏："孟潇来见，精神甚佳，彼此欢慰特甚。勇智兼备之将少有也，而复能忠心于党，诚难得也。"[298] 而石友三在离南京近在咫尺的浦口发动兵变，更使南京为之震动。

当石友三宣布反蒋时，蒋介石既担心石友三趁南京空虚，直捣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又担心曾与石同进退的韩复榘继起跟进，皖、鲁同声相应，威胁整个东南地区的安全。此时，他还在冀望驻河南的唐生智部能协助平定叛乱。12月3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杨杰："此时石既叛变，韩必动摇，我军腹背受敌，危险万状。惟有先定开封，击破韩部，马必中立，石乃孤立，则事易收拾，此为死中求生唯一活着。故已电孟潇，如能照办，请兄等力助之。"[299] 4日，再电杨杰，强调："当此生死攸关之际，对唐总指挥更须绝对服从，以一事权。"[300] 殊不料，此时唐生智反蒋已在紧锣密鼓酝酿。3日，唐生智与刘文辉等联名通电，竭力推崇汪精卫、张发奎。5日，在郑州召集各机关团体集会，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包括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三大；呼吁汪、蒋、阎合作；指责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把持中央，致蒋掩其所长，现其所短；为张发奎评功摆好；所部放弃南京方面颁予的第五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一切非法党部，一律解散[301]。同日，唐又发出"歌电"，声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在郑州行营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当唐生智反蒋已经表面化时，蒋介石还在对唐作最后努力，亲电唐生智："此时我前方将士，惟有以至信互助、共同生死、绝对服从之精神，方得死中求生，完成使命，不可为反动派谣言所挑拨。"[302]

石友三、唐生智携手反蒋，加上韩复榘蠢蠢欲动，鲁、豫、皖联

成一线，对南京国民政府安危形成巨大威胁。12月3日，蒋介石一面在对唐生智做着最后的争取，一面召集军政大员紧急会议，商讨对付石友三、唐生智的对策。决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派赵戴文回山西、吴铁城至东北，分别活动阎锡山、张学良，争取阎、张反对“改组派”；对石部，主要利用韩复榘、马鸿逵部牵制，只派追兵，不予重点攻击；对唐部立即调集主力，全力进行歼击。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唐逆生智电，叛变之迹显露，其目的在要求和平让出武汉，并以空言恫吓，虚张声势，幸有防备也。如此石逆友三必来攻京，广东尚未决战，处置似难而实较易。我必固守京、汉二据点，并以长江运输之便，不患失守。至其他各处之变故与失地，则置不问。人以为忧，吾反以此为乐也。”蒋特别提示：“益之态度暧昧，百川或为此变之背景也。”(303)

由于唐生智部集中于河南中部，唐部反蒋，使进抵洛阳一线的南京方面左翼军就此被唐部分割，成为唐部与冯玉祥西北军挤压下的孤军，蒋对此极为担心：“甚恐唐逆以其主力由巩县攻我洛阳，以孙逆扼我临汝、自由归路。”(304) 在致左翼军杨杰等将领的电文中竭力为此孤军打气：“此时前方各部陷于孤立无援之苦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惟有诸兄团结一致，服从杨指挥官命令，不顾一切以排除万难。即至四面受敌，亦惟有同心一德，死中求生耳。”(305) 蒋的这一弱点，其实也是唐生智可以争取突破的重要环节。

不过，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并无周密计划，尤其是石友三，本来就是因一时惊恐，匆忙举旗，根本无周密计划。因此，在南京空虚时，他却于浦口隔岸骚扰后退却至蚌埠间逡巡不进，明显没有与蒋一决高低的决心。唐、石公开反蒋后，一直保持联络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态度各异。胡宗铎在湖北施南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七路军总司令，与唐、石遥相呼应，但相隔太远，影响不大。韩复榘在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后，虽通电声援：“顷读唐、石两总指挥通电，爱党爱国爱民之旨，溢于楮墨，凡属袍泽，宜表同情。复榘惟有督率所部，本

斯主张，一致进行，以期达到和平目的而已。”[306] 但并未有进一步动作。尤其唐生智发动反蒋时联络冯玉祥部，更引起西北军叛将韩复榘乃至石友三的侧目，使其与唐保持距离，反而与蒋介石渐趋接近。

石友三在发动反蒋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驻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渡江进驻浦口，调驻山东的陈调元南下，南北夹击石友三；一面派驻徐州的马福祥，以结拜弟兄身份出面，对石安抚、利诱。石在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之际，早早就开始动摇。发动事变后几天即“电张之江、李鸣钟来求赦免”[307]。12月8日，蒋介石在致何应钦电中颇有把握地表示：“石已悔过投诚，并与韩愿任灭唐使命，为将功赎罪之计，故以后专对唐逆较易为力也。”[308]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有把握，是因为当天他已接到石友三“请求恕谅”电文，蒋顺水推舟，“准其驻蚌，不撤其职”[309]。其后，双方频繁接触，13日，蒋介石密电杨杰：“韩、石派员来京，愿灭唐以自赎，中正允之。”[310] 石友三方面的威胁由此基本化解。

石友三低头求饶后，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付唐生智。他一面令武汉守军全力防御，“勿稍犹豫”，在军事上全力防范唐生智的进攻[311]；一面稳住孤悬敌后的杂牌军将领，给杨杰空运“中交钞票一百万元”[312]，令其多分给徐源泉、王金钰、王均等师。同时极力争取阎锡山，使之在侧翼威胁唐生智。

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背党叛国，附逆有据”[313] 罪名宣布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通缉拿办。同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令其与阎锡山交涉，设法接济前方被断绝联系的南京中央军部队，“一切由中央负责偿还”[314]。同时，赵戴文回到太原，代表蒋游说阎锡山，阎因唐起兵时未能如约拥护其为领袖，已认为唐言而无信，于是接受赵之劝说，助蒋反“改组派”反唐，表示与蒋“共同奋斗”[315]。此时，张学良经蒋派出的吴铁城活动，决定助蒋反唐。20日，阎张联合通电，指责“改组派”“乘机窃发，煽惑宣传，无所不至”，表示“拥护中央统一”[316]。蒋又以阎支配河南省政为条件，商定以韩复榘、马鸿

逵部扼守陇海路东段，蒋调刘峙部沿平汉线北上，阎派孙楚、杨爱源部分从河北、山西南下，合击唐军。由此蒋、阎、张关系迅速打通，尤其是阎锡山态度的改变，使全局形势迅速朝着有利蒋介石方向变化。因此，当唐生智掀起反蒋声浪，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孤，进退两难。

大局基本稳住后，南京方面组成讨逆军，对唐生智发起军事攻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刘峙任第二路总指挥，率武汉方面部队沿平汉路北上攻郑州；阎锡山兼北路军总指挥，率晋军由河北、山西向南进攻。18日，蒋通告阎锡山："已通令豫西各部归兄节制指挥，务请兄即日进驻郑州，俾得军中有主，以慰军心。对韩、石亦另发一电，令其归兄节制。"[317] 20日，开始对唐军发起总攻。

唐生智反蒋，基干部队有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三师、门炳岳旅、安俊才旅等约十万人，"集结许（昌）、郾（城）间，其前进部队已占领黄山坡、确山、驻马店一带，有沿铁道线南下，直取武汉之企图"[318]。但是，唐生智初期行动"计划不臧，动作迟慢"[319]，在豫南逡巡不进，使蒋介石获得从容布置的时间，当阎锡山表明态度后，唐立即陷入困境。

阎锡山态度转变后，原来与唐联名通电讨蒋的将领随即矢口否认，一些列名唐生智反蒋声明的"二、五两路军将领，如范石生、徐源泉、王金钰、王均、杨虎城等通电四方，声明被诬，一政【致】拥护中央"[320]。12月21日，石友三通电表示"主张和平，反对改组派"[321]。撤销"护党救国军"名义，恢复第十三路军番号。唐军陷入孤军作战。22日，晋军孙楚部进入郑州，向南压迫。与此同时，刘峙下达总攻击令，自南向北进攻的夏斗寅、蒋鼎文两师进入驻马店地区，位于郾城一带的唐军处于蒋、阎南北夹击之中。

12月下旬，经过激战，蒋军攻占遂平、汝南，阎军入河南进抵郑

州。1930年1月1日，驻南阳杨虎城部冯钦哉旅乘风雪之夜袭击唐军供应站驻马店，唐生智虽率主力极力反攻，但因兵力不足，节节败退。4日，阎锡山在郑州就任讨逆军副总司令，晋军纷纷南下，唐部腹背受敌，更呈全线崩溃之势。同日，蒋介石致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逆部既经动摇，应即由诸兄率同所部全力出击，耐冻耐苦，奋勇歼敌，方能表示我革命军之精神，此其时也。万不可以雪厚难进，致使功亏一篑。"[322] 第二路分左、右两纵队展开追击作战："蒋军长鼎文指挥第一、第六、第九各师与右纵队向谭庄、郾城、新店方面追击。杨军长虎城指挥第七军为左纵队，向北舞渡方面追击。"[323] 蒋军先后攻克郾城、新郑等地，"唐部精锐至此歼灭殆尽"[324]。9日，唐通电将所部交给刘兴负责，自己离开部队，随后化装潜逃，经开封至天津租界隐居。10日，蒋军攻占郾城。13日，刘兴率部缴械，听候改编。蒋介石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

第四节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与失败

一　蒋、阎矛盾的加剧与激化

在1929年发生的蒋桂、蒋冯、蒋唐（生智）、蒋张（发奎）战争中，蒋介石纵横捭阖，采取政治分化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给桂、冯、张、唐以不同程度的打击。桂系的第四集团军瓦解，冯玉祥西北军则发生分化，张发奎部遭严重损失，唐生智部被彻底消灭。蒋介石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南京政府实际控制区域由蒋桂战争前的五省一市，增加到中原大战前的湘、鄂、豫、鲁、苏、皖、浙、赣、闽、沪十省一市。广东李济深的12万大军包括海军舰队，冯玉祥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部，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部都投到蒋介石麾下，蒋介石

的军事实力比蒋桂战争前增加了一倍。

蒋介石力量的空前增长，同时也使反蒋的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趋向联合。遭到蒋介石打击的地方实力派，力量不断削弱。即使没受到蒋介石打击的阎锡山，与蒋介石比差距也更大了。失败的教训和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联合起来抗拒蒋介石的武力统一。1930年初开始的日益激化的蒋、阎矛盾成了地方势力联合反蒋的导火线。

在1929年蒋介石打击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中，阎锡山或作壁上观，或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站在蒋介石一边。阎锡山损人利己的政策帮助了蒋介石，暂时避免了与蒋的冲突，保全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是阎锡山要营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蒋介石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终究要和蒋发生冲突，尤其是讨唐战争前后，双方的较量逐渐把阎推到了前台。

讨唐战争最后时刻，阎锡山大举出兵河南，加速了唐生智的溃败。不过，此时唐实际已经势穷力蹙，阎锡山趁此南下，不无欲借遵蒋讨唐之命名义，将善后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借此将河南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企图。阎部南下后，唐生智随即于1930年1月7日晨向阎请降，而阎也“复电允许，并委任刘兴为第八军军长”[(325)]。对于阎的意图，蒋介石自是了然于胸，6日当阎锡山委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前敌总指挥时，他就致电刘峙告以：“阎之委韩，恐是驱韩，我军到郾城后，应观察局势，再定行止。”[(326)]对阎深具戒心。尤其是阎直接处置唐部的行为，更使蒋大为光火，在当天的日记中，他痛斥：“以封建思想与腐旧手段，以愚弄人心，阴谋党国，彼自以为能慷他人之慨以利一己，其和能成，然而险狠亦堪受矣。何党国不幸一至于此哉。”[(327)]8日，蒋回电阎锡山，表示：“对西北问题，请兄主持，惟对中央通缉之人，应另予处置也。”[(328)]实际是否定了阎处置唐部的权力。

对蒋介石的表态，阎锡山并未妥协。围绕着唐部的处置和河南的

归属，蒋、阎间开始明争暗斗。9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以唐生智已遵命引退为由，要求蒋令“前方军队，停止攻击”[329]。10日，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表示：“弟意唐一日不远离其队伍，其行踪一日不明，则未可一日疏防。”[330]再次拒绝了阎锡山停止进攻的要求。同日，在给刘镇华的电文中，蒋要刘劝告阎锡山：“积极肃清河南匪军，而调韩（复榘）主皖省，石（友三）驻皖北，雪亚（刘镇华字雪亚）主豫政……如其尚欲利用杂色军队以牵制中央，则养痈遗患，适足自害以害人而已。”[331]而阎锡山则在讨唐结束后，以郑州绅商名义“挽留孙楚军队”[332]。河南的微妙形势，正如时人所言：“所堪注意者，勿宁谓为仍在中原。盖对唐之战虽告结束，而河南一省驻兵四十万，虽无问题亦即问题也。”[333]

由于双方冲突激化，1930年1月中旬，阎锡山离开郑州。1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百川以号令不行，昨晚秘密离郑回晋矣。”[334]阎锡山撒手回晋，意味着蒋、阎双方此前复杂而又奇特的合作将告一段落，双方将进入激烈交锋时期。对阎锡山的态度，樊崧甫有段回忆，可资参考：“冯、唐既败，阎益孤立，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乘机怂恿阎起兵反蒋。日本军阀鉴于中国的统一，将不利于他的侵略，亦支持阎发动内战。阎觉得此时争取领袖的机会到了，在唐生智败退漯河时，即跃跃欲动。因唐部解决得很快，才停顿少时，但仍信使四出，拉拢各方，准备及时行动。”[335]

在蒋、阎矛盾激化时，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态度对蒋、阎反目起了促进作用。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9年5月和10月的两次反蒋战争中遭到损失，但元气仍在，仍控制着陕西、甘肃、青海广大地区，拥兵30万。冯玉祥的辖区陕西与阎锡山的根据地山西毗邻，这导致了冯、阎、蒋之间微妙的关系。冯玉祥担心阎锡山抄其后路，阎锡山也担心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夹击，蒋介石则更担心阎锡山、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把冯玉祥骗到山西软禁后，周旋于冯玉祥、蒋介石之间，对蒋挟冯自重，对冯则声言共同反蒋。蒋、冯对阎锡山欲借此控制西北的意图

都非常清楚，心中各有打算。蒋介石惟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也决不愿西北地区落入阎锡山的手里，壮大阎锡山的力量。冯玉祥则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

蒋、唐战争结束后，蒋、阎矛盾逐渐尖锐。冯玉祥意识到其一心致力的联合反蒋已到关键时刻，力劝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告诫阎锡山“毒蛇蜇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336]。为促使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冯玉祥令西北军实施逼阎的策略。鹿钟麟奉命回陕西代理总司令，12月17日打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旗号，同时秘密派人到南京面见何应钦，表达联合南京对付阎锡山的意图。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谋划合作倒阎。接获上述消息后，阎锡山十分紧张，担心蒋与西北军联合对付自己，不得不向冯寻求联合，冯玉祥的内劝外逼策略奏效。2月2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利害未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遂不能不币厚言甘，转而求援于我。”[337]

冯、阎携手之势已成时，蒋介石才发现上当，在1930年1月底的日记中写道：“畅卿（杨永泰字畅卿）来谈冯阎合作之经过：冯恨阎之失约，乃派陈某又来投蒋也。余拟发宣言，西北部队令诚心服从阎之节制，不必再思为人利用……屏蔽西北，政府决无其他之人可以信任，而其他之人应知政府主旨之所在，不可妄思挑拨之术，以乱党国。”“中央力求休养生息，安定国家，一意对外，如无破坏统一，背叛党国，称兵作乱者，则中央量力之所及，以补助各省经济政治之发展。至其军队之多寡，则中央任其自决，不强加干涉也。”[338]蒋这一设想让步不可谓不大，只是对阎锡山来说，这已经有点来得太晚了。

冯与西北军促阎反蒋同时，国民党内各地方派系和一些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实力的各方大小军头，都派出代表聚集太原，向阎锡山接头游说，表示惟阎马首是瞻。负责联系的代表包括“西山会议派”的邹

鲁，“改组派”的李锡九，桂系的麦焕章、何民魂，韩复榘部刘熙众，石友三部邓崇熙，四川代表王绍文以及刘桂堂部、刘珍年部、孙殿英部、万选才部、周凤歧部、任应岐部等。各大小派系的拥戴和催促对阎形成反蒋可为的看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蒋、唐战争后，阎锡山于1930年1月16日由河南回到太原。紧随其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就职宣誓仪式。此前，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曾通电宣誓就职，但没有举行宣誓仪式。蒋介石试图以阎锡山宣誓就职表明阎绝对服从中央，但阎并不就范，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就职宣誓仪式，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是党国的本身。非有此健全的本身，不能图党国的发展，如党分派别，国倡南北，是将整个的党变为破碎，统一的国形成分裂，陷党国于大不幸，此为锡山所最惊心者。”[339] 词锋直指南京中央和蒋介石。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阎锡山的一举一动。2月9日致电阎锡山表示：“今日国家危状已达极点，革命成败与党国存亡应由我两人共负此责。弟与我兄如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之所不容也。”[340] 暗示阎锡山要慎重不要异动。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针对阎锡山等主张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的宣传，联合发表《告军人书》，声明中央根本政策为和平统一，影射阎锡山挑拨离间，利用他人：“利用别人作工具，以谋一己之私利，此乃无赖之所为。”[341] 同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批判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指出：“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提出解决国事的办法只有“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342]。

阎锡山要蒋下野的复电，明显使其难堪，蒋在日记中的反应

是："山西人囿于见闻，惯于消极方法以捣乱，故自元年至十六年止，北京政府几无一不为其所倒。去年以此术欺冯，而冯受其欺，入其彀中，乃又欲加之于中正，是诚不知其愚拙而反自作聪明也。"[343] 12日，蒋介石发出复电，坚决表示："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力，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并对阎锡山反唇相讥曰："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344] 13日，阎锡山又复蒋介石12日电，批驳蒋介石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力说，强调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阎进而质问蒋介石："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345] 阎锡山的复电直戳蒋介石的痛处，令蒋十分恼怒，在日记中矢言"不再复其电"[346]。14日，蒋公开发表谈话，坚决表示"用舍进退，不能不以党国之命令为依归，决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议以变更决议，违反法令"[347]。15日，双方笔战升级，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及吴稚晖等人电阎指责其名曰止乱，"何异造乱"[348]。阎锡山立即复电谭、胡、王等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隐喻谭、胡、王等人为蒋帮凶。

为清除阎锡山电报对军队的影响，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军人书，高举中央旗号，辨明"讨伐"与"内战"的区别，告诫军人："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而制裁反侧，勘定内乱，是为讨伐，而非内战。"[349] 18日，谭、胡、王三人复电答阎16日、17日电，请阎锡山像日本萨长诸藩那样，"高拱中枢，弼成训政"[350]。

2月19日，阎锡山再电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以"答复者四、请教者四、商榷者二、建议者二"为题，全面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中央是乱之源。二、有武力支配党就有武力护党。

三、党治国家也有挟党专制的可能。四、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必不能治。五、提出党员总投票以解决党争。六、四个集团军交于党而不能交于个人。七、建议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同时摆脱军权入元老院或机枢院。20日，阎锡山第四次电蒋介石，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和国军编遣予以抨击。提出“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至于编遣，“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起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351]。

阎锡山的政治攻势十分凌厉，使蒋介石不能不放弃“不再复其电”的誓言，再次上阵。22日，蒋亲电阎锡山强硬表示，阎逼其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正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声言如有反抗中央者，他本人定当“戡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352]。24日，阎锡山复蒋电，口气同样强硬，强调：“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电文直指蒋介石的痛处，指出：三全大会代表四百〇六人，纯粹选出者只有七十三人，其他均为指定或圈定，“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决议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353]。2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指责阎锡山诬蔑三全大会是别有用心，是“以此为倡乱之口实”，嘲讽其“不知有党者，而高谈党之主体”[354]。话已至此，双方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

随着电报战的升级，蒋、阎双方都在积极采取行动。

阎锡山方面派出使者到各地活动。最重要的是与冯玉祥结成联盟。冯玉祥至山西联络阎锡山反蒋，两次被阎所算，阎很担心西北军记取前嫌，所以1930年1月底开始积极拉拢西北军。1月26日答应借10万银元给西北军，作为年关费用。2月中旬又拨50万元给西北军。

2月22日，冯玉祥在太原的汽车也被允准与建安村通车，以示合作的诚意。27日下午，阎锡山偕孔庚到建安村会晤冯玉祥，冯、阎沟通了意见。28日，冯玉祥到太原协商反蒋大计。3月8日，阎锡山请冯玉祥回潼关主持西北军事。冯玉祥为坚阎氏反蒋之心，把妻、女留在太原，随即秘密离开太原，9日抵潼关。

冯玉祥力主与阎锡山合作倒蒋，其部下绝大多数人见阎锡山首鼠两端，言而无信，都不愿与阎锡山合作，主张先与蒋介石合作倒阎，再回头倒蒋。石敬亭回忆，1930年2月鹿钟麟等西北军将领于潼关开会，主张对阎用兵，“决定战略为：孙良诚由茅津渡河，攻其右；宋哲元由大庆关渡河捣其左；余跨风陵渡穿其腹；并派快速部队由军渡过河，刺其心。一面积极与南京联系”[355]。为消除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敌对情绪，冯玉祥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2月20日致电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高级将领，解释反蒋的意义及自己的反蒋决心，认为“此次反蒋，关系国家兴衰，人民生死，全军存亡，至重且大”。“余在此虽不自由，然使蒋能倒，即死亦快慰。否则，虽得自由，心亦不安”。以示自己与蒋介石势不两立。敦促各将领“捐弃前嫌，追随阎公，迅速动员，万不可迟，更勿为蒋方谣言所分化”[356]。在冯玉祥的坚持下，宋哲元、孙连仲等将领虽然不愿与阎合作反蒋，也只能勉力服从。

冯、阎结盟，鼓舞了各个反蒋派别，增加了各反蒋派的信心。与冯玉祥结盟的同时，阎锡山从各个方面进行反蒋的部署：一、下令把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地区的属于国民党中央的机关、党报、企业报刊一律查封、接收；控制该地与外地的邮政、铁路、公路，宣布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二、自立税则，收取税费，接收了天津海关，截留天津海关每月代征的约70万元海关税及附税；推行山西纸币，下令各地使用晋钞；预征钱粮到1933年；发行6000万军用票充作军费。三、外交上向北平、天津外国驻华领事馆等机构发出照会，声明保护外侨，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四、积极联系“改组派”、“西山

会议派”以及其他反蒋派别，调解“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矛盾，准备在北平组织政府，造成南北对抗的局面。为此，阎、冯极力敦请汪精卫出面主持“党务问题”[357]，希望借重汪精卫的资历在政治上和南京方面抗衡。

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清楚，反蒋的关键还在于军事行动。早在2月中旬，经过各方协商，就酝酿出了军事领导机构。反蒋军队统称为“中华民国军”，阎锡山被推戴为“中华民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3月15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商震、黄绍竑领衔发表反蒋通电，拥戴冯、阎等人就职，宣布蒋介石的罪状，表示誓除此贼。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广西桂平通电就职。阎、冯、李把反蒋军队编成了八个方面军：以张桂联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副之，白崇禧为总参谋长，下辖三路军：第一路军张发奎，第二路军白崇禧，第三路军黄绍竑，共有五六万人。先以第一、二路军由桂入湘，然后第三路军跟进，与冯阎会师武汉。以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分兵六路，出潼关，入河南。孙良诚为第一路军总指挥，庞炳勋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张维玺为第六路军总指挥，共有兵力30万。阎锡山的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总兵力20万人。亦分兵六路：孙楚部为第一路，傅作义部为第二路，杨效欧部为第三路，张荫梧部为第四路，孙殿英部为第五路，万选才部为第六路。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部为第七方面军。河南樊钟秀部为第八方面军。（张学良、刘文辉、何键均未就职）

反蒋联军的战略部署是：以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南向北，直趋武汉；西北军承担平汉路；晋军承担津浦路；陇海路由冯、阎军联合

承担。战略计划是：冯、阎联军沿陇海路东进；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占济南，与沿陇海路东进的冯、阎联军会师徐州，进逼南京。沿平汉路南下的西北军与沿粤汉路北上的桂张联军，南北夹击湖北的蒋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总体上是以陇海线为中心，津浦、平汉线为两翼，中心取攻势防御，两翼游动，待机而进，以武汉、徐州为目标，一旦拿下两地，则全线推进，一鼓而捣南京。南京方面作战报告对其计划的描述是："查阎、冯、李联合为逆，实力约五十余万，加之附逆之杂军土匪，约近二十万，为苏俄张目之赤匪，更于湘、鄂、闽、赣各地乘机蠢动。当十九年四五月之交，逆军区分为四个方面军，李宗仁领第一方面军约五六万人，由广西分扰湘、粤，冯玉祥领第二方面军约二十万余人；以张维玺一部出陕南，分窥南阳、襄樊。自率孙良诚三路，由潼、陕东犯洛阳、郑州，拟从平汉、陇海两路分窥武汉、徐州。而宋哲元、刘郁芬等分率陕陇部队为第一、第二预备军，倾巢续进，势尤猖獗。阎逆自兼第三方面军约十五万人，分为四路，以徐永昌指挥一、三两路经平汉路向阳武、中牟、延津、开封一带转进至兰封、归德。傅作义指挥第二路由津浦南犯，图与石友三犄角取鲁。石友三领第四方面军，约四五万人，已经渡河，进至东明、临濮附近，图犯曹县、济宁。另有万选才、孙殿英、刘桂棠、樊钟秀、任应岐、王太等部，约十余万人，分据归德、亳州、扶沟、许昌等地，为逆前驱。卢兴邦、高桂滋两部变兵，分据福州、临沂，与逆遥相呼应。"(358)

面对反蒋派的凶猛势头，蒋介石冷静以对。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时局虽有发展，但策略难定，联冯制阎，或联阎制冯，或双方并联，使其互相牵制而听命于中央。阎阴谋，专博旧社会之同情，联旧派以反对中央；冯阳忿，迎合新潮派之趋向，联新派以反对中央。但冯之虚伪，阎之奸诈，皆已信用扫地。前以为用阎制冯为失察者，今是否其时也，详审之。"(359) 10日，得到阎锡山放冯玉祥回陕消息后，他再在日记中表示："阎之用心可谓险狠，而不知其利害关系，最后冯必攻阎也。今日策略，用冯攻阎，用阎攻冯，或联阎以

收拾杂军皆可，但阎非绝路不能悔祸，而中央不必利用他人，先安顿韩、石，使其不为人利用则幸矣。”[360] 总体而言，对北方反蒋联盟渐成气候的形势，他并不惊慌，这一局势事实也早在其预料之中，3月20日，他携宋美龄回溪口老家，悠游山林。按照他自己日记中的说法：“当此反动派联合捣蒋，而我乃回里，必与反动派以造谣机会。实则我心目中本无敌人也。”[361]

在反蒋派紧锣密鼓策划联合反蒋时，蒋介石也在谋算对付反蒋联合阵线的方策。按照惯例，他继续采取软硬兼施方针，一方面针对阎锡山动摇不定的特性，派人规劝阎氏，尤其让阎的老友赵戴文到太原游说，晓以利害：“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们内部对他信仰很深，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赵还指出阎的反蒋大联合实际是乌合之众，为利而来，趋利而往。赵戴文的劝说虽未改变阎氏的反蒋决心，但一度使阎发生动摇，在日后战争进行中对阎的心态也产生了微妙影响。

另一方面，蒋介石更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政治上充分利用中央权威向反蒋派发动反攻。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蒋介石发表《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声称“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一幕”[362]。7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宣称冯、阎不灭，国无宁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开除阎锡山的党籍；训令华北各地的党员，努力奋斗，铲除反动的阎锡山、冯玉祥。同时发表《告第三编遣区武装同志书》，劝告阎锡山的部下“服膺主义，辨别顺逆，不为利诱”[363]。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了《讨伐阎锡山的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战争，南京方面没有颁发通缉令，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解释为：“舍免不能自主，用人亦不能由己。今日之大乱，皆由于武人之报复手段。通缉私仇之人太多，亦由于文人意气用事，排除异己太甚所致。中正竟为人负报仇排人之责，而用舍

毫无自主，此党国之所以不安也。受制异甚，诚哉，无自由不能安宁秩序之格言。今日欲求安宁秩序而必欲多加通缉，使人不能安宁，岂不自相背理乎，决意舍免通缉之令也。”[364] 这段话，虽然不一定代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但其所指责的对象却颇值重视，隐含了中原大战后蒋、胡冲突的潜因。

军事准备方面，早在2月上旬蒋阎双方开始电报战时，蒋介石即致电何应钦、何成濬、刘峙、陈调元等布置对西北军事，计划：“我方决先取守势，如果彼先启衅，则我平汉、陇海两路先会取汴、郑与黑石关之线为第一期，次则由津浦、平汉两路会取平、津为第二期……第三期则规取晋察绥也。”[365] 此后，南京方面军事动作不断。3月初，蒋介石开始针对晋方行动作出具体军事部署。6日，任命韩复榘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石友三为平汉路方面军总指挥，马鸿逵、顾祝同为津浦路方面军正副指挥。3月15日，阎、冯发出反蒋通电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陈调元的第一路军限3月28日以前集中济南附近；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3月20日以前集中在兖州、济宁附近；刘峙的第二路军限3月22日以前将第一军集中在徐州、兖州，第三军集中在宿县、涡阳，第八军集中在阜阳、太和，第十一师驻蚌埠；何成濬的第五路军限3月25日以前在确山、信阳、武胜，漯河、西平、驻马店，枣阳、樊城三个地区集中；杨虎城的第十七师在南阳附近集中；范石生的第五十一师、第四十师在襄樊集中。

4月8日，蒋介石到徐州召集前方将领刘峙、韩复榘、顾祝同等开会，研究作战部署，随后又辗转于南京、武汉、河南等地，与当地将领商讨作战计划。蒋介石确定的作战目标是：对陇海线采取主攻，平汉线副攻，津浦线实行攻势防御，力争在陇海线一举摧垮冯阎军队主力，奠定胜局。根据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将所部编成三个军团，韩复榘任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山东黄河南岸，防止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驻徐州、宿县等地，率主力部队进攻陇海线；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拒守平汉路许昌以南地区，并对西

北军侧背保持威胁；陈调元部担任总预备队。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武汉地区的军事。这一计划具体表述为："本军基于先求击破敌之主力，而后乘势解决余逆之目的，决以第二军团由陇海西进，占领归德、开封一带。第三军团同时由平汉方面出击，合力攻取郑州、洛阳。而第一军团除派第二十六军扫除鲁西渡河之逆部外，余对津浦路北段及沿黄河南岸暂取佯攻姿势，相继驱逐鲁北之逆军。俟豫境逆军主力击溃后，即会同各军团分途并进，协同东北边防军肃清河北、陕、甘、晋、察、绥之逆部。另以陈济棠部第八路军朱绍良部、第六军何键部、第四路一部及刘和鼎、张贞二师，分别解决桂、闽溃军，以靖后方。何主任应钦主持武汉行营，就近处理武汉方面军事。"[366] 为了筹措军费，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办理军队编遣，将筹集到的编遣费移作军费。4月17日还决定发行3000万元公债。

部署既定，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出通电，誓师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决定5月11日总攻。反蒋派方面，3月17日冯玉祥下达动员令。20日，石友三、孙殿英叛蒋，攻陷了陇海线上的重镇归德。26日，万选才部自郑州东进，于30日占领了开封。战争已拉开序幕。5月3日，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召开会议，相约阎锡山主持反蒋政治，冯玉祥主持反蒋军事。

5月11日，蒋介石按预定的计划发起全面进攻，大战正式爆发。因为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中原大战"。

三　陇海、平汉、津浦各路战况

中原大战以8月15日蒋介石军夺回济南为标志，战争形势呈现出前后两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5月到8月，第二阶段是8月中旬到战争结束。战争主要在陇海、平汉、津浦、粤汉四条铁路线为中心的地区展开。

大战的第一阶段，陇海线是主战场。刘峙的第二军团辖步兵十三个师，加上骑兵师、第二炮兵团、铁甲车队、航空第四队及侦察队配备在该地区。反蒋派方面，陇海线由晋军与西北军共同承担。布置在第一线的是万选才、石友三、孙殿英等游杂部队。万选才的部队驻守在陇海线的战略要地归德，孙殿英的部队驻守在位于陇海、津浦三角地带威胁着徐州侧背的亳州，石友三驻防新乡东部地区。归德、亳州均是要地。

陇海线上的战争以双方争夺归德开始。5月11日，刘峙以自己的第一师、陈继承的第三师、陈诚的第十一师猛攻归德守军万选才部。5月中旬，蒋介石亲赴前方督战，催促大军由陇海路西进，希望一举击垮反蒋联军。刘峙回忆，蒋介石“往往将最快必须三天到达之行程，限于一天到达。我的参谋长刘耀扬在目睹蒋公观看地图，初定三天，继改两天，终限一天之情形，而对我说：‘蒋公看地图是越看越近。’”[367] 5月18日刘峙部占领归德，俘虏万选才部“五千多人”[368]。蒋军趁势向宁陵进攻，晋军孙楚、杨效欧部开到宁陵、万集一线增援万选才。21日，万选才部将刘茂恩与陈诚的十一师联系好后，突然劫持万选才，调转枪口反攻晋军。刘峙部乘势猛攻，又占领宁陵、睢县、民权等地，晋军杨效欧部损失惨重。24日，退到民权、西陵寺、潮庄一线，凭坚固的工事与蒋军激战。

蒋介石虽然急于奏功，反蒋联军也在此进行了顽强抵抗，阎锡山集中全军精锐，与蒋军死拼，冯玉祥也急令西北军主力庞炳勋、孙良诚、吉鸿昌、宋哲元部增援，并以一部迂回蒋军侧后，5月26日突然发起猛攻。孙部有生力量的加入，使战场形势迅速逆转，蒋军大批部队被消灭，被迫向山东方面溃退。31日，冯军孙大章骑兵突袭归德马牧集机场，正在附近督师的蒋介石，险些做了冯军的俘虏。战线推进到杞县、兰封一线，呈胶着状态。南京方面未能取得陇海战场的主动权，在对峙中伤亡惨重。仅5月29日一天，顾祝同师第四旅的第七、第八、第十团伤亡官兵“几及三分之二”[369]。6月11日，蒋军从兰、

杞一线后撤至民权、睢县一线，意图在此与冯军决战，冯军不甘示弱，立即以主力跟进，双方在此继续形成对峙。17日，蒋军刘峙等部由杞县、太康间进攻郑州、开封，冯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故意让开杞县、太康一线，诱蒋军在此进入包围圈。蒋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蒋军左侧背兜抄。蒋介石发现冯军意图后，急从平汉线调上官云相部增援，“抄其侧背”[370]，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以分冯军兵力。蒋本人亲赴柳河车站督战，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已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蒋军损失惨重，虽避免被歼命运，但在向周口、商丘方向溃退中，损失惨重。

7月6日，蒋介石下令把右自蔡洼、旧考城，左至白楼、顺河集，横亘二百余里的陇海正面战场分成六个守备区，以范熙绩的四十六师、阮肇昌的五十五师为第一守备区，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胡祖玉的第五师为第二守备区，赵观涛的第六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为第三守备区。第一、第二、第三守备区统归右翼军总指挥陈调元全权负责。阮勋的第六十五师、徐朋云的第六十六师、武庭麟的第六十七师为第四守备区，以刘茂恩为司令。毛炳文的第八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为第五守备区。上官云相的第九军为第六守备区。第四、第五、第六守备区统归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负责。胡宗南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一军、金汉鼎的第十六军、蒋光鼐的第四军为总预备队，由顾祝同任总指挥。自此，陇海战场进入相持状态。

陇海正面战场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部从新乡以东渡过黄河，占领了东明、考城，向济宁方向推进。韩复榘第一军团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第二十六军范熙绩部奉命拦截石友三。石友三“以阵地持久之战”[371]，坚守考城，牵制蒋军兵力，马鸿逵等也不愿全力进攻，双方在此形成对峙。

因蒋介石采用陇海、平汉两战场取攻势，津浦战场取守势的策略，主力集结在陇海路，这就便利了晋军南下。阎锡山亲自指挥傅作

义的第二路军、张荫梧的第四路军沿津浦路南下。此时，韩复榘不积极作战，稍一接触即向鲁东撤退，晋军遂于6月25日攻占济南。之后，傅作义部向东追击韩复榘，张荫梧南下攻占了泰安。晋军控制了津浦战场的主动权。

平汉路战场，早在大战全面爆发前，西北军即与何成濬指挥的湖北、河南等省的杂牌军展开争夺战。据守许昌的樊钟秀和据守西华、扶沟的刘桂堂加入反蒋战线，使蒋军在平汉路战场陷入被动。5月11日蒋介石下令总攻后，平汉路蒋军的计划是沿平汉线分三路北进，与陇海战场的第二军团协同行动。北进的部署是：以王金钰的第九军为中路，沿平汉铁道线北进，先击溃临颍、许昌之间的庞炳勋部，向许昌进攻；以蒋鼎文的第二军为右路军，在铁道的东侧，一部经太康、杞县北向兰封，一部经扶沟、通许、陈留向开封攻击前进；以徐源泉的第十军为左路军，在铁道以西地区，经禹县、密县向郑州挺进。目标是攻占许昌、开封、郑州等重镇。5月25日南京军占领临颍，在许昌附近与西北军展开大战。守许昌的樊钟秀被飞机炸死后，冯玉祥以吉鸿昌代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亲自指挥许昌大战。蒋介石对平汉路也寄予厚望，致电前方将领告以："我军决胜负惟有平汉路进展之一着。"[372] 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蒋军未能抵挡住冯军的攻势，6月12日，何成濬被迫下令退却，全部退到漯河以南地区。

中原战场反蒋军颇有进展时，5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领桂张联军，由桂平、定县北上。由于湖南的何键消极抵抗，桂张联军长驱直入湖南。6月4日占长沙，6月10日占岳阳、平江。李宗仁、白崇禧原计划是率领广西的军队倾巢而出，与阎、冯会师武汉，所以将所部分成了两个梯队，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一梯队，辖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先行出动，黄绍竑率两个教导队及辎重队为第二梯队跟进。

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进入湖南后，蒋介石急令陈济棠派兵截断其后路，与两湖的蒋军夹击桂张联军。李宗仁、白崇禧占岳阳时，陈

济棠派蒋光鼐、蔡廷锴乘虚占领衡阳，把广西的军队截成前后两段。此时黄绍竑的队伍才到零陵，无力夺回衡阳，乃电李宗仁回师，拟击破粤军后，再一同北进。6月17日，李、白部放弃长沙南退，试图击破陈济棠部，与黄会师。桂张军和蒋军在衡阳展开激战，何键追述：当时张发奎部“转身回攻衡州。并且李宗仁、白崇禧等，向部下宣言，广东已有陈济棠在粤边堵截，广西又已经李明瑞占领，均不能去，目前惟一的生路，惟有反攻衡州……鼓励所部，由祈常转折，再攻衡州。此时衡州八路军与五十三师，共有四师之众，迎头痛击，四路军又从侧面抄出，三方合围，几天之内，毙敌四五千人。逆军主力已破，不能支持，乃下令退却”[373]。7月1日李、白、张由衡阳一线撤出，往广西方向退却。反蒋的第一方面军较早地结束了战事。

6月初，西北军在平汉战场取得初步胜利后，没有乘势南下，与桂张联军合击武汉，而是将主力调到陇海战场，桂张联军又被迫回师打通归路，这样就丧失了双方会师夺取武汉的战机。因西北军把主力抽调到陇海战场，平汉战场蒋军所受到的压力减轻，结果何成濬虽败退到漯河以南地区，西北军也无力再组织进攻，平汉战场与陇海战场一样呈僵持局面。津浦路的晋军虽然于6月25日占领了济南，威胁徐州，但是在占领徐州后，却兵分两路：一路东进追击不积极作战的韩复榘，另一路分兵南下。两路分兵后，力量不集中，也没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针对陇海线久攻不下的实际状况，蒋介石决定，在陇海线改取守势，收缩阵地，集中部队，固守待机；精锐部队转用于津浦线，避实击虚，力争从反蒋联军力量相对较弱的津浦线打开缺口。蒋介石判断：“时阎逆主力集中津浦，冯逆主力集中陇海，其后方征调已空。桂逆主力已在湘境覆没，残余回桂。湘鄂赣三省，已令何主任应钦总制三省清剿事宜，后方无虑。平汉线与鄂北两方逆亦无力反攻。此后只须在津浦、陇海两路任破其一即可摧枯拉朽。”[374] “惟陇海以【已】经数月持久作战，逆之阵地，愈曾巩固，即以优势兵力攻击，

犹虑急切难下”，津浦路“以我军实力图之，必可一举摧破”[375]。

蒋介石开始逐步调整战略部署。7月1日，任命贺耀组为徐州行营主任，指挥马鸿逵、夏斗寅等部扼守兖州、曲阜，施中诚、陈孝恩、梁鸿恩等旅扼守济宁、徐州，与退守胶济线的韩复榘倚为犄角，静候主力部队的到来。7月7日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率领胡宗南的第一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孙桐萱的第二十师、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陆续由陇海战场转至滕县、邹县、兖州、曲阜、汶上等地。同时，与桂张联军作战获胜的蒋光鼐、蔡廷锴、钱大钧、金汉鼎也悉数调至津浦路战场。至7月26日，蒋介石军队主力在津浦路战场集中完毕。这一时期，是蒋介石最困难时期，7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之时，惟有以必死之心，守定不动，以维系军心，抵抗叛逆，如至万不得已时，则惟有一死，以殉党国而已。”[376] 30日，蒋介石亲抵兖州，召集刘峙等确定攻击计划。8月1日，蒋军“以刘峙为总指挥，以陈诚、夏斗寅、马鸿逵、胡宗南各师为中央军，由兖州前方，沿铁路进攻”[377]，同时以蒋光鼐、蔡廷锴等部为左翼，杨胜治等部为右翼，三路齐发，向津浦线晋军发起全面进攻。

反蒋派方面，阎锡山指挥的晋军占济南后因分兵导致攻兖州受挫，便在津浦路取守势，而由傅作义的大军向东进攻胶济线的韩复榘，违背了原定的南下徐州与陇海战场配合取南京的计划。与此同时，从6月以来蒋军一直猛攻孙殿英部防守的亳州，蒋介石任王均为攻亳总指挥，令其“务必攻克亳城”[378]。7月22日，由于西北军援军被蒋军阻截，守军在蒋军持续进攻下力尽难支，被迫放弃亳州。亳州位于陇海、津浦路三角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亳州攻下后，反蒋军对宁方军队侧后威胁大大削弱，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由此可“后顾无虑”[379]。致韩复榘电中同样乐观表示：“此次陇海阵线更行稳固，而平汉逆军亦为我第十军击溃退至许昌以北，则以后兵力即可使用裕如，不患不足矣。”[380] 攻克亳州后，蒋介石立即把该地部队调至津浦路。

战机稍纵即逝，反蒋派方面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一度占据优势，但因没有趁机扩大战果，给蒋介石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机会。随着津浦战场蒋军的反攻，反蒋军逐渐陷入被动。8月4日，蒋介石电陈诚，指示："逆军既溃决不能抵抗，且晋逆溃退后决难收拾，望第十一师由山口祝阳镇经泰山东北山径之仲宫镇与西紫镇直攻济南，先入济南城之部队赏洋二十万元。所应注意者，严令各官长督率士兵，不准其出入商埠与外侨商店，并由师部派兵保护各领事馆与教堂为要。黄河铁桥亦须严密保护。"(381) 15日，蒋军夺回济南。阎锡山不得不把晋军撤到黄河以北。蒋光鼐军渡河向德州追击。

津浦战事紧张的时候，8月1日、2日、3日阎锡山连电冯玉祥，请西北军在陇海战场发动攻势，以解津浦战场晋军之危。冯玉祥了解到陇海战场蒋军的主力确已北调津浦战场后，便下令西北军全部出击。8月1日，冯玉祥通电各将领："望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先下归德者赏洋百万元，直下徐州者加赏二百万元，有敢迟疑不前，畏缩不进者，军法俱在，决不宽容。"(382) 然而，津浦线全线出击时，蒋介石预料冯军必乘陇海线蒋军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在陇海线发动攻势，故仍然坐镇柳河，指挥陇海线战事。6日宋哲元精锐部队加入陇海战场，全力向蒋军左翼猛扑，双方均以此为关系成败的决定之战，都竭尽全力，战场上杀得"尸积成阜，血红沟渠"(383)。8月正值北方雨季，9日至11日，阵地上连降大雨，双方在泥泞中苦战，冯军虽然有所进展，但始终未能摧垮蒋军防线。此时，官兵厌战情绪甚浓，有些地区"枪炮虽整天地响着，却谁也不打谁，骗骗当官的耳朵"。"有一次我旅派一连兵进攻冯军阵地，有少数进到外壕边上。一个兵受伤跌到壕中，三个士兵跳下去救他。冯军有人叫打打打，另一人说：他们大头儿争天下，管我们小兵什么事，不要打，让他们把伤兵抬回去吧，终于安全地退回来。"(384) 济南攻克后，津浦线蒋军大批回师陇海线协助作战，冯军攻势终告瓦解，蒋介石涉险渡过难关。

津浦战场战事结束后，蒋介石立即将津浦路的蒋军主力调至陇

海、平汉战场。蒋介石的计划是在陇海阵地的正面吸引西北军，在平汉战场采取积极的攻击，一路沿平汉路东取开封，截断兰封、杞县的西北军的退路；一路从平汉路西抄洛阳，断潼陕、郑汴之交通，不让西北军回西北，将其全部歼灭。8月31日，蒋介石在商丘发布作战命令，因各军没有集中完毕，迟至9月1日开始全面总攻。

冯玉祥面对蒋军的总攻，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仍打算组织郑州会战，扭转败局。他把西北军集结于郑州外围，9月15日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以大部兵力攻济南，以一部兵力攻归德，运2万兵至郑州作总预备队，参加郑州会战。阎锡山已丧失斗志，不仅不配合，反而密令陇海线上归冯玉祥指挥的徐永昌渡河北撤。此时，蒋军各部进展顺利，前锋已逼近郑州、洛阳，蒋介石通电乐观估计“战事不久或可告一段落”[385]。西北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一直在双方间以中立态度出现的张学良，见时机已经成熟，终于于9月18日统兵入关援蒋，冯、阎腹背受敌。

四　北平“扩大会议”的召开

在军事上与蒋对垒时，反蒋派政治上也积极争取主动，与蒋争夺政治上的正当性。3月28日，“改组派”代表陈公博、王法勤与“西山会议派”代表邹鲁、谢持及阎锡山代表赵丕廉等在北平开会，商议由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组织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因陈公博与邹鲁互相争粤、沪第二届法统问题，会谈无结果。

随着前方军事的全面展开，建立起名正言顺的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争取人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冯、阎都急切希望“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息争，尽快召开扩大会议，产生政府机关，协助军事上的反蒋活动。阎锡山派人请时在北平的“西山会议派”成员覃振予以调解。覃振避开“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正统之争，提议由国民党中央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中的革命分子组成中

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战争时期由党部委员会负责政治，整理党务，党的问题留待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鉴于反蒋各方急于达成政治上的表面团结，陈公博也不再坚持所谓法统问题："谓现在无论新旧老少，凡不满南京政府者，均可联合一起，共同对付，各找出路。至纯粹党章论，恐不足以资号召。此事各军事领袖，最为赞成。"[386] 5月4日至8日，覃振、陈公博、茅祖权、胡宗铎等人在天津协商，议定由各方代表召开非常会议，产生党部的扩大会议，然后由党部扩大会议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原则为：对于党务，则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事，则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5月20日，反蒋派的各方代表在北平开会讨论发表联合宣言与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问题，关于联合宣言和会议的名称，陈公博与邹鲁又发生争执，陈公博主张使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名称，邹鲁、谢持坚决反对。为了使扩大会议早日召开，6月1日，汪精卫发出"东电"，对"西山会议派"和陈公博均作出批评，希望迅速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6月12日，汪精卫又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必要》一文，对不利于召开扩大会议的各种内部争论作了抨击，督促成立扩大会议。阎锡山也派代表与各方代表协商，积极调解各派的矛盾。

经过汪精卫、阎锡山及反蒋各方的共同努力，7月13日，反蒋各派在北平联合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过联合宣言，成立办事处。汪精卫等在《联名宣言》中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权制变为个人独裁。宣言称："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会议提出根据孙中山北上宣言及遗嘱，召集国民会议；否认南京方面已召集的国民党三全大会，要求在最短期间依法召开国民党"三大"，"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387]。

8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成立扩大会议的组织机构，推定常务委员会委员七人：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扩大会议宣言指责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表示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后决于最短期内按照孙中山遗教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筹备地方自治，组织民意机关，区分党政军权限，实施中央与地方分权等[388]。针对南京方面训政的种种问题，宣言提出七点意见：（一）孙中山深信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是救国惟一方案，必能于国民会议获得通过，党治不特不因国民会议而生扞格，且将因此日臻发扬。（二）训政时代必有约法，犹之宪政时代必有宪法。约法规定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使政府对于人民之干涉，有其不可逾越之限度，人民权利始有保障。（三）地方自治而不使民众参加，则自治没有意义；地方自治不能实行，亦无民主可言。（四）蒋介石倡党政军三位一体之说，军权高于一切，党政日益混淆，扩大会议成立后，将划分中央党部与政府之权限，各保其独立之地位。（五）训政以来，以中央党部代替国民会议，以各级地方党部代替各地方会议，一切措施，皆以一党专制之名，行一人专制之实。此为民主政治之大敌。（六）曲解党治，一切官吏非党人不用，导致党员官僚化，且屏绝党外人才出路。（七）建国大纲，采中央、地方均权制度，今中央用集权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389]。

召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成立政府。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为组织政府制定依据。大纲突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权力，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军事委员会委员人选均由中央党部推定，防范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390]。同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委员名单。推举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13日，“扩大会议”通过《实行训政规约》，规定：“在训政期间，铁路、邮电等，由中央政府管理，其余各项政治，依据中央法令，悉归省直接处理。”[391]这是建立强势地方、弱势中央的标本性文件。虽然该文件主观上希望引

领向地方自治的方向，但在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背景下，也不无重复民初地方军阀割据的可能。15日，“扩大会议”成立包括罗文幹、周鲠生等六名法学家在内的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询意见。其间，曾计划聘请胡适为起草委员，胡也认真地和罗做过讨论，意见“大致相投”[392]。

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此时反蒋派的军事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后，9月19日“扩大会议”由北平迁往太原。汪精卫、邹鲁等眼看失败在即，决定抓紧时间演出最后一幕，向南京政权作一次“悲壮”的宣传战。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继续开会，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所拟《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全文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用以作为“宪法未颁布以前的根本大法”。

《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规定建设中华民国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训政时期筹备地方自治，中央与省采均权制度，地方自治成立后，即实行宪政，宪政期间设立五院。草案以较大篇幅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声称以法律直接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不受侵害，其所规定的人民人身、财产、居住、集会、结社、言论等“私权”和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公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民主意识。草案规定：“人民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不得逮捕拘留、审问或处罚”；“凡逮捕拘留人民之命令，除现行犯外，限于法院”。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任意抓人；当政府逮捕了嫌疑犯而法院宣判无罪或免诉的情况下，即使有被害人的告发，“其拘留时间应由国家照其本人身份酌给相当之赔偿”。这些条款显然针对着南京政权随意抓人、捕人而立。草案对人民自由权规定也较充分，比如“人民有集会之自由，经有负责发起之人向该管官署声明，如无携带武器或直接扰乱社会秩序情事时，不得干涉”；“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经法院审判确定，不得禁止发刊”；“人民有结社之自由，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经该管署查明时，不得封闭”。针对军人干政，条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依法

律有诉讼于法院之权，除依戒严所规定外，不受军法审判。”[393]

关于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约法草案》并无十分明确的说法。只是在《扩大会议宣言》中强调党与政府“各守其职，不相逾越，尤当各保其独立之地位，举数年以来党政军三位一体之谬说与弊制，悉摧陷而廓清之”[394]。与南京政权公然以党代政不同，“改组派”宣传党不得直接干政。在政体设置上，避开五权宪法，只于政府之下设八个部，监察院独立，以便按照民意监察政府。政府标榜公开主义，财政公开，预算交中央党部核定，决算则交监察院审查。官吏的任用采取考试制度，等等。

由于军事上的溃败，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比较而言，“扩大会议”组成人员非主流派或在野派的身份，使之容易注意到当政者不愿面对的现实，为争取民心，他们的要求相当程度体现出人民的某些要求或愿望。应该承认，“扩大会议”诸人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吁，对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为名专制为实的批判，以及太原“约法”的起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要求。当阎、冯等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天津《大公报》针对《太原约法》发表社评说：“北平所谓扩大会议，在今日国民政府统一之局面下，当然无政治地位可言，其草拟之法案，以效力论，殆与私人之意见书相等。虽然，训政时期中是否需要约法，实为国民党执政后党内外一大悬案。首都党国要人近亦有人表示及之者。社会方面，则谈之者尤多。可知此事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国的问题……国府当局近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闳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395]对文件本身给予相当肯定。只是这样的文件与其说是汪精卫等的当政宣言，不如说是失败挽歌，这样一部具有民主色彩的约法草案，更多只是其在野身份的产物乃至标志，并不完全代表其真实的政治主张。不须负责任的高调总要比实践力行容易得多。

五　东北军入关与阎、冯、桂系的惨败

无论是对于蒋介石还是对于反蒋派来说，张学良的东北军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930年2月10日蒋、阎电报战初起时，在接到阎锡山要求与蒋共同下野电报时，蒋介石即电请何成濬详询奉张态度，东北方面的动向是蒋介石作出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为笼络奉张，蒋介石一方面令何成濬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以各种关系前往沈阳劝张疏晋近宁。2月20日蒋致电张以北方事务相托，声称："阎如启衅，则请汉兄立举义旗，共同努力完成统一也。"[396] 3月26日，为了示惠张学良，蒋介石致电吴铁城主动表示："内政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与外交（部）次长，请汉兄即推人电保，以便提出。"[397] 同时，蒋介石早早就开始其银弹攻势，3月27日，蒋致电宋子文，令其在4月5日前电汇张学良50万元[398]。

南京方面极力拉拢张学良，反蒋方面也不落后，阎冯代表贾景德、梁汝舟、薛笃弼等前往沈阳与张联络，极力争取张学良，许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和华北地盘。

蒋、阎对立初露端倪时，张学良曾向阎表示亲近，东北和华北、西北接壤，地理上的接近使双方有更多相同的战略利益。1930年1月17日，阎锡山致电张学良，请其协助从秦皇岛起运外购的飞艇、机关枪、子弹等武器弹药，张学良批示："电军、警、关，切实给予便利，如咱事一样。"[399] 次日，在给阎锡山复电稿中初言："晋辽提携，绝无问题。"后改为："时事纠纷，近顷愈甚，欲图挽救，宜从提携入手，大而可安一国，小之亦有益地方。"[400]

蒋、阎争端愈演愈烈后，张学良从自身利益计，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公开表态显得不偏不倚。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针对阎、蒋之争声称："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

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401] 同时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表示：“东北四省，对日、对俄关系复杂，外交上不便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际此时局，处境较具苦衷，外交问题，今后仍与宁府联络进行，尚希谅解为幸。”“东北四省，与山西省同有维持华北治安之责，所以视其形势如何，除出兵协助碍难实行外，在维持治安上必要之范围内，不妨接济武器弹药。”[402]

为拉拢张学良站到南京一边，蒋介石方面采取了各种手段。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向东北兵工厂购步枪5万支。随着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蒋介石急于拉张学良参战。6月5日，蒋电方本仁、吴铁城，有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全权负责北方。8日电宋子文，询问其何时可拨付张出兵费用200万元。16日蒋再电古应芬，请李石曾力劝张学良出兵：“凡奉张所要求者，务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允纳，即有不合理而难允之件，亦不必拒绝，或竟暂允其请，再在决战后详行讨论可也。现在惟一目的，只要其五日内能出兵平津也。”[403] 6月21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此时，张学良已倾向于蒋介石。1930年7月底，南京方面李韫珩五十三师拟转海运由青岛登陆，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奉系海军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蒋介石乃电请张学良令准该部登陆，8月初，因奉张的协助，李韫珩部陆续登陆青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到青岛部队已完全上陆，集中胶州，兵力虽只一师，而青岛为奉天海军所在地，我陆军得以上陆，在逆方观之，必疑奉天方面已加入我战线矣。且青岛可以上陆，则天津亦可以上陆，阎锡山之后方动摇矣。奉军虽未加入作战，而于我之政略战略，皆占先一着矣。”[404]

但是，张学良此时尚不急于明确表态，一则他深知自己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绝不轻易表态，而是待价而沽，谋求更大的利益；二则东北内部高官看法不一，意见尚需整合。1930年6月5日，张学良召集东北高官商议应付时局办法，会中意见约分成三派：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主张与南京合作；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则表示静候张学良决定。

为了促使张学良彻底倒向自己一方，7月，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张学良以是否就南京方面任命的副司令一职问题征求张作相、汤玉麟等意见，张、汤等表示反对，强调："此时就副司令名位，即须尽副司令职责，势将与阎成对峙局势。我不犯人，人将犯我。环顾内情，熟权利害，窃以为不可。"[405] 张学良在内部反对声中，再次推迟表态，答应蒋军夺回济南就考虑出兵。张认为如果蒋军夺回济南，那表明反蒋联军已陷入被动。8月15日，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连电张学良出兵。24日蒋介石答应由张学良主持华北，随后又明确答复由宋子文给张学良速筹500万元出兵费，并答应发行1000万元的公债整理奉票。张学良感到出兵的条件已经满足，内心已有"拥护中央"[406] 的打算。9月初，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会中张作相、张景惠仍反对出兵助蒋。张学良心意已决，坚持入关主张，张作相等被迫放弃反对意见。张学良决定令于学忠、王树常组成第一、第二两军，出兵关内。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407]。20日，于学忠率部先行入关。张学良出兵严重地动摇了反蒋派的军心，阎锡山迅速将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撤回山西，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均纷纷自由行动，随同晋军撤到黄河以北。而东北军和晋军也形成默契，东北军每到一地，即通

知晋军让防，阎按通知节节退兵。21日、22日，东北军和平接收天津、北平。为保持同晋军的关系，东北军到达河北、察哈尔后即停止前进，没有进入山西。

东北军入关后，陇海、平汉两战场的西北军也军无斗志。19日，石友三通电拥护张学良，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各路友军或垮或撤，冯玉祥西北军处境艰难，面临后路被截、重兵包围的威胁。蒋又派人四出活动，多方利诱，使冯部迅速分化。9月28日起，吉鸿昌、庞炳勋、梁冠英等高级将领纷纷举兵投蒋，赵登禹、刘汝明、魏凤楼、张人杰等一小部分部队退入晋南，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10月2日、3日，蒋军先后占领开封、许昌。6日，陈诚部占领郑州。9日，杨虎城部占领洛阳，25日占领潼关，截断了西北军回陕西的退路。

在大局已定时，10月4日，阎锡山、汪精卫秘密到郑州与冯会晤，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停战通电。阎锡山随即发出下野通电，表示："今者撤兵河北，损失及半，欲再以战争求达目的已属不可能矣。叠奉严命，督促归田……本总司令即日释甲归田。"[408] 5日，阎、冯、汪联名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冯玉祥率副司令部人员撤到黄河以北的新乡。10月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鹿仲麟领衔通电罢兵息战。11月1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蒋介石与张学良约定晋军由张学良负责收编，西北军由蒋介石负责收编。张学良对晋军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晋军被编成第四、五、六、七四个军（1931年7月改为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另有护路、炮兵、骑兵各一个师，共十六万多人。退入山西的西北军初被编成第三军，1931年6月改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黄河南岸的西北军为蒋介石收编。对于阎锡山和冯玉祥，蒋介石坚决要求他们出洋。阎锡山声言要去日本游历，躲到大连。冯玉祥则隐居于汾阳县峪道河。

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之久，交战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达140万人，死伤四十余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30年度，南京中央的财政支出为5.39亿元，其中军务支出就达到2.45亿元[409]，占到将近一半，连绵的战争严重阻碍了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

中原大战的结果，蒋介石获得空前胜利，统治力量大为加强，全国统一的基础基本稳固。张学良兵不血刃，在关内取得巨大地盘，也是一位大赢家。几位输家中，阎锡山虽被迫暂离山西，但实力尚存，保留有山西地盘，李、白也在广西苟延残喘，只有冯玉祥西北军全部崩溃，从此即离开军队，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本[410]。

第五节　争战不断的西南、西北地方割据势力

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控制向来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要的任务是推翻北洋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可能也无此实力实现对全国的武力统一，只能求得与这些地区的表面团结与平衡为满足。因此，西南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乃至西北一些地区在此后数年间，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国民党“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对西南问题的思考是：“西南川、滇、黔无领袖，甚难处置也。”[411] 由此可知，他此时尚无将西南乃至西北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雄心。这就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南、西北地区的争端实际仍在各地的地方实力派之间进行。

一　龙云入主滇政及对南京中央的态度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横扫两湖和浙赣，北伐军的胜利使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滇系唐继尧处境不利。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排斥异己，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引起滇军将领普遍不满。1927年2月5日，第二军军长兼蒙自镇守使胡若愚、第五军军长兼昆明镇守使龙云、第十军军长兼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

理镇守使李选廷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宵小、公开政治、安内睦外。6日，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向昆明进发。10日，胡若愚、龙云等在宜良法明寺集会，商议改组云南省政府，决定新政府采用合议制，成立云南省务委员会，四镇守使等为省务委员。会后，以四镇守使名义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省政府，确立合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412]等要求。他们声称唐氏如不采纳，势必以兵戎相见。唐继尧在各军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改组省政府，令唐继虞等人出走。2月中旬，胡、张两军先后到达昆明，开始组建新的省政府。新政府推唐继尧为没有实权的云南省政府总裁，不设省长，省务由省务委员会处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九人为省务委员会委员。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3月8日，新政府成立，在第一次省务委员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二六”倒唐事件使唐继尧成为有名无实的“总裁”，此后唐处于被幽禁的困境之中。5月23日，唐继尧病死，旧滇系统治时代结束。

“二六”政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于胡若愚、龙云之手，尤其是龙云利用驻在省城之便，暗中操控军政决策，引起胡若愚、张汝骥等的强烈不满。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派兵突袭龙云第三十八军，龙云猝不及防，束手就擒。此即云南“六一四”政变。

“六一四”政变发生时，龙云部主要将领卢汉、朱旭、高荫槐、孟坤等趁乱逃到滇西凤仪、下关一带，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八军军长，将部队编为四个师，卢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师师长，指挥部队反攻昆明。第三十八军在卢汉率领下，在祥云、禄丰等地与胡若愚部展开激战，胡军被击溃，卢汉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

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担心遭到第三十八军和唐继尧旧部的联合攻击，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板桥协约”，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率部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三十八军3万人整编成六个师，第九十七师师长孟坤、第九十八师师长卢汉、第九十九师师长朱旭、第一〇〇师师长张凤春、第一〇一师师长张冲、新编第七师师长唐继麟。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未按照“板桥协约”供给胡、张饷械，胡、张两部因此拒绝出省，停留在滇东曲靖一带。龙云遂命卢汉、朱旭、孟坤等三师出击胡若愚、张汝骥，予以武力解决。胡若愚、张汝骥在龙云压力下，被迫向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和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求援。周西成素有觊觎云南之心，又与胡、张为旧日好友，曾与胡若愚、刘文辉在赤水结盟，得到胡若愚、张汝骥的求救讯息后，决定趁此机会向云南进兵。黔军派出五个团的部队入滇，于8月18日占领滇东北宣威县城，并新委县长。9月，再占平彝、师宗。同时，刘文辉也派出一个团的川军援助胡、张，占据滇北寻甸县城等。

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也趁机举事，发兵进逼昆明。龙云四面受敌，不得不取缓兵之计，派代表向胡、张疏通，双方妥协和解，龙云争取时间回师击溃唐继虞部。在平定唐继尧余部的反叛后，1927年底，龙云集中全部主力攻击胡、张军。

胡若愚是龙云控制云南的最大竞争对手，龙云首先把其作为重点进攻的对象。1927年12月，龙云与胡若愚在曲靖一带展开激战，胡若愚连战不利，退守曲靖，龙云紧紧围住曲靖，使之成为孤城。胡若愚、张汝骥向周西成求助，借黔军反击龙云。周西成欲扶植毛光翔攫取云南省政权，遂决定再次派兵入滇，任命毛光翔为援滇军总司令，阮德炳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三路，大举入滇。据龙云电蒋介石报告，入滇黔军“占据师（宗）、罗（平）、曲（靖）、宣（威）等十余县，换官征税，视同征服”[413]。龙云以胡瑛出任第三十八军前敌总

司令，统兵迎战黔军，在曲靖、马街等地连败黔军和胡、张军，黔军各路部队均被“摧破追剿”[414]，1928年1月，被迫退回贵州境内。龙军趁势克服曲靖，胡若愚部被迫退往昭通、宜宾间寻求刘文辉的庇护，就任其委任的川滇边防督办；张汝骥部退到黔西北毕节一带。进入滇境的川军见各路已经败退，也自动退回四川。

击败胡、张及川黔部队的联合进攻，龙云渡过难关，随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效忠，声称要“长驱贵阳，打倒军阀余孽”[415]。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4月1日，龙云正式宣誓就职，龙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4月1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请其迅速出兵广西，并允诺提供“出发军费”[416]。中旬，任命龙云为第十路总指挥，李燊为前敌总指挥，要求其率部立即集中云南宜良附近，迅速经由贵州独山入桂，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同时又电周西成，要其“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大计，勿稍犹豫”[417]。为尽可能争取更多力量加入对桂作战，蒋介石任命胡若愚、张汝骥为新编第十二、第十三师师长，令其出兵讨桂。

4月18日，龙云在昆明就任第十路总指挥，准备出兵广西。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滇军入桂，需要借道贵州，而贵州的周西成与桂系关系密切，不愿与广西为敌，更不愿滇军进入黔境。因此，龙云出兵攻桂是假，借机报昔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是真，龙云此举事实上成了滇黔冲突的导火索。

从攻黔目标出发，龙云联络与周西成不和的贵州李燊部组成滇黔联军。联军分南北两路，南路又分为左右两翼，共有兵力十一团，万余人，由李燊指挥，分由云南平彝、罗平向贵州进击；北路由张冲师和高荫槐旅组成，主要任务是防范胡若愚、张汝骥趁机攻滇。龙云率总指挥部行营随北路前进。昆明方面由胡瑛和孙渡分别代理省政府主

席和十三路军总指挥。

1929年5月，龙云以周西成“抗拒义师，阻挠前进”为由，正式宣布“顺道定黔”[418]，滇黔之战爆发。龙云率朱旭、张凤春、高荫槐、刘正富及李燊所部向贵州进发。周西成则亲自率部迎战，由毛光翔、黄道彬指挥左、中路部队，其本人统辖右路，向安顺挺进。龙云率龙李军从平彝向贵州进攻，拟经黔滇公路，长驱直入，进占贵阳。黄道彬师与朱旭师第五旅先头部队在平彝接战，揭开滇黔之战的序幕。战事爆发后，黔军屡战屡败，由亦资孔、盘县、普安、晴隆一直退到关岭。接着滇军又在镇宁击毙亲临前线指挥的周西成，黔军全线崩溃。龙李联军乘胜前进，于5月27日占领贵阳。随后，龙云扶持李燊“以讨逆前敌总指挥名义，留守贵阳，维持现状”[419]。滇军继续驻扎在黔西龙里、贵定等地，并深入贵阳以北、乌江南岸，企图通过李燊实现对贵州的控制。

6月，胡若愚、张汝骥及孟坤等在刘文辉支持下，趁滇军深入黔境之机，假借奉命伐桂之名，以胡若愚为靖滇军总司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此时，龙部主力仍滞留黔境，闻讯后被迫退回云南，滇军离黔后，周西成残部毛光翔趁机进攻贵阳，李燊势单力薄，在贵州立足不稳，不得不退往云南境内。胡、张、孟部从28日开始向昭通发起攻击，7月6日占领昭通。胡、张、孟部虽取得昭通，但费时过久，贻误了战机。龙军则通过在昭通的顽强阻击，争取了从贵州回师的时间。

胡、张、孟攻下昭通后，以张军为先头部队，向昆明进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于7月11日赶到曲靖，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西郊碧鸡关。龙云采用反间计，故意将给孟坤的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挑起胡、张对孟坤的疑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遭覆灭。龙云乘势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龙部跟踪追击，胡、张、孟军被迫退往滇西北的华坪、永胜及四川会理等地，并节节败退至四川西南角的盐源、木里一带。

1930年春，张汝骥被俘处决，孟坤落水而死，幸存的胡若愚已无东山再起的能力。7月20日，昆明城恢复秩序，龙、胡、张第二次混战结束，龙云确立了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龙云为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在与各地方实力派保持联络同时，历来对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恭顺的态度，以换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及承认。1929年10月，当西北军声言反蒋时，他就致电蒋介石，表示“反动军阀，破坏编遣，纵无命令，亦当仗义伸讨”[420]，向蒋表态效忠。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为防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北上，蒋介石于3月底命令龙云发兵讨桂，龙以连年战乱，兵疲将乏为由，婉拒出兵，等待蒋介石拿出更好的条件。为诱使龙云出兵，蒋介石答应提供百万元作“军需之用”[421]，出征部队每月发给军费法币30万元，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也派人送滇20万元[422]。这笔费用拨付迅速，4月18日，龙云就致电蒋介石告知“京粤拨款均已收到”[423]。同时，蒋还许诺如攻下南宁，则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龙云对蒋介石提出的讨桂条件十分满意，5月，龙云以“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名义，任命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滇军三个师十五个团共二万余人进攻广西。6月，卢汉指挥滇军分南北两路向南宁推进。蒋介石对龙军抱有厚望，致电龙云称：“刻张桂诸逆，改图窜湘，贵军正宜跟踪前进，肃清逆巢，望勿稍有瞻顾。”[424] 7月，龙军包围南宁。南宁守军韦云淞部三千余人凭城固守，滇军因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士气沮丧，加之各部“存保全实力之私心，你攻我停”[425]，围攻南宁三月不克。10月，白崇禧率部返回广西，配合南宁守军，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将滇军击溃，迫其退回云南。龙、卢滇军虽未能攻克南宁，还付出损失近半的代价，但在中原大战中拖住桂系后腿，有力支持了蒋介石，蒋对龙云的行动非常感激，作为报答，1931年11月龙云在国民党“四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龙云为牢固控制云南，不断整顿和强化滇军，先后开办军官学校、军官团、军官补习队等，培训大批滇军骨干。同时以响应南京中

央整编军队名义，削弱异己力量，加强其本身对部队的直接控制。龙云严密控制军队的行为引起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个师长的强烈不满，1931年3月10日，四师长以“清君侧”为名武装倒龙。龙云被迫声言“扫墓”，离开昆明回昭通，实际只到寻甸羊街躲避风险。龙云离开昆明后，四师长围绕着继任主席人选互不相让，蒋介石在云南之变中也力助龙云，3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云南事思虑甚切。先电龙云，回省主持，待其复电再定处理办法。对四师长电暂置不复。”[426] 当身为滇人的王柏龄回滇活动，蒋介石特电王氏，令其“离滇回京，切勿预闻滇中内部纷争，免致纠纷”[427]。在内外压力下，卢汉、张冲只好把龙云请回重任省主席。

龙云重返昆明，立即宣布四个师长以下犯上，下令扣押，撤销各师番号，实行废师改旅。不久，将卢汉、朱旭、张冲释放，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朱旭为省民政厅长，张冲为第七旅长兼全省盐务督办。对南京中央，龙云始终采取不即不离的政策，一方面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抵制南京方面对云南的渗透，将云南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二　贵州桐梓系军阀统治的兴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贵州控制在桐梓系军阀手中，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集结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志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1926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省长，掌握贵州军政大权。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大批起用桐梓系人员，贵州军政大权悉数落入以周西成为代表的桐梓系集团手中。

周西成控制贵州，对外联合两广，与南京方面保持距离，这是因

为周与同为贵州人的王伯群、何应钦有过龃龉，“何王跟蒋介石历史久，若走蒋的门路，必为何王堵死，不能不靠拢两广”[428]。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同时，对同样出身贵州的其他军事力量极力排挤，导致其与李燊间的激烈冲突。

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是贵州另一重要派系兴义系的代表人物。1926年北伐战争中率部出黔参加北伐，曾任第十六军、第四十三军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及南京国民政府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一部。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不易，意欲回黔。周西成对李燊部不仅不容，而且为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其撕毁。在云南和四川两方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部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李燊将其四十三军所属三师1.2万人集结于鄂西来凤。11月，从四川酉阳、秀山出发，拟循黔东大道攻入贵州。周部王家烈率八个团集结于秀山邑梅一线。14日，双方交战于天星坡。李燊集中主力兵力猛攻敌主阵地，王家烈难以招架，继而，李部又以一师兵力发动夜袭，终使王部惨败而退。18日，王家烈退保铜仁，李军进逼铜仁，连续数日猛攻铜仁不下。月底，周部援军到达，李军被前后夹击，只得从铜仁分兵两路后撤。周西成除令王家烈跟追外，亲率主力取道大兴场往松桃、秀山，企图迂回围歼李军。

周、李交战期间，双方都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诉对方启衅，以获得南京方面支持。11月9日，周西成致电蒋介石报告李燊进攻情形，对此，蒋介石作出不偏不倚的姿态，致电李燊、周西成望双方勿启兵祸。同时，蒋特电李燊，令其“勿再前进，停止原防，专心训练，为党国之用”[429]。25日，在双方战况日见激烈时，蒋再电李燊并致刘

湘转杨森，严厉指出："李部职在剿匪，继斌（周西成字继斌）治黔，亦有成绩。前中央命继斌援川，与兄小有龃龉，此过去事。今中央对兄责成致力川事，值此训政开始，全国统一，各方应即停止军事行动。川黔相依唇齿，讵宜再启纠纷，牵动大局。除令李部停止前进外，望兄等专力川省建设，勿启川黔战争为要。"[430]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鞭长莫及，但又负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之责，因此，其不愿西南多生事端应属正常，但其态度事实上对当时各方并无任何影响。周、李之战并未因为南京方面的调解而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2月4日，双方在鸡扒坎激战，李燊反击获胜，再度攻至铜仁城下，并将周部主力困于松桃。为摆脱困境，12月7日起，周军猛攻李军扼守的凉亭坳以求突围。双方激战四天三夜，周军伤亡惨重，周西成带数百名残部逃到铜仁。李部在追击过程中遭周部反击，先退至江口、印江，后又退到四川龚滩。1月初，求胜心切的李燊选调二千余精兵，试图出奇制胜，直扑贵阳。周西成以犹国材为前线总指挥，急调贵阳守城部队和崇武学校学生等堵击。双方在贵定石门展开生死战，战斗中李燊负伤，斗志大减，率千余残部从长顺、兴义退向云南。

周西成获胜后，连电南京方面报告战况，蒋回电表示拉拢："此次滇、黔两省因张（汝骥）部问题，几起衅端，赖兄体谅中央维护苦心，遵令调离张部，避免冲突，良深欣慰！顷已电令龙主席同时撤退东防部队，仍回原防，事关中央命令，当能遵照办理。李燊抗令称兵，既经溃败，川中战事，亦有转机；此后西南一家，力谋建设，黔省庶政，素具规模，应更努力以竟全功。"[431]

1929年5月，龙云以讨桂为名，顺道定黔，李燊率残部参加对周作战。2日，周西成致电南京中央呼吁制止龙云行动，因周在蒋、桂战争中倾向桂方，蒋对其早已不耐，迟至8日才复电周西成，虽表示对龙云"当明令阻止"，却要求黔方首先要"明白宣布讨桂，且实行出兵攻桂，使滇中无后顾之忧"[432]，明显袒护龙云。周西成知道依赖南京政府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亲赴前线指挥对滇战事。兵分三路，以

毛光翔为左翼总指挥，率犹国材师由兴仁迎敌；命黄道彬师为中路，由盘县迎沾益来敌；自率一路向安顺进发。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12日，周西成由安顺进驻镇宁县安庄坡，准备在此与滇军决战。滇军投入全部兵力，实行猛攻，周军逐渐陷于被动。激战中，亲临前线指挥的周西成中弹重伤，被迫撤出战场。黔军全线崩溃，周西成在退向黄果树时又被李部包围抄袭，激战中周西成再次中弹负伤，在渡过打帮河时被击毙。其部“自相残杀，尸骸狼藉，共死伤二千余众，器械完全损失”[433]。5月27日，李燊部进入省城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蒋介石明令其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并予以武器支持[434]。7月，滇军由于后方不稳退回云南，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等统率周西成旧部反攻，李燊退出贵阳，沿途遭毛光翔部袭击，伤亡众多，退入滇境仅存官兵数百。李将余部交给龙云，只身流亡香港，1930年在落魄中病死。

周西成死后，驻兴仁的黔军犹国材师和留守铜仁的王家烈师还保有相当实力，他们会师遵义，推毛光翔为二十五军代军长。1929年7月8日，毛光翔进驻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南京方面欲借周西成之死插手贵州政局，初欲任王伯群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因王“不愿屈就”[435]，又准备改任李仲公。但南京方面毕竟尚不具备控制贵州的可能，11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顺应现状，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一改周西成支持桂系的态度，“力图向南京政府靠拢，极表恭顺，对国民党开诚欢迎”[436]。1931年，毛光翔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王家烈任第二十五军军长。

毛光翔虽对蒋介石表示服从，但并不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蒋支持王家烈夺取贵州省政。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讨逆指挥官，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家烈在南京中央支持下，以黔东南和黔东北为基地，扩充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

省按月拨给军饷，王通过参加“剿共”，获得大批枪械，实力大增，同时进一步密切了与南京中央的关系，蒋介石电告其保持联络[437]。

毛光翔担心王家烈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夺取王家烈的兵权。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羽翼已经丰满，又有南京方面支持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1932年2月，王家烈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权。毛光翔权衡利害，将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南京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巩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一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在“追剿”红军长征中顺势入主贵州。

三　四川军阀内战不断与南京中央的倾向

四川是地方军阀争夺十分激烈的地区，1927年至1932年间，经过长期混战，四川逐渐形成刘湘和刘文辉两强相争的局面。

1927年宁汉对立时，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地方实力派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任前敌总指挥，蒋亲电刘湘，告以：“夏师长斗寅可信，请与联络一致为要。”[438] 1927年5月5日，杨森率4.5万人自万县东下，联合驻宜昌的夏斗寅部，顺流而下。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北

上河南，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双方在仙桃镇激烈交锋，杨军大败，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被迫西逃潜江，潜回四川。

杨森败退回川，刘湘趁机以“出兵助战”[439]名义派兵进驻万县，欲将杨拒于夔门之外。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在武汉政府策动下，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7月，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1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吴逆佩孚，殃民祸国，负罪至深。逃窜川边，阴谋煽乱，迭经电饬缉拿……如或瞻徇隐匿，自犯通敌之嫌，政府亦不能宽贷也。”[440]1928年1月6日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441]。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其时，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等组织“四部倒杨”。2月，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当刘湘电告蒋介石获胜消息时，蒋正处于二次北伐的关键时期，期望刘湘能派兵相助，因此一口表示川事任刘湘处置，“对杨森无主张”[442]。5月18日，倒杨联军与杨森部在开江展开决战，由于与杨素有联系的罗泽洲率部袭击倒杨联军后方，杨森取得胜利，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

刘湘自此时对外积极投靠南京中央，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

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有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为二刘并立的局面。刘文辉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嫡堂叔。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

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此时，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二十余县，但从下川南至成都的通道，却被占据雅安、西昌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1927年6月中旬，刘文辉兵分三路对刘成勋部队发起猛烈攻击。一路由双流向新津进攻；一路由崇庆、大邑向邛崃进攻；一路由眉山、丹棱向名山、雅安进攻。刘成勋在猛攻之下，全线溃败，6月29日，被迫通电下野。其防区包括西康、宁远、邛雅地区全部为刘文辉兼并，部队为刘文辉收编。7月6日南京政府特任刘文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刘文辉和刘湘合力将赖心辉部击溃，又占领泸州、合江、江津、永川、纳溪、古蔺等地，迫使赖心辉退至滇境。“八部同盟”发动下川东之战时，刘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援助，将资中、内江、荣昌、隆昌等防地交第二十四军接防。刘文辉遂帮助刘湘击败了杨、李、罗等部，统一了川东。由此四川成为“四巨头”——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分割的局面，并逐渐形成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两大派系争斗的格局。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11月，任四川省主席及国军编遣委员会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刘文辉势力迅速发展。1929年3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南京中央此时对二刘显得不偏不倚，蒋介石表示：“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极赞成，望其能负责办理，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443] 二刘则在蒋与地方实

力派争斗中，倾向各异。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刘文辉回忆："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到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我认为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444)]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令蒋介石深为不满。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处，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到1932年，四川经近二十年的混战，仅剩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和刘存厚八个军阀。实力最大者为四川善后督办

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和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两部实力相当，都企图称霸。刘文辉防区遍及川康八十一个县，多为富庶之区，拥兵十二万左右。刘湘据重庆及重庆以东地区的下川东二十八个县，控制夔门天险，扼长江咽喉，拥兵十万以上，加上结盟各军，总兵力达二十余万。较之刘文辉，刘湘在政治上得到蒋介石支持，1931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为整理四川省军事起见”，在四川设立善后督办，规定：“善后督办在善后期间所有全省驻在军队统归负责处理，并得按该省情形随时咨商省政府，将全省划为若干警备区，每区设司令一员，均由督办呈请陆海空军总司令任命之。”[445] 4月，刘湘就任善后督办，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选任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7月，南昌行营发表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此后，刘湘与南京中央关系愈见密切。同时，刘文辉由于侵占其他各部防地、收编其他各部部队，树敌太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多股势力与刘湘联合，共同反对刘文辉。

“二刘大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虽然对刘湘寄予更多希望，但四川爆发大规模战争，南京方面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此时战局走向毕竟不明，蒋介石不想把事情做绝，认为处理此事的最好办法还是两不得罪。1932年9月，蒋介石专门致电刘湘，劝告道：“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国难愈加严重时期，吾人益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446] 10月18日，何应钦电蒋，请示对川事处理办法。蒋回电表示：“关于川局处理，最好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但日前形势川中各方酝酿愈急，益显严重。而中央一时亦不得易有效制止之办法，且不可有袒护而援助任何一方之明显表示，如兄有与甫澄、自乾两方各个接近之人，不妨各使分工，加紧接近，藉以明了两方之真相及其对于中央之希望，然后静观其进展趋势，再作最后之决定可也。”[447] 表面工夫做到后，蒋介石私下里对刘湘还是有所倾斜。10月12

日，张群致电蒋介石，提出如果刘湘能够出面收拾四川乱局，中央政府不妨“因势利导”[448]，对此，蒋介石应是心领神会，代表南京方面在四川联络的曾扩情回忆，当时蒋介石“关照我以我的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很短期间内解决刘湘，可便宜行事”[449]。1932年底，“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即将结束时，杨永泰对川黔善后做了如下分析：“关于川黔善后，大要有二：甲、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恐不协机宜，有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之恩……现在川省形势，已由两刘对抗，变为刘田联合，且刘田渐已显占优势。处置川事，似宜以刘田为重心。此外，有相当实力，及虽失败而实力尚未完全消灭者，在刘田统驭之下，酌予安顿。”[450]

1932年10月，除第二十四军外的各部川军将领联名通电讨伐刘文辉，声言：“除祸根而奠川局。”[451] 10月1日，驻武胜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第一枪，川北之战爆发。随后，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一部投入川北战场。第二十四军分北、中、南三路应战，陷于被动。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付刘湘，撤出南充、遂宁地区。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东线刘湘军克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岩江、隆昌；北线杨、李、罗等部克遂宁、安岳、乐至，迫资中；邓锡侯部进驻简阳、资阳。以刘为首的联军部队从东、北两线协力向沱江下游推进。刘文辉全力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11月上旬，刘湘第二十一军唐式遵第一师、王缵绪第二师和李、罗等部向内江、资中进攻，第二十四军夏首勋指挥第二、第三师顽强阻击，双方成胶着状态。二刘争夺重心在泸县。第二十一军六个旅在海、空军配合下对泸县实施攻击，第二十四军两个旅据城周高地固守。激战半月，双方互有进退，伤亡均重，相持不下。11月18日，联军突破沱江防线，克资中、内江、富顺。泸城守军因势孤发生动摇，21日，刘湘进占泸县，守军两个旅为刘湘收编。

正当泸城战事激烈之际，11月14日，刘、田成都之役爆发。成都从1926年起即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联合管理。田颂尧见刘文辉在川北、川中节节败退，威逼刘军退出成都，被刘拒绝。11月中旬，田军在邓军暗中协助下与刘开战。双方共出动兵力五十个团以上，刘文辉将撤守资阳、内江等地的十八个团增援成都，实力三倍于田军。经过煤山争夺战、东郊战斗、北门战斗，田颂尧部溃败。后经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调解，双方同意停战，战事结束。此后，刘文辉部专力对付刘湘部，集中七万兵力投入战场，向荣县、富顺发动反攻。

12月10日，荣威之役全面开始。第二十四军夏首勋率六个旅、冷熏南率五个旅自乐山、青神进攻荣威。夏部在井研的千佛寺、马踏井、三江镇等要地，与潘文华等部激战五昼夜，伤亡二三千人。刘湘部退入荣县。同期，冷部五个旅攻刘湘右翼唐式遵师，双方在井研东北的东材场遭遇，唐部不支，退荣县双古坟。尔后，两军在荣县城西险隘老君台展开决战，投入兵力达3万人，双方死亡三千余人，潘师溃败无法再战。荣威之役历时11天，刘湘全线失利。此时，邓锡侯、田颂尧派出四个师部队进攻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川西地区。刘文辉腹背受敌不得不停止进攻。12月21日，双方在老君台签订停战协定。刘文辉兵力损失不大，但防地丧失很多，沱江以东、乐山以南近三十县尽为刘湘所据。

刘文辉不败而败，将原因归咎于邓锡侯的背信弃义，决心集中兵力攻打邓锡侯部。1933年5月9日，刘文辉再次率部突入邓锡侯防地，刘、邓毗河之役爆发。邓锡侯调集所部近30个团，约四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刘文辉部攻击逾月，伤亡数千人，无进展。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进攻刘文辉。6月25日，刘湘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发出讨伐刘文辉通电。此时，中共在四川迅速发展，蒋介石希望二刘能携手对付中共，以免予中共以可乘之机，在致张群电中谈到：“刘湘派员携其

治川方案来谈，内容以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半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整缩军队，其意在先灭刘文辉。中以过去先灭阎冯后剿赤匪以为统一可期，其结果相反之意喻之，属其必先剿匪才可统一川局，名正言顺，亦无人能反对之意力说之。总之测其意似彼已决心，对中正为通告形式，说必无效，川事只有让其自乱而已……如能设法合力灭共，避免二刘之战，使刘湘无法启衅，尤幸也。”[452] 蒋虽想调和二刘，但其既对四川束手无策，又不欲干预刘湘影响与刘关系，因此所谓避免“二刘之战”只是徒托空言。

7月初，刘湘以安川军名义，组织三路大军共一百一十余团，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很快挺进到成都附近。8日，刘文辉不得不退出成都，辞去省主席，将所部二十四军分成六路沿灌县至乐山岷江右岸布防。8月3日，刘湘又与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罗泽洲等联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安川剿赤”会议，决定乘胜追击。中旬，刘湘下令全线总攻，灌县、新津刘文辉军内变，安川军全面突破岷江防线，乘胜追击。第二十四军向西撤退，溃不成军。8月底，刘湘率军攻下雅安，刘文辉部队随之瓦解，一百团以上兵力仅剩数团，主要将领或投降或引退。刘文辉率残部万余退至汉源。8月31日，刘湘宣布安川军事告终。此后，刘湘控制了四川将近一半的县份，而且多为富庶地区，“二刘大战”以刘湘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刘湘控制四川，由于其与南京中央相对良好的关系，为蒋介石所乐见。1935年，随着南京中央以“追剿”红军之名进入四川，南京与四川矛盾趋于激烈，双方的争持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四　甘肃雷、马之变

中原大战后，原隶属冯玉祥的西北马家军大都投降蒋介石。此时的马家军大致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青海的马麟、马步芳；另一部为驻防甘肃的马鸿宾、马鸿逵兄弟。其中甘肃马家军势力最大。为了进

一步分化马家军的力量，蒋介石将马鸿逵所部调驻河南，但因一时又无法抽调嫡系部队入甘，只好同时利用当地各种政治力量，以收相互牵制之效。

蒋最初拟委顾祝同为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为青海省主席。后因原南京中央警卫军军长冯轶裴因病去世，为防石友三反叛，蒋急调顾祝同接任，而不得不暂时委任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任命马文车为驻甘肃视察员，负责协调各方关系。

据陈立夫派往甘肃的谍报员报告，当时甘肃各种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四派："（一）中央派马文车同志为领袖；（二）何应钦派以谭视察员克敏所勾结之禁烟总办王廷翰为领袖；（三）冯玉祥派民政厅长李朝杰为领袖；（四）骑墙派马鸿宾为领袖。"[453] 马文车虽然贵为中央视察员，但遇事常常受阻，为此他曾私下向友人发牢骚道："马代主席系回人，以种族关系激起汉回问题，情形复杂，各同事遇事又推弟首当其冲，应付深感困难，兼以谭视察员克敏系何敬之私人，一切秉承何之意志办理，且受人包围，不顾中央，不顾墨三，因对弟嫉妒，故意多方掣肘。"[454] 而当时驻防甘肃的军事力量则以雷中田为最强，但雷中田同马鸿宾之间又"意见甚深，雷维持地方尚好，马除旧带之部队外，余均不听其指挥"[455]。

1931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落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其他省府委员"均系马（鸿宾）派，闻皆系马福祥以金钱运动而得"[456]。雷中田事先得知消息后，曾致电吉鸿昌："得南京确息，行政院已通过真除马鸿宾为甘肃主席兼省委，即日呈由国务会议通过发表之说……立赐转电中央力阻发表。"[457] 但雷的努力并未成功。为此，雷、马（文车）二人极为不满，秘密联合倒马（鸿宾），并积极同冯玉祥联络，寻求支持。

8月中旬，雷中田的密使到山西向冯玉祥报告西北的军政情况，

同时带来了雷给冯玉祥的“报告及附表、照片等件”。冯玉祥得报后，立即致函雷中田，告之“阎总司令已由大连乘飞机返晋，正在秘密进行倒蒋事宜”，指示雷：“北方各部一俟大规模之联合成熟，即当同时发动。”[458] 此后，雷中田在甘肃积极扩充军队，“收编民团已有数千，各予以游击队名义；纷来请愿收编者尚多”，现有军队“人数约两万，枪万余支，迫击炮百余门”[459]。

8月25日，雷中田等人在兰州发动军事政变，“将马子寅（马鸿宾）扣押城内，缴械数百支。现由各界公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代理主席，推职（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并新编四师，以资扩充甘肃陆军。”雷并请求冯玉祥转告广州国民政府：“汇款接济，以顾军需；西宁马麟、马步芳对我方极表好感，必要时请给以相当名义，将来可资臂助。”[460]

冯玉祥获此消息后，相当兴奋，立即复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并鼓励他们：“进行一切事宜，应以革命的办法，当机立断，不可稍有迟疑……不可为谣言所惑。”[461]

但雷中田等人因青海马麟、马步芳“尚未联络巩固”，特致电冯玉祥表示“此时通电反蒋时机尚早”，“内地反蒋运动成熟后，请钧座通电甘、青、宁，并甘、青、宁实力派，加以名义，必皆翕然景从”[462]。与此同时，雷、马二人还分别致电南京中央表示因马鸿宾勾结土匪，他们扣马是不得已而为之[463]。冯玉祥无奈，只好接受现实，致函雷中田表示：“如因环境关系，暂时不便向广东政府表示，暂缓亦可。”[464]

雷中田、马文车虽然暂时夺取了甘肃政权，但二人并没有公开宣示反蒋。这同他们的内外处境是有关的。此时甘肃内部“经济万分缺乏”[465]，外部青海“二马”的态度尚不明朗。为了打破僵局，并进一步获得广东方面的财政支持，二人联名致电冯玉祥转报广东国民政府

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466] 同时"为适应环境而资联络起见"，恳请广东国民政府"任马麟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并代主席、马步芳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以免观望"[467]。三天后，广东国民政府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468] 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469]。冯玉祥对雷、马等人的财政要求，也尽其所能予以援助。为此，马文车复电表示感谢称："远蒙接济军需，全陇军民靡不感戴。"[470]

当蒋介石获知此事后，深感"甘肃事颇难处置"[471]。这其中主要原因是还掺杂着另一股势力——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想染指甘肃省政。最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即派人转告马文车："此事陕方绝未闻知，且主之者系含对陕作用。"[472] 因此，蒋对马文车的举动极为愤慨："马氏实不知大体，只想作官，见之可恶。"[473] 8月30日，蒋电马文车严重警告道："速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否则目无法纪，反抗中央，罪不容赦。"[474] 而杨虎城得知甘肃事变后，却想乘蒋力所不及之时控制甘省。9月2日，杨主动致电于右任表示："邓宝珊此次省亲来陕，恰值甘变发生。为事择人，可谓适逢其会。伊在西北方面久负物望，且因地方关系与甘肃各军多有渊源。城意拟由中央与宝珊以相当名义，由虎城就近拨给少数军队带往甘肃，负责结束军事，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475] 随后，杨虎城又直接电蒋转达此意[476]。而蒋一方面电令甘肃省城公安局长高振邦："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477] 一方面于9月11日电杨虎城表示："冯玉祥电粤伪府请委雷中田、鲁大昌、陈珪章等为军长，是甘事，冯已有逆谋。此时属宝珊兄万勿参与甘事，免入旋涡。先将马文车事有一结束，马鸿宾行施职权后另定办法。"[478]

此时，蛰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久静思动，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支持下，“声称假道甘、陕，前赴北平”，趁机入甘[479]。雷中田等人因得不到粤方的有力支持，“欲利用吴在西北另开辟新局面”[480]。当时“甘肃军政界盛传吴将去华北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由吴担任元帅”[481]。雷中田借此借口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此间对吴迷信过深，故此来各方均表欢迎……如我部即表示反对，恐数日内即生战事，极盼钧座前备两师早日开甘，俾作后援。”[482]一面致电吴佩孚，表示欢迎来兰州“调解甘、青、宁三省纠纷”[483]。吴佩孚入兰州后，立即反客为主，先下令释放了马鸿宾，继之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

吴佩孚入甘，更加速了甘肃政治的混乱状态。青海马麟为救马鸿宾也出兵甘肃。马鸿宾获释后即投入马麟军中，其弟马鸿逵则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师甘肃平叛。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则在南京暗中指使，希图重握甘肃省政，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对此，陕西杨虎城极为不安，特电驻南京代表胡逸民：“对马云亭（马福祥）活动鸿逵赴宁夏事请注意。”[484]而四川邓锡侯因同省内其他军阀常年内争，也想借此次事件，获得陇南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

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各派力量后，最终只好利用杨虎城来规复甘肃，以达到不使一方势力独大，各派相互牵制的作用。为此邵力子受蒋之命曾电询杨虎城：“此时中央无兵可派，因探询兄处能否派一师前往。如兄能亲自一行尤妙。”[485]10月18日，蒋更直接电令杨虎城：“着即迅令孙师长蔚如率部赴甘。”[486]

杨虎城所部孙蔚如师入甘后，杨即明确向蒋介石提出条件：“吴子玉此次至甘暗中滥发司令、师长等名目。又据探报吴与川军勾结，居心叵测各等情。且雷中田亦擅增师长数人，助长声势。孙师长蔚如此次奉命入甘，若不恳加名义，诚恐阻滞进行，可否赐予甘肃宣抚使名义，俾得奉命西上早奠甘局。”[487]杨虎城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目的是想俟“蔚如宣慰甘肃之命”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

为甘主席”[488]。

孙蔚如率部入甘后，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为了获得甘省主席一职，杨虎城又亲赴南京同蒋介石“商甘政治问题”。但蒋并不愿看到杨虎城的势力坐大，又不愿西北马家军联成一片，故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对此孙很失望，拟辞去甘肃宣慰使一职。而杨虎城则急电孙蔚如表示：“省府我既无十分把握，此名义似仍为目前所需要，嘱转兄打消辞意。”在杨看来，邵力子终究是一文人，邵主甘政后依然要倚靠孙的军队，并提醒孙：“此时应防子寅染指甘政。”[489]

雷中田、马文车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西北政局经过一番重组之后，又暂时恢复到平衡状态。

---

(1)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2)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1930年9月15日），《邓演达文集》，第375页。

(3) 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1931年6月25日），《邓演达文集》，第311页。

(4) 《邓演达文集》，第182页。

(5)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1930年9月），《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40页。

(6) 《致季方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64页。

(7) 《致严重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501页。

(8)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0页。

(9)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37页。

(10)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

第237页。

(11)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14页。

(12)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8月17日于莫斯科），《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04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14) 《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1930年1月5日），《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24页。

(15)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02-403页。

(16)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53页。

(17) 《改组派最近消息》（王茂如先生转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 陈公博：《左派是什么？》，转引自司马仙岛著《北伐后之各派思潮》，北平鹰山社出版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第140-141页。

(19) 仙岛：《战场上的中山与研究室里的中山》，转引自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244页。

(20)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112页。

(21)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第10期，1928年7月。

(22) 《革命评论》第5期，1928年6月。

(23) 陈公博：《党的改组方法和时期》，《革命评论》第18期。

(24) 施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第5期。

(25)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

(26)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

(27)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76页。

(28) 陈公博：《目前怎样建设国家资本？》，《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81页。

(29) 黄汉瑞：《农民暴动与土地问题》，《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85-286页。

(30) 龙鼎：《解决土地问题的讨论》，《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98页。

(31) 《北平迎汪大会实况》，《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28页。

(32) 《阎锡山答复新闻记者与汪精卫会谈五要点》，《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71页。

(33) 《汪精卫在北平中山行馆接见记者就党务及其他问题发表讲话》，《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56页。

(34) 《扩大会议宣言》，《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81、382页。

(35)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二卷第二号，1929年4月。

(36)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37) 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第二卷第二号。

(38)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39)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0)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杂志，第二卷第十二号。

(41)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2)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3)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4)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5)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6)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7) 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第二卷第八号。

(48) 《新月》第三卷第十期。

(4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1929年2月19日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576页；参见《蒋介石何以下野》（1），《晨报》，1927年8月17日、24日。

(5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6、564页。

(51)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6页。

(52) 参见刘凤翰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531—533、535—536页。

(5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5—956页。

(54) 《鲁涤平离湘前后纪》，《中央日报》，1929年2月28日。

(55) 《鲁涤平谈话》，《中央日报》，1929年3月2日。

(56) 《吴稚晖昨在汤山谈话》，《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何成濬二月二十六日宥电——湘局严重及赴平辅助》，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1219页。

(57) 《蒋主席义正词严之湘事谭》，《中央日报》，1929年3月22日。

(58) 《冯玉祥表示病愈即来》，《中央日报》，1929年4月16日。

(5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7页。

(6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8页；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1985年，第398页。

(61)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2) 慎予：《就事论事》，《中央日报》，1929年2月26日。

(6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0页。

(6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南宁1980年，第608—610页。

(67)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

台北“国史馆”藏。

(68)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2页。

(69) 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70) 《白崇禧致李宗仁微酉电》（1929年3月5日），转引自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第143-144页。

(71) 《白崇禧致李宗仁夏威齐电》（1929年3月8日），转引自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第160页。

(72) 以上记载见《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2、960、963页。

(7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5页。

(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7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76)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0页。

(77)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7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2月26日条，第957页；李守孔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399页。又据1929年2月27日《蒋介石致朱绍良电》（原件台北“国史馆”藏），知朱绍良此时为代理师长。

(79)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2月2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0)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3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1) 《蒋介石致各师团长电》（1929年3月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2)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3月10日）；《蒋介石致曹万顺等人电》（1929年3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8页。

(84)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革命军人同志会训示》（1929年3月1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5) 程思远：《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86)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8页。

(87)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3月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3页。

(8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08—610页。

(90) 《蒋介石致李石曾电》（1929年3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1) 《蒋介石致方本仁电》（1929年2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2)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4) 李静之：《唐生智》，宗志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另一说是青岛（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待考。

(95) 《传唐生智抵津》，《中央日报》，1929年3月2日。

(96)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

(97) 《津唐道上有拥唐标语》，《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

(98)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

(99)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0)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1)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102) 此前学术界论著均称白自天津转大连再取道日本南下，误（《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5页）。

(10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4)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05页。

(105)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68页。

(106) 《蒋介石致胡汉民电》（1929年4月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7)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4、35页。

(108) 《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29年5月21日。

(109)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原文作：“其中五十万元请交第三集团。”

(11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3页。

(111) 《蒋介石复张学良电》（1929年3月1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1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3页。

(113)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6—587页。

(114) 《刘镇华部将开赴兖州》，《中央日报》，1929年4月1日。

(115)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此系蒋介石手稿。

(116) 《蒋介石致毛秉文电》（1929年3月2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17) 《陈立夫致何成濬电》（1929年4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此系蒋介石手稿。

(118)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2、607、603页。

(119)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3月2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0)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1) 《蒋介石复陈铭枢转陈济棠电》（1929年3月30日），未刊件，

台北“国史馆”藏。

(122) 《蒋介石致方鼎英等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2页。

(124) 《蒋介石致方鼎英等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5)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6) 《蒋介石致总部行营陈副处长电》（1929年4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7)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13页；张文鸿：《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页；《中华民国大事记》1929年相关条目；《李明瑞旅反抗胡、陶》，《中央日报》，1929年4月7日。

(12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6页。

(129) 《蒋介石致何成濬转唐生智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0) 蒋中正：《国民政府惟一之政策——和平统一》，《中央日报》，1929年5月8日。

(131)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2)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关于西征武汉及鄂西诸战役阵中日记》（1929年2—4月），转引自张同新编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133) 《蒋介石致何成濬、唐生智电》（1929年4月1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4)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5) 《蒋介石致李仲公电》（1929年4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6)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7)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8)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5页；《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44页。

(139) 卢蔚乾：《胡宗铎、陶钧在桂系中的起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140)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1) 《蒋介石致何成濬转唐生智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8页。

(143)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4)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4月2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5) 《蒋介石致陈绍宽转谭道源电》（1929年4月2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6) 《蒋介石致贺国光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7)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8)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9)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5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0)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1)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2—33页。该书属印本，无编者、出版地及时间，从内容看显系第四路军自编战史，湖南省档案馆藏。

(152)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1页。

(153)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1页。

(154)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15页。

(155)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47页。

(156)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7) 《蒋介石致熊式辉电》（1929年5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8) 《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9) 《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0)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3—34页。

(161) 《蒋介石致冯玉祥电》（1929年3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2)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4页。

(163)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2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4)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5)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1页。

(16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29年4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7)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9页。

(168) 《蒋介石致谭延闿转王正廷电》（1929年4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9)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5、591页。

(170)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1)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15、614、621、623、628、632页。

(172) 《蒋介石致何成濬、唐生智电》（1929年4月1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4月2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4)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5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5) 《蒋介石致贺国光、刘峙电》（1929年5月4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6)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7)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8)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9)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0) 《蒋介石致夏斗寅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1) 《蒋介石致谭道源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2) 李纪才时任襄樊警备司令。5月10日，他电告蒋：“南阳石友三部将于今明日向豫南唐县、新野一带游击。”（见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何成濬电》，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3)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何应钦等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4)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40页。

(185) 《蒋介石致贺国光、钱大钧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6) 《蒋介石致钱大钧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7)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0、629、636页。

(188)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3、625页。

(18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3页。

(19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29页。

(191)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5)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6)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7) 蒋介石日记，1929年4月7日。

(198) 《蒋中正电何应钦对韩复榘部忽入武胜关事进行军队部署》（1929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1039。国史馆档案中将此文件标为1928年4月8日，有误。

(199) 蒋介石日记，1929年3月31日。

(200) 蒋介石日记，1929年4月7日。

(20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10页。

(202)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3)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4) 《国军对冯警备计划》，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5)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1日。

(206)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8日。

(207) 《冯玉祥致蒋删电》，《申报》，1929年5月21日。

(208) 《蒋中正电刘峙豫方已积极备战我方亟应备战》（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26，台北“国史馆”藏。

(209) 《蒋中正电何成濬中央对冯玉祥不主张用兵仍求政治解决请以此与阎锡山详商整体计划》（1929年5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398081，台北“国史馆”藏。

(210) 《电贺国光、钱大钧》（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493页。

(211) 《电韩复榘》（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494—495页。

(212) 《刘镇华致冯玉祥寝电》，《刘茂恩回忆录》上，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217页。

(213) 《韩复榘等通电》，《申报》，1929年5月26日。

(214)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23日。

(215) 《蒋中正电韩复榘所部集洛阳拨款一百万供给养》（1929年5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5040，台北“国史馆”藏。

(216) 《中央宣传部告同志及国民书》，《申报》，1929年5月26日。

(217) 《蒋中正电阎锡山对冯玉祥方针请就近观察妥定缓急和战皆依其意为准》（1929年5月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25，台北“国史馆”藏。

(218)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37页。

(219) 《阎锡山公布规劝冯玉祥忍耐五点以挽危局往来电》（1928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5页。

(220) 《蒋中正电冯玉祥与桂系军阀及一般反动政客绝往还》（1929年5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3052，台北“国史馆”藏。

(221) 《冯玉祥宣布洁身引退入山读书通电》（1928年5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0页。

(222)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4日。

(223) 《蒋中正电阎锡山若冯玉祥能到晋则中央于限度内可准其所请》（1929年6月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305，台北“国史馆”藏。

(224) 《阎锡山电蒋中正如冯玉祥能践约出洋则必须偕行倘冯爽约则北路军事当尽力负责》（1929年6月1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5218，台北“国史馆”藏。

(225)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12日。

(226) 《蒋中正电阎锡山冯玉祥将不出洋请速统一大局若其到晋则可拨付300万》（1929年6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321，台北“国史馆”藏。

(227) 《蒋中正电唐生智何成濬顷冯玉祥既无诚意表示并积极备战我方宜速决定方略早奠西北兹拟第一期作战计划》（1929年6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217，台北“国史馆”藏。

(228) 《蒋介石颁发对冯玉祥西北军讨伐的命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编《军事》（二），第12页。

(22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47页。

(230) 《蒋中正电熊式辉如冯玉祥到晋应促其出洋》（1929年6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57，台北“国史馆”藏。

(23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52页。

(232) 《国务会议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抚使兼办军事善后》（1929年6月2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9021，台北“国史馆”藏。

(233) 《阎锡山电何成濬》（1929年6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72页。

(234) 《电陈济棠、陈铭枢》（1929年6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68页。

(235) 《蒋中正电张寿镛三百万款电中行直交中正》（1929年6月25

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2054，台北“国史馆”藏。

(236) 《电陈立夫》（1929年6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109页。

(237) 《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冯玉祥通缉令》（1929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0005，台北“国史馆”藏。

(238) 《徐永昌日记》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44—445页。

(239) 《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印行，第20页。

(24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1页。

(241)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第109—110页。

(24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1期，1929年10月12日。

(243) 蒋介石日记，1929年10月11日。

(244) 《讨伐西北叛逆战斗详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5)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阎锡山特别费二百万元》（1929年10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1035，台北“国史馆”藏。

(246) 《电刘峙闭城固守》（1929年10月2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659—660页。

(247)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274—275页。

(248) 《电徐廷瑶》（1929年11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4页。

(249) 《电蒋鼎文、陈诚》（1929年11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7页。

(250) 《第十军参谋处关于豫西各战场战况及何应钦赴晋拉拢阎锡山成功的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52页。

(251)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8日。

(252) 《中央军克服登临》，《申报》，1929年1月19日。

(253)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报攻占洛阳电》（1929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67页。

(254) 《电阎锡山》（1929年11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94页。

(255) 《刘茂恩回忆录》上，第269页。

(256) 刘峙：《我的回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257)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7页。

(258) 《蒋中正电刘峙新一师移调宜昌荆沙接防第四师》（1929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8003，台北“国史馆”藏。

(259) 《电刘峙》（1929年9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66页。

(260) 《陈绍宽呈报海军各舰队在鄂西截击张发奎等部经过受行政院嘉奖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56页。

(261) 《张发奎拥汪讨蒋通电》（1929年9月17日），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262) 蒋介石日记，1929年9月19日。

(263) 《蒋中正电何键张发奎师集中枝江宜都有窜常德湘西以至广西之迹》（1929年9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44，台北“国史馆”藏。

(264) 《蒋中正电刘文岛转何键湘中各部奋勇讨逆特定俘获师长等犒赏办法》（1929年10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0007，台北“国史馆”藏。

(265) 《蒋中正电刘文岛何键党国存亡全在灭张发奎一举希督饬所部截击》（1929年10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0006，台北“国史馆”藏。

(266) 《国府下令免张发奎职以黄镇球继任第四师师长》（1929年9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2020，台北“国史馆”藏。

(267) 蒋介石日记，1929年9月24日。

(268) 《湘军截击张部告捷》，《申报》，1929年9月26日。

(269) 《蒋中正电杨腾辉等桂省党政由俞作柏负责军事由李明瑞任之》（1929年6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39，台北“国史馆”藏。

(270) 《俞作柏等电蒋中正及五院院长谨遵国府任命宣誓就职成立广西省政府》（1929年8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222，台北“国史馆”藏。

(27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229页。

(272) 《何应钦电何成濬通报冯玉祥之策略》（1929年5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203，台北“国史馆”藏。

(273) 《电李明瑞》（1929年9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61页。

(274) 《电鲁涤平》（1929年9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81页。

(275) 《蒋中正电陈济棠撤换俞作柏直委吕焕炎为主席率队进驻南宁速决桂局》（1929年9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52，台北“国史馆”藏。

(276) 《电酆悌》（1929年9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06—507页。

(277) 《电陈铭枢、陈济棠论桂局》（1929年9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37页。

(278) 《杨腾辉拥护中央》，《申报》，1929年10月5日。

(279) 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03页。

(280)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22—623页。

(281) 黄绍竑：《五十回忆》，第207页。

(282) 《电杨杰》（1929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90页。

(283) 《蒋介石关于对张发奎与桂系军作战军事报告》（1930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68

页。

(284) 《陈济棠关于在北流击溃张发奎等给古应芬等密电》（1930年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70页。

(285) 陈公博：《苦笑录》，第148页。

(286) 《蒋介石给国民政府呈》（1929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660页。

(287) 《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9年编印，第71页。

(288) 《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第69—74页。

(289) 蒋介石日记，1929年10月1日。

(29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7页。

(291)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页。

(292)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278页。

(293) 《电唐生智》（1928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04页。

(294) 《蒋中正电宋子文石友三部已集中蚌埠候船出发速雇船到浦口待运》（1928年11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1073，台北“国史馆”藏。

(295)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第278—279页。

(29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1929年12月15日。

(29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1929年12月15日。

(298)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18日。

(299) 《电何成濬、杨杰》（1929年12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42—143页。

(300) 《电复杨杰支辰电》（1929年12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

略稿本》第7册，第150页。

(301) 《唐生智在郑宣言》，《大公报》，1929年12月7日。

(302) 《蒋中正电唐生智望示以至诚明告最大决心使将士释然勿疑》（1929年12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6028，台北“国史馆”藏。

(303) 蒋介石日记，1929年12月6日。

(304) 《蒋介石致杨杰电》（1929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18页。

(305) 《蒋中正电杨杰等以唐生智叛变诸兄皆得安全部队亦未受危乃革命完成之兆》（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6034，台北“国史馆”藏。

(306) 《韩复榘等同情唐生智与石友三反蒋通电》（1929年1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88页。

(307) 《电杨杰》（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67页。

(308) 《蒋中正电示何应钦陈济棠朱绍良新田支队攻击计划》，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5013，台北“国史馆”藏。

(309) 《电杨杰》（1929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90页。

(310) 《电杨杰》（1929年12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14—215页。

(311) 《电蒋鼎文》（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68页。

(312) 《电杨杰》（1929年12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74页。

(313) 《国府下令褫去唐生智本兼各职予以缉拿》（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5007，台北“国史馆”藏。

(314) 《蒋中正电何成濬请速令徐源泉等服从杨杰讨唐生智并促阎锡山接济前方给养》（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2058，台北“国史馆”藏。

(315) 《阎锡山复蒋介石电》（1929年12月1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01页。

(316) 《阎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大公报》，1929年12月22日。

(317) 《蒋中正电阎锡山豫西各部及韩石归兄指挥并进驻郑州》，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7030，台北“国史馆”藏。

(318)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5页。

(319) 刘峙：《我的回忆》，第81页。

(320)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5页。

(32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1期，1930年1月1日。

(322) 《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1930年1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48页。

(323)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8页。

(324)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7页。

(325) 《唐生智脱离部队》，《申报》，1930年1月8日。

(326) 《电刘峙》（1930年1月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77页。

(327)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7日。

(328) 《蒋中正电阎锡山请主持西北问题》（1930年1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3101，台北“国史馆”藏。

(329) 《唐生智部听候编遣》，《申报》，1930年1月10日。

(330) 《蒋中正电阎锡山商唐生智军之处置办法》（1930年1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6010，台北“国史馆”藏。

(331) 《电刘镇华嘱其转劝阎锡山》（1930年1月1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79页。

(332) 《郑绅商挽留孙楚军队》，《申报》，1930年1月22日。

(333)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5期，1930年2月10日。

(334)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15日。

(335) 樊崧甫：《中原大战亲历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336)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4页。

(337)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14页。

(33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25日—26日。

(339)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5期，1930年2月10日。

(340) 《电阎锡山》（1930年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54—455页。

(341) 《五院院长勖勉军人》，《申报》，1930年2月11日。

(342) 《阎锡山电蒋中正武力统一不易成功以礼让风全国则苦心自可大白于天下》（1930年2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05，台北“国史馆”藏。

(343) 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11日。

(344) 《电阎锡山》（1930年2月1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63—464页。

(345) 《阎锡山电蒋中正党国大治大乱之机在此一转移》，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10，台北“国史馆”藏。

(346) 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14日。

(347) 《蒋抱完成革命决心》，《申报》，1930年2月15日。

(348) 《胡谭王联名电阎》，《申报》，1930年2月16日。

(349) 《告全国军人文》，《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82页。

(350) 《国府三院长再电阎锡山》，《申报》，1930年2月19日。

(351) 《阎致蒋号电》，《申报》，1930年2月23日。

(352) 《蒋致阎养电》，《申报》，1930年2月23日。

(353) 《蒋阎间最近往来电》，《申报》，1930年2月27日。

(354) 《蒋阎间最近往来电》，《申报》，1930年2月27日。

(355)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第113页。

(356)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2页。

(357) 《阎冯盼汪北来》，《申报》，1930年5月12日。

(358) 《蒋介石关于制订讨伐阎冯部署与作战计划报告》（193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26—227页。

(359)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

(360)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10日。

(361)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19日。

(362) 《讨伐冯阎书告》，《中央日报》，1930年4月6日。

(363) 《中执会忠告武装同志》，《申报》，1930年4月8日。

(364) 蒋介石日记，1930年5月8日。

(365) 《蒋中正电何成濬邹鲁奉阎命持电稿赴奉征求张学良同意电询其详》（1930年2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09，台北“国史馆”藏。

(366) 《蒋介石关于制订讨伐阎冯部署与作战计划报告》（193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30页。

(367) 刘峙：《我的回忆》，第94—95页。

(368) 《刘峙等关于攻占归德俘师长万殿尊并巨创晋军孙楚等部文电》（1930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48页。

(369) 《刘峙关于在仪封附近与阎冯军激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79页。

(370) 《电上官云相》（1930年6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64页。

(371) 《蒋中正电马鸿逵石友三在考城构筑工事请设法使其分析或远离考城》（1930年6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9008，台北“国史馆”藏。

(372) 《蒋中正电何成濬等以第十军监视许昌第九军由铁路东区向郑州挺进》（1930年6月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8031，台北“国史馆”藏。

(373) 《何键报告作战经过》，《申报》，1930年7月13日。

(374)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自十九年三月至十月政治工作报告》，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4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75) 《蒋介石关于对阎冯及其他派系作战经过报告书》，《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

(376) 蒋介石日记，1930年7月15日。

(377) 《蒋总司令通电报捷》，《申报》，1930年8月18日。

(378) 《电王均》（1930年6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33页。

(379) 蒋介石日记，1930年7月22日。

(380) 《蒋中正电韩复榘亳州为我第三军攻克先解决津浦线》（1930年7月2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8056，台北“国史馆”藏。

(381) 《手谕先入济南城之部队赏洋二十万元》，《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42页。

(382)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06页。

(383) 《总司令部参谋处对阎冯战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4) 樊崧甫：《中原大战亲历记》，《近代史资料》第69号，第242页。

(385) 《蒋总司令通电告捷》，《申报》，1930年9月17日。

(386) 《阎锡山促汪精卫北上》，《申报》，1930年4月7日。

(387) 《联名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39页。

(388)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89)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90) 《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2—853页。

(391) 《实行训政规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4页。

(392)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版，1930年10月11日。

(393) 《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6-878页。

(394)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95)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

(396) 《蒋中正电张学良负责处理西北事变》（1930年2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6051，台北“国史馆”藏。

(397) 《蒋中正电吴铁城请张学良推荐内政部长军事参议院长外交次长人选》（1930年3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4033，台北“国史馆”藏。

(398) 《蒋中正电宋子文于四月五日前电汇张学良五十万元》（1930年3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4045，台北“国史馆”藏。

(399)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转见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00)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

(401) 《张学良通电望蒋中正阎锡山——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1930年3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29，台北“国史馆”藏。

(402) 《致阎锡山电》（1930年3月），《张学良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403) 《蒋中正电示古应芬答允张学良要求促其五日内出兵》（1930年6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33036，台北“国史馆”藏。

(404) 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3日。

(405) 《张作相复张学良电》（1930年7月23日），《张学良文集》第1

册，第293页。

(406) 《张学良表示始终拥护中央》，《申报》，1930年9月5日。

(407) 《和平通电》，《大公报》，1930年9月19日。

(408) 《阎下野电已发》，《申报》，1930年11月7日。

(409) 《财政部十八年度财政报告》，《申报》，1931年3月17日。

(410) 本节叙事较多地参考了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中《中原大战》一文，谨此致谢。

(411)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6日。

(412)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413) 《龙云电蒋介石》，云南省档案馆藏；转见荆德新《周西成图滇与龙、李倒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414) 《周西成图滇失败》，《申报》，1928年1月4日。

(415) 《龙云电蒋中正陈述周西成侵略云南情形》（1928年1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2013012，台北“国史馆”藏。

(416) 《蒋中正电龙云望积极入桂》（1929年4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2078，台北“国史馆”藏。

(417)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418) 《云南省政府公报》，1929年6月8日。

(419) 《龙云入黔讨逆通电》（1929年6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

(420) 《龙云电蒋中正志切请缨愿效驰驱》（1929年10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063，台北“国史馆”藏。

(421) 《蒋中正电张群催龙云亲征》（1930年4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26022，台北“国史馆”藏。

(422) 《陈铭枢电蒋中正已派员携二十万元赴滇》（1930年4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8032，台北“国史馆”藏。

(423) 《龙云电蒋中正京粤拨款均到已令第九十八等三师直达百色》

（1930年4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116，台北“国史馆”藏。

(424) 《电龙云催前进》（1930年6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02页。

(425) 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云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重印，第7页。

(426)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7日。

(427) 《电王柏龄勿预闻滇事》（1931年4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56003，台北“国史馆”藏。

(428)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第10页。

(429) 《蒋中正电李燊请将部队留原防地专心训练》（1928年11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397074，台北“国史馆”藏。

(430) 《致电李燊望停止前进听候解决及电杨森停止军事行动专力川省建设勿启川黔战端》（1928年11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5025，台北“国史馆”藏。

(431) 《复贵州省主席周西成解决滇黔争端电》（1929年1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页。

(432) 《蒋中正电周西成望其明白宣布并出兵攻桂》（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8038，台北“国史馆”藏。

(433) 《军事杂志》第13期（1929年7月1日），第160—161页。

(434) 《蒋中正电古应芬照发李燊所请领之枪弹》（1929年6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9027，台北“国史馆”藏。

(435) 《电龙云》（1929年9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76页。

(436) 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437) 《蒋中正电何成濬请嘉勉王家烈》（1931年7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9193，台北“国史馆”藏。

(438) 《蒋中正电刘湘等到达荆澧后以主力占领长岳并联络夏斗寅》

（1927年4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100013018，台北“国史馆”藏。

(439) 沈志：《大革命时期杨森两犯武汉被歼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2页。

(440) 《国民政府缉拿吴佩孚令》（1927年12月2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441) 《国民政府免职查办杨森令》（1928年1月6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476页。

(442) 《蒋中正电李仲公川事全托刘湘》（1928年4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2040，台北“国史馆”藏。

(443) 《电何成濬》（1929年10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70—571页。

(444)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页。

(445) 《国民政府公布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行组织大纲训令》（1931年3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23页。

(446) 《蒋中正电刘湘阻止川军内部冲突扩大》（1932年9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53025，台北“国史馆”藏。

(447) 《蒋中正电何应钦派员加紧了解川局双方真相及其对中央之希望再作最后决定》（1932年10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54020，台北“国史馆”藏。

(448) 《张群电蒋中正谈收拾川局方案》（1932年10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59045，台北“国史馆”藏。

(449) 曾扩情：《我奉命参与策划刘湘解决刘文辉的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450) 《杨永泰电蒋中正条陈四川贵州善后大要》（1932年12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66024，台北“国史馆”藏。

(451) 《唐式遵等联名声讨刘文辉电》（1932年10月16日），《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第227页。

(452) 《蒋中正电杨永泰请张群转告汪兆铭设法灭共以免刘湘与刘文辉

之战》（1933年6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86060，台北“国史馆”藏。

(453) 《兰州某致南京陈立夫江电》（1931年7月3日），见《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511。

(454) 《兰州马文车致上海徐圣禅敬电》（1931年3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1692。

(455) 《兰州刘秉粹致南昌何应钦宥电》（1931年3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1723。

(456)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57) 《兰州雷中田陈珪璋鲁大昌致横川吉鸿昌阳电》（1931年8月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777。

(458)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8月16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459)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0) 《雷中田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8月3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1)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462)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密》（1931年9月6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3) 《兰州马文车致南京顾祝同宥电》（1931年8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990。

(464)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9月8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465)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6)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7) 《雷中田、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8) 《邓仲芝、薛子长、李炘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4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9) 《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70) 《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7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第19卷，“蒋档”。

(472) 《南京秉元致兰州马文车鱼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747。

(4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1日。

(474) 《蒋中正电责马文车反抗中央明令囚禁马鸿宾速负责处理恢复其自由》（1931年8月30日），《筹笔》第60册，“蒋档”，档案号04—0392。

(475)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于右任冬电》（1931年9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26。

(476)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寒电》（1931年9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2045。

(477) 《蒋介石致高振邦电》，《事略稿本》第12册（台北“国史馆”编印，2004年12月初版），1931年9月8日条，第56页。

(478) 《蒋中正电杨虎城冯电粤方委雷中田等为军长及嘱邓宝珊勿卷入甘事》（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档案号04—0442。

(479)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哿电》（1931年9月2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49。

(480) 《平凉陈珪璋致西安杨虎城删电》（1931年11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441。

(481)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三马》，第74页。

(482) 《兰州雷中田致汾阳冯玉祥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589。

(483) 《天水吴佩孚致绥定刘存厚朱汉阳筱电》（1931年10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115。

(484)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胡逸民冯钦哉鱼电》（1931年12月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84。

(485) 《南京邵力子致西安杨虎城宥电》（1931年9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298。

(486) 《蒋介石致杨虎城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0月18日条，第185页。

(487)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蒋中正冬电》（1931年11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357。

(488) 《西安王一山致兰州杜彬丞王宗山文电》（1931年12月1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97。

(489) 《西安子坚致兰州孙蔚如寒电》（1931年12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99。

第五章　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第一节　中共以工农武装割据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一　中共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武装革命

1927年国民党武力反共后，中共相继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共和国民党开始长时期的武装对立。此时，国民党虽然逐渐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旗帜之下，但其内部仍然派系林立，扰攘不宁，纷争不断。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又开始“二次北伐”，对南方各省控制力度严重不足，这给中共继续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充足的空间。1928年，中共继续在全国各地领导开展武装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横两县的年关暴动，数日内，起义区域达百余里，组成土地革命军，开始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队，在湘南中共党组织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结合发动湘南年关暴动，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三个月之久。

1927年年底、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开始在洪湖

和湘鄂西发动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三四月，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契的斗争。1928年春，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闽西龙岩、永定的农民起义，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1928年至1929年各地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一是来自各地的工人、农民和会党武装，一是受中共影响的原国民革命军力量，后者又是中共领导的起义武装的主力。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后来存续下来的武装力量，多来自于此。1928年至1929年中最具影响的两次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都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内部领导发动的，两次起义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分别催生了红三军团和红七军，代表了中共领导开展武装革命的重要模式。

湖南平江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的活跃地区，中共在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派系在这里激烈角逐，政权统治极不稳定，加之土劣猖獗，常常“巧立名目，如协进善后等会名称，藉端敛款”[(1)]，民众革命情绪高涨，“把他们的农会解散了，个个都愤愤不平”[(2)]，为中共生存、发展提供了良机。1928年前后，中共在这里领导举行了几次暴动，并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其中1928年3月“扑城”斗争，参加农民达到20万人。6月，湖南省当局调独立第五师进驻平江地区进行“清乡”。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1928年春已秘密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团长彭德怀于4月加入中共。他们利用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与南京中央的矛盾，培植中共革命力量。7月中旬，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到平江，与第一团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传达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的指示。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为中共党员，电令逮捕。彭德怀、滕代远获悉后，立即召集第一团的中共党员研究对策，决定迅速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

江县城举行起义，攻占独立第五师师部、平江县政府、警察局、监狱等处，占领平江城。据国民党方面报告，起义部队夺取“清乡队及挨户团团枪五百余枝，子弹、军装、武器无数，其他捣毁净尽，放出狱囚二百余名……是晚召集各乡匪首及城中共党，成立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党执行委会，改换红军旗帜，散发传单，鼓吹工农暴动”[(3)]。

平江起义成功后，立即“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4)]，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全军共两千五百余人。当时，红五军决定，利用平江周围有利地形作战，争取歼灭国民党军一两个团后，撤出平江，向江西、鄂南发展，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7月底，湖南省当局调集八个团兵力向平江城进攻，红五军主动退出平江，转战于湘鄂赣边区。8月，因部队减员较大，将三个团缩编为五个大队。10月，红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大队。11月初，根据红五军军委决定，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挺进，12月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和平江起义一样，百色起义也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内部领导开展的，而且其触及层级更高，直接利用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等战败，失去广西控制权，俞作柏、李明瑞在蒋介石支持下，取得广西政权。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并未采取对蒋一边倒的政策，从其本身思想和抵制蒋介石对广西控制等多重目标出发，积极与中共联络，大量引进中共党人，接纳中共干部到其军政机关协助工作。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等四十多人到广西，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对于中共和俞、李这一时期的接触，后来共产国际远东局曾批评中共中央“对俞作柏

有过幻想”，谈到：“他同你们耍花招，旨在为了改组派的利益来利用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使党或某些党组织听其摆布。我们当即看出政治局有些动摇，甚至发展到李立三曾认真考虑能否接受他入党的地步。当广西特委要求公开同俞作柏结盟时，同志们，这没有任何夸张地、十分明确地反映了政治局一时不清楚怎么办和摇摆。”[(5)] 其实，中共中央当时的想法并非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而利用乃至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对中共也有利而无害，远东局的批评倒是暴露出其对中国事务的隔膜，尤其对国民革命中形成的国共间千丝万缕复杂关系的缺乏了解。

1929年9月，俞作柏、李明瑞发动反蒋事变，但蒋介石很快联合广东陈济棠展开镇压，俞、李反蒋失败。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很大骚动，中共决定趁此打出自己的旗帜。10月中旬，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分别率中共影响下的武装开往百色地区。22日，邓小平与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抵百色，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武装起义。28日，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密切配合，分别在百色、奉议、恩隆等地同时行动，收缴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武装，拉开百色起义的序幕。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指挥。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在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召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同日，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十人任委员。百色起义与其他很多起义不同，它是在国民党内部激烈内斗和派系分化中应运而生，起义过程中没有激烈的武装斗争场面，开创了中共领导武装起义的一种全新模式。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又在广西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3月，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左江根据地丧失。11月，红八军余部编入红七军。此时，右江根据地生存也十分艰难，邓小平报告，在右江的最后三个多月，“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6)]。11月，红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经过长途跋涉，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

总计从1927年秋至1929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达一百多次。这些起义扩大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生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这些都为中共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中共在各地发动组织武装起义最初的目标是进攻城市，但都先后遭到失败，剩下来的武装自觉不自觉地开赴农村，以求继续保存力量。这其中，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队伍最为引人注目。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为避开强大对手的攻击，辗转到达井冈山后，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和各级政权。1927年11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政府。到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共产党的县委，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民军转战到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势力大增。在和湘、赣两省军阀的斗争中，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5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民主政府。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由湘鄂赣地区到达井冈山。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具规模。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地地方政权而言，能够在城市中心地区击退红军，维持自身的安全，虽然就力量对比言，实为理所当然，但已足够使他们松一口气。中共退向农村，本为被迫之举，却意外而又情理之中地获得生存发展的良机。井冈山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揭开了中共农村割据展开革命的序幕，也使南京方面不得不面对中共绝境逢生的现实。国民党方面发现，江西红军形成彭德怀部，朱德、毛泽东部，方志敏、邵式平部“潜通声气，相为犄角”的局面，“致使各地内成空虚，每遭匪乘。地方团队既无组织，少数军警更为所劫，且时人多以寻常股匪目之，殊少注意，初不知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也”[(7)]。从1928年1月开始，湘赣两省驻军对井冈山反复进行多次“进剿”、“会剿”，均无功而返。5月，杨如轩报告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要求“赣省兵力必有两师，湘军亦须两三师”[(8)]，以集中部队对红军展开追剿堵截，此时，国民党“二次北伐”尚在进行，南京方面尚无法向江西大规模增兵。6月6日，鉴于北伐军事已基本结束，朱培德致电蒋介石，报告中共在江西迅速发展，“各地纷纷请兵，省中已无兵可派”，要求从北伐部队中“准予抽调一部回赣”，对付中共武装[(9)]。9日，蒋回电朱培德，同意其“将第三军陆续撤回江西”[(10)]。随后，国民党军队集中湘赣两省十个团兵力分头出动，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红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龙源口大捷，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会剿”。

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集中十八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第二次“会剿”。8月13日国民党军队趁红军大队离开时进攻井冈山，红军不足一营的部队凭险据守，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赣军因红军大队迫近遂川，急忙回师救援，湘军见赣军退走，也纷纷后撤，红军趁机反攻，三战三捷，湘赣省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联合“会剿”再告失败。湘赣省军“会剿”的失败，和两省军队的相互猜忌、保存实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国民党军队军纪的败坏也有损于其战斗力的发挥，刘峙在电文中汇报他从江西同乡那里得到的报告：“人民就近请求当地驻军前往捕剿，驻军竟向人民勒索开拔费，

始允开拔，及费到手，则暗中通报共匪，令其远飏。到远地方后，又勒人民供应给养，循环需索，故兵来则匪去，兵去则匪之报复较前尤烈。”[11]

11月，蒋介石连续电令湘、赣两省对红军实施大规模“会剿”，组织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以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何键在前线代理总指挥，调集两省军队八个旅二十五团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展开第三次“会剿”，企望“压迫该匪以井冈山、大小五井而歼灭之”[12]。红四、五军及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一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插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国民党方面报告：“朱毛股匪乘我会剿各军尚未集中完毕，即由井冈山匪巢沿湘赣边境窜至遂川西南。”[13] 随后，主力红军转战闽赣边。井冈山留守部队由于力量过于薄弱，被迫放弃井冈山，彭德怀率留守部队向赣南方向游击，寻找红军主力会合。国民党军占领井冈山后，展开凶狠报复，金汉鼎甚至提出“将井冈山人民一律勒令出境”，对此，南京中央政府也无法同意，回复中认为其“过于操切”[14]。

红军主力南下赣南、闽西后，迅速在此建立根据地。随着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兵力抽调他省，赣南兵力更为薄弱，当时报章记载：“本省驻军第七及第十二两师，刻正忙于讨桂，在赣南者仅十五旅刘士毅部而已，朱毛乘此机会，由瑞金向西侵入于都……声势较前尤为浩大。”[15] 中共在瑞金、兴国、宁都、于都、长汀、永定、龙岩等地都建立了红色政权，金汉鼎报告，红军活动于赣闽之间，“声势更大”[16]，“职以五团兵力负责赣西南匪共充斥之区，有进剿之兵，即无堵截之兵，任重材轻，时用兢兢”[17]。金之报告虽不无为己卸责之意，却道出了红军迅速发展这一事实。

朱德、毛泽东率红军进军赣南、闽西，是其后来不断取得发展壮大的关键性抉择。江西、福建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

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以江西为例，1933年底，江西邻近省会南昌的丰城、清江两县分别只有国民党员250人、210人，国民党党务工作“无进展，甚至已陷停顿状态”[18]；而同年省会南昌的调查，国民党员也由20世纪20年代末的2000多人减少到600来人，且“没有方法能把这几百个党员团结组织起来”[19]。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20] 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

对中共以赣南作为根据地所起到的作用，陈诚曾有很精当的分析：“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迭，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第三因为人口稀少……共党拥有庞大的军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既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不能流窜就食，而须取给于当地。当地如为贫瘠之

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地，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踞】？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21]

中共在赣南闽西的壮大，形成所谓“汀、连、杭各属赤焰遍地，交通断绝”[22]的局面，终于使蒋介石再无法坐视不顾。1929年年中，对桂战争基本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加紧对中共部队的“进剿”。6月，电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23]。7月，任命金汉鼎为闽粤赣三省“剿匪”总指挥[24]，集结赣、闽、粤三省军队向闽西地区发动“会剿”。在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压迫下，“会剿”初期红军一度遭遇挫折，但红军及时调整战术，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而是采取游击突袭战法，伺机打击对手薄弱部位。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到9月再次打破国民党的“会剿”，收复龙岩，占领上杭。

国民党军队屡战无功，当时曾有分析道出几点原因，颇称精当：“A、因循不追，怀保全实力之私心，使赤匪得苟延残喘，日事扩充。B、不顾全局。为湘省之匪，驱入赣境，湘军即不再前进，作为匪已逃匿无踪，以粉饰太平；反之，江西亦如此，闽、粤亦如此。赤匪因得此剿彼窜，终难肃清。C、不能合作。同在一省以内之军队，因派别、籍贯之不同，而不能合作，甚且排除异己，以巩固自身位置。D、指挥不统一。职位相等，甲部军队乙无权指挥，致不能收指臂之效，故军队虽多而无用。”[25]

除此之外，红军屡次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策策略赢得群众的支持息息相关。金汉鼎发现，闽西群众心向中共，以致国民党方面“侦探宣传员无法接近匪区探取匪情”[26]。为与中共对抗，国民党方面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中共进行政治争夺。金汉鼎在有关报告中对“剿共”军事作出相当深入的分析：“共逆匪众具有相当组织，所持谬说有时亦能麻醉一般意

识薄弱之群众，且匪党于乡村组织尤为严密，使民众之被胁从者欲自拔而无由，故恃单纯兵力以剿共，所得结果，仅能消灭有形之共匪，而共匪在乡村之潜势力，仍日益滋长，表面上似为剿共之成功，而实际确未著何效果。汉鼎有鉴于此，意以为剿共工作除军事力量外，一方面应赖党的力量，使三民主义的宣传深入乡村，以打破共匪种种谬说，唤醒被麻醉胁从之群众，同时用以分化共匪之内部而懈怠其团结，另一方面应以政治设施严厉清乡而消灭共匪在乡村之组织，同时扶植民众自卫力量用御共匪之压迫，如是以党政军民全力活动，共匪将无隙可乘。”[27] 1929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以编遣委员会名义颁布《国军剿匪暂行条例》，针对红军往往利用省际边区政权力量相对薄弱地区求取发展的状况指出：“悍匪往往麇集两省边境之处，难免此剿彼窜，各区必须协同办理或施行会剿，如有必要时并得由本会临时特派专员督剿之。”[28] 此后，国民党方面作出一些收揽民心、笼络群众的动作，尤其对军队的扰民行为进行整顿，力图挽回民心，不过由于其政权控制力和组织力的薄弱，又缺乏有效地争取民众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基础，努力实际效果仍然有限。

1929年末，国民党内部再起争端，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各部揭旗反蒋，紧接着又是中原大战，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鞭长莫及。在此前后，红军迅速壮大，彭德怀率一部在莲花、永新、遂川、万安等地活动；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一部在赣东北占据着弋阳、德兴、乐平、贵溪间大片地区；黄公略等一部在赣西北占据着铜鼓、万载、修水、平江、浏阳等县边境；袁文才等一部在赣西占据着永新、宁冈、遂川等地；段月泉、李韶九、胡竹笙等部占据着吉水、永丰、南丰、乐安间之地区。力量最强的是朱德、毛泽东部，活跃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八攻吉安、五打赣州，对国民党在该地区统治形成重大冲击。

1930年春，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安远、寻乌等县的赣西南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下旬，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安

富田召开，选举产生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随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与此同时，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18日至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宣布成立闽西工农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到1930年下半年，赣南闽西红色区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大块赤色政权”[29]。这一时期红军的壮大发展状况，可以从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辞职电文中一见端倪：“职自受命入赣，已逾两年。原冀竭其驽骀，荡涤冗秽，无如变乱迭作，征伐频繁，剿匪计划，无由实施，防军远征，匪势转炽，事违初愿，治丝益棼。”[30]

随着根据地的稳固发展，红军也不断壮大。1930年初，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在赣西南建立。4月，闽西地方武装组成红十二军。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方面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迅速壮大，使之获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区的工作计划中谈到：“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31] 1931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据地”[32]的提法，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中出现“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33] 这一概念，中央苏区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

除中央苏区外，各地其他起义部队也相继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得到不断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三个军，近十

万人，枪约六万多支，开辟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分布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陕西等十多个省。其中主要有：贺龙、周逸群等建立的湘鄂西苏区；潘忠汝、吴光治和徐向前等建立的鄂豫皖苏区；彭德怀、滕代远等建立的湘鄂赣苏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开辟的闽浙赣苏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开辟的左右江苏区。此外，在广东的海陆丰和海南岛，川东的宣汉、达县地区，江苏的如皋、南通、泰兴地区，也都建立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发展成燎原之势。

二　中共“六大”的召开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

由于共产国际及中共党内理论准备和经验的不足，在武装革命开展同时，“左”的情绪也在发酵。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判断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不断高涨，要求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由此，“左”倾盲动错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引起中共党内的强烈批评和责难，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因此，到次年4月以后即基本结束。

为总结经验，确定新形势下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路线，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问题、军事问题、民族问题等十五个决议案。大会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大目标。大会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中共在当时

的策略方针应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而不是进攻。

适应中共广泛发动武装起义，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形势，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最初的政权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形式，而后过渡到正式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代表的大多数应为工人和贫农，也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分的代表。大会十分重视军事工作，对农民游击战争给予了一定的注意。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军事训练，要注意培养军事工作人才，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编成常备红军[34]。布哈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特别谈到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问题：“我们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总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一个同志说，在乡里做工生活好些，因为乡中有鸡吃。那么，他们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农民在开始的时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这样奋斗，杀了好多土豪劣绅，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后的一个老母鸡吃了。第二天则这样喊的人要多些了，第三天则这样喊的人更多些了。最后便会有人说：‘见了鬼！什么红军！还要我的米、我的鸡给他吃。’……因此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也可以变成组织的连系，时去时来，都带着一定的任务。”[35] 布哈林的发言，代表了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看法，在后来的具体指导中，这种看法常常会体现出来。

中共“六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为总书记，李立三为中央秘书长兼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为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军事部

长），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等七人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以后，乘国民党内部分裂和混战之机，中共武装革命顺利发展。1930年国民党内发生蒋与阎、冯、李之间的中原大战，形势一时显得对中共发展空前有利，同时也催生了中共党内的急性病。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以冒险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层。李立三认为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因此，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而是要准备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号召在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提出“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等冒险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却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地方的城市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暴露了艰苦发展起来的有限力量，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

在农村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等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结合对全国总形势的认识、判断，逐渐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

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着优势，农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而列强在中国所实行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又造成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使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发展。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域宽广，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是有着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大革命播下的种子，为建立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第三，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但一个也没解决，而且日益发展，所以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必然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主观条件。

在上述两篇著作中，毛泽东还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36)]。江西、福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

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而江西自身的条件又使争取江西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江西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三："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37]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将中共发展放到全国政治、军事和社会环境中予以衡量，注意到力量对比这样非常现实而又不可忽略的关键环节，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考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他之所以能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并在中共党内成功崛起的重要因素。

1930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又进一步提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38] 是正确的。政权发展应该波浪式地向前扩大，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初步解决了局部政权与全国政权的关系等攸关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中共的农村割据发展道路作出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其对中共革命乃至民国历史的影响，可谓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第二节　苏区的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一　土地革命的开展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重要一环。秋收起义队伍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后，经过打土豪、发动群众等准备，1928年2月开始分田。6月龙源口大捷后，土地革命全面展开。12月，毛泽东总结一年来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用法律形式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共领导农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法案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禁止买卖土地，这些规定没有充分满足农民的现实利益。

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1929年4月，制定和颁发《兴国土地法》。该法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精神，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7月，闽西党的“一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要过分打击；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这些政策比较符合农村实际，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闽西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39)]。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40)]；“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41)]。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

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42] 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

1930年初，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2月7日，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田的错误，提出一要分，二要快，决定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会后，赣西南的土地斗争迅速开展，三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民分得土地。6月，在闽西长汀南阳召开的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重申了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并针对富农把持肥田，以贫瘠土地让人的做法，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上述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和文件，大都规定了土地国有，造成地权极不固定，有些地方田地一分再分，农民无法安心耕种，影响了农业生产。针对这一问题，1931年2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布告，说明土地归农民私有，租借买卖自由，他人不得侵犯，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形成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方针和正确的土地分配方法，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在赣南、闽西苏区摸索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其他各苏区也都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制订出相似的政策。1927年11月，方志敏等在赣东北领导弋阳、横峰起义，1928年12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规定了土地分配办法：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人民均有得土地之权。谁种归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这和赣南、闽西政策基本相同。鄂豫皖根据地1928年底规定，只没收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和富农剩余的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反对了绝对平均主义，保护了中农利益，缩小了社会的波动面，是一条成功的

经验。

当中共不断摸索土地革命经验争取民众支持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基本无所作为。即使是温和如浙江实行的二五减租，也因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无疾而终。蒋介石本人对土地问题的判断也偏于乐观，提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内地省区，亦绝少数百亩数千亩之地主，而三数十亩之中小耕农，确占半数以上。职是之故，中正对于土地政策，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既就分配而言，本党早有信条，即遵奉平均地权遗教，应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而关于经营与整理，则应倡导集合耕作以谋农业之复兴。盖本党立场，不认阶级，反对斗争，关于土地分配，自应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田。"[43] 因此，蒋介石对于采取改变现有农村秩序的任何激烈举动都不以为然。不能说蒋介石对土地状况的判断毫无依据，问题是，在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即使是并不十分畸形的土地占有状况，也足以导致贫富分化状况的产生，而"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44]。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任何的书生气都足以导致严峻的后果。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轻忽，使中共的土地革命几乎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展开。

随着土地革命展开及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击退，各苏区更加巩固并不断发展，特别是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为加强对全国苏区的统一领导，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苏区及红军代表、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左联和地下党代表共610人，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任务是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法令草案，制定成法令颁布。大会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

制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45] 会上还通过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

大会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办事机构。根据《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土上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同时并存。

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时，自1927年长期活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重大打击。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获行动。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造成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被捕遇害。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随即被杀。七八月份，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罗绮园、杨匏安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李超时相继被捕。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被捕遇害，加之一批干部被派往苏区，中共中央组织亟须重新健全。此时，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同

意，向忠发被捕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准备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9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新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刘少奇、黄平、陈云、李竹声、康生、王荩仁等九人组成，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

二　国共接合部的“赤白对立”和两党的不同态度

20世纪30年代前后，苏区周边地区曾出现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主要发生在苏区边境地区。早在1928年10月，赣东北就有报告提到：“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食器用，只要能搬运者，莫不抢劫一空。”[46] 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苏区有关文件提到，由于不注意赤色区域外的工作，“形成了赤色区域的农民孤军作战、赤白对立的现象”[47]。

赤白对立的出现，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是有距离的，作为土地革命的倡导者，中共以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为己任，非苏区区域从原则上说，理应是革命的发展对象，当地人民潜藏的革命热情和苏区人民也应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对立现象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着中共这一理念，严重影响着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区域去，以为白区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们接近。”与此同时，“白区群众的怕游击队名之为‘刀子队’，造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如铜城铁壁一般”[48]。

这样一个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其最初出现，客观看，和中共土地革命初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1928年前后，中共在盲动政

策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打击对象甚至蔓延到苏区外的一般群众，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这其中，在革命方面犯了许多盲动主义、报复主义的错误，乱抢乱烧乱杀的结果，反造成那边的群众更加坚决的反对革命。"[49] 同时土地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严重触及到地主等农村强势阶层的利益，作为报复，受到国民党军队支持的反苏维埃地方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对参加革命的民众展开屠杀。地主疯狂的屠杀又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恨，以致"报复心理非常浓厚，盲动主义时代精神的复活，群众无论如何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50]。在对立情绪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相互间的报复行为，有时往往超越了阶级对抗的范畴，变成了区域之间的对抗。福建"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51]。福建宁德横坑民团与中共开辟的游击区敌对，引起苏区群众愤慨，"见横坑人即杀，横坑人就不敢向游击区域来买东西"[52]。由此直接形成了赤白对立局面。

作为一个以群众革命为生存基点的政党，中共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就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坚决反对烧杀政策和报复主义。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53] 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而且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1934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仍然强调："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

[54]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赤白对立的后患难以短时期消除，其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重要原因。苏区大量的地方武装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解决本身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一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55]。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56]。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痛切地谈到：“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57]

除维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58]。虽然当时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59]。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一些不谙苏区实际的领导人掌控苏区后，不顾客观可能一味强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上述问题不但无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

应该承认，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农民本身的利益需求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动因。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

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感困惑，默认群众的抢掠行为势必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强硬制止又担心引起群众不满。总的看，中共多采取教育和引导方式，不加以过于激烈的控制，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冲动，抢掠行为事实上无法完全制止。福建连江群众到白区去，拿走的东西“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得来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但是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和得了很多武装”[60]。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当时，中共的对手国民党方面及地主也为赤白对立的形成推波助澜。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正由于此，作为在民众中缺乏深厚基础及影响力的一方，赤白对立事实上为他们所欢迎。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凭借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中共有关报告承认：“盲动主义乱烧乱杀，不做地方群众工作，缺乏宣传，打土豪只为游击队本身，不把当地豪绅财物发散各地贫苦工农。这种错误往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去争

取群众，说游击队是土匪，并利用群众来和游击队对抗。造成群众非阶级的赤白对立，以抵抗革命势力向外发展。”[61] 这样，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土地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62] 湖北阳新“南乡土豪有少数能用改良主义团结氏族民众（如将家财散给家族，诱骗同志自首）”，他们可以“号召一部分民众向我们进攻”[63]。

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维持赤白对立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制度。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农村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宗族凝聚力越强，其权威和号召力也愈大。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1930年间国民党政权在鄂豫皖地区曾“利用封建宗族策划分裂农民队伍，使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反水，出现许多以户族为首的反动据点和反动武装，对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64]。福建漳州也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65] 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鄂豫皖苏区的麻城黄土岗区“十数万农民群众在有力的反动官领欺骗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加以普遍的封建迷信的红枪会的组织，使该区成为纯粹的反动白色区域，数月来没有方法打入革命的宣传与组织进去。该区反动枪会不断的向赤色区域进攻，有时数百、有时数千群众前来，赤色区域群众亦数百数千的与之对峙”[66]。由于该区组织得力，在三面均已赤化后，中共仍始终未能实施渗透。同样，中央苏区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

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67]。此外，中央苏区大量存在的“土围子”也基本是宗族力量的集合。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鄂豫皖苏区报告国民党方面和豪绅地主“利用群众爱东西的心理，去领导群众出来抢东西，抢去的东西，牛、羊、谷等，他们得十分之七，群众得十分之三”[68]。福建漳州民团则“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69]。在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70]，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71]。

为制造赤白对立，实现对苏区的封锁，利诱之外，国民党政权对农民还极尽威吓之能事：“麻城赤白的群众，因为交易断绝的关系，每每夜晚赤白区民众挑东西到山寨里去做生意，夜中而市，后被军队察觉了，杀了一些农民，以后又不敢来往。”[72] 盲动政策时期，中共为发动农民革命，曾有将农民房屋烧毁、财产毁坏以逼迫农民参加革命的情况发生，由于这样做既违背中共的革命原则，也未始有利于争取民众，因而很快被制止，倒是国民党方面后来又有人采取这种方法与中共对抗。他们“压迫农民反水的方法，将此地农民的东西没收带他们到另一地方去抢，准抢三天归各反水农民，然后逐一做去，使这些农民被迫的不得不反水”[73]。这一做法可谓一箭双雕，既使农民不得不跟随他们，同时还可加剧赤白对立。

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述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

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左”的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这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从苏区建设看，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品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74)]。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当时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在苏区进一步壮大及国民党长时期的“围剿”中，将逐步显露。

三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全国各地群雄并起，对垒各方错综复杂，一片混乱。共产国际和中共高层在此背景下，作出形势有利于己的判

断，希望加速扩大根据地，攻打大中城市，将革命推向夺取政权的高潮。在此形势下，革命力量最为发展的湘赣地区红军，被要求进攻中心城市长沙与南昌，湘赣两省红军的行动，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核心部队纷纷北调，湘鄂赣地区防御力量薄弱。彭德怀回忆："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75] 5月下旬，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6月初曾占领长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虽于7月初将桂张联军逼回广西，但主力被迫布置于湘桂边界，长沙防御力量薄弱。6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攻占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并声言攻打武昌。蒋介石被迫把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运往武昌加强防务。彭德怀获知岳州空虚，率红三军团乘胜挥师西进直逼岳州。7月4日，一举攻占岳州城。随之决定乘湘系军阀何键与张桂联军正在湘桂边界混战，长沙城守备薄弱之际，出其不意，进攻长沙。

7月27日，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开进。当日晚九时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张开琏报告，当时"所有讨逆各师，远在桂境及洪宝常澧一带，一时调援不及"[76]。省主席何键在随后的报告中称，因"众寡悬殊，四面均被围困"，长沙不守，其本人"冒弹出西门渡河转道鄂西"，"暂退湘西待罪"[77]。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虽然国民党方面事后在战史中对此轻描淡写，称："至七月下旬，湘主席兼第四路总指挥何键，为应付世局，巩固边防计，远出湘南，亲自指挥，留长部队，因亦甚薄。彭、黄两匪，遂认为有隙可乘，由平、浏疾趋长沙施行猛袭，单薄防军，自难抵御。"[78] 但省城被占，仍然震惊中外，被红军作为攻打目标的武汉"杯弓蛇影，几有谈虎色变之慨"[79]。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

转告何键，要求“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80]。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军队增援何键。8月5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长沙，海军在江面助战，“外舰……亦仗义协助”[81]。激战一日，因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彭德怀遂决定撤离长沙。5日晚，红军放弃长沙向浏阳方向撤去。长沙之役，是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对扩大红军影响意义重大，不过，这一战役实现于国民党方面内部混战引起的混乱中，并不意味着红军实力已经壮大到可以进攻大城市的程度。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前后，江西方面红军一直在为是否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攻打南昌举棋不定，以致李立三批评道：“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82]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刚刚成立的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发表通电，宣称将“统率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83]。此时，由于国民党内混战正酣，驻赣第九路军第十二师、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外调加入对张桂联军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南昌相当空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召集“商会主席团秘密紧急会议，并宣布朱、毛又近吉安，嘱立筹二万元，备制电网，防御省垣”[84]。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已改编为红一军团的江西红军越过吉安，向吉水、永丰、

樟树攻击前进。27日进抵南昌附近的高安、上高地区。南昌守军龟缩城内，不敢和红军正面交锋。朱德、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军队准备固守的状况，没有贸然进攻南昌，8月19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反映："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85] 放弃了进攻南昌的计划。

8月下旬，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西进湘赣边境，向红三军团靠拢。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进至长寿街休整。不久，得知红一军团从江西进军浏阳，歼灭何键一个旅。两军相向开进，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为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方面军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三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再次攻打长沙。8月29日，红军主力进抵长沙近郊。国民党军队吸取上一次长沙不守的教训，在长沙及其近郊地区加强守备，一共配置六个师、一个旅兵力，准备"待匪至而聚歼之"[86]。红军连续发动对长沙的两次总攻击，均未能突破守军阵地，阵地前"死如山积，血溅尘沙"[87]，红军自身遭受重大损失，仅一军团伤亡"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88]。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下决心从长沙撤围，部队回到江西。

10月初，红一方面军发起攻打吉安的战斗。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4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占领吉安后，红一方面军内部再起攻打南昌、九江的声音，毛泽东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

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14日，红军撤出吉安，移师向北。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89] 10月下旬，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南京方面部队大批南下，并源源向赣鄂湘方向开动，准备发起大规模的"剿共"行动。获悉这一消息，毛泽东立即在罗坊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会议从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出发，认识到要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间转移到回旋余地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军和苏区的日益发展扩大及在湘赣地区掀起的巨大波澜，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震惊和不安。1930年8月底，何应钦奉蒋介石命，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研究对付红军的方法，其中，江西省党部代表呈送的提案，提出从政治民生上改进自身办法六条："一、严惩贪污土劣及遇匪潜逃之官吏，委派有政治经验能为本党奋斗者，担任各县县长。二、匪共肃清之后，应限期严格清查户口，办理联结。三、招集灾民从事建筑道路、开水利，以收寓赈于工之利。四、创办小规模工厂，救济失业工人。五、厉行合作社之推广，以活动农村经济。六、厉行减租运动。"[90] 10月10日，中原大战已稳操胜券，蒋介石发表纪念"双十节"的《告父老文》，将"肃清匪共"列为"五项政治措施"之首，明令："划定区域，责令分区，各负全责"，按"整个会剿计划，务使歼灭根株"，"自军事告终日起，期以三个月，至多五个月，限令一律肃清"[91]。中旬，蒋介石分别任命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谭道源为赣西"剿匪"司令，张辉瓒为永丰县"剿共清乡"委员会主任，胡祖玉为赣北"剿匪"司令，朱绍良为福建"剿匪"司令，并提出"剿匪"以赣南为重点。

10月底，奉调国民党军队纷纷入赣，共调集十一个师两个旅，近十万人，并派定三个航空队，随时准备助战。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上要求确定剿共与军事善后为施政急务，并规定："铲

共剿匪，中央应视为最要急务，党、政、军、民务以全力切实协作，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办理完竣。”[92] 会议期间，蒋介石接见南京中央党部请愿的湘、鄂、赣、豫等省“乡民”，表示“四中全会后本人就赴湘、鄂、赣督剿匪共”[93]。12月2日，蒋介石致电鲁涤平，指示：“各路军希督促其如期急进，现在江西兵力甚多，不必待友军之到齐，始行围剿。请先严令各部猛进，务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江西所失各县收复。”[94] 根据蒋的命令，鲁涤平将所部编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罗霖、谭道源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由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两岸对红军发动总攻击，企图寻红军主力决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兵力，红军采取后退化解策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主力过早决战。国民党军队重新占据吉安、永丰、宜黄、乐安等地，稳住南昌等大城市的防御。事实上，由此开始，由于地方实力派受到很大削弱，南京中央统治逐渐趋于稳定，国民党军队从总体上开始了对红军的全面攻击，红军蓬勃发展势头受到遏制，双方进入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围剿”和反“围剿”时期。

12月7日，蒋介石赶到南昌，召集师以上军官举行“剿共”会议，把“剿共”列为中原大战后的第一要务。蒋介石认为：赣南是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26日，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出动三路部队，除鲁涤平第九路军外，包括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辖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张贞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及一个独立旅；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辖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马昆第十二师三十四旅。他给实际出动的四万多部队制定的战略是“分进合击”，要求“以根绝各匪之目的，决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匪巢包围而聚歼之”[95]。蒋介石对红军的游击战术有所耳闻，他的如意算盘是，各路追击包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使红军无可游击之地，从而分头追击，合围聚歼。

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显然过低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在他看来，江西红军不过是个“地方事件”[96]。长沙被打下后他仍称：“长沙虽失，共犯实癣疥之疾耳。”[97]因此，这一时期，他多次声称要在一两个月内解决红军，对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缺乏一个客观的估计。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发动后，红军第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兵力节节阻击，消耗、疲惫对手，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

12月16日，鲁涤平发出总进攻命令，限各师20日开始行动。12月底，国民党军队左路毛炳文师占领广昌后，向宁都前进，右路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占领泰和、万安后，向兴国前进，左右包抄，指向东固、古龙冈地区。中路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各师分由永丰、吉安、乐安出发，占领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得意地表示：“今日江西永丰之东固为共匪朱毛之老巢已克，则其余当易歼灭矣。”[98]随后，该路继续南进，逼向古龙冈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队表面看进展顺利，几路部队分头并进，将红军压缩在古龙冈一带进行决战，大有取得战略主动之势。但国民党军队方面作战实际隐藏着致命伤，红军对敌军行踪了如指掌，国民党方面战报承认：“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99]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作战，却处处受制，公秉藩回忆：“苏区群众看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实行坚壁清野，房屋一空，看不见人，连锅勺碗筷都沉入水塘，盆盆罐罐也转移了。”[100]第十八师报告则称：“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

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101]

朱、毛要从国民党军队的这一内伤中打开缺口。12月30日，鲁涤平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十九路军在赣州蔡廷锴师本日即急进雩都（今于都），抄袭宁都，戴戟师抵兴国后即经古龙冈向宁都侧袭，第六、第九两路军协同歼敌于黄陂、麻田各处，再行收复宁都，“各师统限于元旦拂晓由现地攻击前进”[102]。

鲁涤平下达攻击部署命令当天，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推进到古龙冈，遭红军伏击。30日晨5时许，两军接触，张一面应战，一面求援；下午3时，红军冒雨出击，张部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志等相继被击毙。此时，张部“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103]。当晚，张师部被红军突破，张本人、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伟黄、团长李月峰以下9000人被俘。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104]

张师被歼后，鲁涤平不得不马上调整部署，下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富田、东固之线，谭道源师由沅头东移，向洛口之许克祥师靠拢。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连电前方要求继续“进剿”红军。1931年1月3日致电林蔚指示：“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战，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矜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因此撤退，以张匪氛。”[105]同日，两电鲁涤平等：“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106]同时确定进攻部署：“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

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107] 然而，就在同一日，谭道源师于撤退途中在东韶南方山中再遭红军追击，“苦战终日，精疲力竭，势难再支，不得已只得突围而出”[108]。战斗结果，谭部一个多旅被歼。此战红军虽然予谭师以重大打击，但未达到歼灭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认为“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109]。虽然，毛泽东高标准地对己方提出不足，但国民党军队在五日内连败两仗，“进剿”计划完全被打乱，蒋介石在痛责鲁涤平“张皇失措”[110]之余，也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第一次“围剿”遂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战争损伤约二千人”[111]，毙伤俘国民党军队达万余人，堪称以弱胜强的范例，这既与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轻敌冒进有关，也是中共方面战术成功的直接反映，毛泽东后来总结：“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112]

1931年2月，蒋介石重整旗鼓，任命麾下头号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出动的兵力除第十九路军原有编制不变以外，增调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并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此外，参加“围剿”的还有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卢兴邦独立第三十二旅、张贞第四十九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共集结十九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三个航空队，总兵力达十多万人，兵力较第一次“围剿”翻了一番。

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改变战略为“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宁都为目标，确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113]，在严密封锁、包围基础上，发起进攻。“围剿”作战方针是：“以歼灭赣南匪军之目的，以主力分别由东、

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匪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断绝匪区物资来源，最后一举而歼灭之。”[114] 3月30日，蒋介石电王金钰，告以“进剿”原则：“赤匪利用山地险要，飘忽无常，与前之讨逆各役，迥不相同。为慎重严密起见，已饬各部以稳扎稳打为主，进攻不得过猛，与友军切取联络，齐头并进，每日以进展二十里为限。经过地方，使匪不能漏网。同时辅助地方，组织民众自卫团，并肃清后方，使匪不易再逞。”[115] 根据以上方针，国民党军队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数百里长的战线。

第二次“围剿”准备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也力图有所作为。何应钦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116] 为此，南昌行营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对江西地方政治、社会展开整顿：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同时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40%，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青壮年“难民”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117] 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心知肚明，并力图在政治和组织上和中共争夺民众。

4月1日、3日，何应钦两次下达总攻击令，限令5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克服各县”[118]。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推进，压向赣南、闽西中共根据地。

此次作战分南北两路展开，北路分左、中、右路，第六路军为左

路，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路孝忱新编第十三师，以主力由南丰、八都夺取广昌，并以一部进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之线。第二十六路军为中路，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二十五师（孙连仲兼）、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关树人骑一师，由乐安、宜黄分两路向东韶、小布进攻。第五路军为右路，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罗霖第七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分别从吉安、吉水、永丰南进，向东固、藤田方面进攻。三路最终目标为宁都。南路为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六十师（蔡廷锴兼）、戴戟第六十一师及第十二师马昆第三十四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城冈、江背之线进攻，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后未及休整补充，只有三万多兵力。面对国民党军队铁桶般压来的庞大阵势，红军采取先破弱敌，在紧密链条间寻隙突破再行反击的方针。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主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119]。4月中下旬，红军主动放弃广昌、宁都等大片地区，对此，国民党方面宣传：“自本月对匪开始总攻以来，已连将匪之第一第二阵线，完全冲破……综计收复区域，纵横共达三百余里。”[120]其实，红军并没有为一时一地得失所动，而是主动西移至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对此，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在政治上全力应付，军事上则加紧准备对赣南苏区的围攻。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也可起到防范两广部队北进的作用，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5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粤局如变，赣南剿匪部队仍须照常围剿，勿因此功亏一篑。

并令各部务于十日内占领宁都，击溃赤匪之主力，则两粤叛军心为胆寒，或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其向北出兵，则粤军必不敢出境攻赣，只有桂军攻湘。如我军能于十日内击溃赤匪，则桂军尚不能过衡州也。”(121) 次日，蒋介石又电告朱绍良：“两粤或有变故，我军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主力，占领宁都，则两广或可用政治方法解决，不至发生危险，请兄部速照预定计划急进。”(122) 中旬，蒋在日记中进一步透露其想法：“上午对南北战局甚为踌躇，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沉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123)

此时，国民会议正在南京召开，“剿共”问题是其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决议高调表态，认为：“赤匪之为祸，诚如国民政府剿匪报告之所言，不特足以倾覆吾国之政制，而且足以破坏吾国之社会，断绝吾民之生计，消灭吾国之人口，危害吾民族之生存，此一全国国民共同之大患，必须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破除之，决不可如过去所持之心理，以为仅仅依赖国军之进剿，或仅仅责望当时省政府局部之努力，即可扑灭之而有余也。国民政府既已始终自矢其贯彻剿灭赤匪之决心，各省军、警、行政长官自亦不容懈怠其防匪剿匪之责；而吾国民全体尤必周知赤匪之毒害与罪恶，人人以消弭赤祸、肃清匪类之责自任，从而予中央与地方军政当局以最大之协力与赞助。”(124) 当“围剿”军事正紧张展开时，国民会议的决议可以指望为其充当强心针的作用，但是，当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正式展开接触时，国民党方面却崩溃得意外迅速。

5月13日，王金钰指挥国民党军队第五路军脱离富田巩固的阵地，向东固地区前进。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

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125] 16日，王金钰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进逼东固时，遭隐蔽于白云山红军拦击、围攻，激战一昼夜，红军“前仆后继，愈战愈多”，公秉藩“恐陷十八师覆辙，乃向富田后退”[126]。是役，该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战死，官兵死亡达二千余人，全师五天后只收容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几乎全军覆没。王冠英旅被俘近三千人。王金钰报告：“此次悍匪尽趋职路右翼，至第六、第廿六两路均无多匪。”[127] 证之中共方面的部署，王所言尚属事实。不过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有报告，此次失利主要是由于：“王金钰之基本部队四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每次故意延缓，不肯前进，廿八师兼程突进，余部均作壁上观。”[128] 毛泽东则谈到：“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129]

由于红军是自西向东攻击，国民党中路军紧接右路军之后也遇败绩。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于5月18日进至南团，受命驰援藤田的郝梦龄师，前进至中村，先头第八十一旅即遭伏击，高率师部直属队和池峰城旅部增援至中村，被红军和游击队团团围住。高树勋最终丢掉部队才得以逃脱，此役第二十七师伤亡官兵二千余人。据孙连仲报告：“敝部奉命向沙溪前进，号日高师先头王旅行抵石马浔南中村以西地，遇枪匪主力，激战终日，初意其为农匪，继而愈演愈烈，至马戌匪力已达两万余人，将我王旅围困，经我高师极力增援，始得解围。”[130] 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此役是第二次“围剿”中“战事最烈者，匪军虽遭重创，高师亦受损甚剧”[131]。

右路和中路国民党军队相继失败，南路第十九军虽进至富田，亦不得不回师兴国，又撤返赣州。红军于是得以进一步集中主力，围攻广昌城。战斗于27日打响，当晚即攻占广昌。守城第五师遭受重创，师长胡祖玉重伤后死亡。进而，进占建宁的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也

在5月31日遭到红军的围攻，“大约消灭三团以上，缴枪约二千支以上，缴到西药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132]。几战下来，国民党军队遭到重创，第二次“围剿”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损失约四千人[133]。这次反“围剿”，红军使用无线电侦察，保证了战斗战役情报的准确及时，“几乎每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根据敌人的命令打仗，很主动。电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34]。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与红军的壮大

一　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围剿”的发动

第一、二次对赣南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克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135]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136]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二次“围剿”国民党军队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则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20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

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137] 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地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确定为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他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138] 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第八、第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第十四师）共七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共七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第七十九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139] 30日，蒋介石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歼灭赤匪为唯一之急务"，要求实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和"剿灭赤匪，安定社会"之重任[140]。

7月1日，蒋介石亲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一）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南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以第三军团朱绍

良部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攻击前进。（四）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141] 7月初，何应钦和陈铭枢部分别从南丰、吉安出发，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中央苏区。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142] 6月22日，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箭在弦上，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143] 毛泽东进一步判断：“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144] 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会如此之快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形势势必影响到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宁、粤冲突发生后，由于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以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看来，似涉行险，但细细分析，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

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145]。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46]

更重要的，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147]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在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148]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149]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已经在政治上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150]。6月底，毛泽东

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指出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151] 这是说的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即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152] 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会议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实乃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7月，当蒋介石的"围剿"发动起来后，从广西长途跋涉到江西的红七军对蒋介石此举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积极进攻，提出'专力剿匪'的口号，削弱粤桂反蒋行动的影响，阴谋拆散反蒋的结合。"[153] 至于"粤桂方面，亦明知内部组织成分的复杂，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及政治上，均极力巩固广州第二国民政府的基础，等待北方冯、阎、张继起反蒋，再会师长江，争取天下"[154]。红七军不愧是经历过国民党内部政争的历练，对宁粤冲突、对蒋介石出牌方式的观察有细致入微之处，可惜第七军7月初才到达江西，无法为中共当时的反"围剿"决策提供帮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下，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是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意外地却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

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猝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155] 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二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剿”和失败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进剿”命令发出后，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156]　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队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现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明确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157]。7月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158]。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3日，蒋介石致电左翼朱绍良等：“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159]

不过，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了两次“围剿”难以捉摸的印象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敢遽下判断，5日，罗卓英向蒋报

告："朱德、彭德怀两部约二万人于将乐附近，退却时扬言先解决福建国军再回江西。"[160] 虽然事后看，报告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在信息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据此改变计划，而是在侧翼保持强厚兵力，然后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压迫。这样的行动方向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缺乏变通，不过对付红军，以变应变似乎并非国民党军队的有利选择。何况，离开预定进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协同背景下，国民党军队大有可能堕入红军彀中，毛泽东后来说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161]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进展顺利，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岗。30日，蒋介石向南京报告："赣南东固、龙岗、黄陂、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占领。"[162] 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163]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交手双方对对方的动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观地看，国民党方面在这一时期似并不处劣势。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164] 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是准确的。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7月17日，上官云相报告，彭德怀部已进至沙溪、中村、黄陂，准备引诱我军深入[165]。23日，罗卓英进一步报告，红军计划"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166]，诱敌深入实

施决战。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0日记有："闻赤匪十日来由老巢向古龙岗窜去者有三万人之众，乃决心即向龙岗、东固攻击前进。"[167] 28日日记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乃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粤桂虽将逼迫湘赣，乱我战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168] 可见，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动向掌握确实相当清楚。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队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169]，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以龙岗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毛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是基于此，这就是毛泽东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170]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171]。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

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7月30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岗一带，正“待命龙岗”[172]，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来抄袭我十九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犹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173]

8月初，国民党军队纷纷逼向高兴圩地区，试图在此逼迫红军主力决战。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尚游魂于兴国西北石陂、沙村之间，扬言由小布来攻白沙，其实乃欺诈我兵力而已。第六师到太平寨，围剿未破，分兵监视，而直攻兴国，颇得法，明知其为牵制兵力而已。惟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174] 蒋此时虽也自称忧虑，但担心的乃是红军会否漏网，已经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反观红军，人困马乏，四面皆敌，处境十分艰危。生死存亡，几在毫发之间。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队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175] 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猝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176]

战争是与对手双方的较量，计划随形势而变化，乃题中应有之义。8月5日，红军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之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民党军队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国民党军队相隔仅20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过，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足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毅然放弃原定计划，向东突进，是红军摆脱第三次“围剿”以来窘迫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同寻常。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队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177)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178)。黄陂战斗后次日，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179) 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莲塘、黄陂两役后，当蒋介石唉声叹气、忧惶无主时，中共方面自身评判也不乐观，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

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180]。也就是说，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红军总体上的被动态势仍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红十二军东进乐安的疑兵事实上并未能调动国民党军队主力[181]。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员上的绝对优势；其次红军活动范围始终在老根据地，活动空间有限，这也使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始终如影随形。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即使内心明白也无暇顾及。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同时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在各方巨大压力下，8月初，蒋一度认真考虑过辞职问题，并对辞职后的政军系统布置提出计划：“顾长苏，蒋长浙，朱长闽，熊长赣，鲁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182]上中旬，蒋对红军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状态，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蒋也实在难言祸福。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183]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184]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

在对红军围而不攻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对已占领的中共老根据地大肆烧杀。16日，蒋电陈铭枢，表示：“清野焚毁之策，中极赞成。请兄详细计划准备完妥后即令各部队切实施行。限十五日内焚平完毕可也。”[185]同时指示焚烧办法和地区：“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

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第三纵队担任安福硕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区，其在龙冈、东固西北地区由第二纵队与该守备队任之。”[186] “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与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头、南陵各圩应皆平毁。”[187] 对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更为残酷，具体执行的指挥官汇报：“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188]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开始进兵湖南。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其对局势发展的应对构想：“据各方消息，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决计抽剿赤之兵以当叛逆，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电召敬之、真如来省商决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189] 9月1日，粤桂联军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190]。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红军抓住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收缩的机会，于7日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在高兴圩地区展开激战。关于此役，蔡廷锴报告与红军“激战肉搏数十次”终将红军“击溃”[191]。陈铭枢随后则报称：“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巷战，均将匪击退……我各军自围匪以来，此为第一次之决战。而匪之凶悍与其死亡之可惊，亦为战役中所罕见。”[192] 国民党方面后来编辑的战报称此次战斗“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193]。

关于高兴圩一战，国共两方面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红四军林彪、聂荣臻战斗刚结束时报告：“此次战役损失较大，职军及三十五军、

三十五师，现收容之伤病已有六百左右，但还有一小部分在阵地未及收容。阵亡的数目不知……全军共计伤团长六名，阵亡两名，其它尚未统计。”[194] 据红一方面军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红军伤亡被俘总数达三千余人[195]。如此损失对于当时实力非常有限的中央红军而言，确实不可不谓重大，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表示：“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196]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仍在继续寻求机会打击退却中的国民党军。15日，红军在方石岭一带向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发起进攻。蒋鼎文部一个炮团和辎重部队被歼，韩德勤部被击溃散。韩德勤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197] 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官兵三千多人，自己阵亡官兵不到三百人[198]。方石岭一战，红军方面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全胜，堪称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扬眉吐气的一仗。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冲突的论点：“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99]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

三　其他苏区的反“围剿”及中央苏区的壮大

在中央苏区“围剿”和反“围剿”激烈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各苏区“围剿”也在展开，国共之间的武力争斗取代国民党内的派系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内战的主要形式。

鄂豫皖苏区以大别山区为中心，东临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威胁武汉，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形成巨大威胁。1930年10月，与准备“围剿”中央苏区同时，蒋介石集结八个师、三个旅兵力，由武汉行营负责，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尽快制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200]。12月上旬至次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围剿”，却劳而无功，其第三十四师被歼，师长岳维峻被俘。对鄂豫皖“围剿”的状况，参战的国民党方面将领总结：“我在麻城一带只能消极的防匪，不能积极的完全消灭。虽然恢复几县，但匪情依旧猖獗。受命之初，武汉行营限一月内将匪肃清，可见对匪情并不了解，许多部队剿匪时到匪区走一次，回来报告说肃清共匪了。这怎算数呢？武汉行营以耳代目，新闻记者更不知匪。自唐生智在驻马店称兵，加上阎、冯作乱，而导致共匪坐大，已成星火燎原之势。”[201]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布置第二次“围剿”，“围剿”部队增至11个师，采取“追堵兼施”战术，限令5月底将鄂豫皖红军完全肃清。蒋介石亲笔致函前方将领，嘱以：“望督励所部，努力进剿，以期一劳永逸也。剿匪不仅以驱匪他窜，实欲消灭其实力，直捣其巢穴为第一要务。”[202] 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首先在皖西发动进攻。红军集中主力，打击深入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红军歼灭对方部队数千人，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再次停滞。此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对鄂豫皖改取守势。鄂豫皖红军趁机发动反击，扩大根据地，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1931年9月，蒋介石亲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

剿”，出动部队增加到15个师。由于日本侵华及国民党内部争权，“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发动。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共约三万人。随后，红军乘国民党方面尚未布置就绪，开始主动出击。12月，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大捷，俘第六十九师长赵冠英及其所属五千余人。1932年四五月，在皖西苏家埠、韩摆渡一带，击垮国民党军队三万多人的进攻，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二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击落敌机一架。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再遭失败。此时，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发展迅猛。1932年1月10日至20日，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河南新集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代表大会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在“全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之下，坚决进攻，和帝国主义作战，【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建立全国统一的苏维埃政府”[(203)]。2月，鄂豫皖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光山县新集召开，选举产生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为主席，辖十五个县苏维埃政府及一个中心县、一个特区苏维埃政府。苏区最盛时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拥有五个县城，建立起包括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

洪湖苏区地处湖南、湖北两省边界，1930年10月，发展到拥有湖北省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和湖南省华容、南县等七座县城，控制着岳阳、沙市间长江两岸大片乡村，纵横达百余公里。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围剿”，洪湖苏区红军主力一度转移，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地方游击队坚持斗争。10月，移往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12月11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月22日至30日，中共湘鄂西“四大”在湖北监利召开。选举产生新的湘鄂西省委，杨光华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湘鄂西“四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强

调："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204]

湘赣苏区和赣南、闽西苏区相互呼应。1931年10月17日至25日，湘赣省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为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为副主席。11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加上地方武装近八万人开始部署"围剿"湘赣苏区。计划多路出动，将苏区分割包围，然后分区"清剿"。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行动，第七十七师进占莲花，第十四师进占永新，第二十八师进占永阳。为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共湘赣省委组成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战争。1932年1月3日，前敌委员会率独立第一师、第三师在永新予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以很大杀伤。随后，又对莲花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七师展开围困。3月2日，国民党守军弃城逃往萍乡，红军收复莲花。至此，湘赣苏区反"围剿"斗争结束。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全面后撤，中央苏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1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尚报告，"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城）、汀（洲）、于（都）、会（昌）四县大部尚是白色"，其他如寻乌、安远、信丰、泰宁、建宁、宁化、清流等，还"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205]。到次年初红军攻打赣州时，苏区已经扩大到不仅于都、长汀、会昌、石城尽入苏维埃掌控之中，赣县、宁都、广昌、寻乌、安远、宁化、清流等县也全部或部分纳入苏区版图。

1931年底，驻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在参谋长赵博生等人策动下发动起义，促成了红军实力的迅速壮大。孙连仲部原属冯玉祥西北军，前一年中原大战中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后，孙连仲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第二十六路军下辖

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共约四万余人。蒋介石对孙部非常重视，怀柔备至，因担心其在山东被韩复榘拉拢为韩所用，极力促成孙部南下至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如此既可增厚江西“剿共”兵力，又可设法使孙效忠于己。1931年初，蒋介石日记中多有调孙部南下的记载：“石友三、韩复榘将有联合，希图抗拒，此时孙连仲部如能开至江西，则统一即可实现矣”[206]；“第十二师张与仁率萧希贤部叛变，在海州附近反抗金汉鼎，及得萧电乃知其事已解决，不致为患。惟外间闻之，恐因此牵大局，又恐孙连仲部因之延不开赣……当此时局，将安而未安，孙部定开而未动之时，诚千钧一发，朽索六马之象，可不慎乎”[207]；“今日萧部变乱虽平，而孙连仲部未开，心犹悬之。”[208]这样密集的记录在蒋介石日记中并不多见，可见其对此的高度重视。

1931年二三月份，经过蒋介石派出代表反复劝说，并馈送孙连仲大量金钱后[209]，孙部遵命如期开往江西，这使蒋介石大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孙连仲部逐渐南下，余计其将实行，则统一实现，更有把握。孙部南移与否，实为统一成败之大关键也”[210]；“孙连仲部既到江西，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211]。政治人物对实力的极端注重，在蒋调动孙连仲上可见一斑。

孙连仲部调赣后，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占领宁都后，孙连仲部驻守宁都。“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外有日本压力，内有西南逼宫，被迫在江西采取收缩态势，这就使孤处宁都的二十六路军形势越来越不利，给养遭遇严重困难，“每天兵站发一点糟坯米，又没有菜吃，大部分以盐水下饭”[212]。加之二十六路军从北方南开，不习水土，部队传染病流行，战斗力严重下降，中共有效的宣传更加剧了军心的不稳。宁都起义参加者回忆：“部队进入江西地界后，沿途的岩石上、路旁的墙上经常发现有红军留下的标语，这些标语的字迹大小不一，多是用石灰水刷上去的。标语的内容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

党！”打土豪，分田地！”天下穷人是一家！”欢迎白军弟兄当红军！’等等。这些标语的每一条，都使我感到新鲜，觉得亲切，并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有一次，部队开到江西宜黄县城，我竟被满街的红军标语触动得彻夜难眠。”[213]

1931年12月14日，在中共地下党人策动下，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及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率领下举行起义。15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诞生，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形势的发展，再次激起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训令》指出，粉碎敌人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214]。根据这一计划，训令对各苏区红军的具体任务和编制作了规定。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对苏维埃革命的形势作出十分乐观的估计，强调：“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

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215]

在中共中央乐观态度影响下，毛泽东扎实推进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受到质疑，军事盲动倾向再次抬头，这集中反映在打赣州问题上。193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即曾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赣州是江西南部中心城市，地处赣江上游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对攻赣州，毛泽东不无疑虑，反对贸然进攻，但中共领导层多认为：“夺取赣州，是我们向外发展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首先夺取赣州，是因为可以把赣南反动势力完全消灭，把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向吉安、南昌取包围形势。夺取赣州之后，我们更容易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216] 对夺取赣州抱有厚望。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下令进攻赣州，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及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2月4日，中央红军陆续进抵赣州城郊，赣州攻击战开始。担任赣州城防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昆部，加上地方武装共八千余人，利用坚城固守，同时向吉安方向国民党军队求援。

蒋介石此时刚刚重新回到南京中央，正为上海淞沪战事焦头烂额，接到江西赣州守将马昆的求援电报后虽曾批示：“务望赴援解围，以保重城为要。”[217] 但内外交困之下，一度有过放弃赣南乃至江西的设想。1932年2月中旬，他致电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表示：“如果局势紧张，或至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今大势如此，倘不早有决心，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以其尚可集团，亦可策应，比死钉在匪区或较胜一着也。”[218] 蒋放弃江西的主张遭到赣籍的熊式辉强烈抵制。18日，朱绍良、熊式辉在回电中提出：“江西剿共计划早已放弃，现在部队只是防区，如将主力撤至赣东，并防区之计划而亦放弃之，恐我军反主为客，将被匪剿。虽众不足恃，牵制保守一隅亦不可得。”[219] 熊式辉等的反对，应在蒋的意料之中，对熊的回电，蒋批：“前电主力集中

赣东之原则决行。皓辰。”[220] 值得注意的是，原批文中还有“江西暂时放弃”字样，后抹去，应是避免过度刺激江西地方之故。20日，蒋介石回电熊式辉等，坚持撤出主力部队的计划，强调：“第十八军与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如不得已时，赣江两岸只可放弃，仅守新淦与抚州以北地区，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221] 此时，淞沪战事已近尾声，“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的说法，真实暴露出蒋在“剿共”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倒是熊式辉比他坚决得多，熊在回电中强硬坚持：“抽调防区部队，坐视地方沦于匪手，职之立场决不能办。盖为人如此办理，其肉将不足为故乡父老食也。”[222] 在江西地方坚持下，蒋介石放弃江西的设想未能成真，吉安方面国民党军队虽然颇多延误，但最终还是出发向赣州方向增援。

赣州攻击战从2月初开始后一直延续到3月7日，历时三十三天，红军采用强攻和坑道爆破等多种进攻手段，一度占领城楼，突入城内，守军旅长马昆报告：“兼旬以来，匪众迭次登城，均被击退。乃漾晨八时，东门城垣又被爆破，匪以炮火机枪乘势掩护，悉其精锐向我猛攻，同时西南两门亦鏖战甚烈。昆等分头督杀，初以机枪佯示威，而匪众蜂拥扒城，我乃施行快放者，匪以前仆后继，来势愈凶，我方弹药用罄，继以肉搏。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匪尸骸垒集，并有授首城垣而坠尸城外。而我方伤亡亦重。”[223] 由于城内守军顽强抵抗及红军攻坚能力不足，红军始终未能拿下城池。3月7日，城内守军和从吉安赶到的城外国民党援军里应外合，向攻城红军发起反击，红军被迫撤出战斗。整个攻击战红军付出3000人的惨重伤亡。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但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政治局

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中革军委于18日发布训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两路：中路军（即第一、五军团）在赣江东岸活动，西路军（第三军团）到赣江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军夹江而下，逐次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3月30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夺取漳州，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时期，筹措给养，然后继续执行赤化赣江流域的计划。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首先攻占龙岩。19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守军张贞部见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红军占领漳州城。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队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面对红军在闽赣两省的积极行动，国民党方面虽然没有如蒋介石所建议的放弃江西，但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几无还手之力。如当时报章所载，江西“全省八十县，完全沦陷匪手者有瑞金、于都、横峰、石城等二十余县，名存实亡者有铜鼓、德兴、永丰、安福等二十余县，土共出没无常者有修水、吉安、南丰等二十余县”。[224] 尤其是赣中、赣南几乎完全放弃，只有赣州、吉安两城留在手中。福建省大部分地区也在中共力量影响之下。

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加上鄂豫皖、洪湖、湘鄂赣等苏区的烘托，1932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地区节节退却，几无防御之力。具体看，红军在此主要形成几大区域：“一、鄂东皖西豫东之股。前共军邝继勋等部，陷广济，扰圻水，攻黄安，经中央派徐源泉往剿，乃收得失地，逐出鄂境，窜入皖属英山。而皖方陈调元不协剿以绝根株，此股共军乃得休息于英山、霍山之山地中，近则已下攻六安，有向皖腹地侵攻之势”；“二、鄂西湘北之股。湘鄂交界处之洪湖，为鄂西共军贺龙、段德昌、王毅民之根据地。去年中央军队曾集

中大军包剿，而洪湖匪未肃清。广东事件发生，剿共主力徐源泉开调湖南，共军气势复盛。近则往北进扰京山、应城，于是长江、汉水之上皆有共军之踪迹”；“三、赣南之股，此为共匪之最大股。据《民报》南昌通讯，此股归朱德、毛泽东直辖，有人十万上下，有枪七八万枝。赣南赣江本岸为其根据地，赣东、闽北及信江流域一带与铜鼓、万载湘鄂赣边境为其支流，其伪中央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政治学校等机关多设于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山中”；“四、闽南之股。闽南之股系赣南共匪之分股，上已述之。此股为罗炳辉、彭德怀、季振同、林彪四部，约四万余人，近则攻陷龙岩、漳州。中央守漳之张贞师节节败退，现云霄亦危”[225]。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一带又一次陷入全面被动，红军的急剧发展，如时人观察所言：“汉口一地已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此实可惊而骇目者也。”[226]

---

(1) 《训令张代指挥官、平江县长查核何迈前呈报平匪情形及善后方法》（1928年8月21日），《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

(2) 《石明关于平江暴动之经过与现状的报告》（1927年9月—10月间），《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第22页。

(3) 《平江清乡委员会魏洁岑等报告关于彭德怀在平江起义情形代电》（1928年8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9页。

(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6)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 《关于平江起义经过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9页。

(8) 《杨如轩电朱培德等匪向茶陵退去是役刘安华阵亡官兵死伤亦多》（1928年5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041，台北“国史馆”藏。

(9) 《朱培德电蒋中正赣境共军猖獗请准予抽调一部回赣肃清共党以免蔓延》（1928年6月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002，台北“国史馆”藏。

(10) 《蒋中正电令朱培德第三军撤回江西》（1928年6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4008，台北“国史馆”藏。

(11) 《刘总指挥关心赣西匪祸》，《申报》，1928年6月13日。

(12) 《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朱毛》，《申报》，1928年12月1日。

(13) 《1929年敌军阻挠红军下井冈山档案史料一组》，《浙江档案》1987年第8期。

(14) 《金汉鼎呈请采择施行剿匪除共计划》（1929年3月9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3，台北“国史馆”藏。

(15) 《赣军开往赣南堵剿朱毛》，《申报》，1929年4月16日。

(16) 《金汉鼎电蒋中正何应钦共匪趁我军集师讨桂逆而重起逆焰回赣活动且声势更大》，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13142，台北“国史馆”藏。

(17) 《金汉鼎电呈蒋介石报告赣西南中共充斥》（1929年4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282页。

(18)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19) 《中国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改组三月来的工作》，南昌《市政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0月1日。

(20) 《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印行，第16—17页。

(22) 《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等部报告与红军在闽境战斗情形文电》（1929年7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37页。

(23) 《蒋介石电张贞令进驻龙岩连城“剿共”》，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2页。

(24) 《蒋中正电粤闽赣三省主席及军长等派金汉鼎为粤赣闽三省剿共指挥》（1929年6月2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020，台北“国史馆”藏。

(25) 《中央革命据据地红军战况史料——上海银行通讯简介红军在赣活动及蒋介石围剿计划》，《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26) 《金汉鼎电蒋中正朱毛匪踪所至赣西南各县受毒已深闽省龙江汀杭连各县人已匪化》（1929年7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141，台北“国史馆”藏。

(27) 《金汉鼎呈会剿共匪计划》（1929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6，台北“国史馆”藏。

(28) 《国军剿匪暂行条例》（1929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6，台北“国史馆”藏。

(29) 《赣西南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354页。

(30) 《鲁涤平电辞本兼各职》，《申报》，1930年4月24日。

(31)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32)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200页。

(34)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413页。

(3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

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36) 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37)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

(38)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39) 《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

(40)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

(41)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

(42) 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

(43) 蒋介石：《电汪院长叶秘书长为解决土地问题详陈分配及整理意见以贡参考》，《军政旬刊》第8期，1933年12月30日。

(44) 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1页。

(4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17页。

(46) 《弋阳、横峰工作报告》（1928年8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96页。

(47) 《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政治任务决议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8) 《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1932年5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11页。

(49)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争取三都七保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

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3期，1931年2月26日。

(50)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51)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17页。

(52)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9册，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20页。

(53)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号·地方武装的策略组织和工作路线》，石叟档案008·5524/2612/05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54)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编印，第302页。

(55)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196页。

(56)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3年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94页。

(57)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947年7月30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58) 《中共会昌县委十、十一两月工作报告》（1932年12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367页。

(59)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陂孝北县委会的指示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97页。

(60)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册，第148页。

(61) 《赣西南工作综合报告》（1931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268—269页。

(62) 《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63) 《关于阳新工作的报告》（1929年9月2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145页。

(64) 陈康等《红二十五军和蔡升熙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11月24日。

(65) 《北冀关于漳州红三团行动的报告》（1933年8月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91页。

(66)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42页。

(67)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争取三都七保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3期，1931年2月26日。

(68) 《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69) 《中共漳州县委书记蔡协民给厦门中心市委的工作报告》（1932年8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24页。

(70) 《匪区割禾办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第11章，南昌行营1934年编印，第48页。

(71) 《中共粤赣省委、省苏给各地指示信》（1934年8月9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6，中央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6页。

(72) 《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33页。

(73) 《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记录》，1931年6月20日于康都。

(74) 子修：《赣北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第264页。

(75) 《彭德怀自述》，第145页。

(76) 《张开琏电告长沙情形》，《申报》，1930年8月2日。

(77) 《何应钦转报何键来电报告长沙失陷经过》（1930年8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6页。

(78) 《国民党政府战史会编：关于红军攻克长沙经过情形的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21页。

(79) 《武汉治安异常巩固》，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6日。

(80) 《蒋介石致何应钦转何键电》（1931年8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7页。

(81) 《何键自长沙报告确实占领长沙电》（1930年8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9页。

(82) 《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

(83) 《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1930年6月2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罗坊会议前后》，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51页。

(84)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战况史料——上海商储银行汉行红军又近吉安函稿》（1930年6月30日），《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85)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86) 《湖南省政府政治报告》，湖南省政府秘书处1931年编印，“剿匪”第15页。

(87) 何键：《湖南铲共汇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34页。

(88) 毛泽东：《攻长沙不克的原因》（1930年9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89) 《红一方面军进攻高安的命令》（1930年10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罗坊会议前后》，第167页。

(90) 《何应钦呈送湘鄂赣绥靖会议决议案》（1930年9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32页。

(9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1930年10月20日。

(92) 《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21页。

(93) 《四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7卷第46期，1930年11月24日。

(94) 《电鲁涤平令各部猛进收复江西各县》（1930年12月2日），蒋中

正文物档案00201020054030，台北“国史馆”藏。

(95)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46页。

(96) 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

(97) 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5日。

(9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22日。

(99)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廿五1010。

(100) 公秉藩：《记龙冈战斗溃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101) 《第十八师失败之检讨》，《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页。

(102) 《鲁涤平电蒋中正以朱毛彭黄诸匪部全在东关寨李庄黄陂小布等处谋抵抗》（1930年12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328，台北“国史馆”藏。

(103)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50页。

(10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105) 《电林蔚》（1931年1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第282—283页。

(106) 《蒋介石电鲁涤平应向龙冈急进围剿》（1931年1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68页。

(107) 《蒋介石致鲁涤平、朱绍良等电》（1931年1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69页。

(108) 《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与中央苏区红军在东韶街战斗详报》（1931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58页。

(10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

页。

(11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第316页。

(111)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48页。

(112)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113) 《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62页。

(114) “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第1卷，台北1967年版，第125页。

(115) 《蒋中正电王金钰饬各部稳扎稳打与友军切实联系》（1931年3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34030，台北“国史馆”藏。

(116) 《在赣欢宴各界之演说》，江西《民国日报》，1931年2月26日。

(117) 《蒋委员长告江西各县离乡避匪之贤良士民书》（1933年9月22日），《军政旬刊》第2期，1933年10月30日。

(118)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429页。

(119) 《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1931年4月19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120) 《毛师收复广昌，南昌行营参谋处通电》，《申报》，1931年4月18日。

(121) 蒋介石电何应钦指示赣南剿共部队应照常围剿勿因粤局变动致功亏一篑，1931年5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0页。

(122) 《蒋中正电示朱绍良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并先剿匪再讨逆》（1931年5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56060，台北“国史馆”藏。

(1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5日。

(124) 《国民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1931年5月

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56页。

(125) 《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1931年5月13日），《朱德军事文选》，第35页。

(126) 《公郭两师进攻东固匪巢之血战》，《申报》，1931年5月29日。

(127) 《王金钰电蒋中正现彭德怀匪主力在水南街图犯吉安》（1931年5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039057，台北“国史馆”藏。

(128) 《曾愚函转蒋中正上次东固剿共惨败情形》（1931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200011104，台北“国史馆”藏。

(12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页。

(130) 《朱绍良电蒋中正共军兵力增至二万余人重创王布恩旅》，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4145，台北“国史馆”藏。

(131) 《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68页。

(132) 《总前委第五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30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47页。

(133)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8页。

(13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35) 《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292页。

(1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27日。

(137)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73页。

(1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28日。

(139) 《剿赤军各路布置完妥》，《申报》，1931年6月28日。

(140) 蒋介石：《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第147页。

(141) 蒋介石：《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1931年7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30页。

(142) 《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151页。

(143) 《总前委第九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58—159页。

(144) 《红军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1931年6月2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62页。

(145) 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2页。

(146)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147)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0日。

(148) 《国民政府慰劳剿共将士通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973页。

(149) 《国府告全国武装同志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75页。

(15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151)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1年编印，第41页。

(152)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41—42页。

(153) 《军阀混战的形势与前途》，红七军政治部编《火炉》第1期，1931年7月18日。

(154) 《军阀混战的形势与前途》，红七军政治部编《火炉》第1期，1931年7月18日。

(15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页。

(156) 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2—13页。

(157)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3页。

(158) 《陈诚电蒋中正何应钦黎川匪以朱德彭德怀为主有窜建宁宁化之虞该路军拟向黎川搜匪主力攻击并规定各部行动等》（1931年7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88，台北“国史馆”藏。

(159) 《蒋介石致左翼朱绍良、孙连仲、陈诚等电》（1931年7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5页。

(160) 《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一师已抵黎川》（1931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4175，台北“国史馆”藏。

(161)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0—211页。

(162) 《蒋中正电王树翰朱培德叶楚伧》（1931年7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4，台北“国史馆”藏。

(163) 《此次剿匪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1931年8月6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59页。

(164)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11日。

(165) 《上官云相电蒋中正据降匪供称彭德怀三师分至沙溪中村黄陂欲诱深入再决战已饬属严防以待》（1931年7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09，台北“国史馆”藏。

(166) 《罗卓英电蒋中正据俘匪供述匪仍图诱我深入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与我决战等匪情》（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64，台北“国史馆”藏。

(16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0日。

(168)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8日。

(169)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1931年7月31日），《兴国文史资料

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20页。

(17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171)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苏区中央局谈到国民党空中力量的影响：“敌飞机轰炸威力颇大，一年来我军被其损伤者近千人。侦察亦有相当作用。”（《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9页）

(172) 《何应钦电蒋中正据陈诚电军情近况现待命龙岗急候钧令指示进止》（1931年7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84，台北“国史馆”藏。

(1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31日。

(174)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3日。

(17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

(176)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177)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7—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5页。

(178)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0日。

(179)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2日。

(180)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181) 8月中旬，在红军由君埠西进兴国后，蒋介石立即获知消息，电赵观涛等告知其已由“君埠西逃”。《蒋中正电赵观涛卫立煌等》（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8；台北“国史馆”藏。

(182)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6日。

(183)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

(184)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0日。

(185) 《蒋中正电陈铭枢赞成清野焚毁之策请详订计划五日内毁平完毕》（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6，台北“国史

馆”藏。

(186) 《蒋中正电陈铭枢详订毁平匪区办法分区施行及击破中坪匪后部队部署》（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0033，台北“国史馆”藏。

(187) 《蒋中正电令赵观涛将小布及以西以南等地区平毁》（1931年8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0041，台北“国史馆”藏。

(188)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李韬珩部配备东固移防赣东情形的报告》（1931年8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8页。原标题中“李韬珩”应为李韫珩之误。

(1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5日。

(190)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页。

(191) 《蔡廷锴电蒋中正何应钦等》（1931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44176，台北“国史馆”藏。

(192) 《陈铭枢通电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高兴圩老营盘一带与匪朱毛彭黄等全部五万余遇战两昼夜将之击破》（1931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59，台北“国史馆”藏。

(193)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7—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6页。

(194) 《红四军关于作战情况的报告》（1931年9月9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74页。

(195) 《红一方面军九月七、八两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30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72—273页。

(196)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197) 《何应钦电蒋中正据蒋鼎文韩德勤面陈向东固途中匪由老营盘来袭五十二师遭惨败经过》（1931年9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63，台北“国史馆”藏。

(198) 《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年9月18日；《红三军团及七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

（1931年9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114—117页。

(199)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200) 《蒋介石指示朱培德对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补充规定电》（1930年11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90页。

(201)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第313页。

(202) 《致吉鸿昌书》（1931年3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328—329页。

(203)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2年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204)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2年1月27日），《湘鄂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198页。

(205)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50页。

(20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10日。

(207)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3日。

(20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5日。

(209) 参见《致刘伯坚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

(2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1日。

(2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3日。

(212) 《致刘伯坚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宁都起义》，第47页。

(213) 《雪三自述》，《李雪三将军·雪三文集》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214) 《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38—539页。

(215)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8册，第39页。

(216) 定一：《夺取赣州》，《青年实话》第10期，1932年2月15日。

(217) 《马昆电蒋中正共军围攻赣城拟请迅予派队驰援》（1932年2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2，台北“国史馆”藏。

(218) 《蒋中正电熊式辉朱绍良上海形势刻决定抵抗到底南昌与开封交通恐中断》（1932年2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5，台北“国史馆”藏。

(219) 《朱绍良熊式辉电蒋中正江西剿共计划已放弃将主力撤至赣东恐不妥》（1932年2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6，台北“国史馆”藏。

(220) 《朱绍良熊式辉电蒋中正江西剿共计划已放弃将主力撤至赣东恐不妥》（1932年2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6，台北“国史馆”藏。

(221) 《蒋中正电熊式辉朱绍良第十八军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1932年2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7，台北“国史馆”藏。

(222) 《熊式辉电蒋中正抽调防共部队使地方沦赤共手职决不能办》（1932年2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8，台北“国史馆”藏。

(223) 《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马昆等报告围攻赣州情形电》（1932年2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82页。

(224) 《赣省举办产销税》，《申报》，1932年6月9日。

(225) 《湘鄂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情况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226) 《湘鄂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情况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

一　蒋、胡矛盾的发展与胡汉民被扣

中原大战的结束，标志着蒋介石击败了国民党内几乎所有敢于公开同他对抗的军事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看起来已稳定全国统一的局面。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统治，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这件事却引起胡汉民的强烈反对，终于导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再次分裂。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依照孙中山遗教，南京国民政府理应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但是训政时期是否需要一部约法，在党内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接受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的同时又颁布约法提案。胡汉民回国后，约法问题被搁置。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予以追认，并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明确指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这也就是说，在训政时期有“总理遗教”就够了，不再需要制定什么约法。大

会为了强化这一观念，更附加说明：“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其效力实较中国以前所见之约法为更大也。”[(1)]

胡汉民主张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反对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虽被三全大会所通过，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众多的反对声音，加之蒋介石借统一“党权”，排除异己，更加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在不满南京中央的情绪下，尽管国民党内其他各派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仍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下，最终结成同盟，在军事上演变成中原大战，在党政方面出现同南京中央对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和北平“国民政府”。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立派系之间，在训政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的一次公开争论。尽管“扩大会议”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但它颁布的《太原约法》却赢得了社会舆论的赞同。甚至连张学良因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也于9月初向蒋介石表示愿与其联合发表宣言，“以开国民会议与定约法”二事为合作前提，以此对抗“扩大会议”。对张氏此举，蒋在日记中斥之为“是其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诚可叹也”[(2)]。

正当训政时期约法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注目的热点时，蒋介石却于中原大战胜利之初，突然翻过脸来，转手接过反对派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面旗帜。这样一来就把胡汉民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中原大战胜利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这时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便开始对妨碍他集权的胡汉民发起挑战。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教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刚刚在前方击败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后，便踌躇满志地从开封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故本党于此乃可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以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要求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3)]。该电报韵目为"江"，故此电又被称为"江电"。"江电"公开发表后，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4)]。

蒋氏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十三条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5)]如此一来，另行编订约法后，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咸传蒋氏欲得一方法为自行制造约法之类，用以为其独裁保障；又有人则谓彼欲自选为大总统者。盖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6)]。

蒋氏此举自然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他决不能忍受在五院之上再设立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当他接到蒋的电报后，因为事先一无所知，便立刻面嘱中央通讯社不要公开发表蒋电，并且指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可公开[(7)]。对此，蒋介石只能无奈地慨叹："江电上中央与国府者，为胡、吴诸先生不赞成，故搁置不发表，以为如此，无异自认政治主张之失败也。书生意气用事，固执己见，必使他人绝望无路，不顾国家，因此更乱也。"[(8)]10月9日，当中常会提出讨论蒋氏"江电"中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确定约法提案时，胡汉民立即发言表示："蒋先生提议召集国民会议的意思很好。不过此事关系重大，非慎重不可。我们为慎重起见，似应先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让第四次会议去决定此重大问题。"[(9)]

召集国民会议，是孙中山遗嘱中的明确主张，并且要求“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对此胡汉民并不反对。但对蒋介石要求颁布约法一事，胡汉民在一次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公开斥为“更是胡闹，因为总理临终的遗嘱，明白要我们大家‘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且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这种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出来吗？”(10)

对于胡汉民的这些言论，蒋介石是不以为然的。在蒋看来，“对政治问题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用政治正当途径解决者，不论其为何人或敌人之主张，必容纳之”(11)。为了最终达成目的，蒋介石尚能暂时容忍胡汉民的反对言行，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时应牺牲一切成见，赴其全力以达成统一之一点，其他只要不越出本党主义之外，与不称兵破坏统一，则一切要求皆可允纳也。”(12)

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两天，蒋介石曾担心自己的计划“恐被人疑有偏私”，但最后仍决心“我尽我心，是非则听之于后世而已，时人之议论亦何必顾哉”(13)。于是，蒋将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为内容的“江电”作为主席团提案，提交大会审议。“但大会对国民会议问题空气不佳”，“制定约法亦有少数人反对”(14)。胡汉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所有议案应先付审查再行提会公决。”(15)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的提案审查会议上，胡汉民就力持异议，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制定约法。因此当该案在审查委员会送回大会之前，已作了颇多修正(16)。当蒋介石拿到戴季陶主持的修正案后，无奈地感慨道：“其所改者，全无关系，等于不改。而于余提案，则搪塞敷衍，皆出于展堂之责。呜呼！展堂书生之见，终不能改。其于国家政治，只求苟安，消极防人，以期不反，而又不能自立奋起。可悯！可叹！”(17)

此后，全会对“约法案审查时辩论甚烈。反对者谓约法虽政府根

本大法，但现在政府已组成，人民权利义务，总理遗教上已明白记载，勿庸约法；赞成者谓政府与人民间之权利义务必须明文规定。结果决留付国民会议讨论”[18]。这一争论很快即传到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关注。11月15日，蒋介石的盟弟、政学系骨干、刚刚进京出席会议的张群再次向全会提议从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张群的提案长达万言，详细陈列了制定约法的五大理由，其要旨为：（一）速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均属总理遗教，徒为倡乱者所阻挠，转以归罪中央。今吾人既于排除障碍之后，立召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与倡乱者所假借之政治主张，截为两事。纵接纳反对者之意见，于政府之威信与尊严，并无所损。（二）党为救国治国之工具，今日通称党国，乃指党治的国家而言，固非党高于国，或党即国之解释；党与国的机关不能混合。（三）国民会议与建国大纲上之国民大会根本不同，国民会议的目的，在将本党建国的主义政纲，提出公认，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实为增进党与国民团结的方法。（四）总理毕生一贯之主张，三十年有如一日，故不能仅限于遗嘱及建国大纲。（五）各种遗著，所涉方面至广，其中阐明立法原理及立法政策者固多，不含法律性质者亦复不少。确定根本法之目的，非备妆饰，原期实行，一条一项，一字一句之中，必须确切简明，始易于共习共守。尤须严格固定，以保法的权威。

该提案最后明确表示：“为实现总理遗教应付今日时局计，为收揽全国人心巩固革命基础计，似非采纳江电之提议。”该案连署人有吴铁城、张继、陈布雷、王伯群、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等[19]。张群的提案是否出自蒋介石的授意不得而知，但提案的核心内容就是针对胡汉民标榜的“党权”提出挑战。接到张群提案后，大会主席于右任当即宣布将该案交付全会讨论。胡汉民立即表示反对，他说：“张委员所提之案用意很好，但关于案中解释各点，不免有些不对的地方……照本席意思看来，本案照审查报告通过，该提案可不必发表。”[20]

胡汉民的发言，立即遭到吴稚晖和李石曾的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吴稚晖反复强调张案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第五点”虽然三全大会已有决议，但并没有什么抵触，很有参考价值。但胡汉民仍坚持己见，他说：“平时有意见，固然可以随便发言，如党内已决议，就应绝对遵守，所以做文字的时候，应该非常留意，不能抄了人家许多话，食而不化……张委员的意思很好，如果作为报告和提案均无不可。但不能抄了《大公报》的批评，就来拼凑成文。所谓自由言论，也一定有一个范围，如果党内已有决议，当然要遵守的。”[21]

在胡汉民的坚持下，四中全会最后仅决议“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并没有将制定约法列入其中[22]。胡汉民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胜利，但他自己也明显地感到在党内缺少同盟者，事实上已无力阻止蒋介石走向独裁。胡汉民在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曾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企图垄断政权。他说：“每个同志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这原是总理的遗训。但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担负，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目前的现象，如果不图挽救，则长此以往，已足亡党亡国而有余，更不必再言训政了。”[23]

胡汉民所说的“某人”指谁？大家都十分明白。他把事情“如果不图挽救”提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说明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但胡汉民这样大声疾呼，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蒋介石则因胡的“政治掣肘”，在日记中愤慨道：“余之天性强果不屈，而乃必欲强余委曲牵就，任彼一人把持，展堂之强人所难，终有使余宁愿独善其身，置天下人类于不顾之一日也。”[24] 为此，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职权。蒋更是当仁不让地以国民政府主席亲兼行政院院长[25]。

胡汉民对此仍不甘心，在大会闭幕当天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

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可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26] 他希望通过这个办法限制蒋在党内的权力，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可是，蒋介石最后仍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27]。这样一来，蒋不仅在“政权”和“军权”上无人抗衡，还不断挑战胡所标榜和依赖的“党权”。这一切，使胡汉民越来越无法忍受。从此他更加公开地同蒋介石唱对台戏，坚持反对制定约法。

1931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作报告，再次提出要在本年内召集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约法。社会舆论一时也多持赞同态度。《大公报》在四中全会期间就曾发表《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的社评，呼吁国民党“应即励行蒋主席江电所陈，迅速筹备国民会议，以决定颁布宪法日期，并先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民公私权利”[28]。胡汉民却在同一天立法院纪念周上抬出孙中山的遗教唱起反调：“近来有很多人故意把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混为一谈，想藉以遂其捣乱的诡谋，破坏本党党治的基础。”根据国民党的“法理”，国民会议无权制定约法。在胡看来，国民大会才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他坚持主张：“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前的召集，会议中的讨论，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29] 此前，胡汉民还坚决表示：“你们不照主义去做，就是反革命；凡反革命的，便是应该打倒的军阀。”[30]

其实，胡汉民反对的并不是约法本身，而是反对蒋介石借制定约法之名在五院之上增设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他始终强调在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反对蒋借制定约法削弱党的权威。他说：“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未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计。”[31]

在蒋、胡合作之初，蒋介石尚需要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领袖

地位，增强他排除异己力量时的政治筹码，以此显示南京中央的合法性。为此，他可以对胡表示十分尊重。不料胡这次在约法问题上对蒋寸步不让，而且据CC派往各地党部特务的调查，支持胡的人还相当多。1931年初国民党各省区重新改选，“改选结果，胡汉民系占优势”[32]。陈立夫就曾回忆道：“胡先生的势力很大，只要党能控制局面，他是党的领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势力。”[33] 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已成为蒋介石实行集权统治的阻力。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自2月以来，蒋对胡的所作所为，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蒋氏在2月10－16日这一周的日记中，几乎天天留下对胡汉民愤怒的“控诉”：

（2月10日）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规，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在身矣，戒之[34]。

（2月13日）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此对中央全会与国民会议诸决议案之能显而可见者，至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一面阻碍政治之进行，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之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不知其恶劣卑陋至此，是诚小人之尤者[35]。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批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痛定思痛，莫能自已。而彼不自悟，仍用旧日手段，挑拨我内部，卖好我属部，使我成为怨受，必欲推倒政府，而其身取以代之为快。如其果有此能力，则我求退不得，而此实万难之事也，奈何？[36]

（2月15日）（胡）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各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余以国民会议之议案，必须自

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并议定训政时期之约法也。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宜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此方足以平乱。不贯彻“江电”之主张，决不能杜绝乱源也[37]。

（2月16日）彼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38]。

从以上引述的这几段日记中，我们不难读出蒋氏内心对胡氏的强烈愤慨。此时，蒋已经下了“能恶人”的决心，并以此“自勉”。

2月24日，蒋介石约集戴季陶、吴稚晖、张群同胡汉民再次商讨约法问题，希望做最后的妥协和努力，但胡在谈话中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他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实在说一句，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处认识你们。”[39] 当晚，蒋介石开始考虑使用非常手段解决胡汉民，他自叹道：“孔子之于少正卯，孔明之于马谡，其皆迫于责任乎？然吾则制止其作恶之机，而保全其身可也。”[40]

但胡汉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迫近。25日他公开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更是倚老卖老地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41] 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力图保持“党权”高于“国府主席”这一政体形式。在胡氏谈话见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写道：“为胡事，又发愤怒。回汤山休息。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总理革命不欲民国之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主张重订训政时期之约法，重订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约法也……故中正痛定思痛，乃有‘江电’，欲要求速订约法，速开全国代表大会，速开国

民会议，以免除国内长时战争，不使再有军阀复起，以压制人民，祸乱党国，此乃牺牲二十万将士之生命与无数国民之损失所得而来者。而乃政客、官僚凭一己之私，欲藉党国之名位，仍欲为个人之权利，而置人民与将士之牺牲于不顾，不但欲毁坏党国，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而且欲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或竟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此恶乎可！且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固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人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若辈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偏狭刻薄者所断送。迨我北伐成功，革命稍有希望，而彼以深悔前非，辅助革命，以求归本党。不料其一入本党，前病复发，野心渐萌，两年以来，欲反原定之和平政策，挑拨播弄。全国将士与国民之牺牲之苦痛，滴滴血泪之痛史，皆不值其一顾，呜呼！摧残革命之罪，莫过于是矣，可不痛哉。”(42)

26日，蒋介石送请柬邀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28日到总司令官邸晚餐。当日晚“八时顷，同人毕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书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室。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堂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43)。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无法转圜。这一夜，胡汉民被扣押在总司令部。蒋介石仅在日记中平淡地记下一句：“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44) 第二天，胡汉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声明辞职的，称：“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另一封是写给蒋介石的，称：“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去年我亦早已提出辞职之议，且自去年与组庵、湘勤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自己有做诗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十五年自苏俄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译述著作生活者年余，以维生计，以遣长日，竟颇有成就。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之生活

也。”胡在信尾还附上一句：“留居此间，室小人杂，诸多不便，能往汤山亦好。”[45] 这两封信被蒋介石再度利用，借以表明蒋并未监禁胡。胡汉民的迁居要求，自然得到了满足。3月1日，胡汉民由邵元冲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押解至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监禁[46]。

胡汉民被扣一事，史称“汤山事件”。

二　国民会议的召开与主要议决案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扣当晚，蒋介石在全体中央委员晚宴中，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当时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叶楚伧诸人都表示附和。会后，国民党诸要员纷纷到吴稚晖处商讨善后。最后，吴稚晖表示：“此事既破裂，则已无法弥缝，惟有力图减少困难及误会。展堂既主辞职，则以静居双龙巷寓次为宜，立法院事作为请假，而由子超（林森字子超）副院长代理之，较为不着痕迹。”蒋当场表示：“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47]

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是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又值国民会议即将开会，不足膺繁剧之任，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案。决议：通过并选任林森同志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同志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二是通过蒋介石等人提议的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并指出：此种约法，为中国民族整个的生命所寄，负训政责任之本党，不得不予再三郑重考虑之后，定坚卓不移之决心，并应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根据总理所指示，以确定其性质范围与产生之方法，俾于国民会议，树久安长治之宏规[48]。会议推定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十一人为约法起草委员，吴稚晖、王宠惠为召集人，负责立即起草约法条文，供国民会议讨论。据出席会议的孙科回忆：当蒋提出议案后，会场“半句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49]。

蒋、胡约法之争，最终以胡汉民的被囚和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从此，国民会议就完全按照蒋的意图发展。对此，蒋曾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为胡汉民事积搁公事至两星期之久，一旦清理为之一快。"[50]

早在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召开国民会议时，国民党中常会即推定蒋介石、胡汉民等十四人为委员，负责草拟召集国民会议之方案[51]。12月29日，中常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交国民政府于1931年元旦正式公布[52]。

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规定，会议代表总额为520人，其分配情形：各省450人，各市22人，蒙古代表12人，西藏代表10人，海外华侨代表26人；选举采用职业代表制，各地代表应按照定额，由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中国国民党等团体选出。同时规定，上述"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以依法设立者为限"[53]。

1月23日，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陈立夫为总干事，具体负责国民会议代表选举和会议筹备事项，并于各省市设立国民会议选举总监督。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第十四条"中国国民党国民会议代表之选举由中央党部另定之"的规定，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又通过《中国国民党出席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施行程序》，共21条，规定各省市国民党员按该省市分得之名额，就中央提名中选出半数或过半数，其余者由党员自由选举[54]。

4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共28条，分别对国民会议的组织、会期、表决方式、会场纪律、秘书处和警卫处的设置等作了具体规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得出席国民会议。"此外，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

各院所属部长、委员长，以及主席团特许人员，可“列席”会议[55]。“因之，中国国民党对于该会议可说有绝对的支配能力”[56]。

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历史渊源、召集经过及其职能，特别强调制定训政约法一事。他说：“中正认此事为国民会议之重要使命，历次坚持，致不谅于平日敬爱之友，言之实心有余痛！”并表示“俟（约法）确立以后，尤须政府国民同立山岳不摇之心，秉化日光天之态度，一致遵守，以致中国于治平”[57]。6日，国民会议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35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29人。会议首先接受国民党推定的中央委员于右任、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选举张继、戴传贤、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共同组成主席团[58]。自8日起正式开会，共开大会八次，通过提案二十余件。

在国民会议通过的所有提案中，最重要的自然是12日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59]。国民会议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13日发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国民会议爰代表全国国民，为下列之决定而郑重宣告于世界：（一）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二）国民政府应遵照总理遗教于最短期内实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由。右之决定，不仅为捍卫中华民族生存之必要，实亦足以消除世界和平之障碍而湔涤近世文明之污点。深信世界各国对此坚决之表示，必能与以深切之认识，而我全国同胞自必一致拥护此项之决定，不辞任何之艰难与牺牲，谨此宣言[60]。

17日，大会一致通过发表《国民会议宣言》，再次强调上述两项主张为“本会议代表国民一致决议”，并要求“全体国民当下最后之决心作最大之努力，拥护国民政府以完成此项使命”[61]。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约法，并发表《约法宣言》，称：国民会议最重要之工作为制订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政府依照国民会议决议，于本

日以约法公布全国，约法亦即于本日发生效力。

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遗嘱中明确提出的二项“最近主张”，“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国民会议算是开完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也昭告于世。但如何废除、具体步骤以及何时“促其实现”，无论国民会议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均无具体规划。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党内的四分五裂，国民会议留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更是形同一纸空文，列强在华所拥有的特权依然如故。

国民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在报告国民会议经过时曾自豪地表示：这次大会的代表，可以说是照组织法规定的人数，全都到会了。出席列席的代表中间，包括蒙、藏、回各族，又另有数位女性代表，所以此次的国民会议，是整个的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至大会的议事经过和一切议决案，无不根据总理遗教，讨论通过的。如实业建设程序案，是根据建国方略的；教育实施趋向案，是根据心理建设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案，是根据训政纲要及建国大纲的。此外所有比较重要以及其他的议案，都无一不是根据总理遗教而决定的。提案方面，计共有四百五十余件，经大会决议通过的约二十余件，其余的四百余案，都在末了一天的下午，通过解决了[(62)]。

但是，国民会议是否真如叶氏所称的“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呢？首先，我们从国民会议的选举机关来看，由国民党中央派往各省市的31位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监督，如陕西省为杨虎城，山西省为商震，浙江省为张难先，上海市为张群，南京市为魏道明[(63)]，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大员，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的规定，他们对参选人民团体有认定资格的权利[(64)]。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代表“党”或“个人意愿”来认定参选代表的资格。我们不妨看看当时在鄂豫皖“剿共”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其日记中关于湖北选举的真实记录：“国民会议选举事，由民厅主办，每县派一指导员，民政厅长吴醒亚电令各县长

接受指导。闻各指导员到达各县后，对县长兼任选举监督曰：‘如何办理，你是明白的，我们心照不宣，惟一事必须迅速完成的，就是制造选民名册。’前些时各军师有人来电，要交换选票，如樊崧甫、周磊要我们选赵观涛，他们选夏斗寅。最后仍由总司令圈定，可说是选举与圈定并用，施之于军队原无不可，若民众选举，由党部先行决定人选交民厅办手续，除大都会尚有形式举行，至各县则关门制造，层层转报与报纸公布而已，老百姓根本不知此事。”[65]

主持湖北全省选举的吴醒亚，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会议代表湖北选举总监督”[66]。由此，可以想见叶楚伧所言“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真实性。难怪万耀煌在日记中不满地表示：“军阀时期选以贿成，为后世诟病，还经过了选，还有人（得了钱）来投票。今日根本连投票形式都没有，主办地方选举作为如此，难怪外人对本党之不谅也。”[67]

此外，我们再从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分配来考查，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共520人，由各省市选举的国民党代表有84人，加上当然出席的84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府委员）；而当然列席的代表亦有50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部会首长），另外还有军队党部特许列席代表15人。以上共计233人，已近大会人数一半。此外，国民党党员参加选举，并未限定不可参加国民党配额以外的职业团体的选举。这就造成国民党员不仅可以参加国民党的选举，也可以参加职业团体的选举，甚至有国民党员在地方党部选举失败后，再加入其他职业团体参选而获得当选的情况。当时在江苏省就不乏这样的例子[68]。由此可见，所谓国民会议，无非是“扩大”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而已，而且其中还排斥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两广代表和改组派等）。可见，南京国民党中央对大会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国民会议选举的代表如此而已，会议通过的决议无论从内容到实质，也很难想象可以代表全体国民了。难怪会议能在最后半天不经过讨论即能“迅速”通过全部提案的95%。而真正经过大会决议通过的二

十余件提案中，最最关键的正如蒋介石所言："国民会议中间，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训政时期约法为唯一的要案。"[69] 前者在于显示蒋介石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以此表明蒋在"党国"的正统地位，至于何时实现，则另当别论。后者则从法理上满足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愿望。

国民会议一致通过了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的闭幕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民会议之目的，在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然而"确认统一与建设之需要为一事，辨明统一与建设必由何道以求得之，又为一事"。为此他"愿恳切开陈于各地父老昆季之前，而蕲求一致之努力"者，"曰巩固统一与尊重法治"。如何"巩固统一"呢？蒋称："今后全国同胞，只须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则统一之基础自固。"又如何"尊重法治"呢？蒋言："在积极方面，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在消极方面，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今后全国国民，以至政府官吏与军人，必须皆知守法为立国立人之要则，不可再蹈放纵恣肆之错误，以陷国家于凌乱不安。"[70] 从以上这段话中不难读出蒋氏的心声：于己"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于人"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不可再蹈放纵恣肆之错误，以陷国家于凌乱不安"。

然而单就法理上讲，《训政约法》还是遭到社会上的众多指责。孔祥熙在实业部的一次演讲中，谈及"约法上之疑点"时，曾把社会上的这种指责归纳为五点："（一）'依法律'或'以法律'等语，在约法上规定至四十一处之多；（二）约法中规定五院院长及部会长，由主席提出，外间颇不谓然；（三）委员之任期，约法未有规定，外间亦以为疑；（四）副署问题，约法未经明定，外间亦以为言，不知各院部长对于政务，既有专责，当有副署法律命令之必要；（五）训政年

限，未经订明，外间亦颇不满。”[71]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专家王世杰就曾对约法评论道：《约法》既欲保障民权，但是“对于人民的权利未采直接保障主义，而采法律保障主义。换言之，人权的保障有赖于法律，而法律亦可限制人权”[72]。在《约法》第三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中，尽管开列了诸多条人民应拥有的种种自由，但每条后均添加一句“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73]。这种法律间接保障制同所谓直接保障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可以依据法律随时停止人民的种种自由。在现代民主国家，法律的修订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构，也就是说限制人民的权利，是通过人民代表决定的。但制定《约法》的国民会议代表并非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换句话讲，国民党可随时单独制定法律，依法“停止或限制”人民之自由。

同样，扩大会议在半年多前公布的《太原约法》，虽然无效，却“采直接保障主义”。如该法第二章《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中，规定了诸多自由条款，大都仅附加一句“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不得干涉”[74]。因此，当时舆论对这部《约法》就公开表示许多不满。《大公报》社评在《约法》草案刚刚公布时，就曾写道：“如何使人民纳税及服兵役工役，政府可以随时自由规定之矣。是以就约法言，关于民权之实际保障，殊不充分。将来能否收预期之效果，其责任仍全在党及政府。此大可注意之一点也。……训政并无年限，自一种意义言，即可解释为无限之延长。盖自治完成无限期，则训政之终了，亦因而无限期也。从前本有训政六年之党的决议，去年蒋主席江电用意，似在缩短之，今乃得一无限延长之结果乎？抑六年终了之，党的决议尚有效乎？吾人纵不必空言求缩短，但亦绝对反对更延长。国议诸君，对此点果作何解也。”[75]

然而，《约法》草案中规定的人民诸多权利依法律保障等一系列条文，在国民会议讨论时，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任何异议，相反地却

将原草案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约法之解释权由约法委员会行使之”[76]，改为“本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77]。尽管《约法》规定了今后颁布法律与约法相抵触者无效，借以显示《约法》在宪法产生前为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之地位，但《约法》的解释权并不是由代表所谓民意的国民会议所授予，而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如此这般，嗣后基于党权而颁布的法律若与约法相抵触时，孰为合法，孰为违法，也唯有执政的国民党才有权加以评判。何况排除了胡汉民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完全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下，因此也可以说对这部《约法》的解释权，最终是操于蒋介石一人之手。

这种冲突很快就表现出来。国民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立法程序上该法须经立法院审查通过才能合法生效。立法院讨论时，众多立法委员对该法不满。部分立法委员发言，“以为（该法）内容与约法有不尽吻合之处，宜先付审查，再行提会讨论”。甚至更有立法委员指责五中全会“不讲法理，不尊重其主张，今乃提至本院，若吾人为尊重立法职权，应将此案内容加以修改，或则退回国府，否则徒为工具”。其实主持会议的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心里非常明白，大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经中央全会决议修正通过的法案，立法院是否仍有权审议。他发现该法“已无通过希望，乃折衷众说，以为此案既经全会修正通过，可径由国府公布，无庸经立法程序，遂散会”。但他私下也无奈地承认“然在立法史上实开一不幸之例，殊足影响于将来”[78]。

照理讲，蒋介石派下的政学系是欢迎《约法》的，因此才有张群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提案，借此挑战胡汉民派倡导的“党权”，并一度引起胡汉民同党内元老的矛盾。陈立夫曾对张氏的这一举动分析道：“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79] 但当约法尚未起草完毕，政学系即从胡汉民被扣

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80]。畅卿即杨永泰，政学系领袖，他的评论颇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孙中山在其《建国大纲》中所规定的训政方式，是由下而上，由县而省，最后至中央，是以民治为基础的。而“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施的训政，是由上而下，而且只在中央，不到省、县，是以党治为构想，与《建国大纲》的精神，颇不相同”[81]。更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训政“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是本末倒置，有名无实”[82]。

胡汉民原本想借训政来提升党权，推行党治，以此消除军权及改变既成的军治局面。这在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时，正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但当蒋介石借“党权”之名消除异己，实现武力统一，大权独握后，胡汉民再想以“党权”压制“军权”，则只能是幻想。正如孙中山早年所言：“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己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83]

孙中山想还政于民深感难矣，胡汉民想还政于党，同样是不可能的。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北伐之际，未行《建国大纲》中的训政工作，造成军权独大的既成事实，事后要其既得之权力，让之于党，已不可能；要其让之于民，更是不可能了。国民党实施训政之挫折，只是军权与党权的较量下，党权为军权所败。至于民权更非军权和党权的对手了。”[84] 胡汉民后来也曾被迫承认，自1928年以来同蒋介石两年多的合作，“是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并愤愤不平地表示：“既然是军治，便非民治，更非党治，军治的帐不能写到党治的帐上来。”[85]

国民会议“顺利”召开了。最能代表国民会议使命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也经会议一致通过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似乎牢不可

破。但事情并不像蒋介石料想的那样简单。因囚禁胡汉民而触发的国民党内的不满，使蒋介石意想不到地面临着另一场更大的挑战。

第二节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一　反蒋派系的再度大联合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消息甫一传出，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在国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奇怪的：以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政治主张和蒋介石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胡尚且如此，其他人如果对蒋持不同意见，其命运更可想而知。这件事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公愤，纷纷谴责蒋，要求恢复胡的自由。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众多要人的不满。据蒋的亲信陈布雷回忆：“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86)

胡汉民被扣当晚，陈立夫为了不使事态恶化，于晚宴结束后拉着叶楚伧同见蒋介石，陈氏恳请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并未接受陈的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87) 与此同时，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言下颇有伤感。三人再三商讨，并无办法，乃联袂往中山东路中央建设委员会招待所，拜见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大家在客厅见面。我们刚入座，吴稚老深知来意，乃大谈汉高祖忌元勋功高震主，大事屠戮，现代历史，似难例外，因将此类故事，古今中外，缕举历三小时，而对胡先生事，如何挽救，毫无

主张。”[88]

其实，吴、张、蔡、李四老对扣胡一事，并非“毫无主张”。蒋介石如此大的举动，如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他是很难做此独断的。2月24日，蒋介石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稚晖先生之见甚当”，“稚老实有政治见解也”[89]。最初，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为此，蒋于扣胡当天事前“往汤山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议事”[90]。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四老”的支持，且这“四老”皆中央监察委员。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随后，蒋向其他在座的党国要人解释时，“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91]。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当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是直欲总揽立法权于一己，藉便任意毁法，造行之私图，而置无数国民与同志之牺牲于不顾。不但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且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胡同志身负党国重任，而越位失职，不自检束一至于此。且胡同志最近之言论、举措多足阻碍革命之进行……将益引起本党无穷之纠纷，尤难姑息坐视，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92]

此后，蒋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93]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此次胡汉民同志辞职事，各位或有不了解真相者。故本晚邀各位同志来此略述大概……不料胡同志竟不顾一切，突于上星期由宣传部以胡同志个人名义，正式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之言论。中央同志于此甚觉不满，监察院某君欲提弹劾案。余负有政治之责，不得不从中调解，免启政治纠纷，并对该委员声明政治问题由余负责解决，请君不必提起弹劾。故于上星期六日，邀集全体中委讨论约法问题。余谓：凡我中央同志尊重胡同志，固无事不可迁就，独于此大政方针，关于中国祸福与存亡问题，则不能不以去就力争。昔者总理常言：吾对汉民之主张事事可迁就到十分之八九，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此总理在日对中正与诸同志屡言之。中正视此约法大问题，决不能以私情迁就，故当时声明：如胡同志以为中正约法之主张不对，则中正可辞职引退。胡同志因自认其主张与中央同志相反，乃表示自愿辞职。"[94]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95]。8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96]。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97]

胡汉民被囚后，蒋介石最初还想封锁消息，"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98]。"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99]。但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访畅卿兄，得悉廿八晚介石以请客为名已将展堂看管……本日公债大跌，或系受展堂事之影响。"[100]最先公开反蒋的

是国民党海外党部，据《华东日报》3月9日广州专电称：“海外党部对胡颇有信仰，此次胡被监禁消息传出后，新嘉坡党部与其他三海外党部，于五日发出反蒋通电。”[101]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102]。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的联络，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103]。

除古应芬外，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104]。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张发奎）、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

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105]，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余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桂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106]。

此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悄然潜往香港。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置于陈济棠的控制之下。

古、陈之外，孙科是参加反蒋行动的另一大将。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107]。据周一志回忆：“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108]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纷纷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纷纷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迫在眉睫，这一切骤然使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政治天平上明显增强了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109] 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力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110]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111]。"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112]。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一度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113] 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114]。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

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115]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116]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117]，甚至连胡汉民都不惜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胡通过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118]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119]。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120]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121]。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

州，只局外接应。”[122] 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123]。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124]。邓泽如等四人都是在国民党内有着很久历史和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汉民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正式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即暴跌[125]。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对于国事，宜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为唯一之鹄的”[126]。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

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127) 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他这一通电发出，使全国为之震动。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据【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128)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129)。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130) 同时，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131)。2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表示："展公（胡汉民）与介公（蒋中正）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132)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

事”[133]。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至为重要。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孙）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134] 从吴铁城转述蒋介石的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135] 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136]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137]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138] 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

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139)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140) 双方会晤仅十五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141)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用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据【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142) 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

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143]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144]。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在《拥护和平统一案》中宣称：“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145]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前此虽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方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国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146]。此前，孙科原“拟随稚、石、静、庸诸公入都向介公直陈，务获先复展公自由，然后再与诸同志从长计议彼此相安之道”[147]。但是，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报告：“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148]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悄悄潜入孙宅，“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149]。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150]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151]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152]。25日，由任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并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藉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153]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正式公开他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154]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二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1931年5月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各派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规定：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宣称：“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以革命之手段……一心一德，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155] 第二天，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156]。宁、粤分裂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织政府反蒋的办法，大致还是沿用了前一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157]。“嗣后凡本党中央委员莅粤，均一律请其出席非常会议，共策进行。又谓扩大会议亦在谋本党精神团结，此次非常会议为再次之扩大，故扩委均为当然之参加者。惟因各方任务重要，暂不能完全来粤耳”[158]。

不过，这次集合的反蒋派却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国民党元老中，一向以广东人为多，而视浙江籍的蒋介石为“新进”。这次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非常会议”下设四个委员会：一、组织委员会，委员为孙科、古应芬、邓泽如；二、宣传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邹鲁、李文范，并任命王昆仑为“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主编；三、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为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四、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为黄季陆、林

翼中、黄公度等。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主席。除外交、财政两部外，广州国民政府又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任命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指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的一切事宜。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并扩充武装力量。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军一百五十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四个军七十二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159]。为了表示两广合作诚意，粤方主动“接济桂军子弹五百万、军费每月廿五万至卅万”[160]。而广西则表示愿代广东招募新兵。为此陈济棠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募兵事此间颇感困难，兄允代募甚为感激。”[161]

在外交方面，陈友仁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162]

6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强行收回粤海关，此后粤海关税收每月250万两悉数解交广州政府[163]，同时发行1000万两公债

扩充军费[164]。16日，广州政府针对南京政府公开发行8000万元公债一事[165]，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自本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如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如敢故违，不特甘受损失，且系有意助逆，一经查出，定当依照反革命论罪。"[166] 粤方希望借此破坏宁方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自唐绍仪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后，上海"公债票等均奇跌"[167]。对此，宁方也以行政院名义发表通告："以后凡粤方所发公债及其他收入，行政院概不承认。"[168]

为了扩大反蒋同盟，广州"非常会议"还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是：一是在蒋管区"立即秘密组织，从事活动"；二是"共（产党）藉蒋为掩护，蒋挟共以自重，故剿共必须倒蒋，倒蒋必须剿共"；三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四是各省反蒋党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机关，都要"取精神之团结，在合法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加入共同工作，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169]。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5月27日，蒋在复孙科的电报中首先强硬声称："中正尽瘁革命，系受总理付托，所任本兼各职，均奉党国命令。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兄以为中正有负总理付托之重，应去职以谢党国，得以合法之手续向党部建议可也。党果决议令中正去职，中正决不敢稍须恋栈……中正个人之进退不足惜，其如党国之纲纪何？至谓中正平日对于政事独断自专，更不知何所指而云然。数年以来，国家重大兴革，无不受命于党，且无一不为兄等所共同主张。兄等既躬亲参加于前，奈何横加訾议于后，今昔矛盾，宛若两人，诚可异也。兄若以为前事应有更张，尽可以合法手续修正，凡党有令，谁敢不从。至少川先生等，不知以何种资格要求中正去职，惟有以一笑置之。"[170] 5月30日，孙复蒋电，指责道："今日南京之

中央，实已为兄一手劫持。”并表示：“欲谋统一和平，必先去统一和平之障碍，实非请兄引退不可，所以毅然南下，正期与诸同志共同奋斗，以谋真正之统一和平耳！”[171]

此后，蒋对孙科也不再客气，在蒋的指使下何应钦等九将领联名致孙数千言长电[172]，指责孙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不智”，并借孙中山之口教训孙科：“总理在时，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173] 广东方面的党国元老萧佛成致电蒋介石，攻击南京国民党中央，称：“以现状而论，今日之所谓统一者，不过独夫之专政统一，非民主政治之统一……望公听纳忠言，将党权交还党人、庶政交还国人，即日自动下野，当可保存数年来之革命历史。若贪恋大位，必效莽、操之所为，则其结果有非弟所忍言矣。”[174]

电报战虽然打得热闹，终究无补于大事，私下的分化活动是宁、粤双方此时最紧要的工作。5月15日，蒋分别密电陈济棠所部的三个师长。致香翰屏电称：“目前伯南已陷孤立，不惜以广东奉之张桂及改组派。故中正已决定免除其八路总指挥之职，请兄继任，以挽救大局而巩固党国。”[175] 致李扬敬、余汉谋电则表示：“陈炯明当时以一念之差身败名裂，永为耻笑。其部下叶举、洪兆麟、林虎等亦随之陷入泥犁。今日亦为兄等成败存亡之关头，亟宜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自应即日脱离伯南，与之断绝关系，以促其最后之觉悟。而兄等之所以效忠党国，自保今名，厚爱伯南者，实无逾此。”[176] 但香翰屏等人不为所动，香率先将蒋致他的密电公布，并复电蒋介石嘲笑道：“取伯公（陈济棠）之位而代之，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执事仍欲用其分化政策，亦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翰屏……誓当随党国诸先进之后，统率所部，与执事周

旋”[177]。蒋的这一打算归于落空。

当时，对陈济棠最直接的威胁，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控制的十九路军。它同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原本都是由北伐时李济深第四军属下的两个师发展而成，同为广东部队。中原大战时，两军曾一度联合击破张桂军。此后十九路军北调为蒋介石效力，屡屡获胜，为此还赢取了蒋介石100万元酬赏[178]，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此时，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因此它的动向至为关键。虽然陈铭枢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但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于是在四监委弹劾电发出前两天，悄然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曾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179]。

为了巩固后方，陈济棠趁陈铭枢自港赴沪转往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四团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180]。同时，陈济棠还派香翰屏赴赣，希望说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据蔡廷锴回忆：“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181]

当时，十九路军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颇闻蒋、蔡对陈军感情尚佳，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182]。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于6月初自日本秘密返国。尽管粤方曾积极酝酿迎陈返省，但因古应芬公开反

对[183]，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抵南京后，蒋见我（陈铭枢）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184]。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氏回国消息后，于6月6日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185]。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186] 13日，陈铭枢又直接致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自陈铭枢抵赣，蒋、蔡态度陡变，匪特无合作可能，且恐粤赣战祸一触即发。”[187] 对此，陈济棠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188]。

和蒋介石一样，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189]。孙科也致电冯玉祥，鼓励他再次投入反蒋阵营。广东方面的努力，立即赢得冯玉祥的回应，并派“代表赴粤，报告一切”[190]。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五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191]。

冯玉祥积极响应，其最初的计划是“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

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同时，冯玉祥也向粤方表示了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192]。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193]。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194]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20日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195] 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196]。

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民政府得知石友三反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并称：“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197] 冯玉祥更是积极联络旧部，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响应，支持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学良）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198] 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促其讨张倒蒋之大联合”[199]。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

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200]。然而中原大战失败后，冯氏旧部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从指挥，各将领为保存实力，心存异志，众人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

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201]。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一俟顺德占领后，主力再向前推进，可不失夹击之机……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202]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来讲至关重要。除了武力威慑外，蒋介石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州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203]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204]。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205]。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兄即汇。”[206]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207]随后，蒋亲自致电山西将领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208]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国民政府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南京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209]。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被迫总

退却，撤向山东，依附韩复榘。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尽管北方军事反蒋的努力一时都归于沉寂，但南方的军事部署则迅速展开。

就在石友三通电反蒋的第二天，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指责蒋“轻视共祸，而亟亟于摧锄异己军队”，并要求全国军民：“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210] 汪精卫对粤方的这一举措特意在国府纪念周中解释道：“六月间国府曾通电表示，蒋如切实剿共，绝不加以一兵一卒。无如蒋对剿共绝无诚意，致匪势蔓延浙闽，且使刘峙等压迫异己军队，因复引起石友三、孙殿英等之反抗，造成北方战局，故国府不得不下令讨伐。”[211] 同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出师计划：“第四集团军集中桂林，全部入湘去武汉，第一集团军先调两军入赣策应。”[212] 25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等又亲赴广西梧州出席广西军政会议，“决由粤助桂军饷、子弹、飞机，桂调兵一师入粤”[213]。此前十日，广西李、白部队刚刚“由港购运步枪四千支，迫击炮四十尊，机关枪一百架及子弹一百万发赴梧”[214]。

针对粤方的讨蒋令，蒋介石也不甘示弱。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表示：“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215] 于是，双方已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自29日起，粤方第四集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及第八军李品仙部分别由广西全州、桂林动员入湘。8月2日，李品仙部先头部队已达湖南永州，第四军吴奇伟部开抵湖南东安，继续向衡州推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江北入湘北伐，同吴奇伟部会师，第二军香翰屏部则入东江兼顾闽、赣。粤方军事委员会还在韶州成立了总司令部行营[216]。

在军事布置的同时，粤方积极寻求外援。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派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陈友仁在日期间先后三次会晤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南京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外交部紧急照会日使，要求否决“陈友仁到日购军火及聘军事顾问”。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217]。陈友仁在日本期间，还一度密访苏联驻日大使，企图寻求苏联的援助。刚从海外归来的宋庆龄曾对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讲：“陈友仁至东京，要求俄大使转达其政府，接济粤方军械、经济等。俄未应允。”[218]

虽然，陈友仁的外交努力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但冯玉祥继策动石友三反蒋后，再次成功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反蒋，并一度控制了甘肃省政。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孙连仲的旅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2月，蒋委任雷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驻防兰州。此后，雷始终同冯玉祥、吉鸿昌等保持密切联系[219]。自石友三失败后，冯玉祥深感“吾人今后作法”：“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220]于是“回到西北去”，重振西北军成了冯玉祥最大的希望，因此他积极策反雷中田。

如前所述，8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派到甘肃的视察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落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二人对此极为不满，于是秘密联合倒马，并积极同冯玉祥联络，寻求支持。冯玉祥则极力鼓动雷中田武装倒戈，并亲笔致函表示：“现在北方大局，虽石（友三）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阎（锡山）总司令已返并（太原），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中田）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221]

25日，雷中田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扣押马鸿宾，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为代理主席，雷自任全省保安总司令，与马文车联名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

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222] 为此，广州国民政府在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上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223] 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224]。冯玉祥还致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225]

此时，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看到新一轮的反蒋局面再次形成，于8月5日请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安排，乘日本军用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226]。阎锡山返晋后，马上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恐慌。据徐永昌日记载：“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227] 当时，阎的旧部中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因此，蒋、张极力要驱阎出晋。而南京国民政府新任命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却公开反对，暗中保护阎留山西。“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徐永昌）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228]。徐永昌甚至私下致函阎锡山表示：“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229]

就在阎氏返晋的当天，“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并鼓励他们：“蒋逆中正横行一时，非倒蒋势力之不足以制之，实乃倒蒋势力之不能集中，遂演成支离破裂之局。今幸广州建立中枢……时机迫切，恳诸同志即起图之。”[230] 冯玉祥也表示：“事已至此，势非百川（阎锡

山）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231]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232]。为了统一北方各派反蒋武装，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同日议决：“北方党务已有天津执行部负责。关于军事政务应有统一机关，以专责成。着在天津设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以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王法勤、邹鲁、覃振、王葆真、傅汝霖、徐景唐、刘维炽、张文、胡宗铎、王懋功为委员。阎、冯、韩三同志不在天津，请派代表出席。”[233] 2日，邹鲁致电冯玉祥表示：“两广军队业经出动，半月之内可至湖南腹地，两湖并有相当办法。华北各军务请公力为催动。甘省之举，并可直举讨蒋之旗，以张声势。”[234] 3日，李宗仁再电阎锡山指出：“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235] 阎锡山复电时明确表示：“自当坚持并积极准备，以待大军进展。焕公处已密达矣。”[236] 这一切都鼓舞了粤方的斗志，为此，李宗仁在广州联合纪念周演讲中，踌躇满志地说道：“我们相信的反蒋运动，决不因北方军事而停止，反天天扩大，我们可肯定的便是蒋中正必定倒台，不过时间问题而已。”[237]

针对粤方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238] 当日，蔡廷锴、蒋鼎文、陈诚部即奉令移师，以阻粤桂军北进[239]。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粤军入湘事，“略谓粤军犯湘，集兵郴州以南，已逾湘境二百余里”[240]。为此，蒋介石增调中央警卫军（新任军长顾祝同）“集中岳州、长沙、醴陵及萍乡等地”，“又手书致何键主席，令固守湘潭”[241]。并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以安其心[242]。张学良也密电何键，向其建议：“敌人来犯时退至湘鄂界坚守为佳。”[243] 何键原有三师兵力驻守衡州，得蒋命令后立即主动收缩。宁、粤双方原本“均拟在衡州一战”，湘军主动放弃宝庆后，李宗仁信

心十足地电告天津执行部，表示：“现在宝庆之敌已逃，自当由永丰直指长沙。”(244)

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并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245)。当日，蒋得杨永泰报告“黄绍竑在桂方情势确与李、白异趣，力促分化桂军”的消息后，当即批复：“所谈甚赞成。请属黄即进行。”(246)

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前往南昌督师。行前，蒋还连电张学良表示：“对粤和平解决计划已绝望，现决武力讨伐，惟械弹恐不足，请饬东北兵工厂加工赶造，以应急需。”(247) 并指示张：“据报粤要人邹（鲁）、谢（持）等多名匿居津日界，希设法拿捕。”(248) 但张学良复电时并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济军火，而是乘此机会开口向蒋要钱：“宋（哲元）、庞（炳勋）两部军费甚缺乏，请速接济，否则恐为阎、冯利用。”(249)

正当宁、粤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这就迫使宁、粤之间的对立冲突，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

(1)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20 - 21页。

(2) 蒋介石日记，1930年9月2日；另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以下均简称《事略稿本》），第517页。

(3) 《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0月7日。

(4) 《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社评），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1931年10月7日。

(5)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6)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广州《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李宗仁也曾回忆说："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7)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6日。

(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3/15。

(10) 胡汉民：《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64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3日。

(12)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1日。

(13) 蒋介石日记类抄，《省克记》卷4，1930年1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文物图书"，毛笔原件，以下均简称"蒋档"。

(14) 《大公报》，1930年11月14日。

(15)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3.2/36。

(16)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93页。

(17)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

(18) 《约法案激辩留交国民会议》，《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

(19)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油印件，3.2/20.43。

(20)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21)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22) 《主席团提召开国民会议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南京中执会秘书处编印，1930年11月版，第24页。

(23) 胡汉民：《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会词》，《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3—547页。

(24)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

(2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77页。

(26)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油印件，3.2/18.26。

(27)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99页。

(28) 《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社评），《大公报》，1930年11月12日。

(29)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民国日报》，1931年1月12、13日。

(30) 《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大会纪事》（1930年10月11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

(31)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5页。

(32)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61年编印，第102页。

(33)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0日。

(35)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3日。

(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4日。

(37)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5日。

(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6日。

(39)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4 - 115页。

(40)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4日条，第167页。

(41) 胡汉民：《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42)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69

- 171页。

(43)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170页。

(4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8日。

(45)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 - 121页。

(46)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3月1日，第711页。

(47)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 - 711页。

(4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三十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2；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49) 孙科：《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0页。

(50)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日记原文为：“二星期余之公事，为胡案而积搁，其数百件，一旦理清，岂不快哉。”

(5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六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1；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103页。

(5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一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1；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328 - 335页。

(53)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南京：编者印行，1931年3月版），第35、3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 - 5页。

(54)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第69 - 74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6号（1931年2月12日），第4 - 5页。

(55) 《国民会议组织法》，《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70 - 275页；另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56号（1931年4月25日），第1 - 3页。

(56)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页。

(57) 蒋中正：《国民会议开幕词》，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纪事），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无出版时间、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目录号573·551/6780，第12页。

(58)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1 - 15页。

(59) 约法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60) 《国民会议第五次会议议事纪录》（1931年5月13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纪录），第117页。

(61) 《国民会议宣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4页。

(62) 叶楚伧：《国民会议的经过》，《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95页。

(63)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276 - 27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701号（1931年2月18日）。

(64)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 - 5页。

(65)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编印，第71 - 72页。

(66)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第276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1页。

(67)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第72页。

(68) 陈之迈：《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的选举》，《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69) 蒋中正：《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1931年3月3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3月），第677页。

(70) 蒋中正：《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1931年5月17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 - 4页。

(71) 孔祥熙：《训政约法的要旨及特色》（1931年6月15日），《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15 - 216页。

(72)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632页。

(73)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

(74) 《太原扩会约法草案》，《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

(75) 《制定约法之完成》（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2版。孙中山在其《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期限并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其早年所撰《军政府宣言》中则有三年完成县自治与全国平定后六年结束训政颁布宪法的希望。因此《大公报》社评中有六年完成训政说。

(76) 《国民会议第一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五《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约法草案》，《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46页。

(77)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约法草案修正理由》，《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92页。

(78) 《邵元冲日记》，1931年6月15日，第743 - 744页。

(79)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80) 《黄郛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1931年3月25日。

(81) 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页。

(82)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7页。

(83) 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1905年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0页。

(84)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 - 198页。

(85) 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第50页。

(86)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2页。

(8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4页。

(88)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2年版，第141 - 142页。

(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4日。

(90)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8日条，第175页。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汤山修正致胡函，与吴、李、蔡等议事。"

(91)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92) 《蒋主席致古文官长并转真如伯南二兄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统一时期第11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拓影"，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93) 《蒋主席致古应芬等支电》（1931年3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4)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4日条，第212 - 215页。

(95) 《戴院长诵经超度》，上海《民友》第1卷第1号（1931年4月6日），第16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编印，第18页。一次，戴氏对前来向他请教营救胡汉民方法的马超俊表示："'胡先生所居双龙巷，为最大不吉之处。'一语双关，意指两雄相争。而其无意斡旋，亦由此可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96) 《古应芬呈辞李文范留粤养病》，《大公报》，1931年3月8日。

(9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0页。

(98) 《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

(99) 蒋氏之演讲后经修改好才允许发表，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3日、4日。

(100)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日。

(101)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第271页。

(102) 《邵元冲日记》，1931年3月2日、3日，第712页。

(103) 《陈济棠电京请加爱护》，《大公报》，1931年3月6日。

(104)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3页；3月11日，李文范同古应芬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19页。

(105)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29页。

(106) 《李宗仁回忆录》，第418页。

(10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5页。

(10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8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1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9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11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1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0页。

(112)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4—105页。

(11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6页；《汪精卫对扣胡案谈话》，《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

(114)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15)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陈济棠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116)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5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208。

(117)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18)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孙科亲信周一志在《关于再造派》一文中，也曾记下了同样的内容，《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页。

(119) 《天津俭日特讯》（1931年5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212。

(120) 《古应芬李文范林直勉致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12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122) 《粤拟组机关在酝酿中》，《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

(123) 《天津佳日特讯》（1931年5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178；《汪精卫致李白张冬电》（1931年5月2日），《大公报》，1931年5月9日。

(124)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

(125)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30日。

(126) 《汪精卫先生通电》，《民友》第1卷第5号，1931年5月4日，第4页。

(127) 《陈济棠等粤军将领讨蒋通电》，《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9页。

(128) 《李宗仁等桂军将领讨蒋通电》，《反蒋运动史》，第303－304页。

(12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491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98页。后两种资料均对日记原文有较大文字润色，但意思大体一致。

(130) 《反蒋运动史》，第289－290页；《事略稿本》第11册，第33页。

(131)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2日，第729页。

(132) 《吴铁城复古应芬冬申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

(1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1页。

(134)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四·41。

(135)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四·41。

(136) 《孙科关于调停宁粤之间矛盾给古应芬、陈济棠的电报底稿》（1931年5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5。

(13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98页。

(138)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3日，第729页。

(139) 《蒋主席五月四日在国府纪念周讲词》（1931年5月4日），《两

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0) 《国内一周大事述评》，《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4页。

(14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4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142) 《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5月12日。

(143) 《蒋对粤事之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5日。

(144) 《何应钦等诰诫陈济棠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12日。

(145) 《国民会议第六、七、八次会议记录》，《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144、214页。

(14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6页。

(147) 《孙科致古应芬等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5。稚、石、静、庸诸公指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孔庸之（孔祥熙），介公指蒋介石，展公指胡展堂（汉民）。

(148) 《吴敬恒呈蒋主席函》（1931年5月1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9)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150) 《“欧阳驹致蒋主席五月养电”批语》（1931年5月2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3日。

(152) 《孙科态度渐明其意不在调解》，《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

(153) 《汪精卫唐绍仪等限蒋四十八小时下野电》，《民友》第1卷第9号（1931年6月1日），第15 - 16页。

(154) 《孙科在广东省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之报告》（1931年5月25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102页。

(1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1931年5月27日），《中央导报》第1期，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1931年7

月编印，第1 - 2页。

(156) 《国府委员就职通电》（1931年5月28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49 - 52页。

(157) 《非常会议宣言》，《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2页。

(158) 《反蒋运动史》，第336页。

(159) 《反蒋运动史》，第401 - 402、405页。

(160)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 / 2205 - 6。

(161) 《广州陈济棠致南宁李宗仁佳午电》（1931年5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 / 2187。

(162) 《陈友仁致驻平各公使通告》，《民友》第1卷第11号（1931年6月15日），第16页。

(163)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64) 《陈济棠发库券千万充军费》，《民国日报》，1931年5月24日。

(165) 5月30日，南京政府立法院审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发行统税公债八千万元”。《邵元冲日记》，第738页。宋子文在中政会上解释发行八千万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对付广东和石友三的缘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百八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2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5。

(166)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67)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16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百八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9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5。

(169)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 - 61页。

(170) 《蒋主席昨复孙科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29日。

(171) 《孙科痛斥蒋介石电》，《反蒋运动史》上，第331页。

(172) 6月1日，何应钦曾电蒋请示："转呈唐绍仪等十四人以伪国府委员名义电湘鄂赣剿匪各军将士，拟电各总指挥勿庸置复。可否？乞示。"蒋即批示："请由兄处拟稿驳复为宜。"《"何应钦呈蒋主席六月东电"批语》（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3) 《何应钦等电箴孙科》，《民国日报》，1931年6月3日。

(174) 《萧佛成痛诋蒋介石函》，《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7页。

(175) 《蒋主席致蒋总指挥转香师长墨林五月删电》（1931年5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6) 《南京蒋中正致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余汉谋删电》（1931年5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33－2237。

(177) 《香翰屏揭破蒋中正挑拨离间电》，《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65－68页。香翰屏公布的《蒋中正致香军长电》同原电内容有一定出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70页。

(178)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179) 《粤挽留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5月4日。

(180) 《国议闭幕后之广东问题》，《大公报》，1931年5月19日。

(181) 《蔡廷锴自传》，第241页。

(182) 《粤传蒋蔡先发部队昨迫南雄》，《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

(183) 《广东酝酿迎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6月8日。

(184) 《陈铭枢回忆录》，第70页。

(185) 《大公报》，1931年6月10日。

(186) 《陈铭枢电汪精卫等》，《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

(187) 《张继到京报告粤事》，《大公报》，1931年6月15日。

(188) 《陈济棠停发蒋蔡两师月饷》，《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十九路人员离粤》，《民国日报》，1931年6月19日。

(189) 邹鲁：《回顾录》下，第327页。

(190) 《冯玉祥复孙哲生电》（1931年6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〇〇一·382，以下简称《冯玉祥发电稿本》。

(191) 《冯玉祥致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电》（1931年7月2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2) 《冯玉祥致精卫先生并许孙陈李古诸先生电》（1931年7月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3)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22页。

(194) 《冯玉祥复邓仲知电》（1931年7月17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5) 《石友三等讨蒋通电》，《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6页。

(196)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02 - 203页。

(197) 《广州汪精卫致天津胡宗铎、王懋功等俭电》（1931年7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 / 1654。

(198) 指张学良叔伯兄弟张学成暗中同石友三联络反对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得知此事，并破译了张、石间的电报密码。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0页。

(199) 《冯玉祥致宋哲元电》（1931年7月2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00) 《冯玉祥致韩复榘电》（1931年7月1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01)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100页。

(202) 《蒋中正电刘峙有关攻击石友三逆军之作战计划》（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 - 0218。

(203) 《蒋中正电宋子文张群请宋速筹三十万元交张群即汇商震为开拔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档案号04 - 0205。

(204)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筹五十万元汇山西为调兵之用》（1931年7

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档案号04 - 0207。

(205) 《蒋中正电询宋子文三十万元给商震事另三日内筹五十万元为山东用》（1931年7月22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 - 0234。

(206)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杨爱源二十万元请速交孔祥熙》（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43。

(207) 《蒋中正电询李煜瀛如徐永昌需款可电告以便汇寄》（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46。

(208) 《晋军将领态度》，《国闻周报》第8卷第30期（1931年8月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209)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80—81页。

(210) 《国民政府讨蒋北伐令》，《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4页；《反蒋运动史》下，第408页。

(211) 《反蒋运动史》下，第409页。

(21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1页。

(213)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页；《民友》第2卷第5号，第12页。

(21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1页；《李白购到军械一批》，《大公报》，1931年6月27日，第1张第3版。

(21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16页。

(216) 《反蒋运动史》，第410页。

(217) 在三次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本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还必须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币原大臣陈友仁会谈录》，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昭和六十三年第6版，第172 - 180页；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年版，第146 - 150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63页。

(218) 《蒋作宾日记》，1931年8月20日，第350页。

(219)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1页。

(220) 《冯玉祥致邓仲芝等函稿》（1931年8月19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〇〇一·381，以下简称《冯玉祥发函抄本》。

(221) 《冯玉祥致李朝杰函稿》，《冯玉祥发函抄本》。李朝杰，字汉三，冯玉祥旧部，时任甘肃省政府委员。

(222)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3) 《邓仲芝、薛子长等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14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4) 《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5)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2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3页。

(227)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版，第463页。

(228)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224—225页。

(229)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3—464页。

(230) 《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1) 《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32)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1页。

(233) 《汪精卫东电》（1931年9月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4) 《邹鲁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5) 《李宗仁致阎锡山电》（1931年9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164。

(236) 《阎锡山复李宗仁电》（1931年9月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

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167。

(237) 李宗仁：《北方反蒋新局面》，《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8月19日），第6页。

(23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页。

(23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2－73页。

(240) 《粤军侵湘情况》，《国闻周报》第8卷第36期（1931年9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24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24页。

(242) 《蒋中正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档案号04—0443。

(243)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三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98。

(244)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筱二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94。

(245) 《蒋主席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大公报》，1931年9月15日。

(246) 《杨永泰呈蒋主席九月元电》（1931年9月1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47)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203－4。

(248)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筱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89－0191。

(249)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203－4。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　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作为迅速崛起的邻邦，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

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中日关系恶化。国民党“二次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列强谈判修订关税条约及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对此态度消极，严重影响中国舆论和社会的观感，中日关系持续低迷。1929年7月，因在皇姑屯炸车案中“处置失当”引起日本国内责难的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后，由浜口雄幸组成新内阁，币原喜重郎任外相。7月9日，浜口内阁公布十大政纲，提出“刷新对华外交”的主张，声称对两国间的悬案，“双方都应理解对方的特别立场并予以同情的考虑，以求得公平中正的调和，不拘谨于局部的利害而保全大局”。声明还提出日本的目的在于共存共荣，特别是谋求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碍”地发展。日本将排斥一切侵略政策，但对关系到日本生存及繁荣且为“正当而密切的权益则必须保持”[(1)]。浜口和币原较之田中时期，虽然谋求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姿态确实相对温和一些。1929年3月，币原曾发表文章论述中日关系，提出：“两国关

系，迄今以前，久在纠纷重叠之中。两方有形无形之损失，决不为轻。至如何而至于此，则一概归诸日本政府责任，自非公平之观察。从局外者眼光观之，两国政府当局者处理相互外交问题，不无过于受对内关系之系累，此不能无忧也。”[2] 虽然币原回避了日方制造事端的主要责任，对两方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但能够对自身的作为有所反省，尚属冷静。

币原任外相后，即着手与中国修复外交，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1926年底曾奉日本政府之命与蒋介石直接接触，属于对华温和派人物，颇为蒋氏所欢迎。其抵沪时，蒋特电张群：“佐分利到时，应设法到埠欢迎，以表好感。”[3] 佐分利贞男到任后，立即应召会晤蒋介石，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要求日本从大局着眼，全面改善中日关系，提议双方公使馆升格，希望日本在撤废治外法权上采取行动。财长宋子文也表示中国准备尽其财力偿付旧有外债。一个月之后，佐分利归国述职，在箱根突然身亡。此后日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长期代理驻华公使。9月5日，币原与国民党元老之一张继在东京密谈，探询中国对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日方提出的主要原则是日本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中国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合法”权益，中日实行经济合作。这大体反映了浜口内阁对华政策的具体方案。然而日本所谓的“合法”权益包含着其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权益，中国方面不能承认，尤其是来自“二十一条”的条款更为中国所无法接受，以此为基础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有违中国的一贯立场，南京国民政府未予同意。

币原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遭到日本军部强烈的指责。军部力主实行对华“强硬”的武力威胁政策，指责币原实行的是“软弱外交”。其实币原和军部在巩固与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特别是在所谓满蒙问题上并无分歧，只是前者主张运用外交手段，后者主张使用军事压力而已。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包括收回租界、租借地等，币原闻讯后立即训令重光葵赴南京，于

4月14日会见王正廷，提出质问：收回租借地是否包括旅顺、大连，收回铁路是否包括南满铁路。王正廷予以肯定的答复，日方立表反对。4月27日，日本确定对法权问题的交涉原则是：中国开放内地，予日本人以居住、旅行的自由，日本则将除各国侨民的共同租界、日本租界及其邻近地区、铁道附属区以外的中国领域内的领事裁判权撤废。中国还应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商租权、在延边的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等。币原此举，无异于自我否定其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的诺言。

当时，中日之间争执的焦点在东北。日本在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权益，并继续处于扩张之中。币原曾公然宣称：“在满洲我国权益甚多……这些权益大都不仅有条约依据，而且都是深刻长久的历史产物。”[(4)] 30年代前后，日本对东北提出的主要问题一是铁路，二是商租权。东北的铁路问题很复杂，北有中东路，南有南满铁路，基本形成苏俄和日本分别控制北、南两大主干线的局面。东北地方当局出于自身利益，也在周边地区修筑了部分铁路。日本为扩张在东北势力，确保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计划修筑新的铁路。1927年6月“东方会议”决定的满蒙政策中包括：一、确保日本的既得权益以整顿东三省财政问题；二、采取强硬手段促进满蒙悬案铁路问题的完成[(5)]。10月，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向张作霖提出先行修筑敦化—图们、长春—大赉、吉林—五常、洮南—索伦、延吉—海林等五条铁路，五路纵横东北全境，经济利益极大。张作霖当时为对抗北伐军，需要借助日本方面的支持，同时又受日本抛出的经济贿赂诱惑，同意了日本的修路要求。15日，张作霖和日方订立同意修建五路的密约，张按其惯例在协约上签批“阅”字，以示同意。此一密约因为日本有意泄露，迅速为中国民众所知，激起强烈的反奉风暴。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以有关铁路的问题交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处理为由，推拒执行这一协定，表示：“铁路问题，虽向属于地方，今日既引起内外注意，自不能撇开中央政府。”[(6)] 对张学良的托词，南京方面自是心领神会，以东北地方协定不生效力为张开脱，日方竭力达成的满蒙五铁路协定成为泡影。

和满蒙五铁路协定一样，所谓商租权也是日本以不正当手段攫取的一项利权。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日本国臣民为经营农业，可以在南满“商租其需用地亩”[(7)]。此后，日本利用此项规定攫得的商租权，不断地以南满铁路为骨干，向四周掠夺大片土地。据统计，日本攫夺南满线时，铁路区域为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而到1931年9月竟扩充至482平方公里。日本在东北攫获土地四百二十多万亩，以商租名义取得日本领事馆签证备案的就有16.2万多垧。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夺取，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28年11月，在回答记者是否拒绝商租权的提问时，张学良明确表示：“在今日中国现状之下，条约方谋改善，工商尚未发达，故不宜内地杂居。”[(8)] 1929年3月，辽宁省政府报告，日本满铁组织移民农业会社，“以多金诱买中国人田地房产，或以轻利息借贷与华人，惟须有田地房屋契约为抵押品，始能有效，以将田地房产吸为己有，而实行移民兼扩充满洲农业计划”[(9)]。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秘密颁布《惩治盗卖国土暂行条例》，1931年6月又颁布《国土盗卖惩办罚则》，严厉禁止将土地、房屋及其他场所转让、抵押、出售或租与日本人，违者严加惩办，以抵制日本蚕食土地，非法扩大满铁区域的行径。

南京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都不敢公开废除商租权，只是对国内土地所有者采取限制措施，虽然作用有限，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人夺取土地的速度。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屡次向东北地方当局提出交涉与“抗议”，指称中国“侵害”商租权。中方严正指出：1915年条约属于“二十一条”的一部分，本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非法条约，已经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废除，故所谓商租权已失去其法理上的依据。至于商租事项，本当由双方和平协商，取得一致，不应含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和手段。对此，日方不甘心放弃所得权益，仍然设法逼迫中国方面扩大商租权的适用范围，并以此作为重大悬案反复纠缠。

由于日本利用攫夺的特殊权益及中国本身长期的混乱状态在东北

苦心经营，到30年代前后，日本在东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31年9月末，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达1129公里，通过中日合办和借款等控制的达1231公里，约占当时东北铁路总长的38%，这些铁路基本都在满铁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煤产量日资企业平均占8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生铁产量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90%以上。1930年，东北的发电量中日本占到80%。满铁总资产，1907年为1.4亿多元，1929年高达百亿元，增长了68倍多。1930年列强在东北投资总额为23亿日元，其中日本为17亿日元，占76%，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日本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使张学良深为戒惧，在其成为东北地方领导人后，设法发展本国工业、交通、港口事业，抵制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为打破日本垄断大连、安东两港的局面，决定继续兴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的吞吐口。葫芦岛港原由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1910年开工兴建，1913年北京政府停止施工。1930年1月，高纪毅代表东北方面与荷兰筑港公司代表签订修筑合同，修建年吞吐量为百万吨商港。4月开始施工，计划1935年建成。工程由北平铁路局营业利润投资。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消息“应为国人所一致乐闻者也”[(10)]。

继葫芦岛筑港工程以后，1931年张学良又计划修建打虎山—通辽—洮南一线铁路，以摆脱日本对东北铁路的控制。计划尚未订立，日本外务省就迫不及待地作出反应，指责中国违反所谓不修建与南满铁路线平行铁路的约定，是对南满铁路权益的侵犯，扬言日本决不能坐视。中国方面表示：对满铁商业上的效用及价值中方决不会予以侵害，但中国否认日本在南满有修建铁路的独占权。1931年1月22日，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开始与张学良进行交涉。木村大谈解决悬案以改善中日之间险恶的空气，提出修筑新线、停止并行线、签订运输协定等要求。张学良表示，外交与铁路问题不属地方权限，他不能自作主张。随后，张学良委派东北交通委员会京奉铁路局长高纪毅为交涉委

员会主任，嘱其与日方周旋。高纪毅与木村多方交涉，终因日方坚持不放弃其无理要求而致交涉中断。

借用南京中央力量，以举国之势，对抗日本的压迫，是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另一重要举措。中原大战后，1930年11月张学良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同意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及军事权移交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决定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对于葫芦岛港及东北新铁路的建设，也交由南京中央政府管理。蒋介石决定由张学良主持华北政务，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央国防军。会谈以后，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即移归南京国民政府，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葫芦岛港归交通部指导。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处处长王家桢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但东北军的改编并未实现。

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向东北各省派出党务指导员和特别区派遣员。26日，东北国民党党部在沈阳成立。同时，张学良又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积极引入美国势力。张学良在答复日本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在引进外资时，“不排除日本资本，同时也不能拒绝欧美资本。我们对欧美和日本将一视同仁，但附带说明一下，只在必要时才引进外资”[(11)]。这年春天，呼海铁路局与美国谈妥借款1000万银元，用以建筑通往鹤岗的铁路支线，以煤矿作保证。5月又与美国谈判修筑吉林—同江铁路；6月与美方福克尔航空公司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与福特汽车公司商谈建造汽车装配厂。美孚石油公司在沈阳设有奉天总公司，在大连、营口、沈阳、安东、哈尔滨设立分公司，业务遍及东北各地。美国还向东北提供无线电台设备，使东北基本上建成完整独立的通讯体系。美国凭借其强大经济实力，在东北影响迅速增长，1929年与1913年相比，美国向东北进口增加了十倍，出口增加了八十倍。到“九一八”事变前，美国资本已经渗入东北铁路建设、汽车运输、煤炭工业和电业等重要部门。这些，对一心要独霸东北的日本无疑形成重大挑战。

随着东北向南京中央靠拢，张学良更加积极主动抵制日本势力在

东北的扩张，如实行抵制日货，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税卡，限制日货涌入东北内地；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起收回国权运动等。1931年5月29日，辽宁各团体召开联合大会，直接提出收回旅大、南满及安奉铁路线，撤退日本军警及日本邮电局等要求。张学良还陆续发出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禁止购买日货，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并通令禁止日人到东北内地旅行。在张学良采取如上措施时，南京中央也相应地作出一些姿态。1929年9月，南京方面公布日本阴谋侵夺东北及内蒙的秘密计划，即“田中奏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反响。日方虽矢口否认文件的真实性，但无法抹杀其行动与计划恰相吻合的事实。

对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维护主权的举动，已经习惯攫取权益的日本认为其“危害”了日本的“权益”，密谋报复。在对满蒙计划中声称：“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彼张学良虽然脱离军阀根性，而牺牲其特殊政权奉还南京，以避其重大责任，此不仅高筑炮垒以自卫，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于东亚全土，意欲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实为空气之大杰作。如谓蒋介石奸雄可怕，则张学良对我政策之阴谋，益为可怕。”(12) 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举动，已迫在眉睫。

二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日本以外交手段控制东北的计谋屡遭挫败之后，即积极策划以武力侵略东北。早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日军即派出观战组，以便对东北军的作战能力作全面判断。他们认为东北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缺乏周密的计划与配合，尤其是害怕炮火的集中轰击。因此，建议对东北军作战时集中使用炮兵。1930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团又到北满作侦察旅行，为在北满地区作战作准备。同年9月，关东军拟定进攻全东北的作战计划，开始全面积极备战。日本右翼军人团体及其他右翼团体、法西斯文化人，以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为代表，公

开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日本以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帑开发出来的“圣地”，为“保护”日本在满蒙权益，日本应“不惜一战”，等等。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13)]。这是“占领满蒙先行论”显著抬头的标志。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要求“预作最后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准备”[(14)]。为配合发动侵略战争的步调，日本的对华外交也一反过去“平息”事态，允许在中方接受日本要求的前提下“结束”事件的做法，而改为扩大事态、寻衅滋事、制造悬案的办法以动员国内舆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口实。

所谓“万宝山事件”及“中村大尉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是指1931年5月，长春附近万宝山地区中朝农民因修建水渠引起的案件。1931年5月，该地区朝鲜移民为引伊通河水灌溉，开设一条宽九米、长十二公里的渠道，不仅侵占当地农民大量农田，而且因筑水坝，使伊通河两岸中国数千顷水田有被淹之虞。旋经长春市政筹备处与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协商达成临时议定书，决定在问题解决前停止施工。但日方于6月24日违约强行突击施工，至月底渠道、水门完成。7月1日，万宝山一带农民四百余人来到现场填平渠道。次日日方出动警察和便衣弹压，中国农民伤亡数十人，受毒刑拷打者十多人。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即在朝鲜进行歪曲报道，散布“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谎言，煽动朝鲜人袭击残杀华侨。中国驻朝鲜总领事报告：“此次本馆管内被害最烈者为平壤，次仁川，次京城，次镇南浦，收容避难人数达一万三千余人。”[(15)] 总计在一连串的暴行中华侨被害的共达779人，其中死亡146人，失踪91人，重轻伤542

人。甚至对事件作出真实报道的朝鲜记者金利三也遭到日本暗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外务省却发表声明，狡辩日本在此事件上并无国际公法上的“责任”。日本外相币原在此次事件中态度亦极强硬，他训令驻沈阳的日总领事林久治郎称：最近在东北发生的“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我方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这种态度，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变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的立场……倘若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其结果必将产生极为重大的局面”[(16)]。币原训令林久治郎警告中方，必须“慎重处理”此次事件，否则“后果严重”。这是币原公开向中方发出的战争威胁。

日本的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众集会，准备对日经济绝交。日方的蛮横态度，使蒋介石也深感愤懑，在日记中写道：“谈日本惨杀朝鲜侨胞案，为之发指。”[(17)]但他对各地民众团体准备对日经济绝交一事，仍然担心扩大事态，7月31日，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批转宋子文、张群的电报时指示：“现在各地反日援侨运动办法，实有审慎将事之必要。若中央地方党政各界，步骤不能一致，势必授人以隙，徒益纠纷。况反动之徒，惟恐不乱，难保不混迹各地，鼓煽风潮。”电文要求通令各地，“如有不法行动，即应取缔，以免为反动派利用，藉安人心而防意外”[(18)]。据此，南京国民政府即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对民众的反日活动加以限制。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万宝山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克制态度，但由于日本的挑衅及两国间恶感的加深，谈判期间，上海、青岛又陆续发生中日冲突事件，使中日关系更形恶化。正在此际，“中村事件”被公诸于世。

1931年6月，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自称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带领日本、白俄、蒙古人各一名，到中国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

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26日，中村一行为中国驻军发现，被带至屯垦队三团团部，经搜查其笔记“多系记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19]，同时还搜查到手绘地形图及关于屯垦军的兵力、武器、营房状况表册[20]。团长关玉衡决定将其处决，并焚毁尸体。对中村的间谍行为，日本方面非常清楚，日本驻郑家屯领事向奉天总领事报告：“中村大尉遇难之苏鄂王府……属于奉天省政府之所谓禁止履行区域。”[21] 为寻找扩大侵华的借口，日军百般扩大事态，于8月17日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并公诸报端。对此，张学良表示将派员详加调查，如情况属实当予严惩，并将驻防当地团长关玉衡扣押，以应付日方。可是日方却借机大肆渲染中国惨杀日本侨民，煽动日人仇视中国，扬言用武力惩罚中国。20日，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提出必要时采取武力解决的主张。24日，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外务省递送了关于“中村事件”如不得解决即占领北满的意见书。关东军更是借机向日本军部提出应由关东军自己来“解决”该事件，反对通过外交交涉以谋解决，认为这一事件实为“扬军部威信于中外，回答国民期待并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机会”[22]。

对关东军的活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虽然予以一定程度的抑制，确定不以该事件作为解决满蒙问题契机的方针，防止关东军借机扩大事态。但日本政府事实上已难以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其内部尤其是军部的侵华冲动也在不断高涨，因此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关东军的侵华举措。9月18日，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走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承认中村已经被杀，希望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而正是这天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对中、日间形势日见紧张，日本武力吞并东北野心愈益暴露，关东军已完成临战准备的严峻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1931年7月，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组致电国民政府，提醒道：“日前中外报载，日军事参议官会议决议于南满设置常备师团，此种于我

国主权极有妨碍，即于领土之完整上可谓发生绝大危险，似应由我外部提出抗议，并对世界宣传。查日本政府对满政策近有改变，征候甚多，如宇垣总督正式言明原来统治鲜满为二元制，现改为一元制等，深堪注意。”[23] 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时，对日本的企图大有感触，感叹日方“一面交涉，一面侵略，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欺诈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技。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侵略，吾已见其肝肺矣”[24]。虽然对日方的侵略计划洞若观火，但出于国内剿共战争及应付地方实力派的需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7月23日，他通电全国强调：“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25] 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26] 与此相应，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27]，嘱张克制，力避冲突。蒋介石的这一判断，对日本发动侵华事变后，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应付方略，都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沈阳附近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路轨，随后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攻击日军，并以此为由向沈阳发起进攻，炮轰北大营中国军队，从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当时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总人数达30万人左右。事变发生时，张部因参加中原大战，移师关内约11万人，留在东北的部队尚有近20万人。日本方面关东军正规部队万余人，另有在乡军人约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万余人，力量上中方完全可与日军一战[28]。但是，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都没有足够的抵抗决心。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令，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

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29]"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北平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30]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据荣臻报告，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1] 19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内称："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32] 在日军相继占领安东、营口、长春等地，并有向哈尔滨推进消息时，张学良仍指示："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惟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安全。"[33]

关于东北当局当时的态度，张学良在事变后有过多次的阐述。19日，张会见记者时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34] 20日，再次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35] 24日，在给蒋介石、王正廷的报告中，张学良更详细报告了当时的状况："9月18日晚十时许，沈阳城北忽有轰然炸裂之声，既而枪声大作。旋据北大营我第七旅报告，乃知系日军向我兵营攻击。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36]

地方当局取不抵抗政策，中央政府态度也极软弱。9月1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在由宁赴赣的途中，会议由戴季陶主持，决定若干应急事项："众意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又电催介石迅即返京妥商一切。"[37] 20日，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决议致电粤方要求共谋团结御侮；定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停止娱乐一天。19、20两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两次对日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蒋对日前中央临时常会决定的若干办法表示赞同，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时对国内必要口岸及首都，加紧警卫，并谋求与粤方妥协。22日，蒋在南京公开发表的讲演中强调："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38] 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告："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39]

为应付内外危机，9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政策之研议机关；同时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并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事诉诸国联，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南京国民政府对和战的态度在其告学生书中说得很清楚："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也。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40] 就当时中国的客观环

境而言，这篇书告强调的显然是不可战的一面。

当时，南京中央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依靠国联主持公道。蒋介石在次年曾明确表示："以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41) 所以，虽然南京方面的抵抗调门比之东北地方当局要高一些，但在精神实质上，南京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是一致的，宁、粤谈判时，顾维钧曾致电粤方为张学良解释："度汉卿兄当时用意，无非因彼出于整齐划一之步骤，而我尚为四分五裂之国家，以一隅而当大敌，实不得不出诸慎重。此种委曲求全之苦心，兄与弟等深知，亦当为粤方诸君所能谅解。"(42) 顾维钧此言，相当程度上道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心声。

由于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日本发动事变后，迅速占领沈阳及其周边地区。日本军方材料记载，9月19日，日军接到报告："已攻进奉天附近、营口和凤凰城，完全解除敌军武装……东北当局已四散逃避"，"军司令官了解到上述情况，认为如果没有接受幕僚的献策，不把事态扩展到今日这样严重的地步而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则将贻恨百年，徒劳后悔。"(43) 在这样弹冠相庆的气氛下，关东军的对华强硬和冒险政策被看作先见之明，备受推崇，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和侵略由此已经难以动摇。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邵元冲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

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44] 戴季陶、朱培德在致蒋介石电中更说到：“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工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45] 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9月21日，事变后三天，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犯烟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46] 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47] 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48] 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49]。蒋的这些答复出现在其与地方军事长官的函电中，在当时情况下，应不完全是大言惑众。

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当然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潮。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并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9月28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大规模游行，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至重伤，王正廷被迫于9月30日辞职。面对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声浪，10月12日，蒋介石公开申明：“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50] 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指出：“日本武力占领东三省，至今已将两月，中国忍耐至今已至最后之限度。如日本继续蔑视国联保持正义之主张，不顾国际公约之尊严，而国联及各友邦无法履行其签约国神圣义务之时，中国民族为保障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尊严，及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

重大牺牲，亦所不恤。”[51] 会议通过决议：“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52]

当时，南京方面受民众尤其是学生的压力，又遭以胡汉民为首的粤方强烈攻击，不得不作出对日强硬姿态稍稍平息各方的责难。大言既出，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举措，11月23日，他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处为宜？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53] 随后，蒋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准备北上的架势。

但是，石家庄及河北一带是张学良的地盘，东北失陷后，张氏的政治生命已全系于华北，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蒋作出表态后，张学良并未响应，而当时情况下，中央军北上又必须与东北军协同，双方不能一致，出兵之议很快搁浅。事实上，蒋介石提出动议时，就未尝没有考虑到张学良的态度，出兵北上，更多的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南京国民政府的真实想法，其对手方日本人的观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给日本政府的电文中写道：“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军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54]

重光葵的观察堪称老辣，“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迅速确定诉诸国联的方针。9月21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德留蒙提出照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罪行，并“请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立采步骤……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款之性质与数额”[55]。9月下旬，根据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国联行政会

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9月30日的决议肯定日本政府关于“尽速将其军队撤回至铁路区域”[56]的表态。但是，日方并未如其承诺的那样撤军，相反于10月初出动十二架飞机轰炸锦州。

锦州是辽西重镇，沈阳沦陷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移至此，是张学良、也是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治权的象征。另外，锦州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关东军的行动使英、美为之震惊，美国总统胡佛表示“对日军占领区之继续扩大，深切注意”，希望国联“在其调处中日行动之法律权限内，保持一切强制与权力”[57]。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提出质询和抗议。10月24日，国联行政会再次提出决议案，要求两国政府“不得诉于任何侵略政策或行动”，限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立即开始并顺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58]。这一提案在表决中获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但根据盟约规定，此类提案须行政院包括当事国在内全体—致通过才具法律效力，提案的约束力十分有限。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下一步走向尚略有不同。日本军部坚决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准备从朝鲜调集军队增援。日本若槻内阁则主张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宣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59]。但是，日军的顺利进军刺激着关东军的胃口，也使内阁的担忧和质疑变得多余。日本政府此后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在国际上帮助军人顶住舆论的压力和列强可能的干预。

对国联绝对多数要求撤兵的意愿，日本方面先软后硬，最后完全置之不理，声称：“10月24日票决之决议案，既未得全体一致之接受，日本不认为有效。”[60] 就在国联提出撤兵提案当天，关东军拟定《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明确提出在东北要以建设“独立满蒙国家为目的”，新政府其实权操之于日本手中，并以东北四省加热河与内蒙古为领域[61]。根据此一方针，日军继续在中国制造事端，11月8日，驻天津日军策动汉奸李际春、张璧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

装暴乱，袭击市公安局、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9日，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向中方提出警告，限中国军队“退距日租界三百米突以外，我退去后，炮弹向我界轰炸，甲车向我界出动”[(62)]。同日，张学良通电南京报告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13日，蒋介石面见列强驻华公使，“责问其租界是否为扰乱中国之策源地而设，天津日租界与各国租界有共同负责性之条约，为何各国放任日本扰乱行动，不加干涉，是否要我中国只守一方面条约而对方不惟以条约为压迫中国之护符，且藉此为扰乱中国之张本”[(63)]。希望列强能出面对日本政府施压，约束日军行动。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省、市政府及电话局等机关，并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

在天津制造事端同时，日军加紧侵占全东北的军事进攻。11月2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日站日本壮丁被征，妇孺归国，年老者均留看守。态度严重，似有袭锦模样。”[(64)] 26日，关东军第四混成旅团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前锋进抵打虎山、沟帮子。对于关东军进攻锦州的企图，日本政府认为其过于冒进，担心引发国际冲突。27日，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暂时止住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侵的步伐[(65)]。

日军策划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顾维钧向英、美、法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驻锦州中国军队撤到山海关，日本向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国联派军驻扎“中立区”[(66)]。张学良对“锦州中立化”方案也非常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中国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防止匪患，维持治安[(67)]。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锦州中立区”方案并不满足，而是极力欲将锦州攘入自己手中，英、美、法三国也不愿直接介入调停，“对担保一层均不允可”[(68)]。中立

区提议同时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谴责，在舆论强大压力下，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东三省事件应积极进行于国联切实保证之下解决；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天津与日租界毗连之处如有中立国切实保证，得划临时缓冲地带以避免冲突[69]。4日，南京国民政府电请国联取消“中立区”计划。7日，国联行政院放弃这一设想。

由于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就地研究任何情形影响国际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者”[70]。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审查中、日之间的争议及考虑中日争议之可能解决办法。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顾维钧以中国代表处处长资格参加，于能模作为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参加，日方参加委员为曾任驻沈阳总领事的吉田伊三郎。由于决议一开始就规定：“该委员会对于任何一方之军事办法，无干涉之权。”[71] 所以调查团对于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实际无法起到阻遏作用。

在国联根本无力制止日本，而关东军又得寸进尺，逼迫无度状况下，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长官仍旧态度暧昧。虽然知道依赖国联难以有成，但又没有与日本决一雌雄的决心，只能以国联为幌子，继续维持“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的态度，寄希望于“公理之裁决”。力图维持不战不和局面，拖过此一危机。

12月15日，尽管用尽心机，蒋介石还是没有逃脱众多的攻击，被迫辞职下野。在他辞职前，12月11日，日本政局发生变化，若槻内阁总辞职。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毅任命强硬派的荒木贞夫为陆相，受到鼓舞的关东军策划以“剿匪”为名再次进攻锦州。18日，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

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日军攻锦一触即发。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的象征，南京国民政府对锦州的得失不能不予以重视。11月25日，顾维钧致电张学良，指出："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72]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强调："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30日再电张学良严厉指出："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职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自解？""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73] 蒋介石下野前也致电张学良，要求"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74]。全国人民要求保卫锦州的呼声更为强烈，学生罢课、集会、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情绪激昂，据顾维钧报告："北平学生示威团到部，捣毁颇剧，嗣赴中央党部示威，由蔡孑民、陈真如出见，均被殴受伤。陈晕倒地，蔡被劫去。幸由士兵开空枪示威，学生溃散，方始救回。"[75]

张学良以得不到南京方面切实援助为由，拒绝固守锦州。早在12月8日，顾维钧在致张学良电报中就提到："吾兄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76] 可见，张此时对守锦已无决心。18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报告："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77] 日方的这一报告绝非空穴来风。21日，张学良电令于学忠："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78] 25日电呈国民政府认为："我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悲观

恐日心理暴露无遗。同时，张学良在电中强调“枪炮弹药，极感缺乏”，要求“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速拨枪弹某口径者一千六百万发，某口径者八百万粒”、各种炮弹四十五万发、步枪一万枝，而且“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79]。

12月26日，张学良再电南京国民政府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难为。”[80] 张学良此时的真实想法，在其致吴稚晖函中隐约有所透露：“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81] 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声称：“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82] 除此之外，导致其对自身、对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没有信心的另一重要原因则应为“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在苏联攻势下的溃退及南京中央政府的无所作为或无法作为，对张学良不能不形成深刻的印象和刺激。

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张学良实际放弃了在锦州的抵抗。与此同时，蒋介石下野后新组成的南京中央政府表面上虽一再督促张学良严守锦州，实际却与日方派出的使者秘密接触，谈判东北命运。犬养毅上台后，派其友人萱野长知为密使，赴中国与南京政府接触，先后与司法院副院长居正及行政院院长孙科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12月24日，在与孙科会谈后，萱野致电犬养毅报告双方协商结果：“中国政府为解决满洲问题特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居正为主席，许崇智、陈中孚、朱霁青、傅汝霖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任务是改组东北各省的行政组织，整理行政事项，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已和张学良的部分手下取得联系）……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所有悬案。所有事

务将委托居正一人全权处理……发表以上各委员的任命时，中日双方即应立刻维持现状，居正到任以后，中日立即商订日本撤兵等事宜。”[83] 这一协议中方未坚持以日方撤兵为谈判条件，而且事实上把张学良排斥在解决东北问题之外，证明南京政府对锦州得失并不十分在意。即使如此，当日本军方得知犬养毅和中方秘密接触，仍然予以强烈反对，迫使犬养毅中断了和中方的接触。

12月28日，日军集中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一个混成旅团渡过辽河攻击锦州。同日，荣臻至北平面见张学良后返锦，下令各军撤退。次日，锦州一带驻军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继为由，向关内撤退，只留黄显声、熊正平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治安。1月3日，日军进占锦州，东北全境基本被日军侵占。

日军对锦州的觊觎，由于中国方面放弃有力抵抗，再次轻易获得成功。张学良在日军进迫锦州时，一再强调双方实力的差距，其实这并不能成为有力的理由。当时，东北方面在黑龙江省拥有正规军1.5万人，准军事部队1.8万人；吉林五万多部队由于熙洽率部投降，实力大损，但尚留有部分反日力量；退守锦州的辽宁部队是东北军的主力，尚有十余万人。相比之下，日军加上违令增援的朝鲜军在东北总兵力也只有五万余人，这些部队要控制辽、吉两省已占领的广大地区，还要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部队，可以抽调用来对付锦州的部队实属有限。同时日军对东北用兵在国际上引起很大不安，日军既须在北边对苏联保持警戒，还要照顾英、美的反应，关东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锦州扩大事态也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日军在东北事实上并不是毫无顾忌。正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使关东军的冒险行为再次得逞，也进一步刺激了侵略者的扩张野心。有回忆谈到，当时王以哲曾痛切指出：“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84] 这样的反省，痛切且切中要害。

四　东北军民的抵抗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日本对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除工人罢工、市民逃避以及知识界、工商界、银行界、宗教界等拒绝与其合作外，主要还有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东北义勇军（群众自发的武装）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东北军基本上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局部的抵抗时有发生：1931年11月，日军进犯黑龙江，马占山率部抵抗，歼敌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队，是为轰动全国的“嫩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黑龙江一带和苏联利益密切相关，日本不愿因此冒与苏联冲突的风险，对在黑龙江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态度谨慎。关东军为达到占领黑龙江的目的，避开哈尔滨，用汉奸部队打头阵，沿洮昂铁路向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进攻。

10月10日，北京张学良电令黑河镇守使、步兵第三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东北边防驻江省副司令官、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和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谢珂等积极布置军事防务，准备迎击日军进攻。13日，投靠日本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派伪军三个团为先锋，由通辽经洮昂路向齐齐哈尔进犯，遭守军痛击，双方隔嫩江对峙。齐齐哈尔位于松辽平原，嫩江是其天然屏障。为阻止伪军过江，马占山军拆毁嫩江铁路桥。关东军以洮昂铁路系满铁所建，破坏铁路桥侵害日本财产为由，开始走上前台。

为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日本向北进攻急需取得苏联不干涉的承诺。10月28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询问苏方是否向马占山部派遣教官，提供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向中东铁路派出军队。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向包括马占山部在内的中国东北各支军队提供援助。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

维诺夫在与广田见面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平等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85] 苏方的明确表态，使日方打消了对苏方干涉的顾虑。与此同时，英、美国家私下里希望日军北进，由其充当远东的反苏堡垒，对日本向北进兵装聋作哑。11月4日始，日军调集嫩江支队、第十六联队第七中队、工兵第七中队"变服华装"[86]，与张海鹏军等数千人，向嫩江桥守军阵地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痛击来犯之敌，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日方材料显示，日军战死167人，伤六百余人，张海鹏伪军被歼七百余人。

日军进攻失利后，数次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出齐齐哈尔，均遭严拒，马通电全国表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87] 在整个东北不抵抗的大背景下，马占山的对日抵抗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国民党四全大会通过提案，"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令张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88]。

11月16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可暂时进入齐齐哈尔"的命令。次日，关东军调集全部增援部队约八千人，在数架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以洮昂铁路为中心的黑龙江防御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在日军猛烈攻击面前，守军官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竭力抵抗，连续打退日军的十多次进攻，守军亦付出沉重代价。战斗持续到18日下午，守军已弹尽粮绝，伤亡过半，日军以坦克重炮"猛攻急扑，以致全阵动摇，几不能支，幸我军心振奋，以一当百，尚在支持期间，彼军骑兵，更复四出扰乱，同时并以飞机两架，飞至省垣猛炸"[89]，守军势穷力竭。19日，马占山下达总退却令，收拢残部退至齐齐哈尔，而后向海伦、拜泉、克山一带撤退。

攻占齐齐哈尔后，哈尔滨成为日军下一攻击目标。哈尔滨是东省

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也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日方对进军哈尔滨态度更加谨慎。日本方面与苏方频繁接触，苏方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日外务大臣后来不无感激地谈到：“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90)] 1932年1月28日，在确知苏联态度后，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出兵。日军两个旅团随即向哈尔滨进攻，2月2日，迫近哈尔滨近郊。依兰镇守使、步兵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联络丁超等成立吉林自卫军，展开哈尔滨保卫战，“抗战极烈”[(91)]。5日，在日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被迫撤离哈尔滨，退往宾县、巴彦一带，哈尔滨被日军占领。不久，在宾县、海伦的吉林、黑龙江两省政府消亡。张景惠与熙洽等组织东北政务委员会，公开降日。短短四个多月内，日军侵占中国从山海关至黑龙江总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执行对外妥协政策，这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重要关联。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92)]。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93)] 1932年1月11日，下野后退居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借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会上演讲的名义，发表《东北问题与抗日方针》一文，系统阐述了其事变以来所持的退让政策，宣称中国尚无实力可与日本一战，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为“今日我国外交惟一之途径”，“四不政策”，实际成为此后数年蒋介石与日本周旋的基本方针。

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蒋介石的表态反映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

念。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迫切时，蒋介石对立即奋起攘外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作出这一选择，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94)]。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95)] 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于今于此，虽决心牺牲一切只求保全本党，维持政府，以为救国之道。然非至最后，得到相当价值，于党国确有保存把握，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也。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96)]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宣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97)] 抵抗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然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借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和“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

第二节　宁、粤和谈与合作分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宁、粤为和谈讨价还价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局。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国民党内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正在北平的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并称：“此时此际，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唯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是则为人民所不恕。”[(98)] 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99)]。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100)]

面对迫在眉睫的外辱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发出“马（21日）电”，表示赞同“和平统

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101]。当天，孙科出席非常会议纪念周，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宁粤纠纷，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明确表示：“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102]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103]

21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同时决定“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104]。针对粤方“马电”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了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内容如下：“（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105]

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同期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106]。陈铭枢首先将蒋介石致汪、孙、古的亲笔函交给粤方代表。蒋在信中表示：“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无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昔】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107]随后，宁、粤双方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解决时局的三原则和三条件。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也应邀参加[108]。最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联名电蒋

介石："（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109)

当日，蔡元培、张继二人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介石，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110) 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表示："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早经陈明，惟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因此他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111) 。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蒋曾在当天日记对粤方这一前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接粤方拟稿通电，仍以统一会议，改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为条件，并多诬辱之句。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来组织政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且乘此外侮之机，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能不痛心！此时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112) 尽管蒋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一再对粤表示"个人下野更无问题"，而内心深处是不肯轻意放弃权力的。

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元老派强硬表示：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两方所希告之十

月十日四全代表大会，拟由两方亦于五日宣告展期。”[113] 此时，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114]。同时电汪精卫表示：“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115]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并恳请蒋在其下野“通电中统议产生之国民政府成立，当解除任务，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116]。

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颇有责备之意，蒋致电三人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117] 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蒋介石斥之为“直等于儿戏”。他在日记中愤慨道：“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呜呼！人心已死，可叹孰甚。”[118]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得知蒋电内容，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强【僵】之局……生死关头，系于瞬息，恳再赐察核。”[119] 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道：“钧座

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江午钧电到后，误会者尤多。现由汪同志设法解释。结果如何，再行报告。”(120)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此时粤方内部开始出现较大分歧。这一分歧又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所洞察。10月4日，陈一天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121) “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陈济棠）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122)

蒋介石得到陈的密报后，态度更加强硬。第二天蒋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通电发表之后，粤中同志尚未来到之前，中间负责无人，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君佩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123)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124) 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内部不和，10月5日，非常会议被迫作出让步，决定：（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

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125] 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作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126]

6日，广州“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127] 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

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之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军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128] 10月10日“双十节”，蒋自省道：“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残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所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顾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任其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129]

12日，陈铭枢由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如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精卫、孙科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130]，宁粤和谈很难实现。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131]。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次日，

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据陈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132)

15日，胡汉民致电粤方报告平安，并对以往党内纠纷深刻反省道："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但胡又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133)。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自谦道："余以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认错误。"(134) 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则慨叹道："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135)

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根据双方和议要求，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136)。粤方看到胡汉民已恢复自由，符合非常会议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偕同蔡元培、张继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两人为代表。同行的尚有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连同随员一百多人，于21日抵达上海。行程中还有一小插曲：船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相当危险。黄绍竑曾开玩笑地对唐生智说："孟潇，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内战的捣蛋鬼。"(137)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领袖，转告

广州国民政府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138]。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也。”[139]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作相、宗仁、济棠、玉祥分任”[140]。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当时粤方许多人都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当汪、胡二人在伍朝枢寓所见面时，汪也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141]。事实上，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据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18日报告：“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142]

同时，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上根据中常委提议：“现值国势危急，本党各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决议：“一，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二，前项恢复党籍者，即请中监会查明开具名单，以便提请四全大会追认。”[143]计恢复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柏文蔚等三十五人。

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先行会谈。“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144]。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

的统治体系。随后，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一）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二）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145)]。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146)]

这封信由蔡元培、张继二人携带入京，在23日晨召开的中常会上向蒋介石报告。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两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在于提高党权、削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前一天蒋在宋宅和宁方代表议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违背。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道：“粤方托蔡、

张携七条件来京，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147]

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蒋介石深表不满[148]。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藉立此后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蒋并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希望粤方“迅与石曾诸先生商定后，即日命驾来京，共赴国难”[149]。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150]。

二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无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151]。会议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152]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单方面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使会谈险遭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所提出的七点办法所拟定，内容涉及党务、

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153]。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用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的两点最为妥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主席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154]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155]。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156] 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此时为党为国均唯有从速集合首都，共赴国难。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157] 此时，蒋的强硬立场，源自他对粤方内部的洞察。蒋曾分析道：“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惟统一之局，因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158] 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与各方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主席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159]。而胡汉民则对何应钦表示：“余爱蒋较

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160)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痛；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161)

此时，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弟与铁城始终主张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162) 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请推铁城兄为代表，共同出席。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163)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164)。吴稚晖的谈话，立即遭到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165)

虽然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被蒋介石否决，但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30日上海和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三项、办法十一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主席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166)]。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二项解决时局方案："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主席，但政制须变更，即主席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汪、孙态度甚好，对此方案亦不坚持成见。胡先生已执意主张实行第一案，谓可免以后一切纠纷。"[(167)] 对此，刚刚到上海的何应钦特电蒋报告道："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168)]

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分为以下五点："（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169)]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170] 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予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171] 最后为推卸责任，粤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172]

3日，胡汉民也针对蒋氏谈话对上海外报记者公开批驳道：“今又有一事骇怪者，即西报载：蒋在纪念周报告，谓余曾语粤代表今日之蒋不仅当使其下野，且当流之外国，若俄之杜洛斯基，使汝不归故土。蒋是否作此言，余不能知，余非史丹林，纵【从】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盼同志均能彻悟。若以个人私见，增党之分裂，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173] 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导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174]，但粤方并不认为外报转载的蒋氏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9日召开的广州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则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175]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政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176) 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177)

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而草拟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请来访的妻弟沈君怡转交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左倾期刊《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 (178) 。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强硬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忠于国家者，必受人民之拥戴，否则亦不能不受真正民意之良心裁判。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任听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179)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180]。粤方也借此下台，双方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彼此暂时将党政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双方希望借“四全”大会的召开，来结束党争，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一）京粤四全会合开；（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181] 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182] 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粤方代表，决定：“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183] 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不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维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

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184)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185) 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186) 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答复何应钦：“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187)

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188)，达成如下协议：“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如左：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189)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着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特意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

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190] 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191]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贾景德就曾电阎锡山表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办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192]。但由于粤方内部已出现分裂的痕迹，因此在和谈中对蒋作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由表面团结走向分裂。

象征团结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举行会议的地点却分在两处，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三　国民党合作分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广州“非常会议”召开后，宁、粤双方都原拟在1931年10月10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推迟。根据上海和谈达成的协议，宁、粤决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并先行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五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194]。

12日，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三百四十余人，于右任致开幕词，并增选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四人为大会主席团

成员[195]。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196]蒋氏在致词中只字不提政府改组和自己下野二事，却在总结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负地写道：“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197]

南京四全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19日，蒋介石向大会代表报告此案精神，共三点：“（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198]蒋氏讲话的真实意图就是：蒋介石要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统率军队，如此才能“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获得本党的生机”。他想以此制造借口，拒绝粤方提出修改政府组织法。当日，大会“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并决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定为160人，包括原有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外，共112人。余额由宁、粤双方各选24人[199]。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人党籍[200]。23日，南京四全大会顺利结束。

广州的四全大会开得相当热闹。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派系争斗激烈，一度休会、复会，最终彻底分裂，导致大会又分别在广州、上海两地举行。

粤方内部的分裂，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即现端倪。虽说“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矛盾重重。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顾）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201] 但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应芬）、邓（泽如）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202]。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为此，“孙科力主扩大海、空军编制，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都是孙科的嫡系。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203]。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明确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言，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204]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广州国民政府

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二是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三是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205]。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曾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206]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207]。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大败之余参加这次反蒋运动，原本希望借此以图自保，重新求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白崇禧在广西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编练民团，扩充武装。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陈济棠，则是为了求得对桂系的发展稍有支持，但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向财政部领取军费三十万元”[208]。李宗仁为此常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满腹牢骚地自称只是一个“联络参谋”。这样自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因而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越来越消极。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他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就是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由于胡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

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馀曾表示：“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209]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尽管汪精卫也曾宣誓：“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210] 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211]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趁】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212]。负责上海地区出席广州四全大会代表选举的范予遂曾回忆说：“非常会议先派张知本为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办理所属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代表选举事宜。上海市派了张企留、余鹏、范予遂等专门负责办理上海市的选举，张、余二人代表广东派，范予遂代表改组派。先要办理选举名册登记，谁登记的人多，谁就多选出一个或几个代表。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多少‘选民’，为了争夺代表就得造假‘选民’名册。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此，由范予遂建议先协商好代表分配名额（数目已不记得，改组派少占一人），再协商好各

造‘选民’二百名，然后各自填写好二百张选票投在票箱里，再开箱计票，宣布当选代表姓名。这就是‘非常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实际情形。”(213)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古应芬、陈济棠眼看救胡目的已达到，因此对和谈态度颇为冷淡。而蒋、胡关系破裂后，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表示：“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214)

9月28日，宁方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赴香港，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展开先期谈判。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藉‘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215) 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216)。陈铭枢事后曾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217)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218)。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密电蒋介石，报告：“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219) 蒋汪在和谈前已达成一定的默契。从此，汪精卫不再坚持粤方提出的蒋必须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始能取消的条件，仅仅要求蒋放弃军事独裁，建立民主集权。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深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220]。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221]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张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此话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222]。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223]。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方面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224]。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225]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

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谓："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份子仍坚不欲赴粤"[226]。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曾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227] 同时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勷勤谐音，古应芬字勷勤）实居发路指示之责"[228]。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位居高位的，他对古是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架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曾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229]《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多少显露他们对汪、胡此举的不满："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230] 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础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231]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

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是遵照阎锡山的命令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232]。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233]。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234]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11月18日，广州四全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代表520人。“非常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七人，选举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褆昌四人组成主席团[235]。大会由孙科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上海和会的经过，次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同时也无奈地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要的还待于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236]孙科的无奈，也正是胡派人物对上海议和的不满。对此，杨永泰曾密电蒋介石报告：“两广实力派认为长期割据为便利，已一致内定推翻和议。胡、古派之粤军总、特党部巧电及近日陈、李、白演词甚露骨，俟汪、胡返即正式表示，纵不返亦欲断……哲生曾抗辩甚烈。闻胡已允返，但必欲挈汪同行。粤四全谅无好果。”[237]

23日，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决议：“（一）对沪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大体采纳，但仍须审查；（二）沪和会决定一、二、三届中委为四届中委一项，根本否决，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之；（三）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238]

当日，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24日晨，孙

科、陈友仁、李文范和汪、孙两派代表一百余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孙科等人到港后发表《致四全大会书》，公开指责粤方“诸同志推翻和议原案之举，竟若急不及待，唯恐其稍纵即逝”，“党国大事等于儿戏，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239]。孙科还表示：“若必凭党章，则西山会议、宁汉合作、扩大会议亦无根据，四全会立场何在？希牺牲成见，服从汪、胡指导，推翻前议”[240]。“与此同时，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示威，一度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241]。而刚刚恢复自由和党籍不久的李济深，原拟经香港返穗，“即遭陈济棠反对”。面对自己部下的无情，李济深甚愤怒，于是绕道回桂，“乘机谋倒陈，桂系附李，海、空军亦不与同情”[242]。

汪、孙两派代表离粤后，广州四全大会完全由实力派陈济棠和胡派元老萧佛成、邓泽如控制。据《民国日报》24日香港电：“萧佛成、邓泽如等决以列席者补足人数，定二十六日晨开三次会，如不足数，决以非常手段解决。闻提案有另组中央党部及改组国府各案。”[243]

眼看粤方内部分裂迫在眉睫，远在上海遥控的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内部矛盾。“胡此行系决于敬（24日）晚汪、胡等之集议。当时以粤全会破裂，决推伍（朝枢）回粤解释，俾得续会，但恐伍力不足，决请胡同去。胡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244]。

汪精卫此时曾有一电致阎锡山，对粤方分裂真相分析道：“此次忽起波澜，其原因有三：（甲）一部分人坚持倒蒋；（乙）一部分人欲不和不战，长期割据；（丙）一部分人欲推翻一、二、三届中委连任之决议，多得中委名额，以便竞选。除甲种尚有相当理由外，乙、丙两种动机均不纯粹。弟现设法补救。约数日后可见分晓。”[245] 汪的“补救方法”就是加紧脱离粤方阵营。为此，汪主动向陈铭枢表示，胡等仍设词欺逼他回粤，他“决令在粤代表如推翻和约，即退出大

会。若大会能开成，闭幕后即召集自己同志赴京”。汪还向陈铭枢“示哲生本日密电，如大会破裂即来沪”[246]。在汪精卫的暗中布置下，汪派代表则纷纷北上赴沪。对于粤方内部分化，陈铭枢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一则电报称：“仲鸣电汪云：粤大会破裂原系胡主使……哲生因此破面，陈策、惠长准备实力决裂。故胡不得不求转圜，陈济棠等亦软化。枢得密电亦云：陈、张等准备惊人举动，随哲生行动云。又任潮积极谋倒济棠；李宗仁昨致汪电大意：介石果辞职，当服从先生指导到底等语。综观上情形，粤军事解决亦有急转直下之势。”[247]

2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立即同粤方要员会商解决党务纠纷办法。据杨永泰报告：“胡、伍抵港，顷与省方来人开会，夜或上省。伍谈话力诋中央，谓：非践诺下野，不能统一；谓：总座只宜任国防会长。闻胡另有新案……如不下野释兵，仍退回，自组党府。惟此案确否，尚待证明。孙昨在乡语其亲信：今日当过港晤胡，但决不回省与陈再合云云。”[248]

当日夜，胡汉民即同孙科等人开会协商，达成初步协议[249]。会后，孙科特致电汪精卫表示：“与展、梯诸人会商补救办法，劝告邓、萧、陈、李等维持和会议决案，惟中有附加必须践言下野之条件。”期间，胡汉民极力劝说孙科返粤，被孙拒绝，最后暂定：“展、梯与科暂留港，非得切实答复决不入省。”[250]为了说服粤方众人接受调停，胡汉民只好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为由，亲自赴广州协调各派冲突[251]。29日，胡即返港，并留函四全大会，解释上海和谈委曲求全之经过，并提出解决办法三项：“（甲）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分子外，一百十二人由主席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如认为必要时，并可声明此为求和平统一不得已之举”；“（乙）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

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丙）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份子外，概予恢复党籍。”[252]

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最终表示接受胡汉民的三项办法，由秘书处电胡报告结果。同时为了显示团结，“大会派李宗仁，粤国府派马超俊，萧佛成、邓泽如派陈融，陈济棠派林翼中，一日午赴港迎胡汉民、孙科等。”[253] 2日上午，各派人物又“团结一致”，乘专车返省。此时，晋系留港代表十七人也一同返粤。晋方并提出贾景德、杨爱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254]。

3日，粤方四全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委，当天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八人，陈济棠实力派占了半数，三位军长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和陈的亲信林翼中当选，此外还有孙派的张惠长、桂派白崇禧、汪派张发奎和超然派的唐绍仪。第二天，续选举黄旭初、梁寒操等十六人为候补执、监委员，并否决了汪派代表在3日上海召开的四全大会选举结果[255]。广州四全大会所产生的二十四名新科中委，“粤人居廿四分之十九，北方无一人当选者”[256]。

在此期间，广州四全大会还通过一系列提案，其中重要提案二项：一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李宗仁四人共同提案，主要内容是：“（一）于若干省政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分别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于军委会指导下，必要时设军事分会。”[257] 另一重要提案是由主席团提出，包括两项内容：“（一）全国一切军官，均须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二）废除总司令制，改设军事委员会。”[258]

蒋、胡分裂后，胡汉民深感自己无望重返南京中枢，他也自知无力有效阻止蒋介石重掌军权；而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即将在南京召开，届时“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势必取消。为此，胡汉民以四全大会决议形式通过前案，无非是希望继续保持两广对中央政府的

半独立状态。奇怪的是该提案主要由胡派和桂系提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并未列名。这也预示着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党、政、军三个新机构，不仅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支持，还将会受到实力派陈济棠或多或少的牵制，由此也显示出两广内部的新矛盾。而后一提案的主要意图，是想从体制上限制蒋今后可能取得的军权，但又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5日，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闭幕词中宣告结束。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自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即借口同宁方代表洽谈一中全会事宜而拒绝返粤。而蒋介石更是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此时，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而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而当时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为此，汪曾主动致电阎锡山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汪电称："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主席，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259)] 阎锡山则复电表示："两项办法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260)]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却为此时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261)]。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262)]，提议"退席之

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原。”[263] 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电召汪派代表脱离粤方迅速北上，为今后蒋、汪合作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张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汪精卫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264]。

25日，在顾孟馀的具体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一百六十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265]。汪派代表离港前还一度发表《退会代表宣言》，公开指责粤方：“四全大会一部分代表，不顾当前之大难，断然将和会此种决议案根本推翻，使和平统一之一线曙光，归于消灭。代表等自信数年来之努力，始终如一，但对此完全不顾国利民福之妄动，则未敢苟同，是以相率退出大会，再图补救之方。”[266]

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为响应汪派退会代表的行动，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大会”，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267]。“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对此蒋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268]。

有了蒋的保证后，汪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公开分裂也为汪的计划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

上，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展堂、哲生两兄鉴：连日真如诸兄往返商榷，均以为对日问题不容再缓。如战，则全党一致牺牲；如和，全党一致忍辱负重……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主席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269)

同时，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270)

此时，汪精卫还希望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29日，再次致电阎锡山征询对时局，特别是对外交问题的意见。汪电称："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271) 30日，阎锡山复电汪精卫，提出补充意见："一，广州四全会可补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

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272] 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表示：“某表示请兄担任主席，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273] 30日，胡汉民、孙科也复电汪精卫表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由宁方褐人替代渠所任各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274] 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表示接受胡汉民的调停后，李宗仁、马超俊为此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日回粤开会”[275]。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陆续抵达上海。于是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276]。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京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现在事实上系各方同志的团结，故有此次会议，在南京、广州分别开会。因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二百五十人，广州方面的中委名额为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则我们可以选出的定八至十人左右。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望大家讨论，但本日即要决定，因为最迟今日须要把名单打电去广州。”[277] 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十人为中央委员，致电广州四全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曾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

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馀，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278]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与重组

一　蒋介石下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一度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279] 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280]。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氏是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放弃手中权力的，但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氏还一度动摇过继续同粤方的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不能否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丧失国土之耻，他是不能忍受的。当他最初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甚至也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

力于陇海路也。”[281] 11月17日，他召集南京干部商讨应付时局对策时，曾毅然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又期民众信仰本党，甘受本党领导，共起御侮也。”当晚，即电嘱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282]。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18日，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283] 第二天，陈铭枢再密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之态度：“汪先生云粤方萧、邓等极反对沪和约，经哲生调解，现决定选举可依和会所拟定办理，惟仍坚持蒋不表示下野，则不到京开会。汪现拟办法两项：（一）俟选举后即召集本派之中委来沪，计有二十余人加入京方，则占多数；（二）即明电粤方力争维持和会到第一次全会解决之原议。惟后项恐即决裂，反因此失事，故决照前项进行，电催迅速选举，并一面密电哲生明告自己之态度，以促哲生之离粤。”[284]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联络汪精卫，李曾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其中一则电报云：“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贸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所见甚是，望商于介公。”[285]

但蒋介石一度想要放弃中央权力的举动，遭到了宁方内部的一致反对，甚至连他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黄郛曾在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

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286]

蒋介石此时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够左右局面，这是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得到陈铭枢等人的详细密报后，蒋对粤方内部分化态势的判断已成竹在胸。除此之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他得知：“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287] 一旦明确了汪精卫和孙科二人的意向，广州四全大会所能带来的危害和不确定因素，也就大打折扣了。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大会闭会，幸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一难关，今既渡过，是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288]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着他要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干部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289]。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闭幕。按上海和会决议，四全大会后，“非常会议”自当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实现下野诺言，为此，粤方四全大会于闭幕当天邀集所有历届及新选执监委员举行临时联席会议，推唐绍仪主席，“议决鱼（6）日结束非常会议，虞（7）日改组中央党部”。“在蒋未实行下野解除兵权以前，仍照常行使职权”。粤方同时决定选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四届一中全会开会事宜。

尽管粤方否决了汪精卫在上海选举的中央委员，但此时仍不愿同汪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表示：“微（5）日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290] 而蒋介石则是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12月5日，蒋特意派何应钦、邵力子两人赴沪，嘱

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291]。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292] 随后，汪致电阎锡山表示：“弟现致力于整个合作，如万无可能，亦使双方缓冲，各图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图。弟以为国事如此，无论何方势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单独，非协力共存不可。”[293]

就在汪、陈会谈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时，一度想采取极端措施：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以此打击粤方所谓的“党统”。他当众表示：“拟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早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藉党之资格以毁党害国，且中国由我手而统一，亦可由我手以奉还国民也。”[294] 由此可见，蒋介石实在不忍交出政权。但吴稚晖马上对蒋表示：“此着太险，现在只有安定制动。”蒋“默然思良久”，不得不承认吴稚晖之言“尚有深见也”[295]。此时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的气焰，但同时也危及了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12月10日，孙科等人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同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首先由孙科报告粤方四全大会情形，并表示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如蒋不下野，粤方中委不能赴京开会。陈铭枢当即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均可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随后，双方商定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所同意者”[296]。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297] 宁方内部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为此蒋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知哲生等必欲强余辞职始快，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

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298]

而此时极力拆粤方台的却是汪精卫。据李石曾11日电吴稚晖云：“真如告粤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开全体会。精卫谓不宜强介公下野。又谓如介公不下野，粤诸人不到京，伊于国难会议时到京参加云云。弟与公权皆以为如介公决下野，必先妥为布置，方可宣布。否则必失大计。望介公勿轻于宣布。关于妥为布置一节，明日到京面陈。”[299]

第二天一早，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李石曾同蒋介石商讨进退问题时，首先表示对陈铭枢的怀疑。李石曾说：“真如亦有劝钧座辞退之言，吾以真如为可疑也。”而蒋则答道：“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疑其伪奸亦冤矣。”下午，蒋召集干部继续研究进退问题。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不主张蒋下野，并一致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惟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300] 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令蒋非常不满，他无奈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稚辉、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余言明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事群方庞杂，主张不一，而又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徒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也。天下之至惨之事未有如此之甚也。”[301] 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会万难召开。

特别是自胡汉民南下后，粤方态度更转强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写道：“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

是处也。”[302] 函中的“门”是指蒋介石，盖取自《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从这封信中不难读出胡氏倒蒋的决心。为逼迫蒋氏下野，李烈钧一度向粤方提议：“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303] 为此，胡汉民积极同北方联络，密电冯玉祥表示：“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下野为先决条件，既不践约，则一切当无从解决。”并“盼随时电示”[304]。冯氏对粤方的提议“极佩服之”[305]，并复电胡汉民表示：“和平统一之障碍不除，则健全政府永难实现。先生及粤中诸贤达主张正大，举国仰赖……弟虽不敏，当追随努力也。现华北各方鉴于蒋之种种乖谬，凛于外交之紧急，当从新团结，以安内而攘外，现正致力于此。”[306] 冯玉祥在日记中还总结了以往反蒋运动的经验教训共16条，深感今后应注意：“使倒蒋派不分裂”，“须有我们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对有实力者，有人望者，须发生密切关系”[307]。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13日，蒋向陈铭枢表示：“如粤方十六日尚不来，则以后余再不与调和，使大局日趋艰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来到，余可早一日辞让了。”[308] 同日，粤方得知蒋决定下野消息后即开会讨论，决议两点：“（一）蒋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机会；（二）下野电到，各委即北上。”粤方并同在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商妥，对双方拟议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均不反对[309]。

12月15日，蒋介石致函中常会，略谓：“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5）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310] 同日，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

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311]。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请求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6日，中执会核准张氏所请，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至此，粤方要求悉如愿以偿。

蒋介石辞职前，曾得蒋伯诚转呈韩复榘一电表示效忠，韩并向蒋贡献意见三条，电称："向兄表示决心服从钧座，他方来人接洽仅与敷衍而已，并对钧座贡献意见三点：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请钧座切实准备"等语[312]。蒋对韩复榘的意见深以为然，当即批复道："向兄所见甚是，当照此酌办也。"[313] 为了减少"再出负责"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兼甘宁青宣慰使[314]。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315]。另据《黄郛日记》载，蒋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316]。

蒋介石此举，实际是为自己卷土重来，预先做好布置。在蒋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第二天，蒋还特意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317] 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出负责"埋下的种种伏笔。

12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返回故乡浙江奉化。24日，他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曾反思道："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

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318)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一，推唐绍仪等主持粤府，中央党部及国府均暂保存，俟统一政府成立后始撤销。二，陈济棠、余汉谋、李扬敬、香瀚屏因边防重要；萧佛成、邓泽如因政务，均不北上。李宗仁、白崇禧须留一人主持桂事。三，定十八日为举行打倒独裁纪念日，各机关均休假，联合各界举行大会。”(319) 当天，何应钦也向蒋介石报告了在沪粤方委员的动态：“钧座通电昨夜深始到。粤方代表今晨召集谈话会，决定全体入京。本拟于本晚车行，因恐夜车铺位不敷分配，反为不妥，故改为明晨九时乘专车来京。汪先生病仍未愈，拟静养二三日即来参加一中全会。汪夫人及左派人员均先行，不再延期。”(320) 18日，粤方中委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沪所选的十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因粤方不承认汪派十名中委资格，对此汪精卫曾信誓旦旦地在沪表示：“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321)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并极力拉拢汪。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当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的怎样”时，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322)

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主要人物陈璧君、顾孟馀、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惟“先承诺”此点，“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323]。

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谈话会，出席中委四十九人。谈及沪选十名中委问题时，因有蒋的支持，“故多数主张加以容纳，以免留一不良之因”。当晚，蒋介石邀宴到京的中委，特意将汪派十名中委邀请与宴，以暗示他事实上承认汪派中委的资格[324]。而汪精卫则借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医院治疗，静候佳音。

此时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各派中委纷纷入京，但反蒋派的“大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都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外，观察事态的演变。蒋下野通电发表的当天，孙科、邹鲁就急电阎、冯，请立即赴京与会。而阎锡山部属曹世振等人则电阎建议：“与赵（戴文）院长、徐（永昌）主席、杨（爱源）督办面商，均谓应复电孙、邹，表示南下出席。徐谓以‘约同入京’措词最为相宜。赵谓银行界、党部、军人、英美均不愿蒋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为蒋如不下野，军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会开会后，再拥蒋继任主席。彼时在蒋势力范围之下，多数中委难免为彼左右。”[325]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胡、汪、阎、冯四人全都不肯主动入京，而同时又不断彼此致电，催促对方入京。先是18日，胡汉民由香港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表示：“闻精卫兄病滞沪滨，弟亦因血压过高必须疗养，势难赴京。而此次全会使命至重且大，所赖于两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弟虽病搁海隅，亦当悉举所知，随时贡献也。”[326] 随后，汪精卫也自上海致电阎锡山表示：“公偕焕章、次陇、允臣三公同入京，党国之福，万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决无不入京之理也。”[327] 而冯、阎等人一面联名复电胡、汪表示：“国难当前，入京开会，义不容辞。大驾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见告，以便追随前往。”[328] 同时，再电孙科、李文范、伍朝

枢、邹鲁等粤方代表："弟等聚商，电请精卫、展堂两同志力疾入京。得复，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329] 实际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诿，甚至连已由广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在粤，对叔均（指蒋）下野是否诚意不甚明了，拟看三两日，再同精卫入京"[330]。各派领袖之间表面上话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又相互猜忌、拆台，毫无精诚团结可言。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出席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惟望全会得到圆满结果，无论如何，终须相忍为国，以期政府早日完成，中正决无另外主张。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331]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三十九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但于宪法颁布时，应依法改选之……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332] 不难看出，以上规定全部是针对蒋介石个人集权而发。全会依据该案修正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蒋介石的一系列特权。

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是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四届一中全会选举结果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陈铭枢；立法院院长张继，副院长覃振；司法院院长伍朝枢，副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刘芦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丁惟汾。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中，原设有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当时称政治委员会，作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决策及指导机关，第二届中执会扩大了它的职权，并于1926

年7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分裂时，武汉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继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1929年5月，第三届中执会制定《政治会议条例》，从此“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333]，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334]。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粤方最初设计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的职能，这一提案在蒋、汪两派的联合抵制中终于流产。全会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时提出两点声明：“一，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二，现任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335] 从这两点声明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府委员只不过是一个尊贵象征而已，其权力大打折扣。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政会组织原则三项：“（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336] 从此，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的地位，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并以叶楚伧兼秘书长[337]。国民党第四届中常委同第三届中常委相比较，增加了汪精卫、顾孟馀、居正三名原反蒋派领袖，以代替原亲蒋的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338]。

29日，四届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居正主席，孙科致闭幕词，于

右任宣读大会宣言。随后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加选刘守中、杨树庄、王正廷为国府委员，决议：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和五院正副院长定于三天后的1932年元旦宣誓就职。当天下午又召开第一次中政会，通过行政院院长孙科提出的各部人选如下：内政李文范、外交陈友仁、军政何应钦、财政黄汉梁署理、教育朱家骅、实业陈公博、交通陈铭枢、铁道叶恭绰、司法行政罗文幹、海军陈绍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339]。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史称“孙科内阁”。

二　“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他们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至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孙科政府既组成，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汤山被扣释出未久，积忿未泄，正欲抓住陈济棠以反蒋，胡亦无意于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难合，蒋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时仅陈铭枢愿以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作哲生之后盾，力挽哲生出面组阁。故哲生赴南京之际，形势极为不佳”[340]。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介石辞职后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341]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两千万元[342]。12月21日，宋子文向行政院递送辞呈，称：“对财政部事务，声明维持至22日止，请政府另简贤能继任；22

日后为职务终了之期，即卸除一切责任。”[343] 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而原本与孙科同一战壕的胡汉民，这时对孙科政权也并非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借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344]

胡汉民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对于新政府“并不希望其具以前政府权力，而希望政分会式之政委会早日成立，庶就统一之形式下，各就其范围内自行治理”[345]。为达此目的，就在四届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即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346]。30日，更决议：此后“三机关每月应支经费均由财政部于西南各省海关税项新增部分拨支……嗣后关税新增部分由两广海关税务司核收解交西南政务委员会”[347]。

胡汉民此举，对新成立的孙科政权根本不是支持，“纵非变相独立，亦即形同割据”[348]。宁方的邵元冲亦曾对粤方此举评论道：“此皆足以致哲生之死命者。”[349] 这自然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立即“十万火急”致电广州，表示万万不可：“查上海和会决议案，原定所有双方四全大会议决案，均提交一中全会处理。一中全会于第二次会议决议改将此项议决案移交四届常会办理。上述三案尤关系重大，自应由四届常会决定颁布条例，始能有所依据，进行组织，方合手续。今由粤方中央、国府联席会议决议，遂行设立，事实上已违反和会及一中全会迭次决议。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一；一中全会开幕后，双方中央党部即行停止职权，此为党章规定，宁方已是如此，粤方何能独异？今于隔世两日，有此重大决议，不免予人以破坏党章口实，此期期为不可者二；关税统一征解，中外具瞻，苟非政府对峙，何可割裂？今统一政府甫告成立，而粤方遂有截留关税之举，设使别方借

口尤效，岂非立陷中央于僵局？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三。上海舆论自接到粤方上项消息，咸为哗然，视为粤方破坏统一，实行割据。国人指责，众口同声，弟等代表粤方情尤难受。特电条陈，务请暂缓发表实行，以图补救，千万千万。”(350)

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常会讨论邓泽如、萧佛成等人提交的粤方三机构组织条例时，孙科愤怒地表示：“广州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军事分会等应该由常会来讨论其组织，才能着手进行。而广州这一回开联席会，把这三种组织条例同时公布了，此种手续简直是破坏中央决议。”孙科并对广州截收粤海关新增收入的行为表示愤慨，明确表示：“此种办法是破坏统一的，中央决不能接受。”最后会议决定“由常务委员详商办法另行提案”，而否决了粤方提出的三机构组织条例(351)。

汪精卫此时正加紧同蒋介石联络合作，同样不愿粤方另组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机构，特派曾仲鸣赴粤，“请济棠取消西南新设三机关”(352)。孙科、汪精卫还致电萧佛成、邓泽如指责“粤设三机关，无异对于统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国又成分割局面”。但萧坚持称：“三机关为适应环境而设，不因汪、孙反对而中止。”(353)

16日，萧佛成、林翼中、陈融、张惠长等粤方骨干赴港同胡汉民“密议三机关问题”，“商定结果，胡决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变更”(354)。然而支持孙科的粤方海、空军将领，在孙的授意下，第二天（1月17日）由张惠长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今后空军将领“誓不参加任何内战，再不为任何个人之工具”。同时海、空军方面还声称：“海、空军权应归中央，听命中央改组两总部。”以示不愿接受西南军事分会控制(355)。19日，陈济棠、萧佛成等人通电全国，表示：“军事分会，因中央未设军委会，故遵中央意旨，暂不成立。”但仍坚持遵照四全大会决议案，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在广州宴请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诚拥护新政府”，并表示以上两机关“纯处监督地位，无割据意”(356)。至

此，粤方拟议组织同南京相抗衡的军事机关——军事分会，在孙科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357]。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便不得不再次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孙科上台后的第二天（1月2日），即电蒋请求“莅京坐镇”：“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358]

1月5日，孙科向新闻界谈时局近状时，再次无可奈何地表示：此次国府组织法修改后，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院由从前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改为对中政会负责。在此制度下，中央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凡对内对外施政方针，必经讨论决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会“负最高指导责任”的三常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在京，行政院更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为此，他向新闻界呼吁：扩大舆论宣传，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359]。

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处境，可谓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借此迫使孙科碰够钉子后知难而退，便于蒋自己东山再起。蒋在接到孙科1月2日的“劝驾”电报后自记道：“哲生昨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360]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南京新政权，完全持一种应付的态度。在蒋的授意下，“蒋方人物对时局均持冷静态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缄默”[361]。当蒋接陈果夫电，得知“我方留京同志

开会多不出席，侄等去留应请指示”后，即复电陈“请在京忍耐从事”[362]；又电宋子文，告以“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对哲生亦不应严拒而联络之”[363]。蒋的亲信刘峙亦电朱绍良表示：“此时我辈似宜以介公之心为心，暂时缄默，以观大局之推移。”[364]但是，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蒋则毫不迟疑，积极部署。1月9日，当蒋得知张治中拟借口养病准备离京，则急电张告以“切不可离去军校，当在京养疴”，并同时电何应钦告以“军校如改校长，请速委任文白。勿延”[365]。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一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如各省谋割据，必尽力反对。”[366]其实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着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特派唐生智亲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367]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精卫此时患的是“政治病”[368]。

1月8日，在京中央委员开谈话会，“除讨论外交外，对内政佥谓长江军人之态度，非蒋来难驾驭；粤桂之设执行部，非胡来难打消；下层党员之意志，非汪来亦无从齐一。讨论结果，再促三人速来主持”[369]。被逼到绝境的孙科在会上沉痛表示：“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人力阻其行，称孙负行政院长重任不能离京。孙说：“短时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众人仍多方劝阻。当晚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居正得知后，立即赶往车站。此时火车已经开动，居正即命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仍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达到真正团结目的。”[370]

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371]。并公开发表谈话称：“中枢空虚，为今日国事最大之险象……余观此险

象，不能不为党为国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诚恳请求，苟犹不获允许，则余已智尽能竭，惟有辞职，以免长此迁延时日，贻误党国。”[372] 10日，孙科准备同吴铁城赴宁波求见蒋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吴铁城电，知哲生拟来甬（宁波）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复电以已入山辞之”[373]。孙科被迫中止成行，第二天改派张继、何应钦赴溪口求见蒋，“据云劝蒋出山无结果”[374]。而此时“粤方举动，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胡意志坚强，决不入京”[375]。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导致中政会不能开会。国难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针无法确定。11日晚，走投无路的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决定破釜沉舟，在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上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376]。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次日通过决议：“（一）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二）推于右任、张人杰、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叶楚伧、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馀14委员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

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377] 其中的“但书”内容是出自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的意见[378]。至此，孙科政府虽然在法理上拥有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其实对“重要方针”依然无权处理。而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仍表示强烈不满，立即电朱培德指示：“特别委员会应积极设法打消，请转在京诸同志，此等破坏政府编制举动，大不利于中外之观听也。”[379]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

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陆续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380]。甚至连蒋介石也暗示部属可以截留国税。当蒋获知刘峙所部给养困难时，就曾致电刘峙表示："如中央无法发给，给养只可在中央税收借支，以免冻饥，但不可蒙截留之名也。"[381] 当时的财政窘况正如孙科所说："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仍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须四百万，不敷数月达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外交、军事种种问题，即有良好办法，亦形格势禁，不能决定。"[382] 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383]。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还将财政部的所有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384]。宋还公开预言孙科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385]。

黄汉梁原本是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该行虽也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员，但因为黄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386]。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攻击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当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孙科、陈铭枢

等人，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六个月为期。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387]。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388]

这是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是给孙科内阁的致命一击。此举也彻底堵绝了黄汉梁的筹款之路。黄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被迫提出辞职[389]。15日，吴铁城代表政府同银行界协商救济财政。"吴表示政府决减政费，月定二百万，军费月一千六百万，除沪税可提用之七百万外，余一千一百万须金融界设法，每月帮忙"[390]。当晚，上海银行界会商办法。他们也深知，如同政府彻底决裂，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难保证，遂决定："坚持须政府声明不动债金；借款不能如数担任，仅可募筹半数。"[391]

特委会议决停付的内债，大都是蒋介石当政时所借的款项，他当然不愿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彻底决裂，并对孙科此举极为愤慨，甚至认为孙科的举措是受胡汉民的影响。为了阻止孙科的行动，蒋介石特命张群赴沪协助吴铁城同金融界会商。16日，张到沪后即向记者转达了蒋氏的旨意，称："蒋认为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然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392]

蒋介石一出面，情况顿时改观。金融界得到蒋的明确答复后，立即改变态度，加之"各方纷往请求（蒋）回京主持大政，蒋亦表示援

助，并嘱岳军（张群）在沪帮同筹款，约可得一千万元”。[393] 16日，张静江、张继力劝孙科“打消停付息金办法”，吴铁城也自沪致电孙科，表示：“与银行界谈判极为圆满。”事已至此，孙科只好以行政院名义于第二天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394]

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终以孙科内阁认输告终。此事也显示出孙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会，离开蒋的支持是毫无作用可言的。财政无力解决，尚需“在野”的蒋介石“援助”；面对国难，孙科内阁亟待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更是需要蒋的“支持”。此时的孙科内阁已实可谓山穷水尽，摇摇欲坠，而蒋介石复出的时机也大致成熟。本来就不甘下野的蒋介石终于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也预示着孙科内阁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　蒋、汪合流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当天，即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蒋在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395] 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张继到上海后立即遵从蒋介石之意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以此为蒋氏复出大造舆论：“目前欲解决外交、财政之难关，只有维护统一之一途。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始见求统一之真诚……循此以进，统一方名符其实，财政、外交始有办法。届时汪、蒋入京当无问题。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政府亦应负全责，解决广东半独立之状态。”[396]

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397]。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因衔蒋命同

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介石信函交顾孟馀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398]。此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1月17日，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399]。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400]。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401]。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402]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再对孙科客气了。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的飞机，直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403]。当日上午，蒋、汪又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井之中，而置衽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404] 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蒋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了。

孙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烟霞洞会议”。参加者计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405]。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406] 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407] 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阻止蒋、汪合流，胡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408]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能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是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在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请愿团谈话，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409)

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21日，蒋介石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搜集旧部，逐渐回复政治地位。"(410) 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已经快唱完了，难以恋栈，已"有引退之意"。(411)

22日，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开始时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412) 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413)

24日，特务委员会议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发言最多。最后多数与会者反对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

并予以否决。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借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辜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叹曰：“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414)

果不出蒋氏所料，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开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人杰、张继、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陈铭枢同志代行行政院长职务。”(415) 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416)。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罢了。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417) 同时，蒋还致电宋子文表示：“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418)

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主席，通过重要决议案两项：“（一）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馀、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员。”(419) 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之意。当晚9时开临时政治委员会，蒋介石主席，决议：孙科辞职，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就在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悍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作出重要决议三项：“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

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梁、陈友仁辞职。”[420]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护送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乘火车转赴战时首都洛阳。当晚蒋宿浦口，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一天的忧愤心情：“今日上午会敬之、益之、墨三，再会党务干部后，即请林、汪二先生过江。林则延缓以为多事，汪夫人亦有难色。余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观此内情，心地之苦，无以复加。然为国为党，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无职权，又恐其怀疑，又恐各方对其失礼。此时余诚忍耐之时，受屈之时乎？林、汪专车八时开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离京后，外交与社会军心不安也。”[421]

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422]。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最后，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423]。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协。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

(1)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十七卷《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中关系的开展》，鹿岛和平研究所1971年版，第306—307页。

(2) 币原喜重郎：《对华问题概况》，《中央公论》1929年第3期；《国

闻周报》第6卷第8期转载，1929年3月3日。

(3) 《电张群》（1929年10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53页。

(4)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十七卷《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中关系的开展》，第332页。

(5) “东方会议”第5号文件，《关于稳定满蒙政局和解决悬案问题》（1927年7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57，P．V．M．23，第1067—1086页；参见任松《从“满蒙铁路交涉”看日奉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6) 《东三省为中国人之东三省》，《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172页。

(7) 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407页。

(8) 《就对日外交答记者问》，《大公报》，1928年11月16日。

(9) 《辽宁省政府为随时查报日本移民政策及其侵略计划给特派交涉员密令，1929年3月27日》，《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0) 《葫芦岛之前途》，《大公报》，1930年2月7日。

(11) 《满铁奉天公所搜集张学良关于满洲铁路等问题谈话情况》（1931年1月12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档案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12) 《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关于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的有关文件》（1931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47页。

(13) 板垣征四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九一八事变敌方材料》，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藏，第5—12页。

(1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15) 《驻朝鲜总领事张维诚关于韩侨惨状之报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第429页。

(16) 《日本外交史》第18卷，鹿岛版，第44页。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4日。

(18) 《蒋中正电丁惟汾叶楚伧请中央与国府对于检查日货与违章处罚不为苛求并通令各地方政府特别注意》（1931年7月3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200003144，台北“国史馆”藏。

(19) 《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致外交部公函》，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33页。

(20) 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1) 《日本外交文书缩微胶卷》，S119卷，S42602，第137页；转见俞辛焞《唇枪舌剑——九一八时期的中日外交》，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22)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篇》，日本原书房1978年版，第84页。

(23) 《九一八事变前夕贺耀组等为日本站东北新动向提请政府有关方面注意来往函电——贺耀组致国民政府文官处电》（1931年7月10日），《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2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第550页。

(25)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49页。

(26)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0页。

(27) 日本外务省缩微档案，转引自俞辛焞《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28) 参见《日本军队宪兵警察在满铁沿线配置表》（1929年11月1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档案选编》，第308—314页。

(29)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84页。

(30) 张学良1931年9月6日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31)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45页。

(32) 《我未抵抗日军轰击》，《中央日报》，1931年9月20日。

(33) 《致东特区长官公署等电》（1931年9月22日），《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486—487页。

(34) 《此时务须镇静——副座对日冲突谈》，《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35) 《张学良9月20日之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36) 《致蒋介石王正廷电》（1931年9月24日），《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490页。

(37)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5页。

(38) 蒋介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322页。

(39) 《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申报》，1931年9月24日。

(40) 《中央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申报》，1931年9月29日。

(41)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317页。

(42) 《顾维钧等为对日不抵抗乃出于慎重致罗文幹密电稿》（1931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45页。

(43) 《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九一八事变敌方材料》，第16页。

(44) 《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

(45) 《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转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11—12页。

(46) 《蒋主席致刘珍年师长指示烟台防务电》（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2页。

(47) 《蒋主席复熊式辉参谋长指示对日军越规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电》（1931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6页。

(48) 《蒋主席致韩复榘主席指示济南防务电》（1931年9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8页。

(49) 《蒋主席致张群市长指示上海防务电》（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90页。

(50) 《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3日。

(51) 《对全世界宣言》（1931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3—34页。

(52) 《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8页。

(53) 《蒋主席致张学良告以拟派警卫军北上并拟亲驻石家庄电》（1931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309页。

(54) 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55) 《我驻日内瓦施代表照会国联联合会秘书长》（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绪编第1册，第324页。

(56) 《国联行政会希望日军速撤》，《申报》，1931年10月2日。

(57) 《国联对日人占领东北之裁判》，《国闻周报》第8卷第41期。

(58) 《国际联盟关于解决中日纠纷的有关文件·国联行政院决议案》（1931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37页。

(59)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1840—1945）下，东京原书房1985年版，第182页。

(60) ［美］韦罗贝编、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4页。

(61)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革命文献》第34辑，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68年编印，第1023页。

(62) 《外交部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与日交涉情况的报告》（1931年9月—193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95—396页。

(6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3日。

(64)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致蒋介石等密电一组》，《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

(65) 《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78—279页；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6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2页。

(67) 张学良1931年1月29日致蒋介石电，《民国档案》1985年2期。

(68) 《顾维钧为撤退锦州华军中日双方态度对立等问题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59页。

(6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速记录》，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70) 《国际联盟关于解决中日纠纷的有关文件·国联行政院决议案》（1931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41页。

(71) 《国际联盟关于解决中日纠纷的有关文件·国联行政院决议案》（1931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41页。

(72)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73) 《国府两电令张学良抵抗》，《中央日报》，1932年1月2日。

(74) 《蒋主席致张学良副司令令锦州军队切勿撤退》（1931年12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312页。

(75) 《顾维钧为蒋介石辞职已获准及北平学生示威团在宁活动情形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68页。

(76) 《顾维钧转报国联行政院拒绝日本提议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75页。

(77)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78) 《致于学忠第一军司令部令》，《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559页。

(79) 《呈国民政府主席电》，《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

(80)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81) 《张学良1931年12月30日致吴稚晖函》，《大公报》，1932年1月1日。

(82)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83) 萱野致犬养毅电报原件，转见黄自进：《犬养毅与九一八事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版，第328页。

(84) 李树桂：《九一八事变目击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第37页。

(8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

(86) 《张学良通电》，《大公报》，1931年11月8日。

(87) 《马占山电告日军侵境》，《申报》，1931年11月10日。

(88) 《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4页。

(89) 《张学良致张景惠等电》（1931年11月20日），《马占山江桥抗战电报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90) 《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II）2—2，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

(91) 《日军占领哈尔滨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0页。

(92) 蒋介石：《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2页。

(93)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482页。

(94) 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

总集》第11卷，第67页。

(95) 蒋介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2页。

(9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9日。

(97)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

(98) 《李张吴电粤吁和平》，《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

(99) 《中央电粤请共赴国难》，《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

(100)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

(101) 《广州国府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1日），《中央导报》第15期（1931年10月7日），第105页；《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102) 孙科：《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中央导报》第13期（1931年9月23日），第4页。

(103) 《阎锡山冯玉祥复广州唐萧诸先生有电》（1931年9月2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26。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29页。

(105)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777页，以下简称：《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之十一，手稿影印件，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106) 最初宁方拟议中的和谈人选有李石曾，为陈铭枢反对，由陈推荐蔡元培取代李。《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107) 《蒋介石关于派蔡元培、陈铭枢赴港协商共赴国难事致汪精卫等函》（1931年9月），《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0页。

(108) 《陈铭枢回忆录》，第页76。

(109)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1页。

(110) 《蔡元培、张继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陈布雷个

人全宗档案》，第772 - 773页。

(111) 《蒋介石复蔡元培等电》（1931年9月30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1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文电”，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896。

(112)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13 - 114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35页。

(113) 《蔡元培等关于粤方要求宁方于十月五日共同发表通电后始行召集统一会议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1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5页。

(114) 《复广州李锡九西密东电》（1931年10月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 / 1326 - 1327。

(115) 《复广州汪先生电》（1931年10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 / 1328。

(116) 《陈铭枢等关于与粤方谈判情形并请勿改原议定条件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8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一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492。

(117)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7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26页。

(119) 《陈铭枢致蒋介石江亥密电》（1931年10月3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66。

(120)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4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9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74。

(121)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4日午时），《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0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85。

(122)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4日亥时），《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1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606。

(123) 《蒋介石关于引退通电必俟粤方代表到沪后发表复陈铭枢等电》（1931年10月5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0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并转蔡元培张继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912。

(124) 《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力排众议来沪共赴国难密电》（1931年10月5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1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转汪精卫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913。

(125) 《汪精卫等致胡汉民函》（1931年10月5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胡”251。

(126) 《京粤和议颇乐观》，《国闻周报》第8卷第40期（1931年10月1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5页。

(127) 《粤方政治主张》，《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 - 6页。

(128)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0月8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4页。

(12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8 - 149页。

(130)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6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2页。

(131)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12日，第783页。

(132) 《陈铭枢回忆录》，第78页。

(133) 《胡汉民删（15日）电汪孙古萧邓等》，《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

(1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4日，见《事略稿本》“蒋档”。

(13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6日。

(136) 《大公报》，1931年10月15日。

(137)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页。

(138) 《广州潘宜之致阎锡山辛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38。

(139) 《阎锡山复广州潘宜之先生壬密巧电》（1931年10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38。

(140)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陈光组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588。

(141)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7页。

(142)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3)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五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5；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6册，第436－438页。

(144)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2日，第786页；《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

(145) 《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

(146) 《汪精卫等致蒋介石函》（1931年10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9。

(14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7－198页。

(1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43页。

(149) 《蒋主席复汪孙等书》，《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

(150) 《南京邱文伯致洪江王家烈艳电》（1931年10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81。

(151) 《天津李锡九达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52。

(152)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政治类第35卷，手稿影印，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档案”。

(153) 《吴铁城为粤方代表在会议前提出“党政改革案”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90 - 792页；《吴铁城致蒋介石勘电》，《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34。

(154) 李文范：《和议经过与我们今后的努力》，《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8页。

(155) 《天津阎秉璋达密陷电》（1931年10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 / 1360 - 1361。

(156)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等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7) 《蒋介石关于粤方“党政改革案”不应在上海会议提出讨论复吴铁城等电》（1931年10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92页；《蒋主席致李石曾吴铁城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214页。

(159) 《上海张涛唐季古致天津之良并转冯玉祥俭电》（1931年10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 / 0063。

(160) 《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 / 1364。

(161)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丁密勘电》（1931年10月28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 / 1491；《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 / 2307。

(162)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68。

(163) 《蒋主席致李石曾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4) 《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

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64－1365。

(165) 《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66) 《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三、四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

(167) 《何应钦致陈诚世电》（1931年10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5日条，第243－244页。

(168)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27。

(169) 《反蒋运动史》下，第462页。

(170) 《国民党非常会议史料一束》，上海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171)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72) 《粤代表发表谈话》，《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

(173)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74) 蒋氏演讲全文修订稿见《中央日报》，1931年11月5日。蒋氏原演讲词笔者目前仍未见到，《事略稿本》1931年11月2日条内所收演讲词全文，同《中央日报》所刊内容一致。

(175) 李宗仁：《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央导报》第20期（1931年11月12日），第8页。

(176) 《王季绪绝食垂危》，《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

(177) 《蒋主席问题》（社评），《时事新报》，1931年11月5日。

(178)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0月29日。

(179) 《银行界求和平》，《国闻周报》第8卷第45期（1931年11月16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80) 《陈铭枢昨晨抵沪解释误会》，《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

(181) 《解决四全会办法》，《时事新报》，1931年11月7日。

(182)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微酉电》（1931年11月5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090。

(183) 《非常会议致胡汉民等电》（1931年11月5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184)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03。

(185) 《张继蔡元培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655。

(186)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87)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6日条，第245页。

(188)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六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89)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七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90)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91)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批语》（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92)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本密冬电》（1931年11月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500。

(193)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31年编印，第12页；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4页。

(194)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临时全体会议决议

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号》，1931年11月），第2598页。

(195)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86页。

(196) 蒋介石：《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1931年11月12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48、153页。

(197) 《省克记》第4卷，1931年11月12日条，“蒋档”。

(19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54页。

(199) 《对于蒋中正同志代表主席团提议团结御侮办法之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第2451页。

(200) 《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3 - 2465页。

(201)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

(202) 《粤局侧面观》，《大公报》，1931年6月2日。

(20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8页。

(204) 《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会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7页。

(205) 《林云陔就粤省主席条件》，《大公报》，1931年6月8日。

(206) 陈公博：《苦笑录》，第256页。

(207)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208) 阚宗骅：《陈济堂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年编印，第4页。

(209)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210)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问》，《粤变文件汇编》，第21页。

(211)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52页。

(212)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80页。

(213)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25页。

(214) 《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1931年10月1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6页。

(215)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216)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0页。

(217)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9页。

(218) 《朱培德致黄蘅秋转汪精卫密电》（1931年10月1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6页。

(219) 《陈铭枢为与汪精卫会谈完满拟赴沪汇报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7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2页。

(220) 《胡汉民致协之（陈融）电稿》（1931年10月30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21) 《汪精卫致民报函》，《时事新报》，1931年11月2日。

(222) 孟曦：《从“非常会议”到“宁粤对峙”》，《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8页。

(223) 《南京汤执中致开封张钫支电》（1931年11月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713。

(224) 《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9日，第793页。

(225)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酉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18。

(226) 《陈铭枢致蒋介石虞酉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79。

(227) 《何应钦致蒋介石虞戌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69。宁粤上海和谈通电原文见《国闻周报》之《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228)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9日，第789页。

(229) 《陈策张惠长陈庆云致胡汉民函》（1931年11月15日），《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胡”251；另见《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档案号“胡”86。

(230) 一志：《敦促胡汪两先生返粤运动》，《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1页。

(231) 《覃振致汪精卫电》（1931年11月9日），《档案与历史》，上海市档案馆编印，1988年第1期，第52页。

(232) 《阎锡山致上海赵芷青成密青电》（1931年11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08。

(233) 《阎锡山复绥远王军长圃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92。

(234)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7页。

(235) 《粤四全会昨开会》，《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0日。

(236) 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9页。

(237)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93。

(238) 《反蒋运动史》下，第479页；《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

(239) 《孙等昨已离港赴澳》，《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

(240)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09。

(241)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9页；《粤局昨忽见严重》，《时事新报》1931年12月7日。

(242)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59。

(243) 《萧邓欲倒行逆施》，《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

(244)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08。

(245) 《汪精卫致阎锡山国密感电》（1931年11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0。

(246)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3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766。

(247)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48)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7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013。

(249) 《京粤和平益趋乐观》，《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日。

(250) 《陈铭枢致蒋介石俭未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40。

(251) 据陈铭枢报告：“胡顷电汪云：我因吊古，即赴省。吊毕，即返港。我拉孙去，孙不肯去。”《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52) 《胡汉民伍朝枢致四全大会主席团函》（1931年11月29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钢笔原件，档案号“胡”314；《民国日报》曾简单登载该函三条原则，《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

(253) 《粤纠纷解决》，《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

(254)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设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31。

(255) 《粤四全选出执监委》，《民国日报》，1931年12月5日。

(256)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歌电》（1931年12月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529。

(257) 《粤会演武剧》，《民国日报》，1931年12月4日。

(258) 《反蒋运动史》下，第490页。

(259) 《上海汪精卫致阎锡山现密筱电》（1931年11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15－6。

(260) 《阎锡山复上海汪精卫共密皓电》（1931年11月19日），《宁粤

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15。

(261) 《宋子文到沪访汪》，《申报》，1931年11月24日。

(262) 11月17日，张发奎曾以第四军军长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愿率所部“助马占山共制强敌死命，保我东三省一片干净土”。《时事新报》，1931年11月18日。

(263) 《汪精卫愿随第四军援黑》，《大公报》，1931年11月26日。

(264)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93。

(265) 《退席代表曾仲鸣等百余人前昨已分批抵沪》，《时事新报》，1931年12月3日。

(266) 《粤四全会退席代表发出通电两通》，《申报》，1931年11月28日。

(267)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883。

(268) 《天津艳日特讯》（1931年11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28。

(269)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44。

(270)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71) 《上海汪精卫先生努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5－6。

(272)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设密陷电》（1931年11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4－5。

(273)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现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7。

(274)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75)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

(276) 《在沪举十人》，《国闻周报》第8卷第48期（1931年12月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277)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

(278) 陈公博：《苦笑录》，第267页。

(279) 《省克记》第4卷，1931年11月12日条，“蒋档”。

(280) 《困勉记》第19卷，1931年11月12日条，“蒋档”。

(28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6日；另见《困勉记》第19卷，“蒋档”。

(28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53页。

(283)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548。

(284) 《陈铭枢致蒋介石皓午电》（1931年11月19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00。

(285) 《李石曾致吴稚晖张静江电》（1931年1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抄件，档案号“吴”字05897。

(286)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8日。有趣的是此时阎锡山对蒋介石北上的看法，竟同黄郛一致。当阎得知蒋放弃北上的消息后，曾电汪精卫表示：“蒋北上正虑激动日人蛮横，缓来甚好。”《复上海汪精卫先生作密勘电》（1931年11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2。

(287) 《上海贾秘书长设密艳三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480。

(28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93页。

(289)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24日条，第413页。

(290) 《粤方致汪鱼电》（1931年12月6日），《反蒋运动史》下，第505页；汪精卫得电后即将该电转何应钦等人，由何等转报蒋介石，〈何应钦陈铭枢致蒋介石佳巳电〉（1931年12月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

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4198。

(291) 《蒋主席致张群十二月微电》（1931年12月5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292)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阳电》（1931年12月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535－7。

(293) 《上海汪精卫先生建密青电》（1931年12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35。

(29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页。

(29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447页。

(296) 《孙科等昨日到沪有重要聚会》，《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1日。

(297)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29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1日；另见《困勉记》第20卷，“蒋档”。蒋介石在前一晚（10日）与宁方干部会商后，就曾对何应钦的表现极端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敬之到紧要关头，彼必毫不负责，而且怨恨无权，此为最可耻之事也。”另见《困勉记》第20卷，“蒋档”。

(299) 《李石曾致吴稚晖电》（1931年12月1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译件，档案号“吴”字05970。

(300)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2日条，第457页。

(30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另见《困勉记》第20卷20，“蒋档”。

(302) 《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303)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04) 《胡汉民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12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305)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06) 《冯玉祥致胡展堂电》（1931年12月15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307)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16日，第548页。

(30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8页。

(309) 《反蒋运动史》下，第507页。

(3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59 - 160页。

(3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59 - 160页。

(312)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13)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批语》（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14) 《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6日。

(315)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5日条，第460页。

(316)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2月6日；另见《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60页。

(317) 《蒋公电各总指挥军师长十二月铣电》（1931年12月1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1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另见《省克记》第5卷，“蒋档”。

(319) 《反蒋运动史》，第511 - 512页。

(320)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6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4347。

(321) 《汪精卫表示必争》，《国闻周报》，第8卷第49期（1931年12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反蒋运动史》，第503页。

(32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6。

(323)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8日条，第467页。

(324) 《十九日谈话会》，《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25) 《太原曹世振致阎锡山静密删电》（1931年12月15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52－3。

(326) 《上海号转胡展堂先生致冯玉祥阎锡山四密巧电》（1931年12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72－3。

(327) 《上海汪先生致阎锡山四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86－7。

(328) 《阎锡山冯玉祥刘守中赵戴文致上海转胡展堂汪精卫四密漾电》（1931年12月2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78。

(329) 《太原冯焕章等致阎锡山静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81。

(330) 《上海煜如致阎锡山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660。

(331) 《蒋委员遽鸣高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3日。

(332) 《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5页。

(33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革命文献》第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443页。

(33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7页。

(335)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7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2／52。

(336) 《决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并推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2625页。

(337) 《推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页。

(338) 谭延闿去逝后，中常委遗缺由朱培德补任，参阅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47页。

(339) 《国民政府公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第6 - 7页。

(340)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35页。

(341) 《蒋中正电宋子文军费应如期发放切勿拖延》（1931年12月16日），《筹笔》第62册，“蒋档”，档案号04 - 0542。

(342) 《宋子文签发支付命令》，《申报》，1931年12月24日。

(343) 《宋子文辞呈昨送达行政院》，《申报》，1931年12月22日。

(344) 《胡汉民致孙科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0页。

(34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12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 / 0779。

(346)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22.49-6。

(347)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22.49-6。

(348)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43页。

(34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9日，第820页。

(350)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22.48-7。

(35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7日），《第四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 - 15次）》，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 / 1。

(35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 / 2047；《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8页。

(353) 《汪孙阻粤多设机关》，《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

(354)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355)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93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6日。

(356)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357) 《陈铭枢电促胡汪蒋》，《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

(358) 《孙科致蒋介石冬亥电》（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9 - 10页。

(359) 《孙院长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

(360) 《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页。

(361) 《天津灰日特讯》（1932年1月1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 / 2049。

(362) 《蒋介石致陈果夫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0页。

(363) 《蒋中正电宋子文缓来奉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1932年1月9日），《筹笔》第63册，“蒋档”，档案号04 - 0599。

(364) 《南京刘峙致南昌朱绍良有电》（1931年12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 / 2043。

(365) 《蒋介石致张治中电》、《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1月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页。

(366) 《汪精卫盼蒋胡入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

(367)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2日，第821页。

(368)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0日，第559页。

(369)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 / 2048。

(370) 《孙科迎汪于右任迎胡》，《大公报》，1932年1月10日。

(371) 《孙电胡汉民》，《申报》，1932年1月11日。

(372) 《孙科重要谈话》，《申报》，1932年1月10日。

(373)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0日，第820页。

(37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4页。

(375) 《胡仍无意入京》，《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

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2年1月18日），第6页。

(376) 《上海会谈情形》，《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77) 《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39、53页。

(378) 《陈铭枢回忆录》，第89页。

(379)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2年1月15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42页。

(380) 《公债风潮记》，《大公报》，1932年1月18日。

(381) 《蒋中正电刘峙无出山理由念旧部属饥寒中央如无法给养在中央税收借支》（1932年1月15日），《筹笔》第63册，“蒋档”，档案号04－0616。

(382) 《孙科返京前谈话》，《申报》，1932年1月1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2页。

(38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第8页。

(384)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2，p．101．

(385)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第92页。

(386)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38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第8页。

(38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7页。

(389) 《黄汉梁上国民政府呈》，《申报》，1932年1月14日。

(390) 《公债风潮有转圜》，《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

(391) 《银界允协助办法尚未定》，《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

(392) 《张群谈话》，《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

(393)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6日，第401页。

(39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第9页。

(3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64页。

(396) 《张继谈盼粤方取消特种组织》，《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

(397) 《陈铭枢回忆录》，第95页。

(398) 《汪精卫昨赴杭晤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

(399)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7日，第401页。

(400) 《致孙哲生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

(401) 《致胡展堂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

(402)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53页。

(403) 《孙何飞杭烟霞洞商谈大政》，《大公报》，1932年1月19日。

(404)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8日条，第54页。

(405)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406) 《孙科飞杭敦促汪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9日。

(407)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408) 《胡复汪铣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

(409)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1934年版，第644－645页。

(410) 《天津养日特讯》（1932年1月2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953。

(41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412) 《汪蒋到京后昨午开谈话会》，《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

(413)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2日条，第66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65页。

(414)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4日，第72页。

(41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1。

(416) 《中常会慰留孙科》，《中央日报》，1932年1月27日。

(417)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6日，第80－81页。

(418) 《蒋中正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即入京相商》（1932年1月27日），《筹笔》第63册，“蒋档”，档案号04－0627。

(4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1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7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7。

(420)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0、31日，第1张第4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9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7。

(421)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0日；另见《困勉记》第21卷，“蒋档”。

(422) 《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页。

(423) 该日会议并决定：“本日各种决议案均不发表。”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3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3月14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7。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陈诚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

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各部会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蒋中正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阎锡山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台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抄件，北京

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馆藏资料，台北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湖南省档案馆藏，长沙

《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中文著作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贾廷诗等，台北，1989

《北伐后之各派思潮》，司马仙岛著，北平，鹰山社出版部，1930

《北洋军阀》，章伯锋主编，武汉出版社，1990

《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长沙，1929

《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

《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台北“国史馆”，2006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北“国史馆”，2007

《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成败之鉴》，陈立夫，台北，正中书局，1994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

《德国外交档案——1928至1938年之中德关系》，郭恒钰、罗

梅君主编，许琳菲、孙善豪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

《邓小平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德良等主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出版地不详，1986

《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出版地不详，1934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军务》，民国史料编辑社，出版地不详，1933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沈云龙、谢文孙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州，1984

《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胡汉民，上海，民智书局，1932

《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1989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南京，1931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张同新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刘维开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南昌行营，南昌，1934

《国民政府外交史》，洪钧培著，上海，华通书局，1930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南京，1931

《国民会议丛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杭州，1931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南京，1931

《寒风集》甲篇，陈公博著，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胡汉民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

《胡汉民先生遗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台北，中华书局，1978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先导社，广州，1934

《湖南省政府政治报告》，湖南省政府秘书处，长沙，1931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

《回顾录》，邹鲁著，台北，三民书局，1976

《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3 - 2007

《蒋作宾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南昌，1986

《剿匪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7

《济南五三惨案》，蒋永敬编，台北，正中书局，1978

《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陈进金著，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

《记者生涯五十年》，金雄白著，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今日之县政》，陈冰伯著，出版地不详，同文图书公司，1933

《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林泉编，台北，正中书局，1983

《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

《考试院工作报告》，国民政府考试院编，南京，1935

《苦笑录》，陈公博，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 193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廖仲恺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立法院第一第二两周年立法工作概况》，立法院秘书处编，南京，1930

《李烈钧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

《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刘茂恩回忆录》，台北，学生书局，1996

《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王养冲主编，广州，中兴学会，1935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2

《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年谱（1893 - 1949）》，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福建，1981

《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北京，中央档案馆编，1984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南京，1935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民国史纪事本末》，魏宏运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编，香港，龙门书局，1965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民国政制史》，钱端升，上海书店，1989

《墨三九十自述》，顾祝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宁都起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宁夏三马》，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内政年鉴》，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 - 1928）》，［美］伯纳德·科尔著、高志凯等译，重庆出版社，1986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王养冲主编，广州，中兴学会，1935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7

《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双照楼诗词稿》，汪兆铭著，上海，民信公司，1930

《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京师警察厅编，北京，1928

《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北京，1957

《孙哲生先生年谱》，孙哲生学术出版基金编，台北，正中书局，1990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986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

《汪精卫集》，上海，光明书局，1930

《汪精卫先生传》，雷鸣著，上海，政治月刊社，1944

《王若飞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

《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广州，1931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

国文史出版社，2002

《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张令澳著，台北，周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5

《我的回忆》，刘峙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五十回忆》，黄绍竑著，长沙，岳麓书社，1999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

《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湘鄂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出版地不详，1985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主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新疆风暴七十年》，张大军著，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石印本，出版地、时间不详

《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出版地不详，1990

《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出版地不详，1930

《雪三文集》，李雪三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阎伯川先生感想录》，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1997

《杨永泰先生言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杨增新在新疆》，李信成著，台北“国史馆”，1993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9

《粤变资料汇编》，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广州，1931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张学良年谱》，张友坤、钱进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张学良文集》，周毅等主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9

《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浙江之二五减租》，洪瑞坚著，南京，正中书局，1936

《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陈少书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政坛回忆》，程思远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保甲制度》，闻钧天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台北，1993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南昌，193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现代史料拾遗》，桂崇基著，台北，中华书局，1989

《中国政府》第1册，陈之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郭廷以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994

《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上海，正中书局，1948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 - 1931）》，程道德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徐曰彪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10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刘文辉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

《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

《邹鲁全集》，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台北，三民书局，1976

中文报刊

《大公报》，天津

《红色中华》，瑞金

《华字日报》，香港

《京报》，北平

《民国日报》，上海、汉口、广州

《人民日报》，福州

《申报》，上海

《盛京时报》，沈阳

《时事新报》，上海

《新晨报》，北平

《新闻报》，上海

《益世报》，北平

《中央日报》，上海、南京

《布尔什维克》，上海

《春秋》，香港

《档案与历史》，上海

《地方自治》，南京

《东方杂志》，上海

《独立评论》，北平

《汗血月刊》，南京

《革命评论》，南京

《国民政府公报》，南京

《国闻周报》，上海

《火炉》，红七军政治部

《军政旬刊》，南昌

《江西党史资料》，南昌

《近代史研究》，北京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立法专刊》，南京

《历史档案》，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民友》，上海

《青年实话》，瑞金

《人事行政》，重庆

《三民主义月刊》，广州

《生活周刊》，上海

《市政半月刊》，南昌

《时代公论》，南京

《史学月刊》，开封

《外交部公报》，南京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西北史地》，西安

《西路军公报》，长沙

《新月》，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云南省政府公报》，昆明

《浙江档案》，杭州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瑞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

《中央周报》，南京

《中央半月刊》，南京

《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中央导报》，南京

《传记文学》，台北

日文书目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外务省編纂，東京，原書房，1985

《日本外交史》第17、18卷，鹿島平和研究所，東京，1973

《石原莞爾資料·国防論策篇》，角田順編，東京，原書房，1978

《外交五十年》，幣原喜重郎，東京，読売新聞社，1951

英文书目

Chan，F．Gilbert，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Westview Press，Boulder，Colorado，1980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Bookman Associates，New York，1952

Charles，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8

Ch'i His-sheng ,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 *1931-1945*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n Arbor , 1982

Ch'ien Tuan-sheng ,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 *1912-1949*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1950

Eastman , Lloyd E . ,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 *China Under-Nationalist Rule* , *1927-1937*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1974

Esherick J , ed . ,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 *1900-1950*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onolulu , 2000

Fairbank , John K Fairbank ,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 12 , 13 :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1983

Kirby , William C . ,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nford , California , 1984

Lary , Diana , *Region and nation* :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 *1925-1937*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1974

Nathan , Andrew J . , *Peking Politics* , *1918-1923* :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rkeley , California , 1976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 1926 , Vol . 1 , 1929 , Vol . 1 , 2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D．C．，1941，1943

Sheridan，James E．，*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66

Skinner，George Willia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7

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199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London，1930

Thomson，James C．，*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9

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2

Yeh 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0

Young，Arthur N．，*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1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安俊才

B

白崇禧

白国庆

白健生　见白崇禧

白瑞安（Briand）

白云梯

柏文蔚

班　禅

板垣征四郎

浜口雄幸

鲍观澄

鲍文樾

北一辉

币原喜重郎

博　古　见秦邦宪

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

布里斯托（Mark L．Bristol）

布留赫尔（В．К．Блюхер）

C

蔡和森

蔡孑民　见蔡元培

蔡廷锴

蔡元培

蔡运陞

曹世振

曹万顺

柴乔松

常荫槐

车鸣翼

陈　策

陈　诚

陈　融

陈　毅

陈　云

陈璧君

陈伯南　见陈济棠

陈布雷

陈昌浩

陈调元

陈公博

陈珪章

陈果夫

陈豪人

陈鸿文

陈济棠

陈继承

陈继善

陈剑如

陈炯明

陈立夫

陈铭枢

陈渠珍

陈少书

陈绍宽

陈书农

陈树人

陈维远

陈耀垣

陈友仁

陈章甫

陈真如　见陈铭枢

陈中孚

陈琢如

程　潜

程汝怀

程天放

池峰城

重光葵

褚玉璞

床次竹二郎

D

大川周明

戴　戟

戴传贤　见戴季陶

戴季陶

戴愧生

戴天民

戴伟士（John K．Davis）

德留蒙（E．Drummond）

邓　英

邓宝珊

邓长庚

邓崇熙

邓飞黄

邓青阳

邓世增

邓锡侯

邓小平

邓演达

邓泽如

邓召荫

邓真德

邓子恢

丁　超

丁惟汾

董振堂

杜洛斯基　见托洛茨基

段德昌

段月泉

E

恩克巴图

F

樊筠青

樊崧甫

樊耀南

樊钟秀

范其光

范绍曾

范石生

范熙绩

范予遂

方本仁

方鼎英

方耀庭　见方本仁

方永昌

方振武

方志敏

芳泽谦吉

封赫鲁

酆　悌

冯焕章　见冯玉祥

冯钦哉

冯少山

冯轶裴

冯玉祥

冯治安

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

福田彦助

傅秉常

傅汝霖

傅作义

富双英

G

甘乃光

高　斯（Clarence E．Gauss）

高桂滋

高纪毅

高敬亭

高凌百

高树勋

高维岳

高荫槐

高振邦

葛敬恩

公秉藩

龚　浩

龚饮冰

古湘芹（勤）　见古应芬

古应芬

顾孟馀

顾墨三　见顾祝同

顾顺章

顾维钧

顾祝同

关树人

关素人

关玉衡

广田弘毅

郭　同

郭春涛

郭滴人

郭华宗

郭化若

郭汝栋

郭泰祺

H

韩德勤

韩复榘

韩光第

韩麟春

郝梦龄

何　键

何　廉

何成濬

何杰才

何敬之　见何应钦

何民魂

何千里

何香凝

何应钦

贺　昌

贺　龙

贺国光

贺耀组

亨贝克（Stanley K．Hornbeck）

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

洪汉杰

洪兆麟

侯之担

胡　适

胡　瑛

胡汉民

胡若愚

胡逸民

胡毓坤

胡展堂　见胡汉民

胡竹笙

胡宗铎

胡宗南

胡祖玉

荒木贞夫

黄　道

黄　郛

黄　平

黄　权

黄　隐

黄道彬

黄公度

黄公略

黄汉梁

黄汉瑞

黄季陆

黄慕松

黄少谷

黄绍竑

黄显声

黄旭初

黄镇球

黄中岳

J

吉鸿昌

吉田伊三郎

汲金纯

戢翼翘

季　方

季振同

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

贾景德

江国璠

蒋伯诚

蒋鼎文

蒋光鼐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廷黻

蒋雨岩　见蒋作宾

蒋在珍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作宾

金鼎臣

金汉鼎

金利三

金树仁

金问泗

经亨颐

居　正

瞿秋白

K

凯洛格（Frank B．Kellogg）

康　生

柯立芝（J．C．Coolidge）

克宁翰（E．S．Cunningham）

孔　庚

孔　明

孔　子

孔繁蔚

孔祥熙

孔昭焱

库库林（Кукунин）

L

赖心辉

蓝普森（Miles W．Lampson）

雷经天

雷中田

冷熏南

李　杜

李　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Lytton）

李　溶

李　燊

李　忻

李抱冰

李超时

李朝芳

李朝杰

李德辉

李德邻　见李宗仁

李德全

李汉魂

李纪才

李际春

李济深

李家钰

李立三

李烈钧

李明瑞

李明志

李鸣钟

李品仙

李任潮　见李济深

李韶九

李石曾

李寿庸

李书城

李惕乾

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

李文范

李锡九

李选廷

李扬敬

李月峰

李云杰

李韫珩

李振唐

李仲公

李竹声

李宗仁

厉式鼎

梁朝玑

梁冠英

梁寒操

梁汝舟

梁忠甲

廖　磊

廖武郎

林　彪

林　虎

林　森

林　蔚

林久治郎

林权助

林瑞笙

林翼中

林云陔

林植夫

林祖涵

刘　光

刘　骥

刘　湘

刘　兴

刘　哲

刘　峙

刘成勋

刘春霖

刘春荣

刘纯一

刘存厚

刘风竹

刘甫澄　见刘湘

刘桂堂

刘和鼎

刘黑七

刘纪文

刘建绪

刘芦隐

刘茂恩

刘乃藩

刘汝明

刘瑞恒

刘尚清

刘少奇

刘士奇

刘士毅

刘守中

刘叔模

刘维炽

刘文岛

刘文辉

刘文龙

刘熙众

刘耀扬

刘郁芬

刘煜生

刘珍年

刘振邦

刘震寰

刘镇华

刘正富

刘志丹

刘志陆

刘自乾　见刘文辉

龙　鼎

龙　云

卢　汉

卢　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卢福坦

卢兴邦

鲁大昌

鲁涤平

鲁效祖

鹿钟麟

路孝忱

路友宇

吕　超

吕焕炎

吕荣寰

罗　霖

罗炳辉

罗藩瀛

罗家伦

罗隆基

罗明纳兹（В．В．Ломинадзе）

罗绮园

罗文幹

罗泽洲

罗卓英

洛　甫　见张闻天

M

马　昆

马　麟

马　谡

马步芳

马超俊

马福祥

马鸿宾

马鸿逵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马文车

马洗凡

马占山

麦朝枢

麦焕章

毛邦初

毛炳文

毛光翔

毛泽东

茅祖权

梅　兹（Sir Frederick William Maze）

梅里尼可夫（Б．Н．Мельников）

梅哲之

门炳岳

孟　坤

孟　子

米　夫（П．А．Миф）

米春霖

敏珠尔哈图克图

缪定保

缪培南

莫德惠

木村锐市

N

南次郎

聂　耳

聂嘉夫

聂荣臻

钮永建

O

欧阳驹

P

潘公展

潘文华

潘宜之

潘云超

潘忠汝

庞炳勋

彭德怀

彭汉章

Q

漆　英

齐　叙

钱昌照

钱承德

钱大钧

钱慕尹　见钱大钧

秦邦宪

覃　振

邱　文

犬养毅

R

任应岐

荣　臻

阮　勋

阮德炳

阮肇昌

若槻礼次郎

S

山本条太郎

商　震

上官云相

少正卯

邵力子

邵式平

邵元冲

沈鸿烈

沈君怡

沈松林

沈泽民

施存统

施肇基

石汉章　见石友三

石敬亭

石青阳

石友三

史丹林　见斯大林

史汀生（Henry L．Stimson）

矢田七太郎

矢野真

司马桑敦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松井石根

宋美龄

宋庆龄

宋渊源

宋哲元

宋子文

孙　楚

孙　渡

孙　科

孙长胜

孙传芳

孙大章

孙殿英

孙鹤皋

孙连仲

孙良诚

孙桐萱

孙蔚如

孙逸仙　见孙中山

孙哲生　见孙科

孙中山

T

谭道源

谭克敏

谭平山

谭延闿

谭组庵　见谭延闿

汤阁丞　见汤玉麟

汤玉麟

唐　澍

唐继麟

唐继尧

唐继虞

唐孟潇　见唐生智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式遵

陶　钧

滕代远

田　桐

田代重德

田金凯

田颂尧

田中义一

童冠贤

头山满

屠文沛

土肥原贤二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万福麟

万选才

万耀煌

汪精卫

汪兆铭　见汪精卫

王　均

王　明

王　琦

王　太

王葆真

王伯群

王宠惠

王恩贵

王尔琢

王法勤

王冠英

王季绪

王家烈

王家桢

王捷俊

王金钰

王荩仁

王昆仑

王乐平

王亮畴　见王宠惠

王懋功

王乃昌

王庆龙

王绍文

王世和

王世杰

王树常

王树翰

王天培

王廷翰

王以哲

王毅民

王尹西

王应榆

王芸生

王缵绪

王泽民

王正廷

王之佐

危宿钟

韦拔群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道明

魏凤楼

魏书香

魏益三

闻承烈

闻一多

吴　尚

吴光治

吴佩孚

吴奇伟

吴尚鹰

吴思豫

吴泰来

吴铁城

吴行光

吴醒亚

吴稚晖

吴忠信

吴子玉　见吴佩孚

伍朝枢

伍廷飏

武和轩

武庭麟

X

西门诺夫斯基（Семеновский）

熙　洽

夏　威

夏斗寅

夏首勋

夏维崧

香翰屏

向传义

向忠发

项　英

项雄霄

萧佛成

萧希贤

小矶国昭

谢　持

谢　珂

谢文炳

谢子长

邢士廉

熊　斌

熊式辉

熊正平

徐　谦

徐承熙

徐景唐

徐朋云

徐声钰

徐世昌

徐向前

徐旭生

徐永昌

徐源泉

徐之赞

徐祖贻

许　琨

许崇智

许克祥

许锡清

许孝炎

许宗武

萱野长知

薛　岳

薛笃弼

Y

严　重

阎百川　见阎锡山

阎锡山

阎毓善

杨　虎

杨　杰

杨　森

杨爱源

杨畅卿　见杨永泰

杨光华

杨虎城

杨绩荪

杨匏安

杨如轩

杨胜治

杨树庄

杨腾辉

杨希闵

杨效欧

杨杏佛

杨永泰

杨宇霆

杨增新

姚　钰

姚禔昌

叶　举

叶　琪

叶楚伧

叶恭绰

易培基

尹承纲

尹扶一

犹国材

于　珍

于能模

于世铭

于学忠

于右任

于芷山

余　鹏

余汉谋

俞作柏

俞作豫

虞洽卿

袁　良

袁德生

袁金铠

袁世凯

袁文才

袁振青

袁祖铭

岳维峻

恽代英

Z

臧式毅

曾　山

曾扩情

曾养甫

曾仲鸣

翟文选

张　璧

张　冲

张　弧

张　继

张　骏

张　群

张　文

张　贞

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张鼎丞

张发奎

张凤春

张辅丞　见张作相

张国焘

张海鹏

张汉卿　见张学良

张辉瓒

张惠长

张景惠

张静江

张静愚

张开琏

张难先

张品哲

张其宽

张企留

张启龙

张人杰　见张静江

张人杰（西北军）

张汝骥

张寿镛

张同礼

张维玺

张文白　见张治中

张闻天

张向华　见张发奎

张叙五　见张景惠

张学良

张义纯

张荫梧

张与仁

张岳军　见张群

张云逸

张允荣

张正地

张之江

张知本

张治中

张自忠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章伯钧

赵博生

赵戴文

赵登禹

赵观涛

赵淼川

赵丕廉

哲布尊丹巴

郑　谦

郑大伟

郑大章

郑介民

郑俊彦

中村震太郎

钟少梅

钟天心

周　斓

周　磊

周　磐

周恩来

周凤歧

周鲠生

周龙光

周伟黄

周西成

周一志

周逸群

周震鳞

周志群

周钟岳

周作民

朱　德

朱　旭

朱　志

朱光沐

朱霁青

朱家骅

朱履龢

朱培德

朱绍良

朱绍阳

朱武彝

朱益之　见朱培德

祝祥本

邹　鲁

佐分利贞男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上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上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内容起自1932年淞沪抗战，迄至1937年“七七”事变，共计五年半时间。主要叙述这一阶段的民国政治、军事与外交，也涉及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及科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和东北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1932年初，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并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又在上海挑起战争，布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此时正值宁粤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与蒋介石联合执政。鉴于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又是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不愿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获得蒋介石的赞同，对十九路军抗战给予了支持，随后派第五军参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同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不使战争持久扩大，又积极谋求妥协。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举行上海停战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即日本便如愿以偿地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在“一二八”抗战前，国民党即先后发动了三次“剿共”战争。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强调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对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和十九路军做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将他们视为反动的反革命的军阀势力，没有能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去了联合抗日的机会。而国民党更视中共为心腹之患，淞沪抗战一结束，立即调集军力进行第四次“剿共”战争。

日本早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3月进占热河，进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守军在

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战，予以重创。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指导，长城抗战最终未能坚持，而与日本签订了妥协屈辱的《塘沽协定》。

1935年日军越过长城，开始入侵华北，制造事端，挑起冲突，迫使国民党认可了后来日本所指称的“何梅协定”，并签订了《秦土协定》。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从此大大削弱，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紧接着，日本便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此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内部，除了汪精卫等极少数亲日派分子主张继续“忍辱求全”，妥协退让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领导人物都采取了较强硬的立场，迫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华北事变向中国人民再次敲响了警钟，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处于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沉痛呼声，为挽救危亡而奋起救国，发起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上海知识界人士也发起救国运动，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们发表救国宣言，痛切地指出：“‘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肩负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1936年1月28日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大学教授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又与全国各地的救亡组织联系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会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从此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被压制后的沉寂状态，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30年代初，蒋介石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了中

国后，总揽兵权，控制全局，“创造了全盛的军事时代”。1933年，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抗日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和黄琪翔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的事变，但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压力下，很快归于失败。1936年，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保存其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同时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又打着“出兵抗日”的旗号，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旋被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所挫败。

1932年—1933年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苏区的战争失败后，接着又倾全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暂时取得了胜利，红军经历长征艰辛退处西北一隅。由于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进一步上升，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抗日倾向增长，对日外交趋向强硬，并有效地抗击了日本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其“安内攘外”的政策有所淡化，但并没有完全放弃。1936年11月，正当上海救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进行镇压，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等七人，投入苏州狱中，是为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特别是华北事变后，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影响到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和高级将领政治态度的改变，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就具有典型意义。张学良1934年从欧洲回国后，接受了蒋介石“剿共”的任务。但他在两年多的“剿共”内战中一再失利，损兵折将，开始省悟到追随蒋继续进行内战，不但于国不利，对自己也没有出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终于由“安内攘外”政策的拥护者，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他暗中与中共和红军进行联络。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诤谏，恳请他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申斥拒绝后，终于被“逼上

梁山”，联合杨虎城走上了兵谏的道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无疑对蒋介石也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因而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并保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释放爱国领袖，西安事变因此得以和平解决。接着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对日政策等问题。和平统一，抗日救国，开放民众运动，实行民主宪政，聚集人才，保护救国运动，成为与会中委们的共识和一致呼声；并做出了相应的有关决议，显示出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意向。此次全会是国民党内外政策基本转变的开始，标志着国民党已从十年内战、独裁和对日妥协，开始转向联合中共及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走共同抗战的道路。

然而，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国民党虽已开始由内战向抗战方面的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继续采取压制迫害的政策。国民党没有完全履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几项承诺，反而扣押了送蒋回京的张学良，准备向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并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提起公诉，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又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定罪。

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格局的上述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政局的转变。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国共两党代表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1936年下半年中共开始放弃反蒋的方针，由“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周恩来等前往调解，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内战，起了重大作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争取实现停止内战，促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迅速对日作战，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定为国

策；并相应作了重大的让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力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等四项保证。此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商谈便积极进行，并于抗战爆发后不久达成合作协议。与此同时，中苏也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蒋介石的干预下，“七君子”也被保释出狱。这样就在政治上为实现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对日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国民政府为了稳固政权，在其成立的头十年特别是后六七年中，在财政、金融和经济以及教育、科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在财政金融方面，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关税方面进行改革，实施海关行政改革和关税自主政策。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市场，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33年重订的第三个国定税则，对国内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械、机具、化学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货物维持低税率，而对于洋货轻工业品则实行高关税，更进一步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口关税的提高，相应缩小了中国的外贸逆差。关税收入的增加，使政府财政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改革税制，为废除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提供了财政基础和物质条件。

国民政府整理货币与废两改元的实施，是中国币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既起到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又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为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1935年实施的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金融史上的重大变革，对坚持抗战起了保证作用。实施法币政策后，经济形势大为好转。

国民政府为了发展经济，1935年设立资源委员会，进行工业建设；1936年创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公路建设、水利建设、农业建设、棉业统制、蚕丝改良及卫生设施六个方面的工作成

绩较为显著。在发展国营经济，加强军工方面的建设，增强国防实力的同时，从清理整顿与奖励两方面扶持民营企业，对工业生产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工业生产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发展。

由于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与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工业、商业、农业较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势头，不幸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破坏了。

为了改变我国教育和科学落后的状况，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增强国力，以抗御外侮，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也给予较大的关注。国民政府把推进最低限度之教育，提高全国基本文化水平，作为发展教育的重点，教育主管部门对初等教育给予较多重视，在30年代初中期发展较快。对普通中学则主要着力于巩固、整顿、提高。职业教育则是发展最快的教育门类。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民间涌现了一种倡导乡村教育的潮流，一些教育家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巩固、整顿的方针，发展速度缓慢，远远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连年战乱，军费开支浩大，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困扰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在经费异常支绌的情况下，筚路蓝缕，开拓前进，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它使我国科学逐渐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达到世界水平；并且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不少人才。除中央研究院外，还成立有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但是，由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水平总体说还是落后的。

本卷由于撰写人员的流动和其他任务诸原因，从拟订提纲，收集

材料到完成书稿，时间前后共历八年。在此期间，著者利用海峡两岸整理出版的有关资料，翻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和部分外文资料，以及相当一部分尚未公布的档案、日记和回忆录。并吸收了现有的某些研究成果，力求写得比较符合历史真实。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卷编写的各人分担章节如下：

周天度　前言

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与张北根合作）

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

第七章第一节第五目

第八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郑则民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章第三节第一目

齐福霖　第一章第七节

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十章

李义彬　第五章第五节

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三目、第四节

第七章（其中第一节第五目为周天度所写）

第八章第四节

董长芝　第九章

黄道炫　第十一章

张北根　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与周天度合作）

第六章第三节第二目

本卷由周天度主编。提纲初稿为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共同草拟。在编写过程中周天度对部分章节提纲做了较多的增减变动；初稿写成后，又对全书做了文字加工修改，统一体例，核对部分史实，改正了其中某些差错，补充了个别材料，并最后定稿。王述曾看了大部分初稿。李新审阅了全书。郑则民前期做了组织工作，看了部分章节初稿。王士花翻译了部分日文资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碧辉协助抄录了上海公安局档案资料。香港中国文化史研究所郑会欣博士帮助复印了当地1935年《中兴报》资料，并核对了《明报》上所载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材料。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水羽信男复印了部分日文资料。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领导和图书资料室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还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宣部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大连市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及档案室、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国史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对本书写作予以支持。中华书局的领导对本书的编辑出版多有贡献，特别是陈铮先生仔细审阅书稿，提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阴谋
　　一　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
　　二　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三　“日僧事件”
　　四　日海军与陆军争功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二　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第三节　淞沪抗战经过
　　一　闸北抗战
　　二　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三　吴淞之战
　　四　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五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六　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七　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第四节　英美等国的调停及上海停战谈判
　　一　英美等国的调停
　　二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第五节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与国难会议的召开
　　一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二　国难会议的召开
　第六节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第七节　伪满洲国的建立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　关东军的“建国运动”
二　伪满洲国的成立
三　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四　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五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一节　长城抗战
一　日军侵占热河
二　长城抗战
三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第二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
一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三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第三节　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纷争
一　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
二　韩复榘与刘珍年之战
三　四川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四　新疆政变，盛世才统治的确立
第四节　福建事变
一　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二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三　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福建事变的失败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第一节　军事独裁体制的确立
一　蒋介石总揽兵权，控制全局
二　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建制与征兵制的实行
三　保安队和民团的编组训练
第二节　保甲制度与特务组织的建立
一　保甲制度的内容和实施

二　“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形成及其活动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
第一节　对鄂豫皖、湘鄂西和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一　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进占
二　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第二节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和追堵红军长征
一　第五次军事“围剿”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二　追堵红军长征
第三节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一　文化专制与尊孔复古
二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第四节　新生活运动
一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
二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实质
三　新生活运动的实施
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一节　1935年的国际环境
一　法西斯侵略的加紧
二　日本侵华政策新方案的确定
第二节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一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
二　华北“自治”事件
三　内蒙“自治”运动
第三节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二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三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第四节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和颁布
一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
二　“五五宪草”述评

第五节　联苏联德制日方针
一　中苏复交
二　中苏代表会谈
三　联德外交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阴谋

一　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一二八”事变，发动侵略中国上海的战争，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争，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远因为东北事件。盖国民哀东北之沦亡，起而作杯葛运动，以经济绝交促暴日军阀之觉悟，弱小民族之心理，亦可悲矣。上海为中国之最大商埠，我国经济之重心地也，杯葛运动一足以号召全国，再则足以制岛国人民之死命”[(1)]。“故日人处心积虑，欲谋取缔我排日运动者久矣”[(2)]。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迫害华侨，中国民众对此不胜愤慨。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成立反日援侨委员会，揭开了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的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停航。就主要行业而言，计有125家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从1931年10月开始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或全部停工。到11月底，80%的工厂关闭，12月底达到90%。“这

样一来，上海的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的总额据说高达四千一百二十万四千日元”[3]。

上海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最大据点，20世纪30年代初，它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及制造业中心。商贸方面，日本三菱、三井等商业垄断企业，大都在上海设有经营机构，日本商号遍及上海商业部门中。航运方面，日本在上海港占有十个码头，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上海是日本在华纺织工业的中心基地，日资纺织厂就有30家。上海的抗日活动使日本政府、侨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极度恐慌。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的“排日运动”商讨对策。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4]。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奉政府训令于10月11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实施排日教育，默许排日运动，“特别在最近敌视日本计划并实行报复的排日异常盛行之中部及南部，排日暴动时有大爆发之可能”，并威胁说，如中国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中日两国间将有最不幸之重大结果发生”[5]。

重光葵后来回忆说：“上海的日本人看到日军在满洲采取强硬态度，消除了满洲的排日运动，也维护了日本的利益，他们认为采用同样的手段在上海也会成功。”[6]“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于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连续在沪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的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的中国。日侨并多次寻衅闹事，如殴打华人，枪击岗警，撕毁标语，打碎商店玻璃。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8日朝鲜人李泰昌在东京樱田门外狙击天皇的事件时，使用了“不幸只炸副车”[7]的词句。日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不敬”报道事件，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12日，村井向吴铁城提出“抗议”，要求更正，道歉，处罚责任者，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重光葵还说：“上海也有陆海军的骨干或青年军官组成的团体在

活动，这些人与极端强硬派沟通起来好像要发动什么事端，正在频繁地活动。”[8] 由于1931年12月组成的日本犬养新内阁一再声明对中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这“对于上海的日本人有如火上浇油”[9]。

日本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闸北后，选中三友实业社作为挑衅目标。在“日僧事件”前夕，日本海军军务局同意了陆战队柴指挥官的计划，即“奇袭北站附近之排日运动的团体根据地，并将其占领，予以封锁，借此消灭排日运动的根据地”[10]。三友实业社之所以被日军选为挑衅目标，原因是“该厂自去年万宝山案发生，及日本侵占东三省之事后，全体工友激于爱国热忱，自行组织义勇军，按日操练，极为认真，颇为日人所嫉恨。而该厂所出三角牌毛巾，因品质精良，将日人在三友厂邻近之东华纱厂所出之铁锚牌毛巾销路，均被三角牌所夺去，是以日人对于该厂恨之已久”[11]。“于是，看到了这种情况的日本军部，乃反而抓住了恶化的对日感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上海制造一次骚动，好把倾注在东北方面的国际视线转移到上海来”[12]。

二　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口附近的淞沪地区发动这场战争，直接目的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联理事会作出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绝大多数会员国对中国表示同情。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力，当日本侵占锦州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不承认主义”的照会，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陷于孤立，这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国其他地方制造事端，以便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关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以何种形式来统治这块殖民地，是日本必须立即决定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4天，即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就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纵的新政权。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一手准备将溥仪挟持到东北，一手在东北各省拼凑伪政权，并阴谋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应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电召，10月1日前往沈阳。板垣告诉田中：“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田中保证完成任务，并说他“正在训练一个极好的间谍，能在上海收买中国的闹事者，来发动这场假战争”[(13)]。田中所说的间谍就是川岛芳子[(14)]。板垣从关东军的特务经费中提取二万日元交给田中使用。由天皇裕仁的文官党羽木户辛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人组成的“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了“一二八”事变。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便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在此时期，日本需要在上海制造一场“假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近卫在“十一人俱乐部”会议上通报说：“关东军准备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15)]

国联决定组成调查团派往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1932年1月，调查团正式成立。日本乃计划在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前，扶持伪满洲国成立，迫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1月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同幕僚拟订出具体方案，决定派板垣回国汇报。该方案决定“满洲国”最迟在3月上旬，即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的破格接见，并留在东京协助制订“假战争”的作战计划。与此同时，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1月6日根据参谋本部的意图，共同制定出与关东军方案基本一致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其中规定东北从中

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的控制，由日本人参与该“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10日，板垣和参谋本部安排好了发动“假战争”的准备。他在东京致电在上海的田中：“‘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16] 田中接电后，将二万日元的特务经费交给川岛芳子，让她具体策划事件。13日，板垣携带《中国问题处理纲要》返回沈阳。于是，关东军加紧了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

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的地方。列强在这里的经济、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上海如果爆发战事，将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十分密切、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力的英、美、法等国，必将介入其中，这样日本就可以乘国际视线转向上海之机，在中国东北放胆侵略，扶持傀儡政权出台。

三 “日僧事件”

蔡廷锴等指出：“一二八”事变的“近因完全为暴日军阀蚕吞中国之支动作。日僧事件及抵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满铁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耳。”[17]

“日僧事件”是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促使海军迅速出兵。

田中后来承认：“上海有一个叫做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指川岛芳子——引者）‘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18]

日莲宗是13世纪兴起于日本的一支佛教流派，近世分为左右两翼。上海日莲宗山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是日本日莲宗极右翼代表人

物、海军特务、“血盟团”盟主井上日召的弟子。“血盟团”主张搞恐怖暗杀活动，发动政变“改造”政府，推动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为此同海军激进分子相勾结，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由于作为政变骨干的海军青年军官大部分随舰队调往上海，因而不得不推迟国内行动计划，井上日召遂派天崎启升以化缘为名，到上海与日本海军继续保持联系，一旦上海事情结束，即刻着手国内政变。田中隆吉想“牺牲”与日本海军关系密切的天崎启升，借以激起海军的愤怒，挑起日中冲突，达到既转移国际视线，又镇压上海抗日活动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在田中隆吉的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的煽动下，1932年1月18日，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五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寒中修行，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故意寻衅闹事，同该厂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当时流浪到上海的日本浪人立即跑去拔刀相助，发生了争端”[19]。这些浪人实际上是重藤千春和川岛芳子操纵的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他们埋伏在既定地点，待时机成熟时出击，结果日僧三人被殴伤，一人伤重身亡。

19日，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要求缉凶，并保留其他要求条件。

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的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纵火焚烧毛巾工场厂房，并打死公共租界华捕一人，打伤二人。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20]。当日下午1时，在田中隆吉的煽动下，约一千余名日侨以“日僧事件”为借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决议：“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21] 嗣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狂热的日侨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而且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

兵。”[22] 散会后，日侨在虬江路和北四川路一带闹事，殴打行人，撕毁标语，捣毁商店多家。

田中隆吉眼看着暴动化的状况而暗自高兴，加紧工作，一方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的重要性，一方面进行侧面活动，以手枪胁迫“三井物产”的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负责人团琢磨，请其主张出动日军。“盖出于三井财阀的派兵要求，是可以促使日本政府拿出决心的一张王牌”[23]。

21日上午，村井仓松见吴铁城，就日人纵火、击杀华捕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缉拿纵火的日本浪人，同时递交关于“日僧事件”的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五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尔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及时解散之。”吴铁城口头答复说，“第二项关于伤害罪之处分，中国律有明文，自当依法办理，一、三两项亦可考虑，惟第四项事关民众运动，其在法律以内者，无权取缔，如有非法行动自当依法制裁。”村井态度强硬，对于第四项尤为坚持，声称若不接受将采取自由行动[24]。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同日在上海各日报发表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提出要求，若非予以满意答复，并将要求各项立即实行，则海军司令官决采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25] 鲛岛具重表示，如日领要求中国上海当局“解散抗日团体等条件无圆满答复，即派兵占领南市、闸北及高昌庙之兵工厂”[26]。日本外务省举行会议，决定要乘此机会，消灭中国“国内以抗日为目的的一切抗日团体为先决条件”，并命令村井要求中国当局道歉、赔偿、惩凶，并保证不会再有抗日运动[27]。

日本海军陆战队极力给中日之间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22日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国日报》社，就该报21日为三友实业社事件刊载的《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一文，指为故意破坏日

本陆战队名誉，要求“（一）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陈谢；（二）揭载半张大的谢罪文；（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种事情；（四）罢免直接责任记者”，限23日午前5时答复，并威胁道：“若不承认，莫怪也。”[28]　23日下午3时，日侨一千五百余人又在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大会。日陆战队派军车载运三十余名日军，在途中各车站警戒。俱乐部门口张贴《每日新闻》、《日日新闻》两日文报刊，对《民国日报》颇多指摘。与会者大多数主张日军自由行动，结果一致请村井向上海市政府严重交涉。在日方的压迫下，租界工部局劝告该报停刊，结果《民国日报》于27日被迫关门。

为进一步扩大事态，23日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在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官邸放火，以制造借口。23日、24日，日大队军舰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陆续抵达上海，形势更趋紧张。24日，村井以海军实力为后盾，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29]

25日，村井谒见吴铁城，询问就“日僧事件”提出的抗议何日可得到答复，并说日侨态度愤激，若不从速解决，如有意外发生，应由上海市政府负责。27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所提4项要求，限24小时以内（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陆战队将采取其所认为必要的手段，以实现其要求。同时，为防备中方不接受要求，盐泽下达了有关行使武力的命令。在日方的压力下，吴铁城28日下午1时45分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四项要求。村井对此表示满意。

尽管如此，日海军当局发动战争的决心早就下定，战争已不可避免。

四　日海军与陆军争功

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

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的庞大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海军也企图在“属手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30]。日本海军则因为要与其在东三省占领我国土地，屠杀我国民众的陆军争功，“更欲使上海事变扩大，进图占领闸北、引翔、吴淞各区，以作日本的租界地”[31]。“对海军来说，上海发生事端确实是天赐良机，它试图利用这一机会粉碎第十九路军，以威武赫赫之名炫耀帝国海军的存在”[32]。

日本政府既让海军在上海放手行动，海军便决定以武力解决上海事件的方针和增兵上海。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33]；“如中国政府不解散各处抗日团体，及取缔各处抗日运动，即将采用平时封锁办法，将沿海口及长江各埠封锁”[34]。“此外，重光葵特别为了此事觐见日皇，考虑上海局势，决议以应付上海事件之紧急计划悉听海相主持，并商定一切事端，悉由驻华日舰队司令盐泽及驻沪日海军官负责解决”[35]。

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36]。26日，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对陆军炮兵监畑俊六中将表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陆战队并非昔日之陆战队，有两千人，有野炮和装甲车，没问题。”[37]

日海军的战争准备得到了天皇裕仁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行使自卫权利”[38]。

27日，日海军省发表声明称：“至于上海事件，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合理妥当之要求，毫无诚意，不肯承认，据最近情报，并以正式军队与日本为敌。日本海军深望中国停止此种行为，如国民政府不加反省，立即制止不法行为，日本为自卫计，必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日侨及维护既得权益，以期万无遗憾。”[39]

为发动战争，日海军大量增兵上海。1931年10月，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有908人，停泊日舰五艘。“日僧事件”发生后，1932年1月21日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四艘），运载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23日、24日分批抵达上海。24日，由旅顺出发的日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也驶抵上海。26日，日本从佐世保军港急调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旗舰“夕张号”率第二十二、二十三、三十驱逐队，共有十二艘驱逐舰），运载佐世保镇守府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468人，28日午后抵沪。26日，又由佐世保加调战机六架援沪。至此，日本在上海共集结了二十四艘军舰，二十余架飞机，1833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及三四千名武装日侨。

28日，日海军省下令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阿武隈号”及水雷舰四艘开赴上海。

日海军陈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的决心下定。在25日召开的由各国驻沪武官组成的租界防备委员会会议上，鲛岛具重说，当日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可由盐泽幸一少将预先向租界工部局要求发出戒严令[40]。28日上午7时30分，盐泽照会各国驻沪武官，称中国对日本的要求无满意答复，日军将于次日晨有所行动。租界防备委员会9时30分开会，决定下午4时发布戒严令，并划定各国警戒区域，其中规定日军负责苏州河以北，北江西路以东，东至杨树浦，沿淞沪铁路一带防卫。盐泽本日下午对《纽约时报》特派员阿本德说，今天即使中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也要为维护闸北的秩序和那里的6000名侨民而派遣陆战队。“陆军必须保卫我们在满洲的权益。上海没有陆军，所以海军在上海就必须负起同样的任务”[41]。晚9时，日陆战队

士兵以虹口、杨树浦为作战根据地，积极进行战斗部署。

战争如箭在弦，蓄势待发。但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上海与东北不同：东北原属日本的势力范围，上海则是国际性大都市。占领上海，势必导致与英、美、法等国的正面冲突，日海军对此是有所顾忌的。从实力上看，日海军陆战队仅有一千八百余人，而驻防上海及其周围的中国十九路军达三万余人，双方力量悬殊。日海军不具备向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挑起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因此，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十九路军后撤20公里，至南翔以西地区。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源于1931年10月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发起的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就外交政策达成妥协：一、实行统一外交，对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负责，广州不办外交；二、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主张退出国联[(4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囿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坚持“不抵抗主义”，结果丧师失地，国难深重，全国抗日潮流高涨，“不抵抗主义”遭到猛烈抨击，走入死胡同，国民党内部对日政策发生纷争。11月初锦州、天津事件后，国民党当局指导思想开始从“不抵抗”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过渡。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特种外交委员会11月间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就对日政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

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43]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政会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12月初，汪精卫对外界发表谈话称：“至于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次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我们如果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44]

锦州失陷后，孙科内阁外长陈友仁主张对日宣战。这一对日外交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暂时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思。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方针。他说：“我国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反与日本首先绝交与宣战，而实与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45] “不绝交、不宣战”是针对抵抗而言的，即在不绝交、不宣战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不讲和、不订约”是针对交涉而言的，即在不讲和、不订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进行交涉，寻求妥协。

1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会谈，否定了孙科、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同意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晚上，蒋介石招待汪精卫和孙科就餐，即席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46] 他离杭赴京前对新闻记者说：“余无特殊之主张，汪先生之主张即为余主张。”[47]

“日僧事件”后，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说：“若国际之约束无效，交涉之结果不利，日本帝国主义复怙恶不悛，非完成其侵略压迫之野心不止，则我亦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48]

23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晚上，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对日应否绝交问题，国民政府政要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一致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24日，陈友仁因其对日绝交主张未蒙国民党中央采纳，向孙科提出辞职。同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励志社举行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故决定不采用，对陈提出的辞职不予挽留。28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政会上作报告，全面申述外交问题的原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同日，中政会决定接受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汪精卫继任。

“一二八”事变前夕，南京当局确定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处理上海问题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但若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国民政府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并且毗邻首都南京的上海发动战争，南京当局是不会不对日抵抗的，否则，一旦日本扼死其经济命脉和占领其心脏部位，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将会丧失。因此，日军如在淞沪滋事，中国必予抵抗。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就有此决心。“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日军在中国各处挑衅，国民政府判断日本有可能“以兵力与日侨自由行动，利用各种手段，捣乱长江，破坏我之金融基础，而置首都于兵力威吓之下，希图造成从前江宁条约的形势”[(49)]，决定如果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予回击。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参谋长向蒋介石请求对策谓：“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实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答复说：“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50)] 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且有即日在华界登陆的报道。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

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51] 1932年1月23日记者采访接替张群的新任上海市长吴铁城，问：“如果日人不顾一切而大举骚扰，则市长之意以为如何？”吴答：“此事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内地领土，决采正常防卫。”[52] 24日，记者在南京中央党部问汪精卫：“如暴日不顾国际公理，万一有占领上海之企图，将取若何态度？”[53] 汪表示当然抵抗。

但南京当局又担心抵抗弄不好会引发中日间的全面战争，破坏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因此，在淞沪战争爆发前，南京当局考虑只要日本在上海的挑衅不超过武力侵占上海，不进逼首都南京的限度，在上海即使妥协退让，也要尽量避免冲突。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召集孙科、何应钦等商讨内外方针，吴铁城向会议报告日人在沪暴乱情况，蒋仍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54]。23日，蒋、汪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会议决定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55]。同日下午，吴铁城同蔡廷锴、戴戟讨论，认为若不接受村井的第四项要求，日海军陆战队必然有所行动，决定如果陆战队侵入华界，准备予以抵抗，并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对策。行政院长孙科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详商应付上海事件的办法，结果“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56]。国民党中央先后派张静江等一批大员到沪，向上海市政府传达旨意：应以和缓手段避免冲突，让上海得以保全。

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下，上海市当局“本中央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筹思缓和应付之办法”。25日晚，吴铁城邀集上海各界谈话，“莫不要求保全地方，请由市政府、

市党部明令将各界抗日会严加取缔，一面由民众团体响应自动解散，然后据以答复日领，则中央及地方双方均能顾及”[57]。考虑国民党中央及上海地方各界的要求，上海市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村井21日提出的要求。

27日下午，吴铁城同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前上海市长张群等人在市政府商量对策，决定避免冲突，接受村井所提全部要求。南京当局对此表示首肯。当晚11时，上海市政府密令公安局、社会局会同各区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其分会。28日，国民政府向上海市政府传达命令：“一切抗日团体，概行取消。”[58]上海市政府遵命取消了各抗日团体。下午1时45分吴铁城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4项要求。

南京当局为缓和事态，派非战斗部队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以缓冲其间，希望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该团27日晚8时在南京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

二　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中国十九路军自发起来抵御日军对上海的侵略。

十九路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军队。它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创建粤军三个师，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师长为邓铿），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等分任副团长、警卫团营长、营长等职。1922年北伐，该团任先锋，屡建战功。是年夏攻克江西赣州。6月陈炯明叛乱，进攻江西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攻韶关不克，转入赣南。陈铭枢痛国事之不可为，离职赴宁学佛。1923年陈炯明败退东江，孙中山回粤主政，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旅旅长，募兵两个团，其中蒋光鼐为第二团团长，蔡廷锴和戴戟等人在该团中分任营、连长。全团下级干部多由原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调用。1925年夏，第一旅奉命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

枢为师长），即以原粤军第一旅蒋光鼐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团，蒋光鼐任副师长，蔡廷锴任第二十八团团长，戴戟任第三十团团长。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十、十二师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建立奇勋，第十师并且攻下武昌，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是年冬，第十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国民政府擢升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下辖第十、二十四、二十六师，蒋光鼐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为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

1927年春，宁汉分裂，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人相继离开武汉，第十一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是年秋，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张发奎，由江西进入福建，复由陈铭枢统率，重组第十一军，蒋光鼐仍为副军长，戴戟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六师，第十师师长仍由蔡廷锴担任。1928年春第十一军由闽回粤，补充兵员，第二十六师师长改为戴戟。1929年春，国民党中央召开编遣会议，第十一军缩编为1个师和1个独立旅，蒋光鼐为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师长，戴戟为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蔡廷锴为第二独立旅旅长。是年秋，奉国民党中央统一番号令，改广东编遣区第三师为第六十一师，第二独立旅为第六十师。1930年夏，第六十、六十一师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北上参加中原大战，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负责指挥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此为十九路军名称之由来。后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兼第六十师师长、戴戟任第六十一师师长。1931年4月，与南京对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用武力驱逐拥护蒋介石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6月，陈铭枢离粤入赣，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剿匪”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11月，将十九路军集中江西吉安，扩编第七十八师，师长为区寿年；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因病辞职休养，以该师旅长毛维寿升任；第六十师师长为沈光汉；蔡廷锴擢升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因病住沪，总指挥一职由蔡廷锴代理。十九路军军部随之成立。陈铭枢由于与这支部队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成为十九路军的政治领袖。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红军打破。在江西兴国的高兴圩一战，十九路军损失两千余人，军部险些被歼。十九路军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自国民党1927年叛变革命后一直被蒋利用充作内战的工具，辱没了自己光荣的历史，而且实力受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9月19日便提出“团结一致打倒日本”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下，全体官兵三万余人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

9月下旬，蒋介石将与粤系势力有深久历史关系的陈铭枢请到南京，商议由陈赴广州调解京粤之争，为表示和解的诚意，蒋答应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9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10月，时值京粤政要集会于上海讨论整理内政问题，十九路军由赣调至京沪承担卫戍任务，以增进京粤相互间的信任。11月，十九路军奉令全部（总兵力3.35万人）到达京沪路沿线，部署如下：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及总指挥部驻南京；第六十师驻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七十八师驻上海、吴淞、昆山、嘉定。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自12月起任淞沪警备司令。

十九路军调到京沪线以后，第七十八师被指定担任原由财政部税警团承担的淞沪卫戍任务。该部到达后，其第一五五旅分驻南市、吴淞、真如；第一五六旅第四团驻南翔，第五团及旅部驻嘉定，第六团驻太仓。闸北的防地暂时仍由税警团担任，直到1932年1月6日由驻太仓的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接替，第六团第三营驻闸北，第一、第二营驻大场。1月11日，第一五六旅旅部由嘉定移至大场。13日，驻南翔的第四团接防吴淞；驻嘉定的第五团除派一个营警戒浏河外，其余向南翔及大场推进；第一五五旅，除依旧警戒南市外，其余警卫虹桥及漕河泾，旅部在真如。两旅的地境以铁道为界，线上属第一五五旅。

十九路军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民众抗日宣传的影响下，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但由于调沪不久，

情况生疏，对于日军的真正侵略意图一时还看不清楚。国民政府又未向其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该军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所以直到1月15日以后才开始进行应战部署。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决定在原十九路军淞沪前线防地进行抵抗。他们分析认为：我军如退出上海，不论在真如、南翔或昆山取抵抗线，实际等于不抵抗；上海为各国通商大埠，我军在原地抵抗，可希望因英、美、法各国利害的冲突，减少敌人的横暴行为；我军军械比日军差，应利用街市作战，以减少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该决定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的赞同。

1月19日，蔡廷锴、蒋光鼐召集上海驻军官长座谈，商定："（一）最近日军或有骚扰，我军须无形的戒备。（二）万一有事发生，第一线兵力之配备若干，区寿年师最低限度死守五天。（三）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后方各驻地亦须预选抵抗线。（四）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五）对上海租界决定态度。（六）由明（廿）日起，各部官兵除因公外，一律不准在租界住宿。"[59]

为鼓舞士气，23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表示："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60] 蔡廷锴、戴戟等还致电南京当局，表示"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61]。同日，十九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发言，表达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会议讨论了抗击日军入侵的计划。晚上7时发出密令，作出部署："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含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

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六十师之黄团限明二十四日开至南翔附近待令，余沈师、毛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62] 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接上级命令后，下令：“一、第四团在吴淞、宝山一带地区，构筑强固工事而死守之。二、第五团除留一连在浏河担任警戒外，其余即集结于大场，并派驻一营进驻江湾附近，对该方面严密警戒。三、第六团在大场之两营，务推进至闸北，扼要占领阵地，严密戒备。其余遵照命令办理”[63]。第四、第五团遵照命令积极部署。驻大场的第六团两个营抵达闸北后，全团从淞沪线上的北站起，沿宝山路、虬江路、中兴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桥止，构筑防御工事，并预定该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会文路至宋公园路之线为第二道防线。

24日，蔡廷锴等人抵达苏州，在花园饭店召集十九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等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23日、24日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部署，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敌。24日，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第一团开抵南翔附近待命。至25日，十九路军依23日命令大体上部署完妥。25日，第七十八师司令部由南翔进驻真如。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总部部分人员也抵达真如。

正当十九路军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却要求十九路军撤退至后方南翔一带，以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遭到蔡廷锴拒绝。24日，何应钦赶到上海，在法租界张静江公馆召见蔡廷锴，要求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蔡廷锴义正词严地驳道：十九路军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64]。为表示抗日的坚定决心，28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发表《敬告淞沪民众书》，内称：“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

淞沪万国具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65] 但何应钦仍于28日电令第一五六旅第六团将闸北一带防务移交宪兵第六团接收，俟防务交替完毕，即移驻真如或南翔附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电后，晚11时在龙华召集十九路军全体军官会议。“席间多数军官均极愤慨，誓愿一死。既而因外交形势已转缓和，双方冲突或可幸免，决计遵令办理”[66]。晚8时，翁照垣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报告，宪兵第六团已有一个营到达真如，因为接防太晚，加上宪兵兵力不敷分配，已经用电话商定宪兵第六团29日拂晓再来接防。同时侦知已有大批日军舰及陆战队士兵抵沪，形势急迫，因此翁照垣令第六团继续严密警戒，不要因即将换防而放松警惕。晚11时10分，戴戟以电话令第七十八师：“敌人欲乘我七十八师第六团与宪兵第六团交替防务之际向我袭击，企图占领闸北”，“由区师长令翁旅长照垣驰赴闸北巡视。着第六团进入阵地，第五团固守原地，相继策应第六团。由翁旅长督饬在闸北之宪兵保卫团警择地戒备，并令黄旅长固转饬第一团监视黄浦江之敌舰，第二团严密警戒沪西”[67]。同时令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南翔推进真如策应。翁照垣接到命令后随即下令：“第六团应即进入阵地，严密戒备。其他各团应在原地准备。”[68] 张君嵩得令后一面准备移交，一面施行严密的戒备。第六团各营依令进入阵地：第一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虬江路、广东路、西宝兴路各路口；第二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横浜路、天通庵路、江湾路、青云路各路口；第三营派一个连在宝山路协同北站的宪兵一个连及铁道炮队防守北站，其余三个连集结于太阳庙路嘉郡会馆，为团预备队。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有一千余人，加上公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和宪兵一个连，驻守闸北的我军总兵力约有一千七百人。

第三节　淞沪抗战经过

一　闸北抗战

1月28日晚11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村井的一封信，内附盐

泽致吴铁城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公告各一件，“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69]。日本军事当局发出这项布告的时间是晚11时5分，吴铁城直至晚11时25分才接到该项布告的副本，而日军五分钟后就挑起了战争。诚如翁照垣所说：“这里面的用意是极明了的：就是恐怕中国的当局一例的接受他们的要求，使他们没有进兵占领的机会。”[70]

当晚11时10分，日海军陆战队数十人乘摩托车，携手提式机关枪，占领陆战队附近的天通庵车站。11时30分，日军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分三路全线进攻闸北第六团防线：一路从天通庵车站入天通庵路，抄京沪铁路上海车站北路之后；一路由吟桂路口日本小学校出发，沿该路西进，旋转入横浜路，与前一路相策应；一路由虬江路直扑北站。各路日军均有四五百人，以装甲车为前导，两侧由摩托车和手提机关枪作掩护，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翁照垣一方面令第六团丝毫不可示弱，另一方面令第五团准备增援。第一五六旅第六团依令向日军展开反击。双方发生激战，日军第一次猛烈的冲锋未能奏效，我军沉着应战，击毙日军三百余人，伤数百人。为抵御日军的第二次冲锋，翁照垣调驻江湾附近的第五团第二营推进至江湾前面劳动大学附近，并由该营派出一个连至八字桥，对日军作佯攻之势，作为牵制，同时掩护在天通庵路、青云路一带的第六团第二营的左翼。十九路军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凌晨1时45分，日军约一千五百人仍旧凭装甲车掩护，向第六团正面第一营的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占领附近洋房，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向我军阵地轰击。我军用手榴弹还击，并和日军展开刺刀战。日军直到五辆装甲车被炸毁后才停止冲锋。我军的损失也较大。在危急时刻，第一营预备队赶来增援。同时第六团左翼阵地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浜路等路口也遭到日军约五六百人猛烈的攻击。我军同日军

展开肉搏，并登上屋顶用手榴弹猛炸日军。日军不支，纷纷向来路退却。凌晨3时，翁照垣令第五团第三营增援闸北。3时50分第三营在青云路至八字桥之间布防。凌晨4时，日机二十余架轰炸闸北。我军用高射炮或步枪击落日机两架。5时30分左右，日步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再次向第六团正面阵地冲击。我军应战十余分钟后决定转守为攻。在猛烈的炮火中我军直冲至淞沪铁路东边，准备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惊慌失措，一部分向北四川路溃逃，一部分逃至广东路的洋房内负隅顽抗。在日军的三次冲击中，天通庵车站一度被日军占领，但第五团增援后又夺了回来。广东路口阵地也曾被日军突破，我军经过苦战击退日军。因第五、六团的兵力全部投入前线，翁照垣向区寿年请调援军。区寿年派第一五五旅第三团第二营归翁指挥。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的炮火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北站。

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的枢纽，其得失关系到整个闸北的安危。开战后日军本欲由北河南路北口铁门冲入，被防守该处的公共租界上海商团拒绝。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派大队由虬江路包抄而入。防守北站的宪兵一个连苦战一小时后不支，北站被日军占领。下午5时，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派队增援反攻，血战一小时将其夺回，并全力追击日军，日军向杨树浦溃退。此战日军死伤甚重，我军亦死伤数十人。下午6时30分，第六十师第一团第一营开到闸北，归张君嵩指挥，部署在宝兴路及天通庵路之线，同时中央铁道炮队也开回闸北，控制于共和路口，警戒北站西南一带，掩护我军右翼，并向日军轰击。晚7时30分，日军百余人向八字桥附近进攻。我军1个排用机关枪还击，只十几分钟就打死打伤日军二十余人，日军被迫从天通庵路退却。同日，北四川路、宝山路继续发生巷战，我军均占优势，并占领日陆战队司令部。晚7时我军乘胜追击，日军大队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闸北已无日军踪迹。至此，闸北参战的日军被击毙八百余人，我军牺牲百余人。盐泽狂妄不可一世，原以为十九路军决

不敢抵抗，夸口四小时内完全占领闸北，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却一无所获。

日军进攻没有得手，遂于29日下午通过英、法、美领事出面调停，约定从晚上8时开始，中日双方暂行停战。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也需要加强部署，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调沪，原在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命令下达后，30日，第六十师第一二〇旅推进至江桥镇，第一一九旅（欠第一团）进驻大场，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到达南翔。

31日，中日当局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谈判，宣布停战三天。在约定的停战期间，日军屡有挑衅活动，我军进行了反击。

盐泽指挥日军进攻闸北失利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海军省立即命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四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30日抵沪增援，随舰而来的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宗军火在黄浦码头登陆。31日晨，第一航空队约三十架飞机随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抵达上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水雷舰四艘，下午4时30分开到上海，三巡洋舰并载来特别陆战队4000名，随即逐批登陆，运往前线。2月1日下午，日邮船“照国丸”载来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在汇山码头登陆。我军也在调整部署。1月31日第一一九旅集中大场附近，并派出一部至小川沙、浏河警戒，第一二〇旅集中江桥镇附近，第六十一师全部抵达南翔。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长蔡廷锴下令：“七十八师附小炮一连（欠第一、四两团）占领虹桥镇——北新泾镇——真如镇——真如车站之线，保持主力于铁道线附近以南地区”；“六十师占领真如车站北端亘——大场镇——胡家庄及其北方之线，保持主力于中央（派出一部至浏河担任警戒，注意敌舰之行动）”；“六十一师之第一二二旅为总预备队，集中南翔候命（六十一师防务交替完毕，概开南翔集中）”[71]。随后，

第六十师接替上海北站、八字桥、江湾至庙行线的防务；第六十一师向庙行、冯家宅急进，接替第一五六旅的防务。

二　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日援军开到后，即不顾停战尚未期满（3日下午6时满期），开始向我军攻击。3日上午8时，大批日军分别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第六十师阵地发起总攻。在闸北，日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协同航空队猛攻横浜路、宝兴路、福生路及北河南路等处我军防线。晚上11时后，进攻更加激烈。我军集中兵力于北站和青云路，沉着迎战。上午10时，二十余艘日舰协助航空队向吴淞炮台进攻。炮台守军奋勇抵抗，一面开炮还击敌舰，一面用高射炮射击敌机。激战两小时，击沉驱逐舰一艘，伤三艘。归第一五六旅第四团指挥的第八十八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我炮台损失大炮三门。日驻沪总领事村井对外吹嘘说："日本海军陆战队决于三日内占领吴淞要塞。"(72)

下午1时50分，翁照垣接区寿年令，调第一二〇旅接防闸北防务。翁接令后即饬第五、第六团遵照办理。就在与第一二〇旅移交之际，晚6时左右翁照垣又接到区寿年的命令：在第一二〇旅接防后，即率第五团开赴吴淞增防(73)。翁照垣即令第五团移防完毕后星夜驰援吴淞，第六团赶往金家角休整。翁本人同旅部人员连夜赶到吴淞。

4日，日军发起总攻。闸北方面，上午7时，日军集中炮火向北站、宝山路、西宝兴路第一二〇旅阵地猛攻，至9时火力更加猛烈，一直轰击到12时，此时日陆战队三千余人发起连续冲锋，均未得逞。下午2时，又以装甲车掩护进行冲击，日机十八架助战，我官兵沉着迎战，用手榴弹炸毁敌装甲车五辆。日军用燃烧弹向我军阵地喷射火焰，我军不能立足，乃退至第二道防线。入夜，火势稍减，我军进行逆袭，恢复原阵地，日军逃去。此次战斗共打死日军一百余人，打伤数百人。吴淞方面，自上午11时13艘日舰围攻炮台，日机二十四架助战，投下大量重磅炸弹，摧毁我炮台大炮六门。炮台守备营官兵死伤

极多，要塞司令邓振铨失踪，余下的炮台士兵逃遁一空，炮台失去攻击力。日陆战队数百人欲乘机登陆占领阵地。翁照垣令第四团守炮台湾的第一营派一个排扼守炮台，协助在炮台左右防守的部队，坚决阻止日军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直到下午1时左右才彻底放弃登陆的企图。但吴淞炮台全遭毁坏。日舰直至下午3时才暂停发炮。日机十二架又飞来投弹，延至下午5时离去。是日我军在不断调兵：第六十一师集中南翔（第一一九旅第一团仍在镇江警备）；中央炮兵一个排抵达真如；第八十八师由浙江调至苏州，其中一个团到达前线；宪兵第六团到南市龙华接替第一五五旅第六团；第七十八师派一个团接替中山路防务。

5日，日陆战队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千余人全力进攻闸北。凌晨1时起，日军用重炮轰击，炮声震撼全市。天明，日机飞来投弹，民房多处着火。敌我双方在天通庵激战，第一二〇旅英勇还击，歼灭日军五百余人，缴获装甲车两辆、机关枪四挺。8时，日军发起全线进攻，来势凶猛，新民路、虬江路、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八字桥各处均有激战。至11时日军均被击退。敌我双方死伤甚重。下午1时，日军又大举进攻。青云路口与宝兴路口的横浜桥战斗激烈，我军以一部向敌包抄侧击，击毙日军百余人，至下午4时战斗稍息。我义勇军全歼窜至邢家桥路的日军。本日上午9时，我空军第六、七两队由南京飞沪，10时恰遇九架日机在闸北投弹后飞向真如，企图炸毁国际无线电台，被我空军击中两架。无线电台守军11时30分用高射炮击落一架日机。其余日机逃遁。11时30分，在高昌庙、吴淞、闸北一带，日机四十余架向我机发动夹攻。结果日机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我机被击中一架，坠毁一架。盐泽本打算今日总攻可占领闸北，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在吴淞，上午10时左右4架日机向吴淞镇阵地投下十几枚炸弹，日舰五艘开炮四五十发。是日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镇江抵达南翔，归回建制。第一二二旅（缺一团）到达嘉定罗店，并派一部至浏河、小川沙接替第一一九旅警戒。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开赴昆山，归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指挥。戴戟委任第七十八师副师

长谭启秀兼任吴淞要塞司令。

6日，闸北方面，拂晓后日军用飞机和大炮向第一二〇旅阵地轰击。10时，日军向虬江路及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中山路一带进攻，每路有步兵百余人，装甲车数辆。而天通庵路至中山路阵地战斗激烈，12时日军被击退，敌我均伤亡数十人。下午6时，宝山路的横浜桥我军阵地遭敌弹轰击，燃烧甚猛，我军撤至第二线防守，至晚9时复夺回原阵地。在真如，我空军击落日机一架。在八字桥、江湾一带，日军4000人在大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击第一一九旅阵地，遭我军迎头痛击，苦战数小时后不支遁回。在吴淞，日机十余架轰击狮子林炮台，伤我官兵20人。下午6时，区寿年调第八十七师高射炮两个连赶来增援，归翁照垣指挥。是日第八十八师独立旅（即税警总团）由松江出动，7日到达虹桥、北新泾之线。

三　吴淞之战

日海军屡战屡败，外务省官员认为："仅靠海军是不可能的，此时陆军如不出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74)] 为此，重光葵2月1日亲自执笔，电请政府立即派足够的陆军援沪。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将第九师团（师团长为植田谦吉）按战时编制调往上海。为紧急赴援，先将距离较近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分乘数艘驱逐舰调来上海。将自上海至南部中国海岸的一切日本海军组成第三舰队，任命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官，代替盐泽指挥上海战事，盐泽率领的第一遣外舰队归其指挥。第三舰队配属有航空母舰、战舰和驱逐舰四十九艘，野村乘旗舰"出云号"6日驶达上海。原在沪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奉命回国，由海军少将植松炼磨继任。自5日至7日，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到达上海。我方也在调集援军。6日，军政部电令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和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增援上海，归十九路军指挥。7日，第二六一旅午前全部集中昆山，第八十八师（缺一团）进至南翔，独立旅的两个团集中虹桥。

野村因日军不善巷战，在闸北所受损失太大，故决定改变战略，将吴淞作为进攻重点，先以海陆空军会攻吴淞炮台，限二十四小时内攻下。其兵力部署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主力由张华浜攻击吴淞，一部协同陆战队攻八字桥；陆战队余部仍攻闸北作为牵制。7日上午7时，二十四架日机沿淞沪铁路线飞至吴淞，沿途侦察我军阵地，并投掷大批炸弹。停泊在张华浜码头附近和吴淞对面三夹水等处的二十四艘日舰一齐向吴淞全线开炮，吴淞镇成为一片瓦砾。张华浜附近也有日军重炮八门集中火力向吴淞镇和铁桥头一带我军阵地射击。9时，陆军二千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乘装甲车和卡车由杨树浦底沿军工路开至张华浜；一路乘军舰及铁壳驳船由黄浦江驶至高桥浜，渡至张华浜粮米栈码头登岸。两路会集后，猛扑蕴藻浜第一五六旅第四团第八连前哨阵地。因寡不敌众，第八连伤亡过半。日军乘机推进至蕴藻浜附近。第八连余部从蕴藻浜车站背后绕过车站前端一带商店，在商店前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日军被截成两段，以为中了我军埋伏，纷纷溃逃，死伤六七百。另一部分日军四千余人以江湾为主攻目标，并以一部分兵力对闸北、八字桥方面施行助攻，初以猛烈炮火轰击第一二〇旅阵地，继之以装甲车为前导，掩护步兵冲锋。我军沉着应战，待日军进至近距离时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日军死伤惨重。

7日晚10时30分，蒋光鼐下令：第六十师担任北站、闸北、江湾之线，以一部固守北站、闸北，主力集结于大场东北一带地区，相机迎击由浦江进犯之敌，左翼与翁旅切取联络；第七十八师除翁旅（欠第六团）死守吴淞外，其余在北新泾至真如之线，对中山路、曹家渡警戒；第六十一师以一团控制于罗店，派出一部至浏河、小川沙一带警戒江面，主力则应于8日拂晓前集结于刘行至大场一带地区。如浏河方面无敌情时，则相机策应第六十师；第八十八师（计三团）及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计二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南翔、虹桥间；宪兵第六团担任高昌庙、龙华一带警戒。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担任虹桥北新泾之线警戒，仍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75]。各部接令后于8日拂晓前部署完毕。

8日拂晓，日军继续向吴淞进攻，除原有兵力外，新增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六千余人。日军向蕴藻浜猛冲，由日舰上起飞的飞机不停地轰炸吴淞。自拂晓至傍晚，日军前后冲锋十余次。我军在战壕中用机关枪手榴弹迎战。战斗激烈时，双方发生肉搏，我军大刀队奋勇杀敌，日军损失惨重。我军还炸毁日装甲车四辆。凌晨5时，七八百名日军从小浜迂回，抄至距蕴藻浜西三里地的纪家桥，企图偷渡，截断我军后路。正在搭浮桥时，我军侦知，由小径抄出袭击，日军惊慌失措，死逃各半。至11时，再派兵来攻，仍无法渡过。在江湾，上午8时日军突然向屈家桥猛攻，打算由此进占江湾、大场，截断吴淞和闸北之间的联络。日军先用野炮轰击，并由飞机轰炸。第一二〇旅守备部队为达到近战歼敌的目的，佯装后退，待日军冲锋至我设伏地点后展开肉搏，击毙三百余名日军，击毁装甲车两辆。闸北方面，日军中午12时由西宝兴路进攻，我军用迫击炮机关枪抵御，双方激战两小时，我军佯退，待敌长驱直入后将其包围，杀伤日军七百余人。我军还击退了八字桥和虬江路日军的进攻。是日十九路军各部均依7日晚命令调整完部署。第二六一旅进至南翔。

在野村指挥下的日军，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毫无成效，且伤亡甚多，只得收集残兵，企图再战。11日8时，日机八九架在闸北上空投弹，同时日军向我全线阵地炮击。下午5时30分，日军数百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八字桥进攻，激战一小时，被迫后退。晚8时，日军在侵入天通庵、青云路我军阵地时被打死二十余人。江湾方面，黄昏时日军约千人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体育会路第一一九旅，晚8时爆发激战。而持志大学附近的日军也有数百人向沈家宅、八字桥猛攻，至晚10时始被击退。是日，俞济时率第八十八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工兵、地雷各一队和中央军校炮兵一个连由南京调至前线。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由真如移至南翔。

12日上午8时至12时，中日军事当局同意闸北停战四小时，以便救出难民。日军乘机化装成难民，三五人为一队，分向闸北和江湾，

冲入我军阵地。闸北我军早有防备，幸免暗算。在江湾，我军开枪击毙二十余名日军，余敌逃散。停战时间一过，日机即轰炸闸北。从下午4时起，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闸北。晚上9时，日军数千人分三路由青云路、天通庵、八字桥向第六十师阵地攻击，发生激战。敌我双方均用大炮掩护进攻，我军打死打伤日军二百余人，日军全线撤退。吴淞方面，日军清晨进攻纪家桥，正面用野炮及飞机掩护，向蕴藻浜冲击，一面分兵抄至曹家桥偷袭第一二二旅。第一二二旅奋勇还击。为牵制进攻纪家桥之敌，第一五六旅第四团令迫击炮连和第三营用猛烈的炮火向蕴藻浜对岸的日军射击。日军终被击退。是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令第二六一旅开至嘉定，以一个团进驻罗店接替第六十一师第四团担任的浏河、小川沙防务；第六十一师担任江湾亘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的守备。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缺一营）及南市警察担任南市龙华虹口亘北新泾的警戒，归蔡廷锴指挥。

13日上午，日军三次在蕴藻浜架搭浮桥竹筏，希图偷渡：第一次，4时30分在黑桥东偷渡，被我军发觉击退。第二次，7时借烟幕弹掩护，在南草庵前偷渡，我军用机关枪向依周塘角扫射，逼退日军。第三次，10时仍借烟幕弹掩护在纪家桥偷渡过河，至北岸曹家桥登陆，突破我军防线。我军第一五六旅从吴淞、第一二二旅从杨行、第二六一旅从刘行向曹家桥增援，将渡河日军千余人三面包围。日军突围数十次，均未成功。隔岸日军用重炮轰击援助，我军奋勇还击，双方进行肉搏。下午4时后，偷渡过河的日军死伤过半。血战至9时40分，为我军全歼。战斗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肉搏继续至十二小时，无一分钟之停息”[76]。是役，我军伤亡一百余人，毙敌近一千余人。日军渡河时落水溺毙者亦不少。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遭此重创，一蹶不振。闸北方面，日军从上午8时起向我军防线发起总攻，新民路、虬江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均有激战，双方各用大炮机枪攻击，至晚9时从未间歇。日机整日在闸北投弹，被我军击落一架。激战时，我炮兵曾炮击北四川路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吟桂路日本小学校内日军司令部。江湾方面：9时，日军五六百人由万国体育

场、水电路方面向第一一九旅阵地进攻，战斗一小时，日军退走。10时，第一二一旅第一团与日军小有接触，敌旋退却。

14日凌晨1时，日军大队至曹家桥对岸，企图再次偷渡。第六十一师渡河应战，至10时将日军击退。日舰同时炮击吴淞镇。在张华浜，日军13日曾向江湾北方的侯家木桥进袭，被击退，14日拂晓再来袭击，激战数小时，仍不支而退。在闸北，日军继续进攻，战斗颇为激烈。我军挟13日曹家桥胜利之余威，上午7时由江湾派出第一一九旅第三团第二营五百余人，进攻侵入万国体育场的日军，激战一小时后，三面包围日军，11时将日军八百余人全歼。是日义勇军、铁血军二百余人到吴淞镇，归翁照垣指挥。晚9时，第六十一师转令其第一二一旅附小炮连工兵，应速在原守备的江湾、小场庙、庙行镇、蔡家宅之线星夜构筑强固工事，严密布防；第一二二旅附山炮连小炮连，将蕴藻浜北岸由胡家庄至吴淞的守备区交第二六一旅接防，第一二二旅第六团接替第二六一旅罗店、浏河、小川沙的警戒，第六十一师其余部队限15日拂晓前开至胡家庄集结，为师预备队。

野村到沪后，变更战略，两度攻击均未得手。其进攻的主要目标为吴淞，但因吴淞口外停泊有英美军舰，不能任意开炮，乃转向炮台后路的蕴藻浜进攻。7日、8日的猛攻未见成效；13日、14日的偷袭不仅毫无战果，反而损失惨重。至此，野村的进攻计划归于失败。

四　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当7日、8日日军猛攻蕴藻浜不能取胜的消息传至东京后，日本内阁即决定调号称陆军最精锐的第九师团统率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及其他部队，组成“上海派遣军”援沪，总数约三万人，任命赫赫有名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为司令官。第九师团主力13日午后开始在上海码头登陆，其他部分日军在吴淞铁道栈桥上岸，至15日全部登陆完毕。植田14日来到上海。此时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开展调停活动，植田一面虚与委蛇，发表谈话称：“日军亦希望沪事和平解决，故现暂

停止攻击行动。拟向十九路军发表要求撤退之哀的美敦书，并拟给相当撤退之时间，不答应时，当即以实力决行该军任务。”[77] 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闸北八字桥方面驻陆战队约八个大队（每个大队约一千人）；江湾至庙行方面驻第九师团约二万人；蕴藻浜南岸至张华浜车站驻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五千人；海军以第三战队（轻巡洋舰三艘）和驱逐舰两艘威胁攻击狮子林炮台及浏河新镇，以第一水雷战队和“能登吕号”航空母舰攻击压制吴淞，以第一航空战队的基地飞机直接协助陆地战斗。

我援军第五军也在积极部署。14日，张治中奉军政部命令率第五军（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共约1.5万余人）赴沪参战。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奉蒋光鼐之命接防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的蕴藻浜北岸阵地。16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抵达南翔集结待命。当晚11时，张治中率军师部人员、师直属各部及军校教导总队抵达南翔后，立即会晤蒋光鼐，商定作战方针。1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右翼军指挥官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指挥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第七十八师第六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及南市一带团警，“应占领由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亘闸北、江湾、吴淞、宝山月浦镇之线（线上属之），保持主力于真如、大场镇之间，迎击当面之敌，待机出击压迫之于引翔港方面而歼灭之，须以一部有力部队死守南市、龙华作全军右翼之据点”；左翼军指挥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缺一团）、第七十八师第四和第五团，“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制于大场镇北杨家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淞”[78]。18日晨，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各部部署完毕。

18日晚8时40分，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要求中国军队撤退的最

后通牒。20日，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针对植田通牒发出通电，表示“惟有以铁血答复之”[79]。

植田策定了“中央突破”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和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和吴淞地区。

20日凌晨7时，日军用飞机和重炮轰炸第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及第八十七师的正面纪家桥、曹家桥一带。7时20分，植田下达第一次总攻击令，日海陆空军全副武装，于7时30分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大举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在江湾、庙行方面。9时，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四千余人及第九师团的一部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张华浜、虹口、靶子场、杨树浦直逼江湾万国体育会跑马场。第八十八师用大炮还击，机关枪扫射，轰发地雷，炸毁日坦克两辆。11时，日军和我军自淞沪铁路线迄天通庵车站均有激战。下午4时，双方在江湾激战。随后第六十一师增援部队赶到，日军不支而退。入晚，日军以猛烈炮火通宵向江湾镇射击，并冲锋三次，均被我军血战击退。在吴淞，7时左右日舰十二艘炮击我军阵地，日机二十八架在空中助战，在张华浜的日军重炮和野山炮也向吴淞我军阵地轰击。我军开炮还击。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这时日军一千余人在飞机炮舰的掩护下，试图在炮台湾附近的江岸强行登陆。我军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死伤落河者甚多，不支而退。闸北方面，八字桥一带战斗最为激烈。清晨，日军四千余人在战车和装甲车二十余辆掩护下，分别向天通庵、八字桥第一二〇旅第四团和第一一九旅第三团攻击。我军开始以步枪应战，继之用手榴弹和大刀与日军肉搏，战至11时，毙敌五百余人，炸毁战车四辆，日军不支败退。

21日，日军自早到晚，继续向吴淞、庙行、江湾、闸北总攻，重点仍在庙行、江湾一线。植田限令早晨占领江湾。日军用炮火向第八十八师阵地猛轰，尤以江湾庙行镇一带阵地落弹最多，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自凌晨5时起，日军主力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发起猛

烈攻击，飞机十余架助战，我军沉着迎战。7时，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大举进攻，被我军用迫击炮击退。其后又发动三次进攻，均未得逞，且死伤甚多。江湾车站附近，入夜后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该车站，毁坏所有建筑，并乘机三面围攻，来势凶猛。第一一九旅第三团主动放弃该站，转移于八字桥附近。在江湾，第一二一旅第二团阵地遭到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猛攻，激战至晚，毙敌千余人，第二团亦伤亡殆尽，阵地岌岌可危，幸该旅第三团适时增援，阵地始告稳定。未几日军败退。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虬江路和新民路等处均有战斗。第六十师痛击日军。吴淞方面，上午11时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偷渡蕴藻浜，激战两小时，也被打退。下午3时起，日舰三十余艘、飞机数架，向吴淞狮子林炮台集中轰炸，我军略有死伤。在浏行镇我军用小钢炮击落日机一架，击毙机师田中大尉。

因我军庙行、江湾阵地巩固，日方乃变更战略，22日日军以一万余人进攻江湾，六千余人进攻八字桥作为牵制。三万日军于凌晨3时乘雾冲击江湾西北的麦家宅，企图一举将其占领，并直取大场，以截断闸北、吴淞之间的联络。我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和第二六四旅奋力抵抗。上午9时，日军突破第八十八师右翼庙行镇以南第二六四旅第五二七团第三营的大小麦家宅阵地一段。10时，形势非常危急，日军前锋过庙行而达李家楼。张治中获悉后，亲自率领军校教导总队（缺一营）赴冯家宅指挥策应第八十八师，并令第二五九旅向庙行镇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第二六一旅主力由纪家桥抄敌侧背，令俞济时对敌突入区施行反攻，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也率兵两个团从竹园墩出击，对日军进行三面夹击。12时，第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猛袭日军，战至下午1时，日军不支而退。我军乘胜追击，恢复防线。下午2至5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三次冲锋，被我军再次击退。晚上，我军由庙行及谈家宅水车头两路反攻庙行以东的日军，拟将其包围消灭。日军拼死抵抗，我军奋力肉搏，血战至8时半，毙敌三千人，其余日军大部分向引翔港方向后退，一部分被包围于庙行东北的金穆宅。庙行镇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此役日

军遭到重创，陆军第九师团一部分散兵逃到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企图觅船回国。据一位记者说："本日庙行之役，与十三日曹家桥之役，实为沪战中我军战绩之高峰；而本日混战肉搏之猛烈，则较曹家桥一役尤甚。"[80] "是役我军于万死一生中打出一条生路，由危转安，竟获开战以来空前之大捷；与敌军以最重大之教训，毁灭敌坦克车两辆，俘获敌装甲车一辆，野炮二十余门，枪械无数。惟我方卫国军士亦牺牲至二千之多。"[81]

是日因日军主力在庙行、江湾作战，吴淞、闸北日军均取守势。上午10时，我军一个团强渡蕴藻浜向日军进攻，日守军恐慌，调日舰水兵协助防守。闸北方面，上午我军用追击迫还击日军的进攻，至正午，日军败退。午后我军乘胜追击，由香烟桥南进，向虹口作大包围，前锋达岳州路、狄思威路及沈家湾，日军向杨树浦退却。我军不打算攻入租界，故止于租界边线。

23日凌晨1时，日援军五千余人，会同22日晚被击退的1.5万余人，驰援金穆宅被围日军。拂晓后，日机六十余架助战。第六十一师的一部及第二五九旅迎头痛击。我军待日军深入后，冲出肉搏，并由江湾派1个团抄敌后路，日军大炮飞机不能发挥作用。至下午2时不支而退。傍晚，日军乘风雨交作时再次攻击，我军待其逼近壕沟时将其击退。

第八十八师连日作战，伤亡很大，阵地部署需要调整。24日拂晓，庙行镇以南至江湾北端严家宅阵地由第六十一师接替，第八十八师撤至葛家神娄宅西塘桥附近休整。由庙行镇经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由第二五九旅接防。24日晨，日军五千人由张华浜登岸，开赴庙行救援被困部队，分两翼向我军进攻。我军由于激战两昼夜未得到歇息，势不能敌。被围日军乘机窜出。我援军及时赶到，协同拒敌，先将被围残敌消灭，再分路攻击援敌，日军全部退过侯家木桥。

25日拂晓，植田下令发起第二次总攻击。日军增援江湾、庙行，

向庙行前线第二五九旅、第一二二旅和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等新接防线进攻，炮兵用百余门重炮轰击我军阵地，步兵全力进攻江湾西北的小场庙。我军竭力死守。第六十一师正面金家塘一端被日军突破，退至严家宅、小场庙、竹园墩至庙行镇西南之线。庙行侧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阵地经不住五六十门大炮的火力，稍退至塘东宅水车头一带。小场庙我军兵力虽单薄，但并不畏怯，待日军逼近时用机枪扫射，相持至10时，日军派飞机侦察，指示炮击目标，我军始不能支，退至周吴黄宅。张治中令第二五九旅由庙行镇出击策应。12时，援军第一二一旅预备队也赶到。各军分三路合力反攻：由江湾出谈家宅攻敌左翼；由庙行镇沿塘东宅、水车头攻敌右翼；由周吴黄宅攻敌正面，形成大包围之势。日军冲击十余次，终不得逞。我军紧缩包围圈，同日军肉搏。血战至晚9时后，毙敌一千七百余人，其余日军突围败走。至此，植田布置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

植田令日军自20日发起总攻以来，激战6日，惨遭失败，主力疲惫不堪，故26至28日虽有冲突，但未起激战。26日拂晓，我军因战略考虑，主动将江湾放弃，移至镇西防守。防线改为北自金穆宅起，南迄杨家楼止，成一直线。第六十一师连日作战，伤亡极大，急待整理，因此总部是日上午11时发出命令，将小场庙竹园墩阵地交第八十八师接防，限晚11时以前接替完毕。

五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自22日庙行激战日军惨败后，植田即向东京求援。重光葵和野村也电请增兵。23日，日本内阁开会，决定抽调第十一师团（1.3万人）和第十四师团（约两万人）增援上海，派前田中义一内阁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充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菱刈隆为总指挥。29日凌晨7时，白川率领第十一师团先遣兵团到达长江口第一抛锚地区，至此，聚集在上海的日军已达近六万人。而我军仅有五个师作战，兵力不足四万人，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已达一个月，人员武器

丧耗极多，且补给无望，处境极为困难。

29日，在白川的部署下，日军开始全线总攻。凌晨1时，吴淞口外日舰向我炮台发炮，遭还击后退去。3时，蕴藻浜日军企图偷渡，被我军用机枪击退。5时，江湾方面，日军装甲车掩护步兵千余人向第七十八师谈家宅以东地区攻击，战至8时被击退。后日军增援，战至11时，仍不得手。8时，日军五六千人向庙行镇进攻，鏖战至11时不支退走。下午1时，日军千余人袭击严家宅，战至下午3时退走。是日战斗重心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第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向狄思威路退却。上午，日陆战队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八字桥、青云桥、宝兴路等处我军防线发起进攻，冲锋十余次，三次占领八字桥阵地，但终被我军夺回。日军死伤极大，遗尸累累，联队长林崛大佐被击毙。入晚，双方用大炮对射，至次日凌晨5时才停止。

3月1日，在白川、菱刈隆的指挥下，日军再次发起总攻。上午7时，日舰二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1万余人驶抵浏河，在炮火和飞机的支援下，施放烟幕作掩护，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杨林口和七丫口登岸。浏河由第五军教导总队第一营会同冯庸义勇军一百余人防守，兵力单薄。张治中将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第二六一旅两个团调往庙行镇左后方的唐乔田湾作为预备队，准备一旦战事发生，前可策应江湾和庙行镇，后可兼顾浏河。日军登陆后，即连占浮桥镇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搏斗，伤亡殆尽。张治中闻讯，立即派第二六一旅增援，但因汽车只有十一辆，每次只能输送一个营，大部分徒步，迟至12时仅该旅第五一二团第一营到达浏河，协同教导总队第一营顽强拒敌。而日军大部则已占据茜泾要点，故对已登岸的日军无法迫其退却江中。若等待援军，援军又不能准时到达，自吴淞、庙行、江湾闸北至大场、真如的第一道防线则势必遭到包围。并且我正面战场形势极为严峻，第五军正面和十九路军右翼第七十八师正面遭受优势日军的压迫，官兵伤亡很大。下午3

时，第七十八师正面自竹园墩南端至江湾以北阵地被突破，第五军右翼被日军包围，预备队皆已用尽。第六十一、第七十八、第八十八三个师已失去战斗力，第六十、第八十七师伤亡极大，总计我军能战斗人员不过三万人。在此形势下，1日晚9时，蒋光鼐总指挥在南翔指挥部下达总退却令："本路军为避免与敌决战，拟本日午后十一时，将主力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待机转移攻势。"(82)

总退却令下达后，江湾、庙行、大场等处我军逐渐向后移动，最前线仍继续作战，掩护退却部队，至2日凌晨5时，这一带部队撤至真如。日军直至2日下午才侦知我军退却，遂派部队向前推进，并移其第九师团司令部于真如。闸北我军于2日凌晨4时退却，留少数警察部队及保卫团驻守。日军不明虚实，未敢轻进。至下午1时，日军前锋部队在大炮的掩护下开入闸北。吴淞方面，我军经杨行、刘行、罗店向嘉定方向退去。这样，本日右翼军主力安全撤至江桥、南翔、广福之线，前线在真如和大场之线；左翼军主力脱离日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

3日凌晨1时，第五军正退集娄塘镇、朱家桥头一线，此时日军一万余人由浏河、大场两路排山倒海而来，袭击第二五九旅第五一七团娄塘镇一带警戒部队，但被我军击退。上午8时，日军又以主力分途向娄塘镇一带阵地进攻，第五一七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截断数段，各自为战，与旅部失去联络，伤亡较大，情况危急。张治中立即令驻蓬阆镇独立旅第一团赴葛隆镇增援，令教导总队移驻蓬阆镇策应，令第五一七团原地抵抗不可擅退，令太仓第二六一旅派有力之一部赴薛家泾附近掩护第二五九旅的左翼，令嘉定的第八十八师固守嘉定城并相机策应第八十七师。是役日军企图突破嘉定与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第五军及十九路军归路，因此来势凶猛，连占娄塘镇及其附近各村落要点，猛扑朱家桥头我军阵地。我军奋勇拼杀，誓死抵抗，血战终日，日军图谋未得逞，被击毙甚多。我第五一七团也损失过半。第八十八师被优势日军压迫，撤出嘉定城。而嘉定、太仓间的日军仍

极力压迫葛隆镇我军，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止我军归路。下午5时30分，蔡廷锴下令："我军拟今晚以各部强有力之一部控置于方泰镇、黄渡镇之线，纵长配备，左翼切实与第五军联络。"晚7时，张治中下令："本军遵令应以主力于今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83] 总部令第四十七师在青阳港一带构筑工事。

同日，十九路军暨第五军发表抗日通电，表示："惟有收合余烬，背城藉一，事之不济，则拼命于沙场，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也。"[84] 下午2时，日本对国联宣布停止战争。日军表面上宣布停战，但仍在积极部署：南翔方面为第九师团，嘉定方面为第十一师团，真如方面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吴淞方面为第四十四联队及陆战队一部，闸北为陆战队主力。

5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全部进入青阳港、陆家桥、白茆新市、常熟之线。下午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本路军拟占领青阳港、昆山城、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梅李镇、福山镇之线，其前端更派出警戒部队节节拒止敌人，如敌人以主力作真面目之攻击，万不得已时，则占领右翼，依据九里湖、凤里村、东湾港、唯亭、杨城【澄】湖至昆城湖及其北端亘常熟至福山镇江岸之线之预备阵地死守待援。"[85] 命令下达后，十九路军、第五军、第四十七师及其所属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总计参加沪战的日军达7.7万余人，我方参战人数约4.2万余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万人[86]，日军死伤共1.0254万人[87]。

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以寡敌众，坚持一月有余，给来犯之敌以狠狠地打击，谱写了一曲我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篇章。

六　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手定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及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交涉的程度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88] 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归何指挥；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指挥。这表明蒋介石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

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判断日军侵略的范围不限于上海一隅，有进犯我东南地区的可能，超出容忍的"最大限度"，因此在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蒋介石、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陈铭枢等纷纷表示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1月29日，蒋介石闻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89] 蒋还致电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师长徐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第十九路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昌严防，切勿分散。"[90]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指出："有关主权领土，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91] 会议推举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定抵抗日本的侵略，先将政府迁至洛阳，以免受日舰的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发表宣言，表示："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92] 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

锴和戴戟，内称：“在外交上暂视作局部问题有利，而在军事上中央已具全局应战之决心，惟调集大军不易，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作退后之辱也。”[93]

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案发生，“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94]。此电发表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95]。2月1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96]

国民政府同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工作。军事委员会对京沪卫戍作了全面部署：“如日以飞机及军舰向南京轰炸或炮击时，则可下令长江各要塞对日军舰即开始射击。现时并应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又如日以陆军一二师在上海登陆时，应令十九路及前警卫军全部以全力夹击而歼灭之”，“到达浦口之一旅应设法令其渡江，并调蚌埠四十七师填防浦口可也。”[97] 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加，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98] 自2月1日起，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事委员会通电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由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黔、鄂、陕、豫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99] 兵力总计有二百四十万人。“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

一防卫区部队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100]。同时命令沿江沿海各地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大筑工事，“战壕密布如网”[101]。

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的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102]

陈铭枢4日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可能派一个师团的兵力增援。蒋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103] 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发出指示电文说：“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可亲来指挥也”[104]。国民政府电调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第九师赴沪增援。同日蒋还指示何应钦：“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飞机应即参加沪战。”[105] 6日，汪精卫、李济深、朱培德等致电十九路军：“务望激励将士，固守原防，不可轻让尺寸。”[106]

蒋介石6日由洛阳到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去迎接他，表示愿意率中央部队参战。蒋马上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合编成为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参战。

十九路军炮兵太少，陈铭枢7日请求国民政府调炮兵一个营支援。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照办。同日，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据驻京外国武官得自东京传来确息，日有陆军一师已起程来华等语，预测该敌将由吴淞、浏河等处登陆，进击我侧背，希对该方面特别注意，派有力部队布防；如能乘其上陆之际设法加以痛击，尤为有利。”[107]

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五万元慰劳前线将士。

日军增援部队第二十四旅团抵沪后，汪精卫、朱培德为此致电蒋介石征求援沪意见。9日蒋复电道："增援淞沪，只要渡江无碍，第一师于三日内集中后，即可出发，七师亦可先调，决无问题。"[108] 蒋还指示刘峙和胡宗南师长："第一师速准备一旅步兵，限三日内候令调遣。"[109]

11日，何应钦派中央军校炮兵一个排开赴南翔，归蒋光鼐指挥。同日，军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队一个中队抵达十九路军总部。军政部并且拨工兵教导队的架桥爆破两个队及中央军校野炮一个连来沪助战。13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须从举国一致着手，以广土众民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110] 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进攻吴淞的战略失败后，日援军第九师团统辖的三万人陆续抵沪。14日，陈铭枢按蒋介石嘱咐，电达蒋光鼐："谍报闸北等处敌方阵地已调陆军接防。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然后别作良图。现已准备加调八十七师孙元良增援。总司令并电韩向方、刘经扶、上官云相、梁冠英共选现役徒手兵三千，输送来补充代募五千新兵矣。"[111] 15日，汪精卫致电已至全州的张发奎第四军（原计划北上支援黑龙江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112]

16日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113] 蒋并且致电俞济时转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114] 18日，植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

通牒。该通牒的要求已超过南京国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获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115] 何应钦认为"求妥洽而不可得，欲忍辱而不可能，势非积极准备军事彻底抗战，再无交涉妥协之望"[116]。蒋介石同意中央驻蚌埠的四队飞机、留江西的两队飞机，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15日、17日、19日，蒋分别令十九路军接受上官云相、梁冠英和刘峙等部挑选的增援上海的士兵两千人。

为抽调援军赴沪，21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和朱绍良："第十与八十三师令其星夜开浙，第十八军如不得已，令其先击破攻赣之匪后，再行出发亦可。"[117] 22日，蒋致电刘峙："第一师自即日起极秘密，每深夜陆续开动，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之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118] 23日，蒋致电朱绍良和蒋鼎文："限第九师于下月三日以前集中杭州勿误。望严令星夜兼程前进。"[119] 24日，蒋又致电刘峙，限第一师于27日前全部集中浦口。鉴于浏河一带河岸，是杂有碎石的沙滩，最适宜于日军登陆，蒋介石于25日致电蒋光鼐注意浏河方面的戒备，"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120]。

日军在实施"中央突破"计划时，在庙行镇遭到我军重创。2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和俞济时："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121] 同时，蒋对援军作了部署，指示鲁涤平："戴旅应集结两团兵力于沪杭路，随时应调，对乍浦方面只派二营可也"；令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派1个团赶赴前线，归十九路军指挥；令卫立煌军长"饬八十三师与第十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122]。

3月1日，陈铭枢复电十九路军："总座（指蒋介石——引者）已

令上官师京镇部队限即刻赶赴昆山转太仓，并令该师现在黄渡之一团赶赴嘉定矣。”[123] 此前2月29日，第四十七师第四团已抵达昆山。3月1日该师主力齐集昆山，当晚驰集嘉定、太仓间增援。2日，蒋介石训令蒋光鼐等：“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124] 3日，第九师先头部队抵达常山。4日，第九、第十师赶至杭州附近。

10日，蒋介石决定第二期作战方案，判断日军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以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125]。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率第二、第十四军自赣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十九路军抗战。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万余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榴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而先后所调援兵，连第五军已达十师以上”，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到达”[126]。

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进行抵抗的同时，又在寻求妥协。他们力图限制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调集援军不力，仍以主力部队“剿共”；希冀通过英、美等西方大国和国联的介入，及早同日本达成停战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何应钦就致电各省，警告说：“误用正当防卫转成诱起战争之口实，国际同情亦易随之而失矣。”[127] 30日，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向何应钦请求参战，遭到拒绝。31日，何应钦

致吴铁城等电："惟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长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128]。

2日，蔡廷锴接何应钦来电云：战事可止即止，"如敌人允撤兵，我亦不反对，除戒备外，暂行停止进攻"[129]。3日，何应钦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决不与任何邻邦轻启衅端。进一步言，即遇与邻邦有所争议时，苟可用外交方法解决者，亦决不轻易诉诸武力。"[130]

自1月29日起，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中日之间调停。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131] 6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称："以弟个人观察，能从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132]

5日，何应钦指示："我原配属十九路军在江西剿匪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133]

自5日至7日，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抵达上海。十九路军电请汪精卫等派兵增援。汪精卫却对记者称："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系余向所主张，今仍未变。"[134]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Kelly）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W．Lampson）分别于2月6日和12日提出调解中日冲突的新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满足日方的要求，将东北问题和上海问题分开解决，而且主张中国军队单方面先撤出上海市区。对此，国民政府竟然表示接受。

8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等："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

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请兄等商在沪外委从速设法先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135)

就在十九路军在闸北、吴淞同日军鏖战，日援军源源不断抵沪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仍坚持同日本谋和。9日，蒋介石向何应钦、陈铭枢指示作战方针时称：“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136) 同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圆【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137)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通过两条渠道同日方谈判。一条是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陈仪13日在上海与日本公使馆武官原田熊吉会谈。外长罗文幹遵蒋介石之意致电蔡廷锴：“请兄等仍斟酌外部前开接受英、美调停办法各电，及陈公侠（即陈仪——引者）兄所言、王俊所述办法，择其于我有利者从速进行。”(138) 另一条是通过英、美、法公使在中日之间调停，力求达成妥协。蒋介石嘱咐陈铭枢电达蒋光鼐：“与美、英、法使磋商办法，果能办到，则和平可望。”(139)

10日，何应钦以“吴淞炮台既失炮战能力，徒以步兵据守，任日海空军之轰炸，殊非得计”为理由，命令十九路军“酌量后退”，具体方案是：“第一步以杨家行、大场、真如为本抵抗阵地；第二步以浏河、嘉定、南翔为本抵抗阵地”；“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则作为前进阵地”(140)。11日，何应钦电令蒋光鼐：前线配置的兵力“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141)。这种方案实际上是让十九路军听从日方的要求，放弃吴淞、江湾、天通庵一线阵地，后撤到浏河、南翔一

带。

12日，何应钦向吴敬恒解释“适可而止”的含义说：“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兼之赣、鄂两方，为匪所牵制之部队在三十余师，且均较称精良者，一时俱难抽调。如事态扩大，势须强抽，剿赤措置是否不顾？此又一般人所熟虑者。”(142) 同日，何又致电蒋光鼐等：“严令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挥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143)

十九路军总部据各方情报判断日军援沪的兵力约有二万人，但连日作战伤亡极大。13日晨日军强渡蕴藻浜，与我军激战，总部决定乘机消灭日军。下午3时总部发出命令，决定当晚全线转移攻势，一举歼灭日军。但该日蒋介石到浦口，召见罗文幹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144) 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解释道：“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145) 结果我军丧失了攻敌时机。同日，汪精卫表示：“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干涉日本。”(146)

14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无如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赤两难兼顾。”(147) 其时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所部先头部队抵达湖南零陵，准备继续开往武汉增援上海。日方威胁日海军将开炮阻止张发奎军渡江。何应钦担心如此武汉“不免形成沪局第二”，商议结果“似以该部暂驻萍乡协同剿赤为宜。且抗日剿赤关系均重，即与该师为国效命之初衷亦仍不稍违也”(148)。15日，汪精卫在徐州各界纪念周发表演讲称：“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149)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150)

2月中旬，蒋介石返回南京，京沪卫戍公署向他提出让邻近上海的军队增援。蒋介石从兵力、运输角度论证日方之强、我方之弱，不肯增援。蒋对敌我形势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淞沪抗战时，中国国防力量固然薄弱，但日本也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对上海的进攻带有局部性和试探性。从兵力上看，日本常备陆军有17个师团，二十六万余人[151]。而中国有一百多个师，二百余万兵力。国民政府如果有“攘外”的决心，是可以在上海制止日军扩大战火的。但它念念不忘“围剿”红军，不愿投入主力部队抗日。

就在我军在前线拼死打破日军“中央突破”计划之际，23日京沪卫戍公署参谋邓世增进见蒋介石，催速增援，而蒋却产生将我军撤退念头，说：“预算增援部队须在十日之后，希嘱蒋、蔡诸兄务照原定计划，迅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久抵抗。至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行决定。”[152]

上海我军总部考虑到日援军源源不断抵达上海，而我各方援军直到3月5日、6日才能到达，与其坐待败亡，不如乘机与敌决战，即使不能使战局好转，也可将日军主力第九师团击破，从而延长第二次会战的时间。是故25日晚9时，我军总部发出命令，决心破釜沉舟，以全军与日军决战。命令发出后，接蒋介石训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即2月29日和3月1日——引者），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即3月6日——引者）不能参加战斗。”[153] 我军总部遂令停止出击。

十九路军自开战以来连续作战，兵力已损失一半以上；第五军经庙行、江湾会战后，人员损失四分之一以上，全军已陷于残破不堪的困境，而日援军大批抵沪，为保存战斗力，我军准备于27日晚撤至真如、刘家行、罗店之线。我军面临如此困境，国民政府不仅不积极调集援军，反而将抵达前线的援军分出他用。27日，陈铭枢致电汪精卫，询问：“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正伦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

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154] 28日，陈铭枢两次致电汪精卫，对援兵不继表示无奈和不满，他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155]

浏河的危急情况，十九路军是知道的，所以请军政部速派2个师驰援，但军政部置之不理。

3月，蒋介石致其兄介卿书，辩解他在此次淞沪抗战中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袖乎（手）观变”或“调援不力”[156]。蒋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多月间，日海陆空军不断增援上海。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政府调集援军不力。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驻浙江的戴岳旅，驻江北的梁冠英第三十一军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不予支援。就连留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指责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事前缺乏准备，临时又无增援”[157]。

淞沪抗战是十九路军自发抵抗引起的，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对十九路军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后又派第五军直接参战，从而使淞沪抗战成为第一次在中央政府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局部抗战。这与“九一八”事变后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非常积极，也不表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它指导淞沪抗战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个“两面”政策受到“安内攘外”基本政策的制约，并服务于该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倡导的“抵抗”，不是坚决、全面、积极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其基本意图是避免战事扩大，通过局部的、有限的抵抗，在抵抗中积极进行交涉，以争取一个较有利的条件实现妥协停战，然后转向“安内”工作。综观淞沪抗战的全过程，可看出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的方针具有抵抗和妥协的双重性。当然，它的妥协退让有一定的限度。当日本态度强硬，超过国民政府妥协的最大限度，即危害到国民

政府统治的根基时，它就以抵抗为主；反之，只要在限度以内，它总是力求妥协。

七　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在淞沪抗战中，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上海，1月27日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号召党组织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并号召上海工人群众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158]。2月2日，中共发表《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海陆空军出境！”[159]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他们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前线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他们还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前线战士每天的两顿伙食。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线。

1月30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各厂工人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建立上海各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加入罢工委员会的有同兴、喜和、日华、公大等三十余厂。中共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简称“民反”）积极支持淞沪抗战。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组织工兵代表会议。“民反”义勇军在上海市大约有二三千基本群众，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四个区受党团影响较大的工厂为主。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

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这些错误认识在淞沪抗战中导致了一些错误行为。

中共临时中央对待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态度和对十九路军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临时中央领导人认为蒋、蔡的抗日行动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160)]，是“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消灭他们的革命行动，以便进一步的出卖中国”[(161)]；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162)]。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163)]。这些宣传损伤了共产党的形象，为国民党的攻击留下了把柄。

就在淞沪抗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164)] 这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中共临时中央还作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说：“目前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及行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拥护红军、苏维埃等更紧紧地适合地联系起来。”[(165)] 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主张由武装的工农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十九路军士兵追击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166)]。

上述这些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如左倾领导人计划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3月1日撤离第一道防线之际，翌日发动武装暴动，占领闸北，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一二八”抗战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何香凝挺身而出，声援抗战。她们不仅发动和联络海内外力量支援淞沪抗战，而且亲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宋庆龄和何香凝冒着风雪到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仅一天时间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见官兵在大雪天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回沪后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运给全体官兵穿用。何香凝还组织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赴前线救护伤员。2月6日，宋庆龄到十九路军军部慰问。12日，宋庆龄不惧猛烈的炮火和炸弹的危险，赴吴淞前线，在翁照垣和区寿年的陪同下视察、慰劳将士。

上海各界群众汇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陈铭枢说：“上海孤军抗战之能维持到三十天，固然是为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众的实力上与经济上的援助。”(167) 翁照垣说：“这次的抗战，所表现的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是民众的力量，借着军队的武器去表现，这是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的。”(168)

1月25日，上海市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上海市民，断不丧失毫末，对于抗日救国之运动，誓必直【再】接再励。”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内称：“对于暴日之此种足以亡我中华民国之无理要求，迅行训令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决定武力与之周旋，全沪市民甘为后盾。”(169)

上海民众一致援助十九路军。上海市民救国联合会义勇军2月2日开赴前线。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呼吁支援上海军民抗战。17日，该会发表郑重宣言，坚决表示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到底。

18日，由上海81个民众团体组成的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集全体理事大会，决议派代表北上，敦促张学良带兵出关收复失地；募集上海一个月房租作为救国捐。参加中华国民救国会组织的义勇军，称为国民救国军，约有五千余人，分驻闸北太阳庙、引翔港、宝山路一带，与日军激战数次，颇占优势。由翁照垣旅长指挥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有的在前线奋勇杀敌，有的积极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上海卡车司机胡阿毛，在被日军强迫运输的途中，开足马力将所载的一车日军和武器弹药驶入黄浦江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上海工人阶级站在抗日的前列。1月30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罢工通告。总工会还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消防队，通令各工会尽力劝募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二千余人在李永祥和朱学范的率领下，开赴前线作战。2月1日，在华日本商轮上的中国工人罢工，使日本船舶开不进黄浦江。上海水木业义勇军五百余人5日出发，先在闸北中兴路、大统路与十九路军一起担任运输和建筑工作，11日正式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日兵运输需用卡车和驳船，无法找到中国工人，日人只得用巨金贿通上海某外人洋行，租用大卡车十余辆和驳船二十余只，往来吴淞、杨树浦一带，装运士兵及军火。2月10日该外人以每日五元的工资代雇上海驳船小工300人，派作运兵之用，当即被上海工人拒绝。外人又出巨金雇佣汽车夫数十人，派充往来淞沪之用，也被上海车夫拒绝。上海马迪汽车公司修理部工人要求厂主拒绝修理日军一切车辆，决心不达目的不复工。罢工后赶往我军后方办事处义务修车。

上海工商界发动罢市，捐献财物，维持社会秩序。1月29日，上海市商会宣布“日兵犯境，罢市御侮”。30日，上海市商会通告罢市，下午3时全市实现罢市。商会并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和现金。31日自早至晚，前往香港路四号银行公会市商会办事处捐献物品和现金的人络绎不绝。2月1日，申报馆爱国人士史量才和上海实业界、银行界人士王晓籁、虞洽卿及张啸林、杜月笙等人

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专职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接济难民的事务。4日，该会致电政府，请求援助十九路军。自2月3日至5月31日，该会共募得慰问十九路军的大洋二十七万余元。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到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将随来的二百多名童子军交给十九路军使用。8日，永安公司派人向十九路军送去大量的白兰地和六十年陈酒。

上海文化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家2月8日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9日下午该会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到会者有戈公振、王礼锡、胡秋原、陈望道、严灵峰、丁玲等人。会议决定设立经济委员会、民众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用募捐的钱购买军需物资，与各民众抗日团体捐募的物资一起，每日用汽车运往前线。民众委员会委员每日轮流随车到前线战壕里，边送物资边向战士宣传鼓励，并将宣传抗日的唱片带到前线。宣传委员会动员全体会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抗日文章，号召全国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23日，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举行盟员大会，丁玲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扩大组织，发表宣言，发动盟员赴前线慰问杀敌将士。

上海新闻界爱国人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号角作用。邹韬奋以《生活》周刊为阵地，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史量才主持的《申报》也发表了大量抗日的言论。

上海学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月31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联合国难救济会，购买食品犒劳十九路军。2月1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发表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通电。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中法药科学院等校学生2日成立“上海各医药学院抗日战地医事联合会”，共有会员180人，3日开赴前线从事救护工作。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不仅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做好战地勤务工作。

在淞沪抗战中佛教组织也显示了爱国心。上海市佛教会组织上海各寺院收容难民，筹款慰劳伤兵，并组织救护队赴前线工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支援抗战活动，或集会游行，发表通电；或捐款捐物，抗日宣传；或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敢死队；或直接参战，以身报国。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数百人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调兵援助十九路军。该校义勇军五十余人赴沪抗日。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及工界国民救国会促进会联席会议议决电慰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南京各界抗日会议决定募集物品慰劳十九路军，通电全国主张对日绝交，并要求政府准许民众组织义勇军。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决定电慰十九路军，致电国民政府调劲旅援沪。京剧艺人梅兰芳在北平开明戏院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寄往上海作为伤兵医院经费。南京中央大学铁血义勇军、西南在野军人抗日救国北上敢死团、四川敢死队等在翁照垣的指挥下，分别担任战地勤务、后方宣传、建筑防御工事、直接参战等任务。湖南省各界在长沙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日示威大会。津浦铁路工人组织义勇军。冀南豫北人民三万余人组织救国军。华北妇女抗日救护队在北平成立。东北冯庸大学义勇军三个中队由校长冯庸率领，投入前线工作。徐州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三十余人赴徐州北站向汪精卫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援助十九路军；维护爱国运动。广州市民召开救国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张家口分会救护队队长王志谦带领救护员27人赶赴前线。粤商陈炳谦捐款一万元，粤银公会汇款十万元，慰问十九路军。

海外华侨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为支援淞沪抗战，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有的寄衣服食物，慰问抗日将士。“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各省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都捐出了很多现金；尤其是遍布全世界各国的华侨，更为踊跃捐输。据总指挥部的报告，收到各处捐款，差不多有三千多万元之巨”[170]。有些华侨还亲赴前线，直接参加战地服务工作。1932年2月3日，约二百人的华侨义勇

队抵达前方，积极协助十九路军军医处救护伤兵。

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战也给予支持。美国飞行员萧特（Robert Short）志愿帮助中国空军打击日机的嚣张气焰。2月20日，他驾驶波音二一八型驱逐机从虹桥机场转场南京，在龙华上空遭遇所茂八郎等驾驶的三架三式舰战机。经过20分钟激战、萧特击落所茂八郎战机，并击伤另一僚机。22日，萧特与我大队飞机同时出发，由南京飞往杭州，因偶失联络，下午4时20分在苏州上空遇轰炸苏州的日机六架，即以一挡六，与之战斗，打死日飞行员小谷大尉，击落一架日机；萧特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群众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崇拜这些敢于笑对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在上海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这样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171]

第四节　英美等国的调停及上海停战谈判

一　英美等国的调停

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集中的地方。1931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4.3%集中在上海，约占直接企业投资的二分之一。其中集中了英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约80%、美国的约60%。日本的进攻对由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构成的远东国际新秩序提出挑战，并直接威胁着西方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和侨民生命安全，因此对英、美触动很大。英国政府对于中日纠纷的态度是：与各国共同拥护国联权威；自始即调解中日纠纷；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制止战争和流血[172]。美国的政策是：应尽量避免上海公共租界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在与各国使节和中日官方代表会谈时，将持公正的立场；保护美国人的合法权利，致力帮助冲突的各方尽快达成谅解[173]。

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了较“九一八”事变远为强硬的态度。1月27日，美国对日本可能在上海诉诸武力提出警告。28日，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W．R．Forbes）会见日外相芳泽，要求日本不要在上海采取侵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权益、财产和生命的行动[174]。2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通过福布斯照会日本政府，指责日军进攻上海的中国居民区和商业区，“这极大地破坏了整个上海港的和平，妨碍了这个港口的商业活动，严重威胁着公共租界的安全”，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在上海使用武力[175]。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训令英国驻日大使，就日本发动上海事变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限制日军的行动。30日，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日本进攻上海已引起爆炸性局面，责任在日本方面，日本不得利用租界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176]。

为向日本显示大国在远东的力量存在，英、美向上海增兵。1月30日英国取消远东军队的返回令，使驻沪英军人数达到2800人，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终日升火，处于战备状态。2月2日，英国一万吨级的巡洋舰“肯特号”从马尼拉启程驶往上海。迄至2月4日，英国在上海的陆海军总兵力达6600人。1月30日，美国驻马尼拉的亚细亚舰队开赴上海。31日，美国海军又派两艘驱逐舰分别抵达南京和芜湖。2月2日，驻马尼拉的美国陆军第三十一联队约一千二百人乘军舰赴沪。当然，英、美炫耀武力并不是要直接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是要日本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促成中日停战，避免在西方列强有重大利益的上海和长江流域燃起更大的战火。为此，它们在中日之间积极展开调停活动。

29日，英、美进行第一次调停。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J．F．Brenan）和美国总领事克宁翰（E．S．Cunningham）共同提出停战建议，日中两军间达成了晚8时停止战斗的协定。31日，英、美进行第二次调停。英、美驻沪总领事约中日当局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会晤，磋商避免战祸办法。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弗列明（George

Fleming）少将在会上提出：日军退至1月28日以前的状态，中国军队也退至安全地带，设立由中立国军队保护的中立区[177]。“盐泽司令官认为这意味着让租界以外的侨民也要撤退，遂当场表示拒绝”[178]。“日领仍以保侨托词，英领反诘颇厉，谓欲保侨而引起战祸，有战祸而侨愈不保，盐泽颇窘，但谓此事须请示日政府，约以3日为期，在此时期内，双方暂缓进攻”[179]。2月1日，英、美驻日大使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接受弗列明的调停建议。2日下午，村井通知上海市政府：日本政府不同意英国的调停办法。

同日，西方大国进行第三次调停。英、美、法、意等国对中日双方提出停战办法五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动；（二）双方勿再作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作战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国民政府4日照会各国，表示完全接受，仅请将“中立区域”字样改为“和平区域”，“中立国”改为“第三国”，并希望第三国不仅观察而且参与谈判[180]。日本政府答复道，对于一、三、四各项可以接受，不接受二、五项。并声明上海事件与“满洲”事件不能混为一谈[181]。“日本政府不接受中立国观察员或人士帮助解决满洲问题”[182]。英国外相西蒙得到日军大量增援上海的消息，立即电请史汀生将停战办法第五条改为只限于上海，不涉及东三省。史汀生不同意。

2月6日，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并提出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日军撤回1月28日原防，中国军队撤出闸北和宝山，退出的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防[183]。英方调解方案的重点在于上海租界的安全。7日，凯莱乘旗舰“肯特号”开进上海港，立即向盐泽和中方探询停战意向。盐泽告诉凯莱：如果中国军队撤退20

英里，他才会将日军撤至虹口[184]。重光葵拒绝凯莱的方案，坚持要中国军队先退出闸北。中国政府认为凯莱方案“大体公允”，就在凯莱提案的翌日，汪精卫发表谈话，表示“大体接受”[185]。但由于日本的拒绝，调停没有结果。8日，中国报纸披露日本要求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各大通商口岸划一个宽15至20英里的非驻兵区[186]。这增加了国民政府在上海对日退让的难度。

8日，英领事偕凯莱访晤重光葵。重光葵自恃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已抵沪，态度强硬起来，要求中国军队撤退15至20英里方可停战。9日，凯莱和野村在“肯特号”舰上会谈。野村表示日军“正如贵长官所说，对以铁路沿线为界大体上没有异议，但不可能撤至新公园附近。闸北的中国军队应撤到安全距离以外”[187]。

10日法国公使韦尔顿（H．A．Wilden）由南京抵沪。12日英国公使蓝普森（M．W．Lampson）和美国公使詹森（N．T．Johnson）也来到上海，各以私人资格进行调停活动。蓝普森联合美、法公使提议：华军应自动先退出上海市所管辖的区域，然后日军可退到公共租界及虹口一带[188]。下午6时，宋子文、顾维钧、郭泰祺和吴铁城先后往访英、美公使，詹森“所谈不多，彼且无确实具体意见”。蓝普森“所提之案，我军由吴淞、闸北沿京沪路撤退至真如站以西，换言之，上海市区域皆不驻兵，主张全由警察负治安之责。吴淞方面，日军亦撤退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原防位置”[189]。在沪的外交委员会委员认为，蓝普森提案是一个“抑我就日之案，我方绝无考虑接受之余地”[190]。12日晚，三国公使邀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参加会议，一同协商停战意见。会议决定以2日各国对中日所提五条办法为基础，特别注意中日两军间设中立区域这一点。13日，郭泰祺告诉蓝普森，中方原则上主动先撤军，但问题是撤退到什么距离？由谁担保日本撤军和日军不占领中国军队撤退的地区。[191] 14日，英、美、法公使及意代办与重光葵接洽。重光葵态度强硬，表示十九路军必须先行退出吴淞、闸北，再举行谈判，否则至少亦须日军

占领吴淞后，始有和解可能。各公使提出折中办法，主张中日军队同时撤退，中国军队退离租界五英里，日军退入租界内，中立区域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日方对此表示拒绝。第五军增援后，中方态度也变得强硬，不打算撤军。

日本拒绝英、美等大国的停战提议，并对上海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致使上海战火愈燃愈大。鉴于形势的发展，国联行政院不得不进一步采取强硬态度。16日，除中日之外的国联理事会十二位理事向日本送交一份紧急警告书，提醒其所负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的责任，即“凡轻视第十条之规定，蹂躏联合会会员领土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之举动，联合会各会员均不能认为有效”[(192)]。

日本完全置国联的紧急警告书于不顾。18日上午9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襄应蓝普森的邀请，在英领事馆与日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会谈。双方对于各自军队撤退的远近意见不一。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地区永久非军事化，永远撤除吴淞、宝山炮台装备。中方虽愿在两军之间开辟一个非军事区，但表示决不放弃吴淞。[(193)] 日本代表态度强硬，要求中方将吴淞、闸北军队撤退20公里，被严辞拒绝，谈判破裂。田代谓日方所提条件将于晚上9时左右用书面通知，希望中国急速答复。是晚8时40分，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村井也向吴铁城发出同样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20日7时前从前线撤退。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之无理要求，甚至有吴淞炮台不得重新设备，是直以庚子各国对于大沽炮台前例相加，故中国当然不能接受”[(194)]。

此前12日，中国代表依据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3月3日为大会开会日期。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立场，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

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他希望“世界其他各国政府能作一个类似的决定”，在法律上否认“以压力或破坏条约的方法所获得的任何名义或权利之合法性……使中国被剥夺的权利及名义得以回复”[195]。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准备加派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团援沪时，史汀生又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制裁日本的行动[196]。

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凯莱之请，偕军事当局代表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由凯莱居间调停，磋商三小时。最后商定五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提议永久撤除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行政权；（五）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197]又商议如中日政府对此赞同，即由双方外交、军事代表举行正式会谈，签订协议。29日，中国代表通知凯莱，中国政府答复赞同，并请其转达日本当局，倘日本政府也同样赞同，则可立即举行停战会议。

英、法公使28日、29日先后到达南京，与中国外交、军事当局磋商初步停战办法。其要点为：“（一）中日战事应于相约日期同时停止；（二）双方停战后，中国军队撤退十华里，日本主要部队全体退至安全地带，其程序当与中国军队相距二十至三十华里；（三）双方撤退时，由第三国派员分别监视，撤退之阵地亦由第三国派队驻守，此项部队待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时撤退。”[198]29日，国联理事会举行公开会议，决定解决上海问题的根本原则：在各国驻上海文武官员的

帮助下，迅速缔结有关停战的地方性协定，然后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国代表召开圆桌会议，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证措施和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协商。日本驻国联代表佐藤对此表示接受。但日军又对上海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即不欲停战，则上海国际会议无从开会，此种策略显欲一面在国际制造有利之空气，一面仍实行武力侵略政策”[199]。

3月1日英、法公使离京来沪，携带其方案准备与中日军政当局接洽，而此时中国军队已开始退守第二道防线。2日晚9时，日本发出停战复文，并向中方提出所谓立即停止敌对行为的四项基本条件，由凯莱转交郭泰祺，其条件大意为：“（一）倘中国保证将其军队由上海撤退至若干之距离（距离由中日当局决定），则日本允停战若干时（时期由中日当局议定），在未续有办法以前，中日军队各守原防，关于停战细目，由中日军事当局商定。（二）在停战期内，中日在上海开圆桌会议，由各关系国代表参加讨论，以其对于左段所开中日军队撤退方法，连同恢复并维持上海及附近之和平与秩序办法，以及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并界内外人生命财产及利益，得一协定；（三）撤兵（连便衣队在内）应由中国军队开始撤退，至一指定之距离：俟中国军队撤退查明属实后，日本军队即撤至上海及吴淞区域，可一俟平常状态恢复后，日本军队再由上海及吴淞区域内撤退；（四）倘有一方破坏停战条件，他方应有行动之自由；又第一段所开议定之停战期满时，双方均得自由行动。”[200]中国当局认为此四项条件与2月28日议定的五点相去甚远。郭泰祺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拒绝日方四项条件，中国竭力保护外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若圆桌会议系为安全问题而召集，则此种会议实无召集之需要”[201]。3日晨，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认为日本2日、3日对上海的进攻表明日本缺乏和平解决上海问题的诚意。3日，史汀生召见日本大使出渊，指责日本一面接受国联2月29日的决议，一面继续扩大军事行动

的做法，表示美国代表暂时不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扩大外国权益的圆桌会议[202]。

二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日本认为中国军队后撤，日本出兵的目的即将达到，但日军正在追击中国军队，担心国联要对日本发起制裁。因此，在国联特别大会开会前夕，3日下午2时，日本发布停战命令。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关于在上海切实停战、缔结协定及日军撤退的决议。

11日国联大会再次通过决议，重申国际联盟的有关规定，再次强调各会员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的原则，重申3月4日的决议；大会还决定由十九国组成远东委员会解决上海停战问题，并至迟于5月1日前向大会提出第一次报告书。史汀生支持国联大会采取的行动，并训令詹森和克宁翰参加上海和谈。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成立伪满洲国的关注，而3月1日伪满洲国已成立（详下）。要从上海着手对中国进行长期并且必然演变成全面的战争，日本当时还没有作好各方面的准备。这样，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同中国进行以停战和撤军为主的外交交涉。

通过蓝普森等的积极调停，3月14日，重光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郭泰祺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谈。经过一番争论，决定了作为以后谈判基础的停战撤军三原则：中国军队留驻现在位置，以待签订协定时为止；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一如1月28日事变前的状态。但考虑到容纳的日军人数，部分日军可暂驻于上述区域的毗连地带；由中立国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证明双方的撤军[203]。

19日中日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谈，“确定停止中日军队敌对行

为，并将日军撤退，而屏弃一切有政治性质之事项。至维持上海租界附近撤退区域内治安，由中国自动宣言，调遣特别保安队来沪，在日军撤退区域内服务”；日军暂驻于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毗连地方[204]。21日中日代表在各国公使的协助下举行第三次非正式会谈，确定了19日提出的停战撤兵三项原则，并议定从23日起在英国领事馆召开正式停战会议。

停战会议延期于24日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外交次长郭泰祺，另有军事代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和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首席代表为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另有军事代表陆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和海军参谋长岛田繁太郎。英、美、法公使和意代办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植田提出以日本22日另拟的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205]。郭泰祺表示会谈应以已确定的停战谈判原则为讨论的根据，日方新提案既不符合会议程序，且含有政治性质，“既与停战无关之新事物甚多，决不能作为今日讨论之根据”。虽然中方对日草案持有异议，但还是勉强同意以日方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首先讨论第一条，戴戟表示“取缔便衣队及停止一切刺激民众心理之行为等事均有政治性质”，不能讨论。双方对此辩论多时，但便衣队问题仍未解决，遂予搁置。继之讨论日方草案第二条“中国军队在以后另有规定前应留驻于现在驻扎地点”，郭泰祺认为这是对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内调动的限制，事关中国主权问题，应修改为“待至常态恢复”。植田坚决反对[206]。

25日，停战会议继续举行。讨论日草案第二条中“在以后另有规定”字样，双方争论甚久。蓝普森拟出声明：“不言而喻，本协议并不含有对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自由调动有任何长期限制之意。”[207]鉴于美、英公使的意见与中方大致接近，郭泰祺答应保留考虑后再议。随后中方说明中国军队驻防地点为：由安亭经蓬阆镇、袁家渡、沙溪、支塘镇、珍门庙，至唐方桥为止。这表明双方就日草案附件一达成了具体协议，此即停战协定附件第一号。接着讨论日草案第三

条。植田就中方特别关注的日军撤退时间和撤退区域提出道：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日军开始向第二道防线撤退，须六个星期才能撤完；由第二道防线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须视情况而定，不能指定时间。至于撤退区域，分为两个地带：（一）前线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点；（二）毗连地点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俟日期确定再行宣布。也就是说，日方打算分两步、两个区域撤军。本来在中日第一、二次非正式会谈中，双方已商定，日军撤退时尽量一步到位，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如人数实在太多，可允许一部分暂住在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的毗连地带。显然，日方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中方对此当然表示反对，认为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撤兵太迟，六个星期撤至第二道防线时间太长，劝日方缩短期限[(208)]。日方提议的第二道防线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的毗连地带指真如、大场、杨行、狮子林一线。中方坚决反对，认为范围过大。

关于日军撤退区域，“日本陆军主张现在占领地区的大部分、上海、吴淞地区当然在内，连离上海很远的松江也作为占领地不准中国军队进驻。另一方面，海军以保障通到上海的水路安全需要为理由，坚持中国军队须从黄浦江入口的南岸及上海的黄浦江对岸的广大地区撤退”。中方坚持“如果日本不缩短迄今为止的占领地区，就不停战”[(209)]。英、美等国代表认为中国军队将来不能进驻的地区，如果只是上海租界及与租界直接接触且有重要设施的地区，尚无妨碍，日军要维持现在的战线是不妥当的。为此，25日停战会议决定由中国代表黄强和日本代表田代另组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中国军队驻扎地点和日军撤退区域问题。

在26日的会谈中，中日双方均对日草案第四条及其附件关于共同委员会的组成及任务表示同意。对于第五条，郭泰祺认为日草案中已规定当日军撤退遇疑问发生时，由友邦代表查明，无须用飞机侦察。对于第六条，认为此时既已停战，“防止毁约，实为过虑”，没有讨论的必要[(210)]。蓝普森也认为应将此条删去。日方不再坚持。最后讨

论日草案第七条，日方主张停战协定中、日文并用。郭泰祺主张用中、日、英三种文字。英、法、美代表对此赞同，日方最后也表示同意。同日上午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日军撤退区域问题，“日将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放弃，提出吴淞、江湾、闸北、引翔乡四区为暂驻地”[211]。我方拒绝，坚持停战原则第二项，认为吴淞、江湾、闸北等处范围太大，非租界毗连地段，故不能同意[212]。日方则坚持分两步撤军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带。下午讨论时，日方放弃昆山、吴淞炮台区域，只要吴淞镇、张华浜一带，至江湾、闸北则保留再议。引翔乡毗连租界，为日军飞机场所在地，力主非暂驻该地不可[213]。随后日方允诺日军从前线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的时间从六周缩短为四周。

至26日，会谈取得的成果为：将日草案第一条具体化为停战协定附件第一号；同意日草案第三条为停战协定第三条；同意日草案第四条为停战协定第四条；删除日草案第五和第六条；同意日草案第七条，改为停战协定第五条。

28日，停战会议继续召开。讨论撤兵期限问题，郭泰祺主张日军应在一定期限内完全撤退，恢复1月28日以前的状态。日方重申第一步退至租界附近，原则上可定期限，至于第二步从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退至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则不能规定期限，须视地方情势而定，并谓日机可自由侦察中国军队防线。中方认为这将侵犯中国领空权，不能接受。29日，在讨论第一条有关便衣队问题时，中方坚决要求删除关于“便衣队”的规定，结果依蓝普森提议改为“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撤退时间问题，植田谓日军“撤退时间须视撤退地点而定，现地点在小组委员会讨论尚无决定，故已允之四星期亦须加以保留”[214]。

30日，军事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日军撤退地点问题。日方提出四个地点：闸北方面，为日本公墓至六三花园一带；江湾方面，为万国体育场一带；引翔方面，为杨树浦及其以东远东运动场一带；吴淞方

面，为吴淞镇至蕴藻浜、张华浜一带。四处各自分立，不相连接，至于距离若干，驻兵若干，按照地图均有详细规定，另要求于京沪、沪杭两铁路交叉处潭子湾、叉袋角一带驻兵。中方对此坚决拒绝，要求日方考虑江湾跑马厅以东、杨树浦以外、闸北区铁路以东、蕴藻浜以南及铁路以东等地为撤退地点。

31日，停战会议首先通过协定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暂驻现在防线，以待将来解决。但附加一项中方的声明："本条不能限制中国政府关于其军队自由行动之永久职权。"[215] 随后讨论日军撤退区域和期限时，中方表示：日方要求的撤退区域过大，且撤退无定期。日方代表则坚持视地方秩序完全恢复之后决定撤兵日期。郭泰祺"即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取消戒严为上海秩序业已恢复之明证，促日方从速撤退"。日代表仍坚持认为秩序未完全恢复[216]。同日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军撤退区域问题，结果为"除闸北之三角地面华人欲以铁路以东之一区域代替外，关于其他各地方，双方达到一试行之协定"[217]。即引翔方面，为引翔港一带；江湾方面，为万国体育场一带；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至蕴藻浜张华浜一带。实际上日方作了一点让步，对于闸北区域，要求以六三花园日本公墓以东为撤兵暂驻地，放弃江湾镇及吴淞炮台，"自江湾镇至以吴淞河栈桥为中心二基罗地点之间各处，保有一部三角地带为暂驻地点"[218]。关于闸北，我方不同意日军退至日本公墓至六三花园一带。这就是说，中方在日军暂驻的"毗连地段"问题上作出让步，即对日方提出的吴淞、江湾、引翔港三处不再表示异议，只对闸北一地表示异议。

此后，日军撤退时间和撤退区域问题是中日双方谈判的焦点所在。

4月2日，停战会议仍讨论日军撤退期限问题，分两步讨论：第一步日军自前线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日方表示于六星期内完成，我方坚持以三星期为限。尔后商定折中办法，规定停战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日军开始撤退，四星期内完成，但日方尚未完全同

意。第二步，讨论日军自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撤至1月28日以前的原防，此是争论的中心，日方坚持待地方秩序完全恢复后才能进行。在军事小组委员会上，首先讨论日军撤退地点。日本代表除坚持闸北地区外，另要求将吴淞方面扩充，包括吴淞炮台及曹家桥，中方不同意，会议陷入僵局。各国公使谓，日方如欲坚持闸北，则将蕴藻浜北岸吴淞镇一带放弃。日方仍反对。在继续讨论中，日方节外生枝，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以南与南市、浦东等处的防务情形，中方谓此与停战会议无关，不能回答。

日方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南与南市、浦东等地的驻防情况，其目的是要求中国军队从这些区域撤走，使上海周围地区非军事化[(219)]。日方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牵扯了停战协定第一条迟迟得不到确定。这成为中日谈判的又一个焦点所在。

4日下午3时，停战会议开会。植田发言，强调撤退期限须视日后情形而定，又谓华军驻防地点与日军撤退至为有关，请求中方说明苏州河以南华军驻防情况。郭泰祺认为该项讨论与本会议议题无关，本会主要讨论停战与撤兵。事关中国主权，中国军队驻在本国领土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况且此次南市中国军队并未参战。会议争论该问题达两小时之久，没有结果。会议继续讨论日军撤退期限问题，也毫无收获。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军撤退地点问题，江湾和引翔港达成协议，日代表声明放弃京沪、沪杭铁路交叉点潭子湾及叉袋角一带，但闸北及吴淞镇两地仍未达成协议，中方反对日军驻在吴淞河以北地区。

6日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就日军退驻“毗连地带”的具体范围初步确定四处：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包括张华浜车站，东至黄浦江，成一半圆形之地点；江湾方面，东北自殷行镇，西南至万国体育场，成一长圆形地点；闸北方面，在横浜桥东，包括六三花园、日本公墓及天通庵车站，成一三角形地点；引翔港方面，东至黄浦江，南接公共租界杨树浦东端，包括沪江大学及引翔港镇，成

一扇面形地点[220]。但以上四处双方同意不得妨碍交通，所以吴淞方面的张华浜车站和闸北方面的天通庵车站均可通车。中方声明，如日军撤退期限未定，则此次协议亦作无效。会议决定7日下午2时双方代表及各国武官分头前往实地视察。

7日，植田在停战会议上重提苏州河南及浦东一带中国军队防务问题，郭泰祺当即驳斥。双方相持甚久。对于日军撤退期限，仍坚持各自的立场。最后，蓝普森提出折中办法三种：一、日方发一单独宣言，日军期望于六个月内，地方情形进展至确保安全之时，完全撤退。二、中日共同宣言附加华方声明，非至日军完全撤退，中国认为本协定尚未履行。三、华方发表单独宣言，非至日军完全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地区，中国认为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及本协定尚未履行[221]。以上三种调解办法，双方代表各自请示其政府后，再行讨论。

8日，军事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日军暂驻地区问题，在6日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一致：一、吴淞方面，于蕴藻浜北岸纵横各2000公尺，南至外马路附近，西至康家河及北泗塘河，北达印家宅、孙家楼，东至黄浦江畔，但吴淞镇、淞沪铁路、同济大学、中大医学院、中国公学等处，日军均不得驻扎，其周围边界，则以附近小河为天然界限。二、江湾方面，以淞沪铁路以东的跑马场及殷行乡属之，其周围亦以小河为界。三、引翔港方面，自引翔港西北至军工路之一部，但沪江大学不在此限。四、闸北方面，为六三花园、日本公墓一带，西以横浜东以淞沪铁路为界。吴淞方面，经各代表亲自考察，规定较详。其余三地均未作最后决定，俟11日考察后再行讨论。

9日下午5时，停战会议继续讨论日军完全撤退期限问题。日方表示对英使折中办法第一种可以接受。中方谓三种折中办法对所要求的日军最后撤兵期限问题均未确实解决，且涉及日侨生命的保护和安全等政治问题，不能接受。对于日方准备接受的第一种，中国政府原不同意，但提出修改意见，将第一种办法中的“期望”二字改为“切望”，并将六个月撤兵期限改为三个月。日方坚决不同意，争执多时。我方

遂改为四个月，日方仍不答应[222]。蓝普森提出调停方案："对中国方面撤回把六个月的时间缩短为四个月的要求，对日本方面希望在日本声明中改成中国所要求的'恢复平常状态'，以便妥协。"[223] 敦劝双方再请示各自政府。本日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浦东及苏州河以南我军驻兵问题，仍无结果。

11日，停战会议军事小组代表赴殷行、江湾、闸北，实地勘察日军暂驻区域。下午3时，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继续讨论浦东及苏州河以南中国驻军问题。双方重复以往的争论，未取得任何结果。但对于吴淞、江湾、引翔和闸北等日军暂驻区域，在地图上详细标出。至此，解决了日军撤退区域问题。

14日上午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日方代表要求中方说明中国军队在浦东及苏州河以南驻扎情形。中国代表认为日方别有用心。随后双方又展开争论，毫无结果。

由于日本不确定撤军的时间表，中国政府11日将争议不决的日军撤退期限问题提交国联十九国委员会讨论。16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开会，经过三天的秘密讨论，于19日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该决议案声明日本对国联"三月两决议案须切实遵守。日军未全撤退前，不能认为履行决议案"[224]。日本认为，鉴于十九国委员会的性质，它无权审议和决定停战条件，所以坚决反对该决议草案，尤其反对其中的第十一条，即"日本军队的完全撤退，应合理地予以实施，根据当事国之一的请求，将宣布其实施时间到来的权限"交给由在上海的中立国代表和日、中两国代表组成的共同委员会，该委员会采用多数表决制。这等于将日军撤退时间的决定权委托给第三国，日本绝对不会容忍。日本陆军认为这一条款侵犯统帅权[225]。于是蓝普森和国联秘书长德鲁蒙（E．Drummond）等人出面斡旋，提出折中办法，将第十一条改为"共同委员会依照停战协定附件规定表决之办法，对于两国履行协定认为遇有忽略时，有促令其注意之权"[226]。由此国联决议案的权力大为缩减，不能确定日军撤退时间，如日方不按时撤军，

仅有“促令其注意之权”。这实际上成为停战协定附件第三号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对此默认。

22日晚，蓝普森与郭泰祺由沪抵京，协商沪事解决折中办法。25日，外长罗文幹、次长郭泰祺偕蓝普森会晤蒋介石和汪精卫。汪表示，蓝氏的折中方案是中国政府所能退让的最低限度[227]。26日，蓝普森与郭泰祺由京返沪。27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张似旭与日使馆二等秘书冈崎胜男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整理双方历次会议讨论的淞沪停战协定条文。是日上午重光葵通知蓝普森，日本政府对折中办法表示接受。这样，中日双方对停战协定附件第三号达成协议。另外，对停战协定附件第二号中关于日军撤退时间也达成协议，加上4月11日日军撤退区域问题的解决，这就表明双方就停战协定附件第二号达成了协议。

28日下午3时，郭泰祺与日本代表及英、美、法等国公使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非正式会议，将中日双方已接受的蓝普森的折中方案予以形式上的通过，并入协定附件第三号中。29日，日本在上海的军政要人白川义则、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重光葵等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并举行阅兵式时，被朝鲜独立党员尹奉吉掷弹炸伤，但经中、英、日三国外交当局的接洽，决定停战会议继续进行。

30日，国联大会召开，通过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中日停战决议案十四条。

5月1日，外交部训令郭泰祺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同日，重光葵接到外务省训令，表示虹口炸弹案与停战会议无关，但坚持苏州河以南及浦东不准中国军队驻扎。2日上午，英使通知各国小组会议代表会同中方代表，非正式讨论重光葵的意见。中方表示坚决拒绝，会谈又成僵局。蓝普森派英国军事代表桑布尔（Badham Thornhill）调停。晚6时，桑布尔和中日代表开会，结果达成协议，即中国代表口头声明：在龙华东西一线以北的浦东地区没有中国军队，将来中国当局也

无意向该地派兵，但为了维持治安，在必要时保留派遣军队的权利[228]。日本不再提及苏州河以南及浦东中国驻军问题。这样，双方就停战协定第一条达成了协议。至此，停战协议共五条、附件共三号均已谈妥。小组会议从此结束，并将议决各案移交5日的停战会议决定。上海民众得悉淞沪停战协定对中国的利益损害很大，颇为气愤，5月3日，郭泰祺被抗日救国团体代表四十余人殴伤左额。

5月5日，停战会议开会。出席代表，中方为郭泰祺的代表张似旭，军事代表戴戟和黄强。日方为重光葵的代表使馆一等书记官守屋，军事代表田代和岛田。中立国代表均参加会议。《淞沪停战协定》先后由在四川路福民医院的重光葵和大西路宏恩医院的郭泰祺签字。该协定共有五条、附件三号。协定第一条规定："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的地位。"附件一还规定中国军队的留驻地位为，从安南镇正南苏州河沿北经望仙桥，然后至西北长江口上的浒浦口[229]。在中国领土发生的一切停战疑问，中国无权过问，而需要第三国来查明处理；中国无权宣布"常态"的恢复，也无权改变其驻军地位，从此中国失去了在上海的驻兵权。这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严重损害。国民党后来尝到这种苦果，所以在1936年9月外交部长张群与日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时，要求取消上海停战协定（详后）。

协定全文签字后，日方代表宣布日军自5月6日起开始撤退。

日本侵略上海对英、美等西方大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破坏了远东均势。英、美等国调解上海事变的目的在于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地区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它们此时的对日态度比"九一八"时期有所不同，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谴责和牵制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使日军不敢在中国放胆侵略。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军民的抗战。但英美等国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世界和平的大局和国际公约的权威之上，不从世界安全的大局着想，不考虑帮

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中国要求制裁日本的呼吁，不遏止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结果放纵了日本侵略，引火烧身，自食其果。国民政府利用英、美等大国和国联与日本的矛盾，积极要求它们对中日冲突进行干预，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的抗战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外交解决问题，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错误政策，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托于大国的调停，结果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而告终。

第五节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与国难会议的召开

一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淞沪抗战爆发时，驻泊南京下关有三艘日本军舰，随后增至七艘。南京当局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判断失误，认为日军进攻上海仅是其“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230]；战火将扩大至全中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231]。南京当局惧怕日本的原因在于防守首都南京的兵力空虚，其统辖的主力部队均集中在鄂、赣等地“围剿”红军，防卫京、沪、杭的军队，除十九路军外，只有第八十八、八十七两个师的兵力。南京当局担心一旦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推进后，势必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因此决定迁都至中原腹地洛阳。另外，迁都还可显示国民政府“长期抵抗”日本的姿态，以弥补“不抵抗主义”招致的责难。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表示：“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232]随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各自发表谈话，声称日军对首都南京的威胁将危及国家的政务中枢，重申国民政府迁都的目的是出于长期抵抗的决心。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机关从1月30日起，陆续从南京移至洛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也于当日动身赴洛阳。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徐州，准备前往洛阳。2月1日、2日将所有印信及案卷输送洛阳，所有职员一律随同前往。国民政府迁洛后，军政部和外交部留守南京，何应钦、罗文幹和陈铭枢仍留南京办公，由何应钦负责一切事务；汪精卫、国民党中政会在洛阳办公；蒋介石往来于洛阳、南京、徐州、浦口等地，进行全盘决策；宋子文、郭泰祺、孔祥熙等常驻上海，由宋子文指挥。

3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洛阳为行都，并设陪都于西安，定名西京。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得以暂时苟安，加上“自称革命的新贵们”的国民党政要自迁都洛阳后，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立即垂头丧气，表示不满，希望尽快还都南京。5月14日，汪精卫、居正通电称，国难严重，政府此时不应迁回南京。回京问题，须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33]。6月，国民党某中央委员表示，国都由洛阳迁回问题，外界传将于7月进行，但东北问题未解决，理论上固然不好表示迁回，但事实上行政院原在南京办公，不过送洛阳用印而已[234]。这样，还都南京问题暂时搁置。

11月17日，国民党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定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迁回南京。12月1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回京典礼。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主持召开了国难会议。

二　国难会议的召开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和上海的战争，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难。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及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集合全国人民共谋拯救国

难之道，由此掀起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浪潮。

1931年11月2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推举蔡元培向大会提出一项临时动议说："现在国难正急，中央亟应延揽各方人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一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235] 国民党四大第九次会议对此原则上予以通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九八次会议，决定由叶楚伧、戴季陶等七人筹备国难会议，并决议国难会议组织大纲为："决定国难期内外交财政军事及关于国难一切临时设施方针"；"国难会议决案，由中政会转国府执行之"[236]。

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孙科、何香凝、王法勤、李烈钧等部分中央委员在会议中提出提前结束训政（按照国民党中央以前的决议，训政应于1935年结束）筹备制宪的提案。全会主席团将上述提案合并，整理归纳为两条原则：一、召开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二、国民救国会议的召集，交由国民党中常会筹议办理。12月28日，全会作出决议：由国民政府半个月内召集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等事宜[237]。1932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于2月1日在南京举行国难会议，由行政院办理。

国难会议会员人选，经国民党中央物色，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共同分四批公布，共五百二十余人，其中有旧北洋系军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政要、外交人士、金融人士、工商界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交通界人士、华侨领袖、满蒙王公及活佛等。首都各界抗日会认为国难会议会员人选未能真正代表民意，曾决定请国民党中央从速召开国民救国会议。

因国难会议会员散处各地，淞沪战事引起交通阻隔，经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同意国难会议改在2月11日召开。淞沪抗战爆发后，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国难会议筹备不及。在此情况下，又决定改在4月1日举行。后仍因时局混乱，3月22日行政院第十四次会议决定

国难会议再展期至4月7日开幕。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即将召开的国难会议纷纷表态，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国难会议平津会员吴鼎昌、左舜生、王造时等人公开披露他们拟向会议提出的重要议案，即对日作正当防御抵抗到底；从速结束党治，实施民治[238]。江苏国难救济会请求政府明令允许人民公开组织政团；停发国民党各级党部经费；集合全国人才，组织国难政府；3个月内开始实施宪政；5个月内成立民意机关[239]。全国救国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对日采取抵抗政策；罗致人才，组织国难政府[240]。

3月11日，行政院公布《国难会议组织大纲》，其中第二条称“国难会议委员由国府就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之人士聘任之”[241]。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国难会议的性质是少数名流参加的咨询会议，对国民党没有约束力。其时某国民党中央委员放出空气说：“国难会议并非立法机关，亦非执行机关，不过讨论出办法来，供中央之参考。”[242]接着，国民政府公布了《国难会议议事规则》，其中第四条规定，国民党中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院长及各院所属部会的部长、委员长均得出席。这反映出国民党想一手包办这次会议。第二十一条规定本会议设置御侮、救灾、绥靖等审查委员会。此条的用意是严格限制会议的议题，不可越雷池一步。3月24日，国民政府明令国难会议4月7日在洛阳举行，并通知各会员，声明“不谈政治”[243]。

被选为国难会议会员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国民党限制会议范围表示不满，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立即结束党治，实施民治。3月底，平津国难会议会员熊希龄等八人抵达南京，向汪精卫询问国难会议的范围，要求结束训政，实现宪政。汪答：中央决定会议范围为御侮、救灾、绥靖，行政院可负责答复。超过此范围，本人不能回答[244]。并生气地表示：“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245]

上海和平津的多数会员以政府限制国难会议规条，拒绝赴会。上海的张耀曾、王造时、张一麐、沈钧儒等发表通电说："遵召赴会，为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会议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246] 平津会员熊希龄等在宣言中则说："倘赴议而默然，则与同人奔走国难之初衷相违反；倘言而不及根本，则上述三项（指御侮、救灾、绥靖），政府固已优为之矣。"[247]

4月7日上午10时，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原定会员有五百二十余人，结果到会者仅144人。"平津国难会员以政府不许讨论政治问题，多不欲与会。平津会员九十余人中，去者不及二十人"，"在沪七十余人之国难会员，去者亦属寥寥"[248]。"乃自职权被限，会期复促，政府无邀请全体必须到会之心，亦未期待该会必受重大效果，故反对派之有组织者，相率缺席，多数智识分子，因洞察前途，亦遂认为无到会必要"[249]。

汪精卫在开幕词中一方面强调要振兴民族意识，抵御日本的进攻，另一方面又重申国难会议的范围，说："在国难会议里讨论御侮、救灾、绥靖与各事宜，所以如果是在这范围以内的问题诸君讨论所及，行政院是当然负责答复，但是如果在范围以外的问题，则恕非行政院权限所能负责答复了。"[250] 下午2时，召开国难会议预备会，选出王晓籁、张伯苓、高一涵、刘衡静、童冠贤组成主席团，同意汪精卫提名章嘉呼图克图担任国难会议名誉主席。

8日上午，国难会议开第一次大会。大会设御侮、救灾、绥靖三个审查委员会。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作关于御侮、救灾、绥靖问题的报告，冠冕堂皇地表示："近来各方面颇望缩短训政期限，实行宪政，此点余可代表本党与政府同人明白表示，极端赞同"，"并可正式声明，宪政开始，决非谓必须俟地方自治完成以后"，"而将训政时期延长，更无以对国人"[251]。外交部代表黄朝琴作外交报告。下午由

军政部代表曹浩森作军事报告，财政部代表黄维钦作财政报告。9日原定开大会，因会员提案达二百七十余件，建议书108件，遂决定开分组审查会议，整理提案。晚7时，汪精卫宴请国难会议会员，发表演说，说明在洛阳开会之要义，表示要“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252]

10日上午，国难会议召开第二次大会。汪精卫作关于军事、外交、财政的补充报告。他表示：“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协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反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253] 会议讨论御侮问题，决议：“甲、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国，政府应兼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原则之条约概不得签订。乙、在政府努力实行上项原则之时期内，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之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积极联络主张正义维护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各友邦，以期充分获得各国之同情并巩固太平洋之永久和平。”[254] 并电慰东北李杜、丁超、苏汉章暨全体抗日义勇军将士。下午2时，国难会议召开第三次大会，推定陶希圣等七人为国难会议起草宣言。

11日上午9时，国难会议召开第四次大会。王晓籁、胡廷銮等人提出议案。汪精卫归纳各方提案，认为可分两类：一、即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并立即改组政府；二、非国民党五大不能讨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问题[255]。会员对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多数审查委员认为改组政府可能引起纠纷，立即制定宪法恐民治基础不牢。“首以提前结束训政付表决，起立者仅十二人，少数否决，再以应请政府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案付表决，大多数起立通过”[256]。大会最后通过决议：一、政府应切实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二、宪政未实施以前，提前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会。三、国民代表会有议决下列各事项之权：预算决算；国债；重要条约[257]。汪精卫对此表示：“以行政院长的资格，固然不能答复一定可以采

纳，即以中央委员的资格也没有此权力。”[258]

下午2时，国难会议召开第五次大会。通过决议：一、国民代表会由各大都市职业团体、海外华侨及各省区地方人民选出的代表300人以上组成。二、国民代表会应于1932年10月10日以前成立，在国民代表会未开会前，政府应依据上列原则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会员陶孟和、胡大刚、萧训等提出关于新闻、人身、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方面自由的议案，大会就此讨论后通过决议：一、废止各种带政治性质的特别刑法；二、保障司法独立，非法定机关概不得干涉或妨碍人民合法的自由；三、除有妨碍公众安宁秩序的具体表现者外，言论、集会、结社一律自由；三、共产党在未放弃暴动政策以前，不得享有上项自由；政府应立即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分别修正现行法规，并制定集会及结社法[259]。此外，大会还就改造海军整饬海防以抗暴日、“清剿”共产党绥靖地方、军制改革、对日军事策略通过有关决议。会议致电即将赴东北调查的国联调查团，请调查团成员主持公道，“根据事实，为正确之报告，使日本强暴情形得以明白昭著于世界，受正义与公理之裁判”[260]。会议还致电慰问东北义勇军。

12日上午8时，国难会议召开第六次大会。主席臧启芳在闭幕会议上致词，就拯救国难的方法说：“对外一致御侮，无分党派，竭诚拥护现在的政府”；“对内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261]。大会通过政府克日将张学良撤职查办，所属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等地案。此外，大会还就整饬军纪、推进地方自治、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救灾、统制义勇军并扩大其势力、经济建设、扩张空军等案通过有关决议。并发出四电：慰勉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嘉慰华侨捐款救国；嘉慰上海民众；勖勉全国将士。会议发表宣言，历述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的罪行，表示：“本会议以为中国在此严重局面之下，非集中全国才力共作长期抵抗无以图存。”此外，还提出“在中央应有民意之机关，在地方应谋自治之促进”；“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自由”；“发展生产自是要图”。宣言最后强调：“惟当东北三省及淞沪被蹂躏之余，御侮尤为急务。”[262]

国难会议通过的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政治自由等决议，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专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不满。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国难会议极为不满。它不是真心诚意地开好此次会议。在会议未开之前就限制会议范围和权限；在会议中诘难、阻滞对己不利的决议，“由汪兆铭一手导演，自拉自唱”[263]。参加会议的会员蒋廷黻认为“政府对于国难会议的态度，全不一致，连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倘以他们对会议报告为标准，显然是无诚意的”[264]；更有甚者，会后对国难会议极尽诬陷、漫骂之能事。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4月1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纪念周作关于国难会议的报告时，诬蔑国难会议会员“其分子复杂，情形紊乱，黄红黑绿，无所不有”，甚至称“主张取消党治者，大抵为有党派背景之政客，或帝王军阀之走狗，平日摧残民治，根本上无谈政治资格”；并主张效法意大利法西斯以党治国[265]。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国民党在国难会议上一手遮天的做法不敢大胆抗争，反映了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参政议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的软弱性。国难会议开幕时，陶孟和强调会员应尽其所能“辅弼”国民党；在会议中有的代表不敢要求国民党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改组政府，成立国防政府；更有甚者，臧启芳在国难会议闭幕会议上致词时称：“闭会以后，会议完全结束，今后在国难期间各人可以国民资格来奔走国事，不可再以国难会议会员的名义来说话。”[266]这就是说，国难会议结束后会员不能监督政府。

国民党当局认为国难会议通过的要求宪政、实行民主自由等决议不属于会议范围，因而拒不接受，这些决议也就被束之高阁，成为一

堆废纸。如决议中要求10月10日成立国民代表会，结果落空。决议中要求政府不得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一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就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国难会议无论如何是解救不了中国的国难的，拯救国难的真正途径，正如时人所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权威超过一切之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创造出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267]

第六节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点是：对内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剿共"被当成抗日的前提。这一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处理国内外问题的主导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由蒋介石提出来的。1931年2月蒋介石、胡汉民的"约法之争"导致宁粤对立。5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相颉颃。粤、桂反蒋势力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还派邹鲁用50万元收买石友三反蒋。7月，石友三打起反蒋旗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东北，7月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境内煽动制造迫害华侨的朝鲜惨案。此外，江西红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和第二次"围剿"。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中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268] 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

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和“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是指平息内部冲突，解决两广问题。国民党当局提出“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的方针[269]。9月初，蒋介石暂停“围剿”红军，集中力量打击反蒋势力，从而爆发了宁粤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幻想依靠国联的力量解决中日冲突。这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必然产物。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武力解决是“攘外安内”的两个方面。结果既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仍争权不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强调团结的重要，强调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其目的是为了将反蒋势力压下去，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0月2日，蒋致电在粤商洽和议之国民党监察委员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270]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作《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演讲。他说：“全体党员，最近有一共同心理，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先团结内部，解决本党的纠纷，不能抵御外侮。”[271] 23日，蒋在国民党“四大”闭幕式上说：“我们中国国民党要立志救国，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尤要在后方没有秦桧那样汉奸，来掣肘或中伤，才能达到御侮却敌的目的。”[272] 26日，南京各抗日学生组织举行“送蒋北上”的欢送大会。蒋的代表贺耀组代蒋致辞，谓：“惟希望于诸同学者，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方可御侮。”[273] 30日，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蒋介石发表《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演讲，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274] 蒋将“战”与“和”规定为“攘外”的两个方面，“国内统一”为对外“战”与“和”的先决条件。“国内统一”有两个基点：实行“剿共”和打击各派反蒋势力。至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

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发表宣言，内中强调要消灭“赤匪”，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救济灾民，“而后可以息内患，充国力，专心一致，以御外寇也”[275]。

“日僧事件”发生后，上海局势极为紧张，但蒋介石、汪精卫仍一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想通过对日妥协退让来换取日本不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民众也起来抵抗日军的进攻。蒋介石、汪精卫感到局势严重，不得不表示对日本进行抵抗，宣布迁都洛阳，制定防卫计划，派第五军增援。但蒋、汪并无全力“攘外”的决心，只是抱定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希望尽快同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安内”。

3月4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通过的施政报告中决定，军事方面：“（一）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二）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外交方面：“对于日本之交涉，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为主旨，其方法取公开的及系统的行动。”[276] 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强调“方今之急，首曰御侮”，“至于绥靖剿匪，所以巩固后方，昭苏民厄，亦不容忽视。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利害而决策，不以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277]。6日，中政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表明，由于日军大规模攻取淞沪地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未被全会接受。

淞沪抗战刚结束，上海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侵沪日军还未撤走之际，国民党当局就关注起“安内”工作。3月14日，蒋介石在对“剿匪”政治宣传人员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278] 4月，何应钦对记者表示：“剿匪乃当前之重要工作，必须竭尽吾人的力量，将赤匪完全肃清。”[279]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沪事已得到解决，遂

派大军赴江西“围剿”红军。6月11日，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280] 2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称：“现在何应钦同志担任闽赣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同志担任豫鄂皖剿匪司令，努力于剿匪工作，期望将五省共匪消灭，方才可以并力御侮。”[281]

汪精卫赴庐山前夕，6月14日说：“中国受外力压迫，实已无可再忍。惟攘外必先安内，匪患一日不除，政府一日不能安心对外。”[282]

蒋介石不顾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舆论压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湘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参加者主要为五省军事负责人，但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李石曾、顾维钧、罗文幹等党政要人也纷纷上山，一时庐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蒋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消灭鄂、豫、皖三省边区的红军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要抵抗日本，必须能自立自强。自立自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自强的地方，即自强的空间；一是要有自强的机会，即自强的时间。“剿匪”即能创造自强的空间，因为政府把“匪区”收复过来，才有足够的空间，供未来对日战争中回旋。他分别召集各省军事长官谈话，“切实表示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认为此为最后机会，不可轻失，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并谓湘鄂赣皖豫五省为全国中枢，必须早日将匪类肃清，然后始能充实力量对外。”[283] 至此，国民党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安内”的主要目标，以“剿共”为先决条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得以确立。

6月下旬，蒋介石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调集63万兵力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30日，蒋在总司令部召集各将领训话，声称“要救党救国，御侮对外，须先肃清赤匪”[284]。7月19日，何应钦在陈英士纪念堂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强调，“尤其应该全

国一致，集中力量，来把赤匪根本消灭，庶几国民革命可无后顾之忧，而坚固其一致对外之壁垒”[285]。

就在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7月侵入热河省境，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尽力抵抗，而自己却留在江西“剿共”前线。7月25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作报告时称：中国目前重要问题为御侮与“剿匪”，“外侮不御会亡国，赤匪不剿也会灭种”[286]。8月11日，蒋介石致电豫省府主席刘峙、鄂省府主席夏斗寅等人，强调组织民团的责任“含有安内攘外两项意义”[287]。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国人书，宣称“今日之剿匪，实为御侮之要着”[288]。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289] 在14日全国内政会议上，蒋声称：“救国必先改革人心，攘外必先安内，刷政首须痛除积习。”他还说：“我们要求安内，就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290] “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291]

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犯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292]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讲话时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293] 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现在华北军队的任务在于

抗日；江西军队的任务在于剿共，一样为国家出力，一样重要。……剿共即抗日，不剿共即等于不抗日。”[294] 而就在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3月4日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全国舆论纷起指责“安内攘外”政策。蒋介石被迫离开江西“剿共”前线北上保定，为推卸责任，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要求抵抗的舆论和稳住长城前线战局。但蒋介石仍无对日作战的决心，他声称虽到北方去，但一刻也不会忘记江西“匪患”。

国民党以“剿共”为中心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鲁迅曾深刻地揭露“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安内而不必攘外”、“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295]。《申报》发表题名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说：“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此诚为吾人所不解者也。”[296] 还著文指责道：“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政府对此，诚不知又将何以自圆其说。”[297] 《南华评论》发表评论指出：“舍外不攘，则内愈安而愈乱，而外祸便愈演愈烈。”[298] 《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当兹中国将整个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平和的解决赤祸之路，夫共党，要之皆中国人也。”[299] 还指出：“剿匪要义，在铲除造匪之环境条件，环境变，匪自不存；不然，方陆续造之而不已，则武力讨伐，其效几何？”[300] 王造时发表《安内必先攘外》的文章，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全国”；政府“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否则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301]。陶行知也指出：“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

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302] 丁文江在一篇文章中称：“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独军队可以消灭的。”[303]

第七节　伪满洲国的建立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淞沪战争一结束，日本即按照它原来挑起战争是为了转移列强对它侵略中国东北的视线，以便建立伪满洲国的旨意，加紧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步伐。

一　关东军的“建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部就已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怎样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提出三个阶段的方案：一、组织亲日政权；二、建立“独立国”：三、吞并东北划入日本版图[304]。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就如何统治东北激烈争论了一夜。关东军方面主张，吞并东三省把它变为日本的领土；建川则提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政权”。经过激烈争论，关东军方面考虑到客观局势，放弃了直接吞并满蒙的主张，赞同建川的方案。9月22日，关东军确定了组织傀儡政权的第一个方案，即《满洲问题解决方案》。方案规定：（一）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的领有东北四省包括蒙古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园”。（二）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日本帝国掌握，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有关内政及其他由“新政权”自行统治。（三）为维持地方治安，决定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张景惠为吉林、洮南、东边

道、哈尔滨等地的镇守使。（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管理[305]。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于是，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别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共同研究和制订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制订《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订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都是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作具体补充。这些方案的基本点表现为三项根本原则：“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一手统一满蒙；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306]此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如前所述，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致电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让他制造事端，“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遂酿成上海“一二八”事变。

根据这个方案，板垣、石原分头活动，策动各地的“独立运动”，假造民意，以掩盖其侵略活动。日军占领沈阳后，便推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等于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不久又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11月20日，改辽宁省为奉天省。12月16日，关东军解散了袁金铠为首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拉出被日军软禁的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长，伪奉天省政权正式成立。

关东军侵占吉林后，即策动原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9月26日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自任长官，名义上总揽吉林省军政大权。9月28日，熙洽发表声明：脱离南京政

府，宣告吉林省独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委任一批汉奸为各厅官员，并“聘请”一批日本顾问，掌管吉林省军政实权。

黑龙江省由于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奋起抗战，延缓了关东军侵占进度，伪政权成立较晚。直至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先操纵当地劣绅成立伪地方维持会，接着又策动原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并让张于1932年1月1日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关东军在攻占锦州、哈尔滨后，马占山所部因嫩江桥抗战受挫，退海伦后又腹背受敌，马占山一度动摇，答应与张景惠合作。1月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便全部建立起来。

关东军在拼凑各省伪政权的同时，又在策动溥仪到东北任伪满政权的“盟主”。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三岁登基，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被迫退位时才六岁。退位后，他继续在紫禁城里当“皇帝”。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溥仪在天津一直住到1931年底，他除了积极“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307]，进行复辟活动外，又受到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的亲日、崇日、恐日的教育，使他“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308]。“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309]。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说，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他“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310]。这次会见是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他的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311]。

正当溥仪举棋不定之时，关东军又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秘密到天津策动溥仪去东北。11月3日夜，土肥原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与溥仪在静园相见，用欺骗的手法，引诱溥仪上钩。他以“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向溥仪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并声称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312]。溥仪以为，“这是恢复满清唯一的机会”，“便答应了他的要求”[313]。土肥原诱骗溥仪去东北的阴谋活动第二天被报纸揭露出来后，许多人对溥仪提出了忠告、警告，也有人劝他“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314]。土肥原恐溥仪变卦，为了达到目的，即向关东军司令官请求，允许他采取特殊手段胁迫溥仪出走[315]。他利用特务，以给溥仪送礼的名义送去两枚炸弹，并接连不断给溥仪打黑电话，写恐吓信“警告”溥仪，如不离开天津，将有生命危险。接着又于11月8日夜策动了天津暴乱。日本驻军则乘机宣布戒严，断绝了日本租界与华界的交通，同时还把装甲车开到静园门外，名谓“保护”。在一片混乱的烟幕中，11月10日晚，日本人将溥仪私藏在一个敞篷汽车的后备厢里，偷偷地开出静园，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敷岛料理店，然后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开到英租界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溥宅总管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偷渡海河到达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往。当时，由于东北各界抗日斗争十分激烈，国际舆论也对日本非常不利，因而日本内阁令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316]。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将溥仪等人移居旅顺的大和旅馆，严加封锁，仍由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等负责“照顾”，实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就在溥仪被挟持到东北不久，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

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日本政府与关东军准备抢在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成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松井源之助、和知鹰二、片仓衷以外，还有土肥原贤二、花谷正等，讨论满铁调查科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等，进一步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此后，又自2月5日起先后召开了十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317]，策划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东北的铁路、矿山、森林、海关、税收、财政，以及用日本人充任伪满官吏、移民、警察制度等问题。

与此同时，关东军指使张景惠出面，于2月16日召集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伪“建国会议”，又称“四巨头会议”。会议由板垣主持，本庄、三宅、石原、驹井、土肥原等出席，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板垣拒绝臧式毅、马占山的“联省自治”主张。赵欣伯、于冲汉按照板垣的授意提出关东军的“建国”意见，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指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内蒙古哲里木盟齐王（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凌升和热河汤玉麟为委员；由该委员会就建立伪满洲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项问题提出初步意见。17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18日，关东军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318]。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从2月18日至2月25日，伪“建国会议”继续讨论“建国大纲”的具体内容，对国体、政体仍有意见分歧。2月25日，板垣拿出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兰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定于长春，改

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319]。

关东军除指使汉奸连续召开伪“建国会议”之外，还以伪“自治指导部”为中心，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各省城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以当时沈阳为例，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机构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制作了六万多面伪国旗，强令市民悬挂，并用汽车在街巷散发传单。自2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促进建立伪国的“市民大会”、“全省联合大会”、“全满联合大会”。为了增加会议人数，事先预告到会者可领一包点心，白看半日戏，甚至把辽西请赈的灾民二百余人也强迫充作辽西八县“代表”参加大会。会议中假造民意，通过所谓“独立宣言”与“决议”，并选出十一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会后又由数十辆汽车组成游行队伍，以图壮大建立伪国的声势。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　伪满洲国的成立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不准接见其他人。关东军在制定《满蒙自由国建设顺序》后，于1932年1月29日派板垣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态度；溥仪则表示愿当元首，但须复辟帝制，保留皇帝称号。这与关东军的想法完全相反，板垣不予理睬，仍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操纵伪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溥仪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失望和愤慨，立刻写了十二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320]，令郑孝胥、罗振

玉去沈阳交给板垣。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当郑、罗二人将日本人让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带回旅顺后，溥仪暴跳如雷。2月23日，板垣不得不再次跑到旅顺面会溥仪。当溥仪情不自禁地询问“国体”时，板垣答称：“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这样折冲三小时未获结果，于是，板垣冷冷地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找到旅馆，令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同意就任“执政”[(321)]。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妄想，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2月29日，伪自治指导部在沈阳召开“全满促进建国运动大会”，按关东军旨意通过决议，拥护溥仪出任“新国家执政”，并派“代表”去旅顺向溥仪“劝进”。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并于同一天，“敦请”溥仪出任元首的“代表”张燕卿、赵仲仁、葆康、冯涵青、凌升、苏宝麟等九人到达旅顺，进行第一次“恳请”。溥仪按照上角利一和郑孝胥的安排，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第一套答词，表示“推让”，予以“婉辞”。3月4日，“代表”人数增至29人，向溥仪进行第二次“恳请”，溥仪又念了事先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暂任执政一年。3月5日，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十人进行第三次“恳请”，溥仪才表示应诺。

经过三次“请驾”之后，溥仪、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护下，于3月6日从旅顺乘车到汤岗子。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也来到汤岗子。当晚，板垣与郑孝胥、郑垂父子会谈，讨论溥仪与日本关东军

司令官缔结密约的事。3月8日，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乘火车到达长春。车还未停，站台上迎驾队伍便响起军乐声和欢呼声。溥仪下车后，“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当他看到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不禁激动起来，又觉得他的复辟“是大有希望的”[322]。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从前是道尹衙门的“执政府”。

3月9日，在执政府举行溥仪的“就职典礼”，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就任执政。参加典礼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郑孝胥、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罗振玉、张海鹏，以及蒙古王公贵福、齐王、凌升等，共有130人。仪式开始，众“元勋”向溥仪行了三鞠躬，溥仪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用黄绫包裹着的伪满洲国国玺和伪执政玺，接着由郑孝胥代溥仪宣读“执政宣言”。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仅用25分钟就完成了由十五项内容构成的会议程序。

第二天，溥仪召集第一次伪国务会议，板垣在会上宣布伪官吏名单：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未到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兴安总局长齐默特色木丕勒，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长林棨，最高检查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

这些官吏都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指定的，事前并未同溥仪和四巨头通报。四巨头之一的熙洽，当即以关东军事先未向溥仪执政报告为理由提出质问。关东军统治部长、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回答说：“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

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323] 未出三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把总务厅长改为总务长官[324]，负责签署伪国务院文件，掌握一切行政大权。各省仍设日本顾问部，请示事项须经过顾问部批准才能实行。4月，各省设立总务厅，日本首席顾问改任厅长。这样，从上到下形成关东军司令官及其统治部——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各省总务厅长操纵一切权力的日军统治体系。中国人充任的执政、总理、总长、省长等官职都是徒有其名的傀儡。

当日，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条约是3月6日板垣与郑孝胥在汤岗子秘密达成的，并以溥仪写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问候信的形式予以确认的。其主要内容有：（一）“满洲国”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而经费由“满洲国”负担；（二）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施，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三）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满洲国”竭力援助；（四）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官有保荐权、解职权；（五）以上各项在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为“立约之根本”[325]。后来，日本与伪满于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以及其他许多条约、协定，都是以这个密约为基础而进一步具体化的。这个密约实质上是一张地地道道的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卖身契，也充分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犬养毅内阁决定，为求“对外关系尽可能不发生障碍”，对满洲国暂不给予国际上的承认，而尽量以非正式的方法，与满洲国之间结成事实上的关系，以此来“努力实现并扩充帝国之权益，造成既成事实”[326]。后来只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武装暴动后成立的斋藤实内阁，鉴于国际上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政策，才于9月15日，即伪满洲国成立后半年，宣布正式承认伪满

洲国。

伪满洲国成立后两年，即1934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政治需要，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溥仪登上宝座时没穿龙袍，而是身着特别陆军大礼服接受臣下的叩拜，这是日本方面的特别安排，其意义在于溥仪之即位并非恢复满清。溥仪当了皇帝，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势力，按照其“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的如意算盘，利用这个傀儡政权，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掠夺。

三　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后，便开始公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行对我国东北的掠夺和控制活动。为了把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输出资本、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重要场所，从一开始便着手拟定殖民地经济政策。1931年12月8日，关东军制定《满蒙开发方策案》，明确了开发满蒙，以利日本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实行国家统制的基本方针。为达此目的，1933年3月1日，由关东军策划制定的《满洲经济建设纲要》，以伪满洲国的名义予以公布。它提出伪满经济的“国家统制”政策[(327)]。所谓统制，实际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制维持其既得的经济权益，把伪满经济完全置于关东军的武力控制之下，实行所谓国家垄断，使伪满经济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为此，1934年6月28日，伪满政府又发表《对一般企业的声明》，提出对国防上的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产业要实行特别统制，同时提出划分统制与非统制企业的界限，初步确定伪满经济的统制形式、范围和内容。“所谓国防重要产业或公共公益性重要产业，几乎全部由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经营，置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统制之下。”[(328)]这种统制形式并在1937年5月发布的

《重要产业统制法》中予以确立。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是从运营机制上完善日本对伪满经济统制体制的一种特殊经济实体，又是构成伪满产业的核心力量，是日本利用伪政权干预经济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它采取的是一业一会社方式，控制了这些会社的投资和经营，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伪满经济。正是在这种经济统制方针下，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垄断和控制了东北金融、交通运输、工矿企业、农业等经济命脉。

（一）设立伪中央银行，控制金融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金融侵略由来已久。早在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就在营口设立支行，1909年日本的朝鲜银行也开始在安东设立支行。到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共有58家，名义资本3.1亿元，实缴资本1.3亿元[329]。此外，还有俄国的道胜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中法实业银行等。东北的外资银行中，日本投资最多，占72%强，其他国家只占28%[33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自然要首先夺取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9月19日，关东军于一天内在沈阳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边业三银行，在长春占领了吉林永衡官银号和东三省银号、边业银行等的分支机构。21日，占领吉林省城永衡官银号，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官银号。在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等所谓四行号抢去的金银和财产，据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所编的合并四行号的总借贷对照表，计有证券一千六百余万元，金、银四百一十万元，财产项目二千余万元，现金三千余万元，合计约为七千余万元[331]。而对我国东北金融机关的抢劫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四行号、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后，便积极筹划设立伪满中央银行。1932年3月15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召开

了伪满中央银行筹备会议，关东军统治部长兼伪满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宣布，合并各官银号和边业银行，成立伪中央银行。6月11日，伪满颁布《满洲中央银行法》、《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6月15日伪满中央银行成立，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分支行共一百二十八个单位同时正式开业，原有的四行号被撤销。总裁为荣厚（原吉林省财政厅长），副总裁日人山成乔六掌握全权，各课课长及分支行经理，多半由日本的朝鲜、正金两行和满铁的人员充任。

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的“国家银行”，是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是完全受控于关东军翼下的为日本资本输出和掠夺东北资源服务的工具。它按照日本银行的模式进行货币、信用管理，它发行的货币，从本位、币值，到汇率都是按照“日满货币一体化”进行，实际上是日本银行在华的特种分支机构。

伪满中央银行一开张，首项业务是统一东北货币，即用伪满钞票取代当时流通的一切通货。伪满币采用银本位，定纯银23.91公分为1元，但不铸硬币，只发行不兑现的纸币。1935年1月，伪满币因与银元产生差价，币值动荡，而放弃银值。同年11月，在“日满货币一元化”的原则下，伪满币以1：1固定比价依附于日元。伪满币初发行时为15，187万元，到1935年底发行额达19894万元，四年间增长了31％。而到1937年底发行额又增到32，991万元，比初发行额增加了117％[332]。由此造成物价日趋上涨，人民收入下降。

其次，利用收回原有货币，肆意盘剥人民。通过强制贬值原货币和限期兑换的办法，极力压低原货币和伪满币的兑价。奉天票五六十元才能兑换1元。尤其官帖比价定得更低，吉林官帖500吊兑换1元。当时，吉林官帖的流通额是103.1亿吊，仅此一项，东北人民即被盘剥伪满币八百多万元[333]。伪满中央银行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所谓的币制统一，到1935年8月收回原货币13821万元，回收率达到97.2％[334]，便停止兑换；余下的近四百万元原货币，多半在僻居乡间的农民手里，他们在无形中又遭到一次劫夺。

伪满中央银行实行货币统一的同时，还通过金融统制，强占四行号的附属企业，并兼并、改组东北原有的行庄。从1933年11月9日公布《银行法》起，到1934年12月末止，对原有行庄进行“整顿”，提出申请的有169家，但批准并发给营业执照的只有88家[335]。1935年10月5日，伪满政府又要求资本较小的银行，在一年内实行改组和增资，即改组为股份公司，资本须在10万元以上。到1936年末，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实行增资的有19家，个人办的银行乃完全绝迹[336]。此外，还通过强制储蓄、生命保险、发行公债等手段，大量搜刮资金。正是由于日本对东北金融业的垄断和掠夺，使东北原有的民族金融业被彻底摧残，同时确立了日本殖民地金融体制，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取亿万财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攫取路权，垄断交通运输

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东北交通运输业所依靠的主要机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掠夺的重点是铁路。“九一八”事变前，满铁所霸占和经营的铁路有：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和安东至沈阳、大石桥至营口、沈阳至抚顺等支线。海运方面，主要霸占着大连港。对吉林至长春、吉林至敦化、四平至洮南、洮南至昂昂溪等铁路，满铁通过贷款、包工、供应材料等形式进行侵略、渗透，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经营实权，但尚未能彻底霸占。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乘机攫取全东北铁路经营权。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就指示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应利用“九一八”事变的绝好机会，通过“委托经营”的办法，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并按照原来计划和军部的要求，建设一批新铁路。满铁首先拼凑了“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夺取了中国人集资修建的沈海路权。接着于10月23日，由关东军和满铁策划成立伪东北交通委员会，作为日本夺取路权的工具，控制着东北铁路的统治权。

伪满政权建立后，伪执政溥仪于1932年3月10日致函关东军司令

官本庄繁，称："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的机关"，从而将路权拱手出卖。同年8月7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满洲国铁路、港湾、航路、航空及新线修建管理协定》，规定："满洲国将铁道、港湾、水路及航空线路等管理委托于关东军，关东军将被委托之铁路、港湾、水路经营及敷设委托于满铁。"[337] 1933年2月9日，伪满国务总理与满铁总裁签订《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敦化、图们江铁道外二铁道建造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这样，满铁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除中苏合办的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以外的东北所有铁路的经营权。

对于中东铁路，日本侵略者当然也是急不可待地要夺取到手。日本侵略者通过制造事端、扰乱铁路沿线秩序、禁止国际直通货运、割断中东铁路与苏联铁路的联系、迫害与逮捕苏联籍铁路职工等手段，迫使苏联自1933年6月与日伪举行谈判，至1935年3月23日，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苏联与伪满正式签订让售中东铁路的协定。按照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代价，从苏联手中购买了全长1700公里的中东铁路及附属财产[338]。当年末，满铁派出2135人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满铁垄断了全东北的铁路交通。这时，伪满沈阳铁路总局所管国有铁路已达6857.3公里[339]。

此后，满铁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以铁路运输为先行，积极协助日本在伪满的所谓经济开发、大幅度地压缩民用货物运输量、无限制地扩大军事运输和战略物资的输送等方面，充分地发挥着交通运输的军事战略作用，强化了殖民地交通运输的军事机能，同时也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提供了方便。仅1936年东北物产的输出额就比1935年增加了43%[340]。至于其他交通运输事业、港湾、航空通讯等各主要经济命脉，也伴随着东北地区的沦陷相继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垄断。

（三）夺取矿权，统制重要产业

首先，煤炭工业。由于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对中国东北的矿藏垂涎已久，早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凭借武力占领了抚顺煤矿，由满铁经办。以后又陆续把持了辽宁省瓦房店煤矿、辽阳烟台煤矿、吉林宽城子煤矿的经营权。“九一八”事变前，抚顺、本溪湖、烟台、新邱等较大煤矿大部分属于日本人经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东北迅速建立起由满铁与日本财阀资本控制的、以基本原料为核心的军事工业体系，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借助于军事力量占领并侵吞了中国官营和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接着，又通过与伪满政权签订协定，全面攫取矿业权。1932年9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其中第二条规定：“满洲国政府将另表所列各矿山的矿业权许给日满两国政府协商指定的日满合办的法人。”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夺取了东北及内蒙古计三十八处地方重要矿产（包括煤、铁、石油、铅、锡、镍、水银、白金等）的开采权。1935年8月1日，伪满公布《矿业法》，规定未经开采之矿物为国有，凡欲经营矿业者应呈请产业部大臣批准，从而实行了矿业垄断，为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北开发矿产提供了条件。

东北煤炭资源丰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把东北的所有煤炭开采权控制在满铁、满炭（满洲炭矿会社）手中。满铁系统的煤矿中，以抚顺煤矿规模最大。以1936年为例，当年满铁系统的煤矿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抚顺煤矿即达到950万吨。抚顺煤在日本煤炭市场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33年至1936年，每年运往日本的抚顺煤都在200万吨以上[(341)]。日本国内的重要军事、冶炼工业都必须用抚顺煤，并把它视作日本的标准煤。满铁还在1933年控制了原由中国民族资本家开设的奶子山煤矿，改称蛟河煤矿，又控制了原由中日私人资本合营的老头沟煤矿。1934年，满铁又“接管”了瓦房店煤矿，强行“收买”了兴安煤矿和富锦煤矿。据统计，满铁系统的煤

产量由1932年的700万吨，到1936年增加到1000万吨以上[342]。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初资本仅1600万元，伪满洲国和满铁各出资一半。满炭通过各种手段，先后以“敌产”为名，强占复州、八道壕、尾明山、孙家湾四矿，又以“入股”名义控制鹤岗、北票、西安三矿，满铁又将新邱煤矿移交满炭，将它和孙家湾矿合并为阜新矿务所，并着手开发高征、太平、五龙和平安各矿。满炭系煤矿，由1934年开始出煤到1936年，从72万吨增加到193万吨，占当时东北煤产量的1296万吨的14.8%，比重虽不大，但增长速度很快[343]。

其次是钢铁冶金工业。“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资本掌握的有鞍山制铁所和本溪湖制铁所。这两家企业生产的生铁，几乎占当时全中国生铁产量的97.3%。日本侵占东北后，积极建立基础产业以满足其军事需要，由满铁投资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所，原鞍山制铁所并入，实行钢铁连续作业。不久，昭和制钢所通过“合营”、“租矿”等办法，先后控制了鞍山的铁矿和辽阳弓长岭铁矿，成为昭和制钢所的主要矿石来源。1933年6月和1934年12月，昭和制钢所相继推行第一期和第二期增产计划。增产建设项目投产后，到1937年，生铁生产能力从原来的28万吨增加到7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从无到有，达到58万吨[344]。本溪湖煤铁公司是东北另一冶金基地，主要生产低磷铁，为日本生产军火的重要原料。在向日本运送生铁方面保持上升势头，1932年至1936年，从7.4万吨增长到12.3万吨[345]。在日本侵略掠夺政策指导下，钢铁冶金业竭力扩充生产规模，除上述两家大型企业外，还有鞍山钢材会社、日满钢材工业会社、满洲住友金属工业会社、满洲大谷重工业会社、满洲久保田铸铁管会社、满洲电线会社、满洲进和钉兵会社等，均由日本人投资，日本资本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钢铁冶金工业。

第三，石油工业。日本石油资源十分贫乏，需求量却非常巨大，仅海军每年就需用重油100万吨。日本国内石油只能满足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其余全部要从国外获得。所以，在日本“一滴油比一滴血还

要贵”。这样，对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就更加迫切了。东北虽隐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日本人组织庞大的力量勘探未经发现，遂转向抚顺的油页岩的开发，并探明抚顺油页岩总储藏量约55亿吨，可炼3亿吨石油，足够日本海军使用三百年。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石油来源。此项炼油工程早已为满铁垄断。满铁经过20年的持续试验，于1928年建立了年产5.5万吨的炼油厂。该厂1929年正式投产，1930年生产石油5.7万吨[346]。“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石油资源全面掠夺。1933年6月5日，伪满设立“满洲石油炼式会社”，资本2000万元，由伪满政府、满铁和日本其他财阀出资。该会社设立后，在大连建立炼油厂，1935年建成并开始生产，但仍然以抚顺油页岩开发为重点。根据日本军部和政府的要求，满铁在1934年对抚顺炼油厂进行扩建，并增加新的设备。1935年抚顺炼油厂产原油15万吨，紧接着在1936年又进行第二次扩张，预计年产石油30万吨，超过了全日本年产石油25万吨的产量[347]。不久，伪满制订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仍然把掠夺石油列为重点。另外，日本还在抚顺进行煤炭液化提取石油的研究，并建立抚顺煤炭液化厂，由于提取过程复杂，产量有限。

第四，电力工业。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东北建立电力工业，至1930年，在东北有日资关系的电力企业达31家，资本总计5311.8万日元[348]。“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力开展电力工业建设。1934年11月，伪满成立日满合办的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总部设在长春，统一经营满铁以外的火力发电厂。该企业不仅合并一些日资电力企业，如满洲电气会社、营口水道电气会社、北满洲电气会社等，而且吞并了不少中国人经办的企业，如奉天电灯厂、长春电灯厂、哈尔滨电业局、吉林电灯厂、齐齐哈尔电灯厂、安东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至1936年，该会社资本达9000万日元。翌年又增资为1.6亿日元，扩建旧厂和在阜新、甘井子等地兴建新厂。该会社在东北电力工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发电容量约占整个东北的40%[349]。另外，日本还在东北先后建立两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在日伪的竭力

推动下，东北电力工业发展特别迅速，这是日本在东北军需产业片面膨胀的结果。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不仅原在东北的满铁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而且新投入的日本资本大量涌入。它们迅速地垄断了东北的军需工业、重工业和其他基础工业。但是，这些工矿业多半是满足日本工业需要的原料工业，已完全纳入了日本殖民体系，是为日本的侵略与经济服务的。

（四）强占海关，控制对外经济贸易

海关是国家的经济门户，直接控制着对外贸易，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关税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也千方百计地夺取海关。“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关受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下的东北海关有大连、安东、营口、沈阳、滨江、延吉、瑷珲七个关及下属七个分关、十个分卡。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又在安东、营口、滨江、延吉、瑷珲五个海关设立监督公署，但不掌握实权。日本侵略者为霸占海关，先占领东北各海关公署，接着于1932年2月17日组织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之后，通知东北各海关监督，由该委员会管辖东北各省海关，“训令”各海关监督及税务司照常服务，并称各关已派有日本顾问一名，驻关监视各关一切政务[(350)]。3月下旬，伪满财政部又通过各海关日本顾问通告各海关及其往来银行，停止向上海总税务司解款，改向伪满财政部缴纳其海关收入。

伪满政权强取海关的行动，遭到了国民政府及东北各海关税务司、中国银行东北各分支行的抗议与拒绝，但伪满政权却在日本支持下，以武力劫夺各海关。从6月26日至30日，伪满政权连续将大连、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等六个海关夺取到手，驱逐各该关税务司及关员，重建以日人为主的各关，并开始办公。8月，又强行接收奉天海关，10月将东北海关一律改称税关。1933年1月，再强行接

收绥芬河海关，至此东北海关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此外，伪满政权还在承德、图们和山海关设立本关，并新设分关、分卡有十四处，以便利日本对东北的贸易。

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劫夺海关，利用海关，通过关税政策，控制东北的对外贸易，以保证日本商品的倾销和对东北资源的掠夺。“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对外贸易是中国唯一出超地区，1927年—1931年平均每年出超1亿关两，1931年达1.69亿关两。日本占领东北后，1932年尚有1.2亿日元（近1亿关两）的出超[351]。后由于日本垄断东北的贸易和伪满政权实行优惠日本商品的政策，所以从1933年开始输出大量减少，而输入则不断增加，从出超变为入超。据统计：1933年为0.616亿日元，1934年为1.855亿日元，1935年为1.857亿日元，1936年为0.879亿日元，1937年为2.419亿日元[352]。

伪满贸易的大量入超，实际是对日本、朝鲜、台湾贸易的结果，而对其他国家贸易都是出超，对中国关内的贸易也是出超。在东北的进出口贸易中，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已居首位，“九一八”事变后更占据了最大份额。东北对日输出，1932年为2.35亿元，占输出总额的38%，到1936年则为2.85亿元，占输出总额的47%，即在东北向外输出总额中，有将近一半是输往日本。在输入贸易中，1932年日本输入为1.97亿元，占输入总额的58%，1936年则为5.34亿元，占输入总额的77%。在东北对日本贸易总额1932年为4.33亿元，比率为45%，1936年为8.2亿元，比率增为63%[353]。

在进出口货物方面，东北输入的工业品中大部分是消费品，如纺织品、食品和日用百货等，1932年输入的消费工业品占总输入额的77.7%，以后虽稍有降低，但在1937年以前，一直不低于60%。输入的机器设备基本上都是供给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工矿交通企事业。东北输出的商品中，农产品、各种工业原料和矿产品占了绝大的比例。农产品和化学工业原料1931年占输出总额的75%，1936年达79%[354]。供应日本军备的铁矿和生铁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出口量有很大增

长。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东北对外贸易的殖民地性质。

（五）强占耕地，掠夺农产品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对东北的农业同样采取了殖民主义的统制政策。首先利用政治、军事的力量，垄断和掠夺东北的土地。“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所到之处，对大量土地加以“敌产”、“逆产”名目，予以没收，侵占了东北大量土地。接着又授意满铁在东满、北满一带强制收买农田，到1935年满铁在东北侵占的土地达100万公顷之多[355]。伪满政权成立后，除接收这些“敌产”、“逆产”土地作为“官产”外，又通过地籍的整理，将旧有官地（包括清室保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和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仓田、辽宁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有地、国有荒地和林地）“处理”成为国有。其中除相当大量土地被划作军事用地外，余下拨作日本移民用地。伪满政权还于1932年4月公布《外人租用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在东北能获得永久的承佃权，并成立日满土地开拓会社，攫夺东北土地。1933年6月，伪满更公布《商租权登记法》，规定日人在东北从事农工商各业所需用之土地，得自由商租，期限30年，期满可以延长，这实际上就是从法律上承认日人对商租土地的永久占有。

在掠夺土地与公布所谓租用土地“立法”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了向东北的大量移民活动。1932年初，日本拓务省拟定《满洲移民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同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移住适用地调查费》等法案，8月又通过《第一次五百名满洲移民费追加预算》，拨出了用于移民的经费。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29人，于1933年3月到达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这种武装移民到1936年7月为止，共移来五次，2900户计7296人[356]。这五次武装移民带有试验性质和准备性质，真正大规模的移民侵略开始于1936年的“百万户移民计划”，企图在二十年内向我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由于日本移民大量侵占东北土地，致使广大东北农民失去了大量土地，被迫流落他乡，沦为日本移民或移民会社的佃户，受

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东北是中国著名的产粮区，农产品丰富，特别是大豆等特产品和玉米等，向来是日本所竭力获取的物资。“九一八”事变前五年，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达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量的40%[357]。“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和战争物资动员的需要，积极推行将东北变为其粮食供应基地的政策。在农业生产上，强令农民种植水稻、棉花、烟草以及鸦片等，增加杂粮生产，剥夺了农民的种植自由。在农产品流通上，日本垄断了东北农产品的收购，以极其低廉的官定价格迫使农民出售它所需要的农产品。如大豆平均价格，“九一八”事变前吉黑两省，每斗价1.3元上下，辽宁则为1.7元左右；而“九一八”事变后的1934年，沈阳豆价每斗0.6元，外县0.55元左右，吉黑两省每斗0.5元[358]。这表明农产品被日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搜刮去了。东北农产品被收购后大量输往日本。1934年，输往日本的玉米价值达290多万元，占当时主要农产品输出总额的58%[359]。从1932年—1936年，每年输往日本的高粱、小米各占总产量的40%和90%以上[360]，从而使东北粮食生产完全服从于日本的需要。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农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民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推行鸦片专卖政策。1932年9月16日，伪满政权公布《鸦片收买法》，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1933年成立鸦片专卖公署，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遍布东北主要城市和地区。在日伪鸦片专卖制度的诱发、包庇下，东北各地鸦片种植成风，如黑龙江的密山、虎林、饶河、马鞍等地，种五谷者绝少，除去烟苗，别无他物。据统计，1934年东北境内种植鸦片的县达35个，烟田面积达35万亩，仅热河一省烟田面积即达17万亩。据伪满政权年报统计，1933年至1937年鸦片栽种遍及伪满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68.5万亩。这还不包括秘密栽种面积[361]。鸦片大量种植给日伪

统治者带来高额利润。据伪满政权官方公布的统计，鸦片的收买量逐年增加，从开始时的每年250万两，到1937年增至800多万两；鸦片专卖利润1933年是700万元，到1937年达到5000多万元。然而，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官方统计。据当时任伪专卖总署署长卢元善供称，1937年鸦片销售量是1200多万两，获纯利润约9232万元[362]。

鸦片专卖造成了烟毒泛滥，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仅伪满登记的吸食鸦片者，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增加到811，005人，五年间吸食者增加了十四倍[363]。日本推行的鸦片毒化政策，不仅掠夺了东北人民的大量财富，而且使东北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身心危害。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将东北经济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中，使东北经济沦为殖民地经济。

四　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剑与火”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的同时，也把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的锁链强加给东北人民，极力摧残中国民族文化与教育，推行愚民与奴化政策，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

（一）建立并加强殖民地文化统治

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时，日本殖民主义者便在伪政府统治机构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它是由积极从事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策划和领导的，其任务有三项：一、“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二、“涵养民力，善导民心”；三、“普及自治思想”。实际上，它围绕建设伪满洲国所谓的“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向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1933年，日本殖民者为了强化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下设立情报处。它成了伪满言论文化的中心统治机关，一元化地管辖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事业。

在新闻通讯方面，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2月1日建立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信自由。1933年9月，又建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把持了伪满的广播事业。1936年9月，日本殖民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垄断政策，建立了为其严格管辖东北新闻、通讯机构的“满洲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严格的“官制统治”

在出版方面，1932年10月，伪满公布《出版法》，规定凡是危及伪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同时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查禁或销毁。据伪满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在禁止出版的同时，还禁止关内报刊书籍输入。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三十六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计有：《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益世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十八种，占禁止输入报刊的一半。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四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押13，664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册[364]。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输入，年年增加。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余册，1937年就增至380万册[365]。

日伪打击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禁止关内书刊输入的同时，还加紧建立殖民垄断的出版机构。1937年2月，建立了伪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垄断出版事业，专门出版、发行与销售伪满的学生课本和宣传伪满“建国精神”与政策的书籍。

在电影方面，日伪于1933年8月成立伪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

控制东北的电影。凡日伪认为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有损于日本侵略军、有损于所谓“皇室”、有损于日伪官吏统治的，特别是有关反战思想的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一律禁演。仅1936年一年就禁演影片178部。有些影片虽未禁演，却遭随意剪截，1936年剪截影片达二千八百余米，1937年增至二万余米。但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电影却充斥伪满影院，可以说，伪满的影坛是日本电影的天下。据统计，1936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影片是154部，1937年升至232部[366]。

此外，对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也进行统制，利用汉奸文人美化日本侵略，鼓吹战争狂热，丑化我国各族人民，咒骂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此来腐蚀、奴化在伪满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

（二）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

东北的教育事业也遭到日本侵略者毁灭性的摧残。关东军侵占东北后，以“排日”的罪名，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的学校。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才开始对各级学校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但进展缓慢，质量低下，以至迟迟达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小学1.36万余所，小学生74.71万人，教职员2.44万余人。至1933年恢复的小学仅有九千一百余所，学生50.21万余人，教师1.63万余人。儿童的入学率在1935年末仅占23%。中学：“九一八”事变前有194所，学生3.85万余人，教职员二千四百余人。伪满政权建立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开学的仅有173所，学生3.36万余人，教师（职员除外）一千六百余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有三十所，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只有五所，1937年也只有十所[367]。

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教育进行破坏的同时，竭力建立以愚民奴化

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在伪国务院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担任伪文教部总长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都操在日本人手中。伪文教部设立后，于1932年7月在长春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具体规定伪满洲国教育以重仁义，尚礼让，发扬王道精神，及于人民生活方面以期共享和平之幸福，于友谊方面尚节义自重，对世界民族讲亲仁亲邻，共存共荣，达到大同为方针。只要除去其中“重仁义”、“尚礼让”、“尚节义”、“大同”等欺骗性的词句，其反动实质是很清楚的。它是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是把教育限制在为宗主国服务和培养廉价劳动力之上的。

按照这个殖民统治的教育方针，日伪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思想。首先，日本侵略者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废除了中国原有的大部分教材，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也不准挂，不让看。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大量的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在所谓新教材出版之前，小学讲授“修身”、《孝经》、《论语》，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中学也以宣扬“建国精神”为主，讲授“国民道德”，并且把日语和“东洋史”列为重要的课程。大学讲授“国体本义”，宣扬日本立国精神“唯神之道”。到1934年及1935年，日伪陆续新出版的“暂行国定教科书”达二十七种，四十七册。通过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改变中国的疆域，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用以毒害与腐蚀东北青少年的思想和民族意识。同时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小学、中学、大学的主课。各类学校一律开设日语课，而且课时远远超过语文、数学等主科。日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初小和中学每周六课时，高小七至八课时；而汉语，小学每周不过六课时，中学仅有三课时。1936年，日伪又在社会上实行日语检定考试制度，规定经考试日语合格者可以分别取得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的资格。一些国民学校的学生可以参加

考试，合格者发给一定的“语学津贴”，毕业后可以优先录用，用以引诱青少年重视日语并接受其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奴化教育，对各级教师进行残暴的“整肃”，把大批籍贯属于关内各省的教师排挤出学校，并对爱国师生实施疯狂的镇压和迫害，甚至捏造“莫须有”罪名，把大批正直、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投入监狱，施以重刑，乃至枪杀，妄图震慑爱国师生的反日情绪，维持反动的殖民地教育秩序。1933年，日军宪兵队对沈阳市第三中学突下毒手，一次捕杀爱国师生35人。同年5月至7月，吉林市学生因散发抗日传单，先后被逮捕、杀害六七十人。1934年5月，长春市二中及其他学校教员，一次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了九名，其中四名被杀害，其余的下落不明。1935年，日伪当局在安东教育界大逮捕、大屠杀更是令人发指。日伪宪警以组织“保国会”为名，将安东省教育厅和安东市、凤城、庄河、宽甸、辑安、桓仁、通化、临江、岫岩等县的教育局长、职员及中、小学校校长，一律逮捕。然后把他们分别押进各地宪兵队，上大挂、灌凉水、烙铁烧、坐老虎凳等，无所不用其极，追索抗日救国会组织。据事后统计，这次大逮捕共抓捕安东地区教育界知名人士、中小学校长、教师及部分商、财界人士五百余人，被判死刑和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者达到二十余人，另有八十余人被判无期以下徒刑，其中一半以上后来瘐死狱中[368]。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广大爱国中小学教师的迫害，到1935年末，中小学教师人数陡然减少了九千余人。

五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对我国领土的疯狂侵略，激起东北爱国军民的愤怒与反抗。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之日起，东北军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随着日本的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也很快燃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蜂拥而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

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一）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队给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回击。

日本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后，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在这紧急时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命令，统帅黑龙江部队，并代理省主席职务，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十六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11月4日中午，关东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江桥中国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守军奋起自卫，将敌击退。18时，关东军一个大队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数门火炮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关东军第十六联队几乎被全歼，骑兵第二旅团也伤亡惨重。守军终因装备低劣、兵力单薄，6日晚马占山下令将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继续阻击敌人。

从7日开始，江桥抗战进入三间房阻击战阶段。关东军一面调集在东北的日本精锐部队向前线集结，一面以强硬态度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至齐齐哈尔以北，被马占山严辞拒绝。关东军见威胁无效，遂向三间房阵地进攻。12日，关东军以七千余人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我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马占山亲到

阵地指挥作战，血战至下午，敌不支，被迫退却。16日，关东军以步、骑、炮兵四千余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入混战状态。后关东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关东军以三个联队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形成包围态势。守军经过浴血苦战，终因伤亡过重，无力支持，当日下午6时，马占山令各部撤出阵地，晚间退至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二万余人退到海伦。至此，历时十六天的江桥抗战结束。

除江桥抗战外，东北军爱国官兵还在锦州、哈尔滨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熊正平），在锦州重新改编三个公安骑兵总队，1931年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步兵第二十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十二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12月22日，日军出动三个旅团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在哈尔滨，日本侵略军遭到了东北军李杜、丁超等部的抗击。日本关东军为占领东三省特区哈尔滨，命令于琛澄伪军进攻哈尔滨。1932年1月27日，于琛澄部伪军在日军飞机掩护下，向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二十四旅、丁超的第二十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展开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于琛澄伪军进犯哈尔滨失败后，1月28日，本庄繁令长谷部照悟指挥步兵第四联队、野炮兵第八联队一个大队向哈尔滨附近进犯。1月30日，东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击溃伪军刘宝麟旅，俘敌七百多人，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长谷部旅团军列开进双城车站，日军整队下车卸掉枪械、拢火取暖之时，设伏的第二

十二旅抓住这绝好的战机，突然从三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被击毙击伤四十八人。

东北军爱国官兵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侵略的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以部分东北爱国官兵和警察为骨干，会同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形成了遍及东北城乡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他们发表通电，痛陈“吾人泥首呼天，求生无路，惟不肯延颈就戮，始起而自卫。我中华裔胄决不甘作亡国之奴，宁可杀贼以致死，不委曲以求全”[369]。表达了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吉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等。

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规模大，斗争也相当活跃。主要有辽西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系由原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在阻敌侵锦过程中，以新编公安骑兵总队为基础组成的，初名“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名“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设于北票。到1931年末，已有义勇军二十二路，每路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约六万余人，转战于黑山、营口、盘山、海城、台安、新民、辽中、沈阳、本溪一带，到处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辽西义勇军的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惶惶不安。1932年1月3日，关东军侵占锦州后即命令：已进入辽西的第二十师团主要用于对辽西各地义勇军作战，并负责对热河及关内的警戒。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命令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进驻锦西城“扫荡”辽西义勇军。1月9日，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队到城西一

带“扫荡”，遭辽西义勇军刘纯启等部伏击，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以下数十名日军被击毙。日本侵略者惊呼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370]。古贺联队被歼，极大地鼓舞了辽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路义勇军士气，抗日武装斗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到4月，经过整顿，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改为军区制，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五大军区。原辽西大部地区及沈阳一带的各路义勇军划归第一军区指挥。辽西地区因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发展快，战绩好。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西义勇军兴起的同时，邓铁梅在辽南举义，创建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勇军武装，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1931年10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声的赞同和支持下，在凤城县联络近二百名抗日志士，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12月26日夜，邓铁梅率东北民众自卫军袭击凤凰城，捣毁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救出百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步枪三百二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371]。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1932年春，苗可秀作为救国会代表，与邓铁梅取得联系，并担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在邓铁梅、苗可秀的领导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安东、凤城、岫岩三角地区打了许多胜仗，给日本侵略军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到1932年8月队伍已发展到1.5万人。1932年冬，日伪军向邓部大规模“讨伐”，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周旋，一直坚持到1935年6月，邓、苗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南组建的另一支义勇军，是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于1931年12月在海城县成立的辽南义勇军。1932年6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南义勇军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委任李纯华为司令。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队伍发展到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

东至岫岩、凤城，西至台安、盘山，南至营口、大石桥，北至辽阳、辽中，控制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的火车、兵站、机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辽东地区兴起的义勇军，主要有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九一八”事变后，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叛变投敌，该部第一团团长唐聚五等起而抗日。1932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县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被推为总司令，下辖十九路军，计有十余万人。他们活动于通化、新宾、柳河、临江、宽甸、辑安等地区，同日伪作战数百次，威震整个辽东地区。

在辽北蒙边地区也活跃着一支由蒙汉各族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1931年10月，原东北军少将高文彬衔张学良之命，在通辽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并先后争取了蒙古族武装统领刘振玉、李胜、包善一、韩色旺参加抗日，组成辽北蒙边义勇军骑兵队，任命包善一、韩色旺为正副司令。随着辽北蒙边行署和骑兵队的成立，蒙边二十余县的蒙、汉民众武装也日趋壮大。1932年5月，救国会将辽北蒙边地区的义勇军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团”，高文彬任总指挥，下辖七个梯队，共万余人。1932年春，在开鲁县一次伏击战中，击溃一支五百余人的日伪军，击毙关东军松井大佐。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攻打通辽，7月收复康平，从此声威大振。直到12月，关东军大举来犯，才转移开鲁。后高文彬被俘，队伍逐渐溃散。

继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以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吉林自卫军、吉林国民救国军等抗日武装相继创建。吉林自卫军是1932年1月31日在哈尔滨成立，以依兰镇守使李杜为总司令，总兵力约1.5万余人。在保卫哈尔滨的战斗中，自卫军奋力抵抗，与优势之敌血肉相搏，阻滞关东军攻占哈尔滨。哈尔滨保卫战后，自卫军分为两路，一路由李杜、丁超、邢占清率领，仍称自卫军，退守以依兰为中心的吉东一带；一路由冯占海统率，于1932年6月改名“吉林省抗日义勇军”，推冯占海为总指挥，宫长海为副总指挥，并将所部改编为

十二个旅及四个支队、三个团、一个营，共五万余人，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等地。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攻占哈市南面重镇阿城，7月占领舒兰县城，9月攻打吉林，终因守敌顽抗，无法攻入市区，后西去热河，转入开鲁，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

李杜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部队迎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伤亡惨重，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吉林自卫军撤到梨树镇后，经过整编，形成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基地，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八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自卫军。9月下旬，日伪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12月下旬，敌又增调兵力分三路向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自卫军发起总攻。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转移。1933年1月5日，敌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率部三千余人，在虎林地区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自卫军余部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区活动。

吉林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除李杜、冯占海部外，还有王德林在吉东一带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原为东北军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愤于关东军入侵与熙洽、吉兴投敌，开始酝酿抗日，于1932年2月8日宣布起义，成立“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任总指挥，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将领。不到半年时间，救国军发展到数万之众，以宁安为中心，在吉东地区坚持反日斗争。11月后，屡遭打击的关东军陆续增派兵力，对救国军发动大规模“进剿”，王德林率部分队伍转入苏联境内。余部经周保中、李延禄的整顿与改编，组成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晚于辽、吉两省，但在整个东北的义勇

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黑龙江，首揭抗日义旗的是守卫嫩江桥的东北军官兵。1931年11月嫩江桥大战时，马占山下令黑龙江省各县编组民团，以支持长期抗日。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以后，“拜泉、青岗、绥化等十余县的民团纷起援马，其他各县亦民团纷起，胡匪亦多揭义旗，请马收编”[372]。1932年5月，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民团、义勇军共约七万人，共推马占山为总司令。其后马占山带领义勇军继续转战黑省各地，成为黑省义勇军的主要力量。

继马占山抗日之后，黑龙江省还爆发了苏炳文率部起兵抗日。1932年10月1日，原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哈满路护路军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兵力约1.2万余人，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引起了敌人重视。10月3日，关东军第十四师团中山支队二千余人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与敌激战亘日，敌死伤甚众，向磨姑溪退却，救国军因损伤严重退守二线朱家坎阵地。11月中旬，关东军向朱家坎阵地发起总攻，救国军寡不敌众，撤往碾子山第三道防线。11月29日，关东军分四路向救国军发动全面进攻，12月1日占领碾子山，2日进入扎兰屯。苏炳文见无力挽回败局，遂于4日率部进入苏联境内。

此外，黑龙江境内的一些“绿林好汉”，面对日本入侵，仇恨满腔，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驱使他们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如李海清，当日本入侵黑龙江省时，他正在狱中服刑，为了抗日，多次要求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联络各地“绿林好汉”，招集三四千人，于1932年2月在肇州举义，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活动在哈（尔滨）长（春）路以西地带。同年3月以后，该部一度南下，15日攻克扶余，28日攻占农安，兵临长春近郊，致使伪都的日伪统治者惊恐异常。后复活动在肇州、安达、青冈等地，经常与马占山部联合抗敌。1932年4月，又被改编为马部步兵第四团和骑兵第二团，兵力达二万人以上。5月下旬，关东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

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从1931年10月兴起，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曾发展到三十万人以上，到1933年初大部分失败瓦解。东北义勇军的受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推行不抵抗政策，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不仅不援助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使抗日义勇军孤军无援，陷入困境。其主观原因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未能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到挫折和失败，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谱写了抗战史上震撼中外的重要篇章。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了创建游击队的艰苦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同时，还通过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和改造整顿义勇军武装，创建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建立了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南满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是磐石游击队，亦称南满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张振国、杨君武、杨林到磐石，帮助磐石中心县委筹建游击队。6月，磐石中心县委在原有的小规模

武装“特务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磐石义勇军”，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全队三十余人。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将“磐石义勇军”改编为“南满游击队”，任命孟木民为总队长，王兆兰为副总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后孟木民、初向臣牺牲，改由杨靖宇任政委，袁德胜为代理总队长。1933年1月至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三十余次，粉碎了敌人四次围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百三十余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游击队由建队时不足百人，扩大到二百五十余人，创建了以玻璃河套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此后，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千余人，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东满地区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1932年先后建立了延吉、汪清、安图、珲春、和龙等数支游击队。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将这些游击队合编为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共二百多人，八十多支枪。面对日伪军的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九百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吉东地区武装抗日斗争开展较早，是吉林自卫军李杜和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义勇军活动的重要地区。满洲省委和吉东地区党组织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派出大批党团员加入自卫军、救国军，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掌握和改造已有的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先后创建了密山、饶河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以中共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委，下辖三个团共约九百人。1933年上半年在宁安、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与日

伪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均获胜利，给当地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随后，救国游击军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吉东地区中共组织创建的另一支游击队是饶河游击队。1932年七八月间，饶河中心县委在饶河民众反日斗争的基础上，为创建游击队在宝清县小城子沟开办军政讲习所，以培养反日骨干。讲习所由崔石泉（崔庸健）负责，郑文任教员，宝清、饶河、抚远、虎林等县的三十名优秀青年参加学习。10月，中共党员崔石泉、金文亨、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等六人，以仅有的一支手枪为武器组成反日特务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特务队从六人发展到四十余人，1933年4月21日在大叶子沟正式成立饶河农工义勇军，由崔石泉任队长，金文亨任政委，下辖三个小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该队一方面配合高禹山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6月，高禹山救国军瓦解后，饶河义勇军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为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中坚力量。

在北满地区，中共北满特委在巴彦、珠河、汤原等地先后创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党员原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发动在北平就学的东北籍同学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张清林等人回东北进行抗日活动。5月16日，张甲洲在巴彦县成立“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张甲洲任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总指挥，孔庆尧任参谋长，下设两个中队，约有二百余人。中共满洲省委很重视这支抗日武装，6月末，先后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及夏尚志等人到队进行工作。经过整顿，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及模范队。巴彦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

底，因在东兴战斗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赵尚志于1933年春到哈尔滨一带孙朝阳部义勇军任参谋长。当年9月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七人携枪到达珠河县六道河子。10月，中共珠河县委以他们和珠河县地方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全队共十三人。游击队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使敌闻风丧胆。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400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活动范围扩展到松花江下游，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也在努力创建游击队。汤原中心县委首先在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的帮助指导下，加紧发展中共组织，培养和吸收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入党。到1932年夏秋之际，已建立六个区委、两个特支，拥有党员208名，为游击队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10月，汤原县委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了一支抗日队伍，因土匪破坏而失败。接着，第二次建立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以汤原为基地，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联合汤原义勇军冯志刚部和张传福部，大破汤原城，声势越来越大，到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约六百人。汤原反日游击队已经成为汤原地区各种抗日队伍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共六千多人，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在这两年半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歼灭了不少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林和北满的四十余县。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十一个军，共三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

大游击区，扩展到七十余县。东北抗日联军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到处打击敌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后来，尽管它在斗争中出现过许多波折，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它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1) 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淞沪战斗详报》，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7页。

(2) 战地新闻社编印：《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战地新闻社1932年版，第1页。

(3)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4) 《民国日报》1931年10月6日社论：《反来严重抗议——暴日对东南十数省进攻之先兆》。

(5) 《异哉日反向我抗议》，《民国日报》，1931年10月6日。

(6)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7) 《满洲事变》，第367页。

(8)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9)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10)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79—80页。

(11) 《在引翔港焚烧三友工厂》，《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

(12)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8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

年译印，第134页。

(13)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5页。

(14) 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清肃亲王善耆之女，自幼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为养女，女扮男装，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间谍，抗战胜利后被处决。

(15)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79页。

(16)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8页。

(17) 《淞沪战斗详报》，第7—8页。

(18)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19)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81页。

(20)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50页。

(21)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22) 《满洲事变》，第369页。

(23)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39—140页。

(24)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9—530页。

(25) 《国新社22日东京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

(26)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31页。

(27) 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72—73页。

(28) 《日海军陆战队突向本报提出四项要求》，《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

(29)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42页。

(30)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九一八事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31)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71页。

(32) 《满洲事变》，第376页。

(33) 《日联社22日东京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

(34)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29页。

(35)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65页。

(36)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73页。

(37) 《满洲事变》，第375—376页。

(38) 《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第612页。

(39) 《抗日战史·“一二八”淞沪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0年版，第6页。

(40) 《满洲事变》，第373页。

(41) 《满洲事变》，第375页。

(42) 《汪精卫报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3) 《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28页。

(44) 《汪精卫在沪接见首都各校代表》，《申报》，1931年12月7日。

(45)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时事新报》，1932年1月21—23日。

(46)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32页。

(47) 《民众三日刊》第1卷第28期，1932年1月24日。

(48) 《蒋主席讲对日方针》，《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

(49) 戴季陶：《特种外交委员会对日政策报告书》，1931年11月，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25页。

(50)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以下简称《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285、286页。

(51) 《蒋主席致张群市长指示上海防务电》，《绪编》（一），第290页。

(52) 《上海市长吴铁城对日交涉经过之谈话》，《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28页。

(53) 《汪精卫谈为自卫当然抵抗》，《中央日报》，1932年1月26日。

(54) 《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

(55) 邱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

(56)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31页。

(57) 《上海市政府呈中央当局电》，《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30—1431页。

(58) 《何应钦1932年1月28日致上海市政府电》，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9) 《蔡廷锴自传》（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274页。

(6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61) 《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30页。

(62)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87页、第192页。

(63) 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申报馆1933年印，第13页。

(64) 《蔡廷锴自传》（上）第275页。

(6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94页。

(66) 韦息予编著《沪战纪实》，开明书店1932年印行，第9页。

(67) 《淞沪战斗详报》，第25—26页。

(68)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20页。

(69) 《绪编》（一），第422页。

(70)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16页。

(71) 《淞沪战斗详报》，第39—40页。

(72)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133页。

(73)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56页。

(74)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84页。

(75)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72—73页。

(76) 中国史事研究社编：《淞沪抗日画史》，中国科学公司1933年印，第12页。

(77)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197页。

(78) 《绪编》（一），第467—470页。

(79) 《淞沪战斗详报》，第142页。

(80) 《淞沪抗日画史》，第13页。

(81)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27页。

(8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32页。

(83) 《淞沪战斗详报》，第220—221页。

(84) 《绪编》（一），第466页。

(85) 《绪编》（一），第494页。

(86)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48、249页。

(87) 《淞沪战斗详报》第一号附表。

(88) 《绪编》（一），第431页。

(89) 《绪编》（一），第430页。

(90) 《绪编》（一），第432页。

(91) 竟迟：《政府迁洛誓与暴日决斗》，《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

(92) 《绪编》（一），第433页。

(93) 《绪编》（一），第505页。

(94)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1日。

(95) 《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96) 《绪编》（一），第445页。

(97) 《何应钦、朱培德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电》，1932年1月29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98) 《绪编》（一），第445页。

(99) 《绪编》（一），第438页。

(100)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55页。

(101) 苏高中电讯社编：《沪案真相二编》，苏州小说林书社1932年版，第43页。

(102) 《淞沪战斗详报》，第45页。

(103) 《绪编》（一），第446页。

(104) 《绪编》（一），第447页。

(105) 《绪编》（一），第446页。

(106) 《绪编》（一），第508—509页。

(107) 《淞沪战斗详报》，第64页。

(108) 《绪编》（一），第450—451页。

(109) 《绪编》（一），第451页。

(110) 《汪精卫之演说词》，《申报》1932年2月14日。

(111) 《淞沪抗日战役第十九路军战斗简报》，《绪编》（一）第514—515页。

(112) 张发奎：《第四军纪实》，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4页。

(113) 《绪编》（一），第453页。

(114) 《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绪编》（一），第472页。

(11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25页。

(116) 《何应钦致朱培德、熊式辉电》，1932年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7) 《绪编》（一），第460页。

(118) 《绪编》（一），第461页。

(119) 《绪编》（一），第461页。

(120)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67页。

(121) 《绪编》（一），第463页。

(122) 《绪编》（一），第464页。

(123) 《淞沪战斗详报》，第204—205页。

(124) 《蒋委员冬亥电》，《淞沪战斗详报》，第215—216页。

(125) 《绪编》（一），第516—517页。

(126)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94、595页。

(12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9页。

(128)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1页。

(129) 《蔡廷锴自传》（上），第279页。

(130) 《何应钦1932年2月3日对时局发表谈话》，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1)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56—157页。

(13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4页。

(133)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3页。

(134) 《汪精卫对记者谈话》，北平《晨报》，1932年2月8日。

(13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5页。

(136) 《绪编》（一），第451页。

(13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6页。

(138)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页。

(139) 《淞沪抗日战役第十九路军战斗简报》，《绪编》（一），第514页。

(140) 《何应钦致蒋光鼐等电》，1932年2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1) 《革命文献》第36辑，第1669页。

(14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6—277页。

(143) 《何应钦致蒋光鼐等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44)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页。

(14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279页。

(146) 《汪精卫之演说词》，《申报》1932年2月14日。

(14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80页。

(148)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80页。

(149) 汪精卫：《政府对日方针》，《革命文献》第36辑，第1570页。

(150) 《汪在徐开外委会》，《申报》，1932年2月20日。

(151) 何应钦：《关于日本军备之报告》（1931年11月21日），《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55页。

(152) 《邓参谋世增梗未电》（1932年2月23日），《淞沪战斗详报》，第162页。

(153) 《绪编》（一），第462页。

(154)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309页。

(155)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316页。

(156) 《绪编》（一），第519—520页。

(157) 《二中全会电孔祥熙说明援沪经过》，《大公报》，1932年3月8日。

(15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159)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1页。

(16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05—106页。

(161)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6页。

(162) 洛甫：《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斗争》第3期，1932年2月9日。

(163) 洛甫：《士兵的反日战争与我们的策略》，《斗争》第2期，1932年1月31日。

(164) 《蔡军长对官兵训话》，《大公报》1932年5月5日。

(16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4页。

(1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05—106页。

(167) 陈铭枢：《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第2页。

(168)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6页。

(169) 《淞沪抗日画史》，第20页。

(170) 《十九路军兴亡史》，第77页。

(171) 《斯诺文集》第3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172) 铁：《沪战与英美态度》，《清华周刊》第37卷第2期，1932年3月5日。

(173)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2*，Vol．3（以下简称*FRUS*，1932，Vol．3），Washington，1948，pp．120-121．

(174)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Papers Relating to Japan*：*1931-1941*，Vol．1（以下简称*FRUS*，1931-1941，Vol．1），Washington，1943，pp．162-163．

(175) *FRUS*，1931-1941，Vol．1，p．165．

(176) *FRUS*，1931-1941，Vol．1，p．167．

(177) *FRUS*，1931-1941，Vol．1，p．172．

(178)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0页。

(179)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10页。

(18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99页。

(181) 《申报》，1932年2月6日。

(182) *FRUS*，1931-1941，Vol．1，p．180．

(183) Butler，Rohan 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以下简称*DBFP*），Series 2，Vol．9，London，1965，p．570．

(184) *FRUS*，1931-1941，Vol．1，P．191．

(185) 《汪兆铭就对日政策发表谈话》，1932年2月7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

(186)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幹对于日本侵略上海发表谈话》，《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

(187) 《满洲事变》，第395页。

(188) 《顾维钧致罗文幹电》（1932年2月12日），《革命文献》第36辑，第1537页。

(189) 《上海市政府致何应钦等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90) 《吴铁城致罗文幹电》，《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50—1451页。

(191) *DBFP*，Series 2，Vol．9，p．575．

(192)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05页。

(193) *DBFP*，Series 2，Vol．9，p．582．

(194) 《中央国府扩大纪念周》，《申报》，1932年3月2日。

(195) *FRUS*，1931-1941，Vol．1，p．87．

(196) *FRUS*，1931-1941，Vol．1，p．202．

(197) 《淞沪抗日画史》，第14页。

(198) 《淞沪抗日画史》，第14页。

(199) 3》《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02页。

(200) 《日本复文内容》，《申报》，1932年3月4日。

(201) 《中央日报》，1932年3月6日。

(202) *FRUS*，1931-1941，Vol．1，p．206．

(203) *FRUS*，1932，Vol．3，pp．584-585．

(204)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28页。

(205)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55—56页。

(206)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10—

611页。

(207)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2页。

(208)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2—613页。

(209)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96—97页。

(21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5页。

(21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5页。

(212) 《停战协定要点待商》，《申报》1932年3月27日。

(21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6页。

(214)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215) 《淞沪抗日画史》，第15页。

(216) 《郭泰祺之谈话》，《申报》，1932年4月2日。

(217)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218) 《日代表之请训》，《申报》，1932年4月2日。

(219) *FRUS*，1932，Vol．3，p．673．

(220) 《停战会议昨开小组会》，《申报》，1932年4月7日。

(221) 《英使折中办法》，《申报》，1932年4月8日。

(222) 《撤兵期限》，《申报》，1932年4月10日。

(22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2页。

(224) 《中央日报》，1932年4月21日。

(225) 《满洲事变》，第400页。

(226)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下）》，《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227) *FRUS*，1932，Vol．3，p．720．

(228) *DBFP*，Series 2，Vol．10，London，1969，p．399．

(229)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31—632

页。

(230) 蒋介石：《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1932年3月10日，《绪编》（一），第516页。

(231) 《绪编》（一），第434页。

(23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1页。

(233) 《国府暂不迁回》，《申报》，1932年5月15日。

(234) 《国都迁回有待》，《申报》，1932年6月5日。

(235)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国难会议纪录》，第5页。

(236) 《社评：国难会议》，《大公报》，1932年1月24日。

(237) 《一中全会决定》，《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9日。

(238) 《平津国难会员拟提重要议案》，《申报》，1932年3月18日。

(239) 《江苏国难救济会对于国难会议之表示》，《申报》，1932年2月26日。

(240) 《全国救国会招待国难会议会员提出意见》，《申报》，1932年2月3日。

(241) 《国难会议组织大纲公布》，《申报》，1932年3月12日。

(242) 《时评：召集国难会议平议（上）》，《申报》，1932年1月28日。

(243)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上）》，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

(244) 《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报告》（1932年4月25日），《中央日报》，1932年4月27日。

(245)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第180页。

(246) 《国难会议沪会员不赴洛》，《申报》，1932年4月6日。

(247)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4期。

(248) 《国难会议会员》，《申报》，1932年4月6日增刊。

(249) 《社评：国难会议与当局态度》，《大公报》，1932年4月13日。

(250) 《汪精卫致开会词》，《申报》，1932年4月9日。

(251)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

(252) 《汪院长宴国难会议会员演说词》，《国难会议纪录》，第26页。

(253)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

(254) 《国难会议纪录》，第56、57页。

(255) 《汪院长昨日抵京过徐谈国难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日报》，1932年4月15日。

(256)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57) 《国难会议纪录》，第69—70页。

(258) 《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报告》（1932年4月25日），《中央日报》1932年4月27日。

(259) 《国难会议议决设立民意机关》，《申报》，1932年4月13日。

(260) 《国难会议电国联调查团》，《申报》，1932年4月13日。

(261) 《主席臧启芳致词》，《国难会议纪录》，第29页。

(262) 《国难会议宣言》，《国难会议纪录》，第2—3页。

(263)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64)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65) 《社评：国难会议与当局态度》，《大公报》1932年4月13日。

(266) 《国难会议纪录》，第29页。

(267) 《国难会议与名人会议（下）》，《申报》，1932年1月29日。

(268) 《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大公报》，1931年7月27日。

(269)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4页。

(270) 《中央发表对粤和平经过》，《申报》，1931年10月31日。

(271) 《四全大会昨开预备会议》，《申报》，1931年11月14日。

(272) 蒋介石：《团结内部抵御外侮》，《革命文献》第72辑，第26页。

(273) 《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申报》，1931年11月27日。

(274) 《蒋介石讲话》，《申报》，1931年12月1日。

(275) 《四届一中全会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9日。

(276) 《绪编》（一），第439页。

(277) 《绪编》（一），第440页。

(278) 《绪编》（三），第34页。

(279) 《何应钦谈剿匪新计划》，《中央日报》，1932年4月25日。

(280) 《抗日必须剿共》，《大公报》，1932年6月12日。

(281) 《汪精卫解释长期抵抗意义》，《申报》1932年6月29日。

(282) 《汪精卫等乘飞机赴浔与蒋会商军事财政外交》，《申报》1932年6月15日。

(283) 《蒋决心肃清五省匪共》，《大公报》1932年6月22日。

(284) 《蒋召各师旅长指示剿匪机宜》，《申报》1932年7月1日。

(285) 《申报》1932年7月20日。

(286) 《御侮与剿匪》，《申报》1932年7月27日。

(287) 《蒋求贤手谕》，《申报》1932年8月14日。

(288) 《中执会九一八告国人书》，《申报》1932年9月18日。

(289) 《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

(290)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5页。

(291)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70页。

(292) 《御侮与剿匪》，《申报》1932年7月27日。

(293) 《蒋勖各将领安内始能攘外》，《申报》1933年4月12日。

(294) 《汪精卫先生关于中日问题之重要谈话》，《南华评论》第4卷第14期，1933年4月22日

(295) 鲁迅：《文章与题目》，《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296) 《申报》1932年6月30日。

(297) 《华北风云紧急之谣传》，《申报》1932年7月5日。

(298) 《汪精卫先生论抵抗》，《南华评论》第4卷第3期，1932年2月4日。

(299) 《蒋汪入京》，《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

(300) 《社评：剿匪要义》，《大公报》1932年6月19日。

(301) 王造时：《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版，第115、118页。

(302) 《斋夫自由谈》，《申报》1932年1月8日。按："斋夫"系陶行知的笔名。

(303) 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

(304)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美铃书房1985年，第161页。

(305)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89页。

(306)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30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

(308)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34页。

(309)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5页。

(310)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666页。

(31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8页。

(31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0页。

(31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369页。

(314)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4页。

(315)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

(316)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67页。

(317)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378—392页。

(318)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385页。

(319)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391—392页。

(320)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1页。

(32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4—308页。

(32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12页。

(32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392页。

(324) 参见辽宁省档案馆藏十四全宗档。

(325)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408—409页。

(326)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495页。

(327)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328)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东京谦光社1973年版，第400页。

(329) ［日］栃仓正一：《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长春满洲中央银行1942年版，第18、19页。

(330) ［日］横滨银行调查部：《满洲特殊会社制度问题》，1942年版，第11—13页。

(331) 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332)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

(333)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216页。

(334)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9页。

(335)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9页。

(336)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8页。

(337)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第363页。

(338) 满铁史资料编辑组：《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4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33—1337页。

(339)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2页。

(340) 吉林省金融研究所：《伪满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341)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1页。

(342)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343)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1页。

(344)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2页。

(345) 《昭和制钢所调查月报》，1940年4月号，第28—33页。

(346)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140—141页。

(347)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324页。

(348)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

(349) 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350)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5页。

(35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387页。

(352)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87页。

(353) 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121页。

(354)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82页。

(355)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页。

(356)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0—341页。

(357)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70页。

(358) 桑润生：《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359)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70页。

(360)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8页。

(361)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423页。

(362)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234页。

(363) 陈本善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页。

(364) ［日］福富八郎：《满洲年鉴》，满洲日日新闻社1941年版，第442页。

(365)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436页。

(366) 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418页。

(367) 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418—419页。

(368) 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79页。

(369) 辽宁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专题档》。

(370) 《协和》，1932年第2期。

(371) 潘喜廷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

(372) 陈清晨：《东北义勇军之考察》，载《申报月刊》第1卷第3号。

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一节　长城抗战

一　日军侵占热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又策划侵犯热河省。

热河省地处辽宁、察哈尔两省之间，东界辽宁，南界河北，西界察哈尔，北界蒙古，是东北的屏障，蒙冀交界之要冲，沟通关内外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在“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中，就把热河省划入了伪满洲国版图[(1)]。12月，日本内阁讨论攻热计划[(2)]。日本在制造伪满洲国的过程中，所有计划、方案，与伪东北政务委员会发表的所谓“独立宣言”，以及伪满“建国宣言”等，都把热河包括在内，这就意味着日本迟早要侵占热河省。只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忙于在辽吉黑三省镇压抗日武装，一时无足够兵力进攻热河，但它很快就开始策划此事。1932年4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热河政策”，其方针规定：“对于热河省，暂时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3)]同月，日本参谋本部将第八师团调到东北，配置在辽西，受命秘密准备侵热。此后，日本进一步密谋策划，并频繁挑衅。

7月3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日军借口军事联络员石本权四郎等三人在朝阳北票之间失踪，以武装搜索为名，派日军三百余人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并占领该地。23日，数架日军飞机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华北旧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4)]。这一年底，日本又从国内调遣第六师团到东北，与第八师团一起准备进攻热河。另外，关东军还积极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作为执行日本侵略的工具。这样日本侵略热河的军事行动便逐渐准备就绪。

面对日军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扩大侵略，进攻热河之时，国民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如上所述，这一政策遭到国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不得不对热河的防卫进行一些布置，并表示了抵抗的态度。6月中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往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时，特与张学良商谈如何处置热河的防守问题。7月，国民政府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在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约二万人，防守榆关地区。同时，蒋介石鉴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腐败及与敌伪方面的暧昧关系，致电张学良，提出调换汤玉麟，并派张群赴平与张学良商谈进兵热河问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内部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及汤与敌伪关系，未下决心调换汤玉麟，但对派兵入热河一事，于8月开始进行。恰在此时，汪精卫挑起对张学良的攻击，引起国民党上层的内讧，因而推延了张学良派兵赴热计划。在张学良调遣万福麟率五个旅陆续进入热河后，12月25日，蒋介石再电张学良，决定密备中央军六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表示：“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

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5]。然而，国民政府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已无法抑制日本侵华的野心，日军仍按既定计划开始进犯热河。

日军为侵占热河，把矛头首先指向榆关。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镇。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经过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6]。事发后，落合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第九旅旅长何柱国提出四项要求，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南门，由日军进驻占领南门，遭到何柱国拒绝。2日上午9时，落合指挥日军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被中国守军击退。3日晨，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何柱国部第九旅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火力更加猛烈，城内多处起火，城上各种防御工事遭到破坏。东南城角终被轰成巨大突破口，日军坦克及步兵跟踪进入，北门至东门立即陷于无险可守状态。中国守军营长安德馨及第二连连长刘窦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镇藩等人，冒死迎战，英勇牺牲，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15时由西水门向石河西岸之线撤退。日军终以阵亡四百余名官兵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4日，日军又攻占五里台，10日再占领九门口。

榆关之战，中国守军第九旅以一个团不足二千人之众，与日本陆海空相配合的强敌三千余人激战三日，官兵伤亡过半，民众伤亡近四千人，毁于炮火的房屋达五百栋以上。尽管损失严重，却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联开会，引起国际上的极大反响，世界各国出于不同目的纷纷发表评论。美国表示反对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愿

意与国联合作制裁日本。苏联也表示不满，《真理报》、《红星报》等不仅痛斥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而且揭露国联袒护日本侵略的事实。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行径与国际上的反映，除向日本提出抗议、继续依赖国联解决冲突外，拿不出一项制止日军侵略暴行的有效措施。日本政府见此情景，一面由外相内田康哉向美、英、法、苏、意五国驻日大使声明，表示事态“不再扩大”，另一方面大造侵热舆论，加紧侵热准备。1月11日，日陆军省发表声明，公然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该省内扰乱治安或侵入该省内之不逞分子，自得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对付手段”[(7)]。21日，日本外相内田在议会作外交方针演说时称：“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8)]

与此同时，日本加紧调动军队进行侵热军事部署：1月28日，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命令；2月10日，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会议，宣布进攻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这些计划和命令所提出的侵热作战方针是：首先进攻热河东北部，把中国军队牵制于热河北部；接着向热河南部进兵，把热河与河北隔断；然后将热境的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聚歼之[(9)]。至2月，侵热兵力计有：关东军第六师团所属第十一、第三十六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八师团所属第四、第十六旅团，混成第十四旅团，以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共四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于芷山、李寿山、丁强等部。

日本调动军队，步步进逼，把战火引向热河的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

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0] 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对华北作出若干部署。2月9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在新乡设立中央执委会华北临时办事处，张继为主任，接着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幹、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2月13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军如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11] 17日，宋子文、张学良、黄绍竑等赴承德检阅军队，承德一片欢腾。18日，汤玉麟在欢迎宴会上，指天画地发誓“矢志守土”。宋子文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12]。张学良勉励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当日，张学良领衔，与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冯占海等二十七名将领联名自承德发出抗日通电称：“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并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13]。宋子文还发告前方将士书并致电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向国联及世界各国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抵抗日本入侵的决心。

张学良、宋子文等回到北平后，北平军分会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14] 张学良把现有部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共八个军团和一个预备军团。其任务区分与防御部署为：第一军团确保津塘，第二军团确保滦东，第三军团确保冀北，第七军团确保察东，第八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第四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五十三军六个师，第五军团汤玉麟部所属第五十五军一个师、四个旅，第六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四十一军三个旅及第六十三军和挺进军等，共约八万人，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至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防区，主要由万福麟率第四军团六个师

担任；此公路以北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副总司令汤玉麟）防区，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六、第五军团担任。海军以主力担任青岛以北海面警戒；航空队临时分配之。

北平军分会拟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要领尚未下达，日军的进攻即提前开始了。2月23日，日本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的备忘录，遭到拒绝后，当日日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被迫仓促应战。

2月23日，日军茂木旅团从通辽攻开鲁，中国守军汤部骑兵旅长崔兴武率部刚一接战，即向林东溃退（3月上旬投敌）。24日，开鲁被占，日军沿辽河直趋下洼。25日，日军第八师团进犯朝阳，守军董福亭旅复有一营投敌，日军占领朝阳。随后，日军第八师团向叶柏寿、凌源一线进犯。茂木旅团向下洼、赤峰进犯。热河守军节节败退，退入热河的各路抗日义勇军也因指挥不一，各自后撤。28日，日军第十四旅团攻击纱帽山附近阵地，同日占凌南，中国守军进行了一些抵抗即后撤。3月1日，日军铃木旅团进攻叶柏寿，中国守军于兆麟旅进行顽强抵抗，激战六七小时，第六八八团第十一连连长以下全部阵亡，但中国军始终守住阵地，日军被迫绕过叶柏寿直攻凌源。3月2日，凌源失陷。驻平泉的万福麟部不战即退往喜峰口。于是，从朝阳至承德的大路完全敞开。

这时，从北平抵承德仅数日的张作相见大势已去，率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于3月3日撤往古北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更是惊慌失措，早在3月1日就急电平津，征集汽车并扣留前线军车共二百余辆，装载私产运往天津租界。3月3日，又仓皇西逃，后听说平泉尚未失守，又返回承德。3月4日，他终于弃热河民众于不顾，率千余人逃往丰宁。义勇军李纯华部与承德一部守军，在敌兵压境、主帅出逃的情况下，还在承德县红石砬进行英勇阻击，夺得小炮四门和大批弹药，终因孤

立无援而撤退。是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侵占了承德。

当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凌源、承德之时，日军茂木旅团于3月1日进犯赤峰，当即遭到由山西援热的第四十一军孙殿英所部的阻击。3月2日，日军炮火轰开赤峰东门附近的一段围墙，大批日军涌入街内，孙殿英指挥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在日军的强攻下，孙部被迫撤退，当天赤峰失守。3月4日，日军占领林西。汤军崔兴武旅所部团长李守信叛变投敌后，孙殿英部又在围场的津生泰和广德号阻击日军，因孤立无援，于3月8日撤出围场，向沽源、多伦一带撤退。抗日义勇军邓文等部也退入察哈尔境内。3月21日，日军占领兴隆。至此，除热西丰宁等县外，热河全境沦陷。

国民政府原来宣传，“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15)]，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十余天，八万大军仓皇败走，19.21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中央军三十余师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只调未参加“剿共”的三个师北上应付，但在北上途中，热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其次，身为北平军分会主要首脑的张学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学良如果在日军进攻热河之前，抓紧整顿部队，提高士气，撤掉与日本有暧昧关系的热河军阀汤玉麟的职务，将军队部署在热东和冀北，加强防务，相机出击，也不会在旬日之间将热河丢失。

热河失陷，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追究责任，矛头所向，直指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蒋介石为平息众怒，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向国民政府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怀着愤懑的心情和难言的苦衷，安排善后一切，决定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至此，蒋介石

取得了东北军军权，并完全控制了华北地区。

二　长城抗战

日军攻陷热河后，为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达到划长城为“国界”的目的，随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使华北局势更为严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3月3日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丧师失地，重申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表示愿意在1月17日所宣示的三个条件下与一切真心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16]。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动上海三十多个民众团体于3月8日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演说，谴责政府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派全国80％以上的军队北上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恢复民权，停止进攻苏区，号召“形成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17]。3月9日，热河省朝阳、凌南民众以联村自治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力谋自卫，誓死抗战”[18]。同时，上海商人救国协会致国民政府各委员代电，要求政府“明令对日作战”[19]。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呼声，激发了国民党军官兵的爱国热情，驻防在平津附近及滦东一带的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准备以实际行动与日本侵略者一拼，雪热河速败之耻。

蒋介石面对热河防卫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也感到如再不认真对付，“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20]。3月6日，他在北上途中分电张学良、何应钦及北方将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指示“即断行反攻”，“以宋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21]。3月8日，蒋介石到达石家庄，召见何应钦，并令调驻河南洛阳第八十三师全部开赴保定，调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北上。他还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将领，商谈调兵及防务问题，并指示何应钦指

挥华北军事，抗击日军的进犯。于是中日双方在长城各口及平榆大道以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战役。是役从3月5日至5月25日，进行了八十余日。全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月初至月底，长城东段各口的争夺战

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乘势分路南犯，以坦克、飞机、大炮开路，向长城线推进。我军在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主要战场在几个长城关口附近展开：一、古北口内外的鏖战；二、冷口地区的拉锯战；三、喜峰口血战；四、罗文峪反击战；五、界岭口、义院口地区的战斗。我军给日军以重创，喜峰口之战尤其引人注目。

3月9日下午，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十四旅一部追击万福麟的部队，并占领了口门。第二十九军立即以第二一七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住了口上的战局。当日晚，第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挑选精壮战士500人，组成大刀队，利用夜幕掩护潜登日军所占山头，以大刀砍杀敌军。日军猝不及防，慌忙迎战，只见寒光闪闪，血染城头，百余敌人被砍杀毙命，五百壮士生还者仅三十余人。10日至11日，第二十九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激烈争夺。由于二十九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着一团，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11日夜间，第二十九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二十九军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别出潘家口和董家口，绕攻敌侧背。夜半，敌正酣睡，两旅发动突然袭击，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在方圆20里的战场上一片杀声，敌军四处鼠窜，死伤惨重，日军阵地的火炮和辎重粮秣亦被炸毁烧尽。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反击作战中，毙伤日军三千人左右，取得长城抗战以来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是中日交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激情。当时日本报纸发出这样的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

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俄）、日独（德）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22] 宋哲元军长统率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威名远扬。著名的《大刀进行曲》，虽然是七七事变后写成，但却是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二十九军官兵用赤诚的爱国之心与热血，为抗日战争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经过二十余日长城各口的反击战，中国军队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与民心。这期间先后调到北平至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十倍于日军，如有正确的作战指导，坚定的抗敌信心，不仅可以夺回长城各口，而且还可以反攻热河。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把长城抗战只不过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直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因而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第二阶段：3月底至5月初，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日军在长城沿线受挫后改变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布命令，决定以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23]。3月31日凌晨4时，日军一部在伪军配合下 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并于次日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9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在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西岸。日军向纵深发展，占领建昌营和迁安，威胁滦河西岸守军阵地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后面，对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形成前后夹击的态

势。宋哲元部和界岭口的第五十三军之杨正治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引起国际纠纷，遂命令日军自4月21日逐次回长城一线。但日军一刻也没有停止军事侵略活动。在日军第六师团等部奉命撤回滦东的同时，日军第八师团却于4月20日攻占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二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二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二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八十三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继续向四二一主阵地猛攻。第八十三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八十三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占领。

南天门之战及在此之前的古北口之战，是长城抗战中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战场。参加作战的中央军徐庭瑶第十七军所属之关麟徵第二十五师、黄杰第二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的广大官兵，以民族大义为重，表达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愿，在古北口、南天门、石匣镇一线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再次显示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和守土卫国、抵抗外侮的能力。

在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的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24] 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

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从4月下旬开始的滦东战场上相对平静局面，维持到5月初发生了突然变化，由于板垣在华北策反失败，日军决定迅速扩大战火，以“武力迫和”。

第三阶段：从5月7日至25日，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制定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裕仁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25)]。接着，日军第八师团和第六师团便再次越过长城，向关内发动大规模进攻。

西线日军第八师团一部于5月4日向石匣镇攻击。中国守军第八十三师利用既设阵地顽强抵抗，在新开岭地区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5月10日，日军第八师团主力投入战斗，中国第十七军之第八十三师和第二师轮番与日军激战，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战至13日，第十七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由昌平进到怀柔侧击敌人。5月23日拂晓战斗展开后，日军向我左右两区队主阵地猛扑，“但在我英勇战士的猛烈反击下，敌迄未得逞，我正面阵地岿然无恙”[(26)]。正当第五十九军战事方酣之际，突接何应钦停火命令，限该部于5月24日后撤至高丽营附近一带。傅作义拒绝向前线下撤退令，但在何应钦接连三次催促下，才不得不派参谋人员往前线各部传达撤退命令。停战协定签订前的最后一场恶战，至此结束。中国官兵不屈服于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十九军阵亡367人，伤484人，也是用他们的血使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击毙346人，击伤六百余人。

东线日军第六师团所属各部，于5月7日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渡过滦河，于15日占领丰润、遵化后，中国守军被迫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并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至23日、24日，日军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政府甘心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25日两军对峙在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开始停战。

综观长城抗战全局，中国军队出动35个师三十余万人参加战斗，损失6.5万人；但其中动用中央军不到十分之一。日军出动十五万余人、伪军十万人，被毙伤达四万人。从中日两军的实力对比看，中国军队并非注定失败。关东军已倾全力作战，而中央军主力并未北调抗日，而且参战官兵也曾打了不少使日军胆寒的胜仗。我国军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国民政府的决策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三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蒋介石在长城抗战的初期虽一度表现了抵抗的姿态，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只不过是为了稳定华北局势，以便为集中全力“剿共”创造条件。因此，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于3月下旬赶回南京，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密商，又经过几次中枢会议，确定了对日谋求停战、对内加紧“剿共”的决策。4月上旬，当日军疯狂向滦东进犯之际，蒋介石选定多年从政、与各方人士特别与日本方面有较深历史渊源的黄郛，

充当国民党华北当局对日“交涉”的代理人。黄郛受命后于4月19日偕同军政部次长陈仪，在上海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开始频繁接触，广泛地讨论所谓关系“中日大局”的停战问题。为了使黄能担负此任，国民政府于5月3日决定在北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但黄郛没有立即走马上任，而是在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调停下与日本代表在上海秘密谈判，对停战的具体条款达成了口头妥协，然后才于15日夜离开南京，17日抵达北平。而在黄郛离沪之日，何应钦已派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晤谈，永津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到顺义、宝坻、芦台一线。16日，熊斌表示同意按永津的要求向宝坻、芦台方面撤军，但对撤出密云表示犹豫。永津看破中国军心不稳，立刻电告关东军迅速攻取密云等县，施加更大的压力。日军为了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逼迫国民政府求和，乃加紧向中国守军进攻。至21日，日军陷香河，其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7公里的地方，北平危急。这时，何应钦、黄郛等在日军进攻面前正惊惶无主、准备南下保定；只是由于日本政府感到战争已进入最有利的态势，可以通过外交来实现其战争目标，才使他们绝处逢生，开始停战的具体谈判。22日晚11时，日本驻北平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及永津佐比重与黄郛会谈，日方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中国军队的撤退线以及为正式缔结停战协定而采取的步骤等。至次晨4时半，黄郛在南京政府划定的“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27]的范围内，与日方达成停战协议。23日，何应钦等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祖诒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即回电称：“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28] 24日，蒋介石回电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唯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29] 同日，南京国防会议也决定：“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决定电告何、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30]。

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派徐祖诒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请求停战，实际上是“阵前求和”。同时，北平军分会命令前线各部队按照已规定的撤退线向后转移。接着，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为代表，到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代表、该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举行正式停战谈判。

5月30日至3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代表有：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军分会顾问雷寿荣、李择一及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有：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炮兵参谋远藤三郎、步兵参谋藤本铁雄、师团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参谋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为了进一步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日本海军将军舰开进塘沽港，并将炮口对准会场。所谓谈判，实际上是日方强迫中方接受其既定的条款。31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拿出关东军拟定的停战协定气势汹汹地对熊斌说：“本协定案是最后方案，没有更改的余地。”他限定中方代表必须在两小时内作出回答。熊斌阅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冈村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是”与“不是”，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日方要求的最后时限只有十分钟时，中方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就是《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
>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
>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

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31]。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才允许熊斌提出声明。经讨论，双方又签订一项《觉书》（备忘录），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此外，日方在谈判中还提出希望事项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是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对日屈服妥协的条约。首先它把中国军队在自己国土上抗击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诬蔑为“挑战”和“扰乱”行动，从根本上颠倒了中日战争的性质，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位置，公开承认日本的侵华行径的合理性。其次，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第三，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停战区），冀东二十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这事实上使冀东5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脱离了中国的主权范围，从中国领土上割裂出去，从而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塘沽停战协定》是蒋汪国民政府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产物，标志着长城抗战以妥协而结束，也暴露了蒋介石以“攘外”掩盖其一贯坚持的对日妥协，以达到集中力量“剿共”的反动实质。他们以为牺牲华北部分权益就可以换取日本不再侵华，赢得消灭红军、剪除异己的时间，以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并未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而是进一步对华北实施大规模扩张和分离政策，从而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华北事变接踵发生。

长城抗战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对于保卫民族利益，反抗日本侵略作出了贡献；但由于长城抗战是在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

第二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

一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长城抗战的失利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同时也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一直批评国民党中央的内外政策，主动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寻求救国道路，矢志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隐居在山西汾阳，与其旧部及两广等方面仍有联系，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同时还与中共北方组织派来的代表萧明等直接会晤，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不断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的错误方针。1931年底，冯玉祥为实现自己团结御侮的愿望，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及至淞沪战起，冯又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怀着满腔热忱，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方案。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顽固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误国政策，使他的愿望落空，郁抑不申，于1932年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在泰山期间，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阅读进步书籍，总结政治斗争经验，探寻抗日救国的途径。他认识到抗日反蒋必须并举，而要抗日反蒋必须集结实力，否则，将无

法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由于山东的韩复榘不支持冯的抗日活动，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于是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于10月9日从泰山移住张家口。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及华北的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这时冯玉祥已经与中共北方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着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准备反抗日本对察哈尔省的进犯，进而为收复失地而斗争。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推动和指导筹建抗日同盟军工作。为了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5月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柯庆施），具体负责党在张家口地区的工作。中共北方组织还从北平、陕西等地抽调谢子长、刘仁、阎红彦等到同盟军各部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冯玉祥加紧军事上的准备。1933年2月，冯电召汾阳军校教育长、共产党员尹心田到张垣，面谈抗日建军事宜。尹心田回到汾阳后与副校长支应遴一起扩编了队伍，于4月末带领该校三千多师生全部开到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拨归佟麟阁指挥，成为冯的基本队伍。3月下旬，冯又派高兴亚赴津与旧部吉鸿昌取得联系，请吉去察共图大事；吉热烈响应，表示“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32)]，随即在天津变卖家产购置军械，于4月1日赴张家口。方振武也在冯的联络下，于5月20日率所部从山西到达张家口。此时冯的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也先后抵达张家口。冯还收编了一些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到5月，由冯玉祥出面联络的军队已达数万之众。这些武装力量尽管政治主张不同，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却都一致拥护冯玉祥统

率，领导他们抗日。

冯玉祥积极准备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多次派人访冯，企图“劝导”和诱骗冯离开察境。从1933年1月至4月，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曾派王法勤、黄少谷、李烈钧、黄绍竑、熊斌等人，陆续到张家口向冯游说，劝冯离察进京，均遭冯拒绝。冯对左右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33] 正当冯拒绝蒋要他离开张垣之际，察哈尔形势日趋紧张。4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阵地的同时，也开始对察省重镇多伦的进攻。4月25日，日伪军从围场出发向多伦进犯，并于29日攻陷多伦。接着，日伪继续南犯，于5月24日占领沽源，察省全境行将不保。值此形势垂危之际，冯玉祥于当日在张垣主持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军各地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26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通电指出：“日本帝国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之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两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且扣留民众之义捐，禁其使用。要之，政府初无抗日之决心，始终未尝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待遇不公之故，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安定人心自欺欺人。”“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仅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的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

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34]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章海，辖两师一旅；第二军：军长吉鸿昌、参谋长崔贡深，辖四师；第五军：军长阮玄武，辖两师；第六军：军长张凌云、副军长徐福胜，辖两师；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辖三师；第十八军：军长黄守中，辖五师；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辖三师两旅；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参谋长傅同善，辖两军；察哈尔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辖三师；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辖三师两旅；第四军：军长米文和，辖一师；蒙古军，辖三军；以及总部直辖各部队，共约十万人[35]。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促进了张家口（张垣）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张家口，5月27日由“各界御侮救亡筹委会”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三千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推选共产党员杨波等为执行委员，负责筹备召集全省的抗日御侮救亡大会。同时，创办了《抗日前线》、《民众日报》、《民国日报》，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为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同盟军的爱国斗争，中共张家口特委成立前敌委员会。前委领导了平绥铁路工人参加斗争，并在电灯、电话、汽车等行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同时，在农村组织了救亡会。在同盟军北征期间，动员农民参加运粮、募捐、慰劳等支前活动。张家口工农群众运动，对察哈尔抗战起了支援作用。

在全国，民众的抗战精神因此而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5月31日，山东全省民众抗日会电贺冯玉祥组成抗日同盟军，表示“誓从公后，湔雪国耻”。6月1日，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西南各省国民对外总会、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分电祝贺冯

玉祥率师抗日，表示竭诚拥护。6月20日，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36]。总之，抗日同盟军的建立，打破了当时的沉闷空气，在全国引起了广泛重视和巨大反响。

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抗日同盟军组建后，冯玉祥加速整顿、训练部队，以迎敌抗日。刚成立的同盟军的人数虽多，但情况复杂。有许多是转战经年的疲惫之师，不仅弹械缺乏，有的甚至连军装、给养都无着落。原东北义勇军的相当多的士兵还穿破烂冬装，无夏衣更换。有的刚组成的队伍，尚无军事经验。虽然各部人员出于爱国热情，愿意齐集于冯玉祥的抗日旗帜之下，但思想水平有较大差距，政治素质不纯，组织松散，无法与敌人抗衡。冯玉祥为使这些部队恢复与增长战斗力，一面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以鼓舞士气；一面多方筹集，补充械弹、给养，更换一部分装备，使疲劳之师焕发出战斗精神。同时，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于6月15日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由冯玉祥、王化一、张砺生、武纯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等九人为大会主席团，陶新畲为秘书长，到会代表共61人，历时五日。会议商讨了两项工作：第一项，通过《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明确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37]。同时，还通过关于军事、财政、政治工作、组织等一系列决议。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出军事委员35人，候补

军事委员29人。尔后又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冯玉祥立即重新部署军事，并组织收复察东的战役。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随后又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统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1日，吉鸿昌率同盟军主力兵分三路北上，集结于张北县附近，准备作战。22日，同盟军先头部队张砺生部进逼康保，经三小时激战，守敌崔兴武部向东败退，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吉鸿昌亲率左路军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直趋宝昌，李忠义率右路军挺进沽源。26日，沽源伪军刘桂堂部通电反正，同盟军乘势将沽源张海鹏之一部伪军击退，沽源遂告克复。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残敌弃城逃往多伦，宝昌亦被收复。

察东三县相继克复后，同盟军士气大振，乘胜进军多伦。多伦是察哈尔省的门户，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滦河上游，北是内蒙锡林郭勒盟，不仅是内、外蒙的中枢，也是张家口通库伦的孔道。日军侵陷多伦后，视之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为巩固该城防务，调日军骑兵第四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排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并调第八师团一部进驻丰宁，互为犄角，便于策应。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兵分三路，迅速进攻多伦。其部署是：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亲率邓文所部为总预备队。7日，同盟军各路开始向多伦发动总攻，日伪军凭借坚固工事与优势的火力拼命顽抗。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袒臂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只因敌人火力猛烈未能攻下，同盟军伤亡团长以下官兵二百四十余名，牺牲极为壮烈。11日拂晓，同

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先期潜入城内的同盟军数十人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三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至此，失守72日的多伦终于被同盟军收复。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四县，共歼灭日伪军一千余名，同盟军亦伤亡一千六百多名。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特别是血战多伦的壮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并组织慰问团，捐款捐物，支援前线。7月13日，张家口各界举行庆祝收复多伦大会，军民高举抗日旗帜，高呼抗日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并向前线战士发出祝捷电，谴责国民党当局“唯知失地辱国，靦颜事敌”，赞扬抗日同盟军战士“义旗奋举，志切报仇，誓师兼旬，连克要塞，干城卫国，薄海同钦”[38]。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荩筹硕画，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瑭、秦桧者，将有所畏惧，而不敢径行其私。”[39]平津各大报都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吉鸿昌收复多伦的消息，盛赞同盟军。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也先后电贺冯玉祥克复多伦，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兴师收复东北四省。冯玉祥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积极进行规复东北的准备，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自东北覆亡，普天同愤”；又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同时表示“职责所在，全力赴之。”[40]

三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察东失地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等却在密谋策划，加紧扼杀抗日同盟军。还在7月3日即同盟军总

攻多伦前夕，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已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并电百川、明轩，一致觉悟协力”[41]。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并令庞率领第四十军、冯钦哉率领第七军、万福麟率领第一一九师、关麟徵率领第二十五师、何遂率领第五十五军一部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开赴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对付同盟军的办法。会议决定增派部队，又命令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此时，日本与南京政府暗相呼应，也乘机向冯玉祥和同盟军施加压力，企图重占多伦、沽源等地。日本于同盟军克服多伦后，即由驻平日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于14日面见何应钦，提出口头警告，指为违反《塘沽停战协定》；同时对冯玉祥驻平代表提出严重抗议，亦指为破坏协定。22日，日机两架侦察多伦后，并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日军将大举进攻，并投重弹轰炸，使成焦土[42]，同时派日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二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伺机进犯。

抗日同盟军处在国民党、日伪的环攻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冯玉祥一面对日本的武力讹诈和威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16日，冯玉祥在接到日本关东军军部提出取消抗日、退出多伦的“觉书”后，立即以日军退出东三省的反要求答复。翌日，日又提出如“三日不答复，即以全力取察省”。冯又复以限日本“三日内速觉悟，否则即以全力夺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19日，复令吉鸿昌向多伦、沽源增兵防敌。接着，续调乜玉岭、姚景川、任平治三个师前往协守，严令寸土不得轻易丧失。一面通电全国和西南当

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各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43]。7月20日，国民党中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味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44]。7月22日，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致电南京政府，指出：“外侮未已，匪乱日炽，而对察又闻有用兵之说，曷胜骇惧。敝会之愚，以为冯氏果志切抗日，则保障察境应予容纳，设或别有主张，亦当以政治手腕解决，避免武力。”[45] 7月30日，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冯玉祥，鼓励“坚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敝会当再通电全国，一致拥护，藉申民意”[46]。

全国既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又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南京政府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47] 冯玉祥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对蒋汪俭电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严厉批驳，指出：抗日“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48]。

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省，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

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北平军分会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察省与外面的弹药、粮食运输。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日、4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与国民党军开战，不利于整个抗日大局，遂希望原察省主席宋哲元回察，以便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力量，于是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49]。6日，宋哲元发表复职通电。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到张家口。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将方、吉两部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转移到张北附近，准备会师商都，创建察绥抗日根据地。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后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贼军”。方振武率部到商都时，因国民党军已先行到达，难以立足，且南下道路亦被国民党军占据，遂东开独石口，后转战于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等地。10月上旬，方、吉等部在小汤山地区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10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为保存抗日力量，另谋抗日出路，忍痛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离开部队。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50]。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不久，他被南京政府逮捕、审讯，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进攻与国民党的阻挠；而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失误，也

是失败原因之一。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同盟军将士将近半年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残内媚外的行径，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北方各省以及全国各地的抗日反蒋斗争。同时，它也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大举进犯。察哈尔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军将士的斗争业绩必将永载史册。

第三节　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纷争

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主军、汪主政的联合执政形式虽然暂时调和了矛盾，但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中央有蒋、汪两大派的明争暗斗，地方有各割据势力之间的争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在停止内战的强大呼声压力下，各地纷争有所缓和。蒋、汪上台后，虽曾号召“团结御侮”，要求各地暂息争战，但当蒋介石着手统一军制时，因牵涉到各地方实力派的实际权益，各地方实力派的火并又相继再起。1932年4月，广东省主席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与海军司令陈策两派之间首先发生武装冲突；同年9月间，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与驻胶东的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发生了激烈的战事；继而四川两实力派刘湘、刘文辉发生争夺统治权之战；新疆也发生盛世才、马仲英之战，等等。本节以上述四例简述当时各省地方实力派互相火并的情况。

一　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

1932年初，南京成立以林森为主席，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国民政府。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仍维持半独立状态，表面上拥戴胡汉民为西南领袖，实际上是陈济棠、李宗仁分掌两广实权，而且陈济棠成了独霸广东的“南天王”。蒋汪联合上台之初，陈济棠仍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但广东的空军与海军各有政治背景，陈指挥不动，当宁粤

对立时期，在汪精卫、孙科的安排下，张惠长、陈策分任空军和海军司令，形成广东军事力量陆、空、海三军并立的局面。南京政府企图利用粤省军队的内部矛盾，暗中支持空军与海军，以牵制陈济棠。陈为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则要统一广东的军队，由此导致与张惠长、陈策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

1932年春，蒋介石着手统一全国军队编制，将第八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西南绥靖主任、湘粤赣“剿匪”副总司令，将陈部调往江西“剿共”。陈与居住在香港的胡汉民磋商，确定对南京当局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从而引起蒋汪的不满。4月30日，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裁撤广东空军总司令部，原有空军由第一集团军接管，任命黄光锐代理粤空军总司令，改任原空军总司令张惠长为第一集团军高级顾问。海军司令陈策为防备陈济棠乘机改组海军，将驻省河的舰只开到黄埔港集中，进入战斗状态。陈济棠电邀陈策到广州议事，陈策为防备不测，遂令飞鹰、福安、海瑞、平南、海虎、广金等舰开赴海南岛集中候命，所有内河各舰大小数十只由“中山”舰舰长陈涤（陈策之叔）指挥，集中内伶仃岛候命，福安、海瑞、平南、飞鹰等舰先行驶出。

5月3日晨8时，中山、海虎、广金三舰驶近虎门，企图出口，不服炮台制止，开炮袭击，三舰还炮，中山、海虎二舰驶出了虎门，引起了虎门事件。当日，陈济棠又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宣布撤销海军总部，改隶第一集团军管辖。陈策改任一集团军高等顾问。当日下午，陈济棠又派第五师师长陈达部赴黄埔收缴海军陆战队军械，但陆战队已登舰他驶，双方发生了激战。广金舰长李锅熙被扣。当时陈济棠与南京政府矛盾加深，陈策通过海军参谋长黄仲瑜表示：“海军改隶如确系维护和平统一，为粤省谋休息，为人民谋幸福，则极端赞成，个人去留不成问题。若以海军改隶于独裁割据的军阀，则认为不可，退往安全地方，以待解决。”[51] 同月5日，粤海军将领陈鼎等暨中山、飞鹰等二十余舰长通电拥护陈策，谴责陈济棠拥兵自固，对海

军蓄意剪除，并表示为避免陈济棠暴力压迫，将舰队移驻琼崖和唐家湾。5月7日，张惠长、陈策反对粤空、海军改组，在港商议投靠南京政府，并派代表赴桂林联络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声援。同日，陈策致函海军同学，揭露陈济棠操纵把持广东，改组海空军是为军阀割据，呼吁主持公道，力抗强权。5月11日，陈济棠委邓龙光为海军司令，即日视事接收粤海军司令部，并加委各舰舰长。同时，召集广东陆军各将领余汉谋、李扬敬等到省城开军事会议，共商大计，决定讨伐陈策，广东内战遂起。陈济棠决心用武力压服海军，调动刚接管来的空军，悬赏轰炸开往海南岛的海军，又在雷州半岛聚集大军，征集大批木船，打算渡海作战。

与此同时，陈策、张惠长等在海南岛成立海军与空军司令部。陈策任陈庆云以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总参议名义，与参谋长陈鼎主持中山、飞鹰、福安、海瑞、海强等较大军舰开赴海南岛，有些舰艇则停在唐家湾。陈策等决定截留十三属税收，将海口中央银行扣留，撤换县长，还成立了航空处隶属于海军部，委周伯成为处长，准备对抗。陈策在海口设立司令部，提出“息内争”、“抗日本”、“不参加内战”，同陈济棠相抗衡。他在海口市发布告，声称：“敬告国人，矢以不参加内战，一致对外……率所部陆战队、舰队移驻琼崖，努力抗日剿共工作，以待党内公判。”[52] 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

陈策的通电迎合了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军制的要求，顺应当时全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舆论，给陈济棠很大压力。6月11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执委派马超俊乘轮抵粤，拟调解这次纷争，但遭到陈济棠拒绝。陈决定对海南岛用兵，令第一集团军准备出动，并于12日电复在沪中委，声称西南政务委员会之令海军改隶，纯为积极整顿海军，指责陈策昧于私见，致有抗命之举，须知军舰改隶整理，并非阋墙之争。马超俊见调解无望，遂于13日赴香港，候轮北返。

6月中旬，广东陆军开始对海军进攻。17日，陆军梁公福部与海军四艘兵舰在唐家湾附近激战约一小时，舰队因不敌陆军攻击，撤退

转移，唐家湾为梁部占领。在内伶仃各舰因逃避空军轰炸，分散驶往附近小岛以及澳门、香港逃避。19日，陈济棠派海军司令李庆文会同舞凤舰长丁培龙、北安舰长李芳等率各舰驶往澳门，商议招收各逃舰事宜。29日，陈策代表黄仲瑜向汪精卫报告广东海军情况，汪于次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讨论此事，决定以中央名义电劝二陈即日停止战事行动，并电请留粤各中委调解海军风潮。7月2日，陈策通电，接受南京中执委调解，电称："敬读陷电，感动弥深，粤省不幸，在国难当前、共乱日亟之际，竟突有海军改隶事件发生，策遇变之下，悲痛填膺，每念我国频年内战，民不聊生，更因此而屡招外患，苟有良知，何忍再作阋墙，贻国家无穷之祸。唯有全军退处海隅，努力剿共，静候中央处置，诸君热诚接受。尤期南针时赐，俾有遵循，海天在望，无任神驰。"(53)

开往海南岛的海军舰只，分泊在白马、海口等处。7月5日，陈济棠派飞机向飞鹰、福安等舰轰炸，弹多落入海中，且遭高射炮还击，粤机改向海口各机关及海军陆战队轰炸，殃及不少商店住宅，死伤惨重。6日，粤机从雷州半岛不断起飞，向海口方面的飞鹰舰轰炸，曾遭到舰上和岛上秀英炮台的高射炮还击，互战约一小时。飞鹰舰中弹，挂起救生旗，但粤机仍将受伤军舰炸沉，死伤二十余人。

陈济棠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寻求结束广东陆海军内争的办法。胡汉民曾提出调解方案，将广东海军分为海防舰队与江防舰队，海防舰队司令由南京中央政府委派，江防舰队司令由第一集团军委任，海军陆舰队调黄埔集训，其司令也由第一集团军委任。7月上旬，陈济棠召开西南政委会，商定按上述方案解决纠纷。这时蔡廷锴也到广州参与调停，在各方面催促下达成了协议。7月中旬，原赴琼崖的福安、海瑞、安北各舰由陈庆云率领驶往厦门驻守，陈策调任福建省任绥靖处长，其他舰只由南京政府改编；琼崖行政由陈济棠派陈光汉前往接管。至此，粤省内战终于结束。

二　韩复榘与刘珍年之战

广东陈济棠部与海军的军事冲突甫告平息，山东的军事纷争又起。1932年9月中旬至11月间，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与驻胶东的第十二师师长刘珍年又发生冲突，导致激烈的内战。

韩复榘原为冯玉祥的部将，1929年叛冯投靠蒋介石，随后在中原大战中与冯、阎军队作战，为蒋立下汗马功劳。1930年9月5日，国民政府改组山东省政府，韩被蒋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先后兼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但蒋介石对韩复榘虽表面信任，暗中则处处牵制，除将青岛交给张学良的海军驻防外，又将张宗昌直鲁联军的降将刘珍年摆在胶东，刘珍年所部被蒋编为第二十一师，也称第十七军，驻烟台及胶东蓬莱、福山、黄县、招远、栖霞、文登、掖县、莱阳、牟平、海阳、荣城、平度12县。刘部辖三旅四团，约三万余人，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山东省政府改组时，蒋介石委刘珍年为省府委员。蒋此举意在以胶刘监视、钳制鲁韩。韩复榘虽为山东省主席，但所辖地区比较贫瘠，鲁南和鲁西又多土匪，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特别是缺乏海口，无法将土产输出换取武器装备。在韩统治区之南有刘峙指挥的蒋军嫡系部队十余万人控制于徐海、开封。因而韩蒋之间矛盾重重，为摆脱孤立，韩也暗向张学良拉拢合作。首要问题是，韩要谋求统一和称霸山东，自难容“一山二虎”，因此胶刘成为韩的心腹之患。况且刘还时刻梦想冲出胶东，取韩而代之。这两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刘珍年所据之胶东，是山东省的富庶地区又有出海口，收入较多。刘在辖区内自行收税，拒绝向省府上缴分文。刘又将其辖区视为独立王国，自派任县长，拒绝接受省政府委任官吏。刘部还曾与国民党特务合伙，计划分化韩的部属，对南京拨给山东军队的一些协款的分配问题，也常与省府弄成僵局。这些都加深了韩刘之间的矛盾。最

关键的问题是韩要统一山东，独据全省，不容许有异己军队占据其间。韩复榘在给南京的通电中曾公开声称："防区（即刘辖区）亦称山东之辖地，其人民亦山东之部民，复榘责任所关，义无旁贷，焉敢放弃，自取愆尤？"[54]

韩刘之战是韩复榘首先发动的，却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刘珍年为准备战争，对胶东人民强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加重了对人民的搜刮。田赋附捐多至几十种，甚至用绑票的方法榨取勒索巨款，还在辖区内强拉壮丁，招兵买马，民众怨声载道。其实在韩的统治区内也有类似情况，中共山东省委曾揭露说：刘珍年"连年来是横征暴敛，招兵买马，不独在烟台称王称霸，并且时时想冲开胶东。他们（指刘、韩）时时有火并的可能与准备，因此，他们不得不加紧（对）人民的剥削，近来山东的苛捐杂税较之张宗昌时代为尤甚。"[55] 韩复榘找到了刘珍年可供借题发挥的口实，大肆渲染，在给南京政府的通电中宣称："复榘为民请命"，"为解除人民痛苦起见，誓当驱逐此獠，以救民命"[56]。他的省政府所属厅长们在通电中也罗列刘珍年的五大罪状，即"把持民政"、"扰乱财政"、"破坏建设"、"摧残教育"、"朘削实业"[57]。

1932年八九月间，胶东民众酝酿揭起反抗刘珍年苛剥的斗争，韩故意饬令镇压。此时，胶东土匪也乘机而起，韩以协同剿匪为名，派部队前往胶东。刘珍年看出韩复榘来者不善，也调兵遣将，准备迎击韩部的突然袭击。于是韩部到刘防区"剿匪遭拒"便成为韩刘之战的导火线。

9月中旬，韩复榘在潍县、高密一带聚集了第三路军约五万余人，作出准备进攻的态势。9月16日晨，韩由济南亲赴潍县督师。与此同时，刘珍年部在沙河、平度、昌邑一带布防，严阵以待。1932年9月17日夜间，韩部在昌邑首先向刘部发起进攻，韩刘之战爆发。韩军兵分两路：韩亲率第二十师三个主力旅为左翼，沿烟、潍汽车路前进，直扑掖县；曹福林任右翼总指挥，率其第二十九师三个旅渡莱河

进攻平度，拟与韩至烟台会师。韩、刘两军9月17日在昌邑、潍河沿线接触后，刘军很快退守掖县与平度，韩督师追抵掖县。

韩复榘对刘珍年用兵是“先斩后奏”，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9月18日，韩向南京政府发出“巧”电，以“为民请命”为由，状告刘珍年。19日，刘珍年则急电蒋介石、何应钦报告挨打，请求中央做主。韩刘战争突发，蒋事先并未察觉，19日特电令双方立即停战，“静候中央处置”。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六十五次会议，何应钦在会上报告韩刘军事冲突经过，决定“严令制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解决”，并电蒋“迅电韩、刘，切实告诫”[58]。蒋介石唯恐刘军败北，急电调刘峙部由徐州向北移进，商震部由河北向南移动，准备南北两路攻韩援刘，压制韩的军事行动。当南路军黄杰部进抵鲁南郯城时，张学良在北平发表援韩通电，并派一个炮兵团增援韩部。蒋、张的军事介入意味着战争有可能扩大，国内各界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强烈要求“和平解决鲁争”，防止日本再次乘机扩大侵华，蒋介石决定“停兵调停”。21日，他派蒋伯诚、熊斌等赴济南转潍县、掖县等处，分别会晤韩、刘进行调解。

韩复榘此次用兵旨在驱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并不理会蒋、何的电令，继续进攻。9月23日，韩、刘两军主力在掖县外围激战，随后刘军退入城内固守。曹福林率右路军与刘军在平度开战后，刘军也收缩战线退入莱阳城固守。但双方为争取舆论支持，都作出一些和平姿态。9月23日，韩向南京发出“漾”电，表示愿意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处理。24日，韩撤回一些部队，并于当天回到济南。27日韩又发出“沁”电，声称此次行动乃为“应胶东人民之请命，为国家弭此乱源，仓促间实出万不得已”，“为进兵攻刘自请处分”[59]。刘珍年也于23日晚将兵力撤出烟台，收缩至栖霞，利用当地四面皆山，极宜固守的条件，伺机再战。9月24日，张学良的海军进驻烟台，韩复榘也派骑兵驰烟台接防，并委派了胶东八个县的县长。至此，刘军的地盘仅有栖霞、莱阳、掖县、牟平四县。同时韩派省府委员张钺赴庐山晋

见蒋介石，商请解决山东问题的具体办法。

蒋介石向张钺提出山东问题的三项办法：缩小刘部的防区；刘珍年将胶东行政权交山东省政府；由山东省府每月拨刘师14万元军饷。韩得悉后，于9月27日夜致电蒋，说明刘师已损失殆尽，无保留必要。30日，蒋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决定：令刘军缩小防区，韩军后撤，由中央派蒋伯诚赴前线监督执行。双方因胜负未见分晓，均不愿善罢甘休。10月上旬起，韩刘两军不断在掖县、莱阳激战，双方炮战甚烈，当韩部得到张学良重炮支援后，刘部渐感处境险恶，难以坚持，10月初，何应钦电促韩、刘“切实停战”。并电请蒋介石速示处置办法。6日，军政部派代表范毓璜等到济南转往胶东前线调查战情，监督两军停战。11日，韩发表《致胶东父老书》，强硬声称：“一日不去刘，良心所不安，已下除刘万分决心，决不半途中止。”[60] 18日，韩特向记者表明他是否撤兵，以刘部是否撤出山东为条件，否则断不撤防。

10月19日，南京当局拟定鲁战解决办法，以何应钦名义发出皓电，规定莱阳、牟平、福山（烟台）、掖县、栖霞等五县及龙口为刘军驻地，所有政权交还山东省政府，刘部让出其他防地，交“民团”负责守备，韩部所属第三路军限即日起撤回潍河以西原驻地，26日前撤完，移防兵应各整饬军纪，静候中央处置。这个方案，在韩看来于己不利。方案限令韩部撤出已控制的除栖霞以外其他胶东地区，还要将其已占领的烟台（福山）、龙口划归刘部防区，至于将刘部外调问题只字不提。对此，韩复榘感到不能同意和容忍，转而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21日，韩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等发出马电，“仰恳准辞山东省政府主席本职。复榘生性坦直，言必由衷，久隶帡幪，谅蒙洞鉴，果尚有一线可行之路，决不作无端烦渎之辞”[61]。韩还对记者说，划五县为刘师防区，使他在“精神上颇受刺激，辗转莫决，提出辞职”[62]。24日，山东省府的厅长们又联署致南京号

电，为韩陈述“苦衷”，并敦促中央“迅赐解决办法”。同日，蒋介石、张学良电劝韩“打消辞意”。韩坚持不听，而以军职名义继续调兵遣将，加紧围困掖县。22日，韩部击退刘部副军长何益三从莱阳派兵增援掖县的部队后，并进而进攻莱阳城。

韩的辞职通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影响，军政界要人张学良、张群、刘峙、宋哲元等纷纷电韩慰留，多数主张挽韩调刘，以息争罢战，并敦请中央重定解决鲁争办法。山东商民代表苗世远等致南京的通电，言词激烈，质问：“中央自不惜一韩主席，独不为山东地方计乎？即不为山东地方计，独不为大局计乎？”[(63)] 至此，南京方面感到，山东问题要妥善解决，除将刘部他调外，别无良策。同时，蒋介石见刘军败局已定，其部留鲁必为韩部收编，将导致扩充韩的军事实力，遂决定将刘部调离山东。刘珍年见大势已去，10月25日电呈南京，表示愿将该师调离鲁境，另谋发展。南京政府答复照准，28日起，蒋介石先后派河南清乡督办张钫及蒋伯诚赴鲁斡旋和平，与韩磋商解决鲁事途径。他们转达蒋意：要韩将包围掖、莱军队撤至潍河以西，并将烟台、龙口让出，由东北海军暂驻，以便调刘部从海道离鲁。韩复榘见目的已达，即打消辞意，表示“唯中央命令是从”，只是要求撤军期限展期至11月8日。经南京同意，并派蒋伯诚、熊斌、高凌百等监督执行。11月2日，蒋介石授命何应钦下达《对胶东韩复榘、刘珍年冲突事件处理命令》：

（一）韩军先让出烟台、龙口，暂交海军维持治安；该两地俟刘军借道开拔后，仍由刘军交海军接防，以免治安无人负责；

（二）除指定刘军暂住之掖、莱等五县外，其余昌邑、平度两县，可各驻韩军一营，文登、荣成可留鲁东民团八九百人驻守，韩军撤至汇河以西。

（三）监视韩、刘两部人员，以蒋伯诚留济，高凌百在烟台，熊斌赴掖县[(64)]。

上述命令得到贯彻，终于使全国关注的胶东战事宣告平息。由于刘珍年部第二十一师声名狼藉，几经周折，才确定了新的驻地。11月17日，刘部开始由掖县等地陆续开拔。23日由烟台登轮离鲁南下。12月19日，全部抵达浙江温州，其中一部驻浙东，一部开闽北加入反共战争。经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军政部电令刘部缩编为乙种师，刘任师长。同时，蒋介石策动了该师驻福建浦城的独立旅脱离刘部，交鲁涤平指挥，归中央军所属。对此，刘珍年极为愤怒，暗中离开驻地到杭州进行反蒋活动。1933年5月被蒋扣押，1935年5月于南昌以“纵兵殃民”等罪名将刘枪决。刘珍年被逐离鲁后，胶东各县悉归韩属。他在各县委派县长，组织胶东民团军，并设局征税。韩复榘统一山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但蒋、韩之间限制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并未就此了结。

三　四川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1932年10月四川爆发了刘湘、刘文辉为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是民国以来四川各军阀进行的四百余次混战中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四川省自民国以后，省内的军事头目依其各自独特的经济、地理条件，在境内拥兵自固，割据地盘，划分防区，在其防区委官收税，敲榨剥削人民。防区之间，视为敌国，并为扩大防区，不断互相火并，形成长期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

1926年秋，北伐军进军武汉告捷，四川各主要军事将领易帜自保，先后宣布支持国民革命，接受改编。但他们没有参加北伐，而是继续互相混战，逐渐形成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四川的局面，进而形成二刘为首的两大派系的对立。因刘文辉同邓、田共同占有成都，亦称蓉派；刘湘占据重庆，亦称渝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对四川相机采取一些措施，但未能改变该省各防区民财各政自行其是的格局。

蒋介石早有染指四川的企图，无奈鞭长莫及，鉴于川省各派系各拥有实力，难以强取，于是采取了“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办法，以谋逐渐达到控制四川的目的。1928年11月蒋任命刘文辉为四川政府主席。刘文辉雄心勃勃，谋求统一四川，进而问鼎中原，但他在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两次借机反蒋均告失败。刘湘则一直采取拥蒋态度。1931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组，蒋介石继续委刘文辉为省主席的同时，任命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将“所有川军归刘湘全权编遣”[(65)]。这样就加剧了四川省内一山二虎猛烈争夺的局面。

刘文辉与刘湘是堂叔侄关系，刘湘虽属侄辈，但约长刘文辉五岁。当刘文辉1916年自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回川时，刘湘已任川军旅长，后在军阀角逐中先后升任师长、军长、总司令等职。他因家族关系，对刘文辉有所援引、扶持，因此刘文辉职位迅速上升，20年代初一跃为混成旅长。刘文辉对刘湘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财力上也曾有过支援。二刘在四川军阀的争战中曾经互为依赖，共图生存，同谋发展。但当他们形成可以左右四川的两大势力时，各自图谋独霸四川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二刘的合作随即被彼此对立、争战所代替。

自1928年下川东之战后，刘湘据有川东二十八县和鄂西十八县。控制夔门，扼长江上游咽喉，并占江运之便利，购买飞机、炮舰及大量枪械，拥兵十余万人，实力大增。1931年2月改任四川善后督办后，更是以四川盟主自居，曾口吐狂言：“中国历史上四川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刘湘身边的江湖术士刘从云亦煽动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四川）不容二流（二刘）。”进一步助长了刘湘独霸四川的野心。

1920年还只是一个混成旅长的刘文辉，经过八年的经营，到1927年已身居二十四军军长，1928年11月，又当上南京政府委派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及川西的崇庆、双流、新津、华阳等县，其势力扩展到顺庆、遂宁、西康十几县，共七十余

县，拥兵十万以上，其实力居于其他四川军阀之上。刘文辉不仅要“统一四川”，而且要“问鼎中原”。1932年夏，刘文辉在重庆问刘湘的谋士刘航琛：“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刘航琛针对二刘互不相容的局面，巧妙地回答说：“统二好了。”[66] 但刘湘、刘文辉都不肯容忍四川长期存在一山二虎的局面。一场叔侄之间的战争就难避免了。

二刘既都企图独霸四川，他们均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对方实力，竭力整垮对方，因而两方矛盾日趋激化。刘湘对刘文辉独占资中、内江盐税、糖税，不履行收入分成之约十分不满，心存报复。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之巨款从国外购买飞机、武器，散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被刘湘师长王陵基扣留没收。刘文辉亲赴重庆交涉，无功而返，更是怀恨在心。1932年，刘文辉以吊唁刘湘母丧为名到重庆，趁机用重金收买刘湘部下师长范绍增和兰文林，还命驻防江津的张清平师截断重庆粮源。更有甚者，刘文辉之兄刘文彩派其副官胡化鹏潜入重庆李子坝刘湘宅行刺。刘湘将刺客活捉后，不露声色地送交刘文辉，又以重金收买刘文辉部师长张志和、旅长陈鸣谦等。二刘明争暗斗，彼此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刘湘决定以武力除掉刘文辉，还得到蒋介石暗中的支持。1930年初，刘湘曾向蒋的四川党务特派员曾扩情表示要对刘文辉用兵，希望中央给予支持，并授意张文果、张梓芳、余惟一等草拟所谓“安川计划”，交蒋介石核定。其主要内容有：“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有不利，但只要能确保四川不遭侵袭，使工农红军囿处江西一隅。”“惟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完全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刘湘要求中央“假我以权责，对邓、田两军予以相当利益，就能形成对刘文辉夹击之势，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去掉其主席，达到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不仅能防止共匪之乱萌，而且还绰有余力，以备中央剿共军事之调遣。”蒋介石看到计划后，即嘱曾扩情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67] 刘湘取得蒋介石支持后，便积极筹划向刘文

辉进攻。

刘文辉为准备对付刘湘的进攻，由成都赴简阳、乐至、遂宁等地检阅部队，在顺庆召集属下林云根、陈鸿文、陈鸣谦、黄锡煊、王元虎等师、旅长商议对刘湘用兵事宜，制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兵合攻重庆之策。

二刘各拥兵十余万，在军力上旗鼓相当。四川其他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各拥有一定兵力，虽无法与二刘抗衡，但他们合起来拥兵达15万人以上。不论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成为二刘各自称雄四川必争的力量。

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败于“后顺庆之役”后，投靠了刘湘。刘湘还主动助以粮饷械弹，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们也想借助刘湘力量夺取防地，因而愿与刘湘联合出兵攻打刘文辉。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人同属“保定系”，1925年以后同驻成都，曾组合“三军统率办事处”、“三军联合办事处”作为联合机构。刘文辉虽属后起之辈，但发展甚迅，声威煊赫，成为“保定系”中心人物，其占有欲也随之膨胀起来，总想吃掉邓、田以扩充自己实力。刘文辉亲自制造了1930年夏的“兵工厂之变”和1931年春的“寇溥渊事件”。邓、田实力受损，对刘文辉时思报复。

1931年，田颂尧派心腹师长曾宪栋、李蕴华等赴重庆，秘密会见刘湘并表示与刘文辉决裂，二者订盟结约共图刘文辉。刘湘许诺必要时出兵相助。邓锡侯也派人到重庆表示合作诚意。田、邓各派代表常驻重庆，与刘湘关系越趋紧密。

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结成联盟后，军力对比占压倒优势，刘文辉已陷入了孤立境地。二刘之争，刘文辉凶多吉少。

1932年9月29日，李家钰部在刘湘的指使下，向周口镇集中，罗泽洲驻武胜部队向李渡移动。10月1日夜，罗泽洲驻武胜新二十三师熊玉璋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林云根部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战争自1932年10月开始，到1933年9月止，先后经历了泸州、省门（成都）、荣（县）威（远）、毗河、岷江几次大的战役，战争以刘文辉大败而结束。

10月1日，罗泽洲部在李渡挑起战火。10月2日，蒋介石致电二刘双方，名为制止川战，实为挑起战乱，从而达到削弱四川军阀的目的。刘湘将驻宜昌、沙市进攻洪湖红军的部队调回四川，集中力量对付刘文辉，同时命令所部分向永川、江津方面驻防。10月3日，刘文辉部陈鸿谦旅长在烈面溪向罗部熊玉璋旅进攻。罗泽洲急电蒋介石，指责刘文辉“素怀囊括全川野心，今既悍然破坏和平，大举来犯，其处心积虑，昭然若揭”，要求蒋介石除就近请善后督办刘设法制止外，迅赐最有力之制止。蒋介石于6日复电刘湘、罗泽洲等：“连电均悉。退让因顾全川安，即系以维护国家，望一本初衷，竭力避免冲突。刘文辉方面，亦严电各守原防，制止侵犯矣。”蒋此电明确表示支持刘湘而指责刘文辉。刘文辉复电在汉口的蒋介石进行辩解，表示“辉亦负西防半壁之任，敢冒不韪自弃国人？”

在刘湘的授意下，1932年10月12日，由师长唐式遵纠集全川军师、旅长九十四人，发出“治川纲要十六条”的通电，以骗取人民信任，从政治上孤立刘文辉。10月19日又发出通电声讨刘文辉：“独有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怀猜恨。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自隶戎行，好出心机，因缘时会，操纵两端，遂有今日之势。彼据地半省，经济极充……乃彼两任省主席，对于治川大经大法从未提及，而于分化他军，收买队伍，钳制部属，强为奴用，则又自诩多能。言之津津，道之凿凿，甚至分遣无赖，阴谋暗杀；嗾使匪类，扰人防区，花样极多，变法层出……弟兄叔侄，遍据要津；家奴养子，横行廛市。……此外叛上作乱，卖友害邻……式

遵等于文日通电时，对于文辉尚复曲予涵容，隐示微意，冀其或有悔悟。今果怙恶，故违众意，是彼已自绝于人。”[68]

刘文辉请其长兄刘升廷赴渝向刘湘寻求妥协落空后，于10月13日以叔父身份电责刘湘：“近日道路传言，渝军将向成都攻击，并已分途并进，即主其事者吾侄也；被攻者，则为文辉也。一时腐旧之伦，不免诧为奇变。而乡曲耕农，市廛商贾，则惴惴焉若大祸之将至，不知痛苦流离，将至何境地。测以常情，度以庸理，初不为意也，乃数日之间，遍传海内，各方劝阻文电，纷至沓来。蒋总司令介公，且于冬日专电诘责，其中所持理由，指陈利害，吾侄度已共鉴之矣。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士各有志，未可强回。吾侄若果决心，辉纵为民而请，亦将目我为愚。即令驰赴渝中，长跽辕下，或反以为言甘胆怯也。”[69] 同日，刘文辉电呈中央指责刘湘：“鼓动战乱，竟于本月东（一日）日密令罗泽洲、李家钰两师突然大举越境称兵，攻击文辉驻之顺庆李渡……文辉懔遵明令，步步退让。……并阅二十一师长唐式遵等窃捏多名之文电，创造规条，征求各军同意，目无中央，故不惜穷兵黩武，更已情实昭然。……恳祈迅颁严令，责成刘军长湘……勿得借口兴戎，扩大战局。”[70]

10月23日，刘湘通电斥责刘文辉“反复以无常，好乱称兵”，“为弭兵计，惟有倾身捍患……衔血忍痛，简励师徒，誓与我友军左右提携，全力制止”[71]。次日，刘湘再次通电，称今晨潼南、永川、江津及候入巴县园明寺之二十四军，实行分头进攻，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与之周旋，并指责刘文辉“一意孤行，擅开兵衅”，声称要“联合各军、民众，予以制裁”[72]。

以刘湘为首的联军即全面展开进攻，其首战的主要目标是攻取川南重镇泸州。

泸州位于沱江、长江汇流处，三面环水，西有龙透关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刘湘联军合力并进，采取攻势。刘文辉取守势，但因防

线铺得太长，北起顺庆，东迄永川、江津，绵亘数百余里，兵力分散，故交战不几日，即下令战略转移，全线后撤，退守沱江防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等沱江沿线县城为主要据点。刘湘联军自后紧追不舍，分道攻取。24日，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部合攻并夺取遂宁；潘文华、王缵绪分取江津、潼南。27日，联军占永川。31日，刘湘部又占荣昌、合江。11月1日，杨森部进抵安吾。11日，邓锡侯部占崇庆。

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王缵绪部攻克内江，唐式遵、潘文华进占富顺、自流井。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及“神兵”联合围攻泸州，逾半月不克，后采取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手段，迫使固守泸州的杨尚周、田冠五旅开城降顺。21日，刘湘部进驻泸州，随即以重兵溯江而上，直取宜宾，进逼乐山，并调集其主力转向荣（县）、威（县），寻求时机与刘文辉决战。

二刘战争酝酿之初，刘文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原拟与田颂尧谋求妥协，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妥协破裂。刘文辉决定先击溃田军，再回师迎战刘湘。于是从前线驻顺庆的第二师九旅十七团、二十三团，川康的二师四旅十团、十一团，星夜赶来成都。顿时成都市内战争气氛越来越浓，南门地藏庵、磨子街、红照壁一带岗哨密布，交通断绝，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市民十分惊惶。

刘田成都之战一触即发。刘文辉以冷寅东为前敌总指挥，唐荣为副总指挥，将五个旅的兵力布防在城东南一带。市内以东南角少城至皇城和东大街南面为防线，市郊以杜甫草堂至青羊宫、南台寺、农学院附近为防线，调手榴弹队、炮兵集中在皇城、四川大学，在煤山架大炮对准山西会馆田颂尧的司令部，外南至簇桥20里一带布防大量部队。

田颂尧则以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曾南夫为副总指挥，调集五个旅的兵力，从东门至糠市街、新化街、新东门、东校场、四圣祠至北

门，再由山西会馆、后子门、青年街延伸至少城为城内防线；城外则从东望江楼至对岸莹华寺及四川兵工厂附近，再由牛市口环绕东北门及猛追湾、西马市至老西门为防线。

1932年11月14日，刘、田两军在成都巷战打响。先是二十九军以刘汉雄、何瞻如、黄正贵三部，与邓锡侯二十八军黄隐师、刁文俊旅和刘高槐旅（均换成二十九军旗帜番号），联合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部，切断二十四军南路交通线，以图困死成都。但刘文辉早已重金收买田部报务员，获悉田、邓两部作战部署已作好迎战准备，结果田、邓全线溃败。邓部师长黄隐落水而逃，旅长刁文俊下落不明，双方死伤官兵三千余人。这次成都巷战又经过煤山争夺战、兵工厂战斗、北门簸箕街战斗等，自西到东，横亘全城，无街不战，无巷不争，残酷惨烈，结果田军大败，被困城北一隅。邓锡侯见田军被围，败局已定，不敢出兵助田，出面调解。刘文辉得知当前主要对手是刘湘，所谓“两利相权从其大”，故同意邓的调停。田、刘相继发出响应邓锡侯调解停战通电。田表示不再敌视刘文辉，率军于11月24日退出成都，至25日刘田成都巷战结束。

1932年12月9日，刘文辉结束省门之战后，撤出成都，军队集结于荣县、威远，设总指挥部于川南眉山，准备与刘湘决战。

荣威决战，刘文辉明白自己的命运及成败在此一举，故部署四路总指挥和两个预备总指挥：一路为夏首勋，二路为张清平，三路为林云根，四路为陈鸿文。第一预备总指挥冷寅东，第二预备总指挥唐英。以荣、威为重点，将主力集中于乐山、井研、仁寿、威远、荣县之间。

刘湘恐老巢重庆有失，电调驻鄂西的张邦本、罗君彤、佟希赞、杨勤安等部回川布防于大足、邻水、永川。又调驻夔府、万县的部队拱卫重庆。12月3日到内江部署荣、威大战，兵分四路：一路总指挥唐式遵部结集于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路总指挥王缵绪与三路

总指挥范绍增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

二刘荣、威大战，于12月4日在宝马场打响。10日，两军全面展开战斗，刘文辉调集七万兵力，刘湘亦集中五万兵马，战斗以荣县的老君台、老林口、犍为城和仁寿之江家场等地最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争夺老君台之战，双方官兵死伤多达三千多人，仁寿江家场战斗，死亡士兵达七千多人。双方激战五天，刘湘在荣、威大战全线失利。刘湘见刘文辉决心死战，为避免两败俱伤，保存自己威慑四川的军事力量，遂采取三项应急措施：一是向刘文辉表示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出兵援助，三是先后争取了刘文辉部陈鸣谦、张长和、陈书农师倒戈。

刘文辉也感到在荣、威大战中不能取胜，只能率残部退至贫瘠的西康，如此则十万人马也将随之瓦解，故抱与刘湘拼死的决心。不料在战斗中连续发生重大失密，一再丧失战胜之机，加之发生部下倒戈事件，不但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刘文辉不得已同意与刘湘讲和停战。

二刘两军于12月21日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至乐山属地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他部队驻原防地，军部回驻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属地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隔岷江对峙，结束了军事冲突。荣威大战实质上以刘文辉败北而休战。

经泸州、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失去了川北，上川东和川南许多防地，部属第三旅旅长杨尚周、第七旅旅长田冠五、独立旅旅长邓国璋、第九旅旅长陈鸣谦等先后倒戈，可谓损失惨重。他深恨邓锡侯不讲信义，抢占川北地盘，又伙同田颂尧从背后出兵袭击，乃决定与邓厮杀一场。荣威之战休兵后，刘文辉回师成都，占城东南。为解决因地蹙财短兵饷缺乏的困难，刘文辉决定用武力兼并实力远不如己的邓锡侯。

刘文辉暗设擒贼先擒王之计，企图先扣留邓锡侯，然后改编其部队，吞并其地盘，不意计谋泄露，邓闻风逃出成都至新都，并急调所部沿毗河布防。

刘文辉于1933年初在眉山改编部队后，此时已拥有八个师、九个司令，一百个团，总兵力十一万余。而兵力不足三十个团的邓锡侯难以与之抗衡。同年5月7日，刘文辉兵分三路向崇庆、双流、华阳等地推进，后又进兵资阳，乐至、简阳。5月15日，刘、邓两军激战于郫县、灌县。邓军退守毗河，与刘文辉隔江对峙。

毗河河西狭窄，宽处不过四丈，窄处仅丈余，水又不深，可涉水而过。邓军为便于防守，砍断都江堰上内江分水码槎，毗河水位陡涨。刘文辉部久攻不下，强渡不成，又获悉邓锡侯与刘湘勾结，并获得十万大洋和六个团士兵子弹的消息，急于抢先突破毗河，令所部协力打垮邓部，但是刘文辉部师长陈鸿文本为邓锡侯的旧属，出于“新恩旧德”，按兵不动。刘文辉部师长唐英、张清平、林云根等与邓锡侯、田颂尧均系保定军官学校学生，认为老同学之间不应自相残杀，因此在对邓作战中不愿出力。

当刘文辉再度下令发起攻击时，师长张清平、林云根等和邓部保定同学陈书农、黄隐等在三河场开会，提出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静观二刘火并，刘文辉再次处于被动不利的境地。

刘湘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双方相持久而不决，认为彻底打败刘文辉时机已到，欲图一举实现称霸四川。1933年7月2日，刘湘由重庆到内江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上旬，刘湘军攻占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固守岷江防线。刘湘步步进逼，于8月13日下令各军分道进攻。迄15日，各军先后突破多处防线，渡过岷江，攻占乐山、眉山、新津、崇庆等县。刘文辉部十万之众溃不成军，退守雅安，终因敌不过“联军”环攻，率残部退至双源。

岷江之战，刘文辉惨败，面临山穷水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岂料刘文辉大哥刘升庭向刘湘以“家族情谊”劝说，刘湘也念叔侄情分，不忍陷刘文辉于绝路，更为重要的是想以刘文辉来牵制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等对手。当时蒋介石也有意保留刘文辉残部，以制约刘湘，故电令二刘停火“言归于好”。蒋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1933年10月8日，刘湘下令所属部队撤出该地区。24日，刘文辉重返雅安。

自1932年10月起至1933年9月，刘湘与刘文辉之战前后经历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和川南数十县，纵横千余里，投入兵力二十余万，几乎四川大小军阀都参与混战。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耗资五千余万元。四川人民惨遭战争浩劫，其生命财产损失更难以数计。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数百次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混战。其后，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进入四川，旧的军阀防区制逐渐解体。

四　新疆政变，盛世才统治的确立

新疆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个地方军阀的统治。盛世才于1930年进入新疆后，逐渐取得金树仁的信任，培植了一定的个人势力。1933年4月乘第一次“新变”之机，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之职，继而经过与马仲英等的战争，并假借罪名诛戮异己，攫取新疆军政大权，于1934年5月确立了在新疆的统治，直到1944年9月被迫离开新疆。

盛世才（1897—1970），字晋庸，原名振甲，字德三，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入韶关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奉军，历任排长、连长等职。1924年二次东渡，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赴南京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盛不甘任此闲职，多方谋求升迁。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之聘入新。经过辽宁时，对其密友说：“此行乃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疆另创一

局面。”[73] 到新疆之初，只被委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他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策略，唯金之命是从，不久被委任为新疆军校战术总教官。他以军校为基础，培植个人势力。后来军校毕业生大都成为盛的心腹及军中的重要骨干。

1931年2月，爆发了在新疆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哈密事变，成为以后新疆政变的前奏。在此之前，金树仁政府借机对哈密维王领地实行改土归流，名义上要废除哈密的农奴制，但仍继续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维吾尔族农民的极大不满。1931年2月，哈密东部发生了小堡边防卡官连长张国琥，要强娶维吾尔姑娘的事件，诱发了小堡农民爆动。各地民众也相继起来驱逐当地官吏，建立反金的武装。前哈密王府侍卫队长和加尼牙孜和大都统尧乐博斯乘机率众掀起东疆暴动，是为哈密事件。

哈密事件首领和加尼牙孜虽然两次挫败省军的镇压，但其力量仍对付不了省军，于是决定联合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共同推翻金树仁的省政府。1931年5月，马仲英率部入新，迅速攻占哈密的黄卢冈，击溃哈密外围的省军，进而威胁省城。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为东路剿匪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军前往支援，与马仲英部战于奇台。金还急电驻伊犁师长张培元率队增援，并允许招募白俄退伍军人二百余人，组成一支“归化军”，率领来省。张培元旋改任为东路剿匪军司令，盛仍为参谋长。张、盛二人指挥省军和“归化军”与马仲英部在马塘激战，因盛指挥得宜，“归化军”军官巴品古特率领的骑兵三团作战得力，省军首获大胜，盛世才初次展其所长。继而张、盛率部深入南北山中与和加尼牙孜作战。马仲英因受腿伤，无心恋战，9月率部退回甘肃。

和加尼牙孜失去了马仲英的支援，战斗力锐减，转入山里等待时机。1932年7月，金树仁提升盛世才为东路剿匪军总指挥统率“归化军”，往剿和部。经过大小四十余次激战，攻破八大石山，摧毁和部主要根据地，迫和部逃亡外蒙。盛率部转战于吐鲁番和鄯善等地，被

誉为常胜将军，进而掌握了更多的军权，一跃成为新疆拥兵号令的最高军事首脑。

哈密事变后，天山南北的民众纷纷响应，组织反省军武装暴动。南疆除喀什由省府控制外，和田、洛甫、于阗、皮山、叶城和泽普等地频频告急。整个新疆仅有北疆西部的伊犁、塔城稍微安定外，均已陷入大动荡中。自1933年1月末起，迪化（今乌鲁木齐）几乎成了一座死城，街上除军警和组织起来的宁城商民外，行人稀少，大多数商店关门停止营业。由金树仁与公安局开设的粮店，趁机提高粮价，谋取暴利，平时存粮不多的民众更是恐慌。省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迪化及以西数县，且完全处于被围的绝境，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1933年2月，马世明等率领反政府军包围迪化，城防司令白寿之无力反击，只得龟缩于城内。是月19日，马全禄联合各地维吾尔民众攻占了迪化西部夭魔山，不断地在迪化四郊进行骚扰和攻击，同省军互相炮击。迪化城内中炮三枚，形势十分危急。21日，马全禄又率维吾尔、回族民众千余人，攻占迪化西北的红山咀，驻守的省军全部被歼，并依山向城里开炮，同时攻打迪化北门外高地“一炮成功”（地名）。此时的迪化城中，终日枪声不断，炮声震断屋瓦。守城的军队仅有省军官及归化军一千多人。

1933年1月，马仲英率主力第二次入新。2月初攻占哈密及镇西。3月下旬，兵分两路，一路由尧乐博斯率部沿天山南路向迪化进攻；另一路沿木垒河、奇台西进。迪化已经危在旦夕，金树仁却毫无对策，他的统治已经无回天之力，终于酿成了新疆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新疆“四一二”政变，亦称“第一次新变”。

这次政变的策动者是金政府督办公署参谋长陈中和迪化县长陶明樾，参与者还有张馨、赵得寿、李笑天、李凤翔。据包尔汉回忆“四一二”政变原因时说：反金人士认为，“金政府再没有力量来维持他的

权力了。这个政府如果被现在反抗它的武力推翻，至少乌鲁木齐（迪化）的汉族官民将同归于尽”。“如果金树仁政府的内部有人起来把金树仁赶走，或许可以缓和各地方反金政府的运动”。当然，发动者“不单纯是以发动政变来自救”，而是“还想通过政变来掌握政权”[74]。陈、陶等人派李凤翔、张得寿联合归化军充当政变的武装力量，决定政变时间定在4月12日。

12日晨，陶明樾、赵得寿假借操练为名，将参与政变的部队汇集各重要地区。下午1时，由巴品古特和安东诺夫分别率400名归化军充当政变先锋，突入东门，一部分直趋督署，一部分分头抢占各处城门。省军仓促应变，招架不及，城防司令白寿之、军务厅长金树信被活捉。当归化军打进督署三堂时，遭到卫队狙击，金树仁趁机携带家眷越墙而逃，后经昌吉、塔城，假道苏联逃亡内地，结束了他在新疆5年的军阀统治。

归化军控制了城内和南梁后，教育厅长刘文龙召集各界有声望人士及各法团代表在归化军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者有省教育厅长刘文龙、财政厅长朱瑞墀、迪化行政长李溶、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等二十余人，决定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刘文龙为临时主席，原东北民众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文龙即席提出了三项要求，自称这是约法三章：第一是保障全省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第二是保障金主席全家生命财产；第三是保护苏联领事馆。出席的人全体签名承认了”[75]。

新疆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垮台，盛世才终于等到了“宏图大业”的机会。时盛世才正屯兵离迪化30里处的乌拉拜。政变者深知盛手中握有一定兵权，要保持政变成果，必须争取盛的支持，乃于政变当天派人向盛通报政变情况。与此同时，金树仁也急令盛火速回师迪化。此时此刻，盛已成为双方必争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盛世才审时度势，决心倒戈反金，乃毅然回师迪化，在迪化东北制高点“一炮成功”处，按兵不动，拥兵观望。

4月12日午夜，金树仁调集杨正中部及白寿之部向归化军反击，在城内省军的接应下，向城中推进。4月13日，杨部反攻占优势，归化军逐渐无力支持，盛世才调转炮口，轰击杨正中部，与东北军郑润成部联合，在“一炮成功”击溃金反攻军，金树仁仓皇西逃昌吉。

4月14日，盛世才率部凯旋入城，随即参加刘文龙召开的临时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盛命令其部队包围了会场，在会场周围及屋顶上架起机枪。会议在武力胁迫下进行，会上增选盛世才、阎毓善、张培元等人以及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锡伯等少数民族代表为临时省府委员。会上，原拟施行军事委员会制之议被压制，恢复督办制。郑润成本来就无意卷入新疆政治旋涡，且盛系东北同乡，政变时盛妻邱毓芳已与东北军达成协议，东北军许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盛，故表示附议盛任督办。在武力震慑下，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事委员会，推盛世才任新疆边防临时督办，陈中任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陶明樾任省府秘书长，李笑天任航空处长。这样，盛世才依靠枪杆子取得了新疆的军政大权，登上“新疆王”的宝座。

盛世才初掌政权，新疆局势依然混乱。南北疆战乱尚未平息；和加尼牙孜还控制着鄯善、吐鲁番，迪化附近南山的马全禄等经常出没袭扰，迪化仍处于被围之中。盛为稳定局势，巩固既得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76)]，以求赢得各族人民的好感。另一方面拉拢各方人士，盗用民意，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定承认。4月15日，朱瑞墀、阎毓善等致电南京中央，称刘、盛二人“均系党国贤达，有功新疆，此次推举出于民众之意，理合电请中央准以任命，以顺舆情”。4月19日，省政府又派陈中假道苏联去南京报告政变经过，敦请中央及早任命省府主席、督办及各委员之职。

南京政府对新疆政变，因情况不明，只取静观局势变化的态度，同时也企图趁新疆局势未定之机打入新疆，实现对新疆的直接控制，

故对新的致电请求，不作答复。

1933年4月20日，马仲英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名义，第二次率兵入新，迅速占领哈密、木垒河、奇台等地，声势大振。盛于5月26日率军五千余人迎战。

当盛、马两军相持之时，6月10日，南京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率宣慰团来新“宣慰”，成员包括党务、民政、军事、建设、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人才，在迪化设立宣慰使公署，准备从盛手中夺取对新的统治权。

黄刚入新，即向盛提出两条要求：（一）立即停止讨马军事行动，和平解决双方矛盾；（二）取消督办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仍以盛为委员长。盛世才岂肯将既得权力拱手交出，于6月10日与黄作短暂会晤后，即率东北军和归化军赴阜康迎战马军，14日马仲英不敌盛军，败退吐鲁番、鄯善一带。

盛世才击败马仲英后，实力增强。即于15日致电蒋介石，指责马助长新乱，涂炭东疆，现已被击溃，请蒋指示机宜[77]。不料蒋复电告盛：“一切新省善后，应秉黄宣慰使，勿懈勿骄”[78]，仍必须一切听从黄的安排，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盛对南京的抗拒心理。

当盛马激战之时，黄慕松在宣慰使公署与各方人士接触，听取刘文龙、吴蔼宸、马仲英代表杨清波及张培元代表徐文舫的汇报，并积极拉拢刘文龙、陈中、陈明樾、李笑天等，组成一个反盛核心。陶在新多年，成为黄的助手，日夕往来，策划南京政府如何在新疆立足，深得黄的信赖。陈、陶、李也私下密谋，酝酿取消督办制。这一切政治上的动向，被盛的耳目一一探清。当盛得到破译黄打给南京关于取消督办制以及如何控制新疆的密电后，决心下手解决心目中的内患，遂放弃追歼马仲英计划，于6月25日班师回迪化。次日，盛世才以在督办公署东花园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请陶明樾、陈中、李笑天赴会。

当陶、陈、李进入东花园的南便门时，被卫兵逮捕，盛不经审讯将三人枪杀，并在会上向大家宣布："陶明樾、陈中、李笑天三人，阴谋推翻现政府，显有谋叛行为，业已置之于法。"[79] 接着出示所谓陈中、李笑天秘密诱惑他部下卢、马两团叛变的信件，并表示不恋居高位，特向大家辞职，率部开赴塔城。临时省府主席刘文龙深感自危，亦表示恳辞。与会各委员见此紧张局面，不知所措，只有对盛、刘两位表示挽留。

是时，黄慕松已被软禁，迫于压力，不得不于6月28日呈请南京政府："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请求南京政府早日宣布任命，"庶名位即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80]。7月7日，国民政府致电刘、盛，表彰他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平定叛乱之劳绩"，要他们"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81]，并于8月1日发布电令，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省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张培元为新疆省府委员、伊犁屯垦使及新编第八师师长。黄慕松摆脱"软禁"处境，于7月21日悄然东返。

1933年8月16日，南京政府派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罗文幹入新视察，出席刘、盛就职宣誓典礼，行监誓之责。实际上罗这次入新的主要任务是：为南京政府造成有利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条件，当南京无力西顾的情况下，竭力促成盛世才、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和马仲英三实力派的鼎足之势，以利南京待机控制新疆。

9月9日，罗文幹赴吐鲁番，调解盛马之争。马表面上接受调解，但拒绝赴迪化与盛会晤，于11日在吐鲁番举行就职典礼。盛对马此举大为不满，遂举行军事会议，指控马仲英"煽惑省军哗变"，"勾结回匪，分拢西路"，故不得不"率师出发"，"以张讨伐"[82]。罗文幹调解失败。

10月7日，罗在伊犁参加张培元就职典礼后，企图说服张培元对

盛“捐弃成见，不计前嫌”，但张执意反对盛任督办。罗又一次调解不成，南京政府企图使新疆之实力派平衡牵制的政策至此完全破产。

盛世才继诛杀政变发动者之后，为实现独掌新疆军政大权，1933年10月以毒刑迫刘文龙的卫队长，诬供刘企图推翻现政府的罪名，将刘文龙软禁，捧出高龄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接着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借口东北军在达坂城与马仲英的作战中失利，当场以“临阵脱逃”罪名，将东北义勇军十五旅旅长郑润成、十七旅旅长应占彪、督署参谋长杨跃均等将领二十余人逮捕，并于后来秘密处死。东北义勇军余部从此也落入了盛的控制之下。只剩下张培元、马仲英两实力派，仍然威胁着图谋登上“新疆王”宝座的盛世才。

时张培元、马仲英在罗文幹从中斡旋下，结成反盛联盟。实力变化使盛处于劣势，陷入张、马东西夹击之中，局面十分危险。盛世才不得不放弃依仗南京政府以号令全疆的愿望，改走投靠苏联的一着。10月间，他派外交处长陈德立和航空队长姚雄去苏联争取军事援助，迈出了最终确立其统治新疆的重要一步。

1933年12月，张培元与马仲英相互策应，举兵反盛。张培元部属杨正中旅迅速攻占乌苏，进军绥来。当时盛在东面迎战马仲英，无法西顾，乃请苏联出兵援助。苏联政府立即派驻守边境的两个红军师团入新。苏联“塔尔巴哈台军”进入伊犁，很快攻占了惠远城张培元大本营。杨正中部在呼图壁被东北军刘斌部击败，张培元陷于苏联援军和东北军夹击之中，大势已去，自杀而亡。

1934年1月12日晚，马仲英率部强攻迪化三天便攻占了东门外机场和无线电台，盛世才孤军守城，形势十分危急。双方激战至2月3日，由塔城南下的苏联“阿尔泰军”赶到，以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势，迫使马军撤出达坂城，败退南疆。6月，盛世才夺回喀什，马仲英遭重创后亡命苏联，其残部由马虎山率领退入和田。

当盛、马、张三派激战时，南疆也处于一片混乱局面。哈密事变后，南疆各地农民也纷纷起义，反对金树仁政府。1933年1月，马世明部攻打库车，当地马行行头维吾尔族铁木尔趁机起事，与马世明部联合攻占库车。不久，马世明部不费一弹一卒进驻阿克苏汉城（今属温宿县），铁木尔进入回城，拟继续南下攻喀什。

泛土耳其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趁机在墨县暴动，攻下和田，自封为和田王，并推举从阿富汗、印度留学归来的学者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5月2日，伊敏、铁木尔与喀什驻军乌斯满暗中联合，攻下喀什汉回两城。8月以后，铁木尔被马占仓伏兵所杀；沙比提与铁木尔残部联合击败马占仓；伊敏又借机吞并了乌斯满的势力，推举沙比提组织南疆独立政府。沙比提勾结在维吾尔族中有声望和势力的和加尼牙孜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于1933年11月12日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选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任国务总理，定喀什为首都。

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马世明进军喀什，双方在阿图什血战。和加尼牙孜的部队不敌马世明部的猛攻，逃入山区，转往英吉沙。喀什落入马仲英的手里，“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随之崩溃。1934年7月，马虎山部退往和田，“和田王”企图抵制而被击败，“和田王”伊敏逃亡印度。

和加尼牙孜在英吉沙接受盛世才条件，回省城任新疆省副主席，随从和归顺的人员均被委任为高级官吏，盛同意和加尼牙孜的主要部队留在南疆。盛如此安排和加尼牙孜，对稳定新疆局面，巩固盛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此，盛世才借助苏联援军消灭了张培元，赶走了马仲英；借助反对派内部矛盾消灭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招安了和加尼牙孜，终于实现了全疆的统一，稳住了“新疆王”的宝座；新疆已完全置于盛世才统治之下。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在迪化举行盛大集会，宣布

新疆战乱结束，把8月1日定为“新疆和平统一纪念日”。

第四节　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当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国民党当局却加紧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严峻时刻，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爆发了一场抗日反蒋斗争，通称福建事变或简称“闽变”。

发起福建事变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抗日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和黄琪翔等第三党人。其军事主力是蒋光鼐、蔡廷锴二将军统率的十九路军，该军驻地福建省则成为其依托的基地。

“闽变”的发动者毅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他们揭起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旗帜，提出一系列民主主义的政策，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虽然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未能有效实施，在蒋介石纵横捭阖，以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压力下仅存在五十四天便告夭折，但其业绩及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一　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进行抗战，威震全国，但触犯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立下卓著战功的十九路军将士，反被蒋介石斥责为不服从命令，欲加以整肃、肢解，达到消灭的目的。4月26日，蒋介石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召集蔡廷锴等人至南京予以严厉训斥，要求他们“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83]，这不能不引起了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十九路军将士在一系列事实启示下有所省悟，从而逐步由拥蒋反共转向抗日反蒋。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便采用多种措施，对十九路军进行控制与肢

解。他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十九路军的上层领导，企图控制实权，又从该军抽调了一百二十多名中、下级军官到南京中央军校“受训”，灌输绝对忠于蒋介石的思想，并秘密发展复兴社分子，培植瓦解十九路军的蠹虫。1932年5月6日，即《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以“剿共”军事紧急为由，令十九路军所辖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而军部则留在南京。十九路军将士对这种倒行逆施表示强烈反对，蒋光鼐、蔡廷锴据理力争，以至不惜提出辞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请愿挽留。蒋介石不得已，于5月21日改令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参加反共战争。国民党当局多方谋划，使十九路军这支爱国善战之师远离宁沪重地，以便免除肘腋之患；企图驱使他们处在反共战争第一线与红军互相厮杀，使之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还企图利用陈济棠等广东地方实力派对十九路军的猜疑，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已有所察觉。他们权衡利弊，为了使这支转战多年、伤亡重大的部队，能利用偏安一地，稍事休整，免遭肢解的厄运，并能利用占有地盘积蓄力量，以图发展，因此他们表示接受国民政府关于入闽的调令。1932年5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十九路军全部由海道入闽。当天路透社发电讯：“十九路军今日接军事委员会命令，立即开往闽省，剿治匪共，故驻京之十九路军将士将于二三日内南下，其驻京沪路一带者，须在五月二十八日后开拔。”(84) 京沪一些民众团体曾发表告同胞书，挽留十九路军留守卫戍这个重要地区。广大民众发出呼吁：“请共起作攀辕卧辙之请求，挽留此保国卫民之钢军，长驻于长江流域，万勿撤此长城。”(85) 国民政府无视民众的要求，于6月1日从洛阳发布命令，撤销十九路军卫戍长官司令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蒋光鼐为主任，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邓世增为公署参谋长。随后，十九路军按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总部、第七十八师的序列，在镇江乘船南下。第六十一师在泉州登陆，其余则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然后分驻漳州、福州等地。

十九路军入闽之时，面临着复杂艰难的形势。当时的福建省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省主席方声涛是个吸食鸦片、腐化堕落的官僚政客，政令只通行省城福州及附近若干县份，地方政权土劣横行，敲榨民众，苛捐杂税多达二百余种。省内虽无蒋介石嫡系部队盘据，但地方土著、杂牌部队割据称雄。全省形成六块军阀割据地区，各自为政，互相攻击。其分布情况是：刘和鼎以所部第五十六师割据闽北建瓯一带；周志群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邵武等闽西北地区；陈国辉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闽东南的仙游等地；张贞所部第四十九师占据漳州等闽西南地区；卢兴邦以陆军第二师盘据尤溪等闽中地区；陈齐瑄以一个独立旅占据福安等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此外还有日本特务、浪人四处活动，恣意破坏。

当时红军的情况，在十九路军进福建前，闽西北和闽西南许多地区已解放，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九路军进驻后，红军第一军团已退出漳州、漳平、龙岩地区。但闽西、闽北的部分地区与江西毗邻，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为红军游击区。面对着反共战争和福建省的复杂状况，蒋、蔡深感步履艰难。蒋光鼐甚至认为十九路军前途险恶，缺乏信心。他于6月初从上海乘船至香港转往广东东莞县南栩乡家居，不愿赴闽就职。蔡廷锴在邓世增协助下，将十九路军带入福建，设绥靖公署于福州，十九路军总部则设于漳州。随后，蔡廷锴亲往广东对蒋光鼐劝驾，二人联袂返闽。蔡返漳州掌管军事，蒋至福州任所。7月16日，蒋光鼐发表通电，宣布就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职，在有病期间由蔡廷锴代理。

面对复杂的局势，十九路军首先是对省内割据称雄的势力加以整肃与编遣，对其中特别顽劣者进行严厉惩戒，不惜兵戎相见，武力消灭，以统一福建的军政大权；同时力图与粤、桂当局搞好关系，争取同盟军。

1932年8月初，蔡廷锴以代理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在漳州召开漳、

泉、尤、汀四属绥靖会议，令各师处长及各县县长皆到会。会议着重强调全省统一指挥，稳定地方秩序。蔡还宣称，“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陈国辉，在泉属一带，勒种鸦片，抽收苛捐杂税，骚扰商民无所不至，致本省各地人民，团体，及南洋华侨等控告”，案积如山，经派员密查，均系事实，拟将陈旅全部改编，以儆效尤[86]。9月22日，蒋光鼐利用陈国辉部防地纠纷，电召陈“即日来省，有所面示”[87]。27日陈国辉到达福州进见时，当场被扣押，撤职查办。12月23日经绥靖公署军法处审讯，判处死刑，立即押赴东湖执行枪决。继而，派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部迅速进驻仙游等地，将陈国辉旧部进行改编和遣散。同时以类似的办法解决了陈齐瑄部。原福建省主席方声涛鉴于自己所依赖的武装支柱土崩瓦解，便弃职逃往上海。接着，十九路军对实力较强的张贞第四十九师，经缩编后调往永定“剿共”前线。1933年夏，张贞辞职离闽休养，该师师长由张炎接任，从此成为十九路军的主力之一。刘和鼎、周志群、卢兴邦等部因未构成重大威胁，予以就地安置，暂时维持现状。

为了健全福建省政府，蒋光鼐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改组了省政府，并于1932年12月6日正式就任省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蔡廷锴奉蒋介石命升任驻闽绥靖主任，于1933年1月6日就职。蒋介石原想借此拉拢蔡廷锴，以便离间十九路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但未能如愿。至此，福建省的军政大权基本上操在蒋光鼐、蔡廷锴手里。在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着手在广东成立一个补充旅，这时也调来福州，扩编为补充师，归绥靖公署直辖。

十九路军为了有个后方，决定同粤、桂当局搞好关系。广东与福建紧密相连，物资丰富，粤当局曾允予每月资助十九路军30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当时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半独立政权”，既“不拥护‘中央’，亦不完全反对。它对十九路军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福建能稳定下来”[88]。1933年3月，由蒋光鼐派秘书长李章达为全权代表，到广州同两广当局拟订《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以期在政治

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条约正式签订后，虽未能切实履行，但也多少起一点作用。

闽西、闽北红军力量的存在，是十九路军入闽后面临的又一大问题。他们在进驻漳州等地后，着手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向闽西、闽北苏区进犯，企图消灭红军的力量，统一全闽的政权。其兵力部署是，设总指挥部于漳州，以主力第六十、第七十八师向龙岩、漳平、连城进攻，派四十九师向永定推进。

为了同红军争夺闽西，十九路军与闽西地方势力傅柏翠等结合起来，提出一些改良措施，以博取民众的拥护，防止红军势力的扩展。当红军主力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后，福建省当局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以谢仰麒为主席，魏育怀、刘侠任、傅柏翠等为委员，将闽西有关各县政权暂归驻闽绥靖公署直辖。1933年7月，该会改组为闽西善后处，由蔡廷锴兼任处长，邓世增为副处长，在闽西各县设立善后分会或分处，下设“农村复兴委员会”，办理户口调查登记，组织区乡守望队，创设闽西农民银行，训练农村工作人员，尤其是推行“计口授田”等工作。“计口授田政策”，是将“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从新分配”[(89)]。其实行办法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暂时保留分田原状，秋收时一律征收土地税，税额为原租十分之三，提出一成，暂作救济业主及逃难者之用，以二成为整理民团，及办理一切地方善后之用。第二步，归来之业主与难民待确实登记后，再按乡区田地面积，计口授田与农民，重行分配，以求其平均。第三步，一俟田地确实分配后，再行规定土地税征收成数，并即废止旧制之丁粮。第四步，每乡组织农村合作社，以管理各该乡田地及农产，俾农村经济得有调节及改进。”[(90)] 这种做法企图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地区，作某些改良，安定农民生产情绪，避免大起大落而造成社会震动。只有在曾被红军土改过的地方，如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地主势力已被打倒，红军退出后，十九路军实行上述办法，贫苦农民不致马上遭受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暂时相安生产，收到一定效

果。蔡廷锴等也趁机整顿闽西地方武装，收编一些“民军”，还组织一些农民自卫军。但贫苦农民既要缴纳租税，政治上也遭打击，要指望他们自愿组织起来对抗红军是办不到的。上述措施在漳平等地推行时，遭受地主、富农的强烈反对，即使在十九路军驻扎时勉强实行了，当该军开拔后，地富势力马上闹翻了天，贫苦农民很快大祸临头。

当十九路军入闽初期，中共临时中央在《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要求福建各级党组织把组织该军士兵斗争与哗变问题，作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厦门和福州的中共组织曾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兵运工作。十九路军当局则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

1932年下半年，十九路军进驻龙岩等苏区。8月18日，泉州发生部分官兵酝酿反对进攻苏区的哗变，六十九人遭到枪杀。又有不愿参加进攻红军的数千名士兵被缴械，责令进行筑路劳动，并分批逐出福建。对此，中共中央曾于当年10月1日发表《告上海工农劳苦群众书》，揭露、谴责十九路军领导的反共行径。

1933年春，蒋介石谋划向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6月，开始实行“五省三路包剿计划”，顾祝同任浙闽赣粤湘五省“剿共”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受蒋介石派到广州，召开粤、桂、闽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广东出兵二十个团，广西出兵六个团，开往赣南，十九路军进入闽西，以陈济棠为五省南路“剿共”总司令，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一再迫令十九路军向苏区进攻，限令以八个团的兵力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蔡廷锴派出驻防闽西的区寿年部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南进犯连城、朋口等地。这时由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在连城、朋口等地歼灭了区部七十八师的三个团，接着挥师北上，于8月26日解放洋口、峡阳，包围了延平、顺昌、将乐。9月，东方军又在青州附近歼灭了十九路军最精锐的第三六六团，直奔水口，威逼福州。蔡廷锴等一再向蒋介石求援，均告落空，还遭到多方责

难。在严峻的形势和一系列事实的面前，十九路军的领导者进一步认识到，“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91]，遂下定决心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

十九路军入闽后，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但屡遭蒋、汪政府的阻挠，使蒋、蔡等人进一步认识到南京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根本障碍。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蒋介石仍坚持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奉行不抵抗主义。十九路军将士强烈要求抗日，1月6日蔡廷锴发表通电表示：“榆关、热河危在旦夕……廷锴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敌。”[92]蒋介石则一再以催促出兵“剿共”来转移和压制广大官兵的爱国热忱。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愿在三项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在十九路军中产生强烈影响。后经过一再请求，蒋介石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允许十九路军抽调志愿官兵，组成“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抗日。当抗日先遣队从漳州等地出发，行军至湖南郴州、耒阳时，长城各口已失，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蒋介石严令“援热先遣队”“火速回闽”。十九路军为抗日绕道进军，用掉军费20万元，反遭责难。蒋光鼐、蔡廷锴对此十分不满，先是联名通电指出：“贼寇入室，唯有痛击，乃不可认贼为父，但图日夕之安。”[93]接着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再次“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从而使十九路军的官兵感到要抗日须反蒋，并在实际上加强对蒋系特务的斗争。

早在1933年春，蔡廷锴为抵制蒋系特务对十九路军的渗透和破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官兵腐化变质，在徐名鸿的协助下，在军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改造社”。由蔡任总社长，徐任书记。每师成立分社，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下设支部。从忠于十九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发展社员。“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94]，实质上对蒋系特务的斗争是首要任务。同年

夏，“改造社”在厦门查获一起由南京化名汇款给十九路军中的复兴社分子作活动经费的事件。经查明，是蒋介石在十九路军搞颠覆，密令潜伏下来的特务履行使命，如“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情。据此，蔡廷锴下令对复兴社恐怖分子进行一次清查，查明全军团以下已有百余人参加蒋系特务组织，均加以拘捕，对其中数十名情节严重者予以秘密处决。通过这一斗争，有力地激发了十九路军官兵的反蒋情绪，加强了内部团结，也增强了蔡廷锴等人的反蒋决心。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营垒中也逐渐分化出来一些抗日民主派，陈铭枢加入了这一行列，并成为推动福建事变最积极的人物。他与十九路军有深厚的历史关系，蒋光鼐、蔡廷锴对他很尊重，彼此配合默契，成为从事重大政治活动的武力后盾。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积极联络李济深、冯玉祥以及第三党，酝酿以十九路军为主力，组成抗日反蒋联合阵线，发起反蒋斗争。

陈铭枢曾努力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作，改组南京政府，但蒋、汪上台后，对内专制独裁，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使陈深感失望，并遭排挤，无法立足。1932年6月5日，他发表通电辞去交通部长职务，随后在神州国光社成员欧阳予倩的陪同下，赴欧洲和苏联考察。欧洲之行使陈铭枢产生效法欧洲人民阵线与蒋介石独裁统治作斗争的设想，从苏联的观感中也加深了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某些道理。陈在巴黎曾与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商谈，认为不应再与红军打仗，并与其他一些人酝酿成立新党的问题。

李济深在蒋、汪联合掌管南京政府之初，曾与冯玉祥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东北军应反攻复土、武装抗日的议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蒋介石阳奉阴违，使这项决议无法施行。蒋心怀叵测，委任李为“剿匪副总司令”、“右路军司令”。国难深重，蒋、汪明争暗斗，使李济深对南京政府完全失望。1932年7月29日，李借故潜

赴香港，继而活动于两广、香港之间，策划反蒋救国活动。陈铭枢回国后在香港与李济深联络，双方取得共识，于是携手共商大计。接着，他们奔走于香港、两广、福建之间，与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民主人士一起，多次进行联络和洽商。

1933年6月初，陈铭枢由港至闽，经与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等人密商，提出了反蒋三策：上策是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中策是广东一旦拒绝，则先联合广西，赶走陈济棠，夺取广东为反蒋基地；下策是两广均不愿加入，就在福建联共反蒋抗日。会后，陈、蒋分别赴港与李济深磋商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问题，又往广东与陈济棠联络，但遭拒绝。陈又派尹时中往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也不被采纳。这样，上、中二策均走不通，只好探寻联共反蒋抗日之路。陈铭枢同李济深、谭平山密商后，先后联系朱蕴山、刘伯垂、梅龚彬等，请他们在上海找中共中央洽谈，均未告成功。9月，蔡廷锴决心推行“联共反蒋抗日”方针，决定派陈公培代表越过前线直接与红军军部建立联系。

陈公培（即吴明）携带蔡廷锴用绸子写给红军的联络信，化装为农民，把信和密码本装入衣领内，从延平西南进入苏区。9月22日，陈等一行五人到达红军驻地王台。红军东方军总部军团长彭德怀立即电告中央，遵照周恩来电示，彭德怀同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红军与陈公培等人进行了谈判。彭、袁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爱国行动，又批评其助蒋“剿共”的错误，重申红军与一切爱国军队“共同抗日的三条件”。陈公培向红军方面说明十九路军决定“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表示与红军停止内战的迫切愿望。随后，彭德怀把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进行谈判[95]。

十九路军与红军初次谈判成功，双方在延平前线开始休战。蒋、蔡听取了陈公培汇报后，于10月初电告陈铭枢，不久共同决定派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与中央红军

会谈合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与十九路军的谈判，派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谈判。10月下旬，徐、陈到达瑞金，向中共方面递交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毛泽东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96]。双方通过会谈，于10月26日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97]，亦称《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有：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四、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五、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的准备；六、双方派出代表常川互驻；七、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八、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九、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定；十、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98]。上述协定的签订，使十九路军解除了西顾之忧，给“闽变”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二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十九路军初步实现了联共的步骤之后，加速了发动“闽变”的进程。1933年10月底，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徐名鸿等在香港秘密集会，讨论在福州组织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权等问题，决定迅速准备起事，并就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各地反蒋抗日人士也陆续到达福州。八一南昌起义将领叶挺也应约前来帮助策划。为了统一思想，蔡廷锴电召各师长于11月中旬到福州东郊鼓山召开军事会议，讲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理，要求“作好战争准

备”。在会议上，一些将领虽表示服从命令回去传达，但缺乏强烈的发难要求，这种情况引起了蔡廷锴对立即发动事变的忧虑。

蒋介石对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动向早获有情报，企图进行分化瓦解，使事变胎死腹中。他先是电邀蔡廷锴前往庐山会晤，被拒绝；继派林森入闽劝陈铭枢切勿轻举妄动，也遭到驳斥。11月17日蒋亲派自己的专机携专函来闽接蔡赴南昌。蒋介石在信中告蔡“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意在分化拉拢。但蔡采取了断然措施，将飞机和飞行员一同扣留下来。诸多因素促使事变成了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11月18日，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的其他主要策划者再次在鼓山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对发动事变问题进行最后决策。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李章达及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与会者对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修正政纲、政策等问题意见较统一。关于废弃国民党旗、国旗，另组新党，使用新国旗等问题，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也趋于一致。但在发动时间问题上，意见分歧极大，争论激烈。会上，蔡廷锴等主张推迟发难时间，以便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因为十九路军本身对发难问题意见不一，不少将官公开反对，有的保持沉默；部队的防务、部署未妥，杂牌军尚未就范，内奸尚未肃清，如果仓促发动，前途难卜。陈铭枢等则认为当前是发动事变的最好时机，只要十九路军树起义旗，登高一呼，必然四方响应。他慷慨激昂表示“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必须不计成败，立即发动。会议在陈铭枢豪言壮语激励之下，意见趋于一致，决定11月20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公开树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鼓山决策会议刚结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通过福建省政府向所属单位发出公函，“迩来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亡国条约，同人不忍坐视民族灭亡，定于本月二十五（星期一）午前九时，在福州城南公共体育场召开人民代表

大会，讨论挽救危亡方策，事关救国，凡农、工、商、学、政、军、警各界同胞均应热烈参加”，届时各界群众均按系统组织出席大会[99]。

同时，蔡廷锴签署命令接收各地中央银行及各国税机关，并即派李超桓接收福州中央银行，叶少泉接收厦门中央银行。

11月19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发出《告民众书》，指出：“现在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自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豪绅、流氓的总代表蒋中正及其御用的国民党窃取中央政柄以来，其中国政策，对外则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则厉行黑暗统治，蹂躏人民权利。此种媚外残民统治实施之结果，乃使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中国人民之痛苦，超于任何国家被压民众以至殖民地奴隶以上。”还具体地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历数南京政府罪状，认为“今蒋中正御用南京国民党系统与南京政府，既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与彻底民主政权实现之最大障碍物，自更为吾人应该首先打倒之敌人。”号召人民“应该立刻起来：打倒蒋中正御用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100]

为了使成立大会开成一个隆重的盛会，福州市政当局事先广泛动员市民参加，卫戍福州市的第六十一师教导团等整队赴会，福建省的各机关团体也都出席。从各地来到福州参加事变的各方势力代表，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并按照个人原籍，分别作为各省代表参加“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1932年11月20日上午，福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等约数万人以及全国25个省市及华侨代表百余人齐集城南公共体育场（即前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参加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当天发布的口号有：一、保障人民权利；二、实行农工解放；三、实施生产人民政权；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五、否认一切卖国密约；六、打倒蒋介石；七、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八、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等[101]。

9时40分，福州公安局长丘国珍宣布开会。大会推举黄琪翔等17人为主席团，黄以执行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是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的一个大会。……中国人民的生存要求谋中国自由独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为要达此目的，必须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当先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的南京政府。""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102] 接着萨镇冰、李济深、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相继发言。其后，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公开宣布：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特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基本主张，其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规定"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为"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之商学兵之代表大会"。对内不分种族、性别、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都有"绝对自由平等权"；对外以国家独立不容侵犯为最高原则。（二）施政纲领要"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彻底之关税自主"；要"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肉体劳动及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保护"。（三）宣布"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大会"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劳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103]。随后，翁照垣、丘国珍展示了一面新旗帜，图案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经大会通过为新国旗。举行升旗礼毕，在一片口号声中进行了环城大游行。

当晚，主席团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为11人。21日下午会议，正式推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何公敢、余心清（代冯玉祥）

等11人为中央委员[104]。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于22日正式宣告成立，并决定发出政府对内对外宣言，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首都，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105]。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人民革命委员会之下，设左列各会、部、院：（一）经济委员会，（二）文化委员会，（三）军事委员会，（四）内政部，（五）外交部，（六）农工部，（七）最高法院。”[106] 经过委员会讨论决定，内政部、农工部缓设，其他中央组织机构迅速设立。军事委员会掌管陆海空军和人民武装事宜，李济深兼主席，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经济委员会统筹全国的经济及下属财政部的经济行政，余心清任主任，下设劳动、土地、商务三个委员会，由蒋光鼐、章伯钧、许锡清分任主任。文化委员会主持全国的文化教育和民众训练等事项，陈铭枢任主席。外交部办理国际交涉，陈友仁为部长。财政部掌管全国财政事务，蒋光鼐为部长。最高法院由徐谦任院长。此外设国家保卫局，由李章达主持。彭泽湘任政府秘书长，等等。

新政府将福建划分为四省，并任命各省省长、副省长：闽海省，辖闽侯、长乐等十五县，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延建省，辖南平、沙县等十八县，省长萨镇冰，副省长郭冠杰；兴泉省，辖莆田、晋江等十一县，省长戴戟，副省长陈公培；龙漳省，辖龙岩、漳浦等十二县，省长许友超，副省长徐名鸿。另设福州、厦门两特别市，由丘国珍任福州市公安局长（福州不设市长），黄强为厦门市长。

福建人民政府共召开了十六次委员会议，先后颁布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最低纲领十八条》、《对外宣言》、《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大赦令》、《通缉蒋中正及其党羽汪精卫等布告》、《建立全国生产人民革命政权案》、《第二次宣言》等重要文件、文

告，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一）内政方略：福建人民政府认为南京政府是出卖民族利益、残害人民生存的蒋介石的工具，提出“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保障人权”。闽府领导人大量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国武装同志，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并颁发了《通缉蒋中正等》布告。闽府领导人指出，这次人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蒋介石及其南京统治之政权，使整个民族献身救护具有广大物质富源与人力之中国，免为附着于南京亲日政策之外人压迫与统治所断送。此运动同时又有一目的，即铲除一种建筑于亚细亚国家观念与实施上之政治制度”，并“求根本改变中国农村生活之中世纪经济情形”[107]。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接着，陈铭枢接受李章达的建议，决定以集体签名方式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首先加入。继而，黄琪翔率第三党党员参加，十九路军的“改造社”等也解散组织，一并加入生产人民党。该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在其党纲和党章中规定，中国革命即民族革命，在经济上求中国工业化，在政治上要实现民主政治。这个党要以直接生产的农工及由农工出身武装保护的士兵为最基本成分；在当时形势下为秘密组织；要树立严明的纪律；党员间实行自我批评。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实际上是几个有关党派的松散联盟。

闽府根据《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双方在福州与瑞金之间互派常驻代表，进行联系。人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凡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判刑的政治犯，“应一律予以赦免”[108]，同时也赦免了一般的刑事犯。仅福州、闽侯等地便释放了中共党员马立峰、范式人等152人。闽府还派出陈子航为代表到汀州与苏维埃政府代表张云逸进行谈判。11月27日，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据此，对双方疆界的划分、驻兵的限制及人员来往的交通和安全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闽府财政部次长

许锡清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州多次洽商物资交换，苏区向闽方提供部分粮食、钨矿砂等；闽府供应苏区部分食盐等紧缺物品。李济深、陈铭枢也就政治等方面问题多次同中共代表交换意见。福建事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闽变当局对中共也有合作的诚意，共同作了一些抗日反蒋的有益工作。鉴于当时的状况，闽府的联共活动基本上采取秘密方式。限于当时的条件，双方也仍然存在某些矛盾与距离。

福建政府支持和倡导社会各阶层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民众工作。在文委领导下，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福州先后成立了工会联合会、店员工会、工人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新闻记者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革命青年同盟、福建文化总同盟，等等。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以“反战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发行了《反帝新闻》。

（二）财政举措：福建政府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计口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根据原闽西善后委员会的《计口授田暂行法》及其细则等，在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地继续推行，其中以前经过土改的龙岩进展颇顺利。而其他地区步履艰难，如在漳平计口授田的试验，遭到地主、富农的反对，中农、贫农也不满，无法进行下去。闽东连江的试点，因军事失利而中止。

闽府宣布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没收和限制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外贸经营企业。提出“关税自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减轻出口税，增加进口税，旨在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闽府领导人认为，“人民革命是欲改造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为近代的国家”，“且创造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109)]；还认为“必须使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设施变为现代的。所谓现代者即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轮船、火车、汽车、飞机、来福枪、机关枪、电报、电话、无线电、工场及其他应用科学之成效之现代意义者同”[(110)]。但因限于当时的局势，没有也不可能落实上述政策。财政困难

是闽府遇到的一大难题。福建政府的成立，无法改变以往军阀割据所遗留的财政困乏状况。事变后广东停止对十九路军每月几十万元的资助。虽几经交涉，接管海关，向福州、厦门等支取关余，但总计不足100万元。政府入不敷出，宣布大幅度降低军政人员的月薪，每人只领取事变前的几成的薪金，福建政府财源枯竭，不得不向工商业者增加摊派、征收苛捐杂税，并于12月底由财政部提出向福州、厦门等地商会借款100万元，这不能不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引起强烈不满。

（三）军事设施：闽府成立后，撤销了原福建绥靖公署，为加强反蒋抗日的作战能力，扩大声势，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令部，保存十九路军番号，正式将原五个师十个旅，扩编为五个军十个师，两个航空大队。由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分任军长，刘植炎、邓粤铭分任航空大队长。另将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的民军改编为第六军，由翁照垣任军长。军委会设立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基层军官。还以扩编、加委的办法，尽力争取福建的地方实力派，如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为第十四军番号，对周志群、陈齐瑄部分别授为独立师。对省内的民军加以招抚和改编，维护地方治安。在一些乡、村组织农民自卫队。总之，力图扩大武装，增强对抗蒋介石的军事力量。

（四）文化、教育改革：废弃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和内容。闽府文化委员会发出通令，“所有从前各学校所授之党义课程已不适用，应即停止”，对教科书内“宣传国民党文字，一律删去”[(111)]。在学校中增设政治课，讲授中国近百年史、社会进化史、生产人民政权的意义等课程。着重规定了民族的、社会的与生产的教育原则，要求以政治、军事、劳动三点并重的教育方针，强调生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主张从小学起，就向儿童灌输生产劳动知识[(112)]。

文化委员会还制定了各校学生会、县市学联会条例，颁布青年学生训练大纲及活动方案[(113)]，要求“根据人民革命理论纲领及政策实

施之”，“使学生在革命的新学制施行中以自动自律的革命精神拥护革命的教育之实施”。闽府把原福建《民国日报》改为《人民日报》，设立人民通讯社，出版政府机关刊物《革命政权》，宣传抗日反蒋，阐述生产人民革命理论。并派欧阳予倩筹设“中央戏剧院”、派胡秋原等筹办“人民大学”[114]，力图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五）对外关系：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其目的，不仅在建设真正民主之中国，尤在排除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以保障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适当步骤与各国订立平等互惠的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原则。新政府成立后，曾电告各国政府不要支持南京政府，同时在《对外宣言》中严正指出：“吾人不得不敬告列强勿与南京之蒋介石政府以任何借款，无论其为金钱，为商品，为军械。吾人更声明以后如缔结任何该种借债，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必全盘加以否认。”[115]人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曾向福州、厦门、三都澳海关进行交涉，经洽商确定，海关用人行政仍归税务司按原规定办理，上述三海关关余每月以42.5万元解缴给闽府财政部[116]。从1934年1月起加征10%的附加税[117]。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曾通过撤销领事裁判权，废止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廨的决定[118]。福建事变揭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但在对日斗争方面实际表现很软弱。日本政府早已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对闽变极为关注与不安，曾致电给驻福州日本总领事守屋和郎说：“倘新政府以确立关税自主权，或撤销不平等条约为名，而致危及旅华日侨之生命财产，则必采取排除此种情形之适当措置。”[119]随后，驻福州的日本警察曾对一些军事要地进行非法侦察，日本浪人在福州南台蓄意滋扰，福建政府逆来顺受，未予过问。对其他列强在闽的势力和特权，基本上也是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对日、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进出沿海港口，也无法制止。厦门的鼓浪屿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南京政府特务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破坏福建新政权的基地，闽府也缺乏勇气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总之，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的出现，表明了国民党营垒的进一步分化。他们揭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坚决与蒋介石集团决裂，把原来对着红军的枪口掉转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口号、方针、政策，包含着反帝、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独裁统治的内容，主张实行民主、发展民族经济，说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在思想理论上存在混乱，缺乏科学性，使其所颁布的纲领和措施大多难以贯彻执行，加上由于敌人的破坏，内部困难重重，连有些可行的政策也未能实施。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得到国内外一部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厦门市各界11月24日于中山公园举行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有72个团体二万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拥护人民权利宣言；讨伐蒋介石、打倒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等决议，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120)]。同日，漳州各界民众五万余人在马肚底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群情激昂，一致通电表示讨伐蒋介石，拥护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权利宣言等[(121)]。此外，龙岩、沙县等十余县也举行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的集会和游行欢庆新政府的成立。福建省内各社会团体发通电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例如福州工联会发出通电表示，“谨率全榕十余万工友，一致拥护，誓为我人民革命政府后盾”[(122)]。农民团体、文化总同盟、妇联、学联、记者联合会等也明确表示：“革命的高潮来到了，劳苦的大众们！自动的起来吧！我们以血和肉来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掌中夺取我们的自由，救我们的民族。”[(123)]

省外的社会团体和爱国志士对福建事变也有所响应和支持。例如，四川成都四十五个生产同业和知识界团体，组织“四川省会生产大同盟”，决议对闽府“所布政纲绝端接受，并竭诚一致拥护，除派员分赴各县组织并宣传外，谨此电陈，伏候垂察”[(124)]。全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理事吴迈到闽进行实地考察和参加革命活动后，向在上海的史量才、黄任之（炎培）致电告以耳闻目睹的实情，认为“此间秩序

甚为安定，金融活泼，首领团结，朝气蠢然，绝不如沪报强制反宣传之所云”，要求“速赋同仇，群起讨贼”[125]。

一些海外华侨也来电表示支持。如马来亚、日、越南侨胞来电热烈拥护人民政府。他们认为“新政府告成，揭橥讨贼，抵御外敌，明定国本，中外腾欢，望即誓师，以苏民困，同侨筹助，先睹成功”[126]。菲律宾爱国华侨致电闽府表示：“本团除切实组织革命势力，以为钧府后盾外，谨代表十余万华侨生产大众，向钧府表示竭诚拥护，务祈克日北伐，声讨国贼，抵抗日寇，收复国土，领导大众革命，打倒帝国主义。”[127]致公党总部致电表示“誓作经济后盾”，加拿大等地致公党也纷纷致电祝贺和支持[128]。朝鲜爱国志士金文专程到闽参加人民政府的革命运动[129]。法国记者士力特女士到榕考察人民政府革命真相，多次采访人民政府领导人，对闽变表示“深切了解，甚表同情”[130]。

三　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福建事变的失败

福建事变的发生，闽府的建立，使蒋介石极为忌恨和震怒。他的“正统地位”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中华共和国”，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加以消灭，进而集中全力“围剿”红军。他与汪精卫急忙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着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克日敉平”[131]。

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严厉鎮压的决心早已确定，而对其武力讨伐的军事部署则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当“闽变”初起时，蒋、汪慌乱，一时拿不出应变之策。蒋甚至“终日徬徨，莫知所措，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糟了！糟了！’其内心的苦恼和恐惧是可以想象的”[132]。他们害怕因闽变而发生连锁响应，打乱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全盘计划；更怕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与红军结成军事联盟；又怕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自立政府。有鉴于此，蒋、汪分别在南昌和南京一唱一和，寻找尽快扑灭闽变的时机和办法。蒋于闽

变爆发的当天即曾电告国民政府，要求对闽变一面用政治解决，一面调军严防浙、粤边境，并连电黄郛通报闽变情况，要求提出对策。南京也电召湖北省主席张群入京，孙科则急忙从上海回南京参加谋划。

南京政府首先以“叛党乱国”、“联共勾日”的罪名对闽变大肆攻击污蔑，煽动国民党各派势力对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的怀疑、愤怒。闽府揭幕当晚，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三八四次中政会上，声称定要严厉处置闽变，在通电中攻击闽变为“叛乱”，认为“若任其猖獗，则荼毒生民，危害国家，为患不堪设想”[133]。继而他在京、沪等地咒骂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134]。11月22日起，蒋介石连发《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告将士长官电》，斥责陈铭枢等人为“联共叛党”、“降敌通匪”、“以联共勾日为手段，以毁党叛国为目的”。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又配合发表大批社论、消息，诬称闽府“背叛党国，毁裂纪纲”[135]，借以引导国民党军队仇视闽变，但未见他省起而响应。粤、桂两省虽借机指责南京，却与闽方敌对，从而使南京当局态度更加强硬。11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决定“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永远开除党籍”[136]，接着又对他们发出通缉令。

其次，蒋汪利用其中央地位，制造各地方效忠中央，激烈声讨闽变的声势。蒋的家乡浙江省最早通电指责陈铭枢等，并表示相信“中央安定国本，保障民生，德威所及，必能戡逆谋于乍著，定变乱于俄顷”[137]。国民党各绥靖区的军事首领，由蒋的嫡系领头，陆续通电表态。江西的熊式辉致电斥责李济深等“潜窃福州，联匪事仇，毁党叛国，改元易帜，逆迹昭彰”[138]。华北的何应钦、河南的刘峙、西北的朱绍良、安庆的刘镇华、汉口的何成濬等都通电声讨闽变，要求“中央速决大计，严厉制裁”[139]，并表示愿“执戈待命，为国前驱”，“赴汤蹈火，所不敢辞”[140]。

第三，蒋汪费尽心机地分化瓦解闽、粤、桂联盟，并抑制了一些地方势力准备响应闽变的举动。两广原同十九路军订有盟约，闽变次

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曾联名电西南政务委员会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要求共同反蒋，表示“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期发动，嬴政无道，陈涉发难于先，安国定邦，沛公继起于后，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141]。胡汉民等公然指责闽变为“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142]。陈济棠在蒋介石拨200万元巨额补助金，并允诺更多政治、经济条件的拉拢、收买下，对闽方背信弃义，一面屯兵粤闽边界，一面封闭十九路军在粤机构，停止协饷，扣押十九路军过境的军火、武器，还以保境安民为名，调兵遣将，准备随时入闽。蔡廷锴曾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语谴责陈济棠等的倒行逆施。

闽方与一些省份如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山东、陕西等原来是有所联络的。但由于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加上闽府一些政策措施的失当，因而没有获得这些省当局的响应。方鼎英曾拟在湘西起义，也策动不起来。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虽在上海致闽方当局一面表示赞同闽府反对南京政府，要求改组中央党部，取消党治，还政于民，而对变更国体，改国旗，取消国民党等主张则认为“实难赞同”。北京《晨报》社的陈博生曾到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闽变，但未见实际举措。

一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报纸如上海《申报》、《大晚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曾经发表比较公正的评论。有的认为：“闽局发生的责任，中央政府一班当局应该自负。不说别的，如今闽局中重要而且最有力的号召是‘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在这一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倘把两年的历史看看，就应该惭愧无地。”同时指出：“闽方的借以号召的一切原则，武力都不能消灭。”[143]这些都表明一些中间势力对闽府敢于揭起反蒋旗帜表示一定的欢迎，但他们对变更国体等举动，在当时仍不愿公开支持。

十九路军曾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但在蒋介石的蛊惑下，闽变在华侨中所得到的反应不够热烈，有不少人持消极观望态

度，甚至有的表示反对。如新加坡等地的一些华侨曾公开声明：如闽府不改正政策，“则拒绝对闽经济合作”[144]，等等。同时，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和军事特派员潜入福建和人民革命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工作，收买和策动一些地方实力派和不坚定分子倒戈。

此外，蒋介石还极力拉拢帝国主义各国支持南京政府而扼杀闽府。南京政府曾照会各国政府，请求拒绝承认福建人民政府并不给予任何形式的援助。英、美、法等国迅速予以答复，电称“对此皆表同情”[145]。当时的苏联急于与南京政府发展关系，对闽变也进行指责，苏《消息报》甚至发表评论认为，闽变领导人“所宣示之口号无论如何激烈，彼等与中国之真正革命运动绝无共同之点”，“无非为一种诱取中国民众之企图”[146]。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大使有吉到南京访问汪精卫，声明日本无意援助闽变。蒋、汪立即派与日本有较深关系的陈仪赴日本，以厦门不驻兵为交换条件，请求日本协助镇压闽府。1934年1月，日、英、美借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日舰派480人，英舰派40人，美舰派30人，强行占领福州要地，配合蒋系军队进攻福建人民政府。

当蒋介石对福建大搞政治攻势的同时，不断派飞机袭扰福建重镇，又派军舰封锁福建海面，给闽府造成沉重压力。他在南昌根据获得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认定非迅速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在与熊式辉、顾祝同、陈诚等紧张谋划后，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九个师，又从南京、杭州抽调两个师，合计十一个师约十五万人的嫡系部队[147]，分三路向福建进攻。他声称：“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本剿灭赣南的土匪，非同时剿灭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148] 其军事部署是：

以蒋鼎文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于11月底由江西南城辗转进闽北浦城，继占政和、屏南，1934年1月

初对水口形成包围态势。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驻地南京、杭州等地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投蒋后改为三十九军，归张指挥。该路军于1月初完成对古田县的包围。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分批从江西抚州，通过部分苏区，经邵武、顺昌与刘和鼎部配合，1月初包围了延平（今属南平市）。另外，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大部分飞机于浙南、闽北，执行侦察、轰炸与战役配合；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进行海上的侦察与封锁。蒋介石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展开攻击[149]。

福建是四战之地，闽府军除因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诸方面均要设防，当时部队经整编号称七万余人，实际上基干部队十九路军仅约五万人。当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若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缺乏机动作战能力。闽府领导人曾寄希望于各地响应事变，群起攻蒋，对自己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对蒋的残酷镇压掉以轻心，曾认为“蒋介石根本无一可调之兵”，“目前集中浙闽边境者，仅赵观涛、张治中等数师，此种军队，十九路军不知遭过多少，实不值我人一击”[150]。

直到12月中旬，蒋介石大军压境时，闽军委会才在福州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有三种方案，蔡廷锴主张集中主力于闽北，趁蒋军入闽未稳之机，先歼灭刘和鼎部，继迎击蒋军先头部队，争取主动。蒋光鼐等提出将主力调闽南，背靠广东，西与红军联合，与蒋军作持久抵抗，或率主力打入浙东，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则主张集中主力保卫福州。经过辩论，多数赞成固守福州，形成决定。按照这一方案，十九路军调集主力部队集中于福州周围。原驻闽西、闽北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第六十一师撤回福州，相继放弃建阳、建瓯、浦城、崇安、邵武、松溪、顺昌、将乐、泰宁、永安等阵地。原驻泉州、莆田、仙游等地的第二军第二师、第三军第三

师、第四军除留周力行一个团外，都调进福州地区。闽北前线只留谭启秀第五军，分驻延平、水口、古田等战略据点。这种部署将福建兵力的三分之二，号称四个军，实有兵力21个团，四万余人，集中守卫福州。分散在其他地区的兵力有11个团，约二万余人。这显然有利于蒋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不利于十九路军的战略防御和机动出击，以至于使闽府在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蒋军对闽北重镇延平发起攻击，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司徒非率一个团一千余人据险顽强抵抗。在蒋军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攻击和轰炸及宋希濂等几支部队轮番冲击下，天险九峰山失守，守军被迫投降。1月6日蒋军占领延平。

在蒋军对延平发动猛攻之时，闽府再次于福州召开军事会议，陈铭枢等被迫变更原来计划，决定全军主力从福州分路西进，一路经大湖、雪峰驰援古田；一路沿甘蔗、白沙、水口开向延平。不料延平骤失，它与福州之间的战略要地水口也于1月7日遭蒋军猛攻。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军部和两个团在此驻防。在蒋军李延年、李默庵、李玉堂共三师十二个团及其他部队协同进攻下，第五军无力坚持待援，当晚水口陷入敌手，谭启秀单身乘木筏突围。此时，蔡廷锴、蒋光鼐等又获悉蒋军有趋永泰企图切断十九路军后路的迹象。1月8日，经白沙军事会议决定，十九路军向闽南撤退，企图背靠广东与苏区，保存实力。蔡廷锴命第四军军长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通知闽府各机关和人员作撤退安排，决定主力南下，在峡兜附近过乌龙江，命区寿年第三军先占仙游，掩护主力，又命毛维寿第二军速占惠安、泉州等地。

古田位于福州的西北部，丛山环抱，形势险要，是福州的重要屏障、战略要地。原由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赵一肩率三个团防守，此时已被张治中率领下的蒋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团团围困。张定下了“此次攻取方略，先攻延平，次攻水口，两地克服，则古田之敌如瓮中捉鳖，可避免攻坚所受之牺牲”[151]。此计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十九路军主力南撤，古田守军陷入绝境，遂于1月12日被蒋军占领，

至此闽北战事结束。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军政部次长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暂设延平。

1934年1月12日晚，李济深、陈铭枢等与十九路军及海军将领商讨撤退事宜。此时闽变当局已难以驾驭福建局势，卢兴邦等已倒向南京，致使福州与永泰、仙游等地间的交通受阻。南京的海军陆战队先后在连江、福清等地登陆，福州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十九路军当局经仓促讨论决定，当晚开始行动，分两路向漳州、泉州撤退：一路经洪山桥，由福湾公路的湾边角出发；另一路是主力，由福峡公路的峡兜过乌龙江，分别向预定目标前进。1月13日，设于福州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办公。当天，蔡廷锴等通电表示将在漳州设人民政府，在泉州设总部，继续坚持战斗。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章伯钧、胡秋原、梅龚彬、何公敢等人民政府领导人分别乘飞机、轮船、汽车离开福州。蔡廷锴暂留福州，处理善后，并商请萨镇冰维持福州秩序等事宜。1月15日，十九路军安全过江，蔡廷锴离榕赴泉。16日，南京政府海军陆战队及蒋鼎文率部占领福州，同时下令所属各部对十九路军继续追击和堵截。

南京第五路军卫立煌部南进追击十九路军，其所属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在仙游以南与十九路军张君嵩师接触。张师英勇反击，掩护十九路军主力撤离涂岭一线。担任后卫的部队又在莆田阻击蒋军，保证十九路军主力南下泉州。蔡廷锴曾下决心在泉州地区组织反击战，苦撑残局，力图使十九路军能在闽粤边界立住阵脚。他离福州后于16日至莆田，主张先集中兵力于仙游，击败卫立煌部后南下，遭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反对，遂改令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一面掩护西侧部队继续南撤。17日，蔡廷锴率部由莆田经涂岭抵泉州，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决定本人离军去闽西，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闽西保存实力，宣布将一方面军部队交毛维寿代指挥。当晚，蔡乘机抵漳州。

掌握着十九路军主力指挥权的毛维寿早有归降蒋介石之意。这与

戴笠派遣特务潜入福建策反有关。戴笠曾派特务运用私人关系，联络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策反该师师长毛维寿等许以高官厚禄。当十九路军向闽南退却时，戴笠赶往厦门，亲自指挥策反，并到漳州与毛维寿等密谈，软硬兼施迫毛维寿、沈光汉等降蒋。毛维寿先是有意放弃晋江口洛阳桥的战略要道，让蒋军轻易占据，致使十九路军聚集的泉州无险可守。在此前，黄强已于1月9日将厦门交给南京政府海军要港司令林国赓，所带部队被收编。20日蒋军从厦门嵩屿港登陆，占领同安、漳州，切断泉州十九路军西撤之路。这时，蒋军八十三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奉命进泉州，找张炎等接洽。1月21日，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发表降蒋通电，宣称："同室操戈，贻害邦国，智者不为。光汉等决议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诸公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任维持，一切政治问题，静待商决。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国之安宁，全国明哲，谅表同情。除令各部队集结停止军事行动，静待和平处理。"(152) 经十九路军代表与蒋介石方面接洽，决定将十九路军缩编为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共四个师。毛维寿被任命为十九路军总指挥。

1月22日，蒋军宋希濂师占莆田，续向泉州推进；王敬玖师与刘戡师相配合进逼泉州，形成包围的态势。闽府第一方面军参谋处长范汉杰暗通国民党当局，使蒋介石对闽方军事了如指掌。蒋鼎文拟定收编十九路军办法，营长以上离营，余则点械收容。蒋介石即日复电照准，令十九路军集合莆田、福清、惠安听候改编。次日，蒋鼎文电泉州十九路军将领，限三日内作出明白表示。沈光汉等复向蒋介石要求仍驻泉州并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另派戴戟来闽负责改编，至25日晚仍未开出泉州。30日，蒋军以重兵相逼，强行取消十九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统率所部。不久又制造借口将各师缴械，强令各师分赴河南归德、开封等地整训，并将连、营以上军官全部更换为蒋军嫡系，彻底肢解了十九路军这支闻名遐迩、战功卓著的抗日军队。

蔡廷锴退抵龙岩时，尚有周力行团及余部四千余人。蔡曾拟与闽西地方武装傅柏翠等合作，以游击战同蒋介石周旋。由于粤军陈济棠等的步步进逼，使他感到坚持反蒋已无实力，参加红军又无决心，最后决定让余部接受粤军改编为一个旅。闽变领导人李济深等分别离龙岩往香港后，陈济棠将这个旅缴械遣散。周力行（即周士第）果断机智地投奔苏区，幸免于难。徐名鸿在通过广东大埔时，被粤军查获，并以“叛国叛党”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名鸿临危不惧，曾言：“死后如立‘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吾愿足矣。”[(153)] 2月上旬，蒋军第三师进驻龙岩，至此，闽府的最后一块基地，十九路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也完全丧失了，“闽变”终于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福建事变发生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遭受蒋介石镇压，革命形势发生曲折的变化，闽变的领导者敢于冲破南京统治集团的牢笼，打起抗日反蒋联共的旗帜，表现了爱国主义与革新政治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次事变的迅速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经济、军事实力仍比较强大，尚处上升的时期，以福建一隅之地和一军之力，要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实际上闽变的领导者对局势的估计过于盲目乐观，以为可能出现“登高一呼，四方响应”的局面，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轻敌思想，认为蒋介石抽不出兵力前来镇压，从而没有作坚实迎敌的准备。在政治措施上又有些失当，例如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下孙中山遗像等，这些做法也使自己陷于孤立。在人民政府内部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内部不能统一，又遭到蒋介石派遣的奸细的严重破坏。福建人民政府作出联共的决定是可贵的，但在当时对联共和军事合作仍存有疑虑，态度不够坚定。在中共方面虽有苏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正确支持，但由于左倾领导占据统治地位，使双方的合作大打折扣，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闽府领导人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方面虽作了一些工作，远远不够，因而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次事变在当时的条件下遭受失败，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失败得如此迅速，以至使一支英勇善战的

铁军顷刻间被消灭，则令人感到意外，作为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的。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其正义性和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闽变”的领导人后来也大多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

(1)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53页。

(2)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37页。

(4)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18页。

(5) 《蒋介石致张学良有电》，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563页。

(6) 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7) 《大公报》（天津），1933年1月13日。

(8) 《国闻周报》第10卷第5期。

(9)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73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11)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12)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13) 《大公报》（天津），1933年2月19日。

(14)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2章第3节。

(15)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396页。

(17)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7日。

(18) 《申报》，1933年3月10日。

(19) 《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快邮代电》，国民政府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0) 《蒋介石致张学良、何应钦鱼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14页。

(21) 《蒋介石致张学良、何应钦鱼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14页。

(22) 中国艺术公司：《长城血战记》，京城印书局1933年版，第2页。

(23)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93页。

(24) 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25) ［日］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102—103页。

(26)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27) 《汪精卫致黄郛养电》，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9页。

(28)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漾未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561页。

(29) 《蒋介石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回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561—562页。

(30)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561页。

(3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40—941页。

(32) 政协河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33) 高树勋等：《察哈尔民众同盟军》，《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15页。

(34)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35)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5—100页。

(36)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37) 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96—197页。

(38)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62页。

(39) 《申报》1933年7月16日。

(40) 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9—220页。

(41)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58年编印。

(42) 《一月来之中国·察哈尔问题》，《申报月刊》第2卷第8号，1933年8月15日。

(43)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4—205页。

(44)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6-207页。

(45)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1页。

(47) 《华北日报》1933年7月30日。

(48) 《晨报》1933年8月3日。

(49)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50)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刚到香港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51) 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52) 《庸报》1932年5月18日。

(53) 见《中华民国海军通史》，第333页。

(54) 《国闻周报》第9卷第38期，1932年9月20日。

(55)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4页。

(56) 《山东省政府公报》第199期，1932年10月2日。

(57) 《山东省政府公报》第199期，1932年10月2日。

(5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念纪事长编》（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70页。

(59) 《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9月28日。

(60) 《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61) 《新闻报》1932年10月22日。

(62) 《庸报》1932年10月23日。

(63) 《新闻报》1932年10月26日。

(64)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念纪事长编》（上），第270页。

(65) 《国闻周报》1931年4月6日。

(66) 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67) 乔诚等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68) 萧波等：《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69) 萧波等：《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70) 《刘湘》第127页。

(71) 《刘湘》，第128页。

(72) 《刘湘》，第129页。

(73) 周东郊编：《盛世才祸新记》之二，油印本。

(7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75)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178页。

(76) 吴蔼宸：《新疆纪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6页。

(77) 《中央日报》1933年6月19日。

(78) 《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

(79) 吴蔼宸：《新疆纪游》，第118页。

(80) 《中央日报》1933年7月7日。

(81) 《申报》1933年8月2日。

(82)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

(83) 《蔡廷锴自传》上册，第296页。

(84) 《申报》，1932年5月24日。

(85) 《庸报》，1932年5月29日。

(86)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8月2日。

(87)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9月23日。

(88)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89)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8页。

(90)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11月17日。

(91)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92) 《庸报》，1933年1月7日。

(93) 《民国日报》（福建），1933年5月2日。

(94)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1页。

(95)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

(96)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14—415页。

(97)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6页。

(98) 《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全文，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

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196页。

(99) 福建省政府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公函（1933年11月18日），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2页。

(100) 福建省政府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公函（1933年11月18日），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4—6页。

(101) 《民国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0日。

(102) 《全国人民临时代表会情形详记》（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8—9页。

(103)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1933年11月20日自福州发），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12—13页。

(104)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3日。

(105)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96页。

(106)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9期。

(10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6日。

(108)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日。

(109)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5日。

(110) 《人民日报》（福建），1934年1月11日。

(111)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2、13日。

(112)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0日。

(113)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30日。

(114) 《北平晨报》，1933年12月7日。

(115) 《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言》，《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3日。

(116)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5日。

(11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7日。

(118)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1日。

(119) 记者：《闽变始末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

(120)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3日。

(121) 《江声报》（厦门），1933年11月26日。

(122)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4日。

(123)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1日。

(124)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9日。

(125)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4日。

(126)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4日。

(12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9日。

(128) 《人民日报》（福建），1934年1月6、11日。

(129)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9日。

(130)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2日。

(131) 《救国通讯》第59期，1933年12月7日。

(132) 符昭骞、郑庭笈：《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战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4页。

(133) 《救国通讯》第59期，1933年12月7日。

(134) 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30页。

(135) 《申报》，1933年11月23日。

(136) 《申报》，1933年11月24日。

(137) 《国闻周报》，第11卷第49期，1933年12月11日。

(138) 《申报》，1933年11月24日。

(1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0) 《申报》，1933年11月23、26日。

(141)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

(142) 《闽变续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48期。

(143) 《解决闽局的合理途径》，《益世报》1933年11月23日。

(144)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8日。

(145)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2日。

(146)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8日。

(147) 《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148) 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1956年增订本，第159页。

(149) 宋希濂：《我参加“讨伐”十九路军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150)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11日。

(151) 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2) 《江声报》（厦门），1934年1月22日。

(153) 转引自冯玉祥1935年3月日记。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第一节　军事独裁体制的确立

一　蒋介石总揽兵权，控制全局

蒋介石于1931年12月第二次下野后，感到短期之内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绝非易事。他退而求其次，便起用过去的政敌汪精卫。蒋介石在1932年1月中旬专程从浙江奉化往杭州与汪氏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的协议，商定组成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由汪负责内政外交，出面对日折冲樽俎；蒋负责军事，专主“剿共”内战。同年3月18日，蒋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他专任军事职务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既没有国民党领袖的名义，也不是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国民党政权的全局仍归他支配。他自己牢固地控制着军队，而南京政府的财政资源、党政要害机关等绝大部分也控制在拥蒋派手里。蒋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及其体制演变，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早在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时就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其职权是在国民党的指导、监督下，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的各机关。北伐战争开始后，又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任总司令，规定军事委员会内各机关改隶总司令部。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为了表示不承认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军事委员会的改组，标榜南京政府符合法统，声

称1927年4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广州迁进南京办公，当时规定，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负全国陆海军编制、统御、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蒋介石经历了第一次下野后，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又在其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中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统辖全国武装部队。11月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军事委员会着即裁撤，该会所有一切事务限于11月10日以前结束，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在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期间，1931年1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对中央政府政治体制进行了某些改革。首先，缩小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实际上是虚位元首，会议推举林森担任此职。其次，实行五院分立制。新政制规定，行政院负实际行政责任，五院独立行使五种治权，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实行五权分立。第三，高级官吏任免权分散行使。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它有防止和打击蒋介石继续实行个人独裁的企图。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定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同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称，这次重设军事委员会，“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1)]。但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并不履行诺言，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在较长时间内，国民党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日作战，而集中军事力量“剿共”。当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鉴》也承认：国民党“于沪战结束后，指导国民政府设置军事委员会，以蒋中正任委员长，本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原则，督师剿赤匪”[(2)]。

在国民政府中，政策和机构常因人而设，因人而易。重设的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集权程度较前大为提高，取消了主席与常委共同署名的制度，常委与委员长不是共同领导关系，而是辅助关系。由于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毫无实权，军事委员会虽直隶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没有哪个机构，哪位领导人能领导军事委员会。它实际上只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蒋介石拥有全权。

蒋介石在跌宕起伏的政坛生涯中，更认识到控制军权的重要性。他于1932年5月1日对天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从前本人求政治统一太急，又以为其力足以扫除统一障碍，认为可先办成统一，再整顿军事，以统一军令。""军政为统一政治之基本。本人愿努力治军，巩固中央。"[(3)] 他下决心先抓军权，再及党权、政权，最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1932年6月上旬，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发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规定统一各师编制，军为直辖单位，军长不兼师长，共编48个军96个师，形成了一支由蒋直接控制的"中央军"。为了加强这支正规化的军队，还逐步聘请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大量购买外国军火，补充和更新武器装备，其首要目的是适应反共战争的需要。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其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指调豫、鄂、皖三省剿匪之陆海空军，均归总司令节制指挥外，所有该三省党务及政务事宜，由中央特许，统受其指导办理之。"[(4)]

蒋介石主持军事委员会后，机构迅速扩大，内除设办公厅外，增设了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调查统计局。1932年8月设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兼委员长，处理北方的一切军事事宜，从此东北军也归蒋直接指挥。1934年5月，航空署改组为航空委员会，直隶军事委员会，蒋兼任委员长。继又设立许多派出机关，如南昌行营、武汉行营、广州行营、四川行营、西安行营、武昌行营等。在《南昌行营组织大纲》中规定，"军事委员长为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及监督、指挥剿匪区内各省党、政事务之便利起见，特设

南昌行营”[5]。还规定了严密的组织系统，除设办公厅外，有第一、二厅、审核处、训练处、经理处、总务处。在办公厅内又有秘书长室、主任室、侍从室，在主任室内再设人事课、文书课、机要课、调查课。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各地划分若干绥靖区，先后设有驻豫、驻鄂、驻赣、驻闽、驻陕、驻广州、驻南宁、驻北平、驻太原、驻豫皖、驻湘、驻贵滇黔、川康、驻甘、冀察等绥靖公署[6]。各公署“绥靖主任由国民政府特派之，隶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受参谋总长、军政部长及训练总监之指导”[7]。行营和绥靖公署除负责指导军事外，并干预甚至控制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军事委员会又领导各省和大卫戍区的保安司令部及卫戍司令部。各省划分若干行政区，设保安司令，县设保安总队。总之，通过一整套的机构，军事委员会建立了对全国的军事统治网，蒋介石成为总揽军权的铁腕人物，从而也控制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中枢。

在军事委员会内，蒋介石还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即军事委员长侍从室。它对蒋建立独裁统治起着特别的作用。正如程思远所指出：“蒋当总司令，权力中心就在总司令部；蒋当国府主席，权力中心就在国民政府；现在蒋当委员长，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他的侍从室。以后蒋的侍从室变成了一个太上内阁，凌驾于党政最高领导之上，‘中正侍秘’、‘中正侍参’的电令，拥有最高无上的权威。”[8]

如前所述，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集中主要军事力量继续“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先在汉口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继而设立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他在赴鄂、赣指挥部队时，总要随身带几个亲信侍从人员、秘书、副官和临时抽调的参谋人员等。这在起初并没有确定正式名称和机构，实际上已是侍从室的雏形。接着蒋把侍从秘书、副官、随行参谋人员及侍卫人员等组织在一起，成立侍从室，属南昌行营编制。在1933年6月20日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组织大纲》中，侍从室已正式列入南昌行营的组织系统表内[9]。侍从室的主任先是林

蔚，后由晏道刚继任。其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记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10]。以后经过逐渐扩充和发展，到1936年1月，侍从室改组，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侍从室”。设侍从第一和第二两个处（到抗日战争时期增设第三处）。一处掌军事，晏道刚、钱大钧先后任主任；二处掌政治、党务，陈布雷为主任。每处下设三个组。处主任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另外，保卫蒋介石驻留和行动安全，由警卫大队和侍一处第三组负责，设侍卫长统一指挥这两个机构的行动，侍卫长由钱大钧兼任。侍从室官兵待遇很特殊，其工资、津贴等远在国民政府各机关之上。

侍从室设立之初，工作偏重于军事方面，1936年1月改组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领导一切，侍从室的职权也扩大到党、政、财、文，国民政府各院、部、会没有哪一个机构的职权有如此全面。蒋介石赋予它的权力不仅是办理一些事务，而是参与策划机密要事，掌握高级官员考核任免，拟发命令文电，实际上凌驾于院、部、会等机关之上。概括地说，侍从室一处第二组和二处第四组是侍从室的核心。一处二组为蒋的军事参谋，掌握范围包括军政、军令、军训、国防设计、绥靖、运输、空军、海军、军法、人事、情报等。二处四组是蒋的党政秘书，主管政治、党务、秘书等。后来权力更加集中，常常包办行政院业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侍从室在人事方面的特殊作用。侍从二处第五组初为蒋介石储备行政官员而设，由陈布雷兼组长，组内设侍从秘书，无定员，无定职，一律上校待遇，备蒋召见咨询，陆续派往其他部门工作。后来蒋的权力膨胀，凡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及中央和地方其他行政单位高级军、政主管官员的任免，都必须蒋亲自核定后，才交由主管部门发布任命。总之，侍从室设立后经过发展演变，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侍从办事机构，逐渐变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内廷”。正如深知内情者指出，“侍从室就像封建皇帝的内务府或内书房”，不同的是侍从室管得宽，党、政、财、文样样都管[11]。此外，1932年4月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设

立了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将CC系特务组织和复兴社特务处集中于军统局，局长先是贺耀组，1935年4月起由陈立夫继任。军统局的设立也使蒋介石能更得力地使用这一支特殊力量。

毛泽东曾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12)] 为了抓住军队，蒋特别注重掌握军校。他早已将黄埔军校迁入南京并改为中央军校，其官邸就设在军校校园的中心（黄埔路）。蒋介石长期兼任中央军校和其他多所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这就使大多军官及县长以上的官吏都成了蒋的门生，成为蒋家王朝的基干力量。

蒋介石又懂得，单有军权尚不足以确保其稳固地位，只有通过重税、外国贷款获得大宗财源，或得到大城市的实业家、商人、银行家等的财政金融支持，才能支持军队，保持权力。因而，南京政府建立后，长期由宋子文、孔祥熙这两位蒋的亲戚和其他江浙籍实业家、银行家掌管财政。在行政院中，汪精卫任院长，宋子文则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这就保证了军事委员会有充足的财力为保障。蒋介石不断提出大宗军火的订单，交由宋子文、孔祥熙向德、美、英、意等国订购，从中获取高额的佣金，有的年份高达数千万元。这也为蒋、宋、孔等提供聚敛财富的重要来源。1935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在原来为筹措"剿共"经费而建立起来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加入250万元官股，改称中国农民银行，蒋任理事长，不久也准其发行钞票，加入法币系统。这个银行后来成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CC系金融资本的核心。同时，又设立以经营进出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从事储蓄、汇兑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蒋介石等还将军事委员会的势力逐渐延伸到工业及经济范围。1932年11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委会。该会起初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产品运销事宜，

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这样，蒋介石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有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后盾。

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组成中央政府以后，胡汉民处于在野地位，南京政府形成蒋汪双头政治，从形式上看，蒋主军，汪主政，但实际上只有主军的蒋介石才能指挥国民政府全局，并且逐渐趋向蒋的个人独裁。蒋汪之间既勾结又争夺，关系时有变化，这是南京政府内争的主要表现。在强大的拥蒋派制约下，汪的地位风雨飘摇，几次提出辞职，经蒋出面周旋才继续留任。稍后，汪企图通过对日外交途径，逐步攫取权力，逼蒋让步，虽一度得手，成为日本最信赖的外交对手，却引起主张抗日的亲欧美派人士的愤怒，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遇刺后，南京政权再次完全由蒋介石所把持，他又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详后）。

二　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建制与征兵制的实行

（一）重要军事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最高统帅机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

根据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1932年3月5日所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职掌“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军费支配、军实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之审核”。该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七至九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国民政府特任[(13)]。7月16日，又对组织大纲进行修改并公布。依据新大纲规定，加上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

议院院长及委员会各厅主任为当然委员，共十七至十九人。其中互推三至五人为常务委员，“辅助委员长筹划一切事宜”[14]。委员长之下辖办公厅，内分第一、二、三厅，分别职掌国防用兵和陆地测量、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军事咨询和研究等事项。此外还有专门为委员长个人服务的侍从室等。

随着军事委员会权力的扩大，其组织逐步扩充。1934年5月航空署从军政部划出，改组为航空委员会，直隶军委会，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下设若干厅、处分管各项业务。所有空军部队、空军院校及场站，均归该会领导。

继而，军委会又陆续增设了铨叙部，统管陆海空人事；审计厅，负责全军审计；政治训练处，掌管全军政治训练；资源委员会，掌管资源的调查、资源的开发和资源的动员事项；调查统计局，掌管军事、党派情报以及禁烟委员会等机构。

为了集中力量消灭红军和其根据地，镇压人民，南京政府还在各地设立各种军事机构。为“围剿”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设立剿共司令部；为对根据地进行围攻或对某重要地区人民进行统治，设立委员长行营；自1930年至抗战前，全国共设十余处绥靖公署；为强化对中心城市的军事统治，设警备司令部或卫戍司令部，如南京警备司令部、杭州警备司令部、平津卫戍司令部等。剿匪司令部是蒋介石集中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武装“围剿”和对苏区进攻的军事指挥机关，它的全称是“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总司令部，一般分为两个层次，即大司令部辖小的司令部。如设在湖北沙市的鄂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承军事委员长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之命，指挥所辖之军队。

军事委员会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军事机构，主要是：直属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和隶属于行政院的军政部、海军部，这些部、院按规定也归军委会指导、节制。

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如军事情报的搜集、作战方案的制订、军队的管理教育、军事编制的变动等。参谋本部设参谋总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参划军机，执掌国防用兵各计划，综理部务，统率全国参谋人员，监督其教育并管辖陆军大学等学校以及驻外使馆武官、陆地测量等。设次长一人，中将衔，协助总长办理部务。

训练总监部掌理全国军队及所辖学校教育和国民军事教育等事宜。部内设总务厅和步兵监、骑兵监、炮兵监、工兵、辎重兵监等，并设政治训练处、国民军事处和军事编译处，必要时增设特种兵监和海军兵监等。设训练总监一人，上将衔，综理部务，负责规划、监督全国军队及所辖军事学校教育以及国民军事教育等事宜；设副监二人，中将衔，辅佐总监处理部务。训练总监部直辖的学校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军官训练班、航空队、陆军步兵、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学校。

军事参议院，是南京政府建立的最高军事咨询建议机关，设院长一人，上将衔，综理全院事务；设副院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辅助院长处理院务。设军事参议若干人，将级，平时专备咨询建设，并担任点验、校阅、演习及特派等事宜，战时则选任为高级指挥官或担任其他重要职务。担任军事参议、咨议的人员，按规定必须是“曾任重要军职，学识优长，勋望卓著，久在党国服务之海陆空军将官及上校”；又规定参议为90人至180人，咨议为60人至150人，其中上将参议不得超过25人，中将参议不得超过50人[(15)]。实际上大多是安置一些高级闲散军官。

军政部隶属于行政院，成立初期掌理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监察指导各省区有关军政事务。设陆军、海军、航空、军需、兵工等五署和总务厅、审计处。设部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经理部务，监督所属各厅、署、处的行政事宜；设次长二人，中将衔，辅助部长处理部务。由于海军署和空军署先后扩为部和委员会，1932年后

军政部实际上仅掌管陆军行政。

海军部前身为军政部的海军署。1929年7月改署为部，直隶行政院，管理全国海军行政事务。内设总务、军衔、军务、舰政、军学、军械、海政等司和一个经理处。设部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综理部务；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一人，中将衔，协助部长办理部务。

（二）军队的编制和整理

（1）陆军的编制与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其军队分别掌握在蒋系、冯系、阎系、桂系等军事实力派手中，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只占军队总数的一小部分，为了加强对各派军队的控制，蒋介石既对军事机构进行整顿，也对军事建制与编制进行大规模整理。

当1928年末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时，全国陆军主力有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以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为主干，由蒋介石任总司令。第二集团军为西北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为晋系部队，以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为桂系部队，以李宗仁为总司令。以上四个集团军“战斗员额几逾百万”[16]。此外，还有新易帜的东北军及其他一些地方部队。集团军以下的编制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决定对全国各系军队实行压缩编遣，同时实行统一编制，平时不设军。师以下设旅，旅以下为团。师分为甲、乙、丙三种。该编遣方案只有利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扩充，因而遭到各地方实力派反对，未能实行。南京政府在一项报告中作如下记述：“当十七年北伐告成，全国统一之际，全国军队均在政府统制之下，计有中央直辖部队及第一、二、三、四各集团军，第八路军暨其他闽、川、滇、黔、东三省各部队约计总数不下一百八十余万人。军队愈多，编制愈不一致。于是政府乃于十八年设国军编

遣委员会，将全国军队收缩整理拟分期裁减，仅留五十万人。所有战时名义及编制一律取消。另由该会制定陆军暂行编制表，呈准公布施行。按此项编制，以师为最高单位，更分甲乙丙三种师。甲种师以步兵二（三）旅，每旅三团为基干；乙种师步兵三旅，每旅二团；丙种师，步兵二旅，每旅二团，并各配属其他特种兵若干。以便依各部队之质量分别改编，改编后每师原额约一万四千余人。乃编遣会成立决议各案正在进行，而李、白、阎、冯等即相继叛变，遂复中止。”[17]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曾将其嫡系部队和受其指挥的地方杂牌军编制为若干“路”军，每路军设总指挥，统率几个师、旅不等。并在师直属队中增加了野战医院及修械所。1932年6月4日，军事委员会通令对陆军实行统一编制，以军为直辖单位，隶属于军政部。初编制正规军为四十八个军，每军两个师，后不断扩建，到1933年3月，已达六十余军。各军长直隶于军政部，各师长对军长负责，军长不得再兼师长。每师增设工兵、辎重、通信等特种营，以提高战斗力。在1932年1月至1935年7月西南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两广军队自成体系。

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1936年初南京政府开始第一期整编陆军10个师，称为“调整师”。到年底，共整编了20个调整师，配置了德国装备。继而又决定在以后二年每年调整20个师，连同已调整完的20个师，共60个师，“以作国防之基干”。另外，还决定同时整理60个师，称为“整理师”，补充装备，使各师单位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队，及守护地方之用”[18]。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整理共八十五个师又九个独立旅，又有已适用调整编制而尚未充实者五个师。同时，国民政府对特种兵进行了整理。1937年上半年，共编装甲兵一个团，炮兵四个旅又二十个独立团、铁道兵一个团、装甲汽车一个团、通讯兵两个团、工兵两个团。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

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一百八十二个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又六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有步兵八十个师又九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炮兵两个旅又十六个团。

（2）空军的建立和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筹组空军。1928年10月，蒋介石命令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航空队，开展飞行教育训练，培养航空人员。同年12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正式成立，由张静愚任队长，厉汝燕任副队长，李珉任飞行主任。同时，南京政府军政部设立航空署，由熊斌任署长。1929年5月，南京航空司令部成立，张静愚为司令，蒋逵为参谋长，下辖三个航空队。1932年9月中央航空军官学校在杭州笕桥正式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1934年5月，航空署从军政部划出，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为秘书长，陈庆云为主任。原来附属于陆军的空军，成为独立的军种，并从国外购进数十架各种型号的飞机。这时空军编制共有八个中队。主要用于进攻红军根据地和参与对付其他军事实力派的战争。

随着国民政府对全国抗战的着手筹划，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1935年增编了六个中队。1936年由于蒋介石用收买分化的手段使广东空军共六个中队归附南京，当年国民政府空军合计增编了十七个中队。至1936年底，增至三十一个中队，编成九个大队。其中三个航空机大队，三个驱逐机大队，两个侦察机大队，一个攻击机大队，共辖二十六个中队，还有五个直属中队和四个运输机队。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六百余架。全国有262个机场，六个飞机修理厂分设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和重庆。1936年南京政府与意大利合办南昌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又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七百余名。同年5月，全国划分为六个空军区，先后在

南昌、南京成立第三和第一空军区司令部。

（3）海军的改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海军总司令统辖海军，1928年12月设海军署隶属于行政院军政部。当年共有各种舰艇44艘，排水量为30281吨[19]。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各军事实力派割据地方，海军将领也纷纷投靠各派势力，大致形成三个系统，即蒋介石控制的福建系、张学良的东北系和陈济棠的广东系。为统一海军，1929年3月，蒋介石在上海召开海军编遣会议，4月成立海军部，以陈绍宽任部长。将海军编为四支舰队：闽系为第一、二舰队，直属海军部，实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嫡系。其中第一舰队下辖海容、海筹等12艘军舰，1934年增至15艘。第二舰队下辖楚有、楚泰等15艘军舰，1934年增至21艘[20]。东北海军为第三舰队，为原东北海防舰队和旧渤海舰队余部合编而成，归东北边防司令官公署节制。广东系为第四舰队，由广东拥有的一些舰艇组成，由陈济棠指挥。

国民政府虽成立了海军部，全国海军仍难以统一调遣。东北系仅有一支舰队，却拥有当时吨位最大最新式的海圻、海琛、肇和三艘主力舰，实力与拥有两支舰队的福建系差不多。1931年后，东北系以青岛为基地，控制了长江口以北的广大海面。福建系则以马尾、象山为基地，控制了福建沿海至长江口以南的海面。广东海军没有大型军舰，实力较弱，遂以大亚湾为基地，控制了广东周围海域。1936年6月，驻青岛的三艘主力舰因不满舰队司令沈鸿烈而脱离东北系逃往广东，但不久其中两艘又改投福建，东北系海军由此衰落。广东海军由于一些军舰年久失修，实力大减，至1935年，不再称第四舰队，改属广东江防司令部管辖。作为中央海军的福建系，经过历年建造舰艇的努力，又收编东北系两艘主力舰，还从日本定制宁海舰一艘，仿制平海舰一艘，实力有所增强。海军部成立后，曾制订了“海军建设六年计划”，但“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21]。至1937年全国

抗战前夕，中国海军的编制仍为三个舰队，包括新建旧有合计66艘舰艇，其中吨位最大者为3000吨，小者为300吨，连鱼雷快艇12艘在内，排水量总数仅为59034吨[22]。

（三）外国军事顾问

在变幻纷繁的民国舞台上，始终活跃着一批来自苏、德、美、日等国的顾问。他们或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或受本国政府的派遣。这些顾问来华后，有的运筹帷幄，指挥作战，有的折冲周旋，排解纠纷和穿梭外交。以黄埔建军为起点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存在的二十多年里，与外国军事顾问的联系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几经改变。

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初期，来华服务的主要是德国顾问。德国顾问来华适应了两国的互相需要。国民政府需要德国的建军经验、军事技术进行内战和军政建设；德国需要中国的资源进行扩军备战。蒋介石在镇压军事实力派的反抗、“围剿”工农红军、整训军队等重大活动中，均获得德国顾问的帮助。

蒋介石夺取广东国民政府军政大权以后，就有意用德国军事专家代替苏联顾问，并通过曾留学德国的中山大学教授朱家骅出面物色德国顾问。1927年10月底，德国军事专家鲍尔上校到达广州，12月22日在朱家骅陪同下到达上海，会见蒋介石。这时蒋刚从日本回国，正准备重新上台。双方经过会谈，蒋介石正式聘请鲍尔为军事总顾问，但为掩人耳目，其公开头衔为“经济事务顾问”。1928年夏，鲍尔从德国率领一个由他负责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顾问团包括十名负责军训的军官、六名军械后勤军官、四名警政专家和五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学方面的专家[23]。德国人把帮助蒋介石巩固政权视为实现“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24]的重要条件。

鲍尔建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军队训练，造就一支精锐的效忠于中央的部队，蒋十分赞同。鲍尔带领顾问团每周五晚上在南京三

元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国民党高级军官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并帮助蒋创办一批特种军事学校，如炮兵学校、坦克学校和无线电通讯学校，大多由德国顾问教授。在1929年的编遣会议上，鲍尔为蒋起草了“军队编遣方案”。他建议把中国的军队改建成类似德国陆军的“分级式体制”，即大量裁撤冗员，训练一支规模较小、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由于各军事集团间的矛盾，这一方案终成泡影。鲍尔在华工作仅半年，就染病去世。鲍尔临终推荐海尔曼·克瑞贝尔上校来华代理顾问团长，不足一年，顾问工作无大进展，以健康不适而辞职。

真正接替鲍尔遗缺的是1930年5月来华的盖尔格·佛采尔将军。他曾任德意志帝国陆军军务局局长，利用自己在军方的关系和影响，使德国国防部正式介入了顾问团的事务，此后顾问团成员的派遣和部分对华军火交易便由德国国防部负责。佛采尔在中国四年之久，他帮助蒋介石训练了后来成为中央军教导师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并亲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在他建议下，国民政府设立了通信、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炮兵等学校，建立了首都演习场和射击场。佛采尔曾多次赴南昌参加部署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提出“长驱直入”的战法，但由于在几次“围剿”中遭失败而未被重视，1934年春离职回国。

同年4月，在蒋介石的坚邀下，德国又派曾先后任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长、总司令的赛克特将军和他的副手冯·法肯豪森来华。在此之前，赛克特曾于1933年来华会见蒋介石并到华北等地考察，写成“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有关军队训练、整顿等五项建议。赛认为国民党军队的“整个军事体系、训练、行政和财务必须隶属于一位领导人物之下”[(25)]，主张集中权力于蒋介石。他还认为“军政部各部门，包括高级主管、军事部长在内，必须隶属于最高军事统师之下”，这是“获致较大成效的先决条件”[(26)]。这些建议正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此赛克特正式受聘任职，蒋介石在南京为赛克特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待遇和特权，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以法肯豪森为他的“总顾问参谋

长”。德国顾问团此时扩展为五个部，即新部队训练部、旧部队训练部、军需和军工部、人事组织部和翻译部，共有德籍顾问61名，加上中方的“顾问事务处”人员共有120人[27]。在陆军大学、参谋本部、炮兵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军需部和铁道部等各重要机构都有德国顾问。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之间的军火交易更加频繁，1934年初，一次就向德国国防部定购了22辆6吨级中型坦克、22辆2吨级轻型坦克，坦克炮弹16060发；轻机关5000挺；20响驳壳手枪10000支，配子弹500万发；德国二四年式七九步枪10000杆[28]。中德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更加密切，1934年蒋介石派遣“政府考察团”前往德国。1935年4月，赛克特因年老体弱辞职回国。他回国后仍受蒋介石委托为发展中德关系继续周旋。

根据赛克特的推荐，法肯豪森继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他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直到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国防及抗日战略的构想。他的建议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有些项目被逐渐落实。例如，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止，在法肯豪森主持下，中国军队整编30万人的计划已完成80%。同年5月17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派法肯豪森为德国军事总顾问”。

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充分信任，力争与德国扩大合作，除了双方急切的现实需要外。还另有缘由。蒋对纳粹组织及其有效地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很推崇，对德国在战败后的迅速崛起甚为钦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函已回国的前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渴望加强中德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合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同时，他向希特勒、德国国防部长及经济部长各致一函，托赛克特转交。1936年，中德两国易货贸易合同签字，正式生效时，蒋又于4月13日致信向希特勒贺寿称：

德国总理希脱拉先生勋鉴：先生寿辰在迩（四月廿日），敬以充分诚意遥致庆贺。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近时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敬希察照[29]。

1936年5月13日，希特勒复信蒋介石，内称：

赛克脱上将转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函一件，至为欣感。钧座决定与敝【鄙】国友谊合作，以实施建国事业，尤希引为幸慰者也。希于钧座勋业倾仰已久，关切亦深，尤愿竭尽绵薄，以资推进之助。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

贵代表团由顾振先生之导领，希获与之接席劳问，藉审钧座对于经济合作之感想，鄙见亦同，并深信两国互助合作所应有之先决条件已根本具备，而两国密切友谊之结合，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是以希对于此次交涉之良好结束至为庆幸者也。谨布尺楮，以表欣感，倘钧座不遗【弃】，尚希接受敝【鄙】国国防军之荣誉刀一柄，藉表希个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30]。

继而，蒋介石希望德国能派来高级官员具体商谈合作事项，经赛克特等人的多方努力，当年7月，希特勒派纳粹第七军军长莱谢劳（Reichenan）炮兵中将来华考察，并对中国“国防经济诸问题”提供咨询。莱谢劳返德时，蒋介石再次修书致希特勒，托其转递。

实际上，基于双方利益关系的中德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蒋介石对希特勒的期望是一厢情愿。希特勒发展对华关系，是从他的全球战略考虑，“决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使他对当时比较贫弱的中国表示歧视，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将中国人与黑人同列为“劣等民族”，以致遭到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的非正式抗议[31]。这不能不

给中德关系蒙上阴影。30年代由日本侵华而引发的中日矛盾，对中德关系的发展牵制很大。希特勒等德国政要人物既企图维持在中国的利益，更不惜牺牲中国来谋取与日本结盟，中国在他的战略中充其量只能是配角，“希特勒决不会因中国某些人对他的谄媚而给予回报”[32]。由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活动，引起日本当局的不安，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德国军事顾问调离中国。终于在1938年6月间，法肯豪森被德国政府“勒令率团回国”。

这一时期在国民政府军中服务的还有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军事顾问。1931年春，国民政府在美国顾问裘育德的协助下，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在该校担任飞行、机械和航空医务等方面教学的美国顾问共十三人[33]。抗战前夕，1937年6月，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以私人身份应聘担任中央航校顾问。由于当时中国一部分军用飞机购自意大利，为此国民政府也曾聘请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来华协助建立空军。1934年，在洛阳增设航空分校，学员全盘接受意式教育。意大利顾问对中国空军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四）军衔制与军事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4月13日公布《陆军军官官佐及士兵等级表》，1934年7月24日及次年1月10日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的《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基本沿用了北京政府时期的军官等级和军衔称谓，即将、校、尉三等九级，增加准尉一级，介于军士和军官之间，并规定军官军佐衔称上须冠以本军种字样，如陆军少将、空军中校、海军上尉等。士兵分为军士、兵卒两等，级数称谓不尽相同，陆空军为六级，海军为八级。各专业士兵称谓有别，如机械、通信、摄影、测候等专业兵种，称一、二、三等军士，上、一、二等兵。1935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把上将分为一、二两级，并增设特级上将，然有名额限制。整个军衔等级增至十八级。此次规定凡中将建有殊勋者升任二级上将，又建殊勋者晋为一级上将。不设大将或元帅制，以特级上将为最高军衔，授予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这

一级衔是专为蒋介石而设的。1936年，又在中将与上将之间增加上将衔一级，授予合乎上将条件，但因员额所限而未能晋升者。军用文官或佐属，分简任三阶，即同中将、少将、上校；荐任二阶，即同中校、少校；委任三阶，即同上尉、中尉、少尉。

在抗战前，国民政府军队还实行官、职区分制度，任官要求较严格，其升迁凭“资”与“绩”。每级都有最高年龄限制，超龄即须退役，后因战争频繁，退役制度并未实行。军官，包括军用文官，必须经过军队院校培养或专业训练才能被选用。但上述制度只限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他派系的军队仅为参照执行。

在统一了全国各军、兵种军衔制后，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还对内蒙、西康、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武职人员实行一种特殊的军衔制度，共分三等十级。其称谓类似清末的军官衔称，依次为都统、副都统、协统、都领、副领、协领、都卫、副卫、协卫、准卫。

国民政府创办不少军事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是南京国民政府设置最早的军事教育机构。1928年创办，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李济深、何应钦分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1929年以后，张治中接任教育长，实际负责军校教育，校务一切事宜，直至抗战开始。其办学宗旨完全服从于蒋介石的统治需求，主要为其培养陆军基层军官，并短期训练部分在职军官，以此建立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并具有现代化训练素质的国民党武装。该校每年招收18至20岁高中毕业生约千人，学制三年，毕业后以少尉补用。1932年增设高等教育班，招收上尉以上军官深造，学制一年。至抗战前夕，共办五期，每期500人。另外，1931年国民政府接收了北京政府的陆军大学，从北平迁至南京续办，并设正规班，主要招收军事机关的中尉至中校级军官，学制三年。陆大设有战术系、情报系、军制系、后勤系等，另设特别班、补习班和函授班。

在空军军官的培养方面，1931年7月，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空

学校，由美国、意大利军官担任教练。该校分为初、中、高三个班。初级班设在洛阳、广州，中级和高级班设在杭州本校。到1937年2月，毕业的飞行生约700人、机械生340人。1936年，又在南昌创办中国航空学校，到1937年，共有毕业生319人。

在海军的培训方面，有福州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等，1932年在镇江（后迁江阴）设电雷学校，实际也是培养海军舰海、轮机人员的。其中福州海军学校（前身为马尾船政学堂）在1930年规定，各省市可按定额保荐学生应考，在南京复试后，按成绩录取。

此外，1931年以后，南京政府还创设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警官、防空等学校，学制多为一年，招收中尉至少校级军官，各校每期人数约100至200人。同时，还创办了兵工、军需、军医、测绘、兽医等学校，学制一般为三年（兵工五年），各校每期招收高中毕业生数十至百余人。

1933年7月，蒋介石为“整军饬政”和准备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在庐山开办“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简称“庐山军官训练团”。由蒋兼任团长，委“剿匪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为副团长，聘请数名德国军事顾问及美、意军事教官，分期抽调赣、鄂、湘等省“剿共”部队校、尉级军官实行短期轮训。蒋介石特手编《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要旨》等作为教材。1933年内该团共办了三期，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1934年夏，蒋介石又下令召集全国各部队高级将领分三批赴庐山集训。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训练，一般由团一级制定年度计划主持进行。训练的依据和内容，是译自日本的典（步兵、炮兵、工兵操典）、范（射击教范）、令（阵中要务令及内务、礼节等条例）。1935年，步兵学校参考日、德操典，结合国民政府军队的情况，编写了一部步兵操典，由训练总监部颁行。训练分为制式（基本）和战斗（应用）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从单兵开始到班、排、连、营、

团，进行检阅和合练。

（五）征兵制的实行

近代中国军队向采募兵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1928年拟订《征兵制实行准备方案》。1929年7月，军政部制定兵役法八条原则，规定“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34]。1933年6月17日公布《兵役法》，经1935年3月2日修正并定于1936年3月1日施行[35]。《兵役法》共十二条，将兵役分为国民兵役和常备兵役两种。国民兵役是基础兵役，凡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应征入伍后为现役，为期三年，期满后为正役，为期六年，平时在乡应赴规定之演习，战时召集回营；正役期满为续役，至40岁为止，任务同于正役。该法又规定，“在地方自治未完成之区域，得就年龄合格、志愿服兵役之男子募充之”。也就是可以继续实行募兵制。这表明这部《兵役法》采取了征募并行的折衷办法，这就为带兵长官用“抓壮丁”方法扩充个人实力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与《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确定1936年为《兵役法》实行之年。当年3月，兵役主管机构军政部将全国划分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5月间，先行在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六省设立12个师管区，每一师管区下辖四个团管区。7月间开始调查、检查、抽签等征兵事宜。

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推进兵役制度昭告国民令》，要求全国人民服兵役。通令称：“凡我国民须知服兵役为人人应尽之义务。际此国步艰屯之时，宜有发愤自强之计。征兵制度为充实自卫力量根本要图，各国行之已久，急起直追，未容再缓。务期全国人民一致醒悟，共策进行。其依法应服兵役者，尤当淬励奋发，踊跃应征。”至当年12月，全国共征召五万新兵入营，这是民国史上首次依

征兵制征召的新兵。

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国民军训工作，提高国民的军事素质。1933年8月，蒋介石提出，“高中及中学大学生毕业时，应先习军事教育三个月，方给文凭”，中央应设一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者轮流军训”[36]。到抗战爆发时，全国已训练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要》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五十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一百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

三　保安队和民团的编组训练

民国成立后，由于乡村面积广大，警力不足，地方治安全靠民团、乡团等地方武装维持。但多无统一名称与编制，各行其是，妨碍政令的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重视加强对地方武装的控制。1928年5月间还在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连续致电南京政府内政部、浙江和安徽省政府，要求迅速在各县“编练民团”[37]。1929年7月，南京政府公布了《县保卫团法》，规定：“凡各县原有之乡团，及其他一切自卫组织，均应依本法之规定，改组为保卫团。”“各县保卫团之组制，每闾为一牌，以闾长为牌长；每乡或镇为一甲，以乡长或镇长为甲长；每区为一区团，以区长为区团长；县为总团，以县长为总团长。”“凡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男子，均有入保卫团受训练之义务。”[38] 但此法实施结果却使保卫团为地方豪绅所把持，鱼肉乡民，为所欲为，民怨沸腾。蒋介石也认为：“查向日各地方之民团，虽极为发达，而其腐败情形，与弊害之大，亦不堪殚述。一县之内，各区各乡，自为主宰，甚至一村一姓，均据为私有，十九皆为土劣豪猾所把持操纵，形成零碎分割之状态，编制参差，枪械窳敝，勒收捐税，敛财中饱，实际毫无力量，动辄闻警先逃。邻县邻乡之匪警，尤视为秦越，不相救助，绝对不能保护地方。

而平时则官吏被胁持，民众受其压迫，不惟无益，适成祸胎。”[39]为此，1933年1月，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公布了《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训令各省执行。从此国民政府除统率正规军外，还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统一建立省以下的地方保安机构和保安团队。

《条例》针对已往各地民团原有的弊端，详立体制，加以整顿。首先，改正名称，规定凡各县武装民团，一律改称各县保安队；凡武装不健全的民团，及无武装之壮丁，在红军未到过的县，一律称为壮丁队，凡红军到过之各县，一律称为“铲共义勇队”。其次，划一编制，各县保安团以中队为单位，每一中队总计官兵为117人，以上设保安总队、保安大队，各分甲、乙两种。甲种保安总队辖九个中队以上，乙种保安总队辖六至九个中队；甲种保安大队辖四至六个中队，乙种保安大队辖二至四个中队。省以下保安队按下列系统管辖或指挥：省保安处长——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各县县长、保安总（副）队长、保安大（副）队长——中队（副）长。《条例》还规定，“保安队各负本县清剿匪共，维持治安之责任。但遇邻县联防会剿时，应受区保安司令之指挥。遇大军驻在本区或本县作战时，应随同区保安司令共受驻军高级将领之指挥，不分畛域，尽力协助。遇有必要时，区保安司令并得将甲乙两县之保安队互调驻防”。为此，各县保安队必须进行军事与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分为术科与学科两种，内容包括战斗教练、警戒勤务及封锁纲要、陆军刑法摘要、连坐法等。政治训练内容包括三民主义问答、党国组织大要、保甲条例摘要，公民常识（国民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及其应尽的义务）、精神讲话（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衣食住行应守的规则等项）等。

《条例》又规定“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概由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编成”。一保编为一小队，一乡或镇有二保以上者合编为一联队，一区合编成一区队，一县合编成一总队。其官长队兵，“概为无给职”，但因救灾、御匪、修路不能回家膳宿时，由保甲经费酌

予必要的给养[40]。

规定“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的任务是：“一、编成巡察队，专任巡逻、放哨、侦查、搜捕及一切警戒事项；二、编成通信队，专任联络、报信、转递公文及一切通报事项；三、编成守护队，专任防御工事、电杆、桥梁及一切交通设备之守护事项；四、编成运输队，专任军实军粮之分站运输及其他一切协助事项；五、编成工程队，专任防匪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设备暨过境公路干线或本地方应备支线之修筑、缮补事项；六、编成消防队，专任水、火、风灾之警戒及救护、抢险事项。”[41]

以上各项任务，通常由省保安处派定专员指导各县组织训练班，分赴各区就地训练或调集各级队长、队副轮流训练。具体训练时间，由各省保安处规定。各乡镇和各保还要将队员、队丁名额及各种机械种类数目造具清册，由区报县，由县报省保安处。

以上队员、队丁的行动还要按照保甲户口条例的规定，实行“联保连坐切结”，彼此要“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共“负连坐切结之责”。

1934年6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苏、浙、闽、鄂、豫、皖、赣、湘八省保安会议，讨论保安团组织、军事训练及保甲组织等事项。当时，上述八省的“民团”已扩大到1700万人。会议决定训令各省切实训练保安团警，统一名称，划定管辖区，统一经费，整顿训练，并制定了《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以使保安队能“执行宪兵、警察职务以保卫地方之安宁，并普及国民教育与确立宪兵制度之基础”[42]。大纲规定，“省设全省保安司令，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呈请国民政府任命各省政府主席兼充。在省政府中特设保安处，秉承全省保安司令之命，掌理全省保安事宜”[43]。至此，保安团队的统率体制更加健全。总的原则是：“各省保安团队以达到国家管理为最终目的。其进行步骤，应首先统一于县，进而统一于区，再进而统一于

省”[44]，逐步形成保安团队由国家管理，地方使用，在省内划定若干团管区，轮训壮丁，以便由小规模的抽丁制过渡到大规模的征兵制。该大纲还提出整齐训练。这也就是要逐渐达到“寓兵于团”、“寓教于军”、“寓管于卫”的目的。

1934年7月29日，蒋介石制订《改善保安团队大纲》，函送国民党中政会、行政院备案。大纲计七章三十一条，要旨为统一名称，训练划一，统一经费等，令苏、浙、闽、豫、鄂、皖、湘、赣、陕、甘等省切实遵行。至1935年多数省的保安团队整编完毕或正在进行。据上述各省呈报，当时已改编的保安团队情况如下：

江苏省：已有保安团四团，共十二个大队，五十八个中队。各县保安大队，计十四个，共一百六十一个中队，另有实业大队四个，共十三个中队。

福建省：有省属保安团八个，共辖二十个大队，七十六个中队；又四个独立大队，共十七个中队。区属二个保安团，共辖七个大队，十九个中队；又四个独立大队，共辖十二中队。县属四十三个大队，共辖八十二中队；又十三个独立中队，另收编民军二团，辖十六个大队，又十三个独立大队，十三个独立中队。

河南省：有省属保安团四团，附无线电台，又保安团十一团，还有骑兵、炮兵、特务、通讯、汽车，共五个中队。

浙江省：有省属保安团四团，共辖十二个大队，四十八个中队；又一个迫击炮中队，一个通讯排，三个无线电台。区司令部九个，军医院一个。县属保安大队十五个，辖六十个中队，又有县属训练队若干。

湖北省：有省辖保安团四团，区保安大队四十二个，共辖一百七十个中队，又有一个机关炮分队。

江西省：有省保安团二十团，共计六十一个大队，二百四十九个大队，每中队枪兵九十名。

安徽省：有省辖团二团，一个独立大队，共步兵二十七中队，特种兵五中队；新编十个团，共步兵一百二十个中队，特种兵十个中队。

陕西省：各县保安队编制人数，计有官长1262人，队兵18104名。

湖南省：共分八个保安区，共有保安团十七团，及一个独立营，二个独立连。

甘肃省，设治局等十三个，保安队有五个大队，辖十中队，十二个分队[45]。

第二节　保甲制度与特务组织的建立

一　保甲制度的内容和实施

（一）保甲制度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保甲制度是县以下的一种地方统治制度，既是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又是历代统治者为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一种办法。它的历史久远，萌芽期可追溯至西周，到宋代已较为完备，历代相沿，至明、清又有较大的发展。清王朝被推翻后，保甲制度曾经松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提出要在其统治区内编组保甲民团的旨意，得到了部分省地方长官的响应。至30年代在全国推行了“保甲运动”，成为国民政府辖区内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管理制度。

1928年5月23日，当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以总司令名

义从徐州给内政部长薛笃弼发出急电，指出应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速即筹备清查户口，清丈土地，编练民团，订立保甲，修筑马路”等，认为“今日各地警察腐败已极，欲求整顿，非经长时间之教练不可，故为今之计，莫若兴保甲，办团练，此法虽古，可行于今，且甚易兴办而能确实也”[46]。同时蒋介石也分别电促浙江代理省主席蒋伯诚、安徽代理省主席孙桨，“须编练民团与订立保甲，亦为当今急务，尤须限期成立”。随后，两省分别复电表示积极进行。浙江省政府复电称：“关于编练民团及订立保甲法一案，亦已积极筹备，本省街村制及施行秩序皆经议决公布，现正通令限期将街村闾邻长副一律选出，令使责成编练保卫团及实施保甲连坐办法。并已拟具街村保卫团条例及闾邻连坐法草案，提出委员会讨论，一俟议决，即行颁布施行。”[47] 此后，因各地派系斗争，内战不断等原因，地方机构未能及时整顿。保甲制度也在一些地方施行，但因中央当局并未颁布统一的保甲法规，各地杂乱不一。20年代末，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各省已经开始有保甲组织，而名称并不统一。如江苏以五至十家为一“甲”，三十至五十家为一“保”。又如广西有“村甲制”，云南有“团甲制”，而广东则以二十五家为一“牌”，以数牌为一“甲”。全国多数地区有“闾邻制”，即以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闾。

1928年10月，国民党二届中常会第一七九次会议通过《下层工作纲领案》，将保甲运动列为全国七项运动之一。南京政府也称要遵照孙中山的遗训，拟定“地方自治”法规，作为“训政”时期的重要任务。自1929年6月起，陆续颁布条例，在全国推行县——区［或乡（镇）］——闾——邻的层级制度。如在1930年颁布的市组织法里规定：市区划分为区、坊、闾、邻四级组织，以“五户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二十闾为坊，设坊长；十坊为区，设区长”。县组织法规定，县以下分为区、乡、镇，乡镇之下设闾、邻。但这些规定均没有得到顺利推行，而很快被保甲制度所取代。

1931年夏，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时，为了配

合军事进攻，“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了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修水县等四十三县试行“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工作，废止旧有的乡（镇）闾邻组织，继而将保甲推广到江西全省。1932年6月，蒋介石调动大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时，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8月在豫、鄂、皖三省接近苏区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在河南、湖北、安徽等省正式施行。当时，蒋介石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中，列举了“地方自治”的七大弊端，极力鼓吹推行保甲的必要性。他称未经训练的农民仍守旧习，缺乏自治能力。自治人员的选举也为人们所忽视，导致各乡镇闾邻组织始终没有健全。农村百业凋零，无实力同时举办自治与自卫，而土劣却借团防之名培植武装，大肆搜括。自治法规繁琐，无法执行。此外，中国农村家族制度本来极为发达，如要安定地方，只有以家族中心的家长制“以为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执简而驭繁”。因此，挽救之道在于办保甲，“先谋自卫之完成，再作自治之推进”[48]。

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四三二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据此，行政院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便由“剿匪区”推向全国，从此进入所谓“保甲的复兴”[49]阶段。

（二）保甲条例的主要内容

国民政府宣称编组保甲的目的在于“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其主要内容是：

（1）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剿匪区内各省县长应根据实际情形划分全县为若干区，依照本条例之规定，限期编组保甲，清查户口”[50]。各县地方原有层级太多，名目不一的自卫组织一律编为保甲。编组标准的基本形式

是十进位制，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保，设保长一人，十保以上为乡镇。即使是寺观庙庵之僧尼，水上漂泊之船民，或公署兵营之公务人员及其他公共处所的住户，均属在编之列。在具体实施时，采用了有弹性的做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继而，各县由县长派员充任保甲户口编查委员分赴各区会同保甲长挨户清查人口，各户成员逐一登记，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家中有无枪支，连失踪或迁居异地死亡者也要登记在册。以上事项经过复查审核后，由当局编造清册，并按编定各户挨次发给门牌，令各户张挂户外易见处，以备军警及保甲长随时检查。

（2）订立规约，推行联保连坐。保甲编定后，由保长负责召集甲长开会议，强行订立《保甲规约》，强迫民众承担各种义务，如勒令住民协同盘查境内出入人员，遇有形迹可疑分子必须报告，甚至帮助捉拿、取缔；对于“匪患”进行警戒、通报及搜查；修筑碉堡、公路和交通设备；关于经费筹集、征收、保管、支用及办理报销；对保甲职员及“住民怠于职务”者的处罚等事项。同时强制实行“联保连坐法”。联保就是各户之间实行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违法之事；连坐就是一家有罪，结内他户举发，若不举发，结内各家连带坐罪，规约规定各户户长除一律加盟保甲规约外，“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五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须负连坐之责。”[51]“此项切结，由甲长面交各户长，依次签名，不能亲书姓名者，得请人代书，但须在姓名之下捺印，并由甲长签押。有为匪、通匪、纵匪，证据确凿之户，则执行搜索、逮捕之紧急处置。否则邻居各户，不得借口拒绝与联保，保内除公共处所外，凡各寺庙，亦应互具联保连坐切结……新迁入户，应与同甲各户联保。”[52] 内政部也发布连坐暂行办法，规定出具连坐切结时，由

户长签名盖章或画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

（3）抽选壮丁，编练民团。保甲内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队，平时受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编成武装民团，分区分期实行集合训练。在一些有红军活动的地区，则组织“铲共义勇队”，各甲的壮丁编为班，甲长兼充班长；各保设分队部，保长兼任分队长。其任务是救灾御匪，搜捕“匪共”，建筑碉楼堡寨、公路，递送情报、通信，守护、巡查地方、清查户口等。

（4）强迫劳役，摊派费用。保甲条例规定，壮丁队及住民要在保长、甲长督率下，办理救灾、御匪或建筑碉楼、堡寨、公路等事务。保甲经费得向保甲内之住民征集。保甲经费则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保长办公处书记之生活费，保甲长因公赴县之旅费，壮丁出队时之伙食费，保长办公处其他必要杂费等都要由保甲经费开支[53]。这就既加重了住民的负担，又为保甲长进行敲榨勒索提供借口。

（5）保甲长的选任与职权。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壮丁队或“铲共义勇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甲制对保甲长人选极为严格，有的省份明文规定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保甲长：一、年未满二十者；二、寄居当地未满二年者；三、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受徒刑之宣告者；四、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五、曾为赤匪胁从虽准悔过自新尚无忠实事实表现者；六、吸食鸦片及麻醉毒品者；七、无正当职业且无恒产者；八、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54] 这些规定保证了保甲长必须代表地主、富豪的利益。力图通过保甲强化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并牢固地控制民众。保甲长的人选，形式上是保甲内互相推举，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操纵和庇护下，当选保甲长的人大多是那些地方豪绅、地主富农或与当权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保甲条例还规定“县长查明保甲长不能

胜任，或认为有更换之必要时，得令原公推人另行改推”。按条例规定，保长的职责是承区长的指挥监督，负维持保内安宁秩序之责，具体规定是：监督甲长执行职务；辅助区长执行职务；教诫保内住民毋为非法；辅助军警搜捕匪徒；对“悔过自新者”之察看管束；检举或处罚违犯保甲规约者；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之设备或建筑；执行保甲规约上之赏恤事项；经费收支与预决算之编制；壮丁队之督率训练，武器保管等。甲长的职责是承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甲内安宁秩序之责，具体为：辅助保长执行任务；清查甲内之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切结；检查甲内奸宄及稽查出入境人民；辅助军警及保长搜捕匪犯；教诫甲内住民毋为非法；抽选壮丁，训练服务等。实际上，在保甲长中有些人私设公堂，鱼肉人民，盘剥勒索，无恶不作。

（6）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保甲法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针对“围剿”红军而订立的，在具体条文中还立专条加以强调，如第二十七条规定，“壮丁队遇军警搜捕匪共时，应受军警长官之指挥，尽力协助，于搜捕、追剿已达本区域以外时，亦应受军警官长之指挥，互相应援”[55]。第三十八条又规定，凡是侦察到红军动向，破获了红军重要机关，擒获了红军重要人物，搜获了红军埋藏的枪支粮食等，因而立功或伤亡者，均可受到奖赏或抚恤，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或坚决反共分子充当炮灰。

（三）保甲制度的施行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1932年8月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时，并制订各路完成保甲限期进度表，说明进行步骤及其办法，要求三省各路在当年9月、10月、11月等月开始编查。由于准备工作不足，各省工作有所推迟，例如河南定当年12月1日为保甲编查开始期，在大约三个月内分三期展开编查工作。

第一期主要办理事项是：县政府将“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研究讨论后，用白话向民众公布，说明推行的理由、意义及施行程度；划分县

属为若干区，指定区公所地点，宣布旧制区乡镇闾邻组织一律停办；筹措办理编查经费，并制订各区需要开办费的标准，由地方款项下先行筹垫支付；选派地方绅士为保甲户口编查委员，分赴各区协同区长赶办保甲；决定先行挨户编号日期。县长赴各区视察，并将上述各项实办情况按旬上报。

第二期主要办理事项是：区长会同编查委员先行挨户编号，暂不查户口，而令各户推定户长；区长与编查委员分批召集户长，讲明编查的意义和方法并令各户推定甲长；区长委定甲长，编甲、户号数上报县政府；设甲长办公处，区长与编查委员召集甲长，讲明甲长的责任和编查保甲的意义及方法；推举保长，并由区长和编查委员召集他们讲明保长的责任；区长编定保号，呈请县长委任保长，继而互推联保主任和组设保与联保办公处；保长编定保甲经费收支预算，汇呈区长核呈县长决定；县政府根据保甲条例规定的样式，印制编查保甲的各项表册、门牌、联保连坐切结等。

第三期主要办理的事项是：县长召集区长和编查委员会议，决定实行编查户口的日期与程序；区长召集保长，保长召集甲长，依次开会，分发表册门牌切结并告之填写方法，由县长指挥监督各区长，区长会同编查委员指挥监督各保长，保长指挥监督各甲长户长，编挂门牌以及详细填写户口调查表，然后逐级汇总复查上报；制定各项保甲规约，由保、甲、户长签名，各甲长将切结分交各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并汇呈保长、区长；县长赴各区巡视督饬各区保甲长等实行各项保甲任务等。

至1933年，豫、鄂、皖三省分别上报基本完成编查保甲，清查户口的工作。其中河南省的经扶、固始两县，湖北的通城、阳新、黄安、宣恩、鹤峰五县，安徽的嘉山、立煌两县延至1934年才先后宣告编查完毕。江西省编查保甲虽在豫、鄂、皖三省之先，因战争频繁剧烈，至红军长征后才完成编查工作。福建省各县于1934年8月开始编查，至次年结束。陕西、甘肃、江苏、浙江、湖南在1936年进行编查

[56]。到1936年底为止，全国有湖北、湖南、安徽、陕西、福建、浙江、江苏、甘肃、宁夏、江西、河南、绥远、四川十三个省及北平、南京两市先后推行了保甲制度[57]。

从3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陆续在全国范围落实编查，绝大部分省份皆以《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为蓝本，结合实际贯彻实行。也有个别省份在具体名称和实施上并不完全相同。如1935年1月颁布的《绥远省政府试办保甲暂行规定》中规定，“编查保甲仍沿用原有之组织，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户以上为邻，邻以上为闾，闾以上为乡镇，乡镇以上为县区”。“乡镇长同于保长阶级，闾、邻长同于甲长阶级”[58]。各省份编办保甲时间的先后也不尽一致，约于1934年至1935年间达到高潮。江苏省主席陈果夫亲自审定的《关于江苏省办理保甲案》在1936年初发布时指出：“本府为安定社会充实民众自卫力量起见，令饬南通、盐城、淮阴、东海、铜山五行政督察区所属各于本年四月一日起先行试办，其他各县于本年十一月起一律举办。”[59]

蒋介石通过推行保甲制度，加紧对城乡人民的控制、束缚和掠夺，加强了地方民团的武装力量，配合了“剿共”战争，同时编查了户口对开展经济建设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发挥一定的作用。1937年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值兹非常时期，民众应有严密组织，以资运用，地方应有自己力量，以助国防，均有赖于保甲制度之健全。”[60] 这时，鉴于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人士强烈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呼声，这次会议也通过了实际上结束内战的决议案。在形势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将1932年颁布的《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作了某些修改，以《修正保甲条例》的名称向全国公布。修正后的保甲条例比以前的条例有了一些小的变化。从立法程度和施行范围看，原条例颁布机关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仅在所谓“剿匪”省份推行，《修正保甲条例》则经立法院通过，由行政院令全国实行；从举办保甲的目的看，原条例以“剿匪”为中

心，而修正条例则标榜“本条例依县自治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制定之”[61]；修正的条例删去了原条例中“赤匪”、“匪共”、“御匪”等词语，多少有利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谈判和准备对日抗战动员。

二 “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形成及其活动

蒋介石为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消除异己势力的反抗，加强内部控制，维护和巩固独裁统治，吸取和运用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德、意等国法西斯统治的经验和措施，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并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务组织主要有以CC系“党方”组成的“中统”和黄埔系“军方”组成的“军统”。

（一）“中统”特务组织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中统特务组织是由CC系特务组织发展演变而成的。CC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而坚决拥戴蒋介石的一个派系。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陈果夫和陈立夫为扩大蒋介石的势力，以地域为纽带，网罗陈肇英等一批反共分子，组成旨在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浙江革命同志会”；同年底又拉拢以段锡朋为头目的江西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简称“AB团”）混合在一起，从事拥蒋反共活动。接着，蒋介石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位，和该部代理部长陈果夫合谋，在上述组织中挑选了一批亲信，准备充当各省、市党部负责人，以夺取各级领导权。1927年春，一部分未能到职的省、市党部委员集中于上海待机。8月，蒋介石下野，在暗中安置黄埔军校出身军事干部的同时，便把这部分待分配的人员交陈果夫负责，以备东山再起。1927年9月10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式在南京成立，实权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把持，宁、汉、沪三方虽然形式上获得统一，但内部仍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此时，陈果夫等立即在上海召集同伙商量对策，决定号令各地的国民党党政人员一致行动，结成组织，反对南京特委会，拥蒋上台。二陈经过紧张的筹备，于1927年11月初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

Central Club，简称CC，恰好与二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相同）。CC组织最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后以字行，名郑亦同）、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62)] 以后，各省党部的骨干陆续加入该组织，发展到一百多人。蒋介石复职后，CC成员分赴各地任职，丁惟汾赴北京，戴季陶赴南京，CC由陈果夫单独领导。这时，中央俱乐部名义上取消，实际上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却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控制下，更加紧密地抱成一团。1927年1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由陈果夫代理[(63)]。1929年，陈果夫、陈立夫当上中央委员，陈立夫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大权在握。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排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或组织外，更重要的是积极开展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的活动，他们主持中央及地方的清党委员会，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全国造成白色恐怖。CC通过党务整理，从中央渗透到地方，控制了各级党部和组织部。从此，CC便逐渐形成为国民党内一大派系，在政治上为其他派系所望尘莫及。

CC集团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基础，逐步扩大，形成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蒋介石挂着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具体事务都由陈果夫办理。陈为加强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便对组织部进行整理和改组。在部内设立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为最重要。他大肆排除异己，安插CC派人员，将其弟陈立夫调来充任调查科主任。这次新设立的组织部调查科又称党务调查科，是奉蒋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设立的。这时蒋已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为要建立独裁专制统治，需要建立特务组织，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转到党务调查科下，该科

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所以蒋强调这项工作“成败利钝，关系党国存亡”。

陈立夫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初步确定调查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为有效实施这项计划，还要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组织，广泛建立特务网。经二陈提出并报蒋介石批准，1929年先从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十人充实调查科。1930年，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二十人参加调查科工作，并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设立秘密办公处。调查科的机构也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务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如上海、武汉等派遣了特派员。从此，特务组成为调查科的核心组织，标志着调查科完成了特务化过程。

陈立夫充当国民党调查科首届主任时间不长，便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但他对调查科却牢牢控制不放。先后继任的是CC派的核心骨干人物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因二陈感到不够满意，便如走马灯似的撤换了，到1930年派其表弟徐恩曾出任调查科的第五届主任，将权力交徐掌管。二陈由于建立特务组织效力，深得蒋介石的欢心。1931年12月，蒋提拔陈立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跃升为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则于1934年被蒋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至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长期仍控制在CC集团手中。1935年底，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调查科扩大为调查处，在各省市党部内设立调查部。还在地方党政机关指定专人为“肃反委员”，指挥特务活动，形成了一个以调查处为中心遍布全国的CC特务系统网。

“九一八”事变后，CC集团积极贯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

针。蒋为对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要求调查科紧密配合，还特批军需署发给特务费10万元，以供其扩大组织的需要。二陈决定，以原来从中央军校挑选来的特工人员为基础，再次扩大人员编制，1932年设立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由徐恩曾为主任。这是CC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始终以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存在，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的名义，而用化名和代号。秘密办公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一百三十二号瞻园内。

特工总部在二陈直接控制下，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特务机构，主要部门有：一、书记室，为总部的核心部门，主要为插手各地方的组织人事安排；侦查、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组织，指引逮捕、关押以至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捕人员进行“审理说服”即劝降诱叛工作。书记室下设四个组，室主任和各组长均由二陈安排CC派骨干担任，由濮孟九任书记，王思诚任副书记[64]。二、总督察，为监督考核特工人员而设，如发觉其成员有“不忠”言行，可随时进行各种处罚，轻则被训斥，关禁闭，重则被关押，直至处死。二陈赋予这一部门掌握有对特务的生杀大权，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先后担任督察的是刘不同、王杰夫等人[65]。三、设计委员会，为特工总部中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参与设计，向总部或直至二陈提出意见或建议。由张冲为主任[66]。四、情报科，为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将所得的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二陈等过目，遇有特别重要的，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报蒋介石。情报科长由刘桂担任。在北平、天津、上海分设情报站，各情报站配有专用电台，与南京情报总台直接联系[67]。五、训练科，对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进行训练，强化思想，提高技能。编辑《动力》、《群力》等内部刊物和其他书刊。陈立夫对培养训练特务提出要求说：“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自己的兵。我们要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一百个猪八戒。”[68] 训练科长由王云亭担任。六、总务科，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科长先是周伯良，后由章祖模继任。

七、电讯总台，负责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电讯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用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用的电码，总台长由范本中担任。此外，特工总部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称为“特务室”。省特务室设主任、秘书各一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科[69]。

CC集团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意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1932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纠集一批亲信，秘密成立“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作为整个CC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为常务干事。他们招纳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要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履行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要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刘不同回忆说：“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70]陈立夫还要召集新成员训话：“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71]

二陈通过“青白团”和“同志会”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CC系统，并成立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进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吴醒亚到上海，张厉生到华北，程天

放到江西，苗培成到安徽，叶秀峰到四川，余井塘到江苏，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按CC集团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

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1933年，CC集团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的亲信，挑选国民党员中忠实拥护蒋介石的分子，另行编成特种组织。这些“忠实分子”编组时经过填表宣誓等手续后，须逐级上报。“忠实同志”的活动，一方面是秘密联络拥蒋和CC集团的分子，介绍其入会。被介绍入会的人，须经过调查审核和个别谈话，认为合格后，才能履行填表宣誓等手续，被批准入会后又负有发展组织的责任。另一方面，入会的成员须从事反共和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还负有监视一般党员，对上有反映情况或告密的义务，必须接受CC和省市负责人交给的任务。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CC主要成员，于1934年建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仿效德国法西斯党的蓝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由吴醒亚任干社社长，潘公展为副社长，丁默邨为干事长，二陈特派其嫡堂弟陈宝华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出版了《社会主义月刊》，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

北平、天津的诚社。二陈派遣张厉生到华北，在平津之间秘密联络串联CC集团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冬天建立“诚社”，参加者达一百多人。其纲领标榜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等，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72]。由张厉生任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总书记，李白虹任总干事。CC集团拨给专项经费。诚社出版了《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山西有苗培成组织的“平民中学派”，湖北有钱云阶等组织的“十人团”，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进行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等项活动。

CC系是蒋介石反共和巩固其统治的得力工具，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在抗日战争前主要有：

（1）执行“清党”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党部组织了“清党委员会”，旨在彻底反共，肃清进步力量。蒋介石亲自部署“清党”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73] CC系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据后来中统局向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报告，从1928年至1930年，“共捕获中共高干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虽然这个报告隐瞒了非法杀人的数字，非法捕人数字也大大缩小了，但仍然可见其反动统治之一斑。

（2）借“肃反”迫害异己。在各省市“清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籍。CC分子把一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疑虑者视为异端，多方刁难，不准恢复党籍，甚至横加迫害。据浙江14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28年初有国民党员2.29万人，参加登记者1.7万人，被审查确定准予重新获得党籍者仅为1.2万人[74]。同时，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各省市党部指定CC系的亲信为“肃反委员”，使其以公开身份对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进行监视。对有反蒋举动或对蒋介石、国民党不满者，常以“反革命”的罪名予以整肃。

（3）设置“反省院”非法审讯。1929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了《反省院组织条例》。接着一些省市设立“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二陈的亲信兼任院长。“反省院”的组织，名义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CC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和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75]。“反省院”的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CC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4）控制政府部门和机关团体。30年代以后，CC组织扩展到国民政府各部门。1934年，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又进而控制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CC集团还派骨干分子到各省担任行政督察专员或实验县长，将其触角伸向全国的四面八方。CC分子也常打入机关团体，对工作人员特别是进步人士加以监视、调查甚至迫害。当时国民党党章中列有“党团运用”一项，规定“凡有党员所在的机关团体或学校，于基层组织之外，指定个别党员，专负对党外人士进行监视、调查，并随时向党组织密告的责任；必要时还要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在所在单位进行种种阴谋活动”[76]。CC成员，特别是中统特务分子常借用“党团运用”为名，实行报复陷害，使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常充满了白色恐怖。

（5）通过邮查，钳制通讯和言论。CC集团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和警察机构，在各重要城市的邮电局设立邮电所，以中统派在各省市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为主体，对各地报刊和信件进行非法拆封检查。如发现有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的言行，立即严密追查，残酷迫害当事人员，以此钳制人们的通讯和言论自由，等等。

1935年5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把党务调查处（调查科扩大而成）与复兴社（力行社）特务处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总的特务机关的编制，将原复兴社与CC派两

大特务组织集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副局长由当时首都警察厅长陈焯兼任[77]。军统局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为党务处，即CC系特务，处长徐恩曾。第二处为军警处，由复兴社（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任处长。第三处为邮电检查处，处长丁默邨。但这个局的特务来自“党方”和“军方”两支不同系统，矛盾迭起，纠纷不止。1938年8月，蒋介石将调查统计局改组，以“党方”第一处为基础扩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军方”第二处为基础扩建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二）“军统”特务组织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军统的前身是力行社的特务处。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黄埔系的骨干分子建立了一个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秘密政治组织，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亲任社长。紧接着力行社成立了其二级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三级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为掩护力行社核心组织的机密，力行社成员一般以复兴社名义相称，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包揽了复兴社上层核心机构的组织领导，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这一系统特务活动的起源，实际上还可追溯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首次执政的年代。

1927年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各派纷争中暂处不利地位，即将首次下野之时，为了东山再起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其中一项是指使他的侍从副官胡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纠集了一批黄埔军校学生在上海充当坐探，为蒋收集政治军事等情报。戴笠（黄埔军校六期肄业生）也参加了这项情报工作。蒋介石担心他的黄埔嫡系因自己的下野而土崩瓦解，在9月20日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号召他们深刻反省，吸取失败的教训，认清失败的“第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他要求黄埔师生经受住“挫折和失败”，“屏绝

一切骄傲、奢侈、放纵、浪漫的恶习”，“忍辱知耻”，“重新创造革命的基础”[78]。蒋介石有计划地选派黄埔毕业生中一批亲信骨干到日本和德国等留学，至1931年夏，人数已达六十余名。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后，戴笠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少尉副官等身份接替胡靖安从事情报活动，胡受蒋派赴德国留学。戴笠等人在上海、南京一带广泛搜罗流氓、帮会分子和一些革命叛徒，为蒋介石收集情报。1931年底，戴出任陆海军总司令部密查组组长，开始正式主持特务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受到舆论的压力，被迫再次下野。就在这多事之秋，国民党内有一群拥蒋的少壮军人，试图筹组一个政治组织，以“拯救党国”。他们是滕杰、贺衷寒、康泽和邓文仪等为首的黄埔军校一至六期毕业的一批青年军官和留学生，戴笠、桂永清、曾扩情、郑介民等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他们经过磋商，由滕杰拟定了一个计划，主张在极端秘密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按集权原则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组织，有效地解决国内外提出的紧迫问题，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此事向下野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报告后，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接受力行社的组织计划，以应付国内外的危机”[79]。1932年1月下旬蒋返回南京后迅速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等人，认为他们的计划很适当，表示愿意亲自领导这个组织。继而蒋还多次召见滕杰等人，在讲话中强调必须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说：“日本已有五十年的侵华准备，装备精良，我华北平原，绵长海岸线和长江水道，都极适于他陆海空军之活动。现代化武器杀伤力极强，机械装备行动迅速。我们虽地大、物博、人众，一点准备没有，有什么用？……故只有忍辱负重。”[80]

3月1日，力行社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在南京励志社召开成立大会。蒋在会上宣布力行社干事会成员名单，并作为入会者的监誓人，誓词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

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81] 宣誓完毕后，蒋介石向这批宣誓人说：“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我将尽心竭力来领导你们。大家从此要更加精诚团结，努力奋斗，不达目的，决不中止。我现在预祝大家成功。”[82]

力行社设干事会为领导机构。首任常务干事兼书记为滕杰，第二任为贺衷寒，第三至第五任分别是酆悌、刘健群和康泽，后两人改称书记长。首届常务干事有滕杰、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康泽。干事以胡宗南、邓文仪、萧赞育、曾扩情等十二人组成。候补干事以干国勋、戴笠等十一人组成。干事会下设四个处：总务处处长李一民，助理何日纲；组织处长萧赞育，助理胡轨、李新俊；宣传处长康泽，助理梁干乔；特务处长桂永清、不久改为戴笠，助理郑介民。稍后，增设检查处和军事处。力行社在一些省设有分社，东北则派特派员。还在中央军校，军政部门等设有分社、支社和小组等，涉足党政军各要害部门，而以军事部门为主要发展方向。

力行社实行领袖独裁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蒋介石最后裁决，具有高度秘密性质；组织结构分多层次，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武装与非武装组织之间，既严格区分，又相互制约。它追逐当时正在意、德等国泛起的法西斯主义狂潮，鼓吹法西斯的“救国”独裁论，宣扬“只有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83]，才是拯救中国的出路，宣称“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84]。为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统治鸣锣开道。此外，还宣传暴力与恐怖，主张以野蛮、残暴的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势力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作为法西斯组织的核心部分，力行社本身在组织吸收中控制很严，须经蒋介石批准才能加入。它的第二层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主要吸收军队中的高级军官；“革命青年同志会”，吸收党政机关里的中层以上官员，也吸收一些知识分子。潘佑强曾任革命军人同志会常

务干事兼书记，杜心如任组织处长，娄饴铠为训练处长，易德明任总务处长兼助理书记。后来蒋介石担心损害国民党军队的团结，下令将该会撤销。革命青年同志会由葛武启任常务干事兼书记，干国勋任组织处长，康泽等任宣传处长，刘城之任总务处长兼助理书记，桂永清、酆悌等任干事或候补干事。复兴社是力行社第三层的外围组织，名义上是一个推动民族复兴的组织，吸收一般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吸收帮会分子等。其事务由革命青年同志会办理，在全盛时期社员众多。力行社常用复兴社的名义进行特务和其他活动。此外，力行社外围组织还有“亚洲文化协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忠义救国会”等。

力行社一经成立，蒋介石就指定德国顾问为总社干部讲授情报工作，并决定成立特务处。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在南京正式成立，后来军统局决定以4月1日为其创建纪念日。有的学者也认为，军统特工事业，“探本溯源，力行社实开其先河”[85]。特务处初设一室二科，唐纵任书记室书记。第一科负责侦查，以郑介民为科长。第二科负责执行，由邱开基任科长。稍后，增设第三科，掌管通讯，以梁干乔为科长。特务处的主要任务，一为情报工作，搜集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教等的动态和静态情报；二为策反工作，策反对立方面的人物、瓦解对方组织、进行潜伏伺机破坏；三是行动，包括绑架、暗杀、逮捕和警卫，监视和破坏革命活动。特务处逐渐成为力行社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它自成系统，对蒋介石交办的事项直接向蒋负责，力行社干事会不得过问；对干事会交办的事项，才向干事会负责。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这使戴笠得以政府正式机构的招牌和身份来掩护秘密的力行社特务组织，并能名正言顺地取得编制和经费，而力行社特务处的活动并不直接受当时军委会军统局的节制。

1933年，蒋介石为配合“围剿”苏区红军的需要，在南昌行营秘书处设立调查课，是专设的特务处情报机构之一，由蒋的侍从秘书、力

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课长。此前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和禁烟密查组均受其指挥。1934年7月，邓文仪因对南昌机场失火案调查不力等原因失宠于蒋而被褫职，戴笠奉派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这使他所统辖的特务实力大增。1935年5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为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为军警处，由戴笠任处长；第三处为邮电检查处，由丁默邨任处长。力行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课都并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在合并之前，力行社特务处已有六百七十余人，这时人员猛增至一千七百余人，还增加了一些特务的骨干分子，成为军统特务组织的中坚力量。

力行社特务处在各省市设有特务的区和站，各区、站长由特务处直接派任，挂名复兴社省市支社干事会的干事。大体上在重要地区设立“区”，各省设“站”，以下设“组”，其系统是区辖站，站辖组。另外，在南京建立了国际组、铁道通讯组、财政密查组等。还在军警宪各部门建立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由戴笠先后派梁干乔、张炎元担任处长。在宪兵团、营设立政治训练员，其成员皆由特务处推荐，经政训处考试后任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股长由该地的特务站（组）长兼任。在军警系统设置的特务机构和派遣人员，其编制和经费由各该部门负责，人员配备和活动则由特务处安排和指挥。戴笠曾说明其意图：“我们之所以要掌握许多公开机关，就是要以公开机关来掩护秘密工作的前进。”“我们的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以严密的组织，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进行。因为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而从事特殊的任务，才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与防范，甚至于加以危害，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86)

特务处以秘密组织来领导公开机关，按规定只有纵的领导，没有横的关系。不属于自己本身范围的工作，不准过问。在开初阶段宣布，特务处的内外勤或派驻在公开机关的特务是终身职业，不准退出

（后来突破此项规定），泄密就是违反组织纪律，轻则禁闭关押，重则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戴笠为控制掌管特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建立了督察制度，在特务处增设督察室。特务处的特务，不仅监视查察党政军公务人员和社会人士，也监视特务处的内外勤特务。监视查察特务处的特务，由特务处督察室负责，派出秘密督察和公开督察监视查察每个特务的言行。特务和特务之间也互相监视。特务处设有监狱和拘留所、禁闭室。除了囚禁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外，也囚禁被特务头目认为违犯法纪的特务。如同戴笠对特务处及其所属人员实行黑社会势力式统治一样，惩治违犯内部法纪的特务分子也全由戴笠等头目说了算。凡投入秘密监狱的人，既不经正式审判，也不宣布明确刑期。但这些貌似森严的纪律并不能真正控制住整个特务组织，其内部的明争暗斗长期存在，并不能成为铁板一块。

军统特务组织的主要活动有：

（1）反对和镇压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力量。军统特务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作为首要敌人，是他们破坏和消灭的主要对象。军统特务组织为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围剿”，以消灭工农红军、摧毁工农政权而竭尽全力。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中设立调查课，令康泽组织别动队，其任务是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和湘、赣、豫、鄂、皖等苏区发达的省份，进行反共军事间谍活动，搜捕共产党，镇压人民革命斗争，侦察监视“剿共”部队官兵。力行社特务处为“剿匪”而举办了多期训练班，培训特工人员。1933年春为配合碉堡政策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康泽任“星子特别训练班”主任，首期招收军校各期毕业生六百余人，授以匪情、情报、化装术、突击战、通讯联络、夜袭等特别训练，修业四个月，结业后以中队、分队、小队、小组等编制，组成“剿匪别动总队”，康泽出任总队长。他们携带手枪、炸弹、特制的轻便通讯工具，化装游动于山区村落间，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有关人员，加速缩小包围圈，并推行保甲制度，组织“铲共义勇队”，收容训练逃亡地主组成还乡团。他们还派遣特务潜

入农村苏区，进行刺探情报、破坏和暗杀活动。在国统区力行社通过特务行动网四处活动，严密侦察、监视中共的活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收买叛徒，派遣特务打入革命组织内部进行活动等。1932年力行社特务处一成立，即着手对国际革命组织之一“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保罗·卢格及妻子以所谓“危害民国罪”进行审讯。1933年6月，为对付宋庆龄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戴笠亲自指挥上海的军统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11月，戴笠又指挥华东区行动组，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著名报界名人、爱国人士史量才。同时，力行社和宪兵第三团在平津等地残酷镇压民众运动，组织屠杀囚禁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例如1934年11月谋杀了察哈尔抗战的前敌总指挥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在上海、武汉、厦门等地，特务处曾破坏中共组织多处，并广泛搜罗中共的叛徒，用以破坏革命。例如，顾顺章[87]叛变后，由陈立夫、徐恩曾的CC特务机构移交力行社特务处，成为戴笠手中的反共工具。

（2）为蒋介石剪除异己，镇压反对派。蒋介石实行的“安内”政策也包括镇压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力行社特务组织也成为蒋镇压反对派的得力工具。1933年6月，力行社特务组织以“华”机关为代号所开列的暗杀名单，就包括大批国民党反对派人士。在镇压和瓦解反对派发动事变方面，军统特务组织发挥了特殊作用。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建事变是以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为了反蒋抗日而发动的。事变发生之前，戴笠就通过打入十九路军中的特务分子获得情报，立即派闽籍特工多人前往监视福建局势。当十九路军与苏区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后，南昌行营调查课特工从其往来密电中破译，侦知福建当局与红军有了联系。戴笠即派遣特务处执行科长邱开基运用私人关系，联络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策反该师师长毛维寿，并安排特务分子加紧在十九路军将领中做分化收买工作。12月间，蒋介石开始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于1934年1月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厦门，16日进驻福州。军统特务分子周昭琼等

赶往厦门、漳州等与毛维寿等密谈，软硬兼施，迫使毛维寿和沈光汉等于1月26日通电降蒋，使福建人民政府很快瓦解而失败。

军统特务组织为蒋介石对付异己势力的另一重大活动是参与瓦解两广事变。力行社特务处成立后便设立了华南区，先后派吴乃宪、梁干乔为特派员，驻香港指挥。1936年春，戴笠获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立即加强了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之前，梁干乔等便派特务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粤空军实力雄厚，拥有六个中队，一百多架飞机，是陈济棠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武装，军统特务把分化瓦解粤空军作为重点目标。当陈济棠树起抗日反蒋旗帜时，戴笠亲自会见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以每架飞机二万元的奖金和升官为诱惑，策动广东空军投蒋。1936年7月，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领衔通电反对陈济棠，率空军归附南京政府，迫使陈济棠下野出走香港。

（3）对国民党陆海空军的控制。力行社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设立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其主要任务是监视、侦察军官、士兵和学生的思想行动，宣传反共，进行法西斯主义教育，并通过有关机关对“共产党嫌疑分子”予以禁闭、开除、交军法机关转送监狱处置。

力行社还控制了军队中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在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成立特别党部，并由力行社特务分子担任党的特派员和书记长等职。管辖军队党务事项的党务处，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实际上由力行社主要骨干分子负责掌握。

（4）对全国青壮年实行军事控制。力行社插手对全国青壮年实行军事组织的训练。军训活动的开展以训练总监部下设的国民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各省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驻军训教官。这些教官大都由力行社特务分子担任。各中等以上

学校编成总队或大队，由军训教官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并借此监视和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言行，从中发展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成员。

（5）为蒋介石收集国际情报。力行社从1932年起开始派复兴社员到日本和欧洲留学，以军校同学调查科名义进行考试，挑选合格出国社员，受派的学生有发展组织和搜集情报的任务。1934年复兴社在日本有一百多名社员。到欧洲的社员分别到英国、丹麦等国学习经济、军事、合作、国防、警政和保安等专业。从1934年起，蒋介石派力行社成员去各大使馆任武官。由“革命军人同志会”拟定选派办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办武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的邓文仪去苏联，其余人员分别到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美国等，这为力行社在欧美的组织发展提供了便利，也为蒋开辟了广阔的情报来源。1934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百多名复兴社成员，柏林设有复兴社的分社组织，下辖有伦敦、巴黎、罗马、莫斯科支社。各支社小组每周有一次聚会，每月向柏林分社提供一份书面报告，柏林分社向南京总社作一次报告。在新加坡和菲律宾也有力行社的耳目。

（6）宣扬法西斯主义。力行社信奉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是它的一项基本任务。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是1931年5月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训政时期要借鉴和实行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在当今的社会阶段，“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他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他提出，“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88)]。蒋介石如此鼓吹借鉴和实行法西斯主义，有力地说明了他所要实行的“训政”的实质。

在力行社成立的同时，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杨周熙写了本

《三民主义法西斯化》的小册子，呈送蒋介石审阅。蒋将其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批准按原文出版[89]。力行社是1933年至1936年法西斯主义思潮在中国泛起的大本营。力行社主办一大批报刊和书店，南京有拔提书店、《中国时报》、《我们的路》，上海有《前途》，南昌有《扫荡日报》，等等。他们大肆鼓吹“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希特勒《我的奋斗》等书籍。

力行社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独裁论。它的喉舌《社会新闻》发表社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它已经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此，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90] 他们狂妄地断言：“中国的出路，无疑是法西斯主义的出路……中国的前途，无疑是法西斯主义的前途。”[91] 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大力鼓吹“服从领袖是无条件的，每个人必须真挚坚定地与他同生死，共患难”[92]。《社会新闻》社论鼓吹：“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93] 而谁是中国的墨索里尼呢？在一篇题为《领袖的认识》的文章中一语道破说：“在今天革命阵线上，德力足以感人，威力足以创业的，就莫如蒋介石先生了！……因此我说蒋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94] 这些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言论虽然曾有过一些煽动性，起了某些蛊惑人心的作用，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言论是极其荒谬的。

---

(1) 《关于军事委员会案》（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2) 《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23年）第九编第一章第二节。

(3) 《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

(4)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

(5)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66页。

(6) 《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0—451页。

(7)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26页。

(8)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9)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68页。

(10)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98页。

(11)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07页；朱明镜：《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总统府》，《江苏文史资料》第9辑第41页。

(12)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46页。

(13)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55—156页。

(14) 《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董霖编著：《中国政府》第2册附录。

(15) 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90页。

(1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81年版，第185页。

(17)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总报告》（1931年11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95页。

(18)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75—376页。

(19) 《海军沿革（1912—19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20)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编，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年版，第862—863页。

(2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80页。

(22) 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3)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台北1969年版，第5页。

(24) 尤特内：《战时中国》，纽约1940年版，第8页。

(25) 《赛克特将军致蒋总司令重整中国陆军建议书》，见《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116—120页。

(26) 《赛克特将军致蒋总司令重整中国陆军建议书》，见《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6—120页。

(27)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28) 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335页。

(31) 郭德钰等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5页。

(32) 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33) 陈栖霞等：《蒋介石空军重要训练基地——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3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264页。

(35) 经1935年3月2日修正公布的《兵役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275—277页。

(36) 《抗战前的国防建设史料选辑》，台北《近代中国》第47期。

(3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98—399页。

(38) 《保卫团法》，戴鸿映编：《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群众出版社

1985年版，第208页。

(3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98—399页。

(40) 《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55—456页。

(41) 《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56页。

(42) 程懋型：《现行保安制度》，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8页。

(43)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49页。

(44)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49页。

(45)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05—508页。

(46)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98—399页。

(47)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05—508页。

(48) 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47—549页。

(49) 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中华书局1945年版。

(50)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07—408页。

(51)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11页。

(52)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678—679页。

(53) 《江苏省保甲办理经过情形及今后整理计划》（193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4) 《江苏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1934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5)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12页。

(5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497页。

(57) 参见《申报年鉴》1936年。

(58) 《绥远省政府试办保甲暂行规程》（193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9) 见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第132页。

(60)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第335页。

(61) 《修正保甲条例》第1条，见《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第252页。

(62)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62页。

(63) 徐咏平：《陈果夫传》，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606页。

(64) 《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65)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66) 《中统内幕》，第17—20页。

(67)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68)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94页。

(69)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70)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71) 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33页。

(72) 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55页。

(73) 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4月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4) 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浙江党务》1928年第18期。

(75) 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76) 柴夫编：《CC内幕》，第71页。

(77) 《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39页。

(78) 《国闻周报》第4卷第39期。

(79)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初稿》（4），台北《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

(80)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

(8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82)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

(83) 《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社会新闻》1933年8月24日。

(84) 《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1933年5月15日。

(85) 良雄：《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86) 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台北《中外杂志》第24卷第5期。

(87) 顾顺章（1904—1935），上海吴淞人。早年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事务员。曾赴德国留学，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4月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警逮捕后叛变。

(88) 《国民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9)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特工秘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90) 《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社会新闻》，1933年8月24日社论。

(91) 陈穆和：《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7期。

(92) 刘健群：《银海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5页。

(93) 《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1933年5月15日社论。

(94) 贺衷寒：《领袖的认识》（1933年9月），见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1945年版。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

第一节　对鄂豫皖、湘鄂西和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南京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与汪精卫重新合作执政后，确定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对日本的侵略继续采取屈辱妥协的方针，而倾全力部署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苏区的军事“围剿”。1932年5月，南京当局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后，调动八十多个师六十余万军队，由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督师，向红军和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次战争从1932年6月中旬到1933年3月下旬结束，历时九个月。前三个月，集中主力二十四个师又五个旅，以“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战术，重点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翌年1月，调集兵力二十九个师另四个旅，以“分进合击”战术重点进攻中央苏区。虽然国民党军在前期作战中进占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大部分地区，迫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主力转移，但在进攻中央苏区时，受到红一方面军大兵团的伏击，损兵折将数万人，再一次遭受惨重的失败。

1931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遭到粉碎，被歼三万多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转为守势，没有能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该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中共秘密党员）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增加了一支重要力量，促

进了中央苏区的迅速扩大。在赣南，已拥有18个县的范围，其中兴国、雩都、寻邬、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广昌皆拥有全县，面积纵370多公里、横270公里，人口245万人以上。在闽西，拥有以长汀县为中心，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等县。当时赣南、闽西苏区已连成一片，成为比较巩固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编成红一方面军[(1)]，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军团，约六万人。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等，此外还有民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其他根据地如闽浙赣、湘赣等苏区也有所发展。还有鄂豫皖苏区，地处长江以北，京汉路东，在1932年上半年经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次进攻战役后，得到空前发展。这时鄂豫皖苏区迅速扩大，“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2)]，跨越26个县的区域。主力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二十余万人，其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直接雄视南京，威迫武汉。湘鄂西苏区地处湖南、湖北两省之交，洪湖苏区是湘鄂西的主要苏区。1932年春，红军第三军出击襄北获得胜利。这时，洪湖苏区扩大到东起洪湖，西抵沙市，北接京山，南邻洞庭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十五个县苏维埃政府。全区主力红军达1.5万余人，地方武装也有较大发展。

从总体上说，当时全国苏维埃拥有十六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一千多万人口，红军共发展到十五万人左右。但在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也给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危害。

1931年9月中旬，因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仍对中共中央实行指导，中共新成立了以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共临时中央先仍设在上海，至1933年初始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在新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更加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1931年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3)] 他们对形势的分析、阶级关系的估量以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存在严重错误，其中危害较大的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革命组织内部的肃反扩大化，经济政策和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因此，“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应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中逐步得到贯彻，排斥了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使红军在进行反“围剿”时遇到更多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述如下：

一　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进占

1932年初，国民党确立了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统治体制。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深感不安，极为仇视。蒋后来在追述当时的形势时惊叹地说：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

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4]。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此时，他一再鼓吹“剿共”是“救国”的唯一途径，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指导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4月，蒋任命何应钦、陈济棠为闽赣粤三省“剿匪”总、副司令。何应钦于月末赴赣部署“剿共”事宜，接着调兵遣将，特派刘建绪、余汉谋、陈诚分任赣、粤、闽三省“剿共”指挥。5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任命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汪随即联名发表通电，声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6月初，南京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调离京沪地区，分两路入闽“剿共”。蒋介石本人也从南京赴汉口再转庐山，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剿共”谋划。如前所述，6月15日蒋在庐山主持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汪精卫、何应钦、何成濬、熊式辉、何键、陈诚、钱大钧等数十人出席。会上，蒋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他回顾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共产党有民众的拥护，仅凭军事力量难以征服，要用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民心，以军事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会议讨论决定五省“剿共”的全盘计划，对红军采取大包围方法和“进剿”方略以及饷粮筹措等，并决定先以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确定采取重兵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会议还决定拨款3500万元作为“围剿”经费，禁止就地筹饷。接着在汉口正式设立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部，宣布第四次“围剿”开始。“剿共”总部设于汉口，运输总部设于蚌埠。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经过编组策划，拟定“剿共”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5] 下组设左、中、右三路军。以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

中、右两路军“围剿”鄂豫皖苏区。

“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迁湖北广水），蒋介石兼任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六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张钫，辖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师和新编第二十师，驻河南潢川、固始、光山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辖第二、三、八十、五十八师和两个骑兵旅，驻河南信阳、罗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辖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三旅，驻河南信阳、广水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湘，辖第三十、三十一师、第二十二路军的特务旅，驻湖北宋埠、黄陂及麻城地区。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辖第四十七、五十四师，驻湖北蕲春、广济地区。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辖第十、八十三师，驻湖北孝感、花园地区。总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集结于汉口。另有三个航空队分驻汉口、合肥、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右路军司令官由李济深兼任，副司令官为第三军军长王均，司令部设于安徽六安，指挥三个纵队、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辖第四师等，集结于正阳关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均（兼），辖第一、七、十二师，集结于六安、霍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梁冠英，辖第三十二师，集结于霍山南部至潜山地区。预备队指挥阮肇昌，辖第五十五、五十七师，集结于合肥。此外，第十三师驻平汉路花园至孝感段两侧，第三十三师驻浠水，新编第二十师等驻光山，第三十八、四十旅驻六安、霍山、正阳关等地，担任“驻剿”。中、右两路军总兵力有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万人。

国民党“围剿”军的“进剿”方案为首先进攻“平汉路以东，潢川麻城之线以西地区”，“以黄安七里坪新集为目标，达到将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皖边境，然后再以“两师兵力由水路移到安庆上路，东西夹击皖西红军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6)]。其总体意图为：集中主力于平汉铁路东侧，以中路军的第一、二、三纵队为主攻，第四、五、六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为助

攻。“围剿”计划分为：“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围剿”战术以“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7]。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进行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化各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军事进攻。

当国民党军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8]，还以为国民党军已临近崩溃，只能作为“偏师”。他积极地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准备，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其时值7月，骄阳似火，红军冒着酷暑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攻占了鸡公山，战果不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于6月底到7月初先后两次建议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认真做反“围剿”的准备。1932年7月初，张国焘在湖北夏店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分局会议，否定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坚持继续“不停顿的进攻”的错误军事方针。会后调集红军主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独立第一师南下进攻麻城。湖北麻城为武汉的屏障，是国民党军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死守麻城，以便牵制红军兵力，并配合中路、右路军作战。张国焘“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上正中蒋介石的圈套，导致红军在这次反“进剿”作战中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8月上旬，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深陷麻城而不能自拔时，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向苏区的中心区域逼近：其中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第三、第六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右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

一带，蒋介石见各纵队进展顺利，便改变其原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法，于8月7日下令“总攻”，命令各路“进剿”军疾速进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企图一举消灭红军。10日陈继承的第二纵队开始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的第六纵队进抵河口一带并向黄安进犯。

当黄安处于危急时，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疲惫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应敌。8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兼程向黄安进发，迎敌第六纵队；同时以第十师开向七里坪，阻击敌第二纵队。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第六纵队对峙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冯秀驿地区，双方互有伤亡。这时，陈继承的第二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犯，红军后路有被敌袭击的危险。红军总部决定率主力转向七里坪，集中力量打击敌第二纵队。13日下午，黄安被国民党军占领。

红四方面军主力赶到七里坪后，在柳树河东布防。8月15日，集中四个师迎击敌第二纵队，歼其四个团的大部，将敌击退。17日，卫立煌的第六纵队两个师由黄安北犯，红军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21日，敌第二纵队由七里坪北上，会攻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命令红军主力北上保卫新集。27日，敌第二纵队四个师从西面向红军扑来，双方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数日，红军歼敌两千余人，本身也有较大伤亡。9月6日，国民党军第一、第六纵队从北、南两面向红军逼近。红军面对不利形势，主力向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北苏区转移。豫南新集、商城相继陷落。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地区后，虽于9月10日同红二十五军会合，但又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等的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提出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苏区的分路合击，红军应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

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9]，不愿执行上述正确方针。

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英山地区，未获战机。10月上旬西进重抵黄安附近的高桥、河口地区。在此期间，张国焘曾致函中共鄂皖边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述申，命他与东路游击队司令员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继续坚持斗争。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留下的二十七、七十五师与各独立师团等在苏区坚持斗争。11日夜，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约二万余人，枪械1.5万支，撤出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为此，蒋介石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廑念。”[10]

红四方面军经鄂西北、豫西南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南越秦岭、大巴山，于12月进入川北地区，部队尚有1.5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至1933年2月创建了川陕边苏区。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同时整顿了各地游击武装，共约二万人，继续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这样，国民党军就地消灭红四方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但进占了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区，并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清剿”。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西苏区也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左路军由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下分设四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辖第十三师，驻应城地区；第二纵

队指挥官萧之楚，辖第四十四师，驻皂市等地；第三纵队指挥官张振汉，辖第四十一师，驻旧口、沙洋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刘建绪，辖独立第三十七旅，驻天门、岳口等地；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直辖的李宗鉴新编第七旅、刘光瑜第五旅等以及一些地方保安团，预备队有第十军特务团、第四十一师一个团、鄂北保安第一团、第八十二、三十四师各一部等，总兵力十万余人。

7月初，国民党左路军下达“第一期进剿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先包围歼灭襄河北岸的红军，然后转入襄河南岸作战。其部署是：四个纵队及一个预备队，集中向襄北苏区进攻；王陵基指挥的川军向襄南苏区进攻；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等任务。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在蒋军大规模进攻的前夕，仍推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肃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枉杀了不少优秀干部和军事骨干，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在军事部署上按照临时中央关于“湘鄂西红三军除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的军事训令，命令红三军主力再次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地区寻求作战。

7月15日起，徐源泉命令国民党军第一、二、三纵队分别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等据点，向京山地区合击红三军；其第四纵队则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阻止红三军南渡襄河。红三军在强敌压迫下，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京山、应城、皂市、天门之间活动，牵制敌人。鉴于敌军兵力强大，红三军决定转移到襄南打击川军。7月底，红三军在荆门东南的沈家集和曾家集一带与川军激战。8月初，从襄河西岸的敌军赶来增援川军。因而红军撤至熊口、莲花寺等地。国民党军乘机占领了钟祥、京山、天门、沙洋等地，基本上控制了襄北地区。红军转战襄南，伤亡很大。

8月上旬，国民党军制订了旨在摧毁洪湖苏区的“第二期进剿计

划”，相应地调整了作战部署：以第三、四纵队为左翼军，由岳口进攻苏区中心区；第一、二纵队留在襄北担任“清乡”，并作为左翼军总预备队；川军第二十一军两个纵队为右翼军，在东荆河西岸担任堵截任务，又以海军一部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南渡。

这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战略方针由冒险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命令苏区构筑碉堡，准备固守。为了牵动敌军并取得粮食与物资，夏曦命令红三军第七、八师向沙市、草市进攻；由第九师担任熊口、莲花寺的防务。红军在进攻沙市和草市中虽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本身也遭到较大损失。鉴于敌人的包围日益缩小，在内线已不能破敌，贺龙等人提出集中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夏曦拒绝采纳正确建议，错误地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夏曦指挥，辖第七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固守洪湖苏区；红三军主力为另一路，由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转入襄北敌占区打击、牵制国民党军。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曾于9月中旬电示湘鄂西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宜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但夏曦拒不接受，仍坚持分兵作战。

8月下旬，国民党军左翼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南岸要地峰口和府场，红七师等部仓促反击失利。9月3日，湘鄂西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翟家湾等地相继失守。红军在作战中损失巨大，夏曦只得率红七师一部和警卫部队向西南江陵地区转移。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与敌军艰苦周旋，至9月中旬才转至京山地区。襄北主要城镇早已落入敌手。驻扎江陵地区的国民党军获知红三军主力重来，立即调集四个多旅会同守军对红军追击和堵截。从9月底红三军采取时分时合、忽东忽西等灵活战术，在旧口、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与敌军周旋，多次打击敌人，保存了本身基干力量。

夏曦所率的红七师等在转移途中，遭受国民党军截击，损失重

大，抵沙岗后，洪湖中心区已被鄂军占领。他感到此地也难以立足发展，遂合红七师北上，与红八、九师会合。9月中旬，尚存的洪湖和湘鄂边苏区的一些独立团也到达沙岗地区。夏曦将这些人马编为独立师，10月上旬，他率独立师向洪湖西北方向突围，后来在大洪山与红三军会合，继而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境。独立师走后，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全部洪湖苏区。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也被国民党军夺占。

红三军绕道豫西南和陕南，于1932年年底到达湘鄂边鹤峰地区，准备重新建立苏区，未能实现；1933年底进入四川，攻占黔江，准备在湘鄂黔区建立苏区，又未能实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三军始终处于流动状态，部队由1.4万余人减少到3000人。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转战到贵州东部地区，至9月创建了黔东根据地。

二　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蒋介石督师“进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同时，加紧策划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2年8月21日，蒋召集何应钦等在庐山商定六省“剿共”的严密计划，拟定消灭赣、粤、闽边区红军的办法：粤军直攻赣粤边红军和苏区，驻赣州、吉安、抚州、南丰各军向宜黄、乐安红军包抄，切断赣粤边红军归路，再以新调到赣各部加入，在赣东将红军整个消灭。由于红军的坚决反击，此项战略目的未能实现。

1932年冬，蒋介石先后击败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后，即抽调部队部署对中央红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2月30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第四次“围剿”江西红军的命令，决定分兵三路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剿”。以驻赣部队大部编为中路军，陈诚为总指挥；闽北、闽西部队编为左路军，蔡廷锴任总指挥；赣南、粤北部队编为右路军，余汉谋任总指挥；并限令各路军于1933年1月6日前到达指定地点，随即实施“围剿”计划，总兵力达50万人，包括29个师四个旅，两个航空队。其作战部署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

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进剿”军主力。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辖萧乾第十一师、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集中于宜黄、棠荫地区，向黄陂、广昌等地攻击前进。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辖李默庵第十师、霍揆彰第十四师、孙连仲第二十七师和吴奇伟兼率的第九十师，主力集中于临川、龙骨渡地区，随后与第三纵队配合，向黎川红军主力攻击前进。第三纵队指挥官赵观涛，辖周浑元第五师、周碞第六师、李延年第九师、樊崧甫第七十九师，先在金溪、浒湾附近地区集中后，与第二纵队联络，然后向黎川攻击前进。还有刘绍先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集中于宜黄、乐安地区后，与第一纵队联络。

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六个师一个旅。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一个旅，周志群暂编第四旅，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的两个团，戴戟第六十一师的一个旅向光泽攻击，并与中路军配合。第五十六师的第一六八旅“清剿”将乐、顺昌附近红军并维护建阳、建瓯、延平间的交通安全。卢兴邦新编第二师负责“清剿”永安、清流、沙县、归化等地红军，并维护永安、沙县间的交通安全。沈光汉第六十师、第七十八师一个团，张贞第四十九师先“清剿”白沙、溪口、梅村、古田、蛟洋、坎市附近红军，然后向连城推进。

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六个师一个旅。李振球第一师，叶肇第二师（两个团），张瑞贵第三师，张枚新第四师，王赞斌第四十四师，陈章独立第二旅，“清剿”南康、寻邬、信丰、安远、上犹等地红军，并适时向北推进。李汉魂独立第三师，维护南雄、大庾、信丰等地交通安全。

另有王懋德第二十八师及第两师两个团，“清剿”赣江两岸吉安、吉水、万安、安福、峡江、新淦、遂川等地红军并维护交通安全。许克祥第二十四师与陶峙岳第八师的一个旅驻南城，第八师另两个旅驻南丰，“清剿”两城间的红军并维护交通安全。李云杰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机动控制于南城西北的滕桥附近。航空第三、第四两队，以

南昌为空军基地，与各路“进剿”军协同作战，并担任侦察、轰炸及通信联络。

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从南京到达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30日，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作《剿匪要实干》的训话，声称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国家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卫自存之“试金石”，号召所属要“硬干、实干、快干”，“要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11)]。3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拟订“剿共”具体计划。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剿匪”总部参谋长贺国光、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等参加。会上决定江西全省动员“剿共”，并确定了作战方略。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据1932年1月临时中央所作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战略，指挥中央红军在1932年连续进行了多次进攻战役。从2月4日至3月7日，首先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红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4月，毛泽东率由红一、五军组成的东路军入闽作战，抓住有利时机，取得攻克漳州等十余座城镇的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获取了大批物资给养，帮助恢复和扩大了闽西、闽南根据地。6月，红一方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个团，但未能大量歼灭敌人。8月，在攻占东安、宜黄战役中，歼敌三个旅，俘敌五千多人。红一方面军在1932年进行的上述进攻作战，虽然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并未达到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或是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的“围剿”的目的，反使红军受到相当大的消耗。

在蒋介石大举“围剿”中央苏区的严重军事形势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针，才能有把握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当时负责指挥前线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项英等几名成员之间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临时中央不顾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不进行战前的认真准备工作，竟指令前线指挥机关，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之前立即出击，攻城打援，迅速击破敌人，求得速胜，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

1932年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前方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他们不同意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下达的这一“左”的军事方针。9月25日前线指挥机关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这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正确战备计划。它首先分析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攻击意图和部署。为了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训令》对红军的战略任务作了规定：“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12)。《训令》还决定以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作为未来和敌军决战的战场，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同时明确指出了中央苏区军事行动的方向和当时形势下的主要战略意图，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但是，这个《训令》却遭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坚决反对。从9月29日到10月1日，苏区中央局连续三次给前方指挥机关发出电报，指责这一《训令》“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会上展开激烈的争论。有的参加者认为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多数人认为

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主要矛头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他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会后，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调毛泽东回政府主持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正当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这种处置使前线指挥机关处于困难和不利局面。然而，毛泽东虽被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仍关心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领导着中央政府做了大量配合工作。在红军中，周恩来、朱德等仍坚持正确的战略主张和作战原则，为取得胜利而团结奋斗。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国民党当局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会后，朱德、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果断地决定：乘敌方部署未定的时候，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10月18日、19日、22日，红军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间又克光泽、资溪和金溪。这一重大胜利扩大了苏区地域数百里，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同时，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连续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说明：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人大举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13)]。

1932年10月1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命令》，在敌人“正倾全力来布置对中央区的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下，提出进行紧急动员的十四项任务，其中包括政治动员、军事准备、群众参战和后方工作、战时的经济工作，等等。《命令》要求在“战争的形势日益紧迫”的情况下，要以全力来动员全苏区工农群众，要以最大的速度，来充分准备一切战争工作。中央苏区和红军要“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经济和一切牺牲去准备战

争，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14]。《命令》发布后，苏区内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在政治上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城乡代表会议和选民大会，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让广大工农群众充分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在军事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加紧扩大红军，壮大革命军事力量。

当时，红一方面军统率着一、三、五共三个军团，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等四个军，以及两个独立师，约七万人。由于双方兵力悬殊，红军的决策是：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主动地打到外线去，打乱敌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朱德、周恩来发布训令指出：“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15]。

1月初，陈诚指挥的赣粤闽边区“剿匪”中路军以抚州为中心，采用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苏区黎川、建宁、泰宁地区包围和截击。红军在誓师后，迅速向北隐蔽前进。1月5日，红军在黄狮渡袭击歼灭了敌第五师的第十三旅，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继而又占领金溪城。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军三个师经浒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周恩来乘敌尚未会合之际，下令攻击浒湾，经过一天激战，击溃敌人援兵，于1月9日占领浒湾。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红军出师告捷之时，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确定的错误军事方针，屡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力出击，先发制人，并特别强调要攻占敌军重兵把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胁并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1月24日，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前方负责人，要求以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还以命令的口吻强调：“我们要你们站在一条路线”，执行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对此前方负责人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和中央局陈述前方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有五点：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并提出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2月6日，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2月初，红军主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2月3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16] 次日，中央局回电认为：“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17]。

在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于2月9日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地带，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军第八师约5个团驻守该城及周围地区，另有1个团驻防里塔圩和新丰街。11日，红二十二军占领里塔圩，新丰街的国民党守军归路也被红军截断，退

回南城。12日黄昏后，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发起攻击，与敌激战一夜，红军“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超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18]。战至次日，红军未能突破敌人主要阵地。

国民党“进剿”军中路总指挥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尔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2月13日调整了部署，“令其各纵队向赣南挺进，尤其第一纵队速在宜黄地区集中，解救南丰之外围”[19]。其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则根据陈诚的部署，于14日向所属各部队下达攻击命令：命第一师开至宜黄、棠荫；“着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率该师经蛟湖向黄陂附近集中，第五十九师经霍源向河口附近集中，以备编入本纵队序列参加作战”[20]。这时，“进剿”军第二纵队也向南丰开进。该纵队第九十师抵东馆，四十三师向宜黄开拔，14日到达公陂，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而南丰守军在东、北门外和城墙上增筑了坚固的工事，阻击红军。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先消灭增援敌军。“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21]。13日夜，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迷惑敌人外，红军主力撤离南丰，并由十一军装扮为红军主力，由新丰街渡河向黎川开动，以吸引敌第二、三纵队向黎川方向移动。主力则迅速秘密地转移到敌援军前进方向的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和吴村一带。

陈诚错误地把开往黎川的十一军当成红军主力部队，立即制定了在黎川、建宁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令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攻红军正面；第二纵队由南城东向，对红军进行侧击；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堵截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红军后方。

周恩来、朱德看到国民党军已为红军的部署所迷惑，其第二、三纵队东向黎川，位于西面的第一纵队比较孤立、突出，并且临近红军主力集结地带，据此认定罗卓英所率第一纵队“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

个纵队”，决心“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22]。为此，周恩来在22日深夜向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发出《抚河等地敌情及我战略部署》的电文说：“抚河之敌以第二纵队集中南城相机进攻里塔圩，以三纵队策应企图吸我于中路决战，然后以宜乐之第一纵队配合南丰出击之敌迂回我后，我军今日已开始向西南运动，但仍佯攻南丰与游击新丰、里塔，迷惑敌人引动宜乐之敌，如宜乐敌人出动即往迎击，否则准备集中东韶、洛口掩蔽目标，待机出击。”同时，命令红军一、三、五军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继续秘密向西移动。周恩来、朱德鉴于敌人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敌决战对红军不利，于23日命令红军全部撤离南丰，连夜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红军撤围南丰“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23]的部署，虽与中央局命令有出入，但却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正确而果断的决定，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24]。

红军决心首先予以消灭的国民党军中路第一纵队的三个师，正是陈诚所部第十八军的三个基干师。其第十一师为陈起家、发迹之师；第五十二师原是1932年春从韩德勤手中编并，委任第十一师副师长李明为该师师长；第五十九师原是1932年秋从川军张英手中编并，委任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时骥为该师师长。后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虽受命被编入第五军序列，由军长罗卓英节制，实际上仍为陈诚控制，属陈之嫡系部队。

红军退到根据地中的东韶、小布、洛口地区后，进行休整，待机破敌。此时陈诚仍没有窥破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意图，命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向黎川、广昌推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中央红军。第一纵队担负着迂回到黎川背后抄袭红军后路的任务，其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由吉安一带集中乐安。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由临川向宜黄

推进，企图为解南丰之围，将主力集中于宜黄以南地区，与向南进的第二纵队，合力围歼红军在南丰、广昌地区。24日，罗卓英下达攻击命令。2月25日，正值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开拔之际，担任第一纵队预备队的第四十三师，于乐安城东20里处获得一份红军乐（安）南军分区司令部致乐（安）北军分区司令部的文件，内称："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不特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至大危险。万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当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25]实际此乃红军设下的圈套，故意只提"两团"兵力，以便麻痹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该二师长坚信上项情报，认为确无红军主力。26日在李明指挥下，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兵分两路，从乐安出动，计划到黄陂会合后再直趋广昌。其行进路线是：第五十二师经太平圩、登仙桥、大小龙坪、蛟湖到黄陂；第五十九师经东坑岭、西源、霍源到黄陂。两路之间隔着一座海拔800至900米高的摩罗嶂大山，彼此不易联系。

红军主力早已在2月23日、24日由南丰附近隐蔽转移到东陂、河口之线集中完毕，分作左、右两翼：右翼为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沿东陂一线进至黄陂，西向迎敌；左翼为第一、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沿金竹、王都、竹坪之线，隐蔽接敌[26]。红一方面军总部还在25日就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说：敌五十二、五十九师将于26日由乐安出动，27日到达黄陂地区，要求红军提前进入阵地埋伏，准备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敌人。26日，发布《第一方面军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月26日向东黄陂前进"之动态，"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命林彪、聂荣臻指挥一军团、三军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五都苦竹圩三线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其主力应控制左翼兜击其侧背"；命董振堂、朱瑞指挥五军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东陂进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并掩护我右侧向东北两方面侦察警戒"，命"第十二军为预备队"。

国民党“进剿”军第五十二师为这次行军的右纵队。该师冒着濛濛细雨，在崎岖山道中以一路纵队行进一天。2月27日黎明时，其第一五五旅超越第一五四旅，就前卫位置，并为缩短行军长径，相互掩护侧背，将三个团分为两个纵队前进。中午，该师在蛟湖遭预伏的红军主力左翼猛烈围攻，并被拦腰切为前卫第一五五旅第一五四旅和师部、后卫第三〇九团等数段，进行围歼。战斗进行到28日上午，第五十二师已被红军基本歼灭，师长李明负重伤被俘，不久死亡。“全师人员损失下级干部三分之二，士兵六千余名”[27]。

第五十九师于26日拂晓与第五十二师同时从乐安出发，为这次行军的左纵队。因淫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进艰难，进程缓慢，当晚宿营在大罗排、杨家、罗山街附近地区。27日晨全师继续开拔。下午3时，该师到达西源西端隘路口，两侧山峰陡立，形势十分险要。这时埋伏于霍源附近摩罗峰东麓的红军主力右翼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居高临下，用步机枪猛烈射击，将第五十九师大量杀伤，并将其分割包围。28日，红军左翼第一、第三军团在解决了第五十二师主力之后，又抽出一部赶到右翼佛岭坳。右翼各支红军便在清晨向第五十九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旅长杨德良被击毙，第一七七旅旅长方靖受伤。师长陈时骥率小部残兵窜逃于附近山中，尚寄希望于李明师，特写信派员送往大龙坪，要求李明迅速援助。此信送到大龙坪时即被红军缴获。29日晨，陈时骥率余部拟退回乐安，因迷失方向，遂搜雇一农民为向导；不料该农民将其引至登仙桥附近，为红军就歼，陈本人被俘[28]。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在围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主力后，“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29]。

陈诚在临川获悉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被红军截击后，立即命令

在宜黄的第十一师前往增援。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急率第十一师由宜黄经杏坊而至河口，方知第五十九师主力已被歼；旋指挥第十一师赶到西源接应。

红军本打算在黄陂大捷后继续消灭敌第十一师，只是地理条件、电讯联络不及时等原因，错过时机。这时，敌人第二、第三两纵队正从南城、南丰地区兼程西援，准备夹击红军。为争取主动，红军从3月2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待机继续歼敌。

这次黄陂战斗，红军共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俘虏官佐一百多人，其中有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旅长三名，士兵五千余人，总计五千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五千六百余支，机关枪一百多挺，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蒋介石闻讯后，于3月4日致电陈诚："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30) 3月23日蒋又电告何应钦、黄绍竑："此次剿赤挫失，短时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31)

黄陂战斗以后，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仍然摸不清红军去向。3月中旬，陈诚改变进攻计划，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为：以第三纵队第六师在抚州守备，第七十九师在宜黄地区为预备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及第三纵队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寻求歼灭红军于广昌地区。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冈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

红军仍坚持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原则。先以红十一军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和吸引进攻广昌之敌前纵队，主力部队仍以待机姿态，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

陈诚误认为红十一军是红军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之第五师配属前纵队指挥。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根据陈的命令，即部署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于3月20日经东陂向草台冈南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在第十师之后跟进，第九师为后卫。这样，后纵队只剩十一师、九师、五十九师等残部，愈显孤立和突出。20日，前纵队进到广昌西北的甘竹、洽村一线，而后纵队尚在东陂、徐庄、草台冈地区。这个地区地势险恶，道路崎岖，部队在山中行进，只能一线拉开，前后相距百十里。

红一方面军总部抓住时机，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敌第十一师于草台冈、徐庄地区，尔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犯之敌。朱德、周恩来联名向参战的红军各部队发布命令："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32]

3月11日凌晨，位于草台冈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于大雾中遭红军左、右两路军的猛烈进攻。第十一师乃骄兵悍将，曾顽强挣扎，使围攻黄柏岭的红军遭到较大损失。聂荣臻回忆说："敌人十一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因系仰攻，我军伤亡较大"[33]。红军战士英勇战斗，反复冲锋，白刃肉搏十余次，血战持续到下午1时，终于消灭了敌十一师大部，师长萧乾及两个旅长受重伤，团长三名死亡，缴枪、俘虏各在六千以上。

当国民党军第十一师遭红军围歼时，第九师一个团和五十九师残部在罗卓英督令下，曾积极进行援救。21日晚7时许，朱德、周恩来电令："各兵团应不惜一切疲劳乘夜消灭东陂敌人，以便打敌增援部队，诸兵团统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34] 红军遵令乘夜追击，又消灭敌第十一师一部及东陂之第九师一小部，第五十九师余部亦被消灭殆尽。第十一师被歼以后，陈诚所率的中路军各部队纷纷后撤，转为守势。在中路军向中央苏区"进剿"期间，蒋介石曾令其左路军和右路军积极策应中路军作战。但是，这两路军队同蒋介石之间矛

盾很深，各自为保存实力，不愿积极配合，加上苏区军民广泛开展袭敌扰敌活动，他们之间也难以达到预期的协同作战的目的。这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便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红军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仅黄陂、东陂两役共损失第五十二、五十九、十一共三个师，被红军俘虏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余支，还有其他多种军用物资，包括不少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蒋介石对三个师嫡系部队被歼懊丧不已。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沉痛地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35] 陈诚接读手谕后，惶恐地在书后附言：“诚虽不敏，独生为羞！”[36] 向来飞扬跋扈的罗卓英在致负伤住院的萧乾信中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并称“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37]。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密电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报告“剿共”失败情形，请速调部队赴援。电称：“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师之损失，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他认为江西情况严重，红军“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略地，更无可奈何”，他准备亲自赴京面陈详情，还悲叹：“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乞蒋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派大员到赣“督剿”。4月4日，蒋介石以江西告急，由南京乘专机赴江西，5日到达南昌，6日偕熊式辉、贺国光到临川视察。7日，蒋召见中路军各将领作“剿共”布置，在训话中声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

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惩处在宜黄、东陂一带“围剿”失利长官：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

大过一次；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萧乾“骄矜疏忽”，记大过一次。4月11日，蒋介石决定派刘峙任抚河、信河“剿匪”督办，取代陈诚指挥临川一带的“剿共”，并从刘峙、张钫等部中抽调三师一旅入赣。这表明：蒋介石、国民党虽在“围剿”红军和苏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仍不肯改弦更张，而仍以“围剿”为“唯一要务”并顽固地坚持下去。

第二节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和追堵红军长征

一　第五次军事“围剿”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决心倾举国之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设立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党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为五省一切党政军参谋部。蒋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检讨对红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针对红军的特点和长处而弃旧图新，取长补短，博采众议，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蒋介石说：作为基本原则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意思是指军队而言，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38)]，“具体点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

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该设法变更。……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39]。在第五次“围剿”中实施党政军合一，军事独裁统治与政治欺骗相结合的新方略。

为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1933年7月，蒋介石接受了柳维垣、戴岳的建议，在江西庐山海会寺举办军官训练团（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蒋亲自任团长，命陈诚为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教育长、“陆大”校长杨杰任总教官，由“军事学校”和实战部抽调的四十八名军官充任教官。训练团还聘请了以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军事顾问团，以裘育德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加强军队的技术战术训练。

训练团的任务是“刷新干部思想，统一战术行动，完成党政军总体战之战争体制”。蒋介石对受训的党、政、军干部说：“举办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40]“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41]

训练团设政治、战术、射击、通信等六门课程。军事课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夜战、险路战及伏兵战等，还进行侦察、警戒、搜索、联络、掩护、爬山等军事技术训练。训练团把政治训练置于首位，开设蒋介石主持编写的《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军人精神教育》、《剿匪部队训练要旨》等课。蒋还亲自讲授《民众组训》、《战时政治》等课，还指定《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军人必读》等作为受训人员必读书目。庐山军官训练团从7月18日至9月18日共开办三期，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北路军三十多个师的团以下军官几乎都参加了轮训。训练合格者发给文凭，并附赠蒋介石相片一张，“军人魂”短剑一把。

蒋介石为强化政治“剿匪”之效，制定了《剿匪临时施政纲要》13项，把厉行保甲视为“最要紧的政治工作”。于8月27日重颁《整理保甲方案》，保甲内实行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连坐制度：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为匪，全甲同罪；一甲为匪，全保同罪，有杀无赦。为笼络人心，还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如整肃军纪、核减赋税、整饬吏治等抚绥伎俩。为对红军进行组织战和精神战，同年8月，行营颁发了《剿匪区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年底又颁发《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此外还设立了“投诚招待所”、“感化院”以期分化瓦解红军队伍。

“以武力为中心”乃第五次“围剿”根本点[42]。蒋介石为不走前四次“围剿”惨败的老路，提出要“精研战术，周详准备”[43]，重新制订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略上“以动制静”，在战术上“以静制动”，放弃过去“剿匪”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方针，采用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略战术，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碉堡推进战略战术。其基本要点是：在战略进攻时完全依托碉堡作为战术防御手段；在部队步步推进中沿途构筑稠密的碉堡体系；在主要碉堡之间及其前后，构筑众多小堡，碉堡之间修建公路相连通，组成梅花式的纵横相贯的碉堡群，碉堡群间隔不超过二里；部队推进与构筑碉堡群并头前进。自吹谓攻有岿然不动之抗，守无丧师失地之虞。这样，就形成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十里八里向前，压缩苏区之势。蒋介石说：“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44] 据统计，在1934年1月，国民党军仅在江西苏区构筑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塞等各种碉堡4920座，到“围剿”终时，达14294座[45]。仅第三路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就构筑碉堡4244座[46]。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五千余公里。

国民党军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对苏区实行严密的“三封”政策，即经济封锁、交通封锁和邮电封锁。颁布《封锁匪区办

法》、《粮食统制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运购办法》、《邮电封锁暂时办法》等十三种禁令。1933年7月以后，南昌行营在苏区周围的县份中，先后设立粮食管理处、食盐、煤油管理所和交通管理处。在地域上划分为“安全区”（白区）、“半匪区”、“邻匪区”及“全匪区”（苏区），除安全区外，其余按其类别实行相应的封锁办法。此外，还严禁粮秣、食盐、煤油、布匹、中西药及有关军用物资运往苏区；凡发至“匪区”的邮电一律停止拍发传递，以期“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企图用这些办法饿困疲惫红军，迫其进行决战。

蒋介石为筹措第五次“围剿”经费，大量举借内外债及加征各种苛捐杂税。1933年，南京政府以卷烟、面粉、棉纱、火柴等税为担保，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订立中美棉麦大借款5000万美元；《航空密约》借款4000万美元，并按此项借款由美国供给军用飞机、战车及化学武器。同时，还向英国借款500万元、向德国借款1000万元，又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塘沽协定》，从日本借到2亿日元；假借修建潼西铁路为名，向英、法借款800万元。1933年先后发行“爱国库券”2000万元，短期公债400万元，还将财政支出的80％用作军费。据中央信托局经办军火的统计，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59万余元[47]，从意大利购买36架飞机和大批新式坦克车，从法国购买30架轰炸机，从捷克订购50万克郎的机械，还从英国订购500万英镑的军械。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48]等原则，并对部队进行了适应山地灵活机动作战的整编，以求精简层次，利于指挥。撤销过去师辖两旅六团或三旅九团的编制，把原一个师整编成三个师或两个师；每师辖三个团。团以上各级指挥部均设侦察队，扩大运输队；每团派遣政训员十余名。同时加强武器

上的火力配备，每团配备重机枪连，每连增加轻机枪数，统一调动了福斯炮团。对士兵进行适应山地战的多种战术技能训练。行营还颁布斩则九项，制订管制士兵办法，实行军人“连坐法”。蒋介石还委派钱大钧、蒋鼎文在保定、汉口训练处大量招募训练新兵，以补充扩大国民党军队。

1933年8月底，部队整编结束后，蒋介石加快了军事部署，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了总兵力达100万，计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6个团并有各省地方保安团，又有11个航空队，飞机105架。准备对各地苏区同时发动“围剿”，而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第五次“围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部署“围剿”计划。蒋在会上作《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演说，要求各将领“振作精神”、“信仰统帅”、“服从命令”、“尽职报国”、“视死如归”，“来造成百战百胜的成功”[49]。同时提出“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挺进游击、争取主动”四项战略；“以迂为直（曲线行动）、独立作战、全力决战、注重工事，就地固守、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纵深配备（梯次序列）、机动灵活”等11项战术和“侦察、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六项要务。蒋对此一再“耳提面命，期在必胜”[50]。10月17日，蒋介石颁发行动纲要和“围剿”计划，指示各“进剿”部队遵照“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以占领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计划规定：以歼灭赣南“匪军”主力及“流窜”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匪军”为目的，区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及浙赣闽边区。定于10月中旬开始“围剿”，以政治配合军事，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及组训民兵之原则，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防止“匪军流窜”，逐步缩小包围圈，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

按该“围剿”计划，各路军战斗序列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三十三个师、三个旅，担任“围剿”主攻，下辖

第一路军顾祝同兼总指挥，副总指挥刘兴，辖四个师、一个骑兵旅及第二纵队、税警总团，部署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蒋鼎文兼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汤恩伯，辖六个师、一个补充团，部置于金溪、胜桥、崇化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辖十八个师、一个补充旅，其中以十四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四个师和一个旅为守备队；赣闽边区警备部队司令赵观涛，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辖五个师，集合于南城、南丰、硝石、黎川等地区，并于抚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在第一、二路军的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步步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两个师，驻于赣江西岸的安福、吉安、万安、遂川一带，协同西路军围攻湘赣边区的红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副总指挥白崇禧，辖一、二、三军，共十一个师及一个旅，扼守赣、粤边境的寻邬、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上杭、上犹、崇文及武平地区，防止红军向南发展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北广昌方向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还动用大量飞机，掩护和支援地区部队向广昌、瑞金方向进攻，担任远距离侦察和对苏区交通、道路、桥梁、渡口及主要城市进行轰炸。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九个师、三个旅，其主力部署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并构筑封锁线。该路军同北路军赵观涛指挥的浙赣闽边守军五个师及四个保安团，担任围攻闽浙赣、湘赣和湘鄂赣苏区。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及赣江以西方向运动。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七个师及两个旅，将主力结集于闽西北地区的邵武、将乐、顺昌、延平、沙县、永安、龙岩一带，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围剿”军乘红军东方军、中央军分离作战之机，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令其第八纵队刘兴的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中央苏区北部要地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战幕。蒋介石在此后近两个月中，多次电令北路军各纵队与红军激战于黎川、临川、金溪一带，在空军火力配合下，迫使红军

陷于北路军主力和堡垒群火力网之间，数度濒临夹攻的险境。

国民党的“三封”政策，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有些地区连一捆纸也不能出去，一两盐都不能进来；粮源越来越少，缺粮情况严重。中央红军的枪械、弹药很困难，“全部火力却只有不到十万支枪，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极其有限”[51]，又没有任何外援。中央直属独立师枪支不齐全。地方红军的独立团，每团人数千计，武器配备三分之二为火力，三分之一为白刃[52]。

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是严重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敌我之间真正的实力对比大大超过五比一。要夺取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十分艰巨的。但也并非全无希望，就当时主客观情况来看，也存在有利于红军的条件：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仍顽固地采取妥协政策，而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反共内战，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和国民党广大官兵的不满。蒋介石调集百万之众的军队“围剿”苏区，虽然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貌合神离，难以协同作战。红军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劣势为优势。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已跨越湘、赣、闽、粤四省，辖有二十多个县，纵横数百里，大有回旋余地。中央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部队总兵力已达十万人，还有近二十万人的赤卫队。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等取得很大成就，苏区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斗志旺盛。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前两个月间，中共中央已估计到蒋介石要发动新的第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剧烈和残酷的战争”。“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53]。193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

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54]。8月，在中央苏区分别召开的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任务》等报告，提出“争取一切有利条件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55]，此外还有苏区广大军民前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如果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方针，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矛盾，针对敌人碉堡战术的固有弱点，充分发挥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能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形势，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出现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党在白区工作几乎损失殆尽，连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10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所留用的军事顾问李德[56]也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不信任中央苏区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原领导者，并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委派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57]。这样，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们提出了“两个政治决战”、“保卫与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左”倾口号；在战略战术上，推行“大军对大军的作战”的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致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丧失了争取胜利的可能性。

当国民党军向黎川发动进攻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仓猝命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命令“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58]。毛泽东、萧劲光等根据敌军进攻势态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为避免被敌包围消灭，主动撤出黎川。28日黎川被敌占领。中革军委为收复黎川，命令东方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同时命令中央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策应东方军对黎川的进攻。10月6日至7日，东方军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不期而遇，消灭敌赵观涛第六师两个多团，并生俘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洵口之战本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胜利，李德片面夸大此役具有普遍意义，主张红军陈兵苏区边缘，主动向敌人碉堡、重兵把守的据点进攻，命令东方军向陈诚部黄维第十一师重兵据守的硝石进攻，连攻5日未克，在红军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这样，中央红军在反“围剿”的初战中，“就丧失了主动权”[59]。

17日，南城之国民党军四个师进抵硝石，北路军陈诚命令第七纵队四个师向资溪桥推进，又令黎川附近的第八纵队主力进抵资溪桥。至此，蒋介石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20公里的地区集中了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构筑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而歼灭之。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无视红军面对优势之敌，仍主张采取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军主力插到堡垒地区间隙中去攻打坚固阵地，并说，“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60]。10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结集于抚河以东，准备以第一、三、五军和第三师、第九师等部队，攻打黎川东北的敌巩固阵地资溪桥。后又两次电令前方红军在敌的援队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团向敌碉堡外与其间隙间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全力争取与敌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胜利。22日，红军以第三、十三、十五师向资溪桥、潭头市发起进攻，以求牵动敌人；第三军团集结于石峡、洵口地区，第一军团主力集结于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的敌人。此时，东方军司令彭德怀、政

治委员滕代远两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认为资溪桥敌“工事均相当坚固”，不应攻打该地，并提出向信河流域机动作战的意见。但中革军委以不能实现为由，拒绝采纳，坚持攻打资溪桥。结果，红军进攻数日，未能实现战术意图。而红军主力集结于敌军堡垒周围，日间遭到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兵力消耗特甚。26日，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建第七、九军团。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萧劲光，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之独立团；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下辖第三、十四师和独立一、四两个团。此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以期调动金溪、南城和南丰之敌。11月11日，第七军团在向浒湾方向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金溪、琅琚出击之敌的夹击，红七军团在八角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敌人。12日，红三军团赶到，从东面包围敌人。敌据碉堡应战，这时在临川的敌第二路预备队邢震南部四师赶赴支援，红三军团主力多次向敌阵地进攻，均久攻不下，在敌人密集火力和飞机低空扫射下，遭到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第七军团也因终日遭敌机轰炸，阵地被突破后，仓忙后撤，这一仗红军伤亡一千一百余人。

11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之十四师，奉命突破由见贤桥至棠阴敌堡垒封锁线北上，经韩庄、上蛟源、温方岭向东北方向出击，以配合东方军的作战。此时，蒋介石再次手令各部“对封锁线碉楼楼区配备，应采取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斗群式配备，增加堡垒个数。每个碉堡守备兵力减为一班，最大一排，星罗棋布，形成面式地带，以火网控制全地带及交通，守军以弹性战斗要领决战于地带以外。匪如潜入地带之内，则以各个碉楼构成之火网，予以极大之损害”[(61)]。16日，陈诚立即集中第五、七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企图断红军归路，在封锁线以北地区消灭红军。红军中央军遂折回至云盖山、大雄关地区。17

日，国民党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向云盖山、大雄关阵地攻击，双方激战数日，红军遭敌飞机的猛烈轰炸，蒙受重大伤亡，第一军团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第一、二师师长均负重伤，红军伤亡六百余人，被迫放弃阵地，从白区转移到苏区内部。

第五次反“围剿”自9月下旬开始至11月中旬，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顽固地放弃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坚持军事冒险主义，采用阵地战、正规战来迎战强大的国民党军，命令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分别御敌于苏区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失利，又打东南之资溪桥，又失利。继而在盱江上游西岸和赣江中游东岸地区“辗转寻找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62]。近两个月的战斗，以惨重的代价证明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完全错误的。

“左”倾主义领导者在实行所谓“全线出击”，攻打敌之坚固阵地遭到几次挫折后，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李德畏敌如虎，不敢大胆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一味采用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企图实现“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63]。

1933年11月20日发生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军事部署，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抽调嫡系部队九个师和宁、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别由江西和浙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蒋介石也飞闽北建瓯直接指挥“讨伐”，对中央苏区暂时采取守势。“福建事变”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有利时机。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64]，调敌军回援重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依据当时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亦向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苏区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65] 但是，"左"倾临时中央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指责彭德怀的建议"是脱离中央与苏区的冒险主义"，害怕红军转向敌人后方会失去苏区，又不愿援助十九路军，坐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扭转战局的良机。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军事指挥权仍然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1934年2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调整了军事部署。2月13日，蒋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十六个师又一旅二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是夺取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长汀和瑞金，协同已组成的北、西、南三路军，形成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四面合围之势。同时，北、南、西三路军都增强了兵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国民党军进攻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在各处构筑碉堡，企求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另一方面又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阵地防御战与反击战：1月25日，第五军团在黎川以南的横村、樟村的阵地防御战；2月15日，红一军团在黎川西南的凤翔峰和三岬峰的战斗；1月26日，第一、九军团和第三军团四师反击进占建宁以

北邱家隘、坪寮之敌的作战；2月9日，第九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3月11日至15日，第一、九军团协同第三军团对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敌的阵地反击战；3月25日，第一、三军团反击由将乐进占泰宁、新桥之敌的作战等。尽管红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但均未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没有击破或打乱敌人的围攻计划，红军自身反而遭到重大损失。仅3月中旬，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三溪圩、三坑的反击战中，由于临时中央拒绝改变错误的方针，红军失去了战胜立足未稳之敌的良好时机，无法攻破敌之坚固堡垒，致使红军伤亡二千二百多人。

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进抵黎川以南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地区。4月10日，北路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进剿军”企图首先占领甘竹，然后打开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最后攻占瑞金。陈诚以罗卓英指挥的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西岸进攻；以樊崧甫指挥的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在河西跟进。“进剿军”在宽10华里的正面上，采取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和筑碉交替推进的战术。在敌军强劲攻势面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无视红军数月来连续作战，严重减员和没有休整的情况，匆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第一、三军团及第五军团十三师、在龙冈地区的二十三师，协同原驻广昌地区的第九军团，共计九个师的兵力，在甘竹至广昌40华里宽的战线上进行阵地战，构筑大量堡垒群，仍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决战”，企图“保卫广昌”。4月14日，当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顽强抗击向大罗山、延福嶂进攻之敌时，抚河西岸之敌乘机占领了甘竹。19日，抚河东岸的“进剿军”攻占大罗山、延福嶂的红军阵地。当日黄昏，红军进行多次反击，未能阻止敌人进攻，被迫撤退。20日，敌人沿抚河东西两岸分别向高州埠、长生桥推进，红军再次向抚河东岸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反击，亦未能歼灭敌人。

2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

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主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66] 并向红军指战员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67]、“胜利或者死亡”[68] 等错误口号。27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第九军团三师、第五军团十三师于抚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第九军团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第一、三军团和二十三师，再次对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不敌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28日，广昌失守，红军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但红军也损失重大，共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集中第八纵队三个师、第十纵队四个师，于5月15日向建宁发动进攻。在敌飞机大炮同时猛烈轰炸和炮击下，红军被迫向宁化退却。16日敌军占领建宁。此后，敌又攻占了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至此，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和归化一线，已被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控制。4月18日，红军苦战四天，阻击向筠门岭进攻的敌南路军，红军伤亡近二千人。21日，筠门岭失守，敌军推进到会昌以南的永和墟和龙和墟附近，并构筑碉堡准备向会昌进攻。

7月上旬，国民党军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依托堡垒群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北路军六个师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四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六个师进占头陂，尔后集中九个师向宁都、赤水、驿前、小松及石城进击；又以东路军为主的六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进击；再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作为总预备队。

这时，中央苏区经过数月连续作战，人力物力消耗甚大，苏区进

一步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在中央苏区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中革军委的“左”倾领导者拒绝采纳，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而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胜利”[(69)]，并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六路分兵抵御部署为：以红军第三军团六师、二十一师扼守兴国西北高兴圩、老营盘一线，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新成立的第八军团二十三师、新编红二十一师，在兴国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第六纵队的南进；以第五军团十三师在头陂地区，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第三军团四、五师和第五军团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第三、十纵队的进攻；以第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东路军向长汀的进攻；以第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的筠门岭地区，抵御敌南路军的进攻。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九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半桥、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军亭到驿前约30华里纵深内，修工事、筑碉堡，以五道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重创其精锐部队八十九师。红军也因伤亡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干部六百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军与北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进攻。1934年9月初，红一、九军团和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歼灭东路军一个多旅；在西线，红军在永新、安福地区也给敌以沉重打击。但局部的战役胜利，已无法扭转中央苏区红军的被动局面。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至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南路军前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企图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

金，以实现“围剿”红军的目的。此时，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进攻气势所吓倒，仓皇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及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决策。可是，李德独断专行，竟没有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70]，当然也就没有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解释和动员。李德竟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71]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10月7日下令，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由地方兵团接替，将第一、三、八、九军团和第五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的战略转移。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经历了一年之久。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国民党军以重大创伤。但是，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博古为首的中央，坚持采取错误路线，拒绝采纳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意见，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二　追堵红军长征

蒋介石在命令国民党“进剿”军合围中央苏区时，唯恐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早在1934年5月便发巧电（18日）致广州陈济棠、长沙何键称：“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72]

正当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全面推进频频得手之时，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10月，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同红三军会合。继而，红三军改编为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之后，两军发起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进至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由项英、陈毅领导，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蒋介石据报，于10月26日以宥电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作“追击行动”。31日，又以世电致广州陈济棠、南宁白崇禧、长沙何键和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责成“诸兄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73)]。

11月，南昌行营制定了追剿计划，其中规定：“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74)] 11月下旬，南昌行营命令赣、闽两省对所占领的苏区实行“绥靖清剿”，务求达到“斩草除根”，“消除后患”。

蒋介石还筹设四道封锁线“追剿”、“堵截”突围西移的红军。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企图以此阻挡红军去路。由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防守。但蒋介石在配备兵力时蓄意北重南轻，以

便在中央军占领赣南后，促使红军进入粤境，从而使红军与粤军拼杀，两败俱伤。陈济棠审时度势，早于10月已与红军达成“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必要时可以借道”的秘密协定，使蒋的图谋落空[75]。

中央红军各部于1934年10月17日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集结地开进。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按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突围西征。此时，陈济棠履行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采取让路保境政策，划定通路让红军在短时间内通过其辖区。红军于10月21日至22日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并于26日之前全部渡过信丰河，向湖南汝城、城口一线前进。

第一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立即在南昌召集高级将领和幕僚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商讨对策，并以东路军占领瑞金所获资料得悉，红军可能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欲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10月31日，蒋下令组织新防线，确定“追剿方针，偏重堵剿，截其西窜”。其中特令“南路军速将汝（城）、仁（化）、曲（江）三县封锁线上努力堵截，以迟滞匪之行动，并以大部追击之”；“桂军应控制于全（县）兴（安）间，并速巩固黄（沙河）、全（州）、兴（安）、桂（林）四县市碉堡线”[76]。

在蒋介石调集部队之时，中央红军于11月3日至4日分两路从南康进入广东仁化县地域，徒涉锦江时，布防在这里的粤军警卫旅奉命不准堵截。粤军主力则集结于乐昌、仁化一线，使红军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由汝城、城口之间，突破湘军设防的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蒋介石见红军西进甚急，为阻截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入湘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专事“追

剿”；令粤军陈济棠主力进至粤、湘、桂边截击；桂军白崇禧以五个师扼守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攻占宜章城，并从郴州、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由湘军何键部、粤军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向道县、江华方向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左”倾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轻装前进，反而采取大搬家的办法：带上所有“坛坛罐罐”，行动十分缓慢。当红军西进至湘江一线时，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1月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总司令部后，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依湘江东岸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吴奇伟纵队，韩汉英、欧震等五个师进至零陵地区集结，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贺、萧二、六军团会合；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谢涛福、萧致平、万耀煌等四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王东原等两个师同第三路配合，沿中央红军右翼突围道路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一个师协同粤、桂军，向江华方向沿中央红军左翼突围道路尾追。

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针对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后的战略意图，发布湘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目标是防止中央红军“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萧贺合股”，以求围堵中央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77]。这样，蒋介石的“湘江会剿”总兵力达三十个师，三十多万人，撒开一个大包围圈，形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同时，这个《计划大纲》规定：“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及部队，应动员民众，择要构筑碉堡，并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其湘省之湘江两岸、黔省之乌江、川省之嘉陵江两岸地

区，应构筑绵密碉堡群”，严密防堵[78]。24日，蒋介石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为借口，命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督率川黔剿共军事”，企图达到“统一川军，困死红军”，控制西南各省的目的。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翼红一军团于11月22日攻占道县城。左翼红五军团在天堂圩击溃李云杰部，从上游强渡潇水。红九军团于24日占领江华，随即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白崇禧深恐红军从恭城、贺县入广西攻占桂林，急令桂军主力集中恭城、贺县一线，随后，又令全州、兴安守军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这使全州至界首间百里湘江两岸守兵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灌阳之间抢渡湘江。27日，中央红军一、三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二师由塘圩直驱湘江东岸大坪，守军民团逃窜。红军过湘江后，直达脚山铺、鲁板桥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进攻。红三军团四师主力渡过湘江进至界首，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60余里湘江两岸，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左”倾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79]，舍不得丢掉辎重，致使红军行动滞缓，每天仍以30至40里的速度行进，未能及时赶到渡口。这时，敌人急调兵力形成四面合围之态势，从而迫使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与国民党“追剿”军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以为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急调兵力于黔阳、洪江一线围堵中央红军。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下辖第二、三路，并令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随红军追击，其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围堵红军于北去湘江的路上。同时，又电请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配置于锦屏、

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12月10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城。这时，桂军在红军左侧后追击，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何键第一、二兵团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16个师已进至通道城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构筑碉堡；这样，敌军以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中央红军北上西去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必将钻进敌军十几万大军围困的口袋。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红军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中央红军遂改变进军方向，转兵图黔。12月13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不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苏区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苏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80] 这次会议纠正了红军前进方向，红军也避免了被覆灭的危险，标志着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进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大多数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追剿"的意见。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81]。这就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随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而使蒋介石

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并为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会议开始时，由博古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问题；二、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错误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解，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洛甫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通常称“反报告”）的发言。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上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确定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

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82)]。

会议结束后，中常委进行了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左右，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错误领导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于1月10日再次电颁《追剿纲要》。令四川“追剿军”总司令刘湘“由黔东推进川南，相机进出黔北堵截，湖南何键向黔东追剿，两广桂军向黔桂边境推进，贵州薛岳总指挥及王家烈军向黔北追剿”[83]。合计调集川、湘、黔、滇、桂及中央军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月中旬，薛岳兵团两个纵队八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控制贵阳后，开始沿息烽北上，进抵乌江南岸；国民党驻川参谋贺国光及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匪总指挥部”，派潘文华十二个旅三十六个团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防封锁长江，阻止红军入川；黔军王家烈两个师，沿打鼓新场，向遵义逼近；湘军四个师结集于湘川黔边境酉阳至铜仁一线，阻止红军东进；桂军廖磊两个师抵黔南都匀；滇军孙渡三个旅进驻毕节。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加上干部团，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编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编三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三个团。按照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决定，全军于1月19日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及

其附近地区进发，准备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各渡河点，迅速北渡长江。

蒋介石发觉了中央红军的动向，急电令“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84)]，并很快调集川军四十多个团封锁了长江。

中央红军在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一反长征初期消极避战、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云贵川边地区进行了一场高度机动的运动战。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川南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渡江，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中央红军掉头向东，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地区。红一、三军团于2月25日“迅速袭取桐梓”。

蒋介石已于2月中旬撤销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另在武昌设行营，并常亲自来往于武汉和重庆之间，指挥“追剿”红军。此时红军突然回黔北攻占桐梓县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桐梓守军不得不退守娄山关。25日晚红六军团攻占娄山关。27日，红一、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粉碎黔敌三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占领遵义。

时值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率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贵阳赶抵遵义城郊老鸦山一线，并令五十九师主力和九十三师一个团为左路，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军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九十三师主力和五十九师一个团控制忠庄铺为预备队。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红三军团十三团阻击敌五十九师于老鸦山，歼敌大部。同时，红一军团二师迂回至遵义南，击溃右路黔军万式炯团后，又直指吴奇伟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见右路被突破，战局对其不利，令五十九师停止进攻老鸦山，率残部向滥板凳方向逃

窜，于次日退回乌江南岸。

遵义战役激战五日，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吴奇伟两个师、王家烈部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缴获枪支二千余支，子弹十万余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并使红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兵力损失惨重，他认为这是“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3月2日，他决定亲赴川、黔督战，整理川政，再次由汉口飞抵重庆，于3日通电川、黔各军由其亲自统一指挥，“无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日，又电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令桐梓黔军于6日集中大渡里、排居场附近，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周浑元部集中于枫香坝、鸭溪口一带，向遵义西北地区进攻；吴奇伟部主力集结茶山渡附近，在茶山渡至乌江取攻势防御；另派一部与周浑元部联络“堵剿”红军。

针对蒋介石部署，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85)]。15日，中央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第二纵队，敌依托碉堡和优势火力及飞机的支援，顽抗死守，战斗陷入对峙，一时无法全歼敌人。此时，黔军援军第一纵队已迫近西安寺。中革军委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进攻茅台。17日，中央红军在赤水上游茅台渡口附近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古蔺地区，佯作北渡长江姿态。

蒋介石为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急令薛岳各部向川南进击；滇军由黔西进抵大定、毕节一线防堵；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至仁怀、古蔺尾追；黔军坚守打鼓新场、三重堰、毛坝一线，以达“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之目的”[(86)]。

这时，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古蔺一带游击，以调动敌人向西。毛泽东则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而东向，于3月21日晚分别在川南太平渡、黔北二郎滩等渡口迅速四渡赤水。在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等地掉头南下，巧妙地从纷纷北上追击的敌军间隙中穿插南下，并在枫香坝、白腊坎一带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将大部分敌军甩在赤水河西岸。3月31日，全军迅速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留在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依据敌情判断，认为继续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或北上渡长江入川，均已无可能，只有西进云南，渡金沙江入川北上。为了摆脱“围剿”的敌军，必须把滇军调出来，以减少入滇障碍。中央决定由一个团伪装主力，东进开阳，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之态势，而令红军主力集结于清水江西侧。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及陈诚，由重庆飞贵阳督师“剿共”。他指挥各军在遵义至鸭溪之线构筑碉堡楼，围困中央红军。4月2日，蒋介石向滇军发电称红军“显有东窜之势”[87]。当“追剿军”进行部署以阻止红军东进时，红军主力突然逼近贵阳，扬言“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并直接威胁贵阳机场。蒋介石闻讯后惊惶失措。据当时任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说：“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88] 蒋匆促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红军，又急电滇军孙渡等各路军火速驰救贵阳。为安全计，蒋于4月7日离贵阳飞昆明督战。正当国民党军各部向贵阳急奔时，中央红军于4月8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防线，直插兵力空虚的云南。4月10日，蒋介石又判断红军将渡司拉河（岔河），即又从昆明飞贵阳，策动十余万兵力尾追红军，并两次亲自乘飞机盘旋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

红军入滇，昆明空虚，云南军阀龙云深怕红军攻打昆明，不得不急调省城周围各县民团防守昆明，又电催在曲靖以东的第三纵队直开昆明。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之防御力量，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打开了通道。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入滇后，如大梦初醒，才明白毛泽东率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的真实目的不是东进，而是相反，自己在贵阳督战一个多月，只是徒劳无功，白忙一场，为时晚矣。

在滇军孙渡南返救援昆明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4月29日给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指示，指出："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二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5月3日，中纵队之先遣队干部团当晚在皎平渡偷渡成功，并控制了渡口。左纵队抢占了龙街渡口，右纵队也抢占了洪门渡口。5月9日，中央红军在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是日夜，龙云电告蒋介石：红军"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心中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89)]。两天后敌军抵达金沙江南岸时，红军已取道通安进击会理。至此，中央红军冲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以少胜多，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的胜利。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之铁厂举行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决定立即北上，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北上，既要通过对汉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彝族聚居区，又要渡过天险大渡河。大渡河西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水深流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畔，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蒋电告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

军覆没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为此蒋介石策划了利用天险，南追北堵的围歼红军的计划。他调动了十余万人的兵力，以求“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90)]。令薛岳率其主力出会理，向西昌尾追进击，以第三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西岸布防。同时令川军第二十四军主力由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再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军事防御。

中央军委获悉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重兵围堵，决定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

5月20日，左路红军攻占冕宁县，进入彝民聚居区。中央红军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沽鸡家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家族支队”。红军因此得以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24日夜，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5月25日晨，一支由十七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岸边火力支持下，分乘两条小船，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强渡成功，红军顺利地渡过大渡河，守敌被迫溃逃。

由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只凭十只小船，在几天内很难完成渡河任务。而此时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将抵安顺场，尾追的薛岳部第五十三师也日益迫近，形势十分严峻。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师及干部由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迅速夺取泸定桥。先头部队红四团兼程急进，两天走了160公里，终于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于29日晨占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横跨大渡河，长101米，宽2.6米，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敌川军两个团，桥板已被敌人拆除，仅剩悬挂的铁索，形势十分险恶。5月29日下午4时，由红四团第二连的二十二名英勇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在全团的火力支持下，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踏铁索，冲向对岸，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烈火，胜利占领大桥，进入街口与敌展开巷战，经过三小时的战斗，守敌被歼，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在天全河击溃川敌杨森部六个旅的阻击，于6月7日占领天全。这时，红四方面军获悉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为了摆脱蒋介石重兵围攻的不利局面，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向懋功急进。6月8日攻克懋功，接着占领了懋功附近夹金山下的重镇达维。中央红军在迅速突破川军杨森部的芦山、宝兴防线后，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实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21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8月上旬，红军总部将各军就驻地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91]的五、九军组成，从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地区前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同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尽艰辛，通过茫茫的松潘草地分别于8月下旬到达目的地。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

在北进途中，张国焘仍坚持南下主张，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执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将这一严重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率领右路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两军（原一、三军团，9月12日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先行北上。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继而，红军又突破国民党军的渭河防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纵横十一省，长驱2.5万里，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追堵“剿灭”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了。次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

第三节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南京政府发动尊孔读经的复古运动和对革命文化的“围剿”是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也是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配合和呼应。

一　文化专制与尊孔复古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专制”的集权政治的需要，不仅把持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的命脉，而且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其手法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渗进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禁锢，而且打着三民主义和“训政”等旗号。

南京政府成立伊始，便公然宣称：“本政府所行政策惟求三民主义之贯彻，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92)] 蒋介石更鼓吹：“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都要紧”；要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93)]。实际上，蒋介石和戴季陶一样，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对孙中山的主义和思想随意篡改与歪曲，其

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将三民主义儒学化，给它接上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传承的“道统”。蒋介石曾以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作为他推行个人独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武器。他虽然十分欣赏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仍继续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他不主张公开提“三民主义法西斯化”的口号，而赞赏用“三民主义之复兴”，“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94]的提法。他解释作为“体”的三民主义，其“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95]。正是在“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口号下，蒋介石把西方的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相结合，成为具有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这也是蒋介石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的武器。1928年10月在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当局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后来进一步规定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96]。

南京政府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力鼓吹和推行国民党党治文化和党治文艺。其特征是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化。这种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蒋介石极力谋取军事上、政治上的“领袖”地位之外，还极力谋求思想领域中的“领袖”地位，以便确立“有效能”的集团统治，为此提出了所谓“力行哲学”。“力行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宋、明两代哲学家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它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道不外索”等命题和“致良知”学说。这一哲学把封建道统和秩序说成是“天生的良知”。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强烈的政治实用性质。他把“行”抬到异乎寻常的地位，认为“唯认‘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97]。他歪曲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所谓“国家意志”对抗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以迷信盲从的“力行”对抗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蒋介石对“阳明之学”推崇备至，认为“当努力以提倡之”，以达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

治目的。总之，“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98]。

蒋介石直接操纵的力行社，极力鼓吹文化专制论调。力行社成员提出“文化统制是社会、政治、教育以及一切活动的症结……它是民族复兴的灵魂，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能使每个人不知不觉地被它所统治”[99]。力行社认为要用“国家至上”的文化，去取代所谓“颓废的文化”。他们要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对旧文化发起毫无怜悯的进攻，重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伎，宣扬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才打下秦朝建国的基础。他们甚至提出，文化统制的目标不局限于文化上。所有的社会现象、行动，都是文化统制所干预的对象，狂妄地叫喊“秦朝文化统制的成功，恰好是我们今天要仿效的”[100]。上述极权主义的主张，反映力行社所追求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目标是：不仅要连根拔除文化上的自由和民主，而且要将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新的共同生活的文化模式”深入熔染到民众的习惯中去[101]。

蒋介石为把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融为一体，早在1928年4月，南京政府就下令恢复孔孟旧道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标准”[102]。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为配合对红军和苏区的军事围攻，令各级党部及社会团体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宣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长时提出，要用上述“八德”作为对付共产党一切偏激宣传的对策。在蒋介石等的鼓噪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祀圣”、“复古读经”的浊流。

当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期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亲去山东曲阜祭孔。随后，他发布保护孔庙令，宣称“保护孔庙之义，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103]。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讲《中国教育思想问题》，提出把“尧、舜、禹、汤、文、武、周

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作教育正统思想”，这样中国的“教育从此一定更有一日千里的发展”，“共产党……也将由此而肃清”[104]。1933年9月他又对“军官训练团”讲《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认为“军人的精神是智仁勇三者，而三者之中又以‘仁’为最要”，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匪”，“‘剿匪’就是行‘仁’”[105]。蒋号召“用‘仁’字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来打倒‘共匪’不仁的邪说异端”。国民党军队就是在蒋介石“行仁”的旗号下，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实行极其野蛮的烧、杀、抢政策的。

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对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在孔子诞辰当日掀起了一个尊孔祀孔高潮。当日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为代表到曲阜祭孔，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内政部、教育部都派代表参加祭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陪祭[106]。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日在南京联合召开“孔子诞辰纪念会”。8月27日，上海“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107]。此外，北平、天津、汉口、长沙、广州、太原、杭州、南昌等地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都召开祭孔会。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上海市长吴铁城、湖南省主席何键等纷纷发表尊孔反共演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

在学校中推行“尊孔读经”是国民党用封建思想毒害学生、禁锢思想的重要手段。南京政府行政院1931年发布第三三五号训令，限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蓝底白字，横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在礼堂或公共场所，为的是使师生们对此所谓训民要则见之怵目惊心，时刻勿忘[108]。1934年湖南、广东等省都强令中小学读经，将“四书”、“五经”及古文编入教科书内容。各地中学毕业会考，语文题目都是经书的原句。

南京政府为配合对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1933年7月开始，在江西、福建、安徽、湖北、河南五省推行反共的“特种”教育。9月3

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颁发《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和《计划纲要》，所谓“特种教育”主要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苏区及游击区施行，分为成人班和儿童班两种。其中成人班公民课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三民主义，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固有道德，讲授公民生活常识，进行反共宣传，以消灭革命思想。其次为自卫教育，实施保甲制度和保卫、打靶、侦察等训练，担任建筑碉堡、挖掘战壕、修筑道路、组织“铲共义勇队”、搜查游击队以及埋藏的武器弹药物资等。

二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南京政府在对苏区发动多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其统治区的文化运动也进行长期的文化“围剿”。这两种“围剿”是相互配合的，实施情况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的起伏是相一致的。

南京政府成立后就开始打击革命文化，摧残进步团体，迫害进步人士。1927年5月，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等罪行，而遭到通缉，后被迫流亡日本。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以“武汉寄来之讨蒋特刊，阅之深为骇异”[(109)]为由，请示蒋介石后，立即派员到邮局查扣，此为封锁进步书刊之肇端。继而国民党对报刊图书实施《宣传品审查条例》，大量查禁进步图书和报刊。1929年7月明文列入《中央查禁反动刊物表》的就达173种。上海国民通讯社、创造社、艺术剧社等被先后查封。

国民党的压迫和“围剿”并不能阻止革命文化的传播。1929年秋，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革命文化运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上海为中心，推进革命文化的新发展，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文化团体相继成立。蒋介石对查处进步文化甚为重视，中原大战结束后便对革命文化运动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9月，国民党当局密令取缔“左联”等组织，通缉鲁迅等进步文化工作者。10月，在南京枪杀“剧联”盟员宗晖。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四十四条[(110)]，对于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任何机关团体或个

人出版纸物，都必须在首次发行十五日前，以书面向所属的省政府或中央直辖市政府转内政部申请登记。凡被视为“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的出版物，一概不得出版。1931年7月，国民政府又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111)]，对《出版法》中的原则和办法更加具体化。例如规定：“未经许可出版而擅行出版之书籍概行扣押”，“凡经许可出版之书籍，如出版后与核准之原稿不符，内政部得予以禁止或扣押之”，等等。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刊有228种，以“共产党宣传刊物”、“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普罗文艺作品”等理由被查禁的有一百四十多种。同时，在国民政府通过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说成“危害民国”，以“叛国”论罪，可定罪判处死刑的条文多达八款。例如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12)]。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宣称：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有关这些方面的文稿一律禁止出版。这个《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

1933年秋，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等单位派人到全市各书店密查“反动刊物”，事后向蒋介石南昌行营报告说，他们密查的对象，一是“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二是“普罗文学”[(113)]。报告中建议“组织专审机关”，“聘任对于此类文艺素有认识者若干人，悉心审查”；并要求国民党中央“通饬各省严密查禁，以遏乱萌”。南昌行营将报告转到南京政府，于是行政院据此作出四项决定：“（一）内政部审查此类刊物时，须更严密，毋使漏网；（二）建议中央积极施行民族文学之计划；（三）由教育部密令各学校，注意学生思想及关于课外阅读之指导；（四）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内政部决定已禁止出版物，现仍流行市面者，应由各执行机关切实认真取缔。”行政院于1933年10月向教育部等有关单位发出密令。教育部又将该密令下达各大学。武汉警备司令部还附上一份“中国普罗文艺家姓名（或笔

名）表”[114]。

国民党当局还设置公开或秘密的稽查机构，禁止进步革命文化的发行流通。1934年5月，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6月，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凡出版的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声请审查”[115]，同时公布《新闻检查大纲》。按照这些法令和措施，稍有进步内容的出版物都要受到干涉，甚至没收查禁。鲁迅对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作了不少揭露：“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查证……字第……号’字样。”审查员们的工作，“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他们“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116]。“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不成功”，“向一种日报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117]“总审”的稿本，有的被长期扣留或销毁，有的被删改得支离破碎。鲁迅的一本《二心集》，原有三十多篇文章，被删后只剩下十六篇，书店出版时改名为《拾零集》，但在杭州还是被没收了[118]。

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等编印的秘密材料，自1928年至1937年6月，国民党查禁的书刊有一千一百多种。国民党当局给这些被查禁、扣留的报刊、书籍罗列了种种罪名，例如有：“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其中遭禁罪名最大、数量最多的是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包括中共出版的书刊。例如国民党中宣部将从1929年至1935年曾经查禁或查扣的社会科学书刊，“加以编纂，汇成一览”，定名为《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共列书刊676种[119]，被注明“共产党刊物”的计有422种，占60%以上。其次被列为“普罗文艺”而查禁的书籍有309种[120]。仅1934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令“派员挨户至各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

五家”[121]。

南京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特务及流氓暴徒袭击捣毁进步革命文化机构，绑架暗杀进步革命人士。国民党当局根据检查书刊获得的线索，经常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持械袭击和捣毁进步的报馆、书店和电影院，砸碎门窗家具，焚烧报刊书稿等。例如，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因聘请了一些左翼作家担任影片的编导工作，拍摄了一些进步影片，国民党特务就扬言说：“艺华公司系共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要求当局命令该公司，“立即销毁业已摄成各片，自行改组公司，消除所有赤色分子”[122]。1933年11月12日，一批特务、暴徒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该公司，同时发函警告上海各大小电影院不准放映各种所谓“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影片”，“否则以暴力手段对付”[123]。良友图书公司因在其出版的书刊中开辟栏目刊登一些进步的新文学作品，也在同月遭到袭击。国民党特务还发信威胁各书局，各刊物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所谓“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否则“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来对付[124]。受到袭击、捣毁的还有发表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国民党暴政文章的美国人士编辑的《中国论坛报》，以及曾受陈铭枢等人投资的神州国光社等等。

南京政府对于进步革命的作家和文化人，有的先以投寄匿名恐吓信、列入黑名单等进行威胁，其后则绑架、逮捕直至暗杀。1931年2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了“左联”的五名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和冯铿。鲁迅也因此案牵连而被迫离家避难。上海大批进步出版单位和书店，随之又遭封闭。1932年7月，上海反帝大同盟大会被特务破坏，到会代表当场被枪杀者八十余人。1933年4月，北平文化界人士发起安葬革命先烈李大钊，遭到军警阻挠，向送殡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有青年学生及文化界人士等多人受伤，四十多人被捕。“左联”作家、共产党员洪灵菲在这次事件中被秘密杀害。同

年5月，应修人等在上海牺牲，丁玲、潘梓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入狱。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于上海。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以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被列入黑名单。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因发表一些反对不抵抗政策的言论，也于1934年11月在沪杭公路上遭到特务刺杀。稍后，爱国人士杜重远因《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诬为妨碍“中日邦交”罪名而入狱。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也先后被查封，负责人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对此，当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发表宣言揭露说：“国民党在虐杀我们的革命作家以前，已经给我们革命文化运动以最高度的压迫了，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一面收买流氓、侦探、堕落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运动消灭了，然而无效，于是就虐杀了我们的作家。”(125)

尽管南京政府全力进行文化“围剿”，取缔了一些进步文化团体，查禁了大量进步革命书刊，逮捕和杀害了不少革命作家，但是这种文化“围剿”阻挡不住进步和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四节　新生活运动

30年代初期，蒋介石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对内，他以全力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并在其统治区进行文化“围剿”，但既不能阻挡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不能使其动荡不安的统治秩序得到稳定。他感到这种革命思想的威慑力量比军事威胁还要可怕，曾感叹地说：“此种思想上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尤甚。”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各地抗日反蒋运动日益蓬勃发展。蒋介石为使其专制独裁统治能够在社会生活方面得到体现，于1934年初在南昌发起一个企图恢复中国固有道德，达到“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按照蒋介石等人煞费苦心的策划，新生活运动试图从国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方面入手，用“礼义廉耻”等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来整治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和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达到其控制下的国家复兴。

一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与国民党内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关系密切。如前所述，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蒋介石亲任社长，是直接效忠于蒋本人的秘密组织。蒋介石企图以这个组织为核心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为其专制独裁统治开创一个新时代。1933年9月，蒋就在力行社成员中鼓吹“伟大的中国的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126)]。要求他的亲信们负起责任，为实现对全国的极权统治出谋划策，贡献方略。

力行社成员多数到国外考察过，十分倾慕西方的社会生活。有的成员去德国考察，更觉得那里秩序井然，而国内却是糜烂杂乱，遂有倡导新生活的建议。1933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成立“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下分政治、党务、军事三组，以力行社成员为骨干，制订军事、政治的大政方针。其中政治组的设计任务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改进，目标是“要从教育学术和一切文化事业上，将国民心理和社会风气，以至民族的气质性能，使之革新变化，以保根本的挽救危亡，复兴民族”[(127)]。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生活运动所揭示的基本思想。力行社成员在建议报告中已包含有“礼义廉耻中，应表现在衣食住行”[(128)]的思想，遂被蒋介石采纳为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一运动的筹划设计工作由政治组中的数名委员暗中进行，其中邓文仪作为力行社的发起人与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划工作。

1933年冬至1934年初，蒋介石离开南昌亲自调兵遣将镇压福建事变，他还是留下一些亲信筹划新生活运动的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后，蒋介石于1934年2月9日乘机飞回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战事。2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教养卫》的训词。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存亡，差不多完全要看我们江西做关键，如果江西能将土匪剿清，社会安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由此复兴起来！”他还说：“现在中国，所以衰败至此的原因，就在一般人不知道自己负有建设国家和复兴民族的责任，更不知道自己有尽此责任的能力，因而苟且偷安，敷衍塞责。一人如此，大众皆然，于是养成一种偷惰颓败的风气，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陷于危亡的状态。”[129] 为此，蒋介石提出“要努力于‘教’、‘养’、‘卫’三件事，而以教育的方法，作一贯的推进。关于‘教’，要以‘礼义廉耻’为基本要义。关于‘养’，要注重‘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修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关于‘卫’，要从‘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做到共同一致。”[130] 这次讲话是新生活运动出台的前奏。

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五百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的乐群电影院，南昌市各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党政军界官员都参加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他首先强调“改革社会”，“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而是“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而国民道德是通过“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表现出来，其道德的标准就是“礼义廉耻”。他认为东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一切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合乎“礼义廉耻”，“不要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要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要求中国人的行动要效法洋人。其次，他要求党政军学商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知识界，“首先能够一齐奋发，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共同协力来做除旧布新的工作，然后一般国民才有效法”[131]。蒋介石宣称：“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

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他断言新生活运动在“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那时，无论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论是要报仇雪耻，复兴我们的民族，都不是什么难事”[132]。

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书记。次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订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的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3月11日，新运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及附近二十多县市民中有十万余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均出席大会，蒋介石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的演说。3月18日，南昌新运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经过蒋介石及国民党各级机构的大力推动督促，在短期内南昌的面貌有了改观，新运促进会自称“规矩”、“清洁”两项已大改旧观。

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迅速推向全国。南京、上海、福建、北平、江苏等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新运组织。例如3月21日，何应钦从北平致电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通告北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5月，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山东军阀韩复榘也发起组织新生活运动。6月，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作为各地推行新运的理论和组织依据。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作为全国开展新运工作的指导机关，蒋介石仍自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正、副主任干事，阎宝航为书记，并聘何应钦、陈果夫、张群、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国民党要员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同时颁布了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规定各地各级新运促进会要接受总会指导，由当地最高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人由厂长或工会负责人、商人由

各业公会负责人、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或主管长官分别负责。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通令各地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以新运列为党务考绩”。这一措施进一步加速新运的推行。到1934年底，全国除东北及西南等数省外，南京、上海、北平、湖北、湖南、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福建、安徽、陕西、江苏、浙江、甘肃、察哈尔、绥远、青海等省市均已完成新运的组织工作，平汉、陇海、胶济等铁路线也组织了新运促进会，独立开展活动。新运的组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二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实质

从1934年2月至7月，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和《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六篇演说，又手订《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重要文件，稍后再加订《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推行方案》、《新生活运动歌》，形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使人们了解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政治目的。

首先，蒋介石确定以“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的准则。3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作《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的演说，他规定“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礼’”。他要求人们要“学礼、知礼、行礼”；“礼一定要有节”，“节就是合理的规矩节度”[(133)]。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一脉相承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则全面表达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纲要”规定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提出“‘礼义廉耻’，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之不同，自各成其新义”。“‘礼’是规规矩矩的态

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134]。在《新生活须知》中作了比较通俗的说明：“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长，克敦伦纪”。“何者为义，一心济世，厚人薄己，不争权利，急公忘私，弗辞劳瘁，扶善除恶，以彰公理”。“何者为廉，既明且洁，严慎取予，操守有节，辨别是非，力排谬说，崇尚节约，以惜物力”。“何者为耻，心存羞恶，不屑卑污，尊重自处，不甘暴弃，力求进步，不图苟存，宁死御侮”[135]。上述的释文表明，“礼、义、廉、耻”都是围绕“礼”来阐述的，而礼的核心就是要人们遵守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也就是国民党政权存在以及由该政权制订的法规法律。说到底是要老百姓做国民党政权的驯服臣民，从而消弭革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二，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这是新运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和内容，可以综合起来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表现我们中国礼义廉耻固有的道德习惯来达到行动一致的目的。”[136] 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规定：“食衣住行之遂行，可分为资料之获得，品质之选择与方式之运用的三个方面。”其中“资料之获得应合乎廉”，即“食衣住行之资料，须以自己劳力换得，或以正当名分取予”；“品质之选择应合乎义”，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方式之运用应合于礼”，即“合乎自然的定律”，“合乎社会的规律”，“合乎国家的纪律”[137]。在《新生活须知》中规定，“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衣”要求“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住”要求“住居有室，创业成家”，“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要求“举止稳重，步武整齐，乘车搭船，上落莫挤”；等等[138]。总之，提出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只有做到这六点，“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但从他通过“蔬米布帛”、“家常便饭”的规定中不难看出，他的目的是要使人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严守纪律，不

要“犯上作乱”。

第三，以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以“军事化”为最终目标。《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说：“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也就是说，“必须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军事化”，“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139)]。一年后，蒋介石对这个“三化”问题又作了进一步说明：“所谓军事化者，并非欲全国同胞悉数武装悉赴疆场也，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所谓生产化者，亦非欲全国同胞胥作农工或尽事商贾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艰，能自食其力，以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黩之习性已耳。所谓艺术化者，更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行为，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已耳。”[(140)] 蒋介石还规定了“军事化”的四项推行原则，即唤起尚武爱国之精神，注意迅速整齐之行动，实行简单朴质之生活，养成遵守纪律之习惯。他强调，只有“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才能解除内外交困的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并要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141)]。新生活运动也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

蒋介石把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讲得天花乱坠。但新生活运动从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蒋介石把民众反抗邪恶势力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黑幕混为一谈，把国民党等统治者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诬称为人民“麻木”、“堕落放纵”、“腐败昏庸”所致。蒋强调新运的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的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的目标，即找到一条“今日立国救民唯一

之要道”。力行社的骨干、新运总会的干事贺衷寒讲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142] 按照蒋介石所设计的“新生活”，实质上是用中国几千年固有的封建道德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使人民停止反抗；同时也用这种混合体去号召他的党徒，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指挥下，为“攘外安内”政策效劳，巩固其独裁专制统治。

三　新生活运动的实施

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由江西南昌发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它的发端和比较认真实施的阶段，其中又可分为江西和南京总会两期。

第一期，蒋介石确定从反共前线的江西省开始，“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地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即要对江西的人心加以“彻底改革”，使其成为“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143]，成为新运的试验地。“先以‘规矩’与‘清洁’两项为第一期运动之中心工作”[144]，“务使以后在南昌社会或市民身上找不到一点不守规矩、不讲清洁的习惯”[145]。规矩运动包括“服装要规矩，容貌要规矩，出门要规矩，待人接物要规矩，食衣住行要规矩，一切行动要规矩”[146]，也要戒绝嫖、赌、烟及酗酒等。关于清洁运动，要求个人方面从锻炼身体做好，次及衣服、被褥、饮食、器具、日常生活习惯等，都有严格的办法。对住户、商家、机关、学校、公共场所也有多项要求。如《新生活须知》中规定，要整理市容、打扫住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走路要靠右边走，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戴好，鞋跟要拔上，纽扣要扣正，等等。

南昌掀起了颇大的声势。首先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活动，达到家喻户晓。其次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查规矩、清洁情况。由宪兵、警察和新运会干事组成检阅队，按南昌十五个区，分成十五队具体执行。如发现违反规定的商户，给予劝导、纠正及警告。第三是考核奖惩阶段，对成绩优良者，分别给予书面奖励、登报公布、或者发给奖状。对不合格者，给予书面警告，以至停业处分。新运会通报说：新生活运动开展后，南昌市“于短促期间，收效颇宏。而‘规矩’‘清洁’两项，大异旧观”[147]。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省市和铁路交通干线也开展“规矩”、“清洁”运动，还开展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多项活动。

在新运推行一周年之际，蒋介石感叹新运的成绩进度“未能尽如吾人之所期”[148]，又提出新生活运动的第二步骤，即实施《新运纲要》中所提出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1935年4月，新运总会颁布实行新生活三化的初步推行方案，公布《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规定团员每日至少义务劳动一小时。当年各省劳动服务团共有295个，总人数达6.9万余人。至年底，四川、云南、贵州、宁夏等内地和边远省份也相继建立新运组织，还有十二条铁路及1132个县成立了当地的新运促进会。新运总会还提出开展守时、民众识字、体育、开渠、筑路、修桥补路、提倡国货、戒烟戒赌等运动。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蒋介石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149]。在此前后，各地纷纷开展新生活运动，利用劳动服务团为地方建设服务。如湖北省曾组织武昌市、汉口市市民中18岁—45岁的男子、公务员、学生等参加，工期约30天。绥远省军队也组织了新运劳动服务团，在1935年秋天，参加修筑道路的工程[150]。

1935年驻华日军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

一系列事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也促使国民政府开展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而这项工作也曾借助于新生活运动在各层次民众中进行。据记载，当时的江西、福建、湖北、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以及一些铁路干线都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过国民军训。如平汉铁路全路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团员自1935年10月以后，每周二、五下午5至6点钟集中军训。军事训练还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一些中、小学也组织起童子军，进行一些军事训练。

1936年起，“新运”总会从南昌迁至南京，新生活运动发生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实际上全面掌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关于总会迁京经过，新运总会有如下记载：“因会长离赣常川驻京，聆受训示，诸多不便，乃由阎书记宝航于是年十二月间率领一部工作同志先行来京，暂假黄埔路励志社设临时办公处，至总会全体同仁，于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始行迁京，正式通告各地新运会知照；并另成立江西省新运会，以便负责指导各县市。旋因励志社办公地点纯系临时性质，复于二月间移入第一公园内陈列所旧址为总会会址。”[(151)] 总会迁京后，调整了内部人事组织，蒋介石仍任会长，改任钱大钧为主任干事。又经过了几次改组，1936年3月1日，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正、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实际负责新运具体实施工作。在总会下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此后，新运组织仍在扩大。1936年7月陈济棠在广州宣布下野后，新运迅速在广东推行。至此，国民政府下属的省区，除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及盛世才控制的新疆、李宗仁控制的广西外，均成立了新运促进会。新运会扩展至二十一省和四个院辖市（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共1355个县，14条铁路，另有海外华侨也成立19个新运促进会，总计1412个[(152)]。新运劳动服务团总数增至495万余人[(153)]。另外，新运总会制订了区乡镇新运会组织大纲，试图将新运由“城市推广至乡村”，还组织了大规模的视察活动，曾有130多人组成视察团，分赴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省以及重要铁路线及沿海、沿江等处视察。

新运总会迁南京后，其宣传得到高度重视。蒋介石以为前两年新运颇呈“沉闷现象”，1936年起，将新运定期刊物《新运会刊》改为《新运月刊》，又出版了《新生活半月刊》，宣传新运理论，又组织编印新运丛书，新运标语、挂图、电影，并利用多种形式的广播，在全国广为传播新运的思想、理论。宋美龄还把“礼义廉耻”四个字译成英文，供外国人理解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蒋介石用推行新生活运动来维护和加强其专制独裁统治，也直接服务于南京政府的现行政策。在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推行“攘外”与“安内”同时并举的政策，它一面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开展国民军训，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另一面仍加强对共产党和反蒋进步势力的“围剿”。在共产党、红军比较集中的地方，新生活运动就主要被用来配合反共、“剿共”斗争。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胜利到达陕北等地后，西南和西北的一些省份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1935年6月中旬，蒋介石到四川成都督促“剿共”，大谈“推行新运以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讲到具体任务就是要协力“剿共”。他说：“今日最急之工作，为全省各县人士所当联合乡里，协助政府而以全力赴之者，厥有如下之六项：（一）清查户口，（二）整顿保甲，（三）修筑碉堡，（四）储积粮食，（五）联络乡村，守望相助，（六）兴建公路，便利运输。”(154) 所有这些都是反共的战争准备工作。又如青海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确定本省新生活运动工作内容：“本会以本省现值剿匪时期，遵照委员长的《劝告川康陕甘青宁民众协剿赤匪书》内第六项规定，通告各县新运会即各劳动服务团，加紧工作，以造成防匪之精神壁垒。”(155) 再如，绥远省征调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劳力，投入建筑碉堡1125个，道路一千余里。山西省也把防共作为全省新运的中心工作，太原市还进行了所谓服务员的防共训练。

新生活运动从发展起到结束，历时长达十五年。其中1934年2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蒋介石集团推行新运最卖力的时期。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新生活运动的作用

和影响寄予厚望。虽然《新运导报》发表评论说："新生活运动之伟大功能，在此三年来所贡献于社会者，在军政党方面，在工商学方面，无不显出灿烂之异彩。"[156] 但三年多的新运声势浩大而收获甚微，蒋介石也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除了极少数的地方以外，一般对于清洁、整齐的两件事，尚且没有切实的做到"。"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食、衣、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157]。蒋介石说："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158] 这的确道出了这个运动的实际情况。

事实表明，人民群众并没有接受蒋介石设计的这种"新生活"。当时，反对独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是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企图把人民的注意力引上"攘外必先安内"的轨道上去是徒劳的；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民众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苟且偷生是不可能的；而在国民党的大小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不顾廉耻的情况下，蒋高唱"礼义廉耻"，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对蒋介石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的实质和欺骗性，中外都有政治家和学者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周恩来曾指出："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159] 冯玉祥在评价新生活运动时说："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

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无论哪件事都能证明蒋介石是利用新生活的名称来骗人。实在说起来，蒋介石一生就决没有实行新生活。看看现在情形，再拿他找人写的几十本小书来看，就知道满没有这么回子事。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什么？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160) 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论述新生活运动时指出：“那些国民党的领袖们也许本能地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制度是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而高谈什么封建道德，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之类的社会禁欲主义，在群众中大肆宣扬。而他们自己却大量搜刮财富，这和他们所倡导的新生活教条完全不相符合。这种心口不一、自相矛盾的做法更使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虚伪本质。所以，事实上，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受到国民党的诱惑。”(161)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前所经历的三年多中，已显出由盛而衰的趋势。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运促进总会随国民政府先后迁至武汉和重庆，开展了一些战时的服务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已与其原初意义的社会活动不同，但新运的名义仍延续下来。1946年2月，新运总会迁回南京。当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后，利用新运为反共、反人民，发动全面内战的工具，直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时，“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162)。

---

(1)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度取消红一方面军建制，至次年6月恢复。

(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

页。

(3)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4)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编第3章第4节。

(5) 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154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98页。

(8) 《中央致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9) 鄂豫皖省委《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1月15日。

(1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87页。

(11) 蒋介石：《剿匪要实干》，《蒋总统集》第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609—611页。

(12)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敌情和军事行动问题的请示报告》（1932年9月23日），《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36页。

(13) 《红色中华》第40期，1932年11月14日。

(14)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285页。

(15)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1933年1月1日。

(16)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17)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作战计划致周朱王电》，1933年2月4日。

(1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19)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台

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77页。

(20)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第600页。

(2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5页。

(22) 朱德：《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4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25)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第605页。

(26)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27)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3卷，第22页。

(28)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第613页。

(29)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73页。

(3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0页。

(3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1页。

(32) 《三月二十日的电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8—69页。

(33)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76页。

(34) 彭德怀、滕代远签署的《草台冈战役详报》

(35)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36)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37)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38)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09页。

(39)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版，第233—234页。

(40) 蒋介石：《庐山军官团训练的要旨和训练方法》，《蒋总统集》第1册，第633页。

(41)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283页。

(42)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顾祝同序。

(43) 《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117页。

(44)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剿匪”第4卷，第14页。

(45) 《碉堡业务报告书》，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 《五次围剿战史》下册，第9图。

(47) 《中央信托局经办各项军械军火及航空器材数额统计图》，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48) 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2），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241页。

(49)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5页。

(50)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11页。

(51)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0页。

(52)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20页。

(5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76页。

(54)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55)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07页。

(56)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1974），德国人，曾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后在上海被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留用为军事顾问。1939年返苏联，后回东德。

(57)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6页。

(58) 《军委关于消灭进逼黎川之敌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59页。

(5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

(60)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

信》，1933年11月20日。

(61)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45页。

(6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63) 《军委对各部任务及动作的指示》，1933年11月28日。

(64)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65)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66)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93—194页。

(67) 《五次战役之第二步的决战关头我们的任务》，1934年4月23日。

(68) 《战斗报》社论，1934年4月28日。

(69)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66页。

(7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67页。

(71)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06页。

(7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404—405页。

(7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405—406页。

(74)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5卷，第4页。

(75) 参见广州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关于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

(76) 胡羽商：《共匪西窜记》，羽高书店1947年11月版，第90页。

(77)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127页。

(78)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5卷，第13页。

(79) 《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

(8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1—442页。

(8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6页。

(82)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6期，第8页。

(83)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5卷，第19页。

(84) 蒋介石1935年1月19日电，《红军转战贵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印，1981年，第96页。

(85) 《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第2辑，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印，1983年，第40页。

(86) 蒋介石1935年3月19日电，《红军转战贵州》，第27页。

(87) 1935年4月2日电文，《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第2辑，第657页。

(88) 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89)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90) 薛岳：《剿匪记实》（1936年冬）。

(91) 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

(92)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1927年4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1），第1页。

(93)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5页。

(94) 《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7期。

(95)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279页。

(9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1），第58页。

(97)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集》第1册，第580页。

(98)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6页。

(99) 茹春蒲：《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前途》第2卷第8期。

(100) 李冰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统制》，《前途》第2卷第8期。

(101) 茹春蒲：《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前途》第2卷第8期。

(102) 《国民政府公报》第51期，1928年4月。

(103) 《孔府档案》。

(104) 《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蒋总统集》第1册，第565—566页。

(105) 《庐山训练集》上编，第167页。

(106) 《续修曲阜县志》第1卷，第27页，1934年版。

(107) 《申报》，1934年8月30日。

(108) 《教育杂志》第23卷第9号，“教育消息”。

(109) 《国民党为破坏中共革命宣传开始邮电检查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0) 《出版法》于1930年3月17日订立，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78—84页。

(111) 《出版法施行细则》于1930年5月订立，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84—87页。

(112)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东方杂志》第28卷第3号，第121页。

(113) 普罗文学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普罗”是法文和英文译音的缩写，当时进步作家为避免国民政府注意而采用的译名。

(114)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232—234页。

(115) 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5页。

(116)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1—462页。

(117) 《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5卷，第418页。

(118)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1页。

(119) 《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

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246—277页。

(120) 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第145、164—172页。

(121) 《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大美晚报》（上海），1934年3月14日。

(122) 《大美晚报》（上海），1933年11月13日。

(123) 《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379页。

(124) 《大美晚报》（上海），1933年11月13日。

(125)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126)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4页。

(127)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4页。

(128)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稿》，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

(129)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训词——“教养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45页。

(130)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训词——“教养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2页。

(13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3—757页。

(13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8—762页。

(133)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革命文献》第29辑。

(13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65—766页。

(13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2页。

(136)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言论集》，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50—51页。

(13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68页。

(13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2—773页。

(13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0—771页。

(140) 蒋介石：《新运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4页。

(141) 《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1页。

(142)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月刊》创刊号。

(143)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8页。

(144) 蒋介石：《新运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4页。

(145) 陈又新等编：《新生活运动之理论与实际》第2编，南京警官高等学校1935年版，第19页。

(146) 陈又新等编：《新生活运动之理论与实际》第2编，第19页。

(147) 《新生活促进总会会刊》第14期，第17页。

(14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4页。

(149)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新运促进总会1936年编印，第49页。

(150)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4页。

(151) 《总会迁京经过》，《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附录》。

(152) 《二十五年度本会工作概况》，《新运导报》第4期，第85页。

(153) 《新运促进会战时工作简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2页。

(154)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3页。

(155)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669—670页。

(156) 《新运导报》第3期，1937年2月发行。

(15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83—784页。

(158) 蒋介石：《关于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的广播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87页。

(159)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6—147页。

(160)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161)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

(162) 《黄仁霖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一节　1935年的国际环境

一　法西斯侵略的加紧

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攫取政权。进入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加深化，法西斯主义势力再次抬头。1933年1月，以德国建立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为开始，接着奥地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都建立了极权主义政权。在亚洲，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法西斯势力已控制了军部，实现了军部法西斯化。正是在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又大大提高了法西斯的地位，扩大了军部的影响。军部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频繁制造政治事件、暗杀、政变等，进行一系列恐怖活动，加剧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军部还乘机要挟内阁废弃政党政治，建立军部独裁。同时，英、法、美等国家中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到1934年12月，法西斯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竟然召开了国际性法西斯会议。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表明，在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相对薄弱，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传统影响较为强烈的某些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中最富于侵略扩张要求和专制主义倾向的集团，为了对抗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挽救濒临崩溃的资产阶级统治，为了争夺市场、领土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终于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统治形式，而走上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的道路。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于1922年10月30日建立以后，墨索里尼怀有巨大的帝国主义野心，扬言要重建“新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变为“意大利湖”，觊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处心积虑地侵入非洲，采取了一连串的侵略扩张行动：1923年侵占希腊科孚岛，1924年—1931年征服利比亚，1934年蠢蠢欲动为侵略埃塞俄比亚进行准备，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夺取了德国政权。纳粹德国建立之日起，就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其最终的军事企图是征服全世界。纳粹党对内强化独裁体制，扩军备战；对外则以建设欧洲新秩序为目标，开始公然否定凡尔赛体系。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借口军备的不平等，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五天后德国继日本之后又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10月，希特勒秘密下令把陆军由《凡尔赛和约》规定的10万人限额增加到30万人，海军人数增加一倍，并秘密建造两艘2.6万吨级的战斗巡洋舰。1935年3月，戈林宣布重建德国空军。同月16日，希特勒颁布法令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25岁以下男女青年必须在战略工事、飞机场等地，进行强制义务劳动。经过紧张的扩军备战，德国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就要开动起来了。

在亚洲，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也在进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夺取了中国东北，接着又进一步向热河、察哈尔和华北其他地区扩张侵略势力。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2月21日开始向热河进攻，仅十几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全省，并在3月初进抵长城各口。守卫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激于爱国热情奋起抵抗，屡败日军。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受挫后便转向滦东进攻，占领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与此同时，在察东的日军从赤峰出发，进占商都、张北等县。在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本妥协，5月31日同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塘

沽协定》之后，日本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进一步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挑战。日本继1933年3月27日宣告退出国联后，于1934年9月又宣布废止《华盛顿条约》。日本采取的这些措施，打破了英、法、美苦心营造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种种束缚与限制，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扫除障碍。

从欧洲到亚洲，在30年代中期，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狂，在世界各地着手点燃侵略战争的火焰，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威胁着各国人民。但是，西方大国面对法西斯势力的战争挑衅，采取了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从而更加助长了法西斯侵略的气焰。

二　日本侵华政策新方案的确定

日本通过长城作战逼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后，虽暂时中止了对关内地区的军事进攻，但没有停止对华北的侵略。日本感到须在北方加强对苏备战，难以抽出更多兵力，而且用武力夺取华北，势将引起国际战争，固宜力避；但中国政局纷乱不已，北方军队号令不一，又对蒋介石怀有二心，如果日本乘席卷东北之威，临华北以压境之兵力，更佐以反间之谋略，可以不经过真正之战争，达到建立傀儡政权，分离华北之目的。为此，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其中关于华北问题的政策主要有两条："（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　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该方针表明，日本在华北的方针不仅"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而且要"逐渐在实际

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2]。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公然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3]。接着，日本陆军省于11月30日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明确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4]。这样，日本陆军与海军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确定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政策。

日本军部策划的分离华北政策，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确认。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订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日本在华北要达到的目标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5]。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一）华北五省独立；（二）华北五省自主；（三）以河北省为中心建立自治地带；（四）设立局外中立裁兵地区[6]。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决策，迅速贯彻到关东军。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第三课长原田义和、参谋河野悦次郎、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驻济南武官花谷正、驻上海武官影佐祯昭及驻平津武官等均出席。会议历时两天，除讨论加强对“满洲国”统治的措施外，着重研究分离华北问题，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以贯彻其最后吞并华北之主张”[7]。会后，关东军派土肥原考察中国南北各地形势，策划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反蒋活动。3月，关东军在土肥原回东北汇报其活动情况后召开第二次

大连会议，并于3月30日确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导引华北政权绝对服从。（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8]。这样，日本政府与军部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与研究，从上到下统一了对华北的分离政策，下一步就是开始实际步骤，即以分离为目标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第二节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一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商定，为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将该五省作为和在日本领导下的满洲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自治区域”，首先“以制造事端作为提出要求的借口”[9]，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平津及河北省，最后达到“黄河以北事实上之独立目的”[10]。因此，5月间制造一个“河北事件”，6月间又制造一个“张北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提出苛刻无理的强硬要求，逼迫冀察地方当局接受其条件。

所谓“河北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联合制造的一项阴谋，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天津日本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所引起的风波；一是日军“围剿”抗日武装孙永勤部的军事行动。

5月2日深夜11时左右，天津日本租界汉奸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遭到枪击。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送至租界盐谷医院，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毙命。在胡恩溥遭枪杀五小时后，即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汉奸报《振报》社长白逾桓在日租界须磨街义德里二十二号私宅内被枪杀，白身中三枪，当日本警察署人员赶到现场时已身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胡白被杀

案。胡、白两人都是接受日本津贴的汉奸。他们受日本军方指使发行中文报纸，传播所谓“泛亚细亚思想”，为日本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他们在日本租界办报，在日本租界被暗杀，中国当局自然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日军却诬为“蓝衣社”所为。胡白案件的行刺人是谁，迄今仍是悬案。不论暗杀者是谁，日方利用该案作为寻衅的借口则是事实。

5月11日，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到北平军分会会见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此次暗杀胡白事件扰乱了日本租界的治安，情形严重，日方万难漠视。他说在一天内暗杀两人，计划周密，必有多数经费及人员，决非少数人所为，想系国家机构或有力的团体所为，省市政府或系知情不敢取缔。何应钦以“白胡被刺事件，因系发生在日租界，我政府无从明了其真相”作答 (11) 。同日，高桥坦又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北平特派员程锡庚，仍称暗杀胡白案与中国的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帮有密切关系。高桥坦信口雌黄，却提不出确切证据。

正当胡白被杀案交涉不可开交之际，日方又提出所谓遵化县当局庇护并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问题。孙永勤部是活跃在热河省南部长城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早在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孙永勤就在家乡兴隆县黄花川领导农民暴动，组织抗日“民众军”，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派委员王平陆到孙部，民众军自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任军长，下辖四个纵队，队伍发展到五千余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攻克敌据点一百多个，消灭日伪军1.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12) 。

1935年2月，救国军在日伪“协剿”之下，被迫转移到河北遵化县境内。5月，在茅山地区遭五千余日军包围和国民党军的协同“会剿”，孙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镇压了这支人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接着又借口孙部进入非

武装区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于5月20日由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关东军书面通知的两项决定：（一）这次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的事实，过去国境附近的中国官吏也庇护过扰乱热河秩序的股匪，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关东军追问其责任。（二）关东军数月来虽然在扫除扰乱热河的孙永勤股匪，然而因为中国官方的庇护，动辄向中国领土内逃遁，因而不能消灭之。因此，日军不得已自动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13]。

日本为利用上述事件进一步压迫南京政府，于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武官辅佐官高桥坦，一同到北平军分会居仁堂，访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首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两点警告：

> 一、中国方面官宪主动地对满实行阴谋，援助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对日实行恐怖主义等，是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而且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天津。如此，日军遂不但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而进入战区，且实有将北平、天津两地划为停战地区的必要。
>
> 二、胡白之被杀案，鉴于胡白是日本军使用之人，所以践踏了庚子事件关于归还天津的交换公文[14]，不仅是明显的排外行动，而且实为对我日本的挑衅。实行排外行动，其后果的严重性，看一看庚子事件及满洲事变即可明白。
>
> 今后在发生此类行为或预知要发生时，日本军根据条约的权限，如果认为有自卫的必要将采取行动。而且，对由此而发生的事态，日军不负责任[15]。

然后，酒井、高桥提出如下要求：

> 一、蒋介石放弃对日二重政策。

二、起码把下述各机关，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与蓝衣社撤出华北。

三、撤走作为上述各机关后盾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

四、罢免事件的直接间接当事者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团长）、丁正（该团副团长）、曾扩情（政治训练处长）、何一飞（蓝衣社平津办事处长）。

五、罢免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16]。

面对日方蛮横无理要求，俞家骥答复立即打电报向黄郛报告；何应钦则表示，关于罢免当事者等，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量加以处理，其他在调查之后务必求得中日关系的改善。对此，酒井、高桥很不满意，进一步强调说："不仅是在何应钦权限范围内，而是必须在华北迅速实现放弃蒋介石的二重政策。"最后附言道："今天不是来商谈的，而是通告我军的决心！"[17] 气势汹汹，颇有下最后通牒之意。

酒井、高桥提出要求后，日方从各方面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5月30日，驻天津日军一个中队乘坐装甲车，手持机关枪、轻型炮等，在河北省政府门前举行武装示威。同时，日本飞机也飞临平津上空低飞盘旋。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向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提出书面抗议，以策应军方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于5月30日访晤黄郛，驻南京武官雨宫巽也于5月31日和6月3日两次访晤外交次长唐有壬，压迫国民政府方面接受日方要求。

在日方压力下，何应钦多次致电蒋介石、黄郛商讨对策，并提出在可能范围内决然自动办理数件的建议。这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南京政府，正集中力量对长征途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对日方在华北的挑衅则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决定满足日方要求撤退宪兵第三团及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党部亦可考虑停止活动及宣传，并由何应钦

向于学忠征询免职的意见。5月31日，南京政府命令原定7月1日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提前于6月1日起开始迁移，并令何应钦尽量按日方要求“妥善办理”。6月1日，又把蒋孝先、曾扩情等免职。6月3日，蒋介石亲自把张学良由汉口召到成都，商量改组河北省政府和于学忠他调问题。至此，日方5月29日提出的要求，南京政府方面基本上一一落实了。

然而，日方并不满足，酒井、高桥又于6月9日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第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全国排日行为之禁止[18]，同时要求解散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励志社及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等行政官吏。6月10日，何应钦会见高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指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的全部要求。同日，南京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要求人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19]。但日方对此仍不满足，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11日，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高桥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用

有碍中日关系之不良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20]。7月6日，何应钦经汪精卫同意复函梅津，内称："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21] 中日双方以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的特殊形式实际达成的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该协定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使日本又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部分主权，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气焰。

河北事件的交涉尚未落幕，土肥原又制造张北事件。6月5日，日关东军驻阿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大月桂等四人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扣留，不久释放。11日，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借口四名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三项要求：（一）惩办直接负责人；（二）第二十九军军长亲自道歉；（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威胁说，五日之内得不到回答，日军将自由行动[22]。秦德纯感到事态严重，12日赶到北平向何应钦等报告事件经过和日方要求，并请示应付办法。

在松井提出要求前，驻热河的日伪军从6月9日起开始侵扰察哈尔省境，占领永安堡等地。11日，热河伪军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国境警察队进攻小厂，均与二十九军发生冲突[23]。

日本为了利用张北事件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6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召集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张家口日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共同制订《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规定交涉的目的是，"希望使宋哲元军队今后绝对不能在察哈尔省内妨碍我行动"，并为此向宋哲元提出：（一）第二十九军撤至长城西南地区；（二）解散一切排日机关；（三）宋哲元谢罪并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以上要求限两周内答复，并由土肥原负责交涉[24]。

6月23日，土肥原、高桥、松井与察哈尔省代理省主席秦德纯在

北平举行谈判。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谈判，调四千余兵力在古北口、南天门等长城一线进行实弹演习。在关东军咄咄逼人的威胁下，南京政府又一次妥协退让。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同意日方的下列要求：（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事件责任者免职；（二）撤退排日机关；（三）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四）二十九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长城一线以东及独石口至张家口一线以北地区；（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六）同意日本在察哈尔设置机构，聘请日本人为顾问，不干涉日本在内蒙的活动等[25]。此即《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本根据此协定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的北部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使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从而便利了日本的下一步侵略行动。紧接着，日本即以军事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二　华北“自治”事件

在“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便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在关内制造第二个“满洲国”。9月24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公然声称：“依靠华北民众的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并存的基础。”并宣布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建立华北政治机构”[26]。多田声明集中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

多田的分离华北言论，不仅反映军部侵华激进派的思想，而且也得到陆相和日本内阁的支持。9月28日，陆相川岛义一综合陆军各方

面的意见拟定的《鼓动华北自主案》提交给内阁，并于10月4日获得正式通过。这样，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提上了日程。

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即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共同导演，由驻屯军参谋人员及驻华武官穿梭于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具体策划的。10月，土肥原带着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分治华北的使命到华北。其计划是：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土肥原将此计划上报关东军，并得到批复：“最迟11月中旬，对宋哲元工作必须搞出头绪。”[27] 土肥原按此计划开始谋略工作，他先是将领导华北“自治”运动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滞留华北的失意军阀吴佩孚等身上，但未成功。他又把目光转向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但阎锡山在民族危机的刺激、蒋介石的安抚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没有坠入日本的圈套。土肥原策动阎锡山失败后，又把目标转向宋哲元，他向宋哲元等人提出要求：（一）政治方面，通电宣告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政府所任命的华北官员一律罢免，并控制北平、天津的反对华北自治言论。（二）经济方面，建筑津石（天津至石家庄）铁路，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利日货输入，打击英美贸易[28]。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的要求，并在10月19日发表公开谈话，说他就职后即奉中央睦邻令努力进行，在互不侵犯、平等的原则下与日本交涉，决无文字或口头上之任何秘密条件[29]。土肥原乃商妥关东军出兵威胁，并于11月11日向宋哲元提出限令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个师团的兵力攻取河北，六个师团的兵力攻取山东。

土肥原一方面对二十九军军政官员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操纵汉奸进行“自治”活动。他于11月19日策动汉奸组织所谓“河北民众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

会”、“天津工商联合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30]。这些所谓“民众团体”还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自治”[31]。同时，停战区各机关、华北新闻公会、各学校在殷汝耕鼓动下，也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舆论[32]。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叫喊声甚嚣尘上。

关东军与驻屯军均全力配合土肥原等人的活动。11月12日，多田骏军司令官飞往济南会晤韩复榘，次日又有十余名日军将校至济访韩。韩复榘乃于11月13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开放政权的通电。而关东军也于11月12日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发出命令，令独立步兵第一联队等部于11月13日前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准备进入华北[33]。同时，日本海军还命令巡洋舰、驱逐舰驶往天津大沽口[34]。日本飞机则连续侵入北平上空。这是关东军以陆、海、空军三方面之示威指向宋哲元，从而表明日本侵略势力已经不惜动用武力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宋哲元接到土肥原限期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的通牒后态度有所软化，宋以平津卫戍司令名义于11月11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结束训政、开放政权之通电[35]。13日，宋哲元又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说，“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处于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不得不宣布自治的苦境”[36]。到19日，宋的态度进一步软化，甚至准备向日方妥协。当日他给何应钦的电报说：“刻下环境至为明显，似非少数军人自由之行动，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涉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进一步亲善表示。”[37] 所谓“进一步亲善”，实即准备“自治”的同义语。此时华北情势遂呈现空前紧张，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于11月18日报告南京说：“华北新组织因彼方威迫限20日以前实现，否则将自行

办理。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难幸免，唯地方尚称安谧。”[38]

面对华北河山瞬息变色的危急关头，南京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予以应付，采取挽救危亡的措施。11月10日即宋哲元发出真电的前一日，蒋介石特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保定、北平，对宋哲元、韩复榘称：“中央政府对华北的具体方案已经决定，故为局部自治或独立运动而狂奔极为不利。”[39] 蒋介石还接连致电宋哲元，勉励宋在日本武力威胁和政治压力面前，“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并说“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仍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以不卑不亢相周旋。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40]。在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南京政府其他要人也纷纷致电宋哲元予以鼓励。这时，蒋介石根据五全大会的精神，作了军事与外交上的部署。在军事上，以“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集中了几个师，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又准备了许多军用列车”[41]，摆出将要北上的态势；在外交上，指令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制止土肥原分离华北的行动，同时密切注意日本的动向。当蒋介石于11月19日晚得悉“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42] 的情报后，立即电示宋哲元，告以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令立即停止与土肥原间的谈判[43]。第二天，蒋介石还针对宋在19日给何应钦电报中提出的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下与日妥协的主张复电宋，严厉予以斥责说：“来电所称，拟在中央系统之下，以不干涉内政，不侵犯领土主权及平等互惠为限度”，是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44]。这时，北平各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五十余人，当面向宋哲元表示，他们一致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宋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招致分裂[45]。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宋哲元于11月20日让萧振瀛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46]。土肥原逼宋哲元于20日宣布“自治”的计划遂告破产。其后数日内，土肥原对宋哲元继续加以逼迫，并怂恿冀东“非

武装区”专员殷汝耕于11月24日宣布“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伪冀东防共委员会的建立，不仅使宋哲元获得拒绝即行宣布“自治”的借口，且触发了华北各大学教授的严词指责，以及学生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英、美两国亦表示严重之关切。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应对华北“自治”力谋轻缓之候。结果，在南京政府的主动提议下，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它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虽隶于南京政府，但也为适应华北的特殊情况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冀察政委会设立，使日本军方所期盼的“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的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

三　内蒙“自治”运动

民国以后，内蒙古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两次变动。1915年，北洋政府将内蒙古的绝大部分划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决定将上述特别区改为行省。1935年前后，内蒙古共有六个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两个特别部（呼伦贝尔部、察哈尔部）、四个特别旗（土默特旗、阿拉善霍硕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依克明安旗）和一个牧场（达里冈崖牧场）。这些盟、部、旗分属于热河、察哈尔、绥远、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七个省。内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长期担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战后回忆道：“在地政学上看，内蒙古地区在东亚大局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47)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征服“满洲”，即意味着征服内蒙古的开始，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对于满蒙，力求在帝国的支持之下，使该地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各种关系上体现作为帝国生存的重要因素的作用。”“由于满蒙的现状可以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成为

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应逐步诱导，使它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实质。”其目的在于“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不允许有外来捣乱行为”[48]。

1933年春，日军占领昭乌达盟和热河省全境后，整个内蒙古东部沦为日本的军事统治范围，内蒙古西部则直接暴露于日本的进攻矛头之下，日本侵略者自1933年起将进占内蒙古西部作为“内蒙工作”的重点。“内蒙工作”实施的第一步是寻找傀儡和代理人。按照先以察东和锡盟为施策目标的侵略方针，日本侵略者在察东扶植李守信，在锡盟拉拢利诱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是年初，李守信在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的策动下，投靠关东军。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要求李守信同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李守信说：“关东军送你子弹22万发，手提机枪15挺，韩林春步枪25支，到奉天兵工厂去提取。另外，送你3万元。”[49] 3月，田中玖任命他为“热河游击师司令”。5月，关东军为稳定伪满洲国西南部与察哈尔省相接的“国境”地带，指令对李守信加紧进行工作，并指导该军按照既定方针，在察哈尔东部一带扶植亲日“满”势力，同时逐步使其势力向乌珠穆沁方面扩张。从此，关东军正式利用李守信的伪军向内蒙古西部扩张，并任命他为“察东警备司令”。8月，李守信部占领察东重镇多伦。此后，多伦成为关东军侵略内蒙古西部的军事据点。1934年1月，日本陆军参谋部决定了《对察施策》，规定施策目标先定为察东锡林郭勒盟，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向西扩张范围。其方法以经济、文化为主（发展交通、开展贸易、开发实业、设立善邻协会等），继之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工作（建立蒙古军、巩固蒙古自卫军、设立通讯谍报机关等），使蒙古人于不知不觉间亲日附“满”，从而有利于“满洲国”的统治与国防，并使之成为对华北和外蒙施策的根据地。其施策任务由关东军领导下的特务机关实施[50]。9月，关东军将多伦划为伪满洲国“察东特别自治区”，任命李守信为行政长官。“察东特别自治区”在日本人看来是“坚实的内蒙工作据点”[51]。

与军事上侵略察东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在政治上策划分裂内蒙古。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制订《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提出要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于是开始了在内蒙古王公中物色和培植其代理人的工作。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本侵略者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林郭勒盟盟长索诺木拉布坦（即索王）为主要对象的。但索王对日人存有戒心，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而对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很感兴趣。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右旗以及贝子庙、浩特济左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官英佐在扶桑馆请其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以迎合、煽动德王。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笹目到苏尼特旗“游历”，笹目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德王领地做谍报工作。德王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一心想建立“蒙古帝国”，欲利用日本人在内蒙古西部扩充自己的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德王看到南京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南京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1933年7月26日，德王和乌兰察布盟盟长云栋旺楚克（即云王）在绥远百灵庙共同倡导召开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8月，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开始对索王和德王进行策反工作。9月28日，德王等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向南京政府提出实行高度自治的要求。193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内蒙古设立推行自治的组织机构，派何应钦为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选云王为委员长，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为副委员长，但实权掌握在秘书长德王手中。这样，德王就成为日本拉拢的主要对象。日本对于内蒙古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阴谋，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或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当它对内蒙古西部蒙旗王公以“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用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动的口号。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德王发动内蒙古“自治”表示祝贺，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

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随后，关东军送给德王200支捷克式新枪和一些套筒式旧枪。是年秋，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来到苏尼特旗，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德王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52] 是年冬，德王指使其亲信宝贵廷同李守信勾结，在内蒙古东部（伪满洲国境内）秘密招兵，并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不久，经德王准许，驻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宍　浦直德在德王家乡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和架设电台。从此，德王和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关系。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研究和策划插手华北和内蒙工作问题。4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参谋田中隆吉和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会见德王。田中表示：“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53] 是年夏，日本大使馆北平参赞渡边渡要求德王加强日蒙之间的合作，不必再和南京政府打交道。关东军为进一步拉拢德王，送其飞机一架。满铁株式会社总裁赠给德王整套的电影、照相和放映机一台。7月25日，关东军制订《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关东军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及为此作准备的平时诸项工作，并以便加强满洲国的国防和统治安全为目的，先图扩大强化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54] 在施策要领中，对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交通政策、经济工作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随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少将亲自出马拉拢德王。他偕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大佐、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于9月18日乘专机抵达乌珠穆沁右旗，在索王府与德王密谈，德王说：“前次田中参谋前来我旗，曾提到帮助我们建立‘蒙古国’的问题，我们很喜欢，希望日本帮助我们早日实现，并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板垣表示：“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是愿意帮助的。”[55] 12月，德王抵达长春，拜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并同板垣和田中隆吉等就所谓“日蒙合作”进行具体会谈。德王表示不满意“满洲国”处理东蒙各旗的办法，希望日本能帮助内蒙先搞一个“独

立”的局面，再帮助蒙古“建国”。板垣答复道：“好，我们尽量帮助你们，先送给日币50万元。”田中接着说：“还给你们5000条枪，作为扩充军队之用。”[56] 12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伪军李守信部占领察东张北、沽源、宝昌、康保、商都、多伦六县。至此，锡林郭勒盟十旗和察东六县陷入日伪魔掌之中。1936年1月，德王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驻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任命卓特巴扎布为“察哈尔盟盟长”。这是日本侵略内蒙古西部的一个重要举措。日伪控制了察东，为建立伪蒙政权和侵略绥远打下了基础。

日本策动德王的事实，南京政府很清楚。1935年夏，南京政府连续接到傅作义、阎锡山和宋哲元关于德王计划成立独立政府的密报。1936年1月18日，戴笠派驻张家口的特务获得“德王现已宣布自治，改年号为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应为七百三十一——引者）年，以红黄蓝白色旗为国旗，伪首都设张北”的情报[57]。在此紧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先发制人，指责德王分裂国家。为防止内蒙古西部被德王夺走，于1月25日下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听命于南京和绥远省的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的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绥境蒙政会以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为管辖区域；察境蒙政会以锡、察两盟为管辖区域。绥东四旗并入绥境蒙政会管辖。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因此，德王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于是开始了筹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活动。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大蒙古包中仿效成吉思汗大祭仪式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名义宣读誓词，决心“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58]。日本驻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宍浦直德等参加了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前来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会议推举德王担任“蒙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日陆军省担心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过于显眼，为避免不必要的国际纠纷，要求其在全面吞并内蒙古

西部的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主要通过特务机关及顾问控制德王。日陆军省制定《对内蒙措施实施要领》，规定对内蒙目前工作范围为锡盟、察盟、乌盟及阿拉善地区，使中国政令达不到这些地区。关东军对内蒙古军政府的指导，应依靠隐蔽和内部进行工作，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以最小限度的日人顾问团等辅佐之。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以亲日“满”为基准，以建设蒙古人的蒙古为根本。

伪蒙古军司令部地处偏僻，不足以扩大“独立”的影响，因此关东军极力怂恿德王将其改为“蒙古军政府”，迁往他处。2月21日，驻百灵庙的蒙政会保安队一千余人因不满德王的投日活动，在绥远当局的策动下，由保安科长云继先等率领倒戈投向傅作义，使德王苦心经营的武装瓦解，德王由此对傅怀恨在心，决定正式打出“蒙古军政府”的旗号，公开建立“蒙古国”。4月24日至5月1日，德王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主持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出席了会议。田中向与会的王公总管们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59] 并将他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给各盟旗，有实力的王公每人一支，以资拉拢。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为副主席。云王希望德王多负实际责任。5月12日，“军政府”在化德县嘉卜寺粉墨登场。德王在成立典礼上表示，该政权的成立“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援助下，驱逐党阀，实现蒙古建国”的目的[60]。成立大会上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一年的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田中玖、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参加了成立大会。今村祝贺“蒙古军政府”的成立，并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云王、索王和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德王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伪府成立表示，内蒙古脱离中国隶属走上“独立”道路。这样，德王终于公开背叛祖国，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道路。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也编入伪蒙古军。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关东军一面帮助德王扩编内蒙古伪军，一面鼓动他在“外交”上“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61)]。德王于6月偕同李守信等人再访问长春，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所谓“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蒙满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派遣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满代表。这样，伪蒙、伪满双方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德王又按照关东军的旨意，派伪军政府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会商，双方政权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所谓“蒙冀协定”。这样，关内外三个傀儡政权连成一气，汉奸、蒙奸融为一体，共同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走卒。

第三节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自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依照国民党党章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

1933年11月召开。是年3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决定于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照常举行等问题，并通令海内外各级党部选举代表。后因忙于“剿匪”工作，加上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反对召集临全代会，6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以“时局关系，筹备不及”为由，决定停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径于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选出之临全大会代表，即作为五全大会代表。9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复以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电请五全大会延期，和“剿匪”工作正在进行，决定五全大会延期一年举行。1934年10月23日，蒋介石电请国民党中央将五全大会展期召开。2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四三次常会，决定：（一）延期举行五全大会；（二）定12月10日举行四届五中全会。随后召开的四届五中全会议定于1935年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依照历来惯例，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以前，须举行一次中央全会。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是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汇文中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等11校学生自治会联名呈请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青年，并将呈文以快邮代电发给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呈文中说：“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约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万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百思莫解者矣。”(62)呈文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和改弦更张的强烈

要求。

出席六中全会的中委百余人，各机关代表及党部职员共千余人，“其人数之多，为历届记录所未有”[63]。原先参加过反蒋的冯玉祥、阎锡山，经蒋介石亲自邀请，也参加了会议，“尤使大会精神粹厉奋发”[64]，“显示国内趋于团结”[65]。

会前，蒋介石于10月19日致电冯玉祥说：“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66] 23日冯玉祥复电说：“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他提出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共十三条建议，供蒋参考，其中关于党务者有：“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不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二、解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亡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是。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能竭其所长，以报国家。”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欲全国一致救亡，必先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除去之。”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电文最后说，以上各点，“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67]。蒋介石接电后，即复电冯：“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晤，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祈即日命驾，无任祷盼！”[68] 与此同时，10月13日，蒋介石由开封乘飞机抵达太原，往访阎锡山，邀请他赴京参加大会，阎亦表

示同意。蒋介石日记记载："由川飞陕、豫入晋，访问阎百川，商谈国事；彼面允入京，参加大会，并表示拒绝'华北自治运动'。此实为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之先着也。"[69] 26日，蒋又特派专机前往迎接[70]。

全会开幕当日，由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开会词。礼成后，中委齐集阶前摄影后转身退上后阶。正在此时，晨光通讯社一名叫孙凤鸣的青年记者因痛恨汪精卫的亲日倾向，挤入人丛中一连朝他开了三枪。汪立即倒地，经急送中央医院抢救后脱险。全会仍照预定日程继续举行。

因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一些方针大计均留待五全大会讨论，故这次全会无甚重要议案，实际上是五全大会的一次预备会议。在这次全会上，冯玉祥联合李烈钧、程潜、柏文蔚、蔡元培等共22人提出了《救亡大计案》，要求：一、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理由是"本党主义重在解放六大自由，载之宣言，并迭经决议实行保障，现进行制定宪法，前项自由更应保障"。二、大赦政治犯，理由是"共和国家，原应实行政党政治，连年以政见不同，致遭缧绁者颇不乏人，现危亡益迫，正国家用人之时，应请颁布大赦，以系人心"。三、精诚团结。四、充实军备。五、注意防灾救灾等七项，并获得全会作为首要议案予以通过[7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实现抗日和民主的迫切要求。但人们更注意关心的是它能否施行的问题。李公朴在一篇短文中说：提案"决依法切实保障，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我们知道过去政府对于保障人民言论信仰等的自由，也曾有过很多的决议，但总是议而不行，等于废纸。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决议能够做到'切实施行'四个字"[72]。

全会共开了五天，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案》、《对于党务报告案》、《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教育改革案》等案。11月6日闭幕，于右任致闭幕词说，这次全会，"中央执监各委员

除远在海外及少数直接指挥剿匪之官长外，几乎是全体到会参加，可算是第四届中央的第一次盛会”；充分表现了“精诚团结的历史精神”，“可以说异常圆满”。他强调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进一步增强团结，“集中国力和充实民力”，“来挽救环境的艰难”[73]。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为抗日南来，为抗日来赴会，不是为位置，不是为分赃的，不是为骂人的。”“六中全会今日闭幕了，一切办法均改为少长有序，整齐严肃了，不似以前之乱七八糟。”[74]

二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继四届六中全会后，在“一心一德，励精图治”，“矢勤矢勇，继往开来”，“集中全党意志”，“发扬革命精神”[75]等口号下，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接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开幕前，国民党中央为“完成统一，齐一意志计”，曾派戴季陶、马超俊携蒋介石的亲笔信飞粤，邀请两广重要人物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等入京，共商国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几次电促粤桂中委北上赴会，说：“救亡图存，刻不容缓，欲达最大目的，必须举国奋起，聚天下智能，同赴国难，乃克有济。各地同志，咸集中枢，商决大计，尤为至要，故弟等先期入京，尽瘁襄助。……中央同人极望诸公命驾晋都，救民在斯，救国在斯，唯衡察之。”[76]胡汉民当时在国外，大会前国民党中央及冯玉祥、阎锡山电促其回国，胡亦有回国的表示。大会开幕后，又决议电请他“早日返旆，共荷艰巨”[77]。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成员集会磋商应否出席五全大会问题，意见不一。国民党元老邹鲁主张参加，说：“国家民族到这种危紧严重的时候，还不急谋团结御侮，决不是我们革命党人应有的行为，也不是同志对同志的态度，更不足使全国同胞深信我们忠于党国的一贯精神。”[78]萧佛成、陈济棠、林云陔等都表示赞成，并决定北上。随后，李宗仁致电大会说：“大会至大无上之任务，在确定举国一致之

对外国策，则过去因对外而起之内在矛盾自可迎刃而解。”“如大会痛下决心确定办法，任何使命，宗仁决不敢辞。……倘徒备议席，复何裨时艰。”[79] 萧佛成因病不能出席，致电林森、于右任说：“弟深为国危至此，惟有真诚相见，以团结之精神，赴国家之急难，始足以御侮救亡。现各同志均能共本此旨，悉力以赴，民族生存，党国复兴，端赖于是。弟虽因病，尚须调摄，然必自奋勉，以随诸公之后也。”[80] 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虽未前往参加，邹鲁和林云陔、黄旭初、张任民、韦云淞等数人均赴会。邹为元老派重镇；林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心腹，完全可以代表陈；黄为广西省主席，“模范省领袖”；张是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韦是重要师长，完全可以代表李宗仁和白崇禧。因此舆论认为：“如此人物，其分量尽可代表整个的两广，纵令陈、李、白三人不来，京粤合作的阵容，已算充分表现出来了。”[81] 还说：“今日举行之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实包罗过去各派，现今各省。阎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国人士对华北现状得到一种慰安；冯焕章之弃嫌入京，自贻实际政治军事领袖一种恢宏大度之风范；而西南代表之多数贲临，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82] “民国十八年以来所未有之盛况也”[83]。中国共产党的巴黎《救国时报》的评论也指出：“国民党各派的首领纷集南京，差不多为蒋介石当权以后少见的现象。”“久苦国民党各派割据内哄祸国殃民政策的全国人民，也多少为之耳目一新。”[84]

11月12日，林森致开会词说：“这次参加大会的代表及中央委员人数，超过了历届的纪录，内部的团结情形较之四次代表大会时更有增进”；同时指出，国难比四全大会时严重十倍，“我们应该讨论如何鼓起全国的热诚，集中全国的心思财力，以共济艰危的方案”。他要求全体党员“牺牲自由与贡献能力”，“我们要以党内牺牲自由的精神，来感动全国国民都为国家来牺牲自由；我们又必须加倍刻苦贡献能力，才可以团结全国同胞，人人贡献能力，为国家效命”[85]。

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林森、张继、戴季

陶、居正、邹鲁、陈果夫、冯玉祥、阎锡山、顾孟馀等二十三人为主席团，由叶楚伧任秘书长。孙科、张继分别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报告，蒋介石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蒋介石在11月19日第四次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外关系的政治报告中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敢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86]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上述方针，全体代表无异议予以通过，确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付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87]。这是国民党第一次表明了对日本侵略比较强硬的态度，标志着国民党已从一贯妥协退让的立场，开始向抗日方面的转变。

国民党蒋介石的上述转变，不只是表现在五全大会上。此前不久的某日，汪精卫请蔡元培共进晚餐，蔡"苦劝他改变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的态度，以推进抗战国策"[88]，并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着，一面两行热泪已经流到杯中[89]。6月19日，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汪派外交次长唐有壬报告华北对日外交谈判经过，蔡元培、吴稚晖等相继发言，指责汪派对日妥协无度，糜烂地方。蔡元培站起来质问汪精卫："对日外交究持何策？际此时局，殊有请外交当局说明的必要。"汪答："对日外交这几年来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行，现在亦复如是。"蔡又问："忍辱云云，我辈固极明白，求全如何，却望予以解释。"汪避而不答。吴稚晖发言讥讽说："求全两字极易解释，简而言

之，是只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兴抗敌之师，反而糜烂地方罢了。”[90] 汪精卫为此愤然退席。中政会不予理会，继续开会，向汪发难。于右任大骂汪是汉奸卖国贼，孙科更拍案怒斥汪等“一二小人公然卖国”，盛怒之下将桌上茶杯震翻滚地摔碎。6月下旬，南京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当事者黄郛、殷汝耕、袁良等六人媚日卖国行径提出弹劾，矛头仍然指向汪精卫。与此同时，国民党全国各省市党部联合电呈中央，抨击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过于软弱”，提出惩戒汪和唐有壬两人；冀、平省市党部工作人员，因华北事件被迫返京后，亦联合京中各党政机关的反汪派向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惩处汪精卫及其左右[91]。汪于是于6月30日托病离京赴沪，住进了医院，随后又赴青岛疗养。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国闻周报》当时发表一则简评说：“自河北事件发生以来，汪先生身当其冲，心力交瘁，以致旧病复犯。……汪先生的病，不是普通所谓政治病，但得病则由于政治。他的赴沪就医，反映着国家局面，在所谓冀察事件解决后，依然棘手与不安。”[92] 邵元冲8月14日的日记亦曾记其事说：“此数月中，汪因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满，故称病青岛。”[93]

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文章，针对日本占领东北和在华北推行自治运动，指出：“中日两国悬案极多，然而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满洲问题。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满洲的支配，而中国则有保持领土的必要，于是中日关系便演成现在的难局。满洲问题如不能圆满解决，中日关系是无改善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我们领土与行政的根本原则，绝无放弃之可能。”并说：“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94] 蒋介石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寇又向华北提出‘撤销军分会与撤换北平市长’之要求，闻之不胜气愤，舍备战外，更无第二条路矣。”[95] 邹鲁在五全大会前即已根据他的观察，认为说蒋不抗日是不对的，因此主张放弃“倒蒋”的口号[96]。后又对人称：“蒋先生热诚抗日。”“中央已决定抗日。”[97] 另据冯玉祥11月15

日日记记载，蒋对人说："对日非抗不可。"[98] 又30日日记记载："中央决定抗日，蒋先生一定抗日。"[99] 就在蒋介石作报告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蒋还致电保定的商震说："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当下最大之决心；望兄毅然拒绝，切勿赴平，与中央共同存亡为盼。"[100] 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就有关"华北自治"问题明确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101] 翌年1月，蒋介石向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演讲时说："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102]

五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实施宪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等有利于抗日的决议案。大会宣言指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检查过去之工作，深觉吾人此日若不舍弃个人之一切，贡献所有之能力，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则革命大业将有中断之危，而民族前途有不可想象之惧。"为此提出了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条措施，即一、崇道德以振人心；二、兴实学以奠国本；三、弘教育以培民力；四、裕经济以厚民生；五、慎考铨，严考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六、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八、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九、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十、恪遵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保持国家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并且表示："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亦唯有秉持总理'人定胜天'与'操之自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之二大遗训，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

平为最大之努力。”[103]

尽管五全大会在有的决议中仍诬称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之大患”，要求继续肃清陕甘红军，但由于华北局势日益严重，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国民党内部反日倾向的增长，以及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得手，共产党和红军已不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已不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博古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内部的分化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南京政府政策的动摇，他取消了某些以前的基本口号，把它放在第二位。……在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几年来的基本政治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号，在大会的宣言的基本纲领是不见了，训政时期宣布了结束，准备召集国民大会，对于叛逆殷汝耕下了讨伐令，这些都是明显的变更。”[104]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100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50人，中央监察委员40人，候补监察委员18人；此外还有由主席团拟定名单，经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委30人，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委22人，总人数共计260人，为历届最多者，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开国民党之新纪元”。其中军界占40%强，党务占10%，政界占30%，边疆占5%，教育界占10%。舆论称“诚可谓党政军三位一体，中央干部之充实，为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也”[105]。蒋系人马得票最多，其中蒋介石得票第一，为495票，其次为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汪精卫所想举出的人选不独没有被选上，而且原来属于汪系的中执监委白云梯、邓飞黄、范予遂、郭春涛都纷纷落马，唐生智只得了一个候补执委，其部属何键、刘建绪反倒凌驾于他之上[106]。正是对日本的侵略态度如何，导致了上述选举结果的这种现象。五全大会于11月23日闭幕。

五全大会后，邹鲁对记者说：“此次全会盛况，为历届大会所未见”，充分表现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107]。他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共赴国难的办法，中央如无切实之办法，则各方同志不能

不各本其热忱责任，以谋救国之途径，不特将意见益见分歧，恐人更将从而欺骗恫吓进而拆台，“党不堪问，国更不堪问矣！”[108] 邹韬奋在一篇短文中更直接了当地指出：“这次五全大会能举出几百个中央委员，所提的议案怎样多，所发的宣言怎样好，这都不是老百姓所注意的。老百姓所注意的，只是要问已发出的‘支票’‘兑现’的问题。”[109]

11月下旬，在蒋介石指示下，由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会拟了《国防计划》方案，分国民训练、民兵训练、军实制造、要塞构成、交通建设等六项。同时，阎锡山与陈仪、张群、黄郛、熊式辉、杨永泰、黄绍竑还奉示会拟了《三十年防守国策》（又称《三十年自力更生国策》）。该文件指出：“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图自力更生，舍增加国力外别无办法。于此国难迫切之时而言增加国力，深有赶不及之慨。但此为立国之有效方法，虽为时已迟，亦必须努力于此，以图补救。”“若只在外交上用力，纵获一时之胜利，终难泯将来之祸患，且恐愈演愈烈也。”因此他们提出增加国力，即集中人力，发展物力的主张。集中人力方面，提出疏通、团结、组织、训练，中央与地方，人与人间，应确实疏通隔阂，精诚团结；民众方面，应组织训练，统一意志，尤应注重实施适合现代中国人之教育，以作育人才，使达举国一致，自力更生之目的。发展物力方面，要求增进科学技能，开辟造产途径。为达到上述目的，要求详计划，专责成，严考核，当赏罚，并说：“以我国今日之处境，危亡迫切，已至眉急，若仍按经常办法，以图自力更生，万难赶及，必须以非常方法，增加速度，用促猛进。”[110]

三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继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接着于12月2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重大决议是订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设立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由主席团指定叶楚伧、李

文范等十九人组成；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交审议委员会草拟原则，呈交常会发交立法院迅速决议公布；各省应赶办地方自治，完成训政工作，以巩固宪政之基础。

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添设主席、副主席，“为国民党之创举”[111]。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其他常委为汪精卫、冯玉祥、丁惟汾、叶楚伧、孔祥熙、邹鲁、陈立夫，秘书长由叶楚伧兼任。组织部长张厉生，宣传部长刘芦隐；中央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会议改为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委员为张静江、阎锡山、李烈钧、张学良、宋子文、陈果夫、唐生智、顾孟馀、何应钦等二十五人；添设主席、副主席，主席为汪精卫，副主席为蒋介石，秘书长为顾孟馀（不久由朱家骅代）。大会还通过了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院长人选，主席仍为林森。由于汪精卫因伤病未愈，请辞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叶楚伧；司法院院长居正，副院长覃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钮永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许崇智。

12月12日，中政会通过了行政院各部、会的人选：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长顾孟馀，铁道部长张嘉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13日，国民政府免去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职，由翁文灏继任。18日，又特任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免去蒋介石总参谋长兼职，由程潜继任。

国民党中枢改组，由胡、汪、蒋三人分担党政责任，舆论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来，“三巨头始终未能完全合作”，“党国三公，多年以来，总是天南地北，意见参商，这次能有机会合作，是政府的幸事，也是国民的幸事”[112]。“显示着集体集权的形式”，是“最值得注意的事”[113]。另外，蒋介石网罗非党员的“财界重镇”张嘉璈、

吴鼎昌参加国务，分任铁道、实业两部部长，“此为从来所无”[114]。同时以学术界名人翁文灏、蒋廷黻分任行政院秘书长及政务处长，“颇为世人所注目”[115]。“是以就中央新局全体而观，实质上精神上，皆得表现某种程度的举国一致之色彩，且实网罗中国一部分人才之精英”；“此乃表现国难已演至最大最急之阶段是也”[116]。舆论还认为，阎锡山、冯玉祥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任参谋总长，在军事行政上，也“是一件很可注意的问题”。这几年来，军政由蒋介石大权独揽，现在阎、冯二人参加，“自然加重了统率的意义”；程潜几年不参与中央政治，是与所谓留沪中委在一起，和两广军人也很亲密，“此次入长参部，也是大家共同负责的一个重要表现”[117]。“阎、冯、程三位之参加军政最高统率机关，使得全国军队更巩固了统一的壁垒”[118]。冯玉祥在宣誓就职的答词中表示：“奉命之日，异常慌悚。当兹外患日亟，国将不国，玉祥既为党员，又系军人，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不敢稍有规避之心，愿本愚诚，追随各位同志之后，效命国家。……竭诚辅佐蒋委员长，努力复兴民族之工作，确【恪】尽救亡图存之责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19]

这次改组，国民党中央虽然形式上是胡、汪、蒋三驾马车并立，采“集体集权”的形式，但实际上是蒋的权力得到很大加强。蒋派在党政二方面均占大多数。在中常会、中政会，蒋介石虽屈居副主席职，但因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后，国民党中央虽曾电请他晋京主持中常会，并派出许崇智、叶楚伧、陈策等前往劝驾迎迓，邹鲁五全大会返回广东后，也敦促他启程，胡的反南京态度虽有缓和，但他对蒋的积恨难消，始终犹豫不决，再加上西南对他殷切挽留，终未能成行，随后不久即因脑溢血逝世，蒋于是成了中常会事实上的主持人；汪精卫因被枪击受伤，一个时期内不能主掌中枢，蒋又成了中政会的主持人，除顾孟馀外，汪派在中枢不剩一人。舆论因此说“此系蒋氏专政加强之表示”[120]。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也由此得出结论：“自兹，蒋公遂躬负党政军重职于一身。”[121] 五全大会通过的《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中，第一条即规定：“为冲破目前危局，统一全党意志，集

中全民力量起见，应授权于本党文武兼赅、伟大崇高之领袖，使之统筹一切，全党同志听其指挥。”[122] 五届一中全会只不过把这一规定付诸实践而已。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为了解决两广事变问题（详后），研究对日本侵略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秉承五全大会既定的方针进行，参加中委一百六十余人，“各地委员躬负重责或久未来京者，无不专莅首都，共襄大计”[123] 。全会推定蒋介石、孙科、冯玉祥、于右任、丁惟汾、居正、陈果夫、王法勤、孔祥熙九人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13日，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应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同时还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并通过国防会议条例。其第一条说：“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124] 指定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傅作义、余汉谋等十八人为国防会议成员。

关于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解释说“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各项决议办法，大家可以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125] 7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蒋介石为国防会议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孔祥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学良、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余汉谋等三十人为国防会议会员。同日，冯玉祥日记中记：“连日开会，其最大事件：开国防会议，而其中之事件又为陈、李、白如何下台。”“我思之甚久，觉得不妥，故对介石说，如冒【贸】然取消，恐对大局不利，莫若设一最高国防会议，指定七人或九人，容纳陈、李、白在内，可以免除意外。”“我对介石谈高级国防会议之重要性，不论如何须留两广同志一条路，以期能和平了事而不伤国家之实力也。介石甚是之。”[126]

蒋介石代表主席团在全会上作了题为《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的报告，对他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外交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还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127) 蒋介石的上述言论，较之五全大会时有了明确的态度。他第一次公开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要确保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蒋介石的对外政策为二中全会所接受。全会通过的宣言说："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国家既处此非常之形势，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128)

14日，冯玉祥致闭幕词说："这次二中全会会期虽然不长，但是精神很好。在这样热的天气，大家平心静气聚在一起，讨论一切救亡大计，这样好的光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实在是很好的现象。这回大会中最紧要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防会议。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救国会议，实在非常重要的。"(129) 舆论称："二中全会舍解决时局具体办法外，要以国防会议为其最大的成就。"(130)

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放弃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了强硬立场；同时在外交、军事、经济方面，为抗日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131)]

第四节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和颁布

一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

1931年5月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第八十六条，遵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第二十二条，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132)]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外侮日亟，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一部分有识之士要求抗日救亡，实行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1932年4月7日，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会内会外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会议因此超出原定的议题范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如期结束训政，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在国民大会未召集前，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大会应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日成立。从此，训政与宪政问题便引起社会上的深切注意。

4月下旬，上海"一二八"抗战刚结束，孙科即发表谈话，主张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实行宪政，彻底抗日。他说："国家当此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秋，余始终认定惟有彻底抗日，为党国唯一出路；惟欲彻底抗日，则非全国全党一致不可，尤须于最短期内，努力促进宪政，完成训政，建立民主政治。"[(133)] 同日，孙科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一文，其总纲第一条即为"集中民族力量，贯彻抗日救国之使命，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第三条为"于本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议决"；第四条为"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召开第一届国民会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134)]。

孙科的意见当时得到了国民党外许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但也遭到党内汪精卫、于右任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程度太低，如不经过国民党的训政，便不能运用民主政治，不能实行宪政；没有国民党，便没有中华民国，而破坏训政，便是破坏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汪精卫还对主张实施宪政的某些人士说："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135]"训政工作一天没有完成，一天就不能谈宪政。"[136] 5月3日，于右任发表《放弃训政与革命危机》的专文，以纠正孙科的谈话。他认为国民党还在"革命"时期中，不能放弃"训政"，否则即是"革命的危机"[137]。

对此，一些积极主张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爱国民主人士，立即给予批驳。王造时著文指出：国民党不配"训"，不能"训"，"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既讲训政，决不能讲民主政治"。"国民党以前没有训政，固然是党，即使现在结束训政，仍然是党。我们之所以主张结束训政，不过想取消国民党垄断政权的特殊地位而已"[138]。他还说："中国现在是寡头政体，无可讳言。寡头政体时起内讧，又是事实，全国人民不满意于现状，那更是不可否认的现象。老实说，到现在，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的局面了。"他认为变的方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争斗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另外一条路就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在今日强寇已经入室，人民无以聊生的时候，理性告诉我们，最好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解决。……我所谓的和平方法，便是实行宪政"。"我们今后如果不行民主共和政体则已，否则只有实行宪政，以法治代替人治"。"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139]。江苏国难救济会也发表一项通电，痛论党治之失，要求在"三个月内结束训政，五个月内制定宪法"[140]。

12月召开的国民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与伍朝枢、马超俊等二十

名中央执行委员联名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该案《关于宪政之准备》一项中提出："（一）为集中民族力量，彻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应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继续进行实行宪政开始之筹备。（二）拟以二十二年一月至六月为宪法起草期间，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准于二十二年十月十日将宪法草案发表，以备国民之研讨，为提交国民代表大会之准备。（三）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四）宪法颁布后，政府应依照宪法规定地方制度，切实完成地方自治及所有训政时期未尽工作。（五）假定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141] 这一提案修正后获得全会通过，并作出决议："（一）为集中民族力量，彻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应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继续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二）拟定二十四年二月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宪法颁布日期。（三）立法院应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之研讨。"[142]

1933年1月，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他就职伊始，遵照中央决议，罗致专家四十人，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自己兼任该会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委员共四十余人，并推定张、吴及马寅初、焦易堂、陈肇英、傅秉常、吴尚鹰七人为主稿委员。孙科提出制宪的两条基本指导思想："第一，我们需要的是五权宪法，因为它是最适合我们的国情和时代需要的；第二、五权宪法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不但它的精神不应违背三民主义，就是它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应用三民主义的原理来研究，来制定。"[143] 张知本首先遵照孙中山遗教起草宪法，内容分一、基本原则；二、民族；三、民权；四、民生；五、附则，共一百七十一条。脱稿后，张知本因事辞去副委员长职，旋由吴经熊就张稿斟酌损益，写成"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宪法与保障"共五篇二百一十四条，经孙科同意，于6月7日以吴经熊个人名义发表，以征求各方之批评意见，世称之为"吴稿"。"吴稿"发表后，批评意见甚多。有的认为应当成立独立的宪法起

草委员会，而不能由像立法院这样的政府机关负起草宪法的重任，并反对由国民党制定党国的宪法；有的认为宪法应集合全国宪法学者共同草议，不能由个人主稿，以免疏漏。吴经熊友人、当时任立法院编辑处专员的黄公觉撰文答辩，对“吴稿”赞扬备至。

“吴稿”发表后，由孙科指定初稿主稿委员焦易堂等七人于8月31日至11月6日开审查会，共开会十八次。审查讨论时，以“吴稿”为基础，加上张知本、陈肇英、陈长蘅分别草就的三个试拟稿作参考，并充分采纳社会各方之批评，就“吴稿”修正为十章一百六十六条，是为主稿七委员之初步草案。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1月举行会议，逐条审查初稿，共开会十一次，至1934年2月23日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完毕，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共分十章一百六十条，3月1日由立法院在报章上公布。宪委会以宪草初稿已经完成，即于2月28日结束。

宪草初稿公布后，各方名流学者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6月，孙科请傅秉常、林彬、陶履谦等三十六人组织宪草初稿审查委员会，审查各方所提意见共二百八十一条，交傅、林、陶三委员审查，共开审查会八十二次，决定采用之意见二百一十六条，并附有《总理遗教中关于宪法问题摘要》一文，编成《宪法草案初稿意见书摘要汇编》，刊印成册，以便参考。

随后由孙科主持召开审查委员会会议九次，编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全文共分十二章一百八十八条，于7月由立法院在报刊上公布，并印送各方面征求意见。9月21日立法院开第六十八次会审查宪草，先后开会八次，至10月16日完成三读程序，当经出席委员一致议决通过，是为立法院第一次议定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11月9日送呈国民政府转国民党中央审核。

12月10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开会，将宪法草案提出讨论，并决定交中央常务委员会审查。1935年10月17日，中常会审查宪法草案完毕，于第一九二次常会作出如下决议：“一、为尊重革命之历史

基础，应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及《训政时期约法》之精神，为宪法草案之所本。二、政府之组织，应斟酌实际政治经验，以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制度。行政权行使之限制，不宜有刚性之规定。三、中央政府及地方制度，在宪法草案内，应于职权上为大体规定，其组织以法律定之。四、宪法草案中有必须规定之条文，而事实上有不能即时施行，或不能同时施行于全国者，其实施程序，应以法律定之。五、宪法条款，不宜繁多，文字务求简明。”(144) 立法院根据上述原则，指派傅秉常、吴经熊、林彬、马寅初、吴尚鹰、何遂、梁寒操七人为审查委员，将宪草逐条审查。10月下旬，立法院三读通过，是为立法院第二次议定之宪法草案。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将宪法草案提出讨论，并作出决议：“本会同人认立法院最近修正之宪法草案，大体均属妥善。惟为适应国家现实情势及便于实施起见，似尚应有充分期间，以详尽之研究与讨论。但现在距代表大会为日无多，且代表大会会期甚短，恐亦无暇逐条详商，为最后之决定，因此拟请六中全会将上列理由，连同本宪法草案，送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将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先行决定；并对于宪法草案加以大体审查指示纲领，再行授权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较长时间之精密讨论，提请国民大会议决颁布之。”(145)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就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作出的决议，已如前述。随后国民党中央指定叶楚伧、李文范等十九人组成宪草审议会。审议会征集蒋介石、汪精卫等各领袖意见，拟具审议二十三条，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后送交立法院。立法院奉命后，指定傅秉常等八人先行整理，于1936年5月1日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是为立法院第三次宪法草案。国民党于5月5日公布，定名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除“五五宪草”外，立法院还拟订了两种重要法规，一是《国民大会组织法》，共二十条，一是《国民代表选举法》，共六十二条，均于5月14日公布。

二 “五五宪草”述评

“五五宪草”全文共八章一百四十八条。其“弁言”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付托，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之遗教，制兹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146] 第一章总纲，规定国体、主权、领土、民族、国旗及国都。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通信、信仰宗教、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有财产、请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考试等权。第三章国民大会，规定国民大会之组织职权及会期，代表之选举任期。第四章中央政府，规定总统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之职权责任，总统、副总统及各院院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期。第五章地方制度，规定省县市府的职权，省长、县长、市长、省议员、县议员、市议员的任期及选举。第六章国民经济，规定中华民国之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并规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生产事业等事项。第七章国民教育，规定教育宗旨，以及人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教育经费之保障，教育事业、学术研究之奖励等。第八章宪法之施行及修正，规定宪法的效力、解释、修正等。

“五五宪草”规定的国家政治体制为五权宪法制度。“宪草”第四章中央政府中，规定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各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最高权，五院平行，不相统属，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制约。“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第三十六条），但既非总统制下的元首，亦非内阁制下的元首，而是五权制下的特设的国家元首。“宪草”规定，总统对外代表国家，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并行使宣战、媾和、缔约，宣布戒严、解严、大赦、减刑、复权，任免文武官员、授予荣典等权，其权力与美国总统制的总统相当。但美国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家的实际行政首脑，直接处理政务，而“宪草”中的总统只是国家元首，不是行政首脑，类似孙中山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

时期《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的内阁制的总统。“宪草”中规定“行政院为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权之最高机关”（第五十五条）。这表明国家行政不由总统负责处理，而由行政院直接负责。行政院设行政会议，由行政院正、副院长及政务委员组成，是行政院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院处理的重要政务，如提出于立法院的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等等，均应由行政会议议决（第六十一条）。总统若对行政事项有意见时，得提交行政会议，不能直接作出决定。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时，须关系院院长之副署（第三十八条）；如遇国家有紧急事变，或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得经行政会议议决（第四十四条）。“宪草”规定虽然行政院对总统负责，但总统与其他四院均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国民大会可以罢免总统、副总统，创制、复决法律，而总统不能解散国民大会。因此，“宪草”规定的总统制，与美国的总统制有明显的区别，是介于美国总统制和英国内阁制之间的一种折衷制度，不过总统制的成分稍多一些。

“宪草”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沿袭过去历次约法，规定对人民的权利采取“法律间接保障主义”，而不是“宪法直接保障主义”，从第十一条至第十六条均加了“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附加字句。这项规定从“宪草”开始，即遭到许多人士的非议，认为这种规定“殊不妥当”，其理由是：“我国无宪政习惯，不能担保立法机关不制定违背宪法之法律，而司法机关又无权保障宪法赋予之权利。”“宪法所畀予之自由，皆得以普通法律剥夺之，宪法保障等于虚伪。”“人民权利如依法律得以停止或限制，则政府随时可以另定法律以侵夺人民之权利，尚可【何】保障之可言？”(147)

在“宪草”起草委员会领导人之间，对这一部分条文意见亦有分歧。张知本主张采“宪法直接保障主义”，认为“非依法律”等字样，在宪法里最好不用，“因为假如有了这样的限制，反致宪法的保障精神失掉了，有宪法等于没有宪法无异”。所以他主张把“非依法律”一语一

律删掉，“这样才可以限制许多单行法和特别法的产生，可以充分表现宪法的保障精神”[148]。吴经熊等多数委员则与之相反，主张采取“法律限制主义”，认为宪法是法律的法律，一切的法律都应根据宪法而制定；单行法和特别法如果有违宪的地方，尽可取消或修改；而且现在人民权利被剥夺侵害真正的原因，并不在单行法太多，而在执行官吏未能依法办理所致。20世纪的各国宪法，没有哪一国绝对规定人民的权利是毫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已不适用于国际间了。当前中国遇着空前的国难，在此情况下，只有整个的国家，没有人民的自由；而且孙中山曾说过，中国人个人自由太多，团体自由太少了。因此不能不对人民的权利稍加限制。如果不用“依法”字样，将来事实上人民有犯罪嫌疑必须逮捕拘禁时，会借口宪法上没有规定来进行抗拒。所以“依法”的字样还是要保存，以免产生流弊[149]。

讨论结果，吴经熊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只对部分条文作了如下的修正：原条文第三项“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修正为“人民有身体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原条文第八项“人民之居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修正为“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处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原条文第十一项“人民有秘密通信、通电之权利，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修改为“人民有通信、通电秘密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150]。其他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条文，已写得较明确，照原案不动。孙科也赞同采用法律间接保障主义，说：“法治国之通例，未有予人民以绝对之自由者。”“彼主张直接保障之说者，亦谓恶法将侵犯民权而无余，而等宪章于具文，不知过去民权之失保障，非法律之不良，行政机关实有以蹂躏之，且宪法颁行以后，法律由民意机关所决议，人民又得运用创制与复决之权，即有恶法，又何患乎无制。”[151] 初稿主稿人认为宪法一面既授予人民自由权，而一面又说依法律可以限制停止，以剥夺其自由权，未免有些矛盾，所以增加一种规定，即：“本章前列各条所称停止或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之法律，以为社会秩序、公共利益

或避免紧急危难而制定者为限。”[152] 1934年7月9日公布的宪草初稿修正案，为保障民权，又增加一条国家赔偿制度，条文如下：“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153] 10月16日经立法院通过，以后各次修改稿均未变更。

宪草中关于人民权利采取法律保障主义，允许用法律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的条文，以后一直存在着争议。人们认为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不符。孙中山在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宣言》中明确说：“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154] 后又说：“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55] 所以在宪法上必须采取宪法直接保障主义；如果采用限制主义，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为法律所限制，就有悖于民主政治的原则。“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固然是限制政府，使不得在法律以外任意侵犯人民的自由权利，但同时也就是允许立法机关可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如果立法机关制定一治安警察法，则人民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便要受到侵犯；如果立法机关制定一新闻纸法，则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便要受到限制。这样一来，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的自由权，便成了具文。

“五五宪草”之制定历时三载，共开会百余次，广泛地征求了意见，七易其稿，是一部在形式和文字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宪法草案。“宪草”中规定的中央政体，基本上属于一种民主政体，而不是独裁专制政体。尽管它还有不完备和值得商榷批评的地方，但比辛亥革命后任何一部约法都要高出一筹，就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重要一步。舆论评论说：“我国宪政制度的拟议，自君主立宪起，一直到民国十二年的曹锟宪法止，可以说自始至终，离不了‘抄袭’的原则。这一次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虽则不能算十分妥贴，却有一点值得赞扬，就是脱离了抄袭的窠臼，依据总理遗教，自行创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本位的制度。”[156] 一位根本反对颁布宪

法、实施宪政、主张领袖独裁的人士也指出："经过三年之筹备，千百学者之精密讨论，这一部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宪法草案的内容，大体上不可不谓相当完善。不过宪法之能否发生效力，还在于全国人民之拥护与遵守。"(157)

按国民党中央原来的规定，应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后因大会代表未能如期选出，决定延期举行。

第五节　联苏联德制日方针

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表明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南京国民政府为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不得不寻求国际援助。加紧联苏联德外交，即是在这方面采取的重大步骤。

一　中苏复交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九一八"后，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苏行径，认为日本入侵是中苏绝交招来的恶果，要求中苏复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恢复中苏邦交的，不仅有进步的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和舆论界，还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上层人士。在朝野人士的共同呼吁下，从1932年4月起，国民政府派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开始商议复交问题。为避免日本从中破坏，谈判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由双方出席国际缩军会议的代表（中方是颜惠庆，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举行。到12月12日，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宣布正式恢复邦交。

"九一八"后，中苏两国面对着共同敌人的侵略与威胁。日本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屯集重兵，滋事寻衅，日本军部扬言要实行"北上"方针。这样，苏联远东地区就处于日本的直接威胁之下。共同的利害和命运，是中苏两国捐弃前嫌，迅速恢复邦交

的根本原因。

在中苏复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国关系发展缓慢。个中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在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他不急于联苏，怕联苏不利其“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推行。同时，蒋介石也不了解苏联对他当年反苏持何态度，担心“四一二”后这段历史是他改善对苏关系的障碍。

1935年后，蒋介石加快了联苏步伐，这与下述情况有关。首先，由于华北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急需寻找外援。鉴于“九一八”后美英对南京的要求多是口惠而实不至，又考虑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中国难以从海路获得外援；而中国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是接受外援的可靠通道。其次，蒋通过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退出闽赣和鄂豫皖等苏区，在长征过程中实力减弱。在蒋介石看来，到达陕甘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蒋便放心地改善对苏关系，加快联苏步伐。再次，了解到苏联的友好态度和联华的迫切心情。1934年暑假，受到蒋介石器重并亲自接见的自由主义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计划访欧，搜集有关历史资料。蒋介石于7月27日在庐山再次召见他，嘱其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告知苏联政府，蒋廷黻是作为他的代表访苏，请苏联通力协助。蒋廷黻在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10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接见他，向他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友好情意。斯托莫尼亚科夫对蒋廷黻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苏联还因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蒋廷黻问：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不知“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斯托莫尼亚科夫解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和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争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蒋廷黻接着说，中苏两国在1924年—1927年紧

密合作后，关系破裂了，“在关系破裂期间，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他问“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斯托莫尼亚科夫在回答这个敏感问题时说：1927年后中苏关系的破裂，责任在中国执政当局，但是我们“不要追究往事”，“也不要感情用事”。他强调：“在确定我们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关系”。斯托莫尼亚科夫郑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蒋廷黻听后十分满意和高兴，他对斯托莫尼亚科夫表示谢意后说：“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的观点，我将马上将我们的谈话报告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影响。”蒋廷黻向苏方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蒋介石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情况，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反对苏联，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158)

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见后，立刻致电蒋介石报告访苏情况，建议蒋实行联苏方针，电文中说：中苏“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159)。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160)。

为加快联苏，蒋介石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35年4月，蒋派其亲信邓文仪以陆军上校军衔去莫斯科，任驻苏使馆首席武官。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物，除履行武官职责外，还奉蒋命秘密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秘密谈判的序幕。邓还两次会晤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布留赫尔（即1927年前在广州的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将布留赫尔提出的中国应如何抵抗日本侵略的建议派人直接呈报蒋介石。年底，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陈立夫去苏联，希望与苏缔结反日军事同盟。陈立夫由张冲陪同前往。

为躲避日本特务耳目，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陈立夫化名李辅臣，张冲化名江融清。圣诞节前，他们乘船先到法国，后转至德国柏林，待命去莫斯科。后来，蒋认为时机不到，命陈等“返国与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交涉”[161]。

随着中苏邦交的恢复和关系的改善，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1934年，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35年2月，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应邀访苏，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评论说：“在近来游俄的各国戏剧家中，没有人能像梅兰芳博士那样的成功，这非是夸大的话。”这位大使认为，梅兰芳在苏演出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他的戏剧天才”外，还“因为他是中国的戏剧家，是我们人民一向有最大的同情之大国的戏剧家”[162]。1935年10月26日，“中苏友好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约三百人出席成立大会，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担任协会会长，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以及颜惠庆、鲍格莫洛夫担任名誉会长，十五名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任协会理事，著名教授张西曼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二　中苏代表会谈

蒋介石加快联苏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举行会谈。从1935年秋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双方曾会谈多次。谈判涉及的内容很多，中心议题是中苏联合制日和苏联援华问题。中方参加谈判的代表除蒋介石外，还有孔祥熙、陈立夫、宋子文、张群等。

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与鲍格莫洛夫谈判时提出：将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通过海路难以获得任何军需物资”，“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163]对此，苏联政府给予肯定性答复。11月15日，莫斯科电示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请“通知中国政府”[164]。

苏联政府此时口头上答应了南京的要求，但在行动上十分谨慎。其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蒋介石对日妥协，尤其害怕蒋联日反苏。1935年12月28日，莫斯科外交当局在给鲍格莫洛夫的信中指出："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如果蒋介石真正参加抗日解放战争，我们准备给中国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但同时指出："同蒋介石缔结互助协定的时机还没到来"，因为"蒋介石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实行让步，尽管这种让步比以前少多了……但毕竟不能排除他企图利用同我们的谈判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可能"[(165)]。1936年初日本抛出"广田三原则"（详后）后，苏联的这种担心就更为严重，几乎中苏每次会谈，苏方代表都要询问中日交涉情况，特别是南京对待"广田三原则"的态度问题。在蒋介石的对日政策还处于摇摆、对日态度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苏联对援华采取拖延态度是自然的。二是苏联要求蒋介石调整对中共的政策，由"剿共"改为联共。苏联政府认为，国共两党的内战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蒋只有停止"剿共"，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莫斯科指示鲍格莫洛夫：在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表明苏联政府对此问题很关切。南京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同时还要向蒋讲明：苏联不准备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166)]。

蒋介石懂得，为谋求苏联援助，在国内须做出些姿态；同时，他认为第五次"围剿"后转移到陕甘的红军，可用收编的办法予以解决。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直接向鲍格莫洛夫表示：苏联"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对红军的处理问题，若能对此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他"要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对红军施加影响"，接受他的收编。蒋说，如能这样，"就表明了苏联政府对南京的诚意，南京政府则可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鲍格莫洛夫郑重回答蒋说："苏联不拟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因为这"纯系中国内政"[(167)]。两个月后，即3月21日，孔祥熙告诉鲍格莫洛夫，蒋介石已开始同

中共秘密谈判。

1936年10月，蒋廷黻接替颜惠庆担任驻苏大使。他到任后，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莫斯科会谈数次，想把中苏两国谈判地点从南京移到莫斯科，由于苏方反对未果。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的会谈还涉及中日关系、苏联与新疆关系以及苏方向蒋廷黻通报日德签订反共协定等有关问题。

三　联德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开展对苏外交，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也大力开展对德外交，并取得了德国的援助。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走扩军备战道路，急需中国南方出产的钨、锑等战略物资；而国民政府不论是为了“围剿”红军，还是为了准备武装抗日，都需要得到德国的军事援助。这就是3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蜜月”的原因所在。

1933年1月和7月，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访德。这两次访问虽未取得实际成果，但双方增进了了解。不久德国政府无视日本反对，支持已退役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来华，担任德驻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1934年4月来华后，大力促进中德两国的政治、经济来往。此前，德国奥托倭夫公司已与中国签订了筑路合同。此后，该公司又与中方签订了修建浙赣铁路、湘黔铁路及修复平汉铁路合同。在塞克特努力下，同年夏南京政府派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交通部副部长俞飞鹏率领军事民用考察团访问德国，主要目的是考察、购买机械化部队和情报部门所需器材，并考察德国的交通设施。考察团受到希特勒和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的接见。中德贸易最大项目《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交换实施合同》，是当年8月23日由孔祥熙同汉斯·克兰（得到德国国防部、经济部支持的军火销售商）签订，并得到希特勒和德国政府及德国银行的批准。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致函孔祥熙，认同中国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要求中方

尽快说明一二年内计划向德国输出的农矿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答应给予中国二千万马克的信用贷款。不久，德国得到中国提供的二千吨钨砂，德国防部长布隆白立即致函蒋介石和孔祥熙，表示感谢。

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1935年5月，中德将各自在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介石称赞这是两国间特别友好关系的象征；希特勒认为这反映了德国精心热切地培养和加深两国长久存在的友好关系的愿望，是两国团结、友谊的象征。

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为争取外援准备抗日，在联德方面采取了更积极的步骤。1936年2月，国民政府派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德。希特勒2月27日接见代表团。4月8日，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信用贷款合同》，主要内容是：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贷款，中国可随时用之于购买德国工业及其他产品，并规定这笔贷款除南京资源委员会提取少部分用于购买工矿设备和进行技术合作外，其余绝大部分由南京当局用来买德国的军火和兵工设备。抗战前，德国军火输入中国的数量猛增，1936年是2374.8万马克，1937年则为8278.9万马克，其中包括榴弹炮、海岸防卫炮、高射炮、鱼雷快艇、军用车辆和各种枪支等。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量的80%。与此同时，中国向德国输出的战略物资也逐年增加，如钨砂输德量，1933年3766吨，1934年4385吨，1935年7883吨，1936年8726吨。德国通常进口钨砂占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其中60%—70%来自中国。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国南部军区司令莱谢芳访华，作为中国代表团访德的回访。他的主要使命是视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情况，培养与密切同蒋介石的关系。

希特勒上台后，在国内建立纳粹党一党专政体制，但当时由职业外交家牛赖特主持的外交部仍有一定独立性，对中日两国保持“中立”立场，使中德关系一度获得发展。但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

《反共产国际协定》后，中德关系迅速冷淡，日渐恶化。

---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第147页。

(2)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9页。

(3)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2页。

(4) 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224页。

(5)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23页。

(6)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2—63页。

(7) 《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

(8)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版，第33页。

(9)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103页。

(1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二），第74页。

(11)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68页。

(12) 河北省民政局：《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167页。

(13)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70页。

(14) 指1902年清政府与日本关于归还天津的换文。

(15)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61页。

(16)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61页。

(17)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79页。

(18)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43页。

(19)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54页。

(20)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51页。

(21)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52页。

(22)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78页。

(23)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74页。

(24)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95—97页。

(25) ［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日本外务省1978年版，第303页。

(26)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56—57页。

(27)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43页。

(28) 鄂森：《土肥原与日本侵华》，上海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04—105页。

(29) 《国闻周报》第12卷42期。

(30) 《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20日。

(31) 《新天津晚报》，1935年11月20日。

(32)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0页。

(33) 《关东军关于向国境集中向参谋本部的报告》，引自［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320页。

(34) 《关东军关于向国境集中向参谋本部的报告》，引自［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1页。

(35) 《华北日报》，1935年11月12日。

(36)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1页。

(3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4页。

(38) 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版，第469页。

(39)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0页。

(4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1页。

(41) 《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

(4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1、713

页。

(43) 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469页。

(4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4—715页。

(45) 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652页。

(46)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93页。

(47) 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48)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3—64页。

(49) 刘映元：《李守信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57—58页。

(50)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468—471页。

(51)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122页。

(52)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19页。

(53)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21页。

(54)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492页。

(55)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页。

(56)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26页。

(5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二），第217页。

(58)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内蒙古史资料》第6辑。

(59)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28页。

(60)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32页。

(61) 内蒙古政协：《内蒙古文史资料》第6辑。

(62) 《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5日。

(63) 汪精卫：《第四届第六次中全会开会词》，《申报》1935年11月2日。

(64)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65)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74页。

(66) 《蒋冯书简》，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年版，第1页。

(67) 《蒋冯书简》，第1页。

(68) 《蒋冯书简》，第2页。

(69)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65页。

(7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1860页。

(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1941年版，第610—611页。

(72) 李公朴：《新闻检查制度》，《读书生活》第3卷第1期，1935年11月10日。

(73)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7日。

(74)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32、634页。

(75) 《国民党五全代会记（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18日。

(7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1935年11月11日。

(77) 《国民党五全代会记（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18日。

(78) 邹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6年版，第455页。

(79) 《益世报》（天津），1935年11月18日；《救国时报》（巴黎），1935年12月28日。

(80) 《国民党五全代会记（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

1935年11月18日。

(81) 短评：《两广重要代表到京》，《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12日。

(82) 《祝五全代会》，《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12日。

(8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45期，1935年11月18日。

(84) 《救国时报》（巴黎），1935年12月28日。

(85)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13日。

(86)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0日。

(87)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0日。

(88) 罗家伦：《伟大与崇高》，《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

(89)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

(90) 《处于内外夹击中汪精卫之两重病因》，《中兴报》（香港），1935年8月4日。

(91) 《处于内外夹击中汪精卫之两重病因》，《中兴报》（香港），1935年8月4日。

(92) 《一周简评·汪院长病假》，《国闻周报》第12卷第26期，1935年7月8日。

(93)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5页。

(94) 《中央周报》第378期，1935年9月2日，按：此为中文原文。

(95)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65页。

(96) 邹鲁：《回顾录》，第455页。

(97) 邹鲁：《回顾录》，第458、459页。

(98)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39页。

(99)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47页。

(100)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75页。

(101) 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外务大臣广田之第1290号报告（1935年11月21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10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7页。

(103)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4日。

(104) 博古：《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火线》第66期，1936年11月30日。

(105) 稚言：《历届国民党中央人数统计》，《国闻周报》第12卷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106)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出版，第219页。

(107)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5日。

(108) 《邹鲁在纪念周报告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申报》，1935年11月19日。

(109) 《大众生活》第1卷第1期，1935年11月16日。

(110) 《民国阎百川先生锡山年谱初稿》第5集，第1872—1873页。

(111) 《五届一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112) 马季廉：《可宝贵的时机》，《国闻周报》第12卷第49期，1935年12月16日。

(113) 《中枢新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9期。

(114) 社评：《政府改造之时局的意义》，《大公报》（天津），1935年12月13日。

(115)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49期，1935年12月16日。

(116) 社评：《政府改造之时局的意义》，《大公报》（天津），1935年12月13日。

(117) 《大公报·短评》（天津），1935年12月19日。

(118) 《中枢新阵营》，《国闻周报》第12卷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119)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66页。

(120) 《救国时报》（巴黎），1935年12月28日。

(121) 《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1949年印行，第53页。

(12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123) 《中央党务月刊》第96期，1936年7月。

(124) 《时事新报》，1936年7月15日。

(125)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第382页。

(126)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754—755页。

(127) 《时事新报》，1936年7月14日。

(128) 《大公报》（天津），1936年7月15日。

(129) 《大公报》（天津），1936年7月15日。

(130) 《评坛：论国防会议》，《时事新报》，1936年7月16日。

(131) 《毛泽东年谱》上册，第574页。

(132) 《国民政府公报》，法规，第786号，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1931年6月1日印，第146页。

(133) 《中央日报》，1932年4月25日。

(134) 《中央日报》，1932年4月25日。

(135)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第180页。

(136) 平心：《中国民主宪政史》，上海进化书局1946年第2版，第308页。

(137) 《申报》，1932年5月5日。

(138) 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申报》1932年5月8日。

(139) 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时事新报》1932年6月19日；参见王造时：《荒谬集》，第45—57页。

(140) 《申报》，1932年4月24日。

(141)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第552页。

(142)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第557页。

(143) 孙科：《我们需要何种宪法》，《东方杂志》第30卷第7期，1933年4月1日。

(144)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第577页。

(145)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1935年11月11日。

(146)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申报》1936年5月2日，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同。

(147) 《宪法草案意见书摘要汇编》，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1934年6月编印，第49—51页。

(148) 宪委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

(149) 宪委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

(150) 宪委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及议事录。

(151) 孙科：《中国宪法的几个问题》，《申报》，1934年10月10日。

(152) 宪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

(153)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下册，第982页。

(154)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155)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页。

(156) 金鸣盛：《宪法草案与总统独裁》，《东方杂志》第33卷第15号，1936年8月1日。

(157) 寒梅：《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新人》周刊第2卷第36期，1936年5月9日。

(158) 以上引文均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与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蒋廷黻教授的谈话记录》，《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1年版，第640—644页。

(159) 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0) 《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161)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99页。

(162) 《苏俄评论》第9卷第5期，1935年11月6日。

(163)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62、663页。

(164)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62、663页。

(16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02页。

(166)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723页。

(167)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第35—38页。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下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下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华书局

目录

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第一节　“一二九”运动
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
二　“一二九”运动爆发
第二节　救国运动的兴起
一　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
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三　各地救国运动的开展
四　上海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
一　两广“六一”事变
二　绥远抗战
三　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趋向强硬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一　在莫斯科的接触
二　CC派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谈判
三　董健吾陕北送信
四　张子华充当联络员
五　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
第五节　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迫害
一　对救国运动的压制
二　“七君子”事件
三　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第七章　西安事变
第一节　西安事变的起因
一　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接连失利

二　中共与张学良共求联合抗日
三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四　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
五　营救“七君子”
第二节　西安事变的爆发
一　诤谏失败
二　临潼兵谏
三　解除蒋系武装
四　摧毁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
第三节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的反响
一　国民政府和战两派的分歧
二　地方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反映
三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四　国际上的反应
第四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一　宋氏兄妹的营救活动
二　周恩来在西安的调解
三　蒋介石获释
四　张学良被扣
五　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瓦解
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
第一节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结束
一　“安内攘外”政策的变化
二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第二节　对救国领袖的继续迫害
一　“七君子”案的开庭审理
二　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三　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
第三节　救国无罪，人民的抗争
一　新的营救抗议浪潮

二　救国入狱运动
三　“七君子”保释出狱
第四节　联共联苏付诸实施
一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积极进行
二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第一节　国民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建立
一　财政收支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二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三　财政审计制度的确立和财政法规的制定与推行
第二节　海关行政的改革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现
一　改革海关行政制度
二　实行自主制定关税政策
第三节　税收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一　中央税制的整顿和改革
二　整顿改革地方税收制度
第四节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与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初步确立
一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
二　对私人行庄的控制与全国金融网的形成
第五节　整理货币与废两改元
一　货币制度的整理
二　图谋采行金本位制与实行海关金单位
三　实施废两改元及影响
第六节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　实施法币政策的导因和条件
二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三　实施法币改革政策的效应
第七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财政收支概况与赤字
一　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和赤字
二　内战军费和债务费占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三　以关盐统三税为中心的国税收入不断增长
第八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的内外债
一　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外债
二　国民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
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
第一节　经济行政的调整
一　实业部的设立
二　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
三　资源委员会的建立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一　国营经济的建立
二　对民营企业的扶助
三　合作事业的推广
四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第三节　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效
一　工业生产状况
二　交通运输状况
三　农村及农业生产状况
四　对外贸易状况
第四节　抗战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计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第一节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一　初级教育
二　中级教育
三　高等教育与留学教育
四　其他各类教育
五　乡村教育运动
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发展
一　中央研究院
二　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

三　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第一节　“一二九”运动

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

（一）“八一宣言”和“秘密指示信”

鉴于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共产国际于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报告，揭露法西斯的极端反动性，分析法西斯上台的原因和共产党应记取的教训，并着重论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8月20日，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为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具体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1)

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宣言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

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2]“八一宣言”还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3]。“八一宣言”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以及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

1935年10月的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4]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一大步。它对华北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问题都作了分析和阐述。

指示信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全面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广大小资产阶级已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加入了“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一些国民党的将军们，他们一面不愿当亡国奴和日本的走狗，另方面又为士兵群众革命所威胁，不能不另图生路”。总之“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

“指示信”提出：党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指出“党现在如果不见到中国这样新的阶级变动，不认识新的革命力量，不会使用这些新的力量，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指示信”提醒全党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当然，参加统一战线的人“因阶级

利益之不一致，其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是，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指示信”还指出，统一战线能否胜利实现，关键是正确的实现党的领导权。

（二）瓦窑堡会议决议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即与共产国际失掉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设法与国内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便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新政策。首先是派张浩（原名林祚培，号育英，湖北黄冈县人）返国。乔扮成小商人的张浩穿越蒙古沙漠，于1935年11月上旬到达陕北定边，后由赤卫队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张浩先向张闻天、邓发等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2月8日，张闻天、张浩等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张浩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张浩回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政策。1935年11月28日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5)] 这是中共中央在国内发表的第一个反映“八一宣言”精神的文件。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秦邦宪、邓发、李维汉、张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6)]。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空前的民族危机，“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总之，“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会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决议重申“八一宣言”提出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人民共和国不仅代表工人农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它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力量。瓦窑堡会议还强调要用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反日斗争的领导权，否则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瓦窑堡会议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7)]的报告。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历史表现，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客观必然性作了深刻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列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态度变化的大量事实，批驳了那种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其变化，拒绝同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提出为了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

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左”倾关门主义的幼稚病。他说，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泽东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虽然都指出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分裂的可能性，提出了要利用敌人内部“争斗”“缺口”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没有看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已由软弱趋向强硬，由一味妥协退让趋向抵制，而继续把他看成是“卖国贼头子”，仍旧采取“反蒋抗日”方针，把蒋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显然，这与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8)]。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的开始。而促成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立场，确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按着历史发展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张学良的影响。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合抗日。经过1936年1月李克农与张学良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当李克农准备再次与张会谈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他要“坚持抗日反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同时又要他“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策略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总之是要“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9)]。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再次在洛川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都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待蒋介石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的分歧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力量，又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李克农则认为，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围剿”抗日力量，破坏反日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包括蒋介石。这次会谈后，李克农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与张会谈情况，并列席3月下旬在晋西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3月27日会议上谈到与张学良谈判的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张重申并坚持他的上述意见。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10)] 张学良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国民党爱国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了停战、通商等协议；可是他始终没有接受“反蒋”方针，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张学良的态度，不能不使中共中央考虑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亟须团结御侮的形势下，“反蒋”方针究竟能否行得通，是否有修改的必要。周恩来、张学良会谈后，4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宣言》说：“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11)] 随后发表的“五五通电”，不仅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且表示愿与南京订立

抗日协定。所有这些，不能说没有受到张学良的影响。

二、随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也在日益深化。这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方针的根本原因。瓦窑堡会议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在晋西石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仍坚持反蒋抗日方针。6月，“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地方实力派出兵湘南，与蒋形成武装对峙的严重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南京当局为集中力量对付两广，避免共产党与两广联合起来共同反蒋，它在与共产党的秘密谈判中态度有所变化，表示愿在一定条件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他所作的关于外交方针的报告中，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全会并作出设立国防会议的决定，已如前述。

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新进展，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从莫斯科返国的潘汉年8月8日来到陕北，汇报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找王明谈国共合作抗日，和他在上海、南京同曾养甫等谈判的情况，所有这些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在8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充分肯定蒋介石对内外政策的变化，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他说，过去提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主张“我们要与蒋联合”，“而不是与他对立起来，讨伐他”。毛泽东还提出，为与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准备做出必要的让步与妥协，“红军改人民军，苏维埃改人民政府”，“我们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12)]。周恩来在会上也提出“过去抗日必须先反蒋口号，现在不适合，现在应以抗日联合战线为中心”[(13)]。张闻天指出南京政府“有许多变动”，并举例说：“在二中全会，蒋不能不提到国防政府，现在反日运动更加可公开，CC也要联俄联共。”张闻天提出要促使蒋介石走向抗日，并说“只要他来抗日”，“我们只要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就可与他联合”。至于取消红军、苏维埃名义问题，张闻天说“要看事变的发展，如果大家真抗日，名义取消也是没有问题的”。张闻天认为在革命转变时期要处理好“民族革命与土

地革命的关系”。他强调指出“现在民族革命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14]。

三、共产国际的指示，加速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最后形成。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七大”时，曾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反蒋抗日方针。1936年中，他们改变了在中国问题上的策略。7月，他们从中共中央来电中得知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后，7月下旬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即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同样，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应提出和坚持的四条原则：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

（2）建立总指挥部，制定对日作战的总计划，同时保存红军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作战的某些战区。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和必要的武器装备。

（4）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地区停止对共产党员迫害[15]。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电报后，立即彻底放弃了“反蒋”策略。张闻天在后来说：“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然有些修改，但基本上

是没有转变的……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16]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过程时也说，“在五月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国际指示以后”[17]。

8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的致国民党公开信，8月25日才正式成文。它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精神。这个《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有关政策。它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宣言，是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致国民党书》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在这“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再次呼吁国民党改弦更张，“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致国民党书》向南京严正指出：你们如仍执迷不悟，“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

对南京政府在对日态度上的日趋强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讲话所表示的绝不承认伪满洲国，绝不订立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协定，《致国民党书》给予肯定和赞扬，说蒋介石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对蒋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现在“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也提出批评。《致国民党书》列举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后指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致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同时向国民党郑重表示：“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

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8]

为了把《致国民党书》早日送到国民党中央及其各级党政军等机关团体，中共中央书记处于9月7日指示中共北方局胡服（刘少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允生（冯雪峰），令他们“以快信付给南京中央党部一份，以后再给他几份”，同时让他们翻印九千份，“分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县市党部、中央政府各要人各部会、各省县市政府、中央及各省县市中外报馆、学校、团体、各界名人、各地军队师团长、各地警察机关、文化机关等”[19]。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对如何进行“逼蒋抗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20]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会者认为，去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决定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年来的工作获得许多的成绩”；“但是决定本身及以后的工作中犯着一些错误，这里主要的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着，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斗争”，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和所有蒋介石的军队看成是日本的同盟者，而且“同时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是不会得到成功的”[21]。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全面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决议》说：“在日寇继

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决议》指出：“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斗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22] 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从组织上的最后完成。

二　“一二九”运动爆发

在国家和民族濒临灭亡的紧急关头，富有爱国传统的北平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1935年12月9日和16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奔腾向前，席卷全国。

（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华北事变后，北平人心惶恐，社会浮动，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在北平的国民党达官显贵纷纷携带细软和眷属南下，故宫博物馆的稀世珍宝开始装箱南运，一些高等学府也在酝酿搬迁，清华大学准备迁往长沙，东北大学要搬到西安。富有政治敏感的北平青年学生，面对华北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无限感慨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23] 这些热血青年心系着祖国的安危和民族的兴亡，一首救亡歌曲《毕业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北平的青年学生在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面前，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掀起了波澜

壮阔的五四爱国浪潮；在30年代新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再次挺身而出，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二）“一二九”请愿游行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是由于民族危亡客观形势的刺激，也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分不开。

“一二九”前，由于敌人多次破坏，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不复存在，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还在，20多名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仍在群众中从事革命活动。

“何梅协定”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从华北撤走，华北的国民党部也撤销，国民党在北平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这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开展活动颇为有利；但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还不可能，对国民党也不宜正面攻击，于是决定从组织灰色团体，开展救灾活动入手。1935年秋后，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成灾，河南、山东的大批难民拥入北平。北平地下党通过“武委会”开展救灾活动，成立了由十几所大中学校代表参加的“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务负责人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地下党通过这个机构发动学生义卖、义演和募捐，将募集的钱物派代表送往灾区。赈济会还开展宣传活动，向广大师生讲灾民的痛苦，国民党见死不救；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揭露南京的不抵抗政策；讲民族危亡和青年肩负的历史重任，等等。

中共的“八一宣言”在国外发表后，通过多种渠道传回国内，也传到北平。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开的书店，陈列和出售《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刊物，姚克广等从这些刊物上看到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季米特洛夫报告和“八一宣言”，就把这些刊物买回后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中传阅讨论。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红军长征到达陕甘的消息，使他们深受鼓舞。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1935年10月北平各大学相继成立自治会。在清华大学，蒋南翔、姚克广、杨述等被选入自治会的代表会和干事会。燕京大学地下党张兆麟、龚普生、陈洁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和文书，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维航（龚澎）分别担任学生会执委会主席、膳务部长和财务部长。北平师范大学的反动势力较强，直到北平学联成立后，才成立师大学生会，于刚被选为主席。在这些由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掌握了学生会的学校，沉闷空气为之一扫，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

11月1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要求蒋介石乘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之机开放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平津十校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分散趋向联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决定将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11月18日，北平市学联成立，郭明秋任执委主席，姚克广任秘书长。由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等组成学联党团。市学联的成立，使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公开统一的领导机构。

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华北策动“独立”运动，他不断给控制平津和冀察的宋哲元施加压力，限他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进攻山东和河北。何应钦12月3日到达北平后，再次屈辱妥协，拟于12月9日成立半傀儡式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当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即于12月8日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第二天组织学生到新华门前集合，向何应钦请愿。

北平国民党当局事前侦知学生将于9日去新华门请愿，便派军警把守各主要学校大门，不许学生队伍走出校门；并把西直门、阜成门等城门关闭，以阻止地处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进城。9日晨，当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在各自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发现他

们事先租来的汽车被开走，校门外有大批军警把守。学生们决定冲出校门，徒步进城。五百多名燕大学生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口号，冲出校门，步行16里路，到达西直门外。清华的学生队伍也冲出校门，徒步走到西直门外。

清华、燕京两校学生队伍在高梁桥会合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桥头，不准学生通过。站在桥头的燕大学生冲破了警察的防线。当局已令西直门关闭，并派军警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等处戒备，拦阻郊外学生进城。学生到西直门下，见城门紧闭，遂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开门进城，并表示进城请愿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守门的警察说，没有上面命令，不能开门。这天，寒风凛冽，气温降至零下10度，学生们的脸和耳朵冻红了，脚冻僵了。两校学生留部分人坚持在原地斗争；大队人马沿城墙南下，从别的城门入城。但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也都关闭，并有军警把守。学生又原路返回西直门。此时，传来城内请愿学生遭军警镇压的消息，同学们在西直门外召开大会，控诉日军的侵略暴行，谴责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口号声此起彼伏，直至下午4时才散会返回学校。

9日这天，由于燕大、清华学生被阻于城外，东北大学学生成了城内行动的主力军。这些背井离乡、过着流亡生活的东大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怀有刻骨仇恨，爱国热情十分高涨。9日上午，他们在四人一排，手挽着手，列队冲出校门。这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沿途几次冲破军警阻拦，并接应出被军警围困的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校的同学，最后到达新华门前。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女一中、女二中、艺文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的队伍已到达这里。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共有二千多名。原计划由燕大和清华学生代表准备请愿书并向当局交涉，但他们既被阻城外，大家临时推选中国大学的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宋黎、师范大学的陈泽云和敖白枫（高锦明）作为代表，并拟出“反对华北特殊化和伪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六条请愿要求。

何应钦拒不接见学生代表，11时许才派代表侯成出来应付学生。学生被激怒，决定将请愿改成示威，以表达抗日的愿望。

学生开始游行时，几名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中外记者（如燕大教师埃德加·斯诺夫妇）也与学生走在一起。走到西单牌楼，遇上八九十名军警拦阻，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口号，多数学生冲了过去，后边的学生遭到袭击。

游行队伍经过护国寺、沙滩时，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有二百多人参加进来。时近下午4时，四千余人的游行队伍来到王府井，当局非常害怕学生冲入东交民巷示威。在日本大使馆的日军紧急出动，在东交民巷架起机枪；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一条严密封锁线。走在队伍前头的学生领袖与军警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阻挡游行队伍。残暴的军警举起水龙头袭击学生，学生穿的棉袍顿时变成冰袍，有的学生脸被水注射肿了。学生手挽手地顽强前进，军警又从两侧包抄过来袭击学生。学生忍无可忍，夺过水龙头向军警还击。赤手空拳的学生敌不过全副武装的军警，几次冲击均未成功，不少学生负了伤，当场有三十多人被送进医院。王府井成了恐怖世界。当晚，北平学联发表罢课宣言，申明："我们为反对出卖华北而罢课"，"我们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罢课"。宣言指出："我们认定解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只有民众自己。"[24]

（三）"一二一六"大示威

"一二九"后，北平各校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几天内，有七十多个学校成立了自治会或学生会。北平师范大学9日晚宣告成立学生自治会，于刚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学生自治会根据市学联决定，宣布从第二天起全校罢课。北京大学10日成立学生会，为罢课还组织了纠察队。10日，东北大学学生在礼堂召开大会，遭到学校当局的干涉与反对，会议仍决定从即日起罢课，并宣布成立东大救国会。校方勾结军警于当日午夜入校逮捕六名学生，接着又宣布"紧急

戒严令”，由宪兵把守学校大门，不许学生外出，并规定13日学生不上课者，降为自费旁听生，14日不上课者开除校籍。东大学生聚集在校方负责人的办公室外示威，强烈要求撤走校内宪兵，释放被捕学生，不得干涉学生的爱国活动。如校方不答应上述要求，他们将自动驱逐宪兵出校，自动夺回被捕同学。在学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驻校宪兵撤走，“紧急戒严令”撤销，被捕同学也获释返校。

国民党当局不顾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坚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何应钦在12月13日离开北平南返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25]。北平学联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日期选定在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

事先，北平学联做了认真准备，决定16日以一些学校为中心，分区集合，最后到天桥集中，召开市民大会。12月16日，学生队伍分四路向天桥进发。第一路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西城区的大中学校；第二路是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及南城各校；第三路是北京大学及东城各校；第四路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城外各校。

16日晨学生开始行动时，军警又包围了各主要学校，关闭了西直门和阜成门，各主要路口都派重兵把守。各路队伍在向天桥行进途中，都遭到军警的拦阻和袭击，不少学生负了伤，有的还被逮捕。上午10时，多数学校的学生或结队或分散地来到天桥，召开学生和市民大会，决定向全国发出通电，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后，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天桥出发，计划经前门、天安门、东单，到外交部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地方去示威。游行队伍从前门大街向正阳门进发时，燕大、清华等郊外的学生队伍赶来了。学生队伍到达正阳门前，城门内外布满了军警，城门楼上架起了机枪。学生要求进城，军警鸣枪示警。学生连续冲击城门，均未成功。此时，当局又派来大批军警，严阵以待。学生见进城无望，打算回天桥再次召开市民大会，之后各校分头宣传。警方不准学生回天桥开市民大会，要学生就地解散。学生即就地召开市民大会，通过

了“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平市各大学组织南下团请愿”、“请求释放被捕同学”等九项决议案。

当局最后允许北大、中大由前门进城返校，清华、燕大、东大、师大、平大则由宣武门进城返校。这是企图分裂学生队伍。指挥部决定，两支队伍进城后，再在宣武门内汇合，继续在城内示威游行。北大、中大学生进城后，城内、城外两支学生队伍分头向宣武门走去。下午4时许，两支队伍到达宣武门时，见城门紧闭，军警把守，不准城外学生入内。学生发现受骗上当，个个义愤填膺，城内城外的口号声连成一片。站在城外队伍中第一排的清华女生陆璀身材较小，从城门下边缝中爬进去，迅速将城门上的铁闩抽掉，又用手解开缠在两扇门上的铁丝，她还鼓动城外同学用力冲击城门。一二十名武装警察猛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将陆璀打倒在地，并把她抓走。随队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附近的警察所采访了陆璀，随即登上城门楼，向城外学生报告了陆璀被捕事件。

愤怒的学生要求当局立刻释放陆璀。晚7时许，城外学生与军警达成协议：释放陆璀，清华、燕大等西郊学生出西便门返校，城内学生进宣武门返回宿舍。当清华、燕大等校学生走后，当局再次食言，紧闭宣武门，把东大、师大、平大法商学院以及辅仁的学生仍关在宣武门外。在严寒中斗争了整整一天的学生，此时饥寒交迫，指挥部为避免无谓牺牲，决定组织撤退，让学生分别到东大、师大去休息。城内同学刚要行动，当局调来三卡车宪兵和消防队，把周围的胡同口堵死，向学生包围冲杀过来。六名女同学被砍成重伤，轻伤者五六十名，被捕者五人。准备去东大休息的学生走进菜市口附近一条胡同，被军警夹在中间，惨遭毒打，上百人受伤。去东大的学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北口时，也同样遭到袭击。据事件发生后第四天燕京大学出版的《一二九》特刊第三号登载的不完全统计，参加“一二一六”示威有组织的学生共7775名，被捕者8人，受重伤者85人，受轻伤者297人，失踪者23人。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从东海之滨到嘉陵江畔，从西南边陲到长城脚下，几十个大中城市和一些县镇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游行、示威、罢课，一些地方当局为阻止学生去南京请愿竟断绝交通。抗日救亡运动的参加者很快越出学生界，发展成全民性的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和催化剂。

（四）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采取种种措施来压制和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12月9日公开发表谈话，禁止学生游行、请愿、罢课。1936年1月5日，蒋介石指令平津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各自回家。接着教育部通知各地学校都提前放寒假。

蒋介石通过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出面宴请北平学联代表，让学生听蒋介石的话，答应南京可以出钱“资助”学联。接着蒋以行政院名义，通知各地大中学校选派校长代表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1月15日蒋在南京对各地来的师生代表发表了题为《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的讲话，竭力为政府“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说“九一八”时“我们政府虽然不抵抗，但绝对没有放弃东北”，“绝对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东北”，“绝对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26)]。

1935年12月26日，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平津学生联合会”这个跨地区的学生组织宣告成立，并决定组织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唤起民众，一致抗敌救国。组织学生南下宣传，是为了对抗和抵制南京当局提前放假和“晋京聆训”。南下宣传团约有五百人参加，第一、二、三团由北平学生组成，第四团由天津学生组成。1936年1月初，宣传团成员分别从天津、北平出发，约定到河北省固安县会合。北平的学生沿着不同路线徒步前进。他们在卢沟桥、青云店、礼贤镇、良乡、琉璃河、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帮助组织反日爱国团体，先后于1月七八日到达固安。第四团的天津学生1月2日出

发，经杨村奔向固安，沿途也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

平津四百五十名学生到达固安时，该县县长奉令关闭城门，城墙上布满军警，架起机枪。学生们向守城的二十九军士兵和当地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月9日，四个团联合召开大会，通电全国，说明这次南下宣传的意义；并决定全体步行到保定乘火车南下。学生开始行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总指挥董毓华被扣留，第二、三团被武力押解回北平。21日，第一团到达保定城外，接到中共北平市委通知：大批学生运动骨干南下后，北平空虚，国民党当局趁机组织“新学联”，分裂学生队伍，南下宣传团要适可而止。第一团便自动返回北平。

通过南下宣传，同学们更深切感到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1月21日，第二、三团被军警围困在保定师范学校礼堂，决定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便回京后有组织地开展救亡工作。中共北平市委也感到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已不适应形势要求，为把“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2月1日正式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下宣传团团员是民先队的第一批成员。民先队具体的斗争纲领主要是：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抗日救亡会；铲除汉奸卖国贼。民先队的工作有：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与各种救亡团体密切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并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民先队的组织系统有四级：总队部、区队部、分队、小队；小队是基层单位，人数由三至五人组成。

民先队总部领导成员，开始时由中共北平市委指定：总队长敖白枫，组织部长萧敏颂，宣传部长王仁忱，秘书长刘导生。总队部设中共党团，上述人员均是党团成员，党团书记先由市委负责人黄敬兼任，后由敖白枫接任。8月，民先队总队进行民主改选，总队长由李昌担任，队部领导成员有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女）、孙传文、

顾德欢等。民先队迅速向全国发展，统一了青年革命团体，带领广大青年开展救亡运动，使“一二九”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在斗争中，民先队也不断壮大。

第二节　救国运动的兴起

一　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危急的局势，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和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开展的同时，上海的知识界也在积极酝酿发起救国运动。

在1935年这一年中，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围绕日本侵华问题举行了各式各样的时事座谈会、报告会和读书会，甚至采取聚餐会的形式，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方策。是年5月，杜重远创办并主编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艾寒松以“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这篇经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一般性叙事文章发表后，日本驻上海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社，判处作者及编者徒刑。南京政府竟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向日本道歉，封闭了《新生》周刊，以满足日方的要求。7月9

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新生》案件，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徒刑，不得上诉。《新生》事件发生后，在全国特别是上海文化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案件宣判的第五天，沈钧儒写了下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哪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27]

流亡在美国的邹韬奋获悉杜重远含冤入狱后，愤怒和悲痛"不能自抑"[28]。8月27日，他由美国赶回上海，下船后就奔往漕河泾监探望被囚禁的杜重远。

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于11月16日出版，他写的发刊词《我们的灯塔》指出："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但同时不要忘却为虎作伥的封建残余的势力。所以封建残余的铲除，是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二目标。"他表示："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29]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当前的最严重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华北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整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要求"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30]。

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钱俊瑞、周新民、钱亦石、沈兹九、顾名、金仲华等二百八十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宣言最后提出坚

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八项主张。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人们首先是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奋起自救。章乃器曾说："上海的文化人，和北平的青年学生，虽然是隔得很远，竟像是心印着心，大家'不约而同'的同时展开历史的救亡运动。"(31)

同日，文化界救国会还发表通电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其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暨北平宋哲元电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发扬民意，拱卫国权，万不能再加压迫，否则听任汉奸冒替民众，是非泯灭，国亡无日。"(32) 致北京大学学生会转各校学生会电文说："诸君在高压之下，奋起抗争，意义之大，远过五四运动，千望再接再厉，全国响应，即在目前。"(33)

12月19日至20日，上海复旦等大中学校学生八千余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游行，并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收复失地，保护救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游行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大家起来救国"等口号。

12月21日，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的妇女救国会首先成立。史良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她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个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34) 何香凝讲话说："我们要奋起精神，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生男育女的性机器。我们是要与男子一样的负起重大的责任，争取民族生存，同到战

场上去，起来！”[35]

大会通过宣言、章程，并推选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等十一人为理事。宣言指出：“四年以来，敌人夺取了我们东北四省，屠杀了我们无数同胞，现在又步步进迫，开始向华北进攻。……冀察两省已经名存实亡，千万同胞又要跟着东北民众而变成亡国奴了。”“在这民族危机极度深刻的现在，要求独立生存，只有用我们的满腔热血去同敌人斗争。”[36] 宣言提出坚决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秘密外交，否认一切破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和协定；全国妇女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等八项主张。

当日，上海包括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育家等近千名妇女，为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这次妇女游行对上海学生运动起了推动作用，24日上海学生的大请愿示威，就是受了妇女游行的影响而爆发的[37]。

随后，妇女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指出，从东北事件到华北事变，明明是日本一贯的“大陆政策的两个步骤”，华北事变一方面是东北事件的后果，另一方面，假使我们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会变成华中、华南事件的前因；要求“打破妇女只会在家庭里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同爱国的男子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38]。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有三百多人参加。沈钧儒在成立会上讲话说：“本会以团结上海文化界同人，推进文化运动，发扬民族精神，保障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为宗旨。我国现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国民，均应自动奋起，以负救亡图存之重任。文化界为国民之先导，更应悉力赴难。”[39] 会议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40]。文化界救国会在成

立会上讨论名称时，沈钧儒鉴于“一二八”抗战爆发时政府因受日本的压力取缔抗日团体，以及《新生》事件的前例，提出不加“抗日”、“反日”字样，以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和日本浪人的捣乱，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接着成立的是顾名、沈钧儒、曹聚仁、周新民、潘大逵、张定夫等六十余人发起的大学教授救国会，他们发表的救国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激进了，无论用枪炮威胁或借外交计诱，总以并吞中国为其最后的目的。……抵抗则存，不抵抗则亡；抵抗则万众一心，为政府之后盾，不抵抗则万众离心，日为汉奸败类所胁迫。”(41) 此外，上海复旦大学等一些大中学校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的成立，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后几年来的沉寂状态，从此，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爱国运动的热烈开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激进，章乃器写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历数了国民党当局四年来执行“先安内，后攘外”路线造成辱国害民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倘使他们到今朝还要隐过饰非，为了要保存自己的历史而不惜断送民族的历史，或者将错就错，甘为敌人的虎伥而不肯自拔，那不但是误国，而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卖国了！这种人，只要中国民族的历史一天不断送，民众自然会起来诛伐他们的。”他大声疾呼：“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42) 沈钧儒曾称赞说，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43) 。王造时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写的《四年以来的教训》一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非吞并我全中国不止。因此，我们与他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如果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与它只有拼一个你死我活。” (44) 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说：我们只要把攘外必先安内，读书救国和

科学救国，建设救国，本位救国，英雄救国等等，“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一扫而空，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45]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一些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上海市民联合会，以及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筹备会等团体发起，于1936年1月28日在上海市商会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有农、工、商、学及妇女等各界民众共八百余人参加，公推马相伯、沈钧儒、何香凝、章乃器、史良、王晓籁、吴耀宗、沈兹九、张一麐等十九人为主席团。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筹备成立全国救国联合会。会后全体与会代表由主席团率领，整队步行至庙行镇，公祭“一二八”抗战无名英雄墓。

2月9日，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其成员多为公司、字号、海关、银行、保险、出版以及教育职业界的爱国人士，主要是属于下层职员的爱国青年，也有少数上层人士。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综合团体“蚂蚁社”（简称“蚁社”），以及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等单位的社员和学员参加者最多。2月23日，陶行知领导的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成立，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店员、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新闻记者等四百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宣言、简章和工作大纲，并选举了执行委员。《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说：“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能获得民族解放；我们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46] 其共同目标是“用国难教育来挽救民族的灭亡”[47]。这两个团体均加入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袁牧之、陈波儿等还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于3月28日出版，4月30日停刊，共出了五期，接着《救亡情报》于5月6日创刊。《救亡

情报》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联同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所共同创办。《救亡情报》每星期出一张（四开）半。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徐雪寒、吴大琨、柳乃夫、刘群、恽逸群、陆诒。该刊出版后，登载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随后不久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许多文件，报道了上海和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救国活动的开展情况，揭露批评国民党当局对救国运动的迫害，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积极作用。1936年12月中旬，因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被捕入狱和西安事变先后发生，被迫停刊，共出了30期。

为了扩大宣传和唤起民众共同起来救国，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三八”、“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举行了几次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反日大示威，参加的男女群众万余人，“为‘一二八’以来未有之壮举”[48]。5月30日，各界民众6000人举行大会纪念“五卅”，“盛大的集会，团结着六千人的心灵；壮烈的游行，唤醒了全上海的民众”[49]。上海救国运动得到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救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但不久以后，就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人参加。由于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遭到彻底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如钱亦石、柳湜、曹亮、周新民、邓洁、胡乔木、周扬、顾准、钱俊瑞、张执一、王新元、王纪华等，都参加了各界救国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他们把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带了进去，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力量。据章乃器回忆说：“那时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尽遭破坏，当然更没有用党组织的名义来同我们接触的。事后发觉，这是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员，主要地也是激于‘国亡无日’的危惧，产生了一种认为不论为党还是为祖国都应该奋不顾身地加倍努力的自觉，从而起来推动工作的。周新民、钱亦石便是这些人的例子。他们所运用的不是党的某一

个文件，而是党在长时期中对于他们的教导，是一些重要的理论原则和重大的政策原则，这些原则在不断的斗争锻炼中，已经驯化为可以用通常语言表达而为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生硬的、难于接受、难于消化的教条。这种成熟的自觉的东西，和我们的自发的但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很容易融合，从而产生了一批气势磅礴、热情奔放而又言之有物的救亡文献。”[50]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到达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与沈钧儒接上了头，同时还会见了章乃器，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及共产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救国会的活动从此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救国会是一个松散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入会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主张抗日救国，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不论属于什么党派，什么阶层，以及从事何种工作，都可以参加。除共产党人外，还有国民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参加，大部分则是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由于是这样一群人的结合，因此除了抗日救国这一个大目标相同外，在抗日的方法和其他问题上，则很难趋于一致。各党各派政治观点的分歧常常在救国会内部反映出来，其中一个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即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以王造时为代表的包括国社党、第三党在内的一小部分人主张反蒋抗日；而以沈钧儒、章乃器为代表的大部分无党派成见的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则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有可能抗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具体情况，如避免和当局发生对抗，争取救国运动的公开合法，以求生存和发展，不主张一般地整个地反对国民党，笼统地提反蒋的口号，而只是反对它的不抵抗和内战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救国会队伍的扩大和救国运动的开展。

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杭州等地的妇女界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随之相继成立，并与上海“文救”和“妇救”取得联系。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率先于1936年1月27日成立，有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一百五十余人参加，选举马叙伦、白鹏飞、陈豹隐、张申府、崔敬伯等三十一人为干事。发表宣言，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两次宣言所提出的一切主张，指出：中国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整个民族快要沦为奴隶，我们不能等待、迟疑，“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51]。

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进一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同时，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内各党派的联合，形成全国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年1月，平津学联代表在山东济南与齐鲁大学学生开会，议决发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并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3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把促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它的工作任务之一，随后派人前往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联络，物色邀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共七十余人，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吴耀宗、钱亦石、钱俊瑞、胡子婴、杜君慧、潘大逵、高士

其、曹亮、王新元、黄敬、刘江陵、李嘉宇、陆璀、董毓华、张申府、刘清扬、曹孟君、孙晓村、薛保鼎、汪德彰、狄超白、王枫、何伟、段君毅、何明理、吴祖贻、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石不烂、洪飙、方少逸、吴超炯、谭冬青、唐守愚、徐范、李仲融等[52]。第二天（6月1日），又有无锡、泰安和十九路军代表赶来参加大会。主席沈钧儒致开会词说："目下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国难严重'四字所能全部表现，而是快到亡国境地了。所以，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实在有大家团结起来的必要。同时，我们一定要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联合起来，便无从促进各党各派合作的。"[53] 会议听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京救国协进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广东教育界、广西全省学联会、武汉文化界救国会等三十余团体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吴耀宗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孙晓村、曹孟君、张申府、刘清扬、何伟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救亡情报》记者报道说："综计大会继续二日夜，各代表始终精神鼓舞，尤其是大会对于抗日救国，完成具体的共同认识，形成全国人民的民族大联合战线，实为救国之一更高阶段的表现。"[54] 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救国方针，这对于联合全国各种抗日救国力量，推动救国运动的向前发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全救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废弃一切引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所谓"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可耻口号，并给予人民以抗敌的组织和言论的自由。谁如果"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限止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

而自陷于覆亡”。“中央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我们为整个民族打算，不忍再见任何力量在内部冲突中消耗，尤其不愿意中央在错误政策之下，消耗了它高度优势的实力”[55]。

文件规定全救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56] 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57]。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中介人，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纲领的忠实执行，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纲领以及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为；并且郑重声明：人民救国阵线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职；它同国民党当局的抗争，只“是一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58]。还指出：中国需要一个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革命，是人民大众的一致要求，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并且认定，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求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坚决反对以指导民众组织名义消灭民众组织，以统制舆论名义消灭舆论。文件还提出外交上要求联络欧美、苏联和弱小民族，建立太平洋安全制度，并对国内教育、工商业、士兵、劳工、农民、妇女、儿童、国内民族、侨胞、失业及灾荒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59]。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重要文章。文章系潘汉年授意，由在香港的胡愈之、邹韬奋起草，陶行知适因出席欧洲世界新教育会议和世界学生青年大会途经香港，亦参与了商讨。文稿完成后，由邹韬奋携至上海，再与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同人作详尽的讨论并修改，最后由四人署名发表[60]。文章分析了国内一般政治形势，

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亦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文章明确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指出："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文章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共产党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要求"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还要求共产党纠正党内某些青年在救国运动中，"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的左倾幼稚行动。文章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解放取得完全胜利。

救国会的宣言、政治纲领和沈钧儒等四人联名的上述公开信发表后，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巴黎《救国时报》全文转载了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编者按语中说："该会之成立，显然为我国救国运动一最重大的进展；该宣言与纲领之发布，显然为我国救国之最重要的文件。"[(61)] 同时发表社论说：宣言不仅接受了四年以来我中华民族从血泪中所得来的一切教训，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正是目前时局的重心"，"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62)]。一篇题为《良药》的文章说：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文章，各方应把他们的意见当做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不抵抗无以救亡，不缔结联合战线无以抵抗，不争取国共合作，无以形成联合战线。四位先生不辞大声疾呼，正给了我们以良好的示范，就是我们要以集锐攻坚的态度，来争取国共合作的实现。"[(63)] 一位署名为"忠实的国民党员"在信中指出："四

位先生的宣言，不独给了我们救亡联合战线的正确立场，而且指出了目前各党各派的最低任务，说得真是诚恳、中肯、具体、公平与周到。这宣言给我以极大的勇气来说话。我身为国民党党员，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国民党员，是百分之百的赞成宣言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64] 还有的读者撰文说：“他们的话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民众从心坎儿发出的要求。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已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主张，而是全国民众共同的愿望。读了这个宣言以后，使我对国事前途抱着无限的乐观，因为中国内部渐渐的团结；同时也更明白了国内团结问题的症结之所在。”[65] 成都救国会的《力文半月刊》第四期刊载了“团结御侮”的文章后，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广大青年更是争相阅读，影响很大[66]。冯玉祥后来写道：“《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希望马上就实行。”[67]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救国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封信中，对救国会的宣言与纲领，以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说：“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你们致送热烈的敬礼！同时并向你们及全国民众申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他在信中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运动和救国组织。“我们愿意经过这些团体和运动贡献我们所有力量，并在这些团体中和各党各派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共同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而奋斗。但我们的党员绝对遵守服从这些团体的章程、纲领和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表示：“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68]

毛泽东随后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毛泽东在信中还宣布已委托潘汉年与他们联系，交换意见，并转达对他们的热烈希望[(69)]。

三　各地救国运动的开展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在各地设立分会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组织，以推进救亡运动。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救国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海外华侨中也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个重要的与全救会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救国会组织，概述如下：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控制十分严密，救国会是在秘密和艰苦环境中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孙晓村、曹孟君等出席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回到南京，积极活动，将原有各行业救国组织联合起来，于8月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和学生界的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南救"），负责人除孙晓村、曹孟君外还有后文瀚、李庚、薛宁人、狄超白、王昆仑、吴茂荪、胡济邦、王枫、千家驹等。"南救"的组织情况：妇女界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学教师和部分中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职业界妇女以及一些家庭妇女（其中多系冯玉祥部下家属）。文化界救国会发展了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以及文艺界中一些人士。学生救国会的主要队伍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以及安徽中学等几个学校中，在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如辎重兵学校、步工兵学校中，也发展了组织。职业界救国会的组织主要依靠几个工人夜校和上海介绍的关系来发展的。中国农村经济会也参加了南京和上海的救国会组织。此外，通过王昆仑、孙晓村、千家驹的关系，"南救"同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如张继、许宝驹等

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冯玉祥、李德全对“南救”的活动十分关心。冯玉祥常常通过孙晓村、千家驹等给他讲学的机会，把一些重要消息告诉“南救”，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作出分析。“南救”成立后，因为不能用本身的名义出现活动，曾以“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南救”与全救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基本上每周由孙晓村、王昆仑去上海一次，汇报国民政府的内情，带回全救会的文件，有时还带回中共的文件[70]，它实际上是全救会的一个分会。

全救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是全救会在华南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于香港。“南总”设理事会，由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以上三人任常务理事）、陈此生、陈希周、梅龚彬等人组成，李章达负总责，何思敬任宣传部长，吴涵真任组织部长。“南总”成立后，全救会曾派钱俊瑞、章乃器、胡子婴、张劲夫等人先后南下以取得联系，开展工作[71]。“南总”名义上负责指导广西、广东、福建省市救国运动，实际作用限于香港、广东两地。在“南总”领导下，9月18日，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其宣言和纲领指出：“全广东人民，只要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不做汉奸的，不分党派、阶层、职业、团体、个人，都不容迟疑的参加到这救国联合会来。”[72] 同时，东莞等县也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原定年底召开华南救国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救会华南分会，后因上海救国领袖沈钧儒等被捕而中止。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初，西安一些中学学生和教职员组织了救国会，随后联合成西北抗日救国会。6月1日，西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上海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又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救”认定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就是它的宣言与纲领，将这两个文件翻印了两千多份，在群众及在野名流中散发，影响颇大，获得普遍的同情与支持[73]。“西救”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说：“我们‘西北救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也就是‘全救’代表大会所决议的一切整体的意见与具体的计划。”[74] 全救会鉴于西北抗日

救亡工作已日见成效，建议“西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75]。“西救”从此逐渐公开组织，扩大活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它与正在筹建中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在西安联合召开了8000人的大会，并游行示威，向当地的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抗日。11月下旬，全救会派执委张语还到西安参加“西救”工作。12月9日，“西救”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悲壮的爱国游行队伍使张学良深受感动，从而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西救”正式公开，并在西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了全救会的宣言与纲领[76]。西安事变前，“西救”下属救亡团体有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二十三个，事变后有极大的发展，新成立的各行各业救国会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运动如打开闸门的潮水汹涌澎湃。“西救”的负责人有韩琢如（总务部）、杨明轩（交际部）、谢华（组织部）、张兆麟、徐彬如（宣传部）、宋黎、李祥九（民众武装部，西安事变后成立）、田润芝（妇女部）。

重庆、成都地区救国会：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的影响，重庆于1935年12月成立学联，展开各项救亡活动。1936年6月正式成立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属有学生界、职业界、文化界、妇女界四个救国会组织。成都各界也同时涌现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他们出版了《力文》半月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10月18日，在成都青年会礼堂召开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从此，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宣传进入组织阶段。《力文》半月刊于11月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接着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出版发行。1937年3月14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77]。

北平的救国运动虽然开展较早，但活动主要是在一部分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进行的。全救会成立后，曾两次派代表到北平与张申府等进步教授联系，促进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救国力量的

联合。1937年1月20日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2月1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78]。主要负责人有张申府、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刘清扬和张友渔，徐冰也参加了，但他不出面，对外活动主要是张申府和许德珩。“该会实际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接受党的领导，公开搞抗日救国工作”[79]。“七七”抗战爆发后，张申府到南京与沈钧儒会面，一起研究开展抗日救国问题，从此，北平、上海两个救国会联合会融合为一体。

此外，广西、武汉、杭州、济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并与上海全救会保持联系。

爱国华侨在民族危机刺激和国内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亦纷起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1936年初，旅居欧洲各国华侨先后组织抗日救国会，但因没有“总的中心组织做指导，致救亡运动无密切关系，而呈散漫状态”[80]。8月间，全救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璀因出席国际会议到达巴黎，竭力宣传华侨团结抗日，建立救国联合会，各国侨胞纷起响应。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者有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华侨代表共四百余人。各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奋起救国之决心，为华侨团结抗日救亡之“空前盛举”[81]。陶行知、钱俊瑞和陆璀在大会上发言，阐明全救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介绍了国内救亡运动进行情况，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团结全国军事力量，组织抗日救国军，武装民众，收复失地，保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政治上应不分党派，一致合作，确立民主制度，给人民以救亡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主张[82]。大会决定以该会为永久组织，定名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全救会作密切之联络。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对团结与推动华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起过重要作用。美国、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华侨也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与全救会保持联系。1936年11月22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

通过决议，加入全救会，与祖国同胞团结一致，为抗日救亡而斗争[83]。

四　上海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是全国救国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有进一步发展。

茅盾是救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努力促成中国文艺作家救亡联合战线的一名战士。为推进爱国文艺作家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联合一致，1936年6月7日，他和傅东华、夏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84]，入会者百余人。其宗旨为："以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85]宣言声称："文艺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艺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国阵线中有他自己的岗位。"文艺作家协会是"全民族运动中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86]针对当时文艺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上的某些分歧和争论，文艺家协会特别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为了民族利益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作家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要求更多的作家们来共同负起历史决定了的使命，把我们的笔集中于民族解放的斗争"[87]。茅盾还就作家的联合战线和现阶段的救亡运动对《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我们要求作家的条件，只能是这样：'你愿意救国。'否则，便把联合战线的范围限止得太狭小了，不能争取一批比较落后的作家，共同踏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88]

鲁迅当时虽然没有参加文艺家协会，但对救国会和文艺家协会倡导的统一战线救国运动，表示完全的赞同和支持[89]。他说："民族

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他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赞成“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90]。还表示：“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91] 6月15日，鲁迅和巴金、黎烈文、张天翼等63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指出：“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定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92]

在文化领域内，抗日联合战线进一步扩大发展并具体化。9月20日，平时不过问政治和国事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包天笑等也都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文学运动中来，他们与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傅东华、谢冰心等联名发表关于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宣言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后说：“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复杂多方面的，各阶层的；其在作家个人或集团，平时对文学之见解、趣味与作风，新派与旧派不同，左派与右派亦各异，然而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之立场亦许各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宣言还认为：“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93] 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是阻碍人民言论自由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概予废止。周瘦鹃、包天笑还将他们编辑的鸳鸯蝴蝶派刊物《礼拜六》贡献给救国阵线，连续几期刊载有不少关于救国的文章，如“双十节”专号就有章乃器的关于辛亥革命回忆及其他激发民族意识的文章。

爱国戏剧运动也有新的发展。文化戏剧界同人发表宣言，反对租界当局压迫上演救国戏剧。为配合救国运动，周信芳排演了京剧《明末遗恨》，描写当时汉奸误国的情景非常动人，给予社会的影响很大[(94)]。

继文艺家协会成立后，6月28日，由曾虚白、周新民、金则人等发起的上海著作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全救会、文艺家协会、妇救会、全国学联代表沈钧儒、章乃器、何家槐、胡子婴以及王造时、李公朴等都在大会发表演说，强调著作人团结一致，负起救亡运动重任的必要性。章乃器着重指出："文化人的任务，是站在指导救亡工作的地位。不待言，是先该把自己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文化人的联合战线，和别的救亡联合战线也是一样的。联合战线无非是对付共同敌人的结合。我以为联合战线不是折中的，调和的，也不是说各党各派的人，参加了联合战线就放弃他们的主张，而是在一个同样【目标】下一致对外。"[(95)] 由彭子冈、王纪元、周新民、成舍我、王造时、章乃器等140人签名发表的《上海著作人协会成立宣言》说，自"九一八"后四年多来，在民族敌人有加无已的进攻形势之下，中华民族已显然到了剥夺全体中国民众生存条件的最后生死关头。"每个中国人，为了要争取他们的生存，为了不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都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建立和运用集体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侵略压迫，来挽救整个民族的最后危机。"中国觉悟的民众，已经团结起来，建立了铁一般的联合救亡战线，"每个著作人，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都应该参加这一神圣的抗争，都应该参加这一民族解放的运动"；"与一切救亡的集体力量联合起来，肩并着肩，展开和完成全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96)]。

1936年下半年，上海工人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先后成立。职业界救国会到10月份已发展为七个干事会，共有会员一千三百多人，还联系了广大的职工和店员。"职救"的基层会员群众，主要是量才补习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的在职学生和蚁社社

员，上海先施、永安等几个大百货公司的店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职救”。“职救”是上海救亡运动中一支生力军，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一些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参加者都是“职救”的会员及其所联系影响的群众。

全救会成立时，正值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为了扩张并加强自己的地位，以抗日反蒋为名，发动“两广事变”（详下节）。李、白等派陈劭先到上海与救国会联系，邀请沈钧儒和章乃器去广西，指名要章当财政部长，并交给救国会2000元捐款，要求给予支持，想通过救国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湘粤边境陈兵，准备在必要时对西南进行讨伐，内战一触即发。全救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这一事变的性质及其所应持的态度，认为在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情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是值得欢迎的；但应真正从抗日救国的立场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更不赞成中央讨伐西南。全救会发表对时局紧急通电，强调：“务使全国兵力，一致向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倘有违背此旨，发动内战者，则本会愿全国民众共弃之。”[97]《救亡情报》发表了《我们对于西南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反对内战！要求全国团结御侮》、《请求政府下令对日宣战》、《下令讨伐西南呢还是下令抗日》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我们民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好，我们所拥护者为抗日救国，我们所反对者是不抵抗。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和西南双方实现团结御侮的诺言，立刻发动抗日战争。”[98]“中国一切的内战无异自杀，尤其是中央与西南之争，非特消耗有用之国防力量于无谓之内争，而且徒为外敌利用。”[99]章乃器事后总结说：“西南事件起来时，我们即决定表示同情，而绝对不放弃一丝一毫救国阵线的立场。那就是说，如果西南来加入救国阵线，接受了我们的纲领，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去依附西南。”[100]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幕，全救会发表宣言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目下有两种不同的努力。一种是少数汉奸的活动：他们一面向地方当局进行分离运动，一面向中央请求讨伐运动；他们的目的在挑拨内战，消灭抗日。另一种是多数人民的呼声：他们赞同地方当局督促中央抗日，然而反对向外投降的分离运动；他们要求中央当局以抗日来统一，反对以内战求统一；他们的目的在消弭内战，促成抗日。"宣言要求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督促中央立即对日宣战，"只要对外能够发动抗日战争，对内就可以根本消灭一切的纠纷"，"国内政权就可以在人民的欢呼中求得自然的统一"[101]。与此同时，全救会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准许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五分钟。国民党派中委、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出来接见。请愿虽未获具体结果，但南京中央当局并不以全救会为不合法而拒绝接见，马超俊且表示愿将请愿各点向大会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也是请愿的一个收获。

日本政府不顾我国主权，强欲在我成都设领，以作为侵略我四川之策源地，四川同胞群起反对。8月23日，四川旅沪各界谢持、杨庶堪、黄复生等二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并在上海召开了大会，沈钧儒、章乃器均被邀请出席，发表演说，予以声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致电南京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要求立即予以拒绝，"将外交情形随时公布，并火速备战，与敌人一拼"[102]。

9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就解决中日争端在南京举行外交谈判，日方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合作，减低进口关税，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中日合作防共等灭亡中国的条件。9月18日，全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针对这一新情况，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的工作[103]。宋庆龄因故未赴会，事后她致信执委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肯定性评价："月来诸同志在各地努力奋斗，

甚慰心怀，整个领导，亦甚正确，其所以能使运动日益开展者，非偶然也。惟救国功业，至为艰苦，如欲获得最后之胜利，尚须有更大之努力。尚希诸同志再接再厉，以取得民族之解放。”[104] 全救会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阴谋，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并且重申：“救国阵线在唤起群众与组织群众上的努力，目的是单纯的，那就是：在战争以前是督促政府抗日，而在战争以后是拥护政府抗日。”[105]

随即上海的救国会会员与爱国市民印就《为中日外交已到最后关头宣言》，发起广泛的签名运动，拟签名十万人后呈送政府，以示民意，数日内即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106]。南京救国会亦印发《为中日问题敬告全国同胞》一文，征求广大同胞签名。10月14日，北平文化教育界代表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等七十余人，起而遥相呼应，发表对时局宣言，向政府提出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失主权的原则下，对日交涉；中日外交绝对公开；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的非法军事行动；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共八项要求，嗣后陆续在这份宣言签名者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实可代表华北一般知识阶层之真正意见”[107]。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闻讯后立即致电响应说：“此间同志认为生死搏斗之时期已至，吾人任务重大，决非一纸文书之所能了事。切望北方同志能即日更进一步，先自加紧组织，同时切实领导青年并扩及一般民众，成为坚不可摧之统一阵线，为实力派抗战之后盾。敝会等自当遥为呼应，合力进行，以争取民族解放之最后胜利。”[108] 10月18日，上海实业界、教育界褚辅成、穆藕初、项康元、沈恩孚、黄炎培等215人也联合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的通电响应，说日本如有“轨外行动”，政府应“立以武力制止，遏未来之萌蘖，收已失之桑榆，万勿存投鼠忌器之心，贻噬脐莫

及之悔”[109]，并表示完全赞同北平文化教育界宣言中提出的各项主张。由于人民和舆论的压力，加上国民党内抗日倾向的增长，南京政府后来在中日谈判中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使谈判停顿下来。

从8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东，随后发动了对绥远大规模的进攻，全救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立即发表宣言，呼吁援绥抗日。9月6日，救国会组织三百多个宣传队共约2000余人，走上街头，进行援绥募捐，并分送宣传品，扩大抗日宣传，当日接触群众数万人。救国会立即将所募得款项如数全部汇交绥省主席傅作义，作为分犒前线士兵之用。傅作义收到后，复函称救国会诸先生“热心爱国，慷慨输将，拜领之余，莫名惭篆”[110]。后来傅作义在接见上海《大公报》记者时曾说：“我跟他们并没有关系可言，以前也不认识，未曾见过面，不过，在绥远抗战时，我们这儿收到的第一件捐款，是他们救国会捐来的，而且都由他们这几位先生署名在沪经募的。”[111] 11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援绥运动。南京救国会在孙晓村、曹孟君等人领导下，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密切配合，并取得冯玉祥的大力支持，推动国民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11月中旬，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民党左派如经亨颐、柳亚子和不少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到会参加。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党不准抗日救国的禁令，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高潮。会后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运动，一直深入到政府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及医院的病房里，成为1932年以来南京规模最大的爱国运动[112]。此外，华北、西北、华南地区，在当地救国会参与领导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援绥抗日运动。

11月中旬，全救会再次发表《为绥远问题宣言》，要求政府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立刻停止内争，停止和日本的谈判。同时分别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要求出兵援

绥，坚决抗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113)

在援绥抗日运动热烈开展的同时，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数万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剥削压榨，同时受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于11月上旬开始举行反日大罢工，提出增加工资，保护工人权益，反对日兵进厂压迫工人等12项条件。救国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援助，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予以支持，将募得的捐款在纱厂附近的市场上买了米票，直接发给因罢工而遭到生活困难的工人和家属。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救国会发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告全国同胞书》的文章，认为"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英、美、法、苏，成立太平洋反侵略的集体安全制度，这就是先生当时联俄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就是先生当时容共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改善工农生活以增强抗日的力量，就是先生当时保护工农政策的发展"。文章指出，政策的含义虽然由于时代的改变有所不同，但"民族解放的路线是一贯的"；还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1925年—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当前救国阵线师承他的遗教决定的联合战线也必然会胜利。要求每一个救国战士学习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抱宁死不做汉奸顺民的决心，和敌人拼死斗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14)。宋庆龄也写了纪念词，要求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建立反侵略的国际联合战线及联合各党派各阶层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115)。沈钧儒发表的《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一文说，孙中山有"博大宽容"的革命人格，所以"是民族联合阵

线的首创者”。“孙中山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三大政策就是救亡联合阵线政策”。救国阵线所倡导的各党各派联合御侮的政策，与孙中山手订的联共政策，“立意完全相同”。文章还强调指出：“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共产党固然一时消灭国民党不了，国民党也一时消灭共产党不了，按照过去‘剿匪’的经验，我们可以晓得，而抗战却已万万不能再行等待。那么只要共产党能够改变反国民党、反政府的策略，恢复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停止一切内战，以共同对外，还会有什么问题呢。”[116] 是日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路女青年会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有千余人参加。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沈钧儒、沙千里均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一致高度赞扬了孙中山“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表示要继承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紧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以挽救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救国运动普遍深入到各阶层，不但为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拥护，而且得到工商界人士和某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同情与支持，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救国会以它鲜明的抗日爱国号召和艰苦努力精神，团结了广大群众，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117]。救国会广泛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促进国内和平，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

一　两广“六一”事变

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剪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这次事变的主要特点是打出“出兵抗日”的旗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导火线是蒋介石要撤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消除两广半独立局面。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1931年2月，粤系领袖胡汉民因约法事件被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大权，树起反蒋旗帜。1932年蒋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11月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原广州非常会议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了“南粤王”的宝座，并借助西南盟主胡汉民的资望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抗衡。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夺”。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剪除异己势力。1936年1月，蒋继染指川、黔、滇之后，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

蒋介石要解决西南地方割据，削夺两广，蓄谋已久。其首要目标是拉拢西南盟主胡汉民。早在1934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为名，诱胡北上，胡未为所动。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再次以调整负责人名义，提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拉胡入京，又为胡所拒。胡汉民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对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深感在粤无可作为，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伧、陈策专程去香港，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月7日，蒋又特派魏道明为蒋私人代表持蒋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并电胡入京主持中央大计。西南方面则先派了与胡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晓生

到新加坡等候。陈济棠为拉住胡汉民，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并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点办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之邀，从香港到广州。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1月30日，胡汉民电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名，拒绝入京。胡居住广州，时而同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蒋对此极为忌恨，决心相机结束西南半独立局面，加强中央集权。就西南的政局来看，胡汉民为国民党元老，德望素著，推举胡做西南领袖，主掌西南党务和政事，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陈济棠担心独霸广东地盘，称雄南粤将受到胡的牵制，唯恐实权旁落。故陈济棠千方百计留住胡汉民，并非为了实施胡汉民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只是想用胡汉民作为与南京对抗的政治筹码而已。

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然从坐椅翻落在地，右侧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广州颙园逝世。胡汉民一死，两广靠山顿时倒塌，阵脚晃动，西南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蒋介石认为西南盟主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5月13日，蒋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陈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118]，企图挑起粤桂战争，拆散两广联盟。陈对此大惊失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地盘何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联合桂系共同反蒋。

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于5月19日，以祭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次日，

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二）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三）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五）统一币制。这五条实际上是要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119]。这也就是说，陈济棠必须从“南粤王”宝座上退下来，同时表明了蒋介石已把先收拾广西，稳住广东的战略方针，改为先解决广东，再吃掉广西，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

陈济棠当即与前来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密商，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广州共商大计。时值华北日本侵华气焰嚣张，逼蒋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对华北大举增兵，威逼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一再退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个可供利用的借口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120]。他致电李宗仁，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白崇禧见陈济棠抗日反蒋意志坚决，势在必行，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另一方面，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黄河流域，急于解决西北剿共问题，又要防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加上华北日本侵华局势吃紧，蒋介石决无余力可以南犯；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同情，扩大西南声势，退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向西南让步。陈济棠敢于起事反蒋，还受其兄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的陈维周及身边术士翁半玄的怂恿。陈维周入京谒蒋回粤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术士们也进言，谓蒋气数已尽。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

还待何时。翁半玄为陈济棠扶乩，得“机不可失”[121]之语，加上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认定举兵反蒋时机已到。

李宗仁于5月20日飞抵广州，与陈济棠商议两广联合行动。两广方面为抗日反蒋着手军事部署。白崇禧与陆军少将、高级参谋刘斐到粤桂边境视察地形，并拟定出作战计划：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

两广方面的兵力如下：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原有三个军，军长余汉谋、陈济棠、李扬敬，副军长李振球、张达、黄廷祯，每军三个师，师长是莫希德、叶肇、邓龙光、巫剑雄、李振良、李汉魂、黄质文、张瑞贵等，另外有独立师，师长黄任寰，一个教导师，师长缪培南，一个独立旅，旅长陈章，一个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四个警卫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事变时，又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编为四、五两个军，以黄任寰、缪培南为军长。粤军共有七十个团，共计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两个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军军长夏威。临时又扩编两个军（包括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师）。另外有作战能力的广西民团九十九个大队，共计约有十多万兵力。

两广兵力总计，陆军有三十万人以上；空军有广东六个中队，司令黄光锐；广西三个中队，司令林伟成；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张之英。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于5月27日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

通过了给南京中央的呈文，并于次日以同样内容通电（即“冬”电）全国，宣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致诚，吁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122]。同时，派出代表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联络，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率先发出“支”电，护拥“冬”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广州市各团体在大东路省参议会礼堂开会，发起向西南当局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同日，陈济棠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谓：“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冬”、“支”两电发出后，粤桂大造舆论，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争取各团体群众的响应。西南两机构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进军。

蒋介石对两广事件的发生虽甚为恼怒，但又故作镇静，未敢动用武力镇压。原因是：当时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又在洛阳、潼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

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左右。蒋原拟集中力量催逼张、杨剿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但两广事变使他不得不先着手解决两广问题，在军事上急令原驻贵州的薛岳部开往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移防粤东边境，令调甘丽初部集结衡阳；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将空军集中于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分海军集中厦门，海空协同陆军作战[(123)]。此时，蒋重申“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笼络人心。蒋介石除从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并采用缓兵之计外，又派戴笠指挥军统特务进行反间、收买活动；还故作姿态，宣布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邀两广派员出席。6月7日，蒋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失于国际之间”[(124)]，劝告两广不应同南京中央政府对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125)]。9日，蒋电陈济棠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的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以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126)]蒋在暗中却紧急调集两个军兵力，抢先控制了衡阳，监视两广军事行动。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西南两机构，令其转饬两广部队不得自由行动。10日，蒋再电陈济棠谓：“我全国军人听命党国，万不宜自由行动……务希严饬粤所有北进部队即日停止行进，迅速归复原防，以扫除谣诼与不安。”同时指出，倘两广继续行动，即为“地方将吏抗命”[(127)]。蒋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复电蒋介石，申明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行动，只要求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并请中央指定北上路线、集中地点与供应军辎军火接济。同日，西南执行部发出真电，对蒋所谓“统一方能御侮”加以驳斥，揭露其无御侮之心：日本在华北用兵，未见向北开动一兵一卒，反而调集兵力向

粤、桂压迫，要求国民党中央放弃贻误全国抗战之内战政策[128]。

正当蒋介石对两广用兵之际，6月21日，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马”电，呼吁“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以图观察宁、粤双方局势动向。6月23日，蒋介石在复宋、韩的“梗”电中，表示两广问题将交由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并称中央“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129]。意在争取宋、韩的支持，使他们不与两广采取一致行动。

两广打出“出兵抗日”旗帜后，粤、桂军队立即分别从湘赣两省边境向湖南推进。6月5日，桂系精锐强渡黄沙河，于6月6日进抵湖南永州，7月占领零陵。粤军也于6月9日进占郴县，直指衡阳，作出一举下长沙而直逼武汉之态势。部队所到之处，散发抗日传单，以争取沿途各界民众的支持。

两广“北上抗日”，必须借道湖南，首先要争取何键的支持。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何键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报告两广行动计划，表示对南京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兵力拨归中央直接指挥。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的奖赏，蒋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同时决定令调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6月10日早晨6时左右，三个师师长等随中央军先头部队，比粤、桂军队早三个小时到达衡阳。桂军获悉中央军已全部达衡阳，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达祁阳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此时，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李品仙联系湖南计划失败，怏怏而返。6月16日，陈济棠和李宗仁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发出“铣”电斥蒋“诬抗日为对内”，“指救国为异动”，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之中央军北上抗日”[130]。

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其中戴笠运用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瓦解两广事变发挥了特殊作用。戴笠对南方地区的特务活动早有安排。1936年春天，他获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即派员加强该地区的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时，在广州方面的特务骨干有梁干乔等，在韶关方面有谢镇南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6月30日，戴笠等通过了与陈济棠发生过摩擦的陈策，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智刚，在从化机场率轻型轰炸机四架，收买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在广州天河机场率驱逐机三架，分别北飞南昌投蒋。随后又有梅锦昭等率机四十架投蒋，并于7月5日在南昌联名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蒋介石立即封黄智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均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发给赏金12万元。

针对上述情况，陈济棠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的所有飞机入库，并派宪兵在机场严加把守，将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扣押。但仍不能稳住粤军的阵脚。接踵而来的是发生李汉魂的“封金挂印”事件。李汉魂原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西绥靖区委员，因遭陈的猜忌被免去这两个职务，而委任以第二军副军长及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李因此心怀不满，于7月6日不辞而别，离开汕头，到香港后分别致电陈济棠和南京政府，表明了拥蒋倒陈的态度。同日，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黄涛、张健等也离穗赴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责其假借抗日，危害国家，劝陈不要做“亲痛仇快”之事。

在“两广事变”中，置陈济棠于绝境的分化事件，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反戈一击，拥蒋倒陈。促使余汉谋投奔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是余汉谋与陈济棠早年就有积怨。1929年的两次粤桂战争中，陈济棠曾以余勾结徐景唐和李宗仁、白崇禧，并有私存枪械，擅权贪财等罪状，对其软禁，撤掉余第一旅旅长之职，余部对此不满，这是余倒陈拥蒋的潜因。二是蒋介石对陈部属长期进行分化收买的结果。早在

1932年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期，蒋介石就通过陈诚手下干将上官云相（余汉谋的妻舅），与在赣南“剿共”的余汉谋来往甚密，对其进行收买活动，故此余汉谋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6月间，余汉谋奉陈济棠电召赴广州商量反蒋时，已经暗里进行倒陈拥蒋的准备，与邓龙光、李汉魂、莫希德等将领密谋反陈。7月5日，余汉谋从广州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回师倒陈拥蒋。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报告陈抗日反蒋的计划。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蒋立即委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迅速回粤倒陈，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余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服从南京，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

余汉谋倒戈拥蒋，使“两广事变”形势急转直下，陈济棠被迫采取应急措施。7月8日、9日两天，召集何荦、张达、陈维周、黄光锐、陈章甫等开会，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北江防务，并命令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虹率部撤出原驻地韶关，退至大坑口，控制由北南下的咽喉。桂军一师由梧州东下转赴北江，海军舰队集中黄埔待命。

7月10日，粤桂双方在广州达成两项协议：（一）成立第一、四两集团军的联合司令部，粤桂两军协同作战；（二）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15日，西南政委会委任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两广采取应变措施，竭其全力挽回危局。

是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京开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最近两粤运动，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广东军事当局，即已首唱异议，自由行动，破坏党国纪律，摇动革命根基，虽经中央苦心之容忍，仍无悔悟之表示，律以国家之纪纲，宜为国民所不恕。”[(131)] 7月13日，蒋又在中央纪念周上说：“我们也要有整饬纪纲，维持统一的决

心和勇气，负起责任来，弭乱定变，决不能因外患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的工作；决不可因顾虑外患之压迫，就听少数地方军人破坏纪律，自由行动。”[132] 当天，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蒋介石又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取消第一、四两个集团军，并对陈济棠、李宗仁采取分化政策，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四路军总司令。

余汉谋部是陈济棠的主力，余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后，广东局势急剧恶化。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伺机再起，还企图以桂军东下援助，挽救广东之危。

是日，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声明拥护“中央”，指责陈济棠称兵背叛中央。余通电说：“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限陈济棠24小时之内离开广东，“听命中央，释兵入京”[133]。次日，余汉谋命令莫希德第一师回师广东，向韶关、翁源等地进发。因驻防韶关第二军军长张达已被余汉谋收买，不战而退。16日，莫希德的先头部队顺利进驻韶关。接着莫希德又以20万元的“伙食费”买通扼守大坑口的巫剑虹，巫部后撤至广州近郊江村。余汉谋不费一弹一卒，顺利推进，把主力部队集结在英德、军田一带，准备向广州发起攻击。巫是陈济棠的亲信，巫倒戈对陈是一个重大打击，北线失去防御屏障，使广州处于余汉谋的直接威胁之下。在这期间，直接发生第三军第九师两个团长通电倒陈，另一团长率队响应。原第九师师长邓龙光不辞而离穗，转入香港，萧佛成也离穗赴港。

7月17日，陈济棠私人代表陈光汉飞南京谒见蒋介石，带去陈致蒋的亲笔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但对粤事交余汉谋主持有异议，提

请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未被蒋介石所接受。18日，蒋介石以“巧”电复陈济棠迎余汉谋就任。此时，又发生了导致陈济棠完全崩毁的事件。

独立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苦心经营的一张王牌。“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遣戴笠、郑介民携带巨款，同当时在香港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谈判。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每架飞机赏金二万元，飞行员官晋升一级，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朱家骅来穗祭奠胡汉民时，已经通过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兼广东航空学校学科主任张云的关系，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联系，获得了率机投蒋的许诺。此后，两人在广东空军内策动倒陈投蒋。7月上旬，有几架蒋介石方面的侦察机来广东空投传单，黄光锐、陈卓林借机献上加强空防，迎击蒋机的机谋。陈济棠不知是计，准其所请。18日清晨，广州天河机场大批飞机起飞，其中黄光锐、陈卓林乘飞机飞至香港新界降落，大部分北飞韶关、南雄。黄、陈飞抵港后，发出团结御侮通电，表示倒陈投蒋。这次由各中队长率领北飞的共有72架飞机，150名飞行员、机械员，在韶关受到余汉谋的接见，于20日飞赴南昌。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共六个中队，一百余架飞机，终于归顺了南京政府。

陈济棠已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绝境。17日晚11时，陈济棠面告李宗仁说，大势已去，决定一走了之，并赠以巨款和武器弹药，作为“散伙费”，劝李回桂处理善后。18日，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蛾号”军舰赴香港，并发出“巧”电宣布下野，声明自行解职离穗。电文称：“此次呈请中央领导抗日，不蒙鉴谅，致徒怀救国之心，未遂请缨之志。诚恐所部将士，因受外部压迫，发生内战，为免纠纷起见，特于昨日解除职务，乘舰离省。”(134) 同日致电余汉谋：“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135) 至此，陈济棠失去了“南粤王”的宝座，结束了他对广东的统治。

陈济棠出走香港，两广联盟解体，西南变局的重心移至广西。李

宗仁派靠广西约十余万兵力，处内线作战之势，内部较粤团结，蒋介石一时无隙可乘，局面尚可维持。广东已失，唇亡齿寒，广西已成孤立势态。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后，也无进一步动作的良策。于是借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为由，采取“缓和”之策，于7月20日分电致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枢真诚抗日，则广西军民效命驰驱”，请他们代为转达广西的态度。广西的这番表态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反应，蒋反而改变了原先准备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的打算，决定兵锋直指广西，企图一举了却多年的心腹之患。7月25日，蒋介石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撤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特委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同时，蒋介石命主力卫立煌部由广东北江方面从连山向广西富川、贺县、八步方向进逼；又以陈诚的第十八军由广东肇庆循西江而上，向广西梧州逼近；并以甘丽初部由湖南威胁桂林，令顾祝同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部由黔南压迫广西西北的宜山；再令余汉谋一部由广东高州一带围逼广西南部，一时大军云集，从四面压境的兵力不下四五十万。同时以空军对桂林、梧州一带上空进行连续威胁扰乱，企图从军政两方面威逼李、白就范。

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蒋介石擅自改变二中全会决定，派大兵压境，已将他们逼上梁山，非兵戎相见不可，当即召集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韦云淞、李任仁、潘宜之、刘斐、王公度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蒋如悍然进犯，即将武力抵抗，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并复电中央，指出蒋介石更调李宗仁、白崇禧原来广西绥靖署主任的职务，是“别有用心的”，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沉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任命“殊难遵令”(136)。同时，在广西下达全民动员令，迅速扩编退役军人组成战斗部队，将民团改编为“别动队”，数天之内就编组二十一个师。7月下旬，桂系驻梧军政干部举行“效忠宣誓大会”，发表《告军民书》，“期

望全部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137]。南宁等地还举行刺血宣誓。李宗仁、白崇禧对外发表讲话，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还派特使黄旭初赴香港邀请李济深，告以“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同时函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入桂重组十九路军。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陆续入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杨东莼、华南救国会代表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均有代表到南宁。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邓龙光、张文、翁照垣等也应邀来桂。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广西全省各界都发动了起来，学生纷纷入伍，老百姓订立《抗日公约》，民众抗日激情持续高涨。

广西当局在全国范围大造抗日声势，号召各方抗日力量，摆出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蒋介石看到用强硬压力不能逼广西就范，又闻广西将于8月1日组织独立抗日政府，恐局面再度恶化将不可收拾。到8月1日，未见广西就组府采取行动，遂于是日以“东”电向李、白解释两点：第一，调李宗仁、白崇禧任新职，是为了摆脱他们6月1日以来所处的困难境地，并实现国家统一，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第二，对李、白攻击他违反二中全会决议问题，诡称二中全会决议发表李、白广西绥署职务后，未见他们正式就职，以为他们一定有现实的困难，所以另调新职作为转圜，只要真心想完成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则任何命令都应该是乐于接受的；至说到任命地方官吏，本是政府的职权，全会也并没有不能变更的限制，断不能看作是违反决议、违法失信。蒋还在电文中警告李、白不可攻粤犯湘，如无视中央爱惜国力，企望和平，也决不容对内有用兵自残的举动，如果他们竟出兵邻省，只有自陷于绝境[138]。实际上，当时整个局势不利于蒋介石对广西战事旷日持久。同日，黄绍竑到广州找程潜面见蒋介石，提出反对以军事解决广西问题的意见。黄绍竑说：“对广西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问题，当前日军集中多伦，绥东吃紧；西北国共两党对

抗，形势亦未可乐观，似宜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以保全国家元气。”[139] 蒋介石亦看到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劝蒋毋断丧国家元气。在冯缓颊之下，蒋介石为了避免被广西长时间拖住，答应和平解决广西问题。以广西方面来讲，摆出欲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就是抓住蒋介石怕被拖进一场旷日持久战争这一个弱点上，逼蒋知难而退，以图保持广西割据一方之目的。李宗仁、白崇禧清楚知道单凭广西一省人力、财力去与蒋之中央军火并，弊多利少，对抗日也无利可言，因而也谋求“避免”战事之良策。蒋桂双方表面上调兵遣将，严阵以待，私下都在寻找转机。

自7月底至9月初这一个多月期间，蒋桂双方派出的使者开始频繁往来，一触即发的战局有了转机。7月30日起，蒋介石先后派香翰屏、邓世增、程潜、何应钦、陈诚、张任民、居正、朱培德等去南宁，对李、白进行疏导，以试探广西态度。8月10日，李宗仁、白崇禧委托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了解蒋之真实意图。蒋介石在黄埔立即见刘斐，刘斐转达李、白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蒋与刘斐就此问题发生争执。刘斐最后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140] 刘斐回南宁向李、白汇报并商定和平的具体办法。李宗仁、白崇禧为此征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真正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141] 此时，中共方面赶抵广西的代表云广英，也按照中共中央在“两广事件”后，依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对中国抗日的指示精神，告诉李、白说，中共中央分析国内国际抗日形势的发展，宜将“抗日反蒋”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并向李、白表示了中共希望蒋、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的意见，希望看到广西方面“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142]。李、白接受了中共、救国会及其他抗日力量的中肯意见，同意在蒋介

石真正领导抗日的前提下接受和谈要求，并提出议和方案六条：（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决定，重新协调职务；（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六）和谈告成后，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143]。

8月21日，邓世增、唐星、舒宗鎏到广西斡旋和平，带回广西方面和平谈判条款。李、白获悉蒋基本接受和平条款后，于8月23日再次派刘斐以正式和谈代表身份赴广州见蒋介石，蒋对刘斐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144] 8月25日，李、白致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举行和平谈判。

9月2日、程潜、居正、朱培德飞抵南宁，并携带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开始正式和谈。根据六条原则达成以下各条协议：（一）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四）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五）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六）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七）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师，军费由中央支付；（八）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请蒋委员长以谈话方式宣告国人[145]。程等三人于9月4日回广州向蒋复命。9月6日，刘斐致电李、白："蒋5日在程潜寓所与居、程、朱以及辞修、季宽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6月发表。"[146] 是日，南京政府明令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回任浙江省主席。李、白遂于9月10日电程潜等，表示

愿意接受新命，请中央派员监誓。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咸惧。所幸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147] 16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南宁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

9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晤面，白夫人马佩璋深恐蒋介石食言，力阻白赴穗。李宗仁只好代白前往广州。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飞穗谒蒋。这是蒋介石、李宗仁自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会晤。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148]。经过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两广事变以和平方式结束。9月28日，蒋介石离粤赴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委任何应钦负责处理。各路大军同时撤回原防[149]。

两广事变的发生，再次表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而对日本执行妥协退让政策不得人心。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的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顺应了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二　绥远抗战

（一）绥远抗战的经过

绥远抗战发生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处于高潮，中国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过渡的阶段，是局部抗战中完全胜利的重大战役。

1．日军侵占绥远的图谋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西部，是贯通华北和西北、联结内蒙与外蒙的重要战略地带。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后，便进而图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以绥、察为基地，建立“蒙古国”。它的计划是：“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150) 还打算在侵占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后建立“回回国”。而绥远就成为联结“满洲国”和“回回国”的纽带，进而成为日本肢解中国北疆的基地；侵占绥远也是日本便于“反共反苏”，称霸世界的需要。在日本看来，“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151) 。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1936年2月在东京演讲日本大陆政策与“满”苏及内蒙的关系时称：“苏俄之武装外蒙，意在包围满洲国，而将日本大陆政策根本推翻。故主张日本应使内蒙古团结坚固，包含于日本势力，以使俄国远东作战大感困难。易言之，日本果将内蒙古之察、绥各地控制在握，则等于将苏俄势力下之外蒙古包围，军事上可占极优越地位。”(152) 日本控制了绥远，就可以对苏联造成自辽宁、热河、察哈尔、宁夏、甘肃直达新疆的铁壁包围圈，并在预想的对苏作战中从正面出击西伯利亚，将苏联截成两半，与德国法西斯侵略欧洲相呼应，以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日本陆相荒木贞夫认为：“如果日本不能在满蒙建立势力范围，日本将无法实现其最大理想。”(153) 当时日本军部正在为南进、北进问题争吵不休，夺取内蒙完成反苏包围圈，在持北进态度的关东军看来，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侵占绥远是想断绝中国接受苏联军援的通道。著名记者范长江撰文指出：日本图谋绥远还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它自认为可凭借其海军实力封锁中国沿海，以断绝国际对华的援助。只是在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联联合的可能，因此决定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日本“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他们所预定的这条封锁线，是从东北到西

北，一条长蛇式的地形。这条长线的中心点，也可以说是封锁的津梁，是在绥远”[154]。傅作义也认为：“敌人在长城以北，从察哈尔东边多伦起经过张北、商都、百灵庙，迤西经过阿拉善而达青海之北之额济纳为止，划成一条联络线。第一交通站，设有特务机关、无线电台、飞机场、防御工程，彼此节节联络，企图截断我对苏联的交通”[155]；绥远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绥远若失，“则新疆、宁夏、陕西、山西都在敌人的掌中，而华北一带更成为日本的囊中物”，“不但我们的国难更形加重，即全民族的生存也受到最大的威胁了”[156]。

1935年6月《秦土协定》签订后，察哈尔省主权遭到严重侵害，绥东屏障失去，日本图谋绥远的野心日炽。是年秋，日本在归绥设立特务机关，派羽山喜郎为特务机关长，进行绥远特殊化的阴谋活动，搜集我方情报，收买汉奸流氓，从事捣乱，制造事端，寻找侵略借口。他们在归绥更主要的工作是挑拨破坏蒙汉民族关系，唆使各蒙旗独立。羽山向绥远省政府提出取消“九一八纪念堂”和“长城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迫使傅作义分别将其改为公共会堂和烈士公园。羽山还在归绥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并有飞机经常往来绥、包两市，在包头修建了飞机库。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并用侵占绥远的计划，即《对内蒙措施要领》，内中指出：“对于绥远的傅作义将军，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如果可能，或者先行收买，努力使其行动符合于关东军的意图；但如果认为无论如何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时机，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157] 1936年1月，关东军制定了新的《对蒙（西北）措施要领》，决定“先对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进行整顿巩固，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之”[158]。12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中井升太郎偕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和羽山喜郎往太原访阎锡山，又访傅作义，策动晋绥加入冀察政务委员会。3月28日，即将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露骨地表示：“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的地带，在实行

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族的外蒙古的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的陆上联系”，“日军数年来已对西部内蒙古逐步进行着工作，日本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将来更将其工作加以推进”[159]。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步骑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侵略者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从伪满洲国抽调骑兵5000人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并计划在必要时指挥伪满洲国军队和德王、李守信、王英的伪军合力占领绥远。

8月，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集太原、归绥、张垣等地特务机关长和北平、塘沽等地驻军头目讨论如何加强对绥远的策反和入侵活动。23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由长春秘密飞往百灵庙，与德王、李守信等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侵绥事宜。9月，关东军批准了田中隆吉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委任其负责实施。9日，伪蒙古军新募壮丁七八千人开往商都、德化，由日方派军官训练。15日，田中由长春飞抵天津，王英亦赴天津。随后王英携日方接济的六万元飞抵绥东。同月，板垣在化德飞机场检阅伪蒙

古军，对几个月来的训练成绩表示满意。阅兵式结束后，当即由化德乘飞机赴伊盟札萨克旗和宁夏省所属阿拉善旗等地，对伊盟盟长沙王和阿旗的达理扎雅亲王进行拉拢。10月1日，任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到德化，与德王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侵占绥远，“首先进攻平地泉附近，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160]。蒙政会成立后，为削弱德王势力，国民政府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境蒙政会管辖，致使德王失去了富庶的产粮区，关东军西进的咽喉被扼住。德王和关东军都想夺回该四旗。王英一直希望重返河套，控制绥远。

10月，王英的“西北防共自治军”初步编成，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田中隆吉遂亲自策划侵占绥远。田中对德王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161]德王和王英都对此计划表示支持。日本完成了进攻绥远的准备：伪蒙古第一军部署于察、绥边境的尚义、兴和等县的边境线上，伪蒙古第二军部署于土木尔台迤北西至百灵庙之线，其第七师全部驻作为后方基地的百灵庙，“西北防共自治军”集结于察哈尔商都附近。

11月1日，李守信、王英部在商都集结步骑兵九千余人，在日军官指挥下建筑防御工事。王英部三千余人窜扰武川、陶林间黑山子，以分散傅作义兵力。5日，田中隆吉在嘉卜寺主持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德王、李守信、王英、张海鹏等与会。会议决定以“西北防共自治军”（11月3日改称“大汉义军”）、伪蒙古第一军主力进犯绥远。“西北防共自治军”由商都进攻红格尔图，伪蒙古第一军由张北以西的南壕堑进攻兴和，作第二线的支援。德王率领第五、六、八、九等师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守护后方，将百灵庙作为后方基地，派第七师驻守。得手后，以伪蒙古第一军由兴和出动，以伪蒙古第二军由

绥北土尔木台出动，以穆克登宝伪蒙古骑兵第七师由百灵庙出动，分路进攻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会后，关东军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日飞临绥东及武川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面对日本对绥远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地方当局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中央军五个师入晋，准备打击经过长征进入西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进行有限度的抵抗。9月18日，中央军小炮队1个大队开抵绥远。10月12日，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及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亦奉令入绥参战。同日，蒋致电阎锡山，决定调中央军第四、第二十一和第八十九三个师增援绥远。21日，蒋又电告阎，正在南京举行的中日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关于绥远的作战方针，蒋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162)] 28日，蒋介石对记者表示：“对中日交涉，政府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以竭诚周旋，而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东匪祸之取缔，在我方尤为必要。”[(163)] 30日洛阳军事会议开会，傅作义向蒋介石、阎锡山汇报了绥远形势，取得了蒋“不亢不卑，相机应付”的默许[(164)]。蒋同意傅进占百灵庙，赶走德王的伪蒙古军。

绥远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阎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傅作义抵抗日伪侵略。他对兵力作出新的部署：“第十九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有四个团在绥）及六十八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参加挺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六十八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165)]。8月9日，晋军第六十八师一部抵达兴和、丰镇，担任前

方战备。10月24日，傅作义赴洛阳向阎锡山请示作战有关问题。阎同意驻绥远的亲信王靖国第十九军和赵承绶骑一军及驻雁北李服膺部归傅指挥，以最近所筑国防工事为据点进行抗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委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布绥远作战部队序列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第一路军所部为第三十五军，附第二〇五旅（欠四〇七团），独立第七旅，补充第十二团，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两团，及小炮大队（欠一、三中队）；（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十三军，附第七十二师，及炮兵第二十七团；（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六十八师，附炮兵第二十四团，及小炮第一、三中队；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指挥所部第七十师（欠二〇五旅），附独立第八旅；（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门炳岳为副司令，指挥骑兵第一、第二、第七师。

日本在绥远的侵略行径激起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愤怒，傅同日本在绥远的特务机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春，傅作义破坏了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在土默特旗总管署强设的专与德王通讯的无线电台一组，7月又毁掉羽山在伊盟札萨克旗政府所在地设立的无线电台，秋天阻止羽山在包头修建飞机库。傅作义自1936年初就开始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顶住关东军对其诱降的压力。8月18日，他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绥境人力、物力两感缺乏，而防匪之决心，并不因困难而稍感气馁。""绥方对于将来之成功与否，并未作此计虑，但'成仁'则已早有决心。"[166] 自24日起，傅作义亲赴各地视察，鼓动抗战，提出"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国耻"等口号。26日，板垣飞赴绥远，对傅作义游说，要求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蒙古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傅和日方携手合作，由日方推举傅负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解决，日方予以支持。傅作义坚定地表示：让不让我负华北责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国民政府去决定，至于德王如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友好必须以国家领土主

权完整为前提。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不允许寸土受损失”[167]。板垣又要求将绥东四旗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省的蒙旗。傅作义说：那是中国法令早就划定的，不能更改[168]。板垣还表示，德王参加防共，是有远见的，绥远当局应与他合作，共同完成防共大业；板垣甚至提出在局部地区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傅未作承诺，交涉没有结果[169]。10月，傅作义去洛阳向蒋介石一再陈述准备反击日军及蒙奸，抗敌御侮的意见。11月3日，傅作义在归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凡扰害绥民治安者，当予以痛击。4日，傅偕骑兵司令赵承绶赴前线视察，与各部队讲话，表示誓保国土。

11月5日，德王对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式的通电，蛮横无理地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返处分。8日，傅作义复电逐项驳斥。蒋介石也电责德王，指出：“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170]

得知日伪蒙军将进犯绥东的消息后，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议抗敌对策。傅坚定地表示：“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171] 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之敌的任务，由晋绥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二八旅旅长董其武指挥；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晋绥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和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指挥。11日，绥远省府任命达密凌苏龙为绥东四旗剿匪司令。13日，就绥东作战问题，傅作义向彭毓斌和董其武面授机宜，任命彭为前线总指挥，董为副总指挥，并会商了作战部署问题。傅作义指出：“红格尔图是敌人进犯的

重点，因为它东与察北日伪巢穴紧密相连，西与百灵庙遥相呼应，要打通西犯的通道，必定要夺取红格尔图这个咽喉要地。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172)

2．红格尔图战役

红格尔图是绥东的门户，是由察哈尔省西部商都县通往绥远的必经之地，又与百灵庙、大庙形成犄角之势，成为敌军进攻的首选目标。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两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准备向红格尔图进犯。主攻兵力四千余人，日机六架和炮兵配合行动，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逼绥远省府归绥，同时从百灵庙和兴和两翼一齐包围，一举占领绥远。守卫红格尔图的晋绥军只有第二一八旅第四三六团第三营一个步兵连，骑兵团第二团两个骑兵连，共二百余人。此外，还有当地自卫队百余人。

13日夜，日伪先头部队同我守军发生前哨战，被我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猛烈冲击，我军奋勇还击，战至下午5时，击退敌军。15日凌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五千余名日伪军，在装甲车、飞机和野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先后七次发起猛烈冲击。我骑兵及当地保卫团分入碉堡应战，至下午6时击退敌人的进攻。当晚，我骑兵第二团团长张培勋率骑兵两个连星夜驰援。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15日夜傅作义、赵承绶亲赴集宁前线指挥。根据前线敌我态势，他们分析后认为，虽然正面敌军有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兴和诸路，但首先应该打击侵犯红格尔图之敌。这是因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王英部虽非敌人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部队庞大，挟其优势围攻我红格尔图孤军。如其得手，首战告捷，则可增长伪军的气势，威胁绥省民众，影响我军士气，并有可能西出绥西，构成对我军的严重危害；“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至兵

力分散，处处薄弱，又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覆辙，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173] 16日上午傅作义发出作战命令：令董其武率所部抄袭敌后，为保守秘密，董其武快速运兵，董旅李作栋团、第二一一旅王雷震团、第六十八师李钟颐团、骑兵第一师周承章团、炮兵第二十五团杨茂材营，分别由卓资山、集宁星夜乘汽车开往红格尔图西的丹岱沟一带集结，限17日夜12时前到达。

17日拂晓，进击部队步、骑、炮兵已隐蔽集结于八苏木附近。夜11时，董其武在十二苏木召开秘密会议，下达进攻命令：董亲自指挥王雷震、李作栋团，各配属炮兵一个连，于18日凌晨2时分别向红格尔图东北的打拉村、土城子、七股地、二台子一带的日伪军进行包围袭击；骑兵第一师周团秘密迂回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并担任追击任务；其余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前进。各部队遵令开始行动，向打拉村、土城子等地之敌进行猛烈袭击。敌军仓促应战，战至拂晓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从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命仓皇东逃，田中隆吉和王英均在车中，我军未能截住。当晋绥军增援部队进攻打拉村、土城子等地敌军时，红格尔图我守军乘势出击，狠狠打击敌军。至19日上午7时，敌全线溃退。日伪军残部向北逃窜，南面之敌也由东面向北绕道而撤。我步骑兵追至察哈尔省境内的统令地，即停止追击。8时许，晋绥军骑兵第一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镇。至此，红格尔图保卫战胜利结束。

红格尔图战役进行七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七百余人，俘虏伪军三百余人，捣毁田中隆吉和王英司令部，俘虏王英部电台台长日人八牟礼吉、雇员松村利雄，缴获很多战利品，其中包括王英乘坐的马车、关东军使用的电台联络表和电报密码本。我方官兵及民众亦有相当伤亡。田中隆吉原以为绥远军队不堪一击，然而绥远方面既有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则是甫经编成，训练很差，担任前

方作战的王英部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弱。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1.5万人，日本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挥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助战。日伪军围攻红格尔图的图谋未能得逞。

当红格尔图战事激烈进行之际，17日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绥高级将领等十余人共商绥省军事。同日蒋介石自洛阳亲赴太原晤阎，18日在绥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略谓：“（一）晋、绥一般同志与全体将士，在国家最前线艰难奋斗，自强不息，本人时刻惦念，此来特表嘉佩慰劳之意；（二）绥东蒙伪匪军扰乱问题之性质与关系，虽至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准备与整个计划，以吾观之，实甚安全，无须惊异。现在吾人一切应以坚固宁静之态度沉着处理。”(174)

红格尔图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令董其武派李钟颐步兵团接替红格尔图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务；另派骑兵两个连驻防土木尔台；其余部队返回原驻地，待命行动。

田中隆吉和德王对其在红格尔图的失败大为恐慌，担心我军乘胜捣其老巢，遂召集李守信、王英等在商都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加强商都、化德等地防务，一面由各地调遣部队再犯红格尔图。11月20日，王英令其副司令张万庆指挥安华亭、王子修等部向兴和县进犯。兴和县县长孟文仲指挥该县部队和地方团队将其击退。21日，三架日机飞至红格尔图上空投弹、扫射，被我守军用步枪击中其中一架的油箱，在飞回商都附近时焚毁。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攻打百灵庙扫清了障碍，并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成为百灵庙战役的先声。

3．百灵庙战役

百灵庙是绥北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有名的大庙，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南通归绥、包头，北与外蒙古接壤，是绥北的政治、经济

与交通中心。日本侵略者对百灵庙的地位极为重视。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指出："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他们准备四万万元巨款，来完成这一工作。据今年上期所得消息，他们已用去六千万元。"这条长线的中心点在绥远，"而在绥远本部未被占领前，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日方并运来大批给养，"存在庙上的子弹有百万发以上，白面约有二三万袋"[175]。德王投靠日军后，企图将百灵庙变为其在绥北的根据地，"近则以该地为中心，对绥蒙人士，威胁利诱，愚弄离间，以潜移默转其内向之心，远则以该地为根据，向西北延伸其政治侵略，期遂其蚕食鲸吞之欲"[176]。11月初，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由化德经嘉卜寺绕过草地，开赴百灵庙。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害怕我军乘胜摧毁其伪政权，遂派王英部两个旅进占大庙，以增强百灵庙外围的防御力量，并令穆克登宝部沿百灵庙山顶、山腰、山脚构筑防御工事，积极备战。总计伪军兵力达一个多师，三千余人，并有日军指挥官四五十人。关东军还派要员到嘉卜寺召集田中隆吉、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增派日军官二百余人补充到各伪部队任指挥官，此外，还拟抽调伪满洲国军队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进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田中隆吉因红格尔图战役失败，拟暂时放弃进攻绥东的计划，转而先向绥北进攻，认为绥北是傅作义军事防御的薄弱环节。

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傅作义决心挟初战告捷之威，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对此予以支持。16日，蒋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177] 傅作义获悉敌人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的企图后，18日发出电令，命令预定使用于百灵庙方向的各部队开始行动。20日傅在绥远新城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指出日伪军可能在近期由百灵庙向绥北发动进攻，我军应在敌军未进攻前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收复百灵庙。令骑兵第二师师长

孙长胜为前线总指挥，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限各部11月23日下午6时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50里附近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11月23日，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孙兰峰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成等情况后，下达作战命令：第二一一旅（欠第四二二团）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大队、汽车队和装甲车为主攻部队，其所属第四一九团为左梯队，从百灵庙南面攻击；第四二一团（欠第一营）为右梯队，从百灵庙东面攻击，并抽调一部先期至该庙东北通滂河的大道上，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断敌归路；刘效曾步兵团为佯攻部队，由百灵庙以西地区先行向敌袭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骑兵团绕出百灵庙东北地区，与步兵右梯队协同由庙北面攻击。占领北山，控制敌飞机场，并追击败退之敌；步兵第四二一团第一营为预备队，位置于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高地附近；各部均须在23日夜12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开始向敌军攻击，并互相密切联系。

24日零时，我军突然发起猛攻。日伪军事先对我军的活动情况一无所知，从睡梦中惊醒，仓皇抵抗。第四一九团团长张成义亲率官兵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日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亲自指挥督战，集中全部火力阻止我军进攻，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十余挺轻重机枪，激战达三四个小时。敌人凭借工事火力顽强抵抗，我军进展较慢。这时离天明只有两小时，如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敌5000名援军赶到，再加上十多架飞机助战，百灵庙战局将会逆转。傅作义令孙兰峰孤注一掷，将山炮营推进至百灵庙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阵地，集中猛烈炮火向女儿山之敌发起摧毁性猛攻，掩护我装甲车队及步兵攻击前进。而后延伸射程向庙内固守之敌猛轰，支援步兵向庙内射击，并令预备队第四二一团第一营营长韩天春指挥装甲车车队，配以汽车多辆，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

我军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向敌军发起拂晓总攻，置生死于

度外，视弹雨如无睹，敌阵地被我猛烈的炮火摧毁。我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山公路向敌军猛烈冲击，汽车六辆满载步兵也由最大的土山口冲入。敌军不支，纷向庙内撤退，我军追至庙内。这时刘效曾团和其他部队也向庙内敌人包围过来。张成义团长选拔敢死队突破庙前缺口，将前院后院分割数段。我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断了敌军后路。敌军惊慌失措，无心再守。恰在此时，伪蒙古军一排官兵二十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指挥官射击。盛岛角芳和穆克登宝见我军攻入庙内，援军又一时无望，绝望中急乘数辆汽车朝东北方向逃窜。孙兰峰令五辆汽车追击，因道路不熟，行驶过快，汽车陷入山涧沟渠，未能追上，敌人逃往大庙。伪军失去首领，全线崩溃，纷纷投降。激战至24日上午9时30分，我军收复了百灵庙。是役共打死日伪军三百余人，打伤六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缴获步兵炮三门，迫击炮六门，步枪六百余支，无线电台三部，汽油五百余桶，白面二万余袋，以及其他军用轻重器材。我军伤亡三百余人。百灵庙战役摧毁了日伪军在内蒙古西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地，拔掉了日伪侵略势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使其西侵绥远、宁夏，南窥山西、河北的图谋遭到挫折。

早在百灵庙战役之前，傅作义就设想了我军在收复后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作战部署："袭击成功后，除留一部在庙构筑工事、向敌警戒外，应将主力立即撤出，控置于原集结地，故意示敌以庙方空虚，诱敌增加部队，向我反攻，则我主力临时进入，期能多杀敌人，并免初占庙时之敌机成群轰炸。"(178) 因此，按照原计划，傅作义除留一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连驻守诱敌外，其余主力于24日下午3时全部撤回二份子镇一带待命，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日本侵略者对其在百灵庙的失败极不甘心，连日派飞机向集宁和百灵庙侦察、轰炸，准备反攻。11月28日晚，敌以汽车百余辆陆续运援军三千余人到大庙。同时王英率所部骑兵二千余人从商都以北绕过土木尔台，经草地窜至乌兰花一带。29日，田中隆吉和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大庙为基地，夺回百灵庙。

我军也在积极部署。28日，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在归绥举行军事会议，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策定将敌遮断，各个解决之方略"，即将王英伪军与大庙之敌加以分隔，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一石三鸟的目的。按照这个方案作出军事部署："一、以骑兵二师孙师长率该师（三个团）附炮两门，进出乌兰花，另以四二〇团附炮一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二一一旅孙旅长，指挥第四二一团、补充第一团、炮兵两连、小炮四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四二一团现在庙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四一九团附炮一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七旅之两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一个团。"(179)

12月2日晚，盛岛角芳和王英的副司令雷中田率日伪军四千余人，乘百余辆汽车由大庙向百灵庙急进，3日拂晓发起进攻。我军高度戒备，发现了在西山坡反穿皮袄伪装成羊群的日伪军。孙兰峰旅长令警戒部队阻止敌人前进；令韩天春营的敢死队张振基连也将皮衣外翻，装扮成羊群绕道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高地，居高临下，对敌人实施前后夹击；令山炮营集中火力射击伪装之敌，掩护敢死队进攻。这时庙东南及西北之敌以猛烈火力向我守军阵地进攻。孙兰峰又令韩天春营强袭敌之侧后。战斗从黎明至上午9时，激战三个多小时。我军全线出击，敌军不支溃败。是役打死打伤日伪军五百余人，俘虏二百余人，雷中田被当场击毙。

傅作义决定乘机收复大庙，4日上午召集孙长胜、李思温等开会，决定派孙长胜为收复大庙的前敌总指挥，指挥骑兵两个团、步兵李思温团，并附炮兵一个营、装甲车四辆、汽车一队，当晚出发收复大庙。6日，孙长胜指挥的骑兵第二师两个团及李思温团，在四子王府北黄草洼一带截断伪军王英部，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两个团也奉命在乌兰花以北向敌进逼。7日，李思温团由乌兰花出发，向伪军石玉山部前哨驻地发起攻击，歼敌一小股。8日，包围了石玉山部驻地哈拉

伊力根。石玉山旅当即在阵地反正。在大庙，9日金宪章旅处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并将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缴械，10日正式通电反正。9日，我军向日伪残部发起攻击，敌向草地逃窜。我军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上午10时，大庙被李思温团占领，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4日，傅作义令汤恩伯、门炳岳军挺进至绥东前线南壕堑一带，迫使王英部的王子修、安华亭两个旅20日反正。至此，日军对绥远的侵略遭到惨重的打击，其苦心培植的德王、李守信、王英部等的卖国势力被摧毁。

绥远抗战，历时五个多月，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连，收复了百灵庙、大庙等战略要点，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粉碎了日军西进绥远，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绥远抗战，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

（二）全国各界援绥运动和绥远抗战的意义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引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

绥远抗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于1936年8月和10月两次致函傅作义称：“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180) 红格尔图首挫敌锋后，11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向傅作义发出贺电称：“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81)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11月24日中午传到全国各地后，民心振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以南汉宸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携带题有“为国御侮”的锦旗和致前方将士的慰问信赴绥慰问。12月1日，中

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各军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援助绥远抗日将士[182]。

全国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绥远问题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对绥远的安全应负完全的责任，应该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国内外向傅作义将军和前方抗日将士祝贺和慰问的电信纷至沓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还组成团体，到绥做战地服务工作。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冲破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阻挠，发起绝食一天和停火节煤活动，捐款援绥，并积极发动组织全市各界援助绥远抗战委员会。北平学生发起万件皮衣劳军运动，并成立义勇军、救护队、慰劳队等组织，直赴前线参加工作。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赴绥远访问我军收复百灵庙的经过，回平津后专门发行了号外进行宣传。天津学界发起募捐二十辆汽车及万件绒衣劳军运动。南开学生联合会内推代表赴绥慰问。法商学院各处停伙三日，节款作捐款，该校国剧及话剧社公演助捐。天津市男女青年会分别组织募款委员会。上海日商纱厂的四万五千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举行罢工。上海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先后成立了各界援绥后援会。上海市文化界成立绥远剿匪后援会。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举行全体理事会，通告全市各中等学校，努力募捐。上海市妇女界成立绥远剿匪慰劳会，议决募集手套十万双、丝绵背心五万件。中国佛教徒会员代表大会开会，决议致电蒋介石和傅作义，表示慰问。全国邮务总工会发起援绥捐，通令全国邮工踊跃输将。上海三十五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上海市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赴绥远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著名音乐家吕骥写了一首《三十五军军歌》，亲自到部队教唱，并向各地军民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作家谢冰心为绥远抗战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写小传。上海联华电影公司导演和

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赴绥远战地拍摄纪录影片。国民党沪市党部召集各机关团体，商讨组织沪市国民贡献一日推行委员会。在南京，上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下至乞丐、妓女都踊跃参加了捐款活动。南京各界救国会发起援绥军民抗日运动，并成立“南京各界援绥后援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除亲赴绥远前线视察外，并发表慰勉将士书。南京市工人福利会通知各工会转饬各会员，节食三日，移充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津浦全路员工发起捐薪一日活动。青岛各界成立慰劳前方将士会，参加者数十团体，规定募捐办法。浙江慈溪县南乡富孀陈氏，其夫在东北从事矿业时被日军惨杀，见绥战又起，痛心往事，感到国事日急，遂倾其家产输助绥军，遗书家人，服毒自杀。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开代表会，议决联合组织援助前线将士会。广州培正中学教员捐款千余元。蚌埠各校师生绝食一日，捐款慰劳绥远将士。郑州各界纷纷发起捐款活动。汉口市工界召集各业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全市工界以一日收入慰劳绥远将士。重庆市民对绥事极为关注，除致电慰问傅作义外，学生在市中募捐，各界捐款，情绪热烈。济南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联名致电慰问前敌将士，并由全体新闻界先捐300元，同时决定各报一律代收慰劳捐款。山东中等以上校联会决定全省各校教职员以一日所得援助。齐鲁大学师生工友组织慰劳将士劝捐团。该校华山足球队联合其他球队举行慰劳绥远将士募捐球类比赛。湖南常识指导会联络各人民团体组织援助绥远将士委员会。湖南省党部捐薪一日。《国民日报》社联合上海银行募款。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和西安学联发起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晋、绥两省在日本的留学生捐款慰问绥远抗日将士；留学德国的绥远学生秦丰川向留学生作绥远抗战的报告。绥远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呼吁全国援绥。绥远旅平同乡绝食一日，集资慰劳绥远将士。归绥教育界同人联合会为绥远将士购置皮衣募捐。土默特旗中学全体学生绝食一天，捐助前线将士。绥远国术馆通电全国国术馆，发起全国国术界募捐援助前线将士运动。绥远民众教育馆召集各街长商定民众援助

办法，扩大宣传，普遍募捐。山西省各将领纷纷捐款。太原女子师范看护队二十余人为伤兵服务。太原山西陆军监狱全体监犯绝食一天，节省囚粮捐献绥东抗敌将士。

上海、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及其他城市的民众团体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相继于途，每日必十余起。全国各地先后赴绥远慰劳的有：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组成的绥远剿匪慰劳救护会推举的代表黄炎培等；北平市民战地服务团；清华大学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等的代表朱自清教授等；西安各界抗日援绥大会代表团；旅陕东北民众慰劳绥远抗战代表团；两广代表团。

绥远抗战得到了绥远境内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王公的支持。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率领的一支武装在守卫绥东十二苏木一带防线，攻击伪军王英部的战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石王和其夫人也亲率蒙军在前线作战。蒙古族上层中不少深明大义的有识之士表示，“大多数的蒙人，深深地坚信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有团结凝固我们民族各个分子、各种民族，才能阻遏当前侵略者的进攻”[183]。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对绥远抗战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将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5万元，并组织“出察援绥军”准备北上。阎锡山遵父命将遗产87万元捐献绥远抗日将士。其他将领如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宋哲元、商震等都表示了对绥远抗战的声援。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和钱财，并撰写了《傅作义高义》一文，颂扬绥远抗战。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致电傅作义，表示侨民誓为后盾。伦敦华商协会汇款2000元。华侨慰问团见塞外运输不便，捐献200辆载重汽车和2000件皮衣给前方将士。

据估计绥远前线收到的慰劳物资和现款，合计在三百万元以上。

绥远抗战在中国的局部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范长江称："红格尔图与百灵庙两次战争，只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184]

绥远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吞并绥远的阴谋，迫使其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在绥战中，德王嫡系第七师全部覆灭；关东军精选的10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有7人丧生；在南京政府要求下，日本不得不撤走青、绥、宁地区的日本侨民；日军被迫撤消其在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日本在绥远惨淡经营的侵略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调整其侵略步伐。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内蒙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基调是"暂缓举起以前企图纠合整个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造成大同团结的泛蒙古运动的旗帜"。为此，关东军提出伪蒙古军自动停战，必要时发表和平宣言；解散王英的"谋略部队"；对绥远、山西、南京等其他中国方面的政权，不进行特别工作；确保《秦土协定》；"蒙古军政府"改组等紧急措施[185]。15日，日本陆军部也作出《内蒙军整顿要领》的决定，提出要确保锡盟和察东为范围的内蒙地区，巩固其治安，整顿蒙古军[186]。"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年4月6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187]。

绥远抗战中"我军坚守阵地，官兵誓死与阵地共存亡，个个英勇奋发，不时跳出战壕同敌拼杀"[188]。爱国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精神。傅作义表示："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189]"我以为今天的中国应下决心，不以利害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而应以牺牲的精神来博取最后的胜利！"[190]"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战

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191] 百灵庙大捷后，在为此役举行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于右任写的挽联“梦魂东四省，血泪大青山。”讴歌了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

绥远抗战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蒋介石的“安内必先攘外”的误国政策遭受挫折，迟滞了其欲再次发动“剿共”内战的企图。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也使国民党“剿共”部队人心涣散。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在《致蒋介石书》中说：“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极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192] 中共中央认为：“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193]

张学良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曾作为其部下的傅作义因绥战而成了抗日的英雄，也激发了他的爱国心。绥远、陕西唇亡齿寒，广大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一些东北军将领向张学良痛哭，呼吁即使国民党中央不同意，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请缨抗敌书》，表示：“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

当加增百倍。”[194] 张学良的抗战请求被蒋介石所拒绝，认为有悖于他的“安内攘外”“剿共”政策，因而引起张的不满。这与张学良、杨虎城随后在西安发动兵谏，不无关系。

绥远抗战也影响到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因绥战的胜利，对日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百灵庙战役胜利结束的当日电责德王轻启战端，并指出百灵庙为绥蒙区域，应遵前令，一律迁出。11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30日，蒋介石发出贺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最大之关键。”[195] 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奉令前往绥远实地收集日本卷入绥战的证据，30日返回南京，准备在中日第八轮谈判中提出。12月7日，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绥远事件妨碍了外交的进行。蒋介石决定结束1936年9月因成都事件而进行的张群与川越的谈判。《东京朝日新闻》云：“绥事发生后，中日交涉搁浅，交涉前途阴云笼罩，岂非事实。自张外长与川越大使第七次会见以来，虽已达到最后解决之一步，而直至今日尚在迁延不决中，且中国态度反而强化，不特不听从华北与防共两主张，甚且对已经意见一致之诸问题，亦不拟作成具体案。此盖绥东问题有以致之。非特此也，中国拟将借题发挥，抗日情绪尖锐强化之形势又将出现。”[196]

三　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趋向强硬

（一）改变对日政策的国内外条件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由软弱趋向强硬，由妥协改为抵制，是从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开始的。而华北事变后，促使南京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染指华北，威胁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

1935年华北事变时，南京再次屈服于日本压力，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免职，撤销了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把驻守华北的中央军和于学忠部五十一军南调，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党部亦被撤销。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已被迫撤出华北。面对这种局面，蒋6月21日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颇为感慨地说："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197] 在蒋介石看来，日本侵占东北，他采取不承认、不交涉、等待国联解决的方针，还可维持一时，况且他的势力从未直接控制过那里；现在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情况大不相同了。华北位于长城之内，素称中国本部，是中国的腹地，是东北通向华中、西北的咽喉要道。华北的安危，关系到中国的半壁江山。日本染指华北，对南京构成了直接威胁。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不得不考虑改变对日政策。

其次，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走私，严重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来源。《塘沽协定》后，冀东成了"非武装区"，为日本在这里走私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1935年夏、秋以后，在日本武力逼迫下，中国撤销了在长城线上的缉私巡逻人员和秦皇岛至芦台沿海的缉私巡逻船只，日本在华北的走私就更加畅行无阻并公开化了。日本从海路和陆路将大批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偷运入境，又将大量白银偷运出境。日本的走私，不仅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也使南京政府的税收锐减。关税历来在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35年全年税收的88%，系来自秦皇岛至宁波的21个海关的关税。据中国海关当局统计，因日本在华北走私使关税蒙受的损失：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为2550多万元；1936年4月一个月，即损失800万元。如果"每月损失以八百万元计，则每年损失将达一万万元"，几乎是全年税收的三分之一[198]。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走私严重威胁了南京的财政来源，南京外交部从1935年9月至1936年5月，先后五次向日方提出抗议，但均无结果，南京与日本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第三，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国的矛盾。“九·一八”时，英美姑息和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希望它继续北上，将矛头对准苏联；可是，日军在侵占东三省后并未北上进攻苏联，而是移师南下，并在1934年4月发表“天羽声明”，公开表示要排挤英美在华势力，把中国视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时，英美以共同支配中国的“九国公约”为武器，反对日本企图关闭中国门户，独吞中国。1935年后，日本对华北的步步进逼及疯狂走私活动，威胁和影响了英美在华利益。就在日本竭力策动华北“自治”时，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对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英政府对华政策，以九国公约原则为依归”，并表示英国对华北局势的发展“甚所关切”，“已与美政府有所接洽，在东京亦有表示”[199]。美国国务卿赫尔12月5日对报界发表谈话，声称华北事态的发展，“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美国就是这种国家之一”，他说：在中国华北，有“相当多的美国侨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注视着该地区发生的事情”。赫尔要求日本政府对其“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200]。英美外交首脑的讲话表明英美两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反对日本正在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反对日本独吞中国的行动。英美的这种态度，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

第四，促使南京政府1935年后改变对日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得手。蒋在1935年末写的《自记民国二十四年中之所感》一文中说：“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201]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后，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202]

最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阶层人民日益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内部因反日情绪的增长而进一步分化，也是南京政府

改变对日屈辱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前发生的华北事变中，南京政府对日本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基本上还是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当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南京的态度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采取了抵制态度，如本书前章述。

（二）拒绝“广田三原则”

日本内阁经过长期酝酿，于1935年10月4日通过了由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中日满三国关系须常能保持圆满”，中国最好承认伪满洲国，起码“对于满洲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防止赤化”，“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日本自知这种独霸中国的行为必引起别国干涉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10月8日广田外相在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通报“广田三原则”时，特别叮嘱“勿向外公表，以免惹起实行上之障碍”[203]。

南京政府认为“广田三原则”内容严重，必须严肃对待。10月13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说：广田三原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是要中国“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所以“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204]。怎样对待“广田三原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忆说：“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蒋介石既不想立即抗日，也不准备降日，便采取了“拖”的方针，即不断然公开反对，也不无条件接受，而是提出一些日方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与之讨价还价。

10月20日，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照会日本外相广田，对其提出的对华三原则作了正式答复。关于广田所提第一点，指出“中国本无以夷制夷之意”，今后“中国与其他各国关系事件，决不使中日关系受不良之影响”，“日本与其他各国事件，亦须对于中国采取同样之方针”。关于广田所提第二点，声明中国对于东北现状，“决不用和平以外之

方法，以引起变端”。关于广田所提第三点，声称如日本对中国采取友善态度，中国拟与日本协商“中国北部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何防范”。蒋作宾在照会中强调：除满洲问题外，日本必须一切回复到“九一八”以前之状态，必须立即撤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以谋中国地方秩序之安宁及中日关系之根本改善”[205]。

就在蒋作宾照会日本外务省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会见日本大使有吉。此时土肥原正在华北大肆策动“自治”，蒋介石要求日本停止分裂华北的行动，他对有吉表示他本人对“广田三原则”“不但赞成，且欲促其实践”[206]。其实这是一种幻想，“华北自治”和“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内阁于10月4日同时通过的两项侵华政策，它决不会轻易放弃其中任何一项。

正因为蒋介石有上述表示，一个月后，有吉在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张群会谈时，一开始便问：日本所提三原则，蒋介石上月20日已表示无条件赞同，“贵部长之意见如何？”张群回答说：蒋介石对日本所提的三原则“绝非无条件的赞同”，而是要求日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谈”。在谈到根本解决中日关系问题时，有吉再次要求中方承认伪满洲国，张群断然拒绝，并要求日本停止策动“华北自治”、分裂中国的行动。此时，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反日爱国浪潮正席卷神州大地，有吉向张群提出：“学生运动逐渐扩大，殊堪忧虑，拟请注意。”张群除表示南京政府十分注意，已采取压制措施外，还向有吉说：“学生何以有此举动，应请贵方亦特别加以认识。”[207] 其意十分明显，即是说学生运动的兴起，是由日本的侵略行动引起的。

日本外相广田于1936年1月21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声称中国政府对“广田三原则”已“充分谅解”，“表示了赞成的意思”[208]。第二天，南京外交部发言人奉命予以否认，说日本提出的“广田三原则”“措词过涉空泛，无从商讨。当要求日方提示其具体内容，日方迄今尚未提出”，并指出广田在国会所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209]。

日本把“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1936年3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到任后，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与张群接连会谈三次，要求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张群则反对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两国的基础，并提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的办法应从东北问题谈起。张群还向日本大使表示：“非满洲问题解决，则不能谈共同防共问题”，起码亦应先行设法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210)]。会谈以无结果告终。日本强迫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企图没有得逞。

（三）张群、川越会谈

1936年日本“二二六”政变后，广田弘毅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加快了侵华步伐。4月18日，日本军部根据内阁决定将驻华北的日军增加三倍以上，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从5月起，大批日军涌入华北，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南京政府反对日本增兵华北，驻日大使许世英于6月1日奉命约见日外相有田，“严重诘问日本在华北增兵事，谓中国政府以为日本不应出此”[(211)]。随后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对日本侵略采取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日趋明朗化。

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中国滋事寻衅，制造事端，借机向中国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日本当局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强行在成都设领事馆，激起四川人民反抗，8月24日发生成都事件。9月3日广东又发生了北海事件。为解决这些事件，从9月5日到12月3日，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会谈了七次。在此期间，南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也会谈了十多次。

交涉既由成都事件引起，张群主张会谈应集中解决成都事件，不要与整个调整两国关系混为一谈；而川越则认为“蓉案不难解决，但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他借机向中方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一、取缔排日问题；二、华北问题；三、共同防共问题；四、减

低入口税问题；五、上海、福冈间中日民用航空联络问题；六、聘用日籍顾问问题；七、取缔鲜人问题。他说中方只有“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方显出“中国方面的诚意”[212]。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方的这些无理要求。在9月23日和后来的几次会谈中，张群向川越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对日方的7项无理要求逐一批驳。关于“取缔排日”问题，张群说：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日本的侵略行为激起的，中国“政府当局能够制止公开的行为，却不可能制止国人的感情”，如要“除去这种恶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压手段来对待中国”，“须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及行政的统一”[213]。关于“华北问题”，张群说：“倘日方之真意，不在平等互惠之经济合作，而在华北之政治及财政方面，甚至欲造成独立或半独立之政权，则此种计划，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绝无商讨之余地。”[214] 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张群说：日本在“广田三原则”中提出“共同防共”，原来中方予以拒绝；“现在打算使国策来一个大转换，且作为‘对日诚意’的一大表示”，故拟与日方讨论此问题，但“防共”范围“只限于从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绥远、包头之线以北，而且其方法以防御为主，而不以攻击为目的”[215]。日本要求将防共线往西延至山西雁门关，并要求在上海互换有关情报。这些遭到张群拒绝。在11月10日的会谈中，川越透露其反苏目的，表示：“日本因对俄关系在远东责任非常重大，故对北境一带之共同防共甚为重视。”他威胁说：“若中国连此问题亦不肯谈，日本将发表中国已答应变更国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之谈话内容。”张群当即表示：“发表亦无不可”，并针锋相对地说：“若贵方发表，我方亦可将一切情形发表。”[216] 关于“减低入口税”问题，张群拒绝了日方希望参加修订税率的要求，并要求日方停止走私、不要妨害中方的缉私行动。关于“上海、福冈间通航”问题，张群向川越指出：此事“与贵国飞机之侵犯我国领空事件有连带关系”，日本飞机“在华北之不法举动不早解决，则上海、福冈间之联航问题殊难谈到”[217]。关于“聘用日籍顾问”问题，张群说：“须待关系得到相当调整时机到来时方可办理，不能作为要

求。”[218] 关于“取缔非法鲜人”问题，张群说：“日方如指明事实及确实地点，我方可协助缉捕。其在中国各地（尤其华北一带）之非法日籍人民（尤其是鲜人及台人），日方官宪尤须从严惩办。”[219]

张群根据蒋介石指示，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会谈中向日方提出了反要求。他对川越说：“《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及走私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220] 调整国交谈判开始不久，蒋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见川越，强调指出，在调整中日国交中，中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蒋指派张群与川越会谈，并向川越声明：“张部长之意见，即政府之意见。”[221]

在12月3日最后一次会谈中，张群针对不久前发生的绥远事件和青岛事件，揭露和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张群说：绥远事件，“据调查报告匪伪军中确有日本军人、日本飞机及日本各种新式武器”。关于青岛事件，张群揭露日方因一日纱厂闹工潮突将全部纱厂关闭，并派7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闯入中国机关，搜去重要文件，捕去公务员多人。张指出：“此种不法行为，不独足以激动风潮，实属侵害我国主权。”他要求日方“立将派驻各处陆战军撤退，恢复纱厂原状，即日分别释放送还不法逮捕之人员及擅取之文件”[222]。

川越在12月3日会谈中宣读了他事前单方面起草的“会谈备忘录”。张群当即指出，“备忘录”与历次会谈情形显有不符之处，表示不能接受。可是川越竟将“备忘录”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南京外交部当即将此件退回。第二天，须磨又将此件送到南京外交部。12月4日，南京外交部再派人将“备忘录”退还须磨，并在公函中指出：“此件既非过去双方谈话之正确记载，不能作为参证之根据。”[223] 12月7日，南京外交部正式公布了张群先后与有田、川越会谈的经过，以正视

听。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从1935年末到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代表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若被日本人知道，很可能会提前发生战争”[224]。谈判是蒋介石主动发起的。从“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一直坚持反共立场，接连进行“剿共”内战，此时他为什么主动发起与中共谈判呢？这和下述情况有关：一、在中苏南京谈判中，苏方要求蒋停止“剿共”，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为获取苏联援助，对中共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后，主力红军被迫撤出江南中心地带，转移到陕甘，实力又锐减。在蒋看来，此时的红军已构不成对他的威胁，他可用“政治收编”的办法予以解决；三、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蒋介石把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误认为是“乞降”，将为其收编红军提供了可能。他是在见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发言后，派邓文仪去莫斯科发起与中共秘密接触的。

一　在莫斯科的接触

1935年秋，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命他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邓请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从中斡旋，遭到拒绝。邓在上海苏联领事馆看到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其中刊有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和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邓连夜找人译成中文送给蒋介石。蒋看后，命邓迅速赶回莫斯科，设法与王明接触。

邓文仪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启程，1936年1月3日到达莫斯科。按照在国内与蒋介石、陈立夫商量的办法，他立即写信给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请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代转，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会面，商谈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信发出几天后未见回音，他又找到在莫斯科的胡秋原，胡是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莫斯科负责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邓请胡代为介绍，希望能与王明见面。

中共代表团1月11日得到消息，决定派在中央苏区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潘汉年先会见邓文仪，弄清事情原委，再决定王明是否与邓会见。1月13日晚，潘汉年与邓文仪在胡秋原寓所会晤。潘先问邓，你找王明谈话，“是以个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邓答道：“我这次来，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关于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邓说：“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关于要抗日为什么必须联共这一问题，邓文仪用蒋介石的话解释说：“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潘汉年向邓文仪说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提出：“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潘汉年郑重表示：“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那么要实现合作抗日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在潘汉年催问下，邓文仪谈了三点：“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

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与粮饷。这一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回答说：“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说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我们将来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会同情的。”潘汉年还说，这次初步交换意见后，下次见面希望邓文仪代表南京政府谈些具体想法。邓文仪坚持要求面见王明，他说：“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王明及时将潘汉年与邓文仪会谈情况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等作了汇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基本上给予肯定。于是，王明决定会见邓文仪。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王明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邓文仪说“蒋先生确实要抗日”，并转达了蒋介石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四项条件：“第一，关于政府问题，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可以和红军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工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他们的政工人员到南京的军队里去，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与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首先是恢复1924年—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其次是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来解决它。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第四，关于防线问题，南京政府打算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要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它不能派很

多的军队到其他地方去。”王明对蒋介石的这四条没有立即做过多评论，只是强调红军与国民党如果要建立密切的联盟，第一位的条件恐怕是：一、互相信任；二、停止内战。他对邓文仪说：“如果国民党方面不能结束对红军的战争，红军的领导人是不会相信你们的。因此你们必须首先采取措施来证明你们与红军合作的想法是真实的。”这次会谈商定，国共谈判要在国内举行，由南京方面的代表与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派出的代表直接谈判，两党都要保证对方代表的绝对安全。

1月22日，王明与邓文仪举行第二次会谈。邓文仪说他已收到蒋介石复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回国谈判，并提议24日或25日启程。王明要求邓文仪写出保证中共代表回国后安全的文件，邓答应可以写。在这次会谈中，王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的意见，对蒋介石的四项条件进行了评论。王明说：“蒋介石作为政治家，是不会提出对中共和红军有利的条件的，因此他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对红军有害。比如关于政府，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关于军队，你们建议改编红军；关于抗日战线，你们建议给最困难的内蒙的防线。”他问邓文仪：“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谈判，你最好是告诉我，蒋介石是否提出了一些对红军有好处的条件？”邓文仪答复说：南京方面的意见是初步的，不是最后的意见；既然谈判，双方都要做出让步。邓承认内蒙“确实离中心地区太远，缺少食品”，可以考虑把“西北的某些地区”给红军[225]。邓文仪应允给中共代表办理回国护照，近日内即可动身。

这次会谈刚结束，邓文仪即收到蒋介石来电，令他即刻赶到德国柏林，参与李辅臣（陈立夫的化名——编者）与苏联的谈判。当他再一次会见王明说明上述情况后，由于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王明怀疑邓是在耍手腕，并怀疑国民党对谈判的诚意。邓给王明看了蒋介石的来电，并说他将于1月25日或26日离开莫斯科，预计2月5日或6日赶回，之后再确定回国日期。

1月23日王明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说明邓文仪将回国前往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同一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代表毛泽东和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二　CC派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谈判

蒋介石与中共秘密接触，采取国外、国内同时并举，国内多渠道同时进行的方针。CC派代表曾养甫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的接触，是国内最早进行的一条渠道。

蒋介石把在国外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邓文仪的同时，把在国内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了CC派首领陈立夫。陈受命后，把这项任务转交给其亲信曾养甫。曾是CC派重要成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命谌小岑具体实施这项使命。谌小岑是曾的下属，担任铁道部劳工科长。五四运动期间，他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1931年在天津办《丰台》杂志，抨击蒋的不抵抗政策，与一些左翼文人有联系。因此，谌是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理想人选。

1935年11月初，谌小岑在受命后的当天晚间，找在南京给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当秘书的翦伯赞商议此事。接着他用暗语和谐音写信给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大意是：“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前来。”[226] 吕振羽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他把谌的来信交给与他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中共北方局决定先派吕振羽去南京，探明此事系由何人发起和主持。11月底，吕振羽到南京面见谌小岑。谌告以此事系由曾养甫出面进行。吕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由谌小岑陪同会见曾养甫。吕问曾：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是曾先生自己的主张吗？曾说，他是秉承宋子文的意旨办事，并说：日本侵略者步步进

逼，看来非抗战不可了。他要吕振羽帮助寻找中共同他们谈判的线索。吕答应从北平的教授和学生中寻找。中共北方局见到吕振羽写的上述情况报告后，即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南京。周告诉吕，组织上决定留他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并向他交待了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一，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227] 周小舟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见面，周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强调："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国民党代表则要求中共"帮助他们联苏"；"要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228]。周小舟在南京逗留两三天后返回北平。吕振羽则留在南京继续与曾养甫谈判，双方围绕谈判条件争论激烈。

1936年3月，周小舟应国民党方面要求第二次来到南京。他除带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六项要求外，还带来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署名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等人的信，还有林伯渠写给覃振的信，每封信都附有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一、"由他改编红军"；二、"取消苏维埃"；三、"延请中共领袖以个人资格参加南京政府"；四、"要求红军由察绥走蒙古国进攻满洲。"[229] 5月14日，曾养甫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信，简略地谈论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由于"一二九"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两广地方实力派在酝酿反蒋，南京对两党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四项办法，回答中共方面提出的六项要求。这四项办法由谌小岑记录下来，转交吕振羽。其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是：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230]。

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向吕振羽表示，这样转来转去，不解决问题，希望中共方面派负责代表到南京谈判。陈立夫有意与周恩来在北方会见，当面解决一切。

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再去南京。他7月1日动身前，北方局针对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提出了四项条件。周小舟到南京后，以这四条为基础与谌小岑谈判。会谈后，双方共同整理了一份“谈话记录”，共五条，由双方代表负责签字，蒋介石、陈立夫也看过。“记录”全文如下：

（1）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2）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存之矛盾，集中力量。

（3）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一协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指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现形势下，应当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4）在上述三原则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逮捕C方人员与爱国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5）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231]。

周小舟这次到南京，还与曾养甫进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国防政府、红军改编、红军防地及南方游击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地争辩。接着，吕振羽又与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在上述谈判基础上，谌小岑代表国民党起草了一个协定条款，经陈立夫修改，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共〉同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定放弃苏雏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完成民族革命任务[232]。

曾养甫向吕振羽表示，希望能与中共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他请周恩来到南京来，或者他与张冲到陕北去。两广事变结束后，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去陕北已不可能。他去广州前，通过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希望以后通过电台与陕北联系。

8月6日，谌小岑写信给周恩来，对邀他“西北之游”表示感谢，希

望就“统一军政组织”和“停止军事行动”继续谈判。信中附上“电台符号及密码”，表示“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商谈”，并说这样“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有所决定，即可约期晤谈”[233]。

吕振羽将上述情况及时报告给在天津的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陈酉生（王世英）和在北平的周小舟。8月，从莫斯科归国的潘汉年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任命他作为中共代表与南京直接谈判。中共中央9月23日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方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同时提出“小周报告已阅，他是否可进苏区一谈，我们拟要他进来一次”[234]。于是，周小舟第四次去南京，从吕振羽处取走所有材料和密电码。至此，中共北方局与CC派代表间的谈判便告结束。

三　董健吾陕北送信

1935年末，宋子文与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去陕北送信，向中共中央传递南京当局愿与中共谈判合作抗日的信息，并决定请董健吾前往陕北。董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的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当过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与宋家来往颇多。1936年1月初，董应邀来到宋庆龄寓所。宋请他去陕北瓦窑堡，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欣然接受委托，答应马上动身去完成这一使命。次日，董再次来到宋宅，宋庆龄将要件一包和行资百元交给他，并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他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作为董沿途的护身符。宋庆龄一再嘱咐董沿途要谨慎，对那包密封的文件要特别保藏好。

董健吾1月到达西安后，由于冰天雪地，雇不到车辆，无法前往苏区，在西安滞留四十余日。春节过后，董仍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路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去找在西安的张学良，恳请张协助他去瓦窑堡。张见到他的“委任状”，又去电南京得到证实，便于2月25日用飞机把董健吾及与其同行的张子华送到肤施（1936年改名

延安），再派一个连的东北军护送他们出境。此前，在洛川与东北军谈判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已将董等去陕北之事向中央作了报告，2月25日李给周恩来、博古的电报说：董、张已飞延安，“拟来瓦窑堡和你们见面，我电约他们廿七日由延安起身，请即妥派武装赶到延安之川口迎接”[235]。董、张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董健吾化名为周继吾。

此时，毛泽东等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董健吾在瓦窑堡见到博古、林伯渠，转交了宋氏姐弟的密信，转达了南京愿与中共谈判的意向。中共中央从他们谈话中，得知南京内部的分化情况，其中除有主张“联日反红”的右派外，还有主张“联俄联共”的左派，而且“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236]。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直接与南京当局谈判。3月4日，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名义致电董健吾：“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说明“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中共“愿意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237]，并提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

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条件于3月5日离开瓦窑堡，回上海复命。宋庆龄对董的陕北之行十分高兴，向他表示感谢，后来又委托他把斯诺、马海德等国际友人送往陕北苏区。

四　张子华充当联络员

国民党CC派奉蒋命打通共产党关系后，除通过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外，还通过左恭与中共长江局取得了联系。左恭，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征集部主任，1933年与谌小岑在南京办过进步刊物《力生》。他接受谌小岑委托后，通过中共长江局介绍一位黄同志与谌小岑接头。这位黄同志真名王绪祥，党内用名张子华，曾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熟悉那里的地形和交通。张子华与谌小岑接触几次后，便建议国民党派人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

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一道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曾养甫等人情况。张子华动身前，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又取得国民党使者的身份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并不了解这位同行者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到瓦窑堡后，单独向博古报告了南京内部在抗日和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化，以及陈立夫、曾养甫等人急欲同中共联系的动向。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子华又应召赶往石楼，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口头汇报。

张子华4月底由陕北返抵南京，曾养甫在家中接见他。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4项办法，谌小岑抄写后也交给张子华一份。于是，张子华再次去陕北，面见周恩来，递交陈立夫口授的办法，转达曾养甫想会见中共主要负责人的意向。他还带去了覃振写给林伯渠的信。

6月初，张子华回到南京，带来了周恩来写给谌小岑、张伯苓、时子周等人的信。周向这些昔日的师友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促进国民党改变政策，联共抗日。周恩来在给谌小岑的信中还欢迎他和曾养甫“惠临苏土，商讨大计”[238]。

7月，张子华应曾养甫要求又一次去陕北，送去曾给周恩来的信。曾在信中希望两党能派负责代表面谈，欢迎周恩来来南京，并口头表示周如不能来，邓颖超来亦可。8月27日张子华到陕北，9月20日又从陕北赶到广州，递交周恩来给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周恩来8月31日写给曾养甫的信强调“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表示愿与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欢迎曾养甫与陈立夫到苏区谈判，保证他们的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239]。周恩来9月1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对他们年来的联俄联共之举予以肯定，指出“西北危亡迫在旦夕”，国共两党的内战是“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信中说，你俩“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240]。陈立夫收到周恩来给他的信后曾给蒋介

石看，蒋令其继续与中共联系，“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考虑”[241]。

曾养甫9月27日在广州面见张子华，提出请周恩来来到广州见面。第二天，张子华向陕北中共中央发电报，转达曾养甫“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242]。此前，中共中央已考虑派周恩来出去谈判，“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而“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243]。收到张子华9月28日电报后，中共中央作出3点答复：“切望南京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进攻，作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244]。为准备周恩来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中共中央于9月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0月15日张子华到西安，用书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245] 中共中央见到上述条件后，认为国民党对谈判还算有诚意，同时得知蒋介石将于16日到西安，便派代表与国民党交涉，争取周恩来与蒋在西安谈判。但交涉未成，此设想没能实现。10月19日，周恩来致电在西安的张子华，作为他9月28日在广州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电报提出：“一、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二、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三、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四、南京方面代表希望陈辞修（陈诚——引者）、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二人来。五、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起程。”[246] 可是，“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30万军队，企图剿灭陕甘的红军。周恩来拟往西安与蒋直接谈判的计划未能实施。

五　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4月，潘汉年偕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胡愈之离苏返国，5月到达香港。胡愈之先期离港去上海，潘汉年则在香港给陈果夫写信，请其派人来港接头联系。

胡愈之到达上海后，会见了刚刚由陕北被中共中央派来上海的冯雪峰，向他报告潘汉年已到香港。于是，冯、胡二人一道赴港接潘。冯告诉潘，上海有秘密电台可直接与陕北联系，也有去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久，陈果夫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港迎潘。潘汉年到南京后，曾养甫与其会面，请他先到陕北会见中共中央负责人，弄清他们对谈判的具体意见后，再来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潘汉年根据冯雪峰提供的秘密交通线前往陕北，7月24日到西安，8月8日到达保安。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和他接触情况以及他到南京后与曾养甫的谈话内容。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周恩来未出去以前，由潘汉年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南京当局谈判。

潘汉年10月中旬到达上海，带来了中共中央9月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

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第一次谈判。潘将中共中央起草的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陈向潘转述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听后气愤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指出"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陈立夫强调必须先解决军队问题，其他一切好办。他对潘汉年说：你我都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

一次，蒋介石愿意和他谈判。潘汉年明确答道：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247]。这次会谈的情况和陈立夫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事，潘汉年于11日电告中共中央。12日，毛泽东复电潘汉年，提出“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同时指出如南京的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248]。

11月19日，陈立夫和潘汉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谈判。陈立夫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他要求潘汉年把上次会谈时他转达的蒋介石意见电告中共中央。陈立夫接着以威胁口吻说：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那时，红军处境“岂不更糟糕”。潘汉年斩钉截铁地说：“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我们今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陈立夫表示，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并郑重地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对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两党合作参考。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4项条件时，陈立夫竟矢口否认，说：“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249]至此，谈判陷入僵局，无法继续进行。当晚10时，张冲去看望潘汉年，委蜿透露陈立夫左右为难，希望双方继续努力。他转达陈立夫意见，请潘把蒋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如周恩来能与蒋面谈，条件尚可斟酌。

潘汉年11月21日将与陈立夫第二次会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复电。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表示谈判不宜中断，建议潘汉年继续留在上海，安全问题他们负责。

11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断然拒绝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以张闻天、毛泽东署名的电报说：“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250]。见到潘汉年11月21日电报后，中共中央12月10日复

电潘，明确指出：蒋介石没有抗日救亡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前提，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辱红军的态度”，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251]。

历时一年的两党秘密接触至此以无结果结束，但它打破了近十年来两党隔绝的状态，为西安事变爆发后两党负责人直接谈判作了准备。

第五节　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迫害

一　对救国运动的压制

30年代中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区，救国运动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开展起来的。上海救国运动刚开展不久，1936年2月初，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就在一份密报中称：“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分子异常复杂，活动范围广大”，“将来毒焰所及，势必直接及于各地青年团体及文化团体，间接更有侵入各种职业、产业团体及民众之危险，故为防患未然计，不可不预筹严密之防范计划”[252]。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开会议决，由中央禁止《大众生活》发行，查封生活书店，查封量才补习学校及量才图书馆，并逮捕其主持人李公朴；密令各团体禁止参加文化界救国会，实行新闻检查，封锁其消息[253]。紧接着，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诬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倡导的救国运动，是在共产党的煽惑下，利用民众的一点热情，“借文化团体知识分子为工具，以逞其危害民国，破坏秩序之阴谋”；其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是皆利用‘救国’的呼声，以作其叛逆行为的掩护”，成为“赤色帝国主义者”“汉奸之爪牙与工具”。文告威胁说，如果不听劝告，不加悔改，“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254]。

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一文，对中宣部的诬蔑和恫吓作了驳斥。文章说："上海的救国运动，兴起于华北伪自治运动抬头的时候。当时华北汉奸，组织烟民，冒称民众；华北报纸甚至公然以汉奸理论代表民意。中宣部在那是非颠倒、国格危殆的时候，默不一言；政府当局也未能当机立断，为有效之制裁。我们在悲愤之余，感匹夫之责，才有救国运动之发起。两月以来，赖各地学生及民众救国运动的勃发，和文化界正确理论的开展，舆论为之澄清，人心为之振奋，汉奸为之匿迹。如果党国诸公真能以民族利益为前提，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是如何的爱护；即使中间有错误的所在，应该是如何的加以善意的指导。不幸得很，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我们所感到无限的失望的。"文章还反驳说："中宣部又谓救国团体之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我们检查所有救国会的宣言，绝对没有此种激烈的文句。这许多铁一般的错误，足以证明中宣部显然是受人蒙蔽，更足以证明其所谓'受人利用'云云，也都不过是奸人捏造事实，诬陷救国运动。这种人造谣生事，为虎作伥，究竟是何居心？中宣部何以会被其蒙蔽？是否所谓'受人利用'者，正为中宣部本身？这是我们所感到无限的疑虑的。"文章庄严宣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诬蔑文告所能恫吓得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255]

沈钧儒曾在一封家信中描述当时的艰难情况说："因抗日情绪勃发不能遏止，与朋辈中之为大学教授者、作家、出版者共同组织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间惹起了许多烦恼，中央党政对此会极端嫉视，要解散及逮捕会中重要诸人，应付环境亦极费力。"[256] 但他表示既参加救国运动，"就要准备坐牢，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257]。王造时也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258] 章乃器则表示：刀锥斧钺，在所不辞。

南京政府不顾爱国群众和舆论的呼声，于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抵抗解散之人。"[259] 随后又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为名，查禁了《大众生活》等二十四种抗日刊物，并逮捕了上海复旦大学生救国会十一名负责人，同情救国运动的李登辉校长等均被殴伤。《大众生活》于被迫停刊前发表《读中宣部告国人书》的评论，要求对爱国运动不要用恶意来估量，否则徒然损伤民族的元气。"客观的危亡事实推动着民众的救亡火焰，增高着民众的救亡热血，压迫的结果只是更惨痛地消耗民族元气而已。"[260] 天津《益世报》也发表《爱国无罪》的社论，对救国运动予以声援，指出：救国会会员中许多是社会中或大学里有声望有品格的学者教授，他们的爱国心是真诚纯洁的。"我们如今只请求政府给人民这个最低限度的权利：爱国无罪！……爱国有罪，人民不敢爱国，到了举国的人民畏罪而不敢爱国，国家必亡;国亡而政府亦随之而亡了。所以今日中国救国之道，中国政府自存之道，最少要做到爱国无罪！"[261]

冯玉祥对国民党压制救国运动感到愤愤不平，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收到章先生他们为救国会对此次中宣部的一篇宣言，可算是赤诚极了。读完了之后，〈谁〉不发生一种对中宣部的很不好的影响呢，真是晕【昏】聩糊涂无所不备了。""读上海救国会之宣言极有感，我拟即刻写一长函给蒋，请其特别注意造谣害人之人。"[262] 3月5日日记又记："到蒋先生处一谈，所谈事项甚多。……三，陶行知、江问渔、章乃器各位先生救国会事，不可压而可联也。"[263] 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许多人疑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别有背影，我想这是由于报告者的夸大蒙蔽，正给敌人造机会。目前学生的爱国运动及国民自发的救国运动都是民气蓬勃的表现，若能加以适当指导，必可成为救亡工作的伟大力量。所以我觉得无论中央或各省市当局，都应多邀救国团体的领袖时常开诚布公的谈话，甚而相对流涕，务须彼此谅解、合作，共同对外，万不可使自己的力量互相摩擦，互相抵

消。”[264]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国民党更视为心腹之患，压迫随之加剧。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将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等文件，亲自送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当局的认可，争取合法公开。吴铁城不仅不予承认，反而恶言相加，说你们“要组织抗日政府，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沈钧儒、章乃器劝他冷静考虑，不要听信特工人员的情报，无事生非，并说：“市长既然说政府是要抗日的，那么，现政府就会转变为抗日政府，有什么推翻另组的可能和必要呢？”吴说：“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的，那不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呢？现在我宣告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非法，命令你们：一、立刻写好通告，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把所有印刷品送到市政府来，以备销毁。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拘留起来！”“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沈、章从容镇定地回答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如同它的名称所表示的，是全国各地的救国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的，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印刷品已经统统发出去了，没有留存的，市长要逮捕我们吗？那应当依法由法院出拘票来拘捕。”[265] 并说明自己“为良心所驱使，根据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除此以外，别无所求，更谈不上什么野心”[266]。坚决表示：“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267] 他们驳斥说：“国难深重，市长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起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市长难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吗？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268] 双方争论了数小时，沈、章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击退了一切意图中的迫害”[269]。

6月5日，吴铁城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再次对救国运动进行攻击，说：“现在有少数野心家，组织了一个甚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里面不过是二三十人在那里包办，说得上什么全国联合呢？这个团体简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他要求校长们负起责来，“取消各

学校内的救国会以及一切类似的反动组织”[270]。

宋庆龄闻悉后，立即写信给救国会领袖表示声援，完全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认为当局一面鼓吹“秘密准备抵抗日帝国主义”，但又一面警告、逮捕我们救国会诸同志，这是一个讽刺，并说：“我们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担保你们将作坚持到底的努力。我们的路是长而艰苦的，但只有伟大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尽力干去，这种胜利是有保证的。”她表示：“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271]《救亡情报》也发表《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巩固我们的救国阵线！》的文章，认为“我们的领袖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民族的忠心，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权威的不屈，而且我们应该给他们进一步的信任，拥护他们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宣称：“对于一切恶意的攻击，我们不需要解释和辩论，我们只有用不可动摇的救国阵线的力量和伟大的献身民族的决心来回答。”[272]

7月中旬，蒋介石又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人到南京面谈，并派戴笠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宿在豪华的中央饭店。三人事先商定应付的三项原则：第一是要用联合战线去吸收各党各派，但不能把联合战线卖给任何党派；第二是用联合战线去运用各党派的势力，但不能被任何党派来利用；第三是每一个参加联合战线的人，应将其社会、组织、政治关系来充实联合战线，而不能因自身关系削弱联合战线。同时确定，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原则立场决不妥协让步，但不同蒋正面冲突[273]。在谈话过程中，沈、章、李表示很关切对日作战准备情况，希望有所指示。蒋介石声称：“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沈钧儒等说：“那太好了，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华北还要退让呢？”[274]蒋于是又重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说“共产党捣乱后方”，不要国家，“共产党的话不能信”，等等[275]。蒋介石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领导，沈等

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不领导也就领导了。我们救国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同谁团结。"[276] 章乃器还提出希望蒋"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偏信CC和军统的情报。蒋介石的目的未能达到，谈话无结果而散。

9月6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援绥抗日，发动会员向民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募捐，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表一项通令，攻击这一爱国行动为"借救国为名，敛钱肥己"，并声称救国会为"非法组织，且系反动分子之集团，如任其随处募捐，不啻助长反动势力"，必须予以严禁[277]。对此，救国会领袖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联名发表声明，予以反驳说：救国会"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还严正指出："国难严重若此，党政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遑，讵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且其所指事实，系九月六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绥远抗敌军队募捐，倘为政府抗敌军队募捐而竟成为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278]

二　"七君子"事件

1936年10月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趋向高潮，显示出强大的声势和威力。此时，日本方面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国民党既慑于日本的压力，又对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感到惊恐，再也无法容忍，于是镇压开始了。

11月23日凌晨2时许，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八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的家里捕人。除陶行知因已先期出国，未遭逮捕外，沈钧儒等七人同时被捕。沈钧儒、李公朴、王造

时三人被押到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沙千里押于爱文义路捕房，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则押于卢湾区法租界巡捕房。沈钧儒在寒风凛冽的深夜在捕房看守所冰冷的水门汀地上坐了一夜[279]。

由于害怕舆论谴责，上海市公安局通令各报不许登载沈钧儒等七人被捕的消息[280]。但《立报》和《华美晚报》于当日在第一版以显著位置披露了这个消息。《立报》的报道极简单，连七人的名字都未敢刊出，《华美晚报》则较详尽，还登载了他们的简历。随后上海及全国各报相继作了报道。上海市当局不得不于25日正式公布沈钧儒等人被捕的罪名说："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种种事实，均可复按。政府当局年余以来，曲加优容，苦口劝喻，无如彼等毫不觉悟，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业经查有实据。现值绥边剿匪吃紧之际，后方尤应巩固，不得不行使紧急处置，以遏乱萌。"[281]这是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

23日上午7时，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人被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受审。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则被送到高三分院受审。10时，高二分院第一庭提审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审判长宣布："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282]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的薛士林代表公安局作为原告，指控沈等有"反动嫌疑"，"鼓动工潮"、"危害民国"等罪，但拿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又未具备公文，却要求移提（引渡）到内地法院。沈钧儒等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公安局违法移提[283]。依据上海法国租界和中国政府协定，除中国的司法机关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和特区法院移提人犯外，像公安局一类的机关必须有证据才能移提[284]。三名被告的九位律师张以藩、张耀曾、俞钟骆、陈志皋等轮流进行辩护，声明："一、搜捕时无法院捕

状，违反特区法院决定；二、被告等所犯为‘爱国未遂罪’，毫无其他证件，应立予开释。”[285] 法院被迫裁定：交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于是沈钧儒和李公朴、王造时先行退庭。当他们于中午12时走出法院时，守候在大门外的群众，向他们热烈鼓掌欢迎。

接着，审判长审问仍未保释的沙千里：“为什么组织救国会？”沙答：“为的是救国，因为现在国难正殷，为保全国家土地主权之完整，凡属国民一分子，均应同尽国民之责任。”问：“罢工事你干与吗？”答：“我不知道。”问：“你加入共产党吗？”答：“没有。我在加入救国会以前是国民党党员，隶属于三区十八分部，不过他们开会我没有去过。”问：“是否拿到第三国际命令，改为救国会的名义？”答：“我完全不知道。公安局的话是不对的。如说因为救国会的会员中有共党，即认为救国会是共党组织，然则救国会会员有国民党，全部即为国民党？这真是不会论理之至。”“不能说救国会的会员做共产党，其他会员也做共产党；如救国会会员做强盗，其他会员也要负责吗？”[286] 沙千里据理指出公安局代表的指控“全属虚罔，毫无根据”[287]。蔡六乘等三位辩护律师也指出捕房拿不出犯罪的证据和事实，没有拘票逮捕罪责不明的公民是违法的，法庭不应当违法移提[288]。法院也被迫作出交责付律师保释的裁定。

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于下午4时在高三分院受审。法庭第一个审问章乃器，审判长问他曾否煽动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他大声地答道：“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力量还不够！倘若我有力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我要很骄傲地回答审判长：我曾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审判长问：“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动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章乃器毫不加思索地说：“是！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和猪猡一样，请审判长问一问全法庭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同胞遭受到侵略者这样惨酷的待遇，谁不表同情！”[289] 在审问邹韬奋时，他坦白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深信参加救国运动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关于他和沈钧儒等

三人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及毛泽东的回信，涉及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此文所主张的是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有原文可按，谁都可以看，可以评论。检查官当庭认为这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关于是否参加煽动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邹韬奋说他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济在纱厂里过着牛马生活，罢工饥寒交迫的同胞。法捕房律师也当庭宣称，捕房政治部曾经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觉得只是爱国文字，没有犯罪的证据，不允许公安局移提[290]。史良审讯的情况基本相同。结果三人均由责付律师保出，于当夜8时回家。

沈钧儒等刚刚出来几个小时，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又以从前拿获的共产党员供认沈钧儒等是救国会委员，有共产党嫌疑的口供新线索为借口，致函高二分院说："查反动分子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业由捕房捕获解送贵院，并经讯问后交保定期再审在案，兹据确报，该沈钧儒等即有逃亡之虞，应请立予拘案，免生意外。"[291] 高二分院又立即发出拘票，于当日深夜再次将沈钧儒逮捕。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五人也同时分别被捕或自动投案，与沈一同被羁押在捕房监狱。高三分院书记官孙瑛事先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史良，史良立即用电话通知沈钧儒、沙千里等人，叫他们赶快躲避，自己随即逃离寓所，前往陆殿栋一亲戚家避难[292]。

24日，高三分院审理时，公安局代表杨福麟指控说："从前拿获的共党都说本案被告等是救国会委员，从前打伤警察的人犯亦说被告等是救国会委员。被告等阳假救国为名，阴施捣乱工作。"[293] 公安局律师詹纪凤则称："被告等从前曾鼓动人民与军警冲突，被告等所有一班党徒都是救国会内分子，假救国为名，和政府捣乱，应请准予移提。"[294] 被告辩护律师鄂森说："现在公安局来文亦说及新事实发现，如认被告有共产党嫌疑，要求移提，须提出相当证据，若无充分的证据，谈不到移送。"[295] 李公朴说："公安局说我们有鼓动工

潮之嫌，究竟有什么凭据？”[296] 王造时也申辩说：“公安局说我们鼓励工潮，有共产党嫌疑，究竟有何根据，不能空言主张。”[297] 沈钧儒说：“所谓新事实，可是说公安局拿到的共产党嫌疑人犯说我们是救国会的委员，便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这完全没有理由。”[298] “既指我有共党嫌疑，又无证据提出，实属不成理论，而保出后又加逮捕，更属违法。”[299] 审判长于评议后宣布：“移送问题应由上海市公安局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交涉办理。”[300] 事实上，公安局与法院早已串通，沈钧儒等庭审后，就被公安局移提过去了。章乃器、邹韬奋也于27日上午从上海地方法院移送上海公安局。

按照《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301] 沈钧儒等被押解到公安局以后一直没有进行审理，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责难。1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找沈钧儒谈话达三小时。沈等要求恢复各人自由，蔡答：“未奉命不敢擅专。”[302] 对公安局要求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则答称，这是大家讨论决定成立的，他们无权解散[303]。

12月4日下午1时半，公安局立即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六人解送吴县（今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羁押。

12月30日，史良去苏州投案，被羁押于司前街女看守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304]。随后，国民党又在南京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和曹孟君；在镇江逮捕了罗青、张仲勉、陈道弘、陈卓，查禁和没收了大批书刊。全救会执行委员、著名的爱国老人马相伯也被从上海移至南京居住。

材料充分证实，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是在日本的压力下，由

南京政府直接下令进行的。8月10日，上海日本报纸《日日新闻》登载：日本领事寺崎为上海市民学生缉私抵制日货事访问市府秘书长俞鸿钧，请求严厉取缔一切抗日救国团体[305]。10月28日，该报又登载消息："最近南京政府拟对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加以弹压，即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近来积极活跃，企图结成抗日救国阵线，但国民政府最近以中日国交调整名目，以中国共产党叛变者刘华（假名）之中心人物，召集上海蓝衣社指导部之'上海特区最高会议'，讨论如何弹压抗日救国分子，最后决议如左：一，将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数十名之抗日救国联合会首脑部，以对付史量才之手段，处以死刑。二，收买抗日救国联合会内之动摇分子，使其发生内部分化作用。三，绝对禁止抗日救国联合会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等公开行动。"[306]《救亡情报》指出这是制造谣言，企图挑拨政府与救国阵线的恶感，但实际上也如实反映了日本要求取缔救国会，压制救国运动的真实意图。对此，全救会于10月30日致电国民政府和各党政要人，并致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求明令宣示保护救国运动，严词驳斥日报造谣，不要"中其奸计，以期上下同心，共赴国难"[307]。

11月中旬，正当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进入高潮时，日本驻沪领事又向上海市当局提出消灭救国运动三项要求：一、逮捕沈钧儒等七领袖；二、解散救国会；三、取缔日商纱厂罢工[308]。上海市当局也担心罢工扩大，形势恶化，局面不可收拾，要求公安局、工部局协助逮捕救国会负责人[309]。

18日，日商丰田纺织公司船津总务到上海市政府会见市长吴铁城和秘书长俞鸿钧，提出要"取缔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310]。同日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派领事寺崎找俞鸿钧说，这次丰田纱厂罢工是"一次远远超出劳动纠纷的暴动，其背后有抗日救国会共产分子领导"；提出："（一）逮捕抗日救国会的幕后人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等五人；（二）搜捕共产党；（三）镇压各大学内的危险分子（特别是参加暴动的大夏大

学）；（四）逮捕暴行犯等。”[311] 俞鸿钧表示：第一条，“沈等同为市政府严加注意之人，只是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等，正等待确凿证据以便逮捕”。（寺崎说要等待确证，“会遥遥无期的，对此，中方应加以考虑”。）第二条，搜捕共产党应该实行。第三条，镇压各大学内的不稳定分子“已安排完毕”。第四条，“暴行犯还未逮捕一人，是怕事态恶化，目标确定后，很快就会逮捕”。俞还特地感谢日方出动海军陆战队的协助。寺崎警告说：“为不使此次事态扩大而隐忍自重，以求无事，将来如果发生同样的事件，说不定会发生不测的情况。”[312] 寺崎随即向工部局提出了上述同样的要求。23日逮捕沈钧儒等七人的当天上午，俞鸿钧秘密通知寺崎，说明这次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逮捕是“不顾法律常规进行的，鉴于这种逮捕引起的反映，希望不要在报上发表这一消息”[313]。同日下午，若杉总领事会见吴铁城，吴谈了这次逮捕“所费苦心”，表示“无论如何尽了最大努力”；若杉“对其努力表示感谢”[314]。上引的日文材料，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若杉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密电，充分说明日本插手“七君子”事件的幕后活动情况。宋庆龄当时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315]

上海市政府吴铁城、俞鸿钧等之所以敢于逮捕爱国领袖，除了日本的压力外，还因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背后支持。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代表唐豹及律师詹纪凤在法院提审沈钧儒等人时均明白声称：“各被告均有共党嫌疑，奉中央密令拘捕。”“本案系奉南京密电令拘。”[316] 沈钧儒等人被捕后的第三天（11月26日）冯玉祥曾密电蒋介石，认为沈等热心国事，设立救国会，宣传救国，并非如某些人所指为共产党和捣乱者。“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317] 12月3日，蒋复电说：“沈钧儒、章乃器等诸人，有为中（蒋自称，下同）所素识者，亦有接谈数次者。前曾以国家大势，救国要义，向之详切劝导，乃彼等不唯不听，而言论行动反日益乖张，若非存心祸国，亦为左倾幼稚病，中毒已深，故尔执迷不悟。近更乘

前方剿匪紧张之时，鼓吹人民阵线，摇惑人心，煽动罢工，扰乱秩序。中处迭据确报，沪上罢工，其经费均由章乃器以救国会经费散发，每日七千元，其背景可知。若非迅予制裁，不特破坏秩序，危害民国；即彼等自身，亦必重陷于不可赎之重大罪恶。值此国难严重，固当集中心力，爱惜人才，但纲纪不能不明，根本不能不顾，故此时处置，正所以保全彼等，使不得更趋绝路以祸国。中意除依法惩处，不令放任外，仍当酌予宽待，以观其后。务望兄等同此主张，以遏乱萌，而正视听。”[318] 蒋还曾对人说：“我对他们是很客气的，谈了话还请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反而闹得更凶了，所以只好逮捕了。”[319] 陈布雷回忆说：“所谓人民阵线沈、邹、章、李等七人之被检举案亦发生于此时，各方为之营救，来电颇多不明立场者，蒋公均命以严正剀切之词复之。”[320]

三　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这一政治冤狱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将沈钧儒等人宣布无罪释放。

11月24日，全救会发表《紧急宣言》说：“将救亡领袖的无辜加以逮捕，实在是一种对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一种公开的无理摧残！在这日帝国主义进攻绥远的今天，更完全是一种在客观上助长敌人势力的行动。”表示：“救国会的人士既以身许国，决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愿的。如果当局不愿让人民救国，一定要人民做垂手听命的顺民、亡国奴，那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也都一定会自动起来争取他们的生存权利的！”[321] 同日，全救会还发表紧急通电，提出政府当局逮捕七领袖，“实出意外，敝会现除仍决继续工作，率全国救国民众为诸领袖作后盾，并要求当局将此案公开审判，将领袖立即释放外，尚望全国各界人士，各公团，凭正义，凭良心，一致主持公道，加以援助”[322]。27日又发表《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对上海市当局于25日正式公布所谓“救国会为非法组织，勾结共产党，破坏

人民对政府之信仰”，以及“鼓动罢工风潮，阴谋捣乱治安”等罪名作了驳复，指出：“此次敝会七领袖于一无罪证之情形下，即为市公安局会同英法租界捕房所逮捕，于法律上言之实为非法；就领袖本身言之，实为无辜”，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诸领袖[323]。

《救亡情报》同时发表《勿为仇者所快》的社评，指出：“自七领袖被捕事发生后，上海的日文报纸就满载了幸灾乐祸的消息，并有宋庆龄先生亦已被捕的消息传来。从日本人这种兴高采烈的神气间，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当局这一次的将七领袖加以逮捕，是如何地满足了日人的要求，以及如何地在客观上帮助了日帝国主义者。”[324] 要求立即释放救亡阵线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开放民众组织。

沈钧儒等被捕的当天，宋庆龄即委托孙科带函给冯玉祥，请他进行营救。她在信中对沈等无辜被捕表示“殊为愤慨”，并说：“我国东北失地几及六省，而绥远战事又已爆发，国难严重至此，正国民急应奋起救国之时，章先生等系救国会办事人，救国为全国国民责任，岂救国者即为共产党乎？”[325] 冯玉祥复函宋庆龄，称已与孙科共同设法营救，并已去电蒋介石请其早日释放。26日，宋庆龄还在一项抗议声明中表示“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并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请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326] 12月初，宋庆龄还介绍章乃器、邹韬奋等的家属去南京找冯玉祥，商讨营救办法[327]。

24日，冯玉祥找陈立夫谈话，提出让“七位来南京大家谈谈为好，以免自己对立。”陈立夫提出：“一、维持政府威信；二、中央不便与地方不一致”，实即不同意。冯认为“是即是非即非为好”[328]，并说：“保持中央威信，我对此六字听了即头疼，即讨厌，为什么说的人很有意思，真是不解了。”[329] 杜重远24日、25日连续几次去见冯玉祥，商量营救事，据冯在日记记载：“见杜重远先生，为七位被捕事，说得很详细。”“见杜先生于铁道部，谈些如何营救七位之

事。”“见杜先生谈沈、章先生之事久之。”[330] 杜重远还和黄炎培商量营救对策。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1月23日，夜四时，得卫玉、重远电话，知救国会沈衡山、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被捕。”“27日，访重远长谈，知廿二夜沈衡山、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被捕以来情况。”“28日，重远来。”[331] 12月2日，胡愈之、徐伯昕也到黄炎培处研究营救事，是日黄在日记有如下记载：“八时半，胡愈之、徐伯昕到职社商六君子事，沈、章、邹、李、王、沙。”[332]

11月30日，马相伯致电冯玉祥说：沈钧儒等“其血心爱国，人人钦仰，视东北义勇军有过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虽得天下，文武不为。今学生爱国，罪以共党；人民爱国，罪以共党，至沈君等数人以民胞物与之心则有之，以苏俄为心，窃可以首领保其无也，幸我将军有以体恤之。”[333] 随后，马相伯还和何香凝、宋庆龄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再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政府和救国阵线间的挑拨离间和政府的无理迫害，并重申：“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救国阵线的立场始终没有变更过，而且今后也决不会变更。”[334]

为了声援沈钧儒等爱国领袖，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营救运动，“以表示民意所依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335]。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和《救国时报》也著文抨击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摧残，认为逮捕救国领袖，“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着的全国救亡运动。”[336] 全救会“努力从事救国之宣传与救国运动之组织，号召全民团结，一致对外，近来我海内外同胞的救国运动之进展，该会实具

有巨大推动与赞助之功”，号召海内外救国团体和同胞一致行动起来，反对南京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援救爱国领袖，争取救国自由[337]。

为了援救被捕入狱的救国领袖，上海成立了后援会，表示“要把这个事变，广泛的传播，大家起来援助我们的领袖，挽救我们的国家”[338]。上海实业界领袖穆藕初等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运动，获得上海各界的签署赞成。夏丏尊、史国纲、杨卫玉等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也著文要求迅速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吾人以为政府当局对于文化界应存爱护之念。”“沈君等六人均为当今才士，倘获早日恢复自由，俾在政府指导之下，献身民族复兴运动，为御侮前敌增加一分人力，亦即为国家民族保全一分元气，此则吾人所馨香祷祝者也。”[339] 沈钧儒等在公安局羁押期间，上海各界人士前往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每日以百计，11月31日一天即有二百余人[340]，这对沈等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救国领袖被捕消息传到北平后，平津文化教育界迅速作出反应。许寿裳、许德珩、张东荪、张申府等109位知名人士于24日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国难严重，端赖合作御侮，不容再事萁豆之争。章等热心救亡，全国景仰，敢请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以慰群情，共赴国难为幸。”[341]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援救办法，当经议决：一、停课二日，以示对被捕诸领袖声援；二、由清华、燕京、北平、中国等十五所大学各推派代表二人，组成请愿队，代表北平学生界赴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勿中敌人挑拨奸计[342]。

天津《益世报》发表题为《算外账莫算内账》的社论，认为逮捕沈钧儒等人，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刺激”。“中国到了今日，内账外账绝无同时清算的机会。合作御侮，方有生机；萁豆相残，同归于尽。”[343]

11月26日在成都春熙路青年会小礼堂召开各界声讨国民党镇压救亡运动、声援七领袖的群众大会，并筹备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会上，车耀先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的倒行逆施[344]。广州各界于11月27日举行反日群众大会，反对压迫救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广州各大学教授洪深、尚仲衣、林励儒等四十余人亦联名电请政府释放各救国领袖[345]。此外，广西、山东等各救国团体亦开展了营救运动。

国民党逮捕爱国领袖也引起一些党政上层人士的不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蔡元培等二十余人联名致电在洛阳的蒋介石，表示对此事应“郑重处理”[346]。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致电林森说：“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捕，闻讯不胜骇异！现当绥战紧张，敌寇进迫愈急，民气激昂，正为发动全国抗战绝好时机，岂可有此违反民意之举动。恳即严令释放，并开放救国运动，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347]广西实力派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冯玉祥、孙科、居正等：“当此日人主使匪伪侵我绥东，全国舆情极端愤慨之时，政府对爱国运动，似不应予以压迫。……且沈钧儒等七人，平时或主教育，或主言论，其为爱国志士，久为世人所公认，如政府加以逮捕，足使全国志士寒心。”[348]

“七君子”事件在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间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旅居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杜威、爱因斯坦等十六位著名科学家和教授致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电说：“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朋友的资格，同情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同人尤严重关怀。”[349]英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的罗素等在援救电中说：“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对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们之被捕，非常关怀。我们相信，这种逮捕是由

日本主使，因为日本害怕中国的统一与自由，我们希望立即释放被捕的抗日志士。”(350)

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巴黎中国学生会、旅法华工总会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日寇攻绥方急，正应团结抗日，何乃自毁长城！望速释放，以示政府救国之诚。”(351) 留英中国学生抗日会的电文指出：“若主张抗日即为共党，主张联合即为危害民国，则全中国国民皆应为政府阶下之囚，罪亦不在此数人。”(352) 旅美侨胞致电说：“国难日亟，正宜全国一致抗敌，乃今自毁长城，不胜惶惑。盼立释七领袖，并惩办陷害主犯。”(353) 旅美华侨柳无垢、陈其瑗、刘维炽、冀朝鼎等三百余人还发表告海外同胞书，认为沈钧儒、章乃器等“奔走呼号，目的纯在抗日救国，不仅得全国人民之敬佩，且得全世界之同情。抗日救国不仅我全国同胞之公意，亦我全国人民之天职。若谓沈、章诸先生有罪，是我四万万同胞均为有罪也”。并指出：“吾人久读救国联合会及沈、章诸先生之文字，他等主张民族解放斗争则有之，煽动阶级斗争则无有；主张督促政府抗日则有之，主张推翻政府则无有；主张援助上海日纱厂工友罢工则有之，煽动总罢工则绝对无有。……至所谓‘勾结赤匪，煽动阶级斗争’云云，均系上海市政府之恶意宣传。”(354) 要求立即释放七领袖，实行对日抗战，保障人民救国运动。此外新加坡等地华侨亦有相同的表示。

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营救“七君子”也作了努力，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详见下章）。

---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8—449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71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第581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第598—623页。

(7)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37—156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9)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给李克农训令》（1936年2月20日），未刊件。

(10) 《周恩来与张学铭夫妇谈话纪要》（1961年7月4日），转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原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第18页。

(12)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3) 周恩来在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4) 张闻天在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5)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1986年俄文版，第266—269页。

(16) 张闻天在193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7) 毛泽东在1937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第77—86页。

(19)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胡服、李允生的信》，（1936年9月7日），未刊件。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21)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允生函》（1936年9月22日），未刊件。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第93—94页。

(23) 《清华救国会一二九告全国民众书》，《清华副刊》第45卷第8、9期合刊。

(24) 传单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5) 《晨报》（北平），1935年12月14日。

(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论（一），第774—745页。

(27) 沈钧儒：《寥寥集》，峨嵋出版社1944年版，第26页。

(28) 邹韬奋：《笔谈》，《生活星期刊》第15号，1936年9月30日。

(29) 《大众生活》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16日。

(30) 邹韬奋：《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30日。

(31) 章乃器：《救亡言论集·序》。

(32) 《大美晚报》1935年12月12日。

(33) 《大美晚报》1935年12月12日。

(34) 《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

(35) 《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

(36) 《生活知识》第1卷第8期。

(37) 《一二九以来上海学运之史的检讨》，《救亡情报》第23期，1936年10月25日。

(38) 《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

(39) 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40) 《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1936年1月11日。

(41) 《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

(42) 《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25日。

(43)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44) 《大美晚报》1936年1月28日。王造时稍后将此文编入《救亡言论集》一书作为“代序”。据他说《大美晚报》发表此文时，将其中很重要的一

段删去。

(45) 《生活教育》第2卷第23期，1936年2月1日。

(46) 《生活教育》第3卷第2期，1936年3月16日。

(47) 《国难教育社成立经过及其现状》，《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48)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3月10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创刊号，1936年3月28日。

(49) 《救亡情报》第5期，1936年6月7日。

(50)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3页。

(51) 《大众生活》第1卷第14期，1936年2月15日。

(52) 参加全救会成立大会的人，无纪录可查，这个名单是作者根据调查访问得来的，参见《救国会》，第94页。

(53)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详》，《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54)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详》，《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55) 《救国会》，第89页。

(56) 《救国会》，第106页。

(57) 《救国会》，第90页。

(58) 《救国会》，第91页。

(59) 《救国会》，第97—105页。

(60) 《韬奋文集》第3集，第346页；《沈钧儒文集》，第542页；胡愈之：《我的回忆》，第301页；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38页。

(61) 《民族出路问题论坛》，《救国时报》，1936年7月8日。

(62) 《救国时报》，1936年7月8日。

(63) 《救国时报》，1936年8月30日。

(64) 《救国时报》，1936年9月10日。

(65) 何伟：《读〈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后》，《救国时报》，1936年9月5日。

(66) 林蒙：《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第1页。

(67)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68)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5页。

(6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70) 以上据孙晓村给著者写的关于南京救国会的回忆，见《救国会》第477—482页。

(71) 连贯：《“一二九”运动前后华南的爱国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集，第419页。

(72) 《救亡情报》第21期，1936年10月11日。

(73) 《救亡情报》第25期，1936年11月8日。

(74)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的讲话》，《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1日。

(75)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的讲话》，《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1日。

(76)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1日。

(77) 林蒙：《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大西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第5页。

(78)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3月31日。

(79) 张友渔：《我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第12页。

(80) 《全欧华侨奋起救国》，《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9月30日。

(81)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0月5日。

(82) 《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83)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1月20日。

(84)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按：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以后，原左联一部分负责人即筹组中国作家协会，后又改称文艺家协会。

(85) 《生活知识》第2卷第4期。

(86) 《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宣言》，《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87) 《生活知识》第2卷第4期。

(88) 《茅盾之话》，《救亡情报》第13期，1936年8月2日。

(89) 据唐弢回忆说："鲁迅当时支持救国运动，但没有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他的文章也很少提到救国会，是因当时斗争形势决定的。因鲁迅目标太大，国民党很注意他；另外救国会的负责人为了照顾他的安全，也有意不让他参加。"（编者访问唐弢笔录）

(90)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救亡情报》第4期，1936年5月30日。

(9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29、530页。

(92) 《作家》（月刊）第1卷第3号，1936年6月；《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1936年7月。

(93) 《文学》（月刊）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

(94) 《全国救国运动最近发展之鸟瞰》，《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10日。

(95) 《救亡情报》第9期，1936年7月5日。

(96) 《生活教育》第3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

(97)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时局紧急通电》，《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98) 《反对内战！要求全国团结御侮》，《救亡情报》第7期，1936年6月21日。

(99) 《请求政府下令对日宣战》，《救亡情报》第7期，1936年6月21日。

(100) 《章乃器先生的谈话》，《救亡情报》第13期，1936年8月2日。

(101)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二中全会宣言》，《生活教育》第3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

(102) 《救亡情报》第20期，1936年10月4日。

(103) 《全救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事报告》，《救亡情报》第22期，1936年10月18日。

(104) 《宋庆龄先生给全救第二次执委会信》，《救亡情报》第22期，1936年10月18日。

(105) 《救亡情报》第21期，1936年10月11日。

(106) 《上海各界爱国市民发起签名请愿运动》，《救亡情报》第26期，1936年11月15日。

(107) 《国闻周报》第13卷第43期，1936年11月2日。

(108) 《上海各救国团体致北平文化界快邮代电》，《救亡情报》第23期，1936年10月25日。

(109) 《国讯》第144期，1936年10月21日。

(110) 《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111) 《桂林日报》，1937年4月11日。

(112) 以上据孙晓村给著者写的关于南京救国会的回忆，见《救国会》，第481—482页。

(113) 《救亡情报》第27期，1936年11月22日。

(114) 《救亡情报·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1936年11月12日。

(115) 《救亡情报·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1936年11月12日。

(116) 《沈钧儒文集》，第262—264页。

(117) 《火线下的救亡运动》，《时论半月刊》1936年11月30日；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救亡情报》1936年12月18日。

(118)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版，第662—663页。

(119)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20)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版，

第663页。

(121) 阚宗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经过》，《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

(122)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6月2、3日。

(123) 参见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2页。

(124) 《申报》，1936年6月10日。

(125)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

(126)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6月13日。

(1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30)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4页。

(13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论（三），第50—51页。

(13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论（三），第50—51页。

(133)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9期。

(134) 《民国日报》（广州），1936年7月19日。

(135) 《民国日报》（广州），1936年7月19日。

(136)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72页。

(137) 《广西文献》第10期，第13页。

(138) 《国闻周报》第13卷第31期。

(139) 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学术论坛》1987年第4期。

(140)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4页。

(141)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的七人案件》，《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4页。

(142) 云广英：《“六一运动”前后我党在南宁活动的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143)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5页。

(144)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6页。

(145)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82—83页。

(14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要述》，《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

(147)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2页。

(148) 《蒋李第一次离合内幕》，香港《春秋杂志》1960年1月2日。

(149)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9月16日。

(150) 《对内蒙措施要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70页。

(15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52) 天津《大公报》社评：《绥东问题》，1936年8月8日。

(153) 《荒木陆相致斋藤总理及紧急措施基本方案》，《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02页。

(154)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155) 黄炎培：《绥远劳军一瞥》，《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47期。

(156) 张明养：《绥远战争》，《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1012页。

(157)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72页。

(158) ［日］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57页。

(159)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27页。

(16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01页。

(161)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46页。

(1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7页。

(163) 《蒋介石对（大公报）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13卷第44期。

(164)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傅作义生平》，第42页。

(165)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0期。

(16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410页。

(167) 《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第59页。

(168) 刘春方：《我所知道的傅作义先生》，《傅作义生平》，第129页。

(16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01页。

(170)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47—48页。

(171) 董其武：《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傅作义生平》，第5页。

(172)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173)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0期。

(17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977—978页。

(175)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傅作义生平》，第202、203页。

(176)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纪》，《军事杂志》第101期。

(177) 秦孝仪编：《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版，第422页。

(178)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1期。

(179)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纪》，《军事杂志》第101期。

(18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2页。

(181)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红色中华》第312期，1936年11月23日。

(18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37页。

(183) 《察绥道上》，《绥远抗战集》，上海星华出版社1937年版，第17页。

(184)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傅作义生平》，第202页。

(185) ［日］《日中战争》1（《现代史资料》8），第612—613页。

(186) ［日］《日中战争》1（《现代史资料》8），第610页。

(18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17页。

(188) 董其武、孙兰峰：《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

(189) 《傅作义生平》，第5页。

(190) 傅作义：《用鲜血争起民族复兴》，《今日的绥远》，三江书局1937年版，第1页。

(191)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傅作义生平》，第245页。

(19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16页。

(193)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97页。

(194)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109页。

(195) 《绥远抗战实录》，《绥远抗战集》，第7页。

(196) 转引自《今日的绥远》，第73—74页。

(19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1981年初版，第688页。

(198) 《日人操纵下之华北走私问题》（1936年5月），《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19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二），第107页。

(20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

(20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42页。

(202)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1984年版，第301页。

(20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42页。

(20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42页。

(205)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45页。

(20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9页。

(207) 《张群、有吉会谈记录》（1935年2月20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08)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6页。

(209) 《大公报》（天津），1936年1月23日。

(210) 《张群、川越会谈摘要》（1936年11月10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1) 《大公报》（天津），1936年6月2日。

(21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90—691页。

(213) 《九月二十三日川越张群会谈时张群宣读之文件》，《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

(21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第691页。

(215) 《九月二十三日川越张群会谈时张群宣读之文件》，《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

(216) 《张群、川越会谈摘要》（1936年11月10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7) 《张群、须磨会谈记录》（1936年1月22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8) 《张群、川越部分会谈记录》（1936年9月15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9) 《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936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20) 《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936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2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75页。

(222) 《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936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23) 《有关张群、川越会谈的几个文件》，《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

(224)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92页。

(225) 以上引文均见《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与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226)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227) 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南京《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228) 《小周报告——关于数次与蒋谈判的情况》（1936年8月19日），未刊件。

(229) 《小周报告——关于数次与蒋谈判的情况》（1936年8月19日），未刊件。

(230)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231) 《雪夫工作报告——关于南京谈判及西南等问题》（1936年7月21日），未刊件。

(232) 《雪夫工作报告——关于南京谈判及西南等问题》（1936年7月21日），未刊件。

(233) 《谌小岑来信》（1936年8月6日），未刊件。

(234) 《中共中央给世英指示信》（1936年9月23日），未刊件。

(235) 《李克农致博古、周恩来电》（1936年2月25日），未刊件。

(236) 《彭德怀、毛泽东致李克农电》（1936年2月28日），未刊件。

(237)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238)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239)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0页。

(240)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1页。

(241)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42)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43)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44)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0页。

(245)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0页。

(246)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247)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潘汉年诗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248)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52页。

(249)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潘汉年诗文选》，第412—413页。

(250)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53页。

(25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252)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9页。

(253)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254) 《申报》，1936年2月12日。

(255) 《大众生活》第1卷第15期，1936年2月22日。

(256) 周天度：《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67页。

(257)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沈钧儒纪念集》，第80页。

(258) 《韬奋文集》第3集，第126页。

(259) 《申报》，1936年2月21日。

(260) 《大众生活》第1卷第15期，1936年2月22日。

(261) 《益世报》（天津），1936年2月25日。

(262)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84页。

(263)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92页。

(264) 《大公报》，1936年3月10日；《救国时报》，1936年4月10日。

(265) 《救国会》，第439页。

(266) 《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巩固我们的救国阵线！》，《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67) 《宋庆龄先生致救国阵线领袖函》，《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68) 《救国会》，第440页。

(269) 《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巩固我们的救国阵线！》，《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70)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71)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72) 《救国会》，第200页。

(273) 《章乃器先生的谈话》，《救亡情报》第13期，1936年8月2日。

(274) 《救国会》，第438页。

(275) 《救国会》，第438页。

(276) 孙晓村：《“真堪衡岳比芳芬”》，《沈钧儒纪念集》，第113页。

(277) 《救亡情报》第21期，1936年10月11日。

(278) 《救国会》第203—204页。

(279) 《韬奋文集》第3集，第119页。

(280) 《全国救国会领袖被捕记》，《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12日。

(281) 《中央日报》，1936年11月26日。

(282) 沙千里：《七人之狱》，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8页。

(283) 沙千里：《七人之狱》，第19页；《漫话救国会》，第32页。

(284) 《韬奋文集》第3集，第103页。

(285) 《沈钧儒等昨再度被拘》，《益世报》（天津），1936年11月25日。

(286)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未刊。

(287) 沙千里：《七人之狱》，第19页。

(288)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第33页。

(289) 《韬奋文集》第3集，第103页。

(290) 《韬奋文集》第3集，第96页。

(291)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2) 史良个人未刊资料，见《七君子传》，第521页。

(293)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4)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5)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6)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7)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8)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9) 《沪市府对沈钧儒等被捕案昨发表正式声明》，《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6日。

(300)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301) 《国民政府公报》，“法规”，第786号，国民政府文官处1931年6月1日印行。

(302)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日。

(303)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5日。

(304) “七君子”一词最早见于黄炎培1936年12月2日日记（未刊），因当时史良尚未被捕，故称沈钧儒等六人为“六君子”。1937年苏州审判开始前后，“七君子”一词才在报刊上出现。

(305) 《救亡情报》第15期，1936年8月16日。

(306) 《沪日报造谣》，《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307)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电请政府辟谣并保护救国运动》，《救亡

情报》第25期，1936年11月8日。

(308) 《日提三要求，谋消灭救国运动》，《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309)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32页。

(310) 《日本插手“七君子”事件的有关材料》，《上海滩》1987年第4期。

(311)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38页。

(312)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38页。

(313)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40页。

(314)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40页。

(315) 《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16)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324，未刊。

(317) 《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与蒋介石来往密电》，《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18) 《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与蒋介石来往密电》，《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19)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39页。

(320) 《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出版，第63页。

(321)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2)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3)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4)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5)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

2期。

(326) 《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7)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328) 《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1月24日，第837页。

(329)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38页。

(330)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37、838页。

(331) 黄炎培日记，未刊。

(332) 黄炎培日记，未刊。

(333)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334)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335) 《救亡情报》1936年12月10日。

(336) 《反对南京政府实施高压政策》，《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

(337) 《争取救国自由》，《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1月30日。

(338) 《救国领袖被捕后各界纷起援救》，《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339) 《读大公报〈沈钧儒等六人案杂感〉后》，《国讯》第149期，1936年12月11日。

(340) 《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10日。

(341) 《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342)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43) 《益世报》，1936年11月25日。

(344) 林蒙：《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第2页。

(345) 《救亡情报》第30期休刊号，1936年12月25日。

(346)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5日。

(347) 《救国无罪》，第122页。

(348) 《桂林日报》，1936年11月26日。

(349)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5日。

(350)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28日。

(351)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28日。

(352)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28日。

(353)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1月20日。

(354)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216—217页。

第七章　西安事变

第一节　西安事变的起因

一　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接连失利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继承父业，继续统帅奉军。同年底，他不顾日本反对和阻挠，毅然在东北实行“易帜”，将30万奉军改名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这支实力强大的非蒋嫡系部队，在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过程中功勋卓著，因此张学良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先后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势力范围也由东北扩展到华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撤到关内，致使东三省的大好河山陷入敌手。因失土有责，张受到国人谴责，被讥为“不抵抗将军”。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受张节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不战而取承德。热河陷落，全国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3月9日他被迫辞职，前往欧洲考察。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时，其初衷本“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1)]。但事与愿违，他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大部分从河北南调，参加对鄂豫皖地区红军的进攻。张到鄂豫皖后，亲临前线，督师作战，鼓动东北军要披甲还乡，首先应“安内，尽心竭力清除匪患”。在进犯湖北长岗岭时，被徐海东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歼灭一个团。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在西安设“西北剿匪总司令

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的红军。张学良再次被蒋介石推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蒋的总司令职务。到西北后，他统辖的军队除调到陕甘的近20万东北军部队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三万人，宁夏马鸿逵部二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余人。驻在甘肃的胡宗南部等中央军则受蒋直接指挥。东北军是西北“剿总”所辖部队的主力，也是张学良能够真正指挥的部队。

1935年9月，张学良部署其所辖部队分三路进攻陕北红军。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为中路，由洛川一带向北进攻肤施（今属延安）；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县向北进攻；位于陇东庆阳、西峰镇一带的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新组建的骑兵军何柱国部为左路，由西向东进击。9月15日，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军部及两个师进驻肤施。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佯攻甘泉，设伏于大小劳山。王以哲见甘泉危急，忙派一一〇师南下驰援。10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的东北军，歼灭两个团及师部，该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洲被红军击毙。王以哲在肤施闻讯，惊恐万状，急令其参谋长用飞机把自己从肤施接回洛川。

张学良率军进入潼关初期，无视红军的实力。在他看来，陕北的红军为数不过几千，又是疲惫之师，用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将其剿灭干净。他认为，一一〇师在劳山遭伏击是个偶然事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0月，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地方军阀武装，对陕甘根据地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一〇七师在鄜县（今富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五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三百余人，被俘一千八百余人（包括团长高福源）。至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被红军分割在洛川、甘泉、肤施。

东北军一一〇师在劳山被歼灭没有引起张学良注意，这次一〇七师在榆林桥的惨败却使他深受震动。他后来说：“本先，一一〇师曾遭覆灭，何立中阵亡，此则一〇七师又覆灭”，这“两次惨败”，使他心

中“倍增痛苦”，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不为轻视”[(2)]。不久，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行前，他特意从西安飞到庆阳，当面叮嘱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要谨慎从事，并说因形势有变，部队何时行动，要听他的命令。西北“剿总”妄图乘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立足未稳之机，未经请示张学良便令在陇东和陕北的东北军夹击红军。11月下旬的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〇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身亡。张学良在南京得知直罗镇战败消息极为愤慨，立即赶回西安，撤了董英斌的职，申斥西北“剿总”代参谋长谢珂。东北军到陕甘“剿共”接连失败，损兵折将的严酷事实，使张学良开始认识到陕北红军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不可低估；“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须另觅新路。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成年后在家乡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后所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于右任等在陕西组建靖国军，杨部被编为靖国军的一个支队。1926年，杨率众五千坚守西安，在粮尽弹绝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十倍以上的北洋军阀势力苦战八个月，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率国民联军南下，西安之围始解。1927年2月，杨虎城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5月，杨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6月初进至郑州、开封。后在与直鲁联军作战中伤亡惨重，遂退往皖北休整。1928年4月，杨一度离开部队，前往日本考察。此后，蒋介石、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杨成为蒋、冯争夺的对象。1928年11月杨归国，其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驻山东单县，归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属冯玉祥系统）指挥，杨就任二十一师师长。1929年4月，蒋、冯关系濒于破裂，冯令杨率部随孙良诚撤往河南，杨拒受冯命，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此后，杨部被蒋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每月拨给经费约10万元。所部由胶东移驻河南，杨兼任南阳守备司令。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在这场军阀混战中，杨率部进攻唐军驻地驻

马店，促使唐军溃败，从而帮助蒋挽回危局。杨因此受到蒋的明令嘉奖，其十四师番号被改编为第十七师，杨升任第七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后来在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杨仍站在蒋介石一边，率部攻击冯军，经豫西挺入陕西，于同年11月攻占了冯经营多年的西安。中原大战前，杨部已扩编为第十七路军，杨任总指挥。中原大战期间，经蒋批准，杨部扩充了两个师的兵力。由于杨虎城在两次新军阀混战中助蒋有功，1930年12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

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下从鄂豫皖地区开始西征，1934年末到达陕南。1935年1月下旬，杨虎城在蒋介石命令下，指挥四个旅另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采用运动战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先在蔡玉窑、文公岭歼杨部三个营，后又在葛牌镇全歼杨部警备三旅。同年5月，杨虎城又指挥三十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实行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方针，7月2日又在袁家沟口全歼杨部警备一旅。至此，杨多年苦心经营的直属部队几乎全被歼灭，还有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这对杨虎城是一个沉重打击。

二　中共与张学良共求联合抗日

正当张学良“剿共”接连失利，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出路、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时，中共开始争取他联合抗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张、杨身上。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请他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使其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突破的。不久前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辽宁海城人，曾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五

期，翌年毕业后入东北军，曾任连长、参谋、少校团附、上校团长等职，颇受王以哲赏识。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学良的信任。高被红军俘虏后先被扣押在瓦窑堡，后被送到前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东北人）多次找他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解释“八一宣言”的精神。高福源表示愿意为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促进两军合作抗日而效力。当时红军正围攻甘泉，久攻不下。经彭德怀同意，高福源在周桓陪同下，去甘泉做东北军守军总指挥、一〇七师参谋长刘翰东的工作。高用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向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军队，指出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后来彭德怀又派周桓去进一步向刘翰东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红军与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关系前进了一步。

1936年1月，高福源向彭德怀提出，他愿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王以哲与红军合作抗日。他说，张学良强烈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只要张能够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彭德怀同意高的要求，第二天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所部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路费二百元。

高福源在洛川先见到王以哲，向他介绍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当时正奉张学良命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急忙将此事电告在西安的张学良。张原以为高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的电报便立刻赶到洛川。高见到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把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和盘托出，希望张停止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听完高的肺腑之言，即让高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以便正式商谈。

高福源1月16日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再骑马到红军前方总部，向周桓报告了张学良请红军派代表前去会谈的要求。经彭德怀与中共中央电报磋商，决定派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见面。李克农17日到洛川，当晚与王以哲会谈，气氛融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3)]。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实行的还是“抗日

反蒋”方针。所以，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与张学良会谈时：“（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乙）向彼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4)]。

1月21日晚间，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张透露说，国民党内同情国防政府主张的不乏其人，并表示红军如真有诚意，他愿去做于学忠、蒋介石的工作，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效，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张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目前只能暗中与红军联系，以原防划作疆界，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5)]。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书中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对东北军歧视压迫，并强调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经高福源从中斡旋，张学良与李克农决定举行第二次洛川会议。2月25日，李克农在高福源陪同下到达洛川，同来的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以及负责电台工作的戴镜元。他们受到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的热情欢迎与款待。张学良因26日要去南京，电嘱王以哲与李先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待他回来后再谈。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

军给予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6]。2月28日李克农将上述协定电告瓦窑堡，当晚中共中央即复电表示同意。双方商定此协定从3月5日起生效。

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会谈内容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

如何对待蒋介石。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中央及军委给他的“训令”，强调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东三省已拱手送给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这一主张。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而且蒋本人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主张先“安内”后“攘外”。对这个问题，张和李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向张表示，可向中共中央反映他的意见。

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李说，抗日主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抗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学良同意李克农的这些看法。

关于红军行动方向。当时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作战。张提出，红军为抗日不应走山西，而应走宁、绥。因为宁夏接近绥远前线，又靠近苏联，阻力小，进展会比较容易；如走山西，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遏，恐难顺利行进。李说明了出山西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政治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这次会谈中，张提出请中共方面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来与他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定。张还请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他给以掩护。双方同意共同派

代表去苏联谋求援助。

张学良从洛川回到西安，收到李杜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他派人去上海接“要找的朋友”。原来张学良1935年11月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了因“新生事件”而获罪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张、杜是老朋友，“九一八”前就熟悉。这次见面，张向杜倾诉了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的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的盛世才，争取苏联援助，共同抗日。张在上海还会见了原东北军将领李杜。李率义勇军在东北抗日失败后退往苏联，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回国后仍保持联系。张向李表示愿在西北联合红军抗日，希望李帮助他沟通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李接受张的委托，表示找到共产党关系后设法通知他。李杜后来找到刘鼎，便给张学良拍电报。张接到李杜来电后，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到上海，3月下旬把刘鼎接来西安。

刘鼎，原名阙尊民，四川南溪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德国期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3年到浙赣皖苏区工作。1935年该苏区失败，5月被俘，10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化名周叔，住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寻找党组织，其间因一偶然事件，曾到宋庆龄住所躲避三天。

当宋庆龄得知张学良拟联共抗日而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时，便向刚刚从陕北归来的董健吾推荐刘鼎。经董动员，刘鼎答应去西安见张，以便借机前往陕北找中共中央。刘到西安第二天会见张学良，张向刘提出三个尖锐问题：一是他与日本有杀父之仇，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为什么骂他是“不抵抗将军”？二是中东路事件，苏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为什么骂他勾结日本反苏反共？三是红军在陕北，为什么打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刘鼎回答的要旨是：张作为东北军统帅，守土有责，“九一八”时执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退往关内，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当

然要受到全国人民唾骂，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东北军在蒋、日唆使下，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侵入苏联国土，苏联被迫还击，这是正当自卫。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管理却采取片面选择，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东北军为蒋打内战，在鄂豫皖和陕北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是人民支持的新式军队，战无不胜，蒋介石的百万军队对红军都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计，企图借此消灭东北军。现在国难当头，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最大、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摆脱蒋消灭异己的阴谋，又可洗掉“不抵抗”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7)]。张听完刘讲话后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慢慢和你说。于是，刘鼎就随张学良一起飞往洛川。

张这次去洛川，名为督师“剿共”，实际是等候与周恩来会谈。他在洛川的十来天里，天天同刘促膝交谈。张把在洛川会见李克农与邀请周恩来的事告诉了刘，并说准备同刘一起去会见周恩来。张问刘：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击败了东北军？他想了解红军的制胜之道。刘鼎曾在苏区工作过，便从红军的成分，红军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特别是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等方面说明红军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张还问刘：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这容易理解，可农民有的连字都不认识，怎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矢志革命呢？刘回答说：共产党和红军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教育农民，这是红军有别于任何旧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他建议张对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张学良、刘鼎在洛川的长谈，使张对中共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认识，加强了他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就为即将举行的肤施会谈做了重要准备。

张学良、周恩来的肤施会谈，1936年4月9日晚8时开始，翌日晨4时结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会议内容，据周恩来在会谈结束后4月10日、11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刘鼎后来的回忆，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首先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对“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条路，他愿酝酿此事”，对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他承认红军真心抗日，认为“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可是他又说：“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前），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对中共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同”，但认为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晋“恐难立足”。他主张红军“最好向绥远解决德王”[(8)]，再向东去察哈尔。其理由是：宁、绥人粮较多，红军解决给养方便；绥远靠近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账。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张的意见，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但表示要和毛泽东主席商量。

当时因红军东征进展顺利，周恩来对张学良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周进一步解释说：红军“兵出华北”，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一起抗日，“华北大规模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9)]。张学良接着说：“如红军坚决出山西向东，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的四个师和红军联络。”[(10)] 他还向周介绍了阎锡山的一些情况，答应两三星期后他去太原和阎联络。周恩来说红二、四方面军要北上抗日，张表示欢迎，并说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如需经过中央军的防地，他可去斡旋。

（2）抗日救国的道路。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已完了，目下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张1933年游历意大利时，对那里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颇感兴趣，认为它可以救中国。后来经杜重远、杨虎城、李克农、刘鼎等人分析说明后，他有所动摇，但未彻底抛弃法西斯主义。周恩来解答说：“法西斯是

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11]

（3）联蒋抗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包括蒋，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他还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来的接触与观察，蒋可能抗日。他也承认，蒋之左右有不少亲日派，因之蒋下不了抗日决心。他向周介绍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共产党从外面逼，他从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把蒋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蒋，他现在反蒋做不到[12]。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仇敌，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对张学良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4）联合苏联。张学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能得到苏联援助。他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13]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援助，办法是由张派人从欧洲前去，中共派人经新疆前往，并由张先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5）停战、通商。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来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途北进。张学良、周恩来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14]；派红军陈先瑞部去陕南，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使东北军有借口不北进。

关于通商问题，商定红军可在东北军防地内设店购买普通货物；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向红军赠送一些弹药；双方派得力人员保障交通畅通。

张学良还要求红军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的人”[15]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向周恩来赠送一本中国大地图，说“共同保卫中国”，并赠私款二万银元，后又赠法币20万元，作为红军的抗日经费。双方对会谈结果都表示满意。张说他这次结交了最好的朋友，周先生说话有情有理。他认为国内今后将走向太平，一切可向抗日迈进了。周后来说张学良是一位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出乎预料。周恩来4月12日回到瓦窑堡，第二天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延安之行，中共中央对会谈结果也很满意，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继续与张学良联系。

三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杨虎城很早就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1922年他驻军陕北榆林时，通过杜斌丞介绍，结识了陕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魏从思想上对杨帮助很大，以后他们长期保持联系，魏曾长期在杨的部队中任职。后来共产党人南汉宸也来到杨的部队。1927年“四一二”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曾达二百余人。以这些党员为基础，组建了隶属于中共河南省委的中共皖北特委（当时杨的部队驻安徽太和），负责人是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在中原大战中，杨奉蒋介石命率部返回陕西，被南京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则委任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代其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1933年，蒋介石对杨多方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南汉宸，南才离开杨的部队。此前，杨部第三十八军驻防陕南时，曾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白区党组织开始派人做杨虎城的工作，

争取他与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初，申伯纯受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的委托前往南京，会见在那里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向他传达“八一宣言”的内容，并且说：“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16] 当时的杨虎城，既因自己不久前在陕南“剿共”失利、损兵折将而苦闷，更因在南京期间耳闻目睹蒋介石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安危而争权夺利从而对国民党失掉信心。他听申伯纯转达南汉宸的话后，认为南谈的问题很好，他也正想找中共的关系。杨告诉申伯纯，江西的红军经过长征已到达陕北，今后西北的形势将是严重的，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办法。可是他又认为，南汉宸讲的是一些原则，具体办法没有讲。杨嘱申赶快回天津找南汉宸，问清具体办法后再到西安找他面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去西安直接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汪锋详细了解杨虎城的情况后，要他作为红军代表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并叮嘱他与杨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和；对杨要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要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

汪锋到西安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秘密会见他，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一、十七路军中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孙蔚如部驻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有协议，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二、十七路军警备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三、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提出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好，但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此，汪锋作了详细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汪锋说：孙部驻汉中两年，没有发生大的摩

擦，孙部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这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在天水地区的中央军胡宗南部极力向南伸张势力，一度到达川西嘉陵江西岸一带，阻挠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胜利完成与中央红军会师任务，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即明攻汉中，威胁天水。红军向汉中进攻时，胡部以为我攻天水，撤回了驻川西的部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安全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师。汪还解释说，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决心消灭孙部，可依靠川北苏区从东、南、西三路出击，合围南郑，使汉中腹背受敌，不是更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进攻呢。这也说明红军攻击汉中，是调动胡部的手段，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汪锋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南，本想休整，可是十七路军柳彦旅天天尾追，逼得红军被迫还击，刚在山阳击败柳旅，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尾随红军比柳旅还近。红军误认该部寻机攻击，遂在九间房接火战斗，将张俘获。由于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后与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损失。现在中共中央已确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关于第三个问题，汪锋回答说：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主席给杨先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我们的态度是帮助其发展壮大，防止损失，因为这是抗日力量的发展，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

此时的杨虎城正急欲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由于他是初次见到汪锋，未敢贸然与他商谈这类重大而机密的问题。就在汪锋滞留西安期间，杨派人去天津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前往西安与杨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王到西安主要是希望杨“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自己实力，加紧充实自己，训练自己”；“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络，发动抗日反蒋战争”。杨虎城向王世英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并谈了他对

国内各方面的态度："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成不合法运动"；对中共和红军"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忙"；他要求中共"不哗变他的部队"，并希望红军与陕北的井岳秀部保持"与他同样关系"[17]。

王世英同意杨的意见，表示即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经杨虎城安排，王世英与汪锋一同去苏区，到瓦窑堡后，王又应召去晋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几年来白区的工作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情况。关于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问题，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18]。

王世英离开陕北后，于4月底到达西安，杨虎城此时驻节韩城。王又专程去韩城见杨，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并很快建立起三个交通站。

在王世英再次到达西安前后，王炳南也衔命从国外归来，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曾任十七路军高级参议，是杨虎城的挚友。1929年杨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在日本，后转至德国。王1925年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4月派王炳南回国，争取说服杨虎城

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王炳南到西安后，向杨坦率地讲明自己回国的使命，并分析了欧洲和整个国际的形势。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都有意与国际建立关系，取得国际的援助。杨向王表示他愿同红军联合抗日，事实上他已同陕北红军打通了关系，有了来往。王炳南就把争取杨虎城的情况用暗号致电巴黎《救国时报》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随后到上海会见杜重远，杜又介绍他回西安与张学良会面，王炳南与张学良也谈得很投契。杨虎城邀请王炳南帮助他做十七路军官兵的抗日教育工作，但王突然患病，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才正式参加工作。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张文彬8月26日到达西安后，先与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会晤，9月6日晚又与杨虎城密谈，双方达成了取消敌对行动、杨约束民团、取消经济封锁、设立交通站和电台等协议。会谈后，张文彬即常驻西安，与杨虎城继续保持联系。

四　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活动，蒋介石早就得到国民党特务的密报。对张、杨违抗“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行为，蒋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两广地方实力派发动“六一”事变，出兵湘南，与南京形成武装对峙局面，1936年夏秋季节，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两广，一时无暇顾及西北。当蒋解决了两广事变，消除了后顾之忧后，立即把目光转向西北。

广西问题刚刚解决，蒋介石就于10月22日来到西安。尽管当时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军已大量增兵华北，并正在唆使和支持蒙伪军进犯绥远，蒋介石仍逼迫张、杨继续进行“剿共”内战。他在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继续“剿共”的计划。张学良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杨

虎城性格深沉，只是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但下面官兵的“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蒋向张、杨表示他的“剿共”计划不变。

10月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五六百名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们说，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国家对这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19]。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名为“避寿”，实则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剿共”内战。几个月前被调到两湖地区对付两广事变的那些蒋的嫡系部队，如今又奉令北返，三十来个师集结在平汉铁路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的郑州至灵宝段，随时可开往陕甘；而万耀煌所部第十三师则将开往陕西咸阳。蒋还决定，如张、杨不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让他的嫡系部队前来担任“剿共”任务，由原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也被任命为一个方面的总指挥。

蒋在洛阳期间，张学良曾两次前往诤谏。第一次是与阎锡山结伴同去，二人向蒋祝寿后，劝蒋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词拒绝和斥责痛骂。蒋在洛阳阅兵后在礼堂训话，张学良在台下听讲，蒋除大骂共产党是大汉奸外，还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张“聆听之下，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20]。

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于11月27日给蒋写了一份“请缨抗敌书”，要求率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开赴绥远抗击日本侵略，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为部署新的“剿共”内战，蒋介石于12月4日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此时，蒋的高级军事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也陆续来到西安。蒋到西安后，开始实施他的“剿共”计划。由于张、杨向蒋反映广大官兵积极要求抗日，“剿共”士气低落，他这次来西安后便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召到他的住地华清池训话，要求这些军官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他还对东北军军官们许诺，他一定带领大家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首先必须服从他的“剿共”命令。他向张、杨提出两个办法供他们选择。第一个办法，服从“剿共”命令，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甘前线，进剿红军；第二个办法，张、杨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显然，这两种办法，张、杨都不能接受。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人心，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这成了引发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诚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21)

五　营救“七君子”

国民党非法逮捕救国领袖，摧残救国运动的行径，引起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极大不满，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从而加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进程。

张学良同情和支持上海救国运动。这一运动也给予了他以新的鼓舞力量，加强了他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决心。1935年10月末到12月中旬，张学良到南京先后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后他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视他素所尊重的老友杜重远，表示亲切的慰问。张学良和杜重远在谈话期间，杜向他介绍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并劝告张一定要看清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一举改变过去执行蒋介石

的“剿共”内战政策的错误做法；认为日寇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但是只要万众一心，中国还是有前途的。张学良在谈话中十分欣赏杜重远的看法，精神很振奋，并表示他目前正在研究时局和抗日问题，不会辜负老友的期望[22]。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2月间张学良到南京开会，随后又去上海虹桥疗养院探视杜重远，并继续密谈抗日救国问题[23]。

1936年7月，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住在首都饭店。其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代表救国会到南京向二中全会请愿，借机前往饭店会晤了张学良，“畅谈当时各地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一派大好形势”；并商讨“组织联合战线，抗日救国诸问题”。张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并答应给予救国会以经济上的援助[24]。

张学良后来自己回忆说：“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1）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25] “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26]

1936年，杨虎城去上海医治牙病并检查心脏，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经常见面，“商讨抗日救国大策”[27]，并通过杜的介绍，和沈钧儒等人多次见面，了解情况。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在沟通张学良、杨虎城关系与促进进一步合作方面起了不少作用[28]。

沈钧儒等七人被捕事件，给张学良以极大的刺激，决心为营救他们出狱而不惜一切努力。11月底，张学良派其亲信秘书应德田去上海公安局慰问“七君子”。应带了两箱桔子，化名“乔所钦”，见到沈钧儒等时转告说：“张学良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定”[29]，希望他们不要灰心丧气。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秘书，新从德国回国的救国会

成员、共产党员王炳南也去看望沈钧儒等人，并对他们说："不要紧，过不了多久，就有新的大事情发生。"[30] 暗示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12月3日，张学良只身自驾军用飞机飞往洛阳面见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央请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稍后他在一次大会上说："上海各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31] "他（指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介石拒不接受张学良的请求。张学良见蒋介石如此固执不听劝谏，忍无可忍，便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却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32] 张学良几次面诤"苦谏"无效，感到十分沮丧愤懑，加上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游行请愿，要求抗日，情绪异常热烈，给张以很大的触动，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心实行兵谏。事后张学良陈诉说："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33] 援救沈钧儒等爱国领袖，保护救国运动，实为引发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纪念会上都说："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

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34]“东北、西北军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七君子事起，最后逼出西安事。”[35] 事变爆发后，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其中之一，即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

第二节　西安事变的爆发

一　诤谏失败

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日益加剧，到1936年末已形成尖锐对立：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张、杨则主张立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主要是张学良）为促使蒋介石放弃误国政策，改弦更张，一再向蒋进谏，结果却屡遭蒋的拒绝、痛斥。为做到仁至义尽，在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如不服从其“剿共”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安徽后，张仍于12月7日晚去临潼华清池向蒋慷慨陈词，大意是：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由占领东北进而控制冀察，今又进窥绥远。对日本这种永无止境的侵略野心，如不加以遏制和反击，定将招致整个国土沦入敌手，到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共产党已一再声明愿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共产党不仅主张抗日，同时还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站在你这一边。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

都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今天，我的态度依然如故。

张学良还说，如今抗日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仅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黄埔系青年将领中也有主张抗日不打内战的。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36]。

张学良的肺腑之言被蒋介石斥责为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麻痹。蒋对张说，即使“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37]！

杨虎城在张学良劝说下，8日上午也去华清池向蒋进谏。杨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措词严厉地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蒋命令杨虎城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38]。杨见蒋的态度确已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城。

张、杨见“苦谏”已彻底失败，才商定对蒋采取“兵谏”行动。张对杨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39]

西安各校学生在12月9日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国民党当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走上团结抗日道路。这天黎明，西师、西安高中、二中、女中、女师、东北大学工学院等校学生纷纷打着旗帜，走出校门，去南院门广场集结，准备在那里召开纪念大会。东北竞存小学的二百多名学生在校长车向忱和教师带领下，途经民立中学门前时，见警察将该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出来，于是便高呼“欢迎警察参加抗日请愿”，“阻止爱国运动的人就是汉

奸”等口号。民立中学的学生在竞存小学学生的声援下，向校门猛冲。警察竟向竞存小学队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负重伤。民立中学学生不畏强暴，冲出校门，与竞存小学的队伍汇合一起，直奔南院门广场。会场上的广大学生得知警察开枪打伤竞存小学学生的消息，群情更加愤激，齐声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惩办枪杀学生的凶手！”等口号。纪念大会宣读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主张“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敌”，呼吁国民党“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先遣现驻西北边疆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组织援绥联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即令前方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讨联合抗日大计”[40]。

学生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总”请愿，张学良派参谋长答话，群众满意。学生到陕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请愿时，都没得到满意答复。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在被迫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不应干预国事，也不应谈救国之事。愤怒的学生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内战，共同战日。邵力子急令杨虎城关闭城门，阻止学生出城。由于杨虎城派去守门的士兵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没加阻拦，学生便自己打开城门冲出城外，冲破国民党宪兵的堵截，直奔火车站，想乘火车前往临潼。由于站长、司机早已跑光，学生只好徒步进发。

蒋介石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的消息，他一面遣人前去劝阻，并派宪兵到灞桥以武力堵截；同时急令张学良派兵制止，甚至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张学良深知学生如去临潼定会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便急忙乘车前往劝阻。在十里铺，他追上了学生队伍。他说：现在天色已晚，路程尚远，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大家太辛苦了。你们不如把请愿书交给我，我替你们代交蒋委员长。学生说蒋是全国党政军的最高主宰，一定得让他亲口答应我们的要求才成。张又说：你们的爱国志愿，我不阻拦，可是你们此去必定触怒最高当

局。我为爱护你们起见，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学生们则同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学生们满腔的爱国激情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他激动地对学生说："我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你们现在回去吧！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的！"[41] 张学良的肺腑之言使学生们动容落泪，张学良本人也掩面而泣。时已黄昏，学生们才返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转达学生的请愿要求，再次遭到蒋的拒绝和斥责。蒋质问张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呢！"[42]

这个事件对张学良刺激很大，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线。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在向其部属解释发动事变的原因时，讲到西安学生的"一二九"事件，他说："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43] 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改弦更张。

二　临潼兵谏

张学良、杨虎城12月9日确定采取"兵谏"行动后，谨慎行事，只向他们最信赖的极个别高级将领透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准备。他们做了分工：东北军负责在临潼扣押蒋介石；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蒋系军警的武装和扣押住在城内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要员。

华清池位于临潼县城南，骊山北麓，距西安城25公里。华清池分内外两院，外边的第一道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把守；第二道门由蒋的卫队把守。蒋介石住在内院的五间厅，与他一起住在内院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组长蒋孝先及十多名秘书、参谋人员。在华清池外禹王庙里驻有中央宪兵一个排，附近的临潼火车站也驻有一排蒋系武装。

临潼一带的驻军是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东北军卫队一营除负责把守华清池第一道门外，还担任华清池至灞桥间的警卫巡逻任务。

张学良对临潼兵谏做了周密部署。12月9日，张指定刘多荃担任扣蒋战斗的总指挥，确定第一〇五师第一旅的一、三团负责外线包围华清池，以防止蒋介石逃跑。具体分工是：驻临潼的第三团负责包围华清池的南面和东南，驻在西安城南的第一团负责包围华清池的西面和北面，外线部队共有五千多人。第一旅旅长高福源因外出执行任务，张临时抽调六十七军的周福成（一二九师师长）前来担任外线指挥官。张学良指派的内线部队是：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令他们前往临潼捉蒋，同时命王玉瓒率领在华清池执勤的卫队一营协同卫队二营执行兵谏任务。张学良考虑到孙铭九缺乏实战经验，特选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指挥攻打华清池。内线作战指挥官是一〇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内线部队共有四百余人。

12月9日张、杨决定兵谏后，对外不露一点声色，一切如常。当晚，张、杨在城内易俗社戏院招待南京军政大员欣赏地方戏秦腔。12月11日，他们最后确定翌日（12日）晨6时发动兵谏，当天张仍到华清池与蒋周旋，并在当晚由张、杨出面在新城大楼设宴款待南京军政要员。这天蒋介石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学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在华清池吃晚饭。饭毕，时间已晚，张又陪这几名大员赶到新城大楼去开怀畅饮，直到晚10时招待宴会才宣告结束。宴会后，张、杨分别向他们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了兵谏计划并作了动

员。午夜过后，张学良率其重要将领和幕僚来到新城大楼，他和杨虎城将在这里指挥兵谏。

12日凌晨2时许，头一天被张学良召至城内接受协同捉蒋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乘摩托车驶离西安，途经十里铺和灞桥镇时，令其所属部队迅速赶赴华清池参加捉蒋战斗。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事先接受了张学良授予他的捉蒋命令，张再三叮嘱他不准伤害蒋，令其要绝对保证蒋的安全。12日凌晨2时，他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车到灞桥，他们向事前安置在此地的卫队二营官兵作了动员，之后一起乘车直奔华清池。3时前，参加外线作战的部队陆续到达预定位置，将华清池团团围住。

12日凌晨四五点钟孙铭九率卫队二营到达华清池外，与驻在此地的卫队一营会合后，捉蒋战斗开始。驻在禹王庙内的一排中央宪兵还在睡梦中，卫队一营轻易地将他们缴了械，两个卫队营开始进攻华清池。他们到达华清池第二道门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武力阻拦，东北军开枪还击，顿时华清池内外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战。东北军将蒋的门卫解决后，孙铭九、王玉瓒各自率队冲入华清池内院，直奔小桥，想从那儿过去进入蒋住的五间厅。由于斜对面房中蒋的卫士的密集枪弹封堵了道路，他们不得不改换方向，沿着假山小道匍匐前进。他们冲入五间厅后，发现蒋介石已不在了。用手摸床上蒋的被褥还是热的，桌上杯子里还放着蒋的假牙，这表明蒋跑走的时间不长。在院内各处搜寻，未见到蒋的踪影。讯问在搜查中被捉到的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侍从秘书汪日章，也不知蒋的去向。白凤翔用电话将上述情况报告张学良，张、杨十分着急，张从外线部队报告中得知确无人逃出包围圈，断定蒋没走远。张、杨一面命令外线作战部队加强警戒，严防蒋介石逃跑；同时命令内线作战部队抓紧搜山。

根据白凤翔命令，孙铭九、王玉瓒分别率部搜山。在半山腰，孙部截获了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问他：“蒋委员长在哪里？”他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孙端起枪威胁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

你！”他朝山上看了一眼。孙朝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山上搜查。原来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后，立即下床，在侍卫搀扶下向后墙奔跑。此时枪声越来越紧，还夹杂着机枪声。蒋踏着侍卫的肩膀爬上围墙，纵身下跳，跌进墙外沟里，腰部受了伤。他忍痛向后面的骊山逃跑，趁天未亮摸索前进，此时又被山上哨兵的枪声所阻。他身边仅剩一名侍卫，左臂还受了伤。两人爬到山坡上，躲藏进一个洼坑里。天色渐明，地形地物已隐约可见，搜山的东北军卫队一营士兵发现半山腰一块大石头旁像有人走动，一会又不见了。他们走到大石头旁，发现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洞里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蒋介石就从洞里走了出来。孙铭九、王玉瓒先后赶到这里，见蒋介石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赤着双脚，脸色苍白，冻得全身发抖。孙走到蒋面前还未来得及说话，蒋就连声说：“你打死我吧！……”孙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44] 并劝蒋赶快下山进城，说张副司令在城里等着他呢。蒋执意不动。后来，孙示意士兵把蒋架下山去，由唐君尧、谭海等陪蒋乘汽车进城，直奔新城大楼，把蒋暂时扣押在那里。东北军在捉蒋的同时，还截获了刚由西安返回的蒋孝先（原中央宪兵三团团长、时为侍从室组长），当即将其枪决。

三　解除蒋系武装

张、杨确定兵谏计划后，杨虎城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他令孔从洲详细了解南京军、警、宪、特机关在西安城内和郊区的分布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的警戒兵力。杨还令孔从洲在夜间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当时西安城内的武装力量情况是这样：蒋系武装力量共有七千余人，其中主要的是杨镇亚的中央宪兵二团千余人，市公安局长马志超指挥的公安总队二千余人，省保安处长张坤生领导的保安部队约千余人，公秉藩率领的交警总队约千余人。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兵力，主要是孔从洲（时任陕西警备二旅

旅长、西安城防司令）指挥的三个团，此外还有十七路军炮兵团、特务营和教导营，共约八千人。十七路军部队分驻在西安的南、西、北城和西关；东城由东北军驻防。

12日晨，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行动按事前的分工进行。宋文梅率其特务营负责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内的南京军政大员。他接受张、杨命令后，便和特务营的李锦峰连长和王子中排长率部奔向西京招待所并将其包围。宋命令李锦峰在外面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入招待所；他带领经过挑选的几十名士兵冲入招待所内，迅速解除了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武装，并让他们到大餐厅集合。经过清点，发现缺少陈诚、万耀煌和邵元冲。宋文梅命令士兵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在大餐厅后面烧火室一个大木箱里找到陈诚，在万耀煌妻子所住房间的衣柜里找到了万耀煌。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房的邵元冲，听到枪声，不明真相，越墙逃跑，跑到招待所西面公园东侧围墙时，被流弹击倒。宋文梅闻讯赶到，邵已不省人事，送入医院抢救，不久死亡。

陕西警备二旅五团团长郑培元，奉命解除城内和西郊机场蒋系军警的武装。12日拂晓，他抽调部分兵力警戒南、西、北城，令第一营解除北大街警察局、派出所及火车站护路队的武装；令第二营解除警察分局、派出所、宪兵二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三大队的武装；令第三营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派出所和宪兵第五连武装。十七路军行动时天刚拂晓，蒋系军警一般还在酣睡中，十七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冲入对方营房，第五团大约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缴械任务；只有第一营在解除西安火车站护路队，第二营在解除宪兵第五连和警察第三大队武装时，发生了较为激烈的战斗，双方互有一些伤亡。到黎明时，十七路军在城内已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接管了西郊飞机场，扣留了所有飞行人员和飞机；查封了国民党各大银行在西安的支行；还扣押了邵力子、晏道刚、曾扩情，枪毙了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同时，张学良还发动了兰州事变。当时的甘肃

省会兰州，主要是由东北军方面控制。以于学忠为军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驻在这里，于当时还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同时兰州也驻有中央军胡宗南部，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的也是蒋的嫡系将领朱绍良。西安事变爆发前，朱绍良、于学忠及其五十一军的三个师长均奉命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事变爆发时他们都不在兰州。12日晨，张、杨在西安指挥扣蒋战斗的同时，张学良密电在兰州的解方（五十一军中校参谋、抗日同志会成员），令其响应西安的行动，在兰州发动事变，电文大意是：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要求解方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人员看管起来，等等[45]。同一天，在西安的于学忠也给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幹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于是，解方通过刘忠幹发动五十一军在兰州采取行动。12日晚7时，五十一军的三个师分头开始行动，将胡宗南在兰州的两个团缴了械，查抄了绥靖公署、省党部、公安局在兰州的特务机关，并把他们的头目集中看管，控制了飞机场，同时发表声明，拥护张、杨在西安的行动和八项救国主张。因主持这次行动的是军、师两级参谋人员，有人把兰州事变称之为“参谋造反”。

四　摧毁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

张学良、杨虎城捉住蒋介石后，为贯彻落实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兵谏宗旨，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张、杨通电全国，阐明扣蒋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

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46]。这八项主张的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47]。八项主张的内容，有的是必须消除的抗日道路上的障碍，有的是为实现全民抗日必须采取的措施。张、杨反复在文电和讲演中申明他们扣蒋的动机是纯洁的，绝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更不是为了金钱和地盘，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抗日救国。为达此目的，事变后他们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采取了如下一些实际步骤：

撤销指挥“剿共”内战的机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领导抗日救国的机关“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组建参谋团，以何柱国为召集人，其成员有鲍文樾、马占山、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李兴中。这个机构由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秉承张、杨旨意研究讨论军事问题。

事变当天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先后参加这个机构的有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洪钫、王菊人、应德田、卢广绩以及南汉宸、苗剑秋等人，高崇民为召集人。设计委员会对张、杨负责，承办张、杨交办的事项，也可向张、杨提出建议。

组建抗日援绥军团。12月17日，张、杨发表通电，宣布已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任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张、杨在通电中表示：“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光复失土。”[48]

改组陕西省政府。原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被免职，任命王一山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原财政厅厅长朱镜宙被免职，由续式甫接任；原警察局局长马志超被免职，任命

赵寿山为局长；原教育厅厅长周学昌被免职，由李寿亭接任；原省政府秘书长耿寿白被免职，由杜斌丞接任。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

释放政治犯。事变后第二天，张、杨下令全部释放西安各监狱中关押的三百多名政治犯，其中多数是红军被俘人员。接管国民党的《西京日报》，改出《解放日报》，丛德滋、张兆麟先后担任总编辑。将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在西安储备的一千五百余万元银圆封存，暂不准挪用。

张、杨在事变后采取的最大行动是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迎击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事变前，张、杨的军队大都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剿共”前线，矛头指向红军。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来说，立刻改变了敌我关系：昔日的对手红军成了共同抗日的友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成为他们的最大威胁。经参谋团认真研究，决定占领渭南以东20里的赤水西岸高坎线、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并连接蒲城、白水地区，形成一条阻击线，重点在陇海铁路和渭河以北地区，以阻击南京讨伐军的进攻。12日夜间，张、杨下达“火速向西安集中”的万急电令，有关部队立即掉转枪口，有的将原有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阻击线的指定地点开拔。驻西安、临潼、三原各地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各旅，作为中央兵团于12月13日、14日进驻赤水西岸高坎南北之线，构筑工事，防止敌军袭击；原驻庆阳、合水、张村驿一带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等部，驻西峰镇一带的骑兵军，接到命令后将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东开进，作为左翼部队分别开往渭河以北的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和蒲城、白水等地；第十七路军各警备旅作为右翼兵团，奉命开往陕南，占领崇宁镇、厚子镇、蓝田一带以东之线，阻击敌之西犯，重点配置于蓝田至商县道路方向上[49]。

上述军政措施采取和落实的结果，把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摧毁，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抗日力量暂时掌握了陕甘的大权。

第三节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的反响

一　国民政府和战两派的分歧

在南京，最早获知西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12日上午，陇海铁路局报告："西安方向可能发生了兵变，因为是日上午九时左右，有部队军官到车站去对站长说，车子要听他指挥，不能随便开驶。"[50] 中午过后，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给何发来"西安发生事变"的电报。原来，12日清晨张学良曾致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令其会同在洛阳军分校学习的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的大队长赵云飞率部起事，响应西安的行动。黄接电后，非但没遵照张的电令行事，反而持电去向祝绍周告密。祝立即采取措施，令驻洛阳的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进驻潼关，抢占这个由豫入陕的咽喉要道；同时向何应钦报告："一、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二、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三、顷处理如下：（甲）已通知万军长，[51] 由咸阳回军西安，协同樊军，听候命令。（乙）已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候命。（丙）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丁）请钧座飞洛坐镇。"[52] 何接到此电，及时电告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零五师叛变，九时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此事变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53] 此后，何又接到樊崧甫等人的电报，确知西安已发生事变。当晚何与在上海的孔祥熙通电话，报告他得到的最新消息："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54] 何请孔将此消息转告也在上海的宋美龄。

南京国民党要员听到西安事变消息，都担心和关注蒋介石的安全，急切想弄清真相，不少人打电话向何应钦探问，更有不少人如陈

果夫、张群、俞飞鹏等亲自跑到何的住所，查询消息；其余如丁惟汾、居正、叶楚伧、张厉生等，约好在家中等候何的电话[55]。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当天传到南京后，一些人不相信张、杨“保蒋安全”的承诺。一时京城内外有关蒋介石死活的种种传说不胫而走。

对西安事变应采取什么对策，应如何营救蒋介石，南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出现两种主张。12日晚10时，一些国民党政要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时就出现了和与战的分歧。据冯玉祥当天的日记记载：李烈钧、陈璧君、陈公博和冯玉祥主张“安全介石为主”；而朱培德、何应钦、叶楚伧、戴季陶则“主打”[56]。当日午夜召开的紧急联席会议上两派的分野更为鲜明，分歧更加尖锐。

12月12日24时，由丁惟汾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由于右任代为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连同列席的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等，共有四五十人参加。会议宣读张、杨的通电后，群情愤慨，争论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借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纪纲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另一种意见，对于上面的“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等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之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57] 简言之，

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不顾蒋的死活，立即进攻西安，讨伐张学良；而冯玉祥、张继、李烈钧等主和派则主张为保蒋安全，对西安不宜使用武力，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种主张针锋相对，争辩至凌晨2时意见仍未统一。此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票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58] 在戴季陶等人鼓噪下，主战派的意见在会上一度站了上峰，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鉴于蒋被扣西安，无法履行行政院院长职务，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59]。

三、调整军事指挥机关。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由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60] 作为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不能到职视事，理应由当时在京的副委员长冯玉祥代行其职务。但因冯不是蒋的嫡系，且长期与蒋有矛盾和冲突，那些蒋的亲信和嫡系绝不肯把军事大权交给他。12日晚在何应钦家中酝酿此事时，戴季陶就明确提出"军队归何应钦管"[61]。尽管冯玉祥当即表示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对排挤冯玉祥掌握军权事，陈立夫后来也说："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

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才“组织一个委员会”，委任何应钦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行动[62]。

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得到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力行社书记长邓文仪，12日下午得知蒋在西安被扣，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以防止张学良用飞机把蒋送去新疆或苏联。他不经军事指挥机关批准，便以力行社书记长名义接连发出两封电报调兵遣将：一封给驻陕西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向他通报“领袖蒙难”，“希望他率部立即开往西安西南的咸阳，与第十三师万耀煌师长联系，围攻西安；第二个电报是打给驻潼关与洛阳之间的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说明原因，要他的部队迅即进占潼关应付变乱，准备围攻西安”[63]。王、董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均是力行社成员。

邓文仪于事变当晚在南京明瓦廊召开力行社全体干部紧急大会，到会三十余人。邓文仪说明开会宗旨后，“戴笠、郑介民相继报告所知的西安情况”，与会者围绕“（一）如何营救领袖，（二）如何稳定局面防止叛乱扩大，（三）如何敉平叛乱”展开讨论，“桂永清与潘佑强对军事应变部署，发表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即刻协调陆空军，包围西安，用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迫使其觉悟，维护蒋公安全，并早日使蒋公安返南京。讨论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64]。会议做出五项应变决定，核心是“营救领袖，安定后方”。为“营救领袖”，力行社“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统一指挥军事行动”[65]，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前往陕西“救蒋”。力行社成员桂永清统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完全是德式武器装备，辖三个团，共1.2万余人，相当于一个甲等师的兵力。桂当时不顾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反对，直接向何应钦请缨，13日于浦口集结部队，乘火车赶往陕西，16日过潼关，17日到华县，后被何的“讨逆”总部编为第三纵队，作为主力担任沿陇海路向西进攻的任务。黄埔一期毕业生宋希濂所部第三十六师当时驻苏州一带，构筑国防工事，西安事变爆发后，也奉

何应钦命西调。为“安定后方”，力行社向其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发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对汉奸、匪谍及反动党派严密监视，务希巩固当地治安”[66]。在事变爆发后的几天内，力行社派出数十名骨干分子到各地去“督导工作，指导行动”[67]。力行社认为，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有可能响应张、杨的行动。这些人如欲夺取南京，武汉是必经之地。因此，力行社为维护南京政权，十分注意它的屏障——武汉的安全。12月13日晨，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干国勋奉命飞往武汉，组织“讨逆赴难”指挥部，协助和支持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部署和落实应变措施，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何应钦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消息并掌握军事大权后，立即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开封绥靖主任刘峙，迅即抽调在河南与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潼关。集结在潼关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除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的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九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和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外，又增加了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其任务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进攻西安。与此同时，何应钦还命令原在甘宁前线“剿共”的部队从西线威胁张、杨。他命令刚刚到达武功一带的万耀煌部第十三师停止南移，集结兵力，向西安方面警戒；命令在天水一带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令驻吴忠堡附近的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一带集结。这样就从东西两翼形成了对西安夹击的态势。

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12日，孔在上海除收到何的电报电话外，还收到张学良给他私人的“震”电，张在此电中陈述发动事变的苦衷，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68]。孔认为张给他私人发电，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又考虑到蒋的安全现完全掌握在张、杨手中，此时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69]。因此他给张复电时没有严厉谴责

张的行动，只是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孔愿充当调人，向张表示"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70]。

宋美龄初闻蒋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有关蒋生死的谣传"已传播于全球"，其中"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71]。她如坐针毡，坐卧不宁，急欲弄清蒋介石生死真相。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十分理想的人选——端纳。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介石的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的了解，他不相信张会杀害蒋。他欣然接受宋的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12日夜间，端纳随孔、宋离沪赴京。同行者还有同蒋、宋关系极为密切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派黄陪同端纳赴陕，担任端纳与蒋谈话的翻译。

13日晨，孔祥熙、宋美龄等一到南京，何应钦立即赶到孔宅，向孔、宋通报昨日午夜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的情况和做出的决定。宋美龄到京后深感"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为营救蒋介石，她"立下决心"，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72]。宋美龄向何应钦等"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她向何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之后"，蒋"即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73]。宋提出派人去西安了解蒋的情况，何表示反对，并说："我们已命令讨伐，委员长已死了。"在场的端纳对何说："你说他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74] 宋、孔不顾何的反对，毅然派端纳于13日中午

飞离南京，经洛阳赴陕。行前，孔祥熙向随行的黄仁霖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开着的"[75]。

14日上午，孔祥熙根据宋美龄要求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武力讨伐前如何采取和平方法"救蒋"出险。出席会议的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以及何应钦、张群、黄绍竑等。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和平救蒋；何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开反对；戴季陶两天前坚决主战，如今也同意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无效再武力讨伐。

孔祥熙受命代理行政院长，集政治、经济、外交大权于一身，这对执行和平方针极为有利。孔返南京后，决定采取"智取之法"救蒋，即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力求"兵不血刃"[76]地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既认为张、杨的"背景与助力"内为不尽悦服蒋之疆吏与将军，外为苏联，孔祥熙便首先拉拢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那些与蒋矛盾较深、与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同时积极开展对苏交涉，以期从内外两方面孤立张、杨。孔回到南京，立刻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屈辱妥协对外政策的揭露和抨击，竭力替蒋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蒋"赤诚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他呼吁国人"一致拥护中央既定之国策"，"各地方长官翊赞中枢，忠诚夙著，当亦必能益励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77]。同一天，孔还给那些素来与蒋矛盾较深，可能响应张、杨行动的地方实力派分别发电，提出不同要求，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78]；对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青岛的沈鸿烈和山西的阎锡山，也都单独发了电，有的还派专人前去笼络。当时京

沪和日本一些报纸都认为苏联是张学良此举的后台。13日下午，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要求苏方对张学良施加影响，释放蒋介石。他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孔并威胁说，这样"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79]。孔祥熙还电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联当局交涉，以促使蒋介石早日获释。

孔祥熙还施展收买策略，分化张、杨内部。他们收买的第一个对象是冯钦哉。冯时任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率部驻防大荔、朝邑一带，是杨部主力之一。张、杨捉蒋后，杨令冯派兵控制潼关，以阻击中央军西进。冯接电后召集部下开会，决定"拒受乱命"，"固守原防"。他派人与樊崧甫接洽，表达了叛杨附蒋的意愿。孔祥熙从樊崧甫电报中得知此事后，便以桑梓情谊对冯进行笼络。他还派与冯有旧的张天枢密赴大荔，对冯策反。当冯明确表示站到南京方面后，何应钦征得孔祥熙同意，立即任命冯为"渭北剿匪司令"，委托去潼关"宣慰"的于右任带去巨款，资助冯部，并答应此后冯部军饷由南京方面拨发。孔还通过冯钦哉向杨虎城策反，企图使杨叛张释蒋，但这一图谋没有成功。

二　地方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反映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不同。公开支持张、杨的和完全站在南京一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持中立态度：既不支持张、杨扣蒋，呼吁张、杨早日释蒋，也不支持南京武力讨伐西安，而是主张双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事变。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同蒋介石关系的不同及其自身利益的不一致。

长期与蒋有矛盾，并多次发动反蒋战争的桂系以及与桂系有关系的李济深，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张、杨的义举。西安事变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正在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密电李、白

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80] 李、白对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虽"不敢苟同"，但明确表示："张学良主张联俄抗日，我们是很赞同的"；对"抗日必须容共这一点"，"有从详考虑的必要"，并一再申明：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在"外侮急迫"的时刻，"绝不容国内再有内战的发生"，提出"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81]。在举国一片谴责张、杨"叛逆"声浪中，李、白也认为张、杨扣蒋是一种"轨外行动"，并且说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起情感"引起的[82]。实际上这是为张、杨的正义行动进行辩护。李济深在12月18日发表的通电中说："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逼出来的，因蒋对张的"屡陈不纳"，张才"迫以兵谏"的，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通电指出："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并说："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83]

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由于手握几十万川军及其所控制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西安事变爆发后成为南京和西安间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此前，蒋介石以追剿长征红军为借口，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蒋、刘矛盾由此激化。蒋在西安被扣后，刘认为他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时机已到。事变后，当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离重庆前往南京的当天下午，刘湘就将其所部将领召至成都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包围成都的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迫使蒋系势力出川；有人主张暂与南京虚与委蛇，派人去安慰蒋系人员，视事态发展再作定夺。刘湘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他派邓汉祥去安慰在川的蒋系人员，并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遵照南京旨意，促使张、杨早日释蒋。刘湘对张、杨则表示同情。张、杨的代表宋醒凝到成都时，他"极为兴奋"，对宋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做后盾"[84]。不久张释蒋返宁，刘自知驱逐蒋系势

力出川的愿望已成泡影，便大骂张学良不止。

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是华北地区两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他俩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都反对南京向西安动武。12月23日宋、韩联合发表通电，针对南京16日发出的“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主张“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85]。南京当局认为，在蒋被扣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会使混乱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86]，便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宋、韩收回上述通电。针对大多数地方实力派普遍反对讨伐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解释说：“中央表面上虽声张讨伐，而实际则仍积极求政治途径之解决，在双管齐下政策下，庶可断张、杨与共党之联合，而救介公之安全，亦以求事变之和平妥善解决也。”[87] 24日孔祥熙亲自致电宋、韩，解释说：如今召集在职、在野人员会议，“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他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胁从以坦途，而军队之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88]

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是张学良寄予厚望、也最使他失望的地方实力派。事变前几个月，他和张学良在洛阳曾一起向蒋诤谏，请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张、阎曾有待机对蒋采取行动的口头默契。因此，张发动“兵谏”时估计会得到阎的同情与支持。捉蒋后，张、杨几次电阎，向他通报情况，期望得到他的支持。阎锡山估计张、杨的行动未必能获得胜利，于是自食其言，攻击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向张、杨提出“何以善其后”？“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89] 张、杨据理批驳阎的无端指责，并派代表李金洲飞往太原，当面向他通报事变的有关情况。阎表示可派代表去西安，但先决条件是这些代表到陕后必

须能单独与蒋会面和谈话。阎又受孔祥熙等人委托，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斡旋，企图让张、杨把蒋送到太原。由于西安方面抵制，他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社会上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因政治倾向不同，对西安事变的反映也不一致。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称赞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12月14日，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十八个民众团体联合发出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指出张、杨是在对蒋多次诤谏，期望蒋“翻然觉悟，即日移师向敌”，而蒋“忠言不纳，责斥备至”的情况下，才毅然“实行兵谏，请蒋氏暂留西安，待其反省”的。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90)]。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三千万东北同胞“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91)]。北平学联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92)]。

有的救国团体对张、杨的救国主张深表同情和支持，但对扣蒋行动持有异议。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对张、杨提出的“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的主张予以肯定，但认为“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是“不合常规的办法”，“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紧急宣言”要求南京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93)]。16日，南京政府颁布讨伐令的当天，全救会又致电南京政府吁请避免内战，指出：“兹当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以消耗国力，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前方将士，继续抗敌，而对陕事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多方努力，得以精诚团给【结】，共赴国难。”[(94)]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也是张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引路人。当张到西北进攻红军接连受挫，损兵折将，

心情苦闷，对前途感到渺茫时，他曾劝张放弃内战，走联共、联杨、抗日的道路，就是他也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他致电冯玉祥、孔祥熙，望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95]。杜重远在给黄炎培、杜月笙的信中说：“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并提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挽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96]

社会上右翼的团体、传媒和知识分子，西安事变后掀起了一股拥蒋潮流和攻击张、杨的恶浪。刚刚从大洋彼岸回国的胡适，得知蒋在西安被扣的消息感到震惊，12月20日发表《张学良叛国》一文，说什么见到“今日还有一部分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感到奇怪。他在文章中竭力为蒋的误国政策辩解，攻击张、杨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胡适支持南京对西安下达的“讨伐令”，鼓动南京“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诚）诸先生的目的”[97]。

三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没有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发动，但事变发生后旗帜鲜明地拥护张、杨的行动，给张、杨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在西安和南京间从事调解，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在事变后的最初几天时间里，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产生了摇摆和动摇。刘少奇后来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98]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事变当天致电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提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运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对蒋介石，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但是，按照当时形势，把蒋与南京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十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各个派别的争斗，蒋已牢牢控制了南京政府，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南京国民政府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无疑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对几个月前中共中央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动摇。

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负责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共对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与会者对此均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会上有人主张“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好处”[(99)]。多数人对此未提异议，但也有不同意见。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一个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则分歧明显，讨论颇多。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全国政府而实际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实际上可发挥领导作用。他认为，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口号。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作了重要讲话，表示：“不要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形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提出中共此时应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100)]。他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

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01]。会议进行总结时，部分吸收了与会者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尽量争取更多的人，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高，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但对张闻天等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没有采纳，“审蒋”、“除蒋”的基调没有变。如对蒋处置问题，提出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在政权问题上，提出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中央军委12月14日在《对西安事变后斗争形势估计》中也采取了类似态度，提出“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对蒋策略之所以发生动摇和反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张、杨在西安义旗一举，全国各地将会群起响应，阎锡山、刘湘和李宗仁可能加入抗日阵线。这样，晋阎与川刘将作为西安的两翼，对南京控制的东南几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将会出现分化，蒋的部下会转到西安方面，南京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二是感情方面因素作用。国共两党对立十年，蒋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九一八”后又推行不抵抗政策，招致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蒋在西安被扣消息传到陕甘苏区时，党内外群众喜出望外，纷纷要求对蒋严惩，这种情绪不能不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发生影响。

中共对蒋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毕竟是短暂的。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西安事变，毛泽东在发言和总结中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实际上是抗日起义。他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他们极力制造中国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他们反对内战，拥护抗日；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共要努力争取中间派。他认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结束内战，实现抗战；二是失败的前途，使内战延长与扩大。中

共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争取胜利的前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毛泽东提出，中共对事变双方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文章调停，二是用武装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以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他说：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张闻天的发言对事变的前途、党对事变的立场、进行和平调解方针等作了全面明确的阐述。他也认为事变的前途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的扩大，然日、德是企图尽量这两方面的扩大，这是两个阵营。"他强调党的方针应是争取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他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他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提出中共应采取的方针是："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量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102)]。

12月19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于当天向全国公开发表，内容是站在第三者立场，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立即召集有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会前各方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先生的处置问题；会议地点暂定南京。上述建议显然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至于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既然主张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前提，当然包括有条件地释蒋在内；二是《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内部文件。"指示"提出

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103)

中共中央在短短六天时间里就实现了由"审蒋""除蒋"到"保蒋安全"的转变，使党的策略走上正轨，这与下述情况有关：

第一，西安事变爆发后，没有出现张、杨义旗一举，全国群起响应的局面；相反，"拥蒋潮流"波及全国。对蒋如何处置，保蒋安全，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赢得群众，从而有利于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要脱离群众，使内战扩大与延长，这样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听取刘鼎的汇报和与张、杨会谈，了解到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只是为了逼蒋抗日，绝无伤害蒋之意，只要蒋答应抗日，张仍拥护他做领袖；蒋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仍能支配南京的行止。12月17日上午他派蒋鼎文持手令飞返南京，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南京以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先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南京的讨伐军已有五个师涌入潼关，威逼西安。周恩来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他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当天夜间就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就蒋的处置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104)

第三，被人们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在蒋被扣后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主战派的首领。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矛盾，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以治病为名前往欧洲。蒋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汪与其在国内同伙来往电报甚频，12月22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发表通电，称西安事变“隳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也”[105]。他随即登船返国。中共中央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106]。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107] 中共中央由要求“审蒋”，改为“争取中派”（当时把蒋视为中派），原因之一是担心“右派”（指何、汪）与日本勾结夺取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

第四，苏联反对西安事变（详下）。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相同立场，12月16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以共产国际书记处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复电说：

> 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
> （一）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
> （二）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立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加入政府，用这样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3）停止消灭中国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解放的国家实行联合。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108]。

考虑到苏联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也有必要协调自己的对蒋策略。这也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

四　国际上的反应

蒋介石突然被张、杨扣留，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世界各国迅速对事变作出反应。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它无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说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社论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要求苏方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12月16日，苏联外交当局致电苏驻华临时代办，要求他立即去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向其声明：

> 一、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
>
> 二、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
> 三、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四、中国居然有个别人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为此感到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109]。

苏联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同30年代中期起它在外交上实行联蒋遏日方针有关。当时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希特勒法西斯已在德国上台，扩军备战，企图吞并苏联。1936年11月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反共同盟后，苏联随时有被夹击的危险。苏联为减轻东线的威胁，实行联蒋遏日方针，希望蒋介石统帅中国军民抗日，以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因而它反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英美等国驻华使节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本国政府，之后又奉命向南京转达本国政府对蒋人身安全的关注。事变期间，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节经常保持联系，商议如何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安全获释。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一项建议：由西方国家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释放蒋介石。经与美、法、意、日等国协商联系，12月24日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代表两国政府向南京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正式提出上述建议。但第二天蒋即在西安获释，英美的建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未起什么作用。

日本是中国当时面对的主要敌人，它已侵吞东北，正在染指华北，企图灭亡全中国。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2月13日晚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由于事变突如其来，一时还弄不清它的原委和性质；也由于日本的入侵已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日本对事变的态度定为西方国家注目，若贸然采取行动，将会“对于中国民众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日本外务省决定暂取静观方针，避免积极行动，对中国“不给任何刺激”[110]。此方针得到了陆军省、海军省的谅解和广田首相的同意，并获得日本内阁

批准。

侵华最激进的日本陆军省，12月14日制定《西安事变后对华时局对策案》，确定“帝国仍坚持既定的对华方策，期其实现”，同时又要谨慎从事，“以赢得中国民心”；南京政府“如不改变以往的政策，进而激化容共抗日风潮，帝国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则“帝国不再犹豫，行使自卫权”。陆军省的方案还具体规定“帝国进一步明确防共态度”；“严格监视华北各政权”，“寻机使防共协定范围扩及华北五省”；加紧策动内蒙自治，“把绥远政权导向反共，以封锁苏联来自北方的策动”，事态如按张、杨通电发展，“恐对日空气恶化，在华帝国侨民及权益受到侵害”，“要不失时机，做可采取自卫手段的准备”[(111)]。

日本在实行静观方针的同时，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奉命加强警戒，17日增派海军陆战军前往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外交机构和特务机关，几乎每日每时都向国内报告西安事变的进程和中国各界的反应。当东京获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停战三天手令飞返南京的消息后，日本外相有田19日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南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威胁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112)] 接着，日本首相广田也发出同样威胁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113)]。

当宋子文、宋美龄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迹象出现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匆忙从国内赶回中国，12月22日、23日接连两次会见孔祥熙，转达日本政府的态度，企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第四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南京立即调兵遣将，下令“讨逆”；西安也准备应战。一时乌云滚滚，一场新的内战呈一触即发之势。所幸的是，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内战危机得以化解，西安事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

一　宋氏兄妹的营救活动

张、杨捉蒋后一再向全国声明，他们此举意在“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114]。事变当天，张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说：把蒋留在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并表示：“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115] 张、杨的这些表示，不是言不由衷的表面文章，而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是他们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捉蒋前，张严令奉命执行任务的孙铭九要绝对保证蒋的人身安全，不许伤害。12日晨，当张从电话中得知孙铭九等冲入华清池五间厅未见到蒋的踪影时，非常着急，担心蒋如发生意外，势将引发内战，有违于他发动“兵谏”的初衷。张当时对在场的文武官们表示：若找不到蒋，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14日，他敦促南京当局派代表到西安谈判。当宋美龄来电要求派端纳来陕见蒋时，张慨然应允。端纳14日到西安后，张请他劝蒋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郑重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立刻释放他，张还表示将亲自送他回南京，继续拥护他为领袖。

应当承认，张、杨的和平诚意是西安事变能获得和平解决的根本前提；假如没有这个前提，和平解决事变根本不可能，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因为张、杨扣蒋的目的只是为了逼他抗日，当宋氏兄妹代表蒋答应抗日条件后，张立即释蒋并送他返京，是自然的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旗帜鲜明地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办法救蒋。

奉宋、孔之命赴陕的端纳12月14日见到了蒋介石。这使何应钦等散布的蒋已死亡的谣传不攻自破。端纳传回的事变真相犹如兴奋剂，鼓舞和坚定了主和派和平救蒋的信心，对主战派的讨伐主张是一个有力打击。

14日上午，孔祥熙应宋美龄要求在南京召开高级官员会议，主和派的意见在这次会上占了上风，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受挫。

张学良本来邀请孔祥熙、宋子文来陕，由于孔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不便脱身，宋美龄建议改由宋子文、顾祝同前往，并征得张的同意。宋子文17日由沪到京，准备赴陕，遭到何应钦等人阻挠，理由是宋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带着这种官方身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有违“纪纲”。19日下午，孔祥熙召开会议，出席者有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经过激烈争辩，决定“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116]。这是南京主和派取得的又一个胜利，主战派因不得人心再次受挫。原来蒋鼎文携蒋手令到京后，何应钦曾下令停战三日，12月19日到期。为宋子文赴西安“救蒋”提供条件，会议决定“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条件是“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117]。

宋子文19日下午2时飞离南京，同行者有他的两名秘书和宋刚从狱中要出来的与杨虎城关系密切、在《活路》事件中被误捕的郭增恺。他们当天在洛阳过夜，20日上午10时飞到西安，张、杨和端纳到机场迎接。张告诉宋，西安方面已拟好条件，准备与南京当局谈判。宋在张学良和端纳陪同下前去见蒋，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宋将宋美龄、孔祥熙的信面交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118] 蒋看到此处，不禁落泪，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蒋对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他才能脱险，并将军事进攻的方略秘密告诉了宋。

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会见中得知，张、杨扣蒋的目的只是逼蒋抗日，绝无伤害蒋的意思，和中共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方针。郭向宋报告了张、杨的和平诚意，建议宋亲自会见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宋委托郭代表他与周恩来会见。周恩来通过郭转告宋：中共未参与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蒋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只要蒋抗日，中共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统一战线。

宋在西安只停留了一天，21日便匆忙返京，向宋美龄、孔祥熙报告此行的收获。宋美龄从宋子文的报告中受到鼓舞，看到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曙光，决心飞陕救蒋。她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暨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119)] 12月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等一起飞往西安，与张、杨谈判。

二　周恩来在西安的调解

蒋被扣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对事变双方进行调解。周恩来一行于12月15日离开保安，16日到达肤施（延安）城外。刘鼎奉张命乘机前去迎接，第二天（17日）把周恩来等接到西安。

周恩来受到张、杨的盛情款待，当晚就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张介绍了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和各方面的反映。张说：现在争取蒋抗日的可能性很大，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赞同张的上述看法，并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蒋虽成了阶下囚，但他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不会被日本侵略者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把蒋杀掉，势将引起更大

规模内战，为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样将使中国的前途更坏。为争取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道路，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20]。张、周17日晚会面时，商讨了迎击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的部署。鉴于宋子文即将来陕，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121]

18日下午，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周向杨通报昨晚他与张学良谈话的内容，阐述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与方针。杨原来以为中共与蒋打了十年内战，现在蒋既被捉，中共定会寻机报复，即或不立即杀他，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现在听到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对周恩来说，他这次追随张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是无不乐从的。杨也向周谈了自己的疑虑：蒋将来是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他不能不有所顾虑。周对杨的疑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并作了解释：现在不但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抗日，国际上英、美、苏等国也在争取蒋抵抗日本侵略。蒋现在除抗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蒋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抗日的可能性更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这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并有强大力量，蒋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次，这次如果没把握，也决不会轻易放蒋走。杨当时表示同意周的上述看法[122]。周、杨会见时还商议了对付南京主战派进攻的军事部署、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等问题，并取得了共识。

周恩来在西安还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在西安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和平方针。当他了解到在西安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党的和平方针缺乏思想准备情况后，19日在西安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谈话，给他们分析形势，传达和解释党的方针，引导他们认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共产党人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挽危亡。

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对促成西安与南京谈判并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作用。

三　蒋介石获释

宋氏兄妹12月22日乘机离京，中途在洛阳停留。宋美龄严令驻洛阳的国民党军队，在未接到蒋的命令时，空军不得派飞机飞往西安，陆军停止向西安进攻。宋氏兄妹飞抵西安稍事休息后，便前往玄凤桥高桂滋公馆看望被关押在那里的蒋介石。蒋突然见到宋美龄十分惊异，“愀然摇首，泪潸潸下”，蒋要求宋美龄等与张、杨谈判时，不要“签订某种文件”[(123)]。宋美龄向蒋通报了南京的情况，劝他珍惜生命，不宜再轻言“殉国”，而要“为国家努力”。

宋美龄会见张学良，批评张“性太急切，且易冲动”，行动“躁急”。张向她申明兵谏“动机确系纯洁”，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表明“不要钱，不要地盘”，唯一目的是要蒋答应抗日，至于签不签文件均可。宋见张态度诚恳，“深信其言之由衷”，承认其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她希望张早日结束事变，释蒋离陕。张表示他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宋催张速将其意转告杨虎城等，并说：凡愿见她者，她均可见，“凡委员长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张学良当夜与杨虎城等商谈后告诉宋美龄：杨及其部将认为“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124)]？

宋美龄在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周恩来。“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予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处。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125)]。宋希望周劝说杨虎城同意早日释蒋。这次长谈二小时，并约次日再见面。第二天再见面时，宋美龄对周说：“我等均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126)]

宋氏兄妹来到西安，促使蒋介石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蒋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他说，双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京后分条逐步实施，但不签署任何文件。

23日，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举行会谈。周恩来提出六项主张，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7)]。周表示，蒋只要接受并实行上述条件，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

宋子文表示同意上述六项条件，并阐述了如下具体实施意见：“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

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鹏飞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周恩来“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周表示“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可为次长”。

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周还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周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128)

24日，双方继续谈判，宋美龄也来参加。周恩来当天将这次会谈结果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129]。

双方意见既趋一致，周恩来便于12月24日晚会晤蒋介石。周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130] 周接着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抢着回答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介石接着向周恩来表示："（子）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指周恩来——引者）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直接去谈判。"[131]

至此，蒋已基本上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条件。释蒋返京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在什么样条件下释蒋，西安各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接受抗日条件，主张立即无条件释蒋；杨虎城担心蒋报复，主张有条件地释蒋；张、杨的部下也大都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中共也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中共中央提出的释蒋条件是：南京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发

表内容相同的宣言；全部中央军向豫绥两省撤退；部分地释放爱国分子和共产党员。宋氏兄妹却一再要求张即刻放蒋，争取圣诞节蒋能回到南京。张学良面对双方压力，担心拖下去会出乱子，决心早日释蒋。24日下午，张对情绪激烈的设计委员会成员们宣布，他即将释蒋，并要亲自送蒋回京。张说："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天大的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132] 他解释要亲自送蒋回京时说："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133]

24日晚，张对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正式宣布，他即将放蒋，并亲自送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以哲等怕蒋变卦，劝张不必送蒋到京。张坚持要送，并向他们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杨虎城；有事多和周恩来商量。

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虎城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蒋走。下午，张学良约杨虎城来对他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我今天决心送蒋走。我想我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134] 杨对这样放蒋有意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此时又为张的真诚所感动，同时也因为近来他也听说十七路军军官在酝酿什么事情，怕出乱子，于是便慨然同意了张的意见，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下午3时半，他们乘汽车从蒋的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张、杨怕部下知道会出事故，行动十分秘密，连周恩来也没通知。

蒋介石登机前对张、杨表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

你们的领袖。”他把答应的条件又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现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135)

张学良登机前把事先写好的手谕面交杨虎城，内容是请杨自25日起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要听从杨和于学忠指挥。

下午4时，蒋同宋美龄乘坐的飞机起飞。宋子文同张学良乘坐张的飞机也随即飞往洛阳。

周恩来听到报告，方知张已送蒋去机场，他匆忙赶到机场想劝阻张不必送蒋去京，但他到机场时，张乘坐的飞机已飞上了蓝天。

四　张学良被扣

蒋介石偕宋氏兄妹在张学良陪同下于25日下午到达洛阳。蒋在洛阳令张给杨去电，将仍扣留在西安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将领释放。杨25日深夜接到张的电报，翌日晨经与王以哲、周恩来等商议，27日将所有被扣人员释放，乘机离陕。几天后又应南京方面要求，把扣留的几十架南京飞机也放走。

12月26日，蒋一回到南京，即命陈布雷杜撰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在报纸上发表，把他在西安获释说成是由于他“伟大的人格”的感召，回避了他对张、杨做出的承诺。

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即受到军统特务和宪兵的监视，先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蒋通过宋暗示张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给蒋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表示“愿领受钧座之责罚”(136)。蒋把此信分送国民党中央和

国民政府，并在呈文中要求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同时要求给张以“国法军法”处分，并说：“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137]

12月29日，居正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第三十一次常委会议，说蒋在西安被扣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认为蒋“毫无引咎可言”，对其“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138]。接着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将张送交军事委员会依军法处理。

12月31日，由李烈钧担任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担任审判官的高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进行审判。在审判会上，张说他痛恨和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因为他对蒋介石极端信服，先后数次将自己意见用书面及口头方式向蒋陈述，均遭到拒绝和痛斥，在“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声明此举“并无别的要求”，绝不是为了“地盘金钱”，“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许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139]。几年后李烈钧与人谈起这件事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问心无愧，有什么畏惧呢？当审讯张汉卿时，张问我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独断独行，何罪之有，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140] 张终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141]。

蒋介石既授意李烈钧出面“审张”并判了刑，自己又向国民政府呈请将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动，努力自赎”。[142] 在上海的孔祥熙1月3日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准蒋所请，对张“准予赦宥，以示宽大”[143]。

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实行特赦。当天发布命令说："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144] 这一纸"管束"令，宣告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过着被幽禁的生活。

五　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瓦解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便着手瓦解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局面。1月2日，蒋离开南京回奉化溪口养伤，处理其兄蒋锡侯的丧事，并遥控对陕甘善后的处理。蒋指令在南京的何应钦负责与西安方面联系；派戴笠来往于南京、溪口间，负责联络；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并于1月6日飞赴洛阳，暂住洛阳车站办公，准备随时开往西安。

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蒋的旨意，于1月5日决定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于当天发布。

同一天，南京以军政部名义发表整理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其内容主要有两项：

甲、人事方面：

1．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委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

2．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3．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戴罪图功。

乙、驻地区分：

1．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鹿万钟各部，及李默庵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宝鸡以及天水一带，又胡宗南、孔令恂、关麟徵各部，仍驻原地。

2．第十七路军直属各警备旅团，移驻正宁、栒邑、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宁县、长武、邠县等县，孙蔚如第十七师移泉甘泉、鄜县、中部、宜君等县。

3．冯钦哉部另编第二十七路，仍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地。

4．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〇五师、一〇九师、一一二师（即张部），一律恢复十二月一日以前之原位置[145]。

按照这个办法，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陕西并占据陇海路沿线的要害地带；蒋的嫡系将领顾祝同掌握西北军事大权，推翻了他离陕时把西北军政交张、杨负责的口头承诺。

南京方面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上述办法，在军事上做了新的部署：将包围西安的30万中央军划“分为五个集团军，以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分任第一至第五各集团军总司令，而以刘峙为前敌总指挥。第一集团军位置于潼关以西至华县沿陇海铁路附近地区，最前线在华县、赤水间；第四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右翼，亦即渭河以北的地区；第五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左翼，亦即华山以南的地区；第二、三两集团军则位置于陕甘边境，其最前线在咸阳附近；以此对西安形成两面夹袭的态势。”[146]

蒋介石回京后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扣留张学良，激怒了西安方面，刚刚趋向缓和的西安与南京间的关系又重新紧张起来。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请张回陕主持一切。1月5日，西安方面发出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名高级将领署名的

通电，揭露“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的事实，指出“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亦惟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内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并严正表示：南京“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147] 同一天，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恢复张学良的公权，指出：“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来，则军民一日不安。”[148]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摆好了夹击西安的态势，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一再强调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解决陕甘善后，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一是日军大量增兵华北，正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亡的客观形势，不容许大规模内战再次发生。而蒋刚刚在西安做出了不再进行内战的承诺，他也不愿承担重新挑起内战的罪名；二是广大群众和地方实力派反对进攻西安。直接面临内战威胁的陕西人民派出20名代表于1月7日到潼关会见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陈述陕民哀吁和平赤忱”，要求南京“对陕事以政治解决，俾得培养国力，一致对外”。他们发表通电说：“旬日以来，交通迄未恢复，潼关复又进兵。设不幸因误会而启衅端，则此仅存之国力将对消于内战之中，其何以制方张之寇焰。”[149] 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月17日发表通电，指责南京是“勇于对内，怯于对外”，要求当局“迅行制止入陕军队，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以弭内战而培国力”[150]。1月15日，由四川刘湘领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署通电全国，呼吁南京“急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勿得逼之过戚，相煎太急”[151]。三是南京担心陕甘红军再次渡河入晋，抄蒋军后路。当时想在南京和西安间进行和平斡旋的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于1月13日向孔祥熙指出：中央军如向西安进攻，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势必全部赤化”。他建议“最好中央军暂取缓和态度”，力求和平解决[152]。同一天，蒋介石在给刘峙、顾祝同、何应钦的电报

中也指出："此时我军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他提出："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153]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1月4日，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三方面高级负责人研究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组成抗日联军，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军的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西安方面确定，集中主力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抽调部分兵力牵制西线胡宗南等部。具体作战方案是：在渭南的赤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归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联军；红军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再经三原赶到高陵地区，依情况参加渭北作战或经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

南京和西安方面都调兵遣将，但双方在军事对峙的同时，又展开了和平交涉与谈判。

蒋为使西安方面就范，1月7日给张学良写信，就南京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作了补充：一，东北军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张推选；二，杨虎城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职权。蒋在信中还令张劝"告虎城及各将领"，"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154]。1月8日戴笠自奉化溪口到南京把此信面交张学良，张当即给西安的杨虎城等写了信，劝他们接受蒋提出的办法，并允派与南京有关系的东北籍人士王化一、吴瀚涛去西安送信并口头转达他的意见。

1月9日王、吴二人离京飞陕。临行前，王、吴会见了被幽禁中的张学良，张对他们说："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张请王、吴转告东北军将领："（一）东北军和东北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不要给蒋有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

回去，否则回去也没用；（二）和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密切团结，不受国民党的离间；（三）和国内各方面同情我们的人士，设法联系，取得支持。”[155]

王、吴到西安转递信件转达了张的口信，劝说杨虎城等接受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杨同两军将领和有关方面经过磋商，1月10日向王、吴表示：将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待双方协商后再作决定。王、吴二人1月11日飞返南京复命。

1月13日，米春霖奉蒋命携带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飞陕，供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乙两案的内容是：

>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乃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在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
> 乙案：东北军（包括驻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刚从南京被移往奉化溪口扣押的张学良也托米春霖捎信给杨虎城和各将领，盼他们“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认为“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156]。显然，甲案虽也使中央军入陕进驻陇海路沿线，顾祝同掌西北军事大权，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地接近，有利于维持“三位一体”局面。张倾向接受甲案，不无道理。可是西安方面认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争取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无从谈起。杨虎城和东北军方面决定派李志刚和鲍文樾随同米春霖一起飞往南京，要求蒋早日释张返

陕。李志刚等16日到南京，17日转赴奉化见蒋，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蒋不允，说张自己不愿回去，愿跟他学修养、读书，你们不要强迫他回去。蒋要求西安方面服从命令，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李志刚18日离奉化时，蒋把一封亲笔信让他带交杨虎城，嘱其返陕后向杨等转达他的话，要杨立刻拆除华阴、华县一带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

李志刚等带着蒋、张的信1月20日飞返西安。张给杨和东北军将领的信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强调“目下最要者”是接受鲍文樾上次带去的甲项办法，“以免夜长梦多，或者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157]。西安方面仍坚持要求蒋必须先把张学良放回来，否则不能接受南京提出的任何方案，并谴责蒋在给杨虎城的信中企图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杨又派李志刚第二次去南京、奉化。李在南京会见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均不得要领。1月23日李到溪口，向蒋详细报告杨虎城等人的态度与要求，遭到蒋的拒绝，蒋向李志刚宣布，今后西安方面可派代表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不要再来南京、奉化了。

从1月24日起，双方在潼关就西安方面接受甲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谈判。西安派出的代表先是米春霖、谢珂，后增加李志刚；南京方面的代表是顾祝同。在谈判中，围绕东北军在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段驻防是一个军还是四个团；十七路军在西安附近是否驻防两个旅；特别是张学良出处复权，是在两军移动前，还是移动完毕后；第三者（红军）移动时（返回陕北），是补助50万还是30万；双方讨价还价。至1月底，双方达成协议，且按此协议东北军已开始从前线撤军。

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群龙无首，以于学忠、王以哲等为首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少壮派围绕营救张学良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锐，愈演愈烈。少壮派坚持蒋不放张返陕就不惜与南京决一死战；老派反对打仗，主张通过谈判救张。十七路军内部也有类似情况。杨虎城本人基本上主和，有时亦摇摆不定。

随着西安与南京间和平谈判的进展，东北军少壮派的主战活动日趋嚣张。1月20日左右，他们发起请战签名活动，鼓吹为救张不惜与南京作战。1月27日晚，少壮派头目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向周恩来请愿，要求中共支持他们的主战主张，声言中共如不同意他们的主战，将不惜先与中共决裂。

1月3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驱车到云阳镇红军前线总部，与在这里的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大家认为，从全局看，西安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果继续进攻，我方则实现自卫战。”可是，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接受。现在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或者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实现和平。但不论打与不打，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158)]。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作战。周恩来、张闻天等于30日22时将云阳会议决定电告延安请示，两小时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指出：“（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159)] 周、叶当晚返回西安，分别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及少壮派通报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叶剑英还同两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此前，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军官会议，40余人参加。王以哲因病未出席，委托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发言主张和平，说这样对救张有利，对东北军前途有利；应德田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坚决反

对和平，坚持张不回来决不撤兵。会议决定在张未回来前，中央军如进逼则不惜一战。与会者都在此决定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等不愿执行渭南决定，又无法说服少壮派，31日派飞机去兰州接来了于学忠，因于是张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于到西安后，东北军中的两派都要求他支持自己的主张。当晚，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与会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于学忠发言时支持王、何的意见，主张先撤兵，慢慢再营救张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同意于的意见。杨虎城说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及放走南京飞机等问题上，都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周恩来说，我们原来就主张先撤兵再设法救张，可是你们两方面有些人主张不撤兵，先救张回来。为了三方面团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现在你们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再设法救张，我们当然同意。

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作出决定后，大多数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坚持主战立场，2月2日上午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率部冲入王宅，杀害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同时派人前去杀害何柱国未果。他们认为王、何二人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他们想杀掉王、何后，拥护于学忠来执行渭南会议决议。

“二二”事件引发了东北军的分裂和内讧。2月2日下午，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不撤兵命令，渭南前线的东北军指挥官刘多荃、缪澂流拒绝执行，3日晨他们自动撤出渭南前线，北渡渭河到达高陵，为中央军进入西安敞开大门；刘多荃的一部兵力还奉命掉转枪口，开到临潼，威逼西安，声言为王以哲报仇。此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不知所措。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同时为避免事态扩大，以利于团结抗日，2月4日，派人将应、孙、苗三人送往三原红军总部。与此同时，杨虎城用武力迫使孙铭九控制下的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东北军内一场大规模的互相残杀才得以避免。

应德田等出走后，刘多荃派人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对东北军联共抗日做出过重大贡献，根本未参与“二二”事件的高福源也被刘多荃下令枪杀。

周恩来得知王以哲遇害消息，立刻偕同叶剑英赶到王宅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电唁王以哲家属，称赞王将军“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对他因“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痛悼[160]。表明中共对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破坏团结、危害和平行径表示愤慨，揭穿了敌人散布的中共支持少壮派破坏和平的谎言。

“二二”事件还使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体东开，导致三位一体瓦解。王以哲被害后，东北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中共和杨虎城产生误会，他们在高陵会议上决定放弃原来已决定接受的甲案，改为接受乙案，东北军东调豫皖地区。周恩来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留在陕甘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保持三位一体局面，以便日后共同东出抗日，但这一建议未被他们接受。东北军接受乙案后，各路中央军向西安进逼。2月8日，宋希濂指挥的中央军第三十六师首先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进入西安。此前，杨虎城已离开西安，前往三原。顾进入西安后，根据蒋介石旨意，派代表前往三原邀请杨虎城回城履行绥靖主任职务。杨2月14日离开三原，返回西安。

东北军各部队1937年3月初全部东开，分驻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他们驻地分散，互不统属，不久接受南京改编，被缩编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任军长。十七路军也被南京改编，除投蒋的冯钦哉师和另外两团外，其余部队被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蒋“认为如杨仍留国内，对西北军的整编，预计将增加不少的困难，因此，力主送杨出国”[161]。1937年3月29日，蒋当面逼杨辞职出洋，杨被迫于4月27日提出辞呈，4月30日获准，6月29日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杨满怀抗日报国激情返国，

刚踏上国土即遭逮捕，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下令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

---

(1) 《张学良文集》第2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2页。

(2)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文集》第2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4页。

(3) 《李克农致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1月18日），未刊件。

(4) 《毛泽东致彭德怀转李克农电》（1936年1月20日），未刊件。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页。

(6) 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2页。

(7) 见《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8)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9)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0)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11)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2)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13)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4)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5)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

（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1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17) 《王世英同志关于西北军与白区工作概况向中央的报告》（1936年3月），未刊件。

(18)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56页。

(19)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98页。

(20)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香港《明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68年9月。

(21)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

(22)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页；孙铭九：《回忆杜重远先生二三事》；《杜重远》，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23) 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5日；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296页。

(24)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5页；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按：一说此次会晤在上海。

(25)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香港《明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68年9月。

(26) 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注68；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27) 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5日。

(28)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29)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6页。

(30) 1979年9月14日著者访问沙千里纪录。

(31)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6日。

(32)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7日。

(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名人全宗档案》，《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34) 《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2月13日。

(35) 《周恩来在双十二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未刊件。

(3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98页。

(37)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98页。

(38)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39)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40—141页。

(40)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41)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第95页。

(42)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第95页。

(43)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6日。

(44) 孙铭九：《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21页。

(45)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68页。

(46)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3日。

(47) 《张学良杨虎城告全体将士书》（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0页。

(48)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9日。

(49) 见孟吉荣：《西安事变时张杨两军的军事部署》，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1980年5月印行。

(50)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北1984年版，第21页。

(51) 指万耀煌，当时在西安已被张、杨扣留——引者。

(52)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21—23页。

(53)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5页。

(54)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68页。

(55)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24页。

(56)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47—848页。

(57)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118页。

(58) 原载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引自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32—33页。

(59)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07页。

(60)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10页。

(61)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48页。

(62) 《陈立夫与西安事变》，《团结报》第1340号，1992年9月26日。

(63) 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革命文献》第95辑，第369页。

(64)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页。

(65) 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革命文献》第95辑，第578页。

(66)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578—579页。

(67) 邓文仪：《冒险犯难记》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91页。

(68)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6页。

(69)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页。

(70)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页。

(71)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26页。

(72)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27页。

(73)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29页。

(74) 符致兴编译：《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75) 黄仁霖：《西安事变及其余波》，《革命文献》第95辑，第283页。

(76)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9—120页。

(77)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0一121页。

(78)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5页。

(79)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6页。

(80) 《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3页。

(81) 白崇禧：《对于西安事变的认识》，《六一运动后白崇禧的言论》，南宁虎声报社编印，1939年9月初版，第74—75页。

(82) 李宗仁、白崇禧12月14日复何应钦电，《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3页。

(83) 《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4日。

(84)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革命文献》第94辑，第248页。

(85)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93页。

(86)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73页。

(87) 《李世军致秦德纯电》（1936年12月23日），《团结报》第1173号，1991年2月13日。

(88) 《孔祥熙致宋哲元·韩复榘电》（1936年12月24日），《团结报》第1173号，1991年2月13日。

(89) 《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1936年12月21日。

(90)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5日。

(91)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78页。

(92)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79页。

(93)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94)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95) 此电见于下引杜重远致黄炎培、杜月笙信中。

(96) 1936年12月19日杜重远致黄炎培、杜月笙信，原信由编者保存。

(97)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0日。

(98)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52页。

(99) 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0) 《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1) 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2) 《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112页。

(104)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05) 《申报》1936年12月23日。

(106) 《毛泽东关于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21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67页。

(107)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同志电》（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23页。

(10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09)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波利瓦涅克电》（1936年12月16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670页。

(110)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08页。

(111) 《关于西安事变的参考资料及调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6—1—5—10—4。

(112) 《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0

—211页。

(113) 《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1页。

(114) 《张、杨对时局宣言》（1936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3日。

(115) 《团结报》第1158号，1990年12月22日。

(116)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0页。

(117)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0页。

(118)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79年4月编印，第509页。

(119)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8页。

(120) 见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46页。

(121)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22) 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47—149页。

(123)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40页。

(124)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43页。

(125)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126)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46页。

(12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12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72页。

(12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73页。

(130)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7页。

(131)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32)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9页。

(133)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0页。

(13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

(135)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2—163页。

(136)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137) 《革命文献》第95辑，第88页。

(138) 《革命文献》第95辑，第109页。

(139)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良的审判笔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

(140)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68页。

(141)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良的判决书》，《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3页。

(142) 《中央日报》（南京），1937年1月1日。

(143)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9页。

(144) 《中央日报》（南京），1937年1月3日。

(145)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版，第121—122页。

(146)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版，第129页。

(147)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2页。

(148)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3页。

(149)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02页。

(150) 《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霰电》（1937年1月17日），《团结报》第1174号，1991年2月20日。

(151)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23页。

(152)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3页。

(153)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取编》，第196页。

(154)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03页。

(155)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西安事变资料选

编》第2集，第53—55页。

(156)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7页。

(157) 《张学良文集》第2集，第1122页。

(158) 《周恩来等关于对张、杨友军军事行动方针的意见》（1937年1月30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59) 《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1月30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60) 《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161)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善后与处理》，第150页。

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

第一节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结束

一　“安内攘外”政策的变化

自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国民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并在随后定为基本国策后，虽然遭到国内许多人士的抨击和反对，但蒋始终坚持不改。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矛盾下降，蒋在“剿共”战争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迫使红军处于西北一隅。形势上的这种变化，使国民党对日态度开始趋向强硬；共产党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国共两党代表在秘密接触谈判，“安内攘外”政策有所松动，但并未放弃，内战也没有停止。

此时，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受新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呼声日益高涨。章乃器说：“在四年前提出‘安内攘外’问题的时候，我是极端主张非攘外无以安内的，然而结果，当局是走上‘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路线！几年来，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勇敢有为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的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的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强调：“非立刻停止自杀的内战，决不足以言抗敌。”[(1)]《永生》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说：目前，内外形势异常严重，摆在我们面前

的是灭亡与抗敌求存的两条路。不抵抗外敌而互相火拼是灭亡的路，全国一致动员对敌才是生存的路。要实现全国一致动员抗敌，决定的因素在于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即必须彻底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客观事实的教训明显的陈列在眼前——再不‘攘外’，只有灭亡，不‘攘外’而只‘安内’，‘内’是无法可‘安’的；不‘攘外’而只‘安内’，只有继续内战，扩大内战，加速灭亡。反之，只有全国一致共同抗敌，则‘内’不待‘安’而自‘安’。在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最高目的之下，内部一切矛盾都可以调和，都可以消灭。”[(2)]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其宣言和其他文件中一再声明，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求各实力派主要是国民党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的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它同政府之间，只是一个政策之争，即是反对“先安内，后攘外”，主张“先攘外”，而后“安内”，认为只有如此，内也才可以安，不然只对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利。

民间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孙科、李宗仁等，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也积极主张反抗日本的侵略。冯玉祥在日记中说：“国家到了今天，若不抵抗日本，则一定亡国；欲不为亡国奴，则只有抵抗。”[(3)] 李烈钧救国心切，经常和冯玉祥就抗日救国事交换意见，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协和先生一跳三尺高，好几次为国事热诚，真奇男子也，可敬可钦。”“协和先生关心国事甚切，极为敬佩。”“同协和先生谈甚久，为国事也。”[(4)] 李宗仁提出：“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5)] 就连蒋介石的嫡系在内要求抗日的倾向也在不断增长，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复兴社领导骨干之一的曾扩情，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对民众代表说：“不抗日，政府就不能存在。”[(6)] 南京国民党人主办的《北方》刊物，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因此舆论称这“是全国抗日力量的发展和南京统治危机的一个反证”，表现出“统治阶级内部之抗日与亲日的公开分裂”[(7)]。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影响。

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当然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上章已有详述。下面不妨再引述一段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弗拉塞（Mr.Fraser）的私电：“这事情（按：指西安事变）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命和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渴望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8] 他后来回忆说：他和蒋介石政策上不一致，存在“政见之争”。“蒋总统主要是要‘安内攘外’，我的主张是‘攘外安内’。……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政见之争，宛若仇雠”[9]。当他几次向蒋介石诤谏，要求改变“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内战，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他忍无可忍，被“逼上梁山”，便义无反顾，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走上了兵谏的道路。

西安事变无疑对蒋介石也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而将被人民的抗日救国浪潮所吞没，因而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10] 保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11]。这样，蒋介石实行了五年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12]，终于走到了尽头，宣告停止，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国内统一战线的局面初步形成。周恩来说：“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13]

二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宋子文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在谈判中商定："关于西安事件之各种问题，由国民党三中全会解决之。"[(14)]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问题，议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讨论国共关系、对日政策等问题。

2月5日，蒋介石决定了解决政局的五项方针：

（一）对内避免内战，然而一遇内战，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是说抗战。（四）加深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材[(15)]。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实现停止内战，促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迅速对日作战，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国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16)]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上述各条保证，是“对国民党一个重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17)]。毛泽东指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18)]

全国各界及舆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十分重视，寄予殷切的期望，要求全会根据西安事变后新的形势，解决事变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成为民族复兴的枢纽。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希望蒋介石及南京政府“重新确定对内对外的国策”[(19)]。其上三中全会呈文中提出七项要求：（一）全国一致抗日；（二）联合世界上和平国家；（三）和平解决

一切政治纠纷；（四）实行民主政治；（五）召集全国救亡大会；（六）实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七）释放一切政治犯[20]。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三中全会书》中，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军力财力迅速收复失地，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确保爱国人民之生命与一切自由的要求，指出“凡兹数端，不但为本会与全国人民所切盼实现，亦一切友邦人民与政府所乐观其成。……用以却敌，何敌不却；用以安内，何内不安？否则外侮益迫，而内乱终不能已，国共合作固无论，即国民党亦将自残以亡。”[21] 上海工、学、商各界于2月15日三中全会开幕日举行盛大群众集会，通过决议，要求团结一致，对日抗战，收复失地，取消辱国条约，将亲日派分子驱逐于政府机关之外，实行民主政治等。北平学生界派代表120人于16日到南京向三中全会请愿，要求顺从民意，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民主政治，以集中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收复失地[22]。

《救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否能贯彻到底，全系于国民党三中全会是否真能接纳全国人民“和平统一，一致抗日”的要求。“因此，从国民党本身来看，三中全会是国民党今后能否真与人民相结合，以挽救自己与民族危亡的关键。”[23] 津沪《大公报》就对外对内问题发表《国民对于三中全会之希望》的社论说：“吾人以为今日不言对外则已，一言对外，则非国内真正统一，上下完全融和，万无可以救亡图存之理。”“非对内有办法，决无对外可言。当前亟务，在于齐一全国意志，集合国力民力，建国救国，双管齐下。”要求中央保持国民的后援，注意多数的同情，贯彻和平宽大政策，开放言论、容纳结社，只要不用武力组织推翻政府，正当活动概予奖掖。“一旦对外有事，乃有全民动员之效。”[24] 《申报》发表《论统一》的时评说：“在今天，凡是中国人都应该接受一个最高的救国原则，那便是民族的利害超过一切的利害。因为如果民族灭亡了，一切的利害都说不上。凡是中国人既然在着着以民族利害为前提的原则下共同奋斗，大家便得相互容忍，相互宽恕，抛弃无谓的纠纷，消除门户的成见，各个人要具有这样的态度，真正的统一才会实

现。”[25]

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在南京开幕，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共一百七十余人。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王法勤、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九人被推举为主席团。蒋介石是日未出席，由汪精卫致开会词。汪是亲日派首领。他于1月14日由欧洲回国后发表的国事感想报告中，公然宣称对外要与日本妥协，说：“任何国家……即使有侵略野心而且见之于行动的，我们也愿意以十二分的诚意与忍耐，求其觉悟，走上共同生存发展之道。”他仍然主张先安内，后攘外。“有人说道：‘当今之务，攘外为先，安内为次。’殊不知安内攘外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不应从轻重来分，而应从先后来分。因为对外是以胜负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必须本身有对外的能力，方才有对外的把握，断没有本身不健全而可以言对外的。”因而“不安内不能攘外”，“安内为攘外之先着”。他还声称一国不能有两种政府与军队，共产党提出的团结御侮，是靠不住的[26]。他在开幕演词中迫于全国民情的压力，不得不讲些保卫领土和收复失地的话，但仍不顾国人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继续鼓吹“剿共”，提出“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27]。汪精卫上述与时局发展大不协调的言论，遭到多数国民党中委的非难。

会议期间，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居正作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蒋介石作西安事变经过报告。

宋庆龄自1927年国共分裂十年以来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2月15日，她和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革命阵营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还说：“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

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28)

2月18日，宋庆龄在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指出必须停止对日屈辱交涉。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作过高的估计，而对中国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低，是错误的。只要忠实履行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中国获得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她针对汪精卫主张继续“剿共”内战的错误言论说：“令人遗憾的，就是直至今日，政府中有个别人们仍不了解欲救中国必先消灭内战。真是可笑，在今日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陈古调子！是不是在抗日之前我们必得先将自己的手臂砍下一个来才行呢？我们已有十年痛苦的内战经验，在经过期中，国力损耗于内争，田园庐舍的破坏，但日本军阀却得以乘机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割去了。”“为救中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一切国力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必须完全利用来保卫中国的完整。事实的本身是极明显的，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她还提出要遵从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训，“与以平等待我们的如苏、美、英、法等国合作”(29)。

在会上，杨虎城、于学忠提出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及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宣称：“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30)孙科、王宠惠、冯玉祥、于右任等六人提出的《请特赦政治犯案》，认为南京政府近十年来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罗致既多，冤抑日众，或流离失所，或则幽羁囹圄，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之士，本无背叛国家反对政府之事实，徒以一时政见不同，或偶为愤激之论者，亦复陷身缧绁，丧失自由，

致使人心皇惑，社会不安”。要求“自民国十六年北伐以后，历次政变，所有一切政治犯，无论已被逮捕或尚在通缉判决，或未判决，应由国民政府明令概予特赦”[31]。冯玉祥等十六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要求：一、努力收复失地；二、采取积极外交；三、集中全国人才，严惩失职；四、筹划开办基本工业；五、励行议而必决，决而必行之精神；指出“以上所陈，为救亡图存，未可或忽者，应请迅议，公决施行”[32]。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刘湘等九人提出《保障民众爱国言论解放民众爱国运动扩大救国力量案》，指出：“我政府数年以来，对于民众救国之言论，民众爱国之运动，皆以外交上之困难，而多方抑制，长此以往，不徒民众对于本党之信仰日益低落，而民族意识之逐渐消沉，必将陷于不可振拔之境地。宗仁等目击时艰，认为目前之中国，非保障民众爱国之言论，不能使民众发扬其聪明才智，以共趋救亡图存之目的；非解放民众爱国运动，不能使民众发展其团结御侮之力量，以从事于民族主义之斗争也。”[33]潘公展、张继、张发奎、朱家骅、陈立夫等二十一人提出的《请确定巩固和平统一之实施步骤案》，要求“在不违背建国最高原则，不抵触中央最近国策范围以内，尽量放宽言论自由之路，使正当舆论得以宣扬”；“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同时各省市应分别加紧推进地方自治，巩固真正民治之基础”[34]。

2月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并将陈布雷为他代笔所写的《西安半月记》作为附件送交大会，提出辞本兼各职的请求。他在报告中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凌乱纪纲”，“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报告陈述他当时虽然不赞成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但表示同意将它提交全会。报告中介绍了八项主张的内容，并说：“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值兹全会开会，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35]大会对蒋介石提出的辞本兼各职的请求表示慰留，决议“无庸置议”[36]。大会对西安事变及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作了否定的决议，称：“此项

主张，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行为及胁迫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大会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37]

21日，三中全会第六次大会通过由主席团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冯玉祥、于右任、邹鲁、居正提出，邵力子、陈布雷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根绝赤祸案》，以答复中国共产党2月10日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决议文对共产党进行了指责后说：“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38] 表示要再次宽容共产党人，要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意向。为此，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办法”：

>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
>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
>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
>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39]。

《申报》周刊刊载的关于《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一文说：“共产党与所谓红军，对于我国形势之推进，影响之巨，几为周知的事，而无需吾们赘述。”“他们也究竟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力量也究竟还是中国的力量。在‘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

上’（见三中全会宣言）的最高原则之下，我们……积极地不能坐视国家民族耗损这一部分力量，自己毁坏救国的壁垒而为仇者快。”关于宣言提出的最低限度四项办法，该刊说：“吾们站在民众的立场，觉得国难十分严重的今日，共产党人既以共同御侮号召，实有接受这些办法的必要。”[40]《救国时报》的社论指出，四项妥协办法，“只是共产党电报中所提议之和平统一五点改换词句而已”，“在内容上，与共产党之提议，并无何种区别……原则上必为共产党所乐于接受”[41]。2月26日，参加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与周恩来谈判国共合作的张冲，介绍三中全会的经过，说明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42]。曾经参加三中全会的亲日派分子陈公博回忆说：“虽然该案开始批评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43]后来周恩来评论这项决议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44]

22日，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宣言后闭幕。宣言重申了二中全会宣言中提出的国家处于非常形势下，对内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体国民之团结，对外决不容忍任何侵略领土主权之事，亦决不签订任何分割领土之主权之协定，否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的方针，仍当继承不变，并努力以策其进行。同时并指出：“盖吾人始终如一之目的，厥为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如果“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45]。这是继蒋介石在前述2月5日的日记中提出“抗战”后，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国民党中央公开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的抗战的方针，比二中全会宣言提出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前进了一步[46]。宣言还规定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数年以来，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

取决于商榷”。宣言和决议一样，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仍称“本党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决不忍数年以来，掷其血汗以从事剿匪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切同志怀功亏一篑之痛，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免贻将来无穷之戚，而永奠民族复兴之基”[47]。

宣言还公布将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民主主义，促进经济建设之进展，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实现民生主义。全会还决定改中常会主席制为常委共同负责制。

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蒋介石接见中央社记者，阐述了对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赦免政治犯等问题的意见。关于开放言论方面，他提出：除了“（一）宣传赤化与危害国家扰乱地方治安之言论与纪载；（二）泄漏军事外交之机密；（三）有意颠倒是非，捏造毫无事实根据之谣言”三者之外，其他均可开放，而且“希望全国一致尊重合法之言论自由”。集中人才方面，他表示“要多方征集人才，来共同努力，挽救国家”。赦免政治犯问题表示要“宽大平恕，召致和平，以谋一切之安定”[48]。随后，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的报刊不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样。

三中全会后，南京政府中张群辞去外交部长，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欧美派人物王宠惠被任命为外长。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49]，标志着国民党已从十年内战、独裁和对日妥协，开始转向和平民主和抗战的道路。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国民党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50]

舆论对这次国民党三中全会都作了肯定性的评价。《申报》周刊认为："这次三中全会的收获是划时代的。……从此全国集中力量，团结一致，从事于救亡、建国之大业，这可说是国事的绝大一个转捩。"[51] 莫斯科《新闻报》指出："这一次的全会决议，是在字里行间另有意义的。但不管决议是怎样，都将不能改变近来已经清楚表示了的团结一致为国家独立而奋斗的历史趋向。"[52] 上海日文《每日新闻》报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对日政策，是外表退让，内实强硬之政策。""全会系使中国坚决准备对日抗战之转变关头"[53]。

第二节　对救国领袖的继续迫害

一　"七君子"案的开庭审理

国民党已开始由内战向抗战方面的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继续采取压制迫害的政策。

沈钧儒等七人被押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后，提审过几次，讯问内容与在上海所问差不多，但也有所增加，概括起来，包括下面几点：一，救国会反对政府，甚至有推翻政府的企图；二，主张停止内战，有袒护共产党的嫌疑；三，鼓动工潮；四，提倡人民阵线。他们的答复是：第一，救国会主张救亡图存，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敌，而且承认中央的领导权，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和争夺政权的企图。它对政府政策有某些甚至是严厉的批评，这是任何国家国民都有的权利，而且其目的在推动政府抗日，绝不是反对政府，推翻政府。第二，救国会主张集合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国内任何力量，不应该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有一丝一毫的消耗，尤其不愿中央在国内的冲突中，消耗它高度的实力。所谓袒护，显然不符合事实。共产党现在尚有很多武装，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力量，并且它已一再通电表示愿意在中央的领导下共同抗日。为加强对抗敌人

的实力计，自以停止讨伐为宜。这种主张完全是出于民族立场，毫无其他作用。第三，关于鼓动工潮问题，因为日本纱厂里面的中国同胞在罢工后饥寒交迫，救国会捐了一些钱救济，并未煽动罢工。第四，救国会主张的是民族阵线，即是救国联合阵线或人民救国阵线，曾未用过“人民阵线”四字。前者以拯救民族危亡为要旨，是要一致对外的，后者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含有对内的意义[54]。沙千里说：“每次讯问，问来问去，老是问那一套，如同将一桶水，倒来倒去，还是这么一桶水，倒不出什么新花样来。”[55]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当局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的第三项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其他几项与救国会的主张复完全相同，而救国会又在事变前二十天曾有电报给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南京政府援绥抗日，且全救会与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关系密切，既然这样，全救会显然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因此迁怒于沈钧儒等诸救国领袖。CC首领陈果夫、陈立夫竟要求枪毙“七君子”，以警告张、杨，幸而为冯玉祥所阻止。冯玉祥说：“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动了杀机我们的人危险太大。”[56]“杀了沈等，救不了蒋介石，却堵死了与张、杨通声气的余地，此刻千万不可轻率从事，更不宜去轰炸西安，这样会玉石俱焚。”[57] 当时南京政府司法部在给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一封密电说：“李公朴等案情节重大，兹值西安事变，人心浮动，其通电尤复淆乱听闻。仰饬看守所务加派看守，严密戒护，毋得稍涉疏虞。”因此从12月14日起，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顿时紧张起来，门口增加了宪兵和保安队，不仅朋友禁止见面，家属也不许探望。连他们看报都不准许。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张学良、杨虎城曾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达成立即释放被捕的上海爱国领袖的协议，并曾提议安排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杜重远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中任职。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在机场对杨虎城说：“回南京之后，实行

（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救国会领导人等六项承诺”，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一一都可实现，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58] 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发出了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保护救国运动，聚集人才的讯号。人们均以为沈钧儒等必可无罪释放。

从上年12月4日沈钧儒等人被羁押，到1937年2月4日侦查期满后，延长了两个月，到4月3日又已届满，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是不能再羁押下去了。

4月3日是对“七君子”法定羁押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公然又炮制了一份《起诉书》，罗织成“十大罪状”，即所谓（一）“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二）“不承认现政府为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三）“蔑视政府，故为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四）“提倡人民阵线”，有“国际背景，政治野心”；（五）“抨击宪法”；（六）煽动工潮；（七）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八）与第三国际有关系；（九）“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引发西安事变；（十）罗青曾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按实指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有牵涉章乃器并及沈钧儒、邹韬奋之处。结论是被告等“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59]，对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陶行知，以及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共十四人提起公诉，并通缉陶行知等人。

《起诉书》4月7日在各报刊登出来后，一场救国无罪和“救国有罪”的尖锐激烈斗争，在江苏高等法院内外展开了。

沈钧儒等七人聘请了律师，分别为：沈钧儒的辩护人：张耀曾、秦联奎、李肇甫。王造时的辩护人：江庸、李国珍、刘世芳。李公朴的辩护人：汪有龄、鄂森、陈志皋。沙千里的辩护人：江一平、徐佐

良、汪葆楫。章乃器的辩护人：陆鸿仪、吴曾善、张志让。邹韬奋的辩护人：刘崇佑、陈霆锐、孙祖基。史良的辩护人：俞钟骆、俞承修、刘祖望[60]。在聘请辩护律师的同时，他们最后写成1.7万余字的《答辩状》递交法院。

《起诉书》提出之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钱新之向沈钧儒等被告进行劝降迫降活动，提示只要他们切实保证以后不再从事救国活动，留居京中或出国，即可撤回公诉，或先行交保。沈表示："三中全会后，政府既宣示上下团结一致对外之主义，本人亦深愿在中央领导下，从事爱国运动。"[61] 叶楚伧等以沈钧儒等人仍表示要继续从事爱国运动，以"应照顾到党部威信"[62]为由，主张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徒刑，随审随判，如沈等不作任何辩护或上诉，即可押送南京反省院；入院后，必须认错并写具悔过书，方准交保释放。但国民党当局担心如果贸然判罪，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将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于是指令法院"取'多调查，少开庭'办法"，以"避免法律上社会上之若干重大麻烦"[63]。

5月23日，叶楚伧在给杜月笙、钱新之的信中，道出了他们策划诱降迫降，将沈钧儒等七人强制送反省院的阴谋："沈事宣判之日，自当同时谕交反省院，以便一气呵成。至就近交反省院一节，弟意不如在京，因在京出院以后，出国以前，更可多得谈话机会。中央同人颇愿与倾心互谈，一扫过去隔阂，而于其出国之时，归国之时，均可于此时日中重开坦白光明之前途，于公于私均为有益。"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若虑及途中引起注意，自可避免一般递解之形式，毫无形迹可寻也。"[64] 国民党这一花招，遭到沈钧儒等七人的坚决抵制。他们认定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国无罪事大，宁可不出狱，决不丧失立场和有损人格，毅然拒绝进反省院的无理要求。

6月7日，沈钧儒等七名被告和他们的义务辩护人在上海各大报发表《答辩状》。《答辩状》指出："起诉书认为被告等有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之嫌疑。然以

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要求江苏高等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65)。

同时全救会也发表《为江苏高等法院对沈章诸先生提起公诉的答辩并告全国人民和全体会员》书，呼吁党国领袖、社会硕望、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民，本正义法理，为本案作合法之声援，俾得迅速判决被告无罪，立即无条件释放。平津各界1690余人亦另嘱托律师代拟一答辩书，认定：“惟就起诉书所采取之书证，通体观察，追求真意，苟不断章取义，故意周内，则不特足以证明被告等非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且证明其所宣传者，又何曾与三民主义不相容，应无犯罪之可言。”(66)

国民党当局诱降的图谋未能得逞，即决定对“七君子”开庭审理。6月11日，“七君子”案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由刑事第一法庭正式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审问要点摘录如下：

问：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怎样组织的？

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以各地救国会作单位的，先由各地斟酌地方情形，分别组织各个救国会，再来联合起来，成立该地各界救国联合会，再由各地各界救国联合会派代表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譬如上海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就是它的一个单位。

问：加入救国会有什么手续呢？

答：凡愿意抗日的都可加入，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救国，都有能力救国，所以对于入会的人没有任何手续上的限制。

问：政治纲领里面关于联合各党各派召集救亡会议两点是怎

样解释的？

答： 集中全国力量共同抗日。

问： 所谓联合各党各派是指那些党派呢？

答： 并没有指定是那一党那一派。希望全国各党各派，都放弃成见共同联合起来抗敌。当然，凡是中国人，除了汉奸都在内。

问： 那末，纲领里面说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什么意思？

答： 这一点请审判长特别注意。起诉书里面曾说，我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为的对内，不是对外，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另组织一个政府的话。我们认为国民政府当然是最高的组织。我们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如果有另行组织政府的企图，那就是革命，怎样会把自己的文件公开，并且拿去见吴市长呢？

问： 所谓各党各派包括那些党派，是否指容共而言？

答： 国内所有党派都在内，如像国家主义派、第三党等也是不能否认的政党，共产党当然也在内。说到容共与清共，这只是政策的转变，不是绝对的。按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容共”是团结力量的好名词，但清共以后变成坏名词了。关于救国会的所有文件，只说停止内战，从未说过“容共”二字。

问： 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答： 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

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末，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 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答： 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能明白。

问： 那末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 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须要说“不统一”，这一种的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问： 你们反对政府剿共么？

答： 这不是这样简单说法的。我们最反对的是日本要来与我们合作防共；关于剿共，我们没有说过。不过政府剿共十年，政府与人民很苦，我们不能不关心。至于说我们巴结共产党，我们的脑子里想也想不出来。

问： 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

答： 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把不登记认为就是秘密的，我们拿宣言去见吴市长又怎么解释呢？救国会是没有丝毫秘密性质的[67]。

沈钧儒审问完毕，依次对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以及顾留馨、任颂高、罗青进行了审问。审问详略虽有所不同，所提问题则大体一样，没有超过审问沈钧儒所涉及的范围。

整个审问一直延续到下午7时。江苏高等法院没有得到任何可以

对被告定罪的口供和依据，决定于第二天再审。为了打乱国民党在第二天结审，随审随判罪，强制送反省院的部署，沈钧儒等人决定先发制人，按照《刑事诉讼法》条文规定，写具《声请回避状》。回避状以合议庭推事“已具成见，不能虚衷听诉，而将专采起诉书所举不利于被告之主张以为诉讼资料，断难求得合法公允之审判”为由[68]，向法庭递状，要求主审的审判长和推事全体回避。全体律师也拒绝参与审理，实行“罢席”。因此第二天下午开庭时，律师席上空无一人。法院无可奈何，审判长不得不宣布停止诉讼程序，改期再审，审判因此中止。

二　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如前所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曾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的要求，并保证回京后即下令办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内战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在积极进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形势较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五六月间，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人物，也在网罗之列。6月初，蒋介石嘱咐叶楚伧早些结束“七君子”案。叶说：“我们早已安排妥当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会议。”蒋介石听后，皱皱眉头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楚伧诡称：钧座放心，沈钧儒等人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69]　当时有记者报道说：“‘准予保释’的风传，记者在上海早听见过了。据说，蒋委员长在庐山时，曾致电中央，请释七人，送他们到庐山去谈话，不想中央党部方面有人主张一定要他们写悔过书，他们那里肯写。”[70]

上述蒋介石和叶楚伧的对话情况，是胡子婴6月6日从《大公报》

社社长张季鸾那里探悉的。张季鸾虽然不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什么官职，但其人足智多谋，一向颇受蒋介石的器重，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往往征询他的意见。张季鸾刚从庐山回上海，他在那里会见了蒋介石和叶楚伧，因而得知这一情况。胡子婴认为，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叶楚伧等人之间，对“七君子”案的处理有不同意见，叶等千方百计坚持诱降，并非出自蒋介石的主张，这点十分重要。第二天即6月7日，胡子婴便赶往苏州，向沈钧儒等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沈钧儒等听后，经过反复研究，觉得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击破诱降的阴谋，争取案件早日结束。沈钧儒同张季鸾比较熟识，于是由他写了一封信，请张再一次上庐山，向蒋介石面陈他们抵制进反省院的决心。胡子婴持信赶回上海，再一次去见张季鸾，转达沈钧儒等人的意见，并说明沈等的决心，如果解送反省院，他们将采取绝食手段，斗争到底，虽死不惜。张季鸾因刚从庐山回来，他不愿在蒋介石眼里成为“七君子”的说客，表示不愿意再度上山。胡子婴知道张季鸾是十分维护蒋介石的，就因势利导向张指陈利害说：“七君子”一案已经引起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在这方面，蒋委员长的信誉不免受损。他们如果因被强制送反省院而绝食致死，那对委员长威信必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这几句话对张季鸾有所触动，他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说：“庐山我是不再去了，既然沈老托我，我就给蒋公写封信吧，试试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于是当面把信写好，信不长，大意是：钧座毅然决然地要实行抗战，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但是现在主张抗敌的最大群众组织救国会七位领导人，却还关在监牢里，这是与人民对立，于抗敌不利。现在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的手段，如果万一发生不幸，则各方面的反应将对国家，对委员长均有不良影响，请钧座三思[71]。

6月12日，就在沈钧儒等递交声请回避状的这一天，钱新之去南京看望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正好蒋从庐山打电话给陈，询问“七君子”案件有什么问题没有，并嘱咐他在顺利结案之后，将他们如期送往庐山。当日下午，苏州审讯发生声请回避的波折，一时不能

审结送反省院的讯息传送到了陈布雷那里。就在此时，蒋介石又去电话告诉陈布雷，说张季鸾有信给他，沈钧儒等反对进反省院，不惜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不放心。陈布雷无法再隐瞒真相，就将沈等声请回避的事报告了蒋介石。蒋听后发怒，训斥了陈一顿。陈布雷遭申斥之后，立即亲自到钱新之寓所，央他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杜月笙，请他邀张季鸾与钱新之于第二天同去苏州探望“七君子”，劝告他们稍安毋躁，还说委员长也是要抗日的，彼此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正在想妥善办法，了结他们的案子，企图借此稳住沈钧儒他们，不要再生意外枝节。钱答应照办。

6月13日下午，钱新之、杜月笙即偕同张季鸾、黄炎培以及沈钧儒的辩护律师秦联奎到苏州去探视沈等七人，并转述蒋介石对他们关怀宽大之意[(72)]。沈钧儒等七人当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钱新之代转，信中说：“钧儒等前年在华北垂危之际发起救亡运动，为全国团结御侮之呼吁，其动机纯在发动人民之力量，为中央制止分离运动之后盾，使国家增强统一抗敌之基础，其决无反对政府之用心，可质天日，所发表文件，足资证明。……钧儒等在羁押中，对个人利害，非所计及，其所忧惶系念者，则为救亡运动之前途。如能在政府抗敌御侮之国策下，努力工作，关于此问题，深愿得间面谒钧座，倾怀陈述，冀获钧座剀切之指示，以求得合理之解决，则对国家对社会始均可告无罪，而无负于钧座之厚望焉。”[(73)]

14日，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74)] 17日，沈钧儒等在致杜月笙、钱新之信说：“如蒙准予保释，趋赴庐山，必可剖陈一切，获得合理之根本解决。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钧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于个人人格有损，万难接受，不得不誓死力争，惟有尽其在我，依法应诉而已。”[(75)]

沈钧儒等于6月22日写了《第二次答辩状》，指出：“缘救国会发起于二十四年终华北问题极端严重，分离运动迫于眉睫之际，故当时

中心主张即为制止分离运动，统一民族阵线，而以抗日为最高之目标，其‘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之呼号，即根据此种要求而来，其意在集中抗日力量于中央领导之下，而绝无改组政府之企图，实彰彰明甚。即以常识判断，被告等为主张息争御侮之人，亦安忍倡改组政府之说，以增重内争，消耗国力，而自陷于矛盾乎？其次，若‘停止内战’及‘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等主张，其意义亦均在保存抗日力量，而使之集中于政府领导之下。千言万语，殆无不以抗日为依归。……”答辩状说：“目下华北危机，依然迫急，敌伪伺隙思逞，不减当年。被告等身处囹圄，忧惶万状，为国自效，固尝寤寐以求之。为此理合补具意见，请钧院盱衡时局，宣告被告等无罪，为政府国策作进一步之阐明，为民族增一重之团结，国家前途，实利赖之。”(76)

第二天，即23日，沈钧儒等再次致书蒋介石，并寄去《第二次答辩状》副文一纸，信中表示：“嗣后如获在钧座领导之下，竭其驽骀，为国效力，不胜大愿。一俟由杜、钱两先生保出，即当随同杜、钱两先生赴庐聆训。”(77)

6月22日，叶楚伧在致杜月笙、钱新之密电中说：“沈事势非先将悔过书内容决定，未便赴庐，务乞立即转知具悔过书。如能接受，并草送文稿，弟廿四晨到沪，可再作内容文字之研究。”(78) 杜月笙、钱新之22日将蒋介石致叶楚伧和叶致杜、钱两密电携至苏州给“七君子”看时，李公朴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的明白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闻杜先生亦表示反对，并向叶说明一切，叶亦认为不必再提。此次观叶电，竟仍谓须悔过，真不知是何用意。到庐山是蒋先生要我们去，非我们求去，今以具悔过书为我们赴庐的条件，是直等于不要我们赴庐耳。……吾人是决不会签署任何有失立场，有丧人格之文件耳。”(79) 邹韬奋也说：“誓死保全人格，是要替中华民族人格稍留余地；誓死力争救国无罪，是要替救亡运动前途稍留生机。”(80) 7月16日，沈钧儒在其致儿子沈谅的一封信中，道及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在“七君

子”案件上的矛盾和分歧时说：“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81)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严厉镇压，到这年5、6月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即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对外共同抗敌御侮。这对“七君子”的出狱起了重要的影响。

三　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

前述6月12日沈钧儒等声请回避，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暂停。当日有记者问高院院长朱树声如何裁定，何时再开庭，朱答称：“现对于沈等各被告声请，如何裁定，正由推事评议中，约一二日可以决定接受与否。如承审推事认为声请理由充分，回避当然不成问题，否则将由另一庭各推事评议决定。至何时开庭，也要回避问题解决后才能决定。”(82) 被告家属和辩护律师当即表示，如承审推事肯回避自无问题，否则决向最高法院抗告。朱树声当晚即电京报告，司法行政部复电指示：“此案苏高法院有裁定权，高院如认为无理由，可予驳回；如被告不服，可向最高法院请求裁定。”(83) 后江苏高等法院经裁定照准。6月24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前夕，沈钧儒等又向法院提出《声请调查证据状》，除请求调查他们上次开庭时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外，另提出十个问题，要求法庭调查证据(84)。

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更新审理。由于沈钧儒等被告写了声请回避状，本案改由刑二庭审理。主审为朱宗周，承审推事李岳，陪审推事张泽浦，主科书记管翎飞，检察官仍为翁赞年。上午9时开庭。

这次审判长对各被告讯问的问题，计有一、各救国会之组织；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中所谓“联合各党各派”及“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的意义；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中所列有容共嫌疑之字句；四、救国会与毛泽东及共产党之关系；六、抨击宪法草案；七、各被告与日商纱厂之罢工有无关系；八、与张学良的关系及与西安事变有无因果；九、《救亡情报》之发行；十、要求释放政治犯之主旨[85]。全日讯问达七小时之久。上午提审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下午审讯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人。这次审理最后集中于西安事变与被告及全救会的关系问题。

审判长问：“你们要向张学良调查，是什么意思？”沈钧儒说：“我们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但起诉书硬说我们有重大关系，如贸然判罪，我们是不服的。”[86] 张志让律师起立发言说：“张学良所提救国会议，与救国会主张救亡会议性质是否相同，应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有向张学良调查的必要。”[87] 问：“你主张建立统一抗敌政权是张学良改组政府的意思吗？”沈答：“救国会所有文件，从未提到改组政府，起诉书硬说我们与张主张相同是错误的。”[88] 章乃器说：“在去年十一月间，我们在报上见绥远抗战，所以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出兵援绥，同时也有电报给政府及傅作义，是要求一致出兵。”审判长问：“你们昨日具状请求调查证据是什么根据？”章答：“刚才检察官所说的西安事变是我们勾结而成的，有何根据，所以要请向张学良调查。”[89]

审问邹韬奋时，检察官翁赞年发言：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故入人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未得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隔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救国会电报在11月中发出，西安事变即于12月中爆发，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所以此次虽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起诉，但核诸各被告之行为，实有构成《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

条第三款第四款之可能[90]。邹韬奋回答："我刚才说断章取义，罗织入罪，是指人民阵线而言，但检察官却牵到张学良的问题，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审判长若认为检察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讯问下去了。"审判长频频摇手，制止其发言，但邹韬奋不理，接着说："被告刚才讲话被检察官驳斥，所以我也有权辩释。"审判长递全救会给张学良电文给邹韬奋看，邹阅毕后又说："此电内容明白说请他出兵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且全救会时有同样电文给国民政府及傅作义、韩复榘、宋哲元，检察官何以不仔细看看。"检察官又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电引起事变，而给国民政府及宋、韩、傅电，则并未引起事变。"邹说："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中所谓援绥究竟和西安事变有何因果关系。"[91]检察官无言可对。

沙千里说："给张学良通电，因张为东北人，应出来打日本人;同时有电给国府和傅作义，西安事变是否由此电而起，请问张学良，此电报是为打日本人还是引起内战？"[92]

史良说："报上只注意致张电，而不注意给政府与傅作义的两电，又何以指张电即为勾结？因为内容是一样的。""请张援绥电文，词义文句甚明，乃检察官既强指我们勾结工人，复又强指勾结西安，须知工人系受日人压迫而罢工，我们实亦并未勾结西安。检察官亦中国人，何苦坚欲挑拨我们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又说："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与我们相同的，中国人所受压迫相同，要求相同是自然的道理。"[93]

辩护律师亦请求向张学良进行调查，使全国清楚本案真相[94]。

这时，全体辩护律师二十四人激于义愤一致起立，向检察官表示抗议，要求调查证据，法庭内空气十分紧张。审判长说："此事要评议后再定。"并声称各辩护人对证据一点，经讯问各被告后再谈。检察官翁赞年则说："不用传张学良，讯问笔录已够。"[95]

沈钧儒起立发言说："勾结军人，应用危害民国罪第一条判处死刑，至少应判处无期徒刑，但蒙检察官'宽容'，却用第六条。起诉书既说'勾结'，但检察官侦察四月，罪证尚未确定，要请检察官彻底调查证据，我宁愿受国法处分。"[96] 检察官哑口无言，不能再重弹老调了。

此时，李公朴又跑到前面说："请问检察官侦察四月，那样有利被告证据曾加调查？现请检察官另外调查。"[97]

章乃器又发言说："检察官自己不调查证据，并且阻止审判官调查证据，这是不对的。检察官刚才说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代表中华民国的人格来说话，不要叫老百姓丢脸。"[98] 王造时、沈钧儒要求再次发言，被审判长制止。

为了要求调查证据，从下午4时到5时，被告及辩护律师同检察官又发生激烈争辩。李文杰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与检察官大开辩论，庭上空气，至为紧张。"[99]

至下午5时35分，审判长只好宣布暂时退庭评议。6时零5分，审判长、检察官、律师、被告再回到法庭，审判长宣布："请求调查西安事变，评议结果，决向军委会调集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其他请求应毋庸议"[100]，并决定调查完毕后，再定期公审。

7月5日，因沈钧儒等被告自4月5日羁押期满已届三月，江苏高等法院以"证据尚未调查完备，尚有继续羁押之必要"为由[101]，将他们的羁押期间再延长两月。

江苏高等法院于休庭后致函军事委员会，调查张学良的案卷。7月6日，军委会的复函如下："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五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

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102] 复函援引张学良这段话，是张于1936年12月31日在军法会审时的供词，这清楚表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基于他的一片抗日爱国赤诚，和对沈钧儒等爱国领袖无辜被捕表示深切同情，并无其他。江苏高等法院的审讯实际上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后来并未再开庭。

第三节　救国无罪，人民的抗争

一　新的营救抗议浪潮

从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到6月苏州审判期间，“七君子”案件成为全国舆论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问题在政治而不在法律；争取救国自由，不仅关系救国运动的命运，而且“要影响整个民族的前途”[103]。全国各方面人士开展了较前一阶段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沈钧儒等人宣判无罪释放。

4月1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诸君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104] 同一天，周恩来致电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指出对沈钧儒等提起公诉的做法“大失国人之望”，希望张“进言当局，断然改变此对内苛求政策”[105]。

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认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他们并长期关押，不特全国人民反对，世界有识人士所不满，甚至国民党内部爱国分子亦多愤愤不

平，西安事变八大要求中，提出立即释放他们，即是明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三中全会开始表示出自愿放弃其错误政策，“全国人士亦正以诸先生之能否无条件开释以判断国民党有否与民更始之决心”。宣言表示：“吾人对此爱国有罪之冤狱，不能不与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并期望国民党中有识领袖之切实反省。”[106] 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取消陶行知等的通缉令，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同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以沈钧儒等被起诉及通缉陶行知等，毛泽东已电潘汉年赴南京谈判，并准备发起援救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要叶通知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准备响应[107]。15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说：对沈钧儒等起诉并通缉陶行知等，已引起全国不安。“良以三中全会后，先生即以释放沈、章、邹诸政治犯，容许言论自由，晓谕全国，会今沈、章、邹诸人，政治犯也，其行容或激越，其心纯在救国，其拥护统一尤具真诚，锒铛入狱已极冤，抑乃苏州法院竟违背先生意旨，诉以危害民国之罪，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先生洞照四方，想能平反此狱，释沈等七人并取消陶等通缉，以一新天下耳目，是则举国民众所引颈仰望者也”[108]。5月23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准备赴庐山见蒋介石，提出商议的若干问题，释放“七君子”是其中之一[109]。

7月3日，因南京政府准备重新审查“七君子”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嘱请立即通过沈钧儒等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期满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110]。中共河北省委刊物《火线》也发表文章指出：起诉救国领袖，“不仅在于科罚他们几个人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停止他们的救国活动，而且在于打击整个中国人民的爱国抗亡运动，确定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都为非法的活动。……我们广大人民是有权而应该批评与坚决反对的，这不仅是关于沈钧儒等几个人的罪名与释放问题，而

是关于今后全国人民是否获得抗日自由问题”[111]。

4月7日，在苏州养病、同情救国运动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烈钧，亲赴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两处看望沈钧儒等和史良，表示慰问[112]。冯玉祥也去苏州看望沈钧儒等人，表示“拟请当局不咎既往，从轻处罚，予以释放”[113]。随后，冯又致信陈布雷说：“沈君等见事之未尽美善，不无义气磅礴，致出过激步骤，或远于事实，此固人所难免。……尚希鼎力设法请求先生（指蒋介石）曲予周全，为国家惜人才，为伊等进规补，运筹在握，两全齐美，庶彼等早日开释，咸知所感，将来为国效用，来日方长也。”[114]

5月，上海文化界谢六逸、胡愈之、夏丏尊、欧阳予倩等百余人，联名呈请国民政府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人，称沈钧儒等七人“素行纯正，热心爱国，案关政治，仰乞钧座鉴核主持，免开爱国有罪之恶例，而励团结御侮之精神”[115]。上海金融界领袖徐新六、林康侯、吴蕴斋、秦润卿等十余人联名通电要求释放章乃器；上海书业公会、商务、中华、开明等大书店联名要求恢复邹韬奋自由[116]。南京、苏州、无锡、镇江等地也开展了营救运动。著名律师、前大理院院长江庸等二十余人联名向江苏高院请愿，认为依据法律，侦查期限不得超过六月，如到期仍无结果，便应立即释放。现对沈钧儒等诸先生侦查已逾六月，既不审判，又不释放，显系违法行为，因此要求依法立即释放七领袖[117]。6月10日，上海市民四千八百余人联名签署请愿书，递交江苏高院，从政府、司法、救亡三方面阐述爱国无罪，要求撤回公诉，迅速恢复沈等自由[118]。6月12日，上海召开了六百余人参加的援助沈案市民大会，并发表宣言说：“我们人民一向是爱护政府的，政府也只有受人民爱护才有力量去打敌人；但是要人民爱政府，总得人民有爱护政府的自由，爱护国家和反对敌人的自由，所以孙中山先生不但讲民族主义，还要讲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因为如果人民爱国的时候，这也算犯法，那也要吃官司，民族主义怎样能够行得通呢？敌人怎样能够赶得跑呢？如果要是七位救国领袖因

为救国而被办罪，那么人民是不是要误解政府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呢？外国人是不是要笑话政府不想打敌人，专门自己闹分裂呢？由此看来，七位先生的事，其实是我们整个国家和全体同胞的事。我们要求政府立刻释放他们，拥护政府释放他们，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抗敌救国。”(119)

6月9日，平津学生数千人举行大示威，抗议江苏高院对七位救国领袖的起诉和判罪。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推出代表到苏州监审，代表经过天津、济南等地时，“沿途赴车站欢送的群众达数千人”(120)，都提出恢复沈等自由的要求，请代表向江苏高院法庭转达。有的群众要求北平的著名律师组织辩护团赴苏为七领袖辩护，并募集讼费。成都和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皆有宣言和代电发表，要求法庭宣判七领袖无罪，无条件释放，政府应切实取消爱国治罪的政策。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营救运动更为积极。“该会所在地邻近苏区，因受红军抗日宣传之熏陶，人民爱国情绪万分高涨，故该会发起之运动规模极大”(121)。广州七千余学生签名要求爱国自由和宣判沈等七人无罪。全救会华南区总部发出长篇电文，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营救，并为沈等代募讼费(122)。

6月6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同盟等团体，上书南京政府，认为起诉书对救国会的宣言等文件“不详本末，断章取义”，“此等行为，显系违背中央‘集中人材’、‘共赴国难’的原则”；要求中央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迅速释放救国领袖(123)。

《东方杂志》7月份用大字标题《轰动全国的沈钧儒等七人案》，详细刊载《起诉书》、《答辩状》和沈等受审的情况。津沪《大公报》发表《沈钧儒一案起诉感言》，认为救国会系时代心理所产生，此际如果绝对课以当时责任，“纵令情真罪当，恐难保不于全国青年以不良之反应”，“于当轴收拾全国人心，促进大同团结之精神，殊有未妥”。还说：“现在情势一变，上下双方，皆应勾销陈迹，一新态度。直率言之，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虽于废止，亦无不

可。”[124]《立报》发表《求立互信》的短文，对《大公报》的上述论点表示完全赞同[125]，同时还在另一篇社论中指出，这一案件为国内外人士所注视，不仅外国人将以此判断我国司法制度是否健全进步，国内人民也都以此观测政府今后施政方针的趋向。因此，政府不能不特别审慎，希望不会再“有第二个杜重远案发生，以自隳其立场，自隳其信誉”[126]。

《申报》认为，沈钧儒等案是国家大不幸的事。三中全会既已宣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宗旨，政府当局即“应以宽大为怀，在党政机关正确之指导下，容许人民御侮救亡之自由。当局本身尤应率先倡导民众救亡之组织与训练”[127]。沈等倡导救国运动，“出于爱国动机，殊有不容一笔抹煞者”，如果在今日仍因此构罪，“宁非至可扼腕者耶”[128]！

上海《天下日报》连续发表《当局应注意沈案的政治影响》、《吁请宣告沈钧儒等无罪》、《沈案的观察》、《救国究否有罪》等评论文章，认为如果根据危害民国罪处理此案，一般国民将因此而疑及政府三中全会后“所抱的基本施政方针，与被告等所提倡的救国宗旨有什么不同”；这种疑虑将使人民与政府间的“隔膜加深，对于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投下不堪乐观的影响”[129]。同时指出，沈钧儒等人是“赤胆忠心的为国家为民族的志士，是领导民众从事救国家救民族的领袖”。人们热烈希望他们“早日恢复自由，重新回到救国阵线上来”，要求政府对他们“判决无罪，迅即开释，以慰民情，以固团结”[130]。如能吸收他们参加庐山谈话会，“定可促进全国上下共信互助，精诚团结，以开内政之新纪元。……如是，则庐山之曙光将烛照苏州之阴影”[131]。

上海《群众新闻》的评论说：沈等能不能得到公平的判决，“是今后国民能否有救国自由的一个重要关键”；要求司法当局“认清民族危机深刻的程度和国际情势的趋向，根据三中全会团结御侮的决议案以及蒋委员长释放政治犯和集中人才的诺言，顺从全国人民的要求，

公平判断，不要被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蒙蔽，操切从事，招致出‘亲痛仇快’的恶果来”[132]。

巴黎《救国时报》发表《再一次号召国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究竟是谁“危害民国”？》等一系列社论，认为江苏高等法院为南京政府下国法所系的机关，政府对于此案的指示，即使不能依从民意，亦应根据事实，始可维护一国法律之尊严及政府之威信。综观全救会及其领袖本身之文件、言论与行动，起诉书所列十项罪名，无一可以成立。“这种‘救国有罪’的案件，在今日最令人失望、痛心与危惧的，特别是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人在企望南京能秉承多年血的教训，毅然改图，实行对外御侮、对内民主的国策，以建树和平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业的时候，这种罪证毫无的爱国罪案……实际上是摧残国家人材，是增加日寇的威焰”。“因此控诉救联七领袖案，不独关系七领袖本身的安全，而且亦关系乎将来国策之动向与中华民族的存亡。这是救国力量与日寇及亲日分子搏斗的重要关头。我全国同胞，无论团体个人，不论党派信仰，都须认清此案之严重意义，奋起力争，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要求救国自由”[133]。还说：“对于这样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爱国运动的团体，对于为抗日救国运动而坚决奋斗的爱国团体的领袖，任何一个有民族天良的同胞，都必然表示无限的同情与拥护；任何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都决不容忍爱国领袖的久陷囹圄。”[134]“南京政府对于这样尽心竭力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力争民主的爱国志士，竟加‘危害民国’的罪名，使全国人民不能不发生偌大的疑问：‘到底是谁在危害民国？’”[135]《救国时报》还刊载了不少全国各方面和海外营救“七君子”，争取救国无罪的活动消息邮寄国内，沟通讯息，对了解事件真相，推动营救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北平晨报》社论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虽有新的趋势，然而事实的表现还不充分。“沈钧儒等之拘捕起诉，更和政府嘴里所说的相矛盾，而与全国及世界不良印象。政府为增加御侮力量打算，虽外国

尚须联合，虽外国人的好感尚须取得，请问：自己的人民何以不速联合一致？何以对于人民救国团体认为非法？对于从事救国者认为犯罪？这是极难理解的。”[136]

天津《益世报》认为，全救会是当时政治环境一部分民意及民情的产物，不可太重视沈钧儒等七人的责任，而抹煞当时的政治环境。沈等“终是爱国书生”，“此数人与一班汉奸集团公开干卖国勾当者，分别奚止天壤？……惟爱国果可有罪，国家对卖国者又将如何？”[137]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沈钧儒等“献身救亡，呼吁抗敌，大义凛然，功在青史”；“纵有万罪，万罪都在爱国。当国家危难的今日，当轴应惟恐人民不爱国，断不能因爱国而判民以罪”[138]。

二　救国入狱运动

为了争取救国自由，防止江苏高等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时对沈钧儒等判罪，“永远造成历史的大错”，同时表示“希望当局领导救国的最大诚意”[139]，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把营救“七君子”的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6月25日，即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七君案”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诸青来[140]、沈兹九、胡子婴、王统照、张天翼、陈波儿等十六人，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称：“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关押在牢里已经七个月了，现在第二次开审，听说还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拥护信仰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沈先生等一天不释放，我们受良心驱使，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宣言还指出：“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

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141]

同时，宋庆龄等给江苏高等法院的呈文中写道：“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具状人等或为救国会会员，或为救国会理事，或虽未加入救国会而在过去与沈钧儒等共同从事救国工作。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他们表示：“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因此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要求江苏高等法院将他们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142]。

宋庆龄等还制定了《救国入狱运动规约》，宣称“救国入狱运动以争取救国无罪为其唯一目的”，凡参加者，可一人或数人联合向江苏高等法院或当地法院具状，声明愿与沈钧儒等案各被告连带负责，并请求法院传押审讯。“如沈等无罪，则同获自由；沈等有罪，愿同受处罚。……在沈钧儒等七人未经全体无罪开释之前，决不请求法院释放”[143]。

宋庆龄等就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发表的书面谈话指出：孙中山曾对三民主义下过一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起诉书认为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主义，是危害了民国，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是错误的，危害民国的罪名绝对不能成立。如果法庭竟判定有罪，“那就将成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冤狱”，“而且在政治上要铸成大错”。因为沈钧儒等因组织和参加救国会而被判罪，则一切参加救国会的都有罪，而且以后人民组织参加任何爱国团体，也都会有罪。“这关系就决不是沈先生等七位，而是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爱国的人民，而是整个中华民国的前途。所以七位先生事小，而抗日救国事大，爱国有罪这一个恶例是万万开不得的”。宋庆龄等表示：如果法院判决沈钧儒等有罪，他们就准备一齐去法院，要求收押，与沈等并案办理。“我们讲过了这些话，以人格保障，都要

做到，直到七位先生恢复自由，爱国无罪达到目的时，我们的工作才完成”。谈话说：“我们相信救国入狱运动是目前最适合的一种救国方式。现在我们首先做着，假如在我们后面，有千千万万人这样做着，我们的运动一定得到胜利。这运动如果得到胜利，我们国内真正的团结统一，才能够实现，而抗日救国，也必然有了胜利的把握。”[144]何香凝于7月4日单独致函宋子文和孙科，赞扬宋庆龄继承孙中山救国救民的遗志，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宣称：“孙夫人如果入狱，香凝决偕行也。”“全国青年，睹敌寇之日深，民族之危机日益严重，为民族生存而奋斗，革命目的，既为人民解决痛苦，今反以救国获罪，此香凝之所以甘愿入狱，冀轻其全国政治犯之罪，俾其作民族生存抗敌先锋”。她还要求孙科和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转述她的意见，使沈钧儒等全获释放[145]。

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踊跃参加。7月2日，作家何家槐、周钢鸣、林淡秋等十三人具状江苏高等法院投案，愿为救国而与沈钧儒等同负连带关系。上海电影界著名导演及演员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白杨等二十余人亦于7月3日具状请求羁押，愿与沈等同受处罚或同享自由。大学教授华丁夷、音乐家周巍峙、戏剧理论家唐纳，以及大学教师学生、公司洋行职员一百四十余人，其中不少并不是救国会会员，纷纷向江苏高等法院具状，“请求与沈钧儒等同负法律上救国责任”[146]。为响应救国入狱，救国会在上海发起一个巨大的签名运动，准备签满一份万人书，上呈有关司法当局[147]。蓬勃兴起的救国入狱运动，给国民党当局以强大的政治压力。

李公朴在狱中的日记曾以《闻入狱运动有感》为题，写了一段感想：“家属来谈及各方有入狱运动之发起，闻之甚感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了民族的生存来力争生存的权利，与其不争而待将来受辱的死于敌人汉奸的魔手中（如现在东北同胞所受者），反不如在我自己人统治下而入狱。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

辱。和平统一，和平入狱。”[148]

为了履行救国入狱的宣言和规约，7月5日，宋庆龄扶病携带简单行李，偕同胡愈之、诸青来、彭文应、汪馥炎、张宗麟、胡子婴、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等十二人，乘车由上海去苏州投案。上午10时宋庆龄等一行到达苏州高院后，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有两个人出来接见。宋庆龄问：“你是朱院长吗？”其中一个回答说：“我是书记官长，我代表朱院长，这位代表首席检察官。”宋庆龄说：“我们要见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不然我们不说话！……我见蒋委员长，他都要亲自出来。”[149] 胡子婴接着介绍说：“这位是孙夫人。”书记官长立刻称：“是，是！”微微地曲了一下身子退出。

几分钟后，书记官长赵某等出来表示，为便于说话起见，请推派几位代表与院长面谈。于是宋庆龄、胡愈之、诸青来三人被推进去谈话。胡愈之、诸青来对朱树声院长说：“如认七君子有罪，亦请同样将我们羁押起来。”朱说：“关于羁押诸位的事，我实在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权力，要检察官说羁押才可以。沈钧儒案子现在正在审理中，将来结果如何还不知道，诸位还是等候辩论以后看看情形再说。”宋庆龄问前次递的羁押的状子为什么还没有批？朱说：“因为你们都是案外人，与本案无关，所以不能批。”又说：“法院对本案，始终没有耽搁的意思。因为第一次被告请求法官回避，第二次调查证据，以致不能早日了结。”[150] 宋庆龄等表示：“我们都是救国会主持人，为使法院对本案易于明白起见，希望对我们也加以同样侦查。”[151] 朱树声对宋庆龄等请求入狱表示同情，但对“七君子”案，他表示既不知如何解决，也不便干涉[152]。三人坚持要求羁押，朱始终不同意，最后只好说：“诸位如一定坚持，请让我来和检察官商量一下。”[153]

接着首席检察官孙鸿霖与主任书记潘元枚在会客室与宋庆龄等十二人谈话。孙声称沈案决不能撤回公诉，态度蛮横。彭文应等齐称：“起诉书所列十条罪状，如认为证据确凿，那我们都曾参加，我

们也有罪，为公平起见，还是请求把我们一道押起来。”

胡子婴说：“检察官上次开庭说，救国会就是危害民国的。救国会既危害民国，我们是救国会的负责人或会员，就应当把我们也押起来呀！”孙鸿霖称：“检察官不过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站的是原告的地位，他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154) 胡子婴等反复说明要求羁押。

“我们递的状子为什么不批？”一个人问。孙说：“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像这种事法院不仅少见，而且是创见。”(155)

中午12时，孙鸿霖和主任书记走了。宋庆龄表示：“坐守达旦，再行请求。”(156) 决定：“没有圆满结果，一致不离开法院。”(157) 到5时半，检察处派检察官夏敬履来和大家谈话，商量解决办法。宋庆龄说：“我是救国会发起人兼全救执委，与他们七位在工作上做同样事情，在法律上也愿意负同样责任，请你把我收押起来，与他们七位一样受不自由的处分。”(158) 胡愈之提出四个问题要求回答：第一，“救国是否有罪？救国会是否危害民国的团体，一如上次检察官所说？”检察官答：“救国会是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只是一个团体中，总免不了不良分子，而你们救国会的内容怎样，因为案子不归我办，我不能断言，但是救国会总不是危害民国的。”第二，“如果沈等七人有罪，我们要求同样待遇。”答：“他们是否有罪还不晓得。你们如有证据，自然要依法办理。”第三，“假使我们提出证据，法院是否能加以侦查？”答：“如有证据，当然受理，各人可以听候传讯。”第四，“救国会其他会员，倘照我们办法，向法院递状，是否能受同样待遇？”答：“只要在本院管辖范围之内，当然同样办理。”(159) 大家认为比较满意，决定返回上海后再提出证据，请求侦查，以达入狱运动所抱定的“救国无罪，有罪把大家羁押起来”的目的。

7月6日，沈钧儒等七人联名写信给宋庆龄，说：“闻昨日扶病率同诸友莅苏投案，正义热情，使钧儒等衷心感动，无可言状。但一念及先生之健康，关系民族解放之前途至深且大，则又为忧惧不已。钧

儒等深信先生伟大之号召，必能使全国人心为之振奋。司法积弊，逐渐澄清；民主权利，奠定基础，其在历史上意义之重大，实不可思议也。惟劳顿之后，务请善自珍摄，以慰千万人喁喁之望。”[160]

9日，宋庆龄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说：“查沈钧儒等爱国救亡，不应有罪，迄今被押已逾半载，自应一面从速先予停止羁押。庆龄等及全国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等瘐困，而己身独享自由，除一面仍应依所立志愿遵检察官之指示进行外，特亟通电奉达，务祈迅予主张公道，勿失全国志士之心。”[161] 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我读了此电，心中万分难过。”[162] 他随即给蒋介石写信说：“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刻无条件释放，请其来庐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训迪指导。此事关系收拾人心至大也。”他指出：“党部工作同志对公此举定能体会。盖党部同志有党部同志责任，中央亦有中央责任也。敬祈我公毅然决然，采取释放办法，党国同利赖之。”他在信的“附及”中还说：“此事如果办到，定能收西安一样之意外效果，全在努力如何耳。”[163]

蓬勃开展的营救运动，特别是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是迫使国民党不敢对“七君子”判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七君子”保释出狱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七七”抗战爆发，全国性抗战开始。8日，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秦德纯等人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经过报告后，当天日记中记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164] 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

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的约束。”他还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65] 蒋介石这篇重要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他在这一天日记中还写道：“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主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166] 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167]，因此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的热烈赞扬与欢迎。

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在苏州狱中获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于14日向宋哲元及廿九军全体将士发出一电，并捐赠100元表示勖勉。电文说：“敌在卢沟桥等处连续挑衅，后复围攻平市，并调集大军，企图席卷华北，幸赖贵军英勇抗战，未逞奸谋。同人等身羁囹圄，应援乏术，翘首北望，只有忧惶，谨先汇上百元，聊表寸意。尚望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坚守疆土，抢救危亡。”[168]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发表的谈话公布后，沈钧儒等七人于7月21日致电蒋，说，谈话“义正辞严，不胜感奋，深信在此伟大

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趋赴空前之国难”。同时指出：“钧儒等身羁囹圄，心怀国族，寇氛日亟，倍切忧惶，赴难无方，赤诚共抱，企望旌麾，无任神驰。”(169)

由于“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有了很大变化，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沈钧儒等在前年华北事变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率先奋起倡导抗日救国运动，振聋发聩，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已是路人皆知。此时去苏州探监慰问并请他们题字的人日益增多，一些国民党政要邵力子、李烈钧、覃振、潘公展等都要求将他们释放出狱。7月底，蒋介石电令江苏高等法院将沈等开释。30日，高院即拟具裁定书，以“沈钧儒等各被告危害民国一案，羁押时逾半载，精神痛苦，家属失其赡养”为词，裁定停止羁押，交保释放(170)。

31日下午5时20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光荣出狱。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共三十余人前往看守所迎接。当沈钧儒等走出看守所大门时，鹄立在烈日下等候的民众二百余人表示热烈欢迎，并高呼抗日救国口号，一时军乐齐鸣，爆竹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情况极为热烈。沈钧儒代表大家对各报记者说：“钧儒等自经法院羁押，迄已半载余，虽身在囹圄，身体仍颇感舒服。此次司法当局裁定，准予停止羁押。关于案件上之将来结果如何，自当听候法院处理，至钧儒等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遍全国，心中万分愉快，当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171) 沈等及其家属，随即由各方代表及学生数十人，手持旗帜，列队为前导，护送玉花园饭店，并出席张一麐、李根源等举行的欢迎宴会。苏州各界原定在第二天举行庆祝大会，被沈等婉言谢绝。

8月1日，沈钧儒等七人回到上海，沈代表大家向欢迎的群众与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之出狱，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对他很

感激。我们一接到蒋先生电报，即赴京谒见。”[172] 王造时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言对日抗战，并于七月底电令苏州高等法院将我们释放，要我们去南京开会。”[173] 七人在上海发表共同谈话称：“关于时局问题，我等过去主张有二个：一为团结，即全国民族联合战线，二为抗日。目下全国团结已有坚强基础，抗日亦已为全国一致之要求，深信在中央领导之下，必可展开极伟大之民族解放战争，而且必可取得最后之胜利。我等惟有准备一切，在民族战争中尽一份人民之天职。”[174]

随后不久，孙晓村、曹孟君也获释出狱。

沈钧儒等出狱，江苏高等法院当时裁定书写明，只是所谓“停止羁押”，属于交保释放，对于救国是否有罪，他们是否危害民国，案情并未了结。国民党当局这样做，一方面是给自己下台遮遮面子，另一方面是故意留下一条辫子，以便有朝一日认为他们“谋反”时可以随时予以治罪。直到1939年1月26日，上海、南京、苏州早已沦陷，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武汉迁到重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关危害民国的某些条文也已作了修改，其中原来所规定的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为犯罪的条款已经删去，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才将对沈钧儒等的起诉书予以撤回。撤回起诉理由书说：“查被告等虽属组织团体号召民众，但其所谓抗敌御侮及联合各界救国各节，均与现在国策不相违背，不能认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该被告等之行为自属不罚之列。本案虽经起诉在先，惟既发现应不起诉情形，合依同法第一条撤回起诉。”[175] 陶行知等也并案撤销通缉。至此，国民政府才对“七君子”案作了司法上的了结，救国无罪最终由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第四节　联共联苏付诸实施

一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积极进行

蒋介石在西安是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条件后才被释放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国内时局转换的枢纽，持续了十年的“剿共”内战终于停止，国共两党由敌对状态开始了合作抗日的谈判。

（一）西安谈判

蒋介石在西安会晤周恩来时，曾邀周在他回京后去南京，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蒋回京后，通过在京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再次邀周去南京。中共中央认为蒋不讲信义，扣押了送他回京的张学良，担心周去京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决定“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委潘汉年全权在京沪与国民党当局接洽[176]。在顾祝同进入西安前一天，蒋在电报中指示他：入城后“对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墨兄（顾祝同字墨三——引者）本人不必多与之见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切勿公布。”[177]此时的蒋介石迫于形势既想联共，又不敢公开，主要是屈从于日本压力。西安事变前后，日本多次表示：蒋如联共抗日，日本坚决反对。

如前所述，国民党中央为讨论和确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些条件成了两党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基础。

周恩来既不去南京，蒋介石便把在京沪与潘汉年接触的张冲派去西安，协助顾祝同与周谈判。顾祝同进入西安的第四天（2月11日），顾和张冲与在西安的周恩来举行首次会谈，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要求。张冲要求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红军改变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南京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的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国民党释放被捕的共产党

员，并保证不再逮捕，不再破坏中共党组织。周还保证中共不再组织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纲领；苏区改为特区，实行民主制度，受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但军官不变，政治领导不变；苏区和红军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目前不参加政府。首次会谈结束后，张冲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2月12日下午，顾祝同与周恩来会谈。周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给顾看，双方以此为原则，进行商谈，结果如下：

（一）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土地，故应坚决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允许分期释放在狱共党，不再逮捕和破坏，并容许共党在适当时期公开。

（二）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直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特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

（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与蒋之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人员编制饷额补充同国军待遇，其领导人员由中央及军委会任命，其政训工作人员自做[178]，以中央党派少数人员任联络，其他各边区赤色部队改为地方团队。

（四）共党得派代表参加民国会议讨论，军队得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179]。

蒋介石把中共1935年后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红军经过长征实力削弱后的“乞降”，因而他同中共谈判是企图逼中共交出军队，由他收编，起码也要进一步削弱并控制红军。西安谈判开始前，蒋于2月8日致电顾祝同，提出与中共谈判的原则：“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之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解决。”[180] 他见到顾祝同2月12日与周恩来会谈的报告后，16日密电顾祝同，进一步提出削弱

和控制红军的具体意见：红军“中央准编其四团制之师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关于干部，“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至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181]。对蒋的上述企图，中共坚决反对。在五个多月的谈判中，双方围绕红军改编后保留人数，三个师之上设不设指挥机构，南京派不派副职和政训人员等焦点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后，张冲立即赶回西安。从2月27日到3月4日，他同周恩来多次会谈，围绕上述几个焦点问题讨价还价，至3月4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主要内容是：

（一）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容四万余人，四师（之上）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

（二）将现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容两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

（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率四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

（四）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经费另定。

（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182]。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委托周恩来将双方一个月来谈判的成果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周总结整理成三项十五条，其中关于政治方面主要条文是：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

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行政经费请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关于红军改编方面的主要条文是：

（一）改编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步兵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

（二）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

（三）红军现有之骑兵三个团及一个骑兵连，共约一千四五百人马，拟编骑兵一个团。

（四）改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国防师编制表于9日下午可到手[183]。

但是顾祝同、贺衷寒等对周恩来的总结作了重要修改，将“承认”改为“服从”，“要求”改为“请求”；“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将红军定员裁减为一师一万人，共三万人；将“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3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张冲时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3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认为：顾、贺在谈判中玩弄把戏，企图让中共服从蒋的一切命令，把陕甘宁划成三个苏区，缩小红军武装。他们的修

改案实际上对红军是“收编”，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接受了便是投降，便是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便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尾巴。会后，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顾、贺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是使中共放弃独立性，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这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3月14日，周恩来向张冲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意见：“顾、贺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184]。第二天，张冲虽向周恩来宣布顾、贺方案作废，仍以3月8日方案为谈判基础，但仍坚持改编后红军的各级副佐和政训人员要由南京派遣。对此，周恩来断然拒绝。

（二）杭州谈判

周恩来与顾祝同的谈判陷入僵局。3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两星期后，周去宁与蒋谈。”周恩来于3月下旬由西安飞到上海，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谈判条件面交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这份书面材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共产党方面承认的条件，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第二部分是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的，主要有：“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行民权，释放政治犯”，“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各武装部队均能派代表参加”；“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共产党亦能参加”；“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185]。当时蒋在杭州，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离沪去杭见蒋。蒋事前已见到中共的谈判条件，周当面向他着重说明中共是为了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目的而提出上述条件来与国民党真诚谈判的。针对与顾祝同谈判中争执的问题，周向蒋特别强调以下六点：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

（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

（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

（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

（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

（六）红军防地须增加[186]。

蒋听完周的意见后发表讲话，其大意有以下五点：

（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希望中共“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于鲍罗廷。他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与他合作”。他希望中共“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中共“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周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好方法。蒋要周速回陕向中共中央报告与蒋关系及共同纲领问题。

（五）“关于具体问题”，蒋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开，中共可以参加；陕甘宁“行政区要整个的”，须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

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愿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187]。

杭州会谈后，周恩来3月30日到上海，4月初经西安回到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汇报后认为，同蒋谈判结果尚好，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此纲领基础上成立民族革命联盟，吸收国共两党及赞成此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参加，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周恩来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4月9日致电蒋介石说：“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并表示会后将再次南下晤蒋[188]。5月下旬，国民党方面派以涂思宗为团长的中央考察团前往陕北苏区，对共产党、红军、地方政权以及群众运动进行考察，看共产党对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有无诚意，以及红军部队有无改编准备。考察完陕北后，又前往陇东苏区考察。

（三）庐山谈判

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于4月26日从延安飞到西安，继续同顾祝同、张冲谈判。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晤蒋，从8日到15日同蒋多次谈判。周将中共中央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交给蒋。这个纲领有五十二条，主要内容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本来是蒋介石在杭州让中共研究与他永久合作的纲领与办法，如今他把周恩来交给他的纲领抛在一边，又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其办法是：“（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对外一切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议讨论

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189] 显然，蒋是企图利用“国民革命同盟会”这个组织，把共产党溶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言论和行动听他指挥，因为他在这个组织里有最后决定权。

蒋虽表示红军仍可改编为三个师，四五万人，但推翻了在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的承诺，改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来做事”[190]，离开红军部队。蒋还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南京派正的长官（可由中共推荐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各地红军游击队，“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员可参加，“但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191]。

周恩来向蒋表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待请示中共中央后再作答复；关于红军的“指挥与人事问题”，他表示“都不能同意”。围绕这些问题，周“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面对这种僵局，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192]

周恩来于6月18日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与蒋谈判情况。在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为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对蒋做出重大让步，在6月25日写成的与国民党谈判新方案中确定：“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力图使同盟会“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新方案确定：中共准备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

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陕甘宁边区准备7月实行民主选举，向蒋推荐南京方面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中的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托故不去”；不放弃“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联合各民众政治团体”；周恩来再去见蒋时“加上博古、林伯渠、董必武”[193]。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继续谈判。7月4日，周与博古、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到达西安，7日飞抵上海。就在这天夜里，日本侵略者在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事变。中共中央7月14日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7月中旬周恩来等再上庐山，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7月14日，蒋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第二天，周给蒋写信，指出他的上述意见与上次在庐山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周建议蒋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迅速发动全国抗战。18日，周恩来通过宋美龄将要解决的十二个具体问题交给蒋，但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管理，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并具体提出由周恩来任政治主任，毛泽东任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蒋的上述意见，中共决不接受。

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之方针”，离开庐山，飞赴上海，7月28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红军

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设三个师，共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另编地方保安队一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

（四）南京谈判

8月1日，张冲奉命电告延安：蒋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来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6日，周恩来、朱德到达西安，会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于8月9日飞抵南京，出席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防会议。

8月12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张冲、邵力子、康泽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由康泽出面对中共中央不久前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朱德当即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的意见报告蒋介石。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国共两党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局面迅速改观，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获得解决。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于22日公开发表。9月22日中央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

二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中苏两国代表会谈开始不久，苏联就提议与南京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则希望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接受苏联援助。由于前面所述原因，苏联的提议被搁置，蒋介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到1937年初，情况发生变化，苏联援华和两国签约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7年3月，回国述职达四个月之久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返任，立即会见孔祥熙、陈立夫，转达苏联政府请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和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建议。4月3日，蒋介石带病在上海会见鲍格莫洛夫，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和给予武器援助的建议。蒋请鲍格莫洛夫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具体外交问题，待他身体复原后，他再与鲍格莫洛夫会晤讨论苏中关系[194]。

4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在南京会谈。鲍格莫洛夫代表苏联政府向南京提出三项建议：一、“中国政府率先提议太平洋国家参加太平洋区域性公约的谈判”（主要的国家是中、英、苏、日、美及法国）。假如中国政府肯这么做，苏联“定将对这个建议做出肯定的答复”，“定将全力促成中国政府办理此事”。二、“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那我们准备以后重新考虑缔结苏中双边互助条约可能性的问题”。三、“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王宠惠表示，他“会在政府中讨论这些建议，也会同蒋介石讨论”[195]。正当中苏两国代表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时，日军在北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促进了中苏两国代表的谈判。

7月13日，孙科会见鲍格莫洛夫，将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照会交给苏联大使，两人还就华北事态及中苏关系交换了意见。孙科认为，华北的“冲突可能发展成为中日间的公开战争”。他着重表示：“中国政府决定不再退让领土，并已向河北以及保定派兵。”他问鲍格莫洛夫：中日战争对苏联与伪满洲国边界地区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其用意是试探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能否用武力援助中国。不久，孙科代表中国政府向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请苏联政府在东北边界调动军事以‘把日本注意力从中国吸引过去’的要求。”[196] 7月16日，孙科又一次会见鲍格莫洛夫，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不能承担太平洋公约发起”者的理由。

7月19日，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会谈。关于两国签约问题，鲍格

莫洛夫仍主张“太平洋公约是当务之急，同时还有互不侵犯条约，然后才能谈到双方互助条约”。陈立夫则主张“从第三条——互助条约开始谈判”。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关于南京向苏联借款订购军火问题，陈立夫说，这是他此次会见鲍格莫洛夫的主要目的。还说，苏联的建议原则上是适当的，中国政府可以接受，只是蒋介石希望将款额增加到一亿五千万至二亿中国元；军火交货期限缩短，哪怕一年；还债（以货相抵）期从五年后算起，十年还清。陈立夫还详细说明了拟从苏联订购的军火名称，如飞机、坦克以及不同口径的大炮、高射炮、反坦克炮等。

7月26日，张冲奉蒋介石命会见鲍格莫洛夫，着重向苏方提出应把军火订货与政治问题分开，因为“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要耗费很多时间”。他转达蒋介石的话说：“因为现在中日间的战争势不可免，所以中国政府不可能再指望从德国得到订货，因德国乃日本的盟国。中国本国的储备只够六七个月用，苏联是唯一可能供给中国的来源。”[(197)] 就在这一天，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华北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派兵逼近南苑、北苑，平津危在旦夕。鲍格莫洛夫鉴于华北事态严峻，请求莫斯科不要把南京的军火订货与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搅在一起，建议从纯商务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7月31日，苏联政府批准了给南京的军事货款和军火订货项目。李维诺夫电告鲍格莫洛夫：“武器的订货拟增至一亿中国元，一年内交货”，“可给200架飞机带装备和200辆坦克”，并准备接收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手前去培训。苏联的方针是，支持中国武装抗日，自己则力避与日本直接冲突。因此，李维诺夫在给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时机更加不宜签署互助条约，因为这样的条约意味着我们立即对日宣战”；但苏联坚持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务必以先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为先决条件”[(198)]。

8月2日，蒋介石会晤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向蒋通报了莫斯科关于军事贷款的答复，解释了苏联不能与中国签署互助条约的理由。

蒋介石则要求苏联增加军事援助，提出“飞机的数量不是200架，而是500架”。在谈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蒋介石不同意把军火订货与签署这个条约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如果这个条约不损害中国的主权，可以立即签署。鲍格莫洛夫解释说：“互不侵犯条约的实质在于双方承担互不进攻的义务，十分清楚，不进攻另一方这个义务绝不可能被说成为什么事而付出的报酬”。他接着说：“中国政府应该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如果连不以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作为起码的让中国不用我们的武器来打我们的保证都没有，那我们是不能向中国提供我国武器的。”蒋介石表示：“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199)

8月上旬，双方交换了条约草案，并继续进行谈判。8月21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共四条，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和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对该第三国不得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与援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

---

(1) 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25日。

(2) 《我们要求实现抗敌战争》，《永生》周刊第1卷第16期，1936年6月20日。

(3)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715页。

(4)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40、655、682页。

(5)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4月18日。

(6) 思达：《论目前阶级关系变动的一些特点》，《火线》第62期，1936年9月30日。

(7) 思达：《论目前阶级关系变动的一些特点》，《火线》第62期，1936年9月30日。

(8) 《剿匪时代的张学良》，北平前进社出版，第127—128页。

(9)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45页。

(10)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11)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3页。

(12) 《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1页。

(13)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1936年12月29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74页。

(14)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5日。

(15)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189页。

(1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35页；《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52页。

(17)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37页。

(18) 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6月13日。

(19) 《国难新闻》第1期，1937年1月10日。

(20)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23、25日。

(21) 《学生导报》第3期，1937年2月5日。

(22)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23日。

(23) 《所望于国民党三中全会者》，《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5日。

(24) 《大公报》1937年2月15日。

(25) 《申报》1937年2月18日。

(26) 《大公报》1937年1月19日。

(27)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37年2月编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3页。

(28)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4月15日。

(29)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4月15日。

(30) 《杨虎城于学忠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6—217页。

(3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97—98页。

(32)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第786—788页。

(3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97页。

(3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99页。

(35)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43页。

(36)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54页。

(37) 《对陕变之决议》，《中央日报》1937年2月20日。

(38)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2日。

(39)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2日。

(40) 《小言》，《申报》周刊第2卷第8期，1937年3月8日。

(41) 《评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共产党的决议》，《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3月15日。

(42) 《周恩来年谱》，第354页。

(43)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354页。

(44) 《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13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4页。

(45)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46)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72页。

(47)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48)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49)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摘要》（1937年4月7日），转引自《周恩来传》，第358页。

(5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5页。

(51) 《小言》，《申报》周刊第2卷第8期，1937年3月8日。

(52) 莫斯科：《新闻报》评论：《国民党三中全会》，1937年2月20日。

(53) 转引自《救国时报·要讯》（巴黎），1937年3月5日。

(54) 沙千里：《七人之狱》第74—75页；《韬奋文集》第3集，第110页。

(55)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第50页；参见《七人之狱》，第94页。

(56)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集》第82辑，第40页。

(57) 胡子婴：《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救国会》，第463—464页。

(58) 《蒋离陕前表示救亡具体意见》，《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7日；参阅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3页。

(59) 《起诉书》，上海《大公报》、《时事新报》1937年4月7日。按：国民政府1931年1月31日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见《国民政府公报》第688号，1931年2月3日。

(60) 《答辩状》，《大公报》1937年6月7日。这些律师中，有的当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相当于后来的最高法院）审判长，以及现任的大学法学院院长、大学教授、上海和苏州律师公会会长等，在社会上都很有声望。请这样多的律师，而且都是知名人士辩护，这在司法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61) 《“爱国罪犯”沈钧儒明日开审》，《广西日报》，1937年6月10日。

(62) 1937年5月4日李公朴日记原件。

(63) 《“爱国罪犯”沈钧儒明日开审》，《广西日报》，1937年6月10

日。

(64) 《救国会》，第240—241页。

(65) 以上见《救国会》，第249、270页。

(66) 《沈钧儒等被诉危害民国嫌疑案（一）》，《益世报》（天津），1937年6月10日。

(67) 以上见《救国会》，第271—283页。

(68) 《救国会》，第309页。

(69) 《救国会》，第470页。

(70) 《沈钧儒先生等访问记》，《救国无罪》，第176页。

(71) 《救国会》，第472页。

(72) 李公朴日记1937年6月13日，未刊。

(73) 《救国会》，第309—310页。

(74) 李公朴日记。

(75) 《救国会》，第311页。

(76) 《申报》1937年6月23日。

(77) 《救国会》，第312页。

(78) 《救国会》，第311页。

(79) 1937年6月28日李公朴日记。

(80) 1937年6月28日李公朴日记。

(81) 《沈钧儒文集》，第326页。

(82) 《立报》，1937年6月13日。

(83) 《立报》，1937年6月15日。

(84) 《时事新报》，1937年6月25日。

(85) 《新闻报》1937年6月26日；《时报》1937年6月26日。

(86) 《沈钧儒等案高院更新审理》，《时报》1937年6月26日；《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87) 《沈钧儒等案高院更新审理》，《时报》1937年6月26日；《时事

新报》1937年6月27日。

(88) 《时报》1937年6月26日；《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89) 《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90) 《大公报》1937年6月26日。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1年1月31日公布）第一条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其第三款为“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第四款为“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见《国民政府公报》第688号，1931年2月3日。

(91) 《沈钧儒等二次庭讯供词（三）》，《时事新报》1937年6月28日。

(92)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3) 《沈钧儒等被诉案苏高院昨竟日审讯》，《时事新报》1937年6月26日；《时报》1937年6月26日；《立报》1937年6月26日。

(94)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5)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6) 心炎：《“爱国无罪”案二次听审记》，《国民》（周刊）第1卷第9期，1937年7月2日。

(97)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8) 《大公报》，1937年6月26日。

(99) 李文杰：《回忆上海律师界为“七君子”案进行辩护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90页。

(100)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101) 《大公报》（上海），1937年7月8日。

(102) 1937年7月24日李公朴日记，参见前引文。

(103)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沈钧儒等七先生案的一个报告》，《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5月25日。

(104) 《毛泽东年谱》，第668页。电文内“陈、张”指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

(105) 《周恩来年谱》，第361页。

(106) 《解放》周刊创刊号，1937年4月24日。

(107) 《周恩来年谱》，第362页。

(108)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109) 《周恩来年谱》，第364页。

(110) 《周恩来年谱》，第370页。

(111) 《评沈钧儒等被控事件》，《火线》第75期，1937年4月30日。

(112) 《大公报》（上海），1937年4月9日。

(113) 《北平晨报》1937年4月22日。

(114)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115) 《大公报》（天津），1937年5月27日。

(116)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17)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18) 《群众新闻》（上海），1937年6月11日。

(119) 《救国会》，第330页。

(120)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21)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22)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23)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5日。

(124) 《大公报》，1937年4月6日。

(125) 《立报》，1937年4月13日。

(126) 《应具辟谣的常识》，《立报》，1937年6月10日。

(127) 《从沈钧儒等案说到统一救国》，《申报》，1937年4月8日。

(128) 《沈钧儒等七人案开审》，《申报》，1937年6月11日。

(129) 《当局应注意沈案的政治影响》，《天下日报》，1937年6月11日。

(130) 《救国究否有罪》，《天下日报》，1937年6月27日。

(131) 《吁请宣告沈钧儒等无罪》，《天下日报》，1937年6月24日。

(132) 《从执政者的政治认识说到沈章等案》，《群众新闻》（上海），1937年6月11日。

(133) 《再一次号召国人——要求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4月10日。

(134) 《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5月22日。

(135) 《究竟是谁在“危害民国”？》，《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5日。

(136) 《论沈案与精神团结》，《北平晨报》，1937年5月6日。

(137) 《对沈等二次答辩状感言》，《益世报》，1937年6月25日。

(138) 杜若：《沈钧儒等的开审》，《广西日报》，1937年6月12日。

(139) 《宋庆龄女士等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救国无罪》第133页。

(140) 诸青来是国家社会党的首领之一，后来为汪精卫伪政府中的一员。

(141) 《妇女生活》第4卷第12期，1937年7月1日。

(142)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8月5日。

(143) 《妇女生活》第4卷第12期，1937年7月1日。

(144) 《救国无罪》，第130—135页。

(145) 《何香凝为营救“七君子”致宋子文孙科函》，《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

(146)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219—220页。

(147)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第74页。

(148) 1937年7月2日李公朴日记，未刊。

(149)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胡子婴：《赴苏投案始末记》，《妇女生活》第5卷第1期，1937年7月16日。

(150)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1)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2) 张天翼：《苏州投案记（一）》《国民》（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3日。

(153) 张天翼：《苏州投案记（一）》《国民》（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3日。

(154)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5)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6) 《孙夫人等赴苏请求入狱纪详》，《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351页。

(157)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8) 胡子婴：《赴苏投案始末记》，《妇女生活》第5卷第1期，1937年7月16日。

(159)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352页；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胡子婴：《赴苏投案始末记》。

(160) 《沈钧儒文集》，第324页。

(161)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162) 1937年7月8日冯玉祥日记，《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204页。

(163) 《宋庆龄冯玉祥等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另见《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204—205页。

(164)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22页。

(165) 《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

(166)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23页。

(167)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317页。

(168) 《沈钧儒文集》，第325页。

(169) 《沈钧儒文集》，第328页。

(170) 《沈钧儒保释出狱》，《申报》，1937年8月1日。

(171) 《沈钧儒文集》，第329页。

(172) 《沈钧儒等昨由苏抵沪》，《立报》，1937年8月2日；《救国无罪》，第185、190页。

(173) 《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1984年1月。

(174) 《沈钧儒等昨由苏抵沪》，《立报》，1939年8月2日。

(175) 《“七君子”案件档案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176) 《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5日），未刊件。

(177)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2页。

(178) “做”字原资料如此，可能是“任”字之误。

(179) 《周恩来关于与顾祝同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2月12日），未刊件。

(180) 引自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147页。

(181) 引自《西安事变纪实》，第213页。

(182) 《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3月4日），未刊件。

(183) 《周恩来关于一个月来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2月8日）。

(184) 《中央关于申明国共谈判须重新调整的理由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3日），未刊件。

(18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79页。

(1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18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180—181页。

(188) 《周恩来年谱》，第361页。

(189)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5页。

(190)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6页。

(191)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6页。

(192)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5页。

(193)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9—230页。

(194)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167—168页。

(195)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167—168页。

(196)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36页。

(197)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05页。

(198)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30页。

(199)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37—439页。

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第一节　国民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建立

一　财政收支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财政收支体制是国民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定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权限和范围的一项根本制度。

中华民国创立以后，资本主义现代化财政金融制度已开始建立。但因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接着是军阀混战，分裂割据，各自为政，列强又从中干扰，故统一全国财政，建立现代财政管理制度遂告幻灭。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是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实际上是钱新之代），后由孙科继任。蒋宋联姻后，蒋介石于1928年1月由上海回南京主持“政府大计”，又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同年1月7日就职。1931年12月下旬，蒋介石第一次宣布下野，宋为与蒋共进退，也辞去财长职务。在这期间是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任命黄汉梁为财政部长，时间不满一个月。1932年1月蒋介石复职，宋也随之复任。1933年10月29日宋辞去财长职务，蒋又任命孔祥熙为财长，1933年11月1日就职，直到1944年11月20日辞职。整个30年代，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掌握在蒋介石的姻亲宋、孔二人的手中。宋、孔在任财长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为支持蒋介石继续“北伐”和维护国民政府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现代

财政金融制度的建立作出了一定贡献。

宋子文出任财长之后，正值蒋介石联合冯、阎、桂各派，准备继续北伐打倒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之时，国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宋子文在筹款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使他深深认识到，全国财政不统一，现代财政管理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财政困难和经济不发展的一大原因。当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天津，奉系张作霖势力退至关外，中国表面达到统一之后，宋便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将各项国税一律收归部办，以谋财政统一”的方案。他指出：“谨查我国民政府自珠江流域进展至长江、黄河流域，对于军事、外交、财政、交通，首在维持统一；而财政为国家之命脉，尤贵彻底统一，方能顺利进行。近时关于本部税收方面，常有他项机关代为主管支配，政出多门，遂生扞格，预决算亦因之破坏，于财政前途影响匪细。……拟请将各项国税范围无论直接间接，凡现为他项机关所管辖者，一律收归本部办理。”[(1)] 该方案在国民党中央获得通过，从而使宋实施财政统一措施得以全权处理。当时，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只有江浙皖赣四省，其他各省的财政收入多为地方军阀把持和截留。为了加强中央财力和统一全国财政，首先必须抓住划分国地收支系统，统一财务行政，逐步建立与政府行政组织相一致的中央财政、省（市）财政与县财政的三级财政体制。但是，财政状况的改善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为此，宋子文决定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之前，先行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企图通过两会来确立财政体制和制定各项财政经济政策。

全国经济会议于1928年6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约有七十人，是中国银行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及财政经济问题的专家与学者，约有四十五人是中央和各省市政府的代表。这次会议名义上虽是全国性的，实际上却是被江浙资本集团所控制的，工商界代表中有70％是江苏和浙江籍的，江浙资本集团的所有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其中包括虞洽卿、王晓籁、荣宗敬、李铭、张公权、宋汉章、陈光甫、秦祖泽和徐新六等人[(2)]。

会议开幕时，宋子文首先发言，他对过去采取强制手段筹措财政款项的做法表示歉意，承认“战争时期我们曾被迫使用极端手段来筹集经费”。接着，他号召出席会议的工商界领袖人物与政府合作，宣称：“如果不让人民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得到人民信任”，“财政部决不能坐等人民参与政府制定高超计划的实现。为此，我们召集可信赖的非政界人士、纳税人的代表在一块来批评我们，帮助我们和指导我们”，并且说这次全国经济会议的成就，“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步”[(3)]。这次全国经济会议是由财政部出面主持召开的，虽然这次会议打的是“经济会议”的招牌，但其主要目的则是要研究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措施与计划。因此，宋子文向会议提出了财政部的方案。宋的方案包括：限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取消银两制，建立中央造币厂和裁撤厘金等。会议对宋的方案原则上是赞成的，工商界人士对限制军费开支和裁撤厘金尤为赞成，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工商界人士吃尽了硬性摊派和各种形式勒索的苦头，繁重的厘金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宋提出的限制军费开支与裁减军队的计划是：将军费开支限制在每年1.92亿元以内，军队人数由现有的近200万人减少至50万人[(4)]。

虞洽卿代表江浙资本集团在会上发言，向南京政府提出保护关税、整顿交通、保护商人财产、整理劳资纠纷、保护及提倡国货等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六项建议。根据虞的建议，会议就有关问题，如保护商人财产和处理劳资纠纷等作出了一些决议。关于保护商人财产的议案规定：“所有私人财产，如船舶、面粉厂、工厂、矿山等等，现在仍被政府当局所占据者，应一律立即归还，所有非法没收的财产也同样立即归还原主。”这项决议反映了江浙资本集团对南京政府侵犯他们的利益十分不满。关于处理劳资纠纷的议案规定：“政府必须制定对工会组织管制的劳工法，以防止滋事之徒利用工会组织挑起事端；工会的经费必须公开，并将置于其监督之下。”[(5)] 这也表明，南京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

镇压工人反抗，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全国经济会议，只是财政部与金融工商各界磋商讨论全国财政经济计划的一次会议，它所形成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会议结束时，宋子文要求各界人士（尤其是江浙资产阶级）要努力去把这次会议的决议变成行动。他说："财政部一定会支持你们的，但是你们自己必须越出财政部走得更远一些，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只有与会的这些商界成员的坚强意志才能创造广泛的公众舆论来对这些机构施加影响"[(6)]，从而促使其核准并实施这些决议。

宋子文提出的财政部的理财计划，通过全国经济会议，取得了以江浙资本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宋氏紧接着又于7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全国各省市的财政厅长及负责执行财政计划职责的国家与地方官员。

宋子文召开全国经济会议，打出一个"经济会议"的牌子，以便于他加强与工商界的联系。而这次全国财政会议则不同，参加者都是主管财政方面的官员，他直接提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案。这个方案归结起来为两点：一为限制军费开支，二为编制全国预算。由于财政会议的参加者均曾被那毫无节制的军费开支逼得到处奔波，因而都赞成宋氏的这个方案。编制全国预算要有前提条件，这就是全国财政要统一，岁出要控制，混乱的税收制度要改革，中央与地方收入应予合理划分，币制应统一，中央要有发行通货权的全国银行。否则全国财政预算既无法编成，也无法实施。所以，全国财政会议对控制岁出、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源、改革币制、成立中央银行等都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全国经济会议与财政会议都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它们所通过的议案都要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交由政府有关部门执行。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

全会，宋子文向全会提出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树立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并将全国经济、财政两个会议所讨论通过的计划作了说明。五中全会对这个提案所形成的决议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关于财政之建议案，大会认为其原则甚为妥当，交国民政府查照，详细规划，妥慎施行。……本大会认为有迅速设立预算委员会之必要，应交国民政府即行组织之。"(7)

宋子文认为，统一财政的基础就是首先要"划分国家地方两税"，由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提出经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通过，并于同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的《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具体规定了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收支体制的详细内容：

国家财政收入包括：海关税、盐税、内地税、厘金（1931年裁撤，裁撤前实际上为地方截留）、烟酒税、印花税、邮包税、所得税、遗产税、矿税等税收。国家财产、国有事业、国家行政等收入和国有事业利润，债务收入等。

国家财政支出包括：党务费、行政费（包括内政费、外交费、财政费、教育文化费、司法费、实业费、交通费、蒙藏费、建设费、国家银行资本、国家其他企业资本、补助费、赔偿与奖励、赈灾、杂项）、军务费、债务费等。

地方财政收入包括：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内地渔业税、船捐、房捐等税收，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工营企事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其他属于地方性质之现有收入，以及拟将开征的营业税、市地税、所得税附加、使用人税、使用物税，后又包括中央补助费。

地方财政支出包括：地方党务费、地方立法费、地方行政费、公安费、地方司法费、地方教育费、地方财务费、地方农矿工商费、公

有事业费、地方工程费、地方卫生费、地方救恤费、地方债款偿还费等。其中地方司法费待将来承审制度取消后改归国家经费内开支。另外，以上各款原无军费开支，但实际上少数省份尚有一项军费负担，或直接拨充当地军队粮饷，或分任协款以济军费。这种现象说明，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仍然存在。

此外，还对隶属于行政院的特别市的收支范围作如下规定：收入包括土地税、土地增值税、房捐、船捐、营业税、牌照税、码头税、市公产收入、市营业收入及其他法令特许征收之捐税，后去土地增值税和码头税，共八种。市支出与省同。

此次划分，对县财政尚无明确规定[(8)]。

除上述规定外，宋子文还特别强调：在国、地两税划分后，关于国税之规章、用人、行政、收入四项，应由财政部主持办理，“以明统一财政之责任”[(9)]。如果财政部没有制定全国统一国税收入及其他规章的权力，没有为执行国税收入规章的用人和行政权力，没有对国税收入予以保管的权力，所谓统一财政，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宋在1932年1月重新出任财长后，便对原孙科、黄汉梁任内的各司、处、署长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情况为：关务署署长张福运、盐务署署长钱隽逵、赋税司司长贾士毅、公债司司长钟衍庆、国库司司长李觉、会计司司长朱忠道、烟酒税处处长程叔度、印花税处处长李调生、禁烟处处长邹敏初、煤油特税处处长林子峰；又设秘书处，由邹琳为秘书长，下设总务、文书、机要三科，将审核科归并入总务科；收发科归并文书科。另任命陈行为金融监理局局长。这样，财政部直辖各职能部门大都由宋子文在广东革命政府任财政部长时期的部属掌握[(10)]，这就为他推行财政统一政策创造了条件。

这次财政划分的突出特点就是加强中央财力和财权，有利于全国财政统一。这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都明显表现出来，划归国家收入的都是税源较大的税项，如关、盐、厘金（1931年后改为统税）等税。原

为地方据有的厘金和类似厘金的过境税上划为中央税收，既有利于税制统一，又有助于改变地方滥征的局面；同时又为后来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开办统税创造有利条件，致使关、盐、统三税成了国民政府三大税源。其次，地方财政来源也有一定保障。如田赋、契税、营业税及杂项收入等均划归地方收入。田赋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而这次破天荒划归地方收入，这既使地方财政来源有了一定的保障，又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起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由依靠田赋而改变为依靠关、盐、统三税，标志着中国已跨入先进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再次，从支出项目看，重要的支出项目集中于国家，特别是军费支出由中央控制，有利于控制各地军阀的权力。总之，这次财政划分，有力地加强了中央财权和财力，有利于全国财政的统一，实际上成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经济上也掌握了其他派系的饷糈来源，使他们不得不听命于中央。这对巩固南京政府的统治，使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都达到统一是有意义的。

地方财政主要是确定省财政收支范围，县级财政是附属于省的，无独立可言。至于省、县收入和支出如何划分和分配，都由各省自行决定。在实际执行中，大多数省份未给县级财政划定收支范围，少数省份即使划给县级一部分收入，也是微乎其微。县当时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但没有明确的财政来源，就使县级财政极不稳定。为了筹措县级行政经费和应付上级各项任务，县级财政往往越权征税，如开征各种附加税、杂捐，甚至乱摊派，结果使得县级财政特别混乱，苛捐杂税越增越多，人民负担日益加重。

孔祥熙出任财长后，着手整顿田赋，废除苛杂，并于1934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将土地税（田赋附加）、土地呈报后正附溢额田赋的全部、印花税三成、营业税三成、房捐（土地改良物税）、屠宰税及其他依法许可的税捐，作为县级财政收入，于是县级财政有了保障。1935年度各省市县财政预算相继成立，

我国的“财政收支乃有采行三级制趋势……惜以抗战军兴未及实行”。虽然县级财政的收支范围有渐趋明确的可能，但由于财政来源中有“依法许可的税捐”一项[11]，这就为县级财政滥征税捐大开方便之门，对堵塞县级财政滥征滥摊派的措施仍然不利。

二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南京政府建立以后，通过各项财政立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部是国民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该部成立于1927年5月，“直隶国民政府”。据1927年11月《国民政府修正财政部组织法》规定，财政部的基本任务为：“管理全国库藏、税收、公债、钱币、会计、政府专卖金银暨一切财政收支事项，并监督所辖各机关及公共团体之财政。”1928年10月，国民党因“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宣布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五权制度”，在国民政府之下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财政部改隶行政院，为“管理全国财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对于各地最高行政长官”执行该部“主管事务有指示监督之责”。财政部初设部长一人，次长一人；1928年增为次长二人，分为政务次长和常务次长。部长“综理本部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及各机关”；次长辅助部长处理部务。该部成立时，以古应芬为首任部长，其后继任部长的有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

财政部成立后，其组织随着职权的扩大而改组频繁。该部成立之初，分设秘书和总务、参事两厅，赋税、钱币、公债、会计、国库五司及关税、盐务、禁烟、土地四个处。孔祥熙继宋子文任财长后，财政部内部组织设置为：一厅、一处、三署、六司，即参事厅、秘书处、关务署、盐务署、税务署、总务司、赋税司、公债司、钱币司、国库司和会计司（1937年7月改组为会计处），除各司处外，关务、盐务、税务三署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用本署的名义发布命令。

此外，财政部为整理财税、改革币制的需要，还先后设立了设计委员会（以甘末尔Kemmerer，Edwin W．等美国专家组成）、固定税则委员会、会计委员会、税务整理研究委员会、币制研究委员会、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金融顾问委员会、发行管理准备委员会、财政整理会等附属机构暨中央造币厂、北平印刷局等事业单位。

关于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等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的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综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之编制，及对各县的财政监督等。县设财政科，综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之编制及各项税收等财政活动[(12)]。

到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全国财政行政管理体制“日臻完备”。惟有一些边远省区或少数地方军阀割据的地区，尚有其自主的一套财政行政组织，但不占主要地位。

三　财政审计制度的确立和财政法规的制定与推行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对财政收支权限和范围的确立与实施，对各项财政法规和法令的制定和推行都起到一定保证作用。

财政审计是财政监督的一项重要手段，是财政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负有监督预算的执行、稽察财务上的一切行为、审定总决算的职权。

审计职权是从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设立第三科开始的，隶属于监察系统。南京政府成立后，直属于审计院。1931年设立审计部后，又改隶属于监察院。监察院既行使弹劾权，又行使审计权，互相配合。

根据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审计法规定，审计方式包括事后审计和事前审计。由于这两种方式不足以制止不法行为，又创立了实地稽

察制度。后又由于审计队伍不健全，人员有限，难免顾此失彼，又有巡回和抽查审计等方式相配合。

国民政府的审计制度虽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打击异己的一种工具，对那些达官贵人、大资本家、地主豪强的重大违法行为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审计[13]。

财政法规是国家组织财政收支活动和调整财政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本身具有强制性。在财政管理工作中，制定和修正各项财政法规，是国家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政府成立的头十年中，制定和修正了一系列的财政法规。从范围上说，这些财政法规包括国家和国家授权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全国性的法规和各地区、各部门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制定的适合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单行法规；从内容上说，这些法规包括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和监督、税收、公债等方面。其主要的法规归纳概述如下：

一、财政体制方面的法规。为确定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权限及范围，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公布实施《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国民政府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权限和范围，为改变北京政府以来的财政混乱局面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鉴于以往县级财政无明确规定这一弊端，又颁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省县收支标准》和《县各级组织纲要》等法规，重新确认了县级财政的收支范围，为改变县级财政的混乱局面提供了法律依据[14]。

二、财政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法规。在财政预算的编制和管理方面，1931年颁行《办理预算收支分类标准》，明确列入预算的收支科目。1932年又公布预算法，包括预算编制的程序、时期及预算未成立时救济办法、预算公布后追加预算和预算外支出的追加等方面的内容。预算法对中央预算、省预算（包括直隶于行政院之特别市的预算）、县（包括隶属于省的市）预算的编制程序及时期，分别作出不

同的规定。编制机关为主计处岁计局，议决预算的权力在立法院[15]。

宋子文在整理财政方面特别注重预算制度的确立。当时，蒋介石连年进行围剿苏区和排除异己的内战，军费不断增加，致使政府的财政预算无法平衡。所以，宋子文积极主张“裁兵减费”，反对无限地追加预算。要确定预算，就需要设立专门的预算委员会。按宋子文的解释，预算委员会的职能有四：其一，统一收入。只有先定收入才能后定支出。财政部根据国地两税划分标准，将全国所有收入列表造册，呈请核准。“俟核定后，财政部即本此标准，整顿收入，统由国库经理，是谓收入统一”。其二，统一支出。财政部根据收入情况按军政各项开支造册，上报预算委员会批准；“俟核定后，财政部即照预算所定支拨，是谓支出统一”。其三，统一政令。“倘国地收支，中央与地方意见参差，或有互相协助之必要时，可由预算委员会秉公解决，是谓政令统一”。其四，统一分配。“如遇收入不足时，由预算委员会先就预备金下填补，再有不足，照预算所列之数，按成均派，以免偏畸，是谓分配统一”[16]。预算委员会所确定的预算，“收入上之有无侵蚀，支出上之有无浮滥，应由审计院严密考核”。同时，宋子文还主张“将收支各款，由各机关如限造报，财政部逐日公布”[17]。宋子文的主张，既反映了当时国内金融界、实业界希望消除战乱，节缩开支，发展经济的愿望，又反映了广大饥寒交迫劳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更是符合现代财政管理制度。但是，穷兵黩武的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宋的主张，反而因此事与宋发生了激烈矛盾，迫使宋辞去财长职务。财政预算制度因此未建立起来。

在加强财政监督方面，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审计法，规定了审计职权和审计方式。1928年颁布了国民政府监督地方财政暂行法，计有六条，但各省多未执行。1931年中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对地方财政权限又有所规定，但由于地方情形复杂，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仍未能实现。

三、税收法规。税收法规，或称税则，是各种税的征收和管理的依据。国家每开征一项税种，就要制定一个税则或实施细则，因而国民政府的财政法规中，税项法规占的比重很大。各项税则都离不开这几个方面的要素：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起征点、免征额、纳税期限、缴纳方式、减免、罚则、附加、加成等。在这一时期里，国民政府的各项税收法规是不断变化的。如关税税则，1928年12月第一次公布海关进口税则，确定七级进口税率。1930年底又制定新进口税则，使最高税率由22.5％提高到50％，1933年5月22日公布的国定进口税则，将最高税率提高到80％，这一税则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1934年6月30日公布海关进口新税则，减低印花染纱织品、金属器具、机器工具等税率。至于盐税税则、统税税则及其他税则也不断变化，变化结果往往是税率的提高。这也反映了国民政府的税收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而很少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负担能力的。

四、公债条例。公债条例也是财政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民政府每发行一种债券，都要公布一项发行条例，作为发行债券的依据。其中规定发行金额、利息、担保、用途、还本付息期限、办法、折扣及其他规定。在本期内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共有三十五种，颁布的公债条例亦在三十五项以上。

五、地方财政法规。地方财政法规是国家授权各地制定的一系列财政法规，包括各省市赋税征收减免的章程、规则和实施细则以及地方公债条例。如“上海市征收地价税暂行章程”八条，“铁路用地免征赋税章程”七条，“江苏省建设公债条例”十四条，等等。到1934年底，上海、南京、青岛、汉口、江苏、福建、浙江、河南、山西、湖北、广东、辽宁等省市颁布的地方财政法规就有四十五项之多[(18)]。

上述可见，在国民政府建立的头十年里，颁布的财政法规不仅数量多，而且修正也比较频繁，国民政府在财政管理制度的建设上做了不少工作，现代化财政管理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

第二节　海关行政的改革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现

一　改革海关行政制度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之后，加紧改革海关行政制度和关税制订政策，为收回国家主权，发展经济和贸易，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懈努力。

宋子文十分了解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主权对中国的危害性。他指出："吾国关税，受协定之拘束，妨害税收，损失主权，至堪痛惜。"[19] 在关政方面，他曾谈到，"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之时，政府和公众对于海关都啧有烦言，诸多不满。人们指责海关已成为国中之国，是使馆街（指北京东交民巷——引者）的走卒；总税务司的话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法律，总税务司还充当主宰北京每一任财政总长的后台老板角色；关税税款扫数存入外国银行，这只为外国银行增加了信用，而中国的银行则被撇在一边；海关所有高级职位全为洋人独占，中国人沾不到边。"[20] 他认为我国关税由外人主持，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对于海关一切行政，决拟彻底改革"[21]。改革的具体措施是：

（一）撤换擅权抗命的外籍税务司。1928年1月，财政部获知芜湖海关英籍税务司贾士（Gards）违背命令，擅放盐斤，并借故恫吓封关，宋认为这是"蔑视政府，滥用职权"，立即决定将贾士撤掉，另委西班牙人马悌（Macti）继任。另一方面训令其他各关税务司："如有不遵政府命令，越权渎职情事，本部职权所在，决当严予惩处，不稍宽纵。"[22]

（二）审查各海关税务司支用经费情况。在关政方面，各海关名义上受辖于财政部，但支出经费情况从来不向财政部汇报送审。宋为了"慎重关款"及为关税自主作准备，通令各海关税务司须将支出费用

分别款目，按期造送表册，以便财政部审查、考核。

（三）严格稽核各关征税情况。宋子文命令海关各关、局将连年实收实解款额查明具报，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关局的税收比率，作为今后考核的标准。此外，为防止纰漏，决定改变以往不查验税单的状况，命令各局须将所有税单之副单按期造册，呈送财政部关务署[23]。

（四）改变以往海关行政习用英文英语的状况。宋认为，海关行政中只使用英文英语，“不足以重体制而便商民”，遂通令各海关税务司，嗣后所有海关应用单照，发布文告，以及批示商人之文件，统应一律以中文为主[24]。

（五）对总税务司的工作进行监督，直至撤换。南京政府成立时，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易纨士（Edwards）代理。易在任广州海关税务司期间，对政府不甚友好。宋子文在出任财长之初，曾与易纨士协商由关余中提出部分款额，未果。宋还希望易纨士在中国争取关税自主一事中发挥积极作用，亦遭拒绝。在国民革命军攻占天津之后，易纨士仍持不合作态度。宋子文对易非常不满。他训令易纨士，“自本年（1928年）1月份起，将逐月收支数目，及还本付息数，每项汇兑率并结存各款数，存何银行，分别列表造册具报，以凭稽核”[25]。又令易纨士：由海关收入项下拨付各机关的经费，须按月将所拨款汇解财政部关务署[26]。采取上述措施后，总税务司的工作就置于财政部较有效的控制之下。宋并在1929年1月任命梅乐和（Maze）为海关总税务司，取代了易纨士。

（六）改变海关职员洋人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宋子文认为海关职员洋人占绝对优势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合理状况，应立即着手改变。1929年初，宋指示有关人员组织了海关章制审查委员会。经研究决定停止招洋人关员，并提高华人关员的地位和待遇，为华人自办海关作准备[27]。财政部还主持开办税务专门学校，限制海关方面自行

招考关员，逐渐使新关员全由该校学生充任。宋还规定，海关用人“应尽华员升充”[28]；“聘雇海关洋员，仅限于技术方面，并须得财长之特许”[29]。这就打破了延续五十多年的旧例，开始提升华员出任税务司一职。以后，出任代理税务司、副税务司、代理副税务司的华员，不乏其人。这就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征收关税，稽查走私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　实行自主制定关税政策

（一）实行自主制定关税政策的经过

所谓关税自主，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财政、经济和文化的需要，自行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国家关税税则，不受他国掣肘和牵制。我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关税制度，就是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国家关税税则，简称“国定税则”。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从此中国就丧失了海关主权和关税自主权。经过《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议定：“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仅按‘值百抽五’征税；货物转口运销，除按值百抽2.5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30] 这就是由列强片面议定后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协定关税税则”，简称“协定关税”。这种值百抽五的协定关税税率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低税率，如德国在18世纪70年代初叶，对进口棉纱征税15％—30％，相当于中国同类商品进口税率的三至六倍。后来因物价腾贵，中国实际征收时还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从《三次修改税则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看，仍均未达到“切实值百抽五”的标准，一般在3%至4％左右[31]。这种罕见的低税率，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廉价倾销商品和掠夺工农业生产原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却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市场，摧残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中国人民生活的苦难，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争取关税自主权便成了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和段祺瑞政府害怕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情绪继续高涨，于同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所谓关税特别会议，参加的有美、英、日、法、意、比、荷、葡、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等国。这个会议表面上名为协商中国关税问题，实际是搪塞拖延，欺骗中国人民。列强的阴谋遭到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会议期间，北京学生和工人举行了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上海、南京等地群众纷纷响应。但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垮台，关税特别会议无结果而散。

为了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摆脱协定关税的束缚，振兴中国经济，南京政府成立后仅一个星期，即于1927年4月21日发布公告，决定“采取攻势外交策略，先就关税权自主自动的宣告独立”。由于当时宁汉分裂，加上张作霖在北京仍打着“中国政府”的牌子，南京政府的“攻势外交”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1928年6月南京政府“统一”北方后，立即于6月15日发表对外宣言称：“中国八十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遵守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32] 北京政府被推翻后，列强相继承认南京政府，并表示支持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于是，南京政府外交部便发表了《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提出“（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已届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33] 这里所强调的“重订新约”，最主要的是指重订关税条约。当时，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有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十二个国家，除前六个国家所订条约已经期满外，后六个

国家的条约尚未满期。

起初，南京政府曾设想与签约各国集体谈判解决订定新约问题，但遭到拒绝后转向与各国政府分别单独进行谈判。谈判按先易后难的顺序，首先派宋子文到美国周旋磋商。因宋与美交往密切，加上蒋介石与美国曾有密议在先，因此美国首先表示支持“重订新约宣言”。7月25日，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Macmurray）在北京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美国成为第一个同意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新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条款，应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34)] 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挪威五个条约未满期的国家，也相继于1928年11月至12月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它们都承认中国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且不以废除厘金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条约已届期满”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五个国家也与中国重新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不仅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而且同意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但是，唯独旧约已经满期的日本，却拒绝与中国重订新约。

已有十一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中国政府决定实行新的关税税则。国民政府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于1928年12月7日颁布了《海关进口税则》，将1926年关税特别会议上初步拟定的七级附加税率，再分别加上5%的进口正税，规定为中国第一个国定税则。其税率分别为：7.5%、10%、12.5%、15%、17.5%、22.5%、27.5%，决定自1929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35)]；新税则颁行之时，二五附税、煤油特税即行裁撤。在实行海关进口新税则的同时，原与俄、英、日所订“陆路边境减税办法”亦行取消，使水路、陆路关税实行同一税则。不过，“此项新订差等税率，仍系以一年为限”。在这一年期间，财政部已令“国家税则委员会从速调查货价”，为1930年第二次改订关税税则作好准备。同时，财政部“对于海关一切行政，决拟

彻底改革”，规定“嗣后海关用人，应尽华员升充，所有各海关及总税务司呈报之收支表册，均由部切实稽核；海关应用之经费，均令遵照部颁预算书程式，按期造报查核；其海关新增税款，并已令饬总税务司交存中央银行保管，以重公款”[36]。

新税则实施以后，南京政府虽然宣告中国的关税权已经自主了，但实际上这种自主权还受到很多牵掣。按最惠国条款规定，如果十二个签约国中有一国不承认中国关税权自主，则其他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仍可以不予承认。当时日本还没有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这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完全收回还留有隐患。为了求得日本的早日承认，中国政府被迫向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如日本提出，新订中日关税条约应规定：日本输往中国的某些棉制品、海产品和面粉三年不能增税（即仍实行值百抽五税率），其他货物一年不能增税；中国输往日本的夏布、绸缎和绣货按日本当时的税率征税，并三年不变，等等。日方还宣称，如果中方答应了这些条件，在中方正式裁撤厘金，并保证每年从关税中拨出专款清偿日方债款后，才考虑与中方签订条约。对于日方所提各项条款，中国政府全都予以接受，而且通知日方说，中国政府已下令自1930年10月10日废除厘金，并已制定了每年专拨500万元清偿外债的计划。这样，日本才于1930年5月正式与中国签订《中日关税协定》。至此，中国基本上最后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中国关税自主权得到各国共同承认后，中国政府即令国家税则委员会重拟国家进口关税税则，并于1930年12月29日公布。这是中国的第二个国定税则。按照这个税则，进口货物的税率分为十二个等级，即5%、7.5%、10%、12.5%、15%、20%、25%、30%、35%、40%、45%、50%。该税率从1931年1月1日起实施，其税率比第一个国定税则提高将近一倍。由于这个税则迁就日本，片面优惠日本，曾引起过英美等国的不满。

1933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届满三年，日本商品所享受的特惠税率期限已到，中国政府随即重修税则，于5月22日颁行，是为第三

个国定税则，该税则将税率定为十四级，分别为5%、7.5%、10%、12.5%、15%、17.5%、20%、25%、30%、40%、50%、60%、70%、80%。这个税则比第二个国家税则的最高税率又提高了30%，而且已经摆脱了《中日关税协定》的桎梏，体现了中国关税自主的精神，表明中国关税自主权已经实现[37]。由于这个税则取消了对日本商品的特惠权，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日本的反对和破坏。于是，1934年7月又颁行第四个国定税则，将税率作了有利于日货的调整，但货物分类和税率等级仍与第三个税则相同。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再没有对国定税则进行过全面的修订和调整，中国人民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已告结束，这就是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推行“四个国定税则”的全过程。

（二）实行关税自主政策的主要内容

实行关税自主政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将协定关税改为国定关税，中国政府可以自定税率。中国政府1929年实施的第一个国定税则，基本上还是沿袭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所定的税率，即最高不能超过30%；1930年实施的第二个税则便摆脱了关税特别会议的束缚，将最高税率提高到50%；1933年实施的第三个税则又摆脱了日本的桎梏，将最高税率提高到80%。1933年的国定税率比1931年提高了30%，比1929年提高了52.5%。这表明中国政府有充分的自主权，否则税率是不会这样成倍提高的。

第二是实现海陆关税的统一。过去，中国海陆关税不统一，陆关进口的关税税率比海关少纳三分之一。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始于1869年4月27日之《中俄条约》，而后法、英、日等国均按最惠国条款亦获得了此项特权。经过中国政府与各国交涉，取消了这个不合理制度。如在《中英关税条约》附件四中，中国声明：“对于新订海关税则，意欲一律适用于中国海陆边界，故从新税制实行之日起，所在陆

路进口货物现在所课之优待税率，予以废止。”[38] 英国公使在复信中称：“英国政府对于该项声明，完全同意。”英国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最多，时间最长，它既同意，其他国家随着也表示同意。从此，中国海关进口税税率等同的政策便开始实行。陆关关税由值百抽二至三的低税率，也提高到值百抽五至值百抽八十的高税率。

第三是自行降低出口税率。国民政府在修订进口税则的同时，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和修订出口税则，与不断提高进口税率相反，而是降低或减免出口税。如1931年6月确定的出口税，分为六类270目，税率为从量部分的是5%、从价部分的是7.5%，但肠衣、罐头、瓷器等项，虽为从价部分却仍按5%税率，而茶、绸缎等二十项免税。1932年又先后免征丝和丝制品的出口税。1933年10月又免征米、谷等杂粮出口税。1934年修订的出口税则，依据1931年出口税则又减低三十五项税率，新增加免税品四十四项；并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对在国外销售困难的原料品及食品酌量减免，对工艺品应奖励输出的，酌量免税[39]。

第四是废除国内贸易多种关税而转加到外国对中国贸易上。中国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同时，取消了国内贸易中多种古老而繁苛的捐税，如子口税、过境税和常关税等，把减少的部分税收转加到外国对中国贸易上，如加征外国货的转口税、关税附加税、水灾救济附加税等，均从1931年开始。1931年6月制定的转口税则为632项，其中从量税为461项，从价税为125项，免税为46项。税率为7.5%，其中3.5%为附加税。1931年夏长江发大水，政府又公布从1931年12月起至1932年7月底止，按关税税率（主要是进口税税率）又加70%的水灾救济附加税，从1931年8月起至1935年6月又按关税税率征收50%的关税附加税[40]。

第五是实行关金制度。长期以来，中国关税一直以银币计征，而当银价暴跌时，用中国银币折换金币时付出代价太大，尤其在外债还本付息时所造成的镑亏损失十分惊人。为此，1896年李鸿章总督曾试

图改以金价征收关税，以弥补这一损失，但由于外国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成立后，仍面临这一严重问题，如1928年—1929年间，中国每年必须按金价付出外债本息约等于3500万美元[41]。但是，关税收入是用银的关平两计征的。1928年每关平两稳定在0.45美元左右，而到1929年就降低到0.36美元[42]。这样，1928年用美元支付外债3500万美元本息，只折成7800万银元，而到1929年就上升到8350万银元左右[43]。到1931年中国银元已降到0.20美元，中国用银元支付外债损失越来越大，其补救办法唯有按金价征税。中国政府在实施关税自主政策的同时，于1930年1月15日宣布实行关金制度，即自同年2月1日起，改用海关金单位计征进口税，规定每一海关金单位等于0.40美元，或英镑19.7265便士，或0.8025日元[44]。纳税人在缴纳关税时，则用银元、银两或其他货币，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牌价（汇兑比价）折成海关金单位缴纳。自1930年3月1日起，每天由中央银行参照各种货币在市场上的实际汇价决定汇兑海关金单位的比价。经过修订的海关新税则于1931年1月公布实施，这时所有税款均已改用海关金单位计征。应当缴纳的关税得用银币、银两或他种货币，按官方牌价折成海关金单位缴纳。这样，中国就可避免银价暴跌造成的损失，把关税收入的价值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说，这次改革既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中国支付对外债务的能力[45]，是非常有利的。它既是实施关税自主政策的主要内容，又是保证关税自主的有力措施。因此，以海关金单位征税是头等重要的政策[46]。其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关金券便不与任何一国外汇固定联系，而完全以单纯含金量计算。从此后，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偿付本息，可以直接用海关税收（关金券）偿还，无须再用银两折算各国金币还债。这样就减少因国际银价涨跌对我国财政和税收的影响[47]。

第六是关税税款储入中央银行，中国政府可以自由支配。多年来，中国关税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办理中国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

关税款全部集中存入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办理外债偿还业务。中央银行按照借款条约，将偿还外债所需款项，先是用中国货币（银元）转解外国银行，后来因运用海关金单位取得外汇，就直接利用外币清偿债务。据估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大约还剩下1.5亿元以上的关税收入可供中国政府自由支配使用。

（三）实行关税自主政策的意义

第一，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市场，促进民族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如财政部声称第一个国定税则是按照以下三个原则制定的："（一）发展国内工业所必需之原料，当减轻其进口税；（二）国内工业之须发展者，政府当尽量扶掖之，使不受外货竞争之影响；（三）抵补裁减各税……。"[48] 此后几次税则修改，中国政府也同样考虑过保护国内工业的问题。财政部在其"工作报告"中曾说明："我国自关税自主以来，迭次修改税则，悉以增进税收及保护产业，双方兼顾为主旨。"[49] 中国政府先后实行的几个国定税则，确实有这种"兼顾"的考虑。如1930年底颁行的海关进口税则（即第二个国定税则），维持原税率的有43%，减少的占10%；在从价税率中，增加10%或10%以上的占17%，增加2.5%的占21%，增加5%—7.5%的占9%[50]。税则规定增税的商品主要是"火柴及磁器"，"其他如糖、水泥、玻璃、肥皂、化妆品、丝、人造丝及毛织物等之税，亦较前增加"[51]。火柴、磁器等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将这些进口产品增高关税，便含有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民族工业发展的性质。该税则实行后，某些工业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如1930年度课征的火柴统税约70万元，水泥统税26万多元；到1931年度，火柴统税增为334万元，水泥统税也达到近60万元[52]。统税的增加，一方面说明南京政府加重了税收，但更主要的还是火柴与水泥工业在一年内获得了很大发展。因为只有产品成倍增加，统税也才能成倍增长。当然也是提高火柴、水泥进口关税保护的结果。1933年重订的第三个国定税则，保护国内产业的性质更为明显。该税则对国内

工业发展所急需的机械、机具、化学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货物维持低税率，而对于洋货轻工业品则实行高关税，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新税则颁布后，国内工业在比较高税率保护之下，旧工厂方事扩充，新工厂方经设立者，流动资本皆已化为地皮、房屋、机器等固定资本”[53]。固定资本的增加标志着中国工业的有机构成提高，这是中国工业获得发展的主要表现。30年代上半期中国工业产品总值之所以能够保持稳步、持续上升的势头，即从1929年的7.73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12.27亿元[54]，国定关税的实施确实起到保护作用。

第二，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表现有三：（一）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由于进口关税的骤然提高，使外货输入大为减少，相应缩小了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据统计，1931年外货进口达1433489千关两（约合48,738.6万美元），而1932年就已降到1,049,247千关两（35,674.4万美元）；至1936年更跌到604,329千关两（27,980.4万美元）；贸易入超额也由1931年的1.78亿美元降到1936年的0.7亿美元[55]。（二）关税自主政策的施行，大大改变了中国进口货物的结构。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定税则是根据国内产业需要，对不同的进口商品实行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的税率。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外商对华贸易必定是避重就轻，从而促使中国进口货物的结构得到了改变。如棉布的进口，1919年—1921年平均每年进口值达7100万元以上，到1930年以前仍然居进口货物第一位（年均进口值在6000万元以上）。但在1933年时降为5800万元，1934年则只有2600万元，已经大大低于机器、染料等货物的进口值；相反，重工业品、化学工业品的进口则大为增加。如1929年—1931年机器进口值总共才有7300万元，而1933年的一年就有4300万元，1934年便跃居进口货物第一位，增加到5900万元以上[56]。（三）关税自主政策的施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中国的出口贸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竞相向中国推销商品，抢占市场。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更加逡巡不振，出口贸易一落千丈。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除提高进口税、限制洋货在华倾销外，还对一些大宗出口物品予以免税减税待遇，以鼓励国货外销。这就使中国出口贸易到三十年代中期的下跌不仅不再增大，反而有逐步回升的趋势。如1930年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由上年的6.5亿美元降为4.1亿美元，次年又继续下跌为3亿美元，1932年仅为1.6亿美元，但此后即不再下跌，到1936年时回升到了2.09亿美元[(57)]。而且再就某些大宗货物看，不仅没有下跌，反倒一直逐渐上升。如棉花1919年—1921年出口414,836公担，1929年—1931年增为515,925公担，而1933年一年就达437645公担；棉纱在1929年—1931年共出口260,638公担，到1933年也增为327,288公担[(58)]。

第三，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关税收入大大增加，为政府改革税制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国定税则的税率不断提高，政府所获得的关税收入也在不断地增加。据统计，1928年的关税收入约为1.34亿元，此后逐年增加，1929年为2.45亿元，1930年为2.92亿元，1931年达到顶点，年收入为3.88亿元。1931年比1928年增加了约两倍。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年冬东北海关被日本攫夺，1932年关税收入比上年略有减少，大约维持在3.12亿元左右，但1933年又上升到3.46亿元，1934至1936年平均年收入约3.25亿元，1937年增为3.43亿元[(59)]。关税收入的逐年增加，对南京政府有三个突出作用：其一，增加了岁入，使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二，增加了税收，使政府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改革税制，为废除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提供了财政基础和物质条件；其三，为抗战作了财政准备。

第四，“关税自主政策和关金制度的实行，使中国关税收入不仅避免因白银跌价而造成的损失，而且有所增加，这就保证中国对外债具有越来越高的偿还能力。所以，到1936年时，中国的旧外债基本还清博得帝国主义各国的好感，不仅我国债券在国际市场上较前增加信

用，而且国家地位声誉亦因此大为提高。”[60] 这就为抗战期间取得国际援助创造了条件。同时，使用海关金单位征收关税，也使中央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建立起雄厚的准备金，也为维持汇兑比价的稳定，为币制改革奠定物质基础。

第三节　税收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一　中央税制的整顿和改革

宋子文出任财长后，首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系统，确立了南京政府的财政体制。为了防止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财政部根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于1928年11月间正式公布了划分国、地收支标准案，同时又对国地收入权限作如下规定：（1）地方性质的收入与国家收入重复时，财政部得禁止地方征收，优先保证国税收入；（2）国家与地方两税划分后，各自自行整顿，不得添设附加税；惟所得税得征收附加税，但不能超过正税的20%；（3）新税收实行时，凡旧税收入与之相抵触的部分，应即废止；性质相同的捐税，应即归并；（4）厘金及一切国内通行税，定期裁撤，时限为六个月，由中央负责实行；在未裁撤以前，暂由中央接管；（5）田赋收入虽归地方；但关于土地税法的大纲，仍由中央制定并颁行，等等[61]。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税收制度特别混乱，直接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宋子文极力主张按照划分国地收支标准和权限的规定，加紧对中央税和地方税各自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抓紧对中央税收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一）废除盐税附加，实行新盐税法

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课税本不可过重，以影响平民生计。但自1913年盐税成为善后大借款的担保后，“由外国债权人设立稽核机

关”，于是盐务稽核所根据善后大借款合同于1913年成立，总所在北京，由中国总办、洋会办各一人主管收税业务。而后盐税收入大增，如1914年，盐税收入就达6800多万元。北京政府除了还债以外还有剩余，即“盐余”，仍是一个重要财源。正因为这样，不仅外国人重视盐税收入，中国政府和地方军阀更把盐税收入视为肥肉。所以盐税附加越增越多，一般称为“盐斤加价”，如1924年仅四川一省的盐税附加税就多达二十六种之多，全国盐的正、附税，1926年比1913年增加了四倍。且盐税税率极不统一。这种繁杂不一的税率和花样翻新的附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虽然盐税收入有所增加，“但盐税事务费支出亦巨，且有主权旁落之讯”[(62)]。

南京政府成立后，因关税自主实现，关税收入增加，便将善后大借款本息改由关税担保，不再用盐税偿付，“于是盐税行政权完全收回”[(63)]。当第二个国定关税税则实施以后，对盐税的整理与改革便开始了。于1931年3月，首次宣布对盐税制度进行改革，规定将各省盐税附加一律划归财政部统一核收整理，同时公布了《盐法》。《盐法》共7章三十九条，主要规定是（一）对盐采取人民自由买卖制。盐由私人制造，制盐人须经政府许可；所制之盐存放在政府指定之仓坨，由政府管理，以防私运；（二）废除盐商专卖之“引岸制”，实行就场征税；（三）盐的场价由制盐人代表按照盐的等级及供求状况议定公告。购盐者先纳税、后购盐；（四）盐分为食盐、渔盐和工业农业用盐三类。工业用盐以规定的十三项工业生产为限；农业用盐限于饲畜、选种和肥料用盐；（五）盐税税额：食盐每100公斤征税5元，不得重征或另行附加；渔盐每100公斤征税三角；工业用盐及农业用盐一律免征盐税；（六）盐务机关由中央设盐政署和稽核总所，直属财政部；各产盐场区设盐场公署及稽核分所，直属盐政署和稽核总所领导。盐政署及其所属盐场公署主管盐的生产、放销和仓坨管理；稽核总所及其所属分所主管盐税征收和查缉私盐（查缉私盐一向是武装缉私，设有专职机构和武装，公布有《缉私条例》）[(64)]。《盐法》公布后，南京政府于同年7月制定出分期改革方案。为贯彻第一步整

改计划，由财政部于1932年6月专门召开盐税整理会议。针对各区盐税税率原定等差所存在的“轻重悬殊”、“既失公平合理，又易启侵销之弊”的状况，整理会议决定：将原来靠近盐场的轻税地区，如长芦、山东、两淮、松江、两浙、河东等区之盐税，一律酌予提高；对于靠近和远离盐场之间的中间邻接地区，根据其税率轻重不一的悬殊情形，实行重减轻增，保持税率的大致均衡。在全国划一税率的基础上，财政部又将名目繁多的盐税项目，按其性质归类合并为三种，即：凡在盐场场区缴纳的盐税及中央附税，统名为“正税”；凡在销岸（或称引岸）缴纳的岸税及中央税，统名为“销税”；凡以地方加征的附税，统名之为“附税”[(65)]。划一税率与合并税项的目的，旨在加强征管工作与增加税收。1933年10月，政府实行第二步整理计划，再度划一税率，使全国各税区（不论离盐区远近）的税率基本均衡。1934年1月，财政部开始实行新衡制。废除旧秤（司马秤），改用新秤（约比司马秤小二成左右）。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新衡制在事实上等于把税率又提高了20%。此后，财政部于1935年对四川盐税进行整理，于1936年对甘、宁、青、蒙盐税税率进行核定，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盐税的整理与改革工作已基本完成。

通过这次整理和改革，盐税收入大为增加，到1934年盐税收入已达20670万元，占税收总额的49.5%。以1936年的盐税收入同1927年相比，增加了十二倍多。十年间盐税收入平均占税收总额的29%[(66)]，成为政府第二大财源。

（二）废除厘金和类似厘金等苛杂，创办统税

所谓厘金，是地方政府在主要水陆交通要道设立的关、卡，向过往客商征收的货物通过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始于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开始征收过境税，后来扩大到连“尺布只鸡”也要征收过境税。税率由值百抽一增到值百抽五，各地不一。关卡林立，到民国元年仅厘金局新增为735处之多。北洋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更是有增无减。中国民族工业生产的产品本来成本就高，而到了流通领

域，又要受到关税厘金的勒索，如从上海到重庆，值百元的中国货，最少要经过五六道关卡，单缴厘金税就达18%—30%，而外国货，从上海到重庆，值百元货物只缴5%的进口正税和2.5%的子口正税，就可畅行无阻，前者比后者高15%—20%。这就严重破坏了民族市场，摧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所以废除厘金和类似厘金的苛杂，不仅是列强的要求，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渴望。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宣布实行“关税自主”的同时就决定裁厘金。1931年1月1日，财政部明令废止厘金及子口税，并从即日实施。厘金明令废除后，各省财政收入减少了，它们又增征各种类似厘金的苛捐杂税，勒索民财，阻碍经济发展。1934年5月2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财政会议，通过了财政部提议办理的《整理地方财政案》、《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捐杂税计划案》。而后，将类似厘金等苛捐杂税比较彻底地废除了。

政府在废除厘金和类似厘金等苛杂的同时，创办统税。所谓“统税”，是政府为增加财源而新开办的一种以“一物一税”为原则的新税。这种新税制所征税的商品与货物，“系选择工厂制造或巨量农产品，为人民消费较大，且与社会经济无妨者”[(67)]。国内产品的统税征收，一般在其生产厂家或出产地进行；进口商品，则由入口处海关或入口第一道统税征收机关稽征；出口商品，或征或免，或征收二分之一，视货物性质而定。根据一物一税的原则，凡已缴纳统税的货物，如遇有重征时，可准许商人申请退税。

统税实际上是一种产品出厂（或出产）税。最早实行这项新税制的是卷烟行业。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的1926年底，湘、鄂、赣三省即开始推行卷烟统税，1928年1月正式公布条例实施。同年6月创办了麦粉特税，1931年改归统税系统。1931年1月，棉纱、火柴、水泥三项同时开征统税，1932年7月，熏烟与啤酒两税亦改为统税，1935年1月，火酒税亦纳入统税范围，由统税机关统一办理。这样，抗战前实行统税的产品计有卷烟、麦粉、棉纱、火柴、水泥、熏烟、啤酒、火酒共八类。统税开办的地区，先从湘鄂赣三省开始，至1936年

时扩大到全国，除云南、青海、新疆、西康、蒙古、西藏等地外，无一例外地都实行了统税。随着地区扩大，统税税率也有提高。如水泥统税，1931年刚实行时每桶（375磅）统税只征0.6元，1933年12月改为每桶（175公斤）征税1.2元，税率增加了一倍。卷烟、火柴、绵纱等也有类似增加，只不过是程度略有差别而已[68]。

财政部为了严格管理统税的课征工作，还确定以下几项原则：一、统税是国家税，地方不得重征和截税；二、征收统税的货物，应该以便于课征的大宗消费品为限，并须用法令明确规定；三、已征统税的货物，若遇有重征，应予以退税，确保一物征一税制度的建立；四、对货物征收统税全国采用统一税率；五、中外商人待遇一律相同。自此，中国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统税体系始告完成。统税因制度比较健全，又避免了厘金的诸多弊端，应当说是进步合理的。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统税收入越来越增加，成了政府第三大税源。统税的不断增加，也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整理其他税制与举办所得税

国民政府在整顿改革关、盐、统三大税收的同时，对印花税和烟酒税也进行了整理。1934年12月制定并颁布了《印花税法》，从1935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同时，财政部规定从1934年起，对印花税实行提成，提成部分拨给各省市作为地方收入，以抵补减轻田赋附加和废除苛杂的少收部分。关于烟酒税，先是于1933年7月对苏、浙、皖、赣、闽、豫等七省土烟叶改办特烟，采取单一税制，并规定与薰烟叶统税实行同一税率，在出产地实行一次性征收（一次课税后即可通行七省）。对土酒则改办土酒定额税，并归类征收。征收办法系以省为单位。在此七省内，除烟酒仍征营业牌照税外，对以前一直征收的公卖费、烟酒捐等一律取消。此项制度，“税目单纯”，税率固定，“征收便利”。正准备推行到其他省份，因抗战爆发而作罢。

国民政府除改革间接税制外，还举办了所得税。当时世界各国的税制都有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发展的趋势，而在直接税中，又以所得税最为重要。所得税的特点不仅是负担较为公平，纳税较为普及，收入较为确实，而且富有伸缩性，“能应国家缓急之需，更可随社会经济之发展，使国家税收有自然之增加，而人民不感其苦”[69]。1934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财政部决定举办所得税。1936年7月《所得税暂行条例》完成立法程序并明令公布。条例将所得税征收范围分为三类：一为营利事业之所得税；二为薪给报酬之所得税；三为证券存款利息之所得税。其征收标准，除第三类外，均采用累进制；其纳税程序，则是课征法与陈报法二者并用。同年8月，南京政府公布所得税实施细则，从1936年10月起，对第二类公务人员薪给报酬和第三类公债利息开始征收所得税。从1937年1月起，对第一类营利事业之所得、第二类自由职业者与从事其他各行业者的薪给报酬之所得，第三类公司债、股票与存款利息之所得，全部课征所得税[70]。所得税的举办，是国民政府税收制度的又一重大改革，而且改革后的税收入越来越增加。这说明中国税收制度已开始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二　整顿改革地方税收制度

财政部在进行中央税收制度整顿和改革的同时，对地方税收制度也开始进行整顿和改革，但进展速度缓慢。中央税制改革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去财长时，大部分已完成，而地方税制整顿和改革才刚刚展开，孔祥熙在地方税制整顿和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地方税系统以土地税为主，此外还包括契税、屠宰税、营业牌照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以及各种附加、摊派和杂捐等。

（一）土地税的整顿和改革

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税是指一切以土地为征税对象的赋税，主要包括田赋、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1．田赋

田赋自古以来都是中央主要税收，而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7月颁布国地税收系统时，却将田赋首次划为地方税，作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时的田赋包括正项和附加两部分。正项包括地丁、漕粮、租课等税目，也有的省份通称为田赋，税目归并为一；至于附加，名目繁多。各省的田赋基本上按土地肥瘠程度，划等定税，按亩征收。税率各省不一，征收期限为上忙和下忙两次。

田赋收入在各省岁入中一般均列第一位，占省税的半数乃至六七成以上。仅以1935年为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山东、山西、河南、宁夏、福建、河北、绥远十二省，田赋总额计达9060余万元，占地方税收预算总额的60％，居首位，成为上述各省税收的主要部分。这说明田赋正税在各省地方收入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

田赋划归地方后，财政部曾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再增设田赋附加。但是，当地方政府把持田赋征收权力后，附加便难以控制，各地通过各种名目加征田赋附加，甚至于附加超过正税若干倍。如1933年江苏泰县的田赋附加税有：教育费、公安亩捐、自活亩捐、积谷亩捐、党部民众捐、农业改良捐、普教亩捐、抵补金亩捐、芦课自治捐、芦课党务捐、清丈费、保卫团捐、水巡队经费、警察队经费、户籍经费、防务费、区经费、区圩塘工捐、乡镇经费、村制费、公益费、开河经费、保安费、建闸费、国省选举费、修志费等26种之多，五花八门，名目翻新。附加税往往超过正税若干倍，如1933年江苏如皋县的附加税就超过正税十六倍，海门超过二十五倍。据浙江瑞安县统计，1934年经财政部命令废除的各项苛捐就有83种，同年广西被废除的苛捐也有45种[71]。田赋征收还广泛流行着预征制，这是对农民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1918年开始，只出现于地方军阀割据的地区四川省，而后遍及全国。这种预征，一年可以数次，或十数次，如四川梓桐，在1926年已征到1957年，温、郫等九县在1931年已征到1961年。苛重赋税的压迫，更增加了农民的贫困和削弱了农业经济再

生产的能力，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我国以农立国，可在1934年以前，沿海和各大都市吃粮全靠进口，外国洋米、洋面进口只收0.5%以下的关税。结果造成中国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惨剧。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到头来一年收入，除去成本，往往不敷税款。人民不堪重负，有将田契贴于门上而逃荒的，更有“以命完粮”者，田赋附加和预征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之大可想而见。

孔祥熙出任财长后，多次明令废除田赋附加税。在1934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通过财政部提出的《办理土地陈报案》、《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捐杂税计划案》、《减轻各省县田赋附加地方费用不足由中央另筹抵补案》等，总共关于整理田赋减轻附加者，计二十五案。经议定明确办法，呈奉国府以明令颁布，嗣后永远不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税则[72]。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作出的关于改革田赋征收制度的主要原则是：一、经征机关与收款机关应行分立；二、串册应注明正、附税额及其合计数，并预发通知单；三、不得携串册游征、预征；四、确定征收费，由正税项下开支，不得另征。这个新办法在当时虽不能彻底贯彻，但内容是有针对性，切中时弊的，尤其是经征机关与收款单位分开，确对旧制是一项革新，对防止征税官员中饱私囊可以起制度上的防范作用。废除田赋附加，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国民政府国定税制委员会还提高了外国粮食进口税率，使之由0.5%以下上升到27%[73]。这又保护了民族市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所以从1934年以后，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发展的好势头，如1934年中国农业产品总值仅为17.11亿多元，而到1936年就增加到18.89亿多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1.78亿元[74]，平均年增长率为3.5%。

2．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地价税，又称土地原价税，是按土地的本身价格（不包括土地改良物价格）课征的；土地增值税是根据土地价格增加的数额向土地所有人课征的。国民政府时期，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同田赋一起划入土

地税范围。

中国的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是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最早出现的。1927年上海市成立土地局，议办地价税。1928年广州开征了临时地价税。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其中对地价税作了规定，税率为：市改良地为10‰—20‰，市未改良地为15‰—30‰，市荒地为30‰—100‰，乡改良地为10‰，乡未改良地为12‰—15‰，乡荒地为10‰—100‰ [75] 。征收地价税曾经是孙中山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而提出的一项措施，南京政府名义上遵循孙中山的主张，实际上是借以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开办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前提是整理土地和核定地价，而很多省市土地未整理，地价也无法核定，结果只有上海、青岛、广州、杭州和广东省等少数省市开办了，其他地区未办。而这几个省市的办法也不一致：上海市1933年规定，凡区内土地，清丈已定，一律开征地价税，未清丈土地暂征田赋，清丈后再补交地价税，税率为6‰，一年分两期缴纳。青岛市1932年规定，地价税为两类，甲类为原官厅收买而出售的土地，税率为2%，如建筑延期则递增至10%，一年税款分四期缴纳；乙类为私有土地，按原田赋额分等征收，一等征洋3角5分，二等征洋2角5分，三等征洋1角5分，每年12月一次缴纳。广州市于1928年开征临时地税，按估定地价征收，其税率为：宅地征1%，农地征5‰，矿地征2‰，在土地转移（除抵押）时，须纳土地增值税，采用累进税率，其增值未及原价一半者征收增值部分五分之一；超过一半不及一倍者，其一半部分为五分之一，超过部分征四分之一；超过一倍以上者，超过一倍部分征收三分之一，一倍以内部分征四分之一。杭州市1933年6月开征地价税，税率为8‰，一年分两次缴纳。

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制度各地不尽一致，开征也不普遍，从1937—1942年全国只有49个县市开办了此税，而且数额甚微。

（二）契税

国民政府初期开征的契税包括正税、附加和验契费三部分。正税税率，各省不一。有的省卖契为9%，典契为6%，有的省卖契为6%；典契为3%，还有的省较低，卖契为4%，典契为2%。除正税外，还有附加，附加额度不一，有的与正税齐等，也有超过正税的。验契费包括契约的呈验费和注册费。1928年对不动产旧契，不分典卖，也不问已税未税，一律呈验注册，换给新契纸，每张收契费1.5元，注册费1角，附加教育费2角。其不动产价格在30元以下的契约，只收注册费。1934年5月调整契税时，将卖契以6%，典契以3%为正税最高税率，卖典契纸每张5角。

地方军阀经常以验契、新契换旧契等方式搜刮人民，致使契税总额不断增加，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在这一时期，契税是地方税收的三大来源之一，占地方税收总额的10%左右。

（三）营业税

国民政府于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决议裁撤厘金，同时为弥补各省裁厘的损失，决定由各省开征营业税。营业税是原有的牙税、屠宰税、当税的扩大，是以地方商业、手工业营业总收入额或营业资本额为课征对象的新税种。1931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营业税法并公布施行。规定营业税为地方税，由各省自行办理。营业税在这一时期为地方岁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占地方税收总额的27.5%。

（四）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

以上几种税是本期地方收入又一来源，但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较小。

营业牌照税是由特种营业执照税和普通营业牌照税合并而来的，

其课征范围与等级各有不同。1935年将营业牌照税列为县税，但未举办。

使用牌照税是由各地的船捐和车捐演进而来的，1935年定为县税。

屠宰税是对屠宰牲畜行为的课税。1931年将屠宰税并入营业税范围，其税率各省高低不一，如宰牛一头，有征6角至1元的，宰猪一头征4角，羊一头征3角。

房捐于1928年列为地方税，征收制度各地不一。

筵席及娱乐税，国民政府初期各市县间有征收，但征收范围各地不同，1935年划为行为取缔税。

各地方军阀同样利用这些小税搜刮人民，这也足以说明地方财政的封建性。

（五）无名税捐

在一些省的预算中，除了上述一些税项外，还列有“其他收入”项目，实质上是没有名目的捐税。许多省份的这项数字相当庞大，其中广东、陕西、江西、湖南均占30％以上，贵州竟达72％。这些“其他收入”或“各项税捐”，其实是一些难以公开的鸦片税、赌博税和妓院税，这些收入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反映出地方财政的丑恶和黑暗[76]。

（六）杂捐

国民政府初期的杂捐可谓为繁杂苛细，称得上无货不税，无物不征，活人抽捐，死人也要收白骨捐。杂捐的名称五花八门。捐税之多，苛征之重，扰民之甚，连国民政府的税务负责人也无法否认。据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透露，1934年7月1

日到1935年8月底，全国各省已裁苛杂五千余种，计税额达5000万元。这不过是第一、二批废除的项目，以后还有第三、第四批的续裁项目，由此推算，全国的苛捐杂税当在万余种。所谓裁撤税捐往往也只是一纸虚文，明裁暗增、边裁边增的情况屡见不鲜。

（七）摊派

在一般情况下，捐税再重，终有个名目和限度，到了人民无法负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统治者往往不得不适当调整，以缓和矛盾。而摊派则师出无名，既无预算，也无限度，随便找个借口即可，所以这种办法更为各级地方政府官所采用，其剥削程度和对百姓的苛扰更甚于捐税。这一时期，摊派十分普遍，有省的摊派，有县的摊派，也有区的摊派，有的是明令的，有的是擅自征收的，甚至各地的保安队长和民团团长都有权摊派。而每一摊派都层层加码，层层剥削，省方若需款五千元，人民就得摊付万元以上[77]。除地方政府搞摊派以外，当地驻军也搞摊派，而且谁也不敢不给。

第四节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与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初步确立

一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

（一）中央银行的建立

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中央银行。1927年10月25日制定《中央银行条例》十九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928年10月8日，《中央银行条例》经国府修订为二十条，并由国民政府拨给资本二千万元，于11月1日成立，总行设于上海”[78]。设九人理事会司立法之责；设七人监事会司监察之责；行政权则由总裁副总裁

行之，使立法、监察、行政三权分立。总裁之下设发行、业务二局。发行对于业务完全独立，若无法定之准备金，不得滥发一纸。第一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按照《中央银行条例》规定，国民政府授与中央银行的特权主要有四项：（一）依兑换券条例，发行兑换券——纸币；（二）国币（硬货）之铸造及发行；（三）办理国库事务；（四）募集内外公债及办理其他事宜[79]。宋子文在发表就职演说时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不是以筹款和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统一国家金融，它的业务方针有三：一、为统一国家之币制；二、为统一国家之金库；三、为调剂国内之金融。"[80] 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是平行关系，宋子文是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又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可见中央银行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有人回顾中央银行开幕典礼情景时说："宋母宋老太太满面春风，一手扶着大女儿宋霭龄，一手搀着小女儿宋美龄，后面紧跟着儿媳张乐怡，刚参观过大女婿实业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南市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又前来参观小女婿蒋介石授印、大儿子出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开幕典礼礼品展览。"[81] 从这些典型的画面里不难看出蒋、宋、孔三大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得意神情。中央银行成立以后，利用它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开展业务，增强实力，加强自己的基础。但中央银行的实力是远不及中国、交通两行的。

（二）将中国、交通两行改造成国家银行

中国银行原为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北京政府时期改组为中国银行，虽无有中央银行之名，却在发行纸币、代理国库、调剂市面、安定金融方面，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其业务发展非常快，但商股占绝对优势，官股微不足道。

宋子文出任财长后，曾设想将中国银行改组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家银行（其作用与中央银行相同），但因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张公权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后来，根据中国、交通二行系仿照日本银行制度建立起来的特点，张公权向南京政府建议，应仿照日本的日本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三行鼎立的制度，另组一个完全属于政府的国家银行，于是才有中央银行之设。因此，中央银行建立起来后，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造是必然的。

政府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造步骤，大致上采用的是先渗透、再控制的办法。所谓“渗透”，就是在中国、交通二行中强行加入官股，改变其纯私股的成分。中国银行有资本2000万元，1928年南京政府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即修改其银行条例，将资本额定为2500万元。这新增的500万元就是强行加入的“官股”。同年，南京政府将交通银行总行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又使用同样的办法，即颁布该行条例，规定其资本额为1200万元。交行资本原为1000万元，新增的200万元便是“官股”。实际上，南京政府口头上虽说要加入交行官股两成，而实际上只交资本一成，即100万元。由于中央银行的设立，中国、交通二行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曾经享有的代理国库的特权被取消了。经过这一步改造，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就渗透到了这两家银行[(82)]。

南京政府又将中国银行改组成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其业务是：“一、经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二、经理政府存在国外之各项公款及收付事宜；三、发展及扶植海外贸易事宜；四、代理一部分国库事宜；并仍有发行兑换券之特权，此外并经理国内外汇兑及货物押汇，商业期票及汇票贴现”，由临时股东会选张公权为总经理，由国府任命李铭为董事长[(83)]。同时将交通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由胡祖同任总经理。其业务是：一、代理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票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二、代理交通事业之公款收支事项；三、办理其他奖励及发展实业计划。四、代理一部分国库事宜，并可发行兑换券。”[(84)] 这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鼎立的制度就建立起来，它们各负其责，共同为推行政府的金融政策服务。

在宋子文出任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期间，为了给蒋介石发动“剿

共”内战和排除异己的军阀混战筹措军费，财政部发行的公债额很大，到1933年已达14亿多元。这不仅使宋子文同上海金融家的矛盾加剧了，而且由于筹划公债的还本付息和开发新财源感到很吃紧，因此宋子文与蒋介石在裁撤军队、减少军费、平衡预算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矛盾，从而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走马换将”的办法，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的职务，于1933年4月6日接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1日接任财长。孔接任当时，“国库每月收入1500余万元，支出2200余万元，其中军费一项每月即达1800万元，每月不敷数目约800万元之谱。库存仅有现金300余万元及尚未发行的公债库券2700余万元，黄金外汇全无。即使2700余万元的公债能全部顺利发行，也不过维持三个月的开支而已。宋子文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85]。孔就是在这样窘迫的境况下受命的，为了挽救南京政府财政窘迫危机的局面，孔与蒋、宋在武汉开会密商，决定对中、交两行进行第二步改造，这就是增资改组，提高中央银行地位。

（三）增资改组，使中央银行成为三行之冠

为了进一步控制中、交两行，使中央银行成为三行之冠，南京政府又寻找机会对中、交两行进行第二步改造。1935年初，孔祥熙开始面临新的财政危机，美国的白银政策使孔所施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受到重大威胁。由于货币市场紧张，上海金融界不愿意认购政府的新公债，而中央银行的负担又沉重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不仅反对孔氏的赤字财政政策，而且当财政危机加剧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联合起来拒绝以财力支援孔祥熙，这使孔十分恼怒。于是，孔与蒋介石密商，决定要把张公权和胡祖同从中交两行总经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由于担心采取强硬措施会引起中交两行投资者的恐惧，从而将其资本转入上海外国银行，孔祥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改造中交两行的工作。1935年2月，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上海货币市场奇紧，很多工商企业面临倒闭破产的危险，工商业团体

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提供救济。孔祥熙便操纵工商界资本家要求银行贷款，把工商界的不满引向银行界。

这样，银行资本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后，就为南京政府改造和控制中交两行提供了借口。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将要对中交两行实行管制，要求该两行增发股票，而且要把两行的控制权交给政府[86]。与索取控制权相配合，南京政府同时发行了1亿元以关税为担保的金融公债，作为购买新股的资金。起初，孔祥熙企图使中国银行的资本股额变为官三商二（即国家资本占30万股，私人资本占20万股，每股为100元），使官股压倒商股，但遭到中国银行商股势力最大的江浙资本集团反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是国家与私人资本各占一半（即官商各占20万股），使资本总额达到4000万元[87]。这样，中国银行的国家资本就占到50%。在交通银行中，财政部增拨金融公债1000万元，连同原有官股，使国家资本占到55%。在向中交两行强行增资的同时，孔祥熙又宣布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置由宋子文接替（后为拉拢江浙资本集团，宋只任董事长，总经理由江浙财团的宋汉章担任），原总经理张公权和董事长李铭被调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则由孔氏派系的唐寿民和胡笔江（即胡筠）分任总经理和董事长。

为了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南京政府决定将其资本总额增加到1亿元，并将总行由上海迁往南京，以便在首都能够有效地担负起调济全国金融之职责。总裁行使行政权的主要机构，是其下设的发行、业务二局。此二局相互独立，若无法定准备金，发行局不得滥发纸币。中央银行成立之初，为得到金融界支持，南京政府曾在理事会、监事会中拉拢一些金融巨头来担任理、监事，如江浙财团的荣宗敬、钱永铭、陈光甫、张公权、吴鼎昌、叶琢堂等先后担任过理事；李铭、秦润卿、贝祖诒、虞洽卿、徐成冕、胡孟嘉、唐寿民等先后担任过监事。而实权却为宋、孔所掌握。

中央银行凭借国有银行的特殊地位，在经营银行业务的过程中大

肆排挤其他银行，获取了巨额利润。以该行成立时的1928年为基期，到1936年时其资产总额增加了23倍，存款额增长了341倍，兑换券发行增加了25倍，从中所获得的纯利则增加了61倍（1934年达最高额）。中央银行确实成了三行之冠[88]。其发展速度是其他银行无法比拟的，它所积累的大量资本，奠定了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基础，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迅速发展，要形成后来以“四行二局”为主干的国家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中央银行是南京政府国家银行团的核心。

（四）四省农民银行改组成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是南京政府由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的一家面向农村的国家专业银行。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时，蒋介石立即把矛头指向中央苏区，并在江西设有“剿共”总司令部。该司令部内设有一个所谓的“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初，为了筹措“剿共”军费，蒋介石批准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组设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该行最初的资金来自湖北鸦片特税，同时湖北省银行也是它最重要的股东。其总行设在汉口，四省各设分行。四省农行时期，总经理是郭外峰，1935年改由蒋介石的亲信徐继庄接任。该行曾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三种流通券，由“剿匪总司令部”布告四省，强制使用。四省农行的业务活动从不公开，它的出现被认为是“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制造麻烦的根源”[89]。

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决定将四省农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据称改组的原因是：四省农行“成立两年有余，于调剂农村金融颇见成效”，“而其他各省农村金融，亦确有统筹调剂之必要。现拟将四省农民银行扩大范围，改为中国农民银行”[90]。同年5月，立法院通过了《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规定该行作为南京政府“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专门银行。它的业务范围是：（1）收受存款；（2）办理汇兑；（3）买卖生金银及有价证券；（4）动产不动产之抵押放款及保证信用放款；（5）经营农业仓

库及放款于农产农具之改良事宜与农民合作社；（6）发行农业债券及农业流通券；（7）农业票据贴现[91]。中国农民银行的资本总额规定为1000万元，由财政部认购250万元，各省市政府共计认购250万元，其余的500万元由社会各阶层人士自由认购。事实上，私人从未认购农民银行股票，其资金全部都是由财政部拨付的。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蒋介石自任董事长，并准备将资本增加到6000万元。孔祥熙为迎合蒋氏的要求，对农民银行进行全力帮助。如法币政策实施后，孔祥熙规定，除河南农业银行、湖北省银行、浙江地方银行、陕西省银行等四家银行的发行部分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接收外，其余各省银行或类似省银行的发行部分，统统由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对尚未设立中国农民银行分行的省份，同意陆续筹备设立[92]。通过这些措施，农民银行很快就发展成为与中国、交通两行并列的第三大专业银行。

中央银行设立之初，其势力原本是很孤单的，但将中国、交通、四省农行相继改组为三大专业银行后，这家“银行之银行”的中央银行，如虎添翼，使国家银行的势力空前强大起来，很快就成为政府国家金融资本的核心支柱。此后，政府就通过这四大国家银行进一步扩大国家垄断资本。

（五）设立中央信托局和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

中央信托局是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1935年7月30日，财政部宣布中央信托局成立，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中央信托局长。同年10月1日，信托局开始营业。在营业开幕式上，孔祥熙对成立信托局的原因作了说明。他说，因政府方面有许多事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同时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的地位，事实上及手续上都不能出面，所以在中央银行之下，组织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经办这方面的事情[93]。中央信托局的理事长由孔祥熙自己兼任，张公权与叶琢堂为常务理事。根据《中央信托局章程》，信托局的资本定为1000万元，由中央银行一次拨足；总局设在

上海，各地酌设分局。其主要业务是：代理国家收购各项出口物资，并经办军火进口生意；经理“国营”事业或“公用”事业债券股票募集与发行；经营国家财产物资的保险业务及政府机关重要文件契约的保管事项；经收“公共机关”或“公共团体”的信托存款；办理各种保证事项和委托代理事项，等等[94]。不久，中央信托局又经营起了普通储蓄存款放款业务，其经营范围从采办、保险、信托、储蓄、直至农贷，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它所侧重的方面还是经营购料和易货业务，以致后来发展成为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从事买办性商业活动的重要工具。

中国邮政局早在1898年即已开办汇兑业务，1908年又开办了储蓄业务，至1929年，通汇的邮局及代办处所有2374处，办理储蓄业务的邮局达206处以上。有这样一群庞大而广泛的信用机构，国民政府自然要将其收归国有。1930年，政府下令将原来经营储金汇兑业务的邮政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并在上海成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直属交通部管辖。1931年6月，政府相继公布《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邮政国内汇兑法》和《邮政储金法》。1935年，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改隶于邮政总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资本，没有规定具体数额，而是以“全国邮政收入为担保”，其经营业务为：举办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邮政汇票、电报汇款、抵押放款、贴现放款，购买公债或库券以及办理保险业务等等。该局成立之时，储金总额只有1000万元，1935年时增至5000万元，通汇的局、所已增加到9500处以上[95]。政府曾规定，凡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未设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的一切款项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转饬当地邮局代办。这样，邮政储金汇业局便成为南京政府吸收大量存款和汇兑资金的工具，到1936年6月，其总资产额已达8520万元。

上述是政府控制国家金融命脉的所谓“四行二局”形成的简略情况。它们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金融统治机构，其最后形成是在1935年前后。通过1935年实施的法币政策，“四行二局”作为国民政府国家

金融体系的主体地位已经稳固下来，并开始发挥控制和支配全国货币金融总枢纽的功能。“四行二局”的最后形成，可以说是政府国家金融体制及其统治网建立的标志。

二　对私人行庄的控制与全国金融网的形成

国民政府刚建立国家金融机构的时候，对私人商业银行采取了任其发展的政策。按照财政部的规定，私人商业银行的设立只须按照银行注册章程申请注册，年终呈送营业报告即可。因此，私人商业银行在政府初建时发展较为迅速。据统计，1927年私人新式商业银行仅48家，到1931年时已增加到110家，其存款总额也增加到占中、中、交三行存款总额的一半左右[(96)]。

政府对私人商业银行的放任政策虽一度使私立银行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迅猛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又为政府实现对这些脱缰的“野马”进行有效控制提供了前提条件。美国政府为转嫁危机而实行的白银政策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发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大恐慌，政府利用这种突发事变，迅速改组一些重要的私人商业银行，从而实现了对私人商业银行的控制。

国民政府兼并和控制私人商业银行的方式大约有四种：一是采用所谓“官商合办”的形式进行控制，如对中国国货与农商两行就是这样。1929年，政府以提倡国民集资的名义，组成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银行，其中商股占五分之三，官股为五分之二，资本额为500万元。董事长却由孔祥熙兼任，总经理则为宋子良。农商银行创办于1921年，曾有权发行兑换券，因1929年受时局影响而停业，并收回兑换券。1933年8月，将农商银行原资本折为80万元，另加入官股140万元（实收资本共计220万元），将总行由北平迁往上海，改组成官商合办银行，董事长由陈公博担任，总经理为梅哲之[(97)]。这样，农商银行实际上已列入国家资本银行系统。二是利用所谓“经济援助”加以控制，如对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商业储蓄等银行就是这种办

法。此三行有几个共同点：建行历史较长，均为发钞银行，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实力空虚。1935年夏，由于金融恐慌，全国发生挤兑风潮，该三行资金周转不灵，引起危机。在这危难时刻，政府下令主动向这三家银行表示愿意提供经济救援，并以500万元拨给中国通商银行，400万元拨给中国实业银行，另以巨款拨给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解救挤兑危机。然后，政府将此救济款项变作官股加入三行，使它们均变成了以国家资本为主的官商合办银行。三家银行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除杜月笙（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外，其余五人全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人[98]。三是利用金融恐慌，对个别银行进行收买。如1913年成立的广东银行，是著名的华侨银行，因1935年受金融恐慌袭击，资金发生严重困难，宋子文乘机将其收买，然后加以改组吞并。四是利用人事改组对银行进行间接控制。曾在中国金融界早已出头露面的一些江浙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馥荪、陈光甫等人，南京政府对他们均委以高官厚禄，从而对他们所经营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此即“南三行”）等银行渗进政府势力，使其变为被国家控制的银行。至于盐业、金城、大陆和中南（此谓“北四行”）银行，虽未被南京政府直接控制，但它们在业务上则无法摆脱对“四行二局”的依赖与间接控制[99]。经过一系列的兼并与控制活动，到1936年，中国一些重要的私人商业银行都被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之内。

一度在中国金融界十分活跃的钱庄业，1927年以后开始逐步走下坡路。上海是钱庄较为集中的城市，1927至1937年间，新设的钱庄只有16家，而歇业的则有57家；1927年全市共有钱庄85家，1937年时仅剩下46家[100]。在其他城市，因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所引起的金融危机，也迫使钱庄大量歇业或倒闭。据北平、南京、广州、福州、太原五个城市统计，1934至1936年间，钱庄总数从244家减少为151家，减少了38.1%[101]。尤其是从废两改元以来，已失去操纵两、元兑换为主要任务的钱庄业，更是日趋没落。这时国民政府以救济危机、安定市面为名，命令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借款1800万元给

予援助，由财政部组织成立上海“钱庄监理委员会，对上海钱庄进行管理监督”。自此这一封建性质的信用机构也因受到国家金融机构的控制[102]而失去独立性，并逐步转变为近代银行业的附庸，也被纳入国家金融机构的控制之中。

到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以前，国民政府已经完成对全国金融业的控制，并在资本实力上占绝对优势。如全国共有银行159家，资本总额是36,800余万元，而四家国家银行就有资本15900多万元，占全国资本额的43.3%。加上官商合办的省市立银行的资本总额3700多万元；再加上由商业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五家银行的资本额2000万元，合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58%。

上述史实说明，政府的国家金融机构不仅建立、发展、壮大起来，而且已完成了对省市立银行和私人行庄的控制，这不仅为国民政府控制全国财政、金融、经济发展方向提供基础，也为法币政策的实施奠定物质基础。法币政策实施以后，国民政府通过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四行垄断法币发行权的手段，更是牢牢地抓住对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中国国货、农商、广东、新华信托等银行以及北四行和南三行等银行的控制权，实际上则等于控制了南京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已形成的江浙、华北、华南三个大资本集团的主要银行。与此同时，省市立银行和主要私人行庄也被控制了。这就标志着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初步形成，为发展经济，安定政治局面，准备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初步确立。

第五节　整理货币与废两改元

一　货币制度的整理

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来就不统一的货币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化。到20

世纪30年代，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在市场上并行流通，严重阻碍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马寅初1925年8月在给上海学生联合会所作演讲时，对中国货币不统一的现状有这样一番话："国内货币之不统一，人所尽知，各省往来，几若异国，故规元不能通用于汉口，洋例（汉口通用的一种银两计算单位）不能通用于上海，即以京津而论，相距不过数百里，费时不到四小时，然以两地银本位币之不同，金融运用，遂发生许多难题。"马氏举例说，如北京商人向天津商人采办货物50万元，天津商人向北京商人采办货物100万元，两相对抵，则津商欠京商50万元。在正常情况下，按理津商只要给京商支付50万元现款就可以了。但是，北京一向使用"长锭十足银"（重10两）；天津使用"行平白宝"（重50两），其惯例是"天津不用锭，北京不用宝"。那么津商所欠京商50万元怎么办呢？其办法是津商用宝银在钱庄或银行兑换成锭银，然后再付给京商。在兑换锭银时，津商要受到钱庄或银行折扣的盘剥，吃亏不小。如此一来，津商感到无利可得，下次就不会再来向京商采办货物；反过来，京商也不会找津商采办。长此以往，双方交流减少，商品不能流通，势必导致市场凋零[(103)]。

类似津京的情形，其他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有东北商人欠上海商人货款100万元，除了用货物抵偿外，偿还现款也是十分麻烦的。因为"东北王"张作霖曾规定：禁止现银出关，每人出关时只能带银50元。当时东北实行流通券（纸币）"奉票"，虽说支付方便，但不能用于上海，沪商当然不接受。如果要解决付款问题，"只有间接汇兑，商人先用奉票购买日金送至大连，托朝鲜银行汇至日本"，日本又汇至上海，沪商将日元卖出兑换成上海通用的"规元"。"如是往来，非假乎于日本不可"。除了银行从中盘剥不说，如果中国"欲与日人经济绝交"又怎么办呢[(104)]？因此，货币制度的不统一，严重地阻碍着国内商品的流通，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不能有效地占领，为外货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所以，整理和统一中国货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财长宋子文认为：中国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必须加以整理，其整理目标，应从开铸统一的国币，严禁各种劣币流通方面着手[105]。在1928年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上，他提出应该统一“各省参差之币制”，整理“滥币”。会议通过了关于整理纸币与硬币、废两用元的提案。嗣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又通过了改革币制的方针，包括“实行改两为元”、“施行金汇兑本位办法”。

（一）整理纸币

在整理纸币方面，宋确定的最终目标是由国家银行统一纸币的发行权。其依据是，“纸币发行之原则，系为代替现币之用；而现币之铸造权系专属于政府，则纸币之发行权自应限于国家银行，其余各银行均不得印发纸币”。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内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多得“几至不胜枚举”，要马上一律取消难以做到，只能徐图整理之策[106]。其办法是对不同发行机构采取不同措施。如对中央银行应呈请国民政府授其享有纸币发行权，载入《中央银行条例》，公布施行；对其他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一面调查这些银行的发行数额与相应的发行准备情况，制止滥发；对一些不具备条件发行纸币的银行，则取消之；同时又制订颁行纸币印制运行条例，对这些银行发行纸币给予限制。对于数量众多的各省县属地方钱庄、商号，则严令禁止发行纸币和类似纸币的票券。宋子文想通过这些措施，限制其他银行、庄号发行纸币，“然后再限令各发行银行分期自行收回，撤销其发行权”[107]，由国家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统一币制。

（二）严格整理广东、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种纸币

（1）整理汉口中央银行纸币及财政部在汉口时期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借之纸币。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汉口中央银行曾发行钞票近2000万元，又委托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过钞票。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为集中现金，下令停止钞票兑现，引起武汉经济恐慌，国民政府的信用受损颇大。在192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上，部分代表曾

提出应对这些钞票加以整理。接着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便决定以发行公债的办法来收回汉口中央银行和中交二行当时发行的钞票。1928年11月，财政部发行民国十七年金融公债4500万元，收回尚在市面上印有“汉口”字样的三行钞票。这笔公债还本期限较长（自第六年至第二十五年），仅每年付息两次。对于上述三行汉口钞票的持有者来说，尽管不可能马上兑现，但毕竟把手中几乎变成废纸的汉钞变成了可望获得本息的债券。这对安定民心、维护政府信用大有益处。

（2）接管中央辅币券的兑换事宜。中央辅币券是北伐期间由国民政府总司令部发行的，以充军饷之用。这是一种变相的纸币，在大规模战事期间，中央辅币券固然可以凭借超经济的力量进入流通，但它的信用无法同其他大银行的纸币相比拟，在流通过程中常遭拒绝收受。在北伐战事进行期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曾在一些地区设立中央辅币券兑换所，以维持其信用。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之后，宋子文把中央辅币券也列入整理之列。其具体做法就是在维持中央辅币券信用的同时，逐步使之退出流通领域。1928年10月，宋子文以财政部的名义接管了中央辅币券的兑换事宜。他一面训令财政部下属各征收机关，并发布告：照旧行使收受中央辅币券；另一方面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那里接收所有印完的中央辅币券，予以封存，不再投入流通。为了加快收回市面上的中央辅币券，又在北伐战事所经地区增设兑换所，由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兼营中央辅币券兑换事宜。到1930年上半年，基本上收回了市面上的中央辅币券。

（3）整理湘鄂赣三省通用大洋券和湘赣桂三省通用毫洋券。这两种钞票在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一度由汉口中央银行代兑，不久便停止兑现。1929年1月，宋子文将湘鄂赣三省通用大洋券与汉口中央银行钞票一并整理，委托上海江苏银行办理十足掉换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后因江苏银行难以独家完成掉换事宜，宋子文又令财政部驻湖北财政特派员公署着手附近地区的大洋券掉换金融长期公债事宜。1929年7月大洋券掉换公债事宜到期后，宋子文又令湖北财政特

派员公署及上海江苏银行开始办理湘赣桂三省通用毫洋券掉换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事宜，至1929年底，这两种纸币的整理事宜基本完成[108]。

宋子文对上述纸币整理的完成，既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又提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基本上确立了财政部在纸币发行上的信用。这样就更有条件对其他金融机构所发钞票进行整理了。

（三）整理铸币

宋子文认为整理铸币（硬币）更加急需和重要。他指出："吾国币制之紊乱，近年已达极点。各省之银铜辅币滥铸滥发，尽人皆知，固无待赘述；即以一元钱币而论，尚有站人洋、龙洋流行市面。形式既未能统一，成色重量自未必一致。因是货币之法价不能维持，市价之涨缩随之而生，自应亟图整理。故厘定币制法规，实为最要。"[109]在实施铸币整理的步骤上，宋子文则主张循序渐进，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拟贸然施行。他主张要实行铸币统一，首先要统一铸造机关。北京政府时期，以天津造币厂为总厂，南京、武昌、成都、广州、云南、奉天、长沙、重庆、杭州、安庆、上海各造币厂为分厂。但各分厂在用人行政方面皆处独立地位。宋子文认为铸币厂数目过多，铸发必滥，应当酌加裁并。1928年10月，宋子文便决定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改建为中央造币厂，筹办开铸统一的国币。这一筹办工作包括清偿原上海造币厂旧债务、扩充厂基、建筑厂屋、添装机器和聘任外籍技师，另外还确定了国币图案、向外国定制铸币模具。对其余造币厂，宋子文则令严加整理，不具备条件者则予以取消[110]。实际上，宋对硬币整理工作未及开展。他的根本思想是主张对现行货币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二　图谋采行金本位制与实行海关金单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白银为货币，以白银重量计值，以两为本位，

故称银两。鸦片战争以后银元由墨西哥输入中国，清光绪年间中国又开始自铸，到民国时期已成为全国通用的货币。银元是一种铸币，有一定的模式、重量和质量，较银两使用方便。所以，清宣统二年（1910）颁布的《币制则例》、民国三年（1914）颁布的《国币条例》，理论上已确定以银元为本位货币。嗣后，政府的财政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银行界人士均以此为努力目标，但始终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当时在金融业中尚占极大优势的钱庄业反对，外国银行团借口过去债款都是以银两计算的，改成银元换算困难，因而也反对，还有其他理由。

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整理全国货币之可行性增大。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银价高涨的因素开始消失，白银产量与日俱增，而白银需要量则日渐减少，银产量供过于求，价格开始暴跌。如1920年伦敦标准银价为每盎司61.95便士，而到1928年却跌为每盎司25便士左右，等于最高银价的五分之二，到1931年2月竟跌至12便士半，仅等于最高峰时的五分之一[(111)]。银价暴跌，对以银为货币的中国，用银币偿还外债和对外汇兑十分不利。而金价日益高涨，又引起国人极度恐慌，中国是否仍应继续保留银本位制，还是改用新货币本位，又引起热烈争论。宋子文为寻求最佳的改革币制方案，决定邀请美国著名货币专家甘末尔（Kemmerer，Edwin W.）博士来华，帮助筹谋改革币制方案。

甘末尔是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曾先后为十个国家充当财政顾问，策划币制改革，有丰富的实际改革币制经验。1929年2月，甘氏偕同财经专家恩·杨格（Arthur N. Young）博士等十四人来华，组成财政设计委员会，谋划币制改革方案。经过六个月的调查研究，于同年11月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草案》，共分五章四十条，另附长篇理由书，其内容之详密为历次方案之最。

改行金汇兑本位制。草案规定，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但并不主张铸造金币，只以金量来确定货币单位价值，因此可谓金汇兑本位制

[112] 。新货币单位为“孙”（sun），其记号为S，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每“孙”为100分，每分为10厘。1“孙”含有纯金60.1866公毫，其价值等于美金4角，英镑1先令7265便士，日币0.8025元。实际流通于国内之货币为“银孙”。1“银孙”之实值较面值（等于1金单位）减少三分之一，为信用货币。还有5角和2角的银辅币、1角和5分的镍币、半分及2厘的铜币。政府承诺个人可选择以金汇票或生金为无限制的兑换，以维持“银孙”与“金”单位之平价 [113] 。因中国地域广阔，可根据各省经济情况分先后推行，故称逐渐采行案。

1930年3月30日，宋子文公布了甘末尔的货币改革方案，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而在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宋子文最终搁置了采用金本位币制的方案。从国内来看，各界持反对意见者居多。究其根源，在于中国用银作为货币的历史久远，已形成巨大的惰性力；而一旦实行金本位，就会被认为将大量抛售现银，引起银价暴跌，这是持银者所不愿见到的。实行这一重大改革，必须筹备足够的储备金。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经济恐慌之中，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大笔储备金；中国对外出口也因之下跌，外汇储备减少。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致使国际市场上英镑、美元及其他货币对黄金的比价变化不定。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宋子文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立即采取金本位币制的经济力量和其他条件，而且改行金本位币制之后，也难以保证新国币汇价的稳定。因此，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仍称币制改革将依据甘末尔的方案，但强调要“参酌国情”。此后，在宋子文任内实际上已放弃了采取金本位的方案。

甘氏的谋划虽未导致划时代的币制改革，但却帮助财政部解决部分财政金融难题。自从1928年世界银价再度暴跌以来，向以海关税收为抵押的外债（包括赔款），因关税稽征系以白银海关两为单位，而对外债务还本付息却以黄金（如英镑、美金、法郎、日金等）为计算标准，因此关税收入受此影响而无形减少，使国家财政损失颇巨。为避免这一损失，国民政府毅然宣布，于1930年2月1日起，将海关进

口税改为征收价值较稳定的金单位。每一个海关金单位值纯金60.1866公毫，即甘氏草案的金本位之单位——“孙”（Sun）所含的纯金量。实施之初，与各国货币的换算率亦完全依照甘氏的设计，即每一海关金单位（关金券壹元）折合美金4角，英镑1先令7265便士，日币0.8025元。其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此海关金单位便不与任何一国外汇固定联系，而完全以单纯含金量计算。从此以后，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偿付本息，可以直接用海关税收（关金券）偿还，无须再用银两折算各国金币还债。这就减少了因国际银价涨跌对我国财政和税收的影响[114]。海关金单位开始使用时，仅为稽征计算单位，非真正货币。但财政部声明：商人完税，除以银洋、英金或美元向海关兑换关金券外，并可以向中央银行直接购买，以防汇价涨落，而且可向中央银行开立关金券活期存款户。于是各商业银行及钱庄等相继前往中央银行开立存户，进口商也可持纽约或伦敦电汇证明书，或即期汇票，前往中央银行折合关金券使用。这样，关金券（即海关金单位）便逐渐进入市场成为实际支付工具。就此而论，甘氏草案对中国财政货币不无贡献[115]。此外，随甘氏来华的著名财政专家杨格博士在甘氏完成任务回国后，仍继续留在中国担任财政顾问，到1947年因身体欠佳才回国，在华期间对中国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改革无不参与谋划，贡献良多[116]。

三　实施废两改元及影响

废两改元是宋子文在货币单位方面进行的重大改革，但在实施步骤、日期问题上是较慎重的。如1928年春天，浙江省政府曾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废两改元案》，经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同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又决定于1929年7月1日实施“废两改元”，而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又通过“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的决定[117]。宋子文一度有此考虑，但他清楚地知道，在统一的国币大量开铸之前，不宜匆忙宣布废两改元。在实际过程中，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筹建中央造币厂并非轻而易举；而分别向西方各国定制新国币模具，加以比较选

择，也需花去不少时日。因此，宋顶住了一些急于施行废两改元的意见。例如：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转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呈请通令各海关税率改用国币为单位以利商民一案，请财政部查照核办。而宋认为：我国币制复杂，各地不同，海关税率沿用关银，因关银划一，以此估计，可求一致。现在币制尚未统一，若一地任用一种货币，则全国税率名同实异，不便于商民者尚小，影响于税收实大[(118)]，因此驳复了这一提案。1931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公布海关出口税制，并要求财政部“以后关于税率之规定，应一律改两为元”。宋子文在听取了国家税则委员会和总税务司的意见后，又认为暂不宜施行。他的理由是：“在此整理币制尚未就绪之时，各商埠通行之银两银币名称甚繁，重量成色复至纷歧，商业习惯既以银两为通货之准则，而标准国币现尚不敷市面流通，设将海关出口税则骤予改两为元，则国税难免受重大之损失，而洋厘行市必将随之增涨，影响银市亦非浅鲜。拟请俟将来修改规则时，标准国币业已推行，再行改订，庶于国税商务两得其宜。”[(119)]

后因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国农工商各业均日趋凋敝，上海洋厘骤跌，造成空前低潮，内陆城乡的银元涌进城市。1932年春，上海银元过剩，内地流进上海的银元达5466万元[(120)]，比以往加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机已成熟。当时官商一致支持废两改元的原因有三：

（1）银两的枯竭。自清末中国自铸银元后，银元不断铸造，银锭逐渐减少，内陆乡村银两几已绝迹，实际收付多改用虚银为记账单位，如上海之九八规元，天津之行化银，汉口之洋例银等。故“废两”仅是停止以虚银为记账单位，使实际收支与记账单位趋于一致。

（2）银元的普及。银元数量不断增加，流通范围日趋广泛。据估计1928年全国仅有6亿银元，到1933年财政部估计，流通的银元已高达14亿元，用作准备金的银元有2亿元，共达16亿元之多。由于银元普及，用途日广，举凡政府收入，盐税公债、公司行号资产负债，

莫不用银元计算。而在1933年中流通的银锭，据估计仅有1.53亿上海两（约2亿元）。充裕的银元为废两改元提供方便。

（3）洋厘的跌落。上海银元价格一向为各地银元价格的标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金融市场乃呈瘫痪，内地钱庄无法前来结账。战事结束后，上海银行钱庄纷纷要求内地钱庄以现款清账，这样上海银元存量就大增。1931年底上海白银存底仅为2.66亿元，至年底上海白银存底即达4.38亿元，到1933年3月更达4.72亿元。结果上海因存银元量多而价格低落。内地因市面萧条，银元需要量小而价格低落。如1931年以前，洋厘行情约为每元价7.3钱即每百个银元值银73两。从1932年3月开始价格下降，到1932年8月洋厘跌至6.8375钱，造成六十余年来的最低价。

当时银两与银元的熔解点为0.711564两，即铸造银元1元需7.11564钱白银。洋厘（就是银元1元折付银两时的折算率）降至0.7两以下，就是银元1元折付银两的价格低于0.7两，这样，银元1元的价格就低于它的成本价0.711564两，实属不正常。就葛茉欣法则而言，两种货币若同时流通市面，价格高的将驱逐价格低的，洋厘价值过分跌落，将使人民收藏银两而抛出银元[121]。这样，市场流通的银元就会更加充裕，实施废两改元更有利于市场资金的流通。

（4）中央造币厂已完成整建，拥有每日铸造40万个银元之生产能力[122]，银元供应不成问题，为改元提供了条件。

到1932年秋，废两改元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是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谈话，说明废两改元的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完全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123]。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须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因此，财政部又于当年秋间“罗致上海中外金融界重要人员，组织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进行研

究。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统一标准的银元。同日宋子文颁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规元7.15钱合1元，并于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3月10日这天，上海各业开始实行银元本位制，银钱业取消洋厘行市，同日海关税收亦改收银元。在上海试行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6日颁发废两改元训令："兹定四月六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应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124] 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以银币收付。凡持有银两者，得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125]。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预先于3月8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公分。""银本位币1元等于100分，1分等于10厘"[126]，等等。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废两改元，还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127]。第三，撤销炉房及公估局。第四，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批准，暂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中央造币厂成立后，财政部便聘请美国造币专家、原美国造币厂厂长罗伯特·格兰特（Robert，Grant J.）担任造币厂的厂长和顾问，并有三位曾在美国费城造币厂受过训练的中国技师襄助。同时还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以保证质量。造币厂所铸造新银元，查不出一个不合乎标准的。新铸的银本位币，成色0.88，重量为26.697克，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

称“孙头”或船洋。旧银元有“袁头”龙洋等，在铸银元的同时，还铸造两种厂条：甲种为成色0.999的“A字”厂条，乙种为0.888的“B字”厂条，每条值1000银元。中央造币厂从1933年3月1日开始工作，到1935年6月30日止，先后共造1亿3千3百万枚新银元和5千6百万元的银条（全部是“B字”厂条）[128]。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之后，新银元的鼓造工作仍旧进行，直至年底止。这样办既是对公众留恋用银情绪的一种安抚，又表示没有贬低银元价值的意图。法币改革后至1936年下半年又生产5亿元价值的“B字”银条，银两的废止是中国完成了对币制的一次真正而有效的简化工作。一座拥有合格人员的现代化造币厂的存在，为铸币的基本改革扫清了道路。造币厂在1935年币制改革后，又集中力量铸造法币本位币1元以下的各种辅币，从1936年2月开始发行使用[129]。中国币制改革能顺利成功，中央造币厂功不可没。

废两改元的实施，是中国币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自民初以来，国内金融界、工商界便有废两用元之议，但由于国内事实上存在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分裂局面，各地成色、重量上参差不等的铸币未能统一，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特别是各省之间交易过程中，仍然须将银元换算成银两。这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实施废两改元，既使货币计算单位由繁变简，又使不同的银元归于统一，由中央造币厂开铸的国币代替，确实对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这也是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使然。废两改元既起到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又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也为以后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废两改元的作用和影响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对加强国民党中央对各地方派系的驾驭力量，强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实行废两改元，中国仍然还是行使银本位货币制，必然受

到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而不稳定。因此，实行法币政策便是历史发展的抉择。

第六节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　实施法币政策的导因和条件

世界货币金融形势的变化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先后放弃金本位，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如英国于1931年8月放弃金本位之后，由于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等双重影响，英镑汇价急剧下跌；日本于同年12月停止金本位，日汇也迅速下落；美国于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新政也放弃金本位。同年12月，美国决定美元的准备金由足金改为“金三银一”使美元贬值。为达到这一比例，就得高价购进13亿银元，这样，它在金银的储备量上均可居世界首位，以“实现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借以执世界盟主之企图”[130]。其结果是，到1933年底和1934年初，英镑汇价已跌40%，日元汇价亦下降60%，美元汇价贬值40.9%。英、美、日三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它们的货币贬值，中国银元汇率却成反比例抬高[131]。中国以银为货币，不论银两或银元都有固定含银量，无法任意贬值，致使国货难以输出而外货倾销易，故入超日甚。国内农工商各业均因受此打击而日趋萧条，中国币制不改无法振兴经济。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币制的冲击　美国是世界的主要产银国，加上在国外投资的银矿，每年产银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6%。银价低落使美国银矿主和白银派参议员大为不满。他们极力主张提高银价，以增强东方各用银国家人民的购买力，打开美国货物的销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困境[132]。为此，美国从1933年起推出一连串提高银价的办法，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1934年6月实施的《购银法案》。此法案授权财政部购买国内外白银，白银价格最高可达每盎司为美金

1.29元。如此高价收购达13亿元之巨的白银，促使世界银价飞涨。从1934年7月至1935年5月，纽约银价由每盎司0.4625美元升至0.7437美元，伦敦由20.5便士上升为33.88便士[133]。世界银价步步高涨，中国汇价随之激升，对中国经济造成三大不利：（1）国货因白银汇价高涨，外销价格也随之增高，更难输出；外国输华商品却因物价、汇价双重降低则加速倾销；结果中外贸易逆差日甚。（2）华侨汇款以往占中国对外收入的大宗，是弥补外汇逆差的重要来源，现因世界经济恐慌和白银汇价高涨而大为减少，使我国对外收支逆差更甚。（3）国际市场银价高涨，中外银价悬殊，为外国在华银行运银出口谋取暴利，造成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们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仅1934年就达25，600余万元[134]，其中8月份最严重高达7900余万元，仅8月21日这一天，只汇丰银行一家就交英国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运出白银1500万元。除外国银行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破坏我国金融外，国内外投机商、冒险家也趋之若鹜，纷纷到各地搜购白银，装运出口，赴伦敦、纽约出售谋利，致使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7月1日到10月15日，仅三个半月内，中国白银外流量就达2亿元以上[135]。白银大量外流使上海的存银，由最高峰的1934年5月底的5.94亿元，降至10月底的3.84亿元，到11月15日又降至3.67亿元[136]。

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中国金融和经济稳定　如：一、大量银元被熔为银块出口获利，导致白银准备锐减，通货紧缩，拆息飞腾。更有甚者是人心浮动，在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迫使许多银行停业或倒闭。如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有14家银行停业，资本额达210万元。二、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奇缺，物价跌落，以上海物价为例：1932年跌11.4%，1933年跌7.7%，1934年跌6.5%，1935年跌0.7%，1935年比1932年总共下跌23.9%[137]。由于物价下跌使商店经营赔本导致商业萧条，工厂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仅上海一地，工厂就倒闭238家，改组839家，全国主要工业营业额大幅度下降[138]。三、中国对外贸易入超增加和华

侨汇款减少，使中国对外收支逆差增加，直接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困难。财政金融是巩固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救治。

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　为了遏制白银外流和稳定币制，财政部决定从1934年10月5日起，采取紧急处置：征收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凡运银本位币或厂条出口，征出口税7.75%（出口税为10%，减去银币铸费2.25%），运大条宝银及其他银类出口，征出口税10%。如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兑之比价，与中央银行当日照市价核定之汇价相差之数，在缴纳出口税仍有不足时，应按其不足之额，加征平衡税[139]。即平衡税的税率应和赢利率相等，可随国际银价涨落而增减，进行灵活调节，使白银输出者无利可图而停止活动。

但事实上，自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开征平衡税后，国内经海关运银者少了，而偷运者则大为增加。据中国银行精密估计，仅1935年白银偷运，曾达2.3亿元[140]。严重的走私，使平衡税失去意义。银本位制的根本动摇，金融市场与整个国民经济行将崩溃，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另谋新途——提早实施法币改革。同时，3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重要国家因世界经济恐慌而相继“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141]的潮流，对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除此以外，如国家财政困难，预算庞大，赤字无法平衡，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迫切需要筹集战时财政，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富有弹性的货币制度给予配合；而废两改元的顺利成功和金融垄断体制的形成，又为实施法币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和奠定物质基础。

二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英国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Leith—Ross）来华考察协助

国民政府1934年10月开征白银出口税之后就考虑币制改革方

案，同时又极力恳请美、英等国派财政专家帮助策划，企图在洋人支持和援助下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英国在中国的经济权益最大，为保持在华经济利益优势，打破日本独占中国野心，在接到宋子文请求援助之后，立即开始行动。1935年3月3日，英国提议由英、美、法、日四国共同借款援助中国。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A.M.G.Cadogan）立刻入京同外交财政部门接洽借款事宜，惟日本反对，美法又不热衷，事遂不成。同年6月初，英国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来华，考察英国在华贸易现况，并协助中国解决财政与金融问题。

李滋·罗斯是英国第一流财政专家，从1932年起担任英国首席经济顾问，8月10日李氏偕同英格兰银行专家罗杰斯（Rogers）等一行十四人来华。于9月6日先抵日本，在日停留两周，9月21日抵上海。李滋·罗斯首先与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恳谈，随后即偕英驻华大使贾德干晋京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财政部长孔祥熙会商。9月底回沪设办事处，对中国财政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并与中外金融商业界头面人物交换意见，其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国货币制度进行“详细调查研究”[(142)]。美、德、法等国亦派代表团来华，但持观望态度，没有实际行动。

（二）中国自行制定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方案在1934年10月开始谋划。不过这是绝对保密的，以防日本人破坏，只有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宋子文、孔祥熙进行过秘商。而后宋立即与美籍顾问杨格等人着手规划，草拟各种币制改革方案。1935年6月3日，财政部次长（原为钱币司司长）徐堪，奉命拟定法币政策具体条文。他独居南京郊区，经若干时日，废寝忘食，草拟实施法币政策办法。“其初方考虑实行金本位制与虚金本位制，均难适合现状。最后乃根据国父钱币革命之理论，实施法币政策，对内不兑现，然必须确立信用，除以现金为准备外，一切完粮纳税均用之，方可示民于信。但对外则可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汇价。于是豁然贯通，乃拟具实施法币政策六条。”“拟定后复字斟句酌，逐条检讨，然后定稿。其后虽经财经首长宋子文、孔祥熙及最高当局之研究

审阅，复征询李滋·罗斯之认可，但并无一字修改”[143]。这就是同年9月底李滋·罗斯抵南京后，孔祥熙送给李氏征询意见的草案。李氏阅后视为周密完善之规划，极表赞许；并协助财政部解决若干实施细节问题。由于英国的同情和支援，使币制改革的障碍去除大半，中国政府断然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实施后，李滋·罗斯又协调英国政府和英商给予支持，协调各国在华商人给予支持。

（三）法币政策的公布实施

11月3日午后4时，孔祥熙在上海财政部办事处，召集银行界领袖开会，讨论改善金融，巩固币制，实行新货币政策的办法，至晚9时结束。会后即颁布实施徐堪拟定的《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这就是《财政部改革币制令》。具体内容有以下六项：

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十一月三日止的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如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的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

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44]。

《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还谈到："中央银行之组织，亦将力求改善，以尽银行之职务。其一般银行制度，更须改革健全，于稳妥条件之下，设法增加其流动性，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并将增设不动产抵押放款银行，修正不动产抵押法令，以谋地产之活泼。"[145]

1935年11月4日凌晨，为减少商民的疑惑，孔祥熙发表谈话，说明实施法币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并另以布告方式，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公布币制改革布告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规定该委员会由财政部、中、中、交三行及银钱业代表等组成；奉命保管法币准备金，并办理法币发行收换事宜；法币准备金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规定的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库房为准备库，予以保管等等。

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共团体和个人持有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者，应于民国1935年11月4日起，三个月以内，就近交各地兑换机关换取法币；兑换机关除中、中、交三行及其分支行或代理处外，还有三行委托之银行、钱庄、典当、邮政、铁路、轮船、电报各局及其他公共机关或团体，各地税收机关和各县政府；除三行及其分支行、代理处以外的兑换机关收兑的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或其他银类，应立即送交附近中、中、交三行兑换法币。国民政府想通过发行法币聚敛白银，而广大群众由于长期使用银币的习惯，和对法币的不

信任，兑换法币期限由1936年2月3日延至5月3日，而后又以偏远省区“持有银币银类未即兑换法币者，仍不在少数”，决定对这些地方兑换法币事项，暂维现状，继续办理，将来由财政部斟酌各地兑换情况，随时随地分别明令截止。

改革币制布告公布后，在全国各地均开始实施新的法币制度。但是，由于现存军阀割据的关系，现银封存在各地方，并未集中到中央，特别是一些偏远省份更是如此。国民政府对于这种情况无能为力，只好顺水推舟，在天津、汉口、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分会”，“办理分会所在地法币准备金之保管检查事宜”。此外，广东、广西还规定以本省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有的地方仍暂准许银币流通。

关于辅币问题，上海造币厂遵照1936年1月的《货币铸造条例》，陆续铸造和发行了一种重量分别为6公分、4.5公分和3公分的两角、一角和五分的镍币；另一种是重量为6.5和3.5公分的一分和半分的铜币（因抗战爆发，改革辅币方案未彻底实行）[146]。

三　实施法币改革政策的效应

实施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金融史上的重大变革。过去人们多看重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铸币，为实行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而造成的恶果，故对法币改革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更看到它的积极效应。

第一，实行统一发行，采取管理纸币制度，不仅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有利于货币统一和国民经济发展。过去，中国货币主体为金属货币，既笨重又不统一，对商品交换极为不利。发行权又不集中，有三十多家金融机构有发行权。法币改革实施后，发行权集中于国家四大银行，把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定为法币，这就是统一全国货币，有利于商品交换，促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国民经

济发展。同时，由铸币换成管理纸币，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使中国加入世界先进行列[147]。

第二，废除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改革，效法英美采取货币减值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政策时，规定银币1元兑换法币1元。而实际兑换时却是银币6元兑换法币10元。银行可以用白银60%，票据40%，兑换100%的法币。这样，法币的流动量就比银币增加了。1935年11月2日以前，四行发行的钞票仅为4.57亿元，到1937年6月底就增发到14.07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3.2倍[148]。

由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使货币紧缩，市场危机得到了缓解，全国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为之一变，从1935年11月开始呈现出回升的景象：如上海1936年上涨12.6%，到1937年6月底又上升到16%；如果以1937年6月的指数126.1与1935年7月的最低指数90.5相比，则高出39.3%，如果与1931年8月的最高指数130.3%相比，则低3.2。物价的普遍回升又使商品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便刺激农工商各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如：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自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几乎增加45%。1936年工业品总产值为1，227，400万元，比1935年的1，104,100万元增加了11.1%，比1927年的670,100万元增加了83.2%。1936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989千万元，比1935年的1.879千万元增加了5.9%。从1916年至1946年铁路运量的工、矿、农、林、畜牧产品历年货量指数表中，还可以看到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峰[149]。法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使刚刚露出的头角就被淹没了。

第三，实行白银国有，卖银换汇，稳定法币汇价和金融行市，有利于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实行法币政策后，法币对内采取管理纸币制度，1元法币不能兑换1元银币。对外却采取金汇兑本位

制，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来保证。从11月5日起，由中央银行每日挂牌公布汇价。当时规定的汇价是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其他汇价由镑汇算出，每100元法币等于29.75美元，等于103日元[150]。此后法币对英镑、美元和日元的汇价，直到1938年3月很少变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全国所有的白银都收归国有，而后又将白银运到纽约和伦敦国际市场去出卖，换回的外汇做法币准备金，由中央银行集中保管的结果。据美籍财政专家恩·杨格统计："币制改革之际，政府各银行收受其他银行所持有的白银总计约共两亿盎斯，这些都加进政府各银行原已拥有的1亿3千万盎斯之内。此外，1937年中期以前的二十个月内，又从公众方面收集到1亿7千万盎斯。因此在白银国有化方案之下，总共动员了5亿盎斯白银。"[151]又据张公权估计：到抗战前，全国收缴白银总额约达8亿银元[152]，占全国存银三分之一以上。收缴如此庞大的数额，有助于法币准备金及外汇基金的设立，对法币改革政策的成功起了良好作用。

收缴如此庞大数额的白银，封藏国内，如遇国际银价下落，将会大贬值；又恐中日战争爆发，外运不及，不如早运国外出售，换回外汇，充作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基金，以稳定汇价，建立法币的国际信誉。而且国人对管理纸币（法币）的信任程度不佳，而法币可随时按稳定汇率换取外汇，也可安定国内法币价值，稳定民心。世界银价均受美国购银政策影响，故国民政府寻求美国协助。在1935年11月2日法币政策公布前一天，美财长摩根索同意购银，13日签订协议，美方以每盎司美元6.625角向我购买白银5千万盎司，限定所得款数悉作稳定新币值用。1936年初，财政部又请求美国收购白银1亿盎司，美国建议派代表团磋商。中国于3月13日派陈光甫、顾翊群、郭秉文等赴美洽商，至5月14日达成协议[153]。美向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每盎司售价为美元4.5角，另以5千万盎司为担保，贷给中国2千万美元。并约定中国保持币制独立，不与世界任何货币集团联系，及中国至少保持25%的白银为发行法币之准备[154]。财长孔祥熙随后宣布：法币现金准备，可用外汇充之，唯白银准备最低限

度，应占发行总额的25％[155]。从此，中国法币既同英镑有联系，又以美元集团为后盾；还有充裕的外汇作准备。这样既能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又能扩大法币对内准备金的范围，法币发行量亦随之扩大，金融市场因而活跃。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在美存银尚有6200万两，卢沟桥事变后，将所有存银售予美国，所得价款又买回美国黄金3000万两，存储联邦准备银行，作为发行准备[156]。

由上可见，实行白银国有，卖银买汇，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和安定国内金融行市，既可解除金融恐慌，又可用法币买汇支付中国所欠各国的外债，以避免用白银偿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而且法币与英镑、美元、日元有固定比价，也有利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法币改革之后的头几个月内，出口超过了进口。“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因而到“1937年上半年，进口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40％”[157]。同时，中、中、交三行外汇准备金充足，又可为农工商各业提供大量贷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第四，缓解金融危机和解决财政困难，为准备战时财政，促进全国实质统一创造条件。法币政策实行以后，放弃银本位，银价与币值完全脱离关系，法币对内不再与定量白银有等价关系，对外汇价也可以作人为的控制。如法币改革前，每一银元所含白银的价值为英镑24便士，而法币实施时，却规定法币每1元只能购买英汇14.5便士，等于贬值40％。这就可以冲销世界各国因放弃金本位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向中国低价倾销汇兑的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放弃银本位，实行白银国有，杜绝外流，使法币与白银脱钩，终止世界银价涨落对中国币制发生不利影响，使中国币值稳定，金融行市正常运行，这就缓解了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得到解决。法币改革后，由国家四行独享货币发行权，原为地方及商业银行分占的发行利润，全归政府所有。而且法币发行准备金由白银十足准备，改为收回6元银币，发行10元法币，降低40％。这样，国家收回8亿元银币，

就可发行12亿元的法币，政府无形中增加了4亿元的收入。同时，实行白银国有，集中准备，国家总共收回8亿盎司白银，将这些白银分批运往纽约，换回美元和黄金，稳定金融行市，政府财富顿形增加。资金因集中而雄厚，金融因调剂而活泼，国家的金融危机和政府的财政困难立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到1936年秋天，国家的旧外债基本还清，中英、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法币对外汇率稳定，无形中提高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法币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被取消，白银被收缴为国有，在财政上不得不依附中央，受中央节制，各省之间因货币、市场的统一，商品交换经济交流更加密切；随着法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人民对法币信用的依赖程度提高，对政府威信的认识有所加深。这就使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同全国人民的关系密切起来，无形中加强了全国经济、政治、思想的实质上统一。这就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创造了条件。

第五，实行法币改革，对坚持抗战起了保证作用。法币改革后，改银本位制为管理纸币制度，钞票发行富有弹性，可以根据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有计划的增加发行。一旦国家面临生死关头，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战争急需。抗战前期，法币价值尚称稳定，后期增发量大，出现通货膨胀。战时，世界各国普遍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德国马克贬值更厉害。全民族抗战八年之久，军用浩繁，国民政府能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法币政策功不可没。

此外，实行白银国有，战前即将白银运往国外，所得外汇存在海外。战争期间，得以外汇购买外国物资和军火运回国内，充实抗战力量。法币改革后，铸发新辅币，将大量的含铜量较多的铜元收回国有，铜为军需金属，用来制造军火，对抗战大为有利。

同时，法币政策实施后，资金集中，调度较易，对筹备战时财政、支援军事作战，特具功效。日本人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158) 银行家陈光甫亦云："抗战之成功在于法币，若无法币，必更艰难。"(159) 冯玉祥在1935年11月4日

日记中记载说："本日政府已宣布法币办法。我以为此事关系抗敌之计甚大，此事若成，将来诸事都好办了，要大家起来拥护此善政。"[160] 蒋介石认为：在抗战前，因"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实赖于此"[161]。总而言之，币制改革，不仅挽救经济危机，有利民生产业，而且对国家存亡与抗战成败，均具重要意义。中国币制，由混乱分歧到统一健全，由传统过渡时期的毫无制度，到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确实是货币史上重大事件，正如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吉田政治所言："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事，任何外国的货币改革，其复杂与困难程度诚不能比拟，亦可谓为世界上无与伦比大改革与大成功。"[162]

为避免日本人破坏，此次法币改革方案的筹备计划是极端保密的，对于实施办法六项内容，孔祥熙除同宋子文协商外，甚至事前未送交立法院审议，是事后送请追认的。故宣布后，日本大起恐慌，视为外交上一大失败。英国因为商务关系，早已答应给予协助。中国宣布后英皇已下诏在华侨民及汇丰、麦加利等银行，须遵行中国新币制。日本为此曾责问过英国政府，但想阻挠，已来不及了。因此，此事不仅是中国财政金融史上一项特大成功，亦是外交史上一大胜利。法币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除国民政府做了精心策划和认真推行外，孔祥熙将自家祥记公司交给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保证金2.5万英镑，按当时的汇价，兑换法币40万元，人们听说孔本人肯将英镑兑换法币，疑虑顿消[163]。

法币改革的成功，废除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硬币制度，实行管理纸币制度，使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进入现代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是中国币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七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财政收支概况与赤

字

一　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和赤字

一个国家的财政是整个国家机器维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财政收支是否平衡，直接影响它统治全国的力度。因此，当某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必须致力于财政问题的解决，否则整个国家机器就运转不起来，其统治不可能长久。然而，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又是能否控制财政支出。如果无谓的财政支出过多，不仅使一般国民的经济生活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也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同时，财政收支能否平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其国家具体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所谓财政者是国家生产力发展至一定阶段上的一种缩影。……国家的财政是直接地由国家的生产力来决定的，同时它和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态也是密切地有连带关系的。"(164)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加上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使中国长时间地处在一种不统一的内乱中，生产力无法得到发展，久在中国驻节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曾经形容"混乱与中国已经成了同义语"(165)。

南京政府是在篡夺北伐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建立起来的。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不仅要进行所谓"围剿"红军和苏区的反人民战争，而且还要进行排除异己的军阀战争。长期的混乱与内战，使中国消耗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时期，南京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服务于军事需要为目的，一切以筹措战费为中心，把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内战上，军费支出日见增长，一年比一年花的钱多。这就是国民政府军事独裁统治的一大特点。

南京政府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债台高筑。它对北京政府积欠的内外

债和清政府的对外赔款一概承认下来，并逐步整理清偿。因此，它一成立就是一个财政破落户。

为了筹措庞大的军务费和清偿债务及赔款，南京政府的财政实支总额不断膨胀。请看下表[166]：

1927年—1936年度国民政府财政收支亏短数及其与实支总额的百分比（百万元）

年　度	实支总额	借债收入外的实收数	亏短数数额	占实支总额%
1927	150. 8	77. 3	73. 5	48. 7%
1928	412. 6	332. 5	80. 1	19. 4%
1929	539. 0	438. 1	100. 9	18. 7%
1930	714. 4	497. 8	216. 8	30. 3%
1931	583. 0	553. 0	130. 0	19. 0%
1932	644. 8	559. 3	85. 5	13. 3%
1933	769. 1	621. 7	147. 4	19. 2%
1934	1023. 6	638. 2	565. 4	46. 9%
1935	1336. 9	513. 2	823. 7	61. 6%
1936	1894. 0	1293. 3	600. 7	31. 7%

由上表可见：

第一，国民政府的财政实支总额是逐年膨胀的，而且愈演愈烈。1936年比1927年增加了12倍多，比1928年增加3倍多。

第二，财政亏短数越来越多，1927年度的亏短数高达48.7%。但国民政府是新建政权头一年，可能不够正常，可置不论。

第三，1928年—1933年的六个年度，虽经常出现亏短情况，大体上徘徊于10%到20%之间，不算严重。

第四，及至本期最后三个年度，亏短情况就相当严重。平均仅略低于50%，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年度1935年，亏短数目占实支的60%以上。以绝对数来说，1935年度亏短数就达8亿多元。

二　内战军费和债务费占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国民政府不顾债台高筑，竟使财政支出在十年间增加了十二倍多。那么，它的财政支出都用到哪里去了？

以1934年度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实支情况为例[167]：

（单位：元）：

党务费	6,217,102	国务费	14,077,236
内务费	4,826,030	外交费	9,772,887
财务费	72,573,581	文教费	36,735,660
司法费	2,292,286	实业费	36,735,660
交通费	5,028,271	蒙藏费	1,903,347
建设费	40,460,791	军事费	367,819,221
国家事业费	82,565,070	补助费	48,599,070
抚恤费	1,582,916	债务费	355,779,876
预支费	8,764,718	暂记各款净额	664,542
整理内外债准备金	5,000,000		
支出净计	1,059,354,593		
结存	143,658,520		
支出净计及结存	1,212,013.213		

由上列实支款项可见，实支总额为10.59多亿元。而军事费就占3.678多亿元，占实支总额的34.4%；债务费为3.56亿元，占实支总额的33.2%；两者合计占实支总额的67.6%。军事费和债务费是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庞大款项。不仅1934年如此，其他年度也一样。如果把军费与偿债两项支出相加，便占去了南京政府财政支出的70%以上。（因引用资料的来源不一，故本节的数据各年份或不一致，总额与分项之和有时亦不一致。）请看这两项支出的比例（单位：百万

元）[168]：

年度	军费与债务支出额	占岁出百分比
1927	132.8	88.1%
1928	330.8	80.2%
1929	404.8	75.0%
1930	552.6	77.3%
1931	542.6	79.4%
1932	490.2	76.0%
1933	575.2	74.8%
1934	842.4	70.2%
1935	720.6	53.9%
1936	1389.8	73.4%

在1927年—1932年度的六年中，军费与偿债支出占了整个岁出的75%—80%以上，1933年—1936年度的比重略有下降，但平均也在70%左右。

由于军费与债务两大支出所占比重太大，剩下的经费已经不多。而国民党的党务费和南京政府的行政费等项开支又占去了百分之十几，这样可以用于进行文化教育和生产建设的费用就非常有限。据统计，1933年—1936年度各年所支出的实业费、交通费、建设费、文化教育费等，其总数分别是：1933年度0.266亿元，1934年度0.764亿元，1935年度0.871亿元，1936年度为1.616亿元；其在各财政年度岁出中的比重分别为3.5%、6.3%、6.5%、8.5%。虽然1936年度投入物资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费用最高，但仍没有超过10%；而且在这种比重中还隐蔽着部分属于军费的支出。实际上在1927年—1936年度的十年期间，国民政府真正用来投资于生产建设性的支出，估计平均每年从来没有超过岁出总额实数的4%，其中如实业费和交通费的支出都不到1%，建设费和文化教育费虽然稍多一点，但也都超不过2%。

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和清偿债务，致使财政支出逐年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那么，它是靠什么措施来解决困难呢？第一，最主要最根本的是靠增加税收，搜刮人民；第二，靠发行国内公债进行弥补；第三，靠发行国外债券，进行调节；第四，靠发行不兑现的纸币补充。

三　以关盐统三税为中心的国税收入不断增长

国民政府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靠不断增长的国税收入来解决的。我们就1934年政府的收入实况加以分析（单元：千元）[169]：

关税	356,258	盐税	172,778
统税	109,926	烟酒税	9950
印花税	67,528	矿税	2781
银行税	1163	交易所税	330
国家行政收入	8880	国营事业收入	831
国有财产收入	727	地方协款收入	671
国家机关协款收入	18574	国有营业纯益	35,000
其他收入	53,120		
公债库券	249,643	银行借垫款	43,464
上年滚存	9929		
收入合计	1,115,506		

上列各项收入可见：第一，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可分三类：（一）国税收入，计660,386，占总收入的66％；（二）国有企业共收入为167,803，占总收入的14.9％；（三）债券借款收入是291,107，占总收入的25.1％。其他各年度也是国税收入占第一位，其次是债券借款收入。而国有企事业的营利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只到本期最后三年，随着国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才逐步开始上升，占有

一定的地位。第二，在国税收入中，关、盐、统三税占绝对优势，不仅本年度这样，其他年度也如此。第三，与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相适应，国税收入也是不断增长的。如下表：

1927年**—1936**年间的国税收入统计（单位：百万元）[170]：

年度	税项收入	年度	税项收入
1927	46.5	1932	583.0
1928	259.3	1933	659.4
1929	461.7	1934	748.3
1930	535.0	1935	704.9
1931	615.2	1936	1057.3

此表可见：1936年度的税收为10.57亿元，是1928年度的四倍，1929年—1932年度的两倍，比1935年度也增长了30％以上，增长速度很快。

从收入分类情况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盐和统三税，其中关税是最大的税源。关税自主以后，收益逐年增加，超过全部税收总额的一半。1935年以后，虽然比例有所缩减，但仍居主要地位。盐税大约占全部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是仅次于关税的第二大税源。统税实行较晚，然而自1931年后，所占地位逐年上升，也成为一项重要税源。

1927年**—1936**年国民政府关税、盐税、统税实收数及其占税项收入的百分数[171]

年度	税项收入(百万元)	关税		盐税		统税		三税合占税收百分数
		数额(百万元)	占税收百分数	数额(百万元)	占税收百分数	数额(百万元)	占税收百分数	
1927	46.5	12.5	27.0%	20.8	44.7%	6.0	12.9%	84.6%
1928	259.3	179.1	69.1%	29.5	11.4%	29.7	11.4%	91.9%
1929	461.7	275.5	59.7%	122.1	26.4%	40.5	8.8%	94.9%
1930(㈠)	535.0	313.0	58.5%	150.5	28.1%	53.3	9.9%	96.5%
1931(㈡)	615.2	369.7	60.1%	144.2	23.4%	88.7	14.4%	97.9%
1932(㈢)	583.0	325.5	55.8%	158.1	27.1%	79.6	13.7%	96.6%
1933(㈣)	659.4	352.4	53.4%	177.4	26.9%	105.0	15.9%	96.2%
1934(㈤)	417.6 (748.3)	71.2 (382.9)	17.1% (51.2)%	206.7	49.5%	115.3	27.6%	94.2%
1935(㈥)	385.3 (704.9)	24.2 (341.4)	6.2% (48.3)%	184.7	47.9%	152.4	39.6%	93.7%
1936	1057.3	635.9	60.1%	247.4	23.4%	131.3	12.4%	95.9%

注：(*1)坐拨征收费及退税未除去。

(*2)括弧内系各该年度预算数字。

首先，上表可见，在本期内三税收入数额大体上是关税高居首位。在正常情况下，关税收入占全部税收半数以上，有些年度且高至百分之六七十，其中1934年—1935两个年度，由于贸易衰退，大量走私，以及日本侵入华北等非常情况，关税锐减。该两年度实收数字低于预算数字各在3亿元以上，从而影响该两年度税项收入，致其未能完成预算部分，亦各3亿元以上。关税在税收中，因而亦在整个岁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亦得到证明。在一般情况下，盐税居第二位，其实收数常占税收百分之二三十左右。统税居第三位，通常占税收百分之十几，乃至百分之二十几。

其次，还可看出，在本期内国内经济政治情况虽极不正常，而关、盐、统三税收入却与年俱增，增长极为显著。以1936年度数字与1928年度相比，关税增长了3.5倍多；盐税更增长了八倍多；统税也增长了四倍多。总计关、盐、统三税合占整个国税收入的95%左右。可见，国民政府国税收入的支柱就是被称为“三大税源”的关、盐、统

三税。国税收入总额在十年中增长了四倍多，而且在1936年突破10亿元大关，这说明它在财力方面比它的前任——靠借债度日的北京政府富裕多了，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为全民族参加的抗日战争的发动和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

第八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的内外债

一　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外债

（一）国民政府对旧外债的清偿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巨额的军务费支出是造成财政困难的第一大要素，第二大要素就是偿还外债的负担。国民政府对外债的政策是，包下旧债，续借新债。据张肖梅、张一凡记载：查我国举借外债，始于同光之交，前后借债12次，合计债款4000万两，十余年后如数清偿。甲午战后，五年间即借款七次，约3.7亿两，后又陆续借款筑路，加上庚子赔款，截至民国元年，已负外债6.266亿多元，赔款18.747亿元。北京政府所发的有确实担保的外债共十九种，其中财政借款九种，铁路借款十种。合计42,363,981英镑、1100万美元、15899万法郎、9360.81万日元、荷金5000万弗洛林、国币500万银元[(172)]。

另据邬志陶换算成国币银元，北京政府时期共借外债是5.337亿元，加晚清时期的6.266亿元，共11.603亿元，再加清政府的赔款18.747亿元，总共是30.35亿元。有人初步统计：从1916年10月至1918年9月，日本对华借款共89项，其中有三项是与英、美、法等国共同借款，总计29500余万元。借给北京政府及各省地方政府的为288,000万元（包括南方各省地方政府七项借款1050余万元）；借给个人和企业公司的1650余万元。就上述数字看，90%以上的借款是给皖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的[(173)]。

国民政府刚成立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各国承认这个新政府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看它能不能偿还以前历届政府所积欠的外国债务。这一点国民政府当然是清楚的。同时政府也明白，只有偿还旧债，才有可能进一步向外国举借新债。为此，1928年7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时就宣布要“全面整理外债”。9月，宋子文又公开声明政府“亟欲维护国家信用”。1929年1月，政府成立了“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专门审议和处理偿债问题，并一直把承认和整理外债当作其初期外债政策的重点。债务委员会由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财政部长以及与内外债有关的各部部长组成，并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参加（上面提到的杨格即是其中之一）。1930年11月，债务委员会与各债权国代表在南京开会，商定了关于外债整理的三条原则：

（一）数小而无问题者，不待交涉，即时开始偿还；（二）数大而无问题者，即予承认，商议偿还办法；（三）有问题者，另行交涉[(174)]。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最为关心的是所谓“西原借款”。这是因为段祺瑞为取得这笔借款，不惜出卖中国主权与民族利益，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先生早在国民党“一大”就宣布不承认这种卖国性质的借款，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南京政府也不予承认。为此，中国与日本的债务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顾问杨格提出解决“西原借款”的妥协办法，“就是把中国公众认为极为可恶的这个债务放在一旁，先解决别的债务问题”[(175)]。因此，这次会议就专门列出一条，即所谓“其有问题者，另行交涉”。

国民政府按照上述原则，将历届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分为两大类进行整理：第一类是指有债约而且债约中已明确规定要由中国关、盐两税来偿还的，即所谓“有确定担保债款”，政府将按债约的规定，按期偿付本息；第二类是指有债约，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偿还方式的即所谓“无确定担保之债款”，政府将“一面审核整理，一面核拨基金，专款存储”，准备逐步偿还。对第一类，“还本付息，从不衍期”，在1927年—1933年的七年间共偿还银元2.49亿余万元[(176)]。对第二类，经

过整理，截至1934年6月底止，已承认列入整理准备偿还的，主要有美债七款、英债十三款、日债三十七款、比债五款以及法、意、荷、瑞典等若干款，总共是六十九款[177]。

据估计，财政部经管的无确实担保之外债，截至1934年6月底止，已承认“整理者”，折合本息计达10.96亿元；铁道、交通两部经管之外债，承认偿还的，截至1934年6月底止，折合本息约为6亿元；对于有确实担保之借款，截至1936年6月底止，折合本息计约5.8亿元；另有战争赔款还积欠约5亿元。总计各项外债债额当在30亿元以上（另据全国经济委员会统计，截至1935年底止，中国国债总数为57.95亿元。在这近58亿元国债中，内债大约为25亿元，外债实数约为33亿元）[178]。

为偿还巨额外债，财政部只得从关税和盐税中拨出款项专做还债基金。自1929年2月起，除由关税中每年拨出基金500万元专款存储外，另又从盐税中拨出专项基金用于偿债。经过整理，到1937年，所欠外债已经清偿了相当大一部分。其中，庚子赔款已由1928年的1.28亿美元减少到1937年的0.33亿美元；财政部负责经管的外债偿还了0.72亿美元（其中包括津浦铁路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等）；铁道与财政两部共同负责经管的债务偿还了0.7亿美元；铁道部单独负责的外债偿还了1.12亿美元，交通部负责的外债偿还了0.17亿美元。政府在1927年—1937年间共计偿还外债额达2.75亿美元[179]。如果按当时中国货币每元等于0.3美元计算，政府十年之间偿还外债额共合国币8.25亿元，平均每年偿还外债接近一亿元。在所清偿的外债中，因日本从1931年开始，相继挑起“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事变和华北事变，所欠日债被迫暂停偿付，所付还的大都是西方国家债款。当时西方的外债已经剩得不多，按杨格的说法，“如果不是由于战争（即抗日战争）的干扰，这些旧债，除去日本的债权因日本侵略满洲和华北而缓议之外，其他都是不久即可清偿解决的”[180]。政府偿还外债如此卖力，在中国历届政府中也是少见的，此举博得了各贷款国家的

好感。1936年“双十节”，财政部长孔祥熙曾“自豪”地宣称：“惟近年来政府对于维持债信，较前益加重视，还本付息，从未衍期，不惟国际市场对于我国债券较前增加信任，即国家地位声誉亦因此大为提高。”(181)

虽然南京政府在内债方面不讲债信，也无任何债信可言，但在致力于外债整理、努力恢复外债债信方面却作了不少工作。这就为它获得国际信任，取得西方借款，也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能获得更多的外国贷款和国际援助创造了条件。

（二）举借的新外债

有人认为“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指1927年—1937年），对于外债力主慎重，不肯轻于起借”。事实并非如此。国民政府为巩固其政权，四处寻找外国借款援助。20年代末，美国政府的主要财政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是决定美国向国外政府提供贷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929年初，国民政府特别邀请他组织一个“财政顾问委员会”，来华进行财政指导，其根本目的是想通过他从美国获得借款。1932年—1933年间，蒋介石多次派宋子文赴欧美国家寻求贷款，报纸上亦不断披露政府与外国秘密接洽借款的消息。1935年3月8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宣称：“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对华贷款‘极具希望’。”然而，外国贷款并未像政府盼望那样源源而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条：

第一，1929年—1933年爆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是政府寻求外债的努力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伴随这场经济危机而来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信用危机，许多国家未按期偿还所负的国际债务。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及大多数拉美国家纷纷单方面宣布停付或缓付外债。而债权国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危机，另一方面又由于国际间普遍的赖债行为，不愿冒风险出借巨额资金，而拒绝向国外提供贷款，国际借贷市场陷于停顿，资本输出几乎停止。据统计，美国的外

国有价证券发行额从1928年的13.25亿美元，到1933年降到160万美元（不包括对殖民地的贷款）。英国亦从1928年的5700万英镑下降到1933年的800万英镑[182]。这种信用危机，对于急需贷款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性的风暴。因此，宋子文数次赴欧美借款，其成果自然难以令人满意。而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大有借贷无门之苦感。孔祥熙曾无可奈何地哀叹："现在各国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来投资中国？"[183]

第二，北京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问题是南京政府寻求外债活动的另一大障碍。北京政府统治时间，每届政府都要向帝国主义借款。到1927年，连同清末所举借的外债，中国所负外债有数百笔，其中除以关税和盐税等担保的之外，大多数都拖欠未还，这始终是外国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整理清偿旧债成了南京政府获得国外贷款的先决条件。1935年9月来华的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就公开宣称，只要主要债务还未清偿，就谈不上对华借款问题。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对华问题上的勾心斗角，牵制了他们的贷款能力。这是中国政府寻求外债活动中所遇到的又一个大障碍。日本与英美在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一向是水火不相容，谁都想夺得对中国政府的支配权。因而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往往互相矛盾，互相掣肘。例如，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浪潮过后的1935年2月，日本向南京政府表示愿意贷款援助中国，英美立即做出反映，首先由美国出面，宣称英美法等国正酝酿"由各国集合力量，援助中国，以代替一国之单独助力，因恐该国单独享受权利，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中国政府得悉后，信以为真。3月上旬，当孔祥熙准备与各国进行"相当之接洽"时，日本政府自知难以同美英政府抗争，只得让步。由日驻华大使有吉明出面宣布："日本并未以任何经济力量援助中国。"[184] 于是，美国罗斯福总统也对记者宣称，英美借款给中国问题，虽在考虑，但不会有新的进展，国民政府极其希望的国际贷款，顿时化为乌有。

上述说明，南京政府“力主慎重”借款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困难重重，经过政府的努力和周旋，在本时期的后一阶段，还是借了一些外债的。请看下表[185]：

1927年—1937年间南京政府举借外债表

年度	名称	金额
1928	中比庚款	500万美元
1931	美麦借款	921.2万美元
1933	美棉借款	1708.7万美元
1934	中英庚款	150万英镑
1935	沙生银行	23.8万英镑
1937	广东河工借款	200万美元

以上六种为财政借款，均系实际发行额。

1936	沪杭甬路	110万英镑
1934	浙赣路	800万法币元
1936	南萍路	1000万法币元
1936	玉杭段	233.1万关金元
1936	宝成路	45000万法郎
1936	湘黔路	3000万法币元
1936	平汉江桥	1000万法币元
1936	成渝路	3400万法币元

以上八种为铁路建设借款，均为实际发行额。

这是有案可查的十四项，共计金额283.8万英镑、3329.9万美元、4.5亿法郎、233.1万海关金单位、9200万元法币[186]。另据杨格估计，中国在这几年得到实际使用的铁路信贷总额约有4000万美元；1937年中期德国为中国政府提供信贷（德国对中国的军火易货款）也有4000万美元，共计8000万美元[187]。

总起来看，南京政府所借到的实际外债还不如其偿付外债的实际支出多，从财政的角度来说，它举借的外债并没有起到平衡预算的作用。政府平衡预算主要是依靠内债，依靠搜刮国内人民来渡过财政难关的。

南京政府在1936年—1937年间所借外债，主要用在铁路建设和国防建设上，对经济发展和抗战准备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国民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

（一）宋子文举借的公债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便以发行内债为主的公债政策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个公债政策，早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就已经制定。“二大”决议案中说：“国家之公债政策，为发展国家之经济及完成重大之计划（如建筑黄浦商港）起见，国民党宜采用国内公债办法。最初发行之公债额宜为一千万元。此公债须以政府所有之产额为其担保，及以明年加增之收入为归还此债额用。此公债宜为短期之有奖公债，抽签发奖之次数须多。此公债成功之时，政府可以发行转为长期之公债。”[188] 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由此发端，尔后成为一项基本财政政策。

南京政府在初建十年发行的公债，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7年—1933年，是宋子文出任财长，有外国支持，有金融资产阶级捧场，以关、盐、统三税作担保，发行大量公债，请看下表[189]：

1927年—1931年公债发行数额表

年份	发行债券种类	债额
1927	2	70,000,000元
1928	6	150,000,000元

1929	6	198,000,000元
1930	4	174,000,000元
1931	7	466,000,000元
合计	25	1,058,000,000元

上表可见，五年内发行25种债券，总金额达10.58亿元。年息8厘，折扣除外，平均利润在1分5厘以上，企图用这种高额利润来吸引钱庄、银行、富商、巨贾购买。到1931年，每月为了偿付公债本息所需的基金便要1600—1700万元，全年约2亿元。当时国民政府每年的收入总额不过三四亿元，还要偿还外债赔款和支付军政各费，所剩无几。关税收入自1929年以后虽然成倍增加，也绝对应付不了这样逐日增加的债券本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债券价格跌落，银行周转不灵，于是国民政府借口“财政困难”严重，第一次宣告债信破产。1932年2月，政府通过“持券人会”对内债发表宣言的方式，宣布改变债券还本付息的办法，主要内容是：

（一）所有债券除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不变外（原定为利息二厘半），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为以前的一倍，即“向来以20个月还20元者，今改为40月还20元”。

（二）取消以关税、盐税、印花税分别担保的办法，改为概以关税为担保。

（三）每月由海关税项下拨出基金860万元，以为偿付所有债券本息之基金。

（四）设立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以替代以前的“二五基金会”[(190)]。

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宣告自己债信破产。它通过“持券人会”的方式提出来，这是表示金融资产阶级对政府的一种让步和支持。但这种让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他们在宣言中说：“持票人既因困难牺牲个

人利益，竭诚拥护国家，自此次减息展本之后，无论政府财政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及变更所定。”同时还要求政府“应将财政彻底整理，完全公开，财政委员会由各团体参加，取节缩主义，应在收入范围内确定概算，不得稍有逾越”。此外，还要求今后“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借为内战及政费之用公债”[191]。这项宣言是国民政府与金融资产阶级成立的一个新谅解，据当时报纸传说，政府且有“四年之内不发行公债”的口头默契。但是，中国的金融资产阶级毕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它们是软弱无力的，根本无力左右政府。政府仅在这一年内未正式发行公债，但也向银行借了一亿数千万元。从1933年起，蒋介石又继续发行公债作为发动内战的费用，而中国金融资产阶级却哑口无言。因为，这时候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还在江西苏区活动。蒋介石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正是为了保护买办金融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宋子文仍坚持不再大量举债，仅发行了用于热河抗战的2000万元爱国库券。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满，最后宋氏被迫辞职。

需要指出，尽管宋子文后来反对举债，但他还是举借了大量的内债，合计总额达12.44亿元，除了其中的3.41亿元公债之外，其余的为国库券，共分为十七次发行，总计9.03亿元[192]，所发国库券大约是公债的三倍左右。为什么宋氏要多发国库券而少发公债呢？因为国库券的还本期近，而且每个月付息一次，如果能够按时偿付，便可以增加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感，提高政府的债信；同时对加强资金的流通、活跃金融市场也有一定的作用。而公债的期限一般较长，还本付息不能按年按月进行，几年付息一次，还须抽签碰运气。因此，发行公债既不利于提高债信，也难于推销。由于国库券偿还周期较短，举借以后所形成的还债压力较大，使宋氏难于应付，感到这条路不能继续走下去，这才迫使他紧缩开支，尽量少借债，从其他方面寻找出路。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除了辞职就没有更好的选择。

（二）孔祥熙举借的公债

请看下表：

1933年—1936年财政部发行公债数额

年份	种类	债款（百万元）
1933	3	124
1934	3	124
1935	7	560
1936	3	455 [193]

在1933年—1937年的第二个时期，由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1933年10月孔氏刚被任命，就立即表示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战争。当时正值蒋介石准备用50万人马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军费需求非常紧迫。11月1日，孔氏对新闻界的声明和11月6日的就职演说中均表示要竭尽全力来筹集蒋介石所需要的军费，声称："能有个平衡的预算固然很好，然而保证剿共战争的成功更为重要。"[194] 蒋介石要多少军费，孔祥熙便筹集多少。孔祥熙筹措军费的最好办法就是发行公债。孔氏发行的公债由上表统计，1933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共十三种，金额为12.63亿元 [195] 。而且1936年为调换旧债券所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还不计算在内，年平均举借内债达3亿元以上。孔氏举债额平均是宋子文时期的一倍左右。

孔祥熙理财素以圆滑著称。他将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如关盐统等税款用来支持蒋介石作为军费开支，而其他应该支出的费用则采取举债的办法。据邬志陶统计，孔祥熙在1934年—1937年共发行十九次公债，合计约11亿余元法币、2000万元美金、150万镑英金。计用于金融建设者七种，如用作增加中、中、交三行资本，整理四川、广西等省金融等等；用于交通建设者五种，如完成粤汉铁路、修筑玉萍京赣铁路，补充铁路设备，建设电报及无线电通讯网等等；用于生产建设与赈济者三种，如赈济华北、补助农村、救济水灾、办理工赈等等；用于水利建设者一种，即1937年4月发行的开浚广东港河工程公

债；至于在名义上纯属用来周转国库解决财政困难的只有三种，合计金额为2.44亿元[196]。可见，名义上专为解决财政危机所发公债占据的比例并不大。而这些借款，有相当一部分做到了专款专用。如在交通运输业中，铁路、公路的建设速度在1934年以后明显加快，全国铁路干线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线的接轨工程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东南的交通干线浙赣铁路也于这一时期完成。同时，为了作好抗日战争的物资准备工作，政府投资煤炭、电力、钢铁等能源工业及基础工业的步伐也较以前加快，有相当一部分工业都是在1936年前后建成或者是在这个时期动工兴建的。

（三）举借公债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举借的内债，在经济建设和抗战准备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蒋、宋、孔举借内债的目的和作用，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如：

第一，为发动内战筹措军费。公债是与内战分不开的，国民政府发行的二十多亿公债，为它进行北伐战争，排除异己的军阀战争和围剿红军的反共反人民的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军费。使它能转不利为胜利，巩固其统治地位，而给人民、给革命却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和灾难。

第二，金融资产阶级发了财。金融资产阶级承购公债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也从公债买卖中发了财。发行公债是有折扣的，在发行条例上虽然规定为“十足发行”或“九八发行”，而事实上，当公债向银行抵押时，普遍是五六折或六七折，加上公债的利息6厘8厘不等，所以银行承购公债，如按结价时计算，所得年利约在三四分之间。政府发行的公债有半数以上，为上海较大的十七家银行所承购。这些金融资产阶级在公债买卖中发了横财。同时又因他们购买公债支持南京政府，与政府结下生死与共的关系，使他们共同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对两者都有利的。

第三，扩大政府国家资本的势力。所谓国家资本就是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经营的企事业。这些国营企事业都是在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靠国家机器这个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建立起来的。其资金来源除了靠税收，就是靠公债。如政府的四行二局的建立和发展、各省银行的建立和发展，都是靠公债。政府发行的金融公债都是同加强国营银行分不开的。另外1936年发行的复兴公债，四川、广东公债，都是加强国有工矿业、铁路交通业、金融银行业建设的。这些公债都增强了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国营企事业的实力，使国家资本逐步成长为对全国金融业、工矿业、交通业进行垄断的经济力量。而靠承购公债支持它的民营资产阶级，却变成了受国家资本支配和控制的附庸，而失去了昔日自由发展的权力。

第四，加速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大量发行内债过程中，发财最快最大的不是金融资产阶级，而是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集中了国家财富，不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而且在公债投机中兴风作浪，从中取利，成了亿万富翁，成为主宰中国大权的统治者。而这些公债的还本付息是靠政府增加关、盐、统三税的收入来偿还的，赋税重担最终都要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头上，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

(1) 国民政府财政部：《国民政府财政公报》第7期，第8—9页。

(2) 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1928年上海版，第1—23页。

(3) 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另见《中华年鉴1929—1930》，1930年上海版，第629页。

(4) 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576—579页。

(5) 《字林西报》1928年6月30日。

(6) 《字林西报》1928年7月7日。

(7)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革命文献》第20辑，第1、8页。

(8)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326页。

(9) 《革命文献》第26辑，第7页。

(10)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11)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7页。

(12) 邱松庆：《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财经政策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3)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7—328页。

(14)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8页。

(15)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8页。

(16) 《革命文献》第26辑，第8页。

(17) 《革命文献》第26辑，第5—6页。

(18)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30页。

(19) 《申报》1928年2月23日。

(20)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21) 宋子文：《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报告》（1931年11月），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103页。

(22) 《国民政府财政公报》第6期，第34页。

(23) 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报告书》（1928年6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3页。

(24) 宋子文：《财政部1928年4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4页。

(25) 宋子文：《财政部1928年11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8页。

(26) 《财政公报》第17期，第87页。

(27) 宋子文：《财政部1929年1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9页。

(28) 宋子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工作报告》（1929年3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9页。

(29) 宋子文：《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工作报告》（1931年11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9页。

(30)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3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0页。

(32)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551页。

(33)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3号，第132页。

(34) 美国国务院1949年出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347页。

(35)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106页。

(36) 《财政部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26辑，第41页。

(37) 董长芝等：《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38) 国民政府外交部编：《中国恢复关税之自主权之经过》下册，第118—119页，《中英关税条约》附件四。

(39)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297—298页。

(40)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297页。

(41) [美] 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7页。

(42) [美] 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51页。

(43) [美] 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8页。

(44) [美] 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8页。

(45)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9页。

(46)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50页。

(47)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国史馆”1986年印行，第238页。

(48) 《国民政府十八年度财政报告书》，《革命文献》第73辑，第120页。

(49) 《财政部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上半年度）》，《革命文献》第73辑，第321页。

(50)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52页。

(51) 《国民政府十八年度财政报告》，《革命文献》第73辑，第120页。

(52) 《国民政府十九年及二十年两会计年度财政报告》，《革命文献》第73辑，第135页。

(53) 李权时：《中国关税问题》（下），第304页，引自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第58页。

(54)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47页。

(55) 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507页。

(5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6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57) 李康华：《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502—507页。

(58)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64。

(59) 国民政府主计部：《中国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版，第248—250页。

(60) 刘振东：《孔庸之先生讲演录》第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79页。

(61) 参见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9—131页。

(62)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版，第47页。

(63)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版，第47页。

(64)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127—131页。

(65)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109页。

(6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67)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第110页。

(68) 参见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9—50页。

(69)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12—113页。

(70)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12—113页。

(71) 郑庆平：《略论中国近代农业赋税制度的发展特征》，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72) 李荣廷辑：《民元来国内外经济大事记》，《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刊行1948年版，第739页。

(73)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0页。

(74)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51页。

(75)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168页。

(76) 孙文学：《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10—312页。

(77) 中国经济报社：《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57页。

(78)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1948年刊印，第5页。

(79)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20页。

(80) 《中央银行开幕志要》，《银行月刊》第8卷11号银行近闻。

(81) 寿乐英：《宋子文与中央银行的建立》，《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82) 董长芝等著：《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83)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第12页。

(84)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第12页。

(85) 郭荣生：《孔祥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3—84页。

(86)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217页。

(87)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B70页。

(88) 石毓符著：《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页。

(89)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96—297页。

(9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

(91)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39年版，第156页。

(92) 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93) 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7页。

(94)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金融法规汇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63页。

(95)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J45页。

(96) 《革命文献》第74辑，第68页。

(97)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文海出版社，第165页。

(98) 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69页。

(99) 董长芝等著：《民国财政经济史》，第159页。

(10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0页。

(101) 见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5年、1936年《全国银行年鉴》。

(102) 石毓符著：《中国货币金融史略》，第294页。

(103) 马寅初：《中国经济之分裂》，见《马寅初演讲集》第3集，北京晨报社1926年版，第173页。

(104) 马寅初：《中国经济之分裂》，见《马寅初演讲集》第3集，第175页。

(105) 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报告书》（1928年6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1页。

(106) 宋子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部工作报告》（1929年3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1页。

(107) 《宋子文评传》，第132页。

(108)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133页。

(109) 宋子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部工作报告》（1929年3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3页。

(110) 《宋子文评传》，第134页。

(111)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国史馆”印行1986年版，第232页。

(112) 杨树人：《甘末尔改革币制方案》，台北《大陆杂志》25卷4期，1962年版，第1—7页。

(113) 甘末尔设计委员会：《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附理由书》，上海银行周报社1930年版。

(114)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第238页。

(115) 沈麟玉：《我国币制改革之经过》，中央银行月报4卷2期，1935

年版，第2473页。

(116) 《时报》1929年2月17日。

(117) 卓遵宏：《抗战前10年货币史资料（一）币制改革》，第99—101、124—131页。

(118) 宋子文：《财政部1929年9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5页。

(119) 宋子文：《财政部1931年9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6页。

(120)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F140页。

(121)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第239—241页。

(122) 《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财政报告》，《革命文献》第73辑，第317页。

(123)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A23页。

(124)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训令》，《国民政府公报》第1098号，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六日，《革命文献》第74辑，第3页。

(125) 国民政府财政部编：《国民政府财政公报》第62期，第76—77页。

(126)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E90—91页。

(127)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128) 《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自开工之日起至1935年6月30日为止的报告》，第14页。

(129)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05—206页。

(130) 《银行周报》，第840号。

(131) 赵兰坪：《现代中国货币制度》，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81—83页。

(132) 李绍荣、钱纯译：《货币银行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04页。

(133) I.Y.Shen，*China's Currency Reform*（Shanghai：Ine Mrcury Press，1941），p.171。

(134)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0页。

(135) 国民政府档案，档号：（财〇二·三——一）档名：《关于银问题之契约节略》，台北"国史馆"藏。

(136) 张素民：《一年来之中国金融事业》，《文化建设》1卷3期，第29页，1934年12月10日。

(137)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第313页。

(138) 张素民：《一年来之中国金融事业》，《文化建设》1卷3期，第29页，1934年12月10日。

(139) 国民政府档案，档号：（财〇二·三——一）档名：《关于银问题之契约节略》，台北"国史馆"藏。

(140) 朱疑译：《新货币政策实施半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之详述》，《中国经济》4卷7期，第13页，1936年7月15日。

(141)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3页。

(142) 《申报年鉴》1936年，A26页。

(143) 徐堪：《自述》，《徐可亭先生文存》，台北1970年版，第5—6页。

(144) 国民政府档案，档号：2—1·12·10—11《改定货币政策》，台北"国史馆"藏。

(145) 《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1935年11月3日。《革命文献》第74辑，第6—7页。1936年1月20日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同中、中、交三行的钞票一样定为法币，在国内同样流通，但不能无限制的买卖外汇。

(146) 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94页。

(147)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国史馆"1986年印行，第404页。

(148) 《历年法币逐月发行数额表》，《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第

67页。

(149)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6页。

(150)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51) ［美］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69页。

(152) 张寿贤：《陈光甫先生传略》，台北1977年版。

(153) 姚崧龄：《陈光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2页。

(154) 张寿贤：《陈光甫先生传略》，第83—84页。

(155) 李骏跃：《中国纸币发行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版，第102页。

(156)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21页。

(157)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82页。

(158) 戴铭礼：《五十年来之中国币制》，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159) 陈光甫：《五十年来之中国金融》，第111、36页。

(160)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34页。

(161)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台北阳明山庄1950年版，第120—121页。

(162) 王骏元：《白银问题与法币改革》，第8页。

(163) 李敏万：《为国尽瘁之孔祥熙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第42页。

(164) 陈叔温：《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6号。

(165)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页。

(16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3页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167)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H19—20。

(16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70页。

(169)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H19—20。

(170)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7页。

(171)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7页。

(172) 张肖梅、张一凡：《民元来我国之国际收支》，《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刊印，第270—271页。

(173) 《光明日报》1965年2月10日；另见孙文学：《中国近代财政史》，第253—255页。

(174) 邬志陶：《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民国经济史》，1948年版，第202页。

(175) [美] 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34页。

(17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63页。

(177) 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第68页。

(178) 李立侠：《中国外债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4卷第14号。

(179) [美] 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55页。

(180) [美] 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55页。

(181) 刘振东：《孔庸之先生讲演录》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杜1960年版，第179页。

(182) 《国际联盟统计年鉴》，1933—1934年。

(183) 孔祥熙在1936年3月30日的中央纪念周报告词《自力更生与经济复兴》，《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录》，第449页。

(184) 《中央日报》1935年3月6日。

(185) 张肖梅、张一凡：《民元来我国之国际收支》，朱斯煌主编：

《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刊印，第271页。

(186) 张肖梅、张一凡：《民国经济史》，第271页。

(187)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18—419页。

(188) 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续编》第一编，中央印务局1948年版，第17页。

(189)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代序，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9页。

(190) “持券人会”对于内债之宣言，见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债券汇编》。

(191) “持券人会”对于内债之宣言，见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债券汇编》。

(192) 邬志陶：《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民国经济史》，第201页。

(193) 本年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系换发的债券，未计入。

(194)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193—194页。

(19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64页。

(196) 邬志陶：《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民国经济史》，第201页。

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

第一节　经济行政的调整

一　实业部的设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分管全国工、矿、商、农等事务的行政机关为工商和农矿两部。1928年2月28日，农矿部设立，以易培基为部长；3月28日，工商部设立，以孔祥熙为部长。国民政府为刷新政治，改善制度，提高行政效率，于1931年1月17日公布《实业部组织法》，将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

实业部是管理全国工业、矿产、农林渔牧及商业等实业行政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内设八司一署。总务司掌公布部令、典守印信、统计、出版、预决算、会计、官产保管。农业司掌农业试验、农地改良、防除病虫害、农田水利、农业调查、农民银行及合作社。工业司掌国营和民营之化学、机械、冶炼及其他工业之筹设、管理、奖励、监督、改良、推广。商业司掌国营、民营商业之管理及推广，商品之展览检验，调节物价，发展国际贸易。渔牧司掌畜产、水产之改良，渔税之拟定，兽疫之调查及防除。矿业司掌国营矿业之筹设，矿区税之拟定，矿业调查及统计，矿区勘定及矿质分析，矿权、矿警及地质调查等项。劳工司掌劳工团体之监督，劳工生活之改良，工厂之卫生设备，工人失业之救济，调解工人与雇主或工会间之纠纷，劳工移植及侨工保护等项。后又设立合作司，计为八司。一署为林垦署，掌林业与垦植。此外，还设有各种专门委员会和专业局等直属机构，如全

国度量衡局、国际贸易局、工厂检查委员会、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地质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模范林管理局、商标局暨各地之商品检验局、海洋渔业管理局等，均为较重要者。

至于地方实业行政组织，各省均设有建设厅（或实业厅）为管理工商业及农林渔牧等经济事务的机构。

实业部设立时，以原任工商部长孔祥熙为首任部长，郑洪年为政务次长，穆湘明为常务次长。这时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军事政治危机，财政上没有力量顾及发展实业，实业部因经费不足，工作软弱无力，几近停顿。孔祥熙在实业部任职一年，虽然继续进行并扩展原工商农矿方面的正常业务，制定《工厂检查法》及六年期实业建设程序，并会同外交、财政两部制定《取缔日渔轮侵入我领海捕鱼办法》等，但在实业方面未有重大举措。

1931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公博为实业部长。陈是改组派的首领，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于1932年1月5日接任部长后，立即提出《四年实业计划》。该计划以统制经济为宗旨，要对粮食、棉花、煤炭的生产进行统制，并建立钢铁厂、化学工厂、机器厂、纱厂、造纸厂、汽车厂、糖厂、磁器厂、铜矿、油矿及大规模农业加工厂等，计划每年投资1亿元。这个发展国营工业的庞大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因为1932年开始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合作并不稳定，汪及其派系得不到实权，使陈公博既无经费又无权力来实现他的计划。陈公博在实业部主政四年期间，只完成了一个较大项目，即1933年与华侨合资创建的中国酒精厂。该厂系与侨商黄江泉合资，资本定为100万元，官股占十分之一。后增加股本至150万元，并扩充设备，最高产量可达每日生产1万加仑酒精，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酒精厂”[(1)]。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于12月1日电请辞去行政院长本兼各职。汪既隐退，陈亦无法恋栈，于12月12日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5年底，吴鼎昌继任实业部长。吴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即“北四行”首脑人物，有金融资本为其实力后盾，又有蒋介石集团中的政学系为其政治背景。他是通过政学系的关系出掌实业部的。由于有政治关系，吴有实力实现较大的实业规划。在吴主持下，实业部成为南京政府参与发展工商业的重心[(2)]。1936年初，实业部创办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着手建立一个价值100万元的现代化鱼市场，有冷冻厂、鱼码头、仓库等完善设备。资本定为120万元，实业部认定50万元，交通银行30万元，私股40万元。5月12日，新鱼市场开业，以促进渔业、减少中国水产进口为名，实行垄断渔业的交易。老式鱼商对此十分愤怒，认为官办公司牺牲他们的利益而攫取超额利润，5月26日鱼行罢市以示反对。后经杜月笙调停，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降低鱼商利用鱼市场的收费标准，平息了鱼商的反对。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有了政府和上海帮会头目的双重支持，成为一个财源茂盛、利润丰盈的企业。

同年6月3日，实业部以响应蒋介石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名义，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请蒋介石任会长，在南京设总会，各省、县设立支会。该会任务为：

（一）协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计划；（二）倡导社会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三）培训及介绍各种经济建设人才；（四）研究发展全国农工副业及地方特殊产品；（五）倡导节约，推行国货等[(3)]。实业部即以此新设机构来创办大型企业，主要有：一、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8月，实业部与川、鄂、湘、浙、皖、赣六省政府和一部分油商共同组成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垄断出口油料，主要是桐油的出口。该公司资本为200万元，由参加单位分担认股。每一单位可将认股的一半股份转售给私人。于是，从事建立机构的政府官员就可以以私股身份参加进来，政学系的影响也得到了体现，因为参加企业的各省当局是和政学系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成员张嘉璈的弟弟张嘉铸担任公司的经理兼商股董事，政

学系的要人熊式辉是官股董事[4]。该公司的宗旨是为了改进植物油生产，并开始建立炼油厂。但提炼植物油获利极缓，于是转而致力于更能获利的销售植物油。豆油和桐油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1936年出口值将近8500万元[5]。1937年该公司在各省政府的配合下，试图完全控制植物油贸易，旋因中日战争爆发而中止，但1937年出口总数仍达1300万元[6]。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由于有强大的靠山，在中国油类出口业中建立了重要基础。二、温溪造纸公司。1937年春，实业部成立温溪造纸公司，资本总额为320万元，商股定为170万元。在吴鼎昌邀请下，三大报纸（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和四大出版机构（商务、中华、正中和世界书局）认定二分之一以上的私股股份。同时也获得宋子文的支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与实业部共同购买150万元的公股，从而保证了造纸公司所需的资金。三、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5月，实业部与闽、鄂、湘、浙、皖、赣六省政府共同组成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200万元，由实业部和六省政府认购，二分之一股份售与个人。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推销和出口茶叶，它在各有关省政府的配合下，在茶叶市场上开始取代私商，掌握垄断权，但开始不久因中日战争而被打乱。四、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和首都国货公司。国货公司于1932年、1933年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但营业未得到大的发展。吴鼎昌主管实业部后，决定大力扩大国货公司销售业务，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出面，联合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国货联办处等，共同成立中国国货联合公司。资本额定为200万元，官商合办，其中政府投资占三分之一，其余均由国货工厂和公司入股投资。1937年4月10日在南京成立，5月17日在上海开业[7]。6月，实业部又在南京成立另一家公私合营的首都国货公司。这两家公司因有政府关系得到不少好处。实业部通知各省政府机关，凡公用设备和办公用品均须向上述两公司购买。由于政府的支持，两家国货公司销售业务得到很大的发展，后因“七七”事变遭受沉重打击。

1937年11月，吴鼎昌因阻止上海棉织品投机，在政治上遇到麻烦，不得不辞实业部长职务。但在他短暂的实业部长任期内，由于有

从事工商业的经验，有与银行业、商业、政界各方面关系，所以能迅速地筹集资本组织企业，成功地创办了几个企业。他所创立的公司，多是针对当时某些特殊经济问题的，如为防止大量渔产进口而办渔业公司，为防止新闻纸进口而办造纸厂等；多数公司是从事销售而不是从事制造，很少建立新式的工业生产企业。

1937年11月20日，程天固继任实业部长，因抗战之需要，于12月遂合并于全国经济委员会，后改为经济部。

二　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

国民政府为注重经济计划工作，于1931年4月采纳国际联盟派遣来华专家沙特爵士的建议，决定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8)]。同年6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全国经济委员会为经济计划与施行机关，统筹国营经济，直隶于行政院。其职掌为：凡国家一切经济建设或发展其经费由国库负担或辅助者，应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审定呈请国民政府核准之；施行国营事业建设或发展计划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审核其工作及其费用；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并得派专门人员视察或指导各种计划之实施。全国经济委员会在性质上被规定为集顾问、审议、实施于一身的指导国营经济的机关，业务庞大、复杂。

全国经委会工作由于内战连绵、洪水为灾和“九一八”事变，迟迟未能展开。虽然当年9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宋子文、刘尚清、连声海、王伯群、孔祥熙、李书华、张人杰、张学良、李煜瀛、张嘉璈、李铭、周作民、晏阳初、虞和德、吴鼎昌、荣宗敬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1月23日、12月15日又分别任命刘瑞恒、马凌甫为委员），指定蒋介石、宋子文为正副委员长，任命朱家骅为秘书长。但直至11月15日才先行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任命秦汾为筹备主任。该筹备处历时两年，至1933年9月该处代行秘书处职权，主持办理一应筹备事宜，奠定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的基础。

筹备处下设机构有：一、审议机构：公路专门委员会、工程专门委员会、农村建设专门委员会；二、实施机构：公路处、工程处、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湖北堤工专款保管委员会。

在筹备处工作基础上，1933年9月13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扩大全国经济委员会职掌范围，直隶于国民政府，采常委制，以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常务委员；棉麦借款交全国经委会支配，另组监督与保管机关。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秦汾为秘书长，并由常务委员决议推任汪精卫、孙科、宋子文、黄绍竑、朱家骅、王世杰、张人杰、孔祥熙、邵元冲、张嘉璈、周作民、晏阳初、吴鼎昌、荣宗敬、陈立夫、钱新之、陈光甫、刘鸿生、史量才、王晓籁、徐新六、叶恭绰、蒋中正、叶琢堂、彭学沛等为委员。

全国经济委员会似为全国经济行政最高机构，这亦可以从其常务委员声望及预算看出。以1934年论，当时的常务委员为汪精卫、孙科、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该年的经费为1500万元，约为该年中央内政部预算6.5%，或为中央其他支出预算的18%[(9)]。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秘书处处理会内一切事务。为完成特定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之直接实施，设立专门的审议与实施机构。

审议系统的主要机构有：一、公路委员会。1932年11月为发展豫鄂皖赣苏浙湘七省公路建设，设立七省公路专门委员会，办理七省公路建设事宜。1933年11月，七省公路专门委员会改组为公路委员会，为审议公路专门事项之机关，掌理公路建设计划之审议及经费之核议，以及公路法规、工程标准之审核。二、水利委员会。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移交之工程，设立工程专门委员会，1933年10月改组为水利委员会，为审议水利专门事项之机关，掌理水利建设计划之审议及经费之核议，以及水利法规及工程标准之审核。三、卫生委员会。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卫生专门委员会，1933年11月更名为卫生委员会，掌理卫生计划之拟订审核，卫生设施之视察指导，以及卫生问题之研究。四、教育

委员会。1932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教育专门委员会，1933年11月更名为教育委员会，掌理教育政策之建议，教育改革计划之拟订及审核，教育之调查。五、农村建设委员会。1932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改良农产、改善农民生活设立农村建设专门委员会，1933年11月更名为农村建设委员会，掌理农村建设计划之拟订、审核及有关农业统计调查、农村教育、移民垦殖、农业租佃与农产品运销等问题之研讨。六、湖北堤工专款保管委员会。1932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保管湖北堤工专款事项而设。湖北堤工专款账用于湖北省内堤工水利工程，各款均委托各征收机关征收径解汉口中央银行列收。七、棉业统制委员会。1932年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对全国棉业纺织业行指导监督及施行统制奖惩之权，棉业统制委员会设技术股对棉业纺织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八、蚕丝改良委员会。1934年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采用科学方法改进全国蚕丝业，设立蚕丝改良委员会，对全国蚕桑丝茧各业行指导监督奖惩之权。蚕丝改良委员会还设技术室，研究蚕丝业的发展。

工程实施系统的主要机构有：一、公路处。1932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7省联络公路督造事宜设立公路处，1933年改组办理公路建设事务，由陈体诚、赵祖康分任正副处长，分设工务、交通、计划三科，分别进行公路工程之实施，公路运输之统筹监督及公路建设、筑路养路材料、车辆油料之研究。二、水利处。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移交工程设工程处，1933年10月改组为水利处，办理水利建设事务，处长为茅以升，分设设计、工务二科，分别进行水利建设之发展及水利工程之设计及实施。三、卫生实验处。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全国卫生设施事务设置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1933年底更名卫生实验处，刘瑞恒、金宝善分任正副处长，下设防疫检验、化学药物、寄生虫学、环境卫生、社会医疗、妇婴卫生、工业卫生、生命统计、卫生教育等九系。四、农业处。1933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农业处，办理农业建设事务，赵连芳、许仕廉分任正副处长，下设农业改良、农业

建设、农业工程三科，分别进行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农产品产销、土地利用及农村教育等之建设，农村垦荒、水利、建筑等工程之实施。五、信托处。1933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信托处，叶琢堂任处长，办理棉麦借款之保管及运用。六、江西办事处、西北办事处。1934年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分别设立江西办事处、西北办事处，分别办理各该地区经济建设事宜。七、驻沪办事处。1934年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驻沪办事处，处长邓勉仁，办理沪地一应接洽事宜。

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初，工作计划先从三方面入手：一为运输交通之设施；二为农业之救济；三为重要生产事业之改良。1934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全国水利行政机关亦归全国经济委员会统筹办理，其工作范围愈益扩大，设有五个直辖水利机构，即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分别管理国家大规模水利工程。至此，国民政府的水利行政始趋于统一。全国经济委员会业务绩效最为显著者有六个部门，即公路建设、水利建设、农业建设、棉业统制、蚕丝改良及卫生设施，它们的规划与指导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曾奉国民政府训令，一方面会同内政部、财政部合组土地委员会，办理土地调查研究事宜；一方面与教育部合作，设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办理全国学术人才供需方面之联络与辅导。又配合西北之开发，通过《建设西北计划》，逐步实施。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国经济委员会五位常务委员由蒋介石领衔提出《全国经济建设方案》，期于五年内完成国家各种必要之建设，一方面充实国防需要，一方面提高民众生活，规划尤为具体而远大。同年7月抗战爆发，全国经济委员会乃进行西南各省公路之统一管理，于人力物力之运输贡献良多。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完成战时体制改组，将全国经济委员会撤销，并将其公路机构归并交通部，水利机构归并经济部，卫生机构归并卫生署，至此全国经济委员会暂告结束。

三　资源委员会的建立

国民政府除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外，还设立了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系国民政府为调查控制全国国防资源及基本工业建设事业的管理机构，其前身是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

1932年3月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4月17日，邀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黄郛到南京，详细讨论国家的分期建设计划。蒋介石特别和黄郛两次单独商谈未来的国防计划，希望黄郛共同彻底研究。黄郛想出组织国防委员会的主意。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他的连襟钱昌照，钱即向蒋介石上条陈，并得到采纳[(10)]。11月1日，参谋本部创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是一个调查统计设计机构，对外并不公开。它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长蒋介石任委员长，秘书长翁文灏、副秘书长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来自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中的知名人士，主要任务是发展国家资本，达成中国工业化。它的首要目标在调查和研究国防经济，以为建设基本工业和筹划经济动员的准备。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研究的范围分为军事、国防、文化、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人口土地及食粮、专门人才等八部分。因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只注意国防经济方面的调查统计工作，其中做得最多的是原料和制造（即矿产、工业）、交通、粮食、经济财政、专门人才等五项。人口与土地的调查，因范围太广泛，只试办了一些地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研究与调查工作，为资源委员会后来成为南京政府主要工业机关，在资料和人员方面进行了初步准备。

1935年4月，南京政府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参谋本部改隶军事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成立以后，仍由蒋介石自兼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根据《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职掌，计有人的资源及物的资源的调

查统计研究事项，资源的计划和建设事项，资源动员的计划事项，其他有关资源的事项等。由于职掌变更，工作也有所调整，原来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三部分工作均告结束，其余国防经济之调查、统计、研究工作则仍继续，以便服务于直接建设及资源动员计划。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重工业建设，过去虽有调查设计，而苦于经费无着未能建设。直到1936年度预算中，南京政府始指定1000万元供建设重工业之用。同时，资源委员会呈准军事委员会统制钨、锑两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而一部分设计乃得见诸实行。

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主要是经办钨锑的对外贸易和建立重工业机构。

1．钨锑对外贸易。钨锑两种矿产是军用合金的重要资源，并为中国特产。1930年—1933年，中国钨、锑产量分别占世界钨、锑产量的41.4%、70%强[(11)]。德国在希特勒执政后扩军备战，急需储备钨锑。1935年，德国派特使克兰（Klien）访蒋介石，随后由孔祥熙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ht）签订了经济合作合同，两国实行易货贸易。蒋介石将此事交资源委员会办理，1936年2月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经济部签订1亿金马克的周转信贷合同。资源委员会从这笔信贷中获得不足十分之一（981.944万马克）的款项用以建设工业，其余都用于购买军火和兵工厂器材。借款以中国桐油、猪鬃和钨锑偿还。桐油、猪鬃由中央信托局收购和出口，钨锑由资源委员会办理。

中国钨矿主要在江西，次为广东、湖南，锑矿集中在湖南，均手工开采，由商人联合经营，办理不好，有的省份各自为政，不能统一。资源委员会接手后，采取和地方政府分利的办法，从钨锑买卖上获得的好处，由地方政府和资源委员会各半分配，用人行政，地方不过问。1936年1月1日，资源委员会在湖南长沙成立锑业管理处，2月28日又在江西南昌成立钨业管理处，吉安建立钨铁厂，把当地钨砂炼成钨铁，并在上海、汉口设国外贸易事务所垄断出口。德方则于上海

设立合步楼公司（Haplo Co.）办理易货。1936年至1937年，资源委员会出口钨16697吨，内易货5183吨；出口锑8583吨，内易货1247吨。从此，钨锑对外贸易地位增强，国际上对于钨锑越来越需要，出口数量和价格也大有增长，资源委员会颇获盈利。

2．重工业建设。1935年，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以供国防需要和经济自给为目标，分为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气五个部门，经费预算计2.7亿元。1936年夏，国民政府指拨1000万元，开始建厂工作。一、冶金工业：有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铜矿、阳新大冶铜矿；二、燃料工业：有高坑煤矿、天河煤矿、万县煤矿、四川油矿、植物油提炼轻油厂、煤气车推行处；三、机器工业：有机器制造厂；四、电气工业：有电工器材厂、无线电机制造厂、电瓷制造厂及四川水力发电厂，以上共计筹建十七单位。

1937年，南京政府又拨经费2000万元，建设计划大体继续上年，事业稍有调整，如冶金工业增设湖南铅锌矿，化学工业增建氮气厂。事实上，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1937年两年陆续设立二十五个企事业单位，其中六个是与省政府或其他部门合办，矿业多是在接办或收买民矿基础上扩建的。当时考虑到与国防有关，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内地各省。

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爆发，它的各项事业受到影响，已设立的二十五个企事业单位中有九个结束或停办，五个迁往内地。它们大都于1938年以后才形成生产力。

上述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是南京政府于30年代初建立的经济行政机构。在此之前南京政府还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建设委员会，以张静江为主席（后改称委员长），直隶南京政府以经营国有事业及计划建设方案，并指导一切建设实施之责。这些经济行政组织，虽说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各成系统，但机构重

叠，各自为政，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与实业部的工作很难明确划分；农业方面，除实业部有农业司外，全国经济委员会下有农业处，建设委员会下有振兴农业设计委员会，而且教育部还设有农业推广委员会。政出多门之弊随处可见，不利于全国经济建设的协调与发展。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一　国营经济的建立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于1930年3月召开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设之方针案》。该案指出："以言需要，则敷设铁道，改良水利，经营工业，开发矿产，扶植农商，均为目前迫切之图，所刻不容缓者也。惟其中如铁道、水利、造船、制铁、炼钢等伟大之建设事业，依总理节制资本之义，宜由国家经营之。"[(12)] 此等基本工业往往建设费时甚长，需款甚巨，而完成之后，亦不易有利可图，私人多无力举办，亦不愿举办。国民党建立国营经济之目的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亦在奠定工业化之基础。基于此点，南京政府在统制金融业的同时，着手在军工、工矿、商业、交通各部门建立国营经济。

（一）军工业

南京政府成立后没收和接办北洋军阀官僚资本的军工厂有汉阳、金陵、济南、巩县、华阴、上海等六厂，另有德州、开封两个小厂和生产兵工材料的上海炼钢厂[(13)]。南京政府接办军工厂后，根据国防需要整理原有军工厂，一是进行撤并或扩建，二是统一各厂出品之制式，以利战时补给。对原有各厂撤销或扩张，基本上是按参谋本部制定的《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进行。1932年9月，为扩展兵工材料生产以谋自给，兵工署决定将汉阳兵工厂之制药厂，"与汉阳兵工厂分立，更名曰汉阳火药厂"[(14)]，并直属兵工署，加以扩建。之后，又

决定将因“一二八”抗战而停工之上海兵工厂撤销，将其机器设备，按性质分别移并宁、汉、巩三厂；并将德州、开封两地方小厂撤销，设备拨济南厂。按《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华阴兵工厂不属撤销之列，但因其设备陈旧等因，1933年奉命停办[15]。该厂停办后，少数设备移并巩县兵工厂，大部分机器交陕西省政府作民用。原有各厂整理后，兵工署直辖之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上海炼钢厂等六家。各厂还淘汰旧机，补充新机，整顿产品，增加品种。

整理旧厂另一项是力谋械弹制式的统一。北伐完成，全国形式上实现统一，但地方军阀拥兵自重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其兵器多购自国外，聘某一国之顾问，即购某一国之兵器，各部队所使用之武器种类陈杂不齐，零件不能互换，枪弹不能通用。一旦发生对外战事，各部队械弹制式不一，不利于补充。1934年12月22日，军事委员会召集有关单位，讨论各式兵器战术要求诸问题，统一制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逐步定型并大量制造我国自造或仿造的诸如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八二迫击炮等制式兵器，一些非制式兵器逐步淘汰。制式武器中，步、机枪口径均为7.9毫米，枪弹能互相通用。械弹制式的统一，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中的械弹补充带来很多便利。

南京政府除整理旧厂外，还建设新厂。根据1932年的计划，拟新建的兵器及材料工厂计有制炮厂、炮弹厂、炼钢厂、动力厂、氮气厂、军用化学厂等。但至抗战爆发时，实际完成并投产的仅有生产军用化学产品的巩县兵工分厂。株洲兵工厂于1936年初开始兴建，抗战爆发时尚未出品。

据统计，30年代，南京政府兵工署系统的兵工厂约十余家，军需署系统的被服、粮秣、炼钢、代工等企业十六家，海军部系统的造船、飞机等企业和工程处十个单位，航空委员会所属的飞机修理厂三处[16]。南京政府的军工建设，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对于增强抗

战实力有其积极意义。

（二）工矿业

南京政府通过建设委员会、国家银行、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等，均组织与筹建了一批国营厂矿企业。

1．建设委员会系统。建设委员会于1928年2月成立于南京，以张静江为主席（后改称委员长），直隶南京政府。它成立后积极向工业领域渗透，没收和吞并了许多重要的工矿企业。金陵电灯官厂是建立于民国初年的官营企业，1928年4月由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改为首都电厂。1929年建设委员会发行八年短期电气公债，扩充首都电厂的发电能力，1930年发电容量已达2.5万千瓦，到1937年资产已从50万元增至1300万元[17]。长兴煤矿（湖州长兴县）是建设委员会吞并的一家重要商办企业，1927年冬因该矿抗纳矿税、私向银行团借款，南京政府派员进驻该矿，宣布收归国有，由建设委员会接办。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设在江苏省，跨武进、无锡二县，1928年由建设委员会接办收归国有。除没收和吞并北洋军阀官办或商办企业外，建设委员会还自办若干工矿企业。1930年建立淮南煤矿，矿区位于安徽淮南，面积达22平方公里，日产煤1700吨，为了运输煤炭至武汉，又修建长220公里的淮南铁路。此外，建设委员会为军事通讯需要设立电机制造厂，专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常年经费4万元，由南京政府国库拨给。

1937年春，建设委员会以该会负债超过投资一半为由，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将所办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淮南煤矿、淮南铁路委托中国建设银公司招商经营。中国建设银公司系1934年6月由宋子文创办，资本1000万元，中国、交通、金城等银行及孔祥熙、张嘉璈、宋子良等均有股份，宋子文任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该公司属投资公司，以引进外资，对企业控股为目的。该公司接办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并收买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股份，组成扬子电气公

司。扬子资本1000万元，内保留建设委员会股本200万元，余由建设银公司募足（银公司自持股本60%）。中国建设银公司接办淮南煤矿、淮南铁路后，成立淮南路矿公司，资本1000万元，内保留建设委员会股本200万元，余由建设银公司募足[18]。

中国建设银公司还于1936年与全国经济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创办西京电厂[19]，并拟与陕西省政府合办同官煤矿和修建同官至咸阳铁路。又于1936年与铁道部、四川省政府、法国银团合作创设川黔铁路公司，资本2000万元，并与法国银团签订3450万元借款合同，抗战前完成内江至重庆段路基及桥梁涵洞工程[20]。1936年底，中国建设银公司总资产3283.6万元，内各项投资750.4万元，放款752.8万元，现金892.9万元，当年纯益191.4万元[21]。

2．国家银行系统。南京政府利用国家银行的金融独占地位，积极向工业领域扩张。其中中央银行因偏重金融，投资工业不多，仅有虬江码头和麻织厂两家。相比之下，中国银行在工业领域的扩张及投资活动显得特别活跃，交通银行次之。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债务关系及投资改组的方法，不断对民族资本企业进行控制，使一部分民族资本企业变成为国营经济。截至1937年上半年为止，中、交两行控制了15家纺织厂，拥有纱锭35万余枚，占华商纱厂的13%，其中利用债务关系经营的有七家，投资经办者四家，通过银团、信托公司等收买的有4家[22]。1934年，著名的郑州豫丰纱厂因倒闭被中国银行收买。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接管，同年中国银行又对破产的济南仁丰纱厂进行加资改组攫为己有。1937年3月，中国银行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金周转不灵之机，以每股5元（每股票面额是15元，市价为七八元）的低价，购买该公司20万股，控制了这家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卷烟厂。1937年春，渤海化学公司破产，中国银行承付该公司债款120万元，控制了该企业[23]。

中国银行还通过“官商合办”或商办的形式投资工业，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中益电工制造厂等。此外，中国银行还投资于其他行业，

主要有面粉厂、电器公司、打包厂、食品公司、造纸厂、制铁公司、麻织厂、薄荷厂、榨油厂等，共17家，至1937年7月，共投资440.8万元，占上述十七家工厂总资本的31.8%[24]。

3．实业部系统。实业部主管全国工商农矿等企业的行政事务，负责执行国家工业发展计划，但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因素，1935年底以前实业部在发展工商企业方面起的作用很有限。1935年12月，吴鼎昌继任实业部长，得到政学系的支持，得以大规模投资工业。抗战前，实业部建成的企业有下列三厂。

中央机器制造厂，1932年筹办，1936年投产，资本310万元，由英庚款项内拨付。厂设上海，机器设备购自英国[25]。

中国酒精厂，实业部与华侨黄江泉、沪商赵晋卿合办，1933年筹办，1935年投产。资本130万元，内官股15万元，由英庚款项内拨付。厂设上海，机器设备购自英国，日产量3万公升[26]。

中国植物油料厂，由实业部与川、鄂、湘、浙、皖、赣六省政府及油商合组，1936年成立。资本200万元，先收100万元。抗战前，该厂主要是经营桐油出口，并在上海、汉口、芜湖、万县、重庆设炼油厂；芜湖厂资本10万元，有新式榨油机三部，日可出油10吨[27]。

4.资源委员会系统。1935年4月资源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发展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首先拟定一个《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规定在五年内投资2.712亿元，兴建冶金、化工、燃料、机械、电气等行业三十余个大中型厂矿，并在内地筹建军事工业基地[28]。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南京政府积极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与德国签订《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资源委员会从这笔贷款中获得不足十分之一（981.944万马克）用以建设工业，并由德国帮助资源委员会建设钨铁厂和钢铁、电工器材等厂，中国则以钨、锑、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作偿付。为了有效

控制钨、锑的生产与出口，资源委员会分别于1936年1月1日和3月1日在湖南、江西设立锑业管理处和钨业管理处，开始实施对钨锑的管制政策。同时，南京政府于1936年夏拨款1000万元，次年再拨2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的建厂资金。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陆续设立了二十五个企业事业单位，如下表。

1936年**—1937**年资源委员会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

设立时间	企事业名称	所在地	附注
1936.1	锑业管理处	长沙	
1936.2	钨业管理处	南昌	另外省府合办钨矿工程处，1938.11结束
1936	国外贸易事务所	上海、汉口	1938年迁香港
1936.6	中央钢铁厂	湘潭	1938.6停办
1936.6	茶陵铁矿勘探队	1938.11停办	
1936.7	彭县铜矿筹备处	四川彭县	接收原官矿，与重庆行营联合投资
1936.8	江西钨铁厂	江西吉安	存沪机器被毁，停办
1936.8	阳新大冶铜矿勘探队	阳新、大冶	1938.2结束
1936	中央机器制造厂	湘潭	1938年迁昆明
1936	中央电工器材厂	湘潭	有4个厂1938年迁滇桂
1936	中央无线电制造厂	湘潭	与湘省府及广播事业委员会合办，1938年迁川
1936	中央电磁制造厂	长沙	与交通部合办，

1936	高坑煤矿局	江西安源	1938年迁川收买民窑，1938.10结束
1936	湘潭煤矿公司	湘潭	与中福公司合办，收买民矿，1938.11结束
1937.1	灵乡铁矿勘探队	1938.3结束	
1937.2	天河煤矿筹备处	江西天河	与省府合办，收买民矿
1937.7	龙溪河水电厂	长寿	
1937.9	水口山铅锌矿勘探队	常宁	1938.8结束
1937	四川油矿勘探处	巴县	
1937	中央炼铜厂	昆明	后改称昆明炼铜厂
1937	重庆炼铜厂	重庆	
1937	云南锡矿工程处	个旧	
1937	青海金矿办事处	西宁	与省府合办
1937	四川金矿办事处	松潘	
1937	宜洛煤矿	宜城洛阳	接办原企业，战后停产

资料来源：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沿革》，1947年油印本，参考其他资料修订。

（三）商业

南京政府实行若干商业统制政策，建立国营商业，进行商业独占活动。南京政府的商业统制，常以改进品种、防止中间剥削、集中运用银行资金为由，如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从事棉种改良，规定棉价，组织银行贷款等。1934年2月，全国经济委

员会设蚕丝改良委员会，江浙两省也相继设立蚕丝改进委员会、蚕桑管理委员会，在改良蚕种和茧灶方面作些倡导，而重点是统制产销，尤其是统制茧行，统一收购，垄断市场。1936年，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的钨锑运销和出口。孔祥熙控制的天津祥记商行，以“商办”名义出现的国家资本，专门从事匹头、颜料、煤油等商品的买卖，在全国各重要都市设有七八个大商号。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棉业公司也于1936年成立，资本为50万元。1937年春，增资为200万元，5月又增资至1000万元。该公司在上海商品市场的交易很活跃，开张第一年，贸易额即超过20万元，原棉交易总额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300万元[(29)]，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垄断组织之一。1937年3月，宋子文又在广州成立华南米业公司，资本1000万元，但流动资金2000万元，垄断了华中、华南大米的运输和销售。1936年和1937年，南京政府又先后设立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上海中央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茶叶股份公司等商业垄断机构。这种商业因有政府或官僚投资，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商业领域的独占活动发展很快，在一些行业已取得垄断控制权。

（四）交通

南京政府成立后继承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修筑的铁路，里程12728公里[(30)]；1931年东北沦陷后，东北铁路里程6000多公里亦连同损失。30年代前期，南京政府修筑了浙赣铁路、粤汉铁路的株洲至韶关段、湘黔铁路的株洲至湘潭段等，至抗战前夕，全国有铁路21，761公里，南京政府实际控制的铁路只有11，419公里，约占52.5%，其余均在外国资本控制之下[(31)]。

公路建设原由交通部主管，后交铁道部接办，再于1932年交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掌理。1933年，全国通车里程除东北外，有6.3406万公里，到抗战前夕，里程扩展到10.95万公里[(32)]。

航运业，主要是招商局。该局成立于1872年，以后所有权经过几

次变动，1932年才由南京政府接办。到抗战前，招商局的船舶数目最多时有153艘，吨位8.63万余吨[33]，占当时全国国营和民营船舶总吨位57.6万吨的15％左右。

航空运输业，到1936年底，中国已有中国（与美国合办）、欧亚（与德国合办）、西南、惠通四家航空公司。中国和欧亚两公司有飞机27架[34]，西南公司系两广政府投资的30万元，惠通公司为中日合办，实为日资。此外，尚有中苏航空公司，仅有两架飞机。

据估计，1927年—1937年，南京政府统治下，国家资本在工矿业中的资本额为2.06亿元，在交通运输业中的资本额为2.35亿元[35]。交通运输业中的国家资本的资产为16.3897亿元（其中铁路为9.8657亿元，公路4.5114亿元）。1927年—1937年，南京政府国家资本的资产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合计为18.4479亿元[36]。国家资本已在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公路、空运和邮局部门取得垄断和独占地位，但在航运部门则落后于民族资本。在工矿业资产中，国营、民营工矿业资本合计为13.76亿元，其中国营为2.06亿元占15％，民营为11.7亿元占85％。这表明国家资本在抗战前，在工矿企业中还没有占居绝对垄断和统治地位，只是处在初步形成阶段。然而，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已占统治地位，它通过货币信用和外汇政策等，已经可以掌握全国经济命运了。这里所指的国家资本已包含有通常所说的官僚资本的概念。关于官僚资本问题，本书以后各卷将作进一步论述，读者亦可参阅现有的相关著述。

二　对民营企业的扶助

南京政府在建立国营经济的同时，也从清理整顿与奖励两方面扶持民营企业。

（一）清理整顿原有工矿

1930年3月，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建设之方针案》规定："中国之普通工业，在政府之提倡农业增加原料减轻原料之价格及政府施行保护税则之范围内，准其自由发展。"[37] 南京政府依据三中全会决议，对普通民营工业给予切实保障，而对于混乱状态的钨锑业、采金业，铁砂贸易，以及有逆股的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先后对中兴煤矿、益华铁矿、烈山煤矿等进行清理；同时对外国人经营的中福、开滦、鲁大等煤矿也进行整理。通过清理，一部分产权被认为有"逆股"而作公产处理。如山东峄县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北洋军阀所占逆股颇多。自国民党军克复枣庄后，战地政委会即委俞飞鹏为整理该矿委员会主任，着手进行整理。嗣经委员会与该公司双方议定，由公司资助军饷百万，逆股充公，商股照旧维持，已由委员会呈报总司令部及战地政委会核准。但该公司初则以国民党军北伐未成，意存观望，继则以战地政委会行将取消，冀该会同时裁撤，虽现款已筹足，复提出种种要求，不肯将款缴案，经俞飞鹏迭次交涉卒归无效。该会遂据情电呈蒋介石请示，奉电严限该公司30日以前付清。后逾期仍不遵缴，蒋以该公司竟敢背约要挟，显系军阀奸商朋比为奸，希图阻挠军饷，大为震怒，遂于1928年7月5日正式公布，将该矿所有财产，一律充公，并责成俞飞鹏负责接收，一面严令该公司遵照移交，如敢违抗，定予严办；一面将处置经过情形，函请农矿部查照备案[38]。同时对一些由外国人经营，中国政府一向难以控制的厂矿，加强了控制。如中福公司合资经营煤矿须经南京政府批准，而合资期限只定为十年，到期后得依法呈请展限，等等[39]。

（二）颁行奖励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

南京政府于1929年7月及1930年2月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及《奖励特种工业审查标准》，以鼓励人民投资创办新兴工业。1934年4月20日又将它修改为《工业奖励法》，并扩大奖励范围。其奖励对象为：应用机器或改良手工制造的制品，在国内外市场能大宗推销的工业；采用外国最新方法首先在本国一定区域内制造的工业；应用在

本国享有专利权之发明在国内制造的工业[40]。这三种奖励对象的目的在于促进：1.基本工业，期能带动其他工业；2.外销工业，以增加外汇收入；3.新工业，以鼓励技术进步；4.进口代替工业，以缩减国际收支逆差。奖励方法：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减低或免除原料税；减低国营交通事业之运输费；给予奖励金；准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五年以下之专制权。至1936年底，经审查核准予专制权的有纬成股份有限公司、中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三件；减免税款的有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汉藜公司、天原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十一件；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的有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章华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裕庆德毛织工厂等二十七件，共计八十一件[41]。

对于小工业及手工业，实业部又于1931年5月15日颁布《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奖励对象为："对于各种制造品有特别改良者"；"应用外国成法制造物品确属精巧者"；"擅长特别技能制品优良者"。奖励方法：奖金、奖章、褒状、匾额[42]。自"规则"颁布后至1932年底的一年半时间内，各省市依照该规则呈请奖励者甚多，经核准发给褒章、褒状、匾额等奖励者，计有哈尔滨华北油漆厂、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天津隆记工厂、山西樊字华铜工厂、山东瑞兴和工厂、湖北叶正兴蚊香厂、汕头曹裕兴爱国纸伞厂等三十余家[43]。同时，对小工业及手工业中擅长特别技能或应用外国成法能制为世人称道的精良物品，除援照前农商部机制洋货税办理外，对于仿制机则给予减免税捐的优惠。1933年一年内，有一百一十多家工厂对外销免税，内销只抽正附税[44]。

南京政府于1931年12月26日颁布《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组织条例》，成立中央工业试验所。该所努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研究工业制造技术，并进行推广。1932年，南京政府还选聘九十余名专家组成工业标准委员会，制定工业技术标准，实行商品检验等。在此之前，南京政府还于1929年6月28日公布《技师登记法》，进行技术人

才登记，以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至1937年，登记技师或技副的有1367人[45]。

南京政府为调查了解全国工矿企业情况，1931年12月18日实业部公布《工厂登记规则》。规则规定："凡中华民国境内之工厂平时雇用三十名以上之工人或用机械动力制造出品者，均依本规则呈请登记。"[46]至1937年，全国核准登记的工厂共3849家[47]。

南京政府于1929年2月还颁布《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奖励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为扶助纺织业的发展，借拨英国退还庚款余额属水利工程项下的购料款，由政府担保，商民向英国分批订购纱锭60万枚，布机5000台。对于私营企业的资金确有困难者，进行贷款等方式给予补助。1931年为解决丝业危机，发行丝业公债800万元等。政府还提倡举办国货展览会，参加国外的博览会，以扩大中国民族工业产品的影响和销路。

南京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奖励和扶持，对工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工业生产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由1921年—1928年的7.3%，到1928年—1936年增长到8.3%。1936年全国工业产值122.74亿元，比1927年的67亿余元增长83.2%[48]。

三　合作事业的推广

中国合作运动萌芽于1919年。"中国初期合作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完全只是凭私人及若干社会团体的努力所推动"[49]。中国初期小量合作社，对后来30年代的合作运动并无直接影响。可以说，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主要是在华洋义赈会推动下，从信用合作社开始的。

华洋义赈会是由中外人士合组，本为救灾而设的慈善组织。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部分驻华外国公使及外国人士在各地纷纷组织国际

救灾会，进行募捐救灾。1921年恰逢丰收，直接的救灾工作结束，但赈款尚余二三百万元，加之中国灾荒频繁，于是这些救灾会于1921年11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从成立起，其目标不再是简单地赈济已成之灾，而是防灾。1922年4月，华洋义赈会本着“救灾先须防灾，防灾先须调剂农村金融，俾能使恢复元气”的宗旨，设立机构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认定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最适合于中国之农村社会。1923年6月，该会拨款5000元为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之费用，并在河北省香河县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到1927年，得到华洋义赈会批准的合作社计561个，社员13190人[50]。

中国初期的合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北洋政府对于带有社会经济改革运动的合作社，始终抱歧视甚至是仇视的态度。1927年11月，北洋政府农工部通令禁止合作社，各地合作社组织相继遭到封闭，特别是关联到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心的生产合作社首当其冲。这样，中国初期的合作运动到此告一段落。

与北洋政府相反，1925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提倡农民合作事业”的决议案；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联席会议亦通过“扶助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纲。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陈果夫等又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体执监会议上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六项运动为各级党部工作纲领，合作运动为其中之一（六项运动为卫生运动、保甲运动、合作运动、造路运动、造林运动、识字运动，以后又加上提倡国货运动，即当时所谓的“七项运动”）。但实际上，1931年以前合作事业远没有形成一个运动。从1931年起，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步骤，包括1931年公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1933年设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及“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3月1日颁布《合作社法》等，合作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抗战前，南京政府直接参与和推动的合作事业，均出于现实的直接需要，即反共的需要。如1931年到1932年，在江西及鄂豫皖“围

剿”共产党而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就在这几个省积极推动合作事业：1931年8月制颁江西省“剿匪”区内农村合作社暂行条例，9月成立江西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1932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复制颁“剿匪”区内农村合作社条例，公布信用、利用、供给、运销四种合作社模范章程，限期实施；同时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规定每省训练100名[(51)]。1933年成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从资金上给予合作社以支持。四省农民银行开办以后，营业进展很快，1935年4月营业范围扩大到十二个省，故改称为中国农民银行。可见，合作运动实际是国民党反共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30年代，合作事业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运动，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从1931年起，合作社的数量及分布地区都有了一个相对迅速的发展。20年代合作社在中国北方主要局限在河北一省，南方主要在江苏、浙江两省。到1932年，合作社已扩展到至少八个省份，而且合作社的数量在各省逐年递增，见下表：

1932年—1933年合作社发展概况表

	有合作社县数			合作社数			社员数		
省别	1932 年	1933 年	增长率	1932 年	1933 年	增长率	1932 年	1933 年	增长率
河北	69	61	0. 88	876	1605	1. 83	24217	40263	1. 7
江苏	51	54	1. 06	1721	1897	1. 10	53512	56192	1. 1
浙江	32	40	1. 25	731	1072	1. 47	20219	29078	1. 4
江西	5	21	4. 20	12	335	27. 92	827	10981	13. 3
安徽	5	24	4. 80	16	1742	108. 88	439	50408	114. 8

（续）

	有合作社县数			合作社数			社员数		
省别	1932 年	1933 年	增长率	1932 年	1933 年	增长率	1932 年	1933 年	增长率
湖南	2	7	3. 50	8	31	3. 88	8203	30367	3. 7
湖北	2	14	7. 00	3	117	39. 00	272	23400	8. 6
山东	24	61	2. 54	114	225	1. 92	6882	14800	2. 2
总计	190	282	1. 48	3481	7024	2. 02	114571	255489	2. 23

资料来源：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上册第413—432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2月版。

从表中可以看到，尽管其绝对数字都不高，但相对各地而言，发展却非常明显。

1933年以后，合作社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到1935年底，合作社已发展到除上述八省外的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甘肃及绥远等共十六省。到1936年底，合作社数增至3.7318万个，社员增至164.3670万人[52]。

第二，从1932年起，更多的金融机构参加到合作事业中来。在20年代，除义赈会外只有专设的省、县农民银行为支撑合作社的金融机构。到了30年代，先从1931年到1933年义赈会先后同上海银行、中国银行、金城银行订立合同为合作社提供贷款。尔后在1933年又有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向农村贷款。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参加，合作社的资金数量也大为改观。例如，以1922年到1931年十年期间，义赈会提供给合作社的全部资金仅11.22万元，而当它与上述银行签订合同以后，仅1933年一年，这些银行提供的资金即达20万元。至1934年上海的商业银行提供给全国合作社的贷款金额达五六百万元，到1936年底，中国农民银行提供的农业贷款达1480万元[53]。

第三，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出现和发展。这一时期除信用合作社外，又有生产、利用、消费、购买、运销、保险、贮藏等多种形式的

合作社。尽管信用合作社仍为整个合作事业的主流，如1933年信用合作社占全部合作社的82.3%，但随着合作社总数的增长，信用合作社的比例逐渐降低，到1936年已降至55.25%[54]。

抗战前南京政府推广合作事业，创办农业金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上的一个进步。信用合作社曾经起到一定调剂农村金融的作用。当时普通银行放款给合作社的月利总在0.8—0.9分之间，加上手续费以及合作社的开销，放给农民时月利多为1.3—1.6分。这与月息四五分以至七八分的高利贷比较，确实低得多。在救济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南京政府发放农赈贷款，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社、合作社，这对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55]。然而，它的客观效果和影响又怎样呢？首先是合作社运动发展不普遍，只集中于少数几个省，合作社名不符实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其次，合作运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高利贷依然存在。据《农情报告》第二年第11期所载的调查报告统计，在全国23省中，银行放款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占到2.4%，合作社平均也还没有占到3%，而富农占18.4%，地主占24.3%，商人占25.03%，三者合计占农民借款来源的70%[56]。银行和合作社对于农民的影响无足轻重，而地主、富农、商人之影响较重要而且普遍。从利率上看，银行的农贷的确是低利贷款，但是由于一般信用社章程规定家有一定财产（10亩地）方能入社，并取得借款权，借款须有财产抵押和担保，所以能够取得这种低利贷款的往往是地主富农。他们取得贷款以后，提高利息转借于农民，这样，农民所得到的仍然是高利贷。合作社被地主、富农所利用，成为剥削农民的新工具，南京政府的合作运动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四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中国进入30年代后，由于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与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压迫，以及天灾战祸的影响，以致农村破产，工商凋

敝，国计民生濒于危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1935年4月1日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称为挽救崩溃之国民经济，而使人民获得相当之生活，“今日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之后而起，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57]。8月8日，蒋介石复于成都通电各省政府主席转告各地同胞，指示经济建设纲要。10月10日，蒋介石又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的文章。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还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计划大纲》。1936年元旦，蒋介石复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计划大纲》公布。蒋介石的讲话及国民党五届一中的决议，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涵义、目标及实施要项作了具体的论述：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涵义：“为促起人民以自动改善国民之经济，即为集合全国社会与生产机关各部分之努力，建设健全之国民经济。政府则以所有之力量，为之排除障碍，且予以种种助力与便利者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以建设国民经济，即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与国家经济政策范围有广狭之殊。盖国家经济政策，于民生而外，更须注意于国计，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本位，则为国民也，其对象则为民生也。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中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实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亦即民生主义实现之初步也。”[58]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59]。其积极方面：甲、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丙、增加输出产品，藉谋贸易平衡。丁、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消极方面：甲、解决阻碍生产发展之外面的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乙、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的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等）。丙、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丁、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等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

蒋介石说：在本运动目标上，“首要急务，为使人尽其才。一方

面使专门人才有贡献能力于经济建设之机会；一方面使有劳动力的国民，尽量发挥其劳动力于经济建设；同时并须养成中级人员有实际之经验与指导之能力。盖必先人尽其才，而后地尽其利，此为我国从事国民经济建设时所不可忽略者”[60]。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共分八点：

一、振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以达到粮食自给自足为初步目标。一方面增加农业原料之生产量，同时提倡农产之就地加工制造。

二、鼓励垦牧：鼓励大规模之移民垦荒与经营畜牧，实施军区屯垦制，恢复并增进牛羊马匹与农村各种副产物（如猪鱼鸭之类）之生产，同时提倡各省所有荒废土地之开垦与耕作，以地无旷土为目标。

三、开发矿产：调查矿产状况及摧残矿业发展之原因，建议政府改善矿业法规，鼓励矿产投资，扶助矿商之独立经营与自由发展，以辟天然之富源，而容纳众多之劳力。

四、提倡征工：赞助政府实施征工制度，鼓励民众参加义务劳动。尤以开发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开辟垦地，为征工之基本工作。同时实施兵工政策，与征工制并行。以军队补助各地征工工务之不足，并为建设地方公共工程之倡导。

五、促进工业：对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之简单工业，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统经营之。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一面设立劳资调节机关，遇有劳资纠纷，予以公平调处。并须赋与该机关以最后强制执行之权，借以保障企业之安全与劳动者之工作。

六、调节消费：统计各地尤其农村之消费品种类与数量，力谋供

求之调剂，必须消费者尽量自己生产；其不能生产者尽量节约其消费。此项工作，须由当地职业团体及合作社协力进行，并须取得进口业公业之赞助。

七、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一方面设立各重要地区之主要农产品，如棉、麦、米、丝、茶等之公共仓库与运销机关。

八、调整金融：鼓励民间之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由政府执行健全之货币与汇兑政策，而人民衷诚拥护之。

至于国民经济建设之初步工作，则为调查统计、集中人才、研究设计、训练人才与宣传指导等项目。其中有宜于利用合作系统者，有宜于利用教育系统者，有宜于利用军队系统者，有必须获得学术机关或学术团体之协助者，有必须产业团体与产业机关自动自发者，因此必须有一统筹机关来负责推动，此一机关即1936年6月成立的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

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总会设在南京，分会遍设各省、县、市。该会并非政府机关，而是一个以宣传及提供实际协助方式，促进人民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机构。委员会除蒋介石任委员长外，大部分委员均由政府人员兼任，但不另行支薪，与建设委员会等机构不同。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后，民众的经济建设观念为之一新，到了1936年国民经济有所转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也开始活跃。中国农业，由于1936年全国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两年多来又采取了改进生产的措施，也出现了增产的势头。1936年的中国工业、商业、农业比1935年都有较大的增长，与南京政府建立的1927年相比，1936年可算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

第三节　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效

一　工业生产状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如1929年实行关税自主，1931年裁撤厘金统一税收，1933年废两改元与统一货币，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等。同时发展金融业，建立国家银行；注重交通建设，增修铁路和公路，开辟航空线路。这些政策与措施使中国工业在赓续民国以来发展基础上向前发展，缓解了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解除了1934年由于美国政府大量收购白银，国内金融紧缩给工业带来的萧条和困厄。此外，“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所激发起来的广泛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也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工业在1927年—1937年间有新的发展。

（一）棉纺织工业

棉纺织业始终执工业界之牛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相当发展，后经过1923年—1924年纱布萧条，1925年纱业有了转机。1927年全国纱厂已达119家，以后纱厂、纱锭、织机逐年均有增加。进入30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纱业一直不振。1932年部分纱厂曾停工数周，1933年4月纱厂联合会决议停工23%，为期一个月。到期又决定各厂根据情况，在下半年自行减工，或停夜班，或全停数周[(61)]。自1932年起，华商纱厂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因这时纱锭增多，故总水平尚高于20年代。自1933年以后，华商纱厂建设停滞，出售、出租、改组频仍。在此期间，华商棉纺织厂中，破产的有三家，清理的有三家，出租的有一家[(62)]。1935年6月底，59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24厂，而减工者复有14厂，停工减产总锭数超过100万枚[(63)]。至1936年，由于农村安定，农产丰收，农民购买力骤增，使中国棉纺织慢性衰落景象获得一线生机，棉业界人士转趋乐观，颇有奋起之势，但形势好转仅系曙光一现，1937年的“七七”抗战发生

后，形势大变。

1927年—1937年，中国棉纺织业虽有发展，但华商纱厂无论是增长速度或是绝对增长数，都远比外商逊色。1927年全国纱锭数是367.5万枚，至1936年增加到510.3万枚，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华工厂所拥有纱锭数，由157.5万枚增加到235.6万枚，增加几乎达50%，在全国纱锭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42.9%提高到46.2%；而华商纱厂拥有的纱锭数，从209.9万枚增加到274.6万枚，只增加31%，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57.1%降到53.8%[(64)]。布机在1927年总台数为2.9788万台，1936年增加到5.8439万台，其中外商厂由1.6329万台增到3.2936万台，增加了一倍有余，在全国布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54.8%提高到58.1%；而华商厂布机数由1.3459万台增加到2.5503万台，增加约90%，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则由45.2%下降到41.9%[(65)]。随着外资特别是日资势力的发展，上海华丰、宝成一厂与二厂及天津裕元、华新、宝成三厂均被日商纱厂兼并，天津裕大、唐山华新也由日资经营或合营。这些情况表明，外资特别是日资势力增强很快，对华商构成重大威胁。

（二）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是仅次于棉纺织的中国重要工业，它大都集中于交通口岸或大城市，尤以哈尔滨为多。1931年前，面粉工业有所发展，新开设面粉厂44家，同时闭工歇业的也有8家[(66)]。这年全国共有面粉厂157家，其中华商148家，外资（主要是日资）9家。以地区分，东北三省64家，江苏（包括上海）40家，山东16家，河北13家，河南7家，山西和安徽各3家，湖北10家，湖南1家[(67)]。

1931年“九一八”事变，面粉业受影响最深；原来华北及华中的面粉有相当部分销售东北，东北沦陷后，关内面粉输往既须征税，如外货，日粉入口反可免税，市场遂为所夺。而且欧美过剩的面粉又咸向中国倾销，益以华北动荡不安，土磨面粉可不纳税，机器面粉销路遂

与日俱蹙，小厂停业，大厂减工，面粉工业经营艰难万状。至1933年，南京政府改订关税税则，每担面粉进口加征进口税0.825金单位；1935年又对出口面粉实行退税办法，同时全数退还运销东北所征的税款，并大力调整铁路运费。凡此种种措施给予面粉业以帮助，面粉业得以渡过困难缓慢发展。到1936年底止，全国机器面粉工厂实存数共计152家，日生产能力为45.2218万包。其中东北地区共53家，日生产能力为11.651万包；上海、无锡以及江苏等地区共31家，日生产能力17.6万包，仍占全国第一位。是年机器面粉工厂的生产能力虽较1921年增加47%，而实际年产量仅增加26%[68]。

（三）卷烟工业

卷烟工业在我国轻工业中仅次于纺织业和面粉业而占据第三位。中国卷烟工业向以上海为唯一中心，全国直接从事卷烟业的工人达8万人之多。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卷烟工业趋于衰退，每况愈下。1927年上海有卷烟厂182家，1928年减至94家，1929年减至79家，1930年减至65家，1931年减至64家，1932年减至60家[69]，到1936年只余44家[70]，仅为1927年的24%。不过，本时期卷烟日益普及，市场不断扩大，又因其制造较易，内地各省都纷设小型烟厂，卷制低级烟，主销农村。据税务署统计，1933年有纳统税的华商烟厂116家，销烟51.7991万箱，其中低级烟占85%左右[71]。

中国的卷烟工业实际上为外商所垄断和操纵。外商烟厂绝大部分在上海，所谓“八大公司”均是外国资本开设。其中以英美烟草公司最大，1935年改名为颐中烟草公司，是国际烟草垄断公司之一。颐中公司在上海拥有三家工厂，汉口和天津两家工厂，青岛一家工厂，并在全国28个城市设有办事处，拥有卷烟机534台，工人达2万人以上，总资本达4亿元[72]。其次还有美商的大美、花旗、美迪，希腊商的锦华、杜柯、健身，意商的大宝等。据统计，1935年华商销烟46.5023万箱，外商销烟64.1891万箱，占58%[73]。

（四）机器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由于欧战后欧美恢复丝织工业，华丝出口尚称顺利，又遇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年—1930年颇有发展。1929年是我国历史上桑蚕丝产量最高的一年，达16.5511万公担，其中厂丝8.937万公担，占54%。这一年全国360家丝厂，有丝车12万部[74]。其中，上海104家、丝车2.3582万部，无锡46家、丝车1.2862万部，苏州与镇江6家、丝车1544部，浙江24家、丝车6452部，广东146家、丝车7.2455万部[75]。

进入30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经济危机，丝的需求量大减，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竞争，以及人造丝大量侵占真丝市场，机器缫丝业面临重重困难。在1930年，上海和江浙两省的开工丝厂共有193家，其中上海111家，而已有开工不足情况；至1931年共减为149家，上海有70家，1932年又减为105家，上海仅存53家。广东省1929年开工的丝厂146家，至1930年减为121家，1931年又减为111家，至1932年仅存58家[76]。山东、四川等地丝厂亦减产或停闭。

但是，在中国缫丝工业的急剧衰落过程中，亦有不平衡现象。其中以原来上海、广东两大基地的衰落最甚，如上海1934年仅存35家，丝车8270部，广东仅存37家，丝车19505部，分别较1929年减少了65%和73%；江苏省因苏州、镇江厂均早已停歇，所存38厂、丝车10348部全在无锡，故与1929年无锡的46厂、丝车12862部比较，减少仅20%，1935年后，由于永泰资本集团形成增长亦较快。又浙江省除1934年丝车减少较多外，其余年份减少不多，1935年后且增长至历史最高水平[77]。

1935年6月以后，美国丝织厂和袜厂纷纷开工，需要生丝增加，丝销渐起，丝价回升，一年内自最低每担380元一跃而至700元以上，我国缫丝工业才稍有起色。除江浙沪丝厂开工者有所增加外，其

他广东、山东等地的缫丝工业也稍见活跃。1936年最高丝价每担为960元，最低价也达720元，外销转旺；全国开工丝厂增加到180余家，厂丝总产量达7.0971万公担[78]，丝厂可略获盈利，行业有所转机。但是，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又给中国蚕丝业以毁灭性打击。

（五）火柴工业

火柴业在上一时期中本已相当发达，据统计，1928年全国有火柴厂180家，资本总额为2400余万元[79]，遍布十四个省市，其中以广东、山东和上海较多。除上海以外，各省火柴厂大都规模较小，设备简陋，随时开张或关闭，生产不稳定，成本高，质量差。1928年后，瑞典火柴商趁机向中国市场倾销火柴，瑞典厂商在东北收购许多日商火柴厂，借助其技术和资本的优势，生产廉价火柴在华北城乡倾销，以图挤垮华北的中国火柴厂，同时在上海和香港囤积大批瑞典火柴，向华中和华南各地城乡倾销，试图垄断中国的全部火柴市场，使中国民营火柴厂因亏蚀或滞销而纷纷倒闭。据报载，1929年下半年，“东北各厂全数倒闭，广东厂家亦倒闭过半，苏浙皖各省虽根基较固，而停业亦及小半”[80]。

在此危机之际，政府与商业界采取措施尽力挽救。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率由7.5%提高到40%，加强国产火柴的竞争力，使进口火柴由1930年的1.7661万箱减少到1933年的1461箱[81]。火柴业集中地广东，1930年组织维业堂共同议定产销定额，避免同业竞争。广东地方当局对外国和省外火柴征收内地消费税，从而形成地区垄断，维持偏安局面。东北华商和日商亦于1931年实行联营，并由东北当局实行火柴专卖，以抵制瑞典和关内火柴，旋因“九一八”事变中止。在关内，由刘鸿生倡导，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议定每年总产量为74.6543万箱，另留有给日本厂商的份额。惟各区内部争执未已，仅华中区21家实行。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厂已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累[82]。

民族火柴工业在国产火柴销路转快的刺激下，不仅原有工厂增加产量，而且又有许多新厂开设。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全国共设立75家火柴厂，其中1933年以前开设的61家，1933年以后仅个别省份有所发展[83]。

（六）水泥工业

水泥工业是本期发展较快的民族工业，新设立的水泥厂有：1928年广东设立的西村士敏土厂、1934年山西太原设立的西北洋灰厂、1935年江苏南京栖霞山设立的江南水泥厂、1936年四川重庆设立的四川水泥厂。中国幅员广大，建设殷切，几家水泥工厂的产品不足以供应全国的需要。据《海关贸易册》的报告，这一时期水泥的进口数量：1928年为270.0609万两，1929年增至340.6814万两，1930年更增至384.0497万两，每年均有若干增加[84]。进口水泥主要来自日本。日本运销中国的水泥每袋售价还不到国产水泥价格的三分之二[85]，以低价打开中国销路。

由于日本水泥在中国市场倾销，华商水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剧烈。为了联合抵制外货的倾销，防止彼此在竞争中失利，启新、上海、中国、江南四家水泥厂于1925年、1931年、1936年先后实行过三次联营，联营内容包括划分销售区域、议定销售数额和价格等[86]。南京政府于1934年7月施行进口税新税则，水泥进口税率每100公斤增至金单位8角3分，使水泥输入大减，促进了国产水泥的销售。至1937年，中国资本自办的水泥厂已增至九家，原有厂家也购进新机，扩大生产规模，年产量增至735万桶，不仅供应本国水泥的需要，而且产品远销海外南洋一带，打下了中国水泥业的初步基础。

（七）重化学工业

重化学工业是中国建立和发展得比较晚的一个化学工业部门。中国早期的化学工业，大都是轻工业性质的，如早期的制药工业、化妆

品工业等，以后才逐步略有重工业性质的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抗日战争之前的二十年间，是中国重化学工业创建和初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重化学工业亦称基础化学工业，属于重工业范围，包括无机化学工业中的制酸、制碱、制盐、肥料等化学工业部门。

本期制酸工厂有：渤海化学工厂，创办于1926年，资本50万元，厂设塘沽，年产盐酸500吨。得利三酸厂，创办于1929年，资本5万元，厂设唐山，年产硫酸400吨。利中硫酸厂，创办于1933年，资本20万元，厂设唐山，年产硫酸800吨。而规模较大者乃是上海的天原和开成。著名化学工业家吴蕴初，于1922年集资5万元创办天厨味精厂；又于1929年创办天原电化厂，资本初为20万元后增至105万元，年产盐酸近2500吨，并产烧碱、漂白粉。他还创办天利淡气厂，资本100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1600吨，以及炽昌硝碱公司与炽昌牛皮胶公司等。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00吨。另上海江南、四川江北广益、成都裕川、西安集成四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00余吨。此外，尚有广州、梧州、太原的省营厂，年产硫酸8200吨、盐酸600吨，而各大兵工厂也皆产硝酸。由于制酸工业的发展，硫酸、盐酸、硝酸的进口量由20年代末的6000余吨降至1936年的1600吨，而醋酸和其他酸类进口则见增长。

制碱工业的发展较制酸尤佳。著名化学工业家范旭东集中科技和管理人才创办久大、永利公司。塘沽永利碱厂是1924年才正式投产，永利纯碱产量逐年增加：1926年产4576吨，1930年产1.9774万吨，1936年达到5.6297万吨。1930年永利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1159吨，1936年已达4517吨。永利由于生产不断扩大，资本由原来的40万元到1936年已超过400万元。另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每年共产泡花碱4880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00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0吨。此外，广东省营碱厂年产烧碱1860吨。至

此，中国纯碱已可自给，永利产品并有出口，但烧碱仍然不足。

硫酸亚（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30年代进口量1.2万吨，价值1300万关两。1933年，范旭东投资800万元，在浦口卸甲甸建硫酸亚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亚120吨，硝酸40吨，但在上海抗战后，被日机炸毁停工。

（八）电力工业

电力是本期发展最快的工业。据建设委员会的调查，1929年全国电厂共有724家，资本共计22102.4559万元，总发电容量为83.5266万千瓦；至1932年，电厂减至665家，但资本则增加到30429.054万元，总发电容量亦增至89.3645万千瓦[87]。1931年至1936年，华商电厂发电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3.21％[88]。

中国电力工业原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上海美商电力公司一家年发电容量和发电度数，即超过全部华厂的总和；但到1929年华厂总和已与外资旗鼓相当，1936年不计已沦陷的东北在内，华厂已占总容量的56％。华厂中绝大部分是民营，官营已居微不足道地位。

然而，这一时期电力工业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上海包括江苏在内，共有发电厂107所，装机容量为12.57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的20％，年发电量3.2亿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8.6％。西南和西北各省仅有一些小发电厂，主要供照明之用。这一时期，上海及江浙一带，电力普及到镇市，促使地方小工业的发展和手工工场改用马达。

（九）矿冶业

中国在抗战前的矿冶业有国营与民营之分。国营矿冶业，无论在绝对数字上或在相对比重上，都显不出重要性。据1933年统计，国营矿场仅有十四处（河北四处，安徽三处，山西两处，河南、浙江、湖南、江西、云南各一处），资产额6926万元[89]。国营矿冶业的扩

展，是在1935年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后。

煤矿工业：战前中国的矿冶工业主要是煤矿工业。当时已知的全国煤矿储量为2583.77亿吨，其中山西省为1271.27亿吨，东北地区为193.18亿吨[(90)]。1927年—1937年间，煤的总产量逐年有所增加：1927年为2417万吨，1929年为2652万吨，1930年为2603.7万吨，1931年增加到2723.6万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年产1032万吨煤全部被日本侵占，煤产减少40%。1932年以后，煤产量（包括东北在内）仍有增加，1932年为2683万吨，1933年为2836万吨，1934年为3934万吨，1937年为3691万吨[(91)]。但增产的主要是日本人控制的东北各矿和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焦作等矿。外资势力控制垄断了中国煤矿，1935年我国煤矿资本总额（包括东北）估计在2.2415亿元左右，其中华资经营的资本为1.08687亿元，占48.22%，中日合办资本为3000万元，纯日资资本2621.3万元，中英合资资本3136.3万元，中德合资资本450万元，中俄合资资本2400万元，合计外资共计占51.78%[(92)]。

这一时期国产煤已自给有余，年出口量约350万吨，但尚需进口工业燃煤200万吨。出口国家主要是日本，其次有南洋各国及越南等地。

钢铁工业：抗战以前，中国的钢铁工业非常微弱，许多铁矿尚未开采，已开采的产量极低，冶铁炼钢设备缺乏。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两处，余均年产不足万吨。龙烟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当涂各公司1928年—1929年生产有较大发展，由50余万吨增至180万吨，后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而衰退，1936年才恢复到29万吨。

冶炼钢铁方面，因欧战时期铁价上涨，有和兴、阳泉、扬子、石景山四家华商铁厂创建，至本期仅有扬子、阳泉两家生产。阳泉1928年—1931年年产生铁四五千吨，颇有盈余；其后铁价跌落，生产衰

退，至1936年才回复到3600余吨。扬子1923年由六河沟接办，以后停产时间多于生产时间，年产最高不过1.1万吨，惟1935年、1936年又超过历史纪录，最高年产1.5万吨。此时还有上海大鑫钢铁厂，仅电炉炼少量钢；天津天兴制铁所于1936年才建厂。

民族钢铁业失败也是由于日本资本的压力。1936年，日本投资和贷款控制的产量，占铁矿总产量的99.2%，生铁产量的96.8%（包括东北）[93]。当时中国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有色金属矿冶工业：中国有色金属矿主要有金、银、铜、铅、锡、锌、钨、锑、钼、锰、铋等矿，多由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开采，其余如东北、山东、河北、安徽等省也有。这些有色金属矿原来大多数是私人集股民营，或是由地方政府经营，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落后，大多是土法开采，产量甚少。1931年以后，国民政府根据《矿业法》规定，将重要矿业归国营，逐步把一些大矿山收归国家经营。

1929年—1933年有色金产量

矿产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锰	61219	70722	31850	21500	9550
钨	9708	6730	6580	2180	5500
钼	0. 93	5			
金	82710	113986	128500	110000	100000
银	96000	119595	105000	148864	120349
铜	312	345	296	240	525
铅	2190	7752	5996	4965	4999
锌*	19859	15222	14618	10870	9994
锡	7528	7217	8598	7890	7987
汞	24. 8	40. 5	22. 5	20	15
纯锑	18201	14276	11755	10530	11000
铋	216. 42	157	150	50	50

资料来源：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6页。

*系指含锌35％—46％的锌矿石。

中国战前的有色金属生产，品种少，产量不稳定，或逐年下降，其中以锰、锌、铋的产量下降最为明显。中国特产品锑、钨，前期产量仍不多，1936年资源委员会设立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改善生产，统筹外销，经此整顿渐上轨道，产量有很大增加。锑、钨、锰矿产品成为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出口物之一，换回了大量军事物资。

1928年—1936年战前中国锑钨出口量统计表

单位：担

年份	锑出口量	钨出口量
1928	196337	121741
1929	239602	146654
1930	183500	144293
1931	105032	114357
1932	131703	34334
1933	139333	91590
1934	161846	47065
1935	187723	73833
1936	173116	70499

资料来源：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3页。

二　交通运输状况

交通是国家的命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均有较大影响。中国地域十分广阔，战前交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仍很落后。当时的交通，分为陆路、水路、航空、邮电四方面，而水路包括海运和内河航运，陆路包括公路和铁路。

（一）铁路

南京政府成立后，接管了北洋政府的国有铁路，于1928年设铁道部，主管全国铁路建设事业。1929年1月，铁道部长孙科提出《庚款筑路计划》，拟六年中从庚子赔款和关税中集资4亿余元，修建铁路4000余公里。1931年，南京政府拟订《十年工业计划》，到1936年又拟订投资近10亿元，修筑铁路7700余公里，并修建黄河和钱塘江铁桥。

南京政府在拟订建设铁路计划的同时，为筹措资金，从整理铁路债务入手，举借外债，并以发行铁路公债方式向国内银行团借款。这一时期，南京政府共向外国借到铁路债款15726.0535万美元，约合法币52910.5966万元，国内借款7455万元，约合美金2215.7699万元(94)。

本期修建的重要铁路有：（1）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456公里，1936年9月1日通车。（2）浙赣铁路自1929年动工，至1937年9月分别完成杭州兰溪段、金华玉山段、玉山南昌段、南昌萍乡段，全长903公里。（3）陇海铁路灵宝至宝鸡段、大浦至连云港，共计408公里，于1936年12月完工。（4）同蒲铁路由大同至风陵，全长800公里，于1937年6月竣工。（5）江南铁路由南京至孙家埠，全长193公里，1936年2月完工。（6）京赣铁路由宣城至贵溪，全长480公里，由于抗战爆发仅完成210公里。（7）淮南铁路由田家庵至裕溪口，全长216公里，于1935年竣工。（8）苏嘉铁路全长74公里，1936年7月完成。（9）沪杭甬铁路闸口至百官段77公里，1937年11月通车。此外，还建成南京轮渡码头和钱塘江铁桥，使津浦、京沪杭甬、浙赣诸铁路连成一线。

1931年，全国国有铁路1.396万公里，其中约40%在东北。除外国直接经营者外，中国自营的有9594公里，其中1718公里即约18%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全部沦入日本之手。1932年—1937年，关

内修筑铁路3543公里，而日本在东北修筑4258公里，1937年全国铁路2.1761万公里中，东北占45%，南京政府所控制的只有1.1419万公里，占总数52.5%，其余440余公里为英、法资本控制[95]。

（二）公路

1928年，全国已有公路2.9127万公里[96]。南京政府把公路建设亦列为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政，交通部于1928年拟订全国公路计划，以兰州为公路中心，分全国公路为国道、省道、县道三种，总长为4.155万公里，预计十年完成。同年11月，铁道部成立，原属交通部主管的公路建设随即划归铁道部。1929年2月，铁道部成立全国国道设计委员会，负责筹划有关选线、建筑计划、工程标准等事宜；旋制定国道工程标准，并颁布《国道条例》。嗣因内战，筹款无着，到1931年时仅有部分公路开工兴筑。

1932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奉命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同年11月，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在汉口召开豫、鄂、皖、赣、苏、湘七省公路会议，决定将三省联络公路扩大为七省联络公路，里程计2.2万余公里。1934年，陕、甘、青、闽四省及闽粤赣边公路亦被纳入七省联络公路网中，全部联络公路路线里程增至2.9万余公里。1932年5月经济委员会开始督造时，七省可通车之联络公路，仅有7700余公里，而至1936年6月止，各省完成联络公路共计2.1万余公里，可互通公路计3万余公里。此外，尚有已兴工路线3900余公里。各省联络公路中，重要者有京沪干线（两路）、京闽干线、沪桂干线、京鲁干线、京黔干线、京川干线、汴粤干线、京陕干线、洛韶干线等。

1935年—1936年，修筑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约700公里，西汉公路（宝鸡至汉中）250余公里，汉宁公路（汉中至七盘关）150余公里。至1936年底，全国共有公路10.8117万公里[97]，中国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同时，南京政府还注重公路交通的发展，每年进口客

货汽车四五千辆，至1937年，全国约有公路营业客车一万辆，并在长沙、南京、汉口、南昌等地设立汽车机械厂、汽车配件厂和轮胎厂[98]。抗战前，南京政府修筑公路8万公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着眼于军事，在路线选择、修筑质量和运输设备上都不能配合，使公路运输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航运

南京政府成立后，交通部于1928年设立航政司，管理航运行政、船舶海事及海员等各项事务，中国始有正式的航政管理机关。交通部于1931年1月依照《航政局组织条例》，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哈尔滨五个重要港埠设立航政局（其中广州局因广东情形特殊，当时没有成立，哈尔滨局成立后不久，因“九一八”事变而停顿），陆续公布各种航政法规[99]。

抗战前，南京政府在航运方面进行如下工作：

1．建筑港湾：最先修筑者为葫芦岛港，嗣因“九一八”事变而停顿。1934年建连云港。另自1929年后，筹建东方大港及北方大港，而民间亦有开辟三门湾的计划。

2．疏浚航路：1928年成立华北水利委员会，疏浚海河上游各河；同时成立导淮委员会，疏浚淮河。1929年成立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疏浚扬子江。1930年，辽宁省开始疏浚辽河。

3．整顿招商局：1932年10月，南京政府决定将招商局收归国营，并交由交通部管理。1936年2月开始从人事及业务上整顿，效率大增。1935年度盈余29.6万余元，1936年度较1935年度增加纯益达65.6万余元。到抗战前夕，招商局已有大小船舶53艘，8.638万余吨[100]，占全国轮船总吨位57.6万余吨的15%。

4.建立水陆联运：招商局与陇海、平汉、京沪、胶济四铁路建立

水陆联运关系，方便客户，加快了货物运转速度。

5.发展民营航运：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新成立的航业公司有25家，依成立年份，1927年5家，1928年4家，1929年2家，1930年4家，1931年7家，1932年1家，1933年2家；依成立地点分，上海22家，厦门、温州、天津各1家。历年轮船艘数及吨数，依照在政府注册的资料，列表如下：

年份	艘数	吨数
1929	1691	324713
1931	3115	482013
1933	3528	616112
1935	3959	711952

另据1936年3月的资料，全国各地注册的帆船有1.4417万艘，共665.7441万吨[(101)]，约为轮船吨数的十倍，可以看出，当时旧式交通工具在运输中所占的重要性。

（四）航空

1929年1月，交通部设立航空筹备委员会，筹划航空专业计划。同年5月成立沪蓉航空线管理处，购史汀逊式飞机四架及其他机械，于上海、南京、汉口等处设机场，并于上海设飞机修理厂。7月，首先开航沪蓉线京沪段。至抗战前，中国已拥有四家航空公司，开辟航线17条，通航里程约1.78万余公里。

1．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由中美合资1000万元设立，交通部占55%，美国飞机运输公司占45%。至1936年6月，拥有飞机17架，先后开辟沪蓉、沪平、沪粤、渝昆、广河等航线。是年，该公司飞行246.6万公里，乘客1.8567万人，计1200万人公里，载运邮件7.0806万公斤[(102)]。

2．欧亚航空公司：1931年2月由中德合资设立。原定资本300万元，1936年增为900万元，交通部占三分之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占三分之一。公司拥有飞机7架，其中4架是租用的；并先后开辟沪新、平粤、兰包、陕蓉、蓉昆等航线。1936年，该公司飞行91.1万公里，乘客5115人，计312万人公里，载运邮件2.6961万公斤[103]。

3．西南航空公司：1933年，由广东、广西省政府合组，资本150万元，内拟招民间投资105万元。该公司经营华南航运，并与法国航空公司合作，租用法航飞机飞往河内，与法航的欧洲航线衔接。至抗战前，开辟广河、广琼航线。

4.惠通航空公司：1936年11月设立，资本270万元，名义上为中日合办，中方出资50万元，日方出资220万元，实际上则全由日本人经营管理。总公司设在北平，经营平津与东北之间的航运，开辟津大、平津锦、津平承、津平张、平沈五条，总长2500公里[104]。因与伪满通航，引起民众与舆论界的抗议。

抗战前，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发展比较迅速，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在运输上所占的比重仍不及传统的交通工具。据1933年的资料分析，新交通工具的运输收入为4.3亿元，而旧交通工具的运输收入达12亿元[105]。

（五）邮电

中国的新式邮电始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国家才逐步独立办理邮件及电信传递业务，但仍然比较落后。

1．邮电：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交通部下设邮电总局，管理全国邮政事务。1931年6月，交通部修订《邮政总局组织法》，规定总局设局长、副局长各一人，全由华人担任；总务、会计、经划、联邮、供应等处处长、副处长，亦由局长遴请交通部委用。此后，在全国邮政系统中虽然还保留着大批洋员，并担任邮务长、副邮务长、会

计长等职，但不掌握大权，改变了以前邮政主权旁落的现象。

南京政府收回邮权的同时，积极进行邮政建设。首先是增设邮政局所。交通部为谋邮政之推广，决定在内地及边远省区增设邮局，于是内地邮务大有发展。1928年，全国各类邮政局所为4.1675万所，到1937年6月底增加到7.269万所，十年间共增加3.1015万所[(106)]。其次，积极拓展邮路。过去邮路向以邮差邮路为主，1928年以后全国邮路随着铁路、公路、航空线、轮船航运线的开辟与发展而增加。1928年，全国各种邮路45.8051万公里，到1937年6月增加到58.4816公里，十年间共增加12.6755万公里[(107)]。第三，发展邮政业务和繁荣邮政经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类邮局停办，使1932年度邮政业务与邮政收入减少。邮政总局自1934年起采取以下措施：各邮局自1934年4月1日起开办代订刊物业务；10月开办“平快”邮件业务，凡邮件于普通资费外，如加付平常快递资费（每件国币5分），邮局即按格外迅速手续办理；11月，取消海关邮包转口税，各邮局代售印花税；年底取消民信局，统一邮权，收回其经营的包封邮件业务；1935年1月，邮局开办代购书籍业务；4月举办小件邮件业务；5月将新疆、蒙古邮资与内地划归一律，增加包裹重量及尺寸限度；1936年3月，开始划一全国航空资费，7月重订国内包裹资费表。到1937年6月底，普通邮件较1931年度增加4460余万件，包裹增加258万件[(108)]。其历年业务发展及收支状况，列表如下：

1928年—1936年邮政历年业务发展状况表

年份	普通邮件	包裹	航空邮件	航空包裹	邮传电报
1928	636,546,340	6,170,553	—	—	—
1929	724,512,360	6,857,250	—	—	—
1930	796,017,800	6,217,230	—	—	26,220
1931	837,025,200	6,518,200	3,740,500	600	30,800
1932	738,978,500	5,930,100	3,593,500	1390	24,870
1933	787,563,600	6,233,900	3,478,900	1700	20,700
1934	822,335,500	6,255,000	4,243,000	2100	34,000
1935	823,654,300	7,015,700	4,672,300	—	46,200
1936	881,634,000	9,105,200	6,563,600	—	56,800

资料来源：《交通年鉴》邮政编第14页，1935年12月出版；《中华民国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度邮政事务年报》，邮政总局档案137/11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电信：电信事业分为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市内电话及长途电话四方面。

有线电报方面，主要进行机构调整，如将电台与电报局合并，又将电报局与电话局合并，并将全国三等及以下的电报局，均与当地邮局合设一处，但仍各受本管机关管理。全国电报局所数目由1927年的1132所，增至1937年5月的1461所[109]。

无线电报方面，交通部于全国各地广设无线电台，据1937年调查，全国二十三省区，有电台66处，无线电报机174架（不包括军事与政府机关专用者）。国际无线电报，原操于外人之手，1931年2月，交通部将所辖国际通信大电台筹备处与中菲电台、枫林桥支台等合并，成立国际电台，直接经营国际无线电通信事业。此后，交通部先后开放中越（1931）、中瑞（1932）、中苏（1933）、中英、中日（1934）、中意（1935）等电路，与西贡、日内瓦、莫斯科、旧金山、伦敦、东京、罗马、柏林等处均可直接通报。到1937年6月，国际无线电台开放的直达电路已达十四条，加上地方政府及交通部所办线路，国际通信直达电路共有二十四条[110]。

长途电话方面，1932年度扩充1347公里，1933年度扩充5560公里，1934年度扩充1.2938万公里，1935年度扩充1.0772万公里[111]。全国线路总长度由1933年的1.48万余公里，到1936年上升到4.8万余公里[112]。随着长途电话的发展，带动了市内电话的建设。1927年初，交通部所辖市内电话共二十处；到1936年6月增至三十六处（原设于东北之三处未予计算），通话局所达72所，装机容量为7.338万号，用户数为5.2617万户[113]。

三　农村及农业生产状况

（一）复兴农村经济

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左右，农业所得占全国所得的五分之四，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我国农村经济之衰落由来已久，自“九一八”事变后，更因天灾人祸之频仍，衰惫益甚。东北失陷，国共内战，江淮大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我国，造成农村经济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业危机，使本来正在激化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不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而且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南京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挽救和复兴农村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以巩固其统治的社会基础。30年代，南京政府颁布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法令。

1．制定土地法规：南京政府初期，土地集中现象相当严重。据各地典型材料估计，抗战前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地主约占有50％以上的土地，地主富农合计约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就区域来看，华中、华南各省及新垦区（例如东北、西北诸省）地权更为集中，各地大约有15％—60％的户数没有土地，华北无地户约在20％左右，华中、华南及东北则在30％以上[114]。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只有靠租佃地主富农的土地来维持生活，他们一般要交纳50％的地租，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80％。沉重的地租剥削破

坏了农民的简单再生产，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无力改良土壤地力，土地日趋贫瘠，生产力不断下降。南京政府于1930年6月30日颁布《土地法》，全文共五编三百九十七条，包括土地行政、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四个方面的内容。《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同时禁止预租制和押租制。这项限制地租的规定比当时普遍实行的地租率要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而禁止预租和押租制，有利于保证农民的租佃权，使租制相对稳定，提高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土地法》又规定对乡村荒芜土地和未经改良的土地加重税率，而对经过改良的土地，则只收1％的土地税。用税收杠杆推动和鼓励农民耕种荒地、改良土壤，这对提高地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这种立法在各省并未真正实施，而二五减租也只在浙江和湖北推行有些成绩，其他地区功效甚微。

2．加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民国以来因政局多变，中央政府对于水利事业未遑统筹。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就各水系流域为范围，先后组设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局等机关，从事测量、设计与施工，创设中央水利实验处，主持有关水利设施的试验研究。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统一水利办法纲要》，并指定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全国水利总机构，全国水利行政始告统一。

南京政府虽然在治黄、治淮及治理长江方面成效甚少，但各地的灌溉工程建设却较有成绩。1937年以前，全国共完成了十三个灌溉工程计划，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其主要工程有：运河方面，山东南来之水，以微山湖为归宿，输水至徐州、海州各属，可灌田2000万亩；淮河方面，利用洪泽湖拦洪蓄水，引至苏北里下河及滨海盐垦各区，可灌田2000万亩，均由导淮委员会负责完成。另绥远开民生渠，干道72公里，支道79公里，于1928年开工，1932年完成。宁夏建云亭渠，长60公里，可灌田50万亩，于1934年12月开工，1935年5月完

成。甘肃开洮惠渠，1935年10月开工，1938年9月干渠竣工，可灌田3.5万亩。陕西开泾惠渠，1930年冬开工，1935年夏完成，可灌田7万亩；洛惠渠，1934年5月开工，1937年春完成，可灌田50万亩；渭惠渠，1935年春开工，1936年12月完成。此外，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于此期亦有灌溉系统的兴建。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也成为1936年中国农业全面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

3．设立农作物试验机构，进行农产改进：南京政府于1931年成立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后改隶农村复兴委员会。该所主要任务是从事农艺研究工作。在农艺方面，有对小麦、水稻、棉花、马铃薯、甘薯等农作物的育种试验。在植物病虫害防治方面，有稻田害虫防治、小麦黑穗病防治、改良桐油品种、培植菌类试验。在施肥、蚕桑和兽医等方面也开展了实验。在农村经济方面，还组织力量深入到一些农村作抽样调查和召开有关学术讨论会。

继中央农业实验所之后，南京政府又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正定棉业试验场、蚕丝改良委员会、祁门茶叶改良场等科研机构。为配合这些科研机构的农业试验与推广工作，又令各省、县相应设立农业试验机构及研究机关，并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增设农学院，与中央和地方农事试验机关共同开展农业科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抗战爆发前，这些农业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在育种和推广良种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如金陵大学培育出的小麦品种就有金大二九〇号、金大南宿州六十一号及一四一九号、金大开封一二四号、济南一九五号、太谷一六九号、徐州四三八号等品种，这些品种比常规品种增产15%—30%[(115)]。中央棉产改进所经过两年的育种，获得斯字棉，它比标准品种，在1934年平均每亩增产42.18公斤，1935年增产53.27公斤。同时将该棉种推广，在苏、豫、陕、晋四省，于1934年栽植57.02万亩，1935年又增加河北省，栽植面积增至128.8454万亩[(116)]。蚕丝改进委员会则在

产丝区进行监督指导，指令各地一律改用良种，如当时经过改良的“诸桂”及“新元”等蚕种，比较受江浙蚕农的欢迎。江浙两省的改良蚕种场在1930年改良蚕种的产量为171.1041万张，至1935年增至262.7207万张[117]。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也找到了一些实用办法，如用砒酸、钙烟汁及植物油等喷施叶面，可以防止害虫对棉花和烟叶的侵袭等。

4.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缓解农村金融恐慌：农村资金短缺，农业经济停滞不前，迫使南京中央及地方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1927年5月江苏省政府成立时，省政府决定将孙传芳时代征收未完成之二角亩捐，作为筹办江苏省农民银行资金，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后，遂于1928年7月正式设立总行。该行以低利资金贷放贫农，促进生产，扶助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后，各省纷起仿效。随后上海各商业银行亦因都市资金壅塞，农村资金枯竭，便以其剩余资金试作农村放款，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31年春开始农贷之尝试，1933年又在上海总行特设农业合作贷款部（后改为农业部），并于全国各地之分行处设立农业科课，分别办理农业贷款。此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农工银行等亦先后成立农业放款部，开展各该银行农贷业务。

1933年，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以四省农行营业范围普及十二省，遂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同年，南京政府明令全国所有银行，应以储蓄存款总额五分之一投资于农业。中国银行除参加农业贷款外，并成立中华农业贷款银团，先后参加银行十余家，以此统一筹划农贷事宜。

1936年秋，南京政府设立农本局，以为强有力之中央农业金融机关，“以调整农业产品，流通农业资金，藉谋全国农村之发达为宗旨”[118]，拥有资本3000万元。它与中国农民银行一起，成为南京政府控制农贷的国家专职农业金融机构。同年12月，南京政府又通令全国，规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隶属于农本局的“合作金库”，进一

步控制农村金融业。至此，南京政府的农业金融统治网最后形成。截至1937年7月止，全国性农业金融机关达一百六十余家，以省为范围的农业金融机关达三十余家，县农业金融机关达九百余家[119]。南京政府从上到下地在全国普遍设立农村金融机构，形成农贷网络，这是有助于农民解决资金困难和促进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

（二）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

战前我国农业状况缺乏精确统计资料，此处根据现有资料对农业生产状况作一粗略统计：

在耕地方面，据当时政府公报和其他有关资料综合统计，1926年—1933年间全国耕地14.1695亿余亩，其中关内各省为11.6648亿余亩，比1913年13.6亿亩增加4.1%[120]。这一时期，人口由4.38亿增至4.5亿，增长幅度为2.7%[121]。耕地的增加基本上适应了人口的增长。统计数字也表明，中国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仅有三亩多一点，实为全世界人均拥有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

在主要农作物栽培面积与产量方面，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的数字，列表如下：

1931年—1935年主要农产面积及产量

年份 农产名称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稻	257701	861585	259934	988642	278816	965743	295982	782867	278968	960793
小麦	295779	432360	310726	454584	292854	450562	293014	449212	312107	426052
大麦	103405	158552	101789	161603	94974	148295	95458	160605	99787	158112
棉	52230	14570	52284	15143	55890	16595	57371	15849	52182	14238
茶	17556	7900	—	—	—	—	—	—	—	—
小米	79768	128678	81038	132910	82556	132829	81740	137284	79328	136247
糜子	22072	30691	22614	30686	23977	30360	23948	29885	24986	32523
高粱	79869	131535	79360	148314	76803	138324	78145	133139	71476	133551
玉米	69354	127744	71912	139495	64510	114988	63028	111184	70665	136889
燕麦	—	—	—	—	13807	15888	15338	18871	16322	17444
甘薯	30708	316537	30931	360699	34764	368041	32351	320633	33220	371611

资料来源：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2章，1937年2月，第1—2页。

从这些作物栽培面积看，战前我国以小麦居首位，历年约在3亿市亩左右，其次为水稻，约为2.6亿市亩。但就产量言，则以水稻居首位，小麦次之，后者仅约为前者一半。1931年—1935年的统计表明，中国农业中主要农产面积及产量均有增长，而中国农业战前发展比较快的是1936年。再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以我国农业作物水稻、麦类、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种植面积产量，列表如下：

1936年六种主要作物每亩产量及其与上年增减比较表

单位：斤

作物名称	亩产量	与上年比较	百分比
小麦	151	＋14	10
大麦	166	＋8	5
燕麦	113	＋6	6
粳稻	370	＋23	7
糯稻	346	＋28	9

棉花	33	＋6	6

资料来源：实业部统计处编印：《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1937年出版，第6—7页。

1936年六种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及其与上年估计增减比较表

单位：千亩

作物名称	本年种植面积	与上年增减比较	百分比
小麦	205,541	-6566	2
大麦	98,101	-1686	2
燕麦	15,945	-377	2
粳稻	241,080	-8864	4
糯稻	26,270	-2082	7
棉花	63,571	＋11389	22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第3—4页。

1936年六种主要作物产量估计及其与上年增减比较表

单位：千担

作物名称	本年总产量	与上年增减比较	百分比
小麦	461,555	＋35503	8.3
大麦	162,784	＋4636	2.9
燕麦	18,036	＋592	3.4
粳稻	895,601	＋25064	2.9
糯稻	90,959	＋703	0.8
棉花	21,058	＋6720	46.9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第8页。

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就全国省份中二十一省的统计，1936年的上

述六种农产产量均有相当幅度的增产。稻增产2500万担，棉花约增产670万担，小麦约增产3500万担。综合所有农产产量的增加数值与上年比较，在10亿元以上[122]。就上述三组统计表看，表一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普遍在5%—10%之间，其中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最大，年总产量增加8.3%，但种植面积却减少2%。稻的单位产量和年总产也分别增长7%与2.9%，而种植面积却减少4%。这种情况说明，在1935年至1936年间，即使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总产量也有2%—8%的增长。棉花在种植面积和年总产量上，均有大幅度的增加。尽管棉花的单位产量仅比上年增加6%，但年总产量却增加47%。无疑这与种植面积增加22%有关系。

至于农产品的净产值，根据巫宝山的估计列表如下。巫宝山所说的农业系指广义农业，包括畜产、水产等产值。

1931年—1936年农业产值

单位:千元

年份	稻麦等作物净产值	稻麦等作物净产值指数	特种作物、蔬菜、水果、牲畜、水产净产值	农业净产值合计
1931	2,699,771	112	11,059,260	13,759,301
1932	2,940,822	122	11,990,400	14,931,222
1933	2,410,510	100	9,860,407	12,270,917
1934	2,024,828	84	8,279,578	10,304,406
1935	2,579,246	107	10,593,242	13,172,488
1936	3,133,663	130	12,792,795	16,926,458

资料来源：巫宝山：《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48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上述统计表明，抗战前十年中国农业向前发展，1936年达到高峰。粮食的总产量也于1936年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其增长速度大体可与人口的增长率相当[123]。而经济作物的增长更快些，因而农业生产结构有一定的改善。

四　对外贸易状况

（一）南京政府的外贸行政与政策

1927年以前，军阀当政，外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贸易几咸操于洋商之手；1920年，北京政府为发展出口贸易，增进国际信用及普及经济知识，特设全国经济讨论处于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工商部派员接收全国经济讨论处，改组为工商访问局，1931年改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该局宗旨是调查中外商情，指导国人经营对外贸易。同时，南京政府在驻外使馆中，亦渐有商务官之设置。此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初基。

鉴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外过剩商品向中国倾销，中国的丝茶特产渐失海外市场，南京政府始筹划国际贸易方面应付方策。

输出贸易政策：南京政府采取奖励出口政策，一方面修订出口税则，对于原料品及制成品在国外市场推销最感困难者，酌量免税减税；对手工艺品宜于奖励出口者，酌量免税，以利推广海外贸易。另一方面设立商品检验局，厉行检政，取缔假冒伪劣，检定质量等级，协助商人提高外销商品的品质。

输入贸易之政策：1929年前，进口税率受《南京条约》的束缚，对输入货品一律课值百抽五税率；其后恢复关税自主，为保护生产，进口税率先后改定三次，最高税率有达值百抽八十者。1930年1月实行关栈制度、领事证单标记办法均有保护国内产业，限制输入的作用。

（二）战前外贸进出口概况

1927年—1937年的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1931年为平稳发展阶段；1932年—1935年为衰落阶段；1936年—1937年上半年为复苏阶段。1927年—1931年四年间，无论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均为平稳发展阶段。其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1927年—1931年中国对外贸易值

单位:千关两

年份	进口净值	出口净值	入超	贸易总值
1927	1,012,932	918,620	94,312	1,931,552
1928	1,195,969	991,355	204,614	2,187,324
1929	1,265,779	1,015,987	250,092	2,281,466
1930	1,309,756	894,844	414,912	2,204,600
1931	1,433,489	909,476	524,013	2,342,965

资料来源：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3页。

上列资料表明，以1927年进口净值为100，则1928年为118，1929年为124.9，1930年为129.3，1931年为141.5。每年进口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出口方面，以1927年出口净值为100，则1928年—1931年分别为107.9、110.5、97.4和99。从出口指数看，前两年增加，后两年减少，但并不是中国的出口货物减少，而是因为物价狂跌的缘故。下面是1929年—1931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价格变化情况：

商品名称	单位	1929年价格（美元）	1931年价格（美元）
生丝	担	320.0	145.3
茶叶	担	27.8	16.2
猪鬃	担	100.7	54.2
大豆	担	32.2	16.0
桐油	担	234.0	182.0
花生油	担	169.3	88.0

资料来源：［苏］斯拉德科夫斯基著、郗藩封等译：《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215页。

以上六种主要出口商品可见，其价格在三年之中平均下跌了一倍左右。中国出口贸易因物价惨跌而受到损失。如果除物价因素，中国商品出口的货物总量在1929年—1931年间实际上还是有所增加的。

1931年—193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衰落时期。其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1932年—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值

单位:千关两

年份	进口净值	出口净值	入超	贸易总值
1932	1,049,247	492,641	556,606	1,541,888
1933	863,650	392,701	470,949	1,256,351
1934	660,889	343,527	317,362	1,004,416
1935	589,994	369,582	220,412	959,576

（续）

年份	进口净值	出口净值	入超	贸易总值
1936	604,329	452,979	151,350	1,057,308

资料来源：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3页。

本期进出口贸易严重衰落的原因：从进口方面看，自1931年底开始，各国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纷纷放弃金本位，特别是美国实行“白银法案”，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高价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缩，影响了中国的进口。1932年开始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经济衰退，生产资料及机器设备需求减少。1933年和1934年南京政府两次修改税则，提高进口税率，使进口贸易额下降：1934年因税则提高进口减少23.2%，1935年则减少22.6%。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大规模走私，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正常的进口贸易。这几年国民党连年发动内战，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购买力下降，进口商品需求量锐减，影响了进口贸易。从出口方面看，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东北出口货物为日本攫取，中国农产品出口受到严重打击。1931年前，东北对外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7%，是唯一出超地区。“九一八”事变前的五年，每年平均输出额为6.6亿元，输入额为4.35亿元，出超2.25亿元。而且这一时期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实行输入贸易统制政策，提高进口货税率，限制农产品进口，而中国出口商品中恰以农产品为最大宗，

因此出口量大受影响。

1936年—1937年上半年为对外贸易的复苏阶段。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世界银价上涨，中国银币增值，加上南京政府的法币政策顺利实施，汇率趋于稳定，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转机，贸易数值与入超情形都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1936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05,730.8万关两，比1935年增加9773.2万关两，增长率为10%；1936年入超为15,135万关两，比1935年减少6906.2万关两，减少率为54.4%。

综观战前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

（1）入超空前增长。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沉重打击，国际贸易总额急剧下降。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都高筑关税壁垒，同时积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推销商品，中国成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地之一，入超急剧增加。1927年入超为9431.2万关两，1930年达到41,491.2万关两，1932年高达55,660.6万关两，创中国外贸史上入超新纪录。此后入超额虽不断下降，但数量仍很大。

（2）主要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其一是消费资料的进口日趋减少。20年代末期，消费资料在中国进口的外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0年代以后，消费资料的进口明显减少。例如，棉布1927年进口额为21，222.1万元，占进口总额的13%，1931年则降至18,864万元，占进口总额的8.4%，1935年减至2137.9万元，仅及1927年的10%，占进口总额的2.2%[(124)]。其他几种主要消费物资，如棉纱、棉花、食糖、大米、小麦、面粉等进口额均逐年减少。消费资料的减少，说明中国农业生产有了发展，中国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基本上可以自给。同时也说明中国轻工业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其二是生产资料的进口日趋增加。1927年五金进口额为7837.7万元，占进口总额的4.97%，1931年增至13262.5万元，占进口总额的5.94%，1935年虽减为8837万元，但占进口总额的9.45%，1936年上半年增至占进口

总额的10.3%；机器进口也由1927年占进口总额的1.79%，逐渐增至1931年的3%，1935年的7%[125]。生产资料进口的增长，相应地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

（3）主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国出口商品中，一直以农副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和矿石为主。1927年以前，以原料及半制品为最多，食品及烟草次之，制造品则较少。1927年起，顺序略有变更，是年出口商品中，原料及半制品占34.5%，制造品次之，占33%，食品及烟草再次之，占31.1%，杂项则占1.4%。1931年因豆类输出特盛，输出额增至32710.7万元，于是食品及烟草遂跃居首位，占35.1%，原料占32.7%，制造品占31.2%，杂项占1%。1936年原料及半制品复居第一位，占38%，制造品次之，占33.7%，食品及烟草占27.5%，杂项占0.8%[126]。这时因东北失陷后豆类及豆制品出口数极微，所以食品及烟草由1931年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

（4）各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1927年，以日本居首位，贸易额达4.57余亿元，美国与英国以2.59亿元与1.16余亿元，分居第二及第三位。1931年情势改变，美国跃居首位，计达5亿元，日本退居第二，计值4.6亿元，英国仍居第三位，计1.8亿元。1935年各主要输入国依次为美、日、德、英。这时期内，德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也较快，1928年只有6131.4万元，占3.8%，而1935年上升为1.03385亿元，占11.09%[127]。

第四节　抗战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计

全国各个行业发展到1936年时，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一年，农业已经复苏，财政收支有很大改善，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发展迅速，因此，这一年是南京政府抗战前十年经济全面好转的一年，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峰。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分为三种资本形式，即外国资

本、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指由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事业。这种资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仅超脱在南京政府的驾驭之上，而且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影响，成为控制和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一种经济势力。由于外商的这种投资是在各国列强攫取中国政治经济特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带有很强的侵略性，因此，人们一般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国家资本，指由南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事业，其中还包括由政府拨款间接经营和控制的官商合营的资本主义企事业。这种资本代表国家经营，是垄断和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一种主要资本形式。私人资本，指由私人独资或合资兴办的资本主义企事业。真正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是本国的国家与私人两种资本，而不是外国资本。一般说来，外国在华投资的比例越大，则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越深；反之，其投资比例越小，越能反映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独立发展水平。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经过1895年至1913年和1914年至1920年两个发展阶段，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再经过1921年至1936年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中扩大开来。因此可以说，1895年—1913年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1914年—1920年为其进一步发展时期，1920年—1936年则为资本主义化时期[128]。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可以列表如下：

1894年—1936年中国产业资本发展水平估计

单位：百万

年份	外国资本	本国资本	比率	国家资本	私人资本	比率	三种资本	近代工业比重	近代工业、手工业比重	近代交通比重
1894	54.34	35.19	60.7:39.3	27.96	7.72	79:21	89.52	—	—	—

(续)

1913	1237	303.86	80.3:19.7	148.87	154.99	49:51	154	—	—	—
1920	1667	700.79	70.4:29.6	270.92	428.97	40:60	2368.3	4.9	10.8	45.6
1936	6434	1776	78.4:21.6	441	1335	24:76	8210	10.8	20.5	51

资料来源：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14—135页。

从表中可以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第一，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所占比重大。在1894年—1936年的四十二年中，中国产业资本的总和增加101.6倍。其中外国资本增加127.6倍，本国资本增加59倍，外国资本比本国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一倍以上。19世纪下半叶，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外贸业，涉足工业的较少。从20世纪开始，外国资本投向又主要集中在铁路的兴建上。20至30年代，其大量投资转向工矿业，到1936年时，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不下29.2亿元，加上铁路和航运业，资本总额约有64.34亿元。其中，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占有很大比例，如不计东北，大约为28.43亿元。经过20至30年代大规模的投资，外国资本在中国工矿业中已经占据了垄断地位，大体上已经控制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械采煤量的66%、发电量的55%[(129)]。也就是说，外国资本掌握了中国基础工业的主要部分。在轻工业中，外资在某些行业也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纺织业中，外资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6%和织布机总数的56%[(130)]。外资比重大，正好说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外资必然要排挤和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二，抗战前夕，私人资本在本国资本中的比重大于国家资本，且在工业资本中居于优势。在1894年—1936年的四十二年中，国家资本只增加26倍，私人资本却增加了175.4倍；国家资本在本国资本中的比重日趋下降，由79%下降到24%，私人资本的比重则急速上

升，由21％上升到76％，私人资本发展越来越快。从四十二年的全过程来看，私人资本发展的最快时期是1920年—1936年。在这十六年间，私人资本增加到13.35亿元，超过1920年以前积累资本总和的两倍多；而在这十六年中，又以1927年—1936年南京政府建立的头十年发展最快。战前十年是私人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抗战前，国家资本在工业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如果剔除本国资本中的金融资本，全国工矿业资本总额是13.76亿元，其中私人资本约为11.7亿元，国家资本只有2亿元，仅占本国资本的15％[131]。抗战前国家资本没有垄断工矿业，但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1936年全国164家银行的总资本为4.0049亿元，国家银行资本约有1.66915亿元，大约占总资本的45％[132]；加上1937年春财政部向中国通商银行等所谓“小三行”增资的1058.6万元，国家资本达到1.7亿元。当时全国共有私营银行135家，资本额为18619.1万元[133]，加上全国1269家私营钱庄的资本7784.8万元[134]和35家私营保险公司的资本4222.1万元，其资本总和是国家银行资本的1.6倍。在1936年，从全国银行、钱庄、保险等金融业资本总额看，国家资本是不占优势的。国家银行资本只是凭借国家政权和通过货币、信用与外汇政策的力量，才在本国金融业中取得相对的优势[135]。例如，1931年，国家行、局的普通存款只有8.89亿元、储蓄存款0.05亿元，合计占全国金融业存款总额的42％；而到1937年，国家四行二局的普通存款就增为26.55亿元，储蓄存款增为1.88亿元，合占全国金融业存款总额的72％[136]。所以，抗战前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亦不占垄断地位。如果把国家资本在工业与金融业两方面的力量合起来，亦不占优势，仍是私人资本占显著优势。其比例是国家资本在本国资本总额中只占24％，而私人资本则占了76％。1936年是私人资本发展史上的高峰点。

第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以前有明显的提高。经过鸦片战争后80余年的发展，到1920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已达到219.03亿元。其中农业为165.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5.4％；工矿业为53.83亿

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6%。在工矿业总值中，手工工矿业产值约为43.17亿元（其中工场手工业约12.95亿元，占整个手工业产值的30%），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9.1%；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业产值为10.6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9%，加上工场手工业的部分，整个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业的产值约为23.61亿元，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8%[137]。这个比例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包括三种资本主义在内）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水平是：新式资本主义企事业的产值大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连同工场手工业（已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产值在内，只有10%左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但是，经过十六年的发展之后，即到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则有了明显的提高。据统计，193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已增加到306.12亿元，其中工矿业总产值约为106.8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5%；农业总产值为199.2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5%[138]。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工矿业产值上升，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标志之一。在工矿业总产值中，手工业产值为73.71亿元（其中工场手工业产值占29.4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如果把工场手工业与近代新式工矿业的产值相加，则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0.5%[139]。这表明，1936年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已经提高到20%左右了。单就工业而言，提高更快，近代工业已占到整个工业产值的58.6%。也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的，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另外，在近代企业的各个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被普遍采用，如交通运输业，1936年的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报、邮政等项总收入为13.5亿元，其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获得的收入占51%[140]，比1920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交通运输业中有一半以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标志。总而言之，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20年代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不大，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扩大到国民经济生产的各个部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

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

(1) 陈公博：《四年从政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9页。

(2)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3)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1—6月），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1145—1146页。

(4) 张嘉铸：《致经济部工作报告（1941年1月14日）》，参见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97—801、797—798页。

(5)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72页。

(6)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72页。

(7) 潘群祥：《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8) 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页。

(9)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第414页。

(10)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66—67页。

(1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63、980页。

(12) 《中国国民党历届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一）》，《革命文献》第79辑，第161页。

(13)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7页。

(14) 《兵工署前第二工厂厂史资料》，1948年油印稿，重庆市档案馆藏。

(15)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中国近代兵器械工业档案史料》（三），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16)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01页。

(17)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75页。

(18)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88—789页。

(19)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20)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 1847—1947年》，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668页。

(2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4页。

(22)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53页。

(23) 中国银行：《1937年度报告》，第42—43页。

(24)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958—959页。

(25)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09—110页。

(26)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09—110页。

(27)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97—800页。

(28)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63页。

(30)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87页。

(3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87—88页。

(32)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第473页。

(33) 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4)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8页。

(35)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0页。

(36) 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7)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9辑，第162页。

(38)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98—699页。

(39)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04—205页。

(40)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98页。

(41) 实业部档案四二二（1）·2010、2009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2)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第3410页。

(43) 《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实业》，《革命文献》第75辑，第1377页。

(44)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第425页。

(45) 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与经济建设》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29页。

(46)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第3415页。

(47) 《工厂登记分类清册》，经济部档案四35297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8) 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与经济建设》上册，第29页。

(49)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349页。

(50) 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上），第415页。

(51)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第426页。

(52)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3)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4)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5)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6)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1935年版，第807—808页。

(57) 蒋介石：《国民经济建设之意义及其实施》，葛定华：《国民经济建设要论》，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58)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

年版，第1014页。

(59)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015页。

(60)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015页。

(6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30—231页。

(62)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668页。

(63)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78页。

(64) 《银行周报30周年纪念刊》，1948年印，第225、335页。

(65) 《银行周报30周年纪念刊》，1948年印，第336页。

(66)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07—300页。

(67)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82页。

(68) 上海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页。

(69)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679页。

(70)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52页。

(7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53页。

(72) 《上海华商卷烟工业之现状》，《工商半月刊》第5卷，1935年1月，第1页。

(73) 《近三年国内制造卷烟华商洋商销量每月比较表》，引自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下册，1947年版，第132页。

(7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75)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27页。

(76)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25页。

(77)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26页。

(78)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27页。

(79)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90页。

(80)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81) 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火柴工业报告书》，1935年7月版。

(82)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83页。

(83)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6页。

(84)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92页。

(8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2页。

(86)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678页。

(87)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292页。

(88)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22页。

(89) 汪馥荪：《中国国营经济的基础》，载《中国工业》月刊新1卷第10期（1950年2月号）。

(90)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1、287页。

(9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24、910页。

(92)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12、914页。

(93)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9页。

(94) 李占才：《中国铁路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95)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86—88页。

(96)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4页。

(97) 赵祖康：《中国的公路与运输》，引自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57页。

(98)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1974年版，第235页。

(99) 《交通杂志》第5卷第3期，第173页。

(100) 《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国营招商局档案四方八②/590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85页。

(101)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台北东华书局1979年版，第543页。

(102)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6页。

(103)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6页。

(104)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6页。

(105)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第545页。

(106)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74页。

(107)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第548页。

(108)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76页。

(109) 俞飞鹏：《十年来的中国电信事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第372—373页。

(110) 俞飞鹏：《十年来的中国电信事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第396—402页。

(111)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上编第3章，第14页。

(112)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8辑，第278页。

(113)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上编第3章，第19页。

(114)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7页。

(115) 沈宗翰：《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0页。

(116)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

(117)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38页。

(118) 《农本局组织规程》第一条。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四，4254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9)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109页。

(120)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99页。

(12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62、264页。

(122) 实业部统计处编印：《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1937年版，第3页。

(123)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82页。

(124)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26页。

(125)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27页。

(126)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第577—579页。

(127)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第580—581页。

(12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9页。

(12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1页。

(13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1页。

(131) 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问题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132) 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问题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133)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508页。

(134)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第3编第4章。

(135) 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问题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136)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台北文海出版社1948年版，第51页。

(137)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7页。

(13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2—133页。

(13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2—133页。

(14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3页。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第一节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一　初级教育

初级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民众和大多数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儿童是推行训政和建设的障碍，也就是推进民族文化的大阻力。"[(1)] 朱家骅（1931年12月至1932年10月任教育部长）认为："在任何国家，如欲谋教育普及，必须推广小学教育使成义务教育。"[(2)] 30年代初，国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法令规章，推动初等教育的发展。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园招收4—6岁的幼儿，接受音乐、故事、儿歌、游戏、常识等方面的简单教育，以促进儿童快乐、健康发展。这一《标准》初步确立了幼稚教育制度的法律依据。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法》。次年3月，教育部依据此法令颁布《小学规程》，初等教育发展步入轨道。

《小学法》规定，小学为施行国民义务教育的场所，小学教育的目标为："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发展儿童之身心，培养国民之道德基础，及生活所必需之基本知识技能。"[(3)] 《小学规程》规定，"小学分二级，前四年为初级小学，得单独设立；后二年为高级小学，须与初级小学合并设立"[(4)]，初级小学实行义务教育。《规程》明确小学教育八项训练标准：

（一）培养儿童健康体格，（二）陶冶儿童良好品格，（三）发展儿童审美兴趣，（四）增进儿童生活技能，（五）训练儿童劳动习惯，（六）启发儿童科学思想，（七）培养儿童互助团体之精神，（八）养成儿童爱国爱群之观念[(5)]。为保证儿童能得到国家民族思想的基本教育，《规程》确定："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或其所组织之团体，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6)]

由于社会残破，民生凋敝，民国时期儿童失学现象极为普遍。《小学法》和《小学规程》特别强调，除六年制完全小学外，各地还可设立简易小学及短期小学，进行速成教育。简易小学招收不能入初级小学之学龄儿童，修业三年，不收学费。短期小学分一年制和二年制两种，不收学费，书籍用品由学校供给，招收8—16岁的年长失学儿童，每班每日授课3—4学时。年授课时间不少于540学时。学校进行基本用字和常识的教育，要求能掌握1400字的读写。在人口稀少、地方贫瘠，无法设立学校的地区还可设立巡回教学班。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儿童接受到最基本的教育。1931年—1936年六年间，全国儿童就学率由22.16％递增到31.09％，学生人数增加56.4％[(7)]。

早在1922年颁发的壬戌学制中，就规定小学实行四年制义务教育，但当时仅为一纸空文。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规定："已达学龄之儿童，应一律受义务教育，其详以法律定之。"[(8)] 1932年6月，教育部颁发《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规定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为第一期，在此期内，各地应设义务教育试验区，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实行强迫入学，入学儿童总数至少应达当地失学儿童的十分之一。第一期开始后，由于经费、师资、校舍、观念等原因，收效不大。

义务教育的停滞不前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1935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遵照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标本兼治"等决议案，制定《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

大纲》等文件，具体推出推进义务教育的时间表，决定自1935年起，在10年左右时间内，分三期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第一期自1935年8月至1940年7月，全国学龄儿童除入普通小学者外，应要求进一年制短期小学学习，使80％以上学龄儿童受到一年以上义务教育。第二期自1940年8月至1944年7月，开办两年制短期小学，保证80％以上儿童享受两年义务教育。第三期自1944年8月开始，最终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期限[(9)]。8月，教育部成立“全国义务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义务教育推进工作。

经费问题是制约义务教育正常开展的最大障碍。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及拨付办法》、《各省市义务教育经费经管办法大纲》等条例，详细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分配和补充办法，确定专款专用的原则。即由省、市自筹和中央补充相结合，省市县新增教育税收，省应提30％，特别市应提50％，作义务及成年补习经费；中央补助义务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经费，每年至少应占总金额45％。据统计，1935年至1937年的3年间，中央财政的补助额分别为290万元、438万元、636万元[(10)]。另外，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教育部还于1936年颁布《训练义务教育师资办法》，规定由教育部定期举办义务教育干部人员培训班，训练各省市义务教育人才。

30年代，传统私塾小学在农村地区仍占很大比重。1935年，全国私塾达110,144家，学生1，878，351人[(11)]，几乎达全国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为此，教育部要求各地应着力改良私塾，各私塾课目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课程开设，不得擅定课程，私塾办理优良者可改为短期小学。1937年6月，教育部颁布《改良私塾办法》，要求私塾塾师应文理清通，常识丰富，塾舍应宽敞，并有学生运动空地，采用教育部审定之教科书[(12)]。然而，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时是很难到位的。据统计，塾师中受过师范教育的仅占塾师总数的8.55％[(13)]，教学质量仍难真正得到保证。

小学课程设置是初级教育的另一个重点，教育部对此也几经斟酌

变更。1928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暂行条例》中规定初级小学科目为：三民主义、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自然、乐歌、党童子军、图画、手工等，高级小学加设职业科目。这一课目叠床架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1929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简化、合并了一些科目，简化后的课目主要有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工作、美术、体育、音乐等。1932年10月，教育部根据各地试行的结果，正式颁布《小学课程标准》，确定小学开设课目为：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1936年7月，教育部对此再作调整，进一步将课目简化为公民训练、国语、常识、算术、工作、唱游。经过数次调整、简化，小学课程设置逐渐与小学生身心发展水平较为符合，在民国时代被长期沿用。

在确定课程同时，教育负责部门还采取措施，改变教材零乱的状况。国民政府成立前，各学校均为自由选用教材，各类教材充斥书坊，良莠不齐。1928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小学必须采用经过审定的教材，并查封了一批质量和政治上被认为有问题的教科书[(14)]。同时，当时的教育主管机关大学院要求各地小学一律用语体文教学，不准采用文言教科书。193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除国文可兼用文言语体外，其他各科一律用语体文编辑。1933年4月，教育部决定分期编订统一的教科书，由教育部聘请专家编写或委托国内著名小学代编，至1936年，完成编订的有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等科。部编教材的推出，统一了教材标准，提高了教材质量，对促进小学教学质量提高有一定意义。显然，教材中也包含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

教育主管部门对初等教育给予较多重视，30年代初、中期，初等教育在所有教育门类中发展速度是最快的。从数量上看，1929年全国小学生只有880多万人，1931年度即增至1172万人，1936年则达1836万多人，八年时间人数翻了一番多[(15)]。另据统计，1935年全

国学龄儿童共49,022,202人，接受义务教育数为10,834,844人，占22.1％左右，上海、山西、威海、青岛等省、市比例更高，达半数或半数以上，上海高达68％，山西接近70％[16]。就教育经费言，1930年全国小学教育经费为5758万元，1936年达11972万元，增长了一倍强[17]。经过多方整顿，教育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应该指出，虽然30年代小学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也还是很突出的。整个30年代，全国有一半以上儿童仍未取得接受最基本教育的权利。虽然教育部宣称要逐步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进展十分缓慢。据在全国居前列位置的江苏省统计，1931年该省有学龄儿童518万余人，实际入学者仅133万余人，仅占总数的26％[18]。另据统计，1930年广东全省共有失学儿童320多万名，全省完成义务教育，年需经费1亿多元，而同年度全省教育经费总计只有1799万元，倾全省财政所入也不过7000多万元，远远不敷所需[19]。中国教育落后的状况仍没有根本的改变。1936年，教育经费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4.8％，但同年儿童入学率只有23.42％，失学儿童仍达76.58％[20]，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终究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美好许诺而已。

二　中级教育

和初级教育相比，30年代中级教育发展相对缓慢。中级教育包括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职业技术教育。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规定普通中学附设师范、职业各科，江、浙等省甚至将师范与中学合并办理。这种普通中学与职业、师范二种教育合并设置的制度，弊端较多，“使中学教育系统混淆，目的分歧，其结果中学教育固无从发展，而师范与职业教育，亦流于空泛”。“中学生之程度，反日而降低，职业技能，未有充分之培养，师范各科，未有专业之训练，而中学应注重之基本教学，反不能严格，结果谋生任教与求学三者均不能自全”[21]。1932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整顿全国教育，重点对

中级教育实行改制，相继颁布《中学法》、《师范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一系列法令，分别设立三类学校。同时在这三项法令基础上，具体制定了各类中级学校规程。

《中学法》和《中学规程》规定：普通中学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修业年限各三年，其培养目标是："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22] 确定："中学为严格训练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之场所。"[23] 具体要求则为："（一）锻炼强健体格，（二）陶融公民道德，（三）培养民族文化，（四）充实生活技能，（五）培养科学基础，（六）养成劳动习惯，（七）启发艺术兴趣。"[24] 这一德、智、体、美和劳动教育五育共同发展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尚能契合。

中学是青少年思想发育的关键阶段，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中学生的意识形态灌输明显加强。教育部要求所有中学必须开设讲授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讲义由有关部门严格审定。实行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确定中学训育的目标为："根据团体化、纪律化、科学化、平民化、社会化的原则，使无处不含有三民主义的精神。"[25] 所有公立中学的校长、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公民课教员均须由国民党党员充任。党义教员和训育人员必须时时与学生接近，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发表之言论，了解学生的思想活动。训育目标中同时也包括指导青年个性及身心发展，指导青年掌握从事职业所必备的技能[26]。

30年代中期，教育文化界既强调教育要面向世界，也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在中学课程安排中，1929年、1932年、1936年三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中学课程暂行、正式、修订标准，其中1929年规定高中国文为24学分，外国语为26学分，外国语受重视程度超过国文；1932年修改为两者均为30学分，教学时数相等；1936年再作修订，确定国文为28—30学分，外国语为26—30学分，外国语时数略逊国文。

同时，国民党内也存在守旧复古的倾向。蒋介石多次强调："必须恢复四维八德，发扬我们民族固有最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以为一切科学之基础。"[27] 要求："我们的教员、学生，大家要相信、要努力研究大学、中庸之道……完满的学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28] 表现出浓厚的守旧倾向。一些国民党内的大、小官员也纷纷起而响应，给教育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就感到："全会予多数人以失望与恐惧之感者，为一部分人之'复古'提案，如何键之中小学校课提案，焦易堂等之设置中医学校皆是。凡此皆不免使负教育行政之责者感觉愤闷【懑】。因此种'复古'倾向，惟令众多知识分子与青年感觉失望，而共趋于偏激一途。"[29]

这一时期，中小学毕业会考制度引起较大争议。1932年5月，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要求中、小学毕业生经所在学校考查合格后，再统一参加有关教育部门组织的毕业会考，会考合格者方得毕业。会考制度过于强调考试成绩，把学生命运系于一次考试中，使学生创造性和学校教学方向受到很大约束，因此招致不少批评。有人指出："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学校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不教。"[30] 1935年，教育部公布《修正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放松了会考标准，学校毕业成绩和会考成绩可合并考查，此后又逐渐取消了小学的毕业会考，中小学会考制度名存实亡。

由于国民政府对普通中学主要着力于巩固、整顿、提高，这一时期普通中学从数量上看发展缓慢。1931年—1936年度，普通中学学校数和学生人数均基本保持平衡，只有少量增长，而且还主要是私立中学的扩张[31]。

和普通中学教育相比，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却比较迅速。1931年教育部根据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多设职业学校的提议，通令各省市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县立中学逐渐改办实业学校，新设私立中学应

劝令改办职业学校。1932年制订了《职业学校法》，此后又陆续颁布《职业学校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等法令，将职业学校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为进一步促进职业学校的发展，教育主管部门颁发各省市中等学校设置及经费支配标准办法，规定职业学校经费需占中等学校总经费的35%（普通中学为40%，师范学校为25%），职业学校经费标准直逼规模远为庞大的普通中学[32]。1936年，教育部报请行政院批准，专门设立生产教育费，用于补助各公、私立职业学校教学、实习设备费用，进一步充实职业教育经费。为提高职业学校师生素质，鼓励接受职业教育，教育部规定公立职业学校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学校供给膳宿费及生活津贴，职校教师待遇也高于其他中等学校教师。此外，政府还设立了工业、护士、助产等四所国立职业学校，着力培养专门职业人才，此为中等学校由国家设立之仅有者。

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生产之技能”[33]。教育主管部门对经由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寄予厚望。职业学校教学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知能、职业道德和劳动习惯为主，课程分为三类：职业学科、普通学科和实习，实习要占总课时的50%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职业教育成为发展最快的教育门类，1928年全国职业学校仅149所，到1936年发展到494所，增长了三倍多，学生数由16641人增加到51822人，增加了311%，经费数由22万多元增加到42万多元，增加了近一倍[34]。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更为突出，上海市的职业学校几乎涵盖了上海的各个职业门类，包括金融、通讯、新闻、商业管理、医药卫生等各种新兴职业，“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35]。

中等师范教育以培养“小学之健全师资”为目标[36]，在小学教育备受重视情况下，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据教育部1929年统计，当年全国学龄儿童数为4144万人，已入学的710万人，失学儿童3432万人。要解决这些失学儿童的入学问题，仅师资一项就短缺90万人，而

当年各师范学校毕业生总共只有2.3万人[37]，远远不敷所需。因此，要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刻不容缓。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师范学校法》，师范学校脱离普通中学而独立；同时规定：中等师范教育机关，包括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主要由政府办理，私人或社会团体未经教育部特许，不得任意创设。师范学校学生免收学费，膳宿、制服由各省市斟酌情形全部或部分供给。1933年3月，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次年9月又公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师范教育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三　高等教育与留学教育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30年代教育主管部门主要着眼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国民政府建立后，相继发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门学校组织法》、《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等，对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大学研究机关的设立、组织、性质、培养方向等作了详尽的规定，使大学教育有章可循，向制度化、正规化方向发展。

国民政府整顿大学教育的最显著例子是实科教育的发展。民国以来，实科教育一直是教育主管部门提倡的对象，但由于传统读书做官观念的影响，文法类学校一直远远超过实科学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明确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38]，将调整实科和文法科比例失衡现象作为工作重点。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共计41677人，文科学生占近三分之二[39]，仍大大超过实科。对此，教育部一方面全力扩充实科学校，压缩超过需要、办理不善的文法科学校；另一方面于1934年起，对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规定严格的比率，大学文、法、商、教育等学院招收新生数，不得超过理、工、医、农科，对文科学生数严加限制。这些严厉措施很快见到效果，到1936年，实科类学生即全面超过文科，达到总数的53.3%[40]。

发展实科教育，旨在为技术不断进步、分工日益精密的现代社会

提供各种专门人才。因此，在提高实科学生比例的同时，教育部对全国大学实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压缩一些重复设置的文科院系，增加理、工、医、农类院系。清华大学市政工程系（后改为土木工程系）1928年还遭遇到被董事会裁撤的命运[41]，1932年却在该系基础上成立清华工学院，设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三系，成为中国工程人才的重要摇篮。同济大学的理学院，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学系也在这一时期相继设立。为适应社会不断增长的对专门人才的需要，教育部增设一批专科以上高等实科学校，培养学有专长且具实际工作能力的专门技术人才，修业年限一般为2—4年。1934年，据教育部统计，国立独立学院有上海医学院、北洋工学院、上海商学院、广东法科学院等，省立有河北工业学院等11所院校，私立有湘雅医学院、焦作工学院等，总计学生9951人[42]，另有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大专学校多所，学生4765人[43]。到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实科学校主要有：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四川工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四川农学院、湘雅医学院、天津工商学院及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涵盖范围较为广泛。数年中，理、工、医、农类实科学校明显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科学技术人才异常紧缺的状况。

清末以来，高等教育几经整顿，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与指导，各校质量参差不齐，师生素质鱼龙混杂。国民政府成立后，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首先，从制度上对各学校进行全面规范。教育主管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章，在确定高等教育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影响教育质量的若干具体问题诸如教师评聘、课程设定、生员来源等方面作了规定：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评聘资格，并明确以上四种职称仅大学教员可以使用；规定大学必修课，强调基础知识的训练，尽力保障、扩充学校基本的图书及教学设备；明令取缔学校中的宗教宣传，规定宗教团体设立的私立学校，不得以宗

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部分教会学校的宗教宣传受到抑制；加强大学生入学资格审查，1937年，教育部令中央、武汉、浙江三所大学联合招生，为全国统一考试招收新生作准备，以根绝各校自行招生营私舞弊的不良现象；限制滥设大学，规定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为大学，不符合上述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开办大学、学院须经教育部核准，并须达到规定的经费限额；大学凡有三个研究所以上者，可设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研究生在校期限原则上初为三年，后改定为两年。1935年公布学位授予标准，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获有硕士学位并在研究院继续研究两年以上，或在高校任教三年者，经审查合格均可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尚处起步阶段，清华大学自1929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1935年在校研究生只有55人[(44)]，全国研究生总数也仅有数百人。

其次，严格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提高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育水准。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私立学校实行分别对待的奖惩制度，对办理不善者，实行惩处以至取缔，而办理优良者，则予以奖励。1934年；教育部设置专科以上私立学校专门补助费项目，用于补助办学水平较高而经费困难的私立学校，同时对成绩优良而生活困难的私立学校学生实行救助，经费最初为72万元，1937年度增至122万元，资助面扩大到省立学校，并为理、工、医、农类学校的设备补充、改造提供部分资金[(45)]。这些措施对刺激私立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一定作用。

第三，增长高等教育经费。高等教育经费1928年仅有1024万余元，1934年增至1812万余元，到1936年底，增为2295万余元，8年间增加1270余万元，增长一倍以上，增速超过同期学生增长速度。其中，武汉、同济两大学1928年经费分别为287,036元、263,790元，1937年增至997,100元、754,000元，增幅均在3倍以上。1937年各大学经费预算居前两名的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年经费分别达1,936,000元、1,700,000元[(46)]。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加上社会资

助的增加，对高等教育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国民政府30年代巩固、调整高等教育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高等教育管理逐渐严格，教育方向渐趋实际，各类高等教育呈现一定的增长态势，实科教育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然而，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仍显缓慢，1931年—1936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数仅有微量增长，全国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仅几千人。1931年中国每万人中大学程度者不足一人，在世界上处于十分落后地位[47]。其次，高等教育发展的地理分布不平衡，有限的大学又形成高度集中的状况，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上海和北平就占了全国大学院校总数的近40%，而中、西部十二个省仅有30所高等院校，仅占总数的20%左右。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加大了各地教育文化水平的差异，进一步拉开地区间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距离。再次，教育经费较之20年代虽然有了较大增加，到位率也相对较高，但和需要相比，仍常显不足，加之各地常常克扣经费，经费问题仍是时常困扰大学教育的一个难题。1931年底，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哀叹："学校的致命伤在经费的积欠，教员的灰心……好多教员，真是穷得没有饭吃。"[48] 1934年平津各院校教师联合会致教育部书中也提到："平津院校经费十九年度、二十年度、二十一年度共短发九个月有奇，以致各院校均向商家借款，积欠教职员之薪俸更巨。"[49] 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大学中普遍存在。

30年代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对高校的渗透。高等教育被强加上严密的政治思想灌输，学生除接受国民党党义课、军训教育之外，还必须接受各种训育指导，学生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受到限制，人身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当时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常委的董霖写道："'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激于爱国热潮，大举示威请愿。因为一时感情冲动，偶有逾越常轨，不无责难甚至反对政府的情事。不幸宪警机关认为其中必别有用心的，有时不加细察，采取逮捕的高压手段，而且迹近专断。"[50] "一二九"运动

后，军警大肆逮捕学生，以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不得不出面要求当局“务取缓和处置，以免激起意外”[51]。

在攸关教育成败的教学质量上，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入学学生素质难以充分保证，不少人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入学后对学业没有足够重视，学校考核也不严格。由此造成部分大学生素质低下，基础知识缺乏，以致有些毕业生不知道井田制，不知道张居正[52]，把上大学当作换取文凭的手段。这些情况对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留学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政府成立前，留学教育管理比较松散，留学生质量没有保证。1929年，教育部相继颁布《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及《中央派遣留学生管理章程》，详尽规定了留学资格，同时成立中央训练部留学生管理委员会，加强留学教育管理。和大学教育相应，留学教育也强调以实科为主，规定“选派外国留学生，应注重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等，以应国内建设之需要”，“每次属于理、农、工（包括建筑）、医药者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53]。1933年4月，教育部公布《国外留学规程》，进一步明确了留学标准，再次强调选派公费留学生应注重理、工、农、医等科。经过整顿，留学生质量提高较快，据统计，1929年—1934年间，中国赴美留学生共计934人[54]，以学习时间2—4年计，略微错后的1931年—1936年间，即有223人获得博士学位，396人获得硕士学位[55]，两组数据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但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留美学生中获高学历者已过半数。此外，留学生所学学科比例也逐渐趋于合理，1932年，政府派遣的理工医农类留学生共213人，仅占总数的37%，1936年即增加到526人，占总数的52.5%[56]，后来对中国科学发展贡献卓著的科学家如周培源、赵忠尧、谈家桢、钱三强、钱学森、陆学善、张宗燧、黄汲清、华罗庚、苏步青等均是这一时期出国或完成学业回国的。

四　其他各类教育

民国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日益繁杂，教育的功能也逐渐多样化，教育不再局限于学龄学生，而不断向社会扩展，由此兴起了社会教育的热潮。

二三十年代，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民众学校、各类职业学校及民众教育馆等公共文化设施。1929年，教育部发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确定："凡年在十二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男女失学者，均应入民众学校。"[(57)] 民众学校修业期限一般为四个月，不收学费及其他费用，所有书籍文具均由学校供给。民众学校注意开展劳工教育，1931年5月成立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次年教育部和实业部联合发布《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要求对劳工进行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训练，各厂矿、公司、商店劳工在50人以上者，均应设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满50人者由各机关联合办理，经费由设立机关承担。针对大批失学民众，教育部也先后制订方案，要求各地推行大规模定期强迫教育，首先对16—30岁青年失学男女进行扫盲，并逐渐推及全体民众，争取用六年时间分期分批肃清全国文盲。办理民众教育经费原则上由地方自筹，中央政府对边远贫瘠省份酌情予以补助，补助费1936年度为50万元。

民众教育馆是社会教育的另一重要形式。1927年江苏率先开办民众教育馆，此后各地纷纷仿效。1932年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鼓励各地开办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此后民众教育馆在各地纷纷涌现。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及社会职业学校的出现，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失学者的扫盲问题，一些大城市的社会教育成绩尤为显著。据统计，1934年上海各类社会职业学校达1173所，在学人数164,566人，数量与正规学校不相上下[(58)]。市立民众教育馆、博物馆、美术馆、公共体育场等社会文化公共设施也初具规模。上海市政府还确定自1935年起两年内完成市区扫盲计划，因

抗战爆发，计划未能如期完成。1936年，全国接受社会教育学生达386万多人，年投入经费1600多万元[59]，形成较大声势。

不过，国民政府庞大的教育普及计划和当时中国实际社会经济状况是存在很大距离的，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大规模接受扫盲教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截止1934年，全国曾经或正在民众学校及识字学校接受扫盲教育的为685万人，占全国2亿文盲的3.4%。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指出："依据教育部的统计，每一个小学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钱的教育费，民众学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钱的教育费。现在中国有二万万失学成人，七千万失学儿童。这二万万七千万人当然是我们大众教育的对象。照上面的费用算起来就得要十万万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众教育。这个数目不但是大众自己办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筹到三百多万元的教育经费，对于这十万万的大众教育经费也一定是筹不出来的。"[60] 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在全国范围短时期内消除文盲是不切实际的过高目标。

边疆少数民族教育长期来一直停滞不前，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纳入议事日程。1930年，国民政府设置蒙藏教育司，负责蒙藏及其他边疆地区地方教育的具体事项。1934年，教育部从中央拨给边远贫瘠省份补助专款内，划出50万元作为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之用，次年又从各国退还庚款中加拨2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教育，并拟出《推进蒙藏回苗教育计划》付诸实施。边疆民族教育获得发展，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察哈尔、绥远、西康、贵州等地都相继设立了民族学校，到抗战爆发前，全国总计设有民族师范学校十一所又九班，中学三所，小学2374所。

"特种教育"是为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产生的。1933年3月，鉴于江西、湖北、福建、安徽、河南等省苏区及周围地区革命思想浓厚，国民党中央通过《特种地区暂行社会教育实施方法》，提出要在这些地区实行"特种教育"，肃清革命思想影响。"特种教育"的宗旨是管、教、养、卫，即以开办民众学校的方式，政教合一，"以学校的

方式，得到实施特种教育之程序；以政教合一的精神，得到实现农村自治之步骤；以学校为改进社会中心，得到建设农村文化之方案；以全区为农事改进对象，得到复兴农村自卫之办法。”[61] “特种教育”对象包括小学生在内的“特种区域”全体民众，通过开办民众学校方式，进行集中的思想灌输。民众学校以16岁为界，分成人与儿童班两种，成人班教授公民，每天授课两小时，两个月毕业；儿童班学习国文，每天上课四小时，一年毕业。学校均使用单独编印的教材，教材内容要求包括60%以上的政治宣传[62]。

1934年9月，蒋介石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颁发《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决定成立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特种教育”的进行。蒋介石为其在1934年、1935两年每年争得40万以上的庚款补助资金[63]。其中江西每年12万元，福建、安徽、湖北、河南四省每年6万元，其他特种补助费4万元[64]。

“特种教育”以反共教育为主，也兼顾文化教育。由于原苏区大多比较落后闭塞，加上战争频仍，教育文化水平很低，“特种教育”开办民众学校，鼓励人人就学，对形成重视教育风气有一定作用。英国人戴乐仁考察江西“特种教育”后提到：“弋阳一县设立中山民众学校五所，因此风气所及，民众自办学校次第设立者，竟有105所之多。”[65]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种教育”的宣传性也在逐渐淡化，1935年7月，蒋介石批发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决议，确定“特种教育”继续进行的四项原则：“一、特种教育应当与当地建设事业发生密切关系；二、应尽量利用已有学校，或就已有学校中增添中山民众学校之课程，或使兼办中山民教事业；三、每县各区应组织教员联合会；四、应兼办职业教育，与当地合作事业机关及领袖人物联络。”[66] 1936年3月，“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划归教育部，4月，教育部拟定“特种教育”方案，着重提出改良精神训练，厉行军训，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抗日目标转移。

军事常识及童子军教育是和正规教育协同进行的。蒋介石

说："军事教育，可以说就是国民教育的重心。"[67]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事教育成为教育政策中的一个重点。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对高中以上学生实行军训的方案。1929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公布《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将军事教育列为高中以上学生的必修科目，每周三学时，学习期限两年，每年暑假还需集中训练三个星期。此后，教育部又对《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作了数次修订、补充，进一步严格军事教育纪律，基本套用了管理军队的办法。

对于初中和小学，当局组织童子军训练。童子军原为英国退伍军人贝登堡倡导，目的是培养儿童热心服务、勇敢进取及机智果断的精神品质，创立于1908年。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国民政府规定的童子军训练目标是：根据儿童生活、生理及心理之状态，为实施训练之准绳，以养成其服务民族、国家及社会所需要之基本能力。童子军在国民政府辖区内初称党童子军，1928年改称童子军，由各地教育主管机关办理。1930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举行童子军第一次全国总检阅，促进童子军在各地的发展。1933年11月，教育部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次年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介石、戴季陶、何应钦分任会长、副会长，王世杰为理事长。童子军教育倡导并努力培养儿童的集体意识、劳动观念和独立生活能力，加强对儿童的纪律教育。1936年10月，教育部举行万名童子军露营大检阅，参加的童子军表现出较好的精神面貌。军事教育和童子军教育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加强纪律观念有一定作用，同时还包含着应付民族战争的意义。"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发出《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方案的通令》，随后又令各校于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68]，激励学生的民族精神。

五　乡村教育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教育救国"浪潮的掀起，教育改革运动也在全国迅速展开，各类教育团体不断涌现，其中黄炎培的中华职业

教育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陈鹤琴的儿童教育社等影响较大。随着教育改革运动的深入，不少人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而农村又是教育最为薄弱的地区，因此，到乡村开展乡村教育成为很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他们以西方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等理论为基础，开展平民及乡村教育实验，试图由此找到一条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道路。1925年—1935年间，各地建立的民众教育实验区共有193处，其中最早提出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实验的，是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是一个以倡导、研究、宣传和推行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民间教育团体。该社成立后，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校，出版《教育与职业》杂志，大力推广职业教育。尤其重视发展农村教育。早在1919年，职业教育社即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研究普及农村教育。1925年8月，黄炎培在山西太原出席职教社年会期间，提出“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69)]，首次揭示出在乡村举办职业教育的基本思想。1926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团体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开办农村改进试验区，明确提出：“鉴于近今教育事业大都偏向都市，又其设施限于学校，不获使社会成为教育化，爰拟从农村入手，划定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规定试验区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无旷土，无游民，村民生活状况日趋改善，知识日进，地方生产日增加合格。”[(70)]

经过两年试点，积累一定经验后，1928年4月，职教社开始独立在徐公桥进行正式试验，试验期为六年，至1934年6月截止。试验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余人，区内成立乡村改进会负责管理，下设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七部，负责指导包括农业生产、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共二十二项改进事业项目。六年中进行的主要工作有：

生产方面，建立农艺试验场、合作养鱼池、养蜂场等，推广农业

新技术；编制指导耕作的农家历，建立测候所，预报天气，传输初步的农业科学知识，使农、副、渔业单产及总产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教育方面，扩大小学规模，推行义务教育；开办夜校，讲授基本文化知识及公民常识；建立阅书室，举办露天识字、露天讲演等，提高全民文化知识水平。

村政建设方面，开展村民普选，在乡村中实行民主管理；组织信用合作社，设立公共仓库，加强农村合作；设立民众公园、民众体育场及婚嫁改良会、儿童幸福会等，移风易俗，改变传统生活观念。

经过六年的精心组织，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效。1934年截止时，儿童入学率由70.7％增加到82.3％，成人识字者由540人增加到1524人，识字率达40％多，小学由两所增加到六所，另有两个公共流动教室和露天识字班等。试验区内共有合作社社员四百多人，参加兴修水利，建立公共设施，改善当地的生产环境和乡村风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农业技术和农业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提高了生产水平，改进区的小麦单产从每亩8—9斗增加到1.4—1.5石，养鱼由不及千尾增加到2.3万尾，家畜数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除昆山徐公桥外，中华职教社还创办了江苏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江苏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沪郊农村改进区等，同时开办有徐公桥乡村改进讲习所、上海漕河泾农村服务专修科、漕河泾农学团及浙江余姚诸家桥农村改进实验学校等。二三十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或代办的乡村事业有三十多处。职教社广大同人本着“替受教育者谋出路”[(71)]的原则，将教育与职业、教育与生产紧密相连，把发展农村教育与开发农村经济、解决农民生计、改变农村风俗结合起来，对推动局部地区的乡村教育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于20年代。初期主要在城市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后逐渐把重点转向农村。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

解释是，“冀以最短之时间，最少之经济，使全国10岁以上、40岁以下失学之人民，无分男女，皆能领受人生及共和国民必不可少之基本教育”[72]；而且由于“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住在乡间，中国大多数不识字的，也都是乡下人”[73]，因此要发展教育，改造中国，首先要从农村做起。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为开展平民教育的试验区，最初参加工作者有十余人，“在村外的一个破庙内办公治学，饮食起居都是在这一点破庙的里面，过的完全是乡间农民生活”[74]。他们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大力在村民中推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1929年，平教会将总会由北平迁至定县，次年正式成立定县农民教育试验区。

定县农民教育试验区成立后，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识字扫盲教育，而是进一步扩及生活思想的改造及乡村社会整体建设。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础建设，为中国的教育谋一出路，为中国人的生活问题，谋一解决。”[75] 为达到这一目标，要对农民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医治中国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治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治贫；以卫生教育培养“强健力”，治弱；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治私。晏阳初认为，这四大教育“实为根据实际生活之要求，逐渐演进而创出之新民教育内容之荦荦大端”[76]。为实践四大教育主张，平教会在定县推行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谋求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相辅相成的教育，把定县整个社会都变成一个大的教育课堂，以“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联锁进行”的不间断教育，“整个的改进国民生活”[77]。

文艺教育是定县平民教育的基本。平教会以县为单位，设实验平民学校，各乡村分别设平民学校，鼓励青少年和儿童到学校就读。对成年人则施以社会教育，举办讲演、展览，并以电影、戏剧、音乐等

逐步丰富其知识素养。在普及教育的同时，平教会更注重提高教育效果。他们自编出版了《平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及《市民高级文艺读本》、《农民高级文艺读本》等教材及自然、社会、应用科学等各方面的课外读物，到1935年共出版了600册。同时定期出版《农民周报》，在全县范围发行。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应邀指导组成了农民剧团，编写农村戏剧，在全县各地巡回演出，深受农民欢迎。

生计教育是四大教育的关键。平教会在定县设立两个实验农场，成立几十处合作社，进行小额抵押贷款，扶植农村经济。编印生计教育书刊资料几十种，传授农业技术，组织农民接受应付农村实际需要的必要训练。

卫生及公民、乡政教育是四大教育的辅助部分。平教会设立县卫生院，联村设保健所，建立医疗卫生保健网，在全县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同时，设立公民教育部，建立“公民服务团”，组织农民进行服务训练。编写《公民读物》发放到各个村、镇，培养、灌输农民的公民和民族意识。

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展开后，受到各方重视。美国财团出资资助，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实地考察后，称赞其为“在中国所见到的最重要的事业”[(78)]。1931年蒋介石电邀晏阳初到南京会面，称赞“公民训练”是个好办法，希望把定县教育试验区纳入政府的轨道。1932年，平教会与河北省政府合作，成立定县实验县。次年设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晏阳初任院长，实验区许多工作逐步纳入县政的轨道。1935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实行县政改革，设立实验县，晏阳初及平教会积极参加，大力推广定县的平民教育计划，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

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理论在国内教育界声誉颇著。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深受

其“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念的影响，回国后积极投身平民教育，与晏阳初等共同创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20年代中期，他逐渐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1926年曾与赵叔愚等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设立乡村师范学院，按照教学做合一原则，培养从事乡村改造的新型人才。1927年2月，他又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晓庄中心小学，3月与赵叔愚等创办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在此期间，正式提出其生活教育理论[79]。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主要包含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方面思想。其中前两者脱胎于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但和杜威相比，拓宽了教育的领域和源泉，使教育向生活化、社会化、实际化方向跨越性迈进。他明确表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80]

晓庄学校开办后，短短几年时间发展成多层次的综合性学校，包括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稚园四所，另有民众夜校、中心茶园及工场、医院等多项教育、培训设施。学校设有图书馆，出版《乡教丛讯》半月刊。陶行知在教学指导中，根据生活教育理论，强调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他为学校毕业生实际上也是为学校提出的目标是：“一年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81] 崭新的办学方式，一时使学校名闻遐迩，一些知名学者纷纷来校授课，蒋介石、宋美龄曾往晓庄参观，冯玉祥等军政大员也多次予学校以帮助。1930年，晓庄学校师生因举行抗议列强侵略中国主权的示威游行，引起当局不满，学校被南京市教育局强行接收，次年2月始发还。陶行知本人也遭通缉，被迫潜赴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教育普及工作，与先前晓庄师范部分师生一起，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介绍最新的科学知识。次年，他发表《古庙敲钟录》，提出建立工学团的主张，并拟定

《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希望以工学团将工场、学校、社会融为一体。1932年9月，上海工学团正式成立。工学团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为办学宗旨，培养团员生产、科学、文化、军事及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方面的知识、能力，使之具备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

上海工学团成立后得到教育界的普遍关注。青年、儿童、妇女工学团相继成立，报童、养鱼、棉花等各具体职业的工学团也陆续出现，不少贫苦的失学青少年及妇女儿童得到了入学的机会。根据当时教员不足的实际情况，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主张“即知即传”，强调学生既要立足学习，又要承担以自己所学教会、影响别人的责任，通过以小教大，相互学习，加快知识的普及推广。他编写了通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专供“小先生”使用。在陶行知的倡导下，“小先生制”被全国各省市普遍推广采用，成为普及初级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实验是乡村教育运动中具有独特风格的部分。梁漱溟是文化哲学家，在他看来，“中国问题并不是旁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82)]。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入手，通过学校把乡村组织起来，开展乡村教育，以逐步恢复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基础，造就一种扎根传统又适合时代的新型的乡村社会组织。

20年代下半叶，梁漱溟着手展开其乡建活动。1927年底，他南下广州，次年在李济深支持下开办乡治讲习所，但反响不大。李济深失势后，他回到北京，主办《村治月刊》，不久应韩复榘之邀，到河南创办村治学院。1930年9月，韩复榘调主鲁政，河南村治学院解散，韩氏随即于次年初邀梁漱溟、梁仲华等到山东邹平建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始“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的试验。乡村建设研究院初期由梁仲华任院长，下设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及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等，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4年梁

仲华调任他职后，梁漱溟接任院长。

研究部是研究院的灵魂，负责研究乡村建设的基本理论，设计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的具体方案。该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有同等学力者，由专门的导师指导训练，梁漱溟为他们主讲“乡村建设理论”。学院开办期间，共招收两期学员计58人，结业后成为开展乡村建设的骨干。

训练部主要培养乡村服务人才，招收具有中等程度学力的学生，每年一期，共招收三期，培养学员千余人。训练内容有乡建理论、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农业常识等，毕业后学员多充实到乡农学校或到实验县、区任职，是当地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力。

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最初选定在邹平，1933年扩大到菏泽，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十三个县，成为当时乡村教育活动中范围最广的一个实验区。实验区主要以乡农学校的形式开展活动。“乡农学校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乡村运动者”[(83)]，这三部分人分别即为校长、学生、教员，原区公所、乡公所的职能由乡学取代。乡学（低一级为村学）的课程主要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农业技术及精神讲话等，担负着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的双重职能。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乡农教育，理论相对完整，计划也较为周密，他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各部门培养的学员累计达3000人。这些人毕业后深入实验区各地，对促进农村社会文化的发展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发挥了一定作用。当然，和梁漱溟重建乡村的宏大信心相比，这些成果是有限的，抗战开始后，乡建运动即无形解体。

除上述团体、个人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外，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的黄巷民众教育实验区，大夏大学举办的金家巷民众教育试验区，燕京大学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在江西黎

川创办的基督教（新）农村服务实验区，以及卢作孚在四川合川、江北、巴县、璧山四县进行的乡村教育运动。江西黎川实验区的创办者曾受到蒋介石接见，蒋表示："这是给你们一个表现基督教怎样能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机会。请你们和我们合作，筹划一个详细的复兴程序。"[84] 到1935年，全国各地共有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193处，影响民众数百万人，虽然和广大的农村人口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但风气所及，对乡村教育的发展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乡村教育运动充分注意到中国农村社会落后的现实，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85]，把教育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放在农村，希望以教育为中心，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改造。他们跳出教育论教育，要求教育要深入实际，"深入民间，站在农夫的立场，去研究解决农事的实际问题……不仅是书本之知识与舶来之学说而已"[86]。把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风气习俗的改造紧密相连，大力引进现代政治、经济管理制度及科学文化技术，灌输医学卫生常识，丰富了教育的内涵和功能，对教育与社会的改革、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当然，乡村教育运动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时有人考察定县后提出五点意见："平民教育的理论，系'县为自治单位'之一部，深盼勿以办法认为主义，造成社会之畸形风气"；"实验区似应有一定期限，期满即交还人民自办"；"地方舆论与平教会尚多不满"；"以后'农村建设'应以少数之钱，少数之人，做多量这事，始能从根本将农村救起"；"平教会已经工作，只注意扫除成年文盲，而忽略未来（青年）之文盲，如此愈除愈多，永除不尽"[87]。这些问题在其他实验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和庞大的旧势力及根深蒂固的农村旧有结构比，乡村教育运动同仁的力量终究过于微薄，所以黄炎培慨叹："吾们既没有政权，赤手空拳地来改良农村社会，除掉根据一点热诚所发出的情感，还有什么武器可以利用！"[88] 这确实是由衷之言。乡村教育运动虽含有与当时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争竞之意，也因其改革终究流于枝节，自然成效甚微。有关详况请读者参阅已有的论著。

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发展

一　中央研究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由政府主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仅有工商部地质调查所，民间也只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屈指可数几个机构。政府用于学术研究的经费微乎其微，各类科学技术人才异常缺乏，学术研究成果也乏善可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社会上获得普遍承认，“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成为追求进步、新知的中国人的两面大旗，不断发展的大学和留学教育也为科学和学术的发展准备了一批有用人才。

设立中央研究院，是发展学术的重要一步。早在民国初年，马相伯、章炳麟、梁启超等曾倡议设立“函夏考文苑”，是为设立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的最早动议。1924年冬，孙中山为召集国民会议离粤北上前，提出设立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89)] 的设想，旋因孙中山病逝，局势动荡，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但此动议逐渐引起知识界的重视。蔡元培指出：“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90)] 1926年10月，他致函胡适提出：“若有一最高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而启……此等学术研究机关，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转移之。”[(91)] 1927年4月，蒋介石等酝酿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参与其中，乘机提出设立国家科研机构问题。17日，李石曾在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前一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中央研究院”[(92)]，随获通过，李及蔡元培、张静江三人被指定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5月，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以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为筹备委员。7月，南京

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大学院为全国学术教育最高行政机关，中央研究院附属该院[93]。8月中旬，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局动荡，筹备工作暂时中辍。

1927年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就院长职，中研院筹备工作继续进行。11月20日，蔡元培召集王世杰、王琎、宋梧生、吴承洛、张奚若、周览、胡刚复、曾昭抡等三十余名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本院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委托，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94] 同时决定筹设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和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中研院筹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央研究院为独立机构，特任蔡元培为院长。同时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该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95]。后又颁布《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将"科学"易为"学术"，规定其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96]。"学术"一词的涵盖，较科学更为广泛。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首次院务会议，中研院正式宣告成立。中央研究院直属国民政府，除院长由国民政府特任外，其余行政及研究人员均由院长聘任。全院迄至抗战爆发前，共成立十个研究所，即1928年1月设立的地质研究所，1928年5月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7月设立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1928年10月设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2月设立的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1929年5月设立的心理研究所，1934年7月设立的动植物研究所（前身为成立于1930年1月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立即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和主持北大时一样，蔡元培在中研院也特别重视科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早在研究院成立前，他就希望国内学者："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

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97] 主持院务后又一再强调：“西洋所谓‘学院的自由’，即凭研究者自己之兴趣与见解，决定动向，不受他人之限制之原则，仍应于合理范围内充分尊重之。盖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就中央研究院之立场言，更宜注意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自不待言。”[98] 蔡元培着力建设各研究所，广泛搜罗人才，奖励科研，发扬学术民主，形成兼容并包、畅所欲言的风气。研究院各研究所汇集了一大批优秀学术人才，如物理学家丁燮林，化学家王琎、庄长恭，工程学家周仁、王季同，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气象学家竺可桢、涂长望，天文学家高鲁，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经济学家陈翰笙，社会学家陶孟和，语言学家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动物学家王家楫等，均为一时之选，代表了国内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蔡元培不拘一格，延揽各方面人才，经济学家陈翰笙思想左倾，蔡元培不避嫌忌，延揽其到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实地经济考察，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陈翰笙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99]

中研院的组织也较好体现了学术民主的宗旨。院中分设研究、行政、评议三大部。研究部包括各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等，是研究院的基础；行政方面，由总办事处主持，设总干事，在院长指导下综理全院行政，从研究院成立至抗战爆发，总干事共历五任，即杨铨（杨杏佛）（1928.11—1933.6）、丁燮林（1933.7—1934.5代理）、丁文江（1934.6—1936.1）、丁燮林（1936.2—1936.5）、朱家骅（1936.6起）；评议会是全院也是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负责决定学术研究方针，督导学术进步发展，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同时在院长需要更换时，负责推选院长候选人数名，交国民政府裁定。该会成立于1935年，成员有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李书华、姜立夫、叶企荪、吴宪、侯德榜、赵承嘏、李仪祉、凌鸿勋、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

吴定良等共四十一人。评议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分别来自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多所研究机关及高等院校，代表了国内有影响的各学术研究机构，集中了学术界公认的中坚人物。评议会成立过程中，时任中研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出力甚大，胡适称许他“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100]。蔡元培也认为，评议会的成立，“是本院历史中可以‘特笔大书’的一件大事”，“评议会运用得好，他们就找到了中国学术合作的枢纽”[101]。

充足的经费是学术研究正常进行的必要保证。中研院成立之初，每年核准的经费为120万元，因当时内战尚在进行，政府基础未稳，中研院1927年度（1927.10—1928.6）实发经费为每月5万元，1928年度始达10万元，次年度增至11万元，1930年度加拨当年临时费40万元，“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减为每月10万元[102]。以当时物价水平和中央财政收入衡量，这笔经费尚属可观。1929年，中研院研究员最高一级薪金达每月500元，助理员的最低月薪也有60元[103]，而当年国内一个五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仅12.21元[104]，收入较高的上海银行界职员也仅在100元以下[105]。另外，当时各大学教授月薪普遍在200元—400元左右，清华大学规定初聘教授月薪为300元[106]，可见中研院所定待遇确属不菲，这和其相对充裕的经费应不无关系。1936年度，该院实发经费为140万元，和规模远较其庞大的清华大学相仿。

在国贫民瘠的整体大环境下，中研院相对较好的资金状况也无法真正满足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主事者仍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为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社会各界尤其是庚款基金管理机关给予了重要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29年起，分三年补助中研院物理、化学、工程三所50万元建设经费[107]，同时资助历史语言研

究所每年3万元。据李济回忆："最初几年，田野考古工作，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108] 中英庚款董事会从1934年起，分三年补助中研院科学仪器设备制造费10万元，至1936年度付讫[109]。1937年度，该会又拨出息金5万元继续资助中研院[110]。此外，中研院开办的试验场、实验馆及田野考古工作也曾得到中基会、中英庚款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

基金是平衡、调节研究院经费的重要杠杆。国民政府规定的研究院基金规模最小限度为500万元，但政府拨支仅50万元，远未达到额定规模。研究院初创时期，基金效用未得发挥。丁文江出任总干事后，决定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快、加强基金的聚集与运作。规定："在基金总数未达五百万元以前，本院得以所举办事业以及其他一切收入拨入基金。"[111] 同时决定运用每年基金利息补助研究及建设事业，具体资助范围为："一，有特殊重要性质之讲座及研究生名额；二，有促成学术进步功用之奖学金；三，院内有利事业之投资；四，其他特别建设设备或事业。"[112] 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立对有效地聚集和运用现有财力有着一定作用。

作为全国最高研究机关，中研院负有指导、促进全国学术进步之责。因本身经费较紧及评议会成立较晚，中研院这方面工作展开不够，仅资助过中央博物馆、青岛海洋研究所水族馆的筹备工作，为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南京中央大学陶瓷试验所、上海科学月刊社等提供部分经费。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研究人员迅速增加，1931年8月，全院共有研究人员235人，其中专任研究员53人，特约研究员50人，兼任研究员四人，名誉研究员二人[113]，阵容颇为强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属于常规和永久性质之研究；第二，利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之原料及生产，以解决各种实业问题；第三，纯粹科学研究及与文化社会有关之历史、语言、人种、考古、社会、经济、法制学等之研究及调查[114]。

历史语言研究和考古发掘是中研院实力较强的研究领域，成绩引人注目。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设立考古学组，负责对古代文物进行科学发掘。从1928年10月开始，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先后发现殷代宫廷建筑遗址、殷代王陵墓葬及大批刻字甲骨、石器、陶器和铜器，证实殷商文化的存在，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史语所的梁思永、李济等主持了殷墟的多次发掘，为殷墟发掘作出重大贡献。1930年，李济和梁思永又主持发掘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发现大批制作工艺高超的磨光黑陶，命名为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成果编成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115)]。历史研究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都出版了大量专著，对中古史及中西交流史进行深入研究，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被誉为“中西交通史的开山作”[(116)]。日本侵占东北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组织下，编纂多卷本东北史，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17)]。该所至抗战前夕，共出版各类专著（包括论文集）十七种，研究所集刊七卷、收录论文183篇，史料丛书五种36册[(118)]，出版量在中研院各研究所中独占鳌头。

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在经济学和社会学。1934年，原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办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该所合并，使该所研究质量及经济来源均有较大改善。社会科学研究所注重调查研究，展开多种社会经济及农村状况调查，保存了一批显示当时社会实况的有价值的数据，如该所出版的《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对北平地区的物价乃至经济变动作了详尽、准确的记录，其在保定和无锡展开的农村调查，也取得显著成绩。

地质学是近代中国基础最好的学科，1912年即成立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中研院地质所成立后，组织研究人

员分赴各省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十数个省份，调查路线、勘测矿产、研究地形地貌，对江西庐山、南岭西段及宁镇山脉的考察尤为详尽，在庐山脚下的江西星子县设立白石陈列馆，展示该所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在实地考察基础上，该所注重加强地质理论的研究，李四光强调："本所的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119] 李四光本人身体力行，对地壳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产生地壳运动的主因，在地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1936年，他完成《中国地质学》一书，这是中国人自己撰著的第一部地质学专著。

天文、气象研究分别由天文、气象研究所主持。天文所主要进行观察、研究、编历三项工作。该所利用新建的紫金山天文台，通过新式天文仪器，观测日象、星云，每年定期编制国民历及国历摘要，并进行改良历法的研究。

气象所由竺可桢任所长，聘有胡焕镛、涂长望等著名气象学家，主要进行地面和高空测候，太阳热力与微尘量，历代及当代气候、灾害的调查研究等。高空测候纪录每年汇集成《高层气流观测纪录》专集出版，有关历代气候状况及各地雨量、水旱灾的研究，有助于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竺可桢、涂长望关于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为后来中国的长期天气预报工作奠定了基础。气象所成立后，积极推进全国气象工作，两次主持召集全国气象会议，并和各地合作设立气象观测所，同时开办测候人员培训班四次，毕业近百人，训练各省保送生50人[120]。经过气象所及全国气象学界的努力，到抗战前夕，全国范围天气预报的科学程度与准确度均大为提高。

心理学在中国相对起步较晚，在唐钺、汪敬熙主持下，进行了普通心理、动物心理、神经解剖等多项研究。1935年起，与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合作，在平绥路南口机厂及南通大生纱厂开展了工业心理研究。

物理学是除地质学外，在中国较“有固定的重心，有可靠的标准，有研究的空气”[121]的一门学科，30年代尤为活跃。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丁燮林等主持下，积极展开有关电学、磁学、电磁振动及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大量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季刊》及《中国物理学报》上，按研究种类分，计有十二种之多[122]。1932年，该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物理学会，负责指导、协调全国物理学研究工作。该所还设有物理检验室、地磁观测台及仪器工场等，将物理学研究成果推向实践。

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展较晚，迄抗战爆发前五六年，化学研究始有所进展。中研院化学所是国内化学研究的中心，所内设四组，分别研究有机、物理、生物及工程化学，发表论文共四十余篇[123]。该所为适应中国实业发展的需要，十分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对国产天然药材，本国食品营养及国产硫化矿提硫等均有研究。1932年8月，为促进国内的化学研究与交流，以该所化学家为主体，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发行《中国化学会杂志》和《化学》两种杂志，1935年，该会会员由成立时的七十余人增至七百多人。

工程研究由工程研究所主持，主要研究陶瓷、钢铁、玻璃的结构与制造。先后在上海建成陶瓷试验场和钢铁试验场，试制各种钢铁材料，研究现代陶瓷工艺，力求使该项技术能应用于“商业竞争”[124]。1934年又设立棉纺织染实验馆，研究改进纺织染制造技术。上述实验场馆的设立，对于提高国内陶瓷、钢铁、棉纺工业水平，引进国外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包括动物学和植物学两个研究方向。动物学着重于鱼类、昆虫及细胞遗传的研究，尤其注重海洋生物。所内研究人员各有所长，伍献文、方炳文等专长鱼类及双栖动物的研究，所长王家楫研究鸟类，贝时璋于实验动物学方面学有专长。1935年4月，中研院联合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实业部、中国动物学会、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江

浙两省水产试验场及海军有关部队等多个机构、学校、部门，联合组成太平洋科学协会中国分会，在厦门、定海、青岛、烟台各设立一个海洋生物研究所，中研院负责主持定海海洋生物研究所，实地研究、考察海洋生物。

动植物所的植物学研究着重于植物分类、形态、病理、细胞遗传等方面。该所由裴鉴负责，曾组织人力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广为搜集植物标本。1930年，时为中研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学技师的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中国科学家开始加入世界植物学研究的行列中。

作为国家最高研究机关，中研院对国际、国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也比较重视。该院定期出版发行《院务月刊》、《院年度工作总报告》及有关学术论文专辑等，详细报告全院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院内设有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专门负责与国内外同行交流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利用该院出版的大量书刊，架起与国内外学者联系的重要桥梁。该院学者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学术研究活动。1929年，翁文灏代表该院出席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次年，气象研究所研究人员出席在香港举行的远东气象台台长会议；1933年，竺可桢、沈宗瀚、凌道扬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1935年，天文研究所研究人员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天文协会第五届大会，次年又加入国际天文学界对有关天文现象的国际联合观测。这些对外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学者开阔眼界，加强中外学术界的相互了解，有一定促进作用。

由于作为“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125]的蔡元培的开明领导，加上院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筚路蓝缕，开拓前进，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二　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备设立北平研究院，当时计划附属于北平大学区，后因大学区制取消，改隶教育部，1929年9月9日正式成立[126]。该院强调“学理与实用并重，以实行科学研究，促进科学进步为其任务”[127]，院长为李石曾，副院长李书华。

北平研究院初期设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地质等六个研究所，1932年增设镭学与药物学两个研究所，1934年生物研究所易名为生理研究所，1936年史地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前后共设九个研究所。院内设出版部，出版《国立北平研究院会报》、《物理学研究丛刊》、《化学研究所丛刊》、《药物研究所丛刊》、《生理学研究所丛刊》、《考古专报》、《气象月报》、《动物学研究丛刊》、《植物学研究丛刊》等多种刊物[128]。至1938年院内共有研究员35人，助理员约五十人，研究力量较为雄厚[129]。经费原核定为每月5万元，实发约3万元左右。

和中央研究院一样，北平研究院在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方面，也投入了较大力量，取得了不少成果。物理学注重光学与地球物理之研究，研究力量较强，在英、美、德等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化学所以应用化学研究为主，共发表有关论文20篇。本着学理与实用并重原则，理、化两所都强调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产业发展中。物理所运用光学研究成果，对矿产及金属进行光谱分析，为各地电台制造水晶振动器，加工光学零件；化学所设立工学化学实验室，成立小型化学工厂，生产有机原料；地质所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展开考古发掘，同时进行土壤、燃料等多项实用研究，调查各地矿产情况，进行地震监测，其地震监测纪录最早起于1930年9月。该所研究人员谢家荣在煤岩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创了中国煤地学研究、应用的新领域。

北平研究院不少研究项目各具特色。植物所的植物分类和植物地理在国内较有影响，植物标本采集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主，足迹遍及内

蒙、新疆等边远地区，对厘清中国植物状况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抗战前十年间，前后采集各类植物标本六万余种，发表论文六十余篇，编纂出版《中国北部植物图志》五册[130]。动物所以海洋动物及淡水动物的调查研究为主，每年派员赴沿海各地采集动物标本，收集了不少珍贵资料。1935年，该所与青岛市政府合作，组建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采集胶州湾沿海地区海产动物并进行海洋学的相关研究[131]。药物所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在所长赵承嘏领导下，以科学方法分析中国传统中草药成分，提取有效药质，鉴定药理作用，对中国医药学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镭学所系与中法大学合作成立，是中国各研究机构中独有的一门学科，研究放射性物质及X光，为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代表中国科学研究的新方向。所长严济慈于1935年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37年前在各西方国家刊物上发表物理学研究论文共十九篇，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一定影响。史学研究所以史料搜集整理及北平地方史研究为主，萧一山辑录的《太平天国诏谕》及《中国秘密社会史料》影响较大。考古组徐炳昶等领导发掘陕西斗鸡台遗址，发现大批仰韶文化实物，并挖掘多座先周至西汉时代墓葬，为研究中国史前及古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生理学研究所着重研究细胞学、生理学、实验动物学，同时在所长经利彬领导下，开展对中草药生理作用的研究。1935年，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到所后，与罗宗洛等发起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积极推进、发展中国的生物学研究[132]。

除上列九个研究所外，北平研究院还成立字体研究会、人地学研究会、博物馆、艺术陈列馆等，1936年，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所涉研究范围颇为广泛。北平研究院对北方地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高，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各级机关、企业实体及广大学者同人也纷纷组织、成立各种、各级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据统计，1928年，全国共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41个，到1933年即增至

100个，1935年高达144个[133]，八年间增加三倍多。其中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等；地方政府设立的主要有上海、广东、山东、河北等省市的工业试验所，广西的化学试验所，湖南、河南、江西等地的地质调查所及两广地质调查所等；民间创办的主要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等。这一时期，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也培养出一批学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到1937年，全国从事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约在三万人左右。科研经费也有较大幅度增加，1934年，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等23个全国主要学术机关年经费为280多万元[134]，全国科研经费超过400万元。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投入的绝对值仍然很低，但中国科学毕竟逐步由此走上了正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设置总理纪念奖金的议案，准备拨置300万奖励基金，以息金奖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文艺、教育方面有突出成绩者。嗣因抗战爆发，议案未能实施。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学术的重要的认识，较前深入多了”[135]，可谓中肯之言。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于1916年10月，最初隶属农商部[136]。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由大学院、农矿部管理，1930年改隶实业部。该所包括古生物、燃料、土壤、地质四个研究室及地质地产陈列馆，年经费额定为每年6万元，集结了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黄汲清、裴文中等一批著名学者，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广地质调查所以及各省、市地质研究、调查所通力合作，在矿产、古生物学、岩石、地文、土壤、工程地质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绘制了一批全国地质图，并培养一大批地质研究人员，成果颇著。调查员黄汲清提出的中国二叠纪地层理论，对煤、锰、石油、天然气等矿产

的勘测、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37]。杨钟健在研究哺乳动物进化方面，独有心得，其对古化石的研究鉴定，国内领先。尤其是该所1929年成立专门研究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新生代研究室后，深入进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于同年12月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又相继发现北京人牙齿、颌骨化石，出土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石器，发现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和人类用火遗迹。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发现，成为研究人类进化的最重要材料之一，使国际学术界为之震动。

中国工业试验所最初动议于1928年。时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本着“工业之振兴，必本于科学，而科学之昌明，尤资于试验”[138]的认识，呈请国民政府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业试验机构。10月，工商部开始筹备设所，1930年7月，该所正式宣告成立。12月，由于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该所改属实业部领导。该所成立后，由国民政府一次性拨给19.5万元作为开办费，此后每年拨款九万余元作为常年经费，资金比较充足，投入研究的速度也较快。抗战爆发前主要进行了新式造纸技术及汽油、柴油替代品的试验，耐火材料的研究及活性炭的研制等，同时积极向工业界提供咨询。由于当时中国工业总体还处于幼稚水平，技术落后，门类不健全，因此该所研究和试验领域比较狭窄，规模也不大，包括各类技术、行政人员仅五十多人，只有化学与机械两个试验组，所长为顾毓琇。

中央农业实验所酝酿于1928年。是年，农矿部召开全国农矿会议，沈宗瀚等提出设立国立农事试验场的议案，经会议通过，报请国民政府采纳[139]。1931年4月，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沈宗瀚等十四人为委员。筹备期间，考虑到农业发展应“注重‘实用’的试验而不仅是理论的研究，故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140]，1932年1月于南京正式成立。该所拥有谢家声、冯泽芳、沈宗瀚等农业科技人员，负责全国农业的研究、调查、实验改良工作，并进行农产品检验、农情报告和人员训练等辅助工作。该所与附设于所内的中央棉产

改进所、全国稻麦改进所及全国稻米、小麦检验处合作，为全国稻、麦、杂粮、蔬菜等优良新品种的培育与推广，蚕桑优化，药剂治虫，家畜防疫等作了许多努力。所内出版有学术刊物，宣传、普及科学的农业观念，沈宗瀚认为："自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秋抗日战争开始为止……是中国农业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141] 这一成绩，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资源委员会是一个具有一定科学研究性质的机构，前身为成立于1932年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期望以该会延揽贤才，筹划军事以外各项工作[142]。该会具体职掌是：一、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议关于国防之临时措施。聘请李四光、曾昭抡、竺可桢、吴有训等一批专家为所属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1934年，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集中全国大批科学研究人才，从事矿产、冶金、电气等重要工业的试验和研究，同时对全国的矿产、土地、水力、森林及人口资源进行广泛调查，为国防及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27年9月，附属于中山大学矿物地质学系，主要进行广州附近及北江、西江流域地质的调查研究，是两广地区的区域地质研究机构，年经费4.8万元。该所与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及国内其他地质研究机构都有合作，地质学家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均曾到所协助、指导、调查研究，朱家骅曾任该所所长。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的科学院，1930年10月，由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办。该院以卢作孚属下的民生公司为基础，加上各界的支持、赞助，共拥有16万多元的产业基金，每年大约有五万元左右经费，院内所办产业中也可获部分收入，1937年创收1.3万余元[143]。自1932年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提供二三千元的补助[144]。西科院下设理化、农林、地质、生物四个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兼善学校等，立足于四川及西南地区，注重应

用科学的研究，以“研究实用科学，促进生产文化事业”[145]为宗旨，为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咨询。该院地质所成立于1932年，主要调查四川地区矿产资源，在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领导下，先后调查、发掘南川煤田及綦江铁矿的矿藏储量，将探明量提高了几十倍，对政府及实业界进行矿产开发有重要指导意义。地质所还与生物所合作，详细调查了川西雷、马、峨、屏及大小凉山地区，除发现一批矿产外，对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及民族习俗也进行了深入考察，所著《雷马峨屏调查记》是当时有关彝族状况的唯一研究著作。生物所还曾多次组织考察团，分赴四川、西康、甘肃、青海等地考察，搜集西南、西北地区特有的大量珍贵植物标本。农林所创建于1931年4月，下设农林、棉作、畜牧等六个组及气象测候所、农事试验场等，人员最多时不过十余人，以“垦荒地，培育森林，并收求优良稻、麦、蔬菜、果树及牲畜（品种）作改良之研究”[146]为宗旨，引进大批优质树木及蔬菜、禽兽品种，对四川及西南地区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影响。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于1928年10月，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尚志学会合作设立，分动、植物二部，秉志、胡先骕先后任所长，研究人员最多时达五十余人。该所主要搜集、研究中国生物资源，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共搜集到动植物标本15万种，居全国之冠。该所标本室主任、研究员秦仁昌1932年写成《中国蕨类植物志初稿》80万字，是中国有关蕨类植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记载11种86属1200多种中国蕨类植物。1930年-1937年，他先后编印《中国蕨类植物图谱》四卷，此书被誉为“东亚研究蕨类最重要之图籍”[147]。1934年，他到江西庐山与江西省立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占地9000余亩，至1937年，从三十多个国家引进2800多种植物，为全国最大森林植物园。所内其他研究人员中，秉志擅长解剖学，享有国际声誉。胡先骕长于高等植物分类，与陈焕镛合著《中国植物图谱》，前后出版四集，发现植物新属种达数百种之多。胡适曾赞扬说：“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之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

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上开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148] 该社每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数万元资助，1936年高达91000元。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私办化工研究机构，1922年范旭东创办于天津塘沽。范旭东认为：“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149] 该社经费主要依赖范氏创办的永利、久大两公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1928年起每年资助一万元左右[150]，研究目标是为企业生产服务，努力解决公司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研究社成立后，在制碱、发酵、肥料制造、菌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侯德榜曾称赞：“化工研究社执工业之成功锁钥，实为工业智囊也。”[151] 侯德榜、孙学梧、李烛尘等都为研究社的创立、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尤以侯德榜最为突出。

上海雷斯德[152]医学研究院开办于1929年，由英国人主办，分临床、生理学及病理学三个研究所，下设研究部，包括预防医学、生物化学、药物学、微生物学、组织病理学、血清学、免疫学等。该院拥有汤飞凡、蔡翘等知名生物学专家，汤飞凡是中国第一个微生物学教授，在细菌学方面有深入研究；蔡翘在研究院期间，与助手易见龙等进行肝糖原代谢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生理学界重视[153]。1936年春，该院与金陵大学农村经济系合作，在南京附近的淳化镇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农村营养状况，第一次在中国将营养学的调查、研究深入到农村[154]。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31年，由中国工程师会（1912年成立）和中国工程学会（1918年成立）合并而成，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规模、影响在民国各学术团体中也首屈一指。主要成员有陈体诚、茅以升、李仪祉、顾毓琇、凌鸿勋、翁文灏、吴承洛等。该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技术”[155] 为宗旨，积极促进国内工程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提

高，每年召开年会，出版《工程》杂志，讨论技术的改造、革新问题。学会设有工程荣誉金牌，颁发给国内工程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者。1935年首枚金牌授予侯德榜，次年授予凌鸿勋，1937年因抗战爆发中断颁发，1941年恢复后颁给茅以升。侯、凌、茅三人均为工程学界的杰出代表。侯德榜，福建闽侯人，1913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到永利公司任职，率永利厂同人第一次在中国制造出纯碱。1931年，他赴美考察和进修，在美期间，用英文出版专著《纯碱制造》，首次公开了苏维尔制碱法的技术秘密[156]，大大推动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英国化工学会特聘其为名誉会员。1934年，永利制碱公司改组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研究、生产范围进一步拓展，侯德榜任总工程师，开始筹建制造合成氨、硫酸、硫酸铵的硫酸铔厂。1937年2月，永利硫酸铔厂正式投产，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联合化学企业。凌鸿勋，广州人，早年留学美国，1929年7月起任陇海路工程局长，负责修筑陇海路河南灵宝至陕西潼关段。1932年，调任粤汉路株韶段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修筑株洲至韶关段铁路，接通粤汉线。在任期间，精心指挥，按较高标准于1936年4月提前一年接通全线。粤汉线的开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均关系重大，“计由七七起至武汉两地失陷的十六个月期间，这段路曾开过军队列车2341列，运送部队达210多万人，军品列车533列，重53万9千吨，由九龙转入内地的建设材料七十几万吨。”[157]茅以升，江苏镇江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1934年出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长，负责浙赣线钱塘江桥的建造，于1937年9月正式把全长1400余米的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工程界自己主持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铁路桥梁。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两个实绩是紫金山天文台和青岛水族馆的建立。紫金山天文台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建立，位于南京城外紫金山上，天文仪器一部分由原中央气象台移交，同时新购一大批先进仪器，整个工程共耗资40多万元，于1934年建成，是中国天文事业发展的标志性建筑。该天文台建成后，主要进行太阳系及天体行星，恒星的观测研究，并对中国古天象理论及观

测纪录进行发掘、研究，是当时东亚最先进的天文台，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158]。青岛水族馆筹备于20年代初，当时蔡元培、李石曾等在青岛发起筹组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决定先行创办水族馆，1932年几经周折终告建成。馆内收藏各种鱼类标本一千余件，附设有鲛鱼标本室、养鱼池、展览室、研究室等，不定期出版馆刊《工作报告》。水族馆的建立，为中国海洋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　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高等学校是教育发展的重心，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1934年，教育部制定《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为高等学校开展学术研究确定标准。到1937年，经教育部核准成立的各大学研究所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中山大学的文科、教育、农科研究所，金陵大学的理科、农科、法科研究所，中央大学的农科、理科研究所，武汉大学的工科、法科研究所，辅仁大学的文科、理科研究所，南开大学的商科、理科研究所，以及北洋工学院、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分别设立的工科、法科、理科研究所。各研究所下按专业设部，其中清华大学包括物理、化学、哲学、经济等十多个部，北京大学有地质、生物等七个部，中山大学有教育心理、农林植物等六个部[159]。契合当时重视理、工、医、农类实科教育的趋向，大学研究门类也向实科方面倾斜，在总共四十二个研究部中，实科类有23个，占了近55%。据教育部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中，1934年—1936年间作专题研究者共1066人，占全体大学教员总数之14%强，其中理、工、医、农等实科研究课题有754项，文法类370项，实科研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160]。

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开展各有千秋。清华大学的物理学研究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萨本栋、周培源等均为国内物理学人才的一时之选。吴有训是国内开展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单原子气体散射之X

线》，为国内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首次亮相[161]。此后，他又相继在英、美等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较大反响，1935年被推为德国自然研究者皇家会会员。赵忠尧1927年赴美留学，在美期间，取得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没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对正、负电子的发现起了重要启迪作用。1931年回国后，组建清华核物理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研究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屡获好评。该系还为国内物理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施士元、王淦昌、赵九章、何汝楫、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等均为物理学界的一时之选[162]。除清华大学外，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物理学研究也开展较好。中央大学的张钰哲留美期间，曾发现过一颗新的小行星，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由其本人命名为中华号。回国后他致力于天体物理研究，著有《天文学论丛》一书，在天文学界有很大影响，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特约研究员[163]。

高校的化学研究成绩显著。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生物化学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赵承嘏、吴宪、张锡钧、陈克恢等均学有专长，赵、吴二人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评议员。另外，北京大学的汪敬熙对大脑皮层构造也有深入研究。有机化学研究者较多，北京大学的曾昭抡、孙承谔，清华大学的高崇熙、萨本铁、黄子卿，中央大学的袁翰青等都取得不少成果。中法、金陵、南开、燕京也有一批研究成果涌现。

地质学在各大学中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实力较强。1931年，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使北大地质学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该系任职或兼职的孙云铸、谢家荣也均为地质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该系曾多次组织往西南地区考察，对西南尤其是贵州一带地层有较深入研究。中山大学地质学系（1928年9月改称矿物地质学系）依托两广地质调查所，阵容也较强。该系每年均组织十余次调查活动，足迹遍及四川、浙江、内蒙等地。1928年5月，该

系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作，组织考察团调查西沙地理及矿产资源，并设法协助制止部分日商在西沙开采磷酸矿、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活动[164]。

中山大学的动、植物研究也颇有成就。该校设农科研究所，下分农林植物与土壤二部，同时还拥有国内各大学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园，研究条件较好。农科所采集大量广东和海南岛地区植物标本，所长陈焕镛著有《中国经济树木学》及《中国植物图谱》（与胡先骕合著）等，并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置的五个科学研究教授席中大学的唯一一席（其他四席为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165]。此外，北京大学的张景钺、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东吴大学的刘承钊、中央大学的邹钟琳及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等校一批学者，在动植物研究方面也各有所长。

抗日战争前，数学在中央、北平两研究院中均未设专所，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浙江、清华、北京等大学中。浙江大学是当时中国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教师中，“陈建功之于分析，苏步青之于几何，朱叔麟之于代数，均极能称职”[166]。陈建功、苏步青均为留日学者，获博士学位后回国。陈建功留日期间，用日文出版《三角级数论》，为国际上最早出版的三角级数论专著之一，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回国后，继续开展研究，先后发表数学论文多篇。苏步青1931年回到国内，在浙大进行微分几何研究，美国数学家认为“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在浙江大学建立”[167]。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成立于1930年，该系主任熊庆来是中国数学研究奠基人之一，他定义的无穷级的亚函数，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研究部的成员还有教授郑之蕃、赵访熊等，华罗庚也是该部成员，陈省身为该部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168]。华罗庚早年辍学，后自学成才，1932年被熊庆来延揽到该系。1932年—1936年四年间，他先后发表数论方面的论文十余篇，逐渐蜚声海内外，1936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资助赴英，留学期间发表有关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哥德巴赫问题的论文共十八篇，其关于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169]。北京大学在数学研究上较突出者主要有江泽涵、冯祖荀等。

人文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研究人员较多，在各大学中广泛展开，其中史学研究最为兴盛。全国高校研究所所设十九个文法类部中，史学就有六个，独占鳌头。北京大学的胡适、孟森、顾颉刚、嵇文甫，辅仁大学的陈垣，清华大学的蒋廷黻、陈寅恪（均为兼职），中央大学的金毓黻及北平中国大学的吕振羽等，在史界乃至学术界均享有很高声誉。此外，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潘光旦、吴景超、俞平伯、朱自清、黄侃、何廉、马寅初、陈岱孙、周鲠生、张奚若等分别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各领风骚。考古学这一时期成果累累，北京大学在各高校中贡献尤其突出。1927年4月，为更好地研究、发掘、保存我国历史文物，防止文物大量外流，北京大学联合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等国内多个学术机构与瑞典科学考察团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及民族状况。考察团共有中方团员35人，北大教授徐炳昶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分任中、瑞双方团长。在考察过程中，北大学者黄文弼首先发现了居延汉简[170]。接着中、瑞学者又相继发现高昌古城遗址及大批简牍文书、壁画、钱币等，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民族沿革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与实物资料。孟森、傅斯年、蒙文通等都参加了对所发现的一万多件汉简的整理工作。3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又分别或合作组织考察团到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台湾、新疆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陕西和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存，证实长江以南地区存在石器时代，提出台湾和新疆等地自古以来与内地联系密切的考古证据，推动了全国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

博物馆、图书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获得长足发展。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以之直属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易培基、于右任、宋子文、汪精卫、蒋介石、蔡元培等为理事，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1934年由马衡继任），开始对博物院展开大规模整顿。院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建立严格的文物保管制度，增辟文物陈列室，出版影印字画、图书文献等，对文物进行有计划的陈列与展示。经过整顿，故宫博物院管理逐渐走上正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地区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威胁，为保证文物安全，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故宫珍贵文物分类装成19577箱分批南运，第一批于1933年运抵上海。文物南运，使祖国稀世珍宝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空前浩劫中得到妥善保存。

30年代前后，一批新博物馆相继建立，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河南省民族博物院（1928年10月成立，1930年12月易名为河南省博物馆）、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29年3月设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1月成立）、震旦大学博物院（1930年成立）、广西省立博物馆（1933年成立）、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4月成立）等[(171)]。1933年4月，经蔡元培等大力倡导，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准备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全国性博物馆。筹备处由傅斯年、李济主持，蔡元培为中博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72)]。1935年11月，中央博物院举行奠基礼，正式开始动工兴建，期间从各方陆续接收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到抗战爆发前夕已初具规模。抗战爆发后，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图书馆事业在抗战前发展较快。1927年12月，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使图书馆建设有章可循。次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不少代表纷纷要求重视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173)]。1930年5月，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规定：“省及各特别市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市、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以资

财设立或捐助图书馆者，得由主管机关遵照损资兴学褒奖条例呈报教育部核明给奖。”[174] 在各方支持、督促下，图书馆事业逐渐走上正规发展的轨道。1934年，仅上海一地就有22个图书馆[175]，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则达2955所[176]，十年中增加了六倍多。全国大部分县、市政府所在地均设有图书馆，最大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私立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东方图书馆，据1931年12月调查，存书达502，765册，其中善本书为3745种35083册（次年“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战火破坏）[177]。此外，各高等院校及部分中、小学图书馆也迅猛发展，1933年，全国公、私立高等院校共拥有图书340万册[178]，此后几年又续有增加。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壮大，对教育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0年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及国人对科学事业认识的加深，一些政界及学术界名流还发起过一个科学化运动。陈立夫、张道藩、张其昀、吴承洛等均积极参与其中。1932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最初会员有五十余人，次年出版《科学的中国》半月刊，系统宣传科学化运动的宗旨[179]。他们提出，“没有经济的转变，固然不会造就近代的文化，没有科学和机械的发明创造，更何从发端今日世界艳丽的文明”[180]，强调科学家的重要使命就是：“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181] 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业经营研究改进会等组织，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展开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182]，提出“以五百万人受科学知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183]。当然，由于当时中国整体文化及科学水平的限制，科学化运动推广、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虽然协会会员到30年代末发展到3000人，但运动始终局限于科学界本身，未能如发起者期望的那样真正推向社会。

总的来看，自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广大知识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人士为之作了不

懈的努力。当然，由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水平总体说还是落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研究不系统，人才匮乏。据统计，1937年全国农林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仅4113人，相当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而天文人才总数仅67人，最多的工矿业也仅1.9万余人[184]，远远不敷所需。每年新毕业的大学专门人才，工矿方面最多也仅及千人，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落后局面。其次是经费不足，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中央研究院是国内各科研机构中经费最高的，但也常有“异常支绌”[185]之感，北平研究院则常因经费紧张，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一些地方及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的经济情况则更为窘迫，常常遭遇“不可思议之穷困”[186]。第三，政府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尚欠完善。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也无力担当起领导全国科学发展的重任，学术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各级科研机构的分工合作远未有效进行，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研究机构设置上就有所重复。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

(1)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0页。

(2) 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教育部公报》第4卷第49—50期，1932年12月出版。

(3) 《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8页。

(4)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5)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238页。

(6)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7) 参见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第84—89页有关数据，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8)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7页。

(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09—610页。

(10) 《教育部民国廿四年至廿六年义教经费支配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 《民国二十四学年度至二十五学年度全国私塾概况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82页。

(12) 《教育部颁布改良私塾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79页。

(1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82页。

(14) 参见《取缔世界书局刊行小学国语读本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 《民国二十五学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79页。

(16) 《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2期，1935年8月出版。

(17) 参见《民国十九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民国二十五学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54、581页。

(18) 《苏省各县学龄儿童统计》，《申报》1931年1月26日。

(19) 据《广东教育概况》、《广东国库、省库最近收支状况报告书》有关数据统计，分见《统计丛刊》第2卷第8期，《民国日报》1930年10月10日。

(20) 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7页。

(21) 《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11期，1933年5月出版。

(22) 《中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4页。

(23) 《中学规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22—423页。

(24) 《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11期，1933年5月出版。

(25) 李桂林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26) 《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教育杂志》第23卷第10期，1931年10月出版。

(27) 蒋介石：《为学做人与复兴民族之要道》，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194页。

(28) 蒋介石：《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12页。

(29)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7年2月22日条，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0页。

(30) 陶行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生活教育》第1卷第8期，1934年6月出版。

(31) 参见《全国中等学校二十五学年度概况》，《民国十九年度至二十六年度全国中等学校毕业生累计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18—519、530—531页。

(32) 黄问歧：《民国二十三年中国教育回顾与今后展望》，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3) 《教育部公布职业学校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2页。

(34) 《民国廿五、廿六学年度全国职业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13—515页。

(35)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2页。

(36) 《国民政府公布师范学校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5页。

(37) 转引自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38) 《中华民国教育实施方针》，《革命文献》第56辑，第198页。

(39) 据《教育部报告民国十九年度高等教育概况》统计；另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242页表5、第334页表13。

(40) 据《江西地方教育》第72期（1937年2月出版）有关数据统计。

(41) 参见《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8至22号有关文件，1928年12月出版。

(42) 《教育部统计最近全国独立学院概况》，《时事新报》，1934年2月8日。

(43) 《教育部统计最近全国专科学校概况》，《时事新报》，1934年2月10日。

(44) 《呈教育部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45)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32页。

(46) 参见《革命文献》第54辑，第183—184页；《教育杂志》第27卷第8期，1937年8月出版。

(47) 《我国大学生与世界主要各国比较》，《江苏教育》第4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出版。

(48) 蒋梦麟1931年12月2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页。

(49) 《世界日报》，1934年3月23日。

(50) 《教学天涯五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1978年7月出版。

(51) 梅贻琦1936年2月29日致翁文灏、蒋廷黻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第913页。

(52) 罗家伦：《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时事新报》，1934年1月20日。

(53)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5页。

(54)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留学生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96页。

(55) 《我国留美学生获得学位学校统计》，《世界日报》，1937年2月14日。

(56)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留学生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96—397页。

(5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693页。

(58)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政报告书（1932—1934）》第82页附表。

(59) 《民国廿五学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737页。

(60) 陶行知：《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生活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出版。

(61) 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4日。

(62) 《特种小学校国语读本编辑要点》，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3) 《各庚款机关有关教育文化事业之工作》，《革命文献》第53辑，第464—466页；汪精卫1934年6月致蒋介石电、朱家骅1935年3月致蒋介石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4) 《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纲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5) 《戴乐仁对江西特种教育的调查报告》（1934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6) 《委员长行营令发赣闽皖鄂豫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会议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7) 《当前整军抗争的要务和军事教育的重点》，《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第20—21页。

(68) 《教育部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266页。按：该件编者断为1931年6月17日，应为1932年之误。

(69) 《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70) 《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36年版，第4页。

(71) 《黄炎培教育文选》，第16页。

(72) 《晏阳初1925年1月致孔祥熙函稿》，《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73) 《平民教育定县的试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版，第19页。

(74)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运动史略》，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5)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处1931年编印，第1—2页。

(76) 《平教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第43—44页。

(77)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第5页。

(78) 斯诺1933年10月17日致晏阳初函，《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79) 1939年1月，陶行知曾撰文指出："生活教育之理论，发端于十二年前。在此理论影响之下，曾先后成立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成立经过》，《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可见其生活教育理论的提出，当在1927年晓庄学校成立前后。

(80) 《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4页。

(81)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82) 《乡村建设理论》，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256页。

(83)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意义》，《邹平的村学乡学》，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313页。

(84) 《女铎》第24卷第9期，1934年3月出版。

(85)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86) 《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书稿》，《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87) 《李宗黄考察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纪实》，《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767—768页。

(88) 黄炎培：《我之农村工作经验谈》，《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93页。

(89)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第4册，台北中华学术院1975年版，第1372页。

(90) 《蔡元培言行录》杂著，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74页。

(91) 《蔡元培1926年10月8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4页。

(92)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纪录》，《革命文献》第22辑，第174—175页。

(93) 参见《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公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94) 《革命文献》第53辑，第4页。

(95) 《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央研究院1948年出版，第4页。

(96) 《国民政府公报》第15号，1928年11月10日出版。

(97) 《蔡元培1926年7月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95页。

(98) 《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进行大纲》，《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次报告书》，中央研究院1937年版，第110—111页。

(99) 陈翰笙：《纪念蔡孑民先生》，《人民日报》1980年4月3日。

(100) 胡适：《丁在君这个人》，《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01)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中央周报》第387、388期合刊，1935年11月出版。

(102) 参见《大学院十六年度决算报告书》，《革命文献》第53辑，第39—46页；《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56页；中研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台北中研院1988年版，第8—14页。

(103)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纪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

务月报》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出版。

(104) 中国经济研究会编：《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出版。

(105) 参见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产业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106) 《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177页。

(107) 参见《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第13—18页。

(108) 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109)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工作》，《革命文献》第53辑，第463页。

(110) 《本年度中英庚款支配计划》，《教育杂志》第28卷第10期，1938年10月出版。

(111)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12)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13)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及今后之计划》，《中央周报》第190期，1932年1月出版。

(114)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444—448页。

(115) 参见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中央研究院1934年版，第1—15页。

(116) 顾颉刚：《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五十年的中国》，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202页。

(117) 参见傅斯年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函，《近代史资料》第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118) 参见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史语所集刊》第7期第30页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

(119) 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0)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4页。

(121) 陶孟和：《追忆在君》，《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22)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1页。

(123)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1页。

(124)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38页。

(12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126) 《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7页。

(127) 《国立北平研究院组织规程》，《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5期，1935年9月出版。

(128) 参见李石曾：《国立北平研究院缘起、筹备经过及组织》，《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0年版，第258—260页。

(129) 《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8页。

(130) 参见《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75—1376页。

(131) 参见《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75—1376页。

(132) 参见于有彬：《朱洗》，《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78—79页。

(133) 参见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来的中国》下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28—529页；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中央周报》第387、388期合刊，1935年11月出版。

(134) 《全国主要学术机关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96—1401页。

(135) 吴大猷：《我的科学心路历程》，《口述历史》第1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

(136) 参见朱庭祜：《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创始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7页。

(137) 参见郭健：《黄汲清》，《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138) 《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一览》，转引自《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139) 参见黄俊杰著：《沈宗瀚》，《中华民国名人传》第5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6年版，第87—91页。

(140) 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3页。

(141) 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3页。

(142) 翁文灏：《回顾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2页；另见《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43)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呈送中国西部科学院文件的说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二），第1387页。

(144) 参见杨翠华著：《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03页。

(145)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呈送中国西部科学院文件的说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二），第1388页。

(146) 《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

(147) 胡先骕：《二十年来中国植物学之进步》，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编印，第28页。

(148) 转引自刘咸：《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第15页。

(149) 《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

(150) 陈调甫：《范旭东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61页。

(151) 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科学》第28卷第5期，1946年5月出版。

(152) 雷斯德（Henry Lester），英国人，1840年生，1860年来华，建筑师。经营建筑及房地产业致富，1926年去世。遗嘱将其财产捐献给上海各医院及学校，一部分作为医学教育和研究之用。

(153) 参见陈高钦：《蔡翘》，《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342页。

(154) 参见姚诗煌、苏瑞常：《王应睐》，《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7—8页。

(155) 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编：《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1946年版，第1045页。

(156) 参见宋子成：《侯德榜》，《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196页；黄汉瑞：《回忆范旭东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39页。

(157) 凌鸿勋：《十六年筑路生涯》，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50页。

(158) 参见余青松：《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设经过及研究方针》，《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出版。

(159) 参见《大学研究院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三），第1385—1386页；《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74—178页；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概况》，《革命文献》第56辑，第153—156页。

(160)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育研究专题概览》，转引自陶英惠：《抗战前十年的学术研究》，《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讨论会》（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年版，第87页。

(161) 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出版。

(162) 参见《清华大学第1—9级毕业生一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第782—857页。

(163) 参见古平：《张钰哲》，《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一157页。

(164) 参见关国煊：《朱家骅先生与中国地质学》，台北《传记文学》第43卷第2期，1983年8月出版。

(165) 参见任鸿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年4月出版。

(166) 《竺可桢日记》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67) 参见刘征泰：《苏步青》，《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123—124页。

(168) 陈省身：《学算四十年》，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5期，1964年11月出版。

(169) 参见顾迈南：《华罗庚》，《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94—95页。

(170)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察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12页。

(171)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中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729页。

(172)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报告》（1933年4月—1935年10月），《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2期，1935年12月出版。

(173) 《全国教育会议中关于图书馆之提案》，《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28年8月出版。

(17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783—785页。

(175)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市政报告书》（1932—1934）第82页附表。

(176) 《全国图书馆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808—813页。

(177) 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第257页。

(178) 《全国各大学民国二十五年度图书册数分类统计表》，《中华民

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24—329页。

(179) 参见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9页。

(180)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出版。

(181)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出版。

(182) 曾昭抡：《中国科学化运动》，《时事月报》第8卷第2期，1933年2月出版。

(183)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科学的中国》第5卷第5期，1935年3月出版。

(184) 维涛：《战时技术人员训练》第46—51、73—77页有关数据，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185)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4期，1930年10月出版。

(186) 《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沈阳

上海市公安局藏档，上海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军事委员会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央档案馆藏档，北京

《访问沙千里、胡子婴、张友渔、徐雪寒记录》，藏地不详

《关于西安事变的参考资料及调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京

《李公朴日记》，藏地不详

《史良个人未刊资料》，藏地不详

《黄炎培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文著作

《财政年鉴续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南京，中央印务

局，1948

《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1988

《蔡元培传》，周天度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CC内幕》，柴夫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1958

《察哈尔实录》，赵谨三编，上海军学社，1933

《长城血战记》，中国艺术公司编，北平，京城印书局，1933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光甫先生传略》，张寿贤著，台北，1997

《陈果夫传》，徐咏平著，台北，正中书局，1978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重庆，出版时间不详

《戴笠传》，良雄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7），宓汝成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第三国际》，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潘嘉廷等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杜重远》，张宝裕、杨美君、关继廉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端纳与民国政坛》，符致兴编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傅作义生平》，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革命文献》，罗家伦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7—197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990

《共匪西窜记》，胡羽高编，贵阳，羽高书店，1947

《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央研究院编，南京，1948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国民革命战史》，蒋纬国、王多年主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国难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出版地不详，1932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委会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贵阳，1983

《红军转战贵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贵阳，1981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

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沪案真相二编》，苏高中电讯社编，苏州，小说林书社，1932

《沪战纪实》，韦息予编，上海，开明书店，1932

《华北抗日战纪》，国民政府参谋部编，出版地不详，1934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荒谬集》，王造时著，自由言论社，出版地不详，1935

《黄仁霖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黄炎培教育文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回顾录》，邹鲁著，南京，独立出版社，1946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火柴工业报告书》，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编，南京，1935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美］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蒋冯书简》，上海，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

《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蒋总统集》，“国防研究院”编，台北，1961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台北，1975

《蒋总统年表》（增订本），王德胜编，台北，世界书局，1982

《剿匪战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著，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

《今日的绥远》，丁君陶编，上海，三星书店，1937

《金融法规汇编》，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1988

《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1991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张篷舟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九一八事变史料》，李云汉编，台北，正中书局，197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著，北京，三联书店，1963

《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66

《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戴鸿映编，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

《救国会》，周天度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救国无罪》，上海，1937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上海，时代文献社，1937

《救亡言论集》，丁石民编，上海，1936

《抗日战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著，台北，1970

《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张公权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李云汉编，台北，正中书局，1982

《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卓遵宏编，台北，1982

《抗战时期的经济》，清庆瑞著，北京出版社，1995

《孔祥熙年谱》，郭荣生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

《孔祥熙其人其事》，寿充一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录》，刘振东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苦笑录》，陈公博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4

《拉贝日记》，［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李石曾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80

《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印，1980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梁漱溟教育文集》，宋恩荣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领袖的认识》，贺衷寒著，北平，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

《寥寥集》，沈钧儒著，重庆，峨嵋出版社，1944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刘湘》，乔诚、杨续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留学教育》，“国立编译馆”编，台北，1980

《六大以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六一运动后白崇禧的言论》，南宁，虎声出版社，1939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马寅初演讲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满铁史资料》，《满铁史资料》编辑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满洲事变》，［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日本参谋本部编，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漫话救国会》，沙千里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冒险犯难记》，邓文仪著，台北，学生书局，1973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1949年出版，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民国财政经济史》，董长芝著，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新运促进总会编，南京，1936

《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实业部统计处编，南京，1937

《民国经济史》，朱斯煌著，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

《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等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民国政制史》，钱端升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万仁元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潘汉年诗文选》，陶柏康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七君子传》，周天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七人之狱》，沙千里著，上海，生活书店，1936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北京，三联书店，1963

《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工作检讨》，上海，1937

《全国教育统计》，教育部统计室编，1936

《全国银行年鉴》，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上海，商务印书

馆，1937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王希亮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作战》，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

《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陈本善等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杨品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杜恂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戎马春秋》，董其武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稿》，邓元忠著，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申报年鉴》，申报社编，上海，1934—1936

《沈钧儒纪念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

《沈钧儒文集》，周天度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沈宗瀚自述》，台北，正中书局，1975

《盛世才祸新记》，周东郊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华振中、朱伯康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

《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战地新闻社，1932

《十九路军兴亡史》，邱国珍著，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十六年筑路生涯》，凌鸿勋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十年来的中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南京，扶轮日报社，1937

《斯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四川军阀混战》，萧波、马宣伟著，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四川军阀史》，匡珊吉、杨光彦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四海之内》，［英］李约瑟著，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四年从政录》，陈公博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淞沪抗日画史》，中国史事研究社编，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33

《淞沪血战回忆录》，翁照垣著，上海，申报馆，1933

《淞沪战斗详报》，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著，上海，中华书局，1933

《宋哲元与七七抗战》，李云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宋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绥远抗战集》，上海，星华出版社，1937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太平洋战争史》，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韬奋全集》，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韬奋文集》，《韬奋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三联书店，1955

《陶行知教育文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陶行知文集》，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特工秘闻——军统活动纪实》，陈楚君、俞兴茂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蒋凤波、徐占权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土肥原秘录》，土肥原贤二刊行会著，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

《唯生论》，陈立夫著，重庆，正中书局，1943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伪满经济统治》，滕利贵著，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伪满中央银行史料》，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伪满洲国史新编》，解学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我的回忆》，胡愈之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我的科学心路历程》，吴大猷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北京，中华书局，1977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吴稚晖先生全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69

《五十年的中国》，潘公展主编，胜利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5

《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编，台北，华文书局，1948

《西安事变处理与善后》，何应钦著，台北，1984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西安事变简史》，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西安事变史料》，秦孝仪编，台北，正中书局，1985

《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李云汉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

《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高存信、白竞凡著，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西安事变资料》，姜克夫、黄德昭、王秦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西安事变资料选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1980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西安，1979

《西行漫记》，［美］斯诺著，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

《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84

《现代中国货币制度》，赵兰坪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公司，1955

《现行保甲制度》，李宗黄著，上海，中华书局，1945

《宪法草案意见书摘要汇编》，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编，南京，1934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编，南京，1934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编，南京，1934

《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孔经纬著，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新疆纪游》，吴蔼宸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新生活运动言论集》，蒋介石著，重庆，正中书局，1940

《新生活运动之理论与实际》，陈又新等编，南京警官高等学校，1935

《徐可亭先生文存》，徐堪著，台北，1970

《续修曲阜县志》，出版地不详，1934

《学钝室回忆录》，李璜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

《晏阳初全集》，宋恩荣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杨虎城传》，米暂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一二九运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一二九”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一九三二年度报告》，中国银行编，上海，1933

《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董其武、孙兰峰著，出版地不详，1937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银海忆往》，刘健群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

《银行周报三十周纪念刊》，银行周报社编，上海，1948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张老帅与张少帅》，司马桑敦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3

《张学良文集》，毕万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应德田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政坛回忆》，程思远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保甲制度》，闻钧天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王承礼著，北京，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91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苏］斯拉德科夫斯基著，郗藩封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

《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李康华著，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南京，193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重庆，1941

《中国国民党与经济建设》，“中央文化工作会”编，台北，1984

《中国国民教育发展史》，司琦著，台北，三民书局，1987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巫宝三著，上海，中华书局，1947

《中国海军史》，包遵彭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70

《中国恢复关税自主之经过》，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南京，1929

《中国货币金融史略》，石毓符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教育史》，李桂林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高奇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金融年鉴》，沈雷春编，上海，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

《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卓遵宏著，台北“国史馆”，1986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

《中国近代财政史》，孙文学著，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工业史》，祝慈寿著，重庆出版社，198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编，北京，三联书店，1961

《中国近代国货运动》，潘群祥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3

《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上海粮食局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章有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丁致聘编，南京，国立编译馆，1933

《中国经济论文集》，中国经济报社编，上海，生活书店，1936

《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孙健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经济研究》，方显廷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中国棉纺织史稿》，严中平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平心著，上海，进化书局，1947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冯和法编，上海，黎明书局，1935

《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齐福霖、田琪之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3

《中国税制史》，吴兆莘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铁路史》，李占才著，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张静庐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李桂林编，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1987

《中国现代经济史》，董长芝、李帆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史》，张玉法著，台北，东华书局，1979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魏宏运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北京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王永祥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南京，出版时间不详

《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龚骏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中国政府》，董霖著，上海，世界书局，1941

《中国纸币发行史》，李骏跃著，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1944

《中国制宪史》，吴经熊、黄公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吴承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大事记》，李新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徐百齐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中华民国海军通史》，陈书麟、陈曾寿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宋恩荣、章咸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郭为藩著，台北，广文书局，198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朱汇森编，台北“国史馆”，1987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国民政府主计部编，南京，1948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

《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杨翠华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中统内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央银行史话》，寿充一、寿乐英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

社，1987

《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台北中研院编，台北，198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1977

中文报纸

《北平晨报》，北平

《大公报》，天津、上海

《大美晚报》，上海

《广西日报》，桂林

《桂林日报》，桂林

《华北日报》，天津

《江声日报》，厦门

《解放日报》，西安

《救国时报》，巴黎

《立报》，上海

《民国日报》，广州、上海、济南、福州、南宁

《群众新闻》，上海

《人民日报》，福州、北京

《申报》，上海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天下日报》，上海

《团结报》，北京

《新天津晚报》，天津

《新闻报》，上海

《益世报》，天津

《庸报》，天津

《中兴报》，香港

《中央日报》，南京、上海、重庆

《字林西报》，上海

中文期刊

《大陆杂志》，台北

《大众生活》，上海

《党的文献》，北京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斗争》，瑞金

《独立评论》，北平

《妇女生活》，上海

《工商半月刊》，上海

《广西文献》，南宁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北平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北平

《国民》，上海

《国民政府财政公报》，南京

《国民政府公报》，南京

《国难教育》，上海

《国难新闻》，上海

《国闻周报》，天津

《国讯》，上海

《红色中华》，瑞金、延安

《火线》，天津

《江海学刊》，南京

《江苏教育》，上海

《江西地方教育》，南昌

《交通杂志》，南京

《教育杂志》，上海

《解放》，延安

《救亡情报》，上海

《军事杂志》，南京

《科学》，上海

《科学的中国》，南京

《历史档案》，北京

《救国通讯》，上海

《明报月刊》，香港

《民国档案》，南京

《民众三日刊》，上海

《南华评论》，广州

《南开经济研究》，天津

《清华周刊》，北京

《群众论丛》，南京

《山东省政府公报》，济南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上海

《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刊》，上海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申报月刊》，上海

《生活教育》，上海

《生活知识》，上海

《生活星期刊》，上海

《时论》，上海

《统计丛刊》，出版地不详

《外交部公报》，南京

《文化建设》，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文献和研究》，北京

《文学》，上海

《协和》，长春

《新人》，上海

《新认识》，上海

《新生活促进总会会刊》，南京

《新生活月刊》，南京

《新运导报》，南京

《学生报道》，上海

《银行月报》，出版地不详

《银行周报》，上海

《永生周刊》，上海

《浙江党务》，杭州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中国工业》，上海

《中国经济》，南京

《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

《中国论坛》，上海

《中国农史》，北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

《中华教育界》，上海

《中外杂志》，台北

《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中央银行月报》，南京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南京

《中央周报》，南京

《传记文学》，台北

《作家》，上海

日文档案文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东京

日文著作

《满洲国史》，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东京谦光社，1973

《满洲年鉴》，福富八郎编，满洲日日新闻社，1941

《满洲特殊会社制度问题》，横滨，横滨银行调查部，1942

《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栃仓正一著，长春，满洲中央银行，1942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日本外务省，东京，1978

《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出版地、时间不详

《日中战争史》，秦郁彦著，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61

《现代史资料》，小林龙夫等著，东京，美铃书房，1985

英文档案文献

Shen，I．Y．*China's Currency Reform*，Mrcury Press，Shanghai，1941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2*．Vol．3，Washington，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Japan*： 19311941，Vol．1，Washington，1943

W．N．Medlicott，Douglas Dakin and M．E．Lambert，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ries 2，Vol．9，London，1965，Vol．10，London，1969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

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本德（Hallet [Edward] Abend）

艾　登（Robert Anthony Eden）

艾　黎

艾寒松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安德馨

安东诺夫（Антохов）

安华亭

敖白枫

B

八牟礼吉

巴　金

巴品古特

白　杨

白崇禧

白川义则

白凤翔

白利南（J．F．Brenan）

白鹏飞

白寿之

白逾桓

白云梯

柏文蔚

板垣征四郎

包　刚

包尔汉

包善一

包天笑

宝贵廷

葆　康

鲍　尔（Max Bauer）

鲍格莫洛夫（Д．В．Богомолов）

鲍文樾

贝登堡（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

贝时璋

贝祖诒

本庄繁

秉　志

波　拉（William E．Borah）

博　古

布劳恩　见李德

布留赫尔（В．К．Блюхер）

布隆白

C

蔡　翘

蔡劲军

蔡六乘

蔡树藩

蔡廷锴

蔡元培

仓冈繁太郎

曹　锟

曹　亮

曹福林

曹浩森

曹聚仁

曹孟君

曹裕兴

柴山兼四郎

长谷部照俉

常经武

常隆庆

车向忱

车耀先

陈　策

陈　焯

陈　诚

陈　达

陈　涤

陈　鼎

陈　端

陈　洁

陈　融

陈　行

陈　仪

陈　毅

陈　垣

陈　云

陈　章

陈　中

陈　卓

陈宝华

陈豹隐

陈璧君

陈炳谦

陈波儿

陈博生

陈布雷

陈昌浩

陈长蘅

陈此生

陈岱孙

陈道弘

陈德立

陈调元

陈公博

陈公培

陈光甫

陈光汉

陈光中

陈国辉

陈果夫

陈翰伯

陈翰笙

陈鹤琴

陈鸿文

陈焕镛

陈季良

陈济棠

陈继承

陈嘉庚

陈建功

陈炯明

陈克恢

陈立夫

陈明樾

陈鸣谦

陈铭枢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陈齐瑄

陈其瑗

陈庆云

陈桑英

陈绍宽

陈省身

陈时骥

陈书农

陈树人

陈体诚

陈霆锐

陈望道

陈维周

陈希周

陈先瑞

陈寅恪

陈英士

陈友仁

陈泽云

陈章甫

陈肇英

陈志皋

陈卓林

陈子航

谌小岑

成吉思汗

成舍我

程　克

程　潜

程国瑞

程叔度

程天放

程天固

程锡庚

程子华

重光葵

重藤千春

出渊胜次

初向臣

褚辅成

褚民谊

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

川岛义一

川越茂

丛德滋

崔贡深

崔敬伯

崔龙锡

崔孟博

崔石泉

崔兴武

村谷彦治郎

村井仓松

D

达理扎雅

达密凌苏龙

大谷猛

大角岑生

大月桂

戴　戟

戴　笠

戴　岳

戴洪宾

戴季陶

戴镜元

戴乐仁（John Bernard Tayler）

岛田繁太郎

德鲁蒙（E．Drummond）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

邓　发

邓　洁

邓　铿

邓　文

邓初民

邓飞黄

邓汉祥

邓龙光

邓勉仁

邓世增

邓铁梅

邓文仪

邓锡侯

邓小平

邓颖超

邓粤铭

邓振铨

邓志才

狄超白

刁文俊

丁　超

丁　玲

丁　强

丁　正

丁鉴修

丁默邨

丁培龙

丁惟汾

丁文江

丁燮林

董　霖

董　钊

董必武

董福亭

董健吾

董其武

董英斌

董毓华

董振堂

杜　威（John Deway）

杜斌丞

杜君慧

杜心如

杜月笙

杜重远

渡边渡

端　纳（William Henry Donald）

段君毅

段茂澜

段祺瑞

段锡朋

多田骏

E

鄂　森

F

法肯豪森（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

樊崧甫

范本中

范长江

范汉杰

范绍增

范式人

范旭东

范予遂

范驭洲

范毓璜

方炳文

方鼎英

方少逸

方声涛

方振武

方志敏

芳　泽

酆　悌

冯　铿

冯　庸

冯涵青

冯钦哉

冯雪峰

冯友兰

冯玉祥

冯泽芳

冯占海

冯志刚

冯治安

冯仲云

冯祖荀

佛采尔

弗拉塞（Fraser）

弗列明（George Fleming）

符昭骞

福布斯（W．R．Forbes）

傅柏翠

傅秉常

傅东华

傅斯年

傅同善

傅作义

富振声

G

干国勋

甘丽初

甘末尔（Edwin W．Kemmerer）

甘粕正彦

冈部英一

冈村宁次

冈奇胜男

高　岗

高　鲁

高崇民

高崇熙

高福源

高桂滋

高锦明　见敖白枫

高凌百

高桥坦

高士其

高树勋

高文彬

高兴亚

高一涵

高禹山

高宗武

戈　林（Hermann Wilhelm Goring）

戈公振

格兰特（J．Robert Grant）

葛武启

葛钟山

根本博

耿寿白

工藤忠

公秉藩

宫碧澄

宫长海

龚　澎

龚普生

龚维航　见龚澎

古贺传太郎

古应芬

顾　名

顾　振

顾　准

顾德欢

顾颉刚

顾留馨

顾孟馀

顾顺章

顾维钧

顾翊群

顾毓琅

顾祝同

顾作霖

关景泉

关麟徵

关向应

管翎飞

广田弘毅

贵　福

桂永清

郭秉文

郭春涛

郭冠杰

郭明秋

郭沫若

郭任远

郭述申

郭泰祺

郭外峰

郭希鹏

郭勋祺

郭增恺

H

韩德勤

韩复榘

韩汉英

韩林春

韩色旺

韩天春

韩向方　见韩复榘

韩琢如

何　键

何　廉

何　荦

何　遂

何　伟

何成濬

何公敢

何宏远

何家槐

何克全　见凯丰

何立中

何明理

何汝楫

何思敬

何香凝

何一飞

何益三

何应钦

何瞻如

何章海

何柱国

和加尼牙孜

和知鹰二

河野悦次郎

贺　龙

贺国光

贺耀组

贺衷寒

赫　尔（Cordell Hull）

黑岩浅次郎

横山顺

洪　飙

洪　钫

洪　深

洪灵菲

洪陆东

侯　成

侯德榜

后藤芳平

后文瀚

胡　轨

胡　筠　见胡笔江

胡　适

胡阿林

胡笔江

胡大刚

胡鄂公

胡恩溥

胡刚复

胡汉民

胡化鹏

胡焕镛

胡济邦

胡经甫

胡林翼

胡孟嘉　见胡祖同

胡梦华

胡乔木

胡秋原

胡廷銮

胡先骕

胡也频

胡愈之

胡子婴

胡宗南

胡祖同

花谷正

华丁夷

华罗庚

荒木贞夫

黄　郛

黄　固

黄　华

黄　杰

黄　敬

黄　侃

黄　强

黄　涛

黄　维

黄　隐

黄朝琴

黄复生

黄公觉

黄光锐

黄汉梁

黄汲清

黄江泉

黄居谷

黄慕松

黄琪翔

黄仁霖

黄任寰

黄任之　见黄炎培

黄少谷

黄绍竑

黄守中

黄松龄

黄廷祯

黄维钦

黄文弼

黄锡煊

黄显声

黄旭初

黄炎培

黄永安

黄正贵

黄质文

黄智刚

黄仲瑜

黄子卿

霍揆彰

J

矶谷廉介

嵇文甫

吉　兴

吉鸿昌

吉田政治

吉田忠太郎

季米特洛夫（Georgi Mikhailviocн Dimit-rov）

冀朝鼎

加　伦　见布留赫尔

贾　士（Gards）

贾德干（Cadogan）

贾士毅

翦伯赞

建川美次

江　庸

江问渔

江一平

江泽涵

姜立夫

蒋　逵

蒋伯诚

蒋鼎文

蒋光鼐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南翔

蒋听松

蒋廷黻

蒋锡侯

蒋孝先

蒋孝镇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作宾

焦易堂

鲛岛具重

今村均

金　山

金　文

金宝善

金璧辉　见川岛芳子

金东天

金井章次

金树仁

金树信

金文亨

金宪章

金永昌

金毓黻

金岳霖

金则人

金仲华

近卫文麿

经亨颐

经利彬

井上日召

酒井隆

居　正

驹井德三

K

凯　丰

凯　莱（Kelly）

康　泽

柯庆施

克　兰（Klien）

克宁翰（E．S．Cunningham）

孔　子

孔从洲

孔令恂

孔庆尧

孔祥熙

L

莱谢劳（Von Reichenan）

兰文林

蓝普森（Miles W．Lampson）

劳　地（Ettore Lodi）

雷寿荣

雷斯德（Henry Lester）

雷中田

冷　欣

冷寅东

黎烈文

黎天才

李　昌

李　德（Otto Braun）

李　杜

李　芳

李　庚

李　济

李　觉

李　珉

李　明

李　铭

李　槃

李　溶

李　胜

李　岳

李超桓

李纯华

李大钊

李德全

李登辉

李调生

李凤翔

李服膺

李富春

李馥荪　见李铭

李根源

李公朴

李锅熙

李国珍

李海清

李汉魂

李红光

李焕之

李济深

李继侗

李家钰

李嘉宇

李洁之

李金洲

李锦峰

李克农

李烈钧

李默庵

李品仙

李庆文

李任仁

李盛宗

李石曾

李守信

李寿山

李寿廷

李书华

李思温

李四光

李泰昌

李维汉

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

李伟森

李文范

李文杰

李祥九

李晓生

李笑天

李新俊

李兴中

李学福

李延禄

李延年

李扬敬

李一民

李仪祉

李永祥

李玉堂

李煜瀛　见李石曾

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李云杰

李允生　见冯雪峰

李韫珩

李蕴华

李择一

李章达

李兆麟

李肇甫

李振良

李振球

李志刚

李忠义

李钟颐

李仲融

李烛尘

李卓然

李滋罗斯（Leith-Ross）

李宗鉴

李宗仁

李作栋

厉汝燕

笠木良明

连声海

梁幹乔

梁公福

梁冠英

梁寒操

梁启超

梁漱溟

梁思永

梁仲华

廖　磊

林　彪

林　彬

林　崛

林　棨

林　森

林　蔚

林伯渠

林淡秋

林国赓

林康侯

林可胜

林励儒

林伟成

林铣十郎

林翼中

林育英　见张浩

林云陔

林云根

林子峰

凌　陞

凌道扬

凌鸿勋

凌印清

菱刈隆

刘　斌

刘　鼎

刘　斐

刘　戡

刘　群

刘　仁

刘　湘

刘　兴

刘　峙

刘宝麟

刘伯承

刘伯垂

刘不同

刘承钊

刘城之

刘崇杰

刘崇佑

刘纯启

刘存厚

刘导生

刘窦宸

刘多荃

刘贵堂

刘桂武

刘汉雄

刘翰东

刘航琛

刘和鼎

刘衡静

刘鸿生

刘建绪

刘健群

刘江陵

刘经扶　见刘峙

刘澜波

刘芦隐

刘清扬

刘瑞恒

刘尚清

刘少奇

刘绍先

刘升庭

刘士奇

刘世芳

刘廷芳

刘维炽

刘文彩

刘文辉

刘文龙

刘侠任

刘效曾

刘珍年

刘振玉

刘镇华

刘植炎

刘忠幹

刘仲容

刘祖望

柳　湜

柳　彦

柳乃夫

柳维垣

柳无垢

柳亚子

龙　云

娄饴铠

卢　格

卢光绩

卢兴邦

卢元善

卢作孚

鲁　迅

鲁涤平

鲁效祖

陆　璀

陆　诒

陆殿栋

陆鸿仪

陆九渊

陆学善

鹿万钟

鹿钟麟

吕　骥

吕振羽

罗　青

罗　琼

罗　素（Bertrand Russell）

罗炳辉

罗家伦

罗杰斯（C．Rogers）

罗君彤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文幹

罗泽洲

罗振玉

罗卓英

罗宗洛

洛　甫　见张闻天

落合正次郎

M

马　衡

马　悌（Macti）

马步芳

马超俊

马海德

马鸿逵

马虎山

马立峰

马凌甫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马佩璋

马全禄

马世明

马相伯

马叙伦

马延守

马寅初

马元放

马占全

马占山

马志超

马仲英

毛邦初

毛炳文

毛维寿

毛泽东

茅　盾

茅以升

梅龚彬

梅津美治郎

梅锦昭

梅兰芳

梅乐和（Sir Frederick William Maze）

梅贻琦

梅哲之

门炳岳

蒙文通

孟　禄（Paul Monroe）

孟　森

孟泾清

孟木民

孟文仲

孟宪吉

米春霖

米文和

苗剑秋

苗可秀

苗培成

苗世远

缪澂流

缪培南

摩根索（Jr．Morgenthau Henry）

莫希德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木户幸一

牧野显声

穆罕默德·伊敏

穆克登宝

穆藕初

穆湘玥

N

南次郎

南汉宸

内田康哉

聂荣臻

乜玉岭

牛赖特

牛元峰

钮永建

O

区寿年

欧　震

欧阳予倩

P

潘大逵

潘公展

潘光旦

潘汉年

潘健行　见潘汉年

潘文华

潘宜之

潘佑强

潘元枚

潘梓年

庞炳勋

裴　鉴

裴文中

彭　鳌

彭　涛

彭德怀

彭文应

彭学沛

彭毓斌

彭泽湘

彭昭贤

彭子冈

片仓衷

濮孟九

朴英根

溥　仪

Q

齐默特色木丕勒（齐王）

齐亚诺

千家驹

钱昌照

钱大钧

钱隽逵

钱俊瑞

钱三强

钱伟长

钱新之

钱玄同

钱学森

钱亦石

钱永铭　见钱新之

钱云阶

钱之光

钱宗泽

桥本正康

秦　汾

秦　桧

秦邦宪　见博古

秦德纯

秦联奎

秦仁昌

秦润卿

秦始皇

秦祖泽

覃　振

丘国珍

丘开基

邱山宁

邱毓芳

裘育德

犬养毅

阙尊民　见刘鼎

R

任弼时

任平治

任颂高

荣　厚

荣宗敬

柔　石

宍浦直德

阮淑清

阮玄武

阮肇昌

若杉要

S

萨本栋

萨本铁

萨镇冰

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三宅光治

桑布尔（Badham Thomhill）

沙　特

沙比提大毛拉

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ht）

沙克都尔扎布（沙王）

沙千里

山成乔六

善　耆

商　震

上官云相

上角利一

尚仲衣

邵力子

邵式平

邵元冲

申伯纯

沈　谅

沈恩孚

沈光汉

沈鸿烈

沈钧儒

沈兹九

沈宗瀚

盛岛角芳

盛世才

施士元

石　瑛

石本权四郎

石本寅三

石不烂

石达开

石世安

石友三

石原莞尔

时子周

史　良

史国纲

史量才

史汀生

笹　目

守屋和郎

舒宗鎏

水上秀雄

斯　诺（Edgar Snow）

斯托莫尼亚科夫

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寺　崎

松村利雄

松冈洋右

松井石根

松井源之助

松木侠

松室孝良

宋　黎

宋霭龄

宋汉章

宋美龄

宋庆龄

宋文梅

宋梧生

宋希濂

宋醒凝

宋哲元

宋子良

宋子文

苏宝麟

苏炳文

苏步青

苏汉章

孙　渡

孙　科

孙　棨

孙　瑛

孙　震

孙炳文

孙长胜

孙朝阳

孙承谔

孙传芳

孙传文

孙殿英

孙凤鸣

孙鸿霖

孙兰峰

孙连仲

孙良诚

孙铭九

孙蔚如

孙晓村

孙学梧

孙永勤

孙元良

孙云铸

孙中山

孙祖基

所茂八郎

索诺木拉布坦（索王）

谈家桢

T

谭　海

谭冬青

谭平山

谭启秀

汤恩伯

汤飞凡

汤用彤

汤玉麟

唐　豹

唐　纳

唐　荣

唐　弢

唐　星

唐　英

唐　钺

唐　纵

唐炳源

唐聚五

唐君尧

唐生智

唐式遵

唐守愚

唐寿民

唐有壬

陶　广

陶克陶

陶履谦

陶孟和

陶明樾

陶希圣

陶新畲

陶行知

陶峙岳

滕　杰

滕代远

藤本铁雄

藤村国吉

藤原喜代间

天崎启升

田　汉

田代皖一郎

田冠五

田润芝

田颂尧

田中玖

田中隆吉

田中义一

畑俊六

铁木尔

佟麟阁

佟希赞

佟泽光

童长荣

童冠贤

涂长望

涂思宗

土肥原贤二

团琢磨

W

万福麟

万式炯

万耀煌

汪　锋

汪葆楫

汪德彰

汪馥炎

汪精卫

汪敬熙

汪日章

汪有龄

王　枫

王　珊

王　均

王　俊

王　明

王　英

王　莹

王　震

王宝珊

王炳南

王伯群

王长海

王宠惠

王大珩

王德林

王德泰

王东原

王法勤

王淦昌

王公度

王宏元

王化一

王纪华

王纪元

王季同

王家楫

王家烈

王家善

王稼祥

王杰夫

王敬久

王靖国

王菊人

王昆仑

王雷震

王礼锡

王陵基

王懋德

王平陆

王平章

王仁忱

王汝梅　见黄华

王世杰

王世英

王树常

王思诚

王统照

王晓籁

王孝英

王新元

王绪祥　见张子华

王阳明

王耀武

王一山

王以哲

王玉瓒

王元虎

王云亭

王赞斌

王造时

王兆兰

王志谦

王子修

王子中

王缵绪

韦尔顿（H．A．Wilden）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道明

魏野畴

魏育怀

魏宗普

翁半玄

翁文灏

翁赞年

翁照垣

乌斯满

邬志陶

巫宝山

巫剑虹

巫剑雄

吴　宪

吴蔼宸

吴超炯

吴承洛

吴大钧

吴大锟

吴大猷

吴鼎昌

吴定良

吴涵真

吴瀚涛

吴化之

吴焕先

吴经熊

吴景超

吴敬恒　见吴稚晖

吴开先

吴克仁

吴茂荪

吴乃宪

吴佩孚

吴奇伟

吴尚鹰

吴铁城

吴醒亚

吴耀宗

吴有训

吴蕴初

吴蕴斋

吴曾善

吴稚晖

吴忠信

吴祖贻

伍朝枢

伍献文

伍修权

武纯仁

武藤信义

武止戈

X

西　蒙（John Simon）

西尾寿造

希特勒（Adolf Hitler）

熙　洽

喜多诚一

夏　威

夏　曦

夏斗寅

夏敬履

夏丐尊

夏尚志

夏首勋

夏云杰

闲院宫

香翰屏

香椎浩平

项　英

项康元

萧　克

萧　明

萧　乾

萧　特（Robert Short）

萧　训

萧　铮

萧纯锦

萧佛成

萧劲光

萧敏颂

萧一山

萧赞育

萧振瀛

萧之楚

萧致平

小　滨

小矶国昭

小叶丹

谢　持

谢　华

谢　珂

谢冰心

谢家荣

谢家声

谢介石

谢六逸

谢涛福

谢仰麒

谢镇藩

谢镇南

谢子长

解　方

邢占清

熊　斌

熊　飞

熊佛西

熊庆来

熊式辉

熊希龄

熊玉璋

须磨弥吉郎

徐　冰

徐　范

徐　堪

徐　谦

徐悲鸿

徐彬如

徐炳昶

徐伯昕

徐成冕

徐恩曾

徐福胜

徐国光

徐海东

徐继庄

徐景唐

徐名鸿

徐庭瑶

徐文舫

徐向前

徐新六

徐雪寒

徐永昌

徐源泉

徐祖诒

徐佐良

许宝驹

许成在

许崇智

许德珩

许阁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

许克祥

许权中

许绍棣

许世英

许仕廉

许寿裳

许锡清

许友超

续式甫

宣侠父

薛　岳

薛保鼎

薛笃弼

薛宁人

寻淮洲

Y

严　重

严济慈

严灵峰

盐泽幸一

阎百川　见阎锡山

阎宝航

阎红彦

阎锡山

阎毓善

颜惠庆

晏道刚

晏阳初

阳翰笙

杨　波

杨　格（Arthur N．Young）

杨　杰

杨　林

杨　铨　见杨杏佛

杨　森

杨　述

杨德良

杨东莼

杨福麟

杨虎城

杨靖宇

杨君武

杨克冰

杨立奎

杨茂材

杨明轩

杨勤安

杨清波

杨尚昆

杨庶堪

杨卫玉

杨杏佛

杨秀峰

杨永泰

杨雨民

杨越均

杨增新

杨镇亚

杨正治

杨正中

杨钟健

杨周熙

尧乐博斯

姚　雄

姚景川

姚克广　见姚依林

姚依林

野村吉三郎

叶　挺

叶　肇

叶楚伧

叶恭绰

叶剑英

叶良辅

叶企荪

叶少泉

叶秀峰

叶琢堂

仪我诚也

易德明

易见龙

易培基

易纨士（Arthur Henry Francis Edwar-ds）

殷　夫

殷汝耕

尹奉吉

尹时中

尹心田

应德田

应修人

应云卫

应占彪

英　佐

影佐祯昭

永津佐比重

有吉明

有田八郎

于　刚

于琛澄

于冲汉

于九公

于文俊

于学忠

于右任

于兆麟

于芷山

余汉谋

余井塘

余惟一

余心清

俞承修

俞飞鹏

俞鸿钧

俞济时

俞家骥

俞平伯

俞钟骆

虞和德　见虞洽卿

虞洽卿

羽山喜郎

雨宫巽

玉　春

裕　仁

袁　良

袁德胜

袁国平

袁翰青

袁金铠

袁牧之

袁世凯

原田雄吉

原田义和

远藤三郎

岳武穆

云栋旺楚克

云继先

恽逸群

Z

载仁亲王　见闲院宫

臧启芳

臧式毅

曾国藩

曾扩情

曾南夫

曾宪栋

曾虚白

曾养甫

曾昭抡

斋藤实

詹　森（N．T．Johnson）

詹纪风

张　冲

张　达

张　钫

张　浩

张　继

张　健

张　强

张　群

张　文

张　襄

张　馨

张　炎

张　英

张　云

张　贞

张邦本

张伯苓

张长和

张成义

张传福

张存实

张道藩

张定璠

张定夫

张东荪

张发奎

张福运

张公权　见张嘉璈

张国焘

张国琥

张海鹏

张汉民

张汉卿　见张学良

张惠长

张季鸾

张嘉璈

张嘉铸

张甲洲

张劲夫

张景惠

张景钺

张静江

张静愚

张居正

张君嵩

张坤生

张乐怡

张厉生

张砺生

张凌云

张枚新

张慕陶

张培勋

张培元

张其昀

张清林

张清平

张人杰　见张静江

张任民

张瑞贵

张申府

张树森

张似旭

张天枢

张天翼

张廷谔

张廷枢

张万庆

张文彬

张文果

张文偕

张文藻

张闻天

张西曼

张奚若

张锡钧

张熙光

张肖梅

张啸林

张学成

张学良

张炎元

张燕卿

张耀曾

张一凡

张一麐

张以藩

张印湘

张友渔

张语如

张钰哲

张云逸

张允荣

张泽浦

张兆麟

张振国

张振汉

张振基

张知本

张执一

张志和

张志让

张治中

张仲勉

张子华

张梓芳

张自忠

张宗昌

张宗麟

张宗燧

张作霖

张作相

章炳麟

章伯钧

章嘉呼图克图

章亮基

章乃器

章祖模

赵　丹

赵　毅

赵博生

赵承嘏

赵承绶

赵戴文

赵得寿

赵登禹

赵访熊

赵观涛

赵锦雯

赵晋卿

赵九章

赵连芳

赵尚志

赵寿山

赵叔愚

赵欣伯

赵元任

赵云飞

赵镇藩

赵忠尧

赵仲仁

赵祖康

真崎甚三郎

郑　垂　郑　文

郑　异

郑炳文

郑桂林

郑洪年

郑介民

郑君里

郑培元

郑润成

郑孝胥

郑之蕃

支应遴

植松炼磨

植田谦吉

中井升太郎

中山详一

钟衍庆

周　桓

周　览

周　嵒

周　仁

周　叔　见刘鼎

周　扬

周保中

周伯成

周伯良

周恩来

周福成

周钢鸣

周鲠生

周浑元

周培源

周士达

周士第

周瘦鹃

周巍峙

周小舟

周新民

周信芳

周学昌

周昭琼

周志群

周作民

朱　德

朱　瑞

朱　冼

朱尔典（Jordan）

朱家骅

朱镜宙

朱培德

朱瑞墀

朱绍良

朱叔麟

朱树声

朱庭祜

朱学范

朱蕴山

朱忠道

朱自清

朱宗周

诸青来

竺可桢

祝绍周

庄长恭

卓特巴扎布

宗　晖

邹　琳

邹　鲁

邹敏初

邹韬奋

邹仲琳

左　恭

左近司政三

左舜生

佐　藤

佐佐木到一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
(1937—1941)
上

吴景平 曹振威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

（1937-1941）

上

吴景平　曹振威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记述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历史；既包括军事方面的主要战役，也包括政治、财经与外交等主要领域的发展演变情况。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拉开了中华民族全体奋起抗战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谋划和不断部署全面侵华的必然结果，虽然在这次事变爆发初始日本决策层的确提出过“现地解决”和“不扩大”方针，但那是以中国军队单方面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是以强占整个华北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领土为直接目标的，与日方提出该方针相应的，是连续不断地向华北、华东增派重兵，企图速战速决，攻略中国若干重要城市，击败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三个月内就灭亡中国，使中国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清楚地表明外敌大规模的全面武装进犯已迫在眉睫。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当局的代表蒋介石终于顺应日益高涨的救亡民意，在庐山谈话会上表明了严正立场，即中国虽然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全体国民将不惜抗战和牺牲。面对日军的猖狂进犯，驻守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痛击来犯之敌，体现了保国卫民的英勇气概。随着1937年7月下旬平津地区的沦陷，国民党高层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随着“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来临，国民党确立了战时体制，作出了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自卫抗战宣言，决定动员全国的军队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投入这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

下的第二次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达了实现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在国共高层会谈中，中共方面主动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并就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具体接洽。在华北大战前夜，中共第二次发表对华北宣言，呼吁“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领导的军队相继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出师敌后，打击日军，对于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7月下旬到当年12月中旬，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大战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战。

平津失陷后，华北日军凭借优势兵力，沿着平绥、平汉和津浦各路，向山西、河南和山东进犯。在平绥路东段，从8月上旬起的半个多月里，中国军队对来犯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后南口和张家口相继失守。9月上旬，经过天镇、阳高等地的苦战，中国军队不得不放弃大同。在平汉路北段和津浦路北段，八九月份战事不断。在晋北的平型关、忻口战役和太原等地的战事中，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有很好的配合，沉重打击了来犯日军。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标志着华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经为日军占领。

在淞沪会战中，日本组成了“上海派遣军”，先后集中了三十万兵力，企图迅速占领上海，然后一举攻陷中国的首都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为守卫上海，先后有近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军队，在没有任何地形可资有效屏障的情况下，与占有海空陆优势的日军展开浴血苦战，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付出了重大伤亡，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军，使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破产，为中国方面组织大量人力和重要资源的西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军队撤守上海后，首都南京顿时直面日军的凶焰，中国抗战事业面临严峻的局面。国民党当局果断决定国民政府西迁四川，中枢机关先迁至武汉，表现出与侵华日军长期抗

衡的决心。1937年12月中旬，大批日军攻入南京，连日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犯下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最为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中日军队从华北的局部冲突，迅速扩大为全面的战争，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接连遭受重挫，战线不得不做较大幅度的西移。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华态度更趋嚣张强硬，逼迫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国民党高层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与此同时，举国上下抗日救亡民意日趋高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表明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立场。是否维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成为对当政者的严峻考验。1938年1月中旬，日本政府宣布“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也使得打着“调停”、“议和”旗号的迫降活动趋于失败。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都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

国民政府西迁后，即开始部署全面抵抗，包括确定和开始实施持久消耗战的方针，重新划分战区，补充、调配装备和兵员，按照新的作战计划部署兵力；同时整饬军纪，严惩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失地的将领，振奋士气。在政略方面，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包括总则和政治、军事、经济、民众运动、教育、外交等方面，对于实现一切抗日党派的团结、遏制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对于凝聚民众的抗日共识，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抗日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1938年1月到10月，中国军队部署和先后实施了徐州和武汉两场大会战。在徐州会战中，日军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共约24万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意图打通津浦路，歼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然后进犯武汉。中国方面则把控制津浦路等铁路干线视作拱卫武汉的需要，向第五战区先后增调数十万兵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和津浦路沿线抗击日军，在包括苏北、鲁南、皖北和豫南在内的广大地区里，进行了多次战役、战斗，其中的台儿庄战役更是重创日军

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徐州会战前后四个多月，延缓了日军主力的西进，为武汉会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攻占徐州之后，1938年6月日本调集华中派遣军主力九个师团共二十五万余人，沿长江西犯，力图尽可能多地歼灭中国兵力，攻占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彻底打击国民政府，进而解决“中国事变”。国民政府方面极为重视武汉保卫战，军事委员会调动了一百二十余师参加会战，总兵力达100万。根据牵制消耗敌人和持久作战的方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依托长江要塞、湖泊、山地、丘陵等地形，对沿长江两岸进犯的日军进行节节抵抗。在五个来月的会战时间里，中国军队英勇杀敌，对日军的大小战斗达数百次，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基本上把日军主力阻遏在平汉线—粤汉线以东，掩护了大量人力物资自武汉进一步西撤。武汉会战的结束，以及大体同时广州被日军攻占，标志着中国方面“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侵华日军则被分散牵制在漫长的战线上，从全局来看，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最高当局调整了新的抗战指导方针，明确要连续发动有限攻势与反击，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战，打破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准备反攻。根据这一方针和武汉会战后的日军态势，最高军事当局重新划分战区和调整了兵力部署，对部队进行整训补充。从1939年初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敌军展开了多次战斗，其中大的会战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1939年的冬季作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其中不少会战的开始阶段，中国军队都处于防御地位，但嗣后抓住战机反攻，甚至一度收复被占的重要城市，如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或者大体恢复战前的战线，如随枣会战。各次会战和战役都十分惨烈，中国军队往往付出重大牺牲，才得以收复重要城池，如昆仑关大战；或历时数月，终遭失败，如中条山会战。各次会战、战役的具体进退得失不尽相等，但都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从整个战局来

看，从武汉会战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队并没有能够像卢沟桥事变后最初十六个月那样攻占大片的中国领土，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持的战线也没有大幅度地内撤。

随着正面战场中日军队主战场内移，侵华日军占领的城镇和控制的铁路干线增多，敌后战场在袭扰消耗敌军兵力、破坏敌方供给线、牵制日军主力、振奋被占领区民气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仅是战术性的，更具有战略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国民党军队主力后撤时，便留有少量部队进行敌后游击，各地也多有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更是在明确的抗日游击战方针指导下，深入华北与华中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和组织民众，极大地壮大了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八路军主力先是在山西的吕梁山脉、晋东南和晋西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然后又在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大力发展，组织起八路军的游击部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底，华北地区较大影响的抗日根据地就有十多个，包括晋察冀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晋冀豫根据地、晋西南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冀热辽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鲁西北根据地、大青山根据地等。在华北的诸多重大战役中，如忻口战役、太原会战、台儿庄战役期间，八路军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而1940年百团大战，更是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通讯设施，摧毁了大批日伪军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的统治，充分体现出敌后战场的巨大威力。在华中，新四军深入江苏、安徽、河南等敌后地区，广泛发动民众，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东、豫东、豫皖苏边、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占领军和伪军。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迅速重建，各部队整编补充后，冲破顽固势力的阻扰，战略挺进大江南北广大地区，多次粉碎了日军“扫荡”和汪伪“清乡”，巩固发展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东北，为配合全国的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主动打击日伪军，建立过多个游击区，取得不少战斗的胜利，即便在敌我对比悬殊的不利局势下，不惧牺牲，奋勇抗敌，谱写了抗战史上壮烈的篇

章。敌后游击战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勇气、毅力、决心和智慧，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领域。为了因应全面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权进行了体制机制的调整。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并直接对国民党中政会负责；组成大本营，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执掌最高军事统帅权。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领袖制，蒋介石被推为国民党总裁。1938年底汪精卫出走后，国民党中央当局旋即把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被定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此外，蒋介石还担任了四联总处理事长，可以便宜方式，对政府金融机构下达指令。这方面的体制性安排，有助于国民党中央当局排除悲观主义和妥协主张的干扰，作出抗战决策并守住抗战的基本立场；但是也强化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妨碍了战时政治民主的推进，不适当地助长了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气焰，对于全面抗战的持续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系，起了消极的作用。尤其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是全力抵御外敌入侵，而是从狭隘的党派私利私见出发，无视中共等爱国力量的抗日救亡权利，提防乃至限制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不时制造摩擦，直至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严重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则从民族大义出发，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原则下，在处理与友党友军的关系中顾全大局，在回击顽固派的挑衅时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神圣事业。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对中国所有政治力量乃至整个民族的严峻考验。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在战争初始就宣扬畏战、乞和的立场，在重大问题的决断上彷徨、避责；待到正面战场接连失利、武汉广州失守，他们终于抛却“低调”的面具“出

走”，很快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由失败主义走向投降主义。更有甚者，汪精卫集团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号招摇撞骗，成立侵略者卵翼下的伪政权，标榜“和平反共救国”，与伪满洲国和其他地区的伪政权一样，其实质是赤裸裸的投敌卖国祸民，通过伪政权的司法、财税、军队、警察、特务等体制，帮助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在沦陷区搜捕迫害抗日人士，掠夺民众，成为日本“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战略的帮凶。与汪精卫等伪政权之间展开的政治军事诸领域的斗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这些斗争加强了抗日力量之间的团结，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着沦陷区民众抵制和反对日伪统治。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内各种力量团结抗日的重要标志。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由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决议组织，大部分成员是由国民党当局确定的，其召集和运作的主要环节，也都是由国民党方面主导的，但依然得到包括中共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响应。从1938年7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参政会召开了两届共六次大会，提出和通过了大量的议案，对政府施政报告进行了询问和审议，在坚持抗战建国纲领、坚持持久抗战、推进战时民主法治与宪政、促进战时经济建设、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以及打击汉奸卖国贼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通过国民参政会，各方进步力量推动着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道路上迈出重大的步子。国民党最高当局也确实曾经考虑过推进政治民主、实施宪政，并且让国民参政会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最终却止步于对国民党既有体制和主要人事的维系方面。参政会对政府的监督，整体上还流于形式上，所通过的决议案的实际执行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便如此，参政会依然是战时中国政治民主取得明显进步的重要体现。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火，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在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原先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和主要外贸口岸几乎全都遭日军占领，当时居于较先进水准的工矿业和交通设施，或直接毁于战火，或无法正常运作。在日伪统治区，日本侵略者在财经领域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和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主要工商城市的社会经济陷于畸形状态。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确定和实施军事抵抗的过程中，主导和

组织了沿海工矿业的内迁，尽可能把重要设施、原材料和有关人才辗转移至距离战区较远的西部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大后方近代工矿业体系的形成。国民政府还颁行了鼓励发展工矿业的一系列政策，尤其加大对于采掘、冶炼业和基础工业的投入，也注意对于民生工业的扶持。后方工矿业对于战时中国的军需民用，贡献良多。另外，大后方的主要交通和通讯事业承续了战前的建设规划，较大提高了运输和通讯能力。后方主要地区战时农业生产有了明显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比战前有较大的提高，为支持抗战军事和维持民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抗战爆发后，由于正常财税收入减少，开支增加，此外仰赖国外输入大量军事物资和工业品，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明显加大，除了加强财政征收和加大举借内外债之外，不得不仰赖发行货币，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加上生产领域和流通环节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市场供需关系失衡，政府当局虽然采取了取缔囤积、限定物价的举措，后方城市的物价涨风难以遏止，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和广大民众生计的维系日趋艰难。在金融领域，国民政府通过设立四联总处并强化其统制权限，总体上控制着后方地区银钱业的运作，但在沦陷地区，国民政府要推行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还受到了来自日伪方面的蓄意破坏，互相之间的较量构成抗战前期军事领域之外的金融战、货币战。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欧美大国或持中立观望，或明里暗里对日妥协，中国在外交领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也致力于打开新的局面。中国政府曾在国际联盟有关场合以及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上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试图达到孤立日本进而解决事变的目的。虽然这些国际交涉并没有能够遏制日本对华侵略，但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有关的大国之中，德国较早便确定了亲日疏华的方针，从执意承认伪满洲国到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单方面停止履行对华提供军需物资，进而与日本、意大利结成法西斯轴心国同盟，甚至承认汪伪政权，中国致力改善对德关系的努力难以奏效，最终导致绝交和宣战。中国分别向苏联以及法、英、美等国寻求援助，其中苏联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久便与

中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华提供最急需的军事物资，以商业信用贷款和易货的方式解决支付问题，还派出志愿飞行员和军事顾问直接支持中国抗战。中国还寻求过法国援华和双方对日的军事合作，但在对中国抗战有着重大影响的输出入货品过境越南问题上，法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给中国带来困难；进而公开对日妥协，导致中法政治关系倒退。在对英国关系方面，寻求财经援助和反对对日妥协，始终是中国对英交涉的重点所在。英国虽然向中国提供过一些商业信贷，并在提供平准基金借款方面采取了较积极的步骤，然而基于对中国抗战的消极评估，英国当时把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点，在诸如中国海关、天津租界和白银、滇缅路的关闭与重开等关乎中国主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不惜牺牲中国、对日妥协，两国关系演进中不无曲折。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在促请美国出面解决中日冲突方面没有获得进展，美国对华的经济援助，也限于数额不大的商业信贷；汪伪政权出笼以及日本加紧在越南等地的军事扩张后，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仍在从事抗战的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包括扩大商业信贷的数额、提供平准基金和成立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乃至把中国正式纳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围绕援助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性，两国之间逐步形成战略意义的共识，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正式结盟打下了基础。总体看来，在抗战的前四年里，中国抵御住了日本的军事进攻而没有灭亡和投降，中国战场成功地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兵力，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上升。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无论战略防御还是相持阶段，一切抗日的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为守土卫民，不惜牺牲，浴血苦战；全体中国人民，无论是日本占领区、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以及大后方地区，乃至海外的华人华侨，有着共同的觉醒和最大限度的奋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本卷主要记述了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重大事件、主要政策的确定实施概况和发展演变基本脉络，由于篇幅、体例和掌握的史料史实等所限，

较少个案性的详细介绍，挂一漏万更是难免；对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及海外地区的有关情况，亦未能顾及周全。这些都有待再版修订时予以弥补充实。

本卷的工作开始于1995年，先后有吴景平、曹振威、张济顺、章红参加了章节结构和主要内容、若干史实和参考文献等方面的商讨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张济顺女士与章红女士最后没有参加书稿的执笔，但却对书稿的写作与成稿非常关心，贡献良多。曹嘉涵博士、蒋立场博士、石涛博士曾参与了有关军事、政治领域部分章节的拟稿工作；徐昂、贾钦涵在查找有关文献史料、校对清样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本卷成稿各章节中，吴景平承担前言，第一章第三节，以及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章；曹振威承担第一章的第一、第二、第四节，以及第二、第四、第五、第十章。最后的统稿由吴景平承担。

本卷从立项、分工、确定大纲章节到成稿和校对清样，自始至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的关心、帮助和推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资料文献方面，则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等机构的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谢忱。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日本加紧部署全面侵华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
　　第三节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国民党决定实现抗战
　　第四节　“八一三”事变和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
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
　　第一节　平津抗战
　　第二节　淞沪会战
　　第三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四节　晋北作战
　　第五节　南京保卫战
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
　　第一节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节　战时党、政、军中枢机构的调整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运作
　　第四节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第五节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第四章　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
　　第一节　鲁南会战和台儿庄大捷
　　第二节　徐州会战
　　第三节　武汉保卫战和武汉失陷
　　第四节　华南作战和广州沦陷
第五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
　　第一节　日本扶植傀儡政权
　　一　日本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

二　伪华北临时政府
三　伪蒙疆政权
四　伪华中维新政府
第二节　汪精卫集团谋求对日妥协
一　低调俱乐部
二　董道宁、高宗武赴日
三　“重光堂”会谈
第三节　汪精卫集团投敌
一　汪精卫秘密出逃
二　艳电——汪精卫的降日宣言
三　汪精卫公开投敌
第六章　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一节　南岳军事会议和第二期作战方针的制订
第二节　南昌战役、随枣战役与枣宜会战
一　南昌战役
二　随枣战役
三　枣宜会战
第三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战役
一　第一次长沙会战
二　桂南战役
第四节　豫南会战和中条山会战
一　豫南会战
二　中条山会战
第五节　鄂北战役和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　鄂北战役
二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七章　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
第一节　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和八路军的反扫荡
第二节　百团大战
第三节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

第四节　华南的抗日游击战
一　东江、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二　海南岛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五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
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一节　国共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一　国共之间局部军事冲突日趋增多
二　皖南事变
第二节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第三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第四节　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日本加紧部署全面侵华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开始对中国发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决不是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历史悲剧，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侵华战略之具体实施，也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之必然结果。

以武力侵占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把侵略目标对准中国内陆。它不断向邻近东北的华北和内蒙古地区扩展其侵略势力，使中国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从而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在客观上也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抓住有利时机，拓展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势力，1934年12月7日，日本内阁的陆军、海军与外务三省有关官员经多次协商，达成一份意见一致的纪要，名为《关于对华政策》，然后分别通报各自的驻华机构。该纪要提出的对华方针是：“使中国成为以日本为中心，日满华三国友好合作，确保东亚和平的帝国方针的追随者”；“基本宗旨为在中国扩张我国的经济权益。”根据中国之现状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上述方针难于立即实现，故应分阶段“逐步追求”。对所谓扩张经济权益，纪要解释说：“实际上是奠定我在中国强固的经济地位。这一政策本身不仅是我国对华政策之根本，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以我方势力控制中国，使该国只能接近我方的有力手段。”当前对中国政局的对策，是促使其自然转化，在转化过程中避

免强加于人，同时诱导这一转化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积极而顽强地实施我方认为必要的方针政策”，“使之处于除接近我方以外，别无他路可行之境地”。其中具体的方策纲要，分为一般方策、对南京政权方策、对华北政权方策和对西南派及其他地方政权方策等四项。这四项方策，以对南京政权即中国中央政府的策略最为强硬。比如，“在我方不主动谋求友好，而中国方面又侵害我方权益时，则我方应按自己立场采取必要措施，以严肃公正态度对之”；“要注意利用彼等的内部斗争，改变其抗日政策”；“如因保障我方权益，而采取必要措施的结果动摇了中国政局，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者”；“影响中日接近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基于远交近攻心理的诸般行动及外国给予的援助，对此应力加排斥”。如果这些言词的含意尚不十分明了的话，那么，下面一段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南京政权的存亡决定于其有无打开中日关系的诚意，如无诚意，即将其赶进不能存在的最后境地，此即对南京政权的基本方针政策。”(1)

尽管这是日本政府中三个部门之间达成的方案，因为这三个部门是对华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机关，而且又作为官方的意见正式提出，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时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正忙于内战，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一再妥协退让，导致日本政府推迟了实施强硬方针的时间。然而，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上述方案已经为日本的对华战略定下了基调。

此后，中日两国曾就改善关系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由于日本根本没有谋求两国平等友好的诚意，所以谈判不可能有圆满的结果。对日本来说，“日中亲善”只是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号。就在谈判期间，日本军方一面抓紧向中国的华北、内蒙地区扩展势力，妄图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早已开始充分准备。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每年都制订一份对华作战计划，以备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使用。在1935年制定的下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准备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同时

发起攻击，具体部署如下：以第七军（包括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攻占北平与天津地区；以第八军（包括两个师团）同海军相配合，在山东半岛登陆，夺取青岛、济南等重要城市，与第七军合编为方面军，进行华北会战；以第九军（包括三个师团）配合海军攻占上海地区，然后第七、第八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第九军溯长江西进，从两路夹击武汉，进行华中会战；另外再以一个师团从福州、厦门、汕头登陆，进行华南会战[(2)]。次年8月，又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该计划把上年度的作战部署作了修改，决定再增加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作战，增加第十军（包括两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配合第九军进行华中作战[(3)]。这样，准备用于对华作战的兵力增加到了14个师团。对此计划，日本海军虽然也采取同一步调，但认为中国正致力于统一，限定局部作战是不现实的，必须做出全面战争的计划。因海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所以一开始即准备去中国所需要的地方，用必要的兵力，迅速达到目的[(4)]。

1936年8月7日，在“二二六”政变后上台的日本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5)]，决定了所谓《国策基准》，更以国家基本政策的形式，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亚太地区确定了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出：日本的根本大政，是“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当前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行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6)]。方案中虽没有直接使用以武力侵华的文字，但从日本要在“名义上和实质上”充当东亚盟主，以及“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这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已把中国同“满洲国”一起列为日本的附属国，除非中国主动向日本臣服，否则武装侵华在所难免。

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广田内阁计划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

以适应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首要任务是扩充军备。陆军军备之扩充，以能够同苏联远东的兵力相对抗为目标，特别充实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兵力；海军军备之充实，应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其次是调整外交政策。在总体上应以不折不扣完成根本国策为基本原则，军部应对外交机关进行内部援助，避免军部直接出面，使外交机关能够进行有利而充分的活动。第三是革新改善政治行政机构，确立财经政策，并充分运用各种措施，以同上述根本国策相适应。其中包括“指导和统一国内舆论”，“发展执行国策所必需的产业和重要贸易”，“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等等[(7)]。

广田内阁在确定《国策基准》的同一天，还在四相会议上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其基本精神虽大致与前者相同，但较多地采纳了陆军方面的意见。在审议外交方针时，陆军曾一再强调，充实对苏军备预计至1941年才能完成，因此在今后五年内改善国际关系和其他形势是十分必要的。其中的对华方针是：“诱导其不得不改变对日态度，力求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础的日华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成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区”[(8)]。依据这一方针，8月11日又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其对华策略分为华北、南京政府、其他地方政权和内蒙方面四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已明确提出了“签订防共军事协定”、“签订日华军事同盟”、“解决日华悬案”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聘用最高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建立航空联系，签订互惠关税协定等内容[(9)]。这些要求，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之重现。

同年8月25日，广田内阁又决定了1937年以后日本重点实施的七大国策，其主要内容有“充实国防”、“振兴产业和发展贸易”、“确立对满的重要政策”、“整顿改善行政机构”等[(10)]。另外从1936年开始，日本政府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就扩充重要产业进行具体策划，拟订出

《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该计划的立足点是“综合运用日满两国资源，其中不足部分靠华北解决”[11]。计划的实施时间为1937年至1941年。与此同时，日本陆军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40年前后爆发的判断，于1936年11月拟订出《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准备在战时“大约配备40个师团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空军约140个中队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部队”[12]。从这些动向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正在大力进行战争准备，伺机向中国等东亚邻国发动侵略战争。

20世纪30年代的东亚地区已是国际关注的热点，日本妄图充当东亚盟主，必然要与西方大国发生冲突。为确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个重大的行动——与欧洲的德国结成同盟。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正式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及《秘密协定》。《协定》虽然打着“防共”的招牌，实际上不仅针对苏联，同时也针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这一协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与德国结成了国际法西斯阵营。

正当日本积极扩充军备、振兴国内产业，以便在适当时期内发动侵略战争之际，中日两国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于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开始趋于强硬。日本国内的一些党派因不满军方对政府的操纵，于1937年1月公开在议会上发表攻击军部的演说，引发了政潮，导致广田内阁倒台。其后，宇垣一成的组阁计划因陆军的强烈反对而流产；2月初成立了威信不高的林铣十郎内阁。由于政党的倒阁运动越来越激烈，林内阁执政未满三月，又于5月31日宣告倒台。6月1日成立了由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为首的新内阁。

面对中、日两国出现的新情况，日本政府对原来的对华政策重新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正方案。1937年4月16日，日本内阁在四相会议上决定了《对华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新的策略和方针除给南京政府一定的面子和“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之外，其他苛刻要

求没有实质性改变[13]。这一表面的友善态度，当然无法缓解中、日两国间的矛盾。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地区控制的增强，中、日之间的矛盾与磨擦出现不断加剧的趋势。

对于急于想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扩展其侵略势力的日本陆军来说，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6月5日，在中国进行一个半月视察后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向军部提出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14] 6月底，日本参谋本部的井本雄男到华北视察后，在报告中陈述了这样的意见："日本方面军部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观察大体一致，但在策略方面存在分歧。少数人的意见认为，应该日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而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井本在报告了上述意见之后，又加了一句："这种状态还不明白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15] 其实这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总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前夕，要对中国实施"打击"的主张，已经在日本军方高层屡屡被提及。当时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已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16]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听到了"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传闻[17]。不久以后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谋划全面侵华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天。那天深夜在古城北平西南卢沟桥畔响起的枪声，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信号，日本军政当局迅速拉开战争的序幕，把中、日两国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这枪声同时也震醒了全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卫战争。

日军选择的全面侵华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卢沟桥。卢沟桥位于北

平西南的永定河上，历来是北平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明代末年在桥东头建造了一座拱卫京城的城垣，后来称为宛平城。在卢沟桥北不远，平汉铁路桥横跨南北。中国军队控制这个咽喉地带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该处被日军控制，则北平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卢沟桥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华北日军早已把目光盯住卢沟桥。

华北日军亦称“中国驻屯军”，最初是根据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而设置的，称“清国驻屯军”。中华民国建立后，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其兵力根据中、日两国关系的形势而时有增减，大体在千人上下。1935年，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兵力增加到1771名。1936年广田内阁决定增强中国驻屯军，其定员总数达到5774名，并实行新编制：军司令官由天皇亲任现役将军担任，兵员由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改编后的驻屯军设军司令部、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一第二联队，以及战车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医院和仓库。新编制于同年6月上旬编组完毕，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联队及军直属部队驻扎天津及丰台，其他步兵部队分布于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18)]。步兵旅团司令部及第一联队（欠第二大队，该大队驻天津）驻北平。

1936年7月，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强行进驻北平西南部的丰台，与当地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中国驻军被迫从丰台撤出。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铁路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丰台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同时也给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造成很大威胁。日军占据丰台后，为以后新的侵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进入1937年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活动空前频繁。3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将驻华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关东军参谋等召回东京商议对华问题。春夏之间，教育总监本部、参谋本部及

陆军省的高级官员先后来华北视察。他们有的深入张家口、大同、济南等地，有的甚至还探查北平郊外第二十九军的防地。与此同时，华北日军也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至五六月间，驻丰台日军的演习从白天延续到晚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高级官员也常来卢沟桥一带视察演习，检阅部队。这些模拟实战的演习，早已超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正常范围。西方国家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的驻军都是象征性的，不仅人数很少，而且没有什么正规的军事活动。然而驻屯丰台的日本军队不仅活动频繁，而且不断去战略要地卢沟桥一带演习，演习活动一直以中国驻军的阵地为假想敌，演习地点更是十分靠近中国驻军阵地，演习时使用的枪弹也由原先的空包弹换成实弹。所以，日军的每次演习，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引发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

1937年7月7日晚上7时半，来自丰台日军兵营的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事后日方称，当晚10点40分左右该中队听到从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射来数发子弹，然后在大瓦窑西面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中队长决定“断然膺惩”，一面作战斗准备，一面派人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报告。半夜12时左右，接到报告的一木清直大队长通过电话向北平城内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报告事件经过，并提出丰台驻屯部队立即出动的意见。联队长同意出动，并指示：迅速去现地，作好战斗准备，再去找卢沟桥中国驻军进行交涉。8日零时20分，日军第三大队出动了主力部队，于3时20分占领一文字山山头，并在山上开设无线电台。凌晨4时整，牟田口联队长根据一木大队长听到中方有“第二次”枪声的报告后，即判断为中方的敌对行为，命令开始战斗。5时整，大队长发出第二号作战命令：大队自龙王庙与铁道线之间向永定河沿线挺进；各部队以已经展开的态势向各自目标前进；步兵炮作好向龙王庙及铁路桥头一带射击的准备。8日上午5时30分，一木大队长立即下达攻击前进的命令，步兵炮也向龙王庙及中国驻军阵地集中射击[(19)]。

根据日方的记载，7月7日晚第八中队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传令兵，感到事态严重，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然而，该士兵并无其他意外，只是向第二小队传令时，因天黑失足掉进十来米深的沙坑内，头部受到撞击而晕倒在那儿。直至次日黎明时分，才恢复知觉，回到位于大瓦窑的中队内，这时事态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另外，7月8日凌晨当丰台日军以战斗队形向中国驻军阵地前进时，处于右翼第一线的第八中队，在挺进到距中方阵地很近的地方时，仍看不到中国军队有什么抵抗迹象[20]。仅从上述由日军当事者所陈述的经过中，即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由日本丰台驻军一手挑起的。不论射击之事的真相如何，7月7日晚上在卢沟桥一带演习的日本军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如果日本军队不想蓄意挑起事端的话，中、日两国军队的武装冲突决不会发生。然而，华北日军指挥机关仅根据一个电话报告，未予调查核实，即通过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与华北冀察当局进行交涉，横蛮无理地宣称：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结果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21]，中方如不允许，（日方）即将以武力强行进城[22]。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为弄清事实真相，立即派河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等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交涉，并与日方人员连夜去现场调查。此时松井已接到失踪士兵归队的报告，但仍无理要求待查清士兵失踪原因后再进行谈判。而丰台日军正进行发动攻击的准备。在此情况下，所谓调查、谈判云云，不过是为日军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作掩护而已。

7月8日凌晨，日军从东、东南、东北三面包围宛平城。4时20分，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令开始战斗[23]。5时左右，日军步兵、炮兵率先向驻龙王庙及卢沟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发起猛攻。对于日军的无理挑衅，在卢沟桥一线的中国驻军没有退让。他们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决心誓死捍卫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第二十九军顽强奋战，吉星文团所部一排全排壮烈牺牲[24]

，铁路桥东端终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日军另一部则由龙王庙渡永定河，企图进袭长辛店，第二十九军毅然抵抗。此后，日军仍攻势不断。8日下午3时许，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所部予以还击，双方展开炮战。当日晚，日军一部突过永定河，进占铁路桥墩以西地区。面对日军进攻，第二十九军坚守阵地。9日，吉星文率部开始反攻，一举击败日军并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把日军赶至永定河东岸。此后，日军改变策略，他们一面抓紧部署新的进攻，同时又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当日十时半起，中日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等候谈判解决[25]。

华北地方当局与日方的最初会谈还是有结果的，这就是9日秦德纯与松井久太郎达成的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双方军队各撤回原防地（日方坚持要求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由冀北保安队担任[26]。但是，在事变现场的日军于7月10日夜间袭击中方，占领了龙王庙，次日第二十九军反击收回了失地。

中、日两军在卢沟桥一带发生冲突的消息，引起了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与华北相邻的关东军最先做出反应，于8日早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方案。关东军认为，与苏联在乾岔子岛冲突的事件刚达成协议，估计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应借此机会，对冀察给予一击。同时主动向参谋本部请战，称二个独立混成旅团的主力和空军之一部已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侵朝日军与关东军一样，也向中央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以第二十师团之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27]。另外，7月8日清晨4时25分，华北日军向东京陆军中央部发出一份至急电报，报告丰台驻屯军一部在夜间演习中，“因受中国军队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的情况。9时10分，又发出第二份电报，宣称：“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28] 得到上述消息之后，日本陆军中央内部就有人主张乘此机会，“依靠行使武

力，把郁结的华北悬案一举解决”[29]。还有人主张，组织一支由几个师团为基干的部队开赴华北，平定华北地区，进而占领整个中国。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则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对华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必须推迟发动。石原曾是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西安事变后又到中国内地考察，看到了中国民族团结的力量，因而竭力主张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在取得对中、苏两国的优势之后，再实行称霸东亚的国策。在此之前，尽量避免小的冲突，以免影响整个战略目标之实施。在石原的要求下，8日晚上，以日本陆军总参谋长名义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发出了“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的临命第四〇〇号指令[30]。第二天又发出一项具体指示，以“撤退卢沟桥左岸中国驻军；对将来作出保证；处罚直接负责人；赔罪”等四项条件为解决事变的基础，在处理中避免触及政治问题[31]。

应当指出，日本军方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实质是以中国军队单方面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不扩大”事态、避免战争的考虑。但即便如此，在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不扩大指令的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也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的老兵延期复员，这样可以增加四万现役军人，以供扩大对华战争之需[32]。陆军省军务局也抓紧与参谋本部作战课磋商，研究向华北增兵问题。对华采取军事上强硬立场的主张迅速高涨。7月9日上午，日本内阁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处理华北问题的对策，决定了“不扩大事件”，“到有危险时再采取适当措施”的敷衍方针[33]。而7月10日，日本陆军拟就了一份派兵方案，身为作战部长的石原也表示赞同，他对于迅即抛却“不扩大方针”有如下的辩解：“如果沿着不扩大主义走下去，岂不应该停止动员吗？这是一般的想法。……其实，所谓不扩大方针是政治上的希望，而在现在因为有战斗行动，所以通常就要考虑到动员的必要。”[34]

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集五相会议，就派兵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下午马上召集内阁会议，对派兵等问题做出正式决定。首先，

将卢沟桥事件正式定名为“华北事变”。同时，对事件做出五项处理决定，主要内容是：派遣五个师团的兵力去华北，先派朝鲜、满洲两个师团，国内三个师团准备动员；派兵之目的是显示威力，达到中国军队赔罪与对将来作出保证；不答应要求时给予打击；坚持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35]。上述决定报请天皇批准后，当晚6时24分，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开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声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36]，公然对中国政府进行武力威胁。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出兵华北，是在全面侵华的道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7月11日晚上，参谋总长分别下达调兵命令，限令关东军的二个独立混成旅团于12日、13日出发，于17日和19日在北平近郊的顺义、高丽营结集；驻朝鲜的第20师团于13日开始紧急动员，17日乘火车去华北，18日达到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集结；关东军的一个航空团于12日集结于天津[37]。为加强现地指挥力量，又任命对华持强硬态度的原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于12日下午飞到天津，连夜拟订出一份入侵华北的方案，13日一早电告东京，请求批准[38]。

日本内阁的决定和出兵声明，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正式作出的第一个侵华方案，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要强占中国华北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以虚伪的言词掩盖了扩大侵略的企图，在文件中多次使用“不扩大”、“现地解决”的词句。此后一段时间，日本军政当局一面抓紧部署对平津地区的军事入侵，一面继续高唱不扩大的调子。

中国政府方面最初得悉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并没有采取重大的外交措施。7月8日，仅由外交部亚洲司日苏科长董道宁在会见日本副武官大城户时指出，卢沟桥事件责任不在中方，要求从速向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省报告，转令华北驻屯军迅即停止军事行动。大城户表示此系一小冲突，决不至将事态扩大，并承诺向东京方面报告[39]

。当时，在军事应对方面，南京当局还是较重视的。蒋介石于7月8日获悉卢沟桥发生事变后，当即命令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城，全体动员以备战事扩大[40]；同时又电令正在山东乐陵的宋哲元速返保定指挥。当日，蒋介石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转示参谋总长程潜，即刻准备增援华北，同时电令兰封绥靖主任刘峙调派一师开赴黄河以北，庞炳勋部则由正太路方面开赴石家庄策应[41]。7月9日，蒋介石又令平汉路孙连仲第26路军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并于当日电召正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回南京部署应战准备[42]。10日，蒋介石又两次复电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一面命其“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一面示意可在不丧失丝毫主权的原则下与日方进行谈判周旋[43]。12日，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议决定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指示，即可以忍耐缓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44]。可以说，当时中国政府处理卢沟桥事变的立场，是让宋哲元为代表的华北地方当局在备战守土的前提下，在现地与日方周旋。

在发生事变的现地，日本方面不断向第二十九军和冀察当局施加压力。7月10日，日本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提出：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附近、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45]。次日晚上，双方签署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即“秦德纯、松井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对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抗日团体，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46]。仅从该《现地协定》内容来看，冀察当局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对日方的无理要求极度忍让，并作出了很大的妥协，且事先并没有把《现地协定》的内容报告南京当局并征得同意。如果联系到签署该《现地协定》的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出兵华北并且下发了调兵令，那么《现地协定》的交涉与签署，只能起到麻痹中方的作用，而绝不可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

7月12日，宋哲元命令二十九军，为履行11日《现地协定》由中国方面首先撤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抵抗[47]。7月14日，宋哲元本人以其代表张自忠等人，就处分事变责任者、道歉、北平城内治安维持等问题，分别与日本驻屯军方面进行了交涉。而南京当局则颇为担心宋哲元的一味妥协退让。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示仍应从速进驻保定，不宜驻津；并电令北平市长秦德纯，勿中日军缓兵之计[48]。7月13日，蒋介石复电示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要宋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49]。7月14日，蒋介石回复宋哲元关于应否放弃天津的请示电，指出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务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50]。

就在中、日双方在事变现地不断交涉的时候，在东京的日本军部认为中方在拖延的同时向华北调遣兵力，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对中方施加新的压力，遂于7月16日决定：限定7月19日必须由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在7月11日提出的解决条件上，改为由宋哲元签字。如在限期内不履行日方要求，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二十九军，并立即将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在期限满了后，即使中国方面对上述要求事项的态度有所软化，也要使二十九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51]。也是在7月16日当天，日本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酒井镐次少将率领下到达密云；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集结于天津；第二十师团从日本国内出发运往华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向全面侵华的目标推进。

第三节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国民党决定实现抗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从对立走向和解与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趋于强硬，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已经不再轻言退让。到了卢沟桥事变前夕，蒋介石认识到："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决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52]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初始，华北的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7月8日接到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曾做出如下的判断：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53]。蒋介石当日即电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54] 另外，蒋介石决定动员中央直属部队六师北上赴援，9日至12日该六师中央军停驻于河南边境，向日方示以"不避战事"之决心，甚至已经"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进行交涉，试图把华北的军事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加以解决，"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55]。当时蒋介石决定中央军北调且进入河北省境内，更多的是让各方面认识到南京政府不会在军事上作出让步的决心，尤其是希望能够阻遏日军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为应付事态扩大，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7月11日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召集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就卢沟桥事件举行第一次会报，决定使一切军事准备由平时进入战时状态，并详细拟订作战方案[56]。7月12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进一步讨论了"部队准备案"，其第十条明确规定："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57]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适值国民党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诸多高层官员和上层知识精英对中日间新的军事冲突十分关注。如陈布雷7月11日的日记记载："十一时到官邸，闻北事消息极恶劣，与辞修等谈极愤慨。"次日的日记："日方企图扩大之消息继续传来，令人忧愤不止。"7月13日的日记："日军侵略益露骨，季鸾来谈，深以发动全面

战为不可免。”[58] 当时刚上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周佛海在日记中也写到：“闻北方当局对日有屈服消息，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59] 可见，当时普遍认为这一次中日战事势将扩大。另一方面，中日在军事行动之外的较量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并且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7月11日，在南京的日本使馆参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威胁意味十足的声明：中国中央当局如动员部队，“日方必下最大决心”。与此相应，7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从蒋介石电话中得知中央军已开入河北后，“甚慌张”。不过，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愿意接受西方国家出面调停中日冲突。7月14日，王世杰曾要求中英庚款理事会理事杭立武以私人名义向英国驻华使馆表示，希望英国出面调停。7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南京向王宠惠提出调解的意见，并问中方是否愿意事态扩大。蒋介石得悉之后，即表示：中国绝对的只谋自卫，不愿扩大，并愿接受英方斡旋[60]。

然而，日方却步步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7月17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持一通告往递军政部长何应钦，意谓中国中央军队若违反1935年夏季的“何梅协定”，而遣送军队及空军入河北时，日方将采取断然处置，其责应由中国负之。同日，日本使馆代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一）中国停止挑战之言动；（二）不妨碍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解决办法之实行。”[61] 当时行政院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如何答复日方之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倾向对日方迁让，并派高宗武赴牯岭向蒋介石报告[62]。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就是在此背景下作出的。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央认定卢沟桥事件，为中日交涉的最后问题，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他表示中国“并不是求战，而是应战”；提出了对日交涉的三点“最低限度”：一、“决不能再订第二个塘沽协定”；二、“绝对不能容许”“在北平造成第二个伪组织，使华北脱离中

央”；三、“日本不能要求撤换”华北地方官吏。此后，为了因应时局发展，7月19日蒋介石向外界公开发表了对待卢沟桥事变的声明，明确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石最后明确指出：“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63)]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其立场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惜抗战和牺牲。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最后关头”的演说公开发表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此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64)] 这表明，当时蒋介石确实考虑不惜与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抗争。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做演讲和随即公开对卢沟桥事变的声明，的确极大振奋了包括国民党政权中有识之士在内的全国的爱国民意，但还不足以统一体制内的思想主张。日方在华北扩大军事冲突，调集重兵强占平津，这对中国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战乎？和乎？当时，部分高官以及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的若干知识精英，对于中、日一旦发生大战后的结局颇为担忧。如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提出不妨把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南调保定[(65)]；实业部长吴鼎昌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

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66]。政治与知识精英的畏战求和观点有着社会的基础。如上海的英国商会与新闻界领袖曾托话给王世杰：如英国政府正式调停，以承认伪满与平津不驻兵为解决条件，中央政府愿商量否？对此，王世杰认为：如英、法等国不能出任保证及制裁之责任，则中央政府断不能接受此款解决办法。而蒋介石对于胡适所提和议意见，认为军心摇动极可悲，不可由彼（蒋）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但蒋同意王宠惠以外长资格仍与日本外交官周旋[67]。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调中央军北上的措施，目的是想以此来提醒日方，中方已有充分的战备措施，企盼达到不战、免战而维持现状。随着日本在军事与外交双重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中的畏战悲观情绪、寄望外来调停的幻想一度颇为严重。蒋介石本人虽然也有过类似的免战企盼，不反对外来的调停，但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和19日的声明中，蒋介石十分明确地宣示了领土主权不能退让、不求战而准备应战的立场。这是国民党走向抗日的重要步骤，但是还不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从整体上作出应战的决策，必须通过当时中央决策体制的实际运作，才能克复高层与知识精英的惧战希和的主张，真正迈出抗战的步伐。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原则立场之后，华北地方当局曾向南京报告与日军达成的协商结果。对此，南京方面在不松懈战备的同时，一度认为局势有缓解的可能，“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68]。然而，数日内华北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大举调兵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蒋介石意识到作出抗战决策的时机业已迫近，准备承担起领导抗战的最高责任，并考虑了由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的时机[69]。7月底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国民党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如何做出军事抵抗即抗战的决策的呢？

8月初，国民党中央“为应付非常时期工作起见，经决定由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组织联合办公厅，所有对于下级党部之指导与内部工作之规划，随时会商办理”[70]。这意味着抗战的决策呼之欲出。

根据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抗战的决策是在1937年8月7日作出的：“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71]

同一天，王世杰日记有较具体的记载：“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军事各部会长官及由外省应召来京之将领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均参加。中央常务委员及行政院各部部长于晚间该会开‘大计讨论’会议时亦出席。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涉。”[72]

铁道部长张嘉璈在当天的日记里，则记下了更多的与会者的姓名，以及发言内容：上午八时在国府大礼堂开国防会议，出席者除蒋介石外，有汪精卫、张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吴鼎昌、俞飞鹏、钱昌照、俞大维、周至柔、钱大钧、陈绍宽等，以及白崇禧、何键、何成濬、黄绍竑、熊式辉、余汉谋、秦德纯、朱绍良、王宠惠、邹琳；当天“晚在励志社与中政会开联席会议，除上午到会会员外，加林主席、张继（监察院）、四院院长及叶楚伧、陈立夫、蒋内政部长、王教育部长等”。“先由主席令何部长报告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军委会徐厅长报告军事准备（甲、敌我之态势　乙、战斗系列　丙、集中情形），次讨论大计”。张嘉璈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讲话记述最详：“此次战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胜则复兴，败则数十年或一百年不能恢复，希望大家去成见，平心发表意见，迨决定后则不问胜负，义无反顾。”“敌军力比我强，经济力未必一定比我强，外交孤立，德亦未必为日助。但俄国此时不遑与日作战，英安定欧洲之不遑，无力顾及东方，美则向来取独立行动，故我方亦无实在援助。有一二学者说如能保持数十年和平，即以承认放弃满洲亦所不惜。果如是何尝不可，但恐不可得。且以为今日中日之战，非以国与国战相论，乃以革命政府与某一国之战，自问革命政府无与中国可敌

者。”张嘉璈日记中还有汪精卫等数人的发言要点，如汪精卫：“先述九一八后日日所希望之全国一致之会议，今始得实现，亦可稍慰。敌人虽无止境，仍视我之抵抗力为转移，准备虽为敌人所不许，然战争仍可进行准备，且更加强。”张继：“应断绝国交，明白表示态度。”林森：“从前说抵抗，此须进一步说应战，来则应之，应否宣战或断绝国交，视对方情形而定。”阎锡山：“我们须有战之决心为后盾，但备战时须有最大之努力，一面估计本身力量。中央与地方力量须打成一片。至友邦关系亦不能不顾及。”刘湘：“条件至不能承受唯有战，力虽不能相敌，然精神作用亦是要素。须使战事延长以待变化，更须运用战略。”程潜：“对敌须运用，彼速则此缓，彼退则此进。”张嘉璈还记载了会议表决蒋介石提议的情况：“蒋先生结论：战争是最后的决心，我方方针照原定方针进行，进退迟速之间由中央作主，何时战亦由中央决定，各省与中央取一致进行，无异言异心。”“全体起立赞成前项决议，十一时半散会。”[73] 根据所记，蒋介石的主战态度很明确，且能够引领其他与会者的表态，较顺利地通过了抗战决策。

随着抗战决策的通过，国民党当局在战时体制的构建上有了较大的进展。

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决定设陆海空军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另置国防最高会议，并下设国防参议会，以容纳党外抗日分子[74]。8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开秘密会议，决定自该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并通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关于推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提议，还正式通过了中政会关于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议，原由五届二中全会决议设立之国防会议和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设立之国防委员会，均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75]。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并由中常会通过的《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共11条，其中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

主席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指定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其委员由五个方面的官员担任：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各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三、行政院秘书长，内政、外交、财政、交通、铁道、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得在上述委员中指定九人为常务委员。这些成员，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为：“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事项之决定。”另外，还授予蒋介石紧急命令权：“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还设置国防参议会，由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76)]。国防最高会议“主要沿袭国防委员会，是抗战之初结合党政军权的全国国防最高统一指挥机构”[(77)]。国防最高会议有权统辖军事、外交、财政、经济、交通、实业各方面的事务，并且明确由蒋介石执掌最高、最终的决策权。这一机关的设立，表明国民党的最高决策体制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国民党已经决定实施抗战。

第四节　“八一三”事变和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

日本政府向华北派遣重兵，强行侵占北平和天津后，一面继续部署兵力，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同时又在上海点起战火。这是它在侵华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当时的上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政治上看，沪宁地区是国民政府政治活动中心，上海是首都南京的一道屏障。从对外关系上看，上海租界林立，西方国家各种驻华机构大都集中于此。从经济上看，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以及远东闻名的贸易港口。日本把上海作为新的入侵目

标，是其侵华战争进一步走向扩大的明显标志。

日本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由日本海军一手挑起，这是日本陆海军联合侵华的开始。日本的陆军与海军，虽由于利益不均而时常发生矛盾，但在对外侵略方面却始终目标一致，互相配合。日本前外相重光葵曾指出：在对华侵略方面，“陆军的态势是北进，海军的态势是南进”，因此，进入30年代以后，“在北方由陆军之手挑起事端的话，在上海一定由海军之手挑起什么事来”[78]。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陆军把苏联作为假想敌人，大力扩军备战，军费开支急遽膨胀；海军不甘落后，从日本退出裁军条约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建造军舰，以同陆军保持均势。陆、海军统帅部各有一套独立的机构，不受内阁管辖，连海外派遣机关也不例外。他们每年制定一套对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经天皇批准后即着手准备。早在1936年订立下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海军即要求将“出兵上海”列入陆军计划之内，理由是，“在日华冲突的情况下，仅仅出兵华北是不充分的，在上海也必须出兵”[79]。陆军原先不同意这一意见，由于海军的坚持以及考虑到对华侵略必须得到海军的支持，于是答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陆军必须出兵”，并将两个战时编制的师团派往上海，以保护当地日本侨民[80]。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中央部分析了各种形势，认为这次事件波及全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于是马上采取对应措施：首先命令在台湾进行陆、海军合作演习的第三舰队终止演习，返回原来的警备地区；接着又向全国海军部队发出备战电报；军令部亦很快决定了“用兵方针”。该方针是为可能发生全面战争而准备的，其中指出：“鉴于在中国一旦发生局部事件常会波及到全国之实态，作为海军，主要任务是预备在波及到全中国各地时，保护我们的权益和在华的侨民。”为此，作出三项用兵准备：一、配备承担保护运输的直接协助陆军之兵力；二、配备预防青岛方面事态恶化的兵力；三、配备在华中、华南事态恶化的兵力[81]。在积极备战的同时，7月11日，海军

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经过协商，签订了有关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和《陆海军航空协定》。两个协定虽为华北作战而制定，但具体内容包含了华中和华南方面。其中规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侨民"，"陆海军协调作战"。对于作战任务之分担与兵力配备，协定规定：对于华北作战，由陆军担当，海军在海上护送与配合；对华中与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担任警戒，在情况恶化时为保护侨民，陆军向青岛及上海附近派兵，预定由国内调派二个师团，陆海军协同作战。在航空方面，以陆军为主力，消灭华北地区敌方航空势力，必要时由海军航空力量协助；华中、华南地区敌方航空势力以海军为主将其消灭，陆军为自卫而进行航空作战[(82)]。海军方面主动与陆军签订上述协定，主要是为在中国南方发动战争做准备。

控制上海，是日本海军的既定目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它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上海。7月16日，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向海军军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因而提请政府在上海方面也发动战争[(83)]。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寻找挑起事端的藉口。7月24日，驻屯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宣称，"队员宫崎贞雄在四川路与狄思威路口被中国人带走"，要求上海市政府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同时又派陆战队士兵在闸北一带实施戒严。为防不测，中国驻守上海的保安队也加强了戒备[(84)]。双方连续对峙了三天，上海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正当双方冲突一触即发之际，7月27日，中国船民在距上海300公里之遥的镇江附近的长江里救起一名将要溺毙的外国人，后查明就是那个"被中国人带走"的日本兵。据宫崎自述："因为违反军纪去娼寮游荡，过后恐怕要受处罚，就潜登日本轮船溯江而上，途中投水自尽，未能死成。"[(85)] 失去继续挑衅的藉口以后，日军的气焰才有所收敛。

当日本陆军在平津地区部署完毕，准备发动全面攻击时，日本海军也要在上海动手了。7月27日，日本陆军向海军通报，决定向平津

两市发起攻击，海军军令部次长嶋田立即表示：“今后陆海两军统帅部应更密切地合作。”次日，在陆军参谋本部兼职的海军军令部高级参谋横井忠雄大佐，向上司提出一项建议，认为这次出兵华北，转变为对华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为消除日中邦交的癌症，猛烈促使中国政府反省，必须下决心给予一次痛击。“如果让战争缓慢转变，使战局延长的话，会产生各种内外困难，事态变得不容易收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尽力在短期内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迅速结束战争”。“根据目前情况，单凭武力作战要让中国屈服，尚需要相当时日。最好的办法是在行使武力的同时，造成中国的财政混乱”[(86)]。横井的意见，当时代表了海军内部多数人的意见。很清楚，他们是要尽早对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发动攻击。

8月初，日本政府下令，将长江沿岸城市的日本侨民向上海撤退。8月6日，海军又下令在上海的日侨全部撤退至日本租界。撤退在华侨民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这直接关系到日本海军的面子。这次海军主动采取这一措施，说明其内部早有安排，这是即将要在上海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信号。同一天，军令部向海军省提出：“为保护青岛及上海侨民的生命财产，请内阁尽快批准，立即派遣所需的陆军兵力。”[(87)]

正当日本海军中央部迫不及待要求向上海增派陆军兵力之际，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开始向中国方面挑衅。8月9日，最后一批日侨撤退到上海，日本海军的后顾之忧已告解除。当晚5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与一等水兵斋藤驾驶汽车，强闯上海西郊的虹桥飞机场，并开枪打死一名劝阻的保安队员。中国保安队当即开枪还击，将两人击毙。这就是“虹桥机场事件”。事发后，上海市政府于当晚通知日方，共同派员去现场勘验，并由日方运回尸骸。对此事件，中国方面由上海市长俞鸿钧通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过外交方式予以处理。但日本以“大山事件”为藉口，蓄意扩大事态。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声称，所以发生事件，“是因为中国方面

的战备超出了必要的程度，要求首先立即撤退保安队以及撤除停战协定地区内的军事设施，并暂时保留提出正式的解决条件”[88]。同时立即进行作战部署，从长江到黄浦江排列战舰30余艘，又从日本佐世保等地调来海军陆战队士兵3000余人。冈本总领事亦向俞鸿钧市长提出：“撤退保安队”与“所有保安队之防御工事应拆除”二项为解决事件的先决条件。俞鸿钧答复称：中方“已自动令饬保安队步哨之贴近日侨居住区域者一律离开”，但冈本继而要求双方派员决定保安队撤退之距离。俞鸿钧驳称，上海系中国土地，“无所谓撤退，更无所谓距离”[89]。自《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来，上海市内已不驻扎中国的正规军队，仅有保安团、警察总队等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为维持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稳定，当然不能再撤走治安人员而使上海处于无警察的状态，所以俞鸿钧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日本海军中央部接到有关报告，一面要求陆军立即出兵上海，一面指示驻沪海军继续向中方提出要求事项。并特别提醒，在外交交涉时要谨慎从事，因为“事态之解决，终究只能依靠武力，然而陆军派兵需要相当时日”，在陆军派兵的情况下，必须在动员后的20天才能发动攻击，所以目前要回避开战[90]。这样，日本海军开始演出上海版的卢沟桥事变。

8月10日，日本内阁确认了就地保护上海侨民的方针，并批准了准备派遣陆军部队的提案。海军内部不像陆军那样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而对华强硬论就成为制定各种侵略方案的基础。他们把处理这个事件提到与日本前途相关的高度，耸人听闻地宣称：如稍有迟缓，“失去对策机宜，就会使我国作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有名无实，帝国的国威国权只能白白委之泥土”[91]。翌日，海军军令部举行首脑会议，确定了事件处理方针，认为“大山事件发生之原因，是由于上海附近保安队军事力量之增强”，“如果采取中国方面能够容忍的温和解决的话，必留下祸根，贻误将来，维护上海侨民的权益，将越来越困难。限于不从上海全面退却，在近期里再次行使我们的实

力，必须促其反省的时机到来了”。“且目下进行的外交交涉，前途遥远，徒费时日，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必后悔莫及”[92]。在这些激进主张的推动下，海军省部首脑经过会商，认为目前已到派遣陆军的时机，决定立即提交内阁讨论。

日本陆军也支持出兵上海的提案。8月12日，陆军参谋本部拟出派兵纲要，决定立即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组成一个军；8月15日开始动员。陆军省军事课又对上述纲要作了补充，要求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和军事元老会议，从全局出发，确定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同时要使陆、海两军不仅在战役范围内协作，还必须站在处理事变的全局上互相配合。陆军的支持，进一步助长了海军的气焰。应米内海相的请求，日本内阁于当晚召开四相会议，通过了陆军的派兵方案，决定交第二天上午的内阁会议正式决定[93]。陆海军统帅部则连夜会商，研究出兵上海的具体问题。陆军方面明确表示：“最初海军是持援助陆军大陆政策的态度，时至今日，陆军也好，海军也好，必须站在同一立场上考虑问题”；对中国之膺惩，必须用尽各种手段，包括“彻底轰炸城市，使用化学武器”；为能够自由运用上述各种手段，需要正式宣战[94]。在日本军政最高当局层面，充斥着军国主义的嚣张狂妄。

实际上，日本陆军对侵略上海也早有准备，他们事先派遣间谍刺探上海与南京等地的军事、经济情报，编撰了《上海及南京附近军用地志概要》、《上海市资源调查》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侵略上海的作战预案。其方针是：“以一个精锐的兵团在浏河镇一带登陆，派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击破阻击之敌后，占领上海及该地北方的重要阵线。”具体要点是：主力在浏河、吴淞登陆，歼灭上海周围之敌，并希望得到海军陆战队的掩护；如有需要，攻击黄浦江上游，切断沪杭铁路；击破正面敌人后，占领上海及其北侧重要阵地，掩护租界；以一部兵力在租界内登陆，增援海军陆战队。登陆后，迅速占领上海附近的机场，并加以扩充[95]。这些方案，在日本陆军决定出

兵上海后，被参谋本部列为必读的参考资料。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的派兵决定以及陆军全力支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上海，正同中国保安队紧张对峙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顿时感到有了依靠，于是不待陆军援兵到达，即于13日上午向中国军队挑衅，制造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来的第二次上海事变。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就派兵问题作出了决定，会后由内阁官房长官以谈话形式发表一项声明，宣称：“今日内阁会议就适应一旦有所变化的当前紧急事态采取之措施，进行了种种协商。该方面形势之恶化，责任完全在于中国方面。在此情况下，政府为在该方面使中国方面放弃挑战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除对中国政府进行严厉交涉外，已对保护侨民问题采取万全措施。”(96) 次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继续在上海市区同中国驻军展开激烈战斗，中日双方都出动飞机协助攻击。中国空军轰炸了侵入黄浦江的日本军舰。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飞机则分别从“加贺”号航空母舰以及长崎、台北基地出发，轰炸了南京、南昌、杭州、广德等中国空军的机场。当天下午，日本海军发表声明，称“此前帝国海军曾一忍再忍，今则不得不采取必要而有效的一切手段”。当天傍晚，又向在上海的第三舰队下令：“除原任务外，要与派遣军协同，确保必要地区，消灭该方面的敌陆军及在华中的敌航空兵力；同时要控制必要的海面，必要时应击灭敌舰艇。”(97)

8月14日晚上，日本政府再次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审议由陆军提出的表示政府决心的声明草案。阁员们因不了解军队的意图，提出了各种意见。陆军大臣杉山元代表军方作了回答。对于已决定向上海派兵，最后如不需要时该怎么办的提问，杉山回答：“在目前危急的情况下，不作那样的考虑。如果不需要援兵，希望转用到华北，华北是决不会安定的。”对于战争继续扩大，是否算全面战争，战争的目的何在，是否要推翻南京政府，是否要改变事变名称等重大问题，杉山虽表示继续坚持不扩大方针，但已作了明确的暗示：“把战争目的定

为改变南京政府（原注：打倒南京政府之意）是个重大问题。没有考虑事变向全面战争转化。尤其是把作战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这是统帅上的问题”；“对于更改事变的称呼，必须意见一致”[98]。其意思十分明显，军方对于推翻中国政府之事，正在考虑之中，只要内阁的意见一致，马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决策。

第二天，日本政府为表明出兵上海的态度，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除开颠倒近几年中日关系的事实，重弹卢沟桥事变以来各项声明中的老调之外，明确宣称，这次采取断然措施，“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之目的，是“根绝在中国的抗日排外活动，铲除如发生今次事变那样不祥事件之根源，并举日、满、华三国融和提携之实”[99]。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日本政府在7月11日的声明宣称：“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100]。至7月27日，仍在声明中宣称：“切望今天依然由于中国的反省，把局面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看到迅速地、圆满地解决”[101]。那两次声明都没有放弃“不扩大”，“现地解决”之口号。而这次《声明》只字不提“不扩大”，并把全面地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作为出兵上海的基本目标。这表明，日本政府把战火延烧到上海之后，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

正当南京国民政府抓紧部署全面抗战之际，上海日军于8月13日向中国驻军发起了攻击。蒋介石于当天深夜向淞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下达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要求“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102]。次日即8月14日上午，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霞谷寺抗敌及革命阵亡将士墓堂前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报告了战事情形，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此次对日抗战，不采宣战绝交等方式，并由外交部斟酌情形，向国联提请予侵略者以经济制裁”[103]。同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书》一开头即表

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接着，历数日本的侵略事实，中国政府为和平所作之种种努力。在揭露日本言行不一、横生衅端，一再扩大战域，妄图"实施其传统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的阴谋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104] 这份声明虽然没有明言"宣战"，但却是7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立场以来，国民政府对于实施抗战最清楚的昭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此后，中国出现了全面抗战的局面。

为了承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谋求战略与战术之密切配合，国民政府于8月20日设立大本营，以作为对日作战之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以大元帅的身份于当天连续发出多项训令，颁布战争指导、作战指导计划等方案，开始指导全国的抗战。其中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是一个总体指导纲要，该方案第一条首先明确了大元帅的职权："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率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之领土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105] 同时拟定了大本营组织系统表：大本营设参谋总长、副参谋长各一员。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辅助大元帅策划全局；副参谋总长襄助参谋总长指挥幕僚，达成全任务。大本营内设立总机要室及第一至第六部，分别执掌军令、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训练等六方面事务，另外还有后方勤务部、管理部及训练总监部等机构[106]。

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公布大本营组织条例，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决议当常务委员会不能按期举行会议时，应提会之案件，由常务委员三人先行批行，报告常会追认。中央政治委员会应提会各案，先由政治委员会主席批行，再报告政治委员会追认[107]。起初，还曾考虑在大本营之下设六个部（分司作战、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国民指导）[108]。据蒋介石日记，在8月下旬已经进一步讨论了大本营组织要领及其发布和地点，“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行政院则在衡阳”[109]。

大本营为在作战指挥上的方便，根据战略需要设置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部直属大本营，司令长官承大元帅之命，统辖战区内一切军事、政治、党务事宜。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组织系统由大本营统一确定：在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之下，设参谋长、政治部、军法执行部及军政部军需处[110]。因每个战区所辖部队较多，所以在司令长官部之下，又设数量不等的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承司令长官之命，仅负作战指挥之职。集团军总司令部设正副总司令及参谋长，下辖军二至五个，独立师一至三个[111]。

根据中日两国的军事态势，大本营随即颁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根据作战地域设立五个战区：第一战区辖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晋察绥地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辖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司令长官为冯玉祥，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闽、粤两省，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余汉谋任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苏北（长江以北）及山东，司令长官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在五个战区之外的地区，再设立四个预备军。第一预备军由李宗仁、白崇禧任正副司令长官；第二预备军由刘湘、邓锡侯任正副司令长官；第三预备军由龙云、薛岳任正副司令长官；第四预备军由何成濬、徐源泉任正副司令长官。至于海军和空军各部队，则分别归海空军总司令部管辖，以

协助陆军作战。海空军总司令亦直属大元帅指挥。当天任命陈绍宽为海军司令；空军司令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另任命周至柔为前敌总指挥[112]。

大本营在划分作战地域、设置组织系统的时候，同时也给各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直接与华北日军对峙的第一战区，“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富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第二战区“为华北惟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第四战区，“对敌海陆军之骚乱，完全战备”。第五战区，主要为应付日军强行登陆作战，根本打破日军登陆之企图。各预备军“除命令所示者外，各依指定之地区，迅速集中完毕后，根据各战区前方会战之经验，各自实施（必要时可与中央各军事学校连络）适当战时之教育，并保有随时应命之机动性”。海军在参与淞沪会战的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止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空军“应集中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以敌舰及炮兵为主要目标），尔后任务另规定”。其他直属各部队，任务与预备军相同[113]。从以上安排来看，国民政府已决定动员全国的军队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以投入这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

但是很快国民党最高决策者意识到，在军事委员会之外另设实体性的战时军事最高指挥机构并无其必要，最可行的便是“以军委会代大本营”[114]。于是，在9月1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在报告中提出，此前对大本营的组织过重形式，且现时仍以在表面上避免战争之名为宜，因之决定暂时搁置把大本营实体化，而是把军事委员会适当改组，将拟设置各部置于军事委员会之内[115]。旋即明确军事委员会设八部及负责人：黄绍竑（作战）、朱绍良（管理）、俞飞鹏（后方勤务）、熊式辉（政略）、吴鼎昌（经济）、陈公博（宣

传）、陈立夫（国民指导）、翁文灏（国防工业），以及张群（秘书长）[116]。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军事委员会发挥了国民党战时最高军事统帅机构的作用。

---

(1) 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24页。

(2) ［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1》，朝日新闻社1967年版，第369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1页。

(3) ［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1》，第413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2—93页。

(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3页。

(5) 五相会议：指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的联席会议。另外，四相会议是指前面四位大臣参加的会议。

(6)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344页。

(7) ［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44—345页。

(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77页。

(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77—78页。

(10) ［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5卷，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352页。

(1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76页。

(12)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86—87页。

(13) ［日］《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

（1840—1945）下卷，《文书》，第360—361页。

(1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22页。

(1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23页。

(16)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1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23页。

(1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65—66页。

(19) 据［日］《关于卢沟桥事件之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昭和十三年11月），长泽连治于昭和四十五年7月印刷，第13—22页。另参见蔡德全：《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62-163页。

(20) ［日］《关于卢沟桥事件之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昭和13年11月），长泽连治于昭和四十五年7月印刷，第2页。

(21)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8页。

(22) 《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上外交部报告卢沟桥冲突情形及交涉尚无结果电》（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22页；载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印行，1986年。

(23) 《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24) 《抗日战史》（第一册）总论，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5年版，第86页。

(25) 《俞飞鹏关于平津地区中日双方和战情形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4-135页。

(2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6页。

(2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5页。

(29)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芙蓉书房1981年版，第210页。

(30)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2年版，第193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7页。

(3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82页。

(32)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12页。

(33)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24页。

(3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3页。

(35)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01页。

(3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66页。

(3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8—149页。

(38)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52页。

(39)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5年版，第219-220页。

(40) 《蒋委员长复示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并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电》（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09页。

(4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32-33页。

(4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5-36页。

(43) 《蒋介石复密电稿》（1937年7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页。

(44) 《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页。

(4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1页。

(4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53-154页。

(47) 《秦德纯关于收拾时局方法之提议》，加藤书记官致电广田大臣第四二八号极秘特急电，引自《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69页。

(4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2页。

(4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3页。

(5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4页。

(5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79-180页。

(52)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3)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4)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二），第32页。

(55)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9日、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10页。

(57) 《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页。

(58)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二册，台北“国史馆”藏，全宗号134，专藏史料0161.40/7540.01—03。辞修，即陈诚，时任军政部次长；季鸾，即张季鸾，《大公报》主编，当时出席庐山谈话会。

(59)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7年7月14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6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3、14、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63—64页。

(6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7、18日，第67—

68页。

(6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9日，第68—69页。

(63) 刘维开：《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讲话的新资料》，《近代中国》第118期，1997年4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7月-12月）》，台湾“国史馆”1987年版，第146-147页。

(64)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9日，第68页。

(6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3日，第82—83页。

(6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4、5、6日，第83—84页。另胡适在7月30日与高宗武等人达成“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打通此路线”的共识后，次日当蒋介石明确“宣言决定作战”后，仍向蒋面谏：“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见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0页。

(68)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9) “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7日）；“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8日）。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0) 国民党中常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5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3页。

(71)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84—85页。

(73) 张嘉璈日记1937年8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16盒。

(7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37年8月1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00.1/234。另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11日，第86页。

(75)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12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7页。

(76)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载《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9页。

(77) 王正华：《国防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1933-19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1930年代的中国》（上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78) ［日］重光葵：《昭和之动乱》（上），中央公论社1952年版，第109、174页。

(79) ［日］重光葵：《昭和之动乱》（上），第111页。

(80)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112页。

(81)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141页。

(82)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42—243页。

(83) 《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1937年7-9月本），转引自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84) 根据1932年5月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地区驻扎与设防，市内仅有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队担任守备。

(85)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11卷，第40页。

(86)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43—344页。

(87)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73页。

(8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89) 《俞鸿钧致军委会等密电》（1937年8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30-331页。

(90) 军令部次长给第三舰队长681号密电（1937年8月10日），转引自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29页。

(91)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77页。

(92)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78页。

(9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页。

(94)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83页。

(95) 《上海派遣军作战要领案》（1937年），［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みすず 书房1964年版，第208页。

(9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页。

(9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4页。

(98)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86页。

(99) ［日］外务省情报部：《支那事变关系公表集》（第一号），1937年10月出版，第66—67页。

(100)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101)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87页。

(102) 《蒋介石致张治中电》（1937年8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过程》（二），第169页。

(10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14日，第88页。

(104)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1937年8月14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9页。

(105)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4页。

(106) 《大本营组织系统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8页。

(107)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27日），中

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9页。

(108) 据熊式辉记载："（八月）十六日，蒋公受命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旋即组织海陆空军大本营，组织分为六个部，余时原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受命兼任大本营第五部部长，主管全国总动员业务，卢作孚任副部长，留京服务。"见于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6、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0) 《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系统表》，《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2年，第19页。

(111) 《集团军组织系统表》，《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0页。

(112)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618、620-621页。另见《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42-45页。

(113)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1-42页。

(114)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9月1日，第97页。

(11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9月7日，第100—101页。

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

第一节　平津抗战

卢沟桥事变是中日两国外交交涉从破裂走向冲突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日军在华北点燃全面侵华的战火时，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国家与民族的“最后关头”已经来到了，于是决心走上自卫抗战的道路。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序幕。

早在1935年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一面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同时也开始全面规划国防建设，以准备对日抗战。西安事变以后，参谋本部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把准备对日作战作为国防军事的基本方向。该计划对中日军事形势作出评估之后，认为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已为时不远，如日军在华北和东部沿海要地再进犯一步，便为“以局部的战斗以揭开其序幕”。并指出，日军“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1)]。基于上述判断，该计划对未来对日作战之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了基本的规定。其中虽有不少不切实际之处，但已正确提出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因此，这仍是一份准备实行全国抗战的重要军事战略方案。

在确立对日抗战战略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也有明显进展。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虽多次制订过国防建设计划，但因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约，大多为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效果。1936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较大改变。在武装力量、国防工程和军事

后勤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对日抗战，作了军事上与物质上的准备。国防准备的中心是军队建设。经过数年整编，至抗战爆发，陆军已整理和未整理的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及42个独立旅，骑兵10个师及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及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2)]。国防工程建设，也建立了以保护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防卫体系，并在华北和东南沿海等地设置了若干防御工事。尽管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准备很不充分，很不完备，而且为时过迟，但应当肯定，这些准备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就1937年初华北的形势看，仍呈现十分复杂的态势。自日本在华北策动“自治”后，当地的中央军和东北军都被迫撤走，平津两市及冀、察两省等广阔地域，只剩第二十九军担任守备任务。该军共辖步兵四个师，骑兵一个师，另有一个特务旅与两个保安旅，总兵力约十万，但武器装备比较落后。该部第三十七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第三十八师驻天津及廊坊等地区。由于军长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本人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第二十九军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3)]。而常驻华北的日本中国派遣军自1936年进行扩充之后，实力增强数倍，司令部直辖的第四混成旅团，拥有精良的装备，还配备重炮、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而且经过较长时间的实战演习，备战已很充分。

应当指出，对于冀察地区严重的形势，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抵御日军武装进犯的决心是坚定的。该军官兵曾在长城抗战中痛击日军，而被人民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调防平津地区之后，看到日军的嚣张气焰，早已怒火满腔，抗日卫国的士气颇为高涨。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主持第二十九军日常事务的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4)]。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北平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支援第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这就更坚定了卢沟桥驻军至死不退的抗战决心。战斗开始不久，平汉线的铁路桥及附近的龙王

庙等处一度被日军攻占，但当天下午，驻守该地的一一〇旅立即组织力量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复将铁路桥等处夺回。此后，双方在卢沟桥附近反复展开争夺战。

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出乎日军的意料，使其一举占领宛平城的计划落空，于是他们又改变策略，称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向中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8日深夜，双方商定停战办法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丰台，中国驻军撤到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三百以内[(5)]。中国驻军开始按照上述办法撤退军队，但日军却反于9日清晨乘机向城内连续发炮轰击。其后，在双方交涉中，日军又多次挑衅，使事态不能平静下来。在与中方交涉的同时，日本不断调动军队前往中国增援，其国内之第五、第十、第十二等师团先后开往华北，驻朝之第二十工兵联队、第二十六炮兵联队及第二十七骑兵联队分批向天津出动。日本朝鲜军、关东军也不断向华北一带输送集结[(6)]。

南京国民政府密切注视着华北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立即电令何应钦返回南京，主持筹划抗战的各项事宜，并电告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城。另外，还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7月8日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翌日，外交部次长陈介向日使馆日高参事重申抗议；7月10日，又提出书面抗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从7月11日开始，每日晚上召集军政部、参谋本部、海军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总监部、航空委员会、交通部等军政机关首长参加的高层会议，全面部署与指挥抗战事宜。国民政府对日本进攻的基本态度，是蒋介石提出的“不挑战，必抗战”。“不挑战”，即维持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不做主动攻击；“必抗战”，即在日本破坏这个界限而进攻的情况下，决然起而抗战。对于冀察方面，认为可以通过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与宛平城不可放弃。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处理的方针是明确的。

然而，直接与华北日军交涉的宋哲元与冀察当局对事变处理的态度比较软弱。他们虽对日军的进攻感到愤慨，但又怕战争扩大会损失兵力与失去地盘，因而力图缩小事态，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宋哲元的部下也“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7)]，因而感到十分不安。7月10日，秦德纯向南京发出密电：称“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8)]为稳定第二十九军的情绪，蒋介石指示侍从室发出如下复电：“如情况和缓，可饬令停止也。”[(9)]此时日军正调兵遣将，而大部队尚未到达。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等主张乘此有利时机，向丰台之敌发起反击，但受到军部“只准抵抗，不准出击”命令的阻止[(10)]。失去这一战机之后，第二十九军遂逐步陷于被动的地位。

宋哲元于7月11日由山东返抵天津，他同意中、日双方达成的新方案——《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次日，他又发表谈话称：“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属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显示了其认为事件已告解决的乐观情绪[(11)]。同日，何应钦密电宋哲元，以天津万分危险为由劝其移驻保定坐镇主持，被宋婉拒[(12)]。正当宋哲元幻想以某些让步换取和平之时，日本内阁已正式决定向华北派兵。蒋介石接获情报，深知华北事态严重，“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战事）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13)]。7月13日，他亲自致电宋哲元，指出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14)]。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7月12日到达天津后[(15)]，立即对“必要时一举歼灭二十九军”这一目标做出战略部署。同时，把对中国方面的要求增加到七项之多，其中包括“撤销排日性的中央驻冀察之各机关”；“取缔学校的排日教育”；“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队负责，城内不得驻扎军队”[(16)]。宋哲元对此要求，表示原则上没有异议，指派张自忠等人与日方商谈。7月16日，张自忠等与日本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达成以下谅解：

一、谢罪办法由副军长往访日军司令部，宋哲元往日军司令部邸向香月致意；二、处罚责任者中方要求改为免职或减俸，日方对此保留答复；三、中方同意撤退北平市内的第三十七师，但需时一个月，并且仅仅是保安队不行，要求以三十八师接替；四、取缔排日，特别是排日要人，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17]。可见，在11日的《现地协定》已经无法遏止日方扩大事态、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冀察当局还是企图通过新的让步来避免整个局势的恶化。日本从朝鲜和伪满地区调派的援军预定于20日到达平津地区，所以日方于17日向宋哲元发出通知，限19日以前做出承诺。

南京方面知悉冀察当局与日方的谈判情形，对于华北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感到担心。鉴于第二十九军已处于危险境地，军事当局紧急筹商对“日军奇袭时之应付计划”[18]。蒋介石、何应钦等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其表明中央的态度，并以此前“一二八”事变为鉴，提请宋哲元等提防日军的缓兵之计，并要求冀察当局一面不放弃和平，同时也应做好军事上的准备[19]。7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秦德纯，提醒注意日本方面的“真意”所在，即“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调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项”[20]。7月1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等，指出日人所谓谈判和平，不过希图缓兵之诡计，应“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电文提醒宋哲元等人严重注意日本正从国内及朝鲜动员与出动大批军队来华，日军兵力调集后，必将攻占北平，先消灭第二十九军。电文还尖锐指出，宋、张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困境”。因此要求第二十九军“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21]。

但宋哲元仍对和谈存有幻想，7月18日下午，宋哲元竟然借参加

田代皖一郎丧礼之机，与香月清司会面，双方“彼此希望早日恢复本月八日以前状态”[22]。7月19日夜，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张允荣又就落实7月11日《协定》中关于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条款，向日方作出了更具体的书面承诺，并且答应自北平城内主动撤出第三十七师[23]。次日晨，宋哲元发出了要求第三十七师自北平西撤的命令。下午，宋哲元还与日方商议了第三十七师西撤和接替部队问题。21日，第二十九军所部依约自北平市开始撤出，卢沟桥附近的部队也开始撤退。然而，得寸进尺的日军并未以宋哲元的退让为满足，20日下午和晚上，卢沟桥地区日军开始采取“自由行动”，以大炮猛轰中国军队阵地，并给宛平县城造成相当的损害[24]。尽管中方多次提出交涉，至23日，占据卢沟桥、宛平城东以及附近的日军依然拒绝按照最初的协定撤退。而从当时整个日军的部署来看，自围绕卢沟桥事变进行现地交涉以来，在华北地区除了原有的驻屯军之外，又集中了关东军、朝鲜军；为了出兵中国，日本国内已经动员和出动的部队，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四、第十六等五个师团，以及朝鲜之第二十师团。这些部队连同大量械弹辎重，分从海路、陆路向平津地区集结[25]。

至此，宋哲元对日本的欺诈手段有所觉悟。通过蒋介石、何应钦及专程北上的军政部次长熊斌等人一再解释与劝告，他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戒心也逐渐消除。平津地区及全国民众强大的抗日呼声，以及第二十九军官兵高涨的抗日情绪，有力地把宋哲元推向抗战的前沿。此后他不再与日军进行谋求妥协的谈判，而把注意力转向抵抗日军侵略的军事部署。

在第二十九军仓促备战时，增援的日军已在平津地区部署完毕，遂进一步向冀察当局增加压力。7月24日，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的命令，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向天津市长张自忠提出如下四项要求：一、北平市内的第三十七师必须在10日内全部向南方转移。二、门头沟的第二十九军亦必须迅速向南方转移。三、驻西苑的第三十七师必须在

最近转移。四、代替第三十七师而进入北平市内的赵登禹师限两团。驻屯军司令部的意向是，如宋哲元不答应上述要求，或虽答应但不积极实施时，将迫使其实行[26]。至7月25日，日军第五、第十、第二十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之一部，及航空兵团，均已次第到达华北战场[27]。日本援军与华北驻屯军会合，使北平近郊及天津等地之兵力，达到十万人以上[28]。日军迅速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准备发起全面进攻平、津的作战。而当时中国方面驻北平及冀北、察哈尔之部队，仅有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下辖四个步兵师（每师四旅），一个骑兵师，及两个独立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兵力总计约十万人[29]。

廊坊是平、津两市之间的一个市镇，由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部驻守。7月25日下午，日军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十一中队及部分通信兵，藉口修理军用电话线，从天津乘装甲列车开抵廊坊，占领火车站。中国军队通知对方退出，遭日方拒绝。双方僵持至深夜12时，日军突然向中国军队开火，引发起一场激战。26日拂晓，日方派出战机14架，对中方阵地实施首次轰炸[30]。26日晨，日本从天津调集第七十七联队主力，并装甲车数辆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向黄村后撤。当天中午，廊坊陷落。日军还占领了天津至廊坊间杨村、北仓等车站，平津间交通被日军切断。

对于日益恶化的华北局势，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廊坊事件发生后，宋哲元方才认识到，“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不可免”。他于26日向南京发出求救急电：“天津方面兵力单薄，危险万分。拟请速饬庞军集结沧县，以作总援。查日方此次发动，纯对冀察，乃职部防务辽远，战端一启，处处堪虑。即祈速示机宜，以备遵循为祷。”[31] 这也是宋哲元与冀察当局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真正抛却幻想，开始进行抗战准备的转折点。

蒋介石在收到宋哲元这份报告的当天日记中写到：“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想矣。”[32] 正是从这一判断出

发，国民政府军事指导当局于7月26日当晚拟订出如下作战指导方针："将沧保线部队推进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而将主力之集中推进于沧保线。"[33] 据此，蒋介石向宋哲元发出如下电令："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1．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2．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3．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4．决心大战，照中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34]。同时又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所部第二十七、三十一两个师，向永定河地区前进，并归宋哲元指挥；在保定等地的原防地由第五十三军接替。令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率部在沧县、献县一带星夜构筑工事，先求该防线之巩固，待后续部队集中后，再考虑向静海一带推进。次日，又向宋哲元发出指示："此时应敌，先要巩固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望兄记之"[35]。

另外，日军为增强北平市内驻军，以强迫第三十七师撤退，7月26日下午，驻丰台日军约500名，分乘30余辆卡车，冒充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使馆卫队，强冲广安门入城，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冲突[36]。27日清晨，日军又先后向通县、团城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于是，平津地区战火四起，这预示着日军即将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为寻找攻击的借口，在广安门事件发生的当晚，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二十九军在28日正午以前，将三十七师撤退至永定河以西，并陆续退到保定以南，在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该师部队，在27日正午以前撤退至长辛店，"如不实行，则认为贵军不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之行动"[37]。宋哲元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于27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方"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38]。这表明，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之下，以宋哲元为代表的华北军政当局终于意识到退无可退，走上了守土抗战的道路。

而26日东京日本军部接到关于廊坊冲突的报告后，即授权在华北的驻屯军“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39]。于是，27日临晨日本驻屯军下令对北平城内的二十九军不分所属，一律剿灭[40]。在日本国内，则迅速作出了对华增兵和动员的决定。27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会商决定动员国内三个师团，并对第二十师团和其他部队进行第二次动员。随即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批准陆军实行动员，并且很快得到日本贵族院与众议院的支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中国驻屯军下达正式作战任务：除现在任务外，应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安定平津地区各重要地方；下令第五、第六、第十师团派赴中国华北作战[41]。这样，经过短短的20余天，日本方面已经把卢沟桥事变从一个局部的军事冲突，蓄意扩大到全面的侵略战争。

由于卢沟桥事变以来一直对和平谈判抱有幻想，第二十九军未采取有效防卫措施，使自己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地位，以至战争一爆发即遭受严重损失。7月27日凌晨3时，日军开始围攻通县以西之宝珠寺，并将中方第二十九军傅鸿恩营包围。双方激战至23时许，傅鸿恩率部突围退守南苑，转移途中，遭敌机跟踪炸射，伤亡重大。8时，北平以北高丽营、昌平一带日军亦向南进犯汤山、沙河中方冀北保安队阵地，但未得逞。下午3时，日军在飞机轰炸的配合下，向北平以南15公里之团河发起攻击[42]。鉴于北平周围地区情势危机，宋哲元电请中央速派大军及飞机北进增援[43]。

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各部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二十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拂晓，日军突袭中方驻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之第三十七师阵地。日军第二十师团进攻南苑，遭到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三二师的抵抗，激战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官兵数千人战死[44]。当日，日军攻占了南苑和北平以北20公里处的沙河镇[45]。

在各路日军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甚至数度出击，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第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在第五十三军之一旅

的协同下，于当日克复丰台车站。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主力，经过与日军奋战，规复廊坊。在日军猛攻南苑之时，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在宛平一带发起反击，将卢沟桥附近的日军赶出了阵地，三十八师之一部还包围了丰台日军。这些局部胜利虽不能挽回全局的失败，但也给第二十九军主力的安全撤退，造成有利的条件。

宋哲元本“决心固守北平”，蒋介石也曾致电宋，请其与孙连仲“切商办法”，以便随时获得增援[46]。7月27日，宋哲元以北平方面情况日趋严重，电令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向长辛店、良乡一带挺进。孙连仲遂命所部第二十七师于28日夜由铁路输送至长辛店，第三十一师及炮兵第七团，则于29日夜随后跟进[47]。由于28日战局陡变，守卫南苑、北苑的中国驻军伤亡惨重，宋哲元认为“殊难有胜算把握”[48]。当天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军政首脑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让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守北平维持局面，第二十九军主力则在宋哲元、秦德纯率领下向保定撤退。当天深夜，第二十九军官兵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离开古城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转移后，永定河以北仅存北平孤城。7月30日，控制北平的日本侵略军拉拢一小撮汉奸，开始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

天津是华北日军攻击的另一个主要目标。这里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驻有一定数量的陆军及华北空军的主力。早自7月20日起，日军就开始在塘沽构筑军用码头，并占用各大建筑物为其兵站仓库。日军登岸不久的海军陆战队，与中方塘沽驻军形成对峙之势。此外，大沽口外泊有日舰3艘，天津南郊之海光寺驻有日军千余人，东郊的东局子机场也经常停机百架左右[49]。中国驻守天津的是张自忠率领的三十八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该部官兵抗战热情高涨，但高层领导态度暧昧，以致没有进行有效的抗战部署。7月29日拂晓，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向中方阵地发起攻击，中方守军沉着应战。至午后，日本海军陆战队数百人在战机

和大炮的掩护下，在大沽口强行登陆。凌晨2时起，日军强占天津四区警察局，并向中方保安队驻地进袭。是时张自忠已离津赴平，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职务。李文田率部协同天津市保安队与日军激战，击退所有天津东西两车站、特别四区之日军。黄维纲旅则据守大沽口，奋勇杀敌，并于15时袭占东局子日军机场，烧毁敌机60余架[(50)]。16时，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电令中国军队停战，并向马厂、杨柳青撤退。30日午后，日军占领天津市区，此后三日，日军到处焚掠，并继续攻击，天津市区一片火海，景象惨不忍睹。8月1日，天津也出现了日军拼凑的治安维持会。

平津抗战过程中，第二十九军将士壮烈殉国者，自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以下，约达5000余人[(51)]。平、津两市被日军侵占后，留守北平的张自忠及部分军队，已无法行使维持治安的基本职权，被迫于8月4日乘隙突围，转赴察哈尔省。于是，中国政府对平、津两市的行政权遂完全丧失。

第二节　淞沪会战

上海是中国第一通商大埠，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战备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立即调集精锐部队奋起反击，在淞沪地区展开了一场悲壮的大血战。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因受《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政府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地区驻兵设防。为防止日军再次对上海发动侵略，威胁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邻近上海周围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划定防御区域，构筑国防工事。“构筑实施之程序，系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沿海沿江的防御工事，“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渐及闽、粤、苏、鲁诸海岸”[(52)]。在具体部署时，曾作过这样判断：日海军可能由长江和杭州湾进犯，陆军可能由

上海附近及杭州湾北侧登陆后，分路西进，进攻南京。为此，把宁、沪、杭地区划分为宁沪、沪杭和南京三个防御区，并以宁沪防御区为重点，先行构筑工事，配备兵力防守。根据沪宁地区的自然条件，选定苏州至福山的吴福线和无锡至江阴的锡澄线为该防区的主要阵地，并在这两线阵地的前后，分别设置后方阵地与前进阵地。后方阵地选在常州至石庄一线，主要是左有长江右有滆湖，两翼具有较为可靠的屏障，交通运输也较方便。在昆山附近选择险要之地构筑前进阵地；在昆山以东及上海附近，则临时设置警戒阵地。沪杭防御区主要在乍浦、澉浦等海岸要点，构筑永久工事形成要塞。另外还根据地形，选定乍浦经嘉善至苏州的乍嘉线和海盐经嘉兴之吴江的海嘉线为主要阵地[53]。经数年努力，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上述防区的防御工事已基本完成。如沪宁地区预定构筑500座工事，已完成471座；沪杭地区预定构筑1102座工事，已完成1062座[54]。

为增强沪宁地区的防御力量，国民政府于1936年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具体实施该地区对日战备事宜。为了保密，张治中把设在苏州的司令部称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们以军校教员身份，到预定各战线实地考察，绘制地图，初步拟订作战方案。当时整个防区只有三个师正规部队，二个师被安排在吴福线上一面警戒，一面构筑工事；一个师接防锡澄线阵地；沿江防务及上海周围城镇的警戒，则由地方保安团队及警察担任[55]。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沪、宁、杭地区加强了警备，各地区官兵也密切注视着当地日军的一举一动。1937年7月中旬，驻淞沪日军“即迭以汽车载运武装官兵，向江湾一带侦察示威，并于沪西越界筑路区实施夜间演习，诡称水兵宫崎乙名失踪”[56]。与此同时，日军编成第一联合航空队（含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装备中型攻击机38架，舰上战斗机12架）与第二联合航空队（含12航空队、13航空队、21航空队、22航空队、装备舰上战斗机24架，舰上轰炸机30架，舰上攻击机12架，水上侦察机12架）。第一联合航空

队的木更津航空队与鹿屋航空队分别进驻济州岛和台北，准备对华作战[57]。8月1日，苏浙边区公署张发奎向南京报告，日舰、日机在杭州湾活动频繁，杭州城内仅存的两名日侨也已离去。据此作出如下判断："敌侨离杭，敌舰、敌机活动情形似于杭州湾有所企图，揆其寻隙挑衅事变或所难免。"[58]

至8月9日，日军驻沪兵力"计陆战队官兵约五千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三千人，壮丁义勇队三千五百人"。此外尚有"各种轻重口径炮约三十余门，高射炮八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约二十余辆"，抵沪之日本军舰也达到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计约三千人"[59]。"大山事件"（即虹桥事件）发生后，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就在中日双方交涉的同时，日军舰20余艘护送其运输舰5艘，向淞沪急驶而来。上海日租界同时实施动员，编组其侨民在乡军人、义勇团，连同驻沪海军陆战队共计万余人，进入备战状态。日军第一、第三舰队军舰30余艘开始不断向吴淞口一带集结，一部且已驶入黄浦江，进入战斗位置[60]。

当时中国方面驻上海市区的仅有保安总队两个团，兵力甚为薄弱。南京当局深知上海的战事终不可免，为在战略上争取主动，军事委员会于8月11日晚上下令张治中指挥之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主力师迅速向上海近郊推进；京沪警备军及原驻蚌埠之第五十六师、驻汉口之第十八师、驻嘉兴之第五十七师紧急向淞沪、吴县等地区输送，统归张治中指挥。张治中连夜进军上海，将主力部署在宝山县的江湾、彭浦一带，以随时准备对日军发动有力攻击。为统一指挥淞沪地区的军队，军事委员会于8月13日下令将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各部队也划归张治中指挥，并将该部统编为第九集团军，由张治中任总司令。同日，苏浙边区公署也被改编为第八集团军，以张发奎为司令，下辖第六十一、第五十五、第五十七、第六十二师及独立第四十五旅、炮二旅（缺第三团）。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划定第八、第九两集团军之作战地境，"为苏州河至上海南站之线"[61]。

正当国民政府调兵布阵之际，8月13日上午9时许，虹口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借故向中国保安队开枪射击，下午又在上海市区的多处地方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侵入黄浦江内的日本军舰也向市内开炮轰击。中国军队尽管尚未完成战略展开，但因守土有责，当即予以还击。“八一三”抗战遂告爆发。

战斗刚打响时，第九集团军只有少数部队到达预定作战位置，张治中下令其余各部紧急部署。当晚各部队的具体位置大致如下：八十七师主力在江湾两江女子体校，沿虬江至虬江桥一带集结，一部在吴淞；八十八师前锋与日军隔横滨对峙，主力在上海北站及鸿兴路东钱江塘之线；炮兵三个团在大场、彭浦一带进入阵地；五十七师一个旅由龙华推进至徐家汇虹桥路一线，另一个旅向北新泾、虹桥飞机场集结；五十六师主力到达太仓，经浏河向宝山推进，直接警戒沿长江各口岸；上海市警察总队部署在虬江码头、张华浜之间警戒；保安总团则在暨南新村附近集结[(62)]。这一部署，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态势。

对于淞沪方面的抗战，南京当局早已做出如下战略部署：“国军以保卫政经要地，及诱致、消耗敌人之目的，初期以优势兵力，迅速围歼上海市之敌，使其尔后增援、登陆困难。如敌援军登陆成功，则集中重兵予以打击，迫其追随我军行动，使其主力向淞沪地区转用后，即改取守势，并利用既设国防工事，实施逐次抵抗，破灭其速战之企图。”[(63)] 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军事委员会于当天晚上做出如下指示：令第九集团军于次日开始攻击虹口附近之敌；令空军于次日出动，协调陆军作战；令海军封锁江阴江面。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宣布“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京沪、京杭两铁路沿线各地戒严，封锁镇江下游长江江面，航行一律暂行停止[(64)]。中国空军于当天上午向上海的日军发起攻击，先后轰炸汇山码头、日本海军司令部及侵入黄浦江的日本军舰，主要目标均命中起火，日军旗舰“出云”号被炸伤。当天下午，大批日本飞机从长崎、台北机场及“加贺”号航空母舰起飞，越过东海，向南京、杭州等城市进行轰

炸。中国空军奋勇拦截，击落日机3架，中方则无一损失，在中日战争史上首次写下击落日机的记录。同时，中国海军为使日舰失去航行目标，除以漂雷封锁长江口及黄浦江水道外，还毁灭通州及通州下游航路标志，同时专门征用军舰商轮沉江，以填塞江阴以下航道，确保南京的安全[65]。中方长江舰队主力亦向江阴附近集中。

陆上攻击也同时展开。第九集团军以第八十七师在左、八十八师在右，向日军发起地面进攻，各部奋力突进，先后夺取预定围攻线上之宝山桥、八字桥、五洲公墓、持志大学及沪江大学等各要点。当晚，第八十八师向天通庵车站、京沪铁路沿线、持志大学之线推进，初战告捷，为下一步行动打下了基础。但在激烈交战时，该师第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少将不幸中炮弹阵亡[66]。16日拂晓，第八十八师在八字桥、爱国女校，第八十七师在日本海军操场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损失均极惨重。当日，中国空军在南京、上海上空与日机交火，击落日机2架，中方亦有2架飞机受创。第一〇五号鱼雷艇则冒死驶至黄浦江内，向停泊在江面上的日本“出云”号旗舰连射鱼雷7枚，予以重创。日军第一〇五号鱼雷艇亦中弹沉没[67]。14、15、16三日，日军损失战机共计30架以上，中方战机受伤数架，空军人员死二人，伤五六人[68]。8月17日，中方再度发起攻击，日军则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优良武器，负隅顽抗。中方“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69]。第八十八师官兵于日本坟山、八字桥、粤东中学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中方部队牺牲达一个营[70]，日军被击伤击毙者约350人。第八十七师也曾一举突入日本海军俱乐部，在日军的全力反扑下，第八十七师被迫退回原防。战局一时陷于僵持状态。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之初作战之顽强，超出了日本军方的预料。为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日本内阁决定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已经没有“不扩大”的字眼，而是强调“为了

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71]。同一天，下达总动员令，编组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下辖第三师团与第十一师团，限期开赴上海，增援海军作战。8月18日，第三师团之半数及第十一师团全部迅速向上海东南约120公里的马鞍群岛集结。日本政府的增兵行动，使淞沪战争的规模急遽扩大。

中国政府见此情形，深知不实行全面抗战，无法维持民族之生存，因而亦于8月15日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在全国划定五个战区，将苏南、上海和浙江列为第三战区，由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陈诚为前敌总指挥。8月20日，第三战区根据军委会之战争指导方案，拟订出围歼上海日军和阻击增援日军的作战计划。22日凌晨，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抽调第九十八师受总部直辖，并限其于8月23日23时前开至大场镇附近地区以备吴淞、宝山方面的反登陆作战。同时，张治中又与陈诚商议，决定调南京之第六十七师紧急向嘉定集结，并以第六十七、第九十八师及炮兵第十六团，归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准备迎击登陆之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日军数量不断增加，也将长江南岸各守备部队改编成第十五集团军，由陈诚任总司令，配合第九集团军在嘉定、宝山一带防御从长江口登陆之敌。

8月23日拂晓，日军舰艇十余艘驶达蕴藻浜口附近，集中火力向吴淞镇以东之轮渡码头猛烈攻击，蕴藻浜口之中方江防阵地大半被毁，守军亦出现重大伤亡。随后，日军第三师团步兵2000余人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于吴淞镇、张华浜附近强行登陆，上海市保安总团由于兵力薄弱，且缺乏武器支援，处境十分困难，张治中遂命第六十一师第三六一团增援保安团。此后，战局渐趋稳定。同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先头部队在烟幕与战机的掩护下，分乘汽艇六七十艘在川沙镇北侧地区强行登陆。中国守军第五十六师之一个连与日军激战一小时，连长负伤，官兵大部壮烈牺牲，生还者仅十余人。于川沙口登陆的十

一师团约一个旅团，也分向宝山、罗店、浏河镇三个方向突进，宝山城很快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第三师团凭借优势火力于张华浜强渡蕴藻浜，遭到中方将士的英勇痛击。第十一师团则企图一举夺取浏河镇，刘尚志第五十六师率部与日军激战竟日，毙敌500余人，中方伤亡营长以下300余人。随着战线之延长，第九集团军已感兵力不足，第三战区司令部紧急调六十二师、九十八师部分主力去吴淞增援。24日晚，夏楚中率领第九十八师主动出击，向宝山之敌军发动进攻，并乘势克复宝山城。

此后，淞沪抗战的重心逐步从上海市区的杨树浦、虹口方面转移到宝山及吴淞、张华浜一带。从吴淞口附近登陆的日本援军站稳脚跟之后，与上海市区的日军互相配合，对中国军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国军队原先的优势与主动性逐渐丧失，开始陷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尽管在战术上作过多次调整，但仍无起色，罗店与吴淞两个重要阵地，经过多日激战，先后于8月28日和9月1日失陷。

战略要害罗店镇是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当时便呈文蒋介石，认为中方应绝对在罗店阻止日军，使不能犯刘行，更不能趋嘉定[(72)]。25日凌晨，中方第六十七师第四〇二团开始由罗店镇东北侧向尤家楼攻击前进，当即与陆家村、沈宅之日军发生激战。战至拂晓，该团已是伤亡逾半，团长李维藩、营长张培甫以下连、排长多人均壮烈牺牲。此后，日军更向罗店以西包围攻击，中方第一九九旅旅长蔡炳炎亲率预备队一个营与敌军反复搏斗，战斗中蔡炳炎阵亡[(73)]。此后，中日双方军队在罗店镇以北之线展开对峙。当日，彭善第十一师奉令将罗店守备交第六十七师接替后，逐次向月浦至周宅之线推进，并积极准备向狮子林炮台、石洞口发起攻击。7时，彭善师预备队第六十二团遭遇日军600余人，双方展开激战。至10时，双方几近格斗，相互进退达七八次之多，战况陷于胶着。26日凌晨，日军一股部队抢登狮子林炮台北侧，中方第九十八师奉令以主力攻击狮子林并占领之，其一部则据守宝山、月浦，构成三

据点阵地。28日拂晓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千余人猛犯罗店，中国守军第六十七师第三九八团奋力迎战，至午时，罗店陷落。

罗店失守使浏河方面的中国守军渐感孤立，30日，浏河守军调整部署，以第十四师主力占领沿新泾河至浏河河川之线，并派出游击队占领施相公庙、曹王庙之线。31日，日军陆战队千余人屡次进犯中方浏河阵地，均被击退。第十一师团虽攻占罗店镇，但其与在吴淞登陆的第三师团仍处于分离态势。为此，第十一师团于31日派出浅间支队从川沙镇沿海岸线向狮子林炮台附近移动。同日，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在战机30余架、舰炮百余门的掩护之下，于轮渡码头至炮台湾车站之线登陆，并与中方第六十一师第三六一团发生激战。三六一团伤亡甚重，渐呈不支，于午后退守吴淞镇西端。次日，吴淞镇陷入敌手。

9月1日，日军在军舰20余艘、战机10余架的掩护之下，向宝山狮子林炮台、月浦一带的第九十八师阵地发起进攻。此后，中、日双方展开了长达五昼夜的激战，中方营以下官兵大半阵亡或负伤，第十八旅旅长翁国华、第三十三团团长朱福星亦身负重伤[(74)]。至5日，宝山守军第五八三团姚子青第三营被日军完全包围。当晚，第三战区下令由刚抵达战场的第一师接替伤亡重大的第六师驻防，第六师撤至广福整补待命。6日，日军继续使用优势火力猛攻宝山城，城内建筑物无一幸免，中方部队伤亡惨重。当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在吴县颁布第二期作战计划，并重新划定第八、第九、第十五集团军之作战地境。其中，张发奎集团与张治中集团以诸翟镇、苏州河之线为界，线上属张发奎集团军。张治中集团与陈诚集团以南翔镇、蕴藻浜之线为界，线上属张治中集团军[(75)]。7日晨，日军重新占领宝山城，中方守军第三营营长姚子青于东门附近阵亡，全营官兵亦同时殉国[(76)]。11日拂晓，日军猛击中方之月浦阵地，守军伤亡惨重，阵地终被突破。此后，中方守军退守街市，与日军展开逐屋巷战，并将月浦重新夺回。

正当中、日双方在宝山城展开激烈争夺的同时，上海市区的战斗仍在继续。9月6日拂晓，日军饭田支队在10余辆战车的支援下，由虬江码头向虬江左岸中国守军阵地反复猛攻达两个小时。午后，日军再增派步兵1600余人、战车20余辆、飞机9架，在海军舰炮数十门的掩护下，续向虬江左岸中方阵地进犯，战况十分惨烈，中方工事悉数被毁，人员伤亡巨大。中国守军顽强抵抗，集中炮兵火力阻击敌军，歼敌百余人，击毁战车数辆，击毙日军支队长饭田七郎[77]。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9日晨，日军出动战机20余架竟日轰炸，停泊在虬江码头一带的日舰20余艘也猛烈射击，中方军工路以东之线悉数被毁。8时，日军3000余人在烟幕的掩护下，向驻陆家宅的中方第五十七师第三四二团阵地发起猛攻，双方激战至中午，阵地易手数次。第三四〇团第三营奋力迎敌，将敌击退。下午，日军卷土重来，中国守军以刺刀、手榴弹应战，官兵伤亡殆尽，此后战斗逐渐呈现出胶着状态。当晚22时，中方部队撤至沈家行镇至徐家宅第二线阵地。9月9日之战斗，第五十七师第三四二团军官阵亡计李子峰连长等12员，伤连排长曾凤歧等24员，伤亡士兵580员。第三四〇团伤亡军官7员，士兵百余员[78]。在此期间，中国空军派出战机对吴淞口沿江一带之日军舰进行了俯冲攻击，至少击沉敌舰3艘以上，重创敌舰亦在10艘左右。中国海军也使用自制水雷于9月7日炸毁日军供登陆之三井码头及趸船，并炸沉日军汽艇2艘。

对于当时淞沪战场严峻的形势，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此战不能避免，惟能持久而已。……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79] 据此，中国军队逐步停止主动攻击，转向以防御为主的持久作战态势。9月11日黄昏开始，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奉第三战区命令，撤至北站、江湾、庙行至蕴藻浜南岸之线[80]。此后，中方各集团军又陆续退守北站、江湾、罗店西南、浏河之线。

此前，中国大本营于9月6日制定出《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以调整淞沪抗战的战略。其中对日军行动的判断是：从长江口

登陆的增援部队将从罗店向南突进，从左侧背对中国军队形成大包围；从张华浜登陆之敌将向江湾镇方面攻击，吸引中国军队进入包围圈内；同时对围攻市区日租界的中国军队形成小包围。对此，该方面军的战略要领是：首先，“运用优势兵力断绝其联系，限制其发展”，“打破其包围企图，而收各个击破之效”；其次，“如各个围攻之目的不能达到，则依状况逐次于后方占领阵地，采取攻势防御”；第三，“于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待后方部队之到达，再行决战”[81]。接着，对各部队的部署及任务做出明确的指示。为加强对淞沪抗战的领导，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加强了后方锡澄线等处的防御力量，以保卫南京的安全。

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向天皇上奏：“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82] 陆军内部经过紧急磋商，于9月7日决定先增派重藤支队，10日再派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三个师团来上海增援。上述军队都归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另外，还派遣野战重炮部队、工兵及飞行团随同去上海。9月12日，从华北调拨的10个大队援兵首先到达上海，重藤支队也于14日到达上海。至9月中旬，日本上海派遣军已拥有5个师团，共约20余万人，另有炮200余门，战车200余辆，飞机200余架[83]。日军得到增援后，立即调整部署，从吴淞一带向中国守军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中国军事统帅部也调整了淞沪前线的作战部署。由于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为便于指挥，军事委员会于9月21日将淞沪地区12个师改编成第十九集团军，由薛岳任总司令，朱绍良则接替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之部署也进一步调整如下：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地区划为中央军，由朱绍良任总司令，以第十八师及第九集团军编成之；右翼军由张发奎任总司令，以第八、第十集团军编成之；左翼军由陈诚任总司令，以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编成之[84]。左、

中、右三个作战军沿“北站—浏河”一线与日军对峙，并展开阵地争夺战。各部队接奉军令，立即开始调整。右翼军因尚未投入战斗，全军处于警戒状态；中央军因仅增加一个师，部署并无改变。左翼军的阵地则有较大的调动：第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九军的三个师，接替蕴藻浜以北、杨家沼一线原第一军的阵地；第十九集团军第六十六军则以三个半师的兵力，驻守杨家沼至樊家桥一线之阵地，充当左翼军的中坚；樊家桥至龚家宅的阵地，原为第十五集团军第十八军之防区，因战斗激烈，伤亡惨重，兵力不足，临时改换第四军之五十九师接替，第十八军在其左侧罗店一带驻防。这一调整，已摆出决战的态势。

从9月22日起，日军集中三个师团近11万兵力，在飞机及重炮的掩护下，向马路河至蕴藻浜间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在左翼军阵地展开。守军的工事几乎被日军炮火摧毁殆尽，第一线阵地上的官兵大半壮烈殉国。有些阵地被日军突破后，中国驻军又发起反击，与敌人肉搏，经过多次反复后，才被迫撤至后方阵地继续抗击。激战至9月30日，日军除夺取有限的几块阵地外，并无其他战绩。

由于中方作战部队逐渐转取守势，日本海军得以长驱直入。中国海军奉命防守江阴长江水道，并相机增援长江南岸守备部队的作战。对于停泊长江及吴淞口外之日本军舰，中国海军一再突击，但未能有所收获。9月22日，日军大编队战机群向江阴地区中国军舰发起攻击，中方沉着应战，击落敌机3架。23日，日机增加至73架之多，继续攻击江阴舰队，并向中方平海、宁海两舰投掷重磅炸弹多枚，两舰相继沉没，“平海”舰舰长高宪申、“宁海”舰舰长陈宏泰均身负重伤。25日，中方“逸仙”、“建康”二舰又被炸沉，江阴海军舰队遭日军重创[85]。鉴于情势紧张，蒋介石手令海军部：“海圻、海琛、海容等凡年在四十以上之大舰，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堵塞长江各段之用。如三日内卸拆不及，则连炮沉塞亦可，务如期办到，以示我海军牺牲之精神。”[86]

日本政府因侵沪战争没有进展而感到焦急，10月1日，四相会议

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明确规定："军事行动之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的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87] 于是，日军调整其进攻方案，将原有的主力从左侧回旋到南面，新增援的几个师团放到右侧第一线，企图从吴淞一带突破中国守军阵地，攻占大场镇，然后向苏州河一线推进[88]。

10月5日，日军以第九、第十三两个师团的兵力向蕴藻浜方面猛攻，7日强渡蕴藻浜，以图突破河防，夺取大场镇，切断防守闸北、江湾的中国军队的后路。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向守军阵地猛扑，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经四昼夜的激战，中方阵地仍然屹立不动。至17日止，日军进展仅数百公尺至千公尺而已[89]。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及第三师团之一部也于罗店镇以南向中方部队猛攻，双方激战四昼夜，伤亡均极惨重，日军虽有所进展，但中方仍固守杨泾河西岸阵地。10月上旬，日军增援兵力陆续在吴淞一带登陆完毕。日方除原有海军特种陆战队及后备军人外，已拥有正规陆军5个师团、1个旅团、2个支队以及伪军于芷山部（约4000人），并有飞机300余架，战车百余辆，重炮一个旅团，各型舰艇100余艘，在淞沪战场上形成了绝对的兵力优势[90]，中国军队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

10月18日夜，中方部队对蕴藻浜南岸之日军发起一连串反击，战至21日夜，进展不大。21日上午，日军重点进攻大场，并利用优越空军对大场附近投弹约百枚，继而以坦克21辆集中向中方阵地冲击。中国守军第十八师官兵英勇奋战，与日军周旋于血肉横飞之中，大场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三次[91]。为挽救大场方面危急的局势，战区司令部急令刚到达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实施反击，并将其划归中央军指挥，以达协调作战之效果。反击部队分三路出击，除中路略有进展外，其余两路虽付出巨大代价仍无收获。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大场最终于24日沦陷。大场失守后，京沪铁路被截，中方闸北、江湾阵地线侧背完全暴露。中国军队于是放弃北站至江湾一线阵地，向苏州河右岸转移。10月27日，中央作战军在苏州河南岸与尾随而至的日军展开对峙。由

于日军已占领上海各要点且后方无主力部队增援，中方将领建议将淞沪战场主力部队撤至苏南国防线抵抗，蒋介石表示同意。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奉命留守闸北，该师所部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一个营的兵力进据四行仓库阻敌前进，并孤军奋战至10月30日方才退入公共租界，移往胶州路孤军营[92]。至此，中方苏州河前进阵地尽失。31日，日军开始横渡苏州河，并向南岸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日双方反复争夺近十日，死伤均极惨重。

为尽快攻占上海，日本政府于10月20日决定向上海增派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的第十军。该军主要由第六、第十八和第一一四共三个师团组成。30日，又下令将第十六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这样，侵入华中地区的日军到达2个军9个师团，其总兵力已超过华北战场。

11月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向中方苏州河南岸阵地发起猛攻。同时，第十军也利用海上浓雾之掩护，并在炮舰火力的配合下，于杭州湾北岸之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街、金山嘴、漕泾等处强行登陆成功。金山卫中国守军2个步兵连无力反抗，日军得以快速迂回中方淞沪阵地之侧背，迅速向黄浦江挺进，淞沪战场形势也随之大变。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与副总司令黄琪翔下令调部队阻击，但未能奏效。日军乘势急进，于6日抵达松江以南附近，8日又渡过黄浦江。此前一天（7日），日军改编成立“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作战。

11月8日，日本第十军占领松江，而北面的上海派遣军也已突破苏州河，此时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已陷于即将被切断退路的危险境地，第三战区司令部当即下令全线后撤，向吴（县）福（山镇）国防阵地转进。9日凌晨，中央作战军率先向青浦、白鹤港一线转移，因退却命令下达太迟，途中又遭到日机炸射，各部均拥挤于公路，秩序至为混乱[93]。左翼作战军各部因奉命现地掩护，遂至12日夜方由新泾河之线向西转移。其时，右翼作战军已撤至苏嘉线附近及以西地区。至此，历时整整3个月的淞沪会战令人遗憾地落下了帷幕。

淞沪会战虽然以失利而告终，但已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同时也给日军造成重创。担当日军进攻主力的第九师团，在中国守军交叉炮火及手榴弹的打击下，损失惨重。该师团第七联队在夺取陈家行的交战中，即死伤千余人，其中一个中队，在与中国军队近身搏斗中，损失过半。因军官死伤过多，由下士伍长代理中队长的即有20余人。在从吴淞至苏州河一线40余日的战斗中，该师团共死伤官兵8527名[(94)]。这一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将士在淞沪会战中的功绩。

第三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的第二次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达了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随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赶赴庐山，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会谈，讨论红军改编抗日事宜。会谈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谈判期间，叶剑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方面就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具体接洽，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且“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红军“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后”。对此，国民党方面的回应是“俟正式战争发动时，可以照办”[(95)]。7月23日，中共中央第二次发表对华北宣言，呼吁“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96)]。

7月12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进一步讨论了“部队准备案”，其第十条明确规定：“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97)] 7月底，何应钦又提出《第三者使用方面及经路之建

议》，建议红军部队使用115D、120D、129D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并“以察东龙关为根据，经赤城向丰宁、承德方面活动”，以对日军侧方形成威胁[98]。8月3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十四次会报会宣布了经蒋介石核定的军事部署计划，其中第三条为：“即令陕北朱、毛所部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红军现编为三师，其番号115D、120D、129D）”[99]，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开始。

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国共双方就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区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100]。由于当时战事紧迫，国民政府急于调军队开赴抗日前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于8月7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先行拨给八路军开拔费、善后费共计40万元[101]。

在国共两党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共即着手红军改编的各种准备工作。红军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县，整装待命。8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亲自与朱德商谈了红军改编参加抗日作战的问题[102]，并最终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根据抗战军事序列的编排，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直至抗战结束，该军一直被简称为“八路军”。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成为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根据国共两党在和谈中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8月25日发出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即：（一）第一一五师，由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而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

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二）第一二〇师，由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六军团、三十二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等部队合编而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三）第一二九师，由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改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以及总部直属部队[103]。为保卫后方根据地的安全，中共中央在编组第八路军各作战师的同时，还从各部队抽调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8月25日当天，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向全国人民保证："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104]这对于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序列。朱德和彭德怀在誓师之后，立即率部从陕西韩城及潼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根据当时华北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预定八路军主力全部进至恒山山脉，并以此为战略依托，再向周围地区发展，建立根据地，然后伺机进入平津日军侧后，牵制日军的正面进攻，配合国民党政府军保卫华北[105]。

自9月上旬起，华北日军分三路沿平绥线向山西、沿平汉线向石家庄、沿津浦线向德州进犯，企图采用正面进攻与右翼迂回的战术，击破中国军队的防御，从而占领整个华北。晋北方向之日军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兵团在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兵团占领蔚县、广灵后，继续向浑原、灵丘方向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大同之日军在雁门关会合，尔后攻占太原。在此情况下，八路军如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将全部陷于日军的迂回之中，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迅即指示八路军改变方针，在战略上寻找主动地位，展

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日军进军太原或继续南下[106]。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7日决定采用新的战略部署：一二〇师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作战；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作战，尔后视情况南移，在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展开；一二九师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作战；八路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适当位置[107]。

此时晋北的国民党政府军已后撤至内长城一线，正组织力量防御晋北之敌继续进犯，以固守太原地区。八路军为配合这一战略行动，支援友军坚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各隘口，令一二〇师进至雁门关地区，令一一五师主力向平型关急进。平型关地区地形险要，一一五师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伏击日军。9月24日夜晚，一一五师主力冒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边设下埋伏，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的一个大队，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该日上午，日军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伏击圈，八路军立即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双方展开白刃格斗，至当天下午终于将伏击圈内的日军全歼，同时在友军配合下击退前来救援的日军。平型关一役，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歼敌1000余人，并缴获日军汽车50余辆，“均满载军用品”[108]。同日，八路军占领蔡家峪、东西跑池等地，并将日军主力包围于鹞子涧、六郎村山[109]。阎锡山将此役胜利消息电告南京后，蒋介石曾在复电中称：“捷报传来，至为欣慰。”[110] 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战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中共中央军委对太原和华北危急的局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国民党政府军节节后退的不利形势下，八路军尚不能担当正面拒敌的重任，因此于9月21日发出指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

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111] 正当平型关战役即将发动之际，毛泽东又给军委及八路军负责人做出重要指示：“林师及王震部既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112]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1937年10月23日，一一五师以政治委员（对外为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等约2000余兵力，留守五台山，着手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五台山地处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区，大山连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参加开辟五台山根据地的部队，乘日军后方空虚，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杨成武率领独立团，在短时间内连续收复涞元、广灵、灵丘、蔚县、浑原等多座县城，开始向平绥、平汉路北段挺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打开了局面。赵尔乐等率领工作团及少数武装部队，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迅速组织起抗日武装。王平等率领工作团同骑兵营配合，在以阜平为中心的地区，组织起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腹地趋于稳定。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周建平等率领工作组和小部队，组建了平山团，并在平定、寿阳等五六个县的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面也出现了新局面[113]。根据晋察冀边区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于同年11月7日任命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统辖军区内的各种部队[114]。为统一边区内的军事指挥，聂荣臻司令员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11月13日下令将边区内的军队划分为三个军分区，分别由杨成武、赵尔乐、王平三人任司令员。同时还任命了军区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卫生部长，供给部长，使军区的指挥机构逐步完善。1938年，晋察冀军区为发展根据地和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

战，先后对平汉路、平绥路、正太路等日军主要交通线进行了三次破袭。此外，军区还针对日军围攻根据地的行动，与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协力开展反围攻作战，先后在郑家庄、阜平、邵家庄、黄台寺等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在反围攻作战中，八路军共毙伤敌军5321人，缴获山炮、迫击炮10门及其他武器一批，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清水喜代美少将也在战斗中被击毙[115]。

随着晋察冀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地的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1月中旬，军区领导机关移至河北阜平县，不久即以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短时期内培训了1500多名干部，满足了开辟根据地和扩充部队的需要。根据地的民众在八路军的影响和宣传下，踊跃报名参军，使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938年1月，在阜平隆重召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来自共产党、国民党、各抗日军队、抗日阶层的各民族代表齐集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会议通过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项决议，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人民群众有了依靠，也使华北敌后的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116]。

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之际，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上，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七七”事变后，中共派遣干部到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在高阳、安新、任丘、蠡县一带，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骨干。1937年10月，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部分官兵回师北上，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誓死抗日，并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接受八路军领导。1938年2月，经过整训的人民自卫军开赴大清河以北，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打游击，并胜利粉碎了日军的春季扫荡，巩固并扩展了冀中根据地。整个冀中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同年4月，根据地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成立冀中区党委，区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还成立冀中军区。不久又成立了政权机构—冀中行政主任公署。随着抗日武装力量

的迅速发展，至同年8月，冀中军区又先后设立五个军分区[117]。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华北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八路军另一支主力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率领下挺进晋西北，于1937年10月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配合友军给来犯日军以有力打击，并伏击其运输队，给敌人的后方运输造成很大困难。与此同时，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师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教导团及师直属机关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朔县、岚县等十余县开展群众工作，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建立起一支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太原失守后，工作团主力进入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在晋北全境展开斗争。

绥远是我国西北晋、冀、察、陕和蒙古数省区的交通枢纽，地广人稀，汉蒙杂居，而大青山地区为横贯全省的阴山山脉之一部，北有公路与察哈尔相通，南有平绥铁路，由包头经归绥、大同、张家口，可直达北平，地形十分险要。因此中共中央对在该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十分关心。1938年初，毛泽东即致电一二〇师领导："关于平绥线路以北，包括丰镇、集宁、天镇、高阳之北部及兴和、尚义、商都、康保、新民、陶林、武川诸县直至东北的张北县这一广大地区，能否创造建立游击根据地，请你调查见告并转宋时轮同志调查见告。"[118] 不久他又向朱德等强调："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119]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及一二〇师即根据大青山地区的地形特点，决定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8月，由李井泉率领的绥蒙游击支队开赴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该地因长期受日伪统治，又是汉蒙杂居地区，群众基础差，外加土匪活动猖獗，形势又相对孤立，所以工作难度很大。绥蒙支队首先以果断的军事行动打击敌人，争取群众。他们在一夜之间攻克被日伪占领一年多的陶林城（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境内），不久又收复乌兰花（今

内蒙古四子王旗）[120]。这些胜利，使日伪及土匪闻风丧胆，同时亦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为下阶段工作奠定了基础。以后又经过不断努力，逐步创立了绥南、绥中和绥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合称晋绥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率领下，于同年9月在陕西三原县誓师后，东渡黄河，向晋东南平定地区挺进。此时日军正向忻口进攻，该师奉令开赴太原，配合友军作战。为阻止日军对忻口的进攻，全师各部挺进敌人侧后方，展开游击战。该师七六九团到达代县一带，寻找歼敌机会。经过侦察，得知离代县城南20余里的阳明堡镇附近，确有日军的一个飞机场，驻有20余架飞机。这些飞机每天轮番轰炸忻口、太原中国军队的阵地，给中国守军造成很大威胁。另外，这个机场又是日军重要的空中运输线。尽管机场附近有日军大部队驻守，七六九团经过精心部署，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机场上24架飞机全部被摧毁，同时毙伤日军100余人，打乱了日军进攻太原的部署[121]。此时，攻占石家庄的日军主力又向西进犯娘子关。为打击日军的气焰，八路军总部率领一一五师主力驰援正太路，一二九师也向娘子关东南挺进。10月下旬，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七亘村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娘子关失守后，日军继续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向榆次进犯，11月上旬，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主力又多次伏击敌人，给日军以有力打击。

在主力参加保卫太原战役的同时，一二九师教导团之一部在太谷、榆次、昔阳等县开展群众工作。11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和顺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强调："山西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122]从此，一二九师即以晋东南为中心，把游击战争逐步扩展到冀鲁

豫大平原。

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屏障和联接晋冀豫根据地的纽带，战略地位重要。早在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之际，毛泽东即指出："游击战主要应处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如若干必要资材之准备迁移等。"[(123)] 太原失陷后，中共中央军委在调整八路军部署的时候，强调"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124)]。于是八路军总部即令一一五师主力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中旬，日军攻占孝义等地，中国军队一再后退，吕梁山部分地区成为敌后。一一五师主力立即挺进灵石、孝义以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此期间，侵占临汾的日军西犯大宁，企图强占黄河渡口，进犯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主力在大宁附近与日军激战，打退敌人了进攻。此后，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南地区展开，与晋西北、晋冀豫两块抗日根据地互相策应，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敌夹击的有利形势。

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山西省的四周实行战略展开后，控制了山西大部战略要地，使进入山西之日军陷入八路军的包围之中。日军自己也承认，"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125)]。1938年4月，侵华日军为部署徐州会战，从华北各地抽调兵力后，对占领区的控制更为捉襟见肘。侵占山西南部的第二十师团日子尤为难过，辖区内的同浦线频遭破坏，各守备队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126)]。由此可见，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已经给侵华日军构成巨大威胁，迫使他们转入

被动防御的态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华北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各部在山西境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向华北更广阔的敌占区挺进。他们北上绥察、南下豫北，东进山东，在整个华北敌后寻找战机，适时创建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还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救亡团体，动员人民参军参战，使华北的八路军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节　晋北作战

1937年7月底平、津两市失陷后，国民政府已经清楚地看到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大战不可避免，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称："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127] 与此同时，迅速调集军队，加紧对华北各战略要地之防卫。而侵华日军则以平、津两市为据点，又开始部署新的攻击。于是，中、日两国在华北大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

早在日军准备对平津两市发起全面攻击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控制整个华北，夺取更大的战果，于7月27日决定再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去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序列，同时规定该军的作战区域"大概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128] 。平津战役刚结束，日本陆军当局于8月5日又做出一份《形势判断》，认为作战地区要扩大，"使中国驻屯军在新派遣兵团到达后，断然进行华北会战，将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击退至石家庄、沧州一线以南并对中国军队主力给予致命打击。使海军航空兵对上述会战予以协助"；"会战结束以前，对华不进行任何外交交涉，并排除第三国干涉"；"会战结束后，应占据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省要地，并伺机通过与南京的交涉解决事变"[129] 。为进行华北会战，增援的日军先在平津地区集结，并逐步向周围地区推进，

准备于集结完毕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向察哈尔省发起攻击。长城一线是华北重要屏障，因而也是日军主要的攻击目标。为与关东军配合作战，日本中国驻屯军于8月7日修订第二期作战计划，除继续准备向保定、沧州方向推进，与中国军队决战外，决定以第五师团为主力沿平绥线推进，“席卷察哈尔省，进入山西北部与绥远地区”[130]。上述计划很快得到日本陆军总部的批准，8月9日，东京发出“临参命第七十二号”，令中国驻屯军及关东军进行对察哈尔省作战[131]。12日，华北日军命令第五师团应“击败进入察哈尔省之敌，首先占领张家口附近”，其他各部队准备对南方作战。关东军派遣第二、第十五两个混成旅团组成察哈尔兵团，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前方指挥官，在多伦设立了前方指挥所，从张北方面发动攻势。中国派遣军则从8月中旬起以第十一旅团为主力，沿平绥线向南口、居庸关方向攻击，以同关东军相呼应。

对于日军沿平绥线的攻击，国民政府早有察觉。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屏障。那里也是中、苏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横贯其间的平绥铁路，以及沿线的张家口、大同和集宁等中心城市，成为敌我必争之地。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即令山西、察哈尔等省从速部署，预为经营。军事委员会亦调集傅作义第三十五军、汤恩伯第十三军、高桂滋第十七军及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等部，组成第七集团军，由傅作义任总司令，刘汝明任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至察哈尔增强平绥路的东段防守。7月31日，蒋介石致电刘汝明，命其速将平绥路青龙桥、八达岭等处各要点铁路炸毁，阻止日军向察哈尔运兵[132]。8月6日，蒋介石又向汤恩伯下达手令，命其专对南口当面之敌作战[133]。

8月8日拂晓，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开始向南口附近中方阵地发动进攻，未能得逞。10日拂晓，日军再次猛攻中方南口阵地，并于下午占领南口车站。次日，日军进攻南口镇，被中方部队击退，日军

伤亡甚重。12日拂晓，日军调集主力约5000余众，火炮五六十门、战车20余辆，飞机30余架，向得胜口、虎峪村、南口、苏林口一带中方阵地发起总攻[134]。中方部队连夜反攻，阵地失而复得，官兵伤亡颇重。14日拂晓，日军再向中方南口两侧高地猛冲，中方部队与敌反复搏斗，极其惨烈，第五二九团官兵牺牲达三分之二[135]。为增强南口方面战斗力，军事委员会令驻石家庄附近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三个师北进增援，第二战区亦先后以第九十四、第二十一、第七十二师及独立第七旅前往增援反攻[136]。中日双方在南口争夺超过一周，日军进攻南口正面一再受挫。于是转移主力攻袭黄老院、镇边城等地。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战争指导方案》，将晋、察、绥三省划为第二战区，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在《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中，称该战区为华北惟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具体作战方案应分步实施，首先固守南口、万全，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然后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137]。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第二战区迅速调集部队，驻守战略要地，抵御来犯的日军。首先紧急把辖有两个师的第十三军东调南口、居庸关一带，防堵从东边来犯之敌；其次调第十七军之第八十四师进驻独石口、赤城等要隘，以巩固侧背外；另外以第二十九军一三四师控制张家口、宣化一带，并使三军互为犄角。北面则坚守张家口以北长城各要隘，以骑兵和步兵相配合，对李守信的伪蒙军形成包围态势。然而，这样的防线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击。

为打破僵局，日军于8月21日派第五师团绕过南口西南，向镇边城发起攻击。23日，镇边城失陷。此后，日军向怀来突进。中方第十四集团军先头部队于当日到达青白口，但因未及时渡过永定河，未能全力开展发起攻击。此时，日本关东军正大力进犯张家口，中方南口阵地后方业已暴露。26日，汤恩伯率部向蔚县、广灵、涞源一带转

移，第十四集团军亦奉命撤回青白口至房山间集结，并与平汉路方面孙连仲部取得联系。南口及附近地区之战斗，从8月8日开始，持续到8月26日，前后鏖战逾二周。中方伤亡29736人，伤毙日军万余人，生俘日军官佐8员，士兵559名，缴获步骑枪414枝，机枪4挺，无线电机1架，击毁敌机1架[138]。

南口战事正酣之时，察北中国军队主动发起攻势，并自8月13日起，接连出击攻克察南之南壕堑、商都、尚义、新明、崇禧等地。15日，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步骑三个旅团，加上战车兵团及伪蒙军等部，由张北向张家口进攻。至19日，日军已突破长城要隘，并向南推进。傅作义急令下花园、土木堡附近的第一〇一师及第七集团军第二〇〇、第二一一两旅，开回张家口出击作战。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方反击没有奏效。24日，日军攻占张家口以西之孔家庄车站，平绥铁路交通中断。26日，张家口失陷，中方部队退至柴沟堡[139]。

攻占南口的日军则继续西进，在宣化附近与占领张家口的关东军会合，然后集中主力向大同发起攻击，同时还以部分兵力在伪蒙军骑兵的配合下，直取集宁。第二战区急调第六十一军在天镇、阳高等地构筑阵地，阻止日军继续西进，掩护第七集团军在大同建立防御阵地。9月6日起，奉命占据天镇、阳高一带阵地的中方第六十一军与沿平绥路西进之日军遭遇，并与之展开激战，日军发射大量毒气弹，中方伤亡重大，但仍沉着应战。至10日，阳高为日军占领。11日，天镇也落入日军之手，大同情势危急。傅作义本来主张与日军在大同附近地区决战，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增援第十五军尚未到达，且大同附近地形不利为由，决定放弃大同。12日，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撤离大同，日军随即侵入，大同失陷。

在华北日军沿平绥线向中国内陆猛烈进攻之时，日本陆军当局决定继续向华北、华东战场增兵，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统一指挥不断增加的华北日军，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8月24日决定将中国驻屯军扩充为华北方面军，以大将寺内寿一为司令，下辖第一、第二两个

军，每个军指挥三至四个师团[140]。9月4日，华北方面军正式行使统帅权，其作战部署是："方面军的目的在于以主力消灭保定、沧县的敌人，迅速进入易县、定兴、霸县、马厂附近准备攻击，同时以第五师团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的作战。"[141]很明显，日军的战略是企图消灭河北境内中央军的主力，沿平绥线西进之日军则是策应性攻击。然而，河北省境内中央军的主力已经纷纷后撤，日军没有找到决战的机会，而对晋北的攻击却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

中国军队弃守大同后，退至雁门关内长城一线，凭借天险阻止日军沿同蒲路南下。南京军委会见华北形势危急，在《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再次强调，要"确保山东、山西两战略要地"，"固守晋北，以待增援部队之到来"。第二战区的主要任务是："〈于〉集宁、绥远线节节抵抗，阻敌西进"，"以主力固守雁门关、平型关现阵地，另以机动部队在平型关外及阜平一带山地为根据，见机袭击晋北方面及沿平汉线南下敌之侧背。"[142]为增强晋北抗战力量，特令陈栖霞率空军4个中队支援晋省作战，以朱德为司令的第十八集团军也划归第二战区指挥。根据军委会的指示，第二战区也确定了自己的作战方针："本军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移转攻势。"[143]

此时，中、日双方在晋北的态势大致如下：第二战区集结的军队有6个集团军，约20万兵力[144]，日军则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及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为主力，另外还有部分伪满靖国军和伪蒙军。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山岳环绕，形势险峻。东以太行山与鲁省丘陵地带遥遥相对；南以黄河天险及中条山邻接河南，可扼控整个黄淮平原；北以外长城及阴山山脉与绥察两省接壤；西临吕梁山及黄河与陕西毗连。省会太原，扼正太、同蒲两铁路之交点，依山带水，历来是战略重镇。第二战区如能控制该地，不仅便利兵力调动，且可威胁沿平汉

路南下日军之右侧背，或北拊由察哈尔西进日军之左侧背。一旦太原为日军所占，则晋省南北交通联络即告中断，而日军还可保障沿平汉路南侵之侧背安全。所以，太原成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9月中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占领大同后，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进占威远堡，北上攻略绥远；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沿同蒲路南下，直指太原。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由宣化南下，占领蔚县，并向晋北广灵攻击。中国驻军凭险抵抗，晋北会战的序幕由此揭开。

9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由蔚县、阳原进犯广灵。此前，阎锡山已增派兵力，加强广灵方面的防御，其左右翼军的兵力达6个军，另外还有两个师的预备队[145]。中国守军与日军激战数日，伤亡惨重，汤恩伯部第四二三师师长吕超然壮烈殉国[146]。14日，广灵失守，奉令前往冀南整训。9月19日、20两日，日军继续凭借强大火力，先后攻陷中方之白旷村、将军山一带阵地，并于21日攻占灵丘。此后，中国军队开始向平型关一带转移。广灵、灵丘作战期间，中国空军也积极配合陆军参战。21日，日军飞机至太原上空进行侦察，遭中方两架战机拦截后退回。当天下午，日军轰炸机14架，在8架驱逐机的掩护下空袭太原。中国空军第二十八大队派出战机7架升空迎敌，击落敌机1架，中方飞机损毁2架，大队长陈其光受伤，队员梁定苑阵亡[147]。

由于战场形势变化，阎锡山对第二战区主力部队重做部署，在沿内长城雁门关至平型关一线构筑起有组织之防线，准备并用火力与攻势转移，以求各个击破来犯之敌[148]。平型关是恒山山脉中一个要隘。恒山山脉的正面是雁门关，纵深达30公里，山势险峻，是著名的古战场；而其右侧却是宽阔的滹沱河谷，宽达10公里以上。在军事地理上，这条川道是恒山的战役走廊，是恒山山脉的军事生命线。这条川道北端的平型关，则是一扇安全门，门被打开，日军就可长驱直入，防御之师只能后撤百余公里，至忻口方可立足。为守住平型关，第二战区安排重兵防守，还令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在侧翼助攻。

尽管作了有力部署，但对能否获胜，阎锡山并无多大把握。因为自日军侵入山西以来，战局一再失利，阎已处于不打一仗无法向国人交代的尴尬境地，然而对这次能否有效阻止日军前进，胸中实无把握。

9月22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先头部队四五千人，在战车数十辆的前导下，开始向平型关正面发起猛攻，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九七旅奋起阻击，重创敌军[149]。23日拂晓，日军再向中方平型关、团城口、师福沟一带阵地全面进攻，至下午，平型关、团城口进犯之敌被中方部队击退，中方伤团长1人，伤亡营长3人、士兵2000余人[150]。东西跑池一带战况尤为激烈，战斗中中方两个连全部牺牲，双方激战至晚，遂成僵持之局。至24日夜晚，防守团城口的中国军队经多次肉搏，终因伤亡过重，被迫后撤。日军突破防线后，立即准备扩大战果，向纵深攻击，然而25日上午，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之一个大队，却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损失惨重。

日军因平型关形势危急，立即命令向石家庄转移的第五师团主力返回救援，同时又令察哈尔兵团两个旅团的主力从大同南下，突破内长城防线，直趋繁峙，予以策应。26日，第五师团全部三个联队开始向平型关发动总攻，主攻矛头直指平型关西北之迷回村，企图打开一个缺口，中方第六集团军及联合预备军奋力阻击。同日，阎锡山派出中国空军北面支队3架战机，对平型关、蔡家峪一带的日军部队及辎重实施空中打击[151]。27日，日军在优势炮、空及战车的支援下，再次发起猛攻，被中方部队击退。28日拂晓，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防日军突破平型关，又派三个步兵团与日军展开肉搏格斗，中方伤亡惨重。此时日本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又经应县南下，向中方守军第二〇三旅及第一〇一师之茹越口、小石口等阵地发起进攻，中方部队坚决抵抗，一度肉搏，损失奇重，旅长梁鉴堂督战时英勇阵亡，“所部向团伤亡三分之二，赵温先团亦伤亡半数以上”[152]。茹越口阵地多次失而复得，但最终失守，中国军队退至繁峙以北三四十里之铁角岭布防[153]。当日，日军攻占朔县。朔县守城部队与日军

激战，仅10余人突围，其余官兵700多人全部殉国。日军占领朔县后，即开始屠城，城内官绅、民众被屠杀者在3000以上[154]。另一方面，八路军一部于28日迂回日军之侧背，在灵丘附近截获满载辎重汽车50余辆，并俘获日军200余人[155]。

此后，日军进逼繁峙，使平型关中方守军处于不利态势。29日拂晓，日军再次来犯，双方激战，中方阵地悉数被毁，但守军仍英勇阻击。然而此时，中方铁角岭阵地已落入敌手，中方部队被迫缩短防线。当日黄昏繁峙失守，中方平型关方面之补给线被切断，各军队被迫向五台山转进。至30日，中方军队大部被迫南移至忻口东西之线，再建抵抗阵地。

正当平型关战役激烈进行之际，日本华北方面军另以4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推进，至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攻陷繁峙之时，其前锋部队已越过保定，进抵正定以北约40公里之新乐一带，正太与平汉两铁路交会之石家庄已岌岌可危。日军攻势之急迫，不仅晋东震撼，太原亦堪忧虑。

鉴于晋北战略地位之重要，10月1日代县弃守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即奉令率所部第十四军、第九军、第八十五师、第五十四师、独立第五旅、炮五团等由石家庄星夜赶往太原增援[156]，第十九军则坚守崞县、原平，以掩护第十四集团军在忻口附近集结布防。10月3日，阎锡山对第二战区主力部队重作部署，分左、中、右三路发起进攻，以第六十八、第七十一、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七旅，配属炮兵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八各团之第三营为左集团军，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以第十四集团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第三十四军之一九六旅、炮兵第二十七团等为中央集团军，由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以第十八集团军、第一〇一师、新编第二师为右集团军，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同时，由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六十一军，第六十六师及独一、独三旅团作为预备集团军，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157]。

日本军部对攻占太原十分重视，10月1日向华北方面军发出命令："以一部进行山西省北部作战，攻占太原。"[158] 当天深夜，华北方面军即令第五师团的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对太原发起攻击。为增强第五师团的攻击力量，还将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在晋北的部队划归该师团统一指挥，另外又增派一个支队给该师团。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还令第一军不失时机地进行石家庄会战，并以一部进入井陉以西要地策应第五师团。

10月6日，晋北日军开始集中炮火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轰击，发起忻口之战。第二战区在忻口的防御计划是：两翼依托五台山和宁武山区，而以主力扼守忻口正面，并准备相机采取攻势，将日军歼灭于平原以北地区。但因时间仓促，工事尚未完备。战役刚发动，崞县即于8日弃守，导致平原被围攻。虽紧急调主力援助解围，但遭日军阻击，平原亦于11日失陷。13日8时许，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主力在板垣征四郎的统一指挥下，联合陆军、空军之战力，向中方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左翼兵团阎庄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日双方当即开展激战，中国守军奋勇迎敌。至10时，南怀化沿河工事全部被摧毁，守军也伤亡殆尽。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南怀化、大白水等中方阵地先后被突破。

此后，第二战区派出傅作义预备军由忻口转移攻势。14日，忻口中国守军开始向日军发起进攻，中日双方遂在南怀化附近展开激战。战斗初始，战场形势对中方有利。至中午时分，日军逐渐获得增援。战斗中，中方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新编第四旅旅长于振河先后负伤，日军在飞机、战车与火炮的支援下再次攻陷南怀化，中方部队退至新练庄以东之线[159]。15日，阎锡山得悉忻口正面之日军已增至六七万之多，中方双方兵力悬殊，于是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五台山区之部队截断敌后交通，阻止敌军继续增援[160]。当日，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在灵丘、广灵间击溃日军步骑兵200余人，汽车30余辆，并进占广灵。同时另一支队在克复涞源后进占紫荆

关[161]。15、16两日，李仙洲、郝梦龄、陈长捷等率部与日军主力在南怀化附近及大白水等阵地激烈交锋，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相继殉国，中方部队指挥也一度中断[162]。此后，卫立煌派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各部继续作战，同时电请军事委员会予以增援。20日起，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南怀化东南之平顶山，先以飞机、火炮连续轰击，又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继之以步兵突进。中方部队堵击不及，平顶山被日军攻占。22日拂晓，中方第八十五师由新编第四旅右翼出击，日军负隅顽抗，并频放催泪弹及燃烧弹。中方部队奋勇突击，与日军肉搏十余次，终于于当日下午克复平顶山。是时，右集团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也在敌后开展游击，配合忻口正面中方军队的作战[163]。24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被中方守军击退。至27日，忻口战事仍呈胶着状态。

正当晋北战役激烈进行之际，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之一部企图入晋增援第五师团，遭第一战区部队在娘子关一线阻拦后，第二战区右翼才暂获安定。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主力继续沿平汉线南下，而以第二十师团主力控制石家庄后，又沿正太路西犯。其先头部队突破多道防线，侵入山西境内。

10月10日午后，第二十师团分途渡越滹沱河南岸，直逼井陉。当晚，阎锡山特派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赴娘子关指挥作战[164]。12日，日军在战机的支援下向中方守军阵地猛攻，下午突破中方刘家沟附近阵地，至黄昏又相继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与井陉。此后，阎锡山急令晋北之孙连仲部回援娘子关，并参加防守正太路的作战。13日，日军攻占旧关。次日拂晓，中方第十二师、第二十七师等部开始向旧关发起第一次反击，中、日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战。15日凌晨，阎锡山下令将娘子关附近作战的指挥权交给孙连仲。拂晓，中方部队再次发动进攻，并占领核桃园、甘桃驿等地。经过两日作战，中方于旧关附近计毙敌鲤登行一大佐、中岛利男少佐以下500余名

[165]。16日拂晓，中方再度出击旧关，此时日军亦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双方展开肉搏近战，最终中方攻占之核桃园等地落入敌手，中方则退回原阵地，第二次反击旧关没有奏效。17日至18日，中方各部队再次出击，攻击黄石嘴以西旧关、大小龙窝一带之日军。中方一度实行夜袭，虽有所进展，但伤亡惨重，第三十八军教导团计伤亡营长3员，连长14员，官兵共2000余人，几乎全团殉国[166]。19日，乏驴岭方面之日军，向中方第十七师阵地全面猛攻，中方部队折损重大，被迫退向北峪、东葛丹一线防守，第三次反击旧关失利。

20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在战机的掩护之下，向娘子关中方第二十七师所守高地及北峪一带阵地猛攻。中国守军奋力迎击，与日军肉搏十余次，阵地大部失陷。22日，日军再次猛攻第二十七师所守高地，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及新十团伤亡营长以下600余人[167]。鉴于中方伤亡重大，战力锐减，且日方援军将至，黄绍竑遂电令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缩短防线。由于第二十六路军自房山、琉璃河、涿州、平山抗战以来，激战数十次，实力损失三分之一强，且又在娘子关一带血战八昼夜，实力已不满6000人[168]，阎锡山遂将刚抵达太原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急调至阳泉，增援第二十六路军的对日作战。24日，日军再向中方部队发动全线进攻，第三军阵地一度动摇。此后，日军又切断阳泉与平定间的通道，娘子关正面的中方部队也被击破。正太路中方部队久战疲惫，且伤亡重大，不得不于26日主动撤离，日军因此轻易进占娘子关。尽管如此，蒋介石仍于28日电令阎锡山，要求娘子关方面作战部队利用寿阳以东地区山地坚强抵抗，“如无命令，即将全部牺牲，亦不许退至寿阳以西”[169]，此举无疑是想通过抵抗延迟日军对太原的进攻。随着第二十六军的撤退和晋东防线的失守，晋北守军立即处于危险境地。阎锡山被迫于11月1日电令忻口各部队退出阵地，向太原以北地区转移，进入预定阵地，继续拒敌南下。至此，忻口战役也以失利而告结束。

随着晋北守军的后撤，日军第五师团于11月3日开始，由忻口向

南追击；晋东的第二十师团，此时也已占领寿阳，向太原逼近。为尽快攻占太原，日本华北方面军令其第一军统一指挥太原攻略战。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于4日发出命令：第五师团以主力继续向太原攻击，以一部向汾阳附近追击；第二十师团以一部攻占榆次西北地区，对太原东南中国军阵地保持监视，其主力继续沿铁路线向晋中的平遥、介休方向追击；昔阳支队先进击榆次，并与随后跟进之第一〇九师团主力会合[170]。这是一个对太原实行三面围攻的计划。

对于太原保卫战，第二战区曾订有作战计划。其指导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援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171]。根据上述计划，阎锡山在太原四周构筑了一批防御工事，对部队配备也有专门部署。对城内防卫，则有更周详的安排，以使各种武器互相配合，“能集中所有火力，以达歼灭敌人之目的”[172]。为使该计划能够贯彻实施，阎锡山曾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统帅全战区各部队，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负责城内防务[173]。然而战场形势之变化，已超出阎锡山等人的估计，因此上述计划根本无法实施。

11月4日，从忻口后撤的中国军队正准备在太原外围阵地部署之际，日军也已尾追而至；从晋东后撤之各部，在途中即遭日军袭击，无法进入后方阵地，被迫向榆次西南转移。卫立煌只得临时抽调其他部队去该阵地防御，但这些阵地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击。日军第五师团，在百余辆战车、装甲车及飞机的配合下，于5日即推进到太原北面的城下；而于晋东来的第二十师团，亦于同一天到达太原南郊。第二天，日军即从南北两面向太原发起攻击。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奋战，在日军炮火与飞机的夹击下，伤亡惨重，至11月8日已无力坚守。当天晚上，残部从南城门突围，向晋南退却，太原城遂告陷落。

从平型关抗战至太原保卫战，蒋介石与阎锡山曾下决心坚决抵抗，在军事上也作出了积极安排，然而第一线部队一再溃退，导致整个战役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武器武备处于劣势，军队整体

素质不如敌人之外，战略上的失误和不少军官贪生怕死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无法发挥在天时地利方面的优势，简单的阵地战更使中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对于参战部队斗志低下，其内部将士也感不满，他们曾向上峰反映："查我军将士无战力，遇敌即退。平型关之敌不过一旅团，以十六团兵力，傅总司令亲临指挥，几日且并无丝毫进展，而以溃后退。……请中央速筹大计，以免遗［贻］误全局。"[174] 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失败就无法避免。

晋北作战失利，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守以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75]。

第五节　南京保卫战

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距上海仅300余公里。淞沪防线失守之后，南京立即面临日军日益迫近的威胁。按照事先拟订的抗战计划，国民政府一面准备向内地迁都，以免受到日军的挟制；同时又调兵遣将，在南京外围布防，以保卫首都之安全。

突破淞沪防线之日军，乘攻占上海之气焰，分兵数路，继续向纵深追击。日本参谋本部为扩大战果，给中国方面造成更大的压力，开始研究"在此之际可否抓住战机，一齐冲出制令线给以强有力的压迫？"这一新的战略问题[176]，为此，专门派员去上海实地考察。而在淞沪第一线的日军，则早已把制令线置之脑后。第十军司令于11月15日召开幕僚会议，研究战场形势，认为在淞沪会战中虽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但中国军队已处于混乱状态，如抓住战机断然追击，很快即可以占领南京，于是作出了果断向南京追击的决定。19日它向东京报告："本日正午许占领嘉兴"，"集团19日晨命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参谋本部对该部超越"制令线"问题向华中方面军询问时，方面

军的意见是："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需占领南京。"其主要理由是："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果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二个月内可以达到目的。"[177] 根据现地的实际状况，日本参谋本部于11月24日发出"大陆指第五号"，宣布"废除以临命第六百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实际上是已经同意向南京攻击。12月1日，参谋本部根据"大陆命第七号"，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178]，以松井石根为方面军司令。同一天又以"大陆命第八号"下达天皇敕令："华中方面军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179] 至此，日本攻占南京的战略正式确定。

向南京攻击的日军来势迅猛。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从11月13日开始，数次下达战斗命令，以加强吴福线和锡澄线的防御，阻止日军向南京攻击。19日又下令让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亲临前方担任指挥"，并令该军"必须死守马牧港、崇德、青镇、南浔镇之线"[180]。然而，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政府军已溃不成军，再严厉的军令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苦心经营多年的两条战略防线，很快即被日军攻破。日本上海派遣军的主力师团一路沿沪宁铁路经丹阳、镇江、句容西进，另一路经金坛向南京进犯；第十军之一部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西进，另一路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图切断中国军队向西的退路。

面临南京即将遭受日军围攻的危急局面，蒋介石从11月中旬起，连续三次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的防守问题。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等高级将领均主张对南京仅作象征性防守。李宗仁等认为，"从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背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

守”[181]。蒋介石、何应钦等虽明知南京难于固守，但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182]唯有唐生智坚决主张死守南京，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同时欣然接受南京城防司令的职务[183]。在决定举行南京保卫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决定迁都重庆。蒋介石把迁都的理由归纳了两点：“甲、为长期抵抗之计；乙、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对城下之盟之妄念。”[184]国民党高层对迁都问题很快达成共识。11月15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议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地点。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主张迁移政府于重庆。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几项决议，包括：1．通过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2．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3．国防最高会议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4．预定迁移地点为重庆[185]。19日，蒋介石对迁都重庆的决定做了说明，他说：“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只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186]这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之意。此后，国民党党部与政府中央机关各部门纷纷迁往重庆、武汉、长沙等地，仅军事委员会尚留守南京[187]。

11月24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并于次日下达第三、第七战区及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之变更及任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由蒋介石自兼，副司令长官为顾祝同，下辖第九、第十九两个集团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陈诚，下辖第八、第十五、第二十三三个集团军。第三、七两战区的作战境地以遂安、淳安、昌化、广德、蜀山镇之线划分，线上属第三战区[188]。南京

卫戍部队则下辖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首都警备军谷正伦部、桂永清教导总队、宪兵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189]。各防区的具体任务是：第七战区“除固守现地外，其左翼须以有力部队留置于安吉、孝丰山地，相机攻击敌侧背，迟滞其前进”；第三战区“须以有力部队分别留置于龙潭以南、广德以北各山地，迟滞敌之前进，掩护主力之行动，并破坏重要交通线”；“各战区须与首都卫戍军相策应，对敌作战保持动作之自由”；首都卫戍军“除固守南京既设阵地外，应与第三战区部队密切协同相互策应，击破敌之攻围军”[190]。从这一部署看，蒋介石对南京的防卫已经比较消极。第七战区的任务仅是牵制日军对南京的进攻，担任正面拒敌的第三战区之主要任务也是“掩护主力之行动”，而负责“击破敌之攻围军”的唐生智部力量十分有限，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早在11月初淞沪会战失利之际，蒋介石已有避免与日军主力正面交战以保持中国军队有生力量的想法：“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191]即便在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之后，蒋介石的内心想法也是“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192]。在当时中日双方兵力和态势实际对比情况下，南京城守与不守，确实难以做出断然的选择。

唐生智受命之后，立即做守城准备。当时南京城防军仅有第七十二军之八十八师和第七十八军之三十六师，以及教导总队，而这些部队又是刚从上海战场撤退下来，尚未得到必要的补充整顿。因军情紧迫，唐生智将上述部队作了如下部署：以八十八师担任右翼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以教导总队担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以第三十六师担任左翼地区大红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以宪兵队担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另以部分兵力警戒长江封锁线。同时又令各部队征集民伕，抓紧构筑工事[193]。南京城防计划从11月26日正式启动，至12月5日日军前锋挺进南京防区，前后仅有十天时间，而各部队的行动也参差不齐，无论军队部署或阵地准备，均与预定要求有很大差距。而第三战区在南京外围的防御，因时间更短，情况则

更糟。

参加围攻南京的日军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指挥，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两个军组成。第十军接获攻占南京的命令后，随即兵分三路向南京推进，其第十、第十一、第十三三个师团沿京沪线经丹阳、镇江、句容西进；第三、第九师团则由金坛扑向南京，第十军之第一一四师团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前进，并以第六、第十八师团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切断中国军队西撤之退路；上海派遣军从12月3日起，令第九、第十六两个师团沿沪宁铁路和长江一线向南京方向攻击，第十三师团分兵渡江北上，攻占靖江，从江北迂围。至12月5日夜晚，日军以五个师团、两个支队及一个先遣队的强大兵力，对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至此，南京保卫战的序幕已经揭开。

在日军向南京合围之时，南京外围阵地之中国守军步步后撤，有一部分退到南京城内，参加南京保卫战。至12月初，南京守军已增加到15个师。因此，城东南方向主阵地改由第七十四军和第八十三军防守，第七十四军的两个师防守板桥至淳化镇一线，孟堂至龙潭一线的阵地则由第八十三军两个师担任。日军先头部队于12月4日开始与主阵地发生接触，因主阵地有永久工事，而日军兵力不足，至7日中午双方仍相持不下。此时，南京外围句容的阵地在日军第十六师团围攻下损失惨重，第八十三军奉命开赴镇江增援，原有防区由第十军接替。该军以第四十八师为先头部队占领龙潭以北阵地，而龙潭以南至乌鸦山之间，因第四十一师未能如期达到，发生空隙，日军则乘机侵入汤山左侧背之孟塘。当时总部立即组织部队反击，但日军也不断增加，因汤水镇阵地将要被日军围歼，守军被迫后撤。此时龙潭方面之第十军，尚未巩固阵地即见汤水守军已经撤退，也向栖霞山后退，后与日军稍有接触，又退至江北。在淳化镇一带之第七十四军，闻龙潭已失，见镇东北之上庄亦已有日军侵入，也开始向牛首山撤退。由于各阵地之退却均无计划，日军尾随而至，主阵地很快就出现了大缺口

[194]。

在南京外围战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抱着“余能多留京一日，国家、人民、首都与前方军队，皆多得一日无穷之益”的想法，仍留在南京城内[195]。12月4日晚上，他在南京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高级军官讲话，强调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次日他又去南京城东20公里的汤山，对守城部队训话。这时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外围阵地也破绽百出，精神上的鼓励已无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12月7日，日本军部给华中方面军下达命令，要该军在攻占南京后，与海军配合，控制包括杭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华中方面军立即制订《攻占南京城要领》，决定“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城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上海派遣军负责攻占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第十军攻占共和门、中华门、水西门；两军在城内的作战区域以“共和门——公园路——中正街——汉中路”为界[196]。围攻南京的日军在12月8日夺取城外阵地，分头向城墙推进。南京保卫战遂进入最后阶段的城廓阵地防御战。

12月9日拂晓，日军占领光华门外的大校场与通光营房，并发炮轰击城门。松井石根也于当日向南京守军发出劝降书，限次日上午答复。唐生智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并于当日傍晚向各军下达命令：“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同时又令第七十八军控制一切船只，严禁私自渡江[197]。从10日开始，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等处同时发起攻击，战况十分激烈，雨花台阵地前面的据点曾数次丢失，又重新夺回。日本空军第三

飞行团自12月4日起对中华门等南京城周围的中方阵地实施猛烈轰炸，10日又对紫金山的中国军队进行重点轰炸，此间重轰炸机中队还数次对长江北岸作战的地面部队空投补给卫生材料、粮食等物品[198]。11日，日军继续地空联合，向南京周围要地进攻，杨坊山、孔银山等地先后陷落，负责守卫之中方第四十八军第二八八团三营与第二八三团一营均全营壮烈殉国[199]。当日，日军突破雨花台右翼阵地和中华门，并一度攻入城内。鉴于南京战局危殆，蒋介石于11日通电指示唐生智称："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继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200]

12日清晨，各路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激战至中午，雨花台主阵地失守，紫金山阵地亦被日军攻占。重要阵地相继失守，引起全城动摇，日军先后从光华门、中华门侵入城内。卫戍司令部曾令部队紧急增援中华门守军，但因城内秩序混乱，部队无法展开而未达目的。至下午3时，从第一线阵地溃退下来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的部分官兵企图出挹江门，渡江北逃，被第三十六师及本部特务队阻拦，使城内秩序大乱。这时，南京城内的防御战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守城部队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了蒋介石之电令，决定弃城撤退，撤退的方案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201]。唐生智还为各部队的撤退拟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如突围路线，行动时间，集结地点等，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第三十六师于当晚渡江北撤；撤退之前，"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202]。

南京中国守城部队撤退后，冒着日军的炮火堵击，向浙、皖边境突围转进。一部分部队渡过长江进入安徽境内，另一部分则由汤水镇、句容退向皖南宁国地区，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奉命率部掩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及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在与日军激战的过程中，南京卫戍宪兵副司令萧中令、第一五六师参谋长姚中英、第一六〇师参谋长司徒非等均壮烈牺牲[203]，最后仅有第六十六军安全转抵浙

皖边区，其余除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均以身殉国。

反观唐生智制订的撤退计划，表面上看颇为周详，但他没有考虑到当时城内已一片混乱，在此情况下是根本不能按照常规方式行事的。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首先，由于部队已被打散，通信联络阻塞，许多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所以撤退计划根本无法有序实施。其次，原计划多数部队从陆路突围，但多数部队从第一线溃退后已基本丧失战斗力，根本无力再突破日军阵地向后方转移，因此，只有少数在城外的部队突围成功，多数部队退至江边，准备渡江北撤，使撤退计划全盘打乱。第三，没有对维持渡江秩序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挹江门内人群拥挤，各部队“均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大乱，发展到“任意开枪，甚至自相冲突”；下关码头的秩序更糟，人多船少，竞相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204]，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在召开撤退会议后已不能返回设于铁道部的驻地，“原定偕宋军长渡江计划，不克实睡【现】……本部员兵五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约百余人”[205]。

12月13日，大股日军分由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等处突入南京城区，其中，雨花台、中华门突入敌人300余，中方守军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溃兵退至铁道部[206]。此后，中日双方进行巷战，战至午夜，留城守军全部牺牲，中华门一带阵亡的中国士兵逾千人[207]。当日午后，日军海军舰队前卫队、主队分别按顺序从泊地出发，以纵阵列突破封锁线向南京进击，第一水雷队主力随后跟进[208]，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也乘势进驻南京机场[209]。至13日傍晚，日本陆海军部队在一片混乱中占领了南京城。南京保卫战之失利，客观原因是新败之弱旅无法抵挡强敌的攻击，但失败得如此迅速，损失如此巨大，则主要由于指挥失策所造成。南京保卫战的损失是巨大的，据日本上海派遣军公布的数字，这一战役中国军队战死8.4万人，被俘1.5万人，而日军仅死伤4800人[210]。

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进入一个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不仅因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沪、宁、杭三角地区完全沦丧，而且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自抗战爆发以来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连首都也告沦陷后，抗日阵营内的投降势力抬头，国民党的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南京沦陷当日，蒋介石发表通电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则之国策。"[211] 为进一步鼓舞国民的抗战士气，蒋介石于12月15日在武昌发表《告国民书》，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日军大举入侵的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212]。蒋介石不屈服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国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击破了日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阴谋。

12月17日，侵华日军在南京举行入城式，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率部游行。此时，南京攻防的军事行动虽早已结束，但日军却对城内的和平居民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日军在进攻南京的途中，已经开始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训令，要求"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213]。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光华门、雨花门进入南京城后，立即以各种火器对马路上的难民进行疯狂射击，一时间血肉横飞、尸体遍街。此后，日军分别占领浦口和下关，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并向江面上正在乘舰艇撤退的渡船、木排疯狂扫射，中国军队被枪炮击毙及因舰艇撞翻而淹死者达3000余人。一名日军随军记者这样记述："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同进城，在城内待了四天，目睹了日

军无数暴行……12月13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的大屠杀。俘虏们在25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向俘虏的前胸和腹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刺落城外去了。”(214) 屠杀战俘，仅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12月14日，日军大部进入南京城，迅即开始烧杀淫掠，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更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地，日军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扫射，枪杀数万人。15日，日军又将平民及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押往鱼雷营屠杀。此外，日军还践踏自身承诺，对难民区内的大批难民进行屠杀。16日傍晚，日军从难民区内搜捕青壮难民5000余人赴中山石码头集体枪杀，随后将尸体推入江中。对于已经投降的中国士兵俘虏，日军也全部将其处死。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以后，在最初的72小时内就被日军在城外用机枪扫射处决。日军将南京城内手无寸铁的平民及被俘士兵用绳索捆绑后，每百人或数百人围成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然后抛尸江河湖塘。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在南京城外，有大批的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并投降。在他们投降后的72小时内，被用机枪屠杀于长江岸边。大约3万多名战俘被这样杀戮。”(215)

12月17日，日本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大加奖励纵兵作恶最甚的第六师团的师团长谷寿夫。当日，日军从各处搜捕中国士兵俘虏及平民3000余人赴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此后，日军在南京城内的屠杀暴行愈演愈烈。18日，日军将城郊大批难民及解除武装之士兵俘虏5.7万余人悉数捆绑，押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将残骸弃于江中(216)。日本士兵在大街小巷见人便杀，南京城内到处血流成河。仅12月一月，日军在汉中门外、鱼雷营江边、中山码头、下关、煤炭港、草鞋峡、水西门外上新河一带，城南凤台乡、花神庙一带，燕子矶江边，宝塔桥、鱼雷营一带屡次制造集体大屠杀，被害者超过19万人。遍布城郊的分散屠杀，更是难以计数。仅3个较大的慈善团体掩

埋的尸体数，就至少有7.7万具[217]。此外，还有一些屠杀的被害者尚不包括在此之内。1937年12月12日至21日，南京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的被俘军民遭日军机关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遇难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有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218]。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除使用现代化武器之外，还采用各种原始野蛮、残酷无比的杀人方法，如砍头、活埋、水溺、火烧、挖心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军军官还展开杀人竞赛，东京《日日新闻》和英文版《日本广宣报》曾连续刊登通讯，介绍野田岩与向井敏明两名少尉的“斩杀百人”竞赛，以炫耀日军的武功[219]。当时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斯博士说：“劫掠、酷刑、屠杀、奸淫、放火，凡是可能想象的坏事，日军进城后，都毫无顾忌地实行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日军的暴行。”[220]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有计划地进行集体屠杀之后，又焚尸灭迹。几名日军记者共同证实：“自12月16日到17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从下关到草鞋峡，一路上沿江边一带都是焚烧过的尸体，约有两三千具。大概是经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死的。”[221]

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的同时，还丧心病狂地强暴妇女。英国曼彻斯特报记者田伯烈曾报导：“依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有二万件。我保守的估计，认为不下八千件，只在金大（金陵大学）一处，我知道全案细节者，有一百件，有确实证据者达三百件。小自十一岁女孩，老至五十三岁的妇人，都被强奸；在大校场上，十七个日军在大白天轮奸一个妇人，事实上，我所知道的案件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222]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战后在东京作证：“日军奸淫妇女，不分昼夜，有时竟在街头为之，有一妇人在公墓内被日兵十七人轮奸，年仅九岁的女童及其七十六岁之祖母，竟在南京城内同被奸淫。”[22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指出：“伴随强奸，还有许多变态和虐待狂的事例出现。许多妇女在被强奸后遭杀害，尸体也

被毁坏。”[224]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日军还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他们在城内抢劫所想要的东西，“装满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225]。1938年1月22日，香港的一则电讯称：“南京被敌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燃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渡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226] 至2月中旬，德国人还有这样的记录：“市街的情况，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下完全变样。每天没有一天不放火，现在轮到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如以百分率计，可以说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街道被烧光了。”[227] 史密斯博士曾对此进行调查，其结论是：“如果分析一下留在南京的人家损失如此之大的原因，可知百分之二是交战因素，百分之五十二是由于纵火，百分之三十三是由于军队的掠夺抢劫，百分之九是盗窃，还有百分之四原因不明。房屋的损失几乎全部是由于纵火，可是动产的损失只有百分之三十一是由纵火造成的。事实上动产的损失中有一半是由于被士兵们抢去了。”[228]

在南京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同胞遇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组织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统计。1946年7月，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综合各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被日军惨杀者为295，885人，另又有家属提出救济申请者为96，260人，共计有39万余人[229]。1947年3月，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认定，“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以上”[23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则这样认定：“后来的估计显示，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231] 上述数字上的差异，主要是认定的标准不同。远东军事法庭的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232]。而这些数字也是相当巨大的。

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因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屠杀现场又完全被日军所控制，在事隔多年之后，要作精确统计是极为困

难的。但从杀人现场留下的大量罪证，众多被害者与中外目击者的证词，已足以证实南京大屠杀这一罪行的客观存在。此后，《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揭露日军暴行的第一手资料陆续被发现与刊布，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日军的野蛮暴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

(1)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1937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页。

(2) 何应钦：《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351页。

(3)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4)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第48页。

(5) 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始末》，《七七事变》，第23页。

(6) 《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日军行动节略》（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83-85页。

(7) 《杨宣诚关于宋哲元与日蒋关系错综复杂情形报告》（1937年7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3页。

(8) 《秦德纯致钱大钧电》（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93页。

(9) 《钱大钧复秦德纯电》（1937年7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93页。

(10)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第49页。

(11)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41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12) 《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12日）、《宋哲元复密电》（1937年7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60页。

(13)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3页。

(15) 日本原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心脏病恶化，卧床不起，于7月15日死亡。日本军部于7月11日紧急任命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

(16)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88—89页。

(17) 《堀内总领致森岛参事官电》，引自《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第175页。

(18) 《卢沟桥事件第六次会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43页。

(19) 《蒋委员长致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指示勿中日军缓兵之计手令》（1937年7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2页。

(2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53页。

(21) 《何应钦致宋哲元等密电》（1937年7月17日），《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第60页。

(22)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0页。

(2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84页。

(24) 《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第180页。

(2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第9页。

(26) 《三十七师撤退交涉》，堀内总领事致森岛参事官第401号电，引自《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82页。

(27)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08页。

(28)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17页。

(2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10页。

(3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6页。

(31)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22页。

(32)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会报》（1937年7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63页。

(34)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26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册），第68页。

(3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5页。

(36)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6页。

(37) ［日］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本）上册，第330—331页。

(38) 《日本华北驻屯军对我二十九军之最后通牒》（1937年7月26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89页；《宋哲元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通电》（1937年7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6-99页。

(3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94页。

(40) 《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85页。

(4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97-200页。

(42) 《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呈蒋委员长何应钦部长告日军围攻通县团河激战平郊遭轰炸等战况电》（1937年7月27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87页。

(4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70页。

(4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页。

(45) 《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87页。

(46) 《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

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8页。

(4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页。

(48) 《宋哲元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7月28日、7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9-100页。

(49)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2页。

(50)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0页。

(51)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3页。

(5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一编《绪编》（三），第354、363-364页。

(53) 黄德清：《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设想、构筑和作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页。

(54) 《抗日战史》（第一册）总论，第358页。

(55)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3—16页。

(56)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4年，第3页。

(57) ［日］海空会：《海军航空年表》，原书房1983年版，第46-48页。转引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58) 《张发奎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25页。

(59) 《张治中报告日军战前动态密电》（1937年8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86页。

(6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8页。

(61)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5-16页。

(62) 《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61-362页。

(6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3页。

(6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7-12月），第300页。

(65) 《海军部长陈绍宽关于征船填塞长江下游航道等致行政院长蒋介石呈》（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721-1722页。

(66)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33页。

(67)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36页。

(68) 《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关于上海战事的报告》（1937年8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99页。

(69) 《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16页。

(7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38页。

(7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页。

(72) 《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1937年8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81页。

(7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67页。

(74)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61页。

(75)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计划》（1937年9月6日），《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77页。

(76)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72页。

(77)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51页。

(78)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53页。

(79)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80) 《张治中致黄绍竑等密电》（1937年9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83页。

(81) 《军委会大本营训令及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74-375页。

(82)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8页。

(83)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40页。

(84) 《蒋介石颁发淞沪会战战斗序列密电稿》（1937年9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44页。

(85)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95-96页。《海军抗战纪事》（1939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743-1744页。

(86) 《海军部交通部为堵塞航道征用军舰商轮情况与行政院来往密呈指令》（1937年9月2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727页。

(87)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1969年版，第370页。

(8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79页。

(89)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8-1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52页。

(9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05-106页。

(91) 《罗广文报告第十八师淞沪会战战斗概要》（1943年5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9页。

(92)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17、119页。另见《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47页。

(93) 《徐志勖编淞沪抗战经过概要》（1937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05页。

(94) ［日］《第九师团战史》，转引自《日中十五年战争》（中），第50—51页。

(95) 《何应钦关于中共表示愿共同抗日意旨密电》（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86页。

(96)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页。

(97) 《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页。

(98) 《何应钦关于红军抗日部队使用及经路建议书》（1937年7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30页。

(99) 《卢沟桥事件第二十四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0页。

(100) 刘武生、杜宏奇：《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

(101) 《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呈蒋委员长电》（1937年8月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5年，第278页。

(10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7月-12月）》，第353页。

(103)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31-334页。这是最初的任命，其后政治部和各师政训处干部有所调整。

(104) 《第八路军总副指挥就职通电》（1937年8月25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60页。

(105) 《八路军主力配合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18页。

(1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107)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的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25页。

(108) 《阎锡山密电》（1937年9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11页。

(109) 《介景和报告蔡家峪等地战况密电》（1937年9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14页。

(110) 《蒋介石致阎锡山密电》（1937年9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29页。

(111)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26页。

(112) 《毛泽东对恒山、五台等地工作布置的指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30页。

(113)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41页。

(114) 《朱德等关于成立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36页。

(115) 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

(116)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42页。

(117)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43—744页。

(118) 《毛泽东致贺龙、关向应、萧克并转宋时轮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64页。

(119)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64页

(120)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72—773页。

(12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1927-1997）》，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122) 毛泽东：《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23) 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1937年9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页。

(124) 毛泽东：《关于华北形势和八路军调整部署的意见》（1937年1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5页。

(125)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126)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75页。

(127) 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1937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88-89页。

(128) ［日］陆军参谋本部：《对华作战大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1页。

(129) ［日］陆军参谋本部：《形势判断》，《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1页。

(130) 《第二期作战计划》（1937年8月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6页。

(131) 《临参命第72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22页。

(132)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1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00页。

(13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59页。

(13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60页。

(136)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52页。

(137)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1页。

(138)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70页。

(13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21页。

(140) 《华北方面军的编成与派遣》，《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2页。

(141) 《察哈尔省及内长城线以北的攻占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7页。

(142) 《第六、一、二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9月2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20页。

(143) 《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作战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21页。

(144) 六个集团军主要是：孙连仲为司令的第二集团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共辖16个军，37个师及15个独立旅。

(145) 据蒋纬国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150页

统计，广灵方面参战部队为第三十三、十七、六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十九军，预备队为第七十一、七十二师，右翼司令杨爱源，左翼司令傅作义。

(146)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46页。

(14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49-250页。

(148)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33页。

(14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34页。

(150) 《阎锡山密电》（1937年9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09页。

(151)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58页。

(152) 《阎锡山致大本营密电》（1937年9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39页。

(153) 《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9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0-541页。

(154) 《何柱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9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3页。

(155) 《徐永昌报告八路军在灵丘涞源抗敌情形密电》（1937年9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20页。

(156) 《卫立煌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10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9页。

(15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64-266页。

(158) 《太原作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71页。

(159)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1页。

(16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3页。

(161) 《阎锡山编拟忻口会战纪要》（1937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56页。

(162)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4页。另见《阎锡山编拟忻口会战纪要》（1937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55页。

(163)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9页。

(16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98页。

(16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05页。

(166)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08页；《孙连仲报告娘子关石门一带作战情形密电》（1937年10-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85页。

(16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12页。

(168)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后方办事处编娘子关会战概要》（1937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77页。

(169) 《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坚守寿阳以东地区密电》（1937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91页。

(17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33-234页。

(171) 《第二战区太原保卫战作战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9页。

(172) 《太原城防工事计划》（1937年10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2页。

(173) 《阎锡山等报告太原保卫战情形》（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05页。

(174) 《介景和致黄绍竑密电》（1937年9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2页。

(175)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8页。

(176) 《废除制令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5页。制令线是日本军部在编组华中方面军时，以临命六百号规定了该军作战范围即制令线："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联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177) 《废除制令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6页。

(178) 11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根据“临参命第一百三十八号”下达华中方面军编组。编组属临时性建制，其司令官由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兼任。战斗序列是正式建制，重新下令组建后，司令官松井石根不再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而另外任命朝香宫鸠彦王中将担任。

(179) 《大陆命第八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9页。

(18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59页。

(181)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182)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8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511页。

(184)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85)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纪录》（1937年11月16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第177页。

(186) 《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演讲，第656-657页。

(18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73-275页。另见《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45页。

(188) 《蒋介石关于第三、第七战区及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变更及任务电》（1937年11月25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78-279页。另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7-288页。

(189) 《蒋介石致唐生智电》（1937年11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98页。

(190) 《蒋介石致顾祝同等密电稿》（1937年11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72页。

(191)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

记手稿影印件。

(192)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3)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80页。

(194) 《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85—486页。

(195)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6) 《攻占南京城要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11—112页。

(197)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92页。

(19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朝云新闻社1974年7月，第30-54页。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册，第149页。

(199)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88页。另见《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增援南京战斗经过详报》（1937年11月-1938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15-316页。

(20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0页。

(201)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83页。

(202) 《唐生智发布首都卫戍部队突围命令稿》（1937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29-330页。

(20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1页。

(204)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1938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94-495页。

(205) 《唐生智等致钱大钧密电》（1937年12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75页。

(206) 《唐生智罗卓英等报告南京守军溃退出城密电》（1937年12月13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46-347页。

(207) 《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先生关于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战情的报告摘要》，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59页。

(20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册，第139页。

(209) ［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页。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册，第151页。

(210) 《日军公布的南京攻击战战况统计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96页。

(211) 《为国军退出南京发表通电》，《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别录”第165页。

(212) 《蒋委员长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220、222页。

(2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14) ［日］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料》（9），《南京事件》2，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第331-332页。

(21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07页。

(216)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七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217) 孙宅巍：《30万南京同胞被屠杀的史实岂容否定》，《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07-111页。

(218)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其附件》（1947年3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五），第783页。

(219) 《日军的“杀人比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67页。

(220) ［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正中书局1938年版，

第88-89页。

(221) 《扬子江边每晚大屠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24页。

(222)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7页。

(22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8页。

(22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第607页。

(225) 《外国人的记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72页。

(226) 《历史名城旷古浩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68页。

(227) 《外国人的记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72页。

(228) 《外国人的记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73页。

(229)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6年7月1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59—360页。

(230)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1947年3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83页。

(23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第607-608页。

(23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第608页。

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

第一节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针对日军不断扩张的侵略活动，国民政府在未来得及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一方面调集军队仓促应战，另一方面仍力图通过外交途径，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1937年底至1938年初，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多变，特别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德国一度中断对华援助，使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日冲突的努力归于失败。而这时日本又提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方针，大力扶持汉奸伪政权。另外，国内政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经过多轮的谈判交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急迫的条件下，也再度联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些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促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亟须改变抗战初期的临时性、局部性应战举措，对抗战有关方针、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规制，以便统一认识，积极动员民众力量，并整合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与派别，确立战时政治体制，应付长期抗战。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国民党酝酿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2月3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六十六次会议，“鉴于国难严重，负荷艰巨，认为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必要”，遂决议于该年3月29日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推由驻汉各常务委员起草[(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中执会常委会第六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组织法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不仅东北早已是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关内华北已经大部沦陷，上海亦成为日军重兵威逼之下的“孤岛”，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更已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因此，已经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产生代表，只能采取权宜之计，以原出席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2)]。2月22日，该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又议决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经费预算案》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临时办事处组织条例》。在此基础上，3月10日，经国防最高会议电请，国民党五届中执会常委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此次大会原为长期抗战而召集，军事最高领袖与其他军政长官，均与前方息息相关，丁此强敌进犯，前方晨夕奋斗，随时请命之际，移地开会，自有必要，今既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于前，本会郑重决定于后，当为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所同谅共喻也。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分驻渝汉，主管长官身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应改在武汉开会。”并决定由武汉临时办事处先行筹备，中央秘书处人员也应即陆续赴汉。紧接着在3月22日召开的中执会常委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议决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组织条例》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3)]。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活动，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召开。会议开幕式于29日上午8时在重庆举行，由林森主持，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开幕词。蒋介石在其致词中，指出了国民党现存的党纪不严、精神涣散等诸多弊病，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整饬党纪，改进党务。

临全大会各次正式会议安排在武汉举行。为了避免日机轰炸的干扰，会议时间均安排在晚上。3月29日晚上8时，临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举行预备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临时主席。会议通过主

席团名单，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居正、于右任、李宗仁、吴敬恒、冯玉祥、戴传贤、陈果夫、孔祥熙等17人，并指派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4)]。晚上9时举行了第一次大会，除通过主席团决定各案之外，由叶楚伧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3月30日晚8时，临全大会开第二次大会，由居正任主席，听取了孔祥熙所作之财政报告与何应钦所作之军事报告。3月31日晚上8时，临全大会开第三次大会，由戴传贤、丁惟汾先后任主席，通过了各组审查的与会代表之提案，通过中央所提之《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会议在讨论《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和《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时，对于设立参政会的必要性、国民党应否设副总裁，均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得以通过。会议还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该次会议一直开至次日凌晨3时。4月1日晚上8时召开第四次会议，由冯玉祥、孔祥熙、蒋介石先后主持。议设总裁一职及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是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在会议上，余俊贤等代表提出一项提案，建议恢复国民党领袖制度并推选蒋介石为领袖。马立山等代表的提案则题为《请推举蒋同志介石为本党领袖以救亡图存案》。同时，国民党中央也以执委会的名义提出内容相似的提案，建议确立领袖制度，“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5)]。在会议有关决议案中，更是从国民党的历史来论证建立领袖制度之必要，“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古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最后，在第四次会议议决通过之《对于审查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有关修改总章部分之决议案》中，要求在国民党总章第四章“总理”之后加上一章，即“总裁”章。并相应规定：“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总裁代行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6)]由于担心汪精卫的副总裁会落选，在总裁、副总裁的产生方式上，临全大会最

终没有采取票选，而是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提出以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主席团成员分别签字，并由吴稚晖代表提案人向大会提出并予以说明，最后以全体起立的方式得以通过[(7)]。蒋介石以当选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讲话："历述日本谋我以谋实现其大陆政策之传统的手段，及我国欲谋独立于世界所不可避免的困难，故吾人应以最大之决心以征服之，最后之成功，惟有赖全党同志一致奋起，努力不息，领导全国共同奋斗。"蒋在讲话中还"对于党员及党部委员多所摘指，责促同志之省悟也。"[(8)]

此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权力构架中居于全党之上，甚至与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表明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之重心[(9)]。这其中虽然不排除个人的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但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使然。自从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积极调动军队抵御日军进犯，努力整合国民党内外各种势力等，表现出较强的抗战态度与决心，这方面的立场和举措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国内许多政治力量的肯定。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其上述基本立场与地位的认同，这对协调、集中国民党各派系势力共赴国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大会最后宣言所称："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10)] 蒋介石本人在当选之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真心，无异予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11)] 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对于遏制国民党内部的失败主义主张和投降主义逆流，阻遏汪精卫集团攫夺最高决策权，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4月1日的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

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不乏其例，然其关系，从未有如今日之深且巨者。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在政治上将使中国失其独立与自由，在经济上将使中国永滞于产业落后之境遇，而为日本工商业之附庸，远非以前历史上一时的暂时军事失败或政治失败可比。以此之故，吾人当竭其全力，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与独立；同时根据三民主义，继续不断完成政治上、经济上之建设，俾中国获得自由平等于世界。”[(12)] 因此，抗战与建国并重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主要方针与任务。

4月1日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则是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议案。此项《纲领决议案》首先就其制定之目的作出说明：“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大业，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特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议决公布，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关于总则，决议案要求“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其中外交方面，要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同时要求尽力维护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的公约，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现存的友谊，并扩大其对中国的同情。军事方面，要求“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以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

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还要求安抚伤残官兵，优待抗战人员家属等。政治方面，要求“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绳”。“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并要求整饬纲纪，严守纪律，严惩贪官污吏等。经济方面，要求“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还要求整理交通系统，增筑交通线路，严禁商业投机，实施平价制度。民众方面，要求“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并要求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充分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救济、组织和训练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加强民众国家意识，辅助政府肃反活动等。教育方面，则要求“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还要求训练青年与妇女，以增加抗战力量等[(13)]。

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制定抗战建国大计，这在当时国内产生强烈的反响。国内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此次大会的召开予以相当关注。

在1938年3月1日，距离大会召开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

央就致电蒋介石并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提出“当目前日寇深入和全国民众的抗战积极进行之际，加紧巩固和扩大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助，已成为国共两党同志和全体我国同胞的一致热望。”接着围绕如何推进国民党自身工作，如何加强国内团结，以及如何发扬民意争取抗战胜利等问题，提出中共自己的意见。其中关于巩固、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中共建议“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鼓动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解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还就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拟定、发表方式以及统一战线组织的形成方式提供具体意见。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中共建议“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中共则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组织为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同时根据地域原则，组织各地方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领导机关，“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14)]。3月2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如何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问题提出八条意见：运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增强国人必胜的信心；继续动员全国各种力量，保卫西北，保卫武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继续改革政治机构；继续动员全国人民；优待抗日军属和伤兵等；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发展国防工业，并改进农业等[(15)]。临全大会结束后，《新华日报》以《国民

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基本的方针。"社论肯定了大会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在外交问题和内政政策上的重大进步，表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正是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重要步骤，我们深望这些进步的继续发展，这些成就的一一实现。"(16)

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议决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尽管没有完全吸取中共方面所提的建议，但中共中央在其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长江局的电文中认为，"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还认为中共站在主动积极拥护纲领并促其具体实施的立场上，不仅能够取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且能够取得国民党内一切进步分子的赞许，从而有利于开展对一切顽固势力的斗争。因此，电文中着重指出："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17) 可见，不仅在公开场合，而且在党内文件中，当时中共对于国民党临全大会都予以了高度评价，表达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事实上，以后中共在向国民党当局争取抗战的合法地位与权益，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一再把《抗战救国纲领》作为有关主张的基础和出发点。

当时的《大公报》针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刊载了题为《全代会之决议及宣言》的社评。其中评论道："此次大会之特值称道者，为充分表现卫国建国的积极精神，而《抗战建国纲领》，就是此种精神之具体化。……其内容与半年来各方论者之志愿，大体相符，且有许多是当然必然的事实需要，无可论辩。"认为《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的议决通过，一方面可以统一国民之意志，一方面更可以击碎日寇战败中国的迷梦。出于自身新闻媒介利益的考量，社评

还对纲领案中宣布组织国民参政会，抗战期间在不违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充分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予以高度赞许，视其“为扶植民权之重要规定”。并提出“抗战民权”的口号[18]。

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议决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可谓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大会讨论制订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方略，决定了以后抗战时期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在相当程度上统一了政府与民众的意志，为保障抗日战争的推进提供了思想理论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基础，具有符合历史潮流的合理性、进步性。

第二节　战时党、政、军中枢机构的调整

除了确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总裁地位之外，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出了政治机构的调整与改善。大会宣言便指出：“对外抗战，虽在宪政时代之国家，亦必授权政府，俾得集中人民之力量，统一人民之言论与行动，以同赴于国家至上之目的。”“至于政治机构，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抗战建国纲领》也提出：“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19] 抗战爆发之时中国尚处于训政时期，政治机构的调整便已经开始了。随着平津失陷、上海撤守、南京被占，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各部被迫西撤，加上战局日趋严峻和持久化，遂使党、政、军中枢机构及其运作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1936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曾议决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议长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议长由行政院长担任，其会员包括中央军事机关各长官、行政院关系各部长，以及中央特别指定的军政长官。国防会议之职权为审议国防方针、国家外交政策、关于国防事业与国家庶政的协进事宜、关于处置国防紧急事变事

宜、国家总动员事宜、关于战时的一切组织以及其他与国防相关联的重要事宜[20]。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设国防委员会，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并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国防委员会正副主席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其组织成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五院院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教育部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办公厅主任、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的职权有国防外交政策的决定、国防作战方针的决定、国防费用的编制与筹备、国家总动员事项的决定、国防紧急事变的审议以及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问题的决定。另外，规定“国防委员会之决议及其行动，应绝对秘密。凡参与会议及工作人员，不得将任何决定事项向外发表”。“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21]。但是，设立国防委员会的同时，并未取消国防会议。

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同时撤销国防会议以及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通过之后，又先后经过1938年3月1日五届中常会第七十次会议和6月9日五届中常会第八十次会议两次修正。根据《修正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的规定：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主席，中政会主席任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组成人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各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五院院长、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军训部、政治部各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及由主席提名经本会议通过者等。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包括国防方针的决定、国防经费的决定、国家总动员事项的决定以及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的决定，并由主席指定九人为常务委员。《条例》还规

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每星期开会两次，全体委员会议由主席随时召集之。"[22] 因此，国防最高会议在组成人员和行使职权方面均比此前的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大为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存在时期，对中政会负责。事实上，由于中政会组织庞大，战时召集困难，而国防最高会议也包括了中政会的主要委员，于是在1937年11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定中政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23] 至1939年1月底，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共举行会议115次[24]。

就在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同时，国民党中常会还决议设立大本营，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25]。旋即国防最高会议于9月1日决定："吾国为自卫而抗战，不采宣战方式，故大本营之组织暂不公布，现就军事委员会改组充实内容。"[26] 于是，军事委员会的组织迅速扩充，设置了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后方勤务、卫生勤务等部以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等[27]。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之下增设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以及水陆运输办事处。这样，军事委员会的权限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机构，扩充到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实现了军事与政治、经济的结合；战时司法权的行使和物资统制，也移转于军事委员会了。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又进行了一次改组：中央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暂时归军事委员会指挥；第二部（政略）取消职掌，与总动员有关事宜归并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办理；第五部（国际宣传）取消其职掌，归中央宣传部办理；第六部（民众训练）以中央组织、训练两部并入之[28]。这次改组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分工作系统归入了军事委员会，体现了党务与军事的合一。这样，大体实现了党、政、军中枢统一工作，军事委员会俨然成为战时内阁或大本营了。

待到南京沦陷，国民党的党政军中枢机构内迁，其中大部分迁至武汉办公，还有一部分直接迁往重庆大后方。正面战场不得不大幅度西移，战线则更长了。由机构庞大臃肿的军事委员会来统领党政军中枢事务，难免指挥失灵困难。当时蒋介石军务繁忙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难以顾及。行政机构内部亦有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的必要。于是，1938年初同时实施了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的调整。军事委员会本身减少了所属机构，具体为：1．参谋本部及第一部合并为军令部；2．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3．第六部及政训处合并为政治部；4．卫生勤务部与后方勤务部合并；5．总办公厅和秘书厅并为办公厅。行政院方面，首先是蒋介石不再兼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为院长，张群为副院长，有关机构的调整为：1．海军部暂行撤销，相应事务归并海军总司令部办理；2．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原建设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并入之；3．铁道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4．卫生署改隶于内政部。此外，军事委员会的若干部门划归行政院相应部门：1．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并入经济部；2．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农产与工矿两个调整委员会，均归并于经济部；3．原属于军事委员会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之下的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于交通部；4．原隶于军事委员会的禁烟委员会总会改隶于内政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再兼禁烟总监职务；5．原隶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29]。至此，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都裁撤了骈枝部门，减少了机构数，从总体上得到了充实健全，同时党政军系统也合而复分，从战初的以军事指挥机构统驭党政军事务，大体上复归各自建制，并且符合简单化、合理化的原则。另外，这些调整还表明，虽然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都面临极大的困难，但是这个政权依然存在，并且能够维持着正常运作。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最高当局意识到，中国进入了“持久抗战”的时期，旋即汪精卫集团叛离抗日阵营，冲击着抗日局势，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混乱，党、政、军中枢机构有必要进行新

的调整。蒋介石有过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思考：1．军事委员会本身机构，尤其是“整顿军委办公厅与侍从室”[30]。2．是否正式确立大本营制，“大本营名称建立对敌利害之作用如何。若大本营成立可带宣战性质，则使敌知所戒惧”[31]。3．“最高国防会议改为执行机关之利弊”[32]。其中，整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与侍从室，应当说与曾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随汪精卫出走，有着直接的关系。至于正式实行抗战初期决定的“大本营”制，蒋介石是有着较多的考虑的。1939年1月中旬，蒋介石曾打算即将行政院各部，甚或其他院、会，划归军事机关直辖，以解决所面临人事与机构的困境[33]。具体而言，就是要修正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统一党政军之指挥，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与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挥，使党政工作与军事行动能密切配合；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国防会议，为国防最高决议机关，并在抗战期间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34]。

然而，国民党高层对上述改制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日方正在攻击国民政府渐成“地方政权”，此时不宜削减机构，不宜为不必要之变更，授敌人以宣传之口实[35]。该提案在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讨论时，引起与会者的责难，认为抗战无论败胜，其责任均应由中国国民党党员承担，决不可因为怕负责任，将国防最高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且这一安排既违反了国民党临全大会关于“中央采取以党驭政的形态”的决议，也违反了训政时期的组织体制[36]。最后，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修正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决定在改组国防最高会议的基础上，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抗战期间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之指挥。”此外总动员委员会也直接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国民党总裁担任，规定：“国防最高

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37]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成委员包括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由委员长提名经中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者，并由委员会指定11人为常务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组成执行委员有中央党部秘书长、各部部长、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中政会秘书长，国民政府文官长，行政院秘书长、各部、会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军法执行总监办公厅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海军总司令，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相比较于国防最高会议仅作为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并且仍对中政会负责，国防最高委员会不仅是国防的最高决定机关，而且是抗战期间统一党政军指挥的机关，并且完全代行中政会的职权，成为一个决策兼执行的最高中枢机关。

1939年2月2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开始运作办公，国防最高会议也相应结束。从1937年8月成立以来，国防最高会议的决策机关常委会共举行会议115次。同样，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策机关也是其常委会，通常每两周举行一次常委会议，有特殊需要时加开一次。从1939年3月2日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共开会69次[38]，主要为听取外交、军事、财经等情势报告，讨论委员长交议案、重要政策的讨论案、国民政府及五院函请核定案、相关人事任免案等，处理五院、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部会呈请鉴核备案等。

根据《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国防最高委员会是“统一党政军指挥”的机构，但又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另外，国防最高委员会还须把会议决议案函送中常会，列入报告事项。于是，国防最高委员会一方面集党权、政权与治权于一身；另一方面与最高党政机关之间的联系混乱。在国民党中常会并未因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而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对于人事任免、法令规章等原来属于党务范围的权

限，依然由中常会直接决定。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无疑有助于提高了该机构的权威性。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蒋介石亲自出席主持常务会议的情况并不多，从而使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应有的功能降低了。此外，国防最高委员会体制上的党政军关系不分，也引发了一些异议和纠纷，如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法院之间围绕着立法权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与纷争，等等。后来，在1940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针对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后，行政效率比较低下，难以适应战争环境的现象，议决通过由蒋介石提交的《拟设置中央设计局，统一设计工作，并设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立行政三联制基础案》，决定进行行政改革，将行政工作的设计、执行、考核三个环节相衔接，实行行政三联制。同时，为了增进党政机关主管长官指挥效能，特别是加强最高领袖个人的权力机制，国民党中央又推行了幕僚长制度[39]。不过在抗战前半期，尽管这些后续的制度安排在某些层面上有所见效，但是其整体性效果不甚显著。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运作

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抗战初期蒋介石试图改造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对该党现状时有不满与担忧。早在1932年，孙科就曾表示："自北伐以来未满民望，党之信用日减，迄至今日，民众对党已大怀疑。"[40] 蒋介石也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场合坦言对党务的失望之情。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民众包括广大青年表达出高昂的爱国热情，蒋介石担心国民党吸引青年、让人民诚心服从领导的能力[41]。蒋介石在不同场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进三青团的筹组活动。1937年九十月间，蒋介石在南京数次召集CC、政学系、黄埔系、复兴社等派系重要人物开会，明确

表示国民党内原来存在着的CC、复兴社和改组派等秘密小组织，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而应当予以解散，成立一个“大组织”，进而实现各党各派和全国的团结。在商议新成立组织的名称的时候，蒋介石反对加上“中国国民党”的字样，而主张以三民主义相号召[42]。

蒋介石非常重视三青团的筹备。1937年11月初，当华北战场和淞沪抗战受挫之时，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调整各省主席的同时，也在“研究青年团之组织”[43]。1938年1月，蒋介石进一步确定了“青年团组织之性质与干部名单”，认为“青年团必须有政纲”[44]。蒋介石还亲自决定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的名单。至此，三青团的成立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致大会开幕词时指出：国民党目前存在的严重缺点就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因此他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国民党自身的改进[45]。该次大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提出了党务改进与调整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设立青年团。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议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也指出：“抗战实力，寓于民众，而青年尤为国家民族之瑰宝，本党应取消预备党员制，另设青年团，征求全国优秀青年而训练之，使各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46]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国民党章程总章第一章第五条写道：“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47]这样，三青团的成立便在国民党体制内获得了最高法源依据。同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该案指出：“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依照本党总章第五条之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由国民党总裁兼任之；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青年团干部由团长指派之；青年团为公开团体[48]。经蒋介石指定，有

陈诚、陈立夫、张道藩、朱家骅、谷正纲、贺衷寒和康泽等人进行了三青团的筹备工作[49]。1938年6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公布，共15章72条。这样，三青团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了。

经过酝酿与筹备，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自兼团长。成立仪式上，蒋介石首先进行宣誓："中正正心诚意，与本团全体同志一心一德，矢忠矢信，继承总理遗志，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以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全体干事、中央团部各处正副处长和工作人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团长命令，严守团纪，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怨，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50]

三青团中央团部设干事会，干事会的职权有：执行团长命令；决定工作计划；组织下级团部并指挥监督之；办理监察会移付执行的案件；编制预算决算支配全团财务。干事会下设书记长办公处、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经济处、社会服务处、总务处。各处均有专门负责人专司其职。1940年4月，书记长下又增设女青年处。

三青团成立时，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31人，以陈诚、朱家骅、陈立夫、贺衷寒、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谭平山、谷正纲9人为常务干事，其中陈诚被蒋介石指定为书记长。嗣因陈诚承担的前方军务繁重，加派朱家骅兼代书记长职务。1939年9月1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陈诚等35人为干事，程思远等15人为候补干事，陈诚等9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仍为书记长。1940年9月，陈诚因军政事务繁忙辞去三青团干事会书记长，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另指派张治中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1941年11月中央干事会干事任期届满后，蒋介石重新选派张治中等49人为干事，毛庆祥等19人为候补干事，张治中为中央干事会书记

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社会服务处、女青年处、法规审查委员会、人事甄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51]。

三青团中央团部还设立监察会，由团长选派15人为监察，9人为候补监察。团长从监察中选派人组成常务监察会，并由团长从常务监察中选派一人为书记长。监察会的主要职权有：监察团务进行；检举并审议干部及团员违反纪律案件；稽核全团决算及经费收支；指挥下级监察工作[52]。1939年9月，中央监察会监察为邵力子、陈布雷等35人，其中王世杰、朱家骅、陈布雷、邵力子、罗家伦为常务监察，王世杰为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包括总务、审查、稽核3个组。1941年11月，第一届监察会期满，其中黄仁霖监察、袁守谦、陶百川二位候补监察调任中央干事，马君武监察病逝，于是以顾孟馀、吴南轩为监察，张洪元、余井塘为候补监察，余均连任[53]。

三青团团章还规定设指导员若干人，由团长聘任，负责指导团务。1941年11月，蒋介石首聘9人为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他们是吴稚晖、戴季陶、孙科、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叶楚伧、张伯苓、蒋梦麟[54]。

三青团组织除了中央团部外，下设支团、区团、分团等组织，根据战地与后方并进、学校与地方并重的发展原则，先在重要地点建立组织，逐渐扩充至各地区及各部门，包括内地各省、敌后战区、边疆海外。到1944年12月底，三青团建立有支团26个，区团35个，分团970个，合计达1031个组织单位，包括设于行政区者878个，战区19个，边疆13个，海外25个，学校72个，训练班团21个，其他区域3个。三青团成立后，非常注重发展团员，扩大团员的总数。据统计，1938年三青团成立的当年总人数仅为9207人，但第二年即1939年的团员总数已经扩大到89，664人，1940年更是发展到了总数达259，147人，1941年总数达421，161人，1944年则发展到了887，865人[55]。三青团团员的年龄构成中，按照1944年的统计，16岁至30岁占94.28%，30岁以上者为5.72%。以教育程度来看，中等学校毕业者

最多，小学毕业者其次，受高等教育者较少[56]。

三青团成立后，中央团部和地方团部即大力举办干部训练班团，从1938年到1944年，受训干部达11，011人，后来扩充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另外，根据蒋介石1939年5月关于举办青年营的手令，同年三青团中央团部和四川支团部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试办夏令营，以后成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重要方式，得到迅速的发展。1939年的重庆、成都两地夏令营共有学员719人；1940年则举办了重庆、成都和城固三个营，学员数增加至1429人；1941年发展至重庆、成都、陕西、贵州、福建五个营，学员共2496人；1944年则共举办19处夏令营，学员总数6157人[57]。三青团举办夏令营既有刷新青年道德观和政治观的使命，还有着扩大组织的目标，训练对象以中学以上学生为主，学员不限于具备团籍者，训练内容包括政治训练与文武体育各种课程。

三青团还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如中央团部创办青年书店和青年印刷所，编印《中国青年》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新闻》周报，开展对国内外青年的广播。各级地方团部也都出版有刊物。此外还三青团并把宣传工作与各种服务活动、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如办理青年馆、服务社，举办演讲会、座谈会、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组织开展慰劳征属、旅行竞艺等活动。一些地方的团部还设立了农场、林场、工厂、合作社。另外，三青团举办的青年学业和职业辅导，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处于战区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还参加了协助军队作战、疏散难民、安抚流亡等工作，如武汉会战后期的撤退，以及河南与湖南的数次战役中，都有三青团组织进行着运送伤员、担任向导和慰劳军队等工作。而处于敌后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则与日伪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总体来看，抗战初期三青团的建立与开展的基本活动，主要服务

于蒋介石整饬不同秘密团体、促使国民党进行除弊更新的目标，同时在国统区青年群体中扩大了蒋介石的影响，扩大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另外，也有助于推进当时国民党确立的抗战纲领和基本政策，对抗战事业有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三青团的筹备和成立，原先处于国民党体制内的复兴社、青白团等秘密团体停止了活动。但是，旧有的派系之争不仅没有中止，相反却以新的样式得以存续甚至发展了，其结果对国民党的体制及其运作造成了冲击。

三青团成立后，其与国民党的关系颇为微妙和复杂。如前所述，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三青团是由国民党所设立的。但是，三青团的创建者蒋介石，虽然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和总揽团务，却明确反对在三青团的名称中加入“中国国民党”，明确表示不想使三青团成为国民党组织的下属部门，以避免其沾染国民党的弊端与恶习。正如蒋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所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58]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文中明确提到“求抗战建国之成功”和“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仅笼统谈“中正受命党国”，但却不明确提及中国国民党。另外，1939年12月4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在第五期党政训练班作“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宗旨及今后团务推进方针”的宣讲时，就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关系有如下说明：从本党与本团的组织系统上来讲，党部与团部都各有其一贯的系统，本党以政纲政策领导整个的团，但各级平行的党部与团部并不发生隶属关系；他还引用了蒋介石在《党与团的关系》训词中的说法：“在整个系统之下，党部指导团部，党员指导团员，为的是要共同为我们主义而奋斗，但要知道‘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指导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团员应知道团的基础在于党的健全与充实，党员应知道党的前途有赖于团的向

前开展，互相辅助，互相提携，向共同的目标而努力。”[59] 这一说法可以为国民党和三青团各持一端，各为所用。

另外，从三青团征收团员的年龄规定来看，最初上限为28岁，后来调整为16至30岁的青年都可以加入为团员，且“对本团工作有特殊需要者”不受上述年龄限定[60]。这就使得三青团与国民党间界限变得比较模糊。事实上，三青团成立之后，其征集发展团员的速度远超过国民党。1938年三青团成立，当年团员数为9207人，同年国民党党员数为633，402人，党、团员比例为68.80：1；待到1941年时，国民党人数为1，745，697人，三青团则发展至421，162人，党、团员人数比例仅为4.14：1。而到194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缩小到3.13：1[61]。三青团的发展势头，仅从成员数量上来看，大有直追国民党之势。

对于党团之间的关系，国民党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解决。1939年，国民党制定《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民党征收党员，以25岁以上为原则；团员满25岁时由中央团部介绍入党；在校学生虽满25岁，仍应入团，已经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入团，保留党籍[62]。1940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三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发展。”党的工作应注重与政治配合，团的工作则注重与教育配合，但二者的工作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同一地区如有党与团的组织，党不征收未满25岁者入党，团不征收已满25岁者入团，现有团员如年龄已满25岁以上者，一律介绍入党；现有党员如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划入青年团，保留其党籍，但党与团的各级干部及工作人员，不受上述年龄的限制。党的活动范围注重于社会，各种民众团体内的团员在民众运动领导方面参加党团组织，由党部统一领导。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各级学校党部不征收学生为党员，青年运动及童子军少年团并由团领导[63]。1941年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

关系办法实施细则》，其中又规定：研究生不以学生论。各级军事学校、各部队、各陆海空军干部训练机关、各交通路线及中央政治学校专设党部。凡是一个地区或学校尚未成立团队者，该地区或学校党部对青年工作照旧进行[64]。

然而，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客观上的组织关系准二元化、成员来源的相叠，加上三青团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了恶性的“双轨竞进”[65]，争议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党团之争加剧了国民党体制内本已存在的派系政争，使得战时本已十分稀缺的各种资源无端耗费，并且销蚀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对战时国民党的体制造成了相当的冲击。

第四节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1938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被视为抗战初期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是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可以公开表达政见的讲坛。

国民参政会的倡设最早见于1932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议决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参政会，并规定组织要点，交常会切实筹备，以期民意得以集中，训政早日完成案》。该案建议应于1933年内召集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代表参用选举和延聘两种方法产生，国民参政会职权应以训政时期约法为基础，参酌中央政治会议及国难会议所举各点规定之，关于国民参政会的一切法规，应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于四个月内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颁行[66]。1933年2月23日，国民党四届中执会第五十九次常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法》。3月2日，四届中执会第六十次常会又制定《国民参政会会员选举法原则》。依据上述两法，国民参政会会员总数定为160人，其中由各省市职业团体、蒙古、西藏以及华侨选举150人，由国民政府从全国各界富有学识资望者中聘任10人。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有四项：一是审议国民政府交议的预算案、宣战案、媾和

案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二是关于政治设施，得建议于国民政府或者请求国民政府予以说明；三是得提出法律案于国民政府；四是得接受人民的请愿。国民参政会每年开常会两次，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党政要员皆得列席会议[67]。

可是，原拟定于1933年内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由于国内时局的原因而一再搁置推延。待到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战全面展开，为了采纳民意，体现战时民主，以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曾于1937年8月中下旬召集国防参议会。国防最高会议起初聘任国防参议员14人，即张伯苓、胡适、张嘉森、蒋梦麟、马君武、曾琦、李璜、黄炎培、沈钧儒、张耀曾、毛泽东、晏阳初、傅斯年、梁漱溟。至11月初增加到24人，到当年底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国防参议会扩充参议员名额案》，把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之名额扩大至75人[68]。尽管国防参议会本身在组织、职权上比较简陋，且其实际发挥的功能也极为有限，但它毕竟是“民主在抗战期间开始发展的小小萌芽”，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69]。

随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尽快召集国民参政会，广泛集聚民意共赴国难，便成为众望所归。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该案首先阐述设置国民参政会的必要性：“唯是民族国家在此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欲求国事万几，算无遗策，尤宜遍集天下贤才、民众领袖，共襄大计，以济事功。且本党五全大会曾有召集国民大会之决议，兹当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大会既难召集，则设置国民参政会，以统一民众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似不可缓。”关于国民参政会组成会员，该案认为由中央就原当选国民大会各省市各职业团体代表召集三分之一充任之，并由中央聘请专家会员若干人，其数额不得超过前项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关于国民参政会的职掌，该案规定有四项：抗战时期政纲政策之初步决定权；预算决算之初审权；对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及各

部部长行使同意权；其他有关国家大计之建议权、质询权。关于国民参政会与行政院、中央党部的关系，该案建议：除国民参政会对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各部部长行使同意权外，如其对行政院长、副院长及各部部长人选不同意时，得请另提人选，如果第二次所提人选仍不得国民参政会同意时，应该移送中央党部解决之；国民参政会之建议及质询事项，如行政院认为无法执行，或者国民参政会认为不满意时，得移请中央党部解决之；国民参政会行使其职掌之前两项时，仍须送请中央党部为最后决定。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置国民参政会的议案，同1933年制定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法》等比较，具有三个特点：1．国民参政会组成会员人数增加，尤其是专家会员人数。原组织法规定由各省市职业团体、蒙古、西藏以及华侨选举150人充任会员，现该议案规定，由中央就原当选国民大会各省市各职业团体代表480人中召集三分之一，即160人充任会员。原组织法规定由国民政府从全国各界富有学识资望者中聘任10人充任会员，现议案规定由中央聘请专家会员若干人，其数额不得超过前项会员总数160人的四分之一，即40人充任会员。2．国民参政会职权的规定更为准确、严格，也更符合实际。1933年的《组织法》规定，国民参政会对国民政府交议的预算案、宣战案、媾和案，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具有审议权，现议案规定国民参政会对抗战时期政纲政策具有初步决定权，对预算决算具有初审权，而最终决审权与决定权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3．关于国民参政会对行政院主要官员人选行使同意权的规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谓具有体制创新的趋向。“这是自孙中山本人建立政权以来，国民党人首次提出把中央政府行政长官的任命交给议事机构认可的主张，已经突破了军政、训政制度的范畴，不能不说是对于当时社会上团结抗日潮流的一种回应”[(70)]。针对此项议案，国民党临全大会作出的决议是：“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其职权及组织方法，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妥订法规。”同时，在此次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之政治部分中，也建议“组织国民参政

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最后，在临全大会宣言中就此宣称：“惟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此固所以充实抗战之力量，而民权之基础，亦于此建立。”(71)

1938年4月7日，国民党第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案》以及各省市应出参政员名额表。经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核定后，4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计15条。该条例首先规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关于参政员总额150名的分配，条例第三条规定：（甲）由曾在各省市（指行政院直辖市）公私机关或者团体服务三年以上，且著有信望之人员中，共选任88名；（乙）由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共选任6名；（丙）由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共选任6名；（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于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共选任50名。关于参政员的选任程序，条例规定：1．候选人的推荐上，前（甲）（乙）（丙）（丁）四项参政员的候选人，或由各省市政府及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或由国防最高会议、或由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按照应出名额加倍提出。2．候选人资格的审查上，前四项参政员候选人经推荐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汇送国民党中执会，提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审议会审议，待审议结束后，其结果报告国民党中执会。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审议会委员由国民党中执会指定。3．候选人的选定上，国民党中执会于接受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审议会审议报告后，即按照前（甲）、（乙）、（丙）、（丁）四项各应出参政员名额，提出中执会会议决定之。另外，按照该条例，各省市应出参政员名额为：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河南、广东，以上各出4人；

山西、陕西、福建、广西、云南、贵州，以上各出3人；

甘肃、察哈尔、绥远、辽宁、吉林、新疆、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以上各出2人；

青海、西康、宁夏、黑龙江、热河、天津市、青岛市、西京市，以上各出1人[72]。

关于参政会的职权，条例虽然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但同时规定：如遇有紧急特殊情形，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依据《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命令为便宜措施，不受前项的限制。条例还规定：国民参政会设置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之[73]。因此，同上述临全大会有关议案内容比较，此《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相关规定中，除分配给专家学者范围的参政员名额有所增加外，其在参政员的选任程序上，具有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明显特征；在国民参政会的职权规定上，也呈现出相当大程度的倒退。最初，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曾有将立法院并入国民参政会之议，其职权亦即移归该会。由于立法院长孙科的反对，遂仍维持立法院[74]，是以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中并不包括立法权。

1938年6月1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八十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对《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进行修正，将国民参政会设置参政员的总额，由150名增加到200名，即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满3年以上且著有信望，或者努力于国事且信望久著人

员中，原共选任50名，现修改为遴选100名。同时决议：选任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75]。7月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和《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组织规则》。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准备，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两仪街20号上海大戏院开幕。出席开幕式的有国民参政会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参政员130余人。各院部会长官、中央委员、外宾及中外记者、参政会秘书处职员共1000余人。由议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其开幕词中就国民参政会的重要使命宣称："在此伟大而艰难的抗战中，非'政府有能'不能应付时局，非'民众有权'不能使政府集中全国的心力物力，以供抗战建国之用。""抗战建国需要民众力量，尤其是需要将这些民众力量集中起来，施以训练，加以领导。""国民参政会的最大努力，便在如何担负起这重要的使命！"因此，"国民参政会开会之际，惟望根据着组织条例所授与之职权，与议事规则所规定之程序，同心戮力，以求《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76]。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从7月6日始至15日止，除了开会式、休会式及各组审查会议外，前后共举行10次大会，先后听取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内政部长何键的内政报告、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外交报告、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教育报告、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财政报告、交通部长张嘉璈的交通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政治部长陈诚关于民众组织与训练的报告、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监察工作报告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并都提供了详尽的书面报告。参政员对于各项报告多有口头或书面询问案，各部长对此分别作出口头说明或书面答复。此次会议提案共129件，设五个审查委员会，最后通过决议案120件。其中军事方面有改善征兵办法加强抗战力量等18件，外交方面有调整外交机构刷新外交阵容等11件，内政方面有改善各级行政机构设立省、县参议会完成自治等32件，财政经济方面有巩固法币节制资金外

流与推行战时税制等36件，教育文化方面有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等10件，另有关于会务的数件议案。提案中最为重要的是7月12日大会上通过的《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此案是在合并郑震宇等参政员28人所提《精诚团结，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陈绍禹等参政员67人所提《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以及王家模等参政员21人所提《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三案的基础上产生的。该案中宣称："拥护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切望国民政府制定实施办法，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施行。同人当随全国国民之后，依据此项纲领，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努力奋斗，以取得抗战最后之胜利，而达到建国之成功。"据称该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起立通过，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此为国民参政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之表示"[(77)]。参加会议的参政员普遍认为，通过的各项议案如能切实执行，"是可以逐渐踏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78)]。

根据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会期十天。为了在休会期间能够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之实施经过，须设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驻会委员，共25人：张君劢、左舜生、曾琦、张炽章、胡石青、董必武、陶希圣、孔庚、胡适、刘百闵、蒋方震、秦邦宪、傅斯年、刘蘅静、邓飞黄、范予遂、许孝炎、马亮、梁漱溟、刘叔模、郭英夫、李永新、罗隆基、沈钧儒、陈绍禹。以后各次参政会大会，均要选举驻会委员会。

7月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闭幕，并发表宣言，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团体，尤其是各类报刊媒体等，在国民参政

会召开前后，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意见，发表评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新华日报》提出参政会作为民意机关应有最低限度的五条原则：所有参政员在会议上有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讨论的权利；参政员在会议上的言论，除涉及军事秘密范围者外，有向外公开发表的权利；参政员在会议上所发言论，不论其是非与否，会外人士不得擅自制裁；参政员有向各地实行调查访问的权利；参政会开会期间民众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得列席旁听[79]。《大公报》则阐述了国民参政会诞生的意义，认为“凡是中国人，不分种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老幼男女，都在抗战建国的中心领导之下，一致从事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而提出，国民参政会的运作不但可以巩固战时团结，而且预示战后政治归趋；政府召集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在于“发挥民权主义，建树民主政治”；国民参政员“须要本自己的理智学识，竭诚行使其职权”[80]。《申报》也发表社评《国民参政会之意义》，认为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在战时既可集中全国之识见与思虑，以谋争取最后之胜利；在战后亦可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81]。尤其是国民参政会开幕的前一天即7月5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位中共当选参政员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认为目前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何动员一切力量保卫武汉及有效进行第三期抗战；如何改革流弊百出的征兵制度而代之以广大的政治动员的征募办法；如何采取具体办法真正达到“有钱者出钱”的目的；如何保证最低限度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普遍地发动、组织民众；如何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的合法权利；如何真正有效地训练青年；如何改善各级政治机构；如何认真推行地方自治，等等。

7月7日，《新华日报》刊登宋庆龄的撰文《抗战的一周年》，文中针对国民参政会即将开幕，建议国民政府“不仅听取彼等意见，贵

能迅速执行彼等所提有利于民族国家及保障抗战胜利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不仅为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而为民主政治国会职权之实”[82]。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正式开幕，当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祝国民参政会成功》，认为：“在抗战异常紧张的今天……全国人民希望着国民参政会能够解决具体的保卫武汉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的方案，建议政府，协助政府，动员军民财物，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而奋斗。”[83] 同日，《大公报》也刊载社评《祝国民参政会开幕》。7月11日，《新华日报》又刊载《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上国民参政会建议书》，提出四项请求：请求国民政府具体施行战时教育；请求政府统筹全局救济失学、失业青年学生；请求政府辅助青年学生组织国际代表团，常驻各国进行国际宣传；请求政府颁布一明确的群众团体登记条例。同日，《新华日报》还译载苏联《真理报》就中国国民参政会开幕所发表的评论。该评论称：中国国民参政会的开幕，“在中国历史上，为一重大之事件，无疑的，对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之民族解放战争，颇为重要”。“国民参政会乃巩固与扩展统一战线一重要阶段，在进一步团结国内各势力，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者上自具有莫大意义”[84]。7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闭幕的次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的成功》。该社论认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之成功在于五个方面：代表全国同胞又一次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国策；代表全国同胞明白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代表全国同胞第一次确定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方针；代表全国同胞正式地宣布了“在抗战时期保障民生”的必要；郑重宣布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希望“最高统帅领导全体军民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85]。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6日至15日召集第一次会议起，到1940年4月1日至10日最后一次会议止，前后共召集五次会议。

第一届二次会议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在重庆召集，除开

会式及休会式外，共开大会10次，到会参政员共140人。这次会议正好在广州、武汉失陷之后召开，举国上下期盼政府对于抗战前途有明确表示，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在11月1日第五次会上，胡景伊等44名参政员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王造时等66名参政员提出“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并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案”。会议结合该两案及其他相关内容的三个提案合并讨论，一致通过决议：“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今后全国国民应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86)] 大会议案共93件，经讨论后，决议案共88件。其中，关于军事和国防者，有改善兵役实施办法案等17件；关于外交国际者，有培养及充实外交人材方案等4件；关于内政者，有刷新政本以利抗战案等24件；关于财政经济者，有调整贸易案等24件；关于教育及文化者，有抗战建国过程中职业教育实施方案等14件；关于会务者1件[(87)]。另外，对于行政院长孔祥熙所作的政治报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张群所作的军事报告、王宠惠所作外交报告、何键所作内政报告、孔祥熙所作财政报告、张嘉璈所作交通报告、陈立夫所作教育报告、翁文灏所作经济报告，以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院的书面报告，与会参政员均有多起询问，甚至书面询问。对于参政员的询问，政府方面均须作出答复。此外，国防最高会议还向这次会议报告了对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移送86案之决议暨实施情形[(88)]。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三次会议于1939年2月12日至21日在重庆召集，除开会式及休会式外，共开大会九次，出席参政员146人。由于原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出走叛离抗日阵营，大会一致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大会听取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孔祥熙的财政报告、何键的内政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张嘉璈的交通报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提出了关于三个月来工作的书面报告。在听取政府各施

政报告后，参政员向政府提出询问共28起，对于这些询问，政府主管机关长官或即席答复，或过一二日作出书面答复。所有施政报告均交由各审查委员会审查。这次大会通过提案共96件，其中较重要的有：政府交议之抗战第二期战时军事、外交、侨务、内政、蒙藏、赈济、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行政计划，普遍推行纳金缓役办法，战区财政金融及经济处理办法等案。经蒋介石提议，会议决定由参政员组织川康建设期成会，于会后组成川康视察团，分赴川康各地视察，拟定川康建设计划，提交政府建议实行。尤其是周览等50名参政员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提出了实施民主的三个原则，即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化；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三个要点：吏治制度必须建立，公务人员权责必须分明，机关系统必须清楚[(89)]。这一提案集中代表了进步人士要求革新政治、实行民主的迫切愿望，以及在发生汪精卫出走事件、日本加紧政治诱降的情况下，国民党最高当局对于这种愿望的相当程度的认同。蒋介石在这次大会的闭会词中便说到："总理倡导三民主义，其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国人民如果不能关切他们自身的幸福，管理他们自己共同的事务，就是说，如果人民不能积极参加政治的话，他们就不能建立强固的国家。"[(90)] 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表态，无疑有助于以后国民参政会推进宪政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案，提出了精神总动员的三个共同目标：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次国民参政会休会不久，国民政府于3月12日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参政员任期为一年，第一届参政员的任期应于1939年6月30日届满。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于同年4月28日颁令，决定本届参政员任期延长一年，并把会期由原来的3个月改为每6个月召集一次。于是，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便于1939年9月9日至18日在重庆召集，出席参政员127人，加上中央政府官员及来宾等列席者，共达300多人。除了开会式及休会式外，这次

参政会共有大会九次，其中听取的会务报告有《国防最高委员会对于本会第一、二、三次大会移送各案实施情形》、《驻会委员会报告》、《驻会委员会检讨大会决议案实施情形报告》等三项；关于政府施政报告，则有行政院的政治报告，以及有关机关长官所作的财政报告、军事报告、经济报告、交通报告、外交报告、内政报告、教育报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均有书面报告。这次会议上的施政报告不仅有过去实施，而且有今后的施政方针，除了参政员有多项询问，均交各审查委员会审查[(91)]。

大会通过提案82件，较重要的有关于川康建设方案，包括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教育各方面。自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之后，以李璜为团长、黄炎培为副团长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15名参政员分成五组，对四川、西康两省的重要县份进行了视察，并把视察结果向一届四次会议提出了报告书[(92)]，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向一届四次参政会提交的“川康建设方案”。另外，一届四次参政会大会突出反映了民主浪潮逐步高涨情况下，国内进步力量对于实施宪政的迫切愿望，相关内容的提案便有七份，正是在合并讨论这七份提案的基础上，一届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决议。该决议分为治本办法和治标办法，各有两项。只是该决议案没有明确规定废止战前的“五五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则是美中不足。但即便如此，国民参政会通过该决议之后，依然有后续的相关举措。根据该决议，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指定19名参政员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以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以后又把委员名额扩大到25人。该次会议闭幕后，宪政期成会即开始工作，首先就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国民参政会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接着就开始了讨论宪政和修改宪法草案的工作。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可见，国民参政会对推进宪政的工作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除了开会式和休会式，共开会议9次。出席参政员145人，政府各机关长官均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决议各案实施情形之报告，驻会委员会提出了检讨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实施情形之报告，川康建设期成会则有常务委员会暨各办事处之报告及华北慰劳视察团之报告。政府各部门所作的施政报告，有何应钦所作军事报告、王宠惠所作外交报告、张嘉璈所作交通报告、孔祥熙所作财政报告、翁文灏所作经济报告、周钟岳所作之内政报告、陈立夫所作教育报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均提出书面报告。参政员对施政报告共提出了61起询问案。这次大会设有与以往相同的军事、外交、内政、财政、教育文化五个审查组之外，另设检讨物价特种委员会；因为参政会极为关注当时的物价高涨问题，收到此类提案十多件，希望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严厉取缔囤积居奇及垄断牟利之奸商。检讨物价委员会审查时，要求财政、经济、交通、内政各部长出席说明，作出彻底检讨和提出具体对策。这次大会通过提案共76件，其中关于宪法草案的提案连开两次大会，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且极为重视。而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修正案，则是对出笼伊始的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严正声讨[(93)]。

1940年10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任期届满，国民党中央当局以国民大会筹备未竣，决定延续设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额由200人增加到240人，议长制改为五人主席制，大会及驻会委员会职权均有所扩充。1941年3月1日至10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在重庆召集，除了开会式和休会式之外，开预备会议一次，正式会议十次。预备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吴贻芳等五人为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政府各部会向大会提出报告，除了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和审计部为书面报告外，由各部长官到会口头报告的有孔祥熙的财政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陈立夫的教育报告、谷正纲的教育报告、张嘉璈的交通报告、陈济棠的农林报告、周钟岳的内政报告、何应钦的

军事报告，以及翁文灏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参政员对每一报告均提出询问案，共61起，均由有关主管长官即席或书面答复。这次大会收到提案155件，除了按规定分军事、外交、内政、财政、教育等五个审查委员会审查之外，另以物价和粮食问题关系人民生活至巨且相应提案甚多，经临时动议，另设物价问题特种审查委员会，专审此类提案。另设宣言起草委员会。这次大会出席参政员204人，超过以往各届。由于一月份的皖南事变，中共党籍参政员抵制此次参政会拒绝参加，这也是此前没有的情况。1941年2月15日，毛泽东等七名中共参政员曾致“删”电参政会秘书处，要求国民党方面接受中共提出的12条，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能参加即将举行的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接受，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再度致函参政会秘书处，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94)]。对此，蒋介石依然决定“置之不理”[(95)]。于是，这次会议期间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向大会作了有关接洽情况的报告，黄炎培参政员也作了补充报告。蒋介石则在第六次会议时对此事声明：军令只有一个，政府只有一个，党派精神一律平等，此次事件只要能达到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目的，一切问题皆愿听从国民参政会根据公众民意解决；对中共各参政员，更希望其毅然接受参政会公众意思，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王云五等54名参政员还临时动议，盼中共参政员坚守统一之宣言出席参政会，俾一切政治问题得循正当途径，以获完善之解决。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大会，于1941年11月17日至26日在重庆召集，出席参政员173人，中央党政军机关长官、来宾和记者300余人参加。共开大会10次。前五次为听取施政报告，计有何应钦作军事报告，郭泰祺作外交报告，俞鸿钧作财政报告，张嘉璈作交通报告，翁文灏作经济报告，谷正纲作社会报告，周钟岳作内政报告，徐堪作粮食报告，陈立夫作教育报告，林翼中作农林报告。第六次会议起开始讨论提案。经大会决议成立的各参政员所提议案共115件，包括关于军事及国防者8件，外交及国际事项者3件，内政事项者38件，经济事项者37件，教育及文化事项者29件。另有政府交议1942年度政府

对内对外重要方针案一件。大会主席团所提“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一案，其要点为：1．抗战终了后，即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2．增强战时民意机关组织与职权；3．延揽各方人才，实践“天下为公”之遗训；4．人民合法自由予以保障等。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临时动议，即“重申我国抗战目的决心收复东北四省”一案。这两项议案受到与会参政员高度重视，获得一致通过[96]。鉴于当时物价大幅波动，成为各界关注所作，这次参政会期间还利用11月20日之暇，召开关于物价及粮食问题座谈会，政府主管部门也有代表参加。

总之，自从1938年7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参政会召开了两届共六次大会，提出和通过了大量的议案，对政府施政报告进行了询问和审议，从而在坚持抗战建国纲领，坚持持久抗战，推进战时民主法治与宪政，促进战时经济建设，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以及打击汉奸卖国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七七”事变以来国内各种力量实现团结抗日的重要标志。当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中间力量的代表，对国民参政会有较高的评价，指出：“参政会集合全国各方人士，尤其是集合各党派人士于一堂，确实可以表现全国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97] 通过国民参政会这一战时民主论坛，参政员们可以听取政府有关报告，并进行必要的询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作用。因此有论者认为：“国民参政会事实已成了国内各党派政治上合作的一种形式，成了在野党监督批评执政党的一个机构。”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毕竟是一种进步，是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主的表现”[98]。这种一定程度民主的开放，又曾推动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道路上迈出重大的步伐。如几次参政会期间，均要求政府澄清“抗战到底”的立场，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公开场合一直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但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二届二次大会上，终于通过了收复东北四省的议案。同时，国民党最高当局曾经考虑过推进政治民主、实施宪政，并且让国民参政会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如1939年9月一届四次参政会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决议，而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在日记中目前写到："宪政应提早实施，本党新老党员落伍，而老党员为尤腐朽，若不还政于民，诚误国而又误党矣"[99]；"决行宪政"[100]。国民党最高当局确实也要求政府各主管长官亲自向参政会作施政报告，听取意见和询问。但是，参政会对政府部门及其长官，"没有弹劾权，也没有不信任投票权，只有用建议权和询问权略略表示意思。然犹恐损伤面子，影响团结，所以关于行政院长的个人问题，系用参政员联名函件的形式秘交政府，而不在参政会内公开提出讨论"[101]。如1939年9月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期间至于休会期间，参政员对行政院长孔祥熙多有批评，作为大会主席的蒋介石却视之"无理攻击"，"政客官僚之无心肝，国难至此，尚以私利私见为重，可叹"。他甚至公开为孔辩解："余乃以正言评判抗战之功多在财政以指示之，众乃无词。""参政会议如常集会，对行政庸之多所指摘，余再三声辩，痛论攻讦非训政意义。"[102]这就使参政会对政府施政无法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另外，参政会虽然设有驻会委员会，但实际发挥的作用更为有限。当时参政会对政府的监督，整体上还流于形式。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决议案的实际执行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国民参政会作为当时条件下的公开合法的民意机关，其自身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如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有关规定，国民参政员、正副议长的选任，明显为国民党一党独揽。国民参政员的任期，在1938年4月12日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中第八条规定："国民参政员之任期为一年，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但在1940年4月16日公布的《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八条条文》中规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任期为一年，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延长之。"这就使得国民参政员任期的长短全由国民政府随意决定。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原条例第九条规定为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10天。但在1939年4月28日公布的《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九条条文》中规定为每6个月开会一次，会期10天。如此延长开会间隔，实有削弱国民参政会的功能及影响的意图[103]。此外，根据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只有在出席

会议参政员人数达到其总额二分之一以上时，才得开议。但在国民参政员人员构成上，国民党籍参政员实占半数以上，因此，国民参政会的开议权，实为国民党当局所把握。

第五节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尤其是统一的战争动员和各种力量的有效组织，有赖于全国各地齐心协力。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朝野上下、中央与各地，都出现了极为高涨的团结对外气氛。国民党中央当局在协调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加强地方的控制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

为了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军政负责人在南京共商对日决策，与会者有桂系的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秦德纯、江西熊式辉、湖南的何键等，并鼓励与会者就抗敌大计畅所欲言。会议最后通过了准备抗战的决策。随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得以从各地调集百余万军队投入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给日军速战速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以沉重的打击。此外，在正面战场其他各主要会战和战役中，都有原地方实力派掌控的军队参战。

鉴于抗战初期各地军政情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对多个内地省政府进行了改组或调整主要负责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改组湖南、湖北、贵州、安徽省政府。其中，湖南省任命张治中等九人为省政府委员，张治中为省政府主席，另任命了省政府委员中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以及省政府秘书长的人选。在湖北省，任命何成濬等九人为省政府委员，何成濬为省政府主席，并任命了省政府委员中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以及省政府秘书长的人选。在贵州，任命原实业部长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在安徽，任命蒋作宾、端木

恺、刘复为省政府委员，蒋作宾为省政府主席，端木恺、刘复分别兼任了民政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104]。

四川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国民政府的处置颇费周折。抗战爆发伊始，军事委员会即委派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不久命令刘湘率领川军出征，经调往抗日前线的川军就有六个集团军，合计单独出川附于其他国军的独立师、独立旅等，共约12个军以上。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11月初设司令部于南京锏银巷川康绥靖公署驻京办事处内。嗣因胃病复发且病情严重，蒋介石即将刘湘转至汉口万国医院治疗，另委任陈诚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于刘湘养病期间代行职权。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之后，蒋介石起初拟取消川康绥靖公署，由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川康方面实力派一致反对。为安定局面，蒋介石发布川军高级将领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为秘书长，改任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1939年2月任命张群为新设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蒋介石利用四川各派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于1939年秋免去王缵绪的代理省政府主席，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待到国民党最高当局较稳固地控制川局之后，1940年10月蒋介石辞去四川省主席的兼职，改派张群兼理四川省主席，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

在云南，以省政府主席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既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又对国民党当局有着很强的防范意识。抗战爆发之初，滇军精锐之部便编为第六十军、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1938年底，上述三个军扩充为第一集团军，龙云任总司令，参加过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时国内各大学、文化机关和中央军政一些部门迁入云南，且滇缅路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蒋介石一直试图加强政治控制和军事的渗透。如任命龙云为昆明行营主任，调关麟徵第五十二军入云南，布防滇缅边境，以后又调远征军入滇，在昆明设立防卫司令部。另外，国民党云南省

党部的主任委员虽然是龙云，但实权则掌握在CC派手中。龙云则力图维持战前的割据地位，对在滇中央军政势力加以限制和防范。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龙云与国民党中央当局的矛盾趋于激化，到抗战胜利初始，龙云被解除在云南的一切军政本兼各职。

抗战时期对地方的关系上，国民党中央当局不仅力图整合各地方实力派，此外为了凝聚民心，调动一切力量，共赴国难，同时也为了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在地方各级（即省、市、县）党政关系方面，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在不少地区推行了新县制。

抗战前半期，国民党中央在不断加强对地方各级党部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推进地方各级党政关系的调整工作，以期达到“以党渗政”的目标。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指出：“回顾数年以来之党务，缺憾殊多，而党政关系，亦往往未臻圆满，若复讳疾忌医，将何以图振奋而尽职责。诚欲增强抗战之力量，必先整饬领导抗战之机构，而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乃为急不容缓之图。”“调整党政关系之原则，（1）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2）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3）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与政的形态。”(105)

关于地方各级党政关系调整的大致方案，《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规定：省党部层次，省党部委员会采取主任委员和委员分区督察制。省党部主任委员由国民党中执会特派中执委员一人担任，并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若干人充任省党部委员。“惟在整理期间，其委员可全由中央指派曾经训练之同志充任之”。“除以主任委员驻省经常办理省党部事务外，其余委员必须按区分派担任督察各该区内所有各县党部之工作，予以指导，并随时报告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与省政府每月必须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出席省政府会议，以收党政联络之效。县党部层次，县党部委员由全县代表大

会选举，并由省党部呈请中央指定其中一人为书记长。“其在整理期间，可只暂设书记长，由中央分配曾经直接受训各同志交由省党部派充之”。“县党部之工作，须绝对受省党部委员常驻该区者之指导与督察”。县政府设地方自治指导员一人，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负责协助县长指导地方自治的筹备事宜。同时增设社会科，直接受自治指导员指导，专司组织、训练民众及筹备地方自治事宜等。各县必须设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由县党部及地方民众团体共选若干人组成。各县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应该进行筹设县参议会，作为设立地方民意机关的准备。同时县党部对外秘密。县政府之预算、决算及其施政方针，须经县参议会通过。在县参议会未成立前则以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代行其职权[106]。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就地方各级党政关系作出进一步调整。其中在省党部层次，规定省党部采主任委员制，委员由中央于省党部执行委员中指定，而主任委员得由中央委员充任。省党部委员得参加省政府会议。在县党部层次，规定将原来的“筹备”一词改为“推进”[107]。此后，国民党中常会又先后制订《省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要旨》和《县各级党政机关调整办法》。

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有关议案，明确地阐释了地方各级党政关系调整的真正目的。其中关于省级党政关系方面，认为“临全大会规定各省党政之关系为‘党政联系’之方式，其所以贯彻之方法，一为在党取主任委员制，以求事权之集中；一为实行党政联席会议，以沟通双方之意思。在前者，主任委员在原则上必须专任，然后可以专心致志以规划党务，推进党务；在后者，必须恪遵中央法令，严格履行，开诚布公，以求党的政策之遂行”。关于县以下各级党政关系方面，认为“就组织言，临全大会所谓县以下各级党部取‘融党于政’之方式者，其真义乃在使党政合为一体，而非欲消灭党的组织与工作也。故今后之县以下各级党部，对外宜改取秘密方式，以加强

其活动力；对内则当力求党员选举、罢免等权之实施，俾能自尊其在党内固有之地位。就训练言，必须使各省训练地方自治人员之工作，实质上即为党的训练工作，即在其他各种训练班中亦均宜加强党的教育，使党与政之在各地确能融洽于一炉，而后训练之目的始达。……就社会工作言，必须选择曾受训练之忠实同志担负县政府主管社会事业之责任，以与党的指示相呼应，而各地方人民团体以及乡镇保甲之工作与活动，尤须由本党发动党员掌握其核心，为积极之推进”[108]。

这样，经过国民党临全大会以来数年的调整，各地“党政对立之现象虽已逐渐消除，而分工合作之效能迄未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关系，仍极疏远而不能融洽一体，同时地方党部对于如何领导民众，推动社会，协助政府，亦未克善尽其职责”。这使得国民党最高当局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依然缺乏牢固的基础。于是，在1941年4月1日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修正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并充实本党基础案》。该议案规定对地方各级党政关系作出了更进一步的调整：省县党部，除了依据总章对同级政府的施政方针及政绩进行稽核外，对其下一级行政机关，应该根据中央颁布或者核定的政令，协助督导并监察其实施。省党部与省政府联席会议，党政双方对于下级干部人员如有不称职，或者违背党政协调原则，以致阻碍党务政令推行者，得互相检举并提出联席会议，予以公同评判并商决处分。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及委员，应该与担任省政府主席、秘书长、厅长及委员的党员划编为一特别小组，直隶省党部实施党团办法。县级层次亦依照同样办理。省党部对担任下级行政职务的党员，得调查登记并考核其工作。被调查考核的党员有报告工作概况及答复查询的义务。还规定：省县各级党部应该随时考核党员的工作与能力，每年选拔优秀党员汇报上级党部，经审核后发交政府任用；应该悉心访询党外人才，向上级党部负责保荐等[109]。可见，自抗战爆发以来，地方党政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未能充分合作，使得在地方层面效率低下，影响了中央政权关于抗战

的一系列方针在各地尤其是基层政权的贯彻执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一直到抗战爆发，其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是“省庞大而县弱小，县以下则尤空虚，致有宝塔倒树之讥”[110]。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相持阶段，迫切需要有效动员各地一切资源，贯彻执行抗战建国的既定方针。同时，由中央政府部署乃至掌控县级行政机构的调整，也有助于制衡地方实力派的离心倾向。以推进地方自治之基础为名义的新县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开始实施的。1938年4月8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案》，提出在保甲制度基础上重新确立县以下党政机关关系之原则。1939年1月26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改进县以下党政机构之实施案》，决定在四川、陕西、贵州、湖南、江西等省开展推行新县制的试点工作。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10月，行政院又拟订《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原则三条》，下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包括县政府组织规定、县参议会设置以及保甲制度等几个方面。

关于县政府组织方面，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的规定，县设县政府，置一人为县长。其职权有：受省政府监督，办理全县自治事项；受省政府指挥，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县政府设置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地政、社会各科。县政府配置秘书、科长、指导员、督学、警佐、科员、技士、技佐、事务员、巡官。县政府还设县政会议，每两周开会一次，议决事项有提出于县参议会的案件、其他有关县政的重大事项[111]。可见，国民党中央及省政府对县政府实际控制的局面没有多少改观。

关于县参议会设置方面，按照《县各级组织纲要》的规定，县设县参议会，参议院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产生，“每乡（镇）选举一人，并得酌加依法成立之职业团体代表为县参议员，但不得超过总额十分之三”。县参议会暂时不选举县长，而县参议会议长则以由县参议会自选为原则[112]。1941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县参议员选

举条例》和《县参议会组织暂时条例》。按照两个条例的规定，在县参议员产生的办法上，与《县各级组织纲要》中的规定相同，参议员的任期为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县参议会的职权有：议决完成各项地方自治事项；议决县预算，审核县决算事项；议决县单行规章事项；议决县税、县公债及其它增加县库负担的事项；议决县有财产经营与处分事项；议决县长交议事项；建议县政兴革事项；听取县政府施政报告以及向县政府提出询问事项；接受人民请愿事项；其他法律赋予的职权等。条例还规定：县长对县参议会的决议案如果认为不当时，有权退回参议会复议，对于复议结果仍不满意时，得呈请省政府核办。必要时，县长可以亲自担任县参议会主席。后来，许多省份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其参议员由省政府遴选决定。如果临时参议会违反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省政府有权随时解散之。

当时国民政府核定了在18个省实施新县制，其中四川、广西、广东、江西、河南、湖北、福建、浙江、甘肃、陕西、云南、青海、宁夏13省在1940年开始实施；贵州、西康、安徽、山东、湖南五省于1941年开始实施。各省实施新县制的基本情况如下[(113)]。

（一）划定县等。各省因情况不同，具体厘定的县等级数不尽相同。如最早实施新县制的四川省，在134个县中，共划分六等，其中一等县25个，二等县38个，三等县33个，四等县28个，五等县8个，六等县3个。浙江、甘肃、陕西、宁夏等也是重新划定六等。广东省则厘定县等为五等，其中一、二、三各县暂仍其旧外，将原有的特三等县改为四等县，另有三个县改为五等县。河南也是重新划定县等为五等，计一等县14个，二等县16个，三等县29个，四等县24个，五等县28个。湖北省重新划分县等为四等，计一等县7个，二等县21个，三等县30个，四等县12个。青海省重新划分各县为六等，其中一等县1个，二等县4个，三等县7个，四等县5个。福建省各县县等仍定为三等，计一等县10个，二等县25个，三等县29个。云南各县原分三等，也没有变更。

（二）改组县政府。各地县政府所设机构名称基本统一，所设机构数根据县之等次及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如四川各县设民政、财政、军事、教育、建设五科，教育不发达的县合并设置教建科。广东省一、二、三等县均设民、财、教、建、军五科，四等县设民、财、教、军四科，五等县设民、财、教三科，通常社会科事务归并教育科办理，建设科事务归并财政科办理，军事课事务归并民政科办理。江西省各县均设民、财、教、建、军各科外，再视具体情况设社会科或地政科。福建省各省设民、财、教、建、军五科，地政、社会不设科，其事务分散于民政、教育科办理。甘肃省各县设民、财、教、军四科，部分县酌设建设科或社会科。青海省一、二等县设民、财、教三科，三、四等县设民、教两科。宁夏省各县设民、财、教、建四科，

（三）调整区署，裁撤无设置必要的区署，改组乡镇公所及办公处，县警察组织通常随县政府与区署改组。甘肃省废除县之下的区署，改设指导员。云南省也废除了区制，扩大乡镇，乡镇公所除设乡镇长、副乡镇长各一人外，另设干事一至二人，书记一人。

（四）划分省县地方财政，这是此次推行新县制的重点所在。县财政收入原则上包括土地税之一部，正副溢额田赋，中央划拨印花税三成，土地改良物税或房捐、营业税之一部，县公产及公营业收入等。各省实际的确认情况有所不同，如陕西将中央补助县地方之印花税三成按每年实收数划拨，营业税按照概算的21％划拨；田赋方面，未办理陈报的县份正赋与附加合计，已经办理者其地税总额的55％留县，43％解省。云南省将全部耕地税划拨县府统收统支，营业税、印花税三成则不拨县。而青海省以往大部分县收入甚少，均赖省款接济，省县财政实际上暂时难以划分。但从整体看，实施新县制之后，多数县的财政状况较以往有更多的保证。

在推行新县制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强化了保甲制度。1939年公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对保甲的编制、机构以及职权作出了具体

规定。1940年1月和8月，又相继颁布《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保甲整编办法》。通过这些法规的实施，保甲制度基本确立起来。该制度主要内容有：设置保办公处，除设保长一名外，还设有副保长一名，下设干事二到四名，分别掌管民政、警卫、经济、文化事务。另通过颁行《防制异党办法》和《国民兵团区乡镇保各级队部组织规程》等，使得保甲组织日趋警察化、特务化；实行保甲组织中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的“三位一体”的制度；推行首席甲长制度；对县以下各级组织机构采行所谓管、教、养、卫四者结合的办法[114]。

此外，推行新县制之后，在设立学校与增加教育经费、建立卫生院、干部培训、整编保甲清查户口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推进。总的来看，加强了国民党中央政权对各地县和县以下行政区域的了解和控制，增强了战时动员和组织的能力，客观上有助于凝聚基础民众的抗日救国意识，对于推进抗战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

(1)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84页。

(2)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87页。

(3)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89、192—196页。

(4)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8年1至6月），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303—304页。

(5)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500、484页。

(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4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30页。

(8)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四册，1938年4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31页。

(9)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四册，1938年4月2日，第431页。

(1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75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1—462页。

(13)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84—488页。

(14)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6—88页。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489页。

(16) 《新华日报》1938年4月4日。

(1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14—115页。

(1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8年1至6月），第345—346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97页。

(2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14—416页。

(2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29—131页。

(22)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7页、第190—191页、第229—232页。

(2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77页。

(2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364页。

(25) 国民党中常会第51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9页。

(26) 《国防最高会议第三次会议纪录》（1937年9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009-1。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51-52页。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52页。

(2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52页。

(30)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2)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1月14日，第15页。

(34)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4年5月，第135-164页。

(3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1月18日，第18-19页。

(36)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第138页。

(3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63—564页。

(38)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下），第502页。

(3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37页；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322—331页。

(4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3期。

(41)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42)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43)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4)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7日、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374页。

(4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四编《战时建设》（四），第476、501页。

(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04页。

(4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6—517页。

(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19页。

(5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23页。

(51)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43页。

(5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四），第472页。

(53)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262页。

(54)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262页。

(55)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116页。

(56)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

辑》第40辑。

(57)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96页。

(58) 蒋介石：《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193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四），第427页。

(5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29—736页。

(6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83页、第786页。

(61)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116页。

(6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33页。

(6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648页。

(6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下），第736页。

(65)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二章，第87-194页。

(6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81页。

(67)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90—291页。

(68) 《国防最高会议第一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1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00.9-1；《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三十九次会议纪录》（1937年12月31日），党史馆藏档00.9-5。另参见刘维开：《战时党派合作的开端——国防参议会研究》，《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国史馆”1998年。

(69)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70)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92页。

(7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06、

486、469页。

(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06页。

(73) 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7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4月8日，第238-239页。

(75)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234页。

(76) 《开会式议长汪兆铭致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202-206页

(77) 《国民参政会资料》，第90—91页。

(78) 邹韬奋：《参政会第一届大会的总结》，《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3页。

(79) 社论：《论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和组织》，《新华日报》1938年4月18日。

(80) 社评：《国民参政会的诞生》，《大公报》1938年6月18日。

(81) 《国民参政会之意义》，《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19日。

(82)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9、106页。

(83)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第117-118页。

(84)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第147—150、254—255页。

(85)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第201—204页。

(8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364-366页。

(8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364-411页。

(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441-506页。

(8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6-178页。

(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9页。

(9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9-180页。

(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710-737页。

(9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787-788页。

(94) 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1962年版，第230页。

(95) 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9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88-189页。

(97) 陈启天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珍稀书籍与手稿图书馆藏稿，第84页。

(98)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98页。

(99)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0)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1) 陈启天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珍稀书籍与手稿图书馆藏稿，第85页。这里的行政院长指孔祥熙，1938年1月至1939年12月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1939年12月蒋介石恢复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孔祥熙继续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102)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3日、9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3) 《国民参政会资料》，第9—10页。

(10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68-69页。

(10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98-99页。

(10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01、481—482页。

(10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21、523页。

(10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29—630页。

(10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96—698页。

(1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44页。

(1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22-423页。

(11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23页。

(113) 《行政院关于各省实施新县政情形报告》（节录，1941年12月），引自《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36-443页。

(114) 林代昭、陈有和、王汉昌：《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470—478页。

第四章　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

第一节　鲁南会战和台儿庄大捷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中国军事最高当局把连接华北与华东两大主战场的山东省与江苏北部地区，划分为第五战区，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主要任务是："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藉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1)] 随着淞沪抗战之全面展开，为阻止华北日军沿津浦路南下，第五战区的地位益发显得重要。同年10月中旬，国民政府改任李宗仁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专门负责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作战。侵华日军也早已看到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际，即令华北日军沿津浦铁路向南推进；攻占南京后，又令华中日军北上，以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这样，中日两军在津浦铁路沿线又展开了一场新的较量。

华北日军侵占平津地区后，随着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开始分兵三路，向中国内陆进击。当时，退出平津两市的第二十九军，集结在天津南部的静海、马厂一带与日军对峙。为加强津浦路北段之防务，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统辖五个军的兵力，在铁路沿线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南侵。

1937年8月中旬，日军第二军第十师团及第十六师团之一部约4万余人在天津附近集结完毕。8月21日起，第十师团主力开始沿津浦路南犯。宋哲元第一集团军作为第一战区右地区队，奉命沿津浦路静海、马厂一带，占领纵深阵地，阻敌南下。至30日，中日双方历经9昼夜激战，中方津浦路北段静海等前进阵地及警戒阵地相继不守，日军进至马厂。9月1日，日军在优势炮兵及空军战机的掩护下，向中方部队全线进攻，战况空前激烈，双方混战至4日，日军攻陷子牙镇、唐官屯，此后继续南攻。为延迟日军南进步伐，宋哲元令骑兵第九师于南运河、子牙河，分别选择要点，实施决堤泛滥，日军攻势受阻。11日，日军一部疯狂而下，中国军队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堵击不及，致使马厂失守，中国部队退至姚官屯。

国民政府根据华北的新形势，判断日军将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向山东境内推进。如日军的目标达到，则不仅使平汉路方面的防御增加压力，而且更有利于日军在青岛方面之登陆。为打破敌人阴谋，必须坚守沧县以北阵地。为此，一方面令第一集团军抓紧构筑阵地，同时又令增援部队编组为第三军团，以增强防御力量。鉴于当时大同已告不守，且平汉路北段之日军也已集结完毕，为加强对津浦路一线军队的指挥，军事委员会单独划出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指挥第一集团军、新成立之第三军团及第六十七军、第二十三师。该战区的具体任务是："在沧县附近固守，万不得已时，亦应在南波、泊头镇、献县之线持久抵抗，最后须在德县东西之线竭力拒止敌人，以待第五战区（山东）兵力之转用。"[(2)]

沿津浦路南下之日军第十师团，在攻占马厂后继续追击，连陷青县、兴济。9月21日起，日军第十师团向姚官屯进攻，并于23日向中方主阵地发起总攻，"姚官屯一带阵地，失而复得达六七次之多"，中方"第四十军折损颇重，不得已，以总预备队第一〇九师接替"[(3)]。24日，姚官屯失陷。为掩护主力后撤，以建立新的阵地，宋哲元曾组织部队逆袭，没能如愿。日军进一步南犯，沧县最终失守。津浦路北

段作战连连失利，南京当局深感忧虑，于25日电告冯玉祥，令第六战区各部队务在桑园、德县以北，“择地固守，拒敌南进，并应集结兵力，力图反攻，以开拓新局”[(4)]。然而，该战区各部队连续战斗之后，疲损交加，已无力阻止日军新的进攻。9月29日至10月1日，日军相继攻下泊头、东光、桑园等地，并进逼德县。10月3日，日军第十师团9000余人进犯德县，中方第八十一师运其昌旅第四八五团负责防守，并等待援军。由于中方增援部队仅有第八十八师一团到达，军队势单力薄，与日军难以抗衡，不得不于5日弃守德县。此后，战场延伸到山东境内。

在德县告急之时，南京当局见形势危急，于10月1日向山东的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及第六战区发出新的指示：为尔后作战便利起见，应以确保战略要地为目的，各抽调有力部队在黄河南岸布防，并构筑工事。第三集团军在长清以东设防，第六战区在长清以西设防。第三集团军还以一部兵力向德县集结，掩护第六战区各部队转移。然而，该军援兵尚未到达，德县已失。10月12日，日军偷渡旧黄河，突破黄河崖阵地，一路追击。次日，日军攻陷平原，韩复榘第三集团军于14日夜退守徒骇河南岸布防，与敌对峙。10月20日，军事委员会调整津浦路沿线之作战，将其划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负责，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改归第一战区指挥，第六战区撤销。同时，军委会训令第五战区，“应确保山东要地，以现在前方之部队担任东海、青岛及胶东半岛各海岸守备，并阻止敌由津浦路南下，以后方部队集结于徐州、商丘一带地区，以策应前方部队之作战”[(5)]，“为顾及尔后状况之变化，应于鲁南一带山地构筑核心工事”[(6)]。

是时，第五战区韩复榘第三集团军主力正部署于徒骇河及黄河南岸一线，而沿津浦路南下之日军兵力亦十分有限：第十师团仅以骑兵与装甲车中队为主的先遣部队一路猛攻，其主力尚未到达；第一〇九师团之主力已西进至深县、辛集，靠近石家庄而远离津浦路，仅川本旅团之一部仍留在沧县附近。见此形势，蒋介石于10月16日向第三集

团军下令："敌人冒险深入，显已犯有战术上重大错误，该部应积极活动，袭敌侧背。"两天后，他再次电示："为确实迟滞敌军前进计，禹城以北之铁路，务必彻底破坏，但敌主力目下已转向晋省，当面之敌，为数不多，希努力加以牵制，并着游击队，积极向其侧背活动为要。"[(7)] 根据军委会命令，第三集团军出动部分军队及游击队对日军进行袭扰，取得一定成效。10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对第三集团军下达如下指示："迭据确报，津浦、平汉两路之敌，大部转用于晋东、晋北后，各仅残余数千人，我为在九国公约开会前，能一新国际视听，并牵制敌人兵力之转用，该集团军应以主力击破当面之敌，进出沧县附近地区，以与我平汉线进出石家庄之第一集团军，相互策应。"然韩复榘奉令后，"以兵力不足为由，对上述任务表现迟疑，一再电呈困难……极尽拖延之能事"，致使贻误战机[(8)]。

11月5日，日军经庆云迂回南犯。8日，由于山西日军已进迫太原城下，津浦路日军解除了后方的顾忌，同时也已集结足够的兵力，于是又开始向南推进，进犯临邑，此后数日连陷无棣、乐陵、惠民等地。韩复榘见事态严重，才慌忙调动军队增援，但在日军优势兵力压制下，已无法扭转被动局面。至13日，日军攻陷黄河下游北岸重镇济阳，直接威胁中方阵地。军委会根据情报，判断日军有越过黄河继续南犯的企图，乃指示第三集团军，应排除万难，以积极手段转移攻势，解临邑之围，争取战争主动权。韩复榘奉令后虽有行动，但又以侧背受到威胁，请准许在不得已时，撤守黄河南岸。当日，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未经请示，即下令黄河北岸各部队撤回南岸固守。韩部炸毁黄河铁桥，中日两军隔岸对峙达40天之久。此间韩部并无积极布置，白白浪费宝贵时间。12月初，平汉路日军已进抵安阳，并以一部侵入山东境内的朝城，威胁第五战区左翼的安全，韩复榘急调兵力防堵。对山东方面偏重西部，忽视津浦路正面防御，军委会曾于11月下旬电令纠正，但韩复榘并未执行。至南京沦陷后，韩复榘的抗战立场更为动摇。

华北日军推进至黄河北岸后，原准备立即渡河南下，但日本军部因抽调二个师团至华中后，担心华北兵力不足，不同意扩大战线。参谋次长曾指示："在现阶段不准备立即使贵军在山东、海州方面进行新的作战，并望避免大概在太原、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南进行大规模的追击或新的作战行动。"10月20日又将部分军队从华北调出后，23日在《临参命第一百三十三号》中更明确规定："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确保大概太原、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北地区，并负责该地区的安定。"同时又命令华北方面军"应尽力集结其兵力，努力整顿军队及恢复战斗力[(9)]。至12月中旬，日本军部根据占领南京后的新形势，为向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同意华北日军继续向黄河以南攻击。同时又给第二军增调混成第四旅团之一部及第五师团之一部。于是，津浦路北段的战事沉寂一个多月后，又重新展开。12月23日晚，日军第一〇九师团之本川旅团突然强渡黄河南岸，并一举袭占周村，进而切断胶济铁路，连陷淄川、博山、莱芜等地。24日夜，韩复榘匆忙弃守济南，移驻泰安。至此，山东的局势急转直下。26日，津浦路正面之日军第十师团，也于济阳一带强渡黄河南岸，逼近济南。在日军的东西夹击下，济南于27日失陷。31日，泰安弃守，韩复榘率第三集团军向鲁西南后撤，司令部退驻济宁。韩复榘部的撤离，致使徐州北部失去屏障，影响所及，青岛被迫于当日弃守。

1938年1月1日起，日军兵分两路向南进犯，于3日攻占新泰、曲阜，4日攻陷兖州、蒙阴，5日又攻陷历山。沂蒙山区就此大部分沦陷。由东河进犯之日军，也相继攻占东平、汶上，并与沿铁路南下日军会合，直逼济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见韩复榘一路向鲁西南山区败退，于1月6日晚向其电示，强调运河是山东省的最后堡垒，而汶上、济宁又是运河前方重要据点，因此必须固守。但韩未派有力部队驻守，于1月11日弃守济宁。日军占领济宁后，中日双方战事告一段落。津浦路北段作战，历时共4个月20天，中方军队伤亡约37，700人，马500余匹[(10)]。就在济宁失守当日，蒋介石召集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军官开会。会上，蒋介石对前段抗战作了检讨，要求各

将官彻底反省，脚踏实地地重整旗鼓。他还指出某些高级将领对抗战毫无决心，“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劣心理”，不但按兵不战，还要拥兵自卫。对此，蒋介石予以严厉谴责[11]。1月24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因违抗军令，回避作战，擅自撤退，贻误戎机，被军事委员会免去本兼各职后枪决[12]。同时，军委会改派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副之，曹福林为前敌总司令，并派员携蒋介石亲笔函去前线传达中央抗战的决心。至此，该集团军的士气有所振作。

日军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没有屈服，日本开始考虑新的侵华战略。它一方面调整侵华日军的编制，同时又给各军下达新的任务。华北方面军的任务是：“确保从胶济沿线及济南经上游黄河左岸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外，以航空部队继续攻击敌国内要地，并应极力充实各部队的战斗力。”[13] 华北方面军早在上年底开始，曾多次向东京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有必要进行徐州作战，占领黄河右岸郑州、开封等据点，以向武汉施加威压。对此，参谋次长于2月3日明确答复：“在胶济铁路沿线方面，现在已占据线或其他方面，均不得越过黄河线进行作战。”华北方面军再次申述需要超越上述范围作战的理由，但仍遭否决，于是在2月5日向第二军发出了确保现占领区并维持安定的命令[14]。

为打破日军大本营之不扩大方针，诱敌北上，蒋介石决定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对津浦路北段采取攻势，而对津浦路南段采取守势。2月6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李宗仁下达电令，命第三集团军主力由大运河西岸向济宁及以北作迂回攻击，并以第二十二集团军由津浦路北正面向邹县、曲阜攻击，同时令李品仙统一指挥津浦路南段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五十一、第五十九军，沿淮河布防，阻敌北犯。根据部署，中方第三集团军以所部第十二、第五十五军向津浦路北段日军发起攻击，双方争夺甚烈。2月12日夜，第三集团军首先渡过运河，分向济宁、汶上攻击，所部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一举占领济宁北关，一部冲入城内，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

是时，与中国第五战区军队对峙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也不甘采取守势，而希望给予一击，打破中国军队的反击企图。2月14日，第十师团大举南犯，一举攻陷界河。蒋介石急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主力分向临城、商丘、蒙城集结待命，后又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随时准备机动至徐州地区参加作战。16日，第三军团围攻蒙阴、泗水，一度突入城内。次日，日军第二军命令第五师团“以一个支队配合向沂州方向前进的第一师团作战”[15]，第五师团片野支队[16]遂由潍县长驱直下，于19日攻陷穆陵关。此后，片野支队与坂本支队合力作战[17]，并继续南下，接连攻陷莒县、日照、沂水，并准备向临沂攻击。临沂守军名为一个军团，实际不足一个军。为阻击南下的日军，第五战区遂急调庞炳勋的第三军团至临沂设防。日军因临沂久攻不下，又调兵增援，加强攻城火力。第三军团伤亡过大，渐感不支。津浦路南段日军为策应北段日军作战，也以第十三师团北犯，接连攻陷定远、凤阳、临淮关、蚌埠等地，此后又乘势强渡淮河，进占怀远要地。鉴于战情紧急，第五战区即令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急驰增援，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也亲临指挥。此时，由江南奉命驰援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抵达合肥，并迅速协同第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向淮河南岸之定远发起进攻。日军迫于压力退回淮河南岸，中国军队占领淮河北岸阵地并与日军隔河对峙。

3月5日，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攻占汤头镇，并企图进占临沂。9日，坂本支队再攻临沂。根据李宗仁司令长官的命令，中国军队对临沂正面日军决定反守为攻，具体采用正面坚守，两翼迂回，抄袭敌后的策略，从3月14日拂晓开始攻击[18]。战斗打响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战，日军因遭中国军队反击，进展缓慢[19]。另一方面，蒋介石急调第五十九军至临沂北郊，协同第三军团对日军展开反攻。日军一再抵抗，不断增援反扑，第一线要点屡得屡失，双方形成拉锯战。16日，双方在崖头、刘家湖、茶叶山一带展开肉搏战，争夺异常激烈。刘家湖失而复得四次，崖头失而复得三次。茶叶山一度被日军占领，旋即夺回[20]。战至17日夜，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被中方部队击

溃，其两个联队几全被消灭，残敌向汤头退却[21]。其后，因第五十九军主力调走，日军又开始反击，双方再次激战，但日军始终未能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与此同时，日本第十师团也沿津浦路方面发动攻势。尽管日本军部在1938年初即做出收缩战面的决定，但侵入山东地区的第二军仍希望继续南侵，为此，它向日本大本营请求："追剿眼前之敌，决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警备后方希望增加兵力。"[22] 得到大本营认可后，第二军即令第十师团向南推进，攻占滕县及附近地区。第十师团于3月初以步兵第三十三旅团为核心，另外还配以炮兵、装甲兵若干，编成濑谷支队。濑谷支队于3月14日开始，向滕县发起攻击。滕县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据点，徐州北面的重要门户。为阻止日军南进，保卫滕县，第五战区把刚从郑州来援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调去防堵。该军来自四川，武器粗劣，环境也尚未适应，但官兵们凭着满腔爱国激情，不畏强敌，奋起抗击。城内守军三个营，在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的率领下，不顾日军大炮和飞机的狂轰滥炸，沉着应战。从16日清晨开始，多次击退日军进攻。17日中午，王铭章以电报给集团军司令呈报城内战况：日军用野炮、飞机从清晨至中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同时又表示决心：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滕县于18日陷敌，守城各团长、旅长及参谋长均先后阵亡，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中弹仆地，仍高呼杀敌，最后以身殉国[23]。

日军濑谷支队在围攻滕县时，另遣其第六十三联队绕道南下，直指临城。第二十二集团军已无力堵截，刚到达临城附近的第二十军团之一部，仓促应战，但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势。濑谷支队攻占滕县、临城后，以第六十三联队第一大队为右翼追击队，沿津浦路向韩庄进击；第二大队为左翼追击队，向峄县进击。支队主力则在临城附近集结。3月20日，日军攻占韩庄和峄县，当天，第十师团向濑谷支队发出命令："须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并警备临城、峄县，同时

应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方面突进，协助第五师团战斗。”[24] 22日，濑谷支队发出作战命令：右翼追击队担任韩庄附近之守备；台儿庄派遣队确保台儿庄附近运河一线[25]，沂州支队于23日出发，策应坂本支队作战；支队主力集结在峄县附近。这一安排，完全不把面前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对于第五战区面临的危急形势，蒋介石十分重视。他一面考虑增调部队，同时又在军事上重新部署。3月20日，第五战区根据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诱敌深入，从东西两面夹击”的策略，作出详细安排。两天后，第五战区下达作战命令，宣布这次作战之方略是：“以一部在运河之线取防御态势，以主力由峄县东南及东北山地侧击南下之敌，聚歼于临枣支线亘韩庄运河间地区。”[26] 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于24日亲抵徐州视察，并令随行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等组成临时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23日晨，第十师团濑谷支队以台儿庄派遣队（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野炮一大队）由峄县向台儿庄攻击前进。中方守军第三十一师奋起迎击，因日军炮火过猛，只能且战且退。当晚，日军推进至台儿庄西北约七公里之北洛。此时，第二集团军由孙连仲指挥的三个师已在台儿庄一带严阵以待。蒋介石也致电孙连仲等，命其对津浦北段轻举暴进之敌实施包围，于微山湖畔歼灭之[27]。次日，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将敌人击退，同时又及时调整部署，准备日军再次攻击。第五战区其他各军，按照预定计划，也主动向日军出击，使台儿庄以北至枣庄间广阔地区，硝烟蔽空，战况激烈。因各军缺乏重武器及空军支援，这轮攻击进展不大。25、26两日，中日两军在沂水两岸亦展开激烈对抗。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出击受挫，被迫撤至河西，庞炳勋第三军团伤亡亦极惨重。27日，日军猛攻沂水西岸的张自忠军，张自忠军两日伤亡2000余人，连同以前在临沂作战，共伤亡达万余人[28]。

台儿庄是中日双方争夺的重点，因相持不下，双方各自一再增加

援兵。为先解决该处日军，第五战区于28日令第二十军团放弃对峄县、枣庄的进攻，主力南进转向台儿庄。由于在台儿庄被困的日军约有一个联队，日军第十师团即令濑谷支队全力投入战斗。30日，被困台儿庄北门的日军乘势向东门区扩张，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巷战，双方都有重大损失。此后，赶来增援的日军凭借优势炮兵与机械化部队不断发动猛烈进攻，与中方第三十一师剧烈巷战，双方反复肉搏，台儿庄城寨虽大部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仍顽强抵抗，不断反击，第三十一师连日作战，伤团长三、营长八，士兵约2000[29]。此时，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开始反攻，并一度冲入枣庄。随后，第二十军团以主力向台儿庄东北侧之日军背后猛攻。战至31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已完全陷入中方部队的包围圈内。因台儿庄方面情势危急，日军第二军令在沂州方面作战的第五师团救援濑谷支队，第五师团遂命坂本支队暂时中止攻击沂州，前往增援[30]。坂本支队星夜赶赴向城、爱曲，企图通过威胁中方第二十军团侧背以解第十师团之围。第二十军团乘势向北反转迂回，遂将坂本支队日军大部投入中方台儿庄包围圈内。此时，被中方包围在台儿庄的日军，共有第五、第十师团各一旅团（即坂本、濑谷两支队）及片野先遣队，连同战车、炮兵等特种部队，其总兵力约4万人[31]。

鉴于增援部队已全部到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根据军事委员会指示，决定从4月3日起开始总攻击。负责堵击的第三集团军越过津浦铁路向峄县、枣庄挺进；担任左翼攻击的第二集团军击退日军猛攻，极力由南向北压迫，并与右翼兵团遥相呼应；担任右翼攻击的第二十军团，除以第五十二军向北攻击被围于爱曲附近之敌外，另以第八十五、七十五军由岔河镇南北之线向西推进。李宗仁亦亲临台儿庄督战。4月3日，第二十军团向日军展开围攻，奉命增援赶到的第七十五军与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也一并投入战斗。4日，中国空军出动飞机27架分两批在台儿庄东北及西北地区投弹支援，歼敌甚众[32]。同日，蒋介石急电张自忠，命其所部第五十九军一面阻止莒县、沂水方向日军前进，一面以三日期限确实封锁台儿庄、临沂及台儿庄、费

县间之交通，以确保台儿庄会战的彻底胜利[33]。4月5日，被第二十军团3个军及第二集团军围困的日军已经死伤累累。坂本支队见大局难于挽回，即开始准备向北撤退。日军濑谷支队被第二集团军三面围攻，被迫于6日晚向北退却，脱离战场。坂本支队见此情形，亦于第二天夜里向北脱离战场。最终，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被歼达2000余人[34]。李宗仁见台儿庄日军已被打败，但临沂方面的日军尚未击溃，所以一方面调兵增援临沂守军，同时又组织力量乘胜追击。

日军濑谷、坂本支队在中国军队急攻猛追下，狼狈而退，撤至峄县附近才停脚集结。台儿庄战役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所遭受到的最惨重的失败。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凭借其先进武器及机械化装备，向中国守军一再发动猛攻，但在第五战区各部将士奋勇抗击下，终被打败。台儿庄战役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第二节　徐州会战

徐州是连接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通枢纽，为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之际，侵华日军为打通华北与华中占领区而从南北两面向徐州发起攻击；中国军队为牵制日军主力，延缓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也在徐州集结兵力阻击日军的进攻。于是就发生了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徐州会战。

早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部署全面抗战之时，即把苏北和山东作为重点防御地区，将该地作为第五战区，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的主要任务是“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一旦有敌军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35]。其后，为加强对该战区之领导，又改任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南京沦陷后，正面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第五战区防止敌军从海上登陆的战略已经失去意义，军

事委员会重新划定第五、第三战区的作战地境，由淮河-洪泽湖南畔-淮安-老黄河一线南移至长江之线，并将江北原属第三战区的三个集团军划归第五战区的战斗序列[36]。当时估计，日军占据沪宁地区后，其主力之行动有三种可能，而“略取徐州，沟通津浦路窥伺陇海路，威胁武汉”[37]，是其中之一种方案。为此，徐州的战略地位比抗战初期更为重要。

军委会给第五战区制订的作战方针是：“为阻止侵入之敌，粉碎其打通津浦铁路之企图，将区内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并用刚性及柔性之战法，展开全面作战……与敌持久抗战，博取最后之胜利。”因该战区所辖地域广阔，为便于指挥，再划四个分区，配备必要的军队：山东全省（除青岛市区）为第一分区，以第三集团军为基干；江苏全省（除江南）为第二分区，以第二十四集团军为基干；安徽全省（除江南）为第三分区，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基干；河南及湖北各一部为第四分区，暂不派基干部队；另外再以海军陆战队为青岛守备队，第三军团为东海守备队，第二十二集团军为战区预备队[38]。

山东本来是抵御华北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的重要战场，然而负责山东防务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畏敌如虎，为保存实力，抗令避战，终致日军顺利渡过黄河天险，不战而得济南。不久日军又夺取泰安，将战线推进到鲁南运河防线，这样津浦路北段全陷日军之手，中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和战略要地徐州完全暴露在日军攻击之下。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步骤完全被打乱，于是只得临时调兵遣将，在徐州地区部署兵力，准备与日军拼搏。

为粉碎日军打通津浦路计划，蒋介石亲赴前线部署。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召集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团以上军官训话时指出：“现在我军战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津浦、道清两铁路，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占。”接着，他又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再次强调保卫本战区要地之重要性，号召全军要“合力同心，一致杀敌”。军委

会交给第五战区的任务是："须固守徐蚌两要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39] 同月24日，又将作战不力的韩复榘明正典刑。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军心。

日本攻占南京以后，从表面看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日子并不好过。为实行速战速决战略，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一增再增，已经到达16个师团，约70万人[40]，但直到占领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未屈服，战场已开始呈现持久的迹象。日本政府为攻占南京而动员了国内最大的力量，历年储备的战争物资也将告罄；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还有巨大的抗战潜力。日本陆军最为关心的满洲地区，此时仅剩5个师团与实力强大的苏联远东红军相对峙。已经侵占的华北、华中地区，形势也不稳定，重点控制的城市和铁路，亦时常受到中国抗日武装的打击，不得安宁[41]。

面对这些不利形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必须树立适应持久战态势的全盘计划，才能指导下一阶段的战争。为此在1938年1月下旬起草了新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设想从政略和战略两个方面，把对华战争逐步导入持久战态势，以等待国际形势出现新的转机。《计划大纲》的战略指导大致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行"对华消极持久战"，在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尽量减少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消耗，以加强对苏中两线作战之准备"。具体分三项：一、"迅速完成进攻广东战略，同时平定黄河以北残部，尔后转为彻底收缩的态势"；二、"建设守备所需要的新军"，换回目前在华之日军；三、"为节约兵力，在当地构筑坚固的城堡"[42]。这一计划在陆军省部间几经协商，初步取得一致意见，并由1938年2月16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御前会议对在华日军的任务明确作出规定："确保在中国已占领的地区（包括华北方面的津浦线以西直到黄河一线），并期望其安定，同时完成对苏中两国作战，作为军的实质的整备，对第三国尤其对苏联须严加警戒。在情况允许之前，对上述战区不要扩大，更不要进行新区的作战。"在华北方面，"确保胶济沿线，并向济南上游黄

河左岸一线继续作战，尔后大概在确保以上两界限以北地区的安定外，对敌人后方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华中方面，“在与海军配合确保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外，对敌人后方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其中特别指出：“济南、浦口铁路沿线（津浦线），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作战面。”[43] 根据御前会议决定，日本军部对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与基本任务重新作了调整。

对于暂停攻势，收缩作战面的计划，侵华日军并不赞成。早在攻占南京之初，华北与华中的日军都希望打通津浦路，把南北两块占领区连接起来。尽管计划没有得到批准，但南、北两军都有部队超出了预定的作战区域。

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驻在南京附近的长江北岸，见苏北及安徽地区的中国军队活动积极，要求攻击凤阳、蚌埠附近之敌，以策应华北第二军在山东的作战。得到批准后，该师团即沿津浦路北上，向凤阳、蚌埠发起攻击，其目标当然是徐州。

在山东的日军，不顾军部的阻止，不断向南推进。至3月中旬，又以“追缴眼前之敌，决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借口，取得大本营赞同后，即以第五、第十两个师团之部分主力，孤军南下，企图夺取台儿庄，控制大运河，以为攻击徐州作准备。但这两支骄横的日军，在临沂和滕县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接着又在台儿庄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伤亡惨重，被迫败退。日本陆军当局大为恼怒，认为这次战斗败坏了日本军队的传统，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长被革职，并编入了预备役[44]。

华北日军见濑谷支队在台儿庄被围困后，一方面组织营救，同时又再次请求大本营，希望立即发动徐州作战。其理由是：“第二军的作战，始终是基于屡次报告的方针进行指导的，但与优势之敌已近于接触，形成对敌之所谓决战攻势，不能不予以迎击的形势”；“倘使敌人断然自由运用其兵力，很可能机动地对我进行各个击破”[45]。日

本大本营是在战局不扩大方针下批准这次作战的。遭到台儿庄战役失败后，日本军部心犹不甘。接到台儿庄附近有大量中国军队，特别还有中央军主力的报告时，认为这是给蒋介石的主力一大打击，挫伤其抗战意志的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进行徐州作战。

实施徐州作战，即意味着放弃收缩战面的计划。对日本军部来说，进入持久战态势毕竟是被迫的，如能通过速战速决方式即可解决对华战争，那真是求之不得。因此，为扩大这次作战的战果，大本营还决定把原定于明年进行的武汉作战，提前到徐州作战结束后立即进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4月3日内定实行徐州作战后，当天即向现地军队传达，并召回现地军的参谋，研究作战细节。4月7日，正式下达徐州作战命令，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一部有力部队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击败上项徐州附近之敌，并占据徐州（包括在内）以南的津浦线及庐州附近”[46]。

为协调南、北两军作战，日军总参谋长还在《大陆指第一〇六号》命令中，下达了《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对这次作战作出具体部署：担任主攻的华北方面军约以四个师团兵力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从北面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华中派遣军以两个师团兵力，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以及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华中派遣军占领徐州及以南的津浦线和庐州地区。为协调好南、北两军作战而不至发生矛盾，参战部队由大本营直接指挥。为此，派出以作战部长桥本群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于4月中旬前往济南[47]。

在日本方面策划徐州作战的时候，中国军委会及第五战区也在加紧保卫徐州的部署。至1938年2月，第五战区共有13个军29个师又一个旅，合计兵力约28.8万人，但其中大部是地方部队，装备差，战斗力弱。如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两个军，来自川西，枪械半为土造。该军出于大义，东进抗战，因装备太差，第二战区和第一战区都

不要，最后被李宗仁收留[48]。按照当时常规武器的配备，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力，约等于中国二至三个军。第五战区的部队，可能还要差一些。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军委会及时调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增援第五战区，使华北日军的两个支队遭受重创后被迫后退。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进一步提高了正面迎战日军的信心。他认为："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忿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49]于是，军令部立即拟订计划，"调后方已整理之部队及他战区可抽调之精锐部队，迅速集中于第五战区方面以求与敌决战，同时第二战区利用优越态势极力反攻收复晋省，第一、三战区相机反攻以牵制敌人"。按照这一计划，先后从武汉、第一、三战区及广西等处抽调近20万军队至第五战区，在徐州附近集结[50]。

4月10日，担任主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拟订出作战指导方案，准备"在徐州附近及津浦线以东吸引住敌之大部兵力，从徐州西面及西南面包围，切断退路，攻占徐州，歼灭敌人"。具体部署分三期：第一期，迅速给第二军增加必要的兵力，"在韩庄、峄县、沂州一线将敌扣住，尔后准备攻击"；增加的兵力有第十六、第一一四两个师团及战车、野战重炮兵等；华中派遣军"按商定以一部迅速从淮阴方面向西北方前进，占据有利地形，将敌牵制在徐州东南地区"。第二期，第二军准备完毕后，于4月下旬以有力兵团从微山湖西侧急袭南下，切断徐州以西及西南面中国军队之退路，配合华中派遣军将徐州包围，攻占徐州，歼灭中国军队；第一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从兰封附近渡过黄河，急速切断陇海铁路之交通。第三期，维护徐州及兰封以东地区的安定，确保津浦铁路之交通[51]。从4月12日开始，华北方面军连续下达命令，准备发起攻击。

为协调南、北两军的行动，日本大本营派遣班于4月17日在济南召开关于徐州作战的碰头会。会议就作战目的、行动时间等主要问题

进行磋商。对于这次作战是歼灭中国军队为主，还是占领要地为主问题，南、北两军有不同意见，最后以华北方面军关于“作战最终目的是攻击徐州，消灭敌人是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的提法为行动准则。关于作战时间，因各军情况不同，难于统一，大致从4月16日发动，总攻击约在5月15日左右开始。第一军还在会上提出了希望发动对开封、郑州方面作战。

日本华中派遣军为准备徐州作战，根据碰头会上商定之事项，于4月24日制定会战计划：决定以第九、第十三师团为主力，同时向蒙城一线推进，然后视战场情况的变化，向左右两面包抄；第一〇一师团向苏北之东台、阜宁，第六师团向安徽之庐州方面进击。各部于4月下旬集结，迅速开赴作战地区[52]。

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华北日军于4月中旬首先发起攻击。在台儿庄战败后撤的第十师团，经休整补充，增强兵力后，于4月18日再次向台儿庄攻击，遭到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和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各部的顽强阻击。22日，日军全线大举南犯，中方部队被迫向台儿庄东北一带转进。中方第六十军在台儿庄以东之线，左右联系第五十一军、第二十军团共同阻敌，徐州东北情势方得以稳定。此时，津浦路南段日军又大肆增兵，企图北进，给第五战区造成巨大压力。李宗仁遂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抽调两个师开赴怀远一带集结，以巩固南侧防线。日军第五师团以步兵第九旅团为骨干组成的国崎支队于4月19日占领临沂后，继续向南攻击，但遭到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等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从4月28日起，双方激战三昼夜，日军受到重大创伤。

5月1日，军委会根据新的形势，拟订出徐州会战指导方案。方案首先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集中兵力打通津浦线，并求击破我军主力，以达速战速决之目的。”日军调动的兵力有四种可能：仅以现有鲁南兵力继续攻击；再抽调其他战场兵力，仍由鲁南攻击；抽调更多兵力，孤注一掷；同时在淮南方面发动助攻。我军作战方针是：“以阻止敌打通津浦路之目的……行攻势防御。”如敌大举增

兵，“则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同时在武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力，准备诱敌深入与之作战”。具体要领是，对第一种可能，以现有兵力“迅速击破之”；第二种可能，再增兵力，“行攻势防御”；第三种可能，以现有兵力为限度，“避免决战”[53]。这一指导方案，实际上已改变大量增调军队的初衷，不准备在徐州与日军决战。因为徐州的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四周是平原地区，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空军作战。如以劣势装备与日军打大规模的阵地战，极有可能重蹈淞沪战场的覆辙。

进入5月之后，南北各路日军都开始行动，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六师团之一部，于4月中旬从芜湖渡江北上，沿巢湖右侧攻击前进，于5月14日占领庐州（今合肥），为华中派遣军主力北上解除了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第一〇一师团之一部从苏北东台出发，连陷盐城、阜宁，使徐州守军的后背受到威胁。华中派遣军主力第九、第十三师团由凤阳、怀远向北进击，于5月9日攻占蒙城，中方守备蒙城之第一七三师周元副师长以下约七百人全部殉国[54]。同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十六师团由济宁南进，向中方第三集团军巨野之线阵地进犯。第十四师团亦开始向濮县移动，试图越渡黄河，南犯鲁西。徐州地区情势日益紧急。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战况发展，特变更第一、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境，两战区以亳县、黄口、沛县、夏镇各东侧附近之线为界，同时令第三军团、第三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指挥，第一战区所辖之第八、第七十四军则向砀山、商丘间集中[55]。此后，鲁西方面之对日作战统归第一战区指挥。13日，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占领徐州西南的重要门户永城和百善。14日下午，日军占领砀山以东的汪阁，炸毁铁路桥，切断了陇海线。5月15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始向徐州南方门户宿县攻击。日本第十六师团经过激战，于5月17日占领丰县，第十四师团连陷郓城、菏泽、曹县，并由内黄进攻兰封，切断了第一、第五战区之间的联络。在徐州正面的第十师团，夜渡微山湖，于18日占领沛县。至此，各路日军对徐州的包围态势已经形成。

鉴于华北、华中日军已在陇海铁路沿线会师，第五战区近60万大军已陷于重围。5月15日，军委会在汉口最高军事会议上做出决定：避免决战，放弃徐州[56]。李宗仁根据战场实况，于次日决定撤离徐州战场，各军分头向包围圈外转移。具体安排是：以张自忠指挥的第五十九军等部分军队在郝寨、萧县等地阻击日军，掩护主力行动。其余各军的行动方案为：以第二、第二十二集团军等组成鲁南兵团，由孙连仲为总指挥，守备徐州，掩护大军撤退；以第二十军团等部组成的陇海兵团，由汤恩伯为总指挥，向西南的亳县、淮阳一带转移；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等部组成的淮北兵团，由廖磊为总指挥，由宿县向颍上、凤台方向转移；由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组成的淮南兵团，由李品仙为总指挥，确保官亭、舒城、怀宁之线；以第二十四集团军为苏北兵团，由韩德勤为总指挥，确保淮阴、东海一带；由第六十九军等组成的挺进军，在费城附近的鲁南山地，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57]。

在第五战区各军分路撤退之时，日军迅速向徐州合围。5月20日前后，日军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分别从沛县、丰县向徐州合击；第一一四师团从津浦路以东地区向徐州进击；第九、第十三师团攻占萧县后向徐州挺进；第三师团攻占宿县后沿津浦路向徐州合围。5月19日中午，徐州失陷。当日，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将徐州一带火车、机关车全部毁灭，以免为敌所用[58]。此时，中国守军的主力已经全部转移，驻守徐州的鲁南兵团亦已分两路从徐州西南和南部突围。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及陇海兵团之第二十军团等，从宿县分头向西和向太和、阜阳等方向突出重围[59]。在包围圈内数十万大军成功地实行战略撤退，从而使日军统帅部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

徐州会战是淞沪会战后中日两军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由于中国军队广大将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尽管最后没有能够阻止日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但已经消耗了日军的力量，

迟滞了日军西犯的日程，为后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第三节　武汉保卫战和武汉失陷

武汉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长江、汉水相望，恰成鼎足之势，又当平汉、粤汉铁路之要冲，其水陆交通十分发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从抗战全局看，武汉地区是联接华北、华东、华南战场的枢纽，亦是重要的后方基地，同时也是西南大后方之屏障。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更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行都。国民政府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大部分迁入武汉，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卫生署及经济委员会等也都在武汉办公，国民政府的首脑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等均云集武汉。此外，武汉还是国共两党合作联络的所在地，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武汉[60]。日本当局企图通过攻占武汉，摧毁中国的抗战中枢，迫使国民政府彻底屈服。

武汉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其地理位置却不适宜现代战争的战略防守。主要原因是，近郊无险可守，中间隔有大江，四周杂以湖泊沼泽，无法持久防御。为确保武汉不失，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认为，“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提出了“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61]。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之际，军事委员会便确立了以保卫武汉为中心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明确提到：“国军以确保武汉为中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南、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具体计划是，把武汉周围的重要地区划分为南段、北段和中间三条决战地带，并在江南的九江附近和江北的鄂皖豫交界山区设前进阵地。决定增强湖口以西至武汉的

各处要塞，由江防总司令统一指挥；调20个团守备武汉，并新设武汉卫戍总司令；交通方面，修筑武昌至长沙以及通往其他各省的公路；通信方面，为防止日机炸断武汉水线，预先架设联接南北的通信网；后勤方面，以粤汉路北段、平汉路南段为基本补给线，储备足敷三个月之用的弹药粮秣[62]。当时蒋介石本人也对守卫武汉充满信心，1938年1月26日他对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发表谈话时特别强调指出："长江方面作战军力虽经京沪之大损失，至本月底，整理补充约可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七；晋方兵力经过近来两月来之整理补充，已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八，再经过两月，均可完全恢复，武汉当可固守，如日方不能增加生力军至十师团之众，将无法夺取武汉。"[63]蒋介石还下令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以陈诚为总司令，并接连发出指令，限期构筑野战工事，随时报告进展情况。

日本军政当局也很清楚武汉的战略地位，因而早已把攻占武汉列入其侵华计划，但中国军民的奋勇抗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攻占南京后，日本国内可以调动的兵力和战争物资已接近极限，于是被迫考虑暂时休整。1938年1月20日，日本战争指导当局起草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中，准备在1939年下半年或1940年再开始攻击武汉。其作战方案是：沿平汉线及长江两岸，从三面向武汉分进合击，其用兵规模约20余个师团，相当于1937年的攻势[64]。然而这一消极持久战计划不久即被现地日军所打破。华北方面军在台儿庄战役被中国军队击败后，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决定立即实施徐州作战。夺取徐州打通津浦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整个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并与攻击武汉作战密切相关。因此，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在策划徐州会战的时候，决定把攻击武汉也提上议事日程。

徐州战役发动后，日军于5月19日占领了徐州，但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全部转移，双方未发生正面的冲突。为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占据兰封、归德、永城一带，并准备以后的作战"，为此解除原设作战地界的限制[65]。5月28日，又向第二军

下达了进入开封东南地区的命令。东京方面看到日军在越过规定的作战区域后，仍没有中止行动的迹象，于29日作出决定：“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同时又划定了南北两军的作战界线。但华北方面军不顾日本大本营的决定，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拨给第二军，并下达向兰封以西追击的命令：“敌主力有开始向京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京汉线”[66]。日军一路西进，于6月6日占领开封，次日攻占中牟，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京汉铁路线。为阻止日军继续西进侵占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等人提议炸开黄河堤防抵抗日军，这一提议上报不到一小时就获得蒋介石的批准[67]。6月11日，花园口、赵口的黄河大堤被完全炸开，洪水形成数千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中牟地区17个县成为泽国，140万灾民无家可归。受此影响，西进日军被围者甚众，日军海空军对被围部队实施全力救援。6月16日至24日之间，日本空军“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六十一吨半”[68]。此外，已进至河南新郑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一个支队由于后路被洪水切断，全部被中方部队消灭[69]。黄河的决堤，使日军第二军被迫放弃沿陇海路西进再沿平汉线南下的计划，转而南移至合肥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分沿大别山以北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向西作并行攻击[70]。

1938年6月3日，日军第二军以其第三、第十三两师团由蒙城南进，连陷凤台、寿县、正阳关等地，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由于寿县、正阳关一带黄泛水位逐日升高，日军于6月下旬转移至蚌埠、庐州，准备掩护其主力到达。长江方面，日军以停泊在大通江面之海军第三舰队，掩护其第十一军波田支队，于6月12日登陆安庆以东六百丈之长江下游附近。同日，日军第六师团由合肥西进。中方守军不敌，舒城、安庆先后失守。13日，日军占领桐城，17日又占领潜山，中方第二十七集团军被迫退守潜山西北猫儿岭至太湖一线，与日军展开对峙。

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后，又在其海军的配合下，于6月24日向中方的马当要塞发起进攻。为阻抑日军攻势，中国海军于6月4日开始，即在马当要塞前后及东流方面加布水雷，增强防御力量[71]。陆路方面，防守马当要塞的中方部队不畏牺牲，在藏山矶与日军展开白刃搏斗，伤亡甚重，加之弹药用尽，渐形不支[72]。26日，日军继续发动攻势，然而却屡攻屡败。情急之下，日军施放毒气，中国守军中毒者极多，日军乘机实施包围，马当要塞守军第二总队牺牲四分之三，各中队长、队副大部均壮烈殉国，第三总队第三大队牺牲三分之二，大队长、队副各一员，中队长、队副各二员为国捐躯，士兵伤亡甚重[73]。当日，马当要塞陷敌，要塞司令王锡焘失踪[74]。此后，日军波田支队在飞机、海军陆战队和骑兵的支援下继续西进，于29日攻占彭泽。7月3日，日军向湖口进攻，并于次日在湖口附近强行登陆，遂与中方第二十六军主力展开激战，湖口炮台多被轰毁，湖口也于7月5日陷敌。此后，中方第十八军及王东原所部两个师，虽曾向彭泽、湖口反攻，但因缺乏重武器支援，未能奏效。马当、湖口战斗期间，中国空军以汉口与南昌为基地，连日出动轰炸机或战斗机一架至十数架不等，攻击安庆至湖口间之日本军舰，予以重创[75]。

日本内阁在徐州会战期间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5月26日，近卫文麿宣布改组内阁，更换了外务、陆军等四个大臣，同时又设立了五相会议制度。这次改组，主要是集中内阁的权力，协调军政之间的矛盾。6月18日，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76]。具体部署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占据前进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关于确保占据区域安定之现行任务。……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牵制敌人于北方。”[77] 根据大本营陆军部要求，近卫新内阁集中力量研究实施武汉作战后的对华政策，以统一内部思想，力争在年内实现战争目标。7月份，五相会议连续举行，分别对确立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逐步转向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轨道，接受第三国调停等问题进行研究，制定了一批内容详尽的侵华方案。

如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屈服，即制定了两套对策。当中国政府屈服时，将其作为一个政权，“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如不屈服，“帝国须更集中国力，即以作战、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国家之全力，使现中国中央政府灭亡或屈服”[78]。

在日本政府看来，只有重庆国民政府停止抗战，侵华战争才能结束。因此，近卫内阁把汉口作战期间对重庆的谋略放到重要地位。7月26日，五相会议决定设立直属内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79]，专门负责对华谋略。为统一部署作战指导、对华谋略以及国内的军需动员，以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7月31日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的时间间隔”；“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广东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在政略指导方面，提出在攻击汉口前以及在攻击广州后，会捕捉到诱降停战的机会，“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80]。

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开始调兵遣将，整备进攻武汉的兵力。7月4日，日本大本营变更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的战斗序列，将第二军划归华中派遣军指挥，以东久迩宫为司令官，下辖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同时又编成第十一军战斗序列，任命冈村宁次为司令官，下辖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第三师团和波田支队。此后，第九、第十八、第二十七、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一一六师团及航空兵团也陆续编入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81]。经过调整，日本全国陆军共34个师团，除2个留在日本国内，9个安排在朝鲜、满洲地区对苏备战外，有23个师团部署在华北与华中，其中华中兵力更达14个师团之多[82]，日军攻击武汉的作战态势逐渐完备。对于汉口作战，日本陆军部早在4月初即派员着手研究。至5月底，方

案已趋于成熟，其要点是：先占领安庆，建立机场及后勤补充基地；新编成的第十一军担任长江沿岸作战；第二军担任淮河流域作战。7月14日，编入华中派遣军各部先后进入预定地域，派遣军发出《中支作命甲第一号》，令各部于次日起进入临战状态，并给各军增配了野战炮兵、高射炮兵、工兵等机械化部队[83]。

汉口作战是日本陆海军的联合作战，7月3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同日本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签署协同作战备忘录。双方约定："华中派遣军以第十一军由扬子江方面，以第二军由大别山麓方面进行作战，在攻占武汉地方要地同时，尽可能大量消灭敌人。在此期间，航空兵团进行空中作战"；"中国方面舰队以第三舰队进行扬子江的溯江作战，在击败当面之敌的同时，占领水路，协同陆军攻占武汉；在此期间，航空部队进行空中作战"[84]。根据这一协定，担任主攻的第十一军与海军第三舰队、陆海军航空部队间也互相协商，确定合作的细节。如陆军航空兵团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在"作战协定"中规定："航空兵团主要协助第十一军，以一部协助第二军作战，同时抓住良机摧毁敌人空军战斗力量，并攻击要地"；"第二联合航空队以消灭敌人航空兵力为第一义，经常、毫不松懈地压制敌人，同时积极协助陆海军溯江部队，以最大努力攻击敌要地，直接或间接协助和策应陆军作战"。航空兵团出动3个飞行团，侦察、战斗、轰炸机共223架；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各种飞机174架，另外还有36架水上飞机和30架远程轰炸机协助攻击[85]。

按照日本大本营的统一部署，参与汉口作战的各路日军于7月中旬开始逐步向预定地点集合，分头向武汉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军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四个师团集结在安徽的庐州附近；第十一军的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等师团则溯江西上，向黄梅、九江攻击，并于7月26日攻占九江。此时，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与苏联红军发生冲突，引起日本大本营的高度重视，汉口作战一度被推迟。8月中旬日、苏双方各自妥协，事态逐步平息后，日本大本营于8月22日

正式发出向武汉进攻的命令："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陷并占据汉口附近的要地，在此期间务须大量击败敌人"；"华北方面军应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努力牵制敌人"[86]。海军方面也令有关舰队协同陆军攻占武汉。至此，日本的汉口作战开始全面发动。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为保卫武汉，在军事上也做出了积极部署。据王世杰记载，还在6月初武汉保卫战刚拉开序幕时，蒋介石便在6月3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军事前途，今后（第三期抗战）之决战地域将在平汉路以西，大别山脉以北（豫南皖北），至于开封、郑州等地，以在大平原中将不固守，免受无益之牺牲。蒋先生并谓武汉可固守。"[87] 当时军事委员会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共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作战。第五战区负责江北方面作战，以孙连仲的第三兵团、李品仙的第四兵团为基干，辖23个军。长江以北的田家镇要塞部分及武汉卫戍司令部，仍归第九战区指挥。徐州弃守后，李宗仁令孙连仲兵团集结在商城侧击向西进攻的日军，令淮南兵团集结在桐城、霍山、六安等地阻击敌人西进，并指出：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须固守大别山根据地。军委会对江南战区亦发出训令，令第九战区以主力在广济、平靖关一线占领阵地，置重点于武胜关、麻城、广济，待机转移攻势，并派一部于信阳、宿松等要点，协助第五战区制敌西进。另在江防、湘赣边区等处都一一派兵防守[88]。

6月8日，军委会颁发武汉保卫战的总体计划，首先确定这次战役的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具体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在广济和豫南两个方面调派主力，构筑阵地，阻敌西进，再派遣部队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袭扰敌人。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

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在南浔路星子方面、瑞武公路两侧、阳新河以南、通山附近设置重兵，阻敌前进。武汉卫戍部队“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用于第五战区及第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日军向武汉转用兵力[89]。

从6月下旬到7月初，日军接连攻占了马当、彭泽、湖口。中国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应对部署。7月11日，军委会颁布作战指导方针，决定将国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外围地区，尤其是将兵力重点置于长江南北之第五、第九战区，希望通过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泊施行战略持久战，“消耗敌人，以换取至少四个月之时间”[90]。当日，军委会正式颁发了新的国军战斗序列。其中，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域为豫南、鄂北、皖北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白崇禧代）；第九战区作战地域为湖南、鄂南及南浔路以西地区，司令长官为陈诚[91]。由于九江失守，军委会于8月1日又将赣北南浔路方面的作战统一交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同时重新划定第一、第二兵团的作战地境线，为鸡公岭、车轮中间山之线。此后，张发奎第二兵团仅负责九江-瑞昌之线的作战任务[92]。

从8月开始，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部队沿瑞昌至武宁公路西进，妄图切断粤汉铁路，迂回武昌之南。其长江北岸之第六师团则由太湖趋宿松，直逼广济。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军主力则沿淮河以南、大别山北麓，由六安、霍山之线，经潢川、罗山向信阳进军，迂回汉口以北。其一部则经商城、麻城进军汉口，日军舰也携海军陆战队溯江而上。针对日军行动，中方逐次转用50个军，共122个师的兵力，广布以武汉为中心，北自信阳、潢川、固始、六安、霍山、大别山东南麓，南迄德安以北及星子在内，怀抱大别山、庐山的长达500公里的弧形阵地线[93]。同时，中方在田家镇长江两岸构筑江防要塞阻击敌军，并集中空军主力对东流、九江间的日军舰船、沿江机场实施昼

夜轰炸，破坏日军的增援与补给。

长江北岸方面，日军第十一军第六师团一部在海军的掩护下，于黄梅以南的小池口登陆，此后又与其沿江北西进的部队对中方实施两路夹击。中方李品仙第四兵团一部奋力拒敌。鉴于广济、黄梅情势危急，李品仙命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向潜（山）太（湖）展开全线攻击。8月1日拂晓，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九师开始行动，一举占领潜山西侧之黄山头，毙日军大队长奥田新九郎与中队长金子以下百余人。该师另一部亦占领潜山以北之余家铺，双方激战四小时，日军联队长长谷川幸造以下官兵百余人被歼灭[94]。8月3日，黄梅落入敌手。8月下旬，中方部队发起全线反攻，一举规复太湖、潜山等地，日军被迫将后方连络线移至小池口方面，并向广济以东中方阵地猛攻。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阵地被敌突破。为牵制日军的行动，蒋介石于8月28日发出电令：要敌后各部队加紧出击，“各尽最大之努力，督饬所属各游击部队，积极游击，其在北部队，特应向津浦南段不断袭击，策应第五、九战区之作战为要”[95]。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广济最终于9月6日陷敌，中方部队退守界岭第二线阵地及田家镇要塞。田家镇要塞位于广济上游十余公里，它与南岸的富池口要塞隔江对峙，扼控长江航道，“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96]。日军占领广济后，迅即转而南犯田家镇。同时，沿江北西进之日军亦于17日攻陷武穴后，向田家镇进攻。李品仙第四兵团集中三个军兵力，阻击由广济南进之敌，以策应田家镇要塞之作战。由于日军海空火力过猛，加之毒气危害，中方部队苦战旬日，伤亡过重，被迫于9月28日弃守田家镇，重新部署后退至界岭之线继续抗敌。10月初，日军第六师团获得增援，遂兵分二路沿长江向西、向北进犯，并在蕲春、兰溪、黄冈、茅山铺等地登陆，连陷浠水、上巴河、新洲等地，直逼黄陂。黄陂乃汉口东北之门户，为此，蒋介石特于10月24日致电李宗仁，令其指派第五路军最精良部队负责布防，必须尽力固守黄陂[97]。然而由于日军攻势强大，黄陂于次日失守，汉口告急。

长江南岸方面，日军第九师团丸山支队于8月21日抵达九江后，即沿长江南岸西进，并在飞机掩护和毒气配合之下，向中方守军第二十二师马家垅、周家垅、蜈蚣山阵地发起猛攻。蜈蚣山一役中，日军施放深蓝色催泪性毒气，中方伤亡惨重，第八十一师守兵两营中毒，口鼻出血，除三人逃出外，其余均壮烈牺牲[98]。24日，瑞昌陷敌。此时，第一〇六师团开始沿南浔路长驱南下，第一〇一师团则由星子登陆，直接威胁南浔路中国守军后方。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利用庐山据点及两侧有利地形予以日军顽强阻击，双方激战至26日，日军大队长石田道一以下官兵200余人被歼，中方部队亦伤亡重大[99]，星子最终陷敌。此后，第一〇一师团继续沿星子德安公路西进，途中与中方第一兵团第二十九军及第六十六军第一六〇师遭遇。中方守军在隘口街之线建立抵抗阵地，与南浔路正面之乌石门阵地彼此衔接。日军一再强攻，频频施放毒气，均未奏效。9月27日，日军再次猛攻第一六〇师阵地，中方以预备队协同夹击，最终击毙敌板塚联队长、长川少佐以次千余人，生俘十余人[100]。

9月间，由九江西北登陆之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及波田支队沿瑞昌阳新公路西进。7日，第九师团向中方守军第二师正面发起强攻，双方激战至下午，日军仍无所进展。于是，日军开始施放毒气，兼用火攻袭击，中方守军被焚毙及中毒者甚多。同时，日舰40余艘向长江南岸之码头镇、富池口要塞发起猛攻，中方第二兵团沉着应战，数度将敌击退，日军乃施放大量毒气。14日，码头镇失陷。24日，富池口亦告不守。此时，沿瑞昌武宁公路进犯的第十一军主力在白水街一带被中方部队击溃。10月上旬，日军不断增兵，沿长江南岸及阳新、辛潭铺、龙港等处并进。中方部队则在龙港、木石港、三溪口、大冶、鄂城、金牛等地截击，予以日军重创。中方第一兵团以主力向德安以北出击，将日军第一〇六及一〇一师团两部共约四个联队包围于万家岭附近地区，双方激战两昼夜，日军负隅顽抗，不愿缴械投降，遂尽遭歼灭，仅有数百人向西北突围逃窜[101]。中方取得万家岭大捷。10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第一〇一师团突破中方隘口街之线阵地，并于

24日与沿南浔路南进之第一〇六师团会合。此后，长江南岸的中方部队逐次向武宁、通城、岳阳附近之线转移。25日，日军逼近武昌。

大别山北麓方面，日军第二军由于淮河泛滥而行动有所延误。8月10日，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急调第七十一、第五十一军向大别山北麓增援，以补充六安、霍山方面的兵力。27日，日军第二军遵照华中派遣军之命，以其第十、第十三师团分由合肥、舒城向六安、霍山攻击前进，中日双方当即展开激战。28日，六安失守。次日，霍山陷敌。中方守军退至淠河西岸之线。9月初，日军渡过淠河，进犯中方叶家集、富金山阵地，遭第七十一军阻击，被歼甚众。由六安西进之日军第二军一部于9月7日占领固始，威胁叶家集第七十一军侧背。11日，第七十一军被迫放弃叶家集阵地。17日，日军攻陷商城。此后，日军进逼潢川，遭中方第五十九军迎头痛击，双方激战近一周，日军以密集炮火及毒气猛攻潢川南北两城，致使中方部队伤亡重大，潢川亦于19日失守[(102)]。20日，日军继而攻陷罗山。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及时赶到，在信阳以东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不久，日军援军抵达，并猛烈反攻，胡宗南部被迫退守信阳附近。10月12日，信阳弃守。7月至10月间，第五战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兵团共毙伤日军32226名[(103)]。其中信阳一役，日军被击毙者达550人，受伤者达1560人[(104)]。

日军占领信阳后，其以钳形之势围攻武汉之既定目标大体实现。10月24日，长江南岸日军波田支队之先头部队已经越过巴铺，逼近武昌以东约二十公里的临葛店。25日，长江北岸日军第六师团在占领汉口以北之黄陂后，随即联合陆、海、空兵力，并在战车及重炮的配合下，向汉口外围发起猛攻。当日，日军战机在长江汉口以上、城陵矶以下全港道更番搜索，轰炸几无停息，中山、楚谦、楚同、勇胜、湖隼五舰在不同时间、地点与敌机发生遭遇战。战斗过程中，中山舰受伤沉没于金口江滨，该舰舰长萨师俊中弹牺牲[(105)]。陆路方面，第六师团一部进至汉口以北约四公里之戴家山对岸。入夜后，其佐野支

队一部又突入汉口市区一角[106]。是时，武昌外围之中方部队均已开赴金牛前线。武昌城内之守备部队，仅有第一八五师之第五四五旅及警卫团，高射炮大队之第三连、宪警一部。由于中方兵力单薄，日军波田支队得以轻易突入武昌。

9月初，即武汉保卫战进行了三个月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主张坚守武汉的，强调中国军队坚守武汉具有战局本身之外的重要意义："我军固守武汉之作用，重在第三国之调停与国际之变化也。如能固守核心三月，则我南北野战军整补就绪，又可在武汉与敌持久抗战也。"为此，他甚至考虑到了在武汉地区与日军进行"最后决战兵力与武器之准备"[107]。还一度认为"转守为攻之时机已到。决心全力加强武汉核心工事，搜集一切材料为要"[108]。甚至到10月3日，蒋介石还亲自"检阅汉口核心工事"，认为"工事坚强，更觉保卫有把握也"[109]。但是，到了10月13日即日军登陆广东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决定应当收缩武汉附近的防线："倭在粤登陆，我军在武汉附近之战线应重新部署。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之持久，一面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110] 他认为："广州既失，武汉已无保守价值，而且敌得广州，更陷于被动，不能不更向我求和也，武汉之得失固无足重轻也。"[111] 蒋介石还权衡了继续固守与弃守武汉的利弊得失："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112] 也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从10月中旬起，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开始逐步从武汉撤退，至10月25日已全部撤出武汉。同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局势无法挽回，遂下令各部转移，自动放弃武汉[113]。26日，日军占领汉口、武昌。27日，汉阳失陷。

此后，第五战区各兵团向平汉路西侧地区转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张发奎部则沿粤汉路南移。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声明政府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

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并号召全国同胞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争取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解放[114]。

武汉保卫战虽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而告结束，但在安庆失守以后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中国政府以江淮流域的鄂、豫、皖、赣四省的广大地域为战场，采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115]，投入120多个师的兵力，步步阻击日军西犯，给日军以有力打击。日军为实施这次会战，共投入12个师团，总兵力达40万，并造成重大伤亡。据日军自己公布的数字，在武汉会战中共死伤21380人，其中军官698人。此后，侵华日军已经没有力量再组织大规模的攻击战，被迫转入持久战的态势。而中国政府在这四个多月时间里，得以把沿江地区的重要工业设施迁往四川和西南各地，为进行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武汉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四节　华南作战和广州沦陷

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日本早有觊觎之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需要集中力量夺取华北和华中要地，尚未顾及到对华南的侵略。在发动武汉会战之际，为给中国政府以更大的打击，日本陆海军互相配合，又发动广州作战，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华南。

中国政府早在淞沪会战之初，即考虑到日本有可能把侵略矛头扩展到华南地区，所以在总体战略上已有所安排。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和《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中，明确把广东和福建两省划为第四战区，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任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海陆军之扰乱，完全战备”[116]；“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

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117]。当时，大本营把第一期作战的界限划分到当年10月下旬，因此要求第四战区准备参加11月以后的对日作战。这一计划的依据主要是对敌情的判断，认为日军主攻方向是在华北和淞沪地区，“闽粤方面，敌军以海空军扰乱，或在所难免，如用陆军实行真面目之作战，则无此能力”[118]。同年9月初，军委会电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和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要他们完成作战准备。两军的分工是：第四集团军负责福建沿海防御，第十二集团军负责广东沿海及海南岛的防御。

对于华南沿海地区在中国对日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当局也早已看到。早在1937年10月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有关科室经过研究，即提出了“为了切断敌之主要补给线路应进行广州作战”的主张。但因实施这次战役，至少需要三个师团的兵力，因而被暂时搁置。为减少用兵，该部又考虑对华南地区重要目标进行限定作战，11月初拿出了具体方案：以一个独立师团的兵力占领香港东面约80公里的平海半岛，建立航空基地，依靠飞机轰炸，切断珠江沿岸及广九铁路的交通[119]。当时淞沪地区的日军已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开始向西进击，预计1月中旬攻占南京。日本大本营认为，在占领南京前实施这个计划，可以收到较大效果，于是决定从上海方面抽调一个师团的兵力，派到上述目的地附近，做好攻击准备[120]。

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决定调第十一师团及重藤支队为登陆部队主力[121]，同时编组第四飞行团以参加华南作战。不久又下达第五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兼任军司令官。该军的任务是：“协同海军占领华南沿海及其附近岛屿，依靠航空作战阻止敌在广东方面的补给。”第五军各部迅速从华北、华中和日本国内向台湾集中，预定在当月25日发动登陆作战。12月20日晚上，攻击部队正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日本军令部中止作战的命令。中止的原因是，日本海军军令部于当晚向陆军参谋本部提出：“鉴于在芜湖、南京附近发生了击沉美舰和轰炸英舰事件及其以后的经过等，在这当口再去

刺激英、美实非上策，所以希望目前正在准备中的平海半岛作战暂时延期。”陆海军双方经紧急磋商，决定暂时中止这次进攻行动，攻击计划延期进行，各部队“在台湾登陆待机”[122]。因该计划没有正式放弃但也没有明确的实施时间，所以第五军的任务和战斗序列没有撤销，该军所属的第十一师团和重藤支队转移到台湾屏东以南的平原宿营待机，进行训练。长江轰炸英、美军舰的事件解决后，日本海军对英、美两国的顾虑并未消除，所以该作战继续延期。

1938年初，日本的对华战争逐步向持久战方向转化，大本营决定中止对华南的作战。2月15日，按照《大陆命第二十七号》，撤销第五军战斗序列和第四飞行团编制，第十一师团调回日本国内。然而，日本军方对华南地区仍十分关注。3月初，华中派遣军在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中，特别提到：“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一带，拥护国民党，排击共产党的空气浓厚，对蒋的容共政策，正逐渐形成对立势力。”[123] 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沿海地区被日本控制后，华南地区成为中国惟一的海上运输口，从香港等地转运的战略物资，约占全中国进口额的八成。对此日本军方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同年5月，日本海军见中国方面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徐州会战，无暇他顾之际，于5月10日拂晓出动军舰多艘，运载陆战队3000余名，在飞机掩护下，袭击厦门。中国守军第七十五师仓猝应战，因日军炮火猛烈，伤亡重大，被迫退守嵩屿，厦门遂于当月12日被日军占领。

厦门失守后，中国军委会估计日军急于要切断我国海上通道，其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广州，因此电令余汉谋要妥为部署，积极完成作战准备。但广东方面的防守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首先是海岸线漫长，其次是兵力不足。余汉谋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当时只有七个师二个旅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部，具体部署为：以一个师守备宝安至虎门要塞一带；以一个师驻惠阳；以一个师守潮汕地区兼大亚湾附近；三个师分驻增城、从化及广州东郊；一个师分驻海南岛及广州市内；独立旅驻守广九铁路[124]。这样分散用兵后，每处兵力都很单薄，尤其在沿

海防护区域更有许多漏洞。

日本在实施徐州会战，打破持久战方略后，华南作战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广东作战和汉口作战同等重要，问题是究竟先实施那一个作战。当时考虑到一旦发生对苏作战，可能要出现运输船舶和资材不足的困难，为此在5月底决定于本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接着就进行广东作战。日本大本营对内外形势经过综合分析，作出这样判断：早日解决中国事变，这是陆军省部的一致希望，“即使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攻占汉口、广东，只要投入陆军主力，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作战”；“估计苏联在此时不能参战”；“海军对溯江作战直指汉口，有很高的积极性，广东作战当然有攻占海南岛的意志”[(125)]。于是在6月15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进行攻击汉口和广东的作战。

由于日苏冲突没有扩大，预定进行广东作战所需的船舶等准备就不会有困难，于是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同年7月31日制定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明确提出：“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的时间间隔”；广东作战之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为此，具体的战术是：“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陷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126)]。这次，日本陆军吸取上年底突然中止作战的教训，为慎重起见，不仅事先与海军统帅部联络，还与陆海军省及外务省协商。对海军提出同时攻占海南岛的方案，因兵力分配不适当而未予采纳。

当汉口作战发动之际，日本陆军当局也抓紧进行攻占广州的准备工作。广州紧靠香港，珠江口还有葡属澳门，市内有英、法租界，周围的惠州、博罗等地还有英、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机关、学校、教会、医院、商店等，攻击广州必然要涉及这些国家的权益。为避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日本陆军在作战指导上作了周密考虑：不采取沿珠江直抵广州的强攻作战，而改用由大亚湾登陆，迂回到广州的方案。

预定参战的兵力有三个师团，分别从华中派遣军和关东军内抽调。参战军队编组为第二十一军，司令官由原第五军司令官古庄干郎担任。9月19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该军的战斗序列及攻击命令。第二十一军由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和第四飞行团为基干兵力，其任务是："夺取敌在华南的重要根据地、切断其主要对外联络补给线"；在攻占汉口的前后，"与海军协同攻占广州附近要地"[127]。具体要求是：在10月中旬前后，分三个运送团把部队主力运送到大亚湾及珠江沿岸登陆；作战中"要尊重第三国的领域及权益，防止无端招致纠纷"[128]。同时还颁布了作战要领，详细规定了军队的运送和行动方案：第一次登陆要动员40万吨运力，准备各种登陆船只约1100艘，其后由这些船只往返运送；10月中旬，以第18师团和另两个师团之一部为主力在大亚湾登陆，迅速建立登陆根据地，从惠州方面开始下一步攻势；10月下旬，第五师团主力夺取虎门要塞，沿珠江推进，策应主力作战；军主力在珠江作战开始时，发动攻势，向广州进击，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攻占广州后，尽量紧缩占据地，切断在广州附近中国的主要对外联络补给线[129]。

根据大本营的指示，日本第二十一军在福冈召集各部队参谋会议，研究行动细节。参谋次长多田骏等大本营幕僚也前来参加，表示了对这次作战的关心。接着，日本陆军又与海军方面及有关舰队协商并签署了作战协定。为对这次行动保密，第二十一军称"波"集团，进攻广州的战役称"波"号作战，海军为"Z"号作战，军司令部移到台湾办公，并派员去香港西南的万山群岛，对大亚湾登陆地域进行战前侦察。据判断：中国方面已料到日军将进攻广州，但未料到时机已如此迫近；广东军已有4个师调到武汉方面，目前还有北调的征候。因此确信可以按照原计划作战。

与此同时，日军参战各部队分别从青岛、上海和大连出发，到澎湖群岛的马公集合，海军护卫舰队主力也于10月7日前集合完毕。10月4日，波集团发出第一号作战命令，令第十八师团、及川支队、第

一〇四师团于12日在大亚湾奇袭登陆，如遭遇阻击则强行登陆。10月9日，波集团的船队在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卫下从马公出发，于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接着以日本海军施放的烟雾作掩护，悄悄进入湾内预定地点。同时，又派一支船队去汕头海面佯攻，以牵制中国守军的注意力和兵力。12日凌晨3时前后，日军开始分数路奇袭登陆，在几乎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占据了滩头阵地，当主力部队和重武器上岸后，即按照预定计划攻击前进。第十八师团分成左右两队向淡水、惠州攻击；及川支队向横沥圩，第一〇四师团向平海、范和岗大道攻击。途中虽有中国军队阻击，但未能对日军构成威胁。

“波”集团司令见登陆军队未遇到有力阻击，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一举进入增江右岸地区，提前攻击广州。10月14日，军司令部下令：及川支队从横沥圩向派潭、从化方向前进；第十八师团攻占惠州后，沿博罗、增城公路，向广州前进；第一〇四师团进入平潭圩后，沿第十八师团的路线向广州前进[130]。14日傍晚，日军第十八师团之一部冒雨向惠州攻击，中国守军第一五一师之一部凭工事抵抗，但黎明前城门已被攻破，守城部队慌忙撤退。博罗守军见日军来攻，未作抵抗即弃城逃跑。

中国政府见广州危急，于10月13日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军委会为确保广东，掩护海上通路，不顾当时武汉军事形势之危急，抽调第九战区之第六十四、第六十六两个军共5个师，紧急南下驰援广东。但远水难救近火，广东守军在援军到达以前已全线崩溃。

为保卫广州，余汉谋委任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率部防守东江。17日，第一五三师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迫使其后退；独立二十旅在正果圩击退日军一支侦察部队。由于前方虚报战果，余汉谋作出错误判断，准备在增、博公路间包抄聚歼敌人，而对日军的合围之势竟不以为然。19日，日军攻占增城，接着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迅速向增城集结，于20日上午向守军阵地发动猛攻。在日军

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守军的阵地很快被突破，并在撤退中发生混乱，日军乘机追击。21日上午，日军追击队的先头部队从镇龙圩出发，沿公路向广州东面地区挺进，连续冲破守军的阻击后，于下午进入广州市区，控制了通向珠江沿岸的各主要公路。其余日军，也先后占领了广州周围的重要城镇。

日军在珠江方面的进攻，原定在10月27日发动，由于从侧面迂回的主力部队进展顺利，提早到22日实施。由于广州已被日军占领，珠江各要塞守军的军心已经动摇。在日军炮火猛烈轰击下，23日虎门告失。26日佛山被占。至28日，珠江水路全面被日军打通。

广州失守后，第十二集团军所部乃退守清远、横石至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整顿部队，准备尔后作战。从武汉回援的主力到达后，第十二集团军开始向日军发起反击，于11月24日克复从化，12月上旬又克复惠阳、博罗和宝安。日军因控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处处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于是被迫放弃大亚湾的补给联络线，集中保护珠江水运通道。至此，日本第二十一军以广州为中心，修筑工事，改取守势，与中国军队相对峙。

广州战役在武汉战役激烈进行之际爆发，前后只有10天时间，广州即先于武汉陷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略部署欠妥，情报工作不灵，一线指挥不力，这是重要的主观原因。广州失守之后，中国海上运输线完全被切断，这使中国抗战更增添了新的困难。

---

(1)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5-36页。

(2) 《对第六战区指导要领》，《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16页。

(3)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17页。

(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18页。

(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23页。

(6) 《军事委员会训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198页。

(7) 《军事委员会训令》（10月16日）、《军事委员会电示》（10月18日），《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24页。

(8)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27页。

(9) 《临参命第一百三十三号》、《临命第五百八十四号》，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63页。

(1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32页。

(1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62-63页。

(12) 有学者认为，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地方实力派作为南京政府、日本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始终在夹缝中投机求生存。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却没有摆正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关系，大敌当前之际避战自保，其最终伏法是罪有应得的。尽管韩曾密谋“倒蒋”，但仍不应过分夸大蒋、韩矛盾，片面认为蒋介石除掉韩是借机复仇。从一定意义上说，惩办韩复榘代表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163-164页。

(13) 《大陆命第七十五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9页。

(14) 《在津浦线方面活跃着的敌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5-26页。

(1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7页。

(16) 片野支队由第五师团第二十一联队长片野定见指挥，主力为步兵一个半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

(17) 坂本支队由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坂本顺少将指挥，基本部队为步兵第十一联队（缺一个大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缺一部）、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之一个大队，野炮第五联队主力、山炮一个中队。

(18) 王瘦吾：《第四十军防守临沂之战》，《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1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4页。

(20)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1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43页。

(21)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61页。

(22) 《第二军的南进命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0页。

(23) 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5年，第31页。

(24) 《濑谷支队进入台儿庄》，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2页。

(25) 台儿庄派遣队，即上述左翼追击队，由第六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野炮一个大队组成；沂州支队由步兵第十联队组成。

(26) 《第五号作战命令》，转引《抗日战史》第四册，第263—265页。

(27) 《蒋介石发布汤恩伯及庞炳勋等部作战任务密电》（1938年3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13-514页。

(28) 《李宗仁致蒋介石何应钦等密电》（1938年3月29-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64页。

(29) 《林蔚等关于台儿庄一带战况及作战方针密电》（1938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62页。

(3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7页。

(31)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71页。

(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46页。

(33) 《蒋介石关于封锁交通阻击莒沂方向之敌确保台峄战斗胜利密电》（1938年4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

（二），第564页。

(34) 根据1938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三课编制的资料，从2月至5月第五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3月至5月，第十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册，第41页。

(35) 《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2页。

(36)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52-153页。

(37) 《军事委员会驾电及战区修正计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405页。

(38) 《军事委员会驾电及战区修正计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405—406页。

(39) 《蒋介石之部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407—408页。

(40) ［日］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3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1月版，第41页。

(41)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66页。

(42)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44页。

(43) 《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页。

(44) ［日］伊藤正德：《军阀兴亡史》第3卷，第78页。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45页。

(45) 《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长下山给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的电报》（1938年3月24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4页。

(46) 《大陆命第八十四号》（1938年4月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5页。

(47) 《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案》（1938年4月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6页。另见《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41-242页。

(48)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532页。

(49) 蒋介石：《在车辐山车站对出迎官兵训话》（1938年4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08-409页。

(50) 《军令部作战计划》（1938年4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4页。

(51) 《徐州附近作战指导方策》（1938年4月10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7-48页。

(52) 《华中派遣军徐州会战计划》（1938年4月24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1-52页。

(53) 《中国军队作战指导方案》（1938年5月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5-626页。

(5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53页。

(55)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86-187页。

(56) 1938年5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决定在鲁南集结相当限度兵力，行攻势防御。但敌如由国内大举增援至兵力较我绝对优势时，则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见《国军战争指导方案》（1938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25页。

(5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06页。

(5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269页。

(59)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五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64页。

(60) 敖文蔚：《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1) 《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3页。

(62)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抗日战

争正面战场》（上），第52-55页。

(6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月26日，第170-171页。

(64) 《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1938年1月20日），《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45页。

(65) 《方面军作命甲第三一七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77页。

(66) 《大本营的作战限制和兰封以西的追击》，《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79页。

(67) 《掘堤的建议和实行的经过》（节录），见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530-531页。

(6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81页。

(69) 沈家五：《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134-136页。

(70) 1938年的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由于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大陆史学界对此多持否定看法。然而有学者认为，花园口决堤一方面是国民党当局以己为重、以民为轻的政治路线的产物，但从纯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决堤亦有合理的成分，可视作一项正确但并非唯一的选择。黄泛区将中国的南北战场隔绝开来，使日军不得不改变其战略主攻路线，中国抗战后方的基地——西南地区由此得以保存。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191页。

(71) 《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1947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833页。

(72) 《陈诚致蒋介石代电》（1938年6月2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743页。

(73) 《陈诚致蒋介石代电》（1938年6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2页。

(74)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7年，第40页。

(7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136页。

(7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2页。

(77) 《大陆命第119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555页。

(78) 《现中国中央政府屈服之对策》、《现中国中央政府不屈服之对策》，［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3—174页。

(7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6页。该委员会由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为首，还有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外务省代表坂西利八郎，简称土肥原机关。

(80) 《陆军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1938年7月3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7-108页。

(8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5-116页。

(82) 《全面配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0页。

(83) 《华中派遣军命令》（1938年7月14日正午），《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9—121页。

(84) 《关于攻占汉口作战陆海军协定备忘录》（1938年7月3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22—123页。

(85) 《关于实施汉口作战协定备忘录》（1938年8月2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25—126页。

(86) 《大陆命第一百八十八号》（1938年8月22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39页。

(8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6月3日，第273-274页。

(88) 程思远：《保卫武汉的军事部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545页。

(89)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保卫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6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08-313页。

(90)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30页。

(91)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14-224页。

(92)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50页。

(93)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68页。

(94)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61页。

(95) 《蒋介石致程潜等密电稿》（1938年8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71页。

(96) 《蒋介石致李延年密电稿》（1938年8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59页。

(9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48-349页。

(98)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8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8-29页。

(99)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76页。

(100)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77页。

(101)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71页。

(102)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依靠其野战瓦斯队、迫击大队和步兵临时发烟部队多次实施化学战，使用的武器主要有特种发烟筒和特种发烟弹。据统计，整个会战期间，华中方面军总计使用毒气375次，其中第二军使用222次，第十一军使用80次。此外，配属华中方面军的德川航空兵团多次空投毒气炸弹，日本军舰和小船队也曾使用毒气。配属华中方面军的正规化学部队使用毒气总计92次，而各个师团临时发烟部队和各种炮兵使用毒气210次。日军的化学战直接造成中方部队的重大伤亡，极大地影响到战局的发展。见毕春富：《侵华日军武汉会战期间化学战实施概况》，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134-138页。

(103) 《李宗仁汇报会战期间各部毙伤敌军概数密电》（1937年10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78页。

(104)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抗战经过》（上），第98页。

(105) 《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1947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837-1838页。

(106)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抗战经过》（上），第116页。

(107)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8)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9)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0)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2)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3) 据陈诚回忆，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八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九月底、双十节，直至十月二十日，领袖尚在武汉。故放弃武汉计划其实早已制定，只是久未实施。见《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下），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9页。

(114)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0月3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第301-306页。

(115) 有学者认为，武汉抗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有所变化发展的，他在国共两党军事要人及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与推动下，改变以往死守式的“单纯阵地防卫战”的打法，而改取主动进攻，在外线牵制日军，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防御特点，成为这一时期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见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28-156页。

(116)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2页。

(117)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5页。

(118)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0页。

(119) 《华南登陆作战的停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

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4页。

(120) 《11月24日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4—105页。

(121) 重藤支队，原名日本台湾守备队，司令官为重藤千秋少将，1937年9月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时称重藤支队。

(122) 《华南登陆作战的停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4页。

(123) 《从华中方面看中国的一般形势》（1938年3月6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1页。

(12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197页。

(125) 《决定进行汉口作战的原委》，《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90—91页。

(126) 《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1938年7月3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7—108页。

(127) 《大陆命第201号》（1938年9月19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3页。

(128) 《大陆指第273号》（1938年9月19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3页。

(129) 《广州作战要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4页。

(130) 《军的作战指导》，《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7页。

第五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

第一节　日本扶植傀儡政权

一　日本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

日本政府通过卢沟桥事变，悍然对中国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之后，即对如何经营中国占领区进行精心策划。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领土之目的，而又要掩盖其侵略野心，它根据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经验，以及曾在华北地区策划所谓“自治”的实践，迫不及待地在新占领区内扶植傀儡政权，以造成该地区仍由中国人统治的假象。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华北是其重点考虑的侵略目标。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日本当局即软硬兼施，对华北地区进行蚕食渗透。1935年，又开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并唆使殷汝耕等汉奸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于当年11月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反对党治，实行独立”[(1)]。这些阴谋活动，虽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日本军部仍一意孤行，继续在华北采取强硬的立场，声称：“总之，帝国的态度，始终俨然不动，不为局部的形势所迷惑。”[(2)] 1936年以后，日本政府连续三次制定《处理华北纲要》，以确定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的基本策略。其目标是：“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现阶段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不能为扩大区域而操之过

急”。对该自治政权指导的原则是：“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方面，并抓住大局”，“并且始终以内部指导为主旨”[3]。随着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日本对侵略华北的具体方针也不断加以修正，但其基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即要“将该地区造成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一切为了建立日、满、华三国实现合作互助的基础”。其具体方针的修正，主要是为了应付列国“以为帝国对于华北具有侵略的野心”，所以强调“在今后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力戒这种引起无谓误解的行动”[4]。这些纲要中所强调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即让日本侵略者选中的亲日分子在前台活动，日本人则在幕后操纵，这样既可达到全面控制该地区之目的，又可回避世界舆论的谴责。这些原则，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不仅继续延用，而且还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扩充和发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一面策划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又开始考虑如何维持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日本陆军军部在7月8日的声明中称将等待华北“当地居民自发地建立起政权机关来”[5]。日本驻北平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以“外交官”的身份，与华北地区中方军政要员和各界名流密切接触，物色可以充当傀儡的人选。北平失陷之后，今井武夫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共同策划，列出了一批汉奸名单，包括总商会冷家骥、银行公会邹泉荪、自治会吕均、市政府周履安、公安局长潘毓桂等，并推出年逾七旬的北洋遗老江朝宗为首，于8月1日宣告“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天津陷落之后，当地日军采用与北平相同的办法，于8月1日成立了“天津治安维持会”，拉出北洋遗老高凌霨为会长。9月22日，平、津两地的治安维持会又合并成为“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并与冀东伪政权互相“联络提携”[6]。

在平、津两市之外的占领地区，侵华日军也同样采用了成立傀儡

组织的方法。9月4日在察南十县成立了以汉奸于品卿为首的察南自治政府。10月15日，在山西北部十三县成立了以夏恭为首的晋北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11月5日，在河南安阳成立了肖瑞臣为头领的河南省自治政府[7]。1937年年底以前，由侵华日军成立的较大的伪组织还有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山西省自治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济南治安维持会等。在有些占领地区，侵华日军还曾在更小范围内物色汉奸，成立所谓的“自治政权”。自1937年9月23日侵华日军首先在吴淞口的宝山县城内成立宝山县自治委员会开始，至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成立前夕止，沪宁地区共成立了五十余个大小不等的汉奸组织。这些组织名目各异，各自为政。控制范围有的仅一个乡镇或几条街道，如宝山县的月浦镇与杨行镇自治委员会，只管辖一个乡村小镇的几百户居民[8]。

日本陆军当局一直在考虑如何控制中国占领区的问题。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37年8月10日即拟订了一份《处理华北事变纲要》，主张“大约在河北省北部并包括察哈尔省在内的范围内，出现一个明朗地区”，即建立一个完全亲日的政权。对该政权的控制，应注意“不要抱有占领敌国的观念”，具体原则有三项：一、“不行使占领地式的行政，但应根据军的指导，巩固治安，以扫除祸根”；二、“政权机构等待当地居民自动产生，给予指导，使其按帝国的希望进行治理”；三、“交通线的整备及经济的开发，由日、满、华民间进行，在必要的统制下积极促其发展”[9]。根据上述纲要，陆军省于8月12日拟出一份《华北政务指导纲要》，提出了对建立华北伪政权的具体指导原则，主要是：“从事各项政务指导时，应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从长远考虑，对本地固有的社会组织及风俗，尽可能允许其存在并善于指导，特别要调整好军队和居民的关系”；“作战的后方地区的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其机构的运用，也要得到居民的积极参加和赞助”；“对冀东政权、特别对其内部要进行改革，使之面貌一新”[10]。这一《纲要》，不仅是指导华北汉奸政权的原则，也是日军在其他地区扶植伪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标准。

在陆军中央部拟订有关方案时，关东军也在抓紧拟订对华“政治工作计划”。8月14日，关东军提出《对时局处理纲要》，对建立伪政权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意见。《纲要》提出：“关于华北政权，最终目标是实行五省联省自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其政权的建立，力促由当地居民自主产生；各地政权的建立，应等待其主观条件成熟；但要从内部给予指导及援助，为之创造条件”；为巩固新政权，“应在一定时期内在该地区的重要地点，驻扎必要的日本军队。撤兵时间要根据政权的基础是否巩固，自行决定”。新政权虽在表面上是由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的自治政府，但要严格按照日军的要求办事，必须“以亲日满、防共、道义立国为根本政策”[(11)]。对在华北地区建立伪政权的具体步骤，这个纲要主张首先让河北及山东二省实行联省自治，合并成一个政权，其领导机关设于北京。将来可考虑将山西也并入该政权。冀东的现状不变，应作为一个独立的省份而单独存在。对华北新政权的指导，应遵循以下原则：“1．在新政权的领导机关及必要的省政府，应配备有能力的日本人作顾问；2．为担任对以上领导机关的内部指导，在北京设立隶属于天津军司令部管辖的大特务机关；3．为维持治安将中国军队改编为保安队，其装备要与现地情况相适应；4．确定币制，接收关税、盐税。”对于察哈尔方面，先在察北、察南二地建立联合政权，其领导机关设于张家口，将来考虑把绥远也并入该政权。察省政权的情况与北京方面不同，对其指导应依照以下准则：“1．新政权要做到日、汉、蒙亲善和睦首先要为对内、外蒙的工作，创造有利条件；2．在新政权领导机关及省政府，配备有能力的日本人作顾问；3．为担任对以上领导机关的内部指导，在张家口设立隶属于关东军的大特务机关，对内蒙自治政府德化机关的指导仍维持现状，但受以上大特务机关的指导；4．除在察北保有内蒙军之外，原则上以保安队担任维持治安，解除一切中国军队的武装；5．看情况确定币制，特别要很好地对察北、察南的财政进行调整。”[(12)] 这些政权名义上是由中国人领导，一切实际权力全部由日本人控制，控制方式是由当地的大特务机关通过日本顾问对该政权进行幕后指挥。

1937年8月下旬，日本军部为迅速侵占整个华北以及与华北相邻的“蒙疆”地区，决定把原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改组成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辖二个军司令部和若干直属部队。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除设置参谋部以外，还专门设置了特务部，原天津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少将为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得到的训令是：“一、贵官为军特务部长，指挥所属部员对军方作战的后方地区（包括冀东），执行各有关政务事项，统辖指导中国方面的机关，为使该地区成为实现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础而进行各项工作”；“二、关于将来在华北建立政权问题，应体察华北人心的趋向，逐步进行准备”；“三、为了削弱中国方面的斗志，以迅速结束战局为目的，对敌军后方应采取相应的谋略”；“有关细节，由参谋长指示”[13]。从这一训令中可以看出，建立华北政权，是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二　伪华北临时政府

日本华北方面军指令喜多诚一在华北建立新政权，但没有明确指示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攻势正全面展开，而在察哈尔方面，关东军操纵的蒙疆伪政权的筹建工作却进展迅速。为不落在关东军之后，喜多诚一在调兵遣将筹组特务部的同时，立即着手研究建立华北伪政权的方案。9月25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订了一个《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方案》，其要点为：“适应时局的发展，及时地在华北建立以防共亲日满为其政纲的政权”；“当达到占领河北省大半时，即建立察哈尔省政府、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及统一的华北政权（加强北平市政府）”；“各省、市政府的组织，大致援用原来的组织标准”；“使各政府聘请少数有能力的日本人为顾问”；“当能包括山西及山东时，即扩大为统一政权”；“新政权虽然实质上是与南京政权分开的，但开始即勿使其采取声明独立或进行易帜的态度”。同时，还研究了将来在华北政权中可以利用的人物[14]。

华北方面军根据侵华战场形势的变化，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进攻

还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抗战的话，“即在华北建立独立的政权，加强此独立政权，实行政治上的变革”。为此，他们于9月29日拟出一份《一般形势判断》，设想“若南京政府仍敢于试图进行长期抵抗，即确实领有占领区，指导其进行政治改革”；“在华北建立的政权，将来应使之成为打倒蒋介石政权的苛政、以使新政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因此，应当阐明当南京政府有所觉悟并采取新体制时，华北政权可以和该政权合并”[15]。

日本政府对于在华北地区建立伪政权问题也十分重视，在10月1日由四相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对建立华北政权问题做出了专门规定：“在事变中，对华北作战的后方地区的措施，应排除占领敌国领土的观念。”具体的原则为：“不实行占领区式的行政。但必须在日军指导下确保治安”；“政治机关由当地居民自主组成。但必须加以指导，使其施行明朗的政治”；“在必要的统制下，进行军事上必要的交通建设和资源开发”[16]。这些原则的制订，既肯定了华北日军筹建伪政权的工作，又为未来政权的性质作出了规定。

日本关东军于10月11日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针纲要》，也提出了建立华北政权的意见。《纲要》认为：“解决事变的前提，首先是依靠我军事行动，目标是使中国迅速抛弃战斗意志。”随着军事行动之进展，应当采取的策略措施是，“目前要在大概黄河以北的华北、内蒙等地力图确保安定，并造成建立自治政权的形势。自治政权一经建立，当即与之合作……在我的合作和援助下，脱离赤化祸患，普遍趋向救国的理想。还有，对反蒋政权的抬头，可在无碍于将来施策的限度内给以支援”。“随着形势的发展，可宣布与南京政权断绝邦交，在新建政权中选其基础巩固者承认之”[17]。

上述意见，成为喜多诚一等人筹建华北伪政权最初的指导原则。10月中旬，喜多诚一回东京向军部长官报告工作时，明确宣称：“我们希望在华北地区建立一个既对日本和满洲国有利又可用以防共的地区。我们并没有领土野心，不过如果这种局势再拖延下去，那很难说

我们会错过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或比满洲国更满洲国的东西。”他还解释说：“我们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如同冀察政务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式的政权机构。”他所考虑的，是在政治实权和地理范围上都要大得多的政权。先成立各省的省政府，然后“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联合省政府’——我们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当使用这个名称”[18]。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还抓紧网罗著名汉奸出任新政权的首脑。

至10月下旬，组建华北伪政权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喜多诚一等人经过研究，确定了这样的构想：这次事变演变成长期战争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事变，“在北方建立的新政权，不应作为华北的地方政权，而应成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权，其政令应普及到日本军势力范围的整个地区”[19]。新政权的政体定为民主制，最初以委员制开始工作，但应尽速转为总统制，并以吸收王道和道教的新民精神为指导思想。此后又对具体方案进行研究，于11月14日拟出《华北政务指导计划案》。

随着侵华战局的变化，10月底以后，日本陆军中央也提出了在华北建立替代南京政府的新中央政府的意见。陆军省军务课完全赞成使华北政权中央化的提案，他们主张：“扩大与强化华北政权，指导其成为更生中国的新中央政府，谋求在整个地区内开发产业，促进贸易，恢复与安定治安，进一步采取措施使中国之更生从华北扩大到全中国。”其设想是首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和察哈尔等省成立“自主的”省级政权，组成联省政府，然后与华中、华南相呼应，并将其归并到联省政府内，逐步使其成为取代现中央政府的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有很大发言权的参谋本部中国课在“建立华北新政权研究案”的结论中也提出：“目前，援助以防共亲日为方针，具有自然发生趋势的华北新中央政府之组织是适当的。”[20] 关东军对建立新中央政权的态度更为积极，11月2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致电陆军中央部，申述自己的意见：“迅速断绝与蒋政权之交涉，培养各地建立之

政权，分别与其提携，促进成立新中央政权之趋势，条件一成熟，看准机会，日、满首先予以承认。”[21]

建立华北新政权的主张，虽然在日本陆军内部有很大市场，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尤其是华中地区的日军，明确表示不赞成在华北设立新的中央政府。为使建立华北政权工作纳入日本侵华总战略的轨道，陆军内部又抓紧进行协商，并由参谋本部第二课拟订《从对华方略论华北政权问题》的文件，提出折衷方案，其主要论点是：“作为解决事变的前提，帝国希望出现新中央政府”；“以建立华北新政权作为过渡到中国中央政权的策略，要慎重考虑到对南京政府采取措施这一因素”；“建立华北新政权，须考虑到将来置于新中央政权管辖下的情况，以此为原则考虑其组织、政纲和对之进行内部指导等”；将来“成立新中央政府时，华北政权将处于微妙的地位，此时应注意不要形成对立和威胁”。基于上述理由，“在目前以华北政权作为中央政权，以它为中心进行各种工作为时尚早”[22]。于是，日本军方对华北新政权的性质有了一个大致统一的意见。

在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伪政权的性质争论不休之时，处于侵华战争一线的华北方面军正抓紧进行伪政权的筹组工作。继9月下旬平津两地治安维持会合并后，华北方面军又以北平维持会的名义，于10月12日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将来新政权的办事之处。新政权需要有影响的头面人物领衔才具有号召力。为此，喜多诚一等人四处奔走，以各种名利相引诱，企图拉拢一些曾活跃于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的老政客，无奈均未成功。于是，他又派特务部总务课长根本博大佐去香港，策动因卢沟桥事变而离开北平，暂时蛰居香港的北洋遗老王克敏出马。12月7日，王克敏随日使到达北平，经与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等一班汉奸会面后决定出山。喜多诚一等人立即以王克敏为中心，谋划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及政府组织纲领。此时，华中日军正向南京发动猛攻，而通过德国牵线的诱降活动尚未终止，所以日本政府打算华北伪政权过一段时间再正式挂牌。

12月13日华中日军攻破南京。次日即12月14日，华北日军便于北平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临时政府采用三权分立制，内设议政、行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别由汤尔和、王克敏和董康任委员长。在该伪政权的主体——行政委员会之下，设行政、治安、文教、司法、赈济五个部[23]。政府主席位置因无合适人选而暂时空缺。

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要人，几乎全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北洋时代老政客。临时政府以汤尔和、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等人为委员，董康、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为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则分由上述委员兼任。王克敏曾于清末在驻日公使馆任职，北洋时期混迹于金融界，并数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汤尔和早年留学日本，20年代曾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及财政总长等职。王揖唐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历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总代表等职。齐燮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洋时期曾任江苏督军及苏、皖、赣巡阅使等职，军阀混战中失败后逃亡日本。上述四人都于1935年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董康于1912年留学日本，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先后任司法总长、代理财政总长等职。朱深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科，长期在北洋政府的司法界任职，曾任皖系政府的司法总长。高凌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农商、内务等部总长，此时任天津治安维持会和京津联合维持会会长。

“临时政府”宣布以民国初年的五色旗帜为“国旗”，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定北京为首都。在宣布新政府成立当天，还对外发表宣言和施政方针。宣言对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进行一番指责后宣称：“树立临时政府，旨在恢复民主国家，煎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德，辑睦世界友邦，开发产业，使民生向上，厘定权责，使中外相安。”最后还假惺惺地表示：“事变略定，我中华民国政治稍有轨道可循，自当联袂引去，以纾罪戾。”[24] 企图以此来欺骗

辖区民众，掩盖其傀儡面目。

“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共有五项：内政方针是：“消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积弊，真正体现中国民众的共同心意，施行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政治”；经济方针是：“确立以农为本的农村政策，同时开发资源，发展生产”；东亚政策是：“以体现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准，与邻邦友好相处，谋求真正的亲善合作”；对外政策是：“前政府所负的对外义务，凡属已向国民发表的债务及其他义务，代其承担一切责任”；防共方针是：“绝对排除容共政策，进一步与防共各国相协力，确保东亚的固有和平。”[(25)]

从“临时政府”的框架结构及其宣言、方针可以清楚地看出，华北日军和王克敏等人妄图将该政权发展成控制全国的中央政府，以取代蒋介石为主的国民政府。临时政府出台后，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华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维持会渐次归并到它的名义之下。

日军攻占南京后，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对华北日军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对该政权今后的发展作出明确规定。《纲要》强调，在对其进行指导时，要谋求“逐步扩大和加强这个政权，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不仅要使它取得在华北的信誉，并且要使它取得在华中、华南方面的信誉”。为此，纲要提出了四点具体指导方针：1．“要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2．“要具备适应时代新的组织”；3．“要有足以号召全中国的主义和纲领”；4．对于上述政权的领导，“只在制订政策大纲方面由日本顾问进行内部领导”。另外，纲要还对华北新政权的统治范围、指导方式等一一作了规定[(26)]。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更进一步肯定了华北伪政权的地位和作用。《方针》强调：“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

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27] 御前会议的决定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一方针成为以后日本统治中国占领区的基本方针。

“华北临时政府”于1938年1月正式出笼后，其组织机构陆续作了若干调整。4月1日，将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总长，并将实业局升格为实业部，任命前北洋政府外交、司法总长王荫泰为该部总长。以后又将财政、内政两局升格为部，撤销赈济部。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临时政府的统治地域也相应扩大，逐步由北平、天津两市扩大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数省的部分地区及青岛市。

1938年3月，“临时政府”将河北省伪政权改组为省政府，以吴赞周为省长，并将省政府驻地由天津迁至保定，全省划分为津海、冀东、冀南、保定四道，各道设置道尹。河南的情况大致与此相似。1937年11月，日军侵占河南安阳后，即在安阳设立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以萧瑞臣为省长。萧为河南人，曾任吴佩孚部师长，当时已同日军相勾结。1938年4月，伪河南省自治政府划归临时政府管辖，改称“河南省政府”。山西占领区划归“临时政府”的时间要稍微晚一些。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太原后，随即成立伪山西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以原绥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苏体仁为临时省长。1938年6月，“临时政府”开始管辖山西省，将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撤销，改设省公署，正式任命苏体仁为省长。山东的情况与上述不同。1937年12月日军攻占济南后，成立了以马良为会长的济南治安维持会。当时因没有省级伪政权，所以“临时政府”于1938年3月5日发布成立山东省公署令，任命马良为省长。3月10日，伪山东省公署成立，划全省为鲁东、鲁南、鲁西、鲁北四个道。此外，又将原隶属山东省的青岛市划为“临时政府”直辖的特别市，任命赵琪为特别市市长。

“华北临时政府”虽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际上它不仅由华北日军一手扶植起来，而且所有活动都必须根据日本的要求来进行。根据日本内阁关于“在制订政策大纲方面由日本顾问进行内部领导”的规定，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总务课长

根本博等人即以非正式顾问身份对政府各个方面进行控制。1938年4月1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顾问的《约定》之后，喜多诚一等大批日本军人随即正式以顾问身份对“临时政府”进行“指导”了。

日本扶植“华北临时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除在政治上稳定占领区的统治之外，就是要在经济上掠夺华北地区的各种资源，以支持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临时政府”成立后提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订海关税率，停止征收日本商品进口附加税，减免棉花、棉籽、胡麻子、矿砂、生铁、废钢材等产品的出口税。1938年5月底，日方又令临时政府再次改订关税税率，宣布从6月1日起，降低所有日本商品的进口税。这样，日本商品开始在“临时政府”统治区域内大量倾销。如何“开发”与统制华北地区的经济，是日本政府早就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38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与“临时政府”间签订了关于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所谓经济协议会，实际上是使日本掠夺华北经济合法化。协议会虽以王克敏为会长，日本人平生釟三郎为副会长，但平生釟三郎作为“临时政府”最高经济顾问，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所以实权仍全部操在日本人手中。不仅如此，对于交通、港湾、通讯等重要设施，得由日军直接控制，协议会不得加以讨论[28]。这些规定，在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临时政府”并入汪伪政权并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之后，仍继续生效。

为了更直接地掠夺华北的经济资源，日本于1938年4月在北平设立“华北开发公司”。由该公司出面，对华北的交通、通讯、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实施全面统制，垄断开发权与经营权。金融业亦是日本特别重视的行业。华北日军筹建“临时政府”时，即拟订了《华北联合银行设立纲要》，企图通过设立新的金融机关，发行伪币，控制华北地区的金融，解决日本军费支出，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1938年2月11日，“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由“财政部总长”汪时璟任总裁，日人阪谷希一任顾问。“临时政府”公

布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规定：临时政府赋予该银行制造和发行纸币的特权；发行的纸币不限金额，适用于公私各种交易，为华北“惟一之法币”；其名称为“联银券”，与日元等值，属于日本元系通货。3月10日，该行正式营业，并在华北各地设立分行。当日，“临时政府”又发表声明称：向来通用之各种纸币，今暂于一定时期中准许其流通，联银券与国币同价使用[(29)]。然而一待联银券广为流通，即开始对法币进行排挤、打击。6月10日，宣布于即日起将法币贬值10%，翌年2月，再将法币贬值40%，接着又宣布禁止法币流通使用。至1938年10月，联银券的发行额已超过2.5亿元，“其势力直伸到内地各处”[(30)]。

“华北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实际运作清楚地表明，它是一个没有半点独立性、完全由侵华日军所控制的傀儡政权。

三　伪蒙疆政权

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伪满洲国接壤。日本关东军利用内蒙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等人要求内蒙自治的意向，暗中策动他们搞内蒙独立，企图把内蒙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尽管这些阴谋活动屡遭失败，但关东军始终没有放弃向内蒙扩张的野心。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向东京方面提出，依靠行使武力，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其目标是：为准备对苏作战，要在华北、蒙疆建立地方政权，并确立日、满、华北经济同盟的基础[(31)]。1937年8月9日，关东军接到日本陆军总部关于配合华北日军向察哈尔发动进攻的命令后，立即进行政治动员，于8月中旬先后制订《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纲要》和《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纲要具体措施案》，主要内容如下：（一）在张家口建立管辖察南、察北的统一政权（暂称察哈尔政权）；（二）在张家口设置直属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的大特务机关，以监督察哈尔政权的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主要事务；（三）派遣具有独创性和统制能力的日本人担任察哈尔政权

的顾问；（四）接管察哈尔银行，无论如何要建立独立的币制[32]。关东军一面召回时任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的金井章次，作为未来新政权的首席顾问；一面以情况紧急为由，让张家口特务机关要员与作战部队同行，以便实施既定方策。

8月27日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当地特务机关随即组织治安维持会。9月4日又设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原察哈尔省政府委员杜运宇和商务会长于品卿为最高委员，下设总务处及民生、财政、保安、民政四厅，管辖万全、宣化等察南十余县。稍后，日本陆军中央在《察蒙处理纲要》中决定：由“关东军政务指导的范围以察北、察南为范围，必要的情况下负责张家口以西平绥沿线的工作”[33]。

此后，关东军的攻势迅速向内蒙古中西部推进，于9月13日攻陷大同，10月14日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10月17日攻占包头。蒙古自治军政府总裁德王也跟随日军西犯，在日军占领区内召集各旗保安队组织联合军，以备东山再起。关东军希望通过德王，在新占领区内建立统一的伪政权。10月1日，关东军在《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大纲》中决定：改组内蒙政府为自治政府；确定晋北自治政府的组织要领；由察南、晋北、蒙疆三自治政府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34]。根据这一方案，建立包括绥远、晋北在内的蒙疆政权已成为关东军新的目标。

10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又训令蒙疆各特务机关遵照执行该《指导大纲》。如在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发出的训令称：“一、贵官对蒙疆方面政治工作，应遵照附件指导大纲统辖有关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二、关于蒙疆方面的领导，应统辖有关特务机关长处理工作。”具体的“指导大纲”由关东军参谋长拟订，主要内容包括：“晋北自治政府，在当地居民自发趋势形成时，即应迅速成立政府”；“蒙古自治政府，应尽力促其早日成立”；“三政权联合委员会应与各有关特务机关长紧密联系，以期使之尽快设立”；平绥铁路，“目前应由满铁华北支局在张家口设立铁道局管理其业务”；“在确定鸦

片、盐务政策时，应特别注意筹划蒙疆方面的财源”；“其他矿山资源的开发，目前龙烟铁矿应以兴中公司为中心”[35]。

根据训令，蒙疆各日本特务机关迅速着手拼凑伪政权。10月15日“晋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由夏恭任主席，日本人前岛升为顾问，下设民生、教育、财政三厅，辖晋北13县。与此同时，德王由百灵庙赶赴被日军占领下的绥远省城归绥，以“蒙古各盟旗联军”总司令名义任命各县县长，并开始与日军共商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事宜。

经反复商讨，德王以“蒙古军政府”名义通知各地于10月27日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36]，讨论建立新政府问题。应邀与会的除“蒙古军政府”、“蒙古军总司令部”等部门负责人和内蒙西部地区各盟、旗王公外，还有原绥远省所属各市、县指派的人员。此外，还邀请了晋北、察南两个伪政权代表，以及日本顾问、特务机关长等。由于日伪双方在政权名称、人员安排等方面意见不一，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与会进行协调，并作出最后裁定。

10月28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政府所在地归绥改名为“厚和”。云端旺楚克（云王）被推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李守信为总军司令[37]。政府下设政务、财政、保安三部，另有参议会及政务委员会；管辖范围为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等五盟及厚和、包头两个特别市[38]。

此时，日军在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的军事行动取得很大进展，当地伪政权先后建立。关东军对内蒙地区的统治策略因此也发生显著变化。10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满蒙方面政治工作指导要纲》，规定：内蒙军政府改组为自治政府后，由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各派遣委员，在张家口设置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协调处理有关三政权的重大事项；联合委员会以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三政权范围内的煤矿、铁矿等地下资源和电力等重要产业均由

联合委员会统制[39]。关东军控制下的蒙疆政权统治范围，因此扩大到包括察哈尔、绥远、晋北等地的广大区域。

金井章次曾这样解释关东军的这个计划："对晋北的经济与物资流通等进行调查，发现通过北京、包头间的京包铁路经营的占八成多，通过晋北的大同与山西省会太原之间而进行的交易，只占全部的二成弱。因此，晋北的经济实体与晋南（太原）分离，同张家口、绥远、包头合为一体的做法是很自然的。"[40] 大同地处交通要冲，是山西省财政收入的重镇。当时绥远以西的鸦片从张家口运往北平，须经过大同，其过境税相当可观，阎锡山历来重视晋北，关东军亦不例外。另外关东军对察南、晋北等地丰富的煤铁资源觊觎已久，他们急于将察南、晋北两地都划入蒙疆伪政权的范围。

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三个伪政权的代表卓特巴扎普、于品卿、夏恭等七人于1937年11月22日齐聚张家口，商议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筹备事宜。筹备会议由金井章次主持，并在"为促进蒙疆三政权的相互善邻关系，加强相互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等名义下，达成了三政权之间紧密联合、共同防共的协议，最后缔结了《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协定》，其主要内容有："本联合委员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有关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各政权将原有权力的一部分，委交本会行使之"；"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其委员由各政权的特派员及其他必要职员组成之"；"总务委员会为联合委员会之代表，并总理本委员会之会务"；"联合委员会设日本最高顾问一名，顾问、参议若干名"；"联合委员会的决议，须得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始为有效"；"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均以命令行之，各政权为援助执行，得分担义务"；"非经各政权之同意，不得脱离本委员会"[41]。

关东军强使这三个伪政权合流，除为掠夺该地区的资源提供便利之外，也意欲增强对平绥铁路沿线的军事控制。为调和各政权之间的

矛盾，增强日本顾问的地位，联合委员会不设委员长或其他最高长官，仅以委员会名义组合各政权，而由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次掌控着“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实权。

“联合委员会”成立当天，出席会议的伪政权代表向关东军司令官呈送函件称：“一、蒙疆地方的本委员会应处理的一切命令及执行的政务、须适应贵军占领地的军事要求，因此，请求贵军给以大力协助，特请贵司令官在幕后指导方面给予深切的关怀。二、本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的主要成员，请由贵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员充任。三、本委员会所管理及统辖的重要交通和重要产业，根据需要，可委托贵司令官指定日满机关分别经营，或合并经营，对此请给以方便。”[(42)] 接到上述“请求”后，关东军司令官于11月25日复函表示：“拟在我方可能范围内，尽力给以协助。”与蒙疆联合委员会完成秘密换文手续后，关东军和驻蒙日军最终确立了对该组织的领导权。

对关东军擅自扩大蒙疆伪政权统治地域的行动，日本陆军中央颇为不满。尽管如此，关东军仍态度强硬，不断活动，造成既成事实，同时又向上呈报，强调蒙疆必须与华北分开进行指导。12月24日，日本内阁在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明确规定：华北临时政府管辖的范围，“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与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察南及晋北两自治政府，则待机与新政权合并”[(43)]。2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亲自致电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再次强调：“现在，如把察南、晋北合并到华北，不仅无视既成事实，有失皇军信誉，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以前艰难经营的各项工作。……因此，本军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28日，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出面答复称：“蒙疆之现状，虽暂且承认内蒙与察南、晋北之关系，但从它们与华北各政权进而与全中国的关系上看，给对华经营埋下了祸根。所以，在将来适当的时期，换言之，在华北政权发展到能够与蒙疆各政权确立关系的时候，再考虑调整与察南、晋北两政权的关系。”[(44)] 由此可

见，日本陆军中央既不想强令关东军执行内阁方针，但又不完全容忍关东军独断独行。这一立场在此后编组驻蒙兵团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早在10月日军攻占大同时，陆军中央见关东军对华北的行动超越了中央指令，即考虑让其撤退，另派军队担任该方面工作。但因察南、晋北地区连接中、苏两国，为避免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发生矛盾，最后决定成立“驻蒙兵团”，直属天皇管辖。1938年1月4日，“驻蒙兵团”正式编成，其任务是：“担任内蒙及察南、晋北主要地区的治安”；与关东军作战地区的分界，“为满洲国与内蒙、察哈尔省的交界线”；与华北方面军的分界，“为内长城线及绥远、陕西省境的长城一线，但涞源县属于华北方面军”[45]。

上述安排表面上平息了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的矛盾，但由于驻蒙兵团的要员大都来自关东军，关东军对该军仍有很大影响力。1938年元旦，关东军司令官与参谋长分别邀请新任驻蒙兵团司令官和参谋长进行恳谈，要求他们在政策、作战、谍报谋略等各方面不要改变现状。同时，又致函蒙疆三个自治政府，通知他们将秘密换文中的“关东军司令官”改为“驻蒙兵团司令官”，并希望早日“与满洲国缔结有关防共、通商、经济、金融及其他必要的协定，特别希望将贵地重要物资为满洲国优先利用和开发提供方便”。1月14日，关东军司令官又给德王、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及驻蒙兵团司令官发出公函，宣布“把蒙古军的统帅权委托给在蒙疆日本军最高指挥官”[46]。

进入1938年之后，日军进一步对其占领地区内的各伪政权加强控制。同年7月，日本政府制订《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明确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各个政权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47]。据此，驻蒙日军决定扩大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以增强

其统治权。8月1日，日本顾问金井章次操纵蒙疆联合委员会以通过决议的方式，将原来的三个专门委员会扩大为总务、产业、财政等六个部，各部设部长、日本顾问和理事官，部长由三政权代表担任，理事官则由中日人士出任。改组后的联合委员会，从原先单纯协商性质的机构，变为高踞各伪政权之上发号施令的机关，并直接掌管整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

德王是个政治野心很大的蒙古王公，在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他将年老多病的云王推为主席，自己只担任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因云王不来视事，政府实权就稳操手中。1938年4月云王病逝后，德王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长。自治政府虽有日本特务机关长和日本顾问的监督，但在内部事务的处理问题上，他仍有裁决权。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后，德王越发感到自己的地位受损，开始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对此，日本当局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面以强制手段令其服从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又邀请他去日本访问。同年秋天，德王利用访日机会积极活动，向日本陆军中央提出建立蒙古国的主张，但未获赞同。随同访日的金井章次也只准他称“蒙疆”，不准他称“蒙古”。尽管受到天皇召见，德王仍很气愤，表现出强烈的不合作态度。

由于德王在内蒙古各盟旗中拥有较大影响力，日本因此没有把他抛弃，而是软硬并用，迫他就范。同年11月，蒙疆联合委员会举行成立周年大会，邀请华北日军和伪满洲国的一批有名人物出席，德王托故不去参加。金井章次焦急万分，派人连劝带吓，硬把他拉到会场。为诱使德王合作，当地日军和特务机关经反复研究，又于1939年4月将蒙疆联合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总务委员长一职让给德王担任。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与苏联红军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均告失败。此后，日军对苏、蒙两国被迫采取防御战略。蒙疆北部地区，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将其划为“防共”特殊地域，急于要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而为一，以便统一发挥“防共前驱”的作用。5月8日，驻蒙日军拟订《蒙疆

建设基本计划》，图谋“建设强有力防共特殊地带”，并以1941年基本完成为目标[48]。6月11日，驻蒙日军司令官邀请德王、于品卿、夏恭等三个伪政权首脑，正式商谈三政权合并问题。当时，日军已在北平和南京成立了两个伪政权，因而考虑再成立一个类似“满洲国”的蒙古帝国或“蒙疆联合自治国”。

日本内阁兴亚院对此计划进行了专门研究，同意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于7月28日制定《设立蒙疆统一政权纲要》，其主要内容是：统一政权“采取高度的自治制”；“以亲日防共、提高民生为施政纲领”；“设最高顾问，作为主席的协议机关，以日本人充任之”；“设参议府，作为主席的咨询机关”等等，连使用年号、政府机关的名称都有具体规定[49]。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根据日军内定，推选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蒙疆伪政府成立当天，公布政府“组织大纲”、“施政纲领”和“成立宣言”；确定张家口为“首都”；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使用黄、蓝、白、红四色七条旗。经过改组后的政府，增设了蒙古军总司令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等职。政务院下设置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等七部，以及牧业总局、税务监督署、榷运清查总署等多个局署[50]。新政府成立后，一批日本人开始以正式官吏的身份出现，分别担任新政府的秘书长、部长、次长、局长等要职。日本政府还专门设立“兴亚院联络部”，由酒井隆担任联络部部长，以加强对这个新政府的监督。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政厅，直隶政务院管辖；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的巴、察、锡、乌、伊五个盟，也直隶政务院。其所辖地域大致如下：察南政厅设张家口，辖张家口市及万全、宣化等10个县；晋北政厅设大同，辖大同市及朔县、应县等12个县；巴彦塔拉盟公署设归绥，辖归绥（厚和豪特）、包头二市与五旗十县；察哈尔盟公署设张北，辖八旗；锡林郭勒盟公

署设贝子庙，辖九旗；乌兰察布盟公署设百灵庙，辖六旗；伊克昭盟公署设伊金霍洛，辖七旗四县[51]。实际上，当时蒙疆伪政权的势力仅能达到黄河以东的准噶尔、达拉特旗的部分地区。

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建立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即使在汪伪政府建立后，仍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四　伪华中维新政府

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是中国政治经济命脉所在。日军通过“八一三”事变，在华中地区燃起新的侵略战火，同时又投入巨大兵力，耗时三月，向中国守军反复猛攻，终于突破中国军队的淞沪防线。鉴于在华北扶植伪政权的经验，侵入华中地区的日军也各自在占领区扶植名目各异的治安维持会，接着又开始组建与“华北临时政府”类似的伪政权。

由于日军在向华中地区进攻时遇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不能像华北那样一下子夺取整座城市。因而伪政权的建立，也与华北不同，日军首先在占领的区县建立小规模的伪组织。1937年9月中旬，日军攻占位于吴淞口的上海外围县城宝山之后，即于9月23日设立宝山县自治委员会。此后，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各地伪政权先后登场，最小的政权仅为乡镇一级。如12月13日，侵沪日军在宝山县所属的月浦镇与杨行镇，扶植了两个镇“自治委员会”[52]。

这批大量出现的维持会与自治委员会，其主要行动口号是：“1．打倒国民党容共政权；2．确立绝对的亲日政策；3．谋求一般民众之幸福；4．发展亚洲民族之团结。”[53] 这些伪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当地日军维持战后的社会秩序，检举抗日分子，清查户口等，由于这批汉奸大多是没有威望、没有能力的地方人士，因此除上述简单工作外，无法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华中日军在拼凑治安维持会的同时，也注意物色有地位的汉奸来组建较有影响的政权，以实现对新占领区的长期统治。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机关精心策划，找到一个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福建商人苏锡文，于同年12月5日在上海浦东组织成立“上海大道市政府”，以太极图旗帜为标识，采用日历纪年，公告文件均采用中、日两种文字。同时，还发表《大道市政府宣言》，对“大道”的涵义进行解释，认为：“惟有彼此实行大道，始能得到真正和平。”然后又阐述了成立政府之目的：“值斯日本皇军代我国民诛锄军阀及国共两党之际……吾人特组织大道市政府，更易旗帜，期拯斯民于水火，而与举世之人，共登大同之域。”与此同时，“大道市政府”公布的“施政方针”明确宣称：“基于日满支一元化之精神，谋市政之独立”；“国共两党思想之清扫与东洋固有美德之发扬普及”；“基于‘一家’组织之精神，确立自治制度”[(54)]。这个初具政府形态的傀儡政权，虽然力量软弱、机构不全，但与治安维持会相比，已能发挥更多作用。华中日军期望通过这个伪政权控制上海及周围的新占领区。

1937年12月14日，华北日军在北平扶植汉奸成立“临时政府”之后，华中日军也考虑成立规模更大的伪政权。日本内阁在12月24日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对华中地区建立伪政权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军事的占领区域内，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与华北新政权有联系的新政权。”由于日本政府对上海租界及其周围地区特别关心，《纲要》专门进行详细规定，仅行政方面就有五项，主要是：“除租界周围即租界及越界筑路外，以大上海市管辖区域为特别市”；“特别市的行政，由中国人市长加以掌管；但在特别市，设置辅助市长进行一般行政指导的日本人顾问”；“为了施行特别市的警察行政，设置特别警察部；警察部长以下的首脑，由中国人担任，但为了与首脑协作，设置相当人数的日本人顾问”。在经济权益方面，“目标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55)]。

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经过中日双方数月激战，人员与物资

方面损害很大，再加上各国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导致日本内部意见不一，组建华中伪政权的工作因此不如华北那样顺利。12月29日，华中日军特务机关拉拢上海财政经济界几个头面人物成立“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首先协调工商界，恢复工商业。1938年元旦，在江、浙两省省会同时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和“杭州治安维持会”。其他新占领区的自治组织，也陆续成立。至1月20日，华中占领区的各种自治机构已达26个[56]。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对华中地区建立伪组织的工作更为重视。日本陆、海、外三省经过磋商，于1月24日达成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在华中方面，对于中国方面的现地指导，须在现地陆、海、外务三个机关联络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为此，决定以在上海的陆、海军特务部长及总领事组成现地联络委员会，上述委员会对现地进行必要的筹划，并决定从事指导的负责人和方法等。”[57] 2月12日，陆军省制订《华中政务指导纲要》，任命原田熊吉少将为华中方面军特务部长，具体实施有关工作。

根据日本政府指示，华中日军抓紧组建华中伪政权的工作，具体工作由华中方面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负责。他首先把目光瞄准了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过国务总理，以后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总裁的唐绍仪。但唐绍仪犹豫不决，使日军的计划无法实现。于是，臼田又策动温宗尧、梁鸿志、陈群等人率领旧人马，共组新政府。温宗尧早年曾赴美国留学，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藏参赞大臣、湖北军政府外务次长、护国军政府都司令部外交局长、广州军政府总裁等职，20年代后退出政坛，长期在上海寓居。梁鸿志是北洋遗老，曾任安福国会参议院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段祺瑞垮台后离开政坛，此时也在上海寓居。陈群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护法、北伐等革命活动，担任过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首都警察厅厅长等职，是个有实力的人物。2月中下旬，臼田宽三与这些

政坛失意的政客，就组织伪政权问题进行具体商讨。由于双方都有很大野心，所以把新政府定名为“中华民国新政府”，同时又确定以民国初年的五色旗为“国旗”，民主立宪为“政体”，“政府”所在地选定南京。另外，还制订了新政府组织大纲，准备于3月16日正式成立[58]。

华中地区的组府活动，引起华北汉奸的不满。“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王克敏等即以中央政府自居，不希望再成立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伪政权。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为扩大自身势力，亦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他们要求在华中地区设省，让梁鸿志等人去北京“临时政府”任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则认为，长江流域的战略地位超过华北，新中央政府应设在华中。华中日军还策动各地自治委员会发表通电，要求在华中地区成立新中央政府。当时主要在华中与华南地区活动的日本海军也支持这一意见。王克敏见反对不成，就向日本当局提出辞呈，以示要挟。

侵华日军的内部矛盾引起了日本当局重视。3月7日，日本政府召集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主管官员进行会商，最终在成立华中新政权的有关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次日，陆军次官向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和特务部长通报了日本政府的具体意见：“一、赞成建立新政权，可以起到给蒋介石政府以威胁的效果；二、关于国旗、政体、政府所在地没有异议；三、名称定为‘华中民国政府’。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另外，对于新政权成立所需的二百万元经费，陆军省考虑拿出一百万元[59]。

然而，华中派遣军不赞成把新政权定名为“华中民国政府”，派遣军参谋长在呈报意见时指出：“政府的性质决定于将来怎样指导，现地可以使用中国人希望的名称，趁建立政权的热情还没有降低的时候，最好先组成政府。”[60] 日本陆军当局只得继续同华北、华中两方面磋商，原定成立新政府的时间也被迫推后。

3月24日，日本政府制订《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对华中政权的性质及与华北政权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华中新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同时，为使两政权的合并统一不发生阻碍，要将成立宣言作必要的修改；新政权的机构和统辖的各种业务（海关、统计局、盐务局等）措施，要有利于将来的合并；两政权应建立联络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一个谅解事项，即以现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用意，是要它领导各地方政权，至于帝国承认它为中国的中央政府问题，则须根据另外的考虑决定；首都设在何地，一任中国方面选定[61]。

梁鸿志等人不甘心充当地方政权首脑，他们认为，政权的性质虽不能更改，但名称可以另外确定，决定把华中伪政权定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特地把成立大会放到尚处于战乱的南京举行。3月28日，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大礼堂正式宣告成立。当天，维新政府对外发表宣言，声称："恢复秩序、抚辑流亡、安定农村，复兴商业，皆目前最急之务。"[62] 同时还颁布政纲，并在南京和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成立大会过后，梁鸿志等人又跑回上海，躲进位于日租界的新亚饭店办公，故被时人讥为"饭店政府"[63]。

"维新政府"宣称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因人事安排的窒碍，实际只设行政、立法两院，行政院之下设外交、内政、绥靖、财政、教育、实业、交通七部[64]。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温宗尧由于内部倾轧，最终担任了有名无实的立法院院长。任援道、陈群、陈锦涛分别出任绥靖、内政、财政部部长，得以掌握实权。王子惠因有日军特务头目土肥原撑腰，当上了实业部部长。

同华北"临时政府"一样，"维新政府"亦是完全听命于日本侵略军的傀儡政权。它不仅由华中派遣军一手策划成立，而且政府的一切活动也都听从日军安排。华中日军仿效华北日军的办法，由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同行政院院长梁鸿志达成派遣日军顾问的协定。因华中地区

还有日本海军，故没有像华北那样书面换文。“维新政府”成立后，日本顾问即控制了政府各重要部门。不久，华中派遣军撤销了军特务部，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出任维新政府最高顾问，特务部其他成员也改任绥靖、内政、财政等部门顾问，总数达27名之多[65]。

日本扶植“维新政府”，主要是为了控制与恢复华中占领区的经济，以贯彻其“以战养战”的政策，这自然成为“维新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成立之时，“维新政府”即宣称，新政府的经济政策为恢复秩序、慰抚流民、安定农村、复兴商业四项。为在经济上取得明显效果，首先着手办理警察，恢复交通。同年5月6日，“维新政府”接收上海海关后，立即下令限制各种重要物资的移动，禁止携带500元以上的法币出口。“维新政府”还接收了松江等地盐务局，设立苏浙皖盐务总局，垄断盐政。为发挥上海全国通商大埠的经济枢纽作用，“维新政府”制订了大上海建设计划，同年9月成立直属内政部的上海复兴局，掌管上海复兴事务。接着，又将上海市伪政权改称特别市政府。

为麻痹统治区人民的思想，“维新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舆论、文化机关，创设华中通讯社，作为宣传奴化理论的喉舌。同年7月，又将原流氓组织兴亚会扩充成大民会，大力宣传“中日提携，谋东亚的自主兴隆”。此外，还在中日文化提携的口号下，把日语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每周上课多达十小时。同时颁布“思想善导办法”，令各级学校对学生进行所谓中日亲善教育。为使奴化教育能够贯彻实施，在南京等城市举办“小学教师夏季讲习所”、“教员临时养成所”[66]。

由于日本政府给“维新政府”的定位是地方政府，不管如何自我吹嘘，“维新政府”总不能以中央政府自居。梁鸿志在宣读《政府成立宣言》时强调：“维新政府之成立，系根据苏、浙等省之事实，原为暂时性质，与临时政府初无对立之心。向来中央所管事项之不可分析者，仍由临时政府商酌办理。一俟津浦、陇海两路恢复交通，即与临时政府合并。”[67] 随后，政府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一面强调“维新

政府”是“纯粹根据实际需要而成立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也承认将来要同临时政府合并[68]。梁鸿志等人虽对合并一事很不情愿，但日方出于侵华战争需要，希望合并问题尽快解决。

“维新政府”成立不久，日本当局即策划南北两个伪政权首脑相互接触。4月4日，梁鸿志、陈群、任援道等实权人物即去北平访问，与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等人会谈，商讨南北两政府合并事宜。4月29日，王克敏回访南京，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经两次会谈，大致达成如下意见：（一）关于外交问题，由临时政府主管，维新政府发生外交问题时，应即向临时政府报告；对日外交机关之设置，临时政府原已任命驻东京办事处处长，维新政府可另发任命，让其兼任维新政府驻东京办事处处长；（二）关于教育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废止排日教育，所有教科书从速另行编印；（三）关于海关问题，如海关之接收，新税率之制订，完全按照日方意见办理；（四）关于财政税收通货问题，依照临时政府的办法，设立盐务公署以辟财源，但征收款额应向临时政府报告；扩展联合准备银行，使之成为中央银行，华北地区以联银券驱逐法币，华中地区逐步限制法币之流通[69]。

就上述事项而言，“临时政府”名义上占有优势。当时中日两军正在苏北激战，津浦铁路尚未打通，实际联合还无从谈起，“维新政府”方面遂乘机将联合问题搁置起来，以待形势的变化。日本华中派遣军也不希望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在南、北合并后处于劣势，因此反对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合并。此外，两政府合并的人事安排亦是重要问题。由于双方均没有合适的元首人选，所以合并工作难以获得进展。

为消除合并障碍，日本当局派土肥原去做协调工作。在取得南北两支日军赞同后，土肥原于9月初召集“临时政府”的王克敏、齐燮元、汤尔和，以及“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陈群、任援道与蒙疆方面的德王等三个伪政权首脑，加上有关日军代表至大连开会，商讨合并问题。经多次协商，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首先是关东军要保持蒙疆政权的独立性，反对蒙疆政权参加新组织；其次是华中派遣军对新组织

不赞同；第三是新组织的人选，无法确定令各方都满意的名单[70]。会议行将破裂之时，日本政府一面令土肥原继续积极与各方协商，同时明确表示，联合机关是过渡性机构，并不是统一的中央政权。这样，南、北两政权的对立才告缓和，双方就合流问题初步达成协议。

9月20日，南、北两伪政权首脑根据大连会议的原则，在北平举行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中心议题仍是两政权的合流问题。在日本当局一手策划下，双方同意设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9月22日，公开发表“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成立宣言》、《组织大纲》、《办事细则》及委员名单。根据组织大纲，“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统制关于政务上共通事项，使新中央政府易于成立”；“对于交通、通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其中需要统制事项协议之”[71]。

“联合委员会”的人事安排，采取对等原则，即南、北两政权各推荐三人为委员代表各自政府。在委员中选举一人为主席委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处理会务。由各政府的委员中各选举一人为常任委员，以主席委员和常任委员组成常任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的秘书长由“临时政府”派员担任，事务处长由“维新政府”派员担任，“临时政府”推荐一名次席秘书，“维新政府”推荐一名首席秘书[72]。经双方推荐，由王克敏担任主席委员，朱深、温宗尧为常任委员，梁鸿志、王揖唐、陈群为委员。上述安排显然表明“临时政府”仍占明显优势，梁鸿志虽感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维新政府”的冷淡态度及南、北日军的内部矛盾，使联合委员会成为一个貌合神离的松散组织。此后，双方分别在北平和南京就“蒙疆自治政府加入问题”、“反对英国政府援蒋问题”、“物资调剂问题”、“沟通南北汇兑问题”、“统一编制教科书与年度日历问题”等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发表了“反共救国宣言”、“反对英国援蒋借款声明”等文告[73]。由于双方都想保住原有权势与地盘，故在涉及实际利益时均不肯作丝毫让步。经过近一年活动，联合委员会始终没有取

得实质性的进展。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日本政府把组建统一傀儡政权的希望寄托到汪精卫身上，对南、北两政权的联合逐步失去了兴趣。

第二节　汪精卫集团谋求对日妥协

一　低调俱乐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绝大多数中国人毅然选择武装自卫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然而，也有一些身居要职的民族败类，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竟认贼作父，投敌卖国。汪精卫等人即是最典型的代表。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号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并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决策高层。卢沟桥事变时，他正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面对日军侵略，他胆战心惊，力图妥协。然而见到全国抗日洪流汹涌澎湃，他又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骗取民众的信任，曾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话，声称："最近卢沟桥事变突发，危急情形，更加严重……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74)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汪精卫曾一度四处为抗日唱高调，声称："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75)"敌人在政治上有一个最毒的策略，就是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的人；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士大夫，来统制中国的人……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赖的人，才肯做傀儡。敌人要学从前满洲进兵利用中国士大夫统制中

国人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了。……现在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那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不齿于人。”[76] 尽管汪精卫一再于公众场合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然而，由于他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于是便利用抗日宣传的缝隙，巧妙散布“亡国论”的论调。

1937年7月30日，日军攻占北平。当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在回顾近年来中日关系时，他说：“我们知道日本对于中国是侵略无已的，自九一八以来，对于中国是一步一步的杀进来。”但中国只有“一步一步的后退”。原因何在？他解释说：“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在侵略。”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缔结《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原因，说当时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忍辱负重”，“确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仍然忍下去，让下去，当时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77]。这些言论，不但是为战前的妥协外交作辩解，而且也宣传了中国不敌日本的亡国论调。

8月3日，汪精卫再次发表广播讲话，强调“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他说：“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怎样才算说老实话呢？他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败于德国，几乎亡国，德国败于协约国，也几乎亡国的例子，说明其终究未亡的原因，是“肯说老实话”。他对此大加发挥：“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格局来。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说老实话，就是“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78]。这些话的意思是：“和”只有暂时吃亏而已，事后可以“有所以抵偿”；而坚持“战”，就会“败个不已”。

在宣扬“抗战必败”理论的同时，汪精卫还不断通过渲染战争恐怖

来吓唬国民。他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牺牲到底”了。“‘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等到“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79]。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式上，他进一步鼓吹战争的残酷：“一年来，破碎的山河，没有一处不染满了我们同胞的血痕。今年三月……据军政当局的报告，武装同胞死伤之数，已达五十多万。如今又过了三个月了……武装同胞死伤的数目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也可以推想而知。”“至于非武装同胞，在沦陷区域内，死于飞机之轰炸，大炮之轰击，机关枪之扫射，步枪之射击，刺刀之刺杀，其数目一时更不易统计。即在后方区域，一样的也日日在飞机轰炸之下不断流血”。“一切武装同胞非武装同胞的血，从前流着，现在流着，未来还要流着。”[80] 这番言论虽没有公开提出对日妥协，但已强调抗战必定要“牺牲”，以“牺牲完了”暗示“再战必亡”。在汪精卫眼中，对日抗战，除了“死”和“流血”以外，别无所有。

汪精卫不仅在公开场合支持和散布关于抗战的“低调”，在国民党高层之间也一直主张对日议和。

1937年8月4日，汪精卫借口报刊关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将南来的报道致函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主张国民政府应当主动对日谋和，他说：“今日仅为应战而非求战，彼既来，既先开口，我无不应之理。故此时努力于谈判公开之外，尚须坚决负起责任，如认谈判所开绝对不可接受，则负起战之责任，要求全国一致效死；如认谈判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要求全国赞成，即不赞成，亦要求必不反对。总之，此时吾党所能望于国民者，得其谅解而已。至于责任，则非吾党负之不可。至于谈判所开内容，此时虽未探悉，然以意测度，可归为数个方式，恕未能详叙，如承赐见，当继续敷陈也”[81]。汪精卫还面见蒋介石，转告胡适等人提出的和议意见。在答复汪时，蒋介

石“以为军心摇动极可虑，不可由彼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82]。对此，汪精卫颇不满意。对于当时中、苏之间洽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汪精卫认为将导致中日之间走向全面战争而失去议和机会，因此直接表示“怀疑”[83]。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签署后，汪又于23日致函蒋介石，称：“中国接受俄之援助，且力谋其援助之加强，实为当然。而对于日本，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此绝非心怀两端，实乃孤舟出险所不容不采之手段也。”[84] 周佛海投敌后曾公开承认：“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确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85]

应当指出，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许多中国人的政治立场面临新的抉择。以原改组派为主体的汪精卫集团，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走上了抗战道路。同时，原属蒋介石集团的一些人却被日军吓破了胆，对抗战前途悲观丧气。此时，汪精卫不断鼓吹的抗战失败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并促使他们转投汪精卫麾下，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就是其中的代表。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信仰过共产主义，后投靠国民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步步升高，进入蒋介石的智囊团，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1931年，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周佛海正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言论感到迷惑，认为蒋介石是“绝顶聪明的”，目前朝野上下都在“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调子还要唱得比别人更高，只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

的支持。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的用心虽然良苦，但决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不愿意走的路”[86]。周佛海还曾对抗日形势做过如下分析：“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蒋惟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因为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87]。当时周佛海与一批高层政要和知识精英往来密切，他们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同时也利用机会传播自己的主张，并且自诩为“低调俱乐部”[88]。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与周佛海两人见面时经常谈起时局问题。汪精卫认为“仗不能再打下去”，周佛海也认为，“中国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较，赶不上他”，国际上“对于中国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没有实际的援助”[89]。两人很快结成亲日派系。于是，“低调俱乐部”成为汪精卫进行所谓“和平运动”的基干力量，周佛海亦变为汪精卫的心腹，为其叛国投敌出谋划策，担当起“总参谋长”的角色。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之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当时汪精卫主张接受，向蒋表示提出“彼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但蒋明确表示“此不可能之事也”[90]。陶德曼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汪精卫集团加紧宣传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1938年1月，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来头很大，根据蒋介石“面命”，受汪精卫“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91] 其活动经费经蒋介石批准，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拨付，每月5万元。艺文研究会总部设在汉口，先后在长沙、广州、

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

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自己的亲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柏生以及梅思平前往香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创办蔚蓝书店。国际编译社实际上是“艺文研究会”的分支机构，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他们每周开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研究一周来的国际时事，主要分析对日情报，会后起草两份内容相同的报告交周佛海，让他转呈蒋介石和汪精卫。由于他们打着研究国际问题的招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同类，“许多人猬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92]。后来汪精卫逃离重庆，在香港的这批人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不断为汪精卫集团摇旗呐喊。

周佛海曾明白供认艺文研究会的宣传宗旨，由于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全民族抗战？“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是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93]。他打着讲理性、讲科学的幌子，归纳夸大国民党临全大会方针中的消极因素，写成《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进行宣传。他认为《抗战建国纲领》主要提了两点：一是民族国家的信仰；二是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要求“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换言之，就是要一切服从国民党，它的矛头完全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科学信仰，文章认为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94]。这实际上是以谈科学研究为名暗示中国的科学不如日本发达，武器不科学，“民族抗战”就不能取得胜利。

成立“艺文研究会”，标志着汪精卫集团组织的进一步扩大。此后，他们继续大唱“战必大败”，同时又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继续抗战。汪精卫在武昌一个训练班上发表演讲时称：“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要和，到底总是要和。”另一次，他更直截了当地对唐生智等高

级将领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95] 汪派集团的骨干林柏生、陈春圃等人，也以"优胜劣败是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理"为口头禅，鼓吹"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国打仗总是要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96]。

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即明确指出："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97] 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正是这样的民族悲观主义者，他们低估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高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因而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在日本和平烟幕的诱惑下，他们一步步地走上了叛国投敌之路。

二　董道宁、高宗武赴日

陶德曼调停终告失败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此深感失望，但没有死心。由于受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中，"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等词句的诱惑，他们急于寻找新的渠道，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周佛海曾回忆说："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98]

为进行所谓的"和平工作"，汪精卫与周佛海几经密商，于1938年2月在"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之下设立"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负责。

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回国，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此间，他担任

《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经常就中日问题发表论文，一时名声大噪，被称为“日本通”。蒋介石亦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并有意延揽其进侍从室工作，最终被其婉拒。1932年底，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是时，汪精卫正以行政院长身份自兼外交部长，他遂邀请高宗武进外交部任职。1934年初，高宗武入外交部工作，次年即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二十九岁。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与他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此后，高宗武在获得蒋介石许可后辞去外交部工作，南下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会”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

赴港之前，高宗武曾前往南京银行公会主席吴震修家中会见正在中国的日本人西义显，商谈中日“和平问题”。西义显是日本满铁南京事务所主任，长期在沪宁地区活动，与不少工商金融界人士及政府官员相交甚笃。听罢高宗武的意见之后，他专程赶赴大连，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报告，请他为之设法。松冈对西义显说：“事已至此，实为中日两民族宿命所定。但将来或有机会恢复和平。你能获得中国人如此信任，亦属难得，你可待机行事。你如有意，可任意选择住地，以便与南京（中国）同志再行会面。”[(99)] 为让他专心从事和平工作，松冈免去了西义显在满铁的一切工作，还给他一笔巨款和一封介绍信，让他去东京面见近卫文麿首相。当时中国军民正在淞沪地区奋勇抗战，举国上下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和谈活动无从下手，西义显只得返回上海，等待时机。

1938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官员董道宁突然前去上海拜访西义显。董道宁早年留学日本，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曾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事，同西义显早有交往。两人一见面，西义显即明白其来意。得知他为两国和平曾找过川越茂大使后，就鼓动他直接去东京活动。为打消董道宁的疑虑，西义显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以交战国外交官之身份，既秘密来上海，会见敌国大使，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理义虽同，而效果则更大”。“对于你的行

动秘密，我负绝对责任，其实较你在上海之保守秘密更为容易。你若有此决意，我当先赴东京，但你是以（中国）亚洲司第一科科长之资格前去，东京自当感激。……今日之悲剧，系由两民族缺少互相信任而起，你赴东京，即表示中国人信任日本人，为建筑信用之第一步。两民族能互信则生共感，东洋之社会始能走上构成之路”[100]。

1月17日，西义显将此消息向长驻上海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报告[101]。松本非常重视，亲自会见董道宁，他说：“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都有重大意义，就这样置于不相往来的状态是不适宜的。”[102]同时他还建议西义显立即返回日本，与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联系。1月19日，西义显即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得到影佐首肯之后，他急派助手伊藤芳南前往上海，为董道宁代办赴日手续，自己则留在东京安排接待事宜。

事实上，董道宁此次与日方秘密接触进而秘访日本，是直接受到高宗武指派的。2月25日，董道宁在伊藤芳南陪同下离开上海，次日抵达日本长崎，28日赴横滨，然后去东京，在横滨与东京共待了九天。3月10日董道宁离日，取道大连，于3月15日回到上海。秘密访日期间，董道宁先后与陆军省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第二部长本间等人进行了会谈，大体摸到了日本陆军对解决中日战争的基本立场。如多田骏一开始虽然表示：“此次两国间不幸冲突……应及时妥为解决。”他信誓旦旦地说道：“日本对于贵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完全尊重，毫无野心……以后对于贵国内政问题，绝对不采取干涉态度，此点可以明言。”但是，旋即多田骏宣称：“惟贵国必须根本放弃抗日政策。换言之，将现在之抗日亲苏政策一变而为亲日抗苏政策是也。”而影佐则赤裸裸地提出：“日方希望中国有大政治家亲自出马，与日方开始交涉。”他提出了中国必须接受的“最基本条件”：放弃抗日政策，与日方合作；承认伪满洲国；对日本赔款；日本在华北驻兵；严加防共[103]。这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日本通过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的条件并无二致。

结束访问时，影佐特地至车站送行，并请他将两封亲笔信带给当年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和张群。信中称：“要解决中日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如能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情付之东流，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相会，则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应有赤诚握手的气概。”[104] 显然，影佐的立场非常明确，即希望中国的亲日派一笔勾销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无条件地与他们“赤诚相见”，充当汉奸，其本质与一个月前发表的“近卫声明”毫无二致。

董道宁秘密访日期间，高宗武也在努力寻找同日本方面接触的渠道。为给谋和活动披上合法外衣，周佛海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等地收集日本情报。得到蒋介石首肯后，高宗武不仅取得了军事委员会的出差证明书，以避免出入境的麻烦，同时又可按月从蒋介石的军事机密费中领取一笔活动经费。到香港不久后，他即秘密前往上海，与松本重治取得联系。3月15日，董道宁与伊藤芳南抵达上海。次日下午，高宗武与松本重治在一家饭店约见他们，询问访日情况。为进一步扩大秘密联系的渠道，几位中日人士决定以兄弟相称，并给每人编一个代号：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二郎”，伊藤芳南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影佐祯昭为“六郎”[105]。

高宗武认为，下一步工作关系重大，于是决定去香港与日方仔细商量后再作决定。3月27日，高宗武、董道宁同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南等人，围绕中日“和平”谈判的主题，在香港浅水湾旅馆展开长谈。高宗武首先介绍了武汉国民党中枢对陶德曼调停的态度，他强调说，之所以将这些情况向日方报告，是为了让在座的日本代表“了解中国方面对陶德曼大使所转达的广田外相的和平条件，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是面向和平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106]。松本重治与西义显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认为董道宁在东京的活动，使陆军内部一些人对“和平”的愿望愈发强

烈了。作为陆军统帅部现役军人影佐祯昭，能够直接给中国高级官员写信，证明他已“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于是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看法，即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意向如果能够互相沟通，再加上两国“和平派”的活动，两国之间开展“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备的[107]。

会谈过程中，高宗武又向日方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认为国民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和平派”，而且其势力正逐步扩大。松本等人听后，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感到异常兴奋。在具体讨论如何把影佐的信交给何应钦与张群时，决定由周佛海转交蒋介石，让蒋介石了解此事[108]。会谈结束后，高宗武、董道宁返回汉口，西义显则去东京，相约十天后仍在香港碰头，交换后续活动情况。

高宗武回到汉口后，立即向周佛海详细汇报，并拿出影佐的两封信。周佛海兴奋不已[109]，他随即向汪精卫请示，汪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应让蒋介石知道为好。于是，周佛海通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将影佐的两封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命高宗武再去香港，并向他指示：“把这一主要意思传给日本：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自己反共的。”[110] 蒋介石日记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上午听高司长报告，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111] 可见，结合战局进展状况和其他资讯，对于来自高宗武的有明确导向性报告，蒋介石主要解读为日本急于与重庆政府休战议和。至于如何应对，蒋介石在稍后的日记中提到“对倭和战方针”之时，既写到要“准备大战”，又指出“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并且“与汪（精卫）张（群）谈对倭策略”[112]。可见，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乃都认为，以津浦线为主要区域的徐州会战的有利态势，已经挫败日军自攻占南京以来的新一轮军事战略目的，中方大可乘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乃至达成和局。

4月16日，高宗武重返香港，他在浅水湾旅馆再次与西义显会面时称："蒋委员长读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口头转达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的主要意向是：对影佐的"诚意与勇气表示敬意"；"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原则上可予承认"；"若上述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113)]。高宗武一再强调：这是蒋介石亲口对自己说的，希望西义显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及时向影佐转告。

4月27日，西义显自香港返回东京，正式向陆军参谋本部要员汇报。然而，此前对"和平工作"很有兴趣的参谋次长多田骏却保持沉默，连影佐祯昭也一言不发。原来，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被歼二万余人，不仅损失惨重，而且面子大失。日本政府恼羞成怒，正调集兵力，准备向徐州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此情况下，"和平运动"自然被抛到了一边。

5月底，高宗武返回汉口，同汪精卫、周佛海等商量对策。这时，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近卫内阁进行改组，宇垣一成替代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宇垣是个老资格军人，曾任清浦、加藤、若槻等多届内阁的陆军大臣，被认为是日本军内"中庸派"人物。他对英、美较亲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力量也有一定认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曾主张采用"不扩大"方针，企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日本的侵华目标。因此，宇垣的上台，预示日本对华策略将有所改变。事实固然如此，宇垣在入阁时曾向近卫首相提出四项条件，其中两项是关于对华方针的："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1月16日的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迫于必要时予以取消"[(114)]。他一上任，即向新设立的五相会议提出修改对华方针的建议，再次向中国政府伸出招降之手。6月24日，五相会议确定了"以大体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不妨碍有条件地接受第三国的调解"的新的对华方针[(115)]。

对于宇垣上台，中国方面表示欢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专门发贺电表示，日本如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汪精卫等人则更显得兴奋。周佛海认为，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较大可能性，于是一再对高宗武说：“到东京去一趟怎么样？”高宗武也因此有些跃跃欲试。此时，蒋介石已考虑另派亲信前往香港与日本接洽和谈，而让高宗武继续留在武汉活动。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出现了转机，不能就此撒手，于是又给高宗武打气，称：“蒋先生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116] 经周佛海屡次鼓动，高宗武瞒着蒋介石再次秘密前往香港，与西义显等人会面。

经多次接触，双方都已表明立场。为使今后工作不致引起误会，经西义显提议，两人于6月14日签订《备忘录》，主要内容是：“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中介和平，计划第三势力之结合”；“第三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两势力须保持公正妥当之立场”；“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中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117]。显然，所谓“第三势力”，即指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他们准备离开抗日阵线，以独立姿态“调处”中日两国的战争。

6月17日，松本重治从东京来到香港，参与策划。他们一致认为，“和平运动的主要之点”是日本从中国撤兵。高宗武满怀信心地说：“问题就是这样。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仅仅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成功。”[118] 同时，他们也承认，日本撤兵是个难题。如果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日本连撤兵声明也不会发表；而要蒋介石下野，中国方面也绝对不会同意。为寻找妥协方案，高宗武设想：日本先发表撤兵声明，蒋介石自己下野，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这时希望停止战争的各种“杂牌军”会从“各方面响应”，形势应当会出现转机。松本等人对此计划存有疑虑，认为有些地方“相当

地混乱”。因没有更好办法，只能对此计划做进一步研究[119]。在战争进行之际研究撤兵问题，松本重治深知风险很大。他一面提议双方都要“绝对秘密”，同时又邀请高宗武一起去东京。为进一步探知日方的“和平”意图，高宗武决定秘密前往东京。

1938年7月2日晚，高宗武乘坐日本“皇后号”客轮抵达横滨。上岸后，高宗武为避免外界探悉，“即乘汽车径赴东京”，当晚“住九段‘偕行社’”[120]。次日，他在松本重治、影佐祯昭等人的协助下，移往麻布区住友银行贵宾别墅居住。当晚，高宗武与前来拜访的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进行会谈。7月4日上午，高宗武又与影佐祯昭会谈一小时。日本陆军省改组后，影佐祯昭获任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兼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手中实权大增，“可称为日本对华政策之中心人物”。高宗武事后回忆说：“此一小时之会见，余以为意义颇为重大。”当天下午，高宗武还与来访的日本参谋次长多田骏进行了会谈[121]。此后数日，高宗武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同盟通讯社社长岩永裕吉等重要人物，并前往首相官邸拜访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并与之会谈。

7月3日晚与松冈洋右见面时，高宗武表示：“此行既不代表政府，亦不代表个人，既非求和之密使，又非军事之密探，专以个人资格请教贵国朝野之意见，以作余个人今后努力张本。”[122]此后与其他日本政要会谈时，高宗武又反复强调这一点。在谈话中，这些日本政府的军政要员顽强狡辩，不断推卸战争责任。板垣征四郎强硬地声称：“非蒋介石先生负责下野、国府改组，日本只有忍痛牺牲一切，以求事件之根本解决。”[123]影佐祯昭也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则不但于日本方面容易转旋，即中国方面亦易作到，于中国面子，亦可保持。”[124]他们对蒋介石既想同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的两面政策非常不满，因而感到谋和还是以汪精卫出面为宜，于是得出以下结论：“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

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25] 对此，高宗武一面呼吁日本深入了解中国人之恐日心理，率先表态息战，同时坚持只有蒋介石方能主持大局。

7月9日上午11时半，高宗武由东京动身，赴横滨乘船返国[126]。回到上海后，高宗武由于肺病恶化，住进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于8月下旬返回香港。高宗武深知，此次赴日未经蒋介石同意，问题严重，回武汉恐被蒋介石扣留，于是请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回武汉，将他的报告送交周佛海。周佛海接报后，立即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听说日本要自己出面“主持和平”，装出有些“吃惊”的样子。此时他尚未下定单独与日本谋和的决心，很想试探一下蒋介石的态度，于是装作不知，让周佛海“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同时又表示：“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127] 蒋介石看到报告，知道日本仍想要自己下台，心里当然恼火。但他不动声色，将这份报告批转张群和汪精卫阅读。几天后，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对他大发雷霆，同时严厉责问：“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128] 他下令立即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要高马上从香港返回汉口。

如前所述，关于高宗武与日方有接触一事，蒋介石是知晓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蒋介石在1938年6月5日曾约见高宗武近一个小时[129]。第二天，蒋再次约见高[130]。只是这两次约谈的内容，陈布雷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是6月23日自香港启程，经上海，于7月2日抵达日本横滨的[131]。但蒋介石在6月24日的日记中便提到：“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的日记提到：“高宗武行踪与处置。”7月9日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他的赴日情况报告送抵重庆后，由周佛海送呈蒋

介石，其内容包括日本希望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来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看了之后，在其日记中写到："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安有关系也。"[132] 7月25日，蒋介石"与汪谈高宗武报告内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岂果有愧怍之心乎"[133]？总之，蒋介石对汪精卫在当时中日秘密接洽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结果十分不满，下令停止向高提供活动经费。而"低调"集团日后便由梅思平出面与日方秘密接洽，谋划汪精卫出走。

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交涉铺设了道路。此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因高宗武身体不佳，周佛海遂让梅思平负责与日方秘密联络的工作。

为配合诱降工作的实施，日本政府在部署武汉、广东作战的同时，开始修订原有的对华方针。7月，日本内阁连续举行五相会议，确立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总目标是通过武汉、广东作战，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力争在年内结束战争。若无法实现此目的，则将以此配合对华新策略的贯彻实施，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具体策略有《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指导方策》、《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大纲》等[134]。

对日本政府而言，只有国民政府停止抗日，战争才会结束。因此，近卫内阁把对付国民政府置于各项对华策略之首。7月8日，五相会议针对国民政府是否屈服的两种情况制定两套对策。如果屈服，即将其作为一个政权来对待。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屈服？对策中列出了四项标准："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旧国民政府改变名称或改组；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取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135]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开始把"不作为对手"的对象只限于蒋介石个人，而把国民政府也包含在"新兴中国中央政权"的概念之中，这是其对华政策的重要转变。

日本政府设想于攻占武汉之后，立即着手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他们对于新政权寄予极大希望，即不仅使它“成为处理这次事变的中国方面的当事者”，而且要“使它成为能把日华国交从过去的一切矛盾中解脱出来，并以大众之观点，成为确立善邻基础的中国政府”。新政权的建立表面上“使中国方面行使”，实际上由日本从内部操纵，其政权组织形式，“采用分治合作主义”，即仅做到表面上的统一[(136)]。

按照日方的设想，新政权的建立大体可分两步走：首先，“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再联合蒙疆政权以及吸收各种势力，使其初具规模。在攻占武汉或蒋政权发生改组前，暂不正式建立。其次，在攻占武汉后，蒋政权如不发生分裂改组，就以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蒋政权分裂改组，出现亲日政权时，“把它作为组成中央政府的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日本政府在该新政权具备中央政府实力时，正式予以承认。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要继续研究确定调整日华关系的基本内容，以便同该新政府签订新条约[(137)]。

根据上述方针，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通过各种渠道，在抗日阵营里寻找合适对象。汪精卫集团当时只是诸多对象中的一个，尚未引起日本政府特别的重视。随着武汉战役的发动，日本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接连遭到失败，而对汪工作却进展顺利。于是，“汪兆铭工作”便日渐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三　“重光堂”会谈

梅思平是紧随高宗武与日本接洽“和平”的重要人物。他是浙江永嘉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先后担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因其才能为蒋介石赏识，故成为蒋介石系统的重要干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也参与“低调俱乐部”的活动，

并跟随周佛海等密谋策划对日“和谈”。

1938年初，梅思平奉命前往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收集情报为名，鼓吹民族失败主义论调。此后，他与在香港活动的高宗武交往密切。同年8月，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于是提议让梅思平接替自己与日本方面密谈。8月29日，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首次会面，以后又就“和平”、“撤兵”等问题进行详细交谈。梅思平熟知中国抗日阵营内幕，他强调指出：“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最笨拙的做法。”“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本方面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138) 松本了解这一情况后，当即表示：“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139)

为防止泄密，他们不断改变会谈地点。至9月4日，他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对中日和平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均事先交换了意见。如关于承认伪满洲国、撤兵所需要的时间及划定例外的驻兵区域、如何消除抗日排日的宣传和教育等问题。这轮会谈为中日双方正式谈判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因而把日汪的秘密勾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由于日军向武汉发动全面攻击，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随国民政府撤至重庆。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返回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向汪精卫汇报了同日方商谈的结果，以“促汪奋起”。汪精卫倍感振奋，认为“和平运动”的前景不错，决定亲自出马。他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为中方谈判代表，正式与日方展开交涉。

自8月下旬开始，日军组织10个师团的兵力，在长江南北两岸约600公里的战线上，分多路向武汉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又调派侵占台湾的第二十一军向广州发起攻击。军事上向国民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日方也积极开展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工作。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同时与国民政府各派人物进行联络。

新上任的外相宇垣一成在诱降活动中一马当先。他上台伊始，即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互通电报。不久，又策划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建立秘密联系。6月中旬，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同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开始在香港秘密接触，进行“日华和平”的第一次试探[(140)]。日方提出由原外相广田拟订的六项条件，并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141)]。中方对谈判条件未作争论，而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不肯让步。由于双方意见都由代表转达，不仅耗费时日，且难于取得一致意见。孔曾把其僚属与日方洽晤的情况报告蒋介石，蒋“属孔不可另自接洽”，认为“对倭事亟须统一”[(142)]。谈判很快陷入僵局，宇垣的希望开始落空。另外，通过萱野长知开辟的民间谈判渠道也中途夭折。武汉战役发动后，日本政府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外相宇垣内外交困，被迫辞职，诱降工作宣告失败。

除宇垣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其他多条渠道进行诱降活动。其中，以土肥原为首的特务机关，在诱降国民政府、拼凑全国性伪政权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该机关以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为首，全称为“对华特别委员会”，简称“土肥原机关”，是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143)]。它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高级官员组成，直接受内阁的五相会议领导，在业务上统辖除军事统帅部门以外的所有侵华机关，负责除军事作战外的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谋略。

土肥原机关成立后，即根据《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的“政略指导”原则，捕捉在攻击广州后至侵占武汉前可能出现的两次诱降机会。10月7日，武汉作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土肥原机关接到华南特务机关的报告，称与国民党代表萧振瀛取得了联系。他们认为第一次诱降机会已经出现，于是迅速拟订诱降方案，计划先后派出三个不同级别的使者，渐次推进谈判：首先立即派出第一使者去香港，试探蒋介石的态度，初步提出谈判要点。接着再派出级别较高

的第二使者，听取蒋介石对第一使者提案的答复。待国民党当局同意日本的提案，马上着手安排中日高级官员的直接会谈。第三使者须由政府特使、首相或陆相担当，直接与国民党首脑谈判解决战争问题[144]。

虽然日本军政当局对此次诱降满怀信心，但事态并未按照日方确定的方向发展。第一使者初步接触后，中国政府因武汉危在旦夕，急于要求在10月17日前进行第二使者会谈。担任日方第二使者的土肥原不愿前往香港谈判，于是临时选在作战区域以外的福州会面。土肥原坚持要在福州海面的日本军舰上会谈，而国民党代表则坚持在福州城内进行。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另外，蒋介石虽有和谈愿望，但坚持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为前提。10月14日，他明确指示：“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以18日为限期，防其缓兵”，“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145]。由于日中双方均不肯让步，这次和谈遂无果而终。

在实施对国民党当局诱降计划期间，土肥原机关并未放松在中国占领区拼凑伪政权的工作。它把目标集中到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这三个“中国第一流人物”的身上，企图让这些曾在北洋政坛上出过风头的遗老重登政坛，充当伪政权的军政头目。9月下旬，土肥原秘密前往上海，拜访隐居的唐绍仪，策动其出山。受名利驱使，唐绍仪产生了重返政坛的欲望，马上与手下党羽商讨组阁事宜，并拟出了未来政权中高级官员的初步人选[146]。可是，唐在9月30日突遭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死亡。土肥原失去了目标，又跑到华北做吴佩孚、靳云鹏的工作。隐居天津的靳云鹏，虽有出山意愿，但因早已在政坛上失势，故没有什么作为。吴佩孚失势后，在北京什景花园隐居，当时仍有不少旧部属。因此，土肥原开始把策动重点转向吴佩孚。然而，吴佩孚与“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有矛盾，又不能与土肥原很好合作。土肥原费尽心机，工作始终没有明显进展。

日本政府诱迫国民政府屈服，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充当统一政

权傀儡这两项主要政略遭遇挫折之后，原先不受重视的“汪兆铭工作”逐步引起他们注意，并被置于重要位置。10月下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把在香港同高宗武、梅思平会谈的内容带回东京，建议陆军大臣与参谋总长推进这项工作。由于会谈内容已同日本政府调整日华关系的原则接近，因而引起东京方面的重视。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召开协调会议，对香港会谈中提出的和平方案进行了若干修正，作为下次对华和谈的基础。同时决定派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民间人士犬养健、西义显等急赴上海，与汪精卫的代表进行正式会谈[147]。

为争取这次诱降活动获得成功，近卫内阁在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立即抓紧时机，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对华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高唱中国政府如“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的调子，同时强调：“帝国所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合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48]。与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相比，日本的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即由企图武力消灭国民政府转为向国民政府诱降。第二次近卫声明向汪精卫集团伸出了招降之手。

经日方代表精心安排，双方会谈地点选在上海的“重光堂”，它地处上海东北虹口公园附近，是一幢深处茂密树丛中的西式二层楼住宅，门牌为东体育会路7号，当时中国居民习惯将其称为“梅华堂”。1938年11月初，今井武夫等人从附近旅馆借了可供七八人使用的生活用具，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布置，准备接待中方代表。

11月7日，梅思平从重庆赶到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缩小目标，他们分乘法国和意大利的轮船，先后于12日和13日到达上海。随后由日方人员将他们接到“重光堂”，并立即与今井武夫、伊藤芳南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会谈从12日晚一直延续到14日晚，会谈核心内容是

商量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和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详细办法。

会谈伊始，梅思平转述了在重庆与汪精卫等人协商的意见：汪表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将来保证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开发权，以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部门的日华合作。中方的底牌亮出之后，根据日方提议，双方就具体方案逐一进行讨论。日方拿出的具体方案为：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区域，允许驻扎日本军队；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等。经过一番争论，梅思平等承认了日方的提案，同时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撤退；要求内蒙以外之日军在实现“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149)]。与日方条件相比，汪精卫方面的“撤兵”希望是虚无的。对此，日方尚认为要价太高，只同意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基本原则确定后，即考虑如何实施的问题。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以及建立政府的有关政策。经过讨论，日方表示同意。行动计划包括“发动”、“建立新政府”、“新政府的政策”三部分；其重点是“发动”，即关于汪精卫等人如何逃离抗日阵营，与日本携手合作。他们设想了七步环环相扣的行动计划：1．“日华代表间如达成协议，日本政府确定解决和平条件，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人通知在重庆的汪精卫”；2．“汪精卫在接到上述通知的一两天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干部同人寻找借口前往昆明”；3．“日本政府准备在汪到达昆明之际，公布日华解决和平的条件”；4．“汪精卫于次日发表对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当天乘飞机到河内，再赴香港”；5．“汪精卫到达香港后，立即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呼应，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同时，“对中国内地及南洋华侨开始进行和平运动”；6．“与上述之声明相呼应，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

与之呼应”；7．“日本军如能援助上述军事行动，以使中央军的讨伐陷于困难，可隔断中央军，向贵州等后方进攻”[150]。上述计划清楚地表明，汪精卫集团的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只是叛离抗日阵营的代名词而已。

虽然中日双方代表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成功与否仍须由日本当局决定。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与高宗武、梅思平两人达成的秘密协定草案，乘飞机赶回东京汇报。今井武夫赶到时，陆军省部首脑恰巧聚集在陆相官邸开会，今井武夫急向板垣征四郎陆相和多田骏参谋次长汇报。对于如此巨大的进展，陆军首脑们感到惊奇，同时也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下午6时，省部中层干部专门召集研究座谈会，详细研究协议草案的可信度。与会者反复向今井武夫提出质疑，而今井则将在上海的三天三夜中讨论、争执的情况详细介绍。对于是否会上当的疑虑，今井断言：“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151]鉴于今井武夫的态度，军部最后作出了大力推进这项和平运动的决定。

此后，陆军省决定派遣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派遣今井武夫作为日方代表负责这项工作。11月18日，今井武夫等人乘飞机返回上海。次日开始，双方在“重光堂”举行正式会谈。由于在预备会议中双方已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所以正式会谈反而比较轻松，仅对协议文本词句做了简单修改。20日晚上7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代表日方，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中方正式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还达成一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最后，日方还把日本内阁将要发表的声明草案亦送给中国方面参考[152]。

《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双方全面合作的条件，二是合作的行动计划概要。合作条件共有六项，主要是：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

住、营业之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日华经济提携基于平等互惠之原则”，“承认日本之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5．“中国方面应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6．“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行动计划大体分四步：首先是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解决时局的条件；其次是汪精卫等中方人士立即响应，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第三步是“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和反共政策的声明”；最后是“俟机成立新政府”。《谅解事项》是对上述协议内容的补充说明，主要是关于驻兵地区以及期限，优先权之解释，日本协助救济难民等三项[153]。

“重光堂”会谈达成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中国新政权的控制，以及要求中国协助其向中国周边地区的扩张。对中国控制方面，规定中国将实施亲日的教育及政策，日华进行经济合作，两国设置必要的合作委员等。协助日本侵略扩张方面的规定则更为宽泛，如对苏设置“共同宣传机关”，“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于战时实行联合作战”，“务必努力使日华两国以外之亚洲各国参加本协定”，等等[154]。因这些内容影响大、涉及面广，一旦泄漏，对双方都很不利，所以没有放入正式协议之中。

上述协议正式签订后，中日双方都加快了行动步伐。11月21日，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再次飞回东京，向陆军省部首脑汇报。22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带着影佐征昭和今井武夫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向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征求意见。内阁同意军方意见，商定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得到政府批准后，今井等人立即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守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消息。中方代表梅思平则于会谈结束后马上回香港，11月25日又从香港乘飞机出发前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

“重光堂”会谈的成功，使日本运作多时的政略攻势取得显著成效。面对这一有利形势，他们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原有目标。11月30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该方针不仅包含了以前已经确定的条款，而且还把正在考虑中的对华要求也添加了进去。《方针》的指导原则为："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其基本方针是："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合作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在华北及蒙疆划定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在长江下游地带，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地区"；"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取得特殊地位"。其中的重要事项，如"善邻友好原则"、"共同防卫原则"、"经济合作事项"等，在《方针》的附件中都有详细的规定[(155)]。

与十天前与高宗武、梅思平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相比，此《方针》中日本对中国的权益要求要广泛苛刻得多。日本代表在"重光堂"谈判中一再强调的"相互本着公正的关系"、"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等美丽词句，不过是吸引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分裂，叛离抗日阵营的诱饵。

第三节　汪精卫集团投敌

一　汪精卫秘密出逃

淞沪战役失利之后，国民政府已难以在正面战场立即组织有效反击。首都南京的失陷，更给国人心理以沉重打击。如何阻止日军的进攻势头，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严峻问题。台儿庄战役的获胜，不仅没有改变整个战场局势，反而使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为挽回面子，侵华日军开始组织规模巨大的秋季攻势，目标直指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及其同伙，因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根本看不到日本外强中干的本质，反而被它的表面凶焰所吓倒。在继续大力

散布抗战必败论的同时，汪精卫等人开始走上投敌之路。

1938年8月间，就在高宗武秘密访日之后，周佛海向汪精卫进言称："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汪精卫也叹息道："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156] 这段话虽然加上了"为中国"的字眼，但却如实反映了汪精卫等人迫切对日乞和的心情。当时他们只知道日本内部有谋和意向，但不知道日本具体的要价。为此，他们急忙派梅思平前往香港，协助高宗武与日本联络。

同年10月，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多次密谈，基本摸清了日方的初步要价。汪精卫等人的对日乞和活动，开始逐步进入新阶段。这时，全国抗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国民党正面战场形势严峻，日军分多路向武汉猛攻，武汉失守已成早晚之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在日本占领区内建立起大小十余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并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形势下，汪精卫等人终日坐立不安。他们既震惊于大片国土之迅速沦丧，对抗战前途悲观到了极点，同时其暂时压抑的恐共、反共情绪急剧膨胀。于是，他们一面暗中积极与日本相勾结，一面又利用各种场合，大肆散布亡国言论，公开向日本乞和。

10月11日，武汉危在旦夕，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吐露"肺腑之言"："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157] 十天后，广州失陷。汪精卫当天向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

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吾人愿随时和平，不过须有不妨碍中国独立条件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在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时，吾人未尝拒不接受调停。去年德政府出面斡旋时，吾人亦未尝拒绝之。即在最近，国联讨论适用盟约十七条时，吾人曾有准备结束战争之表示。”(158)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失败主义、悲观主义弥漫，汪精卫明确主张对日议和，与蒋介石的主战立场直接对立。10月24日，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对于和战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据王世杰日记所载：“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汪、孔均倾向于和平，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余谓政府欲祛一般人对于抗战前途之疑惧，当向参政会提出一个比较切实的继续抗战计画，空洞的主张不足以镇定人心。”(159) 在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160)。在汪精卫集团的核心分子周佛海看来，“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惟日本既不能取消一月十六号声明；而蒋先生又不能、且不可下野，和将从何谈起”(161)？当时蒋介石在湖南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征询今后方针，“闻孙哲生电复主战，并主接受共产党所提意见，以加紧团结；汪精卫先生主张设法请英德出任调停，陈果夫亦然”(162)。蒋介石本人则认为，中国到了对日宣战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战之利害，此时海口全被封锁，吾国已无顾忌，若我宣战，美国应实施中立法，乃可断敌军向美购油钢之路，实于我为有利。”(163)“此后抗战建国必须从新做起，彻底检讨过去之缺点与将来之改革”(164)。他还致电张群“属参政会讨论宣战案”(165)、“宣传宣战事”(166)。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表示政府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并号召全国同胞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争取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解放[167]。次日，他还指示陈布雷：“告国民书可即发外电，使敌知我抗战到底之决意也。”[168]蒋介石的上述立场，使得汪精卫集团彻底失望了。

汪精卫本人急于求和的态度非常明确，汪集团的其他成员紧跟而上，在自己控制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讨论“和平”的文章，大力鼓吹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便是和平，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他们大力宣传：“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169]陶希圣声称：“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及时谋战争的结束”[170]。

然而，大敌当前，投降主义不得人心。为揭露投降派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于10月15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时至今日，如犹有人欲谋妥协或投降者”，“实系破坏吾人抵抗外侮之决心，无疑为一汉奸，为虎作伥”，“势将为国人所弃”[171]。其后，又连续发表题为《粉碎一切汉奸伪组织》、《对基本国策不容含糊》等社论，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言论痛加驳斥。国统区非汪伪集团控制的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评，斥责汪派“和平”言论。同时，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表函电，严辞驳斥这些汉奸言论。函电严正指出：“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等于自杀。”同时明确表示：“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172]10月28日，旅外侨民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获得多数参政员响应，并被正式表决通过。上述这一切，反映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鲜明立场。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政会议长，对全国人民反对投

降的强烈呼声根本不予理睬，照样我行我素。然而，他所宣扬的“和平”理论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强烈抗日气氛的包围下，自己处境非常孤立。他深知，要实现对日谋和，必须离开重庆，从外部发动“和平运动”。“重光堂”会谈的结果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1月27日，梅思平将同日方达成的“密约”带到重庆。汪精卫立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与会者对“密约”的内容表示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心存疑虑，意见不一。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寻找“新的”出路。这一意见最后得到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赞同[173]。

事实上，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冲突，亦是他们打算逃离重庆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汪精卫为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曾经进行过多次尖锐的斗争。抗战爆发以来，汪虽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但仍位居蒋介石之下，且手中没有实权，对此他深感不满。193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174]。对于汪精卫所处的地位，陈璧君十分不满，她曾露骨地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175] 周佛海也是个权力谜，由于在抗战爆发后失宠，他对蒋介石也心怀不满。

多种原因导致蒋、汪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在和战问题上的争论尤为尖锐。汪精卫在出逃前，曾与蒋介石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汪精卫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如不能战，则不如和。”但蒋介石明确回答：“抗战易，和平难。”汪精卫对此予以反驳说：“谋国者不应从难易定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176] 由此可见，蒋、汪两人难于继续合作下去了。汪精卫集团的出逃势在必行。

然而，真正面临抉择之时，汪精卫又显得心神不宁，难下决心。

周佛海等埋怨他“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177]。这其实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必然表现。11月29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就响应日本“和平”倡议的具体细节问题做最后磋商，同时也为即将赴沪答复日方的梅思平饯行。当宴会后汪精卫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178]

12月1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香港，即向日方答复称：1．汪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2．“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3．汪预定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4．“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179]。收到中方答复后，日方也通知汪精卫等人，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协议，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配合日方行动。为此，他们开始选择出走路线。最便捷的方式是由重庆坐飞机直达香港。然而，以汪精卫的身份，不可能无故乘飞机前往香港。只要汪精卫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就会引起人们注意，所以，这条线路风险极大。另一条线路则是经昆明转赴越南河内，线路虽比较稳妥，但事先须取得龙云许可。

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一个地方实力派，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对国民党中央保持着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龙云拥护抗战，并派兵参战，但不满蒋保护嫡系、积极向云南渗透的做法，双方矛盾有所加深。汪精卫等人见此，对龙云尽力拉拢。陈璧君曾亲自去云南找龙云长谈，以笼络其感情。当双方了解达到一定程度后，龙云曾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180] 凭借这一有利条件，汪精卫决定假道昆明出境。

究竟如何走法，他们需要精心安排，所有活动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多人结伴而行，必然引起外界注意，从而导致泄密。于是，他们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于12月5日堂而皇之地前往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讲而离开重庆。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则于同一天飞赴昆明，与汪精卫等人会合。

方案确定之后，先派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春圃去打前站。陈即以送汪精卫的孩子去香港读书为名，把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名孩子护送到昆明，然后让他们转飞河内再至香港，自己则继续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专候汪精卫何时来昆明的电报，以预定由昆明去河内的火车包厢，把全部出逃人员及时运往河内。

汪精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出逃，只能携带少量书籍文件，知道内幕的人也极为有限，即使是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没有通知。为此，陈璧君不断问汪精卫：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网罗中，能不牺牲吗”？汪精卫回答：“蒋是奸雄，我们行后，蒋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不会被害，我们现在尚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181)

陈公博是预定出逃人员中唯一不太知情的人。他虽是原改组派骨干，汪精卫的密友，但自1938年春天起，他就出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汪精卫与日本间的一系列密谋，他事先并不知晓。直到11月底，汪精卫电令他立即来重庆一趟时，汪精卫才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头绪”，自己马上要离开重庆，希望能够跟自己一起出走。汪的主要理由是：“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182) 对此，陈公博感到很突然，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当时表示了反对意见。

这一态度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陈璧君深知，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非同一般，汪精卫走后，陈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所以她采用激将法从反面推动他。这一招果然击中陈公博要害，在走与留的问题上，他思想斗争激烈，“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183]。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出走为上，以后根据局势发展再考虑自己的行止。

按照预定计划，周佛海于12月5日飞抵昆明。接着，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飞往昆明。正当汪精卫准备逃离时，情况突变。蒋介石忽于12月8日从桂林返回重庆，这打乱了汪精卫的安排。他不仅暂时无法脱身，而且还担心行动计划是否暴露，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掩人耳目，他接见《新蜀报》记者，发表改革政治、整顿财政等言论。12日，又出席蒋介石主持的纪念周演讲会。此时已到昆明的周佛海也受到一场惊吓。12月9日，蒋介石令陈布雷电召他立即返回重庆。对此，周紧张万分，事后他对人说：“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184]他深知，如果返回重庆就不可能再逃出来了，于是借口视察工作未完而继续留在昆明。为麻痹蒋介石，他于12日出席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集会，并发表了题为《抗战前后的形势》的讲演[185]。同时，又派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飞赴重庆，打探汪精卫的处境。在昆明为汪精卫开道的陈春圃，同样坐立不安。因得不到汪精卫的行程通知，只得取消已经订好的火车包厢，焦急地盼望重庆方面的消息。

12月13日，他终于收到汪精卫发来的密电，译出的电文是：“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陈春圃不知所云，周佛海向他解释：在重庆时已经约定，“兰妹”是汪精卫的代号，“秀妹”是日本方面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日本发表声明的隐语[186]。于是原密电立即转发香港高宗武，要他迅速与日方联系。

日方对汪精卫延期出走也疑窦丛生，当时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内

部，有许多人对汪精卫的意图表示不信任。他们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汪未如期出走，这些人更以为自己的怀疑已经得到证实。对此，就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感到进退两难。根据“重光堂”会谈时的约定，汪精卫一到河内，日方就由首相发表声明。近卫11月份刚发表过一个声明，再发声明，未免太多，因此他决定于12月11日前往大阪发表演说。接到汪延期出走的通知后，近卫只得以患病为由，将讲演时间推迟到14日，以后还无确切消息，近卫只得取消讲演，回到东京去了[187]。他心里怀疑：“此事或者已被骗亦未可知。”[188]

此刻仍迟留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认真研究蒋介石的活动安排，寻觅出走机会。蒋介石预定于18日发表训话，汪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这种活动自己可以不参加。他以去各地作抗战讲演为名，派人找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彭学沛购买机票。18日上午，汪精卫携夫人陈璧君、亲信曾仲鸣等人悄悄登上飞往昆明的航班。

当天下午1时许，飞机抵达昆明机场，龙云携省政府各厅局官员列队迎接，在场还有军乐队演奏欢迎曲。汪精卫见状，十分生气地质问陈春圃为何不按照指示办事？原来，汪做贼心虚，假托“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只许龙云一人来迎接[189]。但龙云为示郑重，特地布置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场面，使汪精卫哭笑不得。到达下榻处后，他假称身体劳累，谢绝一切活动，只同龙云一人交谈，简略透露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得到龙云赞同后，他才松了口气。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一行十余人，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为蒙骗重庆当局，他在飞机离开昆明前，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称：“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190]当蒋介石读到这份“请假”电报的时候，汪精卫已踏上叛国投敌的不归之路。不过，汪精卫启程前往河内后不久，龙云即致电蒋介石称：汪副

总裁“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191] 因此，蒋介石得以很快掌握汪精卫的异动情况。

二　艳电——汪精卫的降日宣言

汪精卫等人抵达越南河内后，先是分两处居住，后因联系不便，也不易保密，于是合并一处，移居河内西北八十余公里处一个名为“丹岛”的避暑胜地。时值隆冬，当地游客稀少，这正合汪精卫等人胃口。由于延误了出逃时间，无法继续按“重光堂”会谈约定的计划行事，他们只能暂时等待，以便同日本代表接头。

此时，日方也焦急地等待着汪精卫的消息。留在上海专候汪精卫行动情报的今井武夫，早已坐立不安。由于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接到汪精卫方面的答复，他于12月7日离开上海，经福冈、台北转赴香港，直接与高宗武取得联系。至12月20日，今井终于得到汪精卫已经到达河内的确切消息，于是立即电告日本参谋本部，并转达汪精卫的要求，希望近卫首相发表早已准备好的对华声明。

东京时间1938年12月22日晚8时20分，近卫文麿在首相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份简短声明。声明首先重弹老调，称“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但接着词锋急转，宣称：“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192] 显然，这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再度施出政治诱降的故伎，此次声明亦被世人称作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次声明中对“新生的中国”提出三项原则：“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接着又进行具体阐述，

所谓“善邻友好”，“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所谓“共同防共”，“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所谓“经济合作”，“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声明还宣称，上述原则只是日本对中国要求的大纲，同时认为，“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193]。

近卫声明的三原则，表面上看重申了重光堂密约中与汪精卫集团的约定，然其实际内容却已大大超出原先约定的范围。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的对华强硬派已不满足于“重光堂”密约的条款，要求增加更多内容。他们对《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进行了多次补充修订，最后经11月30日御前会议通过，成为日本的一项国策。其中关于“善邻友好”项下的具体内容就有七条之多，如“日满华三国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应废除那些破坏相互之间友谊的措施，消除其原因，并在将来禁绝这种情况”；“三国的外交，以相互合作为基本原则”；“三国应在文化的融合、创造和发展上互相合作”；“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原则加以策划”；“蒙疆，规定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根据既定方针，规定为特别行政区”；“日本应在新中央政府派遣少量顾问，协助其建设，特别在紧密结合地区或其他特定地区，应在必要的机关内配备顾问”[194]。由此可见，日本完全把“新生的中国”当做殖民地或附属国看待，所谓“善邻友好”，不过是欺骗舆论的宣传而已。其他两项原则中亦有许多具体的苛刻条件。为掩人耳目，近卫在声明中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外交辞

令，制造日本确有和平真意的假象。对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汪兆铭工作”的影佐征昭等人亦感不满，他们预感日汪之间的“和平运动”前途茫茫。

近卫声明发表后，重庆国民政府立即加以驳斥。12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首相近卫二十二日晚发表之声明，其内容与以前日方历次声明并无不同，亦即日本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之基本政策丝毫未变。”[195] 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题为《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篇讲演，驳斥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指出：近卫的声明，“表面是空泛支离，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讲演对“日本目前有整个吞噬中国的决心”作了深刻揭露：“大家要注意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目的在什么呢？以防止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大家试想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七个字之下，包藏着怎样的祸心。简单一句话，这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196] 这段分析，恰好击中近卫声明的要害。

在讲演中，蒋介石还特别提醒说：“我深恐世上或者还有一小部分人，不明了他这种烟幕后面所包藏着的祸心，还以为他所提出的并不怎么样苛酷，所以特地将敌国日本的用心整个的揭露一下，让国民知道警戒，也让世界友邦明了日本的野心阴谋，充其极量行将搅乱世界贻祸人类到什么地步！”[197] 这实际上也是向擅自跑到河内的汪精卫一伙发出警告。对汪精卫的出走，当时蒋介石的心情甚为复杂。当确知汪精卫于18日抵达昆明，19日午后“已离滇飞航河内”之后[198]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话，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199] 蒋已经清楚汪精卫出走的真实原由，但在公开场合，蒋对汪精卫离渝只做了如下说明："汪先生出国系养病，无政治意味，尤无如外间所传，代表军委会或政府与日人议和之使命。"[200]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之后，便不再讳言其与日方谋和的立场。12月19日汪精卫临赴河内前，曾向龙云"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201]。抵达河内后，次日便致电张群称："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因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请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云云。"[202] 12月23日即近卫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汪精卫还电请龙云转致蒋介石一电："邃密。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弟兆铭。梗。"[203] 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去电劝汪勿公开主和并赴欧休养，但汪精卫亦复电称："日本所提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云云。"[204] 28日，汪精卫又致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建议接受近卫三原则，函中宣称："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同时，他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205] 可见，汪精卫已经决心与仍主张对日抵抗的国民党中央当局决绝，在对日妥协投降的路上一意孤行。

与此同时，汪精卫对如何答复近卫声明也反复思考，几经研究，最终定稿，决定以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意见书名义发表。12月29日，陈公博、陶希圣携稿子从河内赴抵香港，并在

次日的《南华日报》上公开刊登。因汪精卫在电文末尾签署的时间是“艳（29日）”，该电文于是被世人称为“艳电”。

汪精卫的“艳电”开头即别有用心地篡改中日战争的性质，将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而顽强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立场，歪曲为“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206]。经过铺垫，汪精卫笔锋一转，认为近卫第三次声明恰巧满足了中国的要求。为欺蒙国人，“艳电”依照近卫三原则的次序逐条加以分析。对于“善邻友好”，宣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对于“共同防共”，宣称“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对于“经济提携”，宣称“此亦数年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207]。

随后，“艳电”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电文称：“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将乞和说成是达到抗战目的之途径，对此汪精卫自己也感到心虚，尤其是当百万日本侵略军仍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之时。于是，他在“艳电”最后针对日本出兵等问题，装模作

样地提出了一些要求："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208]

汪精卫发表"艳电"后，林柏生等人毫无顾忌地紧随其后，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南华日报》，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推销"和平"理论，说什么"历史上无不和之战，否则双方须有一方灭亡"。林柏生更以"理论权威"的身份，对"艳电"进行分析解释，强调要认识"艳电"的"重要意义"，吹捧汪精卫此举是"对党对国""尽其责任之所当尽"，"决非徒唱高调所能为力"，叫嚷"凡我同胞，当解此旨，求其贯彻"[209]。

汪精卫的"艳电"公开表明了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立场。它的发表，使国人认清了汪精卫的真实立场和本来面目。汪精卫等人原打算首先尽力拉拢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省的地方实力派，挖空蒋介石的墙脚，同时借此增强自身实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在侵华日军的配合下，当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再由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行动起来，在这些尚未被日军侵占的地方造成汪精卫集团的天下，以便同日本交涉和平。因此，"艳电"发表之后，汪精卫即于12月30日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210]。汪精卫显然希望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扩大自己的"和平"队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叛国投敌毕竟不得人心。即便是汪精卫寄予厚望的龙云，也没有跟随而去。龙云之所以对汪表示效忠，主要因为汪是国民党副总裁，

因此需要巴结，以稳固自身地位，而绝不是愿意随汪赴汤蹈火。汪精卫出逃之际，龙云表面上仍很客气，但随即就向蒋介石报告汪的行踪，以示自己与汪的行动没有关系。其他地方实力派也不愿轻易把自己绑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马车上。

“艳电”的出笼，不仅未能使汪精卫实现欺骗宣传之目的，反而暴露了其险恶用心，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汪讨逆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艳电”见报当日，正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即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其所提各点，措辞恍惚，均只从如何执行‘日本政府所提议者’出发，将近卫声明响应一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她还呼吁国民“万不要被这些荒谬论调迷惑”，“万众一心，向着胜利的坦途迈进”[211]。在香港之国民参政员张一麐、胡景伊、陶行知等联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发电报，请开除汪精卫所任各公职[212]。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电，痛斥汪精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赞同日本提出的亡国条件，“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他们坚决主张“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定国法，而定人心”[213]。

国民革命军第一、三、四、五、九等战区的高级将领及所辖各省政府机关，以及广西、甘肃、广东、湖南、江西、山东、新疆、河南、浙江、湖北等省政府官员与民众团体，一致通电要求对汪“明令通缉究办”。西南地区原先为汪精卫集团看好的那些地方实力派也不甘落后，接连通电声讨。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等人指斥“艳电”是“谬论谬辞，为敌张目”，“挠阻抗战，淆乱是非”，要求对其“明正典刑，以肃纪纲”[214]。

汪精卫的投降主义嘴脸遭到全国各界的声讨，国民党当局也作出了相应处置决定。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发布《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宣布对侧身傀儡，潜作汉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为国人所共弃者，责成军事委员会切实查明，按照《惩治汉奸条例》严缉惩办。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举行谈话会之后，召开了中常会

临时会议，讨论汪精卫的“艳电”及对汪的处置。与会者对汪的行为极端愤慨，一致通过“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的决议”，撤除其一切职务。会议指出：“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二十九）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215] 蒋介石的态度也很坚决，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之演讲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为汪电开谈话会，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幸也。”[216] 国民党中央的上述决议，表明走上投降主义不归路的汪精卫集团，已经不可能再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日立场起到阻碍作用了。

三　汪精卫公开投敌

发表“艳电”是汪精卫集团走上投敌道路的重要标志。此后，他们不顾重庆国民政府的劝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以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为筹码，同日本侵略者不断进行政治交易。

全国抗战处于最困难之时，汪精卫等人突然叛离抗日阵营，影响巨大。汪精卫出走时，其身份仍是国民党副总裁。为减少负面效应，重庆当局曾一度采取规劝的办法，希望汪精卫不要进一步行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作出“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时，由于蒋介石的劝阻，并没有立即下达通缉令。其后，蒋介石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其“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217]。对于留在重庆的汪派人员，蒋介石也好言相抚，称：“这次对汪先生的处分，实在是迫不得已，平时和汪先生接近的朋友应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

疑。”[218]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还直接派人对汪进行“劝阻”。“艳电”发表前，驻英大使郭泰祺奉蒋介石之命，一再电告汪精卫，“历述英政府对近卫宣言之反响，及英国舆论与最近国际情势”，“切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希望汪早日来欧洲休养，自己愿意辞职当他的随从[219]。1939年2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秘密赴越南河内，对汪进行劝说。谷曾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国民党改组派的老人马。他带了汪精卫等人的出国护照与大笔款项，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称：“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220]对此，汪断然予以拒绝。

对于蒋介石的劝阻，汪精卫极度反感。两人除政治立场不同外，个人恩怨亦是重要原因。他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同时，他仍以元老的口气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221]

谷正鼎游说失败后，重庆方面继续通过其他渠道进行劝说。原先与汪精卫共过事的朋友及老部下，也以各种方式进行规劝。时任行政院秘书的陈某，在致汪的信函中委婉地提出一系列疑问，请汪考虑，比如：“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虑之点”；“艳电主和乃在响

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委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竟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无顾及？先生何以自解？”“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222] 这些疑点，与其说是“规劝”，还不如说是尖锐的责问。如果汪精卫还没有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抛尽，就应对这些责问进行深刻思考。然而，汪精卫却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针对汪精卫的重要助手周佛海，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赶赴香港，准备约其会面，劝他回心转意。但周佛海已铁了心，对萧同兹的约见托辞拒绝。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如意算盘一开始就没有打准。“艳电”发表后，不但没有出现全国响应的局面，相反激起了一股反对汉奸卖国的怒涛。更令汪精卫等人感到彷徨的是，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政潮。1939年元旦刚过，与汪精卫达成默契的近卫文麿首相在内外交困中突然下台，继任的平沼内阁又未把对汪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方面无人关注留在河内的汪精卫。他不得不哀叹：“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223]

在此形势下，等待有可能就是失败。为尽早了解平沼内阁的对汪政策，汪精卫自2月1日起，与从香港专程赶来的高宗武紧急商讨对策。经过连续五天的研究，拟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日本直接与蒋介石妥协；第二方案是“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的统一”；第三方案才是由汪出面收拾时局[224]。制定这套方案，实在是用心良苦。汪精卫等人深知，根据当时形势，日、蒋之间

直接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极小，而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因地位不高，影响力有限，难于担当统一日本占领区的大任，所以故意把这二个方案摆在前面。如果日本方面有相同看法，就要考虑启用汪精卫的方案。这时，就可以明了日本对汪的真实态度。

由于汪精卫对第三个方案寄予很大希望，其内容因而要比前两个方案详细得多。该方案共有八项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日本"再次发表声明"；与日方会谈，"发表共同宣言"；建立中央政府；向日本借款二亿日元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建立伪政权的地点作了修改。"重光堂"会谈决定"在非占领的云南和四川省建立独立政权"，而这次却决定"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225]。南京早在1937年底即已沦陷，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成立也将近一年，"维新政府"是全国公认的汉奸政权，这一点汪精卫心里非常清楚。此前之所以选择在"非占领"地区建立政权，就是想避免被人们称为汉奸。由于西南地方实力派中无人响应所谓"和平"倡议，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设想已完全落空。

2月下旬，高宗武携上述方案再赴日本，会见平沼内阁要人，转达了汪精卫的意见："（1）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他援助斡旋；（2）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3）如果要他来负责，他将出马。"[226] 日本新内阁赞赏汪精卫的这种态度，并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马。探明日本政府的态度之后，汪精卫对日本的疑虑一扫而光，开始着手组府的各种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还四处活动，扩充力量。周佛海以财政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三重身份，大力在香港网罗同党。他首先拉到香港金融界巨头、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通过他说动国民党留港诸银行的首脑，筹措到活动经费20万港币。接着又利用各种关系，把失意军人叶蓬、反共文人樊仲云等先后拉到麾下。新入伙者通常经政治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即由财政委员会发给生活津贴。除香港外，他们还派人去后方活动，物色对象。

身为抗日领袖的蒋介石，无法容忍汪精卫等人执意沿着卖国投敌的道路走下去。软的一手失效后，他即开始改用强硬手段。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是汪精卫集团宣传卖国理论的主要阵地，国民党特工即把林柏生作为首选袭击目标。1939年1月17日，林在香港皇后大道漫步时，被人在头上砍了二斧头，因伤口不深，才没有丧命[227]。这次袭击向汪精卫集团发出了警告信号。

对于国民党特务的手段，汪精卫当然不会陌生。谷正鼎无功而返后，他即告诫陈璧君和曾仲鸣："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228] 重庆方面此时确实在部署对汪等人的暗杀工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以"十万火急"电报调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赴港待命。然后亲自带陈恭澍去河内，向他面授机宜。经过周密准备，戴笠于3月19日凌晨向陈恭澍下达"制裁令"，陈立即向全体特工下达命令："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的住所为攻击目标。"[229] 3月21日晚上，国民党特工人员向河内高朗街27号汪精卫住处发动袭击，结果汪精卫夫妇因临时改变居室而侥幸逃脱，由曾仲鸣当了替死鬼。

国民党特工连续在香港、河内对汪派人员发动袭击，将汪精卫集团逼向死角。他们带着对蒋介石集团的仇恨之情，决定实施反击。因手中没有武力，只能采用政治手段。3月27日，河内袭击案发生还不到一周，汪精卫即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名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没有证据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230] 接着，他将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全文公诸于世。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问题。会上，外交部次长徐谟汇报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所提的和平条件，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在会上发表了意见。汪精卫举这

个例子，是要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在抗战初期就没有拒绝过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这同自己现在的主张是一致的。

汪精卫随后笔锋一转，向蒋介石提出责问："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231] 这些责问，使蒋介石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他因而愤恨地说："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232]

汪精卫揭露蒋介石的出发点，与抗日军民有着本质区别。他除了是为反击蒋介石集团对自己的暗杀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叛逃行为辩解。三天后，汪精卫发表另一篇文章《复华侨某君书》，其上述用意暴露得更为清楚。文章借答复"某某老兄"的疑问，大肆发挥，重弹"抗战必败"的老调，攻击"共产党所谓游击战，不过是流寇的别名"，扬言要举发"共产党之趁火打劫"。标榜自己从抗战以来"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持久，怎样可以获得胜利，同时也想着怎样可以觅得和平"。指责"重庆诸人"，对自己的"艳电"，"除了谩骂之外，看不见一些理性的话头"，装腔作势地要他们"幡然觉悟"，"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233]。这些言论说明，汪精卫等人正步步走向抗日阵营的对立面。

《举一个例》等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激起了规模更大的声讨浪潮。汪精卫等人陷于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他们的自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日本当局见此情景，决定立即派员把他们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加以保护，然后再磋商下一步合作问题。

根据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陆军、海军、外务、兴亚院等有关省部协商后，决定组织一个联合班子，由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负责，去河内把汪精卫转移到安全地区。在当地日本领馆的安排下，影佐于4月18日下午前往汪精卫住处拜访，双方正式接上了头。汪精

卫对影佐等来访表示感谢，同时也认为河内不宜久留，准备离开此地，到上海发展。他认为："广东对孙先生和我自己来说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但现在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有可能给国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日本军队保护下搞和平的。和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行动的诚意。"[234] 4月29日，汪精卫一行登上影佐等前来接应的日本货轮"北光丸"，前往上海。5月8日，汪精卫入住上海虹口日租界的土肥原公馆，同早已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会合。从此，汪精卫集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他们从宣传民族失败主义，转为直接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日军占领区筹建傀儡政权。

---

(1) 《秦德纯致蒋介石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第187页。

(2) ［日］参谋本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载《现代史资料8·中日战争（一）》，みすず 书房1965年版，第143页。

(3) ［日］《处理华北纲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22页，原书房1969年再版本。

(4) ［日］《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6—357页。

(5) ［日］今井武夫：《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16页；转引［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7页。

(6) 《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7) 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8) 《维新政府之况》，维新政府宣传局1939年3月编印，第10页。

(9) 《处理华北事变纲要》（1937年8月10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3-234页。

(10) 《华北政务指导纲要》（1937年8月12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6页。

(11) 《对时局处理纲要》（1937年8月14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7页。

(12)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7—238页。

(13)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14) 《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方案》，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6页。

(1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8—60页。

(16)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0月1日），转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

(17) 《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针纲要》（1937年10月11日），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60—61页。

(18)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14页。转引《通敌内幕》（上），第120页。

(19)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1页。

(20)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1页。

(21) 《关参满电》第349号，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1页。

(22) 《从对华方略论华北政权问题》，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6页。

(23) 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与解体"（节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28-230页。

(24)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1页。

(25) 转引《华北治安战》上册，第54—55页。

(26)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2月24日），转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53页。

(27)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1938年1月11日），转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60页。

(28) 北平《新民报》1938年3月27日。

(29) 北平《新民报》1938年3月10日。

(30) 《一年来之临时政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46页。

(3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7页。

(32)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9页。

(3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8页。

(34)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59页。

(35)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59-60页。

(36) 同年春天，德王等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过一次大会，他们称之为“第一次蒙古大会”。

(37) 《蒋鼎文致蒋介石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第221页。

(38)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6页。

(39)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76页。

(40) 金井章次：《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前》，转引《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1页。

(41)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200页。

(42) 《华北治安战》（上），第62页。

(4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53页。

(44)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4页。

(4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9页。

(46)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5页。

(47)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3页。

(48)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190页。

(49)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97—298页。

(50) 《东北蒙旗联络专员张士英关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及其组织状况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6-9页。

(51) 李泰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纪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51页。

(52) 维新政府宣传局编：《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1939年版，第10页。

(53) 《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第9页。

(54) 国民政府情报机关编：《伪上海市政府》，《专报》第7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5)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1969年再版本，第381—384页。

(56) 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6页。

(57) 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0-161页。

(58) 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1页。

(59) 外务省记录：《陆海外三省有关官员关于华中新政权组织大纲等协议之结果》，［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6页。

(60) 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1页。

(61) ［日］《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1938年3月24日），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1—162页。

(62)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宣言》（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43页。

(63)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中），日本教育社1979年版，第106页。

(64)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组织大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44页。

(65) 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7页。

(66) 《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第331—334页。

(67)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宣言》（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43页。

(68) 《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第29页。

(69)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0)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1) 《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57页。

(72)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3)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4) 汪精卫：《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之引论》（1937年7月15日），《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3页。

(75) 汪精卫：《继续牺牲加紧生产》，转引徐达人：《汪精卫骂汪兆铭》，岭南出版社1939年版，第12页。

(76) 汪精卫：《抗战建国同时进行》（1938年4月30日），《汪副总裁莅湘演讲》，第77—79页。

(77) 汪精卫：《最后关头》，《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8—10页。

(78) 汪精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12—17页。

(79) 汪精卫：《最后关头》，《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10—12页。

(80) 《新华日报》，1938年7月9日。

(81)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002-040100-00008-017。

(8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5日，第83—84页。

(83)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84)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002-040100-00008-013。

(85)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转引《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86) 周佛海：《回顾与前瞻》，转引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8页。

(87) 周佛海：《回顾与前瞻》，转引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第1208-1209、1212页。

(88)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转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89)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周佛海笔录》（1946年9月21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90)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91) 《陶希圣致胡适函》，（1938年12月31日），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92) 朱朴：《记蔚蓝书店》，《政治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8日。

(93)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转引《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1页。

(94) 《民力》周刊第四期，1938年4月30日。

(95) 唐生智：《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页。

(96) 袁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转引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97)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353页。

(98)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99)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日本东京文献社1962年版，第80页。

(100)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91、95—96页。

(101) 同盟通讯社是日本半官方的通讯机关，1938年1月，它把原上海分社升级为中南分局，除上海外，还管辖南京、广东、香港等地的派出机构。松本重治亦由原上海分社社长升任中南总分局局长。

(102)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259页。

(103) 邵铭煌：《直蹈虎穴秘档——解读董道宁战时潜访日本刺探报告》，《近代中国》第137期，2000年6月25日，第185-189页。

(104)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1943年12月），［日］《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东京みすず书房1966年版，第359页。

(105)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71页。

(106)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79页。

(107)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81页。

(108) ［日］松本重治：《董道宁、高宗武东京之行》，载《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109)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5页。

(110) 雷鸣：《初步和平运动的顿挫》，载《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1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2)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3)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135—136页。

(11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

本）第二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页。

(115)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2页。

(116)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93页。

(117)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188页。

(118)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95页。

(119)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95页。

(120) 《高宗武东渡日记（1938年7月2日）》，邵铭煌校注：《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15页。

(121) 《高宗武东渡日记（1938年7月4日）》，《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15-116页。

(122) 《会晤松冈洋右谈话记录》，《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17页。

(123) 《会晤板垣征四郎谈话记录》，《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1页。

(124) 《会晤影佐谈话摘要》，《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126页。

(125)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日］《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第359页。

(126) 《高宗武东渡日记（1938年7月9日）》，《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126。

(12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66页。

(128)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9页。

(129) 陈布雷日记1938年6月5日："四时卅分偕宗武同谒委员长。五时卅分归胭脂坪，宗武谈至六时后始去。"《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二册，第283页。周佛海同日亦记："晚，武兄来，云奉命明日飞港。"《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32页。

(130) 陈布雷日记1938年6月6日，《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二册，第283页。

(131) 邵铭煌：《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31日），第25页。

(132)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33)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同日周佛海日记载："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见于《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48-149页。

(134)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3—179页。

(135)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3页。

(136)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6页。

(137)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7页。

(138)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307页。

(139)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309页。

(140)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83页。

(141) ［日］《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47页。转引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142)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43)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6页。

(144)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00页。

(1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第一册，第122页。

(146) 《唐绍仪与岑德广等谈话笔录》，摘自《岑德广案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藏。

(147)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05页。

(148) ［日］《支那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401页。

(149) ［日］《渡边工作现状》（1938年11月21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150) 《渡边工作现况》（一）（1838年11月15日），转引《今井武夫

回忆录》第304页。

(151)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2页。

(15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3页。

(153) ［日］《渡边工作现状》（1938年11月21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154) 转引《今井武夫回忆录》（资料四《汪兆铭工作概况》），第314页。

(155)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5—406页。

(156) 周佛海：《和平运动之回顾与前瞻》，载《政治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7月6日版。

(157) 《申报》，1938年10月13日。

(158) 《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59)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0月24日，第410页。

(160)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8年10月26日，第187页。

(161)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8年10月29日，第188页。

(16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0月31日，第416页。

(163)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4)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5)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6)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1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7)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0月3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第301-306页。

(168) 《陈布雷日记》第二册，1938年11月1日，第312页。

(169)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汪伪档案未刊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70) 陶希圣：《致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396—398页。

(171) 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5日。

(172) 《陈嘉庚致汪精卫宥电》（1938年10月26日），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年版，第7页。

(173) 《周佛海侦讯笔录》（1946年9月24日），汪伪未刊档案。

(174)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175) 《武和轩先生谈话录》（1980年4月15日），转引蔡德金：《汪精卫投敌前前后后》，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76) 陈璧君：《答“为何在抗战中叛离抗日战线”问》（1951年12月24日），汪伪未刊档案。

(177)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8年11月27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178) 罗君强：《高宗武赴日试探投降条件》，《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79)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

(180) 罗君强：《汪精卫逃往河内》，《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81)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6页。

(182)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183)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184)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2—103页。

(185) 《新蜀报》，1938年12月14日。

(186)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3页。

(187)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5页。

(188) ［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7卷，第233页。

(189)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3页。

(190)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191) 《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192)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7页。

(193)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7页。

(194)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5页。

(19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8年7至12月份），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796页。

(196) 《蒋委员长对〈近卫声明〉发表严正声明》（1938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4-35页。

(197) 《蒋委员长对〈近卫声明〉发表严正声明》（1938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4-35页。

(198) 《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199)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0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2月26日，第459-460页。

(201) 《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7页。

(202) 《张群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203) 引自《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8页。

(204)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20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

(206)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2页。

(207)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3页。

(208)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3-54页。

(209) 转引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页。

(210) 《渡边工作现况》（四），转引《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26页。

(211) 转引绍武：《汪精卫叛国秘记》，1939年初版，第28页。

(212) 转引张篷舟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二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213) 《陈嘉庚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5页；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年3月版，第72页。

(214) 《张发奎等以汪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型之微电》（1939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65页。

(215) 《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文》（1939年1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24页。

(216)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17) 《国民党中宣部为汪兆铭投敌致各级党部的内部指示》（1939年1月1日），转引绍武：《汪精卫叛国秘记》，第16页。

(218)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香港《掌故》1972年7月号。

(219)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8页。

(220)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的回忆纪实》，见《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页。

(221)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6—447页。

(222)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223) 汪精卫：《河内的正月》，转引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35页。

(224) ［日］《渡边工作（第二期计划）》，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225) 《渡边工作（第二期计划）》，转引《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17页。

(226) 杨凡译：《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9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79页。

(227)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见《伪廷幽影录》，第16页。

(228)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7页。

(229)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230) 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78页。

(231) 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82页。

(232)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

(233)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21—28页。

(234) ［日］犬养健：《扬子江还在流》，文艺春秋社1960年版，第135—136页。

第六章　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虽占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主要交通线与重要城市，但并未达到其最初制定的“速战速决”之目标，也未能彻底摧毁中国战力，迫使中国屈服。相反，经过前期多场战役的消耗，日军基本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而不得不动用重兵防守占领区域，一边在正面战场与中国军队展开对峙，同时在后方应付游击队的袭扰。中日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要建立独霸中国的“东亚新秩序”。1939年9月，日本大本营将其在中国的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和华南第二十一军合并，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统一指挥在华日军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企图依靠局部有限攻势、战略轰炸和海上封锁，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在继续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还频频使用政治手段，扶植傀儡政权。在日本的诱降与扶植下，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

中国军队退出武汉后，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在正面战场继续抗敌。从1939年初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正面战场历经南昌战役、随枣战役、枣宜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豫南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及第二次长沙战役等战役，中国军队屡次击退日军进攻，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第一节　南岳军事会议和第二期作战方针的制

订

武汉撤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对抗日军事行动作出调整。为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与教训，部署相持阶段的抗日作战，蒋介石于1938年11月18日手令召集第三、第九战区已抽调到后方之各部队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各军师政训处长会议开会，预定会议目录共十九项，包括：甲、此次作战死伤官兵数；乙、各级官兵之有功与有过者之赏罚升降及其姓名；丙、武器现有数目与损失数目（损失原因），等等 (1) 。11月25日至28日，第三、第九战区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在湖南南岳举行军事会议，进行具体研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与会。

11月25日，第一次会议召开，蒋介石作了开幕讲话。他结合自卢沟桥事变以来17个月的开战实践，阐述了对抗战过程的基本设想，修正了以往关于抗战的分期，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抗战按照预定的战略政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1937年7月开战到武汉撤退、岳州沦陷是抗战第一时期，此后则进入第二期抗战。在第一期抗战中，中国军队各方面均处于劣势，“不但各种技术装具和一切准备，都不如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学问能力与种种计划，我们自觉也都比敌人差次”，从军事进退上看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做到了以“劣势的军备”来“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并且“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所以，第二期抗战就是中方“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为此，南岳会议需要制订“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 (2) 。蒋介石讲话之后，各师师长或参谋长分别作了军事报告。

在11月26日上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在讲评中具体指出了中国军队以往在战略和战术的种种缺失即耻辱，要求与会各将

领“加以研究，制成具体方案，以便确实施行”[3]。下午，蒋介石出席第三次会议，在讲话中强调应特别注意研究的事项，包括研究学习过去战争失败和不能扩张战果之原因，健全各级司令部之要件，改进通讯联络，部队接防手续与监督方法之规定与施行，部队衔接处与薄弱点应定补救办法，严格整饬军风纪，赶造战斗详报，部队教育，赏罚公布施行，清报公布经费，充实编制，还在会上提出抗战“四要”实施纲领，即军队要提高士气、收揽民心、爱惜物力、抚养伤病[4]。11月27日，蒋介石出席第四次会议，重点分析日军的作战优点，以为借镜。28日，蒋又出席第五次会议，说明南岳军事会议的最大目的，在于整军建军，即以军官为重心，由军官负起建军的责任。整军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全国部队拟分三期轮流至后方进行整训，每期整训暂定为4个月，全国军队的整训限在一年之内完成。整训的具体步骤是：将全国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的部队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部队到后方整训。第一批部队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此后调换第二批部队到后方继续整训，其他部队依次进行。二是补充点验事务应于军部或师部设补充点验处专司其事，以便核实补充，增进效能[5]。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新的分期，相应提出第二期的抗日战略，强调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作战能力，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反攻阶段的到来。通过这次会议，正面战场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

南岳军事会议之后，蒋介石于1939年1月在陕西武功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之得失和第二期作战特点，作进一步的研讨和部署。

根据上述会议的判断与指示，军事委员会制订颁行《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将作战方针确定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

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6] 第二期作战方针突出强调了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力图消耗日军战力。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构想是：“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7] 此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大体上就是按照上述作战方针与战略构想开展的。

为了适应第二期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将全国重新划分为十个战区，增设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以加强对敌后战场的指挥，国军战斗序列也得到调整。军事委员会还取消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改设桂林行营、天水行营，分别由白崇禧、程潜任主任，负责指挥南北两战场各地区之作战[8]。各战区划分情况概括如下：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下辖第二、三集团军，辖区为豫境及安徽之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四、五、六、七、十四、十八集团军，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之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辖第十、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二集团军，辖区为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辖第九、十二、十六集团军，辖区为广东、广西两省；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辖第十一、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三集团军以及豫鄂边区游击总队，辖区为皖西、鄂北及豫南；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下辖第七、十七集团军，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代），下辖第一、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集团军，以及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辖区为赣北、鄂南及湖南省；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下辖第三十四集团军，辖区为陕西省；

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下辖第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军，辖区为山东省及苏北地区；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下辖第六十九、九十九、新编第五军，以及河北民军，辖区为河北、察哈尔省。

当时，中国的总兵力共计191个步兵师，29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10个骑兵旅，其他特种及游击部队尚不在此内。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重兵配置于第五、第九两战区方面迎敌[(9)]。

第二节　南昌战役、随枣战役与枣宜会战

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双方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峙区域转移至湘、鄂、赣地区。1939年起，驻武汉日军为巩固已占领地区，不断发动有限攻势，中国军队本着持久消耗的原则，对日军采取攻防并举的策略，双方在湘、鄂、赣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多次重要战役。

一　南昌战役

南昌地处南浔、浙赣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毗邻鄱阳湖，与长江相通，战略地位重要。武汉会战时期，南昌本是日本攻略的目标之一，

但当时由于薛岳兵团的顽强阻击，日军被迫受阻于修水以北之线。尽管如此，南昌地区中国军队的存在，对日军利用长江交通线及控制武汉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

南昌战役，是日军为巩固武汉、切断浙赣路而发动的，也是自武汉会战后，中日军队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交战。南昌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如下：国军方面为第一、第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二等集团军，合计13个军，34个师，无海、空军支援。日军方面为第十一军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及第一一六师团之一部，另有各型作战舰艇40余艘，战机约600架次 (10) 。

1939年1月底，日军第十一军即制订了《对南昌作战要领》，决定“军约以两个师团及强大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等，沿南浔路一线地区进攻南昌。另外，以有力的一部向箬溪-修水公路挺进，以利于上项作战”。2月6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又向第十一军发出《对南昌作战要领》称，“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 (11) 。

中方最高统帅部于2月下旬即已判明日军的进攻企图，最初，中方考虑先发制敌。1939年3月7日，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于3月15日向赣北日军出击，但第九战区因部队调整与补给尚未完成，请求展期，军事委员会遂改令赣北中国军队对日军采守势。此时，日军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主力已在赣北德安以南地区完成集结，第六师团亦在箬溪一带完成攻击准备。随后不久，日方即向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1939年3月17日晨，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一部向赣北修水涂家埠北岸青山一带的中国军队进袭，并强渡南岸。东路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以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则自鄱阳湖向吴城方向进犯，中国守军奋起应战，南昌会战由此拉开序幕。

3月19日，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于涂家埠、穗津间南渡修水，并向中方阵地炮击300余发混用毒气弹，中方部队旅长龚传文及另两名团长中毒[12]。不久，日军占据涂家埠以北六七里处之大路叶一带。中方守军第一四二师组织反攻，战事十分激烈，大路叶阵地三易其手，双方伤亡均重[13]。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涂家埠西北之陈村一带进行了数日交战。由于在涂家埠地区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20日晚起，日军主力转向永修至虬津之间，分由狗子岭、刘庄、廖家渡和花园魏四处强渡修水。日军以战车、炮火和毒气弹为掩护，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方第四十九军和第七十九军与敌军血战四日，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此后，日军一路西进至狮子山与太子岭一带，迫使中国守军向南转移，另一路则向滩溪方面进攻。22日，日军在滩溪以北之大源桥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遂增加兵力，并且向中方阵地大量放射毒气，中国守军牺牲颇众，只得转退滩溪以南一带的高地续守。

东路在鄱阳湖西岸登陆进犯的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狮子山附近受到中方预五师和第一四一师的阻击，鄱阳湖内之日军舰艇亦被中国军队击毁数艘。在激战数日后，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分路向吴城进攻，并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兼以连续施放毒气，中方守军伤亡惨重，吴城于24日陷入敌手。基于万家埠阵地已受日军优势兵力之压力，中方第三十二军遂转退至乐化以北的第二线阵地。

为便于作战指挥，蒋介石于3月23日下令重新划分第三、第九两战区的作战地境，暂定为鄱阳湖南岸，沿抚河，经南丰，再沿闽赣边境之线，线上属第三战区。同时，蒋令第三战区速调第一〇二师开赴南昌增援，归罗卓英指挥[14]。同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一部沿公路向万家埠和安义进犯，另一路则向安义与靖安之间的乾州突袭。当日，日军占领了安义城，并进至奉新附近，中方第四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九等军逐次南移，未能予日军有效阻击，不久奉新陷敌。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攻占安义、奉新后，除以一部向高安突进外，

其主力部队由安义左旋，径向南昌突进。为迟滞日军攻势，中方第一〇二师于25日奉命扼守奉新通往南昌之公路，但随着日军主力的抵达，第一〇二师很快被击破，不得不退至丰城一带。第三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急调第三十二军自乐化赶赴南昌守备，但第三十二军尚未全部抵达，从西南方向之新洲、生米街迂回攻袭南昌的日军已经攻入城内。双方随即发生遭遇战，为争夺渡河，双方均伤亡重大。27日，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向南昌城发起猛攻，蒋介石致电中方守军第三十二军宋肯堂部，命其死守南昌待援[(15)]。然而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第三十二军大部被迫于当晚撤出南昌，向进贤一带转移，该军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率余部拼死抵抗，与日军血战至28日凌晨方才奋力突出重围[(16)]。

为策应南昌附近会战，第九战区曾调驻湖南长沙、浏阳一带的第七十四军和第一集团军之第三、六十、五十八军前往高安东北之祥符观、会埠街地区，牵制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由于南昌快速失陷，上述各军遂在该地区与敌军展开对峙。此时，中方第十九集团军所部主力，在靖安、安义、大城等地附近与日军激战后，向上高附近转移。4月9日，高安陷敌。与此同时，中方第七十军在清安一带侧击日军，以策应处于被敌包围的第七十九军奋力突围，第七十军复与第四十九军一并转移至高安以东的锦江南岸地区。

南昌陷敌当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仍与中方第三十集团军对峙于武宁东北之津口一带，双方互无进展。28日，第六师团乘中方第三十集团军换防未竟之时突然发动攻击，中国军队被迫后撤，武宁遂于当日失守。

1939年3月30日，桂林行营发言人就中国军队弃守南昌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增兵赣北，拼其最后之死力，以四师团之众攻我南昌，经我猛烈之抵抗，旬日间，敌伤亡达一万五千余，并有高级指挥官多人，亦不能免，我当以消灭战之目的既达，乃于二十九日自动放弃，仅余空城之南昌，而向新阵地作有计划之转移，准备反攻，此仅

就军事上言，南昌已失去死守之价值。再言南昌在政治上既已非我赣省省会之所在地，一切物资民众早已按照计划疏散，亦已失去政略之地位。故此次南昌之放弃，纯属循我既定之持久抗战一贯之方针，与全面战局毫无影响，而图增敌人之困难，益使其深陷于泥淖中而已。”[17] 当时蒋介石虽然对“南昌失陷如此之速”感到不满，但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南昌失守后之战略，仍以不决战为主也”[18]，“此时战略，仍以打击敌军消耗敌人为主旨，而不在城市之得失”[19]。

南昌失陷之后，日军继续在赣北攻击中国军队，中方亦十分重视赣北战场，不愿轻易退出这一地区，双方仍有若干战事。1939年3月底至4月初，中日双方屡次交锋，赣北武宁、祥符观、高安等地也数度易手。即便是对于南昌，中方自最高军事当局以下，亦希望早日收复。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令其统一指挥第九、第三战区之部队。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制定《攻略南昌计划》，其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系，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为4月24日顷[20]。赣北之中国军队基本完成整训后，蒋介石于4月16日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命其以第三十二集团军的第七十九、十六、预备第十师、预备第五师之一部攻击南昌，第十九、一、三十集团军则在赣北其他各处对日采取攻击行动[21]。

为争取时效，中方将攻击开始时间提前至4月22日。但4月21日起，中方第七十四军就首先由高安以西，及高邮市、石头岗间地区北渡锦江，向高安、大城、石头岗、万寿宫、生米街等地之日军发起攻击。至26日，中方部队先后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要点，并续向奉新东南之虬岭、赤土街前进，途中因遭遇日军顽强抵抗，进展困难。就在第七十四军发动攻击的同时，第一集团军亦开始向奉新反攻。武宁方面第三十集团军，除以主力部队牵制右翼武宁之敌外，另以一部驱逐张公渡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协同庐山、岷山游击队，策应南昌方面之作战。

4月25日，中方部队迫抵南昌城郊，其一部潜入城内活动，予敌重创。次日，中方军队一部曾两度攻克南昌东侧老飞机场，27日又克复市郊之段冈及大佛塔等处，并逼近南昌市区南部的莲塘、向塘等处。日军为挽回颓势，随即增兵固守，进而出动大批兵力向中方部队猛烈反击。中方攻势一度受阻。4月29日，罗卓英下令，限上官云相所部于30日进占南昌[22]。5月1日，蒋介石下令，限5月5日攻下南昌。对此，白崇禧、薛岳等将领均提出：南昌之敌既已有备，我之攻击颇难摧毁克敌之坚固阵地，5月5日前攻克南昌恐难达成任务[23]。在此情势下，中方第二十九军之第二十六师仍于5月5日再度克复南昌飞机场和南昌车站，进而向南昌城防阵地实施突击。此后，日军紧急从上海调来海军陆战队5000余人，并凭借空中的优势狂轰滥炸，投掷大量毒气弹，致使中方之攻势受挫，在激战中，亲率第二十六师发起进攻的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腹部中弹，壮烈殉国，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亦身负重伤，官兵伤亡尤重[24]。

鉴于反攻南昌之举难以一举奏功，且第五战区日军行动渐趋积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于5月9日下令部队停止攻击南昌，转而恢复原有态势，与日军在南昌周边地区保持对峙。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报告，自4月22日至5月9日，中方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死伤官兵共计6883人，生死不明官兵达1284名，另损失轻重武器若干[25]。而日军方面也受到重大损失，计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名[26]，也无力进一步反击中国军队，南昌会战由此结束。总体看来，南昌会战的结局表明，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并没有能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能够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已经体现出了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战略意图，虽然这一战略指导方针尚需在实际作战中得以历练。

二　随枣战役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以武汉、九江为基

地，将部队配置于九江、岳阳、钟祥、信阳间地区，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是时，中方第五战区部队已退守鄂西北及豫鄂边区，于长江至汉江间、宜城至长寿店、桐柏山东南麓至随县一带、汉水上游襄樊地区及大别山区布防，对汉口、钟祥、信阳、麻城等地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为加强第五战区战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从鄂南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至随县、枣阳方面。随枣地区对中国军队巩固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而言关系重大，而且可直接牵制平汉铁路及汉宜公路之交通，威胁武汉地区之日军。日方认为，中国军队集结于襄阳以东枣阳附近的6个师，可能由随县附近采取攻势。日军第十一军遵照大本营之指导，于攻占南昌之后即策划发动“襄东会战”（日军对随枣战役的称呼），其作战指导方针是“一举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27]。

1939年初，蒋介石下令颁发《国军攻势转移部署方案》，决定“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并确定以3月和4月上旬为各战区开始攻击时机[28]。3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向第十一军通报敌情称，蒋介石决心自4月上旬转入反攻，以第一期整编部队为基干，调第三十一集团军2个军6个师从江南向江北移动，并自18日起向枣阳以南地区集结，可能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附近采取攻势[29]。第十一军随即制定作战指导策略，决定予以中方部队快速打击。

1939年4月下旬起，侵据鄂北的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十五、十六师团及第四骑兵旅团各部，开始分路向钟祥、安陆、应山西北等地集结。至4月28日、29日，日军以小股部队向汉水西岸沙洋、大洪山及随县东北的中方部队作试探性攻击。同时，日军出动战机连日轰炸荆门、沙洋等城镇[30]。

5月1日，日军第三师团在炮兵掩护下，自安陆、应山方面向中方第八十四军阵地猛攻，并在郝家店、徐家店一带遭遇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的奋勇抵抗，日军官兵被歼灭者近千人[31]。经过一

昼夜的血战，日军第三师团最终突破应山西北至徐家河东岸中方第八十四军守备阵地，中方部队被迫后撤至塔儿湾一带阵地。次日，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在塔儿湾阵地与凭借飞机与炮兵炮火的日军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锋，所守备之阵地失而复得达七次之多。由于日军疯狂施放毒气，中方守军牺牲殆尽，塔儿湾阵地被迫于5月5日弃守[32]。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十六师团各以一部，在优势地空火力的支援下，分由钟祥、三阳店向中方第三十九军阵地发起全线猛攻。双方激战至4日，第三十九军伤亡重大，遂与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分别转移到漂水西岸。高城镇终告不守。5日，大洪山、长寿店一带阵地也被日军突破。同日，日军又向天河口、白庙镇以及江家河、庐山一带进逼，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一度相持不下。大洪山西部地区，中方第一二七师和一八〇师在长寿店及丰乐镇一带阵地阻击沿汉水东岸北犯之日军，但终被日军突破防线。至5月6日，襄阳对岸之张家湾已被日军攻占，襄、樊与随、枣间公路交通被切断，张家湾附近之公路浮桥亦被日军飞机炸毁。此后，日军后续部队沿汉水东岸向北急进。

中方为避免被日军分别围歼，决定将各部队脱离战区转移。第十三军退入桐柏山地区，以冀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待机攻击西进之敌；第三十九军据守大洪山阵地，直接牵制西进之日军；位于随枣地区的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亦于5月6日撤离枣阳移至随阳店；第八十军撤出随县后经随阳店转至唐河一带。此后，枣阳、随县均很快被日军占领。5月7日，日军令其主力第十三、十六两师团进至襄阳以东滚河之线后，即向东北行右旋突进，企图于枣阳东北山地歼灭中方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5月8日，日军第三师团突破中方历山第二线阵地。嗣后，日军依仗优势兵力继续向北突进，先后突破丰乐、长寿店和于斗湾等处的中国军队阵地，于9日攻陷枣阳以北之胡家镇。10日至13日，又相继攻陷继阳、湖阳、新野、唐河、南阳等地。情势危急之下，蒋介石一边下令第六十八、第三十九军仍留置桐柏、大洪山区担任游击，第三十三集团军转移至汉水西岸布防，同时又急调孙连仲第

二集团军增援南阳。孙连仲集团军先遣部队独立第四十四旅抵达唐河后，遂与日军第十六师团展开激战，最终顺利掩护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安全转移至镇平、内乡一带。由于中方部队在转移期间情况混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各集团军之间的通信联络于5月12日几已完全中断，有鉴于此，蒋介石遂命西安行营主任程潜暂时指挥第五战区各部队作战[33]。

由于日军过于轻装急进，使得接济后援问题逐渐突出，加之沿途又屡屡遭到中方游击部队乃至地方民团的突袭，已成强弩之末。此时，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命其出动部队实施反攻。5月中旬起，中方第十三军主力、第八十四军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开始在鄂北转入反击。第十三军之另一部及在大洪山之第三十九军，分别从南北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在襄花公路截击后退之敌军，而原部署在汉水西部之第三十三集团军也向东岸出击。日军第十一军为避免被动作战，于5月13日起分由唐河、枣阳开始向钟祥、京山、安陆、应山撤退。次日，中方第二集团军由南阳一举击溃唐河之敌，第三十九军亦攻克大洪山西北诸要地。至5月16日，中国军队已先后收复桐柏、淮河店以及唐河、新野、湖阳等地，随即攻克枣阳并向随县逼近。5月23日，随县克复。尽管日军已经逐次撤退，蒋介石仍于27日电令孙连仲派有力之一师前往随枣，向平汉路南段日军不断袭扰，勿使其安全整补[34]。

随枣一役，中方在无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出动兵力约20万人，由于许多部队整补尚未完毕，战力有限。此次战役，中方虽然最终克复随县、枣阳，但损失极为惨重。据中国方面统计，中方部队伤亡人数达到28037人[35]。相比之下，日军兵力虽只有12万余人，却装备精良，且始终得到空军各型战机的作战配合[36]。但是，日军试图通过该战役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目标是失败的。

三　枣宜会战

随枣战役结束后，日军第十一军为清除武汉外围大洪山、桐柏山及豫皖边区一带中方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威胁，企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作战。1940年2月25日，日军制定《会战指导方针》，即“军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自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37]。4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发布第四二六号命令，勉强同意第十一军“超越既定作战地区”进行作战，但限制其作战结束后，必须返回原驻地，而不许固守新占据地区[38]。4月中旬起，第十一军主动调整兵力配置，抽调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约七个师团兵力，进至信阳、安陆、钟祥各附近地区部署，准备向荆门、沙市、宜昌地区发动进攻。早在3月下旬，中方最高统帅部就已探知日军进攻企图，蒋介石随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示其积极策划、严密防范，并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所部准备由鄂北出汉宜公路作战[39]。4月10日，最高统帅部又饬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乘敌军进攻荆门、宜昌企图渐趋明显之际先发制敌[40]。

5月1日起，日军分由鄂北、鄂中、豫南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以襄阳、樊城为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在襄河以东的枣阳地区及南阳以南地区消灭中国军队。枣宜会战大幕由此拉开。

鄂北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两个联队，加上伪军共七千余人，由钟祥和洋梓向襄河右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中方第三十三集团军所属之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推进至转斗湾、半乐河一带迎敌，第二十九集团军则抽调一个师的兵力至汪家店附近，协助第三十三集团军作战。

豫南方面，沿信南公路北进之日军，先是突破大石桥、小林店一线中方第三十军所部阵地，后又突破第六十八军在跑马岭的阵地，但在信阳以北的明港附近，遭到第六十八军独立第二十七旅的阻击。日

军凭借兵力上的优势，攻陷明港。嗣后，中方第六十八军于邢集、蓝店、大营之线向日军展开反击，确实控制通往泌阳的各道路。

鄂中方面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5月4日晨以战车百辆为前驱，并在10架战机的掩护下，由随县附近地区向中方第十一集团军阵地进犯。中方部队极力抵抗，终因敌方火力过猛被迫向北转移。至5月6日，长春店、丰乐等地先后陷敌。至7日，日军又接连攻占泌阳、平氏、兴隆集、资山等地，此后又向枣阳、唐河猛攻。5月8日，防守枣阳的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奉命从西面突围，后在豫省边境之苍台镇附近遇到大批日军围攻，师长钟毅及随行一个营的官兵激战竟日，全部牺牲[41]。为此，蒋介石特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其责令所部长官派专员寻觅钟毅遗体，以慰忠魂[42]。当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枣阳，此后又与第三、第十三两师团会合，从而完成对枣阳以东地区的包围。

此时，中方第三十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及第六十八、第四十五、第八十四军已经转移至新野、泌阳、确山等地，并于5月10日对敌形成包围之势。第二十一集团军之第七军及鄂东游击队也已袭占平汉路之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九十二、第六十八军则相继克复泌阳、桐柏、明港。中日双方激战至5月11日，日军各部陆续向东南方面集中进击，中方部队一度克复的枣阳、信阳复陷敌手。

5月15日，日军集中其第十三师团主力围攻驰往南瓜店堵截之中方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四师及特务营。日军在战机和地面炮火的助攻下，对张自忠所部展开三面环攻。至16日，双方展开白刃搏斗，罗家榨屋附近之山头得而复失者四次。第三十三集团军伤亡惨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多人先后殉职，总司令张自忠苦战至最后时分，终因身负七伤，腹部洞穿，壮烈殉国[43]。日军随即占领南瓜店，并乘机于19日全力北进，向中方部队发起反扑。由于日军地空炮火过于猛烈，中方守军不敌，被迫于21日向唐河、白河两岸及新野、唐河以南阵地转移。

此后，日军第三、第十三及第三十九师团分别集结襄阳正面与钟祥南北地区，积极整顿态势，准备发起对宜昌的攻势作战。5月31日，襄阳、宜城间之敌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强渡襄河，对中方部队发起猛攻。6月1日，襄阳失守。日军主力乘势西渡，向南漳、宜城之线推进，并于3日攻克宜城、南漳。此时，中方第七十五军由老河口南下，并在友军的协助下，于4日规复襄阳。

6月4日晚，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然由沙洋、泗港附近渡过汉水，与由襄阳南退之日军联合进犯宜昌。中方江防军以主力转守董市、当阳之间主阵地御敌。同时，蒋介石急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南下予敌侧击。至6月10日，日军由正面大举进犯，沙洋、荆门、沙市、江陵、远安、当阳等地相继失陷，中国守军退守宜昌外围。双方激战至12日，中方第十八军伤亡甚重，被迫转移，宜昌于当日陷敌。16日，中方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到达当阳、荆门以北地区，随即发起反攻，可惜均未奏效，至18日，双方战事渐呈胶着状态。对于宜昌之得失，中国最高当局亦十分关注。当时正值法属越南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停运中国物资，蒋介石在6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鄂西战局与安南停运之二事，实自抗战以来未有如此苦痛艰危之事也。……安南停运固甚苦痛，然而宜昌得失之关键，甚于安南之交通也。"[(44)] 此后不久，蒋介石又写到："敌进攻宜昌南岸，军事甚觉可虑。"[(45)] 与此相应，中方加强了沿江陵、宜昌与长江两岸间之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各地的兵力，与日方展开对峙。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成立第六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驻节湖北恩施。

第三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战役

一　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处于湖南省的北部，居湘江下游、洞庭湖以南，扼粤汉铁路

与京滇国道之交，与赣、鄂、黔、川、桂、粤诸省相接壤。对中方而言，长沙之得失，直接关系到湖南作为米谷、兵源和工业资源取给基地的存废。而日军占领武汉和岳阳之后，长沙也已成为其通往粤、桂、黔诸省之门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长沙以北为洞庭湖冲积地区，地势平坦，但新墙河、汨罗江及汨水、浏阳河三条水道平行横亘，东西两侧又有幕阜、九岭、万洋山及雪峰山脉为屏障，对中国军队的抵抗防守和侧击截击行动而言，都有相当可倚藉之处。

整个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在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大的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适逢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欧洲大战爆发。中国国内方面，汪精卫投敌后，日军第十一军为配合汪伪政权出台，“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46]。1939年8月15日，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确定了《江南作战大纲》，其目的是：“在第九战区，尤其是在粤汉铁路沿线，歼破敌方中央直系军主力，乘中国军衰退之局势，促进挫折其续战意志，同时加强确保作战地域内之安定。”[47] 9月9日，日本大本营解除原华中派遣军之系列，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下辖华北方面军、华中第十一、十三军及华南的第二十一军，统一指挥关东军之外的侵华陆军各部。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引起了中日双方的极大关注。日军在战前拟定的作战指导方针曾设想：“本作战之实施以奇袭为本旨，尽量在至短时间内结束作战，其后概恢复原态势。”[48] 为此，日军投入大量作战部队，包括第十一军所属第三、六、三十三、一〇六师团全部、第一〇一师团主力及第十三师团的1个旅团，另有海军陆战队的2个独立大队、海军舰艇若干艘、3个航空中队（约30架飞机）、4个独立炮兵联队及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约18万。中方第九战区参加会战的主力部队则有湘北方面的第十五、三十集团军，赣西和赣北方面的第一、十九、三十集团军，鄂南方面的第二十七集团

军以及湘西洞庭湖方面的第二十集团军，另有作为总预备队的15个师，总兵力近40万。

战役开始前，中方最高统帅部一度主张放弃长沙，希望通过避战实现诱敌深入的目的。1939年4月15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称："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49] 然而，薛岳却坚持固守长沙。21日，军事委员会再次致电薛岳，指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进入第二线阵地（平江汨罗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人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50]

8月起，日本空军不断飞临湘、赣、鄂上空侦察，长江日军舰队也以炮舰20余艘，快艇百余艘及水上飞机多架进泊岳阳以西的洞庭湖面[51]。

9月上旬，第九战区获悉日军第十一军已集结于湘北、鄂南、赣北，长沙极有可能遭敌重兵进犯，即确定作战指导方针：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主力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的中方部队则负责击破敌军策应作战的企图，保障主力在湘北方面的作战[52]。

1939年9月14日拂晓，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及佐枝支队千余人，向江西高安以北奉新一带发起进攻，中方第一集团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第六团、第五五〇团奋起抵抗，揭开了赣北方面作战乃至整个长沙会战的序幕。9月15日起，日军增加了兵力，除了步兵外，还出动了炮兵和骑兵，向位于锦江北岸的高安城推进。日军动用飞机连番轰炸，并且不断使用了燃烧弹和毒气弹。中方第五十八军之第十师、第三十二军之一三九师、一四一师所部多次击退日军，数日内双

方在高安以北互有进退。至9月18日傍晚，中国军队弃守高安。19日起，中方将第三十二、四十九、七十四各军所部重新作了部署，与自高安西犯之日军激战。至22日，受重创之日军被迫退回高安城，中方第三十二军乘胜反击，于当晚一鼓作气收复高安，并进占祥符观，日军则往东北方面败退，回到9月14日前之态势。

在高安之战期间，北面同时进行着会埠之战。会埠城位于缭水以北，是阻遏日军自赣北沿缭水西侵湘北的战略要地。9月15日，日军第一〇一、一〇六两个师团分别强渡上乐河与缭水，以重炮猛轰中方阵地，随后日军以步兵、骑兵和战车沿缭水南北两岸向西推进。经过数日激战，北线日军于16日攻占会埠城，然后其一路从会埠向西，沿缭水先后推进到罗坊、上富、横桥、甘坊、找桥，但在横街遭遇中方第七十二军第十五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的有力阻击。另一路日军则经九仙汤、沙窝里、黄沙桥进犯至修水、武宁水一带。

与此同时，南线战事亦十分激烈，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数道防线，推进到高安西北部的天峰岭、萧庄和西部的斜桥、村前街一带。在此情况下，中方军队依令向后集结，准备反攻，进而重新调兵部署，将原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向东开赴甘坊、找桥一带，纳入第一集团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则西调纳入第十五集团军。从9月下旬起，中方开始围剿各路入犯之敌，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师先后歼逐村前街、斜桥之敌；第五十七师收复上富、横桥；第五十一师在九仙汤附近与日军激战，终于收复九仙汤；第六十军第一八三、一八四师收复甘坊[53]。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收复罗坊，然后以其主力沿缭水南岸扫荡追歼日军，并于10月12日收复了会埠。另从9月底起，中方第七十二军新编第十四、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十六师，向修水方面的日军发起进攻；10月上旬，第八军第三师也参加了会攻，终于在10月10日收复修水城，然后沿修水河南北两岸向武宁方向追击。第三十二军的第一三九、一四一师则在会埠以北一带追歼日军，至10月13日，日军败退至奉新、靖安、武宁原阵地，与

中方部队展开对峙[54]。

10月上旬，当修水之战即将结束之际，由鄂南南下的日第三十三师团的2个联队约5000余人，却自三都北窜至时为中方粮仓和游击基地的九宫山一带。中方除调兵固守九宫山根据地之外，另部署第八军第一九七师各部，以较少兵力与来犯日军正面周旋，而以主力沿敌军所经之途实施阻击，并对敌后进行攻扰。日军在沿途受创、进退两难之时，分三路向九宫山西北之通山、正北之富有、东北之燕履等方向逃窜，中方则按计划对其伏击、侧击和尾击，予日军以重创，九宫山根据地完好无损。

在鄂南方面，进犯之日军为三十三师团的二一三、二一四、二一五等三个联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总兵力约2万余人。9月22日起，原集结通城、高冲附近日军南犯，以飞机和大炮的轰击开路，向麦市、王牙尖一线猛烈进攻，中方第七十九军第一四〇师在第一三四师一部的支持下予以还击，双方伤亡均惨重。23日晚和次日，日军分别攻陷王牙尖东西两侧的苦竹岭、南楼岭，然后南进至桃树港，受到中方第一三三师、一三四师的阻遏。26日夜，中方调动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由官田向北、第八十二师自尖山向东，加上第一四〇师自麦市南下，第一三四师自原有阵地向北，合击南窜之日军，予敌重创，并于28日一度收复苦竹岭、桃树港。10月3日，中方第八军第三师开至桃树港东北前来增援，各部纷纷向日军发起攻击。南犯溃败之日军向南楼岭北撤，而在通城的日军一部又南下增援，双方军队在南楼岭展开了激烈的包围与反包围之战。10月7日晨，中国军队规复南楼岭，残敌遂向通城逃遁。

当9月下旬中日双方在桃树港一带激战时，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曾突破白沙岭、包家岭一带中国军队的防线，其一部东向渣津方面进犯，大部则继续南侵，自龙门厂经长寿街直达献钟市北部，企图沿汨水直至湖南平江，与自湘北东进至平江的日军奈良支队会合，进而实现与其他各部日军会攻长沙之目的。这样，在平江以东阻遏日军第

三十三师团主力，一时成为中国军队在鄂南战场最大的战略目标。对此，第九战区司令部极为关注，急调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团向献钟以西之三眼桥推进，以迎阻自平江东下之日军奈良支队一部。第二九三团据守黄花潭、香田、马子岭、粉白岭一线，以切断献钟方面之日军三十三师团西进之路。10月2日，东、西两路日军同时向黄花潭-粉白岭一线进犯，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竟日，香田、粉白岭一度失陷。嗣后，中方又实行反包围，迫使日军分别向平江和长寿街方向回窜。于是，中方分别由第九十八师向平江方向、第八十二师向长寿街方向日军发起追歼。10月6日，第九十八师克复平江。另外，第一三三师之三九九团自长仑岭南下至沙铺里，阻遏企图由长寿街北退之敌，另由第三九七团予以夹击，予日军重创。至10月7日，日军在中方军队追击之下，狼狈退守通城、崇阳。

日军在赣北、鄂南的进袭，原想配合湘北正面的主攻，采取分进合击之战术。但是，无论从赣北的奉新、靖安取道甘坊、铜鼓，还是自鄂南的通城、麦市经过长寿街，通往湘北之浏阳、汨罗，都有190余公里的山路，使日军大部队的行军、通讯和补给均受到相当限制。反之，在赣北、鄂南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武器装备方面落后于敌军，但为支持湘北主战场而不期待增援、奋勇作战，且凭借有利地形，在阻击、伏击、侧击和运动作战中，较充分地发挥了战斗力，终于使日军分进合击战术彻底破灭。

湘北方面是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1939年9月18日起，原集结在岳阳以南的日军第六师团全部和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与新增加的骑炮兵3000余人，沿粤汉铁路向新墙河北岸的中方第五十二军第二师、第一九五师阵地发起进攻，这也是日军整个作战计划之中路突破的开始。中国军队英勇抵抗，第一九五师于9月21日在草鞋岭阵地三次击退日军攻击，该师一一三一团第三营在防守比家山的激战中，自营长史恩华以下，全营壮烈牺牲[55]。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后，中方部队遂在新墙河南岸的乐家湾、王街坊、

新墙、潼溪街、杨林街一带，进行防御作战，阻遏日军的进攻。此外，日军第三师团在十多架飞机的空中支持下，出动舰船20余艘、炮艇百余艘，在洞庭湖夹新墙河口南部的九马嘴、鹿角一带强行登陆，中方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守军凭借着险要的湖岸，与敌军激烈交战。为了防止被从新墙河登岸的日军截断退路，第二师先是有计划地以部分兵力扼守八斗坡、白塘冲、背底冲一线，主力则部署于粤汉铁路黄沙街站附近，从而与长湖、洪桥一带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藕塘附近的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一部（由第五十二军指挥）、藕塘以东的第一九五师，组成了新墙河以南的第二道防线，对南进之日军进行逐次抵抗作战。在给敌军重创后，第五十二军各部奉命撤退，日军则南侵至汨罗江、汨水一带。

在新墙河战役打响后不久，日军第三师团另一部凭借空中和水上之优势，迂回绕至汨罗江湖口登岸，但立足未稳，即受到中方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守军的反击。双方在湖口的千秋坪、黄婆段、眼镜塘等处进行攻守战，不少阵地数度易手。同时，日军另自营田附近登岸，与中方守军激战。9月24日，第九十五师在汨罗车站、第十九师在黄甲桥和东塘一带的纵深阵地，继续抵抗日军，而第七十军的第一〇七师则沿汨水在浯口、长乐街、新市、坡子街等地，艰苦阻击南下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

至9月26日，中国军队已经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汨水一带毙伤日军逾万人，达到了“正面逐次抵抗，消耗敌人以换取时间”的目的。为实现中方最高军事当局关于“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的命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于9月25日命令在汨罗江、汨水一带阻遏日军的中国军队转移，以便诱敌深入、加以围歼[56]。26日起，第五十二军第二、二十五师及所附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进入新田、泗汾、铁河口一线和醴陵附近阵地；第七十军的第十九、一〇七师及所附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进入石亭、渌口一线和株洲附近阵地；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及所附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进

入福临铺以西阵地；第四军第五十九师转移至易家湾和长沙市东南地区，第九十、一〇二师则进入渌口市、易俗河、姜余田和湘潭附近；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进入岳麓山阵地。随着中国军队的逐步转移，日军第三师团上村支队由营田一带南进至湘阴；第六师团一部自汨罗车站沿粤汉铁路线进至三姐桥附近，另一路由新市推进至栗桥附近；第十三师团则从长乐街进至福临铺附近。

日军的冒进，使中方“转进设伏”的部署得以实施。9月27日起，第七十七师第二三〇、二三一两团在盛家冲、玉池山北麓、石桥湾、三姐桥、沙河车站等设伏阵地出击，使沿铁路南犯之日军伤亡惨重；第二二九团则在栗桥、关圣庙一带侧击自新市南进之敌。随后，第七十七师奉令南撤至枫林港以北，继续出击南犯之敌。东线自长乐街南进的日军，在高桥附近遭遇第一九五师阻击，在上杉市则受到第一九五师和第六十师的腹背夹击，旋第二十五师也加入对上杉市附近的围攻，予敌沉重打击。

另外，从9月23日起，日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在上村支队和多架飞机的配合下，以炮舰、汽艇向洞庭湖之上下青山发起进攻，被中方第五十四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的守备部队击退。日军又利用水面兵力优势，强行进入夹港，并由湘江攻占营田。为掩护此一航运线，日军于9月27日凌晨出动40余艘汽艇，试图占领湘江西岸之六姓山。中方守军与登岸之敌激战竟日，后南撤至桓家山阵地，与占据六姓山之日军展开对峙。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亦于9月在湘阴以北，芦林潭一带遍构雷区。日军为趋避雷区，分散登陆，最终导致阵地涣散，首尾不能兼顾，军火粮食之运输亦陷于绝境[57]。

10月1日起，湘北方面作战态势开始转变，日军除留置部分兵力继续与中方对峙外，其主力开始北撤。中方迅速调整部署，以汨罗江南岸为目标，对北溃之敌实施追击。10月2日起，中方第二十五师自上杉市经金井北追日军奈良支队至雍瓦江，然后一部往平江，另一部经浯口往长乐街方向推进。第一九五师则经福临铺向北追歼日军第六

师团。自湘阴和沿粤汉铁路南犯之第三师团上川支队和第六师团一部，一度推进到三姐桥以南的桥头驿、霞凝港附近，亦即整个会战期间距长沙最近之处，此时也分沿湘江东岸和粤汉铁路向北溃退。至10月5日，中国军队已进抵长乐街、新市、归义、汨罗江之线，收复汨罗江、汨水以南地区，后又渡江向新墙河一线继续追击。另外，新编第二十三师一部也向六姓山的日军发起攻袭，并收复六姓山。

在追击作战中，中方起初仍防备日军的反攻，因而第九战区司令部要求各部在北进途中分兵占守各重要地点之阵地。至10月7日和8日，各线日军均败退至新墙河以北，分向靖安、崇阳、岳阳方面后撤，溃退之势已定。撤退途中，日军“在蒲塘、金井、新市一带，奸淫掳掠，残杀我民众，暴尸盈野，惨不忍睹”[58]。10月10日，中方开始全面追击，除向敌侧后挺进外，各线主力还时而绕过固守据点之敌，实施对日军主力的超越追击战。至10月14日，中方停止追击。至此，湘北作战宣告结束。

根据第九战区司令部统计，整个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伤11950人、亡21530人，共计33480人。中方伤16166人、亡14692人、失踪4883人，共35741人[59]。薛岳曾指出：“长沙会战，我军不呆守阵地，不死守方案；只求歼灭敌人，取绝对攻势；实行反包围，以破敌之包围。坚忍沉着，快速机敏，将士忠勇用命，人民动作协同。”[60]

长沙会战是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发起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该战役历时月余，日方投入兵力10余万，中方投入兵力30余万。结果中方部队伤亡数倍于日军，但日军并未达成捕捉歼灭中方部队主力的目的，且因自身力量不足而不得已退回原防线[61]。就整个中日战争战局而言，日方没有因发动此次重大军事行动而取得任何优势。相比之下，中方则在作战中处于主动地位，守、退、攻，大体上均按事先之计划。通过逐次抵抗，迟滞敌军的攻势，并乘机反击，以时间换取空间，使得华中日军深陷难拔。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因此次

会战而大为增强。在当时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国内失败妥协情绪抬头的大背景下，第一次长沙会战增强了重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提高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勇气，在鼓舞士气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至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期，蒋介石便认识到："赣湘战事复起，武长路方面损失颇大，然能照意图部署，已与敌军之大打击，使之不敢再攻他处，则目的达矣。"[62] 此后，在国内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更多地开展了积极的攻势防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二　桂南战役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军在中国战场愈陷愈深。为切断中国通往安南（越南）的国际补给线，同时在中国军队防守薄弱的桂南和粤西江以南地区取得进展，日本大本营于1939年10月14日下令攻占桂南[63]。10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正式向第二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针定为攻占南宁及附近各要地，切断中方通向南宁的联络补给干线。日方参战兵力包括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海军第五舰队（11月15日改称第二派遣支队）、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及其他配合部队[64]。

中国方面，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最高统帅部即考虑发动更大规模的"冬季攻势"。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准备将已经整训完毕的部队主力投入战斗，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等战区实行主攻，同时以第一、第四、第八及鲁苏、冀察等战区担任助攻，各助攻战区于11月底开始攻击，主攻战区则于12月上旬开始行动[65]。11月19日，蒋介石下达"冬季攻势"命令[66]。与此同时，日军按照预定部署发动桂南战役（日方称南宁作战），中国军队随即反击。由于与"冬季攻势"同时展开，桂南战役于是成为"冬季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1月15日，在华南的日军第二十一军指挥第五师团及台湾混成旅团、佐世保海军陆战队，搭载70余艘运输船，在海空军协同

下，兵分三路，在广东北海钦州湾企沙一带强行登陆。中方守军竭力抵抗，仍被迫逐次北撤。对于日方以大批兵力在钦州湾登陆并进犯桂南的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有关战区事先都确实缺乏相应准备，当时在桂南仅有第十六集团军第四十六军两个独立团与新编第十九师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兵力对比悬殊，无法阻遏登陆之敌。为增加抵抗能力，蒋介石于11月下旬谕令空军准备参加南宁方面会战，空军方面遂调集主力于该方面。南宁会战空军使用之兵力，有驱逐机5个大队，飞机86架；轻重轰炸机4个大队，飞机35架[(67)]。

日军第五师团及川支队以约一个旅之兵力，自企沙和龙门附近登岸后，即向防城进袭，中方第五十六团守军抵抗竟日，阵地工事均为敌飞机和大炮所毁，不得不放弃防城，向西北方向山地转移。日军台湾旅团于11月16日在黎头嘴及沙井附近登陆，分两路进攻钦县，中方守备之第五十五团经激烈巷战后，突破日军之夹击而后撤。17日上午，台湾旅团攻陷钦县，随即以一部向东及东北方向攻击中方新编第十九师野战补充团，主力则沿钦邕公路进犯，当日晚已达广西省境附近。另外，日军中村支队约一个旅团兵力，乘汽艇溯钦、防间之渔洪江直上，于16日晚抵黄屋屯登岸，即北进小董一带。

鉴于日军兵力占优且推进颇速，中方第四十六军除电请龙州的教导总队速抵上思外，令第一七五师的三个团赶赴那香附近集结，意在小董、大塘间分两路夹击日军。然而自18日中午起，位于小董的新编第十九师师部和第五十五、五十七两个团，受到日军台湾旅团与中村支队的南北夹击，东向板城附近撤退，日军遂得以径向邕江右岸窜犯。19日，日军分三路续向狮子口、那马至那连一线进逼。

根据桂林行营的命令，第五、三十六、九十九三个军尚在向南宁、宜山、柳州一带挺进，由第一三五师负责南宁之防务，第一七〇师渡过邕江左岸，集结于剪刀墟和二塘附近，新编第十九师及一七五师在那楼一带正面迎击来犯之敌。但中方增援各部尚未集结完毕，日军即从11月22日下午起开始在罗菊村和青山塔附近强渡邕江，并在空

中炮火支持下直逼南宁城。中方第一三五师一部被迫放弃前沿阵地，试图在南宁城郊与陆续到达之增援部队一起固守，以待主力到达后再行反击。22日，蒋介石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命其着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副总司令韦云淞“负责指定部队，固守南宁据点，待我部队集中后，断然予以打击，如无命令而使南宁不守，即以军法从事”[68]。次日，蒋介石再度致电白崇禧，命其令第十六集团军所部“固守南宁，无令不得撤退”[69]。从24日晨起，中方各部在南宁城外以及二塘、凤山等处曾数度击退日军的进攻。至当日下午，南宁城郊阵地多为日军攻陷，敌从东北、南、西北三面对南宁城形成围攻之势。同时，蒋介石急调第五军杜聿明部驰援南宁。由于受交通条件所限，援军进展迟缓。日军则继续猛攻南宁城。最后，中方守城之第四〇五、四〇四团冲出重围，南宁遂告失陷。

日军占领南宁后，一路攻占龙州及镇南关，切断由龙州经镇南关通往越南之路线。自25日起，日军分别向武鸣和宾阳方向北犯，中方军队进行了艰苦的阻击。在邕武路方面，日军于30日在地空炮火的支援下，向高峰隘发起猛攻，中方守军伤亡重大。12月1日，高峰隘阵地被日军突破，中方守军被迫退至武鸣以北之马安墟、陆幹墟、八塘之线，进行整训补充[70]。在邕宾路一线，中方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奋勇迎敌。在二塘的战斗中，第六〇〇团团长郜一之壮烈殉国[71]。二塘阵地被日军攻下后，中方第一七〇师两个营经肉搏一度收复。11月28日至30日，中方接连失守六塘、七塘和八塘，但给予日军沉重打击。12月2日拂晓起，中方曾以第一八八师第五六四团协同第五军之战车部队反攻八塘，激战至次日下午，未得成功。

基于是时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中方决定将下一步作战目标定为限制日军主力之北进，遂于12月3日晚将约5个师的主力向上林、宾阳和武鸣地区转移，邕宾路仅留第一八八师第五六四团防守昆仑关阵地，以掩护主力后撤。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50余公里处，周围群山环抱，与高峰隘成犄角之势，邕宾路纵贯该关南北，是日军自南宁北进必经

之地。12月4日晨起，日军出动地空优势兵力向昆仑关猛攻，并企图包抄中方守军。第五六四团激战至中午，遂向北撤往马岭附近，昆仑关失守。

至12月中旬，中国军队于昆仑关方面完成了第五、三十一、三十六、四十六、九十九等五个军的部署，从18日凌晨起，第五军各部开始反攻，该军荣誉第一师在战车和火炮的支援下，向昆仑关正面发起进攻；新编第二十二师由黄盛岭、茅岭之线向南推进，在五塘、六塘一带与日军激战，进而阻击日方向昆仑关之增援；第二〇〇师攻占昆仑关附近之高地后，也加入对昆仑关的进攻。至12月20日，中方一度收复了昆仑关。2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称："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特种兵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达成任务者，应即以抗命畏敌论罪，就地处治可也。"[72] 由于日方增援部队很快赶抵，中方各部受到重炮和多架飞机的火力攻击，旋退出昆仑关。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双方均增加兵力，对昆仑关周围的战略高地进行了反复争夺，中方也出动了飞机助战。从28日起，中方开始全面反攻，先后攻占了昆仑关东西两侧各高地，新编第二十二师自同兴向昆仑关发起突击，于31日中午收复了昆仑关。日军则向九塘一线溃退，中方乘胜追击，于1940年1月4日克复九塘。另外，在西部的邕武路方面，中国军队也在1月1日收复了高峰隘。综计昆仑关方面，"计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以下四千余"，中国军队伤亡约14000余。至1月16日，日军伤亡8100余人，中方军队伤亡亦达23000余人[73]。

1940年1月下旬，日方从广东抽调援军，使总兵力达三个师团以上，然后分两路：一部分兵力沿邕宾路向昆仑关一线发起进攻，同时另一部分兵力从邕宁-永淳路迂回突袭宾阳，试图围歼昆仑关及附近地区之中国军队。与此同时，日方出动大批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一度使中方各部与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间的联络中断。在与日军苦战数日后，中国军队终因补给断绝，只得在2月2日、3日先后弃守宾阳和昆仑关。至2月8日，日军又接连占领了上林和武鸣等处。中方待增援

部队到达后，立即进行反击，复于2月中旬收复宾阳、武鸣和上林。1940年2月下旬，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反击，24日收复昆仑关，宾阳日军也撤回南宁。

桂南会战初战失利，昆仑关一役，战事无比激烈，中方部队代价惨重。而宾阳一役，中国军队更是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败于日军。对于1940年1月底2月初桂南作战的失利，蒋介石极度不满，曾在2月3日所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到：“本周桂南失败，以主将疏忽大意，处置不当，乃至被围隔绝，纷乱无序，此为开战以来最可耻之丑事。”[(74)] 1940年2月22日至25日，军事委员会在广西柳州召集第四战区军官开军事会议，检讨桂南战役的作战经过，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定今后的改进办法。会上，蒋介石要求各将领认真总结，改过缺点，补过图功，奋发自强[(75)]。会后，军事委员会对相关将领作了赏罚。其中，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政治部长陈诚被降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被记过，第三十七、三十八集团军被取消番号，两集团军总司令叶肇、徐庭瑶，以及第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的军长、第四十九师和一六〇师的师长等，均被撤职查办[(76)]。

至1940年9月，法国同意日军派兵进驻越南北部，日军遂得以从越南直接截断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这样，继续直接占领南宁的意义减少。10月底11月初，日军陆续退出南宁，中国军队乘势收复了南宁以及龙州、凭祥、钦州、防城等地。至此，桂南地区全部收复。

第四节　豫南会战和中条山会战

一　豫南会战

豫南地区位于黄淮平原西部，南部紧邻大别山、桐柏山，西接关陕。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对于日本控制下的平汉铁路、江淮流域和荆湘地区，构成重大威胁。1941年1月初，日军第十一军发现中方第

二、第三十一集团军正部署于信阳以北约150公里的遂平至项城一带后，随即于9日决定“击败进入信阳以北豫南平原之敌，摧毁其抗战企图”[77]。此后，日军向豫南地区集结兵力，不断自长江下游向信阳附近输送大量弹药、器材，并调集日空军第二飞行集团之第四十五战队，分向安阳、新乡、淮阳、信阳各地进驻[78]。当月，日军向河南南部集结的兵力计有7个半步兵师团、1个独立骑兵旅团、3个独立战车联队、1个独立野战炮兵联队，总计步兵约15万余人，骑兵约8000余人，另有各型大炮550余门，战车300余辆，装甲车200余辆，飞机约百余架。其中仅信阳地区就集结兵力3万余人，飞机四五十架，战车数百辆[79]。日军在如此有限的区域集中如此大的兵力，为武汉会战后所仅见，其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势之意图十分明确。

1月20日，日军第十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一联队、第四师团各一部，首先在鄂西襄河两岸对中方第二十九和三十三集团军开展佯攻，以冀牵制该地区中方军队；同时，皖北方面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从宿州向西、骑兵第四旅团及一个战车联队由亳州向鹿邑、涡阳进犯；豫东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的两个联队附一个工兵联队则从开封分别向通许、朱仙镇推进，另一联队沿黄河郑州北岸西犯。上述军事行动的目的均是要保证日军在豫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1月24日，集中豫南的日军分三路发起全线总攻，豫南会战由此揭开序幕。左翼方面，由原集结于信阳的日军第三师团全部、第四师团第八联队（奥津支队）、独立山炮第二联队、独立山炮第五十三大队、迫击炮一中队和工兵一联队展开于小林店、古城、查山一线，向北进犯泌阳中方第六十八军阵地。其右翼则以第四十师团在槐角岭和正阳间强渡淮河，向北推进。中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包括第十七师团的4个步兵大队和第十三、三十九、三十四师团的另4个联队，两个战车联队，一个独立山炮大队，由明港附近沿平汉路向北出击[80]。在发动地面进攻的同时，日军还出动大批飞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

炸。

在豫南平原地带，日军步兵、骑兵、炮兵、战车和飞机得以联合行动。为避免与装备占优势的日军主力正面交战，蒋介石于1月25日急电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命其“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两翼，做主动的侧击；另以有力一部埋伏敌后，待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其交通”[81]。中方之主力“望转至敌后，向敌之侧背反攻”[82]。第三十一集团军遂在平汉路之西平、遂平附近以第八十五军预备十一师一个师的兵力对日军作正面之抵抗与周旋，以牵制、迟滞日军的行动，进而诱敌深入，而将原部署于南阳以东地区的主力转移至敌军进犯路线之两侧。第十三军部署于舞阳以南的象河关、尚店、土山镇、仪封镇，形成向东向西均可侧击之势，第八十五军部署于上蔡、汝南间，准备侧击沿平汉路北进之日军[83]。

1月26、27日，日军已推进至泌阳、高邑、邢店、确山以及春水、沙河店、驻马店一带。27日，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令饬各集团军全面转移攻势，捕歼深入豫南之日军。于是，中方各部队分别向相应地区行动。29日起，第十三军初在象河关附近，嗣后又在舞阳以南之接官厅、尚店、小史店一带，向日军左翼第三师团实行攻击。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在上蔡附近、第四师在仪封镇附近，从两面突袭日军右翼部队之侧背。日军开始后撤时，又由第六十八军向河关以南、第五十五军自唐河向泌阳、第五十九军向南阳进行追击。至1月31日，中路日军分向两侧，试图与其左翼、右翼兵力对中方进行南北夹击。但在日军完成合围之前，中方第十三军已向叶县以北地区转移，第八十五军另向郾城、商水间以及沙河以北转移，使得日军在舞阳和上蔡均扑空。与此同时，在豫西的中方第五十九、五十五、六十八各军开始从唐河、泌阳及以北地区，向舞阳敌后发起攻击；在皖西的第八十四军北上克复正阳，向日军尾击。

日军各部在后方联络线迭遭切断、疲于应战的情况下，于2月2日

全线南退。第五十九军在南阳附近与日军第三师团激战两昼夜，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在其他部队尚未抵达的情况下，第五十九军于4日由南阳撤至镇平以东地区。中方第十三军在接连收复保安砦、舞阳后，于6日克复南阳，续向日军尾追。是时，日军由南阳南撤的第三师团主力，以及由舞阳向泌阳、唐河南进的第十七师团主力和第四十师团之一部，试图夹击中方第五十五、六十八和二十九军。待到进抵象河关附近时，中方第六十八军发起截击，予敌重创。日军退至泌阳附近时，遭到中方第二十九军的迎击，伤亡甚重。至2月7日晚，日军分别向泌阳东南以及信阳附近败退，中方第八十五军和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以及第五十五、五十九军各一部，分别予以追击。至2月11日，豫南明港、跑马岭，以及皖北各要点，先后被中方收复，双方恢复战前之态势。

豫南会战前后历时20余日，中方共毙伤日军9000余名，并附近焚毁敌汽车300余辆[(84)]。日军进行多日的扫荡作战，除损兵折将外，毫无所获，以失败告终。

二　中条山会战

1937年秋冬日军侵入山西之后，基本占领了该省各主要交通枢纽点和路段，只是各主要山岳地带一直为中方所控制，尤其是晋南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中条山位于晋南、豫北交界处，是中国军队在晋南坚持抗战的游击根据地，驻守此地区的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所部的7个军，共16个师，近15万兵力。日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和四十一共4个师团，部署在中条山周围，守备着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豫北地区[(85)]。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曾组织了数次针对八路军的讨伐。到该年秋，日军认为对华北“治安”造成主要威胁的仍然是中条山一带的卫立煌所部，决定集中兵力予以歼灭。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了发动中条山作战的目标：“当前的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盘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要“扩大

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86]。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日军从华中地区抽调了两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增加至该地区，以及从关东军抽调两个飞行团以增加原先在华北的第三飞行集团，投入中条山会战之准备[87]。在会战正式开始之前，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和第三十五师团之一部，曾在陵川地区会攻中方第二十七军，防止会战正式开始时其左侧背的威胁；另以第三十七、四十一师团进攻翼城以南、绛县以东的中方第十五军，夺取若干战略点，为会战开始后日军的集聚扫清障碍。

然而，中国方面却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会战准备不足。“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后方据点与彻底破坏或阻绝通敌道路”[88]，“黄河北岸只注意前线工事，而对于其各渡口生死攸关之桥头堡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甚至掩护退却与收容阵地工事亦无之”。蒋介石将这一点视作晋南战役中“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89]。当日军基本完成战前准备之时，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也作出了日军有进攻中条山企图的判断，决定“乘敌集中尚未完毕，制敌机先，以击破其攻势”，并要求第一战区发起攻击，打破日军进犯企图，令第二战区、第五战区有关部队进行牵制性作战。1941年5月初，第一战区制订了作战计划，但相应的部署尚未完成，日军便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5月7日，日军从西、北、东三路同时向晋南豫北中条山地区发起进攻。其西路则沿张茅大道东犯王家河、台柴村；东路由沁阳出发，向西经孟县、济源进犯封门口；北路从翼城、张马以及绛县、横岭关等地向南进逼垣曲。

中条山西路方面是日军重点进攻所在，共投入了三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的兵力。5月7日下午起，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及第九独立旅团，分别从西桑池及横岭关附近，向垣曲方向发动猛攻。中方第四十三、第十七军所部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凭借优势空中火力援助及大量使用毒气弹，至8日晨该两军阵地被突破。至8日黄昏，日军已攻陷

垣曲、台柴村等地，中方守军遂被日军分隔为两段，即一部分固守于同善镇东北一带之山地，而绛垣大道以西部队则在田反涧河与敌军对峙。此后，日军继续发起攻击，于9日凌晨迫近中方第五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马村附近。由于与后方的联络线被日军截断，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遂向东转移至简南沟。另外，日军第三十六、三十七师团及第十六独立旅团，由夏县方面攻击中方第八十军、第三军阵地。由于一线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中方被迫退守二线阵地。5月8日晨，日军出动战机30余架，向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猛烈轰炸，该师所部损失重大，第七十九、八十两团牺牲大半，剩余不足两营，师部与各团联络被迫中断[(90)]。战斗过程中，该师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壮烈殉国[(91)]。日军在张店附近突破第八十军阵地之后，切断了第八十军和第三军的联系。这样，日军已经数路推进至黄河左岸，然后又返向北进剿，中方第三、第十七军均遭日军围攻，处境极为不利，不得不分散突围，其中大部向汾河以西转移，余部留在山区游击。

北路方面，5月7日下午起，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及第四独立旅团一部，不断向第十四集团军第四十三军之贾家山、第十五军之杨家梁、第九十八军之北次营等阵地发起攻击。8日拂晓，日军突破第四十三军第十八盘阵地后继续南进，其先头部队到达歇马店、王茅镇。此后，第十五、第四十三军遂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同时将主力东移至杨家梁-白鹅之线，阻敌东进。10日，矿铜岭、周北等地的日军，向第四十三军第一六九师大岭口阵地发起进攻，并在南岭附近与第四十二师发生争夺战，日军乘隙进占煤坪中方第二线阵地，此后又分向西庄、河口猛犯。次日，日军继续猛攻中方第四十三军第十、第一六九两师阵地，战斗异常激烈。由于第十四集团军补给线被敌切断，所属各部状况十分恶劣，该集团军仅有两个师突出日军包围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被阻于山区之内，进行艰苦的游击作战。

东路方面，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三十五师团以及第四骑兵旅团，

于5月7日下午起，分两路从济源、孟县两地向中方第九军阵地进攻，并以飞机进行猛烈轰炸。8日，沿黄河左岸进攻之日军攻陷孟县，并继续向西突进。与此同时，沁河两岸之日军亦先后突破中方防守阵地，企图将第九军围歼于济源以东地区。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第九军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予日军重大打击，但终因伤亡甚重，主力被迫退守济源既设阵地，而以一部在孤山一带进行敌后游击。当晚，济源被日军攻占，第九军不得不退至封门口南北之线阵地设防。9日傍晚，日军猛攻封门口。双方经过激战，至10日封门口最终被日军占领。至11日，第九军直属部队、十四师和四十七师一部由关阳南渡，守备黄河南岸，第四十二师及第四十七师另一部留在山地进行游击。12日，日军一部控制了黄河北岸各口，其主力沿封门口西进，与由垣曲东犯之敌会合。

此后，邵源镇和封门口的东、西两部日军打通济（源）垣（曲）大道会合，随即向绛（县）垣（曲）大道北部之中国军队进逼，试图一举围歼。中方第五、第十四集团军各部独立苦战不已。根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命令，各部除留部分兵力留在中条山区内进行游击战之外，主力奋力突围，转移至外线，并伺机实施反包围。5月19日第三、十七两军各有4个团分别到达稷山、乡宁整休。另外，第九十八军一部突围转移至沁水以北地区；第十五军一部以及第一〇一、一〇九两师各一部，第十四集团军总部，转移到济垣以北地区，联络第四十三军一部，向敌后展开游击战。至5月下旬，日军封锁黄河北岸各渡口，并炮击南岸中方阵地；另汇集兵力，对于济垣大道以北及沁水以南地区的中国军队进行扫荡作战，双方军队展开了多日的激战。在济垣大道西侧和阳城附近，绛垣大道以西的闻喜、新绛之间，双方军队亦有殊死激战。至5月27日之后，日军的攻势渐趋休止，中国军队重新部署中条山地区的兵力，业已转移到太行山吕梁山的中国军队，也重新设立根据地，以待反攻。

整个中条山战役作战20余日，日军发动兵力达7个师团之多，最

后除了占领中条山部分山隘和黄河北岸各主要渡口之外，未能根本阻止中国军队的活动，中国游击兵力仍可以在各主要渡口以外地区，进行黄河两岸的联络。而中国军队之所以遭到较大的损失[92]，固然由于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也与中国军队疏于防备、各部之间联络通讯失灵不无关系。

第五节　鄂北战役和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　鄂北战役

鄂北地区东以平汉路为界，西临汉水，南有大洪山，北以桐柏山系与豫南接壤，水陆交通发达，东进可断平汉路，南下可威胁武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武汉会战结束以来，中方第五战区部队一直控制着鄂北之桐柏与大洪山地区，对武汉日军构成严重威胁。日军曾多次向该地区发动攻击，但均无成效。1941年4月30日，日军第十一军为打击驻武汉周边之第五战区部队，策应其华北方面军同期在晋南进行的中条山战役，遂下达江北作战（即鄂北作战）命令："决定自5月5日以后逐次开始攻击，各兵团要击败各自当面之敌军。"[93] 兵力投入方面，日方以第三师团为主力，另独立第十八旅团及第四、第三十九师团各一部，战车第七联队主力及第十三联队一部，炮兵第二联队另有空军第三飞行团一部。中方第五战区洞悉日军进犯企图之后，遂进行迎击部署，共计有17个步兵师，但无空军支援[94]。

日军先以第三师团一部，向信阳以北地区进行佯攻。随后，日军第三师团主力自5月5日起，开始在鄂北应山、马坪港、随县一带，向岩子河、高城等地发动攻击。中方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逐次抵抗，并向西北方向后撤。5月7日，日军先头部队进抵天河口后，主力随即向西南突进，企图将中方部队围歼于澴潭镇地区。此时，退守高城及天河口之中方部队开始转移攻击，并于10日攻克资山、唐县镇。澴潭镇地区之中方部队亦迅速向枣阳转移。13日，日军第三师团继续

在枣阳方面追击中方部队，并于14日攻陷兴隆集，15日攻陷枣阳。然而，中方部队于当日午夜发动反击，一举将枣阳夺回，日军则被迫转移。17日，转移之日军在枣阳西南约30公里处的小板桥遭遇中方第二十二集团军之一部，双方发生激战，互有损伤。随后日军折返，中方部队展开追击，于22日恢复原有态势。

就在日军第三师团进攻的同时，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第四旅团于5月8日分由荆门、当阳及钟祥附近，向北发动攻击，企图策应第三师团作战。日军各部一度攻抵仙居与远安附近，随即为中方部队击退。15日，双方已恢复攻击发起前之态势。鄂北战役至此结束，日军在付出近500人伤亡的代价之后，对中条山会战没有起到直接的策应目标。

二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1月，日本陆军部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中国军队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中国事变”[(95)]。而实施这一作战的重点，便是依靠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进行长沙会战。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在司令官阿南惟畿（原陆军部次长）的指挥下，动用第三、四、六、四十等四个师团的陆军兵力，辅以兵舰20余艘，汽船百余只，飞机百余架，总兵力约12余万，发动了代号为“加号作战”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预想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强渡新墙河，通过汨罗江（汨水）以北、汨罗江（汨水）以南至长沙之间、长沙以南株洲-浏阳等三个阶段的作战，“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96)]。

对于此次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早有部署，决定乘虚打击消耗敌人，确保长沙这一军事、经济要地[(97)]。除了命令第三、六战区攻袭当面之日军以辅助湘北作战之外，特命第九战区于新墙河以南至

长沙之间区域逐次抵抗，同时调集中国军队主力向敌侧背转移攻势，最后围歼敌军。第九战区相应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确定的战法为："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98] 中方参战的部队为第十九、二十七两个集团军所辖的16个师，战区直辖2个军的6个师，6个挺进纵队以及炮兵、工兵部队。为配合第九战区作战，军事委员会又配拨6个师，加之第六战区配拨的2个军共5个师，兵力总计约30余万人。

总体上看，第二次长沙会战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41年9月7日日军向新墙河上游大云山发起进攻，至9月26日浏渭河北岸战斗止，为日方进攻阶段；二、从9月27日长沙附近保卫战，至10月1日日军开始突围，为中方的反攻阶段；三、此后至10月9日，日军退至战前原防线，为中方的追击作战阶段[99]。

9月7日晨起，日军第六师团的第二十二、四十五联队向大云山北侧和东北侧发起进攻，第十三联队则从西侧进攻，其目的是夺取大云山，掩护日军向新墙河北岸地区的集中和展开。扼守大云山各阵地的中方第四军第一〇二师、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所属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第二天起，双方都向大云山地区增派兵力。日军第二十三联队主力由桃林沿大云山西侧南进，被中方第一〇二师堵截于百羊田、甘田和马嘶埠地区；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突破大云山东侧的中方阵地，进犯至长安桥附近，后又分路包抄大云山南侧阵地；日军第四十师团则集结桃林后，向甘田方向推进。9月11日起，中方新编第十师和第五十九师，分别自长安桥北、南两侧，同时由东向西攻击；第六十师自杨林街由南往北进攻，对日军进行了围歼。日军伤亡颇众，一度固守待援。9月13日、14日，中方从各方面加紧包围圈，日方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战斗极其惨烈。日方自岳阳方面继续调重兵南下，至17日，除已在大云山地区的第六、四十师团外，第三、四两个师团也先后抵达新墙河北岸，完成攻击准备；日军还通过舰船穿越洞庭湖向南逼近。中方根据敌方兵力集结的情报，判断日军将有更大规模的南

犯行动，遂令昌水以北各部队陆续向昌水南岸转移。

9月18日晨，日军四个师团，并配以两翼的两个支队，同时多处强渡新墙河及昌水，从而挑起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主力战。

日军凭借着占优势的火炮、战车和空中火力，甚至使用毒气弹，分别向杉木桥、潼溪街、四六方、缪家渡、港口、杨林街等阵地发动攻击，中方第五十九、六十、一〇二各师等第一线防守部队奋起应战，但伤亡较大。经数小时激战，日军突破数处中方阵地，大股日军从潼溪街南侵至长湖、百羊冲一线，受到中方第九十师守军的阻击。另外，中方第四军各师主力撤至长湖、王复泰、胡少保一线的预备阵地，阻敌南进；第五十八军向杨林街侧击日军；第五十九师则转移至石塘、朱公桥以南山地，向西侧击敌军。由于双方兵力差距较大，至18日傍晚，长湖、王复泰、百羊冲等阵地均被突破，新墙河以西更是被日军长驱直入，洞庭湖畔至长岳公路，已完全为日军所控制。至19日晚，日军第四十师团尚与中方第五十九、六十、九十各师对峙，被阻遏于刘家冲、杨家港一带；而日军第四、三、六各师团已分别进达汨水北岸之石头铺、兰市河、长乐街各处，其中第六师团一部已渡过汨水，进犯至颜家铺、浯口一带。

与此同时，根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9月20日拂晓起，第二十七集团军各部在汨水以北侧击敌军，以延缓其南进。第四军以及所附之第六十师，经王家坊、杨家港，向长乐街方向进击。至26日，第九十师收复了浯口，第五十九师攻抵汨水北岸，第一〇二师挺进到新屋内、菖蒲源；第六十师推进达东港。第五十八军经王复泰、大荆街向归义方向进击，于26日达河源坝、哲阳桥一线，控制长岳公路。第二十军（欠暂编第五十四师）经关王桥、渡头桥向新市方向进攻，26日在长乐街附近与日军相持。在近一周内，第二十七集团军各部从各个方向对南进之敌进行攻击，且尽可能地破坏敌军必经之交通道路，成功地达到了迟滞日军之任务，毙伤日军千余名。遂即除第五十八军留置汨水以北之外，主力则渡汨水南下，加入对日军第四、

三、六各师团的攻击作战。

汨水南岸的战事要比北岸更为激烈。9月20日，日军第四、三、六师团及早渊支队，分别从洛公桥、新市、伍公市、磨刀滩、浯口等处南渡汨水。在多处突破中方前沿阵地后，于22日起向中方主阵地发起猛烈之攻击。日军第四师团从下武昌、神鼎山方向，突破第九十九师和第九十五师的结合部，第三师团则由浯口经双江口向第一四〇师右翼包抄。至23日，日军这两个师团的主力已分别南进到了麻峰嘴、新开市，对中方第三十七军形成钳形围攻之势。日军第六师团一部自浯口直接南下，抵达南阳庙、张家祠后，继续南侵，其主力则由浯口向雍瓦江北侧挺进，与经张家坡南渡汨水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会合后，试图围歼中方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和二十六军分别进行了顽强抵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自长沙北上的第十军迅速策应第三十七军。9月23日起，第十军第一九〇师、第十预备师分别在黄泥冲、白杉桥、花门楼、金井一带，与日军第三、第六师团所部激战。第十军第三师则在栗桥、茅根坝、铜盆寺等处与敌第四师团一部及早渊支队苦战。在上述战斗中，第十军各部牺牲较大，其中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负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正是在第十军的殊死应接下，第三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主力得以在9月25日夜突围，分别向麻林市以西和蒲塘东南转进。而第十军第三师和第十预备师转向日军侧后部进袭，在安沙、新桥等处与敌交战，然后奉命转移至敌后进行休整。

至9月26日，日军已南进至安沙、麻林市、路口余田、沙市街等地，并继续向捞刀河谷进逼。中方也向这一地区作了相应部署，包括第九十九军、从赣北赶赴前来的第七十二军和第七十四军；另外第六战区之第七十九军和第七战区的暂编第二军亦前来增援。其中第七十七军立即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激战。该军第五十八师于9月27日晨向麻林市、大坝桥一带日军出击，结果右翼和左翼分别遭到敌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一部的反攻，双方伤亡均重。此后第五十八师在春华山、东林寺、永安市一带同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激战，并遭日军飞机的攻击，

伤亡甚重。第五十一师则在大桥、易家冲之线与日第六师团交战。与此同时，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七和九十五师同日军第四师团主力和早渊支队苦战，亦无法增援第七十七军。

正当双方在捞刀河谷激战之际，日军第四师团一部突破中方的阻击，沿白沙河两侧迅速推进。中方最高军事当局鉴于日军攻势已受到中方逐次阻遏，伤亡颇大，且供给愈益困难，认为是对敌进行反击和截击的时机，遂向第九战区下达攻击命令，粉碎日军占领长沙之企图。当时蒋介石非常重视战事进展："湘北战局关系较大，故朝夕与前方电话指示，实等于前线之指挥。"(100)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即令自常德、沣县赶抵的第七十九军加强捞刀河一线，以保卫长沙之外围，同时向其他各军下达反击作战令。

9月26日傍晚，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在长沙东北侧石子铺阵地的守军，与进犯的日军早渊支队先头部队遭遇，打响长沙郊区之战。27日晨起，第九十八师主力在三窑堂、白茅铺与早渊支队主力激战。当晚，日军借助空中火力支援，突破中方防线而南渡浏阳河，逼近长沙市东郊。第九十八师则奉令进至捞刀河以北霞凝港至罗汉庄一带，截断日军之退路。而由株洲赶抵长沙东郊左家塘附近的暂编第二军第八师第一旅，即迎击占优势的日军，战事颇为激烈。至28日凌晨，该旅与九十八师主力会合后，在跳马涧、新桥、石桥一带阻击日军。当日，日军早渊支队主力突破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三团阵地，自东北部进入长沙市区。29日，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率先自岳麓山横渡湘江，向长沙市内日军发起进攻，当日傍晚占领长沙西、北门及南门一带的街市。10月1日，第九十八师在炮火支援下，向南正街及浏阳门一带日军进攻。在中方军队的内外夹击下，长沙市内的日军开始撤出长沙。在长沙市郊和城内之战斗中，中方部队歼灭日军约2000余名，击毙日军第一一六联队的第一大队长川崎进少佐和第二大队长横泽三郎大佐。中方部队伤亡亦达2400余人，其中官佐125员。

自10月1日傍晚起，处于不利态势的日军分三路向北撤退。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即颁令："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迟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101] 第九战区除第七十九军固守长沙之外，其余各部如第七十四、十、三十七、九十九各军开始了对日军的追击作战。10月7日，中国军队主力已经北渡汨水，8日再越新墙河，沿途截击敌军。

第二十六军方面，在奉令清扫捞刀河两岸战场后，于3日起经高桥、金井及蒲塘东侧追击日军，6日追抵长乐街，并清扫战场。

第七十二军则实行超越追击，4日抵达梅仙市，6日抵达杨林街西侧，在大松岭附近击退日军掩护部队，继续取道黄岸市北追。10日，该军又在忠防向日军占领之阵地发起进攻。

第四军及所附之第六十师于2日起截击向金井以北地区败退之日军第四十师团。4日，第四十师团又改往麻峰嘴以北退走，第四军遂向汨水以北追击，于10月6日收复长乐街、关王桥等处。

10月2日开始，第二十军开始截击自福临铺取道麻峰嘴北退之敌第六师团，6日从新市、伍公市附近北渡汨水，7日协同第四军击溃长湖附近的日军掩护部队，然后追至下高桥附近。

第五十八军亦于2日起从平江加入北进追击，于4日在关王桥附近截击败退之日军。次日，第五十八军向大荆街日军发起攻击，复于8日越方山洞追至桃林附近。

湘阴县城是日军北退途中之要冲，中方先由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团占守。10月1日至3日，该部连续击退日平野支队的进攻。4日，日军荒木支队加入对湘阴的夹击，并攻陷该城。中方第九十九师主力部队奋起反击，于6日收复湘阴。此后，平野支队会同自长沙北撤之早渊支队，从营田乘舟艇退逸。日军荒木支队则尾随第四师团，经归义

向新墙方向溃退。7日，第九十九师主力追至归义，清扫汨水两岸之战场。

至10月9日，湘北方面的日军已全部北渡新墙河，退占其战前之阵地。中方局部攻击已无进展，双方恢复对峙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

除湘北主战场外，根据第九战区的统一部署，9月中旬起，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二军曾向原日军第四十师团据守的鄂南通山、南林桥等地发动进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主力向鄂南咸宁第四十师团一部发起进攻，余部向崇阳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发动进袭。在日军主力从长沙地区溃退之际，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对蒲圻、咸宁之间的交通通讯设施加以破坏，截击北退之日军。另外，中方第七十八军之新编第十三师和第十九集团军的新编第十二师等部队，也在赣北武宁和高安方面，与日军进行了作战。

就在湘北主战场激战之时，第六战区也遵令进行策应作战，集中兵力反攻宜昌，试图迫使日军从湘北撤兵回援，缓解第九战区的作战压力。10月1日，日军从长沙撤退后，即回援宜昌。次日，中方第六战区部队经过激战攻入宜昌城郊。至10日凌晨，中国部队突入宜昌城。日军守城部队在战机20余架的支援下，频频施放毒气，致使中方部队伤亡甚重，被迫撤出城外。此后，第六战区部队又开始对宜昌城发起最后攻击，然而由于日军负隅顽抗，加之城外回援之日军到达，中方部队被迫于11日晚冒雨撤出宜昌。中方攻势功败垂成。

为协助陆军作战，中国空军第一、第二大队于9月下旬曾先后出动SB-3型飞机共31架次，对洞庭湖之日军舰艇以及长沙以北的日军实行轰炸[(102)]。中国海军也出动布雷部队，在新墙河、汨罗江、湘江、沅江等水道布雷，阻遏日军之进退，对战局进展不无助益。

据第九战区统计，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死20830名、伤31991

名，共计52821名；中方参战官兵302640人，死23858名、伤35220名，共59078名，此外失踪11954名；中方第十、二十六、三十七等三个师被击破，四个师伤亡在30％以上[(103)]。日军瓦解中国军队抗战意图，摧毁第九战区战斗力的作战目的，最终没有得逞。日方以15万兵力，企图占领长沙，炫耀武力，配合侵华之政略目的和南进战略目标，结果不仅长沙、株洲等地占而旋失，而且损兵折将。诚如日本军事家冈泷雄所作的客观评论："长沙之役，日本不仅将珍贵之兵力浪费在非常重要的战线上，而且进攻不成，反使华军有机炫耀胜利，这是一次最愚蠢的作战。"[(104)]

整体来看，从1938年底进入相持阶段到1941年秋近三年时间里，正面战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对后方的大肆轰炸，中国军事装备的先进性和必要补给，都有极大的困难。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就是在极其有限的外来补给情况下，依照比战略防御阶段更为积极的指导方针，在华中与华北地区连续开展了一系列主要战役。这些战役基本上都是日军发起的，中国军队基本上属于防御的一方。其中某些战役中方还遭遇较大的挫折，如南昌战役最终日军攻占南昌而中方反攻收复失利，中条山战役中方主力最终被迫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而转入敌后游击。但是，中国军队已经能够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从实际战况出发，不分前方后方，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袭击，运用侧击、尾击、诱敌深入加以围歼等战法，使敌无时无地不在发生战斗，遭到重创。不仅粉碎了日军利用占领地域"以战养战"的企图，且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无法自由运用。中国军队正在以持久抗战的努力与威力，迎接与盟军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局面的到来。

---

(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56-357页。

(2) 《蒋委员长对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5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27-130页。

(3) 《蒋委员长对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38-149页。

(4) 《蒋委员长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58-162页。

(5) 《蒋委员长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71-176页。

(6) 《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1939年1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659页。

(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568页。

(8)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47页。

(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51-256页。

(10) 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5年版，第25-26页。

(1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4-116页。

(12) 《罗卓英密电》（1939年3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41页。

(1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32页。

(14) 《蒋介石关于三九战区作战地境及南昌附近作战部署密电稿》（1939年3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49页。

(15) 《蒋介石令宋肯堂部死守南昌待援密电稿》（1939年3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51页。

(16)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58页。

(17) 《中央日报》，1939年3月31日。

(18)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

手稿影印件。

(20) 《攻略南昌计划》（1939年4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57页。

(2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册，第340页。

(22) 《罗卓英限期攻克南昌命令》（1939年4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70页。

(23) 《白崇禧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陈诚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5月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866-867页。

(2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35页；《罗卓英报告陈安宝军长督战阵亡等情密电》（1939年5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76页。

(25) 《顾祝同报告反攻南昌作战战斗结果密电》（1939年5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81页。另外，蒋介石在5月7日的日记中也写到："反攻南昌失利，未知损失程度如何。"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5页。

(2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7页。

(2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82页。

(2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5-126页。

(30) 《李宗仁关于日军向鄂中鄂北大举集结企图蠢动密电》（1939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88-189页。

(31) 《李宗仁密电》（1939年5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93页。

(32) 《李宗仁密电》（1939年5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95页。《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5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890页。

(33) 《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5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98页。

(34) 《蒋介石致孙连仲电》（193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27页。

(35)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329页。

(3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39-40页。

(3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3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页。

(39) 《蒋介石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示敌情电》（1940年3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53页。

(40)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91页。《军委会拟定第五战区襄东部队作战指导方案》（194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85页。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111页。

(42) 《蒋介石致李宗仁电》（1940年5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71页。

(43)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390-391页；《第三十三集团军枣宜地区战斗详报》（1940年5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97页。

(44) 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5) 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44页。

(47) 容鉴光：《长沙三次会战》，台北“国史馆”1990年印行，第28页。

(48) 《长沙三次会战》，第29页。

(49) 《蒋介石致薛岳陈诚电稿》（1939年4月1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79页。

(50)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577页。

(5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71页。

(52) 《长沙三次会战》，第36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69页。

(53) 《罗卓英报告所部在上富镇甘坊等地战况及作战部署密电》（1939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56-458页。

(54)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64页。

(55) 《关麟徵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114页；《第十五集团军长沙会战战斗要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63页。

(56) 《长沙三次会战》，第120页。

(57) 《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1947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842-1843页。

(58) 《关麟徵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10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122页。

(59) 《长沙三次会战》，第158-160页。据日方资料，称中方阵亡4.4万余人，被俘4000人；日方阵亡850人，伤2700人。冈村宁次：《第十一军作战经过之概要及所见》，《华中华南作战》第612-613页。

(60) 《长沙三次会战》，第143页。

(61) 关于第一次长沙战役日军主动撤兵的基本原因，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其在战略上遵奉大本营指令，准备利用欧战之机南进发动太平洋之役，故在中国战场收缩战线；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日军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难有决胜的把握，不得不做出撤军的选择。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23页。

(62)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复制件。

(6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6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42页。

(65)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79页。

(66) 《蒋介石下达冬季攻势命令》（1939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667页。

(67) 《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1939年11月-1940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91-1192页。

(68)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1939年11月2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915页。

(69)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1939年11月2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915页。

(70) 《第四战区关于南宁各役战斗经过概要》（1939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50页。

(7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296-297页。

(72) 《蒋介石严令各部努力进攻达成任务手令电稿》（1939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43页。

(73) 《白崇禧致何应钦密代电》（1940年1月2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944页。《白崇禧关于昆仑关龙州等役战斗经过概要代电》（1940年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45-246页。

(74)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5) 《蒋委员长对柳州军事会议开幕训词》（1940年2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205页。

(76) 《通电公布处罚桂南作战不力将领》（1940年2月2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别录》第212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0年1月—6月）》，第249-250页。

(7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22页。

(78) 《抗日战史》（第六册）《华中地区作战》（下），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8年，第3页。

(79) 《抗日战史》（第六册）《华中地区作战》（下），第5页。

(8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22—124页。

(81) 《蒋介石致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示制敌之法电》（1941年1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92—493页。

(82)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石觉先生访问记录》，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1年1—6月）》，第120页。石觉，豫南会战时为第八十五军第四师师长。

(83)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呈豫东敌情及部署电》（1941年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93—494页。

(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502页；《抗日战史》（第六册）《华中地区作战》（下），第34页。

(85) 郭如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020页。

(8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33页。

(8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24页。

(88) 《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及陈述意见书》（1941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10页。

(89) 《蒋介石为检讨晋南作战经验教训电》（1941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05页。

(9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425页。

(91)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5月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69页。

(92) 蒋介石在1941年6月30日之“本月反省录”中写有：“此次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此应由卫立煌不学无术处置疏忽之所致。”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

件。

(9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29页。

(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139-141页。

(9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01页。

(9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59页。

(97) 《军令部拟订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军事部署》（1941年9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90-491页。

(98)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1941年9月6日-10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130页。

(99) 以下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基本过程的叙述，系综合参考《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长沙三次会战》、《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等著作的相关部分。

(100) 蒋介石日记1941年9月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1) 《长沙三次会战》，第275页。

(102) 《长沙三次会战》，第283页。

(103) 《长沙三次会战》，第302—317页。据日第十一军司令部1941年11月15日发表的数字，日军死5670名，伤5180名，失踪14人；中方参战50万人，“遗弃尸体54000具，俘虏4300名”。

(104) 《长沙三次会战》，第290页。

第七章　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

战略相持阶段期间，国民政府留置敌后的部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相互协作，积极开展游击战，对日军占领区不断袭扰，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日作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其政策逐步由“联共抗日”转向“排共反共”，国民党军留在敌后的部队频频制造反共磨擦[(1)]。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不断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开辟出十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游击作战区。至1938年10月，八路军兵力已发展到15万至16万余人，新四军也已发展到2.5万人[(2)]，成为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

第一节　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和八路军的反扫荡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侵华方针开始发生转变。战争之初，日军凭恃其强大武力，采取了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决战方针。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日本当局更是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妄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然而武汉一战，日军的战略进攻能力达到极致，其速决战的企图也归于失败。战后，日本被迫改变其原有的侵略方针，采取以政略为主、军事为辅的新方针。1938年11月1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陆军省与参谋部联合制定《促使抗日政权屈服直至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作了详细规定，其首要一

条即是“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3]。与新“政略”相对应，日本的军事战略也很快做出调整。日本大本营决定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已占领地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军事战略各要点做了阐述。该文件特别指出，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要把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包括河北省北部、包头以东之蒙疆、山西省正太线以北地区、山东省胶济沿线地区、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相比之下，正面战场的兵力配备则“限制在最少限度内”[4]。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重新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提出如下方针：“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5]为此，日军开始调整部署，实行对占领地的持久保守作战。日军不断进行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常设师团和特设师团遣返回国休整，同时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制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归国部队。1939年底，日军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以上部队分属4个战略集团，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第十一军配置于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负责对中国军队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第十三军配置于长江下游的华中地区，下辖4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负责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第二十一军配置于华南，下辖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华北方面军的兵力最为雄厚，辖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稳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此后，其后方的作战活动也日趋频繁。

1939年开始，日军一改战争初期奉行的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方针，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逐渐转向敌后战场，集中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1月起，日军便已陆续增兵华北：11月从华中、华南抽调3个师团；1939年1月再调出5个旅团；4月又从关外、国内调来4个师团，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至此，华北方面共拥有15个师团、9个旅团、1个骑兵旅团。从1939年1月至1940年9月，进行了五期“治安肃正讨伐”战，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大扫荡”[(6)]。

针对华中、华北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军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由此成为侵华日军正面战场作战外的又一主要作战方式。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三期“治安肃正”计划，以武力为中心进行“讨伐肃正”，巩固点和线，更重要的是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7)]。第一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1月至5月，此间日军在山西省南北、苏北等地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消灭占领地区的中方部队；第二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6月至当年9月，先后经历鲁西、鲁南和晋东三次作战；第三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日军针对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起的“冬季攻势”，一面进行冬季反击作战，同时又对潞安周围和太行山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扫荡”。

1940年12月26日，日本大本营又确定当前对华作战纲要，决定彻底肃正华北治安，进行航空进攻战，集中实施对华作战谋略，强化封锁及扶植作为治安警察力量的中国武装团体。1941年1月，日军又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与《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对华战争八条原则，决定在长期持久战争的前提下，“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据地区和

返回原驻地为原则”[8]。同时，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41年肃正建设计划，其中包括重点事项12条。该计划指出，“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同时，计划还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9]。兵力部署方面，日军一改以往分散部署的原则，实行集中部署。此外，该肃正计划还对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建设、伪军任务及训练、农村自治自卫、示范占领区工作目标、新民会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为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区的抗日力量，日军自1941年春季至1942年底，连续对华北地区发动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企图在华北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1941年夏，华北方面军又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未来三年逐年应达到之治安指标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日军在华北划分治安区（日伪占领区）、准治安区（抗日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并采取不同的“治安肃正”手段。在治安区，日军利用伪行政机构代行管理，由伪警力量担任治安工作；在准治安区，日军部署固定兵力，在其指导和支援下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安团等，以图控制地方行政，同时加强搜索和“扫荡”抗日力量，扼制其活动；对于未治安区，日军则不断对其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实行“三光”政策，使中共的抗战力量不能建设，或不能重建。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区转变。为保障治安区和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还在治安区和准治安区的交界处及重要交通线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和碉堡据点。在华中地区，日本通过利用和操纵汪伪政权，推行“清乡”。日军通过与伪军、伪政权的力量结合，以及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手段相结合，将占领区划分为若干片，以日军为主力并在伪军的配合协助之下，对各区域的抗日武装实施军事打击。

针对日军的残酷围攻与“扫荡”，八路军各部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晋冀豫、晋察冀、冀鲁豫、晋西北等地区取得了英勇惊人的战绩。

1939年6月起，日军调集十数万兵力对晋冀豫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打通白晋公路及黎城至临汾的公路。八路军所部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一部坚决展开反击，将日军在作战初期占领的辽县、武乡、榆社、襄垣、晋城、高平等城全部夺回，并毙伤敌军万余人。同时，八路军将白晋路、武涉路、平昔路、昔和路、高赞路等公路及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道清路等铁路悉数加以袭击破坏，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交通困难。5月初，八路军大破白晋铁路之太谷-襄垣段，经与日军两日三夜的激战，击毙敌军8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炸毁车站3所、火车3列、大小桥梁30余座，焚毁西药一库、汽油一库、子弹百万余发，挖毁铁路总长80余里，运回铁轨千余条 (10) 。

在晋察冀边区，日军亦从1939年9月起连续不断地进行残酷“扫荡”。晋察冀边区部队和八路军一二〇师一部坚决予以还击。9月25日至30日，日军2000余人猛犯陈庄，经过六天五夜苦战，八路军终将敌人全部击溃，毙敌千余之众，击毙日军旅团长水原，缴获枪炮、弹药及辎重甚多。10月25日起，日军出动2万余人，兵分12路向边区大举进攻，发动所谓的“冬季扫荡”。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亲率所部与敌激战43天，经历大小战斗108次，击毙日军官兵4000余人，俘虏日兵13名，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各种炮6门，电台4架及其他弹药辎重无数 (11) 。在黄土岭战斗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八路军击毙 (12) 。日军的“冬季扫荡”也最终为八路军粉碎。与此同时，八路军还针对日军“筑堡修路”的做法，展开大破路运动，给予日军运输以沉重打击。

山东方面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及山东纵队所部，于1938年7月底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地区的大举围攻，毙敌达4000余人。8月2日，一一五师一个营即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全部枪炮弹药，取得

梁山大捷。1939年1月底，日军大举进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及决死纵队奋起抵抗，经过战斗30余次，毙敌1100余人，俘虏日军200余名，日军企图宣告破产。当年3月，平西方面的八路军挺进军又一举粉碎日军7000余人的“春季扫荡”，毙敌2000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在冀中地区，八路军部队与当地抗日民众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自1939年春天至当年5月，先后与日军作战200余次，毙敌五六千人。日军多次的疯狂“扫荡”不仅毫无所得，反而徒增消耗与损失。

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这一年时间中，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000余次，伤毙敌军6万余人（其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内的特级官长6名、联队长9名、大队长9名、旅团参谋长1名，中队长以下官长若干名）、伪军2万余人，俘虏日军百余人、伪军15000余人，缴获各种炮110余门、轻重机枪720余挺、步枪38000余支、步枪枪弹900余万发、手榴弹万余颗、瓦斯弹200余箱，毁敌汽车1200余辆、装甲坦克70余辆、各种炮50余门，收回电线20余万斤，破坏铁路5000余里、公路5万余里，缴获其他军用品及辎重无数[(13)]。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迫使日军的“治安肃正”计划归于破产，“筑堡修路”的企图亦未实现。八路军的行动巩固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有力牵制了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第二节　百团大战

1940年秋，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所部共105个团，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以破袭敌占正太铁路及沿线据点为重点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史称“百团大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至1940年夏天，德军已相继攻占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英国也被迫退出了欧洲大陆。在

这一国际形势下，侵华日军一面继续对正面战场施加压力，在封锁中国滇缅国际交通线及闽浙沿海各港口的同时，发动随枣、枣宜战役，占领宜昌，并对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猛烈轰炸，试图用持续的军事攻势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另外，在华北占领区，日军加紧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封锁、隔断中共的敌后根据地，使得华北抗日游击战处境颇为困难。

鉴于国内外形势极为不利且华北敌后战场敌情严重，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发出战役预备命令，该命令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击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乘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要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参战的总兵力方面，预备命令要求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一二〇师直接参加这次战役的兵力为22至24个团，另有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命令要求各参战部队须于8月10日前完成战役的准备工作[(14)]。

在各参战部队遵令完成相应准备的基础上，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区分的命令，对参战兵力作出如下部署：（1）由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东至石家庄段的正太线，破坏重点在娘子关平定段；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

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2）第一二九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至榆次段的正太线，破坏重点在阳泉至张净镇段。（3）第一二〇师则派4至6个团破击平遥以北同蒲线及汾阳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至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限8月20日开始战斗[15]。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共9个师团、12个步兵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集团，共计25万人。华北地区另有伪军约15万人。

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重点在于摧毁正太铁路，进行交通总破袭战。8月20日晚，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部队、第一二九师、第一二〇师等部同时发起进攻。

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向正太路东段的车站、据点及矿区等，展开全面攻袭。8月20日深夜，中央纵队第三团攻入井陉煤矿新矿，与守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之一部激战，至次日下午消灭全部守敌，占领全矿，彻底破坏矿上机器设备。第三团另一部同时进攻岗头、老矿，一度占领三个堡垒，与反扑之敌军激战一昼夜；21日夜第二团一部也加入了增援作战，予敌重创后方退出。第三团还攻克了南正敌据点，破坏了南正至微水间铁路，收回电线2000余斤；破坏了井陉、凤山间公路和电话线；还向庄旺、凤山矿敌军发动了进攻[16]。第二团一部进攻蔡庄堡垒，击退拥有铁甲车之敌军，占领了蔡庄，并进击雪花山敌军；第二团另一部攻占了乏驴岭铁桥之堡垒，炸毁铁桥一段，与反攻之敌军竟夜激战后撤出；该团一部还破坏了井陉以西铁路一段。第十六团20日晚攻入北峪，歼灭大部守敌，破坏了北峪石桥；21日和22日第十六团和第二团一部，在北峪车站以北山地与敌军激战。第十六团另一部20日夜进攻南峪和地都两据点，在南峪北高地与敌军展开遭遇战，击败敌军后，一部占领地都，另一部向南峪守敌猛攻，歼敌大部。上述战斗打响后，中央纵队之工兵部队

将南峪、地都间的铁路、桥梁破坏多处[17]。右纵队第五团自8月20日午夜起向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发动猛攻，消灭大部分守敌，破坏娘子关以东之桥梁，收回电线千余斤。次日又在磨河滩与敌援军激战并一度占领该处，至22日晚与优势敌军几度攻防激战，后撤出。第五团另一部向程家陇底发起进攻，一度攻入该车站，与日本援军反复争夺，重创日军后退出。第十九团一部于8月20日晚攻入巨城后，数次向守敌堡垒发起冲锋，激战至次日撤出。21日晚第十九团另一部还曾攻入移穰车站，重创守敌后撤出[18]。左纵队也于20日晚起分别数度进攻岩峰、上安等据点，与守军及敌援军激战，破坏相关之铁路线和通讯电线[19]。

第一二九师主力发起破袭正太路西段的战斗之后，以左、右两翼向正太路阳泉至太谷段以及平定至辽县间公路，发起重点进攻。8月20日晚，第十六团在攻克芦家庄车站的战斗中，仅30分钟便攻下车站南北共四座敌军堡垒，消灭大部守敌，炸毁了芦家庄至段廷间铁路；次日复与车站守敌及大量援敌激战。第三十八团向上湖日军发起猛攻，至21日晚先后消灭上湖车站全部守敌并占领了车站东南部的堡垒。第二十五团于20日夜向马首车站发起攻击，迅速占领车站左、右侧之碉堡，并于21日击溃顽强抵抗之敌军，最终占领该车站。第二十八团20日晚起同时进攻狼峪、张净、芹泉，与守敌展开激战，至23日终于攻下了狼峪、张净两车站，消灭大部分守敌，芹泉未能攻克。第三十团一部从8月20日夜开始进攻桑掌，经过一个半小时数度冲锋，终于攻占该处，消灭大部守敌，彻底破坏该处之大桥。第三十团另一部于20日夜进攻燕子沟，与守敌及自阳泉赶来之敌援军数度激战，直到次日终将敌军歼灭，占领该据点，炸毁该处两座铁桥。该团另一部于21日夜进攻坡头车站，经过约六小时的激战，全部消灭守敌并占领该车站。另外第一二九师之总预备队为配合主力之破袭战，在大战打响时即强占阳泉以南之狮垴山，阳泉之敌军亦视该处为必争之地，因此至22日双方多次激战，我方始终未失阵地。到了23日和24日，日军大肆施放毒气弹，并出动飞机滥轰我方阵地，但未能攻下狮垴山。

直到25日总预备队接到转为破路之任务，遂主动撤往龙门、上庄、曹庄北垴之线，这样敌军才得以在26日占领该阵地[20]。

第一二〇师承担的作战地区是同蒲路北段，虽然这是整个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但却和转为战役正面的正太路紧相联接，是敌军增援的要道。在8月20日即正太路破袭战打响的同时，第一二〇师向同蒲路北段全线出击，当夜便克复日军在忻县和静乐之间最大的据点康家会，全歼守敌和由静乐前来增援的敌军；同时破坏大同至太原之间的铁路和两侧之公路、电线，攻击敌军之碉堡、车站，特别是攻占了朔宁间要冲阳方口，攻入了五寨等县城[21]。

在八路军的攻势下，日军被迫由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南段调援军参加正太路沿线的作战，反击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一二九师，同蒲路北段及两侧公路地区的日军也对八路军一二〇师展开反击。

根据百团大战展开后敌情的变化，8月27日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在正太线已经取得的战果，遂向有关作战部队发出指示："百团大战对整个战局、改变敌我形势均有极大意义，我在正太沿线能坚持愈久、破坏愈是彻底，可能逼使敌人改变其某些部分之兵力部署，从其他点线上抽调兵力增援正太（线），这给我寻求新的机动的方便，或逼使敌人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对整个太行山根据地之巩固更是有利，能达到此目的便使我军队作战容易取得主动权与操纵战争。否则，百团大战的结果只能断截正太线一时期内之交通，而不得能取得战局形势之改变。""估计各线敌人正向正太线增援，正太线南北各据点敌仍图坚守不放。因此，我各线配合作战兵团应继续积极破袭。"[22] 八路军总部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和行动方针，一面坚持正太路沿线之游击战，同时抽出一部分兵力进行休整。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八路军一二九、一二〇师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连续击退日军多次反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旅与出犯阳泉的日军激战两小时，毙敌甚众。该旅亦伤亡官兵30余人，政治主任卢仁灿在奋战中壮烈殉国。与此同时，第一二九师陈赓旅一部攻击平定西南的日军据点，消

灭守敌70余人。由于日军大量施放毒气，八路军方面亦有连长以下官兵40余人中毒[23]。

至9月10日，晋察冀军区共歼灭日伪军900余人，缴获火炮5门，破坏铁路30余公里、桥梁18座，攻克据点10余个；第一二〇师歼灭日伪军2700余人，俘虏25人；第一二九师摧毁正太铁路平定至太原段三分之二以上，使日军控制下的正太铁路一度陷于瘫痪[24]。至此，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结束。

第一阶段战役结束后，八路军各部经过短暂休整和准备，立即投入第二阶段的作战。第二阶段作战从9月22日至10月10日，八路军针对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继续进行破袭作战，旨在摧毁日军的封锁线。经总部批准，晋察冀军区决定以主力破坏涞源、灵丘间公路，并夺取涞源、灵丘两城；第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作战；第一二〇师则以截断同蒲路北段为目的，以主力击破同蒲路宁武至轩岗段。其他部队配合主力作战。

9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以8个团、3个游击支队组成左、右翼，向涞源城及灵丘地区的敌军据点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第一团夺取涞源城东、西、南关，迫使日军退入城内；第二、三团等袭击三甲村、中庄、东团堡、上庄等据点，歼灭日军一部。由于日军火力过猛且施放毒气，进展不大。23日晚，第一、第二两团在炮兵的掩护下，袭入东团堡和三甲村，全歼日伪军100余人。第三团在大部中毒气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至25日下午，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大队长以下100余人，俘虏1人，缴获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攻克周围据点10余个。28日，由于张家口增援之敌3000余人进抵涞源城，八路军遂放弃攻取该城计划，转移兵力至灵丘、浑源方向，日军于10月1日夺回大部分据点。而八路军则攻占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这时，由大同增援之日军千余人进至浑源并向灵丘急进，10月8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再次向驻灵丘日军发起攻击，至10日，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虏86人，缴获

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290余支、各种子弹4.5万余发。晋察冀军区伤亡1400余人，消耗子弹近9万发[25]。晋察冀军区部队于10月10日结束了涞源、灵丘地区的作战[26]。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9月23日晚发动了榆（社）辽（县）公路线战役。该师以8个团的主力组成左右两个攻击集团，另以3个团向和（顺）辽（县）线破袭。其中左翼攻击集团先后发动四次强攻，对日军据点碉堡实施爆破，于25日最终攻占榆社，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右翼攻击集团进攻管头据点日军，进展不大。28日，该集团以一部兵力攻克石匣，歼敌数十人。至此，八路军一二九师已占领榆辽公路上除管头外的所有日军据点。随后，一二九师以主力部队准备攻击辽县。由于和顺、武乡之日军援兵到达辽县，一二九师随即停止进攻辽县城，改变作战计划，转而积极进攻管头，在开进途中与由武乡出援之敌军600余人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歼敌大部。29日，管头被八路军攻克。次日，鉴于辽县、和顺增援日军已经突破阻击部队阵地，迫近我方主力，第一二九师所部遂撤出战役。榆社城及其他几个据点复被日军占领[27]。

就在涞灵、榆辽战役进行的同时，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在同蒲路忻口、宁武、朔县间开展破击战。至9月27日，一二〇师所部袭击宁武县西南之头马营、忻县北之忻口等据点多处，一度控制朔县至原平间数段铁路，阻断了日军交通。由于日军大量增援，一二〇师根据总部命令，结束了第二阶段战斗[28]。

此外，冀中军区对任丘、河间、大城、肃宁之敌发动进攻，攻克据点20余处，歼灭日伪军1600余人，破坏公路150余公里。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对平汉路元氏至安阳段和德石路进行了大破坏，同时还破坏了白晋路、同蒲路南段及其他一些公路[29]。

经过40多天的连续战斗，八路军各部伤亡减员较大，亟须进行整补。

百团大战推展，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起初颇感“意外”：“中共军对这次奇袭采取了同历来游击战术完全不同的战法，出动了大部队，打的是运动战，所以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中共军所到之处，铁路、桥梁被破坏；日军各地警备队陷于孤军作战，不能相互增援的境地，大部分据点好不容易才将敌击退。”[30] 日军遭受八路军的沉重打击，决定实施报复。10月6日起，日军开始向八路军及晋东南、晋察冀和晋西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八路军各部在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依靠自卫队、民兵和广大群众，展开了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由此进入第三阶段。

10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由辽县附近出发，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则从潞城附近出发，南北策应，向辽县、涉县、潞城、武乡地区实施“扫荡”[31]。日军目标直指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企图消灭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及决死第一纵队给予了顽强的阻击，日军被歼近100人，于17日分路撤退。10月20日，日军再次调集重兵“扫荡”太行山区，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10月27日起，八路军一二九师所部与日军在关家垴和凤垴顶两处同时展开激战。至31日拂晓，八路军歼灭日军400余人。由于日本援军赶到，一二九师遂撤出战斗。11月初，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驻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大陌村南北一线进行防御作战，坚守阵地近一昼夜，待总部机关转移后才撤出。11月14日，第二次反扫荡作战结束。11月17日，日军又调集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对太岳山区进行“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除以地方部队在内线袭击进犯日军外，同时以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组成东、西两个支队，转至外线沁河东西岸地区寻机打击日军，在官滩、胡汉坪、光凹、龙佛寺等地，予敌以沉重打击。日军“扫荡”扑空以后，遂疯狂残害抗日军民。仅沁源一县，被害群众就达5000余人[32]。此后，八路军又屡次反击，重创日军。在八路军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共同打击下，日军被迫于12月5日撤退。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日军曾多次扫荡晋西北地区，但均为八路军部队击退。

日伪军1万余人分十路对平西区进行“扫荡”，重点合击斋堂和三坡地区，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十余处据点。冀热察挺进军在人民群众支援下，苦战半月，歼敌一部，又乘敌向北岳区转移时发动反击，攻占敌据点四处，但由于根据地缩小，斗争更为艰巨。11月9日，日军1.2万人对北岳区进行“扫荡”。21日，日军侵占阜平城，而后“分区清剿”。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游击队、民兵的配合下，内外线相结合，予敌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退出北岳区。

此后，日军抽调晋南、晋东南的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配合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及第二十六师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于12月14日至1941年1月24日，对晋西北地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此次“扫荡”空前残酷，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破坏。八路军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毙伤敌军2500余人，日军在遭受打击后退回原据点。

在反“扫荡”中，冀中、冀南区军民对平汉路和一些公路进行了破击战，切断了敌人的交通，歼灭了部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山区反“扫荡”。由于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密切配合，终于粉碎了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百团大战作战地区涵盖了冀、察两省全境，晋绥之大部分地区和热河南部；涉及的交通线包括临汾以北之同蒲正太线，彰德以北之平汉线，北宁、平古、沧石、德石全线，邯济线之邯聊段，以及相关区域里几乎所有的公路线；另外，在山东、皖东、豫东、苏北等地区还进行了配合性作战。日军方面的参战部队包括第一一〇及第二十五师团全部，第二十六、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各两个联队，第三十五、第三十七师团各一个联队，第一、二、三、四、五、七和第九混成旅团各全部，第十五、第六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此外还有伪治安

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等。其中遭八路军打击最大的为第四、五、十独立混成旅团，基本被全歼；第二、三混成旅团被消灭过半，其余各部日军亦遭到很大伤亡。自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含大队长以上之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内有副大队长山西绥清、中队长田木石野、小队长木岛等8人）、伪军18407人，消灭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各种炮53门、步马枪5437支，轻重机枪224挺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4里及桥梁、车站、隧道多处[(33)]。为此，八路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牺牲伤亡巨大。仅前三个半月的作战，八路军伤亡人数就达1.7万人。决死队第三纵队政委董天知在战斗中牺牲，另有2万余人中毒[(34)]。百团大战作为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的一场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给予了华北日军沉重打击，军事和政治意义巨大。战斗不但消灭了大量敌军，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总的来看，百团大战使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大大提高，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也因此得以增强；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正面战场遭受到的日本的压力，有助于遏制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的暗流。与此同时，百团大战也震惊了侵华日军，促使其发动更大规模的报复性作战，这为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增加了困难。

第三节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过去15个月的抗战经验，在分析抗战形势的基础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途，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责任。此次会议还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1938年1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其中关于在

华中的指导要领为："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35] 当年底，华中地区重新部署之后的日军计有2个军，11个师团，6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在新四军周围的南京、镇江、常州、芜湖、泰县、高邮等地驻有第十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另有大批的伪军[36]。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2月亲自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即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3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要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根据全国在新阶段的任务，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的情况，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37] 为打开皖东地区的抗战局面，加强和统一江北地区部队的领导工作，新四军军长叶挺于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精神，亲赴庐江组织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38]。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张云逸于11月率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并将庐江和无为地区的中共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不久，江北指挥部对江北的新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同时，在原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基础上成立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下辖第八、第十和第十五团。此外，指挥部还充实和加强了江北游击纵队。经过整编后，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分别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则以一部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扩大武装力量，同时保持与皖南的交通

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战。

新四军在皖东地区的战略展开，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严重不安，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的“摩擦”有所加剧。1940年5月1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附伪军一部共计3000余人，对津浦路西的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并于14日占领定远县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与日军激战竟日，将敌击退，毙伤日伪军百余人。5月27日，定远日伪军400余人袭击藕塘，29日在老人仓遭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四团的阻击，损失颇重，被迫回撤。6月初，驻滁县的日伪军出动千余人侵占周家岗、全椒一线，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新四军第四支队英勇出击，击退日伪军。另外，5月下旬日伪军2000余人向津浦路以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攻占了津里、来安等地，图谋进行抢粮。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十团各一部于5月29日突袭来安城，重创守敌；第八团另一部设伏于来安至滁县公路，截击了从滁县出动的敌援军。另外，第五支队在津浦路南段连续展开破袭战，破日伪军据点多处，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8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抗日游击区。当月，新四军第四、第五两支队又联合击退国民党顽军及封建刀会组织的武装进犯，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淮宝办事处。

由于1940年夏季的多次“扫荡”收效甚微，从当年8月下旬起，日军分别从苏南、苏中调集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和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加上在淮南的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共计7000余人，加上从扬州、蚌埠调集的伪军，共万余兵力，计划实施在运河、淮河和长江之间地区的“三河作战”，对新四军开辟的津浦路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路东部队主力及指挥机关。9月初，来安、天长、六合、高邮、明光、五河、张八岭等据点的日伪军一起出动，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围歼新四军主力，摧毁路东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五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

十四团，第五支队第八团，加上路东的4个独立团，总共7个团的兵力，自9月5日起展开了反扫荡作战。9月7日，第四支队第十四团伏击开赴竹镇的日军，歼敌20余人，击毙敌指挥官1名[39]。11日，日伪军千余人分三路进犯涧溪，在白沙王被独立第三团击溃。由竹镇向张山集进犯之日伪军700余人亦被独立第一团击溃。进犯新集的敌军则被第八团击溃。第七团则在崔子岗阻击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予敌以重创。新四军的反扫荡作战历时12天，进行大小战斗65次，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比新四军方面的伤亡多一倍以上[40]。日伪军各部均不断遭到打击，扫荡计划连连受挫，围歼新四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破产，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其余被迫撤返原防。这样，皖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

在创建、巩固皖东根据地的同时，新四军所部还在鄂豫边区积极开展工作，创立根据地。早在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即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成立留守处。其中，竹沟镇成为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1938年秋冬，武汉及周边地区沦陷。11月，中共豫南特委将竹沟镇留守处的一个分队与信阳、泌阳等地的游击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迅即投入四望山的游击作战。同时，中共鄂东特委也以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排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派，率部分干部自延安抵达竹沟镇，领导鄂豫边区新四军的敌后游击工作。是时，竹沟镇留守处的两个排已经改组成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该大队遂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开展敌后游击战。6月中旬，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与信阳挺进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下辖4个团。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鄂东、鄂中等地区的游击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1940年1月，挺进支队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立即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冬季攻势作战。挺进纵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鄂中动员群众破坏汉（口）宜

（昌）、襄（阳）花（园）、宋（河）应（山）等公路，并在安陆至花园间的公路上伏击日军第三十九师团车队和骑兵，歼敌近百人。另在京山石板河以南截击日军第十三师团约500人，在云梦以南的长江埠歼灭伪军一部[41]。在豫南地区，信阳罗山边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日军第三师团一部进攻，鄂豫皖挺进纵队一部主动前往接应增援，在灵山冲一带与日军进行激战，并将敌击退。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挺进纵队还在大、小悟山地区与国民党顽军展开坚决斗争，并最终控制了该地区，逐步开展了根据地建设工作。同年5月，日军进攻鄂西北，一度攻占襄阳、宜昌，枣宜会战爆发。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友军作战，牵制日军西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对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礼山等20多处的日军据点展开了袭击，破坏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间的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42]。总之，自1939年春到1940年7月，豫鄂挺进纵队（包括其前身）共进行大小战斗281次，毙伤日军2490名，毙伤伪军7100余名；缴获大小炮11门，重机枪34挺，轻机枪106挺，步马枪5774支，手枪驳壳枪170支，掷弹筒32个，手榴620个，子弹813900余发；破坏公路1870里、大小桥梁192座，砍电线杆3000根，收电线17000斤，破坏铁路120段，大小铁桥5座[43]。7月至10月，新四军所部进行三次保卫战，积极发展鄂豫边区根据地。襄河以西、长江以北的荆门、当阳、远安、南漳、保康等县，以及宜城、江陵、宜昌、枝江、宜都、钟祥等县的部分先后被纳入边区的范围。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的范围已扩大至十几个县，部队规模也不断壮大，共有游击兵团1.5万余人，民兵约10万人[44]。

1939年春，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不断东进，继续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5月初，游击支队以主力进军淮上地区，同时以一部坚持永城、夏邑、萧县、宿县等地的斗争。9月初，支队主力回师新兴集地区进行整训，另一部则分散游击，同时掩护地方工作。1939年年底，新四军游击支队发展壮大到9个团共1.2万余人，同时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全

军“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新四军第六支队随即抽调大批干部至永城、夏邑、肖县、宿县、亳县等地充实抗日民主政权，同时派出4个主力团向北展开，开辟商丘、亳县、宁陵、夏邑和砀南游击区。3月中旬与4月初，第六支队连续粉碎日军的两次“扫荡”，保卫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此后，第六支队各部仍不断出击作战。4月17日，第六支队火烧宿县临涣集外围据点炮楼三座。28日又破击铁路，在黄口车站以西颠覆敌火车一列[45]。5月11日至13日，第六支队夜袭睢县平岗，追歼睢县日军警备司令以下150余人。5月下旬，八路军第二纵队（含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主力）根据总部指示，在黄克诚的率领下由冀鲁豫南下，于6月20日到达安徽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6月底，八路军第三四四旅与新四军第六支队（除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3个旅9个团共1.7万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继续在豫皖苏地区执行防御任务。8月，八路军新编第二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9个团近2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东进苏北的任务[46]。

苏皖边区方面，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屡次制造反共摩擦，同时，日伪军也频繁进行“扫荡”。为打破日军的分割与封锁，粉碎其“扫荡”，新四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先后在水阳、横山、官陡门、东湾、延陵、云台山等地发动攻击，予敌重创。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阳县游击纵队的配合下，冲破国民党军的限制，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于1939年4月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的沿江地区。5月，第一支队以第六团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挺进，并与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5月下旬，义勇军部队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数百日军遭遇，经过激战，日军被歼近100人。6月24日，义勇军又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55人与伪军1个中队。随后该军又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击毁敌机4架[47]。此时，由国民党特

务组成的“忠义救国军”5000余人发起挑衅，义勇军被迫予以反击，歼灭其大部。

1939年11月，鉴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活动日趋紧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江南各抗日武装的作战。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负责担任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任务，同时成立新四军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方面在华中地区的反共活动加剧。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陈毅等向北转移。陈毅接到指示后，迅速率部渡江北上，发展苏北。江南指挥部携主力部队渡江后，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由挺进纵队、苏南第二团、新六团及苏皖支队改编），共9个团7000余人。7月下旬，苏北新四军继续东进，于29日占领泰兴的黄桥、古溪、加力等地，歼灭国民党顽军及地方武装2000余人。此后，新四军部队又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的日伪据点，粉碎日伪军两次报复性“扫荡”，最终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留在苏南的新四军部队继续坚持斗争。1940年7月，苏南新四军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江南指挥部，以留置的第四团两个营及各县地方武装编成4个团，共3000人，坚持抗日。为加强无锡江阴与苏太常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于1940年5月进入该地区，并于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由谭震林兼任司令员。此后，东路军又与西路游击队统一会合，共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和国民党顽军势力，配合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1939年新四军在华中战略展开后，其作战区域不断向东向北移动扩大。至1940年夏秋，新四军在八路军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已先后开辟了皖中、皖东、鄂豫边、豫皖苏、苏皖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长

江南北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同时也挫败了国民党顽军的反复进攻，使得各抗日根据地得以保存和巩固。

第四节　华南的抗日游击战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在华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先派张文彬赴广东整顿、加强党组织，后又派廖承志至香港建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决定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参加民众抗日武装[48]。同年10月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决定积极组织群众，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加强统战工作，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将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将其作为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一　东江、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至九龙的铁路纵贯其中。在中共广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东江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日益兴起。1938年7月东莞县国民党社训总队常备壮丁队，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派干部充实加强常备壮丁队，使之成为一支在中共控制下的抗日组织。与此同时，成立中共东莞宝安边工作委员会，领导宝安县及广九铁路沿线各地人民的抗日斗争。9月，中共增城党组织建立了增城县抗日民众自卫团仙村大队和雅瑶大队，各有200人枪。10月，又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队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此外，惠阳县、博罗县也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等民众抗日武装[49]。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和及川支队，分三路在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然后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

猛烈攻击之下，向广州进犯。承担广州和惠宝沿海地区防御的中方第十二集团军的5个师和2个独立旅，未能对来犯之日军组织起有效的阻遏抵抗。10月21日广州失陷，中方军队大部分撤往粤北英德至河源一线。这样，广州周围各县和东江下游地区落入日军铁蹄之下。

自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那一刻起，便受到东江人民奋起抵抗，如10月12日常柏田乡的抗日自卫队在淡水和霞涌一带袭击行进中的日军，14日坝光抗日自卫队袭击了向西乡围进犯的日军。而沿东江向广州开进的日军，也不时遭到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雅瑶常备队和仙村、雅瑶两个自卫大队的截击。与此同时，中共加快组织民众抗日组织的步伐并加强了领导。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起了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进入大岭山整训并建立抗日游击基地，队伍人数也由150余人很快发展到200余人。10月下旬，东莞常备队第二中队扼守京山高地，连续9天击退日军的进犯。11月，东莞模范队还与常备队第一中队一起，在峡口痛击企图渡江南侵的日军[(50)]。在东莞模范队、常备队防守东江南岸阵地一个月，英勇抗敌，狠狠打击了来犯日军的气焰，极大地振奋了惠东宝地区民众的抗日士气。

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东南特委，以梁广为书记，加强对广州与香港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成立后，立即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等三人组成惠阳工作团，至惠阳整理党的工作，建立起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惠宝工作委员一面发动、组织民众抗日力量，另一方面对当地未及北撤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于12月2日正式建立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由曾生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12月7日，游击总队在淡水地区发动群众，打击伪政权，惩处汉奸，击毙当地的伪警长罗贤和汉奸吴带，伪维持会长曾庚亦在黑夜潜逃时跌死于深山涧中。次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进入淡水维持治安。12月10日，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在淡水成立[(51)]。1939年1月，东宝惠

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原东莞县壮丁模范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由王作尧任大队长。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东江特委，由林平任书记。5月，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坪山成立，由梁广、梁鸿钧负责领导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进而动员组织起东江人民奋勇抗日，从事敌后抗日游击作战。

1939年春，日军撤出广东惠州及东江部分占领区，旨在收缩兵力，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交通线。日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占惠州，设立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下，由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收编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主要活动于惠阳之坪山、龙岗、淡水及惠宝沿海一带；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收编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主要活动于东宝前线及广九路沿线[52]。

1939年夏天起，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频繁出击，积极打击日军。9月初，日军再次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占领葵涌和沙鱼涌，切断了东江地区和香港、南洋间的国际交通线。9月12日，新编大队夜袭日军，战至天明，一举克服葵涌和沙鱼涌，迫使日军从海上撤退。12月，新编大队又在横岗伏击由东莞渡河返回深圳的日军，毙敌30余人。第二大队则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于8月间破坏宝太线上的大涌桥，袭击敌军车辆，割断电话线，使得日军难以离开南头据点侵扰四周乡民。11月，新编第二大队对宝安县城南头镇进行包围封锁，迫使守城日军从海上逃离，南头遂被第二大队收复。该大队由于打击敌伪战绩辉煌，受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嘉奖[53]。东江民众给予新编大队和第二游击大队很大的支持，并纷纷报名参加这两支队伍。至1939年底，新编大队已发展到500余人，第二大队则发展到200余人，两部分别在坪山圩与乌石岩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进入1940年，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活动逐渐加剧。当年3月，新

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在驻地遭到国民党重兵围歼。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这两支抗日武装力量不得不退出惠、东、宝地区，向海、陆、惠边地区突围转移，但仍遭到国民党顽军两个师兵力的追击，损失惨重，仅存100余人[54]。1940年6月，曾、王两部接到了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之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日与不怕打摩擦仗；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敌人进攻；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中央还具体指示了如何做好回防前的工作[55]。以后，处于逆境中的两支抗日武装努力贯彻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为重新返回东、宝、惠敌后做准备。

1940年秋，日军又发动攻势，企图封锁港韶线，扩大东江占领区，国民党军队撤出，宝安、惠阳沿海及南头、深圳等处复告沦陷。原先被迫转退海、陆、惠边之曾生、王作尧部队，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大力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重新回到东宝惠前线，发动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不久，曾生、王作尧两部放弃国民党军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改成第三大队，由曾生任队长，第二大队则改称第五大队，由王作尧任队长[56]。此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在黄潭村、厚街、桥头、赤岭、篁村等地袭击敌伪军，破坏敌通信联络，缴获武器装备。至1941年，已建立了包括连平、大沙等八个抗日民主政权在内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第五大队在宝安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击退日军对上下坪的进犯，在惠阳、大坑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到1941年5月，第五大队建立起包括龙华、布吉、望天湖等抗日民主政权在内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另外，第三、五大队还共同组成小分队，深入增城敌后，在抗日游击战中逐步壮大，至1941年4月正式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兼政委。这样，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并为日后广州市郊增从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41年6月，日伪军600余人再次进攻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妄图一举消灭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主力。虽然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第三大队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熟悉的地形，与来犯敌军激战两昼夜，击毙日军长濑大队长，毙伤日伪军50余名。同年6月至8月，第五大队所在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遭到1000余日军的扫荡。第五大队与优势之敌展开游击战，毙伤70余敌，粉碎日军的扫荡。至1941年8月底，第三、第五大队发展到了1500人，成为东江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坚。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州南面，包含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四县。继广州遭日军占领后，南海、顺德、番禺等地也相继失陷。该地区纷纷成立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其中，前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组建的抗日义勇队最为活跃。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导和帮助下，义勇队得到整编和加强。1938年冬，抗日义勇队在广州市郊河面伏击敌运输船，毙伤日军十多名；另袭击广州、三水铁路线上的小塘车站，打击了企图西进的日军。抗日义勇队还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民众武装取得联系，共同打击日军。后来，抗日义勇队得到当时正推动组织广州市区游击队的广州市长兼西江八属总指挥曾养甫的认可与嘉许，并且给予广州市郊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的番号，吴勤被任命为二支队司令[57]。1939年6月，广游二支在禺南建立了抗日俊杰同志社，吴勤任社长，另有分社十余处，共有千余人。该社在抗日锄奸工作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先后发动两次对广州市郊的盐步、东塱敌据点的大规模出击，动员人数在六七百人。接着又消灭伪地税征收队，出击市桥、吴岗，破坏敌人交通，俘获敌人汽船，毙伤及俘虏敌官兵数十名。1940年4月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登场后，各沦陷区曾出现投敌的浊流，俊杰社更以极坚决的态度从事锄奸活动，大小汉奸被锄达30余人，给敌伪以严重打击，得到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的嘉奖[58]。1940年冬，日军对禺南进行水陆两路的大“扫荡”，俊杰社被迫局部停止公开活动。

针对日军加紧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成立伪政权和伪军，中共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武装，扩大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2月，中共南海、顺德工委利用国民党第七战区第三挺进纵队部署的名义，成立了顺德游击队，由中共南海番禺顺德工委书记林锵云为该队领导人。同年5月至7月，顺德游击队在县城附近的大良多次袭击日军，破获日军汽车，加上该地区其他抗日武装的斗争，迫使日军退出了大良。该游击队还潜入顺德县城，袭击日军。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与顺德游击队还合力击退日军对大良地区的再度进犯，这一仗极大鼓舞了顺德、南海、番禺等县的抗日民众，一些国民党杂牌军和伪军官兵也参加了广游二支。

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抽调中央派赴广东的部分干部进入珠三角地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同时，广东省委决定将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四县从东南特委的领导下划出，成立南顺中心县委，直属省委领导，由罗范群任书记。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以西海村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林锵云领导的游击队并入广游二支队，为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林锵云为中队长，开赴西海。同年9月，广游二支队粉碎了敌伪军对西海的进攻。1940年冬，日伪军数百人进犯禺南，广游第二支队在各乡民众抗日武装的配合下，连续进行了里仁洞、汀根、横江、韦涌等战斗，毙伤日伪军多人，击退来犯之敌。保卫了西海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日军以四个联队配合多艘装甲汽船和战舰，对南番中顺作了将近1个月的反复“扫荡”，所有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都撤退到鹤山、新会去了，但广游二支队依然坚持在该地区，以游击战的方式抵抗来犯日军，保卫当地民众[(59)]。

在抗战爆发后的中山县，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尚同情救亡工作，民众抗敌情绪高涨，在各乡区成立了人民抗日先锋队等武装，抗先队的组织扩大到3000余人，为广东全省之冠[(60)]。中共中山县委致力培训了数百名武装干部，充实加强抗日先锋队。中山的抗先队不只在抗敌宣传上展开积极的工作，他们还参加了区乡政权的改造，参加了别动

队的改造，在敌人两次登陆进攻时，他们直接参加抗敌守土斗争。1939年底日军首次进犯中山县城，中山县第四区工委书记谭桂明率领武装打击来犯日军。中共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其他抗日团体，也纷纷支援当地国民党军队阻击日军。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击退千余名进犯的日军，保卫了中山县城。1940年3月，日军组织重兵分三路再度进犯中山，中山全面沦陷。各地抗日先锋队英勇阻击日军，终因兵力悬殊过大，在重创敌军后撤出，转移至敌后开展游击战。以后，陈中坚、梁伯雄、欧初、谭桂明等人都率领过以抗先队员为骨干的抗日武装，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各地坚持游击作战。

二　海南岛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抗战爆发以后，中共琼崖特委便在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多次展开谈判，要求合作抗日，但颇多曲折。至1938年10月，广州失守，琼崖局势空前紧张，两党谈判出现转机，于1938年10月底双方达成协议。12月5日，原琼崖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琼崖保安司令王毅编制下的广东省第十四区人民自卫独立大队，由冯白驹任队长。独立大队起初仅100余人，很快扩大到300人，分为三个中队[(61)]。

1939年2月10日，日军饭田旅团在海军的配合下进攻海南岛，先后占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又占领三亚、榆林，企图控制整个海南岛。日军在海南岛登陆时，冯白驹部第一中队赶往南渡江的重要渡口潭口，协同国民党军阻敌东进。然而当第一中队赶到潭口时，国民党军已经撤退，第一中队遂发起潭口阻击战，这是日军自登陆以来首次遭到的打击，大大振奋了全岛民众抗日的信心，纷纷要求加入独立大队。经过与日军的多次游击战，冯白驹领导的独立大队迅速发展。1939年4月，独立大队扩编为独立总队，仍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共1300余人。独立总队坚持在琼崖北部的琼山、文昌、澄迈等县的游击战争，多次成功袭击日军，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一度有效地

阻碍了日军深入内地。

1939年秋季，琼崖沿海13个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而国民党军队大都退至中部山区。独立总队却继续深入敌后，甚至把游击战扩大到临高、儋州、琼东等县，给日军带来极大的震撼。在此情况下，日军调集千余人分四路“扫荡”琼文地区。独立总队加强反扫荡斗争，以主力一部西渡南渡江，插入敌后琼山、海口郊区活动，在琼山敌后建立游击区并向琼山西部发展。10月下旬，独立总队在国民党儋州县、乡两级行政人员的配合下，组织军民4000余人对日军的重要据点展开攻势。围攻一直持续到11月5日，日军由于孤立无援、粮食断绝，被迫突围逃向新州。6日晨，日军的那大据点被独立总队攻克，伪军中队80余人被俘虏。独立总队进而推进至昌江、感恩、崖县、乐会、万宁等地，抗日游击战争扩展到了各沿海县市。自1939年2月日军登陆琼崖至1940年1月，独立总队主动采用伏击战术，总计与日军战斗60多次，毙伤敌军500人以上，其中击毙敌少将1人，军官10余人，缴获长短枪支60余支[(62)]。

就在日军进行“扫荡”进攻的同时，新任国民党行政督查专员吴道南加紧制造反共摩擦，限制独立总队的发展。为避免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决定将领导机关转移至琼崖西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中共中央曾对冯白驹部乃至整个海南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作出如下指示：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因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必占琼崖不退；冯白驹与琼崖特委应以全岛为对象广泛发展党组织，发展武装，发展民运，设法争取各县政权，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战争；冯白驹部应在一年内至少扩大至1万人枪，丝毫也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要依靠人民筹给，一切自力更生[(63)]。根据中央的指示，独立总队在各处加强对日军的袭击，打退敌人数次扫荡，整个琼崖地区党员发展到8000人，并有群众武装八九千人[(64)]。

1940年1月25日，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在新编成

的特务大队的掩护下，由文昌地区向西转移。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的主力则继续留在琼文地区活动，此后又成立独立总队东路指挥办事处，由符振中任指挥、陈乃石任政委。2月中旬，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到达琼山、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合地区。此时，那大及周边地区已重新被日军占领，琼崖特委及纵队遂决定不再西移，即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特委和总队积极发动群众，在各地组织成立了抗日民众团体。7月，美合地区还建立了一支70余人的美合自卫队。同时，独立总队第三大队分别以第八、第九两中队为基础扩编为第四、第五大队。当月，独立总队西路指挥办事处成立，马白山任指挥，符荣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三、第五大队。

1940年7月和9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先后派出庄田、李振亚、覃威等干部至琼崖指导工作，并使琼崖与延安一度沟通了电台联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作了调整，由冯白驹任特委书记，李明任副书记，独立总队则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委，庄田任副总队长。同时，独立总队进行整编，撤销东、西路指挥办事处，改设支队。整编后的独立总队下辖2个支队、1个特务大队和直属于总队的1个独立大队（第四大队）。至1940年底，独立总队的部队规模已发展至3000余人，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万宁、琼东等11个县的广大地区[(65)]，先后建立琼文平原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六连岭根据地及其他小块根据地，成为海南岛地区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

第五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

1936年2月起，东北地区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军，以及各反日游击队，抗日武装统一建制，陆续改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66)]。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群众，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

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在此背景下，东北抗日联军相继改编成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同时划分各自的活动区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的任务，由原来的区域性单独对日作战，转变为对于全国抗日主战场的配合性作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也明确要求抗联：“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久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67] 日伪军方面则加紧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彻底摧毁抗联的游击根据地。1937年12月，日本关东军第四师团与伪满军一部共2.5万余人，以松花江下游地区为重点，开始实施囊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三江省大讨伐”，企图一举消灭该地区的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于1936年7月正式成立，共6000人，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下辖第一军、第二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军长[68]。第一路军主要活跃于吉林省南部和辽宁省东部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路军各部不断伏击和袭击敌军，使其不敢轻易出犯。依兰、勃利、宝清、富锦、桦川、集贤、汤原等许多县城，十里之外就是游击区，日伪军无力进行袭扰。对此，日军极为恐慌，他们在大力巩固后方基地的方针下，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大肆烧杀掠夺，实行归村并屯，建立“集团部落”、“保甲连坐”等措施，妄图切断群众与抗日联军间的联系，断绝抗联的兵员与粮食来源，以配合其实施军事打击。同时，日军还对抗联将士实施诱降、劝降的手段，想方设法从内部瓦解分化抗日队伍。

1938年初，杨靖宇亲自率领抗联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军一部在老岭山开辟游击区，破袭老岭铁路隧道工程，并于通化七道沟伏击伪满军，连续袭击太平沟、双叉河伪警察所。第一路军第二军一部和独立旅，在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领下，袭击了辉南回头沟等伪军据点，另

攻占了长白县六道沟镇。同年8月起，第一路军实行新的建制，取消军的番号，所部编成三个方面军和警卫旅[69]。整编后第一路军决定在集安地区的部队向东部山区转移。由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领之一部，在北移途中于七道沟袭击了日军武装勘探队。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方面军于集安长冈地区的埋才沟围歼伪满军，击溃第四十二团及骑兵一部，缴获步枪140余支，手枪30余支，机枪8挺。另袭击伪警察署和日伪据点多处。1938年10月，杨靖宇还率部在临江东北岔沟地区突破伪满军的重重包围，歼敌百余人后转移。当年冬季，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方面军相继转战于集安、通化、临江、辉南、濛江、桦甸等地的东部森林，打击日伪军。

1939年，抗联各部与前来“讨伐”的日伪军周旋，并择机出击，取得不俗战果。该年4月，杨靖宇、魏拯民率部突袭桦甸日军仓库，歼灭伪警察200余人，烧毁了库房。五六月间，杨靖宇率部攻克了辉南县城。6月，第二、三方面军各一部协同袭击延吉天宝山铜矿，第三方面军还在敦化以南大蒲柴河歼灭了日军助川讨伐队。8月下旬，第三方面军一部攻下安图县警察署，缴枪70余支；同时伏击来援之敌，歼敌170余人，烧毁汽车7辆，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2挺。9月下旬，该方面军在敦化南部山地设伏，袭击敌军车12辆，歼敌140余人，缴获步枪90余支，机枪4挺。以后，鉴于敌伪军“讨伐”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三方面军除了留小部在敦化地区坚持斗争之外，大部向延吉、汪清、额穆等地转移，并在途中伺机袭击敌军[70]。另外，杨靖宇直接指挥的警卫旅和第一路军一部，在1939年下半年从事较大规模作战23次，歼灭日伪军676人，俘虏341人[71]。同年冬，关东军调集日伪军七万余人，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讨伐”。第一路军为保存实力，决定各部队缩小目标，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坚持游击战。此后，第一路军各部虽然奋起迎敌，终因寡不敌众，损失巨大。1940年2月23日，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率部在反围攻作战中，弹尽粮绝，英勇牺牲[72]。第一路军剩余部队继续在长白山区各地坚持抗日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于1937年10月正式成立，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此外抗联救世军（王荫武部）和义勇军（姚振山部）也归第二路军指挥[73]。嗣后，第二路军各部便不断与前来讨伐的日伪军作战，予敌沉重打击。该年3月，第五军第三师之八团一连16人，于炭窑沟的头道卡子阻击来犯的日伪骑兵400余人，共歼敌100余人，毙战马90余匹，一连长以下12人牺牲。经过数月的反围攻作战，第二路军各部在取得部分战斗胜利的同时，自身损失也很大。为摆脱日军围攻，从根本上改变形势，第二路军决定第四军、第五军主力突围西征，计划与在哈尔滨东南五常地区活动的第十军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同时总指挥周保中率总部以及第四、第五军各一部和第七军等部，坚持在饶河、密山、虎林一带活动，伺机打击敌军，掩护西征部队。1938年5月中旬，西征部队一部开始自佳木斯移动，沿途遭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历经苦战，于6月下旬到达依兰、方正和牡丹江东岸，与在该地区的西征军另一部会合。6月底，西征军决定向五常、舒兰方向西征。在西进途中，第四、五军所部都与敌军数度作战。如7月初袭击牡丹江畔的江东和三通道；7月上旬攻占苇河县志楼山镇；7月末袭击珠河以东元宝镇；8月初在苇河南沟的反击战。此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专门围追堵截抗联西征部队，西征军处境日益困难。10月上旬，西征军妇女团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遭遇日伪军，指导员冷云率领七名女战士掩护大队突围，在弹尽援绝之下宁死不屈，一起跳河。这就是抗联史上英勇悲壮的“八女投江”[74]。进入五常地区的第四军部队在敌伪重兵不断的追堵讨伐下损失严重，1938年10月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第五军亦被迫转回原地坚持游击战争[75]。第四军主力损失三分之二，第五军主力也损失了三分之一。西征的失利，对于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造成不利的局面。

1938年5、6月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为了突破日伪军对于下江地区的包围，1939年5月，所属第三军进行整编，并与第六、九、十一军所部向西北远征。同年7月起，西征部队分三批出发：首

批西征部队由第六军军部和第一、二师各一部共200余人组成，由第六军参谋长冯治刚率领，7月自萝北以北麻花林子出发，8月份达到海伦八道林子。第二批西征部队由第六军第二、三师一部，加上会合第三军第四师等部，共400余人，于9月上旬从萝北麻花林子出发，上旬到达海伦白马石。11月，由李兆麟率领的第六军教导团、第十一军第一师等部共300余人，自绥滨出发，于12月中旬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三批部队的先后西征，为抗联保存下来部分有生力量。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正式成立，由张寿筷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76)]。此后，第三路军所属各部在黑龙江省的十多个县境内展开游击战，主动出击日伪军。其中第三、六军联合攻袭德都县警察署，歼敌百余人，缴获步枪100多支。11月，第六军一部在德都凤凰山区阻击日伪讨伐队，击毙日军官数人，缴获枪支百余支。另外，龙北指挥部所属各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作战40余次，攻袭多个敌伪据点，歼敌25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77)]。

1940年关东军大肆增兵至十一个师团，从1月至5月发动对抗联各部的讨伐作战便达360余次。与此同时，鉴于抗联各路军相继遭受重大损失，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第二路军总指挥）、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在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会议，确定采取“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八字方针，同时决定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共11个军缩编为10个支队分散活动。由于分散活动受敌军阻隔，加之战争残酷，伯力会议精神只是传达到部分的抗联部队，实施缩编。其中，第七军缩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第五军缩编为第二路军第五支队，第十军没有进行缩编；活动于龙北地区的第三路军各部缩编为第三、第九支队；活动于绥稜地区的第三军、第十一军各一部缩编为第六支队；活动于庆城、铁力等地的第三军所部缩编为第十二支队；第一路军方面未能及时获知伯力会议的精神，其一部于1941年3月缩编为第一路军第一支队。缩编后的抗联各游击支队积极利用夏秋两季对敌实

施攻势作战，颇有斩获。然而一到冬季，日军乘大雪封山，联军弹药无补，部队也无安身之机，跟踪追击。因此，中方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减员情况极为严重。至1940年底，东北抗日联军仅剩1000人左右。为保存实力，培养干部，根据与苏联有关当局达成的协议，抗日联军主力大部于1940年冬撤至苏联境内，并在苏联有关人员的协助下进行整训。1942年8月，抗联整训部队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亦称为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为旅长，张寿筷为副旅长[78]。与此同时，留在国内的联军各游击支队化整为零，以小分队的方式，在北满和吉林之延吉、敦化、桦甸、蛟河等地活动，他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甚至分化伪满军和警察，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

(1) 有学者认为，相持阶段国民党“排共反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亦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积极的抗日态度，期间国军发动较大规模战役9次，占整个抗战时期22次大会战的41%，另进行大小战斗约计496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国军伤亡人数达137.6万，占整个战争时期中方伤亡总数的43%。所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实行的是既反共又抗日的政策。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229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3)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4)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第553页。

(5) 《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8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82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11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84-1285页。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01页。

(9)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362-363、364页。

(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09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09-1310页。

(12)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12页。

(14) 《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532页。

(15) 《八路军文献》，第536-537页。

(16) 《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

(17) 《百团大战史料》，第96-97页。

(18) 《百团大战史料》，第97-98页。

(19) 《百团大战史料》，第412页。

(20) 《百团大战史料》，第211-214页。

(21) 贺龙：《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百团大战史料》，第273-274页。

(22) 《彭德怀、左权关于在正太线继续扩大战果的部署致聂荣臻等电》（1940年8月27日），《八路军文献》，第552页。

(23) 《叶剑英致徐永昌电呈》（1940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24)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26-227页。

(25)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29页。

(26)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页。

(27)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93页。

(28)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3页。

(29)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93页。

(3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57页。

(31) 《日军第二期晋中作战》（1940年10月11日-12月3日），《百团大战史料》，第432页。

(32)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33页。

(33)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百团大战总结战绩》（1940年12月10日），《百团大战史料》，第243-245页。

(3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页。

(3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69页。

(36) 《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4页。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65页。

(38) 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39) 新四军战史编辑室：《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49页。

(41) 《新四军战史》，第120页。

(42) 《新四军战史》，第123页。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4—585页。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45页。

(45) 《新四军战史》，第115页。

(46)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470页。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49页。

(48)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

(49) 《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2—15页。

(50) 《东江纵队史》，第18-19页。

(5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17页。

(52) 《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53) 《东江纵队史料》，第8页。

(54) 《东江纵队史料》，第8-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55页。

(55) 《东江纵队史》，第57页。

(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02页。

(5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4-1525页。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6页。

(5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7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32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45-1547页。

(62) 《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63页。

(63)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49页。

(64) 《胡服、古大存为海南岛工作致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6月28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50页。

(65) 《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63页。

(66)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67)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1938年11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81-182页。

(6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69)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70)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21页。

(71)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9页。

(72)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67页。

(73)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5页。

(74)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22-125页。

(7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67页。

(76)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宣言》（1939年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83-184页。

(77)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31页。

(7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6页。

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一节　国共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一　国共之间局部军事冲突日趋增多

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由于两党所处地位和所持基本方针政策的不同，其相互间的矛盾与冲突始终存在着。这些矛盾与冲突不时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中表现出来。特别是随着中国抗战的持久化、时局日趋复杂化，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地升级，最终发展到了局部军事冲突的阶段。

对于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极为恐惧。正如国民党当局在一份文件中所说："目前共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自由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余地；如处置不当，则第

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行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1]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起草并拟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会后迅速下发执行。该《办法》提出，为限制异党活动，惟有采取像共产党一样“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以组织对付组织”，并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提出了23条限制异党办法[2]。虽然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就整体而言国民党当局应对的重点仍然是日本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密切关注着汪精卫集团脱离抗日营垒之后的动向，但是蒋介石已经把“共党到处发展”列为“目前急患”之首[3]。当时蒋介石考虑的是“融化共党政策”而非军事剿共[4]，不过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制中共武装抗日区域，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故国共军事摩擦事件频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河北、山东是国民党顽固派较早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地方政权和八路军发难的地区。虽然早在1938年夏冀中和冀南地区就已经建立起多个抗日民主政权，但该年秋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却不顾八路军方面的反对，强行接收抗日政权和团体，纵容乃至指使民团甚至土匪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政工人员。12月，河北的国民党顽军甚至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而国民党当局颁令，敌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驻、不得兼管行政，甚至取消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5]，更助长了地方顽固势力的气焰。而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提出的口号是：“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1939年4月，顽军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杀害指战员400余人，即“博山惨案”。同月，河北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400多人，并袭击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部。

除了华北之外，在华中地区发生了多起针对新四军摩擦事件。

1939年6月，湖南平江的新四军通讯处机关遭袭击，职员及家属多人被杀、被抓。11月，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两天，新四军伤残人员、家属和群众200余人被杀害。正如1939年初中共中央便指出的，反共摩擦的不时发生，“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6)] 到1939年12月，中共中央更是认为，国民党“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在这个军事限共政策下，国民党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发布了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并用中央军直接对付八路军与新四军”。中央明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决不轻言退让。”[(7)] 这样，双方的摩擦甚至冲突进一步扩大了。

1939年12月，山西的阎锡山所部首先向中共领导的部队发起进攻，挑起了“晋西十二月事变”。抗战爆发后，按照蒋介石命令，八路军进入山西，加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作战。中共在山西实行与阎锡山合作抗战的政策，帮助阎锡山建立新的武装力量——抗日决死队，亦称山西新军。但是，在阎锡山看来，新军建成却渐渐“八路军化”，为防新军变为异己力量，自然早有夺回新军的想法。1939年3月，阎锡山在山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秋林会议），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新军，解除新军中共产党员的军权，并秘密制定“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阎锡山声称“迩来晋省政治，大部陷于牺盟份子之手，新旧两军，形成对立，真象渐明，深恐尾大不掉”，乃于1939年10月间召开所谓革命同志代表大会，“拟藉整顿决死队之名，消灭牺盟中共份子之势”[(8)]。11月29日，阎锡山密令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9)]。12月初，阎军首先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之第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

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团体，杀害政府人员、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工作人员数十人，制造了晋西事变，亦称“十二月事变”。

面对阎锡山部的进攻，中共方面积极应对。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一部奉令接应晋西南部队北上，在冀中和晋察冀的一二〇师主力也奉令回师。1940年1月，晋西北新军集中主力，重创来犯之阎军，并顺势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同时，在晋西南地区，八路军三八六旅、“集总”特务团及决死一纵队在陈赓指挥下，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逼。至1940年4月，山西省的中共军队和阎锡山部划定了各自活动范围，二者间的冲突暂告结束 (10) 。

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从1939年至1940年，国共双方发生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1939年四五月间，发生了在陇东分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击镇原县的镇原事件和袭击宁县的宁县事件。9月至12月，又发生了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原共产党控制的镇原、宁县、正宁三个县；八路军则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的国民党保安部队300余人。在关中分区，因该地区地理位置重要，因而国共双方摩擦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发动的武装进攻高达64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国民党军占领了旬邑和淳化两县。

在这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40年春夏，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三营和警备八团一部，进行了点头镇突围战和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镇，拔掉了国民党军十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阳县保安团团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共计1000多人，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打通淳旬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边区活动范围的阴谋 (11) 。

1940年初，在华北、华中等区域也不断发生国民党军队袭击中共

军队的情况。如1940年2月，国民党军朱怀冰部袭击在邢台西路罗川的中共独立营，结果该营营长阵亡，士兵230余人伤亡过半，100余人被俘[12]。又如1940年4月，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刘漫天部偷袭天长、六合等地的新四军，10月至12月，国民党军第一二八师莫德宏部在皖东袭击新四军等。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中共坚决予以反击。1940年2月，八路军对石友三、孙良诚、高树勋等部开始发动进攻，结果重创各部。3月，八路军又发动磁武涉林战役，重创朱怀冰部[13]。1940年，新四军陈毅支队渡江北上，进入苏北。而苏北敌后属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防区，他当然不允许新四军前来发展根据地，而决心要将陈毅部赶走。为了消灭苏北地区的新四军，1940年10月，韩德勤所部对初到苏北的陈毅、粟裕等部发起突然进攻，结果惨败，该事件被称为“苏北事件”[14]。之后，苏北的海安、东台、盐城等地皆为新四军所占，以致国民党认为其在苏北的军政机关分散于兴化、泰州、沙沟附近，“四面受敌，进退失据，情势至为危急”[15]。1940年12月24日，蒋介石就苏、鲁局势致电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电文中称：“中央已有处置，一个月后便可实现。希按照前令，尽全力巩固鲁省，至对苏北，可无须再抽兵增援也。”[16]结果，1941年1月，皖南事变便发生了。

应当指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随着双方摩擦的增加，国、共双方高层都曾意识到需要通过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只是国民党方面旨在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和扩大对日作战区域，压缩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控制甚至取消中共领导下的敌后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中共方面则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主张。1939年11月起，国、共双方在会谈中已经较具体地涉及八路军扩编和边区划界等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17]。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新四军与第三战区进行了会谈，曾就新四军的驻地和作战地、区域，达成过初步协议[18]。1940年6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

正式提出了全面解决双方关系的具体方案，在第一部分“请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合、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之下，提出了如下要求：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不因党籍信仰之不同而横遭扣留、拘禁、非刑与歧视；保障《新华日报》之出版发行；保护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家属，禁止非法骚扰和残害。第二部分为“请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第三部分“关于陕甘宁边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是这份提案的重点部分，包括：甲、命令划定延安、延长等23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委任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乙、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其所属游击队按各地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丙、增编新四军至7个支队；丁、规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友队作战分界线；戊、以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新四军械弹粮饷等[(19)]。

7月16日，国民党方面拿出提示案，以“中央最后决定”的口吻答复几点：一、关于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即根据日后通过之《宪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区域为陕西15县、甘肃3县，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区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西省府指挥；三、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范围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上述规定地区；四、规定八路军编制为3军6师6个补充团，新四军为2个师（每师2旅4团）；另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绝对服从军令”、“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称“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20)]。该提示案的实质，就是要压缩边区的空间，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让出在华北江南经过浴血苦战建立起来的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为日后的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留下伏笔。

同年8月，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会谈中，强调

中共50万军队要抗战、无法生活，难以全部开入冀、察，且新四军南调部队不多，南方游击队却很多，表示国民党之方案不可行。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打压企图，9月5日，周恩来曾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三条新的解决方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21]。但是，这并没有获得国民党方面的认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军政高层人士看来，抗战以来中共兵力的发展、影响的扩大，必须加以最大限度的限制，甚至不惜以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为代价。

二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独裁政策的必然结果。继在华北、苏北制造一系列摩擦之后，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摩擦中心移向华中，把矛头指向新四军，制定《防止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加紧了对新四军的限制封锁。先是下令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第四、第五支队开赴到江南的南京、芜湖一带，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根据地，新四军苏北与江南、苏南与皖南部队的联系，陷新四军各部于孤境。同时，制定三路进攻新四军计划，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向新四军皖南、苏南、苏北、皖东及皖中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

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10月上旬，英国政府宣布将按时重新开放关闭三个月的滇缅路。在国民党高层看来，这意味着英、美当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牵制在华日军。10月中旬，蒋介石等人研究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态度、行动、兵力、地区等部署[22]。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宣布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23]。这实际上表明皖南事变拉开了序幕。

继发出“皓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各部。他们在严令催逼新四军北移的同时，命令顾祝同在皖南部署包围新四军，命令李品仙、冷欣分别在江北、江南部署堵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是：如皖南新四军移动，就在新四军行军途中乘机围歼之；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渡江之际；如新四军仍不遵令北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解决。局势日趋紧张，尤其是新四军方面，情况十分紧急。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在此情况下，11月9日，中共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和团结抗战六个方面，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污蔑，揭露了亲日派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毒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对于“皓电”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佳电”要求对于江南新四军“宽其限期，以便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变”；对于在江北的新四军各部，“则暂时拟请免调”，同时责成“整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24]。

在得悉朱德等“佳电”之后，国民党方面该如何处置？是“置之不理”，还是“严词驳斥”，抑或“由中正式命令限其如期集中河北”？蒋介

石没有马上作出进一步的决断[25]。稍后，蒋还同意把八路军、新四军的移驻日期推迟到12月底。国民党方面之所以没有立即催逼新四军按照规定日期北移，一是认为当时尚在“国际局势未定之时”，“如过于硬性反于我不利，而且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此弹性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另一重要因素是日本尚未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蒋介石等人“决待倭敌承认汪伪以后，或待敌是否承认汪伪之真相判明以后，再发此令，比较妥当”[26]。

11月30日，日本方面与汪精卫签订《基本关系条约》之后，蒋介石立即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他催促有关僚属准备对于朱、彭“佳电”的复电稿，并且亲自修改定稿[27]。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了“齐代电”，再度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对国民党军队“侵袭”和实行“割据”，是导致各地摩擦迭起的直接原因，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赴河北”[28]。次日即12月9日，蒋介石又发出如下电令：“令朱彭叶项（即发）。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各地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何白参谋正副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蒋中正。十二月九日。”[29]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部署。到1940年12月底，除了李品仙、冷欣各部在江北、苏南进行堵击布防外，皖南方面，第五十二师、一〇八师、七十九师、一四四师、四十师和六十二师一个团、新七师一个旅，在宣城、泾县、宁国、旌德、太平、青阳、南陵、铜陵地区，构成对新四军的重重包围[30]。至此，皖南新四军已经成为陷入险境的孤军，情况万分紧急。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多次指示在皖南的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31]。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于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如何移动犹豫不决。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批评了项英等人，要求对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月25日蒋介石面告周恩来“渡河不得再缓”[32]之后，12月31日毛泽东、朱德还就如何渡江北移致电叶挺、项英。但是，这一切努力实际上为时已晚。

1941年1月4日至13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转移途中，由于判断错误，加之内部意见分歧，对外联络中断等，结果误入国民党军队在泾县茂林地区事先设好的包围圈。经过数日的恶战，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或牺牲、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军官和干部牺牲。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令：“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通令接着诬蔑新四军为“抗命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33]。这样，国共关系处于抗战爆发以来最为紧张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本党本军，而且正中蒋介石的诡

计。中共中央决定，“佳电”的温和态度立即终结，在政治上发动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34]。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还不敢与共产党分裂，共产党也不宜与国民党分裂；故决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首先在政治上发起反攻，在全国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事变真相，动员全国爱国军民与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共同反对反攻顽固派的阴谋[35]。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案，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与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摩擦事件之后，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围歼皖南新四军的真相，进而提出如下要求：1．严惩罪魁祸首；2．释放被俘将士，保障叶挺等人生命安全；3．抚恤死难将士及其家属；4．停止华中剿共战争；5．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6．停止各地残害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释放政治犯；7.肃清亲日分子；8．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9．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36]。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共行径。“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并维护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等各种途径，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揭露国民党自抗战以来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准备；在大后方，应运用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动员舆论和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37]。1月22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十二条要求：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事

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及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38]。这就把中共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主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重庆，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反动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向何应钦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在电话里愤怒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天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题词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得以刊登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19日即用秘密传单散发。文章就“所谓新四军违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所谓借端要索问题”，“究竟谁打谁的问题”，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39]。同时，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还以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表示抗议[40]。

对于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巨大损害，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鉴于叶挺陷身囹圄，决定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陈毅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41]。1月23日，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出就职通电，旋即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整编为七个正规师，分派粟裕、张云逸（旋改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等七人为师长[42]。这是对国民党围歼迫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最有力的回击。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进行了自卫作战的全面准备。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内外各方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宣言，指出：“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宣言指出，一旦发动剿共战争，则过去之悲剧又将重演，抗战之基础将毁于一旦。认为国民党应“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以奠定抗日基础[43]。1月12日，旅港人士400余人联名发出文电，吁请停止内战，恳请蒋介石“明令凡属抗战部队，俱应加以优容保护，以示大度，表以至诚，使友邦无疑虑之揣，而幸灾乐祸之流无间可入”[44]。此外，如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菲律宾侨胞团体等众多中外组织和个人，也纷纷致电或发布宣言，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主要新闻报刊基于不同的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评论。1941年1月18日，重庆《中央日报》刊登社论《军队的纪律和民主》。该社论诬称：“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万万不能忽视的。当局为贯彻军令，维持军纪起见，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置。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1月22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社论。社论指出：“拥护

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唾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社论认为：“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容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关于皖南事变的处理，该社论建议：“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与蔓延！”1月29日，针对一些敌对势力借口皖南事变散布谣言，以蛊惑国内外视听的恶劣行径，《大公报》又刊载《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论。社论指出：“敌人对我们原是幸灾乐祸的，它希望中国自溃自裂，它也希望中国失掉国际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在平时，它还在无中生有的造谣，寤寐以求的幻想，现在遇到这个新四军问题，它自然要藉此造谣与挑拨。问题的关键，完全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敌人希望我们分裂，我们必坚持团结与统一；敌人希望我们内乱，我们必严明法纪，显示出一个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相信国际各友邦也必然认识中国，而更同情中国。”[45] 总的来看，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日益不得人心。皖南事变后，中共坚决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及时揭露事变的真相，表明了正确的立场，从而广泛地争取了诸多中间力量、民主人士，得到国内外舆论正面的支持。这些既有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对日作战，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运动，使之走向新的阶段。

第二节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1939至1940年前后中国一度兴起的民主宪政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次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战后政治格局影响深远。

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曾有宪政的筹议，并付诸一定的行动。但是自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战事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时惟有依据国民会议所制定颁布之约法以行使治权”[46]。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原定宪政实施计划被迫推延，这是客观形势所致，也容易为国人所谅解。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作战不利，加上汪精卫集团公开叛离抗日营垒，国民党当局急需得到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谅解和支持。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实行战时民主、推进宪政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董必武等所提《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该案认为：“抗战以来，我国政治上的进步，赶不及军事上的进步，更远远地落后于抗战的需要。民众是我国能够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之一，却没有全部动员起来，政治和民众息息相关，民众是否发动起来，一依政治的良窳以为断。”又认为：“政治千头万绪。目前最与民众有关的，是民主自由，民众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没有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永不能提高其积极性。”针对各党派间摩擦不断的缘由，该案指出：“各党派之团结，既已承认其存在，但还没有予以法律上之保障，以至摩擦时生莫由解决。”为此建议：“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之保障。”[47] 在这次参政会上，不少知名人士还提出了多项要求加强民主建设的提案。张澜等提出“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希望政府“选任贤能，俾以绝大之实心与努力，以改进后方之政治，必后方之政治确臻良好，方能兴起人力，发展财力，增加物力，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48]。周览、黄炎培等提出“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提出以下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化[49]。此外，罗隆基等提出“调整政治机关职权与工作以增强行政效能案”，罗文幹等提出“请政府实行选贤与能以澄清党治案”等。

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成为战时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起点。会前，毛泽东等七位中共参政员于9月8日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分别在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及党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在政治方面，提出“容纳各党各派人才，提高战时行政机构效能”，“实行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在党派合作方面，要求“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力，认真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50]。这一意见的公开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为这次会议的民主诉求拉开了序幕[51]。

会议期间，中间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均提案要求结束党治”[52]。陈绍禹（中共）参政员等26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其中要求：（一）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二）由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借口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非法压迫之行为；（三）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之党员，一律有服务之权利，严禁因党派私见，而摒弃国家有用之人才[53]。另外，中国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36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会议还收到了其他有关实施宪政的提案：孔庚等提《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江恒源等参政员40人提《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张申府等参政员21人提《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王造时等参政员37人提《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以及张君劢等参政员55人提《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会议对上述七份有关开放民主、改革政治的提案，合并进行了讨论。最后，由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

宪政案》。议案提出治本、治标办法各两项。治本部分包括：1．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2．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治标部分包括：1．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2．为因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54]。据邹韬奋回忆说：当时审查会议上，各派间“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一直开到深夜三点钟模样，那热烈的情况虽不敢说是绝后，恐怕总可算是空前的”[55]。虽然部分参政员提出的“结束党治”、“取消一党专政”的主张未能列入最后通过的决议案，但这些主张得以在国民参政会的议案讨论期间被提出，已属不易。而决议案无论“治本”还是“治标”部分，虽然没有确切的实施日期的规定，但毕竟成为战时各党派乃至广大民众衡量国民党当局是否致力开放民主实施宪政的标杆。

正因为如此，这一议案通过后，中共和中间党派都曾予以积极的响应。1939年9月2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拥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正确决议》，认为国民参政会通过此项决议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全国人民积极的起来拥护国民参政会这一正确的决议，开展实施民主政治的全国运动”。社论最后指出：“实行良好决议，是今天政府当局及全国人民第一等的共同任务！”[56] 救国会也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所通过之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是我国之政治民主运动之一新阶段”，“全国的人民，应用巨大的力量去支持国民参政会，协助政府，实现这一重要决议。”[57]

在国民参政会决议案的感召下，各党派以及各界人士逐渐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依据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设立了宪政期成会，委员25人：张君劢、张澜、周炳琳、杭立武、史良、陶孟和、周览、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璜、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幹、钱端升、褚辅成、梁上栋、胡兆祥、章伯钧、

马亮、王家桢、李永新。宪政期成会召集人为黄炎培、张君劢、周览。1939年9月20日，宪政期成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根据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授予的“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之使命”，宪政期成会议决请政府早日颁布召集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实施宪政之明令，并开始搜集有关宪法草案的各项资料[58]。这样，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成为各界关注所在。

1939年11月17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其中指出：国民大会的举行“虽因事实上之障碍而一再延期，而本党企求宪政之早日实施，实始终无间。今抗战已历两载有余，赖全国人民于本党领导之下，同心一德，艰苦奋斗，最后胜利之期已不在远。揆之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之义，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确立建国基础，实有积极进行之必要。最近国民参政会曾有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之建议，亦足征国人对此期望殷切”。会议通过三项决议：1．国民大会会期为1940年11月12日；2．大会代表之选举尚未办竣者，应即由选举总事务所督饬赶办，限于1940年6月底以前结束一切选举手续，确定全部代表名单；3．其因地方情势变迁，或事实上之窒碍致选举发生困难者，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妥筹补救办法[59]。这也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中央首次宣布国民大会的召集日期。对此，宪政期成会于11月12日召集第二次会议，决议征集各方对于宪法草案等件之意见，并推左舜生、董必武、褚辅成、罗隆基、许孝炎等五名参政员先拟具待研究之问题。

为了进一步致力促进宪政的实施，1939年10月1日，由救国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及无党派参政员张澜、褚辅成、沈钧儒、莫德惠、张申府、王造时、章伯钧、李璜、左舜生、胡石青、江恒源、张君劢等12人发起的宪政座谈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除12位发起人外，还有王志莘、邹韬奋、张友渔、章乃器、董必武、吴玉章等80多人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怎样推进宪政运动”。沈钧儒以主持人身份，首先表示，宪政的实施，“这不能单赖政府、国

民参政会之努力，这尤赖全国人士、社会各方面的负责者，共同负责，共同努力，这需要有广大的运动，全国人民的运动，以推进之”。他强调，当前首先要讨论的是如何“形成社会的宪政运动，并将这运动普及到全国去”。吴玉章指出，这次宪政运动第一是为了加强抗战，是一种救国运动；第二，这次宪政运动不分在朝党与在野党，我们是共同努力。董必武谈到：“今日我们需要的宪法是真正反映了中国现代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新宪法，过去的宪法草案已不能适用；制宪机关要真正包含全国各方面人民的代表，过去国民大会召集法、选举法都已不能适用，这是两项原则。”[60] 10月18日，宪政问题座谈会举行第二次讨论，召集人由12人增加到19人，参加者也增加了数十人。该座谈会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一共举行八次集会，主要讨论了宪政运动与民众运动的关系，实施宪政与抗战建国的关系，实施宪政的条件，以及宪政与宪法等问题。这些座谈会以灵活的方式宣传讨论宪政问题，虽然期间不无干扰，但总体看来扩大了战时陪都的民主气象，受到各界的关注，推动了国民参政会作出相应的决议。

1940年3月20日，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收到参政员罗隆基、罗文幹、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钱端升、张奚若、杨振声、任鸿隽等提出之“五五宪草”修正草案等意见多项议案或意见。以后，宪政期成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尤其是以参政员罗隆基等九人的草案为蓝本，对于“五五宪草”，“就原案或存或改或补或删”，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将原8章147条改为8章138条。宪政期成会这个草案对“五五宪草”最重要的修改，是增加了“国民大会议政会”一章。这是鉴于“五五宪草”中规定的国民大会成员过多，每六年才开会一次，而且会期又短，这便使治权属于行政院、政权属于国民大会的原则难以实现。据此，该提案提出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其名称叫做“国民大会议政会”，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国民大会的职权，其某些权力甚至超出了政权范围，属于治权范围，它的形式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

[61]。“国民大会议政会”的提议有相当的基础，当时大后方朝野都对行政当局的低效无能非常不满。据王世杰记载，该提议旨在监督政府，“各方面赞成其议者颇众”[62]。宪政期成会同时还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草案说明书》和《对于实施宪政之建议》，后者共两条：1．请政府对于未完成之选举及附逆分子剔除后之补充，切实注意于选举方法之改善。2．请政府促成宪法及宪政之早日实施[63]。

为了进一步推进宪政运动，1939年11月19日，在沈钧儒的主持下，决定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推举沈钧儒、董必武、孔庚、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史良等8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后又推选孔庚、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张申府等25人为常委。12月5日，宪政促进会常委会举行首次会议，决定由张申府担任常委会秘书处主任，沈钧儒任宣传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任联络委员会主任，左舜生任研究委员会主任等。之后，各委员纷纷通过演讲报告、发表文章等方式进行宪政宣传活动。如沈钧儒曾亲往广西桂林进行宪政宣传，作了《关于宪政的几件事》的演讲，还发表论文《实行宪政对我们政治前途发展之重要性》。邹韬奋、张申府等人也经常应邀到各地作关于宪政问题的报告。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则将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编辑成《宪政运动论文选集》、《宪政运动参考资料》向全国发行，等等。

在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推动下，重庆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宪政团体纷纷成立。如以重庆妇女为主体发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宪政研究会等，着重讨论宪政问题与妇女解放问题；以重庆青年为主体发起组织青年宪政座谈会、青年宪政促进会等。此外，在成都、昆明、广西、安徽等地区，一系列宪政组织与团体也不断成立，并积极地开展活动[64]。成都的宪政运动主要以大学教授为主体，他们多次讨论了宪草修改问题。云南的地方人士和大学教授对“五五宪草”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广西，不仅成立了以李宗仁为主席的宪

政协进会，而且还由“广西建设研究会”出面组织若干小组，对宪法草案的各个部分进行了分别的具体研究，并通过电台发表意见。安徽、浙江、广东等地，也纷纷成立各种研究宪政的团体。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也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热潮。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会议发表宣言指出：今日实施宪政的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代表必须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修正，应使国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应该发起普遍深入的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法选举国大代表的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和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自由。大会还推举吴玉章为理事长，毛泽东、陈云、张闻天、王稼祥等45人为理事[65]。此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是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解释说：“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但是，“真正的宪政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66] 随后，延安地区还相继成立了“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新闻界宪政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工人宪政促进会”等组织。此外，晋察冀根据地新闻界宪政期成会、皖南宪政运动期成会、晋西北宪政促进会等也先后发起成立。

面对日趋高涨的宪政运动，国民党内一些人开始恐惧、担忧起来。他们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对宪政运动进行抵制、打击。首先，限制封锁关于宪政运动的消息与言论。国民党利用新闻检查机关对各地报刊和书籍等进行严加控制，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刊登诬陷宪政运动的“理论”，甚至在参政员25人所召集的宪政座谈会中进行捣乱，在各地方则严禁宪政运动的出现，以致许多地方报纸连“宪政”二字都

不许出现[67]。同时他们又利用所控制的报刊大肆刊载诬蔑宪政运动的文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曾公然宣称："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也说："研究可以，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文章，来什么运动！"[68] 国民党当局把限制宪政活动的举措法律化，还甚至派出特务四处进行破坏宪政团体的活动。

1940年2月，鉴于宪政运动超出了他们划定的范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对于实施宪政的四项指示，对于实施宪政与训政的关系，强调："我们一方面要求实施宪政，一方面要求宪政实施后继续进行训政未完成的工作。"对于国民大会之选举与职权，强调在过去由他们一手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仍然"一律有效"。对于宪法草案问题，强调"五五草宪"的合法性"自无疑问"。对于宪政问题之讨论，强调："在此战事未结束前，政府对于为研究宪政而组织团体之举，自亦不能不设定必要之限制，以防流弊，在重庆方面国民参政会之宪政期成会为研究宪政向政府贡献意见之合法机关，为集中意志起见，不必另有其他组织；其他各省市如有组织之必要，亦只须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参议会组织宪政研究团体，领导各该地关于宪政问题之研讨。"[69]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业已获得广泛群众认同甚至参与的宪政运动，完全纳入国民党当局可以接受、可以掌控的范围与程度。

对于宪政期成会提出的宪草修正案，蒋介石甚为不满。1940年4月5日，在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对宪草与实施宪政的意见。他说："我们看世界各国宪政历史，凡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当其施行之始，规定得愈详细，愈繁密，尤其对于政府职权限制的愈严格，就愈不容易实现，而且流弊愈多，乃致毁灭越快，其结果只有宪法之害而无宪法之利。这就是因为制宪的人不明了在开国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有能的政府，宪法规定，必适合这个开国时期的需要，才能够推行尽利，以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因此，他以中国民众教育落后，知识低下，政治素养缺乏为由，反对将外国宪法成规

不加抉择地仿行于中国，并提出："我们一定要使宪法能够实施有效，至少要在10年或20年之中一定要求条条作到，否则如果有了宪法而再遭破坏，则国家永无挽救的希望。"[70] 王世杰认为，蒋介石的这番谈话是"对于宪草中牵制政府权力之规定，表示不满"，使得诸参政员"颇懊丧"[71]。这并不奇怪。宪政运动的迅速兴起，确实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各界对于实施宪政的迫切性，甚至将其等同于中共的主张。1939年11月，即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刚刚问世，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到："共党态势，似在宪政方面求活动"；"共党叛乱，非到其实力充足后不敢公开发难，宪法与国民大会问题不过藉此掩护其活动而已。"[72] 在对中共和宪政运动的双重偏见之下，当时的宪政运动势必遇到挫折。

1940年4月18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一百四十五次会议通过《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根据《办法》规定：凡关于宪政问题的集会，除由中央直接派人分赴各地办理外，得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召集；凡关于研究宪政问题的团体，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组织之；凡关于宪政问题的言论，应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训政纲领、训政约法、抗战建国纲领、总理总裁有关宪政的指示，暨国民政府公布有关宪政法令为依据，宪政言论如有反对宪政及违反三民主义而曲解宪政者，应该一律取缔之等[73]。至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延期召集国民大会[74]。到了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国民政府关于延期举行国民大会的决定："军事倥偬，交通不便，国民大会筹备未及，不克如期召集，此系限于事实，诚非得已。"[75] 至此，这场宪政运动实际上已经中止了。

这次发生于抗战前半期的民主宪政运动，是大后方进步民主力量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一次可贵尝试。它宣传了民主宪政的思想理论，促进了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的团结与合作。特别是中共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提高了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

位和影响。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对中国战时以及战后民主政治发展影响深远。

第三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抗战爆发之初，为了集聚力量抵御日本的武装入侵，国民党一度放松了对中间政治派别活动的限制，使得中间力量获得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合法地位。待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国民党当局“极力统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一切活动，几乎使国民党外的人都不得自由。……这样使得广大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特别是青年，都失去了抗战初起时那兴奋活跃，而陷于抑郁消沉”。一些“历来奔走国是，为社会不断出面”的中间知识分子精英，“势不能瞠目而视，袖手不动了”[(76)]。他们逐渐意识到单个党派力量的薄弱，难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意识到应采取联合行动以加强力量，于是他们开始酝酿成立联合政治组织，在国、共两党之外扮演重要角色。

有鉴于此，1939年10月，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数度聚会，就时政问题交换看法，进而提出了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联合组织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担心“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战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各小党派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调解，“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对敌”。二是看到抗战初期各抗日党派所争取到的一些民族权利受到限制或取消，国民党不仅反共，也打击各小党派，“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各小党派应联合起来，“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77)]。于是，与会者决定成立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1939年11月制定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78)]。“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形式上未表明是党

派联合体，但实则国共两党以外的那些党派人物，差不多全在内。例如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国社党的罗文幹、罗隆基、胡石青等，第三党的章伯钧等，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遹、江恒源等，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皆是。还有一些个人参加，如张澜等。当时订有《统一同志会信约》十二条，揭示他们的信念和主张，主要内容有：该会“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反对国内暴力斗争及破坏行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要求更进一步之统一；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行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内战，等等[(79)]。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确定后，为免致当局误会，托王世杰、张群将信约十二条转呈最高当局。1939年11月29日，梁漱溟受同人委托面见蒋介石，着重说明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蒋许可这一组织的成立。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同意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该会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80)]。

此后，统一建国同志会进行了一些活动，为调解国共关系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总的来说，活动成效不大。各中间党派感到，目前尽管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但各党派仍然是各自一摊，缺乏力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更加有力的组织。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中，把原来便很少的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了几个，而增加了国民党人员。这引起了民主派人士对国民党的悲观和不满。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人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并提出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成立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81)]。嗣

后皖南事变发生，中共的遭遇和国共之间的尖锐对峙，使得中间派别感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他们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以便拓展生存空间和扩大社会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酝酿成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13人。会议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等，并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82)]。后来救国会也正式加入到政团同盟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无党派人士也可入盟。10月，张澜出任中央常委会主席[(83)]。

鉴于国民党反对成立新的政党，民盟是秘密成立的。为了实现由秘密组织向公开组织的转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采取了几个重要的步骤：首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向海外公开自己的组织以及纲领主张。由于国民党不允许民主人士以第三者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84)]。1941年9月18日，经过一番周折与努力，特别是在中共帮助下，《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该报创刊号上刊载了《出版公约五项》，提出：“民主精神为团结之本，其意甚近，并不在远，吾人以政治上实现民主为基本，而先以言论之民主精神自勉。”10月10日，《光明报》同时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其《宣言》中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关于成立之原由，《宣言》指出：“国事好转诚

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入后转不如初，此其事亦皆在人耳目，无烦缕指。要而言之，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则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同人于此，曾本严正之态度，为宛转之尽力，而卒未有补。瞻望徘徊，深惧国不亡于暴敌，功不败于寡助，而顾由吾人自丧其前途，是真民族之不肖子孙，上无以对先民，下无以对后世。”“爰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将以奉勉国人者，先互勉于彼此之间。以言结合动机，端要如是。”关于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包括十项，分别涉及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督促并协助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确立国家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厉行法治，尊重思想学术自由，以及党治、政务应注意各点等[(85)]。

其次，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说明自身组织与活动。如陈友仁、陈翰笙曾主持记者招待会，向外国记者就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问题做出说明与保证。还向欧美等记者散发宣传民盟文件的英文本。招待会结束后，各国记者纷纷向海外各地发布有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消息。再次，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公开自己的组织。如1941年10月9日，蒋介石设宴招待参政员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就国际国内时局交换意见。张等人则证实民盟确实存在。10月11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谈话会，张君劢、左舜生、张澜、李璜、罗隆基等都公开表示对民主同盟负责。民主政团同盟各党派还组织联合办事处，并驻处办公等[(86)]。

最后，召开茶话会正式公开组织，并向国民参政会提呈议案。1941年11月16日，民盟主要负责人在重庆召开了正式公开组织的茶话会。茶话会由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和黄炎培召集，与会的其他党派有中共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以及国民党的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二届二次会议，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

劢、左舜生、罗隆基等向会议提呈了根据民盟纲领拟定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提案再次提出宪政要求，并拟具办法十条，要求“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并预防青年依赖心理，增加其对国体之主义或主张之纯洁信仰，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发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实行经济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87)]。由于蒋介石的抵制，该案“未付讨论”。但这却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以政党的面貌在公开场合出现，实现了其由秘密组织向公开组织的转变。

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88)]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除少数为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外，它主要的是由三党三派组成。即民主政团同盟有两种盟员，一种是有其他党派关系的盟员，一种是没有党派关系的盟员。凡是入盟的党派的成员都有两重党籍。既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又是另外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他们不受盟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松懈的政治团体。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政治力量发展的一件大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影响和力量超过以往任何中间政党的新的政党，它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它有利于民主势力，而不利于国民党顽固派。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89)]。

第四节　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领土大面积沦丧，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也为了配合政府的抗战，全国社会各界民众，世界各地中华儿女，无论工农学商，还是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迅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中华民族救亡史上最为雄伟悲壮的篇章。

工人在抗战中一直充当着先锋作用。如上海地区，在中共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按地区、产业系统或以工厂企业为单位，先后组织起来的工人抗日救亡团体有40多个。其中在按地区组织的救亡团体中，比较活跃的有沪南青年救亡团、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沪西青年救亡团、上海纺织工人救亡协会等[(90)]。又如1937年9月，在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的推动下，以太原毛织厂、晋生纺织厂、太原兵工厂、炼钢厂、育才机器厂、印刷厂、晋华卷烟厂、火柴厂、窑厂、皮革厂、造纸厂以及被服厂等工人为主，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又发展成5000余人的工卫旅，辖3个团，在汾阳、文水、交城、清徐一带活动，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又如石家庄失守后，正太铁路工人冒险将一批火车头、车厢、部分器材等，从正太路运往同蒲铁路。工人们的英勇事迹受到交通部表扬，国民政府也发给10万元奖金[(91)]。此外，在战时工厂内迁过程中，工人们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立即投入到拯救民族的神圣抗战中去，表现出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和强大力量。“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连续不断地举行反日游行和罢工。1937年7月中下旬，上海日商中山钢厂的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日商亚细亚丝业厂工人全体离厂。7月31日，日洋行及住家的华人雇员实行告退，“日人大起恐慌，多允增加工资，而各职员及雇工，毅然不受金钱诱惑，断

然告退”[92]。香港日船华工自动离职，使40多艘日船不能开航。武汉铁路流亡员工抗敌服务团发表《告全国铁路流亡同志书》，表示坚决拒绝替敌人做工，尽自己的力量参加抗日工作。日舰向“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借调长江中段领江员各五名，尽管当时失业海员很多，但武汉海员深明大义，拒绝为日舰引水。广州沦陷后，广九铁路千余员工中，除十人为敌工作外，其余都宁可失业不为敌用，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操。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许多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同军队并肩作战，挖战壕、救伤员、运送军用物资。为支撑起战时的经济，广大工人群众自觉加班加点，增加工时，努力生产[93]。

抗战爆发后，各地工人纷纷成立工会组织和救亡团体。1937年9月，山西总工会成立，太原27个工厂的7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1938年2月，同蒲铁路工人召开同蒲铁路总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成立全国铁总。4月17日，延安召开陕北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各地工会及工人救亡团体派代表参加，目的在于加强联络。各地工人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为了统一工人组织，团结全国工人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朱学范等人先后到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同当地劳工界人士举行谈话，召开座谈会，交换关于劳工界当前救亡问题的意见，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界抗敌组织。在中共长江局工委与朱学范等“劳协”领导层的努力下，经过反复工作，决定共同酝酿发起组织全国工人抗敌总会。3月5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在武汉宣告成立，推举朱学范为筹备会总负责人。

3月24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欢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的决议。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派人参加，并推选朱学范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标志着抗战时期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工会的统一战线的形成[94]。

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更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在平津、淞沪抗战中，战地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力，参加构筑工

事、修筑道路，为部队送水、送饭、送弹药物资、送情报，抬担架，救护伤员等。如1938年2月，皖北地区农民数千人组织起来，以游击战击退日军千余人向蚌埠南山地区的进犯。据统计，至1939年，山西省有121个县建立了县区等各级农民救国会，会员人数达到120万人[95]。

在“七七”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山西抗战、徐州会战等多次战斗中，广大农民积极配合中国军队，供应粮米柴草，抢运军用物资，铺路架桥，修筑工事。日军进攻山西时，农民坚壁清野。平型关战役中，农民封锁消息，保证了八路军伏击成功。台儿庄战役中，民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为了迅速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中共的领导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多种抗日团体。在山西，广大乡村普遍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农民积极投身抗日，保家卫国。在冀中、冀南、冀东、山东、陕甘宁边区也普遍建立了农会等群众组织。在农会的组织下，边区农民积极开展生产建设，踊跃交爱国公粮，破坏日军运输线，开展锄奸工作，积极购买救国公债，募捐慰劳八路军将士，参加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大批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加人民武装，很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甚至父子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给抗日武装以源源不断的新兵补充。1938年到1939年，晋察冀农会组织共动员了2万多农民参加八路军。广大农民群众还组织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中。中国农民在抗战初期就已显示出其主力军的伟大作用[96]。

学生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号手，起着先声的作用。如上海地区，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各校学生积极组织各类救亡团体，如抗敌后援会等，人数多则一二百人，少则二三十人。“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学生们有的参加游击队、别动队、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有的组织各种青年救亡团体。1937年10月28日，上海学生界举行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并通过提案20余条[97]

。又如沦陷区和大后方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参加敌后抗日斗争。从延安迁至泾阳地区的由胡乔木、冯文彬等负责的安吴青年训练班，就团结了海内外大批青年学生[98]。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国学联”），成立后立即联络各地学生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部分学联领导人来到武汉，商议恢复学联工作，决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3月24日，全国学联筹委会在汉口举行预备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会章，审查了代表条例和本届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聘请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为大会名誉主席，推举香港学生代表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推举蒋南翔等人为大会秘书，负责大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25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汉口商会大礼堂召开，陕西、河南、四川等十六省主要学生团体共73个单位123人出席了会议。国共两党负责人陈诚、周恩来、邵力子等及各界领袖也到会表示祝贺。

全国学联恢复活动，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了一批抗日青年，引导他们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并使“学联”争得了合法地位。《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学生是中国救亡运动一支极有力量的队伍”，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定下全国学生大团结的基础”，结成“全国学生精诚团结的统一战线”，克服“摩擦”，使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为动员组织全国学生参加救亡工作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99]。

在“一二九”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到1938年4月，其成员已有3万余人，其中西北地区有一万多人，在大西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在华北，一批批“民先”队员走向敌后战场，当时华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民先’”。“民先”还在武汉成立办事处，由共产党员于光远任主任，有力地推动着华南各省“民先”组织的发展

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为了尽快把沦陷区流亡到武汉的青年及武汉地区的青年组织统一起来，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共湖北工委在“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武汉民先队”的基础上，于1937年12月28日，在武昌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抗日团体，即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团”）。截至1938年7月，“青救团”成员达4万多人，仅武汉就有一万多人。“青救团”的建立，加强了中共与在汉各青年进步团体的联系，为开展湖北地区及全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各地的青年也迅速动员起来，纷纷组建青年抗日团体。在武汉还有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蚁社，广东有青年抗日先锋队，江西有青年抗战服务团，河南有青年救亡协会，甘肃有青年抗战团。在陕甘宁边区，从乡、区、县到边区均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在晋察冀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成员达8万余人；鲁西北有青年救国团，晋东南有青年救国团，至1939年3月，会员达25万人(100)。

商人、资本家作为有产者，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如1937年8月12日晚，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发表播音演讲，号召全沪市民奋起抗争，以全力保卫上海。他说：“诸位同胞，现在真到了最后关头了。每个人只该埋头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觉得为了国家，流血、流汗、捐钱、捐物，都是最光荣、最有价值的行动。”他又满怀信心地说：“现在各银行，各钱庄，各报馆，都在代收救国捐，我预料明天清晨，一定有许多爱国同胞，一早就等候在银行、钱庄、报馆门口，踊跃输捐。”1937年9月2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各省、市商会，就国民政府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事宜进行宣传鼓动，通电认为：“此次对日抗战关系全国存亡，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伍万万元，实为厚集财力，持久制胜之准备，意义重大。”“何况三十年还本，年息四厘……，但使敌人驱出国外，则投资仍旧收回，与完全捐助者不同。”通电还宣称：救国公债上海市商界

劝募总队业已成立，其募集办法是商店以其资本额承购5%，公积款项承购10%为标准，店员月薪满50元者承购10%，不及50元者，自由认购。并建议其他各省、市商界参酌仿行沪市办法。同时，上海商会及银钱业宣布对日经济绝交[101]。商业界还广泛开展了抗日义卖捐献活动，“从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到中小城镇，从卖日用百货到蔬菜水果，从大商行到小商贩，普遍掀起义卖日和义卖竞赛的热潮”[102]。

各中间党派、文化、宗教、妇女各界，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也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如“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保卫北方，要求推行抗战国策，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8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1938年7月，两刊合并为《全民抗战》[103]。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到会者有诸青来、胡愈之、潘公展等500余人[104]。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建立后，上海戏剧工作者也于8月17日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的统一组织，并将所有的人加以战时的编配，而成为后来支持抗战戏剧的主流的13队救亡演剧队[105]。上海文艺界同人还于8月16日组成了战时服务团。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宣告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06]。“文协”以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107]。“文协”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它聚集了全国一大批知名作家，使得文艺界达到空前的团结。“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抗战文艺”的组织与指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上海宗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其他地区的宗教团体也纷纷以召开反侵略大会或从事募捐等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何香凝等人便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妇女工作大纲》，规定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确定将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作为党的妇女工作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相继兴起。动员起来的中国妇女首先建立起自己的团体组织。广东建立了广东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广州市妇女抗战同志会、女界联合会等30多个妇女团体，香港有妇女慰劳会，江西有妇声社、妇改会，上海有妇女界救国会，河南有妇女抗敌协会，武汉有湖北省妇女工作团。各地还建立了各种妇女战地服务团，如西北妇女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等[108]。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界谈话会，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和社会知名妇女参加。宋美龄提出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经过讨论，到会人士表示同意，但建议对“新运妇指会”加以改组扩大，以适应战时妇女工作的需要。会议决定以“妇指会”为基础，加以扩充，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包括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的妇女团体总机构，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这是一个动员全国妇女团结抗战建国的共同纲领。《大纲》指出，占国民半数的妇女，应该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参加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提出了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任务，即是宣传、救护、征募、慰劳、救济、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侦察除奸，以及从事工、农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这个《大纲》基本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妇女界联合抗日的思想政治基础。座谈会于5月25日结束，发表了《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各界领袖，不分党派信仰，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团结起来，奋起抗日[109]。

各少数民族也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潮流中来，如1937年10月，在中共领导下，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活动于大青山一带，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又如回民马本斋带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发展迅速，在先后六年中，一共作战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110]。

1937年7月29日，居住在抗战前线的北平回民同胞组成北平回民守土后援会，通电全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本牺牲到底的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日军侵占华北后，利用回族汉奸马良建立所谓中华回教总联合会、中国回教青年团等伪组织，各地回胞闻讯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通电反对，将马良开除教籍，并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号召广大回民"团结奋进，保持爱国荣誉"，同马良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冀中回民组织了抗战建国会及各级分会，将该地区30万回胞团结在自己周围。包头地区组织西北回民救国会，西安、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回民也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救亡运动。

在归绥，1937年10月，中共成立三边工委，次年4月又成立绥蒙工委，积极开展伊盟、河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乌审、郡王、扎萨克、杭锦、鄂托克等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了抗敌委员会、战地动委会、牺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蒙古族一些上层人士参加并领导了对日作战。

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西藏同胞积极拥护抗战。班禅九世和热振活佛多次向僧俗大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5月，热振命三大寺上下二密院及古刹一律设坛修法，祈祷抗战胜利，20万喇嘛参加了这次祈祷活动，这在西藏历史上是少见的。同年9月，热振致电在武汉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表示拥护祖国统一，祝愿抗战胜利。著名的喜饶嘉措大师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所到之处，或聚众演讲，宣传抗日；或诵经读典，为国祈祷，听众深受教育和鼓舞。1938年9月，他在重庆发表《告蒙藏人士书》，号召努力抗战，挽救国家厄运。

为了回击日帝挑拨中华民族的团结，1938年4月7日，在武汉隆重举行了“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的献旗大会，周恩来、陈诚等国共两党负责人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藏族代表格桑泽仁说，我们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团进行慰劳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粉碎敌人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改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会各族代表一致表示要加强民族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

在新疆，由于中国共产党同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大批党员进入新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相继粉碎了日帝的走狗马木提、马虎发动的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并迅速组织了后援会、反帝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111)]。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援助。这些身居海外的中华儿女面对祖国的遭遇，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抗战一爆发，各地侨胞就云涌地组织起来了，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立即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在欧洲的，成立了欧战华侨救国联合会；在美洲的，成立美洲华侨抗日统一阵线。美国十万华侨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影响下，组织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全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开展捐献活动。纽约市区每月参加救国捐款活动的华侨达3万人次，1937年下半年捐资已达100万美元。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美元[(112)]。

在南洋的华侨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14日，南洋地区统一的华侨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为主席。此后，南洋地区各种华侨救亡组织先后成立。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该会下设分会68个，所属团体遍布南洋各地区[(113)]。另据统计，自1937年7月22日至8月13日，总计收到南洋侨胞捐款18宗，数额达8万余元；“八一三”以后的捐款，亦颇多为“八一三”以前所汇

寄，其中温哥华华侨捐寄35200元，西雅图侨胞捐寄71186元[114]。

抗战爆发至1940年6月，海外华侨献给祖国的捐款已达6万万元以上，单是南洋华侨已由战前的每年3万万汇款，增加到了11万万（1939年）[115]。除了募捐、侨汇外，华侨还通过购债、投资以及把大量战需物资输送回国，如飞机、战车、汽车、药品、服装、帐篷、胶鞋等。华侨对抗战物力上的供给，最重要的是医药，据陈嘉庚先生报告，单是奎宁丸一种，南洋侨胞献给祖国的，其价值达250万元。其他如救伤袋，妇慰会菲岛分会一处便捐送了10万个；寒衣募集，南侨总会负担了50万件[116]。此外，抗战爆发后，大量华侨中的技术工人和青年，放弃国外安全优裕的生活，回国参加抗战。据《华侨战线》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2月，仅经广州回国抗战的就有30批，近2000人，他们或参加救护运输工作，或直接上前线杀敌[117]。

此外，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侨商不卖日货，侨民不买日货。各地抗日救国团体制定具体办法，认真执行。1937年日本对东南亚贸易总额为7.6亿元，1938年降至4.666亿元，由历年的贸易出超变成入超。华侨的罢工和禁运禁载运动也有效地削弱了日本侵华的军事实力[118]。

海外华侨全力支持和直接参加祖国的抗战事业，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840-841页。

(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2-24页。

(3)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 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1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 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致蒋介石电（1939年4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254-255页。

(6) 《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7) 《中央对时局指示》（1939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341-342页。

(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16页。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28页。

(10)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371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37-941页。

(12)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42页。

(13)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372页。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10页。

(1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393页。

(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424页。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54-959页。

(1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61-962页。

(19) 《中国共产党六月提案》（1940年6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64-965页。

(20) 《国民政府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6-507页。

(2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8-509页。

(2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78-979页。之所以称何、白“皓电”为蒋介石所指使，可以蒋10月21日的日记为证：“本日令共党部队撤退至黄河北岸，限十一月底为期，试观其能否遵令，即可断俄国对华最近期间之政策矣。”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9-512页。

(25) 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 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7日、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7)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日：“催发复朱彭电稿。”1940年12月3日：“修正复朱彭电稿。”1940年12月7日：“今日修正何白复朱彭电稿，颇费心力，卒无错误。”均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8) 《何应钦白崇禧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齐代电》（1940年12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11-519页。

(2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463-465页。

(3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1页。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2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23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6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41页。

(36)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1-15页。

(3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22—524页。

(3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4、547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7-988页。

(4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8、550—551页。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48页。

(4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3—544页。

(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56-1058页。

(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58页。

(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67、569—570、572页。

(46)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47)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69页。

(48)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159-1161页。

(5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69页。

(51)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69页。

(5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9月12日，第149页。

(53)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81-582页。

(5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755-756页。

(55) 邹韬奋：《关于宪政提案的一场舌战》，《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94页。

(56)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618-619页。

(5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5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658页。

(5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610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05-1207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194-1196页。

(6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3月29日，第249页。

(6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682

页。

(64)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

(65) 《国共关系70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0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9页。

(6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02页。

(68)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314页。

(6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42-1244页。

(7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44-1245页。

(7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4月6日，第253页。

(72) 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9日、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第567—568页。

(7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9月18日，第345页。

(7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983页。

(76) 梁漱溟：《谈统一建国会之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54页。

(7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17页。

(78)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79)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3页。

(80)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第479页。

(8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60页。

(82)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326页。

(83)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第480页。

(8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63页。

(85)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86)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334页。

(8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80-1281页。

(88)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89) 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461页。

(9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283页。

(91)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92)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209页。

(93)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94)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280页。

(95)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96)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10页。

(97)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246、258页。

(98)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7页。

(99)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5日；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

(100)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101)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313—316页。

(102)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7—148页。

(103)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2—153页。

(10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158页。

(10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10页。

(106)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4页。

(10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29页。

(108)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09)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10)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8—150页。

(111)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页。

(112)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113)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7页。

(11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页。

(1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

375页。

(1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375页。

(117)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第290页。

(118)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第291页。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
(1937—1941)
下

吴景平 曹振威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

（1937-1941）

下

吴景平　曹振威　著

中华书局

目录

第九章　国统区的财政金融与经济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作
一　战时经济纲领和基本政策的制定
二　战时经济机构的进一步调整
三　战时物资管理与统制
第二节　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　战时财政征收
二　大举内外债和停付关盐税担保外债
三　巨额赤字和通货膨胀
第三节　战时金融
一　安定金融和维持法币汇价的努力
二　四联总处的主要活动
三　战时后方的银钱业
第四节　战时大后方的生产和交通
一　大后方的工矿业
二　大后方的农业
三　大后方的交通运输
四　大后方的邮政电信
五　大后方的商业和贸易
第十章　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成立和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第一节　筹组汪政府的活动
一　汪精卫赴日会谈
二　建立特务组织
三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四　汪伪集团与“临时”、“维新”政权的交涉
五　日汪关于“日华关系密约”的谈判

第二节　汪伪政权还都南京
一　汪伪集团的还都丑剧
二　汪伪党、政、军机构的建立
三　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第三节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一　日汪“清乡”运动
二　伪满洲国的殖民地政治与文化
三　华北、华中沦陷区的政治与文化
四　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五　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斗争
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中德关系的曲折反复和断交宣战
一　德国承认伪满洲国
二　德国政府执意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三　购料易货关系的勉力维持和中止
四　中国对德断交与宣战
第二节　对法国的交涉和中法关系的倒退
一　寻求法国援华和中、法军事合作
二　中国输出入货品过境越南的交涉
三　法方对日妥协和中、法政治关系的倒退
第三节　苏联援华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波折
一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二　围绕对华军事援助的交涉
三　中苏三次信用借款协定及其实施
四　欧战爆发后中苏政治关系的波折
第四节　围绕英国对日妥协的交涉和寻求财经援助
一　关于英日在中国海关问题协定的交涉
二　关于天津租界和白银问题的交涉
三　关于封闭滇缅路的交涉
四　关于财经援助和平准基金借款的交涉

第五节　美国对华提供贷款和租借援助
一　寻求美国对华提供商业信贷
二　中美平准基金借款交涉
三　力争美国对华提供租借援助
四　居里和拉铁摩尔访华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九章　国统区的财政金融与经济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确定和实施军事抵抗的过程中，对经济体制逐步进行了调整，使之适应抗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战时经济体制。战时经济体制主要包括指导经济体制运作的经济纲领和基本政策，以及实施这些纲领政策的基本机构。

一　战时经济纲领和基本政策的制定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头半年里，国民政府颁发过一些带有战时经济统制性质的文件，如《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有过一些较具体的规定。而在1938年3月底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其中《抗战建国纲领》的经济部分共八条：（1）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2）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3）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4）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5）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6）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7）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

路公路，加辟航线。（8）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1]。这八条经济纲领，涉及到战时的生产、流通、财政、金融等方面。而会议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分别提出了各个经济领域的基本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一）推进农业以增生产　1．农民生活应使安定；2．有用作物之生产应使增加；3．大宗农产品应设法积储调剂；4．农村经济应使活动；5．土地分配应逐步改进。

（二）发展工矿以应供需　1．固有工矿设备应设法保存，以充实内地生产能力；2．国防急需之工厂应积极筹设，政府除保全原有生产力之外，更应创造新生产能力；3．燃料及动力应妥筹供给；4．农村手工业应提倡促进；5．民营事业应扶植奖导；6．资本与劳工之利益应兼全并顾。

（三）筹办工垦以安难民　提出安置难民从事生产工作，以增加抗战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垦荒，要求于最短期内勘定各省荒地，办理难民移垦登记，并拟定各项垦殖实施办法，次第施行。

（四）发展交通便利运输　1．国内交通线路应加速添设，包括铁路、公路和内河航线；2．国际交通线路开辟扩充，包括铁路、公路、电信和航空。

（五）分别地区调剂金融　1．沦陷区；2．接近敌区；3．距敌远区；4．复兴根据区。要求以政府有关规定方法为经，以分区施行为纬，切实推行，期收良效。

（六）管理贸易以裕外汇　限制非必需品与奢侈品的进口，改善出口环境和发展出口产品生产，鼓励大量出口，以所得外汇巩固战时金融，发展国内贸易和生产事业。

（七）厉行节约以省物力　凡政府机关不必要之开支，不能即生

效果之建设费用，均宜切实核减；至私人经济，应尽量节省物力财力，贡献国家，用于抗战[(2)]。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纲领以及基本政策，成为以后几年里国民政府制订实施具体财经金融政策的基本依据。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更加重视确立起战时经济统制和经营方针，认为："抗战现已进入第二阶段，经济建设，尤其西部各省之生产建设，必更加速其发展，始能适应抗战之需要。"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应该厉行的四条原则：1．确定工矿等业之统制方式，凡与国防有重大关系之工业以及重工业，自以国营为原则。但经中央许可，仍得由省经营之。其他矿业、轻工业、农业以及不带军用性之普通商业，则务必采奖励民营之方式。2．确定工矿等业之经营方针，国营及省公营工矿等业，应均以供给国防需要、增进社会繁荣为方针，不以与民争利为目的；中央应尽必要范围内给予省营事业以积极的经济援助，减少地方困难，增进地方与中央联系；对于民营事业，中央应以扩大现时奖助总预算，予以保息、保债、垫款、贷款等进行积极辅助。3．确定改进交通事业之计划。4．确定各种工作完成之期限并严订考核程序[(3)]。鉴于日本侵略者在前方区域日趋猖獗的经济侵略与掠夺活动，国民党当局还确定了不同地区的基本经济政策，沦陷区域之经济政策应以破坏为主，游击区域之经济政策应以保存资源、扶助民众为主，作战区域之经济政策应以免济敌以粮为主[(4)]。换言之，让西部各省成为战时经济的基地，在统制基础上综合协调，调动中央与地方各种经济力量，发挥其生产建设之积极性，从而促进大后方经济建设，增强持久抗战的实力与物质基础；而在沦陷区、游击区、作战区则以破坏敌方经济、保存我方经济力量为原则。

随着战线的扩大和战事的持续，战时经济的负担十分沉重。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认为中国战时"经济力之能否持久"，已成为中国抗

战“最后胜利之关键”，进而指出基本经济对策为：“积极动员全国人、财、物力，加强战时经济体系，以求生产之增加、分配之公允，并厉行消费节约，务使一切经济之力量，得收全盘控制之运用。”会议制定了《战时经济体系基本纲领》，共十条：

（一）确认当前对敌经济斗争为胜利之主要关键，树立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之基本信念，确立战时经济体系努力之方针。（二）深切了解新时代国防经济政策之重要，并全力推行，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之目的。（三）限定最短期间，充实并调整各级经济机构。（四）动员全国专门人才，分配于各级经济机构中。（五）动员全国优秀青年，施行短期训练，充任经济抗战之战斗员。（六）动员全国工人、农民和妇女，分期加以组训，积极从事生产事业。（七）经济机构均依军事部署与科学管理，统一指挥，分层负责。（八）对人民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消费，应作有体系之计划统制。（九）对于金融、贸易、运输、生产等关键事业，以扩大国营，联合民营，加强联系等手段，使成为整个经济抗战集体。（十）厉行对敌经济斗争[(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订立了《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是关于经济总动员的。《实施纲领》提出了五项目标：1．全国人民力量充分发挥，合理使用；2．士兵之粮秣、械弹，供应无缺；3．土地之使用竭尽其力；4．一切物力之补充，继续不匮；5．全国人民之生活能维持健康之水准。为达到这些目标，又提出了多项要求，其中与社会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等直接相关的有：提高工作效能，增进物资生产；任何人劳力所获或所有之物资，除本人及其他节约合理需要外，应尽量提供政府征购或借用，不得私作无益消耗或囤积隐藏；全国土地应受国家之统制；生活必需品之物价应由政府管制，严禁违法抬价[(6)]。

战时经济纲领和基本经济政策的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强制性地要

求各经济实体及其从业人员，均必须以发展战时经济为第一要务。对于这一点，国民政府及主管部门曾多次颁发相应的条例。

抗战爆发后不久，行政院便训令各省政府：在抗战时期，各地工商企业应加紧生产和调节物品，不得自行紧缩和收歇，无论部分或全部歇业，均需事前呈请许可[(7)]。待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在修正公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数十种经指定的农产品、矿产品和轻重工业品，“其生产者或经营者，非经经济部核准不得歇业、停业或停工。其已歇业、停业或停工者，经济部得限期令其复业复工”；指定各企业之员工不得罢市、罢工或怠工；但对所用原料为军用必需品者，制造非必需品而所用原料供给缺乏者，经济部得令其停业，并将其土地、房屋、机器、动力、材料、工具等移作其他用途[(8)]。

这些，都是从消极方面来防止现有生产力的浪费。此外，更从积极动员和鼓励出发，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奖励发展工矿业　1938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工业奖励法》及《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凡应用机器或改良手工制造货物在国内外市场有国际竞争者，采用外国最新方法首先在本国一定区域内制造者，应用在本国享有专利权之发明在国内生产者，可申请奖励；凡实收资本在100万元以上，并且制造原动力机、电机、工作机器、冶制各种金属原料、采炼各种液体燃料、制造运输器材，其他经政府认可的重要工业，得呈请保息或补助[(9)]。一年之后，又把可申请奖助的重要工矿业确定为电气、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制造、采矿、冶炼等七个行业，范围要比原先扩大；同时把实收资本的限额从100万元改为20万元，体现出对中小规模工矿业的重视[(10)]。另外，除了保息和现金奖励之外，还扩大了奖助的方式，包括：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原料税、转口税及其他地方税捐，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免除和酌减公有土地之地租，提供低息贷款、提供运输上的便利[(11)]。为了发展战时急需的矿业，国民政府修订了《矿业法》，在重

申“中华民国领域内之矿均为国有”的同时，允许各地在行政院核准后，可与外人合资经营矿业，但半数以上的股份应为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有，并有半数以上董事系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之代表，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所派[12]。

（二）重视农业　在中央政府内设农产促进委员会，为发展农业的最高设计机构；设中央农业实验所，主管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推广战前业已开始的合作事业，至1938年底，在国统区已有农业合作社3万余个。根据战时出现大量难民的现实，鼓励组织难民移垦，国民政府要求各省调查并划定垦区，拟订移垦计划和实施办法，帮助垦民建筑住所，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垦民解决移垦第一年所需之食粮、农具、耕牛、种籽、肥料、饲料、种畜等，免交田租三至五年。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并把拓宽农村金融业务视作战时农业经济发展之关键，设农本局主持之。财政当局要求各地金融机关设立农产仓库，增加农产押款，增放农田机器借款和农田水利借款，农民得凭存仓农抵押借款。起初，各金融机关仅以合作社为提供农贷之对象。1938年6月，财政、经济两部联合修正通过了《扩大农村贷款范围办法》，规定农民组织亦得为贷款对象[13]。至1942年1月，四联总处又决定，中央信托局和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发放农贷之对象，包括：1．合作社、互助社、农会等农民团体；2．以改进农业为目的之机关、团体、学校；依法登记之农场、林场、牧场等。农贷的种类也扩大为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农产运销等方面[14]。

（三）开发西南地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在组织安排沿海工业内迁时，便有意识地把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作为重点接受地区。国民党中央政权移至四川后，不仅在政治上提升西南各省的地位，且在经济开发上予以重点扶持。1939年初，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南建设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任委员长，四川省主席张群为副委员长，有关各部的部长、各省主席为委员。国民政府把发展交通运输作为开发西南地区的重要措施，规划和兴建了多条省际公路、铁路干

线。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亦以西南地区作为发展矿业、基础工业和其他工业的重点所在。

二　战时经济机构的进一步调整

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设立的国防最高会议，既是政治和军事领域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经济决策的最高机构。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中包括对国防方针、国防经费、国家总动员事项的决定[(15)]，在战时当然也包括了对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至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设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既取代了原国防最高会议，又明确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之职权，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6)]，经济决策权同样也高度集中了，这是战时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备的标志。

从战时经济具体机构的设立和调整来看，起初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强化军事部门的作用，来应付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为了应付战争爆发对经济造成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当局决定对战时经济“加以严密之组织，予以适当之调整，济以有力之援助”，以解除战争带来的困难，促进农、矿、工商百业之发展。1937年10月，在蒋介石的提议下，经国防最高会议议决，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农业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三个调整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和使命，在于调剂农村经济，保育实业生产，保持国际市场，并“各就主管范围，督促管理，负责调整”[(17)]；另在军事委员会设第三部管制矿产品和重工业品，设第四部管制农产品和轻工业品，设第六部管理交通运输，都体现了这方面的用意。

但是，上述军事部门与已有仍在发挥其职能的政府经济部门，如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显然有职权划分不清、机构重叠的问题，导致了经济决策和管理方面的混乱。为了适应战争持久化的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对经济机构进行较系统的调整。

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对行政院进行改组，将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为管理全国经济行政事务之机关，对于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执行经济行政事务，有指示监督之责[18]。原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归并入经济部；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与经济相关的若干机构，即第三、第四两部、资源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也并入了经济部。在经济部内，先后设置了农林、水利、矿业、工业、电业、商业、企业、管制、总务等司，农本、商标、度量衡、采金、物资等局，工矿调整、燃料管理、平价购销等处，资源、燃料等委员会。经济部的职权范围一度包括了战时中国主要生产领域（农、矿、工业）和商业领域，虽然下属机构众多，但大体上代表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战时经济体制。

资源委员会由原属于军事委员会改隶经济部之后，职权范围扩大了，包括所有国营基本工业、动力工业和矿业企业的创办、经营和管理，统制所有战略物资的生产、收购和运销。战时资源委员会先后建立了数百个电气和工矿企业，是电力、燃料、矿产品和重工业品的主管机构。

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于1938年改隶于财政部，易名贸易委员会，主要职权为管制进出口贸易，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管理外汇、借款、易货偿债，从国外购货，对日伪进行经济封锁，自日伪占领区抢购重要物资等。

战前，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设交通部和铁道部。1938年1月1日，铁道部被撤销，所经营管理之铁道事业归并入交通部；此外，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公路处和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也都划入交通部。自此，交通部的职权范围大为扩展，全面负责国有铁路、公路、电信、邮政、航政事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对地方经办及民营之交通事业，亦有监督之责。

1938年初所进行的调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当局对中央

经济行政机构所作的最全面、最系统的大调整。其结果是经济、行政职能基本上从军事机构中划分出来，统一于行政院系统。这并非意味着淡化经济的战时特征，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为了适应战争持久化的需要，不再人为划分经济的“战时”和“非战时”性质，而是把所有经济机构都定位于为战争服务，从而大大加强了战时中央经济职能和权限的集中，有助于经济行政效率的提高，对战时后方各地社会经济的运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经济统制的全面实施，要求经济决策的集中统一和贯彻实施的高效率，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40年10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央设计局，蒋介石兼总裁，其中集中了一批专门人才，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建设计划和预算之设计与审议[(19)]。这还只是个综合性的高层决策咨询机构。同年12月，决定在行政院内设立经济会议，1941年2月8日，行政院经济会议正式成立，开始办公，每星期开会一次，其职权范围为：“统筹战时经济”、“政府一切经济设施概由经济会议审定”，凡经济会议之议决案，以行政院之命令行之[(20)]。经济会议以行政院院长（当时为蒋介石）为主席，行政院副院长（当时为孔祥熙）为副主席，委员包括财政、经济、军政、交通、农林、社会各部的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总长和次长、军令部部长、后方勤务部部长、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各处的主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四联总处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军需署署长，兵工署署长。指派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为秘书长。行政院经济会议设各专门委员会，指派专门人员组织之。另在秘书处下设政务、粮食、物资、工资、运输、金融、贸易、合作、调查、检察、军事等组，分理各项事务。如检察组可派员前往各地，执行经济检察任务，以贯彻实施经济统制政策。

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实施全面

的战时统制。4月，行政院经济会议也相应改为国家总动员会议。此后，国民政府战时中央经济机构相对稳定，未再作大的调整。

三　战时物资管理与统制

战时经济体制的运作，较多地体现在对物资的管理与统制上。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曾通过资源委员会对某些战略原料的产销进行过控制，但总体上看，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没有纳入政府管制。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就提出要对若干重要物资进行统一的管理乃至统制。

1937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共20条。规定：在战时，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可对所指定之矿产品及重工业制品进行管理，包括燃料、金属及其制品，酸、碱及其化合品，水泥、酒精及其他溶剂，橡胶、交通器材、电气及动力器材；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可对所指定之农产品及轻工业品进行管理，包括食粮、植物油、棉、毛、丝、麻及其制品，纸及其制品，纸及印刷教育文化品，皮革及其他畜产品，药品、茶、盐、糖、酿造品、油漆、木材、火柴、陶瓷、砖瓦。条例还规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得就下列事项规定适当之标准：生产或经营方法、原料之种类及存量、工作时间及劳工、产品之品质与产量、生产费用、运输之方式及途径、销售之方式及范围、售价、利润[(21)]。这是战时第一个在较广范围内对物资进行管理和统制的法规。

1938年10月6日，《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经修正后，易名《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加以公布，从原来的20条增加到36条。新《条例》把对有关物资实施管理的责任机构由军事委员会改为经济部，管理物资的种类由原来的二类（矿产品及重工业品、农产品及轻工业品），进一步分为四类，并作了具体规定：1．棉、丝、麻、羊毛及其制品；2．金、银、钢、铁、铜、锡、铝、镍、铅、

锌、钨、锑、锰、汞及其制品；3．食粮、植物油、茶、糖、皮革、木材、盐、煤及焦炭、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纸、漆、酒精、水泥、石灰、酸碱、火柴、交通器材、电工器材、电气机器工具、教育用品、药品、人造肥料、陶器、砖瓦、玻璃；4．其他由经济部呈准行政院指定者。此外，对于各指定物资，经济部得因必要限制或禁止其输入输出，得依供求情况调节其消费，得因必要分别为禁售或平价之处分，得因必要令生产者或经营者储藏或移置之[22]。这个新颁布的《条例》，无论对列入管理物资的范围还是管理的程度，都超出了抗战爆发之初的规定。

对日用必需品的平价和取缔投机，是战时物资管理和统制的重要方面。起初，国民政府系授权各地方主管官署会同当地商会、同业公会设立的平价委员会，根据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以物品之生产及运销成本受战时影响的程度，或以战前的平均价格，或以战时之成本加上相当之利润，作为对有关日用必需品进行平价的标准。平价委员会拟出价格后，再呈地方主管官署核定，最后报经济部备核；至于应予评定价格的日用必需品的种类，亦由各地主管官署指定[23]。嗣后不久，国民政府授权由经济部来指定需加以平价的日用必需品的种类，并在经济部之下设立平价购销处，主持办理西南、西北各省的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事宜；购销处营运资金由四联总处直接拨付，会计独立，受四联总处的稽核监督；该机构办理日用必需品的平价购销，须依据以下原则：1．采购日用必需品，应维持其最低价格；2．批售日用必需品，应规定其最高价格，3．维护商人之正当营业，不与商人争利；4．规定批发零售价格，应采取稳定主义。另规定，凡受平价购销处委托并请得营运资金从事购销者，其批发利润平均不得超过成本的5%，零售利润不得超过批发成本的20%[24]。

上述平价购销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后方各省的日用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猖獗。至1941年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

法》，重新规定了列为取缔囤积居奇范围的日用重要物品的种类：1．粮食类：米、谷、麦、面粉、高粱、粟、玉米、豆类。2．服用类：棉花、棉纱、棉布、麻布、皮革。3．燃料类：煤炭（包括煤块、煤末、煤球、焦煤）、木炭。4．日用品类：食盐、纸张、皂碱、火柴、菜籽、菜油。5．其他经济部呈准指定者。该办法并对囤积居奇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授权各主管官署斟酌当地情形规定有关物品的“合法利润”[25]。

除了综合性的条例法规之外，国民政府还就若干重要物品的管理和统制订定了专门性的文件。

（一）粮食。粮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最早实行统制的物品。1937年8月18日，国民政府颁发了《战时粮食管理条例》，宣布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直隶于行政院；授权战时粮食管理局得发布有关粮食管理事宜的办法或规章，并得对粮食的下列事项进行管理：1．生产；2．消费；3．储藏；4．价格；5．运输及贸易；6．统制及分配[26]。另设立地方的粮食管理机构，在各省设粮食管理局，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直辖市或市即由市政府负责粮食管理。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后，对粮食的生产、储藏、运输、销售、消费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规定所有的粮食仓库、加工事业、粮商，都必须进行登记，并按期报告经营粮食的数量。全国粮食管理局负责规划设立公仓网，从省到镇、乡、保；规定公有粮食必须存储于公仓内，民有粮食亦奖励寄存于公仓，必要时可限定部分民有粮食储入公仓；全国粮食管理局还直接负责粮食动员的实施，从中央储藏之粮食到各省以下乃至民有之粮食；平时则进行粮食市场的管理，调剂供需，加强运销组织，开展平价[27]。1940年3月起，四川重庆、成都和贵州贵阳等地粮价上涨幅度加大，囤积之风骤炽，蒋介石曾同时致电川、黔两省政府及经济部、四联总处、农本局、重庆市政府等机关，指示施行粮食限价出售，禁止和取缔公私机构购押米谷屯储，现存米谷一律陈报并听候平价出售等措施[28]。同年8月，国民党最高当局强调“采米统制，不许

米商自由采办”[29]。蒋介石还曾发布手令，要求各地政府在乡镇一级均要组织谷米存户调查会，设立登记处，如有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出，充公其所有谷米以外，并加重处罚；同时奖励密报者。蒋介石还要求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努力参加粮食调查工作[30]。全国粮食管理局还进一步采取治本和治标的管理措施。所谓治本，包括查明粮户的地亩数，约定售出量，规定粮户送粮之限期，民户按月购粮之限额等。所谓治标，包括：委托行政督察专员前往征购军粮各县，督导军粮之提前完成；严禁各地阻碍粮运；劝令300市石租谷以上之粮户出售部分粮食；通令各县对所有公学谷除保留必需之最低数量外，其余售卖以接济市场[31]。政府最高当局还要求“粮食没收须从富豪开始”、“余粮囤积不售者应从官方舞弊者开始”[32]。至1940年末，全国粮食管理局还颁行了《粮食管理紧急实施要项》，共18条，要求在各市县克期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各重要粮食市场成立粮食管理处，对所辖境内之粮食市场进行管理，包括制止市场外的粮食交易、管制粮食的转输、定订当地粮食牌价、限期出售民间旧存余粮、对拒绝售粮者照市价征用乃至予以没收，等等[33]。1941年5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施行的《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则在粮食管理方面作出了更严厉的规定：凡非商人或非粮商购囤粮食营利者、粮商购囤粮食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售出者、粮户或农户余粮未按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而规避藏匿者，均以囤积居奇论；凡囤积稻谷5000市石以上或小麦3000市石以上者，除没收其粮食外，视囤积粮食之数量，分别处以拘役或罚款、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规定需粮之民户和机关，如存粮分别超过3个月和2个月以上需要量的而未向主管机关陈报核准的，其超过部分的粮食将予以没收；另外，粮商购进售出粮食未登记报告，不按主管机关规定之地域、期限、数量、价格售粮者，均将处以罚金[34]。

但是，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粮源，严格的粮食管理政策难以奏效。为了直接掌握粮食，也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对田赋收入的不利影响，1941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又在后方各省全面实行田赋征实，起

初规定按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合稻谷2市斗（或等价小麦、杂粮，次年调整至4斗），由财政部经征；结束全国粮食管理局，另设立粮食部为田赋征实经收之最高机关，并负责粮食采办、仓储运输等事项。1941年还开始实行粮食征购以补田赋征实之不足，次年改征购办法为随赋随购，1943年又改征购为征借。另外从1942年初开始，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还全面开展了对大户存粮情况的调查，以冀有效地实施粮食管制。一些省份还实行了对大户余粮的强制性收购。例如，广东省曾对粮户存粮满100市担以上者进行强制收购，收购比率从10%到20%[35]。

国民政府除了以行政手段实行粮食管理和统制外，还一度在战区采用军事体制。1938年4月，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战时粮食管理处，直隶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可对战区内所有公私粮食依法处理，乃至直接管理中央及省市县政府在战区内所设之粮食仓库；管理之粮食种类以米、麦、面粉为主，次及重要杂粮，必要时并得包括食盐、饲料及其他可供食用之物品；管理事项包括：了解和查核粮食存储消费数量，公平分配军糈民食之供给，必要时可决定粮食的移运或销毁，得直接办理粮食之采购、加工、储藏及配销，等等[36]。

（二）棉花纱布。在战时的后方地区，棉花、棉纱和布匹也是列入管制的最重要的物品之一。战前，全国经济委员会曾于1933年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在部分棉区从事过发放农贷、良种培育、收购棉花等事宜，名为统制，实际上不含强制性。抗战爆发后，全国经济委员会撤销，大部分经管事项归并于新设立的经济部。1938年6月，经济部农本局在重庆设立了名为“福生庄”的机构，在各省设分庄，对棉花纱布市场和价格进行管理，以调剂供需。农本局还在主要产棉区川、陕、豫、鄂等省设收购处，又在川黔等省设立手纺办事处。1939年12月经济部成立平价购销处，曾委托“福生庄”在外地采购布匹，然后运交各供应站平价销售。为了平抑重庆等地居高不下的布价，平价购销处最初采取了“放纱收布”的管理方法，即由该处向织户定量发放棉

纱，再向织户收购布匹，平价购销处根据各织户所有织机的种类数量和性能，核发领纱证，准许织户领纱数量，以织布1匹领机纱5市斤3两和土纱5市斤8两为准，最初时先按每台布机织布5匹所需经纬量领纱，以后按所缴布匹数换领相等之纱量，随缴随领，随织随缴，约隔3日缴布1匹，不得延迟；另对织户领纱所织之布的规格，包括长度、宽度、重量、经纬密度、含浆量等，作了具体的规定[37]。用这种方法，平价购销处得以掌握部分布匹，再以平价推出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市场布价的上涨。

但是，1941年以后，市场纱价激涨，进一步冲击了棉业市场，平价购销处只得在经济部指定的区域内，对棉纱、棉布实行限价，凡经规定限价的棉纱、棉布，平价购销处有权随时派员检查其规格，以资考核。到1942年2月，经济部进一步加强了对棉花、棉纱、棉布的管制，提出了“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管制政策，并且实行了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分别规定了16支纱、20支纱的最高价，对重庆附近的豫丰、裕华、申新、沙市四大纱厂的全部出产之纱，均由经济部的物资局加盖标记后，再由农本局按平价统行收购，禁止四厂自行出售纱支；还授权物资局在必要时征购其余公私纱厂的产品。对于所有征购得来的棉纱，除军用部分外，均由农本局负责供销分配，供放纱收布、以纱换布、平价售供直接用户、调节市场之用。对于布匹，一度也采取过平价限量出售的办法。如自1942年3月起，先后向在重庆的公职人员乃至一般市民出售平价布匹，每人可以一次性购买1丈5尺。至当年8月，在重庆市场抛售了平价布12.6万余匹，对平抑市场布价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在财政部设立花纱布管制局，仍沿用“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政策，但执行规程中更为严厉。

（三）矿产品和重工业品。抗战爆发初始，国民政府便实施了矿产品和重工业品的管制。对于煤，授权军事委员会以命令的方式确定各煤矿供给煤炭之地域、数量及价格[38]；全国所有各运输机

关，“应设法使有关于国防建设所应用之煤炭尽先运抵目的地”，由军事委员会统一规定各煤炭管理区域所需最低额之煤量及供给煤矿、承运之运输机关，各机关均须遵守；非经军事委员会的核准，各运输机关不得装运未经规定之煤炭[39]；军事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在煤炭管理区域内设立煤炭管理机关，管理下列事项：1．各煤炭商行存储煤炭及运到煤炭之登记保管与分配；2．各煤炭商行销售煤炭之种类数量及地点；3．各优先用户购买煤炭之种类数量及地点；4．普通用户购买煤炭之种类数量及地点；5．煤炭之价格。所谓的优先用户，指的是有关军事之制造及运输机关、公用事业[40]。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在经济部下设燃料管理处，煤炭是列入管理的主要物资。燃料管理处先是对嘉陵江、綦江、岷江、沱江各沿岸煤矿产煤进行管制，规定各矿应尽先供给重庆市、成都市及各盐场、各工厂之需要；燃料管理处得随时派员调查各矿生产情形及采运选炼费用或工程设备，各矿须按月向燃料管理处呈报各种煤采选、炼焦、运输、存积吨量及次月预计之数；燃料管理处及其下属办事处得指定各矿煤斤运销区域及停泊煤船地点或分设堆栈，各矿须持有燃料管理处所发之煤运证方得由码头起运，到达目的地后，亦由燃料管理处或其办事处分配[41]。自1939年5月起，所有各矿所产煤斤及各重要城市、各工业区暨铁路轮船之用煤，均受燃料管理处管制。对于水泥，由经济部为主，会同军政部、交通部的代表，成立专门的水泥管理委员会，所有的水泥生产厂家和运销行商，都必须向该委员会登记，购用水泥者，亦须预先向管理委员会申请，经核准领取购用证后，再向生产厂家或行商购买[42]。

汽油、柴油及润滑油等非食用油，是列入战时管制的又一类重要物资，由直属于行政院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经管，所有经销行商，均须向该委员会或其办事处申请登记，经核准发给营业许可证后，方得到指定的油公司领购，并按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核定的价格经售。油料经理商每月应将经售数量、现存数量及正在购运中之数量，报告该管理委员会[43]。至于酒精，无论制造还是销售，都列入了燃料管

理委员会的管制范围，违者将受到查缉。钢铁则由经济部会同军政部组织之管理委员会进行管制，钢铁管理委员会指定实施管理的区域和钢铁种类，并得派员驻在各冶炼制造厂进行监督，稽核有关之簿据；钢铁材料的转运，须持有管理委员会所颁发的运照；各工厂、机关、商号需用列入管理的钢铁材料时，须经该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再向指定之主管机关或商号购用[44]。即便是以土法炼制的铁料，也由钢铁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土铁管理处进行管制，被指定区域内的原存及新生产的所有土铁，都由该土铁管理处分配，亦可统一收购；土铁收购及销售价格由管理处规定公布，其生产过程受到监控，运输亦须领有钢铁管理委员会的运照[45]。

（四）出口物资。出口物资中，钨、锑、锡、汞等特种矿产品，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统制。特种矿产品早先主要是民间开采，多系商人自由经营。1936年起，资源委员会在主要矿区分别设立了钨业管理处、锑业管理处、锡汞管理处等机构，开始实施统制，但主要限于对矿砂的收购运销。抗战爆发后，资源委员会一面协助民营矿区改进技术，获得材料，融通资金，督促开采，另一方面加强了国营生产，而且全面统制了特种矿产品的出口。除了特种矿产品外，桐油、猪鬃、生丝、茶叶、羊毛等物资是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管的。各省茶叶的收购、外销事宜，由贸易委员会负责统筹办理，得定价收买，中国茶叶公司及下属机关予以协助；至于各省茶叶之生产、管理、运输事宜，由各省政府组织茶叶管理机关，商承贸易委员会办理[46]。全国猪鬃之收购运销，亦由贸易委员会统一办理，凡经营猪鬃的商号行栈，均须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在内地收集生鬃并整理，然后按定价售与贸易委员会，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囤积猪鬃的数量和期限均有规定[47]。至于各地桐油的收购运销，由贸易委员会属下的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价格由复兴商业公司拟订和贸易委员会核定后公布，凡在复兴商业公司设有收货机关之市场，其他任何机关、商号或个人均不得收购或贩运桐油；桐油的运输须持有贸易委员会所发之转运证，甚至复兴商业公司报运桐油转口和出口，也须凭财政部颁发的专用准用

单，方准放行。至于各地内销桐油，由地方政府将实际需要数量及经营行号，向贸易委员会申请核定；贸易委员会还规定了每经营行号和桐农存储桐油的最高数额，超过限额者，复兴商业公司将按照当地牌价强制收买[48]。

对于国统区所生产的物资的管理和统制，不仅是为了后方各地的直接需求或出口，还在于限制物资流入日伪占领区。早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就颁布了《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严禁向敌军供给食粮，违者将没收所运食粮、课以罚金，并视供敌食粮之数量，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49]。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规定："凡国内物品足以增加敌人之实力者"，禁止运往敌国及其占领控制地区，所谓的禁运资敌物品和敌国控制区域，由经济部随时指定之，由海关或其货运稽核处严密查禁，在各战区亦应严密划定封锁线，配置军警，以防偷运物品资敌，各地军政、交通、邮局等机关予以切实协助；凡截获偷运之资敌物品，予以没收并罚款，如偷运物品查有实据系售卖于敌人者，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50]。凡被列为禁运资敌物品，在各战地党政分会的协调下，应由贸易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农本局及下属机构分别负责办理统一收购事宜，其收购资金、价格、存储地点及仓库、转运等，都有相应的规定[51]。与查禁偷运资敌物品相应的，是查禁敌货进口和运入后方国统区。国民政府曾颁布条例，明确规定由各地主管官署、海关或其货运稽核处实施查缉敌货之职权、各工厂商号不得购买敌货；凡已购入敌货之工厂商号，须在规定期限内申请登记，具结永不购买敌货[52]。

随着对日经济作战愈益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设立了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并在水陆交通重要站口指定负责机关，派军警切实协助，另有军法执行总监部组巡视团监察。

第二节　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　战时财政征收

抗战时期财政征收，主要包括税收（关税、盐税货物税等）和田赋。

抗战爆发之初，1937年8月国民政府确定的税制方针为：1．改进旧税，变更稽征办法，维持国有收入；2．举办新税，另辟战时特别财源[53]。随后，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决授权财政部，对于修改关税、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税则，“得以命令先予施行，一面将办理情形呈报行政院核准追认，以应事机”[54]。这样往常税则修改办理之繁重手续得以大大简化，以因应情势对税制进行及时调整整顿，以保证税项收入。在1938年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中，国民政府进一步将税制方针确定为：从整理旧税与举办新税两方面，推行战时税制。其中整理旧税，在关税方面，改定现行出口税则，“凡出口货品所得外币价款结售于国家银行者，分别减免出口税，手工艺品出口亦予免税，以奖励输出，易取外汇”。在货物税方面，奖励统税货品工厂移设内地，增加卷烟税率以节制消费兼顾税收。在直接税方面，扩大所得税范围，“凡动产与不动产之所得概予课税，现行税率酌予提高，并采分级累进制，使负担公允”。举办新税，主要是举办战时消费税、战时利得税及遗产税[55]。

战前，统税为关税、盐税之外的第三大税项，主要是采用就厂征收的方法。抗战爆发后，对于战区、沦陷区的工厂已经无法如前征税。自1938年4月起，对于内运应纳统税均由第一道统税机关进行查验补收；没有统税机关的情况下，则由海关代征统税。在统税征收科目方面有所增加，如1940年12月开征糖类统税，课税对象包括国制和进口糖类，税目有七种，即红糖、桔糖、白糖、冰糖、方糖块糖、糖精以及其他经财部核定之糖类，征收税率均课统税15%。此外，在课税单位、完税价格、驻厂征收、重征与税照、报请与登记等均有相应规定[56]。至1941年7月，规定征收货物统税之货品包括卷烟、薰

烟叶、洋酒、火酒、饮料品、火柴、糖类、水泥、棉纱、麦粉等十类，由财政部税务署所属税务机关征收之。统税原来采用从量税率，随着物价波动严重，1940年下半年起财政部提高税额一倍征收统税，复于1941年9月起，改为各货品均采取从价税率，区别不同货品分别征收2.5％至80％不等税率。如卷烟从价征收80％，洋酒啤酒从价征收60％，国产烟酒类税方面，税率相对较低。其中，烟类税分烟叶、烟丝两种，烟叶依照产地核定完税价格征收30％，烟丝税征收15％。酒类税按照产地核定完税价格征收40％；棉纱从价征收3.5％，麦粉从价征收2.5％，以体现对日用奢侈品和日用必需品的区别对待。茶类统税方面，包括国内产制及国外输入之茶类，具体有红茶、绿茶、砖茶、毛茶、花薰茶、茶梗、茶末等八类，税率规定为15％。并实行国制产茶出口退税，以补贴促进国货出口，拓展国际市场，赚取外汇[(57)]。

抗战时期，由于扩大统税范围，将其发展为货物税，并结合专卖政策，使得货物税征收数量逐年上升。据统计，货物税征收数量1940年是7200万元，1941年是18900万元，1942年是78300万元[(58)]。

在直接税的开征方面，主要有印花税、所得税、利得税和遗产税。印花税战前已经开征，“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际，国民政府鉴于“值兹非常时期军需浩繁”，决定将现行印花税率加倍征收，即“现行印花税法第十六条税率表第一目至第三十五目所定之税率一律加倍征收”；并酌量扩充征税范围，凡呈文申请书，诉愿书保结、甘结、切结，每件贴印花二角；分别加重处罚漏税之罚款数额，“现行印花税法第十八条所定处分应纳税额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改为二十倍以上六十倍以下，如倍数计算不满五元时，应处以五元之罚款”[(59)]。所得税战前仅开征了该税目中第二类的薪给报酬所得以及第三类的公债利息所得。1938年之后，开始计征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和第三类存款利息所得。另外1938年7月1日起计征过分利得税，征收对象范围为：1．凡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二千元以上之营利事

业，官商合办之营利事业及一时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百分之十五者；2．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其财产价额百分之十二者。税率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不等，但“凡由战区迁入内地之工厂及因战事受有重大损失之营业，经查明属实者，应暂予免税”[60]。开征过分利得税的同时，取消了各省此前擅征的战时利得税、战时商捐等名目。

至于战前规划但未及开征的遗产税，也于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后开始征收。根据1938年10月6日公布的《遗产税暂行条例》，遗产税的征税对象范围为本国公民死亡时在国内和国外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之动产不动产及其他一切有财产价值之权利；征收税率，遗产总额5000元以上者，一律课税1%，遗产额超过5万元者，依其超过额实行按级计算加征，并一一规定按级计算加征之税率，最高就其超过额征收50%，以体现区别对待；关于减免征税，第七条对免纳做出规定，如遗产总额未满5000元者，军官、士兵及公务员战时阵亡或因战地服务受伤致死者之遗产，涉及文化教育等之遗产，捐助各级政府之财产等，则予以免征，以鼓励人们抗战建国，踊跃捐输之积极性。此外，暂行条例还就遗产处分分割、报告期限、申请诉讼、纳税时间次数与证明以及拖延隐匿等，均做出相应规定[61]。暂行条例于1940年7月1日付诸实施。

在关税方面，为了鼓励战时必需品的输入，实行减税，凡列为减税货品的，仅按照1934年进口税则原定税率之三分之一缴纳进口税，因此最低者为值百抽三，最高者也仅为值百抽十左右。至于洋米、汽油、柴油、救护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则全免进口关税。至于非必需的奢侈品，则实行禁控，必须凭进口特许证方得输入。另外考虑到物价波动的因素，自1941年4月起，对于进口洋货的按量计税部分改为按价计税。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出口，凡由专门国营机关统一收购外销的货物，如矿产品、桐油、茶叶、猪鬃、羊毛、蚕丝等，以及经规定由商人向国家银行结售外汇的出口商品，如肠衣、羽毛、皮革、子

仁、木材、麻类等，凭准运单或银行结汇证明书，由海关验放，豁免出口税。对于由沦陷区转运内地行销的洋货，则需要补缴进口税；凡禁止进口的洋货，或以禁止进口的货品为原料制成的物品，则不得转运内地销售[62]。

盐税方面，1941年9月起将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避免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盐税在盐价中的比重急剧下降这一不合理的现象，增加盐税的收入。

1941年6月23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第五次大会通过了裁废各省货物税改办战时消费税案，即克期裁废各省货物通过税、产销税及其他对货物征收之一切捐费，所相应导致的各省收入之减少，由中央统筹弥补办法；另由国民政府举办战时消费税，其要点为：战时消费税为中央税，其课税货品由财政部另表公布，其税率对奢侈品征收10%至30%，对日用品征收3%至6%；战时消费税在货品产地一次征足，进口制造品及直接消费品则由海关按同样税率征收消费税；业经征收战时消费税的货品如系输出国外者，于出口时退还已交之税款；战时消费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捐费[63]。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省以财政困难为由，或自行征收货物通过税产销税，或以统制管理物资名义收取捐费。征收种种名目税费的，有粤、桂、湘、赣、闽、浙、陕、甘、宁、青、苏、皖等十二个省份，至1940年征收总额约达7600万元。

抗战爆发时，田赋为地方税，一般以面积为标准，以货币缴付。随着战争进展，沦陷区和战区实际上难以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田赋征收，于是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颁行《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之救济暂行办法》，主要内容：1．已沦陷为敌人控制之地区，赋税暂行豁免；2．沦陷地方经过克复，或游击队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权之地区，土地赋税及附加税，应予减征，以不超过原税额50%为原则；又田租应予减低，承租人应缴之佃租以不超过原额三分之二为原

则；3．接近战区及将成为战场之地区，土地赋税及佃租亦应减轻，准用第二项规定；上述2、3两种地区之土地赋税，得以农产物按照市价折算缴纳实物[(64)]。这是抗战爆发后关于部分地区土地征收标准变更的最初规定，一方面规定缴纳赋税或佃租，得依照市价折算，另一方面规定征额均比照原额减轻，其主要精神，系对战区及沦陷区农村和农民的一种优待办法。

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除了总体上仍如常继续征收田赋外，晋、闽、浙、甘等省相继开始酌征实物。

山西是最早开始田赋改征实物的省份。1937年随着抗战军兴，在山西境内经常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为数颇多，虽然军饷基本按时拨放，但随着物价逐渐高涨，军粮购备困难很大。从1938年起，山西开始试行所谓摊派法，其摊派对象为财产在3000元以上之富户，分为三等九级，按累进率摊派。到了1939年，山西各驻军盛行“借粮”之风，名为官购，实同征用，结果困难迭出，主要是越来越不易购得平价军粮，同时运输又甚感困难。于是自1940年春山西地方当局倡行田赋改征食粮办法，具体为：1．我统治区，采用集中方式；2．敌我交错区，由人民自行保存；3．敌侵占区，则由人民直交钱赋。因山西境内105县已破碎不全，全年田赋共284万两，1940年开征，计粮30万担，棉10万斤，布400斤。省财政厅规定，每两征小米、大米或小麦1官担（山西官秤130斤、新市秤155.172斤）。大麦、豇豆、豌豆、扁豆、绿豆1担半，或谷子、黑豆、高粱、乔麦2担，折为1担；布4斤、棉10斤，亦等于1两。缴纳粮食之运输，大体由征收者和缴付者各负担一半[(65)]。

福建在全省范围里也较早田赋改征实物。经呈请国民政府核准，福建全省自1940年10月1日该年下忙第二期起开征，其主要办法为：1．依照各县“七七”事变前一年之平均米价为标准，将现有田赋正附税额（包括丁粮每两石正税及原有省县附加）折成米额，改征米谷。2．征米如有困难，得依照米价折合缴纳国币，各以其本县上年10月

至本年3月间之六个月平均米价，为第一期（或上忙）征收标准，本年4月至9月间之六个月平均米价为第二期（或下忙）征收标准，由各县查明，呈省核定公布。3．一切田赋临时附加，经改征实物或米折后，一律取消。4．改制后之溢额，用以抵补取销田赋附加，废除苛杂，并支应实施新县制及军米与及其他应办事业经费。5．本年事属创办，如依折合价款缴纳国币，准予八折实收。“凡此在谋县财政之整理充实，使能去其苛杂，固其根基，经费既无虞竭蹶，事业可计日成功，而人民实无加重负担之顾虑”[(66)]。福建省田赋收入之原有数，计每年正赋约600万元，附加约400万元，改制后，估计可收2500万元左右，约增150％。但是，这种实米折价办法，与国民政府所规定者有所不同，事实上更多地成为各地解决眼前财政困难之变相加赋，忽略解决军民粮食问题[(67)]。

浙江省1941年1月起开始田赋改征实物，其要点为：1．各县田赋改征米额，以原有各则田地山荡应征上、下期田赋省县正附捐税，及比照田赋标准或按亩征收之税费暨带征之赋收公费总数，依照各该县“七七”事变以前一年内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平均米价，进行折算。2．各县田赋仍分上、下期征收，每期各征半数，上期于5月开征，每期征收均以2个月为限，其原系一次征收者，仍照旧例。3．各县征收实物，如因事实困难，得将米额折合国币征收，以各该县各期田赋开征2个月前4个月内之平均公定米价为折征之标准。4．各县田赋改征实物后，不得再征任何附加税捐，或派征经费。5．逾期或抗缴税款之处分：加收滞纳罚金、拘追、提取欠赋地收益、查封财产；6.1940年份及以前各年份之旧赋，仍照旧追缴；6个月未清缴者，照本办法征收实物及米折标准改征。另外，浙江省颁行施行细则20条，其中规定：业户缴纳实物以干谷为限；田赋缴纳实物部分，得照额酌予折扣，折减成数由省政府随时核定，折缴国币部分须十足征收[(68)]。但游击区及征收地价税区域，则仍旧贯。

陕西省颁行的《战时田赋改征实物暂行办法》规定：改征标准，

未办土地陈报县份按原定粮石数征收，已办土地陈报后，按新定赋额半数粮石改折银元比率，回折粮石数征收；暂分全省为五个标准区，分别征收米、麦、小麦，并得折收现物实价。折收标准，由省粮食厅根据各县所报上年度和本年度粮价，核定平均粮价；愿以实物缴纳者，须以乡镇为单位，全体皆缴实物。改征后取消一切附加。征收地价税县份及城区，以及积欠田赋，不改收实物或折价。核定征数照收征额八折征收[69]。

甘肃田赋中地丁部分照旧征收国币，粮石部分改征实物。原粮石中三四成折价，每石折收2元2角8分至13元6角8分不等，自1941年起，一律征收本色[70]。

青海省每年征粮4.6万石，除同仁一县全征本色粮米外，其余各县皆本色四成，折色六成。宁夏夏粮本折各半，秋粮全数折色。西康原有辖境仅泸安稍有征折色，其余概征本色，内分红米、青稞、大麦、小麦、菽麦、豌豆、玉麦、粟米、元粮、洋芋等[71]。

从国民政府层面看，进入1940年之后，由于后方各地物价、粮价腾涨，对于粮食的统筹管制不容迟缓。1940年12月，行政院第409次会议上，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提议，由于各省粮价高涨，政府收支不敷，因而应适应时势需要，准许各省田赋酌量征收实物，并认为田赋征实后，“人民之负担既可平允，政府之损失亦可补偿，而军粮民仓复得资以调节，手续简便，较易推行”。该案经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议通过[72]。

为自本源上解决粮食征购和销售中的问题，1941年3月18日，行政院又修正通过《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通则》，要点为：1．田赋改征省份，应自即时起尽量征收实物；2．田赋改征或加征后，所增加人民负担，不得超过物价增加数60%；3．各省征得之粮食，应尽先充作军粮，其处理办法应经全国粮食管理局核准；4．征收实物之种类，应兼顾地方出产及政府需要；5．田赋改征或加征后，省县收

入之划分，应不违背现行法令；6．田赋改征或加征后，所有未经中央核准之省县地方税捐，应一律撤销[73]。

在推行田赋征实的过程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意识到，必须从制度安排上解决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收支状况的担忧，决定："田赋改组中央，省经费中央统筹。"[74] 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为调整国地收支，并平衡土地负担起见"，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以适应抗战需要；而且中央为适应战时需要，得依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75]。随即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田赋征实办法，自当年下半年正式把田赋列为中央收入。田赋征实以原来的田赋正附税总额为折征标准，以稻谷小麦为主，每元折2市斗稻谷，产麦区另折征等价小麦；并试各地农产具体情况，兼征等价杂粮。其赋较重之省份，得请财政部酌量减轻。次年征实标准提高，每元赋额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斗8升。由于征实所得粮食无法满足军公粮所需，遂于征实之外，另办粮食征购，大体参酌各省所需和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额与价格[76]。实施田赋征实的成效，1941年度后方地区征收总额为谷麦22,938,496石，实际征得谷麦共25,560,297石，超过征额11.2%。1942年度征实征购总额为谷麦65,039,582石，实际征得谷麦共66,175,687石[77]。这与当时国民政府与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协力合作有关，更是产粮区民众支持抗战、踊跃输将的结果。

1941年9月，财政部为防止延、抗、逃税起见，订定催征通则颁行：公务人员欠赋限期清完，逾期撤职处分；公共团体欠赋，逾期未完，将首领经管人传案追缴；行政机关欠赋，在应领经费内扣除；经征人员通同隐匿或据报不实，从严议处；欠粮总额达三年应完税款以上者，得拍卖其欠税财产；业主远出或住址不明，责成佃户代完抵租。蒋介石令饬各省市地方，不得率行报灾，应先电财政部查核，省政府田赋管理处会同有关人员履勘，妥慎拟议，报部查明核办。财政部复有《田赋征收实物考成办法》颁布[78]。

二　大举内外债和停付关盐税担保外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原有的正常性财政收入已无法应付迅速增长的军政开支。“盖抗战建国同时进行，需用既繁，税收又减，中央与地方同感支绌，不得不举行新债，以资弥补”[(79)]。举借公债，首先是内国公债（以下简为内债），便成为国民政府获取税外收入的重要手段。

1937年8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救国公债条例》，宣布为“充救国经费起见”，自9月1日起发行公债5亿元。这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公开发行的第一笔内债，其数额超出了战前国民政府所发行的任何一笔内债[(80)]。与战前发行的内债相比，救国公债有如下特点：不仅可用现金，也可以用“有价物品”认购公债；没有指定具体的还本付息基金，只是笼统地提“由财政部于国库税收项下指拨”；强调对该公债“如有伪造及毁损信用之行为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81)]。另外，从公债的募集来看，国民政府于该年8月下旬设立了“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以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任劝募总会会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立夫任副会长。这是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为发行公债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官方背景的劝募机构。此外，该公债系照票面十足发行，利率原定为年息2厘，后在正式发行前宣布改为年息4厘，但仍低于此前南京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绝大部分内债的利息率[(82)]。即便如此，救国公债的认募情况十分踊跃。在公债发行伊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包括所属机构及同人）便分别认购2000万元，交通银行系统也认购了500万元。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国公债便基本认募完毕。至1938年6月底，解入国库的救国公债发售收入为21619.9余万元，而整个1937财政年度（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各种税项总收入才41287.9余万元[(83)]。由此可见，救国公债的发行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具有较大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在举借外债方面并不顺利，举借内债成为较重要的税外收入手段。在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看来，“战时弥补国用办法虽不止一端，而以发行公债为最普遍之政策”[(84)]。在发行救国公债之后，国民政府又在1938年发行了国防公债5亿元（实发49811余万元）和赈济公债1亿元（实发2510万元）。此后，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公债数额居高不下：1939年，发行建设公债和军需公债各6亿元；1940年，发行军需公债12亿元（实发124,939余万元）；1941年，发行建设公债12亿元和军需公债12亿元（实发118,460万元）[(85)]。这样，自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年里，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公债总额约为59亿元。此外，历年为临时周转库款，另发行有短期国库券及国库证351,395万元[(86)]。

抗战时期若干省政府发行了地方公债。如山东省政府为“办理全省土地陈报及试办地籍图测量”，于1937年9月1日起发行整理土地公债250万元。安徽省政府于1937年10月1日起，发行完成公路建设公债200万元。江西省政府为发展本省生产建设事业，于1938年1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2000万元；又于1941年9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1500万元。湖南省政府“为筹办建设事业，充实金融机构及应付紧急需要等费用”，于1938年7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1800万元。河南省政府为“供应紧急要需，发展农村经济”，于1938年8月1日起发行6厘公债500万元。甘肃省政府“为筹办建设事业”，于1938年8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200万元。福建省政府“为筹办紧要设施及建设事业”，于1938年10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800万元。1940年1月1日起，福建省政府又为“发展本省生产建设”，分三期发行生产建设公债2000万元。浙江省政府“为筹措国防特种用费”，于1938年5月1日起发行6厘公债1000万元。广东省政府为“巩固本省国防起见”，于1938年3月1日发行省国防公债1500万元；复以“均衡战时省金库收入”名义，于1939年发行短期金库券480万元。江苏省政府“为整理地方财政及调剂农村金融”，自1939年4月15日起发行地方财政公债800万元；1940年3月

1日起，江苏省政府又以“整理地方财政及调剂农村金融”名义，发行江苏地方财政公债1000万元。广西省政府“为调整1939年度省库收支”，自1939年5月1日起发行6厘公债800万元。湖北省政府“为办理农民贷款，拨缴湘鄂粮食管理处资金，暨增加湖北省银行资本，谋产业经济之发展”，自1939年7月1日起发行金融公债800万元。四川省政府“为办理交通生产建设事业”，于1939年9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750万元；于1940年10月1日起，发行四川省建设公债750万元；复为“整理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本省债务”，于1941年1月1日起，发行四川省整理债务公债3500万元。甘肃省政府为“筹办水利农矿事业”，于1941年9月1日起发行公债1500万元。甘肃省政府于1941年1月和1942年1月分2期发行了民国30年甘肃省建设公债共800万元国币。四川省政府为“整理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本省债务”，于1941年1月1日起，发行整理债务公债3500万元。安徽省政府为“充实地方银行资金，调剂农村金融，谋经济之发展”，于1941年5月1日起发行公债800万元。该省另为“完成本省公路”，于1941年5月1日起，发行公债200万元[(87)]。战时地方公债条例均由国民政府公布，一般指定以地方财政收入为担保，由各地方银行或中央政府银行在当地之分行负责经理还本付息，财政部、审计部以及省政府、省财政厅的代表参加基金保管委员会。绝大部分地方公债以举办经济实业或交通事业的名义发行，其使用和偿付是各地方财政开支中的重要部分。

战时各项公债除了利率较低外，一般均十足发行，以一般国民为主要对象；偿还期较长，最短的15年，最长的达30年。另外，战前国民政府所发内债之担保主要是关税（占85%）和盐税（占11%），战时关税和盐税收入锐减，列入公债基金的有所得税、统税、烟酒税、国营事业和建设事业余利等财政收入项目。

除了法币内债外，国民政府还公开发行了其他种类的内债。

1938年，国民政府发行了“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这是抗战时期第一笔非法币内债。举借定额分别为关金1亿元、英金1000万镑、美

金5000万元，并分别印制债票。发行该项金公债的直接目的，是收换民间和海外侨胞所持的金类、外币、外汇及国外有价证券。国民政府规定：如以生金、金制品、金币等缴购者，按每一关金合纯金60.1866公毫的比率发给关金债票；如以国外有价债券缴购者，按当时售价发给英镑债票或美金债票；以关金、英镑、美金之外的其他外币、外汇、国外有价债券缴购者，可按当时市价，任择一种或数种债票。该公债年息5厘，期限15年，自1939年起还本，以盐余为偿付基金。规定还本付息时即以债票种类分别付给关金、英镑和美金。该项公债在国内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募集，在海外则由中国银行负责劝募与推销，另由中行委托华侨、中兴、广东、东亚等银行的海外机构代为劝募。各银行劝募该公债，可得劝募债额0.25%的手续费。对踊跃承购的个人和团体，则予以奖励[88]。该金公债的实际发售额分别为关金99,000,110元、英金9,132,340镑、美金48,151,630元[89]，发行是成功的。

此后国民政府又于1940年发行建设金公债（发行定额为英金1000万镑、美金5000万元，实际发售9,874,994英镑、45,989,550美元），1941年发行滇缅铁路金公债（定额与实发额都是1000万美元）[90]。如果加上1938年金公债实际发售额，那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开发售的非法币公债共达关金99,000,110元、英金19,007,334英镑、美金104,141,180美元。而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从英国方面借得的债款约为1800万英镑，从美国方面借得债款约为1.7亿美元。还应当指出，这一时期英美政府向中方提供的债款种类是商业信贷和平准基金借款，前一类只能用于购买货物，平准基金借款固然提供外汇现汇，但其使用仅限于维持法币汇价，且置于外方的严格监控之下。由此可见，非法币公债的发行，使国民政府得以获得巨额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其财政意义颇为重要。

总计上述法币公债、短期国库券及国库证、三项金公债，抗战爆发四年里国民政府发行内债共达国币1,015,284.12万元。如果连同战

前发行的内债，截至1941年6月底国民政府所欠内债本金共合国币13,183,796,200元[91]。

国民政府举借的100余亿元的内债，具有什么财政意义呢？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总支出约为213.48亿元[92]。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财政实际支出总额的46.7%是通过举借内债得以实现的。

另外，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国民政府还开始发行了实物公债，即1941年9月的粮食库券，这是战前所没有过的特殊形态的内债。当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曾提出了“加强公债募集与发行田赋之实物库券双方并进”的方法，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把握粮源，特别是保证军粮的供应。这一次发行的粮食库券分为稻谷和小麦两类，券面分为1市升、2市升、5市升、1市斗、5市斗、1市石、5市石、10市石、100市石九种。根据收购粮食的数量，分别省区发行；年利息率为5厘，以实物计算。其期限，规定自1943年起分五年偿还，即随同券面额按年抵缴各该省田赋应征之实物[93]。根据这一规定，国民政府并不准备以货币或实物偿还，所以，该粮食库券实际上是提前征收的田赋。

举借内债固然对解决抗战初期的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战时所需军用物品及交通、经济事业各种器材，多须自国外输入，往往需要以外汇支付。此外，法币汇价的维持，同样需要为数不小的外汇汇兑或平准基金。所以，在举借内债的同时，国民政府还举借了多笔外债。

自抗日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举借外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苏联。共达成三项易货借款，总额2.5亿美元，其中前二次借款各5000万美元，均在1938年达成，年利息率3%，期限为5

年。第三次借款1.5亿美元于1939年达成，年利息率3%，期限10年[94]。中方均以向苏联出售农矿产品的方式偿付借款的本息。至1941年6月，共动用173,175,809美元[95]。所动支的款额均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苏方购买军用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方面停止向中方交货。

（二）英国。于1939年和1941年分别达成平准基金借款各500万英镑，年利息率分别为2.75%和1.5%，用于维持中国法币汇价的稳定。又于1939年3月达成购车信用借款18.8万英镑，年利率5.5%，清偿期限为1939年6月起的48个月[96]。同年8月达成购料信用借款285.9万英镑，年利率5%，清偿期限十四年[97]。1941年6月又达成英镑区购料信用借款500万英镑，年利率为3.5%，清偿期限为自1946年10月31日起的十四年半，但中方可随时提前清偿。根据借款合同的规定，为了迅捷拨付到期本息，中方准备向英方出售猪鬃、茶叶、生丝、锑及其他产品[98]。

（三）美国。于1939年2月达成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年利率4.5%（后减至4%），清偿期限不得超过1944年1月1日，规定中方在国内收购桐油，分五年运美销售，以收入之半数偿付借款[99]。于1940年4月达成华锡借款2000万元，年利率4%，清偿期限七年，中方在七年期限内向美方运售滇锡共4万吨，其收入提成作为还本付息基金[100]。1940年10月达成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年利率4%，清偿期限五年，规定中方在偿付期内向美方运售不少于1000吨的钨砂，其收益首先提作偿付基金[101]。1941年2月，中美之间又达成了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年利率4%，清偿期限七年，规定中方在偿付期内向美方运售不少于1400吨的钨砂、锑、锡，其收益首先提作偿付基金[102]。上述总额达1.2亿美元的四项借款，均属于信用借款，债权方都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各项借款均不得在美国直接购买1939年美国中立法案规定的军械、军火或军用品。另外，1941年4月中美之间达成了平准基金借款5000万美元，年利率为

1.5%，使用借款期限初定至当年6月30日，后经双方洽商延长一年；该借款系由美国财政部直接供给，协定未规定中方须提供何种经济担保，也没有规定借款动用部分的清偿期限。该借款规定只能用于在中国维持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另外，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央银行必须拨付2000万美元加入该平准基金[103]。

（四）法国。于1939年10月达成南镇铁路借款合同，法方为中国修筑湘桂铁路南镇段提供材料和工款共1.8亿法郎，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提供工程需款14.4万英镑（其中法方占49%）。借款年利率7%，清偿期限十五年，中方如果提前清偿，须在6个月前通知法方并支付2.5%的酬金；国民政府以普通盐余、广西矿税、其他国税收入以及南镇铁路之产业、收入作为担保[104]。1939年12月，中法又达成叙昆铁路借款，法方为修筑叙府—昆明铁路向中方提供材料及设备，价额以4.8亿法郎为限；年利率7%，清偿期限十五年；国民政府以普通盐余、其他政府收入以及叙昆铁路产业、收入作担保[105]。

法国的两项借款，约合1500万美元，远少于苏、英、美各国的借款额。但是法方所要求并为中方所同意的抵押担保条件，以及在工程技术、财务和其他特权方面所获得的中方的让步，却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外债问题中的特例。

除了上述向苏、英、美、法四国的各项借款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年里，国民政府还因自国外购买机械和军用品积欠有相当数额的外债，计：英金704,866.45镑，美金2,437,937.18元，法金5,126,743.38法郎，港币199,760元，关金195,215.23金单位。连同战前所借外债，结至1941年6月底，所欠外债本金约合国币1,244,035,651元[106]。

国民政府一方面大量发行内债和积极举借外债，另一方面不得不支付以往积欠的内外债的本息。偿付本息负担最重的，是以关、盐税担保的债务。按理，关、盐税收入比较稳定，一直被视作债务的“确

实担保”。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关税、盐税多为日本方面劫持，收入骤短。至1938年底，战区关税遭日本劫持约达国币1.5亿元以上。为了维护债务信用，国民政府起初由中央银行垫付到期内外债的本息。据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2月，仅垫付以关税担保的各内外债之本息，就达1.75亿元，占1937年度财政实收总额的42.4%[107]。当时无论从财政收支还是从外汇储备来看，都不可能继续垫付以关盐税担保的内外债的本息了。

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把以关税作担保的债赔各款改为摊存办法，“嗣后对于海关担保各项长期债务，凡在战前订借而尚未清偿者，当就战区外各关税收比例应摊之数，按期拨交中央银行专款存储。惟此项摊存办法，原系应付目前非常情势之临时措置，如战区各关将已存欠缴之应摊债赔款及嗣后税收应摊之数额如数照旧解交总税务司时，政府自当仍即同时照旧拨付债赔款基金，以恢复战前原状也”[108]。具体地说，就是把每月海关担保各项债务之数额，按照各关所在地划分为战区（即日占区）及非战区（即国统区）两部分，各以上个月每区收入数目比照全国关税收入总数，定为各该区本月份应摊债额之标准；国民政府停止支付海关担保各债的本息，但把国统区各关应承担的份额存入中央银行备付，恢复支付的条件，是日占区各关将其以前欠缴之款（即至1938年底的1.75亿元国币）补齐并每月向总税务司照旧解款。具体而言，当时在关税担保项下的长期债务本额约合国币25亿元，其中外币借款约为6亿元，庚子赔款约1亿元，国币借款约18亿元；而1939年内每月偿付数，外币借款项下约合400万元国币，庚子赔款项下约合国币300万元，国币借款项下约合1100万元，亦即每月应付之数约等于国币1800万元[109]。

同年3月，国民政府又宣布：“鉴于日方干涉盐税收入范围益广”，决定停付以盐税担保各债本息，采用与关税担保外债同样的摊存方法[110]。

国民政府宣布停付本息、采用摊存办法的，有以关税担保的英德

续借款、善后借款、庚子赔款，以及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民国二十五年复兴公债、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三项内债；以盐税作担保的有湖广铁路借款、克利斯浦借款、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借款、英国费克斯马可尼公司借款、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等五项外债。

但是，国民政府规定上述三项内国公债照常抽签，中签债票和到期息票，可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政府银行贴现[(111)]。至于以某关附加捐税，或某省盐税及附税担保的内债，如疏浚河北省海河工程公债，辟浚广东省港河工程公债，玉萍铁路公债，二十六年整理广西金融公债，均不在摊存之列。这样，国内债权人的利益实际所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此外，对于中法南镇铁路借款和1938年的金公债，虽然担保中都涉及盐余，但系抗战爆发后举借的，国民政府均由国库另行拨付，予以维持。这样，有利于在战时继续举借内外新债。

三　巨额赤字和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剧增，赤字情况即总岁出与实际收入的亏短数，渐趋严重。

抗战爆发初始，国民政府曾明确了为支持抗战实行节减开支的方针。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大纲》，其中关于财政管理实施方案，就有核减党政各费及停止不急需之一切事业费支出；整理地方财政，增收节支，使有余力补助中央战费[(112)]。但实际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愈益严重。1936年度（自1936年7月到1937年6月底），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国币600.7百万元，占当年度财政实支总额的31.7%[(113)]。1937年度，财政赤字便增加到1532百万元，占财政实支总额的73.3%。1938年度（只包括1938年7月至12月的数字，1939年起，财政年度改成与历年制相同）财政赤字为872百万元，占实支总额的74.6%；1939年度赤字达2082百万元，占实支总额的74.4%；1940年度赤字激增至3971百万元，由于

整个开支额的增加，占实支总额的比率增加到75.1%。而1941年度的赤字高达8819百万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22%，赤字占实际支出总额的88.2%，增加了13个百分点[114]。

赤字额的迅速增加，既是实际支出特别是军政开支居高不下所致，也与战时财政收入、尤其是正常税项增收无着有关。至于举借公债，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虽然可以应付一时，但还本付息又将成为日后的开支负担。这样，增发钞票就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了。

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联系。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持续，既造成了金融的紧张，又导致对通货需求的增加；加上国民政府自战争一开始就实施了收兑金银和吸收侨汇的政策，这些都使得法币的发行量逐渐增长。

通货膨胀政策的出笼，也有一个过程。自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20个月内，法币的发行量只是从4.5亿元增加到14亿余元，增加的幅度还小于被废止的银币的数额，可视作紧缩状态的货币流通。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里，法币的增发幅度也是很有限的。如以1937年6月法币的发行额14.07亿元视作指数100，那么当年9月的发行额15.44亿元的指数，只相当于109.8，增加了9.8个百分点。同年12月的发行额为16.39亿元，比9月份只上升了6.7个百分点[115]。应当说，这一增发幅度还是正常的，是可以为国民政府所实际掌握的财政力量与经济力量所承受的。

但是，由于实行法币政策时国民政府承诺了无限制买卖外汇的义务，这在战争情况下却是无法长久履行的。于是，在1937年11月间，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就已经在考虑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提出了“维持法币同时并应增加筹码”的目标，并提出发行不可兑换外汇的“货币券”[116]。当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不同意在法币之外再公开发行一种不兑换外汇的货币，认为这将造成

两种不同之币制，“影响法币信用及外汇甚大”，势必使法币政策趋于崩溃。席德懋建议“空发”法币5亿元到10亿元，中央银行的英籍顾问罗杰士也赞成这一主张。按照席德懋的私下解释，所谓空发，既不公开宣布取消法币可以买卖外汇的政策，又不为所发行的钞票提供任何准备，“只要保守绝端秘密，对外否认”[117]。这一建议后来为财政部所接受，并且得到了四联总处乃至蒋介石本人的允可。于是，从1939年1月1日起，中中交农“四行发行法币，增加之数可暂以金公债充作现金准备，另帐登记”[118]。公债票本身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它与维持同样是政府所发行的法币的币值，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当年9月，国民政府对于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中，除了原来规定的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之外，又加入了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生产事业之投资凭据。这样，战时便于法币扩大发行的因素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政策在法理上和操作上都不存在什么重大障碍了。

抗战爆发后法币的实际增发情况可见下表：

期　别	发行额（百万元）	指数	较上期增加发行额（百万元）	较上期增加指数
1937 年 6 月	1407	100.0	42	

（续）

期　别	发行额（百万元）	指数	较上期增加发行额（百万元）	较上期增加指数
9月	1544	109.8	137	9.8
12月	1639	116.5	95	6.7
1938年3月	1679	119.3	40	2.8
6月	1727	122.7	48	3.4
9月	1925	137.0	198	14.3
12月	2267	161.1	343	24.1
1939年3月	2411	171.2	144	10.2
6月	2700	191.9	289	20.6
9月	3587	254.9	887	63.0
12月	4287	304.5	700	49.7
1940年3月	4689	333.3	403	28.7
6月	6063	430.8	1373	97.5
9月	6841	486.2	779	55.4
12月	7867	559.0	1025	72.8
1941年3月	9157	650.7	1290	91.7
6月	10715	761.5	1559	110.8
9月	12652	899.1	1937	137.6
12月	15133	1075.4	2481	176.3
1942年3月	17510	1244.3	2377	168.9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0—291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抗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6月的两年里，法币发行额增加了近13亿元，每一季度的法币发行平均增加率为11.5%，应当说涨幅不大。1939年第三季度以后，到1940年底，法币增发额超过51亿余元，每季度的平均增加率达61.2%，速度明显加快。而1941年到1942年3月，法币增发额已近百亿元，每个季度平均增加率提高到137.1%。

如果进一步考察法币的增发情况，还可以看出抗战爆发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货币发行过程中地位的变化。1937年6月，四行的法币发行额分别是37,584万元、50,986.3万元、31,354.8万

元、21,795.1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占法币发行总额的36.23%，中央银行只占26.71%；到1938年9月时，中国银行的发行额为66,193.7万元，占同期法币发行总额的34.39%，仍超过中央银行（发行额为56,638.2万元，占29.43%）。但到1938年12月，中央银行的法币发行额达73,802.8万元，占发行总额的32.55%，居四行之首，同期中国银行的发行额为71,105万元，占发行总额的比率为31.36%。此后，中央银行的发行额一直居四行首位。到1942年3月，中央银行的发行额已达717,620.2万元，占发行总额的40.93%，远超过其他三行。同期中国银行的发行额是502,942.3万元，占28.72%，交通银行的发行额为209,587.9万元，占16.6%；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额为240,785.8万元，占13.75%[119]。

还应指出的是，从1939年开始，无相应发行准备的所谓“另帐”发行额迅速增加。具体数额可见下表。

单位：万元

期　别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合　计	指　数
1939 年 6 月		28720	5417. 6	34,137. 6	100
12 月	53,316. 2	45,483. 3	21,685. 3	120,484. 8	352. 9
1940 年 6 月	102,763. 2	54,983. 3	28,000	210,046. 5	615. 3
12 月	165,498. 8	38,483. 3	37,900	241,882. 1	708. 5

（续）

期　别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合　计	指　数
1941 年 6 月	195,593. 7	38,483. 3	40,000	274,077	802. 9
12 月	281,502. 3	38,483. 3	40,000	359,985. 5	1054. 5
1942 年 3 月	337,866. 6	38,483. 3	40,000	416,349. 9	2196. 2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4页。

战时通货膨胀转趋严重，与法币实行另帐发行直接相关。自1939年9月起，中央银行的发行额一直超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另帐发行额之和。而自1942年12月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另帐发行额基本上被限定，但中央银行的另帐发行额却急剧上升。

与通货膨胀相应的，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物价的上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物价指数上升得并不快。但从1938年起，物价上涨的趋势逐步明显。

以下是国统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物价指数变化表：

1937年6月	1	1939年12月	3.23
1937年12月	1.18	1940年6月	4.87
1938年6月	1.4	1940年12月	7.24
1938年12月	1.76	1941年6月	10.5
1939年6月	2.26	1941年12月	19.8

资料来源：［美］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第436页。（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3,p．436．）

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每一年比上一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分别为：1938年，40%；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

作为战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所在地重庆，物价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情况显得更为严重。以下是1937年至1941年底的变化情况：

日期	**22**种基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以**1937**年上半年为**1**）	法币购买力指数（以**1937**年上半年为**1**）
1937年12月	0.98	1.0172
1938年12月	1.04	0.6097
1939年12月	1.77	0.2813
1940年12月	10.94	0.0783

1941年12月	28.48	0.0365

资料来源：物价指数：《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95—196页；法币购买力指数：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59页。

可以看出，1939年是物价迅猛上涨、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的转折点。

战时物价指数上涨的原因，往往被归于货物短缺和运输的困难。但是，事实上后方各地的基本必需品的生产还能够维持下去，还有不少货物可以辗转从日伪占领区获得。正如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的美国人杨格所指出的："物价不断上升之主因，显然是由于钞票泛滥，而不是由于货物普遍缺乏或运输困难的不断增加。"(120)

应当指出，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便注意到平抑物价的重要性，也采取了若干措施。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曾明确把三大类近五十种货物列为经济部"指定产品"，授权经济部"对于指定之物品，得因必要分别为禁售或平价之处分"(121)。战时通货膨胀之下，物价的平抑成为国民政府十分头疼的难题。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引起了国统区社会各阶层普遍的不满。考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后果，还必须联系同期领薪阶层实际收入指数的变化。重庆等地部分领薪阶层实际收入指数可见下表：

年份	重庆市工人	四川农业雇工	重庆市教员 1936年7月–1937年6月为1	重庆市公务员 1936年7月–1937年6月为1	士兵
1937	1	1	0.9	0.88	1
1938	1.24	1.11	0.78	0.68	0.93
1939	0.95	1.22	0.58	0.43	0.64
1940	0.76	0.63	0.29	0.18	0.29
1941	0.78	0.82	0.24	0.14	0.21
1942	0.75	0.75	0.17	0.10	0.10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62页。

到抗战中期，以工薪收入为生的人们已经明显成为战时通货膨胀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名义工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物价指数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幅度相比，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比战前大大地降低了。特别是完全靠薪金的普通教师、公务人员和士兵，事实上处于难以为继的艰难境地。

第三节　战时金融

一　安定金融和维持法币汇价的努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金融领域的稳定亦受到较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及所属金融机构为稳定金融采取了不少措施。

1937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对两年前实施的《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加以修正公布，除了重申对意图赢利而私运、销毁、或伪造、变造银币、铜币、中央造币厂厂条者的处罚外，特别增加了严厉处罚伪造、变造币券者和收集者的条款，处罚最重的为无期徒刑并课以5000元的罚款[(122)]。这一《条例》的要旨，不仅在于防止贵金属的外流，而且从反面提升了法币的重要地位。

对贵金属币的私运、销毁和伪造，还不是金融领域的主要困难。战争爆发伊始就普遍出现的向银行提存、抢购外汇、逃避资金和大幅

度呆账等情况，要求国民政府加强对商业行庄的管理。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当天就宣布上海银钱业停业两天。8月15日，财政部又公布了以限制提存、鼓励存款为主要内容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如规定活期存款每户每星期提取限于5%，且总额不得超过150元法币；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得通融提取，用作抵押每户亦以法币1000元为限；到期后如不欲转定期者，也须转作活期存款，并以原存款银行、钱庄为限，同业或客户汇款，一律以法币收付之[(123)]。《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金融开始由平时转向战时的重要标志，该《办法》施行后，“虽无外汇管理之名，已收外汇管理之实”[(124)]。嗣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还明确规定：各税收机关收纳税款，仍应以法币及可以兑取法币之票据为限，汇划票据概不适用；至于以支票报解税款，均不受《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第一条的限定，只需得到四行联合审核委员会的核准[(125)]。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旨在控制市面上法币的流通量，来达到安定金融的目标。

为了避免该办法对工商业资金周转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8月16日财政部规定了上海市补充办法四条，以汇划票据弥补市场金融筹码的不足。9月1日又提出汉口市的补充办法四条，采用可以入账而不能支付法币的横线支票，来解决工商业和机关的困难[(126)]。此后，汉口、西安、郑州、济南、长沙、重庆等城市也实行了大体相同的办法，既执行了限制提存的规定，对金融有所安定，又兼顾到市面资金流通的需要。另外，财政部也适当放宽了提存额的限制。

当然，不同地区对《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的执行情况是有差别的。如根据广州市银行公会的意见，广州中国银行当时并不对提存加以限制，准备到万不得已时再按照上海的方法执行，但停止了以法币折合港币或其他外汇的汇出汇款，并通过广东省财政厅要求香港及广州沙面的外商银行，暂不接受华人的新存款。又如河北省省会所在地的保定，为了避免执行“同业或客户汇款一律以法币支付”的规定对

省钞流通的不利影响，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对河北省钞的支持，同时不公布有关安定金融的办法。为了适应战时调剂内地金融、扶助农工各业增加生产的需要，1938年4月8日，财政部发表了《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十项[(127)]。同年6月1日至3日，在汉口召开了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会议，各省代表共到74人。

1937年8月30日，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总动员计划大纲》，在金融管理各主要方面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1．通货管理。（1）推计法币需要数额，预为印制存储，并注重分储于安全地区。（2）将发行之现银准备，为安全存贮之措置，并奖励督促收兑民间之金银，以厚准备。（3）国防民生有关之农工商矿重要事业，其通货之供给，应为合理之增加。（4）法币发行应从速实行中央储备银行法所规定之办法。

2．汇兑管理。（1）严格限制外汇。（2）积极流通内汇，凡未设银行之地方，应利用邮政机关办理。

3．金融业务管理。（1）必要时主管机关得与各地银行公会规定临时之适宜办法，以维持金融之安全。（2）主管机关令中、中、交、农四行规定接济各金融机关办法及维持发展内地有关国防民生农工商矿必要事业办法。（3）指导投资，使资金运用于必需品之生产储集事业。

4．金融机关管理。（1）促令金融机关将资金逐渐移转安全地带。（2）促令各银行分别就指定地点推设分支行或新组银行，以健全金融网。（3）促令各银行组织联合准备机关，以健全金融机构[(128)]。

1938年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中，关于金融方面，又提出两项政策：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维持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金融安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币汇价的稳定所体现的。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官方外汇市场，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买卖外汇，以消耗官方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法币的汇价[129]。但是，国民政府战时管理外汇工作，困难重重。正如孔祥熙所说："一因我国有租界关系，政治力量无法控制；二因有外商银行买卖外汇无法制止；三因金融中心在上海，投机牟利之风盛行；四因敌伪在沪多方捣乱。"[130] 从1937年8月13日到1938年3月修订外汇政策时止，国民政府在上海出售的外汇据报约有5000万美元之多[131]。可见，有大量的资金还是通过外汇市场逃避了。

为了防止各地以汇款方式调集资金到上海购买外汇、逃避资金，四联总处于1938年3月命令各银行限制往上海汇款，包括解付汇划款额。1939年6月21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自重庆发布"马电"，规定从6月22日起，上海银钱业提存款，除政府要需及发放工资者外，每周支取数目在500元以内者，照付法币；超过500元者，以汇划支付，专供同业转账之用；上海以外各埠，仍照旧办理，至于将存款移存内地者，则不受该办法的限制[132]。

1938年初，日本侵略势力和"临时政府"在北平设立了所谓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并由伪临时政府发布《旧通货整理办法》，规定了法币在华北地区的流通期限：中央银行券和中国、交通两行的南方地名券至1938年6月10日为止，中国、交通两行的北方地名券以1939年3月10日为限。而在以"联银券"收兑法币时，有意压低法币的比价，如1938年8月把法币与"联银券"的比价低贬10%；1939年1月起，又压低法币对"联银券"的比价30%。其目的是套换法币，再以法币到国民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换取外汇。

国民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193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1．外汇之卖出，自本年三月十四日起，由中央银行总行于政府所在地办理。但为便利起见，得由该行在香港设立通讯处，以司承转。2．各银行因正当用途于收付

相抵后需用外汇时，应填具申请书送达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3．中央银行总行接到申请书，应即依照购买外汇请核规则核定后，按法定汇价售与外汇[133]。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从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以来的自由买卖外汇的政策，转而实施一定程度上的外汇管制办法，即只有经中央银行审核为“正当”的需求，方得以在上海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购汇，其他一概停止供给。

随着战事的推进，当时外汇的实际需求量很大，但在外汇请核制度之下，无法获得请准外汇者便纷纷在市场竞购，外汇黑市相应出现，且日趋活跃，波动很大。而日伪势力进一步套购外汇，使法币的汇价更难以维持。自1938年3月下旬每1元法币的英汇跌入1先令，月底又缩至10.75便士，5月中旬为10.625便士，至6月13日，上海汇丰银行英汇牌价为8便士，比实施外汇请核办法前夕的牌价1先令2便士半，约下跌了45%。到8月中旬，英汇一度跌破至7.9687便士[134]。为了避免法币汇价的进一步下跌，国民政府多次商请英商汇丰银行乃至英国政府出面支持。至1939年3月，中英双方正式达成协定，共同设立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平准汇兑基金，用于香港、上海两地的外汇市场，以维持法币的英镑汇价[135]。另成立以英国专家罗杰士为主席的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与运用。

中英平准汇兑基金和基金委员会的设立，曾对维持法币的汇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难以应付，法币的汇价也不可避免地低落。1939年6月7日，上海汇丰银行的法币牌价跌至6便士半，10月又跌入4便士。而到1940年5月初，法币的市价下跌到英汇3.125便士、美汇0.045美分。同年7月，平准基金会外汇存底仅200万英镑，难以继续稳定汇市[136]。汇市的不稳又马上影响到上海市场金价的上涨，以及麦、粉、棉纱等均涨价。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局面，1941年4月中国政府分别与英、美签署协定，设立“中英美平准基金”，其中，英方共认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美方摊认5000万美元，中方出

资2000万美元[137]。另设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共同维持上海的法币汇价。中英美平准基金运作之后，采用外汇审核制度，按规定汇价（每1元法币合$3\frac{5}{32}$便士、另合$5\frac{5}{16}$美分），供给正当商业所需之外汇。这一汇价要比同期上海黑市高得多[138]。此外，根据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授权，平准基金委员会商得上海中外重要银行以及香港当局之合作，宣布取消了上海、香港两地的外汇黑市。

除了设立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之外，财政部扩大了原有之外汇审核委员会组织，改为外汇管理委员会，财政部长孔祥熙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成为全部进出口外汇管理职权之中心，有关处理封存资金、集中侨汇，取消上海外汇黑市经过、平准基金委员会规定上海买卖外汇办法之经过，都由外汇管理委员会审定。另外，凡属政府机关及企业发展申请用汇，由外汇管理委员会直接审查，至于私人及商界申请购汇，则授权平准基金会审查。

在平准基金设立和运作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方面还与华中傀儡政权的金融机构及有关伪币进行了较量。

1939年5月1日，以伪南京维新政府为背景，并且直接得到日商银行支持的“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日本占领区宣布成立，同月15日正式开业。该行除在上海设总行外，另在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扬州、芜湖、蚌埠、南通、嘉兴、杭州、绍兴、徐州、海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华兴商业银行宣称系日、华合办，资本总额为法币5000万元。对外公布由伪南京维新政府认股2500万元，另由日本兴业银行认股500万元，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五行各认股400万元。华兴商业银行筹备时，曾试图拉拢在上海的其他外商银行参与认股，但遭拒绝。华兴银行发行面额为100元、10元和1元的“华兴券”。在“华兴券”之前出笼的“蒙疆券”、“联银券”等北方伪币都是与日元联系的，“华兴券”却宣布与法币直接挂钩。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没有让华

兴券与日元挂钩，不仅在于无法承担相应的财政负担，还有着更为险恶的用意。一手炮制华兴商业银行的日本兴亚院的打算是：规定“华兴券”1元兑换英镑8便士，与法币等价行使；但对于日元系各通货，则根据市面实际行情兑换[139]。日方打算通过“华兴券”与法币的挂钩，可以在上海套取外汇。“华兴券”的1元券上印有“凭票即付国币壹元”字样，国币实际上就是指法币。除了宣布“华兴券”与法币等价，另规定“华兴券”“于缴纳租税及其他一切公私交易，一律通用之”[140]。从1939年9月1日起，江海关税收处被日伪方面强占，江海关开始以“华兴券”为征税的折算标准，以法币1元5角5分折合“华兴券”1元收税。日伪方面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江海关税收吸纳法币，再用法币转购外汇，即便法币汇率波动，也将不会直接受损。

早在1939年1月，国民政府方面便针对日元、日本军票和华北伪联银券的肆虐，颁发过《取缔敌伪钞票办法》，明确规定凡“敌国银行所发钞票及敌军所发军用票、伪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暨敌伪所发之其他性质相同之钞券”，“无论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收受行使”[141]。在上海租界内，日伪钞票的流通一直遇到有力的抵制。而当华兴银行和“华兴券”出笼后，国民政府方面立即进行了反击。1939年5月3日，即华兴银行成立的第三天，国民政府财政部即致电四联总处、上海银钱业公会和市商会转知各行庄，明确指出：“现在伪币在华北市价日益低落，乃又在沪成立所谓华兴银行，并发行空头伪币，并逞此欺骗之故伎。我中中交农四行暨全国金融业及其他各业自应严守立场，一律拒用该项伪币，绝对勿与来往，使该伪行陷于孤立，以减少其诡恶伎俩之流毒，而保持我正当之权利。”国民政府外交部则照会各国驻华使馆，要求对非法组织之华兴商业银行严加谴责，并告诫在华外侨一律勿与华兴银行往来，勿接受该行伪钞及其任何票据[142]。5月9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言人对中外记者明确指出：“华北伪银行设立之目的，原即在强骗民众使用不兑现而毫无价值之纸币，现敌人在华北之搜刮，已达其限度，惟仍急需金钱，故又转其目标于华中，敌方所拟设立之新银行为商业银行，据谓，其资本半由敌国各银行担任，

半由傀儡政府担任，鉴于伪币在华北之失败经过，可断言除非受敌伪之武力压迫，决无人愿接受此新伪银行所将发行之纸币。”要求各外国银行“为其本身及大众之利益计”，继续拥护法币，拒绝接受伪华兴券[143]。7月17日，财政部曾电上海银钱业，要求制止伪币收付买卖。8月，根据财政部的要求，行政院又转咨司法院通饬各级法院，任何债权债务若有基于伪钞（“联银券”、“华兴券”等）而成立者，在法律上应为无效[144]。也就从华兴银行成立起，中国、交通两分行停止收受华北地名（如天津、青岛、济南）之法币，以杜塞华北法币南流，防止两行汇兑上之耗损，断绝投机奸商牟利途径。财政部并明确命令上海各业严守立场，一律拒用“华兴券”。

鉴于上海各银行钱庄仍有买卖“华兴券”，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0月9日再度致电上海有关各业公会，要求对各成员店号切实转行告诫，尽力设法制止。内称：查“华兴钞”应一律禁用，并绝对勿与往来，惟沪市银钱烟兑各业，或以贸易零星，不免有收付及买卖情事，并应严予查禁[145]。日伪方面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以法币为准备的“华兴券”并与之等价流通，其重要目的在于套取外汇和掠夺物资，而图逐渐代替法币的地位。由于国民政府方面及时有效的反击，加上法币的实力和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华兴券”，日伪的上述目的一时无法得逞。但是，1939年5、6月间，日本集中大量的法币，向上海外汇市场冲击，造成法币汇价的贬值。7月18日，上海汇丰银行停止法币汇价的挂牌。日伪方面担心“华兴券”随法币汇价的低落而暴跌，即于7月19日发表声明，将“华兴券”脱离法币汇价水准，另订立华兴券1元合6便士的汇价，并称无限制供外汇；其与法币兑换比价，将依法币对英镑之汇价而定。而7月21日汇丰银行的法币汇率牌价跌落到4.75便士[146]。

“华兴券”与法币脱离联系后，尽管订立外汇牌价，却并不供应外汇，毫无信用，不仅没有得到扩张，连独自存在的条件也失去了。“华兴券”脱离法币比价之后新印制去掉“兑换国币”字样的5元券

和10元券，以及日本为华兴银行铸造1分、5分、1角、2角硬辅币，以后也没有发行出去。据统计，1939年6月“华兴券”发行额为60万元，1939年12月为510万元，1940年6月和12月的发行额都是560万元[147]。应当指出的是，伪华兴券的发行额，并不是实际的市场流通额，其中大部分滞留在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和其他在沪日本银行的库房里。即便以“华兴券”的发行额来考察，这一数额与上海市场上数以亿计的法币相比，几可忽略不计。“华兴券”定下6便士的汇价，法币的汇价却在变动，这样“华兴券”与法币的比价也时常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效果，使上海市民更确认为是“华兴券”本身价值的不稳定所致。在市面上，离开法币基础的“华兴券”被视作废纸，流通额无法扩大，仅限于华兴和有关日本银行的往来。

1939年下半年，汪伪政权在酝酿之际，便打算停止“华兴券”的发行，以便让新设立的中央金融机关发行统一的货币[148]。1940年12月，汪伪财政部公布《整理货币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华兴商业银行之发行权取消之，其已发行之纸币之收回办法另定之。”[149] 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正式成立，发行伪中储券，“华兴券”逐步被收回，伪华兴商业银行的发行权被取消，成为汪伪政权金融体制之下的一般商业银行。

汪伪政权取消收回“华兴券”，决不意味着放弃了与法币之间的较量，而是为了推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1941年1月，汪伪政权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但在上海的分行实际上处于总行的地位。中央储备银行最初发行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1元的“中储券”，根据1940年12月汪伪财政部公布的《整理货币暂行办法》规定，汪伪“国民政府授予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兑换券之特权，以期逐渐完成币制之统一”；“凡人民完粮、纳税及其他对于政府之支付，一律行使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但暂准以旧法币与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同样行使”；“凡政府机关各项经费之支付，一律行使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同时又宣布允许法币与“中储券”“暂

行等价流通”[150]。汪伪政权出笼前，曾规划了货币与金融措施，虽然已经确定将以新发之货币“中储券”为统一之货币，且已经明确提出须停发与收回“华兴券”，但却不得不承认，法币所定对英镑的汇率，对中国之国际贸易极为适合而有利，“中储券”将继承法币的法定汇率，“以示信用中外”，因而“当政府成立之日，新、旧法币宜通令照常行使，同时并分令各地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中央信托、邮政汇业两局，以及其他各银行、钱庄照常营业，四行及两局并由政府派员监督”。甚至担心“万一四行不遵令而撤退，恐其他各商业机关因缺乏资金之通融而随之停业，使市面金融陷于混乱状态，予人民以不良之印象。上海为全国金融之枢纽，必须用全力顾及，其他各地只须上海不生问题，均可迎刃而解”[151]。显然，当时日伪方面打算以“中储券”来统一华中地区的伪币，既要扩大“中储券”的流通，又企图利用法币来向国民政府方面套汇。因此，日伪确定采取暂准法币与“中储券”等价流通，先利用法币进而驱逐法币的策略，即先使“中储券”能够立足，然后积蓄力量与法币较量。

伪中央储备银行属于标榜为“国民政府”的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中储券”被明确赋予“统一币制”的职能，这与“联银券”、“华兴券”等地方性伪币不同，“中储券”的出笼对国民政府方面的货币金融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法币汇价的稳定更为困难。

国民政府对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的出笼十分重视。1941年1月初，即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出笼的前夕，重庆国民政府便电令上海银钱业公会和市商会，一律拒用伪“中储券”，在上海租界的邮局也奉令拒绝收汇。与此同时，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在香港召集了上海金融界人士会议，商议汪伪中储行出笼后之应对措施。根据重庆当局的指示，1941年1月9日，上海银行业、钱业公会拟定了拒用“中储券”的办法，如在上海设立“中央特种宣传处”，大张旗鼓地举行“拒用中储券宣传周”。待到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正式出笼后，重庆国民政府电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转饬在沪中外银行拒收伪

中储券，指出："中央储备银行"系非法组织，无充足之准备金，非中国或外商银行公会会员，要求拒收中储券。根据这份电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利浦召集上海金融业和商业上层人士讨论之后，决定在公共租界抵制"中储券"[152]。当时伪中储行分送给上海租界中、外银行的"中储券"样本，各行都未予理睬。伪中储行当局曾指派人员持"中储券"向上海四行及其他商业银行强行存储，中行等在拒绝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收下，但在存单上注明"不付利息，提存时仍以原券支付"，以示抵制[153]。另外，上海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还把收到的"中储券"集中汇解英商汇丰银行，然后向"中央储备银行"兑换法币，致使"中央储备银行"措手不及，难以承兑。"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虽笼络租界内电车公司同意收受"中储券"，但市民鲜有以"中储券"去购买车票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上海四大公司原来已同意接受"中储券"，但大部分市民仍拒绝使用，广大营业员坚决拒收，公司只得在营业间另设兑换处，一时出现凡以"中储券"购物者须事先换成法币才能购买的景象。

为了打开推行"中储券"的局面，汪伪当局于1941年3月中旬起实施《妨害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凡"故意妨害新法币（即伪中储券，下同—引者注）之流通或破坏其信用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之罚金"。（第二条）"拒绝使用新法币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第三条）"凡银行、银号、钱庄、典当及其他公司行号，有第二条、第三条情形者，除犯人依各该条治罪外，并吊销其营业执照"。（第四条）"凡公私团体、军民人等，如有第二条至第四条犯罪情形者，应立即报请当地警察机关逮捕，移送法院讯办"[154]。这就是汪伪方面推行"中储券"的法律依据。3月24日，汪伪财政部向上海金融业发出"通令"，威胁不得拒收"中储券"。在上海日本占领区，固然可以藉此强使市民和商家接受"中储券"，但是在租界却不那么容易了。日伪方面则采取了种种手段，以冀推广"中储券"，排斥法币。如：在上海的各种交通车辆和大马路张贴宣传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的标语，在《申报》、

《新闻报》等报纸内夹送相应的传单，派特务到拒收“中储券”的金融业、商业部门进行威胁，强迫各业业主甚至普通市民到伪中储行存款。1941年7月英美宣布冻结中日资金后，日伪方面加大了在上海外汇黑市的活动，造成黑市汇价猛涨，法币不断贬值。上海日商正金、三菱、三井、台湾等银行的华商票据，原由英商汇丰银行收解，改由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经办，市场上“中储券”一度升值，在伪中储行柜台前以法币兑换“中储券”者日趋踊跃。汪伪财政部还下令，自9月1日起，所有关、盐、统各税及其他“中央”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新法币，不收法币，迫使商人以法币向伪中储行调换“中储券”本票或保付支票，这样伪中储行上海分行曾兑入不少法币。

尽管自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法币的汇价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中、中、交、农四行在日伪地区的业务受到了很大损害，但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较为及时得当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英、美方面和租界当局的公开支持，直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在上海地区与伪币（包括“华兴券”和“中储券”）的较量中仍占了上风，在上海租界基本上仍占绝对优势。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半年后，“中储券”在内地流通已达6000余万元，但在上海租界主要是在辅币流通，本位券无法站住脚。一般市民即使不得不收受了“中储券”，也往往立即设法购买物品或换成法币，最终大部分又都流回到“中储行”，对此伪中储行当局颇感无奈：“旧法币头寸日益减少，而来源枯竭，实可虑也。”(155)

重庆国民政府和南京汪伪当局双方的特务，还在上海等地展开了针对对方金融机构及人员的恐怖活动。1941年1月，伪中储行的专门委员被暗杀，伪中储行上海分行遭到手榴弹的袭击，数名高级行员被暗杀。3月份，汪伪特务在上海绑架了中国银行职员百余人、交通银行职员二人、中国农民银行职员一人，江苏农民银行也有五名职员被暗杀、六人被伤。而中央银行设在上海亚尔培路和静安寺路的两家分行被炸，银行职员和顾客多人伤亡(156)。在上海的中、中、交、农

四行职员一度人人自危，不敢上班，各行只得暂时停业。只是在英、美、法领馆的斡旋下，双方才停止了对金融业及从业人员的恐怖活动，释放了捕禁人员。

鉴于日伪势力日趋猖獗，重庆国民政府有关当局也对上海的金融善后进行部署。早在1940年10月11日，蒋介石曾当面指示财政部次长徐堪："港沪情势将有变化，四行及重要商业银行在沪港人员、钞券及文件、帐册等，务令急速准备，以策安全，并迅拟办法。"徐堪当时拟就关于四行上海分行的三点应对措施：1．租界情势变化不能营业时，即公告停闭，撤退至闽浙省内适当地点。2．撤退时，各行应酌留忠实可靠者若干人，在沪密为照料，并负通讯之责。3．文卷、账册、契据、债券等项，应早为运存浙闽省内适当地点，或在沪移存[157]。针对日伪在上海的金融恐怖活动，重庆当局曾议定应因方针：四行照常营业；斟酌实际情形，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后撤不必要之人员；力予减少库存，将公债和账册放置于安全地点[158]。特别是上海中、中、交、农四行均作了应变准备。至1941年6月，四行在上海之库存及头寸已大大减少，当地放款及存放同业之款均设法收回；重要账册文件或设法内运，或暂时移存公共租界内安全地点；营业机构则全部移入租界内，除了加强警卫外，又请求工部局加派巡捕。另外，上海银行公会也将包括票据交换所及联合准备库等特殊金融机构的重要文件，秘密移入上海美军防区保存，有关人员作了随时移迁香港办公的准备，上海票据交换所在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存款总额由8000万元减至3500万元，联合准备库则拟定在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不能行使职权时暂行取消[159]。由于采取了有关应变措施，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重庆当局掌握的政府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较小。

二　四联总处的主要活动

在战时金融体制的确立及其运作过程中，四联总处起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令饬迅速组成以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为首的金融委员会，作为战时金融决策最高机构。旋因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该委员会未及成立。至7月29日，在财政部授权之下，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设立了联合贴现委员会，共同办理同业贴现业务。8月9日四行联合贴现委员会正式改为“联合贴放委员会”，核办对上海同业的贴现与放款事宜。当时每日由四行代表商定贴现率和放款利率后，再由中央银行挂牌公布；凡经审定通过的贴放款额，由中、中、交、农四行大体按照35%、35%、20%和10%的比例承担。放款的利息则就放款期间的平均利率计算。中央银行逐日把贴放款项收付报告表分送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以资接洽[160]。财政部还令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联合设立审核委员会，办理对特别支取款项的审核，并制定特别支款申请书，由需要申请支款的公司行号填写，且由存款行庄提供证明后，再送交四行审核委员会审核[161]。但这只是四行在贴现、放款和审核支款等普通业务中的合作与协调，还不是一个新的金融机构的成立。同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财政部令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组成了联合办事处，8月16日，上海四行联合办事处在法租界开业，四行联合办事处最初由宋子文负责主持，“每日开会一次或数次不等”，“凡财部决定之措施，如安定金融办法等等，均由本总处赞襄及执行”[162]。当年10月底财政部长孔祥熙回国后，由孔主持四联办事处事务。国民政府设立四行联合办事处，旨在避免四大政府银行之间的歧异，以实行统一管理和指挥，进而对各行的资金进行统筹分配，以应对因战事而导致的金融紧急情况。另在国内其他重要城市设立的四行联合办事分处和联合贴放分会，均受上海办事处节制。

待到1937年11月，因上海和整个华东战局的失利，中、中、交、农四行的中枢机构内迁[163]，四行联合办事处亦移至汉口。不久，又自汉口迁到重庆。

四行联合办事处从成立到1939年改组，还只是一个松散的协调性机构，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各行都不能下达强制性的命令。但它对于统制金融、扶植中央银行和战争初期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仍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行联合办事处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三个调整委员会（即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共筹拨了调整资金6000万元。1938年3月军事委员会的三个调整委员会撤销、其工作相应改归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农本局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继续进行之后，四行联合办事处又增拨营运资金1.2亿元[164]。四行联合办事处还直接向内迁的民营厂矿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至1938年底，贷助民营厂矿内迁和复工的款额达850万元。此外，到1939年12月，四行的联合贴放总额达63645万元[165]。显然，四大政府银行资力的集中使用，对于协助内地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缓解内地资金的紧窘状况，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

在一时期的贴放款中，商业放款和同业放款占了78.61％，协助农业、工矿业、盐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款项只占18.78％[166]。另外，部分贴放款被人以票据或其他资产抵押的方式获得，而实际上却被用于套买外汇或囤积货物。也就是说，四行联合办事处时期的资金流向和实际使用并不完全合理，对金融的宏观调控能力还不大。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宣布“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四联总处设理事会，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中国、交通两行的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以及财政部的代表共同组成；四联总处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国民政府特派之，“总揽一切事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之职权”[167]。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的身份，担任了四联

总处理事会的主席。作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最高负责人的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则为四联总处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另外，翁文灏、张嘉璈、徐堪、陈行、周佩箴、叶琢堂、贝祖诒等为理事。理事会设秘书处管理行政事务。

四联总处的这次实体化改组，还体现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政府金融系统进行高度集中的安排。抗战以来，蒋介石对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间业务经营中实际上存在着各自为政状况颇为不满。在决定四联总处改组前夕，蒋在日记中写到："金融机关如不能由中央统制，则无疑养瘫致患，岂子文一人而已也。"[168] 1939年8月初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四联总处改组并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之后，有关各行均表示接受。蒋介石当时把改组后的四联总处视为"金融联合库机构"[169]，认为改组的完成预示着"财政金融问题渐能如计集中，此亦转败为胜因祸得福之机，国人如子文新之等，究以国事为重也"[170]。从而完成了政府银行系统高度集中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人事安排，国民政府的金融统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组后的四联总处的权限范围较广，包括：全国金融网之设计分布，四行券料之调剂，资金之集中与运用，四行发行准备之审核，受托小额币券之发行与领用，四行联合贴放，内地及口岸汇款之审核，外汇申请之审核，战时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投资，战时物资之调剂，收兑生金银之管理，推行特种储蓄，其他四行联合应办事项，四行预算决算之复核[171]。根据这些规定，四联总处的职权涉及金融和社会经济两大领域。与此相应的，四联总处下设战时金融委员会和战时经济委员会，来实施其职权。战时金融委员会分设发行、贴放、汇兑、特种储蓄、收兑金银、农业金融六处，主管金融方面的事务。战时经济委员会分设特种投资、物资、平市三处，主管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投资、物资之调剂、物资之平价等经济方面的事务。

无论从四联总处最高机构的组成人员还是从其职权来看，它不仅仅是在四行之间起协调作用，而是一个在四行之上起指导、监督、考

核作用的新的机构。

改组后的四联总处统一了在各地的下属组织，在业务重要地区设立分处，次要地区设立支处，以督导国家金融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原在各地设立的贴放分会均归并于当地的分支处。至1940年1月，已设重庆、成都、上海、香港、杭州、宜昌、福州、贵阳、桂林、长沙、西安、衡阳、南昌、昆明、兰州等15个分处，内江、自流井、叙府、嘉定、泸州、万昌、北碚、宁波、吉安、泉州、永安、梧州、零陵、常德、南郑、柳州、西宁等17个支处[172]。各分支处下设文书、业务、会计、调查、农贷、储蓄等组。通过数目多、分布地域广的分支处的活动，四联总处得以控制战时后方地区的金融事务和经济事务，甚至把国民政府的经济、政治影响扩大到日伪地区。

四联总处对战时经济和金融进行了规划。1940年3月30日，四联总处正式提出了《经济三年计划》和《金融三年计划》。同年4月9日，又分别制定了《经济三年计划实施办法》和《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

四联总处拟订的经济计划目标，“首在增进生产，便利运输，以求自给自足。次为稳定金融，安定物价”。确定经济事业包括农林水利、工矿建设、商务贸易和交通建设四个方面，分别匡算了最低限度所需资金。提出农林水利（包括农贷、农林建设、水利建设三项）在1940至1942年的三个年度内，需要资金国币21.451亿元；工矿建设（包括国营工矿、民营工矿及工业保息与辅助等三项）在三年内需要资金国币3.6101亿元、美金2474.5万元；商务贸易（包括平价资金、出口农矿产购运资金、一般商业贴放等三项）三年内需要资金国币7.3亿元；交通建设（包括铁路、公路、电讯及航空四项）三年内需要国币13.28649亿元、美金2034.7万元、英金42.7万镑。此外，还专门列出了军民运输所需汽油机油及汽车配件三年需要资金额度为美金3800万元[173]。整个《经济三年计划》系以工矿建设为中心，其中国营工业所需经费国币部分定为16654万元，民营工业所需经费国币

部分定为3800万元。国营工业拟由国库拨发11415.5万元，四行投资800万元，四行贷款4438.5万元；民营工业拟由国库拨发250万元，四行投资1760万元，四行贷款1790万元[174]。

《金融三年计划》提出“以稳定法币为中心”，首要为调节法币之流通额，防止通货之膨胀；其次为维持外汇、节省消耗、紧缩开支与严防敌伪破坏金融。预计三年内国库亏短数将达国币105亿元，增加法币发行国币60.5亿元，所拟补救之道为：中、中、交、农四行和中央信托局吸收存款共45亿元，财政部会同各行局推销公债12亿元，募集捐款6亿元，增加税收8亿元[175]。拟在1940年度四行和中信局吸收存款14亿元，推销公债3亿元，募集捐款2亿元，增加税收1亿元，其他金融机构拟吸收存款4亿元。此外，在调节法币流通方面，1940年度拟推广法币在内地的流通额相当于增发8亿元，推行小额币券4亿元，保持法币在华北、华中、华南游击区的流通额约15亿元[176]。

由四联总处制定的经济、金融三年计划及其实施办法，成为1940年之后四联总处工作的基本依据，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规范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和金融基本政策。

管理和调剂货币发行，是四联总处的另一重要工作。当时以流通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的法币大券兑换能在沦陷区流通的小券时，须有相当数额的贴水，致使大券充斥、小券短缺，法币实际上发生贬值。四联总处采取了多项措施，如限制搭发大券，限制大量携带小券出境，大量印制小券，在各口岸无限止兑换小券等，及时制止了贴水风波。另外由于欧洲战局的影响，历来承担主要印钞额的英国公司难以按期交货，一度也造成了通货紧缺。根据1940年7月第三十八次理事会会议关于《调剂钞券缺乏办法》，四联总处组织了钞券的印制和抢运。如转向美国方面订印钞券，还商请英、美公司在仰光建设分厂，由香港公司承印。另制定《内地印钞办法》，仅1941年四行便在重庆、赣州等地印制50元券共37.7亿元。四联总处一方面催促英、美方面加快向中国运送定印的钞券，另一方面还会同运输统制机构，组织抢运四

行在香港、海防、新加坡、仰光等地的存钞。1940年平均每月要组织50—60架次的运输机，把钞券抢运到后方地区。并在各地设立了18个钞券集中运存站，核定各个运存站运储钞券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各地军政开支的需要。在货币发行的管理上，四联总处较早就采取了扶植中央银行的措施。如1940年实行轧现制度，规定由中央银行对政府银行实行总轧帐；1942年初起，又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票据交换。1942年3月22日，蒋介石手令四联总处加强对四行的统制，特别是“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统一发行”[177]。四联总处即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会商，先后拟具通过《统一发行办法》和《统一发行实施办法》，规定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之发行，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

四联总处还直接介入了战时的金类收兑事项。1938年5月，四联总处属下设立了收兑金银处，6月间开始收兑。起初仅收兑都市存金，继而收购产地生金。至当年底，共收黄金31464两，合国币6,152,948.3元，另收兑白银折合国币10,980,401.98元[178]。1939年起，实行了收兑金银的统制，即明确规定：“收兑金银事宜，统由收兑金银办事处秉承四联总处主任之命，督促并指导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分行处办理之。”[179] 收兑金银处组设了检查，督促收兑，厉行检查，防杜隐匿和私运。另采取措施增加生产，划拨资金以扩充国营金矿，资助民营金矿；还适当调整金价、酌贴运费，以增进收购。1939年内，黄金收兑数量迅速增长，达314917两，合国币88,277,294.09元；白银收兑数则有所下降，合国币3,528,178.56元[180]。但1940年以后，通货膨胀渐趋严重，采金成本激增，官收价格与黑市价格差距益远，收兑成效下降，走私猖獗。1940年为267,148两，1941年更减少至84152两[181]。1942年3月，四联总处撤销了收兑金银处，由中央银行办理收金事宜。1943年5月，国民政府停止执行统制收兑金银的政策。

在战时平定物价、管理物资等方面，四联总处也发挥了较大的作

用。首先，是审议通过或直接制定施行有关法规。如在1939年11月连续审议通过了由经济部拟具的《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平价购销处组织章程》；1940年3月中下旬，拟订和讨论通过了平定物价办法十二项；1940年3月议决平抑纱价办法四项；1940年8月，拟订《加强同业公会以安定物价之建议案及实施办法》，等等。其次，四联总处采取实际措施，协助和督饬平价工作之施行。1939年底经济部设立平价购销处后，急需运作资金，四联总处曾特予通融，先行拨借800万元；又允准平价购销处以开具贴现票据的方式，向四行支取款项，至1940年8月，共支取18,692,500元，分配予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福生总庄、农本局、燃料管理处等机构。后又改贴现方式为低利基金借款，以保证运作资金。此外，四联总处还负责对平价购销业务进行考核。

三　战时后方的银钱业

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后，后方地区金融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根据1939年10月5日通过的《关于加速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决议》，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凡与军事、政治、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以及人口众多之地，至少应筹设一行，以应要需。至1940年3月20日，依照第一期计划所设立的分支行已达171处，其中四川60处、云南25处、贵州21处、广西22处、广东4处、湖南5处、陕西15处、甘肃11处、青海2处、宁夏1处、西康5处。原计划外所增设的分支行有25处，其中四川10处，云南、陕西、甘肃各3处，贵州、福建各2处，湖北、湖南各1处[(182)]。另根据到1940年底的统计，自抗战爆发之后，中、中、交、农四行在西南西北增设的行处达235处，计中央银行69处，中国银行85处，交通银行37处，中国农民银行54处[(183)]。到1941年12月31日为止，中、中、交、农四行在各地的分支行处总数已达469处（不包括在日伪占领区的行处），其具体分布如下：

省　别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合计
四川	28	29	13	38	108
西康	2	1	2	3	8
云南	6	14	1	5	26
贵州	4	8	6	6	24
广东	3	10	2	10	25
广西	8	12	11	7	38
福建	7	19	7	10	43
浙江	3	14	7	12	36
安徽	1	2		1	4
江西	5	13	4	8	30
湖南	9	8	6	10	33
湖北	2	1		4	7
河南	7			1	8
陕西	7	19	8	5	31
甘肃	6	9	4	4	23
宁夏	1	1		1	3
青海	1	1		1	3
国外		17	2		19
总计	100	170	73	126	469

《四联总处三十年度工作报告》，引自《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7—198页。

战时后方的商业行庄也有显著发展。抗战爆发前，中国西部省区金融业发展滞后，除重庆金融业相对较为发达外，其余贵州、甘肃等省，甚至没有一家银行总行设立。据统计，1937年全国所有银行共有164家，分支行总计有1627家，资本实额为43430万元。其中，设于川、康、滇、桂、陕、宁、新七省的银行总行只有23家，占全国的14%[(184)]。

抗战爆发后，情形迅速发生变化。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国有银行为首的一大批国营、省营、民营银行，纷纷将其总行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其中，中、中、交、农四行总行全部迁到重庆，而且随总行内迁的四行分支行处，也多达200多处。随后，四行在四联总处领导下，在大后方积极推设分支机构，加速大后方金融网建设。到1941年底，中、中、交、农四行在其控制的17个省区内，共设立分支机构450个，其中设于大后方九省为264个，占总数

58.67%[185]。

除了国家行局，抗战时期后方私营银行即一般的商业银行，也有相当快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和诸多工矿业内迁，贸易中心西移，原来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受到极大的冲击，贸易额急剧下降，各种押款也无从料理，金融业出路“各银行既感沦陷区之无业可营，港沪租借地之范围狭小，惟有将其游资散之于农村，爰于抗战之初，即有若干银行随政府内迁，在川、湘、粤、桂、滇、黔各省筹设分支行，入后纷至沓来”。据统计，到抗战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7月底，南方和西南地区银行总支行共322家，其中广东81家，广西48家，湖南50家，贵州4家，四川128家，云南11家[186]。以四川为例，抗战爆发前四川境内商业银行，重庆有28家，其他各县市有47家。重庆的钱庄银号只有十多家，成都内江各有两家。抗战爆发后不久，重庆成为西南乃至整个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到1942年，重庆的商业银行有23家总行、14家分行、6家支行、17家办事处，共计60家。在四川，商业银行有10家总行、35家分行、9家支行、114家办事处，共计168家。其他内地省份的商业银行机构数为：西康省13家，陕西省12家，甘肃省4家，广西省11家，云南省42家，贵州省9家[187]。重庆的钱庄银号比战前增加了41家，达到50多家，四川其他县市增加46家，达到50家[188]。

战前一些著名的商业银行，如“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小四行”中的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或将总行迁往后方，或将业务重心放在后方，在战时后方的金融市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势头，政府最高当局也直接要求关注“各行储蓄总额与竞赛”[189]，甚至命令“各行集中游资，提高其利率”[190]。在管理方面，则要求各省银行及商业银行，必须向政府银行详细报告有关押款、放款、存贷、储蓄等业务情况[191]。这些措施也促使各商业银行加强展开相应业务。以下是1942年1月重庆市主

要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情况。

重庆市二十家商业银行普通存款余额表　（1942年1月　单位：千元）

银行名称	定期	活期	合计
上海银行	2193	15795	17988
浙江兴业银行	584	1484	2068
中国国货银行	126	6031	6157
中国实业银行	60	1249	1309
金城银行	630	6994	7624
大陆银行	368	191	559
盐业银行	313	284	597
中南银行	1533	3225	4758
新华银行	164	2146	2310
聚兴城银行总行	1479	3968	5447
美丰银行总行	435	6298	6733
川盐银行总行	1574	5921	7495
和成银行总行	72	2604	2676
亚西实业银行	45	2913	2958
四川建设银行	6	430	436
通惠实业银行	101	3047	3148
长江实业银行	147	3003	3150
建国银行	72	1463	1535
江海银行	44	1660	1704
开源银行	62	2550	2612
总计	10008	71256	81264
百分比	12.32	87.68	100.00

资料出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734页。

重庆市十七家商业银行普通放款余额表　（1942年1月　单位：千元）

银行名称	抵押放款	信用放款	合计
上海银行	29508	1276	30784
浙江兴业银行	80	9	89
中国国货银行	2092	178	2270
金城银行	2999	1209	4208
大陆银行	6	-	6
盐业银行	22	202	224
中国实业银行	1378	9635	11013
中南银行	120	1198	1318
聚兴城银行总行	1162	10448	11610
美丰银行总行	1510	23033	24543
和成银行总行	2746	9863	12609
亚西实业银行	-	15614	15614
四川建设银行	84	1920	2004
长江实业银行	75	6557	6632
江海银行	60	222	282
大川银行	-	1916	1916
开源银行	-	3986	3986
总计	41842	87266	129108
百分比	32.41	67.59	100.00

资料出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737页。

重庆是战时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中心。从整体来看，经过抗战爆发四年的发展，在重庆的内迁银行与原先在内地的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基本旗鼓相当，但是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额相差非常大，几家大的商业银行显然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活期存款额所占较大比重表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下，后方社会经济活动的波动性甚大，银行业难以汇集起稳定的可用于中长期投资的来源。

第四节　战时大后方的生产和交通

一　大后方的工矿业

抗战前，中国数量有限的工厂，大半集中于沿海省份。“七七”事变后，政府即下令沿海各厂矿迁入内地。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底，三年半时间，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迁移。其中，上海迁出之民营工厂共146家，机料14600余吨，技工2500百余名，成效颇著。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一带工厂，除少数内迁外，大多沦陷。此外，湖北武汉附件厂矿迁移，比较彻底。大冶铁矿共运出5.7万余吨，武汉共迁出民营厂160余家，省有各厂迁出6000余吨，汉阳钢铁厂及六河钢铁厂亦完成拆迁。湖南、浙江、福建等地也有部分厂矿内迁[(192)]。内迁厂矿共计639家，其中经由政府助迁者共448家，包括钢铁工业2家，机械工业230家，电器制造41家，化学工业62家，纺织工业115家，饮食品工业54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内迁器材共计12万吨[(193)]。按性质分类，机械工业约占40.40%，纺织工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0%，教育文化工业占8.26%，电器工业占6.47%，饮食品工业占4.91%，钢铁工业占0.24%，其他工业占3.79%，矿业占1.78%。内迁厂矿区域分布，以四川为最多，占内迁总数54.67%，湖南次之，占29.21%，陕西占5.90%，广西占5.11%，其他各省占5.11%[(194)]。这些内迁厂矿，为战时大后方工业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战时工业对于支持长期抗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时工业建设负有四个基本任务：第一，增加军需原料和制品的生产，以提高国防能力；第二，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提高对外的支付能力；第三，增加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安定人民的生活；第四，发展基本工矿业，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作为战时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经济部以最大努力，积极推行两大政策：即一方面用国家资本，在后方各省自行经办各种重要的工矿业；另一方面协助战区

的重要民营工矿迁入内地，并奖励人民大量从事后方的工业投资[195]。

国营事业的兴办，主要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负责进行。抗战前夕，资源委员会已经开始施行重工业和矿业的发展计划，包括统制钨、锑和建设年产2000吨的钨铁厂，年产共达30万吨的湘潭和马鞍山炼钢厂，年产共30万吨的灵乡及茶陵铁矿，大冶等铜矿和年产3600吨的铜厂，年产共5000吨的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共150万吨的高坑等煤矿，开发延长等油矿和年产2500万加仑的炼油厂、氮气厂、机器厂、电工器材厂[196]。由于抗战的爆发，上述事业大都停顿中断，但相应的器材设备尽可能往大后方迁运、重新安置，而相关的规划、筹办经验、技术和人才，则直接有助于推进战时的工矿事业。

抗战爆发后，后方企业中很快确立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在民族工业中的领导地位”[197]。1938年1月15日，蒋介石致电经济部长翁文灏，要求筹办后方军需工业，地点以川、黔、湘西为主，从速制定方案；另要求拟定西南、西北战时经济建设方案[198]。1938年8月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进一步增强了资源委员会的权限，使其职掌包括：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199]。在服务抗战、增强国防的目标下，资源委员会倾力发展重工业、矿业和电力事业。国民政府相应实施了多项政策措施，主要有：1．奖励工业技术，其范围包括发明和新型或新样式之创作，甚至对于尚未完成的发明创作，经审查合格后，即可获得经济部协助试验。2．厘定工业标准，先后成立医药、器材、化工、机械、电工、矿冶等工业标准委员会，审定颁布相应的工业标准。3．扶助民营事业，包括贷助资金、供应材料、训练技术员工、定购机器成品等。4．扩充电力事业，包括筹设国营电厂、协建民营电厂、督导自用电厂等[200]。

为扶助后方关系国防民生之重要工矿业的发展，国民政府还于1938年12月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奖助方法包括保息、补助、减免出口税及原料税、减免转口税及其他地方税捐、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提供低利贷款等多种方法[201]。

经过四年，大后方的工矿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8年，后方各省新增了40家工厂，1939年新增466家，1940年新开工589家，1941年新增843家，到1942年，大后方各省共有3700家工厂，资本总额达20亿余元，工人约24万人，动力约14万马力[202]。其中，属于重工业范围的厂家约占工厂总数的35%，资本额则占了50%左右[203]。到1940年底时，资源委员会已设或筹设的工矿业已达70余个单位；其中已较有规模者，计工业29个单位、矿业22个单位、电气20个单位。工业方面，特别注重机械、电气、冶炼、化学等基本部门。矿业方面，特别注重开发和国防及易货有关的资源，如煤、铁、石油、铜、钨、锑、锡、汞等。电业方面，则特别注重后方各新兴工业中心的动力的供给，庶几动力的发展可以和整个的工业化之推进密切配合[204]。

大后方各省中，四川原来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其他省份便利，原料丰富，抗战爆发后自沿海地区迁入的厂家最多，又为抗战之中枢，因而工业发展最为迅速。1938年之前，四川的工厂总数不过240余家，但到1942年底，已增至1600余家，增幅达七倍以上。其次是湖南和陕西，1938年前两省工厂数分别为90余家和70余家，至1942年，该两省的工厂数都增加了4倍。此外，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工厂数亦有很大的增加。在后方各省的工厂总数中。四川约占44%，湖南占13.34%，陕西为10.24%，广西为7.77%，甘肃为3.69%，贵州为2.98%，云南为2.82%。在国统区的工业资本总额中，四川约占58%，云南占10.8%，广西占7.89%，陕西占5.43%，浙江占4.71%，湖南占3.91%，甘肃占3.19%，贵州占3.38%[205]。总之，以四川为中心大后方各省工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战前的中国工

业布局。

在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里，后方工矿业各个行业之间，甚至每个行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发展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

采掘冶炼业。煤是战时后方各省交通和工业最急需的燃料，在整理旧矿的同时，开发了不少新矿。1938年上半年，平汉线北段各煤矿相继失陷之前，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即尽量将采掘设备拆迁，移用至后方各矿，如曾将中福公司之设备迁用于湖南湘潭、湖北大冶、江西萍乡、四川天府等煤矿。后方各省中，四川的采煤业发展较快，当时或由资源委员会直接投资，或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提供贷款，扩充三才生、宝源、江合、东林等旧有各矿之设备，开拓运输通道；另一方面新设华安、华银、全济、华昌、义大等矿。1938年四川省产煤不过140万余吨，1940年即增至279万余吨，两年中增幅几达100%。其他各省的煤业也得以改造扩建和新建。云南的明良煤矿扩建为明良公司，所产煤用于昆明之工厂和滇越、叙昆两路，又开办了宜明煤矿，从事炼焦。在贵州，将筑东煤矿改组为贵州煤矿公司，开采筑东和林东煤田。湖南、广西、江西、西康等省的煤矿，也在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的协作支持下，有了明显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一方面由陇海铁路局与陕西省政府合作开发同官煤矿，以满足陇海路行车对煤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部投资协助陕西白水、蒲城、陇县等地煤矿改进产运，在甘肃投资开采永登煤田。从整个后方地区来看，煤的产量有较稳定的增产。1938年产煤470万吨，1939年为550万吨，1940年达570万吨，1941年增至600万吨，1942年则达631万余吨[(206)]，资源委员会系统的煤矿产量则有较大幅度之提高：1937年为2万吨，1939年增至19.2万吨，1941年达51.7万吨[(207)]。

石油的开采，战前仅陕西延长永平油矿有少量生产。1938年初，政府延聘专家，设立机构，从事油矿之探勘工作。1938年，资源委员会加紧对四川巴县石油沟、甘肃玉门石油河等地的勘探。巴县的钻探获得了大量天然气，为嗣后的正式开采打下了基础。玉门地区的钻探

取得了极好的结果，尽管该矿地处塞外、交通不便，采油器材、给养物资的运入和石油产品的输出颇为困难，但1939年起便正式投产，并陆续增开新井、扩大开采，又设炼油厂，生产汽油。玉门油矿投产后，产量连年增加：1939年为4160加仑，1940年达73013加仑，1941年增至20.9万加仑，1942年更提高到189.57万加仑。另外，玉门油矿1941年开始出产煤油113,040加仑，次年即增产为596,936加仑[208]。从整个资源委员会系统来看，石油产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也是连年增加的：1939年仅为1.5万加仑，1940年便增至16.7万加仑，1941年达46.3万加仑。另外，天然气自1941年开始生产，当年产量为2.7万立方米，1942年就增至23.3万立方米[209]。

与煤、油、气三大能源产品相比，钨、锑、锡等重要出口物资的生产并不理想。钨砂1937年产量为11,926公吨，1939年为11,509公吨，1941年为12,392公吨。锑的产量，1937年已达14,597公吨，1939年减少到11,988公吨，1941年更减少到7991公吨。锡的产量，1939年为2501公吨，1940年增至17,416公吨，到达战时最高水准，1941年为16,589公吨，以后连年下降。有色金属方面，西南地区的云南东川、西康宁雅、四川彭县等矿，先后由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联合投资，进行改造扩建，除本身开采外，还收购其他小矿所产之土铜，一并冶炼粗铜。至于提炼精铜（电解铜），主要设有重庆和昆明的练铜厂，年生产能力总共达2000余吨。但粗铜来源的限制，实际产量不高。1938年，精铜产量为580公吨，1939年为582公吨，1940年增至1415公吨（战时最高产量），1941年又下降到779公吨。至于铅、锌，有川康铜铅锌矿物局在西康会理天宝山开采，滇北矿物局亦产纯净铅、锌，湖南练铅厂和炼锌厂经拆迁后，又重建复工。这两种金属的产量也不高。1939年，精铅和精锌的产量分别是262公吨和40公吨，1941年的产量则为277和20公吨[210]。

而作为工业发展重要标志之一的钢铁业，其发展亦远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战前后方铁厂多用土法，制钢的设备尤少。抗战爆发后，

面对抗战军需与众多工厂重新建设的需要，钢铁业的建立即成为各方重视的重点，并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一定成效。

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除将上海等地的钢铁厂内迁外，并于1938年将湖南湘潭筹建中的中央钢铁厂的设备、汉阳钢铁厂和汉口扬子铁厂等钢铁企业的设备，迁至川、滇，改建和设立新厂。例如，为完成汉阳钢铁厂的拆迁，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3月，合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负责将汉阳和大冶两钢铁厂部分设备及六河沟铁厂百吨炼铁炉，拆迁到重庆大渡口，重建大渡口钢铁厂，并于1939年冬与兵工署第三工厂合并，成为战时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211]。另外，兵工署1937年1月接管并继续筹建此前由四川地方政府筹备的重庆电力钢铁厂，并于1939年7月1日正式成厂，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该厂经过不断扩充，年产钢最高达到4000多吨，农产钢材、丝钉等3900多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生产工厂[212]。此外，较为重要的钢铁企业还有，以炼制合金钢铁材料为主的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213]，资源委员会创建或接办的资渝钢铁厂、威远铁厂等，抗战时期官商合办的最大钢铁联合企业——中国兴业公司，由上海迁川重建的民营渝鑫钢铁厂。除了四川，在云南则有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214]。经过数年努力，后方铁厂家数已由战前的几家增至114家，资本总额约为1.2亿元，每年最大生产能力9.9万吨，炼钢厂有10家，资本总额约1亿元，生产能力达3.9万吨[215]。后方各省钢铁冶炼设备也在逐渐扩充，技术不断进步，历年钢铁产量不断增加。如下表所示（单位：吨）：

年度	生铁（包括土铁）	钢
1938	41,000	900
1939	41,466	1,200
1940	55,182	1,500
1941	62,836	2,011

1942	77,497	3,000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2页。

可见，战时后方地区铁与钢的历年产量均有提高，但尚属较低的水准。

电力。战前中国本国资本之电业生产比较落后，在二十三个省区内，国营民营电厂合计仅460家。1936年装机容量35.587万千瓦，发电77255万度，且发电厂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后方电厂数寥寥无几，资本总额才686万元，装机容量仅1万千瓦，发电1400万度。抗战开始，全国电厂沦陷达三分之二，其时后方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电厂共有141家，而川、康、滇、黔、陕、甘六省则仅占到30家，且设备陈旧落后，无法满足后方工业需要。有鉴于此，经济部加强了对后方电力事业的投资与建设[216]。通过向国外购买电机设备，拆迁战区发电设备等措施，后方电气事业得以初步发展。从1938至1940年的三年里，资源委员会在川鄂区、湘黔区、云南、四川、湘潭、西安、安庆等地区建设电厂，特别是利用后方水利资源，建成多处水力发电站。至1941年，大后方各省已有电厂116家，资本总额1.35亿元，装机容量已达5.3万千瓦，发电9300余万度。其中四川省就有发电厂27家，资本7000余万元，装机容量2.3万千瓦，发电4900余万度；云南电业资本总额1400余万元，装机容量6000千瓦；陕西电业资本总额400余万元，装机容量5000千瓦；湖南电业资本总额1000万元，装机容量3000千瓦；广西电业资本总额600余万元，装机容量5500千瓦[217]。战时历年后方地区总的发电容量和发电度数见下表：

年度	发电容量（千瓦）	发电量（千瓦时）
1938	35,405	73,621,694
1939	40,376	91,494,460

1940	40,722	111,931,172
1941	44,313	127,302,000
1942	49,822	136,850,090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0页。

不仅发电容量与度数逐步增加，电厂的分布区域也在逐步扩展，工业用电的比率不断加大，后方工业电气化程度有所提高。

机器制造业。战前中国机器制造业集中于上海，且以机器修理和零件制造为主，也有若干种纺织机之制造，但电动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极少。而在后方地区，机器制造业完全是空白。抗战爆发后，机器工厂在内迁工厂中为数最多，迁入后方的机器厂有180余家，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增加到680余家，资本总额达3.3亿元，从业工人30000以上，使用动力16000马力。所制造的机器，已着重于工具机、作业机和电动机。从地域分布来看，四川最多，有330余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约1.6亿元；广西有87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9000余万元；在贵州、云南、甘肃、湖南等省，也设立了机器制造厂。这里，还可以从典型机器产品生产指数的变化来看后方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1938年工具机的产量指数为100，那么1939年达204,1940年为296,1942年增至367；又以1938年内燃机的产量指数为100,1939年为151,1940年为529,1941年达706 [(218)] 。后方各省主要机器产品（含电器工业产品）产量见下表：

品名	蒸汽机	内燃机	发电机	电动机	工具机	变压器
1938 年		550	229	84	332	4,575
1939 年	559	831	163	8,703	679	3,758
1940 年	2,949	2,910	2,788	12,449	984	5,850
1941 年	4,476	3,886	4,144	21,890	1,220	10,846
1942 年	3,491	3,933	4,001	10,359	1,131	16,136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

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4页。

化工业。主要指制造液体燃料及酸碱等基本化工品的工厂。化学工业战前甚不发达，1936年全国共19家，集中于天津、上海和广东，资本总额1000余万元，年产各种酸约34.4万担，碱86万担。化工业原本在后方属于空白，经过数年之发展，工厂数达44家，其中酸厂31家，碱厂13家，资本总额4.8亿元，各种酸的生产能力为1.9万吨，碱的生产能力为1000吨，但受到原料的限制，实际年产量酸类2000吨，碱3500吨[219]。此外，主要由资源委员会规划筹建了后方的工业酒精生产企业，1938年6月首先在重庆设四川酒精厂，1939年又成立资中酒精厂，在其他省份也先后设立或接办了20余家酒精厂。1939年后方各厂酒精产量共约28万加仑，1940年增至66.9万加仑，1941年产量达129.8万加仑，1942年达到239.6万加仑[220]。工业酒精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液体燃料匮乏的局面。同时，经济部于1938年设植物油提炼轻油厂于重庆，试自植物油炼制轻油，以代汽油，并取得初步成效。1940年，经济部令资源委员会调查五通桥附近煤产，筹建为焦油厂，以低温蒸馏方法，从烟煤中提炼动力油料，如汽油、柴油、灯油等，并于1941年正式出产，陆续扩充[221]。历年化学工业重要产品产量增减情形，如下表所示：

品名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酒精	305,620	807,775	4,553,024	5,401,437	7,843,324
纯碱	944	1,250	1,091	632	1511
烧碱	–	–	209	628	752
硫酸	170	124	428	625	666
盐酸	99	72	151	130	180
漂粉	–	–	147	521	660
水泥	120,460	278,024	296,940	149,584	233,487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10页。（说明：原件缺各产品产量单位。）

纺织业。抗战爆发时，后方棉纺织业仅有纱锭25,000枚。后经上

海等地迁入纱锭22万余枚，纺织厂数增加到55家；至1941年底发展到76家，资本总额1.78亿元，纱锭30余万枚。后方棉纺织厂约有65%在四川，30%在陕西。整个后方棉纺织业的规模，仅及战前中国棉纺织业的4%，华商棉纺织业的10%左右。由于原料和重要器材的不足，实际开工纱锭数约为25万枚，实际开工布机1800余台，另有千余台未开工。从毛纺织业来看，后方地区的机器毛纺织厂都是在抗战爆发后设立的，如重庆附近的中国毛纺织厂、民治纺织厂，乐山的川康毛织公司，西安的西京、西北毛纺织厂。与重工业有所不同的是，在后方纺织业中，民营企业在资本和生产能力方面，均略高于国营企业[222]。

面粉业。战前中国机制面粉厂有百余家，集中于江苏山东、河北，年产量约7500万袋，最大之厂家日产达1.4万余袋。抗战爆发后，战区不少面粉厂迁至后方，如迁至陕西宝鸡的有福新、大新厂，迁至西安的有和合、同兴厂，至重庆的有庆新、正明等厂。加上战前后方原有的面粉厂，至1941年后方面粉厂总数为70余家，集中于陕西和四川，广西、湖南次之，云南、江西又次之。另外，后方机器厂制造了不少小型面粉机，以增加各厂的生产能力。当时后方面粉厂的规模都不大，最大的陕西咸丰面粉厂日产也只有5000袋，大多数厂日产在2000袋之下。据统计，1938年后方各厂生产面粉151.3万袋，1939年为192.6万袋，1940年增加到323.92万袋，1941年的产量达到了451万袋，1942年进一步增至488万袋[223]。

后方主要民生用品历年生产情况见下表：

品名	棉纱	肥皂	机制纸	火柴	皮革	面粉
1938 年	15,870	82,000	24,600	32,109	40,000	1,513,000
1939 年	22,584	98,670	26,281	32,357	43,969	1,926,000
1940 年	44,000	279,900	32,979	39,547	49,045	3,239,200
1941 年	61,500	410,000	63,340	40,508	56,346	4,510,000
1942 年	24,100	320,000	170,000	157,200	112,522	4,880,000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

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9页。

总之，通过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在大量内迁厂矿企业的基础上，大后方的工业在1942年前取得了快速发展，成就斐然。据经济部统计，截至1941年底止，依工厂登记法准予登记之后方工厂共有1350家。其中，冶炼工厂由4家增至87家，机器厂由37家增至736家，电工器材厂由1家增至44家，化学工厂由78家增至380家，纺织服装工厂由102家增至273家，水泥厂由1家增至7家，酒精厂由3家增至133家，机器制纸厂由3家增至14家，面粉厂由6家增至17家，炼汽油厂已达22家，炼润滑油厂5家，炼柴油厂15家，煤、铁矿由33区增至112区[(224)]。后方各省摆脱了战前工业寥寥无几的局面，并开始形成了一些工业区。后方工业的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大后方的农业

战时大后方作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军糈民食和其他生活必需仰赖农业甚重。以粮食而言，战前中国平均每年输入洋米达1600余万担，小麦和面粉每年平均2000余万担[(225)]。抗战爆发后，一方面东部战区人口大量移至后方，另一方面海口均遭封锁，进口受阻。此外，大后方工业的发展，也需要一些农产品作为原料。于是，为谋求战时农副产品需求的自给自足，国民政府将发展大后方农业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一）增加耕作面积。首先是鼓励垦荒，直接扩大耕地总面积。战前，西南、西北各地均有大量可耕地未开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关当局把扩大耕地面积与安置难民和内迁人口相结合，比较重视该项事宜。例如，对于陕西黄龙山、四川边区、广西西北各县、江西南部各县，经济部派员调查，并与当地政府配合，进行大规模难民垦殖。到1942年底，西南各省成立垦殖单位110个，新开垦耕地333万亩[(226)]。此外，推广冬耕制也是重要措施，如1938、1939年在广

西、贵州、湖南等省增加小麦种植面积100多万亩，1940年进一步在后方各省扩大小麦种植面积920余万亩，大麦170余万亩，豆类200余万亩[227]。川、滇、黔、桂四省1938年增加稻谷种植面积980万余亩，增加棉花种植面积165万余亩；1938年又增加稻谷种植面积200万余亩，增加棉花种植面积近110万余亩[228]。

（二）推广良种。为了改良农作物品种，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倡导机关，同时督促各省农事机关，对极需自给自足之食粮，可以换取外汇之出口农产品，以及可为工业原料兼可外销之农产品，努力进行优良品种的培育与推广。在水稻方面，中央农业试验所培育出可供推广的品种120余种，与当地之农产品相比，平均可增产60余斤，产量最高者可增产190余斤。1938和1939两年内，仅在湖南省就推广良种33万余亩，增产稻谷26.5万担。1940年除了在湖南推广良种65万亩外，在广西、江西、四川、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共推广良种25万亩，是年相应增产稻谷约57万担。在小麦方面，战前中央农业试验所曾收集了中外品种5600余种，抗战爆发后运至后方继续试验推广。从1938年到1940年推广了“金大2905号”、“中农28号”等良种，较农家普通品种之产量，每亩可增产15市斤至41市斤。其中，仅1940年就在陕西便推广良种麦18万余亩，四川推广了8万余亩，河南推广3.4万余亩，江西推广2.6万余亩，贵州、浙江各推广2万余亩，上述各省1940年因推广良种而增产小麦9万余市担[229]。在棉花方面，1938、1939两年在四川推广优良棉种共19余万亩；1940年又推广了38万余亩，其中“德字棉”14万亩，计增收皮棉4.1万担[230]。又在陕西关中平原普及“斯字棉”的种植，产量比当地土棉增产65%。另外，1938年发现云南木棉纤维细长，颇具经济价值，即推广种植，并由农产促进委员会试制相应的“七七纺织机”，效果良好，也加快了木棉的推广。此外，对于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如桐油、茶叶、蚕种，也积极进行优良品种的推广。

（三）防治病虫害。在水稻方面主要是防治螟虫害，如1938年至

1940年连续在川西水稻区指导防治螟虫，相应增加产量约合19万担。在麦类方面，主要是防治黑穗病和线虫害，1937年在安徽防治麦田病虫害1万余亩，1938年在四川、贵州防治麦田病虫害400余亩。以后防治面积迅速增加，1939年在川、黔两省防治麦田病虫害19.3万余亩，1940年在川、黔、陕、滇、甘等省防治麦田病虫害44.6万余亩。在棉花方面，1938、1939两年在川、陕、滇三省防治棉芽虫、棉卷叶虫、棉红铃虫、棉红蜘蛛等虫害共31万余亩，相应增收籽棉9.1万余担；1940年川、陕、滇、豫、甘、鄂、康七省防治棉花虫害71万余亩，相应增收籽棉14.2万余担[231]。

（四）兴修农田水利。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在抗战前已由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下在部分地区开展。抗战爆发后，后方各省都有新旧工程之推进。如陕西省的梅惠渠，于1936年开工，战时继续施工，1938年完成，使得岐山、嵋县一带增加了13万余亩水浇地。又如陕西的黑惠渠工程，1938年动工，1942年完成，增加灌溉面积16万余亩。在甘肃省，原有兆惠渠工程，系1936年开工，拟引兆河水灌溉临兆一带农田3.5万余亩，抗战爆发后继续施工，于1938年完成。嗣后，甘肃省又于1939年开始兴建湟惠渠和兆溥渠。宁夏、绥远两省历史上早有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之水利设施，但工程简陋、年久失修，实际灌溉面积很少，战前便有整修规划。战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亦作了若干测试工作。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通过贷款方式完成的农田水利工程就有22处，相应扩大灌溉面积近30万亩；另局部完成水利工程9处，相应扩大灌溉面积46万余亩[232]。

（五）健全农业金融，加强农贷。后方各省农村金融，早在战前已陷入枯竭境地。抗战爆发后，农村金融恐慌程度更为加剧。于是，为谋求后方农业生产、供销、农田水利、运输工具、农业推广、农村副业，能够适应抗战建国需要，在国民政府的明确要求下，以四联总处为主，兼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后方地区积极增设农业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大量农贷。如四联总处1939年9月改组后，在翌年2月便确定

农贷中心地区[233]，决定全国范围内的农贷资金总额为4亿元[234]。农贷主要用于帮助农民解决因种子、农具和其他投入所遇到的经费困难，详见下表。

1937—1942年农贷余额统计表　单位：元

年份	农贷余额（元）	指数
1937	39,529,000	100
1938	73,551,000	186
1939	110,563,000	280
1940	211,408,000	535
1941	465,306,000	1177
1942	682,805,000	1727

资料来源：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农贷以大后方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为中心区，尤其以四川、西康为重点。农贷种类包括农业生产贷款、农田水利贷款、农业推广贷款、农产运销贷款、农村副业贷款等。农贷资金逐年增长，缓解了后方地区农业发展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农业产量有了明显提高。

1936—1942年川桂滇黔四省主要农作物产量及其指数增长统计表

农作物类别 \ 年份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稻	产量（千担）	185,888,100	200,877	388,555	286,847	225,902	216,497	255,320
	指数	100	108	209	154	121	116	137

（续）

农作物类别 \ 年份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麦	产量（千担）	8764	64,857	105,551	103,878	99,903	90,947	117,878
	指数	100	740	1204	1185	1139	1037	1345
棉	产量（千担）	873	644	971	1546	1450	1261	1529
	指数	100	73	111	177	166	144	175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年鉴》（1944年3月版）附表统计数，转引自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

总的来看，后方主要地区战时农业生产事业有了明显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比战前有较大的提高，为支持抗战军事和维持民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　大后方的交通运输

（一）铁路建设

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约为7,400公里。抗战爆发初期，铁路在运输军队粮秣、疏散人口、抢运物资等方面，发挥着极大效能[(235)]。尤其已经完成建设的重要路段，如粤汉铁路之株韶段，陇海铁路之展长至宝鸡，广九与粤汉接轨，浙赣铁路之南昌、株洲段，以及苏嘉铁路与钱塘江大桥之全部筑成，在运送军队和军品方面，作用尤为突出。请见下表：

1937年7月至12月各路运输军队军品数量表

铁路	段运输军队（人）	运输军品（吨）
陇海	822,180	525,245
平汉	1,255,887	248,251

津浦	199,906	111,733
京沪/沪杭甬	615,712	57,728
南浔/浙赣	308,760	60,863
粤汉/广九	697,813	126,380
同蒲/正太	457,103	80,499
胶济	110,525	25,930
共计	4,467,376	1,236,629

资料来源：张嘉璈《战时交通》，中央训练团党政培训班讲演录，1942年2月印，第14—15页。

随着战局的进展，原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铁路干线或落入日军手中，或中断交通，各路段员工尽力拆除车轨，迁运设备至安全地带。另一方面，战前拟定之筑路计划，包括若干实施中的工程项目，往往因军事或财政的原因，亦被迫中止。然而，随着战争初期大量民众及政府机关、工商企业转向西南、西北后方移动，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西移，内地建设对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打破日本的封锁，联结重要的国际通道，以及后方地区国计民生之需要，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均修筑了若干铁路。

湘桂铁路（自湖南衡阳到广西镇南关）。该路联结粤汉路和安南铁路，为西南交通干线，最初动工的是北端的衡阳—桂林段，长361公里，1937年9月开工，至1938年10月竣工通车，工程进展约合每日1公里，为抢筑铁路进度之最快纪录。该路段通车恰值广州、武汉大撤退，在往后方抢运器材、伤兵和难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8年间，湘桂线先后又有三段开工。其中桂林—柳州段计长174公里，于1938年8月开工，虽然受到时局影响，仍于1939年底竣工通车，对于桂南军事所需帮助甚大。柳州—南宁段全长260公里，开工之后，受日敌南侵影响，进度较慢，甚至因南宁一度失陷，于1939年12月完全停工。待到南宁收复，该路段柳江大桥于1940年内赶造完成，以利于黔桂路与湘桂、粤汉两路联通；并把该路段展至来宾。另外，南

宁—镇南关段，系中法合办，1938年4月自越南同登经镇南关向北推进，1939年12月铺轨达67公里，后因日军侵入桂南，工程被迫停顿。

湘黔铁路（自湖南株洲到贵州省的贵阳）。1936年7月，该路株洲—蓝田段动工，长175公里。历经2年半，至1939年1月完工，通车营运。但因江西、湖南战事紧迫，军事委员会令遂拆除该段所有之路料，南移用作修筑黔桂线。

黔桂铁路（柳州经独山、都匀至贵阳）。该线全长620公里，为衔接湘桂铁路至进发西南重要干线之一。1939年9月，该线分四段同时动工。该路所需相当部分钢轨材料，系靠粤汉路南北两段、浙赣路西段及京赣路皖赣两境内搜集后，西运应用。其中，柳州—宜山段95公里于1940年10月通车，宜山—金城江段71公里于1941年1月竣工。至1941年12月，尚余460公里中的广西段120公里正全面开工，贵州境内至都匀的130公里也已经开工。但1944年日军攻陷衡阳，并沿湘桂线先后占领桂林与柳州。为阻日军前进，中方即将湘桂、黔桂两路破坏。

叙昆铁路（昆明经曲靖、宣威、威宁至四川叙府）。该路全长860余公里，战前便准备动工，因与法国接洽筑路借款出现波折，自1938年12月才开始兴建，且系利用滇越铁路工程之料。至1941年3月，全长160公里的昆明—曲靖段竣工通车，对抗战后期之盟军军用品接运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曲靖至宣威段100公里，至1941年底已完成路基，宣威至威宁间170公里桥涵隧道也已部分开工，但因缺乏轨料器材，于1942年全线停工。

滇缅铁路（昆明经楚雄、祥云至缅甸的苏达）。规划全长880公里，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动工的一条国际铁路，中方原先寄望颇高，1938年12月开工，一度发动了25万民工分东西两段赶筑，拟在1942年底竣工。开工初期，越南当局限制有关物资经滇越铁路运入中

国，英国方面也封锁滇缅公路运送物资进入中国三个月，均有碍滇缅铁路工程之进行。1941年美国政府允在租借法案内划拨路材车辆等，在仰光交货，分运来华。至1941年10月，东段工程自昆明至一平浪间的125公里路基全部完成，铺轨22公里；一平浪至祥云的285公里，路基也完成了60%。西段边境至祥云共496公里，分三段同时开工，到1941年12月，三段工程分别完成了20%到45%的进度。缅甸境内共192公里，由英国方面负责施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程进度大受影响，到1942年4月停工。

宝天铁路。该工程自宝鸡展筑，沿渭河而达天水，全长168公里，为陇海线之延长线。1939年5月开工，沿途经秦岭山脉，需开凿之隧道就有100多座，总长度达21公里，石方530万立方，至1941年12月凿通隧道导坑10130米，约合一半工程量。且因财力和其他因素制约，需大量利用其他线段所拆器材，工程进展极其艰难，中途被迫两度停工。直至1945年底，工程始告完成。

咸同线（咸阳到同官）。为陇海线运煤支线，自陇海铁路之咸阳向北，经三原、富平、耀县，跨越泾、渭两大河流，达同官煤矿，共长135公里，于1939年6月分两段同时动工，1941年11月竣工通车。该路工程土石方共约600万立方米，修筑桥涵140处，全部铁轨系拆运自东部战区路段。咸同铁路的通车，使陇海线机车用煤及陕西工业用煤问题得以解决，对军民用运输亦颇有助益。

西部地区战时还进行了成渝铁路工程，该线计划自重庆经荣昌、陇昌、资阳而达成都，于1936年动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抗战时期工程未能竣工。与成渝铁路工程相应的，是成都至天水路段，规划总长755公里，预计土石方共6700万立方米，隧道桥梁多处。由于器材和财力的限制，该路完成勘探规划后，最终没有动工[236]。

总之，至1942年初，战前11,013公里的旧路中，尚存1605公里；修成之新路中，除有428公里复行拆除外，通车者尚有1529公

里，在建铁路2794公里，测量中铁路1983公里[237]。

铁路营业里程表1938年3月—1942年3月　（单位：公里）

路别	1938年3月	1939年3月	1940年3月	1941年3月	1942年3月
津浦蚌滕段	265				
平汉南段	544				
陇　海	1562	542	587	587	680
南　浔	129	29			
粤　汉	1145	451	451	481	481
广　九	179				
浙　赣	998	438	414	414	
固壁石	177	177	177	177	177
湘　黔		175			
湘　桂		361	602	535	535
川　滇					196
黔　桂				95	166
合　计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68—969页。

铁路运量概况表（一）人数

项　别	年度总量	军士人数	占总人数%	旅客人数	占总人数%
1938年	8,543,900	2,050,500	24.00	6,493,400	76.00

（续）

项　别	年度总量	军士人数	占总人数%	旅客人数	占总人数%
1939年	10,282,100	2,467,700	24.00	7,814,400	76.00
1940年	12,045,440	2,968,744	24.66	9,076,694	75.35
1941年	14,134,650	2,089,665	14.78	12,044,985	85.22
1942年	13,459,668	2,131,625	15.84	11,328,043	84.16
总　计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四），第969—970页。

铁路运量概况表（二）吨位数

项　别	年度总量	军品	占总运量%	非军品	占总运量%
1938 年	7,350,000	1,249,500	17.00	6,100,500	83.00
1939 年	3,560,000	605,200	17.00	2,954,800	83.00
1940 年	2,636,827	459,543	17.43	2,177,284	82.57
1941 年	3,136,340	363,700	11.60	2,772,640	88.40
1942 年	3,069,247	380,518	12.40	7,688,729	87.60
总　计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四），第969—970页。

（二）公路建设

战前中国沿海地区公路较具规模，苏、浙、皖、赣、鄂、湘、豫各省之间公路已陆续衔接相通；西北地区亦开始修筑西（安）兰（州）路、川陕路陕段（宝鸡至川陕交界之棋盘阁）、汉（中）白（河）路、华（家岭）双（石铺）路、甘青路甘段（兰州至河口）、甘新路甘段（兰州至猩猩峡）等。到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公路约达11万公里[238]。

抗战爆发后，因主要铁路线路陆续被占或中断，公路交通日趋重要，为配合战局的进展，对原有公路进行改善和新路的抢筑。对战争之初华北战事影响较大的，是修筑河北省之沧石、德石、保石、柳石等军用公路，共617公里，在20天之内便告完工通车；以及连接绥远山西交通的归绥至百灵庙、归绥至杀虎口两公路，太原至大同之公路。在西南地区，继战前通车的川湘公路湘段外，赶筑成川湘公路川段，全长698公里，使得川湘公路成为后方重要干路之一；川黔、湘黔、黔桂、黔滇等线路也有所改善。完成全长163公里的粤港公路，改善湘粤公路，则保证了内地与港粤间交通联系。另外，为配合武汉会战，有湖北与江西、安徽间公路和粤韶、汴洛、武长、汉宜等公路的改善和抢修，尤其是武长、汉宜两公路抢修工程的完成，为自武汉的疏散抢运工作起了重大作用。西北地区则有汉白、老白、华双等路的修筑，以及连接西南、西北之间交通的汉渝、川滇两路。这一阶段共新修筑公路2593公里，计有江苏省28公里、福建省20公里、湖南

省136公里、湖北省63公里、广东省680公里、四川省759公里、河北省533公里、绥远省47公里、甘肃省137公里、青海省160公里[239]。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后方公路线路的修筑、改善工程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规划的西南地区公路网，旨在联通湘、粤、桂、川、贵、滇各省；西北地区，则把河南与陕、甘、新贯通；另进行川—陕—甘公路工程，真正沟通西南、西北公路干线。此外，为开发大后方经济，又有多条线路之改善和新筑，如川康、川中、西祥、乐四、桂穗、黔桂西、贺连等，以及沟通水陆交通的若干线路。

抗战爆发后，还有接通国际交通的几项公路工程。在西北，是整修西（安）兰（州）线，以及自兰州到猩猩峡的甘新线（经哈密、迪化入苏联）。在西南，修建湘桂、桂越、滇越、滇缅等线路。特别是滇缅公路，曾在7个月时间里动员了25万余民工，使该路初步通车。

以下为抗日战争前半期修建的若干条公路的概况[240]。

贺连路　自广东连县，经连山至鹰扬关，到广西省贺县。1938年12月开工，次年9月竣工通车。全长153公里，是粤、桂两省间交通要道。

黔桂西路　自贵州沙子岭起，经兴仁、安龙、八渡而至百色。1939年11月开工，1940年3月完成通车。全长413公里，是广西与贵州间一条主要的通道。

川滇东路　起于四川隆昌，经泸州、叙水，入黔境后，经毕节、赫章、威宁，再入云南达沾益，与黔滇路相交。于1939年8月全线打通，1940年2月通车，全线长969公里。川滇东路的修通，使昆明到四川及西北地区的公路运输线缩短了200多公里。

玉秀路　由贵州玉屏，经铜仁、松桃，至四川秀山，全长187公里。1938年冬全线分三段同时动工，其中玉屏铜仁段1939年5月底竣工通车；松桃至秀山段也于1941年10月完工；铜仁至松桃段，因麻阳江大桥工程难度较大，至1942年底完成。

桂穗路　自广西桂林，经义宁、龙胜、湖南靖远，到达贵州三穗，全长479公里，与湘黔路相连，是桂林至贵阳之间的直达路线，而不需经由柳州。于1940年1月分段开工，1941年3月先完成土路以因应军需，同时加铺路面。

从西兰路之华家岭，经天水，至川陕路之双石铺，共长231公里，自1938年3月开工，1939年2月完成通车。此后，从兰州到成都不再需要绕道西安。

汉白路之安康至白河段　为武汉与西北地区间的联系要道，长258公里，于1938年11月完成通车。1939年7月1日，汉白公路全线通车。

甘川路为四川与西北间的重要通道，其中从兰州到通北口段，长360公里，1939年底完成土路通车。

重庆至西乡段，连接汉白路，是重庆与汉中间的捷径，共长592公里，1941年底完工通车。

乐西路　起于四川乐山，经峨眉龙池、富林、洗马沽、冕宁、泸沽，至西康之西昌，为进入川西南部彝族地区最早的一条公路，亦为川康间主要通道，全长517公里，于1939年8月动工，动员民工2.6万余人，施工沿途险峻异常，越过各河流的大桥和渡口工程尤为困难，如青衣江、峨眉江、流沙河、大冲河、大渡河、安宁河、大都河等。1941年7月中旬竣工开通，对四川经济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川滇公路西路的延展定立了基础。

西祥路　从西康西昌经会理、江驿、龙祥、大姚、姚安至滇西祥云，总长550公里。经过五处峻险山岭，以及绵川河、金沙江、羊蹄河、江底河、岔河等较大河流，工程难度甚大。于1940年11月开工，至次年4月，云南境内的工程289公里得以打通。西康境内工程261公里于1941年6月完成，全线开始通车，为川康、滇缅两路的重要连接线，可弥补滇缅公路之不足。

川中路　起于内江到达乐山，长200公里，系改善原有路段，共200公里，该段东接成渝路，西连乐西路，是川中盐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于1940年1月动工，当年底完成。另自流井至宜宾段的121公里，为新建路段，1941年中已修至邓井关。

川陕路　从成都起，经绵阳、广元到七盘关，长419公里，主要对峻险路段进行改修，如武侯坡、剑门关、牟家山等处，全线并新建大小桥梁20余座。

川康路　从成都经雅安、天全、二郎山到达康定，于1938年全线动工，1940年10月粗通，又经改善，于1942年正式通车，全长374公里。

垒畹路　自垒允到畹町，全长59公里，加上八莫水运，可与邦坎公路相衔接，于1941年5月间全线初步打通，对国际运输颇多帮助。

滇缅路　起自云南昆明，原为滇西公路运输干道，到下关为止，长411.6公里。1937年底决定西延，经保山、龙陵、芒市，从瑞丽畹町入缅，至1938年8月全线通车，完成土方1100余万立方米、石方100多万立方米，新修路段547.8公里。1939年7月1日起，滇缅路开始办理昆明至畹町间的客运。更重要的是，此后，滇缅路成为中国大后方主要的国际通道。1942年5月初，日军进犯龙陵，中方炸毁怒江上的惠通桥，这条国际通道中断。

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底，各省新修筑的公路共达

6640公路，计有湖南省459公里、湖北省60公里、广东省165公里、广西省575公里、云南省1291公里、四川省1225公里、贵州省826公里、西康省823公里、陕西省345公里、甘肃省880公里。至1941年底，全国公里里程总计124,418公里[241]。至于各年新筑与改善公路之概况如下：

1937年—1941年新筑和改善公路简表

度新	筑里程（公里）	改善里程（公里）	总里程（公里）
1937	1594		117,297
1938	973	5584	118,270
1939	2583	9802	120,853
1940	949	9313	121,802
1941	2616	11,883	124,418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有关交通建设部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64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提高现有公路和车辆的运输能力，是颇为重大的问题。随着战局的进展，各省市原有之汽车总队部陆续撤销，设立了地区性的公路运输管理机构，如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川滇公路管理处，主管跨省公路干线之客货运输。当时采取了联运的方式提高效率，扩大公路运输量。战争初期，如由湖北与河南两省办理自汉口经老河口至孟楼、南阳以及信阳之间的公路联运；陕西与河南两省办理南阳经西坪到达西安之间的公路联运；广东和湖南两省办理以坪石为接驳点、以广州和衡阳为起迄点的联运；还办理过汉口经南昌至浙江永嘉、宁波等地的水陆联运。武汉、广州失陷后，于1939年8月成立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专掌各省干线及特约运输业务。1940年1月1日，成立了国民政府特许中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采用了商业公司的形式，并入了交通部所属之川桂公路

运输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商业公司之运输部、交通部所属川滇公路管理处所属之运输业务，额定资本国币5000万元，实际领得开办费150万元，以及复兴公司财产所折定的1992余万元。成立之后专办西南各公路客运货运，以及有关国际贸易运输业务[242]。至1940年4月，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并入了原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和公路运输总局，以统一指挥后方公路运输。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尽管各路段车辆普遍缺乏，但设法维持重要干线之客运班车，如渝筑、筑昆、筑独、筑晃、西兰、兰广、广宝、汉白等路。货运方面，在西南地区重点保障滇境物资之抢运和空运抵昆明物资的接运，西北地区各干线着重于军用补给品运输，另兼顾食盐、棉纱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转运业务。当时江西、湖南两省，尽力维持省内客运业务；福建省还于1939年10月开办了南平至重庆的闽渝直达客车，每月开一班，全程共3100余公里，起初11日到达，后减至7天，成为联结东部地区与西南后方的重要路线。从1937至1941年底，各年中国公路运输情况统计如下：

历年公路运量表（**1937—1941**年）

年　别	客运人数	延人公里	货运吨数	延吨公里
1937 年	6,245,800	1,080,524,400	54,720	31,464,000
1938 年	1,432,200	247,770,600	49,690	28,571,800
1939 年	1,141,600	197,496,800	39,510	22,718,300
1940 年	916,500	159,173,001	36,592	21,936,675
1941 年	484,450	71,443,386	347,686	189,205,226

资料来源：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51页。

战时公路运输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驿运。

驿运制度古已有之，到清末业已衰弛。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粤汉等铁路干线中断；由于车辆、汽油和路段等条件的限制，汽车运输一时又难以满足客运和抢运物资的急需。1938年10月，行政院召集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畜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运力

之不足，遂由交通部拟定驮运计划和组织纲要。同年11月，首先在重庆成立交通部驮运管理所，并在重要路线设立分所，征用民间驮畜。经过近一年的运作，驮运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管理逐步规范[243]。1939年1月开办了叙府至昆明、贵阳至柳州、昆明至贵阳三条驮运线路，利用旧式舟车，配合人力与畜力。当年，先后新辟重庆至贵阳、贵阳至晃县、贵阳至六寨、柳州至三合等驮运线路，共计2900余公里，年内经运物资便达7900余公吨。自1939年1月到1940年1月，叙昆线平均每月运输量在5万吨以上，黔桂线平均每月在10万吨以上，川滇线每月平均在7万吨以上。1940年初，曾将驮运管理所改称车驮管理所，隶属公路运输总局。同年7月18日，全国驿站运输会议决定成立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相应调整地方驮运机构，各省设置支线管理机构，资助生产驮运车辆、改善道路状况，并重新规划路线。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正式成立，隶属公路运输总局。驿运干线经费由国库担负，收入亦交国库；各省支线开办设备费和经常费由中央酌予补助，至1941年初，川、陕、甘、豫、湘、鄂、滇、粤、桂、赣、浙、闽、皖等13个省都设立了驮运管理处，开运干线有八条，即陕甘线、川陕线、川陕川湘水陆联运线、川黔线、川鄂线、泸昆线、黔桂线、叙昆线，总长已达8000余公里。发动的民夫约5万余人，征用驮畜3万余头，起用大车、板车12000余辆。驮运物资总额，1940年初至8月共计12800余公吨，从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共计29000余公吨。1942年后，驿运一度受到战局影响，营运线路有所收缩。1943年，重新规划为川黔、泸昆、陕甘、川陕、甘新等五线；闽、皖、赣、湘、粤、桂、豫、陕、甘、川、滇、康等十二省各有支线。1944年，陕、甘两省撤销，另增青海省。创办驿运原为交通当局不得已之举措，但它对战时后方运输助益甚大[244]。

在水运方面，抗战爆发后，沿江沿海地区大部分沦陷，航线数、里程数、轮船数等都明显减少。参见以下统计表：

年份	航线（条）	里程（公里）	轮船（艘）	轮船吨数	帆船（艘）	帆船吨数
1937	141	18,492	1,027	118,484	11,408	372,632
1938	127	15,052	792	87,453	11,097	285,262
1939	114	13,868	607	68,794	10,786	277,889
1940	109	8,014	507	58,712	10,483	270,516
1941	104	12,989	309	46,540	11,512	357,876

资料来源：《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54页。

为适应战时需要，航政当局曾督饬成立长江、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福州、厦门等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办理联合航运，各埠航商均需加入，所有轮船均由联合办事处统一调度，为战争最初阶段抢运军民用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战局演变，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水运网逐步确立。为统一航政，撤销原四川省政府设于重庆的川江航务管理处，以迁渝之汉口航政局为基础，成立长江区航政局，管辖范围达川、鄂、湘、赣、苏、皖等省。另外，在梧州成立珠江区航政局，管辖粤、桂两省航务。内地新增辟的航线有：沅江线，自常德至沅陵，水程203公里；湘江线，自长沙至宜昌；嘉陵江线，增辟合川以上，直至南充。疏浚水道有：湘桂间之灵渠段（30余公里）、桂全段（120余公里）、桂梧段（360公里）；粤桂间之桂龙段（约720公里）；川黔间之碚龚段（275余公里）[245]。

1939年1月，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了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由交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部、航空委员会、兵工署、贸易委员会和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的成员组成，以统一调度水陆运输工具，调查和规划水陆运输路线和方法，洽定运费和运输工具之租费，对水陆运输业务进行稽查促进，在有关运输机关间进行联络协调。

在民用空运方面，抗战爆发后，因沿海口岸遭封锁，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在战区的线段相继停航，两公司的总部亦辗转迁移，最后落定重庆及昆明。除了后方地区原有线段的业务转趋繁忙之外，两家公司均增开了新的航线，如中国航空公司的重庆—桂林、汉

口—长沙、重庆—泸州—叙府—嘉定、重庆—昆明—腊戍—仰光、南雄—香港、重庆—昆明—腊戍—加尔各答等航线；欧亚航空公司的昆明—成都、昆明—河内、汉口—西安、重庆—桂林—广州—香港、重庆—西安—兰州—武威—酒泉—哈密、重庆—兰州、成都—兰州、昆明—桂林、南雄—香港。1938年10月之后，以武汉、广州为起迄点或中途站的航线，不得不中止或调整[246]。

1938年8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桂林号”由九龙飞重庆，起飞不久遭日机攻击，12人丧生，包括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同年9月6日，欧亚航空公司之第十七号班机在飞往西安途中，亦遭日机攻击。

1939年3月15日，中国航空公司重庆至越南河内间正式通航。

1941年1月19日和20日，中国航空公司首次试飞重庆经腊戍、吉大港到加尔各答航班成功。“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及欧亚公司所经营之桂林、南雄至香港各线停航，中国航空公司之重庆经昆明、腊戍至仰光线亦停顿。两公司飞机遭炸毁，空运颇受影响。经与美国、英国方面商议，委托中国航空公司办理自印度丁江（Dinjiang）经密支那（Myitkyina）、八莫（Bhamo）、垒允到云南驿的航线。1942年4月试航，飞机从9架增至20余架，并改由丁江直飞昆明。中国航空公司另有航线为：丁江分别至宜宾、泸县；重庆—兰州—酒泉—哈密、重庆—汉中（后改宝鸡）、重庆—芷江—柳州。由美国自“租借法案”下拨借C—53、C—47飞机，专门负责中印空运。1945年共50多架，每月运入物资最多时为2400吨。

“抗战以来，中苏通航不容再缓”[247]。1939年9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苏联民航总局合组航空公司，资本总额100万美元，飞机两架，飞行于新疆哈密与苏联的阿拉木图之间。国民政府交通部先于1939年3月24日开通重庆至哈密间航空线，途中经过西安、兰州、凉州、肃州，全程2050公里。每周往返各一次，所经过之城市借用当地

军用机场。自通航以来，每周二、五来回一次，从未间断。同年12月6日，正式开通哈密至苏联阿拉木图（Alamatu）之航线，途中经过迪化、伊宁，全程1415公里，即由双方合资的中苏航空公司经营。1940年6月1日，由苏联民用航空管理局负责的莫斯科至阿拉木图段通航，这样由重庆至莫斯科的航空线已衔接开通。但阿莫线不久即停航。嗣后中方数度交涉，于1941年5月5日起复航[248]。另外，1941年1月15日，双方经协商同意公司增资至180万美元[249]。

据统计，自1937年到1941年，后方地区历年民用航空货运量和客运量统计如下：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飞机架数	27	22	24	17	17
飞行公里数	1,298,722	2,098,982	2,768,906	3,091,255	3,101,548
客运人数	14,657	28,775	28,575	29,060	30,853
货运吨数	139	430	937	4152	4349
邮运吨数	124	210	160	193	100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74页。

四　大后方的邮政电信[250]

战时大后方的邮政事业有了较大发展。自1938年到1941年底，共新增邮政局所12000余处，新辟邮路132,000公里。

战前全国电报线共95000余公里。抗战爆发后，电信设施遭到很大的破坏，如电报线路沦陷损毁便达4.5万公里。而西部地区原有的线路失修情况也颇严重。1938年初，由交通部、军政部、军令部、航空委员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战时电信委员会，规划和协调电信建设工程。

从1938年起，后方地区历年电报线路建设均有显著进展：1938

年4401公里，1939年8401公里，1940年6213公里，1941年1562公里，1942年1979公里。同期整修旧有线路约2.5万公里。至1942年底，后方地区共有电报线路达9.1万公里，虽较抗战爆发前减少约4000公里，但年收发达37000万字，大大超过战前全国24000万字的收发报数。1937年全国电报局为1200余处，线路约10.5万公里，抗战期间，后方线路增设2万余公里。

抗战爆发后，电话设备及线路拆卸抢运至后方者颇为不易，先将自南京、汉口两地撤移之自动交换机用于陪都重庆，至1941年底，重庆城区原人工电话500号改为自动电话1500号，新市区自动电话自1000号扩充至1800号。到1942年，重庆市区电话已经全部改为自动转接，其机器和主要线路逐步移装地下。另外，成都、昆明、贵阳、西安、衡阳、常德、曲江等十多个后方城市的市内电话，也得到了整修扩充。另增设西昌、宜宾、沅陵等小电话局九处。至1944年底，后方城市市内电话总容量约达万余号。

长途电话方面，战前共有长途话线约5.3万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长途话线损失达2.3万公里。1938年至1941年12月后方新设长途电话线共2.5万余公里，合计共有5.5万余公里。从通话地区看，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规划并实施了西北、西南长途电话网，以能够与后方各省联络为目标，展接用话单位。以重庆为枢纽，历年开通长途电话的地区就有：1938年：万县、长沙、宜昌、衡阳；1939年：桂林、南昌、洛阳、老河口；1940年：巴东；1941年：合川；1942年：龙门、沅陵、黔江。另一个长途电信中心衡阳至下列地区也先后开通了长途电话：汉口、南昌、沅陵、贵阳、吉安、南岳、湘潭、南平、邵阳、万载、芷江、上饶、曲江。另外，后方不少地区之间开通了无线电话电路，如从昆明分别通往重庆、贵阳、成都、河口、桂林、西安、下关、上饶。值得指出的是，新增筑的长话线路中涉及南宁以西至云南滇越路以东地区，使得滇桂间军讯得以直接联络；而湖南、湖北、四川间线路，使第五、六、九战区近前方的军讯

联络得以畅通，还有益于江西与安徽间的联络。

在国际通信方面，1938年开通了重庆、成都至莫斯科、马尼拉、河内、西贡、万隆的线路。1939年开通了昆明至仰光、河内、香港的线路。1940年开通了成都至日内瓦的线路。1941年开通了重庆至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的线路。1942年增加了重庆、成都、昆明至夏威夷、孟买、德里、加尔各答、悉尼、密支那、曼德勒、腊戍等地的线路，基本保证了中国大后方国际通信的畅通。

在筑桂、桂衡、衡长、西安至贵阳等线段完成三路载波机，从而加速电话接转、增加通话容量，起到了增加线路的作用，并构成后方地区辐射通信网。该工程于1943年全部完成，也是中国建立长途电话中心制之肇始。至1943年底，全国长途话线共66,700余对公里，其中属于战前架设的为29,800余对公里，而战时新架设的达36,900余对公里。

抗战时期在无线电话方面，国民政府交通部拟定了同样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的通信网计划，覆盖及贵阳、昆明、兰州、康定、桂林、南郑、赣州、迪化等地，总共建立大型电台10余处、中小型电台100多处，为维持军需民用之通话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37年至1941年中国大后方电信事业概况如下：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电信局所(个)	928	941	971	1135	1167
电报(万字)	26121	25308	27541	30986	40999
长途电话(万次)	250	200	240	273	243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五　大后方的商业和贸易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量战时所需物资有赖进口；另一方面，有效

组织农矿产品的出口，是中国易货偿债和获取外汇收入的主要手段，因而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政府深知我国欲将持久制胜，势非控制资源，管理贸易，不足以巩固财政金融基础，而供应长期抗战之要需”[251]。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及《出口货物结汇领取差额办法》，《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等文件，采取了鼓励和统制相结合的政策。尤其对于大宗出口货品的桐油、猪鬃、茶叶，国民政府分别设立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矿产收购出口则由资源委员会经营。制约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很多，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变化迅速，尤其是沿海口岸被日本封锁和占领后，经过法属越南的滇越铁路，以及受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成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这两条通道都曾因法、英当局对日妥协退让而中断过。因此，这里主要考察1937年—1941年间中国外贸及出口情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进出口贸易实施了鼓励和控制相结合的政策。

1938年，政府机构调整时，行政院将对外贸易机关划归财政部管辖，并成立贸易委员会掌理其事，同时将实业部所属之国际贸易局亦归并该会。贸易委员会会同经济部等部门，一方面管制输入，为“增强抗战力量，故凡与抗战无关不急之需，皆应或减或禁，以节外汇”；另一方面，促进输出，其目的“一在保留必须物资于国内，俾军需民用不致匮乏，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一在输入剩余产品于国外，求国际收支保持平衡”[252]。

为推销国货换取外汇，贸易委员会与中外出口商行协助合作；该会还在商行不愿购买时，定价收购土货外销。1938年4月，先后颁布《商人运货出口及应结外汇办法》《出口货物应结外汇之种类及其办法》。近因国际市场不振，货价下跌，致出口商人滞销，转而影响生产；复因公定汇率低于黑市，结汇商民要求补偿，四川、湖南、广东等处同业公会曾提出此类请求。由于外汇法定价格不能变更，出口税也已酌量减轻。贸易委员会遂于6月末向有关商行提出了减轻出口成

本以促进土货外销，并调整土货市场，以维护国内生产[253]。

贸易委员会成立后，通过调整输出业务，管理出口外汇，主办统购统销，管制进口贸易，协助后方生产，抢购战区物资，协助货物疏运等多项措施，实现了对商业贸易的垄断。国民政府战时外贸统制制度的确立推行，为中国换取了大量必需的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和日用必需品等，既增强了国家抗击日帝侵略的实力与信心，又促进了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从而对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1937—1941年主要进出口商品位次表　单位：百万元

位　次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年 1–10 月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第一位	煤油	桐油	米	棉花	棉花	丝	棉花	丝	米	丝
数　量	148	90	58	106	173	140	262	281	276	229
第二位	钢铁	丝	机器工具	钨	麦粉	蛋	米	蛋	棉花	棉纱
数　量	109	53	56	50	77	82	171	133	240	136
第三位	机器工具	蛋	麦粉	蛋	钢铁	抽绣品	麦粉	茶叶	棉花	猪鬃
数　量	65	53	53	49	62	50	142	105	227	127
第四位	纸	钨	钢铁	桐油	机器工具	钨	钢铁	猪鬃	麦粉	煤
数　量	59	41	53	39	60	45	108	94	209	101
第五位	米	抽绣品	纸	丝	米	猪鬃	机器工具	抽绣品	纸	桐油
数　量	41	41	40	38	55	41	75	77	82	94

资料来源：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9、730页。

在后方地区，由于产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日用必需品供销的干预统制。

193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在各省市成立平价委员会，就地方政府所指定之日用必需品，按照产运成本及合理利润，分别评定其价格。为了进一步疏通物资来源，取缔居奇囤积，当年底国民政府又决定垫付资金采购物品，批发给商人销售，同时限定零售价格，即以限制利润的方式间接管理物价。遂相应颁行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以规定最低价格购进货品以促进生产，以规定最高价格出售货品以保护消费，批发利润以5%

为限，零售利润以20％为限。又颁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由经济部和其他有关机构，调查了解各主要城市日用必需用品的存货和销售情况，参酌其他因素，规定公平价格，要求商人照价售货，对不按规定价格出售且囤积者，则予以警告直至依照公平价格强制收买货品，以维护正当利益，取缔不合理所得。

与上述两项方法相应的，经济部分别指定了应施行平价和取缔囤积之物品种类，设平价购销处，下设服用、粮食、燃料、日用品等部门。平价购销处的平抑市价所需经费，系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以贷款方式提供，第一期为2000万元，并先拨800万元应用。在平抑燃料价格方面，1940年2月平价购销处获得寸煤垫款110万元，可购煤斤38200吨；另获得流动资金37万元，每月购入煤斤52000余吨，委托燃料管理处承办平抑煤价，首先向各机关和各用煤大户接济供给平价煤斤。在平抑纱价方面，平价购销处委托农本局福生庄代办门市业务，按规定牌价1760元售纱。经济部对此专门颁行过《取缔棉纱投机买卖办法》，尤其对棉纱的期货交易及非同业买卖，严行取缔。平价门市业务逐步扩大，进而开展平价批发业务。其他日用品方面，则于1940年拨专款200万元委托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等在上海采办货物，其中购得布匹便有100箱，另在后方产地收购土产，辗转运回重庆等城市，平价供售[254]。还组织人力查缉囤积未售之货物，给价收买，然后平价配售，以满足市场需要。

国民政府在后方地区几乎把大部分日用物品均列入了取缔囤积、限定利润的范围[255]，但是，平价购销处主持的平价措施收效并不显著，重庆等后方城市的物价涨风难以遏止。如对煤矿生产难以做到彻底统制，矿商、煤商对官方的煤斤平购政策多有阻扰抵制，因而即便在重庆市也无法维持普遍销售平价煤市。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重庆每担粒煤市价便上涨了11％，岚炭市价上涨25％，缸炭市价上涨20％。棉纱平价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因平价纱售货有限，无法满足需要，且受香港、上海、云南等地纱价涨风的影响，棉纱投机活动

严重，平价措施难以奏效[256]。1940年3月上、中旬之际，重庆、成都等后方主要城市米价飞涨，每担市价由40余元涨至60余元，涨幅达50%，煤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也迅速上涨。为此，蒋介石在3月16日致经济部、四联总处、农本局和重庆市政府的代电中提到："政府日日宣言平抑物价，今乃并此民生日食最需要之米谷，亦复愈平愈高，将何以对人民？……又查渝市燃料及其他日用物价，在旬日以来，亦皆逐步飞涨，与经济部、市政府迭次所报平抑情况完全相反，究竟是何原因？政府当局有无实行取缔？及现在有无有效处置办法？并仰据实具报，不得专以纸面粉饰。平价购销处规定资金，曾否拨付？该处现由何人主管？如何办理？并仰详报。"[257] 在蒋的督饬下，有关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1940年6月22日，重庆市日用必需品公卖处开业，先实行米盐两种物品之平价公卖，米价每斗3元7角，比市价便宜1元，盐价每斤2角3分。每天约售盐800斤，米50担。7月2日另开五处，并由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尽量供给煤炭[258]。1940年8月16日，行政院还颁布了取缔囤积居奇的命令[259]。这些措施执行之处不无成效，得到各方的好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本日用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难，相应的监控和调节体制也存在诸多漏洞。

在粮食市场方面，1934年财政部曾在上海设立粮食运销局，代购洋米以充军粮。后又有华南米业公司之组织，以冀树立近代化的粮食运销制度。1936年9月，设立农本局，内设农产、农资两处。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调整委员会，1938年2月归并农本局，改设农产调整处。凡战区粮食抢运、军粮供应、贷款发放，均由农本局调度。在粮食购销方面，农本局设有福生庄，专门从事粮食及花、纱、布的购运，尤其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粮区设分支庄，购入粮食后，运至消费中心地点储存。另外，农本局还曾出资500万元，另由湘、鄂两省银行共贷款500万元，与第六、九战区粮食管理处一起实施了购运两省存谷，至1939年底，共购谷1,185,365市担；另与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在该省办理购粮业务。农本局还向有关部门提

供用于购粮的专项贷款[260]。

随着市场价格波动日趋加剧，供应紧张，国民政府对军公食粮的供应采取了平价购领的政策。1941年规定中央公务员及其眷属（本人连眷属以五人为限）每人每月得购领平价米2斗，每斗收基本价款6元。次年10月起进行调整，对中央公务员食粮均按人及年龄免费配发，不收基本价款，凡31岁以上者月领米1石，26岁至30岁者为8斗，25岁以下者6斗，工役一律6斗。至于省级机关公务员，则按照中央公务员之例配给平价米，每斗收基本价6元。县级公务人员之食粮则由各地自行酌情筹办。

至于一般民用食粮，抗战之初政府并不干涉其买卖，仅在少数重要城市视需要办理平价供应。1941年在实行田赋征实征购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部分省份向市场投放食粮，以供调节民食。计1941年度在川、滇、黔、粤、湘、浙、皖、赣、闽、桂、康、鄂、宁、青、绥、甘等十六省，共拨谷9,002,000余市石，麦208,000余市石；1942年度川、滇、粤、湘、浙、皖、赣、闽、桂、康、宁、绥、甘、陕等十四省，共拨谷8,426,000余石，麦139,000余市石[261]。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组织投放大量的粮食，诚属不易。

同时在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为最强硬，规定非经营商业之人，或非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营利者；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售出者；粮户或农户之余粮，经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而规避藏匿者，均以囤积居奇论，最高处罚可处以死刑。而需粮民户存粮超过3个月以上需要量，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者；需粮之公私团体存粮超过2个月以上需要粮，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核准者，均将被没收其超过量[262]。

但是，总体来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后方地区的粮食市场供应紧缺、价格腾涨的情势非但没有根本缓解，而且日趋严峻，不仅

直接关乎整个大后方日用物品普遍紧缺、价格失控，还发展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民众与政府有关当局关系的紧张。

此外，对于一些重要商品，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具有垄断性质的专卖制度。1941年4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孔祥熙等人提出的《筹办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该提案中指出，“专卖制度系由政府管制产销，保障生产运销者之合法利润，而使消费者不增加过分负担”，其目的在于“促进生产，促进消费，调节物价，安定民生”。并认为施行专卖制度，可以“抑制豪强，充裕国用”，有利于国计民生。该案提出政府专卖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试办[263]。财政部随即设立了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从事研究及设计。经过半年多准备，除烟、酒两类专卖暂缓实施外，其余盐、糖、烟、火柴四项物品，分别指派专员负责，渐次实施专卖制度。专卖制度除能增加国库收入，还有助于平定市场、改进品质、调剂盈虚。

---

(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50页。

(2) 《非常时期经济方案》（1938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1-8页。

(3) 《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1939年1月26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36-37页。

(4) 《巩固前方经济基础方案案》（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38页。

(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43-45页。

(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46—747页。

(7) 引自《文汇年刊》（1939年），《战时中国的经济动态》，第3—4页。

(8) 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55、157页。

(10) 《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审查标准》（1939年8月4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62页。

(11) 《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1938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59—160页。

(1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80页。

(1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3页。

(1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4—15页。

(15)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9—60页。

(16)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60—61页。

(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55-56页。

(18) 《经济部组织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页。

(19) 中央设计局于1941年2月22日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委员、专门委员、科员。蒋介石发表《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工作要领》的演讲，称根据行政三联制的原则，设计、执行和考核，设计为最首要的工作；主要中央设计局今后一方面是本局自身的设计，一方面是汇合各部门的总设计。现在的工作目标，不仅着眼战时的需要，还要侧重战后的复兴。一切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各种建设的设计，都属于我们工作范围之内，其中实以国防经济建设的设计最关重要。“我们一定要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用在经济建设方面”。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第48—54页。

(20) 《经济会议组织大纲》（1941年3月24日国民政府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59页。

(21) 《文汇年刊》（1939年），《党政重要法令及规程》，第55页。

(2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78—80页。

(23) 《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1939年2月20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3页。

(24) 《经济部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1939年12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5—97页。次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各省办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业务办法纲要》，规定各省政府得设立该省的平价购销机构，依据上述经济部《办法》规定的有关原则，开展当地的平价购销业务。

(2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9页。

(26) 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四），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12—13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0页。

(27) 《粮食管理纲要》（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4—329页。

(28) 《粮政史料》（四），第27—30页。

(29)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0)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行政院函》（1940年8月15日），《粮政史料》（四），第34—35页。

(31) 《管理粮食治本治标办法》（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9—331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32—334页。

(34) 《粮政史料》（四），第67—71页。

(35) 《行政院致粮食部指令》（1944年11月30日），《粮政史料》（四），第94—95页。

(36) 《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1938年4月军事委员会核准公

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2—323页。

(37)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66—267页。

(38) 《煤矿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10页。

(39) 《煤运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7页。

(40) 《城市煤炭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8页。

(41) 《经济部管理嘉陵江、綦江、泯江、沱江各沿岸煤矿所产煤斤暂行办法》（1939年2月25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9—250页。

(42) 《经济部管理水泥规则》（1939年5月26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2—63页。

(43) 《油料经理商经售油料办法》（1938年12月19日行政院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54页。

(44) 《经济部钢铁管理规则》（1940年1月24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6—67页。

(45) 《经济部钢铁管理委员会土铁管理处管理土铁实施办法》（1940年1月经济部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7—68页。

(46) 《修正财政部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大纲》（1939年5月5日财政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08—309页。

(47) 《修正全国猪鬃统销办法》（1940年2月19日行政院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09—310页。

(48) 《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1940年10月24日财政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13—314页。

(49) 《文汇年刊》（1939年），《党政重要法令及规程》，第66页。

(50)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98—199页。

(51) 《战地内禁运资敌物品收购救济办法》（1939年12月22日行政院

转令经济部遵照），《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91—192页。

(52) 《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处检查组工作大纲》（1941年4月25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02—104页。

(53) 《总动员计划大纲》（1937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5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页。

(55) 《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1938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3-15页。

(56) 《财政部糖类统税征收暂行条例》（1940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8-20页。

(5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21-26页。

(5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59) 《财政部公布施行非常时期征收印花税暂行办法》（1937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2-3页。

(60) 《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1938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83-386页。

(61) 《遗产税暂行条例》（1938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75-379页。

(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1—312页。

(63) 《大公报》，1941年6月24日。

(64) 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五），台北“国史馆”1990年版，第143—144页。

(65) 《粮政史料》（五），第144—145页。

(66) 《福建省政府陈主席申州电》（1940年10月），朱汇森主编：

《粮政史料》（五），第6—7页。

(67) 《粮政史料》（五），第147页。

(68) 《粮政史料》（五），第147-148页。

(69) 《粮政史料》（五），第149—150页。

(70) 《粮政史料》（五），第150页。

(71) 《粮政史料》（五），第151页。

(7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75-176页。

(73) 《粮政史料》（五），第48-49页。

(74) 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77-178页。

(76) 《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施行通则》（1941年7月），《粮政史料》（五），第151—152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4—316页。

(7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6—317页。

(78) 《粮政史料》（五），第153—154页。

(79) 《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财政报告》（1938年10月30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6页。

(80) 1936年国民政府曾发行统一公债14亿6千万元，但是为了整理旧有债票，而不是发行新债。

(81)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984年版，第275页。

(82) 1928年国民政府为整理中央汉钞，发行民国17年长期金融公债4500万元，年息2.5厘；1930年发行铁道部收回广东粤汉铁路公债，年息为2厘；1936年发行整理广东金融公债1.2亿元，年息4厘。但这三项公债都属于整理旧债的性质。

(8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2页。

(84)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1939年11月12

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9页。

(85)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另外，1937年12月国民政府曾发行整理广西金融公债，以充实桂钞准备，该项公债的收入用途不同于已述及的各项中央公债。

(86)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

(87) 各地方公债发行概况，参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504号（1937年11月6日）、第2505号（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7号（1937年12月20日）、渝字第29号（1938年3月1日）、渝字第62号（1938年7月1日）、渝字第68号（1938年7月21日）、渝字第69号（1938年7月25日）、渝字第126号（1939年2月10日）、渝字第149号（1939年4月15日）、渝字第157号（1939年5月27日）、渝字175号（1939年8月2日）、渝字184号（1939年9月2日）、渝字236号（1940年3月2日）、渝字237号（1940年3月6日）、渝字第310号（1940年11月16日）、渝字第323号（1940年12月31日）、渝字404号（1941年10月11日）、渝字第410号（1941年11月1日）、渝字第423号（1941年12月17日）。

(88) 详见《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条例》（1938年4月21日）、《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劝募规则》（1938年9月2日），《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282—288页。

(89)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

(90)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

(91)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

(9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93) 《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1941年9月22日修正公布）》，《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01页。

(94) 苏联第一次易货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起计息，即按苏联开设向中国提供军用品的日期计算，但还本期是从1938年10月1日起的五年；第二次易货借款自1938年7月1日起计息，还本则是自1940年7月1日起的五年，因而借款的实际期限等于七年；第三次易货借款自1939年7月1日起计息，自1942年7月1日起的十年内还本，借款实际期限为十三年。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9、23、26页。

(95) 中央银行编《中苏易货借款节略》（1948年），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61页。

(96) 该项购车货价总额为22.3011万英镑15先令4便士，其中25％由中方付现；库券总额包括75％的货价16.7258万英镑16先令6便士，以及利息20749英镑3先令6便士。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78—181页。又：本购车信用借款和下项购料信用借款，通常被合称作战时英国第一次信贷，因为是同一阶段中英谈判的结果，又是在同年订立协定的。

(9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84—191页。

(9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78—380页。该借款亦被称作战时英国第二次对华信贷。

(99)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19—121页。关于桐油借款和下项华锡借款的担保问题，虽然两项借款协定载明由中国银行“完全”、“无条件”地承担，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亦要求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出面担保。但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以“事关国家整个财政”为由，提出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同负责，中央、交通两行应向中国银行书面声明共同承担到期还本付息的责任；孔祥熙同意三行按四、四、二的比例分担责任，并换文件存证。参见《中国银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100)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2—266页。

(10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86—288页。

(10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09—311页。

(10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58—365、373页。中美平准基金旋与中英第二次平准基金合为统一的中美英平准基金。

(104)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76—81、91—93、100—101页。

(105)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25—230页。

(106)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该积欠数额中，不包括美国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英国的第二次信用借款500万美元和第二次平准基金借款四项尚未动用的外债。

(10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72页，并参照第232页1937年

度中央收支报告表计算。

(10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72—273页。

(109) 1939年1月18日财政部发言人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东方杂志》第36卷第5号，《现代史料》第63页。

(11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810页。

(111) 《关税担保债赔各款摊存办法》（1939年1月31日财政部公债司、国库司、会计处会签），《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97页。参阅1939年1月18日财政部发言人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东方杂志》第36卷第5号，《现代史料》第63页。

(11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1-12页。

(11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3页。

(114) 《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11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116) 《财政部次长徐堪致孔令侃电》（1937年11月1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4页。

(117) 《孔令侃致孔祥熙电》（1937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4—285页。

(118)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会决议》（1939年3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5页。

(11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2页。

(120)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360页。

(121) 《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80页。

(1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页。

(12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27页。

(12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483页。

(125) 财政部令上海市银行钱业同业公会（1937年8月21日和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96。

(126)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27—628页。

(127) 《财政年鉴》续编下册，第308—309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2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2-13页。

(129) 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13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471页。

(131)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83页。

(13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9年1至6月），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720页；转引自《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

(13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000—1001页。

(134)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527页；《中央银行月报》，第9卷第8号，1940年8月，第2750页。

(135) 详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45—449页。1940年7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代表，与英国汇丰银行的代表订立建立总额为300万英镑的B种平准基金的协定，其中汇丰银行出资100万英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出资200万英镑。B种平准基金系作为1939年设立的中英平准基金的后备金，但实际上未曾动用。而1941年4月设立的新的中英平准基金，则是由英国政府直接出资的。

(13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58页。

(137) 《财政部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报告》（194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81页。

(138) 1941年8月16日，上海每1元法币的黑市汇价为$2\frac{27}{32}$便士，以及$4\frac{3}{4}$美分。引自［美］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第198页。

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198．

(139) ［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98页。

(140) 《华兴商业银行条例》，《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537页。

(14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三），第151页。

(142)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21页。

(14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四），第1007—1008页。

(144)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22页。

(145) 《银行周报》第23卷40期，1939年10月10日。

(146) 《银行周报》第23卷31期，1939年8月8日。

(147) 前引《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第188页。

(148) 《周佛海起草和平成立后货币与金融政策之设施》（193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54页。

(14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61页。

(15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60—661页。

(151) 《周佛海起草和平成立后货币与金融政策之设施》（193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53页。

(15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53)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61页。

(154)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557—1558页。

(155)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3月10日，第434页。

(156)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61-462页。

(157)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440—441页。

(158) 《四联总处理事会决议》（1941年3月26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448页。

(159)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46-47页。

(160) 贴放委员会致中国农民银行函，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档案，档号Q61—1—240；另参见《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41页。

(161) 财政部令上海市银行钱业同业公会（1937年8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S173—1—96。

(162)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63) 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南迁香港，是为中行港处，后另设渝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行港处撤离。

(164) 《徐柏园为报告四联总处办理联合放款概况及方针呈蒋介石稿》（1941年8月1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16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166)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6页。

(167)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汇编》上册，第634—635页。

(168)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宋子文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69)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70)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子文，即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新之，即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

(171)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1939年10月2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70页。

(172) 《四联总处关于1940年度分支处组织演变情况的报告》（1940年），《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27页。

(173)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56—157页。

(174) 《经济三年计划实施办法》（1940年4月9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66—167页。

(17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58—162页。

(176) 《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1940年4月9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74—177页。

(177) 《四联总处史料》（中），第47页。

(178)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28页。

(179) 《收兑金银通则》（1939年1月17日财政部核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180)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28页。

(181)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61页。

(182) 《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方案》（1940年3月30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1页。

(183) 《四联总处关于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报告》（1940年），《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5页。

(184)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9页。

(18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7-198页。

(18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4-685页。

(187) 《三十一年度战时全国总分支行处分布》，《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605-606页。

(188) 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89)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0)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1)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

记手稿影印件。

(19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19页。

(193) 翁文灏：《抗战时期中国实业概况》，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市档案馆编2005年版，第539页。

(19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20页。

(195)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523页。

(196) 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1939年5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53页—654页。

(197) 吴承洛：《中国战时工业概况》，《中国工业》第6期，1942年6月25日，第25页，转引自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19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二），第291页。

(19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4页。

(200)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85—590页。

(20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4-35页。

(202)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4页。

(20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5页。

(204)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523页。

(205)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4—676页。

(206)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0—602页。

(207)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版，第126页。

(208)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3—604页。

(209)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版，第126页。

(210)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第126页。

(211) 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合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212) 《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第131页。

(213) 《抗战后方治金工业史料》，第200页。

(214)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工作概况》（1938-1945），分别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0—591、611页。

(215)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0-681页。

(2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271页。

(217)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工作概况》（1938至1945年）、《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分别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8—609、679—680页。

(218)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2—685页。

(219)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7—688页。

(220)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第118、126页。

(22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09页。

(222)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9—690页。

(223)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8-599页；参阅《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

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90—692页。

(224) 袁梅因：《战时后方工业建设概况》，见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638-639页。

(225)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40—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17页。

(226) 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605页。

(227)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4页。

(228) 《中华民国年鉴》，附表，1944年版。

(229)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4页。

(230)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6页。

(231)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9—850页。

(232)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28—831页。

(233)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4)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43页。

(236) 以上参阅张嘉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所作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90—993页；《新建铁路工程进展情形》（1942年8月路政司提报），《铁路史料》，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第116-118页；《中华民国交通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1年版，第10—16页。

(237) 张嘉璈：《战时交通》，第25页。

(238) 《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48页。

(239)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46—47页。

(240)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行政院工作报告》（1941年10月），第11—14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档案500—32。

(241)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48页。

(242)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24页。

(243) 《交通部公布修正驮运管理所暂行组织规程及驮运分所组织通则》（1939年9月11日），《交通公报》第2卷23期，1939年9月16日。

(244)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3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88—989页；周一士：《中华公路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3—294页；《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54—55页。另外《大公报》1940年9月1日刊登《新驿运之特点与困难》一文。

(245)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39—140页。

(246)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80—181页。

(247) 《交通部致行政院呈文》（1938年9月29日），《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83页。

(248) 《大公报》，1941年5月11日。

(249) 简笙簧：《西北中苏航线的经营》，台北“国史馆”1984年版。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113页。

(250) 本部分内容撰写参考了《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93—994、997—999页；《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225—232页。

(25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507页。

(25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402-403页。

(253) 《大公报》1938年6月30日。

(254) 国民政府交议：《关于平衡物价工作正在分别推进列举各项重要问题请讨论商榷案》（1940年4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43—444页。

(255) 1941年2月3日公布的《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规定的各类物品是：甲、粮食类—米、谷、麦、面粉、高粱、粟、玉米、豆类；乙、服用类—棉花、棉纱、棉布、麻布、皮革；丙、燃料类—煤炭（煤块、煤末、煤球、焦炭）、本炭；丁、日用品类—食盐、纸张、皂碱、火柴、菜籽、菜油；戊、其他经济部呈准指定类。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48页。

(256) 《翁文灏、徐堪致蒋介石呈文》（1940年3月25日），《粮政史料》（四），第25—26页。

(257) 《粮政史料》（四），第28—30页。

(258) 《中央日报》，1940年7月3日。

(259) 《申报》，1940年8月17日。

(260) 《粮政史料》（四），第111—112页。

(26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20页。

(262) 《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1941年5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52—454页。

(26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72—73页。

第十章　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成立和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第一节　筹组汪政府的活动

一　汪精卫赴日会谈

汪精卫一伙跑到上海后，随即开始谋划筹组新政府的活动。他们深知，日军控制的沦陷区内已有各种伪政权，再要在那里建立新的政权，必须首先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于是，汪精卫等人迫不及待地同日方进行交涉，同时还要求去东京与日本政府高层进行商谈。

此后，汪精卫先派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进行了初步商谈。双方多次接触过程中，周佛海等介绍了汪精卫关于组府的设想，同时也向日本提出一个基本要求："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近卫声明，如实使四亿中国民众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对于将来新政权使用的旗帜问题，汪精卫坚持"国旗绝对不能改为青天白日旗以外的旗帜"[(1)]，以证明自己是国民党正统的延续。

当今井武夫带着上述意见返回东京汇报时，汪精卫召集骨干，抓紧商讨赴日谈判的具体方案。1939年5月28日，他们正式议定一份内容详尽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该《办法》首先确定了此次"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即："收拾时局之要旨以收揽人心为先决条

件，因此，以不使抱有因外来压力而变更政体与中断法统（所谓法统即指现在的法律系统，亦即以国民政府之名制定的现行法制）之观念，实为重要”；“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2)]

根据上述原则，该办法还针对建立新政权问题提出了三个必要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认为，应“首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依照此次大会的决议，授权汪先生以党内同志及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政府之责。在现行法制上此为合法的步骤，不使任何人有指责之余地。而且代表大会在法律上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手续，使国策的变更成为合法化”[(3)]。《具体办法》中对于如何召开此次大会拟订了十大步骤，主要内容有：1．由汪精卫指定人员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2．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授权他指定中央委员；3．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总章；4．重新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政策；5．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今后“一切措施及文告概属无效”；6．宣布“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国”，“彻底肃清共产主义的思想、行动及一切组织之宣传”，“调整国际关系，确立东亚和平”等三项内容为国民党最高指导方针；7．授权汪精卫以党内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政府及还都南京之责”；8．国民党以外之党派中其主张公正者，予以公认；9．国民政府的改组吸收各党派，“在全民的基础上组成之”；10．“使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4)]。由此可见，汪精卫集团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统”的旗帜从蒋介石手中夺过来装扮新建立的伪政府。

第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步实际上是完成新政府的各项组织工作。汪精卫依照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授权，招聘若干党内外人士，组成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实行改组国民政府与还都南京”事宜。

具体决议应包括以下四项：1．“国民政府指定一定期限还都南京”；2．“林主席（林森）……今后所发表意见一概无效，而由行政院长摄行主席的职权”；3．“推举五院院长并任命行政院各部部长”；4．“改组军事委员会”[(5)]。

第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们不顾各种反对意见，坚持新政权仍称“国民政府”。其主要理由是：“盖新政府在于以此来集合同志与军队使之成为主体，新政府的名称定为国民政府，始得使彼等保持真面目，云集于新政府的旗帜之下。”因延用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名称，所以文件强调新政府不是成立，而是“还都”。他们还声称，“政府必须统一”。为表明自己是惟一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对国内各种政府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具体措施有十条之多，主要是：1．在宣布还都南京的同时，已经在沦陷区内建立的“华北临时政府”和“华中维新政府”，即“自动宣告完成任务，自行取消政府的名义”；2．发表还都宣言后，“重庆伪政府对国内发布之法令、规章及对外缔结之条约协定，一律归于无效”；3．“宣告改变国策，即以和平建设、睦邻反共为指导方针”；4．发布公告，令重庆及地方公务员于半年内来南京报到；5．“命令前线各军停战”，6．“各地游击队各自在当地等待检验收编”；7．“促进与日本之平等互惠的谈判，以调整邦交，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6)]，等等。

这份《具体办法》最初虽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拟订，但实际上是汪精卫集团筹建伪政府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并成为后来汪伪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为使这次赴日谈判取得成效，汪精卫与周佛海做了具体分工。汪精卫主要务虚，同近卫前首相、平沼首相及日本内阁重要大臣进行“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周佛海主要务实，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为有利于“和平运动”的开展，日本应表示“丝毫没有侵略、统治中国或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以使中国国民谅解，为此，必须向日本政府提出“有关实行尊重主权原则的各种要求”；二、向日方强调，新政府不是因日本的压迫而成立，有必要不使法统中

断，所以新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建立的形式是还都，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原则，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这几项为绝对条件，务须求得日本政府的谅解与同意[7]。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陪同下，秘密从上海飞赴日本，进行组府谈判。

对于汪精卫的组府计划，日方事先“全然没有足以与之相对应的准备”，其主要原因是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汪精卫的设想已超出“重光堂会谈”的范围。“重光堂会谈”的内容虽得到日本内阁的认可，但当时日本最重视的是如何利用汪精卫集团的出逃，以达到分化、瓦解中国抗日阵线之目的。当时近卫文麿即对汪精卫的组府设想表示了“冷淡的、猜疑的、悲观的”态度，他“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调解人”，以推进同中国的谈判[8]。不久，近卫内阁倒台，继任的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态度更为冷淡。影佐祯昭事后曾说：“日本政府在当时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怂恿汪氏建立政府。”[9] 直至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来日本谈判在南京建立新政府一事报告东京方面时，日本政府仍犹豫不决。尽管陆军省持支持态度，但外务省与海军省仍持有不同意见。几经协商，意见仍难于统一，如果拖延汪精卫访日的时间，局势可能发生意外变化。5月29日，影佐等人竭力向日本内阁进言：“应抓住现在这个难得气氛。而且近来汪的周围流传着日本政府的真意在于和蒋介石谈判的谣言，似有退缩的现象，所以希望能按预定的安排偕其进京。”[10] 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才勉强同意汪精卫一行赴日访问。

5月31日，汪精卫抵达东京，这迫使日本政府迅速对汪的方针政策做出决定。于是，陆、海、外三省及兴亚院分别召回派驻中国各地的有关官员回东京协商。6月2、3两日，陆、海军分别召开“现地与中央座谈会”，现地陆军对汪精卫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及取消临时、维新政府的主张表示保留，但对建立以汪为首的新政府则表示同意和协助。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

的方针》。《方针》规定：1．“新中央政府以汪、吴和已设政权以及翻然悔改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中国方面的问题，应依靠彼等的适当合作建立政权”；2．“新中央政府应根据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正式调整日华邦交。此等组成人员应于事前接受上述原则”；3．“新中央政府的组织和成立时间，应适应涉及全局的战争指导步骤，根据自主的观点处理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和基础实力”；4．“中国将来的政治形态，应适应其历史与现状，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原则，具体内容则应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决定之：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沿海除将特定岛屿设定为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尊重其领导者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对现有政府的特殊关系”；5．“关于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如果放弃容共抗日，改为亲日满防共的方针，则与其他亲日防共为其主义者相同，允许其存在”；6．“重庆政府在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实行必要的人事更换，并接受上述第一、第二项方针时，即承认其屈服，可成为组成新中央政府的一分子”[(11)]。

这是一个决定汪精卫集团未来命运的重要文件。它明确规定，将来的新中央政府，是一个在日本占领军控制下的各种亲日势力的联合体，同时，汪精卫必须承认上一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而这一方针他尚未见过。在这里，日、汪双方在上海“重光堂会谈”中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不见了，日方的要求背离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原则。为了使汪精卫就范，平沼首相、近卫枢密院议长及其他内阁大臣，分别会见汪精卫，以示重视，但这些会见都是礼节性的，丝毫未触及实质性内容[(12)]。这样，使汪精卫感到日本政府很“诚恳”，产生了将会有一个“光明前途”的印象。

汪精卫到达日本等待了十天后，日本政要才出面接见。除寒暄之外，他非常想了解日本政府对自己出马组织新政府的态度。虽然平沼

等人高唱日本“尊重武力”，是为了“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进而“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等空洞论调，并对汪精卫大加称赞、鼓励，以此搪塞过去。但在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谈时，还是涉及了这个敏感问题。6月15日，板垣会见汪精卫，他一开始就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把握，如果能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实为有幸。”这对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的汪精卫来说，无异是一场奚落。汪精卫心里有气，但为了求得支持，只得忍气吞声地向板垣分析重庆“要人方面”与中国军队内部的情况。他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因为“大部分的要人心里希望和平”，而且“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关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因此，他希望日本政府应“深刻考虑”中国军队和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日本计”，应“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13)]。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乞求日本军方支持自己的组府方案。

可是，板垣根本不理会汪精卫的“苦心”，他直截了当地对汪精卫的组府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汪精卫原先设想一个国家不可能有几个政府同时存在，因此一旦汪政府正式成立，“临时”、“维新”等“已设政府”应立即宣告自行解散。但板垣却强调日本政府“分治合作”的原则，认为新政府成立后，应“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其原因是：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防卫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由于对南方国防上的必要，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但不能不考虑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14)]这无异向汪精卫发出警告，即日本已经在华北、蒙疆、华中以及华南沿海取得的权益，均不允许汪精卫染指。对此汪精卫颇为不满，称：“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其实体依然存在的话，中央

政府则将流于有名无实。如果两政府的实体必须保留，那么组织中央政府只能延期，国民党将另找地盘组成一个政权以待来日，时机成熟再组织中央政府。”[15] 而板垣也对此前的话进行解释说：“不是指让地方政府有大得可以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限。当然，只要在中央政府下给予相当的权限就够了。维新政府、临时政府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产生的，和日本方面已经有了种种既成事实，也已经组成关于地方经济开发的机构。前面所说的尊重事实，就是指的这种既成事实”。这样，在日方的胁迫下，汪精卫不得不答应将来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一类的机构，给予较大的自主权限；对于维新政府，根据日本方面的处理意见，另外研究具体方案[16]。

在同板垣会谈时，双方在使用何种旗帜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一番争论。汪精卫为标榜自己是国民党正统，认为“国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坚持新政府必须延用青天白日旗。对此，板垣表示反对，他坚持必须在“国旗”和“党旗”上方加一块印有“反共和平”字样的大型黄色三角布片；对于军队，为避免混淆与纠纷，只使用“写着反共和平大字的黄色旗帜，而不用其他的旗，如国旗等等”。汪精卫则强调：如果军队不使用国旗，只使用黄色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军队不使用国旗，就与军队的士气有关，怕给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期不使用国旗，担心是否会影响军队在精神上的统一性”。板垣坚持说：“从军队的立场来说，现在日军正在和用青天白日旗的中国抗日军进行战争。即使在占领地区，所谓游击队很是跋扈。军队的敌忾心由此旗帜而产生，从军队心理来说，也是当然的。老实说，军方甚至对于日军占领区内除了军队以外的政府机关，或一般民众使用国旗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取严格取缔的方法，不使为此产生误解。何况中国军队突然升起国旗，其情况极为危险，自不待言。所以我想，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板垣并一再强调，“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言下之意，这一问题没有商讨的余地。此后，经过双方反复协商，日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国旗”的上方加一条写有“和平反共

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飘带。

一贯以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法统”自居的汪精卫，居然在“国旗”问题上放弃原来立场，最终接受日本的方案，这在汪精卫集团中引起巨大反响。对此，就连汪精卫最重要的亲信周佛海也深感不满，称这样的三角小黄旗像一条“猪尾巴”。对汪精卫这次赴日谈判，负责从中联络的日本人西义显也认为是失败了。他在事后曾这样分析：“把平沼首相坚持近卫声明的要点和板垣陆相肆无忌惮地交换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日本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这只是日本罗列片面的要求，根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为汪所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单就这一点，已毁坏了和平工作的基础。至于说什么继承三民主义的法统，显然完全是废话。”(17)

汪精卫赴日谈判将近二十天，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定。6月18日，汪精卫怀着沉重的心情以及对日本政府尚存的一丝幻想，乘船离开日本前往天津，准备同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商讨组府事宜。周佛海则留在日本，继续与日方进行交涉。

二　建立特务组织

汪精卫的组府活动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英、美等国早年在上海市区中心设有租界地。尽管抗战开始后不久上海地区就被日军占领，但为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政府仍对英、美等国租界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政策。因此，日军的侵略势力暂时无法深入租界内部。这些外国租界，于是也成为日军占领区中的孤岛，以及各种爱国力量进行抗日活动的基地。抗日爱国力量在上海的活动，不仅阻碍了汪精卫组府活动的进程，同时也对汪伪骨干

的安全构成威胁。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汪精卫集团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开始网罗死党，筹建特务组织，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残酷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借以维持毫无政治基础的傀儡政权。

汪伪特务组织的创建者与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变节分子。20年代，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即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此间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后很快投降，成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18]。抗战爆发后，李士群不满在中统特务机关内的地位，一心想改换门庭。1938年夏秋之交，他席卷所经手的公款，从大后方假道越南转至香港，拜会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开始投靠日本。此后，他被派往日本驻上海使馆，为书记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

回到上海后，李士群先后把“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员刘某等拉下了水，让他们充当日本使馆的情报员。同时，他又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达成互相照应的默契。1938年底，李士群开始考虑从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他深知，搞特工必须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骨干。他把目光集中到原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身上。丁默邨1932年即担任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处长，地位与戴笠差不多。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地位急剧上升，而丁默邨的第三处于1938年初秋遭裁撤，此后不久丁即离职前往香港“养病”，同时静观事态变化。1938年底，丁默邨又秘密到上海，后被日本人发现并受到严密监视[19]。为把丁默邨拉下水，李士群一面在清水董三面前极力吹捧丁的地位、才能及声望，表示愿意让丁坐头把交椅，自己充当副手。同时，李士群又专门找到丁默邨，诱迫其加入到所谓的“和平运动”中。

李士群的活动越来越受日本当局重视，其地位也步步提高。丁默邨来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更对丁、李合作搞特工的计划寄予厚望。1939年2月，在清水董三引荐下，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首脑土肥原

贤二会见了丁、李二人。“对华特别委员会”是直属日本内阁，“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所谓“重大对华谋略”，是指除开直接作战的“关于政治、经济的谋略”[20]。因该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首，所以一般称其为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虹口公园北侧的“重光堂”内，根据预定计划，决定物色北洋时期曾在中国政坛上出过风头的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为新中央政府首脑。然而，唐绍仪由于遭国民党特工袭击而死去，靳云鹏也早已在中国政坛上失势，没有什么作为，吴佩孚则不能与土肥原很好合作。尽管土肥原费尽心机，工作仍无实质性进展。他不得不哀叹：“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21]

正当土肥原机关陷入困境、无计可施之际，丁默邨、李士群的出现使土肥原喜出望外。丁、李两人向土肥原陈述了组建特工队伍的设想，并提出请求日本军方援助的理由，即“上海恐怖活动的元凶是重庆的特务工作队，蓝衣社的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的犯人，但是如果不破获蓝衣社的地下组织，那是没有用的。”他们还向土肥原吹嘘：“我们知道敌人的力量所在，也知道它的弱点所在，我们一定能够取胜，请给我们以援助和指导。”[22] 几天之后，丁默邨与李士群向土肥原提交了两份资料，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另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前者是李士群数月来情报资料的汇总，后者则是他们组建特工队伍的蓝图。计划书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为前提，详细罗列了组建特工队伍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等要项，同时还按照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伍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等具体事项，逐项列出了明确方案。这项计划书引起了土肥原的重视，他及时将此情况向日本大本营作了报告。

日本陆军对此计划很感兴趣。当时，影佐祯昭等人正与汪精卫集团联络，策划所谓“日华和平运动”。他们认为，稳定上海局势，镇压爱国民众的抗日浪潮，阻止国民党特工的恐怖活动，是整个和平计划

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他们主张把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计划作为整个对华和平工作的组成部分。2月20日，日方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明确指定由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具体执行[23]。从此以后，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组织便由晴气庆胤直接指挥，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同年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后，又划归“梅机关”领导。

获得日本军方支持后，丁、李两人立即开始着手特工总部的筹建工作。为“笼络争取上海租界内各阶层的中国人”，日军当局允许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党部成员、捕俘的重庆系特工人员、学校师生等方面物色合适分子，加入其特工组织[24]。另外，他们还炮制了一套“和平运动”的理论，进行欺骗宣传。谎称“和平运动”是“以和平求和平”，是为了使中国尽快统一；相信以战争求和平，则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中国要灭亡的”。经过一番活动，逐步形成了特工组织的核心，最早的骨干主要有七人，他们是：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李志云、杨杰、张鲁，当时被人称作“七人委员会”[25]。此后不久，蔡洪田、马啸天等一批人又或明或暗地参加了进去。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上海租界巡捕、包探听，以及帮会、流氓中网罗对象，组织行动队。通过金钱和武器引诱，使得三教九流人物纷至沓来。如以吴四宝为首的地痞流氓，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先后投入李、丁门下，成为骨干。

特工队伍初步建成后，丁默邨、李士群心里很清楚，以此充当日军的别动队，捞点“外快”，已经不成问题，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为了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他们经日本当局授意，开始投靠汪精卫集团。丁默邨刚到上海时，汪曼云就曾当面提醒他说：“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过去你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的。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

题，而是号召力方面，确有一些事倍功半的。”为此，向他建议道：“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因困难而不做，为求事的迅速‘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接上汪精卫的关系，好在汪精卫已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6] 丁默邨点头称是。以后，通过汪曼云的居中牵线，丁默邨、李士群、特工队与周佛海接上了头；又在日方的“训令”之下，汪精卫决定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作为自己的警卫武装。在日方的安排下，丁默邨、李士群曾与汪精卫洽商双方合作的条件。丁默邨等提出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条件有二：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十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27]。于是，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与丁、李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由丁、李日后主持警政部，并担任“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起人[28]。这样，双方达成一致。从此，汪精卫集团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特工队伍。

丁、李等人投向汪精卫集团后，为适应队伍的扩展，开始寻找合适的基地。几经搬迁，最后选中沪西极司非尔路[29]七十六号，极司非尔路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筑的一条马路，属越界筑路，所以路权归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仍属华界。位于马路中段的七十六号，原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一座花园洋房，因该处三幢洋房的地基曾为洋商购买，所以挂的门牌为蓝底白字，与周围白底黑字的门牌明显不同。日军占领上海后，该房遂被日军控制，后经晴气庆胤联系，同意拨给丁、李使用。丁默邨等将七十六号的房屋建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设立了“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看守所”，进出大门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30]。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令人生畏的一个名字。

汪伪特工总部开张后，立即配合侵华日军，疯狂镇压上海爱国民众的抗日反汪运动，接连不断地制造流血惨案，其首要攻击目标是上

海新闻界。上海沦陷后，留沪爱国报人利用外国租界，继续出版报刊，宣传抗战。汪精卫集团叛离抗日阵营后，上海各报刊纷纷揭露日汪勾结的阴谋，提醒人们要同这伙汉奸划清界限。因此，汪伪集团将上海爱国报人视为眼中钉，必欲清除而后快。1939年6月中旬，丁、李等人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编辑、记者发出恐吓信，威胁称：“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之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31]。同时，又公开发表一道对83人的“通缉令”，将一批新闻界人士列为通缉对象。威胁之外，他们又多次出动汉奸武装袭击《中美日报》、《大晚报》、《大美晚报》等报馆，杀害爱国报人，殴打报贩，妄图堵截抗日反汪报刊的发行。

特工总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威胁利诱手段，为汪精卫集团网罗党羽。其惯用手法是先派一个与对方熟悉的人去拜访，宣传“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理论，并以金钱、官位相引诱。如对方不为所动，即再派人送去恐吓信，里面还有一颗子弹，限其一星期内离开上海，以此给对方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倘若如此仍达不到目的，就采用强行绑架的手段，在七十六号内“嘱令宣誓，签署和平运动誓书”，强迫其就范。总之，凡被七十六号列为活动对象者，除逃离上海之外，均无法逃脱他们的魔爪。

在举国上下声讨、揭露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活动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通过在上海的留守机关，组织特工对其进行打击，以阻止汪伪政权的建立，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以牙还牙”的特工战。由于驻沪国民党机关已转入地下活动，其特工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汪伪特工不仅活动范围广阔，背后还有侵华日军支持。在争斗中，汪伪特工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早在投敌之初，丁默邨即向土肥原夸下海口：“我们要干掉市党部和蓝衣社”，“市党部委员中有不少是我的老部下，现在它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纲纪紊乱，缺少统一领导，如

果巧妙地利用这些弱点，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它拿到手。蓝衣社是最强的对手，但它的情报人员因生活困苦而动摇，这就是它最大的弱点。我们准备从争取它的情报员开始，逐步寻出它的情报网，尽可能接近它的上层人物，说服他们，并使他们为我们所用，最终搞垮蓝衣社。”[32] 在争斗中，丁默邨首先打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将其主要成员汪曼云、蔡洪田等拉了过去，成为汪伪集团的骨干分子。接着，又把国民党“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苏德成拉下水，使该区的特工组织完全瓦解。此后，丁默邨等顺藤摸瓜，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团部全部垮台，主要骨干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悔过[33]。

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为汪伪集团的“和平运动”鸣锣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地位也节节升高。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伪中央党部内特设了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任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指挥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副之。起初，特工总部机构比较简单，不久即增设了三个委员会与四个厅，以后又改设为四处四室。至1940年春汪伪政权建立前夕，特工总部再次进行重大调整，原警卫大队升为警卫总队，由吴四宝任队长，下辖五个大队；增设行动总队，由杨杰任队长，下辖六个大队[34]。另外，还设立了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等机动组织，以及“海社”、“上海法院同仁会”、“立泰钱庄”、“国民新闻社”、“东南贸易公司”等一批外围组织，把魔爪伸向各个行业。

此外，特工总部还在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日军占领区以及沪杭、沪宁、津浦路段各铁路线设立“区”、“站”一类的分支组织，采用各类极端手段开展特务活动[35]。汪伪政府正式建立前后一年多时间里，特工总部迅速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特务机关，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三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汪精卫一伙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公然叛离抗日阵线，其自我编造的理由是对日谋求和平。但自从“艳电”发表后，其汉奸面目已经暴露，并很快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确保自身安全，他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即便到了日本控制的上海，他们仍不敢公开露面。在秘密访日并取得日本政府的口头支持后，他们顿时感觉有了依靠，腰板开始硬起来了。尤其是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建立起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更不用为自己的安全担惊受怕了。为扩大“和平运动”的影响，加快筹建新政权的步伐，他们从地下走到地面，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号。

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做了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这篇被日汪双方称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的演说词，实际上是一篇宣扬卖国理论的代表作，亦可视为汪伪集团公开投敌的宣言书。讲演一开头，汪精卫即以“理论”权威的姿态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36)] 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原因是中国自不量力，“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

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使日本“愿意与中国为友”呢？汪精卫认为：“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37)] 为证明这是解决中日冲突的正确方案，他一方面引经据

典，把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求和的卖国行为当作自己的楷模，同时又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最后他又声称，要“本着怨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我决心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心团结同志并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38]。

讲演结束之后，汪精卫休息片刻，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海外侨胞》的广播演说。这篇演说除对上述卖国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外，还对重庆政府予以攻击。其目的是欺骗海外华侨，阻止华侨对重庆政府抗日战争的支持。数日前，他曾向日本官员分析过华侨的情况：“在这次事变中，华侨却被蒋介石的抗日宣传所欺骗，被蒋的英雄言行所迷惑，因而支持蒋介石。”为改变这一局面，他主张“用实际行动加以宣传”[39]。为证明重庆政府之“误国”，他在讲演中指责蒋介石政权还不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政府“爱国”：“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输越赌，越赌越输，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汪精卫认为，继续抗战，“民安得不穷？财安得不尽？而民穷财尽的结果，只有国亡种灭”，结果是，“抗战不足，国亡灭种有余”[40]。为进一步推销这种抗战不如投降的汉奸理论，汪精卫将这两篇讲演稿全文刊载在新复刊的《中华日报》上，但由于上海租界内报业公会拒绝销售，影响“甚微”[41]。

汪精卫深知，自己被重庆政府开除党籍后已没有威信，只有把自己重新装扮成国民党正统，才能增强理论宣传的效果，排除组织全国性政权的障碍。所以，他在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之后，即着手准备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有关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各特别支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而此时的汪精卫集团，除几名骨干之外，没有任何基层组织，召开一省党代会的

条件尚不具备，遑论网罗全国各地党部的“代表”。8月中旬，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骨干连日开会，商讨对策。

为拼凑“代表”各方的党代表，他们首先设立大会“筹备委员会”，指定“特派员”分区招揽。特派员拥有选择代表的大权，只要他们出具证明，谁都可以充当代表。尽管如此，仍很难觅到合适的人选。汪精卫曾秘密派遣刚从欧洲返回香港的周化人潜赴重庆，拉拢改组派旧人马来沪参加“和平运动”，但只拉到刘仰山等几人。后又让周北上“动员”，结果应者寥寥。于是，汪精卫不得不让周佛海等就地取材，拼凑人数。周佛海利用这个机会，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乘机网罗亲信，扩充私人力量。丁默邨包办了上海特别市和江苏省两个党部，把一批原属“中统”的特务都拉来做代表。同时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陈璧君也不甘落后，把陈耀祖等两个弟弟、三个侄儿都指定为代表。李圣五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全带了进来；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伙计前来参加[42]。

经过一番“努力”，拉到的人数仍同汪精卫预定的300名代表相距甚远。于是只能滥竽充数，由非国民党党员冒填党籍后推为“代表”。这样的胡乱拼凑，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假党员不仅当上了党代表，同时还被指定为两个省的代表；有的人虽然出席了会议，但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省的代表。还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威胁、诱骗到会场，以充当代表[43]。经过这样不择手段的网罗，勉强拼凑到240名代表。

1939年8月28日上午，汪精卫集团一手策划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之所以选择七十六号，是因为那里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自然比其他地方安全。会议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梅思平任大会秘书长。汪精卫自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44]。在开幕词中，汪精卫一再强调，这次代表大会同一年以前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是一

致的。他说："上届大会提出抗战建国的口号，本届大会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所谓建国是什么呢？是完成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之建设，因为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生存，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独立自由，这是目的。至于抗战和平不过是达到这目的之一种手段，为达到这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手段有不同，目的则无异致。"把抗战和投降这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柔和在一起，说是具有相同的性质，这是汪精卫的一大发明。为推销这种汉奸理论，他还无耻地说，这是"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的公意，也就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的公意"[45]。

伪"六大"首先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这是汪精卫集团从重庆政府手中抢夺"党统"大旗的关键一步。该法案包含多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宣称：自1939年1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46]。此决定具有双重目的，首先是要从重庆国民党中央手中夺权；其次是恢复汪精卫原有的地位。汪精卫是1939年元旦被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撤销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的。现在宣布从这天开始，重庆国民党中央已经无权了，那么，对汪精卫的处分也就自然无效了。这样立案，比采用其他方式简单得多。夺过旗帜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即汪精卫不是总裁，领导全党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法案专列一项："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47] 总裁一经废止，蒋、汪之间的正副差别也不存在了；新设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职位，则为汪精卫担任国民党党首铺平了台阶。有了魁首之后，人手不足怎么办？汪精卫等人挖空心思，在《整理党务案》中又加入如下规定："除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38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0人，中央监察委员26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6人。"未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央执监及候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事"；"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

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48]。这样既增补了100名亲信，又不确定开会的合法人数，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就得以完全被汪精卫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

上述法案为汪精卫控制国民党铺平了道路。接着，会议又策动代表提出临时动议两件：第一，因汪精卫“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有功，“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由主席团率全体代表起立，向他鞠躬致敬；第二，依据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49]。

经过一番苦心策划，汪精卫等人自以为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国民党临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蒋介石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而自己又“合法”地获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头衔。抓到党统旗帜之后，汪精卫一伙又开始为自己的行动炮制法律依据。

当天下午，会议又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该纲领对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简称《抗建纲领》）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做了全面篡改，以适应他们进行“和平运动”的需要。若将两个法案进行比较，即可看出其险恶用心。在外交方面，《抗建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50]而修正方案则模糊地宣称：“本国家生存及主权独立之主旨，励行睦邻政策，以奠定东亚永久和平”；“联合非共产主义之有关各国，共同防制第三国际之阴谋”[51]。在军事方面，《抗建纲领》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52]。修正方案则闭口不谈抗战，仅虚伪地列出了这样几条：“军队国家化，消灭个人及地方之系统”；“召集军事复员会议，解决军事复员、军队驻防及军事建设等

问题”；“解散游击将士，助其复业，其志愿服兵役者，经甄别后分别编入国防军或地方保安队”[53]。在政治方面，《抗建纲领》为夺取抗战胜利，明确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54]。而修正方案坚持反共立场，全力回避谈及抗战，仅笼统地宣称：“召集国民大会，商讨建国之大计”：“政府草拟宪法，交国民大会审议，由政府公布实施”；“除共产分子外，人民之一切合法自由应予以充分保障”[55]。

从上述三方面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汪精卫集团别有用心地把“抗日”换成“反共”；把武装自卫换成转业复员；把全民抗战换成排共建国。其目的就是要完全颠倒武装抗日与投降卖国的是非标准。

与此同时，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一批议案，为正在筹建的汪伪政府之“合法”出台贴上一张又一张法统票签。

当会议进行到确定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里出现一阵骚动。其主要原因是，在汪精卫提交大会讨论的名单中，有几个在社会上名声颇臭的汉奸，一些标榜继承国民党“正统”的代表“羞与为伍”。尤其是在“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先后在“上海大道市政府”和“维新政府”等几个伪政权中出任过要职的卢英也竟然名列其中，更使那些人难于接受，于是推派代表去找汪精卫说理。然而那些代表却遭到周佛海的阻拦，周回答他们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56] 这几句话，不仅给卢英的汉奸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撕下了这批新汉奸的假面具，使他们面面相觑，无辞可

对。当然，为了笼络这批新汉奸，汪精卫也作了一些让步，把内定给卢英的中央委员降为“候补”。通过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汪精卫提名的一批老牌汉奸，如“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等，都顺利当上了中央委员。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等文件。这些文件的集中反映了汪精卫集团宣扬的“和平反共建国”的理论。其中《宣言》是一份颇具代表性的文件。

《宣言》首先颠倒是非，诡称这次代表大会的宗旨同上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致的。并认为1938年12月近卫声明所提出的三原则，是日本“为放弃侵略主义欲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的证据。“日本在战争中，有此反省，中国亦不可不深自反省，使合于正义之和平得以早日实现”。而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遽以个人武断，发言拒绝……复用极端严厉手段，箝抑舆论，极端残酷手段，残杀同志，遂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对中日战局作了完全颠倒的阐述后，立即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声称“和战问题为共匪所劫持，则合于正义之和平永无实现之希望”。“上届大会以执行之方针付之蒋同志，蒋同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57]。经这一番论述，汪精卫似乎成了拯救中国的英雄。

在拐弯抹角把自己的投敌行为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抗战方针连接起来后，《宣言》开始亮出汪伪集团的行动纲领：“自今以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特再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据此纲领，又确定了内、外方针。其外交方针，表面上赞成上届大会确定的两条方针，而在具体分析一年来形势时，指斥原有的政策是“无实力妄冀远交近攻，以取胜利，充其所至，徒使战则无同盟之援助，和则受外来之牵制，惟有任东亚相与为

邻之两大民族共受其祸，而不能自已，非独不忠不仁，抑且不智。不忠，不仁，不智，不特不齿于中国之国民，且不齿于世界之人类”。所以强调，今后“当谨守上届大会所示之两大原则，以谋国际关系之维持，各国友谊之增进”，“而益之以睦邻友好”；“不惟远交近攻之策绝对屏斥，一切合纵连横之技亦无所施，必如此，然后对内得以自力，对外得以共存也”[58]。其实，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完全篡改了原外交方针中抗战救国的内涵。关于内政，《宣言》表面上赞成“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挥原理”，具体内容则全面背离了原有纲领。《宣言》既反对因抗战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之决定，又指斥“国民参政会形同虚设”，宣称“本届大会特郑重宣布，授权汪同志，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改变必须由党员才能参加的规定，宣布“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负担收拾时局之责任”。同时又强调，“战争既息，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已无延期之必要，务于最短期间，使全国和平得以实现，国民大会得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正义之阶段”[59]。其用意十分清楚，就是不顾中华民族处所处的危险时刻，要在最近时间里成立伪政权。

戒备森严的汪伪国民党“六大”只开了一天即草草收场，而他们对外却大肆吹嘘，说会议开了三天。9月5日，又在上海愚园路汪精卫住处召开所谓六届一中全会，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主持大会，并就内外形势及党务、政治诸问题发表讲演。会议讨论通过了伪“六大”交议的各项提案，推举了领导成员。周佛海等九人当选为“中常委”委员，褚民谊出任秘书长，梅思平任组织部长，陶希圣任宣传部长，丁默邨任社会部长[60]。

伪国民党“六大”结束后，汪精卫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对今后如何树立统一政权问题，明确表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于此点已郑重说明。连同各党各派，及无党派有志之士，协力一致，以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实为本党之最明确主张也。”[61]

由此可见，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给汪精卫集团正式在广大沦陷区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铺平了政治道路。

四　汪伪集团与“临时”、“维新”政权的交涉

早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侵华日军就已在中国占领区南北各地扶植了一批傀儡政权。汪精卫投敌后想在日军占领区内建立伪政权，其首要条件是必须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另外还得听从日方安排。日本方面不希望汪精卫集团简单地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将原有伪政权吃掉，重新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而是要他们互相合作，共同组织新政权；另外，为扩大新政权的影响与实力，还要求汪精卫与吴佩孚合作。1939年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中明确规定：“新中央政府以汪、吴和已设政权以及翻然悔改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应将此作为中国问题，适当予以协助，以建立其政府。”(62)

为使政府的决定具体化，日本陆军经过研究，草拟了一份“汪工作指导腹案”，其指导方针是：“让汪同吴及已设政权合作，建立具有文武实力的强大政府。为此，首先应作好必要的准备，在此期间，特别应努力争取重庆政府的各种势力，尤其是其重要人物。”“腹案”中对汪精卫提出的首项要求是：“在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准备期间，汪、吴和已设政权等应相互协力，并极力争取重庆政府的各种势力，特别是其重要人物，同时应建立基础地盘，以建立具有文武实权的强大政府。”(63)　上述方案明确反映出日本当局希望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建立强有力傀儡政权的迫切心情，而并不是把汪精卫集团作为惟一的支持对象。汪精卫访日期间与板垣陆相等人交换意见时，对日本的立场表示赞同，并发誓要继承民国法统，纠合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便大力促进和平工作。访日结束后，汪精卫直接去北平，开始同吴佩孚及华北临时政府的头目进行交涉。

从已设汉奸政权的手中瓜分权力与地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对此，汪精卫有一定思想准备。在与吴佩孚合作这一问题上，他自认为具有较好的基础。早在访日之前，汪精卫曾通过互致电报及专人携亲笔信拜访等方式主动与吴佩孚联络，希望双方能够合作。对于汪的“和平”主张，吴佩孚曾一度表示赞同，称汪精卫提出的“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双方具体政见并不一致。吴佩孚在给汪精卫的复函中说：“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信中还强调：“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64)] 由此可见，吴佩孚的“和平”立场实际上与汪精卫有着原则区别。对此，汪精卫自己也承认，双方是“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65)]。

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已根据上级指令，为汪、吴会谈做出周密安排：将日军总司令官的住宅作为会谈场所；计划让汪精卫先去拜访吴佩孚，然后吴再作礼节性回访；合作达成之后，由汪主持政治，吴主持军事。然而，吴佩孚却不买日本人的账，他拒绝华北日军做出的安排，提出要在自己住宅里与汪精卫会面，而且拒绝回访。汪精卫也自视甚高，不愿以低人一等的身份去拜见吴佩孚，双方直接会谈遂成泡影。随后，汪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面见吴佩孚，商讨合作事宜。吴当即提出四项要求，即“一、吴氏对外发表政见汪氏必须采纳；二、汪氏登台后不得干涉军事；三、汪氏不得私自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四、汪氏施政方针须得先征商吴氏同意”[(66)]。这自然是汪精卫集团无法接受的。

由于在吴佩孚那儿碰了钉子，汪精卫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临时政府”首脑谈判。1939年6月23日，汪精卫从日本抵达天津，随即前往华北日军司令官府邸会见“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在华北日军的安排下，王克敏被迫参加了这次会谈，他一开始就对汪精卫抱有很高的警惕性。王克敏一面表示愿意参加汪精卫的组府活动，同

时又声明“不接受担任委员”，主要理由是：“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同时还提出要求，如果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应放到北平举行，“北平在治安上也许适当一些”[67]。王克敏的意思很清楚，即可以考虑同汪精卫合作，但应以北平为活动中心，以“临时政府”为主体组织新中央政府，否则王克敏将继续留在北平，当然也不会容许汪精卫染指华北地区。为怕汪精卫不理解自己的主张，王克敏事后专门召开记者会，“宣布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68]。在华北期间，汪精卫曾打算亲自与吴佩孚会面，但由于吴的“坚决拒绝”而未能如愿[69]。同年10月9日，汪精卫又亲自写信给吴佩孚，称赞其风节“照映宇宙”，将来必成“旋乾转坤之功业”，并请求其参加新组建的“国民政府”[70]。受国内巨大的反汪锄奸浪潮的影响，吴佩孚更不愿同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于是直截了当地在汪精卫来信封面上批了这样一段话：“公离重庆，失所依凭；如虎出山，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71] 吴佩孚的这一态度，打破了日方精心策划的汪、吴合作的蓝图。

华北之行接连碰壁之后，汪精卫灰溜溜地返回上海。此时，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支持和控制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在上海设立了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该机关阵容庞大，除陆、海、外三省的官员外，还有兴亚院的代表和所谓的民间人士。机关长影佐声称，“实行近卫声明是决定汪精卫运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是决定日华事变结果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求全体成员全力以赴[72]。他们将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一处高级住宅拨给汪精卫做公馆，该住宅本是国民政府原交通部长王伯群所建的花园洋房，地处幽静。经日本宪兵与汪伪特工的改装，成为戒备森严的政治活动中心。

6月29日上午，汪精卫在整修一新的“汪公馆”会见“维新政府”首脑，探询他们对合作的态度。上午先同行政院长梁鸿志、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下午又同立法院长温宗尧会面。与王克敏

一样，梁鸿志曾在北洋政坛上翻腾多年，政治经验十分老到，他对汪精卫的警惕性比王克敏更高。双方一开口，即摆出互不相让的架势。在日本特务机关眼中，与王克敏会面在表面上还有“合作的气氛”，“而梁鸿志似乎不赞成汪的企图”。双方会谈时，梁鸿志曾问汪精卫：“阁下在东京会谈时，没有提出排除中国特殊化的问题吗？”汪反问：“所谓中国特殊化是什么意思？”梁说：“没有要求取消蒙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吗？”汪答：“蒙疆作为防共地区，情况特殊；华北也作为特殊地区。因此，适应特殊情况必须有特殊机构。”梁又追问：“要成立特殊机构，不觉得影响中国主权吗？”[73] 在此次各怀鬼胎的会谈中，双方都回避华中问题，汪精卫强调蒙疆、华北的特殊性，暗示华中地位并不特殊，“维新政府”将不再保留；而梁鸿志则一再否定华北、蒙疆的特殊性，示意华中应与华北同样处理，此次会谈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汪精卫心里非常清楚，得不到梁鸿志等人支持，“还都”南京必然困难重重，因此要尽可能采用温和态度，积极争取对方的好感。7月5日，应梁鸿志邀请，汪精卫专程赴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中，梁总体上表示“欢迎汪精卫出马，完成统一，收拾时局”，但谈及具体问题时则明确表示，只支持新中央政府“改组”维新政府。并向汪试探：“维新政府目前缺少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要不要加以充实？”[74] 其用意十分清楚，即希望新中央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各部总长维持原状，自己当然仍担任行政院长。

然而与梁鸿志不同的是，“维新政府”其他要员最关心的是个人前途。温宗尧向汪表示：希望“勇敢排除许多障碍，为建立中央政府而迈进”；“和王克敏及梁鸿志等商谈毫无必要”；自己在中央政府建立后，“拟赴大连养老”，但如汪精卫需要的话，“任何方面都可工作”[75]。他惟恐汪精卫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一再向汪表示：“我个人毫无问题，无需考虑”[76]。维新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给汪精卫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汪精卫加快了“组府”步伐。为尽快成立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他急于同“临时”、“维新”两政权首脑开展正式接触，商讨“合作”条件。在日本当局的安排下，汪精卫将与南、北两政权谈判的地点选在南京。9月18日，他带着周佛海、梅思平等骨干乘火车赶赴南京。次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人各代表一派势力，在南京开始“三巨头会谈”。

会谈开始后，汪精卫即先发制人，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届时将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这一手，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在王、梁的意料之中。此前，他们已经打探到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建立统一伪政权的态度。他们虽不敢违背主子的意愿，但也不愿痛快地交出手中的权力，而准备讨价还价，尽量占据有利地位。会上，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大纲》，希望“临时”、“维新”两政府予以赞同。其中规定，政治会议在暂定的24至30名委员中，“临时”、“维新”两政府只有6个名额，且只能以“社会重要人士”名义参加；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实际大权，也统统由中央政府掌握。对此，王、梁两人当然不愿接受，他们以事先没有从当地日军司令官那里接到有关提案的通知，所以无法答应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为由，予以消极对抗。此后，会谈陷入了僵局[77]。

同日，日方也在南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研究促使三方合作的对策。鉴于中日战争的形势，日本阿部内阁于9月中旬决定采取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的“现实主义”对策，并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来南京向侵华日军传达。9月20日上午，日本参谋本部影佐祯昭、“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喜多诚一参加了“三巨头”会谈。影佐当场宣布了阿部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的立场。汪精卫满心欢喜，以为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会谈一定可以顺利进行了。谁知当晚9点左右，王克敏、梁鸿志匆忙前来声明：“我们对中央政治会议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这一

强硬态度，显然是得到日本顾问支持的。影佐认为：“在时间上来说比他们迟出来的汪精卫要组织中央政府，把临时政府降格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正面临解散的命运，这样一来，两政府要人也不能安下心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78] 此外，日本内部的不统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队的意见存在分歧。侵华日军内部更是派系林立，各地日军都想借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扩充势力，并不希望出现统一的中央政府。王、梁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的立场。

对于这样复杂的问题，汪精卫无法拿出有效的处理办法。为使日本政府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影佐立即同原田、喜多两位最高顾问进行协调，使“三巨头”会谈能够继续下去。经讨价还价，汪精卫对中央政治会议的名额分配做出一些让步，于21日勉强达成一份《决议事项》，其要点是：以汪精卫的提案为基础，“首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建立中央政府”；“建立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中央政治会议人员的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央政治会议中应讨论事项，是政府的名称、首都的位置、国旗问题等极重要事项”；此外，“如仍有须商谈的事项，可在以后三巨头再次相会的机会讨论”[79]。这份《决议》虽对设立中央政治会议做了原则规定，但对南、北两个伪政权如何加入新政权的具体问题则没有解决。

对于这次“未圆满地达成意见一致”的会谈，汪精卫甚感失望。考虑到对外宣传的需要，他于会谈结束当天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承认国民党“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声明还对王克敏、梁鸿志大加吹捧，称他们“挺身离乱之际，相继组织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80]。汪精卫作

出这番吹捧，旨在为统合“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做铺垫而已。

就在汪精卫公开表态的当天，“临时”、“维新”两政府联合委员会也发表了一项声明，全文只有一句话：“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根据本会成立之使命，此时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81)维新政府的声明是以梁鸿志等十名院部长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谈了一通“同人等在水深火热之中，谋救焚拯溺之举……揭橥和平，用心綦苦”后，勉强表示：“吾人所翘首企足，旦夕彷徨，而未遽达此期望者，得汪先生挺身任之，中日永久之和平，不难实现。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努力协进，以完成中国复兴之大业。”(82)“临时政府”则在两天以后，才以政府委员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其格式与“维新政府”的声明相似，先是大谈组府的“艰危”，然后表示了态度：“兹读汪精卫先生发表大文，对本政府奖饰过多，惭惶无似，但于国是民生，有所裨益，定当追随先生之后，以底于成。”(83)

“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公开表态后，从表面上看，汪精卫与华北、华中两个已有的傀儡的协调工作已经取得成果。于是，汪精卫集团又开始了与其日本主子之间关于组织新的伪政权的会谈。

五　日汪关于“日华关系密约”的谈判

在日本占领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除取得现有伪政权赞同外，还必须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汪精卫在北上南下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进行交涉的同时，也在背后加紧活动，以乞求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

汪精卫一心想建立一个具有较大独立性的中央政权，以便争取民众支持，同时也易于吸引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员前来合作。为此，他们希望日本当局不要对新政府控制得太紧。早在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刚抵达上海还未上岸之际，他就向前来迎接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表示了组建新政府的设想：“万一决定建立政府，仍

将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从而以还都为建立政府的形式，意在采用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84]。同年6月15日，汪精卫赴日本访问时，又拟订了一份《热切期望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的原则》[85]，当时日本内部对汪精卫组府问题的意见尚未统一，因而没有对这一方案的细节作具体研究。至9月汪精卫的组府活动正式展开之后，他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对上述方案表示明确意见，同时另外提出了《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及《希望日本方面考虑之种种事项》[86]。上述要求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内政、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如内政方面，汪精卫集团保证“绝对严禁抗日、排日的思想言论，彻底实施亲日的国民教育”，同时要求日本“避免在中央政府设立政治顾问及与此类似之名义与职位；在政治上，凡属与日本需要商议之事项，概由正当途径与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进行”。经济方面，对关税、统税、盐税的收入及中日合办企业、开放长江航运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意见。总体而言，他希望日方“以事实为准则，向国民证明日本之好意”[87]。

对于汪精卫集团的组府活动，日本军政当局表面上虽作出不少空洞的承诺，但在实际行动中，决不允许其超越日本侵华总战略之范畴。1939年6月2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有关人员通报大本营对华谋略时，明确指出：“为策划蒋政权的内部崩溃，正在推动汪精卫的一派，终于出现‘汪’之脱党出国，继之以此次之来访。……在此之际，本问题的解决，应照国家全体一致的方针，中央与当地在军政各方面结成一体，向前迈进，借此发挥策略的作用以使重庆陷于四分五裂，并使离间工作得到飞跃式的进展。”[88]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的基本方针，是要采用谋略摧毁重庆抗日政府。他们之所以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权，其根本目标也是想利用汪精卫政权的影响力来瓦解重庆抗日政府，以达到击破中国抗日阵线之目的。根据这一方针，日本当局对汪精卫集团采用了如下策略：先是哄骗，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引其上钩；然而强迫其就范。在此前提下，日本对汪精卫关于建立“独立”政权的种种要求，是不会轻易答应

的。

1939年10月30日，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对汪精卫的希望要点进行逐一研究后，拟订了一份《日本方面回答要旨》。《回答要旨》首先提出，应“基于互惠、互相提携、善邻友好、共同防卫、经济援助为原则，进而调整两国邦交”，然后将汪精卫的要求一一加以否定。比如，汪精卫为使新政权有一个“独立”的形象，不希望在中央政府设日本政治顾问，也不在中央机关聘用日籍职员。而《回答要旨》则明确表示：“考虑在中央政府设置政治顾问，同时也考虑在中央政府各院、部采用日本职员”；“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就在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亦应聘请日本专家为顾问；同时中央政府直辖机关可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各省政府、特别市政府（直辖市）所属的各厅、各局以及各县也可考虑设置日本政治顾问”。这样，不仅中央机关，就连县一级的政府机构都有日本政治顾问在前台活动。军事方面，汪精卫为营造军事指挥权的“独立性”，希望在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及各种军事教学机关招聘日、德、意三国军事专家组成顾问团或担任教官，各部队内均不得招聘或任用外国军事专家。但《回答要旨》强调：“为适应日中两国新关系的调整，商议有关两国军事合作事项，应设置日本军事顾问；关于中日军事合作，不得使第三国介入。”不仅如此，在日本认为“必要的地区、特殊的军队”，也要“配备日本军事专家”[(89)]。于是，汪精卫希望新政府在政治、军事方面具有“独立”形象的要求，完全被日方否定了。

为使即将成立的汪精卫政府完全听命于日本政府，日方又决定与汪签订一份调整双方关系的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双方的主从地位。当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会谈并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后，日本兴亚院见成立统一中央政权的道路已基本铺平，即以“为中日两国间缔结条约奠定基础”为借口，提出与汪精卫集团谈判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是一份“详细清单”，开列了汪精卫政府成立后必须履行的一大堆条件。其中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外，另有两个

附件：《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日华新关系调整要项》；另外还有《秘密谅解事项》八件，《机密谅解事项》三件[90]。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加剧，日本政府中所谓“强硬路线派”逐步占据了优势，这份谈判方案充分反映出强硬派的主张。其条件之苛刻，范围之广泛，连直接主持谈判的“梅机关”头目影佐祯昭也“为之大吃一惊”[91]。它不仅包括了以前同“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所签订条约的全部内容，而且超出了同年6月6日五相会议所确定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之范围。曾直接参与这次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揭露说，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92]。

1939年10月初，陆军参谋本部堀场一雄中佐将上述谈判方案带到上海。直接从事对汪工作的“梅机关”认为该方案太过苛刻，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则表示，如果以此草案为基础与汪精卫谈判，令人怀疑日本的信义，对日本最为不利；即使汪精卫接受，对和平运动不见得会奏效。因而建议将此方案退回去，“要求上司重新考虑”。“梅机关”负责人影佐虽然“也感到不高兴，有首先把它送回去，促使重新考虑的心情”，但认为作为政府的派出机关，“正确的办法就是忠实执行”，退回政府部门的方案，“那是不适当的”。于是决定：“把这个草案率直地拿给汪看，也听取汪的意见，老实接受其意见中事理明了的部分，以修改草案，然后向政府提出意见。”[93]

11月1日，影佐约见周佛海，将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和兴亚院谈判草案的原件当面递交给他，并请他转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发现，日本要求的条件已大大超越了“重光堂”协议的范围，而且也违背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原则，但考虑到只有取得日本支持才能建立新政权，于是立即给影佐复函，同意谈判，其大意谓：“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

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94] 影佐见汪精卫没有拒绝，即带领“梅机关”成员开始与汪精卫集团进行会谈。

双方谈判采用了非正式接触与正式会谈两种方式。首先由影佐与周佛海进行非正式会晤，双方在总体上交换意见后，即转入正式会谈；在正式会谈中遇到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再通过非正式方式磋商，寻求解决的办法。至11月12日，双方共进行了七次会谈，对日方提出的草案从头至尾讨论了一遍，并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尽管如此，双方仍有十余个重要问题意见不一，作为悬案留待以后解决。其间，在驻兵、铁路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影佐见谈判陷入僵局，即于11月16日赶回东京，向陆军大臣畑俊六、参谋次长泽田茂及有关部、局首长汇报谈判情况，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即“与汪精卫签订秘密条约的目的在于对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明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程度，由此使他们理解日本并不象他们所怀疑的那样进行侵略”[95]。对此，军部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即使重庆政府要求和平，现在也不能减轻条件。影佐的意见被否决后，陆军大臣又命令他无论如何要努力导致谈判成功。

影佐返回上海后，双方重又开始谈判。根据陆军当局指示，日方在驻兵、铁路等实质性问题上寸步不让，为给汪精卫集团留一些面子，日方仅在少数枝节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处于被动地位的汪精卫集团，开始对日本的意图产生怀疑，他们越来越细致地研究各项条款，极力想弄清其具体内容和范围。“梅机关”则按照兴亚院的方案做详细解释。由于涉及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越发明显。渐渐地，日本当局认为这样马拉松式的谈判已违背了原来的意图。12月8日，兴亚院会议就建立新中央政府问题达成四项协议：一、如果现在要求中方对兴亚院会议决定的要求全面作出保证，“则依靠汪精卫建立新

中央政府是有困难的”；然而，日方也难于为建立新政府之便，“而完全同意汪精卫方面的主张”。二、根据当前形势，“尽快建立新中央政府还是有利的”，因此需要弄清双方的差距，“无论如何务必迅速地把汪政权建立起来”；“梅机关”应设法使双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留待将来转入正式谈判时作进一步的商量。三、政府在适当时候，同该新政府进行正式谈判；四、兴亚院11月1日的决定，必要时可加以修改[96]。这一决定，实际上是要“梅机关”采取变通办法，先达成内部协议，把汪精卫政府建立起来，待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由政府出面同汪精卫集团做进一步的谈判。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双方谈判速度有所加快。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日本提出的方案，由于汪精卫集团的步步退让，终于全部得到对方认同。12月30日，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

当时达成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协议书类》，共包括《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两份《附录》，《秘密谅解事项》八件，另外还有作为《附件》的秘密谅解事项两件。《调整要纲》虽然只有非常原则的三项内容，但其《秘密谅解事项》，则完全把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作为日本政府的傀儡；汪精卫希望在表面上有一些“独立”样子的可怜要求，最后也被日方拒绝。

总体上看，这份密约不仅包含了日本政府同“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签订条约的全部条款，而且还有所扩大。军事方面，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日本拥有在防共地区的驻兵权，以及确立治安驻屯权；新政府区域内之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及水路等，应使之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政治上，除不设立政治顾问外，在中央政府及最高军事机关设立财政、经济、军事、及各种技术顾问；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上海特别市等重要地方，设立日本技术顾问或联络专员；在军队和警察机关，得招聘日本教官、职员，特定地区可设顾问。经济方面，以日华合作为借口，日本取得了全国航空、华北铁路、沿海海运、长江水运等各种交通的控制权；开发、利用在国防上必需的地

下资源的优先权；日本“军票”继续流通权；等等[97]。这份密约的签订，比较系统地暴露了日本企图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同时也使汪精卫集团在“和平”伪装的缝隙中露出了日本走卒的汉奸真面目。

汪精卫自知这是一份见不得人的卖国协定，所以在签字时与日方约定“永不公布”。然而，卖国毕竟不得人心，以个人野心为纽带结成的汪精卫集团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密约签订才一个星期，参与汪派并目睹日、汪密约达成过程的高宗武、陶希圣即叛离汪而去，由沪抵港。1940年1月7日，高宗武在香港把日、汪密约稿38纸、照片16张，交杜月笙赴重庆转呈蒋介石[98]。对于这些文件，蒋介石“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为此他手函高宗武予以“慰励”，反复研究了公开日、汪密约的相关事宜。1月20日，蒋介石获知“汪逆已飞青岛开会”的消息，当即决定“秘约非即速发表不可”[99]。1940年1月21日，香港《大公报》以“汪的卖国密约”为标题，公开披露了由高、陶两人提供的日、汪密约稿，同时还发表了两人致报社及汪精卫的公开信。公开信称，自参与这次谈判，“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走”。信中揭露谈判过程中，“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而汪精卫却“迷途已深，竟亦迁就许诺”[100]。另外，在致汪精卫的信中，他们以一副“恳切”的姿态，规劝汪精卫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无益之运动”[101]。

高、陶两人的倒戈，给汪精卫集团带来极大震动。周佛海得知此事后，“愤极之余，彻夜未睡”[102]。汪精卫亦深知密约被揭露后，自己所谓的“和平运动”将会为全国人民所唾弃，以后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于是不得不仰首长叹：“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家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103]然而，他们并未就此悬崖勒马，而是继续沿着卖国

投敌的道路走了下去。

为掩盖真相，挽回影响，汪精卫集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展开反击。1月23日，陈春圃以汪精卫随从秘书的身份发表声明，称高、陶“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面记录”。同时还竭力为汪精卫的行为辩护：“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104)]。汪精卫本人也于1月24日接待路透社特派员，就高、陶事件发表谈话。他一会儿称他们公布的仅是“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人士之私案”，一会儿又说“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105)]。前后之矛盾，反映出他内心的空虚。

在竭力辩解的同时，汪精卫集团还明确表示不放弃原有立场。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在社评中，一方面承认“和议的结果为损失”，同时又强调，“只要屈辱而不至于屈服，损失的程度不至于断送复兴之基础，和了还是比战到灭亡要好”[(106)]。由此可见，他们决心要在卖国投敌的道路上一走到底。

第二节　汪伪政权还都南京

一　汪伪集团的还都丑剧

经过秘密谈判，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了《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协议书》。随后，汪精卫等即准备同“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首脑就组织新政府展开新一轮谈判，以便早日成立统一的新政府。为减少组府过程中的障碍，一切活动都由日本“梅机关”直接操纵进行。

根据日方决定，汪精卫应于1940年1月下旬在山东青岛同王克敏、梁鸿志等进行正式的组府会谈。之所以选择青岛作为会谈地点，

是因为此地过去曾受欧洲国家的侵略，日本“夺回”后“交还”给了中国，“这意味着重建东亚、日华合作的开端”[107]。1940年元旦，汪精卫在上海发表题为《共同前进》的文章和《和平运动之前途》的广播讲话，宣称：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是中日的共同目标，“二十九年（1940年）这一年，无疑是和平运动由开始而达于成功”[108]。第二天，周佛海也发表同样主题的广播讲话，更明确地宣称：“现在中央政治会议，快要召集了。中央政治会议之后，中央政府就要成立了。”[109]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连日同“梅机关”研究会谈细节。1月4日至7日，周佛海、梅思平等与“梅机关”成员连续进行了四次会议，就“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等重要事项议定了详细的谈判方案，随后报汪精卫与日方负责人审核[110]。

1月15日，有关青岛会谈的各项议案全部准备妥当，汪精卫即致电王克敏、梁鸿志，邀请他们两人赴青岛会谈。电文称：“数月以来，各事折冲结果，渐见端倪。兹为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促进和平，实现宪政，作进一步检讨，而期实行计，定于本月下旬，在青岛举行会谈，以便讨论国家大计，尚乞赏临为幸。”[111]在伪中央政府成立前夕，汪精卫没有忘记再次向蒋介石劝降。16日，他发表“铣电”称：自“艳电”发表一年来，与诸同志致力于和平运动，并与日本朝野讨论和平方案。现在，“和平方案基础已具，中国所可得到者，不惟非亡国条件，且循此力行，中国之独立自由可保，三民主义之建设可以完成”。以今日之国内外形势，“抗战到底必无最后胜利之望”。只要蒋介石“毅然决定大计，声明愿与日本停战言和”，“则兆铭与诸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国和平早日实现”，否则，“势必先以全力，从事于局部的和”[112]。醉翁之意不在酒，“铣电”之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劝蒋介石“停战言和”，而是为即将成立伪政府鼓动造势。

1月21日，汪精卫携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等一班人马，在“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陪同下，乘船赶赴青

岛。“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蒙军总司令李守信等人也先后抵达青岛[113]。1月24日，青岛会谈正式开始。为制造由中国人自己组织政府的假象，汪精卫与“梅机关”事先约定，日本人不直接参加会谈。但会谈三方的日本后台，如“梅机关”的影佐祯昭，“临时政府”顾问喜多诚一，“维新政府”顾问原田雄吉，都带领骨干人员来到青岛。这批日本人虽不在会场上露面，但谈判的全过程都由他们幕后操纵。

会议预定举行三天，由于各项提案事先都已得到各方日本顾问的认可，而且规定在讨论中以不变更为原则，所以会议进展顺利，整个议程有所提前。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建立新政府的基本原则，以及重要法规制度。会议首先确认，“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应包括汪精卫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与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并重申：“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114] 这些原则，实际上将日本对华政策具体化了。接着，会议进一步决定了中央政府树立大纲，中央政府政纲及其政策，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央政府名称、首都、国旗及政府机构之构成组织等各种问题[115]。这些议案基本由日本人制定，因此“临时”、“维新政府”的头目毫无异议，一致同意。

1月26日，各项议案一一讨论通过，会谈顺利结束。随后，汪精卫发表谈话，声称：“第一次之会谈，已略具端倪，今进为第二次之会谈，所得结果，更为圆满”，“青岛会谈，实可称为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与发展也。”[116] “临时”、“维新”两政府也于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汪精卫组府活动的支持。声明表示：“关于内外政策，汪先生谈话所发表者，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117] 当晚，各方会谈代表与日

本顾问们举行联欢会。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赶来出席，并在酒席上发表声明，强调“凡东洋事务，应以道义为万事之基础；基础已经一致，日华间的一切问题定能迎刃而解”。同时又给汪精卫一伙打气，称他们是“有志气，行得正，谁都不惜予以支援和帮助；一切挺身而战，敢于言和的人，皆为勇士”。对此，汪精卫立即起而呼应，强调了中国的道义传统[118]。此次会谈，为日、汪合作在日军占领区建立统一政权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青岛会谈后，汪精卫与梅思平等于1月26日晚返回上海。周佛海则于次日前往日本做进一步交涉。抵达上海后，汪精卫立即宣布成立“还都筹备委员会”，着手组府的具体准备工作。为表示新政府是能够容纳各界人士的“中央政府”，汪精卫集团努力拉拢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士入伙。如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中国青年党常务委员赵毓松、无党派的岑德广、赵尊岳等人，均被聘请参加中央政治会议。2月3日，周佛海回到上海。2月12日，他召集被邀请参加政治会议的青年党、国社党代表开会[119]，向他们报告日、汪谈判筹建新中央政府的经过，研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具体问题，抓紧拼凑新政权的基本班底。

在进行组织人事方面准备的同时，日、汪双方还互相配合，展开新一轮舆论攻势。3月9日，上台不久的日本米内首相发表公开谈话，宣称日本将根据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继续进行大规模战斗，“断然溃灭中国之容共抗日政权”，而现在“中国方面体会帝国真意，揭示反共和平方针，以汪精卫为中心之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政府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幅之援助”[120]。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也发表谈话，表示将根据近卫三原则精神，“欣然举广大占领区域，悉置诸行将诞生之新中央政权统辖之下”，“援助其兴隆发展”；“派遣军对新政府之全幅支持，自不待言”[121]。3月12日，汪精卫于上海发表《和平宣言》，声称和平运动已进入“组府还都实践阶段”。《宣言》还吹嘘：“自今以后，举国人民皆在统一而有力的中

央政府领导之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之纠争与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122]

日、汪相互配合的舆论攻势，除为汪政权的建立鸣锣开道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压。为配合对重庆当局的诱降谋略，日本政府一再推迟新政府成立的时间。万事俱备只待日本下令便粉墨登场的汪精卫集团，对此渐渐感到焦躁不安。经多次交涉，日本方面终于同意在4月份以前成立新政府的请求。此后，汪精卫迅速启动了组府议程。3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开幕，正式代表除汪精卫外共有30名，分别代表汪伪国民党、“临时”、“维新”、蒙疆三政权和所谓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另外还有广东、湖北的列席代表各一名。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吹嘘说：参加会议诸人，“或为中国国民党同志，曾服务于国民政府，深感收拾时局之重大责任；或为事变以来尽瘁于国脉民命之维持，先后成立政权之诸当局；或为国内有悠久历史，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之诸政党；或为海内贤达，有忧时先识，今兹相聚一堂……期于共同担负起和平建国之时代使命”[123]。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与会者装模作样地通过了一批由日、汪双方事先确定的法案，主要有《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以及新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成立日期等。会议还通过了新政府各院、各部会长官人选。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把政府主席的位置“保留”给了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汪精卫只任代理主席[124]。这一看似荒唐的决定，实际上真实反映出即将成立的汪政府一切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本质。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对重庆的诱降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虽一再受挫，但从未死心。所以，要求汪伪政府必须为日后的宁、渝合流留下伏笔。3月23日，汪精卫发表题为《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的广播讲演，宣称国民政府还都后，“第一，是把全国普遍的和平实现起来；第二，是把中华民国的建设完成起来”[125]。

为欺骗全国民众与国际舆论，汪精卫在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始终打着国民政府“法统”的旗号。新政府的机构设置也完全模仿重庆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同时新政府的建立亦被称为“还都”。汪精卫等原本打算在还都时由各主要城市悬挂原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即使“首都”南京也不允许悬挂。后经反复交涉，日本中国派遣军方面同意只在新中央政府正面悬挂一面青天白日旗，而将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黄布条挂在另一根杆子上[(126)]。3月30日，汪精卫等人在南京原国民政府考试院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当日，汪伪政府并未按照与日方协定办法悬挂黄色飘带，从而引发日方不满，最后只能被迫“改正”[(127)]。

宣布“还都”的同时，汪伪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政纲》和《国民政府还都宣言》，以宣布新政府的内外方针。其对外方针为：“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并于经济上实现互惠平等之合作，以树立共存共荣之基础。”对内方针则强调：“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过去个人独裁，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同时还煞有介事地向抗日阵营内的军政人员发出布告：“凡属公务人员，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对于此等报到人员，一经确实证明，概以原级原俸任用。……有所贡献者，尤当优予任用。凡属一般将士，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其非正规军队散在各地担任游击者，亦务必遵命停止活动，听候点验收编。”并且还宣布：“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128)]

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同一天，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也分别发表《解散宣言》。“临时政府”的宣言声称：“兹者幸值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二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之目的，趣旨既合，两者自当归于统一。现当民国二十

九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宣言解散临时政府，以普告中外。”[129] “维新政府”则解释道：“兹幸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并揭橥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以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散。”[130]

为显示日、汪之间的紧密合作，日本政府于3月30日发表声明，对汪政权的成立予以支持。米内首相还与汪精卫互换广播词，向对方国民进行广播。日本政府的声明表示：在庆贺其成立的同时，将根据历次声明，对汪政府的发展“给予全面的协助和支援”，“期望各国均能确认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迅速为东亚的和平建设作出贡献”。同时又宣称：“帝国为与东亚各国一起确保其生存，对于开发利用中国资源有着特殊的关心和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以后的对华政策是：“只要残存的容共抗日势力迷梦未醒，帝国对其就断然不能停止战争，并将以坚定的决心和不断的准备，克服与突破今后可能产生的一切障碍，以期达到神圣战争之目的。”[131] 米内首相在广播词中称赞“早就理解帝国真意之所在”的汪精卫等人，是中国方面“目光远大的先觉者”，并表示对新中央政府“不惜予以全般的援助。”[132]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与驻中国舰队司令及川也分别发表谈话，表示对汪政权的支持[133]。

对于日本军政当局的口头支持，汪精卫感激涕零。他在对日本国民的广播词中，称赞日本自近卫声明以来，对华主张“始终一贯”；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基本精神，“在使东亚诸国家民族各得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以为亲爱和平之合作”；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仅尊重中国之主权，且不吝进而援助敝国完成其为独立国家所必须之条件”。为报答日本的支持，除向日本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外，他还表达了决心：“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中国”，“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134]。

正当日、汪双方互相吹捧，大演双簧之际，重庆、延安和其他抗

日后方迅速掀起了一场声讨汉奸的浪潮。3月29日晚，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痛斥汪精卫等人的卖国罪行："当我们抗战进展到这样重要时期，不幸出了汪兆铭等少数汉奸，给敌国军阀利用，拿屈辱和平的论调，做叛逆行为的掩护，冒用中国国民党组织下一切原有名称，举行叛党叛国会议，并且有组织伪政权的阴谋，企图盗窃名器，妄称继承法统，混淆观听。敌人如此利用汉奸，以及汉奸如此给敌人摆弄，只不过拿汉奸做个临时工具，以便敌人换一个方式来侵略。"(135) 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又发布《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另外还宣布逮捕其他大小汉奸百余名(136)。4月1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一届五次会议，发表讨汪通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于4月15日发表《讨汪救国通电》，揭露汪精卫等人的所谓"和平"即是投降，所谓"反共"即是灭华，并严正表示："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江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137) 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讨汪大会，号召全国各机关及群众团体掀起讨汪运动，严禁各级人员和汪派联系，把残余的汪派分子从抗日营垒中清除出去。海外华侨也纷纷通电讨汪，怒斥汪精卫一伙"罪恶滔天，甘作虎伥，成立伪府，有血皆愤，誓不甘休"(138)。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也发表声明，对汪政权予以否认。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指出："南京政权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的"，"美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国民的大多数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作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139) 英、法两国也于4月1日发表了不承认汪伪组织的声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表明不承认汪政权的立场。可见，汪伪政府一开张，即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

二　汪伪党、政、军机构的建立

汪精卫集团为标榜自己建立的伪政府是继承民国法统的“合法”政府，把伪政府之建立称为“还都”，政府内部组织制度也尽量模仿原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东施效颦，终究无法掩盖其傀儡政权之本质。经过精心装扮的汪政府，与同时期其他伪政权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其主要特点是：在政治上标榜继承中国国民党的党统，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在组织上具有比较完备的政权形态；在人员构成方面，其主要骨干或为原国民党干部，或曾在民国政坛上出任过要职，都具有较高层次；在对外关系方面，表面上也显现出相对的“独立性”。

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与蒋介石集团发生过多次激烈争斗，因而深知抓住党统大旗的重要性。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以及出走前仍为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一开始即强调要以国民党为中心建立新政权。1939年8月，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周佛海的指挥下，首先通过《整理党务案》。该案宣称：自1939年1月1日起，原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暂行解散，听候改组”；“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同时还宣布增补一批中央执、监委员，令尚在抗日阵营中的第五届中央执、监委员立即来上海集中，共商国是[(140)]。

在否定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合法地位后，由一批“六大代表”提出两项动议：（一）汪精卫“倡导和平”有功，“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二）“依据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兆铭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上述动议经鼓掌通过后，汪精卫即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41)]。抓到“党统”这面大旗之后，汪精卫开始以国民党元首的身份，担任六全大会主席。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建立伪政权的法案，其中主要有《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反共为基本政

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案》等五项。

伪“六大”结束后，汪精卫等又于9月5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一中全会，确定了新中央机构的干部人选。他们首先增补周佛海等九人为中执委常务委员，同时又宣布原中常会委员继任原职。另外还推选褚民谊为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丁默邨为社会部长。

通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汪精卫把“党统”旗帜抓到了自己手中。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当然无法瞒过中外舆论界。为回答西方记者质询，汪精卫于9月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重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共产党所劫持”，自己为挽救国家危亡，所做工作的第一步，“在如何恢复中国国民党之本来面目，及自由独立之行动”；第二步，“在如何收拾时局，化战争为和平”[142]。为标榜自己行动的合法性，他还歪曲事实，称重庆方面违背了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方针，而自己召开的党代会则同上次会议一脉相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自己的行动符合孙中山先生之遗愿：“而念及孙先生之遗教，尚未能一一实行……孙先生所提倡之中日友好及大亚洲主义，尚有前途辽远之感，实不禁儆惕悲痛之至，因此而更增进和平运动之决心。”[143]

这种解释，当然只能欺骗外国人。对于国内民众，不用说抗日志士绝对不会相信，即便在汪精卫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心存疑虑。为给部下打气，汪精卫于1940年1月专门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合法性问题做了一次讲演。他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对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详细回顾，最后的结论是前后“一线相沿的”。他说：“各位看看，这宣言里头，先后衔接，没有中断，等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各位看看，连体裁都是一样的，最先说明白抗战的目的，后来说到和平条件的达到，后来列举三民主义以及内政、外交，教育，说话完全是一致的。”“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

时候，还没有得到和平的条件，当然还是讲抗战，希望和平，到现在，和平条件已经得到了，我们就要实现和平。”[144] 应当指出，这种抢旗帜的做法，手段虽不高明，但同此前投敌的汉奸相比，却具有相当的欺骗性。

为自己的投敌行为找到理论依据后，汪精卫等在筹建伪政府的过程中也完全摈弃现有伪政权的组织制度，而是全盘模仿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

首先，根据国民党《训政纲领》中“以党治国”的原则，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确定新政权的人士安排。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大小汉奸凭自己的实力排定在新政权中的相应坐次后，正式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的国民党取得十一席，临时、维新两政府各取得五席，其他各方代表十二席。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首先对与会诸人吹捧一番，接着要求与会者对各项议题，“作缜密之讨论”，“使全国同胞所企盼之普通的和平，得以从速实现，使全国多时久悬未决之宪政问题，得以确定”[145] 。经过一番煞有介事的讨论，通过了一大批事先确定的议案。然后根据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并推举汪精卫担任委员及委员会主席。这样，汪精卫的组府活动取得了法统依据。

其次，把组建傀儡政权的活动称作“国民政府还都”，组府地点选在原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所用“国旗”也要采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遭到侵华日军抵制之后，仍一再坚持，最后采用在青天白日旗帜上另加黄飘带的方式以示折衷。为对广大民众实施欺骗，还都宣言一开头，即装腔作势地宣称：“国民政府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谨以诚敬，昭告海内。”[146] 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假象，即在淞沪抗战失利之后内迁的国民政府，在汪精卫的率领下又回来了。未觉察其阴谋的人，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

第三，竭力把新政权装扮成“全国性”的“独立”政权。汪精卫政府

筹建之时，明明只能控制长江三角洲的狭小地域，但硬要充大。汪精卫在对日交换广播词中宣称："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联合事变以来全国各处先后成立之政权，以及在野各党派暨贤达人士，相与协力，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147) 在还都当日公布的"十条政纲"中，亦特别强调"以和平外交，求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完整，以分担东亚永久和平及新秩序建设之责任"(148)。汪伪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采用五院一委制，即在国民政府之下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以及军事委员会。各院再设立数目不等的部委，总数多达23个。尽管许多机关只是徒有其名，但基本框架却与原南京国民政府完全相同。

第四，选用原国民党干部担任要职。值得注意的是，伪政府为标榜承继原国民政府法统，推举仍留在重庆抗日营垒中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仅担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伪政府中虽然也包括"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头目，以及一批封建余孽、马路政客、失意军人，但仍以原国民党党员为主体。尤其是上层官员，大多数是原国民政府中的达官显贵。汪伪政府的灵魂是汪精卫，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是国民党内第二号人物；伪立法院长陈公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实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伪政府中掌管财政、军事、特务大权的周佛海，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伪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行政院秘书长；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社会部长丁默邨等，也都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

然而，不管汪精卫等人如何装扮，伪政府的本来面目还是终究要暴露的。因为一切伪装只能在日本人容忍的范围内进行，越出范围是绝对不允许的。汪精卫非常想把华北控制在自己手里，由于华北"临

时政府”得到日本现地驻军的支持，汪精卫的一切努力全部落空，最后只能默认华北伪政权的独立状态。为给汪精卫保留一些面子，日本同意将“华北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汪政府领导。为明确双方权限，在汪政府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专门制定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允许其享有“极度的自治行政权”[149]。这一规定不仅使汪政府无法插足华北，而且在政治上也大失面子。

汪精卫深知，在侵华日军刺刀的保护下，是无法维持“独立”形象的，所以在新政府筹建的同时，也加紧拼凑一支名义上归自己指挥的军队。这也是汪精卫集团蓄谋已久的计划。在公开叛离抗日阵线之前，汪精卫等人即策划依靠云南、四川和两广的地方军阀部队，组建所谓“和平军”，再成立伪政权。1938年11月日汪双方秘密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中，曾拟订过这样的“行动计划”：汪精卫脱离抗日阵线后，“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运动的”。“日本军队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并为中央军的讨伐制造困难”。“行动计划”还设想：“汪精卫将……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其规模为“建立五到十个师的军队”[150]。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汪精卫等人的意料。“艳电”发表后，西南军阀无一人响应，日军也未从两广地区撤退，这就使汪精卫的计划彻底破产。

1939年年初，汪精卫等人只得把注意力转到自行编组军队上来。他们设立了“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自任主任委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任委员，周佛海还兼任秘书长，以后又在香港发展了叶蓬、杨揆一两个委员[151]。同年2月，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如由自己组建政府，要求“重建军队，组编十二个师的军队”[152]。当时仅有设想，还没有实质行动。至汪精卫赴日本访问，其行动计划得到日本首肯之后，才与组府活动同时开展。同年秋季，军事委员会移至上海愚园路汪精

卫住宅，“由汪氏自任主席，委员有周佛海、刘郁芬……郑大章诸人”[153]。其主要工作是收罗北洋军阀以来的失意军官、兵痞首脑、杂牌部队头目；对原西北军人员的策反，由刘郁芬、郑大章负责；对原东北军方面由鲍文樾、杨毓坤负责；武汉和江苏地区分别由叶蓬和藏卓进行联络。同年12月，在上海开办“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有八百余名学员参加，由汪精卫任团长，叶蓬任教育长。同时还在上海组建一个警卫旅，充当汪精卫等人警卫之用。

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还在上海成立“和平建国军总指挥部”，由王天木任总指挥，负责收罗江、浙、皖一带的游杂部队、国民党溃兵及土匪，编组“和平军”。另外，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撮合下，以丁默邨、李士群为头子的特务机关也于1939年夏季与汪精卫一伙合流，成立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和特工总部，从此，汪精卫集团有了特务机关和特务武装。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时，仿照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正式设立直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并列。“军事委员会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其执掌为关于国防绥靖之统帅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军费支配、军备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及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之审核”[154]。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内设常务委员九人，委员若干人[155]。以后除常委基本未动外，委员陆续补充，最后增加到近五十人。

汪伪军事委员会设有一批直属主管机关。参谋本部为最高参谋机关，“掌理国防及用兵事宜”；军事参议院，为最高军事咨询机关；另外还有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以及航空署和办公厅。汪伪军事机构的设置，开始一个阶段实行军令与军政分权制度。军令属于军事委员会，掌管军事情报、参谋、军队调遣、作战指挥、部队训练等事项。军政则归属行政院，在行政院设置军政部，“管理全国陆军行政事宜”；设置海军部，“管理全国海军事宜”[156]。凡属军需、军制、

军械等方面的事务，均归军政、海军两部掌管。但这两部同时又受军事委员会统辖。另外在军事委员会还设有海军军令处，掌管海军军令。除上述制度之外，汪伪政府的军事法规，也大部袭用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旧制。伪军政部长鲍文樾曾说："国府还都伊始，即遵照中政会之决议，通令各军事机关，根据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前一切法令，按照现在情形，详密审查，其无滞碍者，一律沿用。"(157) 实际上，并列设置陆海军管理机构的做法，已经采用了日本的模式。

汪伪军事委员会在地方的最高军事机构为绥靖主任公署和绥靖指挥部。其职责"为办理各省区及协商邻接边区绥靖事宜，……凡各管区内之军队及地方团队均归其指挥"(158)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陆续成立的机构有：苏浙皖绥靖总指挥部，总司令任援道，司令部设于南京；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部设于商丘；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部设汕头；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部设东台；此外还有开封绥靖主任公署、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在华南地区，则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办事处。在南京，设首都宪兵司令部。在汪精卫的势力无法到达的华北地区，也设立华北绥靖总司令部，以齐燮元为总司令，总部设北平。其后，根据日本侵华战略的需要及汪政府内部的矛盾，其机构与人事曾作过多次改组和调整。

汪伪军事机构建立后，加快了收编、改编和组建伪军的步伐，以扩充其军事力量。首先，将"维新政府"的伪军全部收编。接着，又采取如下办法扩充军队："（一）、原有国军部队，遣散在沦陷区自请收编者；（二）接收日军所已经收编者；（三）不及撤退之散兵游勇或小单位之携有枪械而无统辖者；（四）上项游兵散勇，已有人利用之而编成较大单位者；（五）巧立名目，无正式系统委任者；（六）由日军移交之国军俘虏；（七）极小部分，系向各地招募者。" (159) 其中，收编国民政府的残余部队和改编各地伪军是扩军的两个主要途径。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汪伪政府已拥有如下几支主要军队：（一）

第一方面军。这是由原“维新政府”绥靖军改编而成的部队，由任援道任总司令，总部设在南京，下辖南京、湖州、杭州、庐州、蚌埠、苏州、芜湖七个绥靖区，七个师，两个独立旅，一个教导旅，两个独立团[160]。（二）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由原西北军张岚峰部伪军改编而成，以河南商丘为基地，下辖三个师，张岚峰为军长[161]。（三）第一集团军。由原国民政府军李长江部组成。李长江于1941年2月在苏北地区率部投汪，被编组为四个师，两个独立旅[162]。（四）第二集团军。由原国民政府军杨仲华部组成。1941年3月，原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在苏北公开降日，先被任命为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后改称为第二集团军，下辖四个师[163]。（五）第十九、二十二、二十八师。这是由原国民政府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所属的部分地方部队改编而成。（六）第二军。这是汪伪政权收编苏南地区和淞沪地区的二支和平军合组而成的部队。下辖二个师，三个团，军长为刘培绪。（七）第二十九、十一、十二师。这是在武汉地区先后收编的三支地方部队。（八）闽粤边绥靖军和第二十、三十师。这是在福建、广东地区先后收编的几支地方部队。（九）第三十一师，独立第三、四、十一旅。这是在安徽、山东地区收编的几支地方部队。此外，还有南京的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与中央海军学校，这两校规模不大，主要为培训军队干部之用。

汪伪政府党、政、军机构框架构筑完成之后，即以独立政府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日本政府进行所谓外交谈判，使日本种种侵华罪行合法化。

三　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汪精卫国民政府是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一手策划建立的，但对日本侵略者而言，炮制这个全国性傀儡政权，并不是侵华战争的终极目标，而是企图利用其向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最终迫使中国人民放弃抵抗，接受其殖民奴役。因此，日本对待汪伪政府的态度，完

全根据其侵华战略的需要而定。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不管汪精卫集团如何焦急，日本政府却迟迟不正式予以承认。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汪伪国民政府的傀儡本质。

早在1939年夏季，日本当局决定在中国占领区建立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并与汪精卫集团进行秘密谈判。是时，日方仍未放松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攻势，还派专人与重庆方面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至于不放弃“重庆工作”的原因，直接负责将汪精卫从抗日营垒中拉出来的今井武夫事后坦言：“从本质上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已。”(164)

尽管对重庆的诱降工作在实际执行中与建立汪伪政府工作存在一定矛盾，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两项工作都很重要，应当在提法上统一起来，因而明确提出：“树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在于使重庆与此合流以达到指导停战之目的。”(165) 该方针于同年10月30日被正式批准后，对重庆工作即成为日本的一项重要谋略。不久，所谓“桐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何处理成立汪伪政府与对重庆诱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为表示对重庆和谈的诚意，日本方面曾一度推迟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时间。这一做法使汪精卫集团感到急躁与不满，他们要求立即成立新政府，然后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此时日本对重庆的诱降，有几条秘密线路在同时进行。这些工作都有成功的可能，但暂时尚无眉目。在这一形势下，日本方面认为，应特别重视成立新中央政府和转入持久作战的时间界限。于是在1940年1月1日，制定了一份《关于解决战事的机密指导》，其方针是：“大致以1940年秋季为限，应特别努力解决战事问题，在加强和促进对汪工作的同时，开展对重庆工作，适时抓住对重庆停战的机会，并指导蒋汪合流”。“对重庆工作要与汪工作相协调，逐次积极地加以指导。上述汪、重庆两项工作，在成立新中央政府前后均应努力实施，并须尽快地掌握解决这

个问题的一致点”。同时又规定，新政府成立前的工作大致到3月份为止，此后的工作预定进行半年[166]。

为实现上述目标，机密指导还细分为“对汪工作指导”、“对重庆工作指导”和“综合指导”三个方面，并列出详细的指导原则。其中“对汪工作的指导”原则有五项，主要包括：对汪工作之进行，“可使其适应于工作本身的自然进度。其政权的建立，也要基于其实力作相应的处理。因此该政权的建立，首先要作为临时政权，而为了要解决战事或遂行持久作战，则进一步使它有可能发展成为正式政府”。对于政府成立前的青岛会谈和中央政治会议，应作为“内政问题处理”，使其取得一致意见。尔后的指导，“应着眼于他们对重庆的看法以至措施”。关于中日国交问题，“可把形势引导到完全责成汪精卫处理”。新政府成立时，应注意通过内外措施，“防止堵塞尔后与重庆合流的途径”。对新政府的承认，“可在通过与重庆合流解决战争之际，或在两政府对立之下，我决意遂行持久战之际，（后者预定在年底），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受内外有关形势的牵制”[167]。这些原则，完全抛弃了曾经给予汪精卫的许诺，而把汪政权当作了日本整个侵华战略中的一枚棋子。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重庆国民政府尽管面临极为艰险的形势，但始终没有向日本屈服。1939年底，中国军队在部分战区发动冬季攻势，给日本侵略者予以沉重打击。1940年1月21日，日汪密约公布后，蒋介石于1月23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予以逐条驳斥，指出：“汪派所谓的睦邻友好是日华合并，共同防共是永久驻兵，经济合作是经济垄断”，并呼吁“全国同胞全军将士乘此时机，加倍黾勉，努力奋斗，驱逐倭寇，光复山河”。同日，蒋介石还发表《告友邦人士书》，揭露日本的野心，呼吁各国“共同合作，迅采有效之行动，以制止日本之侵略”[168]。重庆政府的强硬态度，使日本当局进一步意识到，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必须同重庆当局打交道，促使蒋、汪合流，这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为此，日本方面于2月1日确定《调整

汪与重庆关系办法方案》，企图采取措施，分别处理停战与和谈问题，“并利用处理两个问题的间隙，处理合流问题”[169]。

日本方面对“桐工作”充满希望，但重庆方面态度却不甚明朗，这直接影响了汪伪政府的成立。经与汪精卫协商，日本当局决定把新政府成立时间延至3月30日，蒋、汪事前合流的期限也限定为3月底。然而，在日、蒋代表的秘密接触中，重庆方面要求把最高代表的会谈时间推迟到4月中旬。日方认为，“这是一种可能被误解为企图使新中央政府延期成立的意见”，要求重庆方面重新考虑[170]。但至约定时间，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回音。至此，日本方面期待蒋、汪事前合流的计划完全落空，于是才决定成立由汪精卫单独组织的新中央政府。

汪伪政府的建立，并未对中日战争的全局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日本方面对蒋、汪事后合流仍寄予很大希望。正当汪精卫一伙在南京粉墨登场，庆贺“还都”之时，日本特务机关已开始筹划第二期“重庆工作”。他们把事后合流的工作期限延展到本年秋季为止[171]。日本陆军当局也根据欧洲战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抓紧研究如何尽早解决对华战争问题。由于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都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继续与重庆政府直接交涉上，新成立的汪伪政府反而被冷落在一旁。

5月5日，日本方面制定《对新中央政府指导方案》，对汪伪政府在战争中所起作用作出明确规定：“对新中央政府，首先应根据包括重庆在内的解决事变之方略，对其加以扶持和利用，当取得成效时，正式予以承认”；如逾期仍不成功，“根据其成为对立政府之现实，正式予以承认，使之成为持久作战方略之一环”[172]。5月18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在《对华战争处理方针》中，也对汪伪政权的近期活动作出规定：“尽力扶植新中央政府，使之适应帝国的企图并力求其发展，到1940年底以前，特别要发挥它的谋略职能，集中力量做重庆工作。”[173]对于日方的指令，汪精卫等人只能认真执行，但他们肚里不无怨言，希望日本能尽早承认新政权，以抬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汪伪政府是由日本一手炮制的，承认它自然不是什么难题。日本之所以延期承认，首先考虑的是充分发挥其在处理事变中的作用。如过早承认，“势必造成南京与重庆的对立形势”，导致对重庆诱和工作的失败。另外，正式承认时，双方所签条约的具体内容，“关系更为重大”，因而需要做充分准备，并先就条约内容进行谈判。日本方面认为，谈判虽应以先前达成的日、汪密约为基础，但此时形势已发生变化，谈判一事理应由自己承担。为此，它准备了一份《关于起草条约的方针》，以此作为谈判的依据。方针强调指出：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是在正式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作为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提出来的”，“但属于日本和中国内部的指导问题，以及处理事变上应特别考虑的问题除外”，新的条约应“按各项内容性质，分为基本条约和附属协定，且按公开、秘密分别处理”；“应站在处理事变的观点上，并考虑对内、对华和对第三国的关系来决定公开基本条约的范围”，“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中，不包括在公开基本条约内的东西，须用其他形式，正式地与本条约同时处理”[174]。显然，日本总军想通过条约谈判，获取比原先更多的东西，而且采用不为人知的秘密方式取得这些特殊权益。

6月初，日、汪双方开始签约谈判，日本的日高公使和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分别任主任委员。6月初与7月底，日本政府把经兴亚院审议的基本条约方案分两次送达现地。在递交谈判代表之前，日本总军再经审议，并逐条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对第一个基本方案，共提出十三条意见，如“应作好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协议文件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之大部，作为基本条约或附属协定等同时进行签字的准备”；“现在进行谈判的条约体系，均属与基本条约一并处理的范围（即原则的事项），避免涉及部分的细目问题”；“对各条款和共同协议书等，只要内容没有异议，可以不要过分地作字句上的推敲”，等等[175]。日本方面认为，在现地形势没有稳定以前，“对待密约的细目事项之处理，应极力加以限制”，而东京方面却与此意见相左。在第二次送达现地的方案中，写入了不少细目事项。对此，日本当局于

7月18日再次向日方谈判代表提出："为了处理事变，特别是日华两国的将来"，对有关项目和内容的处理，应力求避免"干涉内政"的句子[176]。

签约谈判表面是共同协商，实际则由日方一手操纵。根据日方提议，首先确定了几项谈判与签约原则，对于过去已经达成的"协议文件"之内容，虽不可能全部载入新文件，但将来"继续有效"[177]。汪伪方面为顾及面子，在驻军等问题上与日方进行了争论，但最终仍按日方意见写入了协议条文。在近三个月时间里，双方经过15次正式会谈，于8月28日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条约送至东京后，日本最高决策层经过一个多月争论，至10月中旬，方才决定采纳现地达成的方案。

日汪条约达成之后，日本政府为诱使重庆政府屈服，继续拖延正式签约及承认汪伪政府，这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汪伪集团的不满甚至是动摇。由于日本当局对重庆的诱降活动接连受挫，故决定于11月28日与汪政权签订日华新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为与日本的行动相配合，汪精卫立即于11月29日正式就任南京伪政府主席。30日汪精卫即同日本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另外汪精卫还与阿部信行、伪满"总理"臧式毅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

日汪《基本关系条约》与《附属议定书》是日汪新条约的主体。其中除重弹近卫三原则等老调外，日本还虚伪地承诺"撤销治外法权"并"交还租界"，以示对华友好。然而，为达到全面控制汪伪政府之目的，条约又明确规定："两国政府相约，互相消除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足以破坏两国间友谊的措施及原因，并在将来亦加以杜绝"；"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在必要时期内，"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地区"；"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合作"[178]。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以国际法的形式

将汪伪政府紧紧控制在日本手中。为防止理解上的分歧，双方在《附属议定书》中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中华民国政府谅解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战争期间，随着上述战争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特殊事态，并谅解日本为完成上述战争的目的而采取必要的措施。"除根据《基本关系条约》及两国现行约定而驻扎的日本军队外，"其余日本军队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结束战争状态时开始撤兵，并应在治安确立后的二年内撤退完毕"[179]。这些规定，不仅承认了日本侵华之现状，而且还使日本长期在华驻军具有了合法性。

日汪新条约，除上述两个文件外，还有《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秘密交换公文》等五个机密文件。这些不公开的文件，更广泛、更具体地规定了日本应得的各种权益。《附属秘密协约》规定："日本国应将必要的舰艇部队驻扎于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和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有关地点，日本国的舰艇得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港湾水域自由出入、停泊"；"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允诺，两国紧密合作，筹划开发厦门和海南岛附件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需的资源"；"关于上述资源的利用……特别应满足日本国防上的要求"。双方在《附属秘密协定》中约定，"进行以相互合作为基础的外交，在对第三国的关系上，不采取与此相违反的一切措施"；"对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重要港湾和水路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应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秘密交换公文》更以通信方式，对蒙疆、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具体问题达成谅解，汪精卫再次向日本保证："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完成战争行为的目的，应积极予以合作。"[180]

缔约当天，汪精卫接见中外记者，声称："中日关系，因此获得纪元一新，已为中日两大民族开辟一线光明之路"；"两国之国交方针，对共存共荣，共亡共辱，已趋一致"。因此双方在军事、经济、

文化各方面携手合作，不但可能，而且很有必要。他在谈话中还颠倒黑白，胡说日本侵华是由中国抗日引起的，“此全系重庆方面应受之罪过”，并称自己的行动符合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理念[181]。

日本当局对日汪《基本关系条约》之签订亦极为重视。日本政府于签约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本条约之意义，厥在明示中日两国政府于全世界新旧秩序相互交流之一大混乱期，站在人类相爱立场上维护天赋之本分，为建设有无相通、共存共荣之世界新秩序之先遣。东亚民族之欣慰，莫过于此。”[182] 直接来华签约的阿部大使也发表谈话，强调缔约后，日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无二之正统政府，此后两国政府间关系趋于正常化”，对于该政府，日本“拟不惜予以全幅之援助”[183]。日军西尾寿造总司令也于同日发表谈话，称赞条约“意义重大”；同时又强调“达到伟大理想的前进途中，障碍也多，一切都要依靠三国的合作来打通道路”；“在这里应分清平时战时的观念，正确运用平时、战时的原则。特别是在现地，应当密切日华两国间的互相合作，为达成共同目的而努力”[184]。

汪伪政府得到其日本主子正式“承认”之后，试图扩展其国际承认空间。日本政府也帮助游说德、意轴心国及仆从国。但是，直至1941年6月30日和7月1日，意大利与德国才相继承认汪伪政府[185]。7月1日，罗马尼亚政府为了“与德、意政府一致行动起见”，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186]。此后，西班牙、法国维希政府等也宣布承认汪伪政府[187]。而美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则始终坚持承认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拒绝承认汪伪政府。

第三节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一　日汪“清乡”运动

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侵华日军虽侵占了华北、华东与华南的大片领土，但这些地方并不安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日军占领区，展开敌后游击战，广大爱国民众也奋起进行各种反抗斗争。活跃于城乡各地的抗日武装，迫使控制占领区的日伪军步步退缩，仅能控制一些城镇及主要交通干线。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被迫把主要兵力转向占领区，以“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188]，华北日伪当局反复进行“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运动”。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日本占领区内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又是汪伪政府的政治活动中心。日本中国派遣军为巩固对华中占领区的统治，在汪伪政府开张后不久即策动汪精卫等人，推行了以“清乡”为名的殖民主义活动。

推行“清乡”运动，是日本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后，从国外获取的重要物资急遽减少。为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内阁于1940年11月8日决定了《对华经济紧急对策》，强调要全面控制中国经济，“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的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以此，期待帝国的国防经济力量特别是综合战斗力的迅速提高”[189]。五天后，日本御前会议又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对中国占领区的政治和经济提出了更多要求。

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1941年1月，日本总军制定《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对如何贯彻政府方针做出具体部署。《概要》决定：为实现政府的目标，“特别要加强对敌占区的封锁”，“有效而合理地截断占领区和敌占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划出重要地区，促进占领区的治安整顿，谋求充实我国防资源，同时，谋取民心安定，扶植新政府的实力，渗透其政治力量，以便使之对我战争的进行与事变的处理进行策应与协助”。其实施要领是：“在政略战略上的要地，军队的给养及我方取得国防资源的产地……应确立高度治安，确保它们相互之间的连络线”；“为此，首先从处于长江下游的小块地方开

始，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各种状况，逐渐扩大之”[190]。依照上述原则，日本总军有关部门与汪伪政府官员反复会商，决定将确立“高度治安”的行动称为“清乡工作”，由当地日军与汪伪政府共同实施，并由汪伪政府出面组织。

日伪当局为什么要在华中地区实施比“治安强化”更为复杂的“清乡运动”？这是根据日本在相持阶段的侵华战略决定的。

首先，华中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企图通过“清乡”，把它变成进行“大东亚战争”的一个后方基地。日本划定的华中地区，北至陇海铁路，南跨长江三角洲，西起汉水，东临黄海与东海，包括苏、浙、皖三省及赣、鄂、豫三省之部分，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徐州、南昌等城市及战略要点都在其内。这一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日军虽控制该地区多年，统治仍很不稳固。1938年以来，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这里蓬勃发展起来。日军虽进行过频繁扫荡，但犹如泼油灭火，游击战争更成燎原之势。单纯的“扫荡”难于奏效，于是只能改用“清乡”这一招。

其次，华中沦陷区是汪伪政府的内宅重地，日本当局企图以“清乡”来强化汪政府的统治，引诱蒋介石投降。汪伪政府的建立，表面上实现了南北伪政权的统一，实际上依然是貌合神离，各自为政。伪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不过是原“维新政府”的领地，即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而已。日军发动“清乡”后，提出“强化育成国府”的口号，把汪伪政府扶到台前，在形式上给予更多的独立权能，除武力“扫荡”外，行政、治安、财政、文教等，日军都装出“协助”姿态。日军处处使汪伪当局以“独立”政府的姿态出现，并要求树立“和平模范区”，其真实意图是要给蒋介石集团树立一个“模范”，引诱他们步汪精卫的后尘。

第三，更多地搜括战略物资和掠夺经济资源。当时，江苏的棉花

产量居全国第一；皖中与湘汉平原的米粮生产冠于全国，素有中国谷仓之称；江浙一带集中了大量的近代企业，上海更是工商业的中心。日军占领华中后，到处贪得无厌地掠夺财物。但是，“新四军的抗战，大大破坏了敌掠夺计划。加上日寇处于战争危机，经济恐慌、资源枯竭、粮食缺乏的极端危急状况，加紧对江南的搜括是必然的，而清乡则是'确保占领区'保障掠夺财物的手段”[191]。在汪伪政府看来，实施“清乡”即是为大东亚战争开拓资源。汪精卫说：“努力于清乡，就是努力于大东亚战争之一种重要工作，保障治安，以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增加生产，以培养大东亚战争的资源。”[192] 所谓培养资源，就是更多地劫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输血”。此外，实施“清乡”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汪伪政府成立后，其财政完全依附于日本。当时开办费没有着落，由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从保管的上海海关的关税款中，以借款形式通融4000万元，予以解决[193]。因此，汪精卫集团也希望通过“清乡”，将自己的统治权力向社会下层渗透，以便更多地在统治区进行搜括，改善自身经济困境。

根据侵华日军的要求，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3月24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内政部长陈群、工商部长梅思平、参谋总长杨揆一等十四名各部委长官任委员。根据日本军事顾问团提议，由汪伪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并代行会务[194]。清乡委员会在汪伪政府中与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并列，占有很高的地位。对于清乡区内的军政事宜，清乡委员会有权“制定法规、发布命令”，并“咨商行政院暨军事委员会分别执行之”[195]。

侵华日军对“清乡工作”寄予很大希望，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示有关人员，迅速研究对汪政府进行军事协力，增强其财力、武力之方案。4月3日，日本总军拟出《第一次军事协力施策要领》，强调：“在对敌进行的经济战及安定民生所需条件的限度内，6月以后，设法使国民政府增加收入，以巩固其财政基础，同时在军事协力

上使其分担部分军费。”[196] 其后又陆续拟出关于“政略指导”、“调整物资流通”等一批方案。

从4月14日开始，汪伪清乡委员会在一个月内连续召开八次筹备谈话会。出席者除清乡委员会正、副秘书长、各处处长及部门负责人外，汪伪警政部与特工总部也派要员参加。日方军事顾问则每会必到，直接指挥。根据日本总军的意旨，会议确定了“清乡”目标：一、“确立治安”，即确立日汪在占领区内的统治；二、改善经济，即进一步加紧对占领区民众的掠夺。鉴于以往在华中的“扫荡清剿”和在华北在“治安肃正”屡遭失败的情况，会议决定在“清乡”中采用新的策略。李士群提出，“清乡”要“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由城而乡，遍及全区”。日本顾问晴气也强调：“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197]。谈话会还讨论和确定了实施“清乡”的各种手段和方法，他们把日本曾在朝鲜，中国台湾、东北和华北实行过的各种殖民统治手段与方法统统搬了出来，诸如“扫荡清剿”、“封锁交通”、“政治宣抚”、“物资统制”，等等。为推行这一整套法西斯措施，会议决定在清乡委员会之下再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与专职机构。

根据清乡的目标与方针，日伪双方还秘密制定了具体实施步骤。第一步是“军事清乡”。具体办法是实行分区肃清，“一区肃清后将军队向第二区线内移动，第一区线内改调保安警察接防”；第二步是“维持治安”。“在封锁线内从事收编游兵股匪，抚缉流亡离散”，对抗日军民“设法感化，令其诚服来归，为政府效命”；第三步是“整理建设”。“严整保甲编制，整顿农村生产，推动教育发展，加强党务活动，以及训练民众，扩大宣传，调整交通，调剂金融，等等”[198]。

要推行这一套维持占领区稳定的总体方案，首要条件是拥有足够数量的军队。然而此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已捉襟见肘，汪伪政府能用于“清乡”的“兵力有限”。因此，“清乡”计划只能先在“局部实施”。“清乡”筹备期间，汪精卫曾提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一

个示范性的实验区，先把力量集中在这里试搞一下。因为这个地区最易看出成绩，日本人对这条线也很重视；特别是可以减少南京所遭受的威胁。”[199] 于是，清乡委员会决定，先将京沪铁路沿线以北之太仓、昆山、常熟、吴县、无锡、江阴、常州、丹阳、镇江、扬中等十县划为第一期清乡地区[200]。

基本方案确定后，汪精卫即于5月11日公开发表谈话，正式宣布成立“清乡委员会”。此后。汪伪政府又不断发布各种“清乡”法规，日汪合作的“清乡”运动开始启动。6月10日，汪伪当局在南京召开“清乡”区行政会议，划定“清乡”区域，对实施“清乡”的各项活动作了具体部署。6月18日，李士群与侵驻该地的日本第十三军（登集团军）参谋长秘密签订《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对“清乡”期间军队调度等问题达成谅解事项。协定规定：登集团军司令官为日方“清乡”的最高指挥官，中国方面最高负责者为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清乡”期间，日本军队主要担任“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中国方面主要担任政治工作”；中国方面用于“清乡”的军队、警察及其他武装，“受登集团司令官之指挥”，或受当地日军调遣[201]。

根据该秘密协议，日本总军加强了原先已在苏州设立的“清乡”指挥部，以便严格控制“清乡”运动之展开。曾在汪伪清乡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汪曼云这样回忆说：“伪军事顾问部也设立了‘出张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日寇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名义上它是作‘驻苏州办事处’与日寇‘清乡指挥部’之间的联系工作的，实际上却是按照‘清乡指挥部’的意旨，牵着李士群的鼻子跑。”[202]

日汪的“清乡”运动，从开始发动到最后破产，全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乡”发动至1942年夏季以前在苏南地区的“清乡”。该阶段又可分为三期：1941年7月至9月在江苏吴县、昆山等四县进行的“清乡”为第一期。7月1日，日伪合伙，共调集15000余兵力，攻

击新四军苏常太游击根据地。由于新四军缺少反“清乡”斗争经验，在给日伪军沉重打击后，被迫撤出该根据地。同年9月至12月为第二期。其“清乡”重点移到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部分地区。抗日军民汲取了第一阶段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用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方针，基本达到了隐蔽坚持的目的。1942年2月至6月为第三期。主要在沪宁铁路南侧及江阴、武进两县部分地区进行。该年年初，伪江苏省政府改组，李士群兼伪省主席，“清乡”改由伪省府统一掌管。他们对“清乡”区实施广泛而严密的封锁，推行了种种罪恶措施，但仍遭到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

第二阶段是从1942年夏至1943年春，着重在太湖东南地区和上海郊区进行“清乡”，同时也在苏淮特别区开始“清乡”。

第三阶段从1943年春至1944年初，重点置于镇江地区和苏北地区，同时也在浙江杭州地区和余姚实施“清乡”。第四阶段从1944年初至1945年夏，“清乡”规模日益缩小，最后彻底失败。

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清乡”运动中，日伪当局采用各种法西斯手段，给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清乡”发动之初，汪精卫即强调“清乡”之目的是为了“确立治安，改善经济”；后来又一再鼓吹，“清乡的意义，不只在确立治安，尤其要改善民生”[203]。不久，又提出“思想清乡”的要求，到第三年，更大弹其“清乡必先清心”的滥调[204]，把“思想战”抬到重要地位。日伪的“清乡”，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扫荡，它同时具有所谓“总体战”的特点，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军事则是整个运动的支柱。其手段主要有如下几项：

第一，军事“清乡”。“清乡”运动，首先是一个残暴的军事扫荡运动。军事“清乡”是各地“清乡”的第一步。日伪当局首先调集优势兵力，在“清乡”区周围增设大量据点，构成大面积包围；然后深入到包围圈内，以强大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反抗进军之村庄，实

行大烧大杀，警一以戒百”[205]。接着又构筑封锁网，实施“封锁政策”。在“清乡”区边缘构筑长达数十公里的封锁篱笆，在“清乡”区内的据点之间，也用竹篱笆、铁丝网等构成小块封锁圈，以便分区搜剿。在封锁线的各交通路口，设置检问所，对过往人员进行严格搜查。其封锁法规定，凡民众通过封锁线，“须领有各种证明书”；凡运输物资，“须申请发给搬出入证”[206]。各种证件名目繁多，如“良民证”、“渔民证”、“旅行证”、“归乡证”、“身份证”、“特别通行证”等等，其限制之严格，将人民的基本权利剥夺殆尽。

第二，政治“清乡”。这是军事“清乡”后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巩固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政治“清乡”的首要内容是根据各地治安形势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编组保甲。对于军事扫荡甫告结束的“清乡区”，“以宣传招抚赈济及组织指定队，搜捕零匪及匪物等项为主要工作”；对已完成封锁的“自卫区”，“以严密布置岗哨，编查保甲户口，搜捕零匪，构筑碉堡，整理交通道路等项为主要工作”；对已建立保甲组织的所谓“保甲区”，则“对于保甲组织应切实进行整理”。他们把强化保甲，作为确立治安的主要工作：“清乡区自收复后应于二十日内促进为自卫区，自卫区应于一个月内促进为保甲区。保甲区无论已进至如何程度，应于两个月一律组织完成。”[207]其次是举办壮丁训练，编组“自卫团”、“爱乡会”等伪组织，强令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民众参加壮丁训练，将他们编入“自卫团”，并具“联保切结”，发现有抗日言行，即予镇压。与此同时，为强化“清乡”区内的地方政权，新建并加强了警察保安系统，健全特务情报网。这些罪恶活动，被称为“不流血的清乡”。

第三，经济“清乡”。“改善经济”，是汪伪标榜的“清乡两大宗旨之一”。汪精卫每次巡视“清乡”，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清乡”前后的人口比较；二、“清乡”前后的赋税收入比较。他把这两个问题作为“治安能否确立，民生是否改善的估计标准”[208]。显然，人口多可以增加掠夺的对象，赋税多即直接增加伪政府的财富。经济“清乡”的一项

重要政策是经济封锁，凡日伪当局认为“绝对禁运品”的物资，一律被禁止“在境内运输或运出运入”[209]。其根本目的是要切断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物资流通。通过增加赋税，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这是经济“清乡”的另一项重要政策。田赋被汪伪当局视为“最大之税源”，他们除提高税额外，还“督征旧欠”，即不顾因战祸而造成田园荒废的事实，强行收取自“八·一三”事变至“清乡”开始时未交清的田赋[210]。日伪当局对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捐税的勒索，也是骇人听闻的。他们以“整顿”为名，巧立名目，层层加码，明征暗抢，无所不用其极。江苏太仓等七县在“清乡”第一年，征收的营业税即较前一年增加十倍以上[211]。另外，日伪还在“清乡”地区设立所谓“合作社”，强迫民众出资入社，以合作之名行掠夺之实。如松江特别区强令民众入社，每户出资五元，一次就勒索了6000余元[212]。

第四，思想“清乡”。日伪不仅把“清乡”作为“政治战”和“经济战”，而且还作为一场思想战。汪精卫一再鼓吹“清乡先要清心”，要使人民在“心力”上“信仰和平运动”。周佛海也在代汪精卫主持“清乡”会议时强调：“清心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之扫荡，抑且为思想上之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213]他们空前增强了对“清乡”区民众的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军事扫荡过后，即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清乡宣传”。紧接着再进行“清乡特种教育”，他们自己的解释是，“特种教育……即是感化特殊区域民众的教育”[214]。其目的是“宣传和平反共建国之理论，增强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之信仰”[215]。加强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是思想“清乡”又一个重点目标。为此，他们成立了“清乡区青少年队”，采用诱骗与强制手段迫使青少年参加，入队者奉汪精卫为“最高领袖”，鼓吹学习“武士道精神”，“奉行领袖之意志”，摈弃“共产主义的诱惑”，“为反共和平建国而奋斗”[216]。

纵观日、汪“清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华中、华南占领区的部分地方推行的一种总体性的

侵略镇压措施。然而，不管日、汪当局如何煞费苦心，接连不断的“清乡”运动不仅未能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相反却使这些地区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

二　伪满洲国的殖民地政治与文化

伪满洲国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第一个伪政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通过武力大量侵占中国领土，企图把新占领区视作满洲国第二以便实施长久统治。1937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明确提出：“解决华北问题的目标，在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217] 与此同时，它又把伪满洲国作为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的重要基地。为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维持伪满洲国的稳定，日本政府通过关东军加紧在该地区实施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日本顾问对伪满洲国各级机构的控制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思想文化上，日军则进一步贯彻以亲日反共为中心的奴化宣传。

关东军是日本控制中国东北占领区的总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它为了欺骗沦陷区内的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炮制出伪满洲国，让晚清末代废帝溥仪出面当傀儡。日本内阁在溥仪上台之际即制订《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与满蒙新国家成立相应之对外关系处理要纲》等文件，明确规定伪满洲国“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为了贯彻帝国有关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制机关”；“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218]。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控制，首先是控制溥仪。按照伪满组织法，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大权，还能统帅三军，颁布“紧急训令”，有权大赦、特赦。实际上，这些权力并不属于溥仪，而是归关东军所有。关东军曾在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的文件中，这样阐述日满之间的关系：“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

条件。”“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满洲国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219]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元首溥仪的控制，主要采用“内部指导”的方式。表面上，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但他的一切活动必须听从关东军的摆布，关东军的意见通过设在皇帝身边的常驻代表转达。陆军中佐吉冈安直曾连任十年代表，直到日本战败为止。他因控制溥仪有功，官阶跃升至陆军中将，但在关东军司令部开始时只挂了参谋头衔。至1940年，才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专用头衔。从外表看，吉冈对溥仪及其家眷照料甚殷，但遇到重大问题时却骤然变脸，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迫使溥仪服从自己的意见。溥仪曾这样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220]。

伪满洲国政府各部门大权，更完全由日本人操纵。早在1933年8月，日本内阁即制订如下指导方针：“对满洲国的指导，按照现在的体制，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进行。”[221] 根据此方针，关东军一开始即向伪满政府派遣了大批官吏，控制国务院总务厅等重要部门。国务院各部，原设置总务司，由日本人任司长。1937年实行机构改革，各部撤销总务司，改设官房，同时在各部大臣之下设置日本人次长。从此，日籍次长一手包揽各部重大事务。按照惯例，伪满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审议重要国务。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摆样子的会议，真正的“国务”全由日本人决定。日籍总务厅长官于每星期二召开各部日籍次长参加的定期会议，通常被称为“火曜会”，有时关东军参谋部也派员参加。这个会议因反映了关东军的意见，所以各项决定都是伪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上作出的决定，有的拿到国务会议上过个场，有的则直接交有关部门执行。

对于伪满洲国的地方机构，关东军同样采用委派日本人官吏的办法进行控制。各省设置总务厅，县级设参事官和指导官，这些官员全由日本人担任。从1937年年底开始，各省设次长，县设副县长，以同中央官制的改革相一致。为对中国东北占领区实行长期而有效的统治，关东军还采用分而治之的方针，具体做法是把原有的省分割成几个小省，以削弱地方势力。另外，还把原东北四省境内的蒙古盟旗单独划出，以兴安岭这个山脉为名，分成东、西、南、北四省。至1941年，伪满全境竟设置了18个省、17个都市[(222)]。

为维持占领区的统治，关东军还通过伪满政府，不断增强军警宪特的力量，以配合自身对中国民众实施的残酷镇压。伪满洲国建立之初，日本曾在《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中确定，伪满军的总兵力不超过6万人。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关东军兵力大量被调用，内部日益空虚，于是大量扩充伪满军队以填补空缺。1940年4月，伪满洲国公布《国兵法》，把原来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规定新兵从年满19岁的青年中征集，服役期限三年。从此，伪满军的兵力迅速增加，至1945年日本战败时已达15万人，大大超出原先规定。伪满的宪兵从1934年设立后也迅速扩大，1937年改编成宪兵总团，人数超过2000名。

为对统治区民众实施法西斯高压统治，在关东军直接策划下，伪满洲国设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伪满民政部设立警务司，各省设警察厅，各县设警务局，基层有警察署和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这套机构，全部由日本人控制。1937年底，根据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的需要，警务司划归治安部管辖，警察承担的任务也扩大至配合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伪满的警察，根据不同需要，可分为许多种类：如保安警察，以对付抗日游击队的武装反抗为主，配有强大火力；特务警察，以对付中共地下抗日宣传为主，强调研究侦破的策略；经济警察，以保护各种物资和资源为主，会同经济部门，设立各种关卡，查处经济案件[(223)]。

日满军警机关除对伪满境内爱国民众实施血腥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在政治上进行各种迫害。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恶化，这种迫害也日益加剧。1941年12月，伪满政府颁布《治安维持法》，其中规定：凡以变革国体为目的之团体的组织者、参与者、指挥者，以否定国体或从事可能有损建国神庙及帝室尊严事情为目的之团体的组织者、谋划者、指导者等，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224]。该法规严厉而又空泛，致使大批无辜民众惨遭酷刑或被杀害。1943年又颁布《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两项法规。前者规定，可以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矫正辅导院”，一面进行“精神训练”，一面强制服劳役。后者规定，对可能犯有政治罪的人，实行“预防拘禁”，同时也施以劳役[225]。根据这两项“莫须有”的法令，日满军警可以任意给普通民众戴上一顶“有犯罪可能”的帽子，然后把他投入监狱。

除利用国家机器对占领区民众实行高压统治之外，日满当局还将法西斯组织“协和会”当作殖民统治的另一个工具。“协和会”于1932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名誉顾问。“协和会”的前身是满洲青年联盟雄峰会。该组织骨干是活跃在东北地区的一小撮日本法西斯分子，其中大部分是满铁成员，他们是网罗汉奸、制造伪满洲国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后，专门在占领区内拼凑县一级伪政权的所谓自治指导部，主要就由这批人组成。伪满洲国成立后，自治指导部的部分成员进入各级政权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则开始筹划建立“统一国民思想，进行思想战的全满统一的国民组织”。几经商议，决定成立满洲国协和会。这是一个御用机构，活动费用全部由伪满洲国政府提供，总部亦设在伪满国务院内。“协和会”的组织机构分为中央事务局、地方事务局和办事处三级。该组织的势力迅速向各地渗透，会员也日益增多，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在县、旗、市所设的本部机关有几百个，分会有2700余，会员总数达到80万。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该会一面继续扩充势力，同时紧密配合日本国策，大力宣传所谓“圣战之真实意义”，发起各种运动[226]。

关于该会的性质和作用，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曾这样评介："协和会作为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国家团体，它无限地维护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努力实现其理想，以便成为唯一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组织。……因此，协和会既非政府的附属机构，也非与之对立的机构，而是政府的精神母体。满洲国政府作为以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组成的机关，其官吏应当是协和会精神最高最热烈的体现者。"[227] 关东军将它视作与伪满政府并列的机关，可见"协和会"在辅佐关东军实行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

"协和会"的骨干是一批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是协助日伪军警进行大屠杀的别动队。起初它配合关东军围剿抗日武装，以后逐步把反共作为工作重点。"协和会"中央本部专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排除共产党力量作为"国民运动"来进行。它利用一切机会，采用讲演、办讲习所、放电影等各种形式，进行反共和奴化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各类物资紧缺，"协和会"即配合伪满政府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他们开展所谓"农业增产出荷运动"，以对农民进行掠夺；开展"矿山增产运动"，强迫工人超负荷劳动；开展"国民储蓄运动"，以榨取民众的每一分钱财；开展"勤劳奉仕运动"，强迫学生与青年从事无偿的劳动。

"协和会"还对占领区内广大青年的思想进行严格控制。1937年初，伪满政府发布《青年训练规定》，并决定由"协和会"具体组织实施。此后，"协和会"在48个县开设了青年训练所，分期对6000余名16至19岁的青少年进行训练。训练内容除军事操练外，还进行有关保甲制度及课税方面的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根据日本侵华战略的需要，"协和会"又组织他们开展"爱国运动"、"消费节约运动"、"非常时期报国运动"等活动[228]。显然，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一批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新生力量。

1938年8月，"协和会"本部机关进行大规模改组，增设实践部和辅导部，以对新设立的联合协议会和协和青少年团进行领导和训练。

所谓联合协议会，乃是在“协和会”之中设立的由官方与民间各系统代表联合组成的团体，其目标是实行官民一体，“宣德达情”，消除双方的对立，超越职业和民族差别，共同商讨协和会自身发展，并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联合协议会于同年3、4月份开始在部分县、市筹建，以后迅速扩展到全满各地，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省联合协议会，青少年团也于同时建成[229]。从此，“协和会”通过这样两个下属组织，尽力把伪满全境的民众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满当局对统治区内广大民众的控制与奴役也日益加深。“协和会”除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与行动之外，还策划组织协和奉公队，强迫20至35岁的青壮年发扬“义勇奉公”精神，担任平战两时“国民的警护”，强令当地青年承担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劳动服务等无偿工作。这类组织，很快遍布大小城镇，逐步替代当地的自卫团。1941年3月，“协和会”特设义勇奉公队中央总监部，由关东军参谋长和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任总监，省和县也建立相应的下属机构。从此，全满30多万奉公队员，分别被编入基本组织和特殊组织之中，成为关东军的附属部队和后勤服务队[230]。以后，“协和会”又进一步设置了“满洲国防妇女会”、“军人后援会”、“满洲红十字会”、“兴农合作社”、“劳务兴国会”、“商工公会”等外围组织，将各行业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大力推行殖民地文化，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占领区实施殖民统治的又一显著特点。早在伪满洲国刚成立之时，关东军即在伪满政府中专门设立思想统制机构——弘报处，其主要职能有三项：一是“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二是“涵养民力，善导民心”；三是“普及自治思想”[231]。其后，弘报处改隶国务院总务厅，并大量派遣“宣抚人员”，跟随关东军的讨伐队去各地活动，充当其别动队。“七七”事变爆发后，弘报处进行扩充，其任务也扩展为控制舆论、文艺、宣传资料、新闻机关等七项，实际上已包揽文化宣传的各个方面。1939年与1941年，弘报处又经过两次调整扩充，管辖权限更为扩大。处内设

置监理、宣传、情报三科，分别掌理文化机关的监督、文化宣传的审查和各种情报的收集。如宣传审查，即涉及报刊通讯、电影制作和放映、电台广播、对外宣传、旅游观光、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各个方面[232]。至此，弘报处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伪满文化宣传的核心统制机关。

对统治区内中国民众实施奴化教育，也是日本关东军推行殖民地文化的重要方面。日军侵占东北各地后，先是查封所有公立学校，然后重新组建由日本人任校长、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私立学校也必须经过严密审查，符合日方要求后方可开学。根据日满当局发布的“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的命令[233]，大批原有的教材被废止或焚毁。同时，日满当局又任命教材编审官，组织人员，重新编写教科书。伪满政府先后出版了供小学和初中学生使用的“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供各类中等学校使用的“审定教科书”23种29册。这批新教材中，充满了“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等奴化宣传。

1937年开始，日满当局宣布实行所谓新学制。该学制的小学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的初小改称“国民学校”，后两年的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学则把原来六年缩短为四年，并改称“国民高等学校”，这就使中学教育的文化水准大为降低。高等教育也从通常的四年缩短为三年。这样，伪满的学制总共为十三年，比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五年。不仅如此，这套新学制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殖民主义思想教育，在政治上对学生进行严格控制：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必须赞颂“日满亲善”与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必须尽心竭力地拥护“大东亚圣战”。每天早晨上课前，学生必须集体用汉语和日语背诵《国民训》，并向皇宫遥拜。至于伪满皇帝发布的诏书等重要文书，更是强迫学生全文背诵。小学有一门“国民科”的课程，把殖民主义政治和语文混合在一起，占据全部课时的一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开设了一门“建国精神”课，以取

代地理和历史课。所谓“建国精神”，主要是宣扬“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等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伪民政部教育司对此解释说：“从低年级起，即选择与亲近日本之感情的材料，渐次趋向至日本之国体精神。”[234] 中学则把进行政治宣传的“国民道德”作为主课，后来改名为“建国精神”。该课程的内容全部是宣扬“日满亲善”等殖民主义理论说教。

在新学制中，日语教学被摆在突出的地位。从小学开始即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其授课时间与汉语文课大致相等。到中学以后，日语课程不断增加，几乎超过汉语文课一倍。新学制把日语定为“国语”，伪满政府亦把它列为“公用语”，要求人人都会说，一切正式公文都用日语表述。其后又规定了日语“检定制度”，以确定学生的日语等级。伪满教育官员强调：“学习日本语的究极目的，当然在于理解日本精神”；因为“在日本语中，是蕴蓄着日本自肇国以来日本的思考和感动的，由此日本的思考和感动作为一体的育成，始能得理解日本精神的真髓。”[235] 这显然是要通过学习日语，培植青少年学生的奴隶意识。

在抓紧推行奴化教育的同时，日满当局对文化艺术界的管制也不断增强。日满当局对新闻出版业一开始即相当重视，对其实行严格“统制”。报纸、杂志必须经弘报处审查才能出版，其他出版物也要经过多道审查手续。1939年伪满政府设立书籍发行公司后，即垄断了图书发行和进出口业务，弘报处对报刊的审查也变本加厉。如1939年度发行的113中报纸中，有16种被勒令停刊，263种杂志中也有28种未通过审查[236]。同样。电影业也极受当局重视。1937年伪满政府先后发布《满洲电影协会法》和《满洲电影法》，对统治区内的电影制作和放映实行严格管制。为向广大民众灌输奴化思想，日满当局于1939年策划制作长达37卷的新闻系列片，其中主要有“建国史篇”、“协和会篇”、“国军篇”、“警察篇”、“内治篇”、“拓植篇”等等，另外还引进了不少德、意两国法西斯主义教育电影[237]。对音乐、

美术、戏剧方面的统制同样十分严厉。

1941年3月，弘报处提出《文艺指导纲要》，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推行殖民地文艺的本质："我国艺文以建国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紘一宇之伟大精神的美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238] 根据此《纲要》，日满当局拼凑适应日本侵略战争需要的文艺组织，同时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各地文艺组织普遍被改组，同时又建立了直接受弘报处控制的"文艺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剧团协会"、"乐团协会"等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类行业性团体更多如牛毛，而且大都由日本人主持，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

三　华北、华中沦陷区的政治与文化

如何对中国占领区实行长久的殖民统治，这是日本侵略者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军事占领之初，它采用扶植傀儡政府出面安抚民众，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办法。汪精卫集团投敌后，为瓦解抗日阵线，引诱抗日营垒中的动摇分子，它又同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伪政权，与重庆抗日政府相对抗。表面上看，汪伪国民政府把各派汉奸势力都收归其麾下，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由于各汉奸集团之间充满矛盾，加之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汪伪政府的政令仅能在长江流域的狭小区域内施行。其他各地的汉奸集团，则在当地日军的支持下我行我素，根本不买汪精卫的账。以德王为首的蒙疆伪政权，一开始即表示不加入的态度；华北"临时政府"虽被迫改名，但新设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依然是个"独立王国"。这种行政管理上的割据状态，导致整个沦陷区在政治统治上具有不一致，其文化上也显现出多样性特征。

华北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最先沦陷的地区，那里也最早建立起号称为全国性的伪政权。汪精卫在筹组伪中央政府之初，即想方设法要把华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想法遭到华北日军和以王克敏为首的

临时政府的共同抵制。经日本政府调和，双方各作让步：华北“临时政府”同意撤销原政府名称，归入汪伪政府治下；汪精卫方面也承认“华北地方情形特殊”，同意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实行“自治”[239]。所谓自治，其实就是让华北保持原有的政治形态，汪精卫的势力不向华北地区扩展。

伪中央政府成立前夕，汪伪中央政治会议于1940年3月22日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对华北当局拥有的权限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此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拥有极大的自治行政权。首先，该机关的地位非常高，直属国民政府主席领导，与行政院相并列。其次，其管辖的地域很大，领有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直辖市。第三，拥有广泛权力。政务委员会下设内务、财政、治安、教育、实业、建设六个总署及政务、秘书二厅，负责处理辖区内行政、财政、治安、实业等各方面的事务，而且还拥有一支独立的绥靖军[240]。这些规定，实际上是汪精卫对华北当局作出的最大让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还都”庆典时，王克敏等“临时政府”首脑于当日上午10时举行末次会议，发布解散“临时政府”宣言，降下五色旗帜，换上加有黄飘带的青天白日旗，接着宣布召开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委员长王克敏及各委员、总署督办宣誓就职，宣告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241]。经过这样一番形同儿戏的做作之后，华北伪政权也算并入汪伪政府的治下了。

华北伪政权之所以敢与汪精卫分庭抗礼，是因为获得了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支持。华北方面军在军事行动方面虽受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但对于政务方面，则受陆军大臣直接领导。根据日本《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第九条规定的行政监察权，方面军司令官可以“统治监督占领区内的行政”[242]。据此，华北方面军把华北伪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为对华北伪政权实施有效控制，该方面军参谋部第四科专门承担了相关工作。此外，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本部及所属各省、

各特别市政府内，都设有顾问部，由该军派遣的最高顾问、顾问、顾问辅佐官进行幕后指挥。顾问部名义上协助中国方面开展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实际却是凌驾于各级伪政权头上的太上皇。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最高顾问为预备役陆军中将佐藤三郎。除顾问外，方面军司令官还推荐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教授、教官、教导员进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府机关任职，以进行更为具体的监督控制。

华北方面军除在总体上监督华北全部行政外，还直接担任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个特别市的政务“指导”。山西、山东、河南各省，则分别由第一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团担任“指导”，具体业务由派驻各处的特务机关负责。对于道以下政府机关的行政指导，则由各地日军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派遣道、县联络员，对道、县公署进行幕后指挥[243]。

在华北日军的严密控制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切活动当然严格按照日本的侵华战略进行。其施政方针是：“遵循兴亚之大道，以努力东亚新秩序之完成，而求华北政治之日臻明朗化。”[244]为维持华北占领区的稳定，内务总署着手整顿地方行政，确定各级政府施政纲要，调整行政区域，实施保甲制度。治安总署则编组县警备队和警察所，设立各种训练所，开办警官学校，培养警察干部；招收新兵，创设军官学校，充实治安军之实力[245]。华北伪军早在1938年即开始筹建，以齐燮元为总司令，其骨干多为他的老同学、老部下和同乡。1939年10月，“治安军”正式建成，编成三个集团军与两个独立团，额定兵力约15000人。华北日军在治安军内设有顾问和教官。治安军从建立之初即同日军混合部署，以协助日军作战。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由齐燮元担任治安总署督办兼治安军总司令，统辖华北伪军与警察[246]。同年11月，治安军进行大规模扩充，兵力增加一倍以上。治安军不仅在组织上自成体系，不受南京汪伪政府军事机构管辖，在军队内部建制和服饰等方面也与汪伪军队完全不同。1943年治安军改

名为“绥靖军”，服饰也作了更换，但仍在上衣左上口袋盖上戴一枚五色徽章，以示与汪伪军队有所区别[247]。

为欺骗民众，维持在华北占领区的统治，日伪当局还仿照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了一个号称“中华民国新民会”的所谓群众团体。早在平、津两市刚陷落之际，日本即指派伪满洲国外交大臣、“协和会”主要头目张燕卿为筹备委员长，筹建新民会。当“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在北平粉墨登场时，新民会的筹建也告完成，并于同月24日宣告成立。当天发布的《宣言》称：“本会与新政权表里一体，首先拥护新政权，为反共战线之斗士；进而培养民力，实现友邻之共荣。”[248]其“行动纲领”第一条也强调：“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249]“新民会”成立之初仅有20余人，因其主要任务是为日伪当局摇旗呐喊，故活动经费得到临时政府的全额资助，规模也迅速扩展。1939年10月，“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担任会长后，“新民会”更成为华北伪政权手中的得力工具。汪伪政府建立后，“新民会”并未被汪伪国民党替代，其组织反而得到加强。华北日军先是任命安藤纪三郎中将任该会顾问，进而又宣布与军部宣抚班“统合为一”，对其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强化对统治区内部的控制。各级领导机构中，日方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双方的任务是：中方人员立于“第一线，与民众相接，而日系则由内部指导及协力”[250]。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日本“以华制华”的图谋。

华中沦陷区的政治统治与华北完全不同。早在汪伪政府筹备成立之际，汪精卫一再强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是新政府的两大目标[251]。他打着“以党治国”的旗号，沿用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对沦陷区民众实施欺骗。

伪政府在南京登场后，汪精卫等人一方面加紧与日本相勾结，争取尽早得到日本的承认，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又着手整顿地方秩序，扩充自身实力。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40年4月连续开会，对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作出决定：宣布国民政府“还都”以前的法令仍

然适用，以消除民间的思想波动；由国民政府下令，各地军队立即停战待命，以实现和平方针；令外交部根据政纲，着手调整外交事务[252]。此后，伪国民政府各院部委，开始按照各自的职权运作。在财政方面，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召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决议定名“中央储备银行”，于“双十节正式成立”，负责募集资金、整理旧币、发行新币等事务[253]。军事方面，改编维新政府留下的军队，收编陆续来投的新军队，迅速扩充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又新成立一个警卫师，专门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宣传方面，创办中央电报通讯社，统一对内外发表新闻。另外，还创设宣传讲习所，培训宣传干部，派往各地宣传机关服务。经过半年多努力，日本终于同汪政府正式签约。此后，汪伪当局认为和平建国之基础已成，开始把政治活动的重心转到“强化党权”、“确立治安”等方面。

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初，曾指责蒋介石搞独裁统治，借“以党治国”的名义垄断政治。所以，他在伪国民党六大上做出承诺：“还都”以后将实施宪政，以后又把它写入政纲中，并组织宪政实施委员会，以示能容纳各党各派共同参政。然而，汪精卫决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当汪伪政府的根基大致稳固后，他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一再强调“强化政治中心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培养政治的总力，“我们以为应该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中心，而联合其他各党各派，以共同负荷国家社会重任”。还说：“今日的世界，是拼命的世界，而今日的中国，又正在危急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候，既需要一种同心协力的精神，更需要一种能适合此精神，运用此精神的政治制度，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中心势力而共同负荷责任，我认为是比较最合理的。”在一次与日本记者论及实施宪政时，他又强调：“真正之宪政，需有强大之中心势力为之推动。”[254] 根据汪精卫的理论，同年12月汪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结集党的势力，来推动政治上对内对外工作，将人民思想，集中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大亚洲主义”[255]。在汪伪国民党的压制力下，“维新政府”时期成立的大民会、共和党以及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等三个团体宣布解散。从此，在汪

精卫集团控制的区域内，只有一个汪伪国民党。

汪伪国民党的“中心”地位确立后，汪精卫等人即致力于增强伪政权实力的各项工作。首先是大肆扩军，除陆军之外还建立海军，同时又成立航空署，计划购买飞机，筹建空军。接着又在苏南等重要地区实施“清乡”，以图确保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宁。为树立独立政府的形象，汪伪政府于1941年1月创设“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作为政府的法定货币。

从外表看，汪伪政府比其他伪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更多独立性，但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汪伪政府是在日本一手扶持下，并在日本占领区内建立起来的，因此日本政府决不允许它脱离自己控制而独立存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及一批附属秘密协定，是一根拴在汪伪集团脖子上的大铁链，他们只能在铁链的长度内，围着日本这个中心转。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日本军事顾问部，严密监视着汪伪政府的一举一动，“汪精卫有时到广州、北平、东京、长春等地方去，军事顾问必定同行”[256]。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在沦陷区建立傀儡政权，一开始就打着继承民国法统的旗号。为对沦陷区民众实施长久欺骗，他们上台以后，更加重视利用各种媒体，有计划地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

报刊、电台等近代媒体，一开始即为汪伪集团所重视。1939年7月，当“和平运动”公开发动之际，汪精卫集团即将停刊两年的《中华日报》在上海复刊，作为自己的喉舌。同年11月，又在上海设立“中华通讯社”。汪伪政府“还都”后，“中华通讯社”改称“中央电讯社”，并在辖区各地设立分社，同时大量创办各类报刊。仅南京地区就有《中报》、《南京新报》、《时代晚报》等十余种报纸，《中央导报》、《现代公论》、《大亚洲主义》等五十余种杂志。在上海则有《新申报》、《日本评论》等报刊二十余种。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及一些大中城市也有数量不等的新办报刊。为统一宣传口径，日伪当局对这

些舆论工具实行严格管制，规定所有报刊都必须接受日军报道部和汪伪宣传部的指导，根据其定期发布的宣传要点撰写文章，刊登指定的新闻稿件，接受其新闻检查。1940年10月，汪伪政府发布《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实施新闻检查由各新闻检查所会同当地军警机关一起进行，目的在于“防止破坏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之一切反动宣传”。凡有“企图倾覆政府危害民国”、“扰乱地方破坏金融破坏邦交”、“破坏公共安宁”等内容，以及通令禁止宣传的新闻稿件，一律删除。如有违反规定，轻者“警告”，重者“移送法院依法追究”[257]。

此外，日伪当局还利用图书、画报、电影、戏剧、歌曲等宣传手段，向沦陷区民众进行卖国主义理论宣传。如图书出版方面，汪伪宣传部不仅大量印制汪精卫等人的言论集，还出版通俗读物《大众丛书》等，分篇阐述其基本理论，以适应普通群众阅读。同时还组织人员编写教唱“和平”歌曲，派剧团巡回演出，派人去各地宣讲“为何要和平”，等等。

为表示中日友好，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40年7月成立“中日文化协会”。该会宗旨是：“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合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亚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258] 对于“中日文化沟通”之涵义，汪精卫在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应将排日思想”，“从根本上加以廓清”，“中日两国，必须在文化上，共同努力，使东洋文化，大放光明”[259]。汪政府的吹鼓手叶钧则更加露骨地称：中国文化“随时有遭遇覆亡的危机”，“中国民族文化的发达，必须与日本提携”，“在同一的旗帜下，应紧密团结起来”[260]。1941年2月，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时，“文化沟通”即成为该联盟四大纲领之一，同时也成为汪伪政府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

教育是文化领域中的重要阵地，汪伪集团对教育非常重视，他们一开始即注意控制教育机构，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早在1939年8月汪伪修订的国民党政纲中，即把教育方针修改为：“保持并发扬民族固

有之文化及道德，同时尽量吸收适于国情之外国文化”；“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贯彻睦邻政策之精神”。同时还强调要“改订教育制度，重编教材，以适于新中国建设”[261]。次年1月，汪精卫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称，将以确立中日永久和平及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262]。此后在“还都”时发布的伪国民政府政纲中更明确规定：“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263]

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华北、华中各沦陷区的大中小学教科书，早被日军强令修改，删除一切抗日、排日内容，改成亲日、媚日文字。但汪伪教育部仍不放心，再三嘱令所属机关对各类教科书严格审查，删除所谓不适用之内容。其删除原则是：“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反共，则凡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含有阶级斗争，或有足以引起阶级斗争的一切思想，皆当全部删除”，“又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和平，则凡各级学校教科书上，含有民族国家间仇恨，或足以引起将来的民族国家间的仇恨思想，亦当加以适当修正”[264]。1940年8月，汪伪教育部公布了从幼稚园开始的各类教科书审查表，并删除了一大批文章。同时，还通令各中小学每周必须对学生进行一小时“精神训话”，以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强令沦陷区内各学校学生学习日语，是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的又一重要手段。1940年7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致函汪精卫，要求教育部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宣称这是对日本表示亲善与真诚的“主要标志”[265]。对于日本的指令，汪精卫当然惟命是听，立即批示“照准”。于是汪伪教育部决定在初中以上学校开设日语课，并规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为扩大奴化教育的影响，汪伪教育机关还将学校教育扩展到社会与家庭。1940年8月，伪江苏教育厅制订《小学指导儿童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办法大纲》，要求各小学组织“和平运动推行委员会”，指定由校长教员和家长代表参加，校长任该会主席。其任务是：“规划学校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之具体方案”；“讨论学校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

之实际问题”。要求家长对学生不合于和平运动之行为，配合学校“予以纠正”，“以身作则，为儿童及各家庭表率”[266]。伪南京市教育局还要求社会教育机关对学校加强“和平运动”教学，强调各社教机关负责人，要“随时审察校内或馆内全体教职员工、学生之思想，并召集思想善导会议”，“矫正”教职员及学生思想[267]。显然，日伪沦陷区内各类学校，都已成为控制青少年思想的集中营。

四　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其主要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掠夺中国丰富的经济资源。伪满洲国是日本最早实施经济统制政策的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相继制定《满蒙开发方策案》与《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作为掠夺伪满经济的基本方针政策。1934年3月，日本内阁又进一步通过《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声称将“日满经济特别作为同一组织体”加以管理，并对满洲的金融、交通、通讯及其他事业予以适当统制[268]。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伪满地区各类产业的统制力度不断加大，并为此先后制定《重要产业统制法》与《产业统制法》。与之相呼应的是特殊会社制度的建立，即日本将其认为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统一由国营或特殊公司经营。1932年成立的伪满中央银行就是最早的特殊公司。至1941年7月，日本在伪满地区的特殊会社数量已达36家，涉及金融、交通、能源、矿产、机械、化工等多个产业[269]。同时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煤、铁等资源的掠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他们不惜杀鸡取卵，将一切人力、物力全部集中到采煤、炼钢作业上去，以满足其对资源的需求量。

对于紧邻伪满洲国的华北地区，日本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就企图使其“迅速成为反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区”，以“获取国防资源”[270]。日本陆军专门拟订了“由兴中公司经营，其他机关协助”的开发华北经济的计划[271]。随着侵华战争的日益扩大并转入长期化，日

本国内的经济资源逐步枯竭，日本军政当局的这一愿望更为迫切，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力图从华北占领区掠夺更多的战争物资及其他各种经济资源。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及周围地区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中国的纺织、面粉、矿山、制盐、纯碱等民族工业全部被强占。日军将武力抢夺到手的纺织、面粉等工业依托国内的垄断企业经营，煤矿、矿山、电力、钢铁、制盐、纯碱、铸造等部门则依托满铁出资创办的兴中公司经营[272]。强占中国现有工矿企业是日本对华北沦陷区掠夺的第一步，接着，它又制订所谓“资源开发计划”，以便对华北资源进行系统而长久的掠夺。

1937年9月，华北日军特务机关和日本满铁调查部联合制订《华北产业基本对策纲要草案》和《华北经济开发方策大纲草案》。上述对策纲要的方针是：“华北产业对策的根本，是以扩大日本的生产力所必要的资源的获得及必要程度的加工为目标，进行综合经营，以弥补日满经济的缺陷为目的。”上述方策大纲的宗旨则是：“依靠日本资本及技术的协助之华北经济开发，作为这次事变的善后处理，是赋予我国的重大使命。”华北经济开发，必须“贯注主要力量，获得日满经济区所缺少的重要矿产资源，确保经济根干的交通机关”。具体方案是，把日本资本参与的产业，分为“统制产业”和“自由产业”。统制产业应纳入日满的产业计划，并作为“国策会社”进行经营监理。统制产业的主要范围是：“重要矿山资源的开发”；“以上述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企业”；“盐田的开发及开发指导”；“主要发电送电事业”。其他产业原则上为自由企业，但也应进行适当统制[273]。

掠夺方案确定后，华北日军又进一步对可能掠夺的重要资源进行估算。他们先后制订《华北重要资源对日输出可能数量》及《华北资源所需数量设定委员会报告书》，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3月制订出《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这些文件坦然承认其动机是：“指出至昭和21年（1946年）的9年期间华北产业综合开发目标，在设想的基

础上，制订以日、满、华北为一体的重要资源，特别是铁、煤、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及棉花的需给计划。”[274]《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详尽地列出了各种重要资源的掠夺数量。其中，钢铁是日本最迫切需要的物资。他们计划把以龙烟铁矿为中心的钢铁产量从1938年的48.3万吨扩大到1946年的270万吨，同时规定每年要向日本出口大量铣铁和铁矿。煤炭亦是华北的重要资源，他们计划在当年产量1400万吨的基础上逐年提高，至1946年达到5000万吨，并向日本出口3000万吨。棉花的上市量，计划从当年的24.8万吨至1946年增加到54万吨，其中要向日本输出25.6万吨[275]。由此可见，日本对华北占领区重要资源的开发，是以率先满足日本国内需求为前提的。据统计，日本自1937年至1945年8月经营龙烟铁矿期间，共开采矿砂374万吨，冶炼生铁20695吨[276]。这些物资在维持日本侵略战争机器的运转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实施庞大的掠夺计划，华北日军逐步着手设立综合性的管理机构。军特务部与满铁调查机关共同拟订了组建新公司的方案，经反复磋商，最后报请日本政府同意，决定设立一个名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国策公司。该公司是日本榨取华北沦陷区各种经济资源的大本营，公司注册资本3.5亿日元，由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各出一半；必要时，可发行五倍于公司资本的债券，以筹集所需之资金。在总公司之下，根据“一业一社”的形式，设立若干子公司。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所负之使命，“为促进华北经济之开发，及对各项事业予以投资或融资，并进行综合调整之工作”。其中涉及交通、运输及港湾事业；通信事业；发送配电事业；矿产开发事业；盐之采取及利用事业以及其他促进华北经济开发及统合调整上之必要事业[277]。该公司拥有的特权主要包括：开业后十年内，免除全部所得税、营业税；五年内政府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民间分红未达年利6分时，政府不分红；债券本金及利息受政府保护。因此，华北开发公司实际处于日本“华北经济参谋本部”的特殊地位[278]，它前后共对30余个子公司进行了投资控股。

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除直接设立公司之外，还策动伪政权配合。1938年3月，在华北日军的策划下，日方与临时政府合作成立了“日华经济协议会”。该会由中日双方各派五名委员组成，“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担任会长。据日本同盟通讯社称：“日华经济协议会今后在日本军司令部及中国临时政府中间，本其广泛的权能，促进华北产业资源之综合的开发。”其运行方式为：“大体上每月举行定期总会一次，审议决定开发华北经济最高方针”；“按照经济产业各部门，置通货金融、商工业、矿业农业、交通等部委，使之拟订各专门事项之企图，交协议会附议”；“审议决定事项，交由日华两国各机关协力提携而实行之”；“临时政府为与该协议会保持联络协力，达到开发经济之目的，由行政委员会新设一实业部，协议会设置一秘书厅”[279]。其后，协议会的中日委员联合召开会议，确定开发华北的原则，以及“建立日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之最高方针”。双方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为谋日华亲善之实效，两国首先共同努力于农业之改良”，“农业改良，则棉花之生产增加，使由此所增加生产之棉花与其他农业资源，成为日本工业原料，向日输出”；二、“依上述同样之目的，为与治水、交通、通讯、港湾之修筑、金融之改善等事业相并进，即地下宝藏之矿产资源及其他各物，亦渐次开发”；三、“对于上举以外之事业，亦须避免日华经济相克”，“务须实现依日华合办组织之两国资本及经营上之提携”[280]。至此，华北沦陷区经济已完全纳入侵华日军所设置的轨道。之后，日本又通过设立日华贸易公司、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经济协议会等组织，对华北沦陷区实施经济掠夺。

日本占领华北后，还扶持伪临时政府设立所谓“中央银行”，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安定通货，统制金融为目的”[281]。“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名义上由伪临时政府行政部局长汪时璟任总裁，其实际权力却由日本顾问把持。该银行通过独占货币发行权、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统制汇兑、控制各类金融机关、榨取民间资本等手段[282]，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进行了长时间掠夺。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北地区

的粮食、棉花及农矿产品亦紧盯不放。以棉业为例，日本除尽一切手段控制华商纱厂、压榨剥削棉农棉商外，还专门组织华北棉花协会，运用资本力量统一收购棉花，强行垄断华北棉业市场[283]。

侵华日军对华中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最初采用了与华北大致相同的方式。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军政当局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发挥该政府的作用。日军在巩固占领区统治的同时，又抓紧掠夺各种资源，力争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以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

汪伪政府成立时，日本已经过近三年的侵华战争，国内各类重要物资几近枯竭，经济形势日益紧迫。德、意、日三国结盟后，日本在国际上越发孤立，美国对日禁运范围不断扩大，这导致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一面在国内加紧推行战时体制，将全体国民绑到对外侵略的战车上，同时又紧盯中国占领区，力图榨取更多的战争资源。1940年12月7日，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刚签订不久，日本内阁即决定了《经济新体制要纲》，其基本方针是：“确立以日‘满’为一环，包容大东亚的自给自足共荣圈，并基于圈内的资源，确保国防经济自主性，并于官民协力之下，以重要产业为中心，遂行综合的计划经济，以资应付时局的紧急完成国防国家体制，藉谋军备的充实，国民生活的安定，国民经济恒久的繁荣。”[284]

通过实行新经济体制来巩固与稳定中国占领区统治是关键所在。日本陆军为此特于1941年1月25日制订《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作为加强对中国占领区控制与掠夺的总体方案。该文件由三个内容详尽的具体方案所构成，其中第一个方案是《对国民政府的指导纲要》。方案强调要调整对汪政府的指导方针，使之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对汪政府的指导，首先，应采取措施，“使其一心一意地协助加强帝国综合战力”，“努力向我占领区域内作政治力量的渗透”；其次，是确定对汪政府物资上的要求：“日军在当地独立生活的必要物资及属于物资动员的物资，特别是埋藏物资，按帝国对华要求全额、全部取得”；获取其他普通物资时，“则避免通过压力”，“以正常的经济手

段，圆满且恰当地取得之”，“以资收揽民心，且便于我之长期获取”；“随着政府财政力量之增强，指导其逐渐用新货币交付帝国的军费”；第三，调整对新政府内部指导的部门与范围，“关于国防资源，特别是埋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合办企业直接参与生产”。需要从内部指导的范围大致如下：“关于粮食及棉花生产事项”；“关于通货、金融、贸易事项”；“财政运用大纲”；“关于军事及整备（包括监察）事项”；“关于交通、航空、通信事项”；“关于外交事项”；“关于建设新秩序理想事项”；“关于重要人事事项”，等等；第四，调整国民政府与华北、蒙疆的关系及承认海南岛、武汉的特殊性[285]。根据上述指导原则，日本实际上只承认汪伪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一定统治权，其他占领区的主要权力仍由侵华日军直接控制。

策略中的第二个方案是《对华经济措施》。日本当局逐步认识到，为维持长期对华战争，必须采用“以战养战”的政策，在中国占领区内就地榨取各种战略物资，以弥补国内各类物资的严重不足。因此，日本军方把这个方案作为整个策略的重点，详细罗列如何把中国占领区变成战争物资供应基地的各种策略办法。其基本方针是：“结合日满两国情况，彻底开发和取得国防资源，同时应有助于安定占领区的民心”；“提高日军在现地的独立生活能力，同时坚定地发展国民政府的经济力”；“摧毁重庆方面的经济力”；“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极力防止通货的混乱和膨胀”[286]。根据上述方针，日军计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对策。

一是获取物资的对策，计划从榨取更多的生活用品、开发重要资源和通过租界获取重要物资等三方面入手。榨取生活用品的目标是使侵华日军的生活用品能够就地取材，“提高派遣军在现地的独立生活能力”。重要资源的开发，按缓急顺序与不同地区有计划实施。“按日满华一贯的增加生产及物资动员计划，当前大体以现占领区的铁和煤矿为第一位，其次为棉花、盐、萤石、钨、石棉、羊皮、云母等。力求逐步增加其取得量”。开发资源的方法，“主要采取华北开发与华中

振兴公司的分公司等目前使用的方法，合理利用现有机构，以求提高其效果”。取得上述生活用品与重要资源的限度，“以确保现占领区民众的最低限度生活”为原则，并应“尽量利用中国的习惯、经济机构及地方资本”。利用租界取得物资，主要“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性，以该地为基点，对国内不能取得的主要物资，按物资动员计划中的输入数量，用满洲、华北现有的外汇资金，向第三国订购”[287]。在华中沦陷区，粮食、棉、丝、蔬、果、肉、蛋、皮革等物资是日军掠夺的重点对象。日军占领上海初期，即在浦东等地强行扣留、没收巨额棉花。并公然拦劫运往上海的菜蔬。日军还组织所谓的“牲畜市场”，统制生猪交易[288]。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又指使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组织粮食管理委员会、粮食联络会等机构，专门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粮食征购工作。

二是货币对策，计划让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成为华中地区的统一货币，日本军费也逐步用它支付。“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时，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曾发表声明称：“为使金融市场不生动摇，人民资产得以保障起见，关于现在流通之各种旧法币，暂准与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等价流通，然后徐图调整，设法统一……至日本军票，为事变继续中之特殊事态，新法币当与之为相互充分之协力，使得各完成其所负之使命。”[289] 随着“中央储备银行”实力的增强，日伪方面逐步加强了货币管理的力度，但尽可能不使“联银券、蒙银券受到不良影响”。对于日本军票，仍然维持其适当价值，以利于支付军费，同时根据中央银行券地位之增强，“迅速把它掉换成中央银行券”。对于旧法币，则极力阻止“重庆方面通过向第三国出口，华侨汇款及向第三国借款等办法充实外汇资金”，以降低其对外价值。在情况许可时，考虑全面禁止其流通[290]。

三是贸易管理，目标是“极力使日满华的物资交流综合化，以促进东亚自给经济之确立”。为此，计划把中国对“日元集团”的进出口贸易纳入日本的计划管理之下。对于中国同第三国的贸易，“应促进占

领区的物资出口，抑制管理非占领区物资的出口”。对于中国海关，“应加强现正实施的内部改组和增设日籍职员的手段，看准时机，准备把它全部收回”。对于同非占领区的贸易，采用加强封锁、严格控制的措施。凡占领区内不足的必需物资，应“采用各种方法从非占领区取得”，如有必要，“允许从非占领区流入消费物资”；对于为了交换而流出的物资，“应严格选择，不使重庆方面因此增加抗战力量”[(291)]。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随即实行物资统制与经济封锁。华中派遣军方面还专门发出通知，禁止民间所有物品“由军占据地内向军占据地外输送”，同时还严格限定了向上海租界方面输送物品的范围[(292)]。

策略要领的第三个方案是《对华思想指导纲要》。日本陆军当局认识到，“收揽民心”对维持在中国占领区的长期统治意义重大，因而在《纲要》中明确规定：“适应长期持久作战方略，置重点于占领区，激励国民政府官民建设新国家和大东亚新秩序的热情，在促进和提高其政绩的同时，应开展思想攻势，对反对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向对方进行渗透，瓦解敌军官兵的抗战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293)]《纲要》主张从官吏与知识阶层、普通民众及对敌宣传三个方面采取不同对策。

《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是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在侵华战争进入长期持久战态势之际确定的一个重要战略方案，它和盘托出了日本企图长期占有中国领土和掠夺中国资源的野心。值得注意的是，为达到长期占领中国领土之目的，日本陆军开始注重对占领区的经营与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反映了侵华日军的意见。日本中国派遣军曾一再强调：“全体一致认为，持久作战方略的根本，在于建设新中国”，“不论为了对综合战力的协力，还是为了政治力量的渗透，都必须加强政府本身实力”[(294)]。1941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召集所属各军司令官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各项纲要，同时贯彻派遣军关于本年度作战和政务指导方针。西尾寿造总司令强调：“现在国

内外形势都迫切要求把日满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加强综合战力”，“政务指导的宗旨是，在建立进行长期作战的基本势态期间，使中国方面广泛地进行工作，谋求占领地区的富强，逐步培植国民政府，使之成为统治的主体”[295]。为进一步密切与汪伪政府的联系，总军还决定，每周星期三与该政府要人举行定期会谈。

为稳定汪伪统治区，增强汪伪政府的实力，以获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日本总军还与汪伪当局达成如下意见：总军对汪伪政府推行的增加粮食对策，确立财政基础，扩充军事力量，隔离敌对地区，渗透政治势力等项工作，给予全面促进与支持。汪伪政府确定的施政措施从1940年秋季开始逐步付诸实施，汪精卫在1941年元旦献词中也声称：“去年的一年是调整邦交条约之缔结，今年的一年是调整邦交条约之实行。”实行需要力量，本年度的最低限度一是要建军以保和平，二要复兴农村以充裕民食[296]。

尽管日本中国派遣军给汪伪政府以全力支持，力图促进占领区建设，但汪精卫等人毕竟是一伙“赤手空拳”的汉奸，实在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政治上又十分孤立，所以“还都”一年，毫无政绩可言。就连汪精卫自己也承认：“一年以来，政治经济各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但是全面和平没有实现，战争状态仍然继续，因之随着战争状态而发生之事实，仍然存在，甚且日益扩大。所以在施政上，无论是行政的效率，以及经济生活的改善，都受着限制与束缚，不能有充分的发展。”[297] 日本政府虽然深知汪伪政府面临重重困难，但迫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况，仍不断向中国占领区提出以取得各种物资为主的大量要求。这不仅加剧了现地的各种困难，同时也使汪精卫集团感到焦躁不安。

为弥补双方之间的隔阂，日本总军支持汪精卫再度访问日本，直接与日本军政当局首脑交换意见。汪精卫访日前夕，日本总军特务部就“加强南京政府”、“调整国营商行”、“华北政治”、“物资流通”等问题事先进行了研究，并拟出一套对策方案。方案认为，加强南京政府

问题，“是汪这次赴日的主要事项”，应支持并指导其“本身树立的建设新国家的方略”。为强化实施各种计划，增加财政收入，“促使其首先准备从三角地带开始确立新政府的基础地盘，以及加强训练以国民党为主的政府人员的素质”[298]。此外，总军还就与陆军中央意见不完全一致的“持久方略的根本问题”、“政略战略之协调”、“前线隔离”等重大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向陆军中央部提出《政略指导上的意见》，希望乘汪精卫去东京访问之机，双方“明确与坚定对于将来处理事变的根本态度”，“以转变中国方面目前低落消极的情绪，进一步提高其斗志”[299]。

6月中旬，汪精卫等人在日本总军的安排下赴东京访问，先后同近卫首相及陆、海、外、藏诸大臣进行商谈。为给汪精卫一伙打气，日本政府表示将进一步对汪伪政府提供援助，并在3亿日元武器贷款、交还没收房产及军管工厂、整理国策公司等具体问题上达成谅解，同时又要求汪伪政府“发挥其独立自主的权能”。对此，汪精卫感激万分，表示将克服任何困难，完成全面和平的使命[300]。汪精卫访日，暂时缓解了日、汪双方的矛盾。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指挥下，汪伪国民政府更加卖力地为日本侵华战争效劳。

五　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斗争

日本军政当局以为凭借武力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就可以在那里任意掠夺，实施长久统治。然而，这一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所击碎。自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中国共产党即把反抗日本侵略作为头等大事，不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枪声一响，中共又发出抗战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301]。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中国共产党一面组织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占领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游击战，同时又在沦陷区积极发动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沦陷区民众亦本

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决不当敌国的顺民，他们有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有的自发地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斗争。这些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使日伪当局寝食难安，胆颤心惊，有力配合了国共统一战线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斗争。

华北是卢沟桥事变后最先沦陷的地区，民众反抗斗争率先在那里展开。7月30日与8月1日，日军分别攻占北平、天津。是时城内的各抗日团体仍积极活动，日军不得不派兵四处镇压。此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交给军特务部的第一项任务是："首先应迅速确立治安，并安定民心，为使日军的后方安全，着重建立并扩充各项制度和设施。"[302] 由此可见，日本侵略军刚攻占中国的领土，即遇到后方不安全的问题。为消解沦陷区人民的敌对情绪，日本内阁于10月1日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中特别强调："在事变中，对华北作战的后方地区的措施，应排除占领敌国领土的观念"，"不实行占领区式的行政"，"政治机关由当地居民自主组成"[303]。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策略无法欺骗沦陷区民众，反日浪潮仍不断高涨。

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沦陷区民众的反抗也从城市扩大到农村。至当年年底，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开展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他们主要的斗争方式是："（一）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二）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三）袭击军用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304] 这些斗争使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抽调兵力以加强后方治安。进入1938年后，日占区内的抗日斗争更为活跃。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已在日占区内建立起大块根据地，民众的反抗斗争遍布各地。挺进山西南部的日军第二十师团陷入中国抗日军民的重围，被迫后撤，来不及撤退的部队则龟缩在据点内，"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305]。这一结果，使日本侵略军开始领略到中国人民强大的反抗力量。处于侵华一线的日本军人也被迫承认，八路军"牢固地掌握了农民阶层"，"处于彼此势力中间地区的

居民，朝迎日军，晚通共军，向双方纳税等，这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事实”[306]。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日军每攻占一地，都会遇到当地民众的反抗。如豫东地区刚陷落时，国民党正规军虽已后撤，但当地原有的自卫团、红枪会、联庄会等武装团体，为保卫家园，纷纷起而扩充实力，添购武器，招收散兵游卒，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河南省会开封虽于1938年6月5日陷落，但附近的爱国民众却立即自发行动，在市郊的辛庄大庙集会，筹商组织抗日武装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以原有之联庄自卫团为基础，逐步扩编，用以阻止日军侵及四郊，以待国军反攻[307]。尽管最后未遂所愿，但这一行动已充分表达了开封农民的抗日决心。

如果说沦陷区的农村尚是侵华日军势力的薄弱环节，那么城镇地区则是日军重点控制的区域，大城市更是戒备森严。然而，广大爱国民众凭借聪明才智，照样寻找机会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其中使用较多的手段是暗杀。尽管日伪当局为保护政要不惜代价，却仍无法阻挡爱国民众的正义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居住在北平城内中央饭店的两名日本军官，像平时一样骑马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上班，当他们行至司令部西面约300米时，突然遭到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用手枪射击，导致一死一伤。由于事发突然，日方连袭击者是几人也没有搞清楚。无奈之下，华北方面军只得下令撤掉汽车上带有军官阶级的标旗，以防高级军官再遭袭击[308]。

爱国民众的自发抗日行动，虽予以日本侵略以有力打击，但因力量分散，无法在战略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因此，中国共产党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即提出“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口号。当华北各地相继沦陷，“群情慌急，不知所从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坚持不离开华北，并向群众作广泛耐心的解释，指出自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继续同敌人打，二是逃走到别处去，三是投降敌人。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

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309]。在稳定民心之后，即组织民众，与敌伪当局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斗争，主要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地下政治斗争。华北沦陷之初，原有的国民党政权已完全崩溃，敌伪傀儡政权还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提出“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带领民众配合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310]。与此同时，还在日伪力量比较强大，抗日武装力量不能公开活动的地区率领民众开展地下政治斗争。

地下政治斗争，是配合抗日武装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沦陷区的党组织首先抓组织发动工作。当时华北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而党组织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干部，于是采取如下各种办法：首先举办为期一周的短训班，然后把这些骨干派到各地去工作；其次，把上层领导机关的干部尽可能地分派下去，直接领导工作；第三，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各级组织。由于及时解决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沦陷区的政治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学生及抗日积极分子，经过动员，纷纷下乡组织游击队，或回到家乡打游击[311]。这就为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注入了新鲜血液。

中共地下政治斗争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渗透进敌伪组织内部，收集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侵华日军也承认：“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312]对于中共地下人员向日伪机关内部渗透的情况，根据日军情报机关材料显示，山西省祁县的工作颇具代表性。位于太原南面约60公里的祁县城内，自西安事变后即有共产党组织活动，至1938年底，中共祁县县委已经健全了各级组织，并筹建了

青年、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等救国会及日军地下工作委员会。日伪势力控制该县后，首任县长即为共产党员，他一面在县公署职员中发展抗日力量，同时又向八路军及抗日政权提供物资。第二任县长更是党的支部书记。他秘密成立“日军地区工作委员会”，自己任主任，政府秘书和各科长任委员，他们为抗日武装在城内收集现金、棉布等物资，提供日伪军的行动情报。共产党员还打入县警备队，逐步发展了30余名党员，成立党支部。他们利用有利条件，收集县内外日伪军的装备、兵力、计划、行动等情报，同时还设法向日伪当局提供游击队的假情报。另外，学校、火车站、军管棉布厂等都有中共地下组织[313]。该县表面上仍由日伪控制，实际权力已被中共地下党所掌握。

类似祁县的例子，在整个沦陷区并非个别，几乎各省都有。在河南豫东地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民权、兰封、商丘等四县党组织成立了联合工作委员会。他们通过关系，打入伪军内部，一次即搞到枪弹四十余箱。总部设在商丘的张岚峰部，是伪军中的王牌，经常协助日军与人民武装为敌，联合委员会派遣一名与张有同乡关系的党员打入该部教导团，争取教导团长入党，以后又发展多名党员，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经过党组织的积极活动，这支伪军迅速被瓦解[314]。

动员沦陷区内广大民众，共同投入反对日伪统治的斗争，也是地下政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即明确指出：“挽救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315]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沦陷区党组织采用各种方式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取得显著成效。1938年11月，华北日军曾发出这样的惊呼：“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而共军的核心动力则是政治部。政治部的妙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及顽强的行动，并有一贯的共产思想。”[316] 于是，华北日伪当局开始重视在思想宣传领域与中共进行较量。他们把反复

开展但并无实效的“治安肃正”运动，逐步升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把以军事清剿为主的方针改为政治攻势为主，提出“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争取民众”的口号[317]。然而，中共的抗日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日伪当局如何变换策略，结果仍是劳而无功。

为隔断共产党与沦陷区民众的联系，日伪当局又在华北占领区内推行“新国民运动”，并以河北的高阳县和任丘县为“突击示范区”。具体办法是召开“反共誓约会”，强制推行“反共誓约六条”，要求每个村民背熟并执行。遭到民众的抵制后，又强行把各村18至45岁的男子7400多人驱赶到县城内，要他们背诵反共誓约，交代抗日行动，交出武器文件。村民以沉默表示反抗，结果有100多人惨遭毒打。日伪军把这7000余人当作人质，派人向各村要武器、文件和干部名单，但这一阴谋仍未得逞。于是不让人质吃饭，一直饿了6天，有35人因冻饿而死，尽管如此，被扣群众仍顽强抵制。为让群众能吃到饭，党组织让各村送去一些坏枪、旧书、废报等充数。在半个月时间里，被扣群众只报了冒名的抗日干部，或自己承认是游击组的成员，而真正的抗日干部一个也没有供出来[318]。其他地区的群众同样如此，他们面对敌人的拷打和屠杀，毫不畏惧，宁愿牺牲自己也不向敌人屈服。

由于沦陷区人民的坚决抵抗，日伪的各项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在总结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日伪当局自己承认有许多“不充分之点”。首先是“治安强化重点工作不彻底”，“对敌经济封锁最主要的物资为食粮……当局屡次说过，要使华北粮食一粒也不使流入敌区。然而实际上一到登场期便发生种种遗憾”。其次，“各地区警务警防诸机关，缺乏精神融和”。另外还有“指导能力不够”、“各机关内部防共防谍的措施不彻底”、“过于重经济封锁的宣传，遂致轻视剿共自卫”，等等[319]。这种种“不彻底”，足以说明在爱国民众的反对下，日伪当局无法维持华北占领区的安定。

日伪当局在华中沦陷区的统治方式与华北有所差异，因而人民群众的反抗形式也有所不同。华中地区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日军

进攻时曾遭遇顽强抵抗，至武汉失守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国民党看到敌后抗战的可行性，已抢先在日军力量薄弱的沦陷区内建立起抗日武装。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逐步转为政治诱降。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使国民党留在华中地区的抗日军政人员也动摇不定。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地区党组织要揭露日本的诱降阴谋，“动员并联合一切抗日的党派、阶层和人民，反对汪精卫，反对亲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奋斗”[320]。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挺进江南，在汪精卫集团的活动中心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

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日汪统治的中心，也是日伪军事力量相对集中的区域。新四军一进入紧邻南京的镇江地区后，日伪军即采取攻守并用的姿态，密布“梅花桩”，企图聚歼或迫使新四军退出该地。新四军洞悉敌人阴谋，坚持在南京、镇江、句容这一狭窄的三角地带活动不撤退，在数月时间内打破了敌人23次围攻，这大大提高了江南沦陷区人民对新四军的信任及开展游击战的信心[321]。新四军在南京附近的抗日活动，犹如在日伪胸口插上了一把尖刀，使他们寝食不安。从1941年开始，日汪双方经密谋策划，推出了比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更厉害的“清乡”运动。于是，反“清乡”斗争就成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众的共同使命。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抗日军民除面对强大的敌伪势力之外，还要提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内部“摩擦”。新四军首先向沦陷区民众作抗日形势宣传，提高人民的抗战信心，同时组织民间救济救难，争取得到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对于非共产党系统的游击队，以民族大义为重，采用“杯酒言欢，化敌为友”的办法，消除隔阂，调停各方，“以中国人为本位，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322]。这些言行，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同时也感动了不少士绅，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日伪以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清乡”运动，手段十分毒辣，尽管如

此，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中共抗日武装仍能进退自如。在吸取前几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后，新四军的反“清乡”策略越来越灵活。每当日伪军集结兵力，对“清乡”区实行合围清剿时，新四军主力早已跳到外线作战，而地下党组织则留在区内带领人民展开积极的反“清乡”斗争，他们一面利用合法手段，对日伪的“清乡”措施予以拖延和抵制，同时又领导武工队打击“清乡”骨干，镇压汉奸，制服伪军。1943年4月，日伪开始在苏北实施“清乡”，企图破坏新四军的苏中根据地。4月1日，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境内各据点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向苏中四分区分进合击。抗日军民内外线紧密配合，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6月初，日伪开始政治“清乡”，妄图“六月强化启东，七月强化海门，八月强化南通，九月强化如皋”。新四军采用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群众性隐蔽斗争和合法斗争的方针，发动全民开展反对编组保甲和封锁的斗争。7月初，新四军主力之一部挺进南通地区，开展大规模破击战。迫使集中启东、海门之敌回援，其分区实行政治“清乡”的计划完全被打乱。苏中四分区群众，乘敌混乱之际，一个夜里即破坏封锁竹篱200余里。遭此打击后，日伪被迫改行所谓“机动清乡”。至10月份，又实行“延期清乡”三个月。然而，日伪的这些行动最后仍被抗日军民挫败[(323)]。其他地区的“清乡”，同样遭到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击而归于失败。

华中沦陷区的爱国民众，还利用汪伪集团标榜继承民国法统的幌子，采用向政府上书的合法形式，揭露日汪的黑暗统治。汪伪政府出台后，向沦陷区民众加捐加税，横征暴敛，使民众无法生存，于是他们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联名向汪伪中央政府上书，揭露汪伪地方当局的苛政，呼吁减轻民众负担。这类上书遍及汪伪统治的各省市，如安徽滁县公民上书控诉县政府假借民意，征收警团捐；江苏盐城乡民呈报苏北税务黑暗情形，呼吁统一税务；江苏常熟乡民控诉当地乡长土豪苛征捐税，敲诈勒索；浙江萧山民众多次上书，控诉县乡政府苛征田赋，欺压农民；上海沪北区大场镇各商号联名呼吁，区署设卡征税，不堪负担，请求勒令停止征收；上海市民控诉日本人率领华工铲

除田里豆苗，并强迫缴纳土地登记费。这些呈文，均是摆事实、讲道理，既揭露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又使汪伪当局无把柄可抓。江苏崇明居民施静庵等联名向汪精卫提交的呈文，一开头即强调："呈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上违国策，下迫民生，公恳迅予纠正制止，以苏民困而重政体事。"接着，抓住汪伪政府出台时曾作过的许诺，"国府还都，与民更始，首重安定民生，解除痛苦，定为国策，昭示遐迩，涸辙之鱼待救正殷"。而实际情况如何？沦陷后的崇明海岛，"生产不足于自赡，青黄不接之际，贫穷者恒食糠秕"。"而自上月开始举办清乡后，四周封锁，有天然之环海，益以人工之竹篱，耗全县数千百万支之竹竿，糜千万之币值，将以求全民众之安居乐业。墙壁标语朱墨巍然，讵料安业之境未得，剔括之税频出，多似过江之鲫，犹如雨后春笋。某税冠以财政部，某税冠以财政局，名称虽异，性质类同，纸张税与箔类税已相冲突，再加之以迷信捐，一纸之微，须完三种税捐"。"他如保甲捐。则按户征收，牙税则肩挑贸易必交税领证，所得税外再有营业税，统税之外复有附加税，屈计税捐名称达十余种之多。近又开征住房捐，闻以十万有奇之比额转辗承包，最后承包者以达五六十万元之包价"[324]。如此厉害的苛捐杂税，确实令人咋舌。各地民众发出的公开呈文，实际上也是对日伪统治的有力打击。

---

(1)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页。

(2)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28—329页。

(3)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29页。

(4)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0页。

(5)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1页。

(6)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2—333页。

(7) ［日］《影佐祯昭供词》，见［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

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307—308页。

(8) ［日］风见章：《近卫内阁》，第176页。

(9) ［日］《影佐祯昭供词》，见［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309页。

(10)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0—21页。

(1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61—262页。

(12)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1页。

(13)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14)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15)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2页。

(16)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17)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265—266页。

(18)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59页。

(19)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9月25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64—665页。

(20)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6—107页。

(21)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23页。

(22)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第25、36页。

(23)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第62—63页。

(24) ［日］影佐祯昭：《对汪政府特务工作的协作》，见《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第396—397页。

(25) 马啸天：《关于在上海之汪特组织情况及历史演变》，转引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1页。

(26)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67—268页。

(27)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120—121页。

(28)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121页。

(29) 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30)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75—276页。

(31) 钱俊瑞等著：《我们的檄书》，集纳出版社1940年版，第16页。

(32)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48页。

(33) 《中华日报》，1940年7月16日、9月20日。

(34)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9月25日），《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第666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76页。

(36)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37)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38)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39) ［日］《汪精卫与森岛参事官会谈纪要》（1939年7月3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

(40) 汪精卫：《敬告海外侨胞》，《中华日报》1939年7月11日。

(41)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3页。

(42) 罗君强：《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67页。

(43) 程宽正：《从祸水中登彼岸》，载祝小明编：《汪精卫是什么东西？》第4辑，岭南出版社1940年版，第66—67页。

(44) 罗君强：《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67页。

(45) 《汪兆铭在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讲稿》（1939年8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57—158页。

(46)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47)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48)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49)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5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

(51) 《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3页。

(5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5-486页。

(53) 《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4页。

(5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6页。

(55) 《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3页。

(56) 马啸天、汪曼云：《“七十六号”的一出开锣丑戏》，《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63页。

(57)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36—37页。

(58)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38页。

(59)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40页。

(60) 《召开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中华日报》1939年9月6日。

(61) 汪精卫：《在上海招待外国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

(62)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61页。

(63)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63页。

(64) 《吴佩孚复汪精卫函》，转引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88页。

(65) 《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转引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89页。

(66)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9年6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52页。

(67) ［日］《汪精卫与王克敏会谈内容》（1939年6月27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157号。

(68)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下册，第346页。

(69)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53页。

(70) 《汪精卫致吴佩孚函》（1939年10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61页。

(71) 《吴佩孚先生集》第443页，转引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517页。

(72) ［日］冈田酉次：《日中战争内幕记》，日本经济新报社1975年版，第202页。

(73)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会谈内容》（1939年6月29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42页。

(74)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第二次会谈要领》（1939年7月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54—155页。

(75) ［日］《汪精卫与温宗尧会谈内容》，《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45页。

(76)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第二次会谈要领》（1939年7月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55页。

(77)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4页。

(78)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第375-736页。

(79) ［日］《三巨头会议决定事项》，《日本外交档案》UD51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91页。

(80)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55—56页。

(81)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57页。

(82) 《中华日报》1939年9月24日。

(83) 《中华日报》1939年9月24日。

(84)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页。

(85)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27页。

(86) 《中国方面第二要求》、《中国方面第三要求》，《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45—347页。

(87) 《中国方面第一要求》，《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41—345页。

(88) 《第二部长关于对华谋略的大意》，《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5页。

(89) 《日本方面回答要旨》，《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416—418页。

(90)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日本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326—347页；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25—839页。

(91)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5页。

(92) 陶希圣：《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载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3日。

(93)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6页。

(94)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7页。

(95)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9页。

(96) 《日华调整协议内容》，［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25页。

(97)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26—347页。另见《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98) 《高宗武致蒋介石函》（1940年1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296—297页。

(99) 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13日、14日、17日、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0) 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1日。

(101) 高宗武、陶希圣：《致汪精卫信》，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1日。

(102)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1月22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103) 《汪先生苦难回忆录》，见《和运史话》，第19页。

(104) 《中华日报》，1940年1月26日。

(105) 《南京新报》，1940年1月26日。

(106) 《中华日报》，1940年1月26日。

(107)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57页。

(108) 汪精卫：《和平运动之前途》，《中华日报》1940年1月2日。

(109) 周佛海：《和平运动的发展和前途》，《中华日报》1940年1月3日。

(110)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1月4日—1月15日，第223—226页。

(111) 《南京新报》，1940年1月19日。

(112) 汪精卫：《铣电》，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07—108页。

(113) 《青岛三巨头会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69页。

(114) ［日］《国民政府要览》，新武汉社1942年版，第29页。

(115) 《青岛会谈日程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65—166页。

(116) 《在青岛会谈各处谈话》，《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09—114页。

(117) 《临时维新两当局联名声明》，《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15页。

(118)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60页。

(119)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2月12日，第245页。

(120) 《米内首相谈话》，《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日本之部》第25页。

(121) 《陆军纪念日感言》，《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日本之部》，第29—30页。

(122) 《和平宣言》，《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

第117页。

(123) 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开幕词》，《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124) 《伪中央政治会议推定汪兆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之录案通知》（1940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91页。

(125)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中华日报》，1940年3月24日。

(126)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85页。

(127)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3月30日，第272页。

(128) 《汪精卫发表还都宣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129) 《临时政府解散宣言》，《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5页。

(130) 《维新政府解消宣言》，《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6页。

(13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89—390页。

(132) 《米内首相广播词》，《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第37—38页。

(133) 《西尾总司令及川司令长官谈话》，《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第39—40页。

(134) 《国民政府还都对日交换广播词》，《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43—144页。

(13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0年1至6月份），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389页。

(136) 《国民政府令》（1940年3月3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93—194页。

(137)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解放》周刊第105期，1940年4月30日出版。

(138) 《黄益堂吉隆坡来电》（1940年4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

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212页。

(139)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90—391页。

(140)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代文选》第7期，1939年9月20日。

(141)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代文选》第7期，1939年9月20日。

(142) 汪精卫：《对欧美记者演词》，《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

(143) 汪精卫：《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

(144) 汪精卫：《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解释》，《中华日报》，1940年1月10日。

(145) 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开幕词》，《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146) 《国民政府还都宣言》，《中华日报》，1940年3月31日。

(147)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对日交换广播词》，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4页。

(148) 《国民政府政纲》，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1页。

(149) 陈东白：《和运的展开与国府还都》，《申报年鉴》1944年版，第34页。

(150)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7—98页。

(151)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载《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52)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53)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1页。

(154) 顾仲韬：《政治制度》，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4页。

(155) 常务委员有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肖叔宣等九人。

(156) 顾仲韬：《政治制度》，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5页。

1942年8月，该两部改隶汪伪军事委员会直属。

(157) 鲍文樾：《还都一年来之军事》，载汪伪宣传部编：《国府还都周年纪念实录》，第54页。

(158) 顾仲韬：《政治制度》，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5页。

(159)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7页。

(160) 汪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第119号，《绥靖公报》第9期。

(161) 王翔九：《我所知道的张岚峰》，载《河南文史资料》第3辑，第130页。

(162) 《汪伪军事委员会关于改编第一集团军致国民政府呈文》（1941年7月15日），转引《汪伪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163) 《汪伪军事委员会关于改编第二集团军致国民政府呈文》（1942年1月8日），转引《汪伪汉奸政权的兴亡》，第150页。

(164)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139页。

(165) 《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之事变处理方略》，［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03页。

(166)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53页。

(167) 《关于解决战事的机密指导》，［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53—354页。

(16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0年1至6月份），第132、136页。

(169) 《调整汪与重庆关系办法方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64页。

(170)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129页。

(171) 《关于今后对重庆工作的指示》，［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88页。

(172) 《新中央政府指导方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07页。

(173) 《对华战争处理方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10页。

(174) 《关于起草条约的方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26页。

(175) 《关于起草条约的第一次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27页。

(176) 《关于起草条约的第二次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28页。

(177) 《会议记录摘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327页。

(178)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66—468页。

(179)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68页。

(180)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69—472页。

(181) 《汪兆铭对记者发表谈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89—390页。

(182) 《日本政府声明》，《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1辑，《日本之部》，第69页。

(183) 《阿部谈此次缔约之意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90—391页。

(184) 《西尾总司令谈话》，［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18—519页。

(1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22—423页。

(18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24页。

(18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24—425页。

(18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189) 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90)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17—118页。

(191) 张鼎丞：《为粉碎江南敌寇“清乡”而斗争》，《解放日报》1941年5月21日。

(192) 汪精卫：《清乡与大东亚战争》《政治月刊》第6卷，第2期。

(193) 《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419页。

(19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77页。

(195) 《修正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转引《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63页。

(196) 《第一次军事协力施策要领》，［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94页。

(197) 《清乡委员会第四次筹备谈话会记录》（1941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89页。

(198) 《清乡委员会第一次筹备谈话会记录》（1941年4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85页。

(199)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2页。

(200) 《清乡委员会第七次筹备谈话会记录》（1941年5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94页。

(201) 《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86页。

(202) 汪曼云：《日寇在“清乡地区”对伪政权的层层控制》，《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215页。

(203) 汪精卫：《清乡一周年》，《政治月刊》第4卷，第1期。

(204) 汪精卫：《实行清乡必先清心条》，《政治月刊》第6卷，第3、4期。

(205) 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总结》，转引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页。

(206) 封锁总办事处：《封锁解说》，《清乡日报》，1941年7月31日。

(207) 清乡委员会：《清乡地区整理保甲肃清零匪暂行办法》，转引《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335页。

(208) 汪曼云：《千里哀鸿说清乡》，转引《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339页。

(209) 清乡委员会：《清乡地区物资统制及运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日报》1941年7月11日。

(210) 余百鲁：《清乡一年来之财政》，《清乡新报》，1942年7月8日。

(211) 余百鲁：《清乡一年来之财政》，《清乡新报》，1942年7月8日。

(212) 金湛卢：《汪伪政权在浙江省主办的“清乡”》，《浙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213) 《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1944年2月10日，第850-851页；周佛海：《在行政院清乡会议上的讲话》，《中华日报》，1944年2月10日。

(214) 轶士：《特种教育与农村运动》，《江苏教育》第3卷，第2期。

(215) 清乡委员会：《特种教育实施计划纲要》，《清乡日报》，1941年7月27日。

(216) 清乡区党务办事处：《为青少年总队部成立宣言》，《清乡新报》，1942年11月28日。

(217)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44页。

(218)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494—495页。

(219) 《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908—911页。

(220)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

(221) 《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昭和八年八日阁议决定），《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89页。

(222) 《地方行政》，满洲国通讯社编：《满洲国现势》，康德八年（1941）日文版，第147—229页。

(223) 《警察行政》，《满洲国现势》，第114页。

(224)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防谍关系法令集》，第173页。

(225)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法制处：《满洲国法令辑览》，第5卷。

(226) 《协和会》，《满洲国现势》，第143页。

(227) ［日］植田谦吉：《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第907页。

(228) 满洲国通讯社：《满洲国现势》，康德八年（1941）日文版，第143页。

(229) 《协和会之组织》，《满洲国现势》，第144页。

(230) 《协和会之组织》，《满洲国现势》，第144页。

(231) 《资政局官制》，《满洲国法令辑览》，1933年伪满国务院法制局编，第81页。

(232) 《弘报处》，《满洲国现势》，第92—93页。

(233) 《满洲国法令辑览》，第2页。

(234) 伪满《建国教育》1943年第1期，第19页。

(235) 伪满《建国教育》1943年第1期，第35页。

(236) 《出版》，《满洲国现势》，第500页。

(237) 《电影》，《满洲国现势》，第513页。

(238) ［日］春山行夫：《满洲文化》，日本大阪屋书店1943年版，第335页。转引《伪满洲国史》，第433页。

(239) 陈东白：《和运的开展与国府还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34页。

(240) 《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74—75页。

(241) 北京《实报》，1940年3月31日。

(242) 《政务指导的基本方案》，《华北治安战》（下），第33页。

(243) 《省以下各地方行政指导》，《华北治安战》（下），第36页。

(244) 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编：《第二届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第34页。

(245) 《新民会报》通卷，第101号，1940年12月28日。

(246) 《日军占领区内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状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97—298页。

(247) 陶广仁：《伪华北治安军概述》，《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248) 《中华民国新民会宣言》，《抗日战争》第六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380页。

(249) 《伪新民会的纲领与会旗》，《抗日战争》第六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375页。

(250) ［日］安藤纪三郎：《对于中央总会所指示者加以补充说明》，《新民报》，第72号，1940年8月20日。

(251) 《汪主席招待记者会上发表今后施政方针》，《中华日报》，1941年3月23日。

(252) 汪伪组织档案（十三）1205，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53)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5月3日，第288页；《汪伪行政院公布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194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二辑《附录》（下），第946页。

(254) 孟祺：《国府还都一年》，《政治月刊》第1卷，第3期。

(255) 汪伪组织档案（十三）120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6)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257) 汪伪立法院编译处：《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三）。

(258) 《中日文化协会章程》，《政治月刊》第1卷，第2期。

(259) 汪精卫：《在中日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训词》，《政治月刊》

第1卷，第2期。

(260) 叶钧：《中日文化提携论》，《兴建月刊》第2卷，第6号。

(261)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47页。

(262) 汪精卫：《答记者问》，《中华日报》，1940年1月20日。

(263)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1页。

(264) 杨鸿烈：《国民政府还都后的“文化政策”》，《中日文化月刊》第1卷第2期。

(265) 《中华日报》，1940年7月7日。

(266) 伪江苏教育厅：《小学指导儿童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办法大纲》，《中华日报》1940年8月7日。

(267) 伪南京市教育局：《南京市各级学校暨社教机关实施思想善导办法》，《中华日报》1940年10月5日。

(268) 《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4页。

(269) 《特殊会社一览表（1941年7月调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8—91页。

(270) 《帝国外交方针》，《华北治安战》（上），第13页。

(271) 《中央的政策与华北自治运动》，［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2页。

(272) 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编：《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调查》，转引［日］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273) 《华北产业基本对策纲要草案》与《华北经济开发方策大纲草案》，《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06—109页。

(274) 《华北产业九年计划》，《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11页。

(275) 《华北主要资源对日可能输出量》，《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12页。

(27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91页。

(277)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1014页。

(278)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结构》，《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41页。

(279) 北京《实报》1938年3月27日。

(280) 北京《实报》1938年7月2日。

(281)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908页。

(28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14—618页。

(283) 《敌对华北棉花之夺取（1939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四），第1088—1094页。

(284) 《经济新体制要纲全文》，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202页。

(285) 《对国民政府的指导纲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29—532页。

(286)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3页。

(287)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3—534页。

(288) 《申报》，1939年4月6日、4月16日、8月23日。

(289) 《汪伪财政部长发表关于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钞票的声明》（1940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959页。

(290)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5—536页。

(291)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7页。

(292) 《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长通知》（1939年2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10—111页。

(293) 《对华思想指导纲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42页。

(294) 《总军关于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之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45页。

(295)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长期作战方针》，《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04—105页。

(296) 汪精卫：《所望于中华民国三十年者》，《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1辑《中国之部》，第200—202页。

(297)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一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119—120页。

(298) 《强化南京政府问题》，［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84页。

(299) 《政略指导上的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91页。

(300) 《重新研究对策》，［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93页。

(301)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周刊》第10期，1937年7月。

(302) 《指示喜多少将》，《华北治安战》（上），第50页。

(303)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45页。

(304) 《占领区的治安状况》，《华北治安战》（上），第65页。

(305) 《第二十师团的状况》，《华北治安战》（上），第75页。

(306) 《田副正信少佐的回忆》，《华北治安战》（上），第82页。

(307) 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308) 《长谷川美代次少将的笔记》，《华北治安战》（上），第355页。

(309)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7页。

(310)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0页。

(311)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7—258页。

(312) 《中村三郎中佐的叙述》，《华北治安战》（上），第157页。

(313) 《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例》，《华北治安战》（上），第291—292页。

(314) 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第240页。

(315)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6页。

(316) 《共军的政治工作》，《华北治安战》（上），第100页。

(317) 《剿共指南》，《华北治安战》（上），第408页。

(318) 《新国民运动在高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459—460页。

(319) 《华北“治强运动”总本部第三次“治运”成果检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519—521页。

(320)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7页。

(321) 陈毅：《茅山一年》，《陈毅军事文选》，第86页。

(322) 陈毅：《茅山一年》，《陈毅军事文选》，第91页。

(323) 余子道：《汪伪国民政府的“清乡”运动》，《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325—326页。

(324) 《江苏崇明施静庵等请制苛捐杂税的呈文》，《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清乡”运动》，第330页。

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中德关系的曲折反复和断交宣战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德之间在军事和经贸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在政治关系方面也有着良好的互动。直到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正式访问德国五日，迭与德方军政最高当局会晤，希特勒还邀请孔祥熙赴慕尼黑纵谈二小时，“对我作诚恳好意表示”[(1)]。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德关系不时出现大的曲折反复，虽然中方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加以修补，但是仍然无法挽回，中国最终不得不对德断交乃至宣战。

一　德国承认伪满洲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德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国别关系中的亲日反苏取向，中德之间原先的良好关系受到了负面影响。

当时，国民政府在着力推进对苏关系的同时，力图避免损及中德关系。1937年7月27日，蒋介石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日本如继续入侵，必将使整个东亚被拖入战争旋涡。他向陶德曼保证，中国尚未与苏联缔结任何条约，但如果形势发生变化，他仍拥有回旋余地[(2)]。8月中旬，德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亦译作白龙培）均向再度访德的孔祥熙指出：对于中日战

事，“德国必须保持绝对的中立。惟如范围扩大，苏联卷入漩涡，则形势复杂，恐将影响欧洲”，对中苏接近可能影响中德关系，表示了担忧和警告[(3)]。当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曾向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说明中苏订约理由，盼德政府谅解，维持中德友谊及实行进一步之经济合作。沙赫特表示：本人对中国之立场深表同情，自当尽力，但如苏俄对远东有含政治性质之行动出现，则德国因处反共立场，以后地位将极困难[(4)]。稍后，程天放还向德国外长牛赖特（Constantin Baron von Neurath）解释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经过及中方立场，牛赖特则对苏联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中苏关系演变趋势表示疑虑[(5)]。双方的地缘政治分歧逐渐凸现。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的国际战略取向日益明确。1937年11月6日，德、日、意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这实际上是法西斯三国轴心的雏形。1937年11月底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之后，国民政府非常担心德国政府也效仿意大利，当机立断，撤回了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希望“使德知有所警戒，而不致承认伪满”[(6)]。但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中止后，1938年2月德国政府改组，被认为具有亲华倾向的国防部长布隆堡和外交部长牛赖特被解职，由希特勒本人总揽陆海空指挥权，戈林（Hermann Goring）升为元帅，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出任外交部长。戈林和里宾特洛甫都是强硬的反共亲日派。经过这一人事改组后的德国政府奉行反苏、亲日、疏华的政策，在远东视日本为其最主要的盟国，逐步抛弃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的政策，为了迎合日本的一系列要求，首先是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希特勒政府与伪满当局早已开始了勾结，1936年4月30日，德国政府外汇局就曾与伪满当局的代表在日本东京签订过贸易协定，当时国民政府向德方提出过交涉，在德方保证不会公开承认伪满之后，中方没有把有关交涉的文件公布。待到1938年1月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破产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便向德国政

府提议承认伪满洲国，以示对日本友好。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出，希望德国继意大利之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7)]。这同德国政府亲日疏华的政策一拍即合。而国民政府对德国政府将承认伪满一事也有所知晓，但到了2月19日即德国宣布承认伪满的前一天，中国最高当局依然对德国政府会否走出这一步持有幻想[(8)]。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汉口向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指出，蒋介石和中国政府都希望，有关德国政府将承认“满洲国”之传闻完全无稽，“中国政府并愿中、德之特殊友谊将继续发展进至更密切之合作。在德方似应保持其现今中立态度，俾将来对于中日问题之解决，有一贡献之机会”。陶德曼对德国政府是否将承认伪满没有直接回答，但承认日本正要求德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与日本一致。王宠惠要求德国在与日本接近时，“幸勿以中国与中德间之友谊为牺牲”[(9)]。

事实上，在王宠惠向陶德曼进行交涉的两天之前即2月17日，希特勒已经作出了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决定。2月20日，希特勒对国会演讲中，公开宣布德国政府决定承认“满洲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建议中方应采取强硬态度，包括召回大使、向德方严重抗议、将中国的坚决立场通知其他各国，认为“德政府既已决定亲日，政策无再变更之可能，我方再事敷衍，恐亦无效果可言”[(10)]。次日，程天放在会晤里宾特洛甫时，驳斥了德方关于承认满洲国只是“承认事实”的辩解，指出：所谓“满洲国”，世人皆知系日本军阀武力造成之傀儡，绝对不能认为由人民自由意旨组织之合法国家；近年来中、德邦交甚形敦睦，德国政府以前曾一再声称对中日纠纷取中立态度，今竟不顾对华友谊，承认伪国，实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异常不满而予中德关系一大打击[(11)]。24日，程天放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国民政府的书面抗议照会，并且强调：承认伪满洲国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和完全错误的举措，德国前外长牛赖特多次承诺将不会承认满洲国，去年孔祥熙访问柏林时，德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也作过同样的保证，现在对伪满的承认，只能被认为新外长改变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接待程天放的德国外

交部国务秘书麦根逊（Hans Georg von Mackensen）一方面辩解说德国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推托说，希特勒本人是最后的决策者[12]。

当时中国方面对德国承认伪满一事持克制态度。国民政府指示各报刊："（一）不对希氏个人作人身攻击；（二）对德国人民在不作伤感情之激烈论调范围以内，予以指责。"[13] 王宠惠2月22日也向陶德曼表示对德国承认伪满感到"甚深之失望与遗憾"，但又说："深信德国对于中国仍将维持过去之态度。"[14] 24日，王宠惠向陶德曼提交了书面抗议照会，内称："德国政府现已承认中华民国东北四省内之伪组织所谓'满洲国'者，中国政府闻悉之余，深感遗憾。该非法组织原系出自日本之侵略，其产生之者、统制之者、维持之者皆为日本之军阀，事实昭然，无待指明。世界各国对于不承认伪组织之原则，及全体坚持遵行。且该伪组织之成立，完全由于日方之武力一层，即德国自身，亦尝与其他各国正式确认。中、德邦交素称敦睦，因是中国人民对于德国政府此次公布之行动，倍感失望，中国人民对于德国一年来之发展，则怀关切与了解之意。方谓德国政府与人民对于中国发生之事态，亦必以同样情绪予以观察，乃德国政府对于东亚现有之痛心事态，似有误认或误解之处。对于所谓既成事实过分注重，而未经正确之透视。凡承认主观方面以为真正之事实，而对于该项事实之如何发生，与最有关系方面之权利，未偿详加研究，则其推演结果，国际间进行其正当有秩序之国交，势必受其影响而趋凌乱。"[15] 这是国民政府对德国与伪满勾结问题，第一次向德方正式提出的书面抗议，但对德方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主权的行径，未加以严厉的驳斥，表现出对德方的迁就和退让。此外，国民政府没有采取其他外交行动，亦未召回驻德大使程天放。虽然中方一再克制，德国却一再孤行。1938年5月12日，所谓的《德"满"修好条约》在柏林签署，除了宣称"应即开始两国间之外交及领事关系"外，还表示"应从速开始关于缔结一般通商航海条约之交涉"[16]。

国民政府为什么未对德国承认伪满作出强烈反应呢？当时德国军事顾问仍在参与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部署规划，而且德国仍然是中国海外军火主要来源之一。既然有求于德国方面，国民政府认为就必须维持与德国的关系。只是国民政府方面的迁就和妥协，既未能遏止德国与伪满之间的进一步勾结，也无法阻止德国继续恶化对华关系。

二　德国政府执意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早在20年代的广州时期，国民政府便聘有退役德国军官为军事顾问。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有过包尔（Max Bauer）、魏采尔（Georg Wetzell）、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各任总顾问，经双方的努力，那些以个人名义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已经在中、德两国军事合作、购料易货乃至政治关系领域，都起着十分特殊的重要作用。而在抗战初期，中、德关系走向倒退的过程中，双方围绕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应否被召回，有过不少的交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密令各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队，对于德国顾问可能将中国军事秘密供给日本之可能，注意加以防范，但旋撤销该密令。蒋介石亲颁谕令，应对德国军事顾问照常信用[(17)]。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曾北上保定，与中方指挥官共同研究华北对日作战的方案；在“八一三”战役期间，他又赴上海前线，协助指挥德式装备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作战。1938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法肯豪森又偕其他顾问前往战地参观，并与白崇禧一起分析战况。另外，同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设立战时将官研究班，德国军事顾问担任了主讲[(18)]。当然，在国民政府看来，德国军事顾问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还具有维持对德关系的重要象征意义。

德国政府之所以召回在华军事顾问，最初主要是来自日本的压力。1937年9月，日本就向德方提出交涉，称德国军事顾问介入了华

北和上海两个战场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战事，而法肯豪森本人则在上海指挥作战，要求德国政府召回在华顾问。当时德国方面抵制了日本的压力，驻华大使陶德曼便对日方的指责予以否认，称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只是从事教学和训练，并没有担任军队指挥或高级参谋，无论上海还是华北前线都没有德国顾问参与。陶德曼并向德国政府指出，如果召回在华顾问，就会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后果[19]。同年10月15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还当面向中国大使程天放否认德国政府有召回在华顾问的打算，称只是要求在华顾问不要介入前线战事[20]。

待到1938年1月德国调停中日关系失败后，2月初日本政府就正式要求德方召回在华顾问。希特勒当局见承认伪满洲国并没有导致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便在亲日疏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8年3月初，德国单方面宣布中止双方在军官培养和训练方面的合作协议。4月下旬，德国政府又以对中日冲突保持中立政策为由，照知中方将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当时包括法肯豪森在内，在华德国军事顾问有24人，另有若干名军械、军辅事务方面的顾问[21]。当时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德国公开对捷克进行军事威胁，英、法试图加以反制。欧洲局势趋紧，使得德国进一步联日，中、德之间的交涉沟通更为困难。

德国政府继承认伪满洲国之后不久就提出召回在华军事顾问，这使得国民政府对中、德关系的认识有了较清醒的认识。1938年5月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德意不可恃，应倾向英、美、法、苏[22]。但是，为阻止中、德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方还是尽了较大的外交努力。4月下旬德方提出召回军事顾问之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奉命立即向德国外交部交涉，指出德国军事顾问经中国政府聘用已久，他们在华服务只是私人行为，与德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并不抵触，德方完全没有必要召回在华顾问。程天放进而指出，最近德国承认伪满政权，已对中德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如再召回在华顾问，必对两国邦交更为不利[23]。4月底，在华德国顾问团总

顾问法肯豪森通过陶德曼向德国政府提出不同意见，称：所有在汉口的以及在内地的德国顾问都只是在军校担任教官，没有任何顾问派往前线；依据个人合同，顾问在华服务要到1939年或1940年才满期限，如果单方面不履行合同，在法律上要承担责任，并且损失相应的薪金和回国的旅费；大部分顾问现在回国后都难以找到工作职位，而他们在华财产将蒙受损失；顾问团总部聘请的德籍女秘书也将无法筹得回国的旅费；因此，德国政府必须保证在华顾问以及眷属和女秘书的回国旅费，保证担负因毁弃合同所引起的所有损失[24]。陶德曼本人也并不赞成立即撤回顾问团，担心德中关系更趋紧张。

但是，德国政府已经决心召回在华顾问。5月13日，德国外交部通过驻华使馆命令法肯豪森：在华军事顾问必须尽早回国，德国政府打算支付他们的旅费和其他相关开支；但是如果在华德籍顾问拒绝回国，德国政府将予以严厉处置[25]。5月21日，陶德曼又奉令向王宠惠提出，召回军事顾问是希特勒的命令，希中国政府解除与德国军事顾问间的契约，并尽快安排他们回国。王宠惠指出以下各点：中国国民必以为德国此举无异间接支持日本；从法律上言之，中日之间并没有宣战，并不适用于中立法；德国顾问系以私人资格在华服务，同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华顾问一样，对各该本国政府并不承任何义务；也不介入实际军事行动。王宠惠希望德国政府予以慎重考虑[26]。事实上，当时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一些德国顾问确曾向中方表示愿继续留在中国服务[27]。5月底，王世杰也向陶德曼郑重提出，在召回军事顾问问题上，德国政府“应重视十数年来中德间之友感”[28]。

德国政府并不因为中方的再三要求而作罢。6月10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陶德曼，限中方在6月13日之前就德国顾问离华日期作出明确的答复。到了13日，德国外交部甚至要求陶德曼照知中方，如果不同意德国顾问回国，德国政府将召回驻华大使[29]。6月14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将尽快离华返德，“告其解除顾问契约，我不愿其国民为中国关系而违反其政府命令也”；但提出

有四五名顾问须暂不回国，以免泄露中方的军事秘密。陶德曼“因惧本国政府之谴责，仍以全体返国为请”[30]。蒋介石一度仍不打算让步，“决令德顾问不得余命令不得离开职务”[31]，但德方继续一意孤行。21日，陶德曼转达了德国外交部命令在华德籍顾问尽速回国的电文，如不遵令办理，“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这对在华德国顾问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日陶德曼还偕同法肯豪森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声明：“如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全体德国顾问之即时离华不予明白表示同意，并担保该顾问等之离华（安全回国之意），则本大使奉令立即将所有职务移交于代办，离华返国。本大使又奉令表示下开意见：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德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32] 这等于是借召回顾问问题向中方下达最后通牒。国民政府外交部于6月23日仍按照蒋介石的意见照会德国大使馆，即同意解除与德国顾问的聘用合同，允许这些顾问回国，但有五六位德国顾问须在了结未尽事务后，再离华回国[33]。陶德曼即表示他将不得不离华回国。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借口中方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明确同意让所有德国顾问回国，于是下令召回陶德曼。6月26日，陶德曼便仓促离开汉口返德。6月28日，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全部德国军事顾问离华。但是，中方的最终让步没有能够使得陶德曼重返中国。陶德曼原为驻华公使，1935年中德关系升格至大使级后，陶德曼为德国首任驻华大使，但也是最后一位德国大使。1938年10月汉口失陷前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要机构均迁往重庆。当时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驻华使馆都相应迁至重庆，但德国使馆却安置于上海，在重庆仅设使馆的下属机构。然而，德国政府意欲借召回军事顾问一事，继续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虽以退役军官和个人名义受聘于国民政府，但却是中德军事合作的一大标志，其中不少人与德国大军火商甚至政府军工部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德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还直接帮助中方在德订货和运华。“德国军火在华所以能够找到

这么大的市场，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存在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德国商人明瞭，如果仍然打算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就不可能撤回军事顾问”[34]。德国军事顾问被强行召回，既说明了德国政府远东政策亲日疏华的大势已定，更意味着两国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将出现大的倒退。

三　购料易货关系的勉力维持和中止

较长时期以来，中方向德国采购军工械料、工业设备，同时向德方提供农矿产品，德方为此提供1亿马克的滚动信贷，以作为维系这种购料易货关系的财政保证。德国固然可以得到钨、锑、锡等重要矿品和多种农产品，对中方而言，则是获得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重要渠道。从涉及战时两国易货事务的机构来看，德国政府方面主要是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以及与政府和军方关系密切的军工重工企业合步楼公司，其驻华代表为克兰。中国政府直接负责对德易货事务的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1938年初至1939年12月孔祥熙还是行政院长；负责与合步楼公司接洽德国工业品订货和控制输德矿产品的是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1938年后资源委员会改属经济部，翁以经济部长的身份继续兼任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在对德易货事务方面，资源委员会往往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而对于行政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至于德国所需农矿产品的采购和运德事宜，则由中央信托局负责。在德国，驻德大使馆（大使先后为程天放、陈介）亦为推进易货事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使馆的商务专员（1933年3月起为谭伯羽）承担着军工品的订货督运等具体工作。

抗战爆发初期，德国政府对军品输华并无限制。据德国外交部的统计，1936年和1937年达成的输华军火合同金额分别是6458.1万马克与6098.3万马克，实际输华军火总价额1936年为2374.8万马克，1937年就增加到了8278.86万马克，种类有：步枪、冲锋枪、2公分

口径机关枪及子弹，15.5公分口径大炮、高射炮、反坦克炮及炮弹，坦克，飞机，海军舰艇，探照灯，火炮牵引车等[35]。据德国国防部国防经济署署长妥玛斯1937年6月9日致蒋介石的电文：当年6月德国对华起运步枪枪弹1000万发，摩托车39辆，防空炮60门，装甲侦察车18辆，海防炮2门，鱼雷24支；7月将起运有：步枪枪弹1000万发，防空炮60门，海防炮2门，快艇若干；8至10月均将有机械化防空炮装备起运[36]。又据1937年12月初克兰对翁文灏所言，价值1100万马克的步枪子弹即将运抵中国，当月初将起运的还有105公厘大炮36门附炮弹36000发，150公厘海防重炮4门附炮弹400发以及炮测仪2件，轻迫击炮弹25000发，高射炮及30.7公厘高射炮弹72000发，探照灯2套，防毒气罩10万具，燃烧弹25000枚，10公斤飞机炸弹20000枚，50公斤飞机炸弹2500枚，步枪子弹3000万等，约共值1900万马克。12月15日起运有30.7公厘高射炮弹54000发，30.7公厘防战车炮弹50000发，70.5公厘高射炮24门附炮弹92000发，探照灯2种共63架，听音机18架，燃烧弹75000枚，10公斤炸弹30000枚，50公斤炸弹8500枚，约共值2500万马克[37]。当然，为了避免引起日方的反对，中国在德订购军火和起运，尽可能加以保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力图加快德国军火的输入。1937年8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德国期间，即“订购德机百架，其中八六号重轰炸机25架，下月初即可起运”[38]。另外，抗战初期中德技术合作也在进行中。1937年6月25日，资源委员会代表翁文灏在柏林与德国合步楼公司订立合办湘潭中央钢铁厂的合同，决定由克虏伯公司为首的德国厂商提供设备，并于1939年下半年安装完毕和开始运用[39]。1937年8月1日，资源委员会代表钱昌照、恽震，与德国西门子霍尔斯克股份公司签订了电话厂协助合同，在中国中部设立工厂，德方提供各项电话器材料、厂房和机器设计、制造、安装，中方派遣工程师和学生。除安装工具款之外，资源委员会同意支付酬金营业净额3.5%，不少于第一年8万元，第二年9万元，以后八年每年10万元[40]。此外，1937年由中德双方的技术专家拟订了

《中德经济合作计划》，提出20年内，中德双方交换货物至少达9亿5千万瑞士金法郎。德方要求中国提供的有：锑、钨、金、银、铝、锡、锌、铜、锰铁和生铁、桐油、丝、茶、大豆、其他；德国对华提供有：农业工具及轻机器，农产加工设备，制造肥料设备，铁道建筑及修理材料，电车等轻便材料，公路建筑之机械设备，载重汽车，耕种机，商用飞机，桥梁及其他钢铁建材，采矿设备，选矿设备，强电、电信，轮船，码头，挖土机，自来水厂，灌溉，抽水，水泥厂，卫生，炼油，等等[41]。

抗战爆发前，中国方面总体上能够积极履行易货合同，组织出口往德国的货物。至1937年2月份止，中央信托局在对德易货案下，订购并已向德国运出货物共16700吨，其中钨砂1250吨，锑砂600吨，锡砂50吨，芝麻7100吨，豆油850吨，桐油200吨，以及蚕豆370吨、蛋330吨、茧120吨、棉籽油975吨、花生仁4000吨、花生油925吨，货款达8,825,120.25元。待运德国的货物有：钨砂1250吨、锡砂110吨、花生9500吨、花生油6430吨、芝麻6350吨、桐油400吨、棉籽油2450吨、蛋70吨、蚕茧70吨、猪油450吨，共约27080吨，11,619,845.55元[42]。抗战爆发后，中方加速运送货品往德国。至1937年10月止，中央信托局订购输德农矿品货价共4074万余元，其中业已运往德国的部分为2886万余元。到次年1月，尽管受战事影响，采办货物已经比较困难，中央信托局仍然订购了运德农矿品约650余万元。不过，中方已经感觉到德方态度的变化，在运输、价格等问题上种种挑剔，为难中方[43]。在处理相关交涉时，中方不同机构之间也会出现分歧。1938年6月，掌管钨砂产销大权的资源委员会决定，钨砂售价改国币定价为英镑标准，如以国币偿付货款，须以市面汇率折算。由于法币汇价的下跌，按照这一折算办法，钨砂报价增加不少，引起德方不满。而负责购运输德货物的中央信托局，则以财政部关于所有运德货物均以国币购买、再以中央银行汇率折合的规定，向资源委员会提出异议。当时，如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曾指出：“惟目下所感困难者，即为资源委员会之多方留难，要求照英镑

售给，若不给予英镑，即须照市价予以法币，事实即换汤不换药，无形中使货价抬高，致未能接受，如不予照办，恐资源委员会或将以矿产品销尽为推辞。”[44] 孔祥熙甚至蒋介石都向资源委员会提出，不应以货价问题影响履行对德易货。但是资源委员会坚持钨砂产销成本居高不下，对外应参照伦敦行市以外币报价，对内则另定国币价格。最后，孔祥熙只好同意按资源委员会的报价办理[45]。

随着德国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政权、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等举措，中、德政治关系急剧下降；但是双方间的易货购料关系，却在特殊的条件下维系着，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

1938年5月初，德国政府一度决定禁止对华出口军火。这意味着单方面中止两国间的易货关系，停止履行业已订立的向中方供货的合同。当时德国政府军火出口运输处向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密称，军火仍可照常起运，但避免日方侦探，以后运货不能用客轮，均须改装货船[46]。

当时中国在德国订购有大批军火，包括枪炮、弹药、车辆等，有的装运出厂后受检遭拦截，还有的根本不准装运出厂。为使此事有转圜余地，中国方面没有公开提出抗议，但向德方进行了必要的交涉。5月9日，蒋介石便对陶德曼指出：尽管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并不融洽，但意大利也没有停止交付业已订购的军事物资，中德易货协定实施已有多年，如果德方停止履行供货合同，而其他国家仍然继续向中国供应军火，将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不满，中德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47]。中国驻德国商务专员谭伯羽也奉命频频进行游说，从德国政府军工署负责人、合步楼公司经理到军火厂商。这些人对于德国政府针对中国的军火出口禁令，也有所不满，他们认为一旦实行对华军火及有关物资的禁运，受打击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德国本身的军火工业以及运输等行业，也都将直接蒙受严重损失。在德国政府内部，经济部和军工署都不赞成断绝对华输出军火，认为这将使中国的军火订单落入他国之手。合步楼、克虏伯等大公司厂商的代表数度出

面，要求德国政府允许继续按已订立的合同向中国交付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否则各厂商将难以承受因违反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

于是，德国政府同意按已订立之合同继续向中方交付军火，但须以第三国的名义把军火运出德国国境，然后再转交中方。结果，中方假借芬兰、卢森堡等国的厂商名义，把所订购的军火运出德境，再辗转运往中国。可是，这种间接交运军火的方式，对中国甚为不利，一旦军火运华途中发生损失，中方无从向德国方面交涉。至于在德国达成新的军火合同，其难度则更大了。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经济部、军工署的部分官员仍主张维持对华经济往来，他们绕过了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等人，采取主动措施推进对华经济关系。1938年夏，德国合步楼公司的代表佛德博士秘密抵达汉口，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张群、经济部长翁文灏等人的接见。佛德向中方表示系代表德国政府来华，洽商以军事装备换取以矿砂为主的原料，并称这一合作对两国间的经济、政治关系裨益匪浅。国民政府方面对佛德的来访颇为重视，至1938年10月，佛德与中方在重庆达成如下各点谅解：1．明确规定《中德易货协定》及信贷合同继续有效，其有效期暂定为一年；2．在合同范围内，中国若付以现款时，德国则按国际市场价格及出口货物价格计算，向中国提供军械及弹药除外的各军工厂所用的一切材料、半成品、汽车等；3．中国可在不需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在德国订购2000万马克的货物，德国另向中国提供一万万马克的滚动贷款，年利率仅为5厘；4．中方每月供给德方800万元法币的原料（依正式汇率计算，如按普通汇率合1200万元法币），即1年内供给约合7000万马克的原料，其中须有50％为矿物，即每月须向德方提供钨、锡各500吨，锑300吨；5．今后各项货品采购，买主与卖主可直接进行，合步楼公司和中央信托局仅作为会计、统计暨顾问机构；6．中国政府组成中央采购统制委员会，负责审核中国对德各项货品的订购申请，并监督其采购范围及预算情况，订购方面应派技术专家来华协助该委员

会工作。此外，双方还对以往合同的交付情况作出处理意见，德方同意在最近4个月内交付总额为720万美元的军火，包括2.2亿发子弹、数万发炮弹；同期内中方交付钨砂和锡各3000至4000吨、锑3000吨，充抵军火价款；德方同意中方撤销价额达2亿马克的不急需的订货合同，但中国在德国的潜艇订货合同仍然有效；中国海军仍可派军官学员赴德学习训练[48]。1938年10月19日，以上述谅解为主要内容的“中德新易货协定”在重庆签署，把双方每月的易货额提高到1000万元法币（合750万马克）[49]。

应当指出，当时中德经贸关系得以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有所改善，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交涉和签约，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1939年8月26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的第三天，中国驻德大使陈介便向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表示了中国政府的祝贺，希望中德经济和政治关系由此获得更好的发展。魏茨泽克则谈到，以往几年因为德苏矛盾和中苏友好，德中关系出现困难，德苏签约后，妨碍德中关系的障碍已经去除[50]。此后德国军火和其他工业品一度又大批运抵香港，由在港合步楼公司和中方代表合作，将其运至中国后方各地。通过佛德访华及双方签署的协议，中德易货关系和新的计划得到了两国政府的确认，自德国军事顾问和陶德曼大使被召回之后，中国政府的担忧和疑虑，暂时得到了缓解。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中方避免公开谴责德国，同时希望双方易货购料关系出现新的突破，向德方提议签订扩大德国军火与中国矿砂交换额的合同，为期五年。孔祥熙甚至向在重庆的德国外交官提出：只要德方同意，中方愿保证在今后50年里向德国提供矿砂[51]。在德国政府内部，亦有维持对华经济关系的主张，连戈林一度也表示对中国的“交易仍愿照常”，条件是中国提供金属矿砂并有合适的运输途径[52]。但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只同意扩大武器之外的德国工业品同中国的易货额，急需获得国外军火接济的国民政府方面当然非常不满，遂使这一合同未能达成。不过，德国合步楼公司仍数度

向中国方面秘密接洽，表示愿维持双边贸易，将设法使德国货物运至中立国，再转运来华，希望中国方面以大量钨、锡接济德方。合步楼公司还直接致函孔祥熙，商洽双方具体交付办法。这一动向引起国民政府各有关方面的注意。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认为："德方既有此表示，我国似应趁机善为运用，使德国对远东之和平作有利于我之努力。"但是，具体负责矿产品采购和售运的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则认为，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须慎重考虑德方的建议，英法在加紧对德国经济封锁，如果中方与德方实行易货，以重要矿产品运往德国，万一被英法探悉，会被认为中国在援助德国；且矿产品及其他货物须由越南或香港出口，英法如果为难，中国将得不偿失。蒋介石得悉翁文灏的意见后，于12月3日指示对德方虚与应付："关于对德供给锡产一节，自以暂缓为宜，但亦不必拒绝，只言筹划可也。"[53] 1940年1月5日，德方再度致函于孔祥熙，称将把德方所制柴油汽车100辆、电话制造厂材料等列入易货范围，供给中方，深望中国亦能以钨、锑数百吨运德，并于短期内准备就绪。当时中方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不即不离态度周旋应付"[54]。在处理与德国的贸易关系时，中方不得不慎重考虑英法的因素。

从1937年起，中德之间贸易额逐年下降。1937年中国自德国输入货物总价额6440万海关两，1938年下降为4938.5万海关两，1939年再度减少到3353.3万海关两，1940年已跌至2033万海关两。相应年份，中国对德国输出货物总价额也连年下降，分别为3185.5万海关两、2449.7万海关两、1862万海关两、151.4万海关两。另外，中、德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急剧下降。1937年中、德间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5%，1938年尚占10.2%，1939年下降至5.15%，1940年就只占1.48%了[55]。

中德经贸关系的下降，既与德国政府日趋消极的远东政策密切有关，还与欧战的爆发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无论是德国军工品、重工业品输华，还是中国农矿产品起运供应德国，都受到过来自英、法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阻扰。如孔祥熙前向合步楼公司购枪弹6960万余发，1938年5月德政府密令禁止军火运华，合步楼委托芬兰一家公司（Dahlberg & Hilbert Co．），呈孔祥熙核准，定金17.5%，前后运出5500万发；其余1460万发，原定1939年9月初装载德国利克茂公司轮船运华，欧战爆发停止行驶，德官方不给出口许可，余货堆在不来梅港驳船中，最后只好请芬兰公司设法出售。又如，1939年4月1日驻德商务专员处曾代兵工署经芬兰公司转向莱茵厂订购37炮料156门。定金50%已由合步楼公司于合同签署后交芬兰。欧战爆发后，德方要求中方交全部款，后商请芬兰公司转运瑞典堆存全部炮料，但未运出[56]。可以看出，欧战爆发后，中国直接与德国方面交涉经贸纠纷愈益困难了。

欧战爆发后，英方封锁输运德货物，包括载有中方输德农矿产品的货船，均在禁止之列。中方曾屡屡向英方交涉，指出系执行欧战爆发前的对德易货协定，英方不能没收[57]。后来，英国甚至对中国运往苏联的货船也予以扣留，怀疑这些货物将被辗转运往德国，虽经交涉仍无结果[58]。至于英国本国的货物，更是严禁运德。欧战爆发前，驻德中国商务专员处曾请德商Isola—Werke公司由英国转运云母片9万片，货款已付清，原定1939年9月在汉堡交货，欧战爆发后，该批云母片无法运出转交中方，不得已之下，中方遂向德国公司交涉退款，德方称已付与英国，无法退回[59]。当然，这种情况中方也不可能从英国得到补偿。

法国方面，原先对经过法属越南的运德货物并无限定。欧战爆发后，法国不允许中国矿品经越运德，要求收购在越被扣留的中国矿品。即便是在越的运德农产品，也要求中方提出证据，如在1939年9月3日以前订立买卖契约的，可以通过输出，否则也不许通过。只是在中方反复交涉后，经越南的运德货物才获得暂时解决[60]。

驻德国商务专员还曾把向卷入欧战各国所订而未运出的共240余吨货物存意大利，1940年12月后又设法转运存瑞典。1941年6月下

旬，恐德国承认汪伪后，中国政府在德国存款被德方没收，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把不能外汇之合步楼公司枪弹余款538,625.08马克，以及兵工署结余合步楼公司货款180,207马克，改以谭伯羽私人名义，分别汇存交三殷实德商公司，改订货物，备作运保费等[61]。这些不得不为之的措施，风险也是很大的。

在上述复杂、困难的环境下，中德易货关系的维系诚属不易，遑论进一步发展了。

待到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德间政治关系日趋冷淡。1941年7月，因德国政府公开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宣布中断双方外交关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2月9日分别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中国对德国断交、宣战后，不仅完全中止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且也彻底停止了向德国出口钨砂等物品。这标志着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战时对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得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战前便开始的中国政府有关机构主持的自德购械购料，以及采办运送输德农矿品等方面的事业，也最终划上了句号。

四　中国对德断交与宣战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曾希望德国因其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出面劝止日本侵华。当年7月27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时，告以日本积极行动危害东亚和平，请陶大使转电德国政府，“速以德日防共协定签字国之地位，劝告日本停止在华行动。”陶德曼当即表示：“该项协定实与现在中日形势无关。”三天后，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表述了德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德政府认为不能以该协定为根据，请求日方停止在华行动，反之日方亦不能以该协定为根据，请求德方为任何协助，但德政府业已再向日政府劝取和缓态度云云。”[62] 德国既要从反苏防共的战略利益出发，确立与扩大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但也希望多年来与中国之间

的良好关系得以维持下去，因而对于日益扩大的中日冲突，德国政府大体上持中立立场，同时择机进行调处。

从1937年10月起到1938年1月，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多次向国民政府决策层传递经由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得来的日本议和条件，试图促成中日之间议和。

1938年10月22日，陶德曼在上海从日本参谋本部军官马奈木敬信那里得到了一份停战备忘录，日方希望由陶德曼或法肯豪森把日方的条件转告蒋介石。当时，陶德曼曾经指责日本的军事行动严重损害了德国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地区的商业利益[(63)]。同时，根据德国外交部的正式指示，1937年10月底，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传递了德方愿意为中日之间居中联系的意愿，希望中方做好相应准备。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告知了日本的议和条件：内蒙古实现自治；华北与“满洲国”之间建立非军事区，由中方维持秩序；在上海建立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来管制；停止反日政策；共同防共；减低日货关税。陶德曼还表示，希望中国不应失去议和的机会。对此蒋介石予以拒绝，并且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蒋还希望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条件，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这个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注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64)]。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方的“议和”条件。

待到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弃守上海、日军沿着京沪铁路向南京紧逼之际，陶德曼又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次长徐谟等人提出，日方的条件并不苛刻，希特勒也希望中国考虑与日方议和。另外，德国外长牛赖特也向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提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议和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可能扭转日本在军事上的胜局，“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

大”。可见，德国政府是劝说中方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的。

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向陶德曼表示，中方愿意与日本进行和谈，但是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且和谈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议。陶德曼则指出：中国必须宣布愿意讨论日本的条件；华北的中方负责人应是对日本友善的；德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在幕后帮助中国，但不参与直接谈判；中国应当注意到日本的反共要求。陶德曼还提到，中日停止敌对行动的步骤，即在蒋介石的声明交给日本，而且日本的同意的答复也已经收到之后，由希特勒向中日双方政府建议停止敌对行动。蒋介石表示同意，但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的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陶德曼建议德国政府应尽量支持蒋的这个要求，否则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大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亲苏的人掌握中国政府；他还提出，日本应对蒋介石愿意和谈的态度给予便利，以使蒋得以完成和谈[(65)]。此时，德方对于能够促成中日停战议和颇为乐观。

12月5日，外交部次长徐谟把蒋介石的谈话以书面照会的方式交与德方，并且重申：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日本必须停止敌对行动，日方所提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最后通牒。12月7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把中方的答复转给了日方。

然而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后，次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决心提携亲日政权，彻底惩罚抗日政权，从而根本解决日华间的问题。”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要求德方向中方转达的基本条件：1．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区，并在该地区内各地设置特殊机构；3．日、满、华三国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4．中国对日本赔款。另外，日方还要求德国方面向中方强调：中国政府的代表需到日本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谈判，谈判期间日军不承诺停止军事行动。于是，12月26日陶德曼在汉

口向孔祥熙转达了日本的最新议和条件，并要求中国不要向苏联做任何进一步的亲善。

当时国民政府高层也有接受议和条件的主张，但也有反对议和的意见指出："目前言和者，无非以为和则国民政府之生命可以延长，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协约。和议成后，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个月，政府必不能维持。"[66] 当天蒋介石没有出面，仅由孔祥熙代为会见陶德曼。但在得悉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新提出的条件后，蒋认为："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以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至纠纷矣。"[67] 经过第二天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的讨论之后，蒋介石"乃即决定不理敌之条件"[68]。国民政府其他要员也向德方表示了对日方的不满，如孔祥熙便向陶德曼谈到，日方的新条件实际上是要求在中国为所欲为，日本将使中国绝望并倒向布尔什维主义。12月28日，铁道部长张嘉璈也向陶德曼指出：日本的条件不仅意味着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而且中国其他地区也将被视作第二个"满洲国"，中国在政治、经济、财政上的独立都将不复存在。陶德曼认为中方的解释过于悲观，但也感到可以理解，他把中国政府的反应报告给了德国外交部。在德国方面看来，中国眼下接受日本的条件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但也认为日本应当适可而止，并且由狄克逊转告日本政府：德日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的共同利益，需要中国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即使这意味着不能全部满足日本的条件[69]。

对于中方的疑虑和不满，1938年1月1日，陶德曼向王宠惠、徐谟转达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个人对日方所提四项条件的理解：第一条，首为承认"满洲国"，至加入反国际共产协定及废除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一节，日本虽认为适宜，但并不要求，又中国须以积极证据表示排共之诚意。第二条非武装区域一点，日方意欲有三处，即内蒙、华北、上海附近；第二条特殊政权，内蒙须自治，华北须有权力甚为广

大之特殊政权但仍属于中国主权之下，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外于并不十分广大之地域内，设立特殊政权。第三条经济合作一节，日方指关税与商务而言。关于第四条之赔款，一部分为战费之赔偿，一部分为日本财产损失之赔偿，又占领费用亦须由中国负担[70]。当时中方请陶德曼继续了解日本的意思。日本政府却透过德方逼迫中方作出最后答复。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要求：中国方面须于1月15日前作出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当天，中国外长王宠惠向陶德曼递交了正式答复："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是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的研究，作出确切的决定。"陶德曼提出，中方的答复没有表示希望和解的意愿，会被日本认为是在搪塞。王宠惠答称：除非知道了日本的要求的详细内容，中国政府不能作出决定，也不能表示意见[71]。1月15日，孔祥熙在会晤陶德曼时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绝不是想采取搪塞的态度，政府中曾经多次讨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对于国家和国际都有很重大的关系；中国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愿意同日本实现真正的谅解，以保证持久的和平；中国诚恳地希望寻觅每一条可能的和平的途径。孔要求陶德曼向日方转达如下声明："中国和日本竟会从事目前的武装冲突，使两国都蒙受灾害的后果，这是极为不幸的。中国仍然抱着与日本达成真正谅解的愿望，俾东亚的持久和平得以保持。""我们已经表示了诚恳的愿望，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出的'基本条件'的性质和内容，因为我们愿意尽每一分努力来寻求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迹象。有了补充的说明，我们就更好表示我们对于日本所提出的条件的意见。"[72]蒋介石并指示外交当局"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73]。这就使得德国方面当时无法继续在中日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

另外，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接受日方的迫降条件，日本政府遂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

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中国。”[74] 决定中止中日之间的交涉，战时德国对中日战争的第一次调停也收场了。

如前所述，1938年2月德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中德关系蒙上了阴影。同年6月下旬德国撤回在华顾问和驻华大使陶德曼，且不再派出新大使，对华政策明显趋于消极。但是，国民政府依然重视德国在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并采取种种措施以冀改善对德关系。继陶德曼回国后，国民政府也召回了驻德大使程天放，但很快委派陈介为新任驻德大使。陈介于1938年9月22日抵达柏林后，就向德方表示希望尽快向德国元首希特勒递交国书。可是，德国政府却一次次地借故推迟。11月16日，德方曾向陈介约定递交国书的日期，但又数度被取消。与此同时，希特勒却接受了新任日本大使和伪满“大使”的国书。这使陈介在柏林的处境极为尴尬。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德国政府仍在有意恶化双边关系，蒋介石一度考虑让陈介离开柏林一段时间，甚至要孔祥熙调陈介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长，即日召回中国[75]。直到1938年12月16日，陈介才最终得以向希特勒递交了国书，国民政府对于中德关系进一步逆转的担忧稍有缓解。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德国方面并未放弃过再度充当中日战争调停者的想法。1938年11月，继狄克逊之后出任驻日本大使的奥特（Eugen Ott），在东京与驻南京的德国代办费舍尔（Martin Fischer亦译作飞师尔）讨论过中日冲突的前景，认为日本坚持要蒋介石下台，中日间达成和谈的条件不成熟[76]。1939年9月初欧洲战争爆发，在德国和与之交战的英法之间，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是一个难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考虑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本对英之妥协”。但是，蒋的重要幕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提醒蒋应考虑到不久前达成的苏德条约的规定：“苏俄不得援助与德国交战之国家，则中国对德宣战后，苏联对华之物资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最后，蒋介石接受了王世杰的意见，对德宣战之议作

罢，而是“要求国联制裁侵略，藉以表明我之立场”。同时决定召回驻德大使陈介。稍后，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欧战“不作明显表示”的意见得到确认，业已发出的召回陈介的电令，也被取消了[77]。与此同时，中国驻德使馆参赞丁某曾以个人名义，探询德方出面调停中日关系的可能性。德国方面认为，日本是否愿意与蒋介石和谈，苏联是否打算继续支持蒋介石，在这两个基本问题都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德国出面调停是不适宜的[78]。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汪精卫集团自重庆出逃的风波，成为影响中德关系的新的变数。尽管此前伪满傀儡政权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正式承认，但毕竟不可能威胁到国民政府作为整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另外，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扶持了一些傀儡政权，如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北平的伪华北临时政府、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南京的伪维新政府，这些傀儡政权都有着明显的地区性，其头面人物又都为声名狼藉的民族分裂分子、汉奸或北洋余孽，同样不能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而且不存在其他主权国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然而，汪精卫集团的出逃引起了国内政治局势的极大震动。1939年，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靠日本，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否定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合法地位，另行选举“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设立“中央党部”，由汪精卫本人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该年9月起，汪伪集团又大张旗鼓地开始筹备成立“中央政府”的活动。这引起了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关注，特别是担心其他国家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

根据德国方面公布的档案，早在1939年2月初，汪精卫就曾派员与德国驻河内领事进行过接洽，当时德方对汪精卫集团并不怎么看重[79]。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中华民国惟国民政府依法总揽治权，对内公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主权完整，不容破坏，倘有汉奸集团傀儡组织僭窃名义，擅发文告，或竟与任何国家订立文件，任在何时，概不承认。”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把上述声明

照知各国在华使馆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此项伪组织为虎作伥，实为中国全国人民所共弃，如有任何国家，予以承认，中国政府及人民，即不得不视为非友好行为。"[80] 待到1940年1月8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考虑承认汪精卫领导下的"新政权"，国民政府担心德国政府也将采取同样行动，即令驻德使馆向德国外交部探询，德方称对此尚未作出决定，且汪精卫的新政府还没有成立，在近期内也不一定能够成立[81]。这一答复虽然没有向中方作出任何承诺，但在重庆当局看来，德国至少没有承认汪伪政权的打算。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正式粉墨登场，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即照会德国和其他各国使节，要求对日本扶持的傀儡组织，"决不予以法律上或事实上之承认。无论任何行为涉及任何方式之承认，既属违背国际公法与条约，自应视为对中国民族之最不友谊之行为，而承认者应负因是所发生结果之全责"[82]。由于连日本政府本身也没有立即予以汪伪政权正式的外交承认，德国政府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没有加以相应的考虑。甚至到了1940年的9月初，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还在致希特勒当局的报告中指出：1．日本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毫无成就；2．中国人民和军队服从、忠于蒋介石；3．蒋介石对德国不念旧恶，希望以钨、锑等换取军火；4．汪精卫为日本傀儡，毫无人格力量，且受日本钳制甚严，德国政府千万不要上当予以承认；5．日本牵制英美力量甚微；6．蒋介石决不会与苏俄结盟[83]。

汪伪政权出笼后，重庆方面一度仍希望改善与德国的关系。1940年6月7日，中德文化协会第五届年会在重庆召开，重庆各报刊作了显著报导，体现出国民党当局刻意营造两国间关系融洽的氛围。1940年7月7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致函德国元帅、武装部队总司令凯特尔（Wilhelm Keitel），对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的"胜利"表示"贺意"，同时指出："国民党战后之各项建设，必多借助于贵国之处，而中国之复兴，在任何方面有助于贵国者亦匪可想像……余深信贵国人

士高瞻远瞩，将来必能促成此伟大计划之实现，以解决此次战后之需要，其有裨益于贵我两国及世界和平者，实非浅鲜也。”[84] 蒋介石甚至打算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然而，中德之间不但在政治关系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反而产生了新的分歧。

另外，1940年初起，德国加紧与意大利和日本确立起正式的军事同盟，在此过程中，亦数次试图调停中日关系。如1940年2月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Ernst von Wizsacker，亦译为魏萨克）曾面询中国大使陈介“中国与日本有无直接言和可能”，陈介答称：如条件合理，想无不可谈，倘如最近所传日本与汪所订条件，则任何中国人不能接受。由于涉及到这一敏感问题，魏氏只好表示：德在欧适有战事，对远东无法置喙，但德政府仍持观望态度[85]。

同年夏，原在华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的副官克鲁马赫（Krummacher）向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密告：德方渐注意中日问题，德外交部有出面调停之可能，意谓英无力调和，美以对日关系，亦不便调停，德出调和最相宜，亦于德有利。当时谭伯羽向蒋介石建议，可以答复德方以日本退兵为议和前提。当时蒋介石指示谭伯羽查明这一议和建议是否出自日方，并可顺势要求德国外交部能派大使来华，“以便随时商讨中德经济合作等一切问题也”[86]。中方要求重派大使赴华，这显然又使德方感到为难，不了了之。

1940年夏，德国曾提议让重庆国民党政权参加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这也带有调停中日关系的含义，但遭到日本的反对。同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同盟条约，宣称：“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并承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87]。重庆当局对三国同盟条约的内容极其震惊，认为它标志着德国和意大利公然宣布支持日本对华侵略战争，遂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9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分别向德国、意大利递交了抗议书，指出日本所

谓的“大东亚新秩序”，实际上“乃欲破坏在亚细亚洲及其附近基于法律与正义之国际秩序而行武力征服他国领土之谓”，“德意二国竟承认并尊重日本建立此种新秩序之领导地位，其蔑视国际法律与国家平等原则及助其侵略，莫此为甚”；并指出中国政府保留将来适当行动之权[88]。

但是，待到1940年9月德、意、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之后，德国认为出面调停中日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也希望德国一并向重庆方面施加政治压力。10月初，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已经探悉到了德国可能提出的调停中日关系的条件：日本承认蒋介石政权并撤兵；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及日本在华北的特权，并以上海、青岛、福州、香港、汕头为日本海军基地[89]。当时驻德武官桂永清也转达了戈林关于中日间应实现和平的谈话，但是重庆当局对三国军事同盟之下接受德国调停一事非常慎重，指示桂永清：对戈林谈话最好暂不直接表示态度，如其不再来问询更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知我国之意，如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90]。

接着，日本又利用对汪伪政权的正式承认，要德方传递有意与重庆方面“议和”的信息。1940年10月30日，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参赞告知德国外交部，日本外相打算与蒋介石达成解决中日冲突的谅解。11月7日，日本副外相向驻东京的德国大使奥特明确提出：日本将承认汪精卫政府，德国与意大利根据三国同盟条约的规定也将采取同样的承认，希望德国出面劝说蒋介石与日本就结束两国间的冲突达成谅解[91]。11月11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密谈，吹嘘德国所处的外交和军事地位，称德国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交谊已密”并且益图巩固，可使德国统一欧洲志愿易于完成，英、美联俄将难以完成；德国已对英国完成包围，英国在军事上必将失败，最终胜利终属德国；德国与意大利、日本缔约，是为了促成建设欧洲新秩序，并得到了苏联的赞成，“绝对可望有把握”。里宾特洛甫在提及德国对华政策时辩称，德国政府对中国尤其在经济关系上始

终保持友谊，未取敌对地位，“无如大势所趋，惟强是重，不得不侧重亲日”。他进而提出，日本很可能不久将承认南京（汪精卫）政府，德国与意大利也必继而承认，因此，现在是中日和好的“最后时机”。陈介则答称，中国“为生存与主权而抗战，非达此目的，恐难言和平”；正如此前陶德曼大使调停时蒋介石委员长所表示的，和平须以日军完全退出为先决条件，现在仍持这一立场，如果日军未能放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和平最终不能实现。里宾特洛甫立即表示，很难把日本从中国撤军作为和平方案的基础，尽管他对中国局势并无详细了解。值得注意的是，里宾特洛甫声称仅作为“个人意见”，未受中日政府委托，亦非德国政府自愿调停；而如果中日双方不提出要求的话，他是不会出面调停的[92]。里宾特洛甫故意隐瞒了日本方面请德国出面调停的事实，同时向中方施压和诱骗，以冀使中国向日本妥协退让。

在得悉德国政府再度调停中日关系的上述立场后，蒋介石即于11月21日电示陈介答复德方：必须以日本撤出全部侵华军队为议和前提，“德方当知日本控制中国后，对德终属无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国之独立与主权仍能维持，则将来德国对华之经济发展，自属无可限量”，希望德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审慎考虑”其远东政策。对于中方是否接受他国承认汪伪政权问题，则非常明确地照知德国政府：“汪逆早为国人共弃，绝无任何效能，其伪组织如果被他国承认，更使中日战争永无解决之期而已。”[93] 根据在华德国外交官的分析，当时国民政府内部确实有人主张与日本达成有利于中方的和平，这些人担心苏联与日本达成谅解而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但是亲美派和亲英派反对与日本妥协，由于日本近期在广西战事的失利以及滇缅路所重开，日本的力量被削弱，而美国则可能增加对中国的援助[94]。不管这一分析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可以肯定的是，国民政府当时确实没有接受德方的调停。

到1940年12月2日，德国政府发言人向外国记者指出：日本虽承

认汪精卫“政府”，而德国则并无必须步其后尘之必要，德国此时决不至发生承认“汪政权”之问题，虽三国同盟各签字国彼此有密切关系，但关于对别国之关系，彼此意见上仍有若干不同，德国完全了解日本之承认“南京政权”为一种外交手段，此种手段，在日人观之，系属有利于远东局势之解决者[95]。1940年12月10日，德国新任驻华使馆参赞濮雷森抵达重庆，这表明中、德关系仍得以维持在一定的层次上。

1941年1月，德方又向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谈到：日本自知不能以兵力结束中日战争，德国非常希望东亚实现和平，中国此时与日本谈判和平，日本必无过分要求，实为最好机会；德国进攻英国势在必行，如果中日冲突延至英国被占领之后，则时过境迁，德国想帮助中国，也将非常困难了[96]。但是，重庆国民政府最终没有接受德国的调停。

至于国民政府最为担心的德国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则是该阶段中、德交涉中的重要内容。据陈介掌握的情况，在1941年2月初德方已在酝酿走出这一步。但直到5月，德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仍然否认德国政府有承认汪伪政权之考虑。同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决定在承认伪满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得日本的支持。6月27日，德国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经与意大利协商，希特勒已经决定在7月1日承认汪精卫政府[97]。德国政府对这一决定高度保密，连驻重庆的德国使团也是在6月30日才收到德国政府的正式通知。

另一方面，1941年6月下旬，中国驻德使馆已获悉德国政府即将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6月28日，陈介在柏林就此事询问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的态度，重申中国外长王宠惠1940年11月30日宣言中的主张，希望德国以两国间以往友好历史和未来关系为重，并且明确指出：中国政府立场现唯日本为敌，余均认为友，数年来中国对德已万分容忍，希望德国政府不要承认汪伪傀儡政权，迫使中国对德绝交。魏茨泽克谈到，日本多次要求德国承认汪精卫政府，如果发生这

样的事情，中国政府当然可以自行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德国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如果追随英国将导致不幸后果[98]。另外，德方还向中国驻德国使馆武官桂永清表白，德国为了满足日本的要求，以使日本撕毁与苏联的中立条约，将于7月初承认汪精卫政权，希望中国理解德国不得不利用日本的苦衷，在德国承认汪精卫政府后，中国不要与德国绝交，至少维持暗中联系[99]。

1941年7月1日，德国宣布承认南京汪伪政权。同日，意大利政府也宣布承认汪伪政权。这就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与行政主权，直接威胁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法统地位。此外，德国的这一决定也是对“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华罪行的最公开的支持，国民政府如果不作出强硬的应对，势必遭到中国全体抗日军民的唾弃。7月2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发表了与德国和意大利断交的宣言，内称：“德意两国政府竟已承认南京伪组织，是其侵略政策显已推及远东，且又充分证明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已与中国之敌人同恶相济。该两国政府明知南京伪组织为日本军阀一手造成，乃竟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且不惜自弃其所享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一切友谊。……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国家承认伪组织之举，早经一再声明态度，兹特正式宣告，中国与德意二国断绝外交关系。”[100] 7月3日，驻德大使陈介把中国对德断交的决定正式照知德国外交部，驻德国使馆和各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将奉命撤离。

当时蒋介石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最近二三年来，虽然德国政府屡次对我国采取种种不友谊的行动，如承认伪满，撤回大使与顾问，对于我陈大使呈递国书时种种轻蔑的情形，都是给予我们国家以很大的侮辱，依理我们早应该与他断绝邦交，但我们因为认定这是他们国社党少数人之所为，而并非德国国民真正的公意，所以不愿为了他国内少数人不当行动的缘故，就将中德两民族传统友好的邦交，一旦断绝。……但是我们这种态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我们对德外交更是有一定的方针与决心的。就是等到德国承认‘汪逆伪组织’的时

候，我们就立刻与他断交。现在他既已承认‘汪逆伪组织’，乃是他对于我们中国极大的侮辱，我们如仍一味隐忍，不采取适当的步骤，那我们国家就要失了国格，就不能革命。”[101] 国民政府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对德绝交，实在是抗战爆发几年来德国亲日疏华、一意孤行的结果。

对德绝交后，德国驻华使馆人员及部分侨民陆续撤离回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电知各地政府，对所有在华德侨妥为保护，勿使有任何不当行为，但对行动确有可疑者加以监视[102]。如德华汉沙公司的驻华代表和职员，在结算完竣账目之后，离境回国。对于原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国民政府颁令自1941年8月1日起由本国人独办，所有德方资产由交通部接收保管，德方股东代表、德籍工作人员连同眷属，分批离华回国。一些在华多年的德国传教士，也不得不离华回德。德国合步楼公司希望维持与国民政府的往来，即便中国不便与合步楼保持正式关系，亦请中国政府准许该公司驻渝代表韦尔纳（L. Werner）以商人名义继续留在重庆，以便将来万一交涉之用。蒋介石接受了齐峻的建议，同意由国民政府方面予以韦尔纳维持经费，并保护其安全[103]。

重庆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后，希特勒政府与汪伪政权进一步勾结。在德、意、日的“邀请”下，汪伪政权于1941年11月25日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当天希特勒与汪精卫、里宾特洛甫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还互致贺电。

7月3日，陈介在向魏茨泽克宣布中国对德断交时，曾表示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国际局势的迅速演变使得中国不得不再度对德宣战。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与美国政府紧急磋商，重庆国民政府于12月9日分别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对德意的宣战布告称：“自去年九月德、意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三国显然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

关系。最近德、意与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动，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104] 这样，中德之间由战前友好邦交国，双方关系经历了中日战争爆发后四年多的曲折反复和倒退，由于德国固执其认同甚至公开支持日本的侵华政策，中国最终对德断然绝交和宣战。

抗战爆发后，德国的亲日疏华政策和在军事经贸领域停止对华合作，也促使国民政府把寻求国际援助与合作的重点转向苏联、英国、美国等大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开了战时外交的新局面。

第二节　对法国的交涉和中法关系的倒退

一　寻求法国援华和中、法军事合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法国的远东政策大体上与英、美一致，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有所谴责，对中国抗战表示一定的同情，并且也表示愿意根据商业往来的原则，提供若干财政与军事装备方面的援助。在国民政府看来，法国是欧洲的大国之一，在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又有着相当的军事力量，因而把寻求法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进而实行双方的军事合作，视作对法关系中的重要方面。

1937年6月和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两度访问法国，代表中央银行与法国银行团达成金融借款2亿法郎，拟用于稳定中国法币的汇率；另代表军事委员会与法方签订1.2亿法郎信用借款合同，用于购买法国制造的飞机。法国空军部长甚至表示，愿向中方提供“最合用最精锐之新机”[105]。只是由于中日战事的扩大，法国政府不愿提供相应的担保，这两项借款未能付诸实施。

此外，国民政府委员李石曾、立法院长孙科、驻苏联大使杨杰，都被蒋介石委以特使的名义，相继赴法国接洽援华事宜。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更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与法国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业已订立之经济合同的履行情况，并寻求新的合作项目。

战前法方就对投资中国内地铁路建设颇感兴趣，1936年12月法国银行团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川黔铁路公司达成的成渝铁路借款合同，在抗战爆发后继续得以履行。与此同时，中法之间积极探寻新的合作项目。1938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赴河内，与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夏第（L．Chardy）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商谈修建湘桂铁路南宁至镇南关段工程借款事宜。张嘉璈还就该工程项目与越南总督府秘书长和工务部长、东京省行政长官等法越行政官员进行了会谈。法方从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发展越南商务考虑，对兴筑南镇铁路颇为关注。中方则需在打通西南国际交通方面得到法方进一步的合作，因而在借款合同谈判过程中，作出多处让步。如法方要求在广西获得采矿业务经营权，张嘉璈出面商得广西政府允准同意。

1938年4月22日，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交通部长张嘉璈，同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在汉口签订了借款合同，法方提供材料借款1.2亿法郎，另提供现金借款3000万法郎，并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认购铁路公司股本2.4万英镑，向该公司垫款12万英镑，借款年利息率7厘，期限15年，由法国银行团负责代购筑路材料，收取手续费1.5％及经费5.5％；合同还规定，总工程师及总会计师由法籍人员担任[106]。后因购买车辆需要，双方经磋商后，复于1939年3月31日和10月21日分别签订附约，使法金借款部分的总额增至1.8亿法郎。南镇铁路开工后，日本方面就不断向法方施加压力，作为承包工程的法商建筑公司因而时有耽误迟延情况发生，中方提出过交涉。后因欧洲战争爆发，以及日军攻占南宁，法国方面担心向中方交运的铁路器材将落入日方，遂于1939年11月底起

停止交运。至1940年，随着法国在欧洲战场的失利和越南局势日趋严峻，法方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可能继续履行合同，10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暂行中止该合同。

在达成南镇铁路借款后，中方就考虑举借法国和英国借款，以筑成川滇—滇越铁路。当时中方估计修筑该两条铁路购料和工款将近900万英镑，希望法、英银行团共同承借，1939年1月起中方曾与法、英银行团接洽，但最终未能达成。

抗战时期中法间达成的第二项铁路借款，是自四川叙府经由贵州至云南昆明的铁路工程借款。战前国民政府就开始与法方接洽该项借款，但未能成议。1938年4月南镇铁路借款达成之后，自当年6月起，中方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包括张嘉璈与法国大使那齐亚的会谈，顾维钧在巴黎向法国外交部的游说。中方原先希望英商中英银公司参与该项目，但英方最终退出。中法之间在讨论借款合同具体内容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部门反对由法方独占铁路沿线矿产开发权，后决定允许法方参与开发，中方另由交通部和中国银行设立专门基金，议购矿产品出口。叙昆铁路借款于1939年12月11日在重庆正式达成，由孔祥熙、张嘉璈、中国建设银公司和法国银行团的代表签字。合同规定：法国银行团向中方提供材料借款4.8亿法郎，中国建设银公司垫借工款3000万元，借款年利息率7%，期限15年；中方同意，法国银行团取得叙昆铁路沿线100公里范围以内共同探矿与经营的参与权[(107)]。借款达成后，因核准手续问题，合同延至1940年3月1日始生效。后因法国和越南情势均趋恶化，法方无力履行合同，国民政府交通部宣布自1940年7月1日起暂行中止合同。

至于法国对华军事装备援华和双方军事合作问题，1938年春中德关系出现逆转之时，中国方面转向谋求法国的援助。国民政府特使孙科也赴法洽商，与法国总理兼国防部长达拉第以及殖民部长孟戴尔等法方高级官员会晤。孙科提出中法在远东有共同利害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均应合作，中国特别需要大量军事接济以增强抗战，

希望法方分期提供30至50个师所需最新之武器装备，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两国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保障越南与中国领土之完整，一旦欧洲发生战事，中国可以派遣华工和兵士赴法助战[108]。在此前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就法国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及军事合作问题，与法国当局进行了多次接洽。

关于中方所希望的30至50个师的军事装备，法方表示难以直接大批提供，但原则上同意法国兵工厂接受中方的订货。达拉第本人就曾经批准向中国提供20架飞机。经双方谅解，拟在巴黎设立名为“中法公司”的商业公司，作为法方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中介机构，中方出资1000万法郎（约合国币100万元），法方人士出面主办，专门经理输华军械事宜。在法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允准下，里昂兵器制造厂、马赛南方企业公司、达尔白企业公司、施乃德公司等军工公司，愿意为中方生产各种轻重军械[109]。当时中方以现款订购的军械，法方陆续向中方交付，但毕竟数额较小。由于外汇储备拮据，中方迫切希望法方提供大笔贷款，专门用于在法订购，中方偿付方式以提供矿产品等为主。这也是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英国和美国接洽购办械料时所采取的基本偿付方式。

国民政府还希望法国能够参与中国维持法币汇率的平准基金。在1939年3月初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协定达成后，国民政府就向法方提出为中国平准基金提供帮助。中方先由李石曾以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法国代表德尼（Denys），向法国财政部进行接洽。在进行了半官方的洽商之后，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向法国外交部正式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要求，明确要求法方为中国货币的稳定提供贷款。另一方面，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在重庆向法国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亦译作高思默）也提出同样的要求[110]。此外，英国方面曾多次探寻与美国、法国共同出面维持中国法币汇率。法国方面一度考虑由法国银行向中国法币平准基金投入总额为2亿法郎的资金，法国政府将对法方银行的投资予以担保，并提出法方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占两个席位。

英国欢迎法国资本的加入，但对法方提出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占两个席位的要求颇不以为然[111]。由于英国明显对法国方面加入平准基金管理持排斥立场，也因为中英平准基金的设立未能阻止中国货币的继续贬值，加上后来欧洲局势的变化，法国最终没有向国民政府提供平准基金借款。

中法之间的军事借款交涉，参与的方面较多，持续时间也较长。

在中国国内，国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较早与在华法国银行团进行了接洽，1938年8月，法方原则同意借贷[112]。法国军火代理商欧迪南（Audinet亦译作奥迪内、奥丁勒）不仅活跃于法国政府、军火公司和中国驻法使馆之间，还数度前往中国接洽。如1939年9月间，他便与孔祥熙签订了一个总额为6亿法郎的合同，法方投资在云南和越南建立军事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各类工厂，以供应中国军队[113]。至1940年初，法方对中国矿产品的需求十分迫切，中方则坚持以矿产品交换军事物资。到2月底，法国政府正式同意以军用品换取中国存于越南之钨、锑等矿产品。3月，欧迪南以法国军需部和公共工程部代表的身份秘密访问重庆，进行具体交涉，并与孔祥熙达成协议[114]。

在法国本土进行的军事借款交涉，进行得最为曲折。最初，在法国的中法公司筹备处进行了有关活动，法国财界和政府有意提供总额为1750万英镑的借款，由中方用于在法之购械，中方以矿产品及毛皮等偿付[115]。至1938年11月中国特使杨杰抵达巴黎后，一度由他主持有关的交涉。至1939年1月底，杨杰向国内报告已与法方达成借款原则，2月下旬进一步报告了所达成的要目：借款总额4000万英镑，均用于购买军械，一年内分批运华，年息5厘半，6年偿清；中方以金属原料及商品抵偿，由苏联出面担保[116]。杨杰一度十分乐观，认为可以再接洽借款4000万英镑。实际上，几经周折之后，杨杰在法国主要是同荷兰商人阿鲁福（D．Wolf亦译作沃尔夫）打交道，阿鲁福代表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几家银行，且提出了要由苏联银行作担

保的条件。但是，苏联政府表示不愿与外国银行直接打交道，杨又请宋子文向英美方面大银行接洽担保，宋借故推托[117]。结果，由杨杰负责联系的所谓巨额军械借款不了了之。后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又在巴黎接洽以中国之钨砂向法方抵借巨款，到1940年3月底法方已经原则上予以同意[118]。但是待到同年6月法国与德国接洽停战后，法国对中国战略物资已不复有迫切需要，对华巨额借款也无从谈起了。

至于中方起初提出的军事顾问，经交涉后法国同意派遣来华。1938年6月孙科、顾维钧提出要求时，当时法国外交部担心引起日本的不满，表示对于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必须用最审慎之方式行之”。法国殖民部虽然认为不便派遣现役军官赴华，但提议用半官方的方式处理，由非现役军官个人自由受聘前往[119]。次年1、2月间，驻苏大使杨杰专程赴法国洽商军械借款，期间也与法方讨论了赴华军事顾问的待遇问题，包括月薪、津贴、特别费等[120]。此外，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也在法国为促成军事顾问赴华，开展多方工作。

最后，在法国总理达拉第的首肯下，1939年2月下旬中法间达成了法国派遣军事顾问赴华的协议。顾问团共九人，均为退役军官，总顾问白尔瑞中将（Berger，亦译作伯奇、白奇）系圣日耳曼军校陆军大学战略专科毕业，曾任法国高级军官训练处主任。其余八名军事顾问也毕业于法国著名军事学校。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法国顾问来华后，可按中方的需要，“或任参谋担任作战计划，或任军队训练，或任陆大教官，或派遣至各战场指导作战”，悉由蒋介石调遣安排[121]。但最后实际抵华为七人。

1939年5月，法国军事顾问团抵达重庆后，曾观察地形，研究和拟具重庆地区的防空计划。6月起，法国顾问开始分别在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任教官，后来还安排至航空学校授课。欧洲大战爆发后，至9月下旬法国政府便提出召回在华顾问[122]。中方当时一方面表示不会强留，但也向法方提出，如果军事顾问全部离华，日本不仅会认为

法国行将放弃在中国之权益，并将放弃在越南之地位；在远东局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欲保持中法两国之合作，并维护安南之安全，顾问团实有暂缓回国之必要”[123]。但是，法国政府仍要求全体在华顾问迅即撤回。离华以前，法国顾问先后赴第四、五、九战区视察。在华期间，法国军事顾问参与作战的策划部署，提出一些关于训练与作战乃至建军方面的建议，受到中方重视，蒋介石曾通令采纳改进[124]。到当年10月，白尔瑞率法国军事顾问团离开中国。

蒋介石曾请白尔瑞返法后为促进中法关系而活动。白尔瑞确实也作了一些努力，特别是在以中国矿砂换取法国军火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方面还希望与法方进行军事领域的合作。双方较早就开始交换有关日军在远东调动的情报，中国驻法使馆武官通过法国殖民部，得以与法国殖民地军的总参谋部合作。中方数度把关于日本在越南活动和计划的情报传递给法国，法方也向中方传递过有关华南日军调动的重要情报[125]。另外，早在1938年4月，驻越南的法国军官格莱尔中校便主动前来，与驻守广州湾的中国第六十二军代表接洽，提议双方合作，防御日军进占海南。此事上报后，经蒋介石批示允准，中方与法越军方继续商洽联络。以后，国民政府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侯与法国驻远东特务机关负责人茂莱就中法军事合作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初步拟出了《中法军事合作计划》、《中国与安南合作对抗日本之计划》，主要内容有：中国选送人员前往越南进行训练、组织与武装，中国同时供给劳工，分往法国、越南或其他地方工作；法国供给中国抗战所需之军火、机器及材料；兴筑中国通往越南的铁路以利运输；中国参谋部的该军事计划负责人与越南参谋部成立协定，以便采取共同防御步骤，并取得中国与越南双方军队的合作[126]。当时越南总督和驻越南法军陆军司令马丹（Martin）对双方军事合作都持积极态度。

1939年春，随着欧洲战争风云的日益迫近，国民政府向法国提出

了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提议。3月21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在重庆会见法国大使戈思默时，代表蒋介石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同法国政府签署协定，当越南遭到日本侵略时，中法联合进行军事抵抗。戈思默对中方的建议表示感谢，并称法国政府将十分重视这一提议[127]。同时，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指示，顾维钧于3月底向法国外交部提出了关于中、法、英在远东实行军事和经济合作的四项意见：1．中法英在远东的军事和经济合作，适当时候邀请苏联和美国参加；2．在对日战争中，三方不得单方面与日本缔结停战协定或进行和谈；3．在军事方面，中国承诺尽力提供作战人力和物资，英法承诺尽可能多派海军和空军在远东联合作战，各方应派出全权军事代表，就详细计划及实行方法进行磋商；4．在经济方面，各方承诺在货币和贸易方面相互支持，并联合制裁共同的敌人。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Alexis Leger）称，法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也已考虑，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国的意见，但法国需优先处理欧洲问题，尚未制订处理远东问题的具体计划[128]。

另一方面，蒋介石派驻苏联大使杨杰以特使身份再度前往法国促成上述设想。杨杰经与法国军方磋商后，拟出中法军事协定草案，于1939年5月间报告蒋介石[129]。草案把协定生效时间定于越南遭到侵略之后，而待到协定生效后，法方才承诺对经由越南运往中国的军用品不加限制。换言之，这一规定等于使中方承认了当时法越当局的禁运决定。这一限定使蒋介石感到十分不满，它表明法国当局认为只有当日本进攻越南之后，中法之间才有必要进行公开的军事合作。此外，草案对法方向中方赴越南军队提供军火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规定战争结束后中法军队开回本国，维持战前中法两国原有领土状态。为此，蒋介石将该协定草案压下，没有继续洽商下去。

二　中国输出入货品过境越南的交涉

抗战爆发前，中国在欧洲（主要是德国）所购军火及其他货物，

便有不少部分由海路运至越南北部的港口城市海防，然后经滇越铁路（昆明—蒙自—河口—海防）运入内地；中国输出往海外的货物，包括运往美国和德国、苏联的货物，也有相当部分需假道越南。法国一般允予中方货物过境运输，且免征过境税。当时中国也有经由缅甸仰光的假道运输，不仅路线长，且被征收较高的过境税。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大部分口岸因遭战火或被日军占领，经由越南的过境运输更显重要。法国政府处在中方合法、合理的要求与日本的外交及军事压力之间，对中国过境运输军事物资和其他货物时禁时放，成为战时中、法间的重大交涉之一。

1937年8月初，国民政府特使孔祥熙访问巴黎期间，便向法国当局提出，希望法方如以往一样，允准中国过境运货。法方当时就担心战事爆发后，运送军用品将涉及中立问题，引起与日本的纠纷。同年8月25日、9月5日，日本两度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当时中国除了自德国有大批军火输入外，又开始从苏联获得军事装备，而国外输入军火货价之偿付，主要通过输出农矿产品，因而中方更关注法国政府在越南过境运输问题上的态度。

1937年10月17日，法国政府决定，禁止中国方面假道越南运送军火，法方并以担心越南的交通设施遭日本轰炸为理由，答复中方的质询，建议中方改运香港，然后运往内地。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馆曾照会法国外交部，指出："中国抵抗违约及不法之侵略，实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条约之神圣，法国亦素来重视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之义务，现继续供给军火，实为抵抗成功之要素。"照会并历引中法滇越铁路合同和中越专条有关条款，证明中国假道运输军火为成约所规定，并符合当年国联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因此希望法国政府重加考虑中方假道越南问题[(130)]。经交涉后，法方在不改变禁运决议的前提下，勉强同意中方在途中之货物通过越南，但希望中方慎密处事，勿致泄漏。

此后，法国政局一度动荡不定。1938年1月中旬，以肖唐

（Camiile Chautemps）为总理的新内阁成立后，仍然执行前政府的禁止军火假道越南的决议，当时在巴黎进行交涉的顾维钧、李石曾都感到："法政府慑于日方威焰，对于禁运军火事，不易挽回。"[131]而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于1月赴河内，与越南总督、东京省行政长官等进行交涉，法越当局把实施禁运的责任归于中方办事人员未能保密，要求中方尽快把此前到达越南的余货尽快转运香港，以免日本的抗议[132]。3月中旬，勃鲁姆（Leon Blum）组成了新的政府，但不到一个月不得不辞职。4月份由达拉第（Daladier）任总理的新内阁成立后，法国政坛大体上稳定下来，中方加紧了有关的交涉。直至同年7月，法国殖民部长孟戴尔（Geoger Mandel）向国民政府特使孙科承诺：运输军械，可经过安南，经过虽多误会，将来可设法补救[133]。待到1938年11月杨杰抵法国谈判后，法方再次作出承诺，中方一度认为"假道事全妥"[134]。1939年1月初，法方表示在越境内代运货物当无问题，凡到海防之援华物资，即可视作法国货物，运至大笼后交付中方。但中方另外所希望的将援华物资在马赛交法方包办海运，为法方所拒绝[135]。

待到日军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加大对法方的压力，指责法方违背以往的承诺，使越南成为向中国输入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要求法方切实禁止[136]。驻河内的日本总领事甚至向法越当局提出，要求对假道越南运输的中国货物进行检查。法方一方面向日方解释说，除了1937年7月15日以前向法国的订货，自1937年10月之后，已经停止中国假道越南运输军事物资；另一方面拒绝日方在越南行使货物检查权，称在法国主权管辖的土地上，不能允准外国有这一检查权[137]。1938年12月1日，顾维钧照会法国外交部，要求法方修改1937年10月的禁运令。12月24日，法方复照顾维钧，允准中方于1937年10月之前所订购之军事物资，假道越南运往中国；至于民用物资之假道运输，则不加限制[138]。这样，中方对于假道越南的运输问题的担忧，有所缓解，并试图通过进一步的交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1939年2月初日本攻占海南岛，这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满和不安。中国大使顾维钧又向法方提出，对日本最简单的报复行动是撤销对中国军用物资假道越南运输的限制。法方也认为，日本在占领海南岛问题上的食言，使法国在中国假道越南运输军事物资问题上有理由采取自由行动。于是，法国政府决定，重新解释1937年10月法国内阁通过的禁运令的范围，即不再按1935年9月法国政府发布的禁止出口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法令所附之清单，而是以范围较小的1925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章所列之清单为依据[139]。这就对中国所运物资的限制就要小得多，法越当局一度对包括火炮在内的各种假道运输货物一律放行。

当时，滇越铁路每月运货量约12000吨，而1939年下半年在海防待运往中国国内的积压货物为30万吨。中方曾采取若干措施，以冀提高运量，如商请法越当局增购车辆及机车，利用自海防至云南边境的富良江水道、至镇南关的公路等，但是滇越铁路仍是主要的运输手段。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假道越南的运输能力问题，提高货运量，中国方面还积极与法越当局接洽海防自由港建设事宜。早在一年前的1938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在河内就向越南总督府秘书长和东京省行政长官提出过有关建议，法方当时以需要经过立法程序以及考虑投资收益，没有接受。欧洲战争爆发后，假道越南运输日益困难，中方遂重提海防自由港建议。待到1939年11月底，张嘉璈向法国大使戈思默面交节略，主要内容为：海防辟作自由港；中国政府与川滇铁路公司得在自由港埠区域内建置公事房、堆栈，与改装打包设备及加工厂；滇越铁路在自由港埠区域内应予中国以一切设备便利，凡中国政府之物资出入，须完全自由，不受一切限制；川滇铁路公司于自由港埠之开辟，如得法国政府之同意，可酌量投资；中法两政府应会同组织一委员会，讨论节略所提各点[140]。但是法方在假道运输问题上的立场更消极，所以没有接受中方关于辟海防为自由港的建议。

1939年9月初欧洲战争爆发后，中国经由越南的过境运输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法越当局根据巴黎颁布的战时措施，不准中国方面经由越南运送军火、汽车、汽油，禁止所有已在途中的这类货物进入越南，并限期清理中国在越之相关进出口货物。经中方交涉后，法越方面暂时允准汽油、汽车通过，但对一般货物入口仍实行开箱检查。当时法国与德国处于交战地位；与苏联虽然没有交战，但由于苏芬战争、苏德条约等问题的存在，法苏政治关系冷淡。这样，中国经越南的进出口运输，不仅有来自日本的干扰，还有着德国和苏联的复杂因素。在进口货物上，法越当局的禁运令，尤其是针对中国购自德国的货物，即以1939年9月3日法国对德宣战之日为界，凡中国所购而暂存于越南待运的德国货物，如能证明货款已在9月3日前付清的，可以准许运出越南，但须在1939年10月25日前清理出境；尚未付款及付款日期在9月3日之后的德国货物，将予以没收。以后，经中方多次交涉，法越当局对于不能提供付款证明的货物，可在中国官方机构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予以放行；并放宽了关于德货付款证书和清理出境期限的规定。对于经越南出口的中国货物，如许多矿产、农产品，在1939年9月3日以前订立买卖契约的，可以通过输出，否则也不许通过。法方表示反对中方向德、苏运销，要求强制收买，这类交涉在当时中、法关系中颇为突出。另外，法方还限制在越南通商的中国商民人数目。只是在进行上述交涉时，法国表示对中国的政策不变(141)。

对于中美借款项下之美国货物内属于所公布为禁运者，法越方面曾准予无限期往中国内运；非中美借款之货物内属于禁运品，如确为中国政府所有，经法越总督许可，亦准无限期内运。法越方面曾提出，自1939年11月1日起对经越南过境的中国货物恢复征收通过税。经过中方的力争，法越方面取消了对中国政府所有之过境货物征收通过税。

与此同时，对法方提出的相关要求，中方尽可能予以满足。1939

年10月10日，法越当局向中方提出，希望大量获得中国所产之钨、锑、锡和猪鬃。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查自抗战军兴，我方物资假道越南，法越政府尚能应我方要求，予我便利，欧战发生后，法国颁布战时法令，对我物资假道亦能于法外设法通融，查核上述要求，既非苛刻，其最近对我态度，又极重要，似宜允其所请，以示互助之意。"国民政府经济部于10月3日即令资源委员会：对钨、锑、锡、猪鬃等出产，"法国如有需要按价收购，中国自当充分供给"[142]。可见，当时在维持越南假道运输问题上，中方确实受制于法方，有求于法方。

嗣后，又发生了法方要求征用中方在越所储存的矿砂问题。1939年11月至12月初，法越当局扣压了中方4000吨钨砂和3000吨锑矿砂，提出优先购买，并称对于今后到达的矿砂也将同样扣留封存。重庆当局向法国大使戈思默提出交涉，另由顾维钧在巴黎向法方说明：这些矿砂原本是中方经由越南出口，以履行与美、英、苏签订的易货合同，以及为了出口换汇的，对中方极为重要，其中仅有极少的部分是准备运往法国的。法方答复称，除了运往英国和美国的部分外，法国将购买余下全部的矿砂。中方再度告知法方，发往苏联的矿砂，苏联当局已向中方保证，将完全用于苏联国内，因此要求法国政府撤销已宣布的先买权。中国政府还把这一纠纷告知美国方面，希望美方劝说法国当局收回成议。

在日方的压力和中方的交涉之间，法方的态度十分暧昧，但总的趋势是加大了对中方的限制。如1940年6月法国与德国停战议和之后，法国对中国矿砂已不再有紧迫需求，也不再担心矿砂辗转流入德国，于是一度解除了对假道运输中国矿砂的禁令。当时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向法越当局商谈过境运输问题时，法方表示至少还有3个月的安全时间，已下令把滇越铁路80％的车皮交中国政府货运。许念曾即提出应尽量利用该段时间，为中方货物过境运输提供便利[143]。然而不久，法越当局便屈服于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重新禁止中国

假道越南运输货物。6月20日起所有对华运输均停顿，凡中国货物，不论为官方还是商人所有，均不准经该路运往中国内地。当时中国在越积压待运汽油便有3万余吨，其他物品约6万吨[144]。当时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对于法国禁运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如下评估："安南对我运输一切停止，法国之受倭威胁乃意中事，此或甚于倭寇强占安南攫我于安南一切物资也。"[145] 蒋介石甚至谈到："今后我因国外接济受影响，作战方略或须放弃一切阵地战。"[146] 当时，媒体也十分担心越南对华禁运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法越当局允准日方派员在越南各仓库检查有无中国货物。这样，不仅中国积存越南之货物无法起运，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易货合同的履行，包括中国所输出的矿产、茶叶和畜产品，以交换苏联的军械、汽油、飞机等[147]。总之，这一局面是中国方面难以接受的，因而立即向法方作出明确反应。

6月21日，许念曾继续向法越当局交涉，得到的答复是：目前只是暂停一切运输，以应付日方的压力，请中方放心，并称如果日本对越发动进攻，法国方面必予抵抗[148]。另一方面，6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在重庆的法国驻华大使馆提出了严重抗议。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指出：根据1930年5月16日达成的《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法国允许各种货物通过越南，军械及炮火包括在内，中国政府鉴于法国所负上述之特定义务，自有要求其履行义务及维持越南国际通商路线之权；惟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军械与军火均未要求通过越南，实已尽可能之范围，体谅友邦处境之困难。不幸日本军阀政府，得步进步，近日竟更乘人之危，对于法国政府，肆为公开及非公开之威胁，逼迫其停止中越间之一切运输。法国政府未能坚决拒绝，中国政府实不能不引为深憾。盖日本之要求，在使法国对于亲善之友邦，施以封锁，此种封锁，无论中法条约上或国际法上，均属毫无理由也。法国既未能毅然拒绝日本之要求，其结果必更鼓励日本军阀破坏远东和平之行为。中国政府于此，自不能不有最大之关切。中国政府确信日本在亚洲或太平洋上任何区域，如有军

事侵略行为，无论出以何种方式，无非欲藉其侵略所得，完成其征服中国之根本目的。尤属显然者，日本如侵占越南，其目的将不仅夺取法国属地，势必更取道越南以攻华，故日本如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犯行为，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采取此种局势下一切必要之自卫措施，特此声明”[(149)]。6月24日，外交部又一次向法国驻华大使馆表示抗议。但是，中国方面的迭次强烈反应，最终未能阻止法越当局对日本的妥协，中国经越南的国际通道亦彻底中断了。

1940年6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向越南派出了以陆军少将西原一策为首、海军大佐柳泽藏之助为副的禁运监视团，一行数十名人员前往越南，在河内日本总领事馆内设置了所谓“检查本部”，在海防、老开、谅山等地实施检查，以彻底切断滇越铁路运输物资进入中国[(150)]。监视团入越一个月后，法越当局仍未对货运开禁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于是，许念曾总领事直接面见新任越督德古（Jean Decoux），对以下问题进行了交涉：日方仅要求对军用品禁运，而法越当局为何对华停止一切货品的运输，包括中方急需进口的食米、药品、邮政包裹；对中国之货既不准内运，又不准退运，久屯仓库，甚至使租金超过物价；中方存越货品遭越方自行搬去；中方在西贡有大批钞券急需待用，越方既不准中方直接内运，又不准转经马尼拉或仰光运入国内。德古对许念曾的质询虚与委蛇，不置可否[(151)]。

1940年9月，法越当局与日方达成日军进驻越南的协定后，在日本的压力下，法越当局宣布自10月23日起，扣压在越南的所有中国官、商货物。中国在越货物约有4万吨，多为军用品，约值国币1亿元，合美金600万元[(152)]。中方又进行了多次交涉。法越当局原拟将所扣之中国官商货品予以拍卖，中国外交部向法国大使戈思默提出强烈抗议，称如果法国政府不予以制止的话，中方将把在中国自由区的法方财产封存作抵。戈思默承诺改采以下原则：1．越南当局照价征用；2．物主就地自由出售；3．不能销售之货物，存入仓库由越方负

责保管。至于中方提出的转口要求，戈思默未予承诺[153]。但是，法越当局却仍然拒绝中方自行出售，坚持要对中方之商货强行拍卖，虽经中国领事馆严重抗议交涉亦无果。中方最担心的是这些货物最终遭到日本的劫持，要求法越当局在扣压货物之后，应承担保全之责任，蒋介石就曾明确向戈思默提出："予认为海防商货之保全问题，系法国之责任问题，法国应该设法保全。"[154] 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中方由西南运输处出面，将大部分来不及内运的官有存越物资转售当地的美商信臣洋行（Far Eastern Trading Corporation），同意由该洋行将无关军用者酌量出售于法方指定之商业机构，但其他可以资敌者绝对不售，要求信臣洋行将凡被法越当局或日方攫夺之物资，向美国政府备案，以待战后清算[155]。一直到1941年4月初，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还就制止日方攫夺存海防物资、允准华商出售存货、同意中方将存西贡物资转口他运等事项，数度向法国外交部进行交涉，但均不得要领[156]。待到1941年5月下旬，积存于海防之中国货物几近悉数被日人武力所劫夺，法越政府却无动于衷，在中方交涉时，竟以"日本既用强力，法方亦无可奈何"相推诿[157]。法国外交部则搪塞中方称，已经向日本政府交涉将货物运回，但没有得到日方的答复[158]。由于被截货物名义上已经移转美商，中国的交涉未能引起法方的重视，已在预料之中。至于滞留在海防不准外运的华商行号货物，据越南东京中华商会不完全的统计，就有益昌、国际等20多家的48534件，时值86,553,696法郎[159]。国民政府外交部于6月4日曾向法国大使馆郑重声明：对于滞越官、商货物所遭受之一切损失，中国政府保留要求赔偿及采取适当弥补办法之权。具体而言，就是由驻美使馆出面，要求美国政府抵扣法方在美公款。中方还曾考虑直接扣抵法国在华权益，只是考虑到"我在越侨胞众多，侨产为数可观"，担心法方采取报复手段中方将得不偿失，没有马上采取这一措施[160]。

鉴于法方始则停止对中国货物之运输，继而允许日军利用越南领土及铁路设施攻击中国，为了保证该路调度执行圆满、施行军事措

施，中方遂于1940年9月对滇越铁路施行管理权，即命令该公司所有的法籍、越籍职员服从中国政府管理。待到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对维希政权断交后，同时宣布接收滇越铁路。

三　法方对日妥协和中、法政治关系的倒退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法间不少交涉关系到是否真正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如何看待日本侵华政策的重大原则。

1938年5月当英日订立关于中国海关协定之后，中方希望法国对这种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发表公正的看法。5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将5月2日郭泰祺致英国外交部节略予法外交部亚洲司长，法答：中国之立场甚强，但不可不兼顾事实，幸英日关税协定系一种临时办法，且主其事者仍为总税务司，中国一方面保留主权，一方面任凭处分，实为最妥之政策[(161)]。1938年8月上旬，法国政府获悉，英国准备与国际联盟以及法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中国方面也在向伦敦和华盛顿进行这方面的接触。当时正值武汉会战期间，法方了解到，尽管形势严峻，中国政府将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法国政府认为，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是不现实的[(162)]。而当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次年投靠日本之后，国民政府抗日、反汪的立场更为鲜明，法国方面也没有考虑出面调停中日关系。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法国与英国即考虑与日本妥协，出面调停中日议和，以牵制苏联。8月26日，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吉立脱向中国大使顾维钧谈到，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已间接表示将放弃南进政策，法方认为宜由法国发起、英美为后盾，实现日本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议和，因此希望中方早日将媾和条件告知[(163)]。8月29日中国最高当局从顾维钧来电中得悉上述动向后十分关注，甚至考虑通过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的密切关系，来对法方进行反制[(164)]。同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法方进而要求国民政府与日伪组织合流，当时法国外交部辗转向顾维钧提出，在欧洲战争期

间，法国与英国对远东问题无能为力，为了维护在华利益，法国将不得不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扶持的伪组织往来，因此建议国民政府自动设法组成一个包括中国全境政权之总机关，“一致对外”。得悉法方这一提议后，蒋介石认为：“倭寇自知其组织伪中央无效，而乃借法国之力，转来恫吓，使中央与其伪组织合流，法国不察，受愚至此，其言无异有意侮辱我国家万分也。”他即指示顾维钧明确答复法方：“即使中国灭亡，亦决不出此。……须知今日安定远东之力，实非日本，而不可轻侮蔑视中国至此也。”[165] 悉知中方的明确表态后，法国达拉第和雷诺两届内阁都不敢再向中方提及与伪组织合流之事。法国殖民部长还向中方解释说：欧战初起时，法国政府得知希特勒将出面调解中日关系，与其让德国、还不如让法国充当中日之间调解人，所以法国外交部方面有所酝酿；如果中国抵抗到底，法绝不作中日妥协运动，亦不赞助汪精卫的卖国行为[166]。只是中国政府对于法方的这些承诺，并不敢轻信，并密切关注着有关动向。

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正式出笼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便多次访晤法国新任总理雷诺（Paul Reynaud），以及法国外交部、殖民部、国务会议和国民议会的官员，指出汪伪政权只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工具，中国政府将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希望法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保持不变，不以任何形式承认南京傀儡政权。顾维钧还代表中国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就上述立场公开发表声明。法方虽然当面向中方表示无意承认汪精卫政权，将继续执行其同情国民政府的政策，但以种种借口搪塞中方的要求，迟迟没有公开表明态度[167]。而此前美国、英国都已明确声明拒绝承认汪伪政权。相比之下，法方的含糊态度使得国民政府颇为不满。

在对德战事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法国国内政局再度动荡，1940年6月16日由主张投降的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继雷诺之后组成新内阁，并向德国提出停战要求。6月22日，法国向德国签署了降书。7月法国政府迁至维希，实际上成为德国的傀儡政权。在

奉行亲日疏华政策的德国政府的影响下，加上日本在远东对法方屡屡施加压力，法国在远东政策上日趋消极，中法政治关系发生逆转。

贝当政府成立之初，便与日本签订协定，确认所谓中国的现状，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需要”。此后，在涉及中国领土和主权等重大问题上，中方向法方进行过多次交涉。

1940年8月8日，就日方向法要求假道越南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内称：“中国于抵抗日本侵略中，如日本不利用外国国土攻击中国时，原无派遣军队进入外国之意，故现在越南边境附近驻扎之中国军队，苟日军一日不入越南，当一日留住中国领土，而不令其开入越境。乃得确实消息，日本必欲派军队在越南登陆，并在越南境内采取他种军事行动，藉以攻击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于此特郑重声明：日本武装果侵入越南时，不论其用何种藉口，并不论其在何种情形之下，中国政府认为此举系对中国领土安全直接与急迫的威胁，当立即同样派遣武装队伍进入越南，俾得采取自卫措置，以应付此种局势。所有因采取此种必要措置而发生之结果，中国政府自不负责任。而法国当局如在越南准许或容忍日方任何军事行动，则所有因是发生之结果，包括越南中国侨民所受身体及财产之一切损失，法国政府自不能避免责任。”[168] 8月18日，重庆当局接到顾维钧来电，进一步印证了日本已向法国要求假道越南进攻中国。于是，外交部长王宠惠8月28日再度发表声明：日军如侵入越南时，不论其用何种借口，不论其在何种情形之下，中国政府将认为此举系对中国领土安全之直接与急迫的威胁，当立即派遣武装队伍进入越南，俾得采取自卫措施，所有因采取此种必要措置而发生之结果，中国政府自不负任何责任；而法国当局如在越南准许或容忍日方任何军事行动，则所有因是发生之结果，包括在越南之中国侨民所受身体及财产上之一切损失，法国政府自不能避免其责任[169]。另外，从8月到9月，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向法国政府外交部、殖民部官员多次交涉，要求法方不要与日本签订允准日军进驻越南的协定。中国方面还及时采取了应对

措施。8月21日，蒋介石电何应钦及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令在军事上及早筹防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170]。重庆《大公报》8月29日发表了题为《日若犯越我必自卫》社评，以表示中国方面已经作好了迎击日军的准备。

中国方面的担心决非杞人忧天。就在王宠惠发表声明的两天之后，法国驻日大使亨理（Charles A．Henry）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换文，法方原则上同意日军进驻越南，并向日军提供情报和其他军事上的便利[171]。根据这一换文，驻越南的法军司令官马丹（Martin）与日军代表西原一策少将，于9月4日签署了关于日军进驻越南北部并使用机场的协定。9月22日，马丹与西原签署日军进驻越南北部协定细则，主要内容包括：日方得使用东京（即河内）区的三个空军基地；日军得以6000人进驻越南北部；日军司令部及部队得驻于河内市；日军可在海防登陆，可在海防港区内停泊军舰；日军得根据划定的路线，假道向越南北部国境发动陆上攻击作战（即进攻中国）[172]。当天，法越总督德古发表声明，称上述协定细则“一面对于关系两国间之利益，同样兼及，一面则可以作为法日永久友谊之第一次真诚表现，使在作战中之日军，可以享受其便利。此种由一国可以给予另一国最大的信任的表记，已建立越日双方真诚协调之基础”[173]。事实上，在该协定细则尚未签订的情况下，9月6日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开入越南。23日起，日军大批进入越南，25日占领了海防与谅山。进入越南的日军还与法军发生过冲突。这样，中国自云南、广西经越南的对外交通便被彻底切断了。由于日军的侵入，驻河内的中国总领事馆只得南迁至西贡，另委托美国领事馆照管河内华侨的权益。

对于法日间签订关于日军进驻越南的协定，9月下旬中国方面向法方提出了严重抗议，指出该协定已“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及国际睦邻关系之基本准则，实系敌视中国之行动”，“中国政府对日军出现于印支边境附近及利用印支作为对中国作战的军事基地一事，保留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的全部行动自由，并声明由此产生之一切后果，均

应由法国政府负责”[174]。10月26日，法国大使戈思默在重庆当面向蒋介石作了辩解，称法国在远东的兵力不足，无法拒绝日本对越南的要求，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谅解法国政府现时的艰难处境；据法方军事专家之推测，日方并无假道越南进攻中国之意，日法协定对中国实亦无真正危险，日本现在并无超出协定范围，似不致再有进一步之要求；万一日方再有其他企图，自当先行奉达中方。蒋介石询问了中方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河内以北有无被日军所占领地区、海防要塞是否仍在法方掌握之中，然后表示中国素重信义，对法方处境困难极为了解，中法友谊也决不因此受到影响[175]。

另外，在获悉日军实际上已开始在越南登陆后，中方于9月10日自行炸毁中越边界的河口铁桥，拆除滇越铁路河口至芷村百余公里一段路轨；并对昆明至河口段施行管理权，委任原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为滇越铁路昆明河口段督办，命令滇越铁路公司所有的法籍、越籍职员服从中国政府管理，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明中国处置之正当。但法国大使馆即于9月21日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方收回成命。外交部于24日驳回了法方的照会，并且严正指出：“查法方徇日方要求，始则停止对中国之运输，继而又与日本订立协定，允许日军利用越南领土及铁路设施攻击中国。中国政府在此种情形之下，根据中法滇越铁路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调度。为使调度圆满执行起见，施行军事措施，实为必要之步骤，所有该公司职员均应一体遵从。乃法国大使馆于法国政府破坏中法条约，违背国际公法，不顾中法善良邻谊之余，竟复反对中国政府对于滇越铁路施行管理，此种态度，殊不可解。所提抗议，外交部碍难接受。”[176]但法方仍不甘心交出滇越铁路的管理权，复由戈思默大使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三点：1．对滇越铁路材料之毁坏损失，保留要求赔偿之权；2．中方不应对铁路桥梁及其他重要土木工程一律予以破坏；3．中方铁路管理当局布告称，滇越铁路法籍人员不能享受领事裁判权，而须受中国军事法令之约束，法方对此点极为注意，中方应设法纠正。戈思默进一步强调：“滇越铁路为法国政府所经营，而非法国人

民私有之企业，该路且为法国政府在远东之主要产业，故法政府非常注意。”[177] 然而，当时对于滇越铁路包括法、越籍职员在内的管理，已经直接关系到中国领土安全和行政主权，中方没有因法方的屡屡交涉而让步。待到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对维希政权断交后，同时宣布接收滇越铁路。

1941年7月25日，因日本占领越南南部的海、陆、空军基地，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发表声明，指出这一行动表明日本实际上已对法属越南全境实现了军事占领，此种发展不仅继续威胁中国西南边境，抑且危及西太平洋其他诸国之权益与领土；中国政府必以全力尽其本职，厉行反抗侵略之国策，以促日本冒险行动之失败；中国政府与人民深信，其他有关各国亦必不至纵容日本扩大其侵略，而使整个西太平洋局势日益恶化，甚或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地[178]。26日，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谈话时称，中国为自卫计，当采取必要措施。此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向法方交涉，希望允准中国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遣军队进入越南，以驱逐日军，但均遭拒绝。待到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本和德意正式宣战后，中方再度向法方提出派军队入越的要求，12月15日法国使馆参赞博德答复中国外交部次长傅秉常时称：1．法国政府决定对此次远东战事严守中立；2．法日所订协定纯系防御性质，后新订之协定内容和性质均未改变；3．越南不愿参加任何攻势行动，因此交战各国应避免采取任何足以使战事扩大至越南领土以内的行动；4．中国政府之要求与法政府在停战协定下所规定之义务相冲突，鉴于目前的困难处境，法国仍愿维持中立[179]。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签署之后，傅秉常再度向博德提出该问题，博德辩解说法国政府欲在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仍无意参与远东军事行动，且在越日军人数受到法日协定限制，日军在越南绝非预备对华采取任何侵略行动，因此法国政府反对中国政府任何有侵略性的策动，否则战事扩大的责任将全部归于中国政府[180]。但在中方看来，法越当局允准大量日军驻扎越南且使用军事基地，时时威胁着中国国土，这种所谓的中立实在是虚伪透顶，中法关系的改善完全无

从谈起。

另外，在对待汪伪政权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交涉。由于法国方面在损害中国主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民政府最终与维希政府断交。

1940年9月，上海法租界曾发生法越士兵开枪打死打伤被拘禁的中国抗日孤军的事件。对此，中方曾向法国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同年11月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与日伪达成协定，擅行宣布把上海法租界的中国法院移交于汪伪政权。8日，在上海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在法国巡捕房出面戒备及日本宪兵支持下，被汪伪政权接收。法国方面的这一做法完全违反了中法之间于1931年7月订立的有关协定。对此，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严重抗议："对于上海法租界内自称为中国法院之任何机关当然认为非法，其所有裁判及其他任何行动一律无效。"[(181)] 国民政府11月16日颁令，暂行停止上述两法院行使职务[(182)]。通过上述事件，重庆当局已经意识到，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维希政府很可能进一步损害中国的行政主权，乃至直接与汪伪政权合流。为此，1940年11月30日即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基本关系条约》的同一天，顾维钧奉命向法国外交部秘书罗夏提出，根据南京的消息，日本将承认汪精卫政权，柏林和罗马可能继日本之后也予以承认，这种承认影响不了中国的局势，中国将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希望了解法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考虑到广泛流传的所谓法国奉行与日本合作的政策。当时罗夏说，法国政府不仅没有设想承认"南京政权"，而且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法国政府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183)]。

1943年1月，日本与汪伪政权演出了所谓"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的闹剧后，法国维希政府居然效仿之，于同年2月宣布，将"放弃"在华所享司法特权及其在北平使馆区、上海公共租界、厦门鼓浪屿以及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四市法租界之行政权。同年2月，日军占领了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广州湾法国租借地行政长官还与日本方

面非法订立了所谓《法日联防协定》，使日军对广州湾的占领“合法化”。国民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声明中法1899年广州湾租借条约失效。此后，维希政权又不顾重庆国民政府的数度反对，于1943年5月18日与汪伪政权签订了所谓交还在华法租界的协定。5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法国代办彭固尔提出抗议照会，内称：“查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现在南京伪组织，乃日本军事占领区内之傀儡。迭经国民政府通告各国，并正式声明，该傀儡组织如与各国签订任何协定，均为无效。最近本部亦曾向贵大使馆一再声明，法政府不得将法租界交于南京傀儡组织。现查贵国代表，竟与伪组织签订关于归还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各处法租界等协定，显属违背国际公法之行为，兹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除保留一切权利外，并郑重声明，所有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租界，北平使馆区、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已因法国政府之非法行为，归于消灭，中国政府不再受其拘束。”(184)

基于法方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与行政主权的行径，重庆国民政府于1943年8月1日发表了与法国维希政权断绝外交关系的声明，指出：查自法国政府迁都维希以后，中国政府为保持中法两国传统友谊及维护两国间彼此利益起见，对之始终予以尊重，并继续维持正常关系，法国在华一切正当利益亦无一不继续获得保护，无如维希政府对于中国之不友谊行动，层出不穷，近且变本加厉，与南京傀儡组织一再签订协定，对于中国政府迭次声明该傀儡组织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均为无效一节，加以漠视，中国政府对于维希政府此种行为不能再予容忍，兹特郑重宣告，自即日起，中国与法国维希政府之外交关系，即行断绝。声明并重申，由于法国政府单方面采取了非法行为，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所取得的各项特权及租界、租借地，均已归于无效(185)。不仅如此，由于汪伪政权作为日本侵华战争帮凶和傀儡的性质，中方的立场还意味着已经把法国维希政府置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敌对营垒。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重庆国民政府还与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组织—“自由法国”，建立了联系。1941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国民党中宣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分别在重庆与“自由法国”的代表爱司加拉进行了会谈。爱司加拉代表戴高乐提出，“自由法国”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并向重庆派出常驻代表。1942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爱司加拉，双方就如何在越南共同对日本作战交换了意见。同年8月，“自由法国”在重庆设立了代表处，另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1943年6月，戴高乐在“自由法国”的基础上组织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8月1日重庆当局宣布与维希政权断交后，顺理成章地于8月27日正式承认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8月法国解放后，10月中国政府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双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合作、科技与文化交流活动常有进行。1945年8月，中法签订了《关于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至1946年2月，中法签署了平等新约，法国放弃了在华治外法权和一切特权。

第三节　苏联援华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波折

一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了谋求改善对苏联关系的步伐，双方开始秘密接触，交换对时局和合作方式的看法。193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立夫在南京曾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中苏缔结军事同盟，藉此阻遏日本。鲍氏认为与中国订立军事同盟会给苏联带来风险，主张先商谈互不侵犯条约[186]。当年10月，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方商讨双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问题。1937年2月，蒋廷黻与鲍格莫洛夫在莫斯科会谈时，再提中苏政治与军事合作问题。当时苏联方面对签署互助协定持保留意见，但已经在考虑签署互不侵犯协定、采用易货和派出军事教官等方式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威胁[187]。鲍格莫洛夫回到中国后，

先后与蒋介石、王宠惠、孔祥熙、陈立夫、张冲、孙科等会谈多次。特别是在与中国外长王宠惠会谈时，鲍格莫洛夫提出与中国共同防御外患的三方面步骤：1．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起太平洋地区有关国家举行国际会议，商订互助协定；2．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3．中苏订立互助协定。当时中国方面主张先订中苏互助条约，苏方则以为须先试召集太平洋会议，如果不成再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方可减少德、意等国之疑忌反抗[188]。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事趋于扩大化，国民政府加速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当时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书面照会，内称："中国必须使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保卫其领土、民族的荣誉和生存时，它准备采取为国际法所公认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同日本的争端"[189]。中方并草拟了中苏互助协定的草案，重点写明一旦中国和苏联远东地区受到第三国直接或间接侵犯的威胁时，两国应立即商定办法，实施国联盟约第十条；中华民国或苏联领土受第三者之直接或间接侵犯时，两国应进行相互的军事和其他援助；为履行上述义务，规定经双方同意，一方的军队可调至对方领土等[190]。1937年7月19日，陈立夫向鲍格莫洛夫指出，他受蒋介石委托向苏方表示，国民政府准备随时与苏方签订互助协定，另外蒋介石希望把苏联对华借款的总数扩大到1.5或2亿中国元，武器转交期限应缩短到一年内，借款偿还（用商品）期限应在五年后开始并经十年还清，以及中国政府希望获得的武器，如飞机、坦克、口径为37毫米的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口径为20毫米的同类炮、75毫米的高射炮。鲍氏认为，中方再次提出互助条约问题，是迫于日本的压力。因此，苏方可以考虑中方对武器的要求，但坚持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理由是我们应有保障，我们的武器不会用来反对我们"[191]。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会见鲍格莫洛夫，向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促使苏联尽快提供军事援助，以应付事态的迅速恶化。中国的局势和国民政府的坚持一度使鲍格莫洛夫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致电苏联政府建议先从商务方面入手，使中国获得军事物资。但

至7月底，苏方明确把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向中国提供军事物的先决条件[192]。至于中苏间互助条约之订立，苏方认为则尚须继续磋商。

于是，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就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节，进行了会谈。鲍氏坚持，如果不在互不侵犯条约中做出起码的保证，苏联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苏联政府要确保苏联的武器不会被用来对付自己。蒋介石指出，苏联不必担心中国会用苏联提供的武器来进攻苏联，在中日谈判中，日本的基本要求正是缔结反苏军事联盟，并准备为实现这一要求准备作出更大让步，但中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不会去迎合这一要求。但最终蒋介石同意在没有任何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件下，与苏方立即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193]。双方在此次会谈中还商定，双方各自准备谈判草案，然后由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进行下一步的谈判。

8月8日，陈立夫代表中国政府向鲍氏递交了中方草案[194]。8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商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立即生效。中方原先曾担心，签约将意味“苏俄赤化宣传与外蒙古主权独立之默认”，但最后确定的文本澄清了中方的上述疑虑[195]。8月21日晚，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全文共四条，其主要内容为：中苏双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本条约之条款，不得解释为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以前，两缔约国已经签订之任何双面或多边条约，对于两缔约国所发生权利与义务，有何影响或变更；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196]。双方还口头约定，苏联承诺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则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在中苏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过程中，中方高层也有反对意

见，但在蒋介石的决断下，排除了这方面的异议[197]。另外，在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前，中方还专门向英国、德国政府作了说明。8月3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在南京和莫斯科正式公布。蒋介石认为："对俄外交应促其加入战争。"他曾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乐观地宣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意味着"苏俄终将加入对日战争"[198]，从而对于制止日本侵华战争将产生直接效果，可是中方的这一期望落空了，苏联一直到1945年8月才对日宣战。

二　围绕对华军事援助的交涉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中国便在获得苏联军事援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前所述，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方面就已经与苏方讨论过获得苏联制造的武器和军事装备问题。"八一三"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曾派航空署军务处处长沈德燮秘密赴苏联，与苏联政府接洽购买军用飞机，当时中方的要求是：驱逐机200架，重轰炸机100架，并聘飞行员二三十人，把运至新疆的苏联飞机驾驶至兰州[199]。这可以视作以后杨杰使苏正式接洽军援的先声。

同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本身并没有直接规定双方有"互助"的义务，但无疑意味着苏联在援华问题上将持积极态度。条约签署之后，鲍格莫洛夫就对华提供军事物资与中方进一步交换意见。8月27日，双方就军火供应问题达成原则协议，由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1亿元法币的贷款，该贷款用以从苏联获得中国所需的军火物资，苏方承诺向中国提供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关于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的购买问题将由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在苏联与苏方谈判解决；苏方同意在协定生效的第一年中国可不偿付贷款，从第二年开始五年内付清；在协定中苏方坚持以全部贷款的三分之四得到中国的金属，四分之一得到茶叶和其他消费品；条约以英镑形式缔结[200]。

为了落实上述交涉的成果，中方立即派出了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名义是“考察实业”，但从其实际使命而言完全是一个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杨杰一开始就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提出了购买军械的要求。当时苏方在原则上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如11月18日，在张冲回国前，伏罗希洛夫要求其向蒋介石转告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表示一旦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苏联将出兵。同时，苏联希望中国作长期抗战的准备，苏联将继续尽量接济维持中国所需飞机、重炮、汽油、坦克等装备[201]。但是，中方各项具体的要求，都需要双方之间经过多次交换意见才能达成谅解。

受伏罗希洛夫的委托，自9月9日到10月4日，苏联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与中方进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中方拟购军械的品种、数量、式样和运华途径等问题[202]。杨杰等提出，希望苏方让售的飞机数增加至350架，即重、轻型轰炸机各100架，驱逐机150架。会谈中，杨杰特别强调：“余等来贵国时，蒋委员长曾命购超重轰炸机，作为空袭日本内地之用，若此项超重轰炸机未能购成，则余等此次来苏任务即不能全部完成，务请贵方允诺。至于机数，并不求多，有五十架即够。”[203]这一购买超重轰炸机的要求虽转至伏罗希洛夫，但起初苏方仅同意拨与中方6架。后经磋商，苏方同意提供重轰炸机70架，驱逐机165架[204]。另提供约合飞机数10%的备用发动机即23个；飞机炸弹78200枚，共1900吨；飞机机关枪子弹共1500万发，约合飞机总价额10%的附件，并派飞行教练及技师89人赴华。至9月中旬，苏方已经承诺让购的其他军械有：坦克82辆及为坦克总值10%的附件，外加修理车5辆，坦克炮弹12.3万发；45公厘口径反坦克炮50门，高射炮20门及4万发炮弹，机关枪1000挺，子弹1000万发。在会谈期间，双方还着重讨论了飞机等军械起运的时间、方式等问题。应苏方的要求，中方对自新疆到兰州途中各机场加以修整扩建，储备汽油及其他必要设备；修整公路，以备数以百计的卡车运送所购物料；并规划取道法属越南的海运路线[205]。上述洽商军

事援助的初步进展，对于抗战爆发伊始迫切需要国际援助的中国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当时国民政府对获取苏联军援抱很大的期望，蒋介石数度致电杨杰、张冲，要求争取更多的军援。根据蒋的指示，杨杰向苏方提出获得2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要求。经磋商，苏方同意，除步枪由中方自备外，苏方共提供115公厘重炮80门，炮弹8万发；76公厘野炮160门，炮弹16万发；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炮弹12万发；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枪弹共1000万发；双翼驱逐机62架，附全副武器弹药。上述兵器总数量少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方的理由是，师之编制，应以灵活性和精于火力运用，而不必过于扩大编制。中方则强调日军装备十分精良，希望日后继续提供军援。但是，即便是按照苏方承诺的数量，上述装备中的飞机和轻武器弹药之一部分自陆路运华，中方就须组织16吨的货车1000余辆在边界接运，其余的则由海路运抵越南，再转运中国内地[206]。1938年3月起，上述20师装备及60架飞机开始起运[207]。

但是，经过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几个月的激战，中方械弹消耗极大，蒋介石不甚满意杨杰在20个师装备问题上与苏方初步达成的结果，认为苏方提供的数量与中国实际的编制和需要相差甚远。1938年1月初，蒋介石指示杨杰在苏联继续交涉，具体目标是：105公厘重炮80门，76公厘野炮160门，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并强调轻、重机枪需用最急，务请速运[208]。同年2月初，蒋介石还指示杨杰向苏方接洽反坦克炮500门，手枪5万枝，重机枪2000挺，迫击炮300门，以及大量的弹药[209]。但是，直到3月中旬，苏方还是坚持原先答应的军援数量。

这样，从1937年9月起的约半年时间里，经杨杰在莫斯科交涉而获得的军械主要是以下三种账单[210]：

甲账单，飞机共232架（其中轻轰炸机62架，重轰炸机6架，驱

逐机156架，教练机8架）以及若干附属器材；坦克82辆及附属器材；76公厘高射炮20门，45公厘反坦克炮50门，配件若干。

乙账单，即20个师的装备：76公厘野炮160门，115公厘榴弹炮80门，炮弹共24万发；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炮弹12万发；马克西姆机枪800挺，德克恰辽夫机枪1100挺，枪弹共2000万发。

丙账单，双翼驱逐机60架，其他飞机5架，飞机配件若干；汽车400辆。

上述三种账单的军械及相关物资，从1937年10月24日至1938年2月14日期间，陆续为国民政府代表所接收。所有物资加上运费等，总计48,557,436美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中国法币16000余万元。总之，经过杨杰等人的交涉，苏方提供的轻型飞机和轻型武器的数量方面有所增加，但重型飞机和重型武器方面则远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对此，苏方也给出了解释，如1939年7月10日伏罗希洛夫答复杨杰时称：目前决定运华武器，已超过第一次借款数额，以后能力所及，随时均可办理。不过苏联敌人过多，东西两方，皆须兼顾，尤以蒙伪边境，日在不宣而战之状态中，苏联不能不积极备战，助华程度，只能以无伤国防为限[(211)]。对此，中国方面也颇为无奈。

由于向苏联订购军事物资的交付、输华及中方的偿付办法，均涉及中方的财政收支状况，1938年春曾由宋子文与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商洽具体事宜。中国所需军事物资价款巨大，当时中方无法在易货农矿产品方面满足苏方要求，但又拿不出现汇，这一难题使得中方十分为难[(212)]。后来通过谈判，由苏方提供新的大额贷款方式予以解决，详见下文。

基于寻求后续军事援助谈判的需要，1938年5月起，杨杰正式出任驻苏联大使，并以这一身份开始了新一轮的接洽。当时正值武汉会战开始，中方迫切希望尽快达成订货并启运，蒋介石本人就多次电催

杨杰，指示急需的飞机、大炮种类和数量，甚至直接致电伏罗希洛夫转斯大林，恳切陈词："唯目前需要驱逐机及重轰炸机之增加补充，异常迫切，各种俄炮弹亦不足用，如能迅得此项充切接济，则抵抗力量立可增厚，务请速予提前借给，即日起运，以应急需。飞机应用更急，如能早到一日，则我方战事胜利之成分即多增加一分。"[213] 但是，直到8月初，"苏俄对购械合同托辞不肯签约"，蒋介石担心苏方对武汉战况持观望态度，曾向苏方表示："无论其对倭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也。"[214] 中方的努力收到了回报，8月11日双方达成了价值达12000万元的军械订单，主要包括轻轰炸机120架、重轰炸机10架、驱逐机220架、教练机100架、小高射炮100门，以及备用发动机120台、其他飞机配件、飞机厂设备和航校设备等[215]。8月17日，蒋介石再度致电苏联当局，称武汉会战之需，请苏方尽速将中方所订之军火起运来华[216]。8月23日，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与苏联大使卢干滋（Ivan Lugants Orelsky）商谈借款购械事宜[217]。除杨杰之外，国民政府还先后派遣孙科、贺耀组以特使身份赴苏联，他们对于达成军械订单和与军援直接相关的贷款协定、催运安排重要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方面先后四次向苏联洽购军械，第一次系于1939年6月26日，由蒋介石致电当时在苏联的立法院院长孙科转交苏方。第二次于1939年9月30日，由在华苏联总顾问崔可夫在衡阳用无线电向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提出。第三次由国民政府特使贺耀组于1940年1月20日面呈伏罗希洛夫四类拟购军械表，共11800余万美元，并于同年3月中旬向苏方提出修正，即将所列购买兵工材料之美金3000万元，改购步枪8万枝及15公分榴弹炮96门。第四次系于1940年8月末由军事委员会将贺耀组所提方案再度加以修改，交新任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携苏交涉[218]。在国际局势复杂、交通条件困难以及中苏关系出现反复的情况下，那些达成协定的军械的启运、运输和最终向中方交付，也还有很长的过程。根据苏联学者的统计，战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械有：1235架飞机，1600门大炮，14000挺机枪，大

量卡车，航空汽油，弹药等；5000多辆由苏方人员驾驶的载重卡车沿着2700多公里的运输线，把军用物资运到中国。到1939年1月中旬，在中国有3665位苏联军事专家，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219]。

除了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之外，派遣军事顾问赴华，是当时苏联军事援华的重要方面。

继德国撤走军事顾问、广州武汉失陷，以及日苏之间发生张鼓峰、诺门坎事件后，中苏之间一度酝酿进行较全面的合作。蒋介石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党务、政治、军事顾问来华。至1939年7月初，斯大林表示原则上同意，先派遣军事顾问，续派党政顾问[220]。7月9日，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还联名致电蒋介石，称苏联将在力所能及之情况下，帮助中国完成解放事业，并指责日本对英国和苏联、外蒙古的攻击[221]。

实际上，至迟到1938年，苏联军事顾问就开始在国民政府有关军事部门服务。1939年1至12月，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总人数分别是46、45、51、47、47、56、55、60、75、85、95。苏联顾问涉及的兵种有：炮兵、一般军事、通信、技术员、工兵、辎重、军医、化学、炮科技师、防空、高射炮、战车炮、战车、战车防御炮、公路工程、汽车机械、机械化。这些军事顾问分配的机构和部队分别是：总顾问室8人、军令部7人、军训部4人、军政部军医署1人、军政部兵役署1人、军政部兵工署2人、一战区长官部4人、二战区3人、三战区4人、四战区4人、五战区7人（12月）、八战区1人、九战区7人（11月）、十战区2人、通信兵学校2人、炮兵学校2人、炮7旅司令部1人、步兵学校2人、机械化学校5人、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2人、桂林参谋训练班2人、桂林行营5人、第五军5人（均战车）、桂林防空司令部1人、后方勤务部4人、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3人、天水行营7人（其中1至2人兼十战区顾问）。另外，1939年6月起一些集团军也开始配置俄顾问，分别是第二、五、十二、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集团军，以及工兵学

校、陆军大学、第十三军、炮兵十一团、炮兵二旅二十团等[222]。自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撤回之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中国军队和军事部门中，虽然也先后聘任过少数法国军事顾问，但苏联军事顾问无疑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起的作用也最大。

三　中苏三次信用借款协定及其实施

抗战时期与寻求苏联军事援助相应，中、苏之间先后三次达成信用借款协定，并因实施这些协定两国之间的易货往来延续了数年。

如前所述，中苏在抗战爆发前夕接洽中，双方就已经提到过苏方将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帮助中国获得军事物资，中国可以苏方所需的农矿产品偿付。待到抗战爆发，杨杰、张冲赴苏联进行具体交涉时，苏方曾要求中方全部或部分支付现金，中方则反复申述确实无法以现汇支付所定购的军品，苏方表示谅解，但希望中方尽量提供金属原料，并以农畜产品补充[223]。双方很快确定，以信用借款的方式解决中国在获得苏联军事物资过程中的现金困难[224]。

第一次信用借款系于1938年3月1日达成，借款额为5000万美元，年利息率为3%，自1937年10月31日起计息，即按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军用品的日期计算，但还本期是从1938年10月1日起开始还本，五年还清[225]。这样，从动用到清偿的实际年限为六年。

鉴于中方需定购的军事物资价款巨大，遂于同年7月1日即第一次信用借款协定达成仅四个月后，双方又达成了第二次信用借款协定，借款额也是5000万美元，利息率3%，自7月1日起计息，还本则是自两年后的1940年7月1日起的五年[226]。借款的实际期限等于七年。

然而，这两次信用借款达成之时，双方并没有在协定上正式签字。首先是对于借款协定的具体条款文字，双方都有一个审核认定过程，直到1938年7月11日，苏方才通知中方对于两次借款协定草案审

查完毕，待中方认可后便可签字生效[227]。到8月初，苏方又要求国民政府为在莫斯科的中方代表出具专门的全权证书。为了节省时间尽快完成两份借款协定的签字，经苏方同意，中方采取了权衡办法，即国民政府方面把两次借款的两份全权证书送至在华苏联大使馆，再由苏联大使馆转报苏联政府[228]。得到苏方同意后，中苏第一、二次信用借款遂于1938年8月11日签署，代表国民政府在协定上签字的是业已成为新任驻苏大使的杨杰，代表苏方签字的是对外贸易部长米高扬[229]。一年之内达成的这两次信用借款总额达到1亿美元，对于缓解当时中国获取苏联军需物资的支付压力，有较大的作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政府必须从苏联获得更多的外来军需装备，这也就意味着在支付方面中国必须与苏方达成新的安排。1939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再次抵达莫斯科，谋求进行第三次信用借款。蒋介石十分重视孙科这次使命，希望从苏方新获得1.5亿美元的借款总额[230]。5月13日，孙科分别会晤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苏方原则同意按照中方的要求提供第三次信用借款，数额为1.5亿美元[231]。5月15日，孙科与米高扬就借款协定的各项条款，包括数额、动用期限、利息率、偿付期、偿付方式等，达成基本的谅解[232]。此后，双方进一步具体落实各项问题。1939年6月13日，中、苏之间在莫斯科正式达成了第三次信用借款协定，由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国民政府特使、立法院长孙科代表中国政府签字，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仍为米高扬。这次借款数额达1.5亿美元，年利率3%，自1939年7月1日起计息，自1942年7月1日起的10年内还本[233]。借款实际期限为13年。

这三次信用借款总额达2.5亿美元，均由孙科、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根据借款合同的规定，三次借款均用于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中方以向苏方出售农矿产品的方式抵偿债款。这意味着中国在获得已经签约的苏联军事物资的支付压力，得到了较

大缓解。

然而，上述三次信用借款的动用情况不尽相同。1939年底爆发的苏芬战争，1941年《苏日中立协定》的签署，都使中苏关系蒙上了阴影；1941年6月又爆发了苏德战争。在新的局势下，苏方中止履行业已达成的借款协定，遑论提供新的借款了。

战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三次信用借款共2亿5000万美元，按照结算日期，中方实际动支共九批，历次实际动用概况如下：

批次	结算日期	动支额（美元）	要目
一	1938年6月10日	30,321,164	飞机232架，坦克82辆，高射炮20门，反坦克炮，飞机附件零件、炮弹
二	1938年6月20日	8,379,293	机枪2000挺，76公厘野炮160门，115公厘野战重炮，反坦克炮80门，机枪和步枪子弹各1000万发，炮弹36万发
三	1938年6月27日	9,856,979	飞机65架，汽车400辆，备用飞机发动机及其他零件，232架飞机的整套武器设备，各种运输费

四		1938年9月28日		29,601,215	飞机180架，备用发动机106套，机枪2000挺，汽车300辆，37公厘炮500门及附件零件，炮弹70余万发，步枪子弹2036万发，700辆汽车之零件，各种运输费
五		1939年9月1日		21,841,349	飞机120架，发动机83台，飞机其他附件若干，机枪子弹510万发
六		1939年9月1日		18,622,024	大炮250门，机枪4400挺，步枪5万枝，卡车500辆，炮弹50余万发，航空炸弹16500枚，子弹1万发，运费
七		1939年11月1日		3,909,725	飞机53架，发动机11台，汽车30辆，飞机零件
八		1941年6月1日		49,520,828	飞机250架，机枪1300挺，高射炮250门，汽车320辆，高射炮

				弹30万发，炮弹18000发，炸弹14600枚，子弹3700发，飞机装备23套，石油产品
九	1941年6月1日	1,123,232		飞机4架，发动机21台，机枪子弹16700发。石油产品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1948年编《中苏信用借款节略》，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61页。各年动支要目见于李嘉谷：《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等军火物资数量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128—141页。

进一步分析可看出，第一次和第二次信用借款，苏方均全额供货，中方全额动支；第三次信用借款合同定额为1.5亿美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方交货73,175,809美元，战争爆发后停止交货。这样，至1941年6月，三次借款中方共动用173,175,809美元。所动支的款额均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苏方购买军火和军用品。

中国对于苏联三次信用借款的实际动用总额，其相应利息总额为28,603,897.13美元，中方以苏方所需的农矿产品抵偿借款本息，自1938年到1945年11月底，已向苏方交付农矿产品价额达131,016,271.11美元，尚欠本息70,763,626.02美元，实际上已经清偿了第一、二次借款的本息，第三次借款则正在清偿中[(234)]。

根据苏方的要求，每年应偿债额中，农矿产品各半分摊。其各年具体偿付情况如下（单位美元）：

偿付年度	应偿付本息额	实偿农产品	实偿矿产品
1938—1939	6,796,320.57	10,059,687.61	7,536,703.93

1939—1940	8,354,480.00	8,424,414.89	7,937,089.74
1940—1941	11,487,980.00	8,919,416.73	11,554,269.85
1941—1942	11,563,480.00	6,215,904.53	11,487,731.79
1942—1943	12,003,215.00	8,330,073.67	11,939,950.13
1943—1944	6,669,420.00	6,285,389.88	10,356,336.41
1944—1945	16,805,373.00	5,876,950.75	9,276,000.61
1945—1946	4,390,469.50	11,443,697.85	8,077,546.77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编《中苏信用借款节略》（1948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60—67页。

中方原由财政部所属之贸易委员会统筹办理以农矿产品偿付苏联贷款，后矿产品易货偿债事宜改由资源委员会主办，农产品则由贸易委员会交所属之复兴公司具体办理。至战后，农矿产品易货偿债统由中央信托局接办。历年交货地主要有猩腥峡、昆明和宜宾等地。虽然战时中国运输条件非常困难，中方仍尽力设法运交苏联方面。应当指出，战时中方每年向苏方交付农矿产品价额的计算标准，原订以纽约市价为准，但实际上战时各国均统制物价，并无自由市价之存在，只能参酌成本及过去价格决定，中、苏双方时常发生争执。从各年偿付情况来看，似乎中方在农产品的交付上多有拖欠。实际上其中涉及诸多因素。中方运苏之同一种类农产品，往往产之于不同地区，部分产品的规格与样品不尽相同，苏方动辄严厉挑剔，拒绝签收；部分农产品因未能提供卫生检验注明书（有些产地根本没有卫生机构）而遭苏方拒绝签收；战时中国内地交通条件落后、困难，农产品产地又较为分散，及时交付货物的确不易；另外，在苏方挑剔拒收的情况下，中方考虑到运回国内往返运费损失过巨，往往只能降级折价交付，从而使得已交付农产品的总价额显得低下[(235)]。

四　欧战爆发后中苏政治关系的波折

在1937年8月达成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中以谋求军援和贷款为重点，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不无分歧，但总体发展趋势还是令中方较满意的。

与此同时，鉴于抗战爆发后德国逐渐转为亲日疏华，召回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使得中国的战略地位受到损害，中方非常注意维护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关心苏联对中日战争的基本态度。

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中方十分担心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使日本得以自满、蒙抽调兵力，向中国战场施以更大的压力，因而密切关注着苏日关系的演变，进一步明确把防止苏日妥协作为对苏交涉的重点。1939年9月上旬，蒋介石连日约见孔祥熙、王宠惠、张群、朱家骅等，指示外交方针："欧战如果扩大，我国外交方针应注意两原则：一、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二、不使俄日妥协为第二义。……我国参加欧战后，俄日如果妥协，对我亦不能加重困难，以我已固守西南，能自主也。……我国对欧战政策之惟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联带解决也。"[236] 鉴于当时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称，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诱使日本向苏联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国民政府遂由驻苏大使杨杰在莫斯科向苏联外交部探寻真相。尽管苏方称"尚无所闻"，但杨杰亲耳听到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所作外交报告中谈到：苏联对外政策之要旨在于"减少敌人，今日为敌，明日亦可为友"，凡对苏友好之国家，苏联都可与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237]。对此，重庆方面非常紧张，即由张冲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国人民对传说中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持反对态度，另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塔斯社记者表明了同样的观点[238]。同时指示杨杰向苏方表明，根据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不得与日本签订该一条约。9月7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在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斯大林复电：一、（俄）未与倭谈妥协；二、（俄）与英、法、波（兰）（关系）如常；三、远东有事，当先通知于我[239]。但重庆方面并不放心，接连电示杨杰了解日苏是否仍在

继续谈判边界纠纷以外之问题，尤其是日苏停战不侵犯条约。苏方则向杨杰表示，日苏之间悬案颇多，如承租权、煤区暨渔业各项问题，“如日方继续请求谈判，苏联亦可讨论，惟决不能违反中国之利益及危害中国之抗战。至不侵犯条约，目前日方并未提出”[240]。除了杨杰之外，国民政府还在9月6日致电在莫斯科的中国特使孙科：“传苏日将订不侵犯条约，盼注意查示。”由于当时英国报纸称系德国驻苏大使在居间拉拢，孙科向驻莫斯科的德国、意大利使馆探询消息，德、意方面均予以否认，“此间德义使馆，均否认，德参赞言绝无其事，义大使谓德欲拉日对英，当或希望苏日和缓，但彼意苏援华政策不易改变，故对日妥协，实不可能”。而在莫斯科的美、法使馆亦对苏日妥协的说法不以为然[241]。这样，国民政府稍稍松了口气。

以后，国民政府明确了对欧洲持中立态度，但依然警惕着苏联与日本之间实行妥协的动向。1939年9月15日，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诺门坎冲突的停战协定后，国民政府对苏、日之间谋求妥协的疑虑进一步加剧了。同年11月，蒋介石在与潘友新会谈时提出，希望澄清有关苏联将与德、日联合瓜分中国的传说，并探询苏日通商谈判的情况。潘友新虽然否定了联合瓜分中国的说法，但却表示苏联与日本通商“无何妨碍”。蒋介石即对苏方的态度极表忧虑，指出日本在实现打击国民政府以结束中国事件之后，日本将以全力对付苏联，从而对中国抗战与远东前途极为不利，同时希望苏联在远东政策上能与美国一致[242]。

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后，国际联盟迅速介入，因苏联拒绝国联调停，进而引发了国联会议给予苏联开除会籍之处罚。当时中国既要表达对苏芬冲突的基本观点，又要维护与苏联的良好关系，这在英法控制下的国联会议上，颇为难办[243]。1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中国对于苏芬战争应取态度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便提出：苏联助我抗战，贷款三次共达25000万美金，我不可在国联投票，反对苏联

[244]。由于中国代表没有在国联有关会议上为苏联辩护，且在国联行政院关于开除苏联会籍的表决中投的是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苏联对中国极为不满，对华军援转持消极态度。虽然当时蒋介石亲自会见苏联大使，竭力说明中方的立场[245]，试图减少这一事件对双边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苏方的反应非常强烈。苏联外交部次长拉代夫斯基便在会见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时，故意向中方表示有与日本在满蒙划界、苏日商约等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近可能”[246]。旋即，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更向即将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杨杰提到，苏联援华之前景当“视中国之态度如何”，“苏联对华政策，仍是一贯，但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截至今日止，中国方面未见有任何人向苏解释此次用意之所在，希望贵使报告贵国政府”。莫洛托夫也向杨杰承认苏、日之间正在进行商约的谈判[247]。接着，莫洛托夫在会见因杨杰回国暂时主持驻苏使馆工作的贺耀组时，更为直接地质问道：“此次国际联盟开除苏联会员国，中国出席代表未援助，是否中国改变政策之先兆？中国政府对中国出席代表究作何训令？”莫氏认为，中国政府事先不可能不知道国联将有开除苏联会员国之表决，甚至认为国联会议上的风波是英、法、美策划的结果，且三国以援助中国抗战为条件对中国代表进行过活动；莫洛托夫不接受贺耀组的解释，同时拒绝谈军援事[248]。与此同时，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也两次改变会见贺耀组的约期[249]。

鉴于苏联方面反响之激烈，蒋介石一方面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做了说明，并指示贺耀组向苏方正式表示：“此项国联开除苏俄会籍，为我所意不及料，如事先预知，我政府必电令我代表反对此举，惜乎事先毫无人知悉，即在会前我顾（维钧）代表与日内瓦之俄代表连续接见三四次，而俄代表亦未谈及于此，并未对此作何准备也。以后关于外交关系，只要苏俄能与我事先开诚协商，则中国无不乐于尽力，以中国外交方针与苏俄一致，决不为中国自利打算也。”[250]此

外，蒋介石还就莫洛托夫对中方的责难，于1940年1月21日向在重庆的苏联总顾问郑重声明："鄙人敢负责声明，如当时敝国政府，事前知英、法有开除苏联之举动，当然投反对票，如贵国政府或驻国联代表，事前有所通知，亦必投反对票，今事前不通知，不协商，事后委责，实为抱憾。至于莫氏所称事后无何表示一层，更非事实……同时中国外交部长，正式通知潘使，谓中国仍将协助苏联，中国为国联非常任理事之一，如国联此后有制裁苏联之行动，中国必尽力打消之，使不成立，凡此皆系事后善意之表示，不能抹杀。"蒋介石还对苏方在对华交涉中一系列的冷淡举措表示异议："数月来敝国当局，无论其在莫斯科代表，或在日内瓦代表，甚至中正本人，屡向贵国政府及驻外代表商讨中苏一致对外之外交政策，曾提出种种意见，请贵国政府参酌答复，皆无复音。此种表示，是否以中国无共同讨论政策之资格，不配作朋友，亦无从知悉。但中国方面，事事与苏联商洽，已确尽其朋友之义务与责任矣。"[251] 后来，随着苏联与芬兰之间达成了解决冲突的协定，中国也改派邵力子出任驻苏联大使，做进一步的修复关系努力，这一风波才逐渐平息。

虽然中国方面非常重视维系对苏友好关系，但对于苏日关系接近十分敏感。必要时甚至力图加以反制。如1940年1月，中方得悉苏联在与日本"商谈商约与其他交涉"，作为反制举措，决定对于业已签署的"中俄商约应暂不批准与发表"，同时决定："俄国态度虽恶化，但我应以镇静处之，当操之在我也。"[252] 待到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达成军事同盟后，轴心国势力十分嚣张，关于苏、日之间将实现妥协的动向再度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而当时美国表示愿意提供专门的贷款、由苏联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支持中国的建议，遭到苏联明确的拒绝[253]。10月5日，中国大使邵力子希望苏联外交部次长拉代夫斯基澄清关于苏日将达成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时，拉氏闪烁其词，"但谓传说与推测不能作为事实讨论"[254]。而旋即邵力子从美国驻苏大使处获悉："苏日不侵犯条约，已为时间问题。"[255] 这更加深了中方的担心。在此背景下，斯大林1940年10月16日致函蒋介石，答复

蒋9月29日关于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后中苏关系的提问时，仅称中国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军力，回避是否继续援华；同时谈到："现在关于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谈写颇多，余未知此种传说，与事实有何符合。但无论如何，余认为无疑者，祗须中国国民军坚固强壮，则中国可克服任何困难。"[256] 当时，中方判断"日苏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事渐有可能"[257]，并且考虑过对于"俄国与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限制策略"[258]，任由舆论界公开批评此事。但在苏日正式签约之前，中方还是比较克制，因此蒋介石在对斯大林10月16日来函的回复中，没有直接点出中方的担忧与不满，只是强调"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259]，希望牵制苏联走向对日本的妥协。

此后，中国方面非常关注苏、日之间关系的发展进程。待到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德国途经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的接见。中国大使邵力子即向苏联外交部方面探询事实真相，苏方答称仅系礼仪性会见。邵力子即提请苏方注意日本"尽力造谣"、"离间中苏"关系的阴谋，指出"苏联不仅不能与日本商谈任何不利于中国之事，且并未与日本谈及中国问题，此在中苏友谊与苏联独立自由之外交政策，均应如此看法"[260]。4月上旬，莫洛托夫与结束德国之行再度访苏的松冈洋右会谈，这进一步引起中方的关注。4月1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在重庆向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此事，潘友新表示：苏联对外政策不变，苏联决不为自己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接待"。即便如此，张冲仍表示了中方的担心："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苏联慎重，有以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261]

事实很快证明，中方的担忧不是多余的。4月13日，莫洛托夫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在莫斯科签署了"中立条约"，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

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更有甚者，双方签署的共同宣言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262] 如果说协定文本的指向并不专门针对某一国家，这一宣言则明白无误地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对中国而言，苏日中立协定是“最主要的朋友”与“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之间的缔约，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国民政府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协定不仅意味着苏联在军事上将不再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对东北和外蒙古的主权，对此国民政府无法再保持沉默，“对俄倭协定与声明，我政府立即否认，毫不顾虑与思索，以示我自主自强之决心与国格，而不与俄国以丝毫之空隙与试探机会”[263]。4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称苏日关于中立协定之宣言妨害中国主权，中国政府决不承认：“本月十三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时所发表之共同宣言，内称日本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苏联尊重所谓‘满洲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查东北四省及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264] 4月15日，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按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在中日战事未终了之前，苏联似不应与侵略的暴日，缔结任何协定，致于中国抗战，有不利的影响，乃苏日协定竟成立于中国正在抗战的途中，而且在苏联累次声明反对侵略行动之后，这不免予中国国民以奇异的感想。”社论更批评苏联在外蒙古和伪满问题上，违背以往中苏之间的协约和苏联以往的声明，“向暴日索取对外蒙的保证”和“予暴日以这种（承认伪满）保证”，指出：“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第三国相互间的声明，当然无效。”[265] 另外，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也发表了措辞甚为激烈的社论。

在中方朝野的反响之下，4月19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在重庆访晤蒋介石，为苏日中立协定辩解，称“对华政策不变，仍照常援华抗倭”

[266]，并指责《大公报》发表的社论“殊觉言之过激”。蒋介石则指出：苏日缔结此约，自表面上观之，苏联已与日本妥协矣，此在余个人则固能了解，惟一般民众与前方军队，则不免受其影响。吾人对于斯大林先生个人之崇敬，绝不因此次之条约而减少也，惟大公报所言，亦足见我国一般知识分子，与许多民众对于该项条约之心理。他并且希望：“往事不须多论，余希望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两先生，于今后讨论苏日关系之时，能于事前与敝政府开诚磋商，则敝政府亦可预为布置。苏联最高领导人今后与日本讨论涉及与中国有关问题时，能于事前与中国政府开诚磋商。……余相信贵我两国之邦交，一如往日之亲密，往事可不必怀忆，吾人权当苏日协定未曾缔结，亦不必认此约存在于今日也。”[267]

至于苏日中立协定对中国抗战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中方应持的态度，可见于蒋介石1941年4月24日给各地军政当局的密电，内有五方面的分析：一、是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日本将失去其最有力之盟友德国；二、将使英、美对日备战益亟，敌视益深；三、苏联对我国不免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而于我国固毫无损伤，且可使我军民知立国于今日，所有外交政策，固均以本国利害为首位，正足以警觉自悟，策励自强，此项苏日中立条约订立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国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我国抗战之全局也；四、日本在东北所能抽调之兵力仅六个师团，在军事上任采取何种途径，均不能与我以抗战全局若何之妨害；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军之动向有南进、北进和先解决中国三种可能。蒋介石的结论是：“苏日条约之订立，一方面决不影响我国之抗战，他方面又只足增敌国所已造成之危机……我国抗战之国策，认定只有在世界整个局势发展中，方能求得我最后之胜利，故联合太平洋上各国以制裁寇敌而澄清远东之局势，乃为我国一贯不变之方针耳。”[268] 国民党当局政府当时一方面通知各驻外使馆，告知“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269]。另一方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颁发宣传要点，要求国内各言论机关

在论及苏日中立协定时遵行，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伤苏联之感情，造成反苏之印象，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270]。虽然国民政府低调处理苏日签署中立协定一事，尽量持克制的态度，苏方也一再表白不会损害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毕竟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第四节　围绕英国对日妥协的交涉和寻求财经援助

一　关于英日在中国海关问题协定的交涉

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便颇为担心英日之间关于中国问题可能达成妥协，认为这种妥协无疑将以中国的权益为筹码。对于中方的疑虑，英国方面也在不少场合作出过澄清。1937年5月23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便致函中国外长王宠惠，称英、日关系范围广泛，“凡谈判发展有涉及他国关系者，将竭力使该关系国预闻，美、法、俄、华同样在此预闻之列”[271]。

战前，英国方面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上海、天津等重要口岸税务司的职位。抗战爆发后，有关中国海关主权的完整和相应的利益问题上，中英之间发生交涉达两年之久。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在华北步步进逼，天津海关英籍税务司梅维亮（W．R．Myers）已经向总税务司梅乐和（F．Maze）谈到：“（天津）海关问题终必发生。……将来如果发生此项问题，惟一挽救办法，惟有由我方允许津、秦两关因其关税系专为担保内外债而征收，保证两关税款余数扣留，作为此项用途。”[272]也就是说，英方打算以停止向国民政府汇解津、秦关余的办法，来应对日本可能对海关行政权的攫夺。这种办法究其实质，仍然是以中国的海关权益来与日方妥协。

1937年7月底天津失陷后，天津日本总领事崛内就向梅维亮提出了这个问题。8月10日，梅维亮致电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称日本迟

早将提出海关问题，建议："将来如果发生此项问题，惟一挽救办法，惟有由我方允许津、秦两关系专为以关税为担保之内外债办理征税，并担保两关税全数扣留，作为此用途。此种办法或有成功可能，因日方态度对于各种有关国际事务，似尚无意干涉。"8月30日，天津日本总领事对于天津和秦皇岛中国海关向梅维亮提出三项要求：1．海关税收除应摊付外债部分可照常汇解外，其余税款应存于日方认可之银行保管；2．不准放行中国政府进口之军火；3．关余暂存横滨正金银行保管，否则应另筹日方认可之方法，担保该项余款不移作不正当之用途。梅维亮提出应接受日方前两项要求，梅乐和亦表示赞成，并认为可以维持中国对外债信和中央政府在当地之主权，遂转呈关务署[(273)]。9月7日，梅乐和又致电关务署，催促尽早答复；答应将就拨付内债基金一节向日方交涉，但如果日方不同意，仅准备声明保留[(274)]。

在得悉日方的要求后，以中国金融界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便及时作出了反应，于1937年9月4日致函梅乐和，要求向日方鼎力交涉，对于内债基金务必照前拨付[(275)]。关务署则于9月15日致电梅乐和，认为日本提出的三项要求"碍及国家主权"，且日本已在占领区干涉海关行政，因而拒绝接受；并明确指示："关税收入，关系担保偿还内外债务及赔款，该总税务司责任重大，自应于不妨碍国家主权及关政统一范围之下，力为维护。如遇有某关不能执行职务时，应即将该关宣告封闭，立于附近相当地点，另行设关征税。同时并应预筹由他关代收该关税款办法，以图补救。"[(276)]对此，梅乐和一方面电告梅维亮对日交涉范围：（一）所有税收，应由非日籍之中立银行收解存储；（二）扣解征收费用；（三）扣解津、秦两关应摊付赔款及内外债基金；（四）扣除以上各项外，余款暂存第一条所指之中立银行，以待战事结束。同时，就当时国民政府方面的态度，梅乐和又向梅维亮交底："政府继续摇摆不定，过去和现在，意见都有分歧，'面子'始终是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国民政府"对于外国反对劫夺海关的抗议，未免估价太高"，因为"这种抗议对于独断专

行的日本军方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梅乐和曾试图说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财政部次长徐堪等人接受日本的条件，但遭到拒绝。最为关键的是，梅乐和以表达其个人意见的方式向梅维亮谈到：“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些条件是合理的。”[277] 这实际上是默许梅维亮在对日交涉时可以接受日方的条件。

与此同时，天津海关问题也成为中、英两国正式交涉的重要内容。中国外长王宠惠与英国代办贺武（R．G．Howe）商谈之后，中方仍不愿作出让步，确定了对日交涉海关问题的六项条件，令梅乐和转饬梅维亮遵行：“（一）海关全部收入向系存放于中央银行，现由政府自动令中央银行委托第三国银行暂行存放，其手续由中央银行与受托之第三国银行订定；（二）委托存放之款，为海关全部税款，包括津、秦两关在内；（三）委托存放之时效，以自卫抗战结束时为止；（四）受委托之第三国银行，对于委托之中央银行，负保管其存放之海关全部税款之责，但津、秦两关税款，可允许其转存于其他银行；（五）受委托银行在受托有效时期内，海关按月拨付各款，仍照现行办法办理。但津、秦两关税款暂存其他银行者，得按期提拨外债摊额及经费部分；（六）受委托银行限于保管海关税款，不得干预其他事项。”[278] 上述六项办法，是当时国民政府打算让步的底线。

不过，据梅乐和9月19日致梅维亮电，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非正式特准该税务司得自由斟酌，将津、秦两关税款存于当地有相当地位殷实可靠之银行，以作最后之让步。但所有该两关所需经费及应摊付内外债赔各款，并就地应拨款项，如治河及检疫经费等，应照常如期拨付”。这意味着在津、秦关税存入正金银行一事上，中方实际上打算作出更大的让步。梅维亮即以梅乐和该电文为“授权”依据，迫不及待地于10月22日在天津正金银行设立账户，将津、秦两关征收的全部关税均存于该行。但梅维亮在对日让步方面走得更远，他在当日照会驻天津日本总领事，擅自承诺：“至于指定摊付债务的款项，因目前战事而发生的问题未解决以前，我不拟提取，因此并不发

生任何问题。”[279] 这意味着存于日本正金银行的津、秦两关所征关税之中，不仅内债基金，而且外债基金也不会提拨。于是，中国对天津、秦皇岛海关的主权，只剩下英籍海关税务司这一形式了。

日本在攫得了华北海关税收款的保管权之后，又以华北伪政权派往天津海关监督温世珍的名义，提出了减免关税税率的无理要求。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梅维亮、梅乐和还是驻华英国使节，都压国民政府方面作出让步。对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1月7日电示梅乐和转饬华北各关税务司：“（一）不得接受伪政府命令及与商订任何条件；（二）海关现行章制及办事手续不得变更；（三）现行税则不得擅行变动。以上各点，系维持海关行政权之最低立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不得稍有迁就。”梅乐和则在1月12日复电称：“为维护中国主权……并为减少敌方参与关务之机会起见，将来在其他敌方占据口岸，对于非关重要事项，恐不得不因暴力威胁而从权应付，藉维现状。再因战事关系，贸易衰落，民生困苦，为振兴对外贸易恢复国内经济计，职或于最近将来对于某种税率，呈请准予修改。”[280] 1月22日，华北伪政府正式宣布降低多种货品的进口税率。次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再度电示梅乐和，令饬津、秦各海关税务司，“对于该项非法税则，拒绝施行，仍照现行税则征税，不得违误”。梅乐和一方面要求梅维亮不得在未经国民政府批准之下实施修改税则，但又提议对1931年税则稍作修改后在各海关实施，其实质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减税。英国政府也电令驻华使馆代办贺武劝告孔祥熙接受梅乐和的上述建议[281]。

对于实施伪税则，国民政府方面不愿轻易作出让步。2月中旬，孔祥熙电令各关：“不能容许海关人员继续实施伪税则。如果无法实施合法税则，全体关员也应当拒绝实施伪税则。……税务司应该通告公众，凡按伪税则缴纳的关税，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但是，贺武却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反对孔祥熙对各关税务司的这一电令，称：“任何这一类的指示都将使税务司要末违抗命令，要末使海关分裂。”

[282] 2月25日，孔祥熙致函答复驻汉口的英国使团：按照条约和各项协定的规定，中国政府有义务在全国实施统一税则，以关税收入偿付债务并保持海关机构的现状。日本当局和它的傀儡正在严重地阻扰中国政府履行这些义务。中国政府认为应当把日本的种种暴行揭露出来，不应当让它在合法的外衣下活动。对日方暴行采取默许政策，就是为沦陷区海关落入日本手中铺平道路，并使日方的阴谋得逞。孔祥熙进而要求梅乐和命令各关税务司："伪税则实施范围不得扩大，已实施伪税则的各关应尽可能恢复合法税则，除偿付中国各项债务的税款外，其余税款应设法全部发放。" [283] 这实际上是对英方作出让步，默许按伪税则征税了。

日本在华北实际上控制了中国海关收入后，便打算进而攫夺其他占领区的中国海关。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之后，日本军方便扬言，要按照天津海关的前例控制江海关。11月下旬，上海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向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L．H．Lawford）提出：1．在江海关任用日籍监视员；2．江海关税收以税务司名义存入正金银行，可提取税务司署经费；3．拨付外债赔款问题，在有关各国与日方谈判后再决定。日方并以"接管"江海关压英方接受 [284] 。江海关的关税收入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一半，英国政府自然不甘心轻易落入日本手中，担心江海关税务司作出太大的让步，遂提出几种折衷方案，如：把江海关收入存入汇丰银行，分存于四国银行团成员银行，由国民政府授权梅乐和按照英、美、法三国政府的意见与日方达成临时协议，但中日双方都不同意，英日谈判没有取得实际进展。

然而，随着日本接二连三地施压，英国准备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向日方作出让步，以换得英方得以继续在名义上控制海关，按期拨付赔款与外债。从1938年2月26日起，英日之间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会谈在东京开始举行。27日，日本外务次官堀内谦介便向英国大使克莱琪（R．Craigie）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其核心内容就是日占区内各海关之所有收入，均需存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285] 。尽管在

日后的谈判中英方也提出不少意见，但在攫夺各海关收入保管权这一问题上日方始终没有松口。中国完全被排斥在这一轮英日会谈之外，颇为担心权益进一步遭受损害。同年4月下旬，蒋介石在汉口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Sir A．Clark Kerr，亦译作寇尔、克尔）明确指出：现阶段英、日间就中国海关问题的谈判达成任何协议，都将是对中国的伤害，因为日方将把该协议说成是对他们的道义上的支持以及对伪政权某种意义上的承认，中国部分口岸已经沦陷，落入日伪当局的控制；蒋并且说，如果英国不能向中国提供积极的援助，但至少应停止与中国的敌人达成协议来表示对中国消极的支持[286]。同时，郭泰祺从英国外交部获得的说法是："在我方未表示意见前，英方自不贸然签订。"[287]然而，在日方的压力之下，5月1日英国财政部就通过外交部授权克莱琪签字，甚至来不及等待驻华大使卡尔的最后意见，也没有与英国政府其他部门商议，遑论考虑中国政府的反应了[288]。5月2日下午，克莱琪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换文的方式达成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289]。根据这个协定，沦陷区各海关的一切收入及其支配都将置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这些收入名义上列在总税务司账户上，其他债权国的有关利益也将受制于日本，而中国对海关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国内债权人的有关利益被剥夺。

英国方面是在5月2日才由卡尔把上述协定的内容正式函知蒋介石，称协定在三方面有利于中国：1．日方承认拨付关税担保外债之相当部分，藉以维持国际上中国之信用；2．以中国法币而不以任何新行之伪币付税，藉以维持法币对伪币之地位；3．海关行政人员得以保留。并且要求中方不要采取致使协定不能实行的任何举动，否则将导致海关行政完全破坏，使日方为所欲为[290]。但是中方仍表示了对英日协定的不满。5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向英国领馆官员表示非常遗憾，指出：一个友好大国与日本达成的协定，有助于加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的兵力，却没有中国参加，也没有与中国政府协商。孔祥熙质问英方，关于协定的最后条款，究竟在多大程度与美国和法国协商过[291]。

5月4日，国民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对英日签订中国海关协定表示遗憾，称该协定“对于海关担保之债务，仅提一部分，予以优惠待遇，而对于其他债务，如内债之类，则不提及，是将担保此项债务税款之用途，听其转移，殊为失当。又该协定将现存中立银行之税款，转存于敌国之银行，虽此项税款，系由被占领区域之上海及其他进口商埠所征收，然实际系为我全国各地消费民众所缴纳，存于敌国银行，势将益助长其侵略之行为，尤无疑义”[292]。5月6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正式照会英国大使卡尔：“中国政府兹悉英国与日本政府业已订立关于中国海关的某种办法。不论英国政府订立此项办法具有若何动机，而两国间未经中国之同意，将中国行政上的重要部分即海关问题，作为协定之标的，殊为遗憾。中国政府于此愿向英国政府提醒其作为之正式约言，即不与其他国家订立损害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任何条约与办法。现中国政府不得不声明：英国与日本政府订立之关于中国海关的办法，中国绝不受其拘束，并保留对于海关的一切权利与行动之自由。”[293]

除了发表谈话和照会之外，中方确实也采取了某些相应措施。在日本驻上海领事的压力下，经梅乐和的同意，江海关英籍税务司安迈斯在正金银行开立账户，把原存在汇丰银行的江海关税款约1600万元转存正金银行。中方当即表示反对。5月4日，孔祥熙向安迈斯指出，无论总税务司还是任何中国官员，都不能把已存入外国银行的税款转存日本银行。孔祥熙并指示关务署长郑莱，立即把江海关存于汇丰银行的税款2500万元拨交中央银行[294]。财政部重新核定海关税款汇解补充办法，规定自6月1日起，各关收入中，除将所摊算应付外债赔款、总税务司署经费及其他例拨各款，汇存上海汇丰银行总税务司账户之外，余款均应径汇汉口中央银行总行，存总税务司账户已备拨付内债基金。财政部并且不同意梅乐和的建议，即向汇丰银行借款以偿付积欠的日本部分庚子赔款。

英国在中国海关主权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其后果是十分严重

的，中国方面除了由财政部向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及相关英籍税务司发出指示外，又通过外交途径向英方表明立场。如5月6日外交部照会卡尔大使，对于英日两国间未经中国之同意，将中国行政上的重要部分即海关问题，作为协定之标的，表示遗憾，并声明：英国与日本政府订立之关于中国海关的办法，中国绝不受其拘束，并保留对于海关的一切权利与行动之自由，同时将该照会抄送美、法、比、荷等国驻华大使公使馆，表明严正之态度[295]。6月6日，外交部照会重庆英国使馆，称英方“如果对于实施伪税则不加反对，中国政府对于偿还外债的办法将不得不重新考虑”[296]。7月7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又向英国驻华大使馆表示了中国政府在海关问题上的立场：（1）对日本夺取海关，不予承认，按照现行国际条约基本上维持去年秋天日本非法干涉以前的海关原状；（2）维护所有战前未还清的以关税为担保的内外债持票人的权利；（3）继续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赔款，以免在中日战事期间用于对华侵略[297]。鉴于中方对英日签署关于中国海关协定的明显不满，7月9日卡尔大使向孔祥熙提出，希望中方采取措施帮助实施该协定。对此，孔祥熙则答复称：中国政府面临很大的难处，包括来自舆论的压力和国民参政会的质询，公众质疑英国的动机，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虽然卡尔本人以及中央银行的英籍顾问霍尔巴志（Hall—Patch）都竭力向孔祥熙进行解释，中方依然对协助实施英日关于中国海关协定持保留态度[298]。

应当指出，日方对中国海关收入的攫夺由来已久，在财政上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中国各海关，即以武力胁迫将税款收入存于日商银行，不准海关当局自由支配，对于应由关税摊付内外债赔各款，均未汇解总税务司。国民政府为维持债信，只得由中央银行透支垫付日占区各海关应摊未解之款，以保持按期支付外债本息。据统计，至1937年年底，以关税为第一担保的外债总额为25,877,475英镑、28,800,130美元[299]。从1937年9月至1938年底的16个月里，中央银行为支付关税担保债赔各款，累计垫付1.75亿元，占1937年度财政实收总额的42.4%[300]

。由于英国方面的妥协，日本对中国海关主权和利益的侵害，便披上“合法”外衣，中国收回海关权益的前景更趋遥远。为应对这一严峻局面，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停止支付以关税担保内外各债本息[301]。具体地说，就是把每月海关担保各项债务之数额，按照各关所在地划分为战区（即日占区）及非战区（即国统区）两部分，各以上个月本区收入数目比照全国关税收入总数，定为各该区本月份应摊债额之标准；国民政府停止支付海关担保外债的本息，但把国统区各关应承担的份额存入中央银行备付，恢复支付的条件，是日占区各关将其以前欠缴之款补齐并每月向总税务司照旧解款。

为了取得以英国为首的各债权国的谅解，国民政府当时曾多次声明，采用摊存办法是“不得已而出此，而我努力维持债信之苦心，早为中外所共见”；同时把停付外债本息归咎于日本侵华、劫夺中国财政收入，称：“倘日人仍执迷不悟，毁约失信，则一切责任，应由日人负之也。”[302]在某种程度上，国民政府停付外债本息，既是直接规避日本的侵害，也是对英国在中国海关主权问题上的错误举措所作出的一种外交反应。但是，英国在以中国海关主权与日本作交易的同时，却对中国暂停支付以关税担保的外债的决定表示不满，甚至向中方建议实行英日所拟之海关办法，以增加关税收入，恢复支付外债本息的能力[303]。这一要求遭到中国的拒绝，而英国的妥协，反而助长了日本攫夺中国海关和其他财经权益的野心，英国本身的在华权益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二　关于天津租界和白银问题的交涉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试图控制其他国家在华租界的活动。当时在天津英租界问题上，日本提出了镇压抗日活动和引渡中国抗日志士，交出中国政府银行存银等要求。

从1938年7月下旬起，英日双方便不断进行交涉，侵占天津的日

军甚至在英租界周围设置过路障，但谈判未获有结果。至1939年春夏之际，日本又利用伪政权人员被刺事件，先后提出直接插手上海公共租界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权的要求，国民政府曾向英国明确表示反对[304]。英方联合美国和法国，向日本示以较强硬的立场，日本在上海和厦门两地的租界问题上暂时未能得逞。

1939年4月9日，北平伪临时政府委派的天津海关监督、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遇刺毙命，英国租界当局拘捕了四名中国嫌犯。日本乘机在天津租界问题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迫使英方让步。

英、日之间为应否引渡刺程嫌犯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涉。国民政府当然坚决反对英租界当局向日方引渡四名中国人。4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向卡尔大使强调指出：在类似情况下的中国人都是爱国者，把他们交给日本人将产生严重的后果[305]。6月6日，中国大使郭泰祺又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转达了蒋介石的请求，即不要把拘押在天津英租界的中国爱国者引渡与日本方面，同时保证今后不会给英租界带来新的麻烦[306]。

在日方的压力下，驻天津的英国总领事贾米森（Edgar G. Jamieson）一开始主张向日方引渡嫌犯。但驻华大使卡尔不赞成轻易向日本妥协，他先是向英国外交部提议，由英方自行把四名嫌犯驱逐出英租界；到6月10日，他又建议由英、日及中立国各一名代表组成委员会，就该四名嫌犯是否有罪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向日方引渡[307]。待到英国外交部同意并向日方提出组成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后，日军却于6月14日起正式封锁了英租界，对进出租界的人士进行严格的检查，侮辱英国侨民的事情不断发生，英租界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也基本被中断了。

在天津租界危机发生之初，英国政府一度考虑作出较强硬的反应，如禁止日本船只停靠新加坡、槟榔屿和香港，中止英日商约。英

国还试图获得法国和美国的支持，但未果。在权衡了欧洲和远东的局势后，英国政府最终认为无法单独与日本对峙，决定通过与日本谈判来解决危机。

1939年7月15日起，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商谈有关天津问题。此时，日方提出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引渡嫌犯，进而要求英方在镇压和防范中国抗日运动方面与日方合作，制止法币在华北的流通，交出中国政府银行在天津的存银。英方则只同意就政治方面的问题进行谈判。7月22日，克莱琪与有田达成协定，24日双方发表声明：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英国政府将趁此时机对在华之英当局及英侨说明此点，令其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置，以证实英国在此方面所采取之政策[(308)]。

应当指出，1938年5月英国背着中国与日本达成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后，国民政府对英、日进一步的妥协开始警觉。同年夏，中方知悉英国与日本将就中国问题进行新的会谈后，曾由驻英大使郭泰祺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不接受英、日间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协定[(309)]。同年9月13日，英国驻华代办贺武在武昌向蒋介石探询中方是否接受将汉口设立为安全区，并代表卡尔大使向蒋介石转陈日方之条件，遭到蒋介石当面拒绝："一、从事实上言，凡有华军驻守之处，乃为安全区。二、汉口问题为中国问题之一部分，中国问题又为远东问题之一部分，不可分割。三、除非中国境内，日军全部撤退，决无安全之道。四、中国之抗战，自卫亦为卫（国联）盟约，英法既同为会员国，应彻底与中国合作，驱逐此人类公敌。五、日军从未信守诺言，即使设立安全区，亦不过助益日军之暴行。六、此种无理条款，英方根本不应为之转递。"[(310)] 贺武则辩称法国大使那齐亚亦同意日本此

项要求，在蒋介石看来，这意味着“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而惟以势利是尚也，痛恶之至！”[311] 如果说在英、法提出在汉口设“安全区”无法被中国政府接受的话，那么1939年7月克莱琪与有田就天津英租界危机在东京达成的协定，已经远远超出了天津英租界的范围，完全可以被视作对日本全面侵华合法性的承认，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违背了自抗战爆发以来英国政府在历次国际会议和其他公开场合对中国的道义承诺。对此，中国方面当然更为不满。

中国大使郭泰祺于7月24日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指出，英日协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天津地方问题，也是关系到对日本侵略的基本立场，英国与其他有关国家对此均所负有义务[312]。中方并向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裨德本（Prideaux Brune）提出，英国政府必须就英日协定问题向中国政府作出明确说明。7月25日，裨德本向中方表示：英国愿向中国政府保证，英日所商定之原则丝毫不变更以前情形，对于贵国事件仍照一贯政策[313]。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中国当局对于英国政府在此次东京会谈所采取之态度，不能不引为失望，日军之对华侵略，业经英国自身与其他国联会员国予以公认，而英国政府对于在华日军之所谓特殊需要，竟声明知悉，是不能不深引为憾。英国政府又担任使在华英国当局及英国侨民明悉彼等应避免任何阻碍达到日本军队目的之行动或办法，尤堪讶异。”不过，外交部的声明也表示：“中国政府差认为满意者，则英国首相张伯伦曾在下议院宣称英政府之政策，决不容许任何他国之指挥而使变更，昨又保证英政府现在发表之声明，绝未包含变更其对华政策之意，而英政府之对华政策，向系根据条约与正义及其自身之权益，且始终一贯遵行，未偿稍渝，吾人故不必重向英政府提示其在历届国联决议案下所为之确保即避免采取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其在此次冲突中之困难之任何行动，并对于援助中国之各种办法，尽量使其有效。英方所发表之声明，虽已引为若干疑虑，但中国政府深信英国政府对于所谓天津局部问题之讨论，必将采取一种态度，符合其法律上及道德上对华之责任，并以行动表明其对于日本在

华侵略造成之局势，决不变更其固有之政策。”[314]

当时，国民政府正在谋求英国方面为法币平准基金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对有田—克莱琪协定作出的反应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7月27日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裨德本向国民政府中国外交部所作的口头声明中，竟把英国对日本所作之妥协归之于“中国人在租界内之活动”，指责“此项活动妨碍租界之不偏袒，并使租界当局与日本军人之关系趋于恶化”，辩称英日达成协定之后，“现有困难之解决，实无妨碍中国利益之处”。同日，蒋介石在演讲中指出：“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妨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如此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亦无异于帮助日本撕毁九国公约，英国何能背信蔑义，甘与侵略国相附而放弃其对华久远之友谊？吾人不仅信任友邦之政府，同时更相信世界各国正义舆论之力量。何况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次日，蒋介石致电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希望英国朝野忠于诺言，尊重国际法律与条约，立即停止与日本之谈判[315]。当时蒋介石一度把英国在东京会谈中对日本的妥协，与当时上海外汇金融风潮难以平息，看作是“时局最为严重”的重大标志[316]；可见，英日协定的签署被国民政府视为关系全局的重大事件，它给中英关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冲突，英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反对，于8月11日公开宣布将把涉及刺杀程锡庚的四名中国嫌犯移交天津日伪当局。蒋介石认为，英方的决定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中国政府无法容忍坐视[317]。这就引发了国民政府新的抗议交涉。根据蒋介石的电示，驻英大使郭泰祺8月12日向哈利法克斯递交书面照会以示抗议，指出：所谓天津“地方当局”的合法地位是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的，因而所发出的引渡要求也是不合法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移交嫌犯有悖法律之公正，也不可能有公正之审讯，与英国的司法原则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在实施

引渡决定之前再度慎重考虑，以维持执法之公正和中英两国现有之友好关系[318]。8月13日，国民政府又通过驻渝英国使馆办事处致电卡尔大使："委座对贵国政府决定引渡中国嫌犯引为憾事，盼对我之抗议即有迅速答复，声明此种举动在事实上或情理上决无承认天津伪组织之意。"[319] 在英方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8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英国代办裨德本，要求转告卡尔大使：蒋本人对英方的决定表示遗憾，要求英方对中国政府的抗议作出正式答复，并声明此种引渡措施并不构成对傀儡政权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320]。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也通过裨德本向英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照会，强调英方向天津傀儡当局法院移交嫌犯是非法的。尽管围绕引渡嫌犯一案，中方已经数度向英方进行交涉，但是这一次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响，仍颇使英方感到意外[321]。迟至8月25日，英国才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郭泰祺8月12日的照会作出书面答复，解释说英方之所以没有在天津地方法院提出引渡要求时马上移交嫌犯，是因为当时掌握的证据尚不充分；但在7月24日的东京会谈上，日本方面以及法律顾问提供了证据，嫌犯中两人被指控谋杀，另外两人被指控加入非法恐怖组织，在此情况下，已经无法拒绝天津地方当局的引渡要求，因而英国政府已向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发出相应的指示。另外，哈利法克斯在复函中还辩称，英国政府一贯维持天津英租界的中立地位[322]。8月31日，郭泰祺再度照会英国外交部，要求勿将刺程涉嫌华人移交日方，英方此项行动不仅违反司法惯例，而且违反了英国对华条约义务，指出："本案之症结，并非在于四华人之有罪与否，主要问题即英方是否有权将华籍人民移交与伪法院，即英内阁总检察官于半月前在伦敦审理人身保护状申请案时，亦称天津法院为傀儡法院。"[323]

应当指出，在天津租界危机期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一直不赞成轻易对日本让步。直到8月28日，卡尔还急电哈利法克斯，希望加强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重新确立英国业已受到损害的威信，并且指出：英国政府在天津危机中站在日本一边，无疑损害了英国的威信；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如引渡四名嫌犯，使得中国人对我们产生了疑虑，

他们希望我们重新保证英国仍将在远东起重要作用[324]。但是，在欧洲大战爆发前后，对日绥靖已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主导面，在日方的屡屡施压之下，英方最终于9月5日把涉及“程案”的四名中国人自租界监狱引渡至伪天津地方法院，该四人旋被交与天津日军当局。

然而英国的退让换得的是日本的步步进逼，也使国民政府方面愈益不满，英国远东政策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至于天津存银问题，则由来已久，所引起的英、日之间以及中、英之间相应的交涉也颇为复杂。战前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收兑流通中的白银，另集中各行作为发行准备的白银。但在华北地区收回的白银，却因日方无理阻扰未能南运，大部分留存于天津和北平的中国、交通两行。待到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平津之后不久，即试图攫夺在租界的白银。

1938年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笼后，日本便要求英租界当局交出中方存银，以作为发行伪“联银券”的准备，英方没有同意。当年底日方加速了对天津租界存银的图谋。12月6日，外交部照会法国大使馆：“查中国政府在天津法租界内存有白银，日方屡谋攫取。以天津法租界当局向持严正态度，予以维护，日方未达目的。中国政府对于法方援助，深为感荷！近据报告：日方对于该项存银，图谋益亟。外交部应请法国大使馆转行天津法租界当局，仍本向来维护之精神，将该项存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组织攫取或占有。至纫睦谊。合即略达。”[325] 另在1939年1月21日照会英国大使馆：“查中国政府在天津英租界内存有白银，日方屡谋攫取。以天津英租界当局向持严正态度，予以维护，日方未达目的。中国政府对于英方援助深为感荷。近据报告：日方对于该项存银，仍在图谋攫取。外交部应请英国大使馆转行天津英租界当局，仍本向来维护之精神，将该项存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组织攫取或占有。至纫睦谊。天津有关系各银行已经中国当局知照悉。合即略达。”[326]

为了防止日方的纠缠，英法方面希望封存这批白银时日本总领事在场，但日方却提出，必须有日本军方和“联合准备银行”的代表在场，这一无理要求遭到英方的拒绝[327]。1939年1月21日，外交部再度书面照会英国大使馆：中国政府有银锭存于天津英租界，日人曾几番意欲劫夺，终因天津英租界当局明确所持之维护立场而未能得逞。中国政府对英方之相助，谨致谢忱。然而近日有报告称，日人仍在谋划截得此银储备，中国外交部希望英国大使馆直接指示天津租界当局，一本原先之维护立场，封存此批白银并妥加保护，勿使日人或任何非法组织截夺[328]。

待到1939年夏初日本军队封锁天津英租界后，日方即要求天津租界内中国各银行之存银（约为法币4800万元）交付日方。当时，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杉山元公开宣称：英国若不将英租界中的白银移交伪华北临时政府，并禁止法币流通，则天津问题无从解决；英国若拒绝与日方合作，则日军在必要时准备增强对华北英侨之限制，英国并须对华北局势恶化负责[329]。有鉴于此，7月5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大使馆：“关于日伪谋取中国政府在天津英法租界存银事，外交部曾于二十八年一月廿一日略请英大使馆转行天津租界当局，将该项存银妥为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伪攫取或占有在案。现据报：英当局现拟允敌接收该项存银等情。查此项消息如果属实，不啻有显于中国政府不利，且与英国政府向来采取之政策不符。除分达外，相应略请英大使馆查照，特予严重注意，转达英国政府本一贯之精神，坚予维护保存，切勿接受日方该项要求，以敦睦谊，并盼见复为荷。合即略达。”同日，外交部还向法国大使馆致送了仅改动国别称谓而内容相同的节略。而在致美国大使馆的节略中，要求转达美国政府“予以注意，提醒英法两国政府切勿接受日方该项要求”[330]。

1939年7月克莱琪与有田达成协定后，日方再次要求英方交出天津英租界之中方存银。8月底，英国政府表示，该项白银分别寄存于英、法两国银行，在未商得法国同意前，不能单独解决白银问题。这

样，天津存银问题实际上已经国际化了。起初，英、法建议两项解决方案：一、交由国际委员会管理；二、用作赈济华北之用。但中国政府不愿接受以该两项建议作为解决之基础，坚持中国应有权自行处理该款之主权。

由于日方一开始就把攫夺天津存银的目标公开化了，中方十分关注英方的相应态度。1939年7月18日即克莱琪与有田达成协定公布前夕，中方曾向重庆英国使馆代办裨德本表示，天津存银问题至关重大，英国不能向日本让步[331]。

1939年9月初欧战爆发后，日本再度要求天津英租界当局交出中国之白银。直到当年12月9日，英国才向中国政府提出与日方商议后的解决方案：天津白银问题为日方取消封锁英租界之惟一阻碍，现与日商议结果，拟将白银（是否包括英、法二租界之存银未据说明）存储于中立银行，提出10万镑，组织包括英、日在内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办理救济事宜，奉令征求中方同意[332]。同一天，已得悉英日新方案的蒋介石指示外交部："查该项存银主权在我，英方何能擅自处理，如此种企划实现，我方损失极巨。希即迅筹对策，设法阻止为要。"[333]但在中方尚未拿出对案时，1940年1月上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进而向王宠惠提出两点：第一，白银改存中立银行；第二，英方提10万镑移作救济事业之用，法国方面要提20万镑，合计30万镑。中方接受了第一点，但不同意第二点，因为白银是法币准备金，且赈灾不能与白银问题混为一谈。另外，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方面亦和英、法大使进行沟通，说明天津白银是各有关银行发行法币的准备金，属于在租界的私人产权，租界当局应该加以保护[334]。由于没有得到英方积极的回应，蒋介石本人于1940年2月17日当面向卡尔大使提出警告：如果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立场而欲以天津白银与日本妥协，"余必声明英已破坏九国公约与放弃在华所有条约权益，并协助倭寇侵略我国之罪也"[335]。待到2月21日，外交部方面又向英方提出：一、与十万镑价值相等之白银提出后，由有关各中国

银行所有，其余部分之白银应以汇丰及美法银行名义存放于一中立国银行，并以汇丰及美法银行为有关各中国银行之信托人。二、英国政府应取得日方有关此事将来不能发生其他困难之书面保证，以代前次所提英国政府本身应供给之担保。三、如以十万镑款项全数用于购买赈济所需之食粮，中国政府准备予以同意[336]。到了3月5日英方提出修改意见：将白银以英国及日本领事馆名义存于天津，或将正金银行加入，作为存户之一。中方表示，此实为最后之让步，恐无再让之可能[337]。

但是，在中、英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4月12日卡尔大使却向王宠惠面交英日商定之对案，规定：（1）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之银元及银块，应由英国及日本驻该市总领事共同加封，继续存放于该银行内。（2）除下列第三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封存，直至联合王国（即英国）及日本两国政府商定其他保管办法之时为止。该项白银加封时，驻天津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均应在场。（3）该项白银于封存前，应提出等于十万英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地区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该项救济应包括某种机器之置备，该种机器系急需购自国外，以疏排水灾区域之水量，俾减少疫症之危险。（4）英国主管当局准备供给各种可能之便利，使该项提出之白银得分配于救济工作，以之出卖，及购买救济所需之食粮及其他物品。（5）驻天津之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应指派若干专家在该两总领事之监督下，协助其管理此项经费，并指导现在北平之救济委员会分配救济所需之食物及其他物品。除该日本及英国顾问外，并应邀请中国及法国国籍之专家及其他国籍之专家一人，协助该项工作之进行[338]。由于这个方案与中方新对案出入之处甚多，中方当然无法接受。蒋介石当即认为：英、倭天津存银问题之妥协办法，“此事如果实现，即认为英倭对华共同宣战，我亦必以此应之”，决定“即以严厉态度对英警告”[339]。4月26日，王宠惠向卡尔大使指出：“英日所定方案，我国政府自蒋委员长以下均表示反对。兹为迅求解决起见，拟由中英两方换文，声明白银之所有权属于中国之银

行，将来非经中国政府及该银行等等同意，不得移动。”对此，卡尔表示满意，认为系解决当前可能之合理与公允办法，并希望愈速愈妙[340]。这样，起草一个能够为中、英双方都接受的换文稿，便成为此后交涉的主要内容。中方还准备了甲、乙两个换文方案。

1940年6月11日，中英双方在重庆就天津存银问题换文。外交部长王宠惠致卡尔大使的照会称：“关于天津英租界存银问题之最近谈话，本部长谨向贵大使声述，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之建议经缜密考虑后愿提出解决本案之下列各点：（一）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所有银币及银块，应仍继续存于该行，并由驻天津英国总领事代表该行总管理处及中国政府加封。（二）除下列一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予以封存，非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及中国政府商议，不得移动其全部或一部。（三）在该项白银未经封存以前，中国政府及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授权天津交通银行提出等于英金十万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地区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四）该项经费交与包含中国籍委员之国际救济机关，由该机关会同驻天津英国总领事，受托使用于华北救济目的。中国政府希望联合王国政府表示愿意依照上述方案实行而不背理。”卡尔大使致王宠惠的复照称：“本大使兹奉本国外交部长之训令，向贵部长表示，联合王国政府原意依照来照内所包含之方案实行而不背离，相应照复查照为荷。本大使顺向贵部长重表敬意。”除了上述照会之外，卡尔还与王宠惠有往来函，卡尔在来函中承诺：“联合王国政府对于上述方案所规定之办法加以任何变更以前，先征求中国政府之同意。”[341]根据上述换文、往来函，中国对于天津存银的主权、支配权基本得到尊重。

但是，中方即便经过种种努力，依然无法阻止英、日之间的妥协。1940年6月19日，英、日之间在东京达成天津英租界问题协定，互相换文。其中关于英租界存银问题的解决方法为：1．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之银元及银块，应由天津英日两总领事共同加封，继续存放于该银行内。2．除下列第三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封存，

直至英国及日本两国政府商定其他保管办法之时为止，该项白银加封时，驻天津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均应在场。3．该项白银于封存之前，应提出等于十万英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该项救济应包括某种机器之置备，该种机器系急需购自国外以疏排水灾区域之水量，俾减少疫症之危险。4．英国主管当局准备供给各种可能之便利，使该项提出之白银得分配于救济工作，以之出卖，及购买救济所需之食粮及其他物品。5．驻天津之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应指派若干专家，在该两总领事之监督下，协助其管理此项经费，并指导现在北平之救济委员会分配救济所需之食物及其他物品，除该日本及英国顾问外，并应邀请中国及法国国籍之专家及其他国籍之专家一人协助该项工作之进行。英方并保证，英工部局不得妨碍“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在英界内之流通。英日协定还规定，在维持天津英租界治安方面仍维持双方此前达成的协定[342]。这五项内容与当年4月12日英方提出的方案并无二致，英国不仅同意了日本方面对天津租界的中国存银实施控制，还进一步坐视日伪金融势力排挤法币的流通。

对于英国当局以牺牲中国权益与日本妥协，国民政府当然不能保持沉默。1940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并未参与该方案之签订，英日换文内关于白银问题之各项规定，苟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不能予以变更：“在中国政府提出等于英金十万镑之数额充作华北救济经费后，英国政府对于其余全部白银为交通银行及中国政府之信托人，故现在所议定之封存该项白银办法，对于该项白银之原来状况，并无变更。”“关于英日警务协定之公告，中国政府虽深知天津英租界捕房当局所经历之困难，然依照该协定之规定，日方对于英租界之行政，可予以干涉，且协定之内容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该租界之现行协定，亦有未符，殊觉遗憾。依照英日关于币制问题之方案，英国政府业已允许伪币在天津英租界内流通，此举显然有损中国利益，并与英国政府迭次声明愿予坚定保持之远东政策，不能贯彻。”[343]《大公报》并且发表社评《天津问题如此解决》，指

出："天津问题的如此解决，真令人遗憾万千！这不但损害中国的主权以及利益，尤其大违国际交与之道！……英国年前曾与日本成立中国关税协定，把我们的关税送了礼！那一件事的结果，是我们每年每月负担沦陷区入超贸易的差额，而使日本坐享关税之利，给我们的经济金融以极大的恶影响。那次事情，中国人尚未忘怀，而英法又来断送天津租界内中国人的生命自由及所存的白银了。英法尽管是我们的好友，我们也要明白宣言——绝对抗议！"[344] 由此，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于抗战以来日趋明显的英日妥协倾向，持有更高的警觉。

三　关于封闭滇缅路的交涉

1940年6月中旬法国战败向德国求降，欧洲战局逆转，日本认为可乘机驱逐英、法在远东的势力，进而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在迫使法国确认中止中国假道印度支那运输的同时，于6月24日由外务次官谷正之向英国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要求英国禁止经由缅甸和香港向中国输入军火和其他物资[345]。

滇缅路自昆明到缅甸的腊戍，全长1146公里，每月运输量达数千吨，在滇越铁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已成为中国后方地区最主要的国际通道。中方非常担心的是，前此英国已在中国海关和天津租界和白银问题上接连对日本让步，在欧洲和远东局势趋于恶化的情势下，难保英国不向日本作出更大的妥协，因此向英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如郭泰祺在6月28日访晤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7月1日又访晤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询问英国政府对日本要求封锁滇缅路之态度，表明中国政府对该问题的关注。英方称即将进行讨论，最后之决定可使中方满意。郭泰祺表示：滇缅路运输对于中国抗战及英国自身利益均关系重大，在道义及现实政治方面而论，万不可不维持[346]。7月8日，英方答复郭泰祺，称仅答复日方不能停止运输之理由，如所运各货系美、苏产品，且印、缅与中国地理上关系亦须维持；但向中方指出：英国处境极端困难，不愿与日正面冲突，其他有关之国，应分负

责任[347]。英国政府起初并不同意日方关于封闭滇缅路的无理要求，直到1940年7月8日还由驻日克莱琪答复日方，称单方面切断对中国的物资供应有违中立原则，也无助于中日间达成公正的和平，但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并以日英两国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相威胁。鉴于欧洲政局日趋严峻，美国又不可能出面遏制日本[348]，英方十分担心与日本直接发生战争，但又不想过于丢面子，于是决定采取“暂时关闭”滇缅路三个月的方案。7月12日，克来琪向日本外相有田通报了上述方案，得到日方允可。1940年7月17日，英国与日本在东京签订协定，宣布自7月18日起的三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输入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铁路材料；有关经由香港的货物亦予禁运。

英方决定关闭滇缅路，正值7月初宜昌失守之后。此前中国尚可由宁波经过长沙、沙市、宜昌，以水路把部分国外物资运入后方，日军占领宜昌后，宁波海口随时会遭日方彻底控制，形势顿形严峻。至于西北国际交通路线，其运输能力一直有限，加上当时苏联对华实际提供的物资也很有限。所以，在中方看来，滇缅路被关闭后如何“撑持战事，确是难事”[349]。7月13日，国民政府从驻英大使郭泰祺来电，得知“英政府关于缅甸交通事拟对日妥协，限制若干货物之运输”；来自日方的消息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于是，当日王世杰便以国民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对英国发出警告[350]。同一天，张伯苓等30名参政员联名致电英国国会议员，要求英国勿对日妥协，以保证中国抗战交通[351]。令中方更难以接受的是，英国竟然劝中国与日本言和，并将此与英国维持滇缅路交通相联系。

7月16日蒋介石就英国封锁滇缅路发表声明：“余深信守法重信之英国，决不至有此违背公法条约丧失国家信誉之举，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协助日本迫我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须知中国抗战三年，屹立不动，决非任何第三国威胁所能摇撼，如英国果有

此种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之祸害；如英国认为停止我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事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所作之决定，不得不表示最严重之关切，并认为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缅甸运输之继续维持，对于中国之抵抗侵略至关重要，自不待言。英国接受日本之要求，已给予侵略者以巨大利益，故英国之举动无疑帮助中国之敌人，英国政府曾再三宣称对华政策决不变更，而现在所采步骤，无论如何，断难认为与其所称之政策相符合。”该项声明还指出，根据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英两国所订涉及中缅通商之各项条约，中英双方对于中缅间通商线路，“不论平时或战时，均无权封闭”；另外，“根据国联历次关于中日冲突所通过之议决案，全体会员国均应避免采取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之任何行动，致增加其在目前纠纷中之困难”，“故英国政府接受日方要求停止滇缅路运输之决定，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中英各项条约及国联之历届议决案”[(352)]。另外，驻英大使郭泰祺7月15日就关闭滇缅路问题向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递交书面抗议，表示中国此时决不与日本言和。英方辩称实出不获已，但仅为迁延待时办法，不妨害其将来之行动自由[(353)]。

国民政府还通过驻外使节的游说，希望美国、苏联出面反对英国的决定。美国国务院于7月16日声明反对封闭世界贸易通道，苏联政府未予表态。

另外，在重庆的国民外交学会于7月18日呼吁英国人民劝英国政府迅速取消停止缅甸运输之决定。同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致电国联同志总会，请劝英国政府考虑停止缅甸入华运输之得失。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社评，强烈抗议英国关闭滇缅路、封锁中国国际交通线。一时间，关闭滇缅路事件成为中英关系的焦点所在。

关闭滇缅路，是英国继在中国海关和天津租界等问题上与日本达成协定之后，对日本作出的又一大妥协，并且是对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损害，也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中方在对英交涉过程中的态度也愈益强硬。正如7月18日张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所指出的："现英日妥协，停止缅甸运输，我对英态度应重新考虑。"[354]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发生根本改变，而是在对英交涉中将明确坚持"抗战国策"、"多求国际友谊合作之方策"、"拥护九国公约态度"三个不变，决不承认（包括默认）英日妥协的结果，促使英国认清对日绥靖的危害，尽早重新开放滇缅路。

英国首相丘吉尔7月18日曾在英国国会谈到，关闭滇缅路期间，将寻求在中日之间达成公平的为双方所接受的和平[355]。然而，为了应付中方的交涉，丘吉尔又在7月20日致蒋介石电中称："余（英国首相自称）确信执事（委员长）对于缅运问题之我方困难，极为了解，余永不强请执事接受违反贵国利益或贵国政策之和平。"蒋介石7月28日复电丘吉尔指出："余非不知贵方之困难，但和缓日本之政策必将危及贵国自身，此余所已屡次声言者也。惟有中国战胜并保持其独立，英国远东利益方能保存。故余切迫的声请阁下，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356] 中方并以救护车辆、药品等非禁运品及须备车辆往返所需汽油为理由，在英国和缅甸同时进行交涉[357]，力争局部打破禁运令。

9月13日，郭泰祺再访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交涉重开滇缅路问题。英方称目前局势困难，待三四星期后，局势当较明朗，易于应付[358]。随着日军大批进入越南，尤其是9月下旬德、意、日三国签署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危害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开始走出对日绥靖的阴影，远东政策趋于积极。而在关闭滇缅路期间，日本继续扩大对华战事，为英国不再延长与日方的协定提供了借口。9月30日，郭泰祺又向英方交涉重开滇缅路。10月3日，丘吉尔向郭泰

祺谈到，三国同盟使国际局势明朗化，英国的处境已远胜于三个月前，当时对滇缅路若不对日本让步，恐日将宣战，故暂为关闭，现决期满开放[359]。10月8日，克莱琪向日本外相松冈表示，英方将不再延长关于滇缅路的协定。同日，丘吉尔在国会宣布自10月17日起，重新开放滇缅路："三月之前，吾人被请封闭滇缅路线，当时吾人尤其所请，盖吾人愿以机会给予中日两国政府，藉使两国对其长期而残忍之斗争获得公正而平等之解决。不幸此目的并未达成，反之日本征服中国民族之长期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且更因而引起种种祸患，此种机会之被弃置，殊堪遗憾。但在此种情形下，英帝国政府仍履行此项协定至期满之日为止，十月十七日以后，英政府则认为此约已无续订之必要。"[360]

对于滇缅路的重新开放，蒋介石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不仅对我抗战之成败攸关，而且远东之祸福安危亦系于此也。"[361]中方立即向英方作出积极回应。10月9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对英国政府决定重开滇缅路表示感佩，内称："顷读阁下在国会演词，指斥三月以来日本对华暴行有增无已，中国民族痛苦日深，因而决定恢复滇缅路之一切运输，中正闻之，欣慰无量，尤其阁下演词中提及日本对华和平已无希望，尤佩卓见。"[362]10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大使卡尔进行会谈，主要议题是中、英、美合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卡尔明确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目前形势已将两国合作问题提上议程，并询问在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将对德国宣战。蒋介石则作了肯定的答复[363]。10月17日，蒋介石又宴请英国大使卡尔与美国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请两国政府对滇缅路开放后，沿线运输物资之保护，予以援助。

于是，1940年10月16日，在缅甸腊戍的英海关关员正式开始验货，18日，滇缅路在关闭三个月后正式开放。这标志着中英关系摆脱了日本的阴影，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四　关于财经援助和平准基金借款的交涉

鉴于长期以来英国在华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影响，抗战爆发前后，英国是中国寻求财经援助的主要对象。1937年春夏，国民政府特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利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之际，向英国各方面寻求援华。英方最初态度消极，如中方希望英方帮助发行债券，但英方称根据英国现行法规，他国不得在英市场发售债券；且四国银行团尚未取消，英方难以单独对华贷款，又借口英国正积极充实国防，市面甚紧，须至当年秋冬方有余力对华投资[364]。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努力。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方继续向英国交涉财政经济援助，英方一度也持积极态度，双方曾达成不少协议。（一）广梅铁路（自广九铁路之石滩到梅县）借款300万英镑，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和铁道部的代表，同中英银公司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于7月30日在伦敦签署；（二）浦（口）襄（阳）铁路借款400万英镑，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和铁道部的代表，同英华中铁路公司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于8月4日在伦敦签署[365]。这两项铁路借款的条件，与战前中、英之间的其他铁路借款并无原则的区别，如英方要求中方必须以盐税收入为担保。（三）金融借款2000万英镑，由孔祥熙同汇丰银行的代表，于7月30日和8月3日在伦敦达成，用于维持中国货币的外汇汇率和整理中国的内债[366]。在进行这一借款的谈判过程中，英方提出了较多的条件，如中国在最短期内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储备银行，并聘用英籍顾问一人；中国以关税为偿付本息担保，借款未偿清前仍由英人担任总税务司，并继续酌用英人为关员；中国应实行收支平衡。中方权衡再三，决定接受英方的条件[367]。可见，当时中方在谋求援助的同时，还不得不接受英方对中国财经事务的控制。上述借款，中、英双方仅达成了草约，未及订立正式协定，旋因中日战事扩大，在英国政府未出面为贷款风险作出担保的情况下，英方相关金融机构没有出面为中方发行债票。中日战事的进展，以及英国远东政

策的演变，直接影响着中英财经交涉的过程和结果。

随着德国政府明显采取了亲日疏华政策，中德经贸往来关系急速下降，国民政府方面十分重视获得英国的援助，自1938年起，蒋介石以及外交部长王宠惠都曾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进行过交涉，要求英方从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维持其在远东的地位出发，在援华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368]。驻英大使郭泰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则分别在伦敦和香港进行具体接洽。当年5月中方提出了若干方案：英方承受中方所发行1000万英金公债之全部或一部；中方清偿毕1908年的英法借款后，根据原合同条件对华续借款500万至1000万英镑；英国政府为1937年的2000万英镑金融借款提供担保；切实商定购货信贷1000万英镑[369]。英方没有同意前两种方案，但双方就购货信贷和金融借款进行了后续谈判。中英之间虽历经曲折，但最终在英国对华提供购货信贷和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上达成了协定。

在购货信贷方面，直到1938年12月，英国政府明确答应的只有购买客货汽车信贷50万英镑。当月中方获悉，英国政府授权商务部可在1000万镑的范围内确定对外信贷。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便数度向英方交涉，希望将此1000万镑全数或大部分归中国运用，英方称要求得到该款的国家甚多，中国至多只能得到200万至300万英镑。郭泰祺向英方提交了包括汽车、铁路、电信、材料、颜料、造纸、机器、军用电话等方面的货单，总价额约达400余万镑，提出中国至少应得到500万镑。在中方看来，英国在对华贷款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表明“仍无政治决心”，即担心来自日本的反对，“故我方尚难期其痛快援助也”[370]。至1939年2月下旬，英方决定对华信贷总额为300万英镑。双方先于3月份达成滇缅路购车信贷14.1万英镑，后为中方担保机构及债券发行等问题往返磋商，直到1939年8月18日才签订购料信用借款285.9万英镑，因英方的坚持，中方同意由国民政府及中国银行出面担保，这意味着英方将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风险由中方承担。

第一次英国对华300万英镑的信贷总额，大大少于同期美国对华

信贷额，更无法与苏联的贷款额相比。合同原规定在1939年内完成购料，但因欧战爆发，英国对货物出口实行限制，中方在英购料进展迟缓。当年底，双方商定把贷款使用期限延长半年，以后又多次延长。至1941年底，中方动用该项信贷在英购料的有兵工署、军政部、交通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陆军机械化学校、中国毛纺织厂、卫生部、中央银行等机构，动用总额约1,482,018英镑[371]。一直到抗战结束后，该项信贷仍在运用。另外1941年6月5日陈维城与艾登在伦敦又一次达成英镑区购料信用借款500万英镑[372]。这次信贷的利息率为3.5%，与第一次信贷相比（购车部分5.5%，购料部分5%），显然较为优惠。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英之间在对华提供商业信贷方面没有取得更多的结果[373]，但在国民政府最看重的金融借款即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上，历经多轮谈判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国民政府自1935年11月4日开始实行的法币政策，实际上为外汇汇兑本位，维持法币汇率的稳定必须有相当数额的专项平准基金。当时国民政府必须为稳定法币汇率而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至1937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持有的外汇资产总共约合37,890万美元[374]。但这对于实际需要相差甚大。当年7、8月间孔祥熙在伦敦与汇丰银行达成的金融借款2000万英镑草约，其中相当部分就是用于平准基金的。1938年1月5日，英国财政部次长李滋罗斯（Fredrick W．Leith—Ross）曾明确告诉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英方无法正式履行原对华2000万英镑草约，除非英国政府出面担保，银行方面不会提供贷款。3月31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英国洽谈“维持金融外汇借款”时，英国财政大臣西门（Sir John Simon）提出的方案是：（一）中国向英方出售白银或以白银或抵押借款；（二）以金属矿产抵借[375]。也就是说，英国政府虽然愿意重新考虑向中国提供维持法币汇率所需的英镑，但仅仅定位于一般商业行为。英方所担心的，一是中国方面在对日作战上的进一步失利会使整个局势继续恶化，二是新的援华行动“恐激怒日本攻香港及增强日德合作”[376]。中方对借款的期望和要求，却是政治和

经济援助性质，即由英国政府出面，为英方银行对华贷款提供担保。

在援华问题上，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态度较为积极。在英国政府内，当时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倾向于援助中国，他向内阁会议提出：无论基于荣誉还是自身利益的任何考虑，都促使我们尽可能地援助中国；用一笔较少数额的款项，我们就可以维护在远东的基本利益[377]。时任中央银行顾问的英国人罗杰士（Cyril Rogers）也认为：向中国提供2000万英镑的借款或信贷，将使局势得以维持相当时期，如一年，从而使日本受到极大的损耗，不得不在合理条件之下接受和平[378]。但是，财政大臣西门却强调了欧战的危险局势，担心对华援助并不能保证中国在一年内取得对日本的胜利，反而会导致英国在欧洲和远东两面受敌[379]。这一消极主张在政府中占了上风。1938年7月13日，英国政府内阁会议正式否决了对华金融借款案。

待到1938年10月，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在香港向英方银行接洽，希望加入中国平准基金以支持中国的币制。12月初，中国方面建议设立中英联合平准基金，即英方银行至少向基金投入300万英镑，中方银行将投入相同数额；由中英银行代表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来控制和运作基金。中方并且强调：如果来自外国的支持达到500万镑或者1000万镑，中国货币的汇率将能维持较长的时间[380]。

英国政府在11月下旬考虑向国会提出的方案是：由汇丰银行向中国平准基金认款250万英镑，英国政府对汇丰银行的这一认款额提供担保。到12月初，英国政府还只是考虑把提供担保的借款额稍作增加到300万英镑。到1938年底，英国政府的态度转趋积极。促使这一转变的因素，除了英国商界包括在华英商对稳定英镑与中国法币比价的迫切要求之外，还由于美国已公开表示要对华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且没有引起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响。用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Sir Robert Craigie）的话来说，就是对华货币贷款并不会导致战争[381]。为了减少风险，英国方面起初试图说服美国政府联合支持中国的货币，但为美方所拒绝。英国政府决定不再等待美国，先单独支持

中国货币，并把对华维持法币汇价的借款定位于财政援助。

就在已经大体上确定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之后，英国政府却向中国方面提出，要以承认1938年的英日海关协定作为提供平准基金的前提条件[382]。这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孔祥熙指出：英国加入中国平准基金只须付出极小的代价，但却可以向外界证明英国在保护其利益；英国在援助中国问题上已经说得够多的了，现在该是付诸于行动的时候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本身的利益[383]。另一方面由宋子文在香港与汇丰、麦加利银行洽商，英国政府原先只同意贷款额在300万英镑之内，经中方要求以及罗杰士的工作，至1939年2月下旬，英国政府原则上已同意增至500万镑，按当时的英、美间汇率，约合2500万美元，即与美国的桐油借款额相等。英方最后还同意，提供平准基金借款与中国承认英日海关协定及恢复支付外债本息不直接关联[384]。3月3日，英国提出了平准基金借款协定的具体方案：由汇丰、麦加利、中国和交通四家银行达成合作协议，汇丰出资300万英镑，麦加利银行出资200万英镑，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共出资500万英镑，总共1000万英镑，组成法币平准基金，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在香港设立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管理该平准基金，中国、交通银行每6个月以英镑向汇丰、麦加利银行支付利息，利息率另行商定；基金结束时，所有资产将根据最初投资比例在上述四银行间划分；英国政府则将为汇丰、麦加利银行的投资提供担保；中国政府应承诺，在基金运作期间，其经济和货币政策须以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为原则；中国政府须通过上述委员银行买卖外汇，所得外汇余额，在平准基金不足1000万英镑时，应优先售予基金委员会；当基金结束时，除征得英国政府同意之外，中国政府应按当日汇率购回英方银行名下所摊得之法币[385]。对于该方案各条款，罗杰士认为中方应感到满意；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认为：方案各条款“均属寻常问题，并无故意为难之意，罗杰士认为圆满，我方似不必犹豫也”[386]。

国民政府接受了英方提出的方案。1939年3月10日，双方在伦敦签署了《中国国币平准基金协定》，共19条[387]。《协定》规定平准基金总额1000万英镑均须存于英格兰银行，专用于维持香港、上海两地外汇市场的法币之英镑汇价；出售英镑所购入之法币应存于香港、上海的汇丰银行或麦加利银行；协定有效期为12个月，但经中、英两国政府同意，每6个月得续延一次，这表明当时英方不愿为维持中国法币汇率承担长期的责任；英镑基金所得之利息或贴息应存于英格兰银行，以备付汇丰、麦加利两行应得之利息，并规定中方由中国、交通两行按2.75%的年利率为英方供款银行提供息金担保，这一利息率确实比同期中国政府所获得的外债的利息率要低得多，英方银行对基金之认款将由英国财政部担保清还，基金结束时，将以基金所生利息扣除英方银行所得利息后之余额，作为英国财政部上述清还义务之回报，也就是说，中方虽不直接对英方银行负有还本义务，但实际上是以对基金认款存于英格兰银行所生之利息，作为英方本金之担保。另一方面，英方对中方认款本金不承担任何清还义务，对于中方认款的利息收益，也未作具体的保证，只规定基金清算时，在扣去英方利息和本金之后，其余额将按投资比例在双方银行间分配，亦即中方仅有参与纯益分红之权利。另规定设立一个基金管理委员会，由上述四家银行各出一名代表，另一委员由中国政府委派英籍人士担任，其人选须商得英国政府的同意，未得英方同意，中方不得将其免职；平准基金委员会表决任何问题，均以出席人员之多数通过为原则；委员会须按月及每半年将工作情形及基金状况向英国财政部报告。根据英方的意见，中方提名罗杰士代表国民政府参加平准基金委员会，并担任主席。

就在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签署的当天，郭泰祺与哈利法克斯以互换照会的方式，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确认了由汇丰、麦加利、中国、交通四家银行所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并且强调了英方所关注的各点[388]。无论该照会还是平准基金协定，都表明英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少于中方，而其直接权益则较多且更有保证。

中英平准基金是自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以来，首次设立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外联合平准基金，主要通过维持上海、香港的法币汇率，进而维持法币在日伪统治区的地位和在后方国统区的稳定。由汇丰、麦加利银行这两家在华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英商银行公开和直接出资，又有英国政府作为英方投资担保，可以看作是对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甚至认为，英国决定提供平准基金借款对日本的刺激，必比美国对华借款更甚[389]。不过，由英方银行来保管平准基金并控制基金的使用，固然有利于增强基金的信用度，但也意味着中方将不可能自主地进行基金的投资，遑论整个基金管理和运用了。

中英平准基金和基金委员会设立后，按法币1元合8.25便士的汇价，在上海和香港公开出售，力图把汇价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扬，加上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不敷应付。至1939年5月底，基金已总额售出三分之二，至7月中旬英日在东京举行会谈时，上海金融市场发生重大震荡，平准基金会持有基金几乎耗尽，这使得重庆当局十分担心，蒋介石在日记中便写到："法币惨跌，英倭妥协，人心动摇，于此为甚。"[390] 当年5月起，中国方面就由郭泰祺和罗杰士分别向英国政府探究提供新的平准基金的可能性。到了形势最紧迫的7月中旬，连宋美龄也出面向驻重庆的英国使馆官员求援。7月28日，蒋介石电示郭泰祺把新的平准基金借款额提高到1000万镑，向英方承诺平准基金委员会在供应外汇的方法上将更慎重，杜绝日伪套汇以及资本逃避等情况[391]。郭泰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书面照会英国外交部，但到了8月底，英国外交部借口英国财政部持异议，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英国虽然不准备直接向中方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但却数度游说法国方面加入平准基金。在6月中旬时，法国方面一度同意向平准基金认款2亿法郎（按中英、中法间汇价套算，约合100万英镑），但要求派两名代表参加平准基金委员会。英方既认为法方的认款额太

少，更以容易泄密和降低工作效率为由，不同意法方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占两个席位[392]。后来法方同意只向平准基金会派出一名代表，但考虑到当时英方本身对继续支持平准基金态度不甚明朗，法方也犹豫了。

1939年9月初开始爆发的欧洲大战，一度缓解了国民政府维持法币汇率的巨大压力。到1940年3月平准基金协定一年期满，鉴于汇市又趋严峻，中、英双方均同意延长原协定。此后中方还数度向英方提出，希望向平准基金增加新的认款。但法币汇率的连连下挫，使英方原投资银行的信心受到较大影响，麦加利银行拒绝提供新的借款，汇丰银行也仅愿供款100万英镑。1940年7月6日，中央、中国、交通和汇丰四家银行的代表，在香港正式签署了设立乙种平准基金的协定，共22条[393]。上述各行对平准基金认摊额分别为：中央银行300万美元，交通银行200万美元，中国银行60万英镑，汇丰银行100万英镑，共500万美元又160万英镑[394]。与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相比，加入乙种平准基金的银行之中，中方增加了中央银行，英方减少了麦加利银行；认款总额，也从双方平摊改为中方约占三分之二。在乙种平准基金协定中，为汇丰银行投资提供担保的是中国银行，而不是英国财政部。但汇丰银行方面不满足其投资本息仅由中国银行出面担保，汇丰银行总经理格兰朋（Sir Vandeleur Grayburn）借口在当年5月初与中方达成的谅解中，有国民政府财政部与中国银行共同提供担保的承诺，要求财政部提供书面担保。于是，财政部不得不在同年8月23日致函汇丰银行，称："所有原合同订明应由中国银行负责向汇丰银行缴还本息一节，并准由本部备函加以保证。"[395]就维持法币汇率的职能而言，乙种基金与1939年基金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际意义，还在于使外界知晓中英双方的决心：为了联合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中英双方都不惜向平准基金追加新的投资。

英方在乙种平准基金协定中仅由汇丰银行承诺新增100万英镑，且英国政府不提供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在远东问题上的谨

慎态度，这与当时英国在封存天津英租界中方银行存银问题，以及关闭滇缅路问题上对日本的妥协让步，其基本出发点上有相同之处，即尽可能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达成的同盟条约，使英国朝野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将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更大的威胁，对中国的援助是制约日本扩张的有效途径。于是，在向中国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上，英国政府转持较积极的立场。自1940年10月起，中国方面先由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接洽新的平准基金借款。12月初英方安排财政部次长费立浦（Sir Frederick Phillips，又译斐律普、裴律普）飞抵华盛顿，与宋子文进行谈判。国民政府又加派财政部次长郭秉文抵伦敦，与英国财政部保持联系。在重庆，当时蒋介石本人也与英国大使卡尔数次谈到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中英新平准基金借款的交涉过程中，中方要求英方提供平准基金借款1000万英镑，另加信贷1000万英镑，共为2000万英镑，约相当于1亿美元。按照中方的设想，这是中方应从英方获得的最低借款额。但英方只同意贷款总额为1000万镑，其中平准基金和信贷各500万镑，认为中方提出的数额超出了英方的财政能力。当时蒋介石在重庆、宋子文在华盛顿、郭泰祺在伦敦都进行了交涉，希望英方扩大贷款总额[396]。但12月10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的对华贷款案总额仍为1000万镑，平准基金借款和信用信贷各500万镑。

除了新平准基金借款的数额之外，中、英双方在是否将平准基金运用于上海地区，也不无分歧。至迟在1940年5月即达成乙种基金前夕，孔祥熙便已有异议[397]。待到1941年1月初，上海市场法币之汇率日趋疲弱，单靠原有的平准基金难以维持。18日，蒋介石电示郭泰祺转告英方：蒋本人“对平衡基金维持上海黑市场之计划，不能赞成，此徒为日寇套取外汇，而非有利于抗战与经济也。请勿再作此利敌损己之打算为盼”[398]。在这里，不仅仅是蒋介石对英方在新平准基金借款数额上不接受中方要求表示不满，而且确实表明重庆当局对

以大量外汇来维持上海汇市的做法，产生了重大疑虑：当时中国沿海与陆路国际通道大多遭到日本封锁，通过关税和对外贸易的外汇收入来源基本枯竭，国民政府外汇储备日见拮据，获得外汇借款又如此不易，美国尚未通过对外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中国在美国采购军用物资还得花费外汇。1941年1月上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并发行“中储券”之后，上海外汇市场遇到了更大的套汇压力。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都主张放弃上海，在日伪难以套汇的重庆另辟外汇市场。

但是，英国方面却把提供新平准基金借款与维持上海汇市联系在一起。1941年2月24日，卡尔向蒋介石转告了英国政府的答复：“贵国政府撤销上海法币之支持，如无其他有建设性之政策代之，恐将铸成大错；同时敝国政府以为，就贵国现状而论，统制外汇恐难十分有效，而外汇统制不健全，能否规定任何建设性之政策，实成疑问。”英方在致蒋介石的书面备忘录中陈述维持上海汇市的种种必要性，还断然宣称，无论从组织与设备、交通运输还是自由外汇来源等方面比较，在重庆不可能设立类似上海那样的外汇市场，因此“似以维持现状为最妥办法”[(399)]。由于英方坚持以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作为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的前提，中国方面只得在重庆新设立外汇市场的同时，同意与英方一起继续维持上海的法币汇市[(400)]。

1941年4月1日，由宋子文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李幹代表中央银行、费立浦代表英国财政部，在华盛顿签署了中英新平准基金借款协定，共17条[(401)]。与1939年第一次平准基金借款协定和乙种基金协定比较，新设立的平准基金则必须用于在上海、香港维持法币汇率，但1939年平准基金之余额经英方同意可用于上海、香港以外地区；协定是直接由中、英两国政府的代表签署的，英方向该基金提供借款的是财政部而不是汇丰、麦加利银行；新平准基金借款的利息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不再规定中方必须与英方同步向平准基金注入新款项；也不再明确规定协定的期限，不要求每6个月须办理延长期限

手续；在操有对平准基金存废权的情况下，英方同意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方委员占多数。这些都表明，新的平准基金借款带有更多的援助性质。联系到英国同时还向国民政府提供了500万镑的信用借款，可以认为在援华问题上英国政府已不再顾忌来自日本的反对，英国的远东政策迈出了较积极的步伐。在第二次平准基金借款达成后不久，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英国决定冻结在英的中国资金，经双方协商，由中央银行代表中国政府控制被冻结资金的解冻之权[402]。这意味着中国私人和商业机构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将可以由中国政府支配使用，是继信用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之外，在财经领域支持中国的又一举措，有助于促进双方的关系。

第五节　美国对华提供贷款和租借援助

一　寻求美国对华提供商业信贷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谋求美国财政经济援助，还只是继续战前的以白银换取美元的方式。待到1937年末布鲁塞尔会议之后，中国开始向美国接洽借款。1938年1月30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抵抗。至其他美国所可采之有效办法，足使阁下意想中之最后解决得以实现，则惟阁下之裁夺。"[403]当时，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经过美方中介人与美方银行接洽，曾达成2000万美元的借款意向，规定中方至少以半数在美购物。而中方当时希望获得可自由动支的借款，以稳定币制，周转外汇[404]。国民政府起初对通过这一方式获得美国贷款持盲目乐观态度，1938年7月初时甚至以为王正廷已经达成三年期总共达6亿美元的巨额借款，但不久便确认纯系子虚乌有，中方"耗费巨款，毫无结果，受各方之指责"[405]。当年，驻美大使王正廷因此而遭撤换，由胡适接任。此后，国民政府考虑另派特使径直赴美，与美国专门洽商借款事宜。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国民政府的代表会谈援华问题。1938年7月26日，时在法国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在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表示美国政府在援华问题上准备采取“使中国得到援助而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并建议中国政府派陈光甫赴美国，摩根索本人将与陈直接洽谈对华援助问题。1936年，陈光甫便代表国民政府赴美，与摩根索达成了著名的《中美白银协定》，而且两人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友。摩根索向顾维钧表示：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406]。陈光甫起初推辞，由宋子文推荐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赴美交涉，但8月24日徐新六应召乘飞机由香港赴渝，途中遭日机截击遇难。在此情况下，行政院复督促陈光甫赴美交涉，陈无法推托，遂于9月9日偕同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资源委员会负责矿产出口的官员任嗣达自香港启程。

在美国谈判期间，美方原则上同意提供信用贷款，即中方用美方的贷款在美国购买产品，这也是摩根索此前向顾维钧所提到的方式；中方另以美方所需要的桐油运美销售，以货款偿付借款本息。但美方坚持：无论贷款的获得还是在中、美两国的货物购运，都必须采取商业的方式，要求中方以商业公司而不是政府机构的名义，出面经办贷款和购运货品等事项。于是，国民政府方面只得拨出美金50万元，以“世界贸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的名称，在美国纽约州申请办理了注册手续；由中央银行代表席德懋任总经理，陈光甫任董事。另拨1000万元国币为股本，在国内成立“复兴商业公司”，向经济部办理注册手续，而陈光甫也是复兴商业公司的董事[407]。

经过中、美双方的交涉以及国民政府内部各方面的安排，首先由“中华民国注册之复兴商业公司”和“美国纽约州注册之世界贸易公司”于1938年12月30日订立了购售桐油合同，共11条，规定由复兴商业公司在五年内将总共22万吨（每吨2000磅）桐油，自中国装运至

美国港口，交付与世界贸易公司；世界贸易公司代理复兴商业公司在美购买农工产品运往中国；该合同各条款完全受美国纽约州法律之约束和制裁。由陈光甫和席德懋分别代表复兴公司和世界公司在合同上签字[408]。这份合同在形式上完全符合一般商业合同的要求。

随后，席德懋、陈光甫又分别以世界贸易公司总经理和董事的名义，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总经理庇尔生（W．L．Pierson）、金库副主任格立芬（D．B．Griffin），于1939年2月8日在华盛顿签署了总额为2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这笔借款通常被称为“桐油借款”。该合同共11条，规定世界公司所得之借款，“应如数购运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借款年利率4.5%（后减至4%），每半年偿付一次，清偿期限不得超过1944年1月1日，世界贸易公司将以销售复兴公司运美桐油收入的半数偿付债款；其余收入亦应购买美国产品运华；世界公司所购货物，均将委托美旗商船装运；美方保留随时停止信用放款之权。而复兴公司与世界公司的购售桐油合同，则作为桐油借款合同的附件甲；附件乙则是世界公司所开还款期票式样。根据美方的要求，另由中国银行为该借款提供担保[409]。

陈光甫当时曾指出：美国向中国提供桐油借款，“虽云助我，实际为增进其工商，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故合同最要点为购买美货”。但就中方而言，则是“试探美方合作之门”，为进一步争取美国援助打下基础[410]。当时来自德国的军事物资已经很困难，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态度积极，前景看好，所以在陈光甫赴美前后，中国对美国提供大批援助的期望值并不很高。

美方还明确限定，“桐油借款”不得在美国购买中国所急需的飞机[411]。这样，中方只好把借款用于未列入限制的兵工材料，另以售银收入在世界贸易公司名义之下办理购买飞机、军火事宜[412]。陈光甫还建议以军用矿产销美，作为续洽借款及军火之基础[413]。

世界贸易公司与复兴商业公司之间订立了购买桐油的协定，这

样，复兴商业公司成为代表国民政府在国内收购桐油、运美交货以及接受美货的机构；世界贸易公司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经办借款、销售桐油、得款偿债和采购美货。

嗣后，由于桐油市场价格的上涨，经中方的要求，1939年10月14日，世界公司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订了桐油借款的补充合约，主要是美方同意暂行放弃对中方在美售卖桐油价格的限制，允许中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售价[414]。美方的这一让步对中国关系至关重大。由于美国市场上的桐油价格由每磅14美方涨至34美分，从1938年9月开始至1941年10月，中方共运美桐油89批，计59005.94吨，离确定借款合同时预计的运交桐油22万吨的数量相差颇大，但价值却达27,835,016.15美元，这样，至1942年3月，中方提前清偿实际动支借款2200万美元和利息1,466,573.68美元[415]。

在“桐油借款”合同签署之初，因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不久，国内桐油仍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负责采购，运至香港，再由复兴商业公司装船运美。自1940年1月1日起，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将国内购油之业务完全移交给复兴公司办理。贸易委员会负督导之责，并统一规定国内之油价。

陈光甫在美国接洽第二笔借款是“华锡借款”2000万元。在谈判时，中方承诺提供美方急需的锡矿品。美国政府代表、联邦债务署主任琼斯起初对中国运输能力颇表不满，认为中国大量所购货物积压在海防，不如少购；同时以桐油借款尚未动支完毕为理由，对中国新要求借款的数额2000万美元提出疑问，表示先借500万美元。陈光甫则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善运输条件，运输能力将有较大之提高；另外中国对美货物需要甚巨，仅汽油便达500万美元，另外改善滇锡生产状况亦至少需200万美元，但在新借款数额未最后确定之前，中方对桐油借款的动支颇谨慎。琼斯最终同意了中方的借款数额[416]。

1940年3月7日，美国宣布了即将对华提供新的信贷，即“华锡借

款”。然而孔祥熙突然致电陈光甫和驻美大使胡适，要求向美方交涉取消以提供锡品作为借款的条件，实际上是想改商业信贷为政治援助。孔祥熙认为，大体同时进行中的美国对芬兰借款，并不要求芬兰方面提供什么担保，如果中方负有提供锡品的义务，那么在中国国内会对政府产生不满，尤其是“参政开会在即，更恐引起质询，势将无以为对”。但是陈光甫和胡适认为，这一借款本身就是商业性质，基本条件都已经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以及琼斯等人确定，且已经公布，难以再向美方提出改变。孔祥熙只好在请示蒋介石之后，同意按原议与美方签约[417]。

对于“华锡借款”，美方同样要求中方严格按纯商业方式办理，于是，先由陈光甫以复兴公司董事、任嗣达以世界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于1940年3月15日订立售购华锡合同，规定复兴公司七年内运售滇锡共4万吨至美国，同时委托世界公司在美国购货运华；陈光甫、任嗣达再分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的身份，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代表庇耳生、格立芬，于1940年4月20日在华盛顿达成20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年利率4%，清偿期限7年；世界贸易公司以借款在美购货，并以售卖滇锡之货款偿付债款[418]。嗣后，国民政府由财政部出面，委托资源委员会代购滇锡、钨砂及锑运美，交世界公司在美洽售。这些矿品一般先运至越南的海防或西贡，然后再待美国货船装运赴美。

“桐油借款”与“华锡借款”在数额上远少于同期苏联对华贷款总额，借款的使用也受到种种限制，不能满足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尤其是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出笼，国民政府面临更严峻的局面，蒋介石急于从谋求经济与军事援助入手，使得对美关系有大的突破，进而考虑委派新的特使赴美接洽，同时召回陈光甫。1940年4月初，蒋介石便决定派宋子文赴美商洽新的借款[419]。宋子文当时虽然只是国民政府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但却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权决策层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罗斯福政府不少官员较熟悉。到同年6月

宋子文启程赴美时，他的身份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其在美使命已不仅限于商谈借款，而是被蒋介石赋予“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420]。

宋子文于6月下旬抵美后，于7月1日和2日接连两次访问了罗斯福，他向罗斯福提到：“我国三年来不惜任何牺牲，忍痛苦撑，以期民主集团最后胜利，俾中日问题得在美国领导之下公平解决。惟欧洲诸国几乎不战而降，即如法国，其大部陆军实力未减，海军及属地更未持久抵抗，而竟然降德，致使英国危急万状，因而日本肆无忌惮，断我越南运输，陷中国于万分困难境地，影响军心民心实巨，向所期望民主集团最后胜利之抗战理论，不得不重新考虑。”宋子文表示，他本人系受蒋介石委派来美，“委座亟欲总统指示此后应付大计方针”。宋子文还强调中国抗战事业因法国对德投降遇到的困难，与罗斯福谈到“三角援华方式”，即中国向美国借款、向苏联订货和由中国西北运华，以及美、苏在远东问题上达成谅解的可能性。罗斯福表示愿尽力促成对中国币制及物资之援助[421]。

此后，宋子文又向其他美国政要多次游说，包括赫尔国务卿、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贺恩贝克、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人。7月12日，宋子文向美国财政部提交了援华备忘录，包括三方面的要求：1．支持中国稳定法币，需5000万美元，另外的5000万美元可以只是名义上的；2．购买飞机、军事物资和兵工厂设备，约需7000万美元；3．改善交通状况，如滇缅公路和铁路，从缅甸北部的腊戍到中国昆明的空运等，约需2000万美元。宋子文同时向美方表示，中国可以向美国提供金属原料以偿付债款，在今后五年内，中国至少可出口价值5000万美元的钨、锑、锡[422]。

当时，美国方面不愿意向中国提供维持法币汇价的平准基金借款，但同意通过新的商业信贷，中方以矿砂偿付，由联邦债务署主任琼斯与宋子文具体商谈。宋子文起初提出的数额是5000万美元，琼斯只同意500万，宋通过在白宫、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活动，希望在借

款数额上不要少于以往达成的协定。这时，由于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的推进，美国感到需要通过对国民政府的公开贷款，使日本人“停停，看看和听听”[423]。1940年9月25日，即日本占领原法属印度支那两天之后，美方便宣布将对华贷款2500万美元，即“钨砂借款”。

宋子文最初向国内报告的该项借款数额是5000万美元，所以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悉达成的“钨砂借款”数只有2500万美元，感到太少，希望增加[424]。宋也曾对借款额太少而感到不满，但基于在美寻求援助的局面尚未打开，担心如向美方“斤斤于数目之多少，时机一失，易生变化，且恐引起反感”，主张待机接洽新的借款。

此后，双方为起草借款合同条款磋商。至1940年10月2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2500万美元借款合同，因规定中方以售美钨砂偿付债款，又称“钨砂借款”。中方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幹代表中央银行、吴志翔代表资源委员会签字，美方仍由庇耳生、格立芬代表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字。同日由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达成的钨砂合同，则作为“钨砂借款”合同的附件。根据合同，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央银行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年利率4%，清偿期限5年，中方由作为借款协定债务方之一的中央银行开出期票，国民政府无条件担保偿付；资源委员会则在五年内向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运售总共不少于1000吨的钨砂，其收益首先偿付借款利息和本金[425]。此后经交涉，至1942年2月，美方又同意嗣后资源委员会售美钨砂所得货款，向金属准备公司免交75%，其余25%继续付给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以偿付金属借款利息和到期本金[426]。

需要指出，与此前和美方达成的“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合同相比，“钨砂借款”不再通过陈光甫发起成立的世界贸易公司和复兴商业公司。这固然与主持接洽的中方代表已由宋子文取代了陈光甫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钨砂借款”交涉与合同中，美方已不再要求中方形式上以商业机构出面经办贷款、购运货品等事项，而是直接由中央银行和直属国民政府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出面，宋子文更是以国民政府

代表的名义。因此，“钨砂借款”不仅是新获得的美援，还标志着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进展和美国远东政策转趋积极。

中美“钨砂借款”合同签署后，日本旋即正式承认了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政权，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着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宋子文借此时机要求美国政府加大援华的力度，希望提供1亿美元的新借款。另外，美国驻重庆大使詹森于1940年10月和11月两度致电美国国务院，称除非华盛顿给蒋介石新的财政与政治援助以示支持，重庆政权的垮台将迫在眉睫[427]。在此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12月宣布，将由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和财政部各向中国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

中国方面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达成的5000万美元借款，亦称“金属借款”，于1941年2月4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借款合同，并以同年1月31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所签署的金属合同作为附件。美方由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5000美元，用于资助中国政府输美金属原料和在美购货，借款年利率4%，清偿期限7年，中方由中央银行开出期票，国民政府无条件担保偿付，另规定中方在偿付期内由资源委员会向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运售价值6000万美元（不少于1400吨）的钨砂、锑、锡，其收益首先提作偿付基金[428]。中美双方签约人和身份均与“钨砂借款”相同。

通常认为，上述陈光甫与美国接洽达成的“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宋子文与美方接洽达成的“钨砂借款”和“金属借款”，是自抗战爆发以来美国最初向中国提供的第一、二、三、四笔借款。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也有这样的提法，如孔祥熙1940年8月6日在致宋子文的信中提到“华锡借款”，便称之为“美国第二次借款”[429]；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还谈到：“查我国在美国举借借款，第一次系桐油借款，第二次以华锡作抵，故名华锡借款，或称第二次中美借款”[430]；“钨砂”、“金属”借款达成后，“中美第三次钨砂借款”、“第四次金属借款”的提法，也常见于有关文件[431]。不过，也有史料表

明，在达成“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之间，中国政府还与美国商业机构直接达成过另项可视为债务与债权的关系。1941年美国官方公布过中国所获得的主要外债情况，在列举了“以桐油支付的借款”、“以锡支付的借款”和“以出售钨砂来偿付的借款”之后，明确提到：“除此之外，中国还（从美国）获得1280万美元的商业信贷和1500万美元的飞机信贷。”不过，该文件没有指出提供信贷的美国机构的名称[(432)]。而在国民政府国库署档案中，有关于中美联洲公司飞机价款的记载，称国民政府方面曾与美国联洲公司洽商订立价款总额达1200万美元的购买飞机及配件的总合同，1939年5月20日先达成了部分定购合同，价款为4,424,154美元78美分，其中20％即884,830美元96美分作为定金付现，其余80％自当年6月30日起分27期支付，每期131,086美元6美分，另记息5厘。嗣后商得联洲公司同意，减去价款294,585美元63美分[(433)]。当然，中美联洲公司飞机价款并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借款，属于分期付款的性质；但在较广泛的意义上，仍可视作美方向中国提供的商业信贷。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各次信用借款，是租借方案实施之前中国在美购买战时物资主要的财政安排，帮助中国解决了外汇不足的困难；其采用商业信贷的方式，则使得美方当时得以避免主要来自日本的责难。待到中国开始获得租借法案物资之后，信用借款仍然使得中国可以按照中方实际需要购运美国货品，对支持抗战不无裨益。

二　中美平准基金借款交涉

与分几个年头分别达成四次信用借款不同，为了获得美国以借款方式支持中国法币，中国方面经过了数年的努力，双方多次进行交涉。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后，根据与美国财政部的交涉协议，于当年和次年共向美国出售12500万盎司白银。美国以该种特殊方式提供的美元外汇，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持法币汇

率的努力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运用美国所提供的美元外汇维持中国的汇率方面，战前中、美之间并没有达成进一步的契约性关系，美方对中国法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承担任何义务。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达成如下协定：1．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45美分的价格，买下中国在美存银6200万盎司；2．美国将以黄金支付购银款，价格为每盎司黄金合35美元计，这些黄金存于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用于稳定中国法币；3．如果中国需要，美国准备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用以维持法币对美元的汇价[434]。7月9日公布的孔祥熙—摩根索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币制改革和稳定货币的方案已取得了重大成功，“美国财政部将根据达成的安排，在保证两国利益的条件下，使中国的中央银行获得美元外汇，用以稳定中国的货币”[435]。当时中方确实认为，与美国政府达成的这一新货币协定，标志着两国经济合作的新的进展[436]。此后中美双方经过交涉，分别在1938年的2、4、7月达成了总额为1.5亿盎司白银的售银协议，售价在每盎司43—45美分之间[437]。

通过出售白银以获得美元外汇，对稳定中国法币的汇率当然也不无裨益，但国民政府方面仍希望美国直接提供借款，以增加中国的外汇基金，也有助于确立市场对法币汇率稳定的信心。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美国接洽巨额借款，其主要目的，也是想交涉获得稳定币制的美元外汇。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正廷报告称基本达成总额为1亿5000万美元的借款，条件大致为：期限10年，年息3厘，九一发行，中方以借款价值四分之一的现银存双方指定银行，债券经中国银行签保[438]。中国方面一度对获得该项大借款的前景颇为乐观。

嗣后美方把借款总额减至1亿元，又提出先行提供2000万美元的小额借款，有两家美国银行表示了贷款意向，双方对借款条件的商议大致为：期限三年；年利率3%至4%，后减为3%；中方以白银和证

券作抵押，另由中国银行作担保；中方还须支付律师费和佣金[439]。中方最后未与美方达成正式借款合同。

1938年9月陈光甫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在美国交涉经济援助时，也曾要求美方提供外汇现款借款，以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当时美方只同意以购买中方2000万盎司存银的方式来提供现汇[440]。此后，中、美之间虽然先后达成了数笔信用借款，但美方迟迟不同意向中国提供直接用于维持法币汇价的借款。在美方看来，中国法币汇率的稳定主要关系到英国的利益，因此应由英国出面提供相应的帮助[441]。

国民政府还通过英国政府向美方接洽，希望英美共同对华通过借款，维持法币汇率，但也被美方拒绝。1939年春，中英达成第一次平准基金后，美国政府依然不为所动。而美国运通公司、花旗银行及其他美商一度在上海大肆购买外汇，导致法币汇价低落，孔祥熙也因此不得不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重交涉，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制止[442]。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驻美大使胡适在美促进美方增援中国平准基金，并且特别提到，希望不要通过国会，而直接由美国政府或金融界增援中国平准基金[443]。但美方仍未予理睬。

从1940年春夏之交起，国民政府方面在继续与英方谈判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的同时，还加强向美方谋求平准基金借款。当年4月中美达成“华锡借款”2000万美元之际，曾考虑商请美方拨出一部分现款，以加强外汇平准基金[444]。但中方通过“华锡借款”实际上只能在美购料，至于维持法币汇价，不得不另行洽借平准基金借款。当时除了驻美大使胡适向美国财政部有所接洽外，蒋介石本人也多次向美方呼吁。如5月14日，蒋在致罗斯福的电文中指出：“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拟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弱，影响所及，商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

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贵国经济利益必遭摧残。最近上海美国调查委员会自动电请贵国政府贷款敝国，以维持币制，此事足以显示一般人士，深恐日人破坏敝国币制之企图，势必影响贵国商业之利益也。”蒋介石要求美国政府“于此紧急之时，贷我现款，以维持敝国币制”[445]。同年8月11日，蒋介石又电示宋子文转告美国政府：“美国若不在金融上从速援我救济，则中国内外情势实难久持。”[446]

1940年6月起宋子文在美国接洽援助时，曾建议中美共同设立平准基金，其中由美方实际出资5000万美元（名义上宣布出资1亿美元），中方出资1250万美元；设立由三至五人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的外汇基金存于美国银行，法币基金存于在中国或香港的美国银行；由委员会指定的银行具体实施有关维持法币汇价的措施。宋子文并提出另行设立协调中美和中英两个平准基金的委员会[447]。11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时，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宣读了一份名为《中英美合作方案》的文件，内中提到，希望英、美联合或分别向中国提供借款，用以维持中国法币的汇率，该借款的总额应在2亿美元至3亿美元之间[448]。美国方面，包括罗斯福总统本人，起初不相信中国能够对货币制度实行有效控制，对中国希望美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要求虚予应付。与此同时，日本公开承认了汪伪政权，英国方面又表明了将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美国对于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态度才转趋积极。1940年11月30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借款，用于维持中国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摩根索曾谈到罗斯福作出决定时的情况：“他（罗斯福）为中国担心，他显然担心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会发生某种事，他要求我在24小时内向中国人提供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449]

此后，主要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摩根索代表美国政府，双方就平准基金相关各问题经过数度谈判交涉。

关于美国是否真正向国民政府提供用于维持法币汇率的现汇借

款，起初摩根索称，如果要以美国的平准基金来帮助任何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必须得到国会的特别批准；摩根索又提到，关于罗斯福宣布的1亿美元援华总额，“有人说是1亿美元的贷款，也有人说是1亿6千万美元的贷款，总之你们希望的是在全世界产生的效果”，暗示美国已宣布的对华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宋子文则提出，尽管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寻求过“橱窗装饰”即名义上的借款，但如果美国政府此次借款只是停留在“橱窗装饰”上，势必引起误解。他坚持平准基金借款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现汇借款[450]。

关于实际提供的平准基金借款额，在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后，摩根索又提出，在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的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中，美国拟实际新贷款3000万美元，此外的2000万美元由1937年中美货币协定之下中国获得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抵扣。这也是此前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统一过的口径，按摩根索的说法，宋子文“做梦也想不到，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向韦尔斯（Sumner Welles，美国副国务卿）表明，我们将讨论的是3000万（美元）”。宋子文不同意3000万美元的数额，他提到，蒋介石希望为维持法币获得2亿至3亿美元的借款，5000万美元尚嫌不够，如果再减少2000万美元，蒋本人肯定将十分不满，中国民众也会失望的。宋子文甚至表示：如果这次不是实贷5000万美元，即使中国政府公开接受，他本人也不愿接受[451]。在宋的力争下，美国财政部方面不得不同意按5000万美元的实贷额作进一步的谈判。

关于逐月拨付还是一次拨足，在12月26日的草案中，美方起初提出，为了保证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额能够应付较长时间的需要，在事先未得到美方允准下，每月向中方拨付的款额不超过500万美元。在中方表示异议后，美方同意首次先拨付2000万美元，余款分6个月平均拨付。宋子文坚决不同意，认为分期拨付的方式将使平准基金无法应付紧急情况，何况这一消息一旦走漏，市场对外汇的需要肯定会激增，势必无法满足。参与谈判的中国大使胡适起初同意分期

拨付，但宋子文坚持不允，并且通过蒋介石向美方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文。另一方面，中方宣布由摩根索所赞赏的陈光甫担任平准基金会主席，使摩根索颇为满意。罗斯福的助理居里（Lauchlin B．Currie）也向摩根索指出，不要在这一问题上使中方认为美方不信赖国民政府，何况中国方面根本用不了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的主要作用是心理上的[452]。居里还向罗斯福进言，协定的条款应显示出美国对蒋介石信任和信心[453]。但是，美国财政部坚持不肯把美方认款额一次交付于平准基金会支配，所以直至中美签署平准基金协定之后，中方还曾就此点继续向美方交涉[454]。

到1941年4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中央银行代表李幹，在华盛顿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了中美平准基金协定[455]。该协定共十条（其中第一条至第五条又共分十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设立中美平准基金，美国财政部提供5000万美元，中国政府银行拨出基金至少2000万美元及其他资产；设平准基金委员会，五名委员中，至少三人应为华籍，并由中方在其中指定一人为主席；至少有一名美籍委员，将委员会业已实施或计划中之一切活动随时呈报美国财政部长；委员会在利用基金中的美金进行投资及再放款时，须获得美国财政部长或联邦储备银行之同意；委员会应将有关基金的说明书、报告书、决算表，及基金及其资产已实施或计划中之一切活动情形，提供予美国财政部；凡动支美方资金维持法币汇率，中方由按年息1.5%向美方支付利息；协定还规定美方可以单方面取消以美元维持法币的义务[456]。从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各条款来看，虽然没有采用借款和贷款等字眼，但规定了中方使用美方资金的一系列限制并须支付利息（尽管利息率较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平等的。

在签署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同一天，中英之间也签署了新平准基金之协定。之后，中国方面又同美、英经过磋商和换文，在形式上把中英、中美两个平准基金合并为统一的“中英美平准基金”，三方的认额分别是：英方共认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美方摊认

5000万美元，中方出资2000万美元[457]。1941年8月13日，成立了由中、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平准基金委员会。另外，在美方最终明确同意一次性拨款后，1941年4月25日，宋子文与摩根索正式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协定[458]。同日，宋子文与摩根索发表联合声明，称中美平准基金的达成，是两国在货币领域的合作所采取的重要步骤，除有助于稳定两国货币间之关系外，还是促进两国福利的重要因素[459]。

中美平准基金达成之初，美国方面还是比较支持的。1941年5月8日，摩根索向参议院银行与币制委员会提出，将中美平准基金协定有效期延长至1943年6月底，称平准基金的设立，对于稳定法币汇率、巩固币制，当有重大之帮助。6月14日，摩根索在该委员会发表演讲，称中美平准基金协定有助于中国政府整理金融和开展对傀儡政权货币的经济战[460]。另外，担任中英美平准基金会的美方委员、美国关税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福克斯（A．Manual Fox）也于6月份抵达中国，在英方委员迟迟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福克斯与中方一起拟订了平准基金会的最初工作计划。

1941年9月初，美国政府在和英国政府协调之后，要求所有在华友好银行，对于新设立的中国平准基金会全面合作。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美国政府还表示，各银行的合作是与美国财政部在中国货币领域的合作一致的。美国国务院还分别要求荷兰政府与比利时政府照知各该国在远东的银行，配合中国平准基金会的有关措施[461]。

中英美平准基金的正式运作，是在美国政府率先决定冻结中国在美私人资金、英国与荷兰相继响应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场的套汇风潮，减轻了基金会的售汇压力。另外，新的基金会以外汇审核制取代了以往中英平准基金会公开抛售外汇的办法，并按每1元法币合英金3又5/32便士（即1英镑合法币76.04元）、合美金5又5/16美分（即1美元合法币18.82元）的汇率，供给正当商业所需之外汇。

这一汇率要比同期上海黑市约高10%[462]。美国财政部还主动提议由平准基金会审核所有的美中贸易，即凡在华之中外商人，必须持有平准基金委员会核准使用外汇的证明，才可从美国订购货物运往中国；另一方面，自中国任何地区运往美国售汇之货物，必须出示已将外汇售与平准基金委员会之证明者，美国政府才允准其货物入口。这样，一方面私存外汇难以绕过平准基金会订购进口货物，另一方面对黑市外汇的来源也有所限制。此外，在取消上海外汇黑市和香港法币黑市问题上，美商银行和英商银行都予以配合，这对于中英美平准基金会无疑是一大支持。

尽管如此，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正式运作之后，为维持法币汇率仍然售出了较大数额的外汇。从1941年8月中旬至11月底的3个半月内，平准基金委员会直接出售外汇总额约为2100万美元，这大大超过了以往三年的平均售汇额[463]。不过，中英美平准基金会在该时期所售出的美元主要来自中方银行，所售英镑来自英国方面。尽管自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法币的汇率明显呈下降的趋势，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法币汇率大体上平稳，黑市基本消灭。

1941年11月1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修订1941年7月26日颁布之资金封存法令，声明关于汇华款项，亦已颁发新执照，在新订条例之下，所有中美商务间之款项来往须经中国平准基金委员会之管制[464]。这意味着以后所有进出口概由指定或特准之银行经办，各该银行买卖外汇，必须由平准基金会予以核准，并照平准基金会所订之章则办理，平准基金会得以有效地支配出口货物及汇款所得之外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不可能继续在上海与香港维持法币汇率。另外，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地区，国民政府实际上也不再以出售外汇的方式来维持法币汇率，而是实行了外汇管制，平准基金逐步不再起作用。至1944年，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均告结束。在5000万美元的中美平准基金借款内，中方仅在1942年12月

10日一次动用1000万美元。根据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中方由中央银行按1.5%的年利息率，自1942年12月起每月付息一次。至1943年4月，中央银行已清偿了本金和息金54246.58美元[465]。

三　力争美国对华提供租借援助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租借关系的建立，是中国方面寻求美国军事援助的不懈努力和美国政府调整相关政策的结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除了向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寻求军事援助外，还在美国采购军用物资。特别是陈光甫在美国注册成立世界贸易公司后，这类采购活动的规模有较大发展。但最初中方在美国所能购买到的主要是些非武器类物资。至1939年底，该公司在美国共购得总额为7467.46万元的物资，种类为以下几类：（1）卡车及零配件、维修器械，（2）汽油和润滑油（1145.2万美元），（3）黑色和有色金属（2468.33万美元），（4）无线电和电话设备、器材（560万美元），（5）通用机械（215.1万美元），（6）铁路器材（400万美元），（7）锡矿采掘设备（300万美元）。与此同时，中方也在美国购得若干武器并运回国，但无论种类和数量，都远不能满足中方的需求。例如，据缅甸海关统计，从1939年10月28日至12月31日，经由仰光转运中国的武器价值总额为8,352,756美元，其中购自苏联的为5,418,665美元（火炮、机关枪、步枪及弹药等），占64.87%；购自比利时、英国、瑞典、捷克、法国五国的共1,702,923美元（高射机枪、步枪、爆炸器材、炸药、弹药等），占20.39%；购自美国的1,231,168美元（手枪、雷管、子弹、飞机零件、炸药等），只占14.74%[466]。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军火禁运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939年11月，美国修改《中立法》，规定外国可在美国用现金购买武器，运输自理。1940年7月初，蒋介石曾电示宋子文，按照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开列的总额为3000万美元的物单洽购械料，同时

订购驱逐机150架[467]。由于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已经向德国投降，中方认为美方可把以往售法飞机额度，转售于中国，因而当月宋子文向美方正式递交的第一份军用物资订单总额，除了3000万美元的械料外，还有价款达4000万美元的飞机，包括3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轻型轰炸机[468]。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方向美方提出的数额最大、包括轻重武器和作战飞机在内的军事援助要求。只是美国能否如额提供，中方如何支付价款，却是双方都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

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美国已成为中国能够获得外来军事援助的最重要的国家。可是，当时美国提供援助的方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对美国军事物资日益增加的需要。通过“桐油借款”、“华锡借款”、“钨砂借款”和“金属借款”，中国已经把到1945年为止的矿产品的预期交货量抵押殆尽。从美国对华借款数额来看，也比同期苏联对华贷款总额小得多。此外，由于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主要外贸口岸和盐区，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收入急剧下降，不可能调拨巨额外汇用于购买外国军事物资。因此，到了1940年末，即美方允诺提供“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后，中美双方实际上都意识到，只有采用新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为获得美国军事援助所面临的财政困难。以“租借”名义对华提供军事援助，就是这种新的方式。

1940年12月19日，罗斯福便批准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指示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协商，拟订相应实施方案[469]。1941年1月30日，即美国会尚在就《租借法案》进行听证期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如果美国人民希望中国、希腊等友好国家能够继续成功抵御那些意欲征服世界的力量，那就必须提供美国所能的一切必要的援助[470]。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并经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在其认为有利于国防的任何时候，在资金许可的范围内，或根据国会批准的合同，可以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产任何防御物资，只要总统认为这些国家的防御对于美国的防御是必不可少的；也可以向上述

任何国家的政府“出售、划拨、交换、租借，或另行处置”任何防御物资[471]。3月15日，罗斯福又在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通过蒋介石委员长要求我们提供援助；美国已经答应，中国将获得我们的援助……正如我们所曾宣布过的，我们的祖国正在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472] 1941年5月6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

当租借方案在美国参、众两院寻求通过之际，蒋介石曾向造访的美国特使居里递交一份《美国空军援华备忘录》，请其转交罗斯福总统，这可谓中国向美国接洽租借援华问题的开端。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后，蒋介石立即在3月12日和13日连续致宋子文三份电报，指示宋与美国军方洽商具体的军事援华事宜[473]。旋即国民政府委派宋子文为处理租借事务的全权代表，另从国内调派兵工与交通技术专家赴美襄助。1941年4月，宋子文出面，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专门从事租借物资申请及接洽事宜。5月1日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正式成立，额定资本20万美元，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认购公司首批发行的股本1000股计10万美元，并出任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的董事长；下设航空、兵工、交通、电信、医药军需等部门[474]。为便利对美交涉，公司另聘请美国资源计划委员会主席、罗斯福总统的舅父德来诺（Frederic A．Delano）担任名誉顾问，聘请了杨门（William S．Youngman Jr．）、毕范理（Harry B．Price）、科克伦（David Corcoran）等美籍人员出任该公司董事和经理人员，这些美方人员都明确知道宋子文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475]。根据美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申请租借物资通常经过多重手续：1．整理国内发来的料单并草具计划；2．向美国政府租借事务管理处（Office of Lend—Lease Administration）说明申请物资的用途，并转请美国各购料机关采购；3．从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获得优先配额；4．敦促美国购料机关及时采购；5．防止中方获得额度之物资转拨其他战区；6．预定船只，整批装运；7．预筹货物到达

远东口岸后转运国内方法。凡涉及计划、方针及特别重要事项时，中方还必须向包括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Henry A．Wallace，兼美国经济作战委员会主席）、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租借事务管理处，以及英美合组的联合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Assignment Board），进行游说接洽。另外，在重庆的蒋介石、孔祥熙也曾向美国大使高斯、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等人交涉过租借援助问题。

从1941年3月底到1942年1月，中国方面曾分三次向美国申请提出租借预算案，其具体内容可分为兵工器材、航空器材、交通器材（包括战车）、运输（包括船只）、军用杂品、农工产品、服役及其他、厂房器材；从申请物品合计的价款来看，1941年3月31日第一次提出为218,038,500美元，1941年10月28日第二次提出为461,834,253美元，1942年1月15日第三次提出为1,379,779,067美元[476]。如果这些申请得以满足，对于中国抗战事业无疑是极大的帮助。但是，在租借物资的分配上，美国当局表现出明显的“重欧轻华”倾向，分配给中国的数额往往少于中国的申请额。而实际上向中方交付的物资，又要少于分配定额。罗斯福便曾指示有关人员在审议中方提出的军需品申请时，“只有在研究我们的军事问题以及我们自己和英国的需要之后，才能最后决定”[477]。经过中方的交涉，4月28日美国批准向中国提供第一批租借援助物品，价值仅达4510万美元，包括：滇缅铁路材料价款1500万美元、康印公路器材价款100万美元、军用卡车和民用卡车各2000辆价款1200万美元、汽油500万加仑价款100万美元、柴油5000吨价款5万美元、润滑油2500吨价款25万美元、兵工厂原料1000万美元、轻蚕形卡车150辆价款30万美元、载客车300辆价款30万美元、棉毯300万条价款450万美元、棉布1000万方码价款70万元[478]。5月18日，包括300辆汽车在内的第一批租借物资从纽约启运赴华[479]。同月，美方批准向中国提供价额达4934.1万美元的军械弹药。至7月中旬，美方同意向中方提供飞机435架，大大少于中方要求的1000架。7月下旬，美国军方人士曾非

正式地表示，将建议罗斯福批准当年向中方交付2.4亿美元的军火，翌年再交付5亿美元[480]。至8月15日，宋子文已与美方拟订了6亿美元的租借援华清单，包括2亿美元的飞机、1.75亿美元的军械、7600万美元的卡车等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物料及运费[481]。然而，中方获得的诸多租借物资额度，实际交付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些货单甚至不得不改向加拿大商购，虽然仍归租借案内办理[482]。至于那些当时只能在美国生产而中国难以得到优先额度的货品，中方不得不请美国出面，帮助与其他国家恳商可否先行转让给中国。如1941年10月和11月，经过罗斯福总统亲自劝导，英方把美国专为英国制造的66架轰炸机连同机枪、瞄准器等，一并移交给中方[483]。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1941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约为2600万美元，仅占当年美国提供给各国租借援助总额的1.7%[484]。但即便如此，经过中、美之间的反复交涉，美国毕竟开始向中国提供租借援助，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又多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外援，中美之间也开始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军事互助关系。

四　居里和拉铁摩尔访华

如前文所述，1940年11月底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5000万美元，对于借款合同的起草，中美双方有待进行具体磋商。而美国加入中国的平准基金之后，如何处理与中英平准基金的关系，则需要中、英、美三方有关人士进行协调。中方更希望由此而促成英美在对华援助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蒋介石最初指示驻美代表宋子文，邀请英、美政府派遣经济专家组织远东合作团，共同来华考察。但宋子文认为这一方式在当时尚无可能性，主张首先加强中美间的经济联系，遂建议邀请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兼经济事务主任居里前来中国，考察经济和币制方面的情况。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居里“学识经验宏富”，能够帮助蒋介石决定有关方针；居里在华期间，中方有关部门应向其“随时供给经济财政多项材料”。蒋介石赞成宋子文的看法，即居里结束访华回国后，因其日常在罗斯福总统旁，此后美国

经济财政上或能加强援华，且可成为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私人联络线[485]。这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开展对美外交的积极举措之一。

1941年1月30日，居里离开美国旧金山赴华，取道马尼拉和香港，于2月7日飞抵重庆。美国联邦储备局代表戴沛礼（Emile Despres）偕同居里来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程赴香港迎接居里一行[486]。

重庆当局十分重视居里的来访。正如美国驻重庆大使詹森指出的，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府主要成员，把居里的来访视作美国决心继续援华中国的标志，同时也是向美方表达中方意见的机会[487]。在三周的逗留期间，蒋介石本人便与居里进行了十余次会谈[488]。居里除了拜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外，与其进行过会谈的政、军、财经方面的官员有：孔祥熙、翁文灏、张嘉璈、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商震、俞大维、徐堪、彭学沛、席德懋、徐伯园、顾翊群、贝祖诒和陈介等。在美方看来，国民政府对于居里来访给予了充分协助，提供居里想要了解的各种资料，尤其是财政部、军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489]。除了重庆之外，居里还到成都地区进行了访问，包括专为美国军用飞机降落的机场工地。

由于皖南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原本不想与居里讨论国共关系，曾指示驻美代表宋子文向美国国务院表示，不希望把调查国共冲突作为居里来华的正式使命[490]。但是，在2月8日与蒋介石的首次正式会谈中，居里便转达了罗斯福关于维持中国政治团结、避免内战的口信。根据当时中方的译文，罗斯福的口信大意为："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双方之距离，如为二与八之比，殊少融和之望，如其距离为四与六之比，则接近易矣。"蒋介石则指称中国共产党惟为第三国际服务，无视中国本国之利益；中共反抗中央之命令，即为反对中

国与英美合作且立于同一战线。蒋向居里表示：中共如能服从命令，严守国家纪律，当以爱护，一视同仁，否则如彼利用抗战为名而冀图发展第三国际势力，乃至有违抗中央命令，则当限制其活动，不能任其贻害国家也[491]。在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谈中，居里又指出，美国相当部分民众同情中共，相信中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而对农民爱护备至；他还以罗斯福在美国国内与反对派争取民众的方法为例，表示不赞成国民党的中共政策[492]。虽然蒋介石一再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居里还是提出了希望会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并于2月14日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就国共关系、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土地政策、美国援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并询及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事变真相、中共当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的内容。周恩来回答了居里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内战，从而严重影响抗战[493]。通过与国共双方的会谈，居里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对中共极为忌恨和不信任，但既无法收买，又压服不了；中共是唯一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党。由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表示希望一致抗日，居里认为，虽然局势依然严峻，但近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在整个对日作战期间，国内冲突将得到控制[494]。居里所转达的罗斯福的意见和居里本人的态度，显然使蒋介石在处理中共问题时不得不有所顾忌。

作为一名经济事务专家，居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交通、工业等方面的问题，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和了解国民政府方面的政策。他与蒋介石和中方其他官员多次交换意见，并且提出了不少建议。

居里提议，由美国政府冻结华人在美国银行之存款，据美方调查此类存款总额达2亿美元，这样“中国人民即不能再以外汇汇至美国，而中国出口贸易所得之外汇，将全部受中国政府之支配”。居里还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国政府应保留所冻结的资金为战后建设之用。蒋介

石对该建议极表赞成，认为如果美国帮助解决此事，中国之经济问题实已解决其一部分矣[495]。居里回美后，促成中美双方有关机构间的正式接洽，并于同年9月实现了冻结中国在美资金。

关于维持中国外汇汇率问题，是居里关注的重点。他与国民政府官员以及银行家多次交换意见，他的倾向性观点，是维持上海的外汇市场，以限制大批法币流入大后方地区；另主张在重庆设立外汇市场，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之后，继续实施维持汇率之政策（2月15日谈话）。居里还与蒋介石讨论了有关美国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问题。居里转达美国财政部的意见，即5000万美元的借款，每月拨付不超过500万美元，蒋则强调，必须5000万美元全数一次交付，并称将制止上海外汇黑市对平准基金的耗费。居里代表美国政府提议，中英平准基金会与即将设立的中美平准基金会的合并，即中、英、美三方组成一个平准基金会，总部设在重庆，上海设分部，以比较有限制之数目暂维上海外汇市场，以期逐渐缩小为原则，不使上海市场顿时混乱；由陈光甫担任即将成立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席。蒋介石接受了美方的提议。双方还约定：如果英国不同意，那么中英平准基金和中美平准基金分别运作，中英基金继续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中美基金将设在重庆。但两个基金虽分立，而政策仍须由中国政府统一，以期不至彼此冲突；居里回美之后，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先行签字，美方款额一次交付[496]。同年4月达成的中美平准基金借款协定和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的成立，就体现了居里在华会谈时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在讨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制度时，蒋介石起初不了解居里的观点，把全部为政府投资的中央银行说成有少量商股。居里即明确表示：政府应收买下商股，“俾中央银行成一真正之政府银行”，并且应单独集中纸币发行权[497]。这就促使蒋介石下决心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并于次年年中实行政府银行的专业化，把原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分享的法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银

行。

居里还与蒋介石讨论了国统区的食粮管制、查缉走私、征税、公债、交通运输、防止沦陷区法币内流和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等问题。

蒋介石向居里提到了英美向中国派遣经济使节的问题，寄望来华规划有关外汇、币制、通货膨胀、沦陷区发行纸币与走私等问题之计划，并希望由美方专家担任使节之主席。居里表示同意，称将尽力促成美国政府派遣第一等人才来华，在居里离华前夕，蒋介石与之达成的共识为：经济顾问之职责应集中注意立即措施之当前问题，惟同时可有助手若干人研究战后建设问题，或另组一经济使节以研究战后问题。且最好为知名人士，得到罗斯福总统之信任。蒋介石还明确提出，希望美方派出一合适人选，担任滇缅公路局局长，负养路、运输及人事之全责[498]。后来蒋介石与居里确定了滇缅公路委员会的组成，由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长为主任委员，一为交通部长，一为美国公路专家。

在居里离华前夕，蒋介石向居里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美国空军援华的要求，即希望美国以空中堡垒12架和其他飞机数百架供给中国，俾于日本向英美挑衅作战之前，先予日本海军以致命之打击，阻止日军南下；另希望美国加强其在关岛的军事设备，以制约日本。居里还直接询问蒋介石，中国内部是否有主张对日妥协者，正在对日进行秘密议和，如果有的话，是哪一部分人，议和之目的是否希望日军南下。蒋介石明确回答称，除中国获得最后胜利外，绝无对日和议可言，不论日本以何动人之条件向中国求和，亦必在英美参加的和平会议上谈判；但蒋也表示，英美在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华是中国继续抵抗的重要条件[499]。

2月26日，居里向蒋介石辞行，27日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抵香港，3月2日乘美国航班的飞机返美。

居里回美后，向罗斯福汇报访华情况。他提到了国共关系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罗斯福的关注[500]。居里向罗斯福提出，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既可能出现军事独裁，也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应利用其在华的重大影响，引导中国战后成为一个大国[501]。这显然对国民党当局有关政策持批评态度。不过，在3月15日致罗斯福的书面报告中，居里明确强调美国应加强对华关系，这也是居里首次访华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502]。居里的主张不久便付诸实施，如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租借物资援助、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向国民政府派遣政治和经济顾问、经济代表团访华等，并且派出了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1941年一二月间，蒋介石在重庆数次向居里提出，希望美方派出适当人员，担任蒋本人的政治顾问。蒋介石后来还明确提出过以原美国驻苏联和法国大使蒲立德（W．C．Bullitt）为人选。但当时居里指出，蒲立德曾任大使之高位，来华为政治顾问，将使美国驻华大使处窘困之地位；蒲立德与苏联政府之关系素不融洽，当此中国仍拟与苏联保持亲善关系之时，蒲氏来华出任政治顾问，恐将使中国政府为难；且罗斯福已经任命蒲立德为流亡伦敦各国之大使。这使得蒋不得不同意美方另外推荐人选[503]。

居里回美后，辗转物色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任教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即推荐给罗斯福。拉铁摩尔是加拿大裔美国人，童年和少年在中国渡过，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中国，曾在英商洋行和《京津泰晤士报》任职，并在太平洋学会主办的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担任过编辑。经过居里的极力引荐，蒋介石在美代表宋子文会见了拉铁摩尔，双方初步确定了赴华条件。蒋介石起初对宋子文关于拉铁摩尔与罗斯福并不熟识的报告颇感到意外，要求宋进一步了解拉氏与罗斯福的关系。然而，5月29日居里致电蒋介石，告知罗斯福总统提议由拉铁摩尔（霍普金斯大学Page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以私人身份担任蒋的政治顾问，希望蒋

及早答复，因为拉氏原定6月9日起上课。蒋于6月1日回电居里，同日并电指示宋子文进一步了解情况，具体办理拉氏赴华事宜。6月11日和12日，宋子文还就旅费、薪金等具体问题与拉铁摩尔达成共识[504]。稍后，居里针对重庆当局的疑虑，强调指出罗斯福总统了解拉铁摩尔本人，对拉氏有高度评价[505]。

拉铁摩尔于1941年7月19日飞抵重庆任职，来华以前他只是个普通的学者，并非罗斯福的幕僚成员。拉铁摩尔来华伊始，便接到居里的指示：对美普通电讯，即交大使馆转递，特种电讯，则直接由居里转达[506]。稍后，居里进一步明确要求："凡发自委座之任何建议或请求，包括重要之政策，其发动或经由正常外交机关，或起自委座，此项电讯，皆可由里转呈，想此事先生定能了解也。"[507]这意味着拉铁摩尔要通过居里，才能在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建立联系。居里曾通过拉铁摩尔了解中苏军事合作的详情[508]。蒋介石时而还会请拉铁摩尔起草致罗斯福的英文函电，这些英文函电稿通常由宋美龄转蒋介石定稿，然后拍发美国。即便如此，他对促进这种联系还是尽力的。蒋介石曾请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要求美国向英、苏政府建议与中国成立同盟，并同意中国参加进行已久的美、英、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联防会议。拉铁摩尔在起草电文稿时，提议删去易造成中国只能依赖美国的印象之字句，同时加上："委座颇愿利用全般局势发动反攻，惟念军备有限，倘不能如建议办法在政治上取得保障，此项努力之消耗实甚危险。"拉铁摩尔认为，加入这一内容有助于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重视中国[509]。而居里收到拉铁摩尔8月2日的来电后，又立即转给尚在度假的罗斯福[510]。同年11月24日和26日，拉铁摩尔两次致电居里，转达蒋介石对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的妥协倾向的不满，要求美国在对日谈判中坚定立场，使中国不被孤立。居里于11月26日便复电拉氏转知蒋介石：罗斯福总统的根本态度"迄未改变"[511]。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拉铁摩尔还及时向白宫转达了蒋介石的一系列重要意见，如：美国应当集中军事力量于太平洋战场，这有助于及时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阵线，成立太平洋联合

军事指挥部，由军事重心之美国为之领导[512]；对英缅当局强占在缅甸的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表示强烈不满[513]。

蒋介石之所以希望由罗斯福推荐的美方人士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意在建立起与罗斯福“个人直接关系”[514]。当时蒋介石不满美国国务院在远东问题上所持的消极立场，与美国大使高斯的关系也很不融洽，因此对拉铁摩尔颇为重视，往往把最重要的意见请拉铁摩尔经居里直接转达罗斯福，而不是通过美国在华大使馆。而蒋的这一考虑与当时居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起先指示拉铁摩尔代蒋介石起草致美方的电报时，可把普通电报交美国驻华使馆转递，特种电讯则由居里直接转达[515]。居里和拉铁摩尔都非常重视发展美国对华关系，通过他们两人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的努力，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特殊的联系渠道，这一联系渠道一度绕开了美国国务院和驻华大使馆。如1941年11月11日，拉铁摩尔曾在致居里的密电中，以蒋介石的名义转达了对美方的要求：增加维持汇率基金约5000万美元，提高对法币的信心；固定法币与美金的兑换率，遏止投机性购汇；授权中国领馆派员监督美国对华进口，遏制投机和奢侈品对华出口；把对华小额贷款合并为大额贷款，减少中国战时还款的负担。拉铁摩尔还转达了蒋介石的担忧，即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比军事局势更严峻[516]。

拉铁摩尔从被居里介绍给罗斯福，再由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事先均未征求国务院的意见；待到国务院方面得悉拉铁摩尔即将赴华时，虽不便表示反对，但向白宫强调拉氏只应当以私人名义，而不是作为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份，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517]。而拉铁摩尔在重庆的活动得不到美国使馆的支持和配合，使馆方面也从不就任何事情征求拉铁摩尔的意见，不邀请拉氏参加使馆为招待中方人士所举行的活动，尽管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唯一的外籍政治顾问是由罗斯福推荐的。另外，拉铁摩尔还访晤过英国、苏联、法国等国驻重庆的使节和武官，这类活动既不通过中国外交部，也不经过美国驻华使

馆。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对拉铁摩尔的“不合作”态度，使远在华盛顿的居里颇为不满，1941年9月间，他向美国国务院一官员谈到：国务院应当维护拉铁摩尔的威望，现在高斯与拉铁摩尔的关系不融洽，蒋介石据此断定拉铁摩尔不能对美国政府起到影响，这就妨碍了拉铁摩尔在中国发挥其作用[(518)]。这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外交运作机制复杂性的体现之一。

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确实也对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如新疆、外蒙古等敏感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书面意见。如建议蒋介石派私人代表赴新疆，以柔远政策感化新疆督办盛世才，中央政府宜在“政治及经济建设各方面，与新疆以指导及援助，使新疆与中央之关系日趋密切”。在外蒙古问题上，建议中国驻苏联大使与外蒙公使交涉承认中国在外蒙主权等五项目标；与苏联交涉订立互助防御协定；减少外蒙之苏共势力，阻止中共思想及势力侵入外蒙，发展外蒙资源，增加与内地贸易，注意外蒙对内蒙之影响；外蒙问题之紧急性，交涉之方法，等等。在东北问题政策上，提出了中国应坚决申述中国在东北部分之完整主权与治权等六项原则以及九项建议，外交政策与收复东北之关系、内政与收复东北之关系、战后东北之建设，如何应付在东北问题上的日本外交策略[(519)]。这些意见有的不久即为蒋介石采纳，如派朱绍良等大员入新疆；还有的供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除了孔祥熙外，拉铁摩尔还与冯玉祥、张群、何应钦、王世杰、郭泰祺、董显光、迪鲁瓦·呼图克图等中方人士有过多次交谈，也同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有过多次会谈和社交场合下的会面。拉铁摩尔还到滇缅路的中国段进行过视察，会见过云南省主席龙云，了解到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当局资助不足的情况。他还向华盛顿报告说，云南多山的地形无论对中国的防御还是日本的进攻，都起了制约作用，关键是制空权的掌握[(520)]。这与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国增加对华空军援助的要求是一致的。拉铁摩尔本人对介入中

国内部政治关系非常慎重，对当时的敏感问题通常不表态，然而拉氏也多次明确表达了罗斯福重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希望避免内战的主张。周恩来曾非常坦率地谈到，拉铁摩尔在重庆的存在有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521]。

1942年1月，拉铁摩尔返回美国休假。蒋介石当时致电罗斯福，称“拉顾问业已完全满足我等之期望……中对之从无纤介之疑虑”。重申中国将竭力相助，对抗日本侵略[522]。拉铁摩尔则利用受罗斯福接见之际，谈到蒋介石不会垮台，不会向日本人投降，蒋继续抗战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523]。这对于促使尔后美国加快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军事援助不无裨益。拉铁摩尔还在美国与各方面开展联络，向中方报告美国可能改变对华补给线等重要消息。他还在《国家地理杂志》、《生活周刊》、《星期六邮报》等美国报刊上，撰文宣传中国抗战[524]。由于在美国治疗疟疾，拉铁摩尔直到1942年10月初才回到重庆。由于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拉铁摩尔从内心不赞成蒋的许多做法，但又不可能支持史迪威，旋向蒋介石辞去政治顾问的职务，于当年11月返回美国，就职美国新闻局，负责对远东地区的宣传工作。

当然，拉铁摩尔的辞职对当时的中美关系并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事实上，拉氏抵华不久，蒋介石就发现罗斯福推荐的并不是哈里·霍普金斯那样的重要角色，能够影响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很有限。而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外交、财政、军事各部门都与重庆方面建立起直接联系；另外通过当时已出任外交部长但仍常驻华盛顿的宋子文，蒋介石与美国白宫之间联系渠道之畅通，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拉铁摩尔的退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

(1)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

统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2。

(2) 转引自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4页。

(3) 《柏林程天放来电》（1937年8月1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5年8月发行，第506—507页。

(4) 《程天放致军事委员会电》（1937年8月31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领袖事功）—革命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015209。

(5) 《柏林程大使来电》（1937年9月13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506—507页。

(6) 蒋介石致孔祥熙王宠惠电（1937年12月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领袖事功）—革命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500897。

(7)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即《德国外交政策文件》，以下简为*DGFP*）Series D,Volume1，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9，pp．829—830、832．

(8) “德国承认伪满消息，以理度之，当不至如此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4—155页。

(10) 《程天放致外交部电》（1938年2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5—156页。

(11) 《程天放致蒋介石电》（1938年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7页。

(12) 《麦根逊所作会谈纪要》（1938年2月24日），*DGFP*，Ser．D,Vol．1,pp．843—844．

(1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2月21日，第185—186页。

(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8页。

(1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8—

159页。

(1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61页。

(17) 军政部长何应钦1937年8月25日密令、军政部军务司长王文宣1937年9月3日签呈，《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3页。

(18) 《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56—69页。

(19) 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致外交部电（1937年9月21日）、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1937年9月23日），*DGFP*，Ser．D,Vol．1，pp．759、761—762．

(20) 外交部长牛赖特备忘录（1937年10月15日），DGFP，Ser．D,Vol．1，pp．766—767．

(21) *DGFP*，Ser．D,Vol．1，PP．854—855．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当时在华德国顾问姓名、来华及合同到期日期为如下：法肯豪森上将（von Falkenhausen，1934—？），施太修斯中将（Streccius，1934—1940），史达开少将（Starke，1933—1939），诺尔特上校（Nolte，1931—1939），魏尔克上校（Wilck，1932—1940），鲁希维中校（Voigt—Ruschenweyh，1933—1939），纳维格中校（Newiger，1935—1939），阿德霍尔德中校（Aderholdt，1936—1940），包姆巴赫少校（Baumbach，1933—？），布伦德尔少校（Brundel，1933—1938），海因利希斯少校（Heinrichs，1934—1939），林德曼少校（Lindemann，1934—？），克鲁马赫上尉（Krummacher，1929—1939），马约上尉（Meyer，1929—1939），斯坦因上尉（Baron von Stein，1931—1941），斯特纳斯上尉（Stennes，1933—1939），阿纳德上尉（Arnade，1936—1939），伯迪恩骑兵上尉（von Boddien，1931—1938），包尔中尉（Bauer，1930—1939），毕格尔中尉（Boegel，1932—1938），胡默尔少尉（Humemel，1928—1939），史脱茨纳少尉（Stolzner，1928—1939），狄林斯豪芬少尉（von Schmeling—Diringshofen，1934—1939），波洽德少尉（Borchardt，1935—1939），军械师包兹（Bautz，？—1939），骑兵保养官本哈特（Bernhardt，？—1939），军械士官海恩利希（Heinrich，？—1939），工兵领班库必克（Kubik，？—？），预备役少尉、工程师劳曼（Lohmann，？—1939），军械师马丁（Martin，？—？），士官伯尔

（Pohle，？—？），检验官森泽克（Senczek，？—1939），伙食士官舒尔茨（Scholz，？—1939），预备役中校莱布桑夫特（Lebsanft，1937—？，作为合步楼公司代表，不隶属于法肯豪森）。

(22) 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

(23) 《程天放致外交部电》（1938年4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84—685页；*DGFP*，Ser．D,Vol．1，pp．855—856．

(24)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4月30日），*DGFP*，Ser．D,Vol．1，pp．856—857．

(2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卷，第861—862页。

(26)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5月21日），*DGFP*，Ser．D,Vol．1，pp．86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86页。

(27) 时任军令部长徐世昌1938年5月25日的日记："十一时总顾问来表示，德国政府虽有调彼回国之电，只要中国政府不令其走，彼等决不顾及其政府命令云云，语颇诚笃（且自有其理由）。"引自《徐永昌日记》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10页。

(2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5月29日，第269页。

(29) 《德国外交部致驻华大使馆电》（1938年6月13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卷，第872—873页。

(30)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6月14日，第283—284页。

(31)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7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87—688页。

(33)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6月23日），*DGFP*，Ser．D,Vol．1，pp．881—882．

(34) 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99页。

(35) 备忘录：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1938年4月23日），*DGFP*，Ser．D,Vole．1，pp．852—853．

(36)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7。

(37) 《翁文灏致蒋介石电》（1937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第31页。

(38)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领袖事功）—革命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018410。

(39) 《中德合办湘潭中央钢铁厂契约（1937年6月25日）》，《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428—434页。

(40)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9。又《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收入的翁文灏1939年10月13日致孔祥熙函稿，仅提到资源委员会中央电讯器材厂1937年8月间曾于西门子订立购买制造军用电话特种工具合同。

(41)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0。

(42) 孔祥熙致蒋介石节略（1937年3月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4。

(43) 《叶琢堂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10日、1938年2月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015247。

(44) 《孔令侃致孔祥熙电》（1938年7月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3。

(45) 参见《孔祥熙致翁文灏函》（1938年6月24日）、《蒋介石致翁文灏代电》（1938年7月5日）、《蒋介石致翁文灏孔祥熙电》（1938年8月25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翁文灏致孔祥熙函》（1938年9月1日、9月27日）、《翁文灏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日、9月15日）、《孔祥熙复翁文灏函》（1938年10月10日），《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

(46) 《谭伯羽电孔祥熙》（1938年5月4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4。

(47)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5月9日），*DGFP*，Ser．D,Vol．1，p．860．

(48) 《齐峻呈蒋介石报告》（193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14—716页；参见蒋档：特交档案

—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5。有关佛德访华更多史实和相应的评述，可见黄翠芳、马振犊：《1938年德国特使佛德秘密访华述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49)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294页。

(50) 《魏茨泽克所作会谈纪要》（1939年8月26日），*DGFP*，Ser．D,Vol．7，Washington 1956,p．333．

(51) 《德国驻华大使馆致德国外交部电报》（1939年11月11日），*DGFP*，Ser．D,Vol．7，p．397．

(52) 《陈介致外交部电》（1939年9月1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54。

(53) 《王宠惠致孔祥熙电》（1939年9月16日）、《蒋廷黻签呈》（1939年9月19日）、《翁文灏致蒋介石孔祥熙代电》（1939年9月24日）、《蒋介石复翁文灏电》（1939年12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64—665页。

(54) 《翁文灏致孔祥熙函》（1940年1月6日）、《孔祥熙复翁文灏函》（194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66页。

(55) 《中德关系密档（1927—1947）》，第225—226页。

(56) 《谭伯羽呈蒋介石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处报告》（1942年10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0—9。

(57) 《王宠惠外交报告》（1940年1月15日），《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58) 《王宠惠外交报告》（1940年4月8日、4月22日），《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59) 《谭伯羽呈蒋介石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处报告》（1942年10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0—9。

(60) 《王宠惠外交报告》（1940年1月15日），《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61) 《谭伯羽呈蒋介石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处报告》（1942年10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0—9。

(62) 《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95—496页。

(63) John 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261—262．

(64)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密电（1937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7页；另据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5日记载："敌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辞拒绝。"（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5)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1937年12月3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37—39页。

(6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第158页。

(67)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8)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8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9) John 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pp．279—281．

(70) 《德使陶德曼访晤王部长》（1938年1月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97—498页。

(71)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1938年1月13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47—48页。

(72)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1938年1月15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50页。

(73)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4)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262页。

(75) 《蒋介石致陈介电（1938年11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89—690页；《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8年11月敬日），《蒋介石致王宠惠电》（1938年12月3江），蒋中正

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文件38、40,2020.30/4450.38、40。

(76) 《奥特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11月26日），*DGFP*，Ser．D,Vol．4，p．693．

(7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9月2日至9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影印，第143—147页。

(78) *DGFP*，Ser．D,Vol．8，pp．220—221、243．

(79) *DGFP*，Ser．D,Vol．4，p．700．

(8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15页。

(81) *DGFP*，Ser．D,Vol．8，p．689．

(8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16页。

(83) 《桂永清致蒋介石电（1940年9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二），第418页。

(84)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史料丛刊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657—659页。

(85) 《陈介致外交部电》（1940年2月8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57。

(86) 《谭伯羽致蒋中正电》（1940年7月24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65。

(87)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165—166页。

(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97页。

(89) 《国民政府驻德国商务专员谭伯羽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1页。

(90) 《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0月真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68。

(91) 《奥特致德国外交部电》（1940年11月7日），*DGFP*，Ser．D,Vol．11，pp．491—493．

(92) 《陈介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2—673页；《里宾特洛甫与陈介会谈记录》（1940年11月11日），*DGFP*，Ser．D,Vol．11，pp．515—517．

(93) 《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00—701页。

(94) 《驻华使馆致德国外交部电》（1940年11月15日），*DGFP*，Ser．D,Vol．11，pp．576—577．

(95)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下册，台北1978年，第606页。

(96) 《桂永清来电》（1941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4页。

(97) 魏茨泽克致驻日使馆电（1941年6月27日），*DGFP*，Ser．D,Vol．13，p．35．

(98) 《陈介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6页；《魏茨克致驻重庆德国使团电》（1941年6月30日），*DGFP*，Ser．D,Vol．13，pp．53—54．

(99) 《桂永清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27日），《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68页。

(10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03—704页。

(101) 蒋介石：《出席中央纪念周演讲》（1941年7月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56—257页。

(102) 《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76页。

(103) 《齐峻致翁文灏呈转蒋介石》（1941年12月21日），《蒋介石复翁文灏代电》（1942年1月12日），《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87—88、91页。

(10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04页。

(105)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1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第057—2；并参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

报告》，《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0页。

(106)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8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197页。

(10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25—238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231—232页。

(108) 《孙科与达拉第会谈备忘录》（1938年6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6页。

(109) 《筹设中法公司情形报告书》（1938年11月7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9页。

(110)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07—410、541—542页。

(111) 《哈利法克斯致驻香港商务秘书电》（1939年6月13日），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即《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以下简为*DBFP*,1919—1939）Series 3,Volume 9，London 1955，p．167．

(112)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48—749页。

(113)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10页。

(1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第767—76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49、第349页。

(115) 《筹设中法公司情形报告书》（1938年11月7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9—20页。

(116) 《杨杰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3页。

(117) 详见1939年3、4月间杨杰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往来电函，《民国档案》1999年第一期，第12—14页；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4—25页。

(118) 《顾维钧致孔祥熙电》（1940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69页。

(119) 《顾维钧致孔祥熙电》（1938年6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41—742页；《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99—200页。

(120) 《杨杰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3页。

(121) 《杨杰致蒋介石函》（1939年3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3—754页。

(122)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3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23) 《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9页。

(124)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民国二十八年全年工作报告扼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档号501—205。另参见陈晋文：《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第80页。

(125)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01页。

(1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85—788页。

(127) 《戈思默致博内电》（1939年3月21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5卷，第137—138页。

(128)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13—417页。

(129)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94—795页。

(130)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037年10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34页。

(131)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196页。

(132)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195—196页。

(133) 《孙科与孟戴尔谈话要点》（1938年7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7页。

(134) 《杨杰致孙科电》（1938年11月18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21页。

(135) 《杨杰致孔祥熙电》（1939年1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0—751页。

(136) 《日本大使致法国外交部照会》（1938年10月26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2卷，第386—387页。

(137) 《博内致法国驻日本大使电》（1938年11月4日）、《法国外交部备忘录》（1938年11月15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2卷，第457—458页、第566—567页。

(138) 《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3卷，第401—403页。

(139) 《博内致驻中国代办诺贝电》（1939年2月20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4卷，第256—257页。

(140)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230页。

(141) 《王宠惠在中央委员谈话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1940年1月15日和1月22日），引自《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档号5.5—1。

(14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12—613页。

(143) 《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呈外交部文》（1940年6月1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5年版，第102—103页。

(14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6月20日，第294页。

(145) 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1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4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6月22日，第295页。

(147) 《东方杂志》第37卷第14号（1940年7月15日），现代史料第43页；香港《大公报》，1940年6月22日。

(148) 《驻河内总领事馆致外交部电》（1940年6月2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05页。

(149) 重庆《大公报》，1940年6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32页。

(150) 香港《大公报》，1940年6月26日。

(151) 《许念曾和越督谈话纪录》（1940年7月29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12—116页。

(152) 《侍从室情报44612号》（1941年7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3) 《王宠惠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2月24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25—126页。

(154) 《蒋介石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2月2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19—120页。

(155) 《行政院长蒋中正致外交部训令》（1941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6) 《顾维钧致重庆外交部电》（1941年4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7)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28页。

(158) 《驻法国大使馆致重庆外交部电》（1941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9) 《华商存防商货一览》（1941年5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60)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外交部长郭泰祺电》（1941年7月1日），《外交部长郭泰祺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真电》（1941年7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61) 顾维钧1938年5月7日致外交部电，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第057—3。

(162) 《那齐亚致外交部长博内电》（1938年8月9日）、《博内致驻东京、伦敦、华盛顿的法国使节电》（1938年8月14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0卷，第614—615、667—669页。

(163) 《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9年8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5—757页。

(164) “（8月）廿九日接顾电，知法国已向我示意，其英法将与倭妥协，而欲劝我与倭言和，于此痛恨已极。乃忽思到英法在远东属地之印度与安南，全受我西南力量之控制，特托美间接转告英法此意，使其知所戒惧。”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5)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21日）》、《蒋介石致顾维钧

电》（1939年9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7—758页。

(166)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9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62页。

(167)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35—239页。

(16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33页。

(169) 《中央日报》，1940年8月29日。

(17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181—182页。

(17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446—448页。

(17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454—456页。

(17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0年，9月22日。

(174)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456—457页。

(175) 《蒋介石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0—772页。

(176)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21页。

(177) 《蒋介石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2月2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16—117页。

(178) 《大公报》1941年7月26日。

(17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3—774页。

(18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5—776页。

(18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33页。《申报》1940年11月9日；《东方杂志》第37卷第24号，《现代史料》，第51—52页。

(182)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310号，11月16日。

(183)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8—489页。

(18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44页。

(1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9—780页。

(186) 陈立夫著，卜大中译：《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187)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瓦涅克（1937年2月11日）注2，《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见于《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

(188) 《王宠惠呈蒋介石意见书》（1937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25—326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3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189)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苏联驻华、英、法、美全权代表电》（1937年7月16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

(19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27页。

(191)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急电》（1937年7月19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

(192) “苏俄允接济武器，但以订不侵犯条约为交换条件。”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3)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8月2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蒋介石本人有如下记载：“苏俄允接济武器，但以订不侵犯条约为交换条件。余斥驳之，俄之外交狡诈无比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日。

(194)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8月21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1期。

(19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31日；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28—329页。

(197) “汪对中俄协定怀疑”，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9月1日。

(199) 《蒋介石致蒋廷黻电（1937年8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65页。

(200)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8月27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1期。

(20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8页。

(202)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2—43页。

(203) 《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一次会议记录整理稿》（1937年9月9日），《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2—34页。

(204) 杨杰1937年9月12日的日记，转引自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05)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14日、9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65—466、468页；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四次会议记录整理稿（1937年9月17日），《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9—41页。

(206) 《杨杰致蒋介石密函稿》（1937年12月21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4页。按：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472—474页所载同一内容之函稿，所注日期为1938年1月5日。

(207)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83页。

(208) 《蒋介石致杨杰电》（1938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73页。

(209) 《蒋介石致杨杰电》（1938年2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77—478页。

(21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86—491页。

(211)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18—519页。

(212) 宋子文1938年4月29日、30日致蒋介石电，蒋介石曾分别批示："决无现款可汇，如此则苏俄无异与我有意为难也。""付给外汇决难办到，此无异强中国为难，未知兄可设法解决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93—494页。

(213) 《蒋介石致伏罗希洛夫电》（1938年7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99页。

(214)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3日、8月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15) 《钱大钧呈蒋介石报告》（1938年8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1页。

(21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1页。

(21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4—505页。

(21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8页、第530—533页。

(219) 齐赫文斯基：《1937—1939年蒋介石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通信》，《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59页。

(220) 《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23页。

(22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第379—380页。

(222)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民国二十八年全年工作报告扼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档号501—205

(223) 《杨杰致蒋介石函》（1938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72—473页。

(224) 1938年5月30日斯大林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称："吾人完全理解中国金融财政之困难情形并亦已顾虑及之，因此吾人对于武器之偿价并不要求中国付偿现金及外币，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锡锑等。吾人诚知此类商品中国能供给苏联而对中国之国民经济及国防无若何妨害，因之希望中国供给此类商品。……关于给予中国以新信用贷款问题，将付苏联最高机关讨论，吾人希望能底于成。"见于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3册，对苏外交（2）军火货物交换，文件44。

(22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226)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3页。

(227)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99页。

(228)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0—501页。

(229) 《钱大钧致蒋介石报告（1938年8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1页。根据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修正中苏第一二次借款合约草案原文（提要）》（档号172—1/3180），中方在第一、二次借款协定上签字的均为杨杰。

(230) 孙科携带的蒋介石致斯大林函（1939年4月）称："前向贵国两次军械信用借款，计共美金一万万元，原只备一年之用耳。今入第二期战事，预计一年半间，尚需一万五千万美金之购备，始能补充缺乏，加强力量，以达到胜敌之目的。……故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孙哲生同志为全权特使，同时代表中正趋前聆教。"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3册，对苏外交2军火货物交换，文件73。

(231) 《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14页。

(232) 《孙科致孔祥熙电》（1939年5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14页。

(23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页。

(234)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对苏易货偿债部分报告》（1945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1页。

(235) 财政部编《中苏信用借款节略》（1947年），《民国外债档案史

料》第11卷，第46—49页。

(2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05—406页。

(237) 《杨杰致蒋介石报告》（1939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45—346页。

(238) 《张冲致蒋介石报告》（1939年9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46页。

(239)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7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0)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48—349页。

(241) 孙科致重庆外交部电（1939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缩微档400—1980。

(242) 《蒋介石与潘友新谈话纪录》（1939年11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50—354页。

(243) “国联九日召集会议讨论俄芬纠纷问题，此又为新发生之难题，颇费思索。”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6日；“苏芬开战，—此时应注重苏俄关系，若我因此反对苏俄，则英法对我之态度更冷酷无忌矣。”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12月7日，第194页。

(245) “见俄大使慰问其国联除籍之意，并提议远东外交形势与俄国之利害。”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1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6) 《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39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0页。

(247) 《杨杰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2—363页。

(248) 《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4—365页。

(249) 《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7页。

(250) 《蒋介石致贺耀组电》（1940年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

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5页。

(251) 《蒋介石与苏联总顾问谈话纪录》（1940年1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9—370页。

(25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1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53)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0页。

(254) 《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1页。

(255) 《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苏俄外交062—7。

(256) 《斯大林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2页。

(25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10月17日，第363页。

(258) 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1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59)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40年10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3—384页。

(260) 《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41年3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8页。

(261) 《张冲呈蒋介石报告》（1941年4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9页。

(2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90—391页。

(263) 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19页。

(265) 《论苏日协定》，《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

(266) 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

件。

(267) 《委座与苏联潘大使谈话记略》（1941年4月1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2册，对苏外交，文件87。

(26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20—227页。

(269) 《王世杰致胡适电》（1941年4月15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1页。

(27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28—229页。

(271) 《许阁森致王宠惠函》（1937年5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94页。

(272)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时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273) 《梅乐和致关务署代电》（1937年8月11日）、《梅乐和致关务署呈文》（1937年8月30日），《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以下简为《海关协定》），中华书局1983年，第2—4页。

(274) 《海关协定》，第5—6页。

(275) 《海关协定》，第4—5页。

(276) 《海关协定》，第6页。

(277) 《梅乐和致梅维亮电》（1938年9月23日）、《梅乐和致梅维亮密函》（1938年9月27日），《海关协定》，第7、9—10页。

(278) 《梅乐和致梅维亮电》（1937年10月13日），《海关协定》，第11—12页。

(279) 《梅维亮致天津日本总领事崛内函》（1937年10月22日），《海关协定》，第16页。

(280) 《海关协定》，第33页。

(281) 《海关协定》，第34、37页。

(282) 《梅乐和致梅维亮电》（1938年2月16日）、《贺武致汉口英国使团电》（1938年2月20日），《海关协定》，第43—44页。

(283) 《卡尔致梅乐和电》（1938年3月2日），《海关协定》，第44页。

(284) 《梅乐和致孔祥熙电》（1937年12月1日），《海关协定》，第54—56页。

(285) 《克莱琪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2月27日），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即英国外交政策文件，以下略为*DBFP*）,Ser．2,Vol．21，p．710．

(286) 卡尔从香港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4月28日），*DBFP* ,Ser．2,Vol．21，p．744．

(287)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38年4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96页。

(288) 哈利法克斯致克莱琪电（1938年5月1日），*DBFP* ,Ser．2,Vol．21，p．750．

(289) 英日关于中国海关协定各条款为："1．日本占领区各海关所征一切关税、附加税及其他税捐，应以税务司名义存入正金银行，在该行未设立分行的地区，应存入双方同意的其他银行。2．所有进口税、出口税、转口税及救灾附加税按前项规定存入后，每若干日，最多不超过十日，应将应摊外债份额解存正金银行总税务司税款帐内，以便在1937年7月尚未还清的以关税为担保的各项外债赔款到期时，如数偿还。3．偿还以关税为担保的各项外债和赔款，应作为全国各关所征关税的第一项开支，但经总税务司证明的海关经费（包括由各关分担的总税务司署经费）以及其他照例拨付的款项（过去一向在偿付外债以前从总税收中拨付的）应尽先口付。4．（甲）各关应摊外债份额应照本关税收在上月份全国税收总额所占比例逐月核定。（乙）应摊外债份额以中国海关的进口税、出口税和转口税的总数为计算的依据，摊付份额按照上列（甲）项规定，由总税务司署征得日本及其他有关各国同意后议定。（丙）华北和华中日本占领区某关税收不足应摊数额时，应由各该区内其他海关的税收补足。5．（甲）自1937年9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赔款，现存于汇丰银行暂付帐内，应即付给日本政府。（乙）日本部分庚子赔款和1913年善后借款，以后应照以关税为担保的各项外债赔款偿还办法同样办理。（丙）1938年1月和2月应摊外债赔款（计3966576.32元）现存于上海汇丰银行，应即发还，以归还以该款作担保的透支款项。（丁）日本占领区各口岸汇丰银行海关税款帐内，如有余款，应改存当地正金银行分行海关税务司帐内，以便将来用于支付应摊外债份额。上述办法应自1938年5月3日起

生效，并适用于自1938年3月起征收的关税。”（《海关协定》，第98—99页。）

(290) 《卡尔致蒋介石函》（1938年5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97页。

(291)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5月4日），*DBFP*，Ser．2,Vol．21，p．756．

(292) 《大公报》，1938年5月6日。

(293)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80—181页。

(294) 《梅乐和致卡尔函》（1938年5月3日、5月17日），《海关协定》，第103、第107页。

(295)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外交报告》（1939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2—34。

(296) 《海关协定》，第116页；《江海关被攫与英日协定》，《东方杂志》第35卷第10号，1938年5月16日。

(297) 《孔祥熙致英国大使备忘录》（1938年7月7日），《海关协定》，第125—126页。

(298) Interview between H．H．Kong anf Sir Archibald Clark Kerr,July 9,1938,*Arthur N．Young Papers*,Box 75，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99) *Finance and Commerce*，1938年1月19日，第41—42页。

(300)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第272页，并参照第232页之1937年度中央收支报告表计算。

(30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第272—273页。

(30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第274页。

(303)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1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4。

(304)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9年5月16日），*DBFP*，1919—1939,Ser．3,Vol．9，p．78．

(305)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9年5月1日），*DBFP*，Ser．

3,Vol．9，p．33．

(306) 《哈利法克斯致卡尔电》（1939年6月7日），*DBFP* ,Ser．3,Vol．9，p．144．

(307) *DBFP* ,Ser．3,Vol．9，pp．72,156．

(308)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309) 《大公报》1938年8月21日。参阅《东方杂志》第35卷第18号，1938年9月16日。

(310) 《陈布雷致外交部电》（1938年9月13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79页。

(3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2) 《哈利法克斯致卡尔电》（1939年7月25日），*DBFP* ,Ser．3,Vol．9，p．332．

(313) 《杭立武1939年7月24日报告和7月25日致蒋介石密呈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67—568页。

(314) 重庆各报1939年7月26、27日联合版。

(31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02—104页。

(316)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7) “英国竟正式引渡津同志，可痛之至。人贵自强，国贵自立，于人何尤？”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8) *DBFP* ,Ser．3,Vol．9，p．455．

(31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71—572页。

(320) 《裨德本致英国大使馆（1939年8月21日）》，《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64页。

(321) 杭立武1939年8月18日致蒋介石报告中谈到：“英使馆驻渝代表相告，中国此次对英决定引渡嫌犯一事所引起之注意及反响，实为英外交部初

料所不及，故料想对于钧座去电请英国答复抗议并保证不承认伪组织一节，暨对我外交部以前请于白银及法币两点不再让步加以保证一节，均极慎重考虑，至对保证不承认伪组织一节，原可照办，但因我外交部抗议中提出法律问题，故或略有延搁。”引自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7。

(322) *DBFP* ,Ser．3,Vol．9，pp．498—500．

(323) 《中央日报》，1939年9月2日。

(324) *DBFP* ,Ser．3,Vol．9，pp．504—505．

(325) 《外交部致法国大使馆节略》（1938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1。

(326) 《外交部致英国大使馆节略》（1939年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1。

(327) *DBFP* ,Ser．3,Vol．8，pp．327—328、388—389．

(328) *DBFP* ,Ser．3,Vol．8，p．440．

(32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449页。

(330) 《外交部分致驻华英、法、美大使馆节略》（1939年7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1。

(331) 《杭立武1939年7月24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67页。

(332) 《英国大使馆秘书海特致王宠惠》（1939年12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3) 《蒋介石致王宠惠电》（1939年12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4)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07页；《王宠惠在中央委员谈话会所作外交报告及孔祥熙的补充报告》（1940年1月15日），引自《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335)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7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6) 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行政院会议通过建议

中，原只提汇丰银行，后奉蒋介石面谕改为汇丰与英法银行。

(337) 《部长会晤英国卡尔大使谈话纪录》（1940年3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8) 英方五项意见稿，附于1940年4月12日王宠惠与卡尔谈话纪录之后，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9)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40) 《部长会晤英国卡尔大使谈话纪录》（1940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41) 《中英换文和卡尔王宠惠往来函稿》，均见于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4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1页。

(343) 《大公报》1940年6月22日。

(344) 社评《天津问题如此解决》，《大公报》1940年6月22日。

(345)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136页。

(34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3页。

(347) 《郭泰祺致外交部报告》（1940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4页。

(348) 1940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英国驻美国大使罗西恩（Lord Lothian）就英日交涉问题多次吁请美国政府出面相助，但遭到拒绝。只是在英日已经达成关闭滇缅路的协定后，美国国务院才于1940年7月16日声明，认为此举将成为干扰国际贸易的障碍。参见Retreat from Chian,pp．142—143。

(349)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7月11日，第304—305页。

(35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7月13日，第307页。

(35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75页。

(352)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

133—134页。蒋介石在1940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对英提倡缅甸停运促进中倭和平之宣传，应有严格之声明。"见于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53)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40年7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5页。

(354) 《中央日报》1940年7月19日。

(355) *Retreat from Chian* ,pp．145—146．

(35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6页。

(357) 《郭大使伦敦来电》（1940年8月2日、8月13日），《曾镕浦仰光来电》（1940年8月6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36—138页。

(358)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40年9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7页。

(359)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8页。

(360) 《大公报》1940年10月2日。

(361) 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1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9页。

(36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42页。

(364)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5月22日，伦敦），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2。

(365) 广梅铁路借款和浦襄铁路借款协定的内容，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877—878页。 关于两项借款的数额，《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所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记作"广梅铁路四百万镑及浦襄铁路借款三百万镑"（该期第77页），有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第4卷，第620页（美国驻英大使1937年8月12日致国务卿电），亦作广梅铁路借款300万镑、浦襄为400万镑。

(366) 《美国驻英国大使致国务卿电》（1937年8月12日发自伦敦），《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第4卷，第620—621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第70页。

(367)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6日，巴黎）；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8日，比京），均引自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2。

(368)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11月11日），*DBFP*，Ser．3,Vol．8,pp．216—219；《王宠惠致蒋介石电》（1938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0页。

(369) 《孔祥熙致郭泰祺电》（1938年5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97—198页。

(370)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80—481页。

(37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14—215页。至1945年底，该项信贷动用总额约为2,857,924英镑。

(37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78—380页。该借款亦被称作战时英国第二次对华信贷。

(373) 1940年中英之间曾达成钨砂借款1000万镑之草案，年息3厘半至4厘，期限10年，担保品每年运交钨砂7000吨，在海防或仰光交付，由英商福公司经销，所得价款悉数存储伦敦中国银行，备付借款本息，如有剩余由中国政府自由支用。（见于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6。）但该易货信贷未能实施。又1941年3月28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向印度航空公司购入飞机50架，价款由汇丰银行转付，其中三分之一中方付现；其余三分之二以及银行手续费欠付（共298741.16美元），自1941年7月4日起，中方每月偿付一次（24893.43美元），分12期偿清。（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47页。）

(37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38页。

(375) 《郭泰祺致孔祥熙电》（1938年1月5日）、（1938年4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95、196页。

(376)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38年6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01页。

(377) 《关于中国援华要求的备忘录》（1938年5月31日），*DBFP* ,Ser．3,Vol．21，p．793．

(378) *DBFP* ,Ser．2,Vol．21，p．805．

(379) 《西门关于援华问题的备忘录》（1938年7月1日），*DBFP* ,Ser．3,Vol．21,pp．810—812．

(380) 《哈利法克斯致驻美大使林德赛电》（1938年12月5日），*DBFP* ,Ser．3,Vol．8,p．297．

(381) 《克莱琪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12月4日），*DBFP* ,Ser．3,Vol．8,p．295．

(382)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17日），引自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4。

(383) 《葛林威致在上海的英国大使馆电》（1939年2月5日），*DBFP* ,Ser．3,Vol．8,pp．441—442．

(384) 《罗杰士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08页。

(385) 《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致驻华大使卡尔电》（1939年3月3日），*DBFP* ,Ser．3,Vol．8,pp．486—487．

(386) 《郭泰祺致孔祥熙电》（1939年3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12页。

(38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50页。

(38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48—150页。

(389) 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11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90)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9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15页。

(392) 《英国财政部致罗杰士电》（1939年6月13日），*DBFP* ,Ser．3,Vol．9，pp．167—168．

(393) 可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50—153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55—457页。

(394) 《罗杰士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6日），吴景平、林孝庭主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395)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54、157页。

(396) 蒋介石于1940年12月9日和10日分别电示宋子文和郭泰祺向英方表明：如果英国政府确实有困难，可以实际上先提供币制借款1000万镑，另外1000万镑的信用借款可在以后另议；但希望英国政府宣布借款总额为2000万镑，否则不如暂缓宣布。10日晚些时候，路透社发表了英国政府将对华贷款1000万镑的消息，蒋介石又急电郭泰祺和宋子文，要求与英方“切商此一千万镑专作为币制借款，对于信用借款必须另行续商订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30—232、234页。

(397) 1940年5月6日，孔祥熙在中央委员会谈话会上指出：“与我们抗战有关系的便是上海外汇的变动，这仍旧是平衡基金委员会的老套，他们总是他们的办法，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持自由，不听我们的话。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许多外国银行可以不受中国管辖，同时我们的政治网又达不到那里。”《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398)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1年1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40页。

(39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44—247页。

(400) 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186.1941年3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开设外汇市场，由中央银行提供合法的外汇需要，但是在两个月内仅出售了不到20万美元，对维持法币的汇率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401) 协定中文全文可见于《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195—1220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47—253页；《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十一辑，第348—354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65—470页。关于1941年4月1日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的签署地点，《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195页记为“伦敦”，误，应为华盛顿。宋子文、李幹在同一天（1941年4月1日）还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了中

美平准基金协定，据同书第1187页则把签署地点记作华盛顿。另蒋介石1941年5月致丘吉尔电文中提及中英新平准基金协定的签署地点："贵政府最近在华府签订成立平准基金之协定"，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56页。

(402) 英国财政当局原决定：四行在英存款及中国政府任何英金存款，以及中国政府所属各机关在英存款，均不与冻结；其他中国存英资金（如非政府银行之存款）中方希望予以解冻者，请核示转知。但中方决定只有中央银行有解冻之权，其他冻结之中国资金，暂不解冻。见于1941年7月29日财政部次长郭秉文自伦敦致电孔祥熙和8月1日孔祥熙复电，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14。

(403)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日外交关系》，第460—462页。

(40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25—226、232页。

(405) 据王世杰1938年7月9日的日记："今日孔庸之在国防最高会议报告，我方向美国借款六万万美金（分三年付，第一年三万万元，第二年二万万元，第三年一万万元）已签字，惟尚未交付。"《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306页。

(406) 《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1—152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34—236页。应当指出，在摩根索主动向顾维钧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已有官员主张通过援助中国抵抗日本，来避免美国与日本直接冲突。见范宣德致贺百克备忘录（1938年7月23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以下简为*FRUS*），1938，Vol．3，pp．234—237．

(407) 《财政部呈行政院》（1940年1月12日），何思瞇编：《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台北"国史馆"1994年版，第64页。

(408)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55—60页。

(409)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19—121页。关于桐油借款和下项华锡借款的担保问题，两项借款协定载明由中国银行"完全"、"无条件"地承担，财政部长孔祥熙亦要求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出面担保，但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以"事关国家整个财政"为由，提出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同负责，中央、交通两行应向中国银行书面声明共同承担到期还本

付息的责任；孔祥熙同意三行按四、四、二的比例分担责任，并交换文件存证。参见《中国银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410)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1月4日、3月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4。

(411)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49页。

(412)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3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50页。

(41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52页。

(414)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68—70页。

(415)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98—99页；贸易委员会编《关于对美桐油借款偿债报告》（1945年12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37—139页。

(416)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40年3月5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0—261页。

(417) 《胡适致孔祥熙电》（1940年3月26日）、《孔祥熙复胡适函》（1940年3月27日）、《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40年3月2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4。

(41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2—266页。在此次借款的交涉过程中，中方曾提出免除抵押品，但被美方拒绝；借款年利率初议为3.6%，后美方称北欧、南美各国纷纷援例，提至4%，并应中方要求，把桐油借款利率减至4%。见《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40年4月21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9—270页。

(419)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20) 《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40年6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4页。蒋介石在信中还称宋子文“受余完全之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

(42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93—

94页。

(422) *Morgenthau Diary* ,China,Dacapo Press,New York,1974，p．178．

(423)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3，p．135．

(424)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0年9月2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4。

(425)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86—288页。

(426) 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致资源委员会函（1942年2月11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00页。

(427) *FRUS* ，1940，Vol．4，pp．439、678．

(42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09—311页。

(429)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73页。

(430) 国民政府财政部：《中美华锡借款节录》（1947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80页。

(431) 如国民政府文官处1942年1月15日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函、同年6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函，见于《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178、179页。

(432)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3,p．245, World Peace Foundation,Boston,1941。这两笔信贷与下述中美联洲公司飞机价款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433) 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19—223页。中方所欠价款以及息金，最后于1941年1月和3月，经由国民政府售让印度航空公司之飞机价款内清偿毕。

(434) *FRUS* ，1937，Vol．4，p．610．

(435) *FRUS* ，1937，Vol．4，pp．611—612．

(436) 孔祥熙致罗斯福函影印件（1937年7月13日），《罗斯福与1937—1939年的国际事务》（*F．D．Roosevel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7—1939）Vol．2，New York,1979，No．376．

(437)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61．

(438) 《宋子文致孔祥熙电》（1938年1月2日）。宋子文还要求财政部将以往中国银行运英现银项下拨出3300万元，用中国银行名义交存英国银行或其他银行，作为获得美国借款的准备。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2。

(439) 参见1938年2月至7月王正廷与孔祥熙的往来电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23—224页。

(440)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80．

(441) 参见《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1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04。原电如下："孔院长：密电计达。币制问题，经再与财部要员商洽，称美方协助须国会通过，如动用汇兑基金情形复杂，势难办到，且该问题关系英国最大，美国甚小。应由英国协助云，特闻。辉真。"

(442) 《孔祥熙致美国国务院电》（1939年7月18日），*FRUC* ,1939，Vol．3，p．684．

(443) 《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7月3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53—254页。

(444) 《杭立武致蒋介石呈文》（1940年4月18日、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329—330页。

(4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1页。美国方面公布该电文的译文时，记为1940年5月17日，见于*FRUS* ,1940,Vol．4, pp．656—657．

(44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7页。

(447)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pp．180—181．

(448) *FRUS* ，1940，Vol．4，p．691．

(449) *Morgenthau Diary* ,China,p．243．

(450) *Morgenthau Diary* ,China,pp．300—301．

(451) *Morgenthau Diary* ,China,p．303，pp．310—32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87页。

(452) *Morgenthau Diary* ,China,p．386、39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307—308页。

(453)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182．

(454) 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6日："本日对美大使说话，痛诋其财政部不肯以平准基金整数交付之小器行为。"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55) 该协定全文可见于《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三联书店1962年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等资料集。

(456) 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187—1193页。

(457) 《财政部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报告》（194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1页。

(458) 分别见于1941年4月5日《胡适致蒋介石电、宋子文致蒋介石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308、311页。

(459) *FRUS* ,1941，Vol．5，pp．633—634．

(460) 《新华日报》1941年6月15日。

(461) *FRUS* ,1941，Vol．5，P．723．

(462) 1941年8月16日，上海每1元法币的黑市汇价为$2\frac{27}{32}$便士，以及$4\frac{3}{4}$美分，*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198．

(463)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p．201—202．此前的售汇情况为：自1938年6月到1939年4月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成立，由中国银行出面净售汇600万美元；财政部自1938年6月起的一年里，向市面投入600万美元；中英平准基金会自1939年4月10日到1941年8月18日净售汇3400万美元。三方面共计净投入4600万美元，平均每月投入120万美元。另据《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二卷第1414页载，该时期平准基金会售汇额为美金1570万元、英金211万镑。

(464) 重庆《扫荡报》，1941年11月15日。

(465) 《冀朝鼎致钱币司司长杨庆春函》（1944年2月22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74页。

(466) 根据美国财政部档案中世界贸易公司至1939年底的购货清单，以

及缅甸海关统计单，引自*Morgenthau Dairies* ，China,pp．49—51,90—91．

(467)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7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40页。1940年6月15日，俞大维在重庆面交宋子文这份物单，包括7.9毫米轻机枪10000挺，价额250万美元；7.9毫米子弹3亿发，价额750万美元；7.9毫米步枪、37毫米战车防御炮、75毫米山炮，共1000万美元；兵工厂设备及物资1000万美元。见于T．V．Soong Collection,Box 65—13，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68) *Morgenthau Dairies* ，China,pp．178—179．

(469)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Office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Washington,D．C．,1953．p．11．

(470) *FRUS* ,1941,Vol．5,p．652．

(471)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3,pp．712—713．

(472) *FRUS* ,1941,Vol．5,pp．652—653．

(473)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第41页。

(474) 宋子文：《租借部分报告》，第7—9页，T．V．Soong Collection,Box 56—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75) 《科克伦等致宋子文函》（1941年4月23日、5月20日），《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129—130页。

(476) 宋子文：《租借部分报告》，第19页，T．V．Soong Collection,Box 56—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另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45—447、620页。

(477)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9页。

(478)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50—451页。

(479)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480) *FRUS* ,1941,Vol．5,pp．635—636；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17，pp．20—2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50—451、459—460页。

(481)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8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63页。

(482)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1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93页。

(483) 《宋子文致罗杰斯》（1941年11月7日、15日），《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61、163页。

(484)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p．350．以后几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数额以及占美国对外租借援助总额中的比例分别为：1942年，1亿美元（1.5%）；1943年，4900万美元（0.4%）；1944年，5300万美元（0.4%）；1945年，11.07亿美元（8.0%）。1945年的11.07亿美元中，抗战结束前拨付5.5亿美元。

(485)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33页；《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1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1。

(486) 《蒋介石致居里函》（1941年1月31日），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87) 《詹森致国务卿电》（1941年2月28日），*FRUS* ，1941,Vol．5，pp．602—603．

(488) 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所刊载的蒋介石与居里的会谈记录就达11次，会谈日期分别是：2月8日、10日、15日（2次）、16日、17日、22日、23日（2次）、26日（2次）。胡佛研究所居里档案第4盒中的英文会谈记录则为14次，分别为：2月7日、8日、10日、15日、16日（2次）、17日、21日、22日、23日（2次）、24日、25日、26日。居里回到美国后，于3月19日把与蒋介石的14次会谈以及与周恩来的1次会谈记录，均送交罗斯福总统。

(489) 《詹森致国务卿电》（1941年2月28日），*FRUS* ，1941,Vol．5，pp．602—603．

(490)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

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35页。

(491)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42—543页。

(492)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46—547页。

(4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98年2月版，第503页。

(494) 《居里致罗斯福的报告》（1941年3月15日），*FRUS*，1941,Vol．4，pp．81—86．

(495)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51—552页。

(496) 《蒋介石致宋子文函》（1941年2月27日），T．V．Soong Collection，Box 61—10,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97)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62—563页。

(498)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67—570页。

(499)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85—589页。

(50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3月2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1。

(501) *FRUS*，1941,Vol．4，pp．94—95．

(502) 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03)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79页。

(504) *FRUS*，1941,Vol．5，p．65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26—728页。

(505) 《居里致SEGAS电》（1941年6月9日）、《居里致蒋介石函》（1941年6月25日），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06)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7月3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6。

(507)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8月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8。

(508)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7月2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6。

(509) 《蒋介石与拉铁摩尔会谈纪录》（1941年7月31日）、拉铁摩尔致蒋介石函（1941年8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30—734页。

(510)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8月4日），*FRUS*，1941,Vol．4，p．362．

(51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34—736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文件第17—19。

(512) 《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2月8日、12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6。

(513) 《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2月28日、1942年1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36—738页。

(514) 《蒋介石对宋子文1941年6月3日的批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26页。

(515)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7月3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美外交，053—6。

(516) 《拉铁摩尔致居里》（1941年11月11日），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17) 《赫尔致罗斯福备忘录》（1941年5月21日），*FRUS*，1941,Vol．5，p．648．

(518) *FRUS*，1941,Vol．5，p．716．

(519) 拉铁摩尔致蒋介石新疆问题节略（1941年8月28日）、外蒙古问题节略（1941年9月）、东北问题节略（1941年9月9日）、最近将来解决东北问题方案（1941年12月2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文件14、15、16、20。

(520) 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1月2日），*FRUS*，1941,Vol．5，

p．747．

(521)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522) 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文件21。

(523)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56—157页。

(524) 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文件23。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陈启天回忆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国史馆”藏，台北

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蒋中正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居里档案（Lauclin Currie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民国二十八年全年工作报告扼要，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日本外交档案，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东京

上海市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

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

宋子文档案（T. V. Soong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汪伪（组织）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伪上海市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杨格档案（Arthur N. Young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张嘉璈档案（Chang Kia—ngau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中央委员会谈话会纪录（民国二十九年度），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中文著作

《1930年代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

《八路军》，岳思平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

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百团大战史料》，何理、王瑞泉、刘威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陈立夫著，卜大中译，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

《财政年鉴》（续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长沙三次会战》，容鉴光著，台北“国史馆”，1990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陈毅军事文选》，《陈毅传》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张守广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周惠民著，台北，三民书局，1995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李惠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东江纵队史》，《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东江纵队史料》，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革命文献》第106辑，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6

《顾维钧回忆录》第3、4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国共关系70年纪实》，黄修荣编，重庆出版社，1994

《国民参政会纪实》，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5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7

《国民参政会史料》，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2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198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4部第2、3册，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5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洪朝辉编校，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

《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李嘉谷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河内汪案始末》，陈恭澍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华北治安战》，［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8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美］柯伟林，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册，台北“国史馆”，2010

《金城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今井武夫回忆录》，［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抗日御侮》第5卷，蒋纬国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5—199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重庆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编，重庆出版社，1988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唐润明主编，重庆市档案馆，2005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何思�globe编，台北“国史馆”，1994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粮政史料》，朱汇森主编，台北“国史馆”，1989

《刘少奇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方庆秋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11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南京保卫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7册，张宪文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出版地不详，1946

《七七事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潜流与点滴》，陶希圣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侵略与自卫》，曹振威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日］依田熹家著，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黄美真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邢汉三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

《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王良卿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四联总处史料》，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吴景平、林孝庭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陈立文著，台北“国史馆”，1991

《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吴景平、郭岱君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英］田伯烈，杨明译，汉口，正中书局，1938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

《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汪精卫骂汪兆铭》，徐达人编，岭南出版社，1939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第4辑，祝小明编，岭南出版社，1940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蔡德金、李惠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

《汪伪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汪伪政权全史》，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伪廷幽影录》，黄美真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63

《我们的檄书》，钱俊瑞等著，集纳出版社，1940

《武汉抗战史》，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西北中苏航线的经营》，简笙簧著，台北“国史馆”，1984

《新四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新四军战史》，《新四军战史》编委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

《徐州会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徐州会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

《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马振犊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陈仁霞著，北京，三联书店，2003

《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11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986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南京、重庆，出版时间不详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时期），陈诗启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王建朗、曾景忠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林代昭、陈有和、王汉昌编，重庆出版社，1988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朱建华、宋春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如瑰、黄玉章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张军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1927—199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田淇

之、齐福霖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3

《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著，杨志信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卜明主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中国战时交通史》，龚学遂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公路史》，周一士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交通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1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中华民国史》，张宪文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41册，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1941），台北“国史馆”，1987—1993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1988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罗焕章、支绍曾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4、5、6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95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国史馆”，1984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刘武生、杜宏奇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1998

《周佛海日记全编》，蔡德金编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4

中文报纸

《大公报》，天津、上海、重庆、香港

《南京新报》，南京

《清乡日报》，南京

《清乡新报》，南京

《扫荡报》，重庆

《申报》，上海

《实报》，北京

《新华日报》，重庆

《新民报》，重庆、成都

《新民会报》，北京

《新蜀报》，重庆

《中华日报》，南京

《中央日报》，南京、武汉、重庆中文期刊

《档案史料与研究》，重庆

《东方杂志》，上海、重庆

《国民政府公报》，南京、武汉、重庆

《国闻周报》，上海

《建国教育》，重庆

《江苏教育》，南京

《交通公报》，重庆

《解放》，延安

《解放日报》，延安

《近代史研究》，北京

《近代中国》，台北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历史档案》，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民力》，汉口

《时代文选》，上海

《绥靖公报》，南京

《文汇年刊》，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兴建月刊》，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

《政治月刊》，南京

《中日文化月刊》，南京

《中央银行月报》，上海

日文档案文献

《关于卢沟桥事件之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藏地不详，1970

日文著作

《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西义显著，东京文献社，1962

《汉奸裁判史》，益井康一著，みすず 书房，1977

《近卫内阁》，风见章著，日本出版株式会社，1951

《满洲国现势》，“满洲国”通讯社编，1941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外务省编，原书房，1969

《日中15年战争》，黑羽清隆著，日本教育社，1979

《日中战争内幕记》，冈田酉次著，日本经济新报社，1975

《日中战争史》，秦郁彦著，原书房，1972

《日中战争史料》，洞富雄编著，河出书房新社，1973

《上海恐怖机关—76号》，晴气庆胤著，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

《上海时代》，松本重治著，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

《石原莞尔之悲剧》，今冈丰著，东京芙蓉书房，1981

《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朝日新闻社，1963

《维新政府之现况》，维新政府宣传局编，1939

《现代史资料》7—9、11，みすず 书房，1964—1972

《扬子江还在流》，犬养健著，文艺春秋社，1960

《西园寺公爵与政局》，原田熊雄著，岩波书店，1967

《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堀场一雄著，原书房，1973

《支那事变关系公表集》，外务省情报部编，1937

《昭和之动乱》，重光葵著，中央公论社，1952

英文著作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World Peace Foundation, Boston,1941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2—3, London，1955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 Series D,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9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Dacapo Press, New York, 1974

Clifford, Nicholas R. *Retreat from China* , Da capo Press, New York, 1976

Romanus, Charles F. and Sunderland, Riley.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Office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Washington,D.C.,1953

Young, 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thusetts, 1963

英文报刊

F.D.Roosevel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937—1939, Vol.2, New York,19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1941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部规秀

阿部信行

阿德霍尔德（Aderholdt）

阿鲁福（D. Wolf亦译作沃尔夫）

阿纳德（Arnade）

阿南惟畿

艾　登（Robert Anthony Eden）

爱司加拉（Jean Escarra）

安迈斯

安藤纪三郎

奥　特（Eugen Ott）

奥田新九郎

B

巴勒特

拔也夫（Баев ）

白崇禧

白尔瑞（Berger亦译作伯奇、白奇）

班禅九世

阪谷希一

坂本顺

板　塚

板垣征四郎

包　尔（Max Bauer）

包　兹（Bautz）

包姆巴赫（Baumbach）

鲍格莫洛夫（Д.В.Богомолов ）

鲍文樾

贝　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

贝德斯（Miner Searle Bates）

贝特兰（James Bertram）

贝祖诒

本哈特（Bernhardt）

本间雅晴

本庄繁

毕范理（Harry B. Price）

毕格尔（Boegel）

庇尔生（W.L.W.L.Pierson亦译作庇耳生）

裨德本（Prideaux Brune）

波洽德（Borchardt）

伯　尔（Pohle）

伯迪恩（Boddien）

勃鲁姆（Blum, Leon）

博　德

博　古

薄一波

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亦译作白龙培）

布伦德尔（Brundel）

C

蔡炳炎

蔡洪田

藏　卓

曹福林

岑德广

长　川

长谷川清

长谷川幸造

朝香宫鸠彦王

陈　诚

陈　赓

陈　介

陈　立

陈　群

陈　行

陈　毅

陈　云

陈安宝

陈璧君

陈布雷

陈长捷

陈春圃

陈调元

陈公博

陈恭澍

陈光甫

陈果夫

陈翰生

陈济棠

陈嘉庚

陈锦涛

陈立夫

陈乃石

陈栖霞

陈其光

陈少敏

陈绍宽

陈绍禹

陈维城

陈文杞

陈锡联

陈耀祖

陈友仁

陈中孚

陈中坚

成吉思汗

程　潜

程思远

程天放

程锡庚

重光葵

重藤千秋

褚辅成

褚民谊

川崎进

川越茂

崔可夫（В.И.Чуйков ）

D

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

大城户

大山勇夫

戴　笠

戴传贤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沛礼（Emile Despres）

德　古（Jean Decoux）

德　尼（Denys）

德　王（德穆楚克栋鲁普）

德来诺（Frederic A.Delano）

邓飞黄

邓汉祥

邓锡侯

邓小平

邓颖超

邓子恢

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

狄林斯豪芬（Von Schmeling-Diringshofen）

迪鲁瓦·呼图克图

丁默邨

丁惟汾

东久迩宫稔彦王

东史郎

东条英机

董　康

董必武

董道宁

董天知

董显光

杜聿明

杜月笙

杜运宇

端木恺

段祺瑞

段锡朋

多田骏

F

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樊仲云

饭田七郎

范予遂

费立浦（Frederick Phillips又译斐律普、裴律普）

费舍尔（Martin Fischer亦译作飞师尔）

冯白驹

冯文彬

冯玉祥

冯治刚

冯治安

冯仲云

佛　德

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 ）

符荣鼎

符振中

福克斯（Manual A. Fox）

傅秉常

傅鸿恩

傅斯年

傅作义

G

甘介侯

冈本季正

冈村宁次

冈泷雄

高　斯（Clarence Edward Gauss）

高贵滋

高凌霨

高树勋

高宗武

戈　林（Hermann Goring）

戈思默（Henry Cosme亦译作高思默）

格莱尔

格兰朋（Vandeleur Grayburn）

格立芬（D.B. Griffin）

格桑泽仁

根本博

宫崎贞雄

古庄干郎

谷川清

谷寿夫

谷正鼎

谷正纲

谷正伦

谷正之

顾孟馀

顾维钧

顾翊群

顾祝同

关麟徵

关向应

广田弘毅

桂永清

郭秉文

郭述申

郭泰祺

郭相堂

郭英夫

H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

海恩利希（Heinrich）

海因利希斯（Heinrichs）

韩德勤

韩复榘

杭立武

郝梦龄

何　键

何成濬

何基沣

何香凝

何应钦

和知鹰二

贺　龙

贺　武（R.G．Howe）

贺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

贺耀组

贺衷寒

赫　尔（Cordell Hull）

亨　理（Charles A. Henry）

横井忠雄

横泽三郎

胡　适

胡笔江

胡景伊

胡默尔（Humemel）

胡乔木

胡石青

胡愈之

胡兆祥

胡宗南

华莱士（Henry A.Wallaced）

黄克诚

黄梅兴

黄琪翔

黄仁霖

黄绍竑

黄维纲

黄炎培

霍尔巴志（Hall-Patch）

J

及川古志郎

吉冈安直

吉立脱

吉星文

加藤高明

贾米森（Edgar G. Jamieson）

建川美次

江朝宗

江恒源

蒋鼎文

蒋方震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南翔

蒋廷黻

蒋作宾

今井武夫

金　子

金井章次

近卫文麿

靳云鹏

井本雄男

酒井镐次

酒井隆

臼田宽三

居　里（Lauchlin B. Currie）

居　正

崛内干城

K

卡　尔（A.Clark Kerr亦译作寇尔、克尔）

凯特尔（Wilhelm Keitel）

康　泽

科克伦（David Corcoran）

克　兰（Hans Klein）

克莱琪（Robert Craigie）

克鲁马赫（Krummacher）

孔　庚

孔令侃

孔祥熙

堀场一雄

库必克（Kubik）

邝炳舜

L

拉　贝（John H.D.Rabe）

拉　宁

拉代夫斯基（Радевский ）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莱　热（Alexis Leger）

莱布桑夫特（Lebsanft）

赖传珠

赖侍湘

劳　曼（Lohmann）

雷　诺（Paul Reynaud）

冷　欣

冷　遹

冷　云

冷家骥

李　幹

李　璜

李　明

李长江

李公朴

李汉魂

李井泉

李品仙

李圣五

李石曾

李士群

李守信

李维藩

李文田

李仙洲

李先念

李延平

李养之

李永新

李兆麟

李振球

李振亚

李志云

李中襄

李滋罗斯（Fredrick W.Leith-Ross）

李子峰

李宗仁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

鲤登行一

梁　广

梁伯雄

梁定苑

梁鸿钧

梁鸿志

梁鉴堂

梁上栋

梁漱溟

梁希贤

廖　磊

廖承志

林　彪

林　平

林　森

林　蔚

林柏生

林伯渠

林德曼（Lindemann）

林耕宇

林锵云

林铣十郎

林翼中

林祖涵

刘　复

刘　湘

刘　振

刘　峙

刘百闵

刘伯承

刘蘅静

刘家骐

刘漫天

刘培绪

刘汝明

刘尚志

刘少奇

刘叔模

刘文岛

刘仰山

刘雨卿

刘郁芬

柳川平助

柳亚子

柳泽藏之助

龙　云

卢　英

卢干滋（Ivan Lugants Orelsky）

卢仁灿

卢伟良

卢作孚

鲁希维（Voigt-Ruschenweyh）

鹿钟麟

吕　均

吕超然

吕正操

罗　夏（Rochat）

罗　贤

罗炳辉

罗范群

罗福德（L.H.Lawford）

罗家伦

罗杰士（Cyril Rogers）

罗隆基

罗荣桓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文幹

罗西恩（Lothian）

罗卓英

M

马　丹（Martin）

马　丁（Martin）

马　虎

马　良

马　亮

马　约（Meyer）

马白山

马本斋

马格鲁德（Magruder, John）

马君武

马立山

马木提

马奈木敬信

马啸天

麦根逊（Hans Georg Von Mackensen）

毛庆祥

毛泽东

茅子明

茂　莱

梅津美治郎

梅乐和（F. Maze）

梅思平

梅维亮（W.R. Myers）

孟戴尔（Geoger Mandel）

米高扬

米内光政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

莫德宏

莫德惠

莫洛托夫

牟田口廉也

木　岛

N

那齐亚（Paul Emile Naggiar）

纳维格（Newiger）

倪志亮

聂荣臻

牛赖特（Constantin Baron Von Neurath）

诺尔特（Nolte）

O

欧　初

欧迪南（Audinet亦译作奥迪内、奥丁勒）

P

潘公展

潘新友

潘毓桂

庞炳勋

彭　善

彭德怀

彭固尔

彭学沛

彭雪枫

彭泽民

平生釟三郎

平沼骐一郎

蒲立德（W.C. Pullitt）

濮雷森

溥　仪

Q

齐　峻

齐燮元

前岛升

钱昌照

钱大钧

钱端升

钱永铭

乔辅三

桥本群

秦邦宪

秦德纯

秦启荣

覃　威

清浦奎吾

清水董三

清水喜代美

晴气庆胤

琼　斯（Jesse Jones）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堀内谦介

犬养健

R

热振活佛

任弼时

任鸿隽

任嗣达

任援道

日高信六郎

若槻礼次郎

S

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森泽克（Senczek）

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杉山元

商　震

上官云相

邵力子

沈德燮

沈鸿烈

沈钧儒

盛世才

施静庵

施太修斯（Streccius）

石　觉

石田道一

石友三

石原莞尔

史　良

史达开（Starke）

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

史恩华

史密斯（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

史脱茨纳（Stolzner）

舒尔茨（Scholz）

司徒非

司徒美堂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

斯坦因（Baron Von Stein）

斯特纳斯（Stennes）

松本重治

松冈洋右

松井久太郎

松井石根

宋肯堂

宋美龄

宋庆龄

宋时轮

宋希濂

宋哲元

宋子文

苏德成

苏体仁

苏锡文

粟　裕

孙　科

孙　震

孙连仲

孙良诚

孙桐萱

孙元良

孙中山

T

郜一之

谭伯羽

谭桂明

谭平山

谭震林

汤恩伯

汤尔和

唐惠民

唐少良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寿民

陶百川

陶德曼（Oskar Trautmann）

陶孟和

陶希圣

陶行知

田伯烈

田代皖一郎

田木石野

畑俊六

佟麟阁

土肥原贤二

妥玛斯（G．Thomas）

W

汪精卫

汪曼云

汪时璟

王　竣

王　平

王　毅

王　震

王伯群

王宠惠

王德泰

王东原

王光宇

王家模

王家桢

王稼祥

王克敏

王冷斋

王铭章

王士杰

王世杰

王天木

王锡焘

王晓籁

王揖唐

王荫泰

王荫武

王宇楣

王云五

王缵绪

王造时

王正廷

王志莘

王子惠

王作尧

韦尔纳（L.Werner）

韦尔斯（Sumner Welles）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采尔（Georg Wetzell）

魏茨泽克（Ernst Von Wizsacker亦译为魏萨克）

魏尔克（Wilck）

魏拯民

魏宗瀚

温世珍

温宗尧

翁国华

翁文灏

吴　带

吴　勤

吴道南

吴鼎昌

吴敬恒　见吴稚晖

吴南轩

吴佩孚

吴四宝

吴贻芳

吴玉章

吴赞周

吴震修

吴志翔

吴稚晖

嶋田太郎

X

西　门（John Simon）

西尾寿造

西义显

西原一策

希特勒（Adolf Hitler）

席德懋

喜多诚一

喜饶嘉措

夏　恭

夏　威

夏楚中

夏　第（L. Chardy）

香月清司

向井敏明

项　英

萧　克

萧劲光

萧同兹

萧振瀛

萧中令

肖　唐（Camille Chautemps）

肖瑞臣

谢　鹤

谢晋元

熊　斌

熊式辉

徐　堪

徐　谟

徐伯园

徐海东

徐庭瑶

徐向前

徐新六

徐永昌

徐源泉

徐祖诒

许阁森（Knatchbull—Hugessen）

许念曾

许孝炎

萱野长知

薛　岳

Y

岩永裕吉

阎锡山

晏　勋

晏阳初

杨　格（Arthur N. Young）

杨　杰

杨　门（William S. Youngman Jr.）

杨爱源

杨成武

杨靖宇

杨揆一

杨毓坤

杨振声

杨仲华

姚振山

姚中英

姚子青

野田岩

叶　钧

叶　蓬

叶　挺

叶　肇

叶楚伧

叶剑英

叶琢堂

一木清直

伊藤芳

殷汝耕

影佐祯昭

有田八郎

于光远

于俊贤

于品卿

于学忠

于右任

于振河

余　均

余汉谋

余家菊

余井塘

余时原

俞大维

俞飞鹏

俞鸿钧

宇垣一成

袁国平

袁守谦

原田熊吉

云端旺楚克（云王）

恽　震

Z

臧式毅

泽田茂

曾　庚

曾　琦

曾　生

曾凤岐

曾养甫

曾仲鸣

詹　森（Nelson T. Johnson）

张　冲

张　浩

张　继

张　澜

张　鲁

张　群

张伯苓

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

张炽章

张道藩

张鼎丞

张发奎

张洪元

张季鸾

张嘉璈

张嘉森

张君劢

张岚峰

张厉生

张培甫

张申府

张寿筱

张文彬

张闻天

张奚若

张燕卿

张耀曾

张一麐

张荫梧

张友渔

张云逸

张允荣

张治中

张自忠

章伯钧

章乃器

章士钊

章正范

赵　琪

赵登禹

赵尔乐

赵尚志

赵温先

赵毓松

赵尊岳

郑　莱

郑大章

郑廷珍

郑孝胥

郑震宇

植田谦吉

中村丰一

中岛利男

钟　毅

周　昆

周　览

周　元

周保中

周炳琳

周伯明

周恩来

周佛海

周化人

周建平

周隆庠

周履安

周佩箴

周士第

周至柔

周钟岳

周子昆

朱　德

朱　深

朱　岳

朱福星

朱怀冰

朱家骅

朱理治

朱绍良

朱学范

诸青来

庄　田

卓特巴扎普

邹　琳

邹泉逊

邹韬奋

左　权

左舜生

佐世保

佐藤三郎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十卷
(1941—1945)

石源华 金光耀 石建国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十卷

（1941-1945）

石源华　金光耀　石建国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内容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迄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共计三年九个月时间。主要叙述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状况。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中国独力坚持抗战多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卓越贡献，开创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时代。本卷详尽叙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际环境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国民政府施展的“大国外交”。

在英、美、荷等国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的胜利，激励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先后得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和《莫斯科四国宣言》，跻身“四强”行列。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参加“国联”为标志的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出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参加美、英、中开罗会议，确定中国收复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失地，取得朝鲜战后获取独立的法律保证。随即，中国又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成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字国，奠定了中国的联合国始创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由此获得提升。

中国近百年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美、中英新约及其后一系列平等新约的签署，虽然仍遗留若干不足之处，但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中国

与世界各大国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改观，对于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表现在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印度、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有力的援助，并且派军队两次出国，远征缅甸作战，重振中国军威，使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得到提升。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也表现出与前不同的特点，本卷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方面叙述了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斗争，尤注重于论述大陆学术界以前论述不足的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再现了中国军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伟场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盼来了长久期待中的国际格局变化，受到美、英、荷等国对日参战的影响，国民政府基于与美、英合作作战、推进对日战争进程的战略构想，在局部地区发起攻势作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出现了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趋向。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都体现了正面战场积极的对日攻势作战，取得了重要的战役成果，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有利于同盟国的重要变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一步深入，国民政府所主张的“先亚后欧”战略与英、美等国坚持的“先欧后亚”战略发生对立与冲突，英、美在亚洲战场的消极应对，使国民政府不愿也无法推行拟议中与英、美联合的攻势作战，消极防御又重新占居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主导地位。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一号作战”，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国民政府被动应战，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湘柳会战中，虽在局部有很顽强的抵抗，但在全局上接连败退，导致河南、湖南、广西以及广东、福建

等海岸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衡阳等七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为日军占领，日本军队基本上实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和摧毁美军驻华空军基地的战役目标。1944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并于次年初相继发起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收复广西战役等局部战略反攻作战，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根据盟军的统一作战部署，两次远征缅甸战场，重振军威于海外。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虽以失利告终，但远征军浴血奋战，拼死杀敌，曾予敌以沉重打击，尤其是在同古、仁安羌等地的出色战绩为中国军队赢得了盟国的尊敬和赞扬，也显示了中国与盟国协同作战的诚意和决心。1944年底，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重创的中国军队，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十几万青年加入中国军队，投身抗日战场。在此前后，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分别发起缅北和滇西反攻作战，1945年3月，两军胜利会师，不仅打通了中印公路并改善了驼峰空运线，使大批美国援华物资得以运往中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而且有力地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日军“建设大东亚兵站基地”的需求，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存在和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部队的壮大及其对日军占领区的严重威胁，日军决定将其军事进攻重点移向解放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在华北各解放区出现以反对日军“治安强化运动”为主要目的的反“扫荡”斗争，在华中各解放区则出现了以反对日伪“清乡”为主要目的的反“扫荡”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对日斗争，至1943年底，各解放区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1944年下半年，各解放区开展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军事占领的局部反攻作战。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不仅牵制了绝大部分侵华日伪军，而且从地域上形成了对于

日军占领区的战略大包围，为日后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和条件。

本卷对于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的叙述，分别以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沦陷区为对象展开，清楚地阐明了三个不同区域面临的问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对于国统区，本卷主要论述了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中央体制的强化，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于蒋氏一人之手，这既是战时发挥国民党统治效能的需要，也是蒋介石追求独裁统治的结果。国民政府推行的“行政三联制”和新县制，则是国民政府在战时推行的最重要的行政改革措施，是其强化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措施，在战时具有更广泛动员人力、财力、物力来支持日益艰难的抗战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这种制度建设是以加强国民党集权统治为前提和目的，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国统区的社会经济是本卷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战争和民生的双重巨大压力下，国民政府实施了以“统制经济”为主要特点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增开新税、田赋征实、统购统销、专卖制度、限价议价、举借内外债、发行“特券”等。这些政策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打败侵略者的中华民族利益，对于保证进行战争所必要的物资供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导致国家垄断资本在金融业、工矿业、商业等领域的扩展与独占，导致国统区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和破产，以及国民经济的危机。

国统区的文化事业，也以国民党确立在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该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查禁了不少亲日亲法西斯的汉奸文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也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造成国统区文化局面的沉闷。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则可圈可点之处较多。国民政府积极主导和扶助了全国高校的三

次“内迁”高潮，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值得记述的一页，不仅保存了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力量，免遭日本侵略者摧残，而且将现代教育制度引入欠发达的大西南地区，直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与进步，为抗战事业及后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敌后解放区，本卷详细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的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共领导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确认识与处理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确定了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是中共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不仅帮助中共渡过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而且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是中共政党建设史上的创举，提供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经验。在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虽在当时比较迅速地得到了纠正，却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得到认真的清算，没有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以致在以后中共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成为中共发展历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在解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权建设，内容包括“三三制”政权、普选制与参议会、“精兵简政”、少数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在经济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实践并大大丰富了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1949年中共在全国执政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对于沦陷区，本卷引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分关内地区和东北地区进行了叙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汪伪政权间的关系经历了复杂

的变化过程。本卷着重剖析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后，被迫提出“对华新政策”，并对日汪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内容涉及日本占领军“强化”汪伪政权，同意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向汪伪政权“交还”租界与“放弃”在华特权，允诺汪伪政权“接收”英、美等国在华租界、租借地以及特权，签署“日汪同盟条约”，扶助汪伪政权“统一”沦陷区的部分治权等。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既反映了日本法西斯推行“确定不变国策”的顽固和狂妄，又暴露了其为了挽救危局而不得不依赖中国占领区和走向穷途末日的虚弱。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尤其是汪伪政府“参战”后，日本侵略者又迫使汪政权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部纳入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大大增强了该政权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色彩，内容涉及高度集权的战时政治体制、伪和平军的扩建与整编、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以新国民运动”为中心的战时文化体制等。日本侵略者以“大东亚圣战”为旗帜，以“黄色人种革命”为诱惑，对于中国关内地区沦陷区的统治和控制更加强化，汪伪政权的傀儡政权色彩更加鲜明，沦陷区人民也遭受了更加残暴的殖民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东北沦陷区的统治，也表现出“临战体制”的新特点：在政治上，日本关东军直接操纵指挥伪满洲国建立“临战体制”，一是协助日军防备苏联的进攻；二是尽力搜括战略物资，将东北建设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其对东北人民的摧残更加残暴，除残酷压迫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外，甚至出现了遍布东北各地的矫正辅导院、长城一线南北侧的“无人区”，以及活人细菌战试验等极端的反人道暴行。在经济上，日本关东军操纵伪满洲国实施战时紧急经济方策，疯狂掠夺战略物资，以满足日本进行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内容涉及扩建军工设备、强化战略物资统制、“杀鸡取卵”式破坏东北资源、实施“金属回收强化运动”、继续向东北输送日韩移民、严格实施粮油配给制、扩大鸦片种植、强制征集和奴役劳工等。在思想上，日本关东军以“协和会”为日本法西斯在东

北实施思想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最主要团体，开展“兴亚思想战”，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显扬“惟神之道”，奠定日满“建国”基础；以日本为中心构筑各民族间所谓“协和”关系；确立国民动员体制，充实伪满的战时国民总力；推行战时奴化教育，适应“决战体制之确立”等。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东北沦陷区的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推进和日本法西斯败局的明朗化，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间的矛盾逐步上升，本卷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抗日战争后期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势力围绕着战后中国之命运与前途开展的较量与斗争。蒋介石撰写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战后中国政治前景作出了不同的设计，大后方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及民主宪政运动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国共两大政党对于未来中国蓝图的不同描绘，以及两党围绕着抗战方针与中国前途的多轮谈判，而且推动了中间势力的产生和成长，以及中间道路主张的提出。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大”和5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大”，分别对各自的政治主张作了历史的总结，中国国民党“六大”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确定了继续实施“一党专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七大”则赋予“联合政府”的口号以新的内涵，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纲领。

本卷最后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载入史册及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和意义。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任何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其在战胜日本法西斯中所起作用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中国抗日战争也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不仅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门之外，将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收归版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民族耻辱，而且以以弱胜强的成功典

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大大推动了世界尤其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国际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实现民族觉醒和国家重振的历史良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理性爱国民族主义始终高涨，其呼声之高，传播之广，民众发动之普遍，同仇敌忾精神之旺盛，使20世纪中国理性爱国的民族主义达于新的高度。中华民族由此而得以重新振起，出现了伟大的转折。

本卷共九章，写作分工如下：全书纲目由石源华、金光耀共同拟定；石源华负责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八章，第九章；金光耀负责撰写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石建国负责撰写第三章。本卷的编写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历经多年，完成交稿亦有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对于交稿后公布及出版的不少关于抗日战争的新史料和新成果未及利用，颇为遗憾，或可待今后再版时再行增补。

本卷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历任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汪朝光研究员从本书纲目的确定到全书审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一桥大学图书馆、立教大学法学部图书馆等机构，为作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本书关于汪伪政权部分内容，参考了石源华参加的课题组余子道、黄美真、张云、刘其奎、曹振威等人的集体研究成果。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者

2010年12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一节　加盟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二　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
　　三　中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战区成立
　　四　争取美、英加强援华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　中英战前磋商
　　二　中国远征军组成与入缅
　　三　中日滇缅血战
　　四　中国远征军撤出缅甸
　第三节　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一　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
　　二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
　　三　援助越南独立运动
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军事战略
　　一　受制于“南进”的日本对华战略
　　二　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战略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一　第三次长沙会战
　　二　浙赣会战
　　三　鄂西会战
　　四　常德会战
　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

一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二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三　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第三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统区
第一节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强化
一　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的中央体制
二　国民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实行“行政三联制”
三　推行新县制，强化统治地位
四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第二节　国统区的社会经济
一　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
二　国家资本的发展
三　巨额赤字与通货膨胀
四　抗战后期的民营工商业
五　抗战后期的农村经济
第三节　国统区的文化教育
一　国民政府加强文化控制
二　传统思想的复活运动
三　国统区的教育事业
四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一　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二　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
三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四　加强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
第二节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一　“三三制”政权
二　普选制与参议会
三　“精兵简政”

四　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
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一　减租减息运动
二　大生产运动
三　知识分子与文化教育事业
第四节　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
二　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
三　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
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
第一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日汪关系调整
一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提出
二　汪政府对英、美宣战
三　日本“交还”租界与“放弃”特权
四　“日汪同盟条约”的签署
五　汪政府“统一”沦陷区的活动
第二节　汪政府战时体制的确立
一　高度集权的战时政治体制
二　“和平军”的扩建与整编
三　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
四　以“新国民运动”为中心的战时文化体制
第三节　东北沦陷区殖民地的深化
一　“临战体制”下的残暴统治
二　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
三　协和会的战时活动与思想统治
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
第一节　中美、中英改订新约
一　国民政府的废约努力
二　中美新约的签署
三　中英新约的签署

第二节　中美的合作与冲突
一　中美高层互访的加强
二　“迪克西使团”
三　史迪威事件
四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第三节　中英关系的波折
一　中英远东战略的分歧与争论
二　中英战时交涉的主要问题
三　中英访问团的互访
第四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缔约
一　中苏关系的恶化
二　雅尔塔密约的签署
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
第五节　中国参与战后国际政治的安排
一　中国签署莫斯科四国宣言
二　开罗会议与《开罗宣言》
三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四　旧金山会议与联合国成立
第七章　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豫湘桂战役
一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二　豫中会战
三　长衡会战
四　桂柳会战
第二节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攻势作战
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二　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
三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
第三节　正面战场的局部反攻
一　正面战场敌我战略部署

二　豫西鄂北会战
三　湘西会战
四　收复广西战役
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一节　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一　“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建立
二　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三　国统区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
第二节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共两党谈判
一　1942年—1943年的两党谈判
二　1944年的两党谈判
三　围绕着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谈判
第三节　中国各党派的战后政治设计
一　国民党“六大”与其设计的战后政治构架
二　中共“七大”与“联合政府”的新内涵
三　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
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国民政府结束战争的准备
一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
二　接纳汪政府要员的“输诚”
三　收复台湾的准备
四　收复东北的准备
五　战后处置日本的准备
六　加强援朝独立的力度
七　确定战后对法越政策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战争后期日本对华“谋和”的失败
二　日本无条件投降
三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一节　加盟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1941年12月7日凌晨（中国时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指挥下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猝不及防，在这被罗斯福总统称之为“永世遗羞之日”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性损失。当天，日本还向美国、英国、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军事基地发起猛烈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北进即以苏联为进攻目标和南进即以英、美为进攻目标的抉择上曾长期举棋不定。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在西欧的席卷之势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南进论逐渐在日本决策层占据上风。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大举进攻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南进政策。10月16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组成新的内阁。11月1日，东条在新内阁与大本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对国策提出三种方案：1．“不开战，卧薪尝胆”；2．“立即决定开战，以战争解决问题”；3．“在决定开战前提下，作战准备与外交谈判同时进行”。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并以12月1日为与美外交谈判最后时刻，到时谈判不成功即向美、英等国开战。11月5日，由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决定[(1)]。

从1941年4月中旬开始的美日谈判由此进入了最后关头。日本政府在决定对美开战的前提下，拟出对美交涉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案提出，在日中和平实现后，日本在一定期间内（大致以二十五年为期）在华北、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岛驻扎军队，其余日军在两年内撤退。乙案则搁置美日谈判中分歧最大的中国问题，但提出美国不得干扰日中实现和平的努力[(2)]。日本政府计划先向美国提出甲案，如不成再提出乙案，以谋求暂时的妥协。11月7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将甲案正式递交美国政府，并表示这是日本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但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野村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11月20日，野村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乙案。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得到日本的乙案后认为，如果美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由于此时美国已破译出日本政府给野村的电报，知道日本准备开战的企图，因此为了推迟美日之战的爆发，再争取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得不决定对日本的乙案作出回应，以某些退让达成临时性妥协。11月22日，赫尔向中国及英、澳、荷四国驻美大使通报美日交涉情况，表示美国拟实行一项放松对日经济封锁以换取日本停止向新方向发起进攻的暂时过渡办法。11月24日，赫尔再次召集四国大使，通报美国已确定八点临时过渡办法，并强调根据美国军方的报告，美军参战尚需两三个月的时间[(3)]。

对美日谈判，中国国民政府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9月中旬，蒋介石表示，“余以为今日之美倭交涉，决无须十分顾虑”，“美倭决无妥协之可能”，“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4)]。但在获悉美国将向日本提出暂时过渡办法以求得妥协后，蒋介石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于11月24日致电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嘱他转告赫尔：“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

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矣。”[5] 与中国一样，英国也反对美国向日本提出的暂时办法，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批评这一妥协将危及中国，从而增加英美的共同危险[6]。

中国和英国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与日本取得暂时妥协的打算。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递交了国务院连夜拟定的《美日协定基础大纲》，即“赫尔备忘录”。该备忘录要求日本不以武力推行国策和侵犯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撤退在中国的军队和警察，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7]。美国政府明白，日本肯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美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向日本递交备忘录的第二天，赫尔告诉美国新闻界，美国公众应该知道当前的危险，日本可能在几天内向东南亚发起新的攻击。11月28日，赫尔在白宫军事会议上表示，美日谈判已不可能取得成果，保卫美国安全的重任已落到海陆军的肩上[8]。

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在谈判中态度“显趋强硬”，断定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日作战。12月1日，日本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对美、英发起进攻，并于次日发出12月7日开战的命令[9]。

蒋介石对成功地制止了美国对日妥协十分高兴，认为“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坚毅，尤在于不稍迁延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俄顷也”[10]。同时，国民政府高层明白美国的这一态度使得美日之战正在迫近[11]。

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早就在苦撑之中期待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蒋介石闻此消息如释重负，视之为中国努力争取美英等国共同反对日本的结果，“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上午8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应对方针。由于期望尽早建立远东反法西斯联盟，与会者大

多主张立即对日、德、意宣战。蒋介石虽认为“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却力主在宣战前先征询美、英、苏三国，尤其要先看苏联对待对日宣战的态度，以留“应付余地”。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没有通过立即对日宣战的决定[12]。会后，蒋介石亲拟文稿，致电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请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我国待美宣战时，亦决与倭正式宣战”，但“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因此中国将“先以此意要求苏联之同意，惟此或可促进苏联决心宣战，故暂待苏联之答复，万一苏联回答不愿对日宣战，则我国亦必随美对日宣战，如罗总统以为我国不必待苏联之态度，应先与日宣战，则可随时照办”。当天下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美、英、苏驻华大使，向他们提交国民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反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对各个轴心国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13]

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他当然不愿放弃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苏联此时正全力对德作战，无意分兵远东，不愿对日宣战。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在与美方紧急磋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罗斯福总统理解苏联不能立即对日宣战的情况，认为“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待苏俄答复”[14]。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9日下午在重庆黄山的寓所再次召集会议。由于美国已经对日宣战，而根据日本刚公布的美日谈判决裂经过，蒋介石又认为美国卷入战争“实为中国”，因此会议决定立即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15]。

12月9日下午7点，国民政府以主席林森名义发表宣战文告：

>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

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公告。

同时，国民政府还宣布对德、意宣战：

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义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义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16)]。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结束了“七七”事变以来中日两国间四年多“战而不宣”的状态，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将促成以美国为首的中、美、英、苏等国军事同盟作为首要目标。蒋介石认为：“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的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17)] 在12月8日给美、英、苏驻华大使的备忘录中，国民政府建议成立有关各国的军事同盟，并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次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召开联合军事会议。12月10日，蒋介石分别约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和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请他们向本国政府转告中国的意见：1．由美国提出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军事行动计

划，并以华盛顿为同盟政治、军事中心点；2．在苏对日宣战前，由华盛顿提出四国在远东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3．四国初步谈判地点为重庆；4．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当天，蒋介石还致电宋子文，请他向美国政府表明中国的态度，并对“中、美、英对日至今尚无具体计划与团结一致之行动”表示担忧[18]。

斯大林于12月12日复电蒋介石，指出“太平洋上之反日阵线”虽是整个反对轴心国集团阵线的一部分，但“抗德阵线具有决定之意义”，所以“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请蒋介石“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英国外相艾登的复电，表示对中国关于缔结正式同盟的建议，“英国政府当予以慎重与同情之考虑”[19]。美国政府对此作出最为积极的反应。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对日采取共同行动是“极端重要的”，建议于12月17日前在重庆召开由中、美、英、荷、苏等国参加的联合军事会议，交换军事情报，研讨在东亚地区共同对日军事计划，美国将派勃兰特将军赴华出席[20]。

接到罗斯福电报后，蒋介石接连数日会见美、英、苏、荷驻华使节或代表，商谈召开重庆联合军事会议事宜。12月17日，蒋介石和何应钦与麦格鲁、戴尼斯和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崔可夫举行会谈，提出中国对会议之设想：一、设立名称为军事代表会议或参谋团的联合作战机构；二、会议地点为重庆；三、由美国代表主持；四、会议任务为建立远东各战区之联系，商定整个太平洋作战计划纲要，决定保卫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具体计划等[21]。12月2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拟定了中国准备向会议提出的联合作战总方略，计划于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及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向日本本岛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22]。这些计划和作战构想显示了国民政府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和联合对日作战的积极态度。

12月22日，参加重庆联合军事会议的美国代表勃兰特和英国代

表、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抵达重庆。苏联和荷兰未派代表。当天下午，蒋介石会见勃兰特和魏菲尔。蒋介石将此次礼节性会面看作联合军事会议的预备会议，提出会议议题应包括讨论反侵略同盟的全盘战略纲要、同盟各国间涉及政治军事的永久中心机构以及中英、中美军事合作等问题。在蒋介石看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对日作战和对德作战联为一体，中、美、英等国间的合作不应“只限于东亚”，而且“不独与军事及战略有关，且亦有政治之意义”。但魏菲尔认为，有关战争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应由各国政府决定，重庆会议应集中于讨论具体的合作事宜，并明确表示：“目前本人所最关切者，实为保卫缅甸问题。”勃兰特也持相似看法[(23)]。由于着眼于建立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重庆军事会议寄予厚望，而英、美与会代表只关注具体事宜，因此中、美、英三国对重庆军事会议的看法出现明显的差异。

12月23日下午4点至次日凌晨，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正式举行。出席者中国方面为蒋介石夫妇、何应钦、徐永昌、商震等，美国方面为勃兰特、麦格鲁等，英国方面为魏菲尔、戴尼斯等。澳大利亚驻华公使爱格斯登亦应邀出席。蒋介石在会上再次提出，“研究太平洋与欧洲之战略”，拟定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计划，以及在华盛顿成立一永久组织以“联系各方之战事行动”是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但魏菲尔、勃兰特仍对此持有异议，勃兰特称，罗斯福“所称之战略当只限于东亚”。于是，会议转而集中于讨论中、美、英三国在远东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

勃兰特首先提出他对远东军事合作的基本构想，其要点为先全力守住缅甸，待力量充实时由守转攻，以空军从缅甸向越南、泰国发起反攻，然后向东向北扩展，直至最后从中国向日本发动空中进攻。蒋介石对此计划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应增加关于支持中国战线的内容。魏菲尔则认为勃兰特的计划“为时似太辽远”，他当时只关注英国在缅甸面临的困境，因此主张所拟计划应着眼于眼前，“务必以一二

月时间限度为标准”。蒋介石当即对此提出反驳，指出：“中、英、美三国今即并肩作战，自需一全盘整个之计划。我人试检过去之行动，大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待事件发生，始仓猝应付以与我共同敌人周旋。此后我人计划，自应着眼于整个战区之防卫，防卫缅甸亦包括在内，如是则不作六个月之计划，必将犯目光短浅之嫌。”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将勃兰特的建议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主要内容为：一、守卫缅甸为当务之急，并与中国继续抗战密切相关，因此应尽现有实力发起空军攻势；二、继续援助中国，支持中国抗战；三、中国军队继续发动对日进攻，牵制日军于中国；四、待实力充实后，中、美、英军队协同发起反攻；五、希望在美国组织的总机构早日实现。会议决定将此计划电告美、英首脑，并在重庆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麦格鲁、戴尼斯组成[24]。

重庆军事会议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间就共同抗日而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它虽因各国意见不一而未就整个远东战略达成协议，但实际上推动了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国民政府对此起了积极的、关键的作用。

三　中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战区成立

重庆军事会议结束次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通报会议情况，建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总机构及制定作战总计划，此为民主阵线之各国对侵略者轴心国有联合一致具体之行动，俾得早日消灭共同公敌之惟一急务”，并指派宋子文为中国出席最高军事会议的总代表[25]。

其实，在这之前两天即12月22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已抵达华盛顿，参加代号叫做“阿卡迪亚”的美英首脑会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首脑间召开过二十多次重要的会议，这是第一次。会议主题是讨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战略及与之相适应的举措。尽管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面临着日本的大举进攻，但会议还是决定根

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间已达成的共识，确定“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将德国看做主要敌人，欧洲看做决定性的战场。会议还决定成立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负责战争的战略指挥、各战场间的协调、作战物资的分配等事务。虽然中国已建议在华盛顿召开盟国间的最高会议和建立联合机构，并指派了已在美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代表，但美、英两国并未邀请宋子文正式与会。

“阿卡迪亚”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是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合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会议一开始，罗斯福就向丘吉尔提出由所有参与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一个联合宣言，并在1942年元旦发表以庆贺新年。随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草拟出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合并为一个文本征求苏联、中国等国的意见。对宣言的内容经过短暂的磋商后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宣言签字国的排列顺序最初是美国、英国、英联邦各自治领，然后才是按字母先后排列的其他国家。按这一原则，中国与苏联都将排在最后一类。12月27日，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提出，“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理由是它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他认为“这样排列极为重要”[(26)]。罗斯福十分赞同这一提议，并在宣言的修改稿中将中国列在美国之后的第二位，然后才是英国和苏联。宣言定稿时又作了修改，最后由罗斯福亲笔排出的签字国顺序是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然后是按字母排列的其他各国。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次日，其他二十二个国家在美国国务院依次签字[(27)]。宣言全文如下：

>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

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共同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具体表现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之共同宣言即通称的大西洋宪章中的目的原则之共同纲领，业经予以赞同。深信为保卫生存、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并保全其本国与其他各国中之人权与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实有必要，并深信各签字国家正从事于对抗企图征服世界之野蛮与残暴的力量之共同斗争。兹特宣言如下：

（一）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三国同盟”成员及其附从国家。

（二）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

凡正在或行将提供物质援助与贡献以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之其他国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 (28)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在签字国中与美、英、苏列前而获得“四强”之一的地位，在百年来屡遭屈辱的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四强”地位的取得，首先是中国军民全面抗战以来四年多浴血奋战从而赢得各国尊敬的结果，同时也与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抗战国际环境的极大改善，蒋介石十分欣喜：“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同时，他对中国的“四强”地位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侵略各国签订共同宣言，我国始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甚恐名不符实，故不胜戒惧也。” (29) 对于罗斯福的支持，蒋介

石后来曾对罗斯福的特使居里说："中国得为四强之一，实得总统（罗斯福）所一手促成，英、苏两国并未作何臂助。此为中国所深切了解而铭感者也。"[30] 美国此举使国民政府此后的外交更为倾向美国。

12月27日，宋子文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赴白宫访晤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告诉宋、胡，美、英拟在华盛顿组织军事会议，并在各战区设立联合指挥部，此后南太平洋局面由中、英、美、荷、澳组织共同机关，协力抗敌。此时罗斯福正设想于重庆成立一个分支机构性质的军事会议。12月29日，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中国战区，这个战区应包括中国、缅甸的东北部以及盟国的部队可能到达的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区域。罗斯福删除了"缅甸东北部"后批准了这一建议[31]。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该战区除中国外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越南）及泰国国境"，由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家军队之责"，并"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在蒋介石"指挥下服务"[32]。

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同意接受中国战区统帅一职："承嘱担任联合国现在与将来在中国战区以及安南、泰国境内联合国家军队可能到达区域一切军队最高统帅之责，深知此项任务，对有关各国及其人民与我中国本身所负责任之重大，就个人能力与资历言，实不敢贸然应命，然念此统帅部成立之后，足使中国战区中联合国间得统一其战略，促进其全盘作战之功效，既经阁下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此建议，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盖诸国军队为共同需要而作有效之合作，实为目前超越一切之急务，幸恃阁下之发动与努力，使此目的与方法之统一，已近成功之境，鄙人不敏，自当为诸联合国之共同福利而执鞭追随也。……竭诚欢迎美、英代表之立即派定，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33]

中国战区的成立和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虽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但在战时的盟国关系中，美、英实际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与同时成立的由美、英等国军队共同组成的东南亚战区不同，中国战区没有美、英的地面作战部队，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因此，中国战区在整个战争期间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单位。对此，蒋介石曾向美国表示不满："拥有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联合参谋会议），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不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会议，益使中国感觉待遇之未得其平"[34]。

1942年1月4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请其向美国政府提出遴选一罗斯福亲信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对该人选的要求是：军阶须在中将以上，但"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者，只要其有品学与热心者可也"[35]。蒋介石为确定参谋长人选的条件是颇下一番苦心的，他不希望请一个了解中国"旧情"而对国民党持轻蔑态度的外国人，他只希望未来的美国参谋长能按照他的意愿"热心"增进中美间的联系，为中国获取足够的援助。

当时，美国军方也正在考虑选派高级将领赴华协同作战。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赴华美军将领的主要任务是带兵作战，促使中国成为尽早对日发起攻势的基地，参谋长马歇尔则认为由于美国尚无法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因此该将领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盟国间的关系，训练、装备中国军队，维持中国军队作战。后一种意见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决定由史迪威赴华任职[36]。

史迪威是当时美军高级将领中最熟悉中国的。1911年他首次来到中国，1920年至1923年在美国驻北京使馆中任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在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中任职，期间马歇尔担任过该团的团长，1935年至1939年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就个人背景而言，史迪威显然并不是蒋介石所期望的美军高级将领，这成为两人日后冲突的根源之一。

1月15日，美国陆军部次长致函宋子文，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派往中国的参谋长人选。1月19日，史汀生与宋子文会晤，说明史迪威将被派往中国，在充任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同时拥有如下权限：一、办理美军援华事宜；二、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自愿交与指挥之中国军队；三、代表美国参加在华之一切国际军事会议；四、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运输事。当天，宋子文将会晤情况致电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接电后，看出美方的打算与自己初衷存在差异，即复电宋子文，要他告诉美方，来华美军将领“其职位须明定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内之参谋部长”，“其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但与美方直接交涉的宋子文认为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答复蒋介石，已复函史汀生，“美高级军官一方面指挥在中国区内之美国军队，一方面兼充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当然均应受统帅命令”[(37)]。

1月29日，宋子文与史汀生互换函件，确认史迪威来华的职责和权限是：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四、滇缅路监督人；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六、中国战区参谋长[(38)]。2月11日，史迪威离美赴任。

四　争取美、英加强援华

全面抗战开始后，争取国际援助就一直是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的重点，而美国和英国则是中国争取援助的主要对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与美、英等国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盟国和抗战国际环境的极大改善，国民政府更是将争取美、英加强对华援助作为开展外交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抗战当时已进入第五个年头，长期的战争使国民政府原本就不强大的经济实力大为下降，财政上左支右绌，已露窘况。根据国民政府的估计，此时物价已涨至抗战前的20%以上，法币发行总额已

达抗战前800%以上，“财政收入渐见减少，收支益无法平衡”，“社会情势与人民心理异常不安”，若无迅速补救措施，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39]。与此同时，美日开战后中国的抗战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具有愈发重要的牵制作用，国民政府遂利用美、英有求于中国的有利时机，要求美、英扩大援华。宋美龄在重庆军事会议上明确告诉美、英两国：“不能希望中国不得援助而可无限继续其抗战。”[40]

国民政府首先向美国提出五亿美元借款的要求。1941年12月29日，蒋介石致电刚出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请其向美国政府提出五亿美元借款，以提高法币信用。次日，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亲自提出这一要求，高斯表示愿促成此事。与在这之前中国向外国借款都以实物或中国权益为担保不同，这次国民政府明确表示，“此次借款手续决非如平常普通之财政借款可比”，“不能有任何担保之条件”，并强调：若无大笔借款接济中国，“则中国人民心理必被动摇，尤其在日本初次胜利之时，敌伪以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之理由，竭力鼓吹与煽惑作用发生影响之时，更不能不有此一借款急速成功以挽救国人心理与提高抗战精神也”。为此，国民政府设想了三种借款方式：一、由美国政府利用平准基金直接提供借款；二、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准许中国政府四银行开立信用透支，由中国政府担保，以维持法币信用；三、由美国政府准中国在美发行美元公债，流通市面，便利吸收华侨资金，并请美国国立金融机构酌购若干，以资提倡。在美国直接经手向美借款的宋子文也认为，“中国经济处非常之状态，应有特殊之办法，非可以常情论”，因此，“此次借款五万万元，等于久战疲劳军队之总预备队可到，调用派遣，当随局势为转移”[41]。

在日本的突然袭击前穷于应付的美国急需中国加强对日作战，因而愿意答应中国的请求。高斯在与蒋介石会谈后，致电国务卿赫尔表示赞同这笔借款，但认为数额不必如此之多，用途也应有所限定。1942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就此进行会商。国务院的官员认为，给中国以大笔财政援助对于鼓舞中国的士气是极为重要的，这

一看法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次日，罗斯福致函财政部长摩根索："关于对华贷款，我明白目前中国不可能提供什么担保。但是，我仍急于帮助蒋介石和他的货币，希望你能找到办法。"罗斯福甚至表示可以不必过于计较贷款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42]。

作为一个贷出国，美国政府尤其是财政部不愿对借款不加任何限制，以免借款会被滥用。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怀特在获悉中国的意向后就向宋子文强调："借款方案，须对中国经济能力有切实有效之补救"，"美国对于中国借款非因数额之巨，有所犹豫，其注重者在中国拟定之方案，是否切实有裨战争"。1月12日，摩根索会见宋子文，首先表示极愿为中国帮忙借款，"总当设法解决成功"，但接着又说，如中国无明确之计划，他就很难向国会启齿，提出中国向美国"借款较好方法莫若借美金为每月直接发给中国士兵饷项之用"。次日，摩根索告诉宋子文，罗斯福总统对他的提议"极为赞同"，表示"美国愿每月担任100万中国军队之军费，官兵平均以每人10元美金计，即1000万元"。在罗斯福看来，以此办法美国就可以得到一支在美国将军指挥下的100万人的中国军队[43]。

担负着争取美援重任的宋子文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对摩根索的这一提议颇为心动，他在1月1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我虽非一次之巨额收入，但每月有此接济，加以贷借案军械之供给，此后我军维持及整顿等问题，大致可以解决，如此事宣布，对国内外之影响，或竟甚于一次借我十万万元。……盖维持军队即所以维持国家民族，军队有办法，其他可以徐图挽救。"而蒋介石从指挥控制军队这一角度考虑，认为摩根索的提议有"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此法可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及社会经济形成对立或脱离关系，而且只有使我国经济、政治与法币之加速崩溃，不惟毫无补益而已；其二，我国今日军事与经济不能分离，而现在经济危急，故致军事不济，若拟增强军事，决非单纯军费之所能解决。"蒋介石更认为，这一办法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坚持这笔借款"不能有任何

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办法”[44]。视军队为命根子的蒋介石，对摩根索提议将产生的后果，显然比宋子文要敏锐，看得也深远些。蒋介石的立场使宋子文改变了原有看法，在此后与美方的交涉中，他坚持美国对华贷款不能附带任何条件，必须是共同作战的盟国间无条件的政治贷款。

中国的强硬立场迫使美国政府作出抉择。1月23日，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亨培克致函国务卿赫尔，从美国、英国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的战局出发，强调尽快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重要性，认为援华贷款与美国整个军备相比，只是一个小数目，但若拖而不决，则将使美国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内失去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强大盟友。亨培克的意见实际上代表了国务院和军方的主导看法，他们都主张，当务之急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指中国人）继续战斗下去”[45]。

1月30日，宋子文访问白宫，当面向罗斯福提出5亿美元借款，并再次强调“不能有任何条件之束缚”。罗斯福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当天下午，罗斯福召集国务卿赫尔和财政部长摩根索，“讨论中国借款，并嘱无论如何须立即成功”，最后决定向国会提出，以立法形式提供贷款[46]。

2月7日，美国国会一致通过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贷款。当天，罗斯福向蒋介石通知这一消息，表示这笔贷款“具征鄙国政府与人民对于贵国之衷心钦仰，并足证明在大战中为自由奋斗之盟友，吾辈皆当以至诚与坚决予以协助”，“鄙人希望并相信，此次美国国会所通过之资金，其用途重要的将在帮助贵国政府与人民之努力，以解除经济与财政之负担”。正在印度访问的蒋介石获悉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美国的借款后十分高兴，致电罗斯福表示“对于借款亦不附带任何条件，甚为欣感”[47]。

此后，中美间围绕达成五亿美元借款的具体协议展开交涉。摩根索虽放弃了最初有条件提供贷款的做法，但仍试图通过协议对这笔款

项的用途加以一定的限制。2月21日，他向宋子文递交了美方关于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草案。该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国应将借款用途通知美国财政部长，征询其意见，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可向中国提供技术上及其他适当之建议[48]。摩根索显然想通过这一条款获得对这笔借款的监督和控制权。3月3日，宋子文致函美国财政部次长培尔，表明了中国对该草案的看法，认为第二条规定“会使自愿的行为变成命令式的”，应予删除。在宋子文的坚持下，美方同意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第二条写道：“为表现中国与美国双方共同作战之合作精神起见，双方政府之适当官员对于此项财政援助所发生之技术问题，将随时互商，并交换关于运用此项资金最有效方法之报告材料与建议。”宋子文认为修改后的条款与原来相比“似较优，可予接受”。但蒋介石却强硬地坚持借款不能附带有任何条件，因此必须完全删除这一条款。尽管许多美国官员包括原先极力主张向华贷款的国务院官员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感到不满，但罗斯福最终还是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3月21日，美方通知宋子文，决定将协议草案的第二条完全删除，但希望中国能单方面发表一个声明，承诺随时将贷款使用情况通知美国。宋子文认为“此是美国最后让步”，而且由中国单方面作一声明，也与蒋介石有关美国不应附加条件的要求“不悖”，遂于当天与美国签署了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49]。

这笔5亿美元的借款是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的数额最大、条件也最为优惠的借款。这一方面是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同时这也与国民政府在盟国间力争平等关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向美国提出五亿美元借款的同时，国民政府在1941年12月末也向英国提出了借款要求，希望英国能向中国提供一亿英镑，并也提出了不提供担保的要求[50]。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接获政府指令后，先后与英国外交大臣、财政大臣会谈，强调此一借款对于“挽救民众之心理”极为重要，请英方着眼于双方的政治关系予以重视。英国政

府虽对顾维钧的说辞“颇动容”，且“态度颇佳”，但并没有立即给予中国肯定的答复[51]。直至1942年2月2日，在获悉美国已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才通知顾维钧，英国将给中国5000万英镑贷款。次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蒋介石。但与美国不同，英国当时本身经济拮据，有赖于美国提供的部分财政援助，它宣布向中国提供贷款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其用意在于进行宣传，以及向美国表明，对于中国的抗战它与美国站在一起，因此宣布了上述决定后迟迟未与中国进行具体协商。但国民政府认为，英国既然作出了许诺，它就应该负责履行自己的诺言，成为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另一来源，联系到英国传统的对华政策，国民政府对英国的这一做法产生了不满。4月18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请其转告英国政府：“美国借款已如约交付，而英国借款至今尚滞疑不定，未知何故？……乃允许至今，时已两月，尚未签字，又使我军民因感奋而失望。请转告英政府，务望早日签字，其所有条文性质，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以英与美皆为我盟国，其对我经济共同之义务，不可有宽苛之分，更使我军民对英发生其他感想。如果必须另订有拘束或限制之条件，则中国为两国感情与战友关系计，不敢接受，不如不借之为愈。惟无论借与不借，皆应从速决定，并正式宣布为要。”[52]

在中方的催促下，5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顾维钧送交了英方修订后的借款合约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政府应中国政府之要求，准备以5000万英镑借与中国，但以在英镑区内购买战争必需品为限，并以其中1000万英镑担保中国发行国内公债，至于其他用途须事先由两国政府洽商同意[53]。显然，这一草案与蒋介石关于中英借款协议“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的要求相差甚远。接到英方草案后，顾维钧和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与英方交涉，希望按中方要求再加修订。5月30日，顾维钧还专程赴艾登寓所进行商谈。6月3日，他又在艾登的安排下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虽然英国对草案又作了些局部修改，但仍无法使中国满意。7月20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请切勿对英再提借款与发起助华事，此不仅徒增国耻，而不啻

为人愚弄，无论如何勿再求助为要。”[54] 中英关于借款的交涉就此陷入僵局。直到1944年5月2日，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中英才达成《财政援助协定》，英国最终同意向中国提供5000万英镑的援助。但实际上，中国只使用了810万英镑，而且其中有300万英镑还是在1945年底使用的[55]。

1942年上半年，国民政府还开展了积极争取美国租借物资的外交活动。1941年3月11日，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同年5月6日，中国成为有资格获取租借物资的国家。此后，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陆续运往中国。据国民政府的统计，至1942年5月下旬，中国获得的租借物资计有：枪械、子弹、飞机、通信及医药器材等共6500吨；兵工材料、卡车及零件14.3万吨；铁路材料5万吨[56]。但是，这些援助对于整个中国战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国民政府希望美国能提供更多的租借物资。

1942年6月2日，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磋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为：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未经美国同意，中国政府不得改变美国提供之防卫用品或情报的所有权，或允许非中国人使用；战争结束时，中国当以上述未损坏之用品返还美国；美国应充分考虑中国政府所供给及经大总统代表美国接受之一切财产、兵力、情报等；中国政府为酬报所获利益，应不致影响两国间之贸易，而应促进两国间相互有利之经济关系及改善世界经济关系[57]。

《中美租借协定》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争取美、英援助所获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它使中国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建立在双边条约的稳定基础上，摆脱了以往零打碎敲的被动局面，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因此急速增加。该协定签署后不到半个月，美国就向中国运送租借物资3500吨，其中包括飞机28架、战车防御炮28门、榴弹炮40

门、迫击炮50门。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至抗日战争结束，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达845,748,220.88美元，其中飞机、坦克、武器等军用装备约占5.2亿美元。战后，除2000万美元需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与[58]。

美国以及英国的援助对于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因而也是最急需援助的1942年—1944年，无论是五亿美元贷款还是租借物资，在使用上都未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如五亿美元贷款在这一时期只动用了一半左右[59]。而到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这些援助实际上大部分被国民党用于国内斗争而不是对日作战。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　中英战前磋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战略目标。缅甸地处中南半岛西部，北与东北毗连中国云南省，南濒孟加拉湾。此时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它不仅是英国防守印度的屏障，对中国的持久抗战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昆明至缅北重镇腊戍的滇缅公路，在1940年9月日本侵入越南，滇越铁路完全中断后，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最重要通道。

还在日军袭击珍珠港前，中英之间就已开始酝酿在缅甸军事合作事宜，国民政府对此态度积极。1941年2月，国民政府派遣商震率“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在三个月考察期间，考察团编写出三十余万字的报告书，提出中英在缅甸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报告书认为，日本要封锁中国切断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将从它在亚洲的政略战略出发，在与英国开战后侵占缅甸，达到既夺占英属殖民地又封锁中国的目的。因此，中英军队应

协同作战，以确保仰光海港为目的，集结双方主力于泰国、缅甸边境，采取决战防御态势。在兵力部署方面，预定英缅军2—3个师，中国3—5个军。6月，国民政府正式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御缅甸的建议。但英缅当局对局势的判断与中方并不一致，更不愿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而是强调中国应在中缅、中老（挝）边境布防。而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则赞同中国的建议，认为英缅当局的消极态度“实至愚蠢”[60]。

在向英方提出建议的同时，国民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西南边境防御，为中英共同防御进行准备。军事委员会抽调高级军事人才组成驻滇参谋团，由军令部次长林蔚任团长，作为军委会派出机构进驻昆明，全面指导西南军事，策划中英作战相关业务。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处处提防蒋介石，非滇籍军队长期未能入滇。为抗击日军，经蒋、龙商讨后，这一状况也得到改变。秋冬间，第五、第六军开入云南。第六军第四十九师先开赴滇缅路担任护路，第九十三师开往滇南车里、佛海布防。第五军驻扎杨林、沾益、曲靖等处。

珍珠港事变后，英国感到日本进攻缅甸迫在眉睫。12月10日，戴尼斯拜会蒋介石，代表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协防缅甸：“（一）贵国驻在普洱之军队，今为一团，拟请增至一师。……（二）贵国驻在车里之一团，拟请调至孟扬。……（三）拟请抽调贵国驻云南省之部队一团，贵国负责送至畹町，由畹町南下交通运输，当由本国负责。该部队拟调掸部南方景东附近。我方判断，战事将在此发生，拟以贵国部队为后备队。……（四）调至孟扬及掸部之贵国部队拟请准归英国总司令指挥调度。”蒋介石对英国请求持赞同态度，回答道：“所请在缅境内我国部队归贵国总司令指挥，当可同意”，并表示对调驻车里一团至孟扬也可照办，但部队调遣之具体事宜将在参谋总长何应钦研究后正式答复[61]。

12月15日，戴尼斯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一起见蒋介石时，进一步提出协防缅甸要求：“（一）缅甸军事紧急，拟请下令

以全师兵力开入缅甸。（二）拟请下令，命驻云南军队抽一师待命，于必要时立即开入缅甸。（三）拟请下令，命希诺德（即陈纳德——引者注）部下志愿军留缅参加保卫缅甸战役。（四）准许敝国动用一部分美国租借法案下留在仰光之军用器材。”蒋介石对戴尼斯所提请求一方面表示支持，称原驻车里之一团已根据英国日前要求在开赴孟扬途中，昆明附近已有一军，随时可以调用，而要调用中国留在缅甸的租界物资可进一步商谈；一方面又批评英国方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军事合作之通盘计划。现正开赴孟扬之一团实不能作任何贡献，盖其指挥官既未得任何防御计划之指示，更未能确实明了其职责范围，惟因奉命开拔，只得执行命令开拔前往耳”。因此，蒋介石提出，盟国应就整个南太平洋战局定一通盘战略，“竭中、英、美、荷印四国之物资、人力以保卫星加坡不令失陷，此实为第一要着。其次则为缅甸，中国愿分负责任。以予之意见，应尽量抽调印度、缅甸部队，集中全力以保卫星加坡，缅甸防务如有不足，则藉中国之部队以补充之”。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蒋介石向英方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军队“必须单独负责，绝不愿与英军混合作战。某区某线，划归我军，某区某线，划归英军，责任分明，必能得最佳之效果”，“至分配防区，何处应由中国部队负责，自可由伦敦参谋本部决定之”。戴尼斯对蒋介石的主张表示“完全赞同”，但提出因局势紧迫，希望立即采取行动。蒋介石遂请戴尼斯与何应钦先商讨保卫缅甸的全盘计划[(62)]。对英国提出协防缅甸的请求，蒋介石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回应。当时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对出兵缅甸“以比较被动为佳”，但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63)]。

虽然戴尼斯要求中国出兵缅甸，但负责缅甸防守任务的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却并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12月23日上午，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与前来参加重庆军事会议的魏菲尔、美国代表勃兰特等商讨联合作战计划。在讨论防守缅甸问题时，勃兰特认为，滇缅路对中国获得援助十分重要，因此仰光必须守住。何应钦则提出，盟国应以攻为守，从缅甸向泰国境内的日军主动发起进攻，中国已准

备好两个军，若需要可再增加一个军。但魏菲尔认为，缅甸境内公路甚少，无法使用大兵力，而英国从印度援助缅甸的军队也将抵达，因此除需要中国军队一师驻守车里、畹町外，是否还需要其他中国军队尚待以后研究。实际上拒绝了中国出兵缅甸的提议[64]。

当天下午，在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上，魏菲尔重申，中国大批军队进入缅甸在划定战区和布防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印度增援部队到达后，“不需再请中国增援”；英国所要求中国者是派遣陈纳德志愿航空队参加缅甸空战和调拨在缅甸境内的美国援华物资[65]。

12月24日，魏菲尔离华时，蒋介石再提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事，对他说：“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作战。”魏菲尔答称：“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66] 魏菲尔的这番回答道出了英国不愿中国军队入缅的真实意图。当时英国在缅甸只有新编成的英缅第一师，1942年初英印第十七师增援后，总兵力约3.3万人。驻扎在泰缅边境的日军主力有两个师团并有强大的空军支援，实力上强于英军。但英国并不从保卫缅甸和整个太平洋战局出发，而只关心其本身的利益，欲维护在亚洲的殖民地，担心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会激起缅甸人民的民族主义，从而危及它的殖民统治。因此，对于远东殖民地，英国“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67]。英国的这一态度使得中国军队无法及时入缅参战。

1942年1月4日，日本第十五军根据大本营“切断援蒋路线，清除英在缅之势力，占领并确保缅甸要地”的指令，突破泰缅边境，向缅甸的英军发起进攻。1月31日，日军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2月上旬，开始合围仰光。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英国方面改变了原先的态度。1月2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份电报中指出：“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的交战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68] 1月23日，英缅军总司令胡敦致电要求中国军队入缅。2月5日，胡敦赶到缅北的腊戍晋见前往印度访问

途中的蒋介石，当面请求中国军队火速入缅。此后，仰光情况危急，英方又多次提出请求[69]。于是，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入缅。但是，这时已丧失了最有利的战机。

二　中国远征军组成与入缅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国民政府立即着手调遣军队准备入缅作战。12月11日，在戴尼斯请求中国协防缅甸的第二天，蒋介石下令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开赴滇南车里，第六军第四十九师以一个加强团开赴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准备入缅协同英军作战。16日，担任昆明防守任务的第五军奉令将防务移交第七十一军，向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六军奉令向保山、芒市地区集结，编组远征军入缅作战。同时，国民政府派军委会驻滇参谋团侯腾少将率部分参谋人员赴缅甸腊戍，筹备中国军队入缅事宜。12月23日，魏菲尔在重庆军事会议上拒绝中国军队入缅后，第五军、第六军奉令暂不入缅，于滇缅路上集结待命[70]。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停止入缅准备，1942年1月18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徐永昌应对入缅作战防御工事、组织敌后工作队和热带作战训练等事宜拟出具体计划[71]。

1月下旬英方请求中国军队援助后，2月3日，蒋介石令第六军军部立即进驻缅甸景东，该军第九十三师担任景东、景来地区防御，第四十九师开赴腊戍，暂五十五师集中畹町待命入缅。14日，蒋介石令第五军迅速入缅，全军按第二百师、第九十六师、军部、新二十二师顺序向畹町附近集中，由英军派车接运入缅，须于20日内运送完毕。第五军入缅后部署于同古（又称东瓜、东吁）、仰光地区[72]。第六军、第五军接令后立即开拔，向指定地区集中。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时，日军已在缅南发起全面进攻。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希望中国军队入缅后，第六军部署于景东一带，担任泰缅边境守备任务，第五军部署于同古、东枝（又称棠吉）地区，担任英缅军撤退时之掩护任务。2月27日，蒋介石根据军委会参谋团代表侯腾报

告与英军商谈意见，对入缅作战部队下达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敌为夺取缅甸，威胁中印国际路线，企图占领仰光，并继续北上向曼德勒方面进攻；二、我以摧破敌人企图之目的，第五、第六两军，应即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三、关于入缅部队指挥系统，第五、第六军暂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杜受胡敦指挥；四、关于部队部署，第五军第二百师应急行入缅，在平满纳（又称彬文那）、同古间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集中，第五军主力应随后入缅，集中杂泽南北地区，准备协同英军迎击进攻之敌；第六军应以第九十三师及刘支队任景东方面守备，以第四十九师任孟畔方面之守备，以暂五十五师为军预备队，控制南桑附近地区；五、第六十六军新编三十八师等任第五、第六军后方联络线之维持，第六十六军主力移驻云南保山附近，准备入缅作战。同时，蒋介石令侯腾立即返缅通知胡敦，其要点为：一、曼德勒以南至同古间之铁路归第五军守备，以北由中英军共同使用；二、每一英军之师、旅部，中国应派员联络，中英作战区域以恩戛村、敏乌里、巴尼托特、密雅内特为界，线以东属中国军；三、胡敦答复照办后，第五军始能入缅[73]。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的入缅部署基本上接受了英方的要求，并同意将中国军队置于胡敦指挥之下，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军队协同英军作战的诚意和决心，但蒋介石对军队指挥权甚为敏感，因此仍坚持中英军队划分战区各守其责的原则。

3月1日，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次日与魏菲尔会晤，要求英军坚守仰光，使第五军能集结同古准备反攻。魏菲尔允诺将尽力为之。3日，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参谋团和第五、第六军高级将领训话，称“此次五、六两军出国作战，因地形生疏，习惯不同，后方组织尚未完成，心中颇难自安，故亲来缅甸主持指导”。对部队指挥问题，蒋介石指示：入缅作战的战术由军委会参谋团团长林蔚负责指导，军事最高指挥官拟调卫立煌担任，杜聿明副之，在卫未到任前由杜统一指挥。对作战方面，蒋介石认为，根据英军作战情况，日军早就可占领仰光，其迟迟不前进的原因主要是调查中国军队行动，担心中国军队

威胁其侧面；但3月10日是日本陆军节，日军将于这之前占领仰光，故入缅部队作战指导应视敌情变化作如下考虑：一、第五军集中尚未完成而日军已占领仰光时，应视日军兵力大小决定进攻与否，若日在两师团以内，仍可进攻，若有三师团，第五军主力仍应在后方集中；二、第五军集中期间，日军仍停滞于锡唐河两岸时，则我应歼灭勃固河东岸之敌；三、第五军主力业已集中而日军对仰光攻击时，如日兵力为一师团，应对其反攻；四、第五军主力尚未集中而日军已攻同古时，第二百师应死守，一俟军主力集中完毕即行反攻。蒋介石最后告诫前线将领："我军此次在国外作战，可胜不可败；故在未作战之前，应十分谨慎，侦察敌情十分明了，一经接战，则不计一切牺牲，以期必胜"，"否则，纵全部牺牲，亦所不惜，以保我国军之信誉及对外之信仰"[(74)]。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在作战部署方面，较前一次更为具体，进一步表示了与英军共同坚守缅甸的决心。次日，蒋介石回国，由林蔚指导远征军并协调与英军作战事宜。

3月8日，英军弃守仰光。当天，英方通知中方，已任命亚历山大接替胡敦任英缅军总司令。仰光轻易失守打乱了中国方面原有的作战部署，而英军撤退时不事先通知中方也给此后中英在缅甸的合作投下了阴影。3月9日，蒋介石在欢迎史迪威抵华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宴会后留史长谈，批评英军不与中国真诚合作，撤退时不通知友军，担心此后协同作战时英军再意外撤退，给中国军队安全造成问题。蒋介石表示，英军应将曼德勒交中国军队防守，以确保驻守同古中国军队的后方，否则，中国宁愿将入缅部队全部撤回；如果英方拟将其部队撤至印度，"则保卫缅甸全局之责，由余独任之，固所愿为"。由于中英军队无法协调产生了统一指挥问题，蒋介石请史迪威入缅指挥中英两国军队[(75)]。当天，蒋介石还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以后缅甸作战不能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希望请"邱首相下令在缅英军皆归史君统一指挥为要"。但罗斯福未向丘吉尔提出中方要求，而英方则完全不愿将在缅甸的军队指挥权交出[(76)]。

3月10日，蒋介石约史迪威谈话，命其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赴缅指挥作战，并详细阐明对缅甸战局的看法："余最近遣五、六两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今仰光沦陷，全部战局，顿改旧观"，"国军入缅，已丧失其目的。如欲克复仰光，我必反攻，然我集结部队需时半月。在此期间中，敌方尽量增援。仰光战略地位有类广州，敌在各方面皆占优势，具备海陆空之便利，我如无足量空军与炮兵之掩护，克复仰光，殊非易事，……故我方欲图反攻，必另有策划，其最妥善者，厥惟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鉴于战局变化，蒋介石主张中国入缅军队的主要任务改为保卫曼德勒。次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史迪威，明确表示由其指挥中国入缅军队，并已命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等"绝对服从将军之命令"[77]。仰光失守使蒋介石改变了原先的作战部署，将原先坚守全缅甸并伺机反攻的积极作战方针，改为作战重点北移至曼德勒以防守为主的保守对策，并对指挥体系作了调整。

3月12日，中国入缅参战部队正式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编制如下：

司令长官	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4月2日由罗卓英出任）
副司令长官	杜聿明
第五军军长	杜聿明（兼）
第二百师师长	戴安澜
新编二十二师师长	廖耀湘
第九十六师师长	余韶
第六军军长	甘丽初
第四十九师师长	彭璧生
第九十三师师长	吕国铨
暂编五十五师师长	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	张轸
新编二十八师师长	刘伯龙
新编二十九师师长	马维骥
新编三十八师师长	孙立人

远征军总兵力约十万人。正式成立时，除第六十六军尚在云南境内外，第五、第六军已进入缅甸开始布防。至16日，第五军军部到达塔泽、漂贝地区，第二百师抵达曼德勒以南同古地区，新编二十二师与第九十六师集结于曼德勒东北地区，第六军军部在雷列姆，第四十九师在孟畔地区，第九十三师在景东地区，暂编五十五师在南桑地区。

史迪威于3月11日离华抵缅后，即赴前线视察，并确定了以曼德勒以南的同古为作战重点并进而收复仰光的计划。由于这与蒋介石以曼德勒为重点的作战方针不同，史迪威专程飞返重庆，于3月19日、20日两次面见蒋介石，提出以第五军全军集结同古的建议。蒋介石最初对此并不赞同，仍主张应以第五军两个师驻守曼德勒，而只留第二百师守同古，他对史迪威说："我在缅甸作战，应切记两大纲要：第一，应选择与敌最后决战之场所，此场所应在曼德勒以南之近郊；第二，应固守曼德勒。此次在异邦作战，余至感关切，盖其危机有二：第一，当地民众倾向敌人，对我并无好感；第二，缺少统一指挥。历史上之联军，因指挥不统一而失败者数见不鲜。在此两种危机未能解除以前，我入缅作战部队只应取消极态度，不应过分积极，自不宜远离根据地向前突进。"蒋介石的这一考虑一方面是因为第五、第六军是中国"惟一精粹之部队"，一旦受挫将影响整个中国战局；另一方面是他对英方能否予以援助并协同作战心存疑虑。但在史迪威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采纳了他的部分意见，同意在英军守住同古西侧卑谬（又称普罗美）的前提下从曼德勒抽调一个师南下，作为防守同古和卑谬的后备队。蒋介石同时强调第五、第六军绝对不能受挫。史迪威对此表示不敢保证，"盖在战争中实无任何保证之可能"。对于悬而未

决的中英军队统一指挥问题，蒋介石请史迪威返缅后与英方磋商后再作最后决定[78]。

21日，史迪威飞返缅甸，准备着手按计划进行部署。此时，远征军第二百师已在同古以南与日军开始交战。

三　中日滇缅血战

入侵缅甸的日军第十五军攻占仰光后，不待后续部队到达，就分兵北上。3月15日，第十五军根据日军南方军迫使对手尤其是中国军队在曼德勒进行决战的指令，确定了作战方针："大致于5月底以前，在曼德勒地区（包括以曼德勒为中心的中部缅甸地方）捕歼英蒋联合军主力，继于缅甸境内扫荡残敌。主攻指向英蒋两军内之蒋军，对此，应把握战机，强迫决战，予蒋军以彻底打击，并完全扼止其反扑企图。"[79] 根据这一方针，第五十五师团沿仰光曼德勒铁路北上，直逼同古，第三十三师团在西翼沿伊洛瓦底江东岸向卑谬北进。3月下旬，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仰光登陆后，沿仰曼铁路北上投入战斗。日军在缅甸战场兵力约八万人。

中国远征军入缅后，英军陆续转移至缅甸西部，大体以仰曼铁路为界划分中英军队防区。仰曼铁路以西由英军防守，英军主力沿伊洛瓦底江设防。仰曼铁路以东至泰缅边境间地区划为中国远征军防区，其中第五军布防于曼德勒至同古的仰曼铁路沿线，第六军驻守于第五军以东的雷列姆、孟畔、景东等地。

（一）远征军中路作战

仰曼铁路沿线是中英防守的中路，也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3月中旬，先期入缅的远征军第五军骑兵团已沿仰曼铁路南下至同古以南的彪关河附近。3月18日，日军搜索部队进入彪关河地区，第五军骑兵团与之交战，击退日军，掩护英军撤退。次日，日军以一连步骑

兵冒进追击，进入骑兵团预设伏击阵地。当日军汽车行至桥上时，大桥被炸，军车尽覆，骑兵团从两翼出击，歼灭日军大部，并获地图、日记等重要文件[80]。日军自占领仰光后一直未遭遇英军抵抗，此战是日军入侵缅甸后首次失利。

远征军根据缴获的日军文件，获悉日军部署和作战计划，判断正面日军不会超过两个师团，史迪威、杜聿明商议后决定固守同古，击破当面之敌，掩护主力集中，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这正是史迪威抵达缅甸之初制定的作战计划，与蒋介石以曼德勒为防守重点的作战方针并不一致。3月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第五军第二百师、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暂编五十五师担任同古方面作战，由杜聿明指挥；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开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卑谬方面英军作战；第六军准备抵御泰国方面来攻之敌；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为总预备队，开赴曼德勒附近[81]。同时，杜聿明亲赴同古，指导第二百师准备同古作战，并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号召全体官兵顽强作战，为祖国争光。

3月20日，同古防御战正式开始。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以一个团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十余辆坦克、装甲车为前导，向同古以南第二百师前进阵地鄂克春发起进攻。战至21日，日军伤亡三百余人，远征军伤亡一百四十余人，双方呈对峙状态。22日，日军增加进攻兵力，并加强炮火轰击，“自拂晓至午，炮火之烈为数日以来所未有。敌我冲锋肉搏数次，双方伤亡均重”。“我方伤亡连长以下官长十余员，士兵二百余，敌方倍之”[82]。日军也承认，自北进以来“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而且从前线不断传来攻占敌阵地的误报，使指挥陷于混乱和苦战”[83]。

23日，日军进攻兵力增至两个团，在二十余架飞机支持下，以骑、炮、坦克联合部队对远征军阵地实施正面攻击。第二百师以步兵接近日军坦克，进行肉搏战，击毁日军坦克、装甲车数辆，挫其攻势。但远征军也遭受重大伤亡，第五九八团副团长黄景升阵亡，阵地

一部被日军突破。

24日，日军继续以陆空联合向远征军鄂克春阵地发起正面进攻，同时以骑炮联合部队千余人向西迂回，直趋同古城北的克永冈机场。第二百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激战，从上午战至傍晚，伤亡惨重，终告不守。克永冈机场被日军占领后，第二百师与后方联络被切断，陷于三面被围之势。当晚，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召开团长、直属营、连长会议，宣布各级部队长官阵亡后代理人员名单，以示誓死固守同古的决心。戴安澜自己亲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并致书妻子："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84)

25日，日军从南、西、北三面围攻同古，并遣三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同古城中一般建筑多被炸毁。第二百师依托工事，沉着应战。入夜，第二百师不断以小部队袭击日军，予以骚扰。次日，日军出动九十余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并继续围攻同古，主力则集中向同古西北攻击，并突破远征军阵地。双方争夺惨烈，伤亡均大。当日，日军一部进入同古以北的南阳车站南侧占领阵地，企图阻止远征军增援部队南下。

同古前线激战之际，蒋介石再次强调应以曼德勒为作战重点。26日，他对远征军下达指示："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东吁（同古）、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目前应以第五军之第二百师、新二十二师及军直，在东吁、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六十六军全部，及第九十六、暂五十五师，集中于曼德勒、杂泽间地区，俟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27日，蒋介石又指示史迪威、杜聿明："如情势不急，应待兵力集中后出击，切忌逐渐使用。"但史迪威与杜聿明此时仍依照既定的"击破当面敌人、收复仰光"的作战方针，并以此作出部署：以第二百师为固守兵团，确保同

古，吸引日军；以新二十二师配属骑、炮、工、坦克、战防炮为攻击兵团，攻击仰曼公路以西地区日军左翼；并以第九十六师和第六军暂五十五师为预备队[85]。

27日，日军继续进攻同古，远征军顽强抵抗，双方呈对峙状态。日军自感“攻击力已达极限”[86]。28日拂晓，新二十二师在南阳车站发起进攻，但进展缓慢。而攻击同古日军获悉远征军增援部队抵达，遂加强攻击，欲先解决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远征军伤亡虽重，仍坚强抵抗，士气旺盛，确保阵地不失。此时史迪威判断当面日军“无后续部队，战斗力不甚强”，仍决定集中进攻，并定于29日或30日“开始主力战，一举击破当面之敌”[87]。但实际上，日军后续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此时已赶到同古，并投入对远征军的攻击。

29日，新二十二师继续攻击，经过激战，攻克南阳车站，但随即遇刚开至前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猛烈反扑，战斗呈僵持状态。而急调前线的第九十六师因铁路被日军炸毁，被阻于平满纳附近，无法前进实施原定的增援同古计划。此时，第二百师在同古已孤军苦战十天，伤亡2500人，弹药将尽，给养不济，且三面受围。在此形势下，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决定改变原定计划，让第二百师突围，以保全实力，另寻战机与日军决战。但史迪威仍坚持对敌进攻，两人争执激烈，互不让步。最后杜聿明坚持己见，命令第二百师于当夜向东突围，新二十二师向日军佯攻，予以牵制。30日，第二百师全师包括伤病员安然从同古撤出，转移至叶达西地区。但史、杜两人关系由此紧张。

同古防御战历时11天，第二百师面对有强大空中支援的优势之敌，英勇作战，歼灭日军五千余人，包括击毙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三团团长横田，重创了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美军战史称，第二百师坚守同古是缅甸战役中防御最久的部队，且撤退时秩序井然。日军战史也承认，第二百师“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

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88]。

远征军从同古撤出后，决定集中主力于同古与曼德勒之间的平满纳组织会战。3月31日，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当面之敌第五十五师团，似有继续北进之企图。军决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斯瓦河西岸，及其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区拒止敌人，以主力在彬文那（即平满纳）占领阵地，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灭之。”[89] 根据这一作战部署，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沿线担任阻击兵团，阻敌前进，掩护主力集中于平满纳附近。

日军占领同古后，因占有战场主动权并仰仗其优势兵力，于4月3日制定曼德勒会战计划，决定以主力继续北进，在曼德勒附近与中国远征军决战，并以一部切断腊戍方面中国军队退路，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90]。

4月5日，蒋介石飞赴缅北，会晤史迪威、缅甸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并主持召开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蒋介石指出，缅甸战役目前有两个目标：一、尽一切办法保护缅甸中部的油田；二、为政治上之理由保卫曼德勒。为此，蒋介石在与亚历山大会晤时，要求英军守住伊洛瓦底江沿岸，特别要固守阿蓝庙，护卫远征军西翼，并“成立双方不后退之谅解”。亚历山大对此始终不予以肯定答复。蒋介石对英军此举多有批评，但仍赞成平满纳会战计划，表示：“余决意保持曼德勒以南之中缅地带，决战即应在此。即令英军后撤，我军仍应作殊死抵抗保此地区。”并强调：“我国军出国作战，在近代史中，尚为创举，故应充分表现我忠勇刚毅之气与临难不苟之牺牲精神。”[91] 在缅甸期间，蒋介石还对远征军指挥系统作了调整，由罗卓英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指挥下行使对远征军的指挥权。

4月9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根据蒋介石指令拟定平满纳会战计划，其要旨为：以新二十二师为基干组成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北

岸，逐次阻击消耗进犯日军，并以游击支队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交通电讯；以第九十六师为基干组成固守兵团，吸引日军于平满纳附近地区并坚守阵地；以第二百师为基干组成机动兵团，待日军受挫于固守兵团并呈胶着状态时，转取攻势，将日军夹击包围于平满纳附近地区而歼灭之[92]。

担任阻击任务的新二十二师吸取同古被围的教训，确定不必固守一地，而是利用斯瓦河沿线的地形，预设纵深阵地，三个团梯队配备，相互交替掩护，逐次抵抗占有优势的日军的攻击。4月5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发起猛烈进攻。新二十二师在师长廖耀湘率领下，英勇抵抗。11日，日军第十八师团抵达前线投入战斗，进攻更为猛烈。新二十二师在正面逐次阻击日军的同时，诱敌深入己方阵地，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引发地雷，反击消灭日军，并以游击队在日军后方扰乱其交通运输。这种虚实交替使用的战术有效地迟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激战至16日，新二十二师在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后，按计划进入平满纳预定阵地。新二十二师以一师兵力抗击日军两个师团达十余日之久，毙伤日军约四千五百余人，己方伤亡一千五百余人，完成了牵制日军、掩护主力完成平满纳会战准备的任务[93]。

在新二十二师完成阻击任务后，远征军着手按原定作战计划“转移攻势，歼灭当面之敌”，并认定“敌受痛击之期已至”[94]。但此时平满纳两翼却相继告急。在西翼，英军毫无斗志，在4月1日弃守卑谬后，沿伊洛瓦底江一路溃退不止，不经抵抗，先后放弃阿蓝庙、马格威等地。16日，仁安羌被日军占领，英缅军第一师在仁安羌以北被日军包围。远征军西翼后侧完全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在东翼，远征军第六军暂五十五师在与日军作战中处于不利局面，至18日日军已推进至垒固附近，对平满纳防线构成直接威胁。在两翼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远征军只得放弃原定的平满纳会战计划。18日，史迪威、罗卓英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主力向密铁拉、瓢背间集结，准备曼德勒会战。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对此虽有不同意见，但仍执行命令，率部退出

平满纳地区[95]。

（二）远征军西路救援英军作战

3月下旬，远征军第二百师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同古激战时，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在西翼向英军阵地发起进攻。4月上旬，日军在基本未遇英军抵抗的情况下，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直指仁安羌油田，并预定于5月上旬与第五十五师团会师曼德勒。

4月15日，英缅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下令炸毁仁安羌油田。次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占领仁安羌。随后，日军以一部抢占仁安羌北面的宾河大桥及宾河北岸渡口，截断英军退路，将英缅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一部共七千余人包围于仁安羌东北地区。

在此之前的4月14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已因战情危急，请远征军迅速增援。罗卓英下令担任曼德勒防守任务的第六十六军新编三十八师派第一一三团驰援。15日，亚历山大以一团兵力过于单薄，要求远征军增派部队。远征军再派一团，随第一一三团之后赴援。17日，第一一三团抵达乔克巴党。英军斯利姆将军赶到乔克巴党，命令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率部攻击并消灭宾河北岸的日军。

18日拂晓，第一一三团在英军十二辆轻型坦克的掩护下对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击溃宾河北岸日军，并乘胜追击，渡过宾河。此时，被围的英缅军第一师因被围数日，缺水断粮，士气低迷，师长电告斯利姆称只能再坚持一夜[96]。斯利姆要求第一一三团连续进攻，以解英军之围。亲临前线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根据当前日军情况，连夜调整部署。19日拂晓，第一一三团向围困英军的日军发起猛攻，但攻占日军阵地后，遭日军猛烈反扑，已占阵地，三失三得。经反复肉搏冲杀，至傍晚，日军终告溃退。第一一三团收复仁安羌油田，“救出被围英缅军第一师五千余人（情形狼狈，不复成军），并由敌人手中夺获之英方辎重百余辆，悉数交还”

[97]，另救出被日军俘获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等五百余人，随即掩护他们向宾河北岸撤退。

仁安羌一战，中国远征军以一团兵力1100人，与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两个团鏖战，毙伤日军千余人，自己伤亡五百余人，完成解救英军七千余人的任务。远征军入缅之初，英军对中国军队存有偏见和轻视心理，此战后被救英军官兵高呼“中国万岁！”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向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致谢，并对中国军队表示敬意[98]。仁安羌大捷也轰动了英伦三岛，英国政府向孙立人、刘放吾等人颁发了勋章。

仁安羌获胜后，第一一三团因兵力不足，并未乘胜追击，而是与日军呈对峙状态。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为扩大战果，急调所辖第一一二、第一一四团赶赴宾河北岸，准备以第一一二团为主力，对日军施行强攻，包抄其右翼，断其后路，压迫日军于伊洛瓦底江东岸予以一举歼灭。20日深夜，孙立人下达次日拂晓发起攻击的命令，第一一二、第一一三团利用夜色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但此时传来英缅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的命令，称因远征军中路第五军已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向北转进，从而影响本处作战，要求新三十八师即刻向乔克巴党转移。其实，英军认为防守缅甸中部已无希望，决定放弃，退守印度，并已向西撤退。孙立人接令后只得放弃已完成部署的进攻计划，下令所部后撤，向曼德勒方向转移。

（三）远征军东路作战

缅甸东部雷列姆、孟畔至景东的广大地区，在远征军入缅后由第六军担任防守。3月下旬，第二百师与日军在同古激战时，第六军抽调暂编五十五师第一团南下至同古以东的莫契（又称毛奇）、垒固地区，掩护第二百师的侧翼。同古失守后，第六军正面直接面对日军威胁。

日军在占领同古后，制定了曼德勒会战计划，决定以主力沿同古—曼德勒公路北上，另以第五十六师团自同古东进，经垒固直突腊戍，切断远征军归国之路，然后在曼德勒地区合围歼灭远征军。根据这一作战计划，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于4月初从同古向莫契进军，向第六军发起进攻[(99)]。

4月6日，日军先头部队在莫契与暂五十五师第一团交锋，中国军队与敌激战至深夜，奉命退守莫契以东的克马俾附近地区，继续阻击日军。此时，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已急令调防杂泽的暂五十五师主力再回垒固，并调守备景东的第九十三师一部移师东枝，设立纵深防线。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在挫敌先头部队进攻锋芒后，决定先发制人，乘日军兵力分散之际，予以各个击破，以掩护正准备彬文那会战的第五军的左翼安全，遂于8日命令暂五十五师第二团推进垒固，第三团暂留杂泽、东枝构筑工事，并令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速至和榜集结[(100)]。4月9日，蒋介石在与史迪威讨论平满纳会战计划时，强调必须加强对东枝的防守，兵力由目前的四个营增加至一个师，以防日军从东枝突破，直插腊戍，威胁平满纳前线部队[(101)]。

但远征军正在部署之中，日军后续部队已抵达前线。4月10日，日军在增加兵力后向暂五十五师第一团克马俾阵地发起猛攻，第一团奋力抵抗，直至阵地被毁，于11日退守土冲河以北地区，12日转移至保勒及其以西一线。此时，在杂泽的暂五十五师第三团和第六军工兵营已调至垒固，以加强防御。13日，第六军指挥所也推进至垒固。

15日，日军开始向土冲河阵地发起进攻，暂五十五师在抵御日军进攻的同时，不时予以反击，战况激烈，敌我双方互有进展。至17日，暂五十五师第一团兵力已减至两营。18日，因兵力损失过大，暂五十五师退守南柏，保勒失守。19日，日军续攻，暂五十五师阵地被突破，致使日军北上向垒固进击，暂五十五师与第六军军部间失去联络。第六军为挽回不利战局，急令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第四十九师第一四六团在垒固附近投入战斗，并极力设法与暂五十五师取得联

系，令其突围。20日，第六军各部与日军在垒固激战，虽奋力抵抗，终因伤亡过重，各阵地相继被日军攻破。当晚，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决定放弃垒固，令部队破坏垒固至和榜间公路，并率部向北转移至和榜附近，继续拒敌[102]。

日军占领垒固后继续北进，至和榜以南地区分兵，一路北上进攻和榜，一路向东北挺进指向和榜以东的雷列姆；另一路向西北挺进指向和榜以西的东枝。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东枝为第五、第六军联结要点，急调已在西路的第五军第二百师奔赴该地，迎击进犯之敌，确保东枝。第六军一部在军长甘丽初率领下在雷列姆设置防御阵地，一部由军参谋长林森木指挥在和榜阻击北上之敌。

21日，日军向和榜发起进攻，至中午以装甲车冲破第六军前沿阵地，随即向和榜主阵地猛攻，并以三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第六军官兵与敌激战，伤亡重大，工事大半被毁，至22日夜转移至和榜以东的孟邦。23日，日军在向孟邦攻击的同时，遣一部向雷列姆以北迂回。第六军唯恐雷列姆至腊戍间公路被切断，开始准备从雷列姆撤退。24日，孟邦阵地在日军连续猛攻下被突破，旋即雷列姆失守。日军占领雷列姆后，乘坐百余辆卡车继续北进，直指腊戍，以图切断远征军归国之路。第六军此时已无力阻敌，军长甘丽初急电驻腊戍的军委会参谋团："情况急迫，腊雷公路，请速防范。"参谋团遂调两营兵力南下，掩护第六军撤退并对通往腊戍的公路实施破坏。26日，甘丽初率军部及沿途收容残部抵达猛朽。次日，参谋团根据蒋介石指示命令第六军向景东地区集结，甘丽初遂率部向景东转移[103]。东路日军得以毫无阻拦地向腊戍突进。

东枝方面，第五军第二百师在军长杜聿明率领下从西路向东奔袭三百多公里，于23日抵达距东枝15公里处，但此时日军已乘虚而入占领了东枝。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亲临前线，决定第二百师三个团从正面和左右两翼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收复东枝。24日拂晓，第二百师开始进攻，至中午已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争夺至午夜克复东

枝，歼灭日军大部。次日，日军向东枝发起反扑，激战至夜，被第二百师击退[104]。

攻克东枝后，杜聿明根据战况，决定率部向雷列姆攻击前进，以切断北进腊戍之日军后路。驻腊戍的军委会参谋团也驰电杜聿明："应督率所部，于攻克东枝后，继向雷列姆北进之敌尾击，断敌退路，以解腊戍之危。"但是，史迪威与罗卓英正在部署曼德勒会战，电令第五军"于东枝攻克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杜聿明虽向罗卓英申述东枝对守住腊戍以及整个战局的重要性，但罗卓英接连发出四道电令，命令杜聿明除留第二百师向雷列姆攻击外，第五军直属部队及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均向曼德勒集结。26日，杜聿明率部西返，第二百师则向雷列姆进军。当日，东枝再度被日军占领[105]。

四　中国远征军撤出缅甸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史迪威、罗卓英在4月中旬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就着手准备曼德勒会战。但4月20日后战场情况发生变化，西路英军向印度撤退，扬长而去，东路垒固失守，防线吃紧，远征军在中路曼德勒一线失去两翼防卫。在此情况下，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改变原先"为政治上之理由保卫曼德勒"的作战构想，于4月24日电令史迪威、罗卓英："一、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尤以对棠吉（即东枝）、罗列姆（即雷列姆）北进之敌，须极力拒止其继续前进。二、新二十八师主力可速运腊戍与罗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击灭之。三、第五军在平满纳方面，应以逐次迟滞敌之前进为目的，施行持久抵抗。但亦不可过久胶着于一地战斗，致招过甚之损失。四、为应将来状况之演进，第六军应准备以景东车（里）佛（海）方面，第五及第六十六两军主力，以密支那与八莫方面，为后方补给联络线。"[106] 这一

命令的要点是远征军坚持在缅甸持久抵抗，为此应以守住腊戍为当务之急，同时也对一旦战局不利腊戍失守，各军转移区域作了规定。

但史迪威和罗卓英并不愿放弃准备中的曼德勒会战，27日下达了会战命令。此时东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攻克雷列姆后一路北进，先后占领满里、西保（细胞），于28日抵达腊戍城下。腊戍虽为远征军连接国内的战略要地，但守军只有刚从国内到达的第六十六军军直属部队和所属新二十八师一部，布防仓促。29日拂晓，日军在三十余辆装甲车和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腊戍发起攻击，守军英勇抵抗至正午，新二十八师两个营、军工兵营及新三十八师留守腊戍机场的一个营伤亡殆尽。第六十六军特务营、搜索营等继续与敌激战，终难抵挡日军装甲车冲击，腊戍失守，远征军归国之路被切断。

日军占领腊戍后，立即遣一部南下，企图在曼德勒地区对远征军形成合围之势。在此情况下，史迪威、罗卓英只得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各部分头转移。此时，远征军各部在缅甸的情况是：第五军军部率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及归其指挥的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集结在曼德勒附近地区，第二百师正在东翼向雷列姆进击之中，第六军已退至缅甸东部萨尔温江以东地区，第六十六军新二十九师及新二十八师所余数百人在腊戍以北至云南境内滇缅公路沿线。4月30日，远征军开始全线后撤。

占领腊戍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除以一部南下外，继续北上攻击。第六十六军新二十九师虽沿途抵抗，但仍无法阻敌。5月3日，日军越过滇缅边境，攻占边境重镇畹町。第六十六军兵败后，建制被打乱，沿滇缅公路溃退。日军则乘势急速北进，连克芒市、龙陵，于5日推进至怒江惠通桥西侧。由于国民政府在滇西至昆明一线并无重兵防守，一旦日军突破怒江，将长驱直入，危及整个西南后方。先期退入云南的军委会参谋团遂下令炸毁惠通桥，阻敌于怒江西岸。日军见桥已被炸，即在炮火掩护下以橡皮艇强渡，守军及赶来增援的第三十六师奋力抵抗，激战三日，歼灭已渡过怒江抵达东岸的日军数百人，终

于击退日军的攻势，沿怒江形成对峙局面[107]。

腊戍失守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于4月30日给在曼德勒附近地区集结的第五军下达向缅北撤退命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遂令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及新三十八师轮流掩护，西渡伊洛瓦底江，向北转移。5月4日，各师抵达甘布鲁、车冈一带，准备候车沿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继续北上。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因铁路发生撞车，运输停止，并担忧日军占领畹町后直插缅北，先远征军占领八莫、密支那，故于6日电令第五军放弃向缅北转移的计划，改为西进就近向印度境内撤退。随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开始西行，史迪威亲率中美官兵百余人徒步半月，于5月20日到达印度的英帕尔。罗卓英率司令长官部其他人员也于数日后抵达。

但杜聿明认为，“我军战败入印，将为印人所不齿”，因此仍主张按原计划向缅北密支那转移，“与由畹町犯密之敌决一死战，胜可保存缅北一隅，败则退守腾冲”。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接杜聿明电报后表示赞同：“所见甚当，勇敢之忱，尤为嘉佩。判断敌纵先占领八莫，或密支那，而为数不多，只要人心坚定，集结兵力，敏速行动，必可冲破险难，打通后路，且可解龙陵山之危，纾统帅西顾之忧，应迅将主力沿铁路北上”[108]。7日，蒋介石又直接电令杜聿明：“希即亲率我缅北各部，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109]于是，杜聿明决定率部经密支那向云南境内片马、腾冲方向撤退，并准备途中遇敌即全力击退。

9日，第五军在北进途中获悉密支那已于前一日陷于敌手。10日，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在卡萨与日军发生激战，未能阻敌渡过伊洛瓦底江。此时，第五军军部在卡萨西侧的印道，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主力在南面距印道尚有一日行程，而第九十六师则在印道以北的孟拱，全军兵力分散，日军后续部队则连续抵达。在此情况下，杜聿明只得改变计划：“军以迅速脱离敌人之目的，即改沿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径向孟关、大洛之线转进。”[110]根据这一部署，第五军须

穿越深山野林，绕过密支那然后返回国内，路途较转向西进直接入印度远为艰难。

5月中旬，第五军各部分头转移。13日，杜聿明率第五军军部和新二十二师开始徒步穿越原始森林区，拟取道大洛、葡萄返国。沿途所经之处，皆崇山峻岭，森林蔽天，道路艰险，人迹罕至。部队前进全凭指南针指引，并只得将重武器破坏丢弃。21日，蒋介石来电，令第五军“未奉命不得入印”。31日，杜聿明率部至缅西北清加林，又接蒋介石电：“既到清加林，应即西向印度或（北向）列多（即雷多）转进，暂时休息，不必直赴葡萄，以免中途被困为要。”第五军军部与新二十二师遂改道由新平洋向雷多进发。6月缅北进入雨季，暴雨引发山洪，冲毁道路，更加原始森林中蚂蟥、蚊虫侵人，行军更为艰难。6月6日至14日，部队被山洪阻于大洛以南河边，“沿途杳无人烟，官兵绝粮八日，草根罗掘皆空，饥病交加，死亡甚重”，同时疟疾、回归热等病流行，军长杜聿明也因病昏迷两日。6月中旬，因获空军空投粮食，官兵得以薄粥糊口。至7月25日，第五军军部和新二十二师历时两个半月，行程480公里，终于到达印度雷多[(111)]。

新三十八师于4月下旬归第五军指挥，5月10日杜聿明命令向曼密铁路以西地区转移，但师长孙立人认为从缅北迂回回国，路途太远，环境险恶，且有被日军围歼危险，故决定脱离第五军，转向西进退入印度。5月中旬，新三十八师予尾追日军打击后，迅速摆脱日军，向西转入山林地区，跋山涉水，穿越密林，赶在雨季前于5月24日抵达印度英帕尔。沿途虽历经艰辛，但因路途稍短，未遇暴雨，且组织良好，未遭重大损失[(112)]。

第九十六师于5月10日抵达孟拱，原计划攻占密支那，但当日接杜聿明令放弃攻占密支那，向孟关转进。18日，第九十六师抵达孟关，随后向葡萄前进。进军途中辗转于野人山中，给养全无，毒蛇、蚂蟥侵袭，又逢连日淫雨，兵员损失严重。6月下旬，部队获空投支援。30日，副师长胡义宾率部经葡萄以南的埋通时，遭敌伏击，督战

时阵亡。8月初，第九十六师翻越高黎贡山进入云南境内，然后渡过怒江、澜沧江，于8月下旬抵达滇西的剑川[113]。

第二百师于4月26日放弃东枝向雷列姆进击，30日接杜聿明令经摩谷向卡萨附近集结，归还第五军建制，旋因密支那被占，第五军分头向缅北撤退，师长戴安澜决定向北撤回国内。5月18日，第二百师在穿越西保至摩谷间公路时，遭日军伏击。戴安澜率部与敌激战，不幸身负重伤，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第六百团副团长刘杰英勇牺牲。26日，戴安澜因伤重不治，壮烈殉国。第二百师在副师长高吉人率领下继续北进。6月17日，到达云南腾冲县境内。25日，全师抵达保山县[114]。

从雷列姆东撤的第六军于4月30日获悉腊戍失守，并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令率所部向景东转移。5月上旬，第六军各部向景东附近转进，并沿缅泰边境与日军和泰伪军发生激战。5月15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六军除暂五十五师撤回云南思茅、宁洱外，主力继续留守景东地区。军长甘丽初认为第六军目前三面受敌，且景东地区地势平坦，不易防守，故电蒋介石、何应钦请放弃景东，退回滇南，防守边境。获准后，第六军撤回云南境内，第四十九师至南峤，暂五十五师与刘支队至车里，第九十三师至打洛，军部至佛海[115]。

中国远征军于4月底开始撤退，至8月第五军第九十六师抵达滇西，历时近四个月。沿途经过之处皆深山密林，又适逢雨季，自然环境恶劣，尤其是长途跋涉穿越缅北的第五军各部，兵员损失极为惨重，甚至超过了对日直接作战的伤亡人员：

番　号	动员人数	战斗死伤人数	撤退死伤人数	完成撤退人数
军直属队	15,000	1,300	3,700	10,000
第二百师	9,000	1,800	3,200	4,000
新二十二师	9,000	2,000	4,000	3,000
第九十六师	9,000	2,200	3,800	3,000
合　计	42,000	7,300	14,700	20,000①

①《远征印缅抗战》，第34页。

中国远征军入缅人数共十万人，完成撤退时仅余四万人。第五军入缅作战中为国捐躯的四位团以上军官也都是在撤退途中阵亡的。

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英国对中英合作防卫缅甸的消极态度和自私行为。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就向英方提出共同防御缅甸的建议，战争爆发后，又积极部署准备出兵缅甸，但英国方面出于维护其在亚洲殖民利益的考虑而屡屡拒绝。直至1942年2月，英国无法抵御日本对缅甸的进攻时才请求中国军队入缅，但已经丧失了宝贵的战机，种下了日后失利的祸根。中国远征军入缅后，英国方面不是与中国积极合作，共同商讨制敌良策，而是将远征军推向第一线，掩护英军撤退，并一再不通知中方就独自后撤，致使远征军侧翼受敌威胁，不得不数度变更作战计划，陷于被动境地。因此，英国的消极态度和自私行为是远征军失利的根本原因，其他因素都是由此产生或加剧的。

二、远征军在战略战术上指挥失当。远征军入缅之初，蒋介石制定了积极的作战方针，准备与英军联合对日发起反攻。当英军弃守仰光后，蒋介石改变计划，准备远征军集结在曼德勒附近与敌展开决战。史迪威入缅后，将对日作战地点南移至同古。但由于英方延误了远征军入缅时间，造成第二百师孤军突进，后续部队无法及时跟上。整个缅甸战役期间，远征军先后有三个军十万人进入缅甸，但从未能够集中所有兵力于一次作战行动中。同古战斗后，史迪威、罗卓英专注于在中路组织平满纳、曼德勒会战，而对整个缅甸战场缺少全盘考虑，对西翼英军放弃防守未有足够的估计，对日军分兵进攻东翼也无及时正确部署，导致日军由此突破，一路北上占领腊戍，使整个缅甸战场局势发生逆转。在撤退过程中，远征军缺少统一部署和有效指挥，第五军又舍近求远，没能及早转向西进退入印度，以致在穿越野人山时遭到重大损失。

三、指挥系统混乱多变。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初，蒋介石同意由英方统一指挥中英军队，但英方并无防守缅甸的全盘计划，也不准备与远征军协同作战，更不愿与远征军互通情报，甚至拒绝中方向其师、旅指挥部派遣联络官员。史迪威入缅后，蒋介石希望由其统一指挥中英军队，但英军不愿交出指挥权。在缅甸战场上，中英军队始终各自为战。远征军方面，蒋介石最初派军委会参谋团入缅指导作战，但又任命杜聿明统一指挥第五、第六军；然后授权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全权指挥，同时成立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几者间关系并无明确规定，而军委会参谋团仍在履行指导作战职责，以致前线部队多次收到互相矛盾的命令，无所适从。如腊戍告急，参谋团要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守腊戍，司令长官部却令其赴曼德勒。此时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已被划归第五军指挥，张轸却始终未接命令[116]。令出多门，犯了兵家之大忌，以至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缅甸作战已完全由蒋先生直接指挥。奈何？"[117] 而蒋介石本人又有直接指挥第一线部队作战的癖好，时常不顾千里以外的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越过史迪威、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军委会参谋团直接向军、师一级发命令。

四、准备不足、应战仓促。中国军队虽早有入缅作战意图，但由于英方拖延，直至日军逼近仰光，才匆匆入缅。先头部队第二百师赶至同古，未及部署完毕就已投入战斗。后续部队因运输原因，无法及时跟进，导致逐次使用兵力。远征军入缅时仅有过时的旧图，却无法从英方获得详尽的作战地图，第六十六军军部甚至没有一张缅甸详图，指挥作战如盲人瞎马[118]。

尽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失利告终，但远征军官兵浴血奋战，拼死杀敌，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尤其在同古、仁安羌等地取得的出色战绩为中国军队赢得了盟国的尊敬和赞扬。国民政府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对入缅作战态度积极，派出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和其他部队组成远征军，显示了与盟军协同作战的诚意和决心，也是应予肯

定的。

第三节　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一　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共同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不仅使中国四年多来独力进行抗日战争的状况有了改变，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成为中国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并被视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印度、朝鲜、越南等民族的独立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印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英国赖以与轴心国集团抗衡、挽回南太平洋战局颓势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而且也是缅甸失守后通往中国的惟一通道，对于中国抗战具有重要影响。从历史上观察，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是西方列强在远东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和英国侵略中国的战略根据地，印度如能获取独立，对于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彻底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9月26日和1938年1月9日，两天被确定为“中国日”，组织全印度的声援和捐款活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带头捐款500卢比，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印度人民“尽其所能，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并在全印度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38年9月，印度国大党派出由五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陕北，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9年5月24日和7月11日，尼赫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

互通信件致敬。1938年初，印度国大党还出版了《印度论中国》的小册子，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国国情，支持中国抗战，反映了国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已日益深入，成为国大党制订对华友好政策的理论基础[119]。

国民政府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1938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受到蒋介石和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120]。1940年11月，国民政府派遣戴季陶率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蒋介石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1941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121]

然而，当时的英印关系却十分紧张，以甘地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明确表示：如果印度不能获得完全独立，就不参加此次战争[122]。英国当局则对国大党的独立要求采取镇压的态度，日本人利用印度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乘隙而入，以亚洲盟主自居，鼓吹"大亚洲主义"和"黄色人种革命"，要把英美势力从亚洲驱赶出去[123]，表示愿意以实力支持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阴谋虽为国大党领导人拒绝，但却吸引了以前国大党主席鲍斯为首的一批人，他们策划成立"自由印度政府"，并暗中与日本人接洽。印度局势有日趋恶化的可能。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其目的有三：第一，出于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与英印当局商议开辟中印交通线、使印度成为援华军火的中转基地和生产基地，以及中印缅联合防御等战时合作事宜，并劝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暂时搁置立即实现印度独立的主张，支持英国对于德、日、意的战争；第二，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劝说甚至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蒋介石在临行前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指出：印度"由于受到西方国家长期之统治，又无经济、政治、社会之平等，当地人民可能认为吾人描述日军之残酷，仅只不过宣传。他们也许认为没有理由为防卫现

在统治者，对抗将来之统治者去作牺牲。如果他们要有必要之士气，忍受如中国长期经历轰炸与战争恐怖之苦难，则须使他们感到，他们自己有若干民族利益遭受危险”。呼请美国说服英国等在东方享有殖民利益的国家，“依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作政治上之改变，此对联合作战将有极大贡献。不然，如果敌方为本身目的，挑拨当地人民，则随战争之进展与时俱增”[(124)]。第三，通过访问印度，调解英印关系，提高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中的国际地位，潜意识中还存有成为亚洲领袖的愿望。

2月4日，蒋介石夫妇偕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由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陪同，由重庆飞经缅甸腊戍抵达印度加尔各答，8日转乘火车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14日，蒋介石赴拉合尔访问。16日起再访加尔各答，21日返回重庆。蒋介石夫妇的访印，得到英印当局和印度各党派两方面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归国后的一次演讲中讲到：“我们这次往访印度，印度的政府与各党派领袖对于我们都是十分诚挚的欢迎，无论谈话之间或其他一切行动表现都是真诚坦白，使我们十分感激！尤其是一般社会民众见了我们，如同见了他们自己的同胞国人一样，表示分外的亲爱与恳挚。”蒋介石特别提到：“当我们到新德里以后三天，尼泊尔王知道了我们到了印度，立刻派他在印度的王子特来向我们致欢迎，并将他自己猎获的一张虎皮赠与我国政府，表示他向慕念旧之意。后来我们从新德里再到西北边省——印度与阿富汗交界的地方去视察国防要塞，看到当地的西藏人、尼泊尔人，尤其是布丹人各族长老，有许多在80岁以上的老者，都来欢迎我们，表示格外的亲热。”他认为此为“此行所最感快慰，亦是平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125)]。

然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的收效却不似预期的那么如意。蒋介石与英方印度总督林里斯格等进行会谈，在中英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英方同意美国援华物资经印度孟买卸港，由陆路运往萨地

亚，再从该地空运中国云南；表示愿意说服西藏同意修筑康印公路，经由西藏运输援华军火进入中国；同意以租借方式援助中国军火器械（包括装甲车、大炮、战车防御炮、迫击炮、机关枪和无线电器材）等[126]，这些对于中国的抗战都是重要的支持。但协调印英关系的使命却是毫无进展。蒋介石在与林里斯格会谈时，坦言："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的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如果英国能够以美国对待菲律宾者来对待印度，那印度将来对英国不仅可以做今日的菲律宾，效忠美国，共同抵抗倭寇到底"；印度"将来必会做今日的美国对英国一样的与之同生死、共存亡，与日俱增，不愿意完全脱离与英国在政治上的关系"；"同盟国无论对德对日作战，印度一定可以作我们同盟国胜利的基本力量之一"，"在地中海、印度洋与太平洋上，发挥反侵略最大的功效"[127]，明确要求英国政府立即给印度人民自由，建立自治政府，"使印人愿意作战而不为敌人所利用"[128]。此番劝告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英印当局断然拒绝，他们认为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目下尚非其时"，"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逐渐地、部分地交还，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不仅不同意让印度完全独立，而且连自治领地位也不愿给予印度[129]。英印当局之所以欢迎蒋介石赴印，纯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说服印度各党派支持英国对德日意的战争，对于蒋介石的劝告非常不满，毫不客气地指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否曲直，并且是袒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这种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130]双方不欢而散。

另一方面，蒋介石与印度独立运动各党派的会谈亦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访问期间，蒋介石会见了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并不顾英方的反对，会见了正在软禁中的印度"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并进行长达五小时的长谈，蒋介石夫妇还广泛会见了印度政界、学界、妇女界的著名人士。这些会见加强了蒋介石与印度

各党派，尤其是印度国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向他们表达中国支持他们获取独立地位的明确立场，但对于印度独立的步骤，蒋介石却与国大党不同。蒋介石的基本主张是：一、印度在战时先取得自治领地位，战后实现独立；二、印度放弃“不合作主义”，暂停对于英印政府的攻击，积极参加反日联合战线等。而国大党方面则坚持英国必须立刻将主权交还印度国民，“不合作主义”是国大党惟一的武器，不能够放弃，并要求蒋介石对于英国施加某种压力[(131)]。双方亦无法调和。

蒋介石的访印，不仅未能促使英印关系有所好转，反而遭遇到英印双方的猜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132)]。21日，蒋介石在回国前夕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号召印度人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强调在世界两大壁垒之间“决无中立旁观之可能”，参加反侵略阵线“系在整个反侵略阵线中之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不合作问题”，婉转表达了对于印度国大党“不合作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俾更能发挥精神与物质无限之伟力”，并强调“此乃大不列颠帝国的有益无损且为最贤明之政策也”，向英国政府将了一军[(133)]。

尽管如此，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对于推进中印关系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2月22日，尼赫鲁发表演说，称颂蒋介石的访问“将影响中印两国的历史”，“吾人应勇往直前，以中国兄弟姐妹为楷模而鼓舞奋起”[(134)]。3月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为此发表评论，称：“中印两国是伟大民族，同具悠久的文明”，“在中国过去的抗战期中，你们时常给我们同情与鼓励，这是我们永远不忘的，现在侵略的狂焰，又临到你们的大门，你们已经决定与我们并肩作战，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远见和敏断，异常钦佩，对于你们的参加和合作，异常欢迎！”[(135)]

随后，蒋介石继续支持印度独立运动。2月24日、25日，蒋介石连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强烈认为：“如印度政治问题不立刻解决，则

危险只有与日俱增。如果英国政府等待，直到日机轰炸印度，印度士气瓦解，则为时已迟。如果等到日军进入印度之后，再来解决，无疑的，则为时更为晚矣。如日本知此真相，进攻印度，则彼等必可长驱直入，不致遭受抵抗。”[136] 6月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申述印度人民获得自由之重要，并保证自由印度之政府必同意同盟国家军队可留驻印度，并以印度为抵抗日人进袭之基地等，呼吁中方劝阻英印当局停止对于印度独立运动的镇压。22日，蒋介石两次电嘱正在美国的宋子文与罗斯福总统商议，最好由罗总统转达英国邱首相，“惟望美国政府对于此事勿太轻视”，印度问题“能否妥善之处理，实为同盟国在东方整个战局成败之所系，盖非仅英国一国之事也”[137]。希望由联合国，尤其是位居领导地位的美国来“阻止此一不幸情势发生”[138]。显然，蒋介石是利用印度局势的紧张，策动美国出面向英国施压，促使英国改变对印度政策，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然而，8月8日，罗斯福的复电却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虽对蒋对印度局势的分析表示同意，但又表示由美国出面奉劝英国政府与印度人民存在“困难”，并认为“目前最好不必采取阁下心中所拟议之行动”[139]。蒋介石与印度国大党继续保持联系，并曾邀请尼赫鲁等访问重庆，这使英印当局大为不满。

印度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8日，印度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退出印度”。9日，英印当局正式逮捕甘地、尼赫鲁等一大批国大党领袖，向全世界宣示英国决心维护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指出英国此举“对盟国在远东目标，将证明为一极大挫折，且对整个作战形势必有严重影响”；“如果事态任其进一步恶化，则轴心国之影响，必更为加强；盟国宣示作战之目的，世人将不再予以重视；而联合国公布之原则，其精神意义，亦将丧失殆尽矣”。呼吁美国采取有效步骤，以解决面临印度与世界之迫切问题[140]。另一方面，又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阐明中国立场，劝告英国政府以“恢然大度之姿态”，允许印度完全独立，“实无迫其铤而走险，掀起革命波澜之必要”，并警告说“若使印度不得不用革

命方式取得自由时，则英人在印之势力自然崩溃”等[141]。同日，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评《为甘地等被捕之事惋惜》，紧急呼吁“赶快结束印度的悲剧，谋取合理的解决”等。中国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罗斯福表示：“美国政府至今认为，此一争执，因素很多，不积极介入协调双方，也许更能有效发生影响。”[142]丘吉尔则对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指责中国干涉英国内政，宣称英国在中国的国共争端问题上“从未加以任何轻微之评判”，蒋介石如再干预印度事务，“将要承担严重后果”，声明他决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的调停”[143]。蒋介石的调停活动被迫告一段落。

在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中英间围绕着印度独立问题的交涉仍在重庆和伦敦等地进行。1944年下半年，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命拜会丘吉尔，指出：英国哪怕是做个姿态，就有利于盟国的共同事业，就能对各盟国全体人民以至被轴心国所占领的人民带来莫大的好处。丘吉尔仍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印度问题很复杂，应等到胜利之后再予解决，并表示一旦战局好转，他就要采取措施，为印度问题制订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两人的谈话形成书面文件，蒋介石同意将印度独立问题暂时搁置[144]。蒋介石对于印度独立问题的鲜明态度虽在战时并未帮助印度取得独立，却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二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是国民政府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如果说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采取某种特殊形式，那么中日战争爆发后，这种支持因中国实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而公开化、官方化。在援助方式上，国民政府继续战前的一贯做法，即同时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各个派系。

当时，在中国大后方国统区率领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政

治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国民党和韩国临时政府，1940年9月在中国官方支持下，成立韩国光复军，总部设在西安，下设三个支队，分赴山西、绥远、山东等地，发布宣言要“与友邦中国抗日大军并肩杀敌”，“不但调动白山黑水间枕戈待旦的三韩健儿和散在华北一带的白衣大群，更能以此国内的三千万革命大众闻风而起，冲断倭寇的铁蹄、锁链而遂行圣洁的天职”[145]；另一股是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1938年10月，经中国官方批准成立朝鲜义勇队，总部初设桂林，后迁重庆，下设两个区队，后扩展为三个支队，在抗战前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发布宣言要“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千百万朝鲜同胞，在朝鲜义勇队这面旗帜下集合起来，更联合法西斯军阀压迫下的一切民众，打倒我们真正的敌人——日本军阀，以完成东亚永久和平”[146]。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扶助，原则上仍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联络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临时政府，由军事委员会支持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其所领导的朝鲜义勇队。中国官方的援助包括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经济上的援助和供给、军事上将该国抗日武装列入中国军队序列和共同作战等，朝鲜独立运动由此声势大振，为战后朝鲜的独立准备了舆论，培养了干部，奠定了基础；朝鲜侨民的反日斗争，特别是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战场的出现和活动，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朝鲜独立问题变为指日可待的现实。1941年12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政府对日宣战的次日也发表对日宣战书，声明韩国人民决心参加反侵略阵线，与轴心国作战到底。该政府主席金九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外务总长赵素昂致函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表示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中国对日宣战及其获得最后胜利而完成[147]。1942年3月1日，重庆朝鲜侨民举行盛大集会，并以会议名义致电中、美、英、苏四国元首，要求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准予韩国以第二十七个参战国资格加入同盟国对日作战[148]。

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中国官方适时对援朝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就饬令中国军事委员会从速拟定援助朝鲜在华独立复国运动的方案[149]。军事委员会奉命拟定了《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1942年7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百〇六次会议讨论了援朝问题，决议推举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传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以及蒋介石侍从室负责人与朝鲜独立运动有深远历史关系的陈果夫七人组成专案小组，由吴铁城、王宠惠任召集人，通盘研究援朝政策的调整和强化。这个小组集中了当时中国党政军的重要大员，对于国民政府的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权威性。8月1日，该小组举行首次会议，以军事委员会的草案为蓝本进行讨论[150]。17日，该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特邀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立法院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孙科以及蒋介石重要幕僚陈布雷参加，使对援朝问题的讨论在财政上更加具体化，在决策上更富可行性[151]。23日，该小组将两次讨论的结论及援朝方案呈报蒋介石[152]。12月27日，蒋介石核准该方案，第一次形成了中国官方援朝政策的正式文件[153]。其基本精神是：将援朝政策的重点从扶助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转移到强化朝鲜独立复国力量，帮助战后朝鲜实现独立，并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试图扶助该临时政府成为朝鲜独立后亲华的正统政府。根据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援朝工作。

首先，中国官方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独立列为援朝工作的首要目标。在国民政府看来，争取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不但是由于中朝历史关系的悠远久长，也是战后维持远东和平的需要，更是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运用一切政治的、外交的，或民间的、舆论的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战后立即给予朝鲜独立。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中国将

支持朝鲜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强调说明支持朝鲜独立是中国的国际义务而不是权利[154]。1943年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公开撰文主张战后朝鲜应该立即独立，该文指出："朝鲜为日本大陆侵略之跳板，其独立之被侵，为甲午战之起点，为日俄战之诱因，且亦为太平洋战争之远因，故其独立重建应为目前中日战之归宿，事实上殆亦已成为同盟国协同作战之一共同目标。"[155]该文被国际舆论认为系代表中国政府之见解，美国驻华大使曾将该文全文电报美国国务院。7月26日，蒋介石在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时，直率表示："韩国之在战后应予独立，系中国政府之决定政策。"[156] 8月，外交部长宋子文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发表类似谈话，表示"中国希望于日本战败后，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并使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57]。在中国官方的舆论导向下，中国新闻媒体也形成了呼吁给予朝鲜独立复国的热潮。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着眼于自身的安全和未来亚洲的和平秩序，主张战后朝鲜应立即独立。如重庆《大公报》的社论《论朝鲜独立》，指出中国抗战"是五千年来的空前大战，中国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赌国族的命运"，其"抱负的目标"，即是要"抗战到底"，这个"底"字就是要"回复完整的中国"和"独立的朝鲜"，强调朝鲜独立问题是"远东的百年大计"[158]。

同时，中国官方也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韩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成立后，二十余年间曾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长期支持，虽然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国际环境以及该政府自身时分时合、未能获得朝鲜独立运动团体全体支持等因素，未为中国官方承认。然而，该政府毕竟是朝鲜独立运动数十年奋斗的一个象征，如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战时可以由该政府组织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各团体，努力于朝鲜的独立复国事业，在朝鲜独立后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与中国友好的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趋向积极。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演讲中高度评价韩国临时政府，称它"已有二十三年革命奋

斗的历史，与欧洲的流亡政府不同。它成立时是代表韩国民族，到今天还是代表韩国民族。韩国国内虽有不同的党派，但是却没有第二个临时政府。美国数万的韩侨，最近开会也是拥护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在苏联的几十万韩人，东三省几百万韩人，也是一样拥护这个临时政府，这足证明韩国几千万人民的意志”。孙科首次公开主张目前“最重要的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我们承认了之后，英、美一定会继起承认，将来苏联也会承认。这样临时政府力量更大，更能领导韩国人民，以重庆为中心，一步一步努力完成复国的事业。这样，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但可以恢复几千年来的关系，当然更趋密切，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159)]。孙科的演讲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虽有过分之处，但体现了国民政府的意向，对于当时的舆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高层人士在两次讨论援韩问题的会议中，曾反复探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终因顾忌“承认得太早，英国不痛快，美国亦受影响，承认得太迟，则恐苏联有阴谋”[(160)]，从而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承认”该政府的原则。

与中国朝野的活动相呼应，韩国临时政府自身也积极开展活动，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地位。1942年6月12日，该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在重庆会见记者，呼吁各同盟国“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在物质上援助韩国”，尤强调承认该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回忆上次世界战争，因扶助中欧弱小民族之解放，故能战胜德国”；此刻在伦敦已有九个流亡政府为英国政府承认，“这都因为以政略为前提，而不是局限于法律观点上的斤斤计量”；韩国占有日本“二分之一的人力与价值一千万万的物资供给”，“最有效的办法，莫如承认韩国政府，援助韩国政府，使庞大的人力与物力，不仅不供敌人利用，且可为同盟国战胜日寇的一部分力量的泉源”[(161)]。

中国官方就此与美、英、苏等国进行外交交涉，争取他们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然而，美、英等国却取反对态度。1942年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复函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美国无意立即

承认韩国团体，理由是韩国旅华各团体既不能互相合作，亦未能获得韩国内地人民的支持，同时亦必须顾忌到在美各韩侨团体，以及在苏联西伯利亚一带由苏俄所支持的韩人团体。1943年5月，美国国务院主管官员再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表示，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目前最好搁置不谈。英国政府顾忌它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担心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将引起连锁反应，采取消极态度。苏联则根本不理睬中国方面的征询，积极组织旅居俄境的韩国侨民，准备战后在韩国另建政权[162]。

为了使韩国临时政府能早日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中国官方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化该政府。首先，中国方面从组织上改变了以往援朝工作政出多门的现象。当时中国官方涉及援朝事务的机关有蒋介石侍从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政治部、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国民政府外交部等，各方意见的不一致，常常导致援朝工作出现混乱，并增加了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间的矛盾和冲突。1942年12月27日，经蒋介石批准，派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和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为实施援朝工作主持人，规定今后有关援朝问题，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党务，统由他们协议办理[163]。

朝鲜独立运动的致命弱点自始即是其内部各党派间的四分五裂。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期间，虽经中国官方再三施加影响和劝说，但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仍然只限于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对于该政府始终抱“不关政策”，另一些朝鲜独立运动团体更是公开指责该政府“有害于朝鲜复国革命”，“没有群众基础”，“缺乏统治权力及形式”等[164]。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中国援朝政策的实施。中国官方决定将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援助由原先的多党运用原则，改变为扶助以金九为主席的韩国临时政府为主的方针，采取多种措施来强化该政府的建设。

中国官方采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措施是改变援朝经费的发放办

法，改原来的多党并进为以韩国临时政府为惟一对象，对其他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不再单独给予经费资助，以促成金若山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参加韩国临时政府，这一变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2年5月15日，在中国官方的推动下，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并编入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韩国光复军，由中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在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由金若山担任，并将原朝鲜义勇队改变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支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奭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不动，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165]。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也极力劝说韩国独立党开放政府，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以对韩方贷款是否兑现为条件，敦促金九等人扩大临时议政院、临时政府等，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的领导人金若山、金奎植等加入政府，希望该临时政府能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代表，真正成为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独立复国意志的合法政府。这一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42年10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在重庆举行第三十四届议会，补选缺额议员，开始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左派集团成员，并增加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金奎植、张建相等为临时政府宣传总长、学务总长以及六个部的副总长，初步实现了左右两派在临时政府内部的合作[166]。11月28日，韩国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了《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确定以“三均主义”为“韩国建国精神”和临时政府的最高理想：“实施普遍选举制度，以均政权；采用国有制度，以均利权；采用免费教育制度，以均学权。”该纲领将朝鲜独立运动划分为复国和建国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划分三个时期，并确定各个时期的基本历史任务[167]。这个纲领吸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欧美的三权分立制度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成分，并综合近代朝鲜的改革思想而成，反映了朝鲜民族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观念，使韩国临时政府的政府形态进一步完备。

中国朝野的共同努力，为确立战后朝鲜独立地位造成了有利的态

势。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首脑会议，在中国的坚持下，终于以“我三大同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时机使朝鲜自由与独立”的文句，载入《开罗宣言》之中，从而正式确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实施援朝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然而，中国官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努力却未取得进展，在与美、英、苏等国交涉碰壁后，反为同盟国联合行动规约所制约，迟迟不能在是否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作出决断，坐失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最佳时机[(168)]。

三　援助越南独立运动

中国官方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情况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各有特色。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至孙中山与越南独立运动先驱、越南国民党创始人潘佩珠的密切交往。1903年潘佩珠就在中国粤桂滇各省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经梁启超介绍东渡日本组织光复会，并得晤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甚得孙中山同情与支持，建立了相互间联系。1909年后，潘佩珠长期在上海从事反法独立活动，并将光复会改组成为越南国民党。1925年因广州发生越南志士范鸿泰谋刺法国越南总督事件，潘佩珠在上海被法租界当局诱捕解返河内，长期关押。但中国国民党与越南国民党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一批越南革命青年获准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为越南光复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1930年越南国民党在安沛举行反法起义，惨遭失败后将活动重心移往中国。越南国民党在南京设立该党中央干部委员会海外办事处，并在中越边境地区设置分支机构，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包括在经济上每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资助经费200元[(169)]。这与中国国民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党派的做法基本相似，体现了中国国民党援助周边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态度。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做法却与援助

朝鲜独立运动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在领导体制上，在大后方的朝鲜独立运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接操纵指挥，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主要由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联络指导，由于担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对待越南独立运动的理念以及对待各党派的态度上有所区别，使得中国方面对于越南共产党系统的反日、反法独立活动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其次，在活动地域上，受中国国民党援助的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总部都设在重庆，活动则遍及各战区，而越南独立运动主要活动于中越边境的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其活动的地域与范围远小于前者；其三，在活动内容上，朝鲜独立运动兼具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与争取朝鲜独立的双重使命，尤其是战争前期，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实际上成为参加中国抗战的国际纵队，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而越南独立运动的使命则集中于争取自身独立的事业，其参加中国抗战的声势和影响不如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其四，在与国内联系方面，朝鲜独立运动由于远离国土，与国内人民联系不足是其最重要的缺陷，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与国内人民的反法反日斗争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建有根据地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其主要领导人时而回国内，时而来中国，将境内外的反法反日独立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他们战后在国内获得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越南独立运动党派主要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两派。越南国民党主要活动在云南，自称："根据三民主义为革命指针，与中国国民党保持齐一之步伐，探求东亚之光荣与和平，恢复祖国山河。"对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该党取拥护态度，"一面派同志投效军旅，上前线抗日；一面派同志返边界，秘密活动，向越南民众宣传，使之拥护中国抗战国策，更为扩充工作，并进一步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计，中央即派干部同志返滇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1941）。越南之环境虽数经变易，而国民党始终坚持一宗旨，无论何时皆能镇定依计划而

行动，深信惟有中国获胜，越南革命始有成功之希望也”[170]。他们的抗日独立斗争得到了中国地方军政当局的支持和帮助。

越南共产党在中越边境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1938年秋从苏联来到中国延安。年底，以八路军军人的身份随同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南下桂林，任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参加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新闻台少校台员。随后又赴贵阳，参与创建八路军贵阳办事处，并曾到过重庆。1940年2月，胡志明来到昆明，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与印支共产党海外部接上了关系，成为其核心领导人物。该党海外部及其基层组织以“越南民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名义，在滇越铁路沿线各地进行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揭露法、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罪行，广泛发动越南侨胞拥护和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反日、反法斗争主要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但也未与中国地方当局发生摩擦或冲突[171]。

1940年6月20日，德军占领巴黎，法国向德国投降。9月22日，法国越南总督被迫与日本签订《越日协定》，允许日军在海防登陆及借用北越三处飞机场，法国的战败与对日本的屈服，使其在越南民众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也摇摇欲坠，给越南独立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中国军方开始为中国军队入越作战进行准备，也希望加强与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之间的联系，其时正在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胡学览（越南共产党系统）和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张佩公（越南国民党系统）为中越双方的合作起了铺路架桥的作用。

在中国军方的支持和帮助下，越南独立运动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国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越南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1940年10月，越南独立同盟会办事处在桂林成立。该会于1935年7月在南京成立，曾向中国政府登记，此次组建系恢复性质，经李济深批准，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公开活动的机会。胡学览任主任，林伯杰（范文

同）任副主任，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的联合战线组织，越南共产党在其中占有优势。该办事处曾领导了越南国内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北山、南圻、助江暴动[172]。1940年12月，越南共产党胡志明等又与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共同发起建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并依靠这一组织进行公开活动，呼吁中国和国际进步力量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173]。1940年12月，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柳州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其成立宣言称：“日本军阀与法国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坏东西”，号召越南各民族“立即行动起来，挣脱这双层的奴隶的锁链”，“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为表率，高举我们民族革命的旗帜”，“为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等[174]。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是利用张佩公与中国军方的密切关系，以张佩公主持的边区工作队的名义，举办越南干部训练班，培训越南独立运动的干部队伍。1941年4月，在该委员会基础上，又建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以“亲华、反法、抗日”为宗旨，主张“联合越南一切民族革命力量，组织成为一坚强整个革命阵营；同时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一致打倒法、日帝国主义，以达到越南独立、自由与领土之完整”等[175]。

1941年2月，越南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胡志明等返回越南活动。5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印支共产党（即越南共产党）第八次会议在高平省北坡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成立越南独立同盟战线（下简称“越盟”），将各群众组织改组为救国会，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19日，“越盟”正式建立，这是一个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反抗法日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为越南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领导中心[176]。6月6日，胡志明署名“阮爱国”，发表致越南全国同胞号召书，指出“民族解放问题高于一切，我们要团结起来！为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我国人民，同心合力打倒日、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77]“越盟”当时主要在越南国内活动，其活动区域是高平、谅山、北圻等省的边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自成立至1944年4月的三年间，与中国官方并无联系。越南共产党虽仍在中国境内活动，但并未

使用“越盟”的名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态度趋向积极。1942年3月2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主张越南应该获得独立，他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一项“太平洋宪章”，保证联合国承认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的独立地位。此一意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也激励了越南独立运动志士的斗争情绪。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积极主动地联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为此，决定约请越南革命领袖轮流草拟演讲稿，每周三次，在国际电台向越南民众广播，报道同盟国家的重要消息，加强对于越南的宣传工作[178]。并鼓励原在云南活动的越南国民党人到抗敌前线广西来活动。

在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直接协调和指导下，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于1942年7月在广西柳州建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筹备委员会”，推选越南老革命党人、长期在中国军界任职的阮海臣为主任委员。参加的党派有越南国民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越南复国同盟会以及无党派人士。10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越南国民党在领导层中占据优势地位。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为常务委员，阮海臣、张佩公、武鸿卿、杨清民、陈豹、农经猷、严继祖分任秘书、军事、组织、训练、财务、交际组长，严继祖、武鸿卿、陈豹分任东兴、靖西、龙州办事处负责人，并在昆明设有分会。出版宣传刊物越文版《越魂》和中文版《湄公怒潮》[179]。该同盟会政纲规定：其最高目的“在联合全越民众及中国国民党，打倒日法帝国主义，恢复越南国土，建立自由平等之民主国家”；“为达成此目的，决以全越民众力量与中国国民革命军并肩作战，以驱除日法帝国主义者，肃清一切侵略势力”；“须联合各同盟国家如中美英苏等国，尤其是中国，切求其援助，以建设越南民主国”等。其组织纲要分列总则、中央委员会、省会、县会乡会、小组、附则六章，较为完备地规定该同盟会严密的组织系统[180]。

中国军方与该同盟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该会成立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援助越南党人争取独立，对该会派有指导代表，负责与该会联系，并为之解决问题。指导代表初由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兼任。1943年5月梁调职，由侯志明继任。12月，为进一步加强对于该同盟会的指导和帮助，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亲自兼任，侯志明任副代表，张发奎又将指导权交付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谋、外事处副处长萧文（处长由张自兼）“全权负责”[181]。1944年初，第四战区奉命改编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二方面军，仍由张发奎任司令长官，但原战区外事处却面临裁撤之危险。3月，经何应钦总司令批准，对越指导工作仍请张发奎继续担任，并决定“外事处全部保留，并加强实际工作”[182]。中国军方由张发奎负责指导对该同盟会工作的体系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越南国民党之间也不断进行联系。1942年1月，越南国民党海外执行部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送呈《越南国民党行动计划大纲》和《工作概况》。希望“加强贵国党政当局与本党之联系，希派明了越情及越语之人员专驻开远或昆明，与本党经常接触，负责指导本党工作，传达上级机关法令与转达本党向贵党当局呈报之意见及情报”等，提出该党每月各种费用不下五万元，若工作继续扩大，则所需当必逾此数，恳请“贵党部体察本党处境之困难，优加津贴”等[183]。1943年9月13日，越南国民党中央海外执行部常务委员严继祖、武鸿卿、周伯凤呈文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转呈蒋介石，对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因权利问题互相暗斗，有因工作意见各走极端”，“与过去十余年间各党派互相倾轧情形如出一辙”，提议“组织越南革命行动委员会，集合越南之热血青年及有为干部，加以组织训练”，并主张该行动委员会“拟由本党直接指挥，仍隶越南革命同盟会，务使权力集中，指挥统一，争取工作之高度效率”，要求国民党中央“派员主持组训事宜”，至同盟会各党各派“仍拟由指导机构加以整顿调和，使不致分散革命力量或阻碍革命事业之开展。”[184] 随即，该党迅速提出

了《越南革命青年行动委员会会章草案》和《会员训练大纲》[185]。次月，该党海外执行部又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送呈了《越南国民党现阶段革命方略》等重要文件[186]。现有的档案资料中，虽未发现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越南国民党提案的回应，但仍可断定中国党、军机关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分头指导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表现得尤为明显[187]。

1943年底，张发奎亲自兼任对越工作指导责任后，设置了一个“指导代表办公室”，加强对于援越工作的领导，并着手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以扩大其群众基础，壮大越南独立运动的力量。由于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对越南国内活动方面未能有所作为，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为配合入越作战，急需协助越南革命力量回越活动以为响应，遂逐渐看重1941年8月重返中国的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盟”在国内的力量[188]。当时胡志明尚为国民党地方当局囚禁之中[189]。张发奎决定释放胡志明，并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改组工作。1944年3月，“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在柳州举行，并重组领导核心。张佩公、张中奉、陈豹、蒲春律、严继祖、黎松山、陈廷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为监察委员，胡志明、阮祥三当选为候补委员[190]。该同盟会改组后，越南共产党势力大增，而越南国民党的影响力却有所下降，甚至发生了越南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被强行改组，越南国民党领导人严继祖和武光品被第四战区逮捕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中国国民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但已造成越南国民党在该同盟会中的失势[191]。

1944年6月，胡志明与从越南来到柳州的黄文欢见面，根据越南国内革命形势，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在中国军方的支持下回国活动，直接领导越南的独立解放事业。胡志明迅速向张发奎提出了《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其工作目的是：一、传达中国政府扶助越南民族解放的决心；二、发展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与力量；三、置策

应入越之华军与其他盟军之准备工作；四、越南之完全独立自由。其工作纲领是：一、领一部干部人员秘密潜返越境自龙州至平孟一带，先行观察及实施计划展开之工作；二、在东兴秘密召集一部忠实能干人员，开设一个短期训练班，授以尔后工作的方式与技能；三、曾经训练的人员，以秘密及武装公开式的宣传去号召人民，领导人民；四、国内各党派团体，并促进其团结及参加同盟会，筹开全国代表大会，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五、游击根据地等，并详细拟订了组织实施、宣传实施、训练实施的方案，编制了经费预算[(192)]。该计划大纲深得张发奎赞赏，在报送中国最高当局批准后，付诸实施。8月9日，胡志明率领战地工作总队十八人入越从事策动工作，中国军方提供入越旅费五万五千元、补助费一万元，招致越南青年来柳受训旅费一万元以及护照公文药品等[(193)]。由此，“越南独立同盟”在国内开创了越南独立运动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在第四战区受到压抑的越南国民党人却加强了与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直接联系和求援工作。中国官方内部环绕着援越方针的争执也日趋尖锐。当中国国民党越南支部领导人严继祖等被捕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连电张发奎催促放人。中国国民党对越工作负责人邢森洲在给中央秘书处的报告中严厉批评第四战区的援越工作：“现在越南共产党之势力，蔓延全越。彼以苏联为背景，与中国政策及本党主义相违背。虽能联络应用，不但于吾人不利，且将利用吾人为跳板，阴贮实力，他日必倒戈相向。是故目前援助越南革命，一面树法为敌；一面受共产党之利用，不得微利，徒遭大害耳！”[(194)] 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第四战区援越工作的实际主持人萧文尤为不满，但张发奎却针锋相对地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称赞萧文的援越工作“努力迈进，艰苦备尝，勤劳卓著，其奋斗精神实堪嘉尚”，呈文“将其在越工作成绩分条报请主席核奖”等[(195)]。

1945年3月9日，越南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向越南法军发起进攻，法军投降，日本占领越南全境。31日，安南逊王保大在日

本的操纵下，宣布“独立”，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新伙伴。这一形势给“越盟”在国内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时机。越南共产党中央迅速举行会议，认为该事件所造成的危机，正可以促进越南人民武装起义时机的迅速到来，号召越南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所建立傀儡政权，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196]。“越盟”领导的武装兵分三路，由北向南推进，队伍迅速壮大，并在高平、谅山、河江、宣光、太原等省区建立了地方政权。越南局势的骤变及“越盟”的迅速发展和“失控”，使中国国民党中央大为震惊，其援越政策的重心再度转向越南国民党，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直接操纵指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推吴铁城、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陈庆云、彭学沛、李宗黄、蒋梦麟八委员研究越南问题，由吴铁城召集。1945年6月14日，该委员会会商越南问题，并议决援助越南独立运动之方针及步骤。其方针是：一、保护我西南边境安宁；二、保护我旅越侨胞安全；三、打破越南共产党控制越南之企图；四、扶助越南独立。其援助步骤有：探询法国现政府对越南各党派所采态度、派员赴越调查实情、促进各亲华党派团结合作、成立负责策动援越事宜的专门机构、拨给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枪械、设法使滇桂士兵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及越南国民党军队等。但这一方案因外交部认为有再考虑之必要，蒋介石亦赞同。可能是考虑国际形势之变幻莫测，以及顾忌同盟国对于法国在越南地位之态度，遂被搁置，但中国官方抑制越南共产党、扶植越南国民党的工作方向已经确定。

1945年6月7日—25日，越南国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由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多次进行会谈。越南国民党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请求书》中，提出两项“最紧急之援助”要求：第一，准予接济国内革命军之枪械，即刻在北圻上游各地发动对敌战争，最低限度步枪10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20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60挺、手榴弹2000颗、电台4部等；

第二，在中国援助该党成立一队革命军，配备齐全，以便应战，要求按月补助经费400万元，赐发步枪15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5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100挺、手榴弹3000颗、电台2部等[197]。蒋介石在会见代表团时，明确表示："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得到独立自由"，但同时又提及同盟国关系问题，指出："国际情形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须与英美研究"，并表示"中国政府现时尚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立，接济武器是小问题，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中国所使用之武器，亦多来自美国，故须与美国详细研究"等[198]。吴铁城在与代表团会谈中，强调"最重要者，越南本身如无大规模之革命运动发生，造成新的印象，使联合国注意，则独立将为不可能之事，中国不但希望越南获得独立，并愿意帮助越南独立，希望越南革命同志努力"；指出"越南各党派意见纷歧，殊为不幸，至少在敌人未驱出国土、独立尚未完成之时，应相互容忍，不宜意气从事"；并建议"贵代表团最好一部分先行返越，告知越人以新的希望及指示各种准备工作，以便到时协助盟军驱逐敌寇，一部分可暂留，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切取联络，将来随军进入越南"等[199]。蒋介石、吴铁城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官方既想支持和帮助越南实现独立，又顾忌同盟国关系以及战后法国在越南地位问题而不敢放手以实力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微妙立场。

---

(1)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9—721页。

(2) ［日］服部征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0页。

(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

供应社1981年版，第148—150页。以下简称《战时外交》。

(4)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71—172页。

(5) 《战时外交》（一），第149页。

(6) ［英］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下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00—901页。

(7) 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1941，Japan*，Washington，1943，Vol．2，pp．768-770．以下简称*FRUS*。

(8) Cordell．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pp．1086-1087．

(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第741-743页。

(10)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2年版，第1614—1615页。

(1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42页。唐纵此时任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6组组长，他在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美日之战“当在本月六日以后，明年以前发动”。

(12) 《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83页；《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97—200页。

(13) 《战时外交》（三），第41—42页。

(14) 《战时外交》（三），第43页。

(15)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285页。

(16)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卷第二分册，第162—163页。

(17)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85页。

(18) 《战时外交》（三），第45—53页。

(19) 《战时外交》（三），第57、60页。

(20) *FRUS*，1941，Vol．4，p．7．《战时外交》（三），第59页。

(21) 《战时外交》（三），第73—74页。

(22)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页。

(23) 《战时外交》（三），第55、78—79页；《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299—300页。

(24) 《战时外交》（三），第82—92页；《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301—303页。

(25) 《战时外交》（三），第92页。

(26) ［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页。

(27) ［美］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28)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4—36页。

(29) 《事略稿本》（1942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5页。

(30) 《战时外交》（一），第699页。

(31) 《战时外交》（三），第96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24页；C．F．Romanus & R．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1953，p．62．

(32) 《战时外交》（三），第97页。

(33) 《战时外交》（三），第98页。

(34) 《战时外交》（一），第635页；《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35) 《战时外交》（三），第99页。

(36) C．F．Romanus & R．Sunderlans：*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p．64-70．

(37) 《战时外交》（三），第109—111、113—114页。

(38)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7—28页。

(39) 《战时外交》（一），第323页。

(40) 《战时外交》（三），第90页。

(41) 《战时外交》（一），第324—326页。

(42) *FRUS*，1942，China，pp．423-428．

(43) *Morgenthau Diary*，*China*，Vol．1，p．592；《战时外交》（一），第327—330页。

(44) 《战时外交》（一），第331—332页。

(45) *FRUS*，1942，China，pp．442-443；*Morgenthau Diary*，*China*，Vol．1，pp．632-634．

(46) 《战时外交》（一），第332—333页。

(47) 《战时外交》（一），第336—337页。

(48) 《战时外交》（一），第340页。

(4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08页；《战时外交》（一），第339—343页。

(50) 《战时外交》（二），第259页。

(51)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1月5日、8日），《顾维钧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第56盒。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页；《战时外交》（二），第260、263页。

(53) 《战时外交》（二），第263—266页。

(54)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2年7月20日），《顾维钧文件》，第56盒。

(55) 《战时外交》（二），第267—270、288—29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1—12页。A．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Harvard，1964，pp．232-234．

(56) 《战时外交》（一），第503页。

(5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48—1250页。该协定又称《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58) 《战时外交》（一），第505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69页。

(5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97页。

(60)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载《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战时外交》（三），第49页。

(61) 《战时外交》（三），第48—49页。

(62) 《战时外交》（三），第61—64页。

(63)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291页。

(64)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301页。

(65) 《战时外交》（三），第83—85页。

(66)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3页。

(67) 《远征印缅抗战》，第35页。

(68) ［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第79—80页。

(69)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九册，台北1990年版，第23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70)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9册，第230页；《远征印缅抗战》，第12、85页。

(71) 《蒋介石致何应钦、徐永昌电》、《蒋介石致徐永昌电》（1942年1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13页。以下简称《作战经过》。

(72) 《蒋介石致甘丽初电》（1942年2月3日）；《蒋介石致龙云等电》（1942年2月14日），《作战经过》（三），第226—227页。

(73)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41—242页。

(74) 《蒋委员长在腊戍对入缅作战军高级官长训话》，《作战经过》（三），第228—236页。

(75) 《作战经过》（三），第221—226页。

(7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3月9日）、《宋子文致蒋介石

电》（1942年3月12日），《战时外交》（三），第121—122页。

(77) 《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3月10日、11日），《作战经过》（三），第238—240、252页。

(78) 《作战经过》（三），第254—261页。

(7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152页。

(80) 《林蔚致何应钦、徐永昌电》（1942年3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6页；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17页。

(81) 《史迪威签发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命令》（1942年3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91—1392页。

(82) 《杜聿明致蒋介石》（1942年3月2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07页。

(83)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缅甸作战》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页。

(84) 《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1942年版，第4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55页。

(85)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56页；《蒋介石致林蔚转史迪威、杜聿明电》（1942年3月27日），《作战经过》（三），第270页。

(86) 《缅甸作战》上册，第62页。

(8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0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57页。

(88) Romanus &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GPO，1953，pp．108-109；《缅甸作战》上册，第64页。

(89)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59页。

(90) 《缅甸作战》上册，第78页。

(91) 《作战经过》（三），第279—282、290页。

(92) 《抗日战史》第9册，第265—266页。

(9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5—1417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3页。

(94) 《林蔚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16日）、《杜聿明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6—1417页。

(95)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71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5页。

(96) William Slim：*Defeat into Victory*，London，1956，p．68．

(97) 《罗卓英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9页。

(98) 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仁安羌大捷》，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25、37页。

(9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154—155页。

(100)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72页。

(101) 《作战经过》（三），第292页。

(102) 《林蔚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18、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4页；《抗日战史》第9册，第275页。

(103)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载《远征印缅抗战》，第8—9页；《战时外交》（三），第49页。

(104) 《杜聿明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2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23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9页。

(105) 《抗日战史》第9册，第280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9页。

(106) 《蒋介石致罗卓英电》（1942年4月24日），《作战经过》（三），第299页。

(107) 《远征印缅抗战》，第162、300—304页。

(108)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96页。

(109) 《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2年5月7日），《作战经过》（三），第315页。

(110)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97页。

(111) 《杜聿明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15日），《作战经过》（三），第329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36—1437页。

(112) 戴广德：《缅甸之战》，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0—32、40—44页。

(113) 《远征印缅抗战》，第224—232页。

(114) 《远征印缅抗战》，第262—264页。

(115)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81—284页。

(11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26页。

(117)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1942年4月18日，第373页。

(118)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09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91页。

(119) 参见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74页。

(120) 尼赫鲁在访华期间，不仅拜会国民党军政要人，受到蒋介石夫妇的设宴欢迎，而且也会见了中共驻重庆的高级干部以及社会各界名流。毛泽东曾代表中共致函欢迎，并邀请他去延安访问。林承节评价此行为“中印两大民族合作的新里程碑”。

(121) 胡春惠：《中华民国对韩、印、越三国独立运动之贡献》，《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2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30—431页。

(122) 吴俊才：《甘地与现代印度》（下），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123—124页。

(123)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引自《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285页。

(124)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2年1月7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再版，第422—423页。

(125) 《蒋公自述：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377—378页。

(126) 参见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27) 《蒋公自述：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382—383页。

(128) 《战时外交》（三），第357页。

(129) 《战时外交》（三），第354页。

(130) 《战时外交》（三），第356页。

(131) 参见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32) 对于蒋介石访问印度失败的原因，陈谦平分析了五点：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政策；印度内部严重的教派与种族冲突；印度国大党人坚持不让步；蒋介石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导致举措失当；美国政府的拒绝调停等。

(133) 《战时外交》（三），第431—433页。

(134) 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0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135)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册，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86年印行，第5011页。

(136) 《蒋委员长致宋子文电报，嘱转报罗斯福总统》（1942年2月24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4页。

(137)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册，第5180—5184页。

(138)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2年2月25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5页。

(139) 《罗斯福致蒋委员长电》（1942年8月8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8页。

(140)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2年8月11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9页。

(141) 《战时外交》（三），第476—480页。

(142) 《罗斯福致蒋委员长电》（1942年8月12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30页。

(143) 《战时外交》（三），第485—487页。

(14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25—26页。

(145) 范廷杰：《韩国革命在中国》，台北《传记文学》，第27—29卷。

(146) 《朝鲜义勇队成立宣言》（1938年10月10日公布）。

(147)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台北1985年刊印，第281—283页。

(148) 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3月2日。

(149)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陷川侍六代电》（1941年10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0) ［韩］爱国同志救护会：《韩国独立运动史》，檀纪1989年2月5日刊印，第370页。

(151) 《中央商讨朝鲜问题第二次会议记录》（1942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2) 《中央党部吴铁城秘书长上蒋总裁特6385号快邮代电》（1942年8月2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3) 《军事委员会第6948号快邮代电》（1942年12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4) 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4日。

(155) 邵毓麟：《如何解决日本事件》，重庆《大公报》1943年1月3日。

(156) 《韩国临时政府宣传部长金奎植对旅美韩侨广播演讲词》（1943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7) 重庆《大公报》，1943年9月19日。

(158) 重庆《大公报》，1943年10月12日。

(159) 孙科：《韩国独立问题》，《孙科文集》第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848页。

(160) 《商讨朝鲜问题会议记录·戴传贤发言》（1942年8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61) 《新华日报》，1942年6月13日。

(162)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0页。

(163) 《中央党部吴铁城秘书长上蒋总裁特5259号报告》（1942年12月1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64) 如松：《朝鲜义勇队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纠正两种错误的认

识》，《朝鲜义勇队通讯》第37期。

(165) 范廷杰：《韩国革命在中国》，《传记文学》第27—29卷。

(166) 重庆《大公报》，1942年10月26日。

(167) 该纲领规定：朝鲜复国运动第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宣布独立，确定行使国号，建立临时政府及议政院，颁布临时约法及其他法规"，"以三均制度唤起民族的革命意识，集中海内外民族革命力量，实施光复运动之总动员"，编组强大的光复军，"实行对敌血战"；第二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恢复一部分国土，而党政军机构转奠于国内"，"尽一切手段，扩大并强化大众反抗、武装斗争及国际外交宣传等之独立运动，以扑灭倭寇之侵夺势力"，并"联络同情及援助我国独立运动之民族与国家，扩大光复运动之力量"；第三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完全夺还被敌并吞之国土、被奴役之人民、被侵占之政治及经济、被抹杀之教育和文化"，"准备建国任务所必需之人才、法令及其他计划"等。参见金恩忠：《韩国独立党三均制度之铨释》，第113—119页。

(168) 国民政府如能在开罗会议决定战后给予朝鲜独立地位后，果断地、自主地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然后再以强有力的态度与美、英等国进行交涉，不失为一着好棋。而在豫湘桂战役后，由于中国战场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路下落，最终基本失却了在战后朝鲜独立问题上的发言权，中国虽列名所谓"四强"，实际上成为美、苏、英决定朝鲜问题后的被通知者。

(169) 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卢汉：《越南政治党派概况》（1945年12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70) 《严继祖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报告》（1942年8月16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71) 参见黄铮：《胡志明与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3—65页。

(172) 参见黄铮：《胡志明与中国》，第68页；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123页。

(173) 参见桂林《扫荡报》，1940年12月9日。

(174) 《桂林日报》，1940年12月28日。另据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考订，该委员会并未真正建立，只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175) 梅公毅：《越南新志》，第83页，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

国》，第127页。

(176) 黄文欢：《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转引自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第80页。

(177) 胡志明：《国外来信》，《胡志明全集》第1卷（中文版），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232页。

(178) 《王之五报告》（1941年12月21日），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72页。

(179) 《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代表梁华盛报告》（1942年10月24日、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0) 《越南革命同盟会会章、政纲、组织纲要、工作纲领》（1941年10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1) 《侯志明致蒋永敬信》（1966年9月1日），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71页。

(182)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第四战区改编与对越工作近状》（无日期），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3) 《越南国民党海外党执行部工作概况》（1942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4) 《严继祖等呈文》（1943年9月1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5) 《越南革命青年行动委员会会章草案》及《会员训练大纲》（无日期），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6) 《越南国民党现阶段革命方略》（1943年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7) 1999年8月—9月，笔者曾赴台湾访问，详细查阅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台北“国史馆”的相关档案资料。

(188) 《张发奎答蒋永敬等访问》，参见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84页。

(189) 关于胡志明被捕的原因及其经过，参见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第81—98页。

(190) 邢森洲：《越南情况报告》（1944年5月2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1) 该事件的经过参见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88—191页。

(192) 胡志明：《入越工作计划大纲》，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3) 张发奎：《为派胡志明率领战地工作总队队员杨文禄等十八员即行入越策动工作呈文》（无时间），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4) 《邢森洲报告》（1944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5) 《张发奎致吴铁城函》（194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6) 参见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第111页；陈怀南著《越南的人民解放斗争》，第58页，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216页。

(197) 《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请求书》（1945年5月25日，原稿时间有误，应为6月2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8) 《总裁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45年6月2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9) 《秘书长第二次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45年6月1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军事战略

一　受制于“南进”的日本对华战略

日本决定“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其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面临着重新调整的选择。1941年12月3日，在发出对美国开战令次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对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为完成帝国之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应“负责加强对敌封锁及摧毁削弱敌继续抗战之企图”，具体任务是：

（一）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之安定，尤应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

（二）确保岳州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其作战地域大致为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三）占领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域。广州附近之作战地域大致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之间。

（四）超越上列各项所示地域进行之地面作战，根据另外命令。

（五）竭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域，增强我军战力。

（六）……有关沿海作战及航空作战，根据需要……协同进行。

（七）实施对华谋略，以促使抗日势力之衰亡。

（八）作战需要时，可在靠近满华边境的热河省内地域，暂时派遣一支部队[(1)]。

自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一再避免扩大战线，以求首先解决所谓的中国问题。在决定“南进”并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支援南方作战后，日军在华北、华中保持了二十个左右师团的兵力[(2)]，在战争全局上实际降低了中国战场的地位，使之从属于“南进”作战，但却又未放弃乘机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上述命令同时强调“攻占南方”与“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正显示出日军在对华战略上既要策应太平洋战争又妄图乘机全面征服中国的矛盾状态，这使日军无法制定出“迫使蒋政权屈服的自主、具体方案”[(3)]。另一方面，日军大本营也根据战况变化，强调对在华占领区重要资源的掠夺，指示中国派遣军：“在我占领区内适当构成切断线，严禁物资流通”；“在我占领区内主要城市，严格取缔物资对敌外流”；“确保我占领区内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及取得，并加强军就地自给的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我之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4)]。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在与美、英作战中频频得手，进展顺利，因此并未着手解决对华战略的内在矛盾，制定出明确的作战方针。12月24日，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就太平洋战争后的对华局势作出决定：“利用形势发展，尤其是作战成果，抓住有利时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该决定提出首先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查明重庆方面的动向，其次是通过太平洋战争的战果及施加压力促使重庆方面的动

摇，适时由谍报工作转为屈服工作，同时又提出对重庆工作不宜操之过急。这一决定仍显示了日本既想乘太平洋作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无法以武力达到这一目的的困境。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接到该决定后，认为“这是一个毫无具体内容不得要领的指示”[(5)]。

1942年初，日本对华战略仍举棋不定。日本政府和军方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当前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从未有过的处理对华问题的绝好机会，主张乘势迅速解决中国问题。驻中国派遣军对发起战略攻势更为积极，制定了夏秋季节同时进攻西安、长沙和常德的计划，企图以军事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6)]。但是，由于对美、英开战后日军已从中国战场抽出相当兵力，要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已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至1942年3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进攻势头也已成强弩之末。此外，此时制约日本在华战略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北方的苏联。日本大本营虽认为苏联目前将专心于对德战争，但仍担忧在美英要求之下，尤其在苏对德战争进展顺利，而日本在对美英作战中战力削弱的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对日参战，这也使它对在华采取大规模攻势作战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对驻中国派遣军的计划未作正面回答。3月上旬在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上，外务大臣对军方未能以武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表示不满，责问“难道在军事上毫无办法？”军方代表参谋次长答称，“如单纯考虑中国，在军事上未必有所不能。但是，既有北方，又有南方，如从全面考虑，大概就会理解那是不可能的。所谓进攻到重庆，实际是做不到的”[(7)]。3月中旬，日本陆军统帅部拟定的“今后的作战指导纲要”更是反映了对华战略受制于整个战局的状况。该纲要对日军在华战略提出两种选择：“在全局形势特别在对苏形势许可时，拟利用大东亚战争之成果，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迈进，企图迅速予以解决。在各种形势特别是北方形势不许可时，即大致停止目前态势而加强若干压迫，在长期内期待重庆政权之屈服。”在第一种情况下，“从其他方面调用若干兵团，与在华师团共同进行稍大规模之作战。作战目的为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策划使敌各军分崩离析而重庆

政权愈加失掉统制力”。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占领地区内部，应努力确保治安和加强经济建设，同时对外部依靠彻底封锁，政略谋略兼施，加强经济压迫，以促使重庆政权之衰亡或分裂”。究竟是迅速解决还是长期作战，这一上奏天皇的纲要表示将考虑与全局形势之关系后再作决定[(8)]。

4月16日，日本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一份有关对华作战的通知。该通知判断中国国民政府目前的战略是“对内谋求加强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对外则促使美英加强关心东亚并策划拉拢苏联”，因此“不能期待蒋政权的急速屈服”。在此情况下，日本在华战略仍应“始终坚持积极的精神，竭尽一切手段，向促使蒋政权之屈服迈进”，但“在作战上要作极为慎重的考虑，对于进行大规模作战是否真能收到解决事变的效果，则必须经过充分研究后决定”。该通知还指出：“在中国当前形势下，考虑无论为了迅速解决事变，或为了应付长期战争，彻底解决治安问题极为重要。目前正在进行的清乡工作大有希望。”[(9)] 这一通知一方面强调竭尽一切手段促使中国屈服，一方面又表示对大规模作战要慎重考虑，表明日本对华战略仍难以找到一平衡点。

5月上旬，日军结束缅甸战事。而在这之前的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空袭东京。在此情况下，日本大本营考虑对国民政府发起攻势作战，并于5月中旬通知中国派遣军制订作战计划。6月上旬，日军在中途岛之战中失败，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的攻势被粉碎。面对不利的战局，大本营急于摆脱被动局面，更强调在华采取攻势，要求中国派遣军积极准备对西安和四川进行作战，加强对国民政府施压，以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崩溃或分裂的目的。但日军内部对此仍有不同看法，有的对此计划反应冷淡，有的认为最好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全力以赴进行此项作战[(10)]。此后，围绕着究竟是否要在中国采取攻势，发动对西安和四川的作战，日军内部有各种讨论。

8月15日，经东条英机裁决，日军决定于次年2月前后发动对四川

的作战。8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规定当前日军的作战战略是，在太平洋方面“关键在于加强防守南方现有占领地域，遏制敌反攻企图”，即在中途岛之战攻势被扼制后在太平洋方面取守势；在北方对苏方面，“按既定方针，加强警戒，力求保持安谧”；而在中国和印度洋方面则取攻势。大本营陆军部对中国战场的判断是：“如严重打击重庆政权抗战重要支柱的中央军，进攻其保有整个军需生产力约二分之一、最大的物资补充来源地，而且建有美英空军基地的四川，摧毁重庆政权的根据地并予以占领，则有极大可能使敌屈服。即使蒋政权不屈服，也将名存实亡，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因此，对中国攻势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占领四川省要域，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日军准备组织十六个师团在1943年春从山西南部和宜昌发起进攻[(11)]。

这一决定在形式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日军在对华战略上攻守不定的状况，确定了采取攻势的作战方针。但日军的这一决定是在太平洋战场受挫的情况下做出的，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其战线拉长后在华兵力不敷的问题。因此，此决定刚做出，大本营内部就出现了反对意见，认为发动对四川的作战将征用船只削弱现有的运输能力，而这将影响钢铁产量，从而影响整个战争能力。海军方面也坚持主张以对美作战为中心，对华作战处于从属地位[(12)]。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况继续恶化，物资供应、船只运输等压力更大。9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决定“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大致以昭和十九（1944）年中期为目标，继续确立对付美英进攻之战略态势，随时捕捉及摧毁敌之反攻战力”。该大纲规定的对华战略是：“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3)] 这一战争指导

大纲实际上放弃了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在华采取攻势作战的方针。11月初，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停止对四川攻势作战的准备，并明确指出“今后对华作战在于确立最小限度的地面上及航空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并且“还要抽调、转调、改编驻华兵力”[(1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时间内，日军对华战略一直在攻守之间摇摆，难以决定明确的方针。由于开战之初对美英作战的顺利以及后来为了扭转不利战局，对华采取攻势作战的主张一度颇为高涨。但终因作战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在日本战略全局中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不得不在华采取守势战略。这一守势战略使日军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4年初未能在正面战场发动全局性的持续的战略攻势，而只有局部性的短暂的战役攻势。

二　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战略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持久消耗”战略是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但这一战略在战争的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1939年10月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后，消极成分在这一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盼来了长久期待之中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受到美国参战的鼓舞，国民政府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趋向。

珍珠港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前线将领，“应积极策应英、美作战”，“各战区应于亥月三十日同时发动全面游击，持续时间十五日”，“实施游击时，各战区第一线部队及敌后部队，应同时实施，并各以有力部队分编多数纵队，以广正面逐日派队实施破坏战，遮断其通信，并向敌各据点轮流攻袭，相机略取，务获决定效果”[(16)]。这一对在华日军全面进行游击攻击的部署，是为了在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之际策应美、英作战，而国民政府的主要着眼点还在抓住美、英对日宣战之际，联络美、英制定对日联合作战的总

战略，以改变中国对日作战的总体态势。因此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国民政府就积极筹划重庆军事会议，旨在研究“全盘情况”、“太平洋整个作战计划纲要”和“共同保卫星嘉坡、菲律宾、香港、缅甸、荷印具体计划”[17]。12月20日，在筹备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过程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草拟了中、美、英、苏、荷五国协同作战总方略，计划在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再对日本本土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18]。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拟定了各战区目前作战方针。军事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英对日实行封锁消耗战或攻势作战，还是由中、美、英、苏联合发起总攻，“我军均须凭依自力，利用上述有利形势，攻击敌人，收复失地”。具体作战方针是，先于12月底实施全面游击，然后各战区各选敌人主要交通线之次要据点，集中优势兵力，于1942年3月底同时开始局部攻势，并准备6月底对武汉、宜昌、广州实行总攻[19]。虽然该计划末尾注明“总攻计划须待新战斗序列决定再拟”，但军事委员会还是在差不多同时草拟了1942年收复宜（昌）沙（市）的攻势作战计划稿，准备以“第三战区遮断长江、第九战区攻占岳阳、第五战区切断襄河东岸宜沙敌人后方，以第五、第六战区主力，及本会整训部队保持于襄河西岸，包围襄河以西地区敌人而歼灭之”，“攻势准备应于五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攻势开始时期，待命实施”[20]。

与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后防御占主导地位的作战计划不同[21]，这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拟就的作战方案不仅要求对敌主动出击，而且更着眼于对敌发起全局性的战略攻势，显示出国民政府对日军事战略转向积极的趋向。国民政府的这一变化基于它与美、英联合作战推进对日战争进程的战略构想。但早在珍珠港事变前，美、英就商定了“先欧后亚”的反法西斯全球战略，整个战略重点不在远东，因此对中国的战略构想并无积极的回应。蒋介石为此专门致电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指示他们与美方接洽，“对盟国整个战略，作一确切检讨，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

解决日本’之战略，明确决定太平洋上今后之最高战略，以利整个之战局”。具体而言，蒋介石希望“速将太平洋上主动之战略，包括自印度、澳洲、中太平洋、北太平洋，以至苏联在东方对日之战略，在各国陆、海、空军方面，即有一最高战略明确之决定，速采主动之攻势，则太平洋形势，即可大定，不待欧陆、北非战局揭晓，而日本必由主动而降为被动，由被动而趋于消灭”[22]。但宋子文在与罗斯福面谈后报告蒋介石，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无法变更也”[23]。美、英的这一态度使国民政府非常失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是以与美、英联合作战为前提的，因此美、英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国民政府不愿也无法推行拟议中的攻势作战。这样，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战略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短暂地趋于积极后，消极防御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正面战场采取的是尽量维持现状而不主动出击的方针。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一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2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向英国军队控制下的香港九龙地区发起攻击。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南下策应英军作战，决定再次攻击湘北。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称第二次长沙作战）由此展开。

日军第十一军因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轻易占领长沙，并予第九战区以沉重打击，而生骄横之心。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在日记中对日军发动这次攻击的决策过程这样写道：“第一次长沙作战（中国称第二次长沙会战——引者注），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第二次长沙作战（即第三次长沙会战），决定的很快，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

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24] 次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当场予以批准，并对所属各部下达出动命令。12月15日，第十一军制定会战指导方案，确定作战目的为“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二十三军攻取香港以及南方军的作战”，整个作战期限定为两周左右，调集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主力等共约七万兵力。虽然因兵力所限，日军作战计划将作战行动限在汨罗江一线，但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内仍有进攻长沙之议，显示出日军在作战目标上的不确定和对第九战区战斗力的蔑视[25]。

中国第九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虽然受挫，但因日军占领长沙后又退出，第九战区保全了原有防区，且国民政府又将此役宣传为“第二次长沙大捷”，故第九战区将士并未因受挫消沉，斗志反而得到激发。11月17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曾在长沙举行会议，检讨前两次会战经验教训，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并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选定新墙河、汨罗江之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为决战地带[26]。

日军第十一军于12月中旬向岳阳、临湘一线集中。12月20日，第六师团集结至新墙河北岸地区，完成发起攻击准备。12月22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从汉口飞往岳阳。第四十师团、第三师团也先后抵达指定位置。日军的调兵遣将引起第九战区的警觉。12月17日，薛岳致电蒋介石等，报告日军向湘北调动及增兵，并判断“当面之敌抽集部队，将有使用”[27]。12月20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加强第九战区兵力，令第七十三军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七十九军向渌口、株洲集结待命。随后又将第四军从广东调至株洲、渌口，第七十四军从广西调至衡阳。上述各军皆划归第九战区指挥。也在20日，薛岳制定了

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决定诱敌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围而歼之。具体部署为：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指挥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沿新墙河抵御、消耗日军，然后转移至关王庙、三江口地区，侧击、尾击南进之敌；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南岸抵御、消耗日军，然后转移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一带，待机攻击进犯长沙之敌；第九十九军坚守三姐桥、归义、湘阴及洞庭湖南岸，并准备攻击进犯长沙之敌；第十军死守长沙；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由赣北进驻浏阳，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九军待敌进攻长沙时反击；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进驻平江，指挥第七十八军等部侧击进犯长沙之敌[28]。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原则就是既定的后退决战之天炉战法。

12月21日，日军向第九战区阵地进行炮击，并派小股部队强渡新墙河。23日，日军二千余人又分路向新墙河一线进犯。这些试探性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12月24日，日军向中国军队新墙河防线正式发起进攻。此时湘北天气一反往常冬季的晴朗干燥，连日阴雨绵绵，间有降雪，气温骤降至－4℃。河水因雨雪暴涨，水田亦一片泥泞，给部队调动带来诸多不便，而日本空军的空中优势也因气候恶劣无法发挥。24日午后，日军第六师团乘大雨强渡新墙河，中国守军第二十军堵截不及，日军在新墙附近渡河并建立桥头堡，至傍晚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万余部队渡过新墙河，连夜向第二十军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十军辖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奉命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阻敌十日。日军渡河后，第二十军退守纵深阵地，继续顽强抵抗。25日，日军后续部队第三师团亦渡过新墙河，中日军队于风雪中在新墙河南岸一线展开血战。其中尤以在傅家桥、洪桥两地激战最为惨烈。第一三三师第九八团第二营营长王超奎率全营官兵死守傅家桥，激战终日，风雪交加，腥红满地，直至全营壮烈殉国。第三营副营长吕海群率领部下在洪桥战斗至最后一刻，全体为国捐躯[29]。第二十军在认为已达到预定的消耗及诱敌目的后，主力向关王桥、三江口、王家坊一线转移。26

日，日军乘中国军队转移阵地之际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力抵抗，与敌反复肉搏，但关王桥、龙凤桥等阵地相继失陷。在新墙河南岸的战斗中，第二十军“与优势之敌浴血激战，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伤亡虽重，士气未衰”。日军也承认，中国之“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为前所未有”[30]。日军占领关王桥等阵地后，不顾第二十军侧击，连夜向南急进，战斗遂转入汨罗江南岸地区。

日军第十一军于12月26日颁布作战命令，令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渡过汨罗江，在南岸地区围歼中国军队[31]。在汨罗江沿岸担任防守任务的是第三十七军和第九十九军，以新市为界，前者防守新市以东，后者防守新市以西。

12月27日晨，日军第三师团首先向汨罗江北岸河夹塘、南渡的第九十九军阵地发起进攻，守军两个连激战后与阵地同归于尽。当日下午，第三师团开始强渡汨罗江，至次日，大部主力渡过汨罗江。第九十九军在归义失守后，退至粤汉路以西的大路铺、渌塘铺及大娘桥、新开市一线。日军第三师团随即根据军部计划，在大娘桥一线转兵东进，准备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合围之势。

第三十七军正面之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于12月28日分别在新市、长乐街发起进攻，遭第三十七军顽强阻击，又适逢连日雨雪，河水暴涨，渡河受阻。直至29日天稍放晴，日军才在其空军掩护下完成浮桥架设，开始渡河。30日是汨罗江南岸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从孝顺岭、长乐街南犯，第三师团一部则在空军掩护下东进，一起扑向第三十七军。第三十七军面对强敌，殊死作战，力拼白刃战。一些阵地失守后，官兵仍利用地形，潜伏在山地中继续对敌袭击。当日午夜，第三十七军以阵地残缺，开始向东转移至浯口、孙家山、朱公源一带山地，以对日军形成侧击之势[32]。

至此，日军已攻占汨罗江南岸大部地区，中国守军则转移至东西两侧山地。在此之前，12月25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已占领香港。因

此，第十一军实际上已接近此次发起攻势之目标。但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在制定此次作战计划时就有乘势攻略长沙的企图，27日在与部下讨论时，又提出进攻长沙的必要性，认为其有利之处是："一、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二、把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袭扰之意。三、表明皇军尚有余力。四、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足依靠。"[33] 29日，第三师团向军部提出进攻长沙的问题。而空军也在当日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退却。于是，阿南决定改变原定围歼第三十七军的作战计划，命令东进途中的第三师团转向，朝南向长沙方面追击；第六师团主力进攻长沙以东的槩梨市，另以一部向长沙方向追击；第四十师团向金井进军。这样，日军第十一军就因司令官阿南的个人决断，在战争进行之中临时改变原定计划，将攻占长沙作为最后目标。阿南此举在第十一军高层引起不同意见，也给后勤供给造成诸多困难，负责后勤的军副参谋长就认为"乃自暴自弃之作战"[34]。

守卫长沙的是第十军，辖第三、第一九〇和预备第十师。由于在日军准备发动此次攻势时，第九战区就预判日军将进攻长沙，因此加紧坚固长沙的工事。整个长沙城西面以湘江为依托，北、东、南三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由外围向城里层层构筑工事。长沙城东北一线守备由第一九〇师负责，东南一线由预十师负责，第三师进驻长沙城垣，担任核心守备。湘江西岸的岳麓山有瞰制长沙之利，由第七十三军防守，与第十军隔江呼应。

12月30日，在日军转兵长沙后，蒋介石致电薛岳："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35] 当晚，薛岳根据蒋介石电令，下达与敌决战的命令："以包围歼灭进攻长沙之敌为目的，决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敌军，行求心攻击聚歼

之。”具体部署为第十军固守长沙，其余部队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以长沙附近为目标，分进合击，聚歼日军。同时，薛岳致电蒋介石，并下达所属各部，表示与日军决战的必胜信心：“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二、职如战死，即以罗（卓英）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三、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36]

日军第三师团于12月29日转兵南犯，31日深夜渡过浏阳河，1942年1月1日上午抵达长沙东南郊。由于前两次长沙作战日军有不战而入长沙的先例，骄横的日军竟在长沙城外称当天晚上要在长沙城内为元旦举杯。中午，为争头功的第三师团向预十师阵地发起进攻。预十师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激战至日落，双方仍持胶着状态。入夜，日军遣擅长夜袭的加藤大队，企图趁夜色突破中国守军阵地。但日军多次疯狂的进攻均被击退，大队长加藤以下百余名日军被击毙。中国军队从加藤遗尸上获得日军作战文件，知道日军因改变作战计划拉长战线而弹药不济的重要情报。薛岳获悉后称：“虽仅一张纸之轻，却比万挺机枪还重。”[37] 中国军队与敌决战信心大增。

1月2日晨，第十军前线迫击炮及岳麓山上的重炮，向日军第三师团发出排炮。日军则继续向预十师阵地发起进攻。双方短兵相接，白刃相向，争夺十分激烈。几乎每一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敌我双方几度进退，陷入混战。至黄昏，预十师防线岿然不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面对重大伤亡，第十一军参谋部忧心忡忡。阿南为打破僵局，又令第六师团主力靠近第三师团右翼，向长沙东部、北部发起进攻。

1月3日拂晓，赶到长沙城外的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在东郊、北郊开始进攻，协同第三师团在东南郊的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九〇师在北、预十师在南，死守阵地，与敌展开激战。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因对长沙四郊地形已有精确测量，在一线部队的电话联络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第六师团有一部曾突入城北，但在重炮的轰击下，又退至城外。下午，日军虽迫近城内核心阵地，但弹药将尽，火力渐弱，只能依靠空投物资增援少许。当日，蒋介石特电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暨全体官兵："两日以来，该部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该部能否长期固守长沙，歼灭敌人……我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属，坚强鏖战，务必争取最后胜利，而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之所期。"[38]

此时，第九战区外线部队正从东、南、北三方向长沙逼近，对长沙外围日军合围之势已在形成。因此，3日下午，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提出停止在长沙的战斗，于4日夜开始返转，以在5日晨回到汨罗江北岸。阿南虽仍寄希望于对长沙的进攻，但在木下等部属的反复陈说下，在晚上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于4日夜开始返转，向汨罗江转移的命令[39]。

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接到命令后，不甘心遭到的惨重损失，以部队已冲入长沙城展开巷战，"现在只差一把劲"为由，希望延期一日撤离，但遭军部拒绝。1月4日晨，第三、第六师团孤注一掷，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十军经数日血战，伤亡已达约三分之一，但士气仍然旺盛。战斗最为激烈的八角亭、南正街一带，几度发生白刃战。战至最后关头，预十师以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编成一连投入第一线，师部人员也发给武器，分配死守碉堡和坚固建筑物的任务[40]。激战至傍晚，日军徒增损失而毫无进展。而此时第九战区围击部队已按计划迫近长沙，第四军已通过信号弹与第十军取得联系。入夜，第三师团、第六师团只得留下数百具未及烧完的尸体，从长沙城外仓皇撤退。至此，日军以两个师团之主

力，攻打中国守军一个军，却始终无法破城而入。

长沙激战之际，蒋介石于1月3日电令薛岳，“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击敌人归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汨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新墙河以南及汨罗江两岸地区，应即发动民众，乘敌后方空虚，彻底施行交通破坏，使敌退却时不能迅速脱离战场”[41]。1月4日晚，在获悉日军开始从长沙全线退却后，薛岳发出全线攻击令，命令第二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三军由南向北追击，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由北向南堵击，第三十七军、第七十八军自东向西堵击，第九十九军自西向东堵击，第一四〇师向黄沙街、新墙挺进，以将日军歼灭于“天炉”之中[42]。长沙会战由此转入中国军队追击围歼、日军逃窜阶段。

1月4日晚，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师团分别向东山、梨市撤退，企图在此渡过浏阳河北撤，但途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第七十九军与第三师团在东山附近展开激战。第七十九军将桥梁破坏，占领渡口，迫使第三师团困于浏阳河南岸，并对其进行围击。渡河受阻的第三师团只得向第六师团靠拢。第六师团于5日渡过浏阳河后，根据军司令部命令在梨市附近接应第三师团渡河。于是，对第六师团实施攻击的第二十六军及尾追第六师团的第七十九军与日军两个师团在梨市地区展开激战。6日，日军拼命向北突围，遭中国军队沉重打击，伤亡惨重。第三师团的第十八联队与第六师团的辎重联队均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之中。第三师团与军部及第六师团的通信联络也完全中断。而此时中国军队第四军、第七十三军正从南向北对日军平行超越追击。7日，天气放晴，日军飞机获得活动良机，刚抵达前线的一个轰炸机中队大肆轰炸，限制了中国军队的追击围歼。第三、第六师团乘机突围，向捞刀河一线北撤。先前为接应攻打长沙从金井南下抵达春华山的第四十师团也乘机北撤。傍晚，日军渡过捞刀河，但因仍未摆脱中国军队的前堵后追而士气低落。是夜，明月当空，第十一军司令部却因这有利于中国军队追击的月夜而忧心忡忡[43]。

1月8日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为激励士气，突然决定在北撤途中发起攻势，以第六师团从左翼经栗桥向北突破铜盆寺，第三师团从右翼进入福临铺东北地区，第四十师团一部向西北迂回，企图围攻青山市北部的中国军队。此时在日军北撤途中，第九战区第三十七、第二十、第五十八、第九十九军已占据要地，严阵以待。而第四、第七十三、第二十六、第七十八军正在北进追击。中国军队在捞刀河与汨罗江间对日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当日，蒋介石电令："着以福临铺以东之古华山为界，以西由杨森副司令长官负责，以东由王陵基副司令长官负责督率各军堵截，如敌由某部正面窜逃，即枪决其军师长。"(44)

日军第六师团在向北推进中于8日傍晚靠近栗桥以南地区。但此时第十一军获悉中国军队已占据栗桥，另有两个军也进入附近地区，故命令第六师团改经福临铺北进。第六师团即以后卫改为前卫，连夜转进。第九战区发觉后，急调第五十八、第四、第七十三等军追击围堵，将第六师团团团围住。8日夜，日军独立第九旅团为策应第三、第六师团向北突围，派出山崎大队组成敢死队偷袭青山市北面的影珠山。但至次日凌晨，山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被全歼。一向骄横跋扈的阿南在获悉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及第六师团陷入重围的消息后愕然失色(45)。9日，中国军队以七个师在麻林市以北地区将第六师团分割包围，发起进攻。日军困兽犹斗，战斗极为惨烈，多处展开手榴弹战、白刃战、肉搏战，第六师团指挥部也遭袭击。激战两日，第六师团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在第三师团接应下突出重围。但日军已弹尽粮绝，饥疲交加，"有倒毙路侧者，有落伍被我俘者，有掠夺民间谷物以充饥者"(46)。12日傍晚，日军第四十、第六、第三师团主力方摆脱中国军队围追堵截，分别溃退至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兰市河、新市附近地区。第九战区"痛歼五昼夜，敌伤亡惨重，遗尸遍野"，13日日军残部渡汨罗江时，又遭中国军队痛击，"官兵自相践踏，落水淹死者惨重"(47)。

1月14日，日军三个师团从汨罗江北岸往北退却。中国军队继续对敌主力实施截击、侧击、追击，予敌以重大打击。1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北岸原阵地。至此，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为国捐躯者1.1万余人，受伤者1.6万人。日军被击毙3.3万人，受伤2.3万人，并有139人被俘。被俘者之多为以往所罕见[48]。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香港作战而发动这次会战，但其伤亡人数却达到香港作战的2.5倍[49]。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获胜原因，首先在于制定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正确战略。蒋介石自己总结为："长沙胜利之原因，实由于事先有确实计划之所致。"日军也认为其失败是因为"完全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50]。其次，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尤其是防守长沙的第十军，以相当于不足日军一个师团的兵力，抵抗日军两个师团达四日之久，为围歼日军奠定了基础。再者，日军骄横轻敌，中途变更作战计划，也是其败走长沙之原因。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日军发起太平洋战争后，美、英军队在太平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中国军队的胜利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评："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51]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激励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声望。蒋介石认为："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获得如此空前胜利，不仅可以慰告全国军民，而且也可以慰告世界友邦"，"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52] 而日军则因此次战败"所带来的痛苦体验"而"士气不振"[53]。

二　浙赣会战

1942年4月18日，美军十六架B—25重型轰炸机自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发起攻击，逐次空袭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名古屋、神户等城市，随后按计划飞往中国，多数降落于浙江境内的中国空军机场。这是日本本土首次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对日本国内震动极大，民心恐慌，军政当局心惊胆战。日本大本营最初对美军如何发动远程空袭感到“莫名其妙”，直到俘获一架迫降于南昌附近的美机上五名机组人员后，才明白美机的飞行线路。为阻止美军利用浙江的机场再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4月21日日本大本营电令中国派遣军“务须火速实施炸毁浙江省机场的作战”，并从东南亚调两个大队的轰炸机增援中国派遣军，以图“尽力粉碎敌空军利用中国东南地区空袭帝国本土的企图”[54]。4月30日，大本营就对浙江境内机场发动攻势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令中国派遣军尽快开战，以地面兵力攻占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及一切附属设施，并在占领上述地区一段时间，彻底破坏机场一切设施及主要道路后返回原驻地[55]。

在大本营决定对浙江的机场发起攻势作战前，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已决定由驻江南的第十三军于4月下旬对安徽宁国、广德一带的中国第三战区部队发起进攻，以摧毁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并已完成作战准备。因此对大本营的作战命令，畑俊六最初感到“实难处理”，希望“仍按原计划实施”，在向大本营提出申述遭否决后，他才执行命令，但变更了大本营提出的作战方案，融入了自己原先的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发起浙江作战的目的是摧毁空军机场，因此作战方案是以第十三军为主体，配备驻华中的第十一军和华北方面军部分兵力，共计四十余个步兵大队为基本兵力，由浙东向西进军。而中国派遣军制定作战计划时，以第十三军、第十一军和华北方面军增援一部共82个大队为基干兵力，由第十三军在浙江沿浙赣铁路由东向西，第十一军在江西沿浙赣铁路由西向东夹击作战，企图同时达到摧毁中国空军机场和打击第三战区部队的目的[56]。于是，浙江作战成了浙赣会战。

4月下旬，驻江南的日军第十三军开始浙赣会战的进攻准备。5月2日，第十三军军部下令所属各部向余杭以东直至奉化的各地区集结。5月11日，第十三军军部从上海推进至杭州，并下达第六十二号作战令，主要内容为：1．决定于5月×日（×日预定为15日——引者注）对正面之敌开始发起进攻，首先为了捕捉并歼灭安华街、义乌和长乐附近之敌，约在×＋3日傍晚向诸暨、嵊县西南方地区前进；2．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必须在5月×＋1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向建德、诸暨南方地区和陈蔡市北方地区前进；3．第二十二师团必须于5月×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主要通过沿曹娥江地区向长乐东北地区前进；4．第七十师团必须于5月×－1日日落后开始行动，从奉化方面向新昌南方地区前进；5．第三十二师团必须于5月×＋1日以后，以部分兵力通过富春江右岸地区，主力则通过左岸地区，基本上沿第一一六师团的后方前进[57]。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从5月上旬开始向南昌集中。由于大部兵力需由武汉经长江至九江，再沿南浔铁路前进，费时较多，因此第十三军决定5月中旬发起攻势时，第十一军仍在准备阶段。而华北方面军的增援部队则在5月下旬方才完成集结。

驻守浙江前线的中国军队属第三战区（统辖浙、闽两省及苏南、皖南、赣东地区），司令长官顾祝同。4月下旬，日军频繁调动军队引起第三战区高度关注，判断日军将沿浙赣铁路西进，侵犯金华、兰溪，并夺取衢州。5月上旬，第三战区已获悉日军兵力部署概况，决定在勾嵊山、安华街、王沙溪市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之既设阵地，先予敌严重打击，然后诱敌于金华、兰溪阵地前，以主力进行围歼[58]。但第三战区最终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与敌决战的地点定在衢州："以最小限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持久，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抵抗，并竭力袭扰敌之后方，迟滞牵制敌人，特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59] 具体部署是：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驻淳安，指挥钱塘江（富春江）北岸部队，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驻金华，指挥钱塘江

（富春江）南岸及金华守军，李觉的第二十五集团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为增强第三战区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从第九战区抽调战斗力较强的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四军转用于第三战区，配置在衢州附近[60]。

5月15日，日军第十三军以五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兵力在奉化、东关、绍兴、萧山、富阳一线两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向中国军队陆续发起进攻，浙赣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七十师团最先于5月14日夜间从奉化附近开始行动，沿奉（化）新（昌）公路推进；第二十二师团于5月15日晨从东关出发，兵分三路沿曹娥江南下；河野旅团于15日傍晚从绍兴出发，向诸暨东部地区进犯；第十五师团于15日夜间由萧山附近开始行动，指向诸暨西北地区；第一一六师团（配属原田旅团）于16日晨从富阳出发，沿富春江北岸向新登发起进攻，次日，第三十二师团尾随第一一六师团进犯。

担任从奉化至富阳正面防御的是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面对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军队一方面凭借既设阵地奋勇抵抗，一方面避敌锋芒逐次转移兵力。防守奉新公路沿线的暂编第九军及各游击部队，除一部留置敌后游击外，主力按预定计划，逐步消耗敌人后，转进东（阳）永（康）公路南侧地区，侧击日军。沿曹娥江进犯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遇到第八十八军暂三十二师的顽强抵抗，18日，该师在长乐与敌激战竟日，伤亡重大，余部向西转移。第八十八军新二十二师则在安华街等处抵御日军第十五师团后，向义乌、浦江及金华外围转移。第一九二师、预五师在新登、桐庐与敌激战后，转至敌后活动[61]。日军虽相继攻陷新昌、嵊县、东阳、诸暨、义乌、浦江、新登、桐庐等县，但“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感到“十分遗憾”[62]。至5月22日，日军第七十师团、第二十二师团进至金华东南的永康及附近地区，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旅团进至金华东面的孝顺地区。23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进至建德地区，形成对金华、兰溪地区的合围之势。

第三战区为迎击日军对金华、兰溪的进犯，增派第八十八军主力（新编第二十一师、新编第三十师）至金兰地区，并统一指挥原防守金华、兰溪的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另派第四十师、暂十三师分别拱卫侧后的寿昌、龙游，以便随时策应，战区主力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则集中于衢州附近，准备与敌决战。

5月25日，日军向金兰地区发起全线进攻。日军第七十师团、第十五师团倾力分别进犯金华、兰溪。金华守军第七十九师奋力抵抗，激战至夜间，仍阻敌于金华城外东北六公里处的东关以东地区，粉碎了狂妄的日军于当日攻克金华的计划。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遇到当地残敌出于意料的顽抗，今日终未接到占领金华之捷报。"[(63)] 次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继续猛攻金华，但仍无法取得进展。进攻兰溪的日军第十五师团也遇到第六十三师的英勇阻击。该师师长赵锡田并抽调兵力，对敌左侧发起反击，与敌激战五小时，终因后援不继而继续坚守。

日军在正面向金华、兰溪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第二十二师团、河野旅团则从金华南翼向西突进，扑向金华侧后的开化。26日，日军突破开化防线后，又直扑汤溪一线。汤溪恰在第四十师与暂十三师防守区域的交界处，应由暂十三师负防守之责，但暂十三师误认不在其防守区域内，竟未置一兵一卒，导致被敌不战而陷[(64)]。

此时虽金华、兰溪守军奋勇阻敌，坚守阵地，但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和河野旅团已占领汤溪，并继续西进直逼龙游，于5月27日攻占龙游，使金华西面失去屏障。而沿富春江南犯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也已进至兰溪西北十公里的永昌镇，金华、兰溪实际上已陷入日军重围之中。

5月27日，金华、兰溪当面日军继续发起猛攻，并出动多批飞机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凭借高地和城墙，仍拼死抵抗，一些阵地失而复得，争夺十分激烈。中国守军在城外多处埋

有地雷，阻止日军前进，使之“触雷死伤者不断出现”[65]。当日，第八十八军军长何绍周因金、兰两地已被日军包围，难以坚持，遂下令所属各部于午后向敌后浦江以北转进，担任游击任务，袭击铁路沿线、兰江、金华江、东阳江一带敌军，并从事破坏敌军交通、通信[66]。5月28日，金华城内外工事为日军轰炸机炸毁大半，日军旋即突入城内。第七十九师留守金华城内的第二三七团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后，突围而出，金华终告失守。同日，兰溪也被攻陷。在兰溪城外激战中，日军于慌乱中进入中国军队地雷阵，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炸成重伤，随后毙命。中国战史称此为“开抗战以来，为我击毙敌现役师团长之新记录”。日军战史则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67]

金华、兰溪失守后，衢州直接面对沿浙赣铁路西进的日军。衢州为浙赣铁路从浙江通向江西之要冲，城东建有机场，是中国东南地区最重要空军基地，因此是日军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第三战区准备与敌决战之地。第三战区以第八十六军担任衢州守城任务，并在金、兰之战后，以第四十师进占衢州东南之大洲镇阵地，保持与敌接触，诱敌深入。而以第七十四军集结于衢州以南之溪口镇、湖山镇一带，第四十九军集结于衢州以西招贤镇附近，第二十六军部署于衢州西北浮河村、芳村镇一带，摆开以衢州为中心与敌决战的阵势，准备对进犯衢州日军内外夹击予以聚歼[68]。

日军第十三军占领金华、兰溪后，发现中国军队集结大量兵力于衢州附近，判断将于此进行顽强抵抗，因此决定分兵两路，以第三十二师团、第一一六师团从衢江北岸，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二师团、河野旅团从衢江南岸，分路突破，定于6月3日同时向衢州发起总攻，主攻方向在南岸。此时，在江西的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衢州作战，也于5月31日以两个师团及两个支队约四万兵力，自南昌进犯，与第十三军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6月3日，日军对衢州城发起全面进攻，飞机大炮交相轰炸，守军

阵地大多被炸毁。午后，日军从南门突入城内，一度冲至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指挥所附近。但中国官兵拼死抵抗，城内阵地失而复得达三次之多。战斗十分惨烈，第八十六军伤亡将士有七百多人[69]。当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转入攻势，于4日与敌决战："战区决确保衢州阵地，消耗疲惫敌人，着衢州南北控置之第七十四、第二十六军，于明（四）日拂晓前完成出击诸准备，以衢州阵地为轴，夹击歼灭敌人。"[70]

6月4日，因连日暴雨，河水激涨，给行军作战带来重重困难，但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仍按时分别到达衢江南岸和北岸的指定位置，一面等待出击命令，一面抵御日军进攻。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在等待之中，令第一七二团主动出击，冲至敌阵展开激战，至深夜予敌重创后方才返回原防。而出击令却迟迟未能下达。原来，蒋介石在3日决定放弃在衢州与日军决战，4日夜，军事委员会江亥令一六三电令抵达第三战区："国军以保存战力，以机动打击敌人之目的，决避免在衢州附近之决战。"[71] 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衢州决战的理由是："一、判断敌攻衢可用约三师团（其后方约两师团），出我意料之外；二、节用械弹（以后补充太难）。又衢州本无大价值（机场原受杭机场节制），敌由各方抽兵来……如不能达预期目的，即是敌之损失……且我在现地域损失过大，将无以制其深入浙赣路。"[72] 这一决定完全改变了第三战区原定的战略部署和作战计划。第三战区接上述令后即调整部署，以第七十四军逐次向江山转进，第二十六军以一师守常山，两师向玉山转进，第四十九军在衢州西南待命，第八十六军仍坚守衢州主阵地[73]。

6月5日，大雨停止，天气转晴，日军飞机乘机大肆轰炸，全线向中国军队进攻。第七十四军在衢州以南黄坛口、大滩一线阵地面对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四千余人狂攻，浴血奋战，挫敌锋芒，并击毙日军大队长一名。守卫衢州城的第八十六军正东面有日军猛攻，北、西、南三面为日军炮火所控制，实际已处包围之中，并失去对外联系，但斗

志不减，继续“凭借以城门附近市街为据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6日晨，又降暴雨，守军官兵“浸泡于积水盈尺之掩体中，依然奋战不懈”[74]。此时，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派人突破重围经水路送来突围命令。第八十六军除留一团守城外，主力在狂风暴雨中闯出日军包围圈，一路辗转至衢州以南溪口街与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会合。担任守城任务的第四十六团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继续抵抗，在日军突入城内后，与敌展开巷战，一直战至7日午间，“伤团长、参谋各一员，生死不明者一员；阵亡上校参谋一员、营长十一员（内山炮营营长一员）、生死不明者三员；连排长及士兵伤亡及生死不明者十分之八”，全团兵力损失十之八九，余部弃城突围，衢州遂告失守[75]。

日军大本营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标是摧毁衢州等地的机场，占领衢州意味着这一目标的基本实现。但中国派遣军还企图通过此次战役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因此攻占衢州后立即乘势西犯，以第三十二师团从北路进攻常山、玉山，以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二师团担任南翼，沿江山港南岸推进。衢州失守后，第三战区虽仍在衢州至上饶浙赣铁路沿线作出防守部署，但因部队在转移之中，防守态势已大不同于防守金兰地区和衢州周围之时。6月9日，日军攻占常山。11日，日军在南北两翼同时向江山和玉山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抵抗，但两城仍相继被敌攻陷。此时，从南昌出发之日军正沿浙赣铁路东进，为避免被敌东西夹击，第三战区将部队转移出浙赣铁路沿线狭窄地区，对西犯日军形成侧击态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也于13日从江西上饶南移至福建崇安。15日，上饶被日军占领。

当日军第十三军在浙赣铁路东段向西进犯之时，在浙赣铁路西段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等也完成向南昌的集结，并于5月底分东、南两路向赣东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此时，抚河东岸由第三战区第一百军防守，抚河西岸至赣江两岸则由第九战区所辖之第十九集团军负责防守。

5月31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由南昌东南的谢埠市一带渡过抚

河，向东进犯。6月3日，占领进贤。第一百军第七十五师除在第一线留置一个团在将军岭、东乡、邓家埠逐次抵抗，并予敌以较大打击外，主力转至鹰潭以西即设阵地，与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七师协同防守，但无法抵御日军攻势。6月16日，鹰潭、贵溪失守。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一一九一号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需要，得在南昌附近浙赣沿线全域实施作战。"在这之前，中国派遣军企图打通浙赣铁路的计划曾遭到大本营的指责。6月24日，中国派遣军向第十一军下达"配合第十三军进行打通浙赣线作战"的命令[76]。于是第三十四师团一部从贵溪出发东进，于7月1日在横峰与第十三军部队会合。至此，南昌以东浙赣铁路全部为日军占领。

在江西的日军第三师团及其余各部则于5月底从万舍街、向塘向南进犯抚河、赣江间第十九集团军防地。第十九集团军所辖江西保安第九团、第一团在广福圩、三江口、集贤峰等处奋起迎击，与敌搏杀，但防线先后被突破。日军遂沿抚河两岸疾进，直逼临川。此时，第九战区增援第三战区的第七十九军也正向赣东星夜兼程途中。6月3日，当第七十九军暂六师一部进至临川西北展坪圩时，与日军一部遭遇，当即展开激战。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则趁此掩护，冒雨挺进，于4日夜突入临川城，并与刚入城的日军第三师团"竟夜巷战"[77]。激战至5日凌晨，日军藉飞机掩护反扑，第九十八师因伤亡过重退守城外，临川被占。6日，日军同时向七里店一线之第九十八师、展坪圩一线之暂六师猛攻，第九十八师阵地被敌突破。暂六师虽坚守阵地，但日军一部迂回攻其侧背，使之陷入两面苦战的困境，最后不得不利用夜色突围转移。8日，日军攻占崇仁、宜黄。第七十九军此时集中兵力于南城，企图固守此赣东交通中心。但在日军第三师团强攻之下，南城于6月12日失守。抚河以西地区陷入敌手[78]。

在浙南，日军由华北增援部队编成的小薗江混成旅团于6月22日从武义出发，分左右两路进犯丽水。其左路纵队在进军途中，掠得大批鸡、猪，而误用桐油炸而食之，导致整个部队上吐下泻，丧失行动

能力，在当地滞留三十六小时[79]。6月24日，丽水被日军占领。7月初，该混成旅团又向温州发起进攻，由于中国守军以保安队为主，不能组织起有力抵抗，日军于7月11日进占温州。

日军自6月中旬攻克上饶后进入所谓的“驻扎作战”阶段，作战重点增加“加紧破坏并没收敌方军事设施和军需资源，以削弱敌方物资的抗战能力”[80]。为此，日军不惜动用大量兵力，并强征三万余平民百姓，对衢州、玉山、丽水等机场群大肆破坏，尤其是最为重要的衢州机场，以水淹等措施，被破坏十分严重。日军还大肆掠夺各种物资，仅据日本战史记载，就有轻重铁轨1万条，电瓷瓶6.4万个，萤矿石19.6吨，铜38.7吨，发电机28台，桐油4000桶，木材4000立方米，民船800艘，并销毁大型弹药库三处，大型被服仓库两处[81]。

但在“驻扎作战”阶段，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凸现。第十三军以第七十师团守金华、兰溪，第一一六师团守衢州、龙游，第二十二师团推进至上饶附近地区，第三十二师团防守其右翼玉山附近，第十五师团防守其左翼广丰附近。此外，原田旅团驻富春江两岸地区，河野旅团驻守江山，小薗江旅团驻武义、丽水一带。日军沿漫长的浙赣铁路分散部署其兵力，战线过长，不仅无法继续其在战役初期对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态势，而且使退守浙赣铁路两侧的中国军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

第三战区在日军打通浙赣铁路后调整部署，对敌四处出击，进行游击作战。7月中旬，第三战区部队发起局部攻势。在富春江北岸活动的第一九二师、第六十二师于15日克复桐庐，19日克复建德，迫使日军原田旅团弃守富春江沿线。第七十五师等部也先后收复横峰、弋阳，使浙赣铁路被日军打通仅半个多月后即被切断，日军深感“兵力疲竭，顾此失彼，占领地区不易确保”[82]。在赣东，日军第十一军于7月初向樟树发起进攻，第九战区部队放弃樟树，变内线为外线，向日军发起反击，经多日激战，终于击退日军，并乘胜追击，至7月13日尽复抚河、赣江间失土，日军退返原防[83]。

7月28日，日本大本营鉴于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的——摧毁衢州等地机场——已经达到，下令中国派遣军于8月中旬返转，恢复原有态势，但为扼制中国军队修复机场，需固守金华附近地区[84]。8月中旬，日本第十三军、第十一军分别开始后撤，至8月底，第十三军退至金华、兰溪一线，第十一军退至南昌附近。此后，除第二十二师团担任金华地区防守外，其余部队陆续返回原防。在日军后撤时，中国军队乘势进兵，收复失地，至8月30日，除金华、兰溪地区外，第三战区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浙赣会战结束。

浙赣会战历时长达百余日，日军出动第十三、第十一军两个军，共七个师团及三个混成旅团，侵占浙、赣两省共48个县。此次战役，据日本战史，中国军队阵亡四万余人，日军战死1620人，伤28620人；据中国档案，日军被击毙击伤3.5万余人[85]。日军破坏了衢州等处机场和浙赣铁路，大量掠夺各种物资，并造成当地平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以衢县为例，据当地史志记载，在日军占领的81天内，全县32个乡镇中有28个惨遭日军蹂躏，10,246人被杀，一千四百余人被掳而失踪，三千多名妇女被强奸，62,146间房屋被烧毁。8月下旬，日军撤出衢州时，更是派细菌部队撒播细菌，致使浙赣铁路沿线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传染病爆发流行，仅衢县一县在1942年9月—12月的四个月中，患疫人数就达二万余人，死亡三千余人[86]。

浙赣会战中，中国军队官兵面对日军进攻，奋力御敌，尤其是金华、衢州守军顽强抵抗，拼到最后一刻。但在战略部署和战役指挥上，中国军队存在明显的缺陷。对整个战役，第三战区及最高统帅部缺少一个全盘的考虑。先是决定在金华附近对敌决战，随后改至衢州地区，而到战火烧至衢州城下，又临时取消作战计划，致使中国军队始终处于被动应敌的境地。实际上，对日军沿浙赣铁路进犯，无论是逐次抵抗，寻机围而聚歼，还是避其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只要一以贯之，都可取得相应的成效。问题出在先按与敌决战部署兵力，后又以“保存战力”为主要考虑，结果就自乱阵脚。而在日军后撤阶段，中

国军队又“缺乏利用时机的气魄”[87]，未能乘势加大对日军的打击。此外，浙赣会战以第三战区为主，第九战区在江西配合作战，但在赣东作战中，两个战区的部队未能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给日军以可乘之机。

三　鄂西会战

1940年6月日军在枣宜战役中占领了长江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宜昌，但宜昌以下至岳阳段的长江航道仍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而长江北岸汉口、沙市、岳阳间的三角地带也有中国军队驻扎，对华中日军构成威胁。日军在1942年底搁置进攻四川计划后，驻华中的第十一军于1943年初谋划发起“江南歼灭战”（即中国所称鄂西会战），打击宜昌至岳阳间长江南岸的中国军队，其作战目的之一为打通宜昌至岳阳间长江航道，使停泊在宜昌的十多艘总排水量达1.6万吨的轮船能够沿江下航，以增强军事运输能力。但据日军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说，第十一军作战的真正目的是歼灭长江南岸的中国野战部队，提出打通航道仅是为了获得大本营对此次作战的批准，因为大本营对驻华日军的进攻作战有严格的限制[88]。

为排除对长江南岸中国军队作战时的后顾之忧，日军在1943年2月先对长江北岸的三角地带发动所谓的“江北歼灭战”，击溃占据这一地带的中国军队，并南渡长江，占领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4月中旬，日军着手部署对洞庭湖以北地区至宜昌长江南岸中国军队的所谓“江南歼灭战”。洞庭湖北岸至宜昌附近地处鄂西和湘鄂交界处，地形复杂多样，反差极大。该地区东部洞庭湖与长江之间河港纵横，湖汊交错；而西部宜昌南岸地区山势险峻，山高多在1500米—2400米；连接两者的中间地带则丘陵起伏，江河横贯其间。日军第十一军依地形将战役分为三期：第一期以约两个师团歼灭洞庭湖北面安乡、南县湖网地区中国军队；第二期以两个师团及三个大队南北夹击宜城、枝江以南丘陵地带中国军队；第三期以三个师团围歼宜昌对岸山

岳地区中国军队[89]。

驻守鄂西地区的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湖北恩施，辖四个集团军及长江上游江防军，担负屏蔽川东、拱卫陪都重庆的任务。1943年2月日军发动“江北歼灭战”占领长江南岸华容、石首等地后，第六战区重新调整部署，至5月上旬日军发起攻势前其部署为：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沿南县、安乡、澧县（均在湖南境内）布防，抵御华容、石首一带日军；第十集团军防御宜都、松滋一线，依沿岸即设阵地防守，并向澧县以北联结第二十九集团军，共同阻敌于该线之东；江防军除担负宜昌对岸防守外，应适时向宜都西南实施机动作战；第二十六集团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则在长江北岸鄂西地区策应江南作战[90]。

5月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田勇及军战斗指挥所进驻沙市。5月5日，日军向安乡、南县发起进攻，鄂西会战由此打响。日军第三师团向安乡及其以西地区、第十七混成旅团向安乡及其以东地区、小柴支队向南县、户田支队向南山全线展开攻击，针谷支队则从岳阳由水路穿越洞庭湖向三仙湖方向进军，迂回攻击中国守军。防御安乡、南县一线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起迎击。当日晚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下达作战令，令第二十九集团军坚决阻击南犯之敌，并指定部队死守津市、澧县；令第十集团军以一部阻击由藕池口西犯之敌，死守公安，并加强对松滋、宜都对岸之敌的防守；同时将江防军东调至茶元寺附近，准备策应第十集团军作战。6日，中日军队展开激战，中国守军伤亡重大，防守麓湖山阵地的第四十五团团长陈涉藩、营长李亚安均壮烈殉国，暂五师师部军士队一百二十余名官兵在激战后仅余二十余人。

5月6日晚，蒋介石电令孙连仲：“一、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二、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三、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粮区。四、特须注意保持重点

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91] 自1940年宜昌失守后，国民政府始终对日军溯江而上进攻四川的企图保持高度警觉，因此日军发动鄂西会战后判断其最终作战目标为重庆，确定宜昌上游三峡一带为防守重点，而不是调集兵力于长江、洞庭湖间区域与敌力拼。蒋介石电令到达后，第六战区调整原有部署，停止东调江防军。安乡、南县一带防线面对优势日军攻击，形势由此迅速恶化。

5月7日，日军第十七混成旅团和第三师团一部向安乡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御至夜晚，安乡被敌攻占。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见形势危急，欲进行反击扭转战局，遂令第十集团军除守备公安一部外，其余各部沿东南方向进军，向甘家厂以南地区攻击，第二十九集团军除固守现有阵地的部队外，余部向夹洲、上三汊河以北地区攻击，以求对从藕池口南下之日军进行夹击[92]。但防守安乡的第七十三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并与集团军失去电信联系。该军暂五师防守南县，7日起面临日军小柴支队的猛烈攻击，虽奋勇抵抗，使日军一个大队所属的中队长或战死或负伤[93]，南县仍于9日失守。第十集团军接战区命令后即向东南方向推进。但日军主力第三师团此时已集结于东港附近，向第十集团军逼近，为第二期作战准备，第六战区遂停止反击计划。日军进占洞庭湖以北安乡、南县地区后于11日结束第一期作战。第二十九集团军除第七十三军遭受重大损失，至5月12日仅收容一千五百余官兵外，其余大部转移津市、澧县一线，日军围歼二十九集团军的计划未能得逞。

5月12日，日军开始第二期作战，以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枝江以南地区的第十集团军。南翼第三师团从东港附近向第八十七军发起猛攻。第八十七军无法抵御日军攻势，孟溪寺、张家厂、东岳庙于13日先后失守。北翼第十三师团在12日傍晚从枝江对岸乘夜色几乎未遇抵抗南渡长江，随后分三路向第九十四军防线推进，至次日已进至茶元寺、观音寺、斯家场一线。第十集团军判断日军有在斯家场、西斋一带夹攻歼灭我军企图，遂令部队往茶元寺、斯

家场、官桥、张家厂之线以西地区转移。蒋介石见鄂西战局紧张，于13日致电第六战区，令其警惕日军西进企图，战况无论如何恶化，必须确保宜昌以西防守，并令第五、第九战区策应第六战区作战[94]。

5月14日，日军第三师团继续攻击前进，占领杨林、饶家嘴等地。第十三师团先后占领新河市、西斋，并在向南进犯中发现几路向西转移的中国军队，但大多“终未捕捉到”[95]。中国军队虽逐次抵抗，及时转移，未遭日军南北夹击，但因接连失利，“军心为之震撼”，向西转移途中“交通拥塞，秩序紊乱”，第八十七军转移至暖水街、闸口、王家厂一线时，“余部仅及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殊难再行坚强战斗”[96]。5月15日，日军南北两翼完成会合后，以主力向暖水街急进，并于当日攻占，企图切断中国军队退路。至18日，日军进占茶元寺、刘家场、西斋、暖水街、王家厂一线，结束第二期作战，并以主力向暖水街、刘家场集结，准备第三期作战。

日本第十一军在第二期作战中即准备第三期作战，目标是首先歼灭长阳周围中国军队，然后向宜昌以西地区突进，捕捉歼灭该地区中国军队。为此，除以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在第二期作战结束后向北推进外，并调在当阳地区的第三十九师团向长江北岸云池一带集结[97]。5月1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首先从暖水街、刘家厂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第三师团一部则自茶元寺西犯。此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由云南返抵鄂西恩施任所，鉴于第九战区增援的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九军已到达湘北，战区南翼已有保障，遂下令第十集团军与江防军以渔洋关、津洋口、曹家畈、石牌一线为决战线；第十集团军确保渔洋关，左翼与江防军联系；江防军以第十八军固守石牌，第八十六军守聂家河、安春脑、长岭岗一线，行持久战；第二十九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北攻击暖水街之敌，策应第十集团军[98]。

从暖水街、刘家厂出发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原定在20日晚进入渔洋关附近汉洋河一线，但由于“山地险峻，守敌抵抗，前进比预定计划推迟”[99]。第八十军在子良坪、仁和坪一线逐次抵抗至21日。“22日

晨，渔洋关附近开始争夺，竟日激战，敌我伤亡均重，卒以众寡悬殊，渔洋关失守”[100]。第十三师团在占领渔洋关后继续突进，24日攻占都镇湾，25日师团主力集结于此。日军第三师团于19日袭占王家畈后，因等待后续部队，至21日才分兵三路攻击前进，占领聂家河等处，并于当日夜间进入汉洋河北岸地区，次日进驻磨市。随即根据第十一军“需要迅速消灭长阳附近之敌，准备在宜昌西方地区进行决战”的指令[101]，向长阳北进。23日，第三师团渡过清江，24日占领长阳。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22日于云池附近渡江西犯，次日进占鄢家沱，并根据军部“以全力向偏岩方面前进”的命令[102]，向长阳北面的偏岩推进，沿途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至25日黄昏攻占偏岩。日军在攻占都镇湾、长阳、偏岩一线的同时，驻宜昌部队也渡过长江，使日军于宜昌西岸地区兵力已逾六万，并已打通宜昌下游长江航道。第十一军企图以此优势兵力捕捉合围宜昌西岸江防军，并使宜昌附近的船只下航。

中国军队对日军集结优势兵力于宜昌以西地区，特别警觉其溯江西上的企图。蒋介石“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103]。陈诚依此于5月25日指定作战方针，决心确保石牌要塞，第十集团军和江防军须固守防线，待第七十四军等增援部队到达后对日军“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决战日期定为5月31日—6月2日间[104]。

5月26日、27日，日军连续向江防军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日军进击柳林子一部，被中国军队反包围，最后虽经救援突围，但大队长以下被击毙多人。进攻卷河桥日军，尽管有飞机支援，但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战史称“攻击很不顺利”。中国战史则称“敌每一寸土之推展，必须付出同等之血肉代价，其战况之惨烈，乃属空前”[105]。在日军猛攻下，江防军部分阵地被突破，27日晚，第六战区决定将江防军防线调整至三叉河、木溪桥、曹家畈、石牌一线，固守以待增援部队到达。至此，日军进攻已成强弩之末，而第十

集团军则抓住日军主力北上、清江与汉洋江间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向日军发起反击，于28日收复渔洋关。

由于对江防军的进攻在5月28日后陷入困境，主力背后又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以及中国空军配合美国在华空军开始加强空袭，日本第十一军于5月29日、30日调整部署，命令所部于5月31日开始返转作战，由宜都、枝江等处渡江转移。中国根据截获日本空军电报获悉日军已经开始退却，5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讨论对日军追击，并于当日电令第六战区："渔洋关至长江间各部，应速向枝江、宜昌、长阳沿江追击，歼灭敌人，夺回长江西岸各据点"，"津、澧方面之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及第七十四军主力，应速歼灭新安、王家厂方面之敌，并以一部向公安追击"，在长江北岸鄂西山区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则"应乘敌疲劳混乱，迅向当面之敌猛攻，相机袭占宜昌"。陈诚也在当日下达追击令，并确定追击开始时间为6月1日拂晓[106]。

6月1日鄂西会战进入中国军队攻势作战阶段。江防军从自己防线发起全线追击，先后攻占偏岩、沈家棚、雨台山，至6月2日已收复清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第十集团军各部在清江以南、汉洋江以北地区分多路向日军发起攻势，相继克复都镇湾、聂家河、长阳等处。"敌因久战疲惫，且鉴于过去我军追击发起之迟缓，退却之初，警戒疏忽，嗣悉我军紧迫直追，行动果敢，遂恐慌万状，狼狈东窜。敌之后卫部队……为我追及，甫经接触，即仓皇溃窜。"[107] 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追击"更加疯狂"，第十三师团的后方部队被包围，"处境危急"。该师团殿后的皆塚大队被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包围，大队长被击毙[108]。6月3日，中国军队攻占枝江，并向宜都发起攻击，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则被第十集团军围于磨市附近。为解磨市之围，并争取渡江撤退的时间，日军于6月5日以数千兵力进行反击，枝江、洋溪等地再告失守。8日，第十集团军再度向宜都攻击，并于当日攻克，随即乘势攻击前进，清扫长江沿岸残敌。在战区东翼，会战初期退守湘北

石门整编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九战区驰援的第七十四军也在6月初发起攻势，一举攻占西斋、安乡等地，随后在向公安进击时，一度与日军相持于两河口、斯家场一线，展开激战。6月14日，第七十四军在大雨中强攻公安，于午后攻克该城，并乘胜追击，向长江岸边挺进。至6月中旬，中国军队恢复会战前态势。

6月下旬，第六战区为巩固长江南岸防守，部署向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展开攻击。蒋介石并且命令美国驻华空军“连续轰炸藕池口及石首四日”。但因连日大雨，河水暴涨，而渡河船只，或被敌掠走，或被敌破坏，进攻无法取得进展。6月30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攻击 (109) 。

在鄂西会战后期中国空军与美国空军联合作战，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空袭，予敌重创，成为整个抗战中制空权敌我间易手的开端。从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美空军击毁日军飞机数十架，5月31日，中美空军联合出击轰炸宜昌时与日本空军发生空战，一次就击落日机达二十余架。此外还攻击日军船只、车队、地面部队。日军战史称：“在我方损失中，由敌机造成的损失激增，这一点值得注意。这表明，航空优势敌我易位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110)

鄂西会战日军出动兵力逾10万，中国军队在沿江和湖网地区用兵约十五万，在宜昌以西石牌地区部署防守兵力约六万。根据国民政府战史资料，此次会战日军伤亡16,075人，被俘12人，中国军队伤亡41,863人，失踪7270人，“但我战线各县人民生命物资遭敌兵之烧毁损失，则不可数计”。而日本战史记载，日军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中国方面遗尸30,766具，被俘4279人 (111) 。

日军发动此次战役目的，虽为使上游宜昌附近船只下航，但更重要的是企图歼灭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宜昌附近一万余吨船只在5月下旬下航，使日军这一目的达到；但围歼中国军队之企图，除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损失较重外，则因中国军队适时后撤而未曾实现。

中国方面对日军作战目的判断为夺取川江门户，意在重庆，作出这一判断在当时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蒋介石因此在会战初期不准江防军向宜都下游使用，没有集中使用兵力，在用兵上稍显僵硬。而第六战区在会战后期追击作战中，虽较以往已有改进，予日军以相当打击，但并未完全抛弃行动迟缓之积弊，国民政府在检讨此次会战时也指出："无论攻击或追击时，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力量。"[112] 但在鄂西会战后期中国制空权的获得对此后战争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四　常德会战

鄂西会战后中日军队在华中继续处于对峙状态。1943年8月下旬，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制订秋季后作战指导大纲，企图再次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作战，其主要目标是湖南常德。日本大本营因判断盟军即将在缅甸开始反攻，而发起该作战可牵制中国兵力调往云南、缅甸，因此于9月27日以大陆命第八百五十三号正式批准了常德作战[113]。次日，中国派遣军向第十一军下达作战令，令其于11月上旬发起进攻，具体步骤为："一、第十一军主力（加上由其他方面转用来的部队共三十五个步兵大队）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占常德附近。二、继而追索常德方面猬集反攻之敌，予以歼灭。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114] 至10月底，第十一军及由华东调遣来的第一一六师团共约十万兵力集结于沙市至监利的长江沿岸地区。

常德地区属第六战区，地处湖南西北，沅江下游，洞庭湖西岸，战略地位重要。西为川黔屏障，东南与长沙成掎角之势。第六战区在10月上旬就对日军的调兵遣将有所警觉，并于10月10日制订了守势会战计划[115]。10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敌将抽集其中战场之兵力，再向（长）江（洞庭）湖三角地带进犯，以消耗牵制我

兵力，并（达）到掠夺物资之目的。先压迫我10AG（AG即集团军）、29AG于聂家河、暖水街以西山地，再向左旋回进趋石门、澧县，如战况顺利，则渡澧水，犯常德”。并于10月28日作出部署：第六战区第十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各一部，于滨湖地区阻击敌人，而以主力利用澧水及暖水街一带山地，侧击进犯之敌；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军主力于常德西北太浮山作机动准备；第一百军推进至益阳待命；第九、第五战区进行策应作战。10月30日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在“预想敌军进犯之道路，速即敷设地雷”[116]。

11月2日，日军在松滋至华容间分数路向长江以南迄洞庭湖西北畔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常德会战拉开序幕。中国第一线部队第十集团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九军及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根据部署，先后于南县、甘家厂、公安、新江口之线进行抵抗，迟滞日军推进，并逐次向西南方向转移。日军虽遭阻击，但仍挟其优势兵力，猛进不已，南县、公安、松滋先后被占。至6日，第十集团军第一线部队已转移至王家厂、暖水街、刘家场、洋溪一线。但日军跟踪西犯，以其主力第十三师团直指暖水街地区。中国守军暂六师虽与敌激战，但暖水街仍陷于敌手。此时，中国方面根据战况及缴获文件确定日军将南下进攻常德，而暖水街处于日军进军路线之右侧背，占领该地将予敌以极大牵制。7日，蒋介石下令：“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即刻集中主力，击破向暖水街方向突进之敌。”[117] 但第十集团军正准备发起反击时，日军又向高岩、王家畈、邓家畈等地发起猛攻，并以主力迂回暖水街以南地区西进。敌我之间呈交错对峙状态。至12日，第十集团军退守聂家河、仁和坪、子良坪、曾家垭一线，继续阻敌。日军则除留第三十九师团等部于暖水街附近外，第三、第十三师团相继向南集结，准备向石门、慈利发起第二期作战。

日军第十一军于11月11日部署第二期作战，以第十三师团进攻慈利，随后追歼常德西北地区中国军队；第三师团奔袭石门以北第七十三军主力，然后进入常德西南地区；第六十八师团渡过洞庭湖，攻占

汉寿后进入常德东南地区；第一一六师团经临澧从北面直接攻击常德，企图对常德形成合围之势[118]。第六战区遂以第七十三军部署于石门附近抵御日军，并以第七十四军部署于常德、慈利间，准备对敌决战。

11月13日，日军第三师团在飞机与炮兵支援下，向第七十三军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英勇迎战，连长、排长“多裹伤再战”，至14日黄昏，“已陷入苦战，伤亡已逾三分之二”。入夜，日军突入石门，担任守城的暂五师与敌死战，“几全部作壮烈之牺牲”，师长彭士量英勇殉国，石门失守[119]。

石门被占后，日军沿澧水快速推进，至11月16日已进至慈利以北永盛桥、东岳观，与第七十四军发生接触。在这之前的14日晚，蒋介石电话指示第六战区：“以一部确守常德，主力在慈利附近地区与敌决战。”[120]第七十四军除第五十七师防守常德外，军长王耀武率军主力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师布防于慈利附近。17日，第五十八师正面之敌日军第十三师团开始进攻，守军奋勇抵抗。守卫赤松山的一个营沉着迎战竟日，阵地屹然不动。日军白天无法推进，只得于夜间偷袭，守军战斗至最后一人，全营壮烈牺牲[121]。18日，慈利被敌攻陷，常德西北失去屏障。

日军第三师团南渡澧水后按计划直扑桃源。11月21日，日军飞机向桃源投弹扫射，并趁势降落伞兵六十余人，与地面部队呼应。桃源守军不足一营，无力抵御，被迫撤离，桃源被占。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在陬市继续抵抗，以拱卫常德外围，但最终不支，陷于敌手，该师师长许国璋殉国[122]。常德西南门户洞开。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于11月18日拂晓前从安乡以南鱼口附近地区西渡洞庭湖。是日天气恶劣，风高浪急，中国守军因此疏于防范，使日军突袭轻易得手，登陆洞庭湖畔涂家湖一带。22日，第六十八师团攻占汉寿，从东南直接威胁常德。是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从北面开始

进攻常德。至此，常德成为一座孤城，会战进入常德保卫战阶段。

担任守卫常德重任的是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该师受命后，以主力集中常德城，加强工事，严整战备，并制订持久防守计划，第一期为外围战斗，以德山、河洑山为第一线，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第二期为城垣战斗，固守城垣，坚强抵抗，并实行局部逆袭；第三期为街市战斗，一旦敌军突入城内，“即凭家屋据点，街巷堡垒逐屋抵抗”，直至援军向常德求心包围，乘敌攻势顿挫，予以协力夹击[(123)]。

11月20日，西渡洞庭湖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一部向常德城南面的德山攻击前进。德山守军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被迫撤离，日军于22日进占德山。在常德城西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数千人于21日从北、西两面夹攻河洑山阵地。守军第一七一团第三营与敌激战，坚守阵地至22日凌晨，再退守河洑市。23日，日军集中炮火猛轰河洑市，并发射毒气弹，第三营官兵拼死抵抗，“河洑之巷战，失而复得者凡五次”，全营官兵大部牺牲，仅余七八十人，河洑市终告不守[(124)]。在常德城西北外围的黄土山阵地，第五十七师也与日军展开激战，在击毙日军联队长一名，予敌以重大打击，己方亦遭受重大伤亡后向主阵地转移。

日军原先计划仅以第一一六师团承担攻占常德的任务，但在常德外围遇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后，于11月23日调整部署，决定以第一一六师团从北、西两面全力攻击，第三师团一部从南进攻，第六十八师团从东进攻，并定25日午夜开始进攻。同日，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电令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发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毋致动摇决心。”蒋介石也电令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125)]。

11月25日拂晓，日军飞机二十余架飞临常德上空进行扫射，随即日军地面部队不待午夜即分几路向常德城发起进攻。在北面，日军第

一一六师团第一〇九联队先向外围阵地夏家岗、七里桥发起进攻，遇中国守军迎头抗击，被迫向东绕行，趁守军不备，突破新堤，再转进北门外街一线。中国军队仓促迎敌，展开白刃肉搏，挫敌锋芒。日军战史记载当日常德北面的战斗“由于敌人节节抵抗，前进很不顺利”，直至26日凌晨才到达北门外[126]。在东面，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一部趁第一〇九联队突进之机，攻占岩桥，推进至东门附近。在西面，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在白天开始攻击外围阵地，因守军顽强抵抗无法突破，入夜后才以偷袭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进至西门城外。南面的战斗最晚打响，但战况更为惨烈。先是美军战机袭击向沅江南岸推进途中的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击毙其联队长中畑。午夜，第六联队向沅江北岸常德城内猛轰，其步兵趁此掩护渡江。据日本战史：“江畔的战斗是极其残酷的，我军接连出现伤亡。”日军五百余人强渡后，一部突入城内，守军在下南门、东门附近街巷与之展开恶战，“反复进行肉搏和枪战”，至次日凌晨击退入城之敌[127]。25日一天激战，第五十七师两名营长英勇殉国。鉴于日军从各方逼近常德城。师长余程万调整部署，令外围部队转入城内，并重新配置城垣守备力量，以达固守常德之目的。

26日、27日两天，日军继续发起全线攻势，除以飞机轰炸扫射外，更投掷毒气弹。北门外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两个联队轮番进攻，以期攻破北门，突入城内。但中国守军集中火力奋勇杀敌，26日一天挫败日军八次进攻，日军遭受极大伤亡。西门外遭日军猛烈炮火，渔父中学阵地被摧毁，守军虽仅存排长以下数人，仍战至最后，与阵地同归于尽。日军白天无法得手，其第三大队于夜间对大西门进行袭击，仍以失败告终，大队长被击毙，该大队所属中队军官非死即伤[128]。东门守军面对正面之敌和北渡沅江强行登陆的第六联队，与敌搏杀，虽伤亡重大，阵地屹然不动。第五十八师坚持至此，全师八千多名官兵伤亡甚众，弹药消耗已过大半，但守城斗志丝毫未减，师长余程万命令：“自即刻起，所有排、连、营、团长，一律不得变更位置。”并为充实第一线兵力，将所有运输兵、担架兵合编为战斗

部队，从炮兵中抽调三百余人加入步兵战斗，师部幕僚亦自告奋勇参加第一线战斗[129]。

日军在连续三天攻城受挫后，于28日发起更为疯狂的进攻。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北门，在集中炮火轰击后，步兵反复冲击，北门工事悉被摧毁，防守北门的第一七一团堵截不及，至下午日军从北门突入城内。此时第五十七师已无预备队可资调遣，师长余程万遂命令该团逐次退守城北各街巷，常德保卫战进入巷战阶段。第一七一团利用民宅沿街设置火力点，顽强抵御日军，“苦撑恶斗，拼命力争，一寸山河一寸血肉，惊天动地，惨烈空前”，日军自叹“进展极不顺利，连续出现伤亡”[130]。在大、小西门和东门的日军，自晨至暮，也一再猛攻城垣，但均为守军击退，滞留于城墙之外。因第一线部队消耗将尽，第五十七师又将师部杂兵、政工人员、常德警察等编入战斗部队，并请求战区火速增援。

29日，日军飞机向城内投掷燃烧弹，“城区大火蔽天，家屋碉堡，概成灰烬”。攻城日军也接到命令：“烧毁常德市街，迅速取得战果。”东门外日军依靠火攻，突入城内，但继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入城后的战斗与北门方面同样艰苦”。西门守军奋力防守至深夜，并与突破城墙的日军展开白刃战，最终不支退入城内。余程万师长在危急关头致电第六战区：“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131]

30日，突入城内各路日军四处纵火，“穿墙凿壁，节节紧逼，我余兼师长及各级幕僚，莫不亲任指挥，尺土之微，不肯轻弃。”配属第五十七师守城的第七十四军炮兵团团长金定洲致电蒋介石：“孤城固守，弹尽，援军未到。虽士气奋勇，我步、炮均凭血肉与敌抢夺市街据点，但敌日增，我日减。职等牺牲事小，整个战局大，务恳严限援军协助袭逆为祷。”[132] 12月1日，常德城内巷战更为惨烈，守军

在多处阵地抵抗至最后一刻，与阵地同归于尽。入夜，第五十七师防守区域只剩城内西南一隅。当日，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电告第五十七师，援军已抵达常德附近。2日，刚结束开罗会议返回重庆的蒋介石致电余程万，嘉勉第五十七师守卫常德“辉煌之战绩”，并令其“严督所部与常德共存亡”[133]。2日拂晓起，日军“放大量毒气，炮击愈猛，空炸愈烈，火攻愈凶，窜逼愈近。我守兵与残破碉堡、阵地工事于惨烈斗争之后，复节节同归于尽，而城内残余之建筑物及碉堡百分之九十五已被毁灭。战至下午十二点左右，我几无立足余地。敌有隙钻隙，有墙登墙，到处流窜。我仅存少数人、枪，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则使刀矛或碎石棒”。尽管核心阵地已缩至约三百公尺见方的区域，但守军坚持抵抗，日军仍“不断出现伤亡”[134]。

常德城内巷战进行到12月3日凌晨，余程万以援军未到，大局已无法挽回，遂命令第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指挥残部继续牵制日军，其本人则亲率余部向南突围。柴意新率部与日军经十余次肉搏，终全部壮烈殉国，常德城陷于敌手[135]。

第五十七师九千余名官兵守卫常德孤城，自外围作战至常德失守，坚持近半月。日军先后使用三万兵力和三百余门大炮进行围攻，全师官兵从外围至城垣再至街巷拼死血战，“兵亡官继，弹尽肉搏”，伤亡官兵5703名，谱写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烈史诗。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占领常德后，承认遇到了“出乎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136]。

当日军向常德围攻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除令第五十七师固守以外，并于11月24日令第九战区第十军及第九十九军一部进攻洞庭湖南岸亘沅江右岸日军；第六战区第七十四军、第一百军攻击进犯常德日军之右侧背，第十集团军主力渡过澧水，向羊毛滩、临澧方面求敌侧背而攻击之，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四十四军由太浮山、太阳山攻敌后方，第七十三军夺回慈利，企图从外线对日军展开求心攻击[137]。各部奉命后，即遵令推进，对进攻常德日军形成外线包围态势，但分别遭遇当面日军顽抗抵御，攻势难以取得明显进展，形成僵持局

面。由资水北上的第十军以预十师向敌发起进攻，掩护第三师向常德方向突进。预十师师长孙明瑾率部英勇作战，身中四弹而壮烈牺牲。第三师则趁此掩护，于11月30日攻占常德城南五公里处的德山。

12月3日常德失守后，蒋介石于当日电令第六、第九战区，重申围歼日军之部署："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依既定计划围攻敌人。"[138] 第六、第九两战区接令后加紧对日军发起新一轮攻势，但所属各部因连续作战损失过重，仍无法取得进展。而攻占德山的第十军第三师却遇敌反扑，陷于围攻之中，第十军预十师、第一九〇师也因损失太重，无力救援，12月5日德山再度为日军占领。

当中日军队相持于常德地区时，第九战区为增强北援常德兵力而抽调九个团临时组成的欧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兵团于12月3日抵达战场，并于12月6日加入战斗，向常德以南的日军发起进攻。此时日军已有从常德撤出的迹象，但重庆最高军事当局判断，日军在常德附近兵力在八个联队以上，虽已向东北撤退，"但不能谓无久据常德之公算"，若"反攻无效，耗用殆尽，转恐无力收拾常德战局，而诱起敌更奢之企图"。因此令第六、第九战区准备守势部署，暂维持原态势，以观敌情之变化[139]。

重庆的这一军事部署，使日军获得从容部署从常德撤退的时间。日军在制订常德作战计划时就确定，在攻占常德后适时返回，恢复原态势。但11月下旬美国驻华空军袭击台湾后，日本大本营开始考虑为摧毁美国驻华空军基地而打通大陆铁路线的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据此希望第十一军在占领常德后暂不返回，准备下一步作战，并于12月5日派员赴前线与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就此商讨。但横山勇认为，整个作战计划是以占领常德后返回制订的，由于兵力所限、信心缺乏等原因，第十一军无法长期在常德滞留，因此提出仍按原计划返回原驻地，必要时再出发。这一意见为中国派遣军同意后，第十一军决定于12月11日从常德前线全面撤退[140]。

12月8日，中国前线部队侦知日军已开始撤退。9日，蒋介石电令薛岳、孙连仲：“常德之敌已动摇退却，仰捕捉好机，截击猛追，以收歼敌之效。”[141] 中国军队随即开始全线反击，欧震兵团首先于9日黄昏再次克复德山，并乘势向常德发起攻势，当夜突入常德。常德在失守六天后即被收复。

12月12日夜，正向澧水南岸撤退的日军第十一军接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电报，根据大本营命令，要求其重占常德。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虽只得遵令停止向澧水北岸撤退，将部队部署于澧水南岸，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但对此命令颇有异议，认为并非上策，因为常德作战中国军队“防备坚固”，本方“损失甚多”，参战兵力五万余人，因伤亡、患病等原因减员一万，已无力再发起进攻，因此建议按计划撤回原驻地。在向中国派遣军反复说明情况后，第十一军终于获准继续后撤[142]。

12月18日，日本第十一军在与中国军队对峙一周后全线撤退。中国军队尾随日军进行追击，并收复失地。至1944年1月初，日军返回原驻地，敌我部署恢复战前态势。

常德会战历时两月。根据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统计，中国军队击毙日军联队长三人，日军官兵伤亡约四万人；中国军队三名师长殉国，伤亡官兵约五万余人。日军战史则记载，至12月8日止日军战死1274人，负伤2977人[143]。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采取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相同的战略，即纵深抵抗，逐次消耗敌人，最后坚守常德，以外线兵团进行求心攻击，围歼日军。然而，由于会战初期防御作战退缩过快，会战后期外线兵团无法突破日军防线，第九战区增援部队又逐次使用，未能在常德失守前全部及时抵达战场，这一战略构想最终没能完全付诸实施，取得预期战果。因此中国军队虽在常德会战中予日军相当打击，日军仍基本按其战前部署完成此次作战。

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

一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因日军调整军事进攻重点逐步进入困难时期，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是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

困难局面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日军自1942年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扫荡”作战，使根据地在军事斗争中面临极端严峻的局势。“在四一、四二两年内，敌人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比一次毒辣，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所以在四二年的第四第五两次治强运动中，斗争特别尖锐”[(144)]。日军在1942年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的“扫荡”作战达77次，其中万人至五万人的“扫荡”作战达15次[(145)]。在此期间，日军为了封锁、阻隔八路军，在多处制造“无人区”。如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构筑了割断壕245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74公里，动用作业人员达195万人次。并以武力强迫居民搬迁[(146)]。在“扫荡”作战中，日军增加了在抗日根据地内的据点并增修了公路网。如在晋察冀边区，1941年春日军只有八百多个据点，但至1942年6月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县有15个以上据点，并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兴建了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147)]。由于日军点线的增加，“扫荡”作战更为频繁，使抗日根据地面积显著缩减。在晋察冀边区，冀东、冀中两块平原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北岳、平西、平北三块根据地大大缩小。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根据地许多县、区抗日政府解体，中共基层组织垮掉一半，冀鲁豫区只留下像孤岛一样互不相属的几片不大的根据地，维系着周围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太行区的面积从1940年的十万平方里下降至八万多平方里，太岳区虽总面积没有减少，但全区无一完整的县。山东抗日根据地则缩小了三分之一[(148)]。

而灾荒使面临日军残酷进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1940年秋后开始侵袭华北的水灾、旱灾、虫灾一直延续到1942年，在太行等根据地更是延续到1943年。不少地方旱情连续数月，庄稼颗粒无收。灾情严重的冀南一带，老百姓普遍以糠菜树叶为食，除松柏以外，所有树上的叶子、树皮全被采光[(149)]。日军的“扫荡”、烧杀抢掠和“三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灾荒的祸害，使原本物资就极为匮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的基本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残酷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灾荒也使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日趋困难，军用器材和弹药倍感缺乏，有些部队，每人平均只发几发子弹。在这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缩减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150)]。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具体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但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因此，“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基于对局势的这一估计，中共中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而具体的军事方针是：“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中共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英勇斗争的抗日军民，“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151)]。12月2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又就1942年的中心任务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出指示，指出“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152)]。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

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等许多重要措施，为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指明了方向。

二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于1941年3月底开始在华北发起“治安强化运动”，企图以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一元化的总体战来稳固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并根据它自己确定的治安标准将华北划为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治安区，即仅依靠伪军就能确保治安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由华北伪政权代行管理，由伪警察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尽可能早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二、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势力相互交错，治安须靠日军维持但抗日游击活动仍很活跃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指导、帮助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和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并应加强搜寻和“扫荡”中共势力，予以扼制和削弱，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过渡到治安区。三、未治安区，即日军发动作战时占领、结束后仍成为中共根据地和策源地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不断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除、破坏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不能安身和建设，并应反复“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随后日军进驻，使之向准治安区过渡。1941年7月，日军制订计划，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将治安区从10%扩大至70%，将未治安区从30%降至10%[(153)]。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日军在华北进一步推动“治安强化运动”。12月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部下训示：“方面军鉴于其政略、战略上的地位及任务，感到所负责任更重，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应欣然加以克服，进而推动华北境内的治安及建设。”在新的战争形势下，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政治上强调“在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刷新和加强政务指导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以扶持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使之能够积极参与我军的施策，进而无需我军直接援助，就能确保本身负责范围的治安，最大限度地发挥

中国人的能力”，也就是要更多地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充分发挥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的作用，弥补自身的兵力不足，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经济上强调“尽快确立军、官、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向“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迈进，将华北建成“兵站基地”，培养和补给日军战斗力，服务于战争全局。在思想上强调进一步推动思想战，鼓吹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清算英美侵略的正义战争、皇国的兴衰是大东亚兴废的关键、日华命运不可分离等论调，加强新民会等伪组织，并关闭了燕京大学等学校，在日军管理下接收各种学校，强化奴化教育 (154) 。

1942年2月，华北日军制定了当年度治安肃正计划，其基本方针是：“沿袭前一年度计划大纲，特别在军事方面，灵活实现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在治安建设方面，设法掌握民心，促进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积极性，大力推行具有创造性的措施，使治安状况得到空前改善。”该计划将“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而治安肃正的重点又“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企图以此消灭河北省北部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将未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从而扩大治安区的面积 (155) 。

3月30日，日军以纪念国民政府（即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两周年为名，发起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目标定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运动名义上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新民会为核心，但实际上皆操纵于日军之手。为反对此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针锋相对地对日军发起政治攻势，“强调日本必败，用事实来驳斥日寇的欺骗宣传”，并且“随时提高警惕性，准备迎接敌之‘扫荡’，并集中一切力量，在接敌区与敌进行斗争” (156) 。

作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日军发动了所谓春季四大肃正作战，向冀东、冀中、冀南和晋东南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作战。日军首先于4月1日向冀东发起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扫荡”作战。冀东地区处于联结华北与东北的要道，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已实际控制该区，并扶植了殷如耕傀儡政权，统治十分严厉。但1938年7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一直在此活动，并在蓟县、滦县等七个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设置了直辖于晋察冀军区的冀东（第十三）军分区，成为深入敌后的一把尖刀。此次日军向冀东进行“扫荡”动用了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以及伪军等共三万余人，而冀东军分区此时只有两个团数千人。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合击，冀东军分区避敌锋芒，适时转移，向热河境内挺进。日军合击扑空后，即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6月上旬，日军一部调离后，冀东军分区部队抓住时机于6月下旬重返冀东，并在7月间多次袭击日军汽车，伏击日军部队，使日军屡屡受挫。8月，日军再派主力进入冀东，反复合击，并加强驻守兵力，企图以“蚕食”为主、“扫荡”为辅的方式扩大其占领区。冀东军分区针锋相对地开展反“蚕食”斗争，打击伪组织，破坏交通线，坚持平原游击战。日军对冀东的这次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在此期间，为了阻隔中共部队的活动，保护伪满洲国的“边界”，日军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157)]。

冀中是日军此次肃正作战的重点地区。日军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158)] 4月中旬，日军制定了对冀中的作战实施计划，其方针为：“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

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部十八个步骑兵大队为基干，共约五万兵力。而冀中军区所属抗日武装力量只有约3.5万余人。冀中军区和区党委预料日军即将“扫荡”，于4月下旬决定了反“扫荡”的各项措施，包括精简党政领导机构，主力部队保持相对集中、机动，选择适当时机突围至山区，并留精干部队于内线坚持斗争。八路军总部也就冀中反“扫荡”专门发出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坚持华北，改变某些斗争方式，以求减轻这次损失”，“冀中反‘扫荡’战是相当长期的，最严重的是在最后阶段之反‘清乡’斗争中巩固群众与军队的政治情绪，避免过大过早疲劳与牺牲”[159]。

5月1日，日军开始向冀中发起“扫荡”作战，故此次作战又称“五一大扫荡”。5月1日—10日是日军“扫荡”作战第一阶段。日军分几路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并对石（家庄）德（州）路以北，东至滏阳河、西迄无极安国一线的地区完成了马蹄形包围圈。冀中军区一部转移至外线保持机动，但军区指挥机关与大部部队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被动局面。5月11日—15日是第二阶段，日军以主力对包围圈内深县东南、安平西南和深县、安平以东地区进行合击，随后又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重点，反复“扫荡”。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战斗外，领导机关与主力大部陆续突围转至外线。5月16日—6月20日是第三阶段，日军在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冀中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日军可能撤走，于是在5月21日、22日令部分主力部队返回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即以重兵围攻，冀中军区部队遭受相当大的损失。6月初，冀中军区决定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6月9日，冀中军区一部于深泽城东北宋庄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坂本。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击伤日伪军万余人，但冀中区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为敌细碎分割而控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民众被杀被掳达五万余人[160]。冀中大片的平原根据地此后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建立的冀南抗日根据地也是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目标。日军对冀南发起作战的目的是“击溃冀南地区的国共两军，封锁其暗中活动，以便将来向治安地区推进”。为了配合冀中作战，日军特将冀南作战安排在先，以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对手。4月29日，日军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武城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由于日军隐蔽作战企图并散布各种假情报，冀南军区面对突然袭击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虽经苦战大部突出重围，仍遭受很大损失。此后，日军又对冀县、枣强地区进行“扫荡”，并在占领区设立据点，构筑割断壕，建立伪政权机构和保甲制定，企图向所谓的“治安区”推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此次反“扫荡”中，正规军减员（牺牲、负伤、被俘和失去联络及自行离队）达30％以上（约万余人），游击队垮了十之七八，军队连以上、党政民区以上干部损失四五百人。但冀南军民并未停止抗日斗争。日军自己承认，至6月，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有开始活跃的迹象”[(161)]。

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另一个重点目标是晋东南地区。与河北、河南接壤的晋东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体，其中又分为晋冀豫交界处山岳地带的太行区和沁河中游的太岳区，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就驻扎在太行区内。日军第一军“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起即开始对晋东南地区的作战准备。5月14日日军发起“扫荡”作战，其作战计划分成四期。第一期从5月14日—28日，日军以七千余兵力对太岳区南部进行合击，八路军除以一部阻敌外，大部转移，使日军合击扑空。随后，日军进行疯狂的“扫荡”，大肆烧杀。与此同时，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辽县（今左权县）、涉县地区完成了包围。第二期是此次“扫荡”的重点，自5月20日—6月8日，日军以2.5万兵力分四路向八路军总部发起进攻，并派出空军进行搜索和对地面攻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及三八五旅及时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但八路军总部在转移过程中与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遭遇。“特别挺进杀人队”是日军为此次作战专门成立的，士兵经特别选

拔，着便衣，其任务是在主力进攻前先行出发，“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蔽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5日，八路军总部与其交战，彭德怀副总司令率一部突围，但左权副总参谋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27日起，日军转入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此时转移到外线的八路军部队开始向日军补给线、铁路干线发起攻击和破袭。5月31日，新一旅奇袭日军长治机场，击毁日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第三期自6月8日—20日，日军以一万多兵力向太行区南部的平顺及临近的林县地区发起进攻，在对八路军合击落空后，转入剔抉“扫荡”，并攻击国民党部队第四十军。第四期自6月21日—7月8日，日军的作战目标集中在晋豫边境的国民党三个军。日军发起攻击后，党军迅速转移，日军进行追击，并展开清剿。此次反“扫荡”作战，八路军歼敌三千余人，虽自己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正如日军自己所言：“对于第十八集团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之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162)

1942年10月，日军为扩大并巩固治安区，又发起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日军进行了所谓的“治强战”。与春季四大肃正作战相比，这次秋冬季的“治强战”规模要小些，其特点是“与治安工作和对敌封锁相配合，不断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肃正讨伐”。

日军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及与之相连的“扫荡”作战，虽使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面临抗战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并依托根据地继续抗日游击斗争，而且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日军在华北虽占有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却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而八路军具有人民支持的政治优势，因此针对日军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提出了“敌进我进”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口号，即与敌人争夺游击区，并向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占领区渗透。为适应这一新的对敌斗争

方式，一种新的战斗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出现了。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决定建立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3月17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签署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规定了武工队的任务[163]。随即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向敌后派出武工队。武工队是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斗争于一身的对敌进行综合作战的小型游击队，规模在十几个人至数十人间，“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是“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164]。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牵制了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作战，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如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派出的敌后武工队，在1942年下半年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村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165]。在冀中、冀南这样的平原地区，抗日军民为打破日军的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并便于对敌发起袭击，挖掘了四通八达甚至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将平原游击战坚持下来，使日军惊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166]。

进入1943年后，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面临日益严峻的局势，不断将华北方面军的基干兵力抽调至其他战场，原先强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体战因日军兵力削弱实际上无法实行，不得不将与作战警备无直接关联的政治、经济等事务交由华北伪政权处理，而伪政权却根本无力承担。因此，日本控制下的所谓治安区日趋缩小，而在准治安区，“原来以一个分队就能行动的地区，现在则必须用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的兵力才行”。日军一名高级军官不得不承认：“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其后，巡视了所担任警备的地区，看到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中国方面（指华北伪政权——引者注）各机关也因敌人的反封锁，陷于同样状态。”[167]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军民开始从严重困难中走出来，抗日游击战重趋活跃，敌后根据地逐渐恢复并发展扩大。在晋察冀边区，到1943年底，北岳区恢复和发展了二千多个村庄，新成立了五个县政权，冀中区恢复和扩大村庄三千五百多个，恢复游击根据地五十四块，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冀东也恢复了原有的平原基本区，并开辟了一部分新区。晋冀鲁豫边区等根据地也逐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168]。日本战史记载此时的华北局势时写道："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华北治安殊堪忧虑。"[169]

三　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发展至拥有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另有新四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其中约十万平方公里是巩固的根据地[170]。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分布情况是，第一师在苏中根据地，第二师在淮南根据地，第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第四师在淮北根据地，第五师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六师在苏南根据地，第七师在皖江根据地。

华中地区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及汪精卫伪政权的战略重点。日伪为巩固其统治，于1941年起在华中开始推行"清乡运动"。所谓"清乡"，就是以军事"扫荡"为主体，辅之以强化日伪反动统治的政治清乡、大肆掠夺的经济清乡和宣扬奴化教育的思想清乡，实际上是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战。按汪伪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庆胤的话说，就是"指定应清地区，从事清剿，继以政治，辅以党务，以矫正其观念，了解和运之真谛，整理之，建设之，以健全之行政机构，恢复乡村秩序，则地方之治安庶可确立"，"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171]。"清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行政治上的"以华制华"和经济上的"以战养战"。1941年3月，日军第十三军在

苏州设立了清乡司令部。同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为委员长，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6月，汪伪在苏州设立清乡委员会办事处，由李士群兼主任，负责苏南地区的“清乡”。从7月—12月，日伪先后对苏南的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和无锡、常熟、江阴三个县的部分地区发起了两期“清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于1942年2月发起对苏南地区的第三期“清乡”。在这之前，汪伪将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合并于伪江苏省政府，并成立省保安司令部，同时设立清乡区党务办事处，在“清乡”期间代行伪省党部的职权，而伪省主席、保安司令和办事处主任皆由李士群兼任，以党政军一元化的形式统管“清乡”。第三期“清乡”在昆山、吴县和无锡三县京沪铁路以南地区和江阴、武进两县部分地区进行。与前两期相比，除继续在农村实施“清乡”的各种措施外，并扩展至吴县、无锡、常州、昆山等城市[172]。在“清乡”中，日伪依靠交通干线和据点实行分区封锁，在夜间突击搜索新四军和抗日干部。苏南根据地的新四军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当于实力的五分之一”[173]。但在反“清乡”斗争中，新四军认识到，“清乡”与一般的“扫荡”不同，后者带短期性，前者则不仅在打击我方主力，还要将我方区域彻底伪化，因此相应的对策应是“主力预先转移，跳出其清剿圈，并以少数武装人员利用很好的群众关系，分散坚持原地斗争”[174]。因此，新四军根据形势调整斗争策略，在京沪铁路以北由建立游击根据地转为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的方式，在京沪铁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主力部队则在丹（阳）金（坛）武（进）、太（湖）滆（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开展游击战，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175]。

日伪前三期“清乡”均在苏南并主要集中在京沪铁路以北地区，从1942年夏起，日伪将“清乡”扩展到江、浙两省位于太湖东南的地区和上海郊区。7月，日伪开始对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一期“清乡”，包括吴江、青浦、松江三县和嘉兴、嘉善两县之一部，并在浙江嘉兴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由李士群的副手汪曼云任主任。该期“清乡”原定一年时间，但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担心李士群通过“清乡”抢占他的地盘，因此不予配合，以致“清乡”尚未充分展开，就于9月草草收场。10月，日伪开始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二期“清乡”，并成立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由傅式说兼主任，负责实施。“清乡”区域包括浙江的平湖、海盐和江苏的金山三县的全部和浙江的嘉兴、嘉善、海宁和江苏的松江四县的部分地区，划分为两嘉、平湖、海盐、金山、松南、海宁六个特区。11月，日伪军队开始进行“扫荡剔抉”的军事行动，并推行封锁、编组保甲等各种措施[176]。

日伪对上海郊区的“清乡”开始于1942年8月。8月1日，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16日，陈公博与日军小林部队长小林信男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规定日军以担任军事为主，伪上海市政府以担任政治为主。9月，日伪开始推行上海第一期“清乡”，将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划为清乡区，由日军为主，伪军配合，对三区实行封锁和搜剿[177]。中共浙东区党委为粉碎“清乡”，派出由十二人组成的小型武工队赴浦东“清乡区”坚持斗争。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袭击日军，惩治汉奸，争取伪军清乡人员反正，打击了日伪的“清乡”活动，并建立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78]。

日伪在对长江以南地区推行“清乡”的同时，还对长江以北的苏中等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剿”。1942年春夏两季，日伪军相继对苏中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等发起“清剿”。苏中根据地及新四军第一师采取分散游击与敌纠缠的方针，以麻雀战、阻击战等形式袭扰杀

伤日伪军，并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改造地形，给敌制造障碍。日伪的“清剿”延续至11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但最终无法实现其预定计划，为苏中军民所粉碎[179]。

11月中旬，日伪军又对淮海、淮北、淮南三块根据地发起“扫荡”。日伪军以1.3万余兵力对上述根据地进行合围，企图寻歼新四军主力和党政领导机关。各根据地以主力和领导机关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围扑空，并抓住日伪后方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据点。日伪在合围扑空后，在根据地内反复“扫荡”，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实现分区“清剿”，加剧了各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

鉴于日伪1942年下半年对苏中等根据地的进攻及继续向长江北岸增兵，新四军判断日伪将在新的一年对长江以北的敌后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因此决定分散部队，转移领导机关，并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该计划，并要求他们“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电指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180] 1月初，新四军和华中局机关从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秘密转移至盱眙。

1943年春，日军如新四军所料进一步集中兵力对华中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其进攻的重点是苏北和苏中根据地。2月17日，日伪军以二万兵力向苏北盐阜区发起“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由于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早已转移，新四军第三师除留一部于扫荡圈内与敌周旋，主力向扫荡圈外转移，避敌锋芒。日伪在扑空之后，分兵十数路进行分区“清剿”，修筑公路，安置据点，企图实行长期控制。新四军第三师在扫荡圈内部队袭扰日伪军，打击其薄弱部队，在扫荡圈外部队则寻机攻击敌据点，打击其交通运输。日伪军在新四军内外线打击下，顾此失彼，除留一部兵力守备据点外，其主力于3月中旬不得不向淮阴、盐城等地撤退。于是，新四军集中兵力向敌发起进攻，并攻克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4

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胜利结束反“扫荡”作战，杀伤及俘虏日伪军共约一千五百人[181]。

在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日伪对苏中根据地开始“清乡”。4月1日，日伪成立苏北区清乡主任公署。8日，李士群与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签订《关于苏北第一期地区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日伪选择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四县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集结两万多兵力向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分进合击，进行“军事清乡”。新四军对日伪“清乡”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在‘清乡’圈内以分散的群众游击战，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打击敌人。在非‘清乡’区则以积极动作进攻其薄弱据点，特别是向派出了‘清乡’部队的伪军防区进攻，以配合四分区之坚持。”[182] 日伪军开始合击时，第四军分区以大部主力转移至封锁线外打击敌人，而留在“清乡”区内的主力、地方武装、民兵则避敌锋芒，专打日伪“清乡”小分队，袭击敌“清乡”机关，并开展伏击战，阻扰敌修公路、筑篱笆、架电线。新四军还多次潜入日伪在苏中“清乡”的指挥中心南通城内，先后镇压“清乡”人员百余名。日伪在苏中的“清乡”，“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至，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行之能事。如南通中区被奸淫妇女为数即达千人。奸淫掳掠之外，复采取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烧毁之民房，触目皆是”[183]。6月，日伪转入“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推行编查保甲，企图建立并强化伪组织。第四军分区广泛发动群众反对编查保甲，并以游击战袭扰日伪军，打乱其“政治清乡”的计划。在“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都不能获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日伪从8月起又推行所谓的“机动清乡”和“延期清乡”，但仍无法达到其预期目标。而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从分散的小型的游击战发展成“全面全民的游击战局面，敌人虽部分分割了我地区，但有些地区我工作更为加强，我控制力量能达敌占领之地区”[184]。

1943年春，日伪还在镇江地区推行“清乡”。镇江地区包括镇江、

丹阳、扬中三县（后又划入武进、无锡两县），地处大江南北的出入要冲，南接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北与新四军的苏北根据地隔江相望，是抗日力量南北来往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日伪“清乡”的重点。3月1日，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成立。4日，李士群与驻镇江地区日军指挥官山内正文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随后，日伪军队开始疯狂残酷的军事“扫荡”，由点、线扩展至面，并实施封锁以及清查户口等措施。镇江地区的“清乡”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185)。

1942—1943年，由于日伪疯狂的“清乡”和“扫荡”，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但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根据地军民继续敌后抗战，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巩固并发展了敌后根据地，最终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

(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59页。

(2) 1941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直辖三个师团，其属下的第一军辖三个师团、第十二军辖两个师团，驻华中的第十一军辖六个师团，驻江南的第十三军辖三个师团，驻华南的第二十三军辖两个师团，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八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5页。

(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58页。

(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61页。

(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9—30页。

(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34、185页。

(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44页。

(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91—193页。

(10)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96—397、401—405页。

(1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36—539页。

(12)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59—560页。

(13)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第七册，第185页，引自徐勇：《征服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14)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97页。

(15) 参见马振犊：《惨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6页。

(16) 《蒋介石致薛岳电》（1941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17) 《战时外交》（三），第74页。

(18)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19页。

(19) 《军事委员会拟各战区目前之急务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83—84页。该稿所注日期仅为“1941年”，但根据其内容，可推定此稿成于12月中、下旬。

(20) 《军事委员会拟国军攻势作战计划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79页。

(21) 如军令部1940年4月的《国军守势作战计划稿》、8月的《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1—71页。

(22) 《战时外交》（三），第159—160页。

(23) 《战时外交》（三），第161页。

(2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25) 《长沙作战》，第140—141页。

(26) 薛岳：《第三次长沙会战》，全国政协本书编写组编：《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27) 《薛岳致蒋介石等密电》（1941年12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35—1136页。

(28)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77、385—386页。

(29)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89页。

(30) 《杨森致徐永昌密电》（1941年12月2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2页；《长沙作战》，第149页。

(31) 《长沙作战》，第151页。

(32)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91—392页。

(33) 《长沙作战》，第158页。

(34) 《长沙作战》，第162页。

(35)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稿》（1941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6页。

(36)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95—397页；《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5—1146页。

(37)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01页。

(38) 《事略稿本》，1942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

(39) 《长沙作战》，第182—183页。

(40) 赵子立、王光伦：《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杨正华：《长沙保卫战始末》，均载全国政协：《湖南四大会战》。第十军长沙会战机密日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3页。

(41)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稿》（1942年1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5页。

(42)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07页。

(43) 《长沙作战》，第186页。

(44)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11页。

(45)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199页。

(46)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12页。

(47)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要报》（1942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7页。

(48)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军伤亡失踪官兵统计表》，《敌军伤亡表》，《作战经过》（二），第541—546页。此两表为侍从室第六组调

制，后一表附记曰：“本表系根据军令部转据薛长官一月养达长回辰达电调制，其伤亡总数过大，似不确实。”另据日方记载，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见《长沙作战》，第215页。

(49) 《长沙作战》，第214页。

(50) 《事略稿本》，1942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长沙作战》，第214页。

(5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2页。

(52) 蒋纬国：《抗日战争指导：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4页。

(5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高书全译：《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5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0页。

(5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3—214页。

(5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1—215页。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贾玉芹译《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记载，日军出动兵力共达85个大队，见该书第75页。

(57) 《昭和十七、八年的D国派遣军》（上），第79页。

(5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0页。

(59)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60)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61)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0—601页。

(6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90页。

(63)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96页。

(64)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43页。

(6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04页。

(66)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45页。

(67)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1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03页。

(68)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2页。

(69) 陈颐鼎：《衢州保卫战亲历记》，《闽浙赣抗战》，第361页。

(70)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57页。

(71)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58页。

(72)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17页。

(73) 《第三战区浙赣会战作战经过概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573页。

(74)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18页；《抗日战史》第八册，第63页。

(75) 陈颐鼎：《衢州保卫战亲历记》，《闽浙赣抗战》，第361—362页；《顾祝同报告衢州战役溃败经过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559页。

(7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20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81页。

(77)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4页。

(7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81—85页。

(79)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46页。

(80)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39页。

(81)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54—156页。

(82)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5页。

(8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9页。

(8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14页。

(8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70—172、186—188页；《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10页。

(86) 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页。

(8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89页。

(8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高书权译：《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

(8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744页。

(90)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98—101页。

(91)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11页。

(92)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15—116页。

(93)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71页。

(94)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33页。

(9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82页。

(96)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35—136页。

(9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0页。

(98)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45—146页；陈诚：《陈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99)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3页。

(100) 《作战经过》（二），第602页。

(101)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1页。

(10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5页。

(103)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5页。

(104)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64页；《陈诚回忆录》，第116页。

(10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8—100页；《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65页。

(106)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94页；《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73

—175页。

(107) 《作战经过》（二），第603页。

(10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3—104页。

(109) 《周至柔致何应钦电》（1943年6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七八七，8842；《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97页。

(110)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7页。

(111) 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51页；《作战经过》（二），第597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7—108页。

(112)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227页。

(11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43页。但据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天野正一的看法，常德作战的目的与鄂西会战相同，也是为了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力，见《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25页。

(114)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27页。

(115)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页。

(116)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07—1208页；《蒋介石致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电》，《作战经过》（二），第607页。

(117) 《蒋介石致孙连仲等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0页。

(11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44页。

(119)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26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7页。

(120)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7页。

(121)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30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45页。

(122) 邱正民：《常德、桃源地区战斗》，载《湖南四大会战》，第274—275页。

(12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72—173页。

(124)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0—1191页。

(125)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1页。

(126)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3页。

(12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1页；《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及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5页。

(12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4页。

(129)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86页。

(130) 《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5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9—170页。

(13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0页。

(13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1202页。

(133) 《蒋委员长令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等保卫常德电》，《作战经过》（二），第608页。

(134) 《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及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6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1页。

(135)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90页。另有材料记载，余程万命柴意新离城策应援军，而“柴仍欲死守城内，促师长前往”，最后以身成仁，见《作战经过》（二），第616页。

(13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1页。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认为，“此次战役之激烈为淞沪会战后之第一次”。但其对余程万撤离常德城却颇有微词。见《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12页。

(137)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第1193页。

(138) 《蒋介石致薛岳、孙连仲江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3页。

(139)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11页。

(140) 《日军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44—45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8—181页。

(141) 《蒋介石致薛岳等青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3页。

(14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85—190页。

(143)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13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91—192页。

(144) 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转引自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61页。

(145)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146)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2—174、215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0—652页。

(147)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7日。

(148)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32页；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58—159页。

(149)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65页。

(150)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15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页。

(15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72—273页。

(153)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14—418页。

(154)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3、58、70—76页。

(155)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00—101页。

(156)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反对敌寇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册，第646页。

(157)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2—174、215页；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9、697—699页。

(158)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1页。

(159)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关于粉碎敌对冀中“扫荡”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册，第655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626页。

(160) 吕正操、沙克致军委集总军区电，1942年9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第599—602页；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46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631、635页。

(161)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71页；《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5—137页。

(162) 刘伯承：《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第637—644页；《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8—183页。

(163)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75页。

(164) 《朱德选集》，第153页。

(165) 罗焕章等：《中国抗战军事史》，第350页。

(166) 《华北治安战》，第441页。

(167)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91—292、341页。

(168)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471—472页。

(169)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82页。

(170)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5页。

(171) 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137页。

(172)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28页。

(173) 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9页。

(174) 刘少奇：《关于苏南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175)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8页。

(176)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432—436、442—443页。

(177)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90—191、518—519页。

(178) 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南抗日根据地》，第11—12页；朱亚民：《浦东的反“清乡”斗争》，载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二辑。

(179)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8页。

(18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81) 黄克诚：《盐阜区反扫荡》，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82) 《粟裕军事文集》，第183—187页。

(183) 粟裕：《苏中反清乡斗争胜利》，《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1日。

(184) 吉洛、钟民：《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的经过》，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72—797页。

(185)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92、488—489页。

第三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统区

第一节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强化

一　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的中央体制

1943年5月12日，为接受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呈递国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从重庆歌乐山双和桥官邸乘车入城，前往国民政府办公处。不料，专车在行驶途中与美军卡车相撞，遂使林森突患脑溢血，卧床不起。8月1日，林森在双和桥官邸去世。林森的去世为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提供了机会，也引起了国民政府中央统治体制的一些变化。

在国民党的统治体制中，国民政府主席一直是个微妙的职位。它随着国民党权力重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权力大小也因人而异。现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是根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精神而被推举上台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内外交困，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军总司令之职。在这一背景下，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广东方面（以胡汉民、孙科等人为代表）决议趁此机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变国民政府主席大权独揽的状况。于是，12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便正式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年高德劭”的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并通过了《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它的最大特点是约束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试图建立内阁责任制的权力运行机制。最明显者，以前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依

规定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而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则无此规定，且明确规定不得兼任其他官职。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依规定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司令、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而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时，则无此权[(1)]。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主席权限的变化是很大的。

从此，在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整个期间，仅是一个虚尊的政府元首，政务实权在行政院。林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曾自嘲为“监印官”。由于蒋介石复职后长期担任行政院院长，掌握政府实权，所以没有向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伸手。再者，林森在国民政府主席任上也很会察言观色，博得蒋介石的信任。这样，原本规定只能连任一次，即到1935年12月就应期满卸任的林森，竟连续当了十二年的政府主席，直至去世。而蒋介石虽然权力如日中天，却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和机会问鼎国家主席的权位。

然而，尽管自1931年12月以后，国民政府主席的权限已十分弱小，仅是虚尊的地位，但在中国全面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渐升高，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却日渐显得重要和有分量了。

首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引起美英各国的重视。它们认识到没有中国在东方牵制日军，西方国家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是不可能的，迫于形势，美英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以示尊重。美英不仅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物资，以利中国抗战，而且罗斯福在征得英、澳、荷等国政府同意后，于1941年12月底建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全世界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宣言——《联合国家宣言》。签署该宣言时，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居于领衔地位。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美、英宣布放弃在华侵略权益。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此后，中国被称为四强之一，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显得活跃。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活动日渐频

繁，从参与国际事务的角度出发，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的特殊性显现出来。

在四大国的领袖中，美国是总统制，国家元首是总统。英国虽然保存女皇，但实行的是内阁制，政府首脑是首相。斯大林更是被公认为苏联的象征。蒋介石的头衔虽然已经十分显赫，已成为中国公认的最高领袖，但对外代表国家的却不是蒋介石，而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以，随着时局的变化，蒋介石从觊觎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到企图取而代之，便是很自然的事。

其次，以一般事实而论，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权威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国民党统治的角度来说，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的理论，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政权”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国民行使，闭会时，以政权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治权”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实行[(2)]。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党统政”。抗战全面爆发后，客观上产生了集中指挥权能的要求。于是，国民党领导体制随之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适应战时需要，确立了总裁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同时，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组织庞大，事实上已不召集”[(3)]，其职权移交国防最高会议代行。这样，国民党战时体制演化为两大系统：军事委员会与代行政治会议职权的国防最高会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已被授权对党政统一指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也有在作战时期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虽然两者均为蒋介石，看似不存在矛盾，但从权力运行机制的角度出发，仍存在问题，缺乏一个在制度上统驭一切的机关。为此，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又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使之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对党政军统一指挥的最高机关。在这一体制之下，

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依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它指挥国民政府五院及其所属各部会。上述国民党战时统治体制演化的最大特征是，“政权”的无限扩大，“治权”的日渐弱化，甚至缩小。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取得了超越党和政府的最高“政权”和“治权”。就法律原则而言，蒋的权力已达到不受任何制约的程度。然而，尽管国民党通过“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党政军一体化”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但是，毕竟国民党并不等同于国民政府，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虽然在以党统政的原则下，实际上已是党政军最高统治者，不过，从理论上而言，蒋介石却不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不能代表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所有命令处分，以及关于军事动员之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行之”的规定，对蒋介石仍有某种程度的制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和蒋介石看来，解决“政权”与“治权”、“政治领袖”与“政府首脑”之间存在的二元化矛盾，使二者完全合二为一，实现党国领袖定于一尊的惟一途径，便是改变现状，由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第三，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日益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应对这种挑战，国民党及其代表的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将党政机构“综合化、一元化”，以利用蒋介石的威望，全面强化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

上述内容表明，不论是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蒋介石取代林森都有其必然性。而林森的患病和去世，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实际上，早在林森卧床不久，鉴于林森病势严重，国民党中央就已经在考虑由蒋介石接替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的问题。5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百二十八次常委会临时会议，决议修改1931年12月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由于原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另外，原组织法中也没有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有什么人代行职务的规定。经过修改，于第十三条

中增加一项条文："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之"，并删去了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的条文，为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铺平了道路。8月1日林森去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立即于当晚举行第二百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选任"行政院长蒋中正同志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 蒋介石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已没有任何妨碍，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

1943年9月6日—13日，即在林森逝世后1个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修改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为蒋介石合法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完成法律手续。修改的主要内容为：

> 第十条，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二十四人至三十六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第十一条，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第十五条，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5)]。

同时还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延长了主席的任期，由原规定任期两年改为三年，并把只能连任一次的规定，改为"连选得连任"。还规定："与宪法实施后，依法当选之总统就任时，即行辞职。"[(6)]

显然，此次修改的最大特点是，国民政府由一座空架子变为充分拥有治权的政府机关，国民政府主席不再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虚尊元首，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握有大权的国家首脑。政府体制大体恢复到了1931年12月以前的状况。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修正还有如下的含义：第一，条文修改为蒋介石实行集权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保证蒋介石终身当中华民国最高领袖；第三，为蒋介石日后在实行宪政时出任总统作准备。这次改制，完成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归于一人的最后一步，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统治地

位。全会在作了上述修正后，最后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长。因此，可以说蒋介石已成为彻头彻尾名副其实的专制统治者。

抗战后期，蒋介石利用林森病逝的机会，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当时并未被人们单纯认定此举是蒋介石追求个人权力的表现，在国统区也未引起人们过多非议。其实，从国民党统治的需要着眼，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

其一，对日抵抗战争在客观上要求最高指挥当局具有比平时更高的指导权威和更快捷的指挥方式，以便有效地管理和调遣一切资源用于战争。这样，抗战的特殊形势，客观上为国民党集中权力，加强指挥效能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顺应了这种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社会基础。

其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利用抗战的有利时机，全面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在统治体制方面，相继推出了总裁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制、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制，极力强化蒋介石的权威，使蒋介石高高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因此，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是国民党强化一党专政，实行“以党统政”的具体表现，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既然蒋介石接替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顺应“对于选举主席问题，多数同志主张恢复十八年主席前制”[(7)]，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同时，也相应对国民政府进行了人事调整。首先，选举孔祥熙、孙科、叶楚伧、居正、覃振、戴传贤、朱家骅、于右任、刘尚清九人为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其次，依新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由蒋介石提请任命“蒋中正兼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叶楚伧为立法院副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覃振为司法院副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朱家骅为考试院副

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刘尚清为监察院副院长”[8]。不难看出，此次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数之少为以往历届所未见，国民政府委员同时又为五院院长、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权力被大大加强。虽然从体制上而言，上述变化更多的只是恢复了1928年、1930年的旧制，但实际上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反映了中国政治领域中发展的两种趋势：一是集中权力，试图提高行政效率；二是权力高度集中于蒋介石手中。

第二，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在国民政府中具有完全支配的地位。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字面上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关，身兼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为该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权力的扩大只能意味着权力转移和集中到蒋介石手中，“故委员会的效用殊属微小”[9]。

总之，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进行人事调整，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集中权力，发挥国民党的统治效能。但它表明国民党的抗战体制无论怎样变化，都始终是围绕着蒋介石这一“圆心”进行的。在抗战前途日趋明显，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已广泛提出争取民主的挑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但不采取实际措施逐步弱化政权的战时性质，扩大民主参政渠道，反而在常规政府组织谋求永久独裁权，通过因人易法的手段获取不受限制的权力，这无疑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做法，对国民党的统治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二　国民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实行“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面对战局相对稳定的局面，国民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一些以前即已存在、战时更加突出的问题。“行政三联制”，就是战时国民政府为解决行政效率低下、不适应战时环境、政令不畅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行政改革措施。

概而言之，所谓“行政三联制”，就是将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设计、执行、考核形成一个有机的行政系统。设计是行政活动的开始，执行是对于设计的实施，考核既是对执行的检验，又是对下一个设计的反馈。如此首尾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的行政系统。如果说新县制是国民党意在基层加强其统治的地位和扩大其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的话，那么“行政三联制”的推行则是涉及整个国民党官僚统治系统，因而更具有全局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国民党整合官僚统治机器，提高行政效能，在制度上进行建设的重要手段。

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行政效能低下，历来是国民党党政机构的痼疾弊端，在进入抗战后期后，愈益显得突出，与抗战环境格格不入，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战时的各种努力。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这种弊端的危害，倡议国民党进行行政制度改革。同时，伴随着国民党战时体制的不断独裁化，其权力运行机制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形。例如，一些需经几道法律手续方可解决的事情，凭蒋介石的一道“手令”，便可使其简单化。各部门相互推诿事权，敷衍塞责，事事上报，不见“手令”，不敢作主，一些相关部门行政法律程序成为走过场。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使权力运行复杂化，并形成文牍主义的恶劣官风。一方面是蒋的“手令”使权力运行简单化、表面化。与此同时，又造成权力运行混乱化、复杂化。许多部门因不明职权使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显然，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极不利于抗战大局的，也是蒋介石实行个人高度集权统治的一个严重障碍。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决定进行“行政三联制”的行政改革。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推举蒋介石重新担任行政院长，为推行“行政三联制”的行政改革做人事上的准备工作。次年3月蒋介石就在中央人事行政会议上作了《行政三联制》的训词，首次提出“行政三联制”的主张。同年7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交了题为“总裁交议拟设置中央设计局统一设计工作，设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立‘行政三联制’基础案”的提案。在该提案中他表明了主

张实行“行政三联制”的理由：“凡政治经济之设施，必经设计执行考核三者之秩序，不有精密之设计，无以利事业之推进；不有切实之考核，未有察执行之进度。”蒋介石承认在政府机关中“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因而“进度迟滞，成效难期”，“为纠正上述之缺点，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置中央设计局，……另设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10)]。五届七中全会之后，国民党开始正式实行“行政三联制”。蒋介石又于1941年2月先后发表了《党政工作考核之责任与工作要旨》、《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其工作要领》，作为指导性文件。上述蒋介石的三篇训词和一项提案，就构成了“行政三联制”的基本理论和实施要领。

根据蒋介石的《行政三联制大纲》，行政设计的基本要点：一为计划需要与预算相联系，二为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来制定年度计划与经费支出，三为从各部门预算的百分比中确定各部门的工作中心。关于行政执行，蒋介石认为要改变国民党机关中的涣散现象，首先要建立“幕僚长制度”，并实行分层负责制，使人人明确职责，不相互推诿。其次要命令下级机关执行工作，并监督指导。“幕僚长制度”是蒋介石为行政执行而专门设计的，它脱胎于军队机构中的参谋长这一职务。其用意就是指定一名专人负起机关内部事务的总责任，“机关内部的任务完全由幕僚长负责”，“主管长官可以有时间去主持要务与考虑较大的问题”[(11)]。这一制度对于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力机制有直接作用，因而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关于行政考核，蒋介石专门设计了行政考核三种方法：一为年度政绩比较表，即由各级政府负责汇编其行政机构的年度工作成绩，作成总表呈送上级机关考核。二为政绩交代比较表，这是考核行政主官成绩的报告。三为某事业的进度表，主要针对每一件具体的事项进行考核[(12)]。至于推行“行政三联制”的基本方法，后来孔祥熙是这样概括的：“一方面设立中央设计局，一方面设立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分别主持设计与考核的工作；至执行方面，在党的部分为中央党部，在政的方面，行政院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三联制全部的设施，则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总其成。”[(13)]

具体说来，“行政三联制”的设计一环由中央设计局负责。按照《中央设计局组织大纲》，该局直属国防最高委员会，是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计划之设计及审核的最高机关。局设总裁，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考核一环由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负责。依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组织大纲》，该局也直属国防最高委员会，负责考察核定设计方案之实施进度，以及党政机关工作经费人事之考核[14]。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后，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开始自上而下推行“行政三联制”。这一被称为“新政”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40年7月至1942年秋，为“行政三联制”的发动阶段。但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对“行政三联制”反应冷淡，直到1942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时，“于行政效率未见显著进步”、“不遵送计划与不遵照计划执行”，使“行政三联制”“支节割裂，名不副实”[15]。（二）从1942年11月至1943年9月，为“行政三联制”全面推行阶段。国民党中央鉴于“行政三联制”在各级机关未见实施，遂决定强令将这一制度向全国全面“切实推行”，规定中央各机关必须在1943年3月底以前、省市6月底以前、县9月底以前成立各级设计考核机构，并专门制订《党的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在国民党中央的严厉督促下，各省市分别制订了本机关的实施细则，如四川省就制定了《四川省政绩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十条，至此，“行政三联制”向下层缓慢推行。（三）1943年9月以后，“行政三联制”进入草率结束阶段。

“行政三联制”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措施，是被国民党寄予很高期望的。蒋介石就认为这是“国家基本制度的一种”，“应该在抗战中完成其制度，然后在战争结束后，我们才有推行新建设的机构”[16]。它曾被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吹捧为是“在现代政治制度上并无先例”，国民党的官方学者也认为，“行政三联制”的实施，是战时行政机构演进的第四阶段，是由平时政制转变为战时政制的完成[17]。但是，“行政三联制”实施后，它对国民党战时政体的权力运

行所起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行政三联制”的实施，也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收到什么实效。孔祥熙在总结“行政三联制”实行结果时承认有三个普遍存在的毛病：“一是多犯敷衍门面的毛病”；“二是多犯不相联系的毛病”；“三是多犯铺张夸大的毛病”，并说“字面所写的多与实际不符，或者连十分之二三都做不到”[18]。有人在研究后更认为，实际情形比上述国民党官方说法更糟，存在下列几方面的问题：1．上级与下级不一致，党政各部门互相掣肘。2．计划与预算脱节。3．组织机构徒有虚名，法规命令繁复。4．抗战后期，国统区士气低下，民心相背，广大人民及中下层官吏对国民党政府缺乏信心，因而自上而下地推行“行政三联制”没有广泛的基础[19]。难怪国民党内政部在实行之初就认为这一制度“理想过多，难收实际效果”，经济部也认为“此制之推行，至多仅能维持原有之行政效率”。因此，“行政三联制”的推行并没能消除国民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在行政上化腐朽为神奇，改变其权力运行中的混乱和涣散的局面。作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它最后收效甚微，流于形式，走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三　推行新县制，强化统治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且直接危及到了国民党的统治。从1938年起，为应付日本全面侵华引起的严峻挑战，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在遏制日本侵略势头的同时，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推行“新县制”，就是国民党强化在基层统治地位、巩固其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所谓新县制，是为了贯彻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县以下地方行政制度。国民党人将其解释为：“新县制，是改造基层政治机构，完成地方自治，准备实行宪政的政治建设工作，其中心任务是推进地方自治。”[20]“新县制”从提出、发动到实施有一个过程。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国民政府发现仅依靠工

商业的经济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进战时县政机构促进抗战力量案》，指出："欲求得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力量适应天然地形，运用广大民众自卫战，方足致敌死命。……仍必须从县政上做起。"[21] 1938年4月，为贯彻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作了《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机构关系》的演讲，并创制了《县以下党政机构关系草图》。这是"新县制"出台的前奏。1939年6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又作了题为《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的讲演。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精神，国民政府着手召集研究县政问题的有关人员，起草了《改进县以下地方组织并确立自治基础案》。该方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核修改，定名为《县各级组织纲要》（简称《纲要》），并送交蒋介石"最后修订"，由行政院于1939年9月颁布。

国民政府颁布推行的新县制《纲要》共十章，即（1）总则；（2）县政府；（3）县参议会；（4）县财政；（5）区；（6）县（镇）；（7）乡（镇）民代表会；（8）乡（镇）财政；（9）保甲；（10）附则；凡六十条。其主要内容为："县为地方自治单位。"按照县的面积、人口、经济、文化、交通等状况分为三等至六等，设县长一人。区的划分以15乡（镇）至30乡（镇）为原则，设区长一人，指导员二至五人。乡（镇）的划分以10保为原则，设乡（镇）长一人，副乡镇长一至二人。保的编制以10甲为原则，不得少于6甲多于15甲。甲的编制以10户为原则，不得少于6户多于15户，设甲长一人。同时，还设立"民意机关"，县设参议会，区设委员会，还有乡（镇）民代表大会、保民大会、户长会议等。根据《纲要》，新县制的推行还要相应完成下列十四项工作，即（1）编查户口；（2）规定地价；（3）开垦荒地；（4）实行地方造产；（5）整理财政；（6）健全各级行政及自治机构；（7）训练民众；（8）开辟省县乡交通及电话网；（9）设立学校；（10）推行合作；（11）办理警卫；（12）推进卫生；（13）实行救恤；（14）厉行新生活，禁

绝烟赌，改良风俗，养成良好习惯[22]。

《纲要》颁布后，国民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原则》，规定“各省应无分敌后与前方，一律遵照实行”，于“三年中一律完成”。由此，“新县制”作为一项行政改革措施进入实施阶段。

国民党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力推行“新县制”，实行县制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第一，国民党总结以往对地方统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县以下基层组织涣散、不健全、号令不畅，使国民党难以有效控制地方，已严重影响了国民党战时体制的有效运行的现实，使国民党将新县制视为使其大力加强对广大乡村统治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第二，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形势变化，一些地方军阀诸如新疆的盛世才、云南的龙云等都摆出了服从中央和抗战大局的高姿态，但实际上地方割据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因此，在蒋介石看来，实行新县制可以从根本上打击、瓦解地方实力派的分裂割据基础，真正“统一中国”。第三，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更为现实的需要，则为防共、反共的政治目的服务。“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但是，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在抗战的主张、战后的政治意图等方面也均存在明显的分歧。因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极力想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并力图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然而，随着抗日战局发展，共产党不仅未被削弱，相反，却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在敌占区广大农村广泛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力量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国统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局面对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实行新县制，隐含的政治意图就是“通过新县制”，“从根本上铲除共产党势力及其影响”[23]。第四，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也有更为直接的经济原因，这就是动员广大农村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挽救濒于衰落的国民经济。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富庶地区相继沦陷，对国民政府来说，如何筹措巨额的军费和维持国民政府统治机构正常运转的经费，以支持抗战和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已成当务

之急。而随着战争的进程，国统区财源日趋枯竭，加之，通货膨胀已有加剧之势，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财政收入重心，试图依靠农民来支撑大局。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要保证抗战胜利，就要民众出钱出粮出力来支持抗战"，"为使人民能自动起来办理如何出钱出力来支持抗战"，"必须实行新县制"[24]。可见，新县制已成动员农民支持抗战的工具，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为主要依靠后方农民来提供战时财源的保障。第五，实行新县制是为实行宪政奠定基础。抗战爆发后，迫于全国人民的政治压力，国民党在1938年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加速完成地方自治，为实行宪政作准备"。新县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样，新县制的推行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即完成地方自治，为实行宪政奠定基础，并被看成是"宪政之能否推行顺利，系于县地方自治之能否完成，则新县制实为奠国家于长治久安之基石"[25]。

纵观抗战时期新县制的实施，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9—1942）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9年10月训令各省颁行《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原则》，次年元旦，通令全国实行新县制。于是，各省分别拟定了实施计划。根据国民政府《实施原则》规定，1942年应为新县制预定完成的最后期限。但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报告，此时在19个省的1469个县中，只有944个县实行了新县制（占64%），调整了1053个县政府，建乡镇公所25,069个，保办公处318,367个[26]。另据国民政府内政部1943年9月编《各省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成绩总报告提要》，各省实施概况见下表：

县各级组织实施概况

省别	全国所辖县市局数	实施之县局数（市及特别区除外）	因特殊原因尚未实施之县局数

四川	144	137	4
云南	131	112	6
贵州	79	78	
湖南	78	76	
湖北	72	60	10
广东	99	66	31
广西	100	99	
江西	84	69	4
福建	68	64	
河南	111	67	44
安徽	62	38	24
西康	48	13	35
陕西	93	34	9
甘肃	72	66	4
青海	20	11	9
浙江	77	76	
总计	1337	1106	210（115）

资料来源：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下），第336—338页。

上表所列实施情形与国民政府所规定的期限，以及各省上报国民政府的实施计划都有相当的距离，更何况还存在不少虚假的成分。以受国民政府表彰的四川省为例，由于四川是陪都所在地，具有示范作用，所以蒋介石十分重视，曾一度兼任省主席职务，他要求四川省先于其他省完成新县制。由上表所列情况来看，在四川省上报的成绩中，该省所属144个县市局中，实行新县制者为137个，尚未实施者有4个。但是，实际情形远非如此，时至1942年底，大多数项目并没有完成。峨嵋等数十个县乡公所尚未成立[27]。财政管理、土地测量、地价税等方面的工作，均未展开。新县制中地方自治财政的完成，主要是以地政工作完成为基础的，此项基本工作没有展开，其他

工作均无从谈起[28]。既然像四川这样的省份在新县制的实行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他如西康、陕西、青海就更成问题。因此，新县制的推行到1942年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大多还只是纸上谈兵。鉴于上述情况，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只得详细“规定县政中心工作及分期推行地方自治事业之程限”，严令各省县“务须在1945年底完成新县制”[29]。

第二阶段（1942—1945）

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结束后，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督促下，各省继续推行新县制。1943年11月7日国民政府总结各省推行“新县制”情况如下：“先后办理实施者，即有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绥远等二十一省（其中江苏、山东、山西、绥远情形特殊，虽有计划，但未能尽付实施）。”[30] 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44年底，全国1362个县局（县级管理局）中，已有1107个实施了新县制，占81.2%，调整区署1266个，建保办公处343,823个[31]。

和上阶段一样，上述数字并不真实，弄虚作假的成分居多。实际上，就连上一阶段国民政府褒奖的所谓实行新县制的模范县浙江、四川、湖南等省也未完成。例如，浙江在1942年底已上报完成，但经内政部考核发现“虚假成分颇多”[32]。不得已浙江省只得重拟《新县制三年实施计划》，后干脆以“本省环境特殊”为由，上报内政部不但“近期难以完成”，“即使再过五年，仍不能全部完成”[33]。湖南省则直到1945年底，仍上报该省新县制“根本没有推行”[34]。再以这一阶段新县制推行的重点——建立健全各级民意机关来说，作为“新县制典范”的四川，到1944年底，所属137县的县参议会“均未成立”，而根据国民党1943年9月五届十一中全会规定，1943年底“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一律完成”。期限与实际相差甚远。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再次规定“限于民国三十四年底以前，各县市民意机关一律完成”

[35]。但直至1945年5月，“各地民意机关迄未建立”[36]。

上述事实说明，第二阶段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努力仍然很不理想。如果说第一阶段各省为应付差事，虚报成绩弄虚作假的话，那么第二阶段中，各省仍然存在上述情况，所不同的是有些省干脆上报中央，借口“环境特殊”或“人力、财力、物力条件过差”，一再推延新县制完成的期限，使国民政府视为“全国上下之中心工作”的新县制的完成遥遥无期。国民政府也深知新县制的推行存在很大问题，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回顾了新县制推行六年来的情况后就指出：“政府对于新县制之实施及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六年来督策进行，虽多效力，但课其实效，则地方自治仍未能完成，……实为训政时期无可讳言之缺陷”[37]。实际上等于承认新县制基本上未达预期目标。于是，国民党“六大”只得决议于抗战胜利后继续推行新县制，以奠定宪政基础。这是以后的事了。

抗战时期尤其在后期，国民政府试图将新县制作为理想化的基层统治制度，推行全国。但是，实际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除在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仍是一纸计划[38]。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很多：第一，国民党的集权统治与地方自治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国民政府要真正调动起亿万民众的抗日积极性，真正实行“训政”，以为日后“宪政”奠基，就必须真正实行它一直提倡的“地方自治”；另一方面，面对战时经济的衰微，中共力量的强大，地方势力的抵制，国民党又感到不能削弱集权。这一对矛盾贯穿于新县制推行的全过程，而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实际的推行中，这一对矛盾演化的结果是国民政府一步步走向其反面，由提倡自治到背弃自治，由“自治”到“官治”，日益暴露出其独裁专制的本质，也决定了新县制失败的命运。第二，人才缺乏。据行政院估计，“要推动全国县政工作，政府须训练11,187,336名行政人员”[39]。当时根本无法实现。由于缺乏推行新县制的人才，致使大批土豪劣绅、鱼肉乡民之乡镇保甲长趁机参与其内，各地乡村政权仍基本上为土劣所

掌握，这在人员上就决定了新县制无法推行。第三，经费缺乏。推行新县制除需要大量兴办行政事务机构外，还有相配套的十四项自治事项需要办理。这在客观上就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援。据估算，在原有1.722万余万元之外，需要再增拨5.89万余万元，“倘将各地自治机关所举办的事业费一并加入，那么，数额之巨大当更令人惊骇”[(40)]。如此巨额的经费，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支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结果，无力承担的国民政府只得大力削减地方政府的经费预算，甚至克扣停发。由于没有经费的支持，就造成地方政府缺乏推行新县制的积极性，新县制所要举办的地方自治事业自然就成了纸上谈兵。第四，地方势力的抵制。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自然要触动乡村中的传统封建势力的利益，这部分势力当然不会甘心，于是以各种方式侵蚀和破坏新县制。同时，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也洞悉蒋介石推行新县制，意在削弱他们的统治基础，因此，在明里暗里更是积极反对。山西阎锡山始终抵制中央势力的侵入，“换汤不换药地实行新县制”。西康刘文辉一再用软硬方法反对新县制。云南龙云起初更是拒绝推行新县制，后虽实施，但目的却在巩固自己的统治。此外，战时的特殊环境，也对新县制的推行带来相当的影响。以地方自治的实施而言，正如四川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沈鹏所言：“实施地方自治是当前县府及乡镇公所之惟一主要任务，但事实上今日县、乡镇公所无暇可办自治工作，全部时间为行政工作（即上级委办事项）占去，征兵、征工、征粮、募债，均是他们之‘重头戏’，整日整夜终无演尽之时。”[(41)] 凡此种种，都给推行新县制带来了很大的阻力，致使新县制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的一大陷阱。上述原因，使新县制的推行，虽然热闹了一阵子，但终究是虎头蛇尾，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总之，国民党推行新县制，总体上是为加强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国民党基层统治。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它“把政治统治、思想控制、军事约束、经济盘剥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于征兵、抽税，加强国民党统治思想灌输，防范共产党争取群众”[(42)]。它既着眼于艰难时局

应付战局，更着眼于使抗战的胜利变为国民党的胜利。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县制的推行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加强了思想禁锢与对人身自由的束缚，但作为战时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国民政府确实希望通过新县制的推行，改良基层政权，使民众的负担平均一点，更好发挥民众（包括士绅、其他有产者以及一般民众等）的积极性来有效完成摊筹派募、征丁等任务，是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抗日大局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更广泛地动员广大乡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日益艰苦的抗战，使得国民政府日渐枯竭的财源、兵源、物资有了保障，部分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积极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行政三联制和新县制的推行，说明国民政府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挑战面前，已意识到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这种制度上的建设是以加强国民党集权统治为前提和目的的，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战局的演变和国民党的日益反动和腐朽，上述努力最终都走向失败，这都是加强和实行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四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还可以这样说：战争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在抗日战争进入后期阶段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日益向政治角逐的方向发展。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抛出了由他署名，实际上是由陶希圣代笔写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蒋介石的世界观、伦理观和政治主张。它是国民党强化一党专政的代言书，是国民党积极反共，展开政治角逐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该书一出版，就在中国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很大反响。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是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的。

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到1943年后，战争的局势已

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深重的民族灾难有了结束的希望，中国抗战的胜利即将到来，日本侵略者已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在新形势下，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美国、英国则从战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为确保其在华权益，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开始积极增加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将中国拉入所谓的联合国“世界四大强国”俱乐部。

时局的变化，日本的拉拢和英美的扶持，客观上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地位，被蒋介石视为是其利用的有利时机，从侧面助长了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其集权统治、进行反共活动的气焰。同时，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家已不再为抗战结局而担心，而着眼于战后政治的安排，开始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积极筹划。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其次，在国内，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两年极为困难的局面，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极为艰难的时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之路。这一局面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和国统区怨声载道，腐败成风，百官颓废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共产党人艰难的奋斗过程中，在理论上积极探索，逐渐成熟起来，特别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鲜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一经发表，即在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对国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集权统治受到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严重挑战，国统区人民反对一党专政，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的呼声十分强烈，对国民党形成强大的压力。

因此，进入1943年以后，从国际形势来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十分有利；从国内局势来说，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强大的压力和挑战。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蒋介石在中国抗日大环境刚刚好

转的时候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政治宣传，展开政治攻势，企图在政治理念上进一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强化对民众的思想统治。这多少反映了国民党对自身统治缺乏自信心，承认其独裁统治埋有“隐患”，是具有强烈生存危机感的表现。蒋介石的意图有二：一是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辩护；二是配合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在思想领域中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统治的理念，以与中共领导的进步力量展开竞争，进而为消灭中共力量准备舆论和社会条件。

被国民党奉为“建国之宝典”的《中国之命运》，共十万余言。全书共为八章：（一）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二）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三）不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书之核心就在于纵论内政，阐明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革命、建设及其命运前途的基本观点，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为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集权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其特点是把中国封建文化同改头换面的三民主义糅合起来，炮制出外儒内法，挂着三民主义招牌的国民党理论体系，即周恩来所定位的“中西合璧”的“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又名新专制主义”[43]。

第一，《中国之命运》继续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试图从理论上阐明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国民党统治建立后矢志不移的执政追求目标，作为具有指导国民党建国实践系统化“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自当不能例外，继续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为其领篇宗旨。在书中蒋介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建国的历史来论证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是一个“革命党”，是“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甚至将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来说，没有了中国国民

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处处颂扬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确立统治后的成就，他指出：“中国往昔之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则中国今后之命运，乃就系决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之一点上”。既然他领导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那么，领导取得这一成就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自己自然合乎逻辑地就是抗战建国的领导者，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主宰者。这就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通篇的结论。由此，蒋介石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论调推至极致。

第二，《中国之命运》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蒋介石一方面对中国封建时代“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礼”的“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大加赞扬，说这种组织构成了国家“严肃整齐施政力教的基础”；另一方面，奉孔孟之道为最高信条，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力鼓吹继承和发扬封建时代所谓“崇礼尚义，明廉知耻”、“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养性法。要求国民遵循封建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有序等常理，以“忠孝为本”，信奉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认为“四维八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纲”，“四维八德”发扬光大，则国兴；否则，国便衰微，并以此为抗战中中国的道德准绳。蒋介石如此推崇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礼教，其目的无非是为他的专制集权统治寻找历史依据。

第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全面阐述了国民党的建国“方略”。蒋介石在纵论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全在内政”，“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蒋介石进而详细论说了内政方面的“五大”建设的主旨：“心理建设”的要旨在“发扬民族固有精神”，“伦理建设”以忠孝为核心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社会建设”旨在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旨在坚持“训政”，而经济建设旨在实现“工业化”与保障国民生活。看起来既全面又深刻，但实际上处处体现着复古和守旧的痕迹和倾向，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存在着矛盾。

第四，《中国之命运》鼓吹蒋记“三民主义”，宣扬“力行哲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攻击马列主义。蒋介石在书中说：“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之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又说：“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任何思想离开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当然，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打上他印记的三民主义。与此同时，蒋介石不忘抨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说：“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些学说的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在他看来，惟有“蒋记三民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也是救治中国的良方。蒋介石为了为其思想张目，在哲学上宣扬其所谓的“力行哲学”。在书中，蒋介石进一步强调了“力行”和“诚”，指出：“革命的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地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著。革命的成败，到如今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三民主义，……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古人所谓‘有杀身以成

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蒋介石反复宣扬“力行”、“诚”的目的，就是要民众对他、对三民主义、对国民党，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第五，《中国之命运》极力为实行一党专政辩护，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割据地方，力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蒋介石在书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要实行专制集权制度，有两个直接的政治目的：一是要提高反共效能，否则共产党就会坐大；二是要加强国民党统治效能，提高党权，实现党治。在体现全书宗旨的第七章“党与团”一节中，更宣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特点是“一党专制”，“党外无党”，全国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另一方面，蒋介石则认定“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人权党团，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是在“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在“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这种“革命的障碍”留存一日，则国家政治生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蒋介石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视为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以作为其实行独裁统治的借口，其用心十分险恶，也表露了他要使反共活动进一步升级的意图。

总之，蒋介石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伦理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论述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和必然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这便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逻辑。

综观《中国之命运》一书，内容极其庞杂。国民党把它捧为“政治圣经”，列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此书一出版，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由于《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宣扬反共思潮，将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严重关注。所以该书一出版，中共中央便立即专门召开会议，对该书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蒋介石的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来，就是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蒋介石叫嚣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降帝国主义，联日反共，消灭共产党。"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延安理论干部会议，研究批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主要阵地。1943年5月—10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批判文章。主要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死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请重庆看罗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主要文章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这些社论和文章，从思想政治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入批判，斥责和揭露了蒋介石宣传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面目，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44)]。毛泽东还电示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组织力量开展批判活动[(45)]。直至10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46)]这一宣传战才告一段落。

住在重庆的宋庆龄，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所鼓吹的专制反共倾向，也进行了直接批评。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内的清醒有识之士对《中国之命运》也持消极看法。张治中曾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之注意当

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潮不尽能融会贯通之症结所在，实不容忽略者。”(47)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刚出版，便遭到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内战，坚持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进步人士和力量的强烈反对和批驳。蒋介石原本期望借此打压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但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一片反对责难之声。和以往加强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一样，蒋介石这次在思想、政治领域中的动员运动，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声中，也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其反共喧嚣有所收敛。

抗战后期，是国民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诸多因素影响和作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其统治机器进行了全面调整和强化。以政治理念而言，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全面宣扬蒋记“三民主义”，竭力树立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威，发动了一场使“抗战胜利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胜利”的运动；以政权机器而言，在中央层面上，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使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完成了使蒋介石名正言顺控制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全部三条腿——党、政、军的最后一步。在基层，则通过大力推行“新县制”，力图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牢牢控制广大乡村，以防止共产党力量发展和对其统治构成威胁；以权力运行机制而言，为加强行政效能，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令不畅的现象，推出了“行政三联制”措施。

上述措施看起来环环相扣，无不切中要害，但是，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顽固实行一党专政、个人集权，并且以此为最终目的，这些措施最后都不免流于形式，或适得其反，以失败的结局而收场。这已为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第二节　国统区的社会经济

一　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攻占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又在泰国、缅甸得势，完成了对中国外部的军事大包围，从而切断了偏居西南重庆的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联系的主要渠道，致使国民政府生存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局面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严重影响了国统区工业恢复和重建的工作。由于国门被封闭，一些主要依靠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才能运转的工矿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态，而一些新建企业则不得不停止建设，削弱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经济基础。关于工业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通过下表统计数字，我们便可得到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国统区战时工业历年厂数及资本的统计

年别	厂数	实缴资本(千元)	币值资本(千元)	各厂平均资本(千元)	
1940	571	378,773	59,031	*663.70	**103.38
1941	866	709,979	45,718	819.84	52.79
1942	1,138	7,612	9,896	393.33	8.70

* 指实缴资本；** 指币值资本。

资料来源：参见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8—99页。

从上表所列情况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工厂数虽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其实缴资本额、各厂平均资本则是历史最低水平，由此不难想见战局演变给中国战时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影响。二是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严重萎缩。1942年，重庆海关洋货进口总值为16亿国币元，跌至战时最低点；这年上半年，国民政府的进口物资减少了50%以上，物价上涨了73%[48]。国民政府掌握的战略物资诸如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等农副产品和钨、锑、锡、汞等重要矿产品，除猪鬃因可以空运而未受明显影响外，其余出口量均显著地减少了[49]。

工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进口物资又显著减少，致使工业品消费市场严重短缺，随之，物价腾涨，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现象十分严重，与此相伴的便是社会上大量游资甚至相当部分的工业资本也纷纷转化为商业投机资本。据有人估计，1940年大后方社会游资就已达50亿元之巨[50]。上述事实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中国的战略环境有所改变，但整个国民经济却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和挑战。

困境之二，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锐减，支出猛增，财政赤字逐年加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以关税、盐税及统税为大宗，占整个财政收入的90%以上。但抗战爆发后，三大税收均受战争影响，征收日蹙，政府财政收入锐减。1941年税款收入在国库总收入中仅占6.2%[51]，下降幅度十分惊人。在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的同时，财政支出却在逐年猛增。1942年政府财政支出245.11亿元，较之战争初期（1936—1937）的18.94亿元[52]，已增加了近13倍。支出无限扩张，收入不断锐减，财政赤字便连年攀升。1941年政府财政实支亏短数占实支总额的88.2%，已达到86.93亿元[53]，为战时历年最高点。为弥补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法币，结果导致法币的持续贬值，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如以重庆地方的商品指数为例，1939年1月为100的话，则当地商品在1941年12月其指数已上升至1303[54]。1942年以后，上涨幅度更大。

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已十分窘迫，极不利于抗战局面的维持和国统区社会的稳定，对国民党的统治也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为摆脱财政窘迫，支撑抗战局面，消除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稳定民心，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试图摆脱经济上的困难。早在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就经济问题作了如下的十一项经济议决案：

（1）改进财政系统，制定国家与自治两大财政系统；

（2）田赋直接归中央，施行田赋征实，以解决民需、军用粮食问题；

（3）实施统制经济，务使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用途；

（4）在行政院下设立贸易部（其后改在财政部下设置贸易委员会）以统制战时贸易；

（5）确立战时经济体系；

（6）举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求物价稳定和财源增加；

（7）实行土地政策，举办地价申报；

（8）改进桐油统制，以求外汇增加；

（9）发展边区交通文化经济，以求长期抗战之维持；

（10）扩大水利，以求农产之增加；

（11）战时计划经济之确立[55]。

强调“必使全国人民之一切经济活动完全受国家法令之保障与支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对战局演变带来的影响，国民党又立即于1941年12月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沿袭了五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强化了贯彻的意图和方向。以五届八中、九中全会为契机，国民党政府全面进行了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抗战时实行的“统制经济”政策，进入了全面实施和拓展的时期。

1．增开新税

一般说来，当一个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时，通过增开税种、加重税负来缓解危机，便是一种必然的手段和选择。国民政府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曾开征了大量新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试图通过扩大税种，提高税率，以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危机的意图更加明显。

抗战爆发不久，为了使得战时财政正常运行，筹集日益庞大的战争经费，稳固自己的统治，国民政府便打出了“全面抗战，合理负担”的旗号，在税制方面作了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调整扩充间接税：调整货物转口税，扩大其征收范围，提高印花税税率，将统税和烟酒税合并为货物税，扩展征收地区，将云南、新疆、西康、青海等省也纳入统税区。同时，将果子露汁、蒸馏水、半机制麦粉、手工卷烟、食糖、水泥、茶叶、竹木、皮毛、陶瓷、纸箱等为数众多的项目，逐步纳入课税范围。

二是建立直接税体系：颁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遗产税条例》，并开征过分利得税、遗产税。不过，总体上来说在税制改革、新税开征方面迈的步子还不大。

但随着战事的延长，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便开始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试图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1941年7月，国民政府改变征税标准，将以往的从量征收的方式改为从价征收。同年11月公布《修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中央与省级财政并为国家财政系统；自治财政系统以县、市为单位，包括县以下各级地方自治组织。并通令各省于1942年1月1日起一律实行。增收政策和财政系统的改订，直接为国民政府开征新税，扩大税种创造了条件。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便根

据五届九中全会精神，加快了一系列新税制定和颁行的力度。到1943年4月，先后公布施行的税则计有：

1942年2月14日，使用牌照税征收通则。同年9月9日予以修正；

1942年4月2日，战时消费税暂行条例；

1942年4月12日，筵席及娱乐税法；

1942年4月，茶类统税征收暂行章程；

1942年5月13日，战时粮糖专卖条例；战时烟类专卖条例；战时火柴专卖条例。同年5月1日实行；

1942年5月26日，盐专卖暂行条例。同年实施；

1942年5月，修正契税条例；

1942年7月1日，棉纱麦粉统税改征实物办法；

1942年7月2日，营业税法。同年实施；

1943年1月28日，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法；

1943年2月17日，所得税法；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

1943年3月26日，竹、木、皮、毛、瓷、陶、纸、箔营业所得税条例；

1943年4月，食盐附加税条例[56]。

上述开征的三十种税收（因系调整，与旧税略有重叠），占战时国地税系统种类的60％以上。同时，国民政府还逐次提高了原有部分税率。如契税，1940年暂行条例规定买卖契税为其契价的5％，1942年修正为10％，1943年5月重新公布的契税又提高至15％[57]。而且

货物税改为从价计征后，税率也大幅提高，例如棉纱就增长了四倍多。1944年7月，对糖类实行征实后，税率也由15%提高至30%。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为应付财政危机的局面，在税收方面采取的措施是相当有力度的。

国民政府上述增税方面措施的实施，取得的效果也还是相当明显的。一是增收效果明显，财政收入有了较大改观。如1943年4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后，当年收入12亿元，1944年收入增至145亿元，1945年更进一步增至535亿元[58]。1943年以后，原来一直下滑的年度税收占实际收入比例的状况开始改观，分别为73.7%（1943年）、85.2%（1944年）、66.6%（1945年），已超过或接近69.7%这一战时税收占实际收入的平均值[59]。二是国民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发国难财者的投机资本的过分膨胀，使大后方如陪都重庆歌场舞榭、车马盈门的虚假繁荣和奢侈浪费均有所节制[60]。但是，这一系列税收政策的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作用也非常突出。一方面，它给本来就贫困不堪的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之日常生计更为困苦艰难；另一方面，由于征税面广、种类多、幅度大，在物价上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推行严厉的税收政策，必然要损害许多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使之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以重庆地区的情况为例，据统计，重庆区金属品冶制业同业公会所属18家炼铁厂，1943年已有14家停业，其余仅勉强维持生产。重庆的印刷厂，1943年底到1944年初的3个月内，有70家停业[61]。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的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国民政府增税的政策加重了民众的困苦、百业凋敝的状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确对充裕政府财政，缓解政府财政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对支撑国民政府进行长期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2．田赋征实

田赋改征实物，最初是从山西省开始实行的。抗战爆发后，由于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而粮价又大幅度上涨，使军粮筹集十分困难。于

是，山西省决定于1940年起，实行田赋改征粮食。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军队吃饭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适当减轻军队驻地农民的负担。既然粮产欠丰的战区省份山西通过征实能缓和军粮供给矛盾，此法当然可资其他省份仿效。随后，福建、浙江、陕西、甘肃等省也相继开始征实。在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积极酝酿和推动田赋改制。

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提出“为调整国地收支并平衡土地担负起见，亟应仍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中央为适应战时需要，得依据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62)]。根据八中全会精神，国民政府于同年6月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就田赋问题作出了如下决议：“（1）自民国卅年（1941）下半年起，各省田赋战时一律征收实物；（2）田赋征收实物以卅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为标准；（3）各省征收实物，采取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凡经征事项，由经征机关负责，经收事项，由粮食机关办理”[(63)]。紧接着在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各地方粮政机关和储运、粮供等部门归口统管。财政部则拟订了包罗前述各项原则的《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十六条，提交行政院第五百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后，于7月23日正式颁行。

国民政府的上述举措，一是把1928年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划充地方税收的田赋重新收归中央；二是变更了自明、清以来我国田赋以缴纳银钱为主的惯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田赋从货币税形式倒退到实物税形式。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征收田赋这一具体行动中，拒绝收受它自己所发行的、正在日益膨胀和贬值的法币。”[(64)]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战时环境下，这种倒退在形式上是落后的，但实质上是进步的。促使国民政府对赋税制度采取如此重大变更的原因，一是如前所述因税源枯竭、收入锐减而发生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二是由农业歉收、通货膨胀和囤积居奇等因素所造成的粮食恐慌。而且，后者对国民政府对田赋改征实物起了关键影响[(65)]。

《暂行通则》颁行以后，田赋征实便由酝酿阶段转入由国民政府组织实施阶段。1942年7月行政院会议在总结前期田赋征实工作经验基础上，又制定并通过了《战时田赋征实通则》二十五条，对1941年的《暂行通则》略有增减，以此作为全国各省县推行田赋征实的基本规定。综合两通则规定，重要内容如下：

（1）征实目的：调剂战时军粮民食及平均人民负担。

（2）征实标准：各省田赋征收实物依卅年省县正附税总额。1941年“暂行通则”规定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为标准。1942年“通则”规定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市斗。其赋额较轻或较重之区域，由中央酌予增减。即各省土地，如已依法办完测量登记开办地价税者，亦应依其税额，按上项标准改征实物。

（3）征收种类：征收之实物以稻谷为主，其不产稻谷之地方，以其收获之小麦杂粮等缴纳之。其缴纳小麦杂粮之比例，另定之。

（4）征收单位：征收实物之单位，概以市石为单位，其尾数至合以上，以下四舍五入。

（5）征收制度：各省征收实物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凡经征事宜，由经征机关负责；凡经收事宜，由粮食机关负责。1942年“通则”又对征收国币和兼征国币的事项作了补充。

此外，“通则”对于滞纳与匿粮处分、追交旧欠办法、积谷与摊派以及设库收储等均有规定[(66)]。

依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规定，各省县遂将田赋改征实物视为中心工作，并相继成立了田赋征实的相关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经征经收机构便确立起来，其组织系统如下图：

田赋征实机构：经征机关—财政部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省田赋管理处—县田赋管理处—税征分处—粮户

经收机关—粮管部—省粮管局—县粮食科或粮食管理委员会—税收分处

上述组织机构的运作，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告结束。

田赋征实政策的实施，按当时的标准，每年征实所得约为2300余万市石左右，但这并不能保障当时军公粮的需用。据《解放日报》估计，当时“全国军警公务员为1500万人，共需粮谷7500万市石”[67]。为弥补缺口，在全国田赋征实的同时，国民政府便又规定：“于征收之外，另行办理定价征购，每年参酌各省需要及当时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量、标准及价格，一次征收。”[68] 向大户定价征购余粮，并发行粮食库券作为支付粮价之用，这就是田赋征购。征购“以随赋带购为原则”，办法是以征购额的三成平价付给法币、七成发给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为配合征购，1941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八条，规定自1941年9月1日起发行粮食库券，从征购后第三年起，每年以配额五分之一抵缴田赋应征之实物，五年全部抵清。但官价征购大大低于市价，结果加重了农民负担。由此看来，征购与无偿缴纳无异，只不过是一种披着商业外衣的征实手段，是变相的田赋征实。

1943年各地粮价持续飞涨，粮价指数达到1942年度的390%左右[69]。为顾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征购价格不能不随同提高。这样一来，政府征粮开支迅速增大。于是，国民政府从财政因素考虑，在征得四川省政府同意后，率先又从四川省实行改征购为征借的政策，即派购的粮食全发库券，不再搭发现金，起借点为五分。实行征借的结果，四川等九省仅1943年就节约现款达11亿元以上，大大减轻了国库的负担。

鉴于征借实效明显，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次会议通过《加

强管制物价方案紧要措施案》，其中规定：“粮食征购一律改为征借，采用累进法提高其数额。……除应征借的粮食及地方积谷外，其他地方私立名目摊派粮食者，均应禁止。”[70] 随后各省从1944年起一律改征购为征借，并废除粮食库券，只在交粮的粮票内注明，以作为借粮凭证。这种不计利息的征借，实际上成为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上述“三征”中，征实是根本；征购是商业形式下的征实；征借是征购的必然发展，是借贷关系下的征实。总之，以“三征”为基本形式的田赋统征，均以最大限度取得粮食实物为主要目的。

在全民族进行抗战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支持持久抗战，统一经济力量，将田赋收归中央，并逐步推行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是无可非议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实行田赋征实前，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东南各省主要产粮省份尽陷敌手，战区所在地已非可以就地筹粮之区，四百多万将士的饷糈及后方公教人员和一般百姓的口粮为数甚巨，不但难以从市场上筹集，而且即令能够购到，也必然要带动粮价暴涨，影响非小。购粮款项十分巨大，支出货币过多，还将加剧通货膨胀，于经济、军事都非常不利。惟有直接掌握粮食本身，才能解决以上难题。因此，“三征”措施实质上是不得不为之，而且从实行的效果看，其意义也十分明显。事实上，从下表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正是通过“三征”，掌握到大量粮食实物的。并且通过“三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通货膨胀下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军糈、公粮、民粮之困难。

1941年—1945年度田赋“三征”所得实物折合法币数与各年度税收比较

年度	谷麦（百万石）	折合法币数（百万元）	占税收的百分比
1941—1942	56.2	5,000	44.1
1942—1943	65.6	14,169	23.9
1943—1944	65.3	49,628	26.9

1944—1945	57.8	100,976	28.1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首先，田赋征实给国民政府增加了一大笔可靠的财政收入，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如上表所列，1941年—1945年“三征”所得共折合法币约1697.73亿元。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而且这些收入不是通货膨胀下价值萎缩的法币，而是当时匮乏而须臾不可缺少之食粮，其价值自然也不是相应的货币额所能充分表现的。同时，由于通过征实获得这些粮食，国民政府便节省了在市面上采购粮食的巨额开支，这不但可使严重亏空的财政获得弥补，也在实际上减少了投入流通的货币量，这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田赋征实对维持国民政府的财政不致在战争中途彻底崩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实效。

其次，田赋征实保证了军粮和公粮供应无虞，对坚持抗战有积极意义。从全国来看，在田赋征实政策实施后，军粮供应有了较为充足的来源，四年中实际补给军粮数，米3553万大包，麦2511.7万大包，折合谷约9474.75万市石，麦约3649.21万市石[(71)]。（米每大包100公斤〔合谷2.667市石〕，麦每大包100公斤〔合麦1.429市石〕——作者注。）而且军粮总数也约占田赋“三征”所得的60％以上。另据何应钦在《抗战八年》中称，吃田赋征实粮的军队1941年为425万人，1942年为512万人，1943年为546万人，1944年为681万人。由此可见，田赋征实对保证军队食粮供应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公粮，在战时物价飞涨和粮荒不断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利用“三征”所得的一部分充作公粮，平价或免费供给公教人员，对于缓解上百万公教人员的生活困难，保证后方社会的稳定，坚定抗战胜利的心理也起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三征”所得还被用于调剂市场，实行“控量制价”，以缓和市场供需矛盾，缓解粮荒。

尽管国民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政策有功于抗战，但是，由于在征实的过程中，政府只强调“得粮第一”，而忽视了“公平原则”。再加上经办人员中饱私囊，致使征实弊端丛生，严重祸及了它的实效。具体来说：第一、田赋征实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造成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和农民生活困苦的一大根源。由于田赋征实采用上下分摊的形式，于是地主通过种种办法将田赋转嫁于佃农，结果造成田赋“三征”严重失衡，富家负担极为轻微，贫苦农民负担极重的局面[72]。第二、地方附加摊派有增无已，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受折磨。虽然政府“通则”规定，田赋改征实物后，除“积谷”外，其他摊派筹募“悉予豁免”。但实际上，由于中央政府剥夺了地方政府的田赋征收权，无异于迫使地方政府另辟财源。于是，在执行过程中，各种附裹在田赋上的摊派就层出不穷。据统计1942年四川省仅十八个县的不同摊派和附加就多达二百四十多种[73]。第三、各类经办人员徇私舞弊，中饱私囊，鱼肉人民，使“三征”成为扰民的苛政，腐败的根源。田赋“三征”是通过县、区、保甲摊派的，这类人员便利用职权，浮派、侵吞，从中取利。另一方面，由于实行经征、经收双轨制，不仅造成机构重叠，手续繁多，效率低下，而且形成了众多的粮政人员无人不贪的局面。用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的话来说：“在征收田赋的收集、储存、运送、分配的四个过程中，没有一个阶段中不存在着腐败。”[74] 上述现象的存在，使田赋征实变成了扰民的苛政，严重挫伤了农民为抗战而努力耕作的积极性，对抗战时期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消极和破坏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由于田赋征实存在上述种种弊害，不但使征实的效益大打折扣，也使广大人民对征实和国民党政权愈加强烈不满，从而使国民党的信誉和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国民政府要员张嘉璈就指出：“田赋征实对政治和社会长远的影响远胜过军队暂时能获得廉价粮食的好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75]。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贪污和舞弊现象，并非田赋征实政策本身固有的特性，而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其吏制的腐败所造成的，换言之，即使没有田赋征实，国民政府采用

其他办法筹粮筹款，上述腐败现象也会发生。

3．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政策是以战时物资管制形式出现的一种财政措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便按照国际上应付大规模战争的惯例，采取了统制经济这一非常措施。作为统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购统销政策很早就已开始实施。1937年9月，国民政府首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下设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大公司，负责国统区桐油、猪鬃、生丝、茶叶等物品的统购统销。1938年2月，政府机构进行调整，“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改名为“贸易委员会”。同时，钨、锑、锡、汞、铋、钽等六种矿产品，均系军需工业的重要原料，国内外市场广阔，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收购和外销。

1940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统区物资短缺和市场囤积居奇现象十分严重，已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军队的士气。于是，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实行全面经济统制”。同年12月的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更进一步指出：“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必须尽量增加生产并加以合理管制，使价格稳定，供应无缺。且需由局部管制，推进于生产运销分配消费各过程之全面管制，内地管理扩大全国。”[(76)] 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开始进入强化阶段，当然，作为一种财政措施，它也是加强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手段。

抗战时期统购统销种类很多，从实际统购统销推行的过程看，大致可分为重要外销战略物资产品和日用必需品两大类。生丝、茶叶、猪鬃、桐油、羊毛及若干矿产品等六大类，均属重要的战略物资，为当时主要的外销商品。棉花、棉纱、棉布等日用品类是战时军需民用的必需品。

在外销战略物资方面，统购统销自1938年起实行。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其后四年外运发生困难，除猪鬃因空运减少幅度不大，其余均明显减少。因此，为加强此类物资的销售，1942年2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采取措施，改订桐油、猪鬃、茶叶的运购办法，放宽在国内购存储运的数量限制，取消内销茶叶的平衡费，以扩大内销和外运（包括出口和销往沦陷区）[77]。直至抗战结束，统购统销整整进行了几乎八年时间。在此期间，共收购茶叶近190万市担，桐油180多万公担，猪鬃8万多公担，丝茧7万多公担，羊毛（包括少数驼毛）44万多公担[78]。

棉花、棉纱、棉布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主要的统购统销物资。对这类生活日用品类物资的管制，最初始于1941年。不过，一开始时统制方法并不统一，范围也很有限。1942年2月2日，行政院通过《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开始加强对该类物资的管制。2月14日，经济部物资局成立，拟定并公布了具体实施方案，对棉花、棉纱、棉布实行“统购棉花、以花易纱、以纱易布”的管制方式，以达到取缔中间商盘剥，增加生产者利润和平抑市场售价的目的。1943年1月，物资局撤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对花纱布管制扩大到全国，实行的措施也更为严密，形成了一套统购统运统销棉花，“以花控纱、以纱控布”的完整的管制方式[79]。国民政府通过对花纱布的统购统销，在1941年—1944年共获得棉花160万市担，1942年—1944年累计分别获得机纱22万多件、土纱8万多市担、机布与土布700多万匹[80]。

抗战时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它使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物资，保证了军需民用，也增加了外汇收入。当时政府统购统销的外销物资对美、英、苏诸国易货、购物和偿债等方面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偿还债务为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约有6430万美元的出口物资销往美国和苏联，以偿还其于1942年前提供的为购买军需物资的信用贷款[81]。其次，它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利用统制手段压低物资的收购

价格，然后高价出售，获得了高额的利益。关于此项收入，国民政府财政部曾指出："军用花纱布，由局统筹购供，国库年仅负担价款108余亿元，如依市价收购，则所需价款达1040亿元，故军用花纱因由局统筹购供，仅三十四年度一年，节省国库开支达930余亿元"[82]。据有人推算，1945年国民政府所收购的全部花纱布的盈利额高达4499亿元，是当年税收的4.5倍，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而整个抗战时期，统购统销的收入均达当年总税收的3—6倍[83]。第三，它对市场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大后方局势的稳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1942年上半年，经济部物资局先后分两批配售平价布，其对象分别为陪都及迁建区内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重庆市地方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和文化机关团体、学校的教职员工[84]，缓解了部分公职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

当然，统购统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首先，它严重损伤了工商业者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抗战后期大后方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羊毛五类农副土畜产品收购价均大大低于市价，有的甚至远远不及生产成本。如1943年的桐油收购每担比市价低110余元。1942年的秋茧收购价每担和市价相差8500元。1941年屯绿区毛茶官定价格比成本低103元。1944年猪鬃官价每箱仅及成本的38%，两者差价达1.9万元[85]。属于国家统制的矿产品，1943年"政府收购矿品之牌价，衡以战前及现在物价指数，仅得四分之一，殆实远逾人民所堪受之限度"[86]。如此严重的差价，表明统购统销实质上是对生产者的一场最大限度的掠夺。造成的后果也十分明显，即使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到挫伤，生产大量减产甚至停产，是抗战时期社会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陕西棉花统购统销后，由于所定官价过低，棉农所得不敷成本，转而改种杂粮，棉花因而减产。1943年陕西产棉90万市担，1944年仅产50万市担。后方陕、豫、湘、鄂、川及其他地方，1943年产棉量合计295万市担，1944年仅产155万市担[87]。其次，经营统购统销的官商和各级机构借机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敲诈

勒索，坑害民众，影响了统购统购政策效能的发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抗战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局面的稳定。例如，国民政府经济部物资局驻四川广安专员就承认：囤积棉纱操纵黑市者“多系地方土商富室巨绅驻军，甚至机关法团”，而无法予以惩罚。统制棉纱的成都农本局所属的福生庄，更利用办理收购及发放棉纱事务的机会，串通奸商，秘密从事黑市贩卖牟利，即以原价1.2万元之收购价格提高至4.5万元出售，结果引起棉织业工人暴动[88]。蒋介石也承认物资管制成效不大，问题很多，他曾痛责经济部物资局：“政府管制物资办法毫不彻底，越管制黑市越猖獗，弄得有的不愿售，买的到处争，以致物价上涨不已。如管制面粉厂又不管制麦子，管制纱厂又不管制棉花，所以面粉厂尽量囤积麦子，纱厂尽量囤积棉花，政府这一种管制物资办法，无异乎是帮助少数资本家大发其财。”[89] 和战时其他经济措施的推行一样，伴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机构也日益腐败，而广大民众则深受其害，这是国民政府无法消除的弊端和改变的事实。

4．推行专卖制度

“专卖”在中国并不陌生，中国历代曾实施盐、铁、酒、茶等专卖，尤其是盐专卖。它是指政府将某些消费品，以企业经营的方式，由国家独占经营，并在独占的销售价格中取得独占利润。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军费的大量支出，政府财政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特别是1941年之后，财政危机益形严重。而国民政府国库支出的来源，只有四分之一来自税收和捐献，其余都是由发行公债弥补（实际上由银行垫支）。然而，抗战不能专恃债款，而且债款已不易募集，它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是通货膨胀的极大诱因。因此，另辟财源，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战时专卖事业的筹办，就是因应战时财政危机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事实上，早在抗战开始之初，因军需浩繁，税收短绌，有些省份就曾建议并试行专卖事业。例如，浙江省在得到财政部许可后，曾于

1938年4月设立战时卷烟公卖处，试办卷烟公卖。1939年又实行火柴公卖。福建省援引浙江省之例，也于1938年7月设立卷烟公卖局，实行卷烟公卖。上述两省试行公卖结果，不仅税收增加，且有助于物价的稳定，显示实行专卖具有可行性[(90)]。但是，直到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前，国民政府并未遽下决心，推行专卖事业。

1941年4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日常消费品专卖案》，这是国民党对专卖事业态度的重大变化。在会议通过的《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以保障抗战胜利案》中，决定“试行国家专卖制度，可先选卷烟、火柴、茶叶、食盐乃至纱布等数项，试验推行专卖物品，并可着重民生必需品类，杜绝操纵居奇，而收平抑物价充裕国库之功”[(91)]。标志着国民党高层对推行专卖事业已取得共识。至此，战时国家专卖事业终于确立。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孔祥熙的《筹办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物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其中尤以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提案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而且后来的实践证明，国民政府专卖事业的推行基本上是依孔祥熙提案为蓝本进行的。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国民政府推行专卖事业的原因、意义、目的及施行的办法，现将该提案的要点转录于此：

> 以人民日常消费物品，采行专卖制度，由政府合理分配，为节制私人资本，改善社会经济，实现民生主义方法之一种。盖专卖制度，系由政府管制产销，保障生产运销者之合法利润，而使消费者不增加过分负担，以促进生产节制消费，调节物价，安定民生；而政府对于专卖物品，寓税于价，使居间商之利益归公，财政上可增加巨额收入，资为抗战建国之需。际此非常时期，一般工商业，每多利用时机操纵市价，博取厚利，酿成社会分配不平之现象，施行专卖制度，抑制豪强，充裕国用，又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现我抗战已入第五年度，一面须开拓税源，充裕国库，以供应抗战建国之要需；一面须控制供销，防止垄断，以

贯彻节制资本之国策，选定若干货品，及时实行专卖制度，实为当务之急。财政部业经决定设置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筹划进行。惟此项设施，于国家财政经济上，均有重大关系，其详细办法，固待研究规划，不能不先行决定，俾有准绳。兹将办法要点列下：

（一）政府专卖，拟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试办。

（二）政府专卖物品，以统制、产制、整购、分销为初步实施办法，其零售业务，仍利用现有商店经营，但须经政府登记，给予特许营业证，并须按照政府规定办法，经营买卖。

（三）政府专卖，以使人民得公平享受，公平负担为主旨，专卖物品，寓税于价，实行专卖以后，不再对物课税。

（四）专卖事业有全国普遍一致之性质，应归中央统一办理，地方不得对于专卖物品课征捐费。

（五）财政部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对于专卖事业之一切制度章则，及其他必要事项，应于四个月内计划完成，即筹设主办机关，实施专卖。[92]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之后，财政部即于1941年6月设立“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由孔祥熙兼任主任委员，寿景伟、刘鸿生和梁敬錞为副主任委员[93]，筹划整个专卖事宜。由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六种消费品试办专卖，所以财政部“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奉令规划，陆续拟订法规章程，设立专卖业务机构，先后呈请行政院鉴核实行。盐专卖，因历史悠久，产制运销，均有控制办法，仍由财政部盐务总局主办；糖、烟和火柴专卖则分别成立局和公司；酒类因酿造过于散漫，且正值禁酿期间，决定暂缓经办；茶叶也因产区多半沦陷，运输困难，且已由国家统制产销，

经财政部呈明政府缓办[94]。也就是说，专卖事业推行时，仅限于盐、糖、烟和火柴，不具备专卖条件的酒、茶叶缓办后改征货物税。同时，为有力推动专卖事业，国民政府财政部还下设专卖事务司，综合办理糖、烟、火柴的专卖事务。具体而言，盐、糖、烟、火柴专卖实行的过程是：

盐专卖：因以往已有成规，故设计完成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仍责成原盐务总局主办。1942年1月1日起实施盐专卖。同年8月，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战时盐专卖暂行条例》，自8月10日起在全国实施。1944年10月又正式颁布《盐专卖条例》。

食糖专卖：为推行食糖专卖事业，国民政府财政部特设立中国糖业公司筹备处，不久，又改称财政部食糖专卖局筹备处。按照分区次第实行的原则，财政部决定暂就产量较为集中的省份——川康、粤桂、闽赣、滇黔四区先行试办。1942年2月，设立“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办理食糖专卖。5月13日公布《战时食糖专卖条例》，6月“粤桂区食糖专卖局”成立，7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自是日起，粤、桂两省正式实施食糖专卖，8月12日，国民政府又明令公布自9月1日起在闽、赣两省实施食糖专卖。1943年6月，行政院以滇、黔两省产糖量不少，呈请国民政府将滇、黔两省划为食糖专卖区。至食糖专卖停办，该项专卖事业先后在川、康、桂、粤、闽、赣、滇、黔八省实施[95]。

火柴专卖：为推行火柴专卖，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2年2月在重庆组设“火柴专卖公司”，由原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刘鸿生充任总经理。1942年5月1日起，火柴专卖先行在川、康、黔三省试办，5月13日公布《战时火柴专卖条例》，8月国民政府正式明令上述三省实施火柴专卖。此后，各省依据火柴产销情形先后分别设置火柴专卖公司（分公司），负责办理各省专卖事务。至1944年3月，火柴专卖先后在川、康、黔、滇、闽、粤、湘、甘、桂、陕、浙、青、鄂、赣、豫、皖十六省实施。

烟类专卖：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2年1月成立“卷烟专卖筹备处”，负责烟类专卖筹办事宜，同时，拟具《战时烟类专卖条例草案》，5月13日正式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条例》，同月，“烟草专卖局”在重庆成立，由刘振东充任局长。此外，各省区为办理烟类专卖事宜，也分别设立烟类专卖局。为督导烟类专卖局之业务，又特设“烟类专卖局董事会”。7月1日，烟类专卖首先在川、康、鄂西区实施。至1943年1月，四川、西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安徽等省区已先后实行烟类专卖。

上述四项日常生活必需的消费品涉及面广，但实施专卖的方法却比较简便，概括起来就是食糖、火柴、烟类采取“民制—官收—民运—民销”方式，食盐因以往已有成规，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商销”的专营专卖政策。不过，除食盐外，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因限于人力、物力不足，均有所变通，即实行的是“部分专卖制”。主要表现在收购环节上并非绝对的官收，而是由专卖机关将核定收购价格的品种，按数配给各承销商号，由承销商号向制造厂家按价承购，并向专卖机关缴纳一定比例的专卖收益，逐包领贴专卖凭证，以作为专卖证明[(96)]。

国民政府推行专卖事业，主要是因应当时财政和经济的危局而采取的新政策，一开始就有试办的性质。加之，专卖利益作为变相的消费税，征收比例仍有一定的限度，而且由于专卖机关资金不足，无法完全做到独占，只能采取局部专卖制。运输又十分困难，全国或分区划一价格的目标更难以实现。结果，不仅是控制物价的目标未能实现，商人垄断、囤积居奇现象却愈演愈烈。所以，1944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时，即有人建议将盐、食糖、火柴等专卖品改为部分征实[(97)]。是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终因资金限制，为充分掌握食糖来源，遂将食糖专卖取消，复归统税系统，并改征实物。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迎接抗战胜利局面的到来，对财经政策进行调整，决定放弃

统制经济措施，改采自由贸易制，同年2月，实行已三年有余的火柴、食盐、烟类专卖被废止，改行征税。

总体上来说，专卖制度推行的结果，在一定时间内为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各项专卖收入在年度税收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参见下页表），也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大来源（即税收、田赋、专卖、债款和银行借垫）之一。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的四年间，专卖收入总数也分别占该年国库收入总数的24.10%、15.47%、9.17%、1.07%[98]。就此而言，专卖政策基本上达到了其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专卖政策的推行，也使政府加强了对日用必需品的管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间商的盘剥，对防止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战时专卖制度的推行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正如一位了解内幕者所指出的："中国缺乏有经验的经营专卖商品的机构和人员，对于糖仅实行了生产上的控制，对于盐仅控制了部分的收运工作，烟和火柴的生产和分配仍掌握在私人手中。于是，除了糖以外，其余3种商品的专卖都是徒有其名。各专卖商品的零售价格完全由商人私自决定。专卖收入虽有所增加，但这完全是由于货币贬值所致，实际上并未增加。专卖工作的开支竟占专卖收入的60%。专卖政策因而受到公开的责骂和攻击，政府于1944年对各专卖商品先后停止了专卖，而代之以原来的货物税。"[99] 也就是说，专卖事业开办费用过高，严重影响了其实际的经济效益。此外，由于实际上是实行了部分专卖制，对中间商剥削和商人投机的控制、平抑物价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推行专卖制度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因而往往不惜采取贱买贵卖的手段，严重损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在专卖推行的过程中，又普遍存在着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现象，独享专卖大权的官商及其机构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这极大地损害了专卖机关的信用，致使专卖政策颇受民众质疑。因此有人就这样评价专卖制度说："以言生产，则以专卖物品之收购价格过低，或因专卖利益征收过重，致生产呈萎缩之势。以言消费，则以专卖物品

价格之不断飞涨，致刺激物价上涨，加重消费者之负担。以言国库，则专卖利益增加有限，而专卖机关贪污迭见，税收多为不肖官吏所中饱。”(100)

1942年—1945年国民政府专卖收入与税收比较表

单位：百万元

年别	税款收入	专卖收入	专卖收入占税款收入百分比
1942	2,807	1,357	48.3
1943	12,169	3,157	25.9
1944	30,849	3,504	11.4
1945	99,984	2,270*	2.3

* 本年度2月起废止专卖，恢复征税。本数字只包括1月份收入及补缴上年度余数。

资料来源：《财政年鉴》三编，第三篇，第四章“国库收入统计表”（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5．实施限价议价政策

抗战时期，国统区物价上涨的幅度十分惊人。假定战前（1937年1—6月）重庆的物价指数为100，那么从1938年到1942年历年1月的物价指数则分别递增为110、170、350、1120、3270(101)，呈加速度上升趋势。这种物价上涨的情形也可以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37年至1940年6月，此阶段物价上涨速度较慢；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为后期，此时期物价波动剧烈，各种民生物资价格猛涨，形成经济恐慌。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国民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之一，便是实行“限价”政策，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又一重要内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早对物价上涨作出政策反应是在1939年。由于1938年汉口、广州相继沦陷，造成物价加速上涨。1939年2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颁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试图通过取缔囤积、投机和物价管制，以遏制物价上涨。12月，又颁布《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规定日用必需品必须订立合理价格，同时，成立“平价购销处”，勒令各地成立评价委员会，由各级主管部门与同业公会共同协定商品价格。这构成了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最初阶段，即评价时期。由于评价的要点仅仅是劝导商民，并没有法规约束，因此收效不大，于是1941年2月，颁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品囤积居奇办法》，明确规定了囤积居奇的界限和处罚的办法[10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也转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于1942年初成立物资局，向各省收购物资，大量配给和销售，这就是“以量控价”的平价时期。平价措施的基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来控制大量的物资，当时国民政府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平价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难以维持。鉴于物价上涨严重危及国统区社会的稳定和国民党的统治，影响民众将士的抗战士气，1942年11月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就物价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会上蒋介石提出：“实施限价办法，既为大会对当前经济问题之主要政策，拟请大会再为郑重之决议，昭告国人，使之共信共行。”[103]根据蒋介石的提议，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提案。会议决议指出：“实施限价，应以粮盐价格为平定一切物价之标准，由政府本此原则，分别就当时拟定粮盐与其他物价之比例标准。凡超过粮盐比例标准价格之物品，应令停止买卖，并得由政府如数征购。凡属于奢侈品，则彻底停止销售。”[104]十中全会是国民政府战时物价管制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942年12月17日，蒋介石根据十中全会精神，通令全国宣布限价。此次“限价”规定以1942年11月30日的价格为标准，对商品的价格、运价及工资等一律加以限制，强调“务必达到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物品，只有一个价格之目的”。1943年1月15日，国民政府战时“全面限价”政策正式实施[105]。由此，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转入全面限价时期。然而，全面限价推

行难度很大，而且此次“限价”又以其中八项涉及民生必需的价格为准，即粮、盐、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存在限价的种类和推行范围之间的矛盾。因此，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在对上述八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继续实施限价外，又推行“议价”措施来调控物价。议价的管制，分为重要日用物资，由专管机关议定；社会一般需要之物资，由同业公会议定。与限价相比较，议价涉及的范围广泛，也较为灵活。这种限价议价并重的措施，一直保持到抗战结束。这是限价政策的第四阶段。国民政府以法令形式全面地严格地限制物价，发挥了效用，暂时稳定了长期失控的物价。但这一局面并未维持多久，由于造成物价上涨的因素未从根本上消除，结果1943年下半年以后，国统区物价再度波动、上涨，至抗战结束时，几成难以控制之势。

总体上来说，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对平抑物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治本之策，企图以行政力量来控制物价，违反了物价自身发展的规律，因而每一项限价措施的实施，都不能有效地抑制物价，这是很自然的事。

6．发行“特券”抢购物资

抗战后期，物价大幅飞扬，严重影响民生和战时军政，虽然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农林部、社会部、粮食部等各部部长以及各省主席与市政府市长：“物不患寡，惟虞分配之不均，价不难平，端在意志之统一，所望群策群力，一致奉行，则成功之券，决可计日而致。仰于电到一星期内，切实遵办具报。”[106] 尽管各方对物价飞涨的根源和控制物价的难度有较清醒的认识，可是由于“物价所表示者乃货物与货币间之关系”，若要达到控制物价目的，“必须一方面控制货物，另一方面控制货币”，亦即“控制物价仍不得不控制物价之两端：一为货币，一为货物”[107]。战时后方的税收与公债等收入有限，无法应付浩繁的军政支出，要求国民政府控制货币发行量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由此可行的办法就只有在争取物资

方面。

为争取物资，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调整了抗战初期防范敌货的政策，于1943年4月专门成立财政部货运管理局，负责对沦陷区物资的抢购事宜。对于战时物资抢购活动，国民政府是通过官督商营的许可证制度进行的，即官方机构或民间公司均可向政府申请营运执照，从事抢运工作。伴随抢运工作的展开，与此紧密联系且影响较大的就是“特券”的发行。由此，作为一种因应战时物价上涨因素的措施，“特券”发行伴随着物资争夺应运而生，并成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和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特券”发行最初的提议来自于军统局局长戴笠，他在1942年1月2日呈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 查近来前后方迭破获制造中中交农四行伪钞之机关，……据生推测，此必敌谋以伪法币吸取我后方物资与破坏我法币信用之毒辣阴谋也。吾人为针对敌伪是项之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联银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与拨付特务工作之经费，亦可以破坏敌伪之金融也。(108)

蒋介石虽未批准戴笠的提案，却接受了伪造沦陷区货币的想法(109)。1943年初，为因应即将成立的战时货运管理局的业务，蒋介石下令戴笠规划印制沦陷区货币，“特券”发行工作走上台面。不久，蒋介石正式批准发行“特券”，由戴笠负责对沦陷区的伪造伪政权货币的“特券”发行与运销工作。

国民政府批准华中与华北地区的“特券”发行计划后，由宋子文接洽在美国以中国银行名义委托美国制版印刷，并垫付印刷费用美金25万元。到底究竟发行了多少“特券”？由下页之表可知初期发行的数量。

至1943年6月，累计共发行8862.5万元，其中已领用1570万元，结存7292.5万元。实际上到1944年11月29日止，华中地区的中储券“特券”发行额为1.05亿元，华北地区的联银券“特券”发行额也增至1500万元。与1943年6月22日的数目相比，中储券“特券”增发3000万元，联银券“特券”增发137.5万元。汪伪政权中储券此时的发行额为1071.74亿元，“特券”发行额与之相比的比例为0.098%，联银券的发行额为128.28553亿元，“特券”发行额与之相比的比例为0.117%，也就是说，不论在华中还是华北地区，每一千元的中储券或联银券中，即有一元左右的“特券”混杂其中伺机流通，抢购物资。若将这些“特券”以1944年11月底的法币比价（法币每百元约等于中储券100至133元，本文取其中值117元；约等于联银券8元）分别折算，二者合计3.1035亿元，为此时法币发行额1,703亿元的0.182%，此数值可以算作是法币原应在大后方发行而减少发行的部分[110]。

表一：“特券”领用数额表（1943年5月31日止）

单位：万元

类别	运到数额（4月1日）		运到数额（5月31日）		领用金额	结存金额
	箱数	面额	箱数	面额		
A（中五）	120	1500	120	1500	500	1000
B（中十）	238	5950	238	5950	950	5000
C（北五）	14	175	20	250	—	250
D（北十）	12	300	18	450	20	430
合计	384	7925	396	8150	1470	6680

表二：“特券”领用数额表（1943年6月22日止）

单位:万元

类别	运到数额		领用金额	结存金额
	箱数	面额		
A(中五)	120	1500	500	1000
B(中十)	240	6000	950	5050
C(北五)	26	325	50	275
D(北十)	26	650	70	580
E(北五)	5	62.5	—	62.5
F(北十)	13	325	—	325
合计	430	8862.5	1570	7292.5

资料来源：《贝祖诒呈文（1943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41—（10）。

“特券”发行作为一种抢购物资、与敌伪展开经济战的手段，是国民政府面对物资匮乏与物价激涨困境时的一项因应措施，通过该项措施的实施，国民政府将部分通货膨胀的压力转移至沦陷区，并取得了相应的战时物资给养，对缓解国统区通胀压力的积极意义应予肯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财政危机和维持抗战局面，国民党政府对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上面提到的增税、田赋征实、专卖、统购统销、限价议价、发行“特券”等政策措施外，在金融政策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具体来说，一是大举举借内债，通过配售公债和发行储蓄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例如，仅1942年国民政府就先后发行《民国三十一年第一期土地债券》、《民国三十一年粮食库券》、《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公债》，另宣布发行1亿美元的定期储蓄券。实际募集到法币约7.0965亿元、美金约9980万元、谷1046.3198万市石、麦120.091万包[(111)]。二是大量举借外债。1942年，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是战时国民政府获得的一笔数额最大的贷款[(112)]。客观地讲，这些内债外债为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支援抗战事业还是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不论是增税、田赋征实、专卖、统购统销，还是限价议价、举借内外债、发行“特券”政策，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互为联系，共同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后期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当然，上述国民政府调整政策的实施，也有两个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国家资本的急剧膨胀；二是国民政府对经济生活控制的全面加强。反映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就是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充分反映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具有害民的实质和不合理性。抗战后期，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凋敝和破产，正是这种不合理性所造成的。

二　国家资本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家资本极度膨胀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伴随着国民政府各项统制经济措施的实行，国家资本开始向各领域全面扩张，并形成了垄断局面。国家资本的垄断首先是在金融业方面，然后依靠国家权力，逐渐在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取得了垄断地位。

第一，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垄断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的统治地位就已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于1939年10月改组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即四联总处）。四联总处被称之为“中央银行以上之中央银行”，由蒋介石担任理事会主席。这样，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战时金融垄断体制开始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四行二局作为国家资本的垄断地位，并严格管理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1941年12月9日，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办法》，强调限制新设银行、严控货物押款和禁止银行经商等规定。1942年1月，全面提出了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后处理金融的办法。关于国内金融，规定：（1）“继续收存商业银行及省银行应缴之存款

准备金”，“收兑金银机关可以撤销，由中央银行办理之”；（2）“生产国防及有关民生日用必需品之工矿各业，由四行联合投资放款，尽量协助”。“严格审查省银行及商业银行放款用途”；（3）“不准新设银行并限制增设分支行”。“中、中、交、农四行应与邮汇局及各省银行之分支行处加紧配合，互通汇兑，组成更严密之金融网”[113]。5月28日，四联总处理事会颁布《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重申和规定了四行的业务范围。通过四行的专业化，加强四行对一般银行的控制和垄断，特别是形成了中央银行在四行中的集中垄断地位。

具体来说，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范围是：1．集中法币发行。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发行都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行截止1942年6月30日止所发行的法币和准备金，全数移交中央银行。2．统筹外汇收付，外汇业务的经营和管理，划归中央银行集中办理，所有外汇收付集中中央银行调拨。原来的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只能受中央银行的委托，经营政府对外款项收付和经办进出口外汇及侨汇业务。3．代理国库。4．集中各银行存款的准备金。5．集中办理票据交换。6．办理票据贴现。此外，国民政府的军政费用，均由中央银行办理解付等[114]。不难看出，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信用和外汇管理等方面已形成全面的垄断，作为全国银行的银行和惟一的金融核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又拟定银行监理官制度，加强政府对银行的管制。根据这一制度，全国划分为十六个辖区，区设监理官，凡规模较大业务较多之银行，在银行内都设置“监理官”。监理官的职责是审核辖区内各行庄放款业务及其用途，检查行庄账目与存款情况，督促行庄提缴存款准备金等[115]。7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定实施《统一发行办法》，使中央银行正式拥有独占货币发行与集中银行准备金的特权，并协助财政部拟订货币政策和监督货币市场的活动。与此同时，财政部又为其他三行各增加资本到6000万元，中央信托局也增资到5000万元[116]。

根据分工，四联总处对请求贷款在百万元以下，就其性质分由交通、农民两银行办理；国际通兑业务由中国银行专司其事；请求贷款在百万元以上者，则由四联总处审查后再定核准与否。四行二局正是借助于行政权力，强化了对金融业的垄断。

上述措施执行的结果，一是在资金上收缩和降低了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的信用，增厚了四行的资本，特别是中央银行的资本。使国家资本银行的存款从1938年的40亿增加到1943年的417亿，由占本国银行存款总数的77.7%，增加到90%[117]。四行二局的分支机构也遍布西南、西北各地，到1945年8月，共达2281个，占国统区全部金融机构总数的76.5%[118]；二是在行政隶属和区域划分上大大加强了国家资本银行的控制、监督职能，突出了四联总处作为战时金融集权机构的垄断特征；三是财富日益集中到四行二局手中。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只占1%，1942年上升至16%，1943年为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则猛升至75%[119]。外币与黄金被认为是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它的集中动向体现了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导向和实质。

应该说，国民政府扩充国家银行资本，强化四联总处的垄断地位，严格管制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不仅是统制经济政策在金融业方面的表现，而且也是对战时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必然反应。抗战爆发以后，许多私营银行都采取了紧缩政策，放款数量大为减少。从战时的生存环境出发，在国统区的私营银行都以较大的力量从事于囤积货物。同时，战时物价上涨，商业投机所得大大高于产业利润，所以私人金融资本又都增加了商业放款。据统计，1942年重庆银钱业对工矿业的放款仅为放款总额的12.61%，而同期的商业放款却高达76.9%，如果把对个人的放款并入商业放款，则商业放款更高达82.83%[120]。私营银行推波助澜，是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罪魁祸首之一。例如，1941年下半年，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在成都及其附近各县所查获的十余起囤积案件中，银行是主要的参与者，其作用十分恶

劣[121]。更为典型的则是发生在重庆的金城银行囤积案。据重庆经济检查队查办，该市金城银行信托部利用200余万元以该行高级职员李祖芬等名义，假设天成公司面粉厂，购囤小麦1900余石，布2400匹[122]。相反，抗战后期，工农业生产日渐艰危，急需银行资本的支持，但私营银行却几乎完全停止了对农业的放款，对工矿业放款也不多。面对这种状况，国民政府对金融业进行控制确有必要。

第二，国家资本在工矿业中垄断地位的形成。

在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逐步强化的过程中，迅速膨胀起来的国家银行资本便开始向农工商各业渗透和扩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联总处鉴于后方生产任务严重，就立即着手“将有关放款之原则及方针重加修订，规定凡与国防有关及民生必需之生产事业应加紧协助，以谋战时经济之自给自足，所有普通放款则暂时停做和紧缩，俾使集中财力，先尽急需。至放款之事前审查及事后考核，必须严格，期能确收增加生产之效”[123]。1942年底又规定，贴放款额按中央、中国两行各占35%，交通银行占20%，中国农民银行占10%的比例分配承受。根据这些规定，四行从1942年起逐年提高对工矿业的放款比例，1937年—1939年占9.3%，1943年则已上升至59.1%，1944年更高达72.2%。放款额也由1941年的2.0934亿元，提升至1942年的9.2306亿元，1944年则为238.2156亿元。1943年和1944年，四行工矿业贷款额已占国统区工矿业生产总值的33.4%和40.3%[124]。除了贷款外，国家银行资本还直接对工矿业进行大量投资。例如，截至1945年6月底，中国银行对生产事业的直接投资总额已达3.78亿元[125]。中央信托局1943年填报的生产事业投资表显示，中央信托局实收资本5,000万元，而投资生产事业共有2,100万元，另外又为中央银行出面代办投资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1,800万元[126]。有人就认为，国家资本通过四行二局的投资，其影响范围已超出了国营和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在一些重要的私营企业中也有很大的影响[127]。

在农村，国家银行资本同样也逐渐占领和控制了金融市场。由于商业银行完全停止了农村放款，省地方银行及县乡银行虽也有办理农贷的，但数量极为有限。然而，绝大多数农民必须靠借债来维持再生产和艰苦生活。据一项调查显示，1941年在农村中借款农户约占总农户数的51%，借粮农户占总农户数的39%[128]。因此，有能力并且愿意向农村放款的便只有国家银行了。实际上自1941年以后，四行农贷便已经成为农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见下表）。并且根据《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中国农民银行接管其他各行局的农贷业务后，便加强了对农贷的控制，使四行二局逐渐控制了农村金融市场。

抗战期间农村借贷资金来源

时间	* 四行%	四行农贷实额（千元）	地主富农商人占%	**其他占%
1940	38	211,408	38	24
1941	51	465,306	27	22
1942	59	682,805	21	20
1943	59	1,527,000	24	17
1944	52	2,714,000	24	24

* 包括银行、合作社和合作金库。

** 包括钱庄、典当、商店。

资料来源：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4页。

总之，在抗战后期，国家资本不仅通过四行二局及其领导机构四联总处政策和权力的运作，全面强化了其在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而且通过在工矿业、农村中投资、放款的方式，巩固和扩大了其实力和垄断控制的范围。当然，尽管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但应该看到，国家银行资本对抑制银行资本的投机行为、调控金融市场、维持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借助于银行资本，利用金融垄断和国家权

力，在工矿业中的扩张，除了前述国家银行资本借助贷款、投资等形式外，更重要的则是通过资源委员会的活动来进行的。

早在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在修订颁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中，就公开宣布："为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生活日用所需之物品，经济部"应各地方需要，得随时分别种类地域，直接经营之"，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合办等形式经营[(129)]。这一规定，就为国家资本在工矿业领域中大力扩张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国家资源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营工矿业的主要机构。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45年间，资源委员会预算内投资近12亿元，折合1936年币值约6,632万元。其中，1941年—1945年约为2555万元[(130)]。资源委员会利用这些资金，适应战时需要，逐渐兴办了不少企业。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资源委员会拥有工矿企业只有11个，到1941年，它支配的企业突增至78个，1945年更增加到128个[(131)]。根据有人统计，资源委员会所属的这些企业并非都是直接投资兴办起来的。实际上有的原先是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省地方政府投资兴办，后来资源委员会通过投资合办、投资收买的方式控制了这些企业，或者是民营资本企业，而且这类企业数目不在少数。因此，有研究者就认为："资源委员会的工矿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吞并来的。"[(132)]应该说，资源委员会确实存在利用国家权力和金融垄断的条件，强制接管了一些民营资本企业。但说它的所属企业大都是靠强制方式吞并来的，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反，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资源委员会能够控制这些企业，多半却是由于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艰难环境所造成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渠道遭到封锁，后方工业处境越来越困难，尤其是通货膨胀造成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反常现象，因而民营工业企业生产出现了停滞局面。一些民营企业在困难局面中难于

支撑，濒于破产。然而，只要该厂产品为战时经济所必需，资源委员会就予以接办，甚至出资收购。例如，人和钢铁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因“近来生铁市场发生畸形现象，销路呆滞，兵工方面价格低廉，难维成本”，“而粮食日涨，工价激增，经济窘迫，实难为继”，于1941年要求转让给资源委员会[133]。资源委员会经过核定后，就于1944年与该公司签订了购买其全部设备与资产的合约。又如云南明良煤矿，1939年因资金发生困难，资源委员会乃入股合办，1945年资本家将全部股权卖给资源委员会[134]。这表明资源委员会对私营厂矿的接办或入股合办，有的是出于私人企业的请求，与“强制”、“吞并”完全是两码事。当然，与国民政府有关的企业确实享有许多方面的优势——银行贷款，原材料，汽车运输，这是不少私人企业自愿出售股份给政府的主要原因。相反，未能这样做的许多私人企业，到抗战后期便因缺乏营运资本、原材料、汽车运输或市场保证而垮台[135]。

与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局面相反，虽然国家资本企业也同样处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之下，但由于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即政府财政拨款、四行二局投资、贷款等形式的扶植，国家资本企业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据四联总处拟定的《经济三年实施办法》所载：1940年至1942年拨发“国营”厂矿资金共1.6654亿元，其中财政拨款1.1425亿元，占68.5%；四行投资800万元，占4.8%；四行贷款4438万元，占26.6%。而同期分配给“民营工业三年计划”的资金仅为3800万元，只占“国营”厂矿资金的22.8%[136]。在国家资本的大力支持下，除了石油、钨、锌、锡等金属矿产品完全为国家资本企业生产外，国统区其他重要工矿产品如电力、煤炭、钢等，国家资本企业所占比重都不断提高。例如，1938年后方发电7362万度，其中资源委员会所属电厂仅占5.5%。到1944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电厂发电共达5168万度，已占总发电量的29.7%。汽油类产品更加明显，1938年国统区汽油类产品生产总量共20万加仑，其中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占23.6%。到1944年，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生产量达598万加仑，占全部国统区产

量的65.1%[137]。另从下表中不难看出，国家资本企业不仅发展十分迅速，而且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明显增强。

1940年—1943年官营与民营产量的百分比

年份 产品	1940		1941		1942		1943	
	官营	民营	官营	民营	官营	民营	官营	民营
铁	5.76	94.24	15.09	84.91	25.64	74.36	50.96	49.04
钢	41.06	58.94	54.17	45.83	80.86	19.14	91.65	8.35
生产工具	22.95	77.05	13.20	86.80	35.45	64.55	34.45	65.55
原料品	13.58	86.42	19.42	80.58	24.17	75.83	24.48	75.16
消费品	38.79	61.21	39.12	60.88	50.33	49.67	51.83	48.17

资料来源：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其后，资源委员会进一步加快了投资和建设的速度，采取了独资兴办、和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合办、和地方政府机关合办、和私人资本家合办、银行资本合办等五种举办企业的方法，使资源委员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迅速扩张。到1944年12月，它经营了92家工矿单位——33家工厂、38家矿山、21家电力厂。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时，资源委员会的企业又扩张至131个单位，成为集工、矿、贸、电力、服务机构为一体的超大型的工业集团。

再以各生产部门所占资本比例来看，1942年国家资本占水电工业资本的89%，冶炼工业的90%，机器制造业的73%，电器制造业的89%，化学工业的75%，纺织工业的49%[138]。1942年，经济部的报告资料也显示，国家资本企业在国统区占工厂总数的17.5%，投资的70%，职工的32%和动力的42%[139]。由此可见，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在工矿生产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优势地位，形成了垄断局面，而民营资本整体却呈现萎缩趋势。

第三，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的垄断地位的确立。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商业领域中基本上采取自由贸易

政策，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抗战爆发以后，由于外贸形势日益恶化，国民政府认识到："我国欲图持久制胜，势非控制资源，管理贸易，不足以巩固财政金融基础而供应长期抗战之需要"[140]。于是开始采取切实步骤和措施实行外贸统制，同时由国家投资商业，形成了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扩张的局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国家权力向经济领域全面渗透。伴随着统制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和贯彻，商业领域中国家资本的扩张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确立了垄断的地位。

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扩张所依托的最主要的政府组织机构是贸易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的前身是于1937年9月设立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它成立之初，便由财政部一次拨交2000万元作为营运资金[141]。1938年2月贸易调整委员会改组为贸易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并将国际贸易局并入，总揽一切有关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权，在国内外重要地点设立办事处，并设立直辖的复兴商业、富华贸易、中国茶叶三个出口专业公司。1940年后实行行政业务分工，将贸易委员会直接经营的业务全部移交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公司，分别由三个公司统一负责收购桐油、猪鬃、茶叶和其他土特产品，用于对外贸易和销售。1941年贸易委员会下辖的富华公司撤销，其业务和人员合并于复兴公司。1943年中国茶叶公司又撤销，茶叶经营也并入复兴公司。复兴公司设有四川、西北（兰州）、云南、贵州、苏皖、浙江和仰光等分公司，各分公司之下还设有办事处和储运站等机构，其组织机构几乎遍及整个国统区。另外还有负责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和猪鬃贸易的猪鬃整理工厂[142]。总之，从上到下组织严密，机构庞大，形成了一个从收购到销售的完整的商业网。

贸易委员会利用建立起的商业网，积极从事商品购销活动，成效十分显著。仅以外销物资为例，贸易委员会从成立至抗战结束，共收购桐油183.9305万公担，猪鬃8.088万公担，生丝2.6714万公担，茶叶100.4974万公担，兽皮680.7694万张，以及羊毛、茧等其他物资

[143]。这些物资销售国外所得价款和资源委员会统制的特种矿产品出口所得价款一样，是战时国民政府用于偿付美、苏、英等国债款以及在国外购买各种战争物资的主要资金。可以说，如果没有战时贸易统制，中国就不能进行对外易货贸易，那么就失去了外国的军火供应，对日作战就会产生更大的困难，后方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也会受到更多的阻碍和更大的困苦。因此，抗战时国家资本的贸易机关和企业在商业领域的活动，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应予肯定[144]。

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实行专卖制度。为推行该项制度，从1942年起各地相继创设了专门组织机构。这是国家资本依靠行政特权向商业领域扩张的又一重要阶段。除食盐专卖由原来的盐务总局办理外，从1942年起先后创设了“火柴专卖公司”、“烟类专卖局”、“食糖专卖局”。具体而言，烟类专卖局设有总局，各省区专卖局下设办事处，各办事处又下设业务所（或办公处）[145]；火柴专卖公司设有总公司，各省区分设分公司；食糖专卖局未设总局，而是采取分区办理方式，例如最早成立的“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其下设有分局、办事处[146]。1943年1月，花纱布管制局成立，接管日用必需品棉花、棉纱、棉布的统购统销事宜。上述各级专卖和统购统销组织机构设立后，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营运和管制的网络，将国家资本的触角伸向了国统区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对商品价格实行严格的控制，例如，经营外销的行栈，都必须向国家管制机关登记，其产品也需按核定价格售给该机关，不能自行报运出口。又如对于专卖品，规定“应于制造完成十日内，悉数交存专卖局在该区所设立公栈，或其所指定之商栈”，“概由专卖机关收购之”。利用这种超经济的垄断，国家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

显而易见，上述内容表明，在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在金融、工矿业、商业领域中都已完全确立起了垄断地位，得到了急剧膨胀和发展。这种垄断局面的出现，一是靠国家政权的推动；二是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在民族矛盾高于一切的前提下，这种垄断符

合战时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然而，事物具有两面性。国家资本是国民党统治政权利用国家机器建立起来的，本质上是为国民党政治体制服务，是国民党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其作用好坏也是随着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专制，国家资本的消极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其对金融、工矿业、商业的垄断，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三　巨额赤字与通货膨胀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军费支出迅速增加，而财政收入不增反大幅度下降，财政赤字就已经形成，且呈迅速扩张的趋势。进入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收支更严重失衡，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逐年增高。1941—1945年国民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数额，详见下表：

单位：法币（百万元）

年份	政府收入	政府开支	财政赤字
1941	1,184	10,003	8,819
1942	5,269	24,511	19,242
1943	16,517	58,816	42,299
1944	36,216	171,689	135,473
1945	1,241,389	2,348,085	1,106,696

资料来源：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所编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报表。转引自《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尽管国民政府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采取了诸如田赋征实、专卖、增税等诸多措施，力图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但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虽在增加，而开支数额却增加幅度更大。究其

原因：一是军事开支日益庞大。1939年的军事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57.6%，1940年则猛增至73.9%，1945年更高达87.3%。详见下页之表：

军事支出数额的逐年增加是造成巨额赤字的根本原因。从1941年至1945年度财政赤字占岁出平均为81%左右，1945年度高达87.7%，与该年高达总支出87.3%的军事开支正相吻合[147]。因此，有人就指出："财政上几占九成的赤字，正是岁出上几占九成的军事开支所造成。岁出上每十个钱中的九个钱是用在军事上面，就使财政上每十钱中的九个钱没有着落。这就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财政一个最基本的特点。"[148] 二是行政开支增加。自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为全面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相继增设了诸如田赋征实、专卖、物价管制等新机构，致使政府录用的文职人员迅速增加，相应行政开支的数目也迅速攀升。1940年行政开支占国家总支出的4%，到1941年至1944年间则上升到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强（包括部分军政费用）[149]。三是政府财源枯竭。作为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体的关、盐、统税早已锐减，到抗战中期以后在国民政府税收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货物税和直接税[150]。但货物税和直接税毕竟税源有限，且税负提升幅度有限，其增收的速度是远远赶不上开支增长的幅度。国民政府虽将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将食盐、火柴、烟、糖实行专卖，对于增加国库收入有一定的作用。然而，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特别是1944年4月至12月间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举行的"一号作战行动"，使中国盛产粮食和战略物资的河南、湖南、江西、广西相继落入敌手。这一战局演变给国民政府在财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田赋征实相应巨减，棉花、钨、锑等战略物资带来的财政收入也大量减少。1943年实物收入占中央财源的28.1%，1944年减少至23.6%，1945年则减至18.2%[151]。与此同时，政府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也在减少。1943年直接税收在政府财政支出来源中占8%，1944年降至3.5%，1945年仅占1.1%；间接税1943年占8.3%，1944年占10.1%，1945年占5.5%[152]。

1939年—1945年度国民政府军务费实支数及其占总支出的百分数

年度	总支出（百万元）	军务费（百万元）	占总岁出的%
1939	2,797	（*1）1,611	57.6%
1940	5,288	3,912	73.9%
1941	10,003	（*2）6,617	66.2%
19422	4,511	15,216	62.1%
1943	58,816	（*3）42,943	73.0%
1944	171,689	131,081	76.3%
1945	1,215,089	（*4）1,060,196	87.3%

（*1）1939年度起，加紧急命令拨付款。

（*2）1941年度起，包括国防支出、“国防建设费”、战务费、粮食费、军事运输费和紧急命令拨付款。

（*3）1943年度起，不列军事运输费。

（*4）1945年度包括军政部开支、军政部建设支出和紧急命令支出。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国民政府为解决因税收减少开支剧增而带来的财政赤字，只得采取“赊借收入”的方式来弥补亏空。所谓赊借收入，就是国库向银行借贷的收入。由于国库借支数目庞大，而银行准备金不足，只有扩大钞票的发行。

从下表可以看出，银行垫款的数字几乎与财政赤字的数额相吻合。而这些银行垫款则主要是靠增发法币来实现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银行垫款为201亿元，1943年409亿元，1944年1401亿元，1945年达10,433亿元，而法币增发额则分别占银行垫款总数的

96.0%、100.0%、81.4%、80.8%[153]。

1941年—1945年银行的垫支情况：

年度	财政赤字（亿元）	银行垫支（亿元）	银行垫支占财政赤字的百分数
1941	88	94	106.8%
1942	192	201	104.7%
1943	423	409	96.7%
1944	1,355	1,401	103.4%
1945	10,650	10,433	97.9%
共计	12,616	12,438	98.5%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银行为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大量发行钞票，自然就导致法币的持续贬值，以致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是助长通货膨胀的基本力量。而战时物价无止境的快速上涨，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局面。两者互为因果，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人民对法币的信用产生危机，预期物价上涨，为免遭法币贬值带来的损失，普遍产生重物轻币的思想，货币一到手就换成实物保存。工业囤积原料，商业囤积货物，不仅投机活动日益猖獗，而且加快了货币转手及流通的速度，造成物价进一步上涨。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为2.5；1944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154]。以物价上涨的情况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封锁下，对外交通全部断绝，外援物资无法接济，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不可遏止。1942年全国趸售物价指数已上涨至3900；1943年跃升为12541；1944年则达43197；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已高涨至163,160；而零售物价指数更涨至190,723[155]。据有人计算：抗战八年中，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

前0.6元，到1939年底只值0.28元，到1940年底降至0.08元左右，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156]。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造成了国统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严重影响了国统区工农业生产和民众将士的抗战士气。

四　抗战后期的民营工商业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协助从沿海迁往内地的工厂恢复生产，使得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是，好景不长，从1943年起，国统区民营工业就发生了严重危机。首先，这种危机是表现为设厂数的下降和新设工厂规模的缩小。（参见下表）

国统区工业设厂数和投资规模的变化趋势

年别	登记设立的工厂（家）	每家平均资本额（千元）	指数
1936年以前	300	393	100.0
1937	63（60）	352	89.6
1938	209（182）	414	105.5
1939	419（346）	289	73.5
1940	571	103	26.2
1941	866（738）	53	13.5
1942	1138（1077）	9	2.1
1943	1049（977）	14	3.6
1944	549（533）	6	1.5

注：设厂一项中括弧内的数字为民营工厂数。

资料来源：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由上表资料可以看出，1942年是抗战时期设厂数最多的一年，此后逐年下降。不仅设厂数在逐年减少，同时每家工厂平均占有的资本额也在下降。工厂设厂数和投资规模是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晴雨表，而上述指标的逐年下降，正表明国统区工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正趋向恶化。作为工业投资主体的民营工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动向，正是国统区工业危机的一种表现。

其次，国统区民营工业的危机还表现为工矿企业的停工减产，甚至改组倒闭。以战时的工业中心重庆为例，1943年重庆原有工厂817家，其中停工减产的就达270余家[157]。钢铁业22家（炼铁厂18家，冶钢产4家），其中炼铁厂停炉者14家，4家勉强维持；冶钢1家完全停工，其余3家勉强维持开炉，但产量剧减，因为成本加重，陷于半停顿状态[158]。重庆民营机械厂共有366家，1942年二三月间各区工厂已渐有停歇业者。至6月底，确实倒闭者达42家。采矿业中，1942年嘉陵区减产和停产的煤矿家数竟达77%以上，盐井溪一地的60余家煤矿中，停产的40多家。重庆的纺织业同样处境艰难，重庆最大的3家纱厂（裕华、豫丰、申新）原有纱锭11万余枚，1942年开工的则只有7万余枚。到1943年底各纱厂纱锭又大幅减少。重庆的印刷厂，1943年底到1944年初3个月内有70家停工。衡阳是仅次于重庆的又一工业中心，1943年90余家机器厂中，停工者已达20余家。昆明原有纺织厂30余家，1943年内竟倒闭了20余家。另据《新华日报》报道，1944年四川原有工业的50%甚至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159]。其他各省也和重庆、四川的情形差不多。如云南个旧的锡矿，1944年1月4日《商务日报》报道称："往昔在城东炼锡的火炉，共达40个左右，今天能维持开炉，照常炼锡的不到10个；往昔矿工人数已达10万余，今天仅5000余，……目前个旧大锡生产，已临总崩溃前夕，各私家厂商，95%已宣告破产或停业。"总之，在1944年，国统区工矿企业因资金短缺、原料缺乏、产品滞销、营业亏损、动力供应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歇业、改组、撤销、转让的工厂达326家，其中省营26家，私营300家[160]。由此可见，民营工业在抗战

后期已是危机四伏。

第三，国统区民营工业全面衰退和危机还表现在产品产量指数的下降上。如以1938年为100，在1939年为130.57；1940年为142.34；1941年为130.73；1942年为124.37；1943年上半年为112.36；1944年上半年为93.67；1944年下半年为89.83[(161)]。整个产品产量指数从1941年起就逐年下降。

造成国统区工商业全面衰退和危机的原因比较复杂，可以说既有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因素，又有战争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因素。具体来说：第一，民用工业的凋敝首先是因为国家资本企业的排挤。1942年以后，随着国家资本向金融业、工矿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国家资本企业的相继建成投产，使国家资本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这些国家资本企业资力雄厚，设备齐全，享有原材料、交通及贷款的优惠，因而生产成本低，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例如，钢铁迁建委员会所属的大渡口钢铁厂，每吨钢材售价370万元即有利可图，而民营厂的售价每吨要高达550万元才不致亏本[(162)]。在如此悬殊的竞争条件下，民营厂难以生存。同时，民营厂的大量订货也被国营厂取代，民营厂订货减少，导致生产萎缩甚至停产。以重庆为例，过去民营兵工厂订货占总产值的80%—90%，到1943年则下降到50%，1944年又下降到30%以内[(163)]。第二，通货膨胀的影响。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使民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难以维持生产。往往工矿企业出售产品后获得的利润，不及购买原料时的价格，造成企业虚盈实亏。有人这样指出："一个工厂在账面上虽然赚了钱，但由于物价上涨的结果，它以同样的货币额已经不能从事同样规模的再生产。"[(164)]在物价上涨因素的刺激下，商业投机十分兴盛，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都被吸引过去，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不仅如此，一些工矿企业资金也倒流到商业投机中，出现了"以商养工"和"以商代工"的现象。据统计，1943年3月底，重庆市银行业对商业的放款，占全部放款的70%，而对工矿交

通事业的放款则不到15%[165]。即便是能够得到贷款的企业，也多为国家资本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工厂，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民营工业则因贷款抵押等问题，无法得到贷款而不得不关门停业。第三，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消极作用。由于国民政府对原料、交通运输工具、产品等全面实行统制，一方面造成民营工业因原料短缺、交通工具缺乏，不能正常生产。例如，在1943年，许多棉纱纺织厂就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减产30%—50%。而成都办理棉纱收购和发放事务的福生庄，对于民营厂的棉纱供应，托词无货，故意刁难，造成棉织业工人暴动，就是典型事例[166]。另一方面，则因政府收购价过低，极大地损害了民营企业者的利益，致使民营工业被迫停工减产。如1943年，政府以稳定物价为由，实行限价政策，对物价进行全面管制。但是，这一政策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以钢铁业为例，1943年9月，机制钢的售价为每吨8.6万元，但当月的实际成本已超过9万元；灰口铁每吨限价为3万元，可是实际成本却要3.5万元。又如纺织业，1943年5月以前，棉纱限价为每包1200元，而实际成本已达1500元以上[167]。国民政府收购价过低而导致企业倒闭最明显的莫过于云南的锡矿业。当时资源委员会核定锡价每吨为11万元，而据锡业工会计算，每吨实需成本31万元[168]。二者相差甚巨，导致民营企业亏损累巨，无法继续生产，只得关门倒闭。第四，苛重的捐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税收方面有两个明显的动向：一是扩大税源，二是提高税率。以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论，这一税收政策直接涉及的对象主要为民营工商业者。而国统区工业所负担的捐税，除营业税、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统税、矿税等正税外，还有公债、储蓄捐……以至员工的免役金和各式各样的捐献等等。拿捐税中影响最大的直接税（所得税和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来说，以创办时资本为依据的直接税，在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势下，货币数量上的“盈”，并不是真实的，实际上存在着“虚盈实亏”的现象。而完税则需要抽出一部分资本去缴纳。过分利得税规定，凡盈利超过20%的，就是过分利得，就要征税，而且是累进征课，其盈利额超过资本额60%的，其超过额一律征50%[169]。再如统税，不仅税目的种类一再增加，税率在提高，

而且往往是多次征收。1944年4月30日，黄炎培在谈到统税时就说："实行统一税率，按理就是统一一次征收，现在不仅统一，简直是'统二'、'统三'、'统四'，甚至到'统八'都有的"[170]。由此可见，国统区工业所负担之捐税之严重，是十分惊人的。有人估计，抗战时期后方工业赚20%的利润只够缴纳捐税。且捐税逐年提高，如1941年的生铁每吨完税1.28元，至1942年秋竟增至90元；酒精税额1943年比1939年高169倍，几占价格的1/3[171]。民营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资本规模小，在如此沉重的捐税负担下，生产难以为继，无法生存。

与工业衰退、全面危机的局面相对照，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抗战后期的商业则一度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例如，1937年，重庆只有商号（资本额在2000元以上的）700多家，一般规模都不大。但到1945年，重庆的商业企业则已发展到27,481家，是1937的38.25倍。同期商业从业人员也猛增至23.42万人，占重庆就业人数的39%，全城市人口总数18.8%，居于重庆各行业从业人员之首[172]。贵阳也是类似情况，1937年登记商业行号为1420户，1943年则增至4239户[173]。不仅商业企业数量大增，而且资本额和规模也有所扩大。与商业畸形繁荣相伴而来的便是商业投机的疯狂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越来越严重，形成商业投机利润高于正当商业利润、正当商业利润高于银行利率、银行利润高于工业利润的不正常现象，因而社会资金纷纷如潮水般涌向商业投机。同时，不少工厂也受商业投机的影响而将生产资金用于商业投机。但是，毕竟国统区这种商业的繁荣不是建立在真实的物价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战时性、投机性的特征。随着抗战胜利局面的来临和人民购买力的持续下降，这种虚假的繁荣便大受影响。于是，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商业也开始日益萧条，并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中。1945年春董必武在谈到国统区商业状况时就说："我初到重庆市，夜市很热闹，百货商店里推出涌进的人，川流不息。现在无论哪行哪业，打锣打鼓都无人过问。重庆市面商店关门停业的很多，市场不景气可见一斑了。"

(174)

五　抗战后期的农村经济

抗战爆发后，农村经济就一直是维系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军需民食供应的重要来源和支柱，尤其是在实行“田赋三征”以后，为缓解战时国民政府财政危机、物价上涨的压力，民食军需供应的矛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只重视战时的现实经济需要，忽视对农村经济长远的安排，结果，所制定政策往往演变为以最大限度对农村进行搜刮和剥削为特征，致使农村经济从1941年起就开始逐渐陷入衰落的困境之中。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第一，农田耕种面积逐年减少。大后方15省耕地面积，抗战前为3899.75万亩，1938年为3859.3万亩，1939年为3869.86万亩，1940年为3849.04万亩，1941年为3815.46万亩，较战前减少了84.29万亩。也就是说，1941年大后方抛荒了84.29万亩耕地 (175) 。另据调查，1942年大后方13省农作物面积较1937年减少17.3%。从播种面积看，以四川省为例，在1943年到1945年的三年中，冬季农作物播种面积从6000万亩减少到5700万亩，夏季作物从7900万亩减少到7600万亩。同时，冬季休闲田的面积却从2,400万亩增加到2700万亩，夏季休闲田则从500万亩增加到600万亩 (176) 。

第二，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大后方15省各种作物总产量，由1938年的17.21755亿市担，减为1941年的15.3656亿市担，计减少1.85万多万市担。1942年，大后方13省农作物产量较1937年减少13.3%。从四川省的具体情况来看，以1940年至1945年的平均产量同1939年的产量相比，籼稻下降了24.7%，甘蔗下降了35.1%，棉花下降了43.8% (177) 。

第三，牲畜大量死亡。由于农田面积显著减少，粮食产量下降，草料严重缺乏，以及战争影响，引起牲畜大量死亡。据统计大后方15

省1942年与1937年相比，耕牛减少297万头；马减少34.7万匹；驴减少48.8万匹；猪减少393万头；羊减少293.8万只[178]。

第四，购买力下降。以1937年农民购买力指数为100，到1942年3月，陕西降为69，福建降为45，青海降为63，宁夏降为66，广西降为82，广东降为81，湖南降为86，贵州降为79，四川降为82，江西降为92，甘肃降为95，云南降为98，只有湖北仍为100，西康稍超出为126[179]。

然而，中国毕竟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构成抗战民力的主体，而且，兵员的补充、粮食的供给，军需民用和工业原料的取得，乃至物资运输、商品流通等，无不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村民众。在“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已成为当时国内抗战人士共识的情况下，农村存在的农民“缴纳地主的地租是太高了，苛捐杂税是太多了，高利贷的盘剥是太厉害了，耕地不够，无地的农民太多了”等问题[180]，以及农村经济陷入困境的局面，都极大地妨碍着广大农民对抗战的积极投入，甚至危及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根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意识到依靠自身力量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随即开始着手采取措施，以解决农村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1941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针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土地问题和粮食问题，蒋介石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这个《纲要》是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共有十条，规定在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施以下内容：

（1）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其土地自然增价，应即征收土地增值税，暂依累进制征收之。

（2）国家为调剂战时军粮民食起见，对于农民地价税折征实

物，其实物全归中央。在折征实物期间，有中央按各该县（市）地价税实收金额，以百分之五十之现款，拨归各该县（市）作为补助。

（3）为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和公共建设需要，得随时依照报定之地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土地债券偿付之。

（4）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律不得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

（5）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6）荒地之可为大规模经营者，由国家垦务机关划设垦区，移殖战地难民或后方有耕作能力之人民，并供给生产工具，以资耕作。私有荒地，由政府征收高额地价税，并限期使用；逾期不使用者，得由政府估定地价，以土地债券征收之。

（7）土地之使用应受国家之限制，政府并得依国计民生之需要，限定私有农民之耕作种类[181]。

这一《纲领》的通过和公布，表明国民政府以土地为中心的政策已被视为是“当务之急”，农村经济问题开始得到重视。不过，虽然《纲领》的不少规定从字面上来看是进步的，如对地主地租的租额剥削作了一定的限制，存在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但就实际而言，农民所得具体实惠并不多。例如，《纲要》规定“地租一律不得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实际上1941年各省谷租普遍是主六佃四，甚至有主八佃二的。以前是钱租的，也纷纷改为实物地租[182]。可见，国民政府关于地租租额的规定，远远落后于实际。因此，考察《纲要》的基本精神，不难看出，其实质是以田赋征实，全归中央，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重点。其结果，就只是“重税政策”的战时实施，而不是“土地政策”的战时实施[183]。国民政府对农业政策调整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除了出台《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外，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对农业的重视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放农贷，扶助农村经济发展。早在1938年，国民政府就颁行《战时合作社农贷调整办法》、《扩大农村贷款办法》以及《改进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等一系列农贷政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便加强了对农村资金的支持力度。据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统计，1941年至1944年，四川农业贷款贷给农业生产累计1.9756亿元，农业技术推广3502万元。水利工程3.241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941年—1944年四川农业贷款对象与数额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生产	推广	大型水利	小型水利	运输	副业
1942	4,019	3,424		49			
1942	16,970	3,530	72	13,000			
1943	18,118	8,035	535	4,443	6	61	38
1944	23,073	4,767	2,895	14,210	702		
总计		19,756	3,502	31,702	708		

资料来源：罗君辅：《由中国农贷谈四川农贷》，《四川经济季刊》，1947年10月第四卷第2、3、4期合刊。（分项统计与总数不一致，原文如此）

这些农贷的发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缺乏的状况，是有利于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

第二、兴修水利，鼓励垦殖。由上表内容可知，国民政府的四川水利建设贷款逐年都在增加。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6月止，四川共完成开渠工程26处，筑坝工程233处，挖塘工程3879处，其他工程13处，农田受益面积达66万亩[(184)]。不仅如此，开垦荒地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1944年，全国公私垦殖单位已发展到153个，其中四川就占53个，垦民2.4834万人，垦殖面积达29.7074万亩[(185)]。

第三、推广农业和手工业改良技术。为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成立了农产促进委员会，连同以前成立的中央农业试验所以及各省农业改进所，共同推进国统区农作物推广、病虫害防治、畜牧兽医、肥料、农具、蚕桑、农林副业、水利垦殖经营、棉毛麻纺织品训练等项事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影响较为深入的是农作物和手工业的改良与推广。据一项研究显示，四川省由于推广良种，棉花产量从1938年的76.3万市担增加到了1945年的145.2万市担；粮食产量也从1940年的2.6138亿市担增加到1945年的3.3618亿市担，同时一度趋于衰落的一些手工业如蚕丝业、蔗糖业也取得了恢复和发展[(186)]。

第四、实施自耕农扶植政策。抗战中期土地投机之风十分兴盛，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租佃矛盾十分尖锐，粮食产量也因此大幅度下降。为改进租佃制度，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农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根据《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扶植自耕农的有关规定，国民政府从1942年起着手实施该项政策。1942年6月，国民政府设立地政署，专门负责扶植自耕农政策的贯彻实施。同年11月由地政署主持召开了全国地政业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试办扶植自耕农试验区方案》，要求各省择地定区进行试办。各省遵照方案试办扶植自耕农的办法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或称为甲种）是国民政府依法征收非自耕农的土地，发给农民自种。此种办法又称直接创设；第二种（或称为乙种）是由中国农民银行附属的土地金融机关贷款给无地的农民，购买或赎回土地自耕。此种办法又称间接创设。从推行扶植自耕农政策的三年来看，全国共有14省82县进行试办，扶植自耕农总共1.765万户，农田面积总共31.3123万市亩。其中属于甲种扶植自耕农的区域共30处，属乙种扶植自耕农的区域共有65处[(187)]。

但是，就总体上而言，国民政府上述政策和措施的积极作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以农贷为例，由于借贷关系的成立是通过合作社进行的，而合作社又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因此农贷就成了变相的高利

贷，使农贷的功效大打折扣[188]。况且中国农村面积广大，国民政府发放的有限贷款，并不能根本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再以扶植自耕农政策而言，在国民政府标榜的三个模范示范区——福建省龙岩、甘肃湟惠渠和四川省的北碚扶植自耕农试验区，确实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土地关系得到了调整，土地集中趋势也避免了，土地利用得以促进，农业经营也随之改变，农业收益亦相应增加[189]。然而，这一成效是在国民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后取得的，并不带有普遍意义。就是整个扶植自耕农政策的推行，也只涉及14省的82县，更谈不上在全国广泛推行。因此，扶植自耕农政策影响甚微。

不可否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对农村经济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加之，粮食价格猛涨因素的刺激，抗战后期大后方农业一度扭转了大幅下滑的趋势，总体上还是缓慢的有所发展，各省粮食总产呈增长趋势[190]。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经济的困难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观。实际上随着国民政府一系列统制经济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与强化，从1943年起，农村经济已日渐陷入凋敝和破产的危机之中。

首先，土地投机和兼并十分猖獗，地租暴涨，各种捐税有增无减，使大批农民沦为佃民，农村阶级分化加剧。据对四川某县27户农户交租情况的调查，1938年是48%，1941年是55%，1944年竟高达94%[191]。另据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1944年对川、桂等11省114个县的调查，佃农半佃农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192]。这说明封建剥削关系越来越严重，是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的最大根源。

其次，统制经济政策演变为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对农民的剥削。国民政府对农产品的统制，实际上是贱买贵卖，“不免有破坏经济‘与民作战’的嫌疑，……贬价的收买农产自桐油以至于米粮，比市价低了好几倍。”[193]拿统制经济政策中影响最大的“田赋三征”来说，在初期的征实、征购阶段，农民或许能获得些许抵偿，但到征借阶段，则

完全变成赤裸裸的掠夺，同时，它又为地方乱摊派和勒索大开方便之门，致使农民所受的剥削十分沉重。这种统制当然不能发展生产，反而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害。它是导致农村经济破产与农民生活困苦的一大根源[194]。

其三，国民政府不合理的征兵制和高利贷的盘剥，使衰落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最终走向破产。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征兵制，由于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征兵的基层政权又控制在封建地主势力手中，所以弊端很多。结果在实行过程中，乡、镇、保、甲长乱抓壮丁，征兵变成了掠夫和绑索[195]。国民政府兵役署长鹿钟麟就承认说："不只是兵役官员，而且有时更坏的恶势力，蓄意不分青红皂白地拉夫，把许多农民当作征兵对象，藉此对受害者索取贿赂，借以中饱私囊。"[196]加之，新兵待遇极差，被虐待死亡者很多。所以农村中所有壮丁，以及一部分超过或不及役龄的农民全部被弄得不能安居乐业，或为逃避兵役远走他处。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非但扰民极盛，而且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枯竭。据统计，到1942年止，西南各省农户中在征调兵役后完全没有壮丁的，四川为16.2%，贵州为52.5%，云南为22%，广西为21.4%；因征调工役而完全失去壮丁的家庭，四川为14.9%，贵州为31.7%，云南为2.5%，广西为8.8%[197]。1943年起，西南地区农业生产开始下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劳动力造成的[198]。从中不难想见，兵役和工役的征调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与兵役制一样，对国统区农村经济干扰和破化甚大的另一个因素便是高利贷。在国民政府种种捐税、地方摊派勒索以及高额地租压榨下，农民辛勤劳作一年，所获无几。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和过活，农民只得借债。从1941年到1943年，四川负债农户的比例由51%上升到54%，云南由55%上升为64%，贵州由48%上升为50%，广西由49%上升到59%[199]。农民在高利贷的重压之下，生活更形艰难。总之，原本日渐濒临破产边缘的农民，又在兵役制和高利贷的双重干扰和破坏下，更陷入灾难的深渊，无法生活下去。连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考察东南和西南的情况后也承认："各

地民众真是无以聊生，浙江的民众食糠秕、树皮，广东有的人食人肉。”[200] 因而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明显地回响在全国的乡村”[201]。处于绝望中的农民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在国统区，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省都有农民为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而发动的暴动。例如，1943年春，一支大约五万人的农民队伍发动起义夺取了甘肃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年秋天，福建4000名农民发动暴动，反对当地政府[202]。仅四川省一省，自1939年以来，就有十余县发生过民变[203]。这正是农村经济凋敝和破产的真实写照和反映。

第三节　国统区的文化教育

一　国民政府加强文化控制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战斗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全国的政治抗战、经济抗战、军事抗战紧密配合，相辅相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抗战时期的文化又有进步文化与反动、落后文化，抗战文化与投降、汉奸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等等分野，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厚，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不难发现，它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从维持国民政府的统治、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放松了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和干预，容许进步的抗战文化运动有所发展，使得抗战初期的文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同样是出于为维护和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地位，保证国民党战后对全国的继续统治，国民政府从1938年起便加强了对文化领域活动的干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将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的统治体系和控制范围之内。特别是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特征的进步的文化运动要突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使得文化领域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十分激烈。大体说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文化

政策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即国民政府暂时放松对文化的控制阶段（1937年7月—1938年6月）、国民政府重新加紧推行文化专制政策阶段（1938年7月—1940年底）、国民政府文化专制政策完成阶段（1941年初—抗战结束）[204]。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局势，国民政府不仅将文化专制政策全面推向深入，竭力将抗战文化运动纳入控制掌握之中，而且最终确立了其在文化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地位。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颁布一系列法规，查禁抗日进步文化书刊和言论。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政府在以前法令、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和颁布了《图书送审须知》（1942年）、《书店印刷管理规则》（1943年）、《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43年10月）、《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1943年10月）、《修正图书杂志送审须知》（1944年）、《战时书刊审查规则》（1944年6月）、《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载禁标准》（1944年6月）、《出版品审查法规与载禁标准》（1945年）等，文化专制措施愈加苛繁。凭依这些法规和法令，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抗日进步书刊和言论的查禁力度。1942年度，国民政府查禁196种图书，停止发售120种，就地取登稿件或不准印行的书稿为数更多[205]。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2年间，重庆地区就有1400种书刊被查禁。对剧本的审查更为严格。剧本中凡是出现“诋毁政府之措施”、“描摹战时社会畸形状态”、“宣传三民主义之外一切主义”、“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劳资协调”等内容的剧本，一律禁止上演。由此而遭禁演的剧本，仅1943年重庆地区就有110余种。另据1943年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取缔剧本一览表》，内中开列的不准出版或上演的剧本共达116种[206]。对于言论的控制也变本加厉。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间，有关新闻检查的临时性指示就达二百余种。而《修正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事项就达七十余项。从政治、

军事、外交、经济到财政、文化、社会事务等都有限定，无所不包，使这一时期内不议国是、免谈军情成了舆论界的两大生存技能[207]。更为露骨和荒唐的是，1943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并发表了《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规定："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词不许使用，"两面派"、"亲日派"、"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为"谬误名词"；"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要改为"三民主义"；"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改为"拥护领袖"；甚至"妇女解放"要改为"妇女复兴"，等等[208]。

第二、设立文化机构，强化对抗战文化的管理和控制。早在1938年7月，国民政府就决定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对抗战文化实行管制政策。1939年2月，又在重庆设立"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查禁进步戏剧电影及演出活动。到1942年9月，全国每年只印刷218万余册书刊，而中央一级的书刊审查机构就有八个之多，而各省、市、县也都有类似机构和组织[209]。1941年2月7日，国民政府又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专门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出任主任委员，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主要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210]。中央"文运会"成立后，积极推动、督导全国各省市设立分会，到1943年7月，成立地方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有广东、江西、福建、安徽、陕西、青海、西康、河南、甘肃、重庆等十省市，还有少数省市还成立了县文化运动委员会[211]。"文运会"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强化对抗战文化运动、思想舆论领导的工具和标志。它的成立表明，国民政府已从组织上建立起了全国各级文化运动的组织机构，使各地的文化运动开始直接纳入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控制之下。

第三、制定和实施系统的“文艺政策”，力图将抗战文化运动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轨道。1942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广泛传播，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政府为了抵消《讲话》精神的巨大力量和影响，“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加强对抗战文化运动的思想统治，同时，中央“文运会”统一领导全国文化运动后，也需要在文化运动的理论上随之制订出相应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年9月张道藩在《文化先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该文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规定为文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提出“三民主义文艺”要为“三民主义”政治服务，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服务，也即为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文章提出了“六不”和“五要”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所谓“六不”是指文艺创作的六个写作原则，即：（1）不专写社会的黑暗；（2）不挑拨阶级的仇恨；（3）不带悲观的色彩；（4）不表现浪漫的情调；（5）不写无意义的作品；（6）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五要”是：（1）要创作我们的民族文艺；（2）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3）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4）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5）要用现实的形式 [212] 。张道藩针对抗战以来的新特点，把国民党自20年代以来的文艺法令更加具体化、系统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第一次系统化，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文艺政策的形成。国民政府于抗战后期抛出文艺政策，主要是为了阻止进步民主的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将文艺创作纳入其规定的范围之内，力图控制文艺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就指出：“这一文艺政策的实质，是在所谓‘三民主义文艺’、‘民族文艺’的幌子下，实行只准歌颂国民党而不准暴露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的禁令，意在绞杀抗战文艺和人民文艺” [213] 。

第四、运用专制手段，压迫和摧残进步文化团体。国民政府在对文化界实行严苛的审查制度的同时，又配合以追惩制度以及种种非法手段，以迫使文化界就范。1942年，国民政府查封了《世界知识》等

500余种报刊。1943年8月，《文学月刊》、《音乐与艺术》被查封，9月，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月刊》等刊物被查封。1944年1月，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被查封，等等[214]。国民政府还使用强行“接办”等方式以控制舆论工具，如1943年春，《新疆日报》就被国民政府派员“接办”。除了上述手段外，国民政府更借助于特务行径，捣毁进步报馆、书店、出版社。1942年9月16日，福建省南平《南方日报》被暴徒四十余人捣毁。1945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馆两次被特务纵火。成都《华西日报》则在1月先后发生5次“政治性偷窃”，后又连续发生火警和流弹射入编辑部等事件。4月18日，《华西日报》及晚报又遭国民党特务捣毁[215]。5月29日，复刊后的《华西日报》终被国民政府查封。而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迫害和摧残进步文化团体最典型的事例，则是压迫和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文工会”的前身是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国民政府强迫第三厅所属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时，遭强烈反对，结果，第三厅遂被国民政府宣布解散。但蒋介石又不愿让第三厅文化人士离开重庆，于是又另行宣布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性团体，仍归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然而，“文工会”成员的许多作品，国民政府以种种借口不准出版和上演。“文工会”的进步活动更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委员外出都有特务盯梢。1945年2月，“文工会”顺应时代潮流，由郭沫若执笔起草了《文化界时局进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新闻检查、秘密警察活动和战争投机活动，要求保证人身安全和言论、集会、研究、出版以及一般文化活动的自由，建立联合政府，结果触犯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于是，3月30日，蒋介石下令，由政治部宣布“裁撤”“文工会”。“文工会”的被解散，是国民党政治上倒退的具体表现，也是其文化专制政策推行的高潮[216]。

总之，随着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上述加强对文化领域种种控制措施的推行，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进步文化人士的创作活动受到限制，进步书刊和戏剧被查禁。整个文化界气氛沉闷，出

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当然，在对国民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总体上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的予以分析。例如，为抗战进步文化人士所深恶痛绝的书报审查制度建立后，曾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书刊和作品，是造成国统区文化局面沉闷的罪魁祸首之一。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措施，也查禁了相当数量的日本侵略者、汪伪汉奸的作品和宣传品，以及为数不少的淫秽消极书刊。例如，1942年6月上半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令查禁图书八种，其中就有敌伪宣传品两种，停止发售图书九种，属淫秽图书的有四种；1945年2月上半月，查禁图书五种，其中汉奸宣传品三种[217]。这对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面对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中全面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行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进步的抗战文化人士也针锋相对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例如，1943年11月18日，王亚平、于伶、茅盾、老舍、夏衍、曹禺、臧克家、姚雪垠等五十三人为反对国民政府“中审会”任意扩张书刊限制范围，蛮横查禁进步书刊，扣留送审原稿和肆意删改作家原著的做法，上书行政院，要求予以限制和改进[218]。进步文化人士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公开发表言论，历数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化界造成的诸如出版沉寂、文化活动缩减等种种恶果。揭露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的实质，指出这一“文艺政策”就是“逃避现实”的“鸵鸟主义”，其目的是“置文艺于死境”。抵制和反对国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要求“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要求“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进口书刊、干涉演剧”[219]。这些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文化界人士的士气，壮大了进步的抗战文化运动阵营，暴露了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质，使得国民政府日益在文化界陷于孤立。

二　传统思想的复活运动

思想是时代的要求和反映。在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中，中国人民不仅用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而且也用思想的火花浇铸着抗日的长城。伴随着全民族抗日精神的高昂，抗日战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变化，一股“中国化”的思潮浸漫于中华大地。各种政治势力都从民族生存、抗战精神的发扬角度出发，结合自身政治理念，高唱“中国化”的旋律。所不同的是，国统区的“中国化”现象，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重新整理和认识，即所谓的“新瓶装旧醋”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架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是抗战后期，一些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胸怀和志向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环境下探究国家民族复兴之路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一时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运动，在国统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并由思想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因其主流话语与原创活动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关，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再创新与发展，所以姑且将这一思想运动称之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当然，这一哲学思想活动也是自“五四”以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结合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后期，国统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成就显著，除国民党官方系统的思想体系外，较成熟和影响力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和金岳霖的“新道学”，等等。这些思想体系最大的特征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中华民族生存和复兴的角度出发，重新解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思想体系。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湖北黄冈人，1885年出生。他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来到四川的熊十力，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

的存亡绝续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为此，从1943年起，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勉力著书讲学，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纳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了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出版，标志着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在哲学本体论上，熊十力接受了佛教唯识宗的“万法唯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识”或“本心”乃宇宙之本体、万化之根源，正如他解释为何以“新唯识论”命名其哲学思想体系代表作时所说：“识者，心之异名。唯者，显其特殊。即万化之源，而名以本心，是最特殊。……新论究万殊而归一本要在反之此心，是故以唯识彰名。”[(220)] 在此基础上，熊十力建立了核心为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功用是不能分裂成两片的“本体论”。由“体用不二”论出发，他又建构了他独具创意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翕辟”之说源于《周易》，熊十力借用于自己的哲学中，“翕辟”即是“心物”，“翕即凝敛而成物，故于翕，直名为物；辟恒开发而不失其本体之健，故于辟，直名为心”。“心”与“物”虽是本体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但“辟”包含着“翕”，而“翕”则从属于“辟”。翕是物，辟是心，此心既是“宇宙之心”，也是“个体之心”。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性量分殊”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可以概要分为两种：一是性智，它是一种发自本心的认识能力；二是量智，“习心亦云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新论），量智是从性智中异化出来的而又与性智相对立的一种认识能力，它以日常经验为基础。

“体用不二”的本体论、“翕辟成变”的宇宙论、“性量分殊”的认识论，共同构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

综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他的哲学思想是导源于孔孟的仁学与

王阳明的心学，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融为一体，并且发挥《周易》、《老子》和陆王心学的思想而提出来的[221]。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意，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极具创新的一代大师。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抗战时期，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和当时西南联大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抱着为中华民族复兴有所贡献的坚定信念，冯友兰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先后发表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新事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所谓“贞元六书”[222]，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使“新理学”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庞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哲学思想体系。

冯友兰在观念上构造了一个“理世界”，“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的物，不过是“相对的料”，它是第二性的；“理世界”（或者叫“众理之全”的“太极”、“大全”）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创造者。物不过是“理之实现”。通过对“理之观念、气之观念、道体之观念、大全之观念”的哲学阐释，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并利用这一体系，对他所认识和理解的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解读。其中，他所探讨的“共相”与“殊相”，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论证主宰事物的“理”即是寓于“殊相”中的“共相”，冯友兰论证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必有其共性之所在，而这种共性正是中国人所必须学习的。在此理论前提下，冯友兰的《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又进一步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与归趋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国还是“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西方则已是“生产社会化”的社会，因而，“中国现在所经历之时代，是自生产

家庭化的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的文化之时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民治主义，都是一个社会已实行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以后的事，“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不过，他认为文化类型转变并不是以牺牲文化的特殊性为前提的，需要转变的只是文化类型“有关之诸性”。于是，他合乎逻辑地将视角转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不仅不缺少组织社会的良好道德，而且视道德价值高于一切。仁义礼智信“是无论什么种类的社会都需要。这是不变的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是中国社会自商周以来历久不衰的“国风”。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肩背”；中国所缺乏、所添加的只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样，冯友兰又陷入到了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223]。

为了论证中国的道德不仅值得中国人珍视，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了他的“人生境界”理论。他从人生观的角度将人生分为依次上升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人是“圣人”，和“理世界”合而为一。《新世训》和《新原道》又进一步从“闻道”、“行道”的角度，对“天地境界”的完美至上作了说明和补充。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冯友兰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不言而喻就是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而且申明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为鹄的。换言之，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在复活孔子伦理、程朱理学的封建正统哲学的基础上，再糅合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而构成的，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

“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从而在现

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冯友兰因此而奠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地位，他也被认为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224]。

战时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一样，在国统区有一定影响的另一哲学思想体系是贺麟的“新心学”。

贺麟，字自昭，1902年出生于四川金堂县。和熊十力、冯友兰不同，他属于晚出的哲学思想家。早年留学欧美，回国后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了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

贺麟是以新黑格尔主义发挥陆王心学而建立“新心学”体系的。在其于1942年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中，贺麟全面阐释了“心是主宰”的哲学命题。他说：“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是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故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225]。就是说，客观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的心的存在。同样，贺麟通过从哲学与科学、生命与物品、主观与客观、体与用、人与禽兽的区别等方面论证“心”高于“物”，从而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铺垫。

在认识论方面，贺麟认为“知行合一乃是知行同时发动之意”，“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把科学常识加以玄学化独断化”，称唯物史观为“外观法”，不如唯心史观“内观法”“注重本质”。贺麟对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精辟的发挥”，“实在是发挥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说谋最高的出路，求最后的证明”[226]。此外，他还宣扬和肯定封建的“三纲五常”说，说“五伦”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三纲”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关系。

当然，在贺麟精心构建“新心学”体系时，受时代的影响，蕴含的

特殊本意则是对中国传统封建儒家思想的认识问题。在其《文化与人生》论集中，贺麟从他的“新心学”走到了现实：其一是断言“新儒学思想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其二是指出“以精神或理性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227]。如果将二者融合来看，其主旨是呼吁中国人充分发挥“心”的力量去消除奇灾大难，复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中国人以“心为主宰”去发抒“内蕴的潜力”，归根结底则是儒学的复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失调，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因而，“民族的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指出的具体出路便是“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去“儒化西洋文化”、“中国化西洋文化”，不是“西化”，而是“化西”。

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是在继承、吸收和批判前人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贺麟被认为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

除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金岳霖的“新道学”。

金岳霖是吸收了休谟、康德、罗素等西方哲学的成果，又对先秦老庄哲学和宋儒道学作了创造性发展而创立自己“新道学”哲学体系的。《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认识论。在方法论上，他将西方哲学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结合起来。因之，金岳霖被誉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

不论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还是金岳霖的“新道学”，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其一，宣扬唯心主义（尽管程度上有差异）；其二，“复活”传统思想文化；其三，重建中国哲学，为现实服务。当然，由于它们的社会影响，以及与现实

政治的关系不一样，例如，贺麟除宣扬唯心主义、传统思想外，一度还极力吹捧蒋介石，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集权统治张目，幻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新心学”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冯友兰则因其“新理学”社会影响大、颇有代表性，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以延安出版的《群众》为阵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先后发表了不少批判文章，批判和揭露其反时代、主张唯心复古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倾向。

三　国统区的教育事业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立即陷入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之中。作为民族文化和未来希望传承载体的教育事业，也不例外，受到了蓄意的摧残和破坏。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教育界立即行动起来，为维系民族的血脉，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奋斗。作为教育事业支撑点的国民政府也做了积极引导和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37年8月27日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了抗战时期办理各级教育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学校在战时“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的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范围”；学校教职员及大中学生，“得就其本地成立战时后方服务团体，但须严格遵照部定办法，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228)]。显然，教育督导仍以维持正常教育及管理秩序为主旨。但是，民族的危机和战争的危险，已经给中国教育提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课题。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教育规定如下的任务：“（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

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229] 同时，为实施抗战建国教育的总纲领，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就有关学制、学校的迁徙设置、师资之训练、各大学及各院科系以及中小学科目之整理与调整、训练标准、体育、管理、教育经费、行政机构、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留学制度、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育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的沟通与合作等涉及教育的17个方面，均加以了系统的规定和说明[230]。该《纲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教育的指导性原则。随即，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根据17个要点，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明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的基本方针，研究和改进各级教育，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明确强调“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思想。最后，大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的讲演词为全国教育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即逐步实行的“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最终确立。这一指导方针与“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相适应，既注意到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应急需要，更考虑到教育为建国奠基的战略意义。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就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在贯彻“战时应作平时看”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对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扶助，并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控制，使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得以维持，并在西南西北等地有所发展[231]。概括起来，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为维持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积极扶助高校内迁，帮助恢复教学秩序。在高校内迁与恢复秩序和发展过程中，国民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牵头协调和组织面临战火威胁的高校迁往内地。针对抗战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日军有意识地对我国教育事业进行肆无忌惮摧残的现实，为避免更大

的损失，保存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曾在抗战初期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华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高校内迁。1937年抗战爆发至1939年，这一时期仅迁往四川的高校就达三十一所[232]；1940年夏，英美与日本关系紧张，上海租界形势日趋恶化，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迫使原来迁往上海等租界的高校再次内迁，掀起了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的高潮。由于紧接着日军大举侵占东南亚国家，直接危及我国西南各省，受此影响，原来迁往云南等地的部分高校也被迫再次走上内迁道路。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第二波高潮始自于1944年夏到年底。1944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挽回败局，发起豫湘桂战役，迫使以前内迁至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八所高校再次内迁四川和贵州[233]。三次内迁高潮中，国民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为内迁高校提供各种帮助。高校内迁是一个系统大工程，牵涉校址的选择，图书仪器的搬运，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转移安置，食粮问题的解决等诸多方面，特别在战时环境中，经费和车辆都非常紧张，在此种情况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大批高校的成功内迁，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如此，战时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困苦，国民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应允增加战区学生贷金，每人每月为白米2.1斗、菜金18元[234]。曾于1944年拨出40万元作为专款，用于救济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贫困学生[235]。

高校内迁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行动，它保存了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力量，从而把现代教育引入了欠发达的内地，为抗战事业及后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直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设置国立中等学校，救济战区流亡后方的中等学校师生。到1945年，国民政府共设立国立中学三十四所，国立大专院校附设中学十六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十四所[236]。

第三、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抗战时期特别是后期国民政府在

教育管理上比较重大的改革措施，便是结合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定为：“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及壮丁队长，均暂以一人兼任之”[237]。国民政府意图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机制，加强对广大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广大民众的管教。为有效地贯彻和实施新县制有关规定，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40年4月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在乡镇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同时实施。在管理体制上，确定由县设教育科主管全县教育，乡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两类学校均分为小学和民众教育两部。后来，为推进民众教育，又于1944年颁布《国民教育法》[238]。这一管理体制最大的特征是实行“政教合一”，它通过“管（管理）、教（教育）、养（经济）、卫（警卫）”合一的手段，借助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的专制集权统治和一体化管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乡镇长、保长都未符合教育部关于小学校长所应具备的能力与资格，而且良莠不齐，教育界也强烈抵制由乡镇长和保长来兼任校长职务。因而，1942年国民政府被迫修正有关规定，改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239]

1940年8月在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后，国民政府又结合正在实施的“行政三联制”改革，在教育管理上厉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其核心内容为：在设计方面：国民政府制定五年普及国民教育的实施计划及期限；各省市根据教育部规定，拟定本省市普及国民教育计划以及实施方案与进度，呈报教育部；由省教育厅督导各县市统筹拟定本县市国民教育实施计划，报教育厅审核。在执行方面：由教育部、各省市和各县市督学、指导员分层级负责视导。在考核方面：各县市所设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实施情况，由县市主管教育行政

机关考核；县市由各省市教育厅考核；各省市由教育部考核[240]。教育行政三联制确立了中央、省市、县市分层逐级管理的机制，对提高教育行政效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建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失学失业青年。这对稳定后方和增强抗战力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五、推行“党化”教育。“党化”教育并非始于抗战时期，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国民政府在学校教育中就推行“训育制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在教育阵地中的支配地位，便将“训育制度”进一步发展为“以党治校”，规定学校的行政领导必须加入国民党（指中、小学校长及大学处级以上的行政人员）。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尤其是陈立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1944）期间，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更是不遗余力。在消除不良外来影响和提高学术标准的幌子下，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严格控制。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青年训练大纲》，年底，又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以“协助学校行政”（后来还增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以“协助学校训育”）[241]。自1939年起，又在各校设立训导处，在国民党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广大师生的政治监督。建立起了由校长、院长、处长以及国民党区党部成员、三青团团分部成员等共同组成的完整的“党化”控制系统。通过新县制的推行，在广大农村建立了由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控制的“党化教育”管理模式。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了“党务与教育打成一片”的口号[242]，使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走上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行“党化”教育，要求必须开设军训和三民主义原理的课程，还组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整套“国定教科书”，强令各校统一使用。对违反规定的教科书，则采用查禁的手段进行干预[243]。另外，国民政府甚至还利用

《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以及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方式强化“党化”教育，更有甚者，甚至采用特务手段来推行“党化”教育[244]。

这些政策和措施，有的对抗战后期的教育事业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保证和维持战时教育发展的积极因素，有的则对抗战后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稳定和学生的团结。例如，“党化”教育推行的结果，不仅未能在青年学生中培植起国民政府当政者所期望的“效忠”国民党、蒋介石的氛围，相反，随着国民政府的日渐腐败、军事上的失利，国统区青年学生中反独裁、反迫害、要民主的要求日益强烈，并演化成为一股宪政运动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国民党的统治。对学生运动大感头痛的国民政府，1943年7月竟然以行政院名义通电各地党政机关，要求除国家纪念日外不得随意召集学生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245]。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的推行，也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贯彻“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和各项行政措施，教育的正常秩序基本上得到了维持。国统区的各级教育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141所，比1936年增加30.6%。在校学生人数增至8.3498万人，为1936年的两倍[246]；在中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中学数达3727所，比1936年增加90%。学生数达126.2199万人，比1936年递增162%[247]；在初等教育方面，据1946年统计，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的19省市，共计31.578万保，设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23.7万所，平均每4保设3校，已接受教育的儿童2916.0803万人，占学龄儿童总数3817.3765万人的76%强[248]。上述统计资料虽有不实之处，但也反映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确实取得了进步，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此外，国统区的社会教育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1940年度到1945年度，全国仅国民学校所办成人补习班的学生人数，六年中便增加了256万人，妇女班的学生人数

也增加了165万人[249]。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未来国家发展建设人才的培养，都作了难能可贵和值得肯定的贡献。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时国统区教育的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师生员工的辛勤努力，若没有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支持，国统区的教育事业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成就的。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则通过“党化”教育、“政教合一”与“三位一体”、教科书审定等手段，将国统区教育强制纳入党国统治的轨道，强化了对各级教育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使得国民党的政治专制统治渗入到教育领域中，严重阻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当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的教育战线便日渐成为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要力量，这正是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中推行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教育在中华民族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战时艰难环境中取得了发展，更主要的是它充分反映和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奋斗不息、传承文明的可贵品质和精神。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为例，它是一部让人慨叹的历史画卷。

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于抗战爆发后南迁长沙而临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日军溯长江而上进攻武汉，长沙已不安全，在此种情况下，经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经长途跋涉（其中湘滇黔步行团行程1671公里），克服种种困难，西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迁至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50]。搬迁的艰难和最初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校舍的简陋、图书仪器的缺乏、经费的紧张，时时困扰着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员工。

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西南联大还是逐渐走出了“不必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教育不出好学生”的阴影[251]。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西南联大已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毕业学生达到121人，是1939年毕业学生的七倍。此后人数不断攀升，这可从每年毕业生人数中看出发展的速度和水平[252]。在校学生人数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仅工学院1941年—1942年度就在1000人上下。培养出了一大批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蜚声世界和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教师科研成果也是硕果累累。自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度设立奖励计划以后，西南联大该年度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奖励的科研成果有：冯友兰《新理学》（一等奖）、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一等奖）、金岳霖《论道》（二等奖）等四项；1942年度获奖的有：周培源《湍流论》（一等奖）、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一等奖）、孙云著《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二等奖）、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三等奖）、费孝通《禄村农田》（三等奖）等九项；1943年获奖的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等奖）、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等奖）、闻一多《楚辞校补》（二等奖）、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二等奖）、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三等奖）等十项[253]。反映了抗战后期西南联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是国统区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然而，西南联大毕竟是在抗战后期的严酷环境中取得上述成绩的。当时，受战争的冲击和影响，昆明的物价在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1942年—1943年以后，飞速腾升，据报载，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更有文章指出物价上涨指数为405倍，而联大教师薪金制只增长了5倍[254]。薪金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结果联大许多教师都陷于贫困状态中，时在断炊威胁中度日，甚至靠典当兼差维持生计，最后弄到了无衣无物可卖的地步。即便这样，生活依旧困难，以致有的教师身无分文，患病去世，夫人衣食无着，欲投滇池自

尽[255]。学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更糟。当时国民政府向学生提供助学贷金，昆明学生每月最多可申请贷金150元，但每月伙食费最低需170元[256]。因生活困难，许多学生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买不起书本，就伙用或靠老同学出让旧书学习。艰难的环境没有击倒联大的师生员工，他们用热血和奉献精神托起了联大的希望，支撑起了联大发展的大厦，铸就了辉煌的成就。

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克服和战胜战时难以想象的困难，写就不平凡历史的呢？借用陈岱孙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257]正是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西南联大谱写了一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教育的光辉篇章。

四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广大知识分子满怀悲愤与豪情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他们利用知识和手中的笔为武器，迅即掀起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抗日运动。随着战局的演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抗战文化运动在广大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相继走过了三个阶段，即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时期（1937年7月—1937年11月）、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1938年1月—1938年10月）和抗战文化运动的调整时期（1938年11月—1941年12月）。尽管自抗战进入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即加强了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限制和控制，在文化领域中全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但并未能阻挡住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脚步。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与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积极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以各种形式和机会发展抗战文化运动，使富于时代特色的抗战文化运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逐渐形成了以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期。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以后，汇集于武汉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陆

续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由于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分别是滇系、桂系控制的地盘，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矛盾，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加之，李宗仁、白崇禧与龙云抗日态度坚决，这就使得广西、云南相对地保持着民主的气氛，成为国统区政治空气新鲜活跃的地区。于是，大批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纷纷云集广西、云南的省会——桂林、昆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澳沪以及南洋等地相继沦陷，留居该地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到国内，其中又有不少人到了桂林和昆明。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界人士云集桂林，推动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944年的六年中，在桂林路过或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士约有一千多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人更达两千人以上。其中闻名全国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授近二百人。相继迁到桂林，或在桂林创建的各种文化团体约有三四十个[258]。在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团体的积极推动下，使本来是“文化沙漠”的桂林，“很快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惟一文化中心”[259]，并为桂林赢得了“文化城”的盛誉。在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先后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小春秋》、《桂林晚报》、《自由晚报》等。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央社桂林分社、西南通讯社等。先后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印刷厂达二百家，其中出版杂志近二百种，专著仅文艺方面就达一千余种[2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又向纵深方向发展。创办的文学刊物迅速增加，主要有《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学创作》、《当代文艺》、《人世间》等十九种之多[261]。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小说方面，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收获》、沙汀的《淘金记》、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长篇、短篇名作。在戏剧方面，有田汉的《秋声赋》，田汉、洪深、夏衍合写的《再会吧，香港！》（后改名《风雨同舟》），欧阳予倩的

《忠王李秀成》，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特别是桂林的戏剧演出活动，极为活跃。1944年春，桂林举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西南戏曲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参加西南剧展的有三十三个团体，演出大小剧目七十多个，演出剧种计有话剧、平剧、桂剧、粤剧、湖南花鼓戏、彩调等。这次剧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桂林文化运动发展的状况，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昆明的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则主要得益于内迁的高校。1938年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我国久负盛名并享誉海内外的最高学府。三校合组后的西南联大，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共有一百多位知名教授，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文化精英，以及后起的学者二百余人。此后，又有诸如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等其他高校相继迁滇。更多的文化人士纷纷涌向昆明，使昆明一时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262)]。而抗战文化运动在昆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标志，则是西南联大及其活跃的校园文化。

联大教师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埋头著书立说，在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在文学方面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诗选与校笺》等；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语文拾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以及与叶圣陶合作编著的《精神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书；王力的“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等等。历史学领域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吴晗的《大明帝国与明教》、《明太祖》等；雷海宗与林同济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哲学方面有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系列著作；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自然科学领域

虽因物质条件限制，难以有重大突破，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华罗庚、许宝禄、陈省身在数学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263]。上述这些名作和成果的诞生，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而且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内容。与联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相联系，各种学术演讲会十分兴盛。仅从1942年起，中文、历史两系合办的“文史讲演会”就达六七十次之多。除此之外，联大教师还创办刊物，如《国文月刊》、《今日评论》、《当代评论》等；李公朴开办了“北门书屋”，创办了“北门出版社”，出售和出版进步的书籍和作品。

在联大教师的积极影响下，联大学生的校园业余文化活动有声有色，构成了联大校园文化最有生气的部分。联大学生组织了各种社团，利用独特的宣传形式——壁报，出版了《群声》、《耕耘》、《文艺》等刊物。尤其是进步学生组织的社团，更是将联大的校园文化气氛渲染得富有时代朝气和特色。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全面实行独裁和专制统治，以联大为核心的昆明抗战文化运动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赋予了民主政治文化的品格，使昆明具有了“民主堡垒”的称誉。

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昆明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实际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后方整个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了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广州、武汉失陷以后，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大批文化人士，以及新华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剧协”、“文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都先后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机关迁到重庆，推动了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二、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内迁，其中先后迁到重庆地区的就有三十一所，占整个内迁七十七所高校的将近一半。加上重庆本地设立的高校，使抗战后期重庆地区的高校达到三十八所，居全国之冠

[264]。这些高校成为传播文化和推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

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侵占上海英、法租界、香港、澳门以及南洋各地，迫使留居上述地区的文化人士纷纷向祖国内地转移。数月间，就达几千人[265]。这批文化人士部分去了桂林、昆明，部分到了重庆。其后，桂林的文化人士1944年夏大都内迁到重庆，昆明也有部分文化人士辗转到了重庆。其中著名的作家有：茅盾、张恨水、胡风、田汉等；诗人有：艾青、臧克家；电影戏剧艺术家有：夏衍、宋之的、洪深、司徒慧敏等；表演艺术家有：金山、凤子、黄宗江、蓝马等；美术家有：徐悲鸿、叶浅予、丁聪；音乐家盛家伦；新闻记者顾执中等70多人[266]。到1943年上半年，集中于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约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如此巨大的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和活动，直接推动着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向高潮阶段发展，并成为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第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的内迁，原先在上海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大型印书局也迁到了重庆，并在重庆恢复和扩大了出版业务。许多文化名人和作家自己也开办了小型的出版社，诸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外出版社、作家书屋等。此外，重庆市还新成立了建国书店、文风书店、南方印书馆等印书馆。上述众多出版机构的建立，不仅使重庆的出版事业日益走向繁荣，而且为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以及重庆又是国统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缘故，共同构成了重庆作为全国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主客观条件。正是在汇聚于重庆的众多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与努力下，使重庆的抗战文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的抗战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刊物是文学艺术家的活动阵地和舞台。在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重庆后，整个重庆新创刊和复刊的文艺杂志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

至1943年间仅期刊就有：《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文坛》、《今文月刊》、《中国漫画》、《文风》、《时与潮文艺》、《演剧生活》、《戏剧月刊》、《天下文章》等。而且陪都出版的各大报纸大都创办了副刊，诸如《大公报》副刊“战国”、“战线”；《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诗垦地”；《新蜀报》副刊“蜀道”；《新民报》副刊“血潮”；《中央日报》副刊“文综”；《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青灯”；《扫荡报》副刊“扫荡”；《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1942年9月18日改设“新华副刊”）等[267]。这些副刊内容丰富多彩，它们与新创和复刊的期刊以及先前的刊物一道，迅速促进了文艺界的繁荣。受其影响，此间，重庆的文艺丛书出版也特别盛行，相继出版的丛书有：“每月文库”、“战地文艺丛书”、“中国文艺丛书”、“戏剧丛书”，此外，互生书店、文林出版社、良友出版社、正中书局等均有丛书出版。文艺刊物和书籍出版的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状况。

戏剧是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最重要的标志。由于受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制度的干扰和限制，其他文艺形式的活动受到了一定影响，陪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便利用“雾季公演”的机会，推出了每年一度的雾季戏剧节，使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第一届雾季公演，戏剧界共演出了《大地回春》、《愁城记》、《屈原》、《猴儿大王》等二十九台大型话剧，还有活报歌舞剧《法西斯丧钟敲响了》、小型歌剧《农村曲》、大型歌剧《秋子》、独幕话剧《孤岛小景》等。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的第二届雾季公演中，共演出《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召唤》、《蜕变》等二十二台大型话剧。雾季公演，不仅使中国抗战话剧运动进入空前未有的黄金时代，也使得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抗战文化运动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戏剧内容丰富，有的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腐败；最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

理不善的军医院原始状况[(268)]。有的借用历史剧的形式痛斥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最典型的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

重庆作为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此时期在重庆共设有全国性学术团体141个，各种学术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从学术研究成果获奖的状况就可看出，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市共有266人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发明奖，其中一等奖14人，二等奖74人，三等奖152人，余为奖助金[(269)]。除此之外，抗战后期重庆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创作以及科学和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总之，抗日文化运动是揭露敌人、发动群众共赴国难、参加抗日的重要手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唤醒民众将士的觉悟，粉碎日本侵略者妄图涣散我国军民抗日的意志和精神的文化进攻战和精神战，激励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防止妥协投降行为和失败心理，暴露和抨击时弊，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推动大后方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

(1)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17页。

(2)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04页。

(3)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10页。

(4)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6。

(5)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2日。

(6)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16—217页。

(7) 《政治情报》第171期（1943年11月），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6。

(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61页。

(9)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20页。

(10)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11) 蒋介石：《行政三联制大纲》，1940年3月。

(12) 蒋介石：《行政三联制大纲》，1940年3月。

(13) 孔祥熙1943年5月26日在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开幕式致词，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14)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第212—213页。

(15)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对于行政三联制实施成绩之总检讨及党政工作考察报告之决议案》，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16) 蒋介石在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训词，1943年5月26日。

(17) 刘佑人：《行政三联制发凡》第六章，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18) 《行政三联制会议辑要》，第14—15页。

(19) 参见乐嘉庆：《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权力结构的运行》，《学述论坛》（南宁）1991年第5期，第94页。

(20) 韦永成：《新县制的认识》，载《安徽政治》第四卷第七期。

(21)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二），中共浙江党史协会编印，第356页。

(22) 《地方自治实施案》，载胡昭华《新县制概论》，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27页。

(23)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中国第二历史馆藏档案。

(24) 韦永成：《新县制的认识》。

(25) 《加强推行新县制办法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122目录1卷号223。

(26)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章“内政”，1943年行政院编，第10页。

(27) 内政部档案9048—163，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28) 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第195页。

(29)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42年12月编印。

(30) 《国民政府公报》，转引自孔庆泰等著：《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页。

(31) 《国民政府年鉴》（上），第一章“内政”，1945年行政院编印。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543/173。

(33) 《浙江省政府致内政部盈致字第一一二七号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543/12/3。

(34) 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第196页。

(35)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增编”（二），1946年5月中执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

(36) 《四川省内政工作总报书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9075/190。

(37)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1945年5月5日编印。

(38) ［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39) 延安时事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92页。

(40) 李建昌：《新县制下的财政问题》，载《地方财政》第一期，1941年7月。

(41) 沈鹏：《在实施中发现之问题及其改进意见》，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三专署秘书室档案28号。

(42) 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11页。

(43) 参见宋进：《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44) 参见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上），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52—1353页。

(45)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4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47)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48)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49)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13—314页。

(50) 张锡昌：《中国工业化的当前问题》，《中国工业》，1943年第13期，第28页。

(51) 关吉玉：《四十年来之民国财政》，载台北《中国经济》第十九期，第23页。

(52)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53)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第34页。

(54)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39页。

(55) 许性初：《我国后方之战时经济》，《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年版，第437页。

(56)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57) 匡球：《中国抗战时期税制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11页。

(58)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131—150页。

(59)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60)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61)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3—148页。

(6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88—690页。

(63) 中央银行经研处编印：《民国卅一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概况》，第22页。

(64)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65) 参见侯德础：《抗战时期四川田赋征实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四期。

(66)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9页。

(67)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日。

(6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粮食部工作报告》（1945年4月），见粮食部档案，（八三）100—2.7270。

(69) 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7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89页。

(71) 参见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页。

(72)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粮食部报告》，粮食部档案（八三）100—1.7278。

(73) 伍丹戈：《四川地方摊派》，载《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2期。

(74)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第76页。

(75)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76) 《革命文献》第80辑，中正书局1977年版，第237页。

(77)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7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79)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89页。

(80)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81) 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82)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十一篇，第50页。

(8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84) 《物资局平价布停止配售》，《新华时报》，1942年4月25日。

(8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86)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9页。

(87)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4页。

(88) 《经济部训令》（1942年10月），《民国档案》1994年第二期，第38—39页。

(89) 《为奉谕抄送政府管制物资不彻底之影响等情报一件查照由》（侍六字第54006号，1942年5月24日），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馆藏，物资局档案828/1049。

(90)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64—66页。

(91)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3页。

(92)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93)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0页。

(94)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3页。

(95)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4—86页。

(96)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538页。

(97)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第298—299页。

(98) 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99)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8—89页。

(100)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101) 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1945年）第三编，行文书局印行，第5页。

(10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第448—452页。

(103)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10月版，第811页。

(104)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10月版，第812页。

(10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

(106) 《电令各省市政府负责实施管制物价由（1942年）》，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经济2—（7）。

(107) 《如何解决物价问题（1942年）》，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经济2—（7）。

(108) 《破获制造中中交农四行伪造之机关我方因应方案》（1942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50—（5）。

(109) 王汎生：《为呈复罗坚白现任何职及在重庆否等由》（1943年8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特种情报39—（5）。

(110) 参见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26），1996年。

(111) 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7页。

(112)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113) 《四联总处秘书处关于修正通过对日宣战后处理金融办法的报告》，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386页。

(114)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115) 《财政部拟划设银行监理官》，《新华日报》，1942年6月4日。

(116) 《财政部决定增加中交农三行官股》，《新华日报》，1942年6月30日。

(117) 《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118) 陈绍闻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119)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120) 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3期。

(121) 《成都及附近各县破获大批囤积案》，《新华日报》，1941年12月5日。

(122) 《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36页。

(123) 《四联总处三十一年重要工作报告》，四联总处档案（五八五）

—210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24)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2—83页。

(125)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致财政部函》（1945年7月7日），财政部档案（二七五）19936，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6) 《银行投资生产事业事实表》，财政部档案（二七五）19937，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7)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4页。

(128) 《1942年度农贷概况》，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一八一）979，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9)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26—727页。

(130) 资源委员会编：《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1948年），第38—39页，转引自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6页。

(131)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53—854页。

(132)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

(133) 《人和公司董事长杨萃文、总经理康步七致资源委员会呈文》（1941年7月18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八）6427，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34)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135)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56页。

(136)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137) 转引自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7页。

(138)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页。

(139)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140) 财政部档案（一四八）153，《贸易委员会工作概况》（1937年10月—1940年8月），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十六）6193。

(142)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11页。

(143) 《财政年鉴》三编，第十一篇，第13页。

(144) 参见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90页。

(145)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47卷。

(146)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543页。

(147)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03页。

(14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149) 《重庆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150)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522页。

(151)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152)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15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63页。

(154) 赵德馨等著：《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155)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15—717页。

(15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157)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3页。

(158) 《商务日报》，1943年12月24日。

(159) 《新华日报》，1944年7月9日。

(160)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二卷第3期，第26—41页。

(161)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二卷第3期，第27—41页。

(162) 吴培荣、吴华芝、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概述》，载《重庆工商史料》第五辑，第63页。

(163) 吴培荣、吴华芝、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概述》，载《重庆工商史料》第五辑，第64页。

(164) 《新工商》1943年8月第2期，转引自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2页。

(165) 康家仁：《战时重庆的银行》，载《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3期，第13页。

(166) 《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39—40页。

(167)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502页。

(168) 《商务日报》，1944年1月4日。

(169) 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页。

(170)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5页。

(171) 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172) 傅润华、汤约生主编：《陪都工商年鉴》第一编，重庆文信书局1945年版，第7页。

(173) 《贵州省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74)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第63页。

(175) 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176)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177)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页。

(178) 参见李凯：《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6年第6期。

(179)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破坏的惨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324、328页。

(180) 《新华日报》，1939年4月26日。

(181)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第66—68页，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182) 参见陈翰生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页。

(183)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184)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185) 侯德础：《试论抗战时期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186) 谢放：《抗战时期四川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页。

(187) 《国民政府政绩报告》，《地震通讯》第15期，第46页。

(188)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6—377页。

(189) 杨振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初探》，载

《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190)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507页。

(19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0页。

(192) 《战时佃农概况》，《武汉日报年鉴》1947年。

(193) 陈翰生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194) 吕士鹏：《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页。

(195)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参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

(196) 《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27日。

(197)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209页。

(198) 董时进：《抗战以来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2月15日），第51页。

(199)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20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201)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202)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62页。

(203)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参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第64页。

(204) 参见张强：《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民国档案》1991年第二期。

(205)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六十）103，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馆藏。

(206)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207)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剖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三期。

(208) 江沛：《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

(209)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剖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三期，第73页。

(210) 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出版，第169页。

(211)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212) 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创刊号第5页，1942年9月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

(213) 苏光文：《抗战文学简论》，转引自张强：《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民国档案》1991年第二期，第99页。

(214)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5页。

(215) 穆欣：《1937年至1945年新闻界大事纪要》，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

(216)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466页。

(217)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39、（四）348、（四）377。

(218) 袁润芳、方庆秋：《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度及其实施概况》，参见《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0页。

(219)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3、194页。

(220) 《新唯识论》。

(221) 参见张建祥、张扬主编：《中国现代史》（中），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3页。

(222) 参见冯友兰：《冯友兰自传》，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1页。

(223) 参见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24) 郑家栋、陈鹏主编：《解析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1页。

(225)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第3页。

(226)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4页。

(227) 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2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10页。

(22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10—11页。

(230)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

(231)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232)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233)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234)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21页。

(23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75页。

(236)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页。

(237)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83页。

(238)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23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国民教育制度》初等教育，第5—8页。

(240)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

(241) 参见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24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243) 《查禁初中新本国史第四册一、二、三页令饬更正或查禁由》（1943年），张掖地区档案馆档案（四）150。

(244)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245) “陈立夫关于制止各级学生参加群众集会游行等呈文”，《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三辑，第98册。

(246)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614页。

(247)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633页。

(248) 《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5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刊行，1972年版。

(249)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707页。

(250)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7—32页。

(251)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页。

(252) 1942年毕业生为373人，1943年为516人，1944年为531人，1945年为426人。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72页。

(253)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20—534页。

(254)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73页。

(25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35页。

(256)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257)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页。

(258)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259) 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125页。

(260) 《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261) 参见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214页。

(262)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263)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264) 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页。

(265) 《慰励归国文化人》，《中央日报》，1942年5月3日社论。

(266)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7—108页。

(267)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43—344页。

(268) 转引自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页。

(269)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一　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后期在敌后解放区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百年大计[(1)]。经过整风运动，真正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促成了中共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整风运动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产物。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中共，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35年10月举行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1936年12月举行的中共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领导中共开展了英勇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然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机会从思想上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7年11月，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回到延安，他下车伊始，便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由于中共处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之中，仍然未能从思想上清算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王明不仅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在他所主持的长江局的工作中，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并将自己打扮为土地革命后期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1940年3月，他重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还特别加了三版序言，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将此作为学习党史的教材。在他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不执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缺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结果导致新四军兵败皖南，这一血的教训引起中共深刻的反思。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检讨皖南事变的教训，王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引起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如果任其继续发展，必然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和稳定，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清除王明错误路线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整风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迫切需要。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938年3月，中共中央曾通过《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中共的各级组织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大力做好党的发展工作[(2)]；另一方面，大批革命青年向往延安，积极投奔各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从敬仰到热切希望加入，由此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1942年中共党员已达8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不少新党员已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革命形势在横断面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提高纵向水平的要求，由于新党员90％以上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有高涨的革命情绪和接受马列主义的良好愿望，同时也带有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的欲望，他们此种思想上的弱点常常成为“左”右倾机会主

义得以推行的市场。因此，提高广大新党员、新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论修养，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取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194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面临着日伪顽夹击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均有所缩小，粮食、棉布、药品、弹药以及日用品严重短缺，一些解放区的抗日军民不得不以野菜、柿子充饥，这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整训自己的队伍，锤炼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刚刚组织起来的党员和干部，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明辨方向，坚定意志，以成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高超斗争艺术，领导人民群众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整风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独立自主决定自己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自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国际主义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指引下，它热心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领导机制的不健全、对于中国国情的隔膜及受苏联党内宗派斗争的影响，对于中国革命也起了消极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归国的王明等人依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党内制造混乱，严重干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曾指出："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原因有二：其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其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3)]。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旗帜和口号。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中共全党"研究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重要论断[(4)]。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反对一切照搬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以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作为检验共产国际指示的标准，并决定取舍及执行的程度。实际上是既与共产国际保持原有的关系，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有限度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课题。

整风运动在客观上也具备了在中共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条件，在军事上，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日军加紧了对于各解放区的进攻，战争环境相当艰苦，但由于日军兵力更加分散，战局却比较稳定，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发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大量著作，著名的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等的坚强领导核心；由于筹备中共“七大”的缘故，各地选举的340名代表中的306名已于1941年3月抵达延安，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各解放区、大后方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们迫切要求澄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更加统一中共的思想和步伐，为整风运动准备了组织方面的重要条件。

二　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40年12月至1942年1月为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也可称为高级干部的小整风阶段，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共历史上的路线问题[(5)]。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后期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中的打击政策等等，“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6)]。这一结论性意见修正了遵义会议关于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决议。这一指示发出后在党内引起争论，解决好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否为路线错误的认识问题，便成为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前提。

为了统一中共的思想，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2月，正式出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强调：“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7)] 3月和4月，毛泽东先后写了《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批评“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主观主义错误，阐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8)]。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尖锐批评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指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9)]。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独立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8月，中共中央又作出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从中央到每一个党员都要着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便有效地团结全国各阶级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等。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曾受王明路线影响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明确指出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指出此种错误的残余，至今影响着中共的许多部门的工作。王明拒绝会议对他的批评，不仅未作任何自我批评，而且表示将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并以生病为由不再参加整风学习。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全党300名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范围包括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等学校某些教员，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以半年为第一期，“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10)]。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纂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党史文件集，汇集各种有代表性的中共历史文件，供学习、比较、分析、鉴别，以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高级干部对于党史的学习和讨论为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从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为中共普遍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中共整风运动的开始。

根据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第

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可以王明一伙为典型，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甚至标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而是抛弃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列主义的若干词句和结论当作教条，硬搬到中国来，这样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经验主义者则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能总揽客观实际的全局，轻视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和助手。两者相较，教条主义在当时是最为危险的敌人。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求党员通过整风学习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只有把理论、历史、现状很好结合起来，才能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具体办法是“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11)]。

第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必然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虽已不存在，但它的残余还存在，如闹独立性，特别是由于根据地的被分割而突出表现为山头主义。毛泽东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

业中畅行无阻。”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并具体规定了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关系的准则[12]。

第三，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总是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王明的文章和演说就是党八股的典型，“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毛泽东以此为蓝本，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部署和启动全党的整风运动，并规定此次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和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具体实施的方法是：指定十八个文件为学习考试的范围（后增加为二十二个文件），“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不只是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方面”；然后，“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14]；处理问题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尤强调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要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15]。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在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基础上，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据此，在各解放区的各级中共党委仿照延安的经验，有计划地领导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

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为整风运动总结提高阶段，中共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再次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并最终由中央全会作出结论性的决定。

1943年9月起，在中共深入进行整风学习的同时，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着重批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周恩来曾对王明的错误路线作了很好的概括：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抗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宣传；在党的关系中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中心是想做实际的领袖等[(16)]。12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文件中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17)]。同时，中共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并陆续召开各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总结各地区党的历史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中共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作了总结，代表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号召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夺取胜利”[(18)]。1944年5月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1945年4月20日，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中共全党对于党的历史有了统一的认识，为全党的团结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至此，中共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其次，它是中共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不仅帮助中共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而且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尝试，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提供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整风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三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进行的“审干”工作是与整风运动结合进行的。1942年底，延安的整风学习基本结束，1943年春，整风运动逐渐转为以审查干部和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执行“溶共”、“限共”政策的国民党顽固派除发动“皖南事变”等，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外，又对各解放区实施特务渗透政策，“皖南事变”前后已破获多起国民党特务破坏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大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扩军、招干、招生、发展党员，革命队伍迅速发展，难免鱼龙混杂，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既要整顿小资产阶级思想，也要清理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4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今后的一年中，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两项任务[(19)]。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审干”工作采

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自首”的方法，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公开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自首者秘密向主管机关首长、党组织负责人或直接向中央、中央局、总政治部等上级机关办理手续[20]。

4月9日开始，“审干”与反特务斗争首先在延安进行。任弼时两次代表中共中央向延安的两万干部报告《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宣布中央对于一时被逼迫误入歧途的青年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号召他们忠诚坦白，悔过自新，为着照顾到其家庭和个人安全，采取秘密办法实行自首，并担保对于自首者不治特务之罪，同时也警告不肯自首者，一旦查出将会受到加倍的处分。28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由此，“审干”运动首先在延安展开。在运动的第一阶段，由于实行“秘密自首”的办法，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还是谨慎稳妥的。

5月下旬，出现了共产国际自行宣布解散事件，胡宗南调动数十万部队企图闪击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出现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等反共叫嚣，国共摩擦再次加剧，两党的对立情绪急速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党内有些人对干部队伍不纯情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7月15日，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挽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将反奸斗争引上了歧路。首先，报告对于日伪和国民党破坏解放区的敌情作了过分的渲染，导致对于中共队伍的基本估计失误；其次，将反特反奸斗争与整风“审干”运动合为一体，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三，采用苏联肃反及中共在土地革命后期肃反中使用的群众运动的过火斗争方式进行严肃的“审干”工作，导致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第四，出现逼供信等错误做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原先执行的“秘密自首”政策被改为“公开坦白”政策，“审干”运动实际成为“挽救失足者”运动。

在一段时间里，延安陷入“恐怖”的氛围之中。几乎所有的党政军学机关团体都开展了“全线进攻”，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通过名目

繁多的“抢救会”、“坦白会”、“控诉会”、“规劝会”，甚至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挖出了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CC分子”、“复兴社分子”、“红旗党”、“汉奸”等反革命分子，出现了很多光怪陆离、闻所未闻的怪事：有的女同志因为长得漂亮，有的老同志因为学过外语，就被无端地怀疑为“特务”；有的单位80％以上的人被列为“抢救对象”；有的单位为了造成“坦白”声势，竟决定给“坦白者”戴大红花，发给点心、饼干等食品吃；甚至某师范学校在十几岁的孩子中也挖出了230个小“特务”等。经过“抢救”，延安各县共挖出2463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挖出了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多人中，只有20人没被“抢救”[21]。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康生将原中共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的“红旗党”，诬称该同志是打进我党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广西、浙江等地的中共地下党都称作“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导致严重的后果[22]。

“抢救失足者”运动给中共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整风和“审干”工作的正常秩序被完全打乱，曾在大后方工作过的中共干部或从大后方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冲击，不少人被打成“特务分子”，造成人人自危的严重局面，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使肃奸反特工作陷入真假不分的迷局之中，无法正常进行。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问题，迅速采取措施，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待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讯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假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一针见血地阐明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出现的恶性循环圈，并指出其根源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的保

存着”。针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文件提出了领导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九条方针，全面而详尽地阐述各项政策方针，为“审干”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办法[23]。

对于“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认真做了善后工作。10月，毛泽东坚持在此次反特务斗争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指出：“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24]由于执行这一方针，就为复查、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审干”转入甄别阶段，对于延安1.5万名“坦白分子”一一进行复查、甄别，分别情况实事求是作出结论，对于搞错了的就给予平反。毛泽东还多次在公开场合主动承担责任，向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比较迅速地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所造成的错误，没有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害，并保证了“审干”工作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正常进行。然而，此种错误的做法并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得到认真的清算，尤其是一搞运动就过度估计敌情、混淆“审干”与反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审干”以及逼供信错误做法等，都没有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肃清流毒，以至在以后中共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成为中共政治肌体上需要根治的顽症之一。

四　加强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

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党政、党军、党民关系的原则办法，确定了中共领导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体制，形成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的雏形。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党反对“三风”的过程中，深感各解放区内部理顺党、政、军、民各领导机关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抗

战以来，敌后抗日根据地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已具相当规模。各解放区的中共党组织一般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艰苦奋斗的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和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不协调现象，集中表现在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和政权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地方主义，门户之见等；其次是由于各解放区孤悬敌后，绝大部分在地域上互相隔绝，游击战争又具有独立指挥、分散活动的特点，导致各解放区、各部门及上下级间沟通联系不畅，指挥系统出现某种混乱现象；第三，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加大了各解放区实施中共领导及各种组织间密切配合的困难。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适时地调整党与各组织间的关系，形成各解放区较为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领导体制。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在领导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在各解放区实行中共一元化领导的重要决定，并详尽规定了各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各解放区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的党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等。

第二，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决定规定："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的责任，凡因军队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党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等。

第三，中共对于政权的领导。决定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与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性质"，"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党的机关和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党必须派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等。

第四，中共对于民众团体的领导，决定规定："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等。

第五，中共党的纪律问题。决定规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

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意义”；针对王明在长江局的工作中搞独立王国的做法，强调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主张，危害全党领导之统一”；“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等。

决定最后指出：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方式，规定实施中共的一元化领导的各种细则，并报告中央[25]。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构筑了中共领导各解放区政权以及日后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框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2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颁发《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结合精兵简政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并着重注意培养各根据地军区、分区两级领导核心的建立。指示指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26]。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颁发《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各项政策加以概括总结，形成著名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27]。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采取行动，如中共北方分局改组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使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主要负

责干部参加各级地方党委；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各级党委实行统一领导，使山东党政军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加强了战斗力等等。各解放区先后对各级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和调整，加强了中共对各解放区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1943年3月，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根据中央领导层变化的新情况，调整了中央一级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主席在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之权；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增加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等，并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华中、王稼祥负责华北、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陈云负责国统区、杨尚昆负责敌占区，统一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并直接向书记处负责[28]。中央领导机构的这次大调整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从组织体制上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刘少奇在党内的第二把手位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领导体制的基本格局，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大加强。这一领导体制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一　“三三制”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基地和广阔的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人民都

享有权利的民主政权，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抗日民主政权的样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它来源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陕、甘、宁三省的二十三县，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这个政府既继承苏维埃的革命传统，又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进行了改组，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作了榜样。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设随着战局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变化。当八路军向华北进军之时，中共中央曾经决定在敌后实行“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之原则”[(29)]。中共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各抗日根据地中，或以“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牺盟会”等名义的半政权性质的机构进行活动，或迫使国民党军政当局撤换旧县长，代以进步分子担任新县长行使职权，原有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没有变动。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率先举行军政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49人，通过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的各项提案，民主选举宋劭文、聂荣臻、刘奕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光等九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并通电全国宣布“晋察冀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之日即行终了”[(30)]。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第一个战略区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随即，晋冀鲁豫、山东、晋绥以及华中和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一般实行三级三辅制或三级二辅制，三级指边区、县、乡三级政府机构，另由边区政府派出“行署”或“专署”，由县政府派出“区署”作为辅助机关，但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这种根据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设置的行政机构，是独立于原国民政府行政体制之外的政府机构。这些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民众团体、抗日阶级代表组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

权，是抗日的阶级和阶层联合起来反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有区别，又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府有区别，是敌后战场开展对敌斗争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正式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必须实行“三三制”，其具体规定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31] 三者分别代表无产阶级与贫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并指出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强调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32]。

这一政策的提出有着重要的政治历史背景。首先，中国共产党将实现民主视为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早在1937年制订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产生“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口号。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概括为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实行“三三制”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其次，围绕着敌后抗日政权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主张不要“增加对国民党的刺激”，“在客观上帮助‘抗战胜利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33]。实行“三三制”既可以使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失去凭藉，又能适合中共和中间势力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第三，“三三制”的提出与国统区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也有密切的关系。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各抗日党派代表提出7个宪政提案，要求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中共实现“三三制”政权，可以建立一个实

现民主宪政的试验场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领导机关逐步在边区、县、乡各级政权工作中落实“三三制”的原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各解放区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三三制”更是一再被强调和重视。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三三制”政府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强调“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

第二，“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通过他们“联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孤立顽固派”，强调“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第三，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中共党员克服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强调“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此作为施政方针”；

第四，“三三制”的人员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既强调各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人士补充，同时也指出“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等[(34)]。

“三三制”在各解放区实施后，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与影响。首先，“三三制”有效地保证了工农联盟和共产党对于政权的领导，锻炼

和提高了中共广大干部的思想和政策水平，使他们学会与非党人士化除成见，互相信任，通力合作，共同抗敌。“三三制”也保证了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建设，并使他们有职有权，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争取了中间势力，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阶级合作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和度过艰难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三三制”的实践还是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实践，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设道路将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权模型推广到全国，全国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二　普选制与参议会

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治还集中反映在实施普选制和建立各级参议会。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乃是普遍的民主，人民选举政权机关，政权机关在人民的监督下行使人民赋予的各种权利。选举采用的是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记名的投票法，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新型的选举制度，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各级参议会经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政府经过参议会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

1937年9月—1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进行乡、区、县的普选工作。以后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又逐步将普选制推行到敌后各解放区。太平洋战争前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配合着“三三制”的推行，普选制进一步得到实施并更加规范。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举行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发出指示信，全面论述了实行普选制的意义。针对国民党的“训政”理论，指出：“我们反对那说老百姓文化低，不够讲民主，须要经‘训’的胡说”，强调选举运动“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一齐上大课”，“是老百姓行使自由的头一桩事”，应“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凭自己的意愿去进行参政，选择代表”；同时，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解放区的民主政治进行比较，指出：“民

主和不民主的分别，一是恃强霸占政权，不许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一点权利没有。一是凡事由老百姓作主。老百姓直接出来议事管事，或选代表出来议事管事”，强调革命为的是“推翻那不民主的政府，建立民主的政府，民主的第一着，就是由老百姓来选择代表他们出来议事管事的人”；针对部分解放区领导人存在的“抗战忙，动员忙，那有功夫办理选举”的错误认识，指出：“保卫边区须要选举”，“必须集中边区老百姓的力量，才能对付敌人，渡过危险，边区老百姓为救自己，正在发挥他们的力量，检查他们的代理机关（政府）是否得力”，强调“只有选举，才能改进政治机构，涌出积极分子，有力的保卫边区”[35]。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次年4月正式颁布。5月，边区政府又专门颁发文件对此条例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各解放区也都颁布了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比较完备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根据地实行的普选制的实践总结，是指导各解放区选举运动的纲领。

普选制在各解放区的推行，有着如下一些特征。首先，高举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的旗帜。解放区的选举条例“系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民主选举原则及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形制定”，强调“建国大纲系中山先生写的。孙先生革命，为的是要建立民主国家，要有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和政府，可是建国大纲写的选举办法，国民政府没有实行，现在陕甘宁边区没有阻止实行的障碍了，可以依照孙先生的民主原则制定选举条例”[36]。第二，实行真正普选的选举办法。解放区的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选举”，“凡居住地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行中强调“普遍，是指选举人的资格，没有任何限制，任何普通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是选民直接选出被选人，而不要经过转弯；平等，是任何选民投的票，其效力都是一样；无记名亦叫‘秘密’，是选民在票上只写被选出的人的姓名，不写自己的姓名”[37]。这种普选制“是最公平、最进步的选举办法”，“当着候选人名单

公布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38]。选民们经过批评、比较，选出自己最满意的代表。第三，充分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选举条例规定，除有卖国行为的、经政府缉办的、经军法或法院判决剥夺公权尚未恢复的、有精神病的人外，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强调“工农有选举权了，但并不歧视地主、资本家；共产党是合法了，但并不剥夺别的党派的自由；同样，弱小民族，信宗教的，都一样有权利，谁也不能限制谁，有势力的不能恃势力去限制其他没有势力的人”等[39]。第四，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进行选举工作。各解放区根据本区域的具体情况，各自选择适当的时期依法举行普选运动，甚至在敌我拉锯的地区，在敌人经常进行骚扰性袭击的情况下，仍采用巧妙的方法举行选举。第五，运用选举推动解放区各方面的工作。各解放区的领导将选举视为“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检阅”，通过选举“反映出老百姓的许多意见许多办法，指出政治上那些好与坏的例子”，在选举工作中强调“一切政治上的‘创作’，不存在于领导者的脑子里，而存在于广大群众中间”，“要善于倾听接受，把各种经验添附到政治的宝库里面，作为今后改进工作（包括选举本身在内）的指南”[40]。

各解放区的普选制是与参议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1937年9月起，陕甘宁边区首先经过普选产生了乡级代表和区、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原称议会，后因照顾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而改称参议会。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参议会制度又被推行到各解放区，有的解放区如晋西北和山东解放区称“临时参议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克服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参议会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规范和完善，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通过参加参议会的实践，取得了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宝贵经验。

解放区的参议会虽与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省、县参议会名称相同，

但实际内容却大不相同。后者实行议行分离的原则，前者则在实质上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解放区的参议会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权力机构，是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民意机关。解放区各级参议会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方式选举产生的参议员组成，但同级政府认为必要时，“得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议员，其名额不得超过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41]。参议会拥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监督权和弹劾权，从各方面保证抗日民主政权的运行。参议会所议决的案件咨送政府执行；如果政府认为议案不当，必须详具理由，送回参议会复议；如果参议会复议后维持原议案，政府就必须执行；如果下级参议会的议案不当，同级政府只有在受到上级政府或上级参议会的指示时，才能停止执行等。

边区参议会的职权共十三项，主要内容是：选举和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察与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创制及复决边区之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通过边区政府提出之预算，并审查其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决定发行地方公债；议决边区政府主席、政府委员会、各厅厅长及高等法院院长提交审议事项；议决边区人民及民众团体提请审议事项；督促及检查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之事项；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追认闭会期间常驻会及边区政府主席或政府委员会关于紧急措施之重要事项；等等[42]。

参议员任期三年。边区参议会由参议员选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主持全面工作。参议会每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九名议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或驻会议员办事处，主持日常事务，其职责主要是监督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之议案、听取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向边区政府提出建议和询问、派员出席边区政府委员会的会议、联系散驻各地的参议员，进行调查研究，征求

人民群众意见等。在边区参议会之下，设有县、乡参议会组织，并在最基层的村设立村民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边区各级政府机构实行“三三制”原则时，各级参议会也严格实行了同样的原则。由于实行普选制，不能保证选举结果完全符合“三三制”的原则，便采取让当选的共产党议员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的办法解决。例如，1941年1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由于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王世泰、萧劲光、谢觉哉等18位共产党员申请退出参议会。1942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专门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发出指示信，号召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选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43]。

普选制和参议会的实施和广泛推行，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不仅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广大军民克服困难，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三　“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而制定的重大战略性措施之一。“精兵简政”的实施不仅为减轻根据地人民的战争负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抗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建设一个“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精兵简政”是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首先倡议的。1941年11月，李鼎铭等11位参议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提议：“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

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等[44]。该提案在参议会引起热烈的讨论，“多数议员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提案，应尽快实行；但也有些议员认为时值救国紧急关头，敌人正以大量兵力向我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搞精兵简政，岂不等于束手就擒？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等人的动机是否纯正”[45]。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李鼎铭先生的倡议。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6]。11月1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了该提案，“交政府速办”。12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党“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随即，中共中央又将“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迅速接受“精兵简政”的主张并坚决有力地在全党推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已对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对于“精兵简政”是早有认识的，李鼎铭所提主张，切中时弊，恰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且它在文字上又表达准确，通俗易懂，便于推广，故立即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并很快成为中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来实行[47]。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包围，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党政军民学的脱产人员数没有确定的编制，上层机关人员多，真正打仗做事的人少，大量的脱产人员，使农民负担过于沉重，引起人民的不满。而各解放区普遍存在的“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现象，也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以及官僚主义等弊病的出现，如不能及时进行调整，将危及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7日的党内指示中正确地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

期坚持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是否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为此，将“精兵简政”，节省民力，作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各解放区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48]。中共中央军委也向各解放区发出指示：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与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在山区根据地为2：1，在平原根据地为1：1，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强调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和主力军的全部[49]。

从1941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各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各部门也进行了“精兵简政”，其中尤其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工作特别出色，被毛泽东称为“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总结和介绍其经验，向各解放区推广[50]。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的精兵建设也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整个工作至1943年底1944年初大体结束。“精兵简政”的主要做法如下：

首先，以“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为“精兵简政”的目标，这样就将“精兵简政”的意义从简单的缩减编制扩充至加强政权建设等更广泛和高级的层次。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曾将此精神具体化为十大政策：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紧缩机构，精选人员；确定职责，建立制度；办事迅速，减少文牍；学习业务，工作专门；养成法治，厉行民治；军事第一，对军负责；统筹统支，经营一致；负担合理，节省开支；实行奖惩，俸以养廉[51]。这些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实施“精兵简政”的宗旨。

第二，建立整编委员会，加强统一领导。为了加强对于“精兵简政”的领导，各解放区都建立了整编委员会，“由其负责检查调整各级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尤其是上级机关的

过多人员，尽量缩编，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以做到精悍、灵活为原则”[52]。如陕甘宁边区总整编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边区参议会的领导人组成，以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林伯渠、李鼎铭主持会务，并在各系统建立分会，制订整编方案，统一实施。各解放区都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第三，“精兵简政”采用裁、减、缩、并原则进行。裁，就是把某些不合理的机关或骈枝机关、骈枝部门裁去；减，就是把机关、部队过多的人员、繁冗的事务减少；缩，就是各机关部队在编制上尽量紧缩，以短小精悍为原则，在开支上也尽量紧缩；并，就是把某些工作上相同的机关或部门合并，使工作不致重复等[53]。

第四，认真做好各类人员的分流工作，“做到人人各得其所”。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了详细的分流原则：凡是有相当文化程度、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应该尽量往下移，以加强县、区、乡的机构（县级干部亦应有一部分移到区乡去）；凡是须继续培养、加以深造的干部，应该经过一定的系统送来延安的学校学习；凡是身体确有疾病，实在不可能工作或学习的干部，应该由原机关负责设法给以休养，使其恢复健康后，能够胜任愉快地为革命继续工作；凡是身体健壮的杂务人员，应该送入建设厅所属各工厂，参加生产事业，以发展边区生产；凡是太落后的分子以及太老弱的杂务人员，他们需要回家去务农的，应该让他们回去等。为了做好各类人员的分流工作，解放区各级领导特别强调：在抗日民主政权里，一个干部往下调，并不是“降级”，相反的，应该认为作下层工作是最光荣的事业[54]。

“精兵简政”在各解放区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政军民机关更加精干，领导作风大有转变，机构运转更加灵活，工作效能有了很大提高；军队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更加坚强有力，实现了精干的主力军和强大的后备军的有机结合，使其更能适应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大大减少，人民负担有所减

轻，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帮助了根据地严重物质困难的克服；更加重要的是，它使大批干部经受了“能上能下”的锻炼，思想水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的宝贵财富。“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中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四　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少数民族问题是重要的一环。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民主平等、经济文化帮助、宗教信仰自由的少数民族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长期以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误解和怨仇，实现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目标，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问题理论。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陕甘宁边区和周边的内蒙、甘肃、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省份毗连，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时，也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原有的定边委员会和蒙古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专司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8月，又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列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内容[(55)]。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针对日伪分裂我国少数民族的诡计，将“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列为抗日救国的十五项政纲之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主要内容是：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的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

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等，并强调历代统治者所实行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必须“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56]。这个纲领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和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团结他们一起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中共全党重视少数民族工作。陕甘宁边区或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都成立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专门机关，并制订具体的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如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曾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蒙古、回回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的详细情况，并于1940年4月制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7月制定《关于抗战中蒙古族问题提纲》，颁布对于回、蒙两少数民族的具体政策[57]。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设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专门领导少数民族工作。

其次，尊重与保障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各解放区的参议会都规定了具体的人数比例，保证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当选，并在参议会内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边区政府也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县、市政府机关中设立民族事务科（或设民族事务科员），负责处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还根据边区的施政纲领，将定边县的四、六区，城关区的两个行政村，曲子县的三岔镇划为回民自治区（乡），后又将新正县的一、九区，盐池县的回回庄以及城川蒙民聚居区，分别划为回、蒙民自治区。在这些自治区（乡）内，由少数民族自己选举区、乡长，实行自治管理。此种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

的重要政策。各解放区颁发的各种条例都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曾组织盛大的祭祀仪式，迎送成吉思汗的灵榇途经延安南移[58]。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款7000元，在延安桃花岭修建清真寺，毛泽东为清真寺题写了寺名[59]。

第三，建立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中国共产党在蒙、回、黎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领导各族人民组建抗日武装，共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敌后战场上重要抗日力量。1938年1月，在冀中成立了回民教导队，7月，与河间回民教导队合并组成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成为冀中平原一支威震四方的抗日武装。七八月间，八路军一二〇师李井泉支队挺进大青山，与蒙古族高凤英等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合，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由中共党员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领导黎、苗等少数民族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曾发展至七千余人，解放了海南岛五分之三的土地。此外还有宁夏海固地区的回民抗日游击团，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回民支队，安徽定远地区的回民清真大队，山西的壶关回民游击队、长治回民营，山东渤海地区的回民支队，广西左江地区由瑶、壮、汉各族共同组成的抗日挺进队等，都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第四，创办少数民族的救国组织。中国共产党为组织和动员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还积极联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创建各种救国协会和文化团体。如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10月由该协会发起创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后又在各解放区成立支会。陕甘宁边区还先后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和蒙古文化促进会等。这些协会和团体的建立，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沟通，加强相互间的团结，推动了敌后根据地的抗日事业的发展[60]。

第五，扶植、推动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少

数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帮助少数民族“改进农牧生产，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此，各解放区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居民，可以享受分配土地、贷款、调剂种子、划分宅基的优惠，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从事商业的少数民族居民，可以享受贷款、减免税捐的优惠，帮助他们发展经营；对于迁移至边区来的少数民族移民或难民，可以享受适量的救济粮、安排居住、拨给耕牛或荒地、贷款、三年免征公粮等优惠，帮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安居乐业等。除此而外，各解放区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各种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校，如伊斯兰小学、蒙古族小学等，在成人中举办夜校、识字班等，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文化。这些措施推动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61)]。

第六，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类干部。中国共产党举办各种学校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种专门人才。先是在中共中央党校设立民族班、回民班，在陕北公学设立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后又设立民族部，吸收蒙、回、藏、苗、满等各族青年入学培训。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延安民族学院，首批招生就招收了300名各族青年入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专门从事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大学，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工作干部的摇篮。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抗日战火中不断消除历史上各民族间的隔阂，建立起团结友爱的新关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宝贵财富。

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一　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具有革命和改良的双重性质，其革命性表现在为全民族利益而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夺取抗战的胜利；其改良性表现在它只是削弱封建势力，限制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62)]。这是由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最早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了随即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然而，由于各解放区的领导对于减租减息运动认识不一，执行该政策的坚决程度不同，实际效果也就不一样。凡是认真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证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社会生活就比较安定，根据地就比较巩固。而有的根据地只是在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或者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既未发布命令，更未动手实行，或者已经发布了命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另在一些地方则发生了“左”的倾向，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将减租减息变成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在发生这些倾向性问题的地方，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发扬，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能得到落实，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了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落实和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2月6日

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的党内指示，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处理土地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理论上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三个出发点：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中共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中共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在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中国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及其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中共的政策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在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减息后，同时须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等。

第二，从政策上阐明中共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首先是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谈起，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政策上是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目的在于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争取其回来。

第三，从策略上阐明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

的方针：实施减租减息运动一般应经过酝酿、斗争、团结三个阶段，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气焰，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必须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的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实行“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日之战略目的；必须教育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悉政府的法令，熟悉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第四，从方法上阐明政府处于调节人的立场：在处理农村纠纷中，中共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某一方面，而是根据整个民族的抗战利益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既要使农民明白现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与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使他们不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应把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联系起来，把局部利益与全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同时又要劝告地主不应该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要顾及将来与全民族的利益等。

第五，从思想倾向上阐明目前工作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错误：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为此，应强调反对右倾错误，在这些地区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中共中央的文件强调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期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执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63)]。

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制订或修正了有关的法令和条例，深入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华北敌后各解放区普遍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减租减息。1942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次年10月，又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运动的重点在于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1942年5月，山东省战工会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颁布《租佃暂行条例》和《借贷暂行条例》，广泛推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9月，晋西北根据地领导机关颁布《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的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债务以1933年为界，以前的一律停付，以后的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10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修正颁布《土地使用暂行条例》，详尽规定地租和债息政策，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在各地深入开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创建较晚，1942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也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广泛宣传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并区别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三种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减租减息运动。

从1944年初开始，减租减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国共两党围绕着中国之命运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继续存在，但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各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查租减租”运动，并加大了对于不法地主斗争的力度，许多地区还结合“查租减租”运动进行雇工增资、清查黑田、反对恶霸、反对贪污和反对地主富农把持政权的斗争，通过普遍深入的检查，一家一户的算账，让地主退出在减租法令颁布后多收的租额和债息，使绝大部分的贫苦农民获得了退粮退款，赎回或索回土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取得的胜利果实，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减租减息运动以政府颁布的法令政策为依据，以经济调节手段为杠杆，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用和平、渐进和稳妥的方式推进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稼祥称：减租减息政策“是边区

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人民的抗战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64]。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至131万人，民兵268万人，奠定了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真正基础；其次，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推动了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敌后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协调了各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团结了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和开明绅士一起抗日，奠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还促使根据地的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地因实行以减租减息和税收调节政策相结合的新政策，从适当削弱封建土地剥削，逐步过渡到消灭封建剥削，实质上悄悄变革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日后彻底实行农村的土地革命作了重要的过渡和准备[65]。

二　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经济建设的主要举措。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抗日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的保证。大生产运动贯彻于抗日战争的始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7年7月至1939年2月，主要是军队开展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运动；第二阶段自1939年2月至1942年12月，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第三阶段自1942年12月至抗战结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发展[66]。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环境和大生产运动的特点通过一系列决定，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组织起

来》等重要文章和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原则，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主要内容是：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毛泽东批判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不注意动员人民发展生产，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强调决定财政的是经济，只有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财政困难[67]。

“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大生产运动的基本原则。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五种，除对地主经济实行减租减息，予以削弱、限制外，其他各种经济成分都应兼顾发展。毛泽东指出：“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68]

各业发展，以农为主——大生产运动的实施重点。由于抗日根据地主要在敌后广大农村，没有大城市，极少中小城市，农民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抗战所需物力、人力主要来自农民，大生产运动必须以农业为主，兼而发展包括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等在内的各种产业。毛泽东强调各级党政工作人员“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69]。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方法。由于各抗日根据地散居敌后农村，人力物力高度分散，交通又极不方便，因此，在领导方法上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原则下的分散经营。中共中央决定在大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指示各地成立生产委员会，由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担任主任或委员，派遣最积极最有经验的干部到生产委员会中去工作，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大生产运动。

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70]。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把一切群众的力量，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根据自愿和等价的原则，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成立初级集体劳动组织——合作社，其形式有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等等，这些合作社不仅有助于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而且对于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也具有尝试意义。

生产自给，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的特殊内容。中共中央号召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必须于战争条件下自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分别不同情况，达到粮食和办公用费的自给、半自给和部分自给。此种生产自给"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此种办法"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71]。

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陕甘宁边区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模范。著名的三五九旅自1941年3月起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猪牛羊肥壮"的"陕北江南"，至1944年全旅吃用有余，还向边区政府交纳公粮一万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亲自开荒、种菜，参加生产运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实行"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大生产运动既富于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使解

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障了抗战的物资供应，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第二，它使人民军队提高了战斗力，不仅改善了生活，扩大了军队，而且改善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第三，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建国的毅力和才干，表明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根据地人民前进的步伐。第四，初步改变了农村中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习惯，初级合作社的普遍建立，不仅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而且使广大农民开始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第五，它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考验和锻炼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同时，也应该指出，大生产运动是在激烈而残酷的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它所采用的群众运动方式的发展生产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在科学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不足。

三　知识分子与文化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订和实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无端惩治知识分子干部的工作过失，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教训，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批的知识人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和影响下，许多爱国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大批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和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日事业。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决定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强调"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必须克服，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72)]。这一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壮大得到进一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努力从大后方和敌占区广泛招聘吸收军工、医务、教学、文艺等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如1941年7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曾致书各兵团首长，指示要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家待遇之"[(73)]。

第二，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列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发展科学事业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成立科学研究调查机关，推进和提高经济文化建设；培养科学技术人员，派专门人员出外学习；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购买科学图书仪器，改善研究工作条件；尊重并合理使用各种专门干部，欢迎优待外来科学人士；组织科学团体，开展科学运动；制定条例，奖励科学技术研究；确定科学事业预算等，这八项决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敌后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74)]。为了更好地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种自然科学学会，其中最大、最完备的是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吴玉章任会长，下设农学、生物、化学、医药、航空、气象、土

木工程、地质矿冶、机械电机等十多个分会，并办有《自然界》、《大众科学》、《科学园地》等刊物。

第三，优待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干部的生活待遇，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在敌后根据地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尽其可能制定特殊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工作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吸引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工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制定一系列条例和规定，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根据干部的资历、能力、现任职务，将他们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干部享受的津贴为每月15 - 30元，而当时一般干部的津贴是1 - 5元，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只有10元，伙食由小灶供应，住房可享受单间宿舍，并配备勤务人员和提供乘马等交通工具。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为技术干部规定了较高的薪金标准：技正每月小米600 - 1000斤，技士每月小米450 - 800斤，技佐每月小米250 - 500斤，技术员每月小米200 - 250斤，每月折款发给，有特殊贡献者或特殊技术者得特别优待，其经常有成绩者得予加薪；同时为各类发明、创造、改良者规定了奖励办法：荣誉奖励有建立冠以创造者姓名之研究所、荣誉宣扬、奖旗或奖匾、奖状、奖章等，有特殊发明与贡献者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予以特别奖励等[75]。

第四，使用与教育并重，努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工农群众化。1939年，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并提出了使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76]。延安及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也在于促进知识分子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方向，而且也向广大知识分子党员提出了思想入党的重大问题，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此必须“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77)]，该文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召唤和吸引之下，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干部的在职教育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将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确定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4种。业务教育的范围包括与业务部门业务关系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等，使干部学会和精通自己的业务；政治教育的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使干部通晓一般情况和一般政策，扩大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文化教育（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的范围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理论教育的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其中政治科学以马克思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等[(78)]。

大学和专科教育，敌后根据地的大学和专科教育也体现了干部培训为主的特色。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陕北

公学、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以及“抗大”和“鲁艺”在各根据地的分校等。另有陕甘宁边区的师范学校、警政学校、医药学校、纺织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荣誉军人学校等以及各根据地创办的专门学校。这些学校在体制上尚不完备，办学条件也相当简陋，但及时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抗日人才，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干部方面的重要准备。

普通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相当部分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开展国民教育运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便成为各根据地政府的重要任务。该运动包括以冬学民校为主要形式的成人扫盲教育和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龄儿童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利用战争的间隙和冬令农闲时节，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冬学运动，采用男学组、女学组、青年组、老年组、儿童组、混合组等各种形式，帮助人民群众扫盲识字，并根据群众的需要来确定学习的内容，结合扫盲进行政治和抗日教育。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采用民办公助的方式和全新的游击式的教学方法，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根据当时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除发展部分中学、职业学校外，主要是增加和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小学。陕甘宁边区1945年已建立小学1377所。各敌后根据地的小学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加，如冀中区1941年已建立小学4338所，入学学生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2％，有五分之一的县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在“男女教育平等”的口号下，女生人数增加尤其快，占学生总数的41％以上。原来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的晋绥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1941年晋西北21个县的统计，已有小学1789所，平均每县增加85所，远远超过新政权建立以前的数字[79]。历时多年而经久不息的冬学扫盲运动和迅速发展的中小学教育，有效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文盲人数逐年下降，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

的提高，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在文学艺术方面，抗战爆发后，以战地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艺术事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创作出了如《黄河大合唱》等气壮山河的传世之作，群众性的文学艺术活动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的建立。1942年5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文学艺术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在遍及根据地的“新秧歌”运动中，涌现了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和像《白毛女》等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较高成就的歌剧作品；戏剧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被誉为平剧改革的优秀作品；文学创作也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欧阳山的《高干大》，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新闻出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创办了大量的抗日报刊，总数达四百多种[(80)]。在延安发行的主要报刊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共有八十余种。各敌后根据地也发行了大量的报刊，最著名的有：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敌报》、《边政导报》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等，晋绥根据地的《晋绥日报》（原名《抗敌日报》）、《战斗报》等，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华中根据地的《抗敌报》、《江淮日报》等。在延安还创办了新华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各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延安就有解放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陕北书店、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各根据地也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印刷出版机构，大量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政

策文件以及各种抗战宣传材料，在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在科学研究方面，在敌人重重封锁、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着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的紧迫需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促使根据地的工业，尤其是与抗战事业、根据地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军工、医药、日化、造纸、印刷、纺织等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呈现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

第四节　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和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由中共的政治纲领决定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石，而且也是该党对待周边东方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行动指南。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已提出将“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中国抗日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81)]。次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再次指出中华民族当前的第十二项紧急任务是：“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东方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82)]

，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民中的声望日益高涨，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更是成为广大东方民族的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敌后根据地军政领导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优待、支持和帮助他们在根据地的生活、工作和战斗。1941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83)] 从法律上明文保护在敌后根据地活动的外国革命者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士进行抗日斗争。

1941年9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在延安的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友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共五十余人举行座谈。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威胁着东方各弱小民族，东方各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提议在延安的各东方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推举印度革命家巴苏华等二十人组成筹备委员会[(84)]。9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批评"东方各民族的内部团结尚不够坚强"，"各民族间的联系更嫌不足，以致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指出"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苦的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进一步论述了成立东方各民

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85]。

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来自日本、印度、犹太、荷印、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东方民族的代表，国内蒙、回、满、藏、苗等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台湾同胞共一百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冈野进、甘地、戴高乐、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举行了五天。由朱德作总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国际和远东形势以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意图、侵略方法，指出："东方各民族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统一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打倒法西斯主义或是阻止它发展的最大力量和武器。"并预言："战争的最后胜利，无疑地将属于反法西斯营垒这一面。"[86]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也应邀到会演讲或致辞，给与会者很大的鼓励与激励。日本代表森健清、原清志，荷印代表阿里阿罕、毕道文，朝鲜代表武亭，印度代表巴苏华，泰国代表马纳，越南代表黄振光，犹太代表桑柏格尔德等都在会上报告各自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及对于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见[87]。

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延安，各地设分盟，同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同盟盟员分为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同盟宗旨者均得要求加盟；同盟代表大会为同盟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等。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三十七人当选

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赴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成立东方民族学院，研究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诸问题，培养干部；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宣告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88]。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方各民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　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

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十分关注组织、指导、发展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使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反日力量。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部颁令明确规定了优待和感化日本战俘的政策，主要内容是：1．对于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等[89]。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详尽论述了“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的种种方法，包括向两国人民士兵提出反侵略统一战线；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和恰当内容的日本话，进行反侵略口头宣传；尊重和优待敌军俘虏，给予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教育我国军民大众，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敌军军官与士兵、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等六大方面[90]。据此，中共中央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设置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工作委员会，专司其责。自1939年下半年起，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主要有三个系统[91]：

1939年11月，由首批加入八路军的日本战俘杉本一夫等人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成立“在华日人觉

悟联盟”，后改称“在华日人觉醒联盟”。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帮助创建的华北敌后根据地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该联盟创立后，逐步在延安、冀南、冀中、太岳、晋察冀、冀鲁豫、山东等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支部。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当时正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等商议筹办日本工农学校，专门训练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人士。1941年5月15日，该校正式成立。由冈野进任校长，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任副校长，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担任教员。学校的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日本问题、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学员们享受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津贴标准和外国友人的生活待遇，不仅接受反法西斯的思想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而且积极参加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参议会选举等各种活动，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稍后，随着各根据地日本战俘的增加，该校又先后设立晋西北、山东、鲁中、鲁南、渤海、华中分校，形成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系统。

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第三个系统始建于大后方。1939年11月，日本进步作家、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等人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支持和帮助下创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设在重庆，后陆续在桂林、鄂北、洛阳等地创建支部。1940年5月起，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支持和帮助下，由日军被俘人员森健清、高山等人发起创立该同盟的延安支部，并由此而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中、晋西北、山东、胶东、清河、鲁南、滨海、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支部，形成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支重要的力量。

日本反战运动各团体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分散战斗在各抗日前线，采用广播、“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在瓦解敌军方面起到良好的作

用。1941年10月，当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开幕之时，三十五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在申请书中说："在过去，我们曾经拿了枪和中国弟兄打过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者"，"在八路军友爱的、热心的帮助和优待下，在几个月或是一两年的过程中，使我们渐渐的认识真理，了解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从二十多年的欺骗和麻醉中觉醒过来，知道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他们的行动受到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9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加大了援助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力度。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等"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93)]；同日，又在党内指示中将建立与发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应包括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在内[(94)]。在此前后，八路军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布或制订了一系列援助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法案和文件，如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1942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的《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1943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等，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日军，"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在尊重中国主权和边区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他们"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将他们当作国际友人看待；并规定今后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反战团体去进行等[(95)]。后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中共对待日本战俘的政策归结为三点：1．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2．送统帅部处置；3．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认为"这对于削弱敌军

的战斗意志，有极大的作用”[96]。

继1942年7月，中共中央帮助在华朝鲜人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和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后，又着手促进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联合和统一。8月15日，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同时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反战同盟”和“觉醒联盟”的代表、日本工农士兵学校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朝鲜、印度、荷兰等反战团体的代表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会致贺，表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号召“把在华几百万的日本士兵都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底下，枪口对向你们和我们共同敌人的日本军部！”[97] 华北日本士兵大会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和《抗议日本军部暴行宣言》两个重要的反战文件，前者在日本军队史上第一次提出日本士兵的234条要求，内容涉及供给、军纪教育、军事行动、书信自由、家族生活、伤兵问题、政治自由、兵役制度等广泛的方面，其原则是站在人道主义和日本士兵的立场，抗议日本军阀的暴行，发动士兵与军阀作不调和的斗争；后者则表达了日本士兵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强烈抗议，表示要“坚决反对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暴行、杀戮、实行细菌战、拷问和虐杀俘虏等，严惩命令我们实行一切暴行的长官”等[98]。这两个文件对于推动侵华日军士兵的反战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的主要贡献是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组成统一的“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领导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会议通过了同盟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1．此次中日战争是日本的军部和大资本家所引起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牺牲日本之生命、威胁日本人民生活的战争，因此，我们反对此次战争，为日本军自占领地区撤退而斗争；

2．本士兵的大部分都受着战争是正义的欺骗宣传，不知不觉做了日本军部的工具，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了解战争的本质，促进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斗争；

3．日本军部是压迫日本人民，掠夺他国的野蛮的侵略者，现在的政府是军部独裁的战争政府，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确信有打倒此等人民公敌，建立和平自由幸福之人民政府之必要而斗争；

4．以中日两国人民为首的朝鲜、台湾以及南洋等国之人民都是日本军部压迫下的牺牲者，因此，我们为和全东洋人民团结起来，对共同敌人日本军部进行共同的斗争，建立真正之东洋和平而斗争；

5．我们为了实现以上之目的，积极地援助华北中国军的抗日战争[(99)]。

会议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森健清和松井敏夫为副会长，组成了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两个会议的举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斗争更加有序和活跃。

根据延安会议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团体纷纷举行会议，改组机构，建立统一的反战组织。1944年1月，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协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准备委员会”，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战斗纲领：1．结束战争，日本军队从一切占领地带撤退，缔结公平媾和条约，严惩战争责任者；2．实行彻底的对外和平政策与各民族确立独立、平等、共存共荣的友好关系；3．实行独立、富强、民族繁荣的经济政策；4．肃清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势力，解散军部指导的各团体；5．保证政治的自由，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6．改善、提高一般人民和士兵的生活；7．打倒战争政府，组织联合进步的各党各派的人民政府等[(100)]。4月，日人反

战同盟正式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各根据地建立了十三个支部，此外还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华中地区协议会，下辖四个支部，共有盟员289人[101]。各组织的盟员积极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敌作战，他们在各根据地创办反战刊物，散发反战传单，会见中外记者，给日军士兵送“慰问袋”，演出文艺节目、战场喊话等，以各种形式深刻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宣传中国军队的对敌政策，瓦解日本军队的斗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投向人民军队，其中包括一些下级军官，如日军军医山田一郎中尉在根据地从事医务工作，日军步兵山光美少尉担任八路军步兵炮教员，日军中岛透、江荣甫担任八路军技术教员等，一些反战同盟盟员如寺泽吉藏、安藤清江、浅野清、黑田嗣、松觉野、大野静夫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中共执行正确地对待日本士兵政策和反战同盟盟员们的努力，抗战前七年八路军俘虏日军和日军投诚数目达2522名，新四军俘虏日军人数也达到五百多名。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火热斗争中，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力量不断壮大，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8月11日，日本人解放联盟发表通电，号召日军士兵：“不管你们指挥官发出怎样的命令，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刻带着武器，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102] 30日，日本人解放同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大会，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告别。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叶剑英和日本反战运动代表冈野进互相致词道别。叶剑英表示：“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9月中旬，二百多名日本反战斗士离开延安，踏上归国征途，行前上述三团体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致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对于他们的援助，并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103] 1946年6月，反战同盟的成员和其他日本战俘一起被遣送归国，该同盟在抵达日本博多港后宣布解散。

三　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

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直接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培植了一支朝鲜独立复国的革命队伍[(104)]。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革命者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老红军、老革命，人数很少，但富于革命精神，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领袖和核心；二是从大后方转移到敌后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成员，他们有一定数量，经历过抗日烽火的考验，并且有在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工作和生活的比较，向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干力量；三是来自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投诚、俘虏的日军朝籍士兵和投奔根据地抗日朝鲜侨民，他们深受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有着做亡国奴的切身体验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坚强意志，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本群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往单纯与朝鲜共产主义者联系为与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发生广泛的联系，积极支援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屡屡发表社论和评论，声援朝鲜独立复国运动。1938年7月和10月，中共领导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武汉帮助和支持“朝鲜青年战地服务团”和“朝鲜义勇队”的建立。武汉沦陷后，朝鲜义勇队奉中国军方命令分赴各战区，参加抗日战争，但中国共产党仍对该队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力。11月下旬，该队部分队员随周恩来到了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指导下开展工作。朝鲜义勇队曾积极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的创建和周恩来在桂林发起的义卖献金运动。更为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是，1939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正式成

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直属新四军党委领导[105]。中国共产党对朝鲜义勇队若干部分实施组织上的领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直接影响了随后朝鲜义勇队大部分队员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已正式形成，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敌后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推行“限共”、“防共”政策，不仅使国共关系出现摩擦，而且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左”倾党派也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难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立足；华北敌后散居着20万朝鲜侨民，日寇正处心积虑地推行“以韩制华”的政策，它们竭力挑拨中朝关系，利用朝鲜侨民为其战争政策服务。粉碎日寇分化中朝团结的阴谋，争取华北的朝鲜侨民参加中国抗战，成为敌后根据地军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决定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将在中共影响下的朝鲜义勇队各部陆续调往敌后抗日根据地[106]。自此，朝鲜义勇队实现了向华北敌后的大进军和战略大转移。对此，国民党的官方档案中也有明确的记载。1941年10月29日，国民党中统局在《朝鲜各党派活动近况报告》中指出：“朝鲜民族革命党内部分子，素称复杂，自第二次欧战以来，日苏签订协定之后，该党不稳分子认为中日战局将改观，于是纷至陕北活动，盖八路军内炮兵团长武挺，原籍朝鲜，在中共颇有权威，以此咸与联络，希得延安方面之欢心。据闻朝鲜义勇队分队长朴孝三及号称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之石正，均已前往”等[107]。

1940年，朝鲜义勇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首先受到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队”的远道欢迎，接着，又实现了与八路军三八五旅的胜利会师。八路军各级领导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陈锡联等先后会见朝鲜义勇队成员，热烈欢迎他们的来到。1941年1月10日 - 12日，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志士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

立大会。会议选举武亭为会长，李维民、张振光、韩德志分别为组织、宣传、经济部长。并通过联合会纲领，其要点是：团结流亡在全华北的朝鲜青年，参加光复祖国的大业；拥护朝鲜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发动全朝鲜民族的解放战争；努力保护华北各地的朝鲜人，特别应对青年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保护在中国沦陷区痛苦呻吟的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赞助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和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结成韩、日、台人民的反日联合战线等，会议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是和我们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联系”，号召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打击日寇，促进朝鲜民族解放事业，朝鲜义勇队要抓紧培养干部，统一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团体，把华北朝鲜侨民扩大到革命战线中来”[(108)]。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同时成立。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侨民的日益增多和朝鲜独立活动的逐步开展，如何制订对朝政策的问题摆上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对待朝鲜侨民和朝鲜独立运动的政策。目前见到的主要文件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1年11月3日）、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的《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的指示》（1943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办法》（4月15日）、山东临时参政会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条例》（5月10日）等。主要内容是：一、援助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迅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边区政府保护因反抗日本和逃避战乱来到边区的朝鲜人民；三、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其解决土地、住所及低利贷与资金、农具、种子、耕牛，维持其生活，帮助发展生产；四、朝鲜人民可享受子女免费入学以及设立学校、发行刊物、帮助旅费回家、介绍参加工作等各种优待；五、支持和援助朝鲜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组建以光复朝鲜为目的的抗日团体和武装；等等[(109)]。这些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

主义精神与中朝友谊的结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心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具体帮助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1941年10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积极参与发起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武亭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10]。1942年7月11日－14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某地举行代表大会，决定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两者为军政统一体，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并行。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参照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经验和朝鲜革命的实际制定了朝鲜独立同盟关于朝鲜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纲领。前者十条，主要内容是：建立全国国民普选的民主政权；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思想、罢工自由；尊重人权之社会制度；在法律上、社会生活上实现男女平等；在自主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一切资产及土地，将与日本帝国主义密切之大企业收归国有，土地实行分配；实施八小时劳动制及社会保险；废除对人民的赋税及杂税，建立单一累进税制；实施国民教育制度；研究朝鲜文化，普及国民文化等。后者七条，主要内容是：改善大众生活与增长革命力量，积极领导和参加大众日常斗争；努力对大众实施革命训练，发展革命组织；为居住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各地的朝鲜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奋斗；努力扩大全朝鲜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开展全朝鲜民族的反日斗争，建立革命武装队伍；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赞助东方被压迫民族运动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等。会议的另一成果是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会议选举金白渊（金抖奉）、武亭、崔昌益、韩斌、朴孝三、金学武、蔡野火、王志延、金昌满、李继民、陈汉中、李春岩等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朝鲜老革命家金白渊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总部设组织、宣传、经理三部及秘书处。同时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孝三、朴一禹为

副司令。这个领导核心为朝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111]。12月1日，朝鲜独立同盟又在山西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朝鲜青年革命学校。金白渊为校长，朴一禹为副校长，张治民为校务主任，目标在于培养大批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朝鲜革命干部[112]。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朝鲜青年革命学校以及各根据地的分盟、支队、分校三位一体的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新体制。

至1945年8月，朝鲜独立同盟先后在山东军区、新四军、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晋西北军区、延安、太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华南东江纵队设立了十一个分盟，除太行的两个分盟直接由总部领导外，其余都与八路军、新四军各军区的敌工部发生联系并接受领导，总盟则主要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生联系。同时，还在敌占区的天津、北平、哈尔滨、朝鲜汉城建立了分盟，在开封、徐州、济南、民权、承德、临汾、榆次、霍县、太原、石家庄、顺德、新乡及朝鲜人在华北创办的各农场建立了据点，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协助下，由同盟总部直接领导这些分盟和据点。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朝鲜义勇军的支队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分校[113]。

在敌后根据地的朝鲜抗日军民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对敌斗争中，朝鲜革命者冲锋陷阵，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政治攻势：不论在下大雨的黑夜，或炎热的白天；不论在敌占区，在游击区，就是敌人派遣游击队跟踪他们的时候，也仍然坚决完成任务；他们经常在老百姓的包围圈里，用生硬不熟练的中国话，热情地进行宣传；他们不仅向老百姓宣传，而且也是对敌宣传的能手，在敌人炮楼前或电话上，用流利的日语向日本士兵指出活路；他们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大地上[114]。1944年8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高度评价朝鲜

革命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贡献。指出为中国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朝鲜友人有孙一峰等十七人，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以下的大批成员都为中国抗日战争“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115]。

在整风运动中，朝鲜革命者更是把整风学习视为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最好机会。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后更名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成为朝鲜革命者进行整风学习的重要场所，各分盟也都建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组织朝鲜革命者的整风学习。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武亭在该校整风动员会上强调为使朝鲜同志在思想行动上统一起来，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并提出三项要求：朝鲜义勇军不只要有枪杆，还要有强的政治修养；要把整风和朝鲜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学习时应钻进书本里去，不应徘徊于书本之外等[116]。在另一场合，他盛赞抗日根据地在精兵简政、大生产、对敌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他的主义是活的马列主义，他的主义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发展着，就是在朝鲜革命中也在发展着[117]。整风运动对于朝鲜革命者总体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涌现了一批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朝鲜籍的杰出人物。他们中除了对敌斗争的英雄和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外，还有文化方面的专家。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朝鲜独立同盟陕甘宁分盟负责人方禹镛大夫就是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的五十寿辰时，毛泽东曾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题词相贺，《解放日报》也发表专文，号召边区医疗界的人士向他学习[118]。朝鲜籍青年音乐家、中共党员郑律成是另一位在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延水谣》、《准备反攻》、《陕北公学同学歌》等近三百首歌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威武雄壮的旋律至今回响在神州大地，令人振奋！催人前进[119]！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不断发展

壮大，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朝鲜的独立复国作了政治、组织、军事方面的全面的准备。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全体人员三千余人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从延安出发，直指东北。一路上，他们一边清扫日伪残余势力，一边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吸收了不少朝鲜人加入队伍，使朝鲜义勇军更加壮大。11月7日，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沈阳改编为七个支队，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朝鲜义勇军立即开入朝鲜作战，该军奉命开赴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开展工作[(120)]。1946年3月，该部建制撤销，部分人员归国，其余人员并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

(1)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51页。

(3)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498 - 501页。

(5) 对于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较多的著作主张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

(6)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20 - 721页。

(7)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54页。

(8)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49页。

(9)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58页。

(10)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9月2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11)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 - 786页。

(1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 - 786页。

(13)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87 - 803页。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5 - 176页。

(15)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 - 786页。

(16)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的检查》（1943年11月27日），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 - 549页。

(17)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550页。

(18)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901 - 902页。

(19)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转引自李良志等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20)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533页。

(21) 参见《党的生活》（城市版）1994年第3期。

(22) 此案在“抢救运动”后期，已为中共中央发现系假案，及时作了纠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将此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蒙受诬陷和打击。粉碎“四人帮”后，才由中共中央彻底予以平反。参见戴

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65页。

(24) 《毛泽东对绥德反奸大会材料的批示》（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75页。

(25)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34 - 137页。

(26)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 - 467页。

(27)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01页。

(28)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30—431页。

(29) 《陈周博董致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电》（1938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35页。

(30)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193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4—25页。

(31)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00页。

(32)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08 - 709页。

(33) 《陈周博董致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电》（1938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35页。

(34) 参见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3页；《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2年3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 - 159页。

(35)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72 - 75页。

(36)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 - 194页。

(37)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 - 194页。

(38)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241页。

(39)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 - 194页。

(40)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72 - 75页。

(41)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2年4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74 - 177页。

(42)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2年4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74 - 177页。

(43)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2年3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57 - 159页。

(44) 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4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4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45页。

(47) 参见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4 - 265页。

(49)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2 - 213页。

(50) 《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

(51) 《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1942年9月1日），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376页。

(52)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22 - 124页。

(53) 1942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裁、减、缩、并四原则。参见魏宏运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54)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941年12

月4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22－124页。

(55)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1页。

(56) 毛泽东：《论新阶段》，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1页。

(57)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58页。

(58) 《新中华报》，1939年6月27日。

(59) 《新中华报》，1940年10月20日。

(60)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16页。

(61)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23页。

(62) 参见肖一平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63)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942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97－99页；《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4－27页。

(64) 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解放》第9卷第3－4期合刊。

(65) 温锐：《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论者认为：此种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方式具有特殊的长处：1．它能尽可能地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全面地调动各种阶级的积极性；2．它避免了以往土地革命过程中农村生产常常出现的低落现象；3．它有利于农村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66) 参见何进：《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另一种意见认为：大生产运动始于1941年初，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然后推广至各解放区，发展为普遍的大生产运动（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种意见认为：大生产运动始于1939年中共中央举行生产动员大会，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的热潮（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67)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46 - 851页。

(68)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46 - 851页。

(69)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65 - 868页。

(70)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65 - 868页。

(71)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005—1009页。

(72)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581 - 583页。

(73) 《毛泽东年谱》（中），第314页。

(74)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

(75)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33 - 434页。

(76)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581 - 583页。

(7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32页。

(78)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1 - 172页。

(79) 参见魏宏运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第305 - 307页。

(80) 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持此种看法的还有石西民，参见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则认为："1937年至1939年，在华北、华中两个主要敌后抗日根据地约有各类小型报刊700种。"

(8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2页。由于当时台湾和朝鲜同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文件中一般将两者并论。

(82)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0 - 201页。

(83)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9页。

(84)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85) 《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9月30日。

(86) 《朱德年谱》，第243 - 244页。

(87) 《毛泽东年谱》（中），第336页；《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 - 30日。

(88)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日。

(8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90)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0 - 201页。

(9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159 - 166页。

(92)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93)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6页。

(94) 《中国共产党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页。

(95) 参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9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162页。

(96)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97)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6日。

(98)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7日、19日。

(99) 《解放日报》，1942年8月30日。

(100) 《解放日报》，1944年1月18日。

(101)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02)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

(103)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04) 本节参见石源华：《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纪事研究》一书绪论，韩国高句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54页。

(105)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队》，《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106)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队》，《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107)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刊印，第118－119页。文内“武挺”应为“武亭”。

(108) 《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8日；参见《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刊印，第310页。

(109) 参见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421－422、422－423、427－428页。

(110)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11月1日。

(111)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9日。

(112)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7日。

(113) 武亭：《华北朝鲜独立同盟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工作经过报告》（1945年5月9日），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0页；《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

(114) 宁真：《朝鲜义勇军在晋察冀》，《解放日报》，1944年4月24日。

(115)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16) 《朝鲜青年革命学校扩大生产规模加紧学习》，《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1日。

(117) 《武亭在边区党政军民隆重纪念“八一”大会上的讲话》，《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1日。

(118) 黄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人民日报》，1981年8月3日；《向方禹镛大夫学习　为庆祝他底五十寿辰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27日。

(119) 刘建勋：《郑律成在延安》，《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1949年后，郑律成随中国籍妻子在中国定居，经两国政府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120)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

第一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日汪关系调整

一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提出

1942年与1943年之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出现重要变化。同盟国军队在西方和东方的各个战场上开始了对于轴心国军队的反攻。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严酷的战争形势面前，虽然仍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向国人隐瞒败迹，“彻底实施防谍措置”，甚至“将沉没艇之乘员暂时加以集中管理，不准外出”，“但战败之谣言，不翼而飞”，“开失信于天下之端矣！”[(1)] 战局逼迫着他们再也不敢像太平洋战争初期那样，得意忘形地叫喊“树立长期不败的体制”了。1942年下半年，东条英机无可奈何地表示要“准备决战体制”，以应付与同盟国“业已迫近的决战”，被迫将其战略方针从进攻转为防御。

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正是为了适应其军事大滑坡的局面提出的。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竭尽全力动员其本国以及中国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得不重新审订其对华政策，以便充分利用汪精卫政权，更有效地搜刮沦陷区的物资，建设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从而集中力量，应付与美、英诸国的“决战”。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曾发表宣言，揭露日本的“对华新政策”，“不是任何什么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2)]。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1942年9月1日在内阁增设大东亚省。东条英机明确指出：该省的设立是“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将共荣圈内的各种派出机关统一起来，对各项政治事务实行一元化的统一的速效的领导”[3]。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一针见血称其为“大东亚殖民地省”，“此乃敌人对现在其军事控制下之‘大东亚共荣圈’内一切地区加强政治及经济榨取的一种组织”[4]。长期以来，日本方面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掠夺和统治有许多分歧的地方：在机构上有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的摩擦，对中国采取的‘分治政策’，使现地军人之间，傀儡政权之间纠葛颇深，而各大财阀又竞相渔利”[5]；各派出机关“在实际事务中，矛盾百出，时酿纠纷，给予中国方面的坏印象，实难忽视”[6]。成立大东亚省的目的之一正是调和日本各种势力在中国沦陷区的争夺，弥补各傀儡政权间的巨大裂痕，将治权归一，以利于“对华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由于这一措施涉及日本统治集团几个方面的利益，因此一经提出，就遭到各方的反对。枢密院不表赞同，外务省因为此举将削减其部分权力，也表坚决反对，外相东乡甚至愤而辞职。但在东条英机看来，这一措施事关“圣战”全局，势在必行，便断然决定自兼外相。但围绕着争夺中国沦陷区的指挥全权，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仍然争吵不休。陆军省以“作战需要”为由，主张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兼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海军省强烈反对，外务省则主张“大使”、“公使”均应由文职担任。10月1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大东亚省驻华机构及其运用》，对于人事安排，作了原则规定。20日，由有关各方达成遣华人员分配协议：特命全权“大使”、驻上海特命全权“公使”由文职官员担任；驻北平、张家口特命全权“公使”由兴亚院联络部长担任；各地机构人员暂由原来的联络部、领事馆职员留任，但尽量使陆海军人员退出；特务机关暂时保留，但权限为专司治安，其他事项移交大东亚省派驻机构等[7]。

11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大东亚省官制》，宣布大东亚省成

立，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四个机构，撤销原拓务省、兴亚院、兴亚院联络部、对满事务局官制，并将原外务省所属的东亚局与南洋局、原拓务省所属的拓南局与拓北局的业务一并划归大东亚省主管。同日，日本政府任命曾任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任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在南京担任汪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时就认为实行对华新政策是“绝对必要的”，并曾“提议设立大东亚省作为第一步的措施”[(8)]。同时，任命重光葵为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原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少将任驻张家口“公使”，原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长官盐泽清宣少将任驻北平“公使”，原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任驻上海“公使”，原公使兼总领事堀内干城任驻南京“公使”。大东亚省的建立及驻华人员的调整奏响了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前奏曲。

11月8日，日本第八十一届帝国议会开幕，并发表对华新政策的“转换”声明，向世界宣布了日本政府的这一重要意向。随即，日本政府、军部、驻华机关各部门间，以及日本政府与汪政府间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20日，东条英机与海相青田、大东亚相青木、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等进行会谈，研究对华新政策的实施方案，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12月1日，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抵达上海，就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施问题与汪政府进行磋商。汪精卫立即表示响应，于12月8日发表文章《再告全国同胞——怎样同甘共苦》，表示“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即是东亚共荣基础的奠定”，“决心与友邦日本同甘共苦”；并以农作为例来说明“同甘共苦的意义”：“当耕耘的时候，大家在田间流汗耕作，辛苦备尝，这是共苦，当收获的时候，大家一同在田舍里，尝新谷得安饱，这是同甘，由此可知必先有共苦而后有同甘，共苦是现在的忠实努力，同甘是将来的确实希望”；他特别强调“目前最大的痛苦，是物资缺乏，物价飞腾”，“这些痛苦是不能免的”，要求沦陷区人民要“本着共苦的意义，以极大的勇气来承受”这些“应该承受的

责任”，“以紧张的情绪来克服恶劣的环境”[9]。这些言论表明了汪精卫集团对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支持以及准备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12月18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为基础的具体策略》。21日，又由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决策，正式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这是日本军部和垄断财阀相勾结的产物，是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总纲领。它首先规定了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总方针：“帝国认为国民政府（汪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要求“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据此，从政治、外交、经济以及对重庆政府策略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以“加强”汪政府的“政治力量”为主要目标，规定：对于汪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极力调整占领地区的地方特殊性”，“加强”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对于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的各种形态，应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精神为基础，设法尽速予以撤销，或者予以调整”；使汪政府“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不遗余力地在战争方面与帝国合作”；并斟酌汪政府的充实加强及其对日合作的具体表现等等，“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等。

在经济方面，“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规定：要“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取得重要的敌方物资”；“实行经济措施时，一面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一面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精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等。

在对重庆的策略方面，规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并“使国民政府采取跟随帝国的态度”等[10]。

这个“新政策”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基本国策”，只是在策略和手段上有所变化。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解释说：“以前对华处理方针，均系大东亚战争发生前制订的，故尽量考虑与英美冲突，或诱导之以解决事变，那种方针或有不彻底之处。”他主张随着太平洋战争出现危局，日本应该改而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须举全大东亚之民族，以所有之资源，集中于贯彻圣战之一途，依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以加强国府（汪政府）之政治力，覆灭重庆抗日之根据地，及同盟统一后进中国，以期贯彻圣战。”[11] 显然，日本对华新政策的中心环节是强化汪政府，而以“尊重主权领土”、“经济合作”、“全面和平”一类谎言作为招牌，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从中国沦陷区掠取“所有之资源”，保证“大东亚圣战”的进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既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确定不变的国策”的狂妄和顽固，又暴露出它为了挽救危局而不得不强调依赖中国沦陷区和走向穷途末路的虚弱。

二　汪政府对英、美宣战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第一幕，是汪政府正式对美、英等国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此举是由东条英机和汪精卫共同密谋决定的。

日、美开战后，汪政府曾发表声明，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与日本“同甘共苦”，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当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时，汪伪上海市政府在宣传要点中提出，要“与日本同甘苦，共安危，扫灭侵略东亚的英美势力”，“使同胞免除白种人之压迫”等[12]。当日军攻占香港时，汪精卫指出：“百年以来英帝国主义在东方侵略之根据地一朝打破，于保卫东亚之意义上实为极大之贡献”，指示上海各界要“举行庆祝”，并加“诱导”，“促其本同甘共苦之意，益加努力”[13]

。同月，汪精卫发表《勖中国民众》一文，明确指出："同甘共苦"包含了三个内容：第一是"确立治安"，"以东亚现在形势而论，日本是站在前线，中国是站在后方，前线的活跃进取，有系于后方之安全，我们应该尽十二分的努力，来使治安确立"；第二是"加强军事力量"，"包括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第三是"增加生产，节约消费"，"战争需要物资，物资需要人民来负担"。汪精卫认为：这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14)]，当时尚没有涉及参战问题。

但随后不久，汪政府就改变态度，表示愿意追随日本向英、美宣战。1942年7月，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访日，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了"参战"的希望，称汪政府"不仅和友邦同甘共苦"，而且要"共存共亡，同生同死"[(15)]。

日本政府一度不同意汪政府"参战"。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大本营曾下达过为攻略重庆的五号作战进行准备的命令，日本政府设想在实施五号作战以后的某个时机，诱迫重庆国民政府订立"和平条约"，因此不让汪政府"参战"。但是，到了10月，太平洋战局日趋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中止五号作战的准备，并认为诱降蒋介石已毫无希望，故而改变了态度。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准许汪政府"参战"，并视汪政府的"参战"为"打开日本与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11月27日，又决定将汪政府"参战"的时间定于次年1月中旬。汪政府对美英"宣战"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关键一环和重要组成部分。

12月20日，根据日方的安排，汪精卫以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赴日访问，与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参战"及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有关问题。根据汪政府官方公布的材料，这次日汪密谋的主题是："两国如何协力大东亚战争，如何使国民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意志和力量，分担完成战争责任等问题。"[(16)]双方约定汪政府"参战"的日期为1943年1月15日。12月25日，汪精卫

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的广播讲话，表示“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发出了即将“参战”的暗示[17]。

1943年初，日本政府秘密获悉：美国国会即将审议“中美平等新约”并将公布，决定让汪政府提前向美、英“宣战”。1月7日深夜，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奉命访问汪精卫，要求汪政府配合东京提早宣布“参战”[18]。汪精卫按照日方指令紧急行动，于9日上午接连召开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会议，完成了有关“参战”的“法律”手续。

同日，汪政府发布对美、英宣战文告，宣布：“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19] 汪政府外交部同时通知轴心各国政府，从此以后，汪政府与日本由前后方关系进至并肩作战的关系。汪精卫与重光葵签署了《共同宣言》，宣称“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事，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20]。随后，重光葵又照会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要求对中国境内除英、美以外之敌性国财产，“与帝国采同样措置”，褚民谊复照表示同意，这不啻扩充了“参战”的范围，按照日方抄送的名单，日本的敌国除英、美外，还有澳洲联邦、加拿大、新西兰，断交国则有伊拉克、埃及、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海地、荷兰、墨西哥、巴拿马、比利时、希腊、委内瑞拉、秘鲁、乌拉圭、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挪威、伊朗、智利[21]。

对于日本来说，汪政府的“参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军事方面。日本统治集团完全明白：汪政府并没有什么实力，不可能在对美、英作战中起什么作用。日本政府同意汪政府“参战”，主要在于实施对华新政策，以便运用汪政府作为工具，在中国沦陷区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各方面“协力”日本与英美的“决

战”。对此，《东京每日新闻》在汪政府“参战”的第二天曾发表上海专电评述：“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由于汪政府“实力”不足，不能要求它“参了战就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的战力培养，则长期的武力战将发生困难，这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22]。

对于汪政府来说，“参战”除了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需要外，也还有它自己的企图。根据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记载：汪政府主要首脑间，“关于国府参战问题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没有实力的参战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是为了统一并振作民心，而且从与日本同甘共苦的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参战”[23]。在太平洋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日本方向发展时，汪政府为什么反而主动要求“参战”呢？

首先，汪精卫等人对于日本战胜美英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胜利”，“参战”就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当褚民谊向汪精卫提出不宜主动向日本要求“参战”时，汪回答：“万一抗战失败，吾人非此不能取得战后之国际地位。”[24] 周佛海更加直率地指出：“假如英美打胜仗，这个时候我们难道因为没有参战而能得到英美的原谅，而能免去英美对我们的宰割吧？万万不能的”；“我们绝对不能以为不参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余地。抱有这样思想的人，实在是太蠢不过，不成功，便成仁，假使失败，我们还能觍颜乞怜以求苟全吗？”[25] 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发展形势，汪精卫集团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就军事说，太平洋的军略要点，都被友军占领了；已占领的各地，一年以来已巩固了坚强的防御准备，这就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英美反攻，谈何容易？”“英美以为持久战，或以获得胜利，殊不知时间越久，友邦在占领地的地位越巩固，建设越发展，英美反攻，更不容易。”[26] 汪政府已与日本侵略者绑在一起，不得不孤注一掷，万一日本胜利了，则可分得一点日本法西斯的残羹剩饭。

其次，汪政府的“参战”也有其自身直接利益目标。汪政府在其制订的参战计划中强调要号召“唤起民众，彻底认识参战为中国基于自主的立场与客观的情势之正确的决策，中国因参战而对内之复兴更能推进，对外之国际地位更能提高，日本因中国参战而对我之友好尊重愈加明确，对我之诚意协力愈加强化”[27]。对内，汪政府企图以“参战”为由实现他们企盼已久的“统一”目标，提高所谓“独立自主”的地位。汪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局隅一地的小朝廷，他们幻想通过“参战”，乞求日本驻各地占领军的施舍，由他们“统一”指导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的傀儡政权，使所谓的“中央政府”稍稍像些样子。对外，汪政府希图以“参战”的名义，向日本要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接收”英美等在沦陷区的权益，并进而谋求向日本交涉废除《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另订“平等”新约等。

汪政府向英、美宣战的文告发布后，汪精卫集团内外疑虑重重，议论纷纷：“有人以为中国参战，是受友邦日本所逼迫不得不实行的”，“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负担就要更重，人民就要更苦”，“有人以为英美将来一定打胜仗，我们何必卷入漩涡，将来也随着败亡呢”？“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日本会借着共同作战为名，对中国的主权行使加以很大的束缚和限制”，“有人以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求全面和平，如果中国参战，不是关了全面和平之门吗”？“有人以为参战以后，要抽壮丁，要限制提存，经济统制更要加严，生产更要委靡”，更“有人以为日本如果得了胜利，中国更要不得了”等等[28]，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汪政府要员几乎倾巢出动，大造“参战”舆论。汪政府宣传部迅速制订了《关于参战的宣传要点》以及《参战宣传计划》，要求采用文字宣传（电讯社编发专稿、报纸撰著社论、杂志出版专辑等）、民众运动（举行示威运动、各团体拍发通电或宣言、举办演讲、电影或游艺会、组织参战力行推进队、个人相谈、家庭访问、小组集会等）、特种宣传（组织突击宣传队、公演队、演出画片剧、放映幻灯、绘制

各种漫画和图表、延请军政长官或文化界名流广播演讲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参战”的意义[29]。汪精卫发表了《踏上保卫东亚的战线》等一系列文章、文告和演讲，周佛海针对各种议论，发表了《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连平时很少撰文的汪夫人陈璧君也发表了《战后民众情绪的解剖》，再三宣称：汪伪政府的“参战”完全是“自动的参战”，是“以独立自主完全自由之立场，与东亚诸邻邦，及世界诸友邦，同心协力，步入保卫大东亚战争之联合战线”[30]。

汪政府对美英“宣战”后，并未实际派兵参加对美英的作战，而只是按照日本法西斯的要求和其自身的需要，在“参战”的名义下，将中国沦陷区更紧密地纳入所谓的“战时体制”轨道，继续扮演为日本侵略军建设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的角色。

三　日本“交还”租界与“放弃”特权

与汪政府“参战”同时出台的，是日汪间关于“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交涉，这是日本调整对汪关系，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

“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曾经是日汪间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1938年11月20日，日汪双方在上海市重光堂会谈中就已商定：“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31]。次年12月30日，日汪双方为汪政府建立而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再次重申：“考虑租界及治外法权等之交还”[32]。1940年11月30日，日汪签署的《基本关系条约》又对此作了类似的规定。然而，这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仅是标榜“中日亲善”的一张空头支票。而汪政府为了给“和平运动”装潢门面，却抓住这点，一有机会就与日方交涉，要求日本履行诺言，并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汪政府外交部曾拟定《关于收回租界之研究》的内部文件，内列

租界之概况、租界之地位、过去政府对租界之策略、收回租界之必要、国际之展望、收回之策略等部分，对于“收回”租界后的政策和措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设计和准备。该文件指出：“现在国府还都，邦基重奠，国人所仰望于政府者，即为民可乐业，共享和平，以租界之为投机囤积大本营也，非收回不足以解民众倒悬；以租界之为乱党渊薮也，非收回不足以根绝乱源”，强调“必收回租界乃可解除外人对华种种之非法束缚”，此“为当今要务彰彰明矣”。主张“以欧战扩大，为保持中立，防止冲突，提议收回上海租界，以次推及各专用租界”，认为英法美不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所谓英、法、美联合行动，不外派舰与增军，在欧战扩大之今日，英、法海军以之应付大西洋、地中海及香港、越南之警备，尚不足虞”，“外交当局之集体表示，亦难阻遏蓬勃之收回运动”，指出时为“收回”租界之最好时机。为此，确定了对内对外的各种具体办法：

一、对内准备

1．加强上海特别市维持治安之机构，充实警力，并储备外事警察人才，为接收之准备；

2．发挥健全之民意，唤起民众对收回租界之决心。

二、对外交涉

1．由中央政府发布宣言，申述收回租界为中国之国策，乃合理之要求，各国应明了远东大势及东亚和平之真义，对收回租界应予充分之同情与考虑；

2．中央政府调查俄、德、奥三国在华租界及汉口、九江、镇江英国租界交由中国管理后，中国政府对于居留地外侨之措施，以祛除其凭藉租界保持在华权益之谬见；

3．中央政府以收回租界之意旨通告关系各国，并以上海市

政府为主体，秉承中央之命向驻沪代领事团及工部局要求为接管之谈判；

4．在必要时可发动租界内为外人执业之华人，使之罢工及封锁租界，使之就范。[33]

然而，该方案不仅不可能为当时的英法美诸国所接受，而且也遭到了日方之冷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英、美等国在华租界，名曰“代管”，实际上占为己有。直至1942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军当局才在名义上将广州、天津两英国专管租界移交汪政府，但同时又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如将两租界区域暂定为特别行政区，其“行政上之机构及行政之实施，应与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密切联络”，“一切事项应经由特务机关长”；在租界内接收之英美公馆及其他权益，除在行政实施上有必要移管外，其余“仍由日本军管理”；租界地治安警备，应受日军警备司令处理，“由中日两国军警互相协力担任”；“日本军为管理所接收之权益及保护监视敌性人，在特别行政区内配置一部分之军队”等[34]。如此“移交”，连日本大东亚相青木也承认：“在名义上，虽然将租界退还中国，但租界内之仓库、房屋及其他值钱物品，均将收归我有。于是，在租界内，不复残留一丝一缕，这种退还方式，中国民心之离反，殆属势所必然”，他极力主张“重新考虑，改弦更张”，制定对华新政策，以适应太平洋战局变化之需要[35]。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给汪政府带来了新的机遇。

出于催促汪政府提早“参战”同样的理由，日本政府为了抢在中美、中英新约签署之前，与汪政府签订有关协定，也将原来双方约定的签约时间从1943年1月15日提早至9日。这天，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将日本国在中国境内现今所有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汪政府；日本政府承认汪政府“尽速收

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以及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日本政府决定“速行撤废”在华治外法权，汪政府承诺“开放其领域，使日本臣民得居住营业，且对于日本国臣民不予以较中华民国国民为不利益之待遇”等[36]。

在这之前，汪精卫密令在汪政府行政院内设置“接收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协定签署的第二天，汪精卫又下密令，将该委员会改组为两个委员会：“接收租界委员会”，以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主任委员，李圣五、吴颂皋、吴凯声、汤良礼、周隆庠、张超、王促豪为委员；“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以汪政府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为主任委员，乔万选、吴颂皋、张煜全、裴复恒、周隆庠、徐维震、王敏中为委员[37]。同时，日本方面也设立了以“公使”堀内干城为首的“交还租界委员会”。日汪双方开始就实施“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的具体事宜进行交涉。

3月9日，由汪方褚民谊、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和日方堀内干城、中村丰一、田尻爱义、盐泽清宣签署了《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实施细则条款》及《附属谅解事项》。规定：日本于3月30日将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重庆之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实施交还”，“专管租界内之道路、桥梁、阴沟、沟渠及堤防等诸设施”，应无偿移交汪方；汪政府承诺日本“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利益”，并“应接用从来日本方面为实施专管租界行政而雇佣之中国籍巡警，及为管理维持道路、阴沟等而雇佣之中国籍从业员”等[38]。同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照会褚民谊，提出日方的希望要求，主要内容有：1．希望汪方承担租界内日本居留民团等为建造公共设施负有的债务；2．希望汪方确认各地租界原条款中以永租、租借、借地等文句所规定的权利，“一律改为永租权”，其地租“避免急剧之变化”，“暂维持现行之税率”；3．希望“所有旧租界地域不设立类似过去之特别行政区，而并入所在都市的一般行政组织”；4．希望日本居留民团代表能与中国当局“定期或应需要随时会合举行恳谈”，疏

通双方意思，“增进当地两国亲善关系”；5．希望能保障“侨居租界内之日本臣民之居住、营业及福祉”等[39]。名义上是“希望要求”，实质上是日方指令，汪政府自然只能全部照办。3月30日，除重庆外，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七地的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分别“移交”汪政府各地方当局接管。

3月22日，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日汪关于日本交还北京公使馆区行政权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谅解事项》。北平公使馆区是1901年后根据《辛丑条约》设立的，各国以“自卫”为名，实施独占的行政权，该区域范围虽小，却俨如“独立国”。日汪约定：3月30日由汪政府“实施收回”该区行政权；该区域内之“道路、桥梁、阴沟、沟渠、障壁等诸设施，应与隙地同时无偿移让”给汪政府；汪政府承诺“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在公使馆区域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与利益，并应参此取必要之措置”等[40]。

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与汪政府建有“外交关系”的意大利政府、法国维琪政府、西班牙政府也效法日本与汪政府签署相关的条约，或发表有关的声明，“交还”租界或“放弃”在公共租界享有的权益。3月29日，汪政府与意大利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收交北京公领事馆区行政权之协定》。同日，汪政府“外交部长”与法国维琪政府驻南京大使馆代表领事萨贲德互换照会，宣布法方“放弃”北京大使馆区域行政权。西班牙政府驻南京公使麦唐纳也发表声明，决心与日本采取一致行动，“撤废”治外法权及“交还”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3月30日上午10时，汪政府接收委员吴凯声在北京主持仪式，“接收”北京东交民巷公使馆区域行政权。

3月27日，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关于日本交还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始设于1902年1月10日，其行政权隶属于英、美、日、法、西、瑞典、丹麦等国领事团，是外人

在华南方面的重要据点。日汪约定：3月30日由汪政府“实施收回”该区行政权；租界内属于工部局之一切公共设施、资产及负债由汪政府继承；汪政府承诺“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在上述租界内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利益，并应对此取必要之措置”等[41]。同日，重光葵复照会褚民谊，提出关于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所有在该地域内关于土地的权利（永租、租借、借地等）一律改为永租权，以及采取必要措置“处理在厦门市之中日军事协力及经济提携”等希望条件，并赞同汪政府将厦门市改为直属行政院的特别市[42]。

接着，汪政府外交部又与法国、瑞典、丹麦、西班牙等相关国家进行交涉。5月25日，汪政府外交部、宣传部发表共同公报，宣布这些国家已“赞助同意，故该租界之收回，即可全部实施”[43]。5月28日上午，原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解散，该租界的行政权正式由汪政府“接收”。

比起上述各处来，日汪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交接”谈判要复杂得多。上海公共租界长期操纵于英、美之手，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生活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租界行政权转而为日本掌握。自1月开始，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及其后任谷正之进行谈判。数月间，“几经折冲，双方意见日趋接近”。6月，谷正之奉命回国述职，返任后才由双方最后达成协议。6月30日，由褚民谊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其《附属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与日汪关于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协定内容类似，并定于8月1日由汪政府“实施收回”[44]。同日，褚民谊和谷正之又互换照会，确认“鉴于上海所占地位之重要”，在实现日汪“协力”方面应讲求下列措置：一、“市政府令其所接用之工部局职员及其他被雇佣者之日籍人员退职时，事前由中日两国当地地方官宪间协议之”；二、“市政府经中央政府之许可得聘用日籍经济顾问，必要时得聘用日籍技术顾问”；三、“设置中日联

络恳谈会，由市政府高级人员及日本居留民方面代表合组之，关于影响于日本方面之重要市政事项预先咨询之，该会中国方面对日方所陈述之意见等充分尊重之”，等等[45]。这表明：日本政府虽在名义上放弃了在该租界享有的特权，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在这一区域的重大权益和影响。陈公博以上海特别市市长身份发表告市民书，称颂上海公共租界的“收回”，毁灭了英美侵略东亚和中国的前哨，表现了日本“理想之远大、友谊之深挚、协力之宏毅”，号召市民“不只廓清英美的残余势力，尤在于廓清英美的思想”[46]。褚民谊还致电日本外务相重光葵和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47]。

汪政府随后又与在上海公共租界享有权益的法、意进行交涉。7月22日，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维琪政府驻南京大使馆参事柏斯颂互换照会，确认法国维琪政府“放弃”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条件与日汪协定类似[48]。23日，汪政府“外交部长”又与意大利驻南京“大使”戴良谊签署《关于意大利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对有关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49]。

8月1日，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举行“交收”仪式，汪政府立法院长兼上海特别市长陈公博、监察院长温宗尧、军事参议院长萧叔宣、外交部长褚民谊等，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公使”堀内干城、工部局总董冈崎等参加。10时30分，工部局暨所属各机关将原有旗帜降下，改升汪政府的“国旗”，汪政府由此“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

在日本政府“归还”租界的同时，汪政府与法国维琪政府间关于“接收”法国在华专管租界的交涉也在进行。汪政府成立后，法国维琪政府并未予以承认，但在日本的压力下，与汪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日汪签署“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后，汪政府在日本占领军的支持下，数度与法维琪政府驻华代表“往返磋商”。2月23日，法国维琪政府“自动”通知汪政府，表示将“交还”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的专管租界，并“撤废”在华治外法权。4月1日，汪政府设置“接收法

国专管租界委员会”，法国维琪政府也任命全权代表团，双方开始谈判[50]。5月18日，由汪方夏奇峰、吴凯声、吴颂皋、周隆庠与法方柏斯颂、葛尔邦、高兰、萨贲德签署《关于法国交还天津、汉口、沙面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约定于6月5日实施[51]。嗣后，汪法双方进行“接收”上海法租界交涉，经一月余谈判，双方意见趋于一致。7月22日，汪法双方签署了《关于法国交还上海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并于7月30日举行了“接收”仪式[52]。7月23日，上海市政府根据汪政府的指令拟定《接收法租界要点》，强调在“接收”租界问题上，对待日本与法国的不同点，指出：“两国在华地位不同，故最近由褚部长与法方商定之总原则，仅为法方对于法籍人员人事上之几个要求，其他如将来组织及管理等等，均非法国所能预问，中国自有自主之权。”据此，汪政府在雇用法籍职员问题上给予法方若干照顾，但收归行政权方面则采取了较日本专管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更为“坚决”的措施[53]。

随即，汪政府对原上海两租界的行政、警务、司法作了重要调整。在行政方面，将原上海市各区连同“收回”的租界合编为八区，旧公共租界区域划为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任署长，下设八个处。旧法租界区域划为第八区，也由陈公博兼任署长，下设九个处。次年2月1日，第一、八两区公署合并为第一区公署，仍由陈公博兼任署长，由此实现了上海“市政”的“统一”。在警务方面，租界收回后，改设三个平行的警察局，第一警察局辖第一区，第二警察局辖第二至第七区，第三警察局辖第八区，并由陈公博兼任第一和第八两区警察局长，由汪政府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原公共租界警务处总监渡正监任副局长。11月1日，第一、第三警察局及沪西警察署合并为第一警察局，由此实现上海警政的“统一”。在司法方面，撤销了旧有因租界关系而特设的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三分院，重新设置汪伪上海高等法院、上海地方法院、上海高等检察署、上海地方检察署，由此实现了上海司法机构的“统一”[54]。

关于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当时未能“收回”。1945年3月10日，日军由于国际战局的变化，以武力接管了该地行政权。7月16日，在汪政府请求下，日方又将该地行政权“移交”汪政府。7月20日，汪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法两国间关于租借广州湾条约，已完全失其契约之目的”，汪政府已“直接收回该租借地之行政权”，并任命陈学淡为广州湾行政区区长[55]。

日本在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同时，也向它的盟国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中国与日本采取同步行动，这就为汪政府提供了与意大利政府交涉“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机会。1943年1月11日，意大利政府发表原则声明，表示将“交还”在华租界与“放弃特权”，随即双方进行反复磋商，就若干问题达成了协议。关于天津意大利专管租界，一度“因意政府内乱未定，无从洽商”，9月10日，汪政府在日本占领军支持下，单方面接管了天津意租界。1944年初，已被反对派赶下台的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重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汪政府追随日本立即予以承认。6月1日起，应意国政府要求，汪政府驻日“大使”蔡培与意大利驻日代理大使在东京进行谈判[56]。当时意国政府刚刚成立，急需汪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再加上天津意租界已实际为汪方“接收”，在谈判中相当迁就；而汪政府虽已“接收”该租界，也希望尽快与意方正式签订协定予以确认，谈判进展顺利。5日，双方即议定了《关于意国交还天津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及放弃驻兵权协定》、《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以及意国代表声明文件[57]。随后，意大利政府委派施毕纳利为驻华临时代办。7月14日，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和施毕纳利正式签署上述协定[58]。8月17日，汪政府委派外交部亚洲司长徐义宇、欧美司长范拂公专程赴天津，“接收”该租界行政权[59]。

日汪间关于“撤废”日本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1943年1月9日，日汪有关协定签署后，双方的交涉委员会随即成立，汪方以“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主任委员，罗君强、李圣五、吴

颂皋、周隆庠、汤应煜为委员，日方以堀内、中村、田尻、盐泽、岩崎、高濑为委员，并于3月24日举行首次会议[60]。但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事情迟迟没有进展。

“撤废”治外法权将使在华横行不法的日本侨民受到限制，因此首先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日本各方也对此意见不一。为了协调各方意见，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不得不往返于东京与南京之间，“将此项问题当地方面的意见传达中央，同时将中央的意见，再度与当地的关系者进行研究”，直至7月2日，才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召开会议，成立日本方面委员的最后成案”[61]。7月3日，日汪双方交涉委员举行会议，决定日本“撤废”治外法权先从课税问题着手。这就是说，日本政府仅同意部分地、有限度地“撤废”治外法权。

7月31日，由褚民谊和谷正之签署了《日本在华臣民课税条约》及《附属协定》、《了解事项》。同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当局发表重要谈话，对该条约及有关规定作了进一步有利于日本侨民的解释：第一、日本国臣民在任何场合之下，“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第二、“日本国臣民所应服从之中华民国法令之范围及适用之方式”，应由汪政府事先通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无通告，即无服从之义务”；第三、汪政府的课税权“因战时特殊事态，及其他理由，有免除及减轻之必要。例如对日本军人家属之特例，对军用供给物资的特例，对民团民会等公共设施之特例等，加以减免之特殊考虑”；第四、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未撤废前，日本国臣民违背法令之司法上措置，“仍由日本国领事馆行之”；第五、对于日本国臣民违反法令，只能“用行政处分，不用强制力”，“以免纠纷”，即汪政府官宪不能对日商实行“检查、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及没收等强制行为”，当日本国臣民对汪政府官宪的行政处分有不服时，汪政府应“采适当之纠正措置”；第六，对于日本方面认为不适当的“通过税及其他不适当课税”，汪政府“应从速整备之”；等等[62]。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只是允诺自8月1日起，该国臣民须“服从汪政府的课税法令”，作为日本“撤废”治

外法权的第一步。9月14日，汪政府外交部呈文行政院，报告中日双方将于20日公布，汪政府为“协力大东亚战争”，决定四大措施：日本在华军人家属免除课税；日本在华军需物件免除课税；日本在中国所经营之超重点产业，经日方申请得酌减或免除课税；对日本重要输出物资，经日方申请得酌减或免除课税等[(63)]。这表明所谓的“服从课税法令”在实施中也将大打折扣，而全面“撤废”在华治外法权更是成了一句空话。

“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曾被汪政府头目吹嘘为“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64)]。周佛海得意地说：“所谓不平等条约，大部已由吾辈手中取消矣。和平运动至此始有一交代，居心之苦，谋国之忠，天下后世或可见谅矣！”[(65)] 在“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后更说：“百年来英美等国经营中国之根据地从此消灭，租界也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和平运动是否成功，固属将来问题，但历史总可算有一笔交代矣！”[(66)] 然而，这在实际上却是日本侵华史上最富于欺骗性的一幕，正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评论所指出的：“沦陷区的汪伪政权是完全在日寇控制下，在南京有由大东亚省派来的直接指挥伪政权的‘大使’，在沦陷区有数十万日本皇军，在伪政权里面还有可以掌握实权、颐指气使的日本人的次长或顾问官之类，连汪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无不受日本鬼子的监督。在此种情况下，所谓‘交还租界及废止治外法权’，不是最可笑的骗局吗？”[(67)]

四 “日汪同盟条约”的签署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调整汪日关系的最高潮，是签署《汪日同盟条约》。早在1942年11月27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讨论对华政略问题时，东条英机就提出汪日“基本关系条约”是否“应加以修订”的问题。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表示赞同，认为目前的根本目的是对美英的战争“战胜第一”，“对于以前条约，也不妨重新加以检讨”。大藏相贺屋兴宣也认为：“既有条约，苟有不正之处，即应

加以修正。”[68] 显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只要有利于对英、美战争的胜利，不妨“修正”过去的条约。于是，在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对此作了决策，并把它作为推行对华新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汪政府方面，自1940年11月签署“日汪关系条约”以来，就一直表示不满。周佛海说：该条约“处处表示日本控制及分割中国之心，盖驻兵规定为其一，华北及内蒙等地特殊化为其二”[69]。陈公博则批评说：该条约“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条约”，日本口口声声宣扬东亚新秩序，但该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70]。日本政府提出对华新政策后，汪政府趁机要求日本政府废止“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秘密协定和附件。

1943年3月起，日、汪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互访，就废止“基本关系条约”问题进行磋商。3月13日至14日，东条英机作为日本战时首相首次访问南京和上海，和汪政府要人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进行会谈，讨论了日本军事援汪和取消华北特殊化等问题。4月1日，汪政府以感谢日本“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为由，特派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为特使访问日本，其真实的意图则是“以修订条约、取消华北特殊化为要点”[71]。陈公博在日本拜会了天皇，并与东条英机会谈。此行虽然没有取得具体结果，但日、汪双方已就修订“基本关系条约”问题进行了交涉。

8月19日，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了解实施对华新政策后的中国沦陷区实况，为修改“基本关系条约”作准备，特派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华。他访问南京、上海、北平以及中国东北各地，与汪政府要人进行了会谈。9月21日，汪精卫、陈公博受日本政府邀请秘密赴日，商谈修改“基本关系条约”问题。汪、陈会见了天皇，并与东条英机、外相、大东亚相、海相等进行会谈。东条表示：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目前，将努力取消各地特殊化的情况，以加强汪政府的权力[72]。日汪间基本商定了修订“基本关系条约”的原则。

汪精卫回国后，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继续进行谈判。10月13日，谷正之将日本政府草拟的“新约”共五款面交汪精卫，该约“将二十九年所签之各项条约及附属文件完全取消，即驻兵及各地特殊现象、经济上之优先要求均取消”，但“中日满共同宣言仍然有效”，并且“条约所规定者，均须和平实现后始能实现”等[73]。汪精卫等认为：这个方案乃是“望梅止渴”，提出“除撤兵须待战争终了始能实施外，其余在全面和平实现前也宜逐步实施，即一面高悬理想，一面仍宜改善现实也”[74]。自15日起，日、汪双方就“新约”草案三度进行会谈，汪方参加者有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周隆庠，日方参加者有谷正之、太田参事官及清水书记官，最终达成了协议。2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了《汪日同盟条约》。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代表双方正式在南京签署该条约及附属议定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2．“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3．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4．宣布“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一切附属文书等一并失效；5．规定“日本国约定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日本国军队”，“放弃”在中国的驻兵权等[75]。

《汪日同盟条约》被日、汪吹捧为“中国近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平等条约”。签约前夕，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条约修改如果成功，则吾辈对民族、对国家、对千秋万代均有交代，此心质诸天地鬼神无愧怍矣。”[76] 汪精卫则在庆祝《汪日同盟条约》签署大会上发表长篇训词，颂扬条约“在中日关系开一纪元，在东亚开一新纪元，中日两国从此以后，完全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结成永久友好关系，以共同致力于大东亚之建设”[77]。而陈公博直至战后接受审判时还在辩解：“同盟条约内容内，已取消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所谓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返还中国。所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了。”[78]

但是，不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吹嘘，汪政府的头目们如何辩解，这终究是一个骗局，就在签约的同一天，汪精卫和谷正之又互换照会约定："现在中华民国所存既成事实，如鉴于本条约之旨趣，须调整者，应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准据条约之旨趣，加以根本的调整。虽在战争状态继续中，应按照情形所许，逐次由两国间协议，准据本条约之旨趣，加以所要之调整。"[79] 也就是说，只要战争状态不终了，日本侵略军即可自由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履行条约，或根本不履行条约。

日本政府在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同时，也在南洋各国占领区推行一系列"新政策"，以确保石油、橡胶、锡、钨、奎宁等特殊重要战略物资的掠取。汪政府追随日本之后，也与南洋各国的傀儡政府发生了某些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就占领了泰国南部和首都曼谷，并于1941年12月21日，以武力逼迫泰国签署"同盟条约"，日军由此以泰国为基地，南进马来亚，北攻缅甸。在日本政府的"媒介"下，汪政府曾派员赴泰"宣慰侨胞，与泰国朝野颇多联络"。1942年7月，泰国外交部长华达刚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互相致电，彼此正式承认[80]。

缅甸原为英国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军占领。1943年初，日本在缅甸推行"新政策"，决定改直接的军事占领为"承认"缅甸"独立"，扶植傀儡政权实施统治。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巴莫出任新政府"总理"，并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日缅"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进行全面合作"[81]。同日，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电巴莫，承认缅甸傀儡政府，并称"大东亚共荣圈内，又加入一独立国家，相互合作，前途益见光明"。

在菲律宾也和缅甸一样，1943年10月14日，日本菲律宾方面陆军最高指挥官声明撤废"军政"，承认菲律宾"独立"，由洛勒尔任"大总

统”，并于同日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次日，汪伪政府致电菲律宾傀儡政府加以“承认”[82]。

对于印度，日本政府利用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扶植亲日派的“印度独立运动”。1943年10月21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在昭南成立，由鲍斯任主席兼军事及外交部长。2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承认该政府，鲍斯成为日本军部掌握的又一傀儡。汪政府追随日本由宣传部长林柏生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独立”运动[83]。

在此前后，汪政府还奉日本政府之命加强了与“满洲国”的联系。1942年5月4日，汪精卫以汪政府元首身份访问“满洲国”，并会见“满洲国”皇帝溥仪。6月初，“满洲国”特派国务总理张景惠为特使访问南京。1943年4月，汪政府委派周佛海为特使，视察“满洲国”各地方产业建设，并与“满洲国”当局“作坦白之恳谈”。随后汪政府又先后在奉天和哈尔滨设置“总领事馆”[84]。

1943年11月初，日本政府在东京发起召开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日本政府首相东条英机、泰国政府总理代表温华达亚肯亲王、“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总统”洛勒尔、缅甸“总理”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以及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由东条英机任议长，由于日本政府的有意安排，汪精卫在会议上的地位名列各傀儡头目之首。他在会上称颂：“先进国的日本，已将他独立自主的光辉照耀于世界，如今还要东亚各国都得到独立自主，不惜加以援助，使之团结一致”，表示要出其“全力”，与“各新兴国家”“奋力齐驱”，“把英美所扶持的榨取政策、垄断政策，根本予以消灭，另创造出一个合乎人道的新天地”[85]。

6日，由日、汪、满、泰、缅、菲六国共同签署了《大东亚宣言》，确定并公布了“大东亚各国为互相提携完遂大东亚战争，解放大东亚于英美桎梏之中，完成其自存自卫”的五项纲领：1．“共同确

保大东亚之安定，根据道义以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2．“互相尊重其自主独立，求互助敦睦之实，以确立大东亚之荣睦友谊”；3．“互相尊重其传统发展，发挥各民族之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之文化”；4．“在互惠之下紧密合作，文革谋求其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之繁荣”；5．“与友邦敦睦交谊，消除人种差别，普遍进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之发展。”[86]

日汪吹嘘这是一次“划时代的盛会”，“代表着东亚十亿人民”，取得了“惊人的收获”，“不但将使东亚民族的团结更趋巩固，且将在世界造成一稳定的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使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都能从英美铁蹄下反抗起来，根本推翻英美的统治，而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87]。在表面上，“大东亚会议”将日汪关系的调整推向最高潮，而实际上，这仅是连遭挫折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玩弄的又一场骗局，是“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破灭过程中的一曲挽歌罢了。

五　汪政府“统一”沦陷区的活动

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诚意”，“树立”汪政府的“中心势力”，即肯定汪政府在各傀儡政权中的领班地位。

汪政权建立后，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成为凌驾于汪政府之上的“太上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日本驻各地特务机关及其派出的“联络员”更是颐指气使，汪政府大小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随着太平洋战局的逆转，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日本对华战略的要求。日本军国主义的决策者们已经感觉到给予汪政府以某些有限度的“独立”与“自主”，对于“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之综合战力”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内容之一，就是“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等[88]。

但是，日本政府的这一决策是上层统治集团根据战局的剧变匆忙决定的，并未和驻中国沦陷区军方进行充分酝酿。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政府）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畑俊六大将直率指出：此为"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副总参谋长兼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武官落合甚九郎少将则向大本营提出反对意见，指出："国民政府（指汪政府）很不可靠，如果不改变国民政府的性质，以其薄弱的力量，只能起阻碍我方作战的作用，甚至有崩溃的危险。"[(89)] 日本驻华占领军方面几乎一致的看法是："日华合作并不是扶植和加强国民政府那样简单的事情"，"以为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就能争取民心，是完全不了解占领地区和国民政府实际情况的臆断。"[(90)]

然而，日本最高统治集团既经决策，便执意坚决贯彻。1942年12月24日，日本军部电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以及各军参谋长返回东京，专门解释对华新政策。陆相严厉指出：对华新政策"要排除万难贯彻到基层，彻底执行，特别要努力转变下级人员的思想，如果在执行中遇到阻碍，可采取人事上的措施，或按军纪予以处分。军纪的整肃、军队的威严为强行本方针的基础。军队应回到本来职能方面去，专心于作战的准备。倘以治安警备为借口干涉政治，军队将会堕落。国民政府虽有弱点，但过于干涉反而会削弱其政治力量。望与当地各机关密切联系共同努力。"[(91)] 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也指出：要断然执行天皇的旨意，并解释说："避免干涉，不等于完全放手不管，而是要军队处于后援地位予以推进的意思。"[(92)] 这表明日本军部将不惜以"整肃"军纪来制止反对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表示：决心尽全力执行方针。畑俊六总司令也无可奈何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仅有的最后一策，成败尚属疑问，但既经御前会议决定，我等谨遵执行。"[(93)]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则表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他在华北各兵团参谋长及主管政务人员会议上指出："过去日本方面，尤其是一部分军队在行政、经济方面采取了无视中国方面的立场，挫伤其自主性的过火态度，应予改

正。”[94] 经商定，日本驻中国派遣军计划在1943年3月以前完成准备，至7月底完成日、汪在这方面的“调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汪政府开始了“统一”沦陷区的活动。汪政府“还都”南京后，名义上虽号称“中央政府”，但实际“统辖”地区只限于上海、南京两市和苏、浙、皖、赣等省沦陷区，以及广州、武汉及附近的狭小地区，为一区域性的地方政权。日本直接控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着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和冀、豫、鲁、晋等省沦陷区，形式上虽属汪政府领导，事实上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而“蒙疆自治政府”管辖着绥、察等省沦陷区，更是独立于汪政府之外，俨然“满洲国”第二。此种状况，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实行“分而治之”策略的结果，它们在各地扶植傀儡，由各地驻军直接操纵，并有意使之互相摩擦，互为牵制，以便于控制、利用；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军阀和财阀内部、中国汉奸卖国集团内部的利害矛盾和冲突的反映。这种局面对于日本统治占领区曾经是有利的，可是在新的形势下则不能符合日本侵略战略的要求了。日本侵略者这时需要一个“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为它看守后方，搜刮财物，把中国沦陷区建设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于是，改“分而治之”为“以伪制伪”，扶植汪政府“统一”沦陷区，便成为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的重心之一。

1942年12月，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了“调整”汪政府对地方政府关系的具体措施，强调要“加强”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消除中央和地方之间无意义的摩擦，感情用事”，“酿成融洽的气氛，使中央和地方一起成为更新中国的构成部分，同心协力为完成战争而迈进。”并具体规定：1．“省政府以下各地方政府的人事，一任中国方面自由处理，帝国不加干涉”；2．“省政府以下的施政”，除作战、警备方面外，“应广泛委之于中国方面，有效地运用中国方面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促进其依靠自己主动的行动，加强政治力量及积极地对日作战”；3．“帝国帮助中国方面，贯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的政令”，“防止由于下级部门的抗拒而使中国方面的行政系统似有中断现象”等[95]。同时，对于汪政府同“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及海南岛、蒙疆地方傀儡政权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

汪精卫及其一伙得到日本军部的“册封”，顿感身价百倍。在“参战”的第二天，汪政府行政院就召集全国高级行政长官会议，着重讨论“参战”后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战时施政对策。汪精卫一伙最为不满的，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自成一体，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武汉、广州之不能实行国府统一管理，因为战争关系，接近前线，尚可理解，而华北俨然独立国，最不能令人信服”[96]。“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更为汪精卫集团所不容，必欲去之而后快。1940年6月9日，王揖唐接任委员长之职后，自称“外臣”，一切惟日本主子之马首是瞻，依靠着日本华北方面军撑腰，处处与汪精卫政府作对。

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建立后，立即决定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双管齐下”，试图在“统制经济”的口号下，掌握华北经济的指挥权；在一个主义（大亚洲主义）、一个党（汪伪国民党）、一个领袖（汪精卫）的旗帜下，从思想方面“统一”华北。1943年1月20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导演下，华北法西斯主义团体新民会举行第二次全体联合协议会，宣言“拥护国府参战方针”，与汪精卫领导的“东亚联盟运动”实行合作，同意在华北也推行“新国民运动”；并改组了新民会人事，由朱深代替坚决反汪的王揖唐继任会长，“推戴”汪精卫为该会名誉会长，汪精卫立即复电同意，标志着汪派政治势力向华北沦陷区的进一步渗透。

2月，汪政府在日本方面支持下，采取了实行华北“中央化”最关键的行动，逼迫王揖唐辞职，改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当时王揖唐身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汪政府中央考试院长两职。汪精卫首先逼迫他辞去考试院长一职，他们制造舆论说：“王揖唐先生就任华北

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新职已久，因年事已高，政务繁忙，实难应付，原有之考试院长一职，理当自行让出，俾使位置他人。”但王装聋作哑，不予理睬。汪进而命人通知王，考试院长一职非辞不可，并内定由陈中孚继任，但王依然置若罔闻。汪精卫最终只好“摊牌”，去电命王“即辞考试院长职”。王揖唐只好照办，但又要求保留他任考试院长时支领的一笔“机密费”。正当双方为此争执之时，王揖唐的老政敌王克敏把握时机，在北平刮起一股“倒王”风潮，指控王揖唐“贪污渎职，废弛公务”[97]。经日方派员调查，认为情况属实，便指令汪政府加以撤换。2月8日，汪政府批准王揖唐辞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考试院长职务，明令由朱深继任委员长，为汪精卫“统一”华北扫除了一个障碍。

2月9日，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悬挂五色旗，改悬汪政府使用的“国旗”。这一行动被汪政府吹嘘为“从此不但在实质上，并且在形式上表现了南北的统一”[98]。3月30日，为了协调南北的“剿共”行动，“华北政务委员会”设立了“华北剿共委员会”，为政府、新民会、军方三位一体的总力战机关，在北平设总会，在华北各省、市、道、县设各级委员会。8月5日，汪政府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荣臻兼任该委员会专任委员，以协调双方的行动。6月26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由张心青任处长。7月2日，朱深因病逝世。5日，日本占领军用飞机将王克敏从青岛接回北平，继任委员长。14日，他赴南京“晋谒”汪精卫，报告就职经过，并讨论“华北今后庶政措施”。他在南京接见记者称：“华北为中央之华北，华北政委会系属国府统制下之机构，今后一切庶政措施，自当秉承中枢意旨办理。”[99] 10月4日，汪政府任命胡毓坤为军事委员会驻华北特派委员，以“统一中央军事机构，确保地方治安”。11月11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修正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法》，将该委员会原六总署二厅改组为治安、经济、农务、工务、教育五总署及总务、内务、财务三厅等。在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后，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是得到了加强，表面上该委员会已“归顺”中央，但实质

上由于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严密控制，其独立王国的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汪政府推行“统一”沦陷区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淮海省。多年来，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之间辖区的划分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1939年日汪双方在组建汪政府的谈判中，汪精卫就反对日本华北方面军提出的华北疆界案，不同意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辖区朝南延伸至安徽和江苏北部。对此，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华北疆界南延至山东省为限，即将原由伪临时政府管辖的华北、华中接壤地区归汪政府管辖。

1940年3月，“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其组织条例规定：该委员会“负责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管辖地区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由国民政府委托的各项任务，并监督其管辖下的各省市政府”；同时又对内发出指示说：“临时政府时期管辖区域内实施的政治、经济、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一如既往进行处理，不得因设立委员会有所变更”，并不理睬汪政府的立场[(100)]。为此引起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间围绕着江苏、安徽、河南交界的淮海地区的管辖权问题不断发生争执。在汪政府方面，因淮海地区接近南京，富有农产品、盐、矿产资源，又是铁路、运河等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势在必争。而华北日军则采取“舍名求实”的态度，“表面上虽然作了很大让步”，但“有关接壤地带的所有工作”仍“全部委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承办”[(101)]。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方才作出有利于汪政府的决定。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处理纲要》，将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划分为两部分，规定：“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河南北部，在目前仍维持现状，徐海道及淮北地区在1942年初从华北分离，改为国民政府（汪政府）的直辖区域。”但仍将淮海地区列为特殊地域，继续保持华北日军在该地区的巨大势力，《纲要》同时规定：该地区“有关中国方面政务的幕后指

导，应受总司令官的指挥，而通过特务机关执行工作”，而“苏北特务机关及海州特务机关，仍隶属于徐州兵团（华北方面军），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该地区经济指导工作仍“由华北方面承担”，并“暂准为‘联银券’流通地带，继续保持现状，以缓和徐海道金融的急剧变化，并防止由于‘联银券’的不稳定引起全华北的动摇”；在物资流通方面，“尤应考虑华北的需要（主要为农产品），为确保其需要，应采取特殊的措施”；该地区的华北新民会组织虽予以撤销，“但对其人员，应由推行中国方面（汪伪）政策的东亚联盟组织尽可能予以吸收”等[(102)]。

据此，自1942年1月1日起，原属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管辖的苏淮地区移交给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军。后台易手之后，汪政府才敢有所动作。1942年1月15日，汪政府设置直辖行政院的苏淮特别区，辖区包括江苏的徐州、铜山、丰县、沛县、砀山、邳县、萧县、宿迁、睢宁、东海、灌云、沭阳、赣榆、泗阳、淮安、淮阴、涟水、阜宁；安徽的宿县、泗县、灵璧、亳县共一市二十一县。2月19日，在徐州成立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由郝鹏举任行政长官。这个所谓特别区，虽然在行政上已归属于汪政府，但根据日本军方意见，“为了防止因急剧变动引起人心动摇”，该地区的“财政、治安、教育、交通通信事业、通货等仍保持现状，并使之继续发展”[(103)]。因此，该地区的归属问题从根本上仍未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后，汪政府再次向日方要求彻底解决苏淮特别区的归属问题。1943年1月18日、19日，汪精卫亲临徐州视察，表明汪政府决心染指这一地区。1944年1月13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苏淮特别区改称淮海省，设省府于徐州，由郝鹏举任省长兼任省保安司令、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2月19日，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宣布自3月1日起在淮海省停止发行“联银券”，但不禁止流通。4月进而实行“中储券”与“联银券”的全面兑换，规定一切公用开支及银行存放款必须采用“中储券”，至10月“联银券”禁止在市面流通

[104]。汪政府取得了淮海地区的金融统治权。当然，日本侵略军是不可能让汪伪政府真正实现华北和华中的“统一”的，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华北华中一体化问题上仍是一个悬案”。

汪政府推行“统一”沦陷区活动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调整”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关系。“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侵略军利用德王等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在晋北、察南、绥远地区建立的傀儡政府。1937年11月22日，由“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穆楚栋鲁普（下称“德王”）任主席，以黄、蓝、白、赤四色旗为“国旗”，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以张家口为“首都”，是中国沦陷区内又一“国中之国”。

1941年春，日本中国占领军当局为了确定两个傀儡政府间的关系，由汪方代表周佛海等和蒙疆方面代表李守信、关口保（日人）等在青岛举行秘密谈判，并由周佛海和李守信代表双方签署了《协定书》。主要内容是：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承认汪政府“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重庆政权无论是在法理上，实质上已降为地方政权”；二、汪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地方政权，鉴于历史的、国防的、经济的重要性，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全面施政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高度自治”等。在附件中还规定：汪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使用四色七条旗为其政权标志，并同意其在长城各口驻兵[105]。

这一协定是在日本占领军方面的压力下签署的。对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来说，承认汪伪政府的“中央”地位虽属表面文章，但与以德王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向谋求的“蒙古独立建国”意愿是相违背的，引起强烈不满。德王曾说：“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儿子，但不能做他的儿子的儿子。”德王等对协定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汪政府

对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政务丝毫不能干预。1941年6月，在日本军方安排下，汪精卫以政府主席的身份视察张家口，但遭到了德王的冷遇。他先是称病不见面，后在日本军方干涉下，被迫在家里与汪精卫见面，也只是冷淡地应付，会谈不到20分钟，就不欢而散[106]。

1943年春，汪政府趁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之际，企图将它的“统一”活动推及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地区。汪政府起草了《蒙古自治法草案》，共三章十八条，作为与蒙疆傀儡政府交涉的方案。主要内容是：一、汪政府“尊重蒙古民族之独立、自治、自主”，蒙疆政府“尊重国民政府（汪伪）之职权及其各部、院首长”，“两政府相依为命，完成大东亚圣战之神圣任务”；二、蒙疆政府“在军事行动时间内”，“得国民政府之谅解，特准与日本发生有范围之外交关系”；三、蒙疆政府“应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其职掌系统人事由德王直接支配之”；四、汪伪国民党在绥东、察南、雁北分设国民党省、市、县、区党部；五、蒙疆银行及所属分行，“一律改为中央银行蒙疆区分行，其发行纸币，得重新印刷，额数不得超过八×单位”；六、蒙疆政府辖区内所有之工厂、矿山、铁路等，“其最高主权，仍归国民政府，但在军事时期内，仍由蒙疆自治政府管理之”；七、蒙疆政府军队“一律冠上中央蒙疆区某师等名称”，正规军分别调整为蒙古靖安军、蒙古军、救国同盟军（东亚同盟军）三部共六个师，“以绥远、察哈尔、热河、雁北为作战地区，如遇特殊情况，得调华北区”；八、双方在1943年底以前“组织军事代表团，赴宁、蒙两地参观军事行政（军械、军需、给养在内），并各派代表3－5人组织设立办事处于张家口及南京，直接取得联系”等[107]。这是汪政府向“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行全面渗透、控制的方案。

3月，汪精卫委派“和平建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杨中立将这个草案送到张家口。这一系列举动本来是在日本军部支持下进行的。但日本当地驻军为了防止苏联从北部发动袭击，决定继续加紧对“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直接控制，因而对汪政府干涉他们在蒙疆的既得利

益，“深表不满”。于是，这个汪集团苦心炮制的草案“还未与德王见面，就被日军所否定”，杨中立也被当地驻军顶了回来。同年7月12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会谈时，汪方面再次提出“统一蒙疆”的要求。周佛海说：“蒙疆虽称自治，但另有年号，另有旗帜，俨然为一独立国，盼日方援助，促成中国统一，勿令此分裂状态长此下去”，却未能取得任何结果[108]。

如果说，汪精卫在华北、淮海地区的“统一”活动取得了一些表面的和局部性质的进展，那么，它统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活动是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节　汪政府战时体制的确立

一　高度集权的战时政治体制

汪政府根据日本对华新政策的要求，在“参战”后将其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大大增强了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色彩。

1943年1月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决定向英美“宣战”的同时，通过设立最高国防会议。该会议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由汪精卫任主席，周佛海任秘书长，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揖唐、鲍文樾、叶蓬、任援道、陈群、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为委员。自成立至战争结束，共举行76次会议，由此而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权力集中到汪伪统治集团的少数人手里。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成立后，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都进行了改革，以适应“战时体制”的要求。汪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初设十四个部和四个委员会。1943年1月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改革行政机构案》，主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强化中央行政机构：一、移转管辖，将原隶属于行政院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和新国民运动促进会改为

直隶政府，将原隶属于考试院的铨叙部改为隶属行政院，以利于集中事权。二、裁并部会，将原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为社会福利部；将原粮食委员会改为粮食部；裁撤原边疆委员会，在内政部内设边务局；裁撤原侨务委员会，在外交部内设侨务局，将原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为建设部。三、集中责任，将原行政院内秘书处、参事厅、法制局合并为一，设秘书长一人，综理事务，以“增进行政效能”；将各部原设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一人，改为设次长一人等[109]。经过这番调整，行政院减少了六个委员会，下属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司法行政、实业、建设、宣传、粮食、社会福利、铨叙、陆军、海军共十三个部，机构有所缩减，职权有所集中，是其实行战时政治体制的重要步骤。

一周后，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又通过决议案，将省政府委员制改为省长制。在汪精卫集团看来，因袭原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委员制“责任不明，效率难彰”，已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决定改设事权集中于一人的省长制。主要内容是：省政府设省长一人，“承行政院院长之命，综理全省行政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及各机关”；省政府设政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及保安、警务、经济、社会福利、粮食、宣传、审计、清乡事务等局，承省长及上管命令处理事务；省政府设省政会议，由省长、各厅处局长及参事组成，由省长任主席，主要审议“省令之颁发及单行条例规程之制定”、“增加或变更人民负担”、“地方行政区划之确定及变更”、“全省预算决算”、“处分省公产或筹划省公营事业”、“地方自治监督”、“省政府所属荐任以上官吏任免”及其他“省长交议事项”等[110]。对于县一级政府则强调“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县长”，由县长“综理县政，监督所属职员”。同月，汪政府内政部根据实行“战时体制”的需要，要求“各省政府限期改组县政府，并拟订有关法规”，加强县长的个人集权[111]。

为了稳定所谓“战时治安”，汪政府还进一步强化保甲组织，并编组保卫团，加强对于基层组织的控制。1943年4月1日，汪政府行政

院公布了《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编查"保甲，"严密人民之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治安工作"；各县政府组织"保甲户口编查委员会"，各地方原有之一切自卫组织均应改编保甲；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编组时"不得分割乡镇之一部并入他乡镇"；户口"清查由甲长执行，复查由保长执行，按月至少一次，抽查由区长执行，按季至少一次"，全部工作"由县长监督"；保长、甲长负责辖内"安宁秩序"，"户长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五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为办理救灾御匪，或建筑碉堡公路等事，须多数居民共同工作者，得将保甲内18岁以上45岁以下之男子编成壮丁队，由保长甲长督率分任之"；"保甲内住户有勾结窝藏匪犯或故纵逃脱者，除依法惩办外，凡甲长及曾具切结联保之各户长，应各科以4日以上30日以下之拘留，但自行发觉曾据实报告并能协助搜查逮捕者，免予处罚"等[(112)]。

汪政府在强化保甲制度的同时，还加强"保卫团"的建设，用以"辅助军警维持治安"。其编制分为总团、区团、队、排、班。以五人为班，以甲长为班长，五班为排，以保长为排长，五排为队，以乡长或镇长为队长，五队为区团，以区长为区团长，由县长兼任总团长，"必要时总团得设团务主任，区、队、排、班均得增设副长，以具有军事知识者与技术者为限"。并强行规定："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之男子，均有入保卫团受训练之义务"，其任务"以侦查盗匪及反革命分子或携带违禁物者，水灾之救济，火警之消防为主"等[(113)]。

这样，汪政府从中央、省、市、县到区、乡、保、甲自上而下层层均按战时体制的要求进行改组，形成了较前更为严密的法西斯统治网，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对华新政策，进一步搜刮掠夺沦陷区的战略物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汪政府的"战时体制"还体现在对于军事机构的强化。1942年8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应付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新局面，"充实

军事力量”，通过了《调整军事委员会机构案》。主要内容是：“强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统率权”，进一步确立汪精卫在汪政府军事系统中的独裁地位；改变军令、军政两权分立制为军事委员会集权制，将原行政院所属军政部和海军部改隶军事委员会，“以集中其权力”，“统一指挥及训练”；军事委员会设总参谋长一人，为委员长之幕僚长，“辅佐委员长襄理一切，兼负调整指导部署之责，以谋军务处理之圆满，及建军效率之增进”；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参谋部、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合并为陆军部，“使军令、军政、军训、政训，成为一元化”，另设陆军编练总监公署、军事参议院、海军部、经理总监公署、调查统计部、航空署等[(114)]。

1943年2月15日至17日，汪政府召开全国第二次军事会议，汪伪高级将领集聚一堂，商议“参战期间应如何积极强化国军实力，以巩固大东亚战争之后方治安，并加强训练，充实装备，期于能在前线分担杀敌致果之责任”等[(115)]。随后，汪政府按照“战时体制”的要求，实现军政一体化的原则，逐步实现由汪政府的军事头目去控制地方政权。“军事委员会”驻各地绥靖公署主任一般都兼任省、市长，省、市保安司令，国民党省、市党部主任委员，集数要职于一身，以便集中权力，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

二　“和平军”的扩建与整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前后，日本侵略军和汪政府对于活动在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加强了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在日、汪压力下，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妥协投降倾向明显增长。另一方面，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推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将嫡系部队大部分安置在大西南和大西北，或用于封锁陕甘宁边区，而将所谓杂牌军部队安置在华北、华中、华南与日军交战前线，或在敌后从事抗日游击作战，命令他们积极从事反共摩擦，并在待遇上实行歧视政策。这样就使得这

些杂牌军的将领陷入重重困境：既要与日军在战场上周旋，又要奉命进行反共摩擦活动，武器、弹药、薪饷往往极其菲薄，兵员补充也完全没有保证，难以维持生存，其离心倾向日益增长。在日、汪软硬兼施之下，纷纷叛国投敌。

汪政府属下的和平军由此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发展高潮是“从1942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降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的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67人之多”[(116)]。1943年3月13日，汪伪军事委员会秘密制定《1943年度国军整备要纲暨苏浙皖军队整编大纲》，全面整备日益扩大的武装力量。其方针是：“依中日之协力，迅速整理素质、训练、装备均不完备之现有军队，重建为编制装备充实之新国军，以期增强大东亚战争共同之力量，并准备今后建军工作”；“编制新国军之目标仍在于保境安民，但考虑将来逐渐演变为国防军”；“实行整编，以军事委员会之责任而断行之，当地日军须协助之”；“实行整编之际，严禁秘匿企图，并研究防止动摇之对策，并须注意勿予作战警备以显著之影响。”[(117)] 同年，汪伪军事委员会又拟定《建立新军招募计划》，决定在陆军部设立新军招募处，办理招募士兵之计划、指导、检验等事宜，计划分别从山东、河南、苏淮特别区、安徽（皖北、皖中地区）、江苏（苏北地区）、浙江（浙东地区）、湖北（鄂北豫南地区），共计招募士兵1.4万名[(118)]。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和平军部队主要有：

第二方面军　1942年4月22日，国民党冀察战区冀察游击总指挥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第十三旅及特务旅共二万五千人投汪。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任总司令。6月，经汪伪军事委员会点编，核定该部编制番号如下：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参谋长甄纪印，总参议郭念基。下辖两军五师以及一特务团一教导团，共计三万多人[(119)]。8月20日，原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调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由孙良诚继任。孙本人率总部赴开封

就职，所部分驻山东定陶、曹县及河南濮阳、东明与考城一带，成为当时汪伪集团在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

第三方面军　1943年1月18日，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参谋长徐子珍、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等率部四万余，在山东临沂、沂水地区公开投汪。20日，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山东方面军，吴化文任司令，宁春霖任副司令，郭受天任参谋长，于怀安任第一军军长[120]。7月29日，山东方面军改称第三方面军，仍由吴化文任总司令，成为汪精卫集团在山东地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第二十四集团军　1943年4月23日，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林县临淇镇投敌。5月10日，国民党冀察战区副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庞炳勋在被捕后也通电全国投敌，共七万余人[121]。6月22日，汪伪军事委员会将该部改称伪和平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由庞炳勋任总司令，孙殿英任副总司令，辖第四十军、第二十七军、新编第五军，总部设于汤阴，各部分驻河南滑县、林县等地区[122]。

汪政府除将国民党军三支主力部队改编为和平军外，还收编了其他一些国民党正规军队和地方零星部队，并且将部分和平军部队加以扩编和升格。

1942年1月，汪政府将苏皖边区绥靖军收编为和平军四个师，归军事委员会直接统辖。2月间，又将淮海地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第五旅及第十二旅改组为和平军第三十六师。[123]

1942年冬，汪政府建立豫皖苏鲁边区绥靖司令部，由胡毓坤任司令，驻商邱。翌年又将该部和张岚峰部合编为和平军第二集团军，由张岚峰任总司令，下辖两军。[124]

1943年2月25日，国民党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在湖北咸宁地区被俘投敌，改编为和平军第四十三师，由王劲哉任师长。[125]

1943年3月24日，汪政府取消和平军暂编第十一军李宝琏部、第十二师张启黄部、第二十二师刘相图部、第二十九师邹平凡部的暂编名义，将各部编为和平军正规师。[126]

1943年6月6日，国民党苏鲁战区鲁南指挥部总指挥、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桓率所部四千人投敌，被收编为和平军第十军，由荣子桓任军长等。[127]

在这一阶段，汪政府海军也有所发展。1942年3月，汪政府设立了刘公岛海军警备司令部。7月，复将伪威海卫基地部升编为威海卫要港部，由鲍一民任司令。管辖区域为：北自河北秦皇岛，南至江苏连云港响水口，兼黄、渤两海域，下辖威海卫基地队、连云港基地队、青岛基地区队、芝罘基地区队、石臼所基地区队，拥有海祥军舰、海和炮艇等共八艘。1943年4月，又设立伪海军汉口基地部，由孟秀椿任司令。管辖区域为：长江上游（自湖北宜昌至江西九江）、洞庭湖水域、汉水流域，拥有江靖等炮艇共七艘，任务是“负长江上游水上治安维持之责，并随时随地协同友邦海军，警备江汉各地防务”。至1943年底，汪政府海军共拥有小舰艇共五十九艘，其中吨位稍大者，如海兴、海祥、海绥、海靖、协力、和平等军舰，江绥、江靖、同春、民德、东海、海和、江兴、江复、江东、江亚、江宣、江扬、江权等炮艇，“均系友邦海军本诸东亚道义精神，无代价让渡”的；吨位稍小者，如江平级炮艇十二艘，江一号级炮艇二十八艘，是汪伪集团在“还都”后建造的[128]。

伪财政部税警总团是汪精卫集团的又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独立于汪伪军事委员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自1940年7月始，先后建立了中央税警学校、中央税警团第一支队、第二支队。1943年3月1

日，正式建立伪中央税警总团。先由罗君强任总团长，熊剑东任副总团长。1944年1月，由周佛海自兼总团长，兵力最盛时达二万余，装备较伪和平军其他部队优良，任务“除掌理盐场保卫及盐务缉私外，得由政府命令担任地方警备及剿匪戡乱事宜”[129]。

据1944年度的《申报年鉴》公布的材料：“迄三十二年（1943）底为止，综计国军实力已达四十二个师、五个独立旅及十二个独立团，华北方面有十二个集团军及八个独立旅。”[130] 汪伪和平军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期。

从1944年开始，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日军败迹进一步明显，汪政府的军事力量进入了收缩、整顿的新阶段，其作战重点也逐步转向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几经调整及并编，汪政府和平军正规军的建制在战争结束前夕如下：

第一方面军兼苏州绥靖公署（任援道部），辖有：第二军第一、二师，第三军第三、四师，另有独立旅、教导旅、特务旅，驻苏南、淮南、皖中地区；

第二方面军兼苏北绥靖公署（孙良诚部），辖有：第四军第三十九、四十师，第五军第四十一、四十二师，第九军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直属第三十八师、独立第十九、二十旅，驻苏中、苏北地区；

第三方面军兼蚌埠绥靖公署（吴化文部），辖有：第六军第四十六、四十七师，第七军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师，驻淮南地区；

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辖有：第一军第十七、十八师，第八军第十四、十六师，直属第十五师，驻河南商邱地区；

第五方面军兼开封绥靖公署（庞炳勋部），辖有：第二十

三、五十一师，第十四旅，驻河南新乡、淇县、汲县地区；

第六方面军（孙殿英部），辖有：第十一军第七、八师，驻河南滑县、浚县地区；

徐州绥靖公署（郝鹏举部），辖有：第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五师，独立第七十一、七十三、十八旅，驻苏北、淮北地区；

武汉绥靖公署（叶蓬部），辖有：第十二、二十九师，暂编第五、六师，独立第十三旅，驻武汉和信阳地区；

杭州绥靖公署（丁默邨部），辖有：第十二军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师，独立第十师，独立第四、六旅，驻浙江地区；

广州绥靖公署（褚民谊部），辖有：第二十、三十、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师，驻广东地区；

中央警卫军（陈公博兼军长），辖有：警卫第一、二、三师，驻南京地区；

独立第十一军（富双英部），驻兖州地区等。[131]

除此而外，汪政府还加强了壮丁训练，以进一步扩大其武装力量的后备军。1944年2月，汪政府拟定了《壮丁训练计划》，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全国壮丁训练委员会，由陆军部和内政部共同组织，“以训练全国适龄壮丁，完成协力大东亚战争之准备为目的”；“凡有中华民国国籍而未具备免训条件之适龄男子，均有参与壮丁训练之义务”等[132]。

随着战争的临近结束，国内各种矛盾尤其是国共两党间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国民党当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接受汪政府要员和军事将领的“输诚”，各地和平军与国民党有关战区前沿部队互相联络，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根据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材料：到

1943年8月全国62万伪军中“百分之九十（56万）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133]。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伪军的人数上升到占其总数的95%[134]。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汪政府和平军的穷途末日已一天天临近。

三　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

日本政府为适应同美英进行决战的需要，不仅推行对华新政策，而且实施“大东亚经济体制”，以确保日本“占领圈内自给自足的战争经济”。为此，他们要使中国沦陷区成为“大东亚战争进行中的兵站基地”，明确规定日本对华新政策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135]，要求在中国沦陷区“取得为完成帝国的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确保军队的自给，并有助于维持民生，谋求于占领区域内重点地并有效地取得重要的国防物资，同时积极地获得敌方的物资”[136]。

太平洋战局出现的新形势，使得日本侵略军在战争前期实行的“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抢劫式掠夺难以继续实施。1942年11月27日，日本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发言，指责那些主张在沦陷区囊括一切的日本军方人士说：日本对美英之战“如果战胜，美英势力自不能在中国复活，故在今日，似无囊括一切，尽归我有，连根拔尽之必要。万一战败，无论今日如何搜罗，结局总归乌有，现在之先决问题在赢得战争，其他不足考虑”。他直率指出：“在华经济统制现在都是日本人在搞，日本社团获得暴利，是否可以交给中国人去办”[137]。这种主张为日本统治集团所采纳，他们决定变换统治手法，在保证日本军事需要的前提下，同意给汪政府以较多的“自主权”，并由其出面推行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

1943年1月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首先决定将原隶属行政院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改为直接隶属于政府，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自兼委员

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为副委员长，行政院外交、财政、实业、建设、粮食各部部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农务、工务各署督办为当然委员，其职能也从原来的经济政策审议扩大为经济设计、计划、咨询、审议和调查，成为汪政府推行战时经济的领导机构[138]。

2月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又通过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拟定的《战时经济政策纲领》，主要内容包括“增加生产”、“调剂物价”、“节约消费”、“稳定币值及调剂金融”、“改造经济机构”等五项。该纲领提出要“使军需及主要民需工业之原料及燃料能得最便利之供给”；“以严格的法律制裁取缔投机及居奇”；“健全金融机构，使金融力量逐渐集中，以与经济政策其他部门相适应”等，并特别强调：“各种旧有经济机构，不适合战时经济体制者，一律予以调整或改组”；“各种产业部门，自生产以至于配给之各个阶段，务使其联合组成一贯的机构，作计划的运营”；“各种健全的产业机构，得在政府的指导监督之下，为自治的统制”；“各种主要产业得在政府的指导监督之下，施行团的经营制度”[139]。这是汪政府推行战时经济的纲领性文件。汪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由金融统制、物资统制、产业统制三大支柱组成，三者互为联系，共同支撑战争后期汪政府在沦陷区的经济统治。

金融统制，是汪政府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的必要前提。首先是强化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的战时金融网，统制中国沦陷区的大小银行。1942年9月，汪政府财政部操纵太平洋战争后已落入日本军部之手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复业，使其“辅助中储行，完成安定金融之使命”[140]。1943年又改组中国国货、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家银行，将其中所谓“官股及商股中的敌性弃权股”由汪方接收，“无偿让渡于中储银行”，并派员监察，使四行“置于中储银行的领导之下”[141]。其次是在日本军部支持下建立以中储券为中心的“新货币体系”。1942年5月，汪政府财政部首先宣布“中储券”为江苏、浙江、安徽及南京、上海之“惟一法币”，禁止法币的流通，随后又推广至广

东、厦门两地。1943年4月，日本军方宣布停止军用票的新发行，“中储券”逐渐成为华中和华南的惟一通货，12月后又推广及淮海地区。汪政府战时金融网和新货币体系的建立，加强了他们对于沦陷区经济的实际控制力，为其推行物资统制与产业统制奠定了基础。

物资统制，是汪政府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的核心，也是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新政策在经济方面的基本目标。1943年3月11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设置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16日，该总会在上海建立，作为实行物资统制政策的执行机关。日本驻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指出：“把统制主要物资流通工作从日军移交给中国方面，希望尚未充实政治力量的南京政府来办，这一件事本来就是认为有些不合理的。但是事实上日本政府从培植和加强中央政府这一对华新政策的观点出发，期待着它的政治效果，才决心这样做的。执行这一政策的中心机构就是全国商业统制总会。”[142]

该总会初隶实业部，后改直属行政院。由唐寿民任理事长，闻兰亭任监事长，由一批依附于日汪的上海大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组成[143]。其主管事项为：“统制物资之收买配给”、“各地域物资交换之营运”、“输出物之供给”、“输入物资之配给”、“军需物资之采办”、“实业部及其他主管部指定或委托事项”等[144]。3月20日，汪政府又设立物资统治审议委员会，由汪政府有关部长、日本经济顾问、日本驻南京“大使”及驻华海陆军代表组成，周佛海任委员长，任务为“督导商统会完善地运用其机能，强化物资统制”，是商统会的审议、监督机关，并负责与日方的联络[145]。4月13日，汪政府又决定设立物资调查委员会，为调查统计机关，由日汪两方有关机关共同组织，陈公博为委员长，任务为“彻查上海中外商民非法囤积大量主要物资”等情况[146]。以上三个机构是汪政府实施物资统制的主要机构，其中商统会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

商统会之下陆续建立了由日汪联合组成的四个专业委员会作为核心组织。它们分别是：粉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仲立）、棉业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上达）、糖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江帛）和油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子彝）。下辖由实业部主管的火柴、化工、毛纺织、皮革、百货、皂烛、金属、玻璃、酒精、麻、丝绸、烟、棉花、棉制品、电器、煤、橡胶业十七个同业联合会以及由粮食部主管的茶、食用油、蛋、畜产、糖、杂粮、面粉业七个同业联合会。

商统会建立后，接替原日本兴亚院在华机关，主持实施经济统制。其主要活动是：一、实行物资移动签证管理。首先在苏、浙、皖及上海、南京三省二市实行，物资多达三十七种，几乎包括全部生活资料、工业原料、燃料、运输工具和通讯器材。禁止一切物资运往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准兵器、弹药、火药、鸦片等物资移动，米、麦、豆类、棉花未经许可不准运进上海，汽油、机械、金属、药品、棉纱布及其制品、火柴、肥皂等十二种物资未经许可不准运出上海，并对人员出入上海随身携带的物资数量作了严格规定等[(147)]。二、实行物资登记。为了掌握物资情况，便于“限价收买”，防止物资拥有者隐匿不卖，首先从棉纱棉布开始实施登记，后推及化学工业品（包括原料、西药、颜料、染料及酒精）、毛纤维及制品、茧、丝及丝制品、工业油脂及制品等共十九种物资[(148)]，其“存贮买卖制造”必须登记，“主管官署得随时派员检查仓库，及公司行号主要商品之存货”[(149)]。更制定《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对于违反规定而避不登记者，处以罚金、判处徒刑乃至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厉处罚。三、实行棉纱棉布的统买与配给。作为“防止中国经济崩溃”的紧急措施，对沦陷区市场上的棉纱棉布实行“强制购买”，收买价仅达当时市价的四分之一，如有人拒绝或妨碍收买，将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罚金。强购所得大部分运往日本，少量配给市民[(150)]。四、实行粮食统买政策。汪政府接管了原日军军需米区域，统一实行粮食收购，在日汪军事力量支持下，进行空前巨大的粮食搜刮活动，收购范围包括米谷、麦子、面粉、豆类、杂粮、油料等。在清乡区采用所谓“分担制”，实行赤裸裸的摊派，在非清乡区采用所谓“收买

制”，以低于50%的价格实行强行收购。1943年的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151]。五、实行口粮及日用品的配给制度。先是“计口授粮”，后推而及于香烟、火柴、肥皂、食盐、食糖、食油、煤球等，均按户口实行配给等[152]。

1944年6月，日本政府为了操纵汪政府更有效地推行经济统制政策，掠取物资，又对商统会进行了改组，在商统会下设米粮、棉业、粉麦、油粮、日用品五个统制委员会，由袁履登（陈国权暂代）、闻兰亭、孙仲立、陈子彝、罗纳斋分任主任委员，主持实施物资统制政策，商统会则改为指导监督机关[153]。名义上，各统制委员会直属汪政府行政院领导，实际上通过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日本方面加强了操纵和控制。日汪推行的物资统制政策，完全超越正常的经济规律，依靠政治、军事强力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不仅为日本侵略战争保障了供给，而且掩饰了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战略物资的丑恶面貌，起到了日本商人在日军枪杆子下强制收买物资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产业统制，是汪政府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其主要形式是调整由日本资本完全控制的“国策公司”与日汪合办的“子公司”间的关系，表现为调整华中振兴公司与其附属公司华中铁道公司、华中轮船公司、华中矿业公司、华中盐业公司、华中蚕丝公司、华中水电公司、华中电气通信公司、淮南煤矿公司、上海内河轮船公司等之间的关系。各子公司由日本“将各地中国人的企业加以合并而组成，固定资产作为华方股本，日方主要以流动资金作为股本。形式上华方股本占51%，日方股本占49%，而实际上许多公司日方股本占70%－90%以上，这些中日合办的企业，表面上向汪政府注册，作为中国法人，由中国人当董事长，但实际上营业权完全操纵在日本人之手，中国人的董事长完全是个傀儡。”[154]

1944年3月30日，由汪政府实业部长陈君慧、建设部长陈春圃与日本驻华“公使”堀内干城、华中振兴公司总裁高岛南次郎签署《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日合办公司间业务连络要领》及《中日合办各

国策公司调整通则》[155]。这些文件在表面上扩大了汪方的控制力，如规定“中日合办各国策公司应受国民政府主管部之直接指挥监督”，其组织经营管理“应遵照中国法令办理”；“中日当局对各公司有改进意见时，经双方协议后，由主管部发布部令，日本大使馆对各公司不以命令行之”；“振兴公司对各公司经营上有意见时，应征询主管部同意，俟决定由主管部发布部令行之”；“服务于各公司之职员，其待遇规程，应一律平等”；等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军部放弃了对于沦陷区中国产业的严格控制。在同一文件中明明白白规定着：各国策子公司在章程变更、资本构成变更、年度资金资材计划及其变更、预算决定及变更、董事长、副董事长、业务董事选解任、决算及利益金处分等公司运营的关键问题上，必须“预先与振兴公司总裁协议，得其谅解后，再行讲求必要之处置”，还规定各子公司应随时向振兴公司报告其营业状况，并就经营问题与振兴公司“作紧密之联络”，这表明日本财阀仍然控制着各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所有重要环节。

日本侵略军在这一时期玩弄的另一阴谋，是所谓的“归还”日本军管理工厂和“移交”英美在华产业。在沦陷区将所有华人经营的稍具规模的工厂强行接管，交由日本商人经营，称为“军管理”。据《申报年鉴》（1944年度）统计，此种工厂在苏浙皖沦陷区共有140家，内纺织厂67家，其他工厂73家[156]。1940年3月，汪政府成立后即向日方要求“交还”，日本占领军开始改换方法，逐步解除“军管理”，其中一部分发还中国资本家，三年中共有60家。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后，为了拉拢沦陷区的中国资本家，决定将所谓“军管理”工厂全部发还，并将华中蚕丝工厂解散，将所谓有丝厂、绸厂都交还中国业主经营。1943年2月至10月，日本军方还分三批向汪政府“移交”被日军没收的英美在华产业，共1551件[157]。

1944年5月，汪政府还在中国沦陷区发动所谓的“收集废金属运动”。汪伪行政院制定了《收集废金属办法》，规定“以新国民运动促

进委员会各分、支会及当地行政机关为主干，督饬各区公所办理”，其收集范围是：“凡一切建筑物内外非必需之金属设备，确可收集而无妨碍者”、“凡一切非必需之金属物品，确可收集而不妨碍民生者”、“凡破烂废弃无用之金属”及“破坏废弃而不能应用之机轮、车轴、路轨、自来水管”等，均在“收集”上缴之列[(158)]。这是对中国沦陷区人民的一次空前的浩劫，也反映了走向败亡的日汪在战略物资方面的奇缺。

直至战争结束，汪政府实际上始终未能对其统治区内的产业实行有效的控制。所谓的产业统制以及“交还”军管理工厂与“移交”英美在华产业的花样，在更大意义上是对日本财阀垄断中国沦陷区经济命脉的掩饰，只是这种垄断行径在形式的某些方面改日本军队直接操纵为经由汪政府的间接控制罢了。

四　以“新国民运动”为中心的战时文化体制

汪政府在实施战时政治、军事、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推行所谓“战时文化教育体制”。该体制以开展“新国民运动”和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为中心。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汪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就决定在沦陷区开展“新国民运动”，作为思想文化方面巩固汪政权的重大措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运动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宣传阶段。

1942年元旦，汪精卫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八点要求，其核心是要求沦陷区人民把“一切一切的自由”，“统统收起来”，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以培植适合于“大东亚战争”需要的所谓“新精神”[(159)]。1942年7月1日，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由汪精卫兼任委员长，以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为秘书长。以后又先后在安徽、浙江、江苏、广东、湖北、上海、南京、汉口等省市建立分会，由各省市行政首脑兼任分会主任委员。“新国民运动”进入了组织训练阶段，并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青少年身上。汪政府仿效德国组织

青年挺进队和日本组织青少年团的做法，“选拔有觉悟之青年学生，就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予以根本之训练与改造”，“逐渐推广、普及于一般民众”[160]。

7月4日，该委员会在南京举行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新国民运动第一期组织训练计划大纲》、《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青年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161]。7月9日，由汪政府颁布《新国民运动总动员令》。10月14日，又颁布并实施《中国青年团暂行总章》和《中国童子军暂行总章》。12月29日，更由汪政府明令组建“青年模范团”。该团宗旨是：“集结优秀青年施以最严格之训练及最严密的组织，使其坚守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与大亚洲主义之信仰，具有勇猛精进、刻苦耐劳之精神，及丰富切实之知能，俾成为青年团童子军之模范，推行新国民运动之中坚，服从领袖、推行主义、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之劲旅。”其成员从所谓“体力健全、知力充足、生活严肃、思想纯正、能刻苦、能力行、志愿以毕生心力为国家为东亚而奋斗之优秀青年”中选拔作为“预备团员”，“经各项训练合格”后成为“普通团员及基本团员”，派任为“青年团”、“童子军”各级指导人员[162]。该团“尊奉领袖汪先生为最高统帅”，以团本部为最高组织，团本部下设三个联队：第一联队驻南京，周学昌任指导委员；第二联队驻广州，陈耀祖任指导委员；第三联队驻武汉，杨揆一、张仁蠡任指导委员。该团成为汪伪政府推行“战时文化教育体制”的别动队。

1943年1月9日，汪政府决定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由行政院划归汪政府直辖，提高了它作为战时思想文化统制机构的权威性。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奉行领袖训示决议》，决定在沦陷区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以深切认识“完成大东亚战争”之意义、“树立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之中心势力”、“使总力参战之意识普及而深刻化”、革除“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之恶习”、“普及国家集团主义之正确意识”、“完成战时体制下之国民基本组织”等为七大目标[163]。据

此，汪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于青少年的“思想训练”。同月，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正式成立并招生，至6月已开办四期，“集训”学员309人。在校学员一律仿效德国青年挺进装束，身穿青黄色服装，头戴橄榄形歪帽，实行军事编制，受训项目分精神教育、思想训练、军体训练、劳动服务、生活训练、工作指导、技能训练等。林柏生在校中大搞对汪精卫的偶像崇拜，每日晨操时都高呼“汪主席万岁”，甚至让学员一听到“领袖”两字就立刻“肃立”，并逐步将这种做法推向整个沦陷区(164)。

6月1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进而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详尽规定了“战时体制”在思想、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要求，形成汪政府战时文化体制的完备形态。其实施也由以青少年为重点转而推向整个沦陷区社会。《纲要》规定“战时文化教育体制”的“基本方针”是：“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要求在整个沦陷区“激扬举国一致之战时意识”，“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

据此，《纲要》规定了实施“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的七项方针：

一、“认定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为一切东亚理想实现之前提”，以完遂大东亚战争为战时文化宣传之最高目标；

二、“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思想”，“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转移沦陷区人民反日斗争之锋芒；

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之扰乱，扫除阶级斗争之毒素”，以所谓“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来摧残沦陷区人民反日斗争之意志；

四、“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自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使沦陷区人民成为日本侵略者安分守己的顺民和俯首贴耳的奴隶；

五、“统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纠正“盲目崇外排外之错误思想”，意在磨灭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统合”到汪集团的“共同意志”之下；

六、在“普及科学教育”、“发展中国实业”的幌子下，“协力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七、“集中文化人才，团结文化力量，调整文化事业，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等。

根据这些方针，汪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充实及强化现有关于出版、新闻、著述、广播、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部门之机构”；“调整充实强化现有各种检查机构”，加紧对“图书、新闻、杂志、电影、戏剧、唱片、广播等有关文化宣传作品的严格审查及检查”，删除所谓“违反国策”之文字、实施对各国在华出版物之登记与检查，严厉取缔“敌性”新闻、电讯，“以谋宣传力量之统一”等，加强了对于沦陷区思想文化机构的严密控制[(165)]。

1943年夏，汪政府举办了“新国民运动第一届青少年时期集训营”、“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上海公务人员集训营”等活动，受训人数达千人以上[(166)]。除继续对青少年实施“精神集训”外，已将思想训练的重点转向政府官员。11月，汪政府又举行“全国宣传会议”，进一步研究具体实施“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的措施，内容涉及文化宣传机构之调整、文化宣传事业之推进、国民思想之“肃正”、对渝攻势之宣传、国际宣传与联络等等，由此全面强化了在沦陷区思想文化领域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第三节　东北沦陷区殖民地的深化

一　“临战体制”下的残暴统治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满洲国”也绑上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车。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决定，“满洲国”虽在形式上不宣布参战，实际上却与日本一样，与英、美处于战争状态。1941年12月8日，溥仪发表“时局诏书”，宣称“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生死存亡，断弗分携”，表示将“举国人而尽公之诚，贡献世界之和平；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等。随即，他一再向关东军表示：“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167] 并采取若干措施，视日本的敌对国为敌对国。如伪交通部宣布因战争的关系，终止与除日本、中国（汪政府）、泰国、法属安南、苏联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邮递关系[168]；伪经济部宣布战前给予外国人的经营许可作废，陆续接收一批外国资产，强行指定管理人，享有经营权和收益处分权，并在伪满中央银行设立“特殊财产资金部”，管理使用日本的交战国在中国东北的财产和收益[169]。

在关东军的直接操纵指挥下，“满洲国”迅速建立起所谓的“临战体制”，其战略任务：一是协助日军防备苏联的进攻，“确保北边绝对之巩固，使南方圣战无后顾之忧”；二是尽力搜刮战略物资，确保并扩大“对日农产及经济上之给与”，将东北建成满足日本法西斯进行“大东亚圣战”需要的后方战略基地[170]。为了适应此种战略需要，“满洲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都进行了调整，以实现“临战体制”。

首先是强化日本人在各级政府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政府核心机构总务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新成立的警务总局、防空部、企画部等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重要机构都直属于总务厅管辖，总务厅的权力涉及属于国务总理大臣权限的所有事项；原来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门实际行政首脑“次长”的权力也进一步扩大，决定“满洲国”重大事务的次长会议——“火曜会”的活动进一步公开化，其作出的决议常常不经国务会议审议就直接交付执行；有些省、县则改由日本人担任省长、县长，日本殖民者从傀儡政府的后台操纵者一变而为

前台演出者。

第二是增设若干适应战时需要和强化殖民统治的新机构。1942年4月，重新设立外交部（原为总务厅外务局），以适应战时“外交”事务之需要。10月，设立勤劳奉公局，初属民生部，后升格为勤劳奉公部，专职管理强迫人民实施服役制度，把东北人民完全“劳工化”。1943年4月，又宣布重新设立文教部（原并入民生部），强化在东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将治安部改为军事部，增强“满洲国”军队配合日军作战的意义；新设警察总局，专司原属治安部的警察业务，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统治，实施对于人民的高压措施；1943年9月，为了推行所谓的“思想矫正”制度，又专门设立司法矫正局等。

第三，调整各省、市的政府机构，强化对其之控制。1943年10月，日“满”在临近苏联边境的地区，设立了兴安总省和东满总省，分别辖有兴安东、南、西、北四省和牡丹江、间岛、东安三省[(171)]，总省长由日本人担任，享有比一般省长大得多的权力，不仅可以指挥所属官吏，而且可以在必要时不经过“中央”政府直接请求驻地日军出兵，进行武力镇压。对于东北地方省、市、县各级政府，日“满”主要推进“政府”、“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三位一体的控制体系，并将整个东北划分为东、南、西、北及兴安五个协议区，由日本关东军控制。

在“临战体制”下，日本加强了对于东北沦陷区的残暴统治。1941年12月，“满洲国”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和《治安维持法施行法》，成为强化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纲领性文件[(172)]。该文件的要害是将所谓“变革国体”、“流布否定国体”、“冒渎建国神庙或帝室尊严”等言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为违反治安的行为，从而为日满军、警、宪、特大肆逮捕所谓的“思想犯”、“政治犯”，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制造法律依据。

他们首先对在东北地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地下组

织和活动人员进行疯狂的搜捕和迫害。最为典型的是“巴东木事件”和对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三次大逮捕。1943年3月和5月，在“巴东木事件”中，日“满”军警在黑龙江中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活跃的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实施两次大逮捕，共逮捕662人，被捕者受尽酷刑，其中被判死刑66名，无期徒刑60名，有期徒刑277名，均为抗日救国组织的干部或骨干[173]。1941年12月、1944年4月、1945年5月，日“满”先后三次在东北各地采取“统一”行动，逮捕国民党地下活动人员及无辜群众，累计总人数达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很多人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直至日本战败，许多人还被囚禁在狱中，受尽酷刑[174]。

日“满”镇压、打击的锋芒也指向一般不满于日本法西斯统治的东北民众，尤其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941年12月，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进步组织“读书会”在哈尔滨举行各地代表会议，为日“满”军警一网“打尽”，旋即又在各地搜捕其成员，合计355人。日“满”军警常常在各大中城市以执行《治安维持法》和“清除不良分子”为由，进行“大搜捕”。如1943年4月19日，在“新京”逮捕3160人，27日在奉天逮捕3576人。6月22日又在奉天逮捕3500余人等[175]。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步失利，日“满”对于东北沦陷区的统治更趋凶残。1943年9月，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十二周年之际，日“满”颁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该文件的要害是对“有犯罪之虞者”，实施“预防拘禁”，并强迫服劳役，其“矫正”的对象为：被处刑已终了其执行者、假释者、犹豫执行者、不予起诉者。只要按照这些人的“环境、性格、思想之情况及其他情形”，被认为有可能犯下列行为者：“对帝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家罪”、“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军机保护法之罪”、“治安维持法之罪”、“国防资源秘密保护法之罪”等，就可任意逮捕，关入矫正辅导院[176]。被收容者不仅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被迫参加煤矿、

铁矿等高强度的劳动，而且还要在严刑拷打下进行“思想矫正”，很多人在双重迫害下严重伤残，甚至死亡。

矫正辅导院初设奉天、哈尔滨、鞍山、本溪、抚顺五地，后又增设齐齐哈尔、佳木斯、鹤岗、阜新、鸡宁五地[177]。据日本满洲矫正追想录刊行会统计，至战争结束时，已在各地设矫正院本院十八处，分院十余处，监禁人数达1.3万余人[178]。此种统计还只是指官方正式设立的机构及其拘捕的人数，实际上各地还自行设立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甚至不少铁矿、煤矿也设立了矫正院。“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日人古海忠之和伪司法大臣阎传绶承认：各种矫正辅导院在1943年关押七千多人，1944年上升到二万人，1945年8月达到五万人[179]，将东北地区完全变成了暗无天日的囚场和地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向热辽地区的进军和敌后游击区的开辟，日本关东军除了继续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地区实施“集团部落”的法西斯政策外，又与日本华北派遣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相配合，在长城一线南北侧制造“无人区”。执行这一任务的日军前线指挥官铃木启久少将在沿长城2 - 4公里划定了一条“无人地带”，强调务必“在20天内将这一带居民彻底赶出去，在限期内将中国居民的房屋一律焚毁”。并规定“绝对不允许中国居民至无人地带进出和耕作，凡通过禁区的人一律须持军部发给的特别通行证，有人反抗，严惩不贷”。1943年12月，“满洲国”宣布：在长城沿线的“无人区”面积为2500平方公里，涉及人口100万。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日军实施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10万人丧生，无数的房屋财产被毁[180]。赶离家园的农民被迫住进所谓的“人圈”，即日军选择其易于防备之地，划定范围，强迫迁移者修筑4米高、2米宽的围墙，墙外筑有深沟，置有电网，里面建造简易平房，将所有的人都圈住在其中。入住者如同关入监狱，外出种地、赶集等受到严厉限制，违者将作为“通匪”处罚。在所谓“人圈”内，更是受着政治、经济方面的严重迫害，不仅需要支付繁重的捐税，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稍有不

慎就会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遭到逮捕、刑讯，甚至受酷刑致死。

以长城线附近的光隆县为例，日寇施行的酷刑主要有：

1．“断食空腹”，几天内不给吃饭；

2．“倒栽莲花”，头朝下将人活埋；

3．“军犬舞蹈”，让一群军犬一纵一跳地反复扑上去，将人活活咬死；

4．“滚绣球”，把人衣服脱光塞进一个钉满钉子的木笼里，把人滚死；

5．“电磨粉身”，用特制的一种电磨，把人磨成肉酱；

6．“枪戳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叫新兵用刺刀扎，说是练武试胆；

7．“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绑在一起蜷曲着，投进河里或池里淹死；

8．“开膛取心”，双庙村据点内的日寇中川吃了五十多个人的心；

9．“钢针绣骨”，用大铁丝往手指头上或头顶上深扎。

除此而外，还有“皮鞭沾水”、“辣水涨肚”、“薰烧活人”等毒刑，日寇在该县实施“无人区”的三年，共计屠杀同胞1.54万人，抓走1.5万人，除杀害1000人外，几乎全部送往东北与日本内地充当劳工，有相当多的人被强迫去中苏国境抢修军事工程，竣工后即遭杀害。全县十六余万人口，至战争结束时，只剩下十万余人，非正常死亡高达五万多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81)]。

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东北民众的残害还在于继续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战试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大了准备细菌战的力度，以弥补日本缺乏钢铁、稀有金属和汽油等战略物资短缺的不足。关东军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作了这样的说明："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182] 细菌战成为日本法西斯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秘密武器。日军在中国最主要的细菌部队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亦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拥有队本部（七三一部队），下辖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诊疗部八个部及管理监狱的"特别班"，另有海拉尔支队（五四三支队）、孙吴支队（六七三支队）、牡丹江支队（六四三支队）、林口支队（一六二支队）四个支队，后又将原属"满铁"的大连卫生研究所划归七三一部队管辖。除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外，日本法西斯又在华北建立北京细菌武器研究所（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在华中建立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华中防疫给水部）、在华南建立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华南防疫给水部）等[183]，在中国占领区构筑了一个实施细菌战的战略网络。七三一部队仍然是实施研究、实验细菌战的核心基地和指挥中心。

他们继续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在七三一部队特设的监狱中，常年关着几百名所谓的"原木"或"猴子"，绝大部分是中国的爱国者。此种被送入细菌部队的对象可由日本宪兵和警察随意按主观意志决定，"除所谓政治犯外，凡有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处分案犯，均可作'特殊输送'。华北、华中方面的被俘人员，通过大东公司送交石井部队去的也有"，"为了造成'特殊输送'条件，惟一的手段就是残酷的刑讯，即把人抓来后采用灌凉水、殴打、过电、手指挟铅笔等刑讯，强迫其供认是谍报者"等[184]。日本法西斯用活人进行试验的手段主要有：各种细菌传染试验、注射疫苗试验、冻伤试验、毒气试验、解剖观察、人血与马血换用试验、梅毒传染试验、细菌武器性能试验、

人体移植手术试验，以及以活人为靶子的野外试验等，多得不可胜数。

1945年初，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日本大本营下令加快对苏细菌战的准备，石井四郎确定了生产两吨毒化跳蚤的任务，一旦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即实施大面积传播剧烈传染病鼠疫，其结果将在中国北满地区遍撒鼠疫病菌，不仅使苏联百万红军，而且也使中国的和平居民大受其害。幸而，苏联红军的提前进攻摧毁了日本法西斯的阴谋[(185)]。更为可恶的是，日本细菌部队在战败逃亡之际，不仅用速效毒气全部杀死了监狱中关押的“实验材料”四百余人，以消灭罪证，而且将其生产的传染病菌和细菌武器投撒遗弃在当地，继续残害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根治的战争遗害。

二　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日本法西斯将中国东北建成“大东亚圣战”后方基地的战略总方针，日“满”加剧了对于东北沦陷区的经济侵略和掠夺。1942年12月2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满洲国”政府颁布了《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成为强化日本法西斯经济掠夺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的要害是考虑“满洲国”在日本“国防上的特殊地位”，紧急“整备强化”产业结构，建立“国防经济体制”，“集中地应急满足日本战时紧急需要”等[(186)]。根据这个要纲，日“满”颁布了一系列计划、大纲、法规等，重要的文件有：1942年4月的《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10月6日的《产业统制法》、12月8日的《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1943年1月20日的《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策要纲》等，日本法西斯围绕着建立战略后方基地的目的，紧急进行产业调整，疯狂掠夺战略物资，以满足日本进行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首先是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维持战争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日“满”在上述各文件中对于这些战略物资的增产指标都有明确的规定，如钢铁计划增产60％，煤炭生产量要求达到4000万吨，有

色金属铜、铅、锌等要求增产五倍，液体燃料以9000万公升为目标等。为了摆脱日本战争资源极度贫乏的困境，日“满”采用各种方法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与战略物资，其主要方式有[187]：

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扩建急需工业设备。如日“满”在东北的主要钢铁企业鞍山昭和制钢所和本溪湖煤铁公司新建高炉三座，扩充生产设备，并从华北和朝鲜输入原料，充分发挥东北高炉设备的生产能力，还实施大中小同时并举的方针，增设小型高炉以增加钢铁产量，1944年又将两家主要企业连同东边道开发会社合并为“满洲制铁公司”，进一步以行政手段强制促进钢铁生产，使钢铁产量一度有所增长；又如日“满”为了解决日本奇缺的石油供应问题，先是扩建满洲西炼油厂，使其生产能力一度达到20.446万吨粗油，同时新建满洲东炼油厂，设计能力为19.25万吨粗油，1943年11月又将抚顺煤炭液化厂与吉林人造石油公司合并，成立满洲人造石油株式会社，指定为陆军指导工厂，重点生产飞机和汽车专用油，成为专门进行军需生产的企业。

第二，颁布《产业统制法》，强化战略物资的统制。1942年10月颁布的《产业统制法》比1937年颁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适用产业范围从21种扩大到85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产业；其统制监管的程度也大大加强，主管部大臣有权颁令合并事业的全部或转让、委托一部，转让、租赁事业设备等，也有权处理事业的设备新设、扩充、改良，事业的停止，生产量的确保，生产方法的改良，生产的限制，产品的规格，生产技术的提供，原料的获得，产品的配给，以及试验、研究等广泛的事项，当经营者违反法令时，主管部大臣有权停止、限制其业务，并作出免除其职员的行政处分，实际上，日“满”可以对东北的产业进行为所欲为的处理。

第三，“杀鸡取卵”，疯狂破坏东北资源。为了弥补战争巨大的物资缺口和支撑严峻的战争危局，日“满”不择手段，不守规律，不顾后果，采用“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殖民掠夺方式，使东北的自然资

源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如为了“大出炭”，东北各地煤矿普遍实施了利用残留煤柱取代坑木，少设坑木，广开井口，多设工作面，以及单一煤层片盘开掘等“残柱式”、“蚕食式”、“大舞台式”等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疯狂采煤，由于只顾眼前掠夺，吃肥弃瘦，煤田被掘得千疮百孔，煤炭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另外，对于森林资源、铁矿资源等也是滥采滥伐，肆意糟蹋浪费。

第四，实施“金属回收强化运动”，掠夺战争急需物资。由于掠夺性生产成果甚微，日“满”又在所谓的金属“回收”上大做文章，主要对象是生铁、钢材以及铜、铝、铅、锡、锑等有色金属。1942年4月，日“满”开始推行“金属回收强化运动”，时间两个月，主要分为“工厂营业所清理”、“一般物件回收”、“官厅物件回收”等，回收的还是废品。1943年起，日“满”开始把搜刮的矛头指向“现用品”。8月，“满洲国”更颁布《金属类回收法》，成立专司其职的金属类回收本部，征收的对象改为“使用铜（包括黄铜、青铜之铜合金）、铁和其他金属的物资”，并规定指定“回收”的设施和物件，如被转让或作其他处理，将受到严厉处罚。据此，东北各地的人民、企业、商家以及公众场所，甚至“满洲国”王宫内府、古寺庙都遭到了空前的洗劫，举凡铁制门、窗、栏杆、路灯架子等15类，铜制牌匾、器皿、茶具等97种，均被搜刮一空。10月，著名古庙钟灵寺的铜像207尊，被拆得只剩20尊。

农产品是日本维持战争而必须大肆掠夺的又一重要战略物资。日本法西斯所企盼的“大东亚圣战”的满洲后方基地自然也是其“粮食基地”。《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领》和《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都对农业“增产”、“搜货”、“配给统制”、“对日输出”作了规定。尤强调“我满洲国作为粮食基地的使命日益紧迫，在根据基本国策大纲积极推进农业增产的同时，还应该采取临时紧急对策，彻底执行和完成我国所担负的任务”[188]。日“满”在掠夺农产物方面有以下主要措施：

第一，继续向东北移殖日韩移民与实施“紧急农地造成”。1941年

12月31日，日本殖民当局拟订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决定“遵照东亚共荣圈内大和民族分配布置之基本国策”和“二十年百万户计划和开拓政策基本要纲”，“适应当前战时态势”，在5年内移民22万户，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移入的移民，共计30万户，此外移入青年义勇队13万人[189]。同时，日本方面还制订了《朝鲜人满洲开拓五年计划》，计划五年间每年从朝鲜移民1万户至东北[190]。从1942年至1945年间，日本实际移入东北日本移民4.1万户，青年义勇队1.8万人，共占土地140万町步[191]。日本殖民者想尽各种方法掠夺中国农民的土地，使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另谋生路。被强行移出原居地的中国农民1942年有6554户，1943年有9608户，1944年预计1.0615万户[192]。1943年11月，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的土地资源，使东北成为其进行侵略战争的粮食基地，又制订了《支援农地造成计划》，决定紧急“开垦第二松花江流域及东辽河流域的未耕地，主要为水田，预定完成的总面积相当于鹿儿岛全县的粮食耕地面积”；开垦所需要的劳动力，“满洲国将动员勤劳奉仕队以及满洲国其他劳动力担任”；“开垦完了的耕地，由日本开拓民进行耕种，朝鲜和满洲人也可以耕种”等[193]。这一计划的实施使二万多受害的东北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194]。

第二，强制“出荷”粮食政策，全面掠夺和统制农产物。所谓“粮谷出荷”，是指用低价强行征购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始行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全面实施。1942年11月，日“满”制定了《农产品强制出卖法》，次年1月公布的《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案要纲》规定了实施“出荷政策”的细则。为了完成“出荷”计划，搜刮农民手中的剩粮，伪满中央及各省、各县（旗）都成立了“出荷督励班”或“出荷督励本部”，综合政府、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之力，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到处搜刮粮食。不服从者即遭到严厉的镇压，非打即骂，甚至纵火烧房，逮捕入狱。农民收获量的40%以上均被搜刮而去，有的粮食产品的出售量高达70%以上。如1943年大豆“出荷”量占生产量的74.2%，稻子为69.6%，玉米为32.1%，高粱为38.2%，小

麦为36.2%，谷子为37.1%，平均为42%[195]。在日“满”刺刀的胁逼下，“出荷”的粮食数量逐年增长，“1941年680万吨，1942年720万吨，1943年780万吨，1944年820万吨，伪满崩溃的1945年900万吨。伪满政府每年以最低的价格，把东北农民生产的粮谷掠夺到手，然后再按照物动计划分别运往日本、朝鲜、关东州和华北等处，每年约有300万吨以上。”[196]

第三，严格实施粮油配给制，强制压低中国居民消费水准。为了保证日本侵略者最大限度掠夺东北的粮食，日“满“当局在乡村实施“粮谷出荷”的同时，又用粮油配给制，从中国居民口中夺粮，给东北人民带来更为惨重的灾难。曾任伪满民生部、厚生部大臣的金名世供认：“由于实行粮谷配给制度，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吃大米。大米只配给日本人和一小部分伪满官吏”；“1942年，伪满政府把榨取的粮谷大部分运往日本等处，致使现地粮食严重不足。于是又改变了城市人口粮食配给数量，由原来的15公斤减少到9公斤，并配给豆饼、橡子面，以此替代粮谷的数量。当时农村虽未实行配给，但因生产是有限度的，而榨取却逐年增加，每当粮谷出荷以后，农村就发生粮荒，农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尤其实行粮谷配给以后，因为配给不足而买粮吃，或在年节吃一次大米，都要受到惩罚。”[197]

第四，扩大鸦片种植，毒害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鸦片毒化政策一直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基本政策。太平洋战争以后，该政策成为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重要武器，“满洲国”成为“大东亚圣战”的鸦片基地。1942年9月，日本兴亚院举行“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决定“由满洲国和蒙疆生产并保证供应大东亚各地区所需鸦片”。自1942年起，伪满大兴鸦片种植之风，“不但把热河以前所递减的面积完全恢复，并且重新指定奉天、吉林、四平三省为新的鸦片栽种地区，实行集团栽培办法。1942年，奉、吉两省的鸦片栽种面积各500陌（每陌等于13亩），四平省是300陌。”“1943年奉、吉两省各700陌，四平省是500陌。1944年，奉、吉两省各1000陌，而四平省700陌。1945年，

奉、吉两省各1500陌，而四平省也达到1000陌”[198]。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判定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从事麻药交易，不仅要腐化中国人民，并且有比这更阴险的性质”，“把满洲所栽培的以及朝鲜与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在满洲精制后，再运往世界各地”[199]。日本侵略者曾将鸦片运往日本、德国以及中国的华北、华东沦陷区等，牟取暴利，换取军需物资和外汇。同时，日本一方面以此毒化中国人民，使其因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甚至中毒死亡，另一方面又以戒毒为名，将吸毒者中有劳动能力者编成劳动队，驱逼到矿山、工厂充当苦力，使东北人民受尽其害。

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沦陷区经济上的榨取和勒索，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东北人民的横征暴敛。从1941年至1945年，日“满”当局4次推行“战时大增税”。1941年末，实施第一次大增税，新增了通行税、法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油脂税等，提高了酒税、烟税、卷烟税、房屋税、事业所得税等的税率，国内税比上年激增82%。1942年10月，实施第二次大增税，新增了清凉饮料税、交易税，提高了酒税、劳动所得税、事业所得税等，并恢复了已经废除的小麦、棉花、水泥统税等。1943年12月，实施第三次大增税，以消费税为重点，再次提高了酒税、清凉饮料税、烟税、法人所得税等。1944年12月，实施第四次大增税，除继续修改税制和增税外，大幅度提高了香烟和鸦片的价格，进行最后一次以税收为掠夺手段的抢劫。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四次大增税，使税收种类由原来的20多种增至60多种，税率、税收总额和国内人均税额大幅度提高[200]。除此而外，日“满”当局还采用滥发纸币，发行巨额公债，强制人民储蓄等手段，聚敛东北人民的财富和资金，以支持“大东亚圣战”的需要。

强制征集和奴役劳工，是日本殖民者战时实行经济掠夺政策的又一典型表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加紧掠夺东北战争资源以及修筑军事工程的需要，也由于战争的因素，来自华北的移民日益减少，“满洲国”的劳动力严重短缺。据“满铁”的统计，1941年日“满”各

部门需要的中国劳工达200万人以上[201]。劳工对象主要有：一、“特殊工人”，指日本“华北军移交于满洲国的俘虏和投降兵”以及在当地“清乡”、“讨伐”中捕获或拘留的“俘虏”和“嫌疑犯”、妨碍新民会工作的人等，这些人中相当部分人是中国抗日军人和志士；二、矫正辅导院的“收容者”，即所谓“有可能犯罪”的人在“预防犯罪”时被抓获的无辜百姓；三、所谓“国兵漏”，指20 - 30岁的青年男子未被征兵役者（需在三年内服役12个月）；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如骗招、强征、摊派、抓捕而来者等。使役劳工最多的当属日“满”直接从事战时紧急物资搜刮的重工业部门，尤其是采煤业和制铁业，以及军事防务上的特殊工程，有的甚至被远送至日本服役。劳工们在这些地方遭受着奴隶般的管理，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冻死者、饿死者、病死者、事故致死者、甚至在输送途中受迫害致死者，不计其数[202]。对于他们的生活工作状况，时人曾有这样的记载：

> 在矿区里，一切建造都是经过残酷设想而构成。电网围绕着一排排的鸽笼式的板房，这就是大多数采煤工作住宅区。倘是夏天，到处都是臭味，成队的大头蝇飞来飞去。倘是冬天，窗户只有半片，雨点风雪横袭进来把土炕弄得湿漉漉的，使你坐卧不安。这里一切都是军事管理，五六百人编成个大队，设大队长一人，不过照矿上的习惯叫“把头”，有生杀予夺之权……此外，还有矿警和日本宪兵，枪刺森严地巡逻着，稍有反抗，就得遭毒打、枪杀，以及给军犬咬死。[203]

差不多在每一个矿山、工程附近都有扔弃中国劳工尸骨的“万人坑”，著名者有丰满东山、鹤岗煤矿、大石桥镁矿、辽源方家坟、满炭墓地、富锦五顶山、海拉尔地下工事、虎头要塞等地。中国劳工的嶙嶙白骨是日本侵华残暴和罪恶的最好记录。

三　协和会的战时活动与思想统治

伪协和会成立于1932年，曾被称为“满洲国的精神母体”，是日本

法西斯在东北实施思想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最主要的团体，也是伙同日伪军警宪特从思想文化、社会组织方面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别动队。1936年伪协和会改组后，被明确定为“满洲国”的“国家团体”，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其作为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工具的特征更加鲜明。“七七”事变后，伪协和会复以“国民组织化”的形式，进一步为奴化、奴役和严密控制东北民众服务，它通过协和会青年训练所全面组织训练青少年，通过协和奉公队控制与奴役成年人，通过其分会和所谓国民邻保组织，全面控制一般会员和广大群众[20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协和会进一步强化了其统治和控制民众的功能，并反映出明显的战时特征，是日本法西斯强化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1942年3月14日，伪协和会本部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战时协和会之任务，涉及的论题有：指挥国兵思想、国民勤劳报国、增产出荷、储蓄运动、国民邻保组织、联合协议会、省本部委员会之运营、青少年运动、义勇奉公队、二位一体制之强化等涉及服务战争的重大问题，确定协和会运动的重点是：“进一步运用二位一体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集结民族力，强化国民防卫力”等[205]。同年，该会制定的《康德十年度运动方针》更是详尽规定了该会的三大重点实践项目。其一是“思想战的强化”，要求“信奉惟神之道，奉戴帝旨，振兴国民精神”、“发扬击溃美英的热情，排击敌性思想的妄动”、“完全封锁西南地区和北边的匪区活动”、“组织训练知识阶层，特别是中坚青年，自发地开展强有力的思想运动”、“联系国内弘报、文化机关和宗教、教化团体，实行国民思想一体化的指导”、“与大东亚各国民团体提携，促进亚细亚民族团结和兴亚经济的显现”等；其二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强化”，要求“开展勤劳兴国运动，谋求国民皆劳精神的提高”、“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以期战时粮食的确保和民生的向上”、“谋求岗位奉公，效率提高，挺身于工矿增产运动”、“实施国民储蓄运动，建立战时国民生活伦理”等；其三是“国民动员体制的强化”，要求“以精锐会员的旺盛的实践力为中心，谋求分会活动的整备强化”、“以分会活动为中轴，整备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

以期战时国民防卫任务的完成和国民训练的彻底”、“根据城市、农村的特点，全面强化国民邻保组织的活动，使之成为国民动员的基础”、“促进智能组织的活动，并强化教育者有组织的活动，谋求智能动员的充分”、“整备并强化各省级本部委员会，谋求确立有力的指导体制”等，强调协和会应“适应战时的跃进”，“确立长期战必胜的基础，每天都以决战的觉悟挺身于会的运动”[206]。该文件体现了伪协和会配合“大东亚圣战”的基本运作思路。以伪协和会为核心，日“满”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思想统治的措施：

第一，开展“兴亚思想战”，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为“亚洲的解放战争”。日“满”不仅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而且出版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专著，反复宣传“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从美、英的桎梏中解放东亚，以确立东亚永远的和平”；鼓吹“为了亚洲民族的兴隆与振兴东方道德，要完成兴亚的圣战，唤起以亲邦日本为中心的必定建成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强调“对于美、英的思想谋略及其傀儡重庆政权之思想蠢动，也不予以余地”等[207]。他们把“满洲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确定为“兴亚之先驱，民族协和之摇篮，圣战兵战总基地，镇北之壁垒，增产之宝库”，为此“责任尤重”，“无论在勤劳增产，防卫守边上，都应当率先垂范”[208]。

第二，显扬“惟神之道”，奠定日“满”“建国”的基础。所谓“惟神之道”是伪满建国之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满”在东北全境大兴土木，建造日式“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强迫当地民众前去参拜。至1944年8月，东北各地的“神社”多达195所，其中99所是太平洋战争后新造的。“神社”之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行经该处，骑马的要下马，乘车的要下车，行人须停步向“神社”致敬，否则即是犯法，将遭受严厉的惩罚[209]。1943年3月制定的《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指出：“念建国的渊源，来自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以一德一心，实现建国理想，迈进于创建的道义世界”；并强调“根据建国的道统，超越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或专制的独裁政治，通过会之政治实

践，以宣扬协和道义的政治理念”[210]。关于“惟神之道”的宣传鼓噪，不仅出现于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和御用学者的论著，而且也被引入中小学生的课堂和教本之中，强行向青少年灌输，毒化他们的灵魂。显然，把天照大神供奉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把日本的祖宗硬搬为“满洲国”的祖宗，这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实行全盘日化的重要殖民措施。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以电影、戏剧、美术、音乐、文学等各种形式在东北大地泛滥成灾。

第三，对各民族分别实施国民训练，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民族“协和”关系。1943年3月，伪满协和会根据太平洋战局的需要，明确规定了对于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鲜、“满”、蒙、俄五族不同的训练要求：对于日本人，应“使其明确地树立成为忠诚之满洲国国民的使命观，提高其民族的品格德性，要成为各民族的中心，并且具备被人敬爱的素质”，“确立适应于大陆生活的科学方式，学习中国语，以实现适应于永久居住的生活新体制”等；对于朝鲜人，应“训练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和忠良的日本臣民，特别为了适应征兵令的施行，实施以精神教育和日本语教育，并奖励入籍等”；对于“满洲国”人和蒙古人，应“使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昂扬其国家意识，理解一德一心的真义，信仰惟神之道”等；对于俄罗斯人，应“训练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普及日本语，以提高其就职能力，谋求生活之安定“等[21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满”关系由原来的“友邦”关系发展为“亲邦”关系，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变换，而是标志着中国东北殖民地化的进一步深化。当时的新闻媒体指出：“亲邦就是父母之邦的意思，日、满两国之关系，就如父子的关系，至亲之爱和道义把两国结合在一起。”[212] 形象地勾画出日“满”关系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第四，确立国民动员体制，充分发挥“满洲国”的战时国民总力。为了动员中国东北的全部“民力”用以大东亚战争，日“满”以伪协和会为中心确立了国民运动一元化的指导体制。其主要措施是：1．全面

扩充、强化协和会地域分会及车间分会，扩大、整备基层组织之国民邻保组织；2．整备、扩充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科学技术联合部会、开拓部会，加强其运营与指导；3．以协和会运动为中心，与关系团体、宗教教化团体等进行有组织的联系，综合开展各种国民运动；4．与国防妇女会、军人后援会、兴农合作社、商工公会、劳务兴国会、空务协会、能率协会等保持密切联系，作为协和运动的重要环节而积极活动；5．与佛教总会、道教总会、基督教总会、回教协会、世界红卍字会、道德总会等密切联系，使其成为发挥国民总力的一个环节而加以指导；6．适应时局的进展，在精神上及实践上联系国外团体，以共同确立兴亚国民运动的体制等。据此，伪协和会各级组织纷纷实施青少年训练、国民防卫训练、各种岗位训练、妇女训练以及对于国民邻保组织的指导等彻底的“国民训练”，“显扬奉公的大义，坚持必胜必成的信念，献身于保卫国土、勤劳增产，以实现确立总力的态势”[213]。实质上是将中国东北的各阶层人民都绑上日本侵略者的战车。

第五，推行战时奴化教育，适应“决战体制之确立”。1943年10月，伪满成立了“文教审议会”，以国务总理为会长，总务厅长、文教部大臣为副会长，参议、各部大臣和次长、各大学校长、各会社总裁等为委员，其宗旨是“致力教育刷新、学校教育强化、社会教育及礼教振兴，以确立未曾有的重大时局之文教决战体制”[214]。1944年8月，又在伪协和会内设置“满洲教育研究会”，为“满洲国教育研究的中央机关”[215]，成为推行战时奴化教育的有力机构。其主要措施是：1．在课程设置上，将原来的“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并颁布了《建国精神教授要目一览》，规定了“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建国神庙”、“惟神之道”、“东亚之共荣”、“日本之国体”等42门课，强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2．推行学生勤劳奉仕制度，组织学生勤奉队，规定大学男生每年必须从事30-45天劳役，随着太平洋战争战局的恶化，勤劳奉仕令的适用范围不仅波及女生，而且扩展至所有学校的学生，时间也延长为大学生二三个月，中学毕业生五个月（实

际九个月），直至大中毕业生“通年动员”，劳动强度也日益增强，学生变为从事日本掠夺战争资源生产的苦力；3．强化和扩充军事化教育，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不仅男生要参加各种军事训练，女生也要参加救护训练，学校配置专职的武官及其助理主管学生的军事训练，使学校变成了大兵营，妄图通过军训使学生变成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和驯服工具[216]。

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临战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文化教育上，都使东北沦陷区的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

---

(1)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16－117页。

(2)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年7月），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979年刊印，第280页。

(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4) 《大公报》，1942年9月3日。

(5) 启常：《日寇占领区统治一元化的企图》，《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6日。

(6)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4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69－270页。

(8)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01－202页。

(9) 《中华日报》，1942年11月21日。

(10)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580－582页。

(11) 《中华新声》（半月刊）第7卷，第30—31页。

(12) 汪伪上海市政府：《关于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及友军进驻租界临时宣传要点》，上海档案馆藏。

(13) 汪精卫：《宥电》（1941年12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14) 汪精卫：《勖中国民众》，《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

(15)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16) 林柏生：《在东京答日本记者问》，《新中国报》1942年12月23日。

(17) 汪精卫：《告日本国民》，《中华日报》1942年12月26日。

(18) 《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1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1) 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呈文（1943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2) 转引自廖今天：《汪逆参战与敌寇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

(23) 《畑俊六日记》，转引自《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1—62页。

(24) 褚民谊：《参加和运自述》，江苏档案馆藏。

(25)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26)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27) 汪政府宣传部：《关于参战的宣传要点》（1943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2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 汪精卫：《告将士书》，《中华日报》，1943年1月19日。

(31)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32) 黄美真、张云：《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页。

(33) 汪政府档案，原稿署时间为1939年6月，有误。按照文中内容推断文件形成的时间当在1940年3月汪政府成立之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4) 《移管广东沙面英租界行政权之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5)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6 - 177页。

(36)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0 - 501页。

(37) 《汪精卫密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 《中华日报》1943年3月15日。

(3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2页。

(41)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2)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3)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99页。

(44)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 陈公博：《为签定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告市民书》，上海档案馆编：《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8—90页。

(47) 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

(4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99页。

(4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0) 惠风：《法国在华关系史检讨》，《政治月刊》第1卷第5期。

(51)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2)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3) 汪方接收法上海租界要点如下：1．法租界最高警政长官称警察总监，不受公董局之节制，接收后应将警察总监名称取消，成立警察局，由市长兼任警察局长以适应环境；2．所有行政督办、技正督办、司法顾问等职一律裁撤，改照新组织规程分别调整；3．关于会计部分，成立会计处，设处长一人，由本府总会计处处长兼任，同时成立区金库，设库长一人，主管出纳，由本府会计系统兼任而利管理；4．依照中国法令成立经济处与社会福利处，将现警察总监所管辖之粮食物价管理处及在行政督办下之营业类处统归经济处主管；5．各所属机关之正副首领及各科股主管人员当然应由华人充任，其官制与第一区同。同时，要点还要求在上海的法军防军官兵“应由法国当局自动解散，将一切武器交由中国政府暂行保管，解散后之官兵应驻于法国停泊黄浦之炮舰。”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编：《日伪上海市政府》，第103 - 104页。

(54) 唐学明：《上海租界收回后的新猷》，《政治月刊》第6卷第3—4期。

(55) 《达成领土完整目的，国府收回广州湾》，《中华日报》，1945年7月21日。

(56) 《外交部三十三年下半年施政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7) 《中义两国间关于交还天津租界等协定草案会议记录》，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

(58)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9) 《外交部三十三年下半年施政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0页。

(6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0页。

(62) 《日使馆当局谈话》，《政治月刊》第6卷第3 - 4期。

(63) 《汪伪外交部关于对日减免课税措置呈》（1943年9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第846 - 847页。

(64) 褚民谊：《在日汪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华日报》1943年3月5日。

(65) 《周佛海日记》1943年7月24日。

(66) 《周佛海日记》1943年8月1日。

(67) 《什么是敌寇对华新政策》，《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68) ［日］服部卓四郎：《太平洋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7页。

(69) 《周佛海日记》1943年9月24日。

(70)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1) 《周佛海日记》1943年4月5日。

(72) 参见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73)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3日。

(74)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4日。

(75)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6)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5日。

(77) 汪精卫：《永久友好关系之结成》，《政治月刊》第6卷第6期。

(78) 陈公博：《对于起诉书的答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279页。

(8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280页。

(82)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315 - 1316页。

(83) 《印度开展反英独立运动，我国决心全力支持》，《中华日报》1942年8月18日。

(84)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93 - 500页。

(85) 《大东亚会议经过》，《政治月刊》第6卷第6期。

(8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 - 1945），《文书》下卷，第594页。

(87) 《划时代的盛会》，《政治月刊》第6卷第6期。

(88)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文书》下卷，第580 - 581页。

(89)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

- 274页。

(90)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 - 274页。

(91)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 - 274页。

(92)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 - 274页。

(93)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 - 274页。

(94)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 - 274页。

(95)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史料选编》（1931 - 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 - 420页。

(96) 《中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97) 《周佛海日记》1943年2月8日。

(9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9页。

(99) 《中华日报》，1943年7月17日。

(100)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69页。

(101)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 - 69页。

(102)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 - 69页。

(103)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 - 69页。

(104)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 - 69页。

(105)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

(106)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243 - 244页。

(107)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257 - 259页。

(108) 《周佛海日记》1943年7月21日。

(10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9页。

(11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33页。

(112)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34页。

(113)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35页。

(114) 《一年来之建军与协力大东亚战争》（1943年1月3日），《政治月刊》第5卷第3期。

(115) 《第二次全国军事会议特辑》，《政治月刊》第5卷第3期。

(116)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24日。

(1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268 - 271页。

(11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276 - 278页。

(119) 黄广源：《孙良诚投敌及其下场》，《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20) 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121) 《中华日报》，1943年5月17日。

(122) 延安总部：《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123) 《中华日报》，1943年1月3日。

(124) 徐向辰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25)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26) 延安总部：《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解放日报》

1943年8月24日。

(127) 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00页。

(12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055 - 1056页。

(129) 《中央税警总团条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053页。

(131) 参见《华中伪军战斗序列表之四》（1945年夏），《新四军军史》（未刊稿）；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68 - 270页。

(13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279 - 282页。

(133) 延安总部：《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134)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5个统计材料》，《新华月报》1951年9月号。

(135) 日本御前会议：《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1942年12月2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20页。

(136) 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为基础的具体策略》（1942年12月1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18页。

(137)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6、131页。

(138)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战时经济政策纲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9)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战时经济政策纲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36页。

(14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142) [日]冈田酉次：《日中战争内幕记》第37章（未刊译稿）。

(143) 全国商统会：《商统会成立以来之经过》，《商业统制会刊》创刊号。

(144) 《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暂行条例》，《中华日报》，1943年3月21日。

(145)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13页。

(146)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778页。

(147) 汪政府：《对物资移动取缔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16页。

(149)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775页。

(150) 汪政府：《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及《实施要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152)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20页。

(153) 何望贤：《五统制委员会的事业》，《申报月刊》复刊第2卷第10号。

(154) 袁琳：《抗日战争时期日汪勾结掠夺中国资源的策略》（未刊稿）。

(155)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6)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230页。

(157)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23页。

(15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401 - 403页。

(159)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汪伪宣传部刊印，第353页。

(160) 汪精卫：《国府还都二周年接见中外记者问》，《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78页。

(161) 《新运会首次开会》，《中华日报》，1942年7月5日。

(162) 《中国青年模范团暂行总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3)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097页。

(164) 郭秀峰：《关于汪伪东亚联盟总会的情况》（未刊稿）。

(165)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979 - 981页。

(166) 戴英夫：《汪精卫新国民运动内幕》（未刊稿）。

(167)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的十四年》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168) “满洲国”：《政府公报》，1941年12月23日。

(169) 参见吉林金融研究所：《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

(170) 参见《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

(171) 1945年5月，东满总省撤销，牡丹江省和东安省合并为东满省，原间岛省恢复原状。

(172) “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293号，1941年12月27日。

(173)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 - 662页。

(174) 据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记载：第一次大逮捕人数为500余人，第二次大逮捕人数为400余人，第三次大逮捕人数为400余人，第492、668、670页。

(175) 参见《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447页。

(176) “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788号，1943年9月18日。

(177) 《矫正辅导院官制》，“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965号，1944年5月1日。

(178) 满洲矫正追想录刊行会：《动乱下的满洲矫正》，1976年刊印，第7页。

(179) 陈明德整理：《鹤岗矫正辅导院》，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等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80)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66 - 67页。

(181) 史光：《兴隆县境内的无人区》，《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182) 《前日本陆军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判材料》，转引自解学诗：《伪满洲国史》，第828页。

(183)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209 - 211页。

(184) 《日本宪兵少尉森三吾口供》（1954），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7 - 88页。

(185)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222 - 231页；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834页。

(186) 日本产业调查会：《满洲产业经济大观》，1943年刊印，第448 - 451页。

(187) 有关工矿业的情况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 - 144页；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86 - 100页；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677 - 710页。

(188) 《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策要纲》（1943年2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425页。

(189) 《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1941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690页。

(190) 《朝鲜人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1942年10月2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706页。

(191)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629页。

(192) 转引自孔经纬：《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193) 《日本政府支援农地造成计划》（1943年11月2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743页。

(194) 转引自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195) 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东北经济参考资料》（二），《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一），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抗战时期的经济》，第152页。

(196) 《金名世证词》（1954年11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545页。

(197) 《金名世证词》（1954年11月11日），第546 - 547页。

(198) 《金名世证词》（1954年4月17日），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等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19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00页，转引自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765页。

(200) 参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794页；步平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121 - 122页。

(201) 满铁第二调查室：《劳务关系资料》（1941年5月9日），转引自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742页。

(202) 参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913 - 955页；李联谊：《中国特殊工人史略》，抚顺矿务局煤炭志办公室1991年编印，第10 - 41页；步平等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第277 - 300页。

(203) 哈华：《人的屠场——在抚顺和本溪湖的矿山里》，《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8日。

(204) 参见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351 - 355、571 - 575页。

(205) 《满洲评论》第22卷，第11号，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伪满傀儡政权》，第670页。

(206) 《康德十年度运动方针》，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第670 - 671页。

(207)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第672 - 682页。

(208) 《盛京日报》，1943年12月2日。

(209)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153 - 154页。

(210)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211)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212) “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旬报》第84号（1942年6月1日）。

(213)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214) 《盛京日报》，1943年10月16日。

(215) 《盛京日报》，1944年8月30日。

(216)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157 - 174页；《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

第一节　中美、中英改订新约

一　国民政府的废约努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急骤上升，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有所增强，从而为中国改变低下的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民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随着美、英等国与日本矛盾日趋尖锐和援华态度转向积极，国民政府已经在争取英、美经济财政援助的同时，与他们交涉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训令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在归国途中赴美交涉订立中美平等新约。5月31日，郭泰祺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交换函件，美国政府承诺：一俟中国境内和平恢复，美国愿与中国政府商谈取消美国在华特权。7月4日，英国政府也照会中国作了类似的表示[(1)]。尽管中美、中英换文还只是“空头支票”，但仍对中国的抗战具有鼓舞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废除中外间不平等条约的条件逐渐成熟。在战争初期，与美、英等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改观。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部长诺克斯先后来电和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庆贺中国

军队取得的胜利，称颂这是所有同盟国军队的共同胜利。国际舆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长沙大捷是“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伦敦《每日电讯报》则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2)] 中国军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废除与列强各国的不平等条约奠定了实力基础。

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失时机为废除中外间不平等条约作了积极的努力与准备。7月26日，外交部拟定了《取消其他特权及特种制度办法》和《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关于军事，规定取消外国军舰在我沿岸沿海及海港湾江湖中游弋停泊之特权及外国在中国指定地区驻扎军队和警察之特权，废止条约规定中国在本境指定地带不得驻扎军队或设立炮台之限制等；关于势力范围，规定取消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将某地割让或租给他国之条款，取消外国在某地享有之筑路开矿等特权或优先权，宣布外国间互相协定强指中国某地方为势力范围之条款无效，废止中国在某地不设平行铁路之声明或类似之限制等；关于通商，取消外国在华沿岸贸易及内河航行之特权，以及外籍人员得充中国境内引水员特种制度，外侨在中国设立之行栈、工厂、学校、教会、医院，应受中国法律之限制与管理，敌侨在中国设立者，照敌产处理等；关于交通，规定国内铁路由敌方投资或经营者，准用清理敌产之规定，凡友邦政府或人民经营者，我方备价收回，取消外国在华经营及收发一切有线无线电信特权、在华设立邮政特权、外国邮件由外籍职员检查制度等；关于财政，外人在华应依法缴纳一切捐税，禁止外人在华所设银行发行钞票，废止海关任用外籍总税务司及其他外籍人员之制度；关于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均应立即无条件收回；并强调废止非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之最惠国待遇，取消日本在东三省，苏联在外蒙、新疆、北满之特权等，这两个文件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废除中外间不平等条约将涉及的各种问题及中国方面的处理原则，为日后的废约谈判作了重要的准备[(3)]。

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第三次长沙大捷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朝野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作的外交努力，迫使美、英等国政府将应否同意立即取消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外交界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派反对立即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主要理由是：一、中美刚换文约定战后解决该问题，无须立即改变态度；二、中国大部分领土正在日本军阀占领之下，此时宣布放弃在华特权，敌人势将据以攻讦美国的行动为一种“软弱”的姿态；三、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军事行动及其战果的关注，远在放弃特权的外交词令之上；四、在中国战后的一段不稳定之时期，美国在华人民或极需仰赖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予以保护；五、战后美国政府必将有求于中国政府，保留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利，必将增强美国政府谈判之地位；六、由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州禁止中国人拥有不动产，在中美谈判缔结新约时，美国人在华不动产问题不易解决；七、目前之战争可能继续相当时间，无人预测各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此时缔约，战后或将不合时宜等。另一派则主张立即废除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强调三点理由：一、美国与联合国不仅为生存而战，而且为人类之权利与尊严，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之平等而战，放弃在华特权这种时代错误，将符合并表彰联合国作战之目标；二、中国人极善于折冲樽俎，讨价还价，他们了解美国人民对在华治外法权所持之态度，即使将这些权利保留至战后，届时仍将无补于美国政府的对华谈判地位；三、治外法权倘保留至战后，美国人民将受到鼓励，回到中国再度从事在治外法权之制度下始能经营之行业，将会引起中美之间之冲突，为预先防止这种早已不合现代观念的制度重现，应立即废除旧约等[(4)]。当时在中国的著名美国学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提议：“如能在此危急时期，我们带头对华取消一切特权条约，承认其平等权利，乃不失为一明智宽厚的政治手腕”，“将使在英勇奋斗中的中国全民上下一致欢欣绝顶，并可使日本对西方列强此最易受攻击之点的宣传归于无效。”该提议得到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高度评价[(5)]。美国国务院的最后结论是：美国不拟主动提出该案，除非中国政府要求进行商讨。

英国政府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以外交部执行顾问布伦南为首的一些人认为：虽然中国亟欲以条约结束治外法权及与此相关的权利，但在当时特殊的时机下，只要列强承诺在战后放弃其权利，中国就会满足。他们主张英国应该停止行动，待远东之军事形势好转之后再来讨论，以获取“最高的效果”。外交大臣艾登则认为：“现在把治外法权废除，是适当的政策”，不必“担心人们会认为那种姿态是示弱行为”，但他强调“进行时要让中国晓得主动的是我们，而非美国”。英国政府最终决定英国暂不主动提出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美国约定采取同步行动[(6)]。

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对英、美等国发起了舆论攻势。此种攻势是从批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2年3月17日关于在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重建英国殖民统治和重建大英帝国的誓言开始的。四天后，中国旅美学者林语堂发表《亚洲的命运》，点名批评丘吉尔精心策划的“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是殖民主义的阴谋，目的是反对支持中国抗日，削弱战后中国在谈判桌上的地位，使“白人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巢穴”“十分安全”。林语堂批评说：“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英国要关闭滇缅路和削弱中国，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帮助中国建设自己的空军，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指责英国“缺乏一位有才干的首相和更多有献身精神的官员”，“丘吉尔辈缺乏洞察力、勇气、远见卓识和较好的政治素养”[(7)]。中国国内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钱端升、陈朗川等教授也著文批评英国的殖民主义和对日作战不力。重庆各报都刊登了这些文章，造成了一定的声势。4月19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的长篇文章，直接提出了要求列强废除在华特权的明确要求。文章回顾了列强与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批评列强“以枪口相威逼，一次又一次令中国蒙羞受辱”，侵犯中国的主权，尤指出领事裁判权是“一种恶劣的司法制度”，呼吁各相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特权；文章批评西方在太平洋战争前对于中国抗战的冷漠以及对日本侵略的温顺，甚至变相的袒护，使“中国人民以难以置信的惊愕之情目睹了

西方军队的投降场面”；文章颂扬中国人民的坚持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8]。《纽约时报》在发表文章时曾冠以“东方第一夫人致西方”的醒目标题，使文章引起国际舆论界的广泛注意。8月27日，著名历史学家、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就《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一百周年发表公开演讲，呼吁“不平等条约应该早取消，完全取消”等[9]。10月6日，重庆《大公报》趁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行将归国之际，发表社评《希望美国首先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指出“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枷锁，那不仅是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的奇耻大辱，且根本摧残了中国国家的独立尊严，剥蚀了中国民族的生存大权”；“最难令人索解的是我们并肩作战的盟邦还与中国不平等”，“中国已把国家命运生存整个交给血泪交迸的战争”，“当然有权要求盟友把我们身上的锁链解除”；要求威尔基特使转告罗斯福总统暨美国人民，希望美国首先放弃不平等条约等。在中国舆论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国务卿赫尔承认：“中国政府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的任何要求都会在美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10]

促使美、英等国与国民政府商议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另一重要背景，是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已随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发生重要变化。由于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占领了西方列强权益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列强已无法在沦陷区行使其特权；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列强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而在国统区，由于西方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下降和战争的特殊因素，国民政府也采取了某些措施，收回或者限制列强在华特权的行使。如国民政府成立财政部关务处，收回了英国人把持近百年之久的海关之权；颁布战时法令，限制外国人在华活动，逮捕违反中国法令的外国人。在贵阳，中国官方以间谍罪逮捕了两名来自香港的英籍欧亚混血华人，关入中国监狱，英国驻华使馆对此爱莫能助；在昆明，中国当局传讯了英国缅甸兄弟钢铁公司在华代理人麦凯，审理该公司对于中国人的欠款案件，使英国人惊呼：“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包括治外法权已经不存在了。”[11] 这种

状况显然有利于中国方面的“废约”努力。

日本与汪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玩弄的花招，也为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造成了某种有利的态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在其利益集中的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已为日本占领军夺取，原来居住在租界内的美、英人士被日军作为敌侨，关进了集中营，其产业也为日本占领军接收，成为其战利品。日本法西斯为了欺骗中国沦陷区的民众，正以亚洲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领袖”自居，大肆鼓吹“东亚解放”、“黄色人种革命”等滥调，酝酿推行“对华新政策”，与汪政府实施所谓“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闹剧。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汪精卫宣传“他已将英美驱逐，收回了租界，取消了领事裁判权，废弃了不平等条约；重庆却拥护不平等条约，替帝国主义的特权作战。日本发言人也做着同样的宣传。这种宣传真是恶毒之至。但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是一种事实。”日汪的宣传使中国人民感到莫大的羞愤，“我们的盟邦又何吝惜而不给我们为正义而战的中国人解除这种羞愤呢？”[(12)] 这从另一侧面对于美、英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　中美新约的签署

面对中国朝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呼声，美、英两国自1942年4月起就与中国改订新约事进行频繁的磋商。

1942年6月，美日中途岛大海战之后，美军在太平洋上从守势转取攻势；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却因缅甸战役的失败、对外海陆联系全部中断而更加严峻，美国政府由此认为：已到了美、英主动采取废约行动的好时机。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英方提出他设计的“废约方案”：美、英两国分别立即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简要条约，并对由此产生和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整。确定国家关系的综合性条约可留待战后进行谈判。其理由是，综合性条约谈判“所需时日较长，容易走漏风声，谈判中双方分

歧的泄露易为敌国挑拨离间提供口实”；“且在中国领土全部收复之前，也不宜进行此种谈判”[13]。尽管此议不为英国方面赞成，但美国政府并不动摇，9月5日，再次照会英国政府，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对外政治关系上采取主动”，“目前可能是采取确切行动的最好时机”，并强调此时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实现三个目标：一、为联合国家的事业赢得某些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利益，具体的协助中国，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决心；二、消除美英对华关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三、规定美英两国公民在中国享有通常在其他友邦享有的正常权利等[14]。经过美、英间反复交涉，英方在保留要求上海的“特殊地位”等的前提下，与美方达成共识。

9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魏道明继胡适为驻美大使。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新大使在到任后将随时可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美国政府决定赶在中国提出之前，主动宣布与中国谈判废除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10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批准赫尔的“废约方案”。3日，美国驻英大使通知英国外交部：美国建议两国在10月9日同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约见中国大使，用绝对机密的口头方式说明几个月来美英会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情形。英方不同意美国的机密通知方式，主张两国发表联合文告，10月10日见报。美方同意发表公开文告，但不同意取联合文告形式，主张由美、英分别发表，英方表示同意[15]。

10月9日，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约见魏道明，宣读了美方的声明，并称美方将在一周内向中方提出草约。次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立即放弃在华特权。蒋介石一面致电罗斯福致谢，一面于9日和12日两次致电正在美国活动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美大使魏道明，强调“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符其实也。”对于交涉方法，蒋氏指示：“应静待美政府提出其所谓简短的草约后，我方再表示意见”，但可“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

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

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将《中美关系条约草案》面交魏道明，共八款，主要内容是：一、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二、废除《辛丑条约》规定的一切特权；三、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四、美国政府及侨民在华业已取得的不动产权不变；五、两国人民享有在对方国家旅行、居住及经商的权利，两国给予对方国人民关于法律手续、司法审判、各种租税及经营商业之待遇，不低于本国人民之待遇；六、两国领事官员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豁免；七、战后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近代广泛的友好通商设领条约；八、条约的批准与生效等[16]。草案以取消领事裁判权为中心，未提及通商口岸制度，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制度，内河航行，沿海贸易，美国军舰在中国领水游弋，外籍引水员雇用等美国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详加研讨后，撰成《对于中美关系条约草案意见》、《中美关系条约修正草案》、《中美关于新约范围以外之特权应即废止之换文》等文件，对美国所提草案作了修正，将中美新约的范围扩大为全面废除中美间的不平等条约[17]。11月3日，魏道明奉命将外交部上述文件送交美方，美方同意以此作为双方交涉的基础。

双方在谈判中争执的主要问题有：关于经营商业之国民待遇问题、关于限制不动产权利之行使问题、关于设置领事馆问题、关于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问题、关于通商口岸制度之废止与海外商运问题等。双方互作让步，达成了协议。如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中方主张改为“不得低于第三国人民之待遇”，即由国民待遇改为最惠国待遇，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经营商业问题还需受各州法律的限制，实行中方主张有困难，经商议双方同意删除第三款中“经营商业”字样，留待将来在商约中规定。对于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权问题，最终双方也以互相给以“同样之权利”达成一致意见。对于美国除领事裁判权以外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以换文方式予以废除

的建议[18]。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当顺利，至11月下旬谈判已实际结束。

然而，中美新约的签署却是一拖再拖。中方最先希望能在11月28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闭幕会上宣布，但因中英谈判不顺利而延搁。12月21日，中美新约及换文定稿。其时，汪精卫应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邀请访问东京，日汪间正就日本“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移交”英美产业等进行谈判。在此刺激之下，蒋介石力争中美新约能在元旦签署，以免日汪抢先签约，使中美新约“因之减色”。但中英新约谈判仍未结束，中美新约的签署再次被拖延。1943年1月9日，日本大本营在获悉中美、中英新约将在1月中旬签署的密电后，抢先与汪伪政府签署《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宣布“交还”在中国的专管租界，“承认”中国收回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北京使馆区，“撤废”治外法权。这虽系日汪间的一场闹剧，但仍使蒋介石视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也”[19]。

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按照美国惯例，条约在未经参议院批准以前不得公布，由中美共同拟定《中美条约及换文之概要》，于同日公布。2月1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中美新约。11日，参议院经过简短辩论一致批准该条约。5月20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互换批准书，中美新约正式生效。据此，撤废的美国在华特权计约八大类，包括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区、租界、特别法庭、外籍引水员等特权、军舰行驶之特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以及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等[20]。这些内容基本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中美新约的签署及批准建立了中美间的平等互惠关系，从法理上结束了百年来美国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具有重大意义；但该条约尚未完全解决经济、文化领域美国依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的一些特权，如美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创办学校、设立教堂等均未涉及，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性。

中美新约签署后，国民政府又趁热打铁，向美国政府提议废除实施已六十年之久的《排华法案》。该法案制订于1882年，禁止华工入美十年，并禁止批准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以后《排华法》一再限期，并在1904年由美国国会决议无限期有效，限制性规定也越来越多。这种对中国人实行的“特殊丑恶形式的种族歧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国会中主张废除《排华法》的人日益增多，1943年6月29日，参议员马格纳森提出“HR3070”案，主要内容有三条：1．废除现存的一切排华法令；2．每年允许105名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其中79名分配给中国本土移民，26名分配给各地中国血统移民；3．准许合法的中国移民加入美国国籍等[(21)]。在中国方面的一再敦促下，罗斯福总统于10月11日致函国会，提出：“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呼吁国会废除《排华法》，清除美国法律中“不合时宜的东西”，由此而“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加强中国“对于盟国的信任”等[(22)]。10月21日和11月26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HR3070”案，即《马格纳森法》。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该法案。

中国朝野对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作了高度评价。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发表广播演讲，称颂此举“在促进平等原则与消除对华歧视上乃重要里程碑，并且坚定了中国对美国真正友谊的信心”。《时事新报》称“此举不但改正了历史错误，而且替中美邦交奠下深厚的基础”。《自由西报》则称“此举将获得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一致拥戴与友善，并且是一个世纪的结束”[(23)]。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详细论述美国此举对于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意义，指出：日本所一向宣传的白种人蔑视黄种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白种人想统治世界，以及日本根据此种理论所高唱的“大东亚共荣圈”、“亚洲人的亚洲”以及它对菲律宾、缅甸、印度赐号“独立”，玩弄傀儡，均因此而彻底破产；“日本的恶意宣传一扫，而日寇的无形兵力也被解散，这不但中国军民闻而

欣慰兴奋，倍增抗战杀敌的勇气，而菲、缅、印等民族也将不受日寇的欺骗，坚定对联合国家的向心力，这对于太平洋战争实无异于添莫大的战斗力。”[24] 战时中美关系由此而更加密切。

三　中英新约的签署

中英间缔结新约的谈判是与中美间的谈判同步进行的。10月24日，当美方向中方提出草约时，英方向中方说明，英国的草约文本与美国相似，现正与印度及各自治领商议。30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将英方草约面交中方，计九款，比中美新约草约多一款，规定新约适用之领土、人民及公司，包括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北爱尔兰、印度、英王之一切殖民地、海外领土、保护国、在英王保护或宗主权下之一切疆土及英国的一切委任统治地。另在第四款中增加了交还天津、广州英租界的内容。11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研究拟定了《中英新约草案初步审查意见书》和《第二次审查意见书》，制定了《中英新约修正草案》。

12日起，中英双方在重庆进行缔约谈判。与中美缔约谈判相比，中英间的谈判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在谈判的一个月间，风波迭起，险象环生，几次迫近破裂的境地。双方在谈判中争执的主要问题是：九龙租借地问题、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问题、购置不动产权问题等。

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收回香港是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就奉命试探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收回香港的态度，并向英方说明香港问题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25]。然而，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是：不把香港归还中国，出于从经济上、战略上长期占领香港之需要，也不把九龙租借地归还中国。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在下院明确表示：“废约只是废除治外法权”，香港不归还中国[26]。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长克拉克更在内部文件中指示：“如果美国支

持中国收回香港，英国绝不能屈服于美国压力。”[27] 英国提出的新约草案，只字未及香港问题。国民政府外交部审查英方草案后，决定暂不涉及整个香港问题，集中力量要求交还九龙租借地。提出：1898年6月9日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28]。双方的观点绝然对立。

对于中方的修正提案，英国政府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同意归还九龙租借地，那么在英国人看来将使香港成为“孤岛”，必将极大地降低其经济地位及减损其战略价值；二是拒绝中国要求，英国也担忧将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公众舆论也会同情中国；三是拖延。11月30日，由丘吉尔主持的战时内阁会议，决定拒绝放弃英国在九龙新界的地位，坚持九龙租借地问题不在中英新约的讨论范围之内[29]。艾登甚至表示“不惜冒中断讨论之险，仍要站稳立场”，态度极为顽固。英方的态度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蒋介石一度准备“自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30]。然而，外交部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等却担忧因为香港问题而拒签新约，会使中英关系彻底恶化，不利于中国解决更为棘手的中苏关系，会使中国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他们认为：“先缔约不失为外交上有利的一着；同时，我们可以公开讲明，希望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顾维钧劝告蒋介石说：中英新约是英国主动送上门来的礼物，“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可以在收礼的同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他强调：“战争期间，盟国应该表示团结一致，这点极为重要。”[31] 此主张为蒋介石所采纳。而英国方面出于对美国反对和干涉的担忧，也同意中方采用照会方法对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表示保留。最终，中方在签约的同时照会英方，声明中国对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英方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英方在换文中没有作出任何承

诺，承担任何义务[32]。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的交涉以中方的失败而告终。

关于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问题、购置不动产权问题，中美在交涉新约过程中已通过互让就这些问题迅速达成了解决办法，美方及时将中美谈判情况通报英方。但英方却强调英国的特殊性，坚持要求上述三项权利，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在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这一点上要“坚持到最后时刻”。英国外交部对美国在谈判中的处置方法大为不满，指责说：在上述三个“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人处处拆我们的台”；“由于他们的快速战术，事实上我们被剥夺了与中国人进行实际谈判的任何机会”；“而如果美国人作了让步，我们大概也只能这样做了”；“看来只好等到日后订立广泛条约时再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了”[33]。随后，英方又以在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上让步为条件，要“尽最大努力保证关于不动产权的条款”。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英方放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权及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要求；中方同意双方互相给予对方侨民购置不动产的权利[34]。

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英新约”，其基本内容与中美新约相似。但比起中美新约来，中英新约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就政治领域而言，香港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悬而未决，刘公岛问题也因1940年刚签约展期十年而暂予搁置[35]。

尽管中美、中英新约还有不彻底之处，但毕竟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反帝斗争，尤其是六年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的一大胜利，百年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彻底崩溃。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普天同庆。国民政府颁令，放假三天，“悬旗志庆”。蒋介石为此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称颂新约“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且亦是英美各友邦为世界人类的平等自

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36]。中共中央也决定各抗日根据地“在战地环境许可下，均应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37]。各报纷纷发表社论志贺，《大公报》社论题为“百年耻辱，一笔勾销”；《中央日报》社论题为“平等自由的光明灯塔”；《国民日报》社论题为“五十年外交奋斗之光荣”等。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署，标志着中美、中英间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互致贺电，称颂此举为“盟国间在伟大作战中之一竭诚密切合作”，确信“联合国家争取胜利与改善世界之目的，更易达成”[38]。中国舆论指出：这一举动“不但可以激励我们前方将士的战志，而且可以坚定我们全国民众的信心，不但中国的军民因此可加强其为自由平等与独立而奋斗的意志，即全世界爱好自由平等的民族亦皆透彻认识联合国家的最终目的，对于今后战局必有不可预测的效果”[39]。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署，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强国地位，从而将大大有利于推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专论指出：“战胜为急务，以中国之坚卓抗战，得英、美之明白承认完成主权，其精神将益加强，并保证战胜后居大国优越地位，以重整新亚洲。”[40]

在中美、中英新约的影响下，同盟各国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陆续与中国签署平等新约。1943年8月20日，中国与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签署新约；10月20日，中国与比利时在重庆签署新约；11月10日，中国与挪威在重庆签署新约；1944年4月14日，中国与加拿大在渥太华签署新约；1945年4月5日，中国与瑞典在重庆签署新约；5月29日，中国与荷兰在伦敦签署新约。战后，中国又先后与法国（1946年2月28日，重庆）、瑞士（4月13日，伯尔尼）、丹麦（5月20日，南京）、葡萄牙（1947年4月1日，南京）等签署新约。百年

来，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胜利告终。

第二节　中美的合作与冲突

一　中美高层互访的加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大国，中美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两国高层人物的互访得到加强。

1942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美国，与驻美大使协同工作，在华盛顿政府、国会、商界频繁进行活动，争取美国财政、军事援助，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宋子文多次出席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更多份额的美国军事援助，也为蒋介石的作战方针进行辩解。如1943年5月，宋子文在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力主美国应重点援助中国空军，要求6月、7月、8月，中印空运吨位悉拨空军飞机器材，9月后中印空运应以4800吨拨给空军使用，为此与史迪威发生争执[41]。会后，宋子文又访晤李海海军上将，请其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决策，取得了实效。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魁北克会议，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宋子文据理力争，致电美国政府要求参与协商重要军事方案的权利，并指出："美英官方虽然多次强调四大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代表却未被邀请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或华盛顿会议。这两个会议制订的计划，都关系到以蒋委员长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这些决定只是在事后才通知中国方面，结果导致对中国应承担义务的不同解释。如果确立起真正的合作并实行之，这种误解本可避免的。"[42] 正是在宋子文的努力下，他被邀赶赴魁北克，在会上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促使罗斯福同意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军火分配委员会。

1942年11月26日至次年7月4日，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之邀访问

美国，受到美国朝野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宋美龄虽以私人身份出访，以治病疗养为由，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其使命是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外交，向美国人民广泛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宋美龄不仅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如纽约市政厅、麦迪逊广场、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政厅、好莱坞等，并且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1943年2月12日，蒋致电宋指示演讲要点：一、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二、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往太平洋，中美须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之合作，始能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义；五、中美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肩负着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的时代责任等[43]。次日，蒋介石又两次电宋补充数点：一、感谢美国国会通过中美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二、证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的“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既是“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和“耶稣基督博爱、和平教义”，也即是“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三、强调太平洋问题及战后亚洲经济开发的重要性等[44]。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受到美国公众舆论普遍好评。美国女参议员史密斯夫人称：宋美龄的演讲“言词无多，而如此有力，殊人惊叹”；参议员拉佛莱特称：“此乃余担任参议员十七年来所闻演说中最完善者，余不禁感觉吾人应该紧记吾人必须立即在财政及物资方面援助中国，使能超过吾人所作之诺言。”[45] 宋美龄的访美，在美国刮起一股“宋美龄旋风”，对于增进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了解，推动美国政府加强援华起了一定的作用。1944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奉派访问美国，与美国政府要人就中美合作、国际合作及垫付美军在华用款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洽商，并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194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再次访问美国，就“雅尔塔密约”及中苏谈判等问题与美同当局进行磋商，并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筹建联合国会议。

美国政府也不断派遣高级官员访问中国。1942年7月，罗斯福派遣他的行政助理居里再度来华访问，并亲自致函蒋介石，对居里使命作了说明："居里先生自前次访华之后，本人畀倚至深，随时咨询，凡有关中美关系之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各问题，彼以沉默之姿态，在幕后活动最力，深信彼能将尔我间特殊观点与相互所取之态度，作忠实与正确之沟通，此实为尔我不能面谈不得已而求其次之最善办法。"罗斯福特别解释，美国"正竭尽全力以帮助中国之争取胜利，正如现我协助英国及其他同盟国战胜敌人之努力，无分轩轾"[46]。自7月20日至8月7日，居里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达十四次，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远东战略，并就反攻缅甸、飞机供应、改善中英邦交、史迪威之地位、空运紧急物资、战后政治、印度问题、改善中苏关系等，广泛交换了意见。当时，蒋介石对美国援华物资太少、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没有中国代表以及史迪威监管与控制美国援华物资非常不满，居里的来访，安抚了蒋介石，疏解了双方的冲突和误解，缓和了史、蒋矛盾，使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关系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平安渡过。

10月2日—8日，罗斯福又派遣私人特别代表威尔基访问中国，并致函蒋介石介绍威尔基："彼为反对党名义上之领袖，彼对于政府外交政策以及作战事项，皆竭力予以拥护，并协力以造成今日国内精诚团结之现象。"[47] 威尔基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要人就加强中美合作、战时经济、中国工合运动、印度独立、英苏关系、中共问题以及战后稳定太平洋局势等进行磋商，并在重庆发表演讲，指出"贵国抗战之胜负关系全人类的生存"，"美国更应进一步联络贵国以及其他同盟国家"，"使贵国可以完全解放，使其他现正遭受蹂躏的国家也可以完全解放"等，颇受好评[48]。威尔基回国后，写了《天下一家》的小册子，介绍他访问各国的情况，其中对于中国抗战颇多肯定，并敦促美国政府加强援华。10月2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于威尔基访华结果表示满意，称"威尔基先生已以最热烈之语词，称述彼在中国人民中所见到之良好精神。福深信彼之访华，使吾等在美者对于协调

吾人共同作战力量之各种重要问题，获得更明切之见解，而证明此行有莫大之补益”[49]。

1944年6月18日至30日，当中国战场出现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危机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旨在稳定中国局势。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寄予“信心和希望”，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取得谅解，并表示美国愿意充当调解人。早在华莱士使华前，蒋介石即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华莱士作非正式表示：“如其来华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枭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50] 但美方并不为之而改变既定方针。由于华莱士的坚持，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7月10日，华莱士向罗斯福报告：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美国必须“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51]。华莱士此行为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定向作了重要的准备。9月，当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之时，罗斯福又派遣赫尔利为特使赴华，调处史、蒋矛盾引起的紧张的中美关系。（详见另节）

中美高层人物的频繁互访，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之下，这种互访对于及时交流两国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疏解互相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突发事件，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 “迪克西使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个目标：其一，是利用中国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52]，实际上是

依托中国战场来拖住日本，减轻其在太平洋战场所受的压力，使其能首先击败德国，再打垮日本；其二，以援华为手段，在远东扶植一个亲美的“强国”，代替日本的位置，“在远东为和平、战后的稳定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发挥有效的影响”，既抗衡苏联对亚洲的扩张，也削弱英国在亚洲旧有的殖民影响。

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美国就将不可避免地介入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占领和控制着广大的敌后区域，并从战略上包围着相当多数的侵华日军，成为美国官方不可忽视的政治实体；其二，抗日阵营内部，国共两党的压制与反压制、防范与反防范、摩擦与反摩擦越演越烈，已发展至严重的军事对峙，存在着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局稳定，而且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在美国人看来，发展下去将使其国家利益受损，而使日本得益；其三，随着美国援华力度的不断加强，美国人对重庆政府的抗日态度和治政措施的不满也日益加深。在他们的心目中，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失职与共产党的民主、廉洁、效率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国民党竭尽全力把中共描绘得一无是处，一再警告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但是美国人对于战斗在穷乡僻壤而保持神话般活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

加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调处国共关系，逐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分析美国政府的动机主要有两点：第一，“共产党军队可能对我们的战争努力产生的积极的军事价值”，中共的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满洲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会因为俄国加入对日作战而大大加强”；第二，出于对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考虑，“一旦日本战败，共产党将稳据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处于日军撤出的绥远、热河和满洲真空地带的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他们在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所获得的同情，以及可能得到的来自俄国的支

持，国民党要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国共内战将会引起革命，其结果会“使中国共产党远远超出他们现在所追求的温和民主的范畴”，“更趋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两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将会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53]。美国参战后不久，部分美国驻华官员就主张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建立军事上的联系，扩大对华抗日合作，并设想这种军事合作至少能为白宫判定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方案提供有用的情报。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中国通”们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美国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团，以便于制订对待国共关系的积极对策[54]。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肯定了上述意见，并指出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55]。

处于国民党军事进攻威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意欲介入国共关系采取了欢迎的态度。1942年5月，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在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56]。11月，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与美国驻华官员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有可能改善当前国共关系恶劣局面的惟一的力量；说明中共军队作为对日战争的参加者应当按比例得到美国的租借物资[57]。次年3月，当周恩来获悉美国有派遣官员访问中共控制区的意向后，立即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共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在那里工作[58]。中共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争取与美国方面建立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系；二是要求合理分配美国援华物资，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与国民党谈判的地位，在军事上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力量。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美国介入国共关系采取强烈反对态度，蒋介石担忧美国的介入将会对其权力形成潜在的威胁，危及其统治秩序。于是，步步为营，抵制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当他得知史迪威要

求国民党解除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装备并利用中共军队参加对日作战时，指责美国此举“更将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59]。在美国方面的一再交涉下，蒋介石一方面再三向美国政府保证：“我中央对中共本无武力制裁之意，始终如一以容忍感化为怀”；另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阻止美国与中共发生直接联系。直至1944年2月9日，罗斯福直接致电蒋介石，询问美军观察团可否去山西、陕西等地考察军事？蒋介石虽表示愿意“提供方便”，但仍坚持考察路线只能限于国统区内[60]。

1944年中，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大惨败，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全面的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介入中国国共关系的力度，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成为美国解决中国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问中国时，向蒋介石再三表示对于国共关系的关切，明确提出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希望，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军派遣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迅速完成了军事观察组的组建工作。其使命是获取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有关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提供共产党扩大他们战果最有效的办法”，并协助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同时，此举也是美国政府为阻止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挽救中国战场危机而做的一种努力。

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的成员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组长由“中国通”包瑞德上校担任，谢伟斯、卢登任该组政治顾问，其他成员包括航空兵军官、陆军军官、军医、技师、海军军官和信号兵等。美国中缅印战区给观察组的任务指令是：派往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观察组，请注意下列项目的情况，希望得到特别重视：敌军战斗序列；敌军空军战斗序列；汪伪军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情况、训练状况、

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领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情报目标；敌军轰炸的损失情况；气候情况；经济情况；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敌军的作战行动；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海军情报；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计等[61]。

中共对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颂美军观察组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期待美军观察组冲破国民党封锁来到延安，将认清国共关系的真相，并指出：“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多次会见他们，八路军主要将领专门为观察组作了介绍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彭德怀作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状况报告，陈毅作新四军在华中七年抗战状况报告，叶剑英作有关敌后作战及八路军编制装备报告，聂荣臻、林彪等介绍各抗日根据地状况。同时，在延安参观游览，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南泥湾三五九旅、抗日军政大学等。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能“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62]。其具体目标是：争取实现“盟国给我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等[63]。

美军观察组在中共帮助下，迅速分批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广为收集各种情报，在两个月内就成功发送了112份报

告，其中绝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如华北、西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和经济状况、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实力、布防、作战部署、训练状况等。更为重要的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入接触，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他们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若干重要主张，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高度评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指出："东京的报纸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他们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搜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合作，在通讯主任木克上尉的监督下，许多小型无线电台和指挥行动的仪器被送往共产党控制区的边远部分，惊人的、大量有用的报告一旦通过小型无线电台发出，延安就收到"。这表明双方的合作十分融洽[(64)]。

8月23日，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详细阐明了中共对于时局的分析及其方针政策，其要点是：一、民主改革国民党，是团结抗战和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指出："国民党必须整顿，它的政府必须改组，像它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那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二、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内部事务发挥积极的作用，指出：能否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取决于外部力量能否约束国民党，在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三、中共和美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指出：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调和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兴的，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等[(65)]。毛泽东的谈话，不仅对美军观察组的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通过谢伟思等送往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美

国政府后来派遣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和逼迫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方针，既是美国远东政策的表现，也与中共的外交努力有关。

同时，中共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努力也通过美军观察组取得了若干进展。8月下旬，中共发现在美国正式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情况下，要求美国外交承认中共不大可能时，迅速将工作重点放到争取美国军火援助上来。中共领导人的想法与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谢伟思等人认为：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应从向中共提供其极度缺乏的基本军事装备开始，并辅之以对使用这些装备的训练”。这样做，不仅对战争将会起十分的作用，当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将会得到中共军队的各种掩护和情报帮助，而且将迫使国民党放弃武力解决国共矛盾，在政治上实行改革，从而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66)]。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得到了史迪威的赞同。

9月上旬，中共中央一方面命令沿海各部队，速向京沪及华北各地发展，特别要在沿海一带广泛地开始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建立各种秘密的情报和联络机构，以迎接美军的登陆作战并实现中美联合作战；另一方面，又指示驻重庆代表向美国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特使提出：“根据我军历年抗战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50万正规军，200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后又指示在与美方交涉时，不提三分之一，只提二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其都优于国军也”[(67)]。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平分美国租借物资的要求，与政治上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军观察组从10月开始，先后策划了一系列与中共联合作战的军事行动计划。如谢伟思曾秘密建议美国用缴获的德国武器援助中共，

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交换，令其在江南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后美军观察组又秘密制订了“连云港计划”（空投支援中共在山东的部队）、“伯尔德计划”（为二万五千中共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并加以训练）、“麦克卢尔计划”（美国空降兵部队在中共军队支持下在山东沿海登陆作战）等。

由于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以及中共与美国驻华部分官员双方的努力，美国政府曾经存在着与中共建立正式关系，并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公正处理国共关系的可能，但是随着9月6日赫尔利的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逐渐偏向扶蒋反共的方向，其转折点就是震惊中外的“史迪威事件”。1946年4月20日，美军观察组结束工作离开延安。

三　史迪威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虽然结为战时盟国，但国民政府对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和美国政府的远东战略并不完全相同，两者的战略意图有时可以互相衔接，有时却是互相冲突的。如前所述，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大目标，但其基本点是要求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尽快击败日本，而国民政府却将希望寄托于美、英等国的与日交战，“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蒋介石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大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可以指望由美国“替他打日本”，他自身则利用西方的援助，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消灭共产党，这就是为共产党人所批评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战略。中美战略方针间的差异以及美国两个战略目标间的矛盾，导致中美关系波澜迭起。史迪威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表现。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最基本的分歧大致有下列各项：在政治战略方面，蒋介石认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作战的重担已由美国人接任，他不断批评英、美的“先欧后亚论”，鼓吹“先亚后欧论”，希望依赖美国打败日本，实行所谓“长期抗战”，实际上是

把“保存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蒋的这一态度引起史迪威严重不满。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在一份备忘录中尖锐批评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态度，内称：“一，中国政府的目的，第一是确保其自身的存在及在国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是尽可能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谈判。二，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保存实力而不是消耗其军事实力，指望由美国的海陆空军力量，或者俄国的陆空军力量去打败日本。三，如果有可能指望中国统帅部同意采取攻势的话，那多半只是在说服它相信它所消耗的军事装备能立即得到补充，并有利可图时，才是可能的。四，如果不附带任何交换条件，转交给中国的租借物资都将被囤积起来，而不会被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的规定，将这些物资用于对日作战。”[68] 蒋介石的方针与美国要利用中国的力量削弱、打击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不相吻合的，为此遭到史迪威的激烈批评和指责。史、蒋的分歧实际上是中美远东战略的分歧。

在军事战略方面，按照美国的远东战略，史迪威的基本思路是：尽快进兵缅北，打通滇缅路，恢复美国向中国提供物资的运输线，为此主张按美国方式整编中国军队，担负在亚洲大陆进攻日军的任务，甚至不惜以供应租借物资为条件，强迫蒋介石出兵缅北。蒋介石虽赞成发动缅甸战役，但以英国军队同时在缅南发动两栖作战，美、英提供海、空支援为先决条件，不肯贸然出兵。他热心支持的是陈纳德提出的“空中战略”。1942年10月，美国驻华空军指挥官陈纳德致信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全面阐述他的空战计划，主要内容是：美国驻华空军只要拥有并维持一支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和12架轰炸机组成的空中力量，就可以在中国境内击败日本，并有助于整个太平洋战争[69]。1943年1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中计划，要求美国军方优先保证对于美国驻华空军部队和中国空军的物资供应。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没有要求中国军队担任重任，比较符合蒋介石依靠美国军队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然而，这一方案将与史迪威的进兵缅北计划争夺战略物资，其可靠性也有疑问，遭到史迪威的

坚决反对。史、陈两人为此从重庆争吵至华盛顿，蒋介石是陈纳德的有力支持者。

与政治战略相关的还有是否装备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争执。对此，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但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戴维斯、谢维思等出于对美国战时和战后利益的考虑，力主美国在援助国民政府的同时，也要和中共合作。他们认为中共“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看到的”[70]。一再表示要“给同日本作战的中国共产党人供应美国武器装备”，并指示部下与中共方面拟定种种军事合作计划。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正是他们坚持和活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样做既符合战胜日本的需要，又能“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他们倒向俄国”。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行动，遭到视中共为其心腹之患的蒋介石死命地抗拒，毫无通融余地。

与军事战略相关的则是租借物资控制权争执。美国在战时虽然在政治上执行扶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但在军事上、经济上却并未真正将中国作为大国平等相待。中国战时获得的美国租借物资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15%，甚至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半数。更有甚者，当时给予英、苏的租借物资，货一上船，所有权即归英、苏，而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即便运到中国，控制权仍操之史迪威之手，成为史、蒋争执的又一重要内容。争执首先围绕着租借物资的支配权展开，史迪威声明在租借物资支配问题上，他以总统代表行事，而中国战区参谋长职责中并不包括物资支配权，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出抗议，要求改变史迪威独立控制租借物资的状况，让史迪威服从自己，但美方的答复是：即使换人，也将担任同样的任务，并对租借法案行使同样的控制权[71]。史迪威由此得以继续支配租借物资，并以此作为压迫蒋介石的重要筹码。当史迪威和陈纳德发生“空中战略”之争时，该项争执又转移到陆军和空军的物资分配份额上。1943年4月前，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八分之五用于陆军，八分之三用于空军。

蒋、陈在提出“空中战略”后，极力主张租借物资应优先供应空军，为此不断与史迪威及美国政府交涉。1943年初，陈纳德的主张曾一度得到罗斯福的支持。3月，罗斯福下令成立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并指示应维持陈纳德部队的继续作战能力。4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决定自7月起将“驼峰”运输线的运输能力提高至每月7000吨，其中4700吨拨给陈纳德使用[72]。总统的直接干预，表面上平息了双方的争执，但互相间的积怨却由此而更加加深。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进入高潮，华中、华南战局危急，陈纳德告急，要求每月给他1万吨物资。执掌分配大权的史迪威却在美国陆军部支持下，没有及时给予救援，使华中战场出现大溃败，围绕着“空中战略”的失败及其责任问题，蒋、史间，史、陈间互相攻击，推诿责任，更加闹得不可开交[73]。

导致蒋、史最终决裂的是军事指挥权争执。蒋、史对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军事权限问题从开始时就存在分歧。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他的下属，对于中国军队没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而史迪威则以宋子文与史汀生换文为依据，认为有权指挥中国军队，双方认识不一致。再加上战时中美关系的种种政治、军事问题及其他方面的分歧，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升级。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蒋、史就发生指挥权之争，史迪威指责蒋介石的“战术思想非常离奇”，虽然给予他指挥全权，实际上却是蒋本人遥控指挥，指手划脚，朝令夕改，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战机，感觉“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74]。蒋介石则埋怨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不知军纪何在”[75]？4月，美国以轰炸机16架轰炸东京，此举对于中国军事形势有严重影响，然而事先并未征询中国同意，本来双方曾约定轰炸东京的飞机不能返回中国，美方亦未实现诺言，结果招致日军5月对于中国浙东地区的报复性进攻，美军又不及时支援，造成浙东中国二万军民的伤亡，亦引起双方不愉快的争执[76]。5月，双方又在陆军改革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在蒋介石看来，军队改革只是期望用美式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而史迪威提出的方式却建议精简合并现有的

师，清除无能的高级将领，授予前线总司令以指挥全权，这将会影响蒋介石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史迪威在2月内提出十一个军事改革计划，蒋介石无一作复，使史迪威通过改革军队取得指挥权的计划破产。

7月，史迪威致书蒋介石，强调他首先是总统代表，其次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77]。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私下指责史迪威："言行无常，似有精神病状态，望其在华尽职，恐非所能"，要他转告美国政府，"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78]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问中国，对于蒋、史矛盾有所调解，但问题并未解决。1943年下半年，因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调往山西抗日前线而双方再起冲突。9月15日、28日、29日和10月，蒋介石连电美国，要求撤换史迪威，未为美方接受。至1944年3月，蒋、史又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问题上闹翻。4月4日，蒋介石虽在史迪威中断美援威胁下，下令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却没有放弃对于远征军的指挥权，他对部队的遥控指挥，使史迪威恼怒不已。7月初，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史迪威立即以挽救华中战场危局为名，建议美国陆军部强压蒋介石把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史、蒋矛盾由此而激化。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将晋升史迪威为上将，由他"统率全部华军和美军"，"并包括共产军在内"，以挽救危局。史迪威为了迫使蒋介石交出军权，再次利用美援卡住蒋的脖子，宣布凡不属于他指挥的军队均不能得到美援。蒋介石为了取得美援，一度曾同意委任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并在军队编制方面作了一些准备，但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一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为此，罗斯福决定派遣特使赫尔利来华。事态似乎有了转机，赫尔利的调解有所进展。然而，9月18日，罗斯福总统鉴于豫湘桂战局进一步恶化及陆军部的建议，向蒋介石拍来了"最后通牒"式的电文，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于是，事态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冒中断全部美援之

险而与美国政府摊牌。他向罗斯福强硬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但决不接受史迪威，要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而支持蒋介石，并建议“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79]。10月20日，史迪威被调离回国。

史迪威事件标志着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来说战后的长期政治目标已显得比战时短期的军事目标更为重要，美国政府不愿因一个史迪威而交恶国民政府，以影响战后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利益。史迪威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影响很大，它中断了由史迪威以及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所宣传和推行的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的工作进程，使美国对华政策由此而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向。

四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以1944年10月25日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美军总司令和11月30日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标志，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向。

9月6日，正当史、蒋矛盾激化之时，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赴华，其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队统帅；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统一中国军队等。赫尔利在协调史、蒋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史迪威的看法，其基本思路是：美国应该坚决支持国民政府，并联合苏联对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承认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交出军队，参加政府。为此，他在史、蒋争执中支持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在政治上不能了解蒋介石，或与他合作”，史、蒋的僵局“有深远的影响，会导致战争的延长和增加美国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他甚至危言耸听地对罗斯福说：“你若在此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失。”[80]

史迪威去职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并未结束。与赫尔利持对立观点的有艾奇逊、谢伟思等驻华外交官和美国国务院内的一些高级官员。1944年12月28日，中共领导人会见包瑞德，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去美国，毛泽东和周恩来愿一同或单独一人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进行会谈，并强调此事应由魏德迈将军单独处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知道”。美军观察组及时向重庆美军总部转告中共的意向，但当时魏德迈不在重庆，而且魏德迈与赫尔利早有互通信息的约定，结果观察组的电文落入赫氏之手。赫尔利为此大怒，致电华盛顿，称：“如果共产党人与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安排，那末我们试图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81] 结果，魏德迈从缅甸前线赶回重庆进行调查，并为自己部下加入此事表示歉意，包瑞德被免去观察组组长职务，并因赫尔利的反对而失去了晋升准将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赴美之行自然也是烟消云散。

然而，赫尔利的反对派并未就此罢手。1945年2月19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逊、谢伟思等五人乘赫尔利回国述职之机，联名向国务院拍发紧急报告，反对赫尔利推行的对华政策。主要内容是：如继续赫尔利的政策，“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中国内部冲突的爆发将加快”；美国由于军事需要应“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助于这次抗日战争的团体进行合作，并给以供应”；“向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政府，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将中共军队编入中央政府军队，执行联合作战计划，由美国军官指挥”；可将上述建议“私下通知蒋介石，如蒋拒绝，美国应准备发表公开政策声明”[82]。此份报告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由此而引起赫尔利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一场争论。

赫尔利视艾奇逊等人的行动是驻华美国使馆内的一场政变，他向国务院声明：“发这封电报是他的部下对他不忠的行动，它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作战一方的问题又复活了，而史迪威将军正是为了这个问题被召回的。”[83] 魏德迈支持赫尔利的立场。赫、魏的主张得到了

罗斯福的支持，艾奇逊一派意见被否决，此后难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影响。4月2日，在争论中占了上风的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美国“承认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认为蒋介石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公开宣布不与中共合作，并断然否定美国将向共产党提供武器等[84]。赫尔利的这个讲话即是他与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争论的一个总结。

随后，赫尔利按照既定的政策，积极扶蒋反共。首先，推动美国政府大大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1945年1月至8月，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达到2.265亿美元，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经济援助总额6000万美元的3.7倍，给予的租借军事援助总额也是前两年总额的二倍[85]。魏德迈在军事方面也一改史迪威的做法，采取了许多旨在壮大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新措施，如建立每周一次的中美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专门指挥野战军作战，何应钦任总司令，麦克鲁任作战司令，齐夫斯任后勤司令，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各职能部门；派遣美国军事顾问至中国战斗部队师一级司令部；在广西、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成立训练与装备中心，在日本投降前，帮助蒋介石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师；帮助建立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以及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发展军需品生产和运输；增加驻华美军人数，至战争结束时已达六万余，其中空军3.4万；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进行心理、谍报以及反共等方面的特种技术合作研究等。美国政府在“援华”的旗帜下，加紧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支持国民政府。

同时，赫尔利继续以调停人身份介入国共谈判，企图将中共军队统一于国民政府军队之中。（详见另节）他曾表示：“最主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86] 为此，赫尔利严格限制美国驻华官员与中共间的接触和联

系，否决了所有美国驻华军官和外交官制订的装备和训练中共军队的计划，禁止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艾奇逊报告事件”发生后，赫尔利对美国驻华机构进行了大清洗，一批具有远见的敢于反映实情的外交官被逐出在华外交机构，谢伟思等六人甚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逮捕。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赫尔利还积极谋求让苏联向中共施加压力。他认为，中共在政治上依赖苏联，只要苏联与美国采取同步政策，就能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交出军队，参加政府。1945年1月14日，赫尔利致函罗斯福，建议在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期间，与丘吉尔、斯大林达成协议，促使他们赞同美国的政策，意欲以美、英、苏联合支持蒋介石的国际压力，迫使中共同意“统一”于国民政府。赫尔利的这一建议成为美国赞同签署《雅尔塔密约》的动因之一，给战后中国政治留下了无穷的祸害。

第三节　中英关系的波折

一　中英远东战略的分歧与争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尽管在战略上与日本对立，对日本侵犯其在华利益不满，却始终对日本的侵华行动推行绥靖政策，在中国海关问题、天津英租界问题、华北白银问题以及封锁滇缅公路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换取与日本的暂时和平，给中国民众留下的印象不佳。中英关系随着国民政府争取英国援华的失望而日趋冷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消极抗敌，节节败退，并且不时和中国争夺美援物资，使其国际威望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中英虽然结为战时盟国，在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也曾在缅甸战场上并肩作战，但英国的远东战略与中国的抗日外交间差距很大，双方出现矛盾和冲突为势所必然。

英国政府的远东战略有三个要点：其一，“重欧轻亚”、“先欧后亚”论。英国认为欧洲是决定英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之地，远东虽然也有英国巨大的殖民利益，却不对其本土构成直接威胁。为此，英国牢牢拉住美国，不使其稍离“先欧后亚”的轨道，这与蒋介石奉行的“先亚后欧”论，南辕北辙，无法协调。其二，维护英帝国的远东殖民利益。在英国统治集团看来，远东的抗日战争既是反法西斯战争，又是保护英国殖民利益的战争，对于两者的位置，他们常常把后者摆在首位。蒋介石曾批评英国的远东政策，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上，“绝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87)]。其三，与美国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不同，英国既希望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使其能在战胜德国后，顺利恢复其在远东的旧有殖民地，又害怕一个独立强盛的中国会对其在亚洲事务方面的绝对发言权提出挑战，更担心新生的中国会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的榜样，形成与大英帝国相抗衡的中心，并在亚洲引起民族解放的连锁反应。中国则在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历程后，进入了“四强”的行列，支持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提升自身的强国地位，成为其重要的外交目标，这也势必与英国的远东殖民利益发生冲突。

1941年8月，美、英首脑联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肯定了民族自治原则，但丘吉尔很快作出自己的解释，称该原则只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印、缅等地，将英国的远东殖民地排除出《大西洋宪章》适用的范围之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统治者坚持殖民统治立场，不仅明确反对印度、缅甸等旧有殖民地的独立，而且不断地贬低中国的抗日战争，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激起中国朝野的坚决反对和批判，也一再导致战时中英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机。

1942年8月4日，蒋介石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也对英国的战时对华政策作了激烈抨击，指出：“目前英国所采取之政策，实甚

短见”，“倘无中国之抗战，亚洲大陆早已为日本所独占，印度早成为缅甸第二，而日本铁路早已纵横西比利亚原野矣，英人见不及此，仍视中国为百年前之中国，伈伈俔俔，俛首于英人之压迫，甘受屈服”，表示“英国对我既不愿以平等相待，藐视我为劣等之民族，故即彼有协助之贡献，亦非吾之所可接受”等[88]。

1944年9月28日，丘吉尔在题为“战争和国际形势”的演讲中，针对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的失败，说：“我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尽管中国得到过量的美国援助，但这个伟大的国家由于被七年的战争弄得筋疲力尽，所以遭到严重的失败。其中损失了陈纳德的美国飞行大队所需要无价的飞机场。这些不能不十分令人失望和不安。”[89] 丘吉尔的演讲再次引起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发表社论驳斥丘吉尔的讲话，首先引证美国租借物资分配给各国的比例，指出这些美国物资大部分给了英国和苏联，中国仅得到2%，说明“过量”之说的荒谬；接着历数英国自抗战以来损害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指出丘吉尔之所以尽一切来反对中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七年半卓有成效的抗日，形成了对英国在远东利益的威胁，尤强调三点：第一，中国的抗战会激励印度为独立而战；第二，香港的九龙问题是中英关系中的“脓包”，是英国良心上的耻辱；第三，英国担心战后中国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远东举足轻重的大国。态度之严正，措辞之尖锐，为战前所未有[90]。10月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评述丘吉尔的讲话，“以正视听”。其要点是：中国军队靠的是抗战决心来对抗日军的优势兵力；中国军队将美援物资和其他物资主要用于缅甸战役，才导致本土军事失利；丘吉尔沾沾自喜夸耀的英军在缅甸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中国毫不犹豫地为英属缅甸的抗日大业奉献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等[91]。中国舆论批评远东战场不受重视，大批美援给了英国和欧洲战场，中国未能得到应有的援助，呼吁美国加强对华援助。国民党对于丘吉尔的批判，包含着为自身军事失败辩解和开脱的意义，但丘吉尔指责中国得到的美援“过量”，却为国民党提供了反英的借口和发泄的机会。在中国朝野一片

反英声中，英方被迫做了让步。根据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建议，一方面由英国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结束反英运动；另一方面，由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肯定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并让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上将于10月14日亲往缅甸北部慰问中国军队，同时由英国总参谋部发布特别嘉奖令，表扬中国军队。此次风波在双方的妥协下告一段落。

二　中英战时交涉的主要问题

由于中英两国在远东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朝野的反英浪潮持续不断，中英间的交涉也层出不穷，其数量之繁多，争执之激烈，在同盟国间是很突出的。主要争执除香港问题、印度独立问题外，还有下列数端：

中国的四强地位。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有意不提中国是四强之一，只提美、英、苏三强，还谈到在击败德国之后，英国将采取某些措施让军队复员，只字不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广播前，英方还故意安排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成员去听演讲。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当即提出抗议，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此与英方进行严重交涉。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约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指出中国的不满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丘吉尔的意思是中国是战后需要西方援救的国家，不仅不是四强之一，而且不能参加战后的世界组织；第二，丘吉尔提出在打败希特勒后要部分撤军；第三，丘吉尔大谈战后问题，而不提如何打败日本[(92)]。随后，中国报刊掀起了批判丘吉尔谈话的浪潮。最终迫使丘吉尔指示英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演讲时，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中国为世界作出了贡献[(93)]。事态虽暂告平息，但双方的分歧并未解决。5月，丘吉尔又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由美、英、苏总揽一切，再次把中国“摒之门外”。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随即在芝加哥发表学说“加以巧妙的反驳”，并事前电请罗斯福总统从无线电中收听，争取美国的支持。结果，罗斯福对宋美

龄表示与她“有同一感情”。美国参议员、民主党领袖发表演说，指责丘吉尔，称“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的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之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迫使英国外交大臣改口称“中国必为四强之一”[(94)]。

缅甸战役。英国先是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继而又不积极抗击日军入侵，处处掣肘中国军队的行动，最终独自仓皇撤往印度，导致中国远征军败北，英国在缅甸问题上，最主要是担心中国参与保卫或解放缅甸会导致缅甸倾向中国并走向独立。当曾经在仁安羌救援过英军的中国军队新三十八师退入印度境内时，英印当局竟以“维护治安秩序”为由，要求解除中国军队武装，遭到严拒[(95)]。当盟国间讨论反攻缅甸计划时，中、美均取积极态度，1943年7月至8月，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曾反复强调收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96)]。8月7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呼吁盟国协力收复缅甸。美国政府也希望尽早发动缅甸战役，由于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尝试失败，只能改为沿喜马拉雅山边缘飞行，不断遭到日军飞机袭击，损失惨重，因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重开滇缅路，史迪威曾蒙耻缅甸，重返缅甸报仇雪恨，也是美方急于发动缅甸战役的动机之一。但英国反对在缅甸进行大战役。丘吉尔相信缅甸战后会自动落入英国之手，他指示暂把缅甸问题放下，他强调英国不应该“选择一个错误的地方与日军进行决战”。开罗会议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度确定了由英国在缅南发动两栖作战，中、美军队在缅北发动攻势作战的计划，即代号“海盗”的作战计划。但会后很快因英军拒不进行缅南作战而使计划告吹。英国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其自私的远东战略。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些属地直至战争结束时还在敌人的占领下，则将来在和平会议时，英国人的主权可以分毫无损地恢复，而如果这些属地因借中、美的帮助而夺回，则英国人的主权可能会受到影响。”[(97)] 英国为此拖延收复缅甸作战达两年之久，直至1944年5月才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参加缅甸战役。

西藏和东三省问题。英国政府不仅在香港问题上顽固坚持殖民立场，而且在中国的西藏主权和东三省回归问题上，阻挠中国的统一。英国虽然不能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但不断玩弄花招，企图分离西藏与中国的关系。1943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到中国外交部，就中国军队在青海集结事提出质询，称此举使西藏当局深感不安，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政府在中亚细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外交部严正表示：“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将其挡了回去。蒋介石为此批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询问，“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谊。”[98] 6月，英国外交部在一份题为《西藏的地位》的备忘录中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是“保卫”印度的一个重要地区，为使印度免受俄国和中国的“侵略”，必须由英国控制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西藏国”作为印、苏、中三国之间的缓冲国。为此，英国一直反对中国在西藏行使管理权[99]。1944年，国民政府将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调任重庆农林部长，成功地实现了对于新疆的直接控制，接着，调兵进驻新疆和西藏邻近各省，大有改变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西藏现状的可能，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当中国政府准备在西藏修筑一条公路，以便从印度运进战略物资时，英国立即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决心用武力去统一西藏的象征，为此英国驻华大使数次向中方提出抗议，反对中国在西藏修公路，也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邻省驻兵[100]。在英国的威胁下，国民政府放弃了在西藏修筑公路，也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统一西藏。开罗会议上，双方再次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和争执。中方表示：“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与中国之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切盼英国根本改变其过去对西藏所持之政策，俾中英能彻底了解，增进邦交”；英方则坚持视西藏问题为现实问题，“中国前既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则英方之立场自以此为出发点”。中方要求“英方放弃其不合理之政策，否则不免影响两国邦交”；英方则坚持“如欲寻觅解决方案，当由中英双方同时重行考虑其所持之立场”等[101]。

战后由中国收回东北，是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多次声明战后要收回东北主权，并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英国政府却不愿这样做，担心会引起连锁反应，危及它在香港等地的地位和利益。相反，英国处心积虑地意欲造成东北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东北和西藏、蒙古都被标为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在外交场合和外交文件中，称呼东北为满洲，国民政府数次提出抗议，均不为其理睬。1943年初，中英在东北回归中国问题上的争论终因英国人赫利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上大放厥词而公开化。赫利在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赞成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但由于满洲的工业的发展，完全靠日本人，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战后在安排满洲前途时，一方面终止日本对满洲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让日本继续在那儿进行工业生产。尤强调“应该有余地考虑是否允许日本人战后在满洲继续从事经济活动”[(102)]。此举引起了中国朝野的强烈反应，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舆论也纷纷谴责英国的阴谋，坚决要求战后东北回归中国。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教授致书英国议会领袖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英国著名政治家西赛尔，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收回东北的意志和决心，指出赫利事件使中国人民怀疑英国是否反对无条件将东北归回中国，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公开宣言，支持战后将东北归还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的抗议并未使英国官方改变立场，英国外交部坚持“东北三省及台湾的前途必须留待战后和平会议来处理”，但这一事件使中国朝野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公之于世，在国际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日后开罗会议决定将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打下了基础[(103)]。

战争贷款问题。1942年2月，当美国宣布对华提供五亿美元贷款之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将给予中国5千万英镑贷款。在国民政府看来，英国政府既已宣布给予贷款，就应予以兑现；但英国方面则以此举为一种姿态，“就像一幅字画拿来挂在墙上看着就行了”，其用意是进行宣传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并没有付款的打算，英国本身财政

拮据，有赖美国帮助，也没有兑现贷款的实际能力。消息传出，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英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行动”[104]。随后双方进行长达两年的交涉，至1944年5月2日，由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签署了《中英财政协助协定》，确定英国对华贷款总额仍为五千万英镑，用于战时偿付在中国因战争而为国家所需物资之购买、支持因按对日战事结束前中国政府所订合同所作购买而在英镑区负担之服务费用、备供发行内债所需之英镑、供给中国政府支付在印度与缅甸之中国军队之薪给及当地开支所需之卢比货币、支付两国政府随时商定在英镑区内之其他服务费用等[105]。实际上直至战争结束，中国并未完全得到英国的战争贷款。

宋美龄访问英国问题。1942年11月至次年7月，宋美龄抵美访问，受到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非常隆重和热烈的接待，在同盟国间传为美谈。英国政府为了与美国实行平行政策，也由皇太后出面，邀请宋美龄访问英国。然而，由于中英间存在种种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心存芥蒂，宋美龄不仅没有接受英方的访问英国的邀请，而且也谢绝在华盛顿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这种对于英国外交的冷遇，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战时中英关系的低落。

三　中英访问团的互访

尽管战时的中英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但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还是其主要方面，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声援。1942年4月，英皇以英国最高军人荣誉大十字勋章赠予中国战时统帅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致勋赠词时称：此举“除向贵委员长军事成就表示敬意外，复亦为本国人民对全体中华民族反抗英勇斗争表示崇敬敬佩之忱。”《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英国勋章的授受是“中英两民族友好交流的象征”[106]。为了消除中英间的种种误解，缓解互相间的冲突，寻求沟通与谅解，在中英双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曾互派代表团进行访问，对于增进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起

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战时中英关系中不容忽略的又一重要方面。

1942年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获悉英国国会拟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期改善两国关系。他立即建议蒋介石以中国政府领袖和最高统帅的身份出面邀请，为蒋介石所采纳。顾氏认为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改善中英关系。在英国访华团抵达中国之前，顾氏奉派赶回国内协助接待工作。11月10日，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重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以艾尔文勋爵为团长。四名成员分别代表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党三个主要政党及国会上下两院。他们性情善良，不囿于成见，热爱中英友好事业。其使命除了实地考察中国的抗战形势外，将向中国人民说明欧洲的战局和英国面对的严重局面，解释英国必须集中力量打败德国纳粹，然后才能将注意力转移至远东来。

代表团受到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应邀出席了一系列的宴会、茶话会和招待会。当时，正值国民党中央举行五届十中全会，在顾维钧的建议下，代表团被邀列席了11月16日的会议，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外国人出席中央全会，既表达了国民党对于英国访华团的重视和中英人民间的团结和友谊，也有利于推动国民党与英国各政党间关系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重庆、西安、成都、昆明等大都市，并赴潼关抗日前线视察，对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陪同代表团活动的顾维钧在事后给蒋介石汇报时指出："这次访问是成功的，访华团对战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政府政策、人民的气质以及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获得了一个总的印象"，"对促进两国间的同情和了解肯定是十分有益的"[107]。

1943年12月，国民政府为推动中英战时合作，沟通双方对于互相关系和重要国际问题的意见，并对上年英国国会代表团的访问进行回访，决定派遣代表团访问英国。代表团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任团长，参政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立法委员温源宁为团员。其

使命是：宣达中国对英国人民之友好、考察英国努力抗战状况并报道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与英国朝野交换意见等[108]。蒋介石致函英皇乔治和首相丘吉尔介绍中国访英团赴英访问。

中国代表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英国二十余座城市，受到英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英王乔治夫妇亲切接见代表团，丘吉尔也病愈后将中国代表团作为第一批外国客人接待。1944年1月25日，丘吉尔在唐宁街首相官邸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及驻英大使顾维钧“接谈半小时”，态度庄严坚定，“谈至东方共同仇敌时，渠以郑重词调申述英国国策，必以军力迫使暴日无条件投降求饶，方算对得起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词语沉着，字字有声，盖对中国国民保证也”[109]。使代表团成员深感满意。在一次矿工联合会举办的国际形势报告会上，一位矿工发问：“世界的重心，现代为美国，下代为苏联，再下代为中国，英国应如何及早与美、苏、中取得彻底的联系呢？”表达了英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信任，并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更使代表团感受到英国人民的情谊[110]。

中英代表团的互访，系半官方性质，双方在访问中都没有对中英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互相进行争执和质难，因此，不可能使有争议的问题获得解决或有所进展，但是双方的互访对于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了解和同情是大有裨益的。1944年1月30日，丘吉尔致函蒋介石称颂中国访英团之成功，赞扬访问团诸君所表示的“谦恭和悦与完美合宜之态度，使凡与接触者均发生敬爱与仰慕之感”，向中方表示感谢[111]。4月7日，访英团王世杰、王云五、杭立武、胡霖相继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访问英国经过及观感，亦对此行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英人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对我具有深厚同情，并盼两国于战后之继续合作”等[112]。在当时的情况下，此种方法既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中英访问团的互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缔约

一　中苏关系的恶化

以日苏签署《中立条约》为转折点，中苏关系逐渐逆转。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生存面临严峻考验，对华援助完全中止，其远东政策的重心从战争初期的帮助中国拖住日本，确保自身安全，转变为敷衍中国，稳住日本，避免两线作战，两国在欧洲大战爆发后已经淡化与松懈的双边关系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实现结盟，美国援华的力度大大加强，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民政府转而依靠美国的帮助战胜日本，苏联在国民政府外交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对此感触尤深，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意向“越来越明显”，他“在中国已无事可做”[113]。

中苏间的正面冲突是从新疆问题开始的。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同苏联的中亚地区接壤。1933年4月，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发动政变，依靠苏联军队的支持，平定了新疆的各种反对势力，稳定了统治，苏联势力也随之渗入新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失去了对于该地的权力控制。新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苏联军队可以在新疆常驻，而且苏联有权在新疆开矿、采油、采金和修筑铁路，新疆的对外贸易，完全依赖苏联，而与内地中断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经由新疆运输各种苏联援华物资入内地，但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依然如旧。这种状况至1941年前后发生变化，由于盛世才与新疆地方民族势力间的矛盾以及苏联势力的介入，引起双方的猜疑、摩擦、冲突以至残杀；另一方面，也由于苏联在苏德战争中暂时失利，导致盛世才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并向国民政府输诚。盛世才在致蒋介石的信中，指责苏联“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以帮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检讨他过去的“联苏”，“实由学识与经验之不足，致被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的人们所愚弄欺骗”，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合作，“誓以致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等[114]。

盛世才的“倒戈”，给国民政府控制新疆创造了条件。国民政府迅速制订《收复新疆主权方案》，规定：“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务，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并计划将美、英势力引入新疆等[115]。1942年7月，国民政府利用盛世才在新疆策动反苏行动，逮捕新疆政府中的亲苏人员，并于年底迫使苏联驻哈密地区的红八团部分人员撤退。8月，国民政府很快决定了对苏方针及实施步骤，主要内容是：一、关于苏方在新取得之合法利益应由中央与之商订；二、如无协定根据而无关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三、其所得利益妨碍我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或取缔；四、关于国境检查，我国应在霍尔果斯及其他新边要地派驻军队布置防务，作为中央恢复新疆主权之一种表示；五、苏联飞机入新省境内，须先依照外国航空器飞行国境统一办法及检查暂行办法办理，否则以非法越界论；六、苏联车辆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擅自入境；七、苏联人民未持有我国合法出入境签证者，不得擅自出入新疆省境等。并强调：“苏方在新非法行动相沿已久，兹予矫正，自感不便，但在现在国际局势之下，我方进行调查与之提高，苏方似不致公然表示拒绝，惟难免有色取行违情形，我方似应选派精明干练之负责人员执行之，并先派兵入新以为我决心处置之表示，但在实际上不可过于操切，以免影响邦交。”[116]随即中方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

苏联方面迅速作出反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直接会见蒋介石，交涉新疆问题，同时在新疆采取报复行动。1943年1月，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宣布：“新疆当局之反苏行为，迫使苏联决定撤回对新疆的一切支援。”红八团撤退时，拆除了独山子油田机器和头屯河铁工厂机器，运回苏联。4月10日，普式庚再次声明：完全停止苏联在新疆的地质考查团工作，撤回工作人员和机器[117]。5月17日，由苏联驻华大使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了将近十个月的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也因苏方拆除设备运苏而告中止[118]。6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将苏方决定正式通知中国官方：一、撤销迪化飞机厂，

将新疆苏联工人、职员及技术人员，以及苏联设备运回苏联；二、停止独山子油矿及炼油工作，召回各专家，并将自有设备运回苏联；三、缩减苏联驻新疆商业机关之活动；四、召回在新疆之其他苏联专家[119]。1944年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签署合同，中方以170万美元现款购买苏方在独山子油矿遗留之全部油井建筑及设备，并于21日接收完竣[120]。自此，中苏在新疆的经济合作完全停顿。

然而，中苏在新疆的交涉却并未结束。由于盛世才在新疆的残暴统治，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苏联的影响和卷入也鼓励了部分新疆少数民族领袖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愿望。自1943年春起，新疆不断发生各族人民的起义。1944年8月，国民政府逼迫盛世才提出辞呈，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企图缓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但由于对苏关系恶化后，中苏边疆贸易锐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大幅下降，致使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减，至1944年底形成“三区革命”的高潮。此时，由于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苏联已不再担心来自西部边界的威胁，对新疆政策也转趋强硬，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明里暗里采取支持的态度，甚至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这引起国民政府的更大疑忌和仇视，两国间交涉不断，中方质问苏联驻华大使，指责苏联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要求苏方调查该项飞机来源，并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苏方则称该事件系由中国军队因追缉哈萨克人民、遂侵入外蒙古之领土引起，声明苏方根据1936年3月苏蒙互助条约，为保护外蒙古领土安全起见，将不得不予该共和国以一切必需之援助及支持等。双方的争执复转向外蒙古主权问题，中方声明根据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及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1936年之苏蒙互助协定，中方当时即提出抗议，不予承认，苏方当时亦在复照中重行确认1924年中俄协定仍保持其效力等。蒋介石还将该事件诉之于罗斯福总统，希望美方予以干涉，但罗斯福却复电蒋介石，建议暂时搁置外蒙古、新疆边境事件，“以待此次战争之结束”，事态虽未恶化，但争执却进一步升级了

(121)。

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标志是国民政府在国内不断挑动反苏行动。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国共摩擦、冲突的日益升级，蒋介石越来越将共产党问题与“第三国际”与苏联政府的支持相联系，由此而对苏联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恶感，并大量削减对苏贸易等，恶化两国关系。苏联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1942年3月，召回了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开始对国民政府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1943年夏，当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大规模发动反共摩擦，苏联政府公开指责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围攻。1944年夏，苏联新闻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不将全部兵力用于抗日作战，而是使用大量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抨击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没能组织好对日本军队的反击，大多数部队一触即溃，一败千里，向同盟国呼吁改组中国国民政府，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压力。

苏联政府还在同盟国内部和国际事务中有意贬低、留难国民政府。当美国政府欲将中国列入世界四强行列时，曾一再遭到苏联政府的反对和阻难。1943年10月，苏联政府曾反对中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11月，斯大林又借口苏联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拒绝罗斯福提出的举行美、英、苏、中四国元首会议的建议，不愿与中国平起平坐讨论国际问题。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多次和斯大林讨论中国问题，斯大林始终对中国抱蔑视的态度，罗斯福提出：战后应由美、英、苏、中四大国组成一个“有权立即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的警察委员会。斯大林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是强大的，要中国参加四大国会议或组织，显然是不合适的。罗斯福解释说，他并不是不认识现在的中国很弱，而是想到更远的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民的国家，将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但是，斯大林依然不置可否。1944年夏秋间，当筹备建立联合国的顿巴敦橡胶园会议召开时，苏联政府再次拒绝与中国代表坐在

一起。会议不得不重演开罗—德黑兰的一幕，分为两个阶段举行，使中国处于美、英、苏决定重大问题后被通知的被动境地，这使中国的对苏不满情绪益发增强。1944年下半年，中苏关系下降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点[122]。

二　雅尔塔密约的签署

1943年底，苏军在苏德战场上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作战，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已经确定，欧洲战场的胜利大局已定。尽管大战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但是各盟国的首脑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战后的利益分配和政治安排。美、英、苏三国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各种会晤，力图为自己的国家获取更多的权益。中国虽已荣列“四强”行列，但未能享受“四强”待遇，反而成为美、英、苏三国进行秘密交易的对象。

苏联是谋求在华特权的主要国家。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考虑，苏联早就计划从西向东在新疆、外蒙、东北的中国境内建立自身的势力范围，构筑一道抵御美国在远东势力的防波堤。由于盛世才的“倒戈”，国民政府势力进入新疆，使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受到影响，苏联转而支持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政府斗争，随着“三区革命”的发展，使苏联有理由认为它可以继续保持其在新疆的影响；外蒙古已在它的实际控制之中，需要解决的只是正式独立的名义问题；其主要的目标是中国东北地区，苏联念念不忘要恢复沙俄在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将承诺对日参战视为索取中国权益的最好时机。

1943年11月，美、英、苏举行德黑兰会议，首次就三国击败德国后苏联的对日作战问题进行磋商。斯大林提出了在远东获取不冻港的问题，并表示参战的条件“也许等到俄国人积极参加远东战争的时候再说比较好些”[123]。随着欧战的临近结束，斯大林关于对日作战的条件逐步明朗，并就此与美、英进行了一系列极其秘密的谈判。参

与其事的，除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外，还有华莱士、哈里曼、莫洛托夫、赫尔利等。

1944年10月中旬，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特使哈里曼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军须在德国失败后三个月始能完成兵力调动，集中60个师在远东发动攻势，要求美国在1945年6月30日前协助贮存150万人所需粮食、燃料、交通工具等战争物资，共计固体物资86.014万吨，液体物资20.6万吨，并且处理好俄国参战的政治方面问题——即指中国承认苏联在远东的对日要求等[(124)]。苏联政府以参战为筹码，向美国索取大量物资，并要挟美国满足其在远东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12月14日，哈里曼会见斯大林，再次讨论苏联参战的政治条件，斯大林明确提出：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归还俄国；租借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租借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的铁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其范围远远超过了德黑兰会议所讨论的内容[(125)]。

对于美、英、苏间的这种秘密交涉，中国国民政府有所觉察。1944年11月9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致电蒋介石，密报“苏联国内近月来对旅顺港颇多关注之证，不但杂志著论，称旅顺为苏联之宝，一如其他苏联领土，且有专书出版，追述旅顺之失，视为遗憾”；并称美国海军李海上将曾向他透露：“美方曾表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俾促日寇之败，并探苏联之意，而苏联隐示，欲乘机取得旅顺，为参加条件之一”，实为探询中方态度[(126)]，然而国民政府却无法探知确讯，也难以采取制止行动。雅尔塔会议前夕，苏联政府曾秘密通知中国，表示愿意接待蒋介石的个人代表宋子文访问苏联，讨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战后朝鲜地位、苏联利用中国东北港口、战后中苏经济关系、中苏边界和平以及中苏间建立更密切更协调关系诸问题，中国官方立即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密报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方面的“合作与建议”；然而，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的答复却是：“我们

不应使中国政府得到那样的印象，认为在中苏关系中我们准备承担的‘顾问’责任。”明确表示不在中国与苏联之间扮演“调停者”，实际上拒绝了中国方面的求援[127]。

1945年2月4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8日下午，罗斯福、斯大林秘密磋商苏联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内容涉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问题、大连与旅顺口问题、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问题等。斯大林再三强调：如果此等条件不能满足，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要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对德作战是因为德国威胁了苏联的生存，但他们却不能懂得苏联何以要和一个并未发生重大冲突的国家作战？假如此等政治条件可予实现，人民即将懂得宣战是为了国家利益，且比较容易向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这一决定。双方约定在苏联把25个师的军队调到西伯利亚至满洲边界后，再把有关决定通知中方。斯大林特别强调，在会议结束时将经三国同意的条件见诸文字[128]。

10日，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的草案》，美方提出三点修改，即大连港“应在国际控制下成为自由港”，中东、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委员会来控制管理”，有关港口和铁路的协议“需要取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等。双方略经讨论，即于次日邀约丘吉尔共同签署《雅尔塔密约》。该密约规定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政府承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129]。这就是美、英、苏三国以中国主权为筹码，为满足各自利益而签署的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雅尔塔密约。这是大国强权政治在同盟国间的一次丑恶的表演。由于斯大林的建议，而且罗斯福担心，通知中国政府的任何事情，不出24小时就会让全世界知道，三国约定该密约在斯大林最后决定对日宣战前，暂不通知中国。

美国政府何以会签署这样的密约呢？首先，由于“去年我国军事失利，罗感觉我国力量不够，美国舆论又不愿见美士兵牺牲，故罗转而盼苏联参加远东战争”[130]。其次，美国军方对于日本军力的估计错误，他们以为日本陆军尚有强大力量，如苏联不参战，日本即使丧失本国诸岛，仍可在中国大陆作战，战争可能延长至1946年秋甚至1948年[131]。为此，美国急切希望苏联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挥师东进，参加对日作战，尽早打败日本，减少美军伤亡。第三，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美国出于战后维护远东利益的政治需求，罗斯福担心在美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最终打败日本之后，苏联军队将不请自来，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地区，将该地和外蒙古占为其势力范围，那就将直接影响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为此，预先签署一个条约，将能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并促使苏联政府承认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东北的主权。

英国政府在讨论和签署该约的过程中很少发言，貌似被动，实则另有企图。英国战后在远东的最大目标是恢复其在战前享有的权益，

包括恢复在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地的殖民统治，继续占有香港等。英国政府签署该密约，将可在香港等问题上与苏联保持某种平衡，便于它在远东恢复殖民统治。

苏联政府是签署该密约的策动者和主谋，密约内容也主要体现了苏联政府的远东战略利益。它和当时有求于它的美国和在香港等问题上心怀鬼胎的英国，背着中国达成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肮脏交易，演出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一幕。

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国间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对于美国来说，它已插足中国内政，期望按照自己的意图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国成为两党并存竞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附庸，既借以抵制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又抑制英法殖民势力的复归远东。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苏联政府在处理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同步政策。4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述职途中抵达莫斯科，奉命向斯大林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答称：苏联支持这个政策，表示愿与美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同时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土地改革者，此种提法经赫尔利传播，迅速传遍美国统治集团，引起极大关注。5月28日，斯大林又一次向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表示：无论战时平时都愿意尊重蒋主席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坚固统一的国家[132]。

对于苏联政府来说，随着苏军参战日期的临近，频频要求美国履行诺言，催促中国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密约。5月下旬，斯大林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时，再次希望美国政府立即将密约内容通知中国政府，敦促其履行一切。双方商定中国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应于7月抵达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届时由美苏双方同时和中国政府说明雅尔塔密约的内容[133]。

然而，由于赫尔利在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期间，已将雅尔塔密约

的内容透露给了蒋介石，美国政府不得已提前将密约内容通知中国国民政府。6月9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约见宋子文，通报密约有关内容，并表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便不能不予以支持！"宋氏作出强烈反应："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134] 6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关于俄国备忘录案，暂以兄个人意见对美表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非设法除去不可"等[135]。但是，杜鲁门总统并不为中国方面的交涉所动。14日，美国政府正式将密约通知中国，力促国民政府按照美苏商定的时间表，派遣宋子文赴莫斯科与苏联缔约。

按照国际惯例，中国没有参加签约，也就不存在履行条约的义务和责任。但是，由于该条约是由美、苏、英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中国国民政府受同盟国关系制约，无法拒绝。如果拒绝，即将出兵中国东北的苏军可能会更加无拘束地在中国东北自由行动，给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15日，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方面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论中苏可能签订什么条约，美、英均应为协定当事人；第二，旅顺口应指定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海军基地；第三，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转让苏联，应由四国而不是单独由中苏两国来讨论等。显然，无可奈何的中国国民政府希望将美国拖入中苏谈判之中，以为自己的后援，但是这些建议均为美国所拒绝[136]。中国国民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苏的安排，与苏联政府进行中苏缔约的谈判。

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

按照美苏商定的日程表，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政府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中苏谈判。会谈分为两个阶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为第一阶段，双方进行五轮谈判。后因斯

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波茨坦会议而暂停。8月7日至8月14日为第二阶段，双方又进行四轮谈判，最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政府在谈判中态度傲慢。早在6月12日，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就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

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

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5．库页岛南部及与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当还苏联[137]。

蒋介石则在谈话中强调："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138] 中苏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就拿出"雅尔塔密约"，气势压人地指出："商谈条件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谈判不时出现僵局，苏联方面还以"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以前，应先和中国政府签订协定"为由，催逼中国代表团让步签约[139]。

中国代表团长宋子文在谈判中除据理力争外，始终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保持密切联系。在谈判开始后的十天中，宋子文五次会见斯大林，同时也五次会见哈里曼。显然，国民政府希望通过美国的帮助和干涉，迫使苏联能有所让步。然而，在谈判的第一阶段，美国政府

虽在一些问题上同情中国，却始终恪守不介入中苏谈判的立场。7月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就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对“雅尔塔密约”关于外蒙古文字作出解释一事致电哈里曼：“在目前的双边会谈中，美国政府如试图充当‘雅尔塔协定’任何有关条文的解释者，那将是不明智的。但是您可以非正式地告知宋，据您所知，美并未讨论过如何解释‘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须维持现状的条款，在未进行这种讨论的情况下，这些书面文字可以接受的含义，即应维持外蒙古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现状。您应向宋表明，美不能对‘雅尔塔协定’中的文字作出任何官方解释。您的非正式的解释仅供他本人得知，不得在官方的谈判中引用。”[(140)] 美国的立场反映了当时美国远东战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1951年哈里曼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对此作了说明：

>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及时参战，有助于联合参谋总部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的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作的一般化保证化为俄国人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141)]。

中国代表团孤立无援，只能独力与苏联争辩。

在谈判的第二阶段，由于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导致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同时，也由于中国在苏联的压迫下，在谈判中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将有损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政府逐步介入了中苏谈判，并加大了援助中国的力度。8月5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奉命通知斯大林：美国政府相信宋子文已满足了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提出的要求，希望苏联“不再要求中国让步”，“不要和中国签订要他们进一步让步的协议，不利于我们的利益”，建议在中苏协议中“再次肯定斯大林口头保证东北地区遵守‘门户

开放’政策，并同时公之于众”，表示美国政府不反对成立一个中苏美英四方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管理大连自由港的最高机构等[142]。8月8日，哈里曼代表杜鲁门总统会见斯大林，要求苏联方面“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关于苏中之间现正谈判中的有关使用东北地区的港口和铁路的协议，无论苏方或中方都没有背离该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斯大林表示同意[143]。美国态度的转变使中国代表团在对苏谈判中的艰难处境有所改变，并推动了中苏条约的最终签署。

中苏双方在谈判中主要围绕着外蒙古问题、大连商港问题、旅顺军港问题、东北铁路问题等进行了艰苦而激烈的交涉[144]。首先是关于外蒙古问题交涉，争执最为激烈，几使谈判决裂。焦点问题是如何理解“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中方认为，1924年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已确定苏联尊重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此即是现状，不能变更；苏方认为，“维持现状”是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现状，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中方表示，中国目前可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苏联亦不提此难题，中国任何政府如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苏方表示，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供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日人业已试过，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等。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中方坚决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要求，强调如承认外蒙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苏方则坚持该问题不解决，宁可中断会议。最后，中国在求助美国无望后，由蒋介石亲自决定有条件作出让步，即在苏联政府保证“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伊犁以及全新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三个条件下，中国“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苏方表示同意。随后，中方又提出外蒙古疆界问题，并坚持以中国旧地图为基准，双方经数度争执，最后约定“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大连商港问题。苏方提出以《中俄租借旅大条约》为根

据，将大连作为苏联专用港口，由苏中共同管理，遭到中方拒绝。随后，苏方稍作让步，主张由华人出任管理大连行政的董事会主席，仍遭到中方拒绝。8月10日，在美方的协调下，双方达成协议：大连开放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等。

第三是旅顺军港问题。苏方要求由苏联管理旅顺军港，并一度主张扩充至旅顺港外100公里岛屿，附属地之行政官吏由中国在征得苏方同意后任用，旅顺附近之缪岛、雷岛不设防等，遭到中方反对。后在美国协调下，双方决定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苏军在规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民事行政权归中国，但该地之防护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等。

第四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双方的争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中苏联合公司的人事安排，苏方要求设公司理事会，设理事十人，中苏各半，理事长为华人，铁路局长为俄人；中方主张中东铁路可按苏方意见办理，但南满铁路局长应由华人担任，争执再三，仍未为苏方同意。其二是铁路运输苏联军队问题，此事关系中国东北国防安全问题，中方坚持铁路运输军队只限于进攻东北日军及撤军之时，平时旅顺苏军移动不能利用铁路；苏方始而主张进驻旅顺的苏军在运输武器、弹药及接防时可以使用铁路，在中方强烈反对下，退而主张限制铁路运兵数量，由四个师逐步退至一个师；最终决定铁路运输以军用物资为限等。

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战争局势发生激烈变化，日本即将投降。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由此而变得强硬起来，明确反对中国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再向苏联作出重要让步；苏联政府则已开始将美国作为自己的主要敌手，既对美国干预中苏谈判表示疑虑，也不对中国国民政府抱信任态度，它在与中国签约的同时，不同意在协定中具体写明不支持中共的文字，也回避接收日本在东北的战利品问题，以为自身日后的行动自由留下活动的余地；中国政府面临着苏联百万大军进入东北，深感事势严重，因担

忧苏联在中共问题上变卦而急于要求与苏联签约。14日午夜，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附属协定，换文《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之协定》、《关于外蒙古之换文》等。主要内容是：

1．两国在对日战争中互相帮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和平，战后共同密切合作，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2．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完全主权，并无意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

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开放，中国以所有港口工事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务主任由俄人担任，期限三十年；

4．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苏联可在规定地区驻扎陆、海、空军，该地民政由中国执行，另设中苏军事委员会，由苏方任委员长，期限三十年；

5．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两国合组铁路公司，双方各五人组成理事会，各三人组成监事会，由中方任理事长，苏方任监事长，铁路局长和总稽核分由苏、中人员担任，并依照平等原则任用各处、科、站长，中国政府担任铁路保护，由苏联境内到旅大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三十年；

6．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民意赞成独立，中国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7．进入东北的苏联军队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等[145]。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雅尔塔密约”的基本框架下签署的，是美苏强权政治和妥协的产物。该约的签署使苏联提出的要求基本如愿以偿，美国政府也为因此而与苏联在远东达成某种平衡而感到满意。中国国民政府虽然处于被动和被迫的地位，但也认为：“即使这个条约不能发生预期的积极作用，至少也能有其消极的作用。”当时的谈判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事后这样追叙中国签约的原因：在苏军数十万全线攻入中国东北的情况下，“苏俄当可凭藉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有支持苏联实现其全部要求之义务”；“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造成更混乱的局势”；“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不仅我们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等[146]。

8月24日，中苏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条约生效。中苏两国领导人互相致电祝贺。蒋介石的电文说：“深信今后两国政府根据条约，将能表现互信互助之精神，以尽力为中、苏两大国家及全球造成幸福及繁荣。”斯大林复电称：“确信此项条约及协定将为进一步发展贵我两国友好关系之坚固基础，借谋两国人民利益与繁荣及远东与全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巩固。”[147] 然而，这个条约并没有促进战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也未能如美国所设想的为远东带来和平和稳定。战后的中苏关系将随着美苏冷战的形成和升级以及国共内战的全面展开而历

尽波折。

第五节　中国参与战后国际政治的安排

一　中国签署莫斯科四国宣言

中国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十分关注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鉴于美、英于1941年8月共同发表《大西洋宪章》，蒋介石指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研究太平洋宪章问题。1942年7月7日，王宠惠将研究结果报告蒋介石，在肯定《大西洋宪章》基本精神的同时，指出其美中不足之处在未提及暴日和消极的民族自决，应予补充[(148)]。中国舆论对此问题也积极关注，表示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的国际秩序[(149)]。

美国在1942年下半年整个战局发生有利于盟国的变化后，也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罗斯福总统设想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在其中起支配作用。1943年8月上旬，国务卿赫尔及国务院的顾问就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起草了一份四国宣言草案。草案经罗斯福、丘吉尔认可后，被分送斯大林和正在美国的宋子文。8月下旬，斯大林在推托罗斯福关于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建议的同时，同意举行三国外长会议。美、英方面遂将四国宣言列为外长会议优先讨论的事项[(150)]。

美国国务院在将四国宣言草案送交宋子文时口头说明，宣言草案已列入美、英、苏三国会议议程，中国政府对该草案“如有意见或评论须要向美国政府表示者，当为美国政府欢迎”[(15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在对宣言草案研究后认为，该草案内容“对我均甚有利”，但“苏联对我国参加此项宣言，尚难免不持异议”，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我方政策在力求此项草约得经四国同意迅速成立。”该建议获得蒋介石首肯[(152)]。

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于10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签署宣言是会议的主要议程。正如王世杰所预料，苏联反对将中国包括在内，只愿讨论三国宣言。苏联政府对宣言内容并无不同意见，但认为既然中国没有参加会议，当然就不应签署宣言，实际上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美国国务卿赫尔根据罗斯福的指示，坚持中国必须作为宣言的签字国。为此，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举行多次会谈，强调四国宣言的重要性，表示“将中国排除在四国宣言之外是不可思议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美、英、苏在宣言问题上将其抛弃，那将很可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方面产生十分可怕的反应”[(153)]。赫尔甚至表示，如果宣言不能以四国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三国宣言上签字。由于美国方面的强硬态度以及英国对美国立场的支持，苏联被迫同意发表四国宣言。但在10月26日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又提出中国无代表在莫斯科，主张仍由美、英、苏三国代表签署。会后，赫尔立即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要他尽快获得中国政府授权，代表中国签署宣言。

傅秉常在三国外长会议开始后，与赫尔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向重庆报告会议进展情况。26日，他急电蒋介石，请授予签字全权。蒋介石于27日复电，授权傅秉常全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四国宣言上签字[(154)]。

10月30日，美、英、苏、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正式签署。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四国将继续对轴心国的战争，直至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并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55)]。11月2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与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156)]四国宣言的签署是大战期间盟国合作的重大事件，它奠定了日后联合国的最初基础。对中国而言，四国宣言也意义重大，它进一步确认了

中国的四强地位，并奠定了此后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二　开罗会议与《开罗宣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虽然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但两国政府间并无英、美之间那样的经常性双边工作机制，更不用说像丘吉尔与罗斯福那样经常性的首脑会晤了。对此，中国政府多次抱怨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为安抚中国并商讨战后世界安排，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6月初向在美国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表达了拟邀丘吉尔、斯大林与蒋介石共同会谈的意愿。蒋介石获悉后，于6月7日致电宋子文，请其面告罗斯福，表达在苏、日公开决裂前他本人参加四国高峰会谈可能使斯大林感觉不便的担忧。7月4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与蒋会晤“殊为重要”，建议两人相见于重庆与华盛顿间之中途地点。7月8日，蒋介石复电，表达与罗会晤之期望，并建议会晤时间以当年9月以后最为适宜。此后，美国方面先后提出会晤地点在阿拉斯加及华盛顿，均被国民政府以不便为由婉拒。10月28日，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邀请蒋与他及丘吉尔三人在11月20日—25日期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会晤，当面讨论中美间及战后世界重要问题，以求“圆满之解决”。蒋介石于11月2日复电表示愿意赴会。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地点及日期决定后，罗斯福又于11月9日致电蒋介石，将美英中首脑会晤改为11月22日—26日在开罗举行。蒋介石获悉罗斯福将与斯大林举行会谈，担心中美首脑会晤在美苏首脑会晤之后，遂电罗斯福，希望中美会晤安排在美苏会晤之前。罗斯福复电允诺[(157)]。

为出席开罗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分别准备了中国拟在会议上所提问题的方案。这两个方案涉及日本无条件投降应接受条款、盟国间战时军事与政治合作、战后重要问题及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等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应完全解除

武装，其战犯交付联合国审判，将旅顺、大连、台湾及澎湖列岛、琉球归还中国，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损失；加强中美军事合作，中、美、英联合先行收复缅甸；中、美、英、苏共同或分别承认朝鲜独立，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战争结束后现有之联合国团体应继续存在，而以四大国为主席团，维护世界和平之责；战后美国在资金与技术方面，协助中国经济重建，树立健全制度[158]。这两个方案集中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开罗会议的期望，其重点在收复中国失地、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及加强中美合作等方面。

蒋介石本人对第一次与美、英首脑举行高峰会议也抱有很大的期望。11月18日，即离开重庆赴开罗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与罗邱会谈应注重于最大之问题：甲、国际政治组织，乙、远东委员会组织，丙、中英美联合参谋团之组织，丁、占领地管理方案，戊、反攻缅甸之总计划，己、朝鲜独立，庚、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显然，蒋介石对此次会谈与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尤其是战后世界安排之间的关系具有足够的认识，但因首次与美英首脑会晤及中国本身的实力，他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159]

蒋介石于11月21日抵达开罗。同行的有宋美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等二十人[160]。开罗会议的议程由美、英代表团抵达开罗后于22日定下，中国代表团于当日深夜方才获悉[161]。23日，会议正式开始。由三国首脑及其幕僚出席的正式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

国民政府在出席开罗会议前，由美国派驻中国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制定了拟在会上提出的军事方案，其主要内容为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收复缅甸，打通滇缅交通线，以及由美国提供武器分三批装备中国90个师和每月向中国提供一万吨空运物资[162]。会议中讨

论的焦点集中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上。在11月23日举行的三国首脑都参加的第一次大会上，蒋介石强调了收复缅甸对整个战局的重要性，并认为缅甸之战的关键“完全在于海军与陆军之配合作战，同时发动”，即英国海军必须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与中国陆军形成南北夹攻之势。英国首相丘吉尔虽表示在意大利投降后，可增加在孟加拉湾作战之英国军舰，但并不愿作出英国海军两栖作战的承诺[(163)]。在此后进行的三国军事联合参谋会议中，史迪威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坚持缅甸作战水陆必须同时夹攻。由于美国支持中国的缅战计划，最后经蒋介石与丘吉尔会商后达成共识，英国海军在安得曼岛登陆作战，而中国则允诺将每月空运量减少至8700吨[(164)]。

开罗会议期间有关中国及战后世界安排的政治问题主要在蒋介石与罗斯福两人的会晤中讨论，对中国而言，这也是更为重要的议题。抵达开罗后，王宠惠将原先准备的方案中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修订成四个节略，提供给蒋介石。这四个节略分别是：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关于过渡期间国际安全问题、关于德国投降问题、关于远东之问题。但蒋介石认为这四个节略所涵盖的各种问题无法在会议期间逐一讨论，因为会议重点在调整对日作战战略及日本战败后之惩处办法，所以决定有关政治问题，分别轻重，提出与罗斯福讨论，而将节略书面提交美国以备参考[(165)]。

整个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共有八次会面，其中11月23日赴罗斯福晚宴后长谈与11月25日赴罗斯福官邸茶叙后谈话，最为重要[(166)]。蒋罗会谈涉及下列内容：

一、中国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强之一，并以平等地位参加此后的国际组织，蒋介石欣然接受。

二、日本皇室地位。罗斯福以战后日本皇室的存废征求蒋介石意见。蒋介石表示，事关日本政体，应在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以

免造成国际关系中可能后患无穷的错误。

三、军事占领日本。罗斯福认为，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问题上，中国应担任主要角色。但蒋介石认为，中国尚未有承担这一重大任务的准备，应由美国领导执行，中国于必要时辅助执行。蒋并提出，此问题可视实际形势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四、对华实物赔偿。蒋介石提出，日本战后对华赔偿，一部分可以实物支付，如工业机器与设备、战舰、商船、火车头等可移交中国。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

五、收回失地。蒋介石与罗斯福同意，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包括辽东半岛及旅顺、大连）、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罗斯福还问，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回答说，中国愿由中美两国共同占领琉球，并在国际组织托管下由两国共管。罗斯福还提出香港、大连宜由中国收回后，改作国际自由港。蒋介石表示同意，但以国际保证为条件，并提出应由美国与英国、苏联分别商讨这一问题。

六、战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提议，中美在战后应就防止远东未来侵略作出互相支援的安排；美国应在太平洋上维持适当军事力量，以有效担负防止侵略的责任。蒋介石同意这两项提议，并希望美国提供帮助装备中国陆海空军，以加强中国国防及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蒋还提议，中美军事基地可互相使用，并表示中国准备将旅顺港交中美共同使用。罗斯福又提议，有关亚洲事务，两国应在作出决定前彼此磋商。蒋介石表示同意。

七、朝鲜、越南与泰国。罗斯福认为，两国应就朝鲜、越南和泰国的未来地位达成共同谅解。蒋介石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强调朝鲜应予独立的必要性，中美两国应帮助越南在战后取得独立，并使泰国恢复其独立地位。罗斯福表示同意。

八、战后对华经济援助。蒋介石认为，战后中国经济重建十分艰巨，希望美国能给予各种形式的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罗斯福表示对此问题将予以认真考虑。

九、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罗斯福特别问到唐努乌梁海的现状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历史关系。蒋介石指出，唐努乌梁海原为外蒙古的组成部分，后为俄国夺走；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皆原属中国，应与苏联谈判解决。

十、统一指挥问题。蒋介石提议，中美成立参谋长联合会议，或中国加入现有的英美参谋长联合会议，以示一律。罗斯福允诺与其军事幕僚商量以便作出决定[(167)]。

根据罗斯福事后对其儿子所讲，他与蒋介石的会谈还涉及中国国内政局。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国民党应在战争期间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则表示，如果美国保证苏联能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他可以邀请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168)]。

根据蒋罗会谈商谈结果，罗斯福令其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起草了会议宣言草案，并首先交中国代表团审阅。蒋介石对其内容表示可以同意，但草案中漏缺“澎湖列岛”应予加上。11月26日，美方约中、英代表团共同商讨会议宣言草案时，英方对宣言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欲将东北、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将决定使朝鲜“成为一自由独立之国家”改为“脱离日本之统治”，实际上是对宣言草案只字未提被日本占领的英国在远东的属地不满。中国参加此次商讨的王宠惠当即明确表示反对，指出“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由于美国代表团支持中国的立场，英国上述提议未被接受[(169)]。

开罗会议于11月26日结束。会后，罗斯福、丘吉尔赴德黑兰会晤

斯大林。蒋介石在游览金字塔后于27日离开开罗。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
>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
>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170]

对国民政府而言，开罗会议的成果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蒋介石本人对此评论道："在开罗逗留七日，其间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良之效果也。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列岛为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皆为国民革命之主要目标与期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171] 开罗会议确立了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并以明确的语言和国际公约的形式确定将日本强占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会议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因而成为民国外交史中重要的一页。

三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莫斯科四国宣言签署后，大国间关于国际组织的筹建提上议事日程。1944年5月，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拟邀请中国、英国、苏联赴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开会具体商讨筹建事宜。蒋介石获悉后于6月2日致电罗斯福，表示对此“极为欣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并表明“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此种机构，如其可能，并望在战时结束以前成立”。但由于苏联以尚未与日本开战为由，不愿与中国坐在一张会议桌上，最后会议只得采取开罗会议模式，即第一阶段为美、英、苏三国会议，第二阶段为美、英、中三国会议。7月10日，魏道明将这一安排报告重庆，蒋介石批示“应可赞成”[172]。

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对成立新的国际组织早就有过考虑和研讨。1942年7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主持的国际讨论会拟具了一份“国际集团会公约”，主张为在战后确立集体安全制度、保证永久和平，应建立新的对侵略能行使制裁的国际组织[173]。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也在开罗会议前向蒋介石递交的节略中，主张尽早成立中、美、英、苏四国机构，并以四国机构筹建联合国总机构[174]。

接受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邀请后，国民政府就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准备了多个草案，其中以王宠惠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方案和王世杰主持的参事室方案及驻英大使顾维钧提出的方案最为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王宠惠方案分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两部分：关于前者，王宠惠认为国际组织以“愈坚强有力为愈宜”，并应尽快成立，中国应与美、英、苏取得同等地位，而对与会方针则主张“暂不提出整个提案”，只就美方草案建议补充或修改；对于后者，王宠惠提出，区域组织应隶属国际组织之下，国际组织议案之表决取多数通过原则，对运用制裁应有具体之规定，并宜设置国际警察或空军，倡导国际间经济和文化合作，设置国际法院等[175]。王世杰方案分基本政策、设立程序与组织原则三部分。王世杰主张国际组织应在战争结束

前成立，并应有充分力量，但美、英、苏、中四国不应享有过大之特权，因为“我如主张其他特权，势必增加各小国对我之反感。且四国纵令享有其他特权，实际上我亦未必能利用”。对国际组织的设立，他主张应包含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国际法庭。在组织原则中，王世杰强调国际组织对于侵略国负有执行经济、政治与军事制裁之责任，并应具有执行军事制裁之充分力量，即成立强有力之国际空军。他还提出，国际组织大会与理事会的决议依三分之二多数表决为原则，国际组织具有修正不合时宜的国际法的权力，可设立区域组织等[(176)]。顾维钧方案分应取立场、与会策略与应注意事项三部分。在吸取国联面对法西斯侵略时无所作为的教训的基础上，顾维钧强调新的国际组织的中央机构必须具有权威，而会员国有实施制裁侵略的义务，并应预先规定实施制裁大纲，以避免国联之弊端。对中国与会之策略，顾维钧在权衡中国在四强中地位和会议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主张采取现实、灵活的立场，“慎重发言，减少提案”，“避免提出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多事居间调和”，以确保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顾维钧还主张，国际机构的投票原则应改国联的全体一致为多数原则，但应包括全体常任会员国方为有效，“以重我地位也”[(177)]。

这三个方案在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必须能够进行制裁、国际组织投票表决取多数原则等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有关实施制裁的手段，顾维钧着重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会员国的义务，而王宠惠和王世杰则主张应具有实施军事制裁的力量，建立国际警察或国际空军。三个方案的差异主要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顾维钧与王宠惠持相似的看法，认为中国应与美、英、苏以平等地位参与国际组织，享有大国特权，“以重我地位”，并据此确定中国在会议期间的策略，即应“减少提案”，“居间调和”。而王世杰则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四大国不应享有过大之特权，因为中国未必能利用大国地位，反倒会增加小国的担忧。

国民政府最后根据王宠惠方案和顾维钧方案确立了参加敦巴顿橡

树园会议的方针。8月中旬，王宠惠根据顾维钧方案修订了他原先的方案，作出两条重要增补：1．一旦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可留待他日，不必坚持，“总以促成会议有初步成功为主”；2．“中、美、英、苏四国所投之票，必须在赞成之列”。这一修订后的方案于8月18日电知在美国的中国代表团，作为中国与会的基本方针[178]。8月下旬，蒋介石又指示中国代表团：“一、此次会议，系初步商谈之性质，吾人希望其成功。对于若干困难问题，我方不必坚持，因在将来联合国之大会中，仍可提出解决。二、对于苏联，虽不共同会议，但仍宜设法联络”[179]。

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驻英大使顾维钧、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美大使魏道明和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组成，顾维钧任首席代表，正在美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就近指导”[180]。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于8月21日至9月28日在美、英、苏三国间进行。虽然由于苏联与美、英之间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行使范围和会员国资格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但三国还是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新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联合国设四个基本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有常任席位；大会重要决议由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一般决议以简单多数决定。

对于中国代表团无缘会议第一阶段，中国代表团感到非常失望。顾维钧认为，与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的莫斯科宣言相比，会议“在这方面几乎倒退了一步”，“很显然，中国只能面对既成事实——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181]。如何应对这一困难而又尴尬的境地，具体而言，对第一阶段会议已达成的草案取何态度，成为中国代表团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中出现了意见分歧。驻美大使魏道明、代表团空军专门委员毛邦初等认为，三国草案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中国应该提出自己所有的建议，与美、英两国进行从容不迫的讨论，不论美、英或者苏联的代表有无可能接

受；中国要表现出愿意为会议作出充分的贡献，因此不能让第二阶段会议草草了事。但顾维钧认为，这一立场是不切实际的，根据“现时之国际情势，与我国之地位，我方对于该建议书（即三国草案），似不宜坚持修改，或拒绝同意”，因为一方面三国草案“需要补充之处固多，但其业已列入者，对于我国之权益，似尚无不利之点”，另一方面，美英两国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重要意见，所以，为了装点门面而延长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应该作出适当的妥协”。最终，代表团根据顾维钧的意见决定取现实的态度：“我方主要目的在促成此次会议之成功，使四国能提出一国际和平安全机构方案。再此次会议，原系初步商谈性质，一切现时不能解决之问题，仍可留待将来联合国全体会议中提出讨论，是以我方对于各项问题，可不必坚持，并可藉以表示我国爱好和平及与各友邦合作之精神。但对于和平安全机构之重要意见，我方仍应提出并详为说明，一则可使世人明了中国之正义立场，二则又作为将来在大会中或将再行提出之张本。”同时，“我国现时处于四强之一之地位必须维持”。代表团决定，在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以补充意见的方式向美英表明中国的看法 (182) 。

中、美、英三国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于9月29日举行开幕仪式，10月3日上午，顾维钧代表中国提出补充意见七点并作说明：一、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之原则，以免新的国际组织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二、保障各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增加各国特别是小国的安全感；三、侵略应加定义，并尽量列举侵略的各种行为；四、组织国际空军，以作为安全理事会权威的象征和采取行动的手段；五、国际公法的方针与修订应由大会倡导，以有利于推进符合国际公法原则的安全；六、国际法庭应能强制裁判；七、应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 (183) 。

对中国提出的七点补充意见，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并不完全赞同，三国就分歧之处展开了讨论。对于第一点，英国最初认为国际法是不

明确的，当出现争端时，国际法只会引起争论。经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美国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英国才表赞同，同意列入联合国宪章。对于第二点，美英方面坚持第一阶段草案中“主权平等”字样已包含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涵义，中方不再坚持。对于第三点，美英方面均反对对侵略加以定义，因为一方面难于对侵略下令人满意的定义；另一方面原草案已说明将制止侵略，于是顾维钧表示对此问题可作进一步考虑；对于第四点，美英明确表示根据实际情况无法予以同意；对于第五点，美英接受中国的要求，同意联合国大会应负责提倡研究国际公法，并推进国际公法的发展与改进。对于第六点，美英原则上同意，但又称：“此问题复杂，可由修订法庭法规之专家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第七点，美英同意“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应特别设法促进教育以及其他国际文化合作[(184)]。讨论结果，美英接受了中国补充意见中一、五、七三点，对第六点表示原则接受，第三点留待以后讨论，而对第二、四点则予以拒绝。

在讨论中国补充意见的同时，美英方面提出希望尽快结束第二阶段会议，在10月9日同时在四国首都公布敦巴顿会议文件。美英代表强调，美、英、苏“三国草案经长时期之讨论磋商始得成立”，希望中国政府能予以同意[(185)]。这样，在补充意见未被全部接受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面临着是否同意并完全接受第一阶段会议结果的抉择。尽管代表团内存在不同意见，但首席代表顾维钧认为，促成会议的成功和维持中国的四强地位是首要之事。10月2日，他致电重庆当局，认为美、英、苏三国草案“整个目的期在以实力保障国际之公安，注重实际之效率，不尚理论之空谈，欲矫国联盟约规定空疏之病，故凡与此目的无直接之原则，概不阑入”；该草案对中国主张之主要问题如制裁侵略等均已采纳，虽有数点未被列入，原因在于“其出发点之不同，故特从略”，但“草案全部对我国家权益似无不利之处”。据此，顾维钧对中国在会议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作了分析，并对应取的相应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钧等察英美首席代表语意，此次会议英美邀我参加，乃系形式之举，与莫斯科会议三强发表宣言请我

署名于后同一意义。形势如此，倘我对其草案坚持修改，不予同意，则三国政府同时将其发表，我独向隅，不特四强团结之精神不克保持，我国国际地位亦有影响。钧等思维再四，惟有在开会期间仍将我国立场及主张继续提出讨论予以阐明外，敢请从速授权，对此事相机办理，至本周最后必要时对草案表示我国政府之同意，一面仍请迅速准备届时公布手续，使四国同时发表之议可成事实。”[186] 顾维钧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10月6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复电：“准予授权，相机办理。”[187] 中、美、英第二阶段会议于10月7日结束，10月9日会议公报正式发表。

虽然与美、英、苏三国相比，中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由于确定了务实的方针和灵活应对的策略，还是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中国补充意见中被采纳的三点日后就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会议也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四　旧金山会议与联合国成立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行使范围和会员国资格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共识：有关需采取经济、政治或军事制裁解决的争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使是当事国也有权投票，而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争端，争端当事国不参加投票；由于苏联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它可以有两个加盟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三国首脑还商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请柬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及法国临时政府发出[188]。

2月13日，美国驻华使馆将雅尔塔会议有关联合国事宜的决定通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在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这一决定时认为：“五常任理事之一遇有争议，涉及其本身时仍有权否决施用任何制裁办法”，故“可表示英美对于苏联让步”；“再就整个三国会议公

告而言，对于波兰、南斯拉夫之处理以及在解放国家内，规定三强有权干涉其内政”，不过“就我国目前环境而言，我对三国会议所提之安全理事会投票办法，亦只得同意”[189]。显示出有所不满而又无奈的心情。

3月中旬，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定出席旧金山会议有关各项问题方案共七件，分别为：甲、草拟国际法院规程应注意之要点；乙、设立领土代管制度之原则；丙、对区域组织问题之意见；丁、中国所提已经英美接受之三项建议编入宪章问题；戊、对于我国所提而未经英美接受各项建议之态度；己、解散国际联盟之步骤；庚、各国对敦巴顿建议案之意见与我国应采之态度。该方案在甲件中指出，在国际法院法规问题上，中国“对外可暂勿作硬性主张，并与英美协商，在可能范围内，与苏联采取一致态度，避免不必要之摩擦”。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权，针对一些国家关于当事国不应投票的主张，外交部认为，中国已同意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决定，“未便再作主张，惟对于常任理事为争议国时仍得投票一点，不必为之辩护”[190]。

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上，国民政府高层，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最初都主张由三五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并由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组成[191]。但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中共应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3月7日，周恩来致函王世杰，具体提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对中共的提议，王世杰以“不便转达”为由予以拒绝[192]。这时，已被内定为旧金山会议代表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与蒋介石会面时表示，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基础，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的代表团，扭转国际上有关中国政治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看法，从而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在顾维钧的游说下，蒋介石开始“对包括有几个无党派代表人物感兴趣”。3月19日，宋子文告诉顾维钧，代表团人选已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

长王宠惠、驻美大使魏道明、著名学者胡适、资深外交官施肇基、大公报总经理胡霖、金陵女子学院校长吴贻芳组成[193]。胡、胡、吴为无党派人士，代表团内仍无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

在向国民党提出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应包括中共代表的同时，中共方面周恩来于2月中旬和3月上旬两次致函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同一问题[194]。此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关注并介入这一问题。3月22日，重庆收到罗斯福落款为3月15日的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报，称："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罗斯福还有意指出，"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政府代表团内均有其地位"[195]。蒋介石当时正在昆明，宋子文向顾维钧出示了这份电报。顾维钧当即认为，这表明罗斯福对代表团应包括共产党人这个问题很重视，尽管他提得轻描淡写，语气谨慎，充满外交辞令，但确实希望代表团中有共产党的代表。由于顾维钧翌日将经昆明赴美国，宋子文请其将这份电报面交蒋介石。

3月23日，蒋介石看到罗斯福的电报后，"起初似乎颇感兴趣，继而显得心烦意乱"，强调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并问顾维钧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意图何在？顾维钧认为，这与中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有关，在各大国中，中国最易受别国攻击，而罗斯福既已支持中国为一个强国，可能对中国在大会上的地位有些担心，因此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显得越强有力越好。蒋介石当时仍坚持决不让共产党人进入代表团[196]。然而，对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建议，蒋介石毕竟不能置之不理。而原先反对中共加入代表团的宋子文和王世杰在罗斯福来电后也改变了态度，认为如同意中共派代表，"罗总统当必以钧座（指蒋介石——引者注）为宽大，不能有何闲言"，今后中美交涉"亦可免去一种心理上障碍"。但王世杰又主张只允许中共派一名代表，让秦邦宪去，"其捣乱之力当亦有限度"[197]

。3月26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通知他中国已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十名代表，其中包括中共的董必武与青年党的李璜和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代表团名单，成员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适、吴贻芳、胡霖[198]。

中国代表团由宋子文任团长，但由于会议期间宋子文专心于与美国洽商财政及其他事务，并不常在旧金山，有关会议事宜皆委托给顾维钧全权处理。代表团秘书长由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担任，代表团内设起草委员会和报告委员会，分别由吴经熊和张忠绂任主任。代表团成立时为52人，后陆续增至百余人[199]。

旧金山会议的主旨是制定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的基本框架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已经确定，美英与苏联间的分歧之处经雅尔塔会议也已达成共识。但雅尔塔会议后，美苏间关系因波兰问题而日趋紧张。因此，旧金山会议与敦巴顿会议的一个显著不同是，美苏在大战中形成的合作已开始为冲突所替代，而中国代表团也面临着如何在美苏间自处的问题。美国为使旧金山会议顺利进行，提议美、英、苏、中四强先行协商。4月3日，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与三国驻美大使开始讨论会议程序问题。美国提出，会议应设主席一人，由美国担任，另设副主席三人。但苏联主张设主席四人，由四大国轮流主持会议。英国则在美苏间调和，表示可以接受四个主席，而每次会议都由美国主席主持。但苏联坚持四个主席轮流主持会议的主张。面对美苏间的争执，中国代表团内顾维钧、王宠惠和魏道明讨论后认为，应该支持美国方案，同时“为避免有不赞成苏方提议之嫌”，可提出“美方代表缺席时由其他三国轮流主席”，并以此意见请示重庆。4月9日，蒋介石指示：“关于联合国主席事，我方可赞助英大使提议，由美代表担任，但应事前向苏表示，依照国际惯例，国际会议主席多推地主国担任，故我赞成美方担任。”当日稍后，中国代表团又接到蒋介石第二个电报指示，嘱对苏联解释可便中说明，不必特意为之[200]。根据

蒋介石的指示，在美苏冲突中，中国代表团应站在美国一边，而不必太顾及苏联的反应。但实际主持代表团工作的顾维钧认为，一方面与美国合作并支持美国是代表团的基本原则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四强中的地位比较微妙，不应不必要地冒犯和惹恼苏联[201]。因此，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对美苏冲突虽偏向美国，但并不放弃在两者间居中调停的立场。会议主席的争执一直延续到4月下旬会议正式开幕后，才在全体会议中以表决方式，通过英国方案。但此后，苏联又坚持为乌克兰谋求一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而美、英方面对此都持异议，双方再次陷入僵局。最后在苏联代表团暗示下，中国代表团出面调停，才使这一难题得到解决[202]。

旧金山会议于4月26日正式开幕。根据四大国商定，所有提案在提交大会或各委员会前，必须先经四大国审查批准。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宪章草案，除对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提补充意见中三点已被纳入表示满意外，又在提交会议讨论前提出三项新的修正案，即：甲、国际间如有危害和平事件发生，安全理事会应有权采取临时办法；乙、国际法院之判决，法院本身不能行使，是以应有一种机构以执行之；丙、当非会员国为国际争议之一造，或当非会员国将争议事件送交大会或安理会时，此等非会员国在国际组织中之地位及安全理事会对此等非会员国之权力，在宪章中应有说明[203]。修正案吸取国际联盟的教训，即当侵略发生后，国联不能迅速作出反应，或无法采取有效行动，针对联合国宪章草案中的不足，提出了中国的看法。四大国外长讨论中国修正案时，美、苏最初分别称对第一、第三项须加以研究，但最终美、英、苏三国对这两项表示一致接受，而对第二项三国均持反对意见，中国于是撤回第二项[204]。在四大国外长讨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时，英国提出应注意对和平贡献之大小，意在增加中等国家特别是英联邦国家入选的机会，中国代表团当即以口头修正案的形式，建议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应按地域平等分配。此提议获得通过后，被列入联合国宪章，从而有利于小国、弱国入选安理会[205]。

托管制度是旧金山会议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托管制度是美国最初提出的概念，即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殖民地进行管理，意在取代殖民地制度。但这一主张遭到最大殖民帝国英国的强烈反对。丘吉尔曾言，他对美国关于托管制度报告的每一个字都不同意，只要他当首相一天，就决不让出英帝国遗产的任何部分[206]。而美国对托管制度的看法在大战后期也有变化。美国军方认为，太平洋地区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在美国掌握之下，主张将太平洋地区列为战略地区，另类处理。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就托管制度达成谅解，托管领土仅适用于：一、国联的现有委任统治地；二、此次战争中割自敌国之领土；三、自愿要求置于托管制度下之领土[207]。这一谅解意味着托管制度将不涉及英国的已有殖民地，是美国对英国的一大让步。中国对托管制度有自己的主张。外交部为出席旧金山会议拟定的七个方案中第二个就是关于托管制度的。该方案主旨为，托管制度的目的是“改善被代管领土之人民之经济教育状况，促进社会福利”，尤其是要“扶助其完成自治或独立”；被代管领土若“政治发展已届成熟者”，应“将其独立之日期及早公布”，“其政治发展尚未成熟者，应逐渐予土人以参加当地议会之权，使其能早日获得自治及独立”[208]。与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谅解相比，中国的主张最明显的特点是以殖民地独立为托管制度的最终目标。

旧金山会议期间，美国提出的结合托管制度建立战略地区的提案遭到一些与会国家特别是小国的反对。中国代表团认为，建立战略地区的设想与以往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一样，而有违于托管制度的基本目标。虽然中国代表团不便反对美国的提案，但对托管制度坚持在自治之外，须加上独立字样。5月17日，会议小组委员会讨论托管制度时，美、英及法国、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均反对中国的提案。中国代表顾维钧四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会场空气异常紧张，形成中国与英美尖锐之对立”[209]。由于小组委员会无法达成妥协，只能进行会外协商。美国代表为此专门拜访顾维钧，表示只要中国与美、英等国意见一致，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顾维钧

答道，中国在此问题上并无特殊利益，也无意为自己谋求特殊好处，只希望将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210]。由于中国的坚持，独立两字最终被列入联合国宪章第十二章国际托管制度阐述托管制度目的的条文中。

旧金山会议历时两月，6月25日，全体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次日，大会举行宪章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在五个发起国中按字母列于首位，因此会议后期代替宋子文出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署下自己的名字，随后中国其他代表一一签字。签字结束后，发起国代表相继致词，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

> 今天是我们全体联合国极重要的一天。吾现在代表中华民国签字于新安全组织之大宪章时，心里发生了无穷的感想。我们一生已两次遭遇了世界上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大流血大破坏。此次战争中国是第一个被侵略的国家。今日联合国能在隆情厚谊的美国金山制定奠立世界和平基础之大宪章，实觉无限愉快。现在欧洲胜利既已完成，对日最后胜利不久亦可取得，余个人深信并深望这世界安全组织，一本各国始终不断的合作精神，能使我们的子孙不致重遭战争的苦痛，而得享受和平与幸福。[211]

旧金山会议的成功与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中国作为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因为在战争中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中国与美、英、苏等大国间实力上的差异及实际上仍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国内动荡复杂的政局，中国的这一地位在联合国筹备过程中是不确定的。而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的成功应对，维护和确定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中国对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和指导战后国际关系的原则，如宪章中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之原则的条文、托管制度的制定、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按地域平等分配的原则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 郭泰祺：《呈报商订中美、中英换文经过》（1941年7月25日），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0卷，第4743—4744页。

(2)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2页。

(3)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147—149页。

(4) *FRUS*，1942，China，pp．271-272．

(5) 联合报社：《1941年美国远东外交关系文件》，1962年刊印，第341页。

(6) K．C．Chau：《英国在华汉外法权之废除》，引自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9辑，第439—445页。

(7) 林语堂：《亚洲之命运》，转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30—32页。

(8) 《蒋夫人宋美龄言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5页。

(9) 蒋廷黻：《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大公报》1942年8月29日。

(10) *FRUS*，1942，China，p．282．

(11) 参见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65页。

(12) 《希望美国首先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大公报》1942年10月6日。

(13) *FRUS*，1942，China，pp．282-286．

(14) *FRUS*，1942，China，pp．287-288．

(15) *FRUS*，1942，China，pp．295-298．

(16) 《战时外交》（三），第716—719页。

(17) 林泉：《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中正书局1983年版，第542—568页。

(18) 林泉：《从不平等到平等》，《传记文学》第40卷第3期。

(19)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4册，第307页。

(20)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经过》，台北“总统府”机要档案。

(21)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265页。

(22)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4—445页。

(23)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2卷，第5988页。

(24) 《大公报》1943年1月28日。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4页。

(26) 《备忘录》（1942年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0371—35679。本章所引英国外交部档案、国防部档案均转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 《克拉克备忘录》（1942年11月20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7822—828—10。

(28) 《战时外交》（三），第765页。

(29) 英国外交部档案F0371—31777。

(30)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13册，第781页。

(3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7—18页。

(32) 《战时外交》（三）第781页。

(33) 《布雷南备忘录》（1942年12月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1664。

(34) 《艾登致薛穆》（1942年12月24日、27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1665。

(35) 1940年3月15日，中英互相换文，确定自1940年10月1日起，将1930年4月18日所订之《中英出借刘公岛房屋便利之换文》展期十年，原订条件不变。据此，英国继续在刘公岛享有某些特权。

(3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35页。

(37) 《新华日报》，1943年2月5日。

(38) 林泉：《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第735—736页。

(39) 《中央日报》，1942年10月31日。

(40) 《伦敦大使馆致外交部报告关于英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签订新约英伦各报专论一致颂扬电》（1943年1月16日）。

(41) 《战时外交》（三），第225—226页。

(42) *FRUS*，1943，China，pp．94-95．

(43) 《战时外交》（三），第790—791页。

(44) 《战时外交》（三），第791—792页。

(45) 《大公报》，1943年2月20日。

(46) 《战时外交》（三），第627页。

(47) 《战时外交》（一），第749页。

(48) 《大公报》1942年10月6日。

(49) 《战时外交》（三），第779页。

(50) 《战时外交》（一），第862页。

(51) ［美］伊·卡通：《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140页。

(52) *FRUS*，1942，China，p．139．

(53) *FRUS*，1943，China，pp．193-199．

(54) *FRUS*，1943，China，pp．258-260．

(55) *FRUS*，1943，China，pp．205-208．

(56)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

(57) *FRUS*，1943，China，p．197．

(58) *FRUS*，1943，China，p．214．

(59) 《战时外交》（一），第162页。

(60) *FRUS*，1944，China，pp．329-330，pp．348-349．

(61) ［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62)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63)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4卷，第314—318页。

(64) ［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译本），第42页。

(65) 《谢伟思报告》（1944年8月27日），转引自汪熙主编：《中美关系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2页。

(66) 《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命》，参见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41—442页。

(67) 《毛、刘致张、饶、曾电》（1944年9月10日）、《中央致董必武电》（9月9日）、《毛致林伯渠电》（9月12日），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42页。

(68) *FRUS*，1942，China，pp．129-131．

(69) 陈香梅：《陈纳德和飞虎队》（中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47页。

(70) *FRUS*，1945，China，No．5，p．204．

(71)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112页。

(72) 指日军攻占缅甸，切断中国与西方盟国的交通线后，美国开辟的从印度阿萨姆的提斯浦尔基地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昆明和重庆的空运线。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空运量增加，并利用回程空机运送中国兵员到印度训练。年底每月空运量突破万吨。至1945年5月达7万吨。

(73) 参见陈香梅：《陈纳德和飞虎队》，第135—145页。

(74)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9—390页。

(75)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4页。

(76)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中国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95—96页。

(77) 《战时外交》（三），第608—609页。

(78) 《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79) 《战时外交》（三），第643页。

(80)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第172页。

(81) *FRUS* ，1945，China，No．7，pp．175-176．

(82) *FRUS* ，1945，China，No．7，pp．37-39．

(83) ［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中译本），第197页。

(84) *FRUS* ，1945，China，No．7，pp．317-320．

(8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97页。

(86) *FRUS* ，1944，China，No．6，p．669．

(87) 转引自李荣秋：《珍珠港事变到雅尔塔协定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委员会”1978年版，第112页。

(88) 参见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1卷，第5323页。

(89) ［英］丘吉尔：《战争和国际形势》（1944年9月28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41689，F4516—4516—10。本节所引英国外交部档案资料均转达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特此注明并向作者致谢。

(90) 《重庆致外交部》（1944年10月3日），英国国防部档案WO208—399。

(91) 《重庆致外交部》（1944年10月3日），英国国防部档案WO208—399。

(92) 《薛穆致艾登》（1943年4月5日），英国外交档案FO371—5799，FZ174—254—10。

(93) 《首相致艾登》（1943年3月22日），英国外交档案FO371—35739，FI725—25—10。

(94) 《战时外交》（一），第841—842页。

(95) 史悦：《国民党驻印军始末及缅北战役概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96) 《中央日报》1943年8月6日、8日。

(97) *FRUS* ，1942，China，p．129．

(9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92—593页。

(99) 英国外交部：《西藏的地位》（1943年6月2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46213。

(100) 《致英国外交部》（1943年5月11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5737、F2418—134—10。

(101) 《战时外交》（三），第534—535页。

(102) 《华盛顿致外交部》（1943年1月10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5793、F202—134—10。

(103) 参见李世安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12—15页。

(10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9—10页。

(10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第1297—1298页。

(106) 《战时外交》（二），第191页。

(10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49页。

(108)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致蒋委员长签呈》（1943年11月2日），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4卷，第6143页。

(109) 杭立武：《国民政府时代之中英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页。

(110) 杭立武：《国民政府时代之中英关系》，第42页。

(111) 《战时外交》（二），第134页。

(11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4年4—6月），第33—35页，台北“国史馆”藏。

(113) ［俄］崔可夫：《在华使命》（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114) 《盛世才致蒋介石》（1942年7月7日），《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传记文学》第53卷第2期。

(115) 《战时外交》（二），第438页。

(116) 《战时外交》（二），第445—446页。

(117) 《战时外交》（二），第447页。

(118)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中正书局1969年版，第443—444页。

(119) 《潘友新致蒋介石信》（1944年6月16日），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120) 《吴湘泽报告》（1944年2月），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第1683—1684页。

(121) 《战时外交》（一），第165—167页。

(122) 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

(123)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61页。

(124)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56—458页。

(125)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57—61页。

(126) 《战时外交》（二）第540页。

(127) 《赫尔利致斯退丁纽斯》（1945年2月4日）；《格鲁致赫尔利》（2月6日）；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第1688—1689页。

(128)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59—460页。

(129)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216—217页。

(13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5月26日），《战时外交》（二）第547页。

(131)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59页。

(132)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2页。

(133)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4卷，第6782—6783页。

(134)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3页。

(135) 《战时外交》（二），第558页。

(136) ［美］赫伯斯·菲斯：《中国的纠葛》（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页。

(137) 《战时外交》（二），第561—562页。

(138) 《战时外交》（二），第561—562页。

(139)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67—470页。

(140) 《贝尔纳斯致电哈里曼》，《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141) 《战后世界史长编》（195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42) 《贝尔纳斯致电哈里曼》，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关系》，第492页。

(143) 《会谈备忘录》，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第1761页。

(144) 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1945年的中苏条约”节，第1689—1776页；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5—483页；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25—626页。

(14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第1331—1340页。

(146) 转引自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84—485页。

(147) 《中央日报》，1945年9月1日。

(148) 《战时外交》（三），第796—797页。

(149) 《大公报》，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日、9日。

(150)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7—600页。

(151) 《战时外交》（三），第799页。

(152) 《战时外交》（三），第800页。

(153)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Macmillan Company，N．Y．1948，p．1282．

(154) 《傅秉常致蒋介石》（1943年10月26日），《蒋介石致傅秉常》（1943年10月27日），《领袖特交文电：拾伍、开罗会议》，台北“国史馆”藏。

(155)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2—403页。

(156) 《战时外交》（三），第496页。

(157) 《战时外交》（三），第491—497页；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1943，GPO，1961，pp．1755-5673．

(158) 《战时外交》（三），第498—501、503—506页。

(159) 《事略稿本》（1943年11月17日、18日），台北“国史馆”藏。

(160) 《战时外交》（三），第509页；梁敬錞：《开罗会议与中国》，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62年版，第23—24页。

(161) 《王宠惠呈蒋介石关于开罗会议日志》，《战时外交》（三），第514—515页。

(162) 《战时外交》（三），第501—503页。

(163) 《军事问题会商经过》，《战时外交》（三），第536—537页。

(164) 梁敬錞：《开罗会议与中国》，第74页。但开罗会议刚结束，丘吉尔就变卦，推翻自己作出的承诺，取消英国海军在缅甸的登陆作战计划。详见本章第三节第一目。

(165) 《王宠惠呈蒋介石关于开罗会议日志》，《战时外交》（三），第527—528页。

(166) 梁敬錞：《开罗会议与中国》，第35页。蒋罗之间的会谈，美方没有正式记录。1956年台湾方面将蒋罗11月23日晚会谈记录译成英文提供给美国，被编入《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pp．323-325．（中译本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7—451页）。中文方面有王宠惠所作的记录（见《开罗会议与中国》，第39—41页），与上述提供给美国的英文件内容基本相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无蒋罗会谈记录，只有《政治问题会商经过》中的简要记录，见《战时外交》（三），第525—535页。本文讨论蒋罗会谈，皆依据上述两种资料。

(167) 对于台湾提供的蒋罗会谈记录，有学者怀疑其准确性，认为有关中国领土的内容有些“被篡改了”，见Keith．Sainsbury：*Turning Points：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 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and Teheran Confer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89．刘晓原在其著作中，将会谈记录与霍布金斯文件中中方提交的备忘录比较，认为会谈记录在不少方面故意强调了罗斯福的主动性，从而偏离了事实真相。如会谈记录表明罗斯福首先提出香港问题，并要将琉球交给中国，都

是故意误导，Xiaoyuan Liu：*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S*．*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41-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7-138．

(168) Elliott．Roosevelt：*As He Saw It*，NewYork：Duell Sloan and Pearce，1946，p．164．

(169) 《战时外交》（三），第528—532页。美方宣言草案漏缺“澎湖列岛”由中国代表团成员、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核出并报蒋介石，见梁敬錞：《开罗会议与中国》，第50页。

(170)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407页。

(171) 《事略稿本》1943年11月28日日记，台北“国史馆”藏。

(172) 《战时外交》（三），第828—830页。

(173) 《国际讨论会拟具国际集团会公约》，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档案，国防005/5。

(174) 《王世杰拟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合国外交》第10卷，台北“国史馆”藏。

(175) 《战时外交》（三），第832—833页。

(176) 王世杰拟“我政府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之主张（要点）”，1944年7月20日，《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合国外交》第17卷，台北“国史馆”。并见《战时外交》（三），第834—835页。

(177)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4年8月6日），《顾维钧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第75盒；并见《领袖特交文电：柒》。

(178) 《战时外交》（三），第866—867页。王世杰方案由蒋介石嘱外交部送在美国的孔祥熙参考，但并未作其他指示，王世杰为此颇为失望。见《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21日。

(179) 《出席国际和平组织会议代表团会议纪要》（1944年8月29日），《顾维钧文件》，第74盒。

(180) 国民政府最初于7月下旬指派胡世泽为会议代表，8月10日加派顾、魏、商三人，8月16日明确顾为首席代表。孔祥熙本人虽欲率团与会，但蒋介石只请其“就近指导”。此外，驻美大使魏道明对未任命其为首席代表颇为不满。详见《领袖特交文电：柒》，《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91—392页。并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顾维

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8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05页。

(182) 《中国代表团报告书》；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1944年9月29日、30日，《顾维钧文件》，第74盒；《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17—418页。

(183)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FRUS*，1944，Vol．I，pp．864-865．

(184)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FRUS*，1944，Vol．I，pp．865-866．中美双方关于讨论的记录基本一致，但关于第3点稍有出入，顾维钧的电文称，美方表示“此问题仍在考虑中，并可由大会再行讨论”。

(185)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2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

(186)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2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

(187) 《宋子文致顾维钧》（1944年10月6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

(188)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35、172页。三国首脑在讨论未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权时，实际上考虑的只是确保联合国的决议没有三大国的同意不能通过，中国并未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见该书第136页。另法国后未接受发起国的地位。

(189) 吴国桢：《分析三国会议对于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之决定之意义》，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转引自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90) 外交部：《有关国际和平机构各项问题之方案》（1945年3月），《顾维钧文件》，第79盒。

(19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75—476页。

(192)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24日、3月13日。并参见邓野：《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9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75、484页。

(19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51—152、223页。

(195) 《战时外交》（三），第906页。

(19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88—493页。

(197) 《王世杰致蒋介石》（1945年3月23日），《领袖特交文电：七》，台北“国史馆”藏。

(198) 《战时外交》（三），第907页。董必武是由顾维钧推荐的。原先内定的代表施肇基在增加了董、李、张后改任代表团高等顾问。

(199) 中国代表团报告书，《顾维钧文件》第81盒。根据代表团专门委员张忠绂的说法，光代表团秘书处就增至120余人，但其中大多数是挂名领薪或来旧金山游玩而不干实事的，见张忠绂：《迷惘集》（香港，无出版日期），第188页。

(200) 《魏道明致外交部》（1945年4月8日），《吴国桢来电》（4月9日），《顾维钧文件》第82盒。

(20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97—498、516页。顾维钧并责备魏道明无保留支持美国的做法。

(20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24—525页。

(203) 《中国代表团会议结论》，第六次会议，1945年5月2日，《顾维钧文件》第85盒。

(204)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33、34号电》（1945年5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83盒。

(205)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33、34号电》（1945年5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83盒。

(206)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88页。

(207)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225页。

(208) 外交部：《有关国际和平机构各项问题之方案》（1945年3月），《顾维钧文件》第79盒。

(209) 《毛邦初致蒋介石》（1945年5月21日），《领袖特交文电：七》，台北“国史馆”藏。

(21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30—531页。

(211) 《顾代首席代表签订新安全组织大宪章时演词》，《顾维钧文件》第83盒。

第七章　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豫湘桂战役

一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转折性的重要年头。日本自中途岛海战后在太平洋上转入战略守势，至1943年2月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败退在战略上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而美军则乘势开始战略反攻，从5月起与日军在太平洋上展开逐岛争夺战，步步向前推进。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在1943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后开始战略反攻。7月，英美军队对意大利本土发起进攻，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日德意轴心开始崩溃。

面对美军强大的反攻和每况愈下的战局，日本统帅部不得不考虑收缩战线并着手调整战略。日军参谋本部7月初的一份文件痛苦地承认日本与对手间的实力差距，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我国国力将下降，战力对比恐将更加悬殊”。因此，“今后数年之国力，只能维持现在的态势，勉强实行攻势防御作战以图摧毁敌反攻，势将破坏国力基础，难以承担战争的消耗”[(1)]。9月初，大本营判断战局将朝更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盟军反攻尔后将更加激烈，世界战争将以盟军对轴心军之继续攻势为推移，自本年下半期以至明年春夏之交，将达其高潮。在东亚方面，美英将联合中国、印度、澳洲，加重对日压迫；在东南方面之反攻将继续加强，并将自西南，及东北两方面，缩小对日包围圈，自空海两方加强对我占领要域之攻击，企图尽速解决

东亚战局。”[2] 基于这一判断，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于9月25日制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该大纲确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虽强调“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急速加强决战力量，特别是航空战力，主动地进行对美英战争”，但其第三条指出要“迅速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实际上已将日军防御的战略重点大大后撤。为此，该大纲划出“在太平洋、印度洋绝对确保的要域为：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即所谓的“绝对国防圈”[3]。这一大纲的主旨是战略收缩，它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面对美军反攻在作战方针上作出的重大调整。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于1942年底放弃四川作战计划后就取守势战略。但1943年春季以来在华美国空军日趋活跃，逐渐掌握了制空权，并不断袭击长江和沿海的日军运输船只，因此上述大纲对在中国的战略确定为：“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1月初，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似有困难，船只在中国东海相继被炸沉，其基地似在中国东南部。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并指示部下对此进行研究。11月中旬，杉山元又指示中国派遣军：“为了防止中国东海的海路被切断，要尽力消灭美空军。”[4] 这样，日军在太平洋上战略收缩的同时，在中国大陆却将进攻提上了日程。

11月25日，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从江西遂川机场起飞对台湾的新竹发起空袭。这次空袭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大本营，加快了其在中国策动进攻的计划。11月底，日本大本营研究打通中国大陆的作战，将作战目的定为“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同时摧毁铁路沿线重要地点上的敌航空基地，以阻止在华美军空袭我本土”[5]。12月7日，中国派遣军根据大

本营的命令拟订了《纵贯大陆铁路作战指导大纲》，准备在次年分几期在京汉、湘桂铁路发动攻势。随后大本营在与中国派遣军的讨论中将这次攻势作战称为“一号作战”。12月底，大本营陆军部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为主进行了虎号兵棋演习，将一号作战的目的列为：“一、尔后美机B29为空袭日本国内起见，将利用桂林柳州基地，我须予以攻略，以完成本国防卫。二、将来敌可能自印度、缅甸及云南向华南方面采取攻势，我必须确保桂林、柳州附近，以应付之。三、鉴于海上交通逐渐不安之情况，可修补纵贯南北之此等铁路，经由法属越南，确立与南方军之陆上交通。四、藉中国军基本武力之摧毁及综合战果，以策中国政府之丧亡。”[(6)]

进入1944年后美空军的攻击更为加强，1月上旬对长江和东海航运的空袭就达到12次。日本统帅部深感在华美空军势力已不容忽视，增强了摧毁其基地的迫切性。1月上旬，服部就一号作战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报告，根据虎号兵棋演习列举了摧毁航空基地、打通大陆、击溃中国军队等项作战目的。东条认为，作战目的必须简单明了，最后将一号作战的目的明确为摧毁美空军基地一项[(7)]。但随后在制订作战纲要时，虽强调了摧毁美空军基地这一目标，仍然保留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内容[(8)]。

1月24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将一号作战计划奏请天皇批准，并说明：“消灭中国西南的敌航空基地，阻止敌机对本土及中国东海的活动为第一目的。此外，即使将来海上交通断绝，也可将南方物资经中国大陆运回。在本作战期间期望努力完成纵贯大陆铁路”，将作战目的定为摧毁美空军基地和打通大陆交通线两项。天皇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9)]。当日，大本营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明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攻占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域”，以“消灭在中国西南之敌空军主要基地”，并指令先于4月前后在京汉铁路开始作战，6月间开始在湘桂方面作战[(10)]。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接大本营令后，着手拟定作战计划。在研判中

国战场局势时，中国派遣军认为，国民政府目前最关心的是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其反攻首先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因此，一号作战目的虽在于摧毁美空军基地，但对于消灭重庆军队尤其是其核心中央军，应予以极大关注。3月10日，中国派遣军制定《一号作战计划》。该计划确定一号作战的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作战方针是："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其次，只要情况许可，于1945年1、2月份攻占南宁附近，将桂林至谅山通道打通并确保之"，"在进行作战时，应努力将京汉南部及粤汉两条铁路修复，如情况允许，将湘桂铁路一并予以修复。"该计划还分别拟定了京汉和湘桂方面作战的具体方案，前者以华北方面军发起攻势，作战期定为一个半月，后者以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发起攻势，第十三军策应，作战期定为五个月[(11)]。中国派遣军制定的这一计划将一号作战的目的最终确定为：摧毁美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及通过打击中国军队摧毁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

在决定进行一号作战前，中国派遣军遵大本营令，已在从中国战场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一号作战确定后，为确保足够兵力实施作战，日军停止原调第三、第十三师团的计划，将此两师团继续使用于中国战场，并从关东军调入第二十七师团，先后新编十四个独立步兵旅团和八个野战补充队及军直属部队，派遣军所属空军第三飞行师团也升编为第五航空军。为发动一号作战，日军共调集50万军队、10万匹马、15000辆汽车、1500门火炮和约250架飞机，战线跨南北2000公里[(12)]。这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二　豫中会战

日军一号作战的首期目标是占领河南境内的平汉（日军称京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地区，担任这一任务的是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派遣军的指示在2月拟定了作战设想，准备以全部兵力的一半投入战斗，“为此，只好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牺牲我占区的治安”。“作战分两阶段进行，首先突破正面的敌军阵地，将我主力部队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部队佯作沿京汉线南下，以郾城附近为中心，使主力朝西方向迂回，围歼第一战区敌军，特别是汤恩伯军。作战目标为洛阳，根据情况也可能在许昌附近向右迂回。在此期间以部分兵力打通京汉线，与武汉地区连接起来。”华北方面军预定作战结束时的占领线是自洛阳西面经临汝、襄城直至郾城一线[(13)]。

为发动河南境内作战，日军自1月起重建黄河南岸的邙山头阵地，修复黄河铁桥，并将平汉铁路从新乡附近向黄河北岸延伸。2月下旬，日军开始频繁调兵。3月25日，黄河铁桥修复。至4月，日军调集至黄河北岸第一线的部队有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及四个独立旅团，在第二线集结的有从东北调来的第二十七师团和从绥远调来的坦克第三师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

3月初，日军的集结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打通平汉线而修复之”[(14)]。担任黄河南岸防御的中国军队是第一战区，共十八个军，约30万兵力[(15)]。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第一战区制定了在嵩山附近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准备先以河防部队阻敌渡河，在日军渡河成功后，河防部队凭借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日军，同时汤恩伯部与第四集团军在登封、密县北侧构成守势阵地，在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阵地，与日军在此进行决战。第一战区并按此方案着手调集部队、决战地带道路破坏及地形改

造、疏散洛阳城内机关与民众等战前准备[16]。根据相持阶段以来的作战经验，国民政府判断日军即将发起的军事行动仍是战役性的，上述作战方案就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

4月17日入夜，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先头部队利用夜色在中牟附近悄然向中国守军阵地逼近。午夜时分，担任河防任务的暂编第二十七师发现敌情，奋起阻击日军，黄河沿岸顿时枪声四起。豫中会战就此打响了。

4月18日拂晓，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暂二十七师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以手榴弹、步枪为主要武器进行防守，日军战史记载，中国军队“进行了意外顽强的抵抗，斗志也很旺盛”[17]。但由于暂二十七师成立不久，装备简陋，并为避免背水作战之不利，乃在抵抗数小时后放弃阵地，向南转移。这样，战役打响当日，日军就在中牟一带轻易突破黄河，并随即架起轻便桥梁，其后续部队陆继渡过黄河。

由于开战第一天日军仅从中牟一处发起攻势，中国军队决定趁其孤军突入，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反击，以暂二十七师固守现有阵地，并由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率新编第二十九师之第八十六团和军辎重之一营及特务连等部，由新郑兼程北上迎敌。4月19日凌晨，第八十六团等部向北发起反攻，冒着日军炮火与敌展开手榴弹战，作战异常勇猛，并击溃当面之敌。但日军后续部队迂回推进，从左翼直拊中国军队后背。中国军队虽奋力御敌，终因兵力相差悬殊，且暂二十七师伤亡已过半数，而不得不于当日晚上向南转移。

日军虽从中牟首先发起河南作战，但其主攻方向则定在郑州北面的邙山头方面。4月19日清晨，日军出动两个战队飞机共计200架次，对邙山头一带进行猛轰，随后第十二军主力在炮火掩护下沿黄河南岸向汉王城发起进攻。汉王城中国守军预备第十一师一个营拼死抵抗，多次退敌，战至正午，阵地全被日军飞机、大炮炸毁，“营长王

鑫昌以下官兵三百余人，均与阵地共同牺牲，状至惨烈”[18]。日军占领汉王城后又向黄河南岸制高点摩旗岭进攻。其间，中国军队增援部队曾向汉王城发起反击，并逼近城麓，但最终仍未成功。而摩旗岭阵地也在19日夜失守。摩旗岭阵地失守，使中国军队失去设在该高地上的炮兵观测所，对日军所能施加之炮火威力顿时锐减[19]。

日军突破黄河防线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于4月20日晚下达命令，调整部署，将所辖兵力分为南北两兵团，南兵团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二、第二十九军等部，除以一部巩固许昌、新郑等地外，主力机动侧击日军；北兵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三、第八十五军，固守密县、禹县、临汝、登封间各据点，以期对从中牟和邙山头进犯之敌，在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予以歼灭[20]。

但日军在突破第一线河防阵地的同时，派出多股突击部队穿越中国守军防线，攻击战略要冲，打乱了中国军队的部署。4月18日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从中牟突破后，以第二十二联队三百人组成郑州挺进队，全队人员一律轻装，只携四挺机枪，以每小时6—8公里速度急行军，向西直插郑州。由于日军不走正道，中国守军毫不知晓。19日黎明，日军到达郑州东南火车站附近，用绳梯开始攀登城墙。守城的中国军队暂编第一旅这才发现敌情，仓促之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郑州东南一角被敌占领。20日晨，由邙山头南进的日军第六十二师团也派出挺进队，在郑州西郊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暂一旅在日军两面夹击下凭借工事进行抵抗，数度击退入城之敌。但日军后续部队陆续抵达郑州城下，并以飞机对守军阵地轰炸，战至22日，城防工事被毁殆尽，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固守陇海花园的第三三〇团加强连全体殉国。当日晚，中原铁路枢纽郑州失守[21]。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除派出郑州挺进队，并以大部向西南追击暂编第十五军外，还于20日派出新郑突击队，从郭店南进直逼新郑。而随第三十七师团渡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则从东向西突击新郑。

21日凌晨，日军向新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一五团与敌激战，两名营长先后负伤。后日军迂回从西南突入城内，双方展开混战，战至正午，日军占领新郑。23日，分别从中牟和邙山头进犯的日军又向密县猛攻。时值天降暴雨，中国守军在积水之战壕内艰难迎敌，终不能支，当天密县陷于敌手。此外，尉氏、荥阳等地也相继失陷。

至4月24日，日军第十二军已推进至汜水、密县、新郑一线，其所辖除第一一〇师团部署于密县外，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均向新郑附近集结，第二线兵团坦克第三师团等也陆续渡过黄河，完成预期的河南作战第一期目标。

中国军队虽在一周内被敌突破多处，但官兵在作战中还是十分勇猛。日本战史记载，中国军队“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易崩溃”，中国军队“高级指挥官的部署极为迅速，各部队的行动大致能按命令执行，部队彼此之间也能保持良好的联系。但初期受到我军突然袭击，似乎发生了混乱”[(22)]。第一战区在初战失利后仍积极准备“举全力对渡犯之敌反攻”。此时中国方面对日军战役目的仍不明确，军令部判断其目的“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恩伯）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因此对第一战区反攻请求，军令部于24日决定：“一、汤（恩伯）集结反攻部队于登封、禹县、临汝；二、敌如西进不已，则断然反攻之，如敌尚回旋周折，则以今后所得敌未渡犯之力量究竟如何，以定反攻时期。”[(23)] 第一战区据此令汤恩伯部攻击密县之敌，汤部主力第十三军等遂向密县进击[(24)]。

主力集结于新郑的日军第十二军根据原定作战计划，在4月下旬着手部署对许昌的进攻，并准备在攻下许昌后迅速南下，在郾城附近向西迂回，对第一战区主力进行围歼。4月27日，第十二军下达第六十号作战命令，规定了所辖各部的作战任务。28日，又进一步明确作

战目标为“尽力摧毁敌高级司令部，俘获其高级指挥官”，尤以汤恩伯直系为重点，并要求各部在攻下许昌后，“应准备以后能连续十数日发挥机动性能”[25]。第十二军各部奉令后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许昌一带逼近，沿途遭到中国军队抵抗。至29日，许昌一带日军已逾三万，坦克达150多辆，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及刚到第一线的第二十七师团一部推进至许昌城西北和东北郊，独立第七旅团一部抵达许昌城东南，渡过黄河不几日的骑兵第四旅团则在向许昌以南进击，与在许昌西北正向南推进的第六十二师团遥相呼应，许昌已在日军围困之中。

4月30日凌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向许昌城北门、西门、南门发起猛攻，第七旅团也从东门开始进攻。守卫许昌城的中国军队是新编第二十九师。面对日军四面围攻，全体官兵凭借城墙、碉堡、掩体等奋起抵抗。整个上午，攻城日军无法取得进展，只得惊叹中国守军“毫无撤退迹象”，“将死守许昌”[26]。下午，日军加强攻击，并调12架轰炸机飞临许昌进行轰炸，炮兵则向西门外和城墙西南角集中猛轰，守城工事大部被毁。日军决死队凭借飞机、大炮的掩护发起冲锋，终于在黄昏从城墙西南角突破，中国军队数度反扑，均未能将日军逐出城外。稍后，日军坦克部队向南门猛攻，终将城门冲破，突入城内，并对四周狂轰达一小时之久。入夜，西、南两门守军被迫退入城内，与敌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子夜，北门也被日军突破。在日军三路夹击下，5月1日拂晓，新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率部向东北方向突围，但在许昌城外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伏击，吕公良及副师长黄永淮等均阵亡殉国。许昌遂被日军占领。

4月30日日军对许昌发起攻击的当日，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汤（恩伯）兵团对窜犯许昌附近之敌，应予以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将作战重点从几天前部署的密县转向许昌附近[27]。但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先发制人，于30日向进至许昌以西颍桥镇欲机动侧击的中国第二十师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遭到重创，伤亡达三分之二。因此汤恩伯只得建议于禹县附近集中有力部队，予敌打

击。5月1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汤恩伯意见，并令“汤兵团除监视密县之敌外，应集中全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军、暂十五军、第七十八军等），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敌决战”[28]。5月2日，汤恩伯调整部署，南兵团第十二军集结于郏县、宝丰地区；第七十八军推进襄县；第八十九军集结漯河、郾城一带；北兵团第十三军主力集结白沙、告成间地区；第八十五军集结登封；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摆开与敌决战的态势。

按原定作战计划，日军第十二军在攻下许昌后将南下郾城，然后向西迂回包抄第一战区主力部队。但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开始后，认为汤恩伯部队尤其是其主力第十三军正北上集结，是对其进行围歼的良机，而且中国军队集结对日军南下将是威胁，因此要求第十二军攻下许昌后主力迅速向西迂回。而刚抵达第一线的坦克第三师团则提出，如从许昌南下，汝河南岸无适当道路，从坦克师团行动考虑，以在许昌附近实行迂回为宜。第十二军遂于5月1日下达第七十五号作战令，改郾城迂回为许昌迂回，目标为围歼中国第十三军，“扼杀其南下企图”[29]。

第十二军主力在许昌向西迂回后，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奉命继续南下，向郾城推进，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任务。5月5日，日军向郾城发起进攻，当日击溃守军第八十九军新编第一师防线，占领郾城。随后，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于7日攻下遂平。而武汉方面的日军第十一军也根据中国派遣军部署，派出由7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宫下兵团，从信阳北上，以配合华北方面军打通平汉铁路作战。5月9日，第二十七师团先头部队与宫下兵团在确山会师，平汉铁路被日军打通。

日军在河南境内发动攻势的目标是打通平汉铁路与打击中国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在占领许昌后，日军侦知许昌以南并无重兵防守，打通平汉铁路易如反掌，因此后者成为主要任务。5月2日，日军第十二军转入迂回作战，其具体部署为：由坦克第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担

任突击力量，向临汝及其以西地区突进；第六十二师团在左翼向禹县方向推进，与在密县附近的第一一〇师团配合，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团在右翼向西推进，确保长埠街至临汝沿线要冲，并歼灭南撤之中国军队[30]。

5月3日，日军第十二军分三路发起猛烈攻势。第六十二师团以万余兵力对禹县实行钳形攻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依城抵抗，全城陷入炮火之中。至黄昏，守军支撑不住，弃城向西北转移，禹县及其附近地区为日军占领。第三十七师团一部与独立第七旅团猛攻襄城，于深夜突入城内，占领该城。坦克第三师团主力从中路突进，对郏县展开进攻，守军官兵虽与敌激战，但无法抵挡日军坦克的锋芒。午后，郏县陷于敌手。

5月4日，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向西北方向尾追中国第二十九军，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沿郏县—临汝大道推进。而坦克第三师团则乘豫中平原之利，一路突进，直抵临汝城下展开强攻，很快从东门突入城内，临汝随即告失。

日军以坦克兵团快速突进，迂回作战第三天就占领临汝，冲垮了南兵团的防线，完全打乱了中国军队的原有部署，使告成、白沙间的北兵团第十三军侧后方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而在密县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在迂回作战开始后，分多路向第十三军阵地进犯，并切断其与在登封的第九军之间的联系。面临被日军围歼的危险，第十三军只得转移，于5月5日向南突破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防线，并在临汝以东穿越日军坦克第三师团与第三十七师团间空隙，脱离日军包围圈。

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在占领临汝后，不及补充燃料，就向西北继续突进。而沿途中国守军已悉数南移，因此从临汝向西至伊河间，日军坦克如入无人之境。至5日，其先头部队向龙门高地发起进攻，其中一部竟已渡过伊河。洛阳顿时面临日军进攻的威胁。

洛阳自古以来为中原战略重地，又扼陇海铁路线要津。第一战区除汤恩伯部以外的第四、第十四、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四个军六个师均集结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日军发动河南作战后，其后续渡河部队第九独立旅团曾在4月下旬沿陇海路西犯，但在汜水以西金沟一线被中国军队阻截。5月7日，为击退龙门之敌，第一战区作出部署，以刘戡兵团（由第十四军〔欠九十四师〕、暂四军〔仅辖暂四师〕、新六师等组成）抵御龙门之敌，并相机转移攻势；以第十五军及第九十四师守备洛阳；以第四集团军及第九军坚守洛阳以东汜水至登封一线；并令汤恩伯部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由临汝方面尾击进犯龙门之敌，以期在龙门附近对日军进行夹击。5月8日，重庆大本营也分别电令刘戡兵团向龙门前进，汤恩伯部与刘兵团配合，以夹击日军[31]。

但推进至临汝附近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全力追寻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刚转移至临汝以南山区的汤恩伯部没能组织与敌正面交锋，被迫向嵩县方向西移，致使刘戡兵团无法与之联络[32]。5月9日夜，山西境内的日军第一军派遣其独立第三旅团及第五十九旅团，在垣曲境内强渡黄河，中国守军不及阻截，河防被敌突破。日军第一军渡过黄河后直趋渑池，12日攻陷渑池，切断潼关与洛阳间陇海铁路，并沿铁路向东推进，从西面威胁洛阳。日军南北进击，尤其是第一军突破黄河南下，使中国军队在龙门附近夹击日军的计划破产。

5月13日，根据蒋介石组织反攻的命令，第一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命令第十三军北上向宜阳以南之敌攻击，刘戡兵团在新安至宜阳一线向东进攻，第三十八军在刘戡兵团左翼扫除磁涧及以北地区之敌，以上部队都以向洛阳围逼为目标，仍期望对日军实行夹击[33]。但实际上面对多路推进的日军，中国军队此时根本无法组织反攻，因此该计划形同具文。

5月14日，日军分几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从伊川西进的第六十二师团猛攻宜阳，当日下午宜阳不守。从伊阳西进的第三十七师团则进占嵩县。随后，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沿洛河与伊河向西

猛追败退的汤恩伯军队。而日军第一军与坦克第三师团等部围攻在新安以南的刘戡兵团，刘戡部虽奋力抵抗，终因背腹受敌，向南沿洛河左岸往洛宁撤退。这样，中国军队原本计划在洛阳一带对日军进行夹击，却因洛阳外围中国军队相继撤退，洛阳反被日军团团围住，成为一座孤城。

洛阳城防由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及第九十四师担任，第九十四师守城厢，第六十四师守洛阳城西的西工区，第六十五师守城北的邙岭。5月8日，日军向洛阳逼近之时，蒋介石命令守城部队死守10—15日[34]。5月9日，日军坦克第三师团逼近洛河南岸，并于次日渡过洛河。11日，坦克第三师团开始猛攻第六十四师防区。日军以坦克为前驱，反复冲锋，中国守军奋力抵御，阵地失而复得者九次。激战整日，敌我双方仍成对峙之局，而洛河河水染成赤色[35]。12—13日，日军继续以几十辆坦克反复冲击中国阵地，并曾一度从西南角突入城内，但最终仍被中国军队驱赶出城。此时，第十二军命令坦克第三师团沿洛河河谷追歼向西退却的中国军队，因此13日后坦克第三师团脱离洛阳前线[36]。

日军坦克第三师团调离后，由十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组成、直属于华北方面军的菊兵团接手进攻洛阳。但日军遇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进展甚慢。战至22日，中国守军除以一部继续坚守东西车站外，第十五军主力全部退入城内，与第九十四师共同固守城厢。而日军久攻不下，除增援部队外，将坦克第三师团重调至洛阳前线。洛阳守卫战到了最后关头。

5月24日清晨，日军以数十架飞机轰炸洛阳城区，并空投传单劝降，但守军置之不理。正午，日军以百余门大炮对城区狂轰滥炸两小时，随后数百辆坦克及尾随的步兵向洛阳城猛攻。洛阳西北角和西关首先被攻破，随后各处相继不守，傍晚日军坦克突入城内。但中国官兵仍拼死抵抗，日军战史记载：“各个正面均彻夜进行攻击，随时随地展开激烈的巷战，逐屋逐街相继攻克”[37]，可见守军抵抗之顽

强。至25日上午洛阳终告失守。

在攻打洛阳的同时，沿洛河两岸追击的日军穿插进攻，轻装突进，中国军队此时已毫无斗志，一路败退。洛河沿岸韩城、洛宁、长水等地相继弃守。5月20日，卢氏又被日军占领。5月下旬，日军在河南转入守势。

豫中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第一战区部队面对日军进攻，一再败退，丢失了大半个河南，使日军达到了打通平汉铁路和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的预期目标。中国军队战败主因在于战略指导失误。中国方面从第一战区到大本营直到会战打响仍不明白日军进攻的战略意图，因此作战部署仍按以往对付日军局部战役办法，即以一部从正面阻截，主力从侧面进行出击。而日军此次作战为达到其目的，采用大规模穿插迂回战法。中国军队作战部署多次被敌打乱，却又缺少应变能力。其次，河南境内中国军队虽均属第一战区，实际上却分归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而两人之间缺少信任，更谈不上配合。会战之初，蒋部很少介入，到了会战后期，汤部又怯于北上配合作战[38]。因此在整个河南境内中国军队虽然人数占优，而在局部却并无明显优势。再者，此次日军作战，大量使用坦克，不仅机动快速，也使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难挡其锋芒[39]。当然，会战后期，第一战区不少部队斗志丧失，闻敌丧胆，望风披靡，也是溃败的重要原因。

三　长衡会战

当豫中会战正在进行时，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也开始准备向湖南方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与担任豫中会战的日军相比，第十一军更具进攻作战经验，兵力也更为充足强劲。在湖南作战期间，它辖有11个师团共计100个大队，加上华北方面策应作战的30个大队和华南方面策应作战的20个大队，日军投入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更多[40]。

4月上旬，第十一军开始着手制订作战计划。根据“一号作战”的总体部署和自身拥有的兵力，第十一军判断此次向南进击长沙一举可破，关键在衡阳长沙间的作战，而进入桂（林）柳（州）地区将面临严峻困难。因此，将向南作战分为攻取衡阳和攻取桂柳两个阶段。4月中旬，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制订完成。其要点为：一、将兵力分为两线。第一线五个师团并列于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线，其中第四十师团在湘江以西，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第十三师团在湘江以东。第二线以第五十八师团部署在监利、第三十三师团部署在蒲圻西南方附近，正在集结途中的第二十七师团调至崇阳附近。二、于5月27日至28日开始发动攻势，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汨罗江间中国军队。第二线部队负责扫荡残兵及修补道路。三、突破汨罗江防线后，应准备进攻中国军队主要防线宁乡、长沙、浏阳。四、突破浏阳一线后，应以部分兵力急袭突进占领衡阳[41]。日军此次作战部署，吸取前三次长沙会战经验，强调向纵深急进突破，同时配置第二线兵团，以防中国军队迂回侧击。

守卫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此时辖有第一、第三十、第二十七共三个集团军，计十个军三十余师，此前已多次与日军第十一军交战，但对日军此次作战的意图和部署却反应迟缓。日军虽从三四月间就向崇阳、岳阳、华容等地抽调军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至5月14日方指示第九战区：“敌打通平汉路后，必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人所乘，以粉碎其企图为要。”[42]及至5月27日日军全线发起攻势，军事委员会才于5月31日颁布长衡会战计划，判断日军将“会攻长沙”，“并以有力兵团钻隙奇袭衡阳”，命令“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于长沙附近与敌决战”。第九战区遂决定“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控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43]。中国军队不仅在时机把握上先失一着，而且因对日军作战方针不甚明了，仍沿袭以往的侧翼迂回攻势，在战役部署上又陷于被

动。

5月2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由汉口出发至蒲圻，设立战斗司令所。5月25日中国派遣军决定将其前进司令部推进到汉口，显示其投入此次作战之决心。5月27日，日军第一线五个师团在东起崇阳西至洞庭湖以西公安、南县一线，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长衡会战（日军称湖南会战）由此打响。

在东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从崇阳、白霓桥向通城、麦市进犯。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三师势单力孤，虽经抵抗，通城、麦市一线还是于5月30日失守。随后，日军第三师团沿南江桥、团山铺南下，中国第二十军奉命抽调第一三三师至团山铺堵击，但未能阻敌向平江突进。平江守军虽与敌展开激战，也因伤亡过重未能守住，6月1日平江陷敌。同日，第十三师团南下攻占长寿街。日军控占汨罗江一线后，继续南下，直指浏阳。第九战区根据以往作战经验，除以第四十四军防守浏阳外，调第七十二、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五十八军至浏阳外围侧击、尾击日军，企图围歼日军。日军第三师团自6月6日起向浏阳防线发起攻势，第四十四军顽强抵抗，与敌激战，致使日军一度自认“战斗进展不甚理想”[(44)]。中国守军与敌对峙九昼夜，苦战至14日上午，城防被攻破，浏阳终告不守。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师团从左翼直趋浏阳东南一带，连陷东门市、达浒、蒋埠江等地，至第三师团攻陷浏阳时已抵达浏阳以南，使第九战区侧击、尾击日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在西路，集结于华容、石首一带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亦于5月27日向第九战区防线发起攻势，并于28日、31日先后占领南县、安乡，渡过洞庭湖。随后，日军突向沅江。6月5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从三面猛攻沅江城。中国守军奋力御敌，战况激烈，第九十二师有一营官兵包括营长均壮烈殉国。6日，沅江陷敌。攻占沅江后，日军第四十师团以主力南犯益阳。此时，为增强湘江以西防守兵力，军事委员会特令第六战区之第二十四集团军归第九战区指挥，驰援益阳一线。6

月10日，日军第四十师团向益阳发起围攻，守军第七十七师奋起迎敌，城防在敌我之间几度易手后被日军占领。奉令增援的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于13日向敌猛攻，夺回益阳[45]。而日军第四十师团大部此时已南下进犯宁乡，与守军第五十八师发生激战。面对日军重炮、毒气，第五十八师官兵“忠勇用命，力抗顽敌，浴血抗战”，在日军突入城区后，与敌展开巷战，“毙敌遍巷”[46]。但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按急进突破的作战部署又已南下直趋湘乡，西路战斗遂告一段落。

中路是日军发起湖南会战的重点。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在5月27日晚乘夜色强渡新墙河，守军第二十军在新墙河南岸荣家湾、新墙、杨林街一线与之展开激战。28日，日军后续部队源源渡过新墙河南犯，相继占领八仙桥、黄板桥、黄沙桥、关王桥等阵地，于30日抵达汨罗江北岸。汨罗江南岸是数米高的悬崖，中国守军利用地形构筑纵深网形阵地，并埋设地雷阻挡日军。31日，日军向汨罗江南岸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依托工事顽强抵抗，予敌以较大伤亡，击毙日军中下级军官多名[47]。但汨罗江防线坚持两天后仍告失守。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随即又向捞刀河突进，相继占领福临铺、金井等地。8日强渡捞刀河，与守卫长沙的第四军在南岸发生战斗。11日，这两个师团已抵达浏阳河北岸，长沙东侧外围处于其控制之下。而此时长沙西侧外围已受到进犯宁乡的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威胁。

长沙是日军前几次湖南作战的主要目标，但此次日军作战部署与前几次不同。担任第一线进攻的部队在突破中国守军防线逼近长沙后，并不直接攻城，而是在两翼策应。第十一军专门指定经过攻城特殊训练的第五十八师团担任进攻长沙的任务，对步、炮、空协同作战有周密安排的第三十四师团担任进攻岳麓山的任务，另派配备有150毫米榴弹炮，150、100毫米加农炮的野战重炮部队参战[48]。发起进攻后才赶赴第一线的第三十四师团于6月初投入战场，10日在长沙东北的白沙洲附近西渡湘江，随后推进至岳麓山东、北两面。原先集结于岳阳附近的第五十八师团跟随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推进，于

12日渡过捞刀河，直插长沙东郊，与第三十四师团隔江相望，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夹攻之势。第一线进攻的五个师团则在两翼对中国军队施加压力，使进攻长沙的两个师团无后顾之忧。在此情况下，中国方面仍根据前几次长沙作战经验，准备以两翼侧击的战法与日军在长沙决战，就难以避免被动的局面了。

担任长沙守城任务的是第四军，下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〇二师及炮兵第三旅，共计一万人[49]。6月初，当日军进抵汨罗江时，第四军以第五十九师防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南，以第一〇二师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北，以第九十师守湘江西岸的岳麓山。

6月14日，日军第五十八、第三十四师团分别从湘江东、西岸向长沙和岳麓山外围推进，与第四军守城部队展开交火。次日，日军继续向中国守军主阵地推进。16日，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向长沙城南和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虎形山、牛形山猛攻，中国官兵拼死苦战，数次击退日军进攻。但战至夜晚，城南、虎形山、牛形山等阵地被日军攻破。17日，日军继续向长沙城妙高峰、天心阁及岳麓山、桃花山猛攻。第五十九师凭借妙高峰等阵地死守，中国空军十多架战机也在上午对妙高峰当面之敌予以扫射，打击日军进攻气焰。但湘江西岸岳麓山、桃花山阵地在日军连续进攻，侧背又被其迂回部队威胁，并遭日军施放毒气的情况下，第九十师防守部队“损伤过半，虽经增援，似有不支”，战局危急。岳麓山为长沙城屏障，一旦岳麓山被占，长沙将无以为守。第四军军长张德能遂决定从湘江东岸第五十九、第一〇二师抽调兵力增援湘江西岸，“与敌作决死之斗，以确保岳麓山炮兵阵地，控制长沙”。当晚，湘江东岸部队遵令转移，“但当时情况紧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50]。而日军又以火力对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进行袭击，进一步加大了伤亡。18日凌晨，日军对长沙城和岳麓山发起总攻，飞机、重炮轮番轰炸，并施放大量毒气。第四军官兵坚持至

午后，岳麓山和城内阵地先后失守，长沙城终被日军占领。

至6月中旬，日军在开战20天后，已占领浏阳、长沙、宁乡一线。但第十一军明白，由于第九战区主力回避决战，稍战即退，损失并不很大，如不予以打击歼灭，第二期向桂林、柳州方向作战将有后患。因此，6月18日在占领长沙的当日，第十一军就下达向衡阳挺进的命令[51]。中国方面在长沙失守后，仍采用两翼侧击的战法对付日军突进，准备与之在衡阳决战。6月2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52]

日军南犯仍分东、中、西三路。在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在6月中旬就南渡浏阳河急速推进，20日攻占醴陵，然后转向东进，22日又占萍乡。日军第三师团也于此时南下进犯萍乡地区。第十三师团遂根据军部命令以耒阳为下一步进攻目标。24日，第十三师团折返西向，沿醴陵、攸县公路长驱南进。攸县并无中国军队守卫，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26日进占攸县。随后日军进逼安仁，第三十七军在安仁以北顽强阻敌，激战两昼夜终于不支，安仁陷敌。7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进抵耒阳附近，对衡阳南翼构成威胁。而在醴陵、萍乡一带，中国军队与日军第三师团展开拉锯战，战况惨烈，双方阵地几度易手。

在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不待宁乡战斗结束，即于6月18日南下进犯湘乡。21日，湘乡被占。随后，日军继续南下，猛攻永丰。7月3日，永丰失守。第四十师团攻占永丰后，一部向南进犯金兰寺，一部向东南推进指向渣江，从西翼策应进攻衡阳。

在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在长沙战斗还在进行之时，即南渡浏阳河，于6月13日攻占株洲。随后，日军分兵两路，沿湘江东、西岸一路南下。第九战区部队虽沿途阻截，但仍被日军逐次突破。6月23日，日军在衡阳城东30里的泉溪市附近与担任

衡阳城防任务的第十军部队发生交火，揭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6月26日，第一一六师团主力推进至衡阳西北方向的杨柳桥，第六十八师团则占领衡阳以东的飞机场。次日，该两师团分抵衡阳城西、南两面，对衡阳形成合围，衡阳成为一座孤城。

衡阳地处湖南中部，湘江中游西岸，南岳衡山南麓。整个城市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湘江东岸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经湘江大桥与粤汉铁路相连，使衡阳不仅是湘粤两省的交通枢纽，也是进入西南四省桂、黔、川、滇的门户。粤汉铁路东面有衡阳机场，是美国在华空军在华中最重要的基地。衡阳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使其成为中日双方攻守争夺之焦点。

担任衡阳城防的第十军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坚守长沙城，有丰富的防守作战经验。1943年冬参加常德会战后驻防衡山。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十师，但因常德会战造成的损失尚未恢复，兵力并不充足，三个师的番号实际上却只有七个团。连同归其指挥的暂五十四师、新十九师和炮兵部队，总计兵力约1.8万人[53]。而面对的则是日本两个主力师团。

早在5月29日日军刚发起攻势时，蒋介石就以电话命令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固守衡阳十天乃至两周，吸引消耗敌军兵力，在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以歼灭敌军主力于衡阳近郊地区”[54]。方先觉接令后，根据衡阳城东是湘江，城北有河流，城西大部为密布鱼塘、莲池之沼泽地区，而城南是丘陵地带，因此判断日军主攻方向将在城南，并按此进行部署：第一九〇、暂五十四师守备湘江东岸，预十师防守湘江西岸衡阳城南，新十九师防守湘江西岸城阳城北，第三师则守备衡阳外围的下摄司附近，并于日军抵达前疏散完衡阳城中民众，炸毁湘江铁桥。

6月28日拂晓，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对衡阳城南面和西南的第十军阵地发起攻势，妄图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占领衡阳。早有

准备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其防御之坚固、作战之英勇出乎日军的预料，且炮火相当活跃，将至前线指挥战斗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参谋长原田贞等多名指挥官击伤[55]。日军对衡阳的这次攻势延续5昼夜，除黄昏、拂晓和午夜，战况略为沉寂一两小时外，其余时间敌我双方连续拼杀。日军进攻先以飞机、大炮轰炸，并施放毒气，随后以步兵猛冲。中国守军则在日军轰炸时蛰伏在掩体和工事内，待日军步兵逼近时，以火力将其歼灭于阵地前。若日军突入阵地，则以手榴弹、刺刀与敌展开肉搏战，歼敌于阵地内。一些阵地在双方之间几度易手。30日一天，二二一高地四次被日军突破，守军第二营伤亡达百分之七十，伤势稍轻者虽仍在前线搏杀，但难抵日军连续进攻。入夜，预十师第三十团团长陈德坚亲率预备队增援。“时值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该二高地官兵与突入之敌混战一起，敌我莫辨，双方均静静的不敢弄出一点音响，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有如捉迷藏，我官兵以手摸抚，穿粗棉布衣者为自己人，穿光滑咔叽布军衣者为敌人。发现敌人，即以刺刀刺杀。因此，枪支碰撞声，与被刺者之惨叫声，时起时寂。”至天色微亮，双方后续部队赶到，又是一场激战，最终中国军队将日军赶下山去，恢复阵地[56]。日军在其战报中承认：“衡阳城之敌，利用地面障碍及防御设施，仰仗火力配合反攻，进行顽强抵抗”，日军“前进迟缓”[57]。战至7月2日，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仅占领停兵山、张家山南麓等前沿阵地，而衡阳城南第一线其余阵地仍牢牢控制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因损失过大需等待补给，不得不于7月2日午夜停止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

日军在准备第二次总攻的同时，对衡阳城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以大批飞机对衡阳城进行轰炸，并投下大量燃烧弹，使城内火光冲天，昼夜均在熊熊燃烧，民房大部付之一炬，第十军囤积粮弹也多被焚毁。但第十军亦抓住时机，调整城防部署，并令在衡山的第三师第八团归还建制。该团于7月5日突破日军阵线，冲入孤城之中，增强守军力量[58]。

7月11日，日军发起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总攻。自拂晓起，日军飞机对衡阳展开整日轮番轰炸，其炮兵则对城西南主阵地猛轰，并施放毒气，随即步兵发起总攻。第十军各部在各自阵地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预十师第二十八团防守城南五桂岭阵地，战至12日，第八连连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仅余一位班长率兵两人据守一碉堡，仍与敌作殊死战。第三十团第二营，一个上午就换了三个营长：第一个营长为国捐躯，接任的营长身负重伤，继任的营长指挥作战至下午也被敌军击伤，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59]。在张家山阵地，日军连续三昼夜以成百人为一梯队，在炮火掩护下持续发起进攻。守军阵地四度失守，四度夺回。多名营、连长在第一线率兵杀敌壮烈殉国或身负重伤。一名卧地呻吟之伤兵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驱敌之后，工事残破，“官兵累垒积尸加盖沙土为避弹之胸墙，臭气熏天，群蝇乱飞，不顾也！”只为击退日军的下一轮进攻[60]。至7月16日，战斗更为惨烈。日军再度发起猛攻之时，天气骤变，豪雨倾盆。守军在茫茫雨幕中跃出战壕，与敌展开白刃肉搏，彼此进行拉锯战。担任衡阳城南防御重任的预十师激战至此，伤亡惨重，连炊事兵、运输兵悉数尽上一线搏杀，所属三个团番号虽在，实际上多是第二线阵地增援的第三师第八、第九团官兵。当日晚，萧家山、枫树山等处被日军突破。第十军遂放弃第一线阵地，连夜调整部署，全力固守第二线阵地。而日军虽攻占衡阳城南第一线阵地，却也付出重大代价，许多中队已无军官，不得不由士官负责指挥[61]。日军对中国守军第二线阵地的进攻一方面继续遇到顽强的抵抗，无法取得进展，一方面面临弹药不足，呈难以为继之势。7月20日，日军不得不结束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仍改为重点进攻。

此时湖南战场制空权已渐为美国驻华空军控制。美国空军对日军补给线的轰炸使日军难以向前线正常运送弹药，而且白天作战也因制空权的丧失颇受限制[62]。因此自20日起，日军只能每日在拂晓和黄昏前后以重炮对第十军阵地猛轰，并空投传单，煽动、引诱守军放弃抵抗。第十军至此已在日军重围之中守城一月。军长方先觉于8月1日

致电蒋介石报告："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侵中，与敌奋斗，均能视死如归，克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63]

7月底，日军陆续向衡阳前线增调第五十八、第十三师团，部署向衡阳发起第三次总攻。8月3日，日军炮兵对中国守军阵地开始作地毯式狂轰滥炸，衡阳西南半壁约4500米的正面全为硝烟弹雨所笼罩。次日，日军步兵向经过一昼夜猛轰的守军阵地发起全线总攻。第十军阵地虽在日军轰炸下毁损严重，但广大官兵仍沉着应战，奋勇杀敌，日军第一天的进攻均被击退。5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死奋战，予敌以极大杀伤。第一一六师团黑濑联队一大队长被击毙，这是该联队在衡阳前线被击毙的第六名大队长[64]。但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当日，第十军军、师长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此后作战方针。认为因无可抽调之兵，弹药也将告尽，守城至多再支撑三天，但城内有伤病员六千余人，无法突围，因此只有死守一条路[65]。6日，日军攻势更猛，守军渐渐不支，城西北角率先被敌突破。7日，日军倾其所有兵力向衡阳城发起最后的总攻。至8日拂晓，衡阳半个市区已为日军攻占。当晚，方先觉率守城的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十师、暂五十四师各师长举白旗向日军投降[66]。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至此结束。整个衡阳一战，中国第十军1.8万余人，伤亡1.5万余人，其中阵亡约七千人。日军自称伤亡1.938万人，内含军官910人[67]。

衡阳激战之时，集结在外线的中国军队有八个军共计10万人以上。蒋介石虽多次命令向衡阳增援，但被派往衡阳担任解围任务的仅有第六十二、第七十九两个军和第六十三师。而真正全力杀向衡阳前线进行解围的只有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二军于7月下旬向衡阳进军，与日军在衡阳西南一带展开激战，曾推进至衡阳南郊的火车西站。终因孤军深入作战，无法抵挡日军衡阳攻城部队和外围增援部队的夹击而败退。

日军第十一军攻占衡阳后，虽已筋疲力尽，但为不给中国军队喘息机会，以利下一阶段广西境内的作战，决定乘势进击。于是，第十一军倾其各主力师团由北向南宽广正面急进。8月下旬，为统一指导湘桂作战，日军新成立第六方面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统率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十一、第二十三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三十四军及配备于长、衡地区的直辖部队，实施打通湘桂铁路计划[68]。而衡阳一战后，湖南前线的中国军队尚未调整部署，在日军快速突进之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防线一触即溃。仅半月间日军就横扫衡阳至湘桂边境间250公里，至9月上旬，已轻易占领祁阳、零陵，将战火烧到了湘桂边境，连第十一军自己也为进展如此快速而惊叹[69]。

四　桂柳会战

1944年夏中日双方在衡阳激战之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和缅甸战场上的英帕尔两地连遭败绩，而攻占衡阳又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月。为此，新成立的日军第六方面军不得不调整原来的湘桂战役第二阶段在广西境内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十三军于9月上旬从西江地区发起攻势，于10月下旬前作好进攻柳州的准备，第十一军从衡阳南面展开攻势并攻占全州后，于10月下旬前作好进攻桂林的准备，该两军于11月上旬开展包围攻势，围歼桂、柳附近的中国军队，并攻占桂林、柳州等地[70]。

日军第十一军于9月上旬占领零陵后，以第十三、第四十、第五十八师团继续向湘桂边境推进，并于9月11日越过省境后至全州北面。驻扎于广东的第二十三军也于9月上旬沿西江逼近广西。日军两个军从北、东两面对桂北中国军队形成合击之势。

驻守广西的是第四战区。此时第四战区兵力单薄，仅七个师约六万人，而其中过半兵力刚参加了长衡会战，战力并不充实[71]。国民政府方面在衡阳被攻占前已判断日军必将继续攻打桂林、柳州地区。8月24日，军令部向第四战区及第七、第九战区颁发作战指导，要求在日军大举侵桂时，第四战区以“主力死守全州”，日军如深入桂林附近，则调集军队“协力守军包围歼灭之”；第七战区除留一部固守梧州并准备攻击沿西江西进之敌外，另准备以一部适时参加桂林决战；第九战区部队则积极夹击侧击进犯日军[72]。

南犯的日军第十一军进入广西境内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桂北重镇——全州。全州此时是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补给点，存有弹药粮草等各种作战物资。因此，蒋介石在8月底、9月初两次直接电令守卫全州的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以主力固守全州”，“迅速完成作战诸准备”，“粮草及其他战斗资材之准备，虽以二个月为基准，但须以极激烈之战斗计算，并须将可能之轰炸损耗计入，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三个月以上”[73]。担任全州防守任务的第九十三军，是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为增强桂北兵力而从四川调防的，9月上旬刚抵达全州完成部署。9月12日，日军向全州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次日，日军全线进攻，守军阵地被突破。14日，第九十三军根据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命令，在破坏未能运走之军需物资后放弃全州城防，转移防线至兴安附近。日军遂轻易占领全州。

日军第十一军陷全州后稍作调整，又沿湘桂线继续南犯。中国守军沿途进行抵御后逐次南移。至10月初，日军已进占兴安以南地区。此后，日军虽在大溶江正面遭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难以推进，但桂北门户已经洞开。

广东境内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于9月9日沿西江向粤桂边境发起攻势。西江两岸至广西梧州只有第七战区的三个步兵师，难以阻挡日军的进攻。日军北翼第一〇四师团沿西江北岸挺进，接连攻陷四会、高要、德庆，逼近桂东重镇——梧州。其南翼第二十二师团沿西江南岸推进，连陷高明、新兴、云浮、郁南，与第一〇四师团隔江呼应。而第一〇四师一部穿越粤桂边境山地，于9月中旬迂回至梧州北边。21日，日军向梧州发起进攻，而守军防守部署尚未完成，虽奋力迎敌，但战至次日不得不放弃防守，梧州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又从梧州西犯，进攻丹竹。丹竹是中美空军在广西重要的前进机场，但仅有一团守兵。守军虽浴血抵抗，终因力量相差悬殊，于28日失守。

与此同时，在雷州半岛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也从遂溪向北发动攻势，在占领廉江后北犯进入广西，于9月23日攻陷容县，随后继续推进，于10月初至桂平以东邕江右岸。

第四战区面对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柳州地区的进逼，于10月上旬决定调集可机动兵力，部署于武宣东南地区，形成局部优势，首先击退由西江西犯的日军，以利此后作战[(74)]。10月19日，中国军队在中美空军支援下向日军第二十三旅团突然发起攻势。日军毫无准备，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伤亡重大。第二十三旅团通讯中心遭轰炸，使旅团与上级之间通讯中断达一周之久[(75)]。血战数日，中国军队将桂平、蒙圩外围各据点收复。但日军第十一军主力此时已全部侵入湘桂路至湖南道县以南约40公里处的江华一线，而第二十二师团主力也在10月下旬投入桂平正面战线，面对不利战况，第四战区只得放弃刚刚发起的攻势，将所有兵力向桂林、柳州附近集中。

桂林此时是广西省会，湘桂铁路经此直趋柳州，为广西交通枢纽。9月初当日军沿湘桂铁路南犯时，第四战区指派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于10月10日拟定作战计划，基本方针为“防守军以确保桂林之目的，以主力固守城北要点及杉湖。

榕湖以北城区为核心阵地；以一部固守近郊各要点，掩护核心，采持防御，吸引胶着敌人于桂林近郊，俾与我外线兵团，协力合击敌人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第一三一师固守桂林北部地区，第一七〇师固守桂林南部地区，外围部队则对日军进行侧击尾击[76]。

日军第六方面军于10月11日命令第十一、第二十三军准备攻占桂林、柳州。第十一军于10月14日将战斗指挥所推进至全州，20日在全州召开兵团长会议，部署各师团作战任务。26日，第六方面军向第十一军下达攻占桂林的命令。

10月28日，从全州南下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对桂林北面发起进攻。随后，抵达桂林东郊的第四十师团也向桂江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开始进攻。中国守军凭借桂林城郊的石山、岩洞等天然屏障进行抵抗，阵前预埋之地雷也予敌极大杀伤。11月1日，日军除继续从北、东两面进攻外，一部对桂林西北城郊的笔架山等阵地发起进攻。次日，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又从西南方面向桂林城逼近。至此，日军从东、北、南三面对桂林形成合围之势。由于自10月下旬以来阴雨不断，道路泥泞，致使日军炮兵前进迟缓，一时无法对桂林发起总攻。6日，绕道东面推进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一部抵达桂林城南郊，完成对桂林的四面合围之势。此时，桂林城外四郊均已展开激战，日军逐渐向城区逼近。8日，日军炮兵进入前线阵地，城东的第四十师团一部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掩护下强渡桂江，突入市区与守军展开巷战。桂江东岸的七星岩洞中尚有一连步兵和野战医院官兵约八百人，因洞口被日军炮火封锁，无法突围，洞内储存弹药又起火燃烧，致使全部遇难殉国[77]。

11月9日，日军对桂林城发起总攻。凌晨，日军炮兵对桂林开始集中炮击，城区内一片火海。守军虽遭日军围攻，但仍斗志顽强，奋力御敌。在城北，日军自认“攻击不能顺利进展”，“老人山的守备非常坚固”。在城东，伏波山上的中国军队予敌以重大伤亡[78]。激战至晚上，日军从四面突入城内。10日，城内中国官兵继续抵抗，但阵地

相继被日军攻破或隔离。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率部苦战至此，见战局已无法挽回，遂自尽殉国。其余阵亡将官有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第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厚基等。当日午后，桂林陷敌。

在进攻桂林的同时，日军第十一军认为正面之敌非常薄弱，无须以一军的主力全力对付，遂在11月3日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三师团向柳州发起攻势。第十一军的这一决定未事先报告第六方面军，并与第六方面军在柳州以西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战役设想不合，故引起第六方面军的不满，但并没有能改变第三、第十三师团已经向柳州推进的局面[(79)]。

柳州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但防守力量并不强大，防守准备更是不足。9月中旬之后，第四战区因战事两次调防柳州守军。11月3日，第二十六军奉命接手柳州防务，至7日方才辗转赶赴守区，完成防御部署。11月9日，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柳州发起猛攻，守军奋力抵抗，但损失惨重，阵地相继被敌突破。10日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话指示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桂林情况不明，该军应避免无谓牺牲，着即适应情况，开放西侧道路，配属炮兵应撤离大塘。北市区之一个团，可撤至南岸，对所有仓库，应遵前令彻底破坏。"[(80)] 第二十六军奉令后遂向西撤离守区。11日，柳州被日军占领。这样，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曾宣称可坚守一年的西南战略要地，日军一发起总攻即告失守。

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后，完成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摧毁美国空军在西南的两大空军基地。但由于第十一军未按方面军部署行事，第二十三军推进缓慢，没能如愿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第四战区在桂、柳失守后，调整部署，准备以宜山为中心重布防线。第六方面军遂于11月15日向第十一、第二十三军发布追击令，"决定继续迅猛追击，消灭残敌。""第十一军可不受作战地界限制，消灭宜山附近敌军，并应与第二十三军紧密配合，消灭忻城以西地区及其附近之敌。

此外，应以一部迅速向金城江以西地区挺进，占领黔桂铁路。”“第二十三军应与第十一军密切配合，消灭忻城附近之敌。此外，应以一部向前推进，争取占领南宁。”[81]

攻占柳州的第三、第十三师团在11月12日即根据第十一军的命令开始转入追击，沿黔桂铁路西犯。第四战区没能组织有效防御，日军轻易突进，未经激战就于15日占领黔桂线上重要城市宜山。随后，日军直扑黔桂线上的下一个城市怀远。此时防守怀远的只是一个工兵团、一个坦克营、一个炮兵连及一个教导营等特种部队，但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日军无法从正面轻易突破。战至11月20日，怀远被日军占领。继续西进的日军沿途虽遇到中国军队的零星抵抗，但由于第四战区并未作出有效的防御部署，日军沿黔桂线不断推进，于22日占领河池，28日占领南丹，逼近贵州省界。

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军一部从柳州南下，于11月24日轻取南宁。12月初，在越南的日军也派兵北上。12月10日，两股日军在绥渌会合，日军打通了直贯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

日军第十一军所部从柳州沿黔桂线西进追击，至广西贵州交界处已逾300公里，由于后勤补给无法跟上，沿途又有美国空军袭击，实际上已难以继续推进。但第十一军仍在11月下旬向第三、第十三师团下达越过省界向贵州境内独山、八寨挺进的命令[82]。11月30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由六寨圩进入贵州境内。次日中国守军在黑石关抵御日军，但当日防线就被突破。日军乘势推进，于12月2日抵达独山。中国守军未及有效抵抗，就被穿中国军服的一部日军混入城内，因此仓皇退出独山城。12月3日晨，日军完全占领独山。从黎明关进犯贵州的日军第三师团则于12月2日下午占领八寨，并在当夜继续向都匀突进。次日在都匀东南与中国军队交战。

日军迅速突入贵州境内，威胁贵州，震动了整个大西南后方。蒋介石惊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美国有要求撤

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83] 国民政府虽在桂柳会战之初就向黔桂边界地区调兵，由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准备抵御入侵贵州之敌，但因缺少交通工具，部队调防缓慢，至日军入侵贵州，只有一个军及两个师的部队进抵都匀以南地区，与日军交锋，而其余部队仍远离战线，鞭长莫及。

日军突入贵州后，战线越拉越长，供给更加困难，兵力损失也十分严重，而美军飞机的不断袭击加剧了日军的困难。此时已入冬季，大多士兵还穿着夏服。因此在占领独山后，第十一军指挥部以作战目的已经达到，下达了反转命令[84]。12月4日，日军在对独山城区大肆破坏后，开始沿黔桂线全线后撤。

中国军队随日军后撤尾追跟进，相继收复独山、八寨，并进入广西，于12月12日收复南丹。继续尾追的中国军队在河池遇到日军的抵抗和反击，双方展开激战，伤亡均重。中国军队攻势受挫，战况形成相持局面。桂柳会战至此告一段落。

桂柳会战是在长衡会战刚结束后展开的。日军从湘、粤两省向广西迅猛进犯，中国方面在广西兵力不足，处于劣势。但在指挥上，第四战区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全盘防御部署，致使中国军队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而在作战中，尤其在桂林、柳州失守后，中国军队明显士气低下，“一般指挥官缺乏必胜信念、旺盛精神”，“军队一般精神不甚巩固，士气衰落”[85]。这种种因素最终导致中国军队在广西、贵州的溃败。

整个豫湘桂战役期间，从1944年4月至12月的八个月中，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三个战场上虽在局部也有顽强的抵抗，但在全局上接连败退，河南、湖南、广西以及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洛阳等四个省会城市和郑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以及衡阳等七个空军基地和三十六个飞机场为日军占

领。这与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战后期对日作战相对消极、作战能力下降是分不开的。日军在结束一号作战后，虽基本达到其打通大陆交通线和摧毁美军在华中空军基地的战役目标，但实际上由于国共两党军队对日军的进袭和干扰，所谓的大陆交通线并未真正打通，中美空军则依托西南的机场，仍控制着中国上空的制空权，继续对日军予以打击。而日军由于战线拉长，兵力损耗，在战略上反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陷入了困境。

第二节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攻势作战

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队在作战中减员严重，仅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兵员损失就达60万。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的兵役法规定知识青年可以免役或缓役，致使原本因征兵区域缩小而兵源有限的状况更为加剧。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自1943年下半年再次出兵缅甸，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军中迫切需要具有英语能力和文化素质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1943年年底起产生了遍及国统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根据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为其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兵源的要求，命令四川省军管区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远征军。四川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随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3日，徐思平在绵阳演讲后，当晚就有15名中学生表示愿服兵役。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向东北大学师生演讲，当场就有15名男生、4名女生申请参军。此后，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至12月7日，报名参军接受体检者有六百余人，被录取者213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86)]。

继四川之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先后扩展到湖北、西康、陕西、

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余省。为推动从军运动，由三青团主持的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于1944年1月11日成立，蒋介石亲任委员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教育部长陈立夫、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为常务委员。随后各省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

1944年秋，日军在长衡会战结束后以重兵从湘、粤两省突入广西，震动了整个大后方。9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87] 10月11日至14日，国民党和三青团在重庆召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介石亲临会议两次讲话，强调知识青年从军事关抗战和国家前途，号召知识青年踊跃应征。会议决定征集十万青年入伍，国民党、三青团各负责征集五万人[88]。14日会议结束时，成立"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张定蟠、徐思平为常务委员，罗卓英等十六人为委员[89]。随即，各省、市、县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选征委员会。

在这之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逐渐步入高潮。《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整版整版地报道各地青年从军的消息，其他报纸也大造舆论。国民政府提出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国统区。为激励青年学生从军，一些国民政府高官带头送子女入伍。蒋介石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当场让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军，张治中表示要让儿子从国外回来从军，冯玉祥夫妇遍访西南各地，鼓励青年从军。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题词慰勉其侄陈迨从军，书称："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奏凯归来。"[90] 一时传为佳话，激起众多青年报名参军。

国民政府各机关还制订相应政策、法案，以保证从军青年的各种利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1月1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优待办法草案》，主要内容是：（1）原任职于各级党政教育机关者得保留其职务，并按日照发其工资薪金全额；（2）原肄业于各级学校者得保留其学籍，如系公费生及领有奖学金者一并保留；（3）原从事于国营公营事业组织，得由原机关保留其职务，并照发薪津等。对于从军青年复员后的待遇也有明确的规定：（1）公教人员得依本人志愿仍回原机关工作，该机关不得藉任何理由拒绝其复职，并须给予升迁优待机会；（2）学生得以本人志愿仍回原校原级并特许参加升级考试；（3）参加留学考试及各种考试，予以优先录取之机会；（4）凡志愿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以及出国研究国防科学者，得由政府择优保送之；（5）应征青年因作战阵亡或受伤残废积劳病故者，除政府照规定从优抚恤外，其家属得由申送地点之党政机关救济等[(91)]。考试院、军政部也颁布相关规定。一些学校也制订优待入伍学生的办法，如中央大学规定：从军学生如系自费生，自报名之日起一律改为公费生；从军同学复员时欲转院系者，得依本人志愿请求准予转院系；借读生从军者，退伍后一律转为本校正式生等[(92)]。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1944年秋冬之际掀起高潮后，遍及国统区许多省份，尤以四川省最为热烈。一些沦陷区青年也跋山涉水来到大后方参军。青年从军者以学生为主，广及公务员、教师、新闻界、医务界、金融界、文艺界、法律界、商界、宗教界各界人士及国民党、三青团党团人员，还有很多女知识青年。广大知识青年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表现出高昂的参军热情。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报名率达到三分之一，西北工大则达80％以上。知识青年踊跃参军，渴望到前线杀敌报国，完全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尤其是女知识青年的从军更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猛烈冲击，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不屈意志，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军队，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军队的构成，对于军队机械化和通讯快捷化起了积极作用。

报名从军的青年至1944年底达122,572人，至1945年2月下旬征集入伍工作告一段落时，知识青年从军人数达15万余[(93)]。超出原定计划数一半。从军的知识青年从1944年12月24日起开始报到入营，陆续接受训练，并成立青年远征军，编为第二〇一师至二〇九师九个师。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后，各师正式纳入正规军编制，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另有相当部分调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辎重汽车第十四、第十五团，宪兵第三、四、五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其中部分青年军派赴驻印军，在缅甸前线中担任交通运输、坦克兵等技术兵种工作，为缅北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94)]。

二　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缅甸被日军占领，抗战前期中国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路由此中断。此后，美国空军虽开通了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至昆明的驼峰空运线运送美国援华物资，但对于整个中国战场而言只是杯水车薪。第一次入缅作战结束后不久，史迪威就于1942年7月向蒋介石提出收复缅甸的计划。随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磋商反攻缅甸。1943年8月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决定于当年冬天从印度进入缅甸开始反攻，并为此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由英国蒙巴顿将军任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

由印度突入缅甸的作战任务主要由中国驻印军承担。1942年中国远征军一部从缅甸退往印度。根据史迪威的建议，在印度的中国军队集结于比哈尔省的蓝姆伽地区，接受美国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物资和美国军官的训练，并由驼峰空运线的返程飞机从中国国内运送官兵至印度，补充兵员。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1943年1月刚编成之时仅

有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下辖新二十二、新三十八师，另有直属三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和汽车兵团等[95]。

1943年9月，驻印军根据盟军东南亚战区的反攻计划，制定缅北作战计划，决定于12月中旬向缅北发起攻势，于攻势开始前集中于印度东北的雷多附近，待雷多至新平洋公路完成后即向新平洋突进，攻势作战的第一目标为孟拱、密支那一线[96]。在这之前，1943年1月27日，驻印军工兵第十、第十二团开拔至雷多，协同美军两个工兵团及三个工兵营，开始修筑由雷多至印缅边界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新三十八师先遣部队也深入野人山区，掩护中美工兵筑路，并于三四月间击退企图干扰中美联军筑路计划的日军。9月，雨季结束，中印公路修筑加快，而完成训练、准备补充的驻印军各部也渐次抵达雷多。驻印军总指挥部遂于10月10日令新三十八师以掩护筑路的先遣部队南向攻击前进[97]。缅北反攻战由此拉开序幕。

从印度进入缅北是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山区，山脉与河流皆南北纵向，东西间交通隔绝，形成狭长的河谷，地形险要。驻印军进入缅北后首先面对的是日军沿胡康河谷设置的防线。10月24日，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由缅北野人山向胡康河谷的大洛、新平洋、于邦一线推进。10月29日，攻克新平洋。11月初，第一一二团向于邦发起进攻。于邦是日军第十八师团防守胡康河谷的重要据点。日军“凭借于邦既设阵地工事之强固，顽强死守，以待其后续部队之到达”。第一一二团因兵力有限，无法突破日军防线，双方形成对峙。此时，日军第十八师团从滇西抽调第五十五、五十六联队增援于邦。11月22日，日军增援部队进行反扑，偷袭第一一二团指挥所，并将第一营包围。第一营官兵被围不惊，粮食耗尽后以芭蕉充饥，坚持月余。12月中旬，新三十八师另外两团抵达前线。21日，师长孙立人亲临前线部署第一一四团主力直趋于邦，随后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亦抵达前线。24日凌晨，新三十八师向于邦日军发起总攻，“先以山炮向敌阵地施行一小时之攻击准备射击，继以步兵实行果敢之冲锋”，“如此经一周连

续之攻击，卒于十二月廿九日晨将于邦敌阵完全攻占”。此役击毙日军军官11人，士兵173人[98]。于邦之战虽是局部性小战斗，却极大地提高驻印军官兵战胜日军的勇气，成为此后缅北反攻中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信心来源。而日军战史则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或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99]

在攻克于邦的同时，驻印军于12月28日令新三十八师为左翼，新二十二师一部为右翼，分别向太白家、大洛一线攻击。新二十二师取道丛山密林，辟路迂回推进，出敌不意发起进攻，于1月31日攻占大洛。新三十八师则以两路夹击，于2月1日占领太白家[100]。

攻占大洛、太白家后，驻印军继续以新三十八师为左翼，新二十二师为右翼，向缅北门户——孟关攻击前进。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师团长田中信一指挥下，利用河川沼泽和既设阵地沿大奈河布防，并以优势炮火封锁渡口和各道路。驻印军避免正面攻击，以新二十二师由右翼迂回至孟关以南、北、东三面，先夺取孟关外围。新三十八师则由左翼作大规模迂回，直趋深入敌后，接连占领马高、拉树卡等处，肃清大奈河以北之敌，对日军形成钳形攻势。新二十二师遂从三面围攻孟关，经过激战，于3月5日攻克该地。整个孟关之战，驻印军毙敌1400余人，重创日军第十八师团[101]。

日军第十八师团从孟关溃逃后集结至瓦鲁班，准备伺机反扑。驻印军截获日军此项命令后，当即兵不解甲，马不停蹄，分数路迅速南进追击败敌。此前美军一部已抵达瓦鲁班，但因攻击未得手而于3月6日后撤。新三十八师获悉后立即急行军增援美军，突击当面之敌。新二十二师主力沿公路南进。坦克第一营则超越追击逃敌，至瓦鲁班以北与敌遭遇，“即以炽盛之火力，纵横扫射，死尸累累，枕藉道途。当于遗尸中捡获十八师团司令部关防一颗。”9日，驻印军攻克瓦鲁

班。“此后，败残之敌，毫无斗志，节节溃退。”15日，丁高沙坎被攻占。从而将胡康河谷之日军全部肃清[102]。

从瓦鲁班败退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在瓦鲁班以南30公里的坚布山隘口部署防御阵地，企图阻止驻印军推进。接连败退的日军此时已疲惫不堪，构筑工事也进展缓慢[103]。驻印军不予敌喘息之机，立即向坚布山隘口进攻。由于受日军火力瞰制，且隘口树木茂密，迂回困难，驻印军仰攻深感困难。因此在新二十二师正面攻击之时，新三十八师从东面辟道迂回，截敌后路。随后南北夹击，于3月29日完全攻占坚布山隘口。

坚布山隘口为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的分水岭，占领隘口后驻印军即进入孟拱河谷。孟拱河谷纵长约110公里，平均宽度不及10公里。河谷南端的孟拱城有铁路和公路与曼德勒、密支那连接，战略地位重要。日军退守孟拱后，获得兵员和物资补充，沿河谷设防，企图逐次抵抗。驻印军仍以新三十八、新二十二师为左右两翼，分沿公路以东和公路并列南下。至4月底，新三十八师已攻占高利、马兰等据点。5月3日，新二十二师在坦克营和美军飞机支援下，对英格坎陶发起猛烈攻击，并一举突破日军阵地。

5月以后，缅北进入雨季，行军作战日益困难，日军则期待雨季迟滞驻印军进攻。但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不顾恶劣天气，继续推进。新三十八师一部从深山里开路，冒雨忍饥，兼程急进，向加迈以南迂回，于5月26日强渡南高江，占领西汤，切断加迈与孟拱间交通。正面日军在后路被切断后，无心应战，逐渐后撤。新二十二师遂于6月初突破日军马拉高阵地，逼近加迈。日军为挽回败势，以增援兵力集中于加迈，全力反扑，但未能得逞。6月16日，加迈在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一部协同猛攻下被占领[104]。

在攻克加迈前，驻印军总指挥部于6月11日令新三十八师主力会同英印军一个旅奇袭孟拱。新三十八师即由师长孙立人亲率第一一

三、一一四团冒雨向孟拱秘密急进。此时孟拱地区日军有第十八、第二、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总兵力约达一个师团，在人数上占优。6月18日，第一一四团进入孟拱北部地区，恰逢英印军一部五百余人在孟拱东南进攻中遭日军反扑并被包围，紧急之中向新三十八师求援。第一一四团一部连夜冒雨强渡大雨后水涨流急的南高江，于20日向日军发起进攻，成功地救英军于危急之中。随后经两昼夜激战，第一一四团占领孟拱外围据点，将城中之敌完全包围。23日，第一一四团向城区攻击，经两日激烈之巷战，于25日完全占领缅北重镇孟拱[105]。

在这之前的4月上旬，当驻印军主力越过坚布山隘口向孟拱河谷攻击前进时，驻印军总指挥部以奇袭密支那为目的，将刚到战场的新三十师第八十八团、第五十师第一五〇团与美军两个步兵营组成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由美军米尔准将任支队长。密支那是缅北最大城市之一，亦是缅甸铁路北端的终点，沿铁路南下可达孟拱、曼德勒、仰光。另有公路南接八莫至腊戍，与滇缅公路相连；西经孟拱至胡康河谷，衔接正在延伸的中印公路。城郊还有机场，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美混合突击支队于4月下旬以孤军从古树蔽日之山区挺进，沿途克服种种险恶的自然环境，排除日军轻微抵抗，经二十余日之努力，突进一百多公里，于5月15日迫近密支那附近，并切断密支那与孟拱间公路。由于中美突击队推进神速，日军毫无准备，因此5月17日向密支那机场发起进攻时，日军猝不及防，机场被一举攻占。早在雷多待命的驻印军两个营随即空运抵达。此后，驻印军其他部队亦相继空运降落密支那。

中美混合突击队于攻占密支那机场当日即向市区开始攻击。守城日军总数约有三千余人，依据市区建筑物及预设之坚固工事顽抗。双方攻守激烈，伤亡重大，不少阵地数度在敌我之间易手。更因大雨滂沱，攻势进展甚慢。史迪威为此三次撤换前线指挥官，最后交由新三

十师师长胡素接替美军将官指挥前线作战[106]。

7月7日，为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驻印军向密支那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激战整日，驻印军仅推进百余码。此后，攻城各部均以坑道攻击方式，挖壕推进，每日前进一二百码不等。7月下旬，驻印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密支那前线，遂对日军展开总攻，逐步向市区推进。至31日，大半市区已被攻占。次日，指挥防守密支那的日军水上源藏少将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107]。8月2日，第五十师组成敢死队百人，携带轻便武器，分组潜入日军后方，将日军通讯设施完全切断，并猛烈攻击其指挥所，日军防线完全崩溃。8月3日，经两个半月血战，密支那终被驻印军攻克[108]。

密支那一役，驻印军毙敌两千余人，俘获七十余人[109]。此战胜利，意义重大，不仅使驻印军完全掌控缅北各要点，而且使驼峰空运线可南移至安全航线，从而使空运量急剧增长，且以雷多为起点的中印公路也得以迅速延伸。

驻印军攻占密支那后，所属部队包括新从国内空运至印度的部队编为两个军，新一军由孙立人任军长，辖新三十、新三十八师，新六军由廖耀湘任军长，辖第十四、新二十二、第五十师。在史迪威调离中国后，驻印军由美国中将索尔登任总指挥，原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任副总指挥。

10月中旬雨季将过之际，驻印军在休整两个月后，南进向八莫发起进攻。八莫位于密支那以南，地处中缅边境要冲，是中印公路从密支那南下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驻印军以新一军为左翼，沿密（支那）八（莫）公路向南推进；以新六军为右翼，沿孟（拱）曼（德勒）铁路转进八莫以西地区。

左路的新一军以新三十八师为第一线兵团，新三十师为第二线兵团，于10月21日沿密八公路向南攻击前进。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

攻占八莫外围据点庙提，肃清太平江北岸日军。太平江水流湍急，而庙提对岸地形险要，日军又构筑坚固工事，渡河困难。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亲临前线调整部署，以一部在正面继续进攻，而将新三十八师主力转移于左翼山地，由太平江上游铁索桥渡江，实施迂回进攻。从太平江上游迂回的部队渡江后，与在庙提正面攻击的部队相互呼应，连克莫马克、曼西，突进至八莫东南，切断八莫、南坎间公路。至11月中旬，已将八莫团团围住。

日军在密支那被攻陷后，为阻止中印公路打通，继续从缅南向八莫、南坎增兵。增赴八莫的日军在8月中旬抵达后，即赶筑工事，企图死守。新一军包围八莫后，对城区发起进攻。至11月底，新三十八师将主力全部调至八莫前线，在陆空密切协同下，加紧围攻，逐步缩小包围圈。日军虽数度反扑，均遭击退。激战至12月15日，八莫被驻印军完全占领，日军守城司令原好三大佐以下官兵大部被歼，仅六七十人乘黑夜泅水逃窜[110]。八莫之战后不久，新六军第十四、新二十二师奉调空运回国。

当新三十八师围攻八莫之时，驻印军为争取战略主动，避免因日军死守八莫而推延战局进展，于11月19日令第二线兵团新三十师南下对南坎发动攻势。南坎位于八莫东南百余公里，距中国边镇畹町仅六十余公里，在八莫被攻占之后，是阻隔缅北与滇西间相连的惟一重要据点。日军在此设有重兵防守，并修筑坚固阵地。

新三十师于11月下旬分三路沿八南公路和两侧山地南进。12月初，在康马、南于一线与从南坎企图增援八莫的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战况惨烈。日军反复增援猛扑，驻印军官兵奋勇御敌，均将其击退。12月中旬，新三十师一部向日军正面防线左侧迂回，突入敌后，将八南公路切成数段。27日，一举攻占劳文及其西北的飞机场。由于日军主力布置于南坎正面，当面攻击损伤太大，驻印军决定再采取迂回、奇袭并用的战法，向南坎西南大规模迂回。1945年1月5日，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各一团开始翻越崇山峻岭，秘密迂回。7

日起大雨连续三日，山洪暴发，山路泥泞，人马行动困难。但驻印军官兵不畏艰难险阻，奋勇向前，钻隙突破，偷渡瑞丽河，于1月14日进抵南坎西南侧。随后星夜突进，于15日上午一举袭占南坎。正面防守之敌，在南北猛烈夹击下，也几乎全部被歼，仅少数残敌零星溃逃(111)。

攻克南坎后，驻印军乘胜继续攻击前进，以使中印公路早日通车。1月16日，驻印军以新三十师围歼老龙山之敌，以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东进攻中印公路上日军最后一个据点芒友。新三十八师推进中，相继攻占色兰、苗西等芒友外围据点，并于1月21日与远征军第一一六师第三四八团取得联络。23日，芒友日军纠集主力分三路进行反扑，被驻印军击溃。新三十八师另一部则向南迂回，切断日军退路。随后驻印军向芒友发起总攻，经两日激战，于27日上午攻占芒友(112)。新三十八师与远征军第九、第三十六、第八十八师胜利会师。中印公路终告打通。

芒友被攻占当日，新三十师经过5日激战歼灭老龙山阵地的日军。打通中印公路后，驻印军沿滇缅公路南下乘胜攻击日军。日军此时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和第二、第十八师团一部，企图利用滇缅公路沿线天险要隘继续抵抗。2月11日，新三十师主力强渡南开河，进入山地与敌激战，将其击溃后突进。14日，向贵街发起总攻，于当日午后2时占领贵街。新三十师乘胜向南进击，于新维以北十英里处遇日军依山隘顽抗。新三十师除从正面对敌猛攻外，以两侧部队向敌侧背压迫。19日，正面部队乘敌军心动摇之际，一举突破日军主阵地。次日晨，又乘大雾弥漫冲入新维市区，苦战三小时，全歼守敌，攻克新维。

2月23日，驻印军以新三十八师主力超越新三十师，沿公路分三路南下，直指腊戍。日军在新维、腊戍间山地隘口扼险死守。新三十八师官兵在坦克、炮火掩护下，奋勇向前，连克日军沿路据点。3月6日晨，进抵老腊戍，完成对腊戍包围态势。次日，攻占飞机场和火车

站，并突入市区，展开白刃巷战。3月8日，完全攻占腊戍[113]。

新一军在攻克腊戍后，以新三十八师沿滇缅公路继续向西突进，于3月24日与新六军第五十师胜利会师于细胞。3月30日，第五十师与英军在乔梅会师。至此，驻印军胜利完成缅北反攻任务。

三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除一部转入印度后编为驻印军外，大部撤退至云南西部，编为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沿怒江东岸设防，与西岸日军隔江对峙。1943年4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初由陈诚任司令长官，后由卫立煌继任。

1944年4月中旬，正当驻印军从胡康河谷向孟拱河谷挺进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美国方面要求和要挟下，制定远征军策应缅北作战方案，拟渡过怒江攻击当面之敌，并相机攻占腾冲。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据此制定渡江攻击计划，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强渡怒江，以腾冲为目标；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责怒江东岸防守，并以一部渡江作战，策应第二十集团军[114]。

5月11日黄昏，第二十集团军所属两个加强团由栗树坝、双虹桥间强渡怒江，第十一集团军也派出三个加强团由惠通桥等处渡江，策应第二十集团军攻击作战。次日，远征军各部强渡均告成功。渡江各部面对日军死守，展开猛攻，血战数日，克复红木树等日军沿江等据点。5月20日，军令部长徐永昌以远征军各部强渡怒江后进展顺利，而驻印军已占领密支那机场，在此情况下日军已难以向滇西大量增兵，因此提出“我远征军主力似应即乘机渡河，扩张战果，进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该建议获蒋介石批准后即付诸实施，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集团，攻击腾冲；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攻击龙陵、芒市[115]。

第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后，以第一九八师攻击北斋公房。北斋公房是日军在高黎贡山上的一个据点，腾冲北边的咽喉，从山脚到山顶75华里散设着日军的堡垒。第一九八师在空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全歼顽抗抵御的日军，翻越高黎贡山隘口[116]。第二十集团军其余各部也击溃当面之敌，向南追击，于6月底逼近腾冲北郊。

腾冲是日军在滇西最坚固的防守据点，城池一公里见方，城墙全用大青石垒砌而成，城外有来凤山、飞凤山等为天然屏障。7月2日，第二十集团军以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军对腾冲外围发起攻势。3日，攻克飞凤山等，迫近腾冲城郊。但日军依据坚固工事死守，攻城部队进展缓慢，伤亡重大。26日，远征军在空军支援下，以优势兵力对来凤山日军四个堡垒群同时猛攻，“官兵奋勇，前仆后继，血战竟日，迄傍晚止，歼敌大部，确占该山”。日军被迫退入城内，“四门紧闭，深沟高垒，企图困斗”。远征军兵临城下，将敌四面包围。但腾冲城墙既高且厚，兼有大盈江等河水环绕东西北三面，有险可凭。远征军攻城月余，在空军连续猛烈轰炸下，将城墙炸开缺口十余处，方于8月21日开始向城内日军攻击。但“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远征军各部战斗减员严重，遂从他处调兵增援腾冲前线。苦战至9月14日，终将日军全歼，攻克腾冲。第二十集团军自渡过怒江至此，共生俘日军官四人，士兵六十余人，击毙日军少将以下军官百余人，士兵6000人[117]。

第十一集团军渡过怒江后，以第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于6月初进攻松山。松山扼惠通桥咽喉，距桥仅六公里，有日军守军3000人，构筑有四个各自独立又互为犄角的坚固工事群。新二十八师攻击二十余日，伤亡惨重。6月下旬，由第八军承担起进攻的任务。第八军在空军和炮兵轮番轰炸下，先后发起八次围攻，但至8月底仍无明显进展，而伤亡重大。此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传达蒋介石命令，限第八军于9月上旬攻克松山，逾期依军法论处。第八军遂召集各师师

长重新部署作战计划。9月初，第八军以一部对松山顶峰日军主阵地进行佯攻，而以工兵在松山顶峰日军阵地垂直下30公尺处挖掘两条地道，装进10吨炸药，将整个松山顶峰炸翻，终于全歼日军3000余人，攻占松山。第八军在松山之战中官兵伤亡逾3000人[118]。

第十一集团军另一部第七十一军主力于6月初向龙陵攻击前进，6月6日迫近龙陵近郊，10日攻入龙陵市区。城内尚有数百日军负隅顽抗。此时因连日暴雨，远征军行军困难，弹药输送亦无法及时跟上，致使未能一鼓作气攻克龙陵。而腾冲日军却以2000兵力南下增援，并冲入龙陵城内。芒市日军亦北上窜犯，对攻击龙陵的远征军形成反包围态势。远征军被迫退出龙陵城，“各官兵目睹功败垂成，各个嘘声叹气”[119]。此后中日双方在龙陵城外激战至7月底，处于胶着状态。

8月14日，远征军向龙陵发起第二次攻击。在空军和炮兵猛烈轰炸下，步兵展开猛攻，反复冲杀至20日，将龙陵外围据点全部占领。此时日军2000余人又从芒市北上，持续向远征军进攻。远征军全力阻击，激战至9月中旬，迫敌退回芒市。而远征军为恢复战力，也重新调整攻城部署。

10月29日，远征军向龙陵发起第三次攻击。攻城部队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突破日军阵地，并与负隅顽抗之敌激烈搏杀。“经五日之激战，将龙芒公路截断，并逐次攻略龙陵城区外围坚固据点”，于11月3日凌晨完全克复龙陵[120]。

龙陵被攻克后，日军在滇西已成强弩之末。远征军乘胜跟踪追击，扫荡残敌。19日，远征军挺进至芒市，对千余守敌发起猛烈围攻。次日，日军残部向西南败退，芒市被攻占。11月底，远征军进抵遮放，截断遮放、畹町间公路，经激战于12月1日占领遮放。

此时日军在滇西的据点只剩在中缅边境的畹町了。12月12日，蒋

介石电令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着远征军迅速攻击畹町之敌，限亥月养日（12月22日）以前占领畹町具报。"[121] 远征军接令后部署对滇西日军的最后进攻。12月28日，远征军对畹町地区日军开始全线攻击。日军虽"凭坚固守顽抗，赖我官兵前仆后继，奋勇搏斗，进展尚称得手"。经半月多激战，远征军突破畹町外围阵地后，三面包围畹町，于1945年1月20日，歼灭守敌，占领畹町[122]。随后，远征军继续追击，肃清残敌，并进入缅甸境内与驻印军胜利会师。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自1943年10月向胡康河谷发动进攻起，至1945年3月结束缅甸战斗，历时一年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以中国驻印军为例，大部时间以两个师的兵力（最多时两个军辖五个师）连续击破日军六个师团的兵力，击毙日军27699人，击伤42760人，俘虏395人[123]，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攻击作战歼灭日军的典范。中国军队在反攻作战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驻印军伤亡12729人，远征军阵亡26697人，伤35541人，失踪4056人[124]。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反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取得的辉煌战绩不仅使国人感到振奋，也赢得了并肩作战的盟国的尊敬和赞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打通的中印公路及驼峰空运线的改善，使大批美国援华物资得以运往中国，支援了中国抗战。

第三节　正面战场的局部反攻

一　正面战场敌我战略部署

抗日战争进入1945年时，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中国派遣军因在一号作战中攻城略地，完成其所

谓作战目标，而在1月1日制定的《今后作战指导意见》中提出："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以异常的决心覆灭敌抗战根据地四川要地，扼重庆军总反攻于未然，迫使重庆政权崩溃，俾能有助于指导战争全局。"企图于1945年春季发起对四川的攻势作战[125]。

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12月中旬确认在菲律宾莱特岛与美军作战已处于不利境地后，就开始考虑全盘作战指导问题。1945年1月19日，日本陆军与海军共同确定联合作战计划，鉴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决定"在日本本土上完成最后决战"，"把华中沿岸要地、台湾、南洋群岛、硫磺岛等要地作为外围防御线"，并将主要作战目标"从过去的对重庆和对苏联转向美国"[126]。1月22日，日本大本营根据新的作战计划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新的命令。该命令明确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作战目的"在于击破进攻中国大陆的主敌美军，粉碎其企图，同时确保大陆要域"，为此须加强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战备，并继续对重庆方面实施压迫，但限制对晋西南至黄河、老河口、宜昌等地一线以西进行大规模作战[127]。这一作战计划在"本土决战"的战略方针下，实际上确定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处于战略退却的态势。

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上述命令于1月29日召开军司令官联席会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会上表示，"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辖域，以摧毁敌之根据地。"[128]即在遵照大本营命令以东南沿海为防御重点的同时，仍企图继续其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的计划。由于在湘、桂的机场被占后，中美空军利用老河口、芷江两地的机场分别袭击平汉铁路、长江和粤汉、湘桂铁路，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冈村宁次下令以摧毁两地的空军基地为攻势作战的目标，以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一部攻占老河口，以第六方面军攻占芷江。

在国民政府方面，尽管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但

由于整个对日作战局势发生有利于盟国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已开始考虑对日军反攻作战的计划[129]。1944年12月，为便于协同盟军对日作战及准备反攻，国民政府特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远征军、黔桂湘边区、滇越边区、第四战区及第五集团军的部队，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同时，再次调整了各战区序列，以适应对日作战最后阶段之需要。1945年2月，军令部拟订《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确定“中国陆军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采取攻势，特须保持重点于黔桂路方面，攻略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而在华中等地区，国民政府则仍按战略持久战方针进行作战部署，以“主力固守”，“遏阻敌奸窜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130]。因此，国民政府此时确定的战略重点是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战略态势已发生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转变时，这一战略构想没有拟订中国军队独自先行开始攻势作战的计划，就显得有点保守了。

二　豫西鄂北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部署，在1944年12月中旬就命令其所辖第十二军于次年3月实行以攻占位于湖北西北部的老河口机场为目标的作战。1945年1月中旬，驻扎于平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及洛阳等地的第十二军确定作战基本构想，即利用中国军队战区衔接部位的弱点，进行贯穿突破，选定容易机动作战的南阳平地向西突进。据此，第十二军制定作战计划，决定“于3月末开始行动，以主力快速袭击和突破鲁山（郾城西北偏西90公里）、舞阳、沙河店（确山西北40公里）一带之敌阵地，神速挺进西峡口、老河口之线”。企图以其所辖第一一〇师团、一一五师团、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等部进犯豫西鄂北地区，一举攻占南阳、老河口机场[131]。日军还以驻武汉的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九师团由荆门一带北进，策应第十二军作战。

防守豫西、鄂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一、第五战区。为加强掩护川、陕门户及空军机场，并确保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及尔后协同作战，国民政府又将第一、第五战区平汉铁路以东辖区合并成第十战区。1945年1月初，在日军显露向豫西、鄂北进攻迹象之后，蒋介石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密切协同，作战方针为“第一、第五战区，以广领要地，掩护机场，巩固川陕门户之目的，应就现态势，配合路东及敌后部队，行战略持久战，主力固守函、卢、宛、鄧、襄、樊，以遏阻敌奸窜扰，并利用豫、陕山地，广建根据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具体部署为第五战区以主力固守枣阳、南阳一线，第一战区以主力固守镇平、朱阳关、函谷关一线，两战区其他部队准备适时策应作战，第十战区则攻击日军背后[(132)]。

3月22日，日军第十二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一五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由鲁山、舞阳、叶县分三路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进攻，豫西、鄂北会战由此打响。正面对敌的第五战区并未进行大规模抵抗，即根据重庆指示将主力向湍河以西转移，而以一师兵力防守南阳，准备与日军在湍河一线决战[(133)]。因此，开战仅两天，日军前锋已逼近南阳。25日，日军除以一部正面攻击南阳外，其余大部兵力绕过南阳，继续西犯。

南阳在日军主力向西进犯后，即陷入日军重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3月28日，日军万余步兵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开始猛攻南阳。南阳守军第一四三师在强敌围攻下，退守城垣奋力抵抗。30日，日军突入南阳城内，守军与之展开巷战，至深夜，南阳被日军攻占。

当日军向豫西发起进攻之初，其骑兵第四旅团即按作战计划超越第一一五师团，冒雨急进，先后渡过唐河、白河，突破中国军队正面防线，直插腹地，于3月26日抵达鄂北重镇老河口的外围。老河口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和中美空军基地。27日凌晨，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以4000兵力向老河口外围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二五师

官兵顽强抵抗，美国驻华空军也前来助战，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傍晚，日军攻占老河口城外飞机场和马窟山等外围阵地，但也因伤亡过大，不得不停止进攻。31日，日军再次向老河口发起攻势，“随着与重庆军阵地益发接近，城墙上重庆军的射击也更加激烈，加之受到汉水对岸的炮击，不能按预期的速度前进”[134]。日军进攻再度受挫。此时，从南阳以南西进的日军第一一五师团在占领邓县后抵达老河口，并于4月2日替代骑兵第四旅团实行进攻老河口的任务。4月7日拂晓，第一一五师团在坦克掩护下发起猛攻。守军奋勇抗击，但伤亡甚大，战至次日，城防被突破，继续与敌巷战，直至晚上才乘夜色突围撤出。老河口遂告陷落[135]。

与此同时，从南阳以北西犯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于3月28日攻占内乡后，继续西进，于31日攻占西峡口，随后沿丁河进逼重阳店。日军坦克第三师团最初遭遇大雨和美国空军袭击而行动受阻，随即与第一一〇师团协同西进，也于4月1日攻陷淅川。

当日军在豫西继续西犯之时，蒋介石于4月4日电令第一、第五战区：“深入内乡、淅川之敌，受我陆空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攻势已挫，据俘供称，敌所携行粮秣，仅供一周之需，其后方追捕，亦只备两星期之用。自开战迄今，已逾两周以上，现敌军补给，仅能维持数日，尤当天雨，战地泥泞，敌战车已难活跃，此实为我歼灭敌人之最佳机会，希即督饬所部，积极反攻。”[136] 4月5日，中国军队对向重阳店推进之敌发起反击攻势，并形成三面围攻之势。10日，中国军队以野战重炮、山炮、迫击炮猛烈轰击，美军战机也出动扫射，使日军伤亡惨重。战至15日，日军被围一大队乘夜色方得以潜逃[137]。与此同时，中国军队还向老河口等地发起反攻。4月28日，中国军队一度攻入老河口，但因无后继部队跟进而被迫退出，与日军隔襄河对峙。4月29日，日军再向重阳店发起进攻，中国军队积极抵抗，予日军以重大杀伤，致使日军撤退时连处理战死者的时间也没有，只得剁下死者的手指后掩埋。由于美军战机轰炸，至战斗后期，日军甚至发

生断炊[138]。5月下旬，日军停止在豫西的进攻。

在鄂北方面，策应豫西作战的华中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3月20日夜由荆门一线北犯，向中国守军第五战区第五十九军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边抵抗边后撤，23日自忠（宜城）被敌攻陷。第五十九军随即以南漳为后方，在自忠西北组成防线御敌。中日双方激战至28日，终因第五十九军一部抽调支援老河口方面导致兵力不敷，南漳失守。29日，中国军队反击，收复南漳。但同日，日军一部北上攻占鄂北重镇——襄阳。30日，樊城也告不守。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襄、樊后，以主力西进，向谷城发起进攻，策应第十二军对老河口的攻击，而以一部转进再攻南漳。4月4日，南漳再度失守。此时，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以已达到策应作战目的，决定将向谷城进犯的主力撤回襄阳。而中国军队则开始发动反击。4月10日，经激战，中国军队再克南漳。随后，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向襄、樊地区发起反攻。16日，襄阳、自忠被收复。18日，中国军队又攻克樊城。至此，鄂北地区恢复战前态势。

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美国空军和中美混合团出动战机数百架，不仅完全压制住日本空军的活动，而且对日军地面部队尤其是坦克部队连续攻击，造成其重大损失，甚至不得不放弃白昼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地面部队的作战[139]。

豫西鄂北会战历时两月，日军虽完成其预期占领老河口空军机场的任务，但并未能抑制住中美空军的活动。由于中国战场整个战略态势已发生变化，日军在战役后期已呈疲态。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5万人，日军伤亡约1.5万人[140]。

三　湘西会战

日本中国派遣军在1945年1月下旬确定发起对芷江的进攻时，战略目标在摧毁中美空军基地，并准备下一步对四川的进攻。但4月1日

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后，日本大本营命令驻湘桂铁路沿线的第十一军往华北集结，这样在华日军对四川的进攻已完全不可能。但日军仍欲进攻芷江摧毁中美空军基地，于是发起了对中国军队的最后一次攻势——湘西会战[141]。担任这次进攻任务的是驻扎在湖南的日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军辖五个师团，由于豫湘桂战役后日军战线拉长，防区扩大，先期投入攻势作战的主要是第一一六师团和两个支队（共有两个联队又三个大队）。

防守湖南西部地区的是编入中国陆军总部的第四方面军及第三方面军。中国军队在3月即发现日军调动迹象，判断日军“有抽集三个师团以上兵力，分路会犯我芷江要地，以排除其大陆交通线及空中威胁之企图”[142]。4月14日，日军发动进攻前夕，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部署拟定作战计划，决定以第四方面军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一线与敌决战，第三方面军阻击黔桂路及桂穗路之敌，策应第三方面军，并以新六军为总预备队置于芷江[143]。

4月15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由邵阳方面分几路全面西犯。日军中央纵队从邵阳向小塘攻击前进，未遇激烈抵抗于18日占领岩口，22日进抵山门时遇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成僵持局面，随后中央纵队一部继续西进，至雪峰山东麓半江峰地区遭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右纵队由邵阳西北突进，与中国军队激战三昼夜，占领隆回司，4月下旬进至大黄沙、放洞附近遇中国军队有力阻击。日军左纵队西犯后于18日占领桃花坪，随后在洞口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进攻受挫。中、美空军在日军开始进攻后，也从4月23日起，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致使日军伤亡增大，白昼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在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由邵阳大举西犯的同时，其关根支队和重广支队也分别从南、北两翼开始攻势。关根支队由东安向新宁发起进攻，17日攻占新宁。随后日军分兵两路向武冈和武阳推进。中国军队沿途阻击，与敌展开激战，日军进攻受阻。重广支队于4月15日西渡资水进犯，中国军队在新化以南进行阻击，予敌以重大杀伤。

4月下旬，当日军进攻受阻，中日双方处于相持状态下，中国军队开始部署反攻。4月26日，何应钦下令第九十四军归第二十七集团军指挥，向日军进攻南翼武冈地区进击，参加决战[144]。5月1日，第九十四军攻克武阳，日军残部纷纷后逃，南翼被中国军队突破。北翼重广支队在中国军队攻击之下，也于5月上旬后撤。日军南、北两翼均已败退。日军中路第一一六师团虽仍向当面中国军队阵地猛攻，但在守军坚强抵抗下毫无进展。

5月4日，何应钦下达攻击命令，目标为“击灭进犯之敌，恢复我资水西岸之原阵地，并相机攻略宝庆（邵阳）”，要求“各部队应密切协同，全军一齐猛烈进攻，如敌动摇，应不分昼夜，与敌保持接触。并应以钻隙、迂回、超越、追击诸法，分别截断包围退却之敌而歼灭之”[145]。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在久攻受阻并获悉美式装备的新六军已空运至芷江后，开始改变原定以芷江为目标的进攻计划。5月4日，第二十军给第一一六师团下达命令，决定避免与中国军队决战，应适时脱离战线，向山门、洞口一带后转。5月9日，中国派遣军也下达了终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146]。

中国军队各部根据攻击命令，分别调整部署，转入攻势位置。南、北两翼则继续已开始之进攻。5月9日，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攻。“霎时湘西战场杀声震天，爆声四起，硝烟蔽空，我陆军健儿，个个英勇争先，敌军为之胆寒，被迫步步退缩”[147]。在中国军队奋勇攻击之下，日军各部被分隔切断，陷入困境。日军战史记载，被围攻的日军“陷入苦战。部队因缺乏弹药，只好进行白刃战，粮食也已吃完，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连日激战，损失极大，战力显著减退”[148]。5月12日后，日军后续部队第四十七师团投入战场，但未能改变整个战役已有态势。日军在中国军队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中国军队乘胜收复失地。至6月7日会战结束，日军退至原防线，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据中国第四方面军统计，整个战役，毙伤日本军队近3万人，己方伤亡1.8万余人[149]。

日军发动对湘西的进攻，旨在打击芷江空军基地，但在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下攻势受挫，随后又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狼狈溃逃。侵华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攻势以失败告终，也宣告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处于强弩之末的被动局面。

四　收复广西战役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对整个对日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改变了侵华日军的作战部署。4月14日，日本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为对付美苏，内定将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各师团及第二十七师团，调往华北集结待机。"[(150)] 4月27日，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第三师团7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汉口、郑州开往徐州；第十三师团8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京汉线开往北京；第三十四师团6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南昌、南京开往天津；第二十七、第四十师团5月下旬从广州附近出发，对残存在三南地区的敌第七战区抗战根据地给以一定程度的摧毁以后，经由赣州、南昌，然后第二十七师团开往济南，第四十师团开往南京。"并命令刚开始对湘西芷江进攻的第六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武汉地区及北部粤汉线要地，而继续执行以前任务"[(151)]。这一部署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开始全面战略退却。

1945年春，日军虽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发动攻势，但其整个战略态势败相毕露。因此，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新的战略形势，准备与盟军协同作战，制定代号为"白培计划"的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其主旨是："决定于是年秋间，开始对盘踞中国大陆之日军断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作战容易，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质供应，充实战力，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152)] 同时，鉴于日军发起湘西战役后，广西境内空虚，决定以第二方面军进军广西，收复桂林、柳州[(153)]。

4月21日，日军为在后撤时减轻中国军队追击压力，以第三、第十三师团一部向广西都安一带发起攻击，24日，进攻部队沿原路返回。中国第二方面军乘势推进，于27日占领都安。随后，以主力经都阳山脉向南宁迫近。5月27日，中国军队攻克南宁，残敌弃城逃窜。第二方面军除以第六十四军一部向龙州追击外，另以第四十六军向柳州东南攻击前进。第六十四军一部于6月7日克复思乐，8日攻克明江，并于7月3日收复龙州、凭祥，将桂南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四十六军在攻击前进中，于6月底迫近柳州。

中国第三方面军于5月初也开始向广西西北的河池、黎明关进攻。5月19日，攻克河池，21日攻克黎明关，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6月6日攻入宜山。但日军由柳州方面增援，与中国军队反复争夺宜山。激战至6月14日，中国军队击退日军，再度攻占宜山。随后，第三方面军进军柳州，与第二方面军会师。6月29日，攻克柳州。中国军队攻克柳州后，分兵三路向桂林攻击前进，歼灭沿途顽抗之敌，于7月28日收复桂林[154]。

在广西境内反攻连连告捷之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准备扩大反攻作战规模，于7月中旬制定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拟分三阶段攻占上述各地，即第一阶段于9月15日前攻占桂林、雷州半岛，开辟第一海口；第二阶段于11月1日前攻占衡阳、曲江；第三阶段于次年3月1日前攻占广州、香港，开辟第二海口[155]。但中国军队刚按此计划进行部署，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日作战遂告结束。

---

(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01—192页。

(2)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2页。

(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07—108页。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4页。

(5)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0页。

(6)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94页。

(7)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7页。

(8)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8页。

(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33页。

(10)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34页。

(11)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26—32页。

(12) 徐勇：《征服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78页。

(13)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40—41页。

(14)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56、259—260页。

(15)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但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直接指挥第二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一集团军等一半以上兵力。

(16)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61—64页。

(17)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52页。

(18)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六册，台北1988年版，第310页。

(19) 19日正午日军向摩旗岭发起进攻后，中国军队炮兵就突然停止了对敌炮击，见《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58页。

(20)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249页。

(21)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17页。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于4月20日进占郑州，见《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63—64页。

(22)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84页。

(23)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87—288页。

(24)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1页。

(25)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92—93页。

(26)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05页。

(27)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3页。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这一部署有不同看法，认为“大兵团指导，不应该追随敌人应战”，并提出两项建议：“一、俟机打击西进之敌；二、东向击敌之后”，蒋介石采纳了前者，《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93页。

(28)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3页。

(29)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14页。

(30)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35页。

(31)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9—80页。

(32)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80页。

(33)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284—285页。

(34)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81页。

(35)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37页。

(36)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册，第32页。

(37)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册，第88页。

(38)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评论两人：“汤恩伯一味飘忽，保存实力，而蒋铭三张皇失措。”《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99页。

(39) 蒋鼎文在总结此战失败时提到“以血肉之躯，当装甲部队之锋，终难限制其活动。”见《蒋鼎文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93页。

(4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一

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4页。

(41)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2—13、20页。

(42)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08页。

(4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08—209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56页。

(44)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67页。

(45)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68页。

(46)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71页。

(47)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45—46页。

(48)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75页。

(49)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54页。

(50) 《第四军参加长衡会战作战经过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57页。

(51)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78页。

(5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58页。

(53)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53页。

(54)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54页。

(55)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01页。

(56)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61页。

(57)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02页。

(5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80页。

(59) 预十师第三十团第二营营长甘握回忆，见《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18页。

(60)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66—67页。

(61)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43页。

(6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东京朝原出版社，第478页。

(63)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71页。

(64)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第39页。

(65)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74页。

(66)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第55页。

(67)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76页。

(6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页。

(69)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6页。

(70)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上册，第108页。

(71)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129页。

(72) 《军令部拟桂柳会战有关战区作战指导要纲》，1944年8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23—224页。

(73) 蒋介石令陈牧农密电稿，1944年8月26日，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27—228页。

(74) 《桂柳会战第四战区作战计划》，1944年10月13日。

(75)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4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32页。

(76)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01页。

(77)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08页。

(78)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115—116页。

(79)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78—81、86—92页。

(80)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19页。

(81)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155页。

(82)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180页。

(8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1062页。

(84)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203页。

(85) 《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37页。

(86) 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提交“第二次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京大学2002年12月。

(87) 《勖知识青年从军》，重庆《大公报》1944年9月20日，转引自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88) 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89) 《中央日报》，1944年10月15日。

(90)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1069页。

(91) 《中央日报》，1944年11月21日。

(92) 《中央日报》，1944年12月9日。

(93) 《中央日报》，1944年12月31日，1945年2月22日。

(94) 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95) 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始末》，《远征印缅抗战》第72页。

(96) 《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40页。该书仅记此作战计划为1943年，具体时间不详，据《抗日战史》此计划为1943年9月制定，见该书第九册第334页。

(97)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卅八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44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16—322页。

(98)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卅八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45—1447页。

(99)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71页。

(100) 《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4—455页。

(101) 《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5页。

(102) 《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6页。丁涤勋：《悲壮激烈的胡康河谷反攻战》，《远征印缅抗战》第339—341页。

(10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缅甸作战》，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册，第29页。

(104) 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始末》，《远征印缅抗战》第78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49页。

(105)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卅八师司令部孟拱区作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64—1465页。

(106)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404页。

(107) 《缅甸作战》下册，第73页。

(108) 《攻克密支那街市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69页。

(109) 《抗日战史》下册，第406页。

(110) 《中华民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9—461页；《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八莫区战斗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75—1478页。

(111)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3日、1945年1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81—1487页。

(112) 《中华民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65页。

(113) 《孙立人致龙云电》（1945年3月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90页；《中华民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67—468页。

(114) 《远征军策应驻印军作战指导方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04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38页。

(115) 《徐永昌再致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1944年5月20日），《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05—1506页。

(116) 董铎：《腾冲歼敌记》，《远征印缅抗战》，第425—426页。

(117) 《第二十集团军腾冲战役战斗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08—1509页。

(118) 王景渊：《血战松山》，《远征印缅抗战》，第396—397页。

(119) 《卫立煌致何应钦抄电》（1944年6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13页。

(120) 《卫立煌致蒋介石电》（1944年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20页。

(121) 《蒋介石致何应钦卫立煌》（1944年12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22页。

(122) 《宋希濂等致蒋介石》（1945年1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26页。

(123) 《中国驻印军中国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自马振犊《惨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24) 《中国驻印军反攻侵缅日军作战经过史料》附表三，《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属各战列部队各战役伤亡官兵骡马统计表》，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307页。

(12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5页。

(126)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页。

(12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19—520页；《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页。

(12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21页。

(129) 还在1943年11月，军令部长徐永昌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拟订了一份总反攻作战计划。该大纲基本方针为“先以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会师武汉，再与盟军相策应，逐次肃清长江、黄河流域及沿海之敌，进而规复东北。但倭寇有总崩溃之征兆时，各战区应不失好机，同时反攻”。《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1943年11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2—

114页。1944年2月，蒋介石也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台北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1484页。

(130)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45年1月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6页。

(13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9—42页。

(132)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45年1月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6—137页。

(133)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63页。

(134)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77页。

(135)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下），第2192—2193页。

(136)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73—374页。

(137)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32—133页。

(138)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46、148页。

(139)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82页。

(140)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77页。

(14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4页。

(142) 《陆军总部及第六战区策应王耀武集团保卫芷江作战指导方案》，1945年3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1页。

(143) 《何应钦复蒋介石电》（1945年4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5页。

(144) 《何应钦致蒋介石徐永昌密电》（1945年4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9页。

(145) 《何应钦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9—1350页。

(146)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5—58页。

(147)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385页。

(148)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67页。

(149)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敌我伤亡统计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86页。日方统计其伤亡数为26,516人；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88页。

(150)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二分册，第3—4页。

(15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页。

(152)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第366—367页。

(153)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65页。

(154)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65—268页。

(155)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8—149页。

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一节　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一　“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建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曾出现过民主宪政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提议和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于1939年9月通过了要求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1)]。国民政府当局被迫允诺在1940年冬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但不久即自食其言，以战时环境为借口，以政治高压为手段，迫使战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归于沉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条件逐步成熟。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尤其是中国跻身“四强”行列，同盟国政治军事形势日趋好转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中国以怎样的政治面貌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引起国人高度关注，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推行民主宪政运动提供了较好的历史机遇，而且鼓舞了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起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呼号呐喊，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当局实施预备宪政的若干行动。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2)]。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战争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

国表面上短期的军事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率先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从此独裁政治将日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惟一极则”。并借英国首相丘吉尔之言，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一党专政”，内称“一党专政之极权制度，以秘密警察为其爪牙，取政府之一切官职，虽至微官胥吏而垄断之，举凡地方民政官与法庭，均在行政首长控制之下，国内外皆布有最完整之间谍网。此种制度行之过久，则彼广大群众对其国家生命，即毫无左右之权。舍官吏阶级而外，别无独立人物”，强调实现民主宪政已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政治潮流[(3)]。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李济深、陈铭枢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和谈话，要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政治。如宋庆龄发表公开谈话称：“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的胜利。”[(4)] 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坦承“我们是民主阵线四大盟邦之一，对外既与盟邦携手，和法西斯敌人作战，对于国内政治建设方向，当然只有走向民主的路线，以与国际路线相配合”，并从稳定国民党统治出发，警告说：“如果我们把宪政实施，一天天搁下来，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那就不但违背了建国纲领，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将使“政府对人民损失威信，更予反对党以攻击本党的口实，而中央也就会为人民所不满。”[(5)] 这表明战争局势的变化已对中国的执政者造成强大的压力，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进一步强化，大

后方出现了日益加深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在政治上，“一党专制”、特务横行、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使人民没有安全保障；在经济上，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经济命脉，国统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依赖外援，消极避战，除打了第三次长沙战役等少数胜仗外，在重大战役中连连溃败，而且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汪伪政府60万和平军中50万来自国民党军队，尤其是豫湘桂战役的失利，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和不满。张澜批评说：“年来言政治，则官吏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言财政，则专卖统制于各种收税机关，繁重苛扰，结果是政府受怨，民众受困，大利归于中饱；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地地缴谷；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人；不平现象，到处皆有。”并指出：只有“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使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并协助政府办理各事，政治才有望合理改善，挽回颓势”[(6)]。黄炎培也愤慨地指出：“炎培往来各地，亲见非法逮捕拘禁，几乎到处都有，或怀挟私怨，滥用职权，或假借公务行敲诈，甚至地非监狱，人无罪名，而久久不见天日。”[(7)] 孙宝继更直率指出：“在战时或对决定重大政策之时，则一举一动，俱属有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决不可由一部分人或一党人甚或一党人中的一部分人，擅自决定”，“如果在朝党或多数党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滥用权力，擅自行动，或对异己加以监视、压迫、虐待、逮捕、逐放，甚或残杀，则请问与暴政有何区别？暴政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出来。”[(8)] 改变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实行民主宪政已成为坚持抗日战争至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成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重要动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战时盟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财政、军事援助，随着大批贷款、租借物资和美军人员的来华，国民党的“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引起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从十个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指出“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是到了过去十年来最微弱无力的地步”，“国民党在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之前，渐渐

不复为中国社会中团结和进步的力量，逐渐不成它曾经扮演的并对现代中国有过最大贡献的角色”，“国民党不但无力自动扭转难局，相反的，其政策加深了危机”等[(9)]。美军在华人员大量不利于国民党当局的报告纷纷送回美国国内，对美国最高当局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政府虽然从其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执行维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基本政策，但敦促甚至压迫国民政府改变现状，实行民主改革亦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罗斯福总统明确要求蒋介石：“中国宜从早实行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于平等地位，以解决纠纷。”[(10)] 美国的态度成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外部原因，对于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1943年9月8日，迫于国内外压力的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内称：“今抗战胜利在望，宪政基础已立”，应“从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国民共信共守之大法，以完成建国之大业。”并决议如下各端：

1．全国党政机关，除后方各省应就原有基础加紧推行地方自治之工作外，今后随各地之恢复，应积极辅导各该地人民加速完成地方自治及职业团体组织，确立宪政之基础，并为复员建国之中心工作。

2．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

3．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前次选举未竣或未及举办选举之各区与各职业团体，均应依法补选，至于国民大会召集之前三个月办理完竣。

4．关于筹备国民大会及开始实施宪政各项应有之准备，由政府督饬主管机关负责办理[(11)]。

这个决议案将宪政的实施推迟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不能不使人感觉到是国民党当局的一种缓兵之计，而承认在国共内战期间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更是表明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其专制独裁的立场。

同月，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置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为当然会员，另由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员及其他富有政治学识经验或对宪政有特殊研究之人士中指定35人—49人为会员。由蒋介石指定孙科、王云五、莫德惠、黄炎培、吴铁城、褚辅成、张君劢、左舜生、董必武、傅斯年、王世杰为常务委员，以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为召集人。下设三个委员会，第一组委员会（关于宪法草案研究事项）以孙科、王宠惠为召集人，第二组委员会（关于民意机关事项）以王世杰、吴铁城为召集人，第三组委员会（关于宪政有关法令实施状况事项）以黄炎培、许孝炎为召集人。规定该会的任务是：1．向政府提出与宪政有关之建议；2．考察关于地方民意机关设立情形并随时提出报告；3．考察与促进宪政实施有关法令之实施情况并随时提出报告；4．沟通政府与民间团体关于宪政问题暨其他有关政治问题之意见；5．依政府之委托审议一切与宪政实施有关之事件[(12)]。

该协进会虽由各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然而实权完全操诸国民党当局之手，所有活动都秉承会长蒋介石的意旨进行。至1944年5月该会共开全体会两次，常委会六次，各组委员会若干次，通过各类提案二十二件，其主要内容有：1．组织国人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2．建议加强各级民意机关，提高国民参政会及省市参议会职权；3．提请提前实行提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自由；4．主张改善图书杂志审查与新闻检查制度；等等[(13)]。但均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国民党当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基本局面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国民党当局对于实施宪政的允诺，却为大后方抗日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条件。

二　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以国民党当局的宪政允诺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判断国民党当局的举动是为“国内外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而不得不采取，“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定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为此决定因势利导“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共不仅派代表参加国民党当局召集的宪政协进会，并且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宪政座谈会，“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更在党内严格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况，“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为在全国实行民主宪政作出榜样[(14)]。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重要演讲《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宪政问题的基本主张。他首先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理论论证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性质的”，“不仅可以坚持抗战，而且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不仅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得很有成绩，而且很可以推行于全国”，要求国民党当局“如欲实行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而且要不怕面对现实，来看看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成果”。

其次，指出实行宪政必先实行的最重要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这是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如果“人民的住宅随时可以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以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和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其二是“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

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其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利，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呼吁和争取其实现。

接着，周恩来针对国民党的宪政筹备方案提出了三点具体主张：第一，主张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提出宪法应“承认革命民权”、“直接民权”，“承认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必须以实现民生幸福和繁荣为目的”。第二，主张彻底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新选举国大代表。批评过去的国大选举完全违背“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原则”，“而且是内战时期的选举，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合抗战时期已经变更了的情况，其成分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阶级，不能代表广大的工农平民”，提出新选举法“不应有任何被选举权的不当限制，尤其不应以党义考试来限制，不应有候选人的指定，不应当由乡镇长来推选候选人，不应有对少数民族、边疆及华侨的不平等待遇，并且允许各党派的竞选自由”。第三，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反对国民党当局将宪政实施推迟到战后，指出“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民主的动员是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15)]。周恩来的演讲对于推动该运动在大后方的全面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演讲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民族工商业者、西南地方势力中广泛开展活动，推动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

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相呼应，批评国民党当局“训政十余年，国民的组织未

见加密，国民的道德未见提高，贪污土劣只有增加并无减少，糜烂腐败更加普遍并未减轻”，导致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以及文化与教育，一切一切都生了问题”；谴责国民党当局允诺准备实施宪政半年余，“依然只限于口头，限于纸片，而取缔人民自由的章则或条例，照旧是层出不穷，妨碍人民自由的非法机关，照旧是重重叠叠，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由苦闷而发为呼吁，因呼吁无效而流于怨望”；抨击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除一个执政党而外，绝对不允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地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允许暴露坏的一面”，“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强调“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在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种基本自由”；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相同，该同盟亦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已刻不容缓，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即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16]。

其他各党派亦颇为活跃，国社党领袖罗隆基发表演讲疾呼：“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在“政治上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经济上必须生产手段公有”，指出国民党军队“军事上吃败仗，完全是政治上不民主的缘故”，主张实行“多党政治”。张君劢则发表《联合国家中之治国与乱国》，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寡头统一”，“专恃有形之武力和军警等，而忽视其自动自发之忠诚，则猜忌防制之术终有穷之，而其一致所生之效果，微未不足道矣！”指出“惟有民主，惟有有言论结社自由之民主，有反对党之民主”，才能“去乱国而成治国”。青年党领袖李璜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主张在目前应实现三大自由——人身的自由、思想信仰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各政党能够自由充分的发展。左舜生也著文主张“切实调整国共关系”，“加速实现民主，以澄清国际的

疑虑，并举国内团结之实”。该党机关报还载文提议根本改造国民参政会，批评该会不足称为“过渡的民意机构”，只是“聊备一格之外交姿态而已”！中华职教社的负责人黄炎培更是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发出了“为民主拼命”和“成为一个大运动”的激昂号召，指出：“要民主，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礼物送上门，要成功，一定要我们‘求’的有力，要成功的快，也得拼命的‘求’”，“要说的就说，要干的就干，良心以为该做便做，硬是要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等[17]。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大后方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迅速行动起来，成为推动民主宪政运动高潮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研究会，创办各种刊物，举行座谈会、演讲会，发表通电、文告等等，在国统区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潮流。

在重庆，1944年1月，黄炎培创办了《宪政月刊》，张志让任总编辑，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阵地，该社每月组织一次宪政座谈会，共计举办十七次，邀集各界名流，讨论实施宪政的各种热点问题，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如第四次座谈会讨论妇女和宪政问题，与会者认为：“因为妇女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地位，所以将来在宪法上妇女的权利要特别重视”，主张“妇女要有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目前要有研究宪草的各种权利；宪政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要扩大到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中间去；宪法上应明文规定妇女在国民大会代表中的名额；宪法上应该具体规定对劳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和男子一律平等”；等等[18]。第八次座谈会讨论保障人身自由问题，与会者严厉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要求提早实行提审法”；二是“要求法权统一，不得以命令代法令”，“人治尽好总不及法治”，建议“各位大律师发起一种组织，对保障人身自由为无条件的辩护，以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等[19]。1944年9月，黄炎培等三十人还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提出七项

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处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及早实现“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不惟其名，务求其实”等，“非此不足以一新政象，激发人心，增进团结，以迎最后胜利”[20]。

在成都，1944年6月由张澜、李璜等名流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于国是的十项主张，认为“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其要义有三：第一，“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公教人员、学生士兵入党入团须基于自愿，并不得以党员团员资格为铨叙考核之标准及享受其他特权”；第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政府用人应一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等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政，以减轻人民痛苦”；第三，实施全民动员，“举凡训练群众、组织民众，均以国家立场出之，不再以党的立场出之”等。该国是主张刊出时被有关新闻机关删得残缺不全，但仍发生了重要的影响[21]。自1944年5月起，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华西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力主“迅速刷新政治”，“肃清变相的法西斯”，指出目前的军事危机“决不是单靠盟国的若干协助，就可以改变的”，“政治的彻底刷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提出要警惕那些“想利用人类为民主，为和平，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强盗所流的血，暗中灌溉新的暴力统治”的企图[22]。

在桂林，1944年6月，先后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以李济深为会长，邀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名流学者，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力主动员全民，坚决抵抗，痛斥畏祸先逃，动摇战志之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抗战。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危急，桂林的民主宪政以实行民主动员、解决军事危局为特征，得到了国统区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舆论普遍指出：“不动员民力，当然会自陷于无法无力之境”，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从认真动员做起，急起直追，“敌人已经扼住我们的咽喉，

要窒息我们”，“倘再因循，真就误事透底，要谋补救，都来不及了”。

昆明也是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基地。由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进步师生广泛参加了运动，使该地的运动表现出更为激进的态势。教授们创办了《自由论坛》刊物，公开表明：“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1944年7月7日，云南各校师生三千余人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集中讨论政治改革问题，不少著名教授参加了会议。潘大逵教授呼吁：“青年们应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著名诗人闻一多更是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会后，他又撰专文揭露大后方的深重危机，呼吁青年们起来为民主而斗争，“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平时的规范都是可以搁置的枝节，火烧上眉毛，就是抢救！”[23]

西南地方实力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广西和云南的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就与李济深为首的广西地方势力和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的支持有关。1944年6月15日，李济深在桂林发表演讲，大声疾呼铲除失败主义，“希望中央与各地方长官要尽到领导抗战的责任，立刻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使一部分武装起来”，主张加强民主抗战，在国统区发生重要影响[24]。而在龙云控制下的《云南日报》和《云南民国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和文章，批评国民党中央将地方政府“从前所有之一切权力渐次吸收，而集中于各部院会手中，以致政令频繁，机关林立，直接指挥，收效殊鲜”，“省政府有责无权，有事无权”，要求改变“一切均归中央统制”的独裁政策，“切实保障地方权益，使地方能因地制宜，运行其高度的职权”[25]；更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处处阻碍军事进展”，对待中央军与杂牌军“应该一视同仁，打破地方关系，实行平等待遇”；等等[26]。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刘文辉战时深居西康，沉默寡言，此时也发表谈话，主张加强各党派、各军队团结，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进行大后方的保卫战”[27]。

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

级以及地方实力派领袖对于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统治的认识已较前有了进步，要求改革现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政治主张方面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近，并在行动上逐步实现同步。1944年底，豫湘桂战役失利后，国民党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而发展为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由此而进一步密切。

三　国统区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

与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大后方各阶层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两者相辅相成，使国民党独裁统治出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反对国民党推行的特务制度、经济统制政策、横征暴敛政策以及民族压迫政策成为国统区人民抗暴斗争的重点。

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在战时迅速膨胀，他们和国民党军警相结合，在大后方为所欲为。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出现和日趋严重，特务统治，军警横行，成为国民党当局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1944年7月，遭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被迫离开重庆的著名抗日文化人邹韬奋在上海病逝，激起国统区人民的极大悲哀和对特务统治的痛恨。10月1日，重庆数千学生举行集会追悼邹韬奋先生，并发出了“向法西斯进军”的口号，表达了国人对于国民党特务统治制度的强烈抗议[(28)]。

在大后方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中，成都“市中事件”和重庆“胡世合事件”影响最大。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因校方处理年级之间的纠纷不当，激起学潮。31日，成都市长余英中命令警察局长方超率领武装警察冲进学校，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四十余人，酿成重大事件。成都各大中学学生代表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揭露事件真

相，抗议军警暴行，同时成立后援会慰问受伤同学。叶圣陶、沈志远等52人发表慰问同学书，全市32所大中学校联名致信国民政府，数千学生集会游行，要求省政府公布事件真相，医治受伤同学，保障人身自由，严惩凶手，撤处市长等。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被迫接受上述各项要求[29]。

1945年2月，又发生“胡世合事件”。20日，国民党特务田凯无故枪杀正在正常执行业务的重庆电力公司外勤工胡世和。这一暴行激起了一场以重庆电力工人为中心，得到全市各界人民支持和响应的群众性抗暴斗争，“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为全市人民一致的要求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新华日报》先后发表《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等消息和社论，推动群众性抗暴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电力工人组织了“胡世合血案后援会”，散发求援传单，召开记者招待会，举行追悼会等，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在肇事地枪决凶手田凯、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保障电力工人工作自由和生命安全、优恤受害工友胡世合等要求。23日，3万重庆市民在特务肇事地举行悼念活动，25日，更有近10万市民前往胡世合灵堂吊唁，国民党当局被迫将田凯枪毙，给胡氏家属发放抚恤金10万元，并由市长亲自“主祭”为胡氏举行公祭，公祭三天内共有20万市民参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怒潮。西安、成都、昆明、贵阳、桂林等地也都开展各种形式的反特抗暴斗争，这些斗争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30]。

国民党当局执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在战时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执行机关滥用职权，对于民营企业实行窒息政策，导致国统区的民营企业家濒临破产，难以为继。他们也起而参加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行列。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五工业团体，联合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

之建议书》，呼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改变经济政策，保护民营企业。同年5月20日，重庆宪政月刊社举行座谈会，集中讨论保护民营企业问题，与会者尖锐批评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指出："原料方面自从统制以来，有些物品日渐减少，而有些物品竟致绝迹不见"；运输方面"各地关卡林立，滞留货物，使工业界四肢不灵"；"机械方面则都市里更堆着机器，停置不用，甚而有拆成废铁按斤出卖者，但在各地乡村中对于这种机器却正是求而不有"；营业方面政府"不准更改价格，然而事实上黑市满街，于是我们工业界只好坐视亏本"；"此外以不合标准，管理不佳等理由，下令停闭的中小工厂，更是为数不少，而一息残存的几家较大的工厂，也只是苟延撑支而已"等，大声疾呼："在今天这种机器停搁、技工失业、原料久封不启等等实况下，我们工业界不得不发出这一要求'生产自由'的呼声！"破产的痛切经验使民营企业家们深切感受到，如果不改变国民党的统制政策，那么，所有的正当工商业必然要被窒息至死！为此他们团结起来，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垄断的斗争[(31)]。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营工商业家在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活动充分反映了民族企业家的情绪和立场。

国民党当局在农村的横征暴敛，使大后方广大农民也濒临绝境。《解放日报》利用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材料描述了大后方农村的现状："农田面积逐年锐减"、"农业生产量惊人降落"、"牲畜大量死亡"、"土地加速集中"、"土地租押金飞涨"、"农民分化愈趋尖锐"、"高利贷重利盘剥"、"经济剥削变本加厉"、"农民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保甲长鱼肉农民、出征壮丁妻室被奸、农民铤而走险"等。指出："大后方农村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压榨之下，广大农民正日益剧烈的走向饥饿与死亡的境地"[(32)]。

国统区农村出现了"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先是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边远省区，后发展到国民党严密控制的重要省区，都发生了农民的抗暴斗争，甚至武装起义。1943年，甘肃临夏、临洮等二

十余县的各族农民10万人联合举行反蒋斗争，要求免粮免款，坚持斗争达十个月之久，最后国民党当局出动飞机轰炸残酷镇压了此次起义。广西大瑶山各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设治局”的残暴统治，群起捣毁“设治局”，一度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大瑶山。海南岛白沙县农民也举行了“七月起义”，进攻国民党自卫队，并以各种原始武器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激战，一度占领五指山。后在国民党军队三路“清剿”之下，惨遭失败，被害群众多达万人以上。1944年，河南桐柏、遂平、唐河、确山、泌阳、信阳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县农民为反对国民党强抓壮丁先后举行起义。农民起义军七千余人曾将国民党驻信阳的何励生部缴械，国民党调来大批军队镇压，屠杀五千余人。起义农民并未屈服，数万人继起组织“农民救国军”，提出了“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军队”，与国民党军进行激战，消灭了残害民众的国民党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击毙师长，成为国统区农民抗暴斗争中最为典型的事件[(33)]。

国民党当局的残暴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政策也导致了大后方内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有些地区还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早在1941年11月，云南基诺族人就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征兵命令的武装暴动。国民党当局对只有8000人口的基诺山区下达了800个征兵名额，该乡乡长为抗议此种暴行而服毒自杀，成为起义的导火线。起义军喊出了“踏平宣慰街，赶走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次年8月和10月，国民党当局两次出动重兵围剿起义军，并大开杀戒，仍不能取胜，双方战成僵局，同意暂时停战。12月，双方再起战事，国民党军又遭起义军重创。1943年4月，国民党军改而实行剿抚结合，抚重于剿的政策，国民党军逐渐占据优势，由于连年战斗并遭多次烧杀抢掠已贫困不堪的基诺族人决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一切武装部队十日内撤离基诺山，并保证不再继续烧寨子和抢走、屠宰耕牛，双方实现停火。随后，国民党当局又允诺“现阶段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原下达的征兵命令作废；停战后几年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并免除过去三年所欠一切捐税”，7月，国民党军撤

走，历时近两年的基诺族起义告终[34]。

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又在贵州东部发生各族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黔东事件”。1942年8月，松桃县各族群众4000人，在苗族领袖石宝山领导下，打出“中元左翼军”的旗帜，举行暴动，目标是“安定人民社会，专杀贪官污吏”，“建立新的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起义军连克数乡，两攻县城，10月中旬为国民党军所镇压。10月下旬，镇远境内发生了分别由吴宗尧等和杨树勋等领导的苗、侗、汉族群众的武装起义，起义文告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假借抗日救国之名，“趁火打劫，以发国难财”，决意“除暴安良，打倒恶劣政府并及魔妖土狂，取消苛捐杂税，以免民众受殃”，两支起义部队一度十分活跃，后为国民党援军镇压失败。11月，又发生朱伯屏等领导的“大中华定国军”第五路左翼军和陈信哉等领导的“救国救民军”第六军的武装起义，他们以“奉天命扫尽妖氛，平定天下，永享太平”和“抗兵抗粮”，“解除人民痛苦”为旗帜，聚兵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延至次年3月才在国民党大军围剿之下失利[35]。黔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武装起义，表明国民党专制统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从另一个侧面配合了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成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国民党当局统治危机的全面来临，一个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更大规模、更为强劲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就将到来，国共两党围绕着战后中国政治前途的争执也趋向表面化和激烈化。

第二节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共两党谈判

一　1942年—1943年的两党谈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了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判断：由于中国已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过程仍是慢的”，对国民党应实施“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的方针，在宣传上“务必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等[36]。针对国民党中央五届九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及随后准备策动反共摩擦举动，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决定了“巩固自己，沉机观变”的方针，并为恢复两党谈判作了艰苦的努力。

1942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国民党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在战时首次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37]。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该是团结的”，希望“按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争论问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38]，宣言拉开了本轮国共谈判的序幕。

7月3日和11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周恩来先后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指出克服抗战困难的主要办法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请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速回延安，并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同时要求国民党释放叶挺、廖承志[39]。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已指定张治中、刘斐同中共谈判，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并提出想同毛泽东会面，请周电告延安[40]。迄此，国共两党领袖都表达了见面的愿望，但两党谈判的实际进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却使蒋、毛在此轮谈判中无缘相见。

8月19日、29日，9月3日，毛泽东曾三次致电周恩来，表达了见蒋的意见，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

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关系根本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41] 周恩来力持异议，8月19日，致电毛认为“目前形势虽有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蒋毛会面似嫌略早”[42]。9月5日，再电毛，陈述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如“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则“于我损失太大”。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林彪去西安，“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43]。但毛泽东依然表示：“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此较妥”；并指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此时毛见蒋的愿望并未完全消失[44]。

9月14日，林彪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前往西安，但蒋介石已返回重庆，留话要林转往重庆面谈。林彪在西安先后与国民党方面李宗仁、胡宗南、张治中、谷正鼎等进行洽谈，初步交换双方意见。10月7日，林彪一行抵达重庆，协同周恩来正式与国民党开始皖南事变后两党间的正式谈判。13日，周恩来、林彪会见蒋介石，主要由林彪表示中共方面意见。林首先传达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的意见，指出“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林彪进而全面阐述了国共两党在理论、政纲、组成等方面的共同之点，关于理论，“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不主张将恩格斯、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教条，主观的搬来中国应用，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理论上并无二致”；“就两党之理论方法与所处同一之客观情势与所抱同一之总目的而言，并无纷歧之点”。关于政纲，“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

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求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近半年来，我党已将向来之理论与方策作一总检讨，结果不外上述三要旨，此项检讨不久在会议中即可宣布”。关于党的组成分子，凡属中共党员“只以目击当时帝国主义者所施于中国之侵略压迫，如划设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夺取我内河航行权等种种不当中国人为人，不当中国为国家之事实，大家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故相率入党”，“中国目前既在救国之阶段，则国共两党目前惟一共同之任务即在救国，此客观事实之需要与时代之使命既属相同，然则两党之间尚有何鸿沟之可言？”林彪批评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希望挑起内战，“果如所期，则抗战建国将前功尽弃”，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等，林彪的谈话重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未涉及具体问题，蒋频频点头，但未表示意见[45]。

10月16日，周、林会见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林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发饷、发弹、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46]。一涉及具体问题，国民党代表即开始推诿塞责。周恩来很快感觉到国共谈判具体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国民党方面虽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并不急于解决，也不先提要求，而是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他们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47]。据此，中共中央决定“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48]。

随即，国共两党均为双方关系的缓和做了一些努力。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宣布“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49]。29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出党内指示，认为该决议“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

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50]。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问题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并无二致”[51]。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毛泽东两次与他会面，并请携信转交蒋介石，称赞郑之来延安，“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表示“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52]，表示出相当的和解精神。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民党十中全会后，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坏转的一面已渐减弱的新情况，制定了“三争取，三勿忘”的应对方针，即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53]。

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林彪，以此为标志，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24日，周、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四项要求：

> 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
> 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待遇；
>
> 3．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
> 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54]

周、林声明：如此四项可以谈，林即留此继续谈，倘相距太远，就请蒋介石提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就中共方面而言，此为迫蒋对于各项问题表态。

12月31日，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就上述四项要求的研究意见呈报蒋介石，其结论是：该四项要求“系根据本党所示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皆欲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祸诚意”；“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作为商谈基础”；如须商谈则应以“中共不应有军队”、“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为商谈基础，“假定上述原则中共不肯接受，则不必强求商谈，尽可加紧防制，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以期动摇其内部，增加其苦闷，俾便将来之解决”；“如采取敷衍态度，似可告以此事牵涉太多，并令林彪先行回去”等[55]。这个文件表明国民党上层此时并无解决国共关系的准备和愿望，这给本轮谈判埋下了失败的根子。

1943年1月9日，周、林与张治中再次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四项办法与国民党方面要求“相距较远”，解决问题必须根据“皓电”提示精神，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四项办法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部队数目和移动时间，谈判无果而终。随后国共两党代表又进行数次谈判，除争执中共的四项办法外，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共军队问题，中共方面也提出了要求释放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毛泽民等140人问题等，但谈判毫无进展[56]。

2月12日，毛泽东电复林彪、周恩来，判断“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正在注视日、苏关系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尽管如此，为了推动谈判有所进展，仍指示“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可以提出李先念部与于学忠部对调作为委曲求全的表示，可以答应少编一二师等[57]。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致电各战区，就主动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作出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民党上层虽仍采取拖的办法，而下层与局部已出现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方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事件，主动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

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并命令“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不许自由行动”[58]。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无论国民党对我态度怎样不好，都不要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员团体或党派签订秘密协定，以免给国民党以借口。”[59] 即便如此，本轮国共谈判仍无进展。2月下旬和3月28日，周、林先后约见张治中、何应钦，双方交涉不仅依然没有结果，而且其重点已转移到讨论当时已经发生的国共军事摩擦问题。此后，双方间的谈判实际已经停止。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发动新的反共攻势，国共谈判再也无法继续。6月4日，张治中通知中共代表：前方摩擦正在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恩来表示：谈判暂搁是“意（料）中事”，林彪决定回延安，如要谈时可以再来，他本人也拟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面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7日，蒋介石会见周、林，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此为皖南事变一年半以来，蒋介石首次同意周恩来回延安。本轮国共谈判历时近一年终于无果而终，但双方都留有余地，继续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二　1944年的两党谈判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过高估计该事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冲击和影响，企图利用该事件摧毁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委会军统局长戴笠提出了对付中共的方案，具体拟出四个，其基本原则和目标是：“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60] 国民党顽固派迅速发出了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交出军队政权”、“取消边区”为主要内容的反共声浪，同时，国民党河防大军被调防至陕甘宁边区附近，与原有包围边区的部队会合，共计50万兵力，由胡宗南统一指挥，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反应，决定实行“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

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的方针，并具体化为五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61]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理的军事抗争和坚定的宣传攻势，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的反共攻势不久便偃旗息鼓了，两党又重新回到对话和谈判的立场上来。

1943年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虽然在会上仍有顽固派攻击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叫嚣“打下延安”、“消灭共产党”等，但两个会议都不得不承认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62]。中共方面也积极作出反应，中共中央任命董必武为谈判代表，并要求他向国民党方面传递信息：“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并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63] 10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64]

国民党方面也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0月20日，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周恩来被指定为委员，董必武为常务委员。11月12日，蒋介石找董必武谈话，表示“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请周恩来来重庆，“如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65]。次年1月，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会见毛泽东，奉命要求林伯渠、周恩来、朱德赴渝，毛泽东当即表示林、周或可先后赴渝，并嘱电告当局[66]。2月2日，国民党当局电复延安，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周、朱、林同去重庆。17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随后，国共两党都对本轮谈判方针作了研究和准备。3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演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五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等[(67)]。4月16日，国民党当局也制定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以“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基本方针，重弹在军令军政问题、十八集团军问题、政令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上的老调，该四项“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后，政府可准予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68)]。

5月2日，林伯渠到达西安。4日、6日、7日、8日，与赶往该地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四次谈判。9日，国民党方面将国共谈判初步意见整理出来，以书面形式送交林伯渠，请其签字后上报蒋介石。11日，林伯渠对该文件作修改后签字，并送还张治中，并请其也签字，但遭拒绝，称此为“林先生所提出或同意我们一部分意见，自只应由林先生签字”[(69)]。经过西安谈判，两党初步交换了意见，并各自向中央作了报告。

5月17日，林伯渠抵达重庆，19日会见蒋介石，22日，开始正式谈判。林伯渠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面交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共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罪状，要求中共方面考虑修改二十条的内容和词句，并拒收和转交蒋介石。林表示此件为中共中央对于西安商谈文件的答复，没有修改的余地，双方争辩很久，无法达成谅解。会后，林伯渠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31日，毛致电林指示说：为尊重国民党方面意见，将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加入此次文件，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

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70]。6月5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新提十二条（附口头要求八条）送交张治中、王世杰。这是一个全面表述中共主张的重要文件，内容如下：

一、关于全国政治者：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二、关于两党悬案者：

1．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编为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2．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设施；

3．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时期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4．请政府在物资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情况请予改变；

5．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6．请政府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7．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8．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9．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71]

该文件还指出："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决"，"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将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打下坚固之基础。"

然而，中共方面的让步并未能取得任何实效。当天，国民党方面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送交林伯渠，内容如下：

一、关于军事问题：

1．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2．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3．该集团军之员额照国军通行编制，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4．该集团军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5．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予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理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6．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7．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及其在各战区内之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部整训指挥。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1．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2．该行政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3．该行政区公署直属行政院；

4．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5．该行政区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得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6．该行政区之组织，应呈请中央核准；

7．该行政区预算，应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8．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概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由财政部妥商办法处理；

9．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三、关于党的问题：

1．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2．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72]

这是一个与中共要求针锋相对的文件，综合起来是要中共方面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十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73] 这样的条件是中共方面理所当然不能接受的。

国共两党的立场相距过远，国民党坚持解决办法须依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中共方面表示坚决不能接受政府提示案，指示林伯渠将该案退回国民党代表。双方函件来往，国共谈判毫无进展，陷入了僵局。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举行记者招待会，谎称：国共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了"，指责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共产党"所做的事和他们所说的话相反"，企图把谈判未取得进展的责任推给共产党。8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问，逐条批驳梁氏的言论，声明国共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74]。

9月，两党的争执又转移到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9月15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再次强调"中央政府所求的，只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指责中共方面"还没有接受中央提示案和实行遵守国家军令政令的表示"，声明"中央政府决不变更政治解决的方针"，"期待中共修正其所持的观点，早日解决此一问题"等[75]。同日，中共代表林伯渠亦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声明中共

方面“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更进而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76]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指出：“虽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十分宽容忍耐，委曲求全，但由于政府方面对错误政策之顽固不化，对谈判缺乏诚意，玩弄手段，以致谈判毫无结果，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即使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并宣布“现在谈判经过已在参政会报告，参政会并决议组织视察团来延，四个半月来之国共谈判由此告一段落”。中共方面表示“仍希望张、王两氏来延视察与谈判”，也欢迎“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来延参观，交换意见”[77]。

国共两党均未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此轮谈判却已结束。11月7日，林伯渠由重庆返回延安。国共两党的争执和谈判进入了以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

三　围绕着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谈判

“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1942年—1943年和1944年国共两党两轮谈判的失败以及同时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难以取得进展，使中共中央深感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是解决国共争执、实现全国团结抗日的关键所在。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最早提出与民主党派领袖商量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问题，并指出：“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78] 9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等，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

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79]，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既是抗战后期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共谈判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成为大后方人民争取抗日民主的斗争目标。

“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也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惨败而引起的大后方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有关。豫湘桂战役进入8月以后，国土丧失之广，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耻辱之重，极大地震动了国统区各阶层人士，也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英、美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80] 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解决时局危机的基本主张。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著名的讲演《如何解决》，指出：国民党当局“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钳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续增长，还会更加严重”。强调解决危机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并提出六项具体步骤，指出“只有这样的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81]。同日，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呼应中共的主张，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口号，并就此提出十项具体主张[82]。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办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以此作为解决时局危机的基本思路则是一致的。

“建立联合政府”还与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及其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对于国共关系的关注和干预，早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

时即已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力度不断有所增强。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攻势以及国共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引起美国对于中国局势的严重关注。9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谈话中对战时的国共冲突和战后的中国内战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应“竭尽全力调解重庆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又第一次向蒋介石建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国共两党就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83]。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局面，更使美国震惊不已，对于介入国共争执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强。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寻找解救正面战场危机的办法。他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一再表示对于国共关系问题的关切，并促使蒋同意派一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国国务院在解释此举的动因时称：“一、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有着普遍的不利影响；二、局势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三、它并且可能在将来导致引起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复杂化。”美国驻延观察组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协助美国政府探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84]。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已正式承认中共及其军队与政权事实上的存在。9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奉派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尽管赫尔利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和军队委员长”，但为了“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赫尔利也要求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在民主化问题上多作让步，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中共和各中间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当然其内涵与中共的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

10月3日和13日，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两次致函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明确表示：“现在惟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对于国民参政会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林表示欢迎，并仍请张、王到延安一行。自此，成立联

合政府问题成为下一轮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85]。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10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人招待外国记者称：组织联合政府一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8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新华社评论，严词驳斥了“不值讨论”说和“不拟讨论”说，强调“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86]。

10月17日、18日和23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进行了三轮会谈，中共方面向美国代表阐述了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赫尔利强调蒋介石为抗日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但现政府不民主，他已告诉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称赞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许诺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在军事机关中也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军事物资也不应偏于哪一党派等；赫尔利的计划是：先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伯渠、董必武谈，得出两党合作的初步结果，后由赫尔利同蒋介石商量，蒋同意后，他去延安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基础，最后由蒋介石和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87]。

然而，赫尔利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张日程表行事。10月21日，赫尔利代替高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急于在调处国共关系上建功的赫尔利，于11月7日由林伯渠陪同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亲到机场迎接。

11月8日上午、下午、9日下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四轮谈判。在第一轮谈判中，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中国的事情，此次来延安曾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在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并经国民党方面修改过的《为着协定的基础》五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共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

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88]。

在第二轮谈判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重申改组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1．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2．将原案中共领导的军队改为一切抗日军队都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3．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4．承认中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89]。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进行进一步的磋商。11月9日晚上，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经修改后的五点协定。在第四轮谈判中，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其全文如下：

>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
>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
>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行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90)]。

毛泽东表示："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10日下午2时，周恩来随同赫尔利返回重庆，以继续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

对此次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中共方面是满意的，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91)] 赫尔利由于对于中国政治的隔膜，他并不了解国共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争执的内涵，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签署的把军权交给国民政府的惟一文件，因为"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国民政府与中共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政府，并将防止崩溃"[(92)]。

赫尔利与中共方面达成的协定，遭到国民党方面强烈的反对。11月18日和19日，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长谈，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该方案，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并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虽然对国民党方面的顽固立场表示不满，但最终还是转而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张。其基本的原因是：赫尔利认为"他的使命是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93)]。

11月23日，赫尔利会见周恩来，转告国民党三条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军，其经费、饷项、军械及其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

法政党；二、中国共产党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94]。该反建议回避了最为关键的建立联合政府问题。

于是，围绕着“五条协定”和“三条反建议”，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赫尔利之间进行了反复的交涉和较量。蒋介石认为，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95]，提出三条反建议实际上是要“招安”中共军队。以后又提出一些新的方案，如主张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使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和美国军官一人主持中共军队的编制及军械补给，由美国将领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等，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诱使中共交出军队[96]。中共方面则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五条协定，认为蒋介石不签署“五条”反而对中共战略利益有利，“五条”所包含的内容作为整案，不拆开提出，蒋介石既然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中共也不入阁，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二年时间大发展，以“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97]。并于12月7日电召周恩来回到延安。赫尔利和魏德迈则以向中共军队提供美援和军火作为交易的筹码，诱使中共参加政府，中共不为所动；在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赫尔利又通过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长包瑞德威胁毛泽东、周恩来：如果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建议，会在美国造成不利的影响。毛泽东答复说：“蒋介石的三条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了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并表示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将要做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98]。中共一度甚至准备公布五点协议，这使赫尔利大为恐慌，赫尔利紧急致电周恩来，不同意公布五条协议，包瑞德也出面缓颊，希望中共不要让赫尔利太难堪，“若广播谈判条件，导致与美国决裂，将对中共不利”。毛泽东表示中共方面“毫无与美方决裂之

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但重申“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99]。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电毛、周，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11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表示婉拒，并重提在重庆举行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同意，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100]。20日，赫尔利在与国民党方面经过十天商讨后，致电毛泽东，称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已有所更改，建议中共方面派代表赴重庆作一短期访问，俾与政府商谈问题。24日，周恩来再次奉派赴重庆谈判。中共方面的谈判基调是：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101]。

然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方针却是换汤不换药，除坚持原三条反建议外，又增加了四条：一、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二、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三、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四、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对此，周恩来表示拒绝，并坚持先解决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问题。

2月2日，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国民政府同意召开有国民党代表与其他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职责是：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方法；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等，这表明国民党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中共方面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要点是：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双方的分歧仍然集中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

政和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但中共方面没有拒绝王世杰方案，只说可回延安商讨[102]。

2月3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并指示周恩来“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态度趋向强硬[103]。13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也明确表示：建国大纲所定之还政于民的程序不能变更，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未来之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将政权移交于中共所要求召集之党派会议；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与蒋介石本人，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104]。周恩来逐条进行批驳，国共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2月14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举行记者招待会，单方面公布国民党在谈判中所做的让步和妥协，批评中共拒绝接受政府提议，等于公开宣布两党谈判的破裂。15日，周恩来在离渝前发表声明，指出王氏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说明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反对建立民主的联合国民政府，导致谈判无果而终。次日，周恩来飞返延安，本轮国共谈判宣告结束。

由于在史迪威事件后，美国政府已基本上确定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五个月，虽然主观上企图调处国共关系，按照美国的设想改革中国的政治机制，结果却是不仅没有缓和中国的分裂与内战危险，反而增加了蒋介石坚持独裁专政、分裂内战的意念和政策趋向。

第三节　中国各党派的战后政治设计

一　国民党“六大”与其设计的战后政治构架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战争已在德国本土进行，3月美英联军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苏联军队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纳粹德国的败亡已成定局。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硫磺岛、冲绳岛，并加强了对日本东京及其他战略要地的地毯式轰炸，摧毁了日本的主要军事工业基地。在中国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开始了局部反攻，日本法西斯同样面临绝境。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开始各自为战后中国政治设计蓝图，并为此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全党思想，策划战后国家发展大计，最重要的是抵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

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时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政治压力，首先，中共所领导和倡导的以建立联合政府为旗帜、由各民主党派和国统区人民参加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已汇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迫使他们必须作出必要的应对。

其次，美国政府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军事溃败的不满与日俱增，各种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情报和报告不断送往华盛顿，而美国最高当局和驻中国机构催促国民政府实行改革的劝告和敦促，也源源不断地提出，甚至以停止美援为要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做出一些“革新”的举措，来换取美援与美国的支持。

第三，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党政革新运动”，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政治上贪污腐败日益暴露、经济上通货膨胀情况急剧恶化，国际舆论批评指责有增无减，党内人心涣散，国民党内一批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起而寻求振兴自救之道，他们痛愤国民党之腐败无能和元老派的昏庸误国，具有“亡党亡国，大乱将到”的危机忧患意识。他们逐渐组成松散的跨派系的联合，以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为其政治论辩的场

所，要求实行革新党政人事，改变国民党的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但也向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发起了挑战[105]。

最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已临近胜利，作为一个执政党在面临党内外各种挑战的情况下，必须确定自身的大政方针，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谋求战后国家的复兴”。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曾通过决议：“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事实上可能时，尽速召开，至迟应于战争结束后半年内召开之。”[106]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见，表示俟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不待抗战结束，政府决定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107]。显然，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号召的一种对应。1月6日，蒋介石召集五院院长商讨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大会问题，决定于5月5日举行国民党“六大”，国民大会召集日期可在党代表大会中决定。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核定上述决定，并推叶楚伧、陈布雷、吴铁城等七人筹备有关事项[108]。22日，又由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加派张继、张治中、潘公展、朱家骅、王世杰十四人参加，组成二十一人的“审议委员会”，以叶楚伧、吴铁城为召集人，共策筹备事宜[109]。

2月起，在各地区和各党部选举国民党“六大”代表。有45个单位的代表因情形特殊无法如期完成选举，而采用由该单位提出加倍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代表人选[110]。外蒙、西藏、台湾等边疆党部的代表，由代表候选人委员会提出代表人选，由中央常委会决定。4月间，各地代表抵达重庆。

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复兴关中央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出席代表六百余人。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通过居正、于右任、戴

传贤等36人为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会议共举行二十次大会，蒋介石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吴铁城、吴鼎昌、程潜、翁文灏、潘公展、孙科、何应钦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经济、中共问题、宪草问题、部队整编及湘西战役等报告，会上提出各种议案400余件，讨论通过了有关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各项决议案250余件。就议案内容观察，大会关注的重点政治事项居首，经济事项次之，余依次为党务、外交、军事、教育。

这次大会以实施宪政为中心议题，拒绝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在会议开幕词中，针对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打出了“还政于民”的旗帜，提议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指出：“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必须及早确定，且必须使之如期集会，不可展缓，即使遇到任何困难或阻力，本党亦应毅然决然执行我们革命建国的使命，力排万难，促其实现。”并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野心家假借民主名义，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111)。

为了显示“行宪”的决心，会议通过了《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决定在闭会后若干措施以为实施“宪政”之准备，如：“一、三个月内取消军队中原设的党部；二、各级学校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工作；三、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依法选举，而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皆能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四、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五、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112) 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实质，在实践中也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大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则明显地表现出国民党不肯放弃其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垄断，坚持“一党独裁”的原则。他们所准备举行的“国民大会”，仍然是一个反民主的、一党包办的大会。如会议通过

的决议规定，抗战以前产生的“国大”代表“除因背叛国家及死亡或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113]。这些代表是在战前人民毫无权利的极不自由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当然不能为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所接受。同时，还规定“国民大会开会时，仍应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仍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114]。这表明国民党所勾画的战后政治蓝图，仍将坚持独裁的方针，体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其抵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要求的意图，昭然若揭。

中共问题也是本次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潘公展在第八次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强调“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条件与环境。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当前对中共之论争，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115]。这段讲话及其列出的四个重点，鲜明地反映了两党斗争的焦点所在。

大会组成特种委员会对此议案进行审查，并于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两个决议：其一是公开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一方面仍然指责中国共产党频年以来“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另一方面又表示将“宽大容忍，委曲求全”，“在不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116]。继续摆出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姿态。其二是党内文件《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指责中共“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复政府，危害国家”；要求本党党员“提高警觉，发扬革命精神，努力奋斗，使本党政治解决之方针得以贯彻”。并制订了六项具体措施：一、“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发展本党在农工社会中的组织”；二、“吸收富于革命性的

知识分子，并正确地领导青年”；三、“对外应配合政治环境，加强国际宣传，对内应加强党员政治训练，纠正中共之虚伪宣传”；四、“一切社团中之本党同志，应加强党团组织，争取第三者对本党之同情”；五、“在沦陷区应确立并加强党的领导”，“由中央选派坚强干部深入敌后工作”；六、“加强中央及各地对于本问题之统一指导机构”等[(117)]。由此可见，国民党“六大”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较量的方针，准备随时以所谓的“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进而用武力解决所谓的“中共问题”。

强化国民党的集权体制，是国民党“六大”的又一重要内容。5月17日，大会主席团提请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吴敬恒在关于选举总裁案的说明中，颂扬蒋介石“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擘划军政设施，辛劳备至，总理在其遗墨中论及总裁才能时，亦隐有以蒋总裁为其继任人之意”，吹捧“抗战前后，对我国最注意之人士即为总裁”，并提议总裁一职，职位重要，故用“推选“方式产生[(118)]。大会全体一致通过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党章中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修改为“行使”总理职权，从法理上强化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5月28日，国民党举行六届一中全会，全体新当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举行效忠蒋介石的宣誓，其誓词为：“余誓以至诚遵奉总理遗嘱，服从总裁命令，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绝对不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绝对不自私自利，绝对不以个人感情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处分。”[(119)]对于一般党员，国民党新党章也规定，凡国民党党员“不得于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否则以违纪论处。这些规定表明国民党在组织上已进一步集权化，这与其政治路线是相适应的。

国民党“六大”对于经济问题也有所讨论，代表的提案中经济类多达70余案，会议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土地政策》、《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虽也涉及“耕者有其田”和“扶助民营企业”的内容，却并不准备认真实行，其

基本精神则是为扩大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如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资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和土地涨价归公”，这些均有利于国民党国家资本集团扩展势力。同时，又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更是为国民党国家资本集团限制、吞并民族资本大开绿灯[(120)]。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将继续在中国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国民党“六大”还对兴办党营生产事业，巩固党的经济基础问题有所讨论和决定。为了适应国民党“还政于民”后的经费问题，与会代表提出数件关于筹措党务经费的提案，交党务组负责审查。第十六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党务组的审查意见，决定交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采行。根据决议案，党费筹措除紧缩机构以节开支，增收党员捐款以供县以下党部经费，宽筹100亿基金取其子息以供中央及省市党部经费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将党费基金全部投资于各种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并规定党营生产事业，以实践三民主义经济政策为原则，以有关国计民生文化教育事业为宜，应完全依照合法手续成立合作社或公司组织经营等，具体确定文化、电影、合作运输、金融保险储蓄、农林畜牧等为经营范围。此为国民党利用基金营利，厚植党费的起点，对日后国民党解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121)]。

会议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5月28日至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推选戴季陶、于右任、邹鲁、李文范、陈布雷、程潜、张治中、吴铁城、宋子文、何应钦、潘公展、朱家骅、张厉生、陈果夫、丁惟汾、段锡朋、张道藩、冯玉祥、叶楚伧、陈济棠、孙科、陈立夫、陈诚、白崇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选吴稚晖、张继、王宠惠、邵力子、程天放、林云陔、王秉钧

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次选举有两大特色，一是将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全部吸收为中央执行委员，加强国民党对于军队的集中控制。其二是选举中派系斗争激烈，复兴社、黄埔系、朱家骅派、政学系、新桂系联手对付以陈立夫为核心的CC派，使派系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念此次大会竞选中委情形之恶劣，甚为本党耻之，亦为本党前途忧之"；"此次选举中，各部分猜疑过甚，互信消失，纠纷怨望，无所不有，真堪浩叹！"[(122)] 有论者认为，国民党"六大"在决定今后时局的关键时刻，由于派系斗争激烈，使国民党陷入分裂而不团结，种下了日后在大陆失败的前因[(123)]。

国民党"六大"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继续一党专政的方针。

二　中共"七大"与"联合政府"的新内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正副秘书长，彭真等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设计战后中国政治的蓝图，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做准备。这次会议本早应举行，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以及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关系，推迟了若干年。与中共历史上历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会议是在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国内党内形势和条件下举行的。

首先，国际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世界将走向进步，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胜利的历史总趋势已经确定，"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

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其次，国内形势也有利于人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中国国内虽依然存在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阶层的国民党政府，时刻有将中国拖入内战的危险，但“中国人民不但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124]。“七大”召开时，中共已领导着19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等军队91万人，民兵220万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抗击着中国战场56%的日军和95%的伪军，“成为民主中国的楷模，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125]。

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获得了大发展，实现了大团结。中共党员已从1937年的五六万发展至120万，“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126]。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该报告赋予了“联合政府”新的内涵，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构筑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

“联合政府”的口号是1944年9月提出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长期以来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127] 这个口号是

针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提出的，其实质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128]。国共间环绕着联合政府进行了多轮的较量，双方毫无通融妥协之余地。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案时指出：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其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其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毛泽东特别指出：“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129]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对于“联合政府”的政治内涵赋予了三个层次的意义，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随着时局的变化与国共力量的升降而发生转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着重论述了联合政府问题。其基本的主张是：“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130]显然，毛泽东给“联合政府”赋予了第三个层次的新内涵。

毛泽东首先将两个中国之命运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全党面前，指

出："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131)接着指出："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了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针对有些人怀疑中共在得势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32)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态就是中共所极力倡导的"联合政府"，显然其内涵与中共最初提出"联合政府"时已有很大的变化。其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个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个民主阶级的联盟，要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在政治上，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实行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联合政府"成为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最为合理和合适的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批评了国民党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指出：“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做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指出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和正式的联合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并指出：“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133)

为了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史及其主要经验，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34) 报告详尽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的不同任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中共“七大”还决定以大会的名义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

的成立。”[135]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向着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的联合政府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根据会议制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会议还规定了若干具体路线和政策。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是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新式武器去武装一切能对敌作战的部队，以加紧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完成民族的解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共同奋斗；在沦陷区，是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的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脚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在解放区，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指挥机关，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人民军队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136]。

周恩来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彭德怀所作的《关于华北八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成绩和经验》的发言、陈毅所作的《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经验》的发言、陈云所作的《要真理不要面子》的发言、彭真所作的《在敌占区城市工作问题》的发言、张闻天所作的《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点的认识》的发言、李富春所作的《如何争取胜利》的发言、林彪所作的《关于群众观点和发动群众问题》的发言、刘澜涛所作的《关于党在东北工作问题》的发言、马凤舞所作的《关于组织和领导回民斗争问题》的发言、张鼎丞所作的《关于整风问题》的发言、傅钟所作的《关于团结问题》的发言、叶剑英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等，从各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于中

共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作了具体阐述。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程是通过刘少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37] 新党章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将"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七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祖涵、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形成了一个具有很高政治威信的、能够领导中共去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及其赋予的新涵义，是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二十四年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纲领，勾画了未来共和国的清晰蓝图。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中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138]

三　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分别举行“七大”和“六大”，确定争取抗战胜利和战后建国政治路线，勾画各自的政治蓝图前后，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积极参政议政，扩大政治影响，试图形成中国的第三大党，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辟第三条道路。

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间党派的某些领导人发出了“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的呼声。罗隆基撰文指出：“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正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党”，这个大党有两个很大的作用：“第一，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第二，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并论证说“假使反对内战的人民真有了组织，真有了政团为之领导，他们拒绝供给从事内战的财力与人力，内战自然打不起来”，“两大政党间有了倚重的平衡力量，于是谁是内战的发难者，谁就成了民意的公敌，自然内战不至轻易发生”，这是第三大党的缓冲作用；“有了一个纯粹以民主主义为信仰，以实现中国的民主为目标的政团，他们团结一切小党派及无党派的进步人士，这必能使中国的民主提早实现”，这是第三大党的民主效用。他的结论是：“当前是中国复兴的最大机会，亦是中国复兴的惟一机会，同时亦是中国最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才有解决的途径。”(139)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顺应时局的需要，在重庆举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使其更具政党的色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其背景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日本法西斯加紧侵华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打击和企图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在野党派人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面试图调解国共矛盾和冲突，同时也企图谋取自身的发展空间。该同盟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

会派、职业教育派、乡村建设派三党三派的主要人物参加，实际上只是几个中间党派领导人的较为松散的联盟。该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不再是过去党派的联合，而成为争取民主的各界各阶层的大联合”。尽管该同盟领导人自称他们不是一个政党，但实际上他们同其他政党一样，选举产生了由99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由张澜任主席，下设组织、宣传、文化、财务、国内关系、国际关系六个委员会和秘书处，由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澜（兼）、梁漱溟、张君劢和左舜生分任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并在各地设立支部，如东南总支部、华北总支部、四川省支部、昆明支部、上海支部、重庆支部等。参加对象也由原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扩大为广大的作家、编辑、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和工商界的从业员，而且相当多的无党派关系的盟员也加入进来，使同盟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140)]。

尽管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和基本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并不相同，但他们在中国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却与中共的政治主张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民主的问题上，他们一般能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并肩，团结合作。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共五条三十五款。其主要内容是：1．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2．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3．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对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5．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等[(141)]。从中可见，中国民主同盟的基本立场是赞同和呼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的，尽管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要求，与中共提出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上观察，该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与国民党的专制政治进行斗

争。

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针对蒋介石在其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及时召开国民大会，不必再待战争结束以后”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假定能召开一个举国一致而又确能解决当前一切实际问题的国民大会，吾人在原则上自亦赞成之，但目前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1400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以为必将适得其反。”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其理由与中国共产党方面所表述的内容并无二致。中国民主同盟在该宣言中重申了该同盟的十点主张：

1．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

2．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宪法之制定；

3．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条例；

4．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5．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之组织；

6．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

7．财政绝对公开，凡预算决算及增加人民负担之措施，必须交现有民意机关审查通过；

8．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务人员之待遇，对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尤应统筹救济；

9．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之自由；

10．促进中苏邦交，加强对英美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

宣言强调："吾人以为在战争未结束以前，必须将此项过渡办法切实做到，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之可能，否则借延宕以资敷衍，弄名词以布观听，则不惟当前一切困难无从解决，整个国家民族且有陷于分裂破碎之虞。为国民党计，与其空谈'为政于民'，何如实行与民合作以免自误误国之为愈也。"[(142)] 该宣言的态度较之1944年10月发表的政治主张更为明确，也更有抗击国民党当局的力度。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通过发行报章刊物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如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半月刊），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宪政》，罗隆基主编的《民主周刊》，潘光旦主编的《自由论坛》等，都盛行一时，颇具影响力。在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和组织下，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参与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重点在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片面的"还政于民"。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再次发表谈话，重弹"11月12日举行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的老调。昆明文化界342人联名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蒋氏此举"只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责问国民党当局"宪法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草案，国民代表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选举，试问以这样的代表，通过这样的宪法，再来选举大总统，产生新政府，这样的民主有真实的意义吗？试问这样迂回迁延的方式，能够挽救当前千钧一发的危局吗？"再次提出了以召开党派联席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的四项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政府立即邀约全国在野各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自推选的

代表，而后会同各政党代表共同推定社会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并重行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筹备召集真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实行宪政；二、国是会议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由该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执行战时纲领，并共同负担抗战及参预一切国际会议，奠定世界和平的责任；三、现政府应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取消言论出版登记制度，释放全国政治犯，切实保障人民身体、思想、言论、演剧、集会、结社、居住、旅行、通信等自由；四、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143)]。显然，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相似。

中国共产党“七大”和中国国民党“六大”结束后，环绕着“联合政府”问题展开的两个中国命运之争，更加激烈。国民党一意孤行，5月间，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审议召集国民大会办法等，并仍决定于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6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代表会议筹备事项的决议》，决议国民党如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中共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日期也定在11月[(144)]。毛泽东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145)] 在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中间党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傅斯年六参政员经蒋介石同意访问延安，调解国共分歧。4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六参政员达成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工作，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并建议：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

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各自推出三分之一的代表，并经其他方面同意的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政治会议性质应是公开的、平等的、自由的、有决定权的；政治会议应议的事项为：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政治会议召开以前，应释放政治犯，并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等[(146)]。10日，蒋介石接见六参政员，表示对他们带回来的中共意见将加以研究考虑，实际上却将其束之高阁。然而，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本身表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第三种力量已被国共双方所承认，并各自都想加以利用。

对于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中国民主同盟内部意见不一，以云南省支部为代表，主张抵制该会议。他们认为："国民参政会七年的历史，只证明'参政'徒有其名，而'国民参政'更无其实。国民参政会是政府圈定指派的机关，一党包办，绝对不能代表民意。国民参政会今天惟一的作用，是为政府伪装国内民主，蒙蔽国际观听的工具，是中国实现真正民主的障碍。"为此，他们不仅反对将于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也反对在7月7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他们提出了"圆桌会议"的政治口号，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其具体主张是：

1．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三大政团的圆桌会议；

2．在这圆桌会议上，由三大政团共同推定国内无党派的代表人士，请其前来共同参加会议；

3．由这种圆桌会议产生举国一致（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代表人士）的联合政府；

4．联合政府再拟定人民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宪法；

5．联合政府重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依据这种

新的法律，重新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

6．由联合政府召集新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实行真正的还政于民。

他们认为，国共谈判不能成功的基本原因有两条：其一是国共两党的谈判“没有一个缓和调剂的力量，两党外的政团及人民代表对谈判缺乏一个公正的评判者”；其二是“政府几年来始终不肯认识、承认正在发展、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新生力量的中国民主同盟，其结果不能得到中国第三大政党的合作与协助，全国人民所热望推行的团结统一方案，也就始终得不到效果”[147]。显然，他们已自称为中国第三大政党，并表达了中国政治非第三大党加入不得成功的强烈意识。

然而，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领导人却依然参加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拒绝到会，与会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就成为与国民党代表就国是发生争执的主角。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大会之日期，因意见未尽一致，“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参政员提案衡酌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等[148]。对此，新华社发表记者时论，进行严厉批判，并告示国人“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149]。7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国民党当局：“顺适世界民主潮流，容受人民的要求，以壮士断腕之决心，作悬崖勒马之毅行，实施民主改革，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假如错认时机，固执成议，则此后纠纷益增，演成分裂，将难以邀国人之谅解。”[150]主张停开国大，立即召开政治会议，共商国是。

7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表对时局宣言，再次呼吁召开各党各派政治会议，挽救危局。宣言指出：“谋取团结实现之关键，只视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性的会议能否重开。本同盟以为在此

紧迫时期，此项会议实以万难再缓。应请政府体察时势，顾念民情，即早召集。”要求国民党当局“为表放弃专政，实现民主之诚心”，立予实行四事：确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居住之充分自由，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彻底取消一切特务及类似特务之法令及机构，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之权利等，强调该四事“实为任何民主国家内人民最起码之权利，政府果欲实行民主，即宜立刻照办，同时进行政治协商，召开上述会议，务使最短期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利国家”[151]。

综观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其基本宗旨是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第三大党，在激烈的国共冲突中寻求新的出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国共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赞成举行各党派的政治会议共商国是，赞成由联合政府主持重新选举代表，举行新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斗争纲领比较接近，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和同盟军。但由于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纲领并不相同，互相间的分歧在所难免，战后国共两党斗争更为激烈，中国民主同盟内部就出现了分化，分别倒向国共两党，他们组建第三大党的理想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破灭。

---

(1)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3) 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00—1304页。

(4) 《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

(5) 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1页。

(6) 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06页。

(7)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某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的片断资料》，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13页。

(8)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某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的片断资料》，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13页。

(9) 《谢伟思致国务院报告》（1944年6月2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33—335页。

(1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

(1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34—844页。

(12) 《宪政实施协进会组织规则》、《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名单》、《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分组名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782—1784页。以下简称《战时建设》。

(13) 《宪政实施协进会工作报告》（1944年5月），《战时建设》（二），第1791—1793页。

(14) 《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78—179页。

(15) 《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

(16)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8页。

(17) 以上国社党、青年党、中华职教社的反应，参见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69—470页。

(18)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0日。

(19) 《宪政月刊》第10号，1944年10月1日。

(20) 《宪政月刊》第9号，1944年9月1日。

(21) 《新华日报》，1944年7月3日。

(22) 《华西日报》，1944年5月11日、18日、20日，7月12日。

(23) 参考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65—466页。

(24)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8日。

(25) 《云南日报》，1944年5月26日。

(26) 《云南日报》，1944年8月12日。

(27) 刘文辉：《在省参会的开幕词》，《西康日报》，1944年8月8日。

(28) 参见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29) 参见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2页。

(30) 《关于胡世合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237页。

(31) 参见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0页。

(32) 《解放日报》，1943年8月30日。

(33) 参见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402页。

(34) 参见王军：《基诺族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5) 参见程奎朗：《黔东事变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50页。

(36)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1941年12月28日），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48页。

(3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0页。

(38) 《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39)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

(40)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41—542页。

(4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2页。

(42)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4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2页。

(44)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45页。

(45) 《蒋委员长召见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记录》（1942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四），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236—242页。以下简称《中共活动真相》。

(46) 《周恩来年谱》，第540页。

(47)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1942年10月27日），转引自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第449—450页。

(48) 《周恩来年谱》，第542页。

(4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

(50)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5—416页。

(51)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中国国民党十中全会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42年12月9日。

(52) 转引自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第452页。

(53) 《中共南方局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提纲》（1942年12月12日），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074页。

(54)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48页。

(55) 《参谋总长何应钦呈蒋委员长就林彪周恩来所提要求四项排列并附

具研究意见列表签呈鉴核》（1942年12月31日），《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45—246页。

(56)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54—557页。

(57) 《毛泽东年谱》，第427页；《周恩来年谱》，第549页。

(58)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57页。

(59)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61页。

(60) 四个具体方案分别是：1．军事上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一律听中央编遣，政治上取消边区政府，听候中央处置，党务上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2．军事上十八集团军调驻黄河以北指定地区，取消政委制度，解散军内共党组织，听候中央处置，党务上修改党章党纲，改组为纯政党性之团体；3．军事上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解散军内之共党组织，政治上改组边区政府，恢复原有行政区，党务上保存中共现有组织的存在，但在国民党任何机关中不进行秘密活动与党团组织；4．军事上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政治上改组陕甘宁边区为陕西省两个行政区，并放弃其在甘宁两省之侵占地区，党务上保存中共组织之存在，但在国民党内之任何机关中不得进行秘密组织与党团活动等。

(6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1、456页。

(62)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1页。

(63) 《毛泽东年谱》，第475页。

(64)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

(65)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82页。

(6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3页。

(6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1页。

(68)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55—256页。

(6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7页。

(70) 《毛泽东年谱》，第516页。

(71) 《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1944年6月5日），解放

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41—442页。

(72)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67—271页。

(73)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7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06—312页。

(75) 《中央日报》，1944年9月17日。

(76)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77)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39—440页。

(7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6页。

(79) 转引自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17页。

(80)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062页。

(81)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步骤是：1．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2．国是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3．在国是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4．在众所公认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5．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6．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

(82)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6页。中国民主同盟的十项具体主张是：1．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举国一致之政府；2．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例；3．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

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4．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政会议，制颁宪法；5．在宪法颁布前，赋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6．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7．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8．简化政府机构，分明权责；9．本公平原则，按照生活指数，改善公务员待遇，并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污；10．对于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统筹切实救济等。

(83) 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78页。

(84) 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35页。

(85) 转引自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24—625页。

(86)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9日。

(87)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25、626、628页。

(88) 五款的具体内容是：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2．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3．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4．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8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6—557页。

(90)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32页。

(9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8页。

(92) *FRUS*，1944，China，pp．669-701．

(93)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90页。

(94)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资料》，《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95) 参见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50页。

(96)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37页。

(97)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6—358页。

(9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3—564页。

(9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4—565页。

(10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2页。

(10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4页。

(102)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50页。

(10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104)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105) 参见王奇生：《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以1944年至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1999年12月，2000年1月“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106)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07)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第101、107页。

(108)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4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09)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第1303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0)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第1352—1353页。

(111)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辞》（1945年5月5日），《战时建设》（二），第1799—1800页。

(112)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记录》，第200—201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3) 《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第九次会议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讨论速记录》（1945年5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60页。

(115) 王千秋：《重庆的喜剧——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情》，1946年油印本，第27页。

(116) 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84页。

(117) 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84—1385页。

(11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02页。

(11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25页。

(12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5、936页。

(121) 参见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北京“1994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9年12月。

(122)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三十二年1月1日至三十四年12月31日），第774—775页，转引自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

(123) 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

(12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32—933页。

(12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46页。

(126) 《任弼时报告七大筹备经过》，《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12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86页。

(12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12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86—587页。

(13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

930—931页。

(131) 毛泽东：《七大开幕词》，《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92页。

(13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56—957、963页。

(13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69—970页。

(13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99页。

(13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93页。中共“七大”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该会议没有举行。

(136)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523—526页。

(13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页。

(138)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003页。

(139) 昆明《民主周刊》第1卷第16期，1945年4月9日。

(140) 参见曾守约：《介绍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中华论坛》第4期，1945年4月1日。

(141)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6—477页。

(142) 《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1945年1月15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8—479页。

(143) 《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1945年3月12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11日。

(144)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64—665页。

(145)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7页。

(146) 参见毛磊、范小方等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

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147)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抗战八周年敬告国人书》（1945年7月7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44—46页。

(148) 《参政员提案案由及国民参政会之决议文》，《战时建设》（二），第1454—1455页。

(149) 《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解放日报》，1945年7月23日。

(150)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19日。

(15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9—50页。

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国民政府结束战争的准备

一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简称“陆总”）的建立动因始于豫湘桂战役后中美关于中国战场军事指挥权之争。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使“日本人实际上是没有阻拦地沿汉口到郑州的铁路进军，他们将得以在夏季结束前打通从朝鲜到华南的内陆交通线，这将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完全隔绝”[(1)]。美国军方担忧日军将长驱直入，占领昆明，切断驼峰空运，使盟军驻在成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丢失，甚至导致整个中国战场的崩溃。而当时欧洲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已转入反攻，开始收复西欧大陆。欧洲战场的成功战例和中国战场的险恶军事形势，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产生了在中国战场也采用相同的办法，任命一名美国军官来担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的动议。

同时，美国装备中国军队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美国已装备了十二个美械军及四个半美械军，共约三十几个步兵师。这些美械部队的配备如下：每师辖步兵三团，炮兵一营，工兵一营，通讯兵一营，辎重兵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每团辖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炮一连，通讯连、卫生队、特务排各一个，每团3000人；每营辖三步兵连，机枪连、八一迫击炮排、火箭炮排各一个；每连辖三排，每排辖步兵三班，六〇迫击炮一班，全连配备轻机枪九挺、汤姆森手提枪十八支、六〇小炮六门及火焰喷射器一具等。在所有美械装

备军队中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五部火力最强，称为五大主力，每军除辖三个步兵师外，另配置直辖炮兵、骑兵、工兵、装甲、辎重团各一个，以及通讯、高射机枪、战防炮、平射炮、特务营、新兵训练处等。这些美械军队的编练，使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虽然损失了四五十万人，但总的战斗力却有所增强[(2)]。美国大量装备中国军队，使得美国在中国军队中影响扩大，实际上接受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很多都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之下，如中国驻印军归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团归摩斯上校指挥等等。在美国军方看来，由美国将军指挥中国军队，是摆脱中国战场困境的最佳方案。

史迪威成为美国军方理所当然的人选。在他们看来，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既熟悉中国战况，又在领导中美联军进行缅甸战役中战绩卓著，于是他们计划将史迪威将军由中将晋升为上将，由他来统率中国军队，如同艾森豪威尔指挥欧洲战场一样。史迪威本人也积极赞同这个方案，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局势“实恶劣之至，管理不善与忽视，现在已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无急剧和很快应用的补救办法，吾人将蒙受极大的挫折。”如果罗斯福给蒋一份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指出中国局势的严重性，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坚持非常的形势必须采取非常的补救措施，可迫使蒋同意这种安排。他设想运用正在陕西围困中共军队的胡宗南部，并在中共军队的帮助下，向洛阳、郑州、武汉发起反攻，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形势的惟一办法[(3)]。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同意授以史迪威“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表示将晋升史迪威为上将，“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4)]。史迪威为了迫使蒋介石交出军权，利用美援卡住蒋的脖子，宣布凡不属于他指挥的军队均不能得到美援物资。

蒋介石没有断然拒绝美方的要求，一方面表示原则同意委任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另一方面致电罗斯福，解释中国之部队与内政情况不似他国之单纯，为使史迪威将军有统帅中国部队绝对之权

力而无窒碍，必须有一准备时期，要求罗斯福委派一人来华调整史、蒋之间的关系[5]。在军队编制方面，他们设计了一个应付美方进逼的对策：计划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攻击兵团（第一线兵团）与守备兵团（第二线兵团），列入史迪威指挥的只是列入作战序列的第一线兵团的部队，第二线兵团的部队仍由原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至于被重兵围困的中共军队，除非他们“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否则不能归史迪威指挥[6]。这第一线兵团的设想，就是后来“陆总”的由来。8月，蒋介石又拟以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之名称，规定其职责是：承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负指挥本战区前线各军作战之全责。赫尔利使华后，中美双方在会议中又将该名称改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7]。

后来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冒中断全部美援之险而坚持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向罗斯福强硬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但不能接受史迪威，要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8]。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而支持蒋介石，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其战后的长远政治目标已比战时短期的军事目标更为重要，美国不愿交恶蒋介石，史迪威被调离中国。1944年10月25日，由魏德迈将军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

“陆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44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编组国民党军队，除原由军事委员会直辖的十个战区和五个行营外，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驻昆明，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总司令，龙云、卫立煌任副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保卫云贵川抗战大后方，准备反攻作战。下辖四个方面军、昆明防守司令部和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第一方面军，由卢汉任总司令，驻云南蒙自；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司令，驻广西百色；第三方面军，由汤恩伯任总司令，驻贵州贵阳；第四方面军，由王耀武任总司令，驻湖南洪江；昆明防守司令部，驻云南保山；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由黄琪翔任司令[9]。

1945年2月2日蒋介石颁发告“陆总”所辖各将领书，指出：“此次盟邦以极大的热情友谊，不惜以物资、精神同时对我援助”，“不独协助我指挥作战训练及装备武器，划一编制，即交通、通信、卫生、补给、后勤诸项，亦均负责帮助办理，此正我建军整军之绝好机会”；强调盟邦美国与中国“在政略上毫无利害之冲突，在战略上实有互助之必要，而在两国传统友谊上，美国更时时表现其援助我国独立自由之热忱，故其在物质上、技术上均畀我以积极之援助”，“今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级指挥机构中，均已派定美籍联络官”；要求“陆总”诸将领“对于军队之整理、训练、情报、作战、后勤等诸业务，应尽量接受其建议，学习其优长，并虚怀雅量接受其批评与纠正，一扫国军以往虚浮骄之颓风”，“切盼此次西南整军之成功，完成反攻之胜利，以开拓我全国整军之成功，奠定最后胜利之基础”[(10)]。

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后，美国方面没有进一步要求蒋介石实现让美军将领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而且调整了与蒋介石的关系。依据美国扶蒋反共的新政策，采取了很多旨在扩大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措施，如建立每周一次的中美联席军事会议制度；任命麦克鲁任“陆总”作战司令，齐夫斯任后勤司令，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陆总”各职能部门；派遣美军顾问组到中国师一级战斗部队；在广西、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成立训练与装备中心，继续帮助国民党军队装备美式机械化部队；等等[(11)]。

“陆总”成立后，立即配合美英军队完成打通中印交通线的战略任务，参加保卫云贵川大后方的战斗，并在湘西开始了反攻作战，日本投降后，“陆总”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统帅部在南京主持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陆总”下属部队成为在越南、广东、湖南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重要部队，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　接纳汪政府要员的“输诚”

联络、利用汪精卫集团，进行反共布置，使之成为接受日军投降时的先遣队，是国民党当局为结束战争所做的重要准备工作。长期以来，国民党主力部队绝大部分都布置在大西南、大西北，华北敌后及长江中下游沦陷区都落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战略包围之下。国民党为了与中共争夺战后华北，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原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地区的控制权，并准备配合美国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作战，决定由“军统局”牵头，各机关和各战区一齐出动，加紧对汪政府要员的策反，以实现利用汪集团进行反共布置，战后抢占华北以及上海、南京等战略要地的目标。1944年12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拟定了《协助同盟军登陆前后防制奸伪办法》，策动汪伪和平军为其所用，是其“防制奸伪”的主要内容之一，内规定“利用”和“确实掌握”已策动成熟之伪军，在沦陷区建立秘密据点，“慎选策动优良之伪军，并注意伪保安团队以及地方武力”，将“此项部队潜伏沦陷区重要城市，非必要时不见诸行动”等。蒋介石对此件批示，批评其“尚欠积极，应再研拟积极清除之办法报核为要”[(12)]。

重庆当局的这一战略意图，得到了汪精卫集团的响应。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迹象日益明显，汪政府要员们瞻望前途，忧心如捣。他们担心：如果日本军队战败，他们必定不会“反省自责”，“而心归怨于我政府之不协力或无力，将一切怨毒丛集于我政府少数要员身上，尤以其少壮军人为然”；第二，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遍布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如果日本投降撤兵，重庆军队不能马上赶到，新四军必乘隙而入，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也必定是汪政府要员；第三，即使重庆军队接收南京、上海，其“民族英雄之气焰亦必使人难受”[(13)]。他们既害怕日本败军的骚扰，又害怕重庆政府接收大员的报复，更担忧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会遭受惩办。顾前思后，认为比较好的出路是暗中向重庆当局“输诚”，以积极的反共举动，帮助国民党保住南京、上海等要害地区，并以此为资本，争取蒋介石的宽容和

谅解，为战后逃避罪责寻找政治退路。

在汪政府领导集团中，最先向重庆当局“输诚”的是汪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行政院长周佛海。长期以来，周佛海一直是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投日后他凭借着原先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关系和影响，始终与重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立夫、张群、唐生智、何应钦、顾祝同、陈布雷、胡宗南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重庆政府派往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川流不息地出入周佛海的门庭，在遇到麻烦时，不断地得到他的关照。重庆军事委员会驻沪代表蒋伯诚和国民党“中统局”驻沪代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都与周佛海有直接的联系，在被日宪兵逮捕后，都因周的疏通、庇护而免遭于难。1943年春，他与“军统局”局长戴笠建立了直接联系，听命于重庆当局的指挥。周佛海母亲去世时，戴笠披麻戴孝代周“尽孝”，关系非同一般。重庆当局通过秘密电台，不断指示周佛海，要他“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并要他在战争结束的“过渡时期”，负责“保全”东南富庶之区 (14) 。

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在汪政府要员向重庆当局的“输诚”热潮中也不甘落后。但他与周佛海不同，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曾主编《革命评论》，组织“改组派”，策动“护党救国运动”，参与军事倒蒋等，一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反对派，他向重庆当局的“输诚”比起周佛海来，要困难得多，但他也费尽心机，通过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频送秋波。早在1942年下半年，陈公博已与重庆“军统局”建立了两座秘密电台联系，重新为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效力。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医疗后，陈公博负起了指挥汪政府军事的全面责任。他发现数十万和平救国军所处的军事态势十分不利，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占领军害怕和平救国军的过于集中驻扎，会妨碍其殖民统治，一直实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和平救国军被分割在陇海路以北、商丘以东的山东和河南北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皖北和苏北地区，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浙江地区以及湖北、广东地区，不仅彼此的防务不相衔

接，而且分别属于日本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控制和指挥。更重要的是他们分别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没有一个部队不给共产党包围”[15]。陈公博在接受重庆方面的反共指令后，深恐分散各地的和平救国军会轻而易举地被八路军、新四军各个歼灭，又感到长江以南地区兵力薄弱，不足以对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进攻威胁，为了确保在战争结束时，原国民党统治中心上海、南京及其周围地区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决定利用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机会，不断向日本占领军当局进行交涉，实行和平救国军的军事布局大调整。

陈公博经过缜密考虑，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界，南以钱塘江为界，组成一个防共区。在军事布局上采取层层南移的方针，实现以京沪杭为重点的战略收缩。首先，是把陇海路以北、商丘以东的和平救国军尽可能集中到陇海路以南的皖北和苏北地区，加强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加固防卫京沪的屏障。陈公博认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和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处境很困难，又分别受日军开封重田兵团和济南土桥兵团节制，“不能互为依靠”，“最好能使他们向南京靠拢，以保存实力”。这一安排在取得日军当局同意后实施[16]。1944年10月，陈公博下令将孙良诚部从河南开封调防苏北扬州、泰州、淮安、阜宁、盐城地区，孙良诚任伪军事委员会苏北绥靖公署主任。11月，又将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移驻开封，填补孙部南调后的空缺。接着，陈公博又将原驻山东的吴化文部南调皖北，担任津浦路南段的护卫任务，并保卫南京的大门。

同时，陈公博将原驻苏北、皖北的部分和平救国军逐步调至长江以南，加强江、浙、皖汪政府统治中心地区的军事力量。1944年6月，陈公博将原驻苏北的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师合编为第十二军，由项致庄兼任军长，以便于调动。其时，项氏已秘密接受重庆当局要员陈立夫的指令，要他设法带兵回家乡浙江，“建立一个据点，

以迎接胜利”[17]。同年9月，在陈公博的支持下，项致庄调任伪浙江省长，并兼任伪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二军也同时由苏北调往杭州地区。他们设想在战争结束时，迅速组成“杭州指挥部”，以和平救国军第十二军为基本队伍，加上第一方面军驻浙江的部队谢文达部、程万军部，由张恒指挥，迅速控制沪杭铁路沿线，防备浙东新四军部队的进击[18]。

1945年1月，陈公博为了加强上海、南京的军事力量，将和平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至苏州，由总司令任援道兼任伪江苏省省长、国民党省党部主任、省保安司令和新成立的苏州绥靖公署主任，重点防卫京沪铁路沿线。在吴化文部抵达安徽蚌埠后，将原驻安徽的警卫第二师和第一方面军第四师调防南京，并组建中央警卫军，陈公博自兼军长，下辖三个师。对于上海，1945年1月，周佛海在取得重庆当局批准后，接替陈公博任伪市长兼保安司令。为防备新四军向上海进攻，曾“调黄埔军校学生数人分任要职”，加强对于税警团部队、中央税警学校及警察部队三万余人的控制，并“拟具保卫大上海计划，交由程克祥电呈中央备案，以后就根据这个计划配备兵力、排定战斗序列并且补充军实，加紧训练”[19]。由于日本迅速投降，这个计划未及全部实施。战后，周佛海不无遗憾地说：“盟军如果在上海附近登陆，我们一定也必有相当表现，以后虽然敌军投降没有机会使用，但是在中央没有到达之前，我们维持了四十多天过渡时期的治安，未令一匪入市区，未闻市区开一枪，市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劫掠和焚烧，却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准备。”[20]

在陈公博调兵遣将，实施军事布局调整的同时，汪政府的军事将领们或由陈公博、周佛海间接接洽通知，或由重庆“军统局”或前线相关战区司令长官直接委任，或由重庆当局派遣代表亲赴部队接洽，都暗中接受了重庆当局的委任，为帮助国民党当局抢夺抗战胜利成果作了准备。1945年2月23日，陈公博在南京召集汪政府高级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项致庄、任援

道、郝鹏举、杨揆一、鲍文樾、叶蓬等。会议决定如果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汪政府军队将集中兵力全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采取进攻的姿态。会议讨论了和平救国军各部最感缺乏的子弹问题，陈公博要求各军“自行设法购买或制造”，更“密嘱各军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21]。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汪政府也随之烟消云散。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原已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战略包围之下，日本投降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发动战略大反攻，中共中央已任命了各大、中城市的市长，准备解放上海、南京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然而，由于美国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出动空军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南战略要地，并利用日伪军队作为“卫戍部队”，抵御人民军队的进攻，致使中共的战略意图未能如期实现。显然，数十万汪伪军队于一夜之间成为重庆国民党的先遣队，抵抗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于日伪的受降活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　收复台湾的准备

1943年12月，中美英《开罗宣言》公布，奠定了台湾及澎湖列岛回归中国的法律地位。国民政府加强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

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的台湾抗日团体主要有三支：其一是台湾革命同盟会。1940年3月29日，由台湾留居祖国的反日团体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中华青年复土血魂团、抗日复土大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次年2月10日，更名为“台湾革命同盟会”，总部设重庆，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行动四部，并在金华、漳州设南北执行部，后改为八个地方分会。该同盟会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工作目标。他们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并开展活

动[22]。1942年4月，该会呈请中国最高当局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使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23]。其二是台湾义勇队，成立于1939年春，总部设金华，后移龙岩，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三个区队及“台湾少年团”，主要在东南各省开展抗日活动[24]。其三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1940年成立筹备处，总部设香港，后先后迁九龙、桂林、韶关、赣州、泰和等地，1943年4月，更名为“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执行委员会”，设在漳州，吸收台籍党员689人，积极开展抗日复台工作[25]。国民党当局积极支持、充分利用这些团体开展抗日复台工作。

1944年1月4日，国民党台湾党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台湾党务工作意见书》，对于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提出五项建议：

1．台胞以漳、泉、潮、梅为最多，拟在各地以台湾工作团名义，集结内地台胞随时予以训练，加强主义认识，增进军事及航海技术，团员仍操原有职业，平时利用其各种关系推进岛内工作，总反攻时协助英美海军袭取台湾；

2．台胞团体与全国舆论均主张从速建省，以使台岛人心及工作胜利计，应在台湾党部所在地开办台湾党政人员训练班，以资收揽人才及造就人才，并利组织工作之开展；

3．为配合党政班工作及研拟各种收复与建设方案起见，先成立“台湾政治设计委员会”，聘请台湾问题专家为委员，可向中央提供各种方案，亦可藉此树立省政基础；

4．为明了内地台胞状况，以备协助台岛工作及将来收复进行计，拟举办内地台胞总登记，由台湾党部负责办理；

5．查台湾志愿兵征调已三十余万，分布越、缅、海南岛各地，拟选派干员参加远征军及第四战区司令部担任策动该项志愿兵工作，以为将来配合同盟国海军进攻台岛之前导。

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复函台湾党部书记长萧宜增，称意见书“所拟尚无不合，准予试行”[26]。

4月17日，国民党台湾党部就《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九年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明白指出：“我国抗战之成败，当然以台湾之能否收复为断”，此乃“我四万万同胞全体的责任”，号召国人“切实注意台湾，纠正以前不大注意台湾的毛病，须研究台湾，要把台湾的一切研究得清清楚楚，然后向全国宣传，使大家都能了然于台湾的重要”，“负起全部的责任，致力于台湾的收复，俾完成抗战之使命”[27]。28日，国民党台湾党部又呈请国民党中央恢复台湾省制，内称：“窃查台湾前为我国行省，台民原为中华同胞，此壮丽河山曾因《马关条约》而割让，我固有主权应随此次对日宣战而收回；开罗会议后，须经同盟领袖之公认，正宜掌握时机，使主权由初步收回而达完全管领；首要之图，端在政权名分，得民心，以共赴事功”，为此“似应即由政府明令宣布台湾恢复省制，始足以正内外视听，而促台胞内向，事关国土收复，国族生存大计”[28]。国民党台湾党部的这些活动对于推动国民政府的收复台湾准备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直至战争结束国民党政府却始终未能恢复台湾省制。

1943年9月6日，孙科致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转送台湾义勇队提出的意见书，其主要内容是：在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台湾问题委员会”，或在中央党部设“台湾革命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台湾党务、政治、军事之全盘计划，审核其工作进度，依工作计划分配经费及工作，实施“台湾工作人才总登记”，依其才能分配工作，在我国训练机构设立“台湾政治干部训练班”及“军事干部训练班”，以准备将来设立“台湾省政府及台湾军管区”等，要求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讨论决定[29]。1944年4月，在各方人士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任主任委员，着手编拟《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经该委员会历次开会讨论，并送中央设计局各有关组处陆续签注意见，又根据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之《复员计划纲要》加

以整理，拟定16项82条草案，于10月27日签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鉴核，1945年3月23日“业奉总裁修正颁发”。这个文件是国民党当局准备收复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文件，分列通则、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工矿商业、教育文化、交通、农业、社会、粮食、司法、水利、卫生、土地共计十六大类。主要内容是：1．台湾接管后一切设施，以“力谋强民利益，铲除敌人势力为目的”；2．民国一切法令均适用于台湾；3．地方政制以台湾为省，接管时正式成立省政府，下设县（市），就原有州、厅、支厅、郡、市改组之；4．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予极大的权力；5．台湾应分区驻扎相当部队，以根绝敌国残余势力；6．应由中央银行发行印有台湾地名之法币，并规定与日币兑换率；7．敌国人民所有或与台民合有之工矿商业一律接收；8．学校接收后，课程及学校行政须按照法令规定，教科书用国定本或审定本；9．原有人民团体，接管后一律停止活动，俟举办调查登记后，依法及实际情况加以调整；10．讯释政治犯，清理狱囚，应将未结之民刑案件，分别审结；11．日占时代之官有、公有土地，应于接管后一律收归国有，敌人私有的土地，应于接管后调查是否非法所得，分别收归国有，或发还台籍原业主；等等[(30)]。

随后，又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主持，会同中央设计局、中央训练团、东北调查委员会、台湾调查委员会商拟了东北、台湾党政干部训练办法九项，签奉蒋介石核准。12月25日，由中央训练团举办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由各机关选送学员120名，次年4月20日结业。10月2日，由中央警察学校举办“台湾警察讲习班”，12月22日结业。1945年6月，又举办“台湾银行人员调训班”，这些训练班为台湾的光复与接收工作培养了不少干部。为了更好地接管台湾，该调查委员会还做了不少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如选译台湾现行法规，分为行政、司法、财务、教育、金融、工商交通、农矿渔牧七大类，印成43册，以供有关方面参考。编印出版了台湾概况等调研报告19种，还成立了行政区划、土地问题、公营企业三个研究会，就相关问

题作成了报告书[31]。

1945年5月，国民党举行“六大”，台湾问题成为大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台湾党部代表谢东闵出席大会，是台湾同胞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人。5月9日，谢东闵在第五次大会上提出两点书面质询：中央何以不设立台湾行政机构，又何以未选派一个台籍参政员？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复台工作提出强烈批评。并表示台湾同胞虽受敌寇重重压迫五十多年，但无日不在奋斗，目的则在归宗祖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央似乎还没有注意台湾同胞的愿望，所以迄未设立行政机构，也未选派参政员，不免令他们失望。希望中央能多多注意台湾问题[32]。谢东闵领衔提出了“拟请中央统一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拟请中央从速确定台湾法律地位案”、“拟请有关台湾事业之军政机关尽量录用台湾人案”三个提案，主要内容是：1．“放宽尺度，洞开门户，以便延揽台湾人才，充实党之干部，庶人地熟悉以利工作之进行”；2．“光复在即，台湾人心必大振奋，故台湾党部之工作可能突飞猛进，随时开展”，“经费应大加宽筹，并设特别秘密开支项目，使能因利乘势便宜行事”；3．国内台湾各革命团体尚未能完全集中，拟请中央加以援助，并随时指导，使之形成抗敌巨大力量，使能协助国军光复故土，不独可以减少牺牲，并对国际观瞻收刮目相看之效，显示台湾同胞确抱重归祖国之决心”等[33]，这些提案均为大会通过，交政府办理。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为解决台湾回归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对于日后接收台湾，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说，他们的准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台湾各界人士的批评和国民党台湾党部领导人的呼吁，反映了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心声，但并未唤起国民党领导人采取坚决而切实的行动，以便于战后妥善解决台湾问题。

四　收复东北的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全境，

成为中国抗战的目标之一。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收复东北问题更是被摆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国民党当局主要从党政两条线为收复东北失地作了筹划和准备[34]。

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即通过了钱公来等提出的“重建东北四省政治机构案”，请政府迅速办理。第四次会议又由王卓然等提出“增强宣抚东北工作案”，建议政府“从速恢复省政府主席等名义”，“以收效命疆场打回老家之效”等。尽管东北各界人士奔走呼吁，但政府方面的反应却并不及时。延至1940年4月25日，始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决议：任命万福麟为辽宁省主席、邹作华为吉林省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缪澂流为热河省主席；设立辽吉黑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其组织及人选由军事委员会拟定呈核。5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东北四省主席任命。随后，四省府曾在重庆南山合署办公，处理相关事务，但有名无实，既不受重视，亦无所建树[35]。这表明当时抗日战争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国民党当局还未把收复东北问题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国民政府加大了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力度。1942年初，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何应钦、组织部长朱家骅等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奉命拟定了《推进东四省党务纲领》，决定以国民党为发动东四省军事政治重心，推进东北党务政治，并彻底调整各抗日团体。其总纲规定：

1．推进东四省党务应采取革命方式，以军事为中心，军事所到之地，即党务与政治所到之地；

2．推进东四省党务应先从东四省边境做起，逐渐推进于东四省内部；

3．推进东四省党务应先从建立革命干部着手，将熟悉军事

信仰主义富有牺牲精神之东北人士，予以相当时期秘密工作技术训练，一部派在东四省边境组织挺进部队，一部打入伪军从事反正运动；

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一东四省党务统筹机构，负推进东四省党务与指导团结关内各地东北人士，从事收复失地准备工作之任务；

5．推进东四省党务统筹机构为一极端秘密之组织，其下公开成立一冠东四省名之团体。在新团体成立后，所有过去东北地方性团体一律取消；

6．推进东四省党务应与已成立之东四省省政府行政机构及有关东四省部队工作机构取得密切联系与配合。

对于收复东北的具体工作纲领，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关外工作为“在东四省边境建立挺进部队；运动伪军于必要时反正；对于教育文化界设法吸收，争取知识分子入党；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及有关抗战资料以争取民众；招致东四省青年予以革命之训练”等；关内工作为“大量吸收东四省优秀分子入党；协助政府及慈善团体办理东四省难民失学失业青年救济工作；协助政府办理关内各地东北在乡军人登记训练并使其参加抗战工作；研究准备东四省之收复工作”等[(36)]。

随后，国民党中央设想成立三个重要机构：1．国民党东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外不公开，举凡策动伪军反正，打入伪组织，发动民众等，均由该会统筹指挥，俾政治与军事均纳入党务范畴之内”。2．国民党东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对外不公开，决定东北工作方针、工作计划及工作联系配合事宜，其决议事项由行动委员会分别执行”。3．东四省抗敌后援会，“为民众之组织，将原有之东北协会、东北抗敌建国协进会、东北青年学会、东北救亡总会及其他政治性之民众团体一律取消，公开号召东北民众一

致团结，暗中受行动委员会之指挥”[37]。

实际上，除东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并未正式成立外，其余两个机构建立后均为接收东北主权做了若干工作。1942年5月31日，东四省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前此，原有的东北协会、东北抗战协会、东北青年学会、东北救亡总会等一律于4月15日前自动结束。6月9日，该会选出领导机构，刘尚清等25人为名誉理事，吴焕章等31人为理事，吴焕章、马亮、陈士瀛、田雨时、谭文彬为常务理事，王德溥等9人为监事，马愚忱为总干事，洪钫、程烈、赵宪文、武尚权为副总干事。该会先后设立了文献资料编审委员会、善后问题委员会、经济作战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财务工作委员会、工作考核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救济委员会等，并出版了《东北前锋》刊物，编印东北丛书十种。其主要任务在纵的方面是，“深入东北，策动敌伪，暗施宣传”，横的方面是“与中央各机关所派工作人员取得相互联系”[38]。1943年1月19日，该会在重庆举办收复东北问题座谈会，与会者强调四点：1．东北必须由中国收复，否则无以言世界和平；2．东北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3．收复东北要靠自力更生国策之贯彻，东北尤须努力于收复东北之武装准备；4．东北是防止东方侵略者的一道长城，只有中国才能胜任这个任务等。对于国际上出现的“东北应作特殊处置”的谬论，与会者尤着力进行批判，强调应加强国际宣传，使国际社会对于东北问题有清楚的了解[39]。虽然由于战时环境、经费短缺以及该会内部关系复杂，对于该会的成就不能作很高的估计，但仍然应肯定该会“对于加强东北团结、组织、宣传等方面，努力进行，确有助于抗战及准备复员”[40]。

关于东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时更名为“东四省党务干部会议”，由于组成人员的风波，延至1942年9月28日正式举行会议。组成成员原为何应钦、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朱霁青、刘尚清、刘哲、万福麟、莫德惠、邹作华、马占山、刘多荃等22人参加，后增到37人。其中辽宁15人、吉林10人、黑龙江4人、热河

2人。该会议每月开会1次，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由中央秘书处召集之，由于原定的执行机关东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没有成立，会议的决议由中央秘书处分行各主管机关办理，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综理东北事务，审定一切有关东北设施的最高审议机构，曾提出和通过了不少有关东北接收准备的提案，如1943年8月，该会通过万福麟的提案，送政府采纳，建议中央在东四省拨编四个军，由各省省长兼任军长，以便利指挥增加抗战实力，“必要时可率部深入敌后，或先遣小部骑兵深入东北地带潜伏骚动，乘机扰乱煽惑鼓吹”。并认为“此举纯为着重复土复员之实际工作”。1944年7月，该会议曾决议《为发展东北沦陷区党务工作，应将由关外来归之青年加以严格训练，派遣回潜伏工作案》、《为将来接收东北工作，应先训练高等警官数百人案》以及《东北青年暑期辅导班应否继续办理案》，决定交由中央组织部、高等警官学校、教育部等办理，后又决议在中央训练团内设立东北党政干部训练班，为日后东北的接收培养各种干部。1945年8月，该会议又对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签约事提供意见：“1．在苏联出兵进攻日寇期间所有东北铁路港口尽可允许使用，惟军事结束以后应即予归还，不得假借任何名义长期占据或变相租借，以期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2．战争结束以后东北经济建设，可允许苏联投资，同时应招致英美等盟国尽量参加，以谋经济合作，并期国际繁荣，无论何国不得独享优越地位，以免引起纠纷；3．宋院长再次赴苏随员应派东北籍有声望之人员以备咨询。”这些议案对于推进收复东北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41)]。

在政府系统，1944年5月，最高国防委员会决定在中央设计局之内设置东北调查委员会，由沈鸿烈主持，并由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亲自督导，负责规划战后东北建设诸事务。抗战胜利后，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施策时采用和参考东北调查委员会规划研究的方案和资料颇多[(42)]。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也自1942年起将其注意力投向东北，该委员会的经济研究室不断派人前往东北沦陷区收集日满的重要经济情报，编撰了《伪满经济概况》、《沦陷区经济概况》等报

告，对于战后国民政府东北的接收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战后接收东北将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国民政府亦有所准备。1942年8月，蒋介石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断然表示："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毁灭，亦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即我实力不允，亦必誓死争取。"[43] 1943年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公开撰文，主张必须使日本成为"日本人之日本"，"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日本人所占之中国，如台湾、琉球、东北四省均应重返中国"[44]。当美国出现主张战后不将东北四省交还中国之逆流时，中国朝野及时进行还击，如《大公报》曾发表《辟新孤立主义——并论中国抗战的世界地位》、《读美国白皮书——并论中国东北四省与中国之不可分》等，其结论是："这次大战的根源既在中国的东北问题，就必须达到公正合理的解决。"[45] 战争结束前夕，军事委员会拟具了《旧金山会外应与美英苏商谈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强调"所有中国领土（包括开罗会议宣言应行归还中国之领土在内）无论被任何军队解放，其行政权应即在开始时完全归还我方"。针对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后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主张加强与美方的交涉，"必要时并可将我之顾虑密告美方"，"恺切向美方说明，并以中苏关系实亦有关美国之安全，请美从旁协助，使中苏能开诚谈判。若苏联能有确切表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之决心，则我可考虑（一）予苏联在新疆及东三省之极大让步……；（二）外蒙、唐努乌梁海之在中国主权下予以高度自治，若苏联同意，我并可与之互相订类似英苏、法苏及捷苏条约之互相条约"，"至于旅顺问题，苏方或竟要求回复日俄战争以前之状态，此点我似应坚持"；等等[46]。这些意见在日后的中苏缔约谈判中应是起了参考作用的，然而，由于美英苏"雅尔塔密约"的制约和苏联方面的强硬态度，大多未能实现。

从总体上观察，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复东北的准备工作既无完整严

密的计划，亦未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尤其在东北现地的地下组织工作，更为欠缺，这将直接影响战后国民党政府对东北的接收工作。

五　战后处置日本的准备

1943年底，中美英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即将结束的新形势，加强了对于战后处置日本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战争罪行调查和战争索赔问题。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国民政府早就着手进行调查了。1938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黄炎培等建议政府尽快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提案。1939年，行政院颁布了《抗战损失调查方法》及《查报通知》，通令中央及各地方机关转饬所属人民依照查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核汇编所有材料。自1940年起，主计处每隔半年将统计数字累积汇编成册，名为《抗战中人口与财产所受损失统计（试编）》。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劣及当时人民组织程度的低下，这些统计尚不完备和全面。

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了配合同盟国对于战争罪行的调查，决定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其调查的职责和范围是：中央、省级、县级各机关及其所属各机关所有或管理的各种财产的损失、国营工矿道路船舶及其他经济事业之损失、民营工矿船舶及其他企业之损失、国家人民团体及个人财产之损失，其他因敌人侵略所受之财产及人民生命之损失，敌人在沦陷区经营各种事业之调查等[(47)]。1944年1月，又将教育部所属“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并入该委员会，由孔祥熙兼任主任，下设四个小组，分别负责教育文化事业损失、公私损失财产、其他损失以及日伪在沦陷区经营各种事业之调查。同时修正公布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查报须知》，将调查的时间向前延伸至“九一八”事变，以“七七”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将调查的地域扩展至中国本土和使中国遭受损失的敌国领土及其占领区；将调查的类别详列为人民伤亡、公私财产损

失等十项；并统一印制表式二十二种，要求各地依统一体例具体填报。1945年初该委员会改隶内政部，成为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的前身[48]。

战争结束前夕，西南联大向达教授向教育部提出了《战后应要求日本赔偿我文化上之损失》文件，指出：日本的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觍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人民而已”；“战后重新教育日本，文化上解除武装，以消灭其精神上之夸大狂，实为第一步应采之行动”；提出应“将其视为国宝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勒令缴还我国”，“就其公私所藏我国古器物、书画图籍，指名索要”，并具体提出：上野、日比谷诸处所陈列甲午诸役自我国掠去之战利品，应一一归还，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尊经阁库所有宋以来善本秘籍，为我失者甚多，应择优选取，大连图书馆、满铁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四者，应全部归我国所有，中村小析、大谷光瑞所藏敦煌卷子，“此本公物，复归国家，理所当然”，大连博物馆、满铁博物馆及东方文化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应全部予以接收等等，“一方面藉此赔偿五十年来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之损失，一方面予侵略国家之政府与人民以一种惩戒”。向达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日本赔偿问题[49]。旧金山会议前，中国官方对于日本赔偿问题，认为“拟仿照此次克里米亚会议之苏联办法”提出，其一是“各盟国应摊得之赔偿应以各该国所损失对其本国国富之百分比为标准”；其二是“日本对于中国之赔偿应以实物交付为主”；其三是“盟国应在重庆设立赔偿委员会主持日本对盟国赔偿事宜”等[50]。这些意见均成为战后中国官方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的重要原则。

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中美就战后占领日本进行协商，并达成口头协议。1944年8月，罗斯福总统公开表示：“一旦盟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占领时，与中国成立最后协议，决无困难。”[51] 国民政府开始拟议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总体方案。1945年初，国防最高委员

会秘书长王宠惠和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秘书长王世杰共同主持拟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遵办之条款草案》，共二十五款及三条附加条款[52]。这是全面反映中国官方对于战后处置日本基本方针的文件。

在军事方面共十款，主要内容是：1．日本应立即停止其陆海空三方面一切军事行动；2．日本应于联合国指定之期限内，自“九一八”起在中国所占领之地区及在其他联合国占领之地区撤退其全部陆海空军人员；3．日本所有在中国境内一切武器与配备应悉数缴存，听候中国政府派员接收；4．日本对于其在占领区域以内征编之伪军警应负责约束，听候点验处置；5．日本应释放联合国方面被俘之战斗员及被扣之非战斗员；6．日本应在联合国指定期限内将被其调送出国之联合国人民资送回籍；7．日本之陆海空军除由联合国准其保留者外，应依照联合国之规定予以复员；8．一律禁止日本作战器材之制造、生产与配置及其出口；9．联合国于日本境内指定若干地点由联合国派兵驻扎；10．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等。

在政治方面共十款，主要内容是：1．日本应即交出联合国指定之日本战争罪犯，听候审判；2．日本应依照我方指定名单将在中国各地伪组织重要人员分别加以扣留，听候我方处置；3．旅顺、大连归属中国，应定期由日方撤退其军警，由我方接收；4．日本应将南满路及中东路无偿交还中国；5．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6．琉球群岛应归还中国，如英美异议时，我方可考虑将琉球划归国际管理，或划琉球为非武装区域；7．日本承认朝鲜依甲午战争前之版图独立；8．日本应解散一切从事侵略或宣传侵略主义之组织，取缔一切侵略主义之思想与教育；9．日本应释放一切因与联合国接触、对联合国表示同情，或倾向民主主义而被限制、拘禁或受判决的日本人民及其他任何国籍人民，并免除其所受法律上之限制；10．日本应供给联合国所需之一切情报及文件等。

在经济方面共四款，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应归还中国中央及

地方机关（包括国立银行）之一切文件、簿籍、现金、币钞及其他有价证券等；2．日本应归还自占领地所运走之重要图书、古物、文化品以及工厂设备、机器、机件、铁轨等；3．日本应归还自联合国攫去之一切船舰车辆等；4．日本应赔偿中国因日本侵略（自“九一八”起）所受之一切公私损失，由我方接收之日本公私财产得作为日本赔偿中国损失之一部分等。

该提案设想由联合国设置监督委员会保证上述各条款之切实执行。并在附记中规定：如日本先德国向联合国投降，则应增加三款内容：1．日本应将国内及其占领区内尚与联合国作战之敌国官吏人民及船舰器材等交与联合国；2．对尚与联合国作战之敌国不得予以军事政治经济或其他援助，联合国于必要将利用日本领土物资向上项敌国作战；3．日本应完全遵行联合国根据上列两条款所定之详细办法等。

旧金山联合国创立会议前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根据德黑兰会议美英苏已决定设立欧洲顾问委员会，“以解决欧洲各项政治纠纷，保证三国切实合作”的成例，拟文提出应向美英提出在重庆设立一同样性质的“远东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内称“命名远东较亚洲或太平洋为妥，盖用远东字样，可避免荷兰、澳、纽等国要求参加”；该委员会“由中英美各派代表组成。如苏联参战或愿在参战以前指派代表参加，我当欢迎。如英方要求令法加入，而美不表示反对，我亦可赞同”；“举凡对日之军事占领及战后处置，以及对泰、对韩、对越南各种问题，均可由该会拟具方案送请各政府核定”；该委员会对中国有两大好处：其一是“对于上述各问题可以保持（与）重要盟国之密切合作”；其二是“若苏联不加入，对于远东之措施可以三国协调方式出之，予苏联以有力之钳制，若苏联加入，则我可利用此机构以缓和或增强中苏关系”等；并认为该提议“与我国关系甚大，其着手方法自当先与美方商洽，得其赞助，再共同向英方提出”[(53)]。此议可视为中国官方对于建立对日管制的盟军远东委员会机构的最初设想。

六　加强援朝独立的力度

朝鲜独立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经开罗会议原则确定，但由于开罗宣言中有英国加入的“适当时机”的限制，该问题在战争后期成为大国出于私利而玩弄政治阴谋的热点问题。

英国政府的战后远东战略，以重新恢复战前的旧殖民统治秩序为最高原则。为了维持其在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地的宗主国地位，反对朝鲜以及一切东方民族主义运动的扩大，更不希望由中国来扮演亚洲民族解放领袖的角色，因此，从本质上是反对朝鲜尽早独立的。它与美国一拍即合，成为国际托管朝鲜主张的主要支持者。

美国虽在开罗会议上支持确立战后朝鲜独立的原则，但对于何时给朝鲜以独立，态度一直模糊不清。美国政府早期通知中国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理由是等待英国谅解后，与印度独立问题一并解决，显然是对英国殖民主义立场的姑息；但是在开罗会议后，又引入苏联对日参战问题，担心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会触犯希冀在朝鲜获取权益的苏联，在未获苏联表示意见之前，不敢对朝鲜独立问题有所决定。于是，便以朝鲜人“未经训练”，“缺少自己治理政事经验”为由，主张战后由国际托管朝鲜。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便在旅苏朝侨中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扶助朝鲜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从事抗日斗争，逐步壮大力量，以便战后在朝鲜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此，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赞成开罗会议确定的战后给予朝鲜独立的原则，对于是否将朝鲜交付托管，没有表示十分明确的态度，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争取对日参战后对于朝鲜的军事占领[54]。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阴谋四出的大国政治，国民政府坚持战后朝鲜立即独立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立场，并为此与美、英等国一再进行交涉。1944年9月，美、英政府先后向中国国民政府提

出内容相同的《研究韩国问题草案》，建议在盟军军事占领朝鲜本土后，成立临时国际监督机构。月底，美国国务院在征得苏、英同意后通知中国国民政府，美国的对朝鲜政策主张战后先设美、英、苏、中四强国际托管组织[55]。这一主张与国民政府的对朝政策意图是背道而驰的。10月27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英活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虽可与美、英共同交换意见，但绝不改变我国扶助朝鲜早日独立的一贯政策，更不同意战后国际共管朝鲜[56]。国民政府外交部除派员在重庆与美、英驻华使馆人员多次协商外，又指派亚东司长杨云竹直接与美国国务院当局多次研商朝鲜独立的途径问题，但未获结果[57]。

1945年1月，中国代表团又奉命利用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学会第九届年会提供的讲坛，大力宣传中国主张，并就朝鲜托管问题与美、英等国代表辩论。美、英代表认为，朝鲜业已亡国多年，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干部，一时无法建立有效的政府，而且朝鲜人不能团结合作，短时间难以建立独立国家，主张由同盟国托管五年。中国代表反驳说，托管朝鲜是将朝鲜由日本一国统治改为数强国统治，违反同盟国共同作战目标以及《开罗宣言》确定的朝鲜战后独立的精神；朝鲜人的不团结，是帝国主义统治者挑拨离间的结果；认为朝鲜没有行政管理干部，是对朝鲜人才智慧的侮辱；主张战后立即给予朝鲜独立，而不经过托管阶段[58]。

同年初，中、美、英、苏四国决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创立会议。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支持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参加会议。4月3日，蒋介石着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令财政部比照中国外交人员待遇，拨出15,345美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赴美代表之来往旅费及制服费[59]。然而，美国政府却连会议观察员身份也不愿给予韩国临时政府，美国驻华大使馆奉命故意拖延赴美韩国代表团成员的入境签证，以俟会议将结束时，再准他们入境[60]。而旧金山会议秘书长、美国代表希斯则正式通知已在美国的李承晚等人，拒绝

朝鲜人以任何方式列席会议[61]。

1944年6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争取国际承认无望的情况下，曾要求中国国民政府单独承认，深获中国朝野同情。7月10日，蒋介石指示吴铁城会同外交部长宋子文，“迅即核议首与承认或先与事实承认”的可行性[62]，但外交部经郑重考虑后认为：“开罗会议以后，我国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仅应与美、英两国采取一致行动，而目前对此问题仍有两点顾虑之处，一为韩国临时政府能否真正代表朝鲜内部人民意思，英、美两国对此尚不无疑虑，且开罗会议公报所称，在‘适当时机’承认一节，系指将来承认朝鲜之独立而言，至是否于最近承认在渝之韩国临时政府实系另一问题，英、美两国或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不愿有所决定。二为苏联之态度，查苏联未参加开罗会议，对韩国独立一事未作任何表示，在苏联未参加太平洋战争之今日，中、美、英三国如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恐易启苏联之误会，度美、英也必顾虑及此，我国鉴于目前对苏联关系，似有审慎必要。”在美、英、苏三国压力下，中国国民政府不得已决定暂缓外交承认，以待适当时机[63]。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还积极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反日地下军。早在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就指出：为了加强朝鲜独立运动，应设法使韩国临时政府将其反日工作推进于朝鲜境内[64]。1945年3月，中国方面在得知日本有可能放弃本土而在朝鲜与中国东北进行大陆决战的情报后，更感到在朝鲜组建地下军，利用本土人民高昂的反日情绪，发动反日暴动，对于配合同盟国军队登陆作战的重要[65]。稍后，当中美空军作战能力伸展至朝鲜境内时，中国方面又极力希望能在朝鲜国内组织地下军，从事救护盟国空军失事人员的工作[66]。在国民政府当局的极力鼓励和支持下，韩国临时政府拟定了“军事计划书”，计划选派若干光复军干部进入朝鲜内地，唤起原有之爱国组织，组成地下军，配合盟军登陆。其具体方案是：“设其秘密指挥部于京城，设分部于龙山、平壤、罗南、大丘等敌兵所在地，并广设细

胞于各要地，组织被征入伍之韩军，软化敌之军事组织，吸收敌军中之韩人爱国分子。并将基本队伍隐蔽于江原道山地，俟光复军、东北义勇军或海上韩军攻势接近韩土时，起而破坏敌之交通路线，进而占领京城，隔绝敌军南北交通，与友军协力，将敌人歼灭之。”[67] 但正当中朝双方积极筹划之时，战争已告结束，该计划停止执行。

对于战争结束后盟军占领朝鲜期间如何扶助朝鲜独立问题，最高国防委员会会同军事委员会拟定了《扶助韩国独立方案》，内分拟提出方案和最后磋商让步办法，后者的主要内容是：

1．在军事占领期间，应尽量给予韩国一切协助，所有民政事项概由韩人自行处理，同时承认一韩国“临时政府”以树立韩国独立之基础，中美英三国对于上项“临时政府”之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意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2．对日军事结束后，为维持韩国治安起见，对韩国境内若干重要据点必须加以占领，直至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之时为止；

3．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以后，应由中美英三国同时实行临时国际协助制度，中美英三国对于上项之正式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意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4．正式承认韩国独立以后，应使韩国立即加入国际和平组织，韩国取得会员国资格，其独立地位亦可获得一种国际保障；

5．关于国际协助制度之具体办法应由中美英诸国商议负责执行（俟远东顾问委员会成立后，我国可将其提交该委员会共同研讨）；

6．此项国际协助制度，经参加诸国多数同意，可随时予以废止，但其有效期间应以不超过三年为度。[68]

该文件体现了中国官方尽力使朝鲜尽早独立的意愿，但时势的发

展却使中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越来越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苏成立秘密协定，决定以三八线为界由两国军队军事占领朝鲜半岛。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及朝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了朝鲜北部，美国军队也准备在朝鲜南部登陆。美国远东方面军麦克阿瑟统帅正式向日本大本营下达了驻朝鲜日军应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向苏军和美军投降的命令，并经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很显然，在美英苏三大国眼中，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决定已不再是参与者，而仅是决定后的被通知者。

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下，国民政府为了继续贯彻既定的援朝方针仍作了不少努力。8月2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了“完成民族主义维持国际和平”的演讲，严正表示：中国之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自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也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69)]，说明中国援助朝鲜独立政策的坚定性。同日，当中国方面接到韩国临时政府请求中国建议同盟国立即承认该政府的备忘录后，明知困难重重，仍立即决定由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正面洽商，表明中国认为此时已为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为实现韩国临时政府这一愿望而做最后的努力。但是这个意见遭到美方拒绝，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复照中称：“美国政府对于韩国国外任何政治团体，皆不拟绝对协助”，美国政府还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美国已和英国、苏联达成协议，原则上准备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俟详细办法拟定后，再与中国会商，至于在朝鲜成立临时政府一事，当在国际托管组织商订后再行考虑[(70)]。至于朝鲜临时政府则坚持必须解散，其领导人员以个人身份归国。

至此，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一切希望全部破灭。国

民政府当局只得退而在美国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设法尽早将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员送回国内，以便发挥他们自身在国内民众中的号召力，为战后朝鲜独立地位的实现而努力。中国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的请求，在接受驻华日军投降时，对于日军中的朝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将他们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企图以此作为韩国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队伍[71]。韩国临时政府曾派遣一批干部，收编了为数约5万人的朝籍士兵，分别集中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广州等地，进行训练。但这支队伍同样不为美国政府承认，美国军方坚持此等人员必须先行解散后方准入境[72]。结果这些人员只得列入韩籍日军战俘行列，乘船遣返朝鲜。

国民政府当局于万般无奈之中，只能在经济上给予韩国反日独立运动诸领袖一些帮助，以利于他们归国后的政治活动。9月，蒋介石批准借给韩国临时政府金九等人10亿元法币和20万美元，并由中国方面出面代他们向美国军方借用飞机。11月12日、13日，在金九答应解散韩国临时政府后，美国军方派遣二架飞机，运送金九一行到上海，并于23日返回朝鲜本土，从而结束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流亡二十七年的历史。中国国民政府扶植韩国临时政府成为战后正统政府的政策也以失败告终。

七　确定战后对法越政策

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封锁，越南成为通向中国的主要国际交通线。然而，法国政府顾虑日本的南进威胁，不肯答应中国政府的过境运输要求，一再地下令禁止中国军火假道越南运输。在中国政府的再三强硬交涉下，始获法方允诺凡中国军火各货抵海防后，即视同法货，由军队代运。尽管在日本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威胁之下，过境运输的形式不断有所变化，但中国经过越南的国际通道在法国投降德国之前一直是开通的，这对中国的抗战是一个有力的支持[73]。

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向德国投降，随之成立的维琪政府不仅

关闭了中国经由越南的国际通道，而且准许日军在越南登陆，假道进攻中国。中国政府曾向法越当局提出，中国将进入越南抗击日本侵略，但遭到拒绝。法国维琪政府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军队万勿进入越南，否则越南法军必会抵抗，甚至联合日军进攻中国[(74)]。9月，日本迫逼法国维琪政府签署《日法越南协定》，法方允许日军6000人在越南海防登陆，占领飞机场3处，部分进攻广西的日军为撤退目的经由越南海防撤走。国民政府就此向法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中国政府对此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措施和全部行动自由，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法国政府负责[(75)]。中法双边关系趋于淡化。1943年初，法国维琪政府要求中国撤退驻法使馆，纵容日军侵占广州湾租借地，后又将在华各租界“交归”日本控制的汪精卫政府。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与法国维琪政府断交，双边关系完全中断。

与此同时，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魁北克会议上提议，派遣中国军队侧击越南的河内，减轻驻越日军进攻中国云南的危险。然而，这一主张遭到法国维琪政府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两方面的坚决反对，戴高乐的代表甚至向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如进攻北越，全越人将起而反抗同盟国。”美国虽不同意戴高乐所陈述的政治理由，但也未能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中法关系更形微妙[(76)]。

随即，中国与美国等同盟国家曾多次讨论过战后越南的地位问题，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赞成法国殖民势力重返越南。美国罗斯福总统曾向蒋介石提议将越南归还中国，蒋表示不愿接受，但同时认为越南不能交还法国，因为法国统治越南几近百年，并没有尽到训练越南人的责任，法国在越南只是有取而无予。罗斯福又提出国际托管越南的主张，提议由中、美、英、法、俄、菲律宾各派代表一人，另选越南人二人，成立托管机构，训练越南人成立自治政府。蒋介石表示原则上赞同，同时又强调中国和美国应尽力帮助越南在战后独立，并建议“可否先发表一份宣言，主张越南在战后独立”，未为罗斯福接受[(77)]。后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期间，中国与美国间、美国与苏联

间都曾就战后越南的独立地位问题有所讨论。罗斯福和蒋介石在11月23日的谈话中就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努力帮助印度支那战后取得独立达成共识。五天后，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又讨论越南问题。斯大林一再表示：法国必须对勾结德国的罪行付出代价，不得恢复旧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主义统治；罗斯福表示百分之百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强调法国统治印度支那已达一百年之久，那里居民的处境比开始受统治以前更坏，重申将与蒋介石讨论把印度支那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可能性，其任务是使那里的人民在二三十年内取得独立，但是所有这些谈话均未能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78]。

1944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英、苏等同盟国改取支持和扶植自由法国政府的态度，其对待越南战后独立地位的态度也从原有立场上大大后退。国民政府随之改变了对越方针。10月10日，蒋介石接见中国刚刚承认的自由法国政府驻重庆大使贝志高[79]，表示中国对印度支那或印度支那的领土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能够帮助贵国在该贵国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贵国驻印度支那的军队如果受到日本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到中国时，将会受到兄弟般的接待”；甚至称赞“法国人的思想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管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更接近中国人”，“希望从此把我们的传统地位肯定下来”等[80]。在对待越南独立问题上，这是180度的大转弯。12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致函戴高乐，再次表示要恢复中法两国战前建立的真诚友谊，并“准备以最诚恳的态度解决中国和法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81]。

1945年初，在中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最高国防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合拟定的文件就中国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作了如下表述：

> 我应趁此密询美方态度：1．如美已决定将越南交回法国，我自不便反对，但我可向美方说明：越南与我毗邻，此次日本曾用以为侵略我之根据地，战后法国应予我以特殊交通之便利，并

> 将我侨民待遇改善，我与法方交涉时，美应为我声援；2．如美主张将越南置于国际领土代管制度之下，则我除向美作前项之同样说明外，并表示希望法应早使越南独立；3．如美主张将越南交由数国代管，则我应赞成其主张，并要求为代管国家之一。[(82)]

从中可见，国民政府的对越南政策完全惟美国之马首是瞻，当时还很不确定。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据盟军统帅部第一号命令，中国派遣陆军第一方面军进入越南，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接受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投降。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支持越南独立的良好机会。当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发动了被称为“八月革命”的全国总起义，成立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国民政府的对越政策却陷入了混乱。中国占领军得到的最初指示是：接受日军投降，解除其武装，遣送其回国；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驻云南的法军在原地待命，不准入越等，既未把法国人当作交涉对象，也未考虑把越南交还法国[(83)]。在河内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也只挂中、美、苏、英四国的国旗，而未挂法国国旗。法国代表多次交涉，但主持受降的卢汉将军坚持仅挂《波茨坦公告》签字国的国旗。然而，9月15日，由行政院制定的《占领越南军事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却以尚未回到越南的法国作为一方，有关措施和办法都须与法方商洽，而只字未提业已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使占领军当局不知所措，向最高当局请示的结果是：牢牢掌握老街—河内—海防运输线；对越南当局应采取不管态度；让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以阻挡。随即又补充指示：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84)]。

与此同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身份访问法国，于9月19日会见戴高乐，戴高乐对中国占领军进入越南北部后的形势表示强烈不满，并认为中国的政策与1944年10月中方的承诺不相符合。宋子文重申“中国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声明“中国希望

法国仍然是中国在亚洲的邻邦”，表示回重庆后将按法方的期望处理北越问题[85]。国民政府的对越政策基本定型，中国占领军司令部接到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命令，准备接待法国代表团，法国的军用飞机也准由云南飞往河内。国民政府实际放弃了支持越南独立的立场，而让法国殖民者在战后重返印度支那恢复其殖民统治。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战争后期日本对华“谋和”的失败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战况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始策划通过汪政府实现对华“和平”。1943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规定：“解决中国问题”的要点，是彻底实现“对华新政策”，“应伺机加以领导，使国民政府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等[86]。这是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运用汪政府来“诱和”重庆政府的策略。根据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重庆政府在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得知，“英美对于苏联潜在实力之强大重新作估计，大为恐慌。可以对此防御的，西为德国，东为日本，所以认为打倒此两国，并非得计。从这个观点，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与日本谈判。”[87]

汪政府的要员们是否愿意充当日本政府的“劝降”使者呢？最初，日本方面曾表示疑忌，担心汪政府会阻碍日蒋“全面和平”的实现，曾设想让汪精卫担任华北地方政权的主席，以解决“全面和平”实现后最为困难的蒋、汪关系问题[88]。但日方很快发现“汪似乎希望由他自己这一派尽快完成”中日“和平”的任务。陈公博、周佛海则积极性更高。汪精卫向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表示：“我是一个探险家来发见大陆，如果不能发见，重庆一定拍手笑我，如果能够发见，全中国的民众会感谢。”汪精卫的所谓“大陆”就是指“和日本以好的条件达成和平”[89]。

自1943年1月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汪精卫等不断就“中日全面和平问题”派人与重庆当局进行联络，出面较多的是周佛海。1月4日，周佛海委托即将赴重庆的国民党“中统”特工陈宝骅，“带缄交孔庸之（祥熙）、钱新之、杜月笙及果夫、立夫、布雷六人，劝其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余在外力助其成”[(90)]。2月2日，周佛海又对刚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刘百川说：“国际关系瞬息万变，英美必留日本之势力以牵制苏联，故日美妥协迟早必实现，渝方应注视此点，如日美有妥协之倾向，即宜著先鞭与日和平，不可追随美国之后与日妥协，盖前者为主动，后者为被动，利害得失固可预见也。”刘百川表示同意周的意见，并允将此“转达渝方”[(91)]。4月5日，在汪政府要人的一再疏通下，日本占领军方面同意将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并软禁已一年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用飞机送广州，转道回重庆，传递“和平信息”。周佛海是这样向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解释的：“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睹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92)]

同时，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不断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日本军部在华代表辻大佐、都甲大佐、永井大佐、川本大佐等商谈实现所谓“全面和平”的条件。1943年9月，汪精卫、陈公博等多次与谷正之会谈，“最关心的是撤兵问题，如果蒋提出与英美切断关系，希望日本也撤兵时，日本是否肯答应？”要求日方明确表示态度[(93)]。9月29日，周佛海会见日本军部代表都甲大佐，也提出“重庆所惧者，脱离英美后，而日本不履行条约也。故如何能有切实保证，使重庆信任日本，此日本必须反省者也”[(94)]。10月2日，周佛海又向日本军部代表川本大佐指出：“重庆对日不信任，如何取信于渝，乃为先决问题，而欲取信于渝，先须见信于南京政府下之人民，今日本所约定者多不能实行，其能使重庆信任日本之诺言耶？”[(95)] 10月4日，周佛海在与谷正之会见时再次强调：“中日全面和平”之能否实现，“全在日本做法如何而定，如以在和平区日本之做法视之，则重庆决不

和。‘言必信，行必果’为日本做法今后应取之途径。”[96] 这表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企图利用日本决策者们急于希望结束战争的心情，迫使日本方面向汪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

1943年10月30日，《日汪同盟条约》签署，日本政府答应在“中日全面和平”实现时，从中国撤兵，并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取得的驻兵权，这使汪精卫等大为振奋，趁势向重庆政府发动了一次“和平攻势”。汪精卫在重病之中，仍亲自撰文，指责重庆方面据以抗日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以今日的状态而言，不仅回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且超过若干倍了”，劝告重庆政府“赶快决定自己应走的路”，“抛下抗战，回复和平”[97]。然而，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汪政府的“和平攻势”成效甚微。

1944年初，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了更为惨重的失败。日本大本营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确保日本本土与南方占领地的大陆交通线，于1月24日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要求日军“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并于4月中旬开始发动河南攻势作战。日本军部执行了一种“和”、“战”自相矛盾的方针，即“一面希望对渝和平，一面又常取攻势”。这说明日本政府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举措无定，执行着混乱的对华政策。

在汪政府方面，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赴日就医后，实权已落入陈公博和周佛海手里。他们虽然表面上仍然热衷于居间“劝降”，但从心底里已深信日本必定战败，暗中向重庆政府表示“输诚”，积极地为自己寻找退路。他们考虑“全面和平”的出发点已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重点已放到如何取悦于重庆政府了。

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日本方面的“谋和”要求虚与周旋，另一方面婉转批评日本方面“对渝军事上施加压力，只足以促渝之坚决抵抗，和平更难”[98]，并以“谋和”为由，向日本方面交涉“撤兵”、取消伪满洲国等，力争在较好的政治条件下，实现所谓“全面和

平”，争取重庆当局对他们的宽容和谅解。对于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这种心态，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也有所意识。他说：“日本政府对南京政府的这个提议（即由汪政府居间“谋和”中日关系），南京方面明白看出日本的战意消退，除了只派遣一名表面形式上的使者到重庆以外，似在煞费苦心地寻求同重庆方面的要人进行联系。”[99] 但这种状况却未为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日本政府决策者们所认识，由汪政府出面进行的“谋和”活动仍在继续。

1944年7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继起的小矶国昭内阁面临比它的前任更为严重的局面，战况愈加险恶，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已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他们把与重庆政府“谋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分崩离析的汪政府身上，迫不及待地要以更大的步伐，与重庆政府取得沟通和联系，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8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了《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在“战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100]。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制定了《实施对重庆工作方案》，规定“对重庆的政治工作的重点，在于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具体方式是“使国民政府进行活动，制造彼此之间会谈的机会”，并由“国民政府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同时，“有效地运用由于日苏邦交的迅速好转而造成的政治压力，设法促进这项工作”；“如果需要，使苏联成为这项工作的居间人”；强调“讲求一切手段，助长日华和平思想，并贯彻宣传重庆依靠美、英，终于会招致中国民族的被奴役，造成东亚的灭亡”等。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政府还决定了一旦中日直接会谈实现时，日本方面最大的让步腹案，主要内容是：

1．中国对日本、英美关系“采取善意中立”，“自发地使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

2．“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

3．“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全面和平后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

4．“如果在中国的英、美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

5．“满洲国不改变现状”；

6．“蒙疆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处理”；

7．“把香港让给中国”；

8．尽量答应“中国方面对帝国提出的保障安全的要求”，“为了反对美、英军队再度侵入中国，使中国承认（日本向中国）派遣必要的军队”。[101]

在日本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很为宽大的条件，“将使1932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成果，除满洲国外，一概化为乌有”[102]。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已入穷途末路，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

四天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通过了《对国民政府传达有关〈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的要点》，决定“先由中央派遣适当人数，并会同当地机关，共同向国民政府进行传达”[103]。随即，日本政府派遣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赴南京，向汪政府要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传达日本政府的决策。柴山中将原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与汪派人物关系密切，刚调任陆军省新职，即受命再次来华。

9月13日—14日，柴山中将与陈公博、周佛海进行会谈。柴山表示：“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易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工作”，但此次“谋和”，日本政府不出面，由汪政府出面进行，“且不可使外间知系日方所发动”；提出日本方面实行“全面和平”的条件，主要内容是：1．纯以平等立场讲和；2．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3．渝与英美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

4．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见后决定；5．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等[104]。为了保证“谋和”工作的顺利进行，柴山特别强调该项工作今后“由首相和外相联系，一切要南京方面采取措施，不让当地军方干预”[105]。

在会谈中，陈公博提出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后，“是否要在此线驻屯相当兵力？”柴山表示：“日本政府现在没有考虑这样的驻兵问题”，但“如果中国宣布中立，而美、英侵犯了中立”，“那时只凭中国政府的力量当然阻止不了美、英的侵犯”，“日本不能不考虑到在必要地点的必要驻兵问题”。陈公博又提出：“重庆在与日本言和时，必定担心日本果真能否如约执行？为了消除这个疑问，感到有第三国担任保证的必要。”柴山答称：日本对由苏联来作为中间人，“有充分的考虑”。随即，陈公博表示“可以提出反共问题作为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相接近的方法，现在能作为两方的共同目标的就是反共”。柴山当即表示赞同，并说：“日本对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加掣肘。”最后，双方谈及伪满洲国的存废问题，陈公博指出：如不撤销满洲国，“终为中日间一个极大障碍，而为中国生存的致命伤”，与重庆政府讲和也将“无从谈起”。柴山回答：“现在无法回答，在具体情况有发展时再行协商”[106]。经过双方会谈，陈公博表示：对于日方企图，“当努力求其贯彻”，周佛海也说要“遵命办理”，“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机会，完成预定目标”，并商定：“通过无线电与重庆联系，不是很好的办法”，必须派人去联络。9月28日，陈公博与周佛海决定派遣朱文雄赴重庆，向重庆最高当局转达日方“和谈”条件。直到次年5月底，朱文雄才返回上海，但“并无具体结论”。实际上，汪政府“大部分首脑内心认为此项工作不可能实现，对之表示消极”[107]。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这一决策，招至日本军方及政界不少人士的反对。战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批评说：“中央并未深入考虑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的关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国民政府近一年来几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弃努

力的实际情况，即行作出如此决定。”[108] 差不多在柴山来华的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推进此项工作，还特派和重庆不少要人保有长远历史关系的宇垣一成大将来华活动，以私人名义试探与重庆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9月中旬，宇垣一成偕坂西利八郎等，从中国东北开始，视察了华北、华中地区，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和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王揖唐、缪斌等会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宇垣一成回到东京后，曾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重庆工作需要开辟新路线，南京政府的存在对工作反有妨碍。”表示了反对由汪政府居间进行“谋和”活动的意见[109]。

但是，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中将却赞成并坚决执行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使得通过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持续到1945年初。然而，这一工作的日方主管部门却一变再变，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华工作上的混乱。最初，日本方面确定“由首相和外相直接联系”；10月25日，改由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担任当地日方负责人，受日本首相的直接指示行事；12月13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决定改由日本驻南京“大使”及在华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工作，并“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中央联系，以统一掌握并进行上述工作”[110]。

1945年春，由于“谋和”工作毫无进展，小矶国昭内阁决定改变方针，改由“日本政府自己直接进行缪斌工作”。“缪斌工作”是日本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谋和”活动的最后一幕。缪斌，虽为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却不属于汪精卫派，也与陈公博没有历史关系。他原为国民党在野政客，抗战爆发后，在华北投日，任新民会副会长，汪政府成立时，由日方推荐参加该政府，在政治上一直是汪派集团的反对派。他以为日军情报机关搜集重庆方面情报的机会，与重庆的友人经常联络，并与反对汪政府的日本人士交往，炫耀自己与重庆当局关系密切，建议由他居间进行“全面和平”的谈判。1945年3月16日，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缪斌受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之邀抵达东京活动。当晚，他

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向日本当局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案》，主要内容是：1．“南京政权立即宣布自动取消，成立留守政府”；2．“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政府成立时，立即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3．“停战协定正式发表时，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等[(111)]。3月21日，小矶国昭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议：“以缪斌案为基础正式进行和平交涉”，“允许缪斌使用无线电与重庆联络”等[(112)]。

小矶国昭的这一举动遭到日本驻南京“大使”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对，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致电日本政府，指出：“这种计划既违反过去的决定，也轻视汪政权，决无成功的希望，况且从缪斌的地位看，他所提出的使日本让步的方案的结果仅是被他个人及重庆政府所利用，不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对“缪斌工作”均不表赞同，外相重光葵直接面告天皇，认为“国家处于危局，日本应当采取的态度必须走大路，只要无亏大义名分，即使一旦国破，将来还有复兴的希望；若是玩弄不当的手段走入歧路，日本也许将永远灭亡”[(113)]。日本天皇亦反对“缪斌工作”，表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此时不应采取策略的手段，对整个大局是无益的”[(114)]。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争吵及天皇对此的决断，不仅使“缪斌工作”很快停止，而且使小矶内阁也因之而垮台。日本政府小矶内阁进行的“缪斌工作”表示日本政府在中日战争后期假手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已遭彻底失败。

二　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继小矶国昭成立新内阁。战局迅速恶化，4月5日，苏联政府通知日本，宣布废除届期的《日苏中立条约》。5月7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次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祝贺，表示：“纳粹政权既已崩溃，吾人深信贵国强大之军事力量，与其他盟国勇敢之军队通力合作以击败吾人远东敌人日本，必不

在远。”[115] 随即，日本海军在冲绳岛决战中失利，苏军移师远东，日本陆军声明准备本土决战，但已只剩下7000架飞机。日本天皇私下哀叹：“战况似乎较我想象的更坏。”[116]

日本政府在对华谋和失败后，转而试图邀请苏联出面斡旋媾和。5月11日—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作出重大牺牲，诱使苏联斡旋媾和。其主要内容是：1．防止苏联参战，“目前日本正以全部国力与英美交战，此时如苏联参战，帝国将被置于死地，因此无论对英美战争出现如何状态，帝国必须竭力防止苏联参战”；2．诱导苏联采取善意态度，“苏联的要求必将以废除《朴次茅斯条约》为重点，帝国当然要力争降低其要求，为达成协议，决定承认废除《朴次茅斯条约》和《日苏基本条约》，结果是：A．归还桦太，B．取消渔业权，C．开放津轻海峡，D．出让北满各铁路，E．苏联在内蒙的势力范围，F．租借旅顺、大连也需做好思想准备，不得已也可割让千岛北半部，但最希望将朝鲜留在我方，南满作为中立地带，尽可能维持满洲帝国的独立，关于中国，则建立日、苏、中三国共同体制”；3．邀请苏联作为结束战争的斡旋者，“迅速开始日苏两国的会谈，我方应使苏联了解，苏联此次对德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帝国维持中立之故，并应说明，考虑到将来苏联与美国可能发生对抗的关系，使日本保持相当的国际地位，是对苏联有利的。此外并要阐明日、苏、中三国有团结的必要，应极力诱导苏联达到上述目的”等[117]。

据此，5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及三国间一切协定，缓和对苏关系。6月3日起，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奉命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两次会谈，转达日本政府的意向。6月22日，美军完全占领冲绳岛，战况进一步恶化，日本天皇下令：“关于结束战争问题，此时希望不拘泥于历来的想法，从速进行具体研究，力求促其实现。”24日、29日，广田再度两次与马立克会谈，并面交了日方起草的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文本，马立克答应向政府报告，但随后便避不见面。7月7日，天皇召见首相催促派遣特使赴

苏。12日，近卫公爵奉派为遣苏特使，准备携带天皇亲笔信前往苏联，日本外相与马立克交涉，希望苏联同意其入境。13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奉命将日本外相的电报内容转告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8日，苏方答复："鉴于近卫特使的使命不明确，不能回答诺否。"19日，佐藤将此结果报告外相东乡，并劝告东乡说，日本将不得不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21日，日本政府针对苏联的答复，再电佐藤大使批示说：近卫使团是为了请求苏联斡旋以结束战争，并明确表示日本很希望奉行一项在战争中和战后都与苏联实行合作的政策；同时宣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但只要不是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日本是要和平的，亦即近卫将要求苏联政府为日本争取到他们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而日本政府则准备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24日，佐藤收到电报，25日转达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并向苏方保证近卫一定会带来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包括结束战争和改善日苏关系的内容，暗示近卫将带来某些东西奉献给苏联。但苏联方面仍未答复[118]。这表明日本请苏联斡旋媾和，完全是单方面的想法。日本外交重臣重光葵就对此表示疑义，他对于苏联迟迟不答复一事评价说："答复是会来的，但答复的内容恐怕与日本期待的完全相反吧！"[119]

更为严峻的考验正摆在日本政府和军部面前。7月17日，为处理德国善后问题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在波茨坦举行。其时，美国在新墨西哥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获成功，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建议杜鲁门总统，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前应劝告日本投降，警告日本如不投降，就将使用这种毁灭性的炸弹。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2．《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现，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3．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4．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等等[120]。该公告给了日本政府一次结束战争的机会，也断绝

了日本有条件议和之路。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激烈争吵。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发表谈话称："该宣言只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并未予以重视，只有置之不理。我们坚决完成战争。"[121] 表明了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态度，仍寄希望于苏联的斡旋。7月30日，佐藤拜会苏联外交部，声称要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办不到的，但是，假如日本的体面和生存能得到保证，日本准备"以重大妥协的条件"结束战争，日本准备为苏联调停付出高代价。但苏联方面答复，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在柏林，无法答复[122]。日本的顽固态度，给日本人民再次造成灾难性的打击。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其巨大的杀伤力，使日本朝野极为震惊。同日，杜鲁门总统发表谈话，宣布"吾人现已开始使用此具有可怕威力之炸弹攻击日本，势将完全击毁日本之作战能力，日本不投降则自招毁灭矣！"随即，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布："不久有一种改良之原子弹出现，其效力且将'数倍'于目前之新武器"，进一步给日本施加压力[123]。8月8日，莫洛托夫应约会见佐藤，送交了苏联对日进入战争状态宣言书，内称：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使日本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失去了一切根据"，苏联决定"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124]。苏军对日作战十天，歼灭关东军、伪满军和伪蒙军约70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60.9万人被俘，苏军伤亡3.2万人[125]，这使日本请苏联斡旋媾和的最后希望破灭。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军部坚持须在四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1．维持天皇制；2．敌人既不在本土登陆，也不得占领；3．在海外各地日军的撤退由日本自主地实行；4．战犯之裁判处罚由日本自行办理；外务省则主张只保留第一个条件。正当两种意见争执之时，美军又在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126]。

8月10日，日本政府将在坚持天皇制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

的照会通过驻瑞士和瑞典公使转达美英苏中四国。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盟国答复日方，主要内容是：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听从盟军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到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等[127]。消息传出，中国陪都重庆彻夜欢腾，庆贺战争胜利结束[128]。

日本接获同盟国复照后，内部继续发生争吵，军部反对接受同盟国公告，少壮派军人甚至计划发动叛变，铲除主和派阁员，挟持和拥护天皇继续实行战争政策，阻止盟军登陆，主张在本土与敌人决一雌雄，万一战败的话，全国国民即使都自杀，也在所不惜。他们击杀近卫师团长和参谋长，伪造命令，袭击宫城，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全力搜寻天皇录音唱片，阻止天皇对国民的投降广播[129]。14日，日本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同盟国答复。15日，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录音通过叛乱者所未探知的电台向全国播送，宣告向同盟国投降。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17日，皇族东久迩内阁成立，重光葵重任外交大臣，处理日本投降问题。9月1日，日本大本营根据盟军统帅部命令通令国内外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东三省除外）及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日军向中国战区蒋委员长投降；东三省及朝鲜（北纬38度以北）及南库页岛方面之日军向苏军投降；安达曼、尼科巴、缅甸、越南（北纬16度以南）、马来亚、婆罗洲、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俾士麦及所罗门岛方面之日军，向蒙巴顿元帅或澳军司令投降；日本本土及朝鲜（北纬38度以南）及菲岛之日军，向美太平洋方面陆军总司令投降[130]。

8月15日，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致电美、英、苏三国领袖，庆贺盟邦获得全面胜利。同日，致电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6项投降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

后，日军可暂保留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等等[131]。次日，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全权处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宜。自8月21日至9月5日，何应钦将军共向日军冈村宁次发出20个备忘录，指示有关日军投降事宜[132]。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参加了该仪式。仪式结束后，数千架飞机越过“密苏里号”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就座受降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终告结束。

在正面战场，从9月11日至10月中旬，由国民政府军接受投降的日军共有1个派遣军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3个步兵师团、1个坦克师团、2个飞行师团、41个独立旅团，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共计128.32万人，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万支、手枪6.0377万支，轻重机枪2.9822万挺、主要火炮1.2446万门，步枪弹1.80994亿发、手枪弹203.5万发，各种炮弹207万发颗，炸药6000吨，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包括特种车）1.5785万辆，各种飞机1068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万吨，马匹7.4159万匹等[133]。在敌后战场，从8月11日至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发起全面的大反攻，对于不肯投降的日本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共收复国土31.5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7万，收复城市190座，毙伤日伪军

23万人[134]。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三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载入史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于世界、亚洲，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长期以来，西方有关“二战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往往忽视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135]，战败国日本的某些著作更是别有用心地贬低中国抗战对于战胜日本所起的作用，甚至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136]。中国在所有的反法西斯国家中最早举起抗击日本侵略的旗帜，最后结束战争，是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间最长的国家。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中国人民英勇卓绝的悲壮斗争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9月3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战争阶段。日本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法西斯侵略战火逐渐蔓延到亚、欧、非三大陆，日、德两大战争策源地在远东和欧洲形成，整个世界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高举反侵略战争的旗帜，实行全民族全面的抗日战争，独力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百万大军，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而且使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在长时间内无力扩大侵略范围。同时，中国抗战也给予面临德、日西东夹击危险的苏联以有力的支持，再者，中国抗战不仅捆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而且导致德、日协调其全球战略的谈判一再搁浅，从而延缓了日、德、意结成军事同盟的进程，使英、法在欧战爆发时未遭日本在远东的夹击。总之，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推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并使英、法、苏在大战来临时处于较好的政治军事态势。

1939年9月3日至1941年12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全面战争的新阶段，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较前更为重要。除中国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国敌后战场大显神威，创造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光辉典范。据日方资料统计，仅1940年中共敌后部队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交战2.0123万次，足见战斗之频繁和激烈[137]。日本天皇曾忧心忡忡地以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最终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为例，担忧日军在中国的前途。而中国敌后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却为同盟国军队所借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财富。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继续牵制着日本军队的主力，使德、日始终未能将欧亚战场连成一片，使美、英、苏得以实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苏联得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集中兵力对付德国，并使太平洋战争推迟爆发，美、英、荷等国取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这是中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重要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扩展至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20多亿人口，战火燃遍了亚、欧、非、大洋四大洲，作战区域面积达到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场始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日本陆军主力被牢牢地牵制在中国5000公里的正面战线和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区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的正面战场吸引了大批日军。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一号作战”，攻占了河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大面积国土，也使其当时所能调动的机动兵力全部陷于中国战场而无法动弹。同时，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英美军队配合下，入缅作战，于次年3月打通中印公路，为结束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在敌后战场，尽管日军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使敌后根据地在1941年—1942年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开展了英勇卓绝的反扫荡战争，不仅保卫、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从1944年春开始局部反攻，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条件。1945年更开展大反攻，收复了250余座中小城市和大片国土。

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与盟军在苏联、欧洲、北非以及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互相呼应，彼此支援，共同为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在此期间，中国还积极参加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普遍安全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波茨坦公告》等重要的国际文件，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联合国的建立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员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连续八年的英勇抗战是打败日本法西斯和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原因之一。任何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位与作用的论调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中国抗日战争也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自1840年起，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无数次斗争，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但其结局却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侵略最为频繁、残酷、贪欲最强的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相继吞并了原属国琉球、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的广大地区，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从1931年起，中国人民经历六年局部战争、八年全面战争，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门之外，中国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收归中国版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民族耻辱。中国抗日战争以弱胜强的成功典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极大推动了世界，尤其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大批亚洲新独立的

国家紧随中国抗战胜利之后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国际格局由此而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抗日战争，使中国近代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强烈愿望和奋斗目标。20世纪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废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虽也取得过若干进展，如中俄、中德、中奥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部分租界的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实现等，但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体系却始终未能打破。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中国军民对于战争的巨大贡献，为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升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性机遇。首先，中国成为《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四大领衔国之一，后又因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亦称“四强宣言”）而成为“四强”国家，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其次，1943年1月，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同时签署，除中国与日德意处于战争状态，已自动废除互相间一切条约外，其他在中国享有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国家，先后仿照中美、中英新约的成例，与中国签署新约，尽管个别条约中还有某些缺陷，但从总体上说外国在华享有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予废除，中国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之外的所有失地、租界、租借地、铁路附属地以及北平使馆界的主权。美国还主动废除了为时数十年之久的排华法案，借此表示美国“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为和平时期的伙伴”[(138)]。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是抗日战争的重大成果之一。

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实现民族觉醒和国家重振的历史机遇。日本法西斯企图灭亡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入侵，激发起全民族空前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所积聚起来的民族凝聚力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如同火山般地喷发出来。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沉睡中的睡狮”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骤然觉

醒，奋起抗争。血战了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同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技能出技能，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始终高涨，其呼声之高，传播之广，民众发动之普遍，同仇敌忾精神之旺盛，使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潮达于顶点[139]。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阶段，使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

---

(1) 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致罗斯福备忘录（1944年6月中旬），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2) 参见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0页。

(3)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16页；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80页。

(4) 《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5)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4年7月8日），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82页。

(6) 《战时外交》（三），第643页。

(7)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3卷，第6365、6368页。

(8)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第172页。

(9) 参见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第783页；冷欣：

《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年版，第104页。

(10) 国民政府国防战史局及战史会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24—727页。

(11) 参见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17页。

(1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278—279页。

(13)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4)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5) 陈公博：《对于起诉书的答辩》，上海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

(16) 张耀宸：《汤恩伯勾结敌伪的一个例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7) 徐向宸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8) 徐向宸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9)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江苏档案馆藏。

(20)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江苏档案馆藏。

(21)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上海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

(22) 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中国近代史事论集》，近代中国杂志社1994年版，第477—485页。

(23) 《大公报》，1942年4月14日。

(24) 参见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50页。

(25) 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中国近代史事论集》，第491—496页。

(26) 萧宜增：《台湾党务工作意见书提要》（1944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7) 国民党台湾党部：《“四一七”告国内外同胞书》（1944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8) 国民党台湾党部：《请求恢复台湾省制呈文》（1944年4月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9) 台湾义勇队：《代拟统一加强台湾革命工作，以利收复台湾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0) 《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状况》（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1) 《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状况》（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2)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3) 谢东闵等：《拟请中央统一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1945年5月），抄自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展览照片。

(34) 据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台北东北文献杂志社2000年版）研究：“综括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八年期间，对接收东北的筹划，其荦荦大者，在政府方面为恢复东北四省政府建制，以表收复失地之决心，成立东北调查委员会，以规划战后东北之建设。在中国国民党方面，于敌后设立东北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以策动沦陷区民众及伪军；组织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以整合后方东北民众之行动；成立东北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以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于敌后继续发展党务组织，结合东北青年，以待光复。”本专题的写作参考了陈立文的研究成果，表示感谢。

(35)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89—97页。

(36) 转引自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1—123页。

(37) 吴铁城、陈立夫：《为研拟彻底调整东北党务及各团体意见呈蒋委员长文》（1942年2月26日），转引自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2—123页。

(38)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08—111页。

(39) 参见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1卷，第70—71页。

(40) 吴焕章：《日本投降后东北接收的回顾》，《东北研究论丛》

（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7年版，第148页。

(41)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3—127页。

(42) 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传记文学》第27卷第4期。

(43) 国民党当局这一坚定立场在海外宣传中得到充分贯彻。转引自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卷，第5323页。

(44) 邵毓麟：《如何解决日本事件》，《大公报》，1943年1月3日。

(45) 《大公报》，1943年1月5日、6日。

(46) 原件无时间，当在1945年春，台北“国史馆”藏。

(47)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3卷，第387页。

(48) 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5—666页。

(49)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第639—641页。

(50)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议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台北“国史馆”藏。

(51)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4卷，第866页。

(52)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遵办之条款草案》，台北“国史馆”藏。

(53)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议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台北“国史馆”藏。

(54) 关于英、美、苏对朝政策。参见朱宗震：《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55)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38页。

(56)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39页。

(57)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第288页。

(58)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50页。

(59)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金九函》（1945年5月16日），中国

国民党党史会藏。

(60)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中央吴秘书长之人抄6月8日韩国情报》（1945年6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1) 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22日。

(62) 《中央秘书处特6711号上总裁签呈》（1944年8月19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延世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

(63) 《外交部关于韩国临时政府请示承认事上主席签呈》（1944年7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4) 《蒋主席致吴秘书长（32）字晋侍秦电》（1944年1月2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5)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送军事委员会之《太平洋战争与朝鲜现况情报》（1945年3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6) 《蒋主席致吴秘书长（34）卯尤（1）侍秦电》（1945年4月12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三），第385页。

(67) 《军事计划书》，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170—171页。

(68) 《扶助韩国独立方案》，原件无时间，应为1945年初；台北“国史馆”藏。

(69)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70)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第209页。

(71) 《金九致蒋介石备忘录》（1945年8月24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461页。

(72) ［韩］爱国同志援护会：《韩国独立运动史》，第381页。对于韩国光复军的人数，1946年1月10日军事委员会核准的人数为1021人，与5万人的说法相去甚远。参见中国军事委员会：《韩国光复军各部队及驻地人数表》，上海档案馆藏。

(73) 《战时外交》（二），第720—781页。

(74) 参见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

103—104页。

(75) 《顾维钧回忆录》第4卷，第457页。

(7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44页。

(77)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44页。

(78) 参见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1页。

(79) 1943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但同时声明并非承认其为法国政府，参见《大公报》1943年8月28日。

(80)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32页。

(81) [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译本）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97页。

(82)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谈之各项方案要请示案》，国民政府档案第403卷，台北“国史馆”藏。

(83)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人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84)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14—15页。

(85)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38—39页。

(8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583页。

(87)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

(88)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4月15日）。

(89)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21日）。

(90) 《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4日。

(91) 《周佛海日记》1943年2月2日。

(92)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年版，第151—152页。

(93)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

(94) 《周佛海日记》1943年9月29日。

(95)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2日。

(96)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4日。

(97) 《中华日报》，1943年11月1日。

(98) 《周佛海日记》1944年6月4日。

(99)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221页。

(100)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1—602页。

(101)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4—605页。

(10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195—196页。

(103) 日本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第175—176页。

(104) 《周佛海日记》1944年9月13日。

(105)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221页。

(106) 《柴山中将报告》，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第177—179页。

(10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0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0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2)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75页。

(113)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版，第395—396页。

(114) 台北“国史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月—4月，第988—989页。

(115) 《大公报》1945年5月9日。

(116)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14页。

(11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卷，第622—623页。

(11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编）下卷，第638—639、642—643页；［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译本）第8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6页。

(119)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18页。

(120) 《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转引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298—299页。

(12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卷，第644页。

(122)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译本）第8卷，第209页。

(123)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6卷，第649、655页。

(124) 《苏联对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宣言书》（1945年8月8日），《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5页。

(125) 参见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126) 第二颗原子弹原定8月11日投掷，提前投掷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预测11日天气不佳，不如说是与苏联参战有关。美国驻苏军事使节团团长曾有如下回忆：“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时，苏联的报纸无任何报道，但苏联最高当局无疑对之非常关切。苏联不能不取得太平洋和平会议的入场券，因而必须加快步伐。否则，舞台幕启，观众满座，恐怕将无法挤进。对于阻碍苏联插手远东战争并尽量抑制其打败日本所作的贡献，其方法即尽早投掷原子弹。而苏联既已参战，则必须尽早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27) 《中美英苏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1945年8月11日），《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9页。

(128) 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于10日晚8时许，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爆竹与锣鼓声，打破山城八年来之沉寂，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纷纷手持火棒，自各处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市区交通因行人拥挤，几难维持，无数盟国将士手持啤酒或川产大曲沿街边走边饮，欢喜若狂。”“记者于8时30分起，自上清寺出发，步行全市，直至过街楼为止，一路可见兴奋之情形，为生平所未有，都邮街爆竹声响震天，火花四射，织成美丽之火网，行人穿越其间，识与不识，彼此点头握手。各处舞厅闻讯后，即奏联合国国歌及中华民国国歌”，“不久均开放门户，任人出入，载歌载舞，心花怒放矣。三年来无空袭之重庆，探照灯早已销声匿迹，乃今晚大放光明，光芒满天，已变为象征和平之火炬”。参见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6卷，第668—669页。

(129)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22—423页。

(13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第723页，台北“国史馆”藏。

(131) 何应钦：《八年抗战》，台北1969年印行，第315页。

(132)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5卷，第7219—7247页。

(133)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争史》第3部《抗日御侮》第10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8—119页。

(134) 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第680页。

(135) 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把1940年7月“不列颠之战”到1941年6月苏联参战这段期间称为“单独作战”时期，并把该书第2卷的标题定为“英国人怎样单独坚守堡垒”，完全不提中国抗战早自1937年7月就开始单独抵御日本侵略，也间接打击了德国和意大利。

(136) 数十年来，日本人的此类谬论一直有着相当的市场，近年来更有发展滋长的势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是反映日本右翼势力荒谬历史观的代表作。该书从根本上否定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叫嚣“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防卫战争”，“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胡说1943年大东亚会议发表的《大

东亚宣言》明确宣布“解放亚洲”的思想，战后十年为亚非会议所继承等，并批评日本的进步史学观为“历史自虐症”和“民族自虐症”，扬言要恢复日本的“民族精神”，重树“大和民族正确的历史观”。

(137) ［日］《现代史资料》第9卷，日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470—471页。

(13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8页。

(139) 姜义华认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曾有过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即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大浪潮“激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而起，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达于顶点”（《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陈公博档案，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上海

陈公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褚民谊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南京

顾维钧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韩国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军事委员会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台湾调查委员会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台湾义勇队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外交部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汪精卫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汪精卫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

汪精卫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萧宜增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越南档、韩国档、马来档、泰国档、琉球档、菲律宾档、缅甸档、印度档、台湾档等），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藏，台北

周佛海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金九函》，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请求恢复台湾省制呈文》，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四一七”告国内外同胞书》，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外交部三十三年下半年施政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百七十四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第九次会议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讨论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青年模范团暂行总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国史馆”藏，台北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经过》，“国史馆”藏，台北

《中央税警总团条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文著作

《八路军内日本兵》，［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财政年鉴第三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惨胜》，马振犊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长沙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

《陈诚回忆录》，陈诚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陈纳德和飞虎队》，陈香梅著，石源华、金光耀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重庆的喜剧——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情》，王千秋著，出版地不详，1946

《重庆工商史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1989

《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冷欣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大东亚战争全史》，［日］服部征四郎著，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

《党史概要》，张其昀著，台北，文物供应社，195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8卷，［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本书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

《俄帝侵略中国史》，吴相湘著，台北，正中书局，1969

《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甘地与现代印度》，吴俊才著，台北，正中书局，1987

《革命文献》第80辑，秦孝仪主编，台北，正中书局，1977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金光耀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杨昭全等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贵州省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国共两党谈判通史》，毛磊、范小芳等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冯崇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国民参政会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国民革命战争史》第3部《抗日御侮》第10卷，蒋纬国主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张弓、牟之先主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国民政府年鉴》，行政院编印，出版地不详，1943

《国民政府时代之中英关系》，杭立武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88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文天行编，成都，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1985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石源华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朱宗震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湖南四大会战》，全国政协本书编写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胡志明全集》（中文版），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

《胡志明与中国》，黄铮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胡志明在中国》，蒋永敬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华北抗日根据地》，魏宏运等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2辑，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印，上海，1982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回忆与研究》下卷，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基诺族起义》，王军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美］费正清、费维凯主编，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蒋夫人宋美龄言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蒋介石与蒋经国》，［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郭荣赵编译，台北，“中国研究中心”，1978

《蒋总统集》，“国防研究院”等编，台北，1960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张群、黄少谷著，台北，1985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陈翰笙等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解析冯友兰》，郑家栋、陈鹏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今井武夫回忆录》，［日］今井武夫著，本书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近代唯心论简释》，贺麟著，独立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2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开罗会议与中国》，梁敬錞 著，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62

《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穆欣著，重庆出版社，1992

《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0

《抗日战争》，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张宏志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张宪文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黄修荣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周天豹等著，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等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周天豹等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抗日战争史论集》，刘凤翰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抗日战争指导：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蒋纬

国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

《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林泉编，台北，正中书局，1983

《抗战时期的经济》，清庆瑞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戴知贤、李良志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

《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何思眯著，台北“国史馆”，1997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王洪峻著，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延安时事研究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谢本书、温贤美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

《苦难与斗争的十四年》，步平等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刘放吾将军与仁安羌大捷》，刘伟民著，上海书店，1995

《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美］沙勒著，郭济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美］麦克尼尔著，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美国与移民》，邓蜀生著，重庆出版社，1990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迷惘集》，张忠绂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缅甸之战》，戴广德著，黄山书社，1995

《缅甸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1942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教育史》，李华兴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姜克夫编著，北京，中华书局，

1991

《民国卅一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概况》，中央银行经研处编印，出版地、时间不详

《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魏宏运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民国政制史》，钱端升著，上海书店，1990

《闽浙赣抗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1986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1990

《陪都工商年鉴》，傅润华、汤约生编，重庆，文信书局，1945

《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宋进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中央档案馆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中央档案馆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

《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等编，北京出版社，1995

《日伪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上海金融史话》，本书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史迪威事件》，梁敬錞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4

《使韩回忆录》，邵玉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孙科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李良志、李隆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蔡德金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朱子家著，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伪满经济统治》，滕利贵著，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伪满洲国史新编》，解学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金融研究所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

《文化与人生》，贺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

《行政三联制大纲》，蒋介石著，出版地不详，1940

《徐永昌日记》，徐永昌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

《远征印缅抗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凌其翰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在华使命》，［俄］崔可夫著，万成才译，陈启民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战争回忆录》第3卷，［法］戴高乐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珍珠港事变到雅尔塔协定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李荣秋著，台北，东吴大学，197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贾玉芹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十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出版地不详，197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14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雷云峰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郑友揆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中国的纠葛》，［美］赫伯斯·菲斯著，林海等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1989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刘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纪事》，石源华著，汉城，高句丽出版社，1997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程思远主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出版地不详，1945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出版地不详，194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出版地不详，1984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中执会中央训练委员会，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史》，宋春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史纲》，彦奇、张同新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孔经纬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

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赵德馨等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中国近代经济史》，陈绍闻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经济史纲》，魏永理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严中平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蔡尚思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田酉如著，北京出版社，1995

《中国抗战军事史》，罗焕章、高培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

《中国抗战时期税制概要》，匡球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特殊工人史略》，李联谊著，抚顺矿务局煤炭志办公室，1991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美］伊·卡恩著，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中国通货膨胀（1937—1949）》，张公权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台北，文物供应社，1984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史料长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中华民国外交史》，石源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陈志奇辑编，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86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主编，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

《中美关系论丛》，汪熙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中美关系史（1911—1950）》，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林承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佛海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邱明轩编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

中文报纸

《大公报》，重庆、长沙、上海

《桂林日报》，桂林

《华西日报》，成都

《解放日报》，延安

《晋察冀日报》，出版地不详

《扫荡报》，桂林

《商务日报》，重庆

《盛京日报》，沈阳

《西康日报》，雅安

《新华日报》，重庆、南京

《新华时报》，重庆

《新中国报》，上海

《新中华报》，延安

《云南日报》，昆明

《中华日报》，南京、上海

《中央日报》，重庆、南京

中文期刊

《朝鲜义勇队通讯》，武汉、桂林、重庆

《传记文学》，台北

《东北研究论丛》，台北

《复旦学报》，上海

《解放》，延安

《近代史研究》，北京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民主周刊》，昆明

《民族团结》，北京

《南京大学学报》，南京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北京

《商务月报》，重庆

《商业统制会刊》，出版地不详

《申报年鉴》，上海

《申报月刊》，上海

《宪政月刊》，重庆

《旬报》，出版地不详

《延安大学学报》，延安

《政府公报》，重庆、南京

《政治月刊》，南京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

《中华论坛》，重庆

《中华新声》，上海

日文著作

《动乱下的满洲矫正》，满洲矫正追想录刊行会，1976

《满洲产业经济大观》，日本产业调查会，1943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80—1945）》下卷《文书》，外务省编，1969

《现代史资料》第9卷，日本みすず书房，1964

《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东京朝原出版社

日文报刊

《东京每日新闻》，东京

韩文著作

《韩国独立运动》（一），秋宪树，延世大学出版社，1972

英文著作及报刊

Hull，Corde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

Liu，Xiaoyuan：*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41-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Romanus，C.F. & Sunderland，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1953

Roosevelt，Elliott：*As He Saw It*，Duel Sloan and Pearce，New York，1946

Sainsbury，Keith：*Turning Points*：*Roosevelt*，*Stalin*，*Churchill Chiang Kaic-shek.*，*1943*：*The Moscow*，*Cairo*，*and Teheran Confer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Slim，William：*Defeat into Victory*，London，1956

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1941*（*Japan*），Washington，1943

Morgenthau Diary，*China*，Vol．1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里阿罕

阿南惟畿

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艾青

艾芜

艾尔文（Aylwin）

艾奇逊（Dean Acheson）

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艾思奇

安藤清江

B

巴莫（Ba Naw）

巴苏华（B．K．Basu）

白崇禧

柏斯颂

坂西利八郎

包瑞德（David D．Barrett）

保大

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

鲍文樾

贝尔纳斯（John M．Byrnes）

贝志高（Pechkoff）

彼得罗夫（Appolon Alesandrovich Petrov）

毕道文

勃兰特（George H．Brett）

博古

薄一波

卜道明

布伦南（Brennan）

C

蔡野火

曹禺

柴山兼四郎

柴意新

陈豹

陈诚

陈迨

陈群

陈仪

陈毅

陈云

陈白尘

陈宝骅

陈璧君

陈伯达

陈布雷

陈春圃

陈岱孙

陈德坌

陈公博

陈国权

陈果夫

陈汉中

陈济棠

陈继桓

陈君慧

陈朗川

陈立夫

陈勉吾

陈铭枢

陈牧农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陈庆云

陈绍宽

陈涉藩

陈省身

陈士瀛

陈潭秋

陈廷川

陈锡联

陈信哉

陈学淡

陈耀祖

陈寅恪

陈正云

陈中孚

陈子彝

成吉思汗

程烈

程潜

程克祥

程天放

程万军

程泽润

重光葵

褚辅成

褚民谊

川本

崔昌益

崔可夫（В．И．Чуйков ）

D

大谷光瑞

大野静夫

戴笠

戴安澜

戴传贤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尼斯（L．E．Dennys）

戴维斯（John Davis）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

邓发

邓小平

狄膺

丁聪

丁默邨

丁惟汾

丁治磐

东久迩稔

东条英机

东乡茂德

董必武

董显光

都甲

杜鲁门（Harry S．Truman）

杜聿明

杜月笙

渡正监

段锡朋

E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F

范拂公

范鸿泰

范文澜

范文同

方先觉

方禹镛

费孝通

丰岛房太郎

冯白驹

冯友兰

冯玉祥

凤子

服部卓四郎

傅钟

傅秉常

傅式说

傅斯年

富双英

G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甘丽初

冈村宁次

冈野进

高岗

高濑

高山

高斯（Clarence E．Gauss）

高岛南次郎

高凤英

高吉人

格鲁（Joseph C．Grew）

古海忠之

谷正鼎

谷正之

顾维钧

顾执中

顾祝同

关口保

广田弘毅

郭秉文

郭沫若

郭念基

郭受天

郭泰祺

郭仲容

H

哈里曼（Harriman）

韩斌

韩德志

杭立武

郝鹏举

何励生

何绍周

何思敬

何香凝

何应钦

河边正三

贺麟

贺龙

贺屋兴宣

赫尔（Cordell Hull）

赫尔利（Patrick J．Hurley）

黑田嗣

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

横山勇

洪钫

洪深

侯腾

胡敦

胡风

胡光　见胡志明

胡霖

胡适

胡素

胡汉民

胡厚基

胡仁奎

胡世合

胡世泽

胡学览

胡毓坤

胡志明

胡宗南

华达刚

华莱士（Henry A．Wallace）

华罗庚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怀特（White）

黄江帛

黄景升

黄琪翔

黄文欢

黄炎培

黄永淮

黄振光

黄宗江

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J

季米特洛夫（Georgi Mikhailovich Dimitrov）

江荣浦

江上达

蒋伯诚

蒋鼎文

蒋介石

蒋经国

蒋梦麟

蒋廷黻

蒋纬国

今井武夫

金九

金山

金白渊　见金科奉

金昌满

金定洲

金科奉

金九东

金奎植

金若山

金学奎

金学武

金岳霖

近卫文麿

酒井直次

居里（Lauchlin Gurrie）

居正

K

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

卡拉黛维

凯丰

阚维雍

康生

克拉克（Clark）

孔子

孔祥熙

孔庸之　见孔祥熙

堀内干城

L

拉佛莱特

蓝马

老舍

雷海宗

黎松山

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

李璜

李觉

李宝链

李承晚

李初梨

李春岩

李鼎铭

李范畴

李富春

李公朴

李济深

李杰庸

李井泉

李圣五

李士群

李守信

李维民

李维诺夫

李文范

李仙洲

李先念

李亚安

李玉堂

李政道

李宗黄

李宗仁

李祖芬

梁寒操

梁华盛

梁敬锜

梁漱溟

廖承志

廖耀湘

列宁（В．И．Ленин ）

林彪

林肯（Abraham Lincoln）

林森

林蔚

林柏生

林伯杰　见范文同

林伯渠

林里斯格（Linlithgow）

林森木

林同济

林语堂

林云陔

林祖涵　见林伯渠

铃木贯太郎

铃木贞一

刘斐

刘杰

刘戡

刘哲

刘百川

刘伯承

刘伯龙

刘昌义

刘多荃

刘放吾

刘鸿生

刘澜涛

刘尚清

刘少奇

刘文辉

刘相图

刘奕基

刘郁芬

刘振东

柳树人

龙云

娄凝光

卢登（Ludden）

卢汉

鲁迅

鹿地亘

鹿钟麟

吕公良

吕国铨

吕海群

吕旃蒙

吕振羽

吕正操

罗君强

罗隆基

罗纳斋

罗瑞卿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卓英

洛勒尔

骆宾基

落合甚九郎

M

马烽

马亮

马纳

马本斋

马凤舞

马格纳森

马克思（Karl Marx）

马立克

马维骥

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

马愚忱

马占山

麦格鲁（John Magruder）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麦克卢尔（Robert B．McClure）

麦克鲁（John McCloy）

毛邦初

毛泽东

毛泽民

茅盾

梅津美治郎

梅思平

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

孟秀椿

缪斌

缪流

摩斯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莫德惠

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 ）

木克

木下勇

N

拿破仑（Napoleon）

尼赫鲁（Jawaharlal Pandit Nehru）

聂荣臻

宁春霖

农经猷

诺克斯（Knox）

O

欧震

欧阳山

欧阳予倩

P

潘大逵

潘公展

潘光旦

潘佩珠

潘友新

庞炳勋

裴复恒

彭真

彭璧生

彭德怀

彭士量

彭学沛

蒲春律

朴孝三

朴一禹

溥仪

Q

齐夫斯

钱端升

钱公来

钱新之

浅野清

乔万选

乔治六世（George VI）

秦邦宪

秦景伟

覃振

青木一男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R

任弼时

任援道

荣臻

荣子桓

阮爱国　见胡志明

阮海臣

阮祥三

S

桑伯格尔德

森健清

沙汀

山本五十六

山光美

山内正文

山田一郎

杉本一夫

杉山元

商震

上官云相

邵力子

邵毓麟

沈鹏

沈鸿烈

盛家伦

盛世才

施肇基

辻久一

石正

石宝山

石井四郎

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史密斯（Smith）

史汀生（Henry Stimson）

矢琦

寿景伟

司徒慧敏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斯诺（Edger P．Snow）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

斯利姆（William Slim）

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

寺泽吉藏

松井敏夫

松觉野

宋美龄

宋庆龄

宋劭文

宋之的

宋子文

苏成德

孙科

孙云

孙宝继

孙殿英

孙立人

孙连仲

孙良诚

孙明瑾

孙一峰

孙志远

孙中山

孙仲立

索尔登（Daniel Sulton）

T

台尔曼（Ernst Thälmann）

太田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谭平山

谭文彬

汤恩伯

汤良礼

汤应煜

汤用彤

唐生智

唐寿民

陶希圣

田汉

田凯

田尻爱义

田雨时

田中信一

畑俊六

W

万福麟

汪精卫

汪曼云

王力

王明

王秉钧

王超奎

王宠惠

王促豪

王德溥

王稼祥

王劲哉

王敬久

王克敏

王陵基

王敏中

王世杰

王世泰

王鑫昌

王学文

王亚平

王耀武

王揖唐

王云五

王志延

王仲廉

王竹溪

王卓然

威尔基（Wendell L．Willkie）

韦尔斯（Sumner Welles）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道明

魏德迈（Albert C．Wedemyer）

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

温华达亚肯亲王

温源宁

温宗尧

闻兰亭

闻一多

翁文灏

吴晗

吴大猷

吴鼎昌

吴国桢

吴化文

吴焕章

吴经熊

吴敬恒

吴开先

吴凯声

吴颂皋

吴铁城

吴贻芳

吴玉章

吴稚晖　见吴敬恒

吴忠信

吴宗尧

武　亭

武光品

武鸿卿

武尚权

X

西戎

希特勒（Adolf Hitler）

夏衍

夏奇峰

向达

项　英

项致庄

萧文

萧劲光

萧叔宣

萧宜增

萧毅肃

小矶国昭

小林信男

谢东闵

谢觉哉

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

谢文达

邢森洲

熊十力

熊式辉

徐杰　见陈潭秋

徐堪

徐悲鸿

徐思平

徐维震

徐向前

徐义宇

徐永昌

徐子珍

许宝禄

许国璋

许孝炎

绪方竹虎

薛穆（Sir Horace James Seymour）

薛岳

Y

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

严继祖

岩崎民男

盐泽清宣

阎传绶

阎锡山

阳翰笙

杨森

杨虎城

杨揆一

杨清民

杨尚昆

杨树勋

杨云竹

杨振宁

杨中立

姚雪垠

耶稣（Jesus Christ）

野村吉三郎

叶蓬

叶挺

叶楚伧

叶剑英

叶浅予

叶圣陶

影佐祯昭

于伶

于怀安

于学忠

于右任

余韶

余程万

余意万

宇垣一成

裕仁

袁履登

原清志

Z

臧克家

泽田茂

张超

张恒

张继

张澜

张群

张苏

张轸

张道藩

张德能

张鼎丞

张定蟠

张发奎

张恨水

张嘉璈

张建相

张景惠

张君劢

张岚峰

张厉生

张佩公

张启黄

张迁孟

张清常

张仁蠡

张申府

张闻天

张心青

张学良

张振光

张志让

张治民

张治中

张中奉

张忠绂

章伯钧

赵安博

赵树理

赵素昂

赵锡田

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

甄纪印

郑洞国

郑律成

郑延卓

中村丰一

中村小析

中村义一

中岛透

周伯凤

周恩来

周而复

周佛海

周励武

周隆庠

周培源

周学昌

朱德

朱深

朱伯屏

朱光亚

朱霁青

朱家骅

朱文雄

朱自清

邹鲁

邹平凡

邹韬奋

邹作华

左权

左舜生

佐藤贤了

佐藤尚武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十一卷
(1945—1947)

汪朝光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十一卷

（1945-1947）

汪朝光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赢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终胜利。这是永垂史册的历史性胜利，是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而从未放弃过抗争的中国人民所赢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全面、彻底的胜利。

本卷所述为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民国历史。这是一个中国政局大幅度动荡、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抗战胜利，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全中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富强民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但是，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力量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战后中国，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与行动。国民党奉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和领袖个人专断的理论，企图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排斥其他党派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维持其多年一党专政带来的既得利益。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各党派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这种分歧的实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它成为战后中国政局变化原因的根本所在。

国共两党关于未来中国前途与命运看法的分歧，既缘于政治理念的差别，更缘于对战后中国形势的不同理解。国民党认为，它因为抗战胜利而得到民心，因为接收日伪政权大量资财而得到空前的物质支持，因为战后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而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可以期望苏联的中立，同时它还有着军事上确切无疑的优势地位，所有这些使国民党获取了自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从而处于其统治的巅峰地位。因此，在这种强烈优势感笼罩下的国民党领导层及其领袖蒋介石，没有抓住民心望治的历史机遇，为中国开辟一条和平

民主发展的新路，而是袭用其惯常思维逻辑，以武力作为自己统治的砝码，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企图压服自己的政治对手。

抗战的胜利，同样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历史契机。经过抗战八年的发展，中共已经成为有了大块根据地、独立的武装、严密的组织和成熟的领袖的政党。中共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从理论到实际都更接近中国的国情，从而也更利于自己的社会动员；农村土改政策，使它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口的农民的支持；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舆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军事战略，为自己打下了一块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所有这些，使中共的力量日渐上升，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实力地位。

战后初期，中国出现了和平的期望与现实的机遇。从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到停战协议、军事调处，战争暂时得以停止，国共坐在一起谈和。尤其是1946年初政协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打开了和平民主的大门，社会各界为此而有着极大的期待。但是，面对自己的政治对手强有力的挑战，国民党领导层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意识和多年执政的既得利益，以及其组织力与竞争力日渐低下的现实，使它不甘心在民主竞争中败阵，从而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国民党最终放弃了和平而选择了战争。但是，选择战争就是违反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同样不能逃脱这一历史的必然。

全面内战的爆发，是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转折。国民党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为后盾，对中共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国民党以占领实地为目标的军事战略，使它的军事力量不断在战争中被消耗，而中共的运动战、歼灭战战略，使自己在失去地方的同时，换来了实力的增强。战争进行刚刚一年，国民党统帅部就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行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取全面防御。加上影响民心向背的其他种种因素，自抗战中后期起即逐渐显现的国民党统治力的衰败，已经成为国民党领导层也无可讳言的事实。

国民党通过战争确立自身全面优势的企图失败了。国民党很快就因为接收舞弊和通货膨胀而失去了民心，因为战争而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并导致了经济危机，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而失去了军事优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就基本丧失了它在胜利初期所拥有的诸多资源，从而不得不进行“戡乱动员”。国民党所失即中共所得。在一场以弱对强的较量中，历史的天平正在向新生力量一方倾斜，中共历经多年的奋斗，终于看到了全国胜利的曙光。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的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提供了一次发展机遇，一时党派林立，蔚为大观。所谓中间势力，即介于国共及其代表的阶级之间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企望中国以渐进与和平的方式走西方式民主与发展的道路，思想来源是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缺乏，使他们缺少自身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了，只有实力才是政治斗争的依靠，因此也只有国共两党有实力角逐中国的领导地位。中间党派短时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变这种格局，而且他们的发展本身就是国共相持不下时的产物。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共关系的破裂，处于两党夹缝中的所有中间党派，不是投靠国民党，便是接近共产党，走中间道路的努力最终没能成功。

战后中国的国内政治无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与战前相比，日本退出中国政治舞台，英法在华影响式微，而美国与苏联两强参与中国政治的广度与深度则大大超过了战前。不同的是，美国主要是在台前，苏联基本上是在幕后；美国是全面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事务，如马歇尔使华与中美商约；苏联则更多地关注地区问题及其自身利益，如东北和新疆。美苏的立场与行动对于中国战后政治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实际同时说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主要决定于内部因素，而非国际干涉，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

战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危机。经济恢复迟缓，生产水平下降，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通货膨胀威胁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国家资本有了很大的发展，民营资本运营困难，外国在华投资也在萎缩之中。执政的国民党为更紧迫的政治与军事问题所牵制，对于经济问题，既缺乏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也提不出改善经济状况的良方，其战争政策更拖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黄金风潮。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正在成为统治当局的滑铁卢，并导致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

战后中国外交地位较之战前有所提高。中国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拥有否决权的一员，被列为国际五强之一。中国废除了近代以来被外国列强强加于己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成果。但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国内分裂与战争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外交还只能是大国的附庸。旧的不平等消除之后，新的不平等仍然在出现。在中苏条约谈判及其实施过程中，在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之争中，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中，这种不平等均有种种具体的表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所有这些，就是本卷所要叙述的内容和解释的问题。历史著作的本质特征首先是真实，只有在真实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历史与解释历史，历史才可置信，历史才有意义，因此本卷写作的原则首先是叙述历史事实，然后才是历史分析与评论。尽管特定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但真实的再现仍非易事，其中既有档案文献掌握不够的客观原因，更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及于研究的主观原因，诸如历史的禁忌与避讳，尤其对于距离当今很近的近代史而言，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作者在写作当中，不敢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真实与可靠，但在史料运用、史实分析乃至名词术语的使用、写作文笔的把握上，都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到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尽量避免强不知以为知的主观与个人感情的色彩，以求经得起历史本身与时

代发展的考验。然而历史本身的复杂，决定了求真的困难和解释的困难，也由于作者自身功力的限制，虽然作者努力使本卷叙述的事实和对历史的解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和本来面目，然本卷所述所析离充分反映历史的丰富多彩与复杂多变恐仍有一定距离，因而仍待作者自己与后来者的努力。

由于体例与条件所限，本卷所述仍以这段时期的政治史为中心，辅以直接相关的军事、经济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叙述集中并反映了历史的重大内容，不足之处是，对社会发展全面性的研究仍不够完整。更全面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历史的全面观照，也待将来的继续努力。

在本卷写作中，作者尽可能搜集了国内外的档案文献和图书资料，尤其注重第一手档案文献史料，但因为种种原因，还有许多第一手的、有助于说明与解释历史真相的档案文献，或仍未开放，或开放后不易得之，因此也为叙述与分析这段历史留下了遗憾。好在这方面的条件正在日益改善，而且历史学本身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视今后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或许本卷还可修改，以臻更为完善与真实。

本卷书末附有参考文献与人名索引，俾便读者阅读时参考利用。对于索引的编制，作者尽量接近于国际通行规则，但为了使用的方便，也有若干变通处理。由于技术原因，本卷未附有关示意地图，烦请读者在必要时参阅相关的地图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本卷毕竟是作者十年心血的汇集，所谓敝帚自珍也。作者期待能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有更深入的研究。至于本卷史实叙述或分析论点中的疏漏与不足之处，概由作者个人负责，并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教。

本卷自酝酿到成书历十年之久。最初的提纲于1987年由邓野和作者共同拟订，并曾经过研究室内同仁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其后，作者即开始广泛搜集国内外所藏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准备写作。因为种种原因，写作间有断续，但作者对这一时期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进展的关注则从未中断，其间写的若干论文亦为本书写作打下了基础。1995年起，作者在对原拟提纲进行修改的基础上，集中时间写作，历时三年有余，终告完成。书中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目和第三章第四节第二目，由陶文钊先生惠赐大作。全书经总编李新先生审阅。本卷写作过程中，得到近代史所历任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近代史所图书馆提供了周到的服务。所内外学者杨天石、曾业英、陶文钊、李玉贞、万仁元、马振犊、吴景平、罗志田、章百家、皮明勇、黄亦兵诸先生，均给予作者各种形式的帮助。作者写作当中，常与《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作者朱宗震先生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受益良多，并承朱先生指出书中若干可修改之处。当年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郭汝瑰、杨伯涛、郑庭笈、文强等先生接受了作者的采访，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亲历史料。1993年，作者得到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的资助，赴美访问进修，并搜集了若干现藏美国的民国史料。在此过程中，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曾小苹（Madeline Zelin）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Ramon H．Myers）教授、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范力佩（Lyman P．Van Slyke）教授的帮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等机构，给予作者查阅资料的方便。本卷责任编辑陈铮编审在书稿审阅中付出了大量劳动。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柳宪女士及书局诸领导对于本卷顺利出版多所贡献。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对本卷的写作予以支持。对于以上所有为本卷写作和出版给予帮助的机构和个人，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日本投降普天同庆
　　二　受降权的争执
　　三　各地受降
　第二节　重庆谈判
　　一　重庆谈判的背景
　　二　重庆谈判的过程
　　三　双十协定的签订
　第三节　国共军事政治对峙
　　一　国民党以接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
　　二　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三　不断升级的国共军事冲突
　　四　打打谈谈边打边谈
　第四节　中间势力的兴起
　　一　日渐活跃的中间势力
　　二　中间道路的理想和现实
第二章　短暂的和平
　第一节　停战令的颁布与政协的召开
　　一　和平民主的呼声
　　二　马歇尔来华
　　三　停战令的颁布
　　四　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第二节　政协会议的成就和局限
　　一　各项方案的磋商

二　政协决议的达成
三　整军方案的制订
四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五　中共对政协会议的评价
六　政协决议的实行与顿挫
第三节　军事调处与军事复员
一　军调部的成立及其活动
二　复员整编的实行
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第一节　战后接收及对日伪的处理
一　接收与复员
二　对汉奸的处理
三　对日处理
第二节　边疆问题
一　台湾的光复
二　昆明事变
三　新疆三区问题的暂时解决
四　外蒙的独立
第三节　战后财政经济
一　经济重建及其困难
二　国家资本的膨胀
三　财政状况与通货膨胀
四　黄金风潮的爆发
第四节　战后外交
一　外交关系的拓展
二　中美关系与中美商约
三　中英关系与香港问题
四　中法关系与越南问题
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一节　东北局势的演进

一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企图
二　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与行动
三　山海关之战
第二节　东北的国共美苏四方关系
一　三国四方的纠葛
二　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三　反苏游行与苏联撤军
第三节　东北的战火
一　东北军调的失败
二　空前激烈的四平战役
三　东北的停战
四　国共战略的调整
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一　战前基本形势与国共双方的军事对比
二　中原战事的爆发
三　华东战场的激战
四　华北战场的风云
第二节　内战调处与和平运动
一　三方均不满意的调处
二　反战运动与反美运动
第三节　制宪国大的召开
一　围绕国大的纵横捭阖
二　制宪国大的开幕
三　《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第四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一　马歇尔回国与军调部的终结
二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一　从苏北到山东
二　重点进攻的展开
三　陕北作战暂时得手
四　东北战场攻守易势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一　国民政府的改组
二　反战运动的高涨
三　国共对前途的不同估计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日本投降普天同庆

1945年8月10日夜，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人声鼎沸，炮竹四起，一片欢腾。日本通过瑞士政府，请求转达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1)]，饱受战争的苦难和折磨，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生命财产损失，然而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的亿万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这是八年来，重庆市民第一次可以不必担心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自由地聚会，“这是一个兴奋的不眠之夜”。街上的人流中，人们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在奔走相告，传递着日本投降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街头上是一片狂欢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人的潮水几乎吞没了全部的马路。”[(2)] 他们尽情地欢笑，他们有理由高兴，因为他们为这一天付出了无数艰辛，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名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衷心庆贺的一天，是永载史册的一天。当晚，重庆各报的号外均书醒目大字：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的《大公报》在社评中激情洋溢地写道：“同胞们！战争是要结束的了，整整八年的大战要过去了。强大的敌人，要屈服了。我们实在抑制不住要长长欢呼，欢呼！昨夜，山城已为欢呼的声浪久久淹没。我

们受了八年苦难的压缩的心，好像原子弹一样，已经爆炸了，爆炸了！”[3]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全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从后方到前线，从战时首都重庆到中共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所到之处，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欢欣鼓舞。在沦陷区，受尽了日伪统治带来的屈辱与压抑的民众，也在衷心欢呼抗战的胜利[4]。唯有日本豢养下的南京、华北和东北伪政权的大小官僚处于一片混乱慌张之中，在他们的主子投降之际，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在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前便纷纷作鸟兽散。8月16日，南京伪政权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声称“国民政府自汪主席领导以来，即努力于中国之独立完整，兹者虽其方法有所不同，然既已见诸和平之实现，故作为完成其使命者国民政府应予取消，并为处理善后计，设置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以待将来中央政府之接收。至地方行政机关，则依然继续存在，担当局面之维持，军事委员会则改为治安委员会，其所属军队，将以全力维持治安以待将来之收编”[5]。陈公博和周佛海分任该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6]。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亦电告重庆称，将“尽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统候中央明令派员接收”[7]。8月1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家族偕伪满众臣，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逃离长春，13日到达中朝边境临江县的大栗子沟。17日夜，在这个偏僻小镇一座灯光昏暗的简陋小屋内，上演了伪满洲国历史的最后一幕。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向溥仪表示，“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的终结”[8]。随后，溥仪宣布“退位”，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14年的伪满政权终告灭亡。19日，溥仪飞回沈阳，准备逃往日本，但被苏军扣留，解往苏联。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诏书矢口不提“投降”两字，对于日本挑起侵略战争，造成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诏书中毫无反悔认罪之意，仍声称“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

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除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并“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面对日本战败的事实，诏书解释为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9)]。如此一来，侵略者倒成了悲天悯人、仁义道德之辈，颠倒黑白莫过于此。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的心态，不服输不认输，期待来日。然而，无论日本的心态如何，日本投降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反法西斯同盟国为人类文明与正义做出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为历史铭记。

8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文称：“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0)]。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称：“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11)] 蒋介石的演讲，标志着中国官方对抗战结束的正式表示，也拉开了驻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的序幕。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8月21日，日本驻华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根据中方指令飞抵湖南芷江，接洽投降进行事宜，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指示其有关投降程序及区域划分的规定。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指示日军投降的备忘录交今井带回南京，命令日军：自即日起立即接受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12)]。

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日本投降文书，正式声明："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方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次日即成为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9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1．所有抗战以来殉职官兵，由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凡阵亡将士家属及残疾官兵，并各依例优待，供以年时之抚慰，予以生活之保障，因抗战死难之各地同胞，由各省市县政府查明姓名事迹，报由内政部分别褒恤；2．由军事委员会传令全体官兵，一体优予褒奖，厚为慰劳，其应如何各按功绩分别给赏以励忠勋而资激励之处，并由该会会同行政院迅为拟议，详订办法，呈候核夺施行；3．所有在抗战期中颁布之各种战时法令，着各主管院部官署立即分别检讨，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时规模者，得先申请废止，以相符合约法的精神，而作实施宪政之准备；4．凡我曾经陷敌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其他后方各省为今年军粮民食所赖，准俟明年亦予豁免（次年7月又改为分两年平均豁免），全国兵役，自本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其余减租轻息，以及一切安缉事宜，并责成各级政府暨各主管机关照二五减租决议及其他政纲政策中有关民生之各项规定，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分别条议办法，次第实施[14]。当天，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会及有六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的纪念游行。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这座中国的历史名城，在抗战中蒙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数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痛的一页，也使所有中国人永志难忘。然而，雄伟的紫金山和中山陵终于洗刷了侵略者强加的耻辱，高昂起自己骄傲的头颅，目睹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向全中国人民俯首认降。当天上午，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院内，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得庄严得体。会场门前牌坊上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字样，进门后的大牌坊上书“和平永奠”大字。“会场前面一片草园，绿草如毯，当中康庄大道，两边每隔十公尺，彩扎竹杆，悬五十同盟国国旗，犹如联合国家，聚首一堂，洋洋喜气，弥漫全场”；“葱翠雄壮之紫金山第二峰，屏峙与侧背。而国父陵寝所在之紫金山第一峰，更以虎踞龙蟠之姿态，映入吾人眼帘，真乃毓秀钟灵，宜吾民族有此光荣际会也”[15]。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东南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日本方面投降代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等。出席观礼的有美、英、苏、法等同盟国代表、中外来宾、记者及会场礼仪警卫人员计一千余人。签字仪式于上午9点整开始，首先由何应钦命冈村宁次交出证明文件，其后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至席前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签字盖章后再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宁次。日军投降书声明：在联合国规定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历二十分钟结束。据记者现场报道，“冈村宁次进入席前，脸色惨白，眉头高耸”；“签字时，手臂微抖，签字盖章后，低头俯视有五十秒钟之久”；退场时，“冈村翻着脸……形容惨淡，几乎像要哭了”[16]。

南京受降，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也是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终以自己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赢来了这胜利的一天。所有为抗战胜利献出自己生命的志士仁人，都将得到中华民族永远的尊敬与纪念；所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的党派、团体与个人，都将永载于万千年的中国史册。

抗战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第一次

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的无畏精神；这也是国共两党合作、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而取得的胜利，所有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光荣。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旗帜，这又说明，只有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观察战后中国的现实，抗战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在长期抗战之中，中国饱经了战争的苦难与创伤，遭受了空前的破坏，经济残破，人民生活困苦，战后恢复重建工作极其繁重，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在如何对待抗战胜利成果的问题上，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在如何进行战后恢复重建、改善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国两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向何处去？9月3日，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就战后重建问题，提到“目前急待共同进行的复员，最近必须完全实施的宪政，有许多大事要做。关于前者，要为军人布置就业的机会，要为抗属伤兵难民难童取得必须的救济，要为毁于炮火的城市乡村策复兴，要为海外侨胞谋复业，要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要为工矿农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关于后者，要加紧造成地方自治，要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要从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要充分养成尊重法治习惯”[(17)]。然而这个文件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国共对战后中国发展道路意见不一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加剧，以至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则只字未提。当天，蒋介石也发表广播演讲，比上述文件更为具体地提到：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18)]。这

一演讲对国民党战后政治意图的表达更为明确，即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

比较起来，中共的战后声明比国民党坦率得多，也切实得多。8月25日，中共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宣言提出六项要求：1．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5．承认各党派合法，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各项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19]。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面临的急迫问题的不同表态，将两党分歧一下子摆在了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前，而最先引发两党争执的就是受降问题。

二　受降权的争执

8月10日晚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得知此事后，他立即召集部下会商，将预定电稿发往各战区。电令在通告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指示如下：1．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扰，应有应战准备；2．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3．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4．对投降之敌军及俘虏，不得危害，并剴切通令所属官兵；5．各战区除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外，应酌留必要部队维持当地治安；6．国军之整编，得由各战区长官斟酌状况暂缓实施[20]。

1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通过有关受降和沦陷区问题各案，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行政院负责伪币处理和复员

计划问题[21]。对于最为紧迫的受降问题，蒋介石当天发给各战区长官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电报，用了两种不同的口气。他给各战区的电令称："倭寇政府已示投降，国内外军阀仍不免有负隅顽抗之事故，目前断不能认为日寇已实行投降。且我国领土之内，迄今尚有多数盘踞寇军，狡恶万端，诡计百出，非以军事实力迫令放下武器，绝不能望其觉悟。我各战区前线将领及全体官兵，务当严密警戒防范，加倍奋斗，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执行，绝不可稍有松懈，致涉贻误。务希切实遵照，并逐级饬遵照为要。"而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电令称："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22] 这样就将中共排除在对日受降之外，因而引起了中共的抗议。

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以延安总部名义，于8月11日连发七道命令，下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23]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并请转达其政府。说帖声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受降时代表解放区、沦陷区广大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24]。当天，朱德还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身份，直接命令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

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25] 对于蒋介石的命令，中共公开予以反驳。8月13日和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两份电报，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电称：“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电中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是中共及其武装有权参加受降及受降后的工作，国民党应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26]。

国共关于受降权的争执，并非仅仅是一个对日受降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分歧的焦点所在。承认中共的受降权，就意味着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就意味着中共可以在未来和国民党分享国家政治权力，所以国民党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轻易让步。中共提出受降问题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拟出对策，认为中共“企图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实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提出“中央对共党态度应及时改变，在此期间，应以争取主动为最有利，应予打击者打击之，不可再事迁就与过于顾忌”[27]。因此，蒋介石在随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坚持，“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决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28]。

蒋介石在极力阻止中共参与对日受降的同时，首先部署利用日伪军控制原占领地区，以待接收。蒋在给何应钦的指示中，特别要求“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对于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29]。何应钦因此在给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9月10日，何应

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对他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切勿损坏散失，落于匪手，致扰乱地方。冈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30]。同时，戴笠主持的军统利用过去建立的关系联络各地伪军。8月15日，戴笠致函周佛海称："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周佛海即在京沪地区布置伪军控制局势。戴笠以后曾经称赞周佛海："奉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制奸共，稳定金融，极著成效。……伪府数十万伪军之向背，与东南财富及通都大邑之掌握，不费一枪一弹，而能顺利接管，关系大局极巨。"[31] 冈村宁次和周佛海等日伪头目与国民党的合作态度，是以后国民党不顾各方抗议对他们从轻论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国民党的举动，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立场。日本刚刚宣布投降，中共中央即发出党内指示，要求"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32] 中共以交通线及其两侧地区为接收重点。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如下：同蒲路太原以北段、平绥路归绥以东段、北宁路、正太路、道清路、白晋路（山西白圭至晋城，未完成）、德石路、平汉路郑州以北段、陇海路郑州以东段、津浦路、胶济路，"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33]。在给华中局的指示中，中共中央要求"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津浦线至少集中十万到十五万人，沪宁线至少七万人"[34]。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扩军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应

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编成野战兵团”[35]，表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已经准备将抗战时的分散游击战转向以正规兵团为主的运动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中共部队起先都准备了占领若干大城市的计划。华中局于8月11日提出：由苏浙军区部队占南京，七师占芜湖，浙东部队控制沪杭路并以一部开上海，三师解决苏北，二师、四师占津浦路徐浦段[36]。陈毅亦建议新四军在江南“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在江北“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37]。19日，华中局又向中共中央报告，准备在上海动员二十万人，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被中共中央认为“完全正确”，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中共中央还指示晋察冀分局，要求对于华北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38]。

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中共很快对接收方针作了重要调整，即由大中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8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大区，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39]。中共此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在苏联支持下合法受降的想法，而将工作重点置于尽可能地以和平或武力方式扩大中共占领区，争取在未来国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

三　各地受降

受降权之争由于国共双方的主张不一而没有结果，国民党利用国际上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有利条件，垄断了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

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的命令，“在中国境内（除满洲外）、福摩萨（即台湾——作者注）以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盟国只授权上面指定的各司令官为接受投降的代表，日军只能向各该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40)]。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进行。8月18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以下事项：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对中国战区内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等等[(41)]。20日，陆军总司令部自云南昆明转移至湖南芷江，何应钦在此连续召集部分战区、方面军受降主官和各部门接收代表开会，部署军事受降和政治经济接收事宜。根据蒋介石18日和何应钦25日的命令，中国战区受降地点和指挥关系的划分如下：

第一战区，受降主官胡宗南，接收洛阳地区，受降地点洛阳，日军投降代表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后改为接收洛阳、开封、郑州、新乡地区，受降地点郑州，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

第二战区，受降主官阎锡山，接收山西省，受降地点太原，日军投降代表第一军司令长官澄田徕四郎；

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地区，受降地点杭州，日军投降代表第一一三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

（后改为第十三军司令长官松井太久郎）；

第五战区，受降主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地区，受降地点开封，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后改为接收许昌、商丘、堰城地区，受降地点漯河，日军投降代表仍为鹰森孝；

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受降地点汉口，日军投降代表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

第七战区，受降主官余汉谋，接收曲江、潮州、汕头地区，受降地点汕头，日军投降代表第一〇四师团师团长（后改为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田中久一）；

第九战区，受降主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地区，受降地点南昌，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一军司令长官笠原幸雄；

第十战区，受降主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地区，受降地点徐州（后改蚌埠），日军投降代表第六五师团师团长森茂树（后改第六军司令长官十川次郎）；

第十一战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受降地点北平，日军投降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下村定（后为根本博）。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主官李延年，接收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地点济南，日军投降代表第四十三军司令长官细川忠康；

第十二战区，受降主官傅作义，接收热、察、绥三省，地点归绥，日军投降代表蒙疆军司令长官根本博；

第一方面军，受降主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受降地点河内，日军投降代表第三十八军司令长官土桥勇逸；

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受降地点广州，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田中久一；

第三方面军，受降主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地区，受降地点南京、上海，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司令长官十川次郎、第十三军司令长官松井太久郎；

第四方面军，受降主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岳阳地区，受降地点长沙，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军司令长官坂西一良[42]。

9月3日，指定台湾、澎湖地区受降主官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受降地点台北，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

为了确保接收计划的顺利完成，陆军总部首先令各接收单位派出前进指挥所，先行到达接收地点，安排、监督日军投降事宜，待准备完毕后，即行正式受降仪式。8月27日，陆军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设立陆总前进指挥所，进行受降和接收的准备工作。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当天，蒋介石向投降日军发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投降的具体事项：1．停止敌对行动，暂留原地待命，保管武器装备及一切资产、建筑，严守纪律及秩序，保护战俘及平民，扫除交通障碍；2．提交部队、武器、装备、建筑设施的详细情况报告；3．报告日侨情况，通知其留驻现地或指定地点；4．一切军政官员须协助接收；5．日军及其一切文武官员和人民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命令须敬谨服从，倘有迟延或不能施行者，将立刻严惩违反者及其负责之军官[43]。除此之外，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还给冈村宁次发出若干命令，指示投降具体事项，尤其注重于要求日军维持治安，等待指定接收部队到达。

各地受降仪式举行的时间是：

第一战区，9月22日；第二战区，9月13日；第三战区，9月16日；第五战区，9月20日；第六战区，9月18日；第七战区，9月25日；第九战区，9月14日；第十战区，9月24日；第十一战区，北平，10月10日，济南，12月27日；第十二战区，9月28日；第一方面军，9月28日；第二方面军，9月16日；第三方面军，与南京受降典礼同时进行；第四方面军，9月15日；台湾地区，10月25日。少数地区因接收军队未能及时到达而延至1946年初才缴械完毕，如天津、青岛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先行代理受降。

总体而言，受降大体顺利。也有少数地区的日军有抗拒表示。如日本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因未及时接到改变投降地区的指令，而以“未奉上峰命令，不便洽降”；驻长衡地区日军也以“未奉上峰命令，坚持不肯将轻武器缴收”。经与冈村宁次交涉后，才得到解决[44]。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总数为：一个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司令部，十个军，三十六个师团（内有一个战车师团，二个飞行师团），四十一个独立旅团（内有一个骑兵旅团），十九个独立警备队（含守备队、支队等），六个海军陆战队（含特别根据地队）；总人数1，283，249人，其中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330，376人，京沪地区的第六、十三军330，397人，广东第二十三军137，386人，台湾第十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部第三十八军29，815人。投降地点集中在中国和越南北部的98个城市[45]。在东北，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于8月17日下令向苏军投降。9月3日，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到达长春，关东军近六十万人成为苏军俘虏。

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缴械的主要地点与时间如下[46]：

战区	中国受降部队	日本投降部队	缴械地点	开始缴械日期	缴械完毕日期
第一战区	第三十八、九十军	第一一〇师团	洛阳、开封	10.2	10.28

（续）

战区	中国受降部队	日本投降部队	缴械地点	开始缴械日期	缴械完毕日期
	第四十军	第二十二、三师团、警备队	新乡	10.2	10.28
	第八十五军	第十二军、警备队	郑州	10.2	10.10
第二战区	第七军团	第一军、第十旅团	太原	9.11	10.10
	第七军团	第三旅团	崞县（今原平）	9.11	1946.2.13
	第七军团	第一一八师团、警备队	大同	9.11	10.10
	第七军团	警备队	汤原①	9.11	10.10
	第七军团	第一一四师团	平遥	9.11	1946.2.13
	第七军团	第十四旅团	沁县	9.11	1946.2.13
第三战区	第四十九军	第一一三师团	杭州	9.16	9.25
	第四十九军	第九十一旅团	杭州	9.23	9.25
	第二十八军	第六十二旅团 海军特别根据地队	松江 厦门		10.14 11.11
第五战区	第四十七军	第九十二旅团、警备队	许昌	9.20	9.30
	第五十五军	第一一五师团、警备队	堰城	9.20	9.30
	第六十八军	警备队	商丘	12.27	1946.1.14
第六战区	第六十六军	第六方面军	汉口	10.8	10.14
	第九十二军	第八十八旅团	金口	10.5	10.10
	第六十六军	第八十六旅团	嘉鱼	10.5	10.10
	第六十六军	第十二旅团	咸宁	9.30	10.5
	第七十五军	第一三二师团	天门、岳口	9.30	10.10
	第七十五军	第八十五旅团	应城	9.25	10.6

①原文如此，山西县以上地名无汤原，疑为浑源或襄垣。

（续）

战区	中国受降部队	日本投降部队	缴械地点	开始缴械日期	缴械完毕日期
	第七十七军	第十一旅团	孝感	9.25	10.6
	第七十五军	第八十三旅团	黄陂	10.1	10.6
	第七十五军	第五旅团	仙桃	9.25	10.6
第七战区	第一八六师	潮汕支队	汕头	9.15	10.3
	第一五四师	第一〇四师团	惠州	10.1	11.12
第九战区	第九十九军	第七十一旅团	吴城		9.15
	第五十八军	第八十四旅团	彭泽		9.26
	第五十八军	第十三师团	湖口		10.9
	第五十八军	第十一军、五十八师团	九江		10.16
	第五十八军	第二十二旅团	武穴		10.19
	第五十八军	第八十七旅团	都昌		10.19
第十战区	第九十七军	第六十五师团	徐州	9.20	10.5
	第九十八军	第七十二旅团	海州	1946.1.14	1946.1.20
	第七军	第七十师团	蚌埠、固镇	9.28	10.10
	第七军	警备队	滁州	9.28	10.10
	第四十八军	第一三一师团、六旅团	安庆、大通	11.17	12.7
第十一战区平津地区	第九十二军	华北方面军军部	北平	11.5	12.17
	第九十二军	蒙疆军部	北平	11.11	1946.1.7
	第九十二军	第三战车师团	北平	11.5	12.17
	第九十二军	第八旅团	石匣镇		12.17
	第九十二军	第二旅团	沙河镇		12.17
	第九十二军	警备队	马驹桥		12.17
	第九十四军	特警大队	塘沽		1946.1.17
	第九十四军	第一一八师团	天津、大同		1946.1.17
	第三十四军团	警备队	保定		1946.1.14
	第三军	第二旅团	石门		1946.1.16
	第九十四军	第九旅团	沧县		1946.1.17
	第三军	第一旅团	定县		1946.1.16

（续）

战区	中国受降部队	日本投降部队	缴械地点	开始缴械日期	缴械完毕日期
济青地区	第八军	第五旅团	青岛	1946.1.14	1946.1.16
	第十二军、九十六军	第四十三军、警备队	济南	11.29	1946.1.13
	第八军	第一旅团	张店	1946.1.13	1946.1.30
	第八军	警备队	坊子	1946.1.14	1946.1.15
	第十二军、九十六军	第四十七师团	泰安	1946.1.14	1946.1.30
	第十二军、九十六军	第十一旅团	兖州	1946.1.13	1946.1.30
	第八军	辅助部队	青岛	11.20	11.28
第十二战区		警备队	包头	9.26	10.2
第一方面军	第九十三军	第三十八军	河内	10.1	10.7
	第五十二军、九十三军	第二十一师团	海防、河内	10.5	10.10
	第六十军	第二十二师团	顺化	10.10	10.26
	第六十二军	第三十四旅团	土伦	10.10	10.26
第二方面军	第四十六军	雷州支队	雷州	9.26	9.29
	第六十四军	第一三〇师团	顺德	10.14	10.17
	新一军	第二十三军	广州	9.22	10.11
		第二十三、三、八旅团			
	新一军	第一二九师团	东莞	9.22	10.20
	第四十六军	海南警备队	海南岛	10.5	12.7
第三方面军	新六军、七十四军	第六军、第六十一师团 第十二空军师团	南京		9.26
	第七十四军	第三十四师团	浦镇		11.26
	第七十四军	第三师团	镇江		11.19
	第七十四军	第四〇师团	芜湖	11.21	11.27

（续）

战区	中国受降部队	日本投降部队	缴械地点	开始缴械日期	缴械完毕日期
	第九十四军	第六十师团	苏州	10.1	10.5
	第九十四军	第十三军、第六十一师团 第八十九旅团	上海	9.20	10.10
	第九十四军	海军陆战队	浦东	9.14	9.30
	第九十四军	海军特别根据地队	浦东	9.14	9.30
	第九十四军	海军陆上人员	杨树浦	9.14	9.30
	第九十四军	空军地上人员	杨树浦	9.14	9.30
	第九十四军	第六十九师团	嘉定、昆山、太仓	10.1	10.5
	第九十四军	第二十七师团	无锡、常州	12.4	12.18
	第一〇〇军、七十一军	第九〇旅团	镇江	1946.1.14	1946.1.16
第四方面军	第十八军	第二十军、警备队	长沙	9.18	9.22
	第七十四军	第六十八师团	衡阳	9.20	9.22
	第十八军	第六十四师团	湘阴		9.24
	第七十三军	第八十一旅团	株洲	9.14	9.24
	第七十三军	第八十二旅团	新墙	9.23	9.25
	第十八军	第一一六师团、十七旅团	岳阳	9.22	9.25
台湾地区	第七十军	第十方面军	台北	11.5	11.7
	第七十军	第九师团	新竹	11.5	11.15
	第七十军	第一一二旅团	苏澳	11.22	12.10
	第七十军	第一〇二旅团	花莲	12.5	1946.1.13
	第六十二军	第七十二旅团	丰原	12.11	1946.1.13
	第七十军	第一〇三旅团	嘉义	11.22	12.5

（续）

战区	中国受降部队	日本投降部队	缴械地点	开始缴械日期	缴械完毕日期
	空军第二十二地区司令部	第八飞行师团	台中	11.1	1946.1.13
	第七十军	第七十六旅团	善化	11.22	12.4
	第六十二军	第十二师团	台南	12.1	12.15
	第六十二军	第一〇〇旅团	高雄	12.16	1946.1.13
	第六十二军	第五〇师团	潮州	12.10	12.20
	第七十军	第六十六师团	台东 台中	11.22	12.2 1946.1.13
	海军第二舰队	澎湖守备队	澎湖	11.15	1946.1.13

据统计，接收日军装备总数为：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仅仅是火炮一项，军政部即准备将其编成126个炮兵营，至1945年底，已经编成54个，其中第十一战区最多，已编成20个营[47]。

因为国共关于受降权的交涉没有结果，中共不再理会国民党“固守原防”的命令，从日军或伪军手中，以和平或武力方法接收或占领了若干地区，这些地区多位于华北和华东。据统计，中共部队占领的城镇有，晋察冀近六十座，晋冀鲁豫近八十座，山东六十余座，华中四十余座，晋绥十余座，其中较重要者有，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热河省会承德，绥远的集宁，河北的邢台、邯郸、衡水，山西的长治，河南的焦作，山东的烟台、威海、淄川与博山、周村、临沂、菏泽、曲阜、济宁，江苏的淮阴、淮安、盐城等。在东北，中共进入了数十座苏军占据的城市（见第四章第一节）[48]。由于占领了这些城镇，使中共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大的地域与人口，力量达到了中共从事武装斗争以来的最高峰，从而也增强了中共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

在受降和接收过程中，因为国共双方立场不一，因而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在华北，双方都在争夺失地，国民党军队依靠空运，在接收大城市中占了上风，而中共部队利用国民党大部军队不及北上之机，占领了大量中小城镇。在河北，全省132个县，中共占领了94座县城，完全控制了82个县；在山东，中共部队所占城镇已达到90％以上，以至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向国民党中央惊呼，“情势益危，务乞钧座速赐派机运送弹药，伫盼孙长官、李副长官率军早日空运入鲁支援”[49]。如何解决国共之间日趋激烈的矛盾冲突，成为战后中国的头号问题。

第二节　重庆谈判

一　重庆谈判的背景

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一直是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国共在两党关系如何定位、中共军队与政权的地位等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两党多次谈判均无定论。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的处理，自抗战后期起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等前西山会议派人物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以及以陈诚为代表的黄埔系军人，沿袭传统的看法，主张对中共以强硬为主。陈立夫认为，与中共谈和就是玩火，终必自焚，而且一方面要求军队在前方准备与中共作战，一方面在后方谈和，将会大大影响部队士气。他批评主和派自命为自由派，他们以为有足够的精明对付中共，实际则对中共一无所知[(50)]。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和当时主政的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人，更多地看到国民党正在走下坡路，用传统方法很难与中共相争，因而企图以和的方法拘束中共，同时不无借此刺激国民党改革的意图，以最终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军事解决中共问题，但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量，主要是国民党军事准备不足和美苏两强对国共和谈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和平呼声，使蒋认为动武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在表面上较多地考虑到后一批人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后一批人多与蒋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又身居重要岗位，他们的意见因而更易于影响蒋的决策[(51)]。

战后国共关系首先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此举究属何人所建议，现并无确切记载。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层连续几天开会，讨论有关重要问题，但并未见提及邀请毛赴渝一事。有说法称此事出于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建议，如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赴渝“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52)]。蒋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当为事实，是否出于吴鼎昌献言尚需更为可靠的材料证实[(53)]。倒是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

长唐纵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非常值得注意。该份文件拟于日本投降前后，于8月12日交给蒋介石。关于中共问题，此件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54] 蒋介石对这个建议有何反应，唐纵未予记载，但该文件其他各项建议大多实行，而蒋在两天后即电邀毛赴渝，恐不是偶然的。何况该建议对国民党邀请毛泽东赴渝的原因及利害表述得非常清晰，无论其起到作用与否，它所反映的内容应该是当时国民党的真实想法，即以和谈压中共就范。

由于国民党的体制决定，邀请毛泽东的决定只能由蒋介石作出。无论这个过程如何，外界关注的是其结果。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55] 态度执著，语气谦恭，大有毛不赴渝、如苍生何之慨。

蒋介石邀请中共领袖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出，在国内政治上似乎得了一分。战后中国人民和民间舆论最关心的就是国共是否会打仗，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能够建设，能够让大家不再受战火的折磨与摧残。蒋两电公布后，社会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社评中说，"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得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56]。国民党内主张与中共谈判的一派人还频频与各界人士接触，希望得到社会各界与舆论的支持[57]。

中共对于国共谈判早有考虑。1942年林彪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即考虑“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1944年11月赫尔利到延安，毛又对他表示，“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58]。潜藏在毛泽东这样表示背后的考虑，是毛提出并经中共高层认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1942年，毛泽东在一份给从华中启程回延安的刘少奇的密电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59]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虽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断地有摩擦，甚而在抗战后期中共一度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但就中共的根本战略而言，仍然大体立足于毛的判断。抗战胜利后，在美苏两强合作、国内人民反战的形势下，中共的基本战略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苏联参战后的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中共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之一即继续国共谈判。11日，中共在日本投降后发出的第一份党内指示中便谈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60]。只是由于日本投降后，在受降等问题上国民党摆出了一副独占姿态，中共对内战形势估计较为严重，所以蒋的第一次电邀被中共认为“请毛往渝全系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61]。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对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的态度有了变化。蒋的第二电发出后，中共决定先派周恩来去谈。8月23日，蒋的第三封电报到延安，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了中共将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

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国共各有有利不利之处，但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实力不足），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势。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周恩来认为，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彭德怀说：要把打与争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所提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是主动的、适合的，今后解放区一切工作要作长期打算。毛主席出去，我们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兴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在会议结论中，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关于谈判，“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为了谈判期间的中共领导不至受影响，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补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62)]。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方针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基本决定了。

对于毛泽东赴渝谈判，中共党内也不是没有阻力的，这种阻力更多地来自对于毛赴重庆安全上的担心。据李维汉的回忆，“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为了缓解这种担心，周恩来经过分析对大家说，毛去有利，同时在中共力量和美方调解的保证下，毛的安全是有保障的[63]。

8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和从重庆回延安的王若飞最后商定了毛泽东去重庆一事，并于当晚复电魏德迈：“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64]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毛泽东再次谈到：“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65] 会议并决定中共在谈判中可作一定让步，第一步为广东到河南地区，第二步为江南地区，第三步为江北地区，但从陇海路到东北地区一定要占优势。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向全党通报并解释了重庆谈判问题。通知说：“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

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66]。

重庆谈判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这是战后雅尔塔体系达成的默契。8月1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赫尔利，向其通报中苏谈判的情况，对中苏条约的签订表示满意，认为苏联将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赫尔利不失时机地向蒋建议，这时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适宜时机，但他从蒋处得知蒋给毛的邀请已经发出。过后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他向蒋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并未对蒋的决定承担责任[67]。由此可知，美国人事先并未对蒋的决定作出建议。当然，美国关心国共两党接触的情况，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和美国与苏联争夺战后世界霸权的需要。

苏联在重庆谈判前后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仍然不是十分清楚。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中共确实考虑过在国际大背景下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8月9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68]。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共同意参加重庆谈判，是因为斯大林来电压迫的结果。由于目前无法见到这份电报的原文，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决定参加重庆谈判是综合各方情况作出的决定，斯大林的电报可能对中共的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未必就是决定性的作用[69]。根据美方资料，8月29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见，斯大林告诉他，他相信国共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中国有两个政府，那就太愚蠢了。此处透露的含义是暧昧不明的，并未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这与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既支持国民党作为合法政府的地位以协调苏联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又保留对中共的支持以显示其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立场体现了苏联对外关系的特点，保持国家政策的灵活性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其国家利益[70]。而据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

的实际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71]。这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的看法。毛泽东自己也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72]

二　重庆谈判的过程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本人此次来渝，系因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73]。重庆以及全国的舆论都对毛泽东到渝和即将开始的国共商谈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和期待。《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评中写道：“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74] 这一段文采斐然、激情洋溢的文字，可以说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心声，他们饱经战争的创伤与折磨，祈求中国的和平、建设、强大与繁荣，反对一切内战和动乱。他们寄希望于国共两党的商谈能够得出人民满意的结果。

蒋介石虽然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但对谈判并无准备，在他的内心或许这不过是一种策略。据中共获取的国民党情报，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

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75] 国民党代表张群曾在谈判中告诉中共代表：你们所提的办法，事先经过你们党的决议，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76]。而按国民党的公开说法，没有提出方案是因为，“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77]。直到毛泽东已经到了重庆，蒋介石才决定谈判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78] 这是以国民党军事收编中共部队，从而换取中共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的交换，与中共对谈判的立场有重大差别。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后来被概括为，先行军事国家化，再行政治民主化，还是先行政治民主化，再行军队国家化。

毛泽东到重庆后，在正式谈判前后，与蒋介石有多次会见。因为有些谈话只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们的会见无疑为谈判决定了原则，国共谈判实际是在两人指导下进行的。

重庆谈判最初几天为双方交换意见阶段，也就是“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因为过去不幸的事情太多，不先有良好的情绪，就谈各种具体问题，解决一定很困难”[79]。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会见，双方先就需要商谈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毛建议，当双方会谈有结果后，再由政府邀请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中共举行政治会议，讨论诸问题[80]。9月3日，周恩来将中共的谈判方案正式交给国民党方面。该方案首先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具体内容有

承认各党派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及部队，严惩汉奸，重划受降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结束党治，保障人民自由等。方案中最关键的内容是九、十两项——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前者包括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讨论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改组政府、重选国大等问题，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委任中共推选之省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七省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省副主席或副市长，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后者包括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在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81]。

蒋介石得知中共的要求后，自感“脑筋深受刺激”，事情的进展不如其所愿。他认为：中共“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自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9月4日，蒋召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归纳了他的谈判条件是：1．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编十二个师，驻地由双方商讨决定；2．解放区问题，此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只要中共做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则对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引中共人士；3．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俟国大后再予改组；4．国大问题，已选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可酌增代表名额[82]。4日，他在与毛泽东会见时告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83]。国民党代表根据蒋的指示，拟定了对中共方案的答复，对第一、二项拥护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内容表示“甚佩”，对于其他各项多表示原则上“绝无问题”（实际仍各行其是），但对关键性的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则不予接受，尤其是对解放区和军队问题，提出解放区名词“已成过去”，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则即非真诚作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中共军队编为十二个师实已

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84]。国民党的态度预示着国共谈判前景之不容乐观。

自9月4日起，国共谈判正式开始进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者先后有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叶楚伧和张厉生，中共方面参加者始终为周恩来和王若飞。谈判以中共所提方案为基础，双方唇枪舌剑，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第一次会谈主要涉及国共之间广泛的未决问题。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首先表示，中共方案中第一、二两项（即实行三民主义和承认蒋的地位）态度甚好，不胜赞佩[85]，然九、十两项（即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实令政府为难，没有顾及对方的困难，实有重加考虑的必要。张群称，中共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因此亟须确定谈判之态度与精神。周恩来表示，中共此次不提联合政府、党派会议问题，对国大代表重选虽保留意见，但亦不反对参加，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判之政治基础。我等以上述之让步，政治既可安定，各党派间亦可和平合作。毛先生有此决心，党内异议，均所不顾，毅然来渝。如果不希望解决问题，毛先生何能远来。邵力子答称，他承认中共此次商谈已有若干让步，但中央之让步，亦已达最大之限度。张群称中共所提九、十两项意见，实为问题之症结所在，关于军队问题，与前此所谈距离甚远，而解放区问题如照中共意见，非致导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不止。王若飞提出，解决问题必须根据事实，中共所要求于政府者，亦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军队与解放区政权存在的事实[86]。此次会谈可谓主要务虚，双方未多接触实际问题，但从双方的发言可知，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绝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9月8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主题仍是上次悬而未决的问题。周恩来首先表示，希望国民党能对中共所提各项予以答复。张治中答称，中共所提九、十两项的内容，国民党不能接受，因此要求政府答复实在困难，希望中共重新考虑。王若飞表示，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两党皆有军队和政权的现实，否则便无法再谈了。双方

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反复争辩，未能一致。张群遂建议，今后应讨论具体问题，以期一次会谈有一次之进步，得到周恩来的赞成[87]。此后的会谈即围绕各项具体问题展开。根据中共给各地的通报，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88]。

10日、11日、12日，双方连续进行第三、四、五次会谈，主要涉及政治问题[89]。首先谈政治会议，中共建议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协商解决和平建国、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国民大会和复员善后问题，这样可“在训政结束之过程中，使各党派由协商而趋于合作。一改过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之方式，亦非以此党代替彼党之方式，乃求党派合作，共同参加政府，以求全国政治之安定”。此建议得到国民党的原则赞同，张治中并建议此会议称政治协商会议。双方并就会议的组织、地位与范围问题达成了初步妥协[90]。继谈国民大会问题。中共主张国大延期召开，代表重新进行选举，国民党则坚持国大尽早举行，原选举代表有效，可在此基础上增加若干代表。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第一次国大只进行制订宪法的工作，适当延期举行，第二次国大再通过普选代表赋予行宪权。关于国大代表问题，中共对原代表有效问题没有松口，但国民党提出可在当然代表24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遴选代表240名和未选出代表240名的基础上，由各党派适当分配，因此此一问题虽未解决，实际为以后的妥协留下了活动余地。

军队问题本为国共之间一大难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对中共军队的地位不能不予以承认，但对其应编数量双方意见不一。国民

党起先只同意中共军队编十二个师，但过后感到此一提议很难为中共接受，因此12日蒋与毛会谈时，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中共编二十个师，“唯必须保证共军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率权为前提”[91]。中共也在19日的第七次会谈中表示，军队数量可考虑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如果国民党军队缩编至一百二十个师，则中共保留二十个师。这样，双方在军队问题上的距离有所接近，剩下唯一谈不拢的问题就是解放区的地位问题。

9月15日，第六次谈判主要涉及解放区地位问题。张群自始即表示，他们经请示蒋介石后，认为蒋之提议（即在军令政令统一后，中共可推荐省级行政人员，中央择予任用）为解决问题之唯一办法，中共的方案与国家政令之统一不符，碍难考虑，我等亦想不出任何方法。王若飞认为，中央依照政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之现存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市，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并不有违政令统一之旨。周恩来继提出，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重大之让步，军权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杀共产党，故国民党亦必须为我党打算，方能使我两党各得其所。我们所提之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张群又称，蒋主席此次之所主张，尚未提经党与政府讨论，蒋主席须对党与政府负责，吾人不能不体谅其困难，我等实不能再作任何主张，或者蒋主席与毛先生直接商量，较易获得结果[92]。张群摆出甩手不干的架势，既为胁迫中共让步，也为国民党内可能的反对意见预留地步。

9月19日，双方进行第七次谈判。中共主动表示，中共军队数量可减至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南方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可以撤退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上述地区的部队撤退，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鲁、冀、察、热

四省主席，晋、绥两省副主席，及平、津、青三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较之中共原提方案有了较大的减少。中共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又一重大让步，借以推动谈判的进行。张群对此没有准备，因而只能表示俟转呈蒋介石请示后再议[93]。

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回应。在9月21日的第八次会谈中，反而出现了谈判期间争论最为激烈的场面。此次会谈重点谈军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立场本已有所接近，但在此次会谈中，张治中起始即表示，政府军事上各部门负责同志对中共之过分要求，尤深为愤慨，政府殊难予以考虑。他提出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十六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他提出中共如觉何人堪任省、厅、县长，尽可开列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但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他认为解决两党间问题须首先培养信心，接着指责中共方案有碍信心之培养，何异乎割据地盘。此时，王若飞激动地质问，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也许是考虑到张治中与中共有长期友好关系，周恩来出面为其解围，他赞成张治中所言，双方应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互让互谅之精神，求问题之解决。接着批评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视我党为被统治者，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但他巧妙地将这一批评引导到真正反对国共和谈的陈立夫一派身上，以陈之言为例，说明必惹起我党之愤怒。王若飞继而说明，军队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皆可解决。他并质问你们国民党做了些什么？今日的问题，要看全国的民主实行到何程度，如能实行民主，问题即易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又有激烈的争论[94]。此次会谈气氛紧张，结果导致谈判停顿，陷于僵局，而且连双方已经达成默契的若干问题，也被淹没在争论之中。而美国人的插手，更使问题复杂化了。据胡乔木的回忆，恰在此时，赫尔利企图在回美前见到谈判获得成果，对中共施加压力，提出军队编二十个师，但不能按国军比例缩编，必须放弃任命省主席的要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发公

报。他最后威胁中共，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说完要求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而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答复，情况十分紧张。毛泽东当即决定会见赫尔利，告诉他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95]。

9月21日谈判后，会谈停顿，照其后邵力子的说法，“当时的情形，几乎使会谈搁浅”。他认为这一由于多年以来的事实造成的困难，二由于两方面的立场本不相同，各有不能让步之处[96]。中共在给各地的第二次通报中称，谈判“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97]。毛泽东在会见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时告他：“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98]。作为国共谈判的旁观者，青年党领导人李璜在从美国写给重庆总部的信中认为：“敌人忽然投降，高君（指蒋介石——作者注）得美助力，收复各要地，高兴之余，必骄而难说话。毛则到处有兵，横亘南北东西，势亦不弱，虽苏允独支高君，毛有十年内战经验，亦不愿随便妥协也。……恐谈去谈来，仍是一个先统一军权，一个则先改组政府。美总统杜鲁门今日谈话，仍如前几日，说是中苏协定，苏联既承担蒋为正统，则中共黯然无光，势须妥协。杜总统看法未免简单。杜不知中共根本看不起国民党人，认为不是敌手，对蒋势力毫无所恐惧，且苏联表面不助中共，骨子里有无另一套，亦不可知。”[99] 李璜的看法不无道理。作为两个各有政权和军队并经过多年对立的政党，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可以以几天的谈判便解决多年的积怨。亲历谈判的王世杰认为，蒋介石和毛

泽东“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能合作”，他并且将此看法告诉了毛本人[100]。此一看法恐非一时心血来潮，其间多少透露出国民党内对国共关系的预期。说到底，这不仅是两位领导人个人，也不仅仅是单独两个政党之间的较量，这是各有各的基础、各有各的支持者、从而也各有各的不同利益的两大力量之间的较量。

据胡乔木回忆，9月21日前后几天“是谈判期间最紧张的几天，因为当时看起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而且中共还得到情报，国民党中统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表面是蒋常有国事咨询，实际是此举可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民党军进攻[101]。延安得知后，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认为谈判没有结果，形势可能逆转，蒋介石要共产党屈服，否则就准备武力对立，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建议毛泽东争取快回延安[102]。但毛泽东既然亲自到了重庆，说明国共谈判有其内在和外在动力，也不可能轻易中断。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国共双方打的是心理战，谁都不愿承担谈判破裂带来的政治责任。所以毛泽东决定仍留在重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政治主动，而国民党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谈判又出现了转机[103]。

在重庆谈判进行过程中，蒋介石感觉“目前最重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此”。但他对美苏的态度没有把握，“俄是否因此藉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因此蒋只能决定“不能不为国相忍”[104]。在整个谈判期间，国民党内部仍然有争论，据王若飞说，参加谈判的“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105]。而中共则始终表示拥护国民党的领导，发动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毛

泽东特别告诉《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106]。

9月27日，谈判恢复，张治中首先提出，军队问题的解决，需要经过相当的程序和步骤，技术上的问题可否由军政、军令部同中共派员另组小组会议，共同商讨。此提议得到周恩来的同意。这样，谈判的难题之一军队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剩下解放区的问题，仍成为双方反复争论的焦点。中共提出的解决方法，从重划省区到任命省级长官再到民选，均为国民党所拒绝，最后周恩来只好提出暂时维持现状，留待政治会议解决。张群表示，暂维现状非问题之真正解决，提出国民党的省政府与中共的县政府互相承认，俟宪法颁布后，省政府再行选举。对于这种使中共政权限制在县一级的办法，中共当然不能同意。28日双方的会谈中，就军事小组的成员达成了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由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参加，中共则派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代表[107]。

10月2日和5日，国共双方主要就解放区的问题进行了最后二次会谈。张群先提出中共解放区不过六十余个县，问题不难解决，但周恩来指出经过日本投降前后的战斗，解放区已有二百八十余个县。张治中提出了行政专员区的方案，即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连成一片者，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查专员，显示国民党愿意再退一步，但始终不同意给中共省一级的行政权。周恩来提出，华北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中共治理下，不可与行政专员区相提并论。如中央必欲置一省府，岂非等于虚设。他批评国民党不同意解决解放区的问题，仍旧是心理的问题，以为地方如归中共治理，而军队又驻在当地，则一切归中共包办，中央将永不能插足矣。中共则以为解放区之成立，乃多年奋斗所得之结果，政府何必阻止地方行政之进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一番争辩。张治中认为解放区乃战时的产物，中共的要求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均将怀疑为中国之分裂矣。邵力子指责说，中日战争发生之近因，乃因日本要求华北五省特殊化，今中共又

有此要求，政府将何以向国民解释。周恩来立即指出邵之比喻之不当，解放区问题与华北特殊化根本不同，中共所要求者不过实行民主而已。王若飞则指出，解放区虽为战时产物，然不能说民主制度在战后即须取消，其他莫不如此，政府不可不维持之。中共方面感觉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遂提议将商谈的结果整理发表，而毛泽东来渝已逾一月，拟于下周回延安。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108]。国共历时一月之会谈告一段落。

三　双十协定的签订

10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纪要共十二条，主要内容如下：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双方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限制特务机关活动、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实行地方自治、惩处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等问题上，政府方面表示实行地方自治不应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惩处汉奸要依法律行之，中共参加受降在其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109]；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同意提交政协解决；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提出将部队缩编至二十个师，自八个地区撤出部队至陇海路北和苏北皖北，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谈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军队数目可以考虑，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由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组成，进行具体商谈；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政府方面均不同意。政府方面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

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对于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表示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110]。

“双十协定”列出了国共两党对于战后中国各项待解决问题看法的异同之处。对于国民党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中共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共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对于双方一致之处，实际国民党以后并未能完全实现其诺言，如保证人民自由和限制特务机关权力；对于国民党原则同意的各点，国民党有其前提条件，因此实际基本没有实行，双方仍是各说各话；对于国民大会和军队整编问题，双方虽未达成协议，但实际已有了妥协方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谈判达成协议；因此双方最大的分歧实际是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问题。对于国民党来说，中共的地位可以承认，军队可以整编，但如果军队和地盘结合，则国民党就无可如之何了，因此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周恩来在总结国共谈判成果时曾说：“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111]

10月8日，张治中举行盛大宴会，欢送毛泽东回延安。张在会上报告双方大部分意见已经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很有方法来接近”。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于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112]！

10月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相见，蒋一方面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但又要求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在毛泽东临行前，蒋又告以“所谓解

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113]。据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说蒋在这几次谈话中表示，我们两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并未正面回应蒋的谈话，但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正因为蒋的这些表示，毛泽东对国共和谈前景一度较为乐观，认为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114]。

10月11日，毛泽东飞回延安，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谈判经过。他认为，会谈纪要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会议批准了这个会谈纪要[115]。次日，中共中央下发给各地的指示，着重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116]

全国舆论对于国共会谈结果的评价不尽一致。国民党为了呼应舆论的和平要求，对会谈结果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中央日报》认为，“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至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我们总也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中共则对会谈成

果予以积极评价，《解放日报》认为，“此次会谈获得了重要的成果，表示了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中国人民及抗日党派面前还有很多困难，走向光明的道路上还有荆棘，还有曲折，还有障碍。但是我们坚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117]。社会舆论在肯定会谈成果的同时，又表示出相当的担心。《大公报》认为：对于双方一致的问题应该至诚至速地付诸实施，对于关系建国根本的政治上的大问题希望由政协商得共同的办法，对于现实的军政问题，复杂难决，但必须求得解决，才能真正避免内战的危险。目前似可从求安定着手，但求不决裂，力求妥协，尽力增加向心力，力避割据争夺现象，以求得一个过渡的办法。《新民报》的评论更为低调，认为双方一致之处在谈判的比重上却不是最重要的，现实的问题不是堂皇的原则所能解决的，假如这些现实的问题得不到最后的结果，即使不至于推翻已有的成果，也可能阻碍已有成果的实施。提出民主政治是消灭问题的惟一途径，民主的进程愈快，问题消灭得也愈快[118]。现实也确实如此。国共最高会谈结束后，双方围绕一些现实问题的分歧远未解决，导致双方之间的冲突不仅没有停止，反有越打越大之势。

第三节　国共军事政治对峙

一　国民党以接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

战后初期国民党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其军队向全国推进，控制要点要线，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压迫中共妥协。所谓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因为空运数量有限，公路或水路运输又缓不济急，只有恢复铁路交通，国民党的军队才可以运动自如，接收、复员、遣返等等才可以顺利进行，因此在战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基本是沿铁路线向各地尤其是华北推进。但因为国共双方未就接收问题达成妥协，国民党实行此一方针的结果，必然造成其军队在向前推进过程中，与铁路沿线的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孕育着内战的极大危险。

据李宗仁回忆，还在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应令日军就地维持治安和交通，对沦陷区的接收采用“后浪推前浪”的方法，即以驻豫、皖、苏的部队向鲁、冀推进，驻晋、绥的部队向察哈尔推进，再以后方部队接替上述部队防地，以便尽快接收华北，防止中共捷足先登。但蒋介石为了防止非嫡系部队先入华北，调远在大西南的嫡系部队前往接收，致时间迟缓，落在了中共后面[119]。

8月12日，唐纵将侍从室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给蒋介石，该文件对军事方面提出了八项意见，主要内容为：1．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2．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3．向美国交涉空运及海运，以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华北打击奸伪企图作准备[120]。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观察形势后亦提出四点建议：1．请迅速由陆空两途推进，派遣部队控制要点，以免归顺或观望之伪军，被奸党威胁利诱；2．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以便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以保持交通联络，并安定民心及归顺军之军心；3．令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恐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4．黄河以北，党政军各机关渐次向北推进，联络通信既已困难，协同一致亦属不易，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121]。这些建议的重点都在于尽力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8月18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在办理接受敌军投降期间，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

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22日，又令各部队“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为此下令：预定空运部队，应立即向机场所在地集结。其余部队，除残留必要部队维持辖境区内之治安外，一切应尽可能即向指定目标挺进；各挺进部队之番号、目标、路线，由何总司令及各战区长官指定克日行动，不必反复请示[122]。9月2日，何应钦遵蒋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接收名义“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123]。何首先部署对于全国二十七处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即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安庆、徐州、济南、青岛、郑州、洛阳、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包头、张家口、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山海关，“须于解除日军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受降事宜得以顺利进行，及各地治安得以早日恢复”[124]。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与东北，因为长江以南地区“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地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125]。但是国民党主力部队偏处后方，运送需时，因此国民党最初主要是利用日伪军暂时控制要点，以待其军队的到达。具体作法是，在部署受降时，“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而是暂时保持其建制，利用其力量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军队的到达[126]。各战区接收指挥机构无不要求日军：保持原有态势，在接防前不得移动，并须继续维持地方治安及一切交通通讯，等待接收；不得交由非指定部队接收或占领与破坏，否则应负责任；如有匪徒伪军企图接收或占领破坏时，日军应即加以制止[127]。对于华北各省的接收，何应钦要求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

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俟各该区内指定接收部队全部到达，就日军态势逐次接防，逐次缴械。”对于北平日军准备撤出城外的举动，何应钦令冈村宁次转令根本博“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要地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之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128]。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被中共军队占领后，何应钦即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他“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冈村宁次表示，此种行动为苏、蒙军所为，“我方难于现地处理，故有必要时，作为贵方之要求事项，请中央作为联合国全般之问题，向苏联国方面接洽处理”[129]。在山东，省长何思源要求日军“协助维持山东治安及现在态势”，并完全依赖日军的接应才得以于9月1日打破中共部队的围困，自章丘进入济南[130]。在山西，阎锡山因为兵力不足，索性大规模利用日军，南北自灵石到大同，东西自沁县到汾阳，“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131]

利用日军毕竟受到许多限制，为了应付自身兵力不足以迅速展开的处境，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初即命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132]。在蒋的命令下，伪军被赋予占领要点要线、保护交通通讯、监视敌人、维持治安等重要任务。如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成为南京先遣军、苏浙先遣军，周佛海的税警团成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华北伪军则给以新编第一至十路的名义，其他地区的伪军也多给以先遣军、挺进军的名义。这些伪军堂而皇之成为“国军”，较之日军更易运用[133]。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大环境下，伪军普遍无心继续作战，而且其多数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强，因此国民党在战后争夺华北优势地位的斗争中，大城市依靠空运尚可维持，而广大地方则只能等待接收部队的陆续北上。

就国民党军在华北的行动而言，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由于位置靠近华北日占区，因此出动的也最快。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在8月11日召开所部干部会议，决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1．派楚溪春率军向太原前进；2．电赵承绶速赴太原与苏体仁并日酋澄田联系；3．电史泽波抢占上党；4．电王靖国即赴临汾；5．电高倬之即与日军联络进入运城。8月18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部进入太原，30日阎锡山到达太原[134]。在绥远，8月11日，傅作义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并令马占山部“相机收复各县城，不得再任奸军占领，并选地集结，防止奸军北窜，候与进出绥包部队确实联系后再向察北、东北前进”[135]。18日，傅部暂三军进占归绥，28日傅总部到达归绥，随后继续沿平绥路向东扩展，9月初已经打通了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在西安，8月13日，胡宗南奉蒋介石令，以四个军驻守关中，以六个军入晋，与第二战区切取联系[136]。9月3日，胡部第三十八军到达郑州，8日，第四十军到达新乡，第三军和十六军则自韩城渡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10月18日到达石家庄，改归第十一战区指挥。此外，李延年指挥的第十二军自徐州沿津浦线进入济南，九十六、五十一、七十七军随后进至山东兖州、泰安等地，九十七军进至徐州北韩庄地区，李品仙部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则沿津浦线自蚌埠向徐州前进。国民党军向华北的进军形成了自北、西、南三个方向，以平、津、济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向心推进。

由于中共部队沿铁路线的阻击，9月以后国民党军向华北的推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察、热两省基本由中共控制，冀、晋、绥、鲁等省和豫北、皖北、苏北只能接收省会和大中城市。针对接收中出现的新形势，唐纵判断中共“所持谈判之方针，拖延时间和缓各方空气，以期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因此拟定意见为：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于九、十两月之内，将预定国军全部输送于京、沪、平、津、东北各要地；构成点线，再扩张面；在华北筑成两条长城线，一自津沽而至平绥包头之线，一自青岛济南而至石

家庄太原之线，以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同时研究地方行政战斗体制以抑制其地下组织[137]。10月13日，蒋介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电文称："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抗战八年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138]由于蒋的态度，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剿共"颇为积极。军令部长徐永昌让下属拟出全盘"防剿"共党部署，于10月底连续与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杜聿明曾向蒋介石建议："国军这次接收敌占领区，在解除日寇武装的同时，请令大军所至各地，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胡宗南亦在11月的复员整军会议期间向蒋献言："连日恭聆训示对现时剿匪颇有忧疑，如以管见：一、官兵副食如能维持……则逃兵减少，士气旺盛，成功极易；二、请亲临西安或太原则军心士气必振。补给、交通、通讯、卫生等解决，陆空联络解决，军民配合解决，一年工作，半年决可完成，时间缩短，苏俄虽欲援助共匪，亦不易也。"[139]在蒋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在华北各主要铁路沿线与中共部队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华中，国民党军则着重于"围剿散匪"，"清剿任务，改由第五战区刘（峙）长官负责"，刘峙即命令"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兵力担任交通警备，在各该辖线三十里以内不得有奸匪存在。以三分之二兵力担任进剿，协助友军歼灭本战区所有之奸匪"[140]。

国民党军以接收为中心的军事进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美国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国民党政府军调动提供空中与海上运输，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运输，国民党军队就不可能迅速

确定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华北的优势地位；其二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登陆，为国民党提供直接的支持。所有这些支持，都是以同盟国统一安排、援助中国接收、进行战争善后的名义进行。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说是，“蒋介石需要我们的帮助，运送他的军队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点。否则，中共就会得到日军的武器，并且占领日本人控制的地区”[141]。

美国对国民党军的海空运输计划于抗战胜利前即已决定，并在战后开始实施。7月31日，蒋介石和宋子文与魏德迈达成了一项原则协议，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的关键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据守战略要点，直到中国正规军可以控制这些要点为止。日本决定投降的当天，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迈：“你应该援助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运送政府军到各关键地点”，“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应准备尽可能迅速地控制中国关键港口和交通要点”[142]。9月间，美国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开始空运新六军自芷江到南京，随后第九十二、九十四军10月间自汉口、柳州空运至北平和上海（九十四军其后又空运至天津）；海运第十三、五十二军11月上中旬自九龙、海防到秦皇岛，第七十、六十二军10月下旬、11月下旬自宁波、海防到台湾，第八军11月中旬自九龙到青岛[143]。9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五万余人先后在华北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进入北平和天津以及北宁铁路沿线各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并确保华北若干指定港口和机场，以便利中国政府军进入这些地区；协助对日军的受降并解除其武装；确保对投降部队及其装备的控制与安全，并尽其可能移交给中国当局。此外，他们还受命保护北宁铁路塘沽至秦皇岛段、开滦煤矿的安全。而且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驻华美军的指令，美军占领的地区只能移交给中国国民政府。连同以往驻在中国的美军，在华美军总数最多时达到十一万余人。这些对于亟须确立对华北控制并进而自此进军东北的国民党而言，对于稳定迫切需要煤炭供应的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形势，都是极端重要的[144]。

但是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蒋介石注重于建立国民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主张向东北运送相当军队，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认为国民党应该首先巩固华北。魏德迈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1．如果委员长接受外国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帮助，通过正直而富于进取心的官员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将能够稳定南中国的局势；2．除非他和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并现实地遵循之，他将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稳定华北局势；3．除非他和俄国及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协议，他将不可能在若干年内占领满洲。因此他向蒋建议，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同时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清除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145]。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1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突然拒绝继续海运国民党军北上，蒋向魏德迈询问原因不得要领，只好立即致电杜鲁门，电称华北接收任务“必须再增运五个军之兵力”，“余兹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蒋在电文中表示，“贵国人民关怀贵国军队有牵涉中国内部战争之可能性一点，敝国人民完全了解，余诚盼经中国已往八年抗战及牺牲所获取之胜利之果，得在一建设之时期内享受之，并得由此瞻望一充满自由、民主、繁荣、发展之和平康乐时代”[146]。在某种程度上，当国民党与美国的意见不一时，美国人便将军运视为压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蒋介石对此虽屡有怨言[147]，但迫于形势，也只能与美国周旋，而美国的总体战略仍是支持国民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尚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11月21日，蒋介石告诉魏德迈，政府军在东北只准备进至锦州，以为以后的行动留下一个方便的基地，但政府军的力量无法应付目前的华北局势，再次要求美国加运五个军到华北。魏德迈认为，加运军队一事确实十分必要，他已向美国政府建议，要么进一步援助中国，要么撤出全部美国军队。他还建议蒋可以向联合国求援，在能够确实接收东北前，将其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否则苏联将在东北扶植一个缓冲政权。蒋表示在他作出决定前，将考虑美国的意见，但他怀疑此举的可行性[148]。就魏德迈本人而言，他虽然不赞成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对于支持其控制华北则是

完全赞成的，但他不想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承担美国卷入中国事务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军方则反对任何放弃华北和满洲的计划，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远东有利于美国的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就是一个统一的、包括满洲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蒋介石的地位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美国的援助和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抵抗共产党的决心，因此应该向蒋提供除了加派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一切必要援助。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席会议为美国对华政策确定了大致轮廓，即继续维持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同时努力促成政治解决和停战[(149)]。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和矛盾，从美国当局这种既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又企图将中国问题约束在中国国内和政治层面的政策中，可以找到全部答案，这也是其后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出发点。

到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以接收为中心的全国战略部署，因为运输问题及中共部队的抵抗，未能达成其预期目标。当时的军政部军务署署长郭汝瑰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为，“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弊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150)]。

二　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中共一度摆出了向南发展的态势，派八路军王震部南下湘粤赣，新四军粟裕部南下苏南浙江，以隔断大后方的国民党政权与江南广大沦陷区的联系，争取在日本投降时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中共仍然坚持了这个方针，要求江南粟裕部“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即使“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决不退回江北”[(151)]。

中共决定由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为了有利于谈判，需要作一定的让步，中共准备让步的地区，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

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要看谈判的情况。“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刘少奇亦对毛泽东谈了他的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152)]。于此已经透露出中共向北发展战略的讯息。与此相适应，中共着重部署了华北的军事行动，令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向同蒲路进击，冀鲁豫区进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夺取大同，并争取收复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队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153)]。

对中共确定其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东北的情况，一是部队干部的建议。中共在战后初期的千头万绪之中，已经注意到东北问题的重要，但因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不明，对苏联态度和东北苏军动向不明，在行动上比较谨慎。此时，正值进入东北的中共曾克林部有了很大发展，但对未来究竟如何行动没有把握，而东北苏军面对当地的复杂局势，也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因此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派出飞机，送自己的代表贝鲁罗索夫和曾克林于9月14日一同飞抵延安。贝氏向朱德转告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国共军队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苏军撤退前不得进入，现已进入东北的部队应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154)]。苏联的这一表示，虽然没有支持中共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也没有提根据中苏条约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一事，而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对中共实际还是有利的[(155)]。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谈到东北广大地区无人管理，秩序混乱，而我军进入东北后发展很快，认为应该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如刘少奇所说，在曾克林到延

安前，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而曾克林的汇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了解东北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56]。

也就在曾克林到延安汇报的这一天，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发出给华中局转致中共中央电，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只不过作为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同时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到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主力不多，且部署分散，突击力量欠强大，各根据地联系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他提出目前中共可有三个方针：一是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但将造成严重失败；二是在有利基础下让步，争取和平，保持力量，但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三是主动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逼蒋介石让步，取得和平，他认为中共应采取第三种方针。为此他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以晋、绥、察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在此集中主力决战，以求基本控制，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争取局部决战胜利，不可能时以游击战争周旋；为了达此目的，须从山东调三至五万人去东北，从华中调三至六万人去山东，河南主力调山西，江南主力调江北。他认为："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157]与此同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亦建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158]。9月17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在过去情况与我战略要求下，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决留原地有重大意义，且已收到很大效果（如收复许多县城地区，提高我政治地位）。但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如对顽敌已打不到，扩大地区已达一定限度，山东急需派大批主力前往东北，为应付内战危险，须集中主力作战等），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因此他们建议，"浙东、苏南主力

转移，时间越快越好”[159]。这样的意见同时有人提出并非偶然，可见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了向北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也为中共战略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根据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有改变中共战略方针的必要。15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等人，通报了东北的情况，认为这是中共在东北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当天又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160] 9月17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拟电致重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毛泽东等于19日回电，“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的决定[161]。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我们要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朱德在发言中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三个月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六个月。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162]。发展东北成为中共中央的共识，会后刘少奇即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至各地，指示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63] 指示要求，晋察冀

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从此，中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不仅使中共得以集中力量发展东北、华北战略根据地，而且放弃江南根据地，还可作为中共对国民党的让步，在国共谈判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对中共在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164)]。

中共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之后，迅即付诸实施。在北方部署调兵东北（详见第四章第一节），控制华北，在南方部署部队北撤。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165)]。26日又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因目前谈判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166)]。22日华中局电示江南各部：“粟（裕）率一、三纵王（必成）陶（勇）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飞）率四纵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之后。”[(167)] 在苏南、浙东、皖南的中共各部队遂按计划陆续北撤，先后到达苏北泰兴、南通和皖中地区，总计北移人数达七万余人。随后，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继续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也迁往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两地的部队。在湖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部北撤，与湖北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和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在中原鄂豫皖边地区集结，后因情况变化，未及北撤。中共在南方根据地的调整到10月间大体完成，原拟第一步撤出的八个地区，只有海南岛和广东的部队因国民党不承认中共武装而未撤退（广东部队的撤退直至次年6月才最终解决，而海南岛部队国民党始终不予承认）。至于原拟第二步撤退集中方案，因

在重庆谈判中国民党没有同意中共以在南方让步换取在北方合法发展的建议，中共改变原来设想，要求坚持苏北、皖北和豫北。

为了确保在北方的发展，中共以交通战为核心，阻止国民党向华北的进军。9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提出对沿津浦、平汉、同蒲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用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168)]。2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提出中共的方针就是阻止国民党军的前进，随迹尾追，追跟扭打，应以一切力量争取时间。任弼时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占东北，打傅顽，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169)]。中共派往东北的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后，经过与苏方交涉，传回了更为令人鼓舞的信息：“某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收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云。”彭、陈因此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主力卅万，于一月内赶到彭、陈处，用一切方法控制此间，宁使其它区受牺牲化为游击区，以至暂时丧失。”[(170)]这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共向北发展的决心。为了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回延安后，10月15日，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发出指示，“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保证解放区人民的既得权利，争取部分受降，争取东北工作的开展，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这个指示划定了归各地破坏和扼守的铁路路段，要求组织野战军并以地方部队配合进行阻击作战，以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并由公家订价奖赏。“各地必须在干部中、群众中充分解释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因此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171)]。

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各地中央局为核心的领导机关，按地域关系将各地划分为东北局（书记彭真）、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

石）、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各中央局对各地军区、野战军及政权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以确保令行禁止，统一力量。

总之，中共根据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变化，确立了明确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为此，在国统区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172)]。

三　不断升级的国共军事冲突

还在抗战刚刚结束之时，中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一段时间内的国共军事争夺将主要围绕交通线而展开，因此要求"为围困大城市，夺取小城市，增加国民党军队与我争夺果实的困难，故我应彻底破坏所有铁道"[(173)]。随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中警告国民党方面，在这一问题未解决前，国民党若要利用铁路运输北上接收，我方决不能同意，自不能坐视。他提出建议，双方可协商若干大城市由国民党接收，若干地区国民党不再派兵前往，但未得国民党的同意，最后的会谈纪要中也未能列入这个问题[(174)]。因此当国民党军队在接收名义下向华北推进时，便不断遭到中共部队的阻击，国共双方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国共双方都企图以实力较量占据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如同中共中央在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中所说："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

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175] 这种“军事斗争”主要发生在通往华北的各条主要道路，尤其是平汉路、平绥路和津浦路两侧地区。

1．上党战役

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第一仗发生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区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的古称，8月下旬，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四个师抢先自日伪军手中接收了该地区。但该地区恰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态势孤立，中共在抗战胜利伊始即将其列入应予占领的地区之一。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各地军事部署的指示中，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176]。据此，刘邓部署了对上党地区的作战行动。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在抗战结束后编成四个野战纵队（11月又增编三个纵队），为了进行上党战役，动用了三个纵队。9月10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同时行动，不出十天，阎军据点尽失，20日晋冀鲁豫部队已兵临长治城下，史泽波率部困守待援。阎锡山得知长治被围，一方面给史泽波打气，告其“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方面决定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八十三军共六个师二万余人，自祁县南援长治[177]。刘伯承决定改取围城打援战法[178]，以一部续攻长治，集中主力围歼阎锡山的援军。彭部南下走白晋大道，沿线山势陡峭，地形狭隘，重装备运动困难，不利大军展开，行动时又值天雨，道路泥泞，部队拥挤于

山路，行动迟缓。10月2日，彭部在屯留以北山地被包围，5日在突围中被歼，彭毓斌身亡。阎锡山急令史泽波突围，史虽担心“背敌弃城”的危险，但见增援无望，不得不于8日弃长治城南逃，终于12日在沁水以东被晋冀鲁豫部队抓住歼灭，史泽波被俘。

上党战役，阎锡山以“牵一发动全身，虎搏兔竞全力”的态势出战，结果一次损失十个师，几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对阎本人、对国民党均为一大打击，阎锡山在内战中从此再无大的作为[179]，而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与太岳两区联为一体，在晋冀豫三省交汇处稳固立足，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北对正太路，南对陇海路，均可构成威胁，大大有利于中共在华北的战略地位。而且此役正值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其对双方心理的影响不可轻视。

2．平汉战役

重庆谈判结束后，关于接收问题，国共各持己见，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华北进军，中共也因而部署展开阻击战、破路战，堵击国民党的进军，平汉战役由此而起。

10月中旬，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作战之机，经同蒲路、正太路到达石家庄，第一军在晋南亦准备沿同蒲路后续北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第四十、三十、新八军，组成北进兵团，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李文部在石家庄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此一计划的进行，不仅对中共在华北的地位是一大威胁，而且直接牵涉到中共对华北、东北全盘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完成，因此中共极为重视。10月间，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求晋冀鲁豫部队“必须阻止胡宗南、孙连仲北进”，以地方部队“对顽阻击侧击扭击”，迟滞、消耗对手，“便利我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顽伪每路一师或数师”，并要求“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180]。刘、邓据此部署平汉战役，首先利用沿途均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以地方部队及民兵

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迫其分兵，使其疲惫，同时集中三个纵队于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待对手进至预设阵地时予以歼灭之。

10月14日，国民党军自新乡北上，左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指挥的新八军和第三十军共五个师，沿平汉路北进；右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指挥的第四十军及第三十军二十七师共三个师，沿平汉路东的公路北进。部队受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节制，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随军行动，可谓一国三公，难以令行禁止。这三个军渊源系统不一，第四十军与第三十军是8月初才分由第一、六战区调至第十一战区，临时组合成兵团，“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又把对手“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轻装急进，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181)。

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作战部署上，先对对手故示以弱，以纵其骄，诱其放胆北进至漳河与滏阳河河套纵横的预设战场。24日，国民党军渡过漳河到达磁县，次日续进至邯郸南十余公里的马头镇地区，晋冀鲁豫三纵立即攻占磁县，封闭其退路，一、二纵分由东、西攻击。此时对下一步的进止，马法五与高树勋意见不一，只能先就地转攻为守，形成三个分散防守集团。因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早有联系，因此刘邓集中全部三个纵队重点攻击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只以太行军区部队牵制第三十军，同时对新八军发起政治攻势（27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亲至高部，争取其起义）。自25日起，经过数日战斗，第四十军大部被歼，高树勋率新八军于30日宣布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整个防线顿形动摇，马法五见固守无望，不得不率第四十军残部及第三十军向南突围，脱离既设阵地后，又于途中遭晋冀鲁豫部队的东西钳击和兜击，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宋肯堂被俘(182)。

平汉战役，中共认为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结果“获得完满胜利”，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

实现。孙连仲于是役后报告军事委员会，称“经此次挫折，匪军之势当益甚。负军事之责者，宜详加筹度，勿令大河以北从此不可收拾也”。蒋介石得知此役之败的次日，在与王世杰谈中共问题时，“亦甚悲观，似以为黄河以北一时殆无法收拾作为今后建国之洁净土”。可见此役之败对蒋之战略打击之大[183]。蒋认为，“这次我们在马头镇的失败，并不是兵力不够，更不是土匪的力量如何强大，而完全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指挥的错误和注意的疏忽”[184]。国民党所编战史承认，经此役连同上党之役，国民党损失十七个师，在华北的兵力优势大打折扣，而且“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185]。

3．平绥战役

华北国共冲突的另一个主要地点是平绥路沿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署由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接收绥远、察哈尔两省，由于傅部离绥、察距离较近，而且该两省一直是其地盘，故傅作义行动积极，其部队三个军、四个骑兵师于8月中旬自绥远五原出发，至9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先后进占平绥路上的重镇集宁、丰镇等地，进至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任其继续前进，将导致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战略部署是一大威胁。因此，中共认为这“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186]。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配合，由聂荣臻和贺龙共同指挥，担负平绥路作战任务。

傅作义部东进后，其部队沿平绥路据守各点。中共决定先打路外分散各点，再寻机在绥东歼灭傅部主力。为了实现战役计划，晋察冀集中三个纵队，晋绥集中五个旅，共五万余兵力，10月18日分由平绥

路东、南两面出击。23日晋察冀部队攻占集宁，25日晋绥部队攻占卓资山，傅作义部队未作大的抵抗即向归绥收缩，平绥路沿线各点均为中共部队所占，傅部一度在绥远只占有归绥、包头、百灵庙三点。但从军事上说，傅部本处于一字长蛇阵的不利态势，现在主动收缩固守，以逸待劳，反将远途奔袭的不利留给了对手。根据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聂荣臻等人，“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187]。10月26日，聂荣臻与贺龙在集宁南隆盛庄会见，商定下一步“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188]。至11月初，两部已扫清归绥外围据点，兵临归绥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连电向蒋介石告急称，“我军一面坚守城防，一面机动出击，鏖战已数昼夜，奸匪主力尚未击溃，刻仍围攻归绥甚急，情势极为严重，恳请钧座迅赐有效策略，以济艰危为祷”[189]。

傅作义部退守绥、包，以深沟高垒坚拒固守。在归绥，傅作义亲自督战，“整个防区，筑有坚固防御阵地，阵地内筑有明暗碉堡及侧射斜射轻重机枪掩体和掷弹筒、迫击炮游动阵地，火力交叉，消灭死角。阵地前沿挖有深宽各四米的外壕，壕外设有鹿砦及通电流的带刺铁丝网。阵地后方筑有坚固的炮兵群阵地”。在包头，由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董其武坐阵指挥，“四围是高5米、厚2米的土城，四周筑有深、宽各2.5米的外壕。日占时期即筑有坚固城防工事。外壕筑有鹿砦，壕边设带刺通电铁丝网，并布地雷。城外各据点均有通往城内的暗壕沟通”[190]。攻打这种坚固布防的城市，是中共部队以往作战所没有的经历。关于归绥作战的方法，中共中央军委11月6日曾有指示给聂荣臻与贺龙，提出一举攻克、诱敌出歼、围坚攻弱、久困重围四种方法，实践的结果，由于傅作义部几乎全部主力均集中于归绥，城防坚固，而攻城部队无论数量还是攻击力都不居优势，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聂荣臻和贺龙商定改变原计

划，由贺龙率晋绥部队攻包头，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因绥远作战不顺利，中共中央曾向前线指挥部提出三个方案，或以贺部攻包、聂部围归绥，或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或放弃原计划、部队后撤整理，中共中央更倾向于先以全力攻包头[(191)]。聂荣臻认为，如果照此执行，“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全部主力西进，归绥方面将成劣势，于全部战局不利；再者这样绥远将形成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遥远，兵力分散，难以策应；而且绥远是无后方作战，后勤也是问题。他建议“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因此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192)]晋绥部队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后，于12月4日主动撤出了战斗[(193)]。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结束平绥战役，随后晋察冀部队撤围归绥。

平绥战役，中共部队将傅作义部队向西逼退200公里，并一度使其困守孤城，策应了华北和东北全盘战略部署的实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此役中共部队未达预定目标，主要原因是赋予战役的任务过重，与部队实力不相符合。塞外天寒地冻，土工作业困难，后勤支援不足，也直接影响到作战进程。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总结道：“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194)]因为此役未达预期目的，使傅作义部成为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患”，次年的大同和张家口两役，傅部都被蒋介石作为援兵，发挥了很大作用。

4．津浦战役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另在苏北组建华中军区。中共中央赋予华东方面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195]。同时指示：“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196]为此，华东方面以山东部队为主于10月15日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师，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作战中心，迟滞国民党军的北上。华中则以江南北撤部队为主，在11月10日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进行苏北内线作战。

津浦战役之始，中共部队首先在10月19日占领津浦路上之邹县，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张，南段于12月14日攻占滕县，围困临城、枣庄，北段先后攻占宁阳、曲阜，包围兖州、泰安。坐阵济南的李延年和困守临城的陈大庆，均连电向军委会告急，“援军如再迟延不到，恐将影响山东全局及铁路煤矿”；“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197]。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于11月16日占领盐城，12月26日占领高邮，1946年1月15日占领陇海路徐东要点新安镇，配合了津浦路的作战。山东军区部队则进行了胶济路阻击作战。至1946年1月停战之日，华东三大铁路干线中，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陇海路徐州东新安镇至海州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已连为一体，成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最直接而严重的威胁。

四　打打谈谈　边打边谈

重庆谈判结束之时，国共双方同意就有关未决问题继续商谈，自

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为此进行了多轮谈判。

这一阶段国共谈判的主题之一是政治会议问题。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便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妥协，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会议，邀请各党各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以及相关问题[(198)]。关于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会议进行的方式和会议召开的日期，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中共曾经建议，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额可适当多一些；会议采取平等、自由、一致、公开方式进行，协议结果有最后拘束力；会期可定于10月10日。但国民党方面对代表人数、会议方式有不同看法，对会议日期表示过近恐来不及[(199)]。9月30日，国共就政治会议的一些具体问题征求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各方大体同意国共商谈的结果[(200)]。

10月20日，国共谈判重开。在关于政治会议的商谈中，首先遇到的是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会议原定代表三十六人（蒋介石在外），由国、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四方面平均分配。后来国民党提出减少一人，中共提出减少二人，让于民盟。但青年党在国民党的鼓动下，提出自己是第三大党，历史长、党员多，不同意作为民盟成员参加，而要成为一个单独单位参加，并与民盟代表人数相等，各为六名。这立即成为政治会议能否顺利进行的一大关键。中共认为，青年党的要求毫无理由，其以第三大党自居，纯属主观看法，如照此办理，中共和各党派均可要求加倍。但国民党极力为青年党说话，认为不能对其勉强。后经各方会外协商，青年党同意减少为五名，另在总数上增加二名，使民盟代表达到九名，此一问题遂在21日的会谈中得以解决。国民党即提出政协于11月1日召开，然后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201)]。

国民党此时之所以热心于其以往深为反感的政协，目的是通过政协确定国大日期，再通过国大确立其统治合法性，同时以军事进军控

制全国局势，企图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对中共施加压力并约束中共至其框定范围内，重心在以战迫和。可以说，这是战后国民党处理对共关系时的基本方针之一。而中共对国民党的这个方针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的回击战略，军事上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军，政治上不使国民党以国大获取政治利益。因为国民党的进军没有停止的迹象，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颇为怀疑，对政协和整军的态度也不如以往积极。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蒋现以七十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叶剑英出来也无可谈。伪军、受降、解放区三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202)]。因此，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为不致妨碍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应在开会前将军事和解放区问题商得眉目，实际是以其作为政协召开的先决条件。从21日到30日，国共连续举行了五次会谈，讨论未决问题。在军事上，中共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各守原防，重划受降区，各自执行；国民党则提出治本之法为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治标之法为中央军经交通线通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妨碍。中共认为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在政治上，中共提出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国民党认为如此维持现状，则问题根本未解决，殊非办法[(203)]。双方此轮谈判着重于国民党进军和恢复交通问题，但因意见不一而呈胶着状态。

26日，张群在会谈中就避免冲突问题以蒋介石名义提出，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中共军队退至铁路线以外，早日召开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周恩来愤愤而言，受降问题现在未得解决，甚至视我军不如日军，日军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护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揆诸情理，宁可谓乎？他警告说，在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和受降区没有重划之前，我方视中央之进兵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阻止中央军之前进乃为当然的事。交通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恢复，若中央必欲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方

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204]。张群请中共提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恢复交通的方案。29日，中共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的八条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军事小组可以拟出具体办法，如不能取得协议，可以先召开政协，但开会时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31日，国民党提出对案，主要内容为：双方下令部队各驻原地；中共部队撤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由第三方组织交通监察委员会视察事实提出报告；中央军队如在华北各路运输与中共协商决定；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205]。但中共同意撤出铁路沿线的条件是国民党不得利用来运兵，这个对案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双方未能谈成，谈判陷于停顿。

对于谈判停顿造成的形势，国共双方各有自己的判断。而因为国共之争导致交通受阻，影响战后复员，国内舆论对此有所评论。《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提出“我们需要安定，需要进步”。社评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然在当时情况下，此种批评更有利于国民党，因此受到中共的反批评，指其失去了中立立场。《世界日报》社评称，“我们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团结统一和平民主等等政治主张，绝对拥护”，但是对于破坏交通的军事行动“则不能不予以指责”[206]。国民党利用舆论呼声发动宣传攻势，以《中央日报》为中心，频发言论，利用人民渴望安定的心理，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复员，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线的断绝”。交通部长俞飞鹏、次长凌鸿勋对记者称，华北主要铁路线被破坏一千四百余公里，尤以平汉、津浦、同蒲三路为甚，系“有组织有计划之破坏”[207]。同时，国民党继续摆出热心于政协的架势，呼吁“要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惟有共产党体念国家的前途，悲悯人民的痛苦，迎合全国的期望，不再延期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谋合理解决一切问题”。并策动若干社会团体，以全国人民团

体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责中共“遣将派兵，争城掠地，因利乘便，巧取豪夺，遮断国军，阻挠受降，至不惜举全国铁路航路电杆电线工厂物资，尽情破坏”，“深望共产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归政还军，服从中央军令、政令，放弃武装斗争，遵循政党正轨”[208]。

对于这样的形势，国民党内主和派颇为不安。当时正在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的张治中，曾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份万言书，可谓主和派的代表性意见。上书称：“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张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国际上此时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国民党不宜借任何一国之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而且内战将大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的声望；在国内，人民经多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战争违反人民的愿望，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他坦率地告蒋：“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张的结论是：“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209] 王世杰和张群也向蒋建议，与中共订立一个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盖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藉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王世杰还认为，“中共问题与苏联问题不可分开，今后苏联定将采取与美英合作路线，抑或背道而驰，不久当见分晓。在此一问题未决前，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只可尽力防范其扰乱之范围，不能希望得到根本解决”[210]。由于他们的意见，也由于军事进军受阻的形势，使国民党表面上仍摆出希望谈判获

得成果的姿态。

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如同对其军事攻势一样，中共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战略。11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认为“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他在电中还提出：“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又蒋军侵占各县须退出。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5日，毛泽东再草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认为“在恢复交通问题上有几点提法已处于被动，必须考虑成熟，恢复主动”，即“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电报要求周恩来等以平汉战役缴获的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文件“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而且“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211)]。当天，毛的意见以中共发言人谈话的形式公诸于众，提出“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212)]。中共并且公布了平汉战役期间缴获的蒋介石给各战区的“剿共”密电及各战区的进攻计划，对国民党进行反宣传战。在重庆的谈判中，中共于11月8日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表现了毫不退让的立场。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共的方针是两手策略，但“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的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打”。“蒋军来势很

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213]。由于国共双方距离相距较大，11月中旬，双方在最后两次谈判中泛泛交换了意见而未涉及具体问题，双方均表示希望继续商谈，和平解决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谈判暂时中断[214]。

11月26日，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并公布了三十八名代表名单，但因为政治、军事两方面尚未出现有利于政协召开的形势，国共关系也暂时处于僵持状态，政治协商会议一时尚无法召开。

第四节　中间势力的兴起

一　日渐活跃的中间势力

战后中国政坛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为政党的发展留出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一时党派纷出，颇有政党政治的声势。据《中国党派》一书的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大小小的党派，成为当时所称的中间势力[215]。

中间势力的中坚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的民盟，自称“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主要宗旨是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厉行法治，尊重自由[216]。自成立后，民盟便站在国民党反对派立场上，批评国民党的诸多施政方针，要求结束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权。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剧，民盟对国民党的批评也在加强，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共在政治上的盟友。抗战胜利之初，民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坚决的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的姿态与措施，也是我们

要坚决的排除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声明提出了十项主张，要求延期召开国大，保障人民自由，召集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217]。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政治报告认为：“从国际的及国内的形势来说，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是民主。……因此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就认定我们当前唯一的责任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报告肯定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制度，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报告提出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是，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和国民大会问题。认为政治会议应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国民大会必须名符其实，而不是任何党派包办操纵的机关[218]。会议通过的纲领全面概括了民盟的基本政治主张。纲领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妇女七大项。政治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实行地方自治，并实行国会制、内阁制、普选制的政治制度，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由民选产生；经济上，保障人民经济平等，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统一经济计划，实行减租，并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具有独占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企业员工应有管理权，予外人以投资之便利；军事上，军队属于国家，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实行征兵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并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外交上，以保障国家之领土主权，民族之自由平等，与各国和平相处为原则[219]。大会通过的宣言，重申了政治报告和民盟纲领的主要要求和主张。

民盟一大选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漱溟、张东荪、张申府等十八人任中央常委，张澜任

主席，左舜生任秘书长（青年党退出后，梁漱溟任秘书长）。下设十一个委员会，负责人为：组织章伯钧，宣传罗隆基，国内关系梁漱溟，国外关系张君劢，工商黄炎培，青年沈钧儒，民运陶行知，妇女刘清扬，华侨郑振文，文化张申府，财务张澜[220]。各地支部负责人为：西南潘大逵，西北杜斌丞，南方李章达，华北张东荪，东北高崇民，华东由民盟中央直接负责。据统计，到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前，全盟有总支部五个，分支部四十六个，盟员总数2.2万余人[221]。民盟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认为，这时候的民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集合团体，它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它的代表性，亦有它相当的影响。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它是中国当时较有代表性的有多个派别组成的政治集团[222]。

民盟的特点是各个党派的联合，盟员与各党派成员可以兼跨（随着盟务的发展，无党派盟员数量在增加），入盟党派仍有相当的自主权，因此如何处理盟内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民盟面临的一大问题。民盟成立时，是三党三派的结合（青年党、国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223]，其中青年党力量较大，在盟内占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由于政治立场未尽一致（青年党倾向于与国民党合作，而民盟内不少人则倾向于与中共合作），更由于实际的利益考虑（争取参政时的更多席位），青年党在1945年底退出民盟，自立门户[224]。为了解决盟员与党派的关系问题，1946年4月，民盟中常会专门通过了《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规定加盟党派应负下列义务：1．接受本盟之政治主张，并遵守组织规章，服从决议；2．对政治上之重大意见，顺向政府提出者，应建议本盟提出之；3．不得以其党派之名义，自行向政府交涉政治权益；4．所主持之言论机关，对于本盟或盟内党派不得有所诋毁或攻击；5．不得在盟内收揽盟员参加其组织；6．分担本盟经费[225]。同时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规约》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入盟办法》，以图对盟内成员的不同立场予以约束。尽管如此，民盟的组织基础仍不稳固，盟内各党派间的关系仍然存在某些矛盾，也不

可能执行非常严格的纪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到制宪国大召开时，民社党决定参加国大，导致民盟的又一次分裂。

民盟以外，还有一批中间党派相继成立。民主建国会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中心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的部分文教界人士组成。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充分尊重人民自由，各政治党派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对于经济，主张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宣言称“我们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我们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而努力的党派及个人，都愿保持极度的友善，然而同时保留对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评自由，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成立大会通过的政纲，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方面的四十六项要求。民建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226]。成立大会推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施复亮、李烛尘等为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上海的文教界人士和部分工商界人士为主组成的。1945年12月30日，民进在上海正式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次年1月4日，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实现民主、还政于民、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227]。随后推出马叙伦、陈此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

九三学社以“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为号召。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等一部分文教科学界人士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后改称“九三座谈会”，并决定筹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选出潘菽、褚辅成、许德珩、涂长望等为理事。成立宣言称，“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的实

施，实为救国要着，本学社同人，愿在自己岗位上，作此种问题之努力，促其实现”。成立大会上提出八项基本主张，着重于“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228]。

上述新成立的党派，其政治主张与民盟大同小异，人员组成亦常有与民盟重合者，民建主张“对于中国民主同盟须极端联系”，民进“愿与国内各民主党派友好联合”[229]，因此，民盟实际上是战后中间势力的中坚力量和政治上的代表。除此之外，由国民党内民主派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于1945年10月28日和1946年4月14日成立，民联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等任常务干事，民促由李济深任主席，李未到任前，由蔡廷锴代理。除了在政治主张上与民盟等党派基本一致外，民联和民促的特点是利用其成员在国民党内的老关系，要求改造国民党，并联系与策动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一致行动，共同投身于反蒋的实际行动之中[230]。民联和民促最终于1948年1月合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31]。

除了这些新成立的党派之外，原有的一些老党，主要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原国社党），也在战后全面恢复了活动。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是国共之外各党派中历史较悠久、组织较健全、人数也较多者。抗战胜利后，青年党在10月初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十条要求，中心为“从速召集建国会议（或政治会议），以奠定团结基础。其权限不必动摇国民党之领导地位，但必须是以解决问题；其名额与人选不必拘文牵义，但必须顾及各方之实现，并转得举国一致之信赖”；国民大会之召开，须在政治协商会议作详密之协商；切实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中央与地方之用人行政，宜破除成见，一本惟才惟贤之旨；解散伪军，裁汰冗兵，为全国大举整军的初步[232]。12月2日至12日，青年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目的在重订政纲，修改章则，扩大组织，刷新阵容，尤以研讨战后时局，讲求适当对

策，为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233]。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称：“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234] 大会选出曾琦为主席，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常委，陈启天为秘书长。青年党号称中国第三大党，有党员二十余万，但实际党员人数不过万余人[235]，党部组织以四川、重庆、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市较为健全，尤以四川为其主要活动基地。青年党中央领导号称曾、李、左三巨头，曾琦抗战时期一度活动于沦陷区，形象欠佳，战后代表党内右派，“力主脱离民主同盟”；李璜因在抗战时期实际领导该党，“在党内之势力相当雄厚，该党参加民主同盟及与中共采取联系，多为李璜所主张，故有左派之称”；“左舜生则依违于曾、李之间，曾经联李以排曾，复因不满李之左倾领导，又联曾以排李”[236]。然而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与青年党之间关系的变化，随着战后国内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随着青年党对于参政利益的追求，这三人之间对国共的态度也逐渐趋于一致。实际上，1945年底青年党退出民盟已经预示了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其后青年党实际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

民社党是由张君劢、张东荪负责的国家社会党和由伍宪子、李大明负责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237]。两党领导人因为与康有为、梁启超共同的传承关系，且政见大体相同，在张君劢的运作下，1946年8月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民主社会党，由张君劢任组织委员会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以形成一个大党，在战后政治舞台上据有一席之地。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主张在国家本位基础上，实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俄式的经济平等，故将该党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即政治民主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的结合。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政治生涯中，屡受挫折，政治活动不如其意，感到“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因此希望得到西方式的政治活动空间与自由。他自称：“我从读书起，一直看重英美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是以尊重人民权力为基础，而以选举方法表示民意，始终觉得值得爱护”[238]。张君劢在战后中间势

力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政协和制宪问题上，张主张限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特权，实行英美议会政治，一度颇受中间势力的推重。民社党在成立宣言中主张，奠定和平，拥护统一，要求民主，实现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些，应该实行政争决于选举，不决于疆场，“故吾人尊重政协之协议，非徒以其为协议之结果，乃以其为建国关键之所在，而吾人平日所祈求之和平统一，正在于是”[239]。民社党对各党的态度是：对国民党，反对其一党专政，指出其政治腐化，惟在实施政协决议，则予赞助，如在各地不阻碍本党之发展，与之取友好态度；对共产党，在目前力避文字上之攻击，忠告其停止军事行动或缩小范围，在反对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等方面取同一态度；对青年党，保持以往私人往还及友好态度，在文字上对其取静观态度；对民主同盟，视为联盟，非为政党，暂不退出，惟须保持本身独立，如有共同行动，应以明文约定者为限，党员非经核准，不得自行加入民盟或担任任何名义[240]。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坛上还涌现出一大批形形色色、背景不一的小党派，其中有源起于清末的光复会（1945年恢复，负责人尹锐志）、源起于20年代的中国少年劳动党（负责人安若定）；有主要在海外侨团中发展的党派，如中国洪门民治党（负责人司徒美堂，后退出）、中国中和党（负责人尤永昌）等；有的是特殊社会阶层的集合，如四川袍哥的中华社会党、以佛教界人士为主的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有的是地方实力派为巩固自身利益而组织，如山西的民族革命同志会（阎锡山任会长），四川的中国农民自由党（得到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支持）；有的是失意政客军人的寄托，如四川将领范绍增的益社；多数是抗战胜利后成立或开始公开活动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党（负责人侯野君）、中国人民党（负责人吴仁勋）、中国国民自由党（负责人林东海）、中国农民党（负责人董时进），等等[241]。

战后的小党派，无论旧有或新成立的，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理

念，而为利之组合，希求在战后的政治重组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趋时而起，应时而散，在中国政治中毫无影响力可言。少数有政治主张的党派，在国共分裂前，多数呼吁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与中间势力的主张大同小异，间或有一些代表行业利益的特别要求。而在国共分裂之后，这些小党派或追随中共，或投靠国民党，或干脆散伙，除此很难有别的选择。然而无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他们存在，总是既存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总对执政党形成公开或隐藏的威胁，因此国民党对这些实力不大的小党派也不愿放手，他们不反现政府，则听其自生自灭，一旦有反对现政府的迹象，则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

二　中间道路的理想和现实

何为中间道路？中间势力的基础与意义何在？施复亮的解释可为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在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间派的政治立场必须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上应是自由主义，行动上应是和平的改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民主的。中间派决不笼统地反对或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而"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定，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242)]。

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在战后一度有较大发展与战后美苏相争的国际背景和国共相争的国内背景密切相关。国共两党在政治斗争中都

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而美国要求国民党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容纳反对党，这些均鼓励了中间党派的兴起。中间党派的中间路线，在战后中国主要表现在以和平方式调和国共关系，希冀以此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民盟可称中间势力的代表性党派，它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243]。民社党的张东荪对中间势力的这种立场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国际存在美苏对立，反映到国内即存在国共对立，中间势力的责任，就是调和折衷，使两者之间的对立趋于软化。他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自不待言。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对于国共对立，他希望将“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所以我们一百二十分赞成联合政府，但我们却以为联合政府必须建立于共同纲领之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244]。一句话，中间党派主张在左与右之间保持中立，方法上采取和平改良的立场，协商谈判，不搞暴力革命。

在抗战胜利后的现实条件下，中间势力对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形势的看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脱离实际。理论上，他们对西

式和苏式制度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以为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就可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搭上过桥，这实在是一种空想。至于实践，中间势力企图以调和国共之争争取自身的地位以至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他们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调和国共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国共力量的强大与中间势力的无奈。与政治主张脱离实际相伴随的，是中间党派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多在上层活动。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中间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是中国政治已经处于国共两大党的争斗之下，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而且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党派政治奉行的是实力原则[245]，只有国共两党有组织、有武装、有强大而可靠的群众基础与动员力，任何其他党派都难以代替国共两党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而非一时可以改变。中间党派格于实际，只能周旋于国共之间，受到国共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在国共之间保持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非偏于国，便偏于共。但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中间势力对国民党的压迫感受更为直接，争民主是他们的一致要求，因此在国共尚未破裂之际，他们的态度对中共更为有利，在实践中他们也往往采取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立场。

不仅如此，中间势力自身由于种种利益考量的不同，不仅各党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各党内部同样存在着主张的不一，尤以民盟为甚。民盟是各个不同党派的集合体，在政治问题上一向主张不一，只是对外维持着大体的统一。民盟内部最初的三党三派中，青年党较为倾向于国民党，第三党、救国会较为倾向于中共，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态度较为中立[246]。随着形势的发展，民盟成员不断分化，青年党脱离单干，民社党逐渐与民盟拉开距离而倾向于国民党，他们成为中间偏右政党；而民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多的是中间偏左，与中共更为接近。民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声明中，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要求延期召开国大，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都与中共的主张相一致；而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民盟虽主张军令政令的统一，但

又提出“应该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关方面心安理得”；“组织一收复地带人事调整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况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调整，以避免党派间的冲突”[247]。这又在实际上呼应了中共的要求，自然为国民党所不满。对于中共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问题，中间势力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问题往往为更为迫切的和平民主问题所掩盖，因此中共与中间势力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得并不明显[248]。

实际上，中间势力的作用也只有在国共两党争执不下时才得以发挥，至于他们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因为中间势力的在野特性而未及进入实践。一旦国共破裂，战火燃起，中间党派势必在国共中间作一抉择，任何真正的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他们深知：“倘使内战长期继续下去，中国问题只有依靠武力来解决，那么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内战停止，和平恢复之后，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才有实现的可能。”[249] 如同梁漱溟所言：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250]。

在内战战火即将点燃之际，1946年5月间，民盟领导人在聚会时有若干对话，颇能反映他们的处境与心态。沈钧儒说：内战扩大，人民固然痛苦，我们这些第三者又将如何呢？一方面政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已有地盘，更有枪杆，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恐将左右为难，如何是好呢？梁漱溟说：在左右和谈时，中间人已感不易；到左右开枪武打的时候，中间人当更难以自处。黄炎培说：现在处变之中，固不易决定我们的立场，然恐亦不容静观以待呀！章伯钧说：两个有力的政党都在那剧变，形势实恐不容我们静观。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我敢武断的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不要说我们不愿右倾，就是你想投靠，他们也

不会容纳你。我们在政治协商会中，虽与中共合作，目的仅在造成制衡的力量，以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何尝是左倾呢？国民党失计，因此而加以左倾的罪名。我们如此夹于两者之间，真是不知如何是好[251]？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与条件下，没有武装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政治地位。著名的《观察》杂志记者曾经就张君劢写过一段颇含意味的话："如张君劢氏，固一彬彬有礼的长者，亦为一博学能文的学者，然而他领导组党，数年以来，可谓无甚成就。吾人固不赞成组党要用打手，然而单靠书生，也是不行的。"[252]

中间势力在战后中国政坛上一度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国共两党的态度。由于国内外形势所逼，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战后中国政治大舞台的焦点，而在政治斗争中，国共双方都需要支持者，因此也就为中间党派的活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然而，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势力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势力的左右。国民党中宣部早在1943年就拟订了《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对策提出国民党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一、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本党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宪政"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之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其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二、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箝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三、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本党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劢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外围，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

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的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253]。在这样的认识下，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是，拉住青年、民社两党，争取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对于靠近中共者则施以压力。对于最主要的中间党派民盟，国民党的策略是，“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譬如民盟内部已有左右两派之斗争，即应加速挑起国社党村治派等对救国会派第三党之斗争，扩大其矛盾”[254]。在全面内战爆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尤其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255]。对于态度较为温和的黄炎培，蒋介石专门派陈立夫、陶希圣、杜月笙等去拉拢，还派陶希圣前往上海，征求黄炎培对时局的意见，以得到中间势力对其政策的谅解。但黄答以：“一，对中共只有一法，即以共同制定之宪法范围其行动，故下手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以解纷；二，目前办法宜使参加商谈，迅速解决军事问题，接谈政治；三，若舍政协会，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使陶悻悻而归。陈立夫为此指责黄炎培说：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256]。

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理念，国民党对于各小党派仍多采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对他们的拉拢并不成功。即使是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在一个时期内反对国民党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政策，可见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的不成功。反观中共与其他党派之间，虽然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但因为现实处境的相同，在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权和一党专政的当前斗争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而有相当成功的合作[257]。据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还在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签订了秘密合作的协定，双方同意：1．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2．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加力量；3．中共解放区欢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所做之工作，以不妨害中共事业为原则；4．中国民主同盟对中共解放

区之政治军事经济各设施得尽量予以支持，并扩大其影响；5．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件[258]。在战后国共政治斗争中，如停战、政协、国大、宪法、改组政府等方面，中共与中间势力尤其是民盟的合作，给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即便如此，中共对中间势力的基础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周恩来在总结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时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259]

中间党派自身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逐步放弃了中间的政治主张。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阵营。青年党本身即具有反共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共产党，从周恩来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260]随着战后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青年党的态度也日渐倒向国民党。发展到1947年9月，青年党的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261]民社党起初虽避免直接批评中共，但它的行动已逐步脱离民盟与中共合作的路线，尤其是它决定参加制宪国大后，实际上也已倒向国民党方面。

中间势力中最强调中间立场的民盟，则在政治立场上不断地靠近中共。虽然民盟人士关于在国共破裂后民盟应采何种立场的问题上有争论，有人主张坚持“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也有人认为，民盟实际是与中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因此不能称为第三方面，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262]。但是国民党打击民盟而中共争取民盟的事实，迫使民盟只能左转。民盟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已经表明其与国民党的分道扬镳。1947年1月，民盟举行一届二中全会，分析形势，总结工作。主席张澜在会议报告中回溯了过去一年的形势发展，认为中共“确实有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他将政协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撕毁了政协决议”，召开国大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这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对于国共双方的态度如何实际决定了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张澜此言对民盟在国共之争中的立场是一个明确的解释，说明民盟也不可能在国共之争中保持所谓真正的中立。还在这个报告中，张澜解释了民盟的政治立场，他认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263]既是第三者，但又不能在反民主时保持中立，而反民主的责任者是国民党，民盟就这样在逻辑上解释了自己向中共立场靠拢的原因。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虽然还提到“继续推进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决议中彻底反对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认为制宪国大不合政协决议的要求等主张，与中共更为接近而远离国民党的立场[264]。因此国民党逐渐不能容忍民盟的公开存在，终至发展到压迫民盟解散的地步。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一贯坚持中间路线的人也不能不走向反对国民党的立场，正如施复亮文中所说：“自然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

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265]

相比较起来，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民联及其后身民革，对国民党从言论的批判到实际的行动都更为激烈。1947年2月，民联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报告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军阀、官僚、买办、大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集团，建立了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发动了全面内战。因此提出：中间阶层不但应该立即团结起来，组织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还要和工农民主力量联合，组织广泛、坚强、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流血，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实现政协决议、停战和整军协定[266]。他们虽然还强调自己的中间阶级特性，但他们联合工农，不惜流血的主张，与中间派一贯的和平改良、保持特性的主张，已经有所疏离。他们虽然还不能忘情于国民党，认为反动力量不能代表国民党，主张恢复党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对国民党进行改革，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离国民党越来越远，而离中共越来越近了。

---

(1) 该照会称：“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17页）因此，日本投降实际是有条件的，即维持天皇的名义地位不变。

(2)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11日。这一晚的重庆确实令所有亲历者难忘。陈纪滢写道：“重庆市民的狂欢，是毕生中难得一见的场面，唯有亲自参加的人才能体会到是什么情况。”傅斯年拿着一瓶酒，到街上大喝，又拿了一根手杖，到街上乱舞。易君左正在一家餐馆用餐，忽然有人冲进来大声狂叫：“日本投降了！”“吃饭的客人也同时推翻食桌，一齐向门外狂奔。

这家菜馆的老板、老板娘子、伙计们，什么都不管了。跟着我们跑出大门，只见人潮汹涌，在黯淡的街灯光下，万头攒动，高呼狂叫，嚷成一片，像巨雷的震响。”（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0日，台北“国史馆”1988年版）

(3) 《是投降的时候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11日。

(4) 上海全市商家11日停业，各报均出号外报道日本投降消息，日军因未接到投降令，仍实行戒严，压制民众情绪。

(5) 《情报单位截译南北伪组织善后措置情形》，1945年8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第四册，台北1981年版，第1537—1538页。

(6) 陈公博为了向重庆靠拢，特意致电蒋介石献策称，南京政权所属部队“若有自危之心，无路可投，必走奸匪自固。公博之意似宜均应予以番号，一俟大局初定，再行分别改编复员”。他还对委任名单提出了建议（《陈公博报告伪组织解散并请予伪军番号免其走匪自固一俟大局初定再分别改编复员呈蒋主席之巧电》，1945年8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52页）。然而蒋介石对陈不屑一顾，陈的献策没有得到蒋的青睐，陈不得不于25日在日方安排下匆匆逃往日本。周佛海则早经戴笠和重庆建立了联系，抗战临近结束前，周又与顾祝同“不断派人员往来联络”，“关于配合防制奸匪问题”，顾“指示彼等配合防制办法，坚定其信心，俾不致为奸匪所利用”。因此，日本投降后周佛海即被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负责暂时维持京沪地区的治安（《顾祝同为策动周佛海等反正呈蒋委员长电》，1945年4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51页）。

(7) 《阎锡山转报日本投降后华北王荫泰等上蒋委员长静候处置之皓电》，1945年8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37页。

(8) 田中钧一：《满洲国皇帝的最后一天》，孙邦主编：《伪满覆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9) 《日皇裕仁停战诏书》（1945年8月14日），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10) 《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政府电》（1945年8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1)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1945年印本，第1—2页。

(12)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2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78—79页。

(13)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23页。

(14)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15—17页。根据10月30日公布的《二五减租办法》，凡实行豁免田赋省份的佃农当年地租一律减交四分之一。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亦颁布命令："伪政府所颁布一切法令规章，亟应完全废止，所有因爱国行为，致遭逮捕，及触犯伪订法律，而并不违反国法，业被拘禁判处徒刑人员，均得宣告无罪，予以恢复自由。"（《布告废止伪政府法令规章》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1946年印本，第205页）。

(15) 严问天等编：《南京受降记》，四人出版社1945年版，第132页；《青年日报》1945年9月9日报道，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36页。

(16) 《南京受降记》，第131—133页。

(17)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5—9页。

(18)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12—13页。

(19)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

(20)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1978年印本，第785页。

(21) 《中央对于日本请求投降之决策暨有关受降及沦陷区各问题之议案》，1945年8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9页。

(22) 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3页；《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第48页。

(23)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

(24)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其后通过魏德迈向朱德转交了他们的答复，强调美、英、苏一致同意，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将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国政府希望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与蒋介石充分合作（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3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25)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

(26)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39—1044页。

(27) 《国民党中执会关于延安总部命令的对策》（1945年8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二册。

(28) 《蒋介石致毛泽东电》（1945年8月20日），《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21日。

(29)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页。

(30)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21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78—79、146—147页。实际上，冈村宁次早于8月18日就拟订了《对华处理纲要》，其原则为“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国共关系应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持以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他还命令日军，不但不接受敌方（指中共——作者注）任何要求，且必要时，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46页）。

(31) 《戴笠致周佛海函》（1945年8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8日。

(32) 《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28页。

(33) 《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4)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3页。

(35) 《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6) 《华中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页。

(37)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3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3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

(40) 《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1945年8月17日），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页。东北由苏联受降。由于英国的坚持，香港实际由英国接收，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目。

(41)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3页。

(42)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何应钦电》（1945年8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5—67、71—73页。中国方面接收主官，除李延年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外，其他均为该战区或方面军司令长官。

(4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40—143页。

(44)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5、29号，1945年9月11、2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13页。

(45)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1983年版，第375—376页。

(46) 《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1946年2月1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513页。表中若干错误，根据《中国战区受降始末》第229—236页同表较正，但仍有个别地方两表不一，本书概据前表。

(47)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第21、45表，1946年印本，第7—8页。

(48) 据《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附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事日记》的统计。

(49) 《河北省政府代电》（1946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档），全宗二，卷号9099；《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致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告朱德令鲁境共军窥犯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祈请政府派军援助电》（1945年8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18页。

(50) Chen Li-fu Materials，pp．22-24，*Chen Li-fu Collection*， Box 48，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51) 蒋的亲信陈布雷曾对人抱怨说：自1944年以来，新进的人（指宋子文、王世杰、张群等人——作者注），立论高，气势逼人，拼命拉着政府向左边跑，右倾势力日渐低落，连果夫先生近来也不常见委座，见到委座也不常发言（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52)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34页。据吴鼎昌的旧部、时被提名任吉林省民政厅长的尚传道回忆，他在重庆见到吴鼎昌时，吴告他“现在毛润之先生亲自来重庆了，国共两党正在进行谈判，是我向蒋主席建议连发三次电报才请来的，电报是我亲笔拟的”（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10页）。然此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吴鼎昌是否会向一位地位并不高的下属、以这样明确的方式谈论当时尚属高度机密的事情，甚可怀疑。与吴鼎昌同属政学系、同为蒋之高级幕僚、而且关系十分密切的熊式辉，在其日记中对此事毫无记载（熊的日记为当年所记而非事后回忆，可信度当更高，何况其日记中对国民党高层机密并无避讳处），如果此事确属吴之献言，按常理吴更应该告诉熊。另据《大公报》渝版负责人王芸生回忆，吴鼎昌向蒋献言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新闻，15日将蒋电稿交《大公报》，准备当天发在晚报上，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发出通稿（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3页）。吴将电稿交给《大公报》，只能说明他事先得到此电稿，并不必然证明此电与他的关系。

(53) 现有关于吴鼎昌与蒋电关系的材料均为他人回忆，然后口口相传，吴本人并未有此说法，已公开的蒋的谈话、日记亦未有任何暗示，故尚待更为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5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8页。

(55)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16、21、25日。

(56) 《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得知蒋电后，总主笔陶希圣等决定“假戏真做，制造空气”。陶希圣认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王抡楦：《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重庆文史资料》第1辑，第73—75页）

(57) 8月21日，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宴请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意在沟通感情，结果黄炎培不客气地说：“蒋主席仅发电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后，主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改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黄炎培日记》1945年8月10日，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

(58)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1943年1月25日）、《同赫尔利的谈话》（1944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5页。蒋介石也曾有请毛泽东到重庆当面商谈之意，并在1943年林彪自重庆回延安时，经张治中向林转交了一封给毛的信。因为时机不成熟，此事未有下文（《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5页）。

(59) 《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

(60)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30页。

(61)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1945年8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62)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页；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6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页。贺龙曾在毛赴渝后致电刘少奇等询问："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刘等回电说：毛泽东赴渝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蒋介石不敢不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据贺龙说，"对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大家对蒋介石的诚意有怀疑，对毛主席的安全很担心，许多党员、干部、战士、群众放声大哭"（《关于前后方军事政治群众情况》，1946年3月31日，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8月25日，中共高级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等搭乘美军运输机离开延安赴各根据地，毛特意对他们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6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65)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16页。

(66)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51—1052页。

(67) *Foreign Revol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7，p．446．Here after *FRUS*．

(6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8页。

(69) 参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据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对苏联系工作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有过两封电报，第一封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第二封则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毛泽东看到这两封电报后非常生气，1949年以后曾在不同场合谈到此点（《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这两封电报可能属实，但具体内容在见到电报原文之前，只能存疑。

(70) *FRUS*，1945，Vol．7，p．454．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一度寄予了

过高的期望，实际上，苏联虽然在中苏条约谈判时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但这并不等于不支持中共，国民党是在以后的历史实际进程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的。如同有研究者所论，“斯大林支持统一中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他会全身心地支持国民党，或他将拒绝援助共产党人，也不意味着他会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权力，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政策”（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p．32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7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72) 引自邓泽宏：《美国对华调处政策和第三条道路的兴衰》，《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6页。周恩来也曾告诉美国人，“尽管苏联在欧洲的战争中起了最大的影响，做了最大的牺牲，但它在东方的影响总是次于美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出于这样的估计，中共处理战后国共关系时，在全局上更看重美国，而在局部上如东北，当然较多地考虑到苏联的意见。

(73)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74) 《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9日。

(75)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0日。

(76) 《第六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3页。

(77)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民社党的蒋匀田曾经评论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面对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心理，“无建国救民的具体方案之提出，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吗”？反观中共，“则强调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权利及党派平等合法的地位，自然获得各方面之赞许”（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5页）。

(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15—816页。

(79)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商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

(80) 《政府代表王世杰与毛泽东谈话记录》（1945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7—39页。

(81) 《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21页。

(8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5页。据中共方面的情报，蒋的实际开价是，中共军队编16个师，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副院长，由中共人员担任，并让出新疆省主席给中共，国大保证国民党代表占十分之七以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7—408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4、826页。

(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1—44页。

(85) 在国共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张治中认为，中共这两项表示，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张治中回忆录》，第728页）。

(86) 《第一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5—55页。

(87) 《第二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55—60页。

(88) 《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194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6—277页。

(89) 以下引文见《第三、四、五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0、11、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60—78页。

(90) 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解决战时的迫切问题，但为国民党拒绝。此后中共一直坚持党派会议主张，而国民党反对此一提法，主张采用咨询会议方式，故建议改为政治协商会议，以示协商而非决定。而按中共的理解，政协会议就是党派会议。

(9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2页。

(92) 《第六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8—86页。

(93) 《第七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6—89页。

(94) 《第八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9—97页。

(9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0页。

(96)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

(97) 《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3页。

(98)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2页。

(99) 《李璜自纽约致重庆青年党总部函》（1945年9月16日），*Li Huang Collection*， Box 1，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00) 《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4日，台北1990年版。

(10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1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503页。

(103) 胡乔木认为："当时的情况恐怕是我们紧张，国方也紧张。一方面，他们冷淡我们，向我方施加最后压力，想要我党再让一步；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谈判结果只能大体如此，继续施压有可能迫使我们关闭谈判之门而适得其反。我方担心达不成协议，国方也担心，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2页）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7页。

(10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8页。

(10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34页。

(107) 《国共第九、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7、28日），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知难行易在美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34—142页。

(108) 《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4页。

(109) 根据中共方面关于会谈纪要的原拟稿，中共曾经提出：中央军队进入或通过某一解放区，只有在会谈已有结果，驻地已有划分后，才不致发生冲突，如在目前，不论前进或通过，事实上均为进攻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且此事已在许多地区发生，要求政府立予制止，免致造成内战。因为国民党方面的不同意见，此条没有列入最后公布的纪要中，而以后的事实证

明，正是因为对受降、进军问题的看法不一，导致国共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国共会谈纪要初稿（我方起草）》，1945年10月，《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第91页）。

(110)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

(111)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4页。

(112) 《大公报》（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9日。

(1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45—848页。

(1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2页。

(1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116) 《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24—325页。

(117) 《政府与中共的会谈》，《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3日。

(118) 《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未解决的问题》，《新民报》1945年10月13日。

(11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政协1980年印本，第846—849页。据郭汝瑰回忆，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已有计划，以傅作义进军张家口，胡宗南进军平津，不使中共通过收缴日械而壮大（作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

(12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6—687页。

(121) 《白崇禧副参谋总长上蒋委员长告共军侵夺华北各地并陈述处置事项函》（1945年8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18—319页。白崇禧是战后坚决主张“剿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称曾向蒋介石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共匪剿平，而后行宪”；“若共匪未剿平即行宪，有甚多矛盾处，且难免违宪”。他的理由是，行宪“予共党以扩大叛乱之机会”，负责任者忙于竞选“势必松懈其本身工作”，“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东北华北因无法票选而改为推选，“与宪法规定之普选殊为不合”。他将这些意见签呈报蒋，蒋对他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结果蒋迫于形势未接受白的意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

475、478页，下册第848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122)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69页。

(123)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自芷江呈蒋委员长报告已通令各战区各方面军迅速派出前进指挥所向受降地区挺进并以优势兵力封锁奸匪地域电》，1945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第三册，第642—643页。

(124)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93页。

(125) 《新编陆军骑兵第六师作战机密日记》，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822。

(126)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第7页。

(127) 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6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纪述》，1946年印本，第27页。

(128)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诚字第24、31号，1945年9月28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86、90页。

(129)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31日）、《冈村宁次致何应钦复文》（1945年9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95、109页。

(130) 参山作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进入济南之真相》，《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120—123页。

(131)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据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城野宏回忆，赵承绶初至太原即告诉他，阎锡山认为“这次日本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失败者的地位是暂时的，今后的问题是中日如何团结一致，抵挡北方。为此，希望得到你们比以前更好的合作”。其后，由省防第二军军长赵瑞与城野宏等达成原则：日军自愿者编成部队，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上升三级，合同期两年，期满后阎方负责归国事宜。这种情况以至连蒋介石也觉得“有碍观瞻”。他对阎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说：“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要徐前

往“办理送俘”（城野宏：《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第37、41页；《徐永昌日记》1946年3月23日）。实际上，在全国日俘遣返以后，仍有日军留在阎部参战。直到1949年4月太原战役期间，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义参战的日军最后覆灭。日本前驻华北第一方面军司令澄田徕四郎则一直被阎锡山奉为顾问上宾，至1949年初才被送回日本。

(132) 《蒋中正令》（1945年8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2页。

(133) 军统局局长戴笠在浙江淳安得知日本投降消息后，即致电在重庆的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策动之一百二十七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九十七部，七十四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先给予先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共军滋扰任务。上海方面，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指挥，负维持地方治安，稳定金融责任（《戴雨农先生全集》，引自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1日）。

(134) 贾文波：《上党战役前后在阎锡山身边所见》，《山西文史资料》第37辑，第39页。

(135) 《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机密作战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6页。

(136) 第一战区参谋处编：《第一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1页。

(13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1页。

(138) 《胡宗南十月二十四日致高树勋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1951年印本，第174—175页。此电于平汉战役中为中共部队所缴获，并于11月5日公布。

(139)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页；於凭远、罗冷梅等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9—160页。

(140) 《二十八集团军阵中日记》，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836。

(141) Truman，Harry S．*The Memoirs of Harry S．Truman*，Vol．1，p．378．Hodder and Stoughton Ltd．，Suffolk，1955．

(142) Wedemeyer Files，Schaller，Michael．*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262．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979；Naval Aide Files，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p．10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

(143)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13。次年春，美国又从上海、九龙、海防等地海运新一、新六、第六十、七十一、九十三军到东北，使美国运送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超过了四十万人。

(144) *The China White Paper*，Originally Issued a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Vol．2，p．694．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Far Eastern Series 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Vol．1，pp．381-382．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Arlington，Virginia，1976．

(14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131-132．

(14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90—891页。

(147) 在次年东北作战时，蒋介石便报怨“我中央军则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5页）。

(148)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With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ik，Nov．25，1945，*T．V．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9) Forrestal and Patterson to Byrnes，Nov．26，1945，Meeting of Secretaries of State，war，and Navy，Nov．27，1945，JCS to Wedemeyer，Dec．14，1945，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p．284，287．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p．5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150)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151) 《中央关于华中我军的战略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34页。

(152)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16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7页。

(153) 《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0—251页。

(154)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0页。

(155) 中共中央得知苏联态度后，由刘少奇等致函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热河、辽宁抗战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得到苏方的默认（《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1页）。同时，进入华北的苏军则要求中共“火速北开接收”，并给予武器，“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

(156)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157) 《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83—285页。

(15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4页。

(159) 《华中局建议江南主力北调致中央电》，1945年9月17日。

(160)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2页。

(161)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及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复电》（1945年9月17、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80页。

(162)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5页；《朱德年谱》第279页。

(163)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372页。

(164) 国民党和美英在华人员亦认识到：“国党最大危险，莫如共党全力挺进东北，借苏联暗中掩护占据东北，利用日军武器武装军队，然后由张家口至承德沿山海关秦皇岛一线筑成防线，若是，则国际和会对国共必折衷解决，共产党如失此机处境必危。”（《中情部关于东北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20日）

(165) 《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向北进军问题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86—287页。

(166)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7页。

(16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16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1页。

(169)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170)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

(171) 《中央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前进的指示》（194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45—347页。

(172)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0—372页。

(173) 《军委关于破路给晋察冀、晋冀鲁豫、平原、山东区的指示》，1945年8月24日。

(174) 《国共第九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7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36页；《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日），《重庆谈判纪实》第271页。

(175)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1页。

(176) 《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0页；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65页。

(177) 史泽波：《阎军抢占上党的惨败和“雪耻奋斗”的幻灭》，《山西文史资料》第24辑，第15页。

(178) 晋冀鲁豫部队当时刚刚编成野战军，装备奇缺，全军只有六门山炮，半数以上的团没有重火器，每支枪平均只有数发子弹，因此刘伯承决定不强攻城池，而是力争在野战中消灭对手。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实情的决策。

(179) 阎锡山部总共有七个军（二十一个师），另一个骑兵军（三个骑兵师）。经此一役，一向闭关自保的阎锡山，不得不一再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入晋，接管晋南防务，而山西境内多处防务依赖日军承担，颇为舆论所诟。

(180) 《军委关于阻止国民党军北进掩护我向东北进军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军委关于迟滞国民党军北进给刘伯承邓

小平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17、337页。

(181) 《中央关于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问题给晋冀鲁豫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9—360页；《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1945年12月1日，《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

(182) 上党与平汉两役，刘伯承均利用对手不擅野战、运动战的特点，诱使其脱离既设工事，于运动中歼灭之。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认为，因为国民党军队“战术上的单独防御与互不支援，一切按照条令动作而不会机动”，因此“特别利于我们在野战中，压迫与引诱它脱离阵地，在运动中消灭它”（《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1945年12月1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21页）。邓小平认为，高树勋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183)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11月2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3日。

(184) 《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1945年11月16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786页。

(185)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2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56页。

(186) 《中央关于平绥战役及准备消灭阎锡山残部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5页。

(187) 《归绥包头大同等地必须占领》（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71页。

(188)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页。

(189) 《傅作义司令长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围攻归绥甚急电》（194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21页。

(190) 靳书科：《第十二战区抢夺包头归绥大同胜利果实的经过》，《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4辑，第20—22页。

(191)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2页。

(192)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2—613页。

(193) 董其武在起义之后，曾对贺龙说："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许多水，一冻成冰，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94)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5页。

(195) 《军委关于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给陈毅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35页。

(196) 《中央关于在华中和山东建立野战军等给陈毅、黎玉及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0页。

(197)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12月11、31日。

(198) 《国共第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8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2页。

(199) 《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日），《重庆谈判纪实》，第270—271页。

(200) 《政治会议问题谈话要点》（1945年9月30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3—145页。

(201)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0、21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07—411页。

(202) 《周恩来年谱》，第624页。

(203)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1、22、23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10—417页。

(204)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6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17—418页。

(205) 《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停止内战的四项办法》（194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2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68页。

(206) 《为交通着急》，《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25日；《中共报国之机》，《世界日报》1945年11月4日。

(207) 《建设第一交通第一》，《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1月2日；《时事新报》1945年11月6日；《扫荡报》（重庆）1945年11月1日。

(208) 《迅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2日；《和平日报》1945年12月1日。

(209) 《张治中回忆录》，第734—736页。

(21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31日、11月3日。

(211) 《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1945年11月3日），《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66页。

(212)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66页。

(213)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6—78页。

(214)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未能达成协议，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我方表示无兴，则将给人以我方消极的印象”，不利于宣传。但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请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极大典。”周恩来随后建议：因抗战初胜，双方协定签订未久，人民渴望和平，一般人多幻想政治协商会议能解决问题，故要使人民相信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真正保障和平，非经相当时间体验不可。在这种条件下，我在宣传上只能采取“哀兵”策略，“不仅哀必胜，而且胜亦不喜”，如此“方能使人民同情我们”（《拟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交通的四项临时办法》，1945年10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215) 中联出版社编：《中国党派》目录页，中联出版社1948年版。

(216)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民主同盟文献》，1946年印本，第1—5页。

(217) 《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36—39页。

(218)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50—57页。

(219)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民主同盟文献》，第40—45页。

(220) 卫聚贤编：《中国各党各派现状》民主同盟篇，说文社1946年版，第7—8页。

(221)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页。

(222)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0页。

(223)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45年12月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任主席。

(224) 青年党把持盟务的行为引起盟内其他党派的反对，据罗隆基回忆，他和史良还有救国会以及无党派盟员主张开除青年党，但张澜和其他常委不同意，后因青年党与民盟分歧越来越大，民盟常委开会不再通知青年党成员参加，而青年党成员也不再参加常委会，实际等于开除了青年党（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3页）。

(225) 《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58页。

(226)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1），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9、26页。

(227)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1946年1月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62页。

(228)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229) 《民主建国会进行步骤》（1945年11月2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1），第2页；《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65页。

(230) 1946年2月，李济深、冯玉祥、杨杰、陈铭枢、蒋光鼐等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刘文辉在重庆秘密聚会，李济深提出，“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就在内战中打倒他”；陈铭枢提出，“我们要进一步的合作，把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地把这个独夫民贼打倒”（冯洪达：《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会后成立了先后由冯玉祥和李济深任组长的秘密策反小组，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他们本来希望推出孙科与蒋介石抗衡，但参加了此次聚会的孙科不久即变卦，重新接近蒋介石，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

(231) 参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

(232)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7日。

(233) 《中国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45年1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234) 《中国青年党党章》（1945年12月），《中国青年党》，第243页。

(235) 北平市宣慰团编：《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1947年印本，第39页。

(236)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6页。

(237) 伍宪子等人的民主宪政党袭承梁启超的宪政党衣脉，1945年改现名，但长期在海外活动，国内没有多少影响。张东荪等人的国家社会党成立于1934年，也承继了梁启超研究系的余绪，但长期在上层活动，缺乏群众基础，党员人数从未超过二百人（《中国党派》，第43、49页）。

(238)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1946年3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

(239) 《中国民主社会党组织委员会宣言》（1946年8月31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167—172页。

(240) 《中国政党》，第44页。

(241) 有关战后诸小党派的情况，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党派》两书。

(242)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243)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63—64页。

(244)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第3—4页。

(245)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说：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3页）。证之以民国年间的实际，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此言的道理。

(246) 第三党领袖、也是民盟重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战后问题的中心在于，“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军队国家化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这实际是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个问题上呼应了中共的主张。而民盟领导人张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了一封《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希望“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对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张澜认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谈，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军队则须“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新民报》，1945年9月18日）

(247) 《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38页。

(248) 黄炎培曾为土改问题致函毛泽东，并在民盟内部表示，“应以民盟同人公共名义，向中共委婉而恳切地劝告其从速改善苏北、华北等地政治作风（求生存越困难，改善政治作风，争取人心越需要），是善意的劝告，非恶意的诟骂”。李烛尘认为中共“军纪极好”，但对中共“到处闹清算斗争”颇为

不满。梁漱溟亦然（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1页）。

(249) 蔡尚思主编、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303页。

(250)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251)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70—71页。

(252)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第108页。战后的中间党派主张和平的民主运动，即使是较为激进者，如罗隆基，也“坚决反对运用武力争民主”，认为此乃“手段破坏目的”（《罗隆基日记》1946年7月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05页）。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稍后成立的民革有一定区别，民革因为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在国民党军政界有较为广泛的联系，因此作了一些军事策反和建立武装的工作。

(253) 《各小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1册。据唐纵记，1944年，国民党中央指派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张治中、陈布雷五人负责“联系各党派孤立共产党之工作”，“乃以彼等无组织，各人事忙，终至迄未进行”。1946年4月，又指定唐纵负责，“配合情报，切实进行”。参加此项工作的有陶希圣、李惟果、黄少谷、彭学沛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8页）。

(254) 《国民党应付民盟之策略》，二档，全宗一三，卷号279。

(25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页。

(256) 《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15、2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2-113页。

(257) 有美国研究者认为，中共和民盟合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需要民盟作为其与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共一时尚联系不多的阶层之间的桥梁，而民盟与中共合作的原因，一是只有中共的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放松政治控制，二是共产主义是中共的长期目标而非中共的当前目标，因此不需要为此而担心（Belden，Jack．*China Shakes the World*，p．397，Victor Gollancz，London，1951；Van Slyke，Lyman P．*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pp．195-196，20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7）。

(258) 《中国民主同盟与共产党成立协定》，*T．V．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民盟内部不少成员甚至领导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民盟中委周新民），他们在推动民盟与中共合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259)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284页。

(260)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各地动态的专报》（1948年3月），《中国青年党》，第328页。

(261)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经过的专报》，《中国青年党》，第310—311页。

(262) 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有关这方面争论的情况，参《中国往何处去》（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1958年印本）两书。

(263)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1947年1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66—277页。

(264)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关于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467页。

(265) 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

(266) 民潮社编：《民联政治报告》，香港1947年印本，第16—21页。

第二章　短暂的和平

第一节　停战令的颁布与政协的召开

一　和平民主的呼声

重庆谈判结束后，社会各界所期待的和平局面并未出现，相反，“一个为我们所最忧虑的、所最厌恶的、所最恐惧的大祸，终于无端的飞临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着”。这个“大祸”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内战”[(1)]。

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与担心，刚刚赢得了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不愿见到战争的重演，因此社会各界和舆论界一片反对内战之声。据《新华日报》11月所载，就有第三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六团体、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团体、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华论坛》等二十六家杂志、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以及重庆、成都大学生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宣言、言论发表。他们一致的要求是：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并且必须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2)]。中间派代表民主同盟亦积极反对内战。民盟负责人黄炎培于10月30日致函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各方关心国事者，一致惊讶。”他提出：双方电令部队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组织包括各方人员参加的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至一切基本问题，恐须有待于政治会议，此会议必须早日召集，借以协商结果，安定人心”[(3)]。民盟发言人也发表谈话，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

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现在一切谈判，既已经过两个月，而得不着一个具体的结论，当然便只有把这个问题全部公诸国人之一途，舍此已无其他更好的办法了。”[(4)] 所谓公诸国人，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11月以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呼声日高。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协即将召开之际，“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际此履端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至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予鉴纳施行”[(5)]。

反对内战的呼声一旦转为实际的行动，便很难避免与当局的冲突。11月底，中共云南地下工委为响应中共的反内战宣传运动，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时事演讲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政治学教授钱端升演讲称，“苟无联合政府，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6)]。讨论会进行过程中，遭到军警干扰，引起学生愤慨，各校相继罢课，要求当局查办有关人员，并发表《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要求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云南军政当局认为这是“共党煽动”的结果，遂在各校策动成立反罢课委员会，组织党团人员与学生会抗衡，军警便衣人员奉令禁止学生串联，与学生发生多次冲突，昆明形势趋于紧张[(7)]。12月1日中午，先是身穿军服、佩有“军官总队”徽号的人员闯进云南大学骚扰，接着又有百余人企图闯入西南联大各学院，与在校学生发生冲突，暴徒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导致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和在场的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

“一二一”事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警闯入学校校园内致伤人命，云南省军政当局自然难逃干系[(8)]。消息传出，引起全国各界和

舆论的强烈抗议。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昆明惨案“深引为痛惜”，要求“对此次学潮，即应予以圆满的解决，以平全国之公愤，而政府之威望亦可挽回于既坠之后”[9]。在“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上，民盟主席张澜和梁漱溟、张东荪三人合送的挽联上写着：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邓初民在会上演讲时疾呼：今天有人在争论是谁在发动内战，是谁先放的第一枪。是谁？“一二一”的惨案等于不打自招。谁反对学生反对内战的，谁就是内战的发动者[10]！这无异于将国民党置于被告席上，并在全国引发了抗战胜利后一场大规模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共以此作为推动反国民党的契机，宣传“谁要和平，谁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就是敌人。这种敌人，那怕手无寸铁，也要加以威吓，最后就置之死地”[11]。参政员许德珩等提案，认为“自战事结束以来，内战纠纷愈演愈烈，青年本其爱国热诚，对国事有所主张，亦为事理之常，情非得已”，要求严惩肇事者，抚恤受害者，严禁以后有类似情事发生[12]。《新民报》发表社评《刺刀乎？民主乎？》，认为“这惨案的发生与政府对此案的处置，都可以作为民主前途的测验”；“反对内战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仅仅是反对内战就须受到这样的迫害，试问人民如何能够顾问国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么？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13]？这些言论实际上支持了中共的主张，使刚刚在宣传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问题上似乎得了一分的国民党又处于被告地位，很是被动。事后奉派赴昆处理的联大常委傅斯年抱怨“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历其事的联大党团负责人之一姚从吾感叹，“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14]！蒋介石于事后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称此次“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

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15]。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2月10日下令，以“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虽系有人策动，惟关总司令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将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停职议处，由霍揆彰代理其职，李宗黄调离云南。云南当局还搞了一次审判，于11日将两名“失业军人”以投弹致人死亡而处以死刑[16]。

中国的局势也引起了国际尤其是美国的注意。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认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内争的发展。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在广泛的有代表性的政府成立之后，全中国的武装部队都应编入国军。当中国经由上述途径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17]。这一声明明确要求国民党作出改革，而且只有在这种改革基础上，美国才能提供其所要求的援助，因此中共认为这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因此中共以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对杜的声明表示欢迎，并“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18]。

12月26日，在莫斯科结束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渠等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渠等重申

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苏、美二外长对于两国军队应在合乎完成任务及责任的条件下，尽早撤离中国一事，彼此意见完全一致[19]。公报发表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再度发表谈话，表示其“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希望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与三强对中国所一致表示的愿望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一切争论，以求实现团结与民主”[20]。值得注意的倒是国民党的态度。杜鲁门声明发表前，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特意约见美国总统顾问李海，希望“总统宣布对我协助之旨，必须明确切实无疑，当更有助益，否则影响匪浅”。显然，杜鲁门的声明并未如国民党所愿，魏道明称其“措辞不少含浑之处，语气亦嫌有未当者”。因此，国民党对此几乎没有公开反应，被中共称为“抗拒式的沉默”。只是由于魏道明的建议，“避免外间可能发生误解起见”，蒋介石才对外表示，杜鲁门的声明与他的初衷并不违背[21]。为了抵消杜鲁门声明可能的消极影响，国民党中宣部特别向各省市发出密电进行解释说明。电称杜声明表示美国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不变与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目的为马歇尔使华之后盾，并协调各大国之关系；如以为“似不免对我施以相当压力者，此实为一种不应有亦不必要之过虑”；“吾人为配合此一局势，应当继续推行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的政策”；“望我各级机构在此期中，不论对于军事政治均须充分提高警觉性，以资防备，对于共党组织联合政府一项宣传攻势幸勿轻信谣言，一切镇静应付听候中央指示为要”[22]。无论如何，对于国际上对国民党施加的公开压力，国民党公开不反驳，内心里也难免酸溜溜的[23]。

二　马歇尔来华

出于稳定战后远东局势以及与苏联争夺战略势力范围的需要，中国问题占据着战后美国远东政策的中心位置。对于中国局势，美国当局一直存在着担心，即中国可能爆发西班牙式的内战，从而使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但范围更大，危险性也更严重[24]。而在一场世界大战之后，再爆发一场这样的战争，则是美国人十分不愿意见到的，那

将使美国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处境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按艾奇逊的说法，面临着三种选择：1．自中国完全撤出；2．大规模军事干涉，援助国民党击败共产党；3．援助国民党尽可能确立对中国的统治，同时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以避免内战[25]。第一种选择，是刚刚成为超级大国，并必然与苏联竞争未来世界领导权的美国所不甘为的；第二种选择，是刚刚经过大战的美国所不能为的；因此第三种选择便是美国政策的必然，保持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稳定”，这样既可以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又可避免美苏可能有的直接对抗。还在战争末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中，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便有明确表示，即：我们应该负起领导责任，援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稳固和统一的政府，使其成为远东稳定的主要因素；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的长期政策，应该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赖于中国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我们的政策是在政治上促成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并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26]。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美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前提是并不以武力直接卷入。杜鲁门曾经表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力协助维护中国的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有限度地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同时避免卷入中国内部自相残杀的战争。如同美国舆论的代表《纽约时报》所言，帮助任何一方去进行内战，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正当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影响来求得协议与和平[27]。

美国在考虑战后对华政策时，除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外，苏联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如同魏德迈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说，“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联和美国的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傀儡国……那么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统治如此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强国来统治，将会使世界和平受到危害。……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有关中国的政策，那就不能允许俄国取得对它的统治”。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未来与苏联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

也困扰着美国当局，即如魏德迈所言，“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要在国民党军队统治下使中国和满洲统一起来，那就必须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以至可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而为实现此项政策，肯定需要增派远远超过目前在该战区可以动用的更多的美军”。但是这样行动带来的麻烦与困扰，诸如美国军人驻在海外的代价，中国内部斗争可能引起的困难，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外国内部事务而引起的批评，以及同俄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麻烦，等等。都不是魏德迈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由华盛顿最高当局决定[28]。

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坚决扶蒋政策引起广泛争议而突然辞职，杜鲁门旋即任命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调处中国内部冲突。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拟订了在华行动方针备忘录，提出美国应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北上，收复满洲，在国际上继续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但不进行军事干涉，同时谋求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纷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其大框架是确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在政府官员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这又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共之间的矛盾随着日本投降而渐趋激烈。这一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方式，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关系到美国在中国、远东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如何在美国介入中国问题时处理国共矛盾，是美国当局不能不考虑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备忘录又提出美国鼓励和支持国民政府召开有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以扩大政府基础，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这样的政策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即以武力支持蒋介石抗拒共产党人，而同时又倡导努力在他们之间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办法[29]。马歇尔来华调处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基础上进行的，即一方面谋求国共妥协，在约束中共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另一方面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尤其是接收东北，同时鼓励其进行民主改革。马氏起初并未完全意识到他的使命的艰巨性，而是满怀信心地出任调处使命，并且一度取得了成功。

在马歇尔来华之前，美国高层对他赴中国的任务进行了反复讨论。在支持国民党的问题上美国决策层其实并无根本的分歧，但在运用什么方法上，则意见不一。军方主张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北上，国务院认为，这将损害马歇尔的努力，并导致内战的爆发。麦克阿瑟和魏德迈则建议，美国应支持国民党，但是否运送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可由马歇尔相机行事。结果，这个建议被接受。12月11日，杜鲁门和马歇尔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讨论马歇尔此行的目的。贝尔纳斯说明了美国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即美国将为国民政府继续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但目前不必将此通知蒋介石，以便马歇尔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对国共双方施加影响，以达到美国结束中国内部冲突，建立统一政府的目的。在对中国两大党的态度上，如果中共不合作，美国将全力支持国民党，然而如果国民党不合作，美国怎么办？贝尔纳斯主张，可以通知蒋美国将不再为他运兵，也不会给予进一步的援助。马歇尔不赞成贝氏的意见，他倾向于即便蒋不让步，美国也应继续支持蒋，并帮助他运兵。最后，杜鲁门明确授权给马歇尔，无论蒋让步与否，都应继续支持蒋介石[(30)]。他们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为此应成立一个以蒋为首的联合政府，既使中共处于从属地位，又防止俄国在广泛程度上插手中国事务[(31)]。实际上，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方，对国民党政权战胜共产党和武力统一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而恰恰是这种担心，使他们主张支持国民党，以保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方针之下，马歇尔在中国可以用来压蒋让步的手段十分有限，他一方面要压国民党让步，另一方面又必须支持国民党，这种内在矛盾很难解决。一旦蒋介石摸清了美国的底牌，马氏的活动余地就相当有限了。不幸的是，以后的形势发展，恰恰是向着这个方面进行的。

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一份指示，内称：他和国务卿切望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成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影响达成这一目的。你可以以最坦率的方式告诉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和技术

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方面，一个不统一的、并为内部冲突所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按既定方针接受美国援助的合适地区。就在这同时，国务卿贝尔纳斯根据和杜鲁门及马歇尔讨论的结果，致送陆军部备忘录，要求陆军部指示魏德迈，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前往满洲，作好运送军队去华北的部署，在不妨碍商谈或协商失败时，可由马歇尔决定付诸实施[32]。美国对华政策这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注定马歇尔的使命很难成功。也在15日，杜鲁门发表公开声明，阐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手段和目的（见上目），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蒋介石对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非常敏感的。当他得知报载美国有意派艾奇逊和谢伟思等人为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协助决定美国远东政策时，在尚未证实消息是否可靠的情况下，便交给赫尔利一份备忘录转呈杜鲁门，指艾、谢两人“均曾发表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确实不利之意见，并明显表示拥护共产党之政策”，对美国表示了不满[33]。实际艾、谢两人只驻东京，处理有关对日占领问题，并无来华之意。所以，蒋极力邀请支持国民党的赫尔利回任驻华大使，但赫尔利因为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辞职，使蒋颇为失望。对马歇尔来华的消息，国民党喜忧参半，喜的是美国派出如此高级别的特使，表明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自然获利多多；忧的是对马歇尔态度把握不定，担心其有对国民党不利之言行。得知马氏来华消息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一面对马氏来华表示欢迎，一面又对赫氏辞职表示婉惜，希望“中美合作更加密切化”，马帅“本其素具的抱负，卓绝的才能”，必能执行杜鲁门总统的政策[34]，可谓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心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与马氏会见时也表示，“此时美对远东态度，必须明朗，切实协助，当不仅使远东形势改进，可望由此打破世界僵局”[35]。所谓“明朗”，“不为浮言所动”，实际即希望美国能够坚定地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

12月17日，马歇尔抵达北平。21日，马歇尔在南京与蒋介石首次正式会见，蒋首先告马："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马歇尔则表示："中美关系友好，惟美国人民不愿干涉他国内政，此种情绪相当强烈，足以左右杜鲁门总统之行动，是以今后对中国援助，将视国共双方能否互相让步，达成协议而定。"[36] 于此可见，蒋企图拉马歇尔站在国民党一方，但马氏初来乍到，态度谨慎，双方立场尚有一定距离。不久，蒋便慨叹"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37]。

中共对马歇尔来华抱谨慎的欢迎态度。中共当时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是，"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38]。这种"中立美国"的政策，即争取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中立，只要美国保持中立，实际则有利于缓解其对中共的压力，而于国民党不利。当时中共甚至有让英国和苏联也参加调停的考虑，在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胡乔木认为，"这个设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它反映出党中央当时的一个策略思想，就是要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们党的独立地位，在国际国内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39]。中共的对美政策，随着美国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基点是"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40]。当马歇尔来华之初，一方面被中共认为是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的某种契机（因为马氏来华是反共的赫尔利辞职后的产物），

寄希望于美国可能对其对华政策作一些修正；另一方面，马歇尔来华已是既成事实，中共希望能够有利于至少不妨碍自己的既定政策。在周恩来与马歇尔的首次会见中，周态度热情地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41] 因此，当国民党提议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后，周恩来认为，"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我如完全拒绝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将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如此，才能迅速达成停战。中共中央予以同意[42]。唯其如此，在马歇尔初到中国的一段时间中，中共与他维持着还算良好的关系。

三　停战令的颁布

马歇尔来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停战呼声，国民党政府军推进的受挫，这一切使得停战的条件接近成熟。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是："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要蒋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要蒋目前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43] 作为国民党长期的和最有力的对手，中共对国民党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可以说，正是在国内外对国民党继续作战反应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12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回到重庆，即向国民党表示，立即无条件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马歇尔已到重庆，23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讨论全盘形势，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44]。这样，国民党的对共方针又由战而和，国共谈判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以恢复。

27日，国共重开中断了一个月的谈判。中共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战

的建议，即国共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解放区等，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组织各界考察团分赴发生内战区域考察，报告事实真相。31日，国民党答复中共提议，提出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对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和受降等事项，由国共各派代表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45]。1946年1月3日，中共原则同意国民党的提议，从此马歇尔成为国共冲突之间的调解人，由马氏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会议，负责停战和整编军队中有关事项的讨论和决定[46]。马歇尔提议在三人会议中采取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协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始生效。在北平设立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作调查。执行部亦由国、共、美三方组成，一切行动根据一致协议进行[47]。5日，国共双方在马氏调停基础上草拟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对于停战的原则（无条件就地停战）及其实施方法（由军调部监督执行），国共双方未产生大的分歧，主要的争执之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东北，国民党坚决拒绝将东北列入停战令规定的停止调动军队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理由是东北属于接收主权的问题，牵涉国际条约义务，应由其与苏美协商解决。马歇尔支持国民党的立场，他在1月3日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提到，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调动军队进入东北接收负有义务。中共一方面对东北问题有全面和长远的考虑，而这非在停战谈判中可以解决，另一方面苏联出于种种原因不愿介入国共美三方谈判，因此中共考虑将东北问题留待下一步解决，遂同意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1月5日，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我们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这里关系于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并牵连到根据中苏条约中国由苏联手中接收东北之事，因此，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48] 东北问题的解决为停战消除了一个主要障碍。但从以后停战令的执行过程看，东北条款成为国民党调派大军进入东北的借口，并最终导致东北

大战，牵连关内，使停战终成昙花一现，由此也可知国民党当时之所以坚持东北例外有其更深的意图。其二是热河问题，热河对屏障东北、隔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地的联系、从而对国民党确立其在东北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民党极力主张将热河包括在东北之内，并要求接收东北通往华北交通线上的要点赤峰（在热河）与多伦（在察哈尔靠热河边界），但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指出，华北所有地区均已被政府或中共接收，赤峰与多伦也在中共管理之下，如果政府一定要求接收这两处，则冲突责任不在我方。何况如果按照国方理解，则其他地区亦可被授权接收，而这正是导致过去冲突的原因。中共主张不附加任何条件，立即停战。至于政治问题，可以留待停战以后再解决[(49)]。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能接近几乎导致停战谈判功败垂成。

尽管国共双方就停战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蒋介石仍对停战“颇犹豫”。王世杰认为，停战可以使美国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给予借款，帮助遣返日本战俘，恢复交通，因此建议蒋“断然接受美方提议（略予修正），以加强政府之国际地位与自身力量”。但即便蒋考虑到实际情况而接受停战，在具体得失上，他仍然是寸土必争的，停战问题一度卡在赤峰和多伦问题上即是蒋坚持的结果。王世杰又建议蒋“多从政治上作远大之考虑，不可拘泥于一二城市之暂时得失”，以此作为对马歇尔的让步，“以示宽大，且以坚中共对马歇尔之信任”[(50)]。蒋碍于马氏刚到中国，需要给其一点面子，何况，政协即将开幕，停战多少可以为政协创造一个良好气氛。9日晚蒋在与马氏的会谈中，在赤峰和多伦问题上作了让步，为停战谈判消除了最后的障碍。

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主要内容为：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1．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2．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3．破坏与阻碍一

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4．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双方并声明下开规定，亦经同意，载入会议记录内：1．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2．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3．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三节内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4．国民政府军队在上项规定之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51]。当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均对各自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

停战令颁布前后，国共双方围绕争夺实地，在热河和绥远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

在热河，停战令下发前，国民党第十三军沿锦承路进攻承德，在占领朝阳、叶柏寿之后，已进至凌源附近，与此同时，第九十二军自北平沿平承路向古北口、九十四军自唐山向喜峰口攻击前进，蒋介石严令于停战前拿下承德。中共中央认为“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因此要求冀热辽部队“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同时迅速集中兵力打击进攻之顽军”[52]。至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国民党政府军各部均停止了进攻，承德仍控制在中共手中。

在绥远，由于中共部队在平绥战役后后撤，傅作义部企图跟进打通平绥路。1月12日，傅部占陶林、和林，攻击卓资山，14日又占集宁。阎锡山部与之呼应，自大同派兵于13日攻入丰镇。中共部队立即发起反击，14日收回丰镇，迫使傅部停攻卓资山。就在集宁战斗激烈进行之时，16日军调部小组飞抵张家口，要求前往集宁调停，聂荣臻告诉他们，集宁不属晋察冀军区管辖，如要前往须得晋绥军区的同意，并将谈判延迟了3个小时，使他们不得不改在次日前往。就这样“赢得了收复集宁的时间”。等到次日上午，军调部小组飞抵集宁

时，战斗已经结束，中共部队“已把战场打扫完了”，小组成员也就无话可说了[53]。

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国共双方均下令所属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在军调部派出的执行小组调处之下，到当月底，除了东北之外，内战基本上停止了，一度遍及华北华中大地的枪炮声终于停息了下来。然而停战的基础并不稳固，与其说这是真正的停战，不如说是国共双方都有这种需要[54]。关键是在停战期内双方如何以明智的态度找到办法，以真正避免战火的重燃，政治协商会议一时间便成了避免内战的唯一选择。

四　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否，是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双方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马歇尔来华调处、停战令颁布的形势下，召开政协的条件也告成熟。国民党同意召开政协，一定程度上如重庆谈判一样，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应付国内外舆论。蒋的幕僚唐纵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有两个特质，一是面临当前的现实困难问题，二是国际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开。停止冲突，开放政权，由此可获国内的安定，国际的同情。如果中共不就范，则可获得国内国际对用兵的赞同[55]。但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应不一。强硬派持反对态度，陈诚电蒋称，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56]。温和派则主张对中共采取缓和态度，孙科主张“亲苏和共”，王世杰主张“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57]。处于两者之间的蒋介石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接受了温和派的意见，但他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58]。即以中央政府的一些席位，羁縻中共，本质仍是以军事国家化换取有限的政治民主化。

经过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和宣传战，中共也考虑恢复谈判，并开

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的现实和国共交往的经验，中共起初更倾向于由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到，“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59]。进行政治攻势是中共此时同意召开政协的主要考虑。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政协，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具体方法是争取停战，在政协会议上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大和宪法问题，至于解放区问题在地方自治下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解决[60]。但周恩来重来重庆之后的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修正原先的估计。1946年1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做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10日的中共中央会议集中讨论停战和政协问题，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和平，但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未变，美国的政策基本还是扶蒋、压共，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民主，巩固和平。此次会议提出了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武装斗争[61]。正是由于这种估计的变化，使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积极活动，与民盟合作，得到了一系列有利自己的结果。

由于国共两大党都同意召开政协，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规定“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代表三十八人；会议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民大会召集有

关事项；“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会议代表分配为，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共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悳；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62]。下分改组政府组（十人，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施政纲领组（十一人，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军事组（十人，召集人胡霖、张东荪）、国民大会组（十人，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宪法草案组（十人，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共五个组（各组人员互有重复者），具体讨论各项方案。另设综合小组，由五方面各出二人组成，负责解决一些有关全局的问题，成员为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章伯钧、张东荪、曾琦、陈启天、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蒋介石以会议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和任务，也就在于此。”他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他同时宣布了国民政府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项自由，现行法令将依此原则修订，司法、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人民；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63]。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中共“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其后回顾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处理党派关系的四点经验：

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互相让步，不要独霸；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对于国共曾经争论的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周表示：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64]。政协主角国共两大党领袖的这番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认为使会议有了“光明的前途”。民盟代表张澜（由沈钧儒代读）、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邵从恩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词，均表示祝贺政协开幕，希望各方面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互相谅解，使会议达到成功。全国各界、各主要报刊对政协会议的开幕也都寄予极大希望。会议当天，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自13日起停止一切战争行动。所有这一切，为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开端，使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

第二节　政协会议的成就和局限

一　各项方案的磋商

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各方对其提出了很多希望，焦点仍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两事，更多的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即国民党开放政权，成立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联合政府，召开民主的国大，修改“五五宪草”，保证人民自由。《大公报》的言论可谓代表，它在社评中提出“我们更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要能解决问题，且希望解决得彻底，解决得快”；它认为政协要解决的问题无非政府、军队与地方三者，“这些实际问题，需要有实际的方案，但也有一个前提，即是政治的民主。政治果真大量民主化了，则军队便可能摆脱党派的窠臼，而地方也可能无分彼我了。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人人希望其能做到，而这两个‘化’实是相连的。政令军令的统一，也应该由此着手。我们的政治必须向民主方向迈进”[65]。各方也都认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是中国急待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则意见不一，政协会议的全过程实际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

政协会议根据小组分组，对各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国大、宪法和改组政府问题讨论最多，也最为激烈。关于国大问题，国民党提出，当年5月5日召开第一届国大，职权为制定宪法，原代表有效，另增加部分代表，宪法颁布六个月内，选举召集第二届国大。张厉生在对这个方案作说明时，特别提到原选代表问题，认为就法理而言原国大代表没有任期规定，就情理而言为了求团结也不能不承认其有效[(66)]。对此，各党派代表的意见集中在原国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上。因为原国大代表为1936年选出，当时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选举有许多限制，其他党派不能参加选举，其中还有许多当然和指定代表，何况时间已有十年之久，情况变化很大。因此中共反对原代表有效，主张根据当前的情况，重新举行公正而合理的普选，并得到其他党派几乎一致的支持。民盟代表章伯钧认为，论法理，国大组织法只规定任务，并不能因此而为维持旧代表之根据；论情理，不能忘记民主原则而来讲团结。因此他代表民盟声明，坚决不承认旧代表，要依新的组织法和选举法重行选举。青年党代表曾琦也批评国民党在国大代表问题上一党决定，与民意不合，主张要认清当前事实，不要拿法统来谈[(67)]。当时的舆论认为，“必须承认反对派的理由是相当强固的。任何人不能相信，十年前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选举能够公平合理。即说政府办理并无私心，可是以十年前所选的代表，来代表十年后的民意，又是谁也不能承认的。……要想以不变应万变，将政权交给十年以前的民众代表，那确是民国三十五年的国民所难以承认的”[(68)]。

在国大代表问题上，国民党与其他党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邵力子表示，政府方面于法不能承认旧代表无效，主张增加代表即是让步。陈立夫说，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无党派人士王云五等人附和国民党的主张，认为法令不能随便修改，应在法统中顾及现实。罗隆基则认为，以十年前选出的代表来开议会，制定宪法，为世界史例所无，坚持重选。中共代表陆定一批评陈立夫的说法，责问他

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69]。对立双方各不相让，使此问题几成僵局。用《大公报》的话说是："若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全部工程比作为金字塔，则国大代表问题便是塔尖，然而这个塔尖的工程真是千难万难。"[70] 为了打破僵局，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在若干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么，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71]。也就是说，国民党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如改组政府的问题，宪法草案修改的问题，等等。最后，在其他问题得到解决后，中共才同意在各党派约束其代表在国大支持政协宪草和中共与民盟获得四分之一否决权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在国大代表问题上达成妥协，即原代表有效，增加东北和台湾地区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将原规定的当然及指定代表七百名另行分配于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此一问题在政协闭幕的当天才得到最终解决。

与国大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宪法草案修改问题。国民党提交政协讨论的仍为1936年制订的"五五宪草"，是根据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五权宪法"精神而来，它的核心是实行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具体作法是将国大作名义上的人民权力机关，而以总统为施政中心，五院从属于总统。这部宪草被在野党派和舆论认为"缺点太多，只可作为参考，不可用为蓝本"；"总统大权在握，不啻独裁，而地方制度，规定省长仍由中央任命，处处表现集权，即处处表现不民主"；"把立法这一部门也划成政府的能而不是人民的权，再设立一个庞大不着边际的国民大会以行使所谓直接民权，这种制度从民主运用的观点来说，就远不如英美现行的议会制度"[72]。民盟主张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共出于抑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考虑，支持民盟的主张，因此，采用西方式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宪法成为中共和民盟的

共同要求，并得到了青年党的支持。再者，根据中共提出的宪草修改原则，实行地方自治，这样国民党最为反感的解放区问题可以在这个名义下解决，而不必另行提出，也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争论。张君劢为此设计出一套制度，即由选民直接投票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同时加强立法院的作用，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这样，国民党原来设计的架在五院之上的国大由有形化为无形，不再起作用，而立法院实际成为国会下院，监察院成为上院，中国的政治制度便成为国会两院制下的责任内阁制，有五院之名而无五院之实。张以为这样既可得民主之实，又可在名义上符合孙中山的五权设计，以免国民党的反对[(73)]。在这样的宪政体制下，“总统位尊无权，他只是国家名义上的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74)]。蒋介石如果作总统，则无实权；如果作行政院长，则随时有被倒阁的可能，因此，宪草决议以后成为国民党最为反对的一项政协决议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而这个决议之所以能通过，据梁漱溟回忆，是因为参加宪草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孙科企图在行宪后当行政院长，掌握实权，所以赞成这个方案[(75)]。邵力子本来就是党内温和派，更不会反对了。孙科以后确实也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政协讨论情况时，为国民党的让步作了辩护。他认为宪草原则最大的变更就是国大由有形变为无形，因为有形国大开会期间，除了听报告以外无事可议，也许会发生找问题的情形，如果设立常设机关，就会影响立法院的工作。立法院相当于民主国家的下议院，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相当于内阁制。他强调这些修改并不违反总理遗教，现在是参考英美体制推行五权宪法[(76)]。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委员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由三十六人增至四十八人），并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担任，决议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为有效，遇有紧急情况时主席得为权宜处置，但应于事后报告国府委员会，行政院增设政务委员若干人。王世杰在对这个方案作说明时，强调须顾及事实与法理两面，所谓事实即是政府不能不改组，以容纳党外人士；所谓法理，就是不违背国民党的法统。比如在改组国府委员会

时，交出一权即最高决策权，保留一权即用人权，此即为兼顾法理与事实。他就顾及法理方面作了特别说明：在国大召开前，国府委员仍由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但党外人士自须先征求各方意见；国府委员名额分配，不作具体规定，待事后协商解决；国民党委员名额应占特定多数；国府委员会可以议决法律、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等事项，但不包括用人权，部会长官任命权属行政院。在解释为什么国府没有用人权时，王世杰说，用人如需先经国府讨论，难免有所评论，爱惜声名的人，就不愿来干了，或无勇气来做，做主席的也为难，对行政效率并无帮助。这倒实在是一种新奇的解释，体现了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地位而苦心孤诣地造出的理论的贫乏[77]。由此观察，国民党的本意是使国府委员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最高咨询机关，一种荣誉机构。

国民党改组政府的方案被中共评论为，“把现在已经动摇的一党专政，经过三个多月的临时的‘扩大的’一党专政，最后过渡到完全合法的‘宪政’式的一党专政。总之，变来变去，还是一个一党专政”[78]。中共的主张是，政府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有用人权，国民党委员名额不超过三分之一，委员不能经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主席决定须由会议通过、有人副署，不能有紧急处置权。中共中央曾有指示给周恩来，提出：1．国民党改组政府方案，仍是露骨的要保持一党专政，我们不能接受；2．改组政府未获协议前，对国大问题绝不要让步；3．军队国家化问题，应表示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现利于速决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愈被动”，因此，“我应说服中间派了解此点，争取其共同行动”[79]。民盟同意中共的主张，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时尖锐地质问国民党：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是否要向国民党负责？增加国府委员是整个国府委员会改组重选还是只补充？如是后者，根据三分之一建议、三分之二否决的原则，则党外委员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权；国府委员会如方案所言为政治指导机关，“指导”似谈不上“决策”；国府委员会没有用人权，决策如何保证其实施？对政府官

员弹劾权的问题如何解决？主席紧急处置权如无限制，则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等于今天的国府委员会。他认为，改组后的政府要真能决策，真能执行，真能过渡到民主，不然只有过渡而无目的，就无意义[80]。他以法学专家的身份，对国民党方案的质疑颇为有力，一针见血地揭出其维持一党专政的实质，使同样也是法学专家的王世杰处境尴尬。青年党则主张以中央政治会议代替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国策，而不主张设国府委员会；全盘改组政务执行机关，包括各院会；扩大国民参政会，在宪政实施前作为政府监督机关。曾琦在发言中认为，国府委员会自民国二十年以后就未开过会，以此久未运用的机构，恐难使天下人民一新耳目[81]。虽然青年党的主张与众不同，但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中共和各党派的坚持，国民党在政府改组问题上，同意使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负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有决策权和用人权，主席和行政院对国府委员会负责。接下来的困难是国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国民党企图占据多数席位，中共认为绝对多数不可能，相对多数是可以的。最后国民党对国府委员会让步为其占一半席位，中共表示同意，但提出重要议案须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中共和民盟席位合占三分之一。中共的意图是将国府委员会作为政治枢纽机构，并保证中共和民盟的否决权，只有这样，中共才能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得到保障。最后得出的妥协是，国府委员名额四十人，国民党占半数，其他方面合占另外半数；凡有关变更施政纲领的决议须有三分之二委员的同意。这个方案大体满足了中共和民盟的要求，但国府委员的具体分配方案未能在会中得到解决，又为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留下了空间。

关于和平建国纲领，因为这是中共所坚持，故草案也为中共所提出。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包括了十个方面的内容，基本点是：各党派长期合作，实施宪政，和平建国；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

府；改组后的国府协同政协商定宪法草案，并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民主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推行地方自治，成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省得自订省宪；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公平合理地分期整编全国军队[82]。中共认为，有了共同纲领，可以在过渡期约束各党派，使参加政府的各方有一个共同遵行的施政原则，便于政务的进行。中共提出的草案，被认为是“内外并顾，无微不照”，“赢得在野党派一致赞许”，“更争取得广泛的民间之同情”[83]。民盟认为，没有共同纲领，难免使参加政府的各党派意见不一，不能做事。青年党同意中共的意见，认为很切合需要，可作讨论的根据，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与中共所提草案有相通之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也不便反对，吴铁城提出可以仿照《抗战建国纲领》的形式。青年党也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去掉有关抗战的部分，再加以修改而成[84]。

关于军队整编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具体商谈，而且参加政协的其他党派没有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插不进手，既没有多少发言权，也不关乎其实际利益，所以这个问题虽是国共之间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在政协会议上，各方除了发表一些原则性看法外，没有成为争论的热点。曾琦提出三原则：希望政府切实实行整军计划；国共双方军事问题由双方自行解决，即由三人小组会商，但望时间不要太长；实行军党分治。邵力子很坦率地说，军事方面过于棘手之问题，可由军事三人小组解决，不必在本会议提出[85]。实际大家心中都有数，即使提到大会也解决不了。《大公报》对军事问题讨论的描述是：一派和平，无半点火药味，会中发言的都温文儒雅，心平气和[86]。

二　政协决议的达成

政协会议历经各方磋商与讨价还价，在各项问题上意见终于接近，得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政协的讨论而言，国民党处于受指

责的被动地位。中共与国民党立场对立自不待言，民盟信奉西方式民主，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施政理念距离很大。因为中共当时希望以西方式民主约束国民党，作为结束其一党专政的过渡，所以在要求民主的问题上，民盟与中共意见一致。即使是与国民党接近的青年党，多年在野，时受挤压，也希望通过开放政权而分一杯羹，在政协会议期间他们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虽较为克制，但也主张实行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客观上于国民党并不利。

美国特使马歇尔虽未直接参加政协有关问题的讨论，但始终关心着政协的进程。1月22日他与蒋介石会见，双方同意，在政协关于政治民主化的讨论结束后，即进行军队国家化问题的谈判。马氏告诉蒋，在他看来，有两个因素使其迫切需要与共产党人尽早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达成协议，其一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对付俄国在紧邻俄国的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加强共产党政权、进一步削弱国民政府地位的行动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其二是，美国陆海军力量显然不可能长期待在中国[(87)]。马氏还向蒋提出了一个《临时政府组织法》，主张：1．国务委员会以多数表决为原则；2．各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人选由国务委员会通过；3．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地纯地方性事务之法令，各地方政府仍由现有之行政官员管理，在其他行政人员未确定之地区，国务委员会应成立一小组委员会，国共代表各半，以选拔临时行政人员。这一方案不仅沿用了西方式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是一大约束，而且对中共控制区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并赋予中共参与决定地方行政的很大权力，难怪蒋介石看到这个方案后大发感慨："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它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88)] 虽然如此，在当时情况下，马氏的态度对于国民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成为国民党接受政协决议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89)]。

1月27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了政协商谈

的情况，得到认可，认为成绩很大，方针正确，授权代表团在政协各项决议上签字[90]。国民党方面，对政协会议似无党的统一立场，其政协代表在会议期间通过与蒋介石的个人沟通决定对各项议程的态度。考虑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结论，将造成空前之政治新形势，兼之协商会中所商定之‘五五宪法’草案修正意见，尤足引起党内外之反对”，故王世杰建议“应将协议结果提请常会核定后，始能由本党代表于政治协商会议末次会中正式表示接受”。因此，31日下午，在政协各项议案均达成协议后，国民党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各项议案，授权代表签字。但在常会讨论时，反对派对宪草协议极为不满，“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这实际预示了其后政协决议实行过程中国民党出尔反尔的必然[91]。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五项议案，主要内容为[92]：《国民大会案》规定，当年5月5日召开国大，职权为制定宪法，宪法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原有代表1200名照旧，台湾、东北增加区域代表150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分配另定之，行宪机关在宪法颁布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宪法草案案》规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参加政协的五方面及会外专家组成，根据政协拟定之修改原则，参酌各方面意见，在两个月内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大采纳；宪草修改主要原则为：1．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总统普选制未实行以前，总统由县省及中央各级选举机关选举或罢免。2．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之议会。3．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及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职权为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相当于上院或参院。4．司法院即为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须超出于党派之外。5．考试院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须超出于党派之外。6．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

同意任命，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7．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8．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9．人民自由权利受宪法保障；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关于国大和宪法的决议另有不公开之商定事项：1．各党派负责使其出席国大之党员在国民大会中维持政协所修正之宪法草案；2．如有其他较好之宪草意见，由党派临时协商定之；3．国大增加代表名额分配为，国民党220名，中共190名，民主同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93)]。根据这两案的规定，国民党放弃了“五五宪草”的总统和中央集权制实即变相一党制，而采用国会制、责任内阁制、省自治制度，中国将成为采用西方式民主政体的国家，各方并承诺保证该方案在国大通过，中共和民盟则承认了旧国大代表的有效。

《政府组织案》规定，一、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1．国府委员名额定为40人；2．国府委员由主席就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3．国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4．国府委员会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预算、各部会长官任免及立法、监察委员之任用等事项；5．国府主席对国府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困难，得提交复议，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该案应予执行；6．国府委员会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之，如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7．国府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二、关于行政院，1．各部会长官均为政务委员，并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三至五人；2．政务委员及部会长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附注，1．国府主席提请选任各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者，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主席不同意时，各该党派另提人选；2．国府主席提请选任无党派人士出任国府委员时，如有为各被选人三分之一所反对者，主席须另行选任；3．国府委员半数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分配另行商定；4．行政院政

务委员总额中将以七至八席约请国民党外人士充任；5．国民党外人士担任部会数目，会后继续磋商。根据这个决议，国民党承认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保证中共和民盟在重大问题上的否决权，取消了国府主席的紧急处置权，中共和民盟则承认国民党占国府一半名额和行政院五分之三名额，并担任五院院长。

《军事问题案》规定：1．建军原则，军队属于国家，军制依国防需要，依政制和国情实行改革。2．整军原则，（1）实行军党分立，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中公开或秘密活动，现役军人不得参加党务活动，政党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工具；（2）实行军民分治，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严禁军队干涉政治。3．实行以政治军，初步整军计划完成时，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国防部长不以军人为限；军额及军费经行政院决议，立法院通过；全国军队受国防部统一管辖。4．实施整编办法，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中央军队尽速于六个月内完成90师之整编；上两项完成后，将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50或60个师。国共两党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承认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和以政治军原则，实行军队国家化。

《和平建国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规定了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施政纲要。在总则中规定，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为了使国民党放心，纲领特别提到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的字样。对于解放区的问题，纲领提出“暂维现状，俟国民政府改组后”，再依地方自治原则解决。国民党承认了一系列民主化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中共承认了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在政协闭幕式上，各方面代表的发言均称赞政协取得很大成功，

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和平民主的道路，希望能够早日全部实现。对解决中国问题负有关键责任的国共两党，对政协决议都表示了尊重与支持的态度。蒋介石“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周恩来代表中共声明，“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然而，有心人仍然可以从蒋、周的讲话中听出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在讲话中强调了《和平建国纲领》的重要。因为这个纲领的总则中两次提到了蒋，这可能是蒋不足与外人言的微妙心理。他尤其强调政党不应再使用武装暴动，所有军队听命于政府，是“巩固和平完成统一的最大要素”，是决议“能否全面贯彻的试金石”，这又显然是对着中共而发。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及宪草修改原则，并强调改组政府是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蒋在讲话中丝毫未提到宪草和国大问题，并且在议程讨论完毕时曾经声明，据宪草修改原则而成之宪法草案是提供国大“采纳”而非“接受”，实际并不影响国民大会之权限，这又埋下了动摇宪草修改原则的种因[94]。以后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抵触和反对，就是自宪草修改原则而始，因此蒋有这样的表态恐非偶然。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社会各界和舆论对其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寄予乐观的期望。《大公报》在社评中说：政治协商会议使积累多年的国家严重问题得以政治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各党派态度的妥协，值得赞美；中共不固执己见，甚为难能；国民党着眼于国家，值得赞扬。“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现在这两项具备，以后施政建军有轨辙可循，其前进之路，则归纳于政府改组，以过渡到宪政实施”。中共《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称政协是“中国历史的创举”，“符合于今天中国与人民的需要”，呼吁“努力把所获协议变成现实，使中国历史真正走上和平建设的大道”[95]。经历过晚清、北洋和国民党三个时期的马叙伦先生，过后曾经用令人警醒的语言写下了人们对政协的期待：“我们国内除了一部分所谓顽固分子外，都从政治协商会议的议

决案里，充满了对中国前途的乐观和展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和希望他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而且不但国内这样，就是国际明白中国在世界里面关系重要的人们，也和我们有一样的感觉。”[96] 比较起来，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评论较为低调，它强调的是国民党的让步，军队和政权的统一，认为宪草修改原则为国大多一“参考”，须国大“从长考虑与研究”[97]。

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政协决议以及此前达成的停战协议，此后达成的整编军队的协议，为中国展现了一个光明而有希望的前途，可以说是民国三十余年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于政协会议的成功，参加党派均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和让步，是“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无论主动还是被迫，毕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让步，承认取消一党专政，承认实行民主政治；中共虽然认为政协决议与其政治理念还有距离，但也做出了相当让步，承认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许多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会内外折冲努力，促成了会议的成功。但是，政协决议毕竟还是纸面文章，关键的问题是决议如何贯彻执行，如黄炎培所说，建设中国好比造房子，政协决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真正要把房屋造好，还须依靠今后努力[98]。正是在这一方面，社会各界仍然存有疑虑，其中关键在于当时中国第一大党也是执政党的国民党的态度。有意思的是，政协会后，国民党代表孙科和邵力子都谈到，有人认为政协会议是国民党的失败，他们认为这不仅不是国民党的失败而是国民党的成功[99]。然而正话反说，于此人们可以领会他们的话外音，就是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评价与外界的期待有很大距离，所有人因此都在注视国民党的正式反应。

三　整军方案的制订

政协会议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但军事问题的解决并未在会议上具体讨论，而是在马歇尔的直接参与下，会后由国共美三方谈判解决。马氏提出的对中国军队彻底改造的方案，强调按西方军事传统，在中国建立一支国家的、非政治化的、民主的军队，而非政争的工具。军政分离是他拟订整军方案的总原则[100]。然而他的设想，首先在国共军队混编问题上便碰了壁，中国的现实注定了马氏的设想难以实现。

军队是中共最为关注的问题，即使是在政协刚刚闭幕的乐观气氛中，中共对军队问题也比对其他问题更为小心。2月5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马歇尔的整军方案，马氏提出实行军队国家化，军人不得兼任文职，平时军队只管训练，另划补给区供给，军队不得随意调动；整编时间为18个月，第一步即实行国共军队以师为单位的初步混编。周恩来认为马氏提出的“建军原则可同意，因他在基本上是限制统帅权的”；其“整军原则，基本上亦可同意，因他之统一整编办法，是公平的”。但在整军程序上，周恩来认为国共军队应首先平行整编，混编应待第二步再行[101]。中共中央基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认为：马歇尔所提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的办法，对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对于马氏的混编方案，中共认为“其目的是企图消灭或控制中共军队，故绝不能答应”。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为取得经验并看清美国的意图及当前形势来决定对军队的政策。”[102]

中共对马歇尔整编方案的反应尚在马氏意料之中，令马歇尔不解的是，国民党也反对他的混编计划，原因之一是非嫡系部队及其长官担心因此而失去部队的自主性，从而也就失去了诸多特权。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李宗仁尚愤愤于陈诚企图以混编“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而且这样一来，“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实际陈诚并不主张

立即实行混编，见下段）[103]，马氏另外一个设想更是令国民党莫明其妙。据张治中回忆，马歇尔最初曾提出中共陆军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海空军中共亦占至少30%份额的方案。蒋介石见到该方案后非常诧异，因为国共军队比例双方已有成议，即中共占总数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而海空军问题中共从未提出过，蒋即要马歇尔立予修改。马氏最后提出的方案维持了中共军队占总数六分之一的原案，而未再提海空军问题[104]。大概马歇尔当时企图对中共诱之以利，使中共尽早同意其整编方案。就马氏本人而言，他自认提出的方案对国共双方不偏不倚，然而他是按美国人的思维逻辑考虑问题的，因此他的方案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没有认识到中国长期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军队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的方案遭到国共双方的反对就不奇怪了。

2月14日，关于整编军队的三人小组会议在重庆开始举行。由于国共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已经有私下默契，也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加上马歇尔的调解，整军谈判总体而言是在较为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军队数量、统帅权、复员等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妥协[105]。国共争论较多的是马歇尔提出的混编计划。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最先提出的方案照抄了马歇尔的方案，在第一期整编的十二个月内，军队实行以师为基础的初步混编，即每军由政府军二师和中共军一师，或政府军一师中共军二师组成；十二个月后的第二期整编六个月内，实行彻底混编，即不再有政府师和中共师的界限之分。中共代表周恩来反对此一方案，他提出第一期双方各自编成，不相混合；第二期初步混编或称统编；彻底混编则须视以后局势进展情形如何再议。他的理由是，两支军队彼此对立了十八年，有着不同的制度和体系，不可能一下就合在一起。马歇尔折衷双方意见提出一个方案，第一期整编，前六个月各自编成，后六个月实行以军为基础的混编，第二期实行以师为基础的混编，未提彻底混编问题[106]。实际混编的方案在国民党内亦遭反对，军政部部长陈诚的意见是："混合编军办法最值得研究，因国共军队今后虽均属国军，在理自无问题，惟以种种思想问题，以及各

军历史性，尤其所处之环境及将领之生活等等，决非短期所能融合（此点尤需特别注意）。”张治中详加研究后，认为一年内混编实属利害参半，遂向蒋介石建议，不如顺水推舟，接受马歇尔的折衷方案[107]。结果马氏的方案得到国共双方的首肯。

整军谈判中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宪兵与护路队的地位。周恩来认为此两者人数及武装均不少（宪兵有20个团，护路队有18个总队），考虑到他们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应予限制。张治中则表示，宪兵编制小，部署分散，且无重武器，不能称为武装力量，护路队则不属于军政部管辖，因此这两者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不应提出。周恩来又表示，宪兵问题非纯关力量对比，而是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影响民主政治。马歇尔建议将此问题留给政治方面解决。张治中就此问题向蒋请示时认为：“整编共军最主要的为统编及驻地问题，但如能于六个月后，即以军为单位开始统编，则驻地问题亦可随而解决，似属于我有利。至宪兵及护路队问题，自仍以坚决拒绝商谈为宜。”[108] 最终这两个问题未在协议中写明。

2月25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称“整军方案”），主要内容为：1．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但在撤免中共部队军官时，应由政府内的中共代表提名；2．陆军每军由三个师组成，全国划为八个补给区，负责军队补给；3．本协定公布后十二个月内，政府应将九十个师、中共应将十八个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三到六个星期内，政府与中共应交出保留各师表册及复员部队次序，十二个月完毕后之六个月，政府军应缩编为五十个师，中共军应缩编为十个师，合共六十个师，编为二十个军；4．自整编开始六个月后，由政府军和中共军编成集团军，十二个月终了时，配置如下，东北，政府五个军，中共一个军。西北，政府五个军。华北，政府三个军，另四个集团军，各包含政府一个军、中共一个军，双方各担任二个集团军总司

令。华中，政府九个军，中共一个军。华南，政府四个军。十八个月终了时，取消集团军，配置如下，东北，政府四个军，另一个军，包括政府二个师，中共一个师，政府军官任军长。西北，政府三个军。华北，政府二个军，另三个军，每军包括政府一个师，中共二个师，中共军官任军长，一个军，政府二个师，中共一个师，政府军官任军长。华中，政府三个军，另一个军，包括中共二个师，政府一个师，中共军官任军长。华南，政府二个军；5．省保安部队不得超过1.5万人，以轻武器为限；6．军调部为本协定执行机关，协定生效后，政府及任何党派组织不得保持或支持任何秘密或独立武力，伪军及非正规军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109]。

自抗战中后期起，军队问题就一直是国共之间争执不下、最难妥协的关键问题之一，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达成整军协定，这是继达成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之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又一重大收获。在整军协定签订时，国共美三方代表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张治中称，政治协商会议之成功，乃在达成政治民主化之目标，此一文件，则将奠定军队国家化之基础。今后我国当可本和平建设之大方针，以建设三民主义之新中国。本人代表政府签此方案，并百分之百保证其执行，使达成逐步军队国家化之目的。周恩来称，只要政府和中共，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坚守和拥护此一方案，相信任何困难阻碍，都不能妨碍此方案之实施。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全国人民，向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含这次签订的整军基本方案，我都要使他百分之百的实现。马歇尔称，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利自私，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110]。根据马歇尔拟订原则达成的整军协定，与政协决议精神是相符合的，即在一个西方式民主政体下，建立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考虑到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重要性，整军协定的实行较之政协决议更为困难，更有赖于整个政治环境的支持，然而此时的政治环境较之一个月以前已经有了某种变化，国民党内对于政协决议的反弹

正在浮现，从整军协定在反苏游行的余波中签订这一事实[111]，多少已可预知其未来的命运未可乐观。

整军协定虽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他自记所感曰："整编时期定为一年半，乃全照共党之意见而定，又华北五省，政府只可驻七个军，而中共反可驻四个军，初尚以为只限于冀鲁两省，殊不料其所谈者系指华北五省也，甚矣！文白（张治中）之足以误事也。"[112] 更为蒋介石不满的是，美国提出在整军期间建立一所军事学校，训练中共军队，并以美国武器装备中共部队十个师。在美国看来这是对中国军队一视同仁，并且可以借此笼络、控制中共部队，但在蒋介石眼中，这无异于使自己的老对手如虎添翼。魏德迈在3月27日以备忘录致蒋介石，拟先装备中共部队十个步兵营，十一个山炮连。蒋介石批示以下述意见转告魏德迈："在中共部队未依照规定整编完毕以前，似不宜将此项装备即行移交。"[113] 马歇尔回中国后，对蒋的决定颇为不满，他在给蒋的备忘录中指出，此项装备为供给设在张家口的中共军事学校培训之用，以使其部队在整编时得有适当组织与训练，非为野战使用，"现得见钧座之训令，势将中止上述办法，于是实施整编统编之协定，亦必中止，故此事自极严重也"。国民党方面经过研究，认为训练与装备应该分开，训练所用之必须装备可以同意供应，但应先交由国方保管，至于"装备共军部队，须俟统编后能统一指挥，方可开始，否则，危险性大，我方拟坚持此项原则"[114]。由于形势的变化，马歇尔以后未再坚持前议，此事遂不了了之。

整军协定达成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偕军调部三方委员于2月28日至3月6日巡视了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武汉十处，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国共双方高级军事将领，解决了若干未决问题[115]。此次三人小组视察体现出的合作精神，不仅是军事调处，而且可以说是1946年早春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最高峰。在延安，毛泽东向马歇尔

保证，中共将尽其可能地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这些协议定能付诸实施，完成中国的复兴重建工作。马氏显然为毛的表示所打动，特意告诉他，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因此其党内的自私派别自然不愿交出权力，然而这一定不会被大家所容忍。随后，马歇尔自信地告诉杜鲁门："通过他们的巡视，各地的所有问题已经得到澄清，并促进了普遍的理解。一切都表明，事情将迅速得以解决，交通将重新恢复，平民的正常生活实际正在恢复之中。"[116] 他因此而认为，事态的发展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可以放心地回国述职，安排贷款、援华等事宜。然而马歇尔过于自信了，他没有料到的是，就在他返美前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的反动，导致了这一民主化进程的停滞和逆转。等他一个月之后自美返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与他走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四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政协会议对国民党带来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严重的冲击，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对意见远远大于重庆谈判。因为，重庆谈判并未达成多少实际的协议，而政协决议则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作了许多实际的约束，因此引起其党内的强烈反弹。连同政协前后的停战、整军协议，以及东北问题的激化，在国民党内造成了强烈的反应。如同周恩来5月12日在和美国记者的谈话时所分析的，"停战协定使政府军事领袖不满，政协决议使顽固分子不满，整军协定使高级军官不满，东北问题又使若干国民党分子不满"[117]，所有这些不满汇合起来，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对势力，以至到了蒋介石一度也无法控制的地步。

政协会议进行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假座重庆沧白堂，举行报告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行及商谈情况。在16日到19日的几次会议中，演讲人遭人围攻，并发生扰乱会场情形。会上有人喊出"拥护国民党"和"打倒异党"的口号，显见有国民党背景[118]。

政协会议闭幕后，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二十三家单位发起，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然会议尚未开始，即有国民党支持的职业团体农会、总工会、教育会等派人抢占主席台，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自称主席，会议主席团李公朴等与其交涉，结果李公朴遭人殴伤，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均被殴打，包括记者在内的十余人受伤，大会无法正常进行，本已准备参加的邵力子、周恩来和各界代表只能离去。刘野樵等即以会议名义发表反对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言论。此事发生前，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经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请示，由陈立夫授意市党部主任委员、CC大将方治主持，于2月8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决定派各职业团体参加大会，设法以刘野樵为总主席，由擅长辩论者发言，强调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强调宪法不容修改。对于发言者名单、动员党团员参加会议、如何把握会场情绪等等，会议都作了具体安排。会议记录上报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中央组织部[119]。可见，较场口事件完全是国民党内某些人有计划有预谋造成的，表示了他们对政协决议的强烈不满情绪。一叶知秋，此事发生后，社会舆论认为，国民党“如果心理上先蒙上一层阴影，对于闹嚷嚷、活泼泼的人民行动看不惯，一定要以拳头铁条打击别人表达意见的自由，那可就太危险了。以小喻大，则沧白堂的石块与较场口的铁条，可能就是国家大乱的缩影”[120]。2月下旬，在国民党内部分势力策动下，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活动，进一步恶化了政协会议后的和解气氛[121]。

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和反苏反共游行，成为国民党对政协决议反对意见的一种公开表示，私下里，围绕未来政治发展走向，国民党内各派间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据王世杰所记，2月4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122]。这所谓“某一系统”，即操控党务的CC系的代名词，他们对政协的反对最为激烈。他们认为，中共的根本目的是夺取政权，因此“决不能妄存幻想，希冀中共

和平合作”。说到底，他们是不愿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带来的特殊利益，张厉生以后向黄炎培说过实话：“要改组行政院，那吾们也要恐慌，问题到吾们身上来了。”[(123)] CC系领袖陈果夫向蒋进言，“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124)]。张道藩、谷正纲等在国民党党政小组会上“对现状抨击甚力！谓一切失败，均由于不民主，要求党、总裁给予民主”！反对矛头已指向蒋介石，参会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无法控制局面[(125)]。握有实权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也多反对政协。阎锡山认为，“协商愈久，祸患愈大，调处结果是助共选举，毛得政权，华南三之一，华北十之九有选举把握”[(126)]。而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中统局以重庆传言的名义报送了一份情报，声称对于政协决议，“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成都军校学生群情哗然，认为……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及国防部即无异中共主张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之实现。……各党派高呼拥护蒋主席之口号，恐口是而心非，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12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关于国民党军队动向的情报出于CC系控制的中统之手，他们选择这样的时间将此情报送给蒋介石，意图一目了然，即以此影响一贯重视军队的蒋介石的态度。相反，国民党内支持政协决议的一派人的声音显得较为微弱。孙科指责反对派的意见“犯了严重之错误”，称政协决议是经国民党当时表决通过的，成就很大，是国民党的成功也是国家的成功，并称如六届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王世杰认为，如果政协会议的结果使国大顺利召开，并使中共军队改编为国军，则国民党的让步是有代价的，“惟欲达此目的，似须造成一种宁静的政治空气，而从国共双方相约停止互相攻击入手”。张治中认为，政协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邵力子提醒外界，“政界若干人士刻正企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我人必须保持镇静与忍耐的态度，勿入若辈圈套。目下政治局势紊乱已

极，以是日后之政治发展实难预测”[128]。在国民党总裁决定一切的体制下，党内意见不同的双方都在寻求蒋介石的支持，蒋的态度决定了国民党未来政策的走向。

表面上处于两派之间的蒋介石，实际上更倾向于强硬派的意见。蒋介石对形势的分析在其1月12日的日记中写得明明白白：“颁发停战命令，以及宣布政府关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四项要旨，在现时观之，对于政府乃为不利……但为国家前途计，此时只有忍辱负重耳！”“政治协商会议分子复杂，其真有国家观念主持公道者，实不多见”。事后他称，“政治协商会议集会的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是在“委曲求全”[129]。然而蒋为什么同意召开政协并通过各项决议呢？他曾经在2月召开的军事复员会议上，对高级将领解释了召开政协的原因：一，军队疲劳与空虚；二，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士气不振，纪律废弛，漠视命令；三，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四，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反响。基于以上原因，所以不能不产生政治协商会议，故本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希望大家忍耐，在本人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这样的言论，蒋以后多次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解释过，尤其是告诫军队将领，“我们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因为经过这样长期的苦斗，一般部队未免精神疲惫，内容空虚，战斗的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这在当时平汉路与津浦路各战场剿匪的经过，可以明证。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来充实我们军队的力量”，“所以不能不忍受一时的委曲，求得谅解”[130]。无宁说，这更反映了蒋的真正想法，他对政协的态度本来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环境的压力，不能不作出某些姿态。然而政协决议的达成，使中国偏向于西方式民主道路，多少出乎蒋的预计，也使蒋感到了危险。蒋在其年末反省录中写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与颁发军事停止冲突令后，政府无论政治、军事各方面，皆处于被动逆势，本党中有所谓左派者，以及所谓民主同盟者，皆为共党张目，至平时所谓无党无

派而自名为社会贤达如黄炎培者流，一面受俄国与共党之操纵，一面藉美国与马歇尔为其奥援，煎迫不已，故余此时之处境，乃至感痛苦。”(131)

蒋介石并不甘心这样的处境。会后不久，2月4日，蒋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改组政府时称：现在乃政党合作之开始，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132)。这里已透露出蒋不承认政协决议，而将问题留待国大解决的讯息。10日，蒋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提出了对政协宪草决议案的十二点意见，他表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本党代表八人所同意者，党不能不为八位代表负责，虽有不同意之处，党亦只好为所派遣之代表负责也。然事实上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这实际是将政协决议的通过推为国民党政协代表的个人行为，无异于否定政协决议的合法性(133)。蒋在谈话中对政协宪草决议表示了全面的否定意见，认为“不合党纲，不适国情”，“不足以服党内同志之心，亦不能保证国民大会代表之不反对”，实际这是利用国民党内强硬派对政协的反对，而挑动他们出面公开反对。对宪草规定的国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蒋均提出了反对意见。对于责任内阁制，蒋碍于外界的议论而不便公开表态，但称之为“应顾及我国之国情及事实，不可以若干学者空想之理论，拼凑而成，致有扞格难行之处，使政府成为无能之政府，而无法做事”。此言明明白白地表示，蒋不甘作一个名义领导人，而一定要有职有权，继续独裁。最后蒋“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134)。蒋的这番谈话，实际是对政协会议及其决议的全面否定，其后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否定即是从宪草决议开始，并在其二中全会上得以实现。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开

幕词中表示将实行“和平建国”的方针，“我们要由战时渡到平时，要进行复员建设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难与阻力特别繁多。这些困难与阻力，我始终认为唯有以最大的忍耐来克服，以大公至诚的精神来消除，也要秉着我们历届决议‘政治问题用政治解决’的方针来处理”。然而蒋在这个讲话中，对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否定预留了伏笔，其一，他认为在宪政问题上，国民党“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不惜变通总理关于建国程序的遗教，以求得和平建国的机会”。这为国民党的立场设立了界线，即“主义”和“法统”，至于对这两者如何解释，则取决于国民党的态度，而且他的关于“变通”总理遗教的说法，正为国民党内的不满者提供了攻击政协决议的口实，事实上，二中全会恰恰是以此为借口，否定了政协关于宪草的决议。其二，蒋在讲话中声称，“我们要与各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但是我们本党还负有捍卫主义、保障民国的特殊义务。我们党的地位较之抗战结束以前已稍有不同，而在宪政实施以前，我们在法理上与事实上，还不能诿卸我们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135)]。这仍然是将国民党凌驾于其他各党派之上，坚持国民党的独大地位。从蒋的讲话透出的信息，对于国民党二中全会非常关注的其他党派没有理由乐观。而在会议期间的纪念周演讲中，蒋一方面表示希望大家忍辱负重，认清环境，另一方面又声称宪草协议违反了总理遗教，并鼓励自由发言，实际目的何在一目了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战后国民党的施政方针进行了全面检讨，主题报告多达十七个，其中较为重要者为宋子文的政治报告，王世杰的外交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孙科的政协会议报告，张群的停战问题报告，张治中的整军报告等。报告人回述了国民党在战后实行的政策措施，并为此进行了说明辩护。孙科在政协会议报告中，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是的一贯政策”，并对各项决议进行了解释；认为各党派代表在会中“对于每一问题都能殚精竭虑，多为国家民族打算，少为党派利益计较”；强调“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

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136]。张群和张治中的报告，对停战和整军谈判的过程及内容作了说明。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尤其是围绕政协会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共关系问题、宪草修改问题，会议进行了激烈争论。强硬派在发言中一味指责中共，要求中共“放弃割据之政权”，“放弃武力争权之野心”，“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指责国民党政协代表让步过多。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为强硬派反对之焦点，他们坚持五权宪法“不容率予变更”，应实行总统制，国大“不应约束其权力”[137]。他们连带指责宋子文、王世杰对苏外交软弱，东北处置错误，宋子文的财政金融政策失当。此次会议争论的激烈程度在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中是少有的。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成为众矢之的，宋子文答辩时，因气氛过于激烈，“甚愤慨，其手发抖”。主张对共缓和的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亦噤口不言，以免成为攻击对象。为了适应会场气氛，孙科在报告中数次引用蒋介石的讲话为报告充门面，为各项报告中所仅见。张治中同样打出蒋介石的旗号，称整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最高统帅部处理此项问题，一定不致疏忽，请各位信仰最高统帅”[138]。只有邵力子就宪草协议“说明当时不得不有此谅解之苦衷与彼个人之见解”，被人称为“为人算有担当”[139]。而在强硬派方面，张继、邹鲁、潘公展、方治等极为活跃，谷正纲“慷慨陈词，垂泣而道”；善于演讲的刘健群在发言中极具煽动性地说：“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说出来，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博得会场内一片欢呼[140]。不仅如此，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党内“革新派”，以“救国必先救党”，实行民主革新为口号，打着“肃清官僚主义”的招牌，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以通过自己掌握的组织系统，控制选举，取代党内温和派的地位[141]。据当时美国陆军部战略事务组的情报，二中全会“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政协决议的攻击以及对国民党政协代表们个人的攻击，总言之，是对整个政协决议的不满，但不满的焦点却集中在关于修改宪法的协议”。他们认为，“这一切都说明国民党是故意为了应付公众，特别是

美国人，表示他们保证实施政协决议，而他们实际活动的精神却丝毫不意味这一点”[142]。

二中全会如此激烈的争论，可能也出乎蒋介石事先的预料。他对会议的几近失控不满，感觉党内如此互相攻击，对国民党自身形象和地位都未必有利，因而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3月4日，蒋在纪念周演讲时，告诫代表不能“徒逞感情，执持成见，各行其是”；“切不可作片面的观察，感情用事，凭幻想和主观来决定行动，以致破坏整个的政策和终极的目的”。他强调政协不是在国内外压力下召开的，而是出自他本人的决策，“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然而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最强烈的宪草协议，蒋却表示“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这件事情是否即已不能挽回呢？我认为这是不会没有挽救的办法的。宪草正在审议，而且将来要提到国民大会去采纳，国民大会的权限，自不受任何的约束，所以我们尽有讨论的余地，各党派如有真诚合作的诚意，也不能漠视本党的立场”。他强调“我希望各位都相信我，我决不会不忠于党，不忠于主义，而且绝不肯违反了总理遗教的。所以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最后蒋总结说：“这一阶段，必须平心静气，体察国内国外的环境，采取适当的政策，来达到一定的目标，决不可意气用事，感情冲动，以致破坏政策，而使革命建国的目的愈形遥远。”11日，蒋又在纪念周演讲中表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完全由我负责，你们不能责备负责政协的八位代表，你们如果一定要责备他们，就不如直接来责备我。至于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的原则，违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党纲的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接受，我个人将来到国民大会里面，也一定要负责力争，总要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党纲来加以修正。”[143] 蒋介石的这些表示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他对党内强烈的反政协情绪予以警告，以保证全会至少在表面上不通过反对政协的决议；另一方面，他又为党内反对政协决议的主张留下了发挥余地，尤其是在宪草问题上。前者是做给美国人和舆论看的，后者是在实践中必须坚持的。

在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操控下，国民党重要领导干部何应钦、陈诚、吴铁城、朱家骅，包括对立双方的人物陈立夫和张治中等，多少领会到蒋之苦心，在会下商谈中要求“不要责难太过”，使会议总算得以正常进行。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张继等人的提案，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这个名为关于政协的决议案，对于政协决议没有明确表示赞成还是反对的态度，只提到“于各项协议之实施进程中，凡有足为和平建国之阻碍者，胥必力为排除”。对于政协决议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事，该案完全责之于中共，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对于整军协议，中共“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对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负有无可逃避的责任，然国民党于此独责中共，而对自身责任只字不提，一党独大的心态之外，无非是将能否实现政协决议的责任诿之于中共。更关键的是，决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绝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144)]。综观该案全文，在对政协决议起码的表面赞成都很暧昧的文字中，独独对于宪草问题有如此明确的文字表述，显示国民党势将以此为借口，为政协决议的实行制造障碍。而这样的决议还是在蒋介石公开表态之后才得以勉强通过，可见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反对力量之强烈。

为了将对政协宪草的修改意见具体化，二中全会通过决议，要求：1．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组织，用集中开会方式行使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145)]。这个决议实际主张“五五宪草”一仍其旧，无异于否定政协会议通过的关于宪草的决议。同日，二中全会决定国府委员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中执会闭

会期间，提请中常会选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后，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对于政治的最高指导机构。这两项决定实际又将政务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违反了政协决议各党派协商的民主原则。

17日，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全会宣言后闭幕。宣言提出国民党的六项任务为：1．安定社会，恢复秩序，完成复员计划，以开始和平建国的工作；2．如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以达成我们实施宪政的夙愿；3．说明我们对于贯彻政协决议的诚意，与坚持五权宪法的决心；4．贯彻军队国家化，以立和平统一的基础；5．实行六大着重民生主义的方针；6．贯彻保持国家主权而巩固世界和平[146]。紧接着二中全会，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于3月20日至4月2日召开四届二次会议。4月1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称：宪法的最后决定权属于国民大会；在宪法未颁布前，训政时期约法根本有效；政协会议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协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如政协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蒋的演讲对二中全会决议又加引申与发挥，在所谓民意场合表明了反对政协的态度。在其鼓动下，参政会通过的关于政协的决议声称：国家法统，不容中断，政府扩大组织，尤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宪法制订原则应根据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要求广为延揽民意机关代表参加国大，强调中共应取消特殊组织，实行军事整编[147]。这样，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便通过“民意”招牌而“合法化”了。

六届二中全会是战后国民党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为国民党的战后政策决定了基本框架，然而这次会议带给社会各界的却是重重疑虑。除了重复一些以往的空洞许诺之外，此次会议未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带来任何新东西，相反，会议对政协决议实际的否定，使刚刚为政协决议给中国带来的新变化而感到一些欢欣的社会各界心中又抹上了重重一层阴影。各界舆论在二中全会开幕前后，本期望国民党“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148]

，然而二中全会的结果使这种期待终归落空。民盟主席张澜认为，国民党二中全会“目的无非在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为政协宪草做出贡献的张君劢认为：“国民党内有少数人希图采用总统制是不对的”。无党派人士邵从恩认为：政协决议是全国都赞成的，中国目前的问题，除此也没有可以解决的途径。即使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也认为：应将政协宪草提交国大讨论，如果有几个草案同时提交国大，徒引起纠纷[(149)]。天津《益世报》认为，二中全会表明国民党内“握有实权之强硬派人士，正猛烈抨击目前若干从政之进步派人士，责渠等执行之外交财经等政策均有错误，并对政协表示不满”[(150)]。

对国民党二中全会作出强烈反应的首推中共。政协会议之后，中共立即召开中央会议，认可并力促政协决议的实行。但是中共也知道，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态度对政协决议能否顺利实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共一直密切关注着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动向。可是会议的结果却使中共非常不满，因为国民党实际抛弃了政协决议的精神。国民党如此作法，使本就缺少互信的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中共感觉国民党的不可信，必然要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而中共的政策调整又会反馈给国民党，国内和平的希望就在两党关系的恶性互动之中日渐黯淡，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自国民党二中全会始[(151)]。

五　中共对政协会议的评价

政协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确立和平建国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对于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中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政协刚刚结束，2月1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刘少奇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由于这

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为此，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准备整编军队，学习合法斗争、上层斗争和大城市的斗争。指示特别强调：“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152] 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作报告，对这个指示作了进一步的解释[153]。他在报告中说，这次是苏美英三国、国共民盟三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条件和环境比过去都好，因此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实行转变，党要适应目前这个新的形势，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变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这个变化是一个带基本性质的变化，而且牵扯的很广泛，牵扯到党的全部工作需要转变，需要加以改组。他在报告中用了不少篇幅解释军队问题，认为实行军队统一整编是我党的一个必要让步，好处是换来了我们军队的合法化，国家的民主化，合乎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丝毫没有改变我们军队的本质。以后主要依靠搞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这方面我们比国民党要好一些，熟练些。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对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的重要性，认为这来源于我们党与国民党长期的斗争，使党内外许多人不相信内战可以停止，和平可以到来，因此不愿与国民党合作，不重视合法斗争，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对今天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不适合的。刘少奇在报告最后总结说，我们经过了整风，又经过了七大，我们党有充分的经验，克服左右倾偏向。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也不会有大的危险[154]。

从中共的指示和刘少奇的报告看，中共认为政协决议虽然与自己的主张仍有距离，但基本上是合乎人民利益的，表示欢迎，准备力促其实行，这就是中共在政协会议之后一度实行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的由来[155]。

政协闭幕之后，中共对于全国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估计，通过延安权威人士评论和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讲话的形式公之于众[156]。2月1日，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转达了毛泽东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告以毛将参加政府。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表示，中共在政协会议上作出了很多让步，是因为中共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一蹴而就，国民党也有很多让步，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中共愿与国民党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以后不是武装斗争了[157]。2月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毅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158]。2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提出中共准备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包括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八人，并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159]。同时以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认为国民党内在政协后已起分化，一派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为此，“中央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对于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反动措施的批评，“应该指出这是反动分子的行动，使之与整个国民党及蒋介石分开”[160]。从2月1日到7日，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喉舌《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协的态度表示肯定，对“在蒋主席领导下”，国民党能够实行政协决议寄予希望，提出各党派长期合作，民主协商解决中国问题。从

抗战中后期国共关系恶化之后，这样的言论出现在中共党报上还是很少见的。

自停战以后出现的国内和平局面，与马歇尔的调停是分不开的。马歇尔此时表现的对国共大体不偏不倚的态度，尤其是主张实现西方式民主带给国民党的压力，也使中共较为满意。周恩来在政协会议结束时特意告诉马氏："我们认为你这次在处理停战的态度和方法上是公正的。中共愿在像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的态度和方法的基础上，在地方以及在全国的范围内和美国合作。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周恩来还对马氏说，外传毛泽东要去莫斯科，毛觉得很好笑，如果休养，他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61)]。9日，毛泽东在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综观中国内部及世界大势，各种情形实利于转趋民主的新方面[(162)]。这些表示使马歇尔很是受用，也增强了他调处成功的信心。

2月上旬的十天时间，是中共对形势估计最为乐观的一个时期。这种乐观估计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共认为蒋介石处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之间，将蒋定位于中派，因此认为，经过斗争有可能争取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主；另一方面是中共对美国的作用估计过高，认为美国可能压蒋接受民主改革。然而就当时的实际而言，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确实有不同意见，但蒋并没有居其中，而是自始即站在反对派一边，对此即便国民党内赞成政协决议的一派人也没有完全估计到，而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不会离开其基本立场，这是杜鲁门在马歇尔到中国之前的指示中已经明确的。因此，中共当时对于形势的判断确实不

无过于乐观之处。

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仍然对形势可能的发展保持着一定警惕。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认为：政协成功很大，整个和平民主趋势是确定的。但民主化的具体过程与结果还没有看到，民主化过程必然很慢，还须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尤其对军队整编问题，中共认为要慎重，目前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明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我们的发言权即降低，即成为民主同盟，民主化就反而没有希望[(163)]。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尽量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即使很短时间也对人民有利，一方面要积极做好迎接全面内战到来的准备[(164)]。

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其后明显有国民党势力支持的背景，同时在整军谈判中，马歇尔提出国共军队混编方案，引起了一直关注国民党动向和军队问题的中共的警惕。2月8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代表团关于整编军队问题的指示电中，提出："美蒋的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此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165)] 11日，董必武和王若飞在回延安汇报时，提出了十一点意见，重点在于：失掉军队就失去一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控制在手；力争和平，避免内战，但又要有不怕内战的准备；力争全国和平民主统一是在不丧失解放区政权及军队根本上的统一；马歇尔的整军计划是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军队；他的国共军队合编及分驻计划，有使我们军队被化掉的危险。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代表提出的意见无疑引起了中共党内高层的重视。毛泽东阅后批示："此意见书所取立场及态度是正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见与预防将来之危险的。"[(166)] 次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王若飞讨论了整编军队方案问题，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但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独立性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

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掺杂合编。我们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刘少奇则认为，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性，国民党是不会使它的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化的，在这一点上不可有幻想[(167)]。这与中共最初的乐观态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

政协会议结束后，各方都在等待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召开，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中共提高了对国民党否认政协决议可能性的警惕。2月下旬，全国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反苏游行，并由此发生冲击重庆《新华日报》和北平军调部的反共行动，中共认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应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虽然中共此时仍强调“不要一般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168)]，但一度平静的政治局势再度紧张，国共双方的怀疑和猜忌进一步加深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结果，使中共改变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3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即将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对时局的四条分析：1．战后，民主在向前发展；2．法西斯残余势力与同盟国内的亲法西斯势力已经在组织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这些反动势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敌人；3．各国资产阶级分裂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和苏和共派又包括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如蒋介石就是中派，这就产生了妥协的可能性；4．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的中、左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毛强调：“不管风浪多么大，这几条我们要把握住。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一来就又记得了。马歇尔能够放长线，蒋介石也和何应钦有不同，假如美

蒋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有些人就会忘了第二条，就会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我们的军队是要缩编的，但不是缩编得越少越好，一些同志不知道这些，需要说清楚。”[169] 刘少奇在总结时提出中共的方针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170] 蒋介石虽然还被列为中派，但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对中国未来形势的估计已有了明显变化。国民党二中全会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提出“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同时指示代表团，“闻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71]。1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主要负责人发出指示，通报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情况，要求“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指示指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此电在对形势估计上又进一步，蒋介石不再被列入争取对象而强调其反动性，中共对前途的估计也由“和平民主新阶段”转变为力争“某些”妥协。这个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172]。同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173]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宪法原则协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174] 同一天，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二中全会的结果“令人失望”，“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对国民党在保障人民权利、改组政府、国大、整军、停战诸问题上违反协议的表现提出了批评，关于宪草问题，他认

为这是关系中国民主或独裁的大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他特别提到："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他表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175] 随后，中共报刊发表一系列公开批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文章，直至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公开批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表明政协之后的一度宣传休战结束[176]。这样，中共与国民党在政协决议上的分歧由此而公之于众，而中国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六　政协决议的实行与顿挫

政协会议闭幕后，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开始进入实施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组政府和讨论国大召开问题。然而，国民党方面的一系列举动，使这些商谈很难保持原有的和谐气氛。

国民党修正政协决议的突破口就是关于宪草原则的决议。政协会议通过宪草修改决议后，拥护国民党观点的宪法专家频频公开撰文，从法理角度论证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不合实际，声称"如果曲解了五权宪法的原则而制定的宪法，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宪法"，主张至少坚持下面三种主张：国民大会应有形的存在以行使四种政权；五院行使治权，不容与政权相混；省长可以民选，但不主张省宪[177]。实际即反对政协宪草的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原则，而主张中央集权、大权独揽的总统制。在人皆认为"五五宪草"总统权过大时，他们反认为"五五宪草""对总统限制太严"，"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也实在太多"；攻击政协宪草原则与"五权宪法之精神大相径庭，而且十之七八皆根本欠妥"，尤其是"对于中央政制之拟议，几无一是处"[178]。宪草审议会的领衔专家、立法院秘书长吴尚鹰认为：中国现时所最需要

者，为政局之安定。是以“五五宪草”之国民大会制度，或与欧美之议论政治不同，民权之行使或为间接，而总比议会制减少政潮起伏与政局动荡之虞，实值得国人慎重考虑，不必泥于欧美成例，为偏见所困，使民国初年错误上演也。现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原则，提出修正，实有重加考虑之必要[179]。政局安定唯有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唯有以国民党为主导，这就是国民党的逻辑。

政协结束后，首先成立了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参加政协的五方面各出五名代表组成，另聘吴尚鹰等会外专家十人（其中六人为“五五宪草”起草人），由孙科为召集人。任务是根据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意见，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讨论采纳。根据会议程序，该会如对政协宪草原则作出修正，必须得到五方面的同意，宪草条文以出席者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月14日至19日，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审议会议，就宪草问题作原则探讨。国民党代表主张对宪草原则有关国大、立法与行政关系、地方自治问题作出修改，部分无党派人士和专家附合国民党的主张，中共与民盟代表反对对政协宪草原则作重大修改，青年党和部分无党派人士的态度则左右摇摆[180]。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协期间同意修改“五五宪草”的孙科，此时的态度有明显变化，认为政协宪草原则关于国民大会各点有不妥之处，而有形国大可补救各国议会制度之缺陷[181]，从而也埋下了以后宪草审议纠纷的种子。

3月8日至16日，宪草审议委员会连续举行审议会议，对宪草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问题仍为讨论的焦点。国民党方面主张对政协宪草原则进行修改，尤其对于国大，坚决主张恢复为有形。王宠惠提出，将国大恢复为有形国大，实行总统制，省不必制订省宪。参加会议的制宪专家也都附合国民党代表的主张，这些主张与正在进行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反对政协决议的要求正相呼应。

国民党在宪草审议中的主张，在其他方面引起不同的反应。中共与民盟对于国民党的主张持反对态度。张君劢撰文全面而尖锐地反驳

了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宪草修改意见，他认为：1．照“五五宪草”所规定之国民大会，人数虽多至一千五百名，而在全体选民，仍占绝对少数，此与代议政治何异。何况国大三年开会一次，会期仅一月，名为有形，实等虚设，其去中山先生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意义，不啻十万八千里。以四权属于千五百人，名为尊崇中山先生，实假中山先生之名，以行专制之实；2．国民党主张采用总统制，然在其心目中，政府之权力，宜如英制，但不要对议会负责。总统之地位，宜如美制，以防止政府动摇。试问内阁操全国之大权，而不对任何机关负责，恐按之法理人情，均说不通。今次修改，为总统有权，行政院有责之制，固非总统制，亦非内阁制，纯为针对国内实际情况而设；3．省宪之名，闻者为之疑惧，然吾国即有省宪，亦不怕其因此而分裂，况各省自制省宪，为国民党早年宣布之政策。他在文章中总结说：十余年来政府借三民主义四字，以为妨害民权之借口。目下既已还政于民，中山先生之遗教宜善为规定于国宪中，方不至令人借中山先生之名义，以掩其施行专政之伎俩[(182)]。

在宪草讨论中，周恩来考虑国民党内反对宪草原则呼声正高，如果坚持原议，很有可能使政协决议的实施搁浅，因此为了争取国民党对于政协决议的支持，在3月15日的政协综合小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又做了三点重要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删去宪草协议第六项第二条（即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自治法[(183)]。据梁漱溟回忆，孙科在讨论中以国民党内部对宪草协议反对甚烈为理由提出修改的要求，得到一些会外专家的附和。民盟反对让步，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184)]。因此周恩来在同意对宪草决议作修改时，曾经提出这一问题不能单独解决，要国民党对履行政协决议作出明确表示。实际这是沿用了政协讨论国大代表问题时的策略，希望以此形式上的让步，而保留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精神，同时使国民党约束其党员不再反对政协决议，并尽速实行政府改组，使大

局得以稳定。

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善意回应，反而更增加了国民党内反对派的气势，国民党中央社在报道对政协宪草原则作出修改时擅自扩大范围[185]，更使同意修改的一方居于微妙地位。此时正值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宪草原则发出一片反对之声，中共如再让步有被视为软弱的可能[186]。因此中共中央18日致电周恩来："修正宪草原则三点，我们仍深感不妥，因为这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因为这些是基本的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是决不能容许动摇的，而如果动摇了这些，必给国民党保持独裁以极大便利，国家民主化就没有可能。同时我们现在同意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这种修改，在策略上亦给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的企图和斗争以便利，使我们保卫政协决议的斗争增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对十五日决定，必须迅速加以挽救。"办法是，或者撤回此让步，或者要求召开政协否决，或用其他办法挽救[187]。在19日的宪草审议会上，董必武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必须坚持政协的一切决议，目前应召开政协的综合小组讨论，保障原有政协决议不能有任何动摇。"[188] 3月22日，周恩来回延安请示后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等，"我们打算在宪草修改时，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仍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为中心，如能争得一个民主宪草而又能保证在国大通过，则可参加政府、国大，因此，在目前谈组府及国大时，必须与宪草扣住"。"重庆除继续宣传攻势外，请注意勿再提我之让步各点（如宪草三点东北一师等），以免束缚我之改变打算，而强调我之进攻各点（连东北问题美苏问题在内）"[189]。

由于中共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不满，致使本已达成原则妥协的宪草三点协议又成悬案，有形国大的组织及职权、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省的地位问题，成为宪草争论的焦点，3月19日以后的讨论纠缠在这些问题上，进展甚微。在国大问题上，各方虽同意恢复有形国大，但职权只限于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修改宪法。在行政与立法关

系问题上，关键是内阁向谁负责，国民党要求内阁向总统负责，中共和民盟坚持内阁向立法院负责，认为此“乃是整个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头等重要的原则”，并得到青年党的赞成。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国民党力图限制自治权，得到青年党的附合，但中共坚持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并得制订省自治法。4月1日，在审议会上，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提出，省自治法应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下制订，遭到中共代表秦邦宪坚决反对，认为这无异于使省自治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双方代表就此进行了激烈争论[(190)]。

4月8日，中共代表秦邦宪、王若飞等在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身亡（自“皖南事变”后即被国民党关押，此时刚被释放不久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亦同机遇难），中共随后派李维汉参加宪草审议工作。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恢复后，讨论仍无定议，只整理出了一个由张君劢起草而没有得到各方认可的草案。关于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该案规定行政院长任命须经过立法院同意，行政院依规定对立法院负责，即行政院如不同意立法院的决议或议案，得经总统核可后，交立法院复议，经立法院出席者三分之二复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或接受或辞职，但立法院没有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行政院也不能解散立法院。按此规定，立法院的复议权受总统核可和出席者三分之二的限制，实际仍保留了较大的行政权力。关于地方自治，规定省自治法事先须根据省县自治通则拟订，事后须送司法院认可，也就是为其设置了若干障碍[(191)]。在整个宪草问题讨论中，“争论最久的为行政院问题，争论最烈的为地方制度问题，最后总算勉强定案”，但并未得到一致认可[(192)]。4月21日，在宪草问题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共代表李维汉声明：鉴于小组本无协议权，而许多重要争议问题又搁置未议，加以中共负责代表，因故未能出席，而由雷震秘书长整理的条文更多不忠实，甚至任意增减，故中共代表团对小组全部工作及雷震整理的全部条文，概采保留态度[(193)]。

除了宪草问题外，在改组政府问题上因国共对名额分配意见不

一，亦陷于僵局。政协会议对国府非国民党委员名额分配问题未作明确规定，但根据当时的默契，中共和民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中合占三分之一名额，即十四名，以保证否决权[194]。中共和民盟会后多次提及此一默契的存在，但为国民党方面否认，使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成为改组政府难产的最重要原因[195]。其实根据改组政府的协议，只有在涉及施政纲领变更时，才牵涉到三分之一否决权问题，而议案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按国民党能够掌握的委员席位，应该可以争取到过半数的票数。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耿耿于怀，不过反映了其长期一党专政思维形成的神经过敏，以及对有可能影响其执政地位的任何规定的高度警惕。民盟曾经将这一问题解释为，“民盟与中共在国府委员会中所以要取得否决权，此所以保证中共放下武力。因民盟不赞成政党有武力，而欲使中共放下武力，循民主宪政常轨办事，必有所保证。政协各方面，国民党与中共为反对党，不能予以保证；青年党为国民党之与党，中共不能信任；无党无派，以个人为单位；惟有民盟有力量与资格，为之保证”。民盟认为否决权的问题是换取中共武力的交换品，若不能使共产党放心信赖，则交换不成。国民党坚持反对否决权，表示其“在政治上不肯让步，以求得交换之成功，以遂其破坏政协之私图而已”[196]。

按政协决议的程序，应该首先改组政府，议定宪法草案，再由改组后的政府召开国大，通过宪法，但由于在宪草和改组政府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其他问题更无法列上议事日程，政协决议的实行无形停顿。国民党此时摆出一副急欲改组政府、召开国大，还政于民的姿态，催各党派提交国民政府委员和国大代表的名单。此举被当时舆论评之为：如果各党派不交名单，则国民党“实际上不过是装出一种好看姿态，把不能早日改组的责任推在各党派身上而已”；如果交出名单，则国民党希望“各党派暂时（最好是永久）作为客人，把政府的样子弄得‘民主’一些。这样做有二个好处，对外可以弄得到美国的大笔借款，渡过难关；对内则塞住各党派的嘴巴”[197]。中共

深明国民党的用意，3月30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王若飞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鉴于二中全会所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淆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争议未决；国大代表名额总数，政府又提修改之议[198]；而中共应有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名额，政府亦尚未作最后之肯定；在此种情况下，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199]。4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肯定了他们“所取坚决斗争立场是很对的”，“对于过去所取不适当的让步态度，因而使自己处于很不利的被动地位这一种情况，有求得解脱与恢复主动之可能”。同时提出，“在宪草与国大等问题没有解决，中央没有最后通知以前，我党参加政府的名单不要提出，名单内容亦尚待考虑”[200]。应该说，实施政协决议的契机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可谓稍纵即逝，而在政协闭幕后的一段时间里，本来有这样的机会，但国民党囿于一党独大的理念没有抓住、更可能是根本不想抓住这样的机会，政协决议为中国打开的和平民主的道路终未能走通。

4月2日，王世杰向蒋介石转达中共意见，国大开会法定人数应由2/3改为3/4，但为蒋所拒。15日，蒋亲自出面，召集各党政协代表举行座谈会，表示国大“各党派应提出之代表名单，甚盼于本月二十日以前提由政府办理。至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亦盼同时提出，俾能于还都前完成政府之改组，使和平建国工作，得以逐步实施”[201]。蒋想以改组政府的许诺，掩盖东北正在爆发的战争，并在还都后立即召开国大。但是国民党提出国府国民党外委员名额，中共、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按8:4:4:4方法分配，使中共和民盟失去否决权，被中共认为“决无考虑之余地”。而且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国府委员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一事也未得到中共和其他党派的认可。周恩来在座谈会上表示，政府名额分配、宪草修改问题尚未解决，整军和停战也发生不少问题，希望将诸问题迅速一道解决。会后周致电中共中央，告以蒋是两面作法，公开要求各方提出参加政府及国大名单，暗中布置东北大打全国大闹，代表团的方针是“决提高价求全盘解决”，“中心在人权、宪草、东北、停战、整军五个问题”，“如蒋在

马之压力下最后能接受，我不致上当；如蒋坚不接受，则责在彼不在我。东北不停战，决不参加政府”[202]。周恩来、董必武等和张群、邵力子等为此多次交换意见，但在如此仓促的时间下（此时距国大原定开幕之期还有不到一个月），显然无法达成妥协。4月21日，中共代表团正式通知国民党代表：关于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大会之名单问题，在政协决议、停战协议及整军方案被破坏，内战重新扩大民主毫无保障之情况下，中共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同时警告国民党，“若政府更不顾各方尤其是敝方参加与否，即径自召开国大，则尤为违反政协决议，破坏团结，结果必致造成分裂之局，其责恐政府亦无法逃避”[203]。民盟亦于同时通告国民党，民盟要求：东北必先停止内战；在国大召开之前改组政府，由改组后的政府召开国大；国民政府委员会与行政院同时改组。如果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民盟决定不提名单[204]。

中共和民盟对国大的态度，使国民党召开有各党参加的国大成为不可能。在蒋介石召集国民党政协代表讨论应对方案时，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认为，“中共等不参加国大，则召开国大徒然促成大决裂，于党于国无益，不如暂时不开会”。他们还指责CC系“过去数月鼓励党中同志异论以增加本党负责对外接洽诸人之困难”。吴铁城认为，“今日既不能决裂，亦不能妥协，延期得以争取准备之时间”。陈立夫等仍主张只要能拉入青年党参加，“则即中共不来亦应开会”。结果与会者达成共识：“共党并无急求解决之意，我希望于五月五日前改组政府，恐不可能，而国民大会之召开，亦难望获得决议。”[205]此时正值国民党筹备还都，召开国大本已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蒋介石决定将国大延期。24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国大延期召开，表面显示为尊重各党派意见，实际表示其以国大营造全国统一气氛的企图失败。从此，政协综合小组会和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停顿，再未举行。政协决议实际已被束之高阁，战争成了更迫切的问题，实行政协决议倒成了第二位的问题，很少有人再提了。

政协举行前后，国民党在人民自由权利方面作出了一定姿态。1月2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对于有碍人民自由的法令规定如下：1．法令之已经明令废止者，毋庸再议；2．法令之拟予废止者，由原公布机关明令废止；3．法令之应予修正者，可送立法机关重行修订；4．各省县市及治安机关自行制定而与中央有关人民基本自由之法令抵触者，一律废止。根据这个规定，应予废止者有：《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及其实施规定》、《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办法》、《国家总动员法》、《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战时书刊审查规则》、《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人民团体整理办法》等等；应予修正者有：《保护管束规则》、《出版法及施行细则》、《废止出版品检查制度办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等等[206]。然而这些规定只是纸面上的，实际仍有许多新旧法规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比如舆论出版界啧有烦言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终国民党统治之世，始终未能真正废除。

第三节　军事调处与军事复员

一　军调部的成立及其活动

根据停战令的规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名委员组成，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之直接问题；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207]。在国共双方同日达成的《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中具体规定：军调部的任务是，执行已经商定之停战政策，提出有关建议，增订必要之附属协定，以确保停战命令更有效地实施；军调部委员各有表决及商议权，邀请美国委员任主席；设立执行小组，作为军调部之执行机构，实地监督各种协议的执行，提交报告，国、共在执行组

内应有同等人数，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军调部的工作将延续至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共中央主席通知对方废除此协定时为止[208]。这样就对军调部的性质、作用及美国的地位作出了原则规定，以后军调部的工作大体即按此原则实行。

军调部于1946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平，所有部门成员均由国共美三方共同组成，国方委员郑介民（军令部二厅厅长），共方委员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美方委员罗伯逊（美国驻华代办），执行主任由美方白鲁德担任，5月增设副委员，国方蔡文治，共方饶漱石，美方吉伦。总部下设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为国方蔡文治，共方先耿飚后罗瑞卿再后陈士榘，美方海斯凯），以及执行、新闻、总务、通讯、交通科（5月改为调处、交通、整军、新闻、行政处）。在军调部工作的高峰时，设有36个小组，加上执行部机关，人员总数九千余人（其中国方两千六百余人，共方六百余人，美方则多达六千余人），每月开支法币4亿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机构[209]。根据协议，军调部的工作主要是五项，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日伪、遣返日俘、整编军队，实际工作主要是前两项，尤其集中在停止冲突问题上，后三项任务中，国民党不承认还有受降问题，遣返日俘则主要由国方负责，军调部干预不多，整编军队尚未开始即告搁置。

军调部最早派出的执行小组是集宁第一小组，其后执行小组陆续被派往各个地区，东北停战前后，又向东北派出若干小组，最多时共有36个小组。驻扎地点如下：集宁第一小组（1.17—8.14，以下小组顺序类推），赤峰（1.17—9.28），太原（1.31派出），徐州（1.17—9.29），张家口（1.17—9.30），沁县（3.27派出），济南（1.17—10.1），广州（1.22—7.10），汉口（1.20—9.12），新乡（1.29派出），承德（1.31—9.10），石家庄（2.4派出，4.24共方撤离），大同（1.19派出），侯马（1.31派出），德州（2.1派出，7.8改驻青岛，9.25撤离），泰安（2.7派出），淮阴（3.6派出），泊头（2.18

派出），安阳（2.20派出），南口（2.20派出，8.20共方撤离），高密（2.22—5.16），枣庄（3.5派出，6.16国方撤离），晏城（3.7—7.17），徐州（2.11—9.29），安次（3.16派出，不久回北平，8.2改为安平小组），朝阳（4.9派出），沈阳（3.30—11.21），四平（3.30—11.21），海龙（原在本溪，3.30—11.21），鞍山（原在海城，3.30—11.21），永年（5.7派出，后驻邯郸），光山（宣化店）（5.4—9.2），拉法（6.17—11.21），德惠（6.17—11.21），双城（6.17—11.21），齐齐哈尔（后移洮南即白城，6.17—11.21）[210]。执行小组是军调部工作最基层也最重要的组织，负责监督命令的实行，提出调处报告。在36个小组中，第18到24共7个小组为交通小组，主要负责恢复交通工作，其余为停战小组，负责停战的执行（其中有9个小组兼管交通）；第1、3、4、7—12、27小组为中心小组，必要时可派出分组；小组驻在国方区域者24个，驻在共方区域者12个，华北最多，有24个，其中山东地区即有8个（包括徐州）；派出时间，停战小组主要集中在2月，交通小组集中在3月，东北小组集中在3月和6月；此外还派出过若干特别小组及联络员，任务完成即行撤销。在派出小组地区上，国共双方都争取将小组派往己方处于劣势或需要阻止对方进攻的地区，以保护己方战略利益，如国方要求派往集宁、赤峰和山东等处，共方要求派往广东、中原和东北等处。

军调部成立后，在最初三个月内，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工作进展较快。这一阶段，军调部发出六号和字命令，五件特别指令，派出23个小组，达成69项小组协议或指令[211]，均占各项工作数量的60%以上[212]。关内冲突在军调执行小组监督下基本得以停止。在这一阶段调处中，国共美三方均表现出较为合作与克制的态度，军调部第七号公告曾称，国共“双方皆有保持和平之诚心，且无疑义的，双方要求和平，并将尽可能以全力处之”[213]。中共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在军事调处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军调部工作时，刘少奇指示，在全国要与国民党的主体合作，表现我们力求解决问题的诚意，对1月14日以后被国民党所占地区基本上应

以政治方式解决[214]。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在给中共各战略区的电报中，要求各地实行彻底停战，主动提出双方撤除包围封锁，对国方蚕食政策应采取扩大政治宣传与积极准备自卫方针，各小组对执行部命令应表示积极支持态度[215]。

国共双方在最初阶段的调处中，互有让步。中共在伪军和遣返日俘问题上作了让步。中共原本坚持解散被其包围的伪军、并参与日俘遣返工作。但在国方坚持下，军调部2月9日发出第九号公告（和字第三号令），规定所有部队，不论其是否称为伪军，均属于停战令范围内，应保持在1月13日的位置（此规定可使被中共部队包围的伪军免受攻击），有关部队地位问题，将由三人会议决定。2月18日，发出第十三号公告，将遣返日俘责任归之于国民政府，并由美军协助[216]。

在中共东江纵队撤退问题上，国民党作了让步。东江纵队是中共领导的广东地区抗日武装，停战令下达后，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声称，“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其行动在任何方面观察，均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实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217]。因此张不同意派军调小组到广东（军调第八小组到惠州视察后，因当地驻军的反对而无法执行任务），并派部队继续围攻东江纵队，引起中共的抗议。在三人小组的最初几次会议中，周恩来提出应允许东江纵队北撤，否则“定必引起严重之后果，届时共党军队亦必在山东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如因此使停战协定陷于破裂，其责任应由政府方面负之云”。参加三人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彼既保证此项部队退出广东，则似不宜因此局部问题致影响整个问题之进行”。他与军令部商量后，提出由军令部电令张发奎停止军事行动，并由军调小组前往调处[218]。4月初，国共代表皮宗敢和廖承志在美国代表协调下，与广州行营和东江纵队达成协议，中共武

装人员分为三个地区集中后至指定地点大鹏湾驻扎，准备复员及北撤，行营方面对此给予便利。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延宕，至5月下旬，中共部队才开始集中，6月30日自大鹏湾由美国军舰接运北上，7月5日，东江纵队全部二千六百余人，由司令员曾生率领到达山东烟台[219]。

当然，军调中的三方矛盾斗争，尤其是国共之间的矛盾斗争，自始即存在。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停战原则问题，1月21日军调部第二号公告（和字第二号令）规定所有冲突部队立即停火并予隔离，隔离方法为，城市如一方占领，另一方应撤离一日路程，如双方都在城内，则各自撤离一日路程；野战部队撤离冲突地点一日路程；一日路程至少为60里[220]。因为国方军队占的城市多，如实行此一规定，则共方部队将撤出许多地方，因此指令下达后，国美方即抓住条文在集宁、大同、同蒲路南段等双方相接地区提出隔离问题，企图保护己方所占地区，合法削弱中共所占地区。中共中央认为该项规定“其内容是不公道的，对我是不利的”，因此指示“各地接到这一命令应依照各地情况灵活执行”[221]。叶剑英亦致电各地中共负责人，要求“各地区在实施停战隔离之时，必须根据情况决定。各停战小组的中共代表，在实际执行隔离时有自己的否定权，可以坚决抵抗并将办法中实际行不通的情形电告我们，以便根据实际材料作新的规定”[222]。在中共的坚持下，2月4日，军调部发出对和字第二号令的修订指示，规定隔离办法可由双方根据情况就地决定，随后又将“城”的含义解释为“城、镇或乡村”。3月19日，军调部又发出和字第六号令，规定国共双方军队必须停驻于1月13日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否则，“将以违反停战命令论罪”[223]，从而确定了调处工作根据停战令规定进行的原则，如何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成为此后各方争论的焦点。

在最初的军事调处工作中，恢复交通问题占据着重要位置。国民党特别注重恢复交通带来的战略利益[224]，而中共强调恢复交通的

全面性及拆除封锁线的重要性。在谈判中，国民党提出，立即发布命令，禁止破坏交通和通信；恢复交通由政府交通部负责，派执行组监督实行；交还被拆去铁轨枕木与器材；由交通部警察护路[225]。中共提出交通恢复应为全面性的，包括铁路、公路、水路、邮电；各自地区由各自负责，所有封锁线及碉堡均应撤除；铁路局、运输司令部和路警应由双方人员组成；拆除对陕北的封锁线。对于铁路管理问题，中共希望“深插一脚”，而国民党不同意，为了显示诚意，中共过后作了让步，同意美方建议，由北平执行部监督修复铁路及通车，同时成立铁路管理组，铁路守卫和保护各自负责。“此外，恢复与开放交通应坚持同时并行，一切封锁线碉堡必须拆除，并以后不得建立”[226]。此问题在执行部谈判未得结果，不得不提至三人会议，2月9日，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达成恢复交通原则协议，11日由北平军调部发出第十号公告（和字第四号令）并两项附件，公告规定：“为履行停战任务之一部分，各指挥官应立即进行协助恢复各交通线工作，所谓交通线包括所有道路、铁路、水道、邮政、电话线、电报线、或无线电设备。各指挥官应立即撤去或平毁在交通线上及沿交通线之一切地雷碉堡封锁防御工事，及其他军事工程之妨碍交通线运用者”；“政府或中共任何一方，均不得藉修复交通而获取军事上之利益。除非经执行部特准，重行开放之各运输线，均不得运输军队及武器军火”；对于国共意见不一的铁路管理权和护路问题，协议规定，修复工作将于执行部监督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之代表机关完成之，执行部设立铁路管理科，各指挥官均有护路责任，列车守卫、路政管理、行车员工由交通部代表机构直接管理，受执行部监督[227]。该协议只规定了恢复交通的原则，而在管理权和一些具体问题上未能作明确规定，为以后的实行埋下了隐患，但无论如何，恢复交通协议的达成，是此期国内政治和解气氛的又一产物，它与停战协议、整军协议并称为1946年初国共关于军事方面的三项主要协议。2月16日，军调部决定了待修复的八条主要铁路的次序，成立了铁路管理科，并派出了七个交通小组监督实行。为了争取舆论同情，3月初中共在三人小组内口头同意，“铁路修复不应以等待对于拆除碉堡工事之决定而

中止或受阻碍”[228]。此后，中共在解放区内自行进行了修复铁路的工作[229]。

在恢复交通实行过程中，关于管理权问题国共双方始终争执不下，中共建议仿照军调部成例，成立由三方组成的铁路管理委员会，在军调部监督下行使管理权，而国方坚持由交通部统管，解决方案因而搁浅。对于协议中要平毁的碉堡的定义，国民党只强调拆毁妨碍铁路交通的碉堡，对于“保护”交通线的碉堡则坚决主张保留，而中共则主张拆毁一切碉堡，特别是双方交界地方如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4月3日，在陈诚接任张治中出任三人会议国方代表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强调“不去除一切碉堡，仅铁路通了，则政府有到中共区去的自由而中共区不能反过来照行，这样不能说是恢复一切交通”[230]。7日，陈诚提出国民党方面提案为：1．同意碉堡不应妨碍人民往来；2．拆除工事与碉堡问题应从整体解决，请即执行整编方案，此问题仍可顺利解决；3．如必拆除，提议于整军第一期完成开始拆，第二期完成则拆完；4．如上述条件暂时无法做到，则就考虑凡足以妨碍交通之工事与碉堡一律撤毁，但防守性及保护性之工事与碉堡决不能撤除，必须保留碉堡之地区为，津浦、胶济、北宁线、陇海线西段及平绥线之一部，陕北封锁线是否撤除须待胡宗南决定；5．中共应该做到修复各路，保持路政完整（即用人由交通部考核，统一收费，统一路警），不破坏煤矿和邮政，不向铁路作向心运动[231]。这样的条件实际意味着国民党不同意先拆碉堡，而保持其作为封锁、压迫中共部队的手段，谈判自然无法达成妥协[232]。因此，中共的对策是，“主动的修复解放区铁路，同时不断的提出修路的成绩数字，以争取政治上影响，但在国共地区恢复通车，则自然采取拖延政策”[233]。此后，更为迫切的东北问题占据了谈判的中心，恢复交通问题则被搁置，直到6月谈判中才被重新提起。

对于军事调处，国共双方都希望能够为己所用，国民党由于美国的支持，“开始时期也自然比较主动，来势汹汹”，而中共方面因为工

作干部多系临时抽调，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开始采取的是防御方式，试探性质”[234]。据华东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国民党时常利用中共地方准备不足，交通联络困难，进行突然袭击，提出大批要求，侦察中共方面意图，寻找弱点，造成中共方面仓促应付，前后矛盾，“作对他有利之解决”，“各地美国人态度上，尽管方式有些不同，基本上与国民党站在一齐”。因此，华东局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剧烈的政治斗争，我们须以军事战斗的精神，沉着机敏，提高警惕性与求主动，决不可仓促解决问题，暴露我之弱点与企图，造成劣势与对全局之不良影响”。在具体作法上，要求签字应一律请示上级批准；提交材料须统一提出、完全一致以保持主动；以国民党为主要斗争对手，对美方代表避免正面冲突；对军调部的命令应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形，找出有利于我之解决办法，对恢复交通问题要特别警惕；全部谈判由华东局亲自掌握，进行一元化领导[235]。

三方一致同意原则为军调部工作的核心原则，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国共美三方完全一致的可能性几等于零，国美一致不同于共方者居多，共美一致不同于国方者很少，也有三方各执己见者，由此导致军调部及其小组的实际工作，除了少数程序问题以外，终日处于开会、谈话、互发备忘录的争吵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在军调部存在的一年中，三委员正式会议62次，参谋长会议53次，处长级会议269次，非正式会议和谈话不计其数，国方发出备忘录12571件（实际收到四千余件），共方发出1222件，美方发出约一千件[236]，如此数量实为惊人，可见军调部及其小组就是一个你来我往、但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的事务性机构。如同中共方面参谋长罗瑞卿所言：“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没有终了。”[237]由于执行小组经常因为意见不一而无法工作，3月31日，美方曾提出对三方一致同意原则加以修改，建议当调查违反停战令事件而派出小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时，由美方以主席资格作出决定，但只牵涉小组往何处派出问题，而不牵涉调查的结果或采取的行动。国民党方面同意，而

中共方面反对，认为这种关系军调部活动原则的改变，应由高层当局决定[238]。5月初，美方又提出，派出小组问题由多数决定，为了配合美方提议，国方代表有意在执行部和小组会议上，无条件地同意美方意见而反对共方意见，一切推由美方决定。虽然美方的提议似乎只牵涉到调处中的程序问题，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任何违反三方一致原则的规定无疑首先有利于国民党，因而为中共所反对。周恩来对白鲁德表示，三方一致的原则“才可以解决一切纠纷。这获得我们的完全信任，认为公正，有诚意。这种立场我们不能改变。否则会影响到我们的党对美方的调处公正的信任。这个办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239]。

军调部最初的若干成功，是在国内政治和解的大环境下取得的。美国人在总结时认为，军调部所有被赋予的任务中，只有遣送日俘回国一事顺利完成了，恢复交通和整编军队必须依赖于停战，只要军事冲突还在继续，并且没有对相关政治问题的适当解决，这两件任务不要说完成，即便是有效地开始进行都是不可能的。执行部在其可能限度内，已经非常成功地行使了其职能，但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盘政治形势[240]。军调部成立时间不长，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已经使“全盘政治形势”恶化，军事调处工作很快受到影响。根据整军协定，在协定公布后的三个星期内，国共双方应交出拟保留部队表册和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由军调部制订实施计划。3月16日，三人小组在备忘录中确认，军调部为执行整军方案的工作机构，并将组织小组监督执行情形[241]。然而这也是关于整军方案执行的唯一一个协议。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共方面认为，国民党未能履行政协决议，交出整编表册的时机尚不成熟，整编复员工作未能循序开始，整军处成为军调部最清闲的一个部门[242]。

东北战火燃起之后，军调部的活动集中在找出解决东北冲突的办法，但终未能如愿。此时，关内军事形势虽还保持大体稳定，但亦有恶化的征兆。一是中原地区形势日渐紧张；二是中共为了报复国民党

在东北的进攻，在关内若干地区发起反击；三是恢复交通受阻；四是各执行小组内互相指责，已很难再达成协议。不仅如此，军调部工作人员本身的安全亦成为问题。首先是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不断受到威胁，其中严重者为4月3日北平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被搜查、滕代远将军秘书李新被扣押，5月15日调处处中共方面处长宋时轮遇刺未遂。如同中共其后所总结的，“这时期在谈判与调处上的斗争确是走入最尖锐的阶段，无论与国民党或美国人，大家都已撕破脸，丝毫不让”[(243)]。由于马歇尔此时尚极力控制战火不使蔓延关内，为了保持军调部的权威及其活动的势头，因此而有5月初徐永昌、周恩来、白鲁德的中原之行，以及5月14日三人会议给军调部下发的五条指令（16日以和字第七号令公布）：1．国、共双方应对执行小组的行动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而不得强加以任何延迟与限制；2．国、共双方应保证执行小组成员的个人自由与安全；3．国、共双方将在任一执行小组区域内得到同等的调查机会，调查次序将以报告给小组的违反协定事项的严重和紧急程度而定；4．前往调查地区和调查事件的次序由小组美国代表作为主席而决定，并经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如有不同意见则报告执行部，再有不同意见即报告三人会议（这一条在文字上照顾到了美国的要求）；5．若有关于调查违反协定事项的虚假报告呈送小组，三委员应将其提交三人小组，采取制裁办法[(244)]。但无论如何，军事调处工作已不复最初的权威，当一地发生战事时，曾有有利一方借口离去而拒绝前往调处的情况出现[(245)]，执行小组也由监督执行停战的机构，退而成为报告机构，何况牵涉违约的报告由于意见不一也往往送不上去。

二　复员整编的实行

整军方案达成后，国共双方都依据这一方案，进行了初步的复员整编工作。

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1944年底，

国民党政府军计有124个军354个师31个旅近600万人，如此庞大的兵力于经济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从1945年初起，国民党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21个旅，编制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人数减少了约110万。到整军方案达成时，国民党军队还有91个军253个师[246]。据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政府军将在十八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十二个月，部队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其中第一阶段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期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三分之一[247]。

根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党军队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248]，即将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三旅六团制或二旅四团制的师，裁掉三分之一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三二、二三或二二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应付整军方案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保留原有单位的情况下也较易操作。就军事作战的角度考虑，三三制较为合适，但当时军队高层考虑，“三三制在运用部署上虽较便利，但三旅九团过于庞大笨重，在我国道路不良，行军长径大，补给与指挥不便，易失机动力”。而“两旅六团兼有持续强韧战力与机动力，在运用上似较适宜”[249]。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自3月开始进行，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因内战爆发而停止[250]。

对于复员计划所裁减的官兵，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

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实边等工作”[251]。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252]。根据其计划，预计第一期复员军官（佐）18万人，其中除了1万人深造，1万人退役，1万人集团转业外，其余15万人将经三个月至一年的训练后，予以个别转业。计划为，警官4万人，交通管理5000人，工矿管理2000人，农林垦牧1000人，土地测量1000人，地方行政2万人，地方卫生2000人，金融财政1000人，民众义务教员4万人，劳动服务队督导员4万人，总预算2010亿元。如加上上述事业开办费和军官（佐）薪俸（每月人均7万元），还需3566亿元[253]。至于复员士兵125万人，“除择优深造及资遣退役者约二十五万人外，尚余百万人，即行集团转业，分配于修筑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及垦殖畜牧等项”[254]。可是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很少真正付诸实施。唯一实行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255]。正是由于国民党对复员官兵的漫不经心，使得复员官兵流落社会，生活无着。按国民党原规定，军官佐退役金数量，最高的将官不过发给一年薪给及6斗退役粮另加三分之一月俸，后调整为按实职年资计算，以三个月薪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发一个月薪水，及二分之一月俸。然而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能够维持的生活水平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256]。这就难免使复员工作受到影响，复员官兵对国民党心怀怨恨，不仅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直接影响到部队作战士气。至于被裁军官，更是利用以往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量，四下串联，要求给以适当安排，以致最后酿成中山陵哭陵的一幕，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士气是一大打击[257]。

对于军队复员整编，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据郭汝瑰回忆，“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

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258]。实际上多数高级将领对整军态度消极。2月16日，国民党军事整编会议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出席致词谓：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必须改正过去庞大空虚的军制之思想观念而整军建军，重质不重量。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加强革命武力，贯彻三民主义；拥护领袖，必须分劳任怨；复兴民族，当从死里求生[259]。 会后陈诚即按蒋的旨意大力裁减军队人数及编制，实行精兵主义。但是在明面上的理由而外，陈诚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目的，即排斥异己。照当时人的说法，“同样是国家的军官，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了”[260]。

国民党军队在复员期间的重大改革，是重组了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构迭经变动，至抗战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委员会为龙头，以军政、军令、军训三大部为主干的一整套叠床架屋而庞大繁杂的机构（直属单位十七个，编制人数2.4万人，外有行营、战区、绥署等机构），“组织庞大，系统复杂，指挥运用自难期其灵活”；各部会“事权不一，连系概同，所在不便，行政效率难于发挥”；最重要的是，军令与军政分立，陆海空军各有指挥系统，互不相属与联系，很难组织统一而有效的指挥，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要求[261]。抗战胜利前后，各方均有改革呼声。何应钦呈蒋介石称，军事改制，势在必行，建议仿美体制，撤销军委会，改设国防部，以便号令一致，有始有终。同时魏德迈亦建议：为了今后贵我两国长期协作，军事体制必须紧密配合，达到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俾可达到共同对敌，共同繁荣之目标[262]。蒋介石遂决心在美国顾问团的帮助下

[263]，对军事指挥架构进行彻底改组，以收运用自如之效。1946年3月30日，蒋召见各军事机构负责人，宣布改组中央军事机构，“以仿照美国制度为原则”，并以陈诚牵头组成起草委员会，限于5月15日之前完成[264]。美国方面由白林克将军等参加改组筹备工作。4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向陈诚提交了关于《中国国防部组织》的基本研究，其原则是：1．所有设计主要在中国国防，而非全球作战；2．应求适应自平时转入战时之预备扩充之基础；3．组织应简单；4．应能迅速有效执行参谋总长之命令，并提供适当之方法与权限，以监督及指导其命令之确实执行；5．研究与发明应注重至达高级水准；6．集权之指挥统御，与分权之实施管制，应在各级组织中贯彻之[265]。根据这个方案，4月26日，成立了以陈诚为主席的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进行改组准备工作。5月2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国防部组织法》，决议裁撤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和行政院之军政部，于行政院内设国防部。

根据《国防部组织法》的规定，“国防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综理军令事宜；并承行政院院长之命，综理军政事宜”；国防部设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及联合勤务司令部。国防部以参谋总长为核心枢纽，其职责为“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关国防之各种建议”；国防部所属各厅局处“均承参谋总长之命，分掌业务”；各总司令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参谋总长之指导，分掌军事实施”。国防部长的职责不过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计划，提交行政院决定，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266]。美方最初的建议纯仿美制，以文人担任国防部长，但格于中国实情未能实现。改组后的国防部，形式上仿美制，但国防部的职掌明显偏于一般军政事务，军事实权全在参谋本部，正因为国防部长名大于实，蒋介石才将第一任国防部长的虚名给了桂系的白崇禧，以示拉拢，而将自己的亲信陈诚摆在参谋总长的位子上，其下四大指挥机构的负责人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陈诚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合勤务总司令黄镇球。

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的改组，“系参照美方建议原案，及斟酌国情，顾虑今后新军事建设开展容易为原则”，但在改组过程中，就制度而言，一方面“因彼此国情未能尽合，此次改组偏重采用美制，未能兼顾本国固有之国情与环境”，另一方面又“未能采用美国分层负责之制度，工作程序繁重”。就改组本身而言，时间紧迫，“旧有积习，仍多未除”，“最大缺点为忽视业务，迁就人事”[267]。在国防部的运作过程中，各部门机构重叠，职责不明，相互掣肘，人事纠纷不断。国防部两巨头陈诚和白崇禧更是积不相能，白无实权但名义上是国防主管，陈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白放在眼里，在部务会议（部长主持）和参谋会议（总长主持）上，两人各执一词，下属无所适从，后来矛盾一直发展到互不出席对方主持的会议[268]。在这样的关系下，很难保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效率。

总体而言，国民党一方面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以及过于庞大的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和运转不灵的实情，进行了一定的精简整编，同时其整编的过程也是裁弱留强、军事动员备战的过程，它的一系列军事作战计划都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

中共方面，对复员整编也作了若干规定。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提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该指示要求兵员最多的华东（山东）、晋冀鲁豫、华中三处，“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15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再次强调：“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整军复员（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269]可见中共是从积极

的意义理解整军复员之举，既可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又可精兵简政，提高部队战斗力，而且对政治形势可能的变化，保持了警惕。为了避免被精简人员的不满，中共特别要求“除在政治上彻底解释清楚外，必须对复员人员妥为安置，各得其所”。“各地应组织复员委员会等机关，认真办理，不得敷衍塞责”。具体办法是：

1．复员人员，按照军龄长短，发给胜利生产补助金（标准由各地自定）；2．复员人员，不论军龄长短，一律发给衣服、鞋子；3．连以上干部一般不复员，但有一部分须帮助其转业；4．复员人员回到各地后，应设法拨给土地及帮助解决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5．家庭非在解放区的干部战士暂时争取其不复员或复员在解放区生产[270]。这样避免了复员人员流落社会，有利于安定人心[271]。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前后，中共各大区都召开了复员整编工作会议，颁发复员条例，组织复员委员会，进行复员工作。不过中共内部对复员的看法并不一致。据当时人回忆：“同志们看到整军方案后，有些发愁，说革命二十年，就搞剩这么些枪！”“此刻，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确切地说，是有点混乱，各种议论纷纷不一。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缩编我军为二十个师的问题；……对此简直有点想不通，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情形颇为近似。”[272] 不过，由于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的反复，政治形势变化很快，中共的复员工作实际未能按计划进行，已裁减者主要是地方部队和老弱病残人员，全军人数由138万人减少为127万人[273]。

但是，“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却是一个例外”。在中共各大区中，晋察冀部队复员的人数最多，时间也最快。还在整军方案最后达成前，1946年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因此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减（如果迟了一方面开支浩大，另一方面回乡人员将误农时）。”[274] 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称：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

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复员条例》和《晋察冀边区复员人员费用发给办法》，按参军时期的不同，发给数量不等的小米、衣服和鞋子[275]。此后晋察冀部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抗战胜利时，晋察冀部队编为第一野战军（4个纵队）和第二野战军（5个纵队），共有9个纵队（26个旅）20万人，还有5个地方军区，部队11万人，连同机关学校等共32万人。到1946年6月，虽然地方部队增加为15万人（主要由编余部队转入），但野战部队撤销了3个纵队，其余精简整编为4个纵队（9个旅），人数锐减为五万余人，全区总兵力减少为二十余万人[276]。其间原因，郑维山认为："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率先复员三分之一，恐怕意在给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277]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晋察冀离北平最近。但是晋察冀的复员与该区负责人聂荣臻对形势的估计也有关系，他曾对人说：大势所趋，非要和平。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决心很大……国民党军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278]。其后，他坦承"这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和平幻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极不充分。军队进行了复员"；"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279]。

军队整编对国共双方的作战能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白崇禧认为，国民党军事失利"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徐永昌甚至认为，"当此战事吃紧，部队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280]。除此之外，从军事意义而言，国民党很快在作战实践中发现新编制的不足，最主要的是第一线部队和预备队均不足数，不适应实战要求[281]。蒋介石总结为："在作战时，师长旅长留置必要之预备队后，其第一线兵力极为薄弱，未能尽量发挥其战斗力。譬如三旅

制之师，师长旅长各控制一个团，则该师六个团之部队，其在前线作战之兵力，只有二个团。如二旅制之师，在前线作战兵力，仅有一个团。此种缺点，影响作战甚大。”[282] 因此从1947年起，国民党军队在实战中又陆续恢复了三三编制。至于整编过程中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矛盾，使得人心浮动，战斗力下降，则已经不是军事学意义的问题，而要由国民党军队复杂的派系组成及其多年积累的矛盾中找原因了。

中共方面对精简整编也有不同看法。在精简整编较多较快的晋察冀区，不少人当时和以后都认为，该区在全面内战初期作战不利的原因之一，就是精简整编“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伤了部队的元气”；“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而且大量复员这一行动本身，又增加了部队的和平观念，影响了练兵的积极性。练兵抓得不紧，对战争初期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283]。最权威的意见当然是毛泽东的看法，他在1946年11月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中说：“在复员的问题上我们就吃了亏，结果有些部队不充实，民兵也减少了。”[284]

---

(1)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0日。

(2)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0日。

(3)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日。

(4)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3日。

(5)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1日。

(6)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第1

页，无出版地及出版年月。

(7) 张奚若教授在演讲中指斥蒋介石说："不知主席从何产生，我不能称他为主席；我非军人，我不能称他为委员长；我非党员，又不能称他为总裁；我经考虑再三，唯有称他为蒋介石先生较为合宜。"此语被当局认为是"公然否认蒋主席之法律地位，此为共产党所不敢为者"，"应予处置"（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417页）。

(8) 此次事件实际上是云南军政当局事先布置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在12月1日上午召集手下开会，号召"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随后即由手下开始行动（沈沉：《"一二·一"惨案侧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425页）。

(9)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第86页。

(10) 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镇华出版社1946年版，第18—19页。

(11) 《昆明惨案》，《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12) 《请政府从速严惩昆明学生惨案祸首禁止非法行为安慰员生以平民愤案》，1945年12月7日，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13) 《新民报》1945年12月7日。

(14) 《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彩函》、《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09—413页。

(15)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8日。

(16)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1日。

(17)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07-609．

(1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42页；《和平民主的道路——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一》，1946年印本，第9—11页。

(19)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126页。

(20) 《和平民主的道路》，第20—21页。

(21)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与马歇尔特使晤谈要点电》（1945年12月6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美总统指示马歇尔特使调停方针等事电》（1945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47、61页。

(22) 《中宣部致各省市密电》，1945年12月22日，二档，全宗一（八），卷号178。

(23) 中央社在发自纽约的报道中，虽然极力想使读者认为杜鲁门的声明对国民党并无不利，但除了美国继续承认国民政府这一点外，中央社的报道找不出这个声明中还有什么可以使国民党引为同道之处。而美国新闻处发自重庆的报道称，中国报纸对于杜鲁门的声明一般的明白表示赞同，官方报纸以之为一粒难于消化之药品，共产党则认为彼等乃系可自此种声明获益之主要对象（《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56、160页）。美国人的报道无宁说更接近于事实。

(24) Wells，Sumner：*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2．Harpes and Brothers，New York，1951．

(2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X．

(26) *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p．353，356．

(27)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p．67．《纽约时报》1945年10月2日，译载于《新华日报》1945年10月5日。

(28) *FRUS*，1945，Vol．7，pp．659，665，673．

(29) *FRUS*，1945，Vol．7，pp．745-747．艾奇逊：《参与宇宙的创造时——国务院时代》，第139—140页，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6页。

(30) *FRUS*， 1945，Vol．7，pp．767—768．艾奇逊：《参与宇宙的创造时——国务院时代》，第142—143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354—355页。

(31)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292．

(32)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 pp．72，76-77．

(33) 《蒋主席为艾其森事致赫尔利大使转呈杜鲁门总统备忘录》（1945年9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30页。

(34) 《惜别赫尔利欢迎马歇尔》，《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1月29日。马氏到华后，《中央日报》再度为文，声称“在当前的中国，宣传常大于事实，而事实亦常供宣传之用。若认定这种不正确的宣传为中国的民心，则易生莫大的误解”。也即担心马氏受所谓“宣传”之惑，从而对国民党有负面看法（《马歇尔特使莅渝》，同前，1945年12月23日）。

(35)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与马歇尔特使晤谈要点电》（1945年12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47页。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7页。

(3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4页。

(38)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页。

(3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7页。苏联虽然没有参加调停工作，但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们的意见，要求中共无论如何应决心停止内战，不搞苏维埃化，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实行民主化。他们特别提醒中共，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周恩来年谱》，第638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2页）。

(40) 《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页。

(41) 《欢迎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和平》（1945年12月2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3页。

(42)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232页。

(43) 《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页。

(4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9页。

(45)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46) 张群只在停战谈判的短时期中参加了三人会议，从1月中旬到3月底，国方代表为张治中。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辕主任后，4月上旬陈诚接任国方代表，但他无意言和，只参加了几次谈判，便称病离任。自5月到6月，徐永昌出任国方代表。6月以后，三人会议停顿，直到11月国大召开前夕，陈诚又

一度参加三人会议，但因内战已经大规模进行，此时的三人会议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国大召开后，周恩来回延安，三人会议不复存在。

(47) 《周恩来年谱》，第634页。

(48) Notes on Conference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 Chou En-lai，Jan．3，1946，*FRUS* ，1946，Vol．9，p．12．《停战办法中应删去涉及东北的文句》（1945年1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3页。

(49) Minutes of Meeting of Military Sub-Committee，Jan．8-9，1946，*FRUS*， 1946，Vol．9，pp．73，99-101．

(50)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5、9日。

(51)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

(52) 《中共中央关于保卫承德问题给程子华等的指示》（1946年1月3日），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213页；《中央关于死守平泉、凌源、承德的指示》（1946年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1页。

(53)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9—620页。

(54) 周恩来在对国共谈判作总结时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同意停战是因为军事上还没有准备好，加上国内外环境的压力，而“我党在当时也需要停战整顿，特别在东北是日本投降后才搞起来的。就是在华北，过去也没有这样大，所以当时党签订停战协议是对的”（《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5页）。

(5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78页。

(56)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2页。

(57)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3日、12月16日。中共的分析是，“黄埔、CC是要战的，但对战，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当然希望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此一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8页）。

(5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9—910页。

(59) 《我方发动反攻具有充分理由》（1945年11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9页；《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

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3页。

(60) 《周恩来年谱》，第630—631页。

(61)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页；《董必武年谱》，第238页；《任弼时年谱》，第506页。

(62)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7日。政协代表名单亦详见当日该报。

(63)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

(64)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13日。

(65) 《希望解决问题》，《大公报》（重庆）1946年1月14日。

(66) 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1946年印本，第111—113页。

(67) 《政协文献》，第114、121页。

(68) 《国民大会问题》，《新民报》1946年1月18日。

(69) 《政协文献》，第122—127页。

(70) 《大公报》（重庆）1946年2月1日。

(71) 《政协文献》，第124页。实际上，以承认国大旧代表有效以交换其他问题解决的方案，周恩来在政协开幕前已经提到了。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如果能在政协会议中商定宪草原则，国大只限于在形式上通过宪法，并增加中共和各党各界的新代表，旧代表的作用就不大了，还可永久保留我们批评旧代表的权利。由此也可见中共当时对政治斗争的算度确胜于国民党（《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月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页）。

(72) 《纲领·政府·国大·宪草》，《大公报》（上海）1946年1月24日；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1946年印本，第70页；《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52页。

(73) 据蒋匀田回忆，“因当时所有朝野代表，皆认同张君劢代表为宪法专家”，因“请君劢先生草拟十二条修改五五宪草原则”。宪草原则通过后，周恩来建议由张君劢拟订宪法草案，“以免国民党代表执笔，偏于一党私见”；而王世杰亦中意由张拟订，因为“若由国民党代表执笔，将难免中共代表每字推敲，甚难通过”。因此宪法草案亦由张君劢执笔拟订（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36—37页）。

(74) 曾资生：《论宪法上的中枢行政制度》，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编：《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1946年印本，第21页。

(75)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9—220页。孙科的这个设想未能实现，蒋介石为了安抚孙科，在1947年改组政府时，派其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

(76) 《政府代表孙科报告政治协商会议各分组委员会商谈情形》（1946年1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215—216页。

(77) 《政协文献》，第52—53页。王世杰早年留学欧洲，曾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国内知名法学家，可是却在政协公开场合发表如此有悖常理、且为国民党辩护之言论，颇为时论所诟。

(78)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解放日报》1946年1月19日。

(79) 《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3页。

(80) 《政协文献》，第56页。罗隆基和同在一个小组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会内外有密切的合作，发言和提出方案均在事前有详细地讨论。

(81) 《政协文献》，第57页。

(82)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83)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26页。

(84)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6日。

(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183页。

(86) 《大公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

(87)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Jan．23，1946，*FRUS*，1946，Vol．9，pp．142-143．

(8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4—25页。马歇尔提出由国务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任命临时行政人员的地区包括热、察、绥、宁、鲁、冀、陕、晋、豫、甘等省，以及平、津、青三市，几乎囊括了华北以至西北的大部分省份，比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第二次提出的要求还多出了一个河南省，当然是国民党所不可能接受的（*FRUS*，1945，Vol．9，p．140．）。

(89) 蒋介石以后曾抱怨说，他之所以同意政协决议，一个原因就是“因

为国际关系复杂，我们政府不能不委曲求全，以谋国内的和平统一”（《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1946年6月，《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820页）。

(90) 《周恩来年谱》，第640页。

(91)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31日。

(92) 政协各项决议条文均见《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

(93) 根据最初的协议，国大另行分配代表名额700名，计国民党230名，中共200名，民盟及青年党各100名，无党派人士70名。其后，民盟提出其由各党派合组而成，代表人数应超过青年党，而青年党以第三大党自居，自不相让，中共遂提议国共各让出10名代表给民盟，得到国民党同意，遂成立党派代表名额分配的最后妥协。另根据国共双方的默契，在原有1200名区域代表中，华北战前未及选出需待补选的250名，由中共解放区选出，无党派代表中可有17名由中共或民盟提名，这样中共和民盟合计共有代表577名，超过了四分之一否决权的票数。后来国民党为了打消中共和民盟的否决权，补选代表多采用遴选方式产生，破坏了原有的默契（Memorandum from Sprouse to Marshall，Nov．16，1946，*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2，p．467）。

(94) 《中央日报》、《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据梁漱溟回忆，政协宪草决议通过前，国民党内即有强烈反对，蒋介石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176页）。联系蒋的公开表态，可见蒋对宪草决议的不满始终一贯。

(95)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大公报》（重庆）1946年2月1日；《和平建国的起点》、《中国历史的新方向》，《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2日。

(96) 《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后》（1946年3月17日），《马叙伦政论文选》第86页。

(97)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中央日报》在政协开幕当天发表的社论说，“政权之归还于国民，乃以国民大会为唯一的枢纽，而以五权宪法为正常的轨道。因此，召开国民大会才是宪政的成功。至于政治协商会议乃是国民政府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的一种权宜的重大措施，并不是民主政治完成和其完成所必经的步骤”（《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0日）。可见国民党始终坚持政

协的咨询性，而不当其为决策机构。

(98)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

(99) 《新华日报》1946年2月7日、9日。

(10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0．

(101) 《关于军队整编办法和程序的意见》（1946年2月5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53—54页。

(10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6—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9页。

(103)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51页。

(104) 《张治中回忆录》，第739—740页。

(105) 关于中共军队数量，国方原提15个师，中共要求20个师，后妥协为18个师，即占全国总兵力的六分之一，与政府军比例为1:5。

(106) 关于整军谈判，参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General Chang Chih-chung，and General Chou En-lai，Feb．14，15，16，18，21，22，25，1946，*FRUS*，1946，Vol．9，pp．220-292。

(107) 《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军事三小组第二次会议商讨整编共军方案内容呈》（1946年2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6页。

(108) 《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商谈共军统编问题情形呈》（1946年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7页。

(109)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6日。另据三人小组在3月16日达成的备忘录，整军方案即军调部关于复员、调防和统编的一般指令；军调部为执行此方案的工具，将以小组根据军调部的命令监督方案的执行情况；逐步取消军以上之军事指挥部；三个月内完成伪军之遣散；军调部将指令政府或共产党所要保留的师集中至其所在地（*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26-627）。

(110)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6日。

(111) 有关反苏游行事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目。

(1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56页。整军谈判基本是由张治中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国民党军事高层主官未参加意见，何应钦等人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每次会前国民党方面都未举行会商，是最大的错误。他尤其对方案未曾提及大本营直属部队和西北驻军太多两点深表不满”（《郭汝瑰回忆录》，第235页）。参谋本部经研究亦认为，华北的政府军数量不足以对中共形成优势，建议将原定华南政府驻军六个军减至四个军，西北由五个军减至四个军，将此三个军配置于华中，形成对华北的支援之势。结果，张治中只同意华南减少二个军，西北驻军则不变。因为张治中即将去西北任职，故他对西北驻军数量可能有所偏袒。

(113) 《魏德迈参谋长为装备共军十师训练计划事呈蒋委员长备忘录译文》（1946年3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96—97页。

(114) 《马歇尔特使为装备训练共军十师案复蒋委员长备忘录译文》（1946年4月21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部长陈诚上蒋委员长有关装备训练共军十师案拟办意见呈》（1946年5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13—114、119—120页。

(115) 此次三人小组出巡会见的国方将领有（以先后计）王耀武、顾祝同、阎锡山、傅作义、郭忏等，共方将领有聂荣臻、贺龙、萧克、陈毅、粟裕、刘伯承、陈赓等，如果加上在延安会见的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可以说，中共高级将领中，除了林彪、罗荣桓、徐向前三人，已全部在此次露面。即就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国共高级军事将领，由于此次三人出巡而能坐在一起的事实，亦可称为国共对立史上一次少有的经历。

(116)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Chairman Mao Tse-tung at Yenan，March 4，1946，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March 6，1946，*FRUS*，Vol．9，pp．501-502，510．

(117) 《瞭望台》，《世界知识》第13卷第10期，第1—2页。

(118) 陈立夫曾下令拨给重庆市党部法币400万元，以每人每晚2000元的代价，雇人扰乱会场（张钧陶：《“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601页）。

(119)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二十次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46年2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84—587页。方治曾建议国民党中央召开大会，宣传上述各点，但未获同意。在军统的情报中，也提到较场口事件“为CC方面所为”，“中统局所主使”（张钧陶：《“沧白堂事件”和“较

场口事件”》，《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607页）。蒋介石事先即得到有关报告，但他避不表态，实为默许。

(120) 《民主的习惯》，《大公报》（重庆）1946年2月12日。

(121) 有关反苏游行事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目。

(122)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4日。

(123) 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黄炎培日记》（1946年10月27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4页。

(124) 徐泳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935页。

(12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8页。

(126)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15日。

(127) 《陪都传言国军干部反对政协决议之谣言》（1946年3月12日），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一三，卷号239。

(128)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3页；《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3日；《新华日报》1946年2月9日；《时事新报》（重庆），1946年2月24日。

(12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3页；《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87页。据李璜回忆，张群告诉他，“蒋先生肝火甚大，天天吵马歇尔将军压迫他，他不愿与中共开会了”。李认为，“蒋以正统的全国领袖自待，不愿意平等视中共”，“蒋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封赐权位，而不愿开会讨价还价”，“国民党之二陈派受不住，复在蒋处煽动，于是愈协商则离题愈远了”（李璜：《记生平所经历的几件事》，*Li Huang Collection*，Box 1，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30) 《张发奎日记》1946年2月，*Chang Fa-kue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特种兵的任务与努力方向》（1946年6月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4页。

(1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48页。

(132)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政治协商会议之经过及有关文

件》，1946年印本，第49页。

(133) 根据国民党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承诺，政协会议“协议之结果，各方面均须遵守，当然有最后之拘束力”（《国共第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8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1页）。因此，蒋的意见实际也推翻了国民党当初的承诺。

(13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41-43页。

(1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1946年印本，第6—7页。

(136) 青年远征军第二零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946年印本，第83—90页。

(137)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8日。

(138) 《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1946年印本，第101页。

(139)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页。

(14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页。

(141) 据程思远回忆，革新运动认为：政学系利用与总裁接近的关系，提出各种建议，然后挟总裁手令以压人。例如此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出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藉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因此他们提出：总裁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行使，而不能以面谕或手令方式变更中央决议；总裁最后决定权只能在议案经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认为必要时行使，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致妨碍自由讨论；中央常务委员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以往是总裁指定），中央各部会首长应由总裁提名经中常会通过任命。此案如通过，国民党中央权力将全部置于掌握了组织大权的CC派控制下。对于这种限制总裁权力的举动，蒋介石颇不以为然，当革新派向其游说此项提案时，蒋训以“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由于蒋的反对，革新派的主张终未如愿（程思远：《政海秘辛》，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

(142) 《美国陆军部战略事务组关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情况的报告》（1946年4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

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5页。

(143) 《认识环境与遵循政策的必要》（1946年3月4日），《革新党务之要道》（1946年3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262、266—267、272页。

(14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8页。

(145)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17日。

(1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45—147页。

(14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96—498、267页。国民参政会委员企图通过参加国大而继续自身的政治参与，国民党则利用这一点提出进一步增加国大代表名额的提议，从而推翻中共与民盟合占的四分之一否决权，因而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

(148) 《诉诸国民党的智慧》，《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4日；《所望于二中全会者》，《时事新报》（重庆）1946年3月2日。

(149) 学习知识社编：《评二中全会》，1946年印本，第15—18页。

(150) 《益世报》（天津）1946年3月7日。

(151)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以后曾经对第三方面代表说，千不该，万不该，国民党最不该。一不该，较场口；二不该，二中全会；三不该，东北纠纷，致把政协议案搁起。如果当时打铁趁热，立即将政府改组，则一切没有问题，中枢下令执行，便不得有异议了（《黄炎培日记》1946年6月1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07页）。邵力子也对周恩来说：如照政协决议，当时即应改组政府，一气呵成，情形要好得多。不幸，当时未改组政府，以至六个月中局势更坏，彼此更不信任了（《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12页）。

(152)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62—67页。

(153) 自上年11月中旬起，毛泽东因为疲劳过度、身体不适而暂时休养，中共中央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

(154) 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2月1日。因为是口头报

告，其中一些提法与中共正式文件相比，更随意一些，因而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在中共党内始终存在争议，刘少奇以后也承认这个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林蕴晖：《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党史资料》第57辑，第150页）。但是因为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很快便发生了变化，因而这个报告的精神在中共内部并未起到太大影响。

(155) 周恩来过后曾经总结说：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决议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我们对此要有个深刻的认识，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6页）。

(156) 2月1日，延安权威人士评论政协决议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中国从此无疑的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3日，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更明确说：“从大局方面来看，国内和平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全国民主化的方向，也是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国家，从此已走向和平民主与建设的新阶段。这个事实已经不能抵抗了，已经不容怀疑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针——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二》，1946年印本，第1、7页）刘少奇在2月初会见美国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时，作了同样的估计，他认为反动派修正政协决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随着民主化的进程，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基于美英议会制和内阁制基础的宪法并实行之（Ariyoshi to Fairbank and Conners，Feb．3，1946，Westad，*Cold War & Revolution*，p．149）。

(157) 《周恩来年谱》，第642页；《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周恩来在此时期的一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与国民党合作的一些设想：我们与国民党，准备搞几个君子协定，长期合作，不搞两党交替（执政）。长期合作的办法是：1．保持政府以外的两党协商（政协可普遍化，遇有争论即协商）；2．联合选举；3．公开说明四分之一否决权，备而不用；4．有效地参加政府，不仅今天，宪法实施后亦如此（引自王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共谈判述略》，《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51页）。

(158) 张治中于3月初随军事三人小组巡视到延安时，毛泽东曾对他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

安，开会就到南京（《张治中回忆录》，第750页）。可见中共当时确有将中心移至苏北并参加政府之意。

(15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6页。据国民党称，中共要求为交通、经济两部部长和军政、财政、内政三部次长。周恩来解释中共之所以要求这两个部，一是国防、财政、外交等重要的部国民党不会同意，二是这两个部多是和美国合作，可以使国民党放心。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导致改组政府一事搁浅后，国民党于5月16日局部改组行政院，任命接近国民党的无党派人士王云五为经济部长，俞大维（名义上是无党派人士，实为国民党秘密党员）为交通部长，刚好占据了原定中共所占席位，周恩来认为“这不过是对付中共而已”（《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3页；《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东北》，1946年5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62页）。

(160) 《中央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面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1946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2—73页。

(161) 《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92—93页。

(162)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163) 《任弼时年谱》，第508页。

(164)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473页。

(165)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9页。

(166) 《董必武年谱》，第245页。

(16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6—57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0页。

(168) 《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宣传反攻及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3—84页。

(169)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96—98页。

(1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55页。

(171) 《甲乙致丙丁电》（1946年3月17日），中央档案馆卷90，第9号。

(172) 《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7—98页。

(173) 《甲乙致丙丁电》（1946年3月18日），中央档案馆卷90，第10甲号。据马歇尔的报告，因为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的态度，中共将预定于3月底举行的批准政协决议的中央全会延期，并拒绝送交其军事单位的全部名册，包括将保留的18个师的名册和最初两个月军队复员的日程，而根据规定，应该在整军协定公布后三周内送交这些名册。国民政府已在3月26日送交了这些名册（*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66）。

(174)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175)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

(176) 《解放日报》此文被国民党认为是“诬蔑元首”，国民党各报因而一致发起对中共的攻击。

(177) 杨幼炯：《宪法中必须坚持的几个主张》，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时代出版社1946年版，第87—88页。

(178) 范予遂：《对于五五宪草与宪政期成会修正案之比较研究》，陈长蘅：《评政治协商会议所拟定之宪草修改原则》，《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第116、118，57、63页。

(179) 吴尚鹰：《对协商会议改订宪草原则意见》，李旭编：《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时代出版社1946年版，第182—185页。

(180) 青年党在立法与行政关系上，主张大体维持政协原案；在国大问题上，认为如一定要恢复有形国大，可限制其权力为选举总统与制定宪法；在地方政制上，主张省的地位应提高，但省宪可称为省单行法。无党派委员中，王云五等与国民党一致，而傅斯年仍基本赞成政协宪草原则，但不赞成制定省宪（《宪草审议会第一至六次会议》，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291—307页）。

(181) 《宪草审议会第二次会议》，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293—294页。

(182) 《张君劢对修宪原则疑难之解答》，孔繁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309—315页。

(183) 《周恩来年谱》，第651页。谈判各方还达成默契，修改后的宪草为提交国大的唯一方案，各党派有义务约束其国大代表支持该宪草，国民党中执会只任命参加国府委员会的国民党员，其他党派成员由各党派分别任

命。据孙科说，蒋介石曾明确同意上述各点，但其后的事实表明，国民党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1，pp．64-65）。

(184)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181页。这种让步反映了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他曾认为："既称和，便须有妥协，有妥协便须有价钱。早晚市价固可不同，但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基本价钱，好在有利时机，使妥协能够得到。否则，我有利，我涨价，他有利，他涨价，其目的便非求妥协，而是在求战。""定了价钱，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更不会全盘解决。但是有了定价，而他不解决，其过在彼不在我。如解决了一部分，可使我们有阵地或有资本地进而解决另一部分，到那时另一部分的价钱，也就有可能提得更高些。"（《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页）

(185) 中央社的报道为：国大应为有形之国大，其职权为行使选举或罢免总统，创制立法原则及复决法律之权（如此具体规定各方并未达成一致）；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关系，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权均取消；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规或省单行法规（各方同意者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法与法规虽一字之差，然法理意义大有差别，仅仅制定法规等于取消省的自治权）（《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16日）。

(186) 周恩来其后公开表示，中共的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而据周恩来其后告诉梁漱溟，在中共党内讨论此事时，毛泽东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亲历其事的梁漱溟认为，"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181、244页）。

(187) 《甲乙致丙丁电》（1946年3月18日），中央档案馆卷90，第10甲号。

(188) 《董必武年谱》，第249页。

(189) 《周恩来关于进行宣传攻势及在谈判中要强硬问题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94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1页。

(190) 《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青年党因为要争取参政权，故支持内阁制，但因为其在地方没有多少力量，故对地方自治不感兴趣。

(191) 黄香山主编：《国民大会特辑》，东方出版社1947年版，第24—25页。

(192)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63页。

(193) 李维汉：《人民无权 独夫集权》，《群众》第14卷第3期，第10页。司徒雷登亦承认，宪草问题无法达成协议的根本障碍是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决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民选立法院负责）为总统制（最高权力集中于总统，同时没有美国制度中对总统权力的监督和制衡规定）（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9，1946，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rat*，1946，p．26．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Colorado，1981）。

(194) 司徒雷登认为，如何保证政协达成的协议不被破坏，是中共的主要担心所在，因为他们将政协决议视为生命线，寻求保障以反对对其作任何修改，可能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修改的规定能够向他们提供这种保障（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30，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12）。

(195) 周恩来1月31日会见马歇尔时首次提及，国民党已和中共及民盟成立谅解，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中共和民盟合占十四席（《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94页）。此时正值政协会议期间和平气氛最为浓厚之时，应可排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相刁难的可能，故国共双方的谅解当为事实。据罗隆基回忆，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民盟随后准备提出七人名单，即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沈钧儒、张东荪、梁漱溟、章伯钧，此外罗隆基和杜斌丞参加行政院。同时决定，国府改组应与行政院改组同时进行，民盟名单与中共名单同时提出。不料国民党其后否认有此默契的存在，民盟也拒绝提交名单（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47—248页）。为了拉拢青年党，国民党于4月要其提出四名国府委员，一名政务委员，及社会部部长名单，青年党无人愿干社会部，且第三方面当时尚持一致立场，故未提出（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24页）。

(196) 《梁漱溟先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1946年9月6日），《梁漱溟谈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1946年10月4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46、151—152页。

(197) 陈浩：《改组政府难产》，《消息半周刊》第2期，第3页。

(198) 政协关于国大的决议决定国大代表名额为2050名，此时国民党又在酝酿增加，此举将威胁中共和民盟在国大否决权的实现，因此为中共所反对。

(199)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1日。

(200) 《中央关于用坚决斗争的立场保卫政协决议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4月1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4页。

(20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8页。

(202) 《对蒋介石两面作法的分析和我们的对策》（1946年4月16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48页。

(203) 《新华日报》1946年4月23日、24日。

(204)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49页。

(2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3—114页；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0页。

(206) 《最高国防委员会关于废止及修正侵害人民自由法令之决议》（1946年1月28日），《政治协商会议文献》，第86—90页。

(207)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

(208)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27-628．

(209) 《执行部谈判总结》（稿本），第89、99—100页。军调部最初编制不过国共双方各170人，美方125人，后来随着任务的增加，编制日渐庞大。

(210) 各小组派出与撤回时间各说不一，此处据1946年10月的《军调部三方小组人员名单》，二档，全宗七八七，卷号16716。各小组国共美三方负责人员迭有变动，此处不赘。

(211) 这些协议主要是解决若干地方冲突、恢复交通、交换物资等，如山东德州、泰安、张店、聊城、枣庄协议，河北石家庄、保定、琢县协议，河南新乡协议，山西大同、临汾协议，绥远集宁协议，湖北罗山协议等。以徐州小组为例，先后达成了执行停战令的《停战协议》（1月28日）、同意国方驻临城军队购买粮食及燃料的《运粮证明》和《燃料协议》（2月16、22

日）、保证民众自由来往的协议（3月9日）、不得阻碍恢复交通工作的《特别备忘录》（3月9日）、国共军队撤离枣庄的《徐州协议》（3月15日）等（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军事调处在徐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9页）。

(212)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8页。

(213) 《第七号公告》（1946年2月1日），晋察冀日报资料科编：《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1946年印本，第30页。

(214)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7页。

(215) 《叶剑英等致各战略区各小组电》（1946年3月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216) 《第九号公告》、《第十三号公告》（1946年2月9、18日），《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32、37页。

(217) 《新华社延安1946年2月16日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第，375页。

(218) 《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与周恩来代表马歇尔特使会谈经过呈》（1946年2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4页。

(219) 《陈毅、张云逸、黎玉报告党中央：东江纵队抵达烟台》（1946年7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8页。东江纵队其后被编入华东野战军。

(220) 《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26页。

(221)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0页。

(222)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347页。关于和字第二号令，叶剑英曾经回忆说："军调部刚刚开始工作时，我们没有经验。美国人起草了个协议条文，送给三方委员，说是已经讨论过的东西，各方的意见都吸收了，要求签字。那时黄华作我的翻译。当时我想，刚一开始就闹僵了不好。于是我采取灵活的办法，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公布以后，很快发现问题比较大。我立即给我方各战略区部队打电报，告诉他们，在执行中要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我一连发了几个电报给部队。后来中央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有批评。六号命令发布以后，中央领导又来电报，给予了表扬。那时，我们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代表一起谈判，一开始确实缺乏经验啊。"（同前，第348—349页）后来，叶剑英总结了此次经

验，要求中共各代表，一是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了就不好改变；二是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三是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敌人钻空子；四是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223) 《和字第六号命令》（1946年3月19日），《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45—46页。

(224) 徐州小组国方代表谢慕庄曾对陈毅说，现进入解放区之许多部队，如铁路不恢复很难继续维持，国党对执行政协决议有困难，今后时局仍须巩固，要价不宜太高，山东华中与陈军长关系甚大（《华东局关于我与徐州小组会谈情形报告》，1946年2月10日，《军事调处在徐州》，第39页）。

(225) 《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郑介民上蒋主席报告会商处理共军阻挠恢复交通问题经过情形电》（1946年1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2页。

(226)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1、19页。

(227) 《第十号公告》（1946年2月11日），《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32—35页。按协议解释，恢复交通包括一切交通形式，但军调部只成立铁路管理科，显见国美方只对恢复铁路交通感兴趣。当时华北十条铁路干支线全长7602公里（包括津浦与陇海路），车站830座，其中2512公里和239座车站在中共控制下，占全部里程数的33%，全部车站数的29%，而其中石德路的94%，平绥路的57%，津浦路的47%，胶济路的39%在中共控制下，对国方调动军队准备战争极其不利，因此国方特别强调恢复铁路交通的重要（《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26页）。

(228)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194页。

(229) 据中共方面统计，自2月到5月，解放区共计修复津浦、胶济、陇海、平汉、平绥五条铁路干支线共计1238公里，占中共实际控制铁路长度的近一半，但均未与国方区域铁路接轨（《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29页）。

(230) 《恢复交通应包括铁路和其他一切水陆交通》（1946年4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93页。

(231) 《郭汝瑰回忆录》，第201—202页。

(232) 据中共方面情报，国方在协议达成后，尚命令在华北各要线要

点“应即修碉堡工事，限于本年四月底完工，并在各要点屯足两月粮弹”；“各地无防奸必要之碉堡工事可由战区长官自行决定修筑或平毁，但铁路沿线之防奸碉堡工事则不可拆除”。据不完全统计，国方在华北八条主要铁路线增建碉堡5023个，工事441处，其中以津浦、平汉、同蒲三路最多，同蒲路上十里一大碉，五里一小碉，二里一哨棚，此为阎锡山接受日军经验所致，中共中原军区周围则平均每300米即有一碉堡（《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15—217页）。

(233)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1页。虽然恢复交通问题未能解决，但国共双方实际控制区之间的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中共山东省政府曾下令：“关于对国民党所占城市点线地点的物资封锁问题，前经指示，原则上一律撤销。按目前形势变化，已无封锁必要，因此决定凡粮食、棉花、煤炭、油类等均一律准许输出。”（《山东省政府关于撤销对蒋占区物资封锁的紧急命令》，1946年2月10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到5月，国方区域与共方区域间开放物资进出口24处，其中山东9处，河北8处，山西6处，江苏1处，共方向国方输出粮食29033吨，食盐380吨，煤炭14603吨，其中以山东为最多，对缓解国方区域粮食供应紧张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33页）。

(234)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1页。

(235) 《华东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2月。

(236)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85、328页。

(237)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这种争吵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力争对己方有利，有时也不无幽默之处，令人忍俊不禁。比如有一次，罗瑞卿在会中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蔡文治立即声称此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国代表不明所以，蔡向其解释：中国文字的偏旁有特定含义，“狡”字用的是反犬旁，就是狗的意思，因此罗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翻译也不知该怎么翻，吭哧了半天，美国代表总算搞明白了，只能说：你们中国字实在是神奇莫测。他自以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对蔡文治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蔡不同意，会议只能休会（同前）。

(238)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74-75．

(239) 《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1946年5月12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15页。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在6月休战期的谈

判中再次成为各方争执的问题，详见第四章第三节。

(240)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2，p．632．

(241) Memorandum by the Military Sub-Committee，March 16，1946，*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2，pp．626-627．

(242)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1，p．49．

(243)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46页。

(24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2，pp．640-641．

(245)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出现，军调部不得不发出鸽字第3623号令，申明各小组成员不得擅离小组所在地，违者应予适当处罚，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执行部谈判总结》，第143页）。

(246) 林蔚：《关于整军的报告》，《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

(247) 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2—48页。

(248)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249) 《陆军部队现行编制装备之检讨综合研究》，军官训练团编：《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7年印本。但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国民党军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凡整编部队一律裁减三分之一，导致弱者更弱，强者变弱（作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

(250) 这种整编本身由于时间所限和计划的粗糙，很多时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如第三十八集团军电称："整编之各师军，不论其是否改编完毕，统自五月一日起军改称为整编某某师，师改称为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254页）国民党军队裁减实数尚缺乏确切统计。如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人，则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490万的数量约减少了60万人，但国民党军队缺额甚多，此减少数字完全可能是名义上的数字而非实数。现有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军官佐被裁员后的情况，但很少士兵被裁员情况的资料，或许可能说明问题。

(251)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

(252)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3页。

(253) 《第一期复员军官佐十五万人个别转业训练计划》，1946年印本。

(254) 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8页。

(255) 根据国防部统计称，复员军官佐人数总计约23万余人，其中编余16万余人，失业7万余人，最后安排是，留用约7万人，转业5.6万余人，退役10.6万余人（《国防部对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军事报告》，1947年9月9日，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七一一五，卷号129）。

(256) 《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第三次参谋会报，1946年6月18日），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97、822。

(257) 据重庆警备总司令孙元良回忆，重庆一地的登记失业军官即多达四千余人，“虽经收训若干，但没有着落的仍有三千多人。其中数百人藉口饥饿难捱，成群结队地‘游食’于市内各大小餐馆。食后，照数付给欠条。夜间，露宿于精神堡垒和关帝庙两处。他们那种悲苦无告的样子，社会各界都寄予同情。市内秩序，自然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不得不强令资遣回原籍（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高雄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这些被裁军官，多数身无长技，一旦裁减，势必流落社会，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以至“兔死狐悲，士气也无形中受到影响”（《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页）。国民党在整编时将编余军官组成军官总队，原意是不使其流离失所，但却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场所，发泄他们的不满与怨气。以至当时舆论将“军官总”与“国大代”、“立法委”、“新闻记”、“妇女代”并列为社会“五害”。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五百余人，于中山陵谒陵时，因感生活无着，“多掩面痛泣”，并表示如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费，将续向行政院请愿。史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称为“近年来空前的现实大讽刺”（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258) 《郭汝瑰回忆录》，第237页。

(259)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7日。

(260)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页。实际上不仅是陈诚

系，整个中央系军队裁减都极其有限，被裁者主要是非作战人员或原已列入编余的人员。

(261) 《国防部政绩报告》，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97。

(262) 徐世江：《国民党政府军事整编改制的内幕》，《武汉文史资料》第32辑，第131页。

(263) 1946年3月9日，魏德迈宣布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成立，前美驻华作战司令部司令麦克鲁任团长。“该团人员不超过七百五十人。该团任务乃助华训练军队，纯系顾问性质，而非受雇性质”（《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8册，第770页）。

(264) 国防部史政局编：《国防部改组纪要》，1947年印本，第6页。

(265) 《中国战区美军总部致军政部备忘录》（1946年4月19日），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88。

(266) 《国防部改组纪要》，第12页。起草委员会事先拟订改组计划时，专门制定了《总统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职权划分办法》，将参谋总长定位为“负全部军事指挥之实际责任”，而将国防部长定位为“负有国家政策与军事组织互相联系协调之任务”，这也是为了应付未来可能成立的多党政府，将军事权力置于国民党而非联合政府控制之下。林蔚在改制会议上曾说：“关于军政、军令范围问题，我们也慎重考虑过，如果军政职权过于扩大，今后有关重大军事决策，势必先经行政院，而将来行政院改组，可能扩大组织范围容纳各党派各方面人士参加组阁，那么决策不仅缓不应急，且有泄密之危险！因之，为了党国大计，军事还要第一，不能不将军政职权缩小些，军令范围扩大些，那么有关军事决策，就可由国民政府主席直接裁决，再不经过行政院了。”（徐世江：《国民党政府军事整编改制的内幕》，《武汉文史资料》第32辑，第138—139页）

(267) 《国防部改组纪要》，第23页。

(268) 《郭汝瑰回忆录》，第226页。

(269)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6日）、《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6、93—94页。据郑维山回忆，中共在2月曾有一个关于整编的指示，要求“为将来国民党内反动派一旦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能有效地组织自卫起见，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优秀军政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去请求政府加委，以便在一旦受到袭击

时，他们能自由行动”（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山东报告共有部队29万人，拟保存15万精锐武装，其余逐步复员；华中报告第一期复员5万人，区乡脱离生产部队全部复员（《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47页）。晋冀鲁豫则未见计划。但实际因情况变化均未见执行。

(270) 《中央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194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2—144页。

(271) 中共复员工作也有各区所发复员费多少不一、敷衍应付、“致伤情绪”的情况出现，不过中共部队的正规化程度不高，官兵本无固定薪饷，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272) 《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报告》（1946年6月19日），《贺龙军事文选》，第233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15页。郑维山认为：“第一期就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还要精简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又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同前，第19页）

(27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9页。据郑维山回忆：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整军会议要点的通告，“关于复员的要求已经由第一期的三分之一改为依本身具体情况作适当复员。凡在此之前尚未着手复员的，自然不必按照三分之一的要求执行了”（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19页）。

(274) 《关于整编复员问题摘报》，军事图书馆藏档抄件。

(275) 《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第27—33页。

(276) 北京军区《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编写组编：《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附件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军区实力统计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77)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20页。

(278) 《聂荣臻传》，第401页。

(279) 《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1947年9月30日），聂荣臻传记编写组编：《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59页。

(280) 《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6月14日。因为对裁减不满和前途的无望，当时在被裁人员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作者访问郑庭笈记录，1991年9月10日）。陈毅在对中共作战做总结时认为，国民党政府军的整编，好处是充实战斗力，大力重新配备，缺点是，

所有军官降级使用，情绪不满；编余军官失业，影响在职者不安心；指挥不方便，兵力较前单薄，又不好形成重点，特别是旅更不能形成重点；排斥异己，战斗力大为削弱。因此，“蒋军整编害多利少”（陈毅：《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中央档案馆卷89，第1号）。

(281) 整11师11旅旅长杨伯涛认为，二团制“在战术上部署极为困难。如我旅只辖两个团，等于两根木联在一起，不能直立起来，必须要三根木才能稳固直立，所谓‘鼎足之势，固若金汤’”（《杨伯涛回忆录》，第124页）。

(282) 蒋介石：《机密（甲）10080号手令》（1946年），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3页。

(283) 《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21—22页。

(284)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9页。

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第一节　战后接收及对日伪的处理

一　接收与复员

抗战胜利如此迅速地来到，多少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对于战后复员的设计与安排，国民党还缺乏充分的准备。8月12日，得知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后，唐纵才将侍从室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给蒋介石，对于接收与复员，这个报告建议："从速发表上海、南京、武汉、平、津市长人选，并令各沦陷区省主席、市长从速前往抚辑流亡，恢复秩序"；"饬复员委员会于一周内提出计划纲领并即核定实施，以免临时仓促陷于无计划无组织无秩序之行动。此事最好责成一大员负责主持统一步骤。"[(1)] 关于第一点建议，8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马超俊、钱大钧、熊斌、张廷谔为京、沪、平、津四市市长[(2)]，紧接着又派定了收复区苏、浙、赣、鄂、湘、闽、粤、桂、鲁九省的行政长官。但是对于统一接收步骤问题，并未引起当局的足够注意。

接收之初，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9月5日，在陆军总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总司令何应钦兼，副主任委员为社会部长谷正纲和陆总参谋长萧毅肃，秘书长李惟果，任务是搜集研究接收资料，拟办接收计划与命令，联系协调接收工作。但该会不过是"幕僚性质之机构"，并不实际主管接收工作[(3)]。陆总也不可能具体处理军事接收以

外的各项接收事务，实际接收是由各战区成立的、以战区接收机关为主、由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各机关派出的接收委员或特派员具体主持接收[(4)]。这就难免造成接收中各自为政、各不相属的混乱状况。随陆总参加接收的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告以："军事接收以团体为对手，正面侧面相机配合，并运用其原有组织逐步接收，除有少数日军部队有不法行动，大致成绩尚佳。但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原因为，陆总与行政院配合不够，办法先后不同，职权亦有变更；行政院接收人员对敌伪政治经济毫无认识，不知从何着手；经济接收工作原极微妙难办[(5)]。

接收开始后，陆总很快便觉得没有统一接收机关带来的问题，9月11日，何应钦电请成立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但由于行政院迟迟未派定负责人员，此事仍未能进入实际运作。直到9月下旬，宋子文自国外回国，由行政院系统统一全国接收事宜的工作才提上日程。宋子文首先从上海开始，设立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10月12日），统一接收工作。接着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办理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事宜并协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接收事宜"，"全国性事业系指经济（包括工矿、商业、农林、粮食、水利等）、交通、金融事业，均由本会统筹接收，并移交有关各部会接管之"[(6)]。此举使最初接收的混乱状况有所改观，但"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更，致敌伪事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丧失人心，莫此为甚"[(7)]。

11月23日，行政院颁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收复区敌伪产业接收处理以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中心机关，在重要

区域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办理敌产接收处理事宜；处理局分别委托各有关机关接收敌伪产业；处理敌伪产业的原则是，原属本国盟国人民、被日方强迫接收者发还原主，原属华人后与日伪合办者收归中央政府，产权原为日侨所有或为日伪收买者收归中央政府；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处理原则是，与资源委员会所办事业性质相同者交该会核办，纱厂及其必需附属工厂交纺织业管理委员会接办，面粉厂交粮食部接办，规模较小或不在上述范围内者以公平价格标售；已接收厂矿由经济部督导尽快复工；收复区原有接收及处理敌伪产业机关一律撤销移交处理局[(8)]。在此前后，成立了上海区（后改为苏浙皖区，局长刘攻芸）、河北平津区（局长孙越琦）、山东青岛区（局长程义法）和两广区（局长林继庸）敌伪产业处理局，以及武汉和河南区敌产处理办公处。湖南、江西两省接收委托省政府处理，东北和台湾则设立接收委员会或处理委员会[(9)]。敌伪产业处理局的成立，使接收有了相对统一的机构，并发布了有关规章制度，有助于改变接收中的混乱局面，但因为它们成立得较晚，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账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以致蒋介石在12月还电告宋子文，斥责接收人员“既不互相联系，又不与党政军主管人员通力合作，更有自以为中央所特派，不受当地行营主任指挥者，以致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要其“针对错误，妥拟方策，以图补救”[(10)]。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撤销，由中央信托局接办敌伪产业处理善后事宜。

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因为法币币值变动剧烈，以法币计算其价值因时而变，很难得出确切数字，而以美元计算，在换算时亦不无困难。一般而言，以美元直接计价的数字偏低。如赔偿委员会1946年11月第一次估计是38，992万美元，1947年7月第二次估计为33，496万美元，英国估计为4亿美元，美国顾问估计为3.5亿美元[(11)]。以法币价值折算为美元则偏高。如据1947年3

月的统计，全国接收总数（不包括东北和台湾）为法币95，897亿元，其中已处理6252亿元，转账12，388亿元，未处理76，250亿元（三者相加与总数不一，原文如此——作者注），按当时法币官价12000元兑1美元折算，则为79，914万美元；今人有统计全国接收总数（包括东北与台湾）合战前法币230，155万元，如按当时法币兑美元1:0.295的比例，则合67，896万美元[12]。

以接收产业论，工矿企业为重点。至1946年2月止，苏浙皖区，接收厂矿562单位，其中以上海为最多，又以纺织业为最重要，计接收上海棉纺织厂27家（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毛纺织厂9家，其他纺织业厂71家，金属制造厂19家，机器厂97家，电器厂21家，卷烟厂13家，包括永利公司、首都电厂等大企业；冀察热绥区，接收厂矿58单位，以化工为最多，包括北平石景山钢铁厂、天津永利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北平门头沟煤矿、河北开滦矿务局、华北电业股份总公司、北平石景山电厂、唐山电厂等大企业，以及天津的纺织厂等；鲁豫晋区，接收厂矿74单位，其中青岛纺织工业拥有纱锭38万枚，织机7000台，三省煤炭业亦具有重要地位；湘鄂赣区，接收厂矿90单位，但规模均较小，较为重要者是湖北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粤桂闽区，接收厂矿34单位，以化工厂为最多[13]。

经济部工矿电商事业接收处理概况表（迄1947年9月底）[14]

区　　域	东北	冀热察绥	鲁豫晋	苏浙皖	湘鄂赣	粤桂闽	台湾	共计
接收事业单位总数	160	656	189	873	181	258	915	3232
商社仓库事务所总数	9	275	48	246	12	154		744
工矿厂总数	151	381	141	627	169	104	915	2488
移交资委会及其他机关								
之工矿厂数		86	30	175	75	8	313	687
发还原主之工矿厂数		5	15	162	30	15	1	228
特派员主持移交发还								

（续）

区　　域	东北	冀热察绥	鲁豫晋	苏浙皖	湘鄂赣	粤桂闽	台湾	共计
标售后复工之工矿厂数	11	115	34	238	41	51	377	867
标售之工矿厂数		21	26	94	13			154
自营工矿厂数		60	15	72	2	37		186
尚未处理之工矿厂数	140	182	55	162	49	40	311	939

经历了后方八年艰苦生活的国民党各级官僚，骤一到达收复区，犹如闸门开口，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各谋私利，徇私舞弊，滥用权力，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当时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由于这种事情很难有完整的档案记载，因此确切的贪污数字仍有待研究。据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汉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的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八千五百多幢敌伪房产中，就被占据了五千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二千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己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乘混乱之机，援引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盗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盗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堂而皇之地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的无清册物资），移交物资再经层层转手，另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15)]。

除了上述这些虽然规模很大，但至少名义上还是非法的贪污外，还有一类通过标卖方式进行的合法贪污。接收产业经层层截留，最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的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对这些产业，政府以平卖、委托代售、标卖、拍卖、价让等方式出售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上海区接收478家工厂，标售或由各机关承购者有226家，宋子文坚持将敌伪物资全部交由处理局，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这批巨额财产的控制权转移到行政院，以利其施政方针的实行）。各敌伪产业处理局下有评价委员会，负责敌伪产业标售时的估价、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工作。虽然有规定“变卖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包括逆产）所得价款应悉数解缴国库不得移作别用”[(16)]，但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因此给了接收官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上下其手，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

标售日人房屋二千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汉口江汉关标售物资13批，得33亿元，但标售最高价格只有市场批发价的60%，最低不过20%，中标者的无形收入当在15亿元以上。有人估计全国标售敌伪物资总价在法币5万亿元左右，如以损失一半计算，则有2.5万亿元落入私人手中[17]。

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的一项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9月9日，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政府机关暨国营事业，以及一切税款之收支，自我政府所派人员接收后，即应完全使用法币，不得再用伪钞，京沪区各银行，自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起，凡一切往来交易，应一律使用法币。"[18]及至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收兑期为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11月22日，又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联银券的兑换率定为1:5（收兑期为次年1月1日至4月30日）。这一兑换比例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为如以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为重庆的约五十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三十五倍，当时黑市兑换价为1:80，因此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最高也不能超过1:100。据统计，伪中储券回收总数为41，677亿元，伪联银券回收总数为1167亿元[19]，如按上述兑换比例，只要四百余亿元法币即可全部收回，政府的公开说辞是以少量法币换回伪币，以免刺激通货膨胀，然而实行的结果，恰恰是后方法币大量流入收复区，刺激了收复区物价的上涨，大量资金东流也打击了后方工业，而且接收官员凭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被时人形象地描述为，"陪都来沪接收人员，均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感"[20]。如果说，官员腐败尚是不合法的私人行为的话，法币兑换率的规定则几近于国家掠夺，是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剥夺收复区的财富。这一私心自用的政策，引起收复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国民党官员以后也不能不承认这一重大失误。陈立夫认为，这样"把有钱的人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

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21]。

普遍的接收舞弊不仅腐蚀了国民党的干部队伍，而且使国民党在接收中失尽了人心。《时事新报》在社评中说：“老百姓的希望，说起来实在是极其简单而起码的。他们恨日本人，恨汉奸，他们希望中央来了之后能够把日寇汉奸所作所为的坏事一律革掉，而切切实实地替老百姓做一点好事。”社评问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大公报》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呼吁“我们现在不但去收复失土，而且去抚慰受创的人心。收复失土，千万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足先抢”[22]。

接收中的舞弊行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之后，不能不使当局加以注意。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一周内连续发布《布告不得擅自封占汉奸及日侨产业》、《布告在京各机关人员不合法处置宣告无效》等通令，并称一经查获违法行为，即予严惩不贷，企图抑制各级接收人员擅作主张、影响形象的举动[23]。蒋介石陆续接到有关接收舞弊的报告后，9月25日，分电何应钦和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训以对接收人员“应即严加督饬，务须恪守纪律，以维令誉。如有不法行为，准予从严究办，毋得宽假”[24]。10月24日，陈诚和张群在官邸会报中报告“接收人员花天酒地，以及贪污受贿等种种不法情形”，使蒋介石“闻而怒甚”[25]。他即召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赴渝，令其彻查。同时电致京、沪、平、津四市军政长官称：“据确报，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官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而以沪、平为尤甚，不知就地文武主官，所为何事，究有闻见否？……如各地文武主管再不及时纠正，实无以自容，当视为我革命军人之敌人，必杀无赦，希于电到之日，立刻分别饬属严禁嫖赌，所有各种办

事处之类，大小机关名称，一律取消封闭，凡有占住民房招摇勒索情事，须由市政当局负责查明，一面取缔，一面直报本委员长，不得徇情隐匿，无论文武公教人员及士兵长警，一律不得犯禁，并责成各级官长连带负责，倘再有发现，而未经其主官检举者，其主官与所属同坐，决不宽贷，特此严令遵行。”[26] 12月30日，陆军总部又颁布了《收复区隐匿日伪财产物资及军用品检举奖励规则》，规定凡在指定机关和人员以外自相授受敌伪物资者以隐匿论处；隐匿者凡未向指定接收机关报告者，一经检举查实，物品由指定机关接收，隐匿者除依法惩治外，课以隐匿物品价值10%之罚金；以该项物品价值10%之奖金奖励举报人[27]。行政院1946年2月27日下发的《收复区隐匿敌伪财产物资及军用品检举奖惩规则》重申了这些规定。且不说这些规定能否真正实行[28]，即就其发布的时间而言，接收中大规模舞弊行为的高潮此时已过，因此，这个规则的颁布，除了显示国民党惩治舞弊的决心外，不过是事过境迁的表面文章而已。

为了缓和舆论对接收中大规模贪污舞弊情况的批评，1946年6月，由监察院牵头，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参加，组织接收清查团，赴苏浙皖、湘鄂赣、粤桂、冀察热绥、鲁豫、闽台、东北等地清查接收情况。然而清查团清查时间，已是接收一年之后，可以使接收人员中的贪污者有充分的时间在原始表册上做手脚[29]，兼之清查团所管地区广大，人员不多，时间紧迫，在清查团的清查过程中，各地又有各地的借口，东北借口战事紧张，台湾借口光复不久，上海借口国际观瞻，两广借口地方情形复杂，使清查工作困难重重，与社会和舆论的期待相距甚远。但各清查团都承认接收中贪污舞弊行为的存在，在各方最为关注的上海，清查团团长张知本公开谈及接收中的弊端为：1．政府接收处理政策失当；2．接收机构众多，组织散漫，致骚扰凌乱；3．处理工作迟缓，接收物资或隐匿盗卖，或腐烂，未能充分利用。致战后工厂倒闭，生产衰落，物价腾贵，人民生活不堪其苦[30]。赴北平清查团认为，“接收工作之贪污问题，由于人事者半，由于政策者半”；“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

指挥接收之大员。关于各部分之派员来平，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31]。实际上，虽然清查团出巡浩浩荡荡，真正因涉嫌贪污被处理的官员却不过寥寥数例[32]。

在接收的同时，国民政府各机关、经济事业单位、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战时迁往后方的机关团体也开始了复员回原地的繁复工作。中央设计局拟订的《复员计划纲要》草案于1944年7月31日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该计划分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工矿商业、教育文化、交通、农业、社会、粮食、司法、侨务、水利、卫生、土地十六个部门，每部门又分工作要点和计划项目两项，“前者，在提示每部门主要复员业务之原则，便于各主管机关据以拟订其复员工作计划；后者，在提示有单独计划必要之特别重要事项，便于各主管机关据以拟订其复员事别计划”[33]。根据这个纲要，在各部门提出自己复员计划的基础上，再由中央设计局拟订复员总计划，然总计划尚未编出，日本已经投降，复员工作只能在没有周密计划准备的情况下进行。

8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1．一般复员计划，由各机关分别拟订；2．收复区紧急措施办法，由中央党部、行政院和军委会分别拟订；3．各单位派出人员赴南京接收；4．还都分三期进行[34]。随后，行政院匆匆拟出《收复区各项紧急措施办法》，要点如下：1．地方治安，迅速恢复地方行政、警察机构；2．财政金融，分区设置财政金融特派员，供应钞券，恢复银行系统，举办紧急贷款，处理敌伪金融机构，接收敌伪财产；3．交通，接管敌伪陆海空交通线路，并照常运营；4．邮电通信，接管敌伪邮电通信机构，并照常运营；5．经济工矿，接收后迅速恢复业务，整理就绪后，根据处理原则，或发还原主，或由政府经营；6．军政，接收军用物资，处理后勤补给业务，担任俘虏管理；7．教育，接收教育文化机关，督饬整理恢复工作，各级学校照常上课；8．农林，接收农林渔

牧机构；9．社会，安定沪、京、津、汉、穗五大都市工人，进行社会救济；10．粮食，供应收复地区军公民食；11．司法行政，恢复收复区司法行政机关；12．蒙藏，派员前往宣示中央德意，施放急赈；13．水利，接管水利机构；14．卫生，接收卫生医疗机构；15．善后救济，接运国外物资，设立输送难民机构；16．广播，接收广播事业[35]。复员还都工作进行之中，人人归心似箭，但因交通工具的制约和指挥管理的混乱，复员工作进行困难。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单位在重庆和原迁出地均有工作班子，反而加重了经济的负担并降低了工作效率。12月中旬，行政院第一批复员还都人员陆续抵达南京，行政院例会开始在南京举行。

1946年2月21日，行政院发出《中央党政机关还都办法》，对各部会还都人员、运输及经费预算作出了具体规定，行政机关的复员工作加速进行。4月25日，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各部于2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4月30日，国民政府发出还都令，内称："兹者国土重光，金瓯无缺，抗战之任虽繁，建国之责加重，政府爰定于本年五月五日凯旋南京，以慰众望。"该令同时称陪都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当永光史册，奕叶不灭"[36]。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在南京隆重举行，因战争而流迁异地八年半的国民政府又回到了其发家之地。

二　对汉奸的处理

关于战后对汉奸的处理，侍从室最初拟订的意见提出：1．凡附逆之汉奸均应受特别审判，褫夺公权，其受有任务参加秘密工作者经审查确实准予另案办理；2．敌产逆产由政府组织特种委员会调查处理；3．伪军之处理方针当视其对国军协助与贡献之成绩，本宽大之旨分别处理之。结果奉批"如拟，但不可发表"。因为"为受降便利起见，未予发表。其后，共党倡乱，破坏道路，煽惑伪军，如是政府处理伪军之方针动摇，所有伪军均予收编，利用暂时维持地方秩序。伪

军察知政府之处境，恬不知耻，向政府要挟需索”。唐纵以为“此事关系重大，苟我不予纠正，中央将蒙莫大之羞”[37]。

国民党接收人员到达接收地区之后，因为需要利用原有敌伪政权机构和人员为其服务，因此对汉奸并无动作，结果造成大汉奸逍遥法外，中小汉奸摇身一变而为“地下工作者”，一些无辜者倒成了敲诈勒索的对象。据最早进入南京的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回忆，“不断来见的伪官群丑，均口口声声说是奉有陈立夫或戴雨农（戴笠）两人的使命，负有中统、军统的特别任务为开场白，自命地下英雄，功在国家，口讲指画，神气活现”；“光复后的陷区，所谓地下工作人员，真像雨后春笋，一个连接一个从地下冒出来”。此种情况的出现，使冷欣也感到太不成话，他曾与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联名致电戴笠称，“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妄缴枪械，绑架勒索，无所不为！以致京沪一带城市，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舆论沸腾，闾里骚然！若不迅予遏制，后患殊堪忧虑”[38]。

陆军总部到南京后，先发出电令，对于南京伪政权简任职以上之官吏，“应查明其行踪”，“饬觅具妥保，随传随到，听候依法处理”；对于各地之汉奸，“应先行调查，予以监视，听候中央命令处理”[39]。但对于汉奸问题，蒋介石自有其考虑，他在给何应钦的指示中，要求“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长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同时他命令：“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作者注）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纷歧。”[40] 军统局随后成立肃奸委员会为处理汉奸最高机关，并在全国设立了二十五处肃奸分会。但在审判汉奸问题上，国民党的动作迟缓，大大不利于其政治形象。直到接收告一段落，并且各方对汉奸问题有了强烈反应之后，国民党才开始逮捕和审判汉奸的法律程序。

最早被捕的大汉奸是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9月9日在广州被捕。9月26日，何应钦下令各战区对伪政权武官少将以上、文官荐任以上之正副主官，目前尚未自新自效者，以及职位虽低但罪行重大者，一律拘捕，听候中央处置。自此，南京汪伪政权汉奸梅思平、李圣五、郑大章、项致庄、温宗尧、梁鸿志等陆续落网。30日，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一行五人由戴笠陪同飞赴重庆，听候处置。10月3日，陈公博等人自日本被押解至南京。12月5日至8日，军统局在北平和天津统一行动，缉捕了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殷汝耕、周作人等华北大汉奸（次年5月，其中一部分人被解至南京受审）。据统计，经军统逮捕的汉奸总数为4692名[41]。伪满汉奸和战犯，以溥仪为首，陆续被苏军逮捕后押往苏联关押[42]。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下列汉奸应厉行检举：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机关首长，特务，文武公务员侵害他人经人告发者，曾任军政特务机关工作者，专科以上学校校长，金融实业机关首长，新闻出版宣传文化社会组织团体重要工作者；上列汉奸曾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者，得减轻其刑；汉奸财产应予没收或发还被害人；汉奸案除被告任伪军职应受军事审判者外，均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之规定，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之；汉奸于8月10日以后自首者，不适用减刑规定；各地军政机关对于审理汉奸案件应切实协助。12月6日，又公布了重行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规定有图谋反抗本国等十四项罪名的汉奸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预备或阴谋犯此等罪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对汉奸藏匿不报包庇纵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汉奸案件应迅速审判并公开之；曾在伪组织担任职务未依本条例判罪者，仍应在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43]。

经过一番法律程序，1946年3月，对大汉奸的审判开始进行。18日，汪伪头号汉奸陈公博以叛国罪被起诉，起诉书列举其十大罪状为：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搜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

实施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场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而陈公博对这十条罪状矢口否认，强调他是为了“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并表白自己“防共”之功。与其说这种论调是汉奸的无耻，不如说是求生的本能。然而，众目睽睽之下，罪状铁证如山，赖是赖不掉的，何况汉奸声名已臭，对于当政者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自然难逃一死。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中驳斥了陈公博为自己的辩护，指其“一再破坏抗战国策，助长日寇侵略，将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实属昧于大义，甘作罪魁，于法无可钤全，自应处以极刑，以昭炯戒”。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44]。此判决足以为一切背叛民族利益、通敌谋叛汉奸的警戒。

5月21日，汪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被枪决，这是大汉奸伏法的第一人。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被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重要汉奸还有：伪参谋总长胡毓坤（1946年6月24日，执行时间，下同），伪海军部长凌霄（6月24日），伪湖北省长杨揆一（6月24日），伪外交部长褚民谊（8月23日），伪内政部长梅思平（9月14日），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10月8日），伪立法院长梁鸿志（11月9日），伪华北治安督办齐燮元（12月18日），伪浙江省长傅式说（1947年6月19日），伪陆军部长叶蓬（9月18日），伪冀东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12月1日），伪安国军司令、国际女谍金璧辉（即川岛芳子，1948年3月25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9月10日）。据不完全统计，被判死刑并执行的曾任伪政权部长、省长以上职的特任级汉奸不到二十人[45]。其他大汉奸被判刑者有：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伪司法院长温宗尧、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伪安徽省长罗君强、伪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袁履登均为无期徒刑，伪华北教育督办周作人十四年徒刑。此外，1945年8月17日，汪伪考试院院长陈群自杀。12月25日，原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被捕后病死。总体而言，被判刑的汉奸中，政务

官员多于军事将领，北洋和汪派余党多于原国民党中央官员，手握军权的伪军头目大多逃脱了审判。

汉奸审判虽在进行，但大汉奸周佛海、丁默邨等人一直在戴笠的庇护下，安居重庆，舆论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周“和日本勾结最深，卖国是最彻底的。在汪记傀儡班中，周逆罪实在陈逆公博之上”；而丁所主持“七十六号”之特务机关，“不知多少在地下工作的忠贞爱国分子，死在此人的手里”；“若巨奸不早伏法，多年锻炼培植起来的民族气节，恐不免有所耗伤”[46]。在各界要求下，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1946年9月25日，周、丁等人由重庆解往南京。10月7日，周佛海在南京被起诉[47]。与陈公博不同的是，周佛海与蒋介石关系较深，投敌后又较早与军统拉上关系，在抗战胜利初期为国民党顺利接收京沪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还在审判期内，即不断有各方面党政要员为其说项，甚至陆军总司令部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亦专函说明周之“功绩”。11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以与陈公博相同之罪名判周佛海死刑，并驳其“纵树微功，难掩巨过；偶施小惠，莫蔽大辜。权衡轻重，量刑未便从宽，自应处以极刑，并褫夺公权终身，以伸国法尊严而正人民视听”。周被判决后，各方说项者纷至沓来，然法院方面不改初衷，1947年1月20日，最高法院复判周“实属法无可恕。虽事后稍树微功，仍不足以蔽其过，乃处以极刑，于法并无不合”[48]。此判决作出后，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亲自致函蒋介石，称周“在京沪杭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为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尽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最终批示，“该犯似可免于一死”[49]。2月26日，国民政府发令，以周佛海“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50]。周佛海总算逃脱了死刑判决，1948年2月28日，病死南京狱中。丁默邨则没有周佛海这么“幸运”。1947年2月8日，丁被判处死刑。5月1日，最高法院复判，认其自首在被通缉之后，协助受降则在胜利之后，“虽不无微功，究不能掩其罪恶之万

一，因此不予轻减”[51]。虽然各方为其说项者亦颇具地位与声势，但如果继周佛海后对其再予减刑，则当局承担的舆论压力必更大，因此丁之减刑未成事实，7月5日被执行死刑。

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的截止日期，据司法行政部统计，截至1947年10月，各地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45，679件，起诉30，185人，不起诉20，055人，其他13，323人。审判办结25，155案内，科刑的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无罪5822人，其他10，654人[52]。

关于伪军的问题，国民党的处理更为宽大。何应钦最初指示：如各地投诚伪军已由军委会委派新职者，暂由各战区指挥；各地伪军曾由我策反人员接洽投诚，或现在接洽尚未经军委会委派者，由各战区先行准其投诚，以待日后处理编遣；凡各地伪军抗不投诚者，由各战区分别切实剿办[53]。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需要利用伪军控制局势，而伪军出于未来出路考虑也愿意投靠国民党，因此伪军多为国民党所用[54]。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军陆续运至收复区，而利用伪军易遭社会的反对，因此国民党对伪军的政策转向以编遣为主。但各地对伪军的处理因情况不同而未尽一致，大体在北方者，因其对协助国民党稳定统治有作用而多以原编制保留；在南方者，因为国民党的统治较为稳固，伪军部队编制被遣散，而以士兵拨补各部队。如在北方的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第六方面军孙殿英部、徐州绥署郝鹏举部均被大体按原编制保留下来，投入反共战争第一线，而庞炳勋的伪军被拨给各部队。在南方的伪第一方面军任援道部、蚌埠绥署林柏生部、杭州绥署项致庄部、武汉绥署叶蓬部、九江绥署黄自强部、广州绥署陈春圃部，则被解散，将士兵拨补各部队。据林蔚向政协的报告，对伪军以全部编遣为基本原则，至于官佐则按甘心附逆、投机两可、被迫胁从、奉派策反四种方式处理。至1945年底，全国伪军（除东北外）五十一个单位

60万人，长江以南的20万人已编遣完毕，长江以北尚有20万人未能编遣，将于1946年上半年完成[55]。

三　对日处理

关于战后对日本的处理，蒋介石采取了宽容态度。8月15日，蒋介石在为日本投降发表的广播演讲中提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56] 这就是被称之为"以德报怨"的战后中国对日政策，在战后对日处理问题上，国民政府基本实行了这个政策。应该说，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残暴政策相比，作为一个战胜国的中国战后对日政策，确实相当宽容与宽厚。蒋介石之所以这样作，表面上的理由虽然冠冕堂皇，显示胜利者的"与人为善"和"仁义之师"，实际的目的一则是企图尽可能平稳地处理日本投降问题，以免干扰他对战后中国其他更紧迫问题尤其是国共关系问题的处理；二则是希望在接收问题上得到日本的合作，成为减少接收阻力的策略和手段，不使其因别种原因而投向中共方面；三则蒋已体会到美国对日态度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与对德态度不同，因而在此问题上与他最希望得到支持的美国保持一致。

为了体现"以德报怨"政策，当时对于在华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徒手官兵，并保持了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集中于各地设立的集中营内，由各战区设立的战俘管理处集中监视、教育、管理，等待遣返。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

善后总联络部，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宜”[57]。各战区的日军司令部相应改称该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使日军得以基本以原编制生活在集中营内。在这些集中营里，除了少数执勤人员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非经允许不得外出，如有逃亡者应予追捕法办；接受中方的教育，清算军国主义毒害，灌输民主和平意识，并从事一定的体力劳动，主要是修复交通通讯设施和战时被毁工程[58]。对于中国境内的日本侨民，陆军总司令部先后发布了《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日本在中国私人产业暂行处理办法》、《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规定：“凡散处于中国境内（东三省在外）之各地日侨，应均由各该地区中国陆军受降主官指定区域集中，交由当地省市政府管理”；日侨产业以公司会社形式经营者、战争中以强力占有者、中国法律所禁止者应由政府接收；个人小本产业登记封存；个人财产，除生活必需品外，每人准带法币5000元，其余款项存入中国政府银行作为将来赔款之一部；对于各事业部门中事业不能中断技能无人接替者、技术为我国缺乏者、需征用为业务上之清理者，可以征用日籍员工，发给生活费[59]。

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第一次遣返日俘日侨会议，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决定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北部）日俘日侨的遣返由中国政府负责，日俘日侨的运输自内地至集中地由中方承担，自集中地至日本由美国第七舰队和日本航运管理处提供运输船只，运输规模为每月15万人[60]。1946年1月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遣返会议。2月6日，在东京召开了中国战区遣送会议，确认了中美双方先前的安排。军调部成立后，在遣返华北日俘日侨方面被赋予了特别的使命，它们可以根据情况，安排运输及登船次序，保证被遣返者沿途的物品供应[61]。

日本军队和侨民遣返回国的工作自1945年11月起运，至1946年4月20日，在华日本官兵共124万人，已遣返78万人；侨民78万人，已遣返66万人。官兵和侨民还余58万人等待遣返[62]。据中国战区美军

总部的统计，越南北部的遣返于4月21日完成，台湾于4月23日完成，华南于4月25日完成，华中于7月11日完成，华北于8月11日完成。东北的遣返由于苏联因素，在由谁负责问题上经过一段不明确时期后，直到4月下旬才明确，除旅大地区外，仍由中国政府负责遣返，此后开始由美国负责自葫芦岛起运。到1946年底大规模遣返完成时，自中国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达到近300万人，具体统计如下[63]：

地区	军人	平民	总计
华北华中华南	1，036，922	462，475	1，499，397
台湾	154，634	318，682	473，316
东北	41，688	969，149	1，010，837
总计	1，233，244	1，750，306	2，983，550

对于日本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罪犯，1945年11月6日，由军政部、军令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机关合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日本战犯处理工作，职权为决定审判战犯政策，调查、逮捕及引渡战犯，监督军事法庭的审判。后由国防部主持，部长兼主任委员（1947年1月，改由次长秦德纯任主任委员）。次年2月，军事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战争罪犯审判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战争罪犯处理办法》，对日本战犯的检举、逮捕、审判、行刑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同盟国在东京组织了对日本犯有重大战争罪行的甲级战犯的审判，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只限于在中国战场犯下罪行的乙、丙级战犯，而且由于大量日本战俘遣返工作需要进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迟至遣返基本完成后，1946年10月才开始进行（此前各地已有部分审判在进行，但级别较低）。

因为蒋介石已有对日“以德报怨”政策，因此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亦较为宽大。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举行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决定“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战犯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并迅速结束战犯处理业务”。在此原则下，会议决定：1．

对日本普通战犯之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眼。已拘战犯，限于本年底审理，若无重大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业经判刑之战犯，移交日本内地执行（后因盟军总部持异议，改在上海战犯监狱服刑）；其余战犯案件审查应于1947年6月底结束；2．日本战犯案件，送经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审查通过者，应即行逮捕，其已回日本者，应与盟军总部接洽引渡之；3．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重要战犯应从严处理；4．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之战犯，其与我国有关者暂不要求引渡；5．对于此次受降，日军负责执行命令之尽职人员而有战罪者之处理，俟东京战犯审判告一段落后再行决定；6．战争嫌疑犯中无罪证者，应尽速遣送回国[(64)]。根据这个政策，对日本战犯的检举于1947年10月15日停止，当年底审判基本结束，各地军事法庭撤销，1948年7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解散，1949年4月，国防部军事法庭结束。

日本战犯的拘押和审理，由国防部（国防部成立前，为陆军总部）在全国成立十处战犯拘留所及军事法庭进行，其中最重要者是设于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6年2月15日成立），庭长石美瑜（兼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这些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各军事法庭日本战犯审理情况表（**1947**年**12**月**25**日）[(65)]

机关名称	原拘留人数	不受理	不起诉	无罪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死刑	小计	非战犯（已遣返）	未结案	备考
国防部	63		56	18	12	10	6	102		144	13 名未列入
东北行辕	329	13	197	72	23	4	9	318	11		
武汉行辕	232	17	75	91	18	5	5	211		21	
广州行辕	961		101	39	37	10	38	225	694	9	33 名未列入
陆总徐州总部	81		46	3	11	3	8	71	10		
上海军事法庭	316		20	12	12	3	4	51	68		1947.6.30 撤销
第二绥区	137		40	8	5	1	9	63	74		
太原绥署	15			4	2	3	2	11		4	
保定绥署	180		57	23	20	2	28	130	10	40	
台湾警总	121		69	13	27		1	110	11		
总　　计	2435	30	661	283	167	41	110	1292	878	218	

在日本战犯审判中，最引起国人关注的，是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者、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同年8月被引渡回中国，在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在检察官的讯问中，谷寿夫矢口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说他根本未听说有屠杀的事发生，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在报纸上得知此事。然而谷寿夫的抵赖掩盖不了血的事实，在大量有力的人证物证面前，谷寿夫不得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是他又将责任推到其他部队身上，辩称“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并一再上书陈诚、白崇禧等人，要求“宽延公审”[(66)]。然而历史不容抹杀，身历亲睹南京大屠杀惨祸而得以幸存的中外人士数百人为审判提供了证词。1947年2月6日到8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对谷寿夫进行公开审判，中外人士八十余人出庭作证，庭审长桌上放有刚刚掘出的被害人头颅，无声地控诉着当年日军的暴行。3月10日，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称谷寿夫以“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67)]。谷寿夫申请复审被驳回。4月26日上午，谷寿夫在

南京被绑赴雨花台刑场，就在他当年指挥部下屠杀之地，被执行死刑。是日，南京市民万人空巷，争睹谷寿夫的最终下场。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次屠杀我同胞数百人的第六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以杀人比赛闻名的第十六师团小队长向井敏明、副官野田毅，亦于1947年11月自日本被引渡回中国受审。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三人因“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死刑。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经东京同盟国军事法庭审判，认定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1948年11月12日，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据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法官回忆，“松井石根在两年多的受审过程中一直装出一副懊丧、忏悔的可怜相。在最后一庭，宣布对他判处绞死刑时，他吓得面无人色，魂不附体，两足瘫软，不能自支，后由两名壮健宪兵用力挟持，始得迤步走出法庭”。其当年的不可一世荡然无存。12月22日，松井石根在东京被执行死刑[68]。杀人者终必覆灭，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的下场，体现了人类正义道德的胜利，终使我南京被害数十万同胞地下冤魂得以稍慰于万一。正如梅汝璈法官所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69]

据不完全统计，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还有：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前任第二十三军司令官、攻占香港纵兵屠杀的指挥者酒井隆（1946年9月13日执行），后任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广东多次大屠杀的责任者田中久一（1947年3月27日执行），第一三〇师团师团长、广东多次大屠杀的责任者近藤新八（1947年11月21日执行）；被判无期徒刑的有，前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前日本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以及若干名日军师团长。此外，前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于1946年4月1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自杀身亡，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于11月28日死于战犯医院。如果与其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相比较，日

本战犯判死刑者并不多，而且高层级者偏少，量刑也偏轻，军及军以上方面大员多未追究或判刑较轻，这与当时的整个国内外形势是分不开的[70]。

在多数日本战犯处理告一段落后，还剩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运引人关注。冈村被认为是“中国战区天字第一号战犯，就是不要审问，也可以判处极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碎骨粉身不足以偿其罪”[71]。但由于他在接收中的合作态度，国民党自始就有对其网开一面的考虑。据冈村自记，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均向蒋介石建议，因为其“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如此对将来中日关系亦属有利”。但蒋“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对他们的建议“默不作声”。由于既担心释放冈村带来的政治麻烦，又担心交付审判而无法从宽处理，因此国民党对他既不监禁亦不释放，而是令他住在南京，养尊处优，对外则称尚需其协助处理遣返未了事宜。国防部长白崇禧托人转告冈村，“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72]。迫于舆论的压力，1948年8月23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在上海开庭，对冈村宁次进行“走走形式”的审判。审判只进行了一次即以冈村患病为由休庭。1949年1月26日，法庭重新开庭，认定冈村宁次于1944年11月26日出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因此日军在中国的历次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因此，法庭判冈村“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73]。1月30日，冈村和上海战犯监狱全部在押战犯被送往日本[74]。

第二节　边疆问题

一　台湾的光复

台湾自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而割让给日本后，离开祖国怀抱五十年，由于抗战的胜利而重回祖国大家庭，可谓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大盛事。

鉴于台湾已在日本统治下历五十年之久，情况特殊，还在1944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设计局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任主任委员，台籍知名人士黄朝琴、连震东、游弥坚等任委员，负责根据台湾的具体情况，拟定战后台湾接收计划。1945年3月，该会拟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计划提出，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予较大之权力，此即为日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的来源。该计划并对台湾接收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等各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原则规定[75]。应该说，国民党对台湾的接收准备工作，要比对其他地区的接收准备更为充分。

日本宣布投降后，接收台湾计划进入实施阶段。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其后又任命他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行政长官得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76]。这实际上意味着，台湾省行政长官的权力要大于一般省主席，再加上陈仪还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实际上台湾的军政权力高度集中于陈仪之手。这种对台湾的特殊化政策，虽然有助于台湾的顺利接收，然而在一般台湾人民的观感上，与日本总督制度无甚差别，而且埋下了陈仪在台湾独断，引起台湾人民不满的种因。

9月14日，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先期抵台视察，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率前进指挥所到达台北。自17日开始，

国民政府第七十军和六十二军先后在台湾基隆和高雄等地登陆。25日，台湾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警总参谋长柯远芬等出席仪式，陈仪接受了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证书，然后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台湾，这块中国的神圣领土，历经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受尽了屈辱与苦难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日本投降仪式举行当天，"台北四十余万市民，庆祝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日，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77]。

陈仪甫抵台湾即表示：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对台湾的建设抱有信心，决心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一切弊政；要求台湾同胞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台湾[78]。对于经济政策，陈仪要求，"首先须注意提高人民生活的欲望与水准，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除有特殊情形者外，须以商业化为原则"。政治方面，三年内完成县市自治[79]。具体作法是公地放租，发展公营事业（分类实行资源委员会经营、国省合营、省营），实行统制贸易，维持专卖制度，继续使用台币等。鉴于大陆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陈仪有心在台湾作出成绩，使台湾成为一片"干净土"，成为"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室育种场"[80]。

陈仪认为，"要实行国父建国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计划经济"，因此"要以计划经济的方法建设新台湾"，具体作法则是在台湾实行以公营事业为主的经济体制[81]。这一体制将生产、贸易、金融、运输四位合为一体，工农商业囊括无遗，使台湾经济的90％处于长官公署的控制下。陈仪实行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当属专卖和贸易制度。专卖局"其特点在以生产销售置于政府统一机构之下"，专卖物品为樟脑、酒、烟草、火柴和度量衡器五种；贸易局"专办重要物资进出口

及其配销业务，并兼理有关行政”；专卖制度和台湾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到台湾年预算收入的66％以上，其中仅专卖一项即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为台湾省政府的最大财源[82]。对于实行专卖与统制贸易，他认为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台湾的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贸易所获的盈余，全部投到经济建设上来[83]。然而这样的制度最为台湾人民所不满，“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84]。大商人大企业家的不满，影响到当局的施政效用；而中小商贩的不满更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影响到当局的社会形象。专卖制度终于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陈仪在台湾实行的经济政策，大体维持了台湾经济的正常运转，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出现大陆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现象。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原准备在台湾发行地方流通券，并规定了具体办法，但陈仪“到台后体察实际情形，深觉发行必须由台湾银行办理，方能适应机宜，控制物价，安定人心。要之，中央银行此刻决不宜来台设行发行，致与台湾银行发生竞争，使弟无法控制，以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物价高涨，人心动摇，皆属必然。近日上海物价激涨可为殷鉴”[85]。他建议货币金融暂维现状，中央银行暂不入台，台湾货币由台湾银行继续发行，或由中央银行委托台湾银行发行，得到宋子文的首肯。陈仪公开表示，继续使用台币是因为“内地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果法币流入台湾，势将造成和内地同样的结果，为避免这种威胁起见，所以本省暂准台币继续流通，并以台湾银行续为金融机关的中心”[86]。这一措施对于避免台湾受到法币币值急剧下跌、从而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由于陈仪的调控，台币对法币的汇率一直在缓慢上升，从1946年5月的1:25涨到1947年5月的1:44，上升了76％。然而在生产没有全面恢复的情况下，台湾光复初期的诸多花费，大多只能靠发行货币解决，台币发行在接收时为16.5亿元，到1947年3月已经达到67.5亿元，增加三倍以上，从而也

导致通货膨胀。据1947年3月的数字，台北物价指数为战前的271倍，物价上涨幅度虽仍远逊于大陆，但相对于过去已经使台湾人民大为不满，尤其是台湾本为产米区，然米价居然一年之内暴涨二十倍以上，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87]。

台湾长期处于日本统治下，陈仪到任后，认为“法令与人事，如果变动过甚，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乱”，因而宣布台湾过去的法令暂时继续有效，日本在台官吏暂时留用，以稳定台湾的形势[88]。然这与中国战胜日本的大环境不甚适合，尤其是在日本人大部遣返后，陈仪对起用台湾人士参政问题仍注意不够，从而与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人士亟愿摆脱过去的殖民地地位而参政议政的热情形成反差，使他们心怀不满。其实，对于任用当地人出任公职事，陈仪不是完全没有考虑。他曾发出通令，要求在两年内完成全省荐任委任人员的审查、训练工作，其中对于县市政府科长、中学校长、工厂厂长、公司协理等岗位，将法定名额的四分之一征选本省人才，但同时需培训半年，学习三民主义、国语国文及主管法令[89]。但在实际操作中，格于种种原因，本省人出任公职的情况仍不够理想。据1946年底的统计，台湾全省行政机关、公营事业机关和公立学校共有职员54，617人，其中本省人39，711人（72.7%），外省人13，972人（25.6%），外国人934人（1.7%），但在这些人中，来自外省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占据了荐任职以上的绝大部分重要岗位[90]，而且这些官吏中不少人“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91]。陈仪自己虽自奉廉洁，但不知约束下属，一样为人民不满。

陈仪主政台湾，有自己的理想，也不乏成功之处，然其以统制和垄断为主导的施政措施，使一般台湾人民感觉与日据时期变化不大，而军政当局借此体制与民争利，以至贪赃枉法之处，更增人民反感。以陈仪严峻固执的个性，又不能正视这些已经积累下的社会矛盾，台湾形势便日渐紧张。“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天，《文汇报》记者从台北

发回报道称："假使再不设法对台湾的整个行政设施作通盘的改变检讨，这种积压在台湾民众心里深沉的恨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到那时会弄得整个局面难以收拾。"[92] 国民党中央政府，当时忙于应付大陆一系列燃眉之急的问题，对于台湾也无暇顾及，种种主客观因素，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

"二二八"事件起因于缉私行动。台湾光复后，由于经济一时尚未完全恢复，失业率增高，不少失业人员以做点小商小贩的生意维持生活。他们走街串巷的贩卖举动与省当局的专卖政策不合，屡查屡犯，已经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二二八"事件由缉私而起不是偶然的。1947年2月27日晚，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南京西路查获女私贩林江迈的货物时，与之发生冲突，引起围观民众的不满与围攻，查缉员情急之下开枪示警，击中围观市民陈文溪（次日身亡），更激起民众义愤，群起追至警察局，要求惩办凶手，因未得满意答复，次日，台北全市罢工罢市，向长官公署请愿解决，结果又在公署外发生冲突，士兵开枪，打死数人。当天，警总宣布戒严，军警与民众发生大规模冲突，死伤人数大增[93]。至此，事态由一桩孤立事件而迅速扩大，由经济而政治，由自发而有组织，终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台北事件消息很快传到台湾全省，各地均出现对当局的抗议行动，各级政权机关几近于瘫痪，台中、嘉义、高雄等地且有民众武装与驻军发生激烈战斗，酿成较大伤亡。显然，此一波及全省事件的发生，不是出于个别人所为，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行动，是台湾人民对于光复一年多以来政府施政措施不满的总爆发。

3月2日，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其后，以台北处委会为中心，各地均成立处委会。处委会组织大纲声明，"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成员由台湾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省市县参议员、人民团体和学校代表组成，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各局组，俨然有政权机关的规模[94]。这样，一方面是台北局势渐趋平静，秩序得以恢复，另一方面是全省范围内处委会的成

立，形成从上至下与官府对立的另外一套政治架构，从而孕育了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

3月5日，台北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主要内容为：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长，半数以本省人充任；2．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3．即刻实施各县市长民选；4．撤销专卖制度；5．取消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此后，这样的要求内容不断增加，至7日已扩大为四十二条，主要内容仍集中在和平解决此次事件，取消政治经济上的统制措施，实行地方自治，保证人民自由[95]。台北处理委员会在6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声明："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来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使台湾的政治明朗，早日达到目的，希望关心国家的各省同胞，踊跃参加，和我们握手，举着同样的步骤，争取这次斗争的胜利！"8日，又对全省民众发表声明，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成，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愿我全省同胞速回原位，努力工作"[96]。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难免出现一些偏激的口号或行动，台湾事件也不例外，诸如某些对外省人的过分行为和对台湾自治地位的过分要求，这在当时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实质而言，此次事件还是因为对国民党统治的无能和腐败的不满，对于台湾光复后省当局实行的高度统制政策不满而引起的。

由于新闻封锁，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大陆人民并不完全了解其真像，一般舆论都希望此事得到妥善的解决。《大公报》社评认为："台胞这次剧烈举动，也不是绝对无可疵议的。……此次激发民变，责在政府，故在基本观点上，我们寄予同情。问题只是，感情的野马，应该勒回一点。看在同胞面上，也为了不使台湾地方糜烂，最好能回复正常理智，停止冲突，谋取和平解决的途径。"[97] 在大陆的台胞亦要求废除行政长官制度及其特殊权力，允许台湾地方自治，实行省县长民选，取消专卖及统制贸易，惩办陈仪，抚恤伤亡等[98]

。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台湾最高负责长官陈仪当然有其责任，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有错误，而只认为是手下人没把事办好。面对各地民众上街的现实，仍固执认为是“完全由于少数乱徒希图谋叛，决不是民众要求改良政治与改变专卖贸易等经济制度的运动”，将之归因于“奸党、日本御用绅士、海南岛、南洋、东北各地遣回之台籍日兵、热中之野心家勾结流氓地痞及少数私立学校之学生合串之叛乱行为”[99]。当事件初起时，陈仪还企图以缓和方式解决，以免影响自己的地位，因此“无事不宽，有求必允”。3月1日，在台籍知名人士向其要求妥善处理事件时，陈仪同意：将有关查缉员交司法审判，死伤者予以抚恤，解除戒严，被捕者交保释放，由民意机构与长官公署合组处理委员会，处理整个事件。6日又同意：长官公署向中央请示改为省政府，成员尽量登用本省人；县市长定期民选，未选前不称职者可免职，由当地民意机关选出候选人三人，由长官圈定一人；省市县政府改组调整后，决定有关行政改革事宜[100]。事发时台湾的正规军很少，总计不过特种部队四个营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事件，恐也是陈仪采取缓和态度的原因之一。他曾告友人：“此次处理事变最感困难者，实缘兵力太薄，奸匪敢于暴发者，亦由于我之兵力太薄，稍缓时日，当能彻底肃清。”[101]

台湾“二二八”事件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又出了一道难题。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国民党当局妥为因应，未始不可以和平解决，并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径。但是台湾事件甫经发生，国民党中央在省方报告的影响下，很快认定其为“暴民暴动”，尤其是省方认为“当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分子为此次事件策动之要角”，“证之二十年来奸党之避重就轻，声东击西之阴谋，实无容疑义”，更使国民党中央神经紧张[102]。此时，上海金融风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引起社会震撼，国共关系正告彻底破裂，国民党军队又在山东战场失利，因此国民党不能容忍其后方再出现不稳。处

理委员会提出的台湾改革方案，不过是国民党镇压的借口，“二二八”事件终于由于国民党的过度反应而出现了最后悲剧性的结局。

台湾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最初指示政治上尽量退让，但如“暴徒”干预军事，即以“军力平息叛乱”[103]，显示其基本处理方针是以军力维持台湾的稳定。3月7日，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飞抵南京，带来陈仪报告，强调“奸党”在事件中的作用，要求加派部队至台。陈仪并于当天电蒋，告以“如无强大武力镇压制裁，事变之演变，未可逆料”[104]。其时，处委会提出取消警总要求，触及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根本，蒋即于次日电告陈仪，台湾局势“无时不念，李主委已晤见，现正研究处理方案，兹已派海军军舰两艘来基隆，约九十两日分期到达，二十一师两团定明日由沪出发，刘师长明日飞台面详一切”[105]。可知蒋已决定武力镇压方案。当日，国务会议决定对台湾事件的处理办法为：政府应派大员前往台省宣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组为台湾省政府；改组时应尽量容纳当地优秀人士。9日，蒋介石在中枢纪念周发表演讲，声称：“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106]

3月9日，第二十一师在基隆登陆，由于有军队为后盾，长官公署重新宣布戒严，次日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组织”，搜捕参加事件的重要人员。随着军队陆续到位，省府在全台“进行清查户口，办理连保，彻底肃奸”，局势重新得到控制[107]。虽然蒋介石有令“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对参与事变人员从宽免究[108]。但是在实际行动时，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完全做到。国民党以镇压换得了台湾局势的暂时平静，但同时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时难以弥合的深重创伤[109]。

事件基本平息后，3月14日，蒋介石致电陈仪，提出处理原则，

并于17日以广播讲话形式公诸于众：一，地方政治常态应立即恢复，其办法要点如下：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2．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不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为原则；3．省府委员及厅局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4．台湾各县市长提前民选；5．县市长民选前，省府依法任用，并尽量登用本省人士；6．政府或事业机关职员，无论本省外省，待遇一律同等；7．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8．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现行之政治经济制度及政策，其有与国民政府颁行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予分别修正或废止。二，台省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之组织，应即自行宣告结束。三，地方政治常态应即恢复，其参与此次事变之有关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110)]。3月17日至4月2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与冷欣、蒋经国等奉派赴台湾宣慰。他们提出的处理意见为：1．台湾改行省政府制度后，各厅处多设副职，多用台湾人士；2．轻工业尽量开放台人民营，公地尽量放租，缩小专卖范围，撤销专卖局和贸易局；3．各级政府官员尽先选用台省人士；4．澄清吏制，杜绝贪污，专设监察使署[(111)]。从国民党提出的善后方案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台湾人民的要求，尤其是认为长官公署制度和统制经济制度有改变必要，可见国民党也已认识到台湾事件的起因与其对台政策失当相关。

3月22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刘文岛等五十五人提出的《请即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并迅速实施善后办法案》。4月22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省主席，陈仪成了国民党收拾台湾人心的替罪羊。魏道明上任后，台湾省政府十五名委员中，台籍占七人，在省政府内，台籍人士还担任了一位厅长，三位副厅长和二位处长。警备总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专卖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物资调节委员会，撤销新闻电信图书检查。5月16日，台湾解除戒严，表示“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非常时期暂告结束。

二　昆明事变

云南自北洋时代唐继尧当政时开始，便对中央政府形成半独立状态，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后，虽然致力于统一全国，但对于地处偏远的云南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1927年上台的龙云在省主席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八年，成了称雄一时的“云南王”。这种情况自抗战起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大量抗战物资自滇越路输入和中国参加同盟国阵营出兵缅甸，云南从后方变成了前线，国民党中央系部队源源不断开入云南，到1945年已有将近十个军驻在云南，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先后设于云南，这本身就为蒋介石解决云南半独立的问题准备了强有力的条件。随着中央系势力伸入云南，原本尚不明显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在发展，而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西南联大教职员和学生以及民盟在昆明的民主运动采取了某种放任态度，以此作为对国民党中央的抗衡力量，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更引起蒋的忌恨[(112)]。这种矛盾最后发展到蒋介石下决心以强力解决云南问题，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为蒋的决断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蒋介石处理云南问题，系其“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一切均是在极为秘密的准备中开始的[(113)]。1945年4月，蒋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诉他为了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拟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但龙可能不服从命令，要他作好军事解决的准备，在调令下达同时，解除龙的全部武装。杜认为，龙云在昆明的部队不多，解决并不困难。蒋要他即刻准备，并再三叮嘱“要守秘密，要慎重”[(114)]。接着，蒋介石在7月间召见云南出身的李宗黄，谈及云南问题处理方案。他对李宗黄明确说：“志舟（龙云）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我都念他的前功，曲予优容。可是长此以往，对他过于纵容，恐怕他自己也很难善始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伯英兄（李宗黄）回滇，接任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假如志舟能够听命，那就调他到中央来另畀职位，否则就应该予他以

相当的制裁。”[115] 从蒋与杜、李两人的谈话可知，解决龙云的方案此时已在蒋的考虑之中。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想法为何应钦所知后，何认为最好能避免动武，以免不测之后果，如能劝龙自动辞职更好。他的看法也为杜聿明所同意，武力解决的事暂时拖了下来。然而，何和杜两人用尽了各种方法婉劝，龙云一概置之不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感觉此事不能再拖，否则将失去时机，因此武力解决方案正式开始运作。为此，蒋作了精心部署。先是以受降为名，令卢汉率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第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使龙云在昆明失去自己部队的支持。其后蒋再次召见杜聿明，要他从速准备。杜回昆明后，对武力解决龙云作了周密部署。为了缓和此举可能造成的反弹，分化云南内部力量，蒋决定由龙云的亲信部下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行动前夕还由何应钦专程赴河内，安抚并监视卢汉所部[116]。虽然杜聿明在昆明的部署不可能不露出一点风声，但似乎并未引起龙云的警觉[117]。

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同日蒋介石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免去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龙云职务，行营原属部队均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当天下午，空军长官王叔铭和李宗黄一行飞抵昆明，会同杜聿明秘密布置。杜聿明得令后，即召集部下开会，宣布蒋的处理方案，部署以驻昆明的第五军解除龙云部队及警察的武装，如有不从者即以武力实施，控制昆明所有对外交通和通讯出口，将此次行动通告驻昆明美军[118]。3日凌晨，杜聿明部按计划行动，其间与龙云的部队发生冲突，但因杜部占据压倒优势，龙部很快便被制服，并被解除了武装[119]。龙云本人则于事起后，避入他在五华山的官邸，拒不外出，但因对外联系中断，无所作为，而杜聿明因为有蒋保证龙生命安全的命令，也不能进攻，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4日，李宗黄至龙云官邸，将蒋致龙函面交龙云，函称："当兹建国开始，重在中枢，故特调兄入长军事参议院，参赞戎机，辅导统一，甚望兄能树立楷模，为党国与共休戚也。"[120] 然龙云仍迟迟不愿成行，或许他还寄希望于赴越南受降的云南部队回师救主。昆明事变的消息传到越南，确实引起了云南部队的震惊、不满和激愤。"有的要求卢汉下令打回去，有的要求连名发电，强求蒋收回成命，还有的说应忍辱负重，以待时机"。然卢汉权衡利害，认为云南部队正在越南受降，如有行动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其部队装备及战斗力也不如在滇中央军，事前又无准备，何况蒋令已发，木已成舟，"故力排众议，告诫部属，千万不可轻举妄动"[121]。龙云于无可奈何之下，又蒙蒋介石派何应钦和宋子文先后到昆明劝驾，给他面子，10月6日，终于由宋与何陪同离开昆明到达重庆。

龙云去职，是蒋介石实行全国统一计划的一次成功，被国民党认为，"消灭西南割据危机，苟不能适时处置，政府东迁，民主同盟与龙云勾结，藉云南之武力，行西南之割据，中央投鼠忌器处理唯艰。此事之解决，对于大局裨益匪浅"[122]。为了对外有所交代，蒋介石稍后以杜聿明"管束不严，防务处理颇多失当"为由，予以免职处分[123]，由关麟徵出任云南警备总司令。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昆明事件的余波至此得以平息。不过卢汉主政云南，仍然力图控制省政，不让中央插手，而蒋介石正被内战所牵制，也无力对云南施以重压，双方相安无事，云南仍维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

三　新疆三区问题的暂时解决

1944年9月1日，统治新疆十多年的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吴忠信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治新期间，实行政治高压政策，滥兴冤狱，苛税繁重，贪污腐败，积累下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吴上任伊始，采取了清理监狱，宣抚地方，敦睦邦交等政策，以缓和这些矛

盾。然而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相反，由于吴的统治措施从高压一变而为宽松，使多年积累的民怨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新疆的局势反呈恶化之势。吴忠信是一个所谓“耆年硕德”的老官僚，对应付新疆复杂的局势显然缺乏准备，以至国民党中央对新疆事变的爆发颇感突然。新疆在地理、民族、经济上与苏联一直有密切的联系，苏联也把新疆视为后院，对国民党和英、美势力在新疆的拓展抱着怀疑态度，而对反对派势力则表同情与支持[124]。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新疆事变的发生与迟迟不得解决。

战后新疆问题源于伊宁事变的爆发。伊宁是新疆伊犁区的首府，设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及苏联领事馆，为新疆西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犁区辖十一个县和一个设治局，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粮食产量占全疆的五分之一，一旦有变，势必影响全疆。1944年9月，伊犁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哈族牧民首先起事。11月7日，伊宁城内发生事变，起事者围攻城内各政府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困守若干据点，坚持至次年1月30日被迫突围而遭全歼。与此同时，伊犁区除精河外，各县全告失守。

伊宁发生事变，省府迪化（今乌鲁木齐）震动。坐镇迪化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紧急调兵增援，但因兵力有限，且缺乏塞外作战经验，兼之天寒地冻，未见成效。吴忠信则进一步实行政治安抚政策，组织宣抚委员会到各地，优遇各族头领，以图稳定局势。然而，伊犁方面的事态仍在发展。1945年4月8日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民族军成立，随后三路出击，北路进攻塔城、阿山，中路进攻精河、乌苏，南路进攻拜城、阿克苏。到9月，占领了北疆伊、塔、阿三区全部及乌苏、精河与拜城，并成立政府，通过施政纲领，与省政府对抗[125]。此时迪化人心浮动，已有人主张省府撤至哈密，朱绍良、吴忠信决定坚守迪化，同时连电重庆告急。蒋介石接电后，即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入新，代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并自青海调马呈祥骑五军入新，以稳定局势。

新疆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感到了局势的严重，尤其是新疆问题牵涉到对苏关系，处理不当，极易为苏联利用，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政治。前此，在中苏条约谈判时，蒋介石已提出新疆对苏方针是，以新疆对苏经济合作为条件，换取苏联在新疆内部问题上对国民党的支持[126]。为此，在中苏条约附件中，苏联承诺“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127]。随着新疆局势的不断恶化，国民党尤其需要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此时一心考虑如何对付中共，不希望被新疆问题牵扯过多力量。9月11日，蒋决定对新疆的方针是，“只可暂时忍受，不能立即作积极之抵抗”，外交对苏“只作应有与合理之表示，而不加以刺激，勿使其有所借口”、“对新疆政治与宗族之改革，则作积极之准备”[128]。恰好此时，原定到东北任职的张治中因为受熊式辉的排挤而无法前往，蒋介石有意让其到西北任职，遂先派他到新疆调查情况，提出解决方案。

9月13日，张治中衔命飞往新疆，与朱绍良、吴忠信等探讨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法，并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会见。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认为：此间情况万分紧急，除非伊宁军队停止前进，迪化殊无把握确保。目前只有通过外交一途从事和平解决，否则迪化一失，则局势全非，今后即能恢复，亦须费极大力量与极长时间。夜长梦多，变化难测，恐影响中央威信太大。应请当机立断，不要拘于外交常规……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129]。

国民党要求苏联调停的信息，很快便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回应。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称新疆三区代表“希望俄国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之冲突”，“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和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住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整新疆已造成之局势”。外交部随即答复称：“苏联驻伊宁领事愿意协助，请即代为通知并令介绍彼等到迪化晋谒张部长，商洽进行和平解决办

法。”[130] 至此，国民党与三区方面谈判的渠道已经打通。

张治中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并综合与各方商谈的结果，建议：新疆人民历史上备受高压，当前应改变过去的作法，保证新疆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新疆与内地路途遥远，增兵不易，补给困难，不能动武；新疆与苏联有历史渊源，关系密切，不能反苏；因此，只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张的看法得到了蒋的首肯，蒋遂授权张全权处理新疆问题[131]。

1945年10月，张治中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飞往迪化，随行的有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梁寒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昭贤，政治部一厅厅长邓文仪，三青团秘书处长刘孟纯，陕西省建设厅长屈武等人。17日，张治中与先期到达的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赖希木江首次会见，张在谈话中将双方关系形容为“兄弟手足”，表示：“本人这次代表中央到这里来，很希望弟兄间的感情很快的能够恢复，新省的问题很快的能够得到解决，使一切恢复正常状态。”[132] 张的谈话为其后的谈判定下了基调，即在不损害国家主权、不违反三民主义、不违背中央法令的前提下，“充分予地方自治发展”。在张治中给三区方面的《中央对新疆局部事变的提示案》中提出：扶助新疆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之平衡发展；尊重各族之宗教信仰；尊重各族固有文化风俗习惯；保障各族人民身体、财产、行动、居住、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减轻赋税，严禁摊派。在实施地方自治方面，提示案规定：三个月内进行乡镇保甲选举，六个月内进行县参议会选举；县参议会成立六个月后，可选出二人，由省府择一为县长；各区行政专员由省府保荐，中央任命，亦可任用地方人士。提示案要求变乱区域停止军事行动，限一个月内恢复事变前状态，取消不合法组织，参加人员资遣回籍或考核任用，免予追究[133]。张治中认为，此一提案对三区方面作了不少让步，尤其是关于地方自治的规定，内地尚未实行。三区代表当时未作答复，只表示须携回研究。

11月13日，谈判重开。三区代表带来了对中央提示案的对案，认

为中央提示案“未能满足吾人之要求”，故“要求真正的高度自治权”。该对案与张的提案最重要的分歧之处在于，它要求各级行政官吏由选举产生，并规定省府的组织形式，还要求组织民族军队。张治中先同意县级选举时间可提前三个月，三区部队可以团为单位编为保安部队，后又在省府组织形式上作了重大让步，同意将省府委员名额扩大一倍，其中地方可保荐十分之六，包括副主席一人及二位厅长，而三区方面可在其中保荐厅长一人，委员可占地方名额的十分之四。作为谈判中间人的苏联领事认为此案比原案“显示了极大的进步”，但三区代表表示还需要回伊宁研究。

12月25日，三区代表第三次来到迪化。他们先提出了三项要求，最重要者为1945年内国民党新增军队于签约后全部撤回。张治中认为这是“节外生枝，没有商谈的余地，即席坚决拒绝”[(134)]。经过苏联领事的疏通，三区代表同意暂时不提这几条，双方的谈判回到上一次的两个分歧点上。关于军队问题，没能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后再谈。关于省府组织，张同意增加一名三区副主席，三区同意主席由中央任命。

1946年1月2日，《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在迪化签字。该协定共十一条，主要内容为：事变解决后三个月内选举县参议会，由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由县长委用；区专员由当地保荐，省府核定；县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省府委员25人，中央直接派定10人，各区保荐15人，其中包括副主席两人，副秘书长两人，教育、建设厅长，民政、财政副厅长，及卫生处长、社会处副处长。附文（一）规定，三区可保荐省府委员六人，包括副主席、副秘书长、厅长、副厅长各一人，处长或副处长一人。关于成立民族军队问题，规定由三区部队进行改编，具体办法由附文（二）决定[(135)]。这个协定基本满足了三区方面的要求，当地舆论认为，“由于张氏诚挚开明态度之感动，与其负责精神及非常之忍耐心，使此一困难问题终于获得解决”[(136)]。

新疆签约的第二天，张治中飞回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此期间，他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有关新疆谈判的报告，提出今后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是：以三民主义力量保障新疆，以修明政治安定新疆，以充分经济力量建设新疆。同时，为了便利新疆问题的解决，国民党对西北人事作了调整。2月15日，调朱绍良为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办公厅主任，撤销第八战区。3月1日，吴忠信以述职为由离开迪化。同月29日，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于当天离开重庆，飞往新疆，主持西北政务。

张治中主政新疆，首先调整人事，调跟随自己多年的刘孟纯任省府秘书长，作风稳健的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以保证自己的权力运作少受干扰，同时“对省府改组事宜，刻正积极着手办理”，“对施政方针将开始拟定具体草案……方针将本中央之一贯民主精神，配合地方情形树立宪政基础，予各宗族人民以合理之平等自由与人权之绝对保障”[137]。在这样的气氛下，他和三区方面继续就上次未能达成协议的有关军事条款进行商谈。三区方面要求，部队编为骑兵十个团，步兵三个团，住地除三区外，还要住在南疆喀什、阿克苏、库车与省府迪化，这与张治中的编二个团与三个保安大队且全住于三区的方案相差甚大。双方对此进行了反复的讨价还价，张只同意部队数字可以让到六个团，但坚决不同意住地扩大到三区之外。三区代表最后同意了张的方案，但张也允诺三区部队可设统一指挥官。6月6日，新疆和平协定的附文（二）《关于事变部队改编与住地的补充条款》签订，规定三区部队编为步、骑各三个团，人数以1.2万为限；指挥官兼省保安副司令；住地以三区为限。协定签订后，中央社在发自当地的报道中称，“商谈已逾八月，计正式商谈十八次，非正式商谈不下数十次，经历无数挫折，其间且曾有三度陷于僵局”的新疆和平谈判，终于“获得最后之协议”，“经历一年又八个月之伊宁事变问题，至此已告和平解决，新疆全省人民于殷切盼望欢欣鼓舞之下进入和平建设之时期”[138]。

7月1日，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宣誓就职。根据事先的协议，张治中仍任省主席，三区方面的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赛福鼎任教育厅长，赖希木江任民政厅副厅长，其余各区推荐的包尔汉任副主席，萨力士任副秘书长，伊敏任建设厅长，马廷骧任财政厅副厅长。中央派定的成员为，秘书长刘孟纯，民政厅长王曾善，财政厅长卢郁文。这可说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联合省政府，成员既有政治上的革命派（三区），也有中间派（包尔汉等），还有保守派（伊敏等），而张治中则以中央大员身份操控省府的运作过程。

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之初，尚能保持合作局面。7月18日，省府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疆省政府纲领》，提出政治上保证人民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经济上扶植自耕农，保护佃权；对外增进中苏亲善。各方对这个纲领颇有好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各方对这个纲领都可谓言大于行，最后只能束之高阁。不仅如此，因为联合政府成立而暂时被掩盖的矛盾也在随时间的推移而凸显。国民党与三区方面围绕三区地位及选举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矛盾。此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三区方面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实际成为中共领导的反国民党阵营的一个组成部分[(139)]。而国民党也对三区形同独立的存在很不满意，11月，宋希濂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力主对三区采取强硬态度，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

1947年2月20日起，迪化连续三天发生示威请愿，参加者向省府提出中央军队撤离新疆、重新举行选举、在南疆成立民族军等要求，有着明显的三区背景，因而引起国民党势力的强烈反弹。24日，迪化出现国民党势力操纵的拥护中央、要求取消地方特殊化的游行。次日，游行群众至省府请愿，与支持三区的群众发生冲突，互有死伤，一时迪化人心恐慌，当局宣布全市戒严。此时，张治中正在南京，他对省府主政者未能控制局面很为不满。3月16日，他回到迪化，25日发表告全省民众书，表示："我们的坚决的态度是，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誓以全力贯彻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全部不折不扣实现；从消极方

面说，我们誓以全力采取最严厉而有效的办法来制裁破坏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的分子和挑拨者。”[140]“二二五”事件后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缓和。但是随后张治中为地方选举问题于5月去南疆巡视，受到群众围攻，他认为此事得到三区方面支持，使原本显得超然的张治中也开始对三区方面不满，他态度的变化，使本来表面上尚能一致的联合政府滑向了解体的边缘。

新疆联合政府的破裂，是从省政府改组开始的。为了实行地方自治，张治中推出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担任省主席，但麦氏是国民党内维吾尔族头面人物，政治立场与三区方面对立，因而遭到三区方面的强烈反对，决定“宁可不要和平条款，也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绝不与大土耳其分子合作”[141]。5月28日，麦斯武德宣誓就职，三区方面省府成员拒绝出席，此后并拒绝出席麦氏主持的省府会议。张治中事后也认为，他“坚辞省主席保荐麦斯武德一举，终于演成与伊宁方面再度分裂的开端”[142]。麦氏就职的当天，民选产生的省参议会开幕，但也因为在省主席问题上分为两派，经过一个多月协商仍未能达成一致，结果一次大会未开便宣告休会，联合政府的命运岌岌可危。

7月中旬，迪化以东的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发生三区支持的武力袭击当地驻军的事件，这三个县位置重要，一旦为三区控制，既可以控制出疆通道，又可对迪化形成夹攻之势，还会影响南疆局势，张治中再三犹豫之后，觉得不能再让，遂告宋希濂，“坚决镇压，彻底肃清，交你全权处理”[143]。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力居优，不出几天，便平息了三县武装事变。

吐、鄯、托暴动迅速被国民党军队平息，使三区方面深感唇亡齿寒，决裂不可避免。8月12日，代表三区方面出任省府副主席的阿合买提江离开迪化回伊宁，随后三区方面成员陆续撤离，维持了一年多的新疆省联合政府最终破裂。此后，新疆局面处于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中。

四　外蒙的独立

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苏条约谈判中，中国确认了外蒙古独立的现实。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临时联席会上特别解释了外蒙独立的问题。他说：“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如今已届二十五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用断然的决心，经和平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使得这个问题能够完满的解决。否则将使中国与外蒙古之间，永无亲善之可言，其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更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影响。”[(144)] 中国随后为履行条约义务，敦促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外蒙古政府于9月21日决定在10月10日至20日间进行公民投票，并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观，“俾重向全世界表示蒙古人民独立之意志与愿望”[(145)]。10月18日，内政部次长雷法章率领由蒙藏委员会、军政部和内政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外蒙古首都库伦（即乌兰巴托），参观定于20日进行的投票过程。据蒙古独立中央委员会公布，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决定是否独立的公民投票。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均有权参加，全境共设投票点4251个，投票采用公开记名签字的方法，决定对独立是“赞成”还是“反对”。据公布，在有资格参加投票的494，960人中，有487，409人参加投票，结果百分之百同意外蒙古独立[(146)]。其实谁都知道，公民投票不过是形式而已，外蒙古独立是雅尔塔协定早已决定的现实。

11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收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的电文，内称：“谨将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会议主席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决议案，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关于国家独立问题之公民投票之纪录，送达阁下，即认为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之正式文件。”[(147)] 12月10日，国民党第十六次中常会决定承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

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148] 2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苏伦札布率代表团访问重庆，完成了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最后手续。双方并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国民党内外都曾有强烈的批评声浪，尤其是在东北接收受挫之后，这种批评更为强烈。1947年3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对此作了专门解释，以消除党内外的批评。他称：“外蒙古的问题完全是我个人的主张，不能怪外交或军事方面负责的人，这在历史上我个人负责任，与外交当局没有关系。这个政策是我决定的，但是我相信外蒙虽然离开了我们中国，而是自由独立，不是给予人家割据的，我相信我决定这个政策没有错误，而是根据外蒙古当时的情形，应该给他们独立。至于决定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想以外蒙的独立，使得我们东北完全收回，至少以外蒙掉换东北是事实的话。外蒙古虽然独立，而东北没有完全收回来，旅顺大连也没有完全收回来，这不是我们政策的错误，如果说是错误，就是我个人的错误，不过这个政策一定成功，东北一定可以完全收回，而外蒙古一定可以独立。”[149] 蒋的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事实，当时他确实是企图以允许外蒙独立作为苏联将东北交给国民党的交换，并为此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而作出了决断，而且外蒙已经长期脱离中国的实际管辖，其独立又是苏联所坚持，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显然无力与苏联抗衡，蒋因此而弃名求实，谋取实利。至于后来的情况，则非蒋当初可料。

外蒙古独立以后，在新疆北部的北塔山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喧腾一时。北塔山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位于新疆东北阿勒泰地区，距奇台县城二百余公里。中苏条约谈判时，对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同意以现有疆界为准，但现有疆界究为何指，双方理解显然不同。外蒙古独立后，认为北塔山属其管辖，1947年6月2日，蒙古边防军派代表至北塔山，要求驻守该地的中国军队于四十八小时内撤离。驻军连长马希珍以守土有责予以拒绝，但答应向上级请

示。因为交通不便，层层转递，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收到请示电报已是事发之后的事了[150]。

6月5日，外蒙古军队突然向北塔山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并有飞机、大炮助战[151]，守军予以还击，双方激战竟日，互有死伤，但中国军队守住了阵地。北塔山冲突消息传到迪化，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立即决定派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一个团准备支援奇台。6日到8日，外蒙军队续向北塔山进攻，均为守军击退。双方共计死伤百余人。

北塔山武装冲突的消息传出，除了中国外交部在6月11日向外蒙提出强烈抗议外，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渲染所谓外蒙军队深入国境几百里及苏联支持蒙古进攻事，借此进行反苏宣传，意图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在对苏外交上争取主动。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张沅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此事并非寻常边疆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当地军事当局，已奉命坚守疆土，慎重处理，我政府并拟派大员赴新疆，指示地方当局[152]。外交部长王世杰电令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并经外蒙驻苏使节向外蒙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有关负责人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苏联坚决否认其与冲突有关，声称中国的抗议“不符事实，并系挑拨性之虚构”[153]。身处新疆第一线的张治中致电蒋介石和王世杰，认为中央社电讯夸大事实，北塔山不过是局部一时冲突，以目前情形论，不宜扩大事态，主张只向外蒙提抗议即可。陷于内战漩涡中的国民党，政治经济正处危机之中，不可能在如此遥远之地再受牵制，且对苏关系一向敏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研究后认为：“最近外蒙军侵入新疆之事件，性质颇为复杂，事态亦相当严重，迥非偶然发生之边疆纠纷可比，亦非外蒙之独自行为，显有其背景。当此内乱外患交相剪逼之际，政府应付之策，自宜审慎考虑，轻率固属不可，畏葸亦为非计。”提出：1．不使事态扩大；2．尽力保守阵地；3．恢复原有态势[154]。蒋介石亦无意扩大事态。他指示新疆当局：一面极力避免足以扩大事态之行

为，一面固守防地，不许轻易退让，并将当地情形，逐日分电外交部，以便随时研议对策[155]。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针对传媒对北塔山事件的过火宣传，在对各宣传机构的指示中，要求对蒙苏此项举动作适当之批评，但措辞应采取就事论事态度，不宜激烈，尤不可予人以开始反苏运动之印象，对所传苏联在东北协助中共军队之行动暂不涉及[156]。中蒙双方在经过若干次互提外交抗议后，此事不了了之。北塔山续有一些冲突，但不至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大局。

因为北塔山冲突的发生，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遵照外交部命令，在联合国大会反对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理由为北塔山“在民四所定蒙新疆界西，有档案地图可证，且历在新疆省治之下，又有中国军警驻扎”，而外蒙以正规军攻击北塔山，“非普通边界纠纷可比，纵有问题，不用和平方法解决，实不爱好和平，不应入会”。“在该国有确已改变其政策及确系爱好和平之证明前，我国仍将继续反对其加入联合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还要求美国“考虑这种新的情况，不要在安理会支持接纳外蒙古的想法，而要继续保持其反对的立场”[157]。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下，外蒙加入联合国一事被搁置。从此，中蒙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未及建立即趋于冷淡。

第三节　战后财政经济

一　经济重建及其困难

经过八年战争的摧残，战后中国经济面对的是复兴重建的艰巨任务。有利一面是，中国的近邻与宿敌日本战败，退出东亚经济角逐场，战前压迫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日资不复存在，相当数量的日资产业转入国人之手，增加了经济实力。不利一面是，政治不稳定，交通恢复迟缓，基本生产资料缺乏，不利于吸引长期投资，东北工业基地因为苏联强拆装备而受到严重损失。比较起来，不利面的影响远大于有利面的影响，而国民党政策的不当，更造成经济重建的失败。其

一，接收中的大量产业转为国家资本，但因效率低下而未能发挥应有的支柱作用；其二，恶性通货膨胀销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波动不已的币值，令任何现实的投资者望而生畏，投机心理如同癌症般弥漫于有产者心中；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没有抓住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结果，内战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且是经济重建极端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重建成为幻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目的是，“实行民生主义，帮助人民使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今日的伟大和平建设及发展的工作上”；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筹划交通、农业、工业、外贸、卫生和五年经济建设方案[(158)]。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子文在委员会成立致词时提出了政府战后经济政策的纲领，一是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与民营事业的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二是平衡政府收支，协调政府各部门利益；三是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毫无偏倚[(159)]。然而此三点纲领均在执行中成为泡影，政府经济政策不是扶助民营而是偏于国营，政府收支不仅不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友邦经济合作偏于美国一家而且名为互惠实受其害，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普遍不满，成为导致宋子文下台的重要因素。

收复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的经济活动，战后由于复员还乡对消费的刺激和人口与资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经济基础较好，首先得以恢复。1946年，上海新登记工厂1992家，1947年则达到9285家，创历史记录。如同战前一样，上海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工厂、工人、产值数均要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在各主要工业部门中，棉纺织工业，由于日资退出，复员所需，低价美棉大量进口（纱棉比价为战前的三倍），及投机囤购因素，“是以凡能开工的纱厂，无不利润累累”。1947年，全国纱厂纱锭数达到438万锭，布机数5.4万台，恢复

至战前总数的90%左右，如与战前华商（包括民营与国营）设备比较，纱锭超出59%，布机超出一倍以上。但由于日资企业被接收后多转为国营，战后民营纺织业的地位较战前下降，纱锭数虽已恢复到战前水平，纱产量则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二，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企业集团的产量均未恢复到战前水平。面粉工业，虽然新开厂数仍有三十余家，简易小厂则新开二百余家，厂数和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原料缺乏，进口大增，产量逐年下降，1948年只有3600万包，仅及战前华商厂产量的三分之一。火柴工业，战后新增60家工厂，大中华公司年产已恢复到8万箱。造纸工业，机器造纸业工厂与职工人数，均比战前翻了一番，产量增长三分之一以上。橡胶工业，上海一地即增设工厂71家，产量超过战前水平。酸碱工业，酸产量为战前的1.5倍，碱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重工业中的水泥和煤炭工业，较战前衰落，水泥需求跌落，进口增加，致开工不足，产量只及设备能力的28%；煤产量仅及战前的一半，导致燃料紧缺[160]。

收复区工业多少得以恢复的同时，战时在后方发展起来的工业，反因胜利而陷于危机与萧条之中。战后后方厂商急于清货复员，物价下降，资金紧缺，加之后方工业本身就是战时产物，缺乏坚固基础，设施简陋，战后需求减少，主管当局又倾注意力于沿海城市的接收，导致后方工业几一蹶不振。1945年底，后方工业指数较8月间下降20%以上，其中重工业下降一半。在后方工业中心四川，重庆工厂歇业数达到95%，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家工厂，停工者达80%，其他云南、贵州、陕西等后方各省情况亦莫不如此。曾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贡献的后方工业，“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他们“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161]。

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程度，我们只能以现有统计作一估计[162]。从工厂和工人数看，1947年全国工厂数为11，862家，工人81万人，比1936年分别增长了59%和33%。从实际生产量看，1947年产

煤1949万吨，铁3.6万吨，钢6.3万吨，电37亿度，水泥73万吨，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面粉5565万包，火柴85万箱。如与1936年华商（包括民营和国营）企业产量比较，这其中除了面粉下降近一半外，其他全都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其中电力增长3.8倍，棉布增长3.3倍。但如果加上外资企业产量，则1947年与1936年产量的比较，火柴为0.70，棉纱为0.67，水泥为0.65，煤为0.52，面粉为0.37，钢为0.17，铁只有0.05，只有电达到1.21，棉布达到1.28。如果再与1942至1943年的最高产量相比较，则煤为0.33，钢为0.07，铁不到0.02，电力亦只有东北和华北的0.72 [(163)] 。由此可见，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最高水平尚有相当距离，这主要是因为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遭到战争和人为的破坏。据今人研究，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看，除了新式交通运输业的指数上升了22%以外，其他近代工业生产指数均在下降，因此战后中国的近代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也趋于下降。按不变价格计，战后农业指数为战前的88%，近代工业指数为79%，矿冶业指数为42%，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战前的21.81%，下降到战后的19.7% [(164)] 。

在战后中国经济的重建中，也有两点略有积极意义的现象。其一是由于日资退出中国，在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下降，1948年，外资总额为1936年的0.81，其中直接投资为0.48。与此相对应，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亦明显下降。如按1936年币值计，在中国全部资本总值中，外国资本占8%（战前为36%），其中占产业资本的11%（战前为57%），商业资本的4%（战前为25%），金融资本的6%（战前为19%），这就为一直苦于外资挤压的华商腾出了一定发展空间，但由于外资腾出的空间多为国家资本占据，使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又打了折扣；其二是民营重工业有了明显增长，煤产量超过战前16%，铁产量超过39%，发电量则超过89%，尽管实际产量并不高，但这种增长对于一直以轻工业为主的民营工业而言，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165)] 。

战后经济的恢复重建，主要集中在1947年以前，但即便在这一时期，经济重建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主要是经费短缺，进口冲击，通货膨胀，加上政府的政策不当。由于内战再起，政府军费剧增，能够用于经济重建的费用少得可怜。据估计，战后用于经济建设的政府投资和国外借款总数为28，200万美元，不及战时损失的十分之一，而政府用于经建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的0.5%，最低为1949年的0.17%，在军费吞噬了所有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还会在经济建设上投入多少资金[(166)]。而本身实力有限的中国经济，一度又受到开放市场政策的强烈冲击，国产货难与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货竞争。1944年中国外贸尚有出超100万美元，但1946年入超即猛增为47，430万美元[(167)]。除了棉纺织业得益于廉价美棉外，其他工业多受打击，面粉、卷烟、水泥等工业受影响尤大。日渐高涨的通货膨胀，更使有效的生产很难进行，企业虚盈实亏，被迫转向投机，所谓生产不如投机，存钱不如存货[(168)]。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则偏重国营，忽视以致压抑民营企业，但国营企业效率不高，使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及至1947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全盘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恶化，经济建设更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正常的生产已经很难进行，就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发展而言，此时已经跌入民国以来的低谷。

中国农业经济因为其本质上的自然经济性质，受外部形势影响相对少一些，但是大规模战争对生产环境的破坏，军队征发对劳力的占用，田赋征实对农民生产物的低价以至无偿占有等，对于战后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不利影响仍然是相当大的，加之旧有农业生产关系甚少变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1947年全国稻、麦、高粱、小米、玉米、大豆六种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为22.5亿市担，为1936年产量的97%，但棉花产量下降较大，1946年为743万担，只及1936年的43%（以后也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169)]。

作为民生基本的粮食问题仍然是战后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由于收复区的扩大，粮食消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各地粮价均在不断上涨，尤其是收复区各省，受抢购军粮和复员还乡的影响，粮价攀升更为剧烈。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为446万吨[170]。为了保证粮食尤其是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的供应，国民党仍然沿用了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因为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其统治区面积的减少，实征数趋于下降。1945到1947两个年度内，实征7210万石，占定额数的比例从86%下降到76%，而1948年度的实征数更是剧降为2000万石，预示着继货币制度的崩溃，实物征收制度也难以为继[171]。

农业经济复兴的关键仍然是土地问题。据22个省的统计，战后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3%，半自耕农占25%，两者合占58%，较战前增长了四个百分点[172]。如何从解决土地权问题入手，提高农村人口大多数的生产积极性，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国民党内对此也不乏认识，“土地问题是解决国民经济的中心，土地问题合理解决，政治与军事便迎刃而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即刻规定耕者有其田之实施步骤及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收购大地主土地，分配于退伍士兵及贫农，并切实扶植自耕农，保护佃农。行政院亦于1946年12月修正通过《二五减租办法》，规定本年度豁免田赋省份一律减租四分之一，下年度豁免田赋省份亦照此实行[173]。但平均地权、减轻租赋是国民党当政二十余年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要打出这面旗帜，以拉拢人心，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实践中迁就、照顾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地政部在答复国大代表的质询时承认，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拥有土地者多持反对态度，而省县参议会亦有请求暂缓实施者，今后全国土地改革之推进，政府固须努力，尤赖全国人民之策动，地主阶级之觉悟，以及人民团体之协助。因此，行政院对解决土地问题的答复，始终是“正在拟订实施办法”。终国民党统治之世，土地问题一直没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它的所有关于农村的政策，无论其理论上多么完美多么有效，一

到实行之时则如大海中之一滴水，很快便消失于无形。连国民党自己也承认其政策“执行之不力，或由执行之时发生曲解”[174]。

在国民党的战后农村政策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是对所谓“收复区”或“绥靖区”（即原中共占领区）的政策。根据《绥靖区施政纲领》，“凡经奸匪盘据及流窜，经国军进剿收复及尚待进剿收复之区域，概划为绥靖区”，第一期暂以苏皖豫鲁冀五省为范围，第二期推及晋绥察热及东北各省[175]。由于这些地区或长或短处于中共治理之下，实行了一系列不同于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政策，得到相当多数民众的拥护，因此国民党对这些地区的政策曾经想作出某些调整，主要是改革土地收益关系，给直接生产者以实利，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与中共的土地改革相抗衡，争取广大乡村民众的支持。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收复区经济政策应着重下列各点：1．解决土地问题，应一本国父平均地权之旨；2．发行土地债券；3．设立农村合作社；4．创办农民银行[176]。这几条措施中，关键在平均地权，而蒋强调在所谓“收复区”实行，明显含有与中共争夺民众的意义。他训诫部下，我们“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匪处理土地的情形，还要表现更好的成绩出来，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是真正为民众解除痛苦，使农民得到利益。然后国际的观感，也可因而改变”[177]。

尽管国民党认识到与中共争夺农民支持的重要性，但国民党正式出台的政策仍然偏向于土地所有者。1946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绥靖区施政纲领》（1947年2月19日修正公布），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为自耕农者，得凭证收回自耕，其所有权人为非自耕农者，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得凭证保持其所有权，但其农地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之佃农，对地主纳租，其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其约定以钱币交租者，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之折价，收复前佃农欠缴之佃租，一概不得追缴；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地主失踪，或无从恢复原状者，应由县政府

征收，其地价应依法估价折合农产物，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给予合法所有人，分年偿付[178]。在此前后，行政院公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绥靖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绥靖区城市土地及建筑物处理办法》，以产权恢复原主为原则，将土地问题的处理具体化[179]。这些办法，一方面强调地归原主，对于已经通过中共的土地改革得到土地的广大乡村贫农而言，实为一次再剥夺；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照顾到这些地区经过土改后的现状，对于现耕作者给予一定优惠。然而即便如此，其实施范围仍非常有限，当局只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察哈尔、陕西六个省划出十四个县为实验区，其中正式开始实行的不过五个县。更普遍存在的是，流亡在外的地主以还乡团名义跟随进攻的国民党政府军回到原住地，向得到土地的农民追回土地和其他财产。据国民党官员实地所见，“收复区最近发现两种怪现象，（一）查封奸匪家属全部财产并驱逐之。（二）本年地租地主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地方官绅均为地主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识者担心“佃农无钱无势，虽不服亦不敢诉讼。若长此以往，实无异驱民为匪，自塞剿匪胜利之路”[180]。在苏北和山东，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徐州绥署曾制订了还乡团组织办法，规定还乡团受当地县长及党政军联席会报指挥监督，必要时得派军队掩护，这意味着土地所有者可以在武力支持下向农民追索失去的财产[181]。因此，国民党在仍然依靠地主作为农村统治支柱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最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土地所有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农业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就只能是空中楼阁[182]。

为了战后经济重建和善后工作，国民政府于1945年1月21日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由蒋廷黻出任第一任署长。该机构实际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中国的对应机构[183]，任务是“办理战后收复区善后救济事宜”，“善后救济工作办理完毕时，善后救济总署应即撤销”[184]。当年11月14日，行总与联总签署

协定，规定联总以善后救济物资和服务供应中国，分配过程对联总公开，并须全部用于善后救济，联总可观察行总是否遵守协定，并派员视察救济工作[185]。根据善后救济要求，行总确定战后工作的重点是：输送难民回乡、各地难民救济、医药卫生工作、协助修复铁路河堤、房屋修复、协助农业复员、协助平抑物价等七大项，实际最主要的工作为分配联总援华物资。行总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救济区，设立分署，并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六处港口设立储运局，接收、存储、拨发、转运联总运到中国的救济物资。1945年10月23日，联总救济物资正式运抵中国港口，至次年1月即运来物资16.8万吨，其中粮食即达14万吨，其他还有衣物、农业、工业和医药卫生器材。这些物资中的一部分，并未直接运到各地，而是由政府在市场出售，如1946年1月前在上海出售的有1.8万吨，占第一批到华物资的十分之一以上[186]。至于收入按规定应全部用于善后救济工作，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挪用于他项用途者有之，借机贪污，攫为私有者也不少（行总副署长李卓敏即因贪污被停职）。

中国向联总要求的善后救济援助额为94，500万美元，但联总只能援助67，500万美元（其中11，250万美元为运费），据美国白皮书所言，联总对中国的援助，“是这一时期外国对华援助中最大的一笔，也是联总对所有国家援助中最大的一笔”，其总数达到了65，840万美元，其中美国承担的份额占到了72%，即47，400万美元。“联总对中国的援助主要包括食品、衣物和对于中国工农业复兴至关重要的、种类广泛的生产资料和物资。此外，联总还派去了大量的技术与监督人员，以帮助中国分配这些消费物资”[187]。1947年12月31日，联总和行总的工作结束，据行总署长霍宝树报告，联总运华物资总数达到225万吨，价值6.6亿美元，受惠人民7600余万[188]。

根据联总的章程，“一切形式之救济，应依各该区域中人民之相对需要而公平分配，不得因任何理由而对任何人有所歧视”，尤不得有“政治信仰之歧视”[189]。因此，联总对华援助应一视同仁，公平

分配于政府统治区和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解放区为此相应成立了由董必武任主任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1946年7月，解总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陆续在天津、开封、烟台、临沂、淮阴、菏泽等地设立联总、行总、解总三方联合办事处，处理联总对解放区分配物资问题。国共关系破裂后，解总驻沪、津、开封三地人员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的公开合法机构，直至1947年底，联总结束在华救济工作，解总人员才全部于12月间撤回解放区。据统计，在联总对华救济工作中，解放区共得到价值约1000亿元法币的物资，主要通过山东港口运入解放区的物资计八万多吨[190]。

二　国家资本的膨胀

战后中国经济的突出现象是国家（官僚）资本的急速膨胀，其直接原因，是接收敌伪产业庞大数量中的相当一部分以或自营，或转让，或标售等方式，转移到国家手中，使中国的国家资本发展到其最高峰。据估计，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中国资本总值为142亿元，其中国家（官僚）资本占54%（战前为32%），民族资本占38%（战前为33%）。按分类计，产业资本总值为65.5亿元，其中国家（官僚）资本占64%（战前为22%），民族资本占25%（战前为21%）；金融资本总值为38.7亿元，其中国家（官僚）资本占89%（战前为59%），民族资本占5%（战前为22%）。从1936年到1947年，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民族资本，数量均有下降，只有国家资本保持增长，产业资本年均增长6.72%，占到工业总资本的43%，交通运输总资本的91%[191]。国家（官僚）资本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反映出国民党历经二十余年的经营，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由国家政权掌控的、集中在少数官僚经营下的国营经济体系[192]。

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有多种实现形式。经济学家王亚南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即由官僚自己参股或经

营的企业；其二是官僚使用或运用资本，即名为国营企业但由官僚处置；其三是官僚支配资本，即既非自己经营，也非通过国营形式运用，但却因种种原因在多方面受官僚支配的私人资本[(193)]。在这三种形式中，第三种形式牵涉较广，概念有欠严密，姑可不论。第一种形式属于官僚个人资本，亦即纯粹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等。而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大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企业的运作基本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并打上了企业负责人即官僚个人的印记。

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有种种特权，因此其战后发展也快于民营企业。1947年，全国工业指数为1945年的7.86倍，其中国营工业为21.37倍，而民营工业只有5.36倍。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使得生产效率不如民营企业。以产值为例，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1947年，国营企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42%。国家资本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量只占61%，水泥工业中的国家资本工厂生产能力占全国的72%，产量则只占57%[(194)]。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的若干垄断性公司，其中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最为引人注意。战后接收敌伪产业以棉纺织业最成规模，当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营，自无余力再行承购”为理由，1945年12月决定成立中纺公司，“暂由政府独资经营，以二年为期，今后当依原定期限或提前逐步售予民营”[(195)]。中纺公司董事长由经济部部长兼任，总经理由宋子文的亲信束云章担任，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有三处分公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棉纺、毛纺、麻纺、绢纺、印染、针织、轧花、打包等几乎纺织业的所有部门，员工7.5万人，拥有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

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产量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和煤炭，还可利用其特殊地位，免受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抛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196]。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规格提高为部级单位。由钱昌照任委员长，孙越琦任副委员长。根据资委会组织法，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事业。对于战时创办和战后接收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有重工业的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钢铁、机械、电器、化学、水泥九个部门，轻工业的制糖、造纸两个部门，共96个单位，附属厂矿291个，职员3.3万人，工人19万人[197]。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属的绝大部分，其他工业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198]。产业分布于全国各地，重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京沪地区，轻工业主要集中在台湾。资源委员会1946年收入2731亿元，支出2366亿元，盈余365亿元；1947年收入51，497亿元，支出50，180亿元，盈余1317亿元。盈余率（盈余占总收入的比例）由1946年的13.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56%，显示经济效益在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199]。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200]。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有其主客观因素。客观上是接收的大量敌伪产业为国家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主观上是国民党企图以此为其统治建立有力的经济基础，而国家资本企业对于国民党政权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值超过1000亿元[201]。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一批官僚豪门，利用权势，以国家的经济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从而成为社会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所有国家资本，无论其运作形式如何，有无官僚豪门的插手，均被社会舆论指为官僚资本，遭致社会各界的猛烈攻击。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202]。曾有国民参政员提出议案，痛斥“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议案要求，公务员及公营事业人员，应宣誓不兼营工商业，如有兼营者应在两者间作一选择，否则任何人得告发之；如有利用职权经商图利者，应依法加重处罚；公营事业机关之收支，应受审计机关之审核[203]。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不仅是社会反应强烈，国民党党内因为内部矛盾，CC系亦借此对当政的宋子文等发起攻击。CC系文宣系统的核心《中央日报》多次发表社论，认为，“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社论提

出，“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并且应该追究一下，这些年中间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一切政策和方案搁在一旁的，究竟是谁？把财政经济弄到今日不可收拾的田地的又是谁？然后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204]。

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CC系代表为主，对官僚资本大加抨击。萧铮认为，战后经济失败的原因是忽视民生主义，培养官僚资本，而对民营工业，则听其自生自灭，不加注意；赖琏认为，战后种种经济措施，均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要求官商分离，登记官吏资产；吴铸人认为，经济问题，最严重而最难解决者，为官僚资本，经济部应宣布官僚资本之姓名，列为革命之对象；吴铁城认为，经济事业官营者多失败，且有官僚资本之讥，何不将民生必须之工业，交由民营。吴绍澍、潘公展在发言中更是直指宋子文控制的中纺公司带头涨价，且有特殊待遇，要求行政院如无办法，应即辞职。二中全会《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提出，“肃清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为修明吏治之前提”，要求清查战时暴利者之财富，课以重税，并进行征借巨富之资财及外汇，并严格推行适度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205]。上述言论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的因素，CC系因对宋子文把持权力不满，借此问题发难。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国民党党报，并引起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它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实。

三　财政状况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困扰国民党政府的一大难题，抗战结束后，这一难题除了在最初一二个月内有所缓解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并日渐恶性化。

抗战的胜利，为人民带来了新希望，复员还乡的期待，使人们急于处理手中的物品，而且沦陷区的接收，使法币的使用范围陡然扩大，导致后方物价一度急剧下降。重庆物价指数（与战前相比）从8月的1793倍，下降至10月最低点的1184倍，下降了三分之一，黄金价格则从每两25万元陡降为5万元，只及高峰时的五分之一，同时美元兑换价亦跌为1:1040，下跌40%以上。而在收复区，由于法币币值的高估，使得物价指数最初亦反映为下降。上海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了36%，黄金从每两伪中储券1400万元，剧降至230万元，只及高峰时的六分之一。这是自抗战中后期物价日日高涨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206)]。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从11月起各地物价重又上涨，至12月，物价指数大致又恢复到8月的水平，而在收复区，由于高估法币币值，造成法币大量拥至收复区，物价上涨更为明显。上海物价指数（与战前相比）从9月的345倍，暴涨至11月的993倍，上涨1.87倍，米价从每石3725元涨至10250元，上涨1.75倍，上涨程度为抗战以来少有[(207)]。

物价的上涨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财政完全依赖发行造成的恶果。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日高，而物价的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的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一度出现的物价下跌情况不是建立在通货收缩的基础上，而是市场对骤然到来的胜利的一种短期反应。随之而来的物价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仅仅使物价保持一个还能忍受的涨幅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不必说彻底稳定了。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是国民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宋子文以财政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行政院长，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度颇具信心，原因是他手头确有若干砝码是他的前任所不具备

的。战后政府掌握的若干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几千亿元的接收物资，为稳定物价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宋子文为此采取了一些相当大胆的措施以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以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刺激进出口贸易，以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不足，压抑物价；以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这些措施一度取得了相当成效，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物价上涨势头尚未失控。然而宋子文知道，物价上涨的关键是政府收支的不平衡，导致纸币大量发行，只有使预算收支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他认为："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208)] 因此宋子文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即"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

对于如何解决收支不平衡，宋子文上台后动了不少脑筋。增收方面，首重积极整理税收，对作为政府财政收入支撑的四大税种关税、盐税、货物税和直接税特别关注，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提高进口货物税率，使这两种税有了较大增长。减支方面，宋子文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军费应积极减低"，"同时一切政费，凡于经济复员不是切实需要的，也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极力撙节"[(209)]。然而在这方面，宋子文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却无力改变，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完全靠中央银行垫款解决，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因此宋子文不能不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210)] 据统计，军费和特别支出（即以蒋介石命令开支的军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1945年为71%，1946年为54%，1947年为60%[(211)]，这还不算其他名义下的军费支出和实物支出。军费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最终也导致经济事业和政府财政的崩溃。

法币的发行战后呈加速趋势。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1937年6月的395倍；次年1月即翻了一番，8月再翻一番，到1947年2月黄金潮爆发时，法币发行额已经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3月前，法币月增发1000多亿，3月后月增发2000多亿，到12月剧增为4000多亿，1947年1月陡增为8000亿，4月以后，月增发额超过1万亿元[212]。同一时期物价上涨较法币发行的增加更快，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增加2.6倍，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上涨5.5倍，月增16.9%，大米、黄金、外汇价格上涨幅度也均超过法币发行额的增加。经过八年抗战，物价上涨倍数为法币发行倍数的22.5%，战后第一年即达到111.5%，而且这一差距还在继续增大，两者互相刺激，互为影响，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加速阶段，这也是所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必然规律[213]。因此，尽管法币发行已达天文数字，但以往具有的支付功能日渐萎缩，几成废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钞券产量有限，生产与支出不能配合，券料输送已到随到随罄之境地”。钞票在外国印刷，由飞机运送，钞票印刷、运输费用已经成为政府外汇第三大支出，1947年3月至9月，印刷钞票耗去外汇968万美元，占政府机关同期外汇支出的七分之一，仅次于购米和偿债支出[214]。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正常的收支已经无法反映真实的收支状况，每年编制的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意义，执行的结果总是超出许多，预算成了数字游戏。根据财政部长俞鸿钧对行宪国大的报告，1946年政府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张嘉璈提供的数字为，1946年收入28，770亿元，支出75，748亿元，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支出433，939亿元。无论哪一说，赤字均高达60%以上[215]。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实际开支和赤字比预算都只会高不会低，政府财政已完全成为赤字财政，靠印钞票过日子。而且物价上涨程度已经高出预算增长数字，与战前相比，1946年物价上涨倍数比预算增长倍数高出36%，1947年则高出215%，表明政府的实际开支处于萎缩之中[216]

。由于钞票越来越不值钱，即便政府收支也不得不运用实物（如田赋征实）或美金（如美金公债）计算方法。以往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由于币值变动过于频繁而难以计算；填补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一般外国财团甚至政府也不敢轻易借给外债。1946年政府总收入只占支出数的38%，即便如此，税收在收入中也只占42.3%，非税收入（包括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产业）则占到57.6%，而公债只占万分之七（不包括外国借款），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张嘉璈认为："黄金、外汇储备的减少和处理敌产工作的困难都使非税收入下降。在间接税方面，其收入跟不上物价水平的上升；在直接税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的危机和国民经济处于半战时状态，是无法改进和扩展的。结果，政府收入越来越落后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和政府支出的增加。"[(217)] 在非税收入已经占据政府收入大宗的情况下，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如停售黄金），填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就只剩下印钞票一项，法币信用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防波堤，其崩溃就不可避免了。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杨格在1946年5月14日给政府的意见书中认为："从来未有通货膨胀像中国现在膨胀的情况，而能避免财政崩溃的"；"美国和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协助，和运用中国的国外资源，只能推迟而不能避免崩溃"[(218)]。

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一般民众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法币购买力指数，从战争结束时的0.289，下降到1947年3月的0.0089，即下降到战争结束时的三十分之一。因此，尽管以货币数量计算的收入在增长，但实际收入水平仍在下降。虽然实行了根据生活指数发放薪金的方法，并按时调整生活指数，但仍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仅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的关系看，1945年9月，上海物价指数为战前的346倍，生活费指数为299倍，此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互有涨落，互有高低，而自1947年5月以后，直到1949年5月，物价指数始终高于生活费指数。在物价指数高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工薪阶层的收入绝对下降，而在物价指数低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因为指数编制的滞后效应（按季或按月进行），以及编制时的操作（如按低价而不按

基准价编制），因此以实物计算的收入仍在下降。另据统计，上海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之比，如以1937年为1，则1945年8月为0.68，1947年12月又降至0.49，表明即使按指数计算，生活水平也至少下降一半以上。而这种下降在社会各阶层中的表现不一，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公教人员，即各级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和大中小学校教师。据统计，一个昆明大学教授，战前月工资为350元，到1945年下半年超过11万元，为战前的300倍以上，但同期生活费指数上涨6039倍，因此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二十分之一[219]。公教人员“以此可怜之薄薪，维持五口之家之生活，其清苦情形，可以想见。欲其工作情绪之提高，与为官操守之清廉，当非易事”[220]。所谓公教人员，是维持政府及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环节，他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导致其对自己服务的政权态度的变化，从而威胁到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在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他们或者是洁身自好，清廉自守，但要忍受清贫的折磨；或者是得过且过，甚或贪污腐败，以至政风日下，民怨四起。国民党统治后期的吏治败坏，确乎不完全是官僚个人的好坏或良心发现的问题，而与经济状况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牵动政治，政治又影响到经济，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对国民党统治的衰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国民党统治下的通货膨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统治体制的政治问题[221]。

国民党对于通货膨胀导致民心涣散的严重性并非不知。宋子文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通篇所谈内容几乎不涉政治，而完全为经济问题，关键又是如何扼制恶性通货膨胀。他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并将其原因归结为抗战带来的收支不平衡。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提出的方案无非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老套。谁都知道，平衡预算的关键是减少军费支出，但战后政府军费支出不减反增，根本原因是内战支出成为预算无底洞。宋子文知道军费必须裁减，但又承认这“还需要相当时期，方能成就”[222]。实际上，终国

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军费始终是预算大头，军费降不下来，赤字问题便解决不了，恶性通货膨胀便难以遏止。如果说，通货膨胀之初对于缓和经济困难、支持战时经济还有某些作用的话，那么一旦其进入恶性膨胀阶段，首先摧毁的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所谓得不偿失，饮鸩止渴，先是经济停滞，后是民心不顺，成为最后导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黄金风潮的爆发

宋子文的经济政策与前任相比，也有一点重大区别，就是他在战后采取金融开放政策，以买卖黄金外汇作为平衡通货、稳定价格与市场的重要手段，并在一个时期内显出其成效。但是这一政策的基础极不稳固，在内战不能停止的大环境下，很快失去效用，并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法币与美元的兑换率一直是固定的，自抗战后期起长期为20:1。这显然早已脱离实际情况，黑市兑换率大大超过此一比例，已经接近2000:1。宋子文上台后认为，这种情况导致法币与美元比价与市场脱节，使外贸停顿，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他制订了开放金融的计划，将法币与美元兑换率改为随市场供给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他以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所以开放对外贸易，在国内可以安定人心，在国外可以导引投资，予我国经济建设以重要的助力”[(223)]。这一政策的重要倡导者，是行政院的美国顾问杨格，他力主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有利于战后美国资本的对华扩张，也符合美国倡导的世界经济自由化潮流，而宋子文执著于西方经济理念，以西方理想套中国现实，最终导致自己的失败。

实行金融开放政策，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市场作后盾。宋子文在开

放外汇买卖的同时，决定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为基础，以官价通过上海黄金市场买卖，借此回收大量发行的法币，吸取民间游资，稳定通货，并给金融开放政策以有力支撑。宋子文采取这样的政策，姑不论其是否有私心[224]，但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而在发行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回收通货的手段，也不失为一条可行途径。而宋子文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个政策仰仗于三大法宝，即库存黄金、美元和战后接收物资。据统计，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于1945年底达到最高峰，为85，805万美元，其中黄金为568万盎司，1946年上海接收物资变卖收入为6698亿元[225]，这样空前的硬通货储备，为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国内一度的和平气氛，使宋自信其政策可以成功。这一政策实施初期收到了一定成效，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也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它在本质上是自由经济与开放经济政策，适合的是和平时期，它能够顺利实行的前提是市场预期心理的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政治的稳定。可是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战争要求的是紧缩经济和统制经济，在内战烽火四起的情况下，市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不确定，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便极易波动，引发投机，因此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不仅不能压抑物价，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带头羊，导致两者之间互相刺激、互为影响的恶性循环，最终连累整个经济大局。加上国民党各级军政官员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以投机获取个人利益，更使宋子文的黄金外汇政策难以成功。事实证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是宋子文施政期间最引起众人非议并最终彻底失败的一项政策，除了消耗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由官控转为“民有”，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之外，这一政策不仅未能取得宋子文当初设想的成果，而且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线。

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将进口物品分为三类，一类为工业及民生需要物品，可自由进口，二类为烟草、汽油、汽车、纺织品等，可经许可进口，三类为奢侈品，禁止进口；中央银行指定若干银行买卖外汇，供一二类物品进口之用；废止官价外汇汇率，由中央银行根据供求情形，随时调节，对于外币

现钞及黄金买卖，依同样原则办理；政府拨出美金5亿元，并由中央银行拨出一定数量外汇，作为基金，作随时平准市场之用，并指定专员负指挥运用之责。金融开放政策由此付诸实施[226]。2月26日，贝祖诒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成为金融开放政策的实际指挥者。

3月4日，中央银行开放外汇市场，以法币2020元兑1美元的价格买卖美元。与此相配合，中央银行制订了《黄金买卖细则》，每天由各金号银楼向央行申购黄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托几家指定金号随时抛售黄金，即暗售，通过这种方法，中央银行控制着市场黄金买卖的平衡[227]。8日，中央银行开始买卖黄金，每条（10两）售价165万元，起初2个月内，黄金买卖大体持平，4月卖出3674条，买进3000条。从5月开始，卖出大大超过买进，6月卖出19，982条，买进只有402条，净卖出19，580条，买卖已经完全失去平衡，表明市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及对法币的不信任。同期美元买卖情况与黄金大体相当，4月买进1013万美元，卖出1850万美元，净卖出837万美元，此后逐月增加，6月净卖出2492万美元[228]。但因为当时中央银行手中掌握的黄金美元数量甚大，通过大量抛售，尚可维持黄金外汇价格的基本平稳。7月金价升至190余万，美元2500余元，上涨了20%左右，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两者指数的上涨（与战前相比），分别为756倍和1663倍，远低于同期上海物价4072倍的涨幅[229]。也正因为如此，投资或投机于黄金外汇市场所得，实际是低进高出，利益远大于其他市场，而这又导致黄金外汇市场在巨大投机压力下的崩盘。

由于在实行开放市场政策时，高估了法币与美元比价[230]，导致外国商品大量进口，外贸入超严重（6月入超已超过千亿，还不算走私），外汇市场售汇压力日渐增加（8月美元净售出3262万元），法币的持续疲软，加上游资作祟[231]，造成市场抛出法币换取黄金美元之风日甚，迫使中央银行于8月19日宣布将法币与美元比价由2020:1调高为3350:1，法币贬值66%。表面上，改变外汇汇率的理由

是鼓励出口，减少进口，激导侨汇，扶助生产[232]，然而实际上，此举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原有自由买卖外汇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市场的反应非常灵敏，调整外汇汇率决定公布后，上海金价越过200万大关。由于中央银行供应能力的有限，一度消失的黑市卷土重来，与公开市场互相刺激，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形势的恶化。虽然中央银行严令取缔黑市，并规定美元价格不得超过官价的5%，但在经济规律作用下，无法遏止黑市现象的存在，美元黑市价已超过官价的三分之一。11月17日，政府又决定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实行输入许可与出口补贴，大幅度放宽出口限制，同时严格限制进口，除禁止进口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进口亦需申领许可证，用行政手段压抑进口，缓和外汇供应压力，此举对减少外汇供应确有成效[233]，但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改善、对压抑黄金价格并无明显作用。在黄金外汇价格上涨幅度较为平稳时，一定数量的买卖有助于平抑市场物价的上涨。而一旦价格大幅度上涨，社会对平抑物价的信心就会动摇，黄金外汇价格反成为物价上涨的带头羊，并刺激市场万物齐涨，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黄金买卖运作由宋子文指示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再由贝下令央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执行，复由央行指定的同丰余等五家金号银楼作为市场代理人，每天的抛售数量和价格高度机密，知者不过三五人，也没有非常严格的手续规章。全部过程外人不得与闻，不要说财政部长俞鸿钧，即便蒋介石，对于黄金外汇买卖情况也是一知半解[234]。运作过程的机密性，固然使外界对央行的实力不明底里，但导致市场极易受流言影响，在各种势力尤其是权势机关、人物的介入下，市场日渐成为投机集散地，各军政机关收到现钞后，首先用于购买黄金美元，大量军饷发出后，原封不动地回到上海黄金市场，投入黄金投机买卖[235]。一般工厂企业在开工困难的情况下，也改走炒买黄金之路。同时由于外地金价大大高于上海，导致游资向上海集中，抢购黄金保值。而且由于央行的抛售，金价上涨幅度还小于物价上涨幅度，使投机黄金买卖有利可图。就在各色人等几近

疯狂的投机行为下，中央银行有限的黄金外汇储备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挡。

由于美元汇价的改变，美元投机稍有收敛，市场游资多集中于黄金，进一步加大了黄金价格上涨的压力。12月12日，上海黄金价格突破300万大关，美元价格达到5650:1，黄金美元价格从此开始进入急速上扬阶段，几乎到了一日一涨以至一日数涨的地步。12月24日，金价突破400万，中央银行两天抛出16，000条黄金，才使金价稍有下降。由于物价的上涨，1947年1月1日，当局宣布实行花纱布管制，凡由政府供给外汇购棉之棉纺织厂，其生产之棉纱、棉布的半数由政府按成本加价20％收购。加之中央银行于16日发行500元关金券，其与法币兑换比例为1:20，即合法币1万元，这更刺激了物价的狂涨。中央银行孤注一掷，1月30日一天抛出黄金19，000条（19万两，合六吨左右），回收法币750亿元，“气魄”不可谓不大，但2月4日，上海金价仍无情地涨到480万，美元达到8500:1[236]。次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出口结汇由政府补贴100％，进口货物从价征收50％附加税，以图挽救法币的颓势，预示着黄金外汇政策已至强弩之末，市场反应则是更疯狂地投机。6日，上海金价一日五涨，达到550万，美元兑法币比价突破1万，并引发各地投机抢购狂潮的出现，南京、广州、汉口、重庆金价均突破600万，天津暗盘达到700万。上海由于央行抛售，金价相对较低，引来各地游资聚集上海市场争购，央行已至无法招架之境。8日，央行停止暗售黄金，10日，停止对金号的配售（即明售）。由于在毫无通告的情况下突然停售黄金，使快速上涨的市场物价一下失去原有的制动阀，黄金、美元黑市价格暴涨，上海金价涨至720万，美元达到16000:1，带动市场谣言四起，一片混乱，所有物价均大幅度上涨，引发了抗战胜利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上海物价指数为例，1946年3月为战前的2558倍，12月为5713倍，9个月上涨了123％，而1947年2月为10665倍，两个月即上涨了86％[237]。

黄金价格的暴涨，引发经济危机，使国民党中央再也不能对此熟视无睹。2月11日起，蒋介石连续召见宋子文并主持中央常会，讨论经济形势。此时，上海黄金官价730万，但有价无市，黑市高达940万，直逼千万大关（广州已达到1100万）。宋子文虽也意识到形势的严重，但仍图最后一搏，他要求蒋介石核减预算，节约开支，以对金价釜底抽薪。这是正孜孜于前方军事行动的蒋介石所不可能接受的，他要宋速筹对公教人员以实物代货币的紧急方案，以安定人心。然宋子文仍不甘心，2月13日，他搬出美国顾问杨格见蒋，提出改变外汇汇率，继续抛售黄金，被蒋认为“决难持久”，“期期以为不可”[238]。蒋决定实行停售黄金、管制物价、禁用外币、取缔投机等一系列经济紧急措施。财政部长俞鸿钧过后在国民参政会解释实行紧急措施的原因是，“全国各地游资麇集上海，群以黄金为投机对象，央行如不大量抛售，则金价日高，刺激物价。如拟以全力与投机者相搏，则牺牲甚大，徒使牟利者益增利润。于是政府运用黄金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辙”[239]。

2月15日，中央银行公告停止抛售黄金。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主要内容为：1．关于平衡预算，本年度政府支出，除非迫切需要者，均应缓发；严格征收税收，加辟新税源；加紧标售敌伪产业和剩余物资；国营事业除重工业及特殊者外，应公开出售民营。2．关于取缔投机买卖安定金融市场，即日起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国外币券在境内流通；加强金融业务管制。3．关于发展贸易，法币与美元比价调为12000:1；废除出口补助进口附加税办法；推广出口；修正进口许可制度。4．关于物价工资，行政院指定若干地点，严格管制物价；一切日用必需品，按评议物价实施办法，严格议定价格；职工薪金，以1月指数为最高指数，粮、布、燃料亦按1月平均零售价，定量配给于职工；经济紧急措施时期内，禁止罢工怠工、投机垄断、囤积居奇。5．关于民生日用必需物品供应，政府对日用必需品米、面、布、燃料、盐、糖、油以定价供应公教人员，先在京、沪两地试办，并在各重要地区分期推进。同时公布

的有《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禁止外币流通办法》、《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评议物价实施办法》等条例，对于有关金融物价事项作出了严格规定，如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流通，持有者必须按公布价在指定行局兑换成法币，违者处五年以下徒刑；各行局应严控放款，5000万元以上放款必须经四联总处核定，多余款项一律存放中央银行，机关单位用款一律使用支票，商业行庄业务应照章办理；一律不准新设银行钱庄；在全国重要地点设立物价评议会，评议主要民生日用必需品售价，协助检举违反议价行为，等等[240]。在这些规定中，最重要者当属严格管制黄金外汇和物价，期以遏制投机风，稳定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当局矫枉过正，甚至规定金银首饰店的首饰亦需登记，在三个月内出售，逾期未售出者，必须兑换为法币。可见黄金风潮影响所及，已经到了草木皆兵之境。然而且不论这些规定是否真正有效，过于严厉的规定本身就因为其没有可操作性而留下了反弹空间（有关首饰业的规定即明显例证）。不出两月，这些看似极为严厉的规定便有了程度不同的松动。

黄金风潮中损失的黄金美元数量，由于其机密性，当年从未公布过确切的统计数字。当监察院彻查风潮委员向贝祖诒询问时，他答以“事关机密，奉主席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241]。较为可靠的统计有两个。其一为现公布的财政部档案所载，自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共售出黄金353万两，收回法币9989亿元，结存黄金122万盎司[242]。更详细的数字出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杨格档案。根据中国政府当年致送杨格的密件可知，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1946年2月已较上年底的峰值略有下降，为83，359万美元（其中黄金未变，仍为568万盎司），1947年2月下降到37，987万美元，减少了45，372万美元，为上年2月的46%，为峰值时的44%，其中黄金为237万盎司，减少了331万盎司，为上年2月的42%，即两者均在一年中减少了一半以上，黄金减少比例更大一些[243]。这两处档案所记黄金损失数量差别不大，前者比后者多近7%，唯留存数有较大差别，前者只有后者的51%。考虑到杨格档统

计为逐月报告，且包括外汇统计，因此可能更为可靠。央行在一年的金融操作中，黄金外汇损失相当严重，但并非如外传消耗殆尽[244]，然而由于财政当局操作上的机密色彩，事发后又刻意封锁信息，使得黄金潮的影响被人为扩大了，加上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矛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危机。

上海黄金风潮爆发，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对国民党统治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宋子文因此成为众矢之的。2月13日，监察院由院长于右任主持会议讨论黄金风潮，决定派何汉文等四委员前往上海彻查。次日立法院会议则对宋子文发动猛烈攻击，要求“宋子文应辞职以谢国人”。傅斯年在《世纪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两文，以极为尖锐的文辞痛责宋子文经济政策的失败。文章开宗明义便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此语直指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而要挽救这个危机，“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傅文以宋子文连带以孔祥熙作靶子，批判“孔宋两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提出“彻底肃清孔宋两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245]。傅文一出轰动朝野，成为倒宋潮中的重磅炮弹。早就对宋子文不满的CC系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亦借机发起倒宋潮[246]。宋子文经济政策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宋本人无论多么能言善辩，也抵挡不住舆论的攻击，黄金风潮使他遭到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击。以他行政院长的身份却成为舆论公开攻击的对象，预示着他的政治地位也摇摇欲坠。

宋子文的经济政策不但导致经济的危机，而且引发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蒋介石震怒之下决定换马。据宋的亲信贝祖诒告诉张嘉璈，29日下午，蒋介石约宋子文谈话，告诉他明天立法院会议将对其大加攻击，是否不必出席。宋答以如不出席，必须辞职。蒋名为关心

其声誉，实际暗示宋自动辞职，但宋并不明确表示，谈话没有结果。当晚，蒋再约宋谈，告以不必出席为宜，宋谓只好辞职，蒋允之。由此观之，宋尚有恋栈之心，他的下台实为蒋逼迫的结果[247]。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职务，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对于下台，宋子文心中难免有对蒋介石不支持自己的怨气。当天，他未如蒋之要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方针。他首先自夸了一番理财功绩，接着声称“政府对于收入极为有限，但为应付各方开支要求起见，不能不仰仗于增加发行。本人深悉此种途径，足以引起可能之严重局势，因此本人和同僚们，日夜为这个问题担心，但是各方面总以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们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责备，几乎只可认为命运所支配”。此种表示暗含了他对蒋不同意他削减开支也即军费主张的不满。宋不无伤感地承认，“本人已经好像是公众的仇敌，每遇物价暴涨，本人即被人唾骂”，但他表白：“本人自从担任行政院的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之，政策方面，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而在良心方面，离开行政院的时候，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然而立法委员不因宋的表白而罢休，宋讲完后立委群起质询，宋称“所有问题不加答复，以后问题自有新院长答复，关于黄金外汇之问题，俞部长及贝总裁均知道很清楚，辞职的人不应该讲话”。言毕扬长而去，既让准备打落水狗的立委们无奈，又将了蒋一军[248]。

监察院调查黄金风潮案四立委于3月间对宋子文提出弹劾案，认为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以来，其误国失职多端，尤以此次黄金风潮，使社会骚动，影响国计民生至深且巨”。该案列举宋之误国失职事实为，财政金融政策失当，摧残生产事业使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运用黄金政策失败贻误国家财政，浪费外汇促成金潮，独断孤行贻误全盘行政，因“依法提出弹劾，即请提付惩戒，以正纲纪”。但监察院的审查意见为：“本案所举弹劾宋子文之事实，均属政策运用问题，尚未举出有何犯罪情事。该宋子文于金钞风潮发生后，既经自请去职，

应毋庸再付惩戒。”[249] 在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与会者对金潮案反应强烈，以黄宇人领衔，一百名中央委员临时动议，提出《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案》，提出：“抛售黄金政策，原意固在收回法币，乃负责主持之人，不但运用失宜，抑且有勾串商人操纵图利之嫌，亟应一面再促政府依法提付惩戒，一面转咨中央监察委员会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蒋介石虽对宋子文不满意，但一损俱损，对宋的攻击过火，亦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因此蒋在三中全会上为宋辩称，宋院长“依法执行任务，不知何故加以谴责”；“宋子文在行政院长任内，并不贪污，如谓余见贪污而不知，则由余负责”。他告诫说，“这次三中全会通过之决议案，大部分属于破坏性”，“党内纷争，殊为扼腕”。查办宋的声浪就此停息[250]。而对金潮本身，国民党拿不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只是寄希望于“迅速处理无须国家经营之企业，出售敌伪产业及剩余物资，并整理税收，以谋在短期内弥补财政之不足，防止通货之膨胀”[251]。

3月13日，与黄金风潮案有关的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兼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三人被捕，贝祖诒亦被监察院提出弹劾（后予以申戒处分了事）[252]。林、杨两人受贝祖诒的指示，与詹莲生直接联系，通过詹进行全部明配与暗售业务。据监察委员调查指称，央行出售黄金价格由同丰余等行号与央行对讲电话报告为准，行号指定则由贝祖诒等三人“任意决定，漫无标准，已属不当，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莲生一人介绍，则显然央行出售黄金事宜在市场方面故任詹莲生一人把持操纵，谓为官商勾结，实非过分”[253]。由于这个过程的高度机密性，林、杨等有无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之处，恐怕法庭也很难得其详，但詹莲生获利之丰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在事先得知买卖数量和价格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时间差赚上一笔，更重要的是，黄金卖出前需要从金块改铸成市场所需的金条，每条有三分火耗，如按售出35万条黄金计算，仅此一项，詹即可得到十余万两黄金[254]。4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配

售黄金“舞弊嫌疑”案。林、杨两人均称“一切都是奉命办理”，詹莲生亦称买卖黄金的金号和价格都是由局长和总裁决定，“我丝毫不能参加意见”[255]。然而无论当事人怎么说，对这一震动全国的案件总要有所交代，最后，法院以判处林凤苞无罪，杨安仁有期徒刑八年，詹莲生有期徒刑四年而了结此案。其实严格说来，不仅是林、杨两人，即使贝祖诒亦不过奉命行事，黄金风潮引发的危机绝不是处理这样几个人物所可以解决的。

黄金风潮的爆发并引发经济危机，原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黄金政策，即使改弦更张圆滑的运用，还只能减杀物价的波动，并不能根本解决物价问题”[256]。解决的办法如同时论所言，“今天中国的经济财政病症，任何专家设计，任何医生开药方，其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257]；倾向于国民党的著名金融家陈光甫认为，除非政府改变对中共的政策，否则经济注定无法长期维持，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错误，而是错误的政治政策的结果[258]。黄金风潮的当事人贝祖诒在辞职答立法委员质询时直言不讳地认为，黄金政策一度取得的成功，“原因大部应归功政协会议之成功”，“主要由于国内和平，今年情势大变，此一政策能否继续施行，实有详细加以考察必要”[259]。国民党无意实行和平政策，因此其经济政策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出根本解决之道。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出台，暂时以行政手段抑制了市场动荡，然而并未能解决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时论认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在目前或不失为一治标应急之策。但是国内经济上的积弊，政治上的积弊，币值稳定上的积弊，依然很明显的存在。一次风潮算是过去了，第二次的风潮又在酝酿着。如果不从根本上想办法，难道焦头烂额的人民生活，还经得起再受打击吗？”[260]这是当时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看法与担心，即使国民党官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张嘉璈

上任后，认为能否平衡预算、获得外援及军事胜利，是稳定财政经济的三个条件，而在战争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法币增发，物资日趋缺乏，距离紧急措施之平衡预算与稳定物价两目标，相去日远”。如是，“则我之任务必告失败。思之几于寝食不安”[261]。他的不安完全被其后的事实所验证。他要求中央银行垫款应有限度，紧急支付命令宜经过审核再付，财政部长俞鸿钧首先反对，“谓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主席亦以俞部长所言为然”[262]。在这种情况下，张嘉璈迟早要走上宋子文的老路。果然，在国民党拿不出治本之策的情况下，市场只维持了大约两个月的稳定，4月中旬开始，因为法币万元大钞的发行，物价再度发生剧烈波动，从而成为5月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直接诱因。

第四节　战后外交

一　外交关系的拓展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废除了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跻身世界五强之列。联合国以及各个国际组织均有了中国的地位甚至是重要地位，国际形势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较之以往更多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日渐重要，中国在海外的数千万侨民需要祖国的关心与保护，中国战后外交正是在这样有了很大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263]。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声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指针是：“我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负责任特别重大。今后自应根据一贯政策，与美、苏、英、法诸大盟邦及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密切合作，以加强联合国之组织，而求国际间各项问题之合理解决。”具体政策是，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有所贡献；废除尚存的不平等条约；广订友好条约，以开展邦交；谈判通商条约，以树立新的商业关系[264]。

自美国和英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之后，中国与其他订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也在逐一谈判废除中。抗战胜利前，已有中比（利时）、中挪（威）、中加（拿大）、中瑞（典）、中荷（兰）新约成立。战争结束时尚未签订平等新约的国家尚有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南非等国，但法、瑞、丹、葡四国均已表示放弃特权，西班牙根据1928年中西商约条文规定自动放弃，澳、南两国因系英国属下的自治领，而英国已下令取消本国及自治领在华行使特权所依据的《中国敕令》，故此两国的领事特权实际已经停止。战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未遇大的阻力，中法、中瑞（士）、中丹（麦）、中葡（萄牙）先后签订平等新约。至此，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列强入侵而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中国人民历经百年的奋斗和抗争，终于在抗战胜利声中摆脱了列强加于自己的耻辱，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权的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相应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外交关系的拓展。中国是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具有否决权的五强之一，在联合国占有重要地位。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等，中国均有理事和法官参加，并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至于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中国也都参与了其活动。抗战以前，中国与二十五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大使级八个，公使级十七个，数量很少，级别也不高，主要局限在几个大国。而到1947年，中国已与四十一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大使级二十四个（以欧洲最多），公使级十七个，还设有七十六个领事馆（以亚洲和美洲最多），三个驻外代表团。驻外外交使团数量和外交关系的级别都有了较大提高。外交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尤其是与亚洲和美洲国家的关系发展较快。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和巴西、墨西哥、暹罗（泰国）、沙特、阿根廷、菲律宾等亚洲和拉美的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265)]。

然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旧的不平等消失了，新的不平等又产生了。中外之间不仅仍然存在着新的不平等条约，如战争结束之时签订的中苏条约，即使是中外签订的平等条约，往往在表面的平等下仍然隐藏着实际的不平等。如中美、中英关于互相给予驻军治外法权的专约（1943年5月和1945年7月签订），表面上是平等的，然而实际上中国不可能驻军于美、英，因此只有美、英驻华军队可以享受如此特权，与此类似并引起更大反应的是中美商约[266]。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国，无力为自己争得国际上应有的平等地位，而国家的分裂与内战，无疑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又是先国内后国外，在内战烽火连天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文汇报》在社评中写道："看政府当前外交政策的运用，我们认为，追随的实例太多，独立自主的表现太少；为迁就眼前内外情势而过分倒向美国的地方太多，真正站在国家远大利害的考虑上利用国际矛盾来维护民族利益的作为太少"；"我们深知，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在目前内政情形之下，外交政策很少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内政问题能够赶快圆满解决，同时也希望政府尽可能减少内政问题对外交政策的影响。"[267]如果说国民党对于大国的外交妥协尚可找到借口的话，对许多同样是弱国或小国的外交也无起色，则是很难使人理解的，在东南亚华侨保护问题上的软弱无力便是一个例证。

东南亚华侨在战争期间本已因战争影响，颠沛流离，遭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战后不仅未享受到胜利成果，反而受到所在国内部冲突（如法越、荷印冲突）以及排华风潮（如泰国）的影响，生命财产均遭受严重损失，流落在外者返乡困难，"华侨所望国家强盛，以解除过去痛苦者，竟成幻影"[268]。关于侨务政策，外交部长王世杰曾提出，"目前基本保侨工作，仍在与一切有华侨居留之国家订立友好条约，使华侨在条约上获得最惠国待遇"[269]。然而实行的结果，华侨待遇并未见明显改善。在越南，中法谈判时虽有关于华侨问题的默

契，但法军虐待华侨、迫害华人的情况并未稍减。据第一方面军参议袁子健在西贡亲见后的报告："西贡法军劫杀华侨案件，据领馆调查，已达两千件以上，现尚继续发生，仍未停止。究其原因由于军纪堕落，长官纵容，不加严厉处分之故。"[270] 在泰国，中泰虽订有友好条约，但其国内仍时不时掀起排华风潮。其他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华侨同样处境困难。其实不仅是东南亚，世界各国的华侨受到不公平待遇者所在多有，各国均在中国侨民入境、居留及其他问题上苛求不已，究其实质，仍是中国的软弱与政府保护不力。对此，国内各界和舆论有强烈反应。《大公报》社评说："南洋近千万华侨，现正遭遇着总攻击，孤军绝域，可能被各个击灭。这一严重的事实，不知道政府看到了没有？那一片哀切呼救碎心断肠的声音，不知道政府听见了没有？假定看见与听见了，不知道政府有无对策？有无救援的心思？看在千万侨胞面上，祖国呀，你该争气了！该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该让中国人抬头见人。"[271]

对于有关中国切身利益的华侨问题尚且解决不了，遑论其他。中国参加了战后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如1945年9月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1946年1月的伦敦联合国会议，7月的巴黎和会等，但多是以配角身份出现，并在有关主要问题的立场上追随美国的态度。1946年7月，巴黎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召开欧洲和会和对意大利等五国签订和约等问题，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竟坚决反对中国列为和会邀请国[272]。美英虽曾支持中国，但在苏联的反对下，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中国代表表示，"中国为召集人系属颜面问题"，"希望中国政府平心静气，统筹全局"；英国外长贝文表示"因苏联坚决反对，未便坚持"，表现出国际政治游戏以实力为第一的原则。结果，中国只能接受现实，只是由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未来在巴黎举行之和会，应由外长会议全体会员国召集，并不仅限于英、美、法、苏四国，实至明显。不然，则中国政府将视为违反前述协定。"[273] 1947年3月莫斯科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苏联提议将中国问题列入会议议程，虽然未能实现，但已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在列强中的地位，以所谓五强之一，

其国内问题居然成为别国讨论的对象，无论如何也和大国的形象不相符合。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于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决定影响全世界的主要问题而未能取得成果，使我感到很遗憾。我尤其感到特别失望，因为我毕生的希望是，在世界大家庭里，应使中国享有适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应对维持和促进世界安全与福利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国政府未能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实在是所有过失的根源，甚至在中国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把中国的国内局势作为议题，使我国在国际领域内蒙受耻辱[(274)]。

二　中美关系与中美商约

中美关系始终是国民党外交的重心所在，战后尤其如此。美国与中国除了因为马歇尔使华以及美国介入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而发生的密切的政治关系之外，经济关系也是战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尤以中美商约的谈判占据着战后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地位。

在旧有不平等条约体系下，外商在华经济活动受到一系列特殊的保护，与华商相比处于优势地位。1943年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由不平等条约体系保护的旧有经济规范取消了，如何界定中外之间新的经济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美商约谈判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又是中国与外国间谈判的第一个新商业条约，因而不仅对于中美两国，而且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美商约谈判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工商企业家的广泛关注。

还在抗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和工商界已经在为中美商约谈判进行准备。有四百家成员参加的美国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其中包括不少美国著名工商企业），代表美国工商界提出了对中美商约谈判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帮助为两国间的贸易和美国在华投资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基础，并为双向贸易最大限度的发展提供一切实际的帮助。"[(275)] 由于过去特权带来的好处，他们仍然希望在新条约中保持

某种特权。在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向国务院提交的意见中要求："战前美国在华实业因遵循美国法律、服从美国法庭而得到好处，人们合乎情理地相信，这种状况将继续下去，如果发生什么转变，将会规定一个过渡时期，其间将继续享受美国法律带来的好处。"[276] 不仅是美国工商界要求中国市场的开放，甚至连美国军方亦认为，蒋介石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支持应当付出的代价是，保证美国的特殊经济利益，将中国经济置于美国的完全指导之下[277]。美国国务院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草拟了条约草案，在新商约框架中，将旧有特权尽可能保持下来。

根据中美新约的规定，新商约的谈判将在战争结束六个月后开始。不等战争结束，1945年4月2日，美国方面已将一个长达五十八页的商约草案交给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召集经济、财政、交通、内政、教育、司法行政等部和地政署及中央宣传部对美方草案进行了详尽研究，认为美方约文"范围之广，内容之详，为以往美国对外商约所未有"，而且此约"不但对于中美今后合作关系重大，且将为我国与其他各国商约之范本"，因此各部均提出了若干意见，其中最大的异议集中在美方要求的给予缔约双方公司、社团以国民待遇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278]。虽然这样的待遇是给予双方国民的，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使中国国民实际上无法享受此种待遇，而且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特别规定，外国国民在美国所能享受的国民待遇只限于联邦法律的范围内，这对于中国极为不利，最惠国待遇则有被他国援用之担忧，因此中国有关部门均反对不加限制地给予美国公司、社团以国民待遇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美方草案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关于在华美国公司法律地位的规定与中国正在讨论中的新《公司法》不符。拟议中的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法律地位采取属地原则，无论由谁经营，凡本部设在中国领土内的公司为中国公司，反之即为外国公司，这样许多在华营业多年的美资公司（如著名的上海电力公司等），由于他们的本部不在国外，不能算外国公司[279]。美国对

此反应强烈，他们在商约草案中极力要求中方接受美国对于公司法律地位的解释，即公司的法律地位决定于其注册地，这样许多在华营业的美国公司，虽然本部设在中国，但因其在美国注册仍可算美国公司。

美方草案提出之后，在美方催促下，中美双方首先在美国进行了非正式会谈，主要是中方要求了解美方草案中若干规定和措辞的确切含义。日本投降后，美国实业家急于返回中国，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及其下属公司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向战后中国市场进军的运动，协进会及美国各大工商业企业代表纷纷来华，准备在战后中国市场上大显身手。美国政府和企业家雄心勃勃地要把19世纪末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对中国市场的高度期望变成现实，把中国潜在的庞大市场变成能为美国实业家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的市场。因此，美方催促中方尽快开始正式谈判。美国商人提出，如果中国不同意开始谈判，则美国应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和援助[(280)]。马歇尔受命来华后，美国又将中美商约谈判与马氏的使命联系起来。1946年1月17日，美国国务院将财政部的急电转致马歇尔，其中转述了由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等部门代表组成、负责协调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监管对外贷款的国际货币财政问题委员会的意见，将立即谈判商约作为美国给予中国贷款的条件之一，同时还要考虑中国在下列问题上的态度：1．中国商业政策的非歧视性质；2．并非旨在发展自给自足经济的合理的关税政策；3．为外国在华公司创造与在其他商业国家相似的条件；4．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使外国公司进入各种实业领域；5．扩展私人贸易和私人企业经营的领域；6．无损中外企业的经济发展计划，等等。上述种种条件多数与商约谈判有关，质言之，谈不成美国满意的商约，国民政府就很难得到贷款。这实际是在谈判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即国民政府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及马歇尔在调处中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依赖于谈判的进展，这对于已经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的国民政府又加一重新的压力，而且这样的压力，对于正在极力争取美国支持以削平对手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商约

谈判的过程充分反映了双方的这种不平等性，美国政府与工商界一直密切合作，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商利益，而国民政府因为担心外界对条约的负面反映，一直保持了谈判的秘密性，工商界不得与闻，只能在条约签订后，接受既成事实。

在美国的压力下，1946年2月5日，关于中美商约的谈判在重庆开始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美方首席代表是美国驻华参赞施麦斯。双方以美方提出的草案为基础，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中方首先声明：1．为中美友好全面合作起见，“我们已对贵方所有建议均加以最优惠的考虑，并尽可能立即按原有形式接受美方条款”；2．中方不仅要考虑本约，而且还必须联系与其他国家的关系；3．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并非所有条款在实际运用上双方都有同样的好处；4．中方的对案勿让第三方知道。美方强调，美方方案是谈判的基础，因为此方案注意到了最近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作为一项统一的计划而设计的，因此它的有关内容须放在与这一整个计划的关系中考虑”[(281)]。

有关中美商约谈判的讨价还价实际集中在三个主要分歧点上。中国首先在公司法律地位问题上向美方作出了重大让步。3月中旬，国防最高委员会审议新《公司法》，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堪提出取消外国公司需在本国“营业”的规定，遭到委员们一致反对。但主管当局深知，“就两国经济相需情形而论，我所赖于美者急，而美所求于我者缓，故研议本约自应权衡国家整个需要，就全面之利害着想，庶不致因小失大”[(282)]。换句话说，中美双方在商约谈判中地位的不平等，是自始即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在主管当局坚持下，3月23日，立法院还是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法》，在公司定义上接受了美国的要求，这在国民政府立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指出：“外国人不应干涉我国的内政，更不应干涉我们的立法。中国的立法应当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可是我们的政府不重视人民的意见，而重视美国的利益，只知道如何便利美国，而不顾老百姓的

利益，这不是中国的经济，而是美国的经济。”[283]

关于国民待遇问题，美方坚持如果没有该项规定，外商在华经济活动将受到中国地方法律的限制，但闭口不提美国联邦法与州法律的差别。美国要求美商在华享受国民待遇，而华商在美国只能享受他州待遇，这显然不公平，但在美方压力下，中方同意给予美国公司、社团国民待遇，并同意公司范围包括金融业（中方以前一直反对金融业享受国民待遇），但加上“除缔约彼方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时接受了美国的“它州待遇”。关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双方于此费时最多，中方坚决反对“无条件和无限制”字样，因为这将开一个供他国援引的不利先例。由于中方表示“我国在事实上已采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但为避免舆论反对及他国援例要求，故不愿列入条约，美方人员以我立场坚定，经请示国务院终于让步，同意将本款中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一句删去”[284]。谈判从重庆到南京，历时半年，至8月底谈成了初稿。

11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使馆参赞施麦斯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内容十分广泛，林林总总，计有三十条之多，各条中又有若干款，但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项：1．缔约双方国民在下列各方面彼此享有国民待遇，即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购置动产，进出口商品内地税的征收，商品的销售、分配，在彼此领土内所制造商品的出口关税；2．缔约双方在下列各方面彼此享有最惠国待遇（即所谓“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法人及团体所享有之待遇”），即进口关税、采矿、内河及沿海行船与通商、购置不动产[285]。

中美商约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之后，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商约。该条约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限于条约名称所指的通商航海，还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宗教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如同艾奇逊所称，它“为美中两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286]。与旧

有不平等条约不同，这个条约的大多数条文规定对于双方都是平等的，互惠的[287]。考虑到中国近代订立的那么多单方面优惠的不平等条约，该约条文的平等互惠内容当然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在废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外侨特权之后，是否只要规定了互惠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就是平等呢？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是最发达的经济大国，而中国还是一个极不发达国家，互惠平等对于两个经济发展差别极大的国家的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美国可以充分享受的优惠，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所限，根本不可能享受，因此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各界反应最为强烈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的不平等。中美商约公布之后，除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文认为，“只要这个条约在原则上是平等的，便无非议的余地”外[288]，几乎没有得到中国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支持。知识界称其为单惠条约，沿海大城市工商界人士多数反对或不无疑问，而内地工商界则一致反对。《大公报》认为：“在实质上，我们觉得它几乎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是片面的，现在则是双方的，自然是平等的了。但事实上中国的国力太差，于是所有的互惠都变成了单惠。……中国这样的大开门，是完全符合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的高度工业品大量涌来，美国的高度生产力与高度生活力都大量拥来，试想想，我们的工业将如何建设？我们的经济将成何形状？我们人民的生活将处何境遇？我们是弱国穷国，我们不怪美国，只是惊异我们的政府为什么竟不为本国的工业、经济与人民生活谋一些保护？”[289] 中共更是抨击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度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谴责国民党借此约“不但将获得前次所谈五万万元借款，而且将获得更大更多的借款与投资，以便加强统治与扩大内战”[290]。

面对外界对中美商约的强烈批评，主持中美商约谈判的王世杰承认，“因中美经济状况不同，所谓互惠实际上仍易成为片面之惠，故对若干问题，中国不能不采取若干保留之态度。然为鼓励美国对华投资以助我工业发展起见，势不能不给予美国人民及公司以必要之保

障”[291]。为了缓和这种批评，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于11月28日发表声明：“总观各界批评，最着重之点，佥以中美两国国力不同，我国不能根据条约而享受与美国同样之平等互惠利益，对于此点，我方于谈判中，无时不予以细密之注意。”他认为条约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亦给予了考虑，在九个方面中国作了保留。如国民待遇在“法律另有规定时，则不适用”；关于版权，中国人翻译美国著作不受任何限制；对关税自主和进出口的决定权毫无影响；关于船舶航行范围，“其权操之在己”，“我方对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之必要保留，由本国国民享有一点，向所坚持”。他强调“所谓最惠国待遇，实即为与第三国之平等待遇，此为我国历年来在外交上所力争之原则。我既不愿在美华侨遭受低于其他国家国民所受之待遇，则我当亦不应对在华之美侨予以不平等待遇”[292]。

评价中美商约，不能仅仅从经济意义考量，它的谈判过程和政治背景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一面。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方始终承受着某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有些是美方公开强加的，有些是中方可以感觉到的。而条约谈判的政治背景，加剧了双方的这种不平等性。战后中美关系的两个显著特点是：中国经济的恢复有赖于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需要美国的支持对付其对手中共并确立其在国内的独尊地位。可以说，中美双方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谈判中的不利和有利、劣势与优势地位，唯其如此，美国才敢于对中国有关立法过程进行干预；国民党才不顾内外的强烈反对，不惜以损害国内工商业界利益为代价迁就美国，以换取美国的支持。为免节外生枝，条约签订后，11月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了条约，9日立法院表决通过条约，这样在条约签订后的一周内，国民政府已经完成了全部批准手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各界对中美商约强烈反对之际，被中国人认为占了便宜的美国人对这个条约仍不满意，这其中除了两国经济文化环境带来的差别外，确实也存在对于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同理

解[293]。比如内河航运问题，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关于航运的规定，采取了相背于普遍国际惯例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即所有外籍货轮均不得载货驶往非指定海口的中国口岸。这样就使外籍货轮不能进入上海以远的长江，而只能在上海卸货，再经转运至长江上游港口，如重要的商业中心汉口。结果，货物在中国水域内的转运费远高于其应花费数字，而且上海转运中的种种程序，使它成为阻碍中国内地极需货物的瓶颈[294]。再如知识产权问题，在国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而在极端重视知识产权并以此作为出口创汇大宗产品之一的美国人眼中，条约对中国作了重要让步。美国人希望的是无条件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以及国民待遇，因此，直到1948年11月，美国国会才批准了该条约，30日，中美双方在南京交换了批准书。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在内战中全面失利，条约对美国人的意义已经很小了。

在战后最初两年间，中美之间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如《关于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协定》（1946年4月29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6年12月20日）、《关于美国武装部队驻扎中国领土之换文》（1947年9月3日）、《关于美国救济援助中国人民之协定》（1947年10月27日）、《中美在华教育基金协定》（又称《中美文化协定》，1947年11月10日）等。通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将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进一步固定下来，保障了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具有绝对优势的排他性的特殊地位。单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1936年，中国自美进口及对美出口货值分别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19.6%和26.4%；而到1946年，这两个数字为57.2%和38.7%[295]，仅此一项，即可见美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占的特殊重要地位。

三　中英关系与香港问题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中英关系也不再具有以往所有的重要意义。战后中英关系除了在香港接收问题上有所交涉外，既非十分密切

也无大的冲突。

在抗战期间中英进行新约谈判时，为了尽早达成此约，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没有坚持战后收回香港的主张，但对于九龙租借地问题，因为中英新约的签订，其法理依据已不复存在，何况各国均已将租借地交还中国，因此国民党尚有借抗战胜利而收回的想法。然而英国顽固地坚持其旧有殖民帝国的傲慢立场，拒绝讨论任何有关改变未来香港九龙地位的主张。直到抗战胜利，香港问题再次由于接收而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上解释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称，我们中国决不借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的主权，所以我们不愿借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间误会。关于香港的地位，从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依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政策，主张尊重条约，根据法律以及时代要求与实际需要，求得合理的解决。现在全国各租借地均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例外。但是我们亦必循两国外交谈判的途径，以期收回领土，行使主权[296]。当时政府内部有人建议，应在时机成熟之际，以精兵直袭港九，再与英国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龙为限[297]。但蒋介石对任何与英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建议均态度谨慎，他不愿在战后国内问题优先的情况下，因此影响与英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对这样的建议均未认真考虑。

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接收香港的准备工作，英国首相艾德礼并致电杜鲁门，要他指示麦克阿瑟，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298]。曾经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美国，此时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竟然同意香港由英军受降。尽管蒋介石不主张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发生冲突，但他也反对英国军队重返香港并接受日军投降的举动，要求日军根据原计划向中国投降，他还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强烈反对对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统帅已经发布的投降条款作任何改变。但杜鲁门告诉蒋介石：香港受降不过是个军事行动问

题，而无关英国的主权，中国应该与英国进行合作，“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299]。美国的态度使蒋大失所望。蒋只能再后退一步，8月23日，蒋介石电告杜鲁门，提出香港由中国战区统帅委派英军代表进行受降，实际这只是挽回一点面子而已，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料英国连这一点面子也不愿给。8月27日，蒋介石会见英国大使，英方告以“英国必须在击败日本以后，恢复香港原有之地位，因此彼等甚歉彼等不能接受蒋委员长之建议，由英国军队之官长作为蒋委员长之代表，在此英国领土接受投降”。蒋当即表示“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300]。29日，蒋介石发出命令，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接收香港及九龙日军投降。次日，蒋再次会见英大使，告知此项决定，表示：“除非联盟国不承认余为中国战区之统帅，华盛顿之盟约无效，或尔英国脱离联盟，宣告单独自由行动；否则余之指令决不能改变，余决不能破坏盟约，违反公约，屈服于强权也。余令既出，必贯彻到底，希望英国恪守信约，保持荣誉，如其最后仍加拒绝，则必宣布其恃强违约，公告世界，以著其罪恶而已。”9月1日，英国表示同意中国的意见，由蒋介石委派英军将领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此一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8月30日，英国舰队抵达香港，次日即成立军政府，重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在原总督府举行，由英国第十一舰队司令哈考脱将军和日本香港军司令冈田梅吉、华南舰队司令藤田赖太郎分别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潘华国将军参加了日军投降典礼。受降典礼之后，中方交给英方一份备忘录，称今日受降之事，并不包括九龙日军。此前，中国新一军第五十师先于英军大部队于9月8日进驻港、澳地区，待英军开到后，香港由英军进驻，新一军仍驻九龙，直到11月下旬奉命开赴东北时为止[301]。

香港问题虽因中国的让步而得到解决，但国内要求收回香港的呼声一直不绝，国民党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次向英国提出此一问题[302]，原则均为和平解决，但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英国不会理睬中国的要求。直到1948年行宪国大期间，还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外交部的答复是：我国外交政策，有一极显著之点，即我素来一贯尊重国际义务，信守国际条约。香港以及九龙之一部分，系我于1842年鸦片战争后，先后依照条约规定，割让与英国者。纵然我人对签订该项条约之当时环境与历史，深具遗憾与憎恶，但我人对已经签订之国际条约义务，在条约未失效前，只有忍痛遵守。我政府决循正当外交途径，以求港九问题之根本解决[303]。但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告终，香港问题始终未能提上中英双方的外交议事日程。

四　中法关系与越南问题

中法关系在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中本不是重点，因为同盟国将北纬16度线以北的越南北部划入中国战区受降范围，而越南在战前是法国殖民地，才使中法关系一度成为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

中国赴越受降之时，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已经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法国殖民者重回越南。越南本与中国有长期往来关系，越南独立运动领导人抗战时多在中国活动，而法国驻越当局和军队在中国抗战期间长期与日本合作，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因此中国当政者中有人对越南独立呼声颇表同情[304]。但是这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当时的全盘方针不符。支持越南独立，势必与法国对立，可能还会与其他大国发生矛盾，对于急需在战后国内政争中得到大国支持的国民党自然是得不偿失[305]，何况蒋介石正设计将龙云赶下台，不会听任云南军队因待在越南而坐大或出现什么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国民党对赴越受降较为谨慎。行政院组织了越南顾问团，由外交部代表凌其翰，军政部代表邵百昌，财政部代表朱偰，以及经济、交通、粮食等部的代表组成，任务为拟定受降期间的行政命

令，并与法方协调接收问题。根据行政院在顾问团出发前的十四条指示，受降时将邀请法国派员参加，并由法国组织代表团协助接收，顾问团应与法国代表团密切联系；对越境内一切交通工矿事业继续维持，听候商洽法方派人接收；对法越间一切关系严守中立态度，不加干预。显示中国无意长期待在越南，介入越法之争。这些规定在顾问团内被人认为是“过于消极，一切出发点，皆以将越南交还法国为前提”，也被卢汉认为“不合实际情形”。但是他们无力改变国民党中央的受降方针[306]。然而即便如此，法国从越南原宗主国的立场出发，对于中国赴越接收充满了疑虑和敌意，中法之间便难免在越南问题上的矛盾。

9月28日，驻越南北部日军投降典礼在河内举行，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接受了日军司令土桥勇逸的投降，法国代表亚历山大因以官方身份出席的要求遭到拒绝而未出席典礼，受降仪式也未悬挂法国国旗[307]。卢汉发布的受降布告中称，“中国军队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未提越南以后的地位问题，只要求“各级行政机构，均一仍旧贯”，“现有行政人员，亦应各就岗位”，并强调了中国军队指挥官在接收期间的最高权力[308]。10月1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赴越视察，除了对受降具体事项有所规定外，决定“对于越南现有临时政府之态度，必须审慎，但宜保持友好立场，不可有正式公文来往，交涉最好以备忘录（无头无尾）出之”[309]。先期回重庆请示的外交部代表凌其翰也于10月上旬携回重庆的指示为：对于越盟党政权，采取不管立场，惟我国驻军必须切实掌握铁路与港口；我军受降缴械遣回日军工作完毕，即行撤回；对于越南民政机构，不必接管；对于东方汇理银行，不必接收。卢汉在得到这个指示后，进一步指示下属，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越军进入我防区即须解除武装，对越党不干涉亦不警戒，对法人生命财产尽力保护[310]。

由于国民党的谨慎政策，中法双方在越南尚能做到相安无事，只

在中国军队用费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入越受降部队15万人，其初期费用为国内携去之法币与关金券，折合越币大约在每月近亿元，入越时间既长，继续使用多有不便。10月间财政部代表朱偰回重庆请示，建议先由法国供应越币，以后再由两国政府结算，同时在当地由银行开办法币、关金与越币的兑换业务，但法方在谈判中拖延不予答复，最后行政院径行指示卢汉，请其与东方汇理银行交涉，暂行开办法币、关金与越币兑换业务，每月暂借越币4000万元，以后统由中法两国政府结算[(311)]。法国驻越代表对此仍极力拖延，经中国驻越军政当局以强力要求，方才应允。但11月20日兑换刚刚开始，法方突然宣布停用500元越币，导致市面紧张，金融混乱，关金价格下跌，越南人民也因此而不满，26日群众游行抗议，与法方发生冲突，东方汇理银行停业，此事只能暂停。中国驻越当局遂决定以强力手段解决，11月29日，财政部代表率员前往东方汇理银行，逮捕其副经理和河内分行经理，强制执行兑换，并加借军费至其已允之每月5500万元。12月4日，中法就此事达成协议，500元越币照常使用，每月兑换额由华侨、法人和越人按一定比例兑换，中国部队机关的兑换由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审核后，开据证明兑换[(312)]。

法国对于战后重新确立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地位是孜孜以求的。1945年9月，法国军队在英国支持下开入越南南部，而中国军队则成为他们开入越北的主要障碍。如同戴高乐所说："中国军队占领着北部和中部以及老挝的一部分，却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将长期受到阻碍。"[(313)]为了尽快消除法国人眼中的这种障碍，法国在对华关系上作出了若干姿态。1945年8月18日，法国与中国签订了《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同意将广州湾租借地提前交还中国。在西方各大国中，法国因为战争缘故，是尚未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的国家。11月，中法两国就此进行了初步谈判，在其他问题上，因有中美、中英新约成例可循，故谈判的重点集中在有关中国在越南的利益问题上。主要有：1．华侨问题。越南是中国大量侨民的聚居地，他们在法国殖民时期受到种种歧视性待遇，中方在谈判中提出，

在越华侨的历史传统和习惯性权利（如使用中文等）应予保持，在居住经营等方面应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法方应取消向华侨收取的身份税，华侨应享受与法籍居民相同的法律待遇；2．国际交通运输问题。因中国滇、桂两省对外联系不便，长期依靠通过越南的海运，法方提出，将海防港划出自由区，使中国过境物资运输可不经检查直接通过并免缴关税和过境税；3．滇越铁路问题。中方提出，中国因日本侵略导致中越过境交通中断而遭受重大物质损失，法方表示可由中国提前赎回法国投资的滇越铁路云南段以为补偿，赎款由清算日本财产中补偿。对中方上述意见，法方并不反对，但其签约的前提是中国尽早在越南撤军交防，而中方表示撤军原则自无问题，但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中法正式谈判直到次年的2月才开始举行。1946年2月28日，中法关于双边关系的谈判在重庆结束并签订新约，法国同意交还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法租界，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以及其他特权，并确认了谈判中达成的关于华侨、海防港和滇越路地位的各点意见[(314)]。对法国而言，放弃特权是大势所趋，“不因此而受损失”，而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对于法国重新确立其在越南的殖民地位却有重要意义，“至可满意”[(315)]。

法国既已在有关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急于从越南脱身的国民党便同意从越南撤军。在中法新约签订的同时，双方以换文方式同意中国军队于3月1日至15日期间开始撤退，月底撤完，而法国每月向中国军队垫付越币6000万元[(316)]。3月4日，军令部指示驻越军司令部，法军可自海防登陆开始接防，至月底完成。当晚第一方面军与法方谈判接防日期，法方要求允许法军于6日在海防登陆。陆军总部代表陈修和以未接到重庆命令和法越谈判正在进行为由表示反对，而第一方面军因卢汉不在河内，不敢作出决定，谈判无结果。次日，顾问团得知后，认为法越谈判正在进行，如允许法军在海防登陆，越方必定抵抗，中国军队将处困难境地，反对法军立即登陆，参加谈判的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正在重庆）副军长赵镇藩也反对让步，刚好驻海防的即五十三军的第一三〇师，因此海防驻军决定在未接到正

式命令前拒绝法军登陆[317]。

法国为了迅速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急于派遣军队入越，因此在中法双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法方代表于3月5日向海防中国驻军提出，法军在海防登陆事已得重庆和河内中国当局的许可（事后调查此事纯属法方的欺骗），但海防驻军以未接到命令为由，拒绝法军登陆。6日晨，法军开炮轰击码头，守军还击，双方遂发生激烈战斗。法舰被击沉一艘，击伤二艘[318]。此事发生后，中法双方都采取了低调处理态度。法方表示，“双方利益在树立以后友好关系，应避免事态扩大，以中法友谊为重，地方误会宜解不宜结，不必过于追究”。中国外交部则电令卢汉，“海防事件移向外交途径处理，交防任务仍不变更”。18日，法军开入河内[319]。顾问团遂于3月底结束工作，4月上旬陆续撤离河内。第一方面军各部亦同时登轮径赴东北，6月上旬全部撤离越南。中国对越受降工作由此结束，中法关系亦因新约的签订而完成了重新定位的工作。

---

(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7页。

(2) 8月18日，蒋介石在接收大员一时未及到达情况下，任命蒋伯诚、何其巩为委员长驻沪、平代表，策应接收工作。

(3)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第36页。

(4) 行政院曾订有《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规定各部会署局可派出接收特派员，以各区受降军事长官驻在地为工作地点，受陆军总司令部指导监督。第一批派出的特派员有，京沪、冀鲁察热、晋豫绥、鄂湘赣、粤桂闽区财政金融特派员，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市四行两局接收委员，京沪、平津、武汉、广东区交通通信特派员，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绥、鲁豫晋区经济工矿特派员（《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0页）。

(5) 《邵毓麟为经济接收问题呈蒋委员长电》（1945年9月22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1页；邵毓麟：《胜利前后》，台北1967年版，第75页。

(6) 《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组织规程》（1945年10月26日），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编：《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第1辑第1页，1946年印本。

(7)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审4第134号，1946年印本。

(8) 《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11月26日。

(9) 《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1页。

(10) 《蒋主席令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转各部部长议处接收失职人员电》（1945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4页。

(11) 《我国接收敌产估计表》，“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66年版，第106—107页。

(12)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22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04页。

(13)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经济章，1946年印本，第6—8页。接收数量各家统计不一，本节各数均取其中一种。

(14)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经济部）之答复》，1946年印本，第11页。

(15) 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22—30页。

(16) 《行政院节三字第3070号训令》（1946年1月31日），《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第30页。

(17) 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28页。

(18) 《布告处理伪钞办法》（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页。

(19) 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财政年鉴》第3编（下），第10篇第5页，1948年印本。

(20) 汤心仪：《上海之战时经济》，引自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

(21)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337—338页；《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52页。

(22) 《市政所感》，《时事新报》（上海）1945年12月15日；《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4日、27日。

(23)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210页。

(24) 国民政府档案《复员计划纲要卷》，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9月25日。

(25)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4日。

(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58—859页。

(27) 《收复区隐匿日伪财产物资及军用品检举奖励规则》（1945年12月3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329—330页。

(28) 据亲历者称，检举密报办法给各级官吏又一次贪污机会，“因为密报物资的范围很宽，数目很大，又无案可稽，报来以后，可以任意以多报少，或全部吞没，毫无问题”；“而且密报查封的物资，不少系被挟嫌诬报，损害私人利益，尤属巧立名目劫夺民资”（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杜建时：《蒋帮劫收平津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9、41页）。

(29) 湘鄂赣区清查团在武汉清查时，“有的声称原始清册已经上交到南京去了，有的干脆什么清册也没有，最好的也只有接收机关自己造具的接收清册。三百多个单位的接收，全部都成了一笔无底帐可查的糊涂帐。而原来投降时移交的日本人都已经离开原单位不知去向，无法对质。整个的接收帐目，如果按照会计审查手续核其有无原始凭证，都是显然有重大贪污嫌疑，可以一起送法院治罪”（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3页）。

(30) 《大公报》（上海）1946年9月23日。

(31) 《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二档，全宗五三六，卷号56。

(32) 根据公开报道，被处死刑的官员计有，军统局少将秘书叶燕荪

（1946年9月4日），海军驻津专员刘乃沂（1947年1月16日），沈阳市工务局局长李荣伦（1947年12月9日），江海关帮办尹兰荪（1948年1月31日），北平市民政局长、原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1948年9月28日）。此外，1947年9月19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李卓敏因贪污案被停职，1948年1月21日，原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上年因贪污失职被撤职）在香港被逮捕。另据杜建时回忆，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仅贪污黄金就有400两，清查团到天津后，张“做贼心虚，唯恐有人告发，心神不安，坐立不宁”。清查团离开的次日，9月1日，市府招待记者，张致辞时已语无伦次。当晚，在游艺大会上，张忽然发生脑血管痉挛，晕倒地上，几乎丧命。不久，张被免职，杜接任市长，张贪污事亦不了了之（《从接收天津到垮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1988年印本，第10页）。

(33) 《复员计划纲要》（1944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51页。

(34) 国民政府档案《复员计划纲要卷》，引自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7日。

(35) 《收复区各项紧急措施办法》（1945年9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82—402页。

(36) 《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4月30日。

(3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0、579页。

(38) 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8—129页。

(39) 《电令南京市政府首都警察厅监视伪方简任以上官吏》，《电令各受降主官各战区各省市监视重要汉奸》，《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13页。

(40) 《电令各省市军政长官拘捕汉奸》，《电示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逮捕汉奸权限》，《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196—198、214页。

(41) 《戴雨农先生全集》，引自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0月3日。另一说称军统逮捕汉奸总数为3455人，尚不及军统人员在抗战中死难四千余人的数字（何国涛：《国民党政府惩治汉奸的真相和对敌伪产业处理的见闻》，《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1页）。

(42) 上述人员在1949年后由苏联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战犯拘留所的改造，得到宽大处理，除已死亡者外，其余人员自50年代末起陆续被特赦。

(43)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5年11月23日），《惩治汉奸条例》（1945年12月6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0—1494页。

(44)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1946年3月18日），《陈公博之答辩书》、《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1946年4月12日），《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第41—44、45—59、65—69页。

(45) 根据洪桂己的《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第766—804页的统计，台北1986年版。

(46) 《陈逆公博判死刑》、《周佛海丁默邨怎样呢？》，《大公报》（上海）1946年4月13日、8月24日。

(47) 据周佛海日记，戴笠曾“谓蒋先生对余事至相当时期必有办法”，因此戴飞机失事身亡后，周“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隐忧也”（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周佛海狱中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日记中记载了周佛海为求一命而请人四处活动奔走之情形。

(48) 《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11月7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7年1月20日），《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上），第238、272页。

(49) 《陈果夫、陈立夫为请对周佛海减等处罪致蒋介石函》（1947年1月25日），《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上），第273页。

(5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625页。

(51)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7年5月1日），《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第862页。

(52) 《中国战区受降始末》，第176—177页。

(53) 《何应钦电》（1945年8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9页。

(54) 据时人回忆，在讨论对伪军的处理时，何应钦与白崇禧主张收编，陈诚反对。主张收编伪军最坚决的恐为戴笠，他在军统局会议上说，“经我们

策反的伪军将近百万，他们对国家、对抗战，有罪无功。现在要他们对付共产党，保卫国家，用来洗刷伪军耻辱，必然全力以赴。所以，这百万伪军，我们必须善为运用。试想，如果不是靠这些伪军负责保守各个城市，我们接收能这样顺利吗？能不为共产党抢占吗？伪军是对付共产党的一股强大武力，我们不能疏忽”（刘措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63页；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9月20日）。

(55) 林蔚：《关于整军的报告》，《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

(56)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3页。

(57)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一号（1945年9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44页。

(58) 《第一战区受降纪实》，第81—84页；《广东受降纪述》，第96—97页。

(59)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政字第21号（1945年9月3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177—182页。

(60)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1945年10月），《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24—227、236—238页。

(61)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83．

(62)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7。

(63)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23．另据报告，自越南北部遣返的有30888人。而自东北遣返的日本军人数字之所以如此之少，是因为有大批军人被送往苏联，还有不少军人或是害怕被处罚或是为了在遣返时带回更多的日元而改称平民（Ibid．pp．92-93）。

(64)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1946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458—459页。

(65) 《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469页。原表总数与分列数字不一，概照原文。已处徒刑战犯包括将官2名，校官6名，尉官9名，士兵92名，其他99名。已判死刑战犯包括将官6名，校官4名，尉官21名，士兵44名，其他35名。另据1949年1月27日上海《申报》报道，日本战犯被审共

二千二百余件，其中被判死刑145人，被判徒刑四百余人，其余均无罪遣返。

(66) 胡菊蓉整理：《中外军事法庭对战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审判概况》，《史料选辑》（南京文史资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第63—64页。

(67) 《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233页。

(68)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89页；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页。南京大屠杀的其他责任者，如日本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和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因已死亡而未予审理。

(69)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15页。

(70) 据冈村宁次回忆，广州军事法庭曾一次判处40人死刑，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全部无罪释放返国（《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37、139页）。被判死刑的田中久一等人，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地区的屠杀行为和杀死被俘美军飞行员而遭美英当局追究，田中即为设在上海的美军法庭审判后押回广州执行（李汉冲：《广州受降接收纪实》，《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35页）。

(71) 《大公报》1948年8月24日。

(72)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44—148页。

(73) 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传记文学》第2卷第2期，第37—38页。

(74) 据冈村所述，“事后得知，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已下令对我重新逮捕，而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将命令扣压不发，而令我乘船归国。此外，日后在东京，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亲口告我，李宗仁也曾命令商震将我逮捕归案，经与美军当局协商结果，予以拒绝”（《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34页）。

(75)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1945年3月），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7页。

(76)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9月4日。

(77)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接收总报告》（1946年4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162页。

(78) 杨鹏：《台湾受降与“二二八”事件》，全国政协、浙江省政协、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组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79)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通知》（1946年4月9日、7月10日、5月2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机要室编：《陈长官通知辑要》第1辑，台湾省印刷纸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版，第20、26、34页。

(80) 《陈公洽与台湾》，南瀛出版社1947年版，第18页。

(81) 《来台三月的观感》（1946年1月16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1946年印本，第61—62页。

(82) 《台湾省贸易局工作报告》、《台湾省专卖局工作报告》（1946年4月—12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24、532页。

(83) 《陈公洽与台湾》，第17页；于百溪：《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19页。

(84)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39页。

(85)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令中央银行暂不在台设行事致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电》（1945年11月15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427—428页。

(86)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中国新闻社出版部1947年版，第48—49页。

(87) 《财政部档》，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0页；《陈公洽与台湾》，第70页。

(88) 《台湾的施政方针》（1945年11月3日），《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第4页。

(89)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通知》（1946年6月3、4日），《陈长官通知辑要》第1辑，第4、6页。

(90) 《台湾省公务人员概况统计》（1946年12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265—268页。

(91)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

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0页。

(92) 扬风：《台湾归来》，《文汇报》1947年3月4日。

(93) 《鲍良傅等调查“二二八”缉私血案发生经过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67—68页。

(94) 黄存厚辑：《二二八事变始末记》，扫荡周报社1947年版，第9—11页。

(95)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第116、120—124页。国民党认为，7日的要求中有解除政府武装、撤销警备总司令部等要求，“不惟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28页）。

(96)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第117、146页。

(97) 《台湾官民要停止冲突》，《大公报》（上海）1947年3月11日。

(98) 《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为挽救台湾危局致于右任电》（1947年3月19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3页。

(99) 《陈仪报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吴鼎昌等电》（1947年3月24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7页。

(100)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10—612页。

(101) 《陈仪致徐学禹》，1947年3月8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56页。

(102)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1947年3月30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08、620页。中共对于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行动当然是支持的，但台湾长期处于日本严酷统治之下，中共活动极为困难，光复后，中共在台组织与活动尚在恢复之中，远不能与其在大陆国统区的组织与活动相比。台中处委会委员谢雪红，台湾漳化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8年在上海参加建立台湾共产党，担任候补中委，同年赴台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捕长期系狱。事件期间成为台中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台共并非中共直接下属，谢是在事件被镇压、自己潜赴香港后才重新加入中共。因此，中共地下组织与台湾事件的关系，尚需深入研究，但以中共策动为事件主因显为过于夸张。如当时人所言，“台湾共党组织

战前被日人消除殆尽毫无活动能力。胜利以后如有一部分由内地潜入，但数甚微，绝无力发动蔓延及全省之民变，但地方当局为减轻责任计自不得不加重共党活动之报告”。国民党事后派往台湾调查的监察院闽浙监察使杨亮功在其报告中也承认，“共党人数甚少，亦无控制全局之力量”。至于民盟与事件的关系更是无稽之谈（《“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呈于右任关于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1947年3月14日，《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1、636、644页）。

(103) 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著：《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1994年版，第203页。

(104)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204—207页。

(1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0页。二十一师于9日到达台湾，因此不可能如蒋电所称“明日”出发，实际离沪时间为7日。

(1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0—401页。

(107) 《白部长宣慰台湾报告书》，《二二八台湾事变及其他处理台湾各案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存档抄件。

(10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3页。

(109)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死伤人数，各家统计不一。官方统计一般偏低，在2000到3000人之间，民间统计则又偏高，在1万到5万之间，甚而有估计多至十余万人。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兼之时日的流逝，确切的统计数字也许已经难以得出（参侯坤宏：《“二二八事件”有关史料与研究之分析》，《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6期第62—63页；《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368、370页）。

(110) 《主席三月十四日寅寒府交代电》，《二·二八台湾事变及其他处理台湾各案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存档抄件。

(111)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第163—164页。

(112) 据罗隆基回忆，龙云是民盟秘密盟员，龙经他和中共建立了联系，龙还指定缪云台代表他，罗代表民盟，加上中共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组成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派反蒋的问题（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8页）。龙云秘密参加民盟一事，也为其他一些民盟人士所证实（王昆仑、楚图南：《怀念龙云先生》，《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

(11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5页。

(114)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7页。

(115) 《李宗黄回忆录》，引自《一二一运动》，第419页。据李宗黄回忆，1945年内，蒋为了云南问题，曾经五次召见他，面授机宜，可见蒋对处理龙云颇费心机。

(116) 在越军队中央系与滇系数量大致相当，驻地互为牵制，至昆明事件前，蒋介石又调第五十三军向越南推进，以加强对滇军的控制。卢汉地位居龙云部下之首，与龙的关系既密切又难免矛盾之处。蒋在解决龙云前，亲书致卢汉函，告以将调龙云到中央任职，并任其为省主席，“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范承枢：《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第73页）。

(117) 据时人回忆，9月下旬，已有人要龙云提防蒋介石的阴谋，但龙云没有重视，他认为在战后的和平气氛中，蒋不至下手，即使有事，卢汉部队也会迅速回滇。事后龙云曾责卢汉和滇军其他将领没有“闻讯火速回军”，并要卢一旦国内和平局面破裂，即通电反蒋，打回云南（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22、28页）。

(118)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1—44页。杜文所记时间为29日晚，疑有误，因龙云撤职命令为10月2日下达（杜文误为9月30日），故李宗黄回忆的10月2日在时间上更为合理。

(119) 据昆明防守司令部发言人对报界称，“此次中央部队奉命接收地方部队防务均持有中央命令，直接送交各部队，其中有少数不明大义者，未遵中央命令，不幸发生局部冲突”。在冲突中，中央部队死24人，伤71人，干训团伤54人，地方部队死48人，伤29人（《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7册，第206页）。

(120)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0月2日。

(121) 张第东：《回忆六十军起义前后》，《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06页。

(12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7页。

(123)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6日。蒋对杜的处分不过是做姿态而已，杜旋被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124) 不仅三区起事前的宣传组织工作得到苏联的支持，而且三区起事

后苏联直接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并派兵参战。三区民族军第一任总指挥便是一个俄罗斯人（参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5) 11月7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伊宁成立，艾力汗·吐烈任主席。有关情况请参《赛福鼎回忆录》、《新疆革命史》等著作。

(1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735页。

(12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9页。

(12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1页。

(129) 《张治中回忆录》，第41—42页。

(130) 《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公署新苏外交档》第15号，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802—6803页。

(131) 《张治中回忆录》，第422页。

(132) 新疆省政府秘书处编：《新伊和平谈判》会议卷第1号，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6810页。

(133) 新疆省政府秘书处编：《新伊和平谈判》会议卷第1号，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6813—6814页。

(134) 《张治中回忆录》，第437页。

(135) 《新疆日报》1946年1月3日。

(136) 《新疆日报》1946年1月3日。

(137) 《新疆日报》1946年4月10日。

(138) 《新疆日报》1946年6月7日。

(139) 1946年11月，三区代表去南京参加制宪国大，阿巴索夫与董必武会见，要求中共接受三区的人民革命党为下属组织，请求中共派人指导人民革命党工作，中共同意与其建立友谊关系，派代表前往联络与观察，欢迎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加入中共（《赛福鼎回忆录》，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3页）。

(140) 《新疆日报》1947年3月25日。

(141) 赛福鼎：《天山雄鹰》，第137页。

(142) 《张治中回忆录》，第661页。

(143)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

(144) 国际出版社编：《蒋主席最近言论》第1辑，国际出版社1945年版，第5—6页。

(145) 《傅秉常致外交部电》（1945年9月25日），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525—1526页。

(146) 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陈大维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74页。

(147)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第1534—1535页。

(148) 《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1月6日。陈立夫等人曾主张，中国对外蒙独立最好是保持沉默，不必以公开声明方式留下历史的记录。王世杰等则主张，承认外蒙独立不可延搁，以示我方之守约。陈立夫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决定承认外蒙独立，是因为他担心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会影响到中苏条约的效力，从而对国民党不利（Chen Li-fu Materials，p．70，*Chen Li-fu Collection*， Box 48．《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2日）。

(149)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第1541页。

(150) 《鹰犬将军》，第246页。北塔山所在的阿山地区专员乌斯满原为三区领导人之一，后因与三区方面发生矛盾，退居阿山地区，并在三区武装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至北塔山附近。因此，张治中和宋希濂当时均认为，北塔山的冲突不仅仅是边境纠纷，外蒙还有与三区方面配合，消灭乌斯满势力的意图。宋希濂在回忆录中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任何结论，还不能彻底弄清楚外蒙古军队当时进攻北塔山驻军的真正动机”（《鹰犬将军》，第233、248页）。

(151) 据马希珍报告，有苏联飞机参战，但张治中认为，马系行伍出身，对苏、蒙军队标志分不太清楚，所谓苏联标志飞机参战并不可靠（《张治中回忆录》，第531—532页）。

(152)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6月12日。据宋希濂回忆，蒋介石当时想派白崇禧到新疆视察，但为张治中反对而未成行。张其后告宋，“白健生以反苏反共著称，现在北塔山事件又牵扯到苏联，他一来，必然引起苏方的严重不满，我们都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人所代表的伊犁势力，是有其背景的，现在我们和伊方，正处在紧张和微妙的阶段，白健生在这个时候到新疆

来，不啻火上加油，会使局势更为不利”（《鹰犬将军》，第253页）。

(153) 孙福坤：《苏联侵略北塔山的症结及经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776—778页。

(154) 《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外交军事三专门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外蒙军侵入新疆问题报告书》（1947年6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789页。

(15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3页。

(156) 《中宣部第五十次宣传通报》，二档，全宗一八，卷号987。

(157) 《蒋廷黻自纽约致外交部电》（1947年8月1日），二档，全宗一八（二），卷号160；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第1573页；《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6—117页。

(158)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34—40页。

(159) 《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27日。

(160) 本段资料均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644、651—667页。

(161) 狄超白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7），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版，第9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1、244页。

(162) 中国经济一向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由于战后整个形势的不稳，此种统计更为缺乏，各家统计不一，公布数字与实际情况又不一，更由于币值变动的频繁，许多数字已经失去了比较意义，因此本节各目引用的有关经济数字，只是就现有较为可信的研究选择若干统计，目的更多的是提供一种参照，以估计中国经济在战后的地位。

(163)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6—647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30、142—143、146—147页。

(164)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3、793—796页。

(165)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00、646—647页。

(16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791页。

(167)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56、584页。

(168) 知名工商业家刘鸿生曾经坦承："如果从生意人的角度说，那几年我确实是赚了一笔钱。但是从一个搞实业的人来说，我们企业在那几年中几乎全部停顿了。因为当时只要生产，必定赔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页）因此在生产活动日渐萎缩的同时，商业和金融业显得十分活跃。上海棉布商业同业公会会员，从1946年3月的813家，增至1948年4月的2115家，为战前的三倍。百货批发商从战后初期的244户，增至1946年5月的372户，为战前的近四倍。全国商业银行数从1936年的132家，猛增八倍以上，达到1947年的1210家，还有超出此数两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可见投机风之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69—671页）。

(16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页。

(170) 行政院新闻局编：《全国粮食概况》，1947年印本，第15页。

(171)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172)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

(173)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04页。国民党的扶植自耕农计划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政府征收土地，放给农民耕种，乙种为贷款给无地农民，购地自耕。前者在七个省份试行，后者在十一个省份试行，但数量均极为有限。

(174)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46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03—104页；《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地政部）之答复》，第34—35页；《中国经济年鉴》（1947）下编，第40页。

(175) 《绥靖政工手册》乙编，1946年印本。

(1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1页。

(177) 《绥靖区之中心工作》（1946年11月18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45页。

(178) 《绥靖区施政纲领》（1946年10月31日），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编：《绥靖区行政法令汇编》第1辑，1946年印本，第1页。

(179) 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为行政院下属机构，由行政院长兼主任，国防部长兼副主任，负责处理绥靖区之行政、经济、文教等问题，然实际作用不大。

(180) 《关于“收复区”地主还乡清租倒算的情况》（1946年12月5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页。

(181) 《绥靖区难民还乡团组织办法》（1946年8月10日），《绥靖政工手册》丁编22目。

(182) 关于抗战胜利后的土地问题，参见本书第十二卷。

(183) 1943年11月9日，43国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约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处理战争善后救济问题。该机构中央委员会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下属委员会之一的远东委员会主席由中国代表担任。联总在中国设有办事处。

(184) 蒋廷黻：《善后救济总署》，1946年印本，第28—30页。

(18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基本协定》（1945年11月14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43—1350页。

(186) 浦薛凤：《善后救济工作报告》，《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71—74页。

(187)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225-226．

(188)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2月27日。

(189) 成润等：《回忆解总沪办》，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190) 成润等：《回忆解总沪办》，《上海周公馆》，第299页。

(191)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22—723、727、731页。所有统计均包括东北，外国资本比例已见前述。

(192) 只有在商业资本领域，民族资本占90％以上的压倒优势，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商业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为主，故私人资本占据优势；二是国家资本中的商贸机构大户，如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等被列入了其他部门。

(193) 王亚南：《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文汇报》1947年3月25

日。关于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仍有争论，一般而论，国家资本较接近于经济学的概念，而从中国特定经济史或政治史的角度而言，官僚资本的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根据叙述时的不同情境，两个概念并用。至于两个概念本身的含义及相关争论，请参有关著作。

(194)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第767—768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25、666页。

(195)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经济部）之答复》，第6页；《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附件，第22页。代表民族资本的全国棉纺同业联合会对于中纺公司的成立“深表诧异与不满，认为不特违背国家既定之经济政策，且系与民争利”。有参政员提议，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国家资本为后盾，供少数人盘踞利用之”，“害国病民，此为尤甚”，要求停办中纺公司（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页；《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审4第47号案）。

(196) 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28页。

(197) 台北“国史馆”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82、131、142页。

(198) 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199)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资源委员会）之答复》，第4页。

(200)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03页。

(201) 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32页。

(202)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引自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203) 《国民参政会关于严厉清除官僚资本的建议》（1946年8月20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402页。

(20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114、123页。

(205) 《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第40—44页；《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03—104页。对于征借巨富外汇的建议，行政院答称，财政部拟有征借人民外汇资产办法草案，并由外交部向英美政府商洽，但困难为英美政府在法律上并无强迫银行商号申报存户姓名数额之权，故此项建议似已无法进行（《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附件，第3—4页）。

(206)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98页。

(207)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21、168页。

(208) 《行政院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活动报告（财政金融经济部分）》（1946年10月），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

(209) 《宋子文政治报告》，《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第70页。

(210) 《行政院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活动报告（财政金融经济部分）》，1946年10月，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488页。

(211)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212)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第95页。

(213)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50页。

(214)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96、898—899页；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5页。

(21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71页。

(216) 《历年总预算数与物价增长倍数比较》，二档，全宗六，卷号2462。

(217)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志信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5页。

(218)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77—78页。

(219) 贾士毅：《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版，第11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84、168—170、335—337页；杨培新：《中国通货膨胀论》，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53—54页。

通货膨胀甚至对于上层高官也不无影响。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1946年每月工资收入十余万元，但开支需四十余万元，其妻每与他争吵，他也感无可奈何。以唐纵这样的高官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百姓（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5页）。

(220)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8页。

(221) 对于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给国民党政权带来的严重后果，当时和现在、国民党内外、中外人士和研究者的看法有相当的一致性。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财政金融经济的决议中认为，“风气败坏，军纪废弛，行政效能低落，其最大原因，首为军警公教人员，生活待遇之未尽合理”（《财政金融经济决议案》，1946年3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36页）。美国学者认为：“层出不穷的事例说明，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普遍的对于政府应付日渐恶化的经济形势的能力丧失信心，是政府诱使人心归顺的企图失败的根本原因。”（Pepper，Suzanne．*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p．9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8）

(222) 宋子文：《在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1946年3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17—18页。

(223) 宋子文：《在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1946年3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21页。

(224) 有批评者认为，宋氏此举无异以合法方式将国家财产转入私人腰包，证据是孔、宋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从1946年3月开放外汇市场，直到1947年2月黄金风潮爆发，共计结汇33，447万美元，占同期售出外汇总数的88%。这些以官价得到的外汇或用于进口原禁止进口的物品以赢利，或直接出售赚取差价。此事被《中央日报》透露后，在官方压力下，报纸其后发出更正，称小数点点错，使总数一下减少了99%，成为334万美元（漆敬尧：《小数点的玄机化解一场政治风暴——独家采访宋孔家族利用特权结汇谋取暴利新闻的一段往事》，《传记文学》第54卷第1期第67页）。孔、宋家族通过官价与黑市价的差价套汇谋利当为事实，但孔、宋两家即便权势显赫，能否一举得到88%的出售外汇，尚需更确切的资料证实。据财政部和经济部上蒋介石呈文，孚中公司结汇153.8万美元，扬子公司结汇180.7万美元。监察院和审计部的联合调查，则称孚中公司结汇158.5万美元，扬子公司结汇182万美元。然而，即便是334万美元，在当时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财政部档》，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

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842—843页）。

(225) Strictly Confidential，Jan．1 1946，*Arthur N．You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现金收入总报表》（1947年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39页。盎司与中国旧市制的两基本持平，即1盎司约等于1两。

(226) 《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2月26日。

(227) 暗售数量远远大于明配，1946年全年明配为42，100条，暗售则达231，600条（《中央银行档》，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0页）。

(228) C．Y．Pei（贝祖诒） to T．V．Soong（宋子文），July 22，1947，*Arthur N．You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229)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75页。

(230) 按1946年2月公布的法币汇率，较战前贬值约585倍，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战前的1759倍，汇率高估2倍，考虑到后方物价指数较上海为低，汇率高估也至少在一倍以上。

(231) 据估计，战后上海一地的游资即达8000亿元之巨，按官定汇率合4亿美元，它们在市场上寻求高额利润，兴风作浪，对央行的外汇自由买卖政策是巨大的压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72页）。

(232) 调整后的汇率为战前的971倍，但此时上海物价指数已达到4285倍，法币币值仍为高估，因此对减少进口作用不大，9、10两月外贸月入超已高达1800亿元。

(233) 此前出售外汇已经达到38155万美元，此后直到实施经济紧急措施时为止，出售外汇锐减为2011万美元（《财政部档》，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835页）。

(234) 据监察院调查，中央银行自开始买卖黄金，逐日均有详细英文报告一份呈宋子文，而自1947年1月起，每星期始向蒋介石及财政部报送统计（《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黄金风潮呈文》，二档，全宗二九三，卷号69）。

(235) 据监察委员的调查，各机关部队均以紧急支付命令提款，“间有军事机关人员以种种威胁方法胁迫提款”，用以黄金炒作。仅1947年1月，一次

提出1亿元以上之款项者即有293起，总数超过1000亿元。据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亲历者回忆，载有军饷现钞的轮船未及出港即卸下钞票参与黄金投机，亦有各地军政长官嫌汇款太慢而包飞机运钞参与黄金投机者，“中央银行由南京往北运送钞票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掉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黄金风潮呈文》，二档，全宗二九三，卷号69；Wu Kuochen Memoirs，*Wu Kuochen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236) 四联总处此时发出650亿元的生产贷款，名为恢复生产，实际早晨发出的贷款支票，下午已经出现在黄金市场上，对黄金价格可谓雪上加霜。

(237)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68—169页。

(2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85页。

(239)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国民参政会报告》（1947年5月23日），《银行周报》第31卷第24期。

(240)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2月17日。

(241) 何汉文：《记上海黄金风潮案》，《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43页。

(242) 《财政部档》，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44—745页。

(243) Strictly Confidential，Jan．1，1946，Feb．28，1947．*Arthur N．Young Papers*， 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244) 自1944年4月到1945年6月，中央银行实行买卖黄金政策期间，共售出335万两，收回法币838亿元（《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财政章，第5页）。此次黄金潮中消耗的黄金数尚不及前次之大。

(245)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世纪评论》第7期第5—8页，第8期第7页。

(246) 宋子文一意垄断战后接收产业和物资处理权，扶植与重用其所属部门和部下，早已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满，在一年前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系便借东北问题发难，对宋发动过不指名的攻击，陈立夫并曾当面指责宋之经济政策的不当。孙科亦公开批评“主管当局对（经

济）政策方面，颇有若干错误，以致发生了不良的恶果”（《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0月9日）。黄金风潮为所有对宋不满的派系和个人攻击宋子文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王世杰认为，导致宋下台的原因有三个，一则党内陈立夫等及黄埔同志等均对彼不满，二则党外之民主社会党一再声称如宋继续主持行政院则彼等决不参加，三则胡适之傅斯年等无党派人士均反对宋子文（《王世杰日记》1947年3月1日）。

(247)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01页。有研究者认为，宋子文下台的根本原因除了经济危机之外，还与宋恃才自傲、难以驾驭有关。宋较具西方经济理念，主张经济政策的规范，不能如蒋所愿任意动支。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派陈诚多次向宋催索军费，遭到力图减少货币发行的宋子文的冷遇和拒绝，使蒋甚为不满。联系到1933年宋子文辞职即是因为不愿破坏财政收支程序滥发军费而起，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506页）。

(248) 《行政院长易选》，《东方杂志》第43卷第6期，第82页；《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53页。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宋子文擅作主张耗空国库资金仍耿耿于怀。他在国民党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民国卅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1952年10月13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7辑，台北1978年印本，第86页）

(249) 《监察院对宋子文黄金舞弊案的弹劾书及审查报告》，二档，全宗八，卷号1362。

(250)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49页；《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63—64页。

(251) 《经济改革方案》（1947年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91页。

(252) 贝祖诒被弹劾后，张嘉璈特意找到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请其与司法行政部谢部长冠生接洽，勿再重生枝节”。此事最终以贝受申戒了之（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37页）。

(253) 《监察委员何汉文等弹劾黄金风潮负责人员呈文》，二档，全宗

二九三，卷号69。

(254) 据何汉文当时调查，五家指定金号资本不过4610万元，最高的同丰余不过区区1500万元，然而1947年头2个月配售量近8万条，其中同丰余一家超过4万条，如果以每条400万计，流通资金额为五家总资本的6500倍，为同丰余资本的1万倍以上，资本额与经营数极不成比例，内中必有奥妙（《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黄金风潮呈文》，二档，全宗二九三，卷号69）。

(255)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80—81页。

(256) 严仁赓：《检讨黄金政策》，《世纪评论》第8期第10页。

(257) 《由上海市场看国家需要》，《大公报》（天津），1947年2月7日。

(258) Chen Kuang-pu Memo．，Feb．13，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 Box 8，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259) 《行政院长易选》，《东方杂志》第43卷第6期，第83页。

(260)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大公报》（上海），1947年2月17日。

(261)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05页。

(262)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28页。

(263) 本节分目叙述了战后中国的一般外交及与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中苏关系主要涉及东北问题，已在第四章叙述，本节不赘。

(26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9页；《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外交章，第1页。

(265) 建交国数量见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页。

(266) 关于中美商约问题，本节下目将专题叙述。中苏条约问题已在本书第十卷中叙述。

(267) 徐林仪编：《战后中国的两条路线》，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39—40页。

(268) 《请政府贯彻护侨政策迅速厘定具体实施办法并选择贤能熟悉侨

情人士负责执行以期实收效果案》，《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提案原文》，审一第10号。

(269) 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上的报告》（1947年5月22日），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722页。

(270)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2—83页。

(271) 《为千万华侨呼吁》，《大公报》（上海）1947年2月4日。

(272) 苏联的理由是，非签字于投降条款之国家，不得参加对该国和约的讨论。1945年9月伦敦五国外长会议期间，英国提议五强可以参加和约讨论，曾得到苏联同意，可是苏联很快又出尔反尔，坚持原议。

(273) 《驻法大使钱泰关于巴黎和会致外交部电》（1946年7月6、8、12日），二档，全宗一八，卷号233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3页。

(27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08—609页。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公开表示，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有助于管好全世界的事呢。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告诉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为了保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必须尽快解决国内问题，否则就将失去这种地位（同前第6分册，第75页）。

(275) *Directory of 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A Guide to Nearly 400 American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p．6．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d．，New York．1946．

(276) Julia F．Gosgrove，*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1943-1946*，pp．117-118，Ann Arbor，1983．

(277) Report by JCS，Oct．22，1945，S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279．

(278) 《外交部上行政院呈文》，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

(279) 新《公司法》对公司如此定义的原因，一是防止外商皮包公司在中国买空卖空，以及在其属国与经营国同时享受优惠待遇，二是防止国内资本抽逃国外，再以外资名目出现。

(280) *United State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pp．

182-183．

(281) 《中美商约谈判记录》，引自任东来：《试论一九四六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8页。

(282) 《经济部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意见书》，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

(283)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153页。

(284)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初步谈判报告书》，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

(28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9—1451页。

(286) Raymond Dennett and Robert Turner，eds．，*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9，p．577，New Haven，1950．

(287) 该条约的有些规定文字上仍然不平等，如第26条第4款规定，美国给予古巴和菲律宾的贸易优惠不适用于该条约。更重要的是，美国坚持移民法规中涉及中国的条文仍然适用。1943年，美国废除了《排华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此后美国实行移民的国籍配额制度，以各国1920年在美人数的1％的六分之一为基数，而1920年的美国已经实行排华法律三十多年，当时在美华人数比1882年还少近五万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的华人移民配额与别国配额相差悬殊，因此这个配额对于中国仍然是歧视性的。

(288) 《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1月5日。

(289) 《评中美商约》，《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6日。

(290)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7日。

(291) 《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4日。

(292) 《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1月29日。

(293) 如何建立新的、涉及全球发展的、基于自由贸易体制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世界面临的新问题。美国所希望的，是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利于美国资本的扩张。中方在讨论商约草案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经济部认为，美国“意旨在将其近年来所主张之自由思潮与经济政策施诸于商约条款，以为今后美国与他国商订商约之范形，藉为推行其世界政策之滥觞”（《经济部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意见书》，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此时这一国际经济秩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如何理

解并在实践中运用，作到真正有利于缔约双方的互惠利益，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合过程。

(29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1，p．223．

(295) Cheng Yui-kui，*Foreign Trade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p．180-182，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Washington D．C．，1956．

(296) 《蒋主席最近言论》第1辑，第9—10页。

(297) 外交部欧洲司：《收回香港问题》（1945年8月），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636页。

(298) Truman，*Year of Decisions*， p．379．

(299) Truman，*Year of Decisions* ，p．380．［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卷，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年版，第3037页。

(30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13—814页。

(301) 尹骏：《胜利后国军率先光复香港记》，《传记文学》第46卷第3期，第19—20页。

(302) 1946年6月，蒋介石会见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大使，告以香港问题务设法早日解决。王世杰称此一问题尽可觅得解决，而不影响双方之实际利益。王世杰还要顾维钧向英国外相当面提出香港问题（《王世杰日记》1946年6月13、14日）。

(303)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外交部）之答复》第52页。

(304) 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人胡志明、越南国民党领导人武鸿卿和革命同盟会领导人阮海臣等，战时均在中国从事越南独立活动，后两者还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支持。主管受降的中国陆军总部和赴越第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多主张支持越南独立。陆军总部最初拟定的赴越受降指令中，并未提及与法国的关系，没有考虑将越南交还法国的问题（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22页）。行政院驻越顾问团也多倾向于这种意见。

(305) 据外交部驻越代表凌其翰以后回忆，蒋介石曾在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达成默契，战后越南不交还法国，而由国际托管并最终实现独立。但由于史迪威事件的发生导致美蒋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突于1944年10月10日接见戴高乐的法国政府驻华代表，表示“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

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28、32页）。因此，国民党不准备介入战后越南问题的立场实际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决定了。而在国际上，英国坚决支持法国，并允许法军在越南南部登陆，美、苏由于战争末期已与法国达成了默契，同意法国成为战后五强之一，因此也不再提越南独立问题，中国缺乏支持越南独立的国际环境。

(306)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4、10页。由于卢汉等人对法国重回越南持消极态度，9月19日，法国总理戴高乐对在巴黎访问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抱怨，中国占领军的态度使情况复杂化了，但宋向其保证：“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军投降内幕》第38页）

(307) 原驻越法军一部在1945年3月日军接管越南后退入中国，驻在云南蒙自。日本投降后，他们向中国陆军总部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目前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维希政权瓦解，要求贵部协助我军重返越南，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陆总答以：四国波茨坦公告，并无法国代表参与其事，未闻法军可以受降，我总部无权擅自改变盟国共同的决议，碍难照办。因此法方代表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受降仪式（万金裕：《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35页）。

(308)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21页。

(309)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31页。

(310)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35页；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15页。

(311)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49页。

(312)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74页。

(31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314) 《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1946年2月28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62—1369页。

(315) 《尹凤藻致外交部电》（1946年3月4日），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651页。

(316) 《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关于法国供

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1946年2月28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71—1375页。

(317)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7—28页。

(318) 冲突发生后，中法双方战地指挥官签约，法方承认此次事件由法军负责，赔偿海防居民财产损失，今后不再偷袭海防，中方释放法军被俘人员（王理寰：《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军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52—153页）。

(319) 《尹凤藻致外交部电》，1946年3月14日，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651页；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125页。此时顾问团仍建议，在海防事件未解决前，应以第五十三军留在越北，要求法方赔偿损失。结果行政院回电，“以事关军事，非本团职责，颇有斥责之意”。陆军总部驻越代表陈修和建议何应钦以三个军驻越，而“万不可以区区经济利益，尽忘前仇，弃友援敌，自拆藩篱”，电文由何转蒋后无下文。据卢汉致外交部电，海防冲突发生后，各种意见大略为：1．不准法军登陆；2．海防突变后应借此拒绝登陆，不予交防，以造成推翻协定之外交；3．迟延交防，同时故意利用法军对华侨生命财产确有危害之事实，即借武力以解决其武装，就此使中法协定被破坏；4．交防后，应将海防事件解决后方能撤兵，以便护侨。可见当时反对立即自越南撤军的呼声很高，但这均不合主政者的既定政策。王世杰曾数电卢汉，催其尽快交防撤退（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125页；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5页；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100页）。

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一节　东北局势的演进

一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企图

东北面积占全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铁路长度占全国的一半，可谓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东北工业，在中国并不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1943年的统计，东北的钢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左右，煤产量占一半，发电能力和水泥产量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全国举足轻重。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占领，国民党势力无法插足，而随着日本对东北统治的日趋严酷，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也受到压制。尽管如此，东北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重要性是双方都不会忽视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接近胜利，国共双方都开始考虑战后东北问题。蒋介石曾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1)] 的确，国民党如据有东北，不仅可以占有东北的工农业资源，而且可以对中共的主要根据地华北构成合围之势，战略上将占据极大的优势，这也是国民党忍辱负重签订中苏条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还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已经开始了战后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最

早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政学系。当时，在熊式辉任局长的中央设计局下面成立了一个东北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由沈鸿烈主持。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改组后方东北各省政府，作好接收准备；训练接收干部；处理好对苏对共关系[(2)]。在此之前，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在重庆多次讨论过东北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为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定会要求苏联参战，而苏联进入东北必然对中共有利，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他们提出了五点意见：一、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东北的具体情况，将东北划为九省；二、以三民主义为东北总的施政方针，保障人民自由，成立地方民意机构，实行民选，限制私人资本，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三、以一部分国军长住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同时改编伪满军队，作为辅助；四、将日本在东北的公私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对东北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五、人事上避免一党专政色彩，争取中间派的合作[(3)]。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东北施政方针的某种中立色彩换取苏联的支持，以确保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但国民党战后在东北的施政并未能照这几项建议办理。

1945年6月9日，蒋介石召见熊式辉，指示对上海、平津、东北接收工作早为准备，并提出由熊负责上海，张群负责东北。然而政学系的如意算盘是，张群在中央运作，操控政局，熊式辉出任东北职务。因此，熊向蒋坚辞去上海的使命，而蒋确也离不了张群在中枢的谋划。最后，蒋同意由熊负责战后东北政治，张治中负责东北军事。但政学系不愿东北这块肥肉落到别人手中，便四下活动，终使蒋同意由熊“专任东北，文白任西北事”[(4)]。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九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六九次常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由国民政府公布，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综理一切”，并“得就近指挥监督东北各省区内行政机关”（1946年9月22日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

辕）；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二个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在长春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同时决定东北行政区划改为九省：即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9月19日，立法院通过东北改划省区案，次年6月6日，正式公布各省行政区划）[(5)]。9月1日，熊式辉被任命为东北行营主任。其后，熊又兼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多为原东北知名人士和将领，以安抚东北人心），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何柱国为参谋长（后因何双眼失明，改任董英斌），组成了东北接收的一套班子。10月8日，关麟徵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26日，关与因昆明事变而为龙云所极不满的杜聿明对调，杜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9月1日，东北行营筹备处在重庆开始办公，主要是遴选行营工作人员，准备接收计划。在此前后，熊式辉与宋子文、陈诚、陈立夫就接收东北的有关经济、军事、党务问题交换过意见，但都未涉及苏联和中共对东北的态度问题，外交当局亦未对外交交涉作什么指示。由于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对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持乐观态度，他们似乎对具体接收方案并未下多少功夫。奉召自美国回来参加接收的张嘉璈，在重庆盘桓近月，只参加了行营政经两会的两次联席会议。当他得知中苏间对东北接收移交程序并无具体规定，而行营上下盲目乐观，不禁感慨万端。

蒋介石比他的部下们考虑得多一些。日本投降后蒋就不断接到密报，中共军队正进入东北。在蒋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建议迅速派兵去东北，同时力控华北，抑制中共北上企图[(6)]。美国也向国民党建议：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将来在和平会议上对国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7)]。这引起了蒋的重视，尤其是中共军队占领山海关的举动，使蒋认为东北“驻

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8]。9月11日与13日，蒋两次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速向美方商洽运送军队去东北事，否则，如“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亦未可知也”[9]。但因调派军队需要时间，而且蒋此时更关心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东南沿海一带的接收，他最初还是将接收东北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协助上[10]。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称：“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蒋表示今后建设东北的方针是：“第一，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奠定建设的基础。第二，我们也要获得盟邦的援助，以完成建设的全功。”蒋特别表示：“至于希望盟邦协助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援助和技术上的协力而言。尤其是对我盟邦苏联业已订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此后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东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我东北同胞必须重视这个友谊，真诚相处，以增进两国的邦交，实现我们国父共同奋斗的遗教，完成我们建设的大业。”[11] 这个演说对苏表示友好，从中可见当时国民党寄希望于苏联的心态。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军业已开始自东北部分撤离，主力将于当月下旬开始撤退，11月底撤完，请中国接收人员在10日后到长春与苏军统帅接洽。同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中国军队将于10日自九龙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不料苏联于5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询问中国军队此次登陆目的何在，又于6日正式答复称：“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12] 虽然9日外长王世杰会见苏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对条约所规定之义务，必完全履行”，但中国派兵到东北登陆，“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13]。但苏方并未接受王的解释。苏联为何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及在东北各港登陆，

牵涉到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本原因是苏联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已经充分暴露了它对东北的企图，它对美国背景浓厚的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入东北，进而导致美国插足东北，威胁自身利益，持有相当的戒心。无论如何，苏联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一事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预示着东北接收不会如国民党预期的顺利，但这仍未引起国民党足够的重视。

10月9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等先行到达长春，准备行营到后的工作事宜。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一行飞抵长春。国民党接收东北的领导机构姗姗来迟，与中共争夺东北动作的迅捷恰成鲜明对比，此时中共东北局已在沈阳工作了近一个月，中共已有好几万部队在东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熊等由苏方指派的抗联人员担任警备工作，行营用款也因既无旧币亦无新币又不能向苏方借用而无法解决。张嘉璈因而感觉“不易自由行动”，“如同身在异国”，认为这是“中央有关各部尤其外交部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尚缺乏经验，不能于事前缜密准备”的结果[(14)]。一叶知秋，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前途由此可知。果然，13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见。马氏表示，苏军已遵约开始撤退，希望中国照约接收，但对熊等提出的部队登陆、协助运输、恢复交通、行政机关接收等几个关键问题，马氏均未作出使国民党满意的答复，而推之以“无权”，或须“请示”。在国民党最关心的部队登陆和运输问题上，马氏对登陆事不表反对，但请自便，对运输事，则称铁路正用于苏军撤离，并有几处发生鼠疫，因此不能相助。相反，马氏却提出东北反苏组织问题，要求国民党“注意并设法阻止，否则苏方将采取严厉处置”[(15)]。事后，张嘉璈和蒋经国对此次会谈最深刻的印象都是，“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入东北”，“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结论是“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16)]。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军海运登陆、接收东北采取如此态度，完全出

乎国民党意料，且因事先没有准备，使其措手不及，极为被动。国民党只好改变原定计划，“以交涉我军登陆及出关二事，作为中心工作”[17]。而国民党所可依据的只有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其中的有关条款较为模糊，并无接收程序的具体规定。虽然在有关附件中有国民政府可“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的规定，但又规定“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且应“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有此效果”[18]。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一切行动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

经过与苏方的几次交涉，苏联坚拒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的态度毫无松动。10月下旬，熊式辉回重庆请示东北接收问题。18日和23日，蒋介石两次会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请其向斯大林报告，“根据中苏同盟关系之精神及感情，苏联即能予我帮助。我军在大连登陆，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谈到条约根据，大连为我国领土，主权属我，为条约所保障。如果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反为破坏条约。……我个人请他根据友谊关系，予我回答”[19]。但苏方未予置理，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大连登陆方案，25日改提在营口、葫芦岛两港登陆的方案（国民党也曾提过安东港登陆的方案，但苏方答以安东属另一战区管辖而未同意）。对苏联的态度，蒋似还抱希望。10月29日，杜聿明到东北与苏军接洽登陆事，行前向蒋介石请示：“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国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只强调“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20]。他还针对苏联所提“反苏活动”事，指示熊式辉：“苏方顾虑两国合作之事与人，吾人应特别注意，竭力避免。”[21] 希望以此示好于苏方，得到其协助。

然而，苏联并未因国民党示好而改变其态度。相反，自10月下旬起，“苏方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25日，苏军搜查了长春国民党党部，切断了行营电话，在蒋经国与马氏顾问巴佛洛夫斯基的谈话中，

苏方甚至提出行营应对反苏活动负责，并询问“行营既为收复事而设，可否取消”[22]。11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的会谈中告诉熊：营口、葫芦岛已“被十八集团军所占，苏军已经退出”，故对国民党政府军登陆事“不能负责”；苏军已“由南向北撤退，至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至于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至此，熊式辉等与马氏会谈五次而一无所得，熊不能不对马氏表示：行营到东北后，“毫未展开工作”，军队不能登陆，“行政方面，不能着手编练团队，不能接收铁路邮电金融等机关，不能派员赴各地视察，致一切接收准备皆无从进行。以上事实，不符合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诚为遗憾，万一接收部队不能按时到达，而影响整个东北之接收，此责任应由贵方负之”[23]。一位美国研究者这样评论：苏联对国民党军队登陆一事的阻挠，“为中共军队深入满洲并从苏军遗下的库存中得到日本武器提供了时间”，“这几个星期至关重要，它在控制满洲的较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4]。

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尤其是指望军队一到，“一切可迎刃而解”。然而苏联表面上不反对国民党接收，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熊式辉感到事态严重，已非他在东北交涉所能解决，因此在5日的会谈后，他将情况报告蒋介石，建议或由外交部与苏方交涉，“请苏方对于东北措施，重行考虑，加以改善”，或由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告以东北现状，有不能贯彻中苏友好条约精神之顾虑，请其主持改善”[25]。在行营讨论接收对策时，熊式辉主张“共党力量犹未长成，我久放任，则其活动更易，力量滋长更速，应不必定待国军到达始往各地接收”，但事实上做不到，也为张嘉璈和蒋经国所反对。事实上，熊式辉其人多谋而少断，是政客而非政治家，难以应付东北的复杂局面，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显出蒋介石所选非人。张嘉璈、蒋经国、杜聿明对熊都颇为不满，小蒋认为他“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皆无决断”，甚至“以长春万一有变则将如何自处为念”[26]。

由于苏联的态度以及中共军队大举出关的现实，国民党原来设想的东北接收方案无法实行，必须对其东北决策作出调整，实际可能的抉择有四个：

一、继续外交交涉，以进一步妥协的姿态求得苏联的谅解与协助。张嘉璈等主张采用这个方案，作“忍耐为有限度之妥协”[27]。东北元老莫德惠认为，“必须先即速表示不再运送军队来，以安苏联之心，然后再由经济政治上求转机”[28]。但前一阶段中苏交涉的实际，使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不再有当初那样的乐观。最关键的是，苏联对东北有它的利益要求，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就必须与苏联妥协，但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妥协到什么程度可以解决问题而又不至于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国民党似乎心中无数。主持中央外交政策的宋子文与王世杰已经担心因中苏交涉而背上骂名，拒绝了对苏再作让步的可能。此一方案遂不行。

二、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或由联合国解决。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人持此主张。他们认为此案“其害在失经济与人心，其利则不分关内兵力”[29]，即可集中兵力于关内，首先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苏联大军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对苏决裂不仅使接收东北更遥遥无期，而且苏联一旦放手支持中共，“数月之内，东三省内将有以日本武装为装备之中共军数十万出现与我作战”，此种前景足以使国民党担忧不已。何况所谓公诸国际，说穿了只能是求助于美国，而美国是否会冒与苏联公开对抗的风险施以援手则大成疑问。因此从中央的宋子文、王世杰，到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都反对此案，而主张“为顾及接收东北之重要，非尽最后之努力，决不可轻易放弃”[30]。

三、立即以强力打进东北。东北前方军事将领主张此案。国民党政府军虽在东北各港登陆一事上受挫，但在美国支持下，11月间改在秦皇岛登陆成功，控制了出关的前沿阵地。杜聿明力主乘中共军队立足未稳，先解决东北问题。此案与前案的分歧源于军事战略的不同考

虑，即先关内还是先关外，但实行此案的困难在于，国民党在东北前线兵力不足，增援需时[31]，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增加兵力又必须得到苏联的谅解，这又回到了第一案的出发点，需要以外交妥协为代价。如此双重困难，使此案未被采纳。

既然上述方案都不可行，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外交上作适当表示，但保持交涉渠道，同时进行军事进兵的准备。用王世杰的话说，就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32]。国民党于无奈中选择了这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或许对国民党是一个最不利的选择。

从东北接收交涉不利的报告不断传来后，蒋介石似乎便无意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而开始将重心置于准备军事接收上。他一再要求东北行营“作陆运为主之准备……积极恢复北宁路为首要工作”，“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进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期其完成也”[33]。10月29日，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谈到：“万一我军不能在葫芦岛登陆，则决心在秦皇岛与天津登陆，由山海关入东北也”[34]。大约在11月上旬，蒋介石已觉得“东北登陆计划，今已尽我心力，不能再有其它道路可循”[35]，决定暂时搁置东北问题，撤回行营，先解决关内问题，同时加速运兵至津、秦两地，循机由陆路进入东北。11月7日，蒋介石重订东北接收计划：“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36] 次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张群、王世杰、白崇禧、吴鼎昌、陈布雷等讨论东北局势，蒋提出了撤退东北行营的计划，众人未表异议。12日熊式辉应召到重庆汇报，13日和14日，在有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张群、熊式辉等参加的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蒋的决策经讨论被通过。14日，蒋介石致函在长春的蒋经国，告以：“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

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37] 蒋的考虑是以退为进，反守为攻，借助国际力量迫使苏联让步。

11月13日，王世杰约见苏联大使，告以中国将对东北接收问题重新考虑。15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中国政府鉴于现在东三省尚有甚多日本投降之军队及伪满军警，需待处置，地方秩序，必须维持，拟于派员接收东三省时，随派军队若干前往。兹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故中国政府决定：

一、东北行营职员及偕行营赴东北之军事、行政外交人员全体四百余人，迁移至山海关。

二、迁移时间决定为本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每日将用运输飞机一架至六架往长春接运。

三、我政府依照中苏协定，并派定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军事代表，带同助理人员数名派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总司令部所在地，随同进止，以资联系。”[38]

至此，东北行营在长春一月，未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得不撤回关内。国民党企图依靠苏联协助接收东北的计划暂时告一段落。

二　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与行动

中共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丝毫不亚于国民党，而战略与战术则远胜于国民党，因此中共成功地在战后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并为其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在抗战中期，中共在战后国共继续合作的前提下，已经考虑到向东北发展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

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39] 在决定战后方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两次提到了东北问题。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特别强调东北的工业对中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共现有的基础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40]。根据毛的结论所言，“七大”提出了“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的问题，可见中共当时已经有了战后经略东北的设想。不过由于中共对苏联的动向无所知，其具体行动方案尚不明确[41]。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的第二号令，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察、热、辽、吉进军，揭开了战后中共经略东北的序幕，而最早进入东北的中共力量是抗联教导旅的部分人员。1940年冬，抗联部队迫于日益严酷的环境，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后于1942年8月，成立了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即抗联教导旅，并组成了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负责。苏联对日宣战后，周保中等决定，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大小城镇，迎接中共大部队出关。经与苏方商定，同意抗联人员以卫戍副司令身份随苏军进入东北五十七个城市。9月上旬，抗联人员入住包括长春、沈阳、哈尔滨在内的东北五十七个城市，以黑龙江为最多，以长春为总的指挥中心，其中周保中在长春（对外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冯仲云在沈阳，李兆麟在哈尔滨，同时原在苏联学习休养的刘亚楼和卢东生等也到了哈尔滨。他们的工作重点一是接收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广播、银行、铁路

等要害部门，二是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而且由于他们的身份，起了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中共东北局成立后，这批人员均归属于东北局领导。

8月13日，紧邻东北的中共冀热辽军区由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主持，在冀东丰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一万三千多人的军队及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西、中、东三路向承德、赤峰、锦州进军。担任东路进军任务的是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的四千余人，他们于25日进行动员，29日即从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绕道越过长城，进入了东北。30日上午，该军与苏军在山海关以东二十余公里北宁路上的前所车站会合，并成功地说服了苏军帮助一起攻打尚被日军占据的山海关。当晚，山海关被攻占。这样，日本宣布投降不过半月，中共便卡住了陆路出关的咽喉要道，占据了进入东北的先机之利，迫使国民党其后为了循陆路出关不得不付出加倍的代价。

中共中央对曾克林部的行动虽有所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实际情况与指挥部署未必能够同步（曾部攻占山海关的消息，延安《解放日报》一周后才予报道）。9月4日曾部过锦州后，由于电台功率太小，已与李运昌失去了联系，而当时各种情况纷至沓来，中苏条约又于27日公布，中共一时尚不能确定苏联的立场，因此中共起初对进入东北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8月20日，中共决定从山东、冀鲁豫和冀中调四个团入东北。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目前不可能援助我们，因此我党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未提及东北问题[(42)]。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起草的通知中，认为东北“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43)]。但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华中局的指示中，虽然仍认为“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同时又认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

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在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这是对苏联动向和国共双方战略态势作出的较为准确的判断，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的基本正确。正是因为这样的估计，这个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44)] 胶东军区情报部的邹大鹏8月底率人员到达大连后，发回的情报称“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进一步坚定了中共进入东北的决心。9月10日，中共将出关部队增加十个团，并决定调集近万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出关。次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45)]。

对中共确立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其一是9月14日曾克林和苏军代表一起飞抵延安，使中共中央得以第一次从亲历者口中了解到东北的实情；其二是新四军领导人黄克诚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多派军队去东北的建议（此二事详情已见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据此，中共于19日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此而使进军东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共战后全盘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着棋。

中共确立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部署。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局，彭真为书记。19日决定原去山东的林彪改去冀热辽（10月17日令其去东北），罗荣桓去东北。其后，又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去东北。最终到达东北的有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近三分之一，可见中共对东北的重视。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开始工作，并陆续组建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分局和各地方

党委。10月9日，成立东北军区，以程子华为司令员。10月31日，中共决定东北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46]，林彪任总司令。这样，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政治、军事领导机构便组建完成。

中共进入东北最初的两个月，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出关和占领地盘。9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47] 9月中旬与10月中旬又决定分两批调至少十万部队到东北，并规定了部队去东北的行军路线与部署地点。至此，中共向东北调派十万部队与一百个团架子干部的大盘子已定。

中共出关部队的主力是山东军区的部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水之隔，海路交通比较方便，以往就是闯关东的一条捷径。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已编成主力与基干部队八个师、十一个警备旅和四个独立旅，共二十三万余人，为调兵它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时机非常紧迫，望你们迅速动作，越快越好。"同时并指示东北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48] 山东部队主要由海路进入东北，在胶东由蓬莱和龙口出发，在辽东于孤山、庄河、貔子窝一带登陆。显然，在辽东登陆至少得到了苏军的默认[49]，而苏方又以此为借口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军协助登陆的要求。到11月底12月初，山东部队约有6万人到达东北。

由陆路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前期走山海关，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军向山海关进攻而改走热河绕道出关。这其中最主要者为黄克诚率

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余人，还有陕北、冀中、晋绥的部队，以及抗大总校和大批干部。到12月间，中共出关部队总数达到近十一万人，还有两万干部，原定调军计划基本完成。同时由于在东北“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因此中共要求出关部队“必须分散摆开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会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在大规模扩兵之后，早期出关部队几乎是以成倍的速度增加，以至“一名排长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已多了一个排的新兵，一时传为笑谈”[50]。曾克林部半月内从4000人扩到2万人，年底便达到7万人。当年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已辖有十三个军区，三个纵队，五个师，十七个旅，共274，900人[51]，1946年1月14日，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东北已一跃而成为与中共其他战略区平行的大区之一。

与中共部队大举出关的同时，中共在东北大力扩张地盘。根据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2日，中共中央再度强调按前电部署执行，“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52]。东北局据此提出东北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材，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或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53]。但是由于中共初入东北时的特殊情况（各城镇尚无正式政权，苏方不仅不加限制，而且愿意中共协助其维持城市秩序，刚出关的部队需要城市作为补给、中转地），加上东北工业发达，人口集中，广大乡村人烟稀少，需要中共在工作方式上有所变通，因此东北局的工作重心起初放在南满地区，对城市工作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而中共中央一度也曾有过力求控制全东北的主张（见下节）。

曾克林部到达沈阳后，9月9日便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然后分兵五路接管了鞍山、本溪、抚顺以及原辽宁省的大部分城市。18日彭真、陈云等到沈阳后，感觉“此间发展条件甚好”，因此在次日召开的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决定以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沿线，以及营口、山海关等要点，迎接大部队出关为中心开展工作。据过来人回忆，当时的东北“到处是放手发动群众，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的轰轰烈烈的场面”[54]。然而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随着国民党接收东北部署的逐渐到位，随着国共美苏四方关系的演变，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出现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国共冲突。

三　山海关之战

国民党接收东北虽然暂时受挫，但其军队登陆一事在美国的帮助下，却有了重要进展。10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由美军掩护在秦皇岛登陆完毕，建立了进军东北的前进基地。10月底，杜聿明亲往东北与马林诺夫斯基交涉，马氏“同意”国民党政府军可在营口登陆，但11月初，杜聿明和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乘军舰到营口，准备指挥军队登陆时，发现苏军已经撤退，营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杜认为国民党想依靠苏联协助派军接收东北已无可能，遂飞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既不能和平接收，即不惜使用武力，迅速抽调十个军，以美舰掩护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55]。蒋此时对依靠苏联接收也不抱希望，但出于总体战略考虑及实际困难，尚无意在东北动用重兵，况且他对用兵也无十分把握，不过完全听任中共在东北发展，亦为蒋所不甘，所以他采取了折衷办法，令杜聿明先以两个军打下山海关再说。

国民党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与注意。国民党军队陆续在秦皇岛登陆后，距离控制在中共手中的山海关只有咫尺之遥，中共认为其“向山海关、锦州进攻前进是必然的”[56]。此时正值中共向东北

进军的关键时刻，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控制了大片地区，苏联在东北又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合作态度[57]，中共认为如能控制山海关和东北各港口，可能将国民党堵在东北大门外，由中共独占东北，因此，中共对东北工作的部署有了变化。10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彭真等人："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58] 19日再度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59] 10月28日三度指示东北局："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60] 这几次指示改变了早先分散部署部队，首先创立根据地，与国民党长期争夺东北的方针，而要求"竭尽全力霸占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61]。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中共并请求苏联推延撤退时间并在此期间拒绝国民党军队登陆及接收政权，同时允许中共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62]。如此一来，东北国共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

11月7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应即占领山海关而确保之，相机向大凌河之线挺进"[63]。此时国共双方部队已有一段小规模接触，国民党军并未占到便宜，十三军军长石觉甚至建议杜重新考虑是否要立即进攻山海关。杜聿明到秦皇岛后，经过了解，判断山海关的中共军队"素质训练均极低劣，弹药尤为缺乏"，而自己指挥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为美械部队，装备精良，兵力集中，数量上亦占优势，且背依铁路，补给方便，自信可以一战。14日，他下达作战命令："本部以迅速进入东北地区接收防务之目的，于11月15日晨，以主力自临榆、九门口强行出关，以有力之一部，由驻操营经无名口、永安堡向中前

所、大石桥东南地区迂回，冲击匪之侧背，并与主力协力，将其包围于临榆、中前所间地区一带，向海滨压迫而歼灭之。尔后进出绥中南北之线。”他令十三军第四、八十九师对山海关进行正面攻击，十三军五十四师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由九门口和无名口迂回攻击，拊山海关之侧背，五十二军主力为预备兵团，“随攻势之进展，逐次向山海关推进，于攻击兵团攻势奏功而弹药缺乏时，应适应战机准备超越第一线扩张战果，穷追败退之匪”[64]。15日上午，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各一部首先向山海关侧翼九门口和义院口攻击，当晚占领两地。次日又向山海关正面发起攻击，经一日激烈战斗，至晚中共军队撤离阵地。

林彪接受中共中央指示于10月下旬从冀东到达沈阳。11月上旬，他命令程子华、杨国夫、李运昌、吴克华、萧华为五方面前线司令员，分兵把守古北口、山海关、葫芦岛、营口、安东五处，算是落实了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但是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兵力部署上主张“我之战术基本原则是将主力隐蔽、控制于前方的适当地点，寻找战机”[65]，因此他并未将主力全部放在山海关一线。当时中共在山海关的部队，先只有冀热辽的一个旅，后来山东第七师加入，总数一万余人，由师长杨国夫统一指挥，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显然远不如当面国民党军，而且冀热辽部队多系扩编，杨部又经长途跋涉，战斗力不强。15日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后，守军感到强大压力，虽经顽强抵抗，然终不得不于次晚撤离。就军事角度而言，中共的失利并不意外。国民党投入了两个军七万人，全美械装备，而中共部队只有万余人，还包括新兵，平均两个人才有一支枪，且缺少纵深配备。

山海关发生冲突之初，中共对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毛泽东给东北局的指示认为：国民党“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而我军正向东北开进，“只要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66]。他同时又令黄克诚、梁兴初部速赴山海关

参战。至山海关失守前夕，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新出关部队同样存在“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的问题，如“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因此要求“谨慎使用主力”。但他此时在给林彪的指示中，仍主张沿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待对手疲惫而自己休整后，由林彪“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67]。可见中共还没有完全放弃拒国民党军队于东北之外，而由自己独占东北的想法。11月12日，东北局作出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要求“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68]。即便在山海关失守后，为了配合国民党撤退行营而引起的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仍指示东北局，“蒋介石困难甚多，即使苏方以重庆为移交东北对手，蒋亦无法接收，如我能迅速组织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并在锦州方向大量消灭蒋军，则我争取满洲仍有极大可能”[69]。

事实证明中共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正是因为山海关被较为顺利地攻下，使杜聿明感到自己判断的正确，从而坚定了他进一步追击的决心。攻占山海关当晚，他便下令前线部队自次日起沿榆沈公路两侧向绥中进击，19日绥中被杜军占领。当天，林彪受命到达前线，他观察形势后认为：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缺少用费，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地方群众则尚未发动。况且，出关部队来自各地各个山头，刚到东北不久的林彪当时还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因此他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70]。此时正值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顾忌国际影响而对其在华战略有所调整，中共也相应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准备退出大城市和中长铁路沿线，军事部署当然亦随之改变。23日中共军委复电同意林彪前电的“基本意见”，28日电告东北局：“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

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71] 这表明中共此时已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

国民党军占领绥中之后，蒋介石致电杜聿明，嘉奖其部下“忠勇奋战，迭克要隘，着即转谕锦州、葫芦岛一带，尚有匪军，仍希转励所部击灭之，向大凌河进展”[72]。杜聿明即下令攻击兵团沿锦榆公路和北宁铁路、一部自公路以北山地迂回，迅速向锦州推进，企图乘林彪部主力未到之前一鼓而下锦州。22日，国民党军占领兴城、锦西与葫芦岛，对锦州构成合围之势。林彪此时无意在锦州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率主力部队退往辽西阜新一带，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

国民党军从攻占山海关到占领锦州，前后不过用了十天时间，而且未付出很大代价，可谓长驱直进，说明国民党用于东北的两个军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而中共军队当时尚不具备与对手全面抗衡的实力。中共其后也认为，国民党军“几乎未遇严重抵抗”，表明出关部队“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目前与顽军决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73]。然而国民党的弱点在于，它当时可用于东北作战的部队只有这两个军，本来蒋介石答应杜聿明，调天津的第九十四军出关，但军令部和北平行营都不同意，因为军令部自始即主张先解决关内问题，而北平行营李宗仁认为，“华北如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所以何应钦曾令杜聿明先进攻热河，收复承德，杜自恃有蒋的指示而未予理睬。但东北地域辽阔，以两个军兵力出关确实力有不逮。第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刘玉章进入锦西后就向杜抱怨：锦西太大，兵力不够，不是他不敢打，实在力量不够啊[74]。杜聿明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但一路未吃到大苦头，还跃跃欲试，企望再进一步。然蒋介石一则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惟恐出关部队“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

谷之境”，为避免与苏冲突而主张“应特别慎重，不在急于接收也”[75]；二则他此时更多地关注华北局势，不愿多调兵力出关。因此他一面致电杜聿明表示慰勉，一面严令非有其手令不准继续前进。杜聿明虽不同意，但不敢抗命，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12月上旬，蒋召杜到重庆，指示他对东北苏军占领区准备用外交接收，当前任务是打通锦承铁路，占领热河，保证侧翼安全，切断东北中共与华北的联系。杜遂将主要兵力转用于热河。

山海关和锦州的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却表现了战后东北局势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如何解决政治与军事、战略与战术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以后还将多次出现。国共双方的战地指挥官主要考虑的是军事战术的运用及是否有利于我的问题，并且都表现了与中央的某些分歧，这自无可厚非。但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战略运用则体现了在对战后形势与自身优劣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全盘部署，而在这方面，中共显然占了上风。中共部署在山海关等地作战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如此，“则将给我党以布置东北及热河全盘工作之时间”[76]。山海关作战失利后，中共认识到当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77]，因而适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并有了后退一步的准备。以当时的实际（国共力量的对比，美苏之间的角力，苏联对国民党态度的某些缓和，甚至中共也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国民党军队至少可推进到沈阳一线而无大碍，甚而再进一步也并非全无可能。杜聿明根据其亲身观察，一直力主集中重兵，先向北进，然后再回师关内。应该说，他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78]。然而，蒋介石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对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耽误的时机却是以后很难挽回的。

第二节　东北的国共美苏四方关系

一　三国四方的纠葛

战后东北问题不仅仅是国共之争，而且是美苏两强解决战后世界问题的雅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苏两强的角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东北成为国共、美、苏三国四方之间互为联系互相争夺的大舞台。

国共东北之争离不开美苏之争的大背景。雅尔塔会议时期的美苏妥协气氛决定了有关东北的战后安排。自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界对其与苏妥协的政策颇有微词，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至战后，两大国间的合作因为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而失去了当初的动力，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开始凸显出来，冷战的阴云在凝聚。无论是美苏妥协还是美苏冲突，对他国尤其是弱国的影响都非同寻常，国际政治的冷酷是毫不留情的。雅尔塔会议后，国民党利用美苏的妥协，争取了两强对自己的支持，而面对战后的美苏矛盾，国民党在拉住美国的同时必然失去苏联，由于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失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起初对国民党表示了友善态度，表现之一是苏联对国共谈判的支持，国民党也因而对顺利接收东北持有信心。然而时间不长，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美国独占日本，排斥苏联，使苏联很不满意。接着在9月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伦敦会议上，美苏在管制日本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议不欢而散。在此背景下，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着国民党提出由美舰运输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计划，自然使苏联猜疑美国是否企图插手东北，因而坚决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后与熊式辉的会谈中也一再提及美军舰运输问题。国民党决策者很快体会到其中的奥妙，王世杰认为苏联的态度“半因中共问题，半因美苏既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也”[(79)]。张嘉璈认为这是苏联“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80)]。其后，王世杰便对苏联强调这是“因中国缺乏运输工具，故所用运输船舶及侦察飞机系借自盟邦美国。惟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请苏方不要“误会”[(81)]。王的

话当为实情，当时国民党要求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去东北，恐怕并没有与苏联为难之意，但是美苏矛盾最终使国民党的东北登陆计划成为泡影，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难怪王世杰以后感叹，“想不到国际局势变化如此快，美苏僵化如此快，美苏关系使得我们更增加许多困难，使我们交涉丝毫不能得第三者协助”[(82)]。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接收的失利，其党内对美苏矛盾影响及于中国的事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1月5日、6日、9日，主持东北接收的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三人先后致函蒋介石，报告情况，提出看法。三人均认为“东北局势之变化，系受美苏关系及中央与共党冲突之影响，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苏方之目的为：“1．东北今后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旨与行动。2．阻止美国染指东北，断绝中国以夷制夷之观念。3．使中央不能在关外有雄厚之武力，至少使八路军可在关外立足。”[(83)] 这样的分析大体符合当时的实情，然而如果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便要走联苏疏美甚而反美之路，这无异于要国民党脱离其执政二十年的基本轨道，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国民党虽然认识到东北问题受到美苏矛盾的影响，但在处理上，则沿袭了以往的一贯作法，首先求助于美国，也就是苏联极其不满的“以夷制夷”。国民党这样做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基础。就历史而言，美国对东北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在本世纪初，美国便极力想打入东北这块俄、日两国的传统领地。就现实而言，雅尔塔会议期间，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虽然在东北问题上对苏妥协，同意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然而这并不表明美国就此甘心让苏联独占东北。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美国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程，并在东北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战后，东北问题更成为美国考虑对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国民党军队才得以在东北各港

登陆无望时，以秦皇岛作为接收东北的前进基地。东北接收不利之后，国民党早先对苏的乐观估计不复存在，遂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国民党首先通知了美国，11月17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对于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则故意蔑视，对于中国方面实现该协定之种种努力，在在予以阻挠”，“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窃意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22日蒋又致函杜鲁门，告以“余之决心为立即撤退业已前往满洲之中央官员，并延缓进入该有争议之地区”，蒋在函中提出增运五个军赴华北，“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84)]。蒋还要王世杰随时将中苏交涉情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以便其贡献意见。其后，驻美大使魏道明又当面对杜鲁门表示：“东北问题不能视为中国问题，乃系整个世界问题之一面，自伦敦会议后，形势急转，此显为苏联对于国际僵局之反应，亦实为角斗之开端……望美国尽量与吾人可能之协助。”[(85)] 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将东北问题适度国际化，利用战后美苏的矛盾，以美国的战略利益打动美国，然后拉美国下水，压苏联让步。

国民党的期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确实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不满，但战后美苏矛盾一时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就只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东北这样关系苏联切身利害的问题上，美国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为了国民党与苏联彻底翻脸。说到底，国民党只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它不太可能使美国完全听从自己的调遣。美国对东北的政策是，保持对苏联的压力，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但不直接卷入，这也符合美国对战后中国的基本政策。因此，美国在得知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之后，杜鲁门虽对“苏联此种态度，甚为失望”，对国民党的求援“频表同情”，并称将与其“密切合作，妥商办法”[(86)]，但除了派遣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去东北一事外，并未见有对苏强硬的表示，对国民党而言，这多少有些口惠而实不至。

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而中共在东北最初的发展则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共部队初入东北之时，苏联方面并未认可[87]，为了照顾苏联的立场，中共指示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88]。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苏军代表到延安，随后中共东北局在沈阳成立，延安、沈阳、莫斯科之间在东北问题上从此建立起密切的热线联系。

中共东北局到沈阳后，与苏军建立了经常联系，苏军由驻沈第六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和该军军委委员杜曼宁出面，东北局则由彭真牵头，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参加。据伍修权回忆，他在沈阳“一开始就从事着大量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即与苏联红军驻沈阳指挥机关的联系”[89]。这种联系随着苏联全盘外交战略的变化而时紧时松，时起时伏，总体而言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陈云在回顾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时认为，中共夺取东北的胜利，第一个原因就是苏军出兵东北，“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90]。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苏联对中共初入东北的帮助体现在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让中共接收了若干省市的政权。据曾克林回忆，他的部队接收了大量工厂和军用仓库，包括全国闻名的沈阳兵工厂和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仅在苏家屯仓库，就用了三天时间，拉出了步枪2万支，机关枪1000挺，各种炮150门，其后还给山东送去了500万发弹药[91]。但据黄克诚回忆，他的部队到东北后，既未得到接收物资，也无后勤供应，“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92]。有一个统计称，仅长春一地，在三个月内，就接收了步枪6万支，机关枪2800挺，弹药1200万发[93]。比较权威的数字当来自中共中央方面，陈云和高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

告中提到“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十万，炮三百）”，而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及“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94]。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95]。看来，十余万支枪的轻武器与实情还是大体相符的。在政权方面，由于苏联的默许，从9月到11月，中共先后成立了滨江、奉天、安东、辽北、黑龙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连、哈尔滨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一半的县份，并以各省市县政府作为公开的号召机关，同国民党争夺。在苏军占领下的城市，中共通过城市警察或保安部门实际控制着城市行政权。以中共东北局为领导中心，各省市县委员会为工作支柱，出关及新发展部队为武装手段，中共已在东北初步建立了自上而下一套相当完整的党政军体系，而此时国民党除了在长春有一个足不出都门的行营外，在东北疆域内尚无多少武力，更不要说行政架构了。

国民党按计划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并公告中外后，苏联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毕竟它还要顾忌条约的国际义务和苏美两强间的复杂关系。熊式辉曾对手下人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96]。果然，苏联立即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称苏军“对于中国政府将予应有之协助”，对于中共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在空运部队等问题上也有松动，并表示如中方需要，苏军可延缓撤退一至二个月[97]。同日，长春苏军代表两次约见留在长春、负责与苏军联络工作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称苏军将协助中国政府建立政权，取缔反政府活动，禁止反政府宣传，长春可即行接收。其后，马林诺夫斯基又在长春向张嘉璈表示“苏方绝对遵守中苏条约”，政治情况“一定即能好转”[98]。国民党在随后提交的接收计划中，要求苏方保证长春和沈阳空运的安全，协助利用铁路和港口运兵，给予接收人员以物质协助等，苏方虽予同意，但对关键的运兵要求则表示“实无可能协助”[99]。与此同时，苏联也相应改变了对中共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及

东北各大城市。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斗争暂时从军事移到了政治。

东北行营撤退之后，对下一步怎么走，国民党内认识不一。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多次讨论，王世杰主张重订接收计划，部分军方将领主战，徐永昌仍主中止交涉，但“终无结果”。其实，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态度，身处东北交涉第一线的张嘉璈与蒋经国看得最清楚。蒋经国在11月6日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100)] 张嘉璈也认为，“苏方有一图样在其胸中”，既不会“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因此“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101)]。因为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雅尔塔协议已充分表明了苏联的意图，而国民党的历史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有所阻挠便顺理成章。苏联的态度又直接决定了对国共两党何方更为有利。因此，当时如果要使东北局势出现对国民党有利的转圜可能性，在于前述国民党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第一案与第三案的结合，即尽最大的努力以外交妥协求得苏联可能的谅解，同时以现有军队控制要点，继以增援作战略展开，不能说如此可操胜算，但至少不失主动性与进攻性。

然而，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麻烦在于，如何寻求外交与内政间的平衡。它既要遏制中共的发展，又不能因为过分地对苏妥协而引起非议；内心里它倾向于党派利益，明面上又不能不维护国家主权。它始终未能在这两者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待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方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强大武力；2．空运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这实际是使东北在某种程度上的中立化。然而蒋可能心有不甘，因此又交待说：“以上四项，实为不得已之所为，如当地情形以为尚可尝试，不妨为

之。”这又表明蒋并无真正照此办理的决心[102]。所以，除了经济合作一事由张嘉璈与苏方谈判而无结果外，其他几点似未见向苏方正式提出。张嘉璈认为，这几条可“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再照此“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并为此事的不遂行而遗憾[103]。蒋经国在交涉不利时向他父亲建议：“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内政上设法转变局势外，对于接收以及进兵各事更应作积极之布置”，并认为“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104]。但国民党既未在外交与内政的平衡上作出新努力，也未在两者之间作一取舍，其转圜的可能性也就在自己的无所作为中消失于无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此时考虑首先解决华北中共问题。他对参加重庆复员整军会议的高级将领专门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了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东北的主权仍然不得完整，一切接收都不能进行，建设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的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105]蒋介石的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以后形势的发展看，搁置东北问题的结果，不仅失去了争夺东北的有利时机，而且因为军事力量和舆论环境的因素，国民党在华北同样无大作为。

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后，国民党中央对东北问题态度消极，只有张嘉璈和蒋经国还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做着对苏外交的努力。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返回长春后和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谈，苏方对解

除非政府武装和非中央政权、组织地方团队及空运等事作出了承诺，“并声明其已得莫斯科训令，必须设法切实执行”[106]，但实际还是诺而不行。为了打开僵局，使国民党能够顺利接收，张嘉璈返长前，于11月30日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为此他表示可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中共对此表示了积极态度，告张可就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107]。张又以此作为筹码，在长春请马林诺夫斯基劝中共退出铁路线。但如此一来无异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是蒋介石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蒋一直坚持东北只有主权问题而无中共问题）。何况张此举事先并未与蒋通气，在张是为国民党着想，体念蒋“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在蒋却以为张“不识政治情形”，擅作主张，因此蒋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他不仅电告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而且要熊式辉告张，“毋与董必武商谈共军事，尤不可向苏方言之。关于共党问题，中央有人负责与之谈判也”[108]。张嘉璈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决策人物，在党内的影响有限，对国共政治关系更缺乏深入认识，不可能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恰当人选。此后，张嘉璈主要就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在长春与苏方谈判（见后述），而蒋经国则出任访苏并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艰难使命。

当初行营撤退前，熊式辉等都有请蒋介石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建议，苏方也向蒋发出过访苏邀请，蒋虽未接受，不过他有意让蒋经国赴苏一行，既代表自己与斯大林沟通，或许还不无锻炼小蒋之意。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表示，中苏关系应该加强，如果双方彼此完全谅解，苏中关系就一定能够加强。他向斯大林重复了蒋介石一贯的主张，即中共军队和共区政权应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中共可以参加政府，他还请斯大林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则反复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政府，但中共并不听从苏联的指挥，他也不知道中共的情况如何，苏联不能为中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共。双方还讨论了东北、新疆、中美关系和对日处理问题。斯

大林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对国民党的反苏言论表示不满，蒋经国则向斯大林保证中国决不反苏。当蒋经国问斯大林，苏联可以为中国的统一作些什么时，斯大林回答，需要同中共谈判，了解他们有何要求，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比如实行选举制度。可以说，除了重复支持国民政府的外交辞令以外，斯大林没有对国民党作出任何令其满意的切实的承诺，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按斯大林的说法，似乎苏联与中共已经毫无关系，令国民党想寻求苏联的支持亦不可得，蒋经国此行一无所获[109]。

国民党的外交努力未取得应有的成果，但它在两个方面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其一是苏联同意延期撤军，其二是苏联同意国民政府行政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

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苏联为了不在外交上给国民党留下口实，主动提出延期撤军事，同时还企图借此尽可能掠夺东北资源、压国民党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让步。国民党本来是反对苏军缓撤的，在熊式辉赴东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苏军撤退期届，而我尚无军队到东北接防，致为共产党军队所乘，不如责苏军缓撤”。但王世杰认为，“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蒋介石因而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缓撤”[110]。然而此时国民党改变初衷，实因其以为有苏军在，苏联顾虑国际反映，总会对中共有所约束，可为自己增兵赢得时间，一旦苏军立即撤离，在当时情况下，东北势必完全落入中共手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11月底，决定苏军延期一个月撤离，12月底，又将苏军撤离时间定为次年的2月1日。此事表面上对国民党有利，它因此在苏军保护下接收了东北若干城市，但实际上，苏联在东北的存在，首先束缚的是国民党的手脚。中共认为，“苏军延长住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这对国民党真具有讽刺意味，如果它知道自己的对手也希望苏联延期撤军，不知该作何感想[111]。

苏军在延期撤离的同时，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

的行政权力。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许多人对无军队随行的行政接收并不热心，加上苏联此时提出经济合作问题，更使蒋认为“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112]。直到12月下旬，国民党才决定先行接收若干省市。因此，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于12月22日接收长春，26日接收沈阳，1946年1月1日接收哈尔滨（12日接收松江省），8日接收辽北省和四平市，24日接收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此后因为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停滞，苏联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行政接收再度停顿，原定接收的黑龙江和合江两省及若干城市未能如期接收。而在已接收省市中，因为只有若干保安部队随行，在中共部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的情况下，国民党接收人员大都坐困省城，根本无法真正展开工作。辽北省总共任命了三个县长，“其他各县县长均无法到任”，“对于各项政务之推行均感棘手，处境之艰难当可想见”[113]。如张嘉璈所言，“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因此目下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114]。此时苏联还同意国民党可空运部队至东北，但蒋介石因对苏联不放心，没有同意空运计划，以至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对张嘉璈冷嘲热讽，称“贵方何以有二十余架飞机来长接撤退人员，而不将军队运来？”“吾人等待中国军甚久，不悉何故乃迟迟不来”[115]。然蒋介石坚持己见，即军队只能尾随苏军的撤退行动，不能超越苏军防线，因此国民党军除了在1946年1月中旬派二个师进驻沈阳附近的新民和铁西区外，其余部队始终控置于锦州一线不动。不过无论如何，由于苏联延期撤军并同意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省市，双方对外都算是有了交待。

就在国民党与苏联继续交涉东北接收问题的同时，中共也在积极进行争夺东北的预定计划。东北行营撤退的消息公开后，中共认为：这是“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116]。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其高明

之处在于，其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较国民党准确，认为美苏两强之争，并不能完全决定各国内部政治的运行轨道，因而中共可以在东北独立发展而不必顾虑美苏的干涉；其二，中共认为苏联是决定东北命运的关键力量，主要作苏联的工作，并扩大苏联与国民党的矛盾；其三，中共与苏联对形势的看法毕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苏联与中共之间虽也有矛盾，但如在国共之间作一抉择的话，苏联恐怕还是宁要共而拒国，何况中共非执政党，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较国民党具有相对大的自由度。因此，在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角力中，11月间东北形势的变化，对中共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其活动空间仍然很大，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东北行营撤退之前，中共已得到某种情报[117]，由于苏方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情况似乎对中共并不有利。11月19日，苏方通知彭真、林彪：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得与国民党军作战，并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若干里之外，但“彭林未答应”。彭真要求苏方重新考虑其作法，并向上转达他的意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斯坦科维奇态度傲慢，他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回敬以：“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据在场的伍修权回忆：“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118] 当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仍提出“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119]，但次日，中共中央便给东北局连发两电，一电指示：“彼方（指苏联——作者）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一电要求：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120]。此两电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已和苏联有过交涉，在不能继续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退而沿用传统

的根据地战略。但是中共为了在东北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对苏联提出了若干条件，主要是为了让中共有时间布置撤退等一系列工作，请苏方“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并要求保有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121]。随着以后东北局势的发展，中共认为苏联与国民党在东北接收问题上并无协调，“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122]，因此中共与苏联之间可以说至少在对国民党的方针上存在着某种默契。

由于东北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之间以及东北局内部对东北未来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尽一致之处。前已述及，林彪主要是从军队状况出发，主张避免仓促作战，先行军队的整顿，再图发展。东北局则从未来工作方便考虑，较为关注尽可能多地保有东北地盘。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总方针是一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则又不断有所变化。因此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战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表现出某些矛盾与摇摆。

锦州一战之后，林彪率部退往辽西阜新一带，进行整顿。东北局也在11月23日撤离沈阳进驻本溪。11月2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在说明根据情况需要退出城市的同时，要求：“一切既不影响苏联外交，又可以在城市立足之干部，应坚决留在城内”，在已撤退的城市，应“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总之，“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一切工作的部署，都为着这一伟大的斗争目标”[123]。在中共中央28日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后，东北局也相应指示下属照此执行，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保持了城市与农村并重的局面。

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城市，毕竟使中共的公开活动受到影响，对于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控制东北的战略战术，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有着频繁的往复商讨。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内部多数人倾向于首

先整顿军队，巩固后方。陈云、高岗、李富春、罗荣桓等均认为，“根据情况无独占满洲的可能”，“但力争优势仍有充分可能”，提出首先整训军队、建立根据地的建议。黄克诚认为出关部队有“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提议“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林彪则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须肃清土匪，充实后勤，整训部队，“做长期打算与大规模打算”[124]。中共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也根据实情而逐渐趋于务实。12月初，东北局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但中共中央回电强调，“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季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同时提出，东北的力量对比还待发展而定，“而苏联又要求满洲局势安定，因而达到一种妥协有一个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125]。随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阜新召开会议，研究战略部署，对东北工作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进行了争论。会后，东北局在给各部的指示中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指示同时又提出，对个别大城市，“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对次要城市及工业动力基地，“亦应争取控制之”[126]。这又表明东北局并未完全放弃夺取城市的计划。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指出：“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

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127] 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128] 这两次指示使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争取与巩固城市转入传统的以建立根据地为中心，这在当时被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29]。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以后又有过相应变化，而在东北方面，直到次年3月的东北局抚顺会议，“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有的地方思想上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十二月指示，传达和贯彻就更谈不到”[130]。

二　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在国共双方围绕东北问题进行政治军事较量的同时，国民党还在东北进行着另一场艰苦的外交谈判，这就是和苏联就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的交涉，此事本为中苏国家关系中的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又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可避免的与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

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关于经济问题没有过多涉及。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指示中要求：“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据宋称，苏方“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131]。

熊式辉一行到达长春后，在和苏方的会谈中不可避免的涉及经济问题。10月17日，熊等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均应视

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并提出中长路须用煤，故抚顺煤矿应由中长路当局经营。苏方此举无疑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中方接收东北日伪产业的合法权利，而“欲籍战利品为名，攫取东北工业”，并为全面介入东北经济预留伏笔。张嘉璈马上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如照苏方说法，则“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我方丧失经济自立”。他建议迅由外交部向苏方提出：1．满洲繁荣有利于中苏经济，故已有工矿不可破坏；2．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欠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赔偿中国战争损失，故应归中国没收（因为满币及公债、储蓄等价值超过150亿元，而东北全部工矿资产不过100亿元）；3．苏联若提出战费问题，则只能由中国政府付给，不宜合办工矿事业，否则影响主权；4．东北矿产不能归入中长路；5．苏方战利品以已拆卸之机器为限，未拆机器不得继续拆卸。否则，“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132]。张嘉璈此时不仅主张将东北日产收归国有，而且反对苏联以经济合作为借口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但是当时国民党正全力交涉东北接收，并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无暇也无力在此问题上与苏联对抗，所以蒋介石接到张的报告后，只“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133]。苏联则企图以既成事实压国民党让步，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此事遂暂时未提上双方的商谈日程。

然而，中苏双方不谈东北经济问题的情况并未能持续多久。在苏联方面，它对东北经济的方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可以拆卸的动产尽量运回苏联，二是对无法拆卸的不动产要求中苏合办。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即使谈也是敷衍，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法理而言，苏联的要求毫无道理，即便是索取战争赔偿，也应该由同盟国共同向日本提出，更不必说经济合作这样完全超出战争善后范围之外的问题。可叹的是，苏联自恃强权，完全无视中国也是同盟国和战胜国一员的事实，任意处置日本在东北掠夺中国资源而形成的大量产业，表现出一副贪婪面目。在拆卸了动产之后，苏

联必然提出不动产的问题。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对苏联的行为很是不满，本不愿涉及此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导致国民党态度的变化，由不愿谈而同意谈，尤其是主持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他很快便认识到，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具有关键的作用，经济合作问题是苏联全盘战略的一部分，简单的拒绝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恶感和戒心，对国民党不利，因此他转而主张就东北经济问题与苏联谈判，并在可能情况下满足苏联的要求，以此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双方抱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了经济问题的交涉。

10月27日，张嘉璈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就东北经济问题进行首次接触。斯氏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表示自己的态度，而只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他“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这次接触“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没有接触实质问题[(134)]。此前三天，斯氏已直接要求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达之助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将满业和满电各项事业移交苏联，高崎质以“若交与苏联，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将何以应付”，斯氏答云，“对于中国方面之问题，由苏联负责解决”，并称将以此为基础，在东北成立中苏工业公社[(135)]。29日和30日，满业和满电与苏方达成移交协议，全部过程中方毫不知情，苏方所谓由它“负责解决”中国方面之问题，无非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压中方承认而已。11月7日，马林诺夫斯基在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对张嘉璈说：“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阁下向在经济界负有声望，富有经验，阅名已久，且知阁下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决一切，但望勿为金元（即美元）所左右。”张氏不明底里，“不知何以在其语气中如此注重我之工作”[(136)]。直到13日，他得到苏方与满业和满电签署的文件，“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必欲染指，为排斥美国势力之侵入，阻滞我方军队之运输之一重大原因。苏方设计以战利品名义先自日本手中攫取工矿之所有权，同时又恐计不得逞，再拆迁重要机

件入掌握之中，故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又灼然可见”[137]。正是抱着这种认识，张嘉璈主张不能不与苏方谈判解决经济问题。

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璈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东北中苏经济合作问题。苏方在中苏东北接收交涉陷于僵局之时提出此要求，时机颇为耐人寻味。16日，斯氏复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更使张感觉自己对苏判断的正确，但张已接到行营撤退的命令，对东北交涉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只能表示将等候政府的指示再行谈判。为了对以后的谈判预作铺垫，张提出“政治环境可妨碍此种经济合作之发展”，并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138]，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党接收的想法传给了苏方。当然，张深知此事的难度，姑不论苏联的态度，即便是在国民党内和舆论界，对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苏联视以战败国待之，是很难赞成的，所以，张对此事小心翼翼，必领命而行，而且他从未将其想法公之于众，以免引起更大的争议。

苏联的态度则颇为急迫。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与张嘉璈见面，正式提出苏方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满业和满电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所有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人员担任总裁，苏方人员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大棒和胡萝卜并用，一方面声称“目前有迫切问题，亟待解决，因许多工厂全被破坏，无人管理，急须设法保护”，在两国政府解决前，他将令苏联人员照管维持；另一方面又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党接收的态度[139]。张嘉璈不敢怠慢，当即急电重庆，向蒋介石请示方针。22日接熊式辉电，令其返渝汇报。

11月25日，张嘉璈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早定经济合作方案，以便接收顺利进行。蒋对经济合作问题本有考虑，但态度游移，

28日他召集宋子文、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等讨论此事，张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140]。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仍表示“目前万不能谈”。宋、王两人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在这种情况下，宋、王虽不主张对苏决裂，但为顾及自身地位与名誉而反对对苏再做让步实为情理之中。宋、王态度如此，更不必说国民党内对苏强硬的主张了，他们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张也承认宋、王的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他又自信自己主张的正确，认为国民党“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然而他无能也无力说动国民党内的多数人同意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方面是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先接收而后谈经济，反对对苏再作妥协，另一方面是苏联有意无意的将经济合作与接收相联系，先经济而后谈接收，国民党与苏联关于东北接收问题的僵局便无法真正打开，东北问题只能暂时拖下去。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璈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的三项原则：1．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2．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3．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的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141]。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王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苏联不能等待国民党在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拖延与犹豫。12月4日，张嘉璈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马氏在对接收诸事表示态度的同时，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142]。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谈话，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因蒋有电要张按“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的内容。张还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作法，一方面表示，“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无结果[143]。9日，马林诺夫斯基又在与张、蒋的会谈中直接了当地要求，“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与迅速之办法解决”。这两次会谈后，张嘉璈与蒋经国联名致电蒋介石汇报情况，称：“现适值紧要关头，迎拒之间，十分微妙。实不敢负此重任，务请中央早日定一原则，是否愿于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电中建议由翁文灏或钱昌照“来此主持交涉”，或“迅派大员来长主持，以免延时太久，恐生枝节”[144]。此时的张嘉璈，既感在国民党内得不到支持，又对同意苏联要求后东北能否顺利接收心怀疑虑（苏方在谈判中只作空洞承诺而不提实际问题），从而也不再过于坚持己见，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因此而迟迟不得开始。

根据苏联代表斯拉特科夫斯基12月11日对张嘉璈所言，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原满业和满电的全部产业及关东军经营的产业，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81%，水泥37%，电力89%。两天后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八十一个单位，总价值38亿元。苏方要求组织十一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等五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就上

述方案而言，苏联的胃口相当大，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大半囊括其中，再考虑到合办企业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全部精华，则问题更为严重[145]。苏联的要求如果实现，意味着东北工业将由苏联所控制。张嘉璈在对苏方方案的分析意见中认为，化学、机械工业及本溪钢厂设备已为苏军掠去，不妨同意合作；鞍山钢厂设备虽被拆走，但宜保持；煤矿可以部分合作；有色金属应予保持；电力除鸭绿江电站外均应自办。但对这一既要政府同意又要顾及民众和舆论反应，不仅适用当时且可影响久远的重大问题，张嘉璈此时不能也不愿自作主张，而是静待蒋介石的决定。

12月19日，蒋介石、王世杰和应召回渝的张嘉璈、蒋经国讨论东北对苏外交。决定：以延期撤兵费名义付给苏方东北流通券10亿元，苏方不再提战利品问题；合办事业分为若干单位，不搞成一个大公司；先由经济部派人至长春商谈，俟苏方撤兵后再正式谈判[146]。其时，蒋介石决定先接收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派蒋经国赴苏协商，开始新一轮外交努力，因此他同意就经济合作问题与苏方作初步商谈，不无以此向苏方示好，得其协助接收之意。

张嘉璈回长春后，于24日将中方意见通知苏方，随后中苏开始了经济合作问题的非正式交涉。但国民党内对此意见不一，反对声浪很高，经济部提出的交涉方案比原方案有所后退，不再提撤兵费一事，缩小合办事业的种类和规模，电力不能合办，矿业应避免合办，可合办者只有本溪钢铁厂及一部分机械厂，所有合办企业的董事长应为中国人，总经理保留中国人担任的机会，更关键的是，在苏军撤退前，只能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预作初步谈话交换意见[147]。面对党内的反对意见，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变化，主张“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148]，并对经济部的方案又作了重要修改，只限于南满路以东的少数单位，中方股份占50%以上，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担任，而且必须等待苏联撤军之后才能签订协议。在此情况下，张嘉璈出任交涉使命，虽然他和蒋经国仍主张：“先作让步表示

诚意与坚决，能得一气呵成，反少受损失，以免重蹈以往对外交涉愈拖延愈吃亏之经验。”[149]，但因为国民党始终坚持苏联不撤军即不签约的态度，中苏经济合作交涉难有大的进展。

国民党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提交给苏方后，苏方极为不满。1946年1月26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在和张嘉璈会谈时声称：中方提案“无法使每一公司有发展之基础，实在不敢报告政府”。同时威胁说：“此项讨论，拖延已久。若再拖延，势必影响军事政治一切问题。”斯氏还解释说：苏方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并非苏方欲一手霸占利益”。对此，张表示：“我政府方面已尽最大之努力。”[150] 2月1日，张嘉璈会见马林诺夫斯基，马氏直言不讳地告张，中方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如仍拖延不决，作赌牌式勾心斗角之种种举动，则工业停顿，且继续遭受破坏，东北秩序始终不能恢复”，“而华方所提对案，决不能使此问题获得解决”。他半开玩笑半是真实地对张嘉璈说，经济合作问题如能解决，他和苏军便可早日返国。张嘉璈认为，“此次谈话无异苏方之最后通牒”，决定回重庆请示[151]。中苏有关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未及正式开始，便已实际陷于僵局。

2月4日，张嘉璈回到重庆汇报谈判情况，并与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商量对苏方针。此时在国民党内，除了孙科、邵力子等少数人主张妥协外，多数人反对对苏让步。据张嘉璈所记，国民党主其事者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三人，“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唯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蒋介石则“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不愿让步，因此事无可为之处[152]。蒋介石向张表示，“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153]。

就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处境微妙之际，美国人的插手使事态更为复杂化了。马歇尔到中国后，不止一次对王世杰谈到，对苏联的经济

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不主张对苏让步”。这样的意见无疑是有分量的[154]。2月11日，美国大使馆交给王世杰一份照会，转达美国政府之意见称：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之人民，并可能对于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的不利地位”。“在此时将日本在满洲之国外财产作最后之处置，或以‘战利品’之方式而迁移此项财产，或由中苏两国政府订立关于此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之协定，均将视为最不适宜。……对于中苏双方现已有或在计划中之商讨，以及或将采取关于处置或管理满洲工业组织之行动，美国政府深愿获悉，并欢迎一般问题之详尽的、坦率的商讨”[155]。美国此举，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它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使谈判益增困难”。就在美国照会送达的当天，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156]。这几件事使国民党决策者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就连一直主张对苏让步的张嘉璈也认为，即使此时与苏方达成协议，东北接收也“非用武力不可”，如此，“不特主持交涉者将遭唾骂，即交涉协议亦势难实行”[157]。

张嘉璈到渝后，经其与王世杰、翁文灏商议，搞出一个方案，蒋介石本想以此“作为最后之尝试”。2月19日，王世杰约见苏大使，告以中方提案已为最后方案，将由张嘉璈和蒋经国在长春与苏方谈判。然而就在当晚，张嘉璈正准备次日束装就道之时，接蒋介石电话，令其缓行。两天之后，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全国范围的反苏游行，并继而在二中全会上指责对苏外交软弱，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中苏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实际中断[158]。

三　反苏游行与苏联撤军

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不顺利，苏联迟迟无撤军之意，激起了民众和社会舆论的不满与疑虑。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势力利用这一点，策动了一场反苏运动，一方面压苏联撤军，一方面借此对党内温和派施加压力，以否定他们认为对国民党不利的政协诸决议，结果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国民党并未因此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确实功莫大焉，但是苏联毕竟有它自己的利益考虑。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东北物产资源的掠夺，加以苏军士兵以占领军自居，在东北的种种劣行，也是不争的事实，并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与反感。中共部队最先感受到了这一点，据曾克林所见，“在奉天之红军士兵生活甚苦，衣裳褴褛不堪，纪律甚坏，强奸事甚多，曾每日将红军士兵违犯纪律事实向红军政治部汇报……但仍无法维持”[159]。伍修权也回忆说：“苏军进入我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据反映在他们的连队里，有部分士兵不是正规军人，而是一些刑事犯人……这些人原来不是正路人，来华后又以胜利者自居，不断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醉酒的红军士兵……后来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等等，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160]。甚至中共高级将领、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在制止苏军士兵抢劫时被这些士兵所杀害[161]。

国民党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所知更多。熊式辉和张嘉璈初到东北，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苏军在东北的恶劣行为。熊报告：金融业，现钞均被提走，银行全部停业；交通业，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已改为宽轨，公、铁车辆“均为苏军征发运赴它处”；工业，“重要工厂机械已有多数撤去”；通讯业，电报电话完全停顿。熊认为：“照上述情形，经济方面，前途十分棘手。”[162] 张在报告中写道：“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即电厂电机亦已部分拆走，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163] 据事后统计，东北著名的丰满、抚顺、阜新电厂，鞍山、本溪钢厂及煤炭、机械、化

学、水泥工业均受到严重破坏。东北以至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满洲制铁会社，全部设备的三分之二和七万余吨物资被苏联运走，其中包括全部炼钢、炼铁、轧钢、选矿设备，以及大半发电、锅炉、机械设备[164]。苏军还在东北发行军用票，用途超出原协议范围，扩展到民用领域，用以任意购置物资，助长了通货膨胀[165]。

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苏联占领期间对东北工业生产力的破坏，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后人对此问题的计算方法与结论也各有差别。1946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于1946年中视察东北后提交的报告。该报告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失为85，800万美元，其中电力20，100万美元，煤炭1亿美元，钢铁14，100万美元，铁路13，700万美元，金属业15，000万美元，如果加上间接损失，则高达20亿美元，各行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报告认为“东北工业大部分的破坏都是发生在苏军占领的期间，而且主要是由于苏联对各种设备的迁移”造成的。苏联还接收了伪满银行5000万元以上的现钞和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发行了约10亿元的军用票[166]。1947年2月，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发表了《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估计东北工业损失为123，600万美元，如加上无法确证者不下20亿美元，其中电力21，954万美元，钢铁20，405万美元，铁路19，375万美元，机械15，887万美元[167]。中共方面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东北“共损失各类机器40，269件，发电设备1，537，046千瓦等，共计折合美金352，815，851美元”。其中毁于战火或散失原因不详者，折合135，129，331美元，苏军拆走者约合189，934，947美元，国民党方面搬走的约合899，800美元，中共方面移出的共合12，151，773美元[168]。无论哪一种统计，东北工业的损失程度都是惊人的[169]。而且，“许多工业设备既已拆去，剩余部分，即无法运用。例如抚顺煤矿，电力设备因被迁拆四分之三，故电力不足，抽水机不能大量使用，煤矿被水淹没，全部不能工作；又如鞍山钢铁

厂，因炼焦炉被毁，不能炼焦，既无焦炭，则所余之平炉、化铁炉即毫无可用之途；又如轧钢厂，虽一切设备未动，而精小之轧钢机则被苏军拆走，该轧钢厂犹如人之心脏被挖，丝毫不能生产；更如机器厂之皮带，苏军于临撤退时，皆斩为寸断，论其生产能力之损失，亦等于百分之百，故苏对我东北工矿业之抢劫与破坏，绝不能以区区之数字所能表示于万一也”[170]。在这方面，苏联的作为有违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初衷，也找不到任何条约和法理的依据，表现了大国强权主义行径。此种情形的逐渐披露，给本为苏联二战盟友并且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中国民众泼了一瓢冷水。

中国民众对苏联在东北所作所为的反应由于雅尔塔密约的公布而更形强烈。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正式公布了雅尔塔密约。在此之前，中国民众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支援中国抗战，并由中苏条约界定了两国关系，但密约的公布，使人们得知在表面文章之下，还有大国之间的交易，而中国完全处于被动无援的地位，一切都是由大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由于东北处于苏军占领下，苏军不仅有种种伤害民众感情的举动，而且迟迟不撤兵，并在经济合作谈判中要挟中方，因此这种不满便主要针对苏联而发。从2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读雅尔达秘密协定有感》为开端，全国各报连续发文，抨击苏联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知识界对此反应强烈。傅斯年、王云五等领衔发出《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签名发出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等中间党派领导人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谴责雅尔塔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苏联的作为“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大国“运用秘密外交，以

处置第三国之领土与权益，实为旧日帝国主义之惯技”，要求：“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171)

中国人民历经艰辛、含辛茹苦，在同盟国共同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然而少数大国为了一己私利，以牺牲中国国家主权作代价，私相授受，无异使中国仍处于二等地位，当然为中国人民和舆论所不满。这种不满和反感是完全正当的。然而这种对苏不满情绪给了国民党强硬派一个机会，他们借此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活动，以实现他们改变国民党对苏对共政策的企图。美国则利用这个机会，极力鼓动中国排挤苏联。2月8日，王世杰征求马歇尔对苏联迟迟不撤兵一事的意见，马歇尔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认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他还建议让同盟国记者进入满洲，对苏联发起心理战。王世杰告诉马歇尔，将公众注意力转向东北一事正在考虑中(172)。当然，这样做的后果，美国和国民党都没能完全预计到。

自2月中旬起，首先是东北旅渝人士在16日举行会议并游行请愿，接着重庆各校学生开始酝酿举行游行，反对苏军继续占据东北，要求苏军尽早撤离。一直对学生运动心怀警惕的国民党此次一反常态，在事先已得到情报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阻止的举动，而且党部和三青团系统人员在学校频繁活动，力图将游行导向对其有利的轨道。20日和21日，国民党党政小组举行两次临时谈话会，分别由陈立夫和吴铁城主持，决议对学生游行不能劝止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意外，学校当局和教职员应参加游行，严防工人参加游行，游行后之宣传由吴国桢等负责，游行当日，党内负责人坐镇中央党部，“以便应付一切”(173)。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省市政府与党部，称对学

生行动“制止恐不可能，但本党只宜善为引导”，而“引导”方向为，“避免正面攻击苏联，”“东北问题，乃是共党阻挠国军接收问题”，“应痛加指责”，“予以驳斥”，并要求各省市“特加注意，妥为运用，并将该省市情况随时电报为要”。吴铁城、陈立夫等还电告正在杭州的蒋介石：重庆学生酝酿游行，“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生意外”[174]。由此清楚地说明，国民党支持游行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党内强硬派企图将游行导向反共之途，以此加强自己的党内地位，并为在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上改变政协决议预作舆论准备。

2月22日，以中央大学为主体的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二万多人，举行“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会”，发表《告全世界人士书》、《告全国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质中共书》等文件，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苏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进而提出反对东北“特殊化”，反对“割据东北”，拥护政府接收东北等矛头指向中共的口号。在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时，有人煽动捣毁了该营业部。重庆游行当天，国民党中执会再次指示各省市党部，重申前电各点，并特意提出严防“异党分子”“转移运动之领导权”，“各地党团应即与军政各机关首长举行会议，密切联系，妥慎应付”，“各地有关此事之情况应随时以最迅速方法报告中央”[175]。其后重庆续有游行，全国各地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游行示威及抗议活动，北平还发生了冲击军调部中共方面办公处的事件。国民党宣传工具乘机推波助澜，发表反苏反共言论，挑动民众情绪。

此次反苏反共游行，是国民党多年来第一次得以利用学生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实则是党内强硬派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还有一个原因。本来国民党认为苏联在东北的驻留对自己有利，所以才要求苏军延期撤退。但延期撤退的期限2月1日已过，苏军并无

撤退之意，且称由于运输、接收及若干问题尚未解决，撤退将展缓至开春以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经研究认为，“苏联目前拖延东北驻防军撤退时间，似确有利用此时间完全充实中共军之实力，滋长共党在东北蔓延之趋势。一俟将来苏军撤退，则共军装备亦已完成，根据地亦已巩固，即国军北进既难克尽收复之任务，且对装备优势之共军亦无可奈何”[176]。国民党因而一改过去的主张，要求苏军尽快撤退，以为自己能在东北放手动武准备条件，学生游行即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要求苏军尽快撤退，国民党内本无异议，但党内温和派对强硬派采用如此激烈的公开动作颇为忧虑。王世杰事前曾邀集孙科、邵力子、王宠惠、张嘉璈等商议，均认为应和苏联继续商谈，不宜采取激烈行动。王世杰认为：“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政局确走入极严重状态。”因此他致电在杭州的蒋介石，“谓情形严重，盼其急电党中同志，阻止扩大此种政潮”。游行发生后，王“十分忧虑”，认为“蒋先生在杭州似未十分明了近日陪都情形演变之严重性”，因而连电催其速“返渝主持”[177]。但蒋在杭州静观事态发展，不急于有所动作，正表示了他的态度。强硬派的行动实际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内心未尝没有借此压苏联和中共让步的想法。24日，蒋才从杭州回重庆，王世杰告其重庆近日情形，请其作适当之公开表示，以安苏联之心。次日，蒋公开发表谈话称，“东北问题必能有合理的解决，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178]。然而此一讲话明显不过是马后炮而已。

3月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强硬派借政协决议和东北问题发难，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全会秘密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以保我领土主权行政完整而固国防案》、《限令中央对当前东北严重局势采取紧急有效措施以维国权而保领土案》和《本党结束训政前拟请政府迅采关于经济国防及东北问题之有效措施期使全国民生安定人心振奋案》，强硬派以此进一步向蒋介石和中央施加压力，而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强硬派指为“卖国”的猛烈攻

击下，噤口不敢言，国民党整个东北政策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179]。

国民党的举动使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2月26日，苏联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反苏游行责任应由中国政府负责。3月6日，外交部照会苏大使，要求“转请贵国政府令饬现在仍驻中国东北诸省之苏军即行撤退”[180]。一周之后，苏军在不通知国民党的情况下，突然从沈阳撤退。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是，苏军的撤退完全不等国民党军的接防，无异为中共部队大开方便之门。3月17日，中共军队经过激烈战斗攻占辽北省省会四平，扼住了长春铁路往北的咽喉要道，使整个北满将要落入中共的控制之中。国民党感到形势的严重，21日，王世杰紧急约见苏联大使，表示“我预定担任接防之军事人员，遂感受重大困难”，要求苏方预先通知撤退日期，并“对中国接防军队予以便利与协助”。苏方对此未作表示，只于次日正式通知外交部，“苏军依照政府之决定，本年四月底将自满洲撤退完毕”[181]。而东北苏军总部的态度则更为直截了当。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面告留驻长春的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关于接防问题，如贵军在苏军预定撤退之日期以前到达，我军可采一切必要之步骤交防接防，如未到达，苏军亦不能改变预定计划”；苏军“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务，不遑顾及其他，并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至于长春以南，苏军虽表示可以交付接收，但又称因鼠疫停止一切铁路客货运输，中国军队应在公主岭停留十天以接受检疫。马林诺夫斯基对董彦平称，苏军“因等待甚久，外间误会滋多，故不得不及早撤退”[182]。国民党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代价。

4月14日，苏军自长春撤退，25日自哈尔滨撤退，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和松江、嫩江省及哈尔滨市政府接收人员不得不随苏军撤入苏联境内[183]。5月23日，苏联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苏军

已于5月3日自东北撤退完毕。至此，困扰国民党的东北苏军问题暂告一段落[184]，然而，对国民党而言，东北接收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难题还在后头。

第三节　东北的战火

一　东北军调的失败

日本投降以后，东北虽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但在一段时间里，东北问题并没有端上国共双方的谈判桌。在国民党方面，是根本不愿提，而将其定位为接收国家主权问题，目的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以独占东北。在中共方面，是有意不提，以尽量争取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从实力出发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国民党按兵不动，中共则致力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双方暂时还能做到相安无事，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华北的冲突比较，东北还不算国共冲突的热点地区。随着苏军逐步撤离东北，原先隔离国共武装不使之发生直接冲突的缓冲力量不复存在，东北国共冲突的可能性骤然上升，而国民党内政治情势的变化，使这一冲突很快便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和主战军人集团结合，不满于政协决议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限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检讨战后政策得失为名，在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东北问题上发难，对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导致国民党战后政策走向的重大改变。国民党内政治动向的这一变化，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纵容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温和派不敢或不便再作主张，从而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动武大气候已成。而苏军的撤离，更使国民党不再有过去的担心，东北问题的焦点开始从国民党与苏联的矛盾向国共矛盾转化。

蒋介石决定对东北的政策时，从未真正放弃过收复东北的想法，但他一方面顾虑苏联的反应，所谓投鼠忌器也，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力量不足，因此他迟迟未下令军队进入东北。随着苏军从东北撤离的最后期限的到来，虽然苏军还在找借口拖延，但蒋判断苏军撤离不过是迟早问题，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协助下正源源不断开入东北，蒋对东北接收的态度逐渐趋于积极。1946年1月19日，蒋要求熊式辉和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忽。"2月13日，再次下令，要点有苏军者力予交涉接收，要点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以防东北成为"第二华北"[185]。这表明一向迷信武力的蒋介石已准备军事解决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云南系统的六十军、九十三军等部由美国军舰陆续运抵东北，使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总数将近25万人，军事实力大大增强。1月发布的停战令，由于国民党的坚持，规定"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186]。这一条规定虽只涉及军队调动问题，但含义并不明确，何谓"恢复主权"，范围如何确定，军队如何调动，国共双方各有不同解释。实际上，国民党如此坚持这条规定，已透露出其改变东北政策的信息。停战令生效前后的国共营口争夺战，凸显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187]，在全国局势的相对平静中，东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也开始关注如何解决东北问题。随着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的召开，整军协议的签订，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而东北局势的不确定，蕴含着发生冲突的极大可能。随着苏军的即将撤离，中共势将直接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如果能在此时，为东北问题确立一个解决框架，无疑对巩固中共的地位，完成中共预定的战略任务，是非常有利的。何况，经过半年来的积极行动，中共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并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自信可以在政协决议的框架下，与国民党讨论解决东北问题，争取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

位。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代表团，“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声明如不先谈好，在东北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谈判的方针为：1．改组东北行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2．承认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地位；3．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已存在的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4．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须有数量限制[188]。

由于东北在中共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东北局彭真、林彪等负责人对国内形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国民党可利用停战稳定关内，同时自关内调兵出关，与中共争夺东北，这样对中共不利，因此他们建议应以各种手段“逼蒋迅速与我谈判东北问题，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189]。此时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认为“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因此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为此，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指示东北局，军事上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退出长春路及沿线若干大城市，在军事上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190]。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了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的基本方针。次日，中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公诸于世。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整军谈判中向张治中不断提出东北问题，表示“东北问题长此拖延下去，恐不是办法”[191]。整军协议签订当天，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战和整军应将东北包括在内，“因这是一严重问题。在上次的停战协议中，此点规定得尚不够明确，致你的提议未能在东北实现。现在整军和停战的协议都有了，以后就要赶紧把冲突停止”[192]。但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并未能得到国民党的应有回应。国民党坚持东北接收是关系国家主权的问题，而且有条约依据，不能受任何限制，同时不承

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公布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后，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之，东北问题解决的关键显然在于国民党的态度。

在苏联即将从东北撤军之时，东北问题纠葛中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登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马歇尔使华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东北问题，维护美国的利益。他来华不过两个月，就在停战与整军两事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但东北问题的悬而未决，不仅存在着发生军事冲突的极大可能，而且必然影响全国和平，使马的成功付之东流。如同马歇尔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所说："过去一个月在中国已经成就的一切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及早处理满洲正在恶化的局势。"[(193)] 马氏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在停战与整军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便着手解决东北问题。

还在1月24日，马歇尔便提议派出军调小组前往营口，并建议以后遇有同样事件时照此行事。这实际是将军事调处的范围扩大到东北，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2月20日，马歇尔重提向东北派遣军调小组的建议，又为国民党拒绝。这使马氏认识到，"国民政府似乎决心不使它在满洲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限制，并且倾向于以军事完全占领满洲全境，如遇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阻挠，则消灭中共军队"。马氏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国民党此时在东北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有把握消灭中共，相反，轻率动武的结果，可能反而对国民党不利[(194)]。问题在于，马歇尔对国民党在东北行动的后果估计不足，因此他当时尚无意压国民党让步。而美国帮助国民党大规模运送军队到东北，并发表对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反对意见的声明，使国民党寄希望于在未来的东北冲突中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氏的建议便更可能被国民党理解成一种姿态，而非强力。这反映了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它既要伸展美国在东北的势力，对抗苏联的利益企图，就不能不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从而也就不能不导致国共军事冲突，而东北冲突的结果，必然影响关内，促发全国内战，最终使马歇尔调停失败，并损害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

蒋介石对马歇尔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置之不理，反映了国民党此时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态度，即不承认中共的地位，要求由国民党独占东北。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大环境下，这个态度很难再有松动的可能。3月9日，蒋介石对马歇尔表示同意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但提出五项条件，即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小组随政府军行动；小组有权去双方冲突的一切地点；政府军有权接收中长路及两侧30公里内的全部地区；中共军撤出矿区和铁路；凡国民党军队接收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当马氏将此转达给周恩来时，周反问他，如此岂不等于中共军队将从全东北撤退？因此当然为中共所拒绝[(195)]。在马歇尔回国前，周恩来与他连续会谈，解释中共对东北的要求是先停战，再谈其他；外交与内政分开，内政要协商；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党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周恳切地对马氏转达了延安的表示：你能否把东北问题解决了再走，这样对中国人民有极大好处，而且改组政府事也可决定了，全国的局面就都安定了，这对你回美后要解决各种问题也可有极大便利。由于马氏前一阶段大体公平的调处，使中共对他压迫国民党解决东北问题寄予希望，然而马氏在东北问题上代表美国利益，显与中共立场有较大距离，他更希望看到的是由国民党接收东北，以排除苏联插手，确保美国战略利益。针对马氏“对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还未释然”，周恩来特意解释说，“中共和苏联在思想意识上有其共同点，但两者绝然是两个国家”；“至于外交方面，现正由政府和苏联直接办理，我们并未参加意见。因此在解决东北的问题上，我们力避接触到外交问题，而在东北的内政问题上，我们欢迎美国来帮助解决”[(196)]。但3月11日马歇尔离华当天，根据蒋介石的五点意见拟出的东北军调命令草案，因在铁路沿线接收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而无法达成妥协，这也表明马氏此时尚不急于解决东北问题，或许他还想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马歇尔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一个月后回到中国时，东北已经战火纷飞，并且最终牵动整个大局，使他辛辛苦苦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成了废纸，他本人的公正性和由此而来的声名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事实证明，马歇尔在东北调处问题上的大意或是故

意，是美国人调处中国内战的工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东北问题未得合理解决引发的战火，则是全面内战最终爆发的导火线和时局由和而战转换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来，中共从国内外大势出发，准备在东北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但是东北与关内的不同之处在于，关内是现地停战，中共并不损失实际利益，而东北停战后势必要让出中共已占领的若干地方给国民党接收，因此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认为“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并且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正因为如此，中共一方面准备对国民党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认为“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即中共前所提之四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需要东北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作为逼蒋谈判的筹码。因此，中共中央最初要求东北方面退出长春路沿线城市，其后又同意了东北局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同时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会提出一些或高或低的条件。无论是作为实际要价，还是谈判策略，作为对抗的一方，中共这样做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直到3月中旬，中共“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是要让给国民党的”[(197)]。问题在于，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缓和主张，以及中共心中“最难”的让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应有的回应，东北的军事形势日渐紧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更有对共强硬的表示。国共双方长期的对立与斗争，使双方内心的互相猜忌与疑虑很难一下子消失，国民党的举动，使中共不能不怀疑对方的真实企图，从而相应改变自己的政策。

3月13日，苏军撤出沈阳，国民党政府军立即进驻，随即以沈阳为中心，向外围作扇形攻势，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并有北上长春的意图。与此同时，关于东北军调的谈判在美国调停下正在紧张进行。中共认为，在此情况下，“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

协”[198]。3月16日，中共中央两电周恩来，东北“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如国民党“不愿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199]。表明中共决定在东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3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200]。同日，东北民主联军攻下四平。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须：1．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决不让国民党军向长春前进；2．南满主力就现地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国民党军，牵制其不得北进；3．如国民党军北进时，南满主力应转移至四平街地区，为保卫北满而战。随后，又在25日、27日连电东北局和林彪、彭真等领导人，强调“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据此“部置力量，指导工作”[201]。这表明中共对东北方针的重大变化，即由和为主、承认国民党的接收权转为先战后和、在可能时最大限度地占领东北实地，以在未来的谈判中可以照关内现地停战的先例，从实力地位出发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在此前后，由于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恶化，因此苏联对国民党态度也转为强硬，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并一再询问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202]。中共力争东北的方针因得到苏联的支持更增强了把握。

马歇尔回国述职后，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进行，周恩来和张治中以及马氏代表吉伦进行了反复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求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而中共认为如此则含义模糊，使国民党“可指任何一苏军到过的地方都是撤退区，都要进驻，毫无限制，将使我陷于彻底被动。彼方即不承认我军驻地，甚至连维持现状的话都不愿规定，我

方当然不能承认彼方此种无限制的要求”[203]。因此，中共坚持接收只能限于苏军现时撤退的地区，同时国民党应承认停战，解决东北驻军配置及政治问题。3月16日，张治中同意接受中共要求，国方只接收苏军现时撤退地区，而如进驻中共军队驻地应经过商定，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否决。直到27日，国共美三方才就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一事达成协议，规定：1．小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2．小组应在政府军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驻留之地区；3．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作公平之调处。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政治问题另行商谈[204]。这个协议抹去了国共分歧的关键点，即国民党的接收要求和中共的政治要求，因而没能解决东北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更鼓动了交战双方抢占实地，使执行小组成了观战小组。根据协议，东北成立四个执行小组，其中第二十七小组驻沈阳，为中心小组。3月29日，美方白鲁德飞抵沈阳，与熊式辉讨论派出小组问题，遭到熊的强硬拒绝。因为熊有蒋介石的指示：“凡我军工作有妨碍之处，如执行组有前往视察之要求，亦可暂为婉谢。”因此熊有恃无恐。尽管白鲁德向熊表白：小组作用“可使国军顺利接收”，“可暴露苏、共勾结情形于世界”，但熊并不领情，回以“不便与小组会议”[205]。4月2日，参加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在飞抵沈阳机场时被扣留了三个小时，导致原定派出的执行小组大多未能到达战地，说明东北军调根本无法进行，东北和平的前景日渐黯淡[206]。

4月1日，军政部部长陈诚接替去新疆的张治中出任三人小组国方代表。陈诚是主战派，他甫上任便对美方代表吉伦说：中共与英美等国的政党不同，它是有国际背景的集团。他们一贯不守信义，只知不断争取利益。因此他主张中共必须严格执行军队整编统编事项，不然用不着再谈。他还表示，尽管他个人与周恩来关系尚好，但主义不同，友谊关系不可靠[207]。陈与张对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使谈判更不可能有进展。对于整军和东北局势，陈诚在召集部下讨论后决定谈判方针为：东北按停战协定调军不受限制，以此向美方说明并再运一二个军去东北；所谓东北国方的五个军为整编后之数字；中共规定

在东北只驻一个军，然而现在超出远甚，希望停止秘密运兵并速整编；只要迅速按基本方案规定国共双方部队驻地，并且中共不在东北接收苏军退出之城镇，冲突自可停止；全国问题须整个解决，不可因东北局部情况而陷整军于停顿，希中共速按整编方案整军并规定驻地[208]。由于陈诚缺乏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多次讨论东北问题而无结果。4月8日，蒋介石致函美方代表转马歇尔：对于国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带一事，事关恢复我国主权，必须办到。今共军非法占领沿铁路线各据点，造成冲突，中共应负其责。因此，余要求中共军队立即沿铁路线各点撤开，俾国军可以通过，达成上项任务。至于中共对于东北军事有何其他意见，尽可提出，由三人会议讨论，以谋合理解决[209]。同日，在三人小组会议上，陈诚指责“发生冲突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或攻击已接收之地区，故必须明确规定中共让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并限制中共军队不准攻击政府接收人员，只能如此，方能避免两方冲突”。美方代表吉伦附合陈的意见，他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再事调动，撤出铁路两侧一日行程。周恩来则坚持，“必须先将冲突停止下来，再定如何接防。现在政府推翻原协议而不执行，即或再得协议，也可能被推翻，这样，谈来谈去有何作用？”[210]会谈不欢而散，陈诚于会后干脆借口去上海治病，不再出席三人小组会议，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从此无形中断，表明国民党决心在东北武力接收。

由于中共军队攻占四平，切断了中长路，整个北满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3月30日，周恩来会见张嘉璈，表示中共“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唯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明确地将信息传给了国民党[211]。然而两天之后，和平解决的希望便破灭了。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演讲，坚持“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对中共军队和政权“决不能承认”，“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

进行”[212]。这无异于宣战声明。13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了蒋的演讲，他表示：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则中共也将不停止抵抗，假如国民党有权从那里进攻，则中共也有权在那里自卫，假如国民党用武力进攻，则中共也将用武力反击[213]。难怪张嘉璈感叹，东北问题“除国共两方武力决斗之外，别无解决之道”[214]。

二　空前激烈的四平战役

东北军事调处的努力失败后，国共双方尽遣精锐，在四平、本溪一北一南两条战线作实力较量，双方一攻一守，战斗的规模与激烈程度，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国共军事较量中可称空前。战斗的结局，不仅影响东北，而且及于全国；不仅影响军事，更及于政治，以及国共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全局。四平战役可称为战后中国政治军事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自上年攻占锦州后暂时停止，但国民党军队自进入东北后，虽和中共军队交过几次手，然并未真正吃过苦头，前线将领多持主战态度。杜聿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力主“一面接防，一面肃清，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215]。1945年12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以锦州、锦西为出发地，开始在北宁路锦州、沈阳段西侧发起进攻，先后攻占北镇、黑山、义县，12月30日，进占阜新。1946年1月上旬，又对热河发起进攻，先后占领了北票、朝阳、叶柏寿、建平、凌源等地，因停战令发布而停止于赤峰、承德近郊。中旬，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近郊的新民和市内铁西区待命。2月上中旬，杜聿明又以二个师发动了对北宁路锦沈段两侧的扫荡战，先后占领了路南的辽中、盘山和路北的法库，其间在法库南之秀水河子和盘山东之沙岭子与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激战，结果一失一得，打成平手。

2月底，杜聿明因病离职赴北平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其职务。3月4日，熊式辉奉蒋介石令，“着坐镇锦州，直接指挥军事”。他随即下

令开始在辽南进攻，并与前线将领商定“一致拒绝三人小组干与东北接防事”，并在三人小组到东北前，尽可能抢占实地，控制铁路沿线及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日后谈判。29日，他致电蒋介石，认为“苏军将撤，共军自危”，建议“对苏对共，应取强硬态度”，“中央对东北军事，似无重订新协定之必要”。其后，他又向蒋提出，“此后青纱帐起，继以雨期，故此时间性之重要，甚为明显”[216]。这些主张对蒋的决策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尤其是在蒋本人也倾向于动武的情况下，前方将领的态度，使蒋更可以之压服党内不同意见。

3月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15日即发出进攻命令。此时正值中共军队调整部署，准备大战，而不求保守城市，因此国民党军的攻势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南线，3月21日，占领辽阳、抚顺，4月2日，又占领了鞍山、海城和营口三城。在北线，沿中长路北进，3月23日，占领铁岭，30日，占领开原，4月4日，占领昌图，复经过激烈战斗，中旬进至四平外围。

4月6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目前共军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217]。13日，又严令熊式辉于20日前攻下四平。由此表明蒋决心在东北动武，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展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分为南北两条战线。北线进攻由孙立人的新一军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担任，从重要性而言，国民党更看重北线，因为东北未接收地区集中在北满，何况长春是东北首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线进攻由廖耀湘的新六军和赵公武的五十二军担任，由于南线对其后方威胁较大，而且“化冰后，辽南平原河川横梗，进军不易”，因此熊式辉对南线较为重视。由于杜聿明此时因病离职住院，北线由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南线由东北行营熊式辉直接指挥。从兵力部署而言，国民党军摆出了一个平分兵

力、齐头并进的阵势。

在国民党军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之时，中共东北部队也在进行着部署的调整。在上年底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下达后，中共东北部队分散进行整顿、剿匪、发动群众与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指示，3月2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新的作战部署，认为完成中共中央指示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为此要求“各军区应不顾惜暂时可能失掉某些地区（例如被匪占据）。将守备兵力减到必要限度，而抽最大限度的兵力参加此次有关东北全局的大会战”[218]。东北局决定由西满部队承担四平作战任务，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南满部队承担本溪作战任务，掩护东北局机关转移并牵制国民党北进部队；东满部队承担攻击长春任务；北满部队承担攻击哈尔滨的任务。此后，西满与南满部队开始分别向四平和本溪集中，对其他各城未作坚决防守的部署。而在北满，中共集中二万余部队，自4月14日苏军撤退当天开始进攻长春，18日占领长春；24日，占领齐齐哈尔；28日，未经战斗进驻哈尔滨。至此，全部北满落入中共手中。

东北战事爆发后，4月上旬，国民党军首先在进攻本溪的作战中遭到挫折。防守本溪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萧华、程世才指挥的南满军区第三、第四纵队，由于国民党军在辽南占据了若干城市，需要分兵把守，而且前一阶段进攻的顺利，使它有些轻敌，因此最初进攻本溪的部队只有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和新六军第十四师。4月2日，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攻受挫。7日，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率部再度发起攻击，由于兵力不集中，被萧华部反击，损失了一个团，于10日被迫退回出发地。

四平方面，国民党军队从4月17日开始发起全面攻势。由新一军担任正面主攻，分为左路新三十八师、中路新三十师、右路第五十

师，以四平南中长路上之虻牛哨为基地，向四平三路同时进攻。另以七十一军两个师由四平西面之大洼、八面城向四平作大迂回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以两个团守四平城，另以陆续调来之十四个师（旅）在四平正面构成蜿蜒百里的防线，林彪率前线指挥部在四平西北的梨树坐镇指挥，并要求“每一个前线指挥员必须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皆无权离开岗位”[219]。从17日到27日，新一军对四平连续发起猛烈攻势，并出动空军和装甲部队助战，双方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由于是阵地战，便于国民党军队发挥优势火力装备的作用，但中共部队在劣势装备下，完全凭高昂的士气与精神，抵挡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对手在十天时间中不能越防线一步。国民党军虽一度攻入城内，但未及立足即被迫退出，而七十一军由于在15日的大洼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心有余悸，迂回作战不很有力，直到25日方攻下八面城。

因为攻势顿挫，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熊式辉和杜聿明虽都主张动武，但两人也都认为东北兵力不足，杜提出东北应有十个军，而熊更要求东北部署十二至十五个军。四平作战时，国民党在东北已有七个军，但实际可用于前线的不过四个军，就军力而言，装备优于中共部队，而人数并不占多少优势，但中共军队抵抗之顽强，大大出乎国民党的预料。熊式辉先前的主战态度有了变化，主张只有等待援军开到，才能继续进攻，尤其是北线，不可过于深入。国民党统帅部方面，何应钦主张“后防不可少忽，主要兵力不宜远出”[220]。军令部方面则一直主张，东北不宜孤军深入。4月2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既进入矣，以为政治尽可前进，军事力量只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今日诚不可再进一步矣”[221]。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兵力的增加之外，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地位与半年前相比并无明显改观，而中共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根基大为稳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

北军事行动的最佳时机。

尽管东北作战不利，但一则此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主战派；二则收复东北是国民党公之于众的抗战基本目标之一，事关其政治地位与公众形象；三则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随后又占领哈尔滨的行动，使国民党感到大丢脸面，主战的喧嚣掩盖了作战的不利。蒋介石于恼怒中确立了必须拿下长春再及其他的决心。21日，蒋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23日，又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指示作战方略，要求：彻底使用空军助战，设法抽调新六军活用，坚定各军官兵信心，并答应增调援军[(222)]。由于蒋的作战决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停止。

中共方面对四平作战的得失也不是没有异议的。东北局和林彪最初主张乘苏军撤退之机，尽可能控制东北广大地盘，以实力与国民党讨价还价，他们的想法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并与中共中央夺取中长路沿线大城市的命令相合拍。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一贯作战谨慎的林彪审时度势，反对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队对抗，而主张作长期打算，以运动战为主。4月11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对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223)]。他的主导思想是“且战且退”，延缓对手的进攻，以争取时间。东北其他中共领导人陈云、高岗、黄克诚等也都认为，在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进攻下，不宜采取固守城市的战略。

中共中央的考虑与林彪等人的建议显然不同。尽管毛泽东也曾同意林彪意见，“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

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224]，但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四平战役前后的大量指示而言，其主导面是指示东北方面，“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要求“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从一开始就表示了打大战的决心[225]。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战事开始前，中共“估计在东北的内战不可能长期继续，在我党采取明确和平方针下，国民党终将被迫和我谈判停战”；“蒋方对东北问题大吹大擂，高声恐吓，其实是想达不战而得大部地方之目的。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战事开始后，中共认为国内舆论和民主党派都在要求停战，而美国也不会听任东北战火蔓延影响全局，只要能够坚守四平，便可在停战时“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部在我手中”，这样，“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226]。四平作战期间，中共中央给东北方面的有关指示，多是围绕停战问题而部署工作。战事开始前，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电致林彪：“马（歇尔）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长春、哈尔滨先后被中共部队攻下后，守住四平，便意味着北满可能掌握在中共手中，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四平坚守的决心更为坚定。26日，毛泽东再电林彪：“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5月1日，毛泽东三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尽，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电文并告林：“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227]他还不断指示四平前线的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总之，守住四平，以利谈判[228]。

在此期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和美国以及国民党交涉的结果对中共在东北的作战决心和部署有着重要影响。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

报中，根据谈判的情况，数次建议，不能消极防御和等待，应“打得顽痛，以利谈判”；“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若如此，非打不足以杀其锋”；并建议“抢先开兵入长”，对国民党军“在四平街及其东西翼宜给以重击”。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视东北为检验国民党军战力的战场，只有痛加打击，“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当马歇尔调停暂时中断后，周恩来又建议：“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229] 中共中央坚守四平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重庆代表团对于形势的判断。

正是由于这诸多原因，中共中央强调集中兵力，打大战，打硬战，“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视四平战斗为国内和平能否实现的关键一战。四平作战，一反中共传统的运动战战法，以阵地战与国民党军对抗，主要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图。从战争的过程看，中共对国民党作战的决心和美国调停作用的估计不无失当之处，而且即便守住四平可以促成和平，但中共部队在东北当时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全面阵地战的能力。这样，中共的政治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间不协调，是导致中共四平作战未达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北作战由于国共双方各有企图，不仅没有在全国舆论的停战呼吁中歇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有了决战的心理准备和相应部署。国民党方面，如蒋介石所言：“此次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则全局皆危，国脉将断。”中共方面，如东北局在动员令中所言：“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230] 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轻易不会停止运转。

4月中旬，杜聿明出院回到沈阳，接过东北军事指挥权。他在国民党将领中属于较为有胆有识而且长于实干者，事前蒋介石有电给他：“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231] 因为前一阶段的作战他未参加，他对东北打成这个局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

重在争城夺地的失误，应该集中兵力消灭对手的主力和有生力量，才能改变战局。他经过研究，认为四平和本溪两条战线中，在四平的中共军队实力强于本溪，而且是中共的作战重点；而国民党方面，四平战线兵力不足，损失较大，本溪战线的两个军只动用了两个师，且对本溪成包围态势，攻击较易，如能先解决本溪方面，既可确保沈阳安全，还可抽出兵力增援四平，因此他决定“以集中主力，各个击灭共匪之目的，决先将本溪之匪包围而歼灭之”，得手后再图四平[232]。他的主张得到本溪方面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和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的支持，廖而且夸口，发起攻击后，四天之内拿下本溪。但杜的方案不符合蒋介石先解决四平的意图，也与熊式辉四平与本溪并重的意见相左。不过杜自信他的部署符合实际，一旦进攻有了进展，蒋介石与熊式辉都不会再说什么。在部署上，杜将到东北不久的六十军接替鞍山、抚顺等城的防务，以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兵团，沿太子河两岸向北进击；五十二军为左兵团，抑留当面中共部队，待右兵团取得进展后，向南压迫，最后两路会合攻占本溪。杜要求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迅猛行动，不使对手有各个击破之机。

4月29日，新六军及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三路并列攻击本溪，位于中央的新二十二师于次日逼近本溪城下，五十二军则进展稍缓。此时，中共在本溪地区的部队，三纵二个旅已调往四平助战，本溪只有四个旅的兵力，攻守之势悬殊。萧华等认为，本溪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守卫，但中共中央要求“死守不退”。经过数日激战，5月2日晚，五十二军首先突破防线，攻入城内。次日，中共部队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撤离本溪。

国民党军队攻下本溪后，杜聿明认为对手遭此打击，短期内战力不易恢复，遂大胆转用兵力于四平方面。5月10日，他下令以新六军附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路，自开原向四平东攻击，继以公主岭、梅河口、长春、永吉为目标；以新一军为中路，自现地向四平正面攻击，继以德惠、农安及松花江北之双城子为目标；以七十一军为左

路，自现地向四平西攻击，继以三江口、郑家屯为目标；三路中以右路为攻击重点，取大弧形包围态势，“同时发动攻势，吸引匪于新四平街附近，包围而歼灭之”，并规定了四平中共部队固守或撤退时的作战预案[233]。

5月14日，沉寂了近二十天的四平战线战火重燃，战况之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以每分钟二十发以上的密度，连续二小时以上的时间，炮击守军阵地，为内战、抗战多年所仅见，空军连日助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部队的顽强阻击，中路与左路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仍然甚为缓慢，而右翼指挥官廖耀湘由于本溪一战的成功，颇为自负，行动较为迅速。他将部队分为二个纵队，以宽正面跃进方式行动，这样既可互相掩护，使对手顾此失彼；又可避免对手的纠缠，确保行动的迅速。14日，新二十二师在威远堡门与担任阻击的中共南满军区三纵遭遇，三纵于抵抗后因实力不足主动撤退，廖耀湘判断，对手兵力不足而且实力有限，遂下令各部迅速向各自目标迈进，遇有抵抗应断然攻击。廖部利用其机械化优势，行动甚速，18日已进到四平外围，并占领了四平防守的要地塔子山。林彪事后也说：“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234]

塔子山扼四平东南之要冲，国民党军队占领之后，不仅可以据此威胁四平城，而且可以从此迂回，截断四平守军之退路，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此时，中共在四平的部队，外有大军压境，内部伤亡、减员较大，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林彪审时度势，认为不能再守下去，否则“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235]。18日夜，林彪决定撤出四平，次日，中共中央电告林：“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236]因为情况紧急，此时林彪所部已在撤出四平的途中。

5月19日，国民党军进入四平。恰在此时，蒋介石因四平久攻不

下，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飞东北视察，于17日到达沈阳。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杜聿明和蒋、白之间发生了分歧。杜主张继续向长春进军，白则向杜转达了蒋的意见，如果长春再打成四平式的胶着，不如适可而止。白的看法与蒋一致，他对杜说，四平打下，国民党已有了面子，不如暂停整理，再行大举进攻。但杜不同意，他认为：1．攻击四平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春、永吉，如不乘胜追击，必将前功尽弃；2．共军整补比国军迅速，这有去年打下锦州后暂停前进的先例可证；3．命令已下，中途改变部署困难，反有为对手所乘之危险；4．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之小丰满电站为东北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政治经济意义重大。对于蒋、白能否顺利拿下长春的怀疑，杜保证绝对有把握，坚持不拿下长春不停止前进。最后，白崇禧同意了杜聿明的计划，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237)]。

根据杜聿明的命令，国民党军按原方案仍分左中右三路向长春、永吉攻击。杜聿明得报攻击途中未遇中共部队大的抵抗，又从已向七十一军投降的林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处得知，中共部队减员过半，遂判断中共部队已无力作决战性防御，命令所部“应不失时机，编组机动纵队，实施猛烈果敢之超越追击，寻求匪之主力而歼灭之”[(238)]。

四平撤守后，中共中央本来要求林彪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守，则坚守长春，继续以实力换和平的战略，以在谈判中交换有利条件。但国民党军队行动甚速，而林彪所部经四平苦战，已极度疲劳，在仓促后撤中来不及调整部署及防线，而且四平以北铁路沿线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只能于21日撤出公主岭。随后，林彪、彭真、罗荣桓等东北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经过讨论，决定放弃长春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松花江北撤退[(239)]。

由于中共军队主动撤退，新六军于23日占领长春，28日占领永吉，新一军于29日占领德惠，进至松花江南岸，与中共军队隔江对峙[(240)]。在此前后，中共南满部队乘国民党军队在辽南部署分散之机发

动进攻，5月25日占领鞍山，30日驻海城的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宣布起义，迫使杜聿明自四平前线调新一军南援。6月7日停战令发布后，历时两个月、规模与激烈程度均属空前的四平战役暂告一段落。

四平战役，国共双方均动员了东北战场的大半精锐。国民党方面为在东北的七个军二十一个师中的十个师，且全为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中共方面为东北主力三十九个团中的二十个团。双方伤亡情况大体相当，都在近万人左右，但中共部队转移过程中减员不少。就此战的纯军事意义而言，国共各有得失。中共因四平阻击国民党军队北上而得以夺得北满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对以后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战线过长，防御纵深过浅，更主要的是因为实力的差距，未能达成战前预期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在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的指示电中说："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241)]

国民党军在四平战役前后虽然占领了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十几座城市，表面很是风光，但相对于东北的辽阔地区而言，仍然局限于点线，尤其是采取广正面推进战术，并未达到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企图。国民党以后对此的检讨是：中共部队"对任何战略要点，判断已无力继续据守，类皆能相机及时撤离，虽有时不免招致损失，但决不至遭受全歼"。而己方"只要求各部队应占领某城某地，并继续加以确保，而且特别提示，应向长春急进，……此种只重视接收空间目标——城镇，忽略对敌有生力量之击灭，乃国军最普遍最常见之错误"。具体就四平战役而言，国民党方面认为其失误在于：四平未下前，兵力分配平均，未能形成绝对的优势；作战正面过广，不能发挥突击功效；进攻目标不明，不能紧密配合；没有对四平形成包围圈；四平既下后，行广正面追击，不能收歼灭对手有生力量之效[(242)]。

然而，四平战役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军事的，实际上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战事的结束而结束，它还不断在谈判桌上，在全国的其他战场表现出来。

三　东北的停战

与四平激战同时，国、共、美三方在谈判桌上就东北以及全国政治军事问题也在进行着反复的讨价还价，其中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东北停战问题。

中共在东北作战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根本无意商谈，美国方面在马歇尔走后实际也处于观望之中。周恩来在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东北情况在张治中走后便是拖，陈诚故意不积极，沈阳小组派不出，白鲁德颇有困难，说接收不在渝商定三人去沈无益。吉伦亦改口强调国方接收被破坏，只好打进长、哈，扫清南满。"[243] 实际上，各方都在等候东北作战的结果，谈判暂时无法取得进展。

自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比较期望美国能够压国民党让步，解决东北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在前一阶段的调处中保持着较为公正的形象，也在停止内战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共估计美国可能和苏联有默契，保持双方在中国的中立立场。然而，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极为顽固，因为国民党的态度，美国权衡利弊，调处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方面倾斜。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态度更为明显地偏向国民党方面。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达成，但即将派往东北的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接到密令，小组应通知政府军有权执行：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政府军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上、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3．政府军得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244]。这实际是由美方出面保证国民党的顺利接收，无奈国民党自信其军事实力，对美国人的好意不领情，小组未能派出。4月8日，

三人小组就东北问题开会，吉伦提出美方方案，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再有调动，并从长春路和苏军占领城市中撤出，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而闭口不谈中共关心的政治军事问题，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承认政府无条件接收，中共纵然被打也得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能停止冲突。这是二十天来我方不能接受的方案。"[245] 中共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助蒋的表现，但此时中共还希望马歇尔回来后，能在东北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还未放弃努力。

马歇尔回美国后，一直关注着中国局势尤其是东北局势的发展。然而他离开中国时间不长，战争却急剧升级，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4月6日，罗伯逊急电马歇尔，告以"形势极为严重，而且还在迅速恶化，为防止你的使命遭到严重危害，务请立即返回中国"[246]。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的当天，马歇尔匆匆回到中国，而此时中国的局势与他离开时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马氏对东北战火的蔓延极为不安，认为如此打下去，势必影响关内，导致整个和平局面的破裂，而且他担心政府军战线过长，军事上未必有利。但他对中共军队攻占长春也很不以为然，无论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国民党的需要出发，他都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长春的要求[247]。这种在东北和战问题上的两难自始即困扰着马歇尔，不偏不倚是马氏可以做但不能做的，他采取的立场是交替压国共双方让步，在他看来这仍是不偏不倚，然而在对立双方心目中，他的做法是吃力不讨好，最终没有成功。

马歇尔返华后，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的支持。4月19日，蒋介石接见马氏，"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国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其消极容共之目的。若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法，则将贻误大计，必根本失败而后已"[248]。中共中央则指示周恩来，"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要他与马歇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以利谈判的进行[249]。22日，周恩来与马氏会见，周介绍了

马氏离华期间的情况，强调国民党既要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于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愿意停战的”。周表示：“我对你此次重来中国抱了很大的期待”，“我相信公正的办法是自可找出的”[250]。马氏对双方的回答是在23日搞出了一个调停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战，根据整军协议确定双方军队的位置，国民党政府军对东北的接收根据军调部的指令进行，政治问题暂时维持现状。蒋介石对马的方案很不满意，认为“在在予我政府以多方面之限制，且有承认共党伪地方政权之无理拟议”，并指责“美方协助我对东北之海运不力，且自下月起将减少运输舰至十四艘，使我后方联络线有随时断绝之虑，因之我东北军心不安，士气低落”[251]。结果马氏同意为国民党运足九个军到东北，而他的这种作法只能鼓励国民党继续打下去。果然，蒋介石在第二天拿出了他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在东北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东北军队调动根据整军方案规定，长春路两侧30公里内之地区由政府军接收中共不得阻挠，中共军队所驻地区之政治事宜由国共协议解决。蒋之所以重提1月停战协定，伏笔是坚持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权，而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则认为，“现在的环境造成了新的问题，这是现况所造成的，是四个月来因为不停战造成的结果……现在局势既已如此，而苏军又走了，便已无接收的问题，那么便应该先停下来再说”[252]。马氏也知道蒋的要求中共不可能同意，因此他迟迟未将其转达给中共。

4月28日，马歇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蒋在会谈中对马氏“说明美国以往对共党之调处政策，虽采取消极与怀柔方法，因当时共党尚在华北，未与俄国打成一片，故美国尚可以声威制之。今后共党在东北已与俄国联成一气，对美国既无所顾忌，亦无所企求。若美国不改变已往之消极政策，积极支助我国政府，则必不能贯彻其协助我收复东北主权与和平统一之政策，而且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蒋在会谈中除了重提他的要求之外，强硬地表示：“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之其他若干要求。”[253] 马歇尔

对蒋的态度虽有不满，但他同样不满中共占据长春，因此他在29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将蒋介石24日的方案和关于长春的要求转达给周，表示他已尽其所能，筋疲力尽，但他看不出在目前的调解中还能做什么，他的立场因中共在满洲的行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只能退出调停，由国共直接商谈。周恩来强调苏军已从东北撤退，因此不再有接收问题，如果蒋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如同赌博，很危险。马氏与周的会谈历三小时，言谈之间，周感到“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254]。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表示只说对了一半，他的“颓丧”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东北的战火将使他几个月的辛劳付诸东流，但他说已尽其所能则又未必如此。他手中还有牌而且是可以使国民党让步的王牌。这张牌不仅他知道，周恩来也明告他了。5月3日，周恩来给马歇尔发去备忘录说：“你今天手边实尚有其他的资本，可使得你对政府所说的话增加许多分量。因为今天政府之能在东北发动这样大的武装冲突，如果没有美国海空军对其军队所给予的运输便利，几是不可想象的。就这方面而言，美海空军在运输上的协助对目前东北的严重局势实起决定作用。为此，延安要我正式地向你做这样适时的建议，即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帮助政府军运兵及军火去东北。”[255] 问题在于，马歇尔不愿轻易动用这张牌，这和他当初得到的授权有关系，也和他本人的想法有关，他此时也希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拿下长春，压一压中共。如周恩来所说：“美马对苏联及中共却具大疑惧，其本身亦急欲插足东北，故对蒋之接收长春主权虽不公开主张，但亦不反对，而且助其运兵。”[256]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战争的机器并不是任由某个人调遣的，马歇尔不久便明白了这一点，这张牌他最终还是打了出来，不过到那时，国共双方都不再领他的情了。

5月10日，马歇尔应国民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分析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位和弱点，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份备忘录指出：政府军在东北的部署应根据中共未来行动之不可预测和苏联可能的反

应，以及后勤和运输状况而定，因此他建议政府军应集中于东北南部尤其是沈阳附近；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将中共军队置于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之间，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方指挥所，至于东北的政治问题也与中共军队的分布相关，中共可能在北部诸省占据一定位置。他提醒蒋介石，政府军如从长春北进，不仅将妨碍谈判，而且也无力消灭中共军队，反将使自身遭受打击。他的结论是，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有严重的弱点，中共则占据着战略上的优势，而且时间对中共有利，因此国民党必须迅速作某种妥协，否则将陷于军事、财政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257)]。马氏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他为国民党设计的方案是军事上确保南满，政治上力争北满，这与美国当初的立场比是一种双重后退。它既承认了国民党控制南满的事实，在中共看来是从美国自诩公正立场的后退；它也承认了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是从美国力图通过国民党控制全东北立场的后退。但在马氏看来，这总比陷入未来深不可测的战争泥潭好得多。

由于马歇尔对东北战事暂时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向东北运输国民党军队的行动照常进行，无疑鼓励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马氏在长春设立军调部指挥所以换取中共撤出长春的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响应。5月1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见，重申除非中共撤出长春，他无法再向蒋介石进言，并指责中共过分重视武力，使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无法工作。周恩来在会见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因此，很难希望马既认识苏在东北助我而他仍会去要蒋无条件停战。故我方利用美马的可能性已日益狭窄，而欲麻痹之则更难”[(258)]。而毛泽东仍认为：“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259)] 因此，毛此时还有让出长春、有条件妥协的意图。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电文提出让出长春的三个方案，

力争双方不驻兵、由中间派任市长的方案[260]。

但是，形势的变化使各方调停终未成功。国民党政府军于5月18日攻下四平，23日进入中外瞩目的长春，以长春作筹码的种种调停方案失去了意义。不过由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它事先声称的目标，马歇尔的调停活动再度趋于积极。他极力向蒋介石兜售他的设想，即确保南满，再图北满。23日，马氏与蒋会谈，提出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发布停战令，军调部派人进驻长春。然而蒋氏夫妇当天飞赴东北视察，并且由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长春，使蒋颇为自负，故提高了他的要价。24日，宋美龄给马歇尔连发了二封信，开出了蒋的要价：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不得阻碍政府修复铁路，履行停战、整军与恢复交通协议，并在国共对执行以上协议有分歧时，赋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信中还提出整编后之中共军队在东北只能驻在新黑龙江省或合江省，东北政治问题留待军事问题解决后再谈。蒋介石亦同时有函给宋子文，要他向马歇尔解释，这样做是因为中共“故意刁难，无论大小问题皆未能解决一件，徒使政局动摇，人心不安，以致国家危殆”；“故此时不得不提最低限度之办法，并对共党作最后之试验也”，如果中共不提要求，马氏可以暂不与中共谈判[261]。

蒋介石的态度引起了马歇尔的极大不满。他之所以放任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是因为他原本相信蒋的解决长春问题便可停战的诺言，但蒋现在不愿罢手，使马氏处境尴尬，“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周恩来在和马歇尔的会谈中几次明确表示，如果按照蒋的要求去办，“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262]。马歇尔最担心的就是战事扩大到华北，他不能不重视周恩来的警告，因此也不得不从原先袒护国民党的立场后退，对国民党施以压力。26日，他给蒋回函，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并由军调小组进驻长春。29日，马氏要求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由于政府军在东北不断向前推进，使他的调停工作遭遇极大困难，如此他将退出调停。马氏并频频与国民党要员接触，告诫他们中共军队主力并未被击垮，国民党军队如再

向前进，后方将受威胁，不如适可而止，在有利条件下寻求解决办法。马歇尔的态度和蒋介石的要价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温和派的不安。宋子文和王世杰均认为蒋的要求过于“硬性”，“并以军事再进之转多可虑”，向蒋建议，不妨同意马氏要求，因为马氏对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出力不少，我方似应顾虑马受共党在美国攻击，而助长东北战事”[263]。蒋仍未改变其态度，28日他提出东北苏军撤退地区应由国民党接收，赋予美方以修复铁路恢复交通问题的决定权，整军协定先在东北实行，如作到了这些，则可停止军事行动，军调小组人员可进驻长春[264]。

马歇尔在压国民党让步的同时，也在寻求中共可能的让步，由于对停战、恢复交通和整军问题中共原则上均不反对，因此马氏对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周恩来5月30日明告马氏，不同意美方决定权，理由是美方“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而且周恩来在和马氏的谈话中，虽然还对马氏的处境表示理解，但也坦率地批评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制止”。这是中共对马歇尔和美国态度变化的预兆[265]。处于两难之中的马氏，面对蒋介石的顽固和中共的坚决，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先逼国民党让步再说。6月3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次日与马歇尔会见，马氏表示，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安排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和补给到东北，以此迫使蒋接受自己的计划。

蒋介石对东北问题的态度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在国民党的全盘战略中，东北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当抗战胜利之初，蒋企图借苏美之力收复东北的计划失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于关内，尤其是华北。停战协定签订后，由于关内不便大打，蒋又重新关注于东北，导致东北战火的扩大。长春打下后，蒋再次面临抉择，是继续北进还是另作考虑。他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飞赴东北，不无就此实地

考察之意。最初，他受国民党军事胜利的影响，有意北进，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至于调处执行部自以不来东北对我为有利，以免共军借其掩护，获得喘息之机会。"在当时，这一计划军事上并无问题，中共已有了退出哈尔滨的计划。但是，北进不仅仅是纯军事问题，蒋介石对美苏的反应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同时考虑："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一不慎，将受重大影响，故当马歇尔未谅解以前，不能不委屈以求和平解决也。"[(266)] 马歇尔果然没有"谅解"，蒋也因而不得不改变他的原订方案。

6月4日，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在马氏的压力下，蒋表示可考虑停战半个月。马歇尔则不容蒋犹豫，次日再次见蒋，终于使蒋同意东北停战。6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267)] 打了将近半年的东北战场总算暂时平静了下来。

东北停战的实现，对国共双方各有利弊。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东北停战，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还有他自己的考虑。一则是他已准备关内作战，东北不宜牵制过多兵力；二则是东北国民党军队自四平战后急速冒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需要巩固后方。但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在没有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停止进攻，又分兵把守各个城市，反而暴露了其后防弱点，并且丧失了再向松花江北进军的唯一机会。过后，蒋介石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268)]。但问题在于，即使

蒋下决心北进，他能对苏联可能的反应无动于衷吗？他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吗？问题又回到它的起点，东北问题首先需要苏联的合作，需要美国的支持，这又需要国民党付出代价，这于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两难抉择。

中共需要停战作为休整之机。经过四平一战，中共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据黄克诚反映，“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有些战士撤退时走不动，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怨战情绪……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269]。因此中共部队亟须休整，以利再战。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270]。16日，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271]。在休整期间，东北局动员了1.2万名干部下乡，野战军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剿匪，其余部队迅速进行了整顿补充。到东北再度开战之时，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西满、南满三个军区，五个野战纵队，及一批地方部队和二线兵团，总兵力达到36万人。

东北停战实现后，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分部，并增设四个执行小组（6月17日派出），原有小组的任务也作了调整。军调部长春分部国民党代表为蔡宗濂（后为邓为仁），中共代表饶漱石（后为伍修权），美国代表白鲁德（后为田博门）。不过，这些停战小组的作用与关内一样，没有战争时用不着他们，有了战争时他们也管不了。

东北停战并不意味着国共双方就此罢战言和。四平一役对国共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并不随着战事的暂停而停止发生作用，相反，国共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机会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大战

的来临。和平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四　国共战略的调整

东北的停战，被马歇尔认为是自己努力的成功，他认识到整个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如果不能借此机会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他的使命也就彻底失败了，因此他在休战期内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达成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然而，四平战后的国共关系与战前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四平战役，国共双方都在重新估计自己的战略战术。四平未下前，国民党党内对东北以至全国作战的前景都不乐观，据长期在蒋身边的唐纵所记："此次东北问题，是我们对于情况判断的错误。当初以为东北之共军不堪一击，故不接受调处。现因苏军援助共军之故，共军实力增强，欲调处而不可得，政府感觉苦闷万状。"[(272)] 四平作战胶着之时，国民党高级官员观察到蒋介石的心境是，"忧心如捣"，"焦虑万分"[(273)]。然而四平为国民党军队攻下后，国民党内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党上下都迷信"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之作用"，不仅主战派兴高采烈，即便是温和派，也开始动摇不定，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274)]。5月20日，蒋介石召集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275)]。5月23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飞抵沈阳视察。在他25日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像者，完全不同……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密之处置，请勿过虑。"宋子文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也大谈"共军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276)]。军令部长徐永昌则向蒋建议，"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今日不办，仅就断交通扼我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277)]。因为国民党的这种认识，必然导致其战略向战争方面倾斜，也因此而使停战令下达后

的全国局势仍然处于紧张之中。

中共方面，对四平战役的结果同样有自己的估计。长春失守的次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278] 这里所说的"自由"，实际是指四平之战解除了中共原先在和与战问题上的某些顾虑和约束。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态度是："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279] 更重要的是，四平战役直接导致中共对全国形势估计的变化。直到四平失守前，中共一直认为国民党"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四平战后，国民党趾高气扬，使中共认为"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恐难有挽救可能"，并因此而布置作战准备工作[280]。从根本上说，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是非常脆弱与不稳固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前后，这种互信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四平之战则使这种互信荡然无存。周恩来就对马歇尔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双方没有互信，在一切问题上彼此的信心都破坏了"[281]。很难想象这种互信会在半个月的停战期内再次建立起来。

实际上，四平战斗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已通报在重庆的周恩来，"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282]。这种"报复"即是将战争引向关内，以减轻东北的压力。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在山东攻击津浦路上泰安、兖州地区的吴化文部、德州王继祥部和胶济路上张店、周村地区的张景月部，理由是："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283] 6月7日开始，中共山东部队以讨逆自卫作战名义发起进攻，历时1周，攻占德州、张店、周村和枣庄等地，几乎占领了山东全境。中共的行

动使蒋介石感到华东地区中共部队的威胁，更加强了他准备在关内动武的决心，他在6月停战谈判中重点强调苏北和胶济路问题，实际上已是在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准备借口。

尽管国共双方都在准备战争，但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停战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三人小组会议也在东北停战后恢复举行，国民党代表换成了原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蒋介石在停战声明中提出，在十五天停战期中，应商定停止东北冲突、恢复国内交通及实施整军协议之办法。蒋原本并不感兴趣的整军协议现在成了他强调的重点，因为他急于通过对军队的整编框住中共的手脚，同时通过解决交通问题，使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可以运用自如。因此蒋指示“对以上三事之协定，必须同时签字，不可再有先后之分，以免共党继续拖延也”[(284)]。6月停战期的谈判，在恢复交通、军调部工作和停止东北冲突等问题上，国共双方较快达成了协议，这就是6月24日国共美三方草签的《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和《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关于交通的协议规定：华北华中一切交通线立即恢复，铁路修复立即进行，拆除碉堡时，铁路沿线重要车站、隧道、桥梁一千米以内之碉堡可以不拆，郑州以西以南之碉堡不拆，陇海路徐郑段缓拆（中共原要求一律限期拆除）；中共区域铁路员工由交通小组考核决定任用（中共原要求一律任用）；各路均限定修复期限，最短者同蒲路仅三十天，最长者津浦路也只九十天（原交通协议无限期规定）。关于军调的协议规定：当小组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直接向上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决定何时何处进行调查，命令停战及实行隔离部队；当执行部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指导命令或指示之执行；此项规定是中共在“最后决定权”问题上作出的一定让步，在调处中酌量增加了美方代表之职权。关于东北的协议规定：在东北完全停战，15日内交出部队清册，中共因此而承认了1月停战令以后国方军队进入东北的事实[(285)]。从这三个协议的条文看，中共均作了重要让步，显示出谈和的诚意，应该说，如果能够将这些协议

真正付诸实施，和平还有某种希望。但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因为蒋介石的指示，坚持只有在修订后的整军方案达成协议后，才能在这些协议上正式签字。换句话说，如果中共不同意国民党的整军方案，这些协议则无异废纸。而军队整编方案的修订，尤其是军队驻地的划定，由于国民党的过高要求而非常困难，何况蒋要求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解决半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使他的要求具有了类似最后通牒的性质，不排除蒋的内心正是用这种方法或逼中共就范或由中共承担战争责任。

中共对国民党的要求并未正面回绝，但周恩来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先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做起，中共的目的是“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既要避免破裂，又要不大让步”[286]。国民党却无意于此，在谈判中采取了步步紧逼，以求彻底解决的方针。6月17日，蒋介石提出东北中共驻军方案，中共军队三个师分驻于兴安、黑龙江和嫩江省，或驻兴安、黑龙江和延吉地区，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由中央护路宪警进驻，如中共同意该方案，其军队必须撤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烟台和威海卫两地，双方在山东恢复6月7日的军事位置[287]。在18日徐永昌、俞大维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国民党又提出，中共军队在关内的五个军应集中在陕北、山西上党、河北大名、山东临沂、察北五个地区，这意味着中共还应退出苏北。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方案，不仅中共在东北的军队被限制于北满狭小偏僻的地区，而且中共在华北的地位还将受到重大削弱，军队将被挤出城市和铁路沿线，而被分割部署在若干偏僻孤立、互不联系的地区。周恩来在见到这个方案的当天致电中共中央，称蒋的方案“混蛋之至，战意已大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及热河”。他建议“中央令各地，尤其是苏北、山东、东北、热河速作各种准备，迎接蒋方进攻”[288]。在和马歇尔的谈判中，周恩来表示，蒋的方案“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愤慨”，政府“是在出难题，使问题不能解决”。他明确告诉马氏，中共要求东北驻军增加为五个师，驻安东、牡丹江、齐齐哈尔、洮安、哈尔滨；关内军队驻地应另

行商谈，且应规定双方驻地；至于退出所占城镇，原则上双方应退出1月13日后所占之地[289]。周恩来坦白地对马歇尔说，蒋介石就是要“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能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290]。当时谈判的实情如此，一方放心，另一方必然不放心，而这又是因为东北开战之后一系列冲突造成的连锁反应。

作为调停一方的美国，关键的要求是国共双方停战。司徒雷登告诉马歇尔，“主要是使蒋停战，然后才好续谈。中共愿和，愿解决问题，但必须双方让步，不能单要一方屈服”[291]。但马歇尔以为，他已经压蒋介石同意停战，现在该中共作出必要的让步了。因此他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一方面企图说服蒋介石不要要价太高，另一方面又企图让中共让步，尤其是在华北问题上，马氏主张中共接受蒋的条件。马歇尔的处境仍然处于两难之中，他既要保证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又要限制国民党的行动在不引发全面内战的范围之内，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由于东北战事的发生，马氏在中共眼中已经失去了他一度有过的公正形象，而他在停战谈判期内的表现，更使中共确信，美国已经站在了国民党一边，对马氏的调停不再抱什么希望。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马歇尔“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恢复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蒋介石在“第一时期还听马建议，但不愿其成功，放纵和指使部下违约反对。到第二时期便准备大打，借口主权、交通使内战全面化”[292]。国民党则因为马歇尔的态度受到鼓舞，美国国内因为冷战而逐渐升高的反共声浪更使马歇尔失去了回旋余地。由于马氏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所限，他只能偏向于国民党一方。

6月16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纪念日演讲，次日又在国府纪念周演讲，声称：共产党过去在日本掩护下，得以发展割据一方，今日人投降，共产党再无幸存之理。本党对中共如此让步，欲以政治方

法，给中共以合法存在之机会。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又有人以为中央经济困难，不能用兵，殊不知中央财政之准备，足以维持二年有余。出席听讲者都认为蒋的讲话“充满剿匪意味，并坚定大家之信心”，可见蒋已无意再言和[293]。但是为了进一步拉住马歇尔，20日蒋介石同意延长停战期至月底，但同时又提出中共军队必须在此期间撤出胶济路两侧30公里之外。蒋明知中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而他还如此提出，主要是为了争取马歇尔和舆论的支持，把战争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为动武作准备。中共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6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林彪的电报中明确谈及中共的方针是：“（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294] 中共确实不能抱什么幻想。26日，蒋介石决定全盘战略方针为：“此时对东北军事应暂取守势，不可亟求进展，因原定政策本以收复长春及其以南之南满与北宁二铁路干线为军事目标，其他地区则用政治方法以求解决，一则使俄国不致正面出而干涉，一则使我兵力运用容易，不致过于分散而为俄共所乘也。故关内共军未戡定以前，对东北之军事决心维持现有形势为要旨，此不能不慎重出之也。”[295] 于此表明蒋的战略重心转向关内，就在这一天，中原战事爆发，全面内战已经无可避免。

马歇尔还在做着徒劳无用的努力。从停战开始，马歇尔搞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但没有一个行得通，问题的焦点是国民党的要价一次比一次高，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而中共又决不可能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以至马歇尔也认为：“在休战期的谈判中，很清楚的是中共更愿达成停止冲突的协议，而政府方面如此苛刻的条件使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同样清楚的是，部分国民党文武领袖以其力量和权威倾向于武

力解决，他们的信念是，全面战争比目前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停滞的不战不和状态更好。”[296] 28日，蒋介石向马歇尔又提出新的条件，即国共军队的总比例不变，军队驻地问题应整个解决，进入防区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达成协议后十天内，中共军队在山东、山西6月7日后攻占地区及胶济路、临（城）枣（庄）支路和临（城）徐（州）路沿线撤出，三十天内从承德、古北口和苏北撤出。29日，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要绞死我们。我用一切力量让，而我让一步他即迫一步！”[297] 即便如此，为了争取时间，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中共同意可有条件让步，东北的松江省和哈尔滨可由政府派军驻扎，但行政机构改组为联合政府；中共军队撤出国民党所要求的若干地区，如苏北淮安以南、皖东北、胶济路沿线、承德和张家口以南地区，条件是“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实施行政”。结果国民党仍坚持中共应交出地方政权[298]。中共对此绝不能接受，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299]。此时的谈判对双方都不再有实质性意义，而成了一种准备战争和动员舆论的手段。

6月28日和29日，蒋介石连续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共战略。主战呼声占了上风，只有王世杰等少数人仍主张“成立协定，即令协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亦可避免局势之恶化”，但他们的主张得不到蒋的支持。不过格于政治环境，蒋亦不能公开宣战，因此决定方针是，在军事“进剿”同时，宣布“和平之门不闭，唯待共党之回头”[300]。30日，停战令到期之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声称：“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其军事进攻与破坏交通之行动，以证明其诚意，并开诚切商整军实施方案与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则政府仍当曲予容忍。……今停战命令虽已期满，政府对于和平统一之方针决不变更，除非共党进攻国军……则国军不仅为自卫计，且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持地方安定秩序，职责所在，不能不加以

抵抗和驱除。此外中央军队不对中共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以静候各项未决问题之解决。”[301] 周恩来亦在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国民党的声明“不能算有期限的休战，更不算是长期停战”。对于国民党的停战条件，周恩来指出：“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该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了，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政府要求虽然如此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让了步，答应在某些地区不驻兵。然而政府还不满足，一定要这些地方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一律撤出，实在太不合理了，而且超出整军的范围，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考虑的。”[302]

6月30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马氏告以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提案，蒋询问如国民党暂不提承德问题，中共能否同意，马氏认为仍无此可能，因为交出地方政权为最大困难。马氏坦诚告蒋：政府的条件颇为苛刻，中央有人将国军武力估计过高，如果酿成全面内战，甚不值得，并批评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非武力不能解决的言论，影响谈判。蒋也似乎推心置腹地对马氏说：本党党员皆有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论不会左右自己的意见。他举圣经为例，称其中有言饶恕罪人应饶恕七十个七次，而余所受已达过此限，惟余系为国家忍受一切。在蒋问马歇尔是否要为以后的谈判规定一个期限时，马答以不定期为好，可见马氏也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303]。

7月2日，蒋介石几个月以来首次会见周恩来。周提出，在全面停战的同时，一面谈判军事问题，一面恢复政协综合小组会，谈判政治问题。蒋则根本对此不感兴趣，而仍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前所要求之各地，否则，“政治问题实无法商谈”。蒋强调如中共占据苏北，“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而“政府如要保卫北平，则必须保有热河”。“此为政府与中共和平谈判之基础，倘此点不能实现，则一切无法再谈”

[304]。这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这也是国共双方最高层次之间最后一次实质性会谈了。

从7月2日到10日，国民党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行了四轮会谈，继续讨论未决问题，双方的立场始终无法接近。国民党代表反复要求中共退出蒋所提出的几个地区，表示只要退出了其他就好办了，希望中共了解政府的困难。他们承认在地方政权问题上他们改变了政协的程序，但理由是政府已在东北问题上对中共作了让步，承认了中共在黑龙江、兴安和嫩江省的地位。周恩来只同意可考虑苏北减少驻军，但坚持不交出地方行政是中共的基本立场。他对国民党态度的判断是，如我方同意他们的要求，便不放弃谈判；如我方不同意或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军事动作便会扩大[305]。就在谈判期间，国民政府4日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这等于政府又投下一颗炸弹”。蒋介石的目的是以此显示改革和民主，拉住美国（马歇尔听到这个消息确也表示“感动”），但国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中双方争执的一个重点，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表示此事“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敝方坚决反对”，“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306]。这一插曲使双方会谈气氛更为恶化。在10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在国方进入中共撤出地区时，对中共党部给以照顾，周恩来表示，“那些地方可考虑少驻兵，但非撤退，不是行政权就不要了”。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当天的会谈结束时感慨地说：即使行政问题达不成协议，照6月30日那样也可以签字了，如果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定签字了[307]。然而他个人的感慨终究代替不了国民党决策层的决定，此次会谈之后，国共高层代表接触暂告终止。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回顾了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批判国民党“公开号召全国的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公开要求夺取解放区更多的地方，并要求推翻整军

方案，以便扩大内战和保存军阀制度”。宣言引人注目地公开谴责“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提出“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们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中共中央对下属解释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是，“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308)]。这个宣言无疑表明中共战后政策的改变已经公开化，基本放弃了战后一度采取的中立美国的政策，而将美国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反美、即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动员群众的手段。中共的这种政策转变，一方面向外界表明了坚决抵抗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美国调处的接近收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309)]

国民党方面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7月11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劝其暂作静观态度，并告以三十年来处事之经验，凡事至无能为力时，只有暂时搁置，听其自然，但终有解决之一日，非至时机成熟，则徒劳无益也。至于政府现所采取有限度之军事自卫行动，实有助于彼之调解工作，而决无任何妨碍”[(310)]。蒋介石的态度已经预示着谈判这一幕就要收场了，一切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7月14日，蒋氏夫妇以避暑为名赴庐山，就在前一日，苏北战火点燃，全面内战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

---

(1) 刘武生主编：《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 《熊式辉日记》1945年6月5日。

(3)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74页。孙科也提出：苏联必在东方参战，东北将为苏军力所及，如我内政上无良好措施，如苏联兵力所及，可能将政治交与中共，中共将于其间大扩张武力，黄河以北全入掌握之后，大局可以推想而知（《黄炎培日记》1944年5月17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49页）。

(4) 《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23日。

(5)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9月4日；参谢国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东北为九省述评》，《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6)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1页。

(7)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

(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8页。

(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2、834页。

(10) 因为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承诺所有援助只给予国民政府，使国民党作出了苏联将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错误判断。实际上，苏联对东北有其自己的考虑，其对中共的支持也没有违背条约承诺。美国情报机关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苏联在条约中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承诺，将中共排除在满洲之外（Manchurian Prognosis，Fall 1945，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p．3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11) 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9日。

(12) 《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19页。

(13) 《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关于中国政府派兵由大连登陆至东北谈话纪要》（1945年10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1页。

(14)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前言。

(15)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后与苏方代表谈话经过之情形》，1945年10月12日（原文如此，应为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1—122页。

(16)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3日）；《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

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2—123页。

(17)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方交涉国军登陆与出关之经过电》（1945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4页。

(18)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39页。

(19) 《主席接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要》（1945年10月23日），《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132页。

(20)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6页。

(21) 《蒋介石致熊式辉、张嘉璈函》（1945年10月1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去东北的特派员齐世英发表反苏言论，遭到苏方抗议，蒋即令熊世辉约束东北党部活动，以免刺激苏方（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85页）。

(22)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方态度急激变化电》（194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6—127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10月28日。

(23)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占据营口葫芦岛苏方藉口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电》、《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8、141—142页。

(24) 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8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25)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3页。

(26) 《熊式辉日记》1945年11月1日；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第161、156页。

(27)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苏联不容强力政权存在并扶植中共立足关外函》（1945年1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61—562页。

(28)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4日。

(29)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9日。

(3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1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7页。

(31) 因为种种原因，直到次年3月，国民党在东北只有十三、五十二两个军的兵力。

(32)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7日。

(33) 《蒋介石致熊式辉等函》（1945年10月16、2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34)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告决心在秦皇岛天津登陆出关接防函》（1945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0页。

(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2页。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8页。

(37)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6页。

(38) 《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7页。

(39) 《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

(4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411、426页。

(41) 据师哲回忆："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5页）然而据参加中苏条约谈判的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所记，斯大林告诉宋子

文、孙科将莫斯科谈判的内容传给了延安，并称这是“非常糟”的事，必须停止（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胡世泽文件，1945年7月12日谈判记录，引自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P．4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中共知道苏联动向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在8月23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对中苏条约的内容尚是推测，因而胡的说法未必可信，而且不排除斯大林以此故意向国民党示好，以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

(42)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

(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5页。

(44)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57—258页。

(45) 《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4页。

(46) 苏方曾对进入沈阳的曾克林建议，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中共军队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改叫东北人民自治军，我们就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接受了苏方建议后，苏方下令凡佩戴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加阻拦限制（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18页）。刘少奇也建议彭真，出关部队既要有正式名称，又要避免外交纠纷，“请考虑是否可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9页）。

(47) 《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1945年9月15日。

(48) 《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电》，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0、24日。

(49) 据载，罗荣桓在渡海途中，遇到苏军巡逻艇，苏军官登艇后表示，我们不阻止八路军的行动，船队可在旅顺、大连之外的任何港口登陆（《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50) 《中央通报》（1945年9月16日）；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46页。此种扩军素质不高，中共亦有察觉。据林彪的报告，“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分，亦被带坏”（《林彪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4日）。据萧劲光回忆，“后来，当国民党部队一进攻，这些部队整团整营的

反水，杀害我们的干部，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底到次年初，东北收编部队叛变的有近四万人（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著：《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因此，中共在东北后期的扩军作法有了改变，并对新编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整顿。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3卷，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552页。

(52)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0、309页。

(53) 《东北局关于建军方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第4页。

(54)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42页。

(55)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8页。杜聿明是当时国民党内主张在东北动武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对前景较为乐观。他曾对人说，“如今我们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再加上美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整个形势都将对我们有利，只要认真、慎重地指挥作战，打败共军不是不可能的”（《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99页）。

(56)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阻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57) 苏方与中共当时在拒绝国民党政府军登陆一事上似有默契。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国民党军队准备在东北登陆前，苏方即已通告中共，并促“派兵阻击”。毛泽东要彭真告苏方，对国民党在东北各港登陆的试探，“请告辰、马诸兄（苏方代号——作者注）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拒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第189页）。苏方随后建议中共部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以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而中共对苏方的态度“甚为欣慰”（《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页）。

(58) 《中央关于阻止国民党军队入东北问题给彭真、陈云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1页。

(59)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60)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

(61) 《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页。

(62)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

(6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474页。

(64) 《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册，第2011—2012页。

(65)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79页。

(66) 《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19页。

(67) 《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1945年11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3—144页。

(68)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编：《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

(69)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3日。

(70) 《林彪致军委等电》，1945年11月21日。

(71)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页。

(72) 《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第2024页。

(73)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

(74)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3页。

(7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1页。

(76) 《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

集》第3卷，第117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

(77)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页。

(78) 杜聿明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中共部队的发展比国民党迅速，当时以两个军可以打到锦州，半年后以七个军却胶着于四平一个多月，可见国民党军队缓进东北对中共有利。

(79)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9日。

(8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29日。

(81) 《王世杰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录》（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5页。

(82)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重庆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交涉接收东北报告》（1945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14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4、876、880页。

(84) 《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扶植中共阻挠接收遣俘工作并请拨船舰增运兵力往华北函》（1945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9、565页。

(85) 《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6页。

(86) 《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6页。魏德迈认为，由于苏联和中共的行动，此时国民党无法控制东北，建议国民党首先确保华北，而将东北提交国际讨论，由美英苏三国托管，直到国民政府强大到足以完全控制该地区为止（*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1，p．132）。

(87) 曾克林部初到沈阳，苏军不让入城，经过三天交涉才予同意（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12—218页）。

(88) 《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等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89)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59页。

(90) 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1983年8月9日），见《辽沈决战》（上），第2页。周恩来当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

到："在可能条件与许可情况之下，它（指苏联）没有不愿意援助中国人民和支持中共谈判的。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远方朋友（指苏联）曾为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页）

(91)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23页。

(92) 《黄克诚回忆录》，第333页。

(93) 孟宪章、杨玉林、张宗海主编：《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94) 《陈云和高岗给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4页。

(9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97页。1952年，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称苏联在东北交给中共枪30万支，炮2700门。1975年，苏联出版的著作称交给中共枪为70万支，炮4200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引自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梅寅生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57页；阿坚科等著：《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所给予的军援》，引自台湾"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台北1985年版，第65页）。这些统计显然大大夸大了实情，只能认为是政治考量的产物。

(96)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88—189页。

(97) 《外交部为另订接收办法与延期撤兵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3页。

(98)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5册，第43页）；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

(99) 《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5年11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覆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照会译文》（194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4、155页。

(10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7页。

(10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11日。

(102)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6页。张嘉璈主张蒋经国访苏时将这几条面告斯大林，但未实现。熊式辉也曾向蒋提出东北政治“可以商量限度，一、只要不私拥武装，各级政府用人可不论党派；二、省县政府职权在开国民大会以前应依照中央法令规定，不能擅自改变；三、一切选举不许有暴力威胁；四、不私有武装之任何政党可以公开活动”。蒋“许可照办”，但未见下文（《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1日）。

(10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6—877页；《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第165页。

(105) 《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1945年11月16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787页。

(106)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8页。

(107) 《董必武年谱》，第232页。

(108)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促锦州共军通告移撤日期电》（1945年12月6日）、《蒋委员长致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指示对苏交涉要领电》（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67、167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7日。

(109)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第193—219页。此会谈记录存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1996年由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公布。据蒋经国自己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不客气地告诉他：“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蒋经国：《访苏交涉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12页）。

(11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11日。

(111)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实际上，还在10月底中共中央便已要求苏联延迟撤退时间至次年1月或2月。

(1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1页。

(113) 刘翰东：《本省接收一年来之回顾与前瞻》，《四战四平》，第365页。

(11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18日。

(115)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张嘉璈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纪要》（1946年1月3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16)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

(117) 11月13日，中共中央已告东北局：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

(118) 《刘少奇年谱》，第531页；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62页。

(119)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

(120)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的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1、434页。

(121)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0日。

(122) 《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3页。

(123) 《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5—436页。

(124) 《陈云、高岗给东北局及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李富春等给彭真等的报告》（1945年12月11日）；《黄克诚回忆录》，第334页；《林彪致东北局及中央电》，1945年12月11日。

(125)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页；《任弼时年谱》，第503页。

(126) 《东北局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第14页。

(127) 《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1945年12月24日的电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4页。

(128)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75—1076页。

(129) 此语最早出自11月2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针对苏联要中共力量撤出东北各大城市的举动，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1页）。

(130)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0页。

(131) 《蒋委员长致宋子文院长令与苏方切商东北工矿应归我所有电摘要》（1945年8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41页。

(132)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报告苏方视东北工业设备为战利品函》（1945年10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71—372页。

(133) 《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5年10月2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3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27日。

(135)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3日。

(13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7日。

(13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3日。

(138)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

(139)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0日。

(14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8日。

(14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8日、12月1日。

(142)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8页。

(143) 《张嘉璈主任委员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关于东北工矿合作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

编第一册，第387—394页。

(144) 《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商谈经济问题电》（1945年12月8日）、《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为经济合作原则事呈蒋委员长请示电》（1945年12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94—396页。

(145) 苏联要求合办的企业有：本溪、阜新等煤矿，鞍山、本溪钢铁厂，主要的有色金属矿山，鞍山、本溪的化学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业，丰满电厂等（《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2月11、13日）。

(14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2月19日。

(147) 《指示张主任委员对苏谈话要点》（1946年1月1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8) 《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6年1月16日），*Chang Kia-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9) 《张嘉璈致翁文灏电》（1946年1月19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5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26日。

(15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5页。

(152)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18日。

(15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4日。

(154)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29日、2月8日。

(155) 《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施麦斯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有关美国对东北经济合作态度之照会》（1946年2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453—454页。美国此意见在2月9日转达给苏联。3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不承认‘战利品’之解释为包括工业或其组织要素，如东北之日本工业与设备等在内”。5日，美国国务院再次致文予苏联政府，重申：美国不同意战利品之说法，日本资产应由各战胜国共同处理，中苏如成立协定美国不能承认（同前，第247—248页）。英国政府亦表示反对苏联的作法，但苏联坚持己见。

(15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4、11日。

(15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20日。

(158) 中苏谈判中断之后，苏联仍未放弃达成协议的努力，并提出了新的方案，作了若干让步，不过国民党坚持苏方不撤兵接收未完成则不谈判的态度。4月间，苏军自长春撤退前夕，张嘉璈“深以长春等地危险为虑”，蒋介石亦以“东北军事紧急……欲藉此消灭苏方之阻挠与操纵也”，准备重开经济合作谈判。但王世杰坚持“我决不可因军事上一时之需要”而予让步。4日，王世杰会见苏联大使，表示中方决定与苏方谈判，但仍需等苏军撤离及完全接收东北之后才能成立正式协定（《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4、13日）。其后，随着长春为国民党军攻占，蒋介石态度再次变化，声称“哈尔滨收复以后，苏方外交可进行，此时尚无外交可谈也”（《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7年6月17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再以后，东北成为国共交战的主要战场，经济问题事实无法提上日程，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最终不了了之。

(159)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6日。

(160)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63页。

(161) 卢冬生被害日期诸说不一，有1945年11月15日、11月17日、12月14日等说法，但被害经过则大体相同。

(162) 《熊式辉主任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委员长报告长春当地金融交通经济情形函摘要》（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42页。

(16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4日。

(164) 张克良：《国民党接收鞍钢面面观》，《鞍山文史资料》第1辑，第158—159页。

(165) 1945年12月11日，中苏签订财政协定，规定苏军可在东北发行军用票，以供其支付开支所需，此票在苏军撤离后，由中国政府收回，并向日本提出偿还要求。此票发行数量，苏方从未通知中方，苏军撤离后，中央银行在东北收兑数即有六七亿元，实际发行数显大于此。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日索赔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此项损失实际是由中国承担了（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37、39页）。

(166) 《鲍莱调查东北工业报告》（1946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63—267页。

(167) 《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1947年2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74—275页。

(168)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

(169) 根据苏联官方在1947年1月29日公布的数字，东北“战利品”总值只有9700万美元，这个统计其后没有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支持。如果这个统计是这些“战利品”在运到新地点重新安装后的价值，而这种新价值由于种种损耗和其他因素，大约只有原价值的10%至20%，则苏联的统计应增加五至十倍，才可能接近于事实（McLane，Charles．*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p．23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8）。

(170) 郭克悌：《东北的盘据与劫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63页。

(171)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2日、23日。

(172) Marshall to Truman，Feb.9，1946，*FRUS*，1946，Vol．IX，p．426．

(173) 《重庆党政小组临时谈话会会议记录》（1946年2月20、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39—642页。

(17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陪都学生为东北问题酝酿活动事致各省市当局指示处理方针电》（1946年2月20日）、《吴铁城陈立夫等上蒋总裁报告沙坪坝学生酝酿游行出于自动势难劝阻正设法疏导电》（1946年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38页、642—643页。

(17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各地学生爱国游行事致各省市党团部指示应注意事项电》（1946年2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44页。

(176) 《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关于中共军与苏军勾结情形之研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84页。

(17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5日）；《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21、22、24日。

(178)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6日。

(179)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1946年印本，第19—20页，附件第74—75页。据张嘉璈所记，在全会讨论

中，“对于中苏友好条约纷纷反对，有人主张应提交安全理事会，亦有谓应要求苏方修改”；“谷正纲谓应发动民众运动，萧铮谓应请求总裁罢免外交部长或劝告辞职”。宋子文“大受攻击，体无完肤，宋答复神态极窘”；“东北问题审查会决议指出，应撤换熊主任，取消政务、经济两委员会，停止地方交涉”（《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6日、8日、15日）。

(180) 《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6年3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87页。

(181) 《王世杰部长为先期通知我方撤军日期事致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照会》（1946年3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4月底撤退完毕照会译文》（1946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88—189页。由于苏军的突然撤退，不仅使国民党接收行动不及展开，而且使国民党已经派出的部分接收官员处境尴尬，熊式辉不得不部署紧急撤退计划，但为蒋介石所反对，而蒋固执的结果，不过使这些接收官员成为中共军队的俘虏而已。

(182) 《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7日、4月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80页。亲身经历这段过程的黄克诚这样评价：“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指中共占领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作者注）。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修整、补充时机。”（《黄克诚回忆录》，第344页）

(183) 撤入苏境的行政人员，于5月19日自海参崴回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则暂驻伯力，处理善后问题，6月15日启程回国。

(184) 苏军撤退后，国民政府在东北与苏联的外交接触主要是关于大连接收问题。此事苏联一度表示可以进行，并同意国民政府派出视察团在1947年年中去大连视察。但大连行政此时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国民政府格于实际，无法接收，也不能动武。此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军在东北军事的失利，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了接收大连的企图。

(1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0—21页；《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3日。

(186)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

(187) 杜聿明为在东北占据一个海口城市以利以后作战，命五十二军于1

月10日占领营口，随后又为接收沈阳，令其北上，在营口留置一个加强营守备，中共部队于13日对营口发起攻击，次晨占领之。

(188) 《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56页。

(189) 《彭真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14日；《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15日。

(190)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60页。其后中共中央还决定原拟调往东北的山东叶飞纵队、晋察冀杨得志纵队不再去东北，以免“给国民党以借口”，“结果不仅拖延东北战争局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协定责任人民一时也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中共中央致林彪等电》，1946年3月4日）。

(191) 张治中在向蒋介石的请示中认为：“揆其前后再三向职提及东北问题，其用意似希望政府与其商谈者然。但此问题关系甚大，职自未便作任何表示”，并建议蒋，“现在东北问题日趋复杂，政府似有郑重考虑决策之必要”（《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情形函》，1946年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8页）。

(192) 《停战和整军都应把东北包括在内》（1946年2月2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0页。

(193) Marshall to Truman，Feb.9 1946，*FRUS*，1946，Vol．IX，p．428．其实不仅是马歇尔，有关各方都认识到东北问题将是能否实现政协决议的关键因素之一。

(19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46．*Marshall's Misson To China*，Vol．1，p．56．

(195) 《代表团关于东北问题的对策》（1946年3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32页。

(196) 《关于东北问题的说明》（1946年3月10日）、《东北问题必须军事与政治一道解决》（1946年3月1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5、135页。

(197)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4页；《辽沈决战》（下），第603页；《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

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9—90页。

(198) 《四战四平》，第3页。

(19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2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页。

(200) 《辽沈决战》（下），第606页。

(201)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5页。

(202) 《失去的机会》，第253页。

(203)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页。

(204) 《中央日报》1946年3月28日。

(2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82、88页。

(206) 据原定去四平的第28小组中共代表耿飚回忆，他们到达铁岭之后，既不能向前进，又不能与北平联系，实属被软禁于驻地。及至四平被国民党军队攻占后，小组才到达该地，但已无事可作（《耿飚回忆录》，第390—391页）。

(207) 《郭汝瑰回忆录》，第200页。

(208) 《郭汝瑰日记》1946年4月6日；《郭汝瑰回忆录》，第201页。

(209) 《郭汝瑰日记》1946年4月8日。

(210) 《郭汝瑰回忆录》，第206页。

(21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30日。

(212) 《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213) 《解放日报》1946年4月16日。

(21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4月15日。

(21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4页。

(216) 《熊式辉日记》1946年3月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89—90、110页。

(21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0—101页。

(218) 《迅速占领长哈齐，确保北满于我手中》（1946年3月26日的电报），《彭真文选》第124—125页。

(219) 《四战四平》，第467页。

(220) 《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12日。

(221)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1日。

(222) 《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25日。

(2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4页。

(224) 《东北作战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1946年4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3页。

(225) 《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是当前关键》（1946年4月6日）、《对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1946年4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59、161页。

(226) 《中央关于在东北与国民党停战谈判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2页；《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1页；《四战四平》，第464页；《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2页。

(227) 《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1946年4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5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3页；《毛泽东关于东北前线指挥及在四平、本溪歼敌问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9页。

(228) 四平前线的中共将领多不知坚守四平是毛泽东的决定，当时极力反对守四平的黄克诚，直到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时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而此时毛也并不认为守四平是错了，只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黄克诚回忆录》，第348页）。

(229) 《东北应以消灭顽军为主守城为次》（1946年4月2日）、《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非打不足以杀其锋》（1946年4月8日）、《对陈诚忽然改口赞成停战维持现状的分析和我们的对策》（1946年4月11日）、《马歇尔扬言停止调解要我接受蒋介石的意见》（1946年4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89、230、241、282页。

(2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1页；《迅速占领长哈齐，确保北满于我手中》（1946年3月26日），《彭真文选》，第126页。

(231)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35页。

(2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28页。

(23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70页。

(234)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8页。

(235)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7页。

(236) 《中央关于主动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6页。

(237)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集》第42辑，第47—48页。蒋不主张立即进长春，主要是顾虑苏联的反应。22日，蒋命令杜聿明：暂就原地停止候命，如共军已退出长春，则可派少数军队入城维持秩序（《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47页）。但据白崇禧回忆，蒋令杜停止追击，他要杜继续前进，并表示责任由他承担。白并向蒋面陈："战胜则当进，或追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匪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未置可否，直到杜军进入长春，蒋才因"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458页）。可见蒋介石对进长春较为慎重当属事实，但白和杜两人谁坚主进入长春，两人说法不一，揆诸情理，白是代表蒋来督战，更应领受蒋的意旨，而杜作为战地指挥官，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主张进长春更为合理。

(23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79页。

(239) 1947年5月8日，陈云在给高岗的信中曾经说：造成东北胜利形势的原因有两件事是必须提及并计算在内的，即一是锦州不决战，二是四平撤退的指挥是很成功的。如果在这两件事上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情况了（《辽沈决战》下册，第631页）。

(240) 新一军已以一部渡松花江，中共也已有了撤出哈尔滨的准备，旋因停战令下而各守原防，新一军只在江北保有唯一一个据点陶赖昭，驻有一个团。

(241) 《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1946年5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6页。

(24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91—594页。

(243) 《东北问题切勿幻想国民党能让步》（1946年4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23—224页。

(244) 《军调部致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密令》（1946年3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94页。

(245) 《三月二十七日协定不能推翻》（1946年4月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27页。

(246) Robertson to Marshall，April 6，1946，*FRUS*，1946，Vol．9，pp．735-736．

(247) 周恩来以后曾经对马歇尔说："我们攻下长春以后，这是给你一个难题"，但强调这"是不得已的行动，是被迫的"（《美国的两重政策很难使中国内战停止》，1946年6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90页）。

(2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1—112页。

(249) 《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36页。

(250) 《当前的政治情形和东北问题》（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61—264页。

(251) *FRUS*，1946，Vol．IX，pp．792-79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6页。

(252) *FRUS*，1946，Vol．IX，pp．795-796；《主要的环子是停战》（1946年4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70—273页。

(25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24页；丁晓春等：《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第54页。

(254)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106-107．《先打下长春再谈判的想法行不通》（1946年4月29日）、《马歇尔扬言停止调解要我接受蒋介石的意见》（1946年4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77—280、281—282页。

(255) 《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运送政府军及军火去东北》（1946年5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88页。

(256) 《蒋介石的两面作法和我们的方针》（1946年5月13日），《周

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3页。

(257) *FRUS*，1946，Vol．IX，pp．824-828。

(258) 《美蒋在东北问题上的距离已不相远》（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8页。

(259) 《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及我方的对策》（1946年5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18页。

(26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双方不驻兵的方案最早由民盟在4月间提出，即国共军队均不进长春，由警察负责市内治安，另组东北政务委员会主持政务，人选由各方协商产生。中共表示可以考虑，但马氏其时对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表示默认，未将这个方案转给蒋介石。5月22日，民盟向国共双方重提这一方案。

(261) 《蒋夫人致马歇尔特使申述蒋主席对于停止冲突与恢复和平统一之意见函》，《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指示面交蒋夫人函予马歇尔特使时相机补充说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27—130页。

(262) 《政府军占领长春后是停战的时候了》（1946年5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2页。

(263)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9日；《宋子文院长呈蒋主席转述马歇尔备忘录电》（1946年5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40页。

(2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58—159页。

(265) 《美方代表调处不公正，不能有最后决定权》，1946年5月30日；《美国的二重政策很难使中国内战停止》（1946年6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7、386—387页。

(26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51—152页。

(267)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6月7日。

(268)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336页。

(269)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罗荣桓：《在四野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辽沈决战》（上），第88、38页；《黄克诚回忆录》，第349—350页。

(270) 《中央关于同意放弃哈尔滨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5页。

(271) 据伍修权回忆："林彪来到东北以后，一直极力贬低和排斥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同志，因此在东北局内部发生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中央只得调开了彭真同志，并派叶剑英同志来调查和处理此事，以求解决分歧，团结斗争。"（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27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8—609页。

(27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4月14日；《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22日。

(274) 据邵力子告诉罗隆基，"主战派不止抬头，且特别抬头，时局极为严重"（《罗隆基日记》194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00页）。据顾维钧回忆，邵力子告诉他，国民党内部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赞同摊牌，其中包括白崇禧、何应钦和陈诚。可是，大多数文职领袖都不赞同使用武力，因为在过去中共力量较小的情况下，都未能将其摧毁，现在就更难办到了。但是，委员长内心是赞同使用武力的。孙科也告诉顾维钧，除文官以外的所有军职人员，都主张使用武力。国民党内部大多数赞同武力解决，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国民党就会垮台。6月13日，蒋介石接见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要他做好对美宣传工作，使美国人相信是中共不遵守协议，因此政府不能只采用政治手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08—709、725—726页）。

(27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9页。

(276)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嘱告马歇尔特使国军进入长春无碍于和平统一函》（1946年5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29—131页。

(277)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19日。

(27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

(279) 《东北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准备长期斗争》（1946年5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4页。

(280) 《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1页；《周恩来关于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及我之方针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58页。

(281) 《国民党积极准备大打，希望马歇尔继续居间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09页。

(282) 《对顽军进攻取局部报复手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28页。

(283) 《山东军区以首先消灭吴化文等部为有利》（1946年5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2页。黄克诚曾向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黄克诚回忆录》，第347页）山东则已于5月初作好内战一旦爆发时进攻枣庄等地的准备，故中共首先令山东施以报复行动。

(28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89页。

(285)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1341—1347页。

(286) 《准备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1946年6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7页；《周恩来年谱》，第673页。

(2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81页。

(288) 《蒋介石战意已大明》（1946年6月1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2—443页。实际上，即便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徐永昌和俞大维也感觉蒋的要求过于苛刻，主张在东北将中东路以北让给中共，但为蒋否决。

(289) 《蒋介石的方案是无意解决问题》（1946年6月18日）、《对政府关于整军问题有关文件的意见》（1946年6月1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5、455—456页。据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要求关内驻军地点为华北的绥德、集宁、张家口、承德、赤峰、闻喜、长治、邯郸、曹州、德州、青州、滕县，华中的宿迁、淮安、东台，此与国民党的提议距离甚大（《我方提出整军方案的原则和实施步骤》，1946年6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137页）。

(290) 《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关头》（1946年6月2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66页。

(291) 《南京空气紧张》（1946年6月2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57页。

(292) 《周恩来年谱》，第669页。

(29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3页。徐永昌当日日记亦有同样记载。在此前后，蒋介石在军队中作了一系列演讲，与政协前后要求大家“容忍”的态度完全不同，此时的蒋毫无妥协地表示，国民党与中共“势不两立”，国民党“最后的敌人是谁？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次剿匪的成败，就是本党革命生死的关头”，实际是为战争进行动员（《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1946年6月7日）、《政工人员对于时局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46年8月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3、385页；《如何消灭我们最后的敌人》，1946年7月16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31页）。

(294) 《暂无和平希望准备全国大打》（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5页。同日，中共中央致南京代表团电称：“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又不可能则请考虑恩来托故回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带必要人员回来，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坚持代表团工作，以待时局之变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7页）

(2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1页。

(296)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176．

(297) 《力求和平，但不允许国民党武装接收》（1946年6月2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3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9页。

(298) 《整军期间政府军不得开入中共部队退出的地区》（1946年6月2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92—493页。地方政权问题，政协曾有协议留待改组后的政府解决，因此中共的要求是有协议根据的。6月28日，第三方面代表在与国民党代表会商时，黄炎培建议，“中共在军事方面既多让步些，则政府在政治方面应多开放些，以此为交换条件”。但因国民党坚持中共交出地方政权，导致谈判最终破裂（《黄炎培日记》1946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

(299)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33页。

(300) 《王世杰日记》1946年6月29日；《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9、30日。

(301) 《中央日报》1946年7月1日。

(302) 《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第20—21页。

(30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9—203页。

(3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07—208页。据周恩来告马歇尔，蒋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北太威胁京沪，你们的军队在这里，人家觉得你们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苏北你们要退（即退到陇海路以北），由政府接收”。而且说苏北地方小，中共让出不能算吃亏（《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9—511页）。

(305) 《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11页。

(306) 《中共代表为抗议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致国民党代表函》（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97页。

(307) 《政府军应停止追击被迫突围的我中原部队》（1946年7月1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43—544页。

(308) 《解放日报》1946年7月7日；《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1页。

(309) 《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0页。

(3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7页。

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一　战前基本形势与国共双方的军事对比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中共军队。据中共方面统计，国民党陆军有86个军（师），248个师（旅），200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海、空军19万人（各型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总兵力430万人[(1)]。

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国民党军一线兵力主要部署在东北（7个军），华北（13个军7个师），华东（5个军9个师），中原（16个师）四个地区。二线兵力主要部署在华南（1个军3个师），西北（4个军7个师），西南（6个师）三个地区，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这不包括国防部和各绥署直辖部队及台湾驻军，如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因此，国民党陆军部队总数不会少于80个军（师），其中部署在第一线的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左右[(2)]。

中共部队总数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共有野战部队24个纵队（师）、11个旅（师），分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晋绥军区（5万人）、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晋察冀军区（20万人）、中原军区（5万人）等七大战略区，没有海、空军[(3)]

。

国民党不仅军队数量对中共具有绝对优势，装备也大大超过中共部队。以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强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由此可知，国民党军装备的步兵武器大体与中共部队持平，但自动武器占据绝对优势，重火力接近于中共部队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中共部队[(4)]。

国民党的战争部署从停战令下达后就没有停止。1946年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4．安抚伪军，在未整编完成以前，一律按实有人数发给主副食费，已整编完成者，则由一月起按军政部规定给与发给薪饷，免因粮饷告绝，而投匪军；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5)] 军队整编方案的实施，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调整其战争部署（虽然该方案也有对国民党不利的一面），蒋介石要求各部队在整编期内特别注重攻击、防御、清乡侦察、组训民众方面的训练。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拟出了一个名为复员行动计划，而"实一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拟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则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6)]。虽然国民党其后的军事行动没有

完全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但其大的轮廓此时实际已确定了，即着重于控制华北与华东战略要点，打通主要交通线。

对于打一场全面内战，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蒋认为“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7)]。

然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优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的一系列致命的失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胜势，从而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一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曾经解释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蒋的战略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8)]。蒋还从中国古代战史中为其主张找来根据，他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而在

现代条件下，由于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只要国民党军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大功告成[9]。蒋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惜一经实战，则完全显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从不采用固守一处被动挨打的战法，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国民党军的能力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灵活性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为了达成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目的，蒋介石主张打速决战，这对国民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其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未必能够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速决的条件有三个：1．我以优势之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敌决战之自由；再则为避免三次世界大战之发生，我亦有迅速安定国内实行建设国防之必要；2．我军装备优良，除国械日械之外，并有美械装备，且有飞机坦克，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我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亦唯有速决歼灭乃最经济之战争[10]。然而，国民党军四处出击的战略，与其速战速决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有能速战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自己的设想，但他并未能据此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的初期作战指导基本是随机而无序的。全国如此，具体战区亦然[11]。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陈诚提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1．剿共方针，东北应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平衡发展，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为辅，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但仍配合军事要求；2．共军利持久，国军利速决，以国军之优攻共军之劣，防国军之劣取共军之优为制胜要诀；准备时间要长，作战时间要短，战前准备极端重要，兵员粮弹补充愈快愈好，要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作战计划是：“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12] 按此设想，国民党政府

军进攻初期的战略重点应是在华东和华北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从苏北到山东一线，但为了全面摧毁中共的抵抗能力，国民党总是倾向于将进攻面铺开，也就是采取全面进攻的方法。可是由于政治考虑和军事动员的实际情况[13]，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之初又未能全面行动，而成逐次用兵之势，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14] 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占其总兵力的比重为30%，到10月的最高峰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占总兵力的50%[15]，这个数字与中共部队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具体作战战术上，国民党军亦存在重大的缺陷。其一为攻击力低下，缺乏顽强坚持精神，作战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16]，对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因此每逢运动战，国民党军总占不到多少便宜。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1．部队对后勤之依赖过重，故不敢过度远离补给线；2．装备钝重，机动不容易；3．在对手所经营之地区，运动亦易遭敌攻击；4．抗战时常采守势，惯用防御，一时不能摆脱积习；5．部队行军力之训练过差，缺乏机动之先决条件；6．接收为先，束手束脚，不能放胆行动[17]。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师之间，很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部队与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的多次出现，导致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

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18] 国民党军复杂的派系渊源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排斥异己而影响到军队作战士气，又因为编制缩小而影响到军队作战部署。

其三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福将”刘峙。更糟的是，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兵团至军，至少有四五级之多，越级指挥，下不服上成了常事，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而且由于派系、个人等种种原因，不仅战区一级，往往是军师一级的指挥，也要靠统帅部和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姑不论蒋的指挥是否正确，即就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而言，蒋的指挥也经常有隔靴搔痒之感。在情报方面，国民党几乎没有获取过中共统帅部和战区一级有价值的重要情报。蒋介石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19]。更令国民党其后耿耿于怀的是，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三厅厅长郭汝瑰秘密为中共传递情报，导致国民党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20]。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疏离，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经受又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其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也即所谓抓夫，越到后来越难以适应战争的要求。1946年全国征兵69万人，实际分配至部队59万人，估计超过18—25岁适龄男性青年数的2%[21]。在刚刚经过八年抗战的大规模征补之后，继

续维持这样高强度的征补率，极易引起社会的不满与骚动。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22]。结果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而国民党又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军队，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因为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它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作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一方面没能在野战中削弱或消灭中共军队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无力作运动战。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出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23]。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共的判断。

至于战争的目的，国民党企求实现的是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目标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政治的分裂、经济的混乱、外交的牵制未及深思熟虑，只企图以军事解决问题，本身就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是不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的。正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24]。

国民党的短处恰恰是中共的长处。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处于劣势，但这种弱者地位迫使中共不敢大意，而是兢兢业业，作战略和战术上的精心算度，将总体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又由局部的优势积累为均势而最终超过对手，变为全面优势。

自内战不可避免之后，中共就在作着一系列的战争准备。首先是思想动员，这是中共最为擅长的。政协会议之后，由于一度的和平气氛，中共各地区也就难免缺乏战争的准备。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开始强调战争的可能。5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地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25)]。东北战事迟迟不得停止，表明国民党的大打意图，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为此又对各军区发出指示，"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26)]。这个指示对战争时间的估计相当精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应该是有备无患。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主要军事负责人，电文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全面内战爆发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指示要求"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27)]。至此，中共已经将战争的准备传达给了各地区。

与思想动员的同时，中共着重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部署和动员。中共强调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对于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而在作战上则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28]。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这个指示认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29]。在作战时机上，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权，这些方针为中共部队确立了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方面失败后也承认中共军事战略战术的高明。

至于作战部署，中共特别强调各大区间和大区内部各地区间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战争爆发前，中共以中原部队原地坚持，吸引国民党军，便利其他各区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要求各地区打击当面国民党军的同时，最初设想出击外线，太行（晋冀鲁豫）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主力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

段），配合徐州方向作战；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主力渡淮河出击大别山，“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30]。东北、西北则争取时间，准备作战。此时中共的战略重点是跳到外线打几个大仗，以此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

7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情况，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31]，并将整个作战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由于内线作战取得很大胜利，至10月间中共又“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我军……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将外线作战时间推至次年春。次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32]。这说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战略，着重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实际上，中共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是在全面内战开始的一年之后。

中共强调的是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战争开始，中共就算计了国民党军用于进攻的总数，将应该歼灭的数字分给各个战略区。最初中共定下的数字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四个旅”，后来这个数字被定为每年消灭国民党军一百个旅左右[33]。中共的征补机制也远较国民党有效。中共部队分为野战（一线）、地方（二线）、民兵（三线）三类，可以逐级迅速递补[34]。尤其是中共特别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教育争取工作，发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国民党军队几乎成了中共军队的补给队。以华东野战军为例，莱芜战役后，有的部队解放战士（国民党军俘虏参加解放军后的

称呼）占50%以上，有的已经达到70%，技术兵种的人员基本是解放战士。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华野伤亡47万人，但人数却从成军时的27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35]。此外，中共对战争之算计，情报之准确，舆论动员之得力，都是国民党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如此，中共在国共对抗中毕竟处于弱势的一方，准备尚不充分，下定决裂的决心也并非易事。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军事上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一般群众和舆论存有疑虑，即便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对于未来的前景也存在着一些担心，因此中共当时并不希望内战的发生。在中共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的对策是，“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36]。据胡乔木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有两件事是毛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就是1946年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毛“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但一旦下了决心，毛泽东就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气魄。他在给东北李富春和黄克诚对和战前途的请示电的复示中写道：“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37] 对于共产党外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疑虑，毛泽东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8] 可以说，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也已基本完成了战争的思想动员和实际准备工作，最后的胜负只能留待战场决定了。

二　中原战事的爆发

关内首先全面打响的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中共部队是抗战胜利后数支部队汇合而成，主体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其后又加入了南下的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和自湘粤赣边北撤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震部。1945年10月底，成立中原局（郑位三任书记）和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树声、王震任副司令员），下辖二个纵队、三个军区，共六万余人，集中在中原鄂北和豫南地区。中原地区原属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提议让出的八个地区之一，但其后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牵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并在未来的战争中以中原地区配合内线作战，不再提让出一事。10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和李先念，“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11月28日，又指示中原局，“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因此应在现地“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作大的转移的打算”。同时中共中央在11月3日致电重庆代表团，要求：“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39] 然而，中共在中原地区能够牢固掌握的根据地面积狭小（不过一百余万人），陡然增加众多部队，获取给养非常困难。经中共中央同意，12月底，中原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苏皖地区转移。因停战令发布，他们停止在鄂东北、豫东南以宣化店（位于礼山县，今属大梧县）为中心的一块狭小地区内集结待命。

停战令发布后，中共部队虽停止了前进，但与尾追的国民党军之间仍不断有摩擦发生。1946年1月19日，军调部成立第九小组，负责中原地区的调处工作。21日，第九小组到达汉口，随后召集国共对峙双方前线军事将领会谈，23日，国共双方在河南罗山达成本地区停战协议，规定双方部队“均停止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中共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方面“绝不阻挠干涉此种运输行动”[40]。至此，中原的战事才算基本停止了下来。

在中共的全盘战略考虑中，最初有意要中原部队在原地坚持，意图增强中共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在鄂、豫、皖三省未来的政治安排中打进一个楔子。但中原地区情况特殊，一是位于国民党层层设防的中

心地区，四周至少有三个军（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二是孤悬于外，与中共其他部队均无联系；三是地区狭窄，纵横不过百余华里，且无可靠之根据地，回旋余地甚小，尤其是粮食供应极度困难，接近于无米之炊的程度。自停战令发布后，中原部队就要求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准备合法不行则“非法”行动[41]。鉴于中原部队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定方针，同意他们的转移要求。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郑位三和李先念，中原部队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冒然行动”[42]。3月初，军事三人小组巡视各地到达汉口时，周恩来和李先念提出中原中共部队全军调往安徽五河，张治中表示可在回渝后讨论。但周恩来在回渝后提出这个问题时，张治中又表示，只要能够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撤离即无此必要，实际拒绝了中共的要求。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曾经说，共军要求移驻苏北，“苏北毗连鲁南，鲁南为窜扰东北之基地，是乃显欲将此共军部队置于开往东北跳板之上，蓄有其最大之阴谋也，当局所以拒绝其请”[43]。虽然处在停战期中，国民党军队仍云集中原地区，加紧修筑碉堡，包围蚕食，将中共部队挤压到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中，以便在动武时能够尽快解决。中原地区因而成为当时除东北之外的国内第二个可能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数量远小于四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部队处境确实非常危险。

虽然中原的战事迫在眉睫，但中共还在争取延迟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争取突围的准备时间。5月1日，周恩来会见徐永昌，建议国共美三方代表同赴宣化店，实地监督停战的实施情形。5日，军事三人小组徐永昌、周恩来和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飞抵汉口。8日，周、白和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到宣化店实地调查，次日回到汉口。10日，三方达成关于中原停战的汉口协议，规定：立即停止本地区之战斗和冲突；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停战令中允许之调动应通知执行小组；停止碉堡和工事的建造；确定对峙部队之界线；同意中共部队运出伤病兵

及有关人员1160人至安阳；保证中共军队复员还乡人员之安全[44]。由于该协定的签订，暂时缓解了中原的紧张局势，但在全国局势的影响下，这个协议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周恩来不辞辛劳亲赴宣化店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并就突围的有关问题进行周密部署。而国民党方面同样也没有放弃围歼中共部队的企图，陈诚对俞大维说：中共李先念部突围，政府不能同意放一条路让其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伊本领好，政府不能打，算政府不行[45]。

东北停战之后，国民党准备关内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原成为行动的首选地区，因为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完成了对中共部队的包围，行动把握较大。但在讨论对中原地区的进攻战略时，武汉行辕主张先解决平汉路西，郑州绥署则力主先解决平汉路东之中共部队，后者的意见得到国民党统帅部的认可。6月18日，蒋介石电令由郑州绥署刘峙“统一指挥五、六两绥署之部队围歼李先念部”。20日，刘峙下达作战计划，以防剿部队“堵匪流窜”，“肃清收复区潜伏残匪”；以进剿部队“依急攻猛打、穿插分割，先将匪截成数段……分别包围而歼灭之”；以机动部队“准备适时截击企图逃逸之匪”。兵力部署以定远店、泼陂河、宣化店为三个攻击中心，采“四面对进，将匪分割为三部分，同时击灭”的行动方案，其中整四十一师、整四十七师在北面之罗山、光山；整四十八师在东面之商城；整七十二师在南面之黄安、经扶（今新县）；整六十六师、整十五师在西面之武胜关、广水；整七十五师为机动部队，位于应城；整三师为总预备队，位于信阳；总兵力十八万余人（在其后的“追剿”阶段，又增加了六个整编师，总兵力达三十余万人）。绥署驻驻马店指挥，要求“各部队应于6月25日前，进抵指定地区，完成攻击准备，待命开始进剿。预定进剿时间为6月底”[46]。21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刘峙，“应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便尔后主力作战之利”，“担任攻击各部队统于巳月养日（即6月22日——作者注）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各部应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对敌一举包围歼灭之”[47]。在

国民党作出上述部署后，其进攻部队开始向指定地区运动，形势异常紧张。

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情况为中共侦悉后，中原局立即报告中共中央，“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如果等顽军已经完全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即在战术上亦处于被动地位”。6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原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48]。至此中共部队的突围行动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共中原部队所在地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在突围方向选择上，中原局认为：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因国民党在津浦铁路上控制有强大兵力，难以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川很多，危险极大；因此决定向西，从国民党军队部署的薄弱处突出，再转向豫、陕、鄂交界处的广大山区活动。具体计划是，由皮定均率一纵一旅向东，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然后自行突围；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军区机关和二纵，自西北方广水、信阳间过平汉路后向豫西、陕南运动；王树声率一纵自西面孝感、花园间过平汉路后向鄂西北运动；另以三个独立旅原地游击，掩护突围。在整个行动部署上，中共保持了高度的机密性。

根据部署，6月24日，中共部队开始秘密集结。26日，国共双方军队在前线已有交火，当晚，李先念等率所部开始向平汉路运动。29日，李部乘国民党整十五师在平汉路之部署尚未到位之机，在信阳南之柳林车站附近突过平汉路。7月1日，王树声部在花园北之王家店越过平汉路，皮定均部也利用国民党军两部之间5公里的空隙突出包围，向东疾进。中原军区宣化店留守代表29日在军调第32执行小组会上宣布，中原军区部队已经突围。至此，国民党原定围歼计划落空[49]。

由于中共部队以迅速动作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6月30日，刘

峙下令“各部队即以现态势，以主力分途堵击，各以一部兵力，按原计划清剿匪之老巢”[50]。在西线，整四十一师行超越拦截，整四十七师向南阳前进堵截，整十五师向高城攻击，整三师在四望山堵击，但因各部行动不够迅速，李先念部于7月3日、8日两次乘隙越出包围。此后，第一战区胡宗南派整九十师自洛阳南下至荆紫关要隘一线加入堵截，而李先念和王震则分率所部，且战且走，于月底到达陕西南部之商南和商县。王树声部在国民党整六十六师追击、整七十五师堵击下，月底到达鄂西北地区。在东线，国民党追击部队只有一个旅，皮定均部脱离其追击后，于7月20日越过津浦路，进入淮南根据地。国民党军队此后由“追剿”转入“清剿”。

中原战事，国民党虽先后集中了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余万人，五倍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由于中共部队行动迅速而灵活，使国民党临时改变军事部署，由围歼转为围堵，兵力调度迟缓，目标不明确，战术配合不完善，没有完成其全部围歼的预定计划。至于中共方面，中原部队在突围过程中减员近三万人，“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但就全局而言，“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51]。

中原战事爆发后，6月28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告他国民党已开始进攻中原中共部队，“迫我起而自卫，形势很严重”。周强调，“如蒋愿和平处理，应即电豫、鄂政府军停止进攻”，否则，“闹起来事便大了”，“这里的冲突也会使别的地方（如济南）的战事扩大的”[52]。但国民党对此不予理睬。直到7月27日，军调部第九小组和三十二小组才在湖北老河口达成《中原临时休战协议》，要求自8月2日起到20日止，双方停战，各自现地后撤20英里，并在西安继续谈判有关事宜。显然这一协定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法执行，西安的谈判毫无进展，8月24日，国民党代表宣称老河口协议无效，并退出调处，谈判中断[53]。中原战事打破了停战协定生效后关内较为平静的局面，

意味着内战的战火从关外烧向关内，导致内战的最终爆发。

三　华东战场的激战

中原战事尚未了结，华东战场便开始了大规模战斗，这是全面内战初期国共双方倾注全力的战场，对全国战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在华东的军事进攻准备早在1946年的春天便开始了。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在5月初提出了进攻苏北的计划，但此时蒋介石正专注于东北战场，对汤的计划，“初已允许，继因全面冲突多处无把握，其议遂寝”[(54)]。东北战事告一段落后，因为种种压力，蒋同意东北停战，预备在关内动武，苏北形势顿显紧张。

华东战场包括江苏（苏中和苏北）、安徽（淮南和淮北）、山东三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时也包括在华东的作战行动中。国民党方面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负责指挥华东战事，下辖第一（无锡）、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四个绥靖区。但由于华东战场的特殊性，国民党参谋本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经常插手华东战场的指挥。国民党初期军事进攻的重点是，“以徐、蚌地区国军，极力向东、西发展，在第一绥区及第五军北进支援下，合力规复苏北、皖东，彻底歼灭地区之匪军。同时打通胶济路，并准备继续向鲁境进出，寻求华东陈匪主力，实施决战”。徐州绥署计划将华东作战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徐蚌方面扩展周边空间，江北方面进至天长、盱眙、如皋、海安线；第二期，徐蚌方面西侧贯通陇海路，东侧进至运河线，江北方面进至东台、高邮线，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西段；第三期，徐州方面廓清鲁西，进出两淮，肃清苏北；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全线。作战指导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匪反扑，确保既得成果。”[(55)]

中共方面华东战场部署分南北两线。南线为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

军，北线为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两线由新四军及山东军区陈毅负责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策应华东作战。战事开始前，中共中央指示陈毅部“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粟裕部“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策应北面作战”；而以刘伯承部出击陇海路及豫东为策应[56]。战事开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也在不断调整作战部署，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粟裕部改变原定方针而进行内线作战。

1．苏中作战

华东战场最先打响的是苏中地区。自抗战中后期起，苏北就是中共重点经营的地区，抗战胜利后，苏北大部为中共所占，尤其是苏北沿江的苏中地区，除了南通、扬州、泰州等几个孤立城市外，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一江之隔的南京、上海和沪宁路沿线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及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现在处于中共部队的直接威胁下，“使南京政府感到极不安全，面子上很不好看，所以，下决心要攻占苏中、苏北”[57]。

7月4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二号作命，“以确保京沪津浦长江之交通，而达到确实拱卫首都安全之目的，应先肃清长江以北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之匪，以利尔后之进剿”[58]。担任此方向作战的主要是第一绥靖区所辖的整编第二十五、四十九、六十五、八十三师，及整二十一、六十九师各一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12万人。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刚刚于6月间接替汤恩伯的职务，甫上任便受命进攻苏北。他决定先集中兵力攻占伸入国民党军队防线的如皋、海安等地，解除对北进的后方威胁，再行北进攻击盐城等地，然而就在他部署完毕，准备于15日开始进攻时，出乎其意料的是，他的进攻计划已为中共所获知，由于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下令暂缓行动，更使他被动的是，“由于我部的作战计划泄密，导致我部不能按计划行动。粟裕的部队首先向我部发起了进攻，造成我部被动挨打的局面”[59]。

在苏北的中共部队是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1945年11月成立），下辖二个师、三个纵队，五万余人。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中央部署外线作战计划，赋予华中方面的任务是，“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出淮南，“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限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60]。中共中央的意图是以此配合刘邓和陈毅出击外线的行动，争取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华东局据此于6月27日命令粟裕部留一个纵队在苏中牵制，主力集中西移天长整训，准备行动。

粟裕受命后，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第一，如集中兵力在淮南地区作战，“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第二，如主力出击，苏中被国民党军占领可能性极大，“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均不利；第三，淮南国民党军实力较强，不如苏北好打，对初战获胜不利。因此，他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61]。他的看法得到了华中分局负责人的支持，29日他们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强调“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仍在苏中作战[62]。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在7月连续发电给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并华中局，提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63] 苏北首先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至此确定。

虽然国民党军占据着数量和装备的优势，但粟裕没有采用中共部队通常采用的诱敌深入战法，而是选择在苏中前部主动出击，利用对手的骄傲轻敌，一战获胜，既可鼓舞士气，又可掩护作战准备，还可收战略侦察之效。他选择的初战对手是宣家堡、泰兴一线的国民党整八十三师孤立、分散部署的二个团，以一个师打一个团，形成6:1的绝对优势。7月13日，华中第一师遵令发起对宣家堡，第六师发起对

泰兴的攻击，李默庵接到报告，事出意外，不知中共主力何在，没有及时派出增援，结果战至15日，宣家堡的一个团全军覆没，泰兴的一个团基本被歼。

苏中战斗打响，国民党统帅部急令徐州绥署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16日，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师自南通的白蒲进攻如皋，整六十五师和九十九旅由靖江增援泰兴并攻击黄桥，整八十三师自泰县向东策应。他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自认“信心很大，决心很硬，严令各部要不惜代价，一举突破”[64]。

粟裕部初战获胜，内线连续作战的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粟裕得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部署后，再次作出一个出乎对手意料的决定，将部队迅速由西转东，二天急行军一百多里，奔袭四十九师。17日，四十九师已到如皋附近，当晚，华中第一、六师和第七纵队发起突然攻击，整四十九师仓促由攻转守，损失甚大，至19日晚，右路第二十六旅被歼，师长王铁汉率师直突围而出。此时，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北上增援，整六十五师于18日占领黄桥，随后向如皋进逼，整八十三师于19日占领姜堰，粟裕部在国民党援军进迫下，被迫于22日放弃对进攻如皋的七十九旅的攻击，随后，又在23日放弃如皋，向北撤退，未能完成预想的作战目的。粟裕认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有日美各种装备，弹药充实，有飞机配合。我军技术、战术均差，且兵团配合亦不协同，不能如愿圆满完成战役计划”[65]。

国民党军占领如皋后，继续向北进攻，目标指向苏中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海安，因为拿下海安，便可使国民党军在苏中的防线取直，巩固长江沿岸的苏中占领区，确保长江通道的安全。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师附整二十一师新七旅由如皋北、整八十三师附二十五师一四八旅由姜堰东，两路向海安进攻，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向李堡进攻，30日开始行动。面对兵力居优的对手，粟裕决定实行运动防御，华中七纵于8月3日放弃海安。

占领海安，使国民党军实现了进攻苏中的战略目的，李默庵认为自己“打了胜仗”，而对手“大势已去”，“一时不会有大的行动”，遂命令部队抓紧时机，建立自泰州、海安直到海边的防线。而此时，中共华中部队主力就在海安东北休整，近者离海安不过十几里地，国民党却一无所知。正是由于对手的轻敌，使中共部队又抓住了一次机会。8月10日，驻海安的国民党整二十一师新七旅和驻李堡的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换防，粟裕即令华中第一师和第六师十六旅攻击一〇五旅，第七纵队和第六师十八旅求歼新七旅。当晚，国民党军在李堡交接当中突遭攻击，新七旅和一〇五旅各损失一个团。次日，新七旅另一个团又在开赴李堡途中被歼。

就在李默庵决定暂停进攻，调整部署之时，粟裕看准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处，率部南下对手的侧后，21日以第一师攻丁堰，第六师攻林梓，守军交通警察第七和第十一总队缺乏正规作战经验，除了一个大队突围而出外，余皆被歼。就在这同时，李默庵接令以驻扬州的整二十五师在西线北上攻击运河要地邵伯、乔墅、丁沟一线，策应国民党军对淮阴的进攻，粟裕则指挥所部西进如（皋）黄（桥）公路，攻黄（桥）救邵（伯）。25日，粟裕部在如黄路上遭遇自黄桥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师九十九旅和自如皋开出接应的整六十五师一八七旅，粟裕当即决定以第六师攻九十九旅，以第一师和第二师第五旅攻一八七旅，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部署，战至27日，全歼这两个旅和如皋出援的一个团，获得苏中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1日，乘胜攻占黄桥。在西线，华中第十纵队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虽丁沟、乔墅相继失守，但邵伯阵地仍能保持，而国民党方面因东线失利，影响军心，26日李默庵下令撤攻后退，“以主要精力巩固如皋、海安等地的防区，设置障碍，构筑堡垒，休整和补充部队”[(66)]。苏中战斗暂告一段落。

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民党重在收复失地，解除中共军队对京沪一线的威胁；中共重在发挥内线优势，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

双方对作战结果的看法也不一致。战役历时一个半月，中共方面以损失1.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六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5.4万余人（国民党方面统计为五个旅4万余人）。国民党战役指挥官李默庵认为："我部虽然受到较重的损失，但是，实现了第一期作战计划。"[67] 中共则称苏中作战为七战七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中称：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68]。对于中共而言，苏中作战带有战争初期战略侦察的性质，其成功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中共确立内线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客观地分析，苏中作战，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粟裕能够抓住战机，连续作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胜面确实大于国民党方面。而且，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事进攻势头正盛之时，中共在苏中战役中的胜利，对于坚定并鼓舞各战区与国民党作战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2．皖北作战

与苏中相比，国民党在皖北的军事行动进展较为顺利。皖北战场分淮南和淮北两部分，部署在淮南的国民党军是其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作战目的是"确保津浦南段交通及首都安全"[69]。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四十五师为右翼，由六合攻天长；以九十六师为左翼，由来安攻盱眙；五十八旅为预备队，随右翼北进。7月16日，第五军开始北进。中共在淮南的部队是华中第二师，兵力装备上显然不及对手，地处孤立，又未能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而是采取了分兵防御的战术，使本已不足的兵力更形分散，在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压迫下，步步后退，处于被动，遭受严重损失。26日，四十五师攻入天长，29日九十六师占领盱眙，中共部队背靠洪泽湖，已无可退

处，被迫向东转移至苏北淮安一带。

国民党在淮北战场的军事进攻由徐州绥署直接指挥，部署是：南路第七军由固镇向东面之灵璧、泗县、五河进攻；中路整五十八师由宿县、蒙城向北面之濉溪口进攻；整六十九师由宿县北之夹沟向东面之朝阳集进攻；北路整二十八师向徐州东陇海路两侧进攻；总的目标是从西、北两面进迫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便于随后在南面苏中、淮南国民党军策应下，三面合围淮阴。在淮北的中共部队是由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第七、八师和第二纵队，以及华中第九纵队，共五万余人。其作战计划是按原部署出击，在淮北寻机歼灭国民党军队一部，巩固苏北。

7月18日，国民党在淮北的军事进攻开始。在南路，第七军于22日占灵璧，28日占泗县，30日占五河。在中路，整五十八师于20日进占濉溪口，整六十九师于25日进占朝阳集。在北路，整二十八师于21日进至曹八集。陈毅抓住对手中路较为突出孤立的弱点，集中十三个团于27日攻击朝阳集，歼灭整六十九师九十二旅。此时苏中连战皆捷，陈毅认为："现华中全境，苏中敌势已颓，淮南、淮北敌势正旺，"因此"决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变局势"[(70)]。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为其后作战不利埋下了种因。

朝阳集战斗之后，因北路国民党军队密集，"只能击溃，不能歼灭"，陈毅"决心以主力向灵璧、泗城找桂顽求战"。中共中央军委得知后，于8月3日指示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战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71)] 华中方面和山野内部也对先打泗县有不同意见，但陈毅决心已定，他以第八师主攻泗县城，第九和第二纵队分攻泗县东、西关，第七师位于泗县南阻援。这个部署使用兵力分散，攻城兵力不足。7日晚，陈毅部发起攻击，次日晨第八师攻入泗县城内，但守城的第七军一七二师为桂系主力，作战顽强，拼死抵抗，并借助优势火力反击，致八师伤亡严重，无力扩张战果，攻守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九纵和二纵对泗县

东、西关的攻击均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因正值雨季，“火炮、辎重因雨水影响未及跟上，打援兵团又为河水所阻，无法投入攻城作战”[72]，而第七军一七一师增援部队已突破阻击线逼近泗县，陈毅于9日决定后撤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是淮北战场初期的关键一战。中共部队攻城未克，主力部队伤亡近二千五百人，这不仅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对部队的作战心态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国民党军借中共部队调整部署之机，迅速行动，导致中共部队在淮北、苏北均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3．两淮作战

8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为配合华东作战，以三个纵队出击陇海路豫东段，半月内占城五座，破路三百余里，威胁到徐州侧翼安全。徐州绥署在策定第二期作战计划时，不得不考虑这一情况，将作战重点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以期改善徐州当面态势。徐西方面，以刚调来的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十一师为左右两翼，分由宿县和黄口向砀山、夏邑进击；徐东方面，陇海路南侧由第八绥区夏威指挥整六十九师、整七十四师和第七军向宿迁进攻，陇海路北侧由第三绥区刘汝明指挥整二十八师向碾庄进攻，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向台儿庄进攻。

徐西方面，8月13日，整十一师自黄口向西攻击前进，19日再占砀山，21日第五军占夏邑，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其后徐州绥署又命该两部配合郑州绥署的攻势，向鲁西南进攻。（有关鲁西南作战情况，详见下目）徐东方面，陇海路南整六十九和七十四师自西向东，第七军自南向北，21日发起进攻，直指宿迁、睢宁。整七十四师为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自恃兵精械优，一味冒进，与南路第七军很快形成对宿迁的夹击之势。陈毅部自泗县战后甚为疲劳，兼之对手又是重兵推进，遂决定暂避其锋，未作坚守之打算。8月27日，整六十九师占睢宁，29日占宿迁。陇海路北，整二十八师于22日占碾庄，整五十九师

于9月2日占台儿庄，10月8日，又占峄县、枣庄。

自9月起，徐州绥署开始实施其第三期作战计划，重点是攻击中共苏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淮阴和淮安，以求尽早结束苏北战事，将中共部队压至陇海路北，再行山东作战计划。由于第一绥区作战不利，此期作战主要由淮北方面担负。其部署是：第七军由洋河向泗阳推进，占领泗阳后掩护整七十四师侧后安全，策应作战；整七十四师正面攻击两淮；整二十八师推进至洋河，为预备队；整六十九师守备宿迁。作战行动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统一指挥。

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山东野战军转移至泗阳以东休整，华中野战军则在休整的同时准备攻击海安。面对国民党新的军事进攻，山野和华野之间在作战部署上出现不同意见。陈毅倾向于北移沭阳，而粟裕认为这样将使两淮空虚，一旦两淮失守，苏中与山东的联系将大受威胁，势将处于被动，建议山野在泗阳地区作战。这种不同意见，实际反映了自华东作战开始后，陈毅和粟裕在作战重点置于何处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陈毅强调淮北和山东的重要性，要求华中主力尽早北上作战。粟裕则更着重在苏中作战，认为如苏中“不断向坏的方向发展，于我不利，且部队拖来拖去亦徒增疲劳，着实不合算”[(73)]。因此他不仅主张陈毅所部作战方向尽可能靠近苏中，而且认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对将来整个战局不利。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74)]。虽然陈毅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但他需要统筹各方关系，兵力的调动洵非易事，何况在战争初期，华中毕竟有很大的独立性，在兵力向什么方向集中的问题上，经过了反复的讨论[(75)]。

对于华东战场的兵力使用，中共中央是在尊重战区指挥员建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最初，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76)]。粟裕遂按照这个精神，部署攻击海安。然国民党军逼近两淮的现

实，使苏北根据地处于危境，中共中央改变了方针，于9月9日指示粟裕，“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宜放弃海安，及时休整”。11日又致电粟裕等：“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77] 这表明中共在苏北作战方针的一大变化，华中主力北上作战的方针得以确定。

就在中共华中主力转移北上途中，山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的动向判断失误，将主力由泗阳北调，采取由北转西的作战方针，准备求歼由宿迁出动之整七十四师或攻睢宁，但整七十四师并未经宿迁出动，而是自运河西岸南下洋河，会同第七军从10日起进攻泗阳。山野不及调整部署，第七军于12日攻进泗阳。次日，整七十四师超越第七军，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守军虽是地方部队，但仍顽强抵抗。整七十四师借助优势火力，并由空军连日出动轰炸，17日进至淮阴城郊，复经二日激战，19日终于攻下淮阴。22日，整七十四师又占领了淮安。此时，山野和华野的主力部队均未能及时赶到战地，陈毅虽“五内如焚，力图挽救”，但终不能挽回两淮之失。

中共苏皖根据地首府淮阴失守，使国民党在苏北战场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此一阶段，国民党军将中共苏皖根据地压迫为自南向北沿运河以东的一条狭长地带，并对其形成了半弧形包围，迫使中共不得不作放弃苏北，向山东转移的计划。中共部队在作战中受到一些挫折，尤其是两淮失守，“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78]。至于失利原因，既有华野和山野兵力一直分散使用不能集中，也有对对手的进攻意图估计不确，还与陈毅在指挥中的失误不无关系。陈毅坦承：山野三月来未打好，“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79]。但在整个苏皖作战过程中，国民党军注重的只是扩大占领区，故平均使用兵力，多点进攻，而未求歼中共部队的有生力量，虽然解除了中共部队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的直接威胁，但

并未能在战略上获得优势。

4．胶济路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在山东只控制了济南、青岛和潍坊三座城市，大约占全省面积4%的地区。国民党在山东共有五个军，经略全省显然实力不够，因此，国民党在山东的初期作战目标主要为打通胶济路，建立济南、青岛两大城市间之联系，同时从徐州以一部进出鲁南，控制进攻基地，等待苏皖战事结束后，再会攻山东。

1946年6月，第二绥区制订了山东作战计划，以“贯通胶济路西段为目的。以一部确保济、青基地，而以主力编成东、西兵团，分由济南、昌乐，沿胶济路对进”[(80)]。兵力部署为：东兵团为第八军，西兵团为七十三、九十六军，第十二军固守济南，第五十四军扫荡胶东，策应东兵团。6月25日，东、西兵团发起攻势，中共山东军区各部进行节节抵抗，但因实力不济，7月6日，国民党东、西兵团在张店西会合，打通了胶济路西段。继之，第八军于9日占淄川，七十三军于11日占博山，胶济路西段作战结束。

胶东方面，第五十四军自6月23日起由青岛北之城阳对即墨发动进攻，中共胶东军区部队进行阻击作战。城阳距即墨不过15公里，然因中共部队的坚强阻击，五十四军耗时10天，直至7月2日才攻下即墨。随后，五十四军以全部主力西进，10日占蓝村车站，12日占领胶县。此后转入休整。

9月底，第二绥区开始胶济路第二期作战行动，以“贯通胶济全线之目的”，“打通胶县至坊子间交通，并索匪主力而歼灭之”[(81)]。部署是，以第八军为西路，五十四军为东路，分自坊子和胶县东西对进。10月1日，第八军占昌邑，9日，五十四军攻占高密，次日与第八军会合，胶济路全线打通。

5．苏北作战

苏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10月间大战又起。南线国民党第一绥靖区部队经过休整，于10月初开始自苏中向北进攻，由于中共华中野战军北调，战斗并不十分激烈，西线整二十五师于10月8日攻占高邮，控制了运河一线。东线整八十三师自海安北攻东台，26日占领东台，30日又占兴化。至此，中共在苏中的据点尽失，部队被挤压至苏北以盐城为中心的一个狭窄地域，处境不利。

在运河一线作战的同时，攻下两淮的国民党整七十四师自10月中起倾全力向东攻击涟水。涟水位于中共苏北尚存地区的中心，如涟水失守，不仅苏北无法立足，而且盐城北撤的后路将被切断，因此粟裕认为“必须彻底歼灭该敌，才能巩固涟水，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82]。他部署在涟水进行坚决抵抗，华野第一、六师和九、十、十一纵均参加了涟水守备及外围运动作战。19日起，整七十四师分三路猛攻涟水，并以飞机大炮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与华中野战军发生激烈战斗。23日，整七十四师一部突入城内，双方以白刃战相拼，战况惨烈。经过反复争夺，华野终迫使整七十四师后退，至27日暂停进攻。此役中共部队付出伤亡六千余人的代价，其中包括十纵司令员谢祥军于10月24日战死城下，成为内战期间战死于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共野战部队纵队一级指挥官。

就在战场激战之时，中共华东部队内部有关作战战略战术的争论也在继续进行。由于前此分散作战的不利之处，华中野战军北上之后，粟裕等建议集中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得到了陈毅的赞成，陈毅还建议将两个指挥部合而为一，“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复电，“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并指示集中行动后，由陈毅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83]。

对集中兵力作战的方针，华野和山野均无异议，但集中在哪一个方向，双方的考虑不尽相同。起初，陈、粟共同决定了一个首先在宿迁作战，然后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的方案。然而此时，国民党在苏北

发动军事攻势，在山东则占领峄县、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临沂。为此，陈毅认为：如临沂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山东破碎，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野回鲁或全军回师入鲁作战。粟裕则认为，“两淮失陷后，华中局势即已严重……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主张继续在苏北作战，然后出击两淮[84]。这种分歧意见实际上是华东战事爆发后，华野与山野在主要作战方向置于何处上一直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85]。

对于华东战场应以何方为作战重点的不同看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陈、粟等人：“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华东各负责同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86]。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涟水战后，华野留原地整补，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师回鲁南，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87]。这样，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作战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88]。直到国民党军队在苏北继续向前推进，客观形势不得不要求中共部队集中兵力迎战，此一问题才得以最终解决。

国民党在苏北的军事行动于12月再度大规模展开，此时正值制宪

国大进行期间，国民党急需战场上的胜利为自己打气。12月7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七号作命："以迅速击溃共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之目的，决先攻占阜宁……涟水沭阳……各要点，以利尔后之进剿。"[89] 具体部署为：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十一、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整七十四、二十八师和第七军进攻涟水；第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师进攻盐城；第三绥区冯治安指挥整二十八、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师在鲁南威胁临沂。

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仍以占领实地为目标。整七十四师自12月3日起再攻涟水，这一次他们避开涟水正面，改由侧翼突击，以伤亡四千余人的代价，于16日攻占涟水。与此同时，整八十三师于18日攻占盐城，整二十五师于27日攻占阜宁。

国民党军虽然在占领实地上得了便宜，但在宿北野战中却遭到重大损失。担任宿迁一线进攻的国民党军右翼为整十一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左翼为整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新安镇。这一路被认为对中共威胁最大，因为"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90]。而整六十九师是由三个原建制不同的单位组成，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因此陈毅和粟裕在提出多个方案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先打整六十九师。作战部署是，由谭震林统一指挥涟水、盐城方向的华中部队，尽可能牵制当面国民党军，粟裕则指挥山野第一、二纵队、第七、八师和华野九纵共三倍于整六十九师的兵力，秘密行动，隐蔽开进，在对手尚未发现自己的意图时，于15日晚突然出击，切断了整六十九师与整十一师之间的联系，将整六十九师分割包围于宿迁北人和圩一带。整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言大而夸，"平时侈谈战略战术滔滔不绝"，然缺少实战历炼，"遭此不意袭击，张皇失措，无法对付，部队陷于混乱"[91]。近在咫尺的整十一师非但未能解救戴之奇，反因其在整六十九师右翼的二个团弃守阵地时未通知整六十九师，而使整

六十九师师部所在地人和圩更陷于重围之中。战至19日晨，整六十九师三个旅二万余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也因而丢了官。

宿北战役首开内战以来中共部队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三个整旅的记录，这是中共在华东战场一大胜利。这也是中共华中与山东野战军统一行动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上下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严令“只许打胜，不许打败”[92]，这对于一贯重视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中共来说，并不多见，可见中共对此役的重视。此役之胜，对中共华中与山东两大部队此后顺利协同作战、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此前，中共在苏北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因此宿北战役“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93]。此战之后，华东战场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陈毅“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部队编制、番号均须统一。一面作战，一面正商讨整编办法。”[94] 虽然中共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最终被迫自苏北撤向山东，但在这一转战过程中，中共不仅没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大的损失，而且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在战略防御的一方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国民党军队苏中、苏皖、两淮、苏北作战的结果，于损兵折将的同时，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作战计划，最大的收获是占领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将中共主力部队压过了陇海路，既解除了中共对长江南岸南京、上海一带的直接威胁，又为下一步山东决战准备了条件。李默庵认为：“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

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95] 然而他也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稳扎稳打的正规战法，但是因为各部队之间的战斗力不整齐，战力强的部队容易受战力弱的部队拖累，加之指挥官麻痹大意，骄傲自信，又不能集中兵力，优势变成了劣势，战斗中吃亏甚多。

尽管如此，苏中、苏北作战对国民党军队确立对中共的战略优势地位并无多大裨益，其中关键在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目标大多局限在占领实地，各个部队为了确保自己任务的完成，只求占领上级规定的要地，而对当面中共部队则都乐于推至其他部队的作战地域，这种战术使中共部队有生力量未受大的损失，而国民党军队每占一地必分兵守卫，反赋予中共部队灵活运用、任意打击国民党军队驻守各点的机会。国民党军队在苏北战场投入兵力虽数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缺乏协同与策应，“兵力虽较优势，但均胶着于据点，致决战方面，兵力反较敌为劣”[96]。然而当时国民党仍然陶醉于苏北的军事进展之中，其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华东主战场即将转入山东境内。

四　华北战场的风云

华北战场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自抗战结束之后，华北战场便一直冲突不断。停战协定签订后，华北战场暂时得以平静，及至全面内战爆发，华北的战火再度燃起。不同的是，中共在华北战场一度占据着军事主动地位。

1．北线作战

华北北线国民党军分为第二（山西）、第十一（河北）、第十二

（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战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在华北除了晋南和豫北有攻势外，其他地区暂取守势。中共方面，赋予华北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即首先集中晋察冀四个纵队主力出击平汉路北平石门（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门两城；然后以晋察冀主力入晋，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与大同两城；这样将使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可西接陕甘宁，东接东北，确立中共在华北的战略优势。因此，中共中央强调此一计划“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97]。就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实力对比而言，中共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显然脱离了实际，同时高估了己方力量，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和晋绥军区贺龙等负责人认为，如果同时出击三路四城，则兵力不易集中，建议先打大同，再战平汉路，末战正太路。大同位于国民党华北三个战区的结合部，其兵力调动不易迅捷，而且经过前一阶段的晋北作战，大同已陷于孤立，如攻下大同，则晋绥到晋察冀的交通得以畅通，并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因此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首肯。

大同为著名煤都，三面环山，筑有四郊、外廓和内城三道防线，易守难攻。守军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的三个师及零散部队两万余人。楚溪春判断中共部队为有备而来，而大同至太原铁路已断，增援不能北上，东西援军则分属另两个战区，能否及时赶到难以预料，因此作了困守的准备，事先即储存了大量粮弹。大同城池设防坚固，阎锡山部队接收后，增挖深12米、宽16米外壕一道，并以暗道通入城内，同时筑有侧防工事，控制壕内。城外要点均以碉堡和壕沟构成防线[98]。防守部署考虑到“若将兵力分散，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虑”，因此要求“选择要点而占领之”，主动放弃了若干城外据点，收缩至城郊，依托核心据点和坚固工事，划定责任区据守[99]。尽管大同守军成分复杂，建制混乱（两万人的部队，单位则有七八个之多），

但在一定的协调准备之下，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作为大同攻击战的序战，7月20日，中共晋察冀部队开始攻击应县，但历时20天攻击四次未克（后来直至大同战役结束也未能攻下），此一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8月1日，他致电聂荣臻、贺龙等人，提出："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估计到。"同时，他还请自北平回晋察冀的罗瑞卿向聂、贺等人转达了他的先打平汉路的意见[100]。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和意见未能引起前线将领应有的注意。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大同已成孤城，守军战斗力不强，估计一个月内可以解决战斗。会后调集了晋察冀五个旅和晋绥四个旅的兵力，以四个旅攻城，五个旅打援，战役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实际上这九个旅并非全建制参战，尤其是攻城部队总人数不到两万人，与大同守军人数相比并不占优势。而且由于整个作战准备时间不够充分，又是两个方面联合作战，联络不能得心应手，为失利埋下了伏笔。

8月初大同攻击战打响。中共部队经一周作战，基本攻克了外围据点，守军收缩至城郊。14日，中共部队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对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发起攻击，由于守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而中共部队"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大同矿区虽然有充足的炸药，但"没有利用爆破进攻。近郊作战打得非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101]。直到9月4日，才攻至城垣。

大同被围后，因为阎锡山困守太原，自顾不暇，8月9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告以"大同部队应归兄指挥，如此则调配补给皆易生效，如兄以为可，则中即电阎长官照办，此乃有益大局之事，兄自无须推辞也。……至如何空运交警部队及武器增援，请兄主持定夺，概

可照办”。次日蒋电阎锡山称：“大同情势日急，该处作战似由绥远方面负责指挥为便，……中意大同方面之指挥，就近暂归第十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为宜。”[102] 此在蒋为一举两得，既可促傅速援，解大同之围，又可在傅、阎间打入一个楔子，便于居间运用。此着果然生效。傅作义因大同划归自己指挥，增援颇为积极，而阎锡山因大同危在旦夕，对这块肥肉落入他人之口也不便表示什么。8月底，傅作义在先派出一个交警大队空运大同后，下达了增援大同的作战计划，“以夺取集宁，威胁张垣，并解大同之围之目的，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并相机捕捉匪军主力于丰镇附近，予以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中路以暂三军攻击平绥路之卓资山，北路以暂骑第十二、十四纵队攻击集宁，南路以三十五军攻击归绥丰镇公路上之香火地，俟后会合攻击丰镇，解大同之围[103]。

9月1日，傅作义各部开始自归绥向东攻击前进。中共事先未估计傅部会全力援大同，打援准备不足，部队猝不及防，5日傅部暂三军占领卓资山，由于其他各部距离尚远，傅改令暂三军攻击集宁。面对傅部积极东援的态势，中共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对大同暂取围困之势，集中七个旅四万部队打击傅军。7日，暂三军绕道进抵集宁城下，发起攻击，而中共部队因联络不畅，8日晚才得知此信息，随后各部陆续到达集宁四周，自10日起双方在集宁城郊展开激战。傅部一面抵抗，一面攻城，各据点有反复争夺至五六次者，由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优势，战况渐对傅军不利。9日，傅部主力三十五军到达卓资山集结，然因情况不明，未能及时向集宁前进，暂三军陷于苦撑之境，由于空军的支持，也由于中共部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使其得以稳住阵脚。

12日，傅部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开始东进增援，暂三军一部攻入集宁城内，此时中共部队如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集宁暂三军，则形势有利，但此时前指决定调兵打击三十五军，结果导致兵力分散，而且因为是临时决定，部署、协同、联络等问题均不能及时解决，甚至连对

手的位置也不十分清楚，结果打援计划未能实现，集宁战场也陷于胶着。这是中共部队此役关键的一次失误，傅作义其后总结时认为："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一个是侥幸。"[104]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13日中共前指决定撤出集宁。聂荣臻认为"我如仍以重兵屯驻于大同坚墙之下，已属不利"，因而"决心撤除围攻大同之部队，以便迅速休整，准备执行新任务"[105]。大同遂于16日撤围。

大同、集宁作战，中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集中兵力并确定作战重点。中共在大同战场的兵力本居一定优势，但由于重在攻城，且对国民党军队守城决心与攻击坚固设防城市的困难估计不足，攻城战术有误，导致久攻不克。在集宁作战中，又未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轻率分兵，导致战场形势胶着，不得不撤出战斗。聂荣臻这样评价大同战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虽然我们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的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106] 当时作战的指挥者之一罗瑞卿认为："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107]

中共大同作战失利，立即导致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处于危境之中。9月中旬，北平行辕制订张垣（张家口）会战计划，“以收复张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截断共匪国际通路之目的，以十一、十二两战区主力，分沿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向张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分别进出赤峰、围场及独石口各附近，策应张垣攻势，并遮断匪北窜退路，将匪包围而歼灭之”[108]。根据此一计划，东线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第十六军由南口、五十三军由怀柔进攻张家口，九十四军集结于沙河，准备出击怀来南侧，对张家口形成包围之势。十六军率先出动，于9月29日起，从南口、青龙桥向怀来方向攻击前进。

自大同作战失利后，中共即已估计国民党军将向张家口发起进攻，面对对手的东西夹击战略，兼之己方部队因大同之战伤亡较大，甚为疲劳，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本“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然而，由于华北方面初战不利，中共中央指示“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109]。遵此，晋察冀军区以主力二个纵队置于东线，以一个纵队置于西线，另以一个纵队出击平汉路，准备以防御作战结合运动作战，打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

9月30日，国民党第十六军进占平绥路要点康庄，并经整顿后于10月3日开始猛攻怀来，中共部队一面节节抵抗，一面发起运动反击，致十六军苦战一周而仍无进展。此时，五十三军经激战于11日占领延庆，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进至怀来南之长城线。就在东线激战之时，西线傅作义部却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傅作义曾于9月24日飞大同视察后致电蒋介石，称：“大同守军经四十余日之苦战，均已疲惫不堪，且该部素乏攻击训练，势难再赋予第二任务。”[110]傅明知蒋已令其攻击张家口而如此说，一面是对他增援大同期间第十一战区不予配合行动表示不满，一面也是借机向蒋提高要价，而蒋也只有重

施故伎，将张家口划入第十二战区管辖，诱使傅积极行动。

傅作义在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后，积极部署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企图乘中共主力“与第十一战区部队在怀来方面作战，而张垣西侧防务空虚之顷，尽速秘密移师东进，夺取张垣”[(111)]。他采取声东击西战法，一方面令部下在大同扩大番号，采办军需，造成将由大同沿平绥路正面东援的假象，而以董其武指挥三十五军的二个师和暂三军一个师及骑兵集团秘密集结于集宁地区进行演练准备，并以三十五军和暂三军各一个师为二梯队在大同随时准备增援。傅充分发挥骑兵在塞外的作用，令董部绕由长城外荒芜之地向张家口以北疾进，保证了行动的迅捷与出人意外。由于中共事先估计傅部出动将在怀来攻下之后，援军将走平绥路，而且援军数量不会很大，因此西线部队大部位于平绥路待命，不料傅部避开铁路，由北面直扑而来，9月27日袭占兴和，10月6日占尚义，8日傅部骑兵直下张北，中共守城部队只有一个连，不得不退出。张北位于张家口以北不过百余里，此处一失牵动张家口形势顿趋紧张。东西线中共部队临时调动已缓不济急，10日傅部进至长城要隘狼窝沟，张家口完全处于其威胁之下，当晚中共晋察冀各机关仓促撤离，次日，傅部进入张家口。

张家口既失，平绥路阻击战也失去意义，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国民党西线部队于12日占宣化，东线部队于13日占怀来，14日在宣化东会师，打通了平绥路。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展，至11月初，北线先后攻占了商都、新明、康保、宝昌等地，使热、察、绥三地交通得以贯通；南线则占领了蔚县、广灵、阳原等地，使大同周边态势得以改善。

张家口作战实际是大同、集宁作战的延续，对国民党而言，打下张家口是其既定目标，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同和张家口先后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调动了早就想向华北中心腹地发展的傅作义的积极性，傅则运用了适当的战略战术，并充分发挥了奇兵的作用[(112)]。因为傅作义的部队多

年跟随他，彼此熟悉，指挥运用得当，协同能力明显好于所谓中央军[113]。几仗打下来，傅作义颇为自负，他在部队长会议上声称："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114] 他还特意让其新闻处副处长阎又文捉刀起草了一份《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自吹自擂："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115]

对中共而言，张家口是中共所占的有数的大城市之一，虽然有了撤离的准备，但在东线阻击成功的情况下，为傅作义部所乘，导致张家口的过早丢失，确有失误之处。内战开始，华北几仗中共部队打得都不理想，"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116]。事后总结，罗瑞卿的意见可为代表：失利原因，"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作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117]。

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以及在此前后占领安东等城，使当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控制区城市数达到63座，可称其进攻的顶点。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国民党军事行动作了乐观的展望。他认为，张家口收复后，冀察热绥以及晋北均可联系起来，对战略有很大的影响。当有记者问及内战前景时，陈诚自负地说，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118]。但张家口之战的影响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中共以国民党军是否停止攻击张家口作为能否继续维持国共关系的条件之一，而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的当天，

蒋介石得意之余，宣布如期召开国大，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此再无挽回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家口之战是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标志性战役之一。

大同、张家口作战是华北战场北线的西路，华北战场北线的东路是热河作战，不过热河位于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国共双方在此的作战都由东北方面负责，而又与华北密切相关。

承德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攻击重点之一，还在上年底，承德即发生激烈战斗，只是由于停战令的颁布，才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前进，为此，东北国民党军指挥官杜聿明一直心有不甘。关内打响之后，国民党在东北方面暂时维持了和局，而将东北部分兵力转用于热河，企图拿下承德，截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大区之间的联系，并保证东北的侧翼安全。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热河的行动调动了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又加上了第十一战区的第五十三军，共三个军的兵力，而中共部队则只有冀热辽地方部队七个旅，就军事实力而言，显然不及对手，因此中共也没有准备在承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硬拼。8月下旬，第十三军担任主攻，由凌源沿锦承路进攻承德，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策应，分由绥中进攻都山（今青龙）、由锦西进攻凌南（今建昌）。28日，十三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第十三军负责热河守备，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转向冀东卢龙、迁安方面进攻，第十一战区出动第十六、九十二军由平北之怀柔、密云向平谷、遵化进攻，九十四军由唐山向丰润、玉田进攻，整六十二师由滦县向乐亭进攻，企图全面解决冀东中共部队，安定东北后方和平津侧翼。至9月底，国民党军在冀东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张家口作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以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出动配合作战。10月7日，十三军攻占围场，然后转向西进，12日占领多伦，17日占领沽源，与察境之国民党军打通联系，同时九十三军于10日占领了热河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之赤峰。然而就全盘战局而言，热南冀东的作战并不是国共双方关注的重点。

2．南线作战

华北战场南线主要指以豫东、豫北、鲁西南为中心，包括晋南部分地区的作战地域。国民党方面以郑州绥署刘峙所辖兵力为主，并得到徐州绥署薛岳部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的支持，中共方面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承担该线作战任务。由于该区域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北线、华东和中原诸战场的结合部，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共双方在此线的作战，除了攻与防之外，还有牵制、配合其他战场作战的目的。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根据其全盘部署，赋予晋冀鲁豫刘邓部的任务是，“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开（封）徐（州）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一波）负担”[119]。此一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出击陇海路，切断国民党徐州和郑州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分散国民党军兵力，沟通中共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区的联系，从而配合华东以至全国战场的作战。根据这个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首先出击豫东。

国民党在豫东的兵力部署极为单薄，只有战斗力不强的前西北军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和六十八师及一些地方部队，分布在陇海路开封至黄口段及豫东广大地区。“惟因正面过广，处处形成空隙；且地当徐、郑两绥署之结合部……仓促应变，难期发挥统合战力”[120]。8月10日夜，刘邓以三个纵队分左、右两路向陇海路沿线突然出击，当夜左路攻占砀山，右路攻占兰封，控制了百余公里铁路沿线地区。随后继续南下豫东，半月内连占杞县、虞城、通许等地。迫使国民党调华东战场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在豫西的三个整编师分从东西两面驰援。在国民党东西对进的军事压力下，加之“作战半月，伤亡五千余，已感疲惫，亟待休整”[121]，刘邓部队遂撤回陇海路北，结束了此次作战行动。

陇海路两侧战事虽告一段落，但蒋介石判断“刘伯承部经各部反

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因此于8月底下令徐州、郑州两绥署发起对中共冀鲁豫区的攻势[122]。国民党军队摆出钳形攻击态势，东线以徐州绥署所属之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率第五军、整十一师及新二十一旅，自虞城、砀山一线向北出动；西线以郑州绥署所属第五绥区孙震部整三、四十七师为左翼兵团，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师和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为右翼兵团，自考城、兰封一线向北出动，另以整四十一师自长垣东进，掩护北侧安全，各部进攻的中心目标是中共冀鲁豫区的中心城市菏泽和定陶。为了显示进攻决心，刘峙将郑州绥署前进指挥所设于攻击出发地考城，将第四、五绥区司令部由许昌和驻马店前移至兰封和开封，就近督导攻势。8月底9月初，东西两线部队开始攻击前进。

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刘邓以整三师为打击重点。因为西线国民党军队实力不及东线（两个师不过1.7万余人），整三师又是其中唯一的嫡系部队，如能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聚而歼之，估计其余各部将知难而退。为此，刘伯承、邓小平调回原在豫北的一个纵队，集中全部主力四个纵队，预备在鲁西南歼灭整三师。恰于此时，刘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许是因为攻击途中并未遭到大的抵抗，他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到二十余公里，与其他部队相距至少也在三十公里开外。事为中共部队侦知后，刘邓立即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时间与地区，提前开始围歼整三师的行动。

9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诱使整三师进入定陶西南天爷庙预设地区，以第二、六纵队为右集团，第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实施向心攻击。刘峙得知整三师被围，急令各部迅速增援，但为晋冀鲁豫阻击部队所阻，整四十七师离整三师不到十里，仍未能会合。整三师方面，战至6日晨，大部被歼，师长赵锡田见增援无望，于当日午后率余部突围，结果于混乱中全军覆没，赵本人被俘[123]。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胜追击，又歼灭退却中之整四十一、四十七师各一个旅。至9

月8日，国民党军退回进攻出发地。定陶战役，国民党损失一个整编师及二个旅，共1.7万余人，被中共誉为“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124]。此役之败，国民党指挥无能、协调不周、将无斗志、兵无士气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刘峙轻率下令改变攻击目标，导致战线出现漏洞，而在一部被围的情况下，增援部队又迟迟不能到位（最近者不过相距五公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结局。国民党统帅部恼怒于刘峙的指挥无能，于9月14日下令免去他的郑州绥署主任职务，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郑州绥署主任。

由于中共的攻击重点在西线，东线国民党军的行动较为顺利，9月初起先后进占单县、城武、鱼台、金乡，12日攻占定陶，20日攻占菏泽，完成了预定作战目的。接着，第五军和整十一师北、南两路，沿菏泽、济宁公路自西向东行动，作战目标进一步指向巨野、嘉祥。由于整十一师态势稍为突出，部署较分散，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以一个纵队牵制第五军，集中三个纵队寻歼整十一师。9月29日，第五军首先与阻击部队接战，晋冀鲁豫二纵以龙堌集为核心，顽强抵抗十天，第五军前进不过十余里。与此同时，晋冀鲁豫三、六、七纵从10月3日开始攻击整十一师，因整十一师几次变更部署，攻击扑空。6日，晋冀鲁豫三、七纵猛攻张凤集，与守军1团展开逐屋争夺，双方战线犬牙交错，均有惨重损失。奉令解救的第五军激战竟日，终未有大的进展。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对第五军进展缓慢甚为不满，如果不是整十一师战斗力较强，必定重演定陶战役之一幕。结果整十一师还是靠自己的力量，于次晚以两个团接应张凤集守军余部突围而出，全师集中一处，方免被歼之命运。此后，国民党统帅部感到鲁西南作战地域分属两个绥署在指挥上的不便，将其全部划归郑州绥署指挥。郑州绥署于10月下旬集中八个整编师兵力，继续在鲁西南追踪刘邓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甄城以南歼其一个旅后，主力避其锋芒，主动撤过黄河，至濮阳一带休整。

在晋南战场，郑州绥署所属的第一战区胡宗南派出四个师，北渡黄河自运城沿同蒲路北进，期与介休南下的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打通同蒲路南段；中共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在晋南作战，任务是夺取同蒲路南段若干县城，沟通与晋绥区的联系[125]。7月上旬，胡宗南部进入山西，连续占领同蒲路上之闻喜、侯马、曲沃等地。陈赓部首先于7月中旬歼其一个旅，接着于8月下半月在同蒲路南段临汾以北地区，连续攻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五城，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又于9月24日在临汾、浮山公路全歼了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一师第一旅五千余人。不出3月，陈赓部三战三捷，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陈赓因而和粟裕一道被誉为中共新起的军事家。

豫北战场，郑州绥署为巩固平汉、陇海两路安全，策应鲁西南作战，由整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指挥四个师，先于9月底占领了平汉路东的道口、浚县等地，再于10月中旬占领平汉路西的焦作、博爱、沁阳等县城，下旬占领鹤壁，结束了豫北作战。

华北南线以鲁西南为中心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二十五座，并将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暂时抑制在黄河以北，但国民党军队为此被牵制诸多兵力，战略上也未达成其预期目的。其战史承认：“国军两绥署投入之兵力达三十余万，以优势战力居外线之有利态势……惜因缺乏统一之指挥、齐一之行动，虽屡有斩获，但亦损兵折将。”[126]

第二节　内战调处与和平运动

一　三方均不满意的调处

内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是“边打边谈以打为主”，打是为了获得与己有利的谈，谈是为了掩盖打。蒋介石虽然还在公开场合谈论和平，但在内心里，他已承认其通过和谈拘束中共战略的失

败，对中共采取了誓不两立的态度。7月18日，蒋在青年军复员工作检讨会上讲话，称国民党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要彻底消灭共党，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对共党发动全面的斗争”[(127)]。在此前后蒋作类似的演说不止一次，其通过军事手段消灭中共的方针已经无可更改。在这种方针下，国民党干脆回避谈判一事。中共方面还在作谈判的努力，然而照马歇尔对叶剑英所言：这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坦承：“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128)]

7月15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29)]。司徒雷登长期在华活动，可谓中国通，他出任大使出于马歇尔的极力推荐，因为马氏认为，“中国局势的恶化和围绕着委员长周围的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决定性影响力使我确信，我需要在调解努力中，获得一位有着无可争议的品行和诚实，并在中国有长期经验的美国人的帮助”。“司徒雷登博士对于中国及其人民心理的了解，对于中国语言的熟练掌握，以及国共两党对其共有的尊敬，使他成为参加调解努力的极好人选。他的参加将可抵消对于我缺乏对中国事物了解的批评”[(130)]。司徒雷登的任命确实为美国调停带来了新的动力，无奈其时运不济，没能挽救美国调停的命运。

自7月中旬起，蒋介石避居庐山，等待战况的发展。此时国共谈判已经中止，只有美国人还在作着徒劳无益的努力。对于美国的调处，蒋的方针是“使马歇尔氏明了欲完成其调解之使命，不在单独使国共两党妥协之一途，而应另觅途径，即先协助政府用军事解决，然后再收抚之，此乃剿抚兼施之道也”[(131)]。马歇尔不顾盛夏酷暑，仆仆风尘，自7月18日至9月15日，八上庐山，奔走于南京庐山之间，虽然还想努力挽救危局，但实际上也不过是随着蒋的方针转而已。

8月1日，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一个由国共双方各二人组

成的非正式小组，加上他本人，以达成打破僵局的协议。5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蒋同意司徒的建议，但重提6月所提诸条件，并称这是“最后之条件”，“为政府最大限度让步。如共方有一不能同意，则应断然中止谈判，不可再予以拖延之机会也”[132]。次日，司徒雷登在南京向周恩来转达了蒋的意见。周恩来回答司徒：蒋的要求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蒋要求无厌，故内战责任应由蒋负之；美既为调解人，应主持公正，判明内战责任在蒋，不能形式上不管，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仍是参加内战，不能卸脱责任。会见后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必须一面在准备全面大打的基础上，打两三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周的判断与答复[133]。美国调处者在中国特色政治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影响的有限。

对于谈判的僵局，美国人很不满意。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行动与美国在华所要达成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他在8月10日将一封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请其转蒋，信中称：“本人自向阁下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本人特使以来，曾密切注意中国之局势。深以为憾者，本人不得不断言，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属徒劳无益。”“除非短期内能见明证，使人确信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解决已有真正进展，否则欲期美国舆论继续对贵国持优容态度已不可能。进而本人必须重新确定美国立场并向美国人民加以说明。切盼不日可闻阁下之积极表示，冀其有助于实现贵我双方共同宣布之目的。”[134]当天，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称为了结束目前中国日渐滋长之冲突已用尽全力，但冲突仍在天天扩大，蔓延全国，有演至不可收拾之势。国共双方尚有若干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无法获得协议，以至不能发布完全停止全国冲突的命令[135]。马歇尔在与国民党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本人的多次谈话中曾强调，美国不会担保中国的内战，美国的目标是一个统一和新生的中国，而不是如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象的，是使共产党就范。马歇尔告诫国民党，政府遵循的策略是压

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然而这种努力反为共产主义制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以财政和经济状况为例，认为军事行动的继续将使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内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为共产主义提供迅速滋生的土壤，提供颠覆政府的极好机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136)]。18日，杜鲁门以行政命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以此作为促使国民党“作出某些合理妥协的唯一手段”，同时亦符合“给予国民政府以有条件的支持”的原定政策[(137)]。

面对美国人的压力，国民党内的反应不一。正在巴黎开会的外长王世杰连续致电蒋介石，认为“倘我不采若干步骤，致使马歇尔陷于完全失败状况，美国政府将必采取若干不利于我之措施与声明……基于此种考虑，认为钧座对于中共问题，至少尚需更作六个月之忍耐，拟请责成俞部长大维等，与马歇尔及中共，就业经商有成议之约定整军等事先行成立协议，六个月内，如该协议不能实行，政府自可自由行动”。蒋介石以此令陈布雷研究意见，陈认为，王“对美国舆论非常顾虑，常恐因坚持中共撤退苏北，而影响马歇尔之使命与美国对我之观感”，对王不无揶揄之处。他提出，如蒋认为“马帅态度尚不如其声明之焦急，拟请钧座将最近与马商谈情形电告雪艇（即王世杰——作者注），以安其心”；如蒋“亦认为美国当局对谈判停顿畏怯太深，而有另发声明之可能，则似宜对当前僵持之局，有以缓和之”[(138)]。在这种情况下，蒋既未接受王之意见，但又不能不对美国人的表示略予敷衍。8月14日，蒋介石在纪念抗战胜利周年文告中，提出召开国大、遵守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停止冲突等主张，19日，蒋函复杜鲁门，解释国民党和他本人的政策，指责中共不能合作，称将“竭尽所能，排除万难，与马将军取得合作”；继表白“政府方面，亦不免有少数分子曾有错误之行动，但比较共产党之公然破坏协定，其程度相去甚远。政府方面，如再发见类似错误，则将予以严厉之处治”；表示“切盼共党方面能接受余之意见，政府方面必将尽一切可能使此等达到和平民主之步骤，迅速成为事实”。但是，蒋并未提出具体主张，而私下在日记里仍表示“坚持我一贯之政策，决不为任何环境压

迫而有所动摇”[139]。说明蒋介石此时仍寄希望于靠军事解决问题，无意真正言和。

马司联合声明发表之后，调处和谈判实际处于停顿。中共认为“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此时谈判的目的则在于“揭露蒋及逼美表明态度”[140]。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马歇尔在3月回美国前，“声望是很高的，因为他当时的行为一般是公正的。他对于和平民主的原则是坚持的，他对于顽固分子是曾予以斥责的”；接着批评马氏，“并不为已成的协议之实现去奋斗，却不顾已成的协议，而来重新‘调处’，这样，就使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肆无忌惮，美国反动派也越来越肆无忌惮，马歇尔自己的地位就越来越低”[141]。这表明马氏已经失去中共曾有的信任，已被中共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他的中立调处者地位很难继续维持。中共的谈判策略此时也有了重要变化。9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认为“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条件是国民党军退出被侵占的解放区，并从江北撤退二分之一的兵力到江南，“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142]。此后，这个方针被概括为恢复1月13日的“地区和军队原状”，“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143]。

周恩来在南京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谈判中，坚持进一步的谈判必须在停战条件下进行，并询问马、司两氏，如果改组政府谈成了，蒋介石是否可放弃自己的条件，立即停战并根据政协决议成立国府委员会。马、司两氏均表示不能保证。周告以如此谈判不过利于国民党拖延时间。在美方坚持下，8月29日，中共同意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张厉生，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美国代表司徒雷登组成。在国共代表的非正式接触中，国方代表表示只谈改组政府，不谈军事和停战问题，中共表示如此则改组政府无从谈起，何况国民党坚持不同意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拥有否决权，不

同意放弃蒋介石的各项条件，因此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一直无法正式进行。蒋介石并坚持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和停战的条件是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并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双方的立场各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9月13日，马歇尔第八次去庐山与蒋商谈无结果。16日，周恩来自南京飞抵上海，行前他以备忘录致马歇尔，提出："六月休战以来，一切迂回曲折之办法均已试验失败，无补时艰，且徒使好战者拖延时日，蒙蔽舆论，扩大战局，祸害人民。因是，我现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之地位，特向阁下，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提出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之办法，请阁下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谈停战问题。"并对马氏请其回京续谈的来信，表示不愿再进行无意义之磋商，除非重开军事三人会议，否则自己将不返南京[(144)]。中共对于美国和马歇尔调处的态度，在毛泽东9月底会见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有明白无误的表示。他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145)]

9月底，国民党军队在解大同之围后继续进攻张家口，引起了中共的强烈反应。张家口是中共当时在华北占有的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省会城市，国民党在以前的谈判中对张家口的地位一直未表示异议，因此中共中央于9月29日指示周恩来，如果国民党政府军攻占张家口，"即是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次日，董必武向马歇尔转交了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给蒋介石和马歇尔的备忘录，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146)] 然而此时国民党军事进攻连连得手，蒋介石判断中共急切要求停战是无力再战，因此坚持攻下张家口后，再考虑停战，以在军

事压力下“促使共党参加国民大会”，“如共党再不接受，亦可使美国了然于共党之悖乱也”[147]。对于与国民党有二十年对抗史的中共而言，这种以战迫和的手法很难取得成功。

9月底10月初，马歇尔为美国的调处作了最后的努力。他一方面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战，一方面要求中共参加和谈，企图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解决自己面临的尴尬局面。10月1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提交备忘录，内称：“政府现显然采取以武力解决基本争执之政策，此即以全面攻势强制其遵照政府之条件及要求，余实难同意。……现余仅欲表明者，即对于停止冲突之协议，应即获得协议之基础，而不再彼此提出条件及反条件，而致拖延谈判之进行，否则余拟向杜鲁门总统建议，请其将余召回，并终止美国之调处工作。”他还在与蒋的会谈中表示，“本人代表美国政府，若因本人之处置与地位，使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担负道义上之责任，则诚非本人所愿者，故战事不停，则本人只有请求回国之一途”[148]。但蒋介石对马氏的努力反应冷淡，他在2日给马氏备忘录的回复中仍坚持中共先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蒋在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上故作让步，提出中共与民盟委员十二名外，中共可推荐一名无党派人士），规定中共军队驻地并限期进驻后，再行停战。他并对马歇尔当面表示，国民党必待收复张家口之后才能考虑停战[149]。但为了给马歇尔一点面子，6日蒋在与他的会谈中提出，如果中共接受他在2日给马备忘录中的两项条件，政府军可以对张家口休战十天。对蒋的建议，就连马歇尔也认为中共“必将拒绝”，而且表示对所有问题是否可在休战期内解决“实无把握”，“对于短期休战办法之成功性，颇为怀疑”。他不无悲哀地感觉：在政府继续使用武力并拒不停止对张家口进攻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调停而这场战役却进行到底，我本人和我所代表的美国的公正立场已经成为疑问[150]。

10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对国民党提议和美国调处的应对方案。认为国民党正进攻张家口，表明其无意真和，中共

应采取强硬立场，国民党如不同意停攻张家口，不同意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则应表示一切不谈，对美国调处亦不必表示挽留[151]。9日马歇尔亲到上海，促周恩来回南京谈判。周告马氏，蒋介石的要求“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敦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周恩来向马歇尔重申了中共的要求：只要国民党政府军停攻张家口，则中共愿意参加军事三人小组和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在军事方面，双方军队在关内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恢复6月7日的位置，规定双方军队驻地；在政治方面，国府委员中共与民盟合占14席，行政院与国府同时改组，依据政协原则制订的宪草提交国大并保证通过，国大召开日期和代表名额分配由政协综合小组决定，各党派向改组后的政府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地方政权维持现状待政府改组后实行地方自治[152]。马氏的努力再遭失败，而且与中共的关系也到了非常僵的地步[153]。10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现时一切所为均在为分裂时责在彼而不在我”，“目前谈判与军事无联系，不发生配合问题。你们只把握教育群众，表明分裂责不在我一点便好，对美蒋欺骗取坚决揭露方针，对马司退出调停之表示不要表示挽留之意，再过一时期我即应考虑退出执行部”[154]。此时的调处对于国共美三方面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处理时局的八点办法，主要内容为实施6月达成的有关恢复交通、军调部调处办法和东北军队驻地方案等三项协议，华北华中国共军队暂驻现地以待三人小组商决，五人小组成立之协议交政协综合小组处理，关内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宪草委员会商定宪法草案后交国大讨论，在中共同意以上各点后下令停战，同时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155]。中共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后，即宣布开国大，此时又提出此一声明，表明其“方针是政治大攻，军事大打，现在他骄气正盛”，中共决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屈服[156]。1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提出：“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其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

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157] 蒋的声明遭到中共的拒绝，此后的政局转入围绕国大召开问题各方之间的纵横捭阖，第三方面登场，美国调处反退居二线。

二　反战运动与反美运动

自东北战争爆发之后，国共商谈没有进展，6月停战令到期前后，国内笼罩着一片战争气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是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声。在这样的呼声下，国内一度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反战活动。

6月8日，以马叙伦领衔，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马寅初、茅盾、巴金、许广平、周建人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内称：“国内人情，莫不深厌战祸，盖中国既为世界政局未来之枢轴，而战焰复燃，足以外召凌侮，内致崩离，公论皆谓抗战已终，一切皆属内政问题，自宜摄息干戈。”[158] 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主[159]，推出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各方请愿停止内战。车至镇江，即有自称为苏北难民代表的人上车纠缠，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后，代表们受到名为苏北难民代表实为国民党组织人员的围攻。据马叙伦日记所记，由于请愿代表不听这些人的鼓噪，车站内“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往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包，眼鼻亦伤，腹受踢，遂以痛坐地”[160]。民盟在向国民党的抗议中指称：“在场军警时多时少，时远时近，始终不为有效之制止，以致自晚七时拖延至夜深十二时，前后历时五小时余，以首都重地，军警如林，而不能维持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身体之自由，窃不能不怀疑吾人为有政府抑为无政府。此断非可以防范疏忽等论调推卸责任者。”[161] 请愿团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请愿不要再打内战。蒋介石告诉他们，“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162]

。然不及一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更严重的事件接踵而来。

7月中旬，在全面内战的低压气氛中，云南省会昆明连续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引起国内各党派、一般民众和舆论界的震惊和广泛关注。11日晚，战前以“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偕夫人外出访友并看电影，散场后在回家途中遇刺身亡。四天之后，15日下午，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悼念亡友并痛斥杀人者的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在回家途中遭暗杀而逝。出事前，有人劝闻一多暂避，但他表示“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临出门前，他又说：“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163] 结果，闻一多以身殉言，终于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案发后，昆明形势空前紧张，民盟在滇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至美国领事馆暂避，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则被查禁。

这两次暗杀发生在昆明不是偶然的，昆明长期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龙为了与蒋抗衡，对民盟的活动采取了默认和赞助态度，兼之因抗战而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汇聚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昆明成为民主派活动的基地，久为国民党所不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利用赴越接收迫龙云下台，西南联大准备复员，学生陆续离开昆明，民主派活动失去奥援，又值国内形势紧张之际，云南国民党当局遂有此举。从5月份起，昆明各种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刊物即不断传出对民盟以至李、闻二人不利的谣言，诸如民盟成员是共产党员，民盟要组织暴动，闻一多正组织暗杀团，李公朴携款到滇等等，且越传越甚，情节已至离奇程度。迫使民盟云南支部不得不于6月底连续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民盟所持为“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宗旨，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团体[164]。然此种表示并未使云南的主政者有所收敛，各种谣言、威胁仍不断出现。案发地点附近，军警机关密布，但却无人出而过问，刺闻更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后凶手从容登车而去，可见这决非一般凶案。

李闻案发之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内政治空气空前紧张，全

面内战已经爆发。李闻案又有明显的国民党方面背景，此一行动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当政的国民党难辞其咎。李闻案一出，即引起舆论强烈反应。《大公报》在社评中写道："李公朴这个人，本如鸿毛之轻，而遭如此凶死，其意义却有如泰山之重。假使李氏之死，是有政治背景，则前方兵争，后方暗杀，那岂不是国家大乱的象征？""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165] 当事主角民盟由其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声明此两案"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166]。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直接批评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敢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167] 不仅如此，这两次暗杀事件，原因出于国民党"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蓄意"破坏民盟，打击民盟"[168]，从而不能不导致民盟为自身利益向中共进一步靠拢，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在7月15日民盟政协代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民盟代表批评国民党拒绝再开政协会议为最重要的错误，要求立即恢复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从而与中共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相一致。其后，民盟又批评蒋介石8月14日的文告，认为政协决议之所以未能实行，执政党比在野党之责任为大，文告所提方针完全违反政协决议，并举李闻案为例，"在此事存在之下，有武力政党如何敢放下其武力"。当有人问民盟为什么不批评中共时，梁漱溟称，在此一致争取和平之时，目标一致，不能批评[169]。可以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国民党方面策划李、闻案，本想打击反对派，但就政治影响而言，此事对国民党可谓因小失大，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反却导致其政治形象的下降。

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对李、闻案的强烈反应，使国民党当局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内心里，它无疑支持至少默认这样的举动，而表面上，它又不能不应付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以至蒋介石出面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政府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面对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抗议，国民党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姿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先后抵昆明查办此事。8月2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下令革职看管，由何绍周接任，警总特务营三连连长汤时亮和该连排长李文山，以闻案凶手罪名被处死刑，此一震惊全国的大案暂告一段落(170)。

反对内战的和平运动的进行，无论参加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不能不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党，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此持反对态度，而中共则持支持态度，许多反战活动本身就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如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就是由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建议，得到同意后，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实施的。从请愿代表的产生、请愿口号的选定，到请愿的具体方式、欢送队伍的组织等等，都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具体操办的(171)。国民党对反战和平运动当时还不便公开镇压，只好采取暗中活动或特务活动方式进行破坏，而这又与民众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呼声站在了对立面，从而使自己在争取民众的工作中失了重要一分。如当时舆论所言，国民党的行为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处境实在尴尬。

1946年底反美运动的爆发，更使刚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国民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文法组学生沈崇，在北京城中心的东长安街东单操场附近，被美军士兵强奸。自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后，美军士兵恃强凌弱、行为不检之举所在多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时又正值中美商约刚刚签订不久，舆论对商约确立的美国对华经济优势多有批评，使社会上形成对美不利印象。恰恰“沈崇案”发，又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文化首都的北平，最高学

府的北大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年青女学生身上”[172]，立即引起北京大学学生的抗议，并进而扩散到社会。使社会的对美不满情绪找到一个发泄点，经过传媒的广为传布，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次反美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沈崇案”后，立即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控诉“我们中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法律保障，犯罪的美军们一直逍遥法外，受迫害者却无从申诉，这表明了不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已被糟蹋无余，而且连生杀大权也完全操在外国人的手里了”。告同胞书提出应严惩凶手并由美军最高当局公开道歉，同时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173]。这样的要求为此次运动定下了强烈的政治性质。北大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北平以及全国大中学校的支持。12月30日，以北大、清华、燕京为主导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北平行辕请愿，强烈抗议美军暴行。南京、上海、天津、杭州、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也都先后举行了支持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反美学潮得到各校教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北大名教授沈从文、周炳琳、钱端升、朱光潜、向达等48人得知“沈案”之后，致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先生以教育家出任驻华大使，对此事之观感，当与吾等相同”；“望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事关吾国国民身体自由，及人格完整之保障，处置略欠允当，并足影响中美两国人民间之敦睦”[174]。清华大学教授绝大多数赞成罢课和游行，朱自清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吴晗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175]。他们对此事的反感与抗议，不能不牵涉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从而演变为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诉求。向达认为，国大闭幕宪法制完就应该也算民主了，宪法的兑现程度如何，就要进行考验了。张奚若表示，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民盟在公开表态中认为，美军一日不离中国，此种

暴行一日不会中止。美军在华无必要，应即退出中国[176]。全国各报亦对学生行动发表了大量正面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反美学潮，国民党出于公众反应既不能公开镇压，考虑到对其极为重要的对美关系又不能听之任之，处境颇为尴尬。蒋介石对于学潮的处理原则是：1．对共党扰乱我后方社会，应指明其叛国害民之罪恶；2．中美国交与关系，不能以美兵个人罪行，而妨碍破坏；3．统一我内部之言论行动[177]。这种力图将此事限制在法律范畴内的处理原则，不能化解公众激烈的情绪，负责具体处理的国民党官员又奉命惟谨，不善以技巧性操作应付公众情绪，反而刺激了运动的扩大。北平市政府虽于27日对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严肃纪律，但为了避免刺激美方，当局在公开表态中，一再强调“此案系一纯法律问题，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这种态度极易引起公众的反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传统道德的国度[178]。国民党在北大的代表人物、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出语荒唐，先训斥学生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后来为了“威信”又予否认，但又说什么，“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各校且有此事为中共“阴谋”的传单出现。此种言论当即引起学生与社会舆论的愤慨[179]，可以说，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无方，是学潮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

处在风暴漩涡中心的北平各大学当局，显然不能完全按国民党的解释行事。刚刚开完国大、在学生游行当天才回到北平的北大校长胡适，态度较为温和，他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180]。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表示，“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燕京代校长陆志韦，对学生行动均表示同情。梅贻琦在北平学生游行当天上午，主持召开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由于学校

当局的态度，北平游行得以顺利进行[181]。直到反美游行高潮过后，1947年1月4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才对各地发出通令：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裁判，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182]。

反美学潮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领导。“沈崇案”发后，北平各大学中的中共地下党认为，时机非常有利，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作出反应，给美蒋以打击。他们因此进行了发动学生、组织反美抗议运动的工作[183]。中共中央得知北平反美学潮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国统区组织，在各大城市尽量发动游行示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更重要的是，全面内战爆发及制宪国大召开之后，中共亟须以群众运动扰乱国民党后方，打破国民党合法与正统的外部形象，反美学潮即为中共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184]。连马歇尔都告诫国民党官员，反美示威虽然无疑有共产党的参加和鼓动，但有迹象表明，示威也是间接反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国民党情绪的一个信号，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将转到直接反政府一面[185]。反美学潮过后，1月28日，成立了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3月8日，进而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两会的宣言中都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186]。将反美学潮的政治诉求又推进了一步，为五二〇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准备了条件。

第三节　制宪国大的召开

一　围绕国大的纵横捭阖

制宪国大是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国民党而

言，当政近二十年尚未确立一部宪法，使国家政治体制处于悬空状态，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训政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认同，由此孕育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自抗战中后期起，国民党便一直酝酿召开因抗战而搁置已久的制宪国大，企图以“训政”向“宪政”的过渡而为自己的统治找寻更能为社会接受的法理依据，并以此完成社会整合。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民党可以一手遮天的阶段，国大的首要议题制订宪法便引来了众说纷纭，中共和民盟对制宪有其自己的主张，并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任何一部宪法得不到他们的认可，便不具有统一全国人心的代表性。抗战后期，此事已成为困扰国民党的一大政治难题。政协会议期间，制宪原则问题几经争论，终于得到了各方都可接受的结果。本来按预定计划，国大应该在5月5日开幕，但是政协会议之后的和解气氛很快便被破坏了。对召开国大至关重要的宪草修改问题悬而未决，先改组政府再开国大的程序无法实行，因此国大能否如期召开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中共的反对下，4月24日，国民党同意国大延期召开，后又于7月4日宣布改至11月12日召开。

就在国共双方战场厮杀的同时，政治上的斗争也没有停止，其中的中心环节就是国大问题。国民党急于通过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使国内外认同其统治合法性，并使中共陷于孤立；中共坚决反对在其他问题未能完满解决前召开国大，实际是以此作为手段，不使国民党建立统治合法性的既成事实；中间党派既愿意通过召开国大使中国走向民主化，又不愿意因为国大问题而使国共彻底破裂，因此极力调和国共，希望找出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随着国民大会预定召开日期的临近，各种政治势力围绕这个问题，纵横捭阖，演出了中国政坛的一幕幕悲喜剧。

国民党在国大开会日期问题上一延再延，自感有失尊严，因此国大已成了国民党的心病，开不成国大，就标志着国民党的失败。内心里实际上并不想放弃一党专政地位及其利益的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却

成了实行多党民主制的热心鼓吹者和捍卫者，“制宪”和“还政于民”一时间成了国民党最有力的宣传口号。为了达到开成国大的目的，国民党一面极力拉拢民盟，一面在战场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战迫和。

中共对国民党开国大的用意一目了然。中共的战略就是让国民党开不成各党派共同参加的国大，不让国民党打出合法的旗帜。即便国大开成了，只要中共和民盟不参加，国大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大，国民党就不能以此作为号召各界的借口。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攻势，中共在政治上争取民盟，军事上坚决抵抗，以不妥协的姿态与国民党对抗。

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攻占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即宣布国大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此时国民党上下都为胜利冲昏头脑，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因此匆忙宣布召开国大[187]，企图一鼓作气，以军事胜利压迫中共在政治上屈服，如中共拒绝，则以国大号令各党派和舆论，完成社会整合工作。这是国民党一大政治失策。当时舆论评论为：“这从政府方面看，是一个军事胜利紧接着一个政治僵局，这是很欠斟酌的。”“在军事上，政府占了优势，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政治。”[188]民盟也认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89]。

国民党召集国大的命令发表后，原本积极调处中国内战的美国人感到事已无可为，遂推出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再作努力。第三方面因为国民党极力拉其参加国大，感到在表明其态度之前，先有调停国共之必要。而且国共之间在国大问题上僵持不下，使民盟以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照梁漱溟的说法，“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190]。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第三方面在国大问题上的支持，国民党不想因为国大背上分裂的名声，中共则希望以此教育第三

方面认清国民党的不可信，因此给了第三方面一次表现的机会。自6月以后一度沉寂的第三方面调停再度趋于活跃。

10月17日，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和雷震到上海，与各党派代表交换意见，并力邀周恩来回南京谈判，以此发起和平攻势。周恩来此前即估计，国民党将“争取第三方面参加‘国大’，争取舆论同情而孤立我们”；因此“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中共中央同意他的判断，指示他“给第三者面子，参加三人会商与政协综合小组，不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对于美蒋背信弃义，破坏和平，作历史性解释”。所以中共在明知谈判很难成功，周恩来且已准备只待国大开幕即回延安的情况下，在第三方面出于种种原因劝说周恩来回宁时，周恩来同意回南京继续谈判[(191)]。

此时谈判表面上的主角是第三方面，尤以民盟为中心，参加者有民盟的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无党派人士莫德惠、缪云台，可称知名的中间派人士几乎全体出动。作为第三方面而言，其内部立场并不完全一致，青年党更接近于国民党方面，民盟更接近于中共方面。但就总体而言，第三方面希望国大能够顺利召开，以获得自己合法参政的机会，而不愿在国共分裂的情况下召开国大，那样国大就缺少了名正言顺的号召力，而且一个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只能是国民党主宰的民意工具而已。因此第三方面此时调解国共之心还是非常迫切的。

然而全国形势的发展，使第三方面的调解一开始就显露败象。不给第三方面面子的首先是蒋介石。10月21日，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代表一行到达南京，然次日蒋介石在与他们匆匆见面之后，未谈正事便启程飞往台湾视察，此举表明蒋根本无意谈和，所谓重开谈判不过是敷衍美国人和国内外舆论而已。23日，第三方面与国民党代表首次聚会，第三方面转达中共提出的国府委员名额、行政院改组、宪草、国大日期、国大代表名单、地方政权、停战及驻军地区等问题的解决办

法，王世杰的答复完全以蒋介石16日声明所提八项条件为依归，几乎没有透露出国民党方面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已经预示了调停的结局[192]。尤其是25日国民党政府军又在东北占领安东，使周恩来极为愤怒，经第三方面的极力挽留才同意暂时留在南京，但和平前景更为黯淡。

此次第三方面调停采取的方法是，由第三方面与国共分别商谈，听取意见，然后再转达彼此的意见。国共双方，一个是八条，一个是二条（中共18日声明）。第三方面原以为既是要价，总有还价的余地，岂知国共都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三方面代表“愈跑愈觉得这个中间派难做，总找不着双方要价还价的眉目来”，经过几天奔波，毫无进展[193]。第三方面感到这样下去终无尽期，不少代表已厌倦思归，而国大开幕在即，时间不容再拖，便在28日搞出一个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依整军方案整编进驻；地方政权依据政协决议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依据政协决议及程序，商定改组政府、国大、宪草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和国大。但是梁漱溟在讨论时认为应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还应该将方案的规定具体化，如东北军队驻地应事先规定，以免到时再起争执，出席者遂推举黄炎培、梁漱溟和莫德惠三人进行研究。三人提出东北中共军队驻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地，莫德惠又提出长春路沿线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这个方案得到了第三方面参加调停者的一致赞成，他们认为现在再恢复1月13日的位置“非事实所可能”，需要国共双方“衡情酌理，互相让步”[194]，而且第三方面调停者迫切希望早有成果，心浮气躁，在未事先征求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便贸然将这一方案送交国、共、美三方。然而事实全不如他们的一厢情愿。且不说就地停战方案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与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相距甚远，他们自作主张提出的东北中共军队驻地和国民党接收长春路沿线政权方案，也是中共决不可能接受的。周恩来见到这个方案后极为震怒，痛斥第三方面不守信义，落井下石，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195]！接下来便出现了第三方面调

解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他们见中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自知难以成功，又不愿让国民党用作借口，便由黄炎培、罗隆基、李璜、莫德惠四人去孙科处，告以这个方案还漏抄了一条，需要补上，将其从孙科处要回。经此一幕，第三方面的调解已很难进行下去。

10月29日，蒋介石会见民盟黄炎培，民社党徐傅霖，青年党曾琦、李璜、陈启天，以及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胡霖、缪云台等人，诱以第三方面如能先提交国大代表名单，虽中共不交，则政府亦可下令停战。蒋还对莫德惠、胡霖说，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胡霖建议找个办法将国大延期，并说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当场遭到蒋的训斥[196]。但是由于中共对民盟所作的工作，也由于国民党战后诸项施政措施大失人心，第三方面对国民党的拉拢反应冷淡。

第三方面提出的调停方案，未及正式提出即遭否定，第三方面的调停也失去了最初的动力。29日和30日，国民党政协代表与第三方面代表会谈，第三方面要求国民党再作让步，首先改组行政院，并表示最好由国民党与中共直接会谈，并有多人表示将陆续回沪。其间原因，李璜说了实话："此乃有如连环，不能打开，即政府要先提国大名单，而中共要先改组国府及行政院。政府所要求者，中共做不到；中共所要求者，政府不许可。"会后孙科认为，此次会谈"简直是第三方面代表中共说话，为中共而向政府办交涉，完全丧失其公正立场矣"[197]。然而国民党方面也感到问题的严重，孙科、吴铁城、张厉生、邵力子、陈布雷、王世杰在事后联名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目前形势，希望中共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固不可能，第三方面单独提出名单，在势亦有不能，因此对于十一月十二日即将开幕之国民大会，不得不作郑重之考虑"。他们建议，"此次国民大会原为制宪，而宪法为百年根本大法，自不宜在战争尚未停止之局势下开会议制，为此拟建议将大会日期再行延缓，一俟大局好转，再行召集"[198]。但蒋介石决心已定，他知道如果接受这样的建议，意味着国大

将永无开会之日，除非国民党准备接受中共的条件，而这是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自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就准备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召开国大，而现在他感觉时机已到，他不准备再作让步。

11月8日，蒋介石下令自11日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各守原防”。蒋介石同时声称，国民党在一系列问题上之所以不能按政协决议的程序行事是因为，“自政协会议闭会以来，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关外东北严重之战事发生，旋又蔓延及于华北，而中共军队之整编，迄未照协议之方案而开始实行。在此种状况之下，政治协议遂未能获得结果”。他声明“现国民大会依法选出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实不能再予延期，以增加政治、军事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且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亦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199]。这就封死了国民党再作任何让步的可能，因此虽然蒋在声明中表示军事、政治诸问题仍可协商解决，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敷衍舆论的手段，而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不仅中共决不会接受蒋的条件，民盟等党派也表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停战完全是为国大开幕营造一些虚假的和平气氛而已，各战场从未真正停止战斗。

自国民党宣布国大如期召开到其开幕的短短一个月中，各方面进行了频繁的接触。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经过他们的建议，由国、共和第三方面组成非正式综合小组，开会讨论政治问题，同时由国、共、美三方非正式三人小组讨论军事问题。直到国大开幕前，非正式综合小组和周恩来、陈诚和马歇尔参加的非正式三人会议仍在断续进行。在国民党，是显示其尊重社会舆论，对第三方面进行拉拢；在中共，“目前谈判中心工作在向第三方面解释一切系蒋美骗局”，以争取第三方面对抵制国大的支持[200]。国共双方实际对一切早有定规。11月10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表示：现在争执的焦点，或者是政府取消国大，召开政协综合小组解决全部争端；或者是政府置中共及其他党派意见于不顾召开国大，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任何一种会议讨论政治

争端的基础就荡然无存[201]。而国民党根本无意停开国大。双方之所以还在谈判，目的都是为了争取第三方面的支持。只有第三方面内心尚存一丝调停成功之念，因为他们明白，国共的分裂也就意味着第三方面的分裂。但此时国民党坚持蒋介石的八条，中共则坚持自己的两条，即一切照政协决议办事，同时恢复1月13日军事位置。在国共各执己见之下，第三方面日日聚议，但仍找不出可以使国共那怕是稍为接近的方案。于理，第三方面较倾向于中共，因为政协决议也是他们立身所在；然而于实际，第三方面无力改变国民党的立场。在现实的考虑下，第三方面内部也在分化。

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各方关注的焦点转向他们是否参加国大。国民党仍极力企图将第三方面代表拉入国大，以充实民主的门面。据民盟人士言："近日政府拼命拉第三方面，真是无孔不入，笔难尽述，证明了政府主要只在拉拢第三方面，交出国大名单，就算达到目的。"国民党向第三方面表示："最好各方先提名单，即不然，只要第三方面提供保证，交一部分国大名单，那怕三五个人都成，政府便可对十二日的开会，予以延期。"[202] 11月11日张君劢遂提出，由第三方面致函政府，说明如果国大延期至12月1日举行，在此期间解决各项问题，各党派可以参加，签字者即作为提送的提名名单。张君劢此举，为民社党、为民社党同仁、甚至是为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考虑兼而有之，不意却成为第三方面最终分裂的导火线之一。

张君劢提议以签名信解决交出国大代表名单与国大开幕在即之间的矛盾，民盟诸代表出于情面或其他考虑，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当天，蒋介石宣布国大延期三天举行，以示尊重民意。但在张申府、章伯钧和沈钧儒三人将此告知周恩来后，周立即向第三方面表示：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事情牵涉全体，变成中间人避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愿意

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203]。结果除张君劢之外的民盟代表均退出签名。张君劢对此很不满意，表面上是表示独立行动，实际上是为民社党最终参加国大寻找理由。他表示“此后民社党不得不自由活动了”。青年党诸领导人亦借机表示对民盟向中共靠拢的不满，同时准备参加国大[204]。第三方面在国大开幕前，终因为内部态度不一而面临分裂。

二　制宪国大的开幕

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截至当日，国民政府公布代表名单为1580人，已报到代表1420人，到会代表1355人，占应到代表总数2050人的三分之二[205]。蒋介石在开幕式演说中称，“宪法是全国共循的法典，一方面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国家现实的情况，我们的理想就是国父遗留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国家社会自抗战以来经过长期间的演变和进步，惟有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宪法，才是适合国情而完善可行的宪法”，其间含义不言自明[206]。

对于国民党不待各方一致同意坚持召开制宪国大，其他各党派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1月10日和13日，马歇尔在国大召开前夕与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两次会谈，周表示，“政府单独召开国大，政治方面必然产生决裂，而军事方面亦将不无影响”；“如国大将不延缓召开，则是明白表示政府正走向政治决裂之路”。马歇尔对此无话可说，他明白任何调解此时都是多余的了[207]。11月16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中共坚决反对及不承认一党包办国大的书面声明，并对记者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疑，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208]国共关系实际已经因为国大的召开而破裂。19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对一年来的国共谈

判总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209]

第三方面调解国共的努力终因国共在国大以及其他各个问题上互不相让而无结果。国大开幕之日，第三方面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以及民盟的现实处境，终于使民盟决定与中共共始终。11月14日，民盟总部秘书处发表紧急通告，声明民盟留京中委于11日决定：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前，暂不参加[210]。其后民盟公开声明："民盟拒绝参加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理由很简单，这次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整个精神，破坏了政协决议的程序，并且这次国大不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制宪会议，这是举世共同承认的事实。"民盟今后的方针是"恢复和谈，停止内战"[211]。

作为第三方面成员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则与民盟表示了不同的立场。青年党原就靠拢国民党[212]，在调停失败后，青年党声明："吾人为促成民主宪政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益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213] 国大开幕当天，青年党代表向国大报到。社会贤达代表多数也参加了国大。此后，各方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民社党参加与否，如果形象较青年党为中立的民社党不参加国大，对国民党将是一大打击。

民社党内部对是否参加国大意见不一。张东荪、叶笃义等反对参加，张东荪且有言称，"民社党参加国大之日，即弟退出民社党之时"[214]，蒋匀田等主张参加[215]，但最后参加与否，关键在于主席张君劢的态度。张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政协会议前后一度与中共

和民盟联系较为密切，被民盟中人认为“态度非常之好”，“站得稳，拿得住”。即使此前因为签名信问题而对中共不满，但他仍向民盟内人士表示：“我作人有个格，党有个立场，分裂的国大，我们不会参加的。”[216] 国大开幕前，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重点对象。

11月1日，张嘉璈接蒋介石电自东北飞南京，据其自记：蒋“此次要我返宁，专为希望我劝君劢家兄采取独立立场，勿受共方影响”，并嘱其“多多与君劢接洽”[217]。张嘉璈遂奔波于沪宁间，将蒋意传达给张君劢。私下接触外人难以度之，然张君劢的态度自此有了变化当属事实[218]。11月16日，张君劢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参加国大条件，20日，张君劢公开致函蒋介石，强调在彻底实行停战命令和政协决议之前提下，“倘宪草能一本政协之决议，而同时政府能迎之于机先，早日自动表示结束党治，一面彻底执行停战命令，一面彻底实现政协决议之精神，则民主社会党同人虽深以各党不克共聚一堂为缺憾，然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此函既发，显见民社党是在为出席国大及避免外界批评寻找借口，蒋介石立即顺水推舟，次日即复函表示“函中指示各点，或为政府所已办，或为政府方在实施，要皆真知灼见，与政府不谋而合。……总之，函中列举诸端，俱为政府所当为，亦即中正个人所愿竭全力以求实现者。……故此国民大会，甚盼贵党人士出席，共同参加制宪工作，俾宪政早日实施，则先生所有政治主张，一切皆可迎刃而解。务希贵党与各党人士及社会贤达，一本抗战初起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与本党通力合作，以促进建国大业之完成，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经此一番公开对答，双方都找到台阶可下，民社党也就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国大。23日，张君劢发表谈话称：“此次民主社会党与国民党交换之文件，纯粹以国家人民之需要为出发点，承蒋主席之答复，实为施行宪法前之重大表示。本党同人本此精神参加国大，以赞大法之完成。”[219] 至此，民社党向国大提交40名代表名单。

民社党虽已决定参加国大，但张君劢本人仍表示不参加，使需要

借助张君劢声望充实国大门面的蒋介石仍不罢休，派出多人劝驾。张既主张民主，对国民党的一党统治自不无反对，何况其对政协宪草出力甚多，出席分裂的国大脸面上有点下不来，因此他只能声明："至君劢个人，向来好致力于政治思想与学术研究工作，所以自重庆各方讨论提出国大名单时，即一再声明不愿担任任何名义，至于讨论宪草时，无论任何方面，如需要君劢说明或参加意见，无不乐从。"[220]应该承认，张君劢对国大的态度是矛盾的。据张嘉璈的观察，张君劢在参加国大与否的问题上"有无限痛苦，认为中共问题不解决，即开国大会议，亦无补于国家统一与政治安定。但彼一生迷信立宪政治，总觉有法胜于无法，以致矛盾环绕于胸中"[221]。而且他长期受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对蒋介石的"民主"承诺总抱着怀疑的态度[222]。但张君劢不仅对中共也对与中共接近的民盟抱有疑虑[223]，与国民党有着比较密切的人事往来，其弟张嘉璈又是国民党高官，对于国民党的拉拢也不能过于拒绝，加之党内有要求参加以脱离在野地位而从政的呼声，因此他最终决定全党参加，但其本人不参加，以两面都留有余地[224]。

民社党既已决定参加国大，12月24日，民盟秘书处致函张君劢称：民盟中央常务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民社党参加国大，"与本盟的政治主张显有出入。兹经本盟决议，认为民主社会党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应予退盟"[225]。次日，民社党发表声明称：此次参加国大，所以完成宪法，所以期望以宪政代替训政，较之于停滞在专政阶段，自进一步。本党既无武力，又无地盘，对于接近民主之路，岂能舍而不顾？本党自有主义，自有政纲，与夫因牵挂而起纠纷，自不如各自独立之为得计[226]。中国战后中间党派的代表力量民盟就此再度分裂。国大开幕之日，不仅是国共分裂之时，也是中间力量分裂之时，中国政治经过战后短暂的多元化时期后，再度呈现出两极分离的传统特色。民盟自己也承认，"在内战中的中国人民根本不能超然中立"，"今后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这一名词应成过去"[227]。

国民大会开幕时，决定保留中共和民盟代表名额。但在这样一个所谓决定国家根本大计的会议中，除了中共而外，国民党终于未能拉进最大及最有影响的中间党派民盟，使国大失去了所谓广泛的代表性，被当时的社会舆论评为，“在全体代表的成分中，虽有极少数的小党派及几个无党派的分子参加，然而无论如何，不是圆满而毫无缺憾的”[228]。国民党本想以国大为其一党统治打上民意与合法的印记，然而就理念而言，一个不能做到所有代表参加的国大，不仅不能为国民党提供广泛的社会整合基础，反而只能加深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裂，给国民党的反对派提供攻击的口实；就实际而言，第三方面的多数代表未参加国大，对国民党争取民意支持是一大打击；尤为关键的是，一个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这不是国民党的主观愿望所可决定的。然而国民党迷信于武力可以解决中共问题，执著于维护自己统治的既得利益，坚持召开一个分裂的国大，使得国民党若干年来所谓通过制宪而“还政于民”的政治宣传，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反而成为其无法摆脱的政治包袱。

三　《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此次国民大会按其组织法的规定为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因而也被称为制宪国大。国民党提交国大讨论的宪法草案是张君劢草拟、曾经政协宪草审议会讨论而未得到各方一致认可的方案，此草案于开会前由王宠惠、吴经熊等作文字之整理校正，复经孙科、王宠惠、吴铁城等就校正稿加以研究，基本维持原案。国大开幕后，孙科邀请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成员（中共与民盟未参加）再度审议后，经国民党中常会“原则通过”，11月22日立法院决议“照案通过”，国民党遂以政治协商会议商订之宪法草案修正案的名义于28日提交大会[229]。由于政协被认为是全国一致的政治协商，因此蒋介石在向大会提出该草案时仍然强调，这个草案是“根据政协的修改原则，再加审订整理和补充，成为完整的草案……中国共产党虽没有参加，而当时参加政协的大多数党派是经过同意的”[230]。大会分八个审查委员会

审议宪草各章内容，另由综合委员会负责审查各组争论不决事项、各组审查结果与宪草原则有变更者、综合各组意见及宪草章节文字整理。

提交国大的宪法草案虽然作了若干于国民党有利的修改，如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取消立法院的不信任权，降低省的自治地位等，但因为当时的情况，国民党尚需以民主的门面号召全国，因此不能不留有政协宪草原则的痕迹。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上，保留了立法对行政的制约权，尤其是国大组织形式，虽为有形，但只限于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和复议宪法等极少事项，使出席国大的国民党代表很不满意。大体而言，“制宪国大中有一部分国民党籍代表以遗教及五五宪草为依据，希望尽量修改宪法草案。而非国民党籍代表则认为宪法草案系各党派意见调和折衷的结果，内容比较合于民主，宜尽量予以维持”[231]。

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国民党代表对这个草案的不同意见，集中在国大权力过小，立法院权力过大上。他们主张国大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应为常设机关，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全国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他们的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一是搬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强调不能违反国父遗教；二是立法权大，易形成议会专制，且行政受牵制，不能顺利运转；三是所谓中国地域辽阔，人民程度不高，以数百人的立法院由人民选举产生，必不易运作。总之，如照国民党代表的意见，现行宪草是人民无权，政府无能；扩大国大的职权，加强行政权力，则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

国民党代表的言论，引起舆论和部分代表的反弹。《大公报》连发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一党独大的心态与做法，其言辞相当尖锐。该报社评《一个可怕的观念》，针对国民党立委讨论宪草时所说“相信我们的主义，才能做我们的国民”的谬论批道：“这话严重极了，这话就代表着一个很为可怕的观念。由此观念出发并发展，那就注定了一党力图独裁，而国家终于破裂。……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主义不能

做‘我们’的国民的那大群‘他们’怎么样呢？岂不就被拒于‘我们’一群的国家之外，而势所必至，使那大群‘他们’而另成一个或数个国家了吗？……这就是说，与‘我们’思想不同的人，就是自外生成，就应摈出于国家之外。这在主观上，是无比的凶暴；在客观上，是迫使国家碎裂，迫使天下大乱。”[232] 该报评论指出：“国民大会，会期间隔长，集会时间短，名为有形，实同虚设”；照此办理，“一个权力极大的总统，下面直属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院，旁边有一个徒拥虚名的有形国民大会。如此总统既高踞五院之上，有权支配国民大会，再加上总统手中握有无限制的紧急命令权。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233] 这就点出了国民党之所以独钟情于国大制度的用心。国民党代表坚持民主只能通过国大体现，然外人难免疑问，数百人的立法院尚且不易运作，以一个两千人以上的国民大会，又如何能够体现人民权力？再者何以立法院是代议制而遭否定，而国大就不是代议制？何以国大可以代表民意，而同样是民选的立法院就不能代表民意？说到底，国民党如此坚持国大的权力，无非是以国大大而无当的形式，又不经常开会，更便于执政党操纵而已。参加国大的青年党代表亦反对国民党的主张，认为“一个万能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常设的人民代议机关从旁时时监督，谁能保证总统常是贤明，官吏常是尽责？如果不贤不能，人民有什么办法去纠正他？照五五宪草的规定，国民大会每三年仅召集一次，会期不过一月至二月，是三年之中有二年零十个月政府可以为所欲为，无人掣肘……以两千人左右的国民大会，断无法长期集会，行使监督政府的职权”[234]。其实这也正说明，国民党制宪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民主，而在于通过制宪为其统治找出法理依据。当年制宪国大的副秘书长雷震以后亦承认：“如以国民大会为代表人民的机关，立法院为纯粹立法技术的机关，那么，顾名思义，国民大会仍属于代议的制度。可是代议制度之下，经由立法程序来控制行政权活动的手段，国民大会几乎完全没有，故此种民主政治，实际上连代议制度都不如了。”[235]

国大关于宪草的争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表态，他在各种场合反

复告诫国民党代表，“如果大家意见纷纭，议论庞杂，往复辩难，各逞己见，那不仅在二十天内不能制定宪法，即使讨论一年，也不会获得结果！这次国民大会如果失败，就等于是共产党胜利，所以要特别注意！”蒋的意图非常清楚，即以国大和宪法堵住外界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批评。为了平息党内的反对意见，蒋推心置腹地告诉他们：“任何宪法都有修改的规定的，这次宪法草案通过之后，如果将来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在下届国民大会，仍旧可以提出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理想。”[236] 蒋之所以急于通过宪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的压力。马歇尔明白表示，考虑到美国的关心，如果通过偏离接近于政协认可的基本原则的宪法，对国民政府将是致命的[237]。结果在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层人士讨论宪法问题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原草案的有关内容终得以维持[238]。

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也有事先没有料到的热点问题，即首都应设在何处。提交大会的草案将首都定为南京，但颇有代表反对。有人主张定都武汉，理由是位置居中，便于指挥国政；有人主张多设陪都，广为疏散。比较集中的争论是定都南京，还是定都北平。主张前者的认为，定都南京有其革命历史的背景，孙中山领导建国，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乃留以不可磨灭的光荣历史，是以南京之为国都，实系全民热血铸成，更为举世周知之事实。主张后者的认为，东北西北为国防首要，北平能控制东北和西北，有利国防，远胜于南京；北方多产煤铁，可促进重工业发展；北平为数百年古都，规模宏大，形势雄壮，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甚至说，凡建都于北纬25度以北的国家或民族，无论大小国家或民族，没有一个不是强国；如果中国北伐成功时即定都北平，“九一八”及卢沟桥事变或不会发生。为了缓和两派的争论，也有不少代表提出“国都为政治之中心，不能不配合当时之国策，为顾全事实及解除目前种种之困难计，宪法中似可不必作此硬性之规定”[239]。结果在第一审查委员会第一次表决时，全部192人中，主张首都定为北平者117人，主张宪法对首都不加规定者67人，还有其他若干意见，主张首都定在南京者竟至无一人（有若干人主张

南京为首都之一）。第二次表决时，主张维持南京为首都者亦只有63人。北平为首都一案遂提交综合委员会。

12月21日，国大第十三次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审查报告书。各审查委员会提出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后，经综合审查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予以定案。蒋介石特意让陈诚主持综合委员会，直接秉承己意，既保证自己的意图得以贯彻，又可以以军方力量控制CC系的嚣张。在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上：1．关于国大职权，草案规定为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宪法修改之创议，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关于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权时，由国大制定办法并行使之；第二审查委员会建议改为，国大职权为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四院院长副院长及立法、监察委员（行政院长由立法院选举，但可由国大罢免），创制和复决法律，修改宪法，宪法所赋予其他职权；参加该委员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部分代表声明保留；综合委员会决定基本维持原草案。2．关于总统与行政院的关系，草案规定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长或有关部会首长副署；第三审查委员会争论未决，最后以出席73人中之43票通过并送综合委员会；综合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草案。3．关于总统紧急命令权，草案规定于天然灾害或财政经济重大变故时，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第三审查委员会建议在天然灾害和财政经济重大变故外，增加紧急事变一项；综合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草案[(240)]。4．关于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草案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不赞同其重要政策之决议，或立法院通过之议案但认为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或原案，行政院长应予接受或辞职；第三审查委员会将立法院复议通过人数改为全体立法委员的三分之二；综合委员会决定基本维持原草案[(241)]。

由宪草一读对原草案的修改可以看出，审查委员会的修改倾向于维护五五宪草原案，即扩大国大权力，加强行政权力，但综合委员会的最后修正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政协宪草的名义，也就是维护未来宪法的社会认同，这也是国民党在国大设立综合委员会，意图对过分偏激作法有所纠正的目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政制方面，草案意见为省于不抵触国家法律内得制定单行法规；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省自治法制订后，须即送司法院，如司法院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文宣布无效。第五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综合委员会的意见于此完全一致，可证国民党对于地方政制的敏感，在事关国民党统治根本的方面，审查委员会和综合委员会是高度统一的。关于首都，草案原定为南京，第一审查委员会建议改为北平，综合委员会亦通过。与提交大会的草案相比，宪法一读经综合委员会定案后，除了删去立法与监察委员为国大当然代表，及首都改为北平外，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动[(242)]。

为了保证宪法的顺利通过，蒋介石在20日对国民党国大代表的演讲中要求：凡综合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意见，除中央另有指示者外，应依照通过；除临时指定必要者外，其他代表不必发言[(243)]。在这样的严令下，从21日到24日，宪草一读修正案经二读逐条通过，惟删去了关于首都的一条[(244)]。12月25日，制宪国大第二十次会议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决定于1947年12月25日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分为十四章，共一百七十五条，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纲，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非经司法或警察

机关依法定法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人民享有居住及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秘密通讯、信仰宗教、集会及结社自由；人民有生存、工作及财产权，请愿、诉愿及诉讼权，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权；人民其他自由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保障；以上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国大代表由区域、民族、侨民、职业、妇女代表选举组成；国大职权为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国大代表六年改选一次，于总统任满前九十日由总统召集开会，并得在补选或弹劾总统副总统时、或修正宪法时、或五分之二以上代表请求时，召开临时会议。

第四章总统，总统为国家元首；统率全国军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长或有关部会首长副署；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解严；依法任免文武官员；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疠疫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

第五章行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由院长提请总统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质询之权；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不赞同其重要政策的决议，或对于立法院议案认为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核可，移请立法院覆议，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或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或辞职。

第六章立法，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立法院有议决法律、预算、戒严、大赦、宣战、媾和、条约等议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立法委员任期三年，连选得连任，院长副院长由委员互选[245]。

第七章司法，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法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第八章考试，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公务人员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第九章监察，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纠察及审计权；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委员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院长副院长由委员互选；监察院对于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有全体委员四分之一以上提议，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审查及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

第十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中央立法并执行者为，外交、国防、全国性法律、司法制度、全国性交通、中央财政、国营经济、币制及国家银行等；中央立法并执行或交由省县执行者为，省县自治通则、行政区划、森林工矿及商业、教育制度、银行及交易所制度、土地法、劳动法及其他社会立法、警察制度等；省于不抵触国家法律内，得制定单行法规。

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省自治法制定后，须即送司

法院，司法院如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文宣布无效；省自治法施行中，如因其中某条发生重大障碍，由五院院长组织委员会提出方案解决；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县实行县自治，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县自治法；县民关于县自治事项，依法律行使创制之权，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县议会议员及县长由县民选举。

第十二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各种选举以普通、平等、直接及无记名投票方法行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依法选举之权，年满二十三岁者有依法被选举之权；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以法律定之。

第十三章基本国策，国防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军队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任何政党及个人不得以武力为政争之工具，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外交应本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敦睦邦交，尊重条约及联合国宪章；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第十四章宪法之施行及修改，宪法之解释，由司法院为之；宪法之修改，或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提议，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决议，得修改之；或由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员四分之三决议，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246)]。

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就其条文而言，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性。以人民自由权利而论，“五五宪草”对于每项自由权利均附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条文，名为自由实为限制大开门径。在代表的反对下，此项条文被取消，而另列一条规定，除了几项条件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对于人民自由的保障更为明确。在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既非总统制，亦非完全的责任内阁制，而是折衷了立法与行政、总统与行政院的权限，但基本保证了立法的控制地位，对于总

统权力亦作了较多限制，如发布命令必须行政首长副署，实际是有限度的责任内阁制。然而宪法毕竟是理论，要想将其真正运用于实际中，并非其条文显示的完美。还以人民自由为例，宪法于1947年12月25日实施后，国民政府即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其后又在全国普遍设立特种刑事法庭，以所谓“戡乱时期”为借口，以严酷手段处置所谓“谋叛案”，宪法中的各项人民自由条款几成空文。另以总统权力为例，蒋介石在将宪法草案提交国大时称，“五权宪法的中央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总统制，行使政权的人民如果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对于治权不能有适当控制，则总统权力过分集中必至形成极权政治，这种政治不合于现在时代，而且有害于中国有害于中华民族的”。照蒋的讲话，他也是反对总统制的，然而妙就妙在他话锋一转，称“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以治权来保护政权，培育政权，使民权充分发展”[247]。换句话说，别人实行总统制会搞独裁，我实行总统制则是民主，这表明了蒋的真心还在总统制，然而又要在形式上表现出民主。蒋的亲信左右对他的这种想法可谓了然于心[248]，果然，就在蒋介石在国大上声称“总统的紧急处分权，我以为也可以删去，以避免外人的误会”之后，在次年的行宪国大上，国民党代表领会蒋意，又搞出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既不违宪法“民主”之名，又保证总统权力扩张到了极限，实际上一切大权仍操总统之手[249]。

即使是这样一部远远谈不上完善的宪法，因为在议会民主制方面有所突破，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多少有些限制，因而引起其党内相当多数人的不满，以至宪法通过后，孙科、王宠惠、彭学沛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不得不撰文解释订立这样一部宪法的理由，以缓和党内的反对声浪[250]。一般舆论则认为，这部宪法“较五五宪草为进步，但从时代性格与立法技术上看，尚非理想的佳构”，“思想上有矛盾，因之在制度上欠和谐，而条文尤其粗陋草率”，“最大缺点还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的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

[251]。美国人则从他们的立场对这部宪法予以肯定。马歇尔认为，这部宪法可称为一部民主宪法，其主要部分符合政协决定之原则；司徒雷登认为，提交大会的宪法草案比十年前的草案要民主得多，如果不是委员长的决心，它本不会被大会通过[252]。然而这部宪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美国人也心知肚明。

12月25日，制宪国大闭幕，扰攘经年的国大与宪法问题总算暂时落下了帷幕。虽然蒋介石宣称“这一部宪法的精神，是荟萃全国各方面的意见，是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所定的原则”；“宪法的内容，兼顾到理想和现实，对于国内各民族，汉满蒙回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各政党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人民权利自由的积极保障，都有确切的规定”[253]。然而国民党原来希望达到的目的远远没有实现，最关键的是中共与民盟对国大和国大通过的宪法持反对与不承认态度。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辛辣地写道：“蒋介石打出了最大的一张牌，但是他既不能满足人民，又不能压倒对方，却只把曾弄假成真的国大再弄真成假。一切历史家都会看出，这乃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败。”[254] 民盟声明认为此次国大“是违背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程序与精神而召集的一种制宪会议”，“此次宪法所依据的宪草乃国民党片面提出的草案，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均非政协宪草”；批评国民党“显系假借制宪行宪之名，为长期内战永久分裂作准备，此实政府决心放弃和平与团结之预谋”；表示“政府此种措施，与本同盟之主张根本违背，更与全国人民之利益根本冲突，本同盟愿唤起全国人民共起坚决反对”[255]。这样的结局，还在国大开会时，已有代表认识到了。因为“政治协商会议，由政府重要人员与各党重要人员组织之。……此各党皆为会议中主体。必须主体完全存在，始终遵守，由此会议产生之宪法，方能有效。今共产党及民盟，皆不来参加制宪，是政治协商会议之主体，已不完全存在，由此产生之宪法，安能期其有效”[256]。

第四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一　马歇尔回国与军调部的终结

国共内战规模日益扩大，马歇尔待在中国已无事可干。他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仅凭武力无法统一中国，但又不能对国民党施以强硬压力；另一方面他对中共也不满意，但更无力施以影响。二战英雄马歇尔面对中国的复杂局面，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从而萌生退意。

还在马歇尔未能使国民党政府军停止攻击张家口时，他已感到自己对国民党决策影响力的有限。10月5日，他致电华盛顿，表示他感觉他已不可能继续作为调处者，并应将此通告委员长[257]。11月13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苟余公正不偏之诚恳努力，不受信任，则余之力求调处，势必无用。……故余希望阁下愿正式自延安适当之权力处决定彼辈是否希望余个人继续目前之工作？余之兴趣，全在以调处方法尽绵薄之力。余知如延安对余失去信任，余即无法做此工作。”[258]至此，马歇尔对国共双方都表示了他将退出调处之意。

国大开幕后，马歇尔还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力，以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原则的民主宪法，在中国组织一个能够支持好政府的真正自由派集团，实现政府的改组，以有利于恢复和谈并使共产党重入政治活动”[259]。但马氏此种表示并未体现在美国的政策上。在此期间，他与蒋介石有多次会见，他认为国民党仅靠军事不足以言胜，当务之急是由国大通过一部符合政协精神的宪法，然后成立有中共和民盟参加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对行政院实行真正的改组。蒋介石则强调共产党受苏联的影响，目的是瓦解政府，因此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问题就不难解决。他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260]。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对一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作出了总结。声明回顾了一年来中国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国一直未能用和平方法达成团结目的实为一大遗憾。声明表示：中国是一个主权

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也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仍然希望该政府找到和平解决的路径。我们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将维持我们帮助中国人民在其国家内争取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同时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冲突[261]。这个声明在国大召开期间发表，主要谈及美国一年来的活动和成就，为美国调处政策辩护。这个声明与上年的声明相比，声调较为低沉，虽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但显示了美国对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失望，对国民党的支持并未完全如其所愿。不过，蒋介石却有理由作另外的理解，他认为杜氏的声明不提中共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但提及东北问题，将和平破裂责任归于中共，表示无论中国是否有战乱美国都将给予援助等等，较之上年声明“可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变动的迹象，而且对于我们是有利的”[262]。以后的事实证明，蒋这样的乐观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至此，马歇尔再留在中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为了拉住美国人，提出聘请马歇尔为总顾问，马歇尔告诉司徒雷登，对这个建议最好的回答是：不。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调解人尚且不能影响中国政府，就更别指望作为政府顾问能在这个政府内促成什么有益的回应了[263]。在随后的会见中，马歇尔干脆地拒绝了蒋的邀请。马歇尔在和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的会谈中，一再告诫国民党，期望美国为政府军事领袖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而造成的经济空洞注入金钱是不现实的，同时，期望美国为执著于垄断政府权力的反动派系所控制的政府注入金钱也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不可能靠军事力量去消灭。抵御共产党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实行改革，以获取人民的支持[264]。为安马氏之心，王世杰告诉他，国民党将改组政府以容纳党外分子，对于中共问题，政府决不关闭谈判之门，但对于恢复交通、收复失地、及行宪工作，则决不再因中共之拒绝妥协而延搁，希望继续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马氏对此未表示具体意见[265]。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担任美国国务卿，他行前发表

声明称：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共和国民党彼此间完全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猜疑心，政府领袖深信，中共愿意参加政协所规定之政府完全出于破坏性的目的；中共则感觉政府并无实行政协决议、组织新政府的诚意。因此，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对每一项建议和可能性，都心存偏见和戒心。马歇尔在声明中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他认为：最近谈判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亦即国民党方面，有一居于优势地位的反动集团，反对我促成真正联合政府的一切努力，他们公开坦率地声称，与中共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实力政策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集团包括军事和政治领袖。中共方面，也有极端分子，他们完全不信任国民党领袖，确信政府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摧毁中共。马歇尔认为，如欲挽救此种形势，将依靠政府与小党派中的自由派取得领导地位，他们目前仍缺乏政治力量去发挥其具支配性的影响力[(266)]。这个声明将其调处中国内战的失败归于国共双方的“极端分子”，表现出马氏在中国政治特质面前的无奈，也为其调处的失败自寻托辞。马氏将中国的未来寄于所谓“自由派”当政，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缺乏真正的“影响力”。这个声明名为对国共双方不偏不倚，但国共对此均不满意。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谈话时，表示马氏声明只能“视作对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之补充”，“仅就马氏之声明而论，似有若干漏略”。周恩来认为马氏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的观察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马氏想以实行宪法改组政府为蒋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267)]。由于国民党视美国为其最大的支持者，而中共对美国无所求，马歇尔的声明虽对双方都有批评，但在实际效果上，国民党更可以感觉到其影响[(268)]。

1月8日，马歇尔在反美浪潮遍及中国的难堪境遇下，自南京黯然登机回美，这与一年前他来华时，中国各界和舆论对他的热诚欢迎形成鲜明对照。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名闻遐迩的英雄，虽然马氏以国务卿的身份离华，多少挽回了他个人的面子，但他在回国时的心情很难称得上是愉快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他的中国使命也只能说是一

段失败的经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说明了任何其他国家在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时影响力的有限，而且多少也反映出美国对华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趋势。

马歇尔离华，表示美国退出调处，作为调处重要机构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走到了其尽头。全面内战爆发后，军调部早已失去其最初的动力，成了观察战争的机构，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美方曾经提出由国共双方高级指挥官进行直接会谈和在双方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但均被中共认为单方面对国民党有利，未能实现[269]。“执行部所派出的各个小组，这期间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执行部内部的谈判与工作也是一筹莫展。除美方故作忙碌状态，硬拉着讨论无关轻重的积案以外，实际上对下面冲突与纠纷的调处已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时争论的中心已不是停战、调处、恢复交通诸问题，而主要是执行人员安全自由问题和连续发生的几个困难的案子”[270]。这其中包括1946年5月20日高密小组共方代表辛冠五失踪被害案，5月30日枣庄小组共方代表甘重斗及译员被殴致重伤案，6月10日晏城小组国方代表雷奋强中弹身亡案，19日新乡小组国方译员郭子祺中弹身亡案[271]。7月23日，执行部国方委员郑介民竟然发出密令：“如中共方面组员与非法密探人员有关，而证据充足时，则当地之最高军事机关将以间谍罪审理之。”8月21日，执行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在给美方的备忘录中又称：“凡有执行小组之中共方面人员被发现为密探时，则即失去代表资格，且受法律制裁。”这样一来，执行部及小组共方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可言，因此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周恩来专函致马歇尔，要求“敦促政府采取有效办法，以保障执行部中共人员在政府区之安全与自由”。在中共坚持下，军调部于9月10日发令，重申保障各方人员之安全，如有间谍行为，只能提交执行部三委员处理，此前所有人员工作不受限制[272]。

1946年7月29日，安平事件的发生，更使作为调处中立一方的美国直接牵入冲突之中。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共治下的

冀东解放区近在咫尺，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美军在进入冀东解放区活动时，已经迭有冲突发生。7月13日，美军自北戴河进入冀东解放区时，因事先未得同意而被俘七人，后经交涉获释，预示着未来冲突的不可避免。29日晨，中共驻安平镇（位于北平东之平津公路70公里处）部队得到情报，当日将有载运军火之运输车队经过，因此布置伏击。至午，果有无标识之二十余辆车组成之车队经过，伏击部队开火，双方交战历三小时，后中共部队主动撤离。事后得知，该车队所载为驻津美军六十余人，在冲突中美方伤亡十五人（亡三人，伤十二人），国美两方随后派军增援，占领了安平。此事之发生，立即轰传中外，国民党视为天赐良机，大肆鼓噪，企图就此拉美下水，使美国在调处和内战中完全站在国方一边。蒋介石致电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令其“根究彻究，从速处理”，“一面派员协同美军洽商处理善后办法详报为要”[(273)]。而中共方面态度沉稳，提议派遣小组进行调查，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再作解决。周恩来告诉马歇尔：美军“如说要巡察，何必到解放区去！有了美军，又有国民党军，这只能说明国民党一些人想利用美军在北宁路制造事件，把美国牵扯进来，并使北宁路周围成为国民党占领区”[(274)]。8月2日，执行部决定派第二十五小组调查有关安平事件的前后情况，询问证人，向执行部提交报告。经过若干时日的争执，三方在调查程序、轮流担任主席等问题上取得一致，17日开始调查工作。然三方各自提出的证人各说各话，无法得到一致，更因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最终安平事件的处理不了了之。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大环境下，国共美三方都失去了继续进行战地调处的耐心。9月27日，执行部三委员签署协议，关内除保留太原、沁县、临汾、邯郸、新乡、泊头六个小组外，其余小组均撤回北平，随后，东北亦由八个小组缩减为三个[(275)]。11月21日，东北小组全部撤离，1947年1月，关内各小组全部撤退完毕。此时的军调部名存实亡，只有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维持着一定的工作和人员，最后结束军调部的工作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制宪国大召开后，一方面是国共关系实际破裂，另一方面是战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执行部无所事事，但因为考虑到宣传和责任，国共双方均不愿主动提出撤销问题。国民党用种种办法，企图逼中共撤离，但中共则坚持对方不宣布解散则不走的方针。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存废问题还只能由始作俑者美国人来解决。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现已决定结束其与三人会议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关系，这是马歇尔回国、美国调处失败的逻辑结果。30日，国民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与美国退出调处的同时，美国大使馆宣布，美方将负责送返军调部国共双方人员至各自地区，以3月5日为最后期限，“以后仍留驻现地者，应由其自身负责，美方将不予过问”[(276)]。随后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于2月内陆续撤离北平，长春分部人员则撤往哈尔滨。2月21日，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人员离开北平回到延安。

二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虽然国共关系因为制宪国大的召开而实际破裂，战争已在大规模进行，但为了配合国大通过的宪法，显示和平民主的姿态，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表示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国民党发起了新一波和平攻势。194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和司徒雷登的谈话中，表示考虑派人直接赴延安谈判[(277)]。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其后，孙科、张群、吴铁城、彭学沛等人均放出言和风声，孙科主张“大家放弃成见与主观，重视国内与国际之客观现实，一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召开各党派圆桌会议解决问题[(278)]。15日，蒋介石召集出席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商谈，决定派张治中去延安恢复国共谈判。次日，国民党通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转达中共：1．政府愿意派员赴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2．

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3．整编军队及恢复交通，政府仍愿根据三人会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4．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20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声明，将国民党恢复和谈的条件公诸于世，并称“深盼中共体谅政府相忍为国，力求政治解决之苦心，捐除成见，继续协商。政府仍愿以最大之忍让，竭诚相与，虚怀接纳”[279]。

对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共反应冷淡。1946年12月3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称：“一党包办之国大既开，政协决议遂被蒋主席破坏无疑，国共两党谈判之基础亦不存在。唯我方为适应全国人民之和平民主要求，认为只要国方能立即解散正在开会之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下时之驻军位置，则双方谈判仍可重新开始。”[280]这是中共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而国民党显然不可能接受。得知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的信息后，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并利于三月莫斯科会议，美方好作交代，粉饰太平。故我们对美蒋所谓恢复和谈认为全是欺骗，绝不信任。我们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的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281]。因此，中共坚持恢复上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和取消国大通过的宪法两条为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次日，王炳南将中共意见告诉了司徒雷登。2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董必武和王炳南：“（一）目前情况下董暂在上海工作，不要回宁；（二）王亦不要去看美蒋两方的人，对他们表示冷淡；（三）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282]在国民党将和谈条件公开后，26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认为国民党的方案“完全是欺骗”，并逐条批驳之[283]。由于国共双方的和谈条件距离相差太远，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中共之所以拒绝国民党的和谈提议，是因为这时中共对于形势的判断已经有了重要变化。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并未能团结全国各党派，其军事进攻在占城掠地的同时，丧失了相当的有生力量，因此在国民党上下尚沉浸在所谓胜利的欢欣中时，中共已经敏感地预计到形势将起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共在几次高层会议中，对以往的国共谈判作了回顾，对未来的形势发展作了分析，决定了中共将要采取的战略方针。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两天前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枣园开会，回顾了一年多以来国共斗争的情况，并就未来的部署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因此，揭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现在已经降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是要宣传我们有条件取得胜利，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总的说，斗争是长期的，中间还会有许多曲折"。周恩来说：经过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蒋集团中除极少数外都缺乏对前途的信心，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刘少奇最后说：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国际上也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和虽不可能，谈是必须的，为了教育人民。几个问题可以确定，打的方针是定了，但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国际国内分析，胜利是可能的，但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要提倡克服困难[(284)]。当晚，中共中央举行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了"打"的方针，即蒋

要灭共，我必倒蒋，但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与会者认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预计用三年到五年，也可能十年到十五年[285]。此时此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的问题，并由中共中央会议认可，表明中共认为国民党出牌已尽，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谈判合作建国的问题了，而是准备另起炉灶，为中共的建国理想而奋斗。这在当时还不为社会以至中共党内许多人所知，但是不久，国民党就会感觉到中共方针的变化。

1946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认为，半年到一年要有大革命，要准备在半年到一年内作出成绩来。确定大革命前夜的形势很重要，有预见才能有领导。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目前的主要倾向仍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286]。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指示提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287]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均肯定了形势的变化及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毛泽东说：“和国民党打的结果，解放区的区域有打得大、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提出两个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者注），现在仍未解决，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指出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这一点，使全党了解并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预作准备，那么在这次高潮中我们就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刘少奇认为，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认为从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关键是自卫战争的胜利。朱德认为，

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288]。这两次会议表明中共高层对形势的估计又进了一步，在中共党内许多人对革命“高潮”尚有疑虑之时，就提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问题，并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确表现出了中共领导层的棋高一着之处。很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估计之下，中共不可能再去理会国民党的和谈提议。

也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举行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289]这个声明的发表，无异于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国共之间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为自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政治形势发展的逻辑结果[290]。

马歇尔走了，军调部结束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山东战场战斗正酣，国民党军队并准备进攻延安，一切都预示着勉强维持的国共关系即将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对维持表面上的国共联系也不再有兴趣，它已不能容忍中共在其统治核心地区保留办事机构，作为宣传鼓动的阵地。军调部结束时，美方表示以3月5日为期负责送返中共人员的承诺，也给了国民党一个实际的借口，因为中共人员的撤离显然需要美方的协助。而中共之所以保留南京等地的机构不撤，主要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阵地，“在蒋管区进行宣传组织与联络工作，促进蒋区民主运动”，并保持这些地方与延安的空中交通，因此中共指示各地办事机构，坚持“非赶不走”原则，并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291]。

最后的破裂举动只能由国民党出之。1947年2月28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致送中共代表团公函称：“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

散播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居留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292] 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和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也在当天和前一天分别致函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和驻重庆代表吴玉章，以同样理由要求中共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周恩来于接到中共代表团被逼撤退的报告后致电蒋介石，提醒他：限令中共人员撤退的举动，“不识为贵方地方当局之主张，抑出于阁下之命令。如属前者，则地方当局之任意妄为应请阁下予以制止；如属后者，则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293]。但蒋介石未作答复。

3月7日，中共代表董必武一行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行前，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称：“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感慨莫名。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他在谈话中指出：“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294] 董必武登机前，自信地对送别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至此，以抗战为开端，维持了十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终因抗战的结束使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而最终结束，中国的未来只能由战场胜负决定了。

---

(1) 国民党军总数统计缺乏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此处据中共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统计，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 关于国民党军的部署，各说不一，此处采用《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256—257页的统计。据国防部的统计，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共有步兵36个军、150个师（内整编师54个、独立旅3个），骑兵10个旅，3个独立团，炮兵12个团（内美式榴弹炮5个团），工兵18个团，辎汽兵24个团，11个营，通信兵8个团，11个营，战车兵3个团，铁道兵3个团（《国防部政绩报告》，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97）。

(3)　中共部队的人数和编制各说不一，此处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338页的数字。因为各区人数不断变动，故总数与各区数有5万人之差。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6页。国民党军拥有的重装备是否能在实际作战中发挥效用，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中共部队的运动战战法，往往使重装备失去作用。国民党军由美国提供装备的39个师，虽然装备程度为中国军队前所未有，但在实战中经常受到补给问题的影响，装备不能发挥效用，尤其是在美国一度禁运军火的情况下，这些装备的效用大减。据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回忆，该军初入东北时，还是用的训练时发下的弹药，直到打下锦州才得到补给，“总的说来，军品补给断断续续”（《石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版，第238页）。陈毅根据其作战经验亦认为，“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卷89，第1号）。

(5)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第四册，第387页。

(6)　《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

(7)　《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

(8)　《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

(9)　《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0)　《剿匪战事之检讨》，第6页。

(11)　国民党方面的战史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06、308页）。

(12)　《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3) 在政治上，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由于要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还维持着国共关系和表面上的谈判不能破裂，因而迟迟不能完全动员，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进行，这多少也影响了它的战略部署。在军事上，由于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国民党急于维持其全国优势地位，导致兵力部署分散，及至战争开始，兵力调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

(14) 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4—545页。

(16) 蒋介石曾经抱怨说：“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1947年4月2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98页）

(1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150—151页。

(18) 《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1947年4月20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9) 《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1947年1月6日。

(20) 郭汝瑰自述曾于1927年加入中共，后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又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并和董必武几次会见，要求到延安去。董必武通过他的联系人告诉他，“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此后郭即为中共秘密传送军事情报。他的联系人与他单线联系，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有一次他送交的情报传到民革王葆真处，而王因暴露一度被捕，此前，王将文件烧毁，使郭未因此而暴露。因为郭与其联系人始终是单线联系，而他的联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留下郭的姓名，因此郭一直为中共传递情报而未暴露（《郭汝瑰回忆录》，第385—389页）。此外，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获取情报。

(21) 《国防部兵役总局关于兵源补充等问题的说明》，1947，二档，全

宗七八三，卷号860。国民党军队征补的困难，根本上是其不能给被征者以实际利益，在当时情况下，就是不进行土地改革，使兵源最广大来源的农民没有利益驱动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战斗积极性，极易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胶东兵团司令范汉杰以亲身经历上书行政院，认为：共军在山东号召青年参军，往往超出征兵人数的一二倍，而国军靠保甲长拘捕的办法，很难补充足额，即使抓来，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国民政府卖命。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非迅速改革征兵制度不可（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65页）。

(22) 根据国防部下发的《陆海空军日给养定量》，陆军士兵日给养定量大米1.5斤，蔬菜豆类0.75斤，肉则1两都不到（《第一期军事小组讨论大纲及参考资料》，附表）。姑不论这样的定量能否兑现，即使可以兑现也很难适应战场艰苦生活的需要。蒋介石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07页）以如此生活水准，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很难指望部队能有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

(23) 《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2页。

(24) 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pp．437-438．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25) 《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6页。

(26) 《军委关于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194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0页。

(27) 《中央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96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1084页。

(28)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页；《学习陈赓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1946年7月16日）、《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人》（1946年7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48、368页。

(29)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3—1094页。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军事思

想以后被总结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3—1144页。

(30) 《中央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给刘伯承等的指示》（1946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0—211页。

(31)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946年7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32) 《华中等战略区战况及对蒋军攻势的估计》（1946年10月28日）、《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1947年3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30页、第4卷第1页。

(33) 《周恩来年谱》，第691页。

(34) 中共征补机制的活力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使千百万农民可以为保卫自身利益而主动参军，并为中共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战场情报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持（有关中共土改的情况，见本书第十二卷）。

(35) 陈士渠：《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参谋次长郭忏自嘲自己是“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军的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日记》1947年11月29日）。

(36)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我之基本方针的指示》（194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8页。

(37) 《毛泽东对李富春、黄克诚关于时局的意见的复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10页。

(38)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1页。

(39) 《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9页；《中央关于中原我军行动方针给中原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3—454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页。

(40)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8日。

(41) 据郑位三2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我焦急万分，事情真如火急，连日检查，3月1日全军无粮，即使有钱买，也要在25公里至50公里以外

运输。3月13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称：部队有1.6万人已全部无粮吃，其他数万人至多只能维持一星期到九天（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1页）。国民党方面则加紧对该地区的封锁，即使有罗山协议，中共部队也仍无法外出购粮运输。因此中共部队内部也有人认为无法坚持，“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原突围前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42) 《中央关于中原军行动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0页。

(43)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第115页。

(44)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1日。

(45) 《郭汝瑰日记》1946年7月9日。美国调处代表马歇尔的助手吉伦曾经要求蒋介石与中共就中原部队的问题达成妥协，蒋勃然大怒，宣称他不会让中共部队逃走的（Pogue，Forrest C．*George C．Marshall-States Man*，p．109．Viking Penguin Inc．New York，1987）。

(46) 《武汉行营关于围攻鄂西汉川、刁汊湖一带中原部队战斗详报》（1946年6月26日至7月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5册；《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395—398页。

(47)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第66页。

(48) 《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8—289页。

(49) 据王首道所记：“我军军事行动保持了高度机密，一切行动与平日一样，坚持生产、练兵。行动前三小时，我们以野外演习为名下达了出发命令。”因为“我军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段均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因此，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工事，敌人大多没有占领，只派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也没有配置重火器”。中原部队突过铁路线没有遇到太大阻力（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4页）。

(5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17页。

(51) 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前后》，第21—22页；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中原突围》，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中原军起了极大的

战略作用》（1947年5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87页。

(52) 《政府军已开始攻我中原部队形势极为严重》（1946年6月2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89页。

(53) 据俞大维告郭汝瑰，蒋介石不同意对李先念部调处，郭感觉，“李先念部调处与否，均不过如此一回事，李要逃出重围，政府军则图加以消灭，此观念未从根本改正，调处与否都是打仗”（《郭汝瑰日记》1946年8月3日）。

(54) 《郭汝瑰日记》1946年5月10日。

(5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37—39页。

(56) 《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1946年6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2页。

(57)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58)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1946年印本，第2页。

(59)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58页。事隔五十年后，李默庵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华中野战军对我部作战计划的掌握是很准确的。然而，至于我部的作战计划是怎样泄露的，事后我始终也没有查清楚。那个时期，抗战胜利不久，各部队指挥机关保密观念很淡薄，泄密事件的发生，并不奇怪。”（同上）粟裕在其回忆录中则写道：“我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可以打乱其部署，寻歼其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是否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否！……衅自彼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给予敌人以反击是顺理成章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60) 《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1946年6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1页。

(61)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山东野战军、军委、华中军区电》，《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62) 《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建议一、六师仍在苏中作战致中共中央并陈毅、舒同电》（1946年6月29日），《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63) 《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1946年7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64)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61页。

(65) 《华中野战军关于苏中十天战况及建议乘胜收兵休整待机致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电》（1946年7月21日），《苏中七战七捷》，第124页。

(66)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1页。

(67)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1页。

(68) 《延安总部发言人谈苏中自卫胜利战果》，《苏中七战七捷》，第236页；《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38页。

(69) 国防部编：《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1948年印本，第7页。

(70)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72页。

(71)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81页；《不要打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战》（1946年8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75页。

(72)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83页。

(73) 《粟裕关于再在苏中打一仗尔后西移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1946年8月8日），《苏中七战七捷》，第174页。

(74) 《粟裕等致陈毅等电》（1946年7月17日），《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76页。

(75) 自山东主力调东北，新四军主力入鲁后，粟裕便建议华中应留下一定兵力，以坚持华中现有阵地。战争初期，山东和华中都强调保卫地方的重要，都愿意留下更多的主力部队在当地作战。陈毅需要协调两大区（山东和华中）、四方面（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关系，“为寻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间电报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个，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数之多，简直难以数计”（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76) 《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苏中歼敌》（1946年8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10页。

(77)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00、402页。

(78) 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3页。

(79) 《陈毅同志给第八师领导同志的信》（194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6日。

(8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158页。

(8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171页。

(82) 《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关于计划在涟南打击七十四师向陈毅的报告》（1946年10月7日），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涟水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83)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04—405页。12月23日，陈毅、粟裕等进一步提出，“必须将山东、华中政治上、经济上、财经上均统一指挥、统一收支始能维持战局”，建议“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粟（裕）、谭（震林）主持前（方），陈往来前后指挥”（《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05页）。此一方案直到1947年2月才最终实现。

(84) 陈廉：《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酉时报中央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粟裕军事文集》，第284页。

(85) 陈、粟之间的不同意见还受到一些非常微妙因素的影响，当时山东有“华中的部队不要到我们山东来”的言论，华中也有“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的言论。山野几次作战不利也影响到陈毅的威信，泗县作战失利后，“‘陈毅不会打仗’的澜言就在临沂城传开了”。两淮失守后，“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这一分歧又因为华东局内部饶漱石与陈毅之间的矛盾而更为复杂化了。饶在两淮失守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以粟代陈”的建议，并当面对粟裕说：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他还找山野一纵司令员叶飞谈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此举无异于在领导层内制造矛盾。这些对中共华东战场作战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王昊：《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8、347页；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3、18页）。9月间，中共中央一度也有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作战的动议，有人认为这是“对陈毅在淮北仗没打好，也有些不满”（《陈毅传》编写组编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4页）。

(86) 《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以开展局面》（1946年10月13日）、

《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在淮北歼灭东进之敌》（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22、525页。因为出淮北作战是陈毅曾经同意的方案，对他又提出回鲁的主张，中共中央担心他与华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故有此“团结协和”之要求。

(8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44—145页。

(88) 陈士渠：《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第32页。

(89)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41页。

(90) 《歼灭进攻沭阳之敌极为重要》（1946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5页。

(91) 《杨伯涛回忆录》，第126—127页。

(92)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7页。

(93)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5—427页。

(94) 《陈毅军事文选》，第359页。

(95)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5页。

(96)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9页。

(97) 《国民党大打后晋察冀军区的基本任务》（1946年6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5—306页。

(98) 行定远：《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对大同的控制》，《大同文史资料》第15辑，第36—37页。

(99) 《暂三十八师战斗详报》（1946年8月3日至9月2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

(100) 黄瑶、张明哲著：《罗瑞卿传》，第179页。

(101) 《张宗逊回忆录》，第299页。

(10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1—233页。

(10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200—201页。

(104) 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编：《傅长官讲话》，1947年印本，第49页。

(105) 《聂荣臻、萧克给各纵队的指示》，1946年9月15日。

(106)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29—630页。

(107) 黄瑶、张明哲著：《罗瑞卿传》，第182—183页。

(108) 《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84页。

(109)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1946年9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87—488页。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58页。

(11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261页。

(112) 为了保密，傅作义不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自己另搞一套，而且通过电台测向得知中共在张北兵力空虚。比较之下，中共对蒋系部队较为重视，对傅作义则重视不够，这可能是因为傅部长期地处偏僻，而又未和中共部队交过手。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中共通过情报事先即得知，而傅进攻张北的行动则保持了高度机密，使中共情报部门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113) 傅作义较为强调团队合作精神，自抗战结束傅部东进之初，即指示各部："为期密切协同作战胜利，兹规定凡各部队奉有作战任务，在战场上或战场外遇到友军受敌攻击，或战斗激烈时如闻枪炮声，应即自动速往增援，参加战斗，如此不但绝对易获战果，更足实现密切协同之真精神，或因支助而受到损失亦情有可原。"（《三十五军阵中日记》，1945年9月，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312）

(114) 《傅长官讲话》，第48页。

(115) 《罗瑞卿传》第182页。10月18日，陈诚召集各战场主官在北平会商军事，傅作义甚为得意地介绍了其部的作战经验。

(116)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38—639页。

(1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21页。毛泽东曾告聂荣臻等：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其中必有原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军委致聂荣臻、萧克电》，1947年3月12日）。

(118) 《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0月18日。

(119)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1946年6月22日）、《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1946年6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3、292页。

(12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50页。

(121) 《定陶战役作战经过和主要经验》（1946年9月），《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122) 李达：《回顾定陶战役》，《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编：《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23) 据第五绥区副司令胡临聪回忆，赵为黄埔一期毕业（实为二期），又是顾祝同的外甥，本来就骄横跋扈，对绥区抱若有若无态度，私人之间亦少接触，彼此存有隔阂，他接到刘峙的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对他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东明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于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对于其战斗力的影响（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

(124) 《蒋军必败》，《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25) 陈赓部虽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编制，但受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作战行动具有战略单位的独立性。

(12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79页。

(12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1页。

(128)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9页。

(129) 美国曾有派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的动议，此事为国民党所欢迎，但因美国国内因素未能实现。据王世杰所记，蒋介石对司徒雷登“颇不喜其人，以其人无定见徒趋时尚也。惟彼既经正式提出，我照国际习惯亦殊难拒绝”。但司徒上任后，王世杰觉其“态度甚为确定，且可随时纠正马歇尔之性急与狭隘之见，殊出予之意外”（《王世杰日记》1946年7月8日、9月20日）。

(13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186．

(1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7页。

(132)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7，1946，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rat*，*1946*，p．7．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Colorado，198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0页。此前，周恩来通过马歇尔向蒋转达解决时局的办法是，立即无条件停战，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道解决。蒋介石的条件可谓对中共的答复。

(133) 《蒋介石的五条要求绝对不能接受》（1946年8月6日），《周恩

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83—585页；《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致周恩来电》，1946年8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美国调处者在中国特色政治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影响力的有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134)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p．86．《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7—18页。顾维钧认为：这封信意味深长，它表明总统对中国目前局势极为失望，措辞严峻，甚至唐突。他立即将全函译成中文转呈蒋介石。顾维钧其后又告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曾对其谈及美政府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主要内容为：国军虽暂占优势，但难以武力统一，政府方面或望以军事胜利逼共方就范，但此着亦不能得根本解决；中国分裂局面的存在，使美国无法援助，若军事行动继续，徒耗政府实力，益使中国转弱；若政治统一告成，军事停止，美国将立即进行各种助华计划，此计划必有利于政府；如军事扩大范围，美国或须撤退，以免卷入漩涡；国民党乃中国多数大党，与他党合组政府，可无顾虑，只要实行改革，增强民众对政府信仰，对共党问题为釜底抽薪，凡允许共党参加政府者，其共党势力反深减削。顾维钧认为，这种意见与马歇尔回美时与其所谈意见“大致相同”，表明美国不愿中国局势“激成危局。并认为实际情势，惟采此婉转和缓方法，始能扶助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呈蒋主席谓美方盼我下令停战如战事扩大美或自中国撤退电》，1946年9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第217页）。

(13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48-649．

(136)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173-174，176．

(137) 此次禁运最大的影响是，美国拒绝为1.3万发7.92毫米子弹核发对华出口许可（《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21页）。该禁令于1947年5月撤销。国民党对该禁令极为不满，并称这严重影响了其军队的作战能力。但据马歇尔1948年2月20日在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所言，发布禁令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争蔓延至整个华北，并显示美国在调处中国内战时的中立立场，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有足够的弹药供应军队，政府军的失败不能归因于缺乏武器。同时，美国供给中国军用物资和在华基地剩余物资的转让与出售实际并未停止。就在8月30日，中美签订协定，将价值大约为9亿美元的战时过剩物资折价为17500万美元售与中国，其中便包括了不少海空军设备和交通工具等军用物资，结果导致了中共的强烈抗议（*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355-356）。

(138) 《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我如不停战使马歇尔陷于失败则美国舆论逆转于我不利电》（1946年8月14日）、《陈布雷主任对王世杰部长寒电研究之意见》（1946年8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0—211页。其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巴黎告王世杰，马歇尔认为他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意义，对蒋未能压制主战派表示不满。贝氏并要求王转请蒋介石，设法使局势好转。王因而认为，“在对美未有充分谅解，对苏未有应付之准备以前，我政府统筹全局，似仍须力持忍耐，如改组政府，似尤宜尽量容纳党外人士”（《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与美国务卿贝尔纳斯面谈马歇尔续留华合作及对华政策问题并建议力持忍耐电》，1946年8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4页）。

(139) 《蒋主席复杜鲁门总统说明马歇尔调处经过及共党破坏协定攻击国军情形并重申合作态度函》（1946年8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3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9页。杜鲁门接蒋函后，于9月5日复函称：“本人切望政治解决方法，早日完满达成，俾武力纠纷，得以停止，而阁下与贵国人民得从事于重大紧急之建设工作。抑更有进者，本人仍愿贵国政治统一之早日完成，迅速消灭内战蔓延之威胁，能依美国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政策末段所含意义，推进协助中国农业与工业经济复兴计划。”（《驻美大使顾维钧译呈杜鲁门总统复蒋主席函》，1946年9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6页）

(140) 《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72页；《周恩来年谱》，第689页。

(141) 《七个月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8月14日。

(14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0页。

(1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9页。

(144) 《内战严重发展请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1946年9月13日）、《如政府对停战要求确有事实回答我自可回京商谈》（1946年9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43、651页。

(145)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8页。

(146)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2日。

(14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55页。

(1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65、273页。司徒雷登亦认为，目前情况有碍于马歇尔和美国政府的公正立场，马歇尔的退出是他能够体面采取的唯一途径（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7，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20）。

(14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72页。宋子文曾在10月1日向司徒雷登提交非正式备忘录，建议首先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改组国府问题，然后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整编问题，当中共接受军队驻地及移驻日期时即下令停战，这实际仍是以停战为手段逼中共就范，自然得不到中共的回应（《宋子文院长向司徒雷登大使提出之非正式建议备忘录》，1946年10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第219页）。

(15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76—277页；*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309。

(151) 《任弼时年谱》，第528—529页。

(152)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194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04页。

(153)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在关于蒋介石对张家口休战十天的条件的用词表达上，在10月6日马氏致司徒的备忘录上，说是蒋的条件将被“实行”，而在8日马、司两氏的对外声明中又改口说是可以“考虑”蒋的条件。这使周恩来极为不满，因为如果“实行”蒋的条件，“就等于一纸迫降书”，而对外说“考虑”显见有敷衍中共之意。此事使马歇尔更失去了中共的信任（《蒋介石的两条要求是迫我投降的最后通牒》，1946年10月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66页）。

(154) 《关于目前战局及谈判问题》（1946年10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17—518页。周恩来早于8月底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提出：“估计前途，美国可能撤兵而仍暗中助蒋内战，而蒋仍大打，起码要作本年准备，大打中开国大与否，须看情况如何，如此马司调处及执行部已无作用，我应主动提出撤退以准备下一步。”（《美蒋在三个问题上已得到一致意见》，1946年8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35—636页）

(155)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0月17日。

(156) 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袁伟、吴殿尧

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82页。

(157)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8日。

(158)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2日。

(159)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由民主促进会发起，于当年5月5日成立，参加者有各界社会团体53个（后发展到91个），自成立后便一直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160) 《人民政协报》1986年7月8日。

(161) 《民盟代表团致函国民党代表对南京血案提三项意见》（1946年6月2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15页。

(162) 雷洁琼：《血溅金陵忆当年——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北京）第16辑，第34页。

(163)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李闻案调查报告书》，1946年印本，第20—21页。

(164)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第11页。

(165) 《李公朴案感言》、《闻一多案的判决》，《大公报》（上海）1946年7月16日、8月27日。《大公报》在战后对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措施屡有公开批评，以至蒋介石恨之为：“《大公报》言论，几全为共党宣传，已丧失其昔日之公正立场，至为惋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8页）

(166) 《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946年7月22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23页。

(167)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电责蒋介石》（1946年7月18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98—199页。

(168)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国民党当局破坏民盟发表谈话》（1946年7月21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01页。在此两案前后，民盟还遭到国民党一系列打击。5月3日，民盟中常委、西北支部主委杜斌丞担任发行人的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迫停刊，该报顾问、民盟盟员王任竟在4月13日被诬以“烟犯”名而遭枪决。民盟成员、著名教育家李敷仁4月30日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幸未死而辗转逃至延安。8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又在成都参加李闻追悼会后遭特务袭击。

(169) 《民盟发言人为蒋主席八月十四日文告发表谈话》，《梁漱溟先

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民主同盟文献》，第126、146页。

(170) 据时驻大理的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回忆，闻案真凶为云南警总二处（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人，事发后由顾祝同令他派人秘密押至滇西大理看管，他调走时又移交警总（王凌云：《国民党处理闻一多被刺案凶犯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175—176页）。1950年4月，参与闻案的蓝鹏、崔宝山等三人在昆明被处死刑。1951年1月10日，王子民在成都被处死刑。1958年4月26日，最后一名涉案人员、原预备二师谍报队组长蔡云祈在江苏盐城被处死刑（李晓奇：《“杀人者终必覆灭”——暗杀李闻两先生的漏网特务归案记》，《中国青年报》1997年2月14日）。

(171) 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和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等，在上海和平请愿团出发当天，均亲临上海北站秘密指挥行动。参刘晓：《关于“六·二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的一些回顾》，《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6期。

(172) 周扬：《在爱国主义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晋察冀日报》1947年1月20日。沈之曾祖父沈葆桢，为清朝两江总督，其父时任交通部处长。

(173)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同学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告全国同胞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174) 《新民报》1946年12月31日。

(175) 《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

(176) 《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1947年1月1日。

(1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53页。

(178) 《华北日报》1946年12月29日。

(179)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分册，1948年印本，第13页。陈雪屏一言既出，北大学生即贴出斗大告示，上书：“如果是你的妈，你管不管？”北大教授钱端升说：学校里出了一个情报网，说是被奸同学是从延安派来的女同志，逗引美兵制造事件。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文汇报》1947年1月5日；《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

(180) 《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31日。

(181) 《益世报》1946年12月30、31日；《世界日报》1946年12月31

日。

(182) 《世界日报》1947年1月5日。根据中美新约，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已经废除，但因战时同盟国关系需要，根据1943年10月1日公布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在华美军所犯刑事案件，除非美军当局愿意移交中国者，均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中方可以要求美军将处理经过及进行程度随时通知中方。该条例本应于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废止，但中方因美军在华任务未完成，1946年3月3日又予延长一年，至1947年3月期满。故沈案仍由美方审判（《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612页）。1947年1月17日，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沈崇案被告皮尔逊，22日法庭判被告强奸罪名成立，3月3日，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宣布，皮尔逊被开除军籍，处以15年劳役。但皮尔逊被押送回国后，8月11日，美国海军部宣布，原判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皮尔逊宣告无罪并恢复职务。

(183)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北平学委抗暴运动总结》，载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84) 据中共北平学委对反美学潮的总结，此次学潮“使群众运动由防御转入进攻”；“是亲美的传统思想转为反美的运动，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北平学委抗暴运动总结》，《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69页）。

(185)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19-420．

(186) 《平津学生团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宣言》（1947年1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18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52页。

(188) 《为国民大会设想》，《大公报》（上海）1946年10月14日。

(189)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时局发表谈话》，《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41—242页。

(190)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0页。

(191) 《对国民党正在发动和平攻势的斗争策略》（1946年10月14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77页；《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682页。

(192)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07—108页。

(193)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65页。

(194)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5页。梁漱溟认为，国民党的八条，不包括解决东北的军事政治问题，而第三方面提案提出关内外同等对待，即为照顾到中共利益，何况整军之后，军队统一编组驻扎，所谓恢复某日位置即无作用。

(19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48页。因为民盟事先曾对中共表示，将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同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所以周恩来才如此愤怒。

(19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0页。胡霖对于蒋的态度甚为不满，他曾在第三方面集议时表示，“在蒋统治下，绝对无民主可言。假如不是为人民的安全想，我一定主张革命”（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46—147页）。然而在蒋的软硬兼施下，他最终还是参加了国大。

(197) 《陈布雷主任上蒋主席续报告十月三十日政府代表与第三方面人士会谈情形文》，1946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37页。

(198) 《政府代表孙科等六人上蒋主席告第三方面人士态度突变建议邀集中共面商函》（1946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40页。

(199)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9日。

(200) 《周恩来关于目前谈判中心为向第三方面解释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174页。

(201) 《周恩来年谱》，第703页。

(202)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7、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4、121页。国民党拉拢第三方面代表参加国大不自此时始，还在全面内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即开始有意识地拉拢第三方面人士集体或单独参加国大，以壮大国大的门面。陈立夫专门作了黄炎培的工作，希望他单独参加国大，然黄回以：“1．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2．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3．欲我离同盟，我不能自毁人格。”国大开幕后，杜月笙、钱新之、陶希圣还力劝黄参加，雷震则从南京一直追到上海劝说，为黄坚辞（《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27日、11月21、23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3、130

页）。

(20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1页。

(204)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23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0页。

(205) 因为国大开幕当日，民社党代表及若干其他代表尚未报到，故代表人数非最后人数。此次国大最终公布代表数为1745人，出席代表为1701人。

(206)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词》（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特辑》，东方出版社1947年版，第3页。

(207) 《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话记录内容摘要》（1946年11月10日）、《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延缓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谈话摘要》（1946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43、250页。

(208)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209)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0页。

(210)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秘书处紧急通告》（1946年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46页。

(211)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26日。

(212) 在国大开幕前夕第三方面最后的调停中，青年党的李璜也强调遵守政协，决不单独提交名单，被认为“表现得很好，各方面都甚称赞他”（《范朴斋致鲜特生》，1946年11月2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2页）。但青年党内主张参加者居多，尤以曾琦态度更接近于国民党，李璜最后也不能不随了大流，但他本人实际并未出席国大会议。

(213)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16日。青年党的陈启天私下曾对黄炎培说：青年党陷于十六字中，即内外夹攻，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啼笑皆非（《黄炎培日记》，1946年11月12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8页）。可见青年党在参加国大时的矛盾心理。

(214) 《中国党派》，第45页。后由于民社党内的斡旋，张等未退出民社党，但在次年1月的民盟二中全会上，张东荪当选民盟秘书主任，叶笃义当

选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社党以两人违反党纪，决议停止其党籍，实际等于变相开除。

(215) 此据范朴斋致张澜函中所言。然据蒋匀田言，民社党参加国大，“乃参加组成民社党的海外民宪党所促成。他们缘于渴望中国变成立宪政府多年，所以不愿放弃此一机会，因此敦促君劢先生同意参加。此一历史性的真情，逼得君劢先生无可如何，乃允予在求得保证通过政协宪草条件下参加”（《范朴斋致张澜》，1946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26页；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30页）。

(216)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7、9、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4、117、123页。

(217)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0—761页。

(218) 民社党内有人认为，对于参加国大与入阁等问题，“君劢先生似举棋不定，俯仰随人，其实不然，君劢先生早已拿定主义，一步一步进去，但不肯坦白说出，不曾开诚布公，与各常委磋商，遂至闹出无限纠纷”（卢毅安：《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之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41—142页）。民社党革新派其后称，“参加国大的前夕，张氏还口口声声主张不参加，而中常会讨论的时候，九个常委除了蒋匀田外，也都不主张参加，但他突然来了个相反的决定，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委员会告全国同仁书》，1947年8月，《中国民主社会党》，第415页）。

(219) 《张君劢关于参加“国大”问题与蒋介石往来函》（1946年11月），《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36—339页。王世杰认为，“实际上彼等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唯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17日）。

(220) 《张君劢关于参加“国大”的谈话》（1946年11月23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39页。张君劢事前与张群、王世杰等有数次商谈，告他个人将不参加国大，“以留彼与中共及民盟分子接触之余地”。结果蒋介石“答以既然如此，不必再勉强”（《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22日；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70页）。

(221)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9页。

(222) 据雷震回忆：张君劢对他说，“‘蒋中正是过河拆桥的人，有求于你的时候，可以满口应允，等到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完全无视对方的人格’。所以他就不愿意参加国民大会来共同制宪，他对蒋中正守法的精神

则是十分怀疑的”（雷震：《制宪述要》，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7页）。

(223) 因为签名信的问题，张君劢认为民盟与中共过于接近，因此对罗隆基说：“开除也好，退出也好，民盟跟着共产党走，我本来不想再搞了。”（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82页）

(224) 张君劢决定参加国大之后，对罗隆基说过一段心里话：“这一伙人跟着我这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大会要开了，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我还能够要他们老饿着肚皮跟着我吗？国民党是国库养党。我有什么法子养这批党员？让他们去搞吧，我是不参加的。”（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82页）因为张君劢的态度，中共当时对他也留有余地。周恩来在离开南京前给郭沫若夫妇的信中写道：“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东望沪滨　不胜依依——致郭沫若、于立群》，1946年11月17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225)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5页。

(226)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第119页。

(227) 《文汇报》1946年12月24日。

(228) 《国民大会开幕　特致两点希望》，《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15日。

(229) 秦孝仪主编：《实施宪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275页。

(230) 《蒋主席演说》（1946年11月28日），《国民大会特辑》，第21页。

(231)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0页。

(232) 《一个可怕的观念》，《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20日。

(233) 戴文葆：《国民大会、直接民权与五权分立》，《大公报》（上海）1946年12月15、16日。

(234) 常乃悳：《宪法问题的我见》，《中华时报》1946年12月13日。

(235) 雷震：《制宪述要》，第16页。

(236) 《本党对国民大会和宪法问题应有的态度》（1946年11月25日）、《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59—461、484—485页。

(237)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27-428．

(238) 《王世杰日记》1946年12月4日。

(239)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1946年印本，第10、31、98页。国都问题自抗战胜利后便有议论，1946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曾通过议案，要求定都北平。

(240) “紧急事变”字样为五五宪草所有，在非国民党籍代表坚持下，综合小组审查时认为，“此四字意义过于广泛，不宜增加”（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12页）。

(241) 非国民党籍代表认为，“若将出席两字改为全体，则复议难于成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规定亦不易实现”。孙科也认为，如照审查委员会的决议，只要行政院能控制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复议程序便无从进行，凡行政院所不愿执行的法案，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置之高阁，必将给行政院控制立法院开方便之门（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13页；孙科：《新宪法与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特辑》，第184页）。

(242)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会议纪录》下册，1946年印本，第25、27、28、31、36、44、47页。

(243) 《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89页。

(244) 首都问题虽经综合审查委员会改为北平，但24日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出，宪草内可不必规定首都地点，最后通过的宪法因而删去首都一条，使国民党免去了因宪法通过而不得不行迁都一举。

(245) 王世杰认为，“依照宪法草案之规定，立法院或将经常集会，能不断的干涉行政。此一机关之人数如超过四百人，将使行政与立法频频陷于争执纷扰之状态而不易平息。但依此次审查会通过之条文，则立法院之名额可达六七百人。故予深虑此项规定为使民主在我国再度失败之一大因素”。从“行宪”后的立法院工作看，王的担心不无事实根据（《王世杰日记》1946年12月21日）。

(246) 《国民大会特辑》，第165—177页。

(247) 《蒋主席演说》（1946年11月28日），《国民大会特辑》，第22页。

(248) 蒋的笔杆子陈布雷曾对左右说："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问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令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陈布雷》，《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67页）

(249) 关于宪法临时条款，见本书第十二卷有关章节。

(250) 参王宠惠、孙科、彭学沛文，《国民大会特辑》，第180—185页。

(251) 《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上、下）、《国民大会闭幕了》，《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23、24日，12月26日。《大公报》在会议期间多次发文鼓吹政协宪草，并批评宪法以三民主义为国家基础，认为"中国现状是多党并存，贫富悬殊，人民的利害及意见纷歧不一。如此现状，以一党主义冠诸国体，是不切实的。强制人民接受这个国体，不仅欺人自欺，或且将贻纷扰于无穷"。结果遭到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为"开倒车，实为一种反动企图"（《关于宪草第一条》，《大公报》（上海）1946年12月18日；叶青：《驳大公报"关于宪草第一条"》，《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2月21日）。

(252)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688；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171．据国民党搜集的国外舆论反应，"国民大会召开时，各国舆论初期对我之批评，颇多不利，嗣后因青年党、民社党，暨社会贤达踊跃参加，复以会场内充分表现民主精神，国际遂以另眼相看。更益以主席恳切之演讲，及保证宪法通过之坚决，尤得国际舆论之赞扬。新宪法通过后，因大部原则系依据政协决议，除极少数之左倾报纸继续吹毛求疵，攻讦本党及政府外，其他各报咸一致称赞，尤以美国霍华德及赫斯特两系报纸，更多推崇之辞"（《谷正鼎秘书长上蒋总裁有关国际对我新宪法之评论呈》，1947年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39页）。然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随着宪法通过后国民党继续垄断权力，国外舆论的批评也日渐增强。

(253)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3页。

(254) 《弄真成假——评蒋介石"国大"的闭幕》，《解放日报》1946年12月28日。

(255) 《中国民主同盟对于片面宪法发表声明》（1946年12月31日），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9页。与民盟靠近的党派，如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亦声明反对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

(256)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第76—77页。

(257)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92．

(258) 《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延缓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谈话摘要》（1946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52页。

(259)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22．

(26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05-407．

(261)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694．

(262) 《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85—486页。

(263)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12．

(26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210-213．

(265) 《王世杰日记》1947年1月7日。

(266)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86—688．虽然马氏在这个声明中对国民党有所批评，但美国对国民党政策的基点并未变化。马氏离开中国前，与司徒雷登讨论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司徒建议可以有三种选择，即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并促其改革，不作有力行动一切等着看，完全退出中国内部事务。司徒建议采取第一种方法，马歇尔原则同意，这实际是马氏来华之前就已确定了的（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p．178-179）。

(26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63页；《评马歇尔离华声明》（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21—723页。

(268) 据对美国人有深切认识的顾维钧分析，蒋介石和马歇尔曾多次争论，有时甚至不欢而散，原因是两人都个性极强，如果他们能够合作，那倒真是奇迹了。但马氏在杜鲁门心目中公正、可靠而忠实，他在中国调处的失败，将会影响到他本人、杜鲁门以及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此蒋介石担心马氏出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对国民党不利（《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9—40页）。

(269) 美方在7月间提出山东王耀武和陈毅、山西阎锡山和贺龙、热河石觉和李运昌、中原程潜和李先念、东北杜聿明和林彪进行直接会谈，但对会议具体内容无所规定，中共因而认为此举只有宣传意义，甚而有诱禁共方高级将领之意图，因而除山西阎、贺代表进行会谈但无结果外，其他会谈均未举行。至于在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显然对正在向前推进的国方军队有利，因而中共坚持应恢复1月13日之位置。

(270)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2页。

(271) 辛冠五由高密乘火车返回解放区途中，被暂编第十二师赵保原部绑架遇害，后因赵在胶东作战中身亡，国方借口调查无法进行，此案遂告悬置。雷奋强自晏城至济南途中不幸中弹身亡，郭子祺因未经通知即赴修武调查中弹身亡，中共认为此两案皆属“偶然”及“误会”，国民党则利用来大作文章，并在新乡扣押了第十小组共方代表黄镇。直到10月底，双方达成协议，共方同意支付郭家属抚恤费二千万元并向执行部书面致歉，国方同意将黄镇送回。雷奋强案亦以共方支付抚恤费方式解决，国方承认此为偶然事件。

(272)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4—65页：《执行部和小组之中中共人员在政府区安全与自由应该得到保证》（1946年8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26—627页。

(273) 《蒋主席令李宗仁主任从速处理美军在平津道上被共军袭击事件电》（1946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01页。李宗仁回电称，前“经迭次派员洽商，如后在国军警卫区以外行动，请事先通知我方，以便协助。但美军当局不肯照办，以致保护难期周密”（《李宗仁主任呈蒋主席报告调查美军被共军袭击经过及善后处置电》，1946年8月1日，同前，第202页）。

(274) 《安平事件应该进行调查》（1946年8月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5页。

(275)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7页。

(276) 《司徒雷登大使为遣送各方人员事呈蒋主席备忘录译文》（1947年2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72页。

(277) 蒋介石的表示不过是争取美国人和舆论而已，因为在12月1日，蒋会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时，蒋坚信中共的军事力量将在9到10个月的时间里被粉碎。一周之后，蒋将军事解决的时间提前到了6个月（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2，21，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p．46-47，53）。

(27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5页。此前，民社党已经提出类似建议，“即日恢复国共两党的和议，政府当局应派员前往延安或邀请中共首脑来京，商讨一切”；“由国共谈判中求得基础后，扩大为全国党派会议，各民主有力团体，亦应邀其参加，共商一切政治问题，以奠定法治基础”（《中国民主社会党对目前时局意见》，1946年12月31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296页）。

(279)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月21日。

(280) 《解散非法国大　谈判仍可重开——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946年12月3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63页。

(281) 《中央关于对美蒋恢复和谈阴谋所采方针给董必武的指示》（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88页。

(28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63页。

(283) 《解放日报》1947年1月26日。

(284)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6—200页；《谈判使党赢得了人心》（1946年11月2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95—699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6页。

(285) 《任弼时年谱》，第533页。

(286)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7页。

(287)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7页。

(288)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1947年2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0—221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65页；《周恩来年谱》第718页；《朱德年谱》，第292—293页。

(289)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290) 王世杰认为，中共此一声明“使蒋先生痛矣”，因此“不欲允其留人在京沪”（《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8日）。

(291) 《周恩来年谱》，第709页；《中共中央关于京沪渝联络机关坚持非赶不走方针给董必武等指示》（1947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迫我撤离之对策给董必武等指示》（1947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

(292)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3月1日。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最终撤退日期推迟了两天。

(293) 《大公报》（上海）1947年3月3日。

(294) 《撤离南京时的书面讲话》（1947年3月7日），《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中共人员自京沪渝三地撤退之后，唯一还留在国统区的中共公开人员是办理战后救济工作的解放区救济总会人员，分驻上海、天津和开封三地。1947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停止在华工作，所有中共人员于12月撤离国统区。

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一　从苏北到山东

华东地区一直是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点所在。到1946年底，国民党军将华东中共军队主力从苏皖压到了山东，国民党因此认为中共部队实力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企图在山东与中共部队决战，华东主战场因此而由苏皖转入山东。

国民党军队虽在宿北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但在苏北战场仍居有兵力优势，同时在鲁南的四个师则直接威胁中共山东根据地的中心临沂。中共方面对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陈毅、粟裕等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在苏北沭阳打整七十四师，但不易割歼；二是出击淮北，创造运动歼敌之机，但须有时间准备；三是回师鲁南，此地国民党军系统不一[(1)]，间隙较大，有利割歼，但须将我主力长途北调山东。虽然中共部队在苏北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毕竟国民党军队已占据苏北大半地盘，而山东为中共长期根据地，后方条件较好，有利内线作战，因而此时的主客观形势都要求中共部队转入山东，陈毅等提出的第三方案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在为中共军委代拟的电文中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2)]

国民党军在鲁南的四个师自1946年12月中奉命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已进至向城一带，离临沂不过几十里路程，“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后撤一步，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3)]。陈毅等抓住这一机会，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一纵和第八、九、十师，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共27个团的兵力，围歼整二十六师，同时苏北部队适时北撤，集中山东。中共部队作战部署的这一改变，并未引起其对手的警惕，从而相应改变其部署。

1947年1月2日晚，山东野战军突然出现于向城、傅山口、卞庄地区，包围了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事先毫无察觉，元旦那天正在峄县后方欣赏京剧《风波亭》。结果风波来时，前方部队群龙无首，又无增援，只能决定于4日突围。但突围之日“天忽大雨，道路泥滑，人马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4)]。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无法发挥作用，两部于突围当日下午被全歼。蒋介石在得知整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失利的消息后，认为“此乃徐州绥署指挥错误，对战车重炮皆置于最前方突出部分，且其时甚久，此无异以精械贻敌”[(5)]。

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山野原计划打冯治安部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冯部原已奉令增援整二十六师，但为保存实力，进展极为迟缓，此时更迅速收缩至运河南岸固守。山野遂改变计划，于9日起分头攻击国民党军据守的孤立据点峄县、枣庄，11日占领峄县，俘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20日占领枣庄，歼整五十一师全部，俘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结束，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被歼。在近二十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没有作出有力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令人莫明所以。

国民党军虽在鲁南又遭损失，但其统帅部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经移至山东，符合其原先作战设想，因此策划发起鲁南会战。蒋介石判

断，“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他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万不可以一隅之得失，而置根本计划于不顾……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6] 参谋总长陈诚认为，经过上年的作战，政府军已获“莫大之成功”，华东中共部队“大势已去，不得不作困兽之斗”，而鲁南“为主要战场所在地，同时更为匪我决战所关”[7]，为此，他亲临济南，策划鲁南会战。他命令将攻击部队编为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为主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十一、二十五、五十九、六十四、七十四、七十七、八十三师和第七军，由陇海路沿沂河、沭河分三路直指中共华东区的中心所在地临沂；北兵团为助攻兵团，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十二、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断中共部队后路。整个战役部署是南北对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8]。1月30日，国防部决定鲁南会战计划，2月初，蒋介石亲至徐州、郑州部署，“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9]。此时徐州绥署下辖四个绥靖区，24个整编师，7个军（20个师）及特种部队，总兵力达八十余万人，实为国民党军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1月中旬，中共部队放弃在苏北的最后一座县城沭阳，原在苏北的部队大部撤至山东，酝酿已久的中共华中与山东两支部队的合并在2月初最后完成。2月3日，中共华东野战部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所辖部队编为十一个纵队（野司直接指挥九个纵队）及一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指挥，部队数量和战斗力有了较大增长，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中共中央在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即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吸引对手北上到适当地区，然后歼灭最

为有利，“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10]。因此国共两军可谓都有了在山东打大仗的心理与物质准备。

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命第十号，各部开始行动。或许是吸取了几次失利的教训，南线十余万兵力在宽不过几十里的战线上，以密集平推方式缓慢推进，而且稍遇阻击便停止不前，七天才走了不到七十里，且各部互相观望，都不愿过于突出，行动非常谨慎。绥署的作命特别规定：“如匪集中全力向我某一纵队猛犯时，则其他纵队除以一部向原任务迈进外，应以主力策应该纵队之作战。”[11] 而北线国民党军未遭败绩，表现冒进，2月1日开始行动，4日便到达莱芜，8日，整四十六师已前出至新泰，三个军（师）的兵力沿莱芜、新泰公路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且脱离了胶济路后方。按国民党统帅部原计划，北线为助攻，但在南线主攻部队迟疑不进的情况下，北线助攻部队过于突出，已经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已经有了准备[12]。根据情报，1月底中共中央指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13] 华野最初的设想是在南线诱敌深入，争取歼其一路，为此采取了种种手段逼其突出一路。但因欧震所部行动谨慎，没有暴露明显弱点，2月4日，陈毅和粟裕报告中共中央，南线各路“进攻之敌前进甚为稳重”，“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14]。他们提出三个作战方案，重点放在转兵北线、先打弱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据此，2月10日，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布命令：南线“尚未获歼敌良机，局部战斗虽能获胜，亦难获得彻底解决整个战局问题，经我们研究后目前战局，以先解决李仙洲所部然后肃清胶济线之王耀武部，再全力南下歼灭南线之敌较为有利”[15]。根据这个命令，华野集中在山东的全部主力投入此次作战，其中一、四、六、

七纵自临沂北上围歼李仙洲部（另加由胶济路南下的八、九、十纵），二、三纵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在南线担任牵制任务。2月10日，参战部队秘密撤离临沂，以急行军速度北上[16]。由于华野严格保密，并部署了一系列佯动（临沂外围伪装主力节节抗击，在运河上架桥，筹集渡船等），国民党方面一时难以判断华野的真实企图，作战部署难免失误。

2月9日，徐州绥署发出第十二号作命，令南线各部于10日起“向临沂及其以西地区攻击前进，诱致匪主力于当面一举歼灭之”[17]。由于华野主力已转兵北上，南线部队佯作抵抗后即行撤离，国民党南线部队于15日占领临沂。蒋介石对此颇为得意，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国军占领临沂以后，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对于外传中共是主动撤退的说法，蒋不屑一顾，声称“他们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18]。然而南线部队未经大战便占领临沂的情形，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起了疑心，他得到中共部队正在北移的情报，遂判断“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19]，因此急令李仙洲部收缩。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判断与王耀武正相反，他们以为中共部队是“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有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因此命令王耀武执行原南北夹击之作战方案，“勿使其继续北窜”，并派飞机向李部空投命令，严令其回防，否则以抗命论处[20]。本来李仙洲在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已于16日开始将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后撤颜庄，七十三军自颜庄后撤莱芜，十二军自莱芜后撤胶济路，次日又因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的严令，各部重回原地。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中共大部队已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批准命李部火速后撤。但就是这两天的动摇与延误，注定了李仙洲部的覆灭命运。

华野主力北上后，虽然其对手的行动反复变化，华野部署也随之

变化，但歼灭李仙洲部的决心不为所动。2月20日，华野首先以八、九纵在莱芜北设伏，歼灭了由博山南下莱芜归建的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又以六纵攻吐丝口，封闭李部向北退路；以十纵阻击莱芜西北可能来的增援。此时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北撤，且战且走，21日到达莱芜南，而莱芜城外各要点多已为华野占领。南线欧震兵团自占领临沂后，因对华野动向判断不明，迟迟未有行动，距李部尚有相当距离。王耀武认为，李部孤守莱芜，粮弹缺乏，援军无望，因此下令李部突围，先至吐丝口与新三十六师会合。莱芜至吐丝口不过二十余里路程，王耀武认为“以如此强大力量，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之战斗前进，绝未料其失败”[21]。但李仙洲属下的两个军（师）互有矛盾，李本人既非军事长才，又无与中共作战的经验，突围不过无奈之举，注定很难成功。还有一个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使得李部注定难逃覆灭命运。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与周恩来早有联系，上年11月调往山东前，韩在南京曾受董必武交待与华野联系的办法。战役开始前，韩与华野建立了联系，并透露了己方的行动部署。战役开始后，整四十六师因韩之拖延而行动迟缓，及至李仙洲接令突围，韩坚持准备不及而要求将突围时间自22日延至23日，使李部进一步陷于不利境地[22]。

23日晨，李仙洲部开始突围行动。临行前，韩练成不知去向，此时李仙洲尚不知韩已在中共安排下离队出走，他以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并列行动，因突围心切，出莱芜城后即径行向北，未派有力部队占领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一部留守莱芜以为支持，而华野已派一、七纵在左，四、八纵在右，六纵在北既定阵地设伏。李部后尾刚刚脱离莱芜，华野便占领莱芜城，断李部回城之路，预伏各部发起有力攻击，李部全军陷入重围[23]。因北撤队列位于一狭长地段，正面宽不过几公里，机动空间有限，无法展开，李部被迫向内收缩，互相拥挤，队形大乱，已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整四十六师因韩练成离队，全军失去指挥，在中共部队打击下，迅速崩溃解体，并直接影响了七十三军的队形与士气。四万人的部队，不过四个小时即遭全

歼，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24]。当晚，驻守吐丝口的十二军新三十六师弃城而走，又遭华野九纵伏击，大部被歼。华野乘胜占领博山、张店等地，再次切断胶济路。

奇怪的是，就在国民党统帅部严令北线各部不得后退之时，南线欧震兵团在占领临沂后，却在原地停止不动，徘徊近十日之久。既然判断华野主力向北“溃退”，正应令欧兵团从速北上，以实现南北夹击之原定计划，而且也不至于使北线李仙洲部其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25]。1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与薛岳，望吸取以往之教训，“务希激励所部积极扫荡，以为一劳永逸之计”[26]，但直到23日，李仙洲部被歼当天，徐州绥署才发出第十三号作命，以一部“监视临沂以北山地之匪”，主力向临沂西北费县、曲阜、汶上、东平“进剿，会师兖泰，将匪压迫于黄河右岸而歼灭之”。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国民党之想当然于此可见[27]。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在四天内损失七个师（旅），五万余人，开其大兵团被歼之例，为内战开始以来之空前失败，王耀武自认为“不仅损失重大，使党国蒙忧，而本部一年来在鲁省艰苦奋斗所开创之新局面亦悉告破产，每一回忆实有无限之沉痛与惭愧”[28]。此次战役，连同先前之鲁南（峄枣）战役，使国民党军在鲁南的攻势顿挫，被国民党战史称为“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29]。在战后总结中，陈诚认为：“匪以轻装，我以重装，面大线长，消极防守，未有不败。”王耀武认为：“此次南进兵团之失败，为战场上诸种错误之总和。本部在奉令向新泰进出之前，已深感态势不利，既进出新泰之后，尤觉兵力分散过于突出，随时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共军放弃临沂后，本部即已判断共军必打击我南进兵团，以挽回其颓势，故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层峰因有整个计划，始终未能采纳。”结果，国民党军“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30]。

莱芜之败，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他在日记中写道：“莱芜所造成之最大损失，实为国军无上之耻辱……本月下旬，实为军事最危急之时期也。”[31] 2月24日，他亲飞济南部署善后。他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王耀武说：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32]。在追究失利责任时，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成了替罪羊。3月3日，国民党统帅部下令撤销徐州与郑州两个绥署，设立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和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阵徐州，统一指挥华东战事。此举实际是将陆军总部搬到了徐州，由此也可见国民党对华东战场的重视。然而顾祝同其人并非大将之才，守成有余，进取不够，即在国民党内亦被评为“太无军事天才”，“军事上之庸才耳”[33]，很难期望他能够改变华东战局。中共得知国民党换将的消息后，评论为：“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34] 果不其然，不出三个月，国民党军便在山东遭受了又一次惨重的失败。

二　重点进攻的展开

战争进行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在各战场的进攻已由盛而衰。在晋冀鲁豫战场，1946年12月，国民党以王仲廉的整二十六军和王敬久的整二十七军发起冀南攻势，1947年1月初占领大名和临漳，逼近邯郸。晋冀鲁豫野战军转而出击鲁西南，发起巨金鱼战役，20天内收复县城九座，迫使国民党军自冀南回援。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局部反攻，先以五个纵队出击豫皖边陇海路两侧地区，接着又于3月下旬到5月下旬在豫北发动攻势，收复了豫北大片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陈赓部，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也在晋南地区先后发起

多次攻势。国民党军在豫北和晋南被迫收缩到安阳、新乡、临汾、运城等少数孤立据点。

在华北战场，国民党军于攻占张家口之后，自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4次南进攻击易县，企图占领中共整个晋察冀区，但遇到了中共晋察冀部队的有力反击，进攻受挫。5月，中共晋察冀部队重组野战军，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在此前后，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攻占了冀晋两省交界处的要点娘子关，控制了正太路大半；占领沧县、徐水，切断津浦路天津至济南段和平汉路北平至保定段。

经过大半年的作战，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若干中共根据地，但远未达成其战略构想，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也在逐渐显现，高层已有这样的议论，“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35]。因此，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对未来的进攻计划重作检讨。1946年11月15日，陈诚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已经提出：“为争取主动计，我应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分区扫荡原则。先肃清苏北、鲁南地区，再准备解决刘伯承匪部主力，进一步再准备对刘伯承、聂荣臻两股匪军联合之作战。”18日到19日，陈诚在北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华东的顾祝同、王耀武，华北的李宗仁、孙连仲、傅作义，东北的熊式辉等。与会者多提到集中兵力、打击中共主力的问题，陈诚总结为四点：兵力转用免化众为寡，与空军密切协同，发挥特种兵效用，各战区协力[36]。1947年初，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遂使主战场之陇海方面，无法集注绝对优势及精锐之部队，以致进展迟缓”；“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37]。在军官训练团的讨论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总结军

事失利的原因时也认为，政府军“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迅速以围歼匪之主力不计其他点线得失”，“要点要线应施以据点工事，以节约兵力而固守，得以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38]。即便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39] 这些情况说明，国民党统帅部此时也认识到全面进攻在兵力调度上的困难和战略上的不利，而考虑对作战战略作出一定调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的进攻已呈疲态，蒋介石决定改行重点进攻计划。他的设想是：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凡是匪军的老巢，尤其是他的制弹厂和粮秣、弹药的集中地，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根据这个设想，蒋将作战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两地。前者是企图捕捉中共主力进行决战，或者至少将中共部队压过黄河再行歼灭；后者是企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使中共陷于群龙无首之境。而在这两个战场中，蒋更注重山东战场。他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

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40]。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基本计划是：

一、西北第一战区及徐州绥署同为本反击作战之主攻，分别于西安、徐州地区，向北发起攻势。

（一）第一战区为西翼主攻，首先反击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战志，削弱其对外声势，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连系第二、第十二战区，续向北平亘石门之线进击，会合徐州绥署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于晋、冀、豫、鲁边区地带。

（二）徐州绥署为东翼主攻，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陈毅主力，控领山东，截断共军来自东北之外援。尔后再北渡黄河，除以主力继续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地区外，另以一部左旋，于石门附近地区会合第一战区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肃清关内共军。

二、郑州绥署应与华东、西北战场切取联系，以有限攻势，拘束刘伯承部，并准备于后期作战中，协同友军，围歼共军于晋、冀、豫、鲁边区。

三、第十一战区（北平）确保冀境要点、要线，对当面聂荣臻部，相机发起攻势，策应主攻作战。

四、第十二战区（归绥）及第二战区（太原）准备协同第一战区在晋、冀之作战。

五、东北保安司令部暂采战略持久，以待国军主力移师关外后，随同转移攻势，彻底歼灭共军，规复东北[41]。

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自1947年3月开始，以山东和陕北为中心

战场，尤以山东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战斗规模最大。蒋介石一直重视山东在战略上的地位，在军事部署上强调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因为山东地当要冲，交通便利，便于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决战。他认为只要消灭了山东境内中共军队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中共部队也就容易肃清了。蒋此时虽仍强调作战目标为收复据点，控制交通线，但在方法上则提出集中兵力，增加部队机动性的问题。山东战场的大规模战斗因此而展开。

莱芜之败，负责国民党政府军全盘作战指挥的陈诚实不甘心，对于山东攻势，他下了绝大的赌注，集中了原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的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将其编组为三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指挥整编第二十五、二十八、五十七、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师，以临沂为中心，加强据点工事，准备尔后向北推进；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以主力自宁阳、汶上东进，逐次攻击大汶口、泰安等要地；第三兵团司令欧震指挥第七军及整编第十一、四十八、六十四师，自兖州进出曲阜、邹县地区，并续向新泰、蒙阴地区攻击；三路互相协力，构成一个半月形攻击态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指挥第八、十二、五十四、七十三、九十六军，第三绥区司令冯治安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师，徐兖绥区司令李玉堂指挥整编第二十师，担任守备、牵制任务，整编第九师为总预备队，全部兵力达到24个军（师）45万人。作战基本目标是“迫匪于蒙山与沂山地区，与我决战，抑或迫匪放弃沂蒙山区老巢，向胶济路以北、东北地区退缩，以利我尔后之围剿”[(42)]。由于以往作战经常由于缺乏协同而被各个击破，此次攻击部队编组为兵团，强调统一指挥和行动，基本战法则改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纵深配备与兵力密度，最重要的变化是，此次战役目标强调的是寻找中共主力决战，而不再如以往着重于点的占领。

4月1日，国民党军各部全面行动，当天占领泰安，随后打通了津

浦路济南至兖州段和临沂兖州公路。不久，徐州司令部发现中共华野部队由鲁中向南运动，遂调整部署，令第一兵团向临沂收缩，调第三兵团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东援，加强第一兵团，同时以第二、三兵团东进威胁华野侧后方。此举虽使华野打击第一兵团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同时却使泰安陷于孤立。华野遂拟订泰蒙战役计划，集中了三个纵队，十纵于22日围攻泰安，一、三纵预备打援，希望以此调动国民党驻大汶口的两个师北上而歼之。对于前方将领的谨慎，蒋介石颇不以为然，他训斥顾祝同、汤恩伯等：敌人退了你不知，自己又无计划，不知打什么仗，令其尽速行动[43]。在蒋的命令下，顾祝同决定置泰安于不顾，各部按原计划行动。26日泰安被华野攻占，整七十二师被歼，但向华野正面进攻的汤恩伯、王敬久兵团仍无大的进展，只有欧震兵团经过激战，于28日攻占蒙阴，30日占领新泰。

自国民党发起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华东野战军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打破此次进攻。但此次对手表现非常谨慎，大军麇集一团，稳扎稳打，不以一地之失而变更计划，而华野“耐心持重不够，战役企图过大，兵力不够集中，因而几次决心都未能实现”[44]。陈毅、粟裕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蒋、陈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重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45]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46] 华野遂将部队集结待机，同时采取各种行动，调动、迷惑对手，等待并创造作战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

国民党军在经过一段巩固调整后，得到情报称华野“损失甚重，刻已北窜”。5月3日，蒋介石飞徐州、济南，部署新的攻势，令汤恩伯兵团自正面北进，欧震兵团和王敬久兵团自西向东推进。顾祝同于

10日下令各部开始行动，重点放在汤恩伯第一兵团，令其进至莒县、沂水、坦埠一线[47]。第一兵团自此次进攻开始后，行动较他部更为谨慎[48]，此时汤恩伯也认为当面中共主力部队已北撤，遂令所部于11日自临蒙公路上的垛庄，经孟良崮北进，“先行攻略坦埠，尔后，与友军协同，求匪主力而歼灭之”[49]。攻击部队以整七十四师为中心，其左翼为整二十五、六十五师，右翼为整八十三、四十八师及第七军，整个部署成一弧形。行动开始后，由于整七十四师比其他部队速度稍快，12日已进至坦埠南，独立展开攻击，处于弧顶的位置，而且与两翼拉开了一段距离。

国民党军队的动向立即为中共抓住。陈毅、粟裕原准备先打右翼桂系第七军，情况变化后，他们认为整七十四师态势突出，又正处华野主力当面，便于分割歼灭。虽然该部战斗力较强，且四周国民党大军云集，一旦形成胶着于华野极不利，但陈、粟仍定下了打整七十四师的决心。陈毅豪迈地说：打整七十四师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5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粟裕，指示根据情况选其一路打之，“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50]。此战的关键，一是将整七十四师从国民党进攻部队中割裂出来并迅速歼灭之，使国民党其他部队不及增援；二是在国民党大军环伺下，能否阻止其增援。陈、粟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一、八纵自左右插入，割裂整七十四师与他部的联系，六纵封闭其退路，四、九纵正面进攻，二、三、七、十纵负责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华野以五个纵队对付整七十四师，兵力上居于优势。何况自内战爆发后，整七十四师占两淮，攻涟水，与华野几次交手都占了便宜，华野上下“久已抱有同第七十四师决一死战的夙愿，可以说是完全达到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灭此朝食的气概”[51]。此役华野一改先打弱敌的传统战法，舍弱取强，充分表明了中共部队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我们几次定下决心和变更决心，而最后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捕歼位于敌军密集队形中央的‘王牌’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地区，是很不容

易的。充分体现了歼敌决心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52]

5月13日，华野第一、八纵队分向整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运动，但国民党此时尚未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参谋本部方面判断，在汤兵团进至沂水后，中共部队有攻其右翼可能，但并未料到中共部队会强行楔入汤兵团的当面中心[53]。因此，蒋介石于当日决定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令汤恩伯部占莒县、沂水，欧震部占南麻，王敬久部占淄川、博山，“达成包围歼灭淄博山地共匪之目的”[54]。汤恩伯即令整七十四师于14日攻占坦埠。但实际情况完全不似国民党的判断。次日，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华野部队续向己部两翼运动，有封闭己部退路的征兆，而左翼整二十五师一〇八旅和右翼整八十三师十九旅已在华野打击下放弃界牌、桃花山要点后撤[55]，己部已陷于孤立。正面华野部队又发起猛烈攻击，张灵甫“乃确信解放军有积极企图，已成包围我师之态势，乃决心撤退”，立即向后收缩[56]。但又一次出乎张灵甫的意料，华野在鲁南埋下的伏兵六纵昼夜兼程，两天走了二百余里赶到战场，15日拂晓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张灵甫遂决定全师退踞孟良崮固守待援，他以为如此可以居高临下，态势有利，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

整七十四师被围后，起初张灵甫“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又以“顾虑战责及上级指定勿退”，因此指挥所部顽强抵抗。“战斗空前激烈，官兵伤亡重大，骡马、非战斗人员多漫山遍野，通讯机构时断时续，已成混乱状态；且因石地无法构筑工事，伤亡特大，而伤兵又无法护运，呻吟不绝，士气影响很大”[57]。此役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缺乏灵活死守教条的错误。据其作战详报载，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将全军挤在一处，又盲目相信高地的优势，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

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58]。经15日一天战斗，整七十四师阵地“人马纷杂，混乱不堪”，大部已失去抵抗能力。

整七十四师被围，国民党统帅部认为是决战之机，企图以整七十四师吸引华野，调各部援军对华野实行反包围，与华野决战。汤恩伯致电张灵甫，称此“实难得之歼匪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并以一部占领垛庄，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59]。他令驻桃墟的整二十五师，驻青驼寺的整八十三师，驻汤头的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驻蒙阴的整六十五师，同时王敬久令驻新泰的整十一师向孟良崮增援。这些部队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它们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在孟良崮外围还有第五军和整六十四、二十、九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然而事实证明了国民党军指挥系统不一，缺乏协同精神，行动迟缓，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一方面在15日晚给张灵甫去电，为其打气：“目前战局，贵师处境最苦，而关系最重，本日空军全力来助，黄（百韬）、李（天霞）两师并王凌云师即向东出击，只要贵军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亦即贵师极大之功，希必转告全体将士，一致坚毅奋斗，以达成此伟大任务。”[60]另一方面，他在16日电令各部增援时已近于恳求：“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61]然而两天时间里，各部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及至整七十四师被消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十里开外的界牌。从而也印证了张灵甫在战役开始前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所言：“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

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62]

5月16日，华野对孟良崮发起总攻，至下午5时，全歼整七十四师三个旅3.2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以下高级军官多人，自己损失1.2万余人[63]。此时蒋介石尚存决战之念，16日手令各部：“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之惟一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各向当面之匪猛攻……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使匪军漏网逃脱者，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顾祝同因此命令“集中主力围歼匪军于蒙阴以东汶河畔”[64]。除了第一兵团继续向北进攻外，顾还令欧震进驻新泰指挥整十一、九师向东进攻，与一兵团会师孟良崮。但华野部队面对国民党援军的逼近，改变原定继续打整二十五师的计划，迅速脱离战场，使蒋的决战计划又落了空。

5月19日，整八十三师终于进至孟良崮，但华野部队已经撤退，空余昔日激战的战场供其凭吊。经此一役，国民党亟须调整作战部署，当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陈诚、顾祝同商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实施全面整训，改正战术，期作最后决战之准备”[65]。次日，陈诚与顾祝同赴临沂处理善后，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暂告一段落。

孟良崮战役，整七十四师被全歼，对国民党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和全国战场的作战都是一次沉重打击，蒋介石称之为“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官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66]。5月29日，蒋介石为此役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

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为此，他下令对作战不力的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其他“与作战应援有关者，迅即查明责任，依法严处，以昭炯戒”[67]。

对于孟良崮战役之失败，即使在国民党内，亦有不少人感觉不可理解。郭汝瑰在其日记中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甚觉此失败十分怪异。整七十四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加。各部队如此不协同，战斗力如此之差，舍失败而外，当无二条路。他认为：山东已集中全国兵力，如仍失败，则政府军前途堪虞之至[68]。为了检讨此役的得失，国民党在山东的将领大半被召到南京接受训练，以“对整个军队之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检讨，彻底改革”。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也因而停止了一个多月。但是效果如何，连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前方将领之教训勖勉，心力已尽，未知果有效验否？”[69] 更妙的是，蒋介石不承认他和国防部的作战指导有什么错误，而是指责汤恩伯错在部署失当、下令整七十四师孤军仓促行动，张灵甫错在修路暴露目标（因张部行动必须借助道路）、而后退时又不留意地形、不肯放弃地点，甚而指责重装备部队不该使用于山地。他忘了正是他自己下令汤部速进，下令张部坚守，并且很以国民党军队的重装备而得意的。蒋认为以后作战，“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并且独出心裁地提出，“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70]。他倒没有具体说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摆梅花阵法，可见蒋介石自己对如何与中共作战也失了方寸。

孟良崮战役对中共而言，“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灭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71]。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已在东北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给国民党以极大的震撼，战局即将

进入一个转折点。

三　陕北作战暂时得手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另外一个战场是陕北。全面内战爆发前，负责镇守陕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便于1946年5月令部下拟订了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但因陕北是中共中央总部所在地，此时国民党尚未与中共最后决裂，此一计划“因碍于政治因素，未蒙批准”。10月间胡托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再向南京建议攻延，王告他“暂缓，将来如何，尚不一定”。胡为此进京“力言进攻延安之时机，逾此，天候限制、地形限制、补给限制，不可为矣”。然蒋介石仍以为时机不至，要他出兵晋南，打通同蒲路[72]。直到1947年初，国民党重开和谈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2月底蒋介石下令驱逐中共驻南京等地的谈判代表团，国共关系最后破裂，进攻陕北的计划才得以付诸实施，目的是“摧毁共匪叛乱之神经中枢，瓦解匪军意志，并打击其在国际上之虚妄宣传”[73]。

1947年2月28日，胡宗南应召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讨陕北作战方案。因国民党军刚在山东莱芜失利，蒋对陕北作战亦不放心，连问胡两次“陕北作战有把握否”？胡“列举匪我兵力以对，并称极有把握”，蒋因此决定实施进攻延安方案[74]。胡回西安后，立即下令各部按计划进行。战役目标为，“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洛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入敌后而奇袭之”；战术指导为，“第一线兵团应以步工兵编组多数攻击群，于空军及炮兵掩护之下，突破敌之阵地并继续贯穿其纵深，遇匪之顽抗，则由第二线兵团迅速前进作翼之延伸包围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以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十七、三十六师及整十五师一三五旅为左兵团，自洛川北攻甘泉、延安；整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一、二十七、九十师为右兵团，自宜川北攻临镇、延安；整三十六师副师长顾锡九指挥整七十六师新一旅及六个团为陇东兵团，自合水向东作扰乱性攻击；整七十六师为预备队；进攻总兵

力达到15万人[75]。3月12日，胡宗南率前线指挥所到达攻击出发地洛川，次日，国民党军开始全线进攻。

延安虽为中共中央驻地，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恰恰为中共军事力量最为薄弱的一个地区。战前，陕北部队尚无野战指挥机关。2月14日，为了应付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进攻，陕北部队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随后，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之势，中共中央决定调晋绥军区王震部至陕北，3月20日将陕北部队编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但所辖只有两个纵队六个旅，两万余人（有的部队每支枪只有十发子弹），与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共自始就没有固守延安之意。其部署为，以晋冀鲁豫陈赓纵队出击晋南，刘伯承、邓小平部出击豫北，牵制国民党军；陕北部队则在内线构筑三道防线，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的转移。放弃延安后，继续吸引国民党军，“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它区作战取得胜利”[76]。陕北成为中共全盘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以后的战局发展，基本是按中共的设想进行的。

3月13日，国民党军发起对延安的进攻，中共部队以三个团兵力，作宽正面纵深阻击。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命令，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77]。中共部队遵此在延安近郊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周激烈的阻击作战。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居住了十余年的延安，19日上午中共部队放弃延安。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21日蒋介石电致胡宗南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诚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24日，胡宗南率指挥部进驻延安。陈诚认为陕北战事不久将可结束，已令部下拟订胡部

兵力转用计划，并准备撤销郑州指挥所，由胡担任郑州绥署主任，负责平汉路战事并策应山东方面[78]。因此，胡宗南更为志得意满，急于实现其战役计划，一举将中共部队歼灭或赶过黄河，这种轻敌浪战、急于求成的指挥，为自己的失败准备了条件。他判断中共部队已向安塞“北窜”，遂令向安塞攻击，同时以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安塞东南的青化砭进发，以掩护大队侧翼。24日，整一军占领安塞，但并未发现中共主力，不等胡宗南判明实情，次日，西北野战兵团利用青化砭的有利地形，预先设伏，歼灭了三十一旅。胡宗南此时才发现中共主力在东面，改令所属转向东进，“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79]。26日胡部占延长，29日占延川，30日占清涧，4月3日西转占瓦窑堡，但都未能找到中共部队决战。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清涧北枣林子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80]。这是一个重要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共对于战争前途的自信，并以此在战略上吸引胡军在陕北，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幽默地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81] 4月9日，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通知，通报了这个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82]。

青化砭战后，为了避免再受中共部队的伏击，胡宗南部行动“异

常谨慎”，采取所谓“方形战术”，各部排成数十里方阵，“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83]。一时在陕北的山梁上，胡军的行进队列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被中共讽之为“武装大游行”。中共则利用有利的地形与群众条件，不断调动对手，使其始终无法确切得知中共首脑机关和主力之所在[84]。胡军来回扑空，疲于奔命，补给困难，士气大受影响[85]，而中共部队则选择时机，予以打击。毛泽东在给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等负责人的电报中称之为“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86]。国民党战史也不得不承认，“陕北追剿作战，因无全程之指导，加以情报失灵，不仅使追剿作战捕风捉影，往返奔驰，徒劳无功，全陷被动”[87]。

胡军在陕北多日求战不得之后，主力南下蟠龙整补，4月13日，再向蟠龙西北进出，并令驻守瓦窑堡的整十五师一三五旅南下策应。西北野战兵团抓住战机，集中四个旅于14日在羊马河设伏，全歼一三五旅。其后，蒋介石、胡宗南据空军侦察发现在绥德附近黄河渡口出现渡船，判断中共部队将东渡黄河入晋。26日胡宗南下令以所部为南兵团，由蟠龙北进绥德，另以榆林守军三个旅组成北兵团，南下米脂镇川堡，企图南北夹击中共部队。西北野战兵团得知后，决定避其锋芒，以一部伪装主力诱胡部北上，主力四个旅则大胆南下，攻击胡部后方唯一的补给基地蟠龙，这样既可补充自己，又可使胡部后方动摇。

5月2日，整一军占领绥德，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非但没有发现中共主力，自家的后方基地蟠龙已在当晚受到西北野战兵团的猛烈攻击。此时，胡部后方空虚，在绥德的部队一时难以调回，胡宗南只能急令驻延安的整二十七师派出一个旅前往救援，但已缓不济急，蟠龙守军整一师一六七旅在抵抗了两天之后，于4日被歼灭，大量物资为

中共部队缴获。9日，胡部主力放弃绥德，撤回延安、蟠龙地区休整。曾经对胡攻占延安大为嘉许的蒋介石，发现陕北战况并不如前之预期，面对各战场均兵力不足的窘境，此时已有自陕北调兵他用之意。5月25日，蒋在召见胡时直截了当地问他："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为了己部的利益，称"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蒋因而同意陕北兵力暂不南调，令其在两个月内肃清陕北[88]。然而，胡宗南部已陷入陕北作战僵局难以自拔，所谓两个月肃清陕北也成了遥遥无期之事。

国民党军攻占延安，除了在政治上可以借此鼓吹一番之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得到利益，反而被牵制了大量兵力。中共部队三次作战，虽然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基本度过了延安被占后的困难局面。就战场作战而言，胡宗南部虽占了绝对优势，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不高，并未表现出过人之处。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被俘后认为：胡宗南指挥无能，孤军深入，下了一着死棋，摆开了挨打架式[89]。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各级干部缺乏战场磨练，一般官兵临战慌张，战况稍显不利，即莫知所措，以一个旅万人之众，仅经一个多小时战斗，即全军覆没。其战斗力之脆弱，深值检讨"[90]。蒋介石以胡部作为战略预备队，长期控置于西北，一朝投入战场又无所表现，显示其无知人之明。周恩来为新华社改写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对胡作了辛辣的讽刺："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91]

四　东北战场攻守易势

东北战场自1946年6月停战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调整而维持了四个月的平静局面。进入10月，东北战场战火重燃，战场主要在

南满。

杜聿明对东北的停战始终耿耿于怀，因此他并未放弃在东北动武的准备[92]。蒋介石当然也不甘心让中共在东北生根，不过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与关内相比，他对东北军事行动的态度略为谨慎一些，尤其对苏联可能的反应，他不能无动于衷。这是东北战场与关内的不同之处，也是东北战事暂时主要局限在南满的最主要原因。而在军事上，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有限，既要占领点线，可使用的兵力便更少，兵力不足与东北地域的辽阔恰成矛盾，使国民党也无力在东北发动全面进攻，因此杜聿明经与下属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先集中足够兵力进攻南满，消灭兵力相对弱小的南满解放军，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向北满进攻”。要旨为：辽西方面，控制热河，确保北宁路安全；辽南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貔子窝、普兰店之线以南，封锁旅大与内地的交通；辽北、辽东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松花江、长白山以北；待上述任务完成后，再进攻北满[93]。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在华北东线热河的攻势已近结束，西线已占张家口，蒋介石自感无后顾之忧，遂令杜聿明“对安东方面迭次进犯之匪，应集结主力而痛击之，并尽可能予以彻底歼灭之”[94]。此时正值中共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而攻占西丰，杜判断中共南满部队主力集结于沈阳至梅河口铁路（沈吉路南段）以北，因此以打通沈吉路，捕捉中共军队为第一步进攻目标。他以新一军新二十二师为左路，自长春路上之开原出发，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为右路，自沈吉路上之营盘出发，攻击沈吉路两侧，新一军新三十师出梅河口策应，行动统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10月6日开始进攻，至中旬先后占领西丰、清原、柳河、新宾、辉南等地，打通了沈吉路全线。

10月17日，杜聿明发布对中共南满根据地的攻击作战命令。他以新六军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及六十军一八四师为右兵团，自海城进攻普兰店、庄河一线，担任迂回任务；五十二军为中央兵团，其中二、

二十五师由本溪沿沈安路两侧正面进攻安东，一九五师自新宾进攻桓仁、通化，牵制安东方面；新一军新三十师及六十军一八二师为左兵团（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稍后加入），自柳河向南进攻当面中共部队，并相机协助占领通化。

10月20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攻击行动。南满中共部队是由萧华指挥的第三、四两个纵队，实力对比处于劣势，林彪等人电示萧华：我军如勉强进行保卫安东的战斗，则不仅仍然达不到保卫安东的目的，且反加上碰坏了部队；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95]。因此南满中共部队并未作固守安东的准备，在进行了几天阻击后，10月25日退出安东。此时，新六军已进至普兰店、庄河一线，一九五师逼近通化，杜聿明据情报判断中共军队已被“击溃”，遂越过五十二军军部，径令二十五师向东攻击宽甸，企图夹击中共部队于通化、桓仁地区。30日，二十五师进至宽甸西北，为南满军区四纵包围，经三日激战，11月2日全师在新开岭被歼。当天国民党军占领通化、桓仁、宽甸，达到其在东北攻势的顶点，但二十五师被歼事实预示着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兵力不足与地域辽阔之间的矛盾将日趋严重。

国民党军占领安东后，中共在南满所占地区已缩小为沿鸭绿江中朝边境的狭窄地带（最少时只有四个县23万人口及部队3.6万人），内部对是否继续坚持南满地区有不同意见。东北局经过讨论，认为坚持南满“意义甚大，使我们仍能保有广大土地与人口，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北面的根据地，使我南北互相依存”[96]，因此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互相配合，改变东北局面。中共中央也指示东北局：“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97] 为此东北局加强了南满的领导，派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辽东（南满）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兼辽东军区司令员，陈云到任后，

12月中旬在分局七道江会议上确定了坚持南满的方针。

安东作战告一段落后，杜聿明已感兵力不足，需要调整部署，进行整补。11月他去南京向蒋介石面陈增援要求，未得批准，相反国防部认为应一鼓作气，收复南满还在中共掌握之中的临江地区，确保国民党在南满的优势地位。熊式辉则认为，南满临江地区山林丛密，军事意义不大，而北满“地形平阔，攻取自易”，主张“不如收复哈市齐齐哈尔较为有利也”[98]。但蒋介石顾虑苏联的反应，对进攻北满始终持慎重态度。因此从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先后以五到六个师的兵力，四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辽东（南满）军区以内外线结合、防御和出击并用战法，扰乱、打击对手的进攻。此时正值东北的冬季，气候严寒，临江地区地形复杂，国民党军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非但始终未能攻占临江，而且还丢失了已占的桓仁、柳河、辉南等地。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作战，使国民党军往来调动，疲于奔命，也消耗了其有生力量。

自最后一次进攻临江地区失败后，东北国共之间攻守易势，国民党军在东北已无力发动攻势，被迫转取守势。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域广阔与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99]，大量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极易被各个击破。杜聿明因为担心中共即将发起的进攻，5月上旬特意派其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要求增援。蒋强调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因此无兵可派，指示东北“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100]。杜聿明无奈，只得将作战方针改为：“为保持战力，及确保战略要点要线，依工事及火力之加强，逐次消耗匪军战力之目的，分别集结兵力，固守永吉、长春、四平、沈阳、葫芦岛诸要点，期待关内增援部队之到达，相机转移攻势，捕捉匪之主力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新一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二〇七师、九十三军各以长春、永吉、四平、本溪、抚顺、锦州为中心，“确保战略要点及机场之安全，并逐次以保安部队，扩张外围据点；如遇匪之主力，

即依机动战法，退返守备据点，同时注意埋伏及袭击之实施”。以新六军位于沈阳附近为机动兵团，利用铁路线往来支援各点[101]。但还未等杜聿明完全部署完毕，中共部队便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中共部队在东北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部队数量与战斗力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到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45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20万人，虽然数量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基本持平，装备仍不如国民党军，但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而且北满在经过剿匪与初步的土改之后，中共地位较前更为稳固，具备了转守为攻的条件。国民党军对临江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后，4月7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根据东北局的讨论，“决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东北局势发生根本变化”。23日林对东北全军发布指示，要求“全军高度集中兵力，坚决放手打击敌人，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以根本改变东北战局”[102]。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103]。中共中央不仅同意了东北局的意见，而且要求晋察冀部队配合行动“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104]。

5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第一、二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个师，东满六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分别自扶余和榆树渡松花江南下。13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五条战线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夏季攻势由此拉开战幕。北满部队首攻长春西之怀德，东满部队攻击吉林周边地区，同时南满第三、四纵队出击沈吉路，西满辽吉纵队出击四平西北地区，刚刚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指挥的冀察热辽部队则出击热河西部与河北东部，配合东北作战。由于东北民主联军同时在广大战场全面出击，迫使东北国民党军往来救援，疲于奔命，他们不得不大量放弃中小城镇，同时也放弃了一些位置较偏的中等城市，开始向中心城市收缩。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占领了中长路

上的公主岭、开原、昌图，南满部队重占通化与安东，攻占沈吉路重镇梅河口，西满部队占领通辽、郑家屯，东满部队收复沈吉路东大片地区，打通了东、南、北满之间的联系，冀察热辽部队占领热河的围场、赤峰，冀东的昌黎、抚宁，共计二十余座城镇。

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大规模攻势，使本已兵力不足的东北国民党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此前，杜聿明旧病复发，难以指挥战事，临时代理的熊式辉更形慌张，5月20日匆匆飞往南京求援。蒋介石无兵可派，只能指示其“速将南满各地之正规部队完全集中于四平街附近，而以地方团队接替其防务，除沈阳外围……各据点必须固守外，其他至不得已时，皆可放弃，须立下决心，切勿犹豫，至于长春与永吉，应严令死守核心，待援勿失”；同时又教训熊式辉：“身处危急之际，凡事须尽其在己，而尤须以顾全大局为第一要着。”[105] 30日，蒋介石亲临东北，视察战局，观察到的形势完全不容他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沈阳内部复杂，天翼（熊式辉）威信已失，光亭（杜聿明）卧病在床，军国大事，推诿延宕，几误全局。”但蒋并无制胜之方，只是手书各将领（包括四平陈明仁、长春孙立人、永吉曾泽生、朝阳孙渡等人），望“淬励所部，沉着固守”而已。由于杜聿明身体欠佳，他令熊式辉全权处理东北军政事宜，不得有误[106]。

经过一个月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将作战矛头指向中长路沈阳、长春间的孤立据点四平。如果攻下四平，则可切断中长路沈阳与长春两大城市间的联系，孤立长春、吉林，威胁沈阳。为此，东北民主联军以一纵、辽吉纵队和六纵十七师，共七个师的兵力攻击四平；以八个师位于四平东南之西丰地区，三个师位于中长路四平南之昌图地区，一个独立师位于开原南，阻击沈阳援军；以五个独立师位于四平北，阻击长春援军。攻击发起前，林彪要求攻城部队“发扬高度攻坚精神、小部队硬打死打精神”，“力求乘胜猛烈扩张战果，须准备数天解决战斗之精神”，“充分准备，务期必胜”[107]。

四平守军是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

师和十三军五十四师，以及保安团队，共三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后，七十一军在5月中旬救援怀德时遭到重大损失，八十八师几乎被全歼[108]。退回四平后，周边据点尽失，态势孤立，势将成为中共部队攻击的下一个目标。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身经百战，自认“平生以打胜仗著名”，“到东北后却无特殊表现，仅仅解德惠之围有点成绩，但怀德一役又失败了，希望能够特别出一次风头”；而且他“估计当时凡属国民党的部队，守了一个地方，如能坚守下去还比较有把握，如守到中途而要撤退，则绝对会被击溃、被消灭的”，因此他作好了“置之死地”、“全力死守”的准备[109]。事前，蒋介石曾亲书于陈，告他“此时为弟成功成仁之机会，切不可因一时之小胜小负而自馁”，并表示“必集中陆空军尽速增援”[110]。这与陈想出风头的想法正相吻合，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陈明仁的决心对四平防守确实起了相当作用[111]。

陈明仁为守四平制订了完整严密的守卫计划。其指导要领为：“依都市防守要领及要塞配备方式，依核心内外复廓之细胞组线构筑坚强工事，大量储积粮弹而死守之。”在具体部署上，他将全城划为核心守备区及一、二、三、四守备区，各守备区“除在指定之地区构成复廓及核心工事外，并在内外复廓及核心工事间，构成据点严密之纵深工事。使相互间成为带式阵地网状配备，使匪无法向任何方向突进，均不能长趋直入”；“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成前进阵地，迟滞匪人于远方，非万不得已时不得弃守，俾心脏不受作战之威胁”；“市区工事应将既设半永久性之据点工事予以加强，阵地之编成应采纵深配备，各阵地带须编成犄角侧防若干支点以半永久机枪掩体为骨干而以野战工事连系之”；控制强大预备队，集中使用炮兵。对通信、交通、补给、民政等都作了具体规定[112]。整个部署强调以面为主，以点控面，纵深配备，交叉火力，对进攻一方形成较大威胁。

6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部队发起了对四

平的攻击。经过三天外围战斗，14日对城区发起总攻。由于保安团队战斗力不强，弃守后退，一纵当晚攻入市内铁路以西市区，守军利用纵深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攻守双方反复拉锯拼杀，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由于是城市攻防战，进攻与防守双方的作战地域都不大，兼之守军利用城区坚固楼房为工事，双方遂进行逐屋争夺，死伤惨重。东北民主联军此时装备已有了很大改善，此次进攻动用重火炮近百门，而国民党方面则动用大批次空军助战，更加剧了战斗的激烈程度[(113)]。19日，七十一军司令部在猛烈进攻下告急，陈明仁不得不率部退往铁路以东。为尽快结束战斗，林彪下令调准备打援的六纵两个师投入战斗，并和罗荣桓电示各部：决以共计付出一万五千之伤亡，再以一星期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以达到完全消灭敌人和打垮敌守城信心[(114)]。至22日，七十一军机动兵力已告用尽，陈明仁已将军直属队编组投入战场，守军退至城区东北隅作最后的抵抗。当天，蒋介石电致陈明仁鼓其气，告以“关于增援陆空各军，中朝夕督促向前迈进，预计五日内必可直上四平”[(115)]。

由于四平在国民党军东北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四平被围之后，国民党东北当局立即部署南、北两路增援，企图夹击中共部队，解四平之围。南兵团以新六军三个师自中长路右侧向四平东南迂回，另以二〇七师掩护其右侧安全；九十三军两个师及五十二军一九五师自铁岭沿中长路正面向四平推进，另以骑兵第一军掩护其左侧安全；刚刚由关内增援东北的五十三军两个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兵团以新一军两个师自长春南下四平。为了避免以往中共围点打援的情况再现，援军被要求实行纵深配备，逐段跃进，保持后方稳固。

6月22日，四平援军南、北同时出动，南线占开原，27日又占昌图，北线逼近公主岭。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吸打增援”，抽调部分攻城兵力，集中四平南阻击援军并着重打击新六军。但因援军行动谨慎，未能捕捉到战机，而四平前线攻击部队已显疲惫，态势不利，林彪遂决定停止攻击，除掩护部队外，全军于30日

撤离四平战场。7月2日，林彪等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

四平攻城战，是继上年四平作战后在这一地区的又一次大规模作战，不同的是主客易位，仅仅一年时间，国民党军便由攻转守。东北民主联军以1.3万人伤亡的代价，未能攻下四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四平守军情况不明（原估计只有两万人，有战斗力者不过五个团，实际有三万余人），因此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攻击部队人数不到守军的两倍）；对其坚守决心估计过低（认为大半系新兵败兵），因此急躁轻敌；对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掌握不够（主要是突破后的纵深战斗和巷战未及充分演练），因此伤亡较大；步炮协同不够熟练，有时压制火力已经结束，而进攻部队还在三里路之外[116]。还有一个事先未料到的原因，当时正值东北夏季，“日长夜短，白天不进攻，黄昏调集部队，一打天就亮，白天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117]，对素擅夜战的中共部队不利。但这种情况便利空军活动，国民党空军出动大规模机队支援守军作战，空投补给[118]，对攻击部队威胁极大，对守军也是个鼓舞。因为攻击四平是东北以至全国中共部队首次大规模攻坚作战，“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最后未达预期目的，多少影响到其后林彪对攻坚战的看法。

虽然国民党方面经苦战保住了四平，但经过此次作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八万余人（四平一地即近三万），丢失县城42座，兵力大部退据几大城市和南满、北宁铁路沿线，已完全处于守势。不仅如此，东北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由守转攻的战场，而且其攻势规模之大，动用兵力之多，大大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连同其在山东战场遭到的挫折，已经使国民党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其统治的威胁。如同新华社在社论中所言：“东北形势的变化，不能不震动全国。东北解放军的全面反攻，难道不是整个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吗？以东北在全国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而首先反攻并取得了胜利，难道不是大大加强了华北解放军反攻时的地位吗？”[119]就在东

北大战前后，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也疲于应付，国民党统治处于危机之中，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酷的统治措施的出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戡乱总动员”的酝酿与实施。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一　国民政府的改组

自上年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便酝酿改组政府，改变一党独裁形象。1947年初对中共的和平攻势失败后，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制造全国和平统一的表象已不可能，国民党尤其需要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摆出民主的姿态，争取舆论与民心，也对美国的“关心”予以回应[(120)]。在改组政府之前，1947年3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立法院增加委员50人，监察院增加委员25人，国民参政会增加参政员44人，其中均包括了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代表。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讨论结束训政促进行宪问题，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称：“本届全会对于行宪准备时期本党的地位和职责，应该特别有一个详尽的检讨和明确的决议……现在宪法既经颁布，在建国程序上，我们就要进入宪政时期，在政治形态上，就要由一党负责的时期过渡到各党派和全民共同负责的时期。”[(121)] 23日，三中全会通过《宪政实施准备案》，表示“本党之政治设施，应以从速扩大政府基础，准备实施宪法为中心”；“国民政府扩大基础后，在三民主义原则指导下，依据宪法基本精神所为之各项设施，本党应予以全面之支持”；“本党与国内其他和平合法之政党，应切实合作，共同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122)]。3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织法。至此，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改组政府一事进入国民党的议事日程。

在讨论改组政府问题时，国民党与民社、青年两党的争执所在，

表面是施政纲领应如何决定的问题，实际是权力如何再分配的问题。施政纲领是政府施政的指导方针，民、青两党既自诩入阁参政，自然要显出其与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不能如国民党那样以老大自居，在许多问题上更愿打出民主旗号；而国民党既要走改组政府这步棋，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青两党曲予优容，总要在表面上像那么回事。3月5日，蒋介石召见民社党张君劢、徐傅霖和青年党左舜生、余家菊，讨论改组政府问题。18日张君劢致函蒋介石，提出："同人以为和平建国纲领，本为各党共同参加政府时代之决议，此纲领就年来之国内局势与主席最近之演说观之，已有出入，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何在？令人有惘惘若失之感。兹特列举各点为商讨之资（另纸列陈），此项和平建国纲领依旧保存，此外加以补充。窃愿本此精神先行商讨，俾各党有一共守之信条，此后实行之际倘有背驰之处，则各党有进退之自由。"(123) 民社党和青年党各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草案，民社党案强调以政协的《和平建国纲领》为准绳，试行行政院负责制，并提出仍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青年党案除与民社党案相近处外，强调开放地方议会和政权，使各党派平等参加。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其实在一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已经精神全失，但国民党还可以此作为搪塞外界指责的工具，因此对民、青两党的提案，国民党除了在中共问题上有所争执外，其余未表反对(124)。实际上，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与民、青两党间都不过是为了敷衍外界而已，在改组政府时表面热闹，改组过后即置之度外，实际上的讨价还价集中在政府阁员的分配问题上。

在政府的改组过程中，国民党极力想拉进著名的党外人士，以装点民主的门面。然而民盟与国民党本非同道，自然不可能入阁，余下的所谓党外人士只有青年和民社两党。可是民社党自参加制宪国大以后，党内对未来政治走向看法不一，张东荪等已有退党之意，副主席伍宪子一派对张君劢在制宪、入阁等问题上自作主张很不满意，要求由中常会决定党内大政。对于入阁与否，民社党内有主张全面参加者（蒋匀田、戢翼翘等），有反对参加者（张东荪、叶笃义等），双方

争执不下。民社党的核心人物张君劢虽然赞成改组政府，但明确表示暂不入阁。他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到不入阁的原因是，最近几个月里，在中国迈向民主的道路上还没有什么有希望的征兆，国民党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采取的许多行动并无平等和公平竞争精神[125]。虽然如此，张君劢却不能不考虑党内要求入阁的呼声[126]。最后由张君劢以主席身份决定参加并提出了民社党方面的名单，但只出任国府委员和行政院政务委员[127]。不过民社党因为张君劢不入阁，对部长的争夺似还收敛一些，青年党则将改组政府看作捞取实惠的好机会，对国府和行政院成员均要求比民社党多一席，完全是赤裸裸地伸手要官，令有识者为之齿冷[128]。青年党不仅要求参加中央政府，而且力争参加地方政权，要求四川一厅长一省委，湖北、湖南、江苏、福建、广东一厅长，江西、河北、安徽、辽宁一省委，因为这样“不但足以掩护党务活动，而且可以藉政权在手，吸引下层群众，争取乡镇保甲长，以为竞选之准备”[129]。

4月16日，蒋介石与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曾琦，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共同签署《共同施政纲领》。“纲领”共有十二条，基本内容是：1．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准绳，由参加之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负责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2．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原则，为各党派合作之基础，在此共同认识之下，力谋政治上之进步与国家之安定；3．外交政策，应对各友邦一律平等亲善，无所偏倚；4．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只须中共愿意和平，铁路交通完全恢复，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谋取国内之和平统一；5．提前试行行政院负责制，行政院依国府委员会之决策，负执行全责；6．行宪前之行政院院长人选，国民政府主席在提出任用时，应征求各党派之同意；7．对各省行政，本军民分治与因地制宜原则，作彻底之检讨与改革；8．凡因训政需要而设立之法制与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9．彻底整理税制及财政，减轻人民负担；10．严格保障人民各项自由，严禁非法逮捕与干涉，其因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紧急危难而必须予以限制者，其法律应由国府委员会

通过；11．今后所举办之外债，应专为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及生产建设之用；12．各省市县参议会及地方政府，应尽量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130]。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在政府改组后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不再悬挂党旗，不再诵读国父遗嘱，但各级党部照旧举行纪念周。

4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改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张群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131]，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同时选派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为秘书长，作为全国政治的指导机构。18日，《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公布，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新任国民政府委员二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十七人，除五院院长外，还包括党政重要负责人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四人，为曾琦、陈启天、何鲁之、余家菊；民社党三人，为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132]；社会贤达四人，为莫德惠、陈光甫、王云五、包尔汉。当日，蒋介石对报界发表谈话，称政府改组为“自训政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我国之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以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所共同行使。国民政府委员会将在此过渡时期行使其职权，执行国民大会之决议，而完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行宪之准备工作”。为了与《共同施政纲领》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精神一致，蒋介石声称：“倘中共放弃其以武力夺取政权之行动，能为国家之团结统一而合作，则该党仍有参加政府，从事建国工作之机会。”[133]

4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行政院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国民党十六席，包括院长（张群）、内政（张厉生）、外交（王世杰）、国防（白崇禧）、财政（俞鸿钧）等关键部门；青年党三席，为经济部长李璜、农林部长左舜生及政务委员常乃悳[134]；民社党二席，为政

务委员李大明、蒋匀田[135]；社会贤达四席，为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交通部长俞大维、卫生部长周诒春和政务委员缪云台；同日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至此，国民政府改组完成。5月1日，张群首次向立法院报告新内阁的施政纲领，称其基本方针为：1．多方努力迅速结束军事，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国内纠纷，恢复统一；2．力求收支平衡，努力整理通货；3．遵守宪法精神，保障人民自由，严惩贪污；并称“立法院与行政院系并立而非对立，希望立法院体谅事实困难，信赖行政院之经验及能力，两方面切实保持联系”[136]。

虽然国民党声称“国民政府改组完成之日，即为训政开始结束之时”，然而，修改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仍以训政时期约法为根据，而国民党则称“实行主义保卫民国之责任，则义应积极继承而决不有丝毫之诿卸”[137]。不仅中共对政府改组不屑一顾，斥为“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诸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民盟认为其“实与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途径背道而驰”；一般社会舆论也认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纵然是多党政府，而实质仍是一党负责”[138]。即便国民党的合作伙伴青年党也不能不承认，除了在中央当花瓶之外，国民党“在各地之地方政府及民意机关，甚至各地选举事务所，竟拒绝青年党党员报名竞选，由此可见国民党仍欲把持地方政权，操纵选举，尚缺乏合作诚意，故要求开放地方政权，实为急切需要”[139]。

而在极力主张改组政府的美国人眼中，青年党与民社党的追随者之少，使将他们拉入政府努力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具有名义上结束一党统治的象征意义。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现在估计政府改组的意义还为时过早，因为以往历次政府改组都只具有对外的意义，而在中国国内很少发生有影响的变化。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真正的改变，它们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国民党手中[140]。可见，政府改组在美国人眼中并没有国民党预想的效果[141]。实际上，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目的，除了表面文章之外，是

拉各党为“剿共”内战共同负责。结果不出三月，所谓各党派联合政府便通过了“戡乱动员”案，为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抹上了一层“民意”色彩。

二　反战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其后方爆发了一场来势甚猛的反战运动，此次运动以大学生为主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使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大为动摇。

学生运动最初起因于经济危机。自2月间经济紧急措施实施之后，物价在强力管制下略为稳定了两个月。4月下旬以后，物价再度开始急速上涨，上海5月的物价指数比4月上涨了70%，米价上涨更为惊人，4月为15万元1担，5月急涨为31万元，翻了一番以上，较之上年下半年6万的均价上涨了四倍以上[(142)]。不止一座大城市爆发抢米风潮，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呼声高涨。5月5日成都的抢米风潮，导致两人被打死，全市戒严，整个社会呈现不安与动荡之势。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因物价腾昂，生活不安，人心浮动，几乎处处都在闹事，事事都有风波，一种阴霾恐慌的气象遍布各地。”[(143)]

大学生本为社会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抗战以后，由于公费制度的实行，大学生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心，即使是在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之中，大学生的基本生活仍然得以维持。然而，战后通货膨胀的日趋恶性化，使定额公费远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生活。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看不见一滴油，吃不到一片肉，连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的伙食都不能维持了”；北京大学“由于最近物价暴涨，自本月（指5月——作者注）五日起改食丝糕，白开水一碗，青菜一碟，完全素食”；即使在素有贵族学校之称的燕京大学，也开始供应玉米面、黄豆面和小米。以至校园里出现了这样的打油诗：“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144)]舆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政府“除以军事为重外，似对其他

建设较为淡漠，尤其是对教育的视线，几乎是视若无睹，遑论教育建设，各校经费拮据，直接原因当归于此”[145]。对于抗战时期的困难学生尚可忍受，而战后反不如战时，这对敏感的大学生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进入5月以后，各大学校方和教职员率先要求提高待遇[146]，对于学生的行动也是一个鼓舞。

5月起始，各大学校园都处于动荡之中，而最先酿成风潮的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大学生们。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第一次向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副食费增加一倍，但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接见请愿学生时一派官腔，不仅对学生没有安抚，居然说出什么：中国穷，物资缺乏，所以物价亦涨，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儿女也吃不饱。甘的一番言词更激怒了学生，中大学生立即决定联合全国大学采取一致行动，导致学运迅速兴起，很快便到了国民党难以控制的程度[147]。

5月15日开始，南京学生连续举行反饥饿请愿游行。政府官员不是温语劝慰，而是一副官僚架势，不能缓和学生的情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学生要求“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学生问“钱哪里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头可断亦无力答复”；学生复追问“为什么军费可以增加？”“为什么打内战？”[148] 因为请愿未达目的，中大学生决定，如果政府不同意学生要求，将举行无限期罢课。南京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各地学生的支持。上海复旦、同济、交大和杭州浙大等大学派出学生代表赴南京，参加向政府的联合请愿。北平学生从17日起先后罢课，18日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对内战，受到青年军士兵的围攻，学生多人受伤，进一步刺激了学生的激烈情绪。北平学运自始即喊出了“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表现了此次学运强烈的政治性[149]。

学生运动之起，来势迅猛，多少出乎国民党意外。国民党官僚机构事先既无防范，事起则一片慌乱，除了沿用一贯的高压手段外，别

无他法。5月16日，行政院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学潮，教育部长朱家骅“主张采严厉办法”，但王世杰认为，学潮“一因经济的压迫遍及各校员生，一因内战之结束无期，人心苦闷”，“学潮之解决，究非警察所能为力也”[150]。但此时军事与经济形势对国民党均极为不利，它不能容忍学潮再动摇其后方统治。18日，国府委员会匆匆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及一部分工商界职工，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措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办法”规定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以十人为限；如有学生罢课、民众罢业、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地行政主管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当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责学运受“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以达成其夺取政权，推翻中华民国之企图”，因此“决非政府所能许可，亦决不能有所姑息”。在这个谈话中，蒋声色俱厉地质问，“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完全没有了一国元首的气度[151]。教育部据此通令各大学，“近来学生之罢课游行，请愿要挟，荒废学业，扰乱治安，逾越教育范围行为，殊应予以纠正”；下令“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152]。由此可见，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离社会的脉搏相距甚远，他们已经完全被自身的既得利益蒙蔽了眼光。

国民党的处置并未能压抑学生运动，反而激起了学生反抗的高潮。5月19日，京、沪、苏、杭区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决定次日举行联合请愿游行，会议通过的宣言疾呼：“我们不要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要饭吃，要图书，要仪器，要教授，要安定的生活”；要求全国教育经费提高到总预算的15%；学生副食费增至10万元，以后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并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请

政府拨付充分外汇，交学校定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会议通过的游行口号包括“反对内战”、“遵循政协路线”、“反对征兵征粮”等内容[153]。

5月20日这一天，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在南京，游行历时自晨至晚，学生与奉命阻拦的军警宪兵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学生数十人受伤、被捕，是为“五二〇惨案”。在北平，游行最富于政治性。学生们明确地将反饥饿与反内战联系起来，在宣言中声明：“老百姓要团结，和平建国，而这反动腐败的一群却要实现武力统一，征兵征粮，一切为内战，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紧急关头，为着千百万老百姓要活命，为着我们自己要活命，我们忍痛暂时牺牲学业，放下书本，进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其后又在递交北平行营的请愿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追根求源，知道目前中国社会一切混乱不安的局面，都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及打内战的关系，所以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恢复政协路线，实行民主政治。”[154] 这些要求将这次学潮定位在反内战的政治层面，呼应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使此次学运发展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这是与中共的领导和动员分不开的。

自上年底反美学生运动发生之后，中共对国统区组织发出指示，认为“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要求“必须注意纠正对群众运动与民主来潮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加强对学校学生组织的领导、发展和巩固[155]。还在此次学运发生前，中共已确定了国统区工作战略策略是，“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156]。学运兴起之后，中共认为“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

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乃至相互埋怨，美帝国主义对蒋借债的犹疑，都可看作搞垮蒋介石统治的间接帮助。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157]。与反美学潮的突发性不同，此次学运基本上是在中共预先有计划地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行动策略为基础，从一般群众可以接受的反饥饿、求生存口号入手，继之以反内战的政治性口号，目的是利用国民党政策的不得人心，造成国民党后方的不稳，从而配合战场作战[158]。

学生运动既起，如同时论所言，“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159]。社会各界对学运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态度，因为饥饿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学生，也关系到社会各阶层。著名学者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演讲，愤愤地说：“请愿就是承认政府，与革命不承认政府完全不同，而政府不准，不知其用心何在。”他将一切问题归之于“内战造成的恶果”，“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160]。北大和清华教授一百余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提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郁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治本之道，在求实现其正当合理之要求；治标之法，亦惟有疏导，以缓和其情绪。此乃政府起码的责任，亦当局应有的措施”。对于时局，平、津各大学教员在宣言中声明：“一切纷扰现象，根源胥起于经济危机，则又为长期内战之恶果。一切学潮工潮，均为当前时势下必然之产物。默察当前情势，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俱已临于崩溃之边缘，危机迫于眉睫。政府如仍长此敷衍支吾，不迅采釜底抽薪之有效办法，最后势必同归于尽而后已！继续战争，决不能解决困难，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难。党政军各方面欲图自救救民，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

外别无他途。”上海各大学教授几十人亦发表《对学生运动之意见》，表示学生主张“不可厚非，倘能一一贯彻，实可挽回国家民族的危运于无形”[161]。即使是亲国民党的北大校长胡适，虽碍于身份未公开支持学运，但对学运也未大加谴责。他一方面呼吁学生“以理智抑制住感情之冲动”，一方面表示希望当局与校方合作，“保护青年安全”。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蒋介石声色俱厉的讲话的次日发表谈话称，“所谓学生受共党煽惑，此说不甚公平，应当说是青年在困难无路中的烦闷较为合适，一个国家政治未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学生必然要干涉政治”，话中透露出对学生的同情[162]。北平“五二〇”游行未发生大的冲突，与胡适事前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疏通有一定关系。

此次学运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舆论态度。原本立场左倾的上海《文汇报》自不待言，它与《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因被国民党当局认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于25日起停刊。素称中国社会舆论喉舌、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大公报》，其天津版此次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据时人统计，《大公报》天津版在学运期中，发表社论11篇，专论三篇，特写三篇，以及大量的通讯报道，正面反映学运情况，主旨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5月中旬恰在北平、天津公干，他在北平和天津各大学演讲，“简直与学生论调一致”，他对津版编辑部面授机宜，对于学运态度“居中而偏左”。事后他又撰文，表示反内战反饥饿不单是青年学生的要求，实是全国善良人民的共同呼声，并大声疾呼：赶快停战！快快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更是北方人民的生路。因此有人论为：“北方学潮之风起云涌，《大公报》不为无力。另外一点是，除该报的文字号召外，王芸生的口头宣传，得力尤大。”[163]无论此种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对于一年前因《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反对中共攻占长春，而遭中共尖锐批评的《大公报》，此时此刻的言论，表示出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倾向。北平市政府在致蒋介石报告学潮的电文中承

认，“综观此次学潮，社会人士明知学生系受奸匪煽动，但生活不安，人同此感，仍不免寄予同情。客观情势如此，强制消弭，似难奏效”[164]。

“五二〇”大规模游行发生之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于23日的国务会议通过《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和《追加公费学生膳费》案，给学生与公职人员适当安抚；另一方面下令对各地学运加强防范与镇压。淞沪警备司令部、平津警备司令部等军警机关，均发出严禁游行示威的命令，学运在严酷环境下渐趋回落[165]。

国民党指责学生运动为中共“利用之工具”，就前述中共对学运的领导而言，学运当然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国民党并未追问何以学运是中共的工具而不能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根本原因还是国民党战后的一系列政策失去了民心。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承认，中国学生较之其他国家的学生更能反映民心所向，他们是社会中最为敏感的分子；他们日渐同情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非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政府[166]。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国统区学生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167]

与学生运动发生的同时，国民党操纵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内部也在酝酿着和平运动。自抗战胜利后，参政会便甚少开会，制宪国大召开之后，参政会本已失去其作用，但因为民盟拒不参加国大，同时又未退出参政会，国民党还想利用这个机构为自己的政策抹上更多的民意色彩，遂有参政会开会一举。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民盟正好利用参政会这个合法机构和场合，发起反战和平运动，使国民党一时狼狈不堪。

5月20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在学运高潮中开幕，若干参政员发起的和平运动引人注目。民盟参政员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联署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吾人主张，既求政治解决，只有政治解决，凡国内一切政治问题所构成的党派纠纷，必须在和谐融洽之空气中，用协商方式，本着相忍相谅之精神，以寻得结果”。建议：1．依据政协路线，重开和平会议；2．恢复国共联系，商讨停战方案；3．政府停止征兵征粮征实；4．尊重人权，保障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恐怖行为[168]。26日，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讨论和平方案，并邀请中共参政员来京出席。邵从恩、褚辅成、张难先等也提出和平方案，要求“政府重申和平意愿，恢复和平谈判，邀请中共速派代表进行商谈，并由参政会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促进和平”。许德珩、钱端升、周炳琳等亦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169]。参政员的行动实际反映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大公报》为此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认为“国共纷争骑虎难下，仇恨越搞越深，如不猛然回头，速化干戈为玉帛，则兵连祸结，尚无止期”，希望参政会“尽其最大最善之努力，争取和平，务求迅速实现”[170]。

对于学生运动，国民党可取高压手段，但对于合法的参政会，国民党有点无可奈何。5月28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参政会演讲，声称“当前国家最大之隐患，在于是非观念之混淆，与利害认识之不明，以致丧失共同之目标”。何为“是非”与“利害”，蒋责以“在共产党迫使政府不得不以武力遏止破坏统一之武装行动时，而若干社会舆论，只以战争责任加之政府，反对征兵征粮，全不思此种痛苦之原因，系何方所造成”。晚间蒋宴请全体参政员时，更是声色俱厉地说：现政治、经济、军事皆临极危，但最要在明是非。中共区人民还要苦，何以不向他们诉苦，而责我征兵征粮。军警制止学潮，是奉令，不能以昆明事件比。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殉职，是光荣。中共虽暂胜，必为我灭[171]。在当时情况下，蒋的这番讲话，多少给人以色厉内荏之感。在蒋的授意下，国民党参政员在会上大肆鼓吹“唯

有派大军剿共，方有和平，政府是戡乱，不是进行内战”；“与共产党谈和，等于向日本人投降，与土匪妥协，请政府明令讨伐”[172]。结果，会议通过《共军扰乱情势日迫请政府速派大军分路应援以挽危局而救民命案》等“讨共”案，而和谈案则决议交驻会委员会“本此次大会之精神，于最短期间促成和平之实现”[173]。实际上，无论战与和均非国民参政会这样的“民意机关”所能决定，这也是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国民党很快就不需要这个工具了。

尽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若干“和平”议案，但此时已非一年之前，形势的发展已经使中共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对与其谈和根本不屑一顾[174]。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新华社社论，将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称为“不但是一辆破车，并且已经抛锚了。以CC系、复兴系为中心的一切反动派，在这次参政会上结合起来，要帮蒋介石推动破车。但是，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决非他们所能挽救，也决非任何人所能挽救”[175]。

学生运动的猛烈兴起，社会各界的反战呼声，加上经济危机的日甚一日，使国民党疲于应付，统治基础大为动摇。从蒋介石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忧心之虑：“上月间经济、物价、学潮与政治、军事，可谓险象毕呈，尤以参政会开会期间为甚，而奸党之造谣滋事，其势亦几至不可遏止，幸我当机立断，始告平服，现国内部分舆论，虽仍持异议，惟鉴于治乱世用重典之义，此亦良非得已，固未遑葸葸顾虑也。”[176] 蒋心中的“乱世重典”即不久之后出台的“戡乱动员令”。

三　国共对前途的不同估计

1947年年中，全面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国民党未能达成预期目的。政治上，制宪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未能整合社会力量于一个共同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经济上，以黄金潮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起的学潮，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外交

上，不仅对苏外交一筹莫展，对美外交也无重大突破，美国援助未能如国民党原先之预期；最重要的是在军事上，经过一年的战争，国民党承认“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他们认为原因是，“在精神方面国军于抗战胜利后不无和平苟安轻视匪患之观念，缺乏旺盛坚勇积极战斗之意志，稍受挫折，又存惧匪之心理，或有观望不前，消极避战之行动，在指挥方面国军由于江西剿匪及八年抗战习惯过度保守及被动，一般指挥官缺乏独断专行与密切协同之精神，每每行动迟缓，各自为战，频失战机，不但不能制匪，反为匪所制，多因战略上之分离，及战术上之突出，予匪以可乘之机，致遭重大损失，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177]。

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的种种失利，国民党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自信，党内弥漫着一种悲观气氛。一般人不论，即便当初主战最力的人，现在也感到情形之不容乐观。阎锡山致蒋介石函中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病如到了不可救药时再治，那就徒劳了”；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电告蒋，“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178]。蒋介石的头号大将陈诚一方面辩称“自己不能负责，因为命令多不由彼决定或发出”，向人抱怨蒋“几次之不当罚彼经过，直使其不能做下去”；另一方面又大叹“军队根本不够，况尚多不好用者”，“颇露消极之意，谓俟局势稍好转即将引退”，全没有了上年“三五个月解决中共”的“豪气”[179]。作为一个军事行动的旁观者，陈光甫在6月6日的国府会议上听了陈诚的军事报告后写道：我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印象，陈诚将军正面临着困难，战争在继续，而他的战线正越来越虚弱，他的报告充满了踌躇和不定，没有任何最后胜利或何时能得到这样的胜利的保证。这与我一年前得到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在一次蒋介石为欢送何应

钦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任职的聚会上，陈诚和高级军事将领全体出席，大家充满了希望与自信，认为政府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胜利可以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来到，并以共产党的失败而告终[(180)]。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多份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而加速恶化，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开明派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181)]。

不仅是国民党军方对前途不乐观，政界人物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6月18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时局，张继认为，“现在真是江河日下，今日并非不信总裁，不过派往东北军队都是精华，这种精华消耗到不精华将如何。我们不能尽恃命运，到北方不保恐南方亦难保，到那时又将如何”。邹鲁谈及，“我每谈共匪必须打，旁边即有劝我，留点余地吧，可证人心之已死”。原先主张对共缓和的孙科在会上发言：“剿共最少必有两个把握之一，即美国援助吾人剿共，苏联不助共匪扰乱，今可明确的认识，美国不助我内战，而苏联确切的助共叛国，如此我们剿共决无把握。”可见国民党内高层对形势估计极其严重，但如何解救这样严重的形势，众人全无良方。王世杰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不少人主张退出东北，相当多数人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将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彭学沛感叹：“美军部甚悉苏联野心，惜美国政事必听舆论以为准绳，今如有能转移美国舆论之论说在美发表，是最需要最有力的一法。”梁寒操甚至建议在东北实行张治中在新疆所用和苏一法，起用张学良，真给人以方寸尽失，病急乱投医之感[(182)]。陈光甫在进入国府委员会后，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总的印象是：目前的困局找不到出路。军事上，进展不令人鼓舞；经济上，形势是危险的；除非美国大规模经济援助的介入，我看不出目前的形势如何收拾。政府处于无望之中，他们不知该做什么，既没有明确的政策也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183)]。

面对国民党的颓势，蒋介石只能决定动员全部力量，作殊死之搏。国民党军事屡屡失利之后，蒋对军队将领的演讲和训诫明显增加，在鲁南失败之后，蒋更直接走上军事指挥的前台，决定由自己亲自指挥作战。他在高级将领军事研讨会上抱怨说："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他认为"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他告诫军队将领："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184)] 这倒真像一个大家长在苦口婆心地训斥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而且确实如蒋自己所言，是有点老年人的唠叨了，无奈孩子们不争气，令家长也徒唤奈何。从此，国民党军的行动"必受到蒋先生亲署命令方生作用"，更进一步养成了将领们的谨慎心理和依赖心理，更不利于作战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何况，蒋介石的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尤其远隔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即便亲令，也是"一曝十寒，无甚效果"。蒋此举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愈独裁愈不近人才，同时愈不放心人愈非私不用"[(185)]。蒋亲自指挥的结果，并未能改变国民党军事每况愈下的不利局面。

蒋介石挽救危局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全国总动员。由他手批的《剿匪战事之检讨》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不仅为中国国内问题，且有其国际性与世界性，故剿匪军事实为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战争，举凡与战争有关诸条件，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均含于剿匪问题之中。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故剿匪军事，非局部之戡乱，乃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世界战争，即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均非动员不可。"[(186)] 在3月间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案"，

全会宣言并宣称，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实际即预示全国总动员的即将实行[187]。其后山东和东北战场的接连失利、经济紧急措施的失败、学运造成的政治震撼、社会上的谈和呼声，使蒋介石只有使出加强控制，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一招，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危机。5月24日蒋自记：“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略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而此次参政会中，亦既为只求和平不顾利害之空气所笼罩，而本党同志又大都苟且自全，随声附和，革命志业，委以尸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再图军事之进展也。”[188]东北战事紧张之时，蒋介石又记：“东北与华北战局紧张，人心动荡特甚，党内同志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且有主张放弃东北，撤守关内者，余则主张应先决定明令讨共问题，一面全体动员，改革内政与币制，以一民志；一面仍进行宪政，如期召开国民大会。”[189]国民党的政治路向又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戡乱动员”呼之欲出（有关情况请参第十二卷）。

与国民党的悲观沮丧相反，中共内部却洋溢着一派乐观气氛。还在学运兴起之时，毛泽东便兴奋地写道：“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190]6月1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工委刘少奇和朱德去电，谈及“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渐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191]。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对一年的战事作了总结：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在一切区域均已停止，其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但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

（二）第一年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部队，共112万人。

（三）经一年作战，国民党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已陷孤立。

（四）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使敌由数量优势变为劣势。

（五）我已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

（六）第二年作战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192)]。

根据中共公布的战报，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间，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97个旅，78万人，非正规军被歼灭34万人，两者共计112万人，其中被俘68万人。中共部队损失36万人。国民党军净占中共解放区面积19万平方公里，人口1800万人，城市84座。但从1947年3月开始，在国民党最为看重的城市方面，中共所得已超过所失。到6月为止，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只有15个师40个旅，占其总兵力的不到五分之一，表明其攻击力已接近枯竭。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一年战争中，俘毙国民党军将级军官202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9人，“战争的这个令人惊异的特点，最是表现双方士气的悬殊”。所以陕北军事观察家自信地宣称：“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一方愈战愈强大，一方愈战愈弱小，前途胜败如何，人们不难作出科学的判断。”

(193)

还有一件事可作为中共自信心的重要象征。在中共部队的作战方法中，破路一直是重点，抗战刚刚结束时，破路甚至是中共部队最重要的行动。但在1947年6月，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提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仍可予以局部性的战术性的破坏外，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为应予停止。……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194)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195)。这表明中国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展望未来，摆在国民党和中共前面的是两种不同的估计，不同的发展前景，而根据一年来的形势发展，中共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

---

(1) 在鲁南的整二十六师为中央系，整五十九、七十七师为原西北军，整五十一师为原东北军，彼此互有矛盾，打一部他部不会全力增援。

(2) 《鲁南首战以歼敌二十六师为宜》（1946年12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91页。

(3) 《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153页。

(4) 《马励武日记》，《鲁南战役资料选》，第152页。

(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54页。

(6) 《郑州绥署鲁豫边区作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62页。

(7) 陈诚：《告剿匪各部队官兵书》，转引自《大众日报》1947年3月10日。

(8) 国民党政府军的指挥每逢重要战役必定层次重叠，即以鲁南作战为例，南线的指挥层次为：蒋介石——陈诚——薛岳——欧震——各军师长，很难想象在这样重叠的指挥系统下，各部队能有多少主动性的发挥。兼之上级对下级干涉过多，不仅影响下级的独立自主能力，而且上级的指挥也无法适应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这与中共强调在统一指挥下充分发挥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作战指导方针恰成鲜明对比。

(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80页。

(10) 《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1947年1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03—604页。

(11)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71页。

(12) 国民党鲁南会战计划于1月30日下午5时由国防部作战会报讨论，5时半即已为中共通过秘密渠道得知。

(13) 《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1947年1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49页。

(14)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18页。

(15) 《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命令》（1947年2月10日），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编：《莱芜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16) 中共部队当时还缺乏机械化能力，完全靠徒步行军，为了保密只能昼伏夜行，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转进几百里山路，行动是相当迅捷的。

(17) 谢声溢：《徐州绥靖概要》，第85页。

(18) 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1页。国民党军事将领对攻占临沂亦极为乐观。陈诚称“中共之损失极大，现正向鲁西溃退”；“中共此次集合号称二三十万人之众，败后残余渡河者当不过十万人”。空军司令周至柔报告，临沂一战，共军因空军轰炸伤亡七八千人，毁汽车千余辆，陈毅主

力被迫向泗水方向退却（《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17、20日；《郭汝瑰日记》1947年2月15日）。实则中共部队是主动转移，而当时中共部队还很少有汽车，所谓千余辆汽车明显是夸大其辞。这种虚报战果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影响到国民党的作战决策。以至蒋介石其后训诫部下，“过去我们的作战计划往往凭借空军的侦察报告而下判断来决定的，但照这次莱芜战役的经验，空军的侦察并不能作为唯一可靠的根据，以后还是要你们靠陆军本身在前方实地的侦察来决定，前方将领在必要时，就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所得的实际情况，决定计划，独断专行，向敌人进攻”（《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蒋总统集》第2册，第1578页）。

(1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4页。王耀武自始即对李部南下计划态度消极，认为南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且使胶济线兵力空虚。李仙洲南进后亦电告王：鲁南未有决战征候，鲁中为中共根据地，共军决不会轻易放弃。但陈诚认为共军是已败之师，无足顾虑，要王耀武在事关国共存败之时具有决心，顾全大局（《莱芜战役前后敌情综合介绍》，军事图书馆藏档）。

(20) 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1页。

(21)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山东省政协、莱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则认为，“第二绥区未能恪遵本部迭次指示，使新泰莱芜我军坚守待援，反饬令其退却，致于半途遭优势匪军截击，蒙受重大损失”（《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39页）。

(22) 周士观：《回忆我所参加的军事策反工作》，《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1辑，第28—29页。韩后来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国民党最高统帅尚且如此不知彼不知己，何论其下属。其后，蒋一度安排韩为侍从室武官。一年后，由于其与中共的关系暴露，张治中将正在西北任职的韩送往上海，后潜赴香港。

(23) 据王耀武回忆，在他下令撤退前，曾派人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认为：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尾及两侧的安全。而李仙洲在撤退时将此完全置之不顾，使蒋事后大为恼怒（王耀武：《莱芜蒋军

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4—125页）。

(24) 李仙洲：《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91—94页；刘贯一：《关于争取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月3日），《莱芜战役纪实》，第104页。

(25) 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进占临沂的国民党军离华野预定在北线发起攻击的时间（最早为18日）不过四天距离，如其继续前进，“则在我打响第二天即可赶上与北线之敌会师”（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298页）。国民党方面在战后总结中也认为，徐州绥署未能“使欧震兵团适时迅速放胆跟踪追击，进出蒙阴新泰，致匪得以充裕时间，集中全部兵力，围攻我新泰莱芜。至廿四日，徐州绥署始转用十一师六十四师由临城北进，已不及挽救战局”（《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39页）。

(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2页。

(27)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94页。国民党自己也承认，“我方情报每欠确实，易受匪方宣传所惑，且传递迟缓，多失时效，致影响上级指挥官之判断”。这其中原因很多，但国民党军脱离群众当为重要原因之一。国防部甚至在作战总结中提出，“我部初至一地时应避免人民之一切招待，并与人民断绝往来为原则，盖匪常假装民众，乘机暴动，使我措手不及”（《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39、43页）。

(28)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莱芜战役纪实》，第287页。

(2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8页。

(30) 《陈诚对鲁南战役的检讨》，军事图书馆藏档；《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韩浚：《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和整编第四十六师莱芜就歼纪实》，《莱芜战役纪实》，第287、162页。

(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5—396页。

(3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

(33)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7、30日。某次，郭汝瑰至徐州总部与顾研讨作战计划，当要写下来时，顾“噜苏半天，于大处全得不着要领”，可见其在一般军事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8日）。

(34) 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

集》，第304页。

(35) 《徐永昌日记》1946年12月3日。

(36) 《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19日。

(37) 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绥靖作战检讨》（二），第75—78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3页。

(38) 《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第一次战术小组讨论一般战法综合汇编》，《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

(39) 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40) 《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34—335页。据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所谓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的原始资料，而系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同前，第335页）。但据时任国防部三厅厅长、主管作战的郭汝瑰的回忆，国民党军攻占延安之后，蒋介石即令国防部三厅研究陕北战事结束后的兵力转用计划，三厅提出的方案是：1．局部各个击破案，即以主力监视中共主力，然后选择局部目标，集四五倍于敌的兵力加以歼灭；2．主力决战案，可选三个主攻方向，山东、豫北或陕北。结果蒋选择了山东。郭认为“这便是以后山东重点进攻的由来”。“进攻山东，是他主观以为进攻延安后，就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蓄谋已久。他之所以选定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是想为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撑持门面，借此以证明解放军不能‘负隅’，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很有把握罢了。但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由此可见，蒋介石配合协调各战区的本领很差，很不高明”（《郭汝瑰回忆录》，第243—244、420—421页）。如据郭的说法，则所谓重点进攻更可能是蒋介石本人根据战场情况的适时决策，而非事前精心计划的结果。

(42) 《陆总徐州司令部鲁中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7册；《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50页。

(43) 《郭汝瑰日记》1947年4月18日。

(44)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1947年5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45) 《放弃歼敌十一师的计划拟一部南下鲁南华中》（1947年5月3日陈粟给军委的报告），《孟良崮战役》，第31页。

(46) 《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1947年5月4日）、《不性急不分兵诱敌深入相机歼击》（1947年5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2、59页。

(47) 据战后国民党军战俘云，顾祝同认为当面情况不明朗，北进有风险，但陈诚以整七十四师战斗力强，可以造成有利战术形势为辞，力主即行北进（《孟良崮战役》，第249页）。

(48) 蒋介石曾令汤恩伯“先发制人”，“惟第一步行动，必须快速，最好改变我军向来重装迟钝、日行夜防之旧习，而转为轻装远探、夜行晓击之新作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25页）。但前线指挥官的普遍心态是避免决战，企图以其兵力优势压迫中共部队北撤，或等中共部队疲惫后再行出击，可以自保兼邀功。此一战略上的速决和战术上的犹豫不决构成了很大的矛盾，为中共创造了作战机会。

(49)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18页。国民党通过情报得知坦埠为华野指挥部所在地，企图一举摧毁华野指挥中心，但华野指挥部此时已移至坦埠东北的西王庄。

(50) 《须不失时机歼击一路好打之敌》（1947年5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70页。

(51)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孟良崮战役》，第213页。

(52)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孟良崮战役》，第216页。

(53)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4日。

(5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9页。

(55) 第十九旅一个团撤至张部附近，后奉令掩护张部右翼，于战中被歼。

(56) 《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孟良崮战役》，第252页。

(57) 《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孟良崮战役》，第251—253页。

(58)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32—433页。关于这一点，粟裕在莱芜战后总结中已有精辟的说明："敌人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怕分散为我各个歼灭，随时将兵力集中。加上部队素质差，因此抓得更紧，靠得更拢，四五万人挤在东西六七里、南北仅三四里的狭小区域内，无法展开，在我炮火杀伤后迅速为我歼灭。这从反面说明了兵不在多，而在于谁能首先展开兵力火力，并高度发挥其作用，谁就能胜利。"（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308页）孟良崮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

(59)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1页。

(60)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3页。

(61)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7页。

(6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6页。

(63) 国民党方面一直称张灵甫等为自杀，此处据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据最后调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64)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8—429页。

(6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56页。

(6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页。

(6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2—463页。此役李天霞的整八十三师和黄百韬的整二十五师离张灵甫最近，但两部先则后退，致整七十四师被围，后又未积极救援。蒋介石严令李天霞17日到达孟良崮，但李部直至19日才到。李天霞打仗惯于保存实力，自诩为打巧仗，不打硬仗。上年苏北作战已受过撤职留任处分，此次战后李天霞被撤职查办，但最后仍不了了之，1948年复出担任徐州"剿总"下辖的第一绥靖区副司令。黄百韬则

受到告诫处分，因他非黄埔出身，自感后台不硬，此后作战较为积极。汤恩伯也于战后被撤职，由范汉杰接任。

(68)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7、1日。

(6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1页。

(70) 《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55—57页

(71) 《军委关于歼灭第七十四师的意义及下一步行动方针给陈毅等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2页。

(72) 於凭远、罗冷梅等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77页。

(7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8页。

(74)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86页。

(75) 《西安绥署延安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9册。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延安的全部部署当时就由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传给了延安。熊自1939年起即在胡身边工作，国民党1943年6月进攻延安的计划，1946年5月进攻中原的计划，都是由熊传给中共。此次进攻延安情报的传递堪称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一次成功的情报杰作（参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76) 《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战局形势的通报》（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26页。

(7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23页。

(78)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0页；《郭汝瑰日记》1947年3月21、22日。但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认为，“延安为一空城，攻延安无非关闭和谈之门，且可使世界知政府有力攻占延安而已，军事上无何价值可言也”（《郭汝瑰日记》1947年3月14日）。

(79) 《瓦窑堡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9册。

(8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78页。中央工委后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留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同前，第181页）。

(81)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563—564页。中共中央留在陕北，恰恰印证了国民党内对占领延安不以为然者的担心。徐永昌认为，延安被占后，“陕北共党若折回扰胡宗南之后，则可征其有力，如被迫仅至扰晋，则无能为矣（吾将以此测中共前途）”（《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1日）。事实证明了徐之担心。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1页）。

(82)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1947年4月9日的通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7页。

(83) 《关于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九个电报》（1947年4月2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84)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确切行动去向，国民党始终未能真正搞清。6月8日，胡军刘戡部曾进至离毛泽东等在靖边县王家湾的驻处只隔一个山头处，当晚，中共中央紧急转移，次日脱险。以中共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和国民党十余万大军周旋一年而安然无恙，亦可谓战争奇观。

(85) 胡宗南年谱称：“我则全待后方补给，车运艰难，虽有延咸、榆延、延洛、清绥诸公路，时遭阻截，以至前方士兵，既须裹粮而战。部队则须易地取粮。溯自延安作战之前，联勤总部仅补给干粮十五万份，以后即无补充，陕西省府军粮支应，尤乏热忱，后勤如此，每致影响战机，如四月三日我整一、整九十师会克瓦窑堡，次日即以粮尽，回至永平；十六日整一军再克瓦窑堡李家岔，十八日须南下补充；五月七日整二十九军到林家畔高家河，整一军到刘子坊坪，皆以粮尽空投补给。”（《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07页）

(86)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8—1119页。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进入延安后，仔细看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宅，在枣园毛泽东住处，发现一张纸条，上写：“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第80页）胡军在陕北的行动恰成此写照。

(8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782页。胡军在陕北作战期间，基本没有实地情报，只靠空军侦察和电台测向，所知极为有限。加以陕北人烟稀少，地处荒凉，后勤供应大成问题。整一师师长罗列向胡宗南报告：“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营，构工戒备，

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衰，且士气已远非昔比。临履实境，时切心痛。”（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88)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6页。

(89) 《贺龙年谱》，第440页。

(9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783页。

(91) 《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1947年5月9日），《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第155—158页。

(92) 东北国民党将领对停战多不以为然，认为“军事不宜久停，若再拖延半载，则匪势坐大，不堪收拾”（《熊式辉日记》1946年8月22日）。

(93)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杜此一计划9月间已拟好，因国民党正集中注意力于张家口战役而暂缓进行。

(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621页。宋子文因担心进攻安东可能引起马歇尔的不满，曾面请蒋停止进攻，但为蒋所拒。

(95) 《林彪彭真陈云致萧华等电》（1946年10月20日），陈廉：《决战的历程》，第273页。

(96) 《辽沈决战》（下），第623页。

(97) 《南满集中主力歼敌拖延敌对北满进攻》（1946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7页。

(98) 《熊式辉致蒋介石函》，1946年11月21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99) 国民党在东北（包括热河）当时有7个军（21个师）约20万人，特种部队5万人，地方部队15万人，总共40万人。还在东北大规模战斗爆发之前，林彪便分析了国民党的弱点：“顽在东北的最大困难，为彼如兵力集中，则广大地区落在我手，且无法寻求我决战；彼如分散，则被我各个击破。其进攻时，如兵力在一师以下，则有被我消灭的最大可能；若分兵守碉，则一营以下即有被我消灭的危险。”（《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23日）

(100)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446页。

(10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41页。

(102) 陈廉：《决战的历程》，第396页；《萧劲光回忆录》，第363页。

(103) 《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1947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藏中央档案馆，第77页。

(104) 《钳制关内敌军配合东北作战》（1947年5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66页。

(1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57页。

(1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4—467页。

(107)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阵中日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108) 郑洞国认为，当时如果中共部队立即向四平攻击，四平可能守不住，但因为中共部队在四平外围“忙于分兵略地”，使陈明仁“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457页）。其他国民党战场指挥官也有同样看法。

(109) 陈明仁：《四平之战》，《四战四平》，第349页。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5页。

(111) 据亲历守城战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回忆，守卫铁西的八十八师师长彭锷打到最后，只身逃到铁东，陈指示下属不准放过来，“后来还是下面私自放他过来的”。而已经当过一次俘虏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建议陈明仁突围，陈板面告之：如再有胆敢言突围者，以扰乱军心论处，立即枪毙！（熊新民：《一九四七年四平战役回忆》，《四战四平》，第355—356页）

(112) 《四平兵团防守计划》，《四战四平》，第433—438页。

(113) 陈明仁认为八年抗战都未遇到如此猛烈的炮火，熊新民则称“战斗之残酷，真是不堪回忆”，“是我生平打街巷战斗中最残酷的一次”（《四战四平》，第350、354—355页）。

(114) 《阵中日记》上册，第292页。

(11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9页。

(116) 参李天佑：《四平攻坚战总结》，《四战四平》，第143—156页。

(117) 《阵中日记》上册，第287页。即便在晚间，守军也使用照明弹或柴油照明，协助防守。

(118) 据国民党资料统计，其空军在四平作战过程中各型飞机出动2000架次以上（《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716页），蒋介石称其为“第一首功”。

(119) 《东北一年》，《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52页。

(120) 杜鲁门在其声明中曾声称美国援助将给予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这也是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目的之一。政府改组后，经济部长陈启天即以非国民党籍部长身份，向美国要求二三十亿美元的大规模援助，并称，美国不能待和平及政治改善后，援助中国，倘是项援助无望，则中国只有面临经济崩溃之途，而美国亦不免受其后果（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34页）。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即将举行，也是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动因之一。

(121)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6页，1947年印本。

(122) 《宪政实施准备案》（1947年3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页。

(123) 《民社党张君劢上蒋主席告各党参加政府之意见函》（1947年3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5页。

(124) 《陈布雷副秘书长上蒋总裁报告讨论国府改组后之施政方针案情形呈》（1947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5—797页。

(125) Chang Chun-mai to Wedemeyer，July 26，1947，*Chang Kia-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26) 据张君劢对董必武所言：为安插追随其个人数十年之党员及维持其生活起见，故参加政府之立、监两院及参政会与宪政实施促进会四机构，希望中共予以谅解（《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70页）。

(127) 因为入阁一事，民社党内意见不一，1947年5月，民社党中常委孙宝刚等因不满张君劢作为，成立革新委员会，8月，副主席伍宪子等人亦参加革新委员会，在《告全国同仁书》中，指责张君劢“自食其言的参加了国

大，接着又忸忸怩怩的参加了所谓四民意机构，又支离破碎的参加了国府。……张氏受少数人的把持，竟一意孤行，前后翻覆，置大多数同仁意见于不顾”（《中国民主社会党》，第414页）。结果造成双方均自开代表大会，自称代表民主社会党的情况出现，民主社会党最终分裂。

(128) 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青年党则因党中闲人甚众，亟思借参加政府而多获位置，对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思取得甚多之位置，对今后政治之改进，似无任何真正理想或信仰（《王世杰日记》1947年3月3日）。

(129) 《陶希圣函陈民社党青年党方面之希望》（1947年3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4页；《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7页。青年党首领曾琦曾经坦率地告诉蒋介石：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黄炎培日记》1946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5页）。陈启天出任经济部长后，党内某老至其家，边哭边说：“不给我做次长，我便死在这里不走。”（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27页）

(130) 中央训练团编：《宪政实施参考资料》，第266—268页，1947年印本。

(131) 蒋介石曾想提胡适为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他亲自敦请胡出任此职，并请王世杰和傅斯年促胡接受，但胡表示不入政府则能为政府之一助力，终未接受（《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9日）。

(132) 民社党原提4人，由于徐傅霖坚辞（表示不愿干空头委员），临时未任命，直到6月6日，徐才被任为国府委员。伍宪子表示在党内纠纷未决前，暂不就职，8月15日，国务会议免去其委员职务。

(133) 《蒋主席为国府改组成立发表谈话》（1947年4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8—799页。

(134) 李璜被任命后一直未上任，原因是“经济部职权太小，吃力不讨好，党徒欲进经济部者太多，难以完全容纳，次长人选争夺剧烈，深恐开罪一方；又加以其川康干部多不主张就任，李璜因鉴于种种困难，为保持其干部信仰及领导地位，故坚决不就经济部长”（《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6—307页）。青年党改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常乃悳任国府委员，郑振文、杨永浚任政务委员，5月18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135) 李大明当时滞留美国未归，不久后又参加民社党革新派，8月15

日，国务会议免其委员职务。

(136)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97页。张群对于政府的前途并不乐观，他坦率地对黄炎培说：我是没有办法才上台的，国民党关系四十年，蒋关系四十年（《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4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2页）。

(137)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1947年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0页。

(138) 《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1947年4月22日），《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8页；《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1947年4月25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21页；《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19日。

(139)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经过的专报》，1947年9月15日，《中国青年党》，第312页。在青年党十一大上，决议向国民党交涉开放地方政权，解除各地方党政军对青年党之压迫歧视，如无圆满结果，则考虑退出政府（《中国党派》，第108页）。

(140)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234；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9，27，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p．90，99．

(141) 司徒雷登直率地对急于得到美国援助的蒋介石说，他尚未得到任何指示，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美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任何可能采取的财政援助应该真正有利于全中国人民，而不是任何派别或集团，这样的援助不应使内战延长，也不应使内战中的一方得益。短期内，政府应尽快结束主动的军事行动，同时向共产党敞开大门。目前的政府改组，应使未来进一步的改革成为可能。这是华盛顿的中国友人和所有热心公益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5，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99）。

(142)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21、169页。

(143) 《须要替老百姓找生路》，《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13日。

(144) 《向炮口要饭吃》，1947年印本，第46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

页；《在第二条战线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145) 《严重的教育问题》，《益世报》（北平）1947年2月23日。

(146) 上海复旦等4所国立大学校长致电教育部称，“教职员生活困苦已达山穷水尽之境，非空言所能慰藉，务恳迅予提高待遇”；北大教授180余人透支4亿元，其中最多者为600余万元，校方称，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清华大学教职员要求，“迅照现实物价指数，调整公教人员生活待遇，俾能略具薪水之资”；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批评“教育经费太少，故教师待遇很低”，决议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当考虑适当步骤以求上列决议案的有效实施”（《文汇报》1947年5月3日；《大公报》（天津）1947年5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13日）。

(147) 《文汇报》1947年5月14日。国民党对于学生要求自有说不出的苦衷。全国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有36万，每月每人需供米2.3斗，副食费为学校所在地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的七分之一，以5月的市价计，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中，两者合计每人每月共需十万余元，即国库每月需支出360亿元左右。如按学生要求的副食费增加一倍，则每月又需多支出200亿元（《学风与学潮》，华北日报社1947年印本，第24页）。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国民党迟迟不能作出决断，也就无法扼止学潮的发生。

(148) 《文汇报》1947年5月16、17日。

(149) 《北京大学学生罢课宣言》（1947年5月18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第134页。

(150) 《王世杰日记》1947年5月16、18日。

(15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5月28日，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在蒋介石邀宴时，述特警凶暴殴学生状，蒋居然不顾以往惯用的礼贤下士的风度，愤愤地说，是我叫他们打的，他们奉我命令打的，他们是自卫，否则学生打他们了（《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在著名教育家、且为女士的吴贻芳面前，蒋如此失态，可见其面对国民党政权危机时的真实心态。司徒雷登认为，蒋委员长和他周围的负责官员将学潮归之于中共和民盟的煽动，他们不能理解民众的诉求，倾向于武力镇压，反而对共产党有利。他们高估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既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而只是中国人，关心自己的生存状况，即便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激进行动，首先也是由于物质

的痛苦和精神的幻灭。把这些归于共产党的阴谋，并企图以残暴的武力消灭之，只能加剧已有的不满（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4，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114）。

(152) 《教育部饬令所属执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代电》（1947年5月18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241页。

(153) 《京沪苏杭区专科以上十六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宣言》，《京沪苏浙各大专学校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口号》（1947年5月20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246—247页。

(154) 《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请愿书》（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第160页。

(155) 《中央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的指示》（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83—385页。

(156)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9页。

(157) 《中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5页。

(158) 中共对学运的领导，由各地地下组织通过学委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参《在第二条战线上》一书。

(159) 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观察》第2卷第17期。

(160) 中大《公报》1947年5月23、25日，引自《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391—392页。

(161) 《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30日、6月3日；《益世报》（天津）1947年5月29日。

(162) 《最近学潮之起源及其演变》第4辑，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62页；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163) 王芸生：《我看学潮》，《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25日；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观察》第2卷第17期。《大公报》上海版因处于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态度没有天津版激烈，对政府和学生两面都予敷衍。

(164) 《国民政府文官处抄送北平市政府有关学潮密电》（1947年6月6

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345页。

(165) 此次学运的悲剧一幕发生在5月31日晚，武汉军警包围武汉大学，进行搜查，次日凌晨，军警枪击企图解救被捕同学的学生，结果打死三人，打伤十余人，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因此而被撤职查办。

(166) 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 pp．188—189．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学生运动的目的本来并非是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只不过是因为对它的腐化无能不满而要限制它的权力而已，他们中的多数人显然并不赞成共产党统治全国的想法，但国民党的种种作为，使学生日渐疏远政府，使自己的群众支持减少到了最低点，同时扩大了其政治对手的群众支持（Pepper，*Civil War in China* ，pp．43，69，93）。

(167)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0—1121页。

(168)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1947年5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33—334页。此次会议开幕前，民盟中常会认为参政会与国大及宪法毫不相干，决定民盟参政员出席此次参政会，以“反映人民意见”，“代表人民呼吁”，同时要求“本盟各地组织应立即就近与民主团体联合，策动——争取和平阵容与当前之和平运动相配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对于五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之决定》，1947年5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28页）。

(169) 彭静中：《“和平老人”邵从恩》，《文史资料选辑》第101辑，第182页。

(170) 《读收复区视察报告》，《国民参政会大会开幕》，《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16日、5月20日。

(171)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1—132页；《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

(172)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12页。

(173)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17页。

(174) 此时国民党与中共唯一的联系渠道是解放区救济总会驻上海办事处，但试探的结果，救总称与解放区很难联系，对国民党的试探置之不理。

(175) 《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30页。

(1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2页。

(177)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51页。

(178) 《徐永昌日记》1946年2月25日、5月20、28、29日；《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9页。

(179) 《王世杰日记》1947年5月31日；《徐永昌日记》1947年6月8日。

(180) Chen Kuang-pu Memo．，June 7，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s*， Box 7，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81)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1，pp．238-241．

(182) 《徐永昌日记》1947年6月18日；《王世杰日记》1947年6月18日。国民党寄予希望的美国，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颇为失望，自无再全力相助之心。据司徒雷登在南京告诉黄炎培：蒋无能，且战败，美决不助蒋，美愿调国共（《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

(183) Chen Kuang-pu Memo．，May 24，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 ，Box 7，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84) 《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30页。

(185) 《徐永昌日记》1947年5月29日、7月30日、9月28日、11月22日。

(186) 《剿匪战事之检讨》，第1—2页。

(187)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1页。

(18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下），第459页。

(1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下），第479页。

(190)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3页。

(191) 《致朱德刘少奇》（194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192)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0—262页。

(193)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及陕北军事观察家的评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0—550页。蒋介石亦承认，“自从去年七月开始剿匪以来，我们前方有若干师旅团部高级指挥干部为匪所袭击，指挥官且被匪所俘，这不仅影响一部分的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剿匪必胜的事实》，1947年5月12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05页）。

(194) 《中央关于停止破路的指示》（1947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60页。在中共第一个反攻地区东北，毛泽东在4月26日即致电林彪，“我们感觉似不宜再破路”，“不久将来即可全为我用，若再破坏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5页）。

(195)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6页。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军事图书馆藏档，北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北京

中央档案馆藏档，北京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张嘉璈著，*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郭汝瑰日记》（稿本），军事博物馆藏，北京

《熊式辉日记》，*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张发奎日记》，*Chang Fa-kue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执行部谈判总结》（稿本），1948年4月，军事图书馆藏，北京

《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编，中央档案馆藏，北京

中文著作

《八十年来》，黄炎培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财政年鉴》，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南京，1948

《陈公洽与台湾》，南瀛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7

《陈果夫传》，徐泳平著，台北，正中书局，1978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全国政协、浙江省政协、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陈毅年谱》，刘树发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编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陈长官通知辑要》第1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机要室编，台北，台湾省印刷纸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

《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台北，194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出版社，1993

《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冷欣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

社，1967

《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郑维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刘武生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向晖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第六战区受降纪实》，第六战区参谋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第一期复员军官佐十五万人个别转业训练计划》，出版地不详，1946

《第一期军事小组讨论大纲及参考资料》，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第一战区受降纪实》，第一战区参谋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东江纵队史料》，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董必武年谱》，《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二二八事变始末记》，黄存厚辑，南京，扫荡周报社，1947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著，赖泽涵总主笔，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冯洪达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傅长官讲话》，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编，1947

《冈村宁次回忆录》，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革命文献》，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耿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顾维钧回忆录》，第5、6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1988

《广东受降纪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国防部改组纪要》，国防部史政局编，出版地不详，1947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提案原文》，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7

《国民参政会纪实》，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7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之答复》，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会议纪录》，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实录》，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特辑》，黄香山主编，南京，东方出版社，1947

《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三军大学”编，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郭汝瑰回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第1辑，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和平民主的道路——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一》，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针——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二》，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和谈覆辙在中国——知难行易在美国》，张九如著，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贺龙军事文选》，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贺龙年谱》，李烈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贺龙传》，《贺龙传》编写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胡琏评传》，王禹廷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北京军区《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编写组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分册，《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48

《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王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黄炎培年谱》，许汉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寄园回忆录》，陈启天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

《蒋介石的经济危机》，中国问题研究社编，华北新华书店，1947

《蒋经国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蒋主席最近言论》第1辑，上海，国际出版社，1945

《蒋总统集》，“国防研究院”编，台北，1960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

《剿匪战事之检讨》，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全国政协等合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洪桂己编，台北，“国史馆”印，1986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5卷，张蓬舟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著，北京，三联书店，1963

《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黄逸峰、姜铎、唐传泗、徐鼎新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决战的历程》，陈廉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军事调处在徐州》，谢端尧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晋察冀日报资料科编，出版地不详，1946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抗战后期反间活动》，陈恭澍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抗战胜利的代价》，许倬云、丘宏达主编，台北，联合报，1986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出版地不详，1945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出版地不详，1946

《莱芜战役纪实》，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莱芜战役资料选》，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李达军事文选》，《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李聚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李宗仁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宁，1980

《涟水保卫战》，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台北，1985

《辽沈决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刘伯承用兵要旨》，杨国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

《刘少奇年谱》（1898—1969），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鲁南战役资料选》，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罗瑞卿传》，黄瑶、张明哲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罗荣桓传》，罗荣桓传记编写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马叙伦政论文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周永林、张廷钰编，重庆出版社，1983

《毛泽东军事年谱》（1926—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逄先知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泽东文集》第3、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陈大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孟良崮战役》，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贾士毅著，台北，正中书局，1970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於凭远、罗冷梅等编，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

《民联政治报告》，香港，民潮社，1947

《民主同盟文献》，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南京受降记》，严问天等编，贵阳，四人出版社，1945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传记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聂荣臻传》，《聂荣臻传》编写组编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配合军事收复苏北紧急措施方案》，江苏省政府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彭德怀军事文选》，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彭德怀年谱》，王焰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彭真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出版地不详，1958

《评二中全会》，学习知识社，出版地不详，1946

《评中美商约》，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研讨股编，出版地不详，1947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薄一波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全国粮食概况》，行政院新闻局编，出版地不详，1947

《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出版地不详，1945

《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台北，1966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戎马生涯的回忆》，曾克林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山海关之战》，袁伟主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善后救济总署》，蒋廷黻著，出版地不详，1945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2

《胜利前后》，邵毓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实施宪政》，秦孝仪主编，台北，1978

《石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1947），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出版地不详，1989

《四战四平》，高永昌主编，长春，1988

《宋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董彦平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苏联出兵东北》，孟宪章、杨玉林、张宗海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苏中七战七捷》，《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粟裕军事文集》，《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国防部编，出版地不详，1948

《绥靖区行政法令汇编》第1辑，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绥靖政工手册》，出版地不详，1946

《台湾光复初期历史》，赖泽涵主编，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

《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南京出版社，1989

《台湾事变内幕记》，唐贤龙著，南京，中国新闻社出版部，1947

《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陈士榘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88

《天山雄鹰》，赛福鼎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张大军著，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往事沧桑》，伍修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伪满覆亡》，孙邦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我的历程》，伍修权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我与民革四十年》，朱学范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

《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2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87

《五五宪草之评议》，孔繁霖编，南京，时代出版社，1946

《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主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编，出版地不详，1946

《宪政实施参考资料》，中央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向炮口要饭吃》，出版地不详，1947

《萧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北京，新华通讯社编，1960

《新华社评论集》（1947—1950），北京，新华通讯社编，1960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张大军著，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新疆革命史》，朱培民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出版地不详，1946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徐州绥靖概要》，谢声溢编，出版地不详，1946

《学风与学潮》，北平，华北日报社，1947

《杨伯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编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镇华出版社，1946

《一二·一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王昊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1942—1946年的远东》，［英］琼斯、博顿、皮尔恩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高雄，世界出版社，

1972

《忆南征》，王首道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忆往谈旧录》，梁漱溟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越南受降日记》，朱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在第二条战线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凌其翰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国史馆”编，台北，1984

《战后中国的两条路线》，徐林仪编，山东新华书店，1946

《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著，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张宗逊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阵中日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政海秘辛》，程思远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

《政协文献》，历史文献社编，出版地不详，1946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9

《政治协商会议文献》，立华编，北平，中外出版社，1946

《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李炳南著，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

《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李旭编，南京，时代出版社，1946

《政治协商会议之经过及有关文件》，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制宪述要》，《雷震全集》第23册，雷震著，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6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陈昭桐主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中国党派》，南京，中联出版社，1948

《中国各党各派现状》，卫聚贤编，重庆，说文社，1946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北平市宣慰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中国各民主党派》，于刚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3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北京，长征出版社，199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青年远征军第二〇八师政治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出版地不详，1947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7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参考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1961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史转捩点》，蒋匀田著，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中国近代珍藏图片库——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万仁元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4

《中国经济年鉴》，狄超白主编，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

《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东北日报社编，佳木斯，东北书店，1947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张军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中国民主社会党》，方庆秋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青年党》，方庆秋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2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1996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北京，1951

《中国通货膨胀论》，杨培新著，上海，生活书店，1948

《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著，杨志信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吴东之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往何处去》，上海，文化出版社，1949

《中国现代军事史》，刘馥著，梅寅生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李华兴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彭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战区受降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史画》，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朱汇森主编，台北，“国史馆”，1988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6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

《中华年鉴》，南京，中华年鉴社，194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央银行史话》，寿充一、寿乐英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原突围》第1、2、3辑，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986

《中原突围纪事》，李少瑜等编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中原突围前后》，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中原突围史》，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钟期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周恩来军事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周佛海狱中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袁伟、吴殿尧主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最近学潮之起源及其演变》第4辑，时代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7

中文报纸

《大公报》，重庆、上海、天津

《大众日报》，山东

《和平日报》，南京、上海

《华北日报》，北平

《解放日报》，延安

《晋察冀日报》，张家口

《申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世界日报》，北平

《文汇报》，上海

《新华日报》，重庆

《新民报》，重庆、上海

《益世报》，北平、天津

《中央日报》，重庆、南京、上海

中文期刊

《党的文献》，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观察》，上海

《国民政府公报》，重庆、南京

《国史馆馆刊》，台北

《近代史研究》，北京

《近代中国》，台北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群众》，上海

《时与文》，上海

《世纪评论》，南京

《世界知识》，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消息半周刊》，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再生》，上海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传记文学》，台北

英文档案文献

Arthur N. You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Chang Kia-ngao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Chen Kuang-pu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Chen Li-fu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T. V. 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Wellington Koo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Wu Kuochen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英文著作

Beal，John Robinson．*Marshall in China*，Doubleday Canada，Toronto，1970

Belden，Jack．*China Shakes the World*，Victor Gollancz，London，1951

Chen，Kenneth S．*Dilemma in China*：*America's policy debate*，1945，Hamden，Archon Books，1980

Cheng，Yui-kui．*Foreign Trade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Washington D．C．，1956

The China White Paper，Originally Issued a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Far Eastern Series 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

Directory of 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A Guide to Nearly 400 American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d．，New York，1946

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Ferver，John H．*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1945-1950*：*the Policy of Restrained Intervention*，Michigan University，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Garver , John W .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 1937-1945*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1988

Gosgrove , Julia F .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 1943-1946* , Ann Arbor , 1983

Levine , Steven I . *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 1945-1948*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1987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 Inc . Arlington , Virginia , 1976

McLane , Charles .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1958

Pepper , Suzanne . *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 , 1945-1949*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rkeley , 1978

Pogue , Forrest C . *George C . Marshall-States Man* , Viking Penguin Inc . New York , 1987

Rea , Kenneth W . and Brewer , John C . edited ,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rat , 1946* , Westview Press Inc . , Boulder , Colorado , 1981

Schaller , Michael .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 1938-1945*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1979

Stuart , John Leighton .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 Random House , New York , 1954

Truman，Harry S．*The Memoirs of Harry S．Truman*，Vol．1，*Year of Decisions—1945*，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Hodder and Stoughton Ltd．，Suffolk，1955，1956．

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Van Slyke，Lyman P．*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7

Wells，Sumner．*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Harpes and Brothers，New York，1951

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

英文期刊

Dennett，Raymond．and Turner，Robert．eds，*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9，New Haven，1950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巴索夫

阿合买提江

艾德礼（Clement Attlee）

艾力汗·吐烈

艾奇逊（Dean Acheson）

安若定

安藤利吉

B

巴　金

巴佛洛夫斯基（Павловский）

白崇禧

白林克（F．C．Brink）

白鲁德（Henry Byroade）

坂西一良

包尔汉

鲍　莱（Pawley）

贝　文（Ernest Bevin）

贝尔纳斯（James Byrnes）

贝鲁罗索夫（Белуросов ）

贝祖诒

彼得洛夫（А．А．Петров ）

薄一波

C

蔡仁杰

蔡廷锴

蔡文治

蔡云祈

蔡宗濂

常乃悳

陈　诚

陈　赓

陈　群

陈　仪

陈　毅

陈　云

陈璧君

陈布雷

陈春圃

陈此生

陈大庆

陈公博

陈光甫

陈果夫

陈纪滢

陈立夫

陈明仁

陈铭枢

陈启天

陈绍宽

陈士渠

陈文溪

陈修和

陈雪屏

城野宏

程　潜

程世才

程思远

程义法

程子华

澄田徕四郎

楚图南

楚溪春

重光葵

褚辅成

褚民谊

崔宝山

D

戴　笠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之奇

邓初民

邓为仁

邓文仪

邓小平

邓颖超

丁默邨

董　钊

董必武

董其武

董时进

董彦平

董英斌

杜斌丞

杜建时

杜鲁门（Harry S．Truman）

杜曼宁

杜聿明

杜月笙

F

范汉杰

范明枢

范朴斋

范绍增

方　治

费孝通

冯文彬

冯玉祥

冯治安

冯仲云

傅秉常

傅式说

傅斯年

傅作义

G

甘乃光

甘重斗

冈部直三郎

冈村宁次

冈田梅吉

高　岗

高崇民

高崎达之助

高桥坦

高树勋

高倬之

葛敬恩

根本博

耿　飚

谷寿夫

谷正纲

顾维钧

顾锡九

顾祝同

关麟徵

郭　忏

郭寄峤

郭沫若

郭汝瑰

郭子祺

H

哈考脱（Harcourt）

哈里曼（William Harriman）

海思凯

韩　浚

韩练成

韩兆鹗

郝鹏举

何汉文

何鲁之

何其巩

何绍周

何思敬

何思源

何应钦

何柱国

贺　龙

赫尔利（Patrick Hurley）

赫斯特（Willan Randolph Hearst）

侯野君

胡　琏

胡　霖

胡　适

胡海门

胡厥文

胡临聪

胡乔木

胡世泽

胡毓坤

胡志明

胡宗南

华　岗

华西列夫斯基（A．M．Василевский ）

黄　华

黄　镇

黄百韬

黄朝琴

黄克诚

黄少谷

黄炎培

黄宇人

黄镇球

黄自强

霍宝树

霍华德（Roy Howard）

霍揆彰

J

矶谷廉介

吉　伦（Alvan C．Jr．Gillem）

戢翼翘

江亢虎

蒋伯诚

蒋光鼐

蒋介石

蒋经国

蒋梦麟

蒋廷黻

蒋匀田

今井武夫

金璧辉（川岛芳子）

近藤新八

酒井隆

居　正

K

康有为

柯远芬

克拉夫钦科

孔祥熙

蒉延芳

L

赖　琏

赖希木江

蓝　鹏

雷　震

雷法章

雷奋强

雷洁琼

冷　欣

李　达

李　海（William D．Leahy）

李　璜

李　文

李　新

李大明

李敷仁

李富春

李公朴

李济深

李鲁连

李默庵

李品仙

李荣伦

李圣五

李天霞

李天佑

李惟果

李维汉

李文山

李仙洲

李先念

李延年

李翼中

李玉堂

李运昌

李章达

李兆麟

李烛尘

李卓敏

李宗黄

李宗仁

笠原幸雄

连震东

梁寒操

梁鸿志

梁启超

梁漱溟

梁兴初

廖　昂

廖承志

廖耀湘

列　宁（В．И．Ленин ）

林　彪

林　枫

林　蔚

林柏生

林伯渠

林东海

林凤苞

林继庸

林江迈

凌　霄

凌鸿勋

凌其翰

刘　斐

刘　戡

刘　晓

刘　峙

刘伯承

刘长胜

刘攻芸

刘翰东

刘鸿生

刘健群

刘孟纯

刘乃沂

刘清扬

刘汝明

刘少奇

刘文岛

刘文辉

刘亚楼

刘野樵

刘玉章

柳川平助

柳亚子

龙　云

卢　汉

卢　醒

卢冬生

卢郁文

陆定一

陆志韦

吕正操

罗　列

罗伯逊（Walter S．Robertson）

罗君强

罗隆基

罗荣桓

罗瑞卿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M

马超俊

马呈祥

马法五

马汉三

马励武

马林诺夫斯基

马廷骧

马希珍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马叙伦

马寅初

马占山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麦克鲁（John McCloy）

麦斯武德

毛人凤

毛泽东

茅　盾

梅津美治郎

梅汝璈

梅思平

梅贻琦

缪　斌

缪云台

莫德惠

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 ）

木村经宏

N

聂荣臻

钮永建

O

区寿年

欧　震

P

潘　菽

潘　琰

潘大逵

潘公展

潘光旦

潘华国

潘朔端

庞炳勋

彭　锷

彭　善

彭　真

彭德怀

彭学沛

彭毓斌

彭昭贤

皮定均

皮尔逊（William Peirson）

皮宗敢

平岛敏夫

浦熙修

溥　仪

Q

齐世英

齐燮元

钱昌照

钱大钧

钱端升

钱新之

钱永铭

乔巴山（Horloogiyn Choybaisan）

秦邦宪

秦德纯

邱清泉

屈　武

R

饶漱石

任弼时

任援道

阮海臣

S

萨力士

赛福鼎

森茂树

山田乙三

商　震

尚传道

邵百昌

邵从恩

邵力子

邵毓麟

沈　崇

沈葆桢

沈从文

沈鸿烈

沈钧儒

盛丕华

盛世才

师　哲

施复亮

施麦斯（Robert L．Smith）

十川次郎

石　觉

石美瑜

史　良

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史泽波

束云章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司徒美堂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

斯拉特科夫斯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 ）

斯坦科维奇（Н．В．Станкевич ）

松井石根

松井太久郎

宋肯堂

宋美龄

宋时轮

宋希濂

宋子文

苏伦札布

苏体仁

粟　裕

孙　渡

孙　科

孙　震

孙宝刚

孙殿英

孙立人

孙连仲

孙良诚

孙蔚如

孙元良

孙越琦

孙中山

T

谭平山

谭震林

汤恩伯

汤时亮

唐　纵

唐继尧

陶　勇

陶希圣

陶行知

陶峙岳

特罗增科

滕代远

藤田赖太郎

田博门（Tim Berman）

田中久一

田中军吉

涂长望

土桥勇逸

W

万　毅

汪精卫

王　任

王　震

王葆真

王必成

王炳南

王宠惠

王鸿韶

王化成

王继芳

王继祥

王敬久

王靖国

王克敏

王凌云

王懋功

王若飞

王绍鏊

王世杰

王首道

王叔铭

王树声

王天鸣

王铁汉

王亚南

王耀武

王揖唐

王荫泰

王云五

王芸生

王缵绪

王曾善

王仲廉

王子民

魏道明

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

温宗尧

闻一多

翁文灏

乌斯满

吴　晗

吴鼎昌

吴国桢

吴化文

吴经熊

吴克华

吴奇伟

吴仁勋

吴尚鹰

吴绍澍

吴铁城

吴贻芳

吴玉章

吴忠信

吴铸人

伍宪子

伍修权

武鸿卿

X

细川忠康

下村定

夏　威

向　达

向井敏明

项致庄

萧　华

萧　克

萧　铮

萧劲光

萧毅肃

小林浅三郎

谢冠生

谢慕庄

谢伟思（John Service）

谢祥军

谢雪红

辛冠五

熊　斌

熊式辉

熊向晖

熊新民

徐　堪

徐傅霖

徐继庄

徐向前

徐永昌

许德珩

许广平

宣铁吾

薛　岳

Y

亚历山大（Alexander）

阎宝航

阎锡山

阎又文

杨　格（Arthur N．Young）

杨　杰

杨安仁

杨伯涛

杨得志

杨国夫

杨揆一

杨亮功

杨尚昆

杨永浚

姚从吾

野地嘉平

野田毅

叶　飞

叶　蓬

叶　挺

叶楚伧

叶笃义

叶剑英

叶燕荪

伊　敏

易君左

殷汝耕

尹兰荪

尹锐志

鹰森孝

尤永昌

游弥坚

于　再

于右任

余汉谋

余家菊

俞大维

俞飞鹏

俞鸿钧

裕　仁

袁履登

袁子健

Z

曾　琦

曾　生

曾克林

曾泽生

詹莲生

张　继

张　澜

张　群

张　镇

张承宗

张道藩

张东荪

张发奎

张华昌

张嘉璈

张景惠

张景月

张君劢

张岚峰

张厉生

张灵甫

张难先

张申府

张廷谔

张廷孟

张闻天

张奚若

张学良

张学诗

张沅长

张知本

张治中

张宗逊

章伯钧

章嘉呼图克图

章乃器

赵　瑞

赵保原

赵承绶

赵公武

赵家骧

赵锡田

赵镇藩

郑大章

郑洞国

郑介民

郑天挺

郑维山

郑位三

郑振文

中岛今朝吾

周保中

周炳琳

周恩来

周佛海

周福成

周建人

周新民

周诒春

周毓英

周至柔

周作人

朱　德

朱　偰

朱光潜

朱家骅

朱绍良

朱自清

邹　鲁

邹大鹏

左舜生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十二卷
(1947—1949)

朱宗震 陶文钊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

第十二卷

（1947-1949）

朱宗震　陶文钊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是《中华民国史》的最后一卷。这一卷主要是叙述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最后溃败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旧政权交替的标志。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本卷写作的历史时期，主要是从1947年7月到1949年9月，而以最后一章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残部在大陆失败和最后撤离的经过，以求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分期问题经常是历史学工作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历史过程是纷繁复杂的，后人对历史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时，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分期方法。所以，本卷章节的划分，只求叙述历史过程的方便，而不纠缠于分期问题。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走向失败，有许多深刻的历史原因。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此作过许多探讨，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探讨都还不够系统，人们仍然十分关注这段历史，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评价往往众说纷纭，难求一致。历史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就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清理历史真相。因此必须在收集大量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来叙述历史。本卷着重于叙述历史真相，对历史的分析也着重于使读者理解复杂的历史事实，而不作过多的历史评价。相信读者完全能够根据历史事实，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卷所述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许多核心资料又尚未公开，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面临着双重的困难。尽管本卷作者在近十年内一直用心搜求历史资料，但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仍然有限，由此叙述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不免还有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本卷所叙述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动员“戡乱”，实行战时体制，强化法西斯式的统治，以支持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一方面又要实行“宪政”，举行国大代表选举，“还政于民”。而进行战争是真，实现民主是假。这种自相矛盾的体制，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自乱阵脚，加剧了内部矛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缺乏凝聚力的党，始终不能解决其内部激烈的派系纷争和冲突。这种内部派系斗争，成为促使它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上，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掌握和指挥的政府系统的军队同样派系林立，内部矛盾尖锐，指挥难求统一。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以及前线将领之间，勾心斗角，加以赏罚不公，结党营私，人事制度腐败透顶，蒋介石的军事威信严重失落，战略意图难以贯彻。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面前，国民党将领的战斗意志越来越趋于消极，已经没有能力去控制战局的逆转，最终以一连串的指挥错误，导致了全面的雪崩式的崩溃。

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社会经济破产，通货恶性膨胀。社会各界一再要求打击豪门，即官僚资本。但国民党政府不肯触动豪门的丝毫利益，却用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对全体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甚至用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中小资本家，结果导致了社会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国民党政府完全丧失了民心。

土地制度的改革为现代社会所必需。同中共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始终未能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直至它的崩溃，仍然流于空谈。这使国民党的统治和战争动员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对农村残酷的人力物力的掠夺，导致了农村的破产。落后的地主经济并不能构成国民党战争政策的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民党政府军士气低落。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尚未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基地，控制

城市并不能够制约农村。国民党未能实行土改，也就失去了战争动员的最广大的社会力量，这构成了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基本社会历史原因。

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专制、腐败、自私及内部派系斗争，也导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由于自己不能振作有为，也就逐步失去了美国的积极支持。尽管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寄予很高的期望，并曾给予支持，但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扶植一个扶不起的政权，最终只好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无奈地从中国内战中脱身。

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说过一段十分痛心的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尽管傅斯年并不希望国民党政权崩溃，但历史的进程仍然证实了他的理智的判断，“自己的崩溃”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本卷概括而扼要的叙述，难以详尽地分析和论述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全部原因。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运作方式、行政效率、官吏贪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整个社会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的交互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层次和世界发展趋向的落差，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本卷还难以细加叙述。同政治问题相比，社会问题更为复杂，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因素，也有待历史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

我们在民国史研究过程中，遇到许多称谓问题，诸如北洋政府、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用法和区别，等等。由于中华民国历史时期，政治状况和社会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党派冲突变化的复杂性和尖锐性，造成了称谓问题的复杂性，在本卷的写作中，称谓问题是服从于叙述清楚历史事实的，我们尽量根据历史事实和我们所要叙述的问题的具体状况，来灵活地使用不同的称谓。我们参考了相关

图书有关称谓使用方法，也作了一些新尝试，或许这样处理更有利于叙述历史。究竟如何，有待史学工作者和读者共同研究，以便将来能更好地处理这个复杂问题。

由于技术原因，本卷未附有关示意地图，烦请读者在必要时参阅相关的地图集。

本卷共分十章，第九章由陶文钊执笔，其余九章由朱宗震执笔，全书经总编李新审定。人名索引由程朝云编制。本卷因人手少，有些章节可能写得比较粗糙，如有错误、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在本卷写作过程中，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惠予帮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在实地考察辽沈、淮海战役的时候，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税务局及徐州、临沂、邳县税务局等单位，惠予提供帮助。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刘凤翰、万仁元、陈兴唐、阮家新、黄亦兵、胡绳武、王鹤鸣、田昭林、俞辛焞、程悠、马长林、皮明勇、华校生、莫永明、申晓云、陈谦平、戚厚杰、李玉贞、薛衔天、汪朝光等著名学者的帮助，并承郭汝瑰、杨伯涛、郑庭笈、文强等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指教。周炳钦、萧甡、邵维正、杜振发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在本卷写作过程中，王欣嘉帮助解决了许多电脑操作中的问题。还有许多学者、朋友在我们工作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未能一一列名致谢，谨致歉意。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赞助。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一节　“戡乱”总动员
　　一　总动员令的发布
　　二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
　　三　民主同盟被迫解散
　第二节　国大选举和实施宪政
　　一　行宪国大的政治意向
　　二　纷扰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三　行宪国民大会的召开
　　四　总统选举和政府组成
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
　第一节　战略形势的转换
　　一　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
　　二　七月山东战场的攻防战
　　三　解放军挺进中原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守势作战
　　一　国民党军日趋恶化的北方战场
　　二　中原战场的拉锯战斗
　　三　解放军战略优势地位的确立
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一节　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国民党的对策
　　一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
　　二　国民党对中共土地改革的对策
　　三　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的立法努力
　第二节　总体战和国统区统治的强化

一　总体战
二　国统区的强化统治
第三节　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　民主党派的斗争和新政协运动
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
第一节　战略决战的准备
一　战略决战的酝酿
二　战略决战的序曲——济南战役
第二节　辽沈战役
一　锦州攻防战
二　长春之围
三　廖耀湘兵团的覆灭
第三节　平津战役（上）
一　辽沈战役期间的华北战场
二　平津作战的决策
三　平津之围与接洽和谈
第五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
第一节　淮海—徐蚌战役
一　国共攻防计划
二　黄百韬兵团的覆没
三　黄维陷围和徐州弃守
四　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覆没
第二节　平津战役（下）
一　天津之战
二　北平和平解放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一节　财政金融的严重危机
一　财政收入状况的严重恶化
二　对美援的失望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第二节　掠夺性的币制改革
一　币制改革的酝酿
二　币制改革方案的发布
三　以强力贯彻的币制改革
第三节　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一　币制改革的失败
二　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和财政的总崩溃
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谈判
第一节　和平运动和蒋介石引退
一　和平运动与白崇禧主和
二　蒋介石引退和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第二节　李宗仁的求和活动
一　初步的接触
二　南京主和派的和谈方针
三　和平代表团与和平内阁
第三节　北平和平谈判
一　和谈酝酿成熟
二　北平和谈初期的意见交换
三　北平和谈的破裂
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一节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
一　国民党军的江防计划和形势
二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三　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
一　上海战役和太原战役
二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上）
三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下）
四　广州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纷争
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

第一节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一　魏德迈使华
二　美国1948年的《援华法》
第二节　对日和约和战争赔偿诸问题的处理
一　对日和约问题的初步讨论
二　战争赔偿与索还劫物问题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的末路外交
一　难以挽回美国从中国脱身
二　美国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
第四节　走向“一边倒”的中共外交政策
一　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
二　中共的反美斗争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开国大典
第二节　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溃灭
一　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二　蒋介石退据台湾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一节　“戡乱”总动员

一　总动员令的发布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了四大强国之一。国家面临着和平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由国民党一党执掌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坚持一党的狭隘利益，拒绝了和平、民主和发展经济的道路，蓄意发动内战，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然而，在政治和经济上拒绝改革的国民党，在军事上同样腐败无能，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的装备和兵力，却屡战屡败。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衰败的形势开始明朗起来。在军事上，打了一年的仗，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要想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连不懂军事的人也明白已经是做不到的事了。在经济上，通货膨胀，财政破产，民生凋敝。在政治上，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群众运动高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威信扫地。国民党面临着失败的局面，不能不力谋补救，企图挽回危局。

当时，在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军已经只能处于守势，除了局部性的反击之外，总体上是被动挨打。西北战场，对于国民党军来说，并无军事上的重要价值，占领延安，只有暂时的宣传上的、或者是说不清的心理上的价值。然而，中共中央和彭德怀所率领的六个野战旅，在陕北坚持旋磨打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三十多个旅的主力部队被牵制，置于无用之地，一无作为，还屡屡损兵折将。在南线，国民党军

拥有明显的优势，但孟良崮一战，主力第七十四师被解放军歼灭，师长张灵甫阵亡。高级将领随着整师整旅成建制地被歼灭，也屡屡被俘、阵亡，使国民党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蒋介石也十分沮丧地说："自从去年七月开始剿匪以来，我们前方有若干师旅团部高级指挥干部为匪所袭击，指挥官且被匪所俘，这不仅影响一部分的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1)] 战略上的主动权，慢慢转移到了解放军手里。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群众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日趋高涨。5月20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后院起了火。在5月间的参政会会议上，民盟主席张澜等参政员的提案，历数人民的痛苦，坚持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并且要求"政府先明令停止征兵与征粮、征实，为倡导和平之表示，以减轻人民负担"，"政府先饬各地方文武官吏，切实尊重人权，保障自由，迅速释放一切政治性被逮捕、被拘禁之人民，恢复政治性被封闭、被查禁之刊物。并停止一切有名无名的特务非法恐怖行为"[(2)]。张澜等的提案在参政会内得到了广泛的共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战方针，在自己的统治区也遭到了严重的抵抗。这使国民党深感自己的区区虚假的民主政治形式也成了它的战争政策的绊脚石。

同时，原先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冯玉祥等也加紧了反对蒋介石的活动。美国驻北平领事弗里曼（Fulton Freeman）获得情报说，存在着建立一个第三党的运动，其中包括了许多非黄埔系将军，"他们中的许多人，急于除掉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以便促使内战结束"。据估计，这股力量共计有32个整编师[(3)]。当然，这类活动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和成效，存在着疑问，活动的性质也各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着蒋介石的统治，打击着国民党的士气。

1947年5月24日，蒋介石考虑时局对策说："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

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掠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而此次参政会中，亦既为只求和平不顾利害之空气所笼罩。而本党同志又大都苟且自全，随声附和，革命志业，委以尸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再图军事之进展也。”[(4)] 也就是说，他已不能容忍区区民主政治的形式存在，而要进一步强化军事独裁统治。6月27日，蒋介石进一步考虑当前要务归结为：“一为实施总动员，二为党政改革，并拟于鲁中军事告一段落，即实行总动员，巩固后方，而先以整饬党务，充实军队，改革币制，切实稳定社会，树立威信，恢复革命精神为急务。”[(5)]

不过，蒋介石已经等不得前线军事的进展，即着手部署动员。国民党发动的对中共的军事进攻，当时叫作“绥靖”行动，按文字含义，只是对地方进行“安抚”的工作，用以掩盖大规模内战的本质。国民党为了进一步强化战时体制，“绥靖”这一概念就名不正言不顺了。6月20日，蒋介石在宴请国府委员时，张继就提出要对中共“明令讨伐”[(6)]，以便公开用军事、特务统治，强力压制舆论，强行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25日，最高法院检察署训令全国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以“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名，饬属严缉毛泽东[(7)]。《中央日报》借用某法学家的话说：“最高法院对于毛泽东之通缉，在人民心理上必能产生一种极严正之印象。此后倘仍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作乱为政治性之斗争，不仅属是非之观念，且系犯罪思想。”[(8)] 不过，蒋介石对于选择明令讨伐还是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有所犹豫。当时，青年党方面，曾琦主张：“第一，讨伐令下后，共党必在东北自行组织政府；第二，苏俄可能首先承认其所支持之傀儡组织；第三，战事若扩大及长江时，最重现实之英国，亦可能承认其为交战团体。故不如实际上总动员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讨伐令则从缓发。”[(9)]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正式向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励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该案指控“中国共产党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并要求：“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方能扫除民主宪政之障碍，达成和平建国之目的。本此意旨，拟请由国务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励进行，举凡加强经济建设，刷新地方政治，发动人力物力，改善粮政役政，保持社会安全，救恤人民疾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厉行消费节约，增进农工生产，提高官兵待遇等项，均交各主管机关，妥拟方案，制颁法令，一体依法推行。”(10)

总动员令的实施，本是使国家从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的强力措施。国民政府曾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宣战后，制定《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民政府于战时为集中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加强国防力量，贯彻抗战目的，制定国家总动员法。”(11) 《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要》规定：“国家总动员之使命，在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其方法为增加生产、限制消费、集中使用，因而管制物资之生产、分配、交易、储存乃至征购、征用，实属急要之图。”(12) 但中国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战争状态，在战前和战后，也一直处在内战状态，人民长期过着战时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痛苦之后，迫切需要和平和民主的生活。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发布这种总动员令，根本不可能起到动员人民从事战争的作用，只能是强化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更加残酷地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战争的需要，加剧人民的痛苦，从而激起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

按例，战时体制，必须限制人民平时享有的民主生活，以便当局集中权力，实行军事管制。抗战胜利之后，对人民要求的民主权利，

国民党为了敷衍各方面的舆论，做了一些表面文章，而且召开了制宪国大。这些举措，本不为中共和中间性的民主党派所承认，所以他们并没有参加制宪国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要实施总动员，当然就要进一步限制人民本来就不存在的民主权利，也就不可能去实行什么宪政。然而，这个总动员提案却要让总动员去扫除民主宪政的障碍，在后来也就是在总动员令之下行宪。如果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循序渐进的理论，也就是让军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同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行政院长张群也感到了逻辑和体制的无理，只好勉强解释道："现在的动员问题，一方面是要集中人力物力来使用，加强戡乱的力量；一方面又要作实施宪政的准备，从事建设。这两件事好像不能平衡，顾到戡乱便顾不到建设。就如今日谈到的军法问题，顾到治安，就顾不到宪治一样。这都是出于情不得已。"(13) 国家体制的混乱和滑稽，也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统治乏术，回天无力了。

正由于有上述的矛盾，行政院在贯彻总动员令时，没有直接援用《总动员法》及其相关法规，而是另行制定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这个纲要，除规定对于妨碍人力物力动员的行为以及怠工罢工停业等予以惩处外，其第七条规定："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第十四条规定："人民基本权利，均应切实尊重，妥为保障，除因动员戡乱所必需之各种法令必须切实施行者外，任何法外侵扰行为，均应严行防制。"而第二条规定："实施宪政及各项有关宪政之选举，均应依照规定积极进行。"(14) 这就是说，在实行战争动员的同时，还要制造民主宪政的表象，多少缓冲一点人民对独裁政治的愤怒。张群在前述总提示中表示："我们对于动员令的实施，除了照动员戡乱实施宪政纲要运用外，假如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行政院权责上，自然还可以再引用动员法其他条文，另定办法。不过，我总希望能够如此顺利进行，不至于扩大更好。"(15)

“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民盟成了执政的国民党攻击的主要对象。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总动员令之颁布实施，旨在加强剿匪军事，若仍有人提出反对战争口号，即系反对政府。此项行动绝对不能饶恕。君等可以我意转告民盟朋友。”[16] 蒋介石在“七七”前夕发表广播讲话，一面攻击中共，一面也对民盟加以影射攻击：“共产党利用社会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指使其反动工具，提出‘反对征粮’、‘反对征兵’、‘反对内战’等各种口号，来颠倒黑白，麻醉人心，蛊惑社会，动摇国本，使我们的人力物力乃至精神的力量，都不能集中应用到剿匪和建设的工作上去，坐视共匪暴力长大，叛乱因而蔓延。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人士中了共匪反宣传的毒计。”[17]

但是，民盟方面并不因为总动员令的发布，及蒋介石、孙科的威胁恫吓而屈服。7月8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对总动员令表示遗憾：“至今日政府下总动员令矣。同人痛心之下，复有何言。”同时表示：“同人一日为中华民国国民，矢愿一日为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18] 7月11日，参政会举行驻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白崇禧在会上作了军政情况的报告。参政员潘朝栋在会上提议，请政府励行总动员令，遭到民盟参政员黄炎培的痛驳，主张由提案人撤回。潘的提案，在参政会内遭到强烈反对后被迫撤回。黄炎培在日记中记道：“参政会条例第一句，团结全国力量，不能赞成战争。大会通过和平方案，驻委会无权违反。我本次多数第九，经十余人让出递补驻委，全为我民盟或可为和平助力，我安能主张战争。”[19] 国民党政府方面，为此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民盟的压迫。

此外，总动员令发布后，经7月18日国务会议第七次会上通过，国民党政府于7月22日发布训令，批准行政院于7月8日第十一次院会决议：“原保留共党之国大代表及国府委员之名额，应予取消，共党现任参政员者，应予除名，今后如办选举，亦不再为共党保留名额。”24日，参政会秘书处函复国民政府文官处，已将毛泽东、林祖

涵、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周恩来、吴玉章除名（另一共产党参政员秦邦宪已去世）[20]，表示了国民党与中共的最后决裂。

此后，各种加强统治和控制的法令法规即陆续出台。

二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面临着全面的统治危机，深知不改革就难以生存。总动员和党政改革，是他企图挽救危局的两项措施。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集中党与团的力量，二是加强剿共军事，三是依照宪政实施准备程序，办理选举[21]。与准备总动员的同时，部署改革。党团统一是为行宪作准备的改革部署。

国民党之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原期望向党内输送新生力量，而结果却形成党团之间的纷争。白崇禧在1947年初即向蒋介石建议，确定青年团的性质。他指出："青年团应使成为党之生力军，在党领导之下，为巩固革命政权而奋斗到底……惟就过去七年来之经验与教训，青年团与本党之关系，未能明确划分，而工作亦多重复，必须立即加以调整，乃能避免相抵相消之病。"他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案确定青年团隶属于党而在工作上与党有明确之划分。如苏联的青年团。第二案青年团独立成一政党。第三案青年团为社会性之训练组织，其性质如今日之童子军[22]。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时，萧铮也指出："党的号召力异常薄弱，非但一般人不相信国民党自己的决定能够施行，一般民众没有信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党员也没有信心。党到了这个阶段，的确没有法子收揽人心。抗战期间，总裁看到了党的危机，为新的号召，在抗战期间成立了青年团，希望能有真正新的号召，从【重】新提起党的精神。不幸到现在目的没有达到，党团分成了两个组织。"[23] 这就是说，组织三青团的结果，不过是使派别林

立的国民党又增加了一个派系。

蒋介石把白崇禧的意见交给吴铁城、张厉生、陈诚，会商的结果并未如白崇禧要求的那样确定团的性质，竟规定："绥靖区高级军事长官，如察明当地党政负责人员有不称职或自相磨擦贻误事机者，先行撤换，或调整，再行补报。"[24] 这种规定只是一种战区的军事独裁手段，不可能达到发挥党团政治功能的目的。

这时，国民党即将部署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准备行宪。6月25日，选举总事务所正式成立。党团之间，在竞选中发生冲突，已经难以避免。蒋介石认为青年团"过去在心理上精神上已经犯了两个足使革命失败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决定今年团的中心工作在参加立委和国民代表的竞选；第二个错误是主张与本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发生相互的作用。这两个错误的决定足可以使革命整个失败。青年团是青年组织，是培育青年、为青年服务的团体，为什么要参加竞选，为什么要使纯洁的青年变成政客？这样的青年组织还有什么革命性可言？要知道：凡是竞选的人就是你的敌人，那里还有功夫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你们这种行动的后果，只有促成党团对立，而减少本党革命的力量。这是我所以要把团合并于党的主要原因。"[25]

6月27日，蒋介石召见三青团书记长陈诚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宣布实行党团统一组织的决定。至6月30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党团统一。蒋介石在讲话中感叹说："现在我们党的精神是太颓唐，太消沉，根本提不起气来。所以我们中央同志人人都要立下决心，要趁此时机来自反自觉，贡献自己的才力。对于本党作一番彻底的改造，彻底的刷新。如果还是不从改造党的本身着手，那么革命建国的前途，绝对没有希望！"[26] 是日，蒋介石手令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设立党团统一组织研究委员会，并拟订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27]。

当时，国民党正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士大夫意识，压制他

们对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批评。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深深地侵入到国民党政权中去。虽然民国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观念有所发展，但仍非常薄弱，大批读书人仍然只能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像黄炎培那样，辞官不做，一心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像章乃器那样，主张不靠做官吃饭，不靠做官发财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战争环境下，是无法发育壮大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蒋介石通过青年团向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的结果，竟发展成了传统的朋党之争。尽管国民党人以北宋的新旧党争的历史教训为鉴，实行党团统一，又能发生什么改革效果呢？

7月16日，蒋介石对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作出指示："此次合并统一，应以求其产生新的力量为前提。故必须提出新的革命主张及办法，以资号召与团结，使人民拥护本党。其次为对党员团员提出新的要求，并以能否符合此要求，作为肃清腐败分子之标准。党团合并统一工作，应视为政治革命性的，而非技术或事务工作。"同时，确定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为会议准备相应文件[28]。

1947年9月5日至14日，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宣告了三青团团务的结束。9月9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召开。在开幕典礼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大会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造本党，充实内容，以期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他规定了大会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这次大会要完成党团的统一，团结意志，加强党的力量，来消灭共匪，完成革命。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实在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达成这种任务。第二，这次大会要对今年十二月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要作必要的准备。对于选举国大代表的具体办法，应该赶快决定，迅速举办，使别人明了本党有真正实现民主、还政于民的决心，以打破共产党对我们的毁谤和社会上对我们的怀疑。"蒋介石痛苦地指出："这次大会，各位同志应该切实检讨，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

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自信心。经济问题不过是各种问题中的一种，其他如军事、政治各方面没有一样不是如此。本来处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他警告说：“而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腐败堕落，甘于暴弃，那即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遭遇天然的淘汰，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29)

在会上，秘书长吴铁城作了党团统一组织的报告，行政院长张群作了政治报告，国防部长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吴铁城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极高的期望：“此次会议为富有革命性、建设性、政治性之会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巩固革命组织之会议。其由此会议而实现的党团统一组织之力量，其必可以戡定变乱、统一国家、改善民生国计，将同于民国前二年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以后之卒能推翻清廷，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后之卒能推翻袁世凯帝制，民国十三年改组中国国民党以后之卒能荡平军阀，民国二十七年本党实行新建设以后之卒能获得抗战胜利。”(30)

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如何加强本党革命组织，革新政治，完成戡乱建国，贯彻后期革命之任务》(31)，围绕此中心议题，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拟有《党的新建设纲领草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拟有《中国国民党改造纲领草案》供大会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仅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而“关于当前政治纲领，经大会详加研究，认为此次全会不必另订新的纲领，应就历届全会所作决议，择要力行，藉收实效”(32)。同时，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蒋介石认为：“此次会议，以本案最为重要，今由大会通过，充分表现吾人团结之精神，奠定本党新生之基础。”(33)

国民党的这次党团统一，其主观目的上，“系革命组织之彻底改造，其意义系政治革命性的，而非事务技术性的”(34)。改造方案反映在《当前组织纲领》上，纲领中的“原则”一项规定：“1．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整饬纪律，淘汰腐恶分子，严肃革命阵容，以促进党

的新生。2．吸收党员，应特别注意优秀农民、工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以为革命之主力。3．建立宪政时期党的作风，改善组织运用。今后各级党部当以服务民众，切实为民众生活之改善、痛苦之解除及知识水准之增高而努力。”纲领规定党团员要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要登记财产，禁止党内的小组织，等等[35]。但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成风，这些官样文章，难收实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在9月20日致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报告中评论说：“对这次大会的特殊成就似乎毫不足道。它只是在常务委员会之前进行了职位的预先瓜分和政府的一些调动。鉴于合并青年团的计划规定党员要重新登记，所以可能出现改革和清党。但现阶段尚难预见改革和清党的形式及性质，不过可以推测，它符合于最有势力的集团的愿望与野心。”[36]

为了改造国民党，蒋介石于会后继续部署统一工作，并曾要求：“自明年一月起，办理党务人员，均为无给制，应与统一组织办法同时宣布，并自十一月份起，凡有党籍之党员，均应由其所属党部实行征收党费，并以收费之成绩，定党部工作之优劣。”[37]也就是使国民党从国库养党，改造为党员养党。但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似不可能”[38]。因为，地方党部的人，本来就觉得待遇不公，生活困难。程中行说：“地方党部里，个个人都是苦干，生活很苦，像叫化子一样……现在上海市党部就没有一辆汽车。所以中央对于地方党部的待遇似太残忍。”[39]谷正鼎说：“党外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实在没有……在我们本党，今天既不能支配政治，实际上政治的权力反被一些官僚所窃据支配了，成了官僚政治，挟天子以令的诸侯的政治。”[40]这些CC派分子，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并不满足。

蒋介石在9月13日闭幕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第一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这当然是部分的现象，然而我们政府里面如有一个贪污的官吏，就是我们全体的耻辱。而本党是中国的执政党，

当然要负责任。”然而，就在这篇讲话中，他在要求党员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时，直接出面为宋子文辩护：“今天有一件事可以附带报告的，就是宋子文同志，已决定捐献其建设银公司全部股产，作为救恤抗战剿匪死难同志家属之用。宋子文同志在前次卸任财政部长之后，经营经济事业，颇多成就，而社会上多诬为官僚资本。现在宋同志慨然将其财产捐献于党，足见其并非为私人利益经营事业，而是为党为国发挥服务精神。他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感佩，值得全党同志效法。”[41]

一位路人侧目的权贵，竟然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不免使正人丧气。会后不久，宋子文即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一位反对共产党、宁肯与国民党同归于尽的自由主义学者傅斯年，是年3月间写信给胡适说：“‘政府决心改革政治之诚意’，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上（指三中全会——引者）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借重先生（指胡适——引者），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假如先生在京听到蒋公教训中委的一段话，当知此公表面之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决不相同。我八九年经历，知之深矣。”[42] 他感慨地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43] 傅斯年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说出了至理名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了，任何所谓的改革，都无法挽回它失败的命运。

三　民主同盟被迫解散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改革”和“民主”的旗号下，筹备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准备行宪，所谓“还政于民”；而一方面又在“戡乱”总动员令之下，压迫中间派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解散。这一严重的政治压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大尚未召开之时，就给

自己筹备中的“民主政治”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自从5月间学潮爆发之后，国民党方面就对民盟的疑忌更为加深。“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民盟仍坚持反对内战、反对总动员的政治立场。延至10月间，国民党决心排除民盟这一异己的政治派系。10月1日，新闻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指责民盟“殊非独立政党，实为中共之附庸”[44]。为此，黄炎培起草了一个经民盟同人商定的书面谈话，予以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为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那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两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两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45] 对当局的攻击，常驻南京民盟总部的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罗隆基，也在报上公开进行了答辩。

国民党方面一步步地强化对民盟施加的压力，它已容不得民盟以不同的政治观点进行自由答辩。10月3日，董显光就黄、罗的答辩，进一步攻击民盟：“自参加政协以来，无独立之政治主张，有之，唯追随共党，亦步亦趋，为世人所共见。”[46] 10月7日，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了在押的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0月1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声称，民盟在“戡乱”总动员令宣布后，“尚认定共匪为友党，即无异于附敌，无异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之列”，要求当局“明令解散”[47]。10月23日，南京梅园新村、高楼门两处民盟总部办事处均为警察围困，出入须检查。罗隆基和民盟成员的活动遭到跟踪和监视，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民盟作为一个从事合法活动的政党，面临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上海民盟方面接到南京方面的报告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在张澜处商谈对策。同时，上海警方对民盟

事务的干预也强化起来。至10月27日，为了缓解国民党对民盟的压迫，上海民盟领导成员决定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较密切的黄炎培到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黄炎培即与上述民盟领导成员商定最后主张："如政府不下令解散，即声明现状，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48] 当日，叶笃义和黄炎培即先后前往南京。同一天，内政部发言人指控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内政部"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处置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49]。10月28日，黄炎培乘车到南京后，看到了报纸上登出的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谈话；翌日，又看到了报上登出的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真相文件。鉴于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压迫，民盟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他必须为民盟的结束方式和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同当局谈判。

黄炎培到达南京的当天，即先访问邵力子，旋至司徒雷登大使官邸，同傅泾波、罗隆基、叶笃义一起商谈两小时，随后到参政会借邵力子办公室再和罗隆基、叶笃义商量两小时。翌日，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说："民盟的共产倾向仍令人怀疑，很少希望它能具有自由运动的核心作用。我目前主要担心的是，政府在对民盟的鲁莽迫害中，将进一步使自己声名狼藉。而民盟则获得主张开明宪政的人士的同情，这使民盟更加左倾，并从事地下活动。"[50]

黄炎培探明了民盟的处境后，第二天即前往拜访行政院长张群，就民盟的结束方式和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与当局谈判。根据《黄炎培日记》的记载，谈判的要点大体为：一、民盟解散由政府宣布还是由民盟自行宣布；二、民盟要求必须公告其成员免除登记；三、罗隆基个人的自由保障。民盟方面，黄炎培向张群、吴铁城（国民党秘书长）要求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方面既要迫使民盟解散，又不愿背解散民盟的反民主的政治包袱，因而逼迫民盟自行宣布。黄炎培提

出的基本条件是："一、撤退监视，恢复自由；二、各地盟员一律无庸登记；三、代管（指为中共代管——引者）或拨给房屋交还政府。"[51] 在谈判中，和黄炎培个人友谊良好的张群，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而在幕后的人则立场严峻。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1月3日）夜九时，岳军（张群——引者）又招往谈，乃大变：（一）取消换函，（二）不允努生（罗隆基——引者）明日同赴沪，皆以某方为梗。余议将来往函叙入总部解散内，准明晨八时半脱稿送到，努生事明日偕努生来面商。即夜起草完了，大能（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引者）录副。……（11月4日）七时到参政会共努生等公阅昨夜稿。八时半至官邸挟努生、笃义往。岳军接稿，约定十二时顷电话复努生去沪事，恳商结果亦待十二时复。十二时得岳军电话，昨稿略修正认可，努生见允去沪，此事乃始圆满解决。"[52] 谈判的结果，民盟以自行宣布解散的严重代价，换取了暂时免遭大规模镇压的危险，为民盟成员转入地下赢得了时间。

11月4日下午3时3刻，谈判结束之后，黄炎培即同罗隆基、叶笃义一起在特务监视下回沪。翌日，民盟中央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九时半，到集益里，表方、衡山、努生、笃义、史良、张云川（陈新桂列席）共商大计。余报告在京商洽经过，努生继之。衡、史、云各就携归之稿仔细商榷，发表异议。终以大局被迫至此（至门外特务为努生云集），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53] 沈钧儒、史良、张云川等虽曾义愤填膺，表示反对解散，但因缺乏具体办法未能通过。民盟本是一个松散的进行合法活动的团体，并没有武装斗争和转为地下斗争的充分准备，在国民党压迫来临之际，民盟中央并没有力量采取强有力的应变措施。在国共两党眼里，民盟都只是历史机遇的产物，在国共大决战的时候，民盟作为一个并无强大社会基础的政党，其被迫解散，也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命运。

1947年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不得不签署了民盟解散的公告，

这份由当局审定的公告宣布："合将洽商经过情形公布周知，并通知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54] 翌日，张澜发表个人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55]

黄炎培在南京谈判期间，心力交瘁。11月2日，在谈判间隙游玄武湖时，赋《玄武湖秋感三绝》[56] 以明志：

> 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
>
> 红黄设色补寒苔，点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圆角后雕材。
>
> 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谁从草际怜生意，百万虫儿绝命时。

民盟公告发表后，他又发表了《我与民盟》一文表明心迹："经过无数沧桑，到今年——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政府认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民盟同人亦已不能活动，而我于其间被推自沪赴京，与政府当局商善后办法。七日之间，会商七次，民盟主席乃于十一月六日宣布洽商善后经过，同时正式公告……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我只平心静气地问一句话：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者否？"[57] 他忧劳过度，旧病复发。

从1940年底黄炎培动议创立民盟起，作为一个独立、中立、进行合法活动的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系（或称第三方面）的政党组织，至此宣布结束。中共方面，周恩来也指出："自民盟在蒋管区被

迫并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58] 从此，民盟的基层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活动，民盟总部的恢复和政治路线的确定，转移到香港进行。

第二节　国大选举和实施宪政

一　行宪国大的政治意向

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实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仍继续部署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所谓“还政于民”。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行宪是抵制社会上与中共进行和谈要求的一种手段。南京《中央日报》曾于是年5月24日发表社论：《和平的根本是行宪》，强调说：“寄语热心和谈的先生们，与其空费唇舌以倡导前车可鉴的和谈，毋宁同心协力来促成宪政，督促共产党也实施宪法，一切听命于人民代表的决议，移疆场的战争于议场之中，这才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办法，这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音。”

同时，实行民主改革一直是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8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陈述了他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意见[59]：

1．中国应参加反对共产党侵略的国际民主集团。

2．美国一直准备以正当和可能的方式援助中国，条件是现政府必须足以证明其进行改革，以恢复非共产党人民的支持。

3．程序可包括以下措施：

（1）国民党应与政府截然分开，就像民主制度下的其他党派一样（蒋委员长已让郑将军准备一份有关美国两党的材料交他

审阅）。（郑将军，即郑介民——引者）

（2）军事方面，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从目前内战的实际情况出发，按政协原则改组军队。军队短小精悍，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物质充足，士气高涨，这将比目前的军队更有效率，开支更少。如何裁官减兵，这一问题不可忽视。

（3）行政方面，在开始阶段可扩大监察院职权，以制止文官中猖獗横行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宪法生效日期（12月25日）之前，先宣布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条款生效。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对民主制度的真谛和价值的崭新的革命精神，具有全新的热情与生意昂然的信念。蒋委员长必须对此有献身决心。他本应是国家的元首，但他太多的只是一党之魁。

1947年七八月间，魏德迈（Albert Wedemyer）奉美国政府派遣访华期间，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官员就民主改革问题，作了训导式的建议："政府不应对于批评感到烦恼。我想建设性的批评应当加以鼓励。这样可使人民感到他们是参与政府，成为政府中的一分子……政府应该指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有缺陷，能做错事，然政府应当强调错误一经指出，必将采取有效步骤来补救。政府应将有关支出及税收的消息，坦白发表，让全国人民知道，每个人，尤其是富户及大商业公司现在交付多少所得税。任何官吏或个人违法犯罪要公开宣布，并指出所定的处罚。政府个别活动的成绩或良好工作亦要依同一方式公开宣布。所有这些事情，将有助于人民方面对政府的信任。人民需要知道，也有权利知道现在进行什么。政府方面公开的正式公告也能促止反政府者的恶意揣测和反宣传。"[60]"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空言已是不够，实行乃是绝对需要的。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61]

因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党团统一来进行改革，一方面

急于通过行宪来表现改革的实绩。

但是，要蒋介石和国民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实现民主，开放政权，谈何容易。司徒雷登一再劝蒋介石让陈立夫出国，以减弱CC的影响。但仅这一条，蒋介石也不愿意去做。他向司徒表示："他本人也考虑过让他（指陈立夫——引者）到欧洲旅行，但眼下鉴于选举日益迫近，他不能没有他。"[62] 仍然是3月间傅斯年批评的作风。那么，蒋介石又怎样来体现行宪的民主性呢？显然，他只能做一些民主的花架子。

对于召开行宪国大，在9月9日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一些布置，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通过大选，向青年党和民社党"开放政权"。蒋介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这次选举代表，必须信守下列三个方针，即：（一）党员参加竞选，必须由党提名，绝对禁止自由竞选。任何党员如不听命令，自由竞选，党部即开除其党籍。（二）必须选贤与能。凡本党所提之候选人，必须其人格道德和能力学识，均足以为人民的代表，且为众望所归的人物。青年同志最好不要参加竞选。党部尤不可以选举为迎合青年心理的手段，使他们放弃本身基本的工作，而走上政客的道路。（三）选举必先推社会贤达与友党提名的人士，而后及于本党党员。这一点特别重要。"他希望："这次国民代表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同志只占半数，则可以说是我们的成功，若是超过半数甚远，甚至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则是本党的失败，而非建国的成功。"[63]

但是，有着民主政治理念和一定社会基础的民主同盟，由于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显然不会参加大选，而不久也被迫宣布解散，更何况中共了。国民党的让贤怎能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呢？当时的中国政治，只有通过政协的形态，才有可能在实质上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向民主政治前进一步。但政协精神已被内战破坏无遗。青年党和民社党在民主的旗帜下，其实仍然充斥着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在社会上并无群众基础。章乃器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党左舜生所主张

的“民主”，是“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64]。司徒雷登也曾指出：“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两个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65] 蒋介石把行宪国大的“还政于民”，变成向青年党、民社党开放政权，这样的民主政治，当然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而且，由于国民党内对任何微小的权力都争夺不休，他想向青年党和民社党“开放政权”，也成了一桩徒增纷扰、加深国民党分裂的举措。

二　纷扰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国民党在四中全会后即着手部署选举事宜。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党派限于参加制宪的党派。由于中共和民盟不参加大选，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够和国民党竞争，而为了确保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成员当选为国大代表，使得这次大选体现出党派民主的模样，国民党就只能采取让予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又怎能体现民主法治的精神？这本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早在7月初，国民党方面，由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与青年党、民社党的胡海门、蒋匀田、左舜生、陈启天等商定，三党选举合作，国民党对青、民两党的竞选采取协助态度。这时候，民主社会党内部发生分裂，以伍宪子为首的革新派从民社党中分出，但仍称民社党。张君劢的民社党力量和影响更为衰弱。国民党四中全会后，三党即具体协商三党联合提名方案。但三党协商非常困难，加上中国交通不便和内战十分激烈，原定10月份举行选举，不能如期进行。9月26日的国务会议上，决定将选举日期推迟到11月21日至23日举行。

没有实力的民青两党，不能不仰仗国民党的帮助，但他们又贪心很重。10月15日，民社党发言人徐傅霖对记者发表谈话，声明“若民社党不能获得国大代表四百名、立法委员一百名额，该党将保持在野党地位，放弃本年普选”，并表示这是该党“最低限度之要求”[66]。选举即将临近，而三党的协调仍未结束。11月6日，民青两党对国民

党方面交来的两党候选人名单都表示不满。张君劢在致吴铁城、陈立夫的信中说："兹经本党中常会议决认为，台端所提名单中，于本党前提之重要人员，漏列甚多，倘照此公布，将令全党哗骇，有碍于目前合作之局，断难同意。爰再将前开首要名单中，必须产生者，另开名单，计共七十四名，并将台端所开名单中，删去四十四名。至于绥远、山西、山东、东北、河北以及其他未能选举之区域，请查照本党原开首要名单，于提名时，分别补入，以符协定。关于由本党提名之县份，其候补人亦应由本党分别提名。再，职业及侨胞代表人数，原在定额以外，仍请维持原议，合并声明。"左舜生、余家菊、刘东岩在致陈立夫、吴铁城、张厉生的信中说："顷奉先生等交来之本党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册两件，经本党中常会研讨之结果，认为与原议大有出入。贵党调整名单之煞费苦心，本党无任钦佩，自能予以体谅。但本党对此名单难于完全接受之实情，亦望贵党特予鉴原。兹特送上最低限度必须增改之名单一份，拟请察照增改，始可公布。如贵党对此增改之名单，尚有不能同意之处，务希将本党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全部保留，并即约晤，以便商洽。否则，本党对先生等未经采纳本党所请增改之意见，而公布之名单，势必难以承认也。"为此，国民党特意召开中央临常会进行讨论，"各委员为顾全宪政大局计，均主张委屈求全，不使破裂，决定关于各县市之候选同志，能让与者，即予让与，其确有困难之县市，则说明理由，拒其要求"[(67)]。

直至11月中旬，三党候选人提名名单才协调成功，先后予以公布。《中央日报》（南京）于11月11日发表社论《国大代表两党提名之公布》，为国民党对外谈苦经说："两个友党要提名候选人五百六十人，就是说全国各县之中，发生了五百六十个问题，需要国民党来考虑其解决的方法……直至最近五日，民社党将其既经提出的名单抽出四十四人，另提七十四人，更使国民党中央在技术上感觉困难。"结果，国民党提名1758人，青年党288人，民社党238人[(68)]。而国民党提名者中间，还有不少非党员，以贯彻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员让与非党及友党人士的指示。但由于国民党内反对采取"比例"制，反

对“保证当选”的舆论很强烈[69]，因此，这次协调，仅仅是三党的联合提名，以此来提高当选的概率而已。民社党于提出候选人名单后，发表声明，对蒋介石表示感谢：“本党为参加制宪政党之一，今日参加竞选，以肩负共同行宪之责，实为义不容辞。此次虽以候选人之提出，与原来之协商出入过多，致费周折，然为突破行宪困难计，始终与友党委屈商洽。幸有感于蒋主席鉴空衡平、公平处理之精神，乃予接受……此不能不感佩蒋主席之诚恳与友党之相谅，仍望友党今后本此精神，共同继续努力，以利宪政基础之树立。”[70]

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人士要求推迟大选。10月18日，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余楠秋责问张群说：“政府对人民缺乏诚意，大选何以不能顺从民意而延期？”[71]但蒋介石决意举行大选。11月8日，蒋介石约集五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与各政党提名事宜，决定仍照常进行。虽其时民社党所提名额与指定地区问题，尚未获解决，但蒋以为“倘再延期，则将益感困难”[72]。张治中在邀请司徒雷登与王世杰、吴鼎昌、吴铁城、邵力子、甘乃光等共进午餐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司徒雷登于11月19日向国务卿报告中说：“鉴于选举有可能危害和谈的效果，他们建议应该延期选举。邵力子说，他已在国府委员会上提倡过这一行动，但被否决了。他说委员长坚持认为，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步骤。”[73]

11月21日到23日，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如期举行，在几个大城市中一般秩序尚好，而各地的舞弊和纠纷情事则层出不穷。《中央日报》（南京）引用司徒雷登的话以肯定大选：“以美国人眼光看中国大选，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此事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当发生至佳之影响。”[74]《大公报》评价说：“一般对这次选举的观感，总认为一般选民不够热心，这可说是我们的经验还少，同时也因为这选举甚安全，毫无危险性，所以不必惊慌”，国、民、青三党都是在朝党，“在朝党选举，况且三党实力悬殊，青民两党根本不会有

取而代之的野心，而且也绝无此可能”[75]。但很快舞弊和纠纷事件暴露出来，沸沸扬扬，使国民党自乱阵脚。《黄炎培日记》中说：“为了大选，连日各地怪现象记不胜记。本日国民党控制下的《正言报》称：‘本报连日接读者来函，报道此次大选舞弊之真相，揭露操纵把持以及偷天换日之丑态，不一而足，前后信件五百余起。’同报同日载：‘张君劢强调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江问渔说，有一亲戚青年女子来沪谋事，某机关招令专写选举票，得酬金一百几十万元。’”[76]

当时，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操纵的大选十分冷淡，参加选举的人文盲比较多。如上海北四川路区第一投票所，这一带文化艺术界选民很多，但来投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不识字的选民[77]。这次投票，采用单记法，即选民要书写被选举人姓名，文盲要请人代书，既易舞弊，错写的废票又很多，笑话百出。而选票在选举前即凭选举权证领取，投票时，选举票是否和投票人相符未加验证，结果，“本届选举之最大弊端，为少数不法之徒，竟利用此种罅隙，事前大量搜集选举权证，甚至区镇公所或选举团体负责人径将选举权证扣留不发，待投票时利用中小学生，轮流投票（实则中小学生，多未达选举年龄），常有一人投票十次以上者，此种情形以第一日妇女选举时最为普遍，当日大行宫、大瓦巷、中华路等投票所几全为市立第一第二女中学生包办（前者属沈慧莲，后者属徐元璞）。二条巷投票所竟有某报记者夏某，临时雇佣贫苦妇女二十余人，轮流投票，每次给钱若干，实为非法”[78]。

但是，选举的结果，最令蒋介石烦恼的乃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候选人大量落选，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当选为国大代表，这会使大选所要达到的花架子的门面也难以支撑起来。例如，浙江省，民青两党提名十八名，当选仅七名，上海民社党候选人金侯城所获选票估计仅列第十九名。各地办理选举时，国民党员并未如蒋介石所希望的那

样，听命于党的提名，许多人按选举法的规定，自由竞选。民青两党原指望国民党能保证他们当选，结果落了空，尤其是民社党。时评指出："民社党在大选中的失败，一方面是实力问题，其次是准备问题。他们把这次普选看做'配给'，而不把它当作竞选。这点是致命的错误。"[79] 其实，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它是一个不具备民主观念的"民主"党。为此，国民党方面，不能不试图予以补救。11月28日，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国务会议上，张群、莫德惠、吴忠信、居正、余家菊、曾琦、张继、戢翼翘、邹鲁、陈布雷、徐傅霖、于右任十二人提出了《政党提名补充规定》一案，经讨论通过："（一）凡中国国民党、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党员参加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竞选者，均须由各所属政党提名。（二）用选民签署手续登记提名者，以无党派者为限。"[80]

本来，出现国民党员自由竞选的情况，最多如蒋介石原来指示的那样，执行党纪，开除党籍，而不能改变选举结果。现在，国民党政府竟以国务会议提案的方式，来企图改变选举结果，完全无视选举法的规定，迫使当选的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退让，强行让民青两党成员递补为国大代表。三党标榜的"民主政治"其虚假性，在这一提案引起的纷扰中也就暴露无遗。

12月25日，在宪政实施促进会纪念制宪完成一周年的会上，一些对被迫退让表示不服的代表，会晤孙科，要求予以支持。孙科当即回答说："此次选举太迁就事实，精神上已与宪法相违背。由于采用若干权宜处置，因此发生种种问题。关于国务会议发表之国代选举罢免法补充规定，亦即国民党中央为扶植友党之补救办法。此次友党要求联合提名，保证当选，事实上是强人所难，而为一件不易交卷之事。"孙科认为："补充规定对当选之国代当然无约束力，因此本人认为，现在既然事已如此，诸位恐怕除了依法律起诉外，并无他法。"[81]

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例会上，又通过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国

民党党员让与友党实施办法规定，国民党党员当选为代表时，得与友党当选之候补人互换，作为党让与友党，与本人无关。当时，一批代表于是日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常会请愿，认为当选人资格不能由任何政党及任何行政机构非法撤销，并要求于12月31日前发给当选证书，否则，将于元旦后诉之国际公论，并依法起诉[82]。

国民党一方面要应付与中共日趋激烈的战争，一方面要做实行宪政的官样文章，弄得手忙脚乱，正是图虚名而得实祸。大选进行之后，制宪国大原定的1947年12月25日宪法生效的日期，越来越逼近。但各地当选代表名单一时无法齐集，而按照有关法律，国大代表需达到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即2031人，才能召集国民大会。显然，到12月25日召集国大是来不及了。于是，一部分制宪国大代表乘机要求召开临时国大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国民政府在12月12日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训政结束程序法案》，规定国民政府职权继续行使到依宪法选出之总统就职为止。同时，将国民参政会的任期也推迟到国大开会为止[83]。这一法案，当即遭到一部分制宪国大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欲变更，舍制宪国大会议本身外，任何机关个人不能擅动其只字”，旧约法到时已经失效，“法律绝难略有迁循，而宪法之神圣，更未可丝毫逾假”[84]。但国民政府仍然于12月22日由立法院会议修正公布了《训政结束程序法》[85]。12月24日，全国各地选出之国大代表呈报到选举总事务所的，已达2042名，超过了总名额的三分之二。于是，国民政府即于24日明令于民国三十七（1948）年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86]

宪法生效日期正是西方的圣诞节。蒋介石早在12月21日晚即发表了圣诞节广播讲话：“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降生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将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全体人民统一、独立、平等、自由新生机运肇始的一天。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这个新宪法确认了全国国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它在国家统一与自由之下，于

一个自由人民的精神中孕育诞生……我们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只是完成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最后目标的初步。但这对我们中国三千年来专制政体和封建社会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我愿我们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87] 然而，空话不可能掩盖铁的事实，假民主的把戏，并不能达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预想的目的。

三　行宪国民大会的召开

1947年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宪法已经生效，但事实上只是一纸空文，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围绕着行宪的问题，政治上的纷扰，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一方面国大代表退让问题，遭到通过自由竞选当选的国民党籍国大代表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央一再提出妥协方案，均未能说服他们让出代表名额。一方面立法委员选举的纠纷接踵而来。鉴于国大代表选举的教训，国民党中央加强了立法委员提名的审查，并且规定办法如下：“（一）各级选所委员，各政党均有人员参加，关于签署提名立委候选人有无党籍，应由各级选所抄录名单，先送各党各省级党务机关审查，取具正式公文附卷。（二）如确系政党党员，未经政党提名而自由竞选时，应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之限制，不予公告。（三）如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限制之立委签署候选人，虽经公告，亦应予以撤销。”[88] 1948年1月21日到23日，举行了立法委员的选举，尽管国民党改善了立法委员的提名让予方法及投票办法，但舞弊事件和让予纠纷，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依然未能避免。

3月18日，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但是，国大代表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是日，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同签署提名国大代表当选人代表马文车、盛紫庄、翟宗涛等会谈，劝他们退让，但遭到拒绝。据说，当时签署提名当选的国大代表有600多人，必须以党让党的有170多人，已经取得协议的有37人，也就是说尚有130多人的代表权问题还没有解决[89]。19日天还没亮，马文车等50多人就到内政部等

候选举总所主任委员张厉生，要求发给当选证书，以便到国大报到。僵持到晚上9时半，他们又离开内政部到陈立夫公馆等候，待陈回家，直谈到半夜也无结果。20日，代表们对外界表示："我们今后的态度是不退让，不妥协，不请愿。我们的办法是：（一）全体到京，依法报到，参加大会，驱逐非法代表；（二）加紧团结，不受各个击破；（三）以脱党救党；（四）组织真正的民主宪政集团；（五）拥护蒋主席戡乱建国。"[(90)] 陈立夫、吴铁城等一度准备向代表们让步，但民青两党国大代表鉴于代表权纠纷，正在商讨对策，没有一人前往报到。25日，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面和部分代表见面，希望他们"体认革命环境，互让互谅，牺牲小我，顾全大局"[(91)]。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在民选原则和政党协议之间，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27日，他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总裁的双重身份发表声明，进行裁决："兹当国民大会开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乃负责予以解决。余以为本党同志相互间的问题，应依一般选举之通例，使得票比较多数者当选。至本党同志与友党候选人之间的问题，则应以政治方式为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格，俾友党候选人膺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之宗旨。"[(92)] 28日上午，蒋介石约见民社党的徐傅霖、青年党的余家菊，保证三党合作，并望民青两党国大代表能于28日开始报到。午后，国、民、青三党代表在孙科公馆继续会商，达成协议：（一）民社党名额由260人减至202人，青年党名额由300人减至230人。（二）两党在京代表应于28日晚先行报到[(93)]。青年党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至于本党所坚持之国务会议关于政党提名补充规定，及党与党间之协议，业经蒋主席郑重宣告执行，故本党决然参加国大，以襄盛举。"[(94)]

但是，被蒋介石要求退让的代表，依仗着"民主政治"的护身符，依然不肯屈服于领袖的权威。28日晨，他们分三组向各方请愿，杨翘新等二十多人宣言要"以绝食争取民权，维护宪法"。9时半，他们到

达国民大会堂，进去10人之后，警卫发现情况不对，即阻止其他人进入。这十人进入国大会堂之后，即开始绝食。另一当选代表赵遂初则买了棺材，扬言要在国大开会时，在会堂门口自杀[95]。弄得当局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交给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处理。孙即选拔精壮干练人员数十人，并预为觅定房间数十间，备好汽车若干辆，迨至深夜时，乃强行婉劝他们离开国民大会，每车派二人，分别护送至预定处所，使之隔离休息[96]。第二天的国民大会才得以开幕。这场绝食斗争纷扰了二十多天，给这届国大抹了一脸的灰。

随着国民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总统和副总统选举问题，又露出了新的纷扰的端倪。按原定日期，国民大会应于1947年12月25日召集，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自当在此以前作好充分准备。但事实上，到是年底，无论是人选问题，还是选举办法问题，国民党都尚未准备。新年一过，国民党内桂系集团领袖、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开始表示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1月8日晚，李宗仁在北平宴请外国记者，发布了竞选意向。据报道："李曾对人说：蒋先生要好太切，脾气太躁，不免欲速则不达，我愿意为他帮忙。他相信蒋主席定为总统，所以决竞选副总统。某记者问，这样是否将离开华北，李氏幽默答称：作了副总统，坐镇华北，岂不更好？"[97]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得悉这一消息，竟十分兴奋，于11日写信给李宗仁，抄录了自己从前做的《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第一章："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并表示："我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李宗仁得到胡适的鼓励，于14日即复信胡适，反劝他加入赛跑，"参加大总统的竞选"，并认为"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98]。胡适的政治判断力，虽然一再遭到他的好朋友傅斯年的批评和校正，但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并无长进。一个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只是一种象征，按例就不是政治竞争的重要目标，何况区区副总统。胡适对于李宗仁

竞选副总统所包含的违宪的政治结果，也就是说，蒋介石将预定为一个实权总统，而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竟茫无所觉，还要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表示祝贺，他对宪法、民主和法制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胡适鼓励李宗仁个个争先，他自己却并不打算身体力行。15日，他对记者说，“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99]。其实，胡适如果主动参加自由竞选总统的活动，倒是可以给这次竞选活动增加一些活力的，也可以避免后来在他当“总统”的问题上给他人作猴子耍。

总统候选人问题尚未明确，副总统竞选活动倒开始热闹起来。于右任、程潜、孙科等都有各方面人士推举参加竞选副总统，不过，他们本人的表现好像还不如助选集团来得积极。谦让是中国的美德，公开的竞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区区副总统，要兴奋起来，也不容易。正如李宗仁所说：“我是个乡下姑娘，到城里来也想自由恋爱，但究竟不太习惯。”[100] 3月14日，孙科还在对记者说：“直至今天，没有决定参加竞选，也没有决定放弃竞选，因为在党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办法以前，我个人未便有什么表示。最近李宗仁先生来信问我的态度，我也这样答复他。”[101] 直到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之后，正式的竞选活动才开始。3月20日，李宗仁的助选班子才在上海召开了上海各界拥护蒋主席竞选总统、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大会，由杨虎任主席，得到上海名流和工商界有力人士，如颜惠庆、陈光甫、杜月笙的支持。22日，李宗仁从北平乘军用飞机到达上海，进行竞选活动，当天即在国际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自我介绍，“目的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作风，他如能当选，必以三十多年来从政治军的经验，辅佐未来的大总统，一定对戡乱刷新政治有很大帮助”，并表示政见说：“行宪后的政府，应由前进分子组织，也就是说，应以人才主义代替党派关系。”[102] 23日，李宗仁又表示赞成自由竞选[103]。这时候，于右任、程潜、孙科的竞选活动也先后展开。25日，孙科正式招待记者，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孙科原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为主席蒋介石的副手，竞选副总统又系蒋的授意，等于以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

的班子参加行宪政府的竞选。所以，孙科公开宣布说："我要是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就对不起蒋主席了。"[104] 续后，莫德惠（代表东北人）、徐傅霖也加入了竞选副总统行列，居正则象征性地表示要竞选总统。

蒋介石作为一个独裁者，事无大小总要亲自过问，精力分散，而又异常辛苦。尤其是战争屡屡失利，军务倥偬，他又年过六十，深感力不从心，为此曾埋怨部下说："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彻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至象今天这样的辛苦？"[105] 张群也说："领袖无论在清晨，或午夜，有时甚至通宵，时时均有电话，或是接前方报告，或是给前方指示，不但在政治上要日理万机，而且还要管军事。这种忧劳的情形，自己多年来在中央服务，侍随左右，当然晓得。但再没有比这次到行政院后更为清楚。"[106] 本来，无论行什么宪，都不可能动摇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显然，在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对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在事先并不十分在意。国大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才不能不来考虑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这时候他才发现，一堆麻烦事已经摆在面前不易清理了。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当总统还是当行政院长？二是总统、副总统由政党提名还是自由竞选？三是自己当总统，谁来当副总统？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举行开幕式，秘书长洪兰友作开幕前报告。这届国大，法定人数3045人，依法选出2908人，至29日，报到1694人，是日出席1639人。一部分代表正在途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强调："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对于大会本身的任务，他作了限制："这次国民大会是行宪的第一届大会，宪法甫告施行，利弊得失之所在，还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供

修改的参考。因之，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107]

蒋介石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反对。张知本认为：“现行宪法绝对有修改之必要，如强制不准修改宪法，则事实上已违宪……个人认为代表现有之职权乃有名无实，代表仅以六年一次之集会，为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之象征，实觉空洞，无妨仿照过去参政会驻委会之机构，成立国大驻委会，以三千代表每五百人轮值一年。”[108]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选举和召集国大代表，只是为了选举一个虚权的总统和副总统，这样的国民代表大会，自显得多此一举。但立法原意，在非国民党派系方面，原担心国民党借人数众多、无法议事的国民大会，以贯彻其一党专制之实，因此，为贯彻议会民主制度，妥协地架空了国民大会的权力。所以，张知本等人重新扩张国大权力的要求，自然遭到其他派系的反对。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于4月30日散发的小册子《国民大会走到那里去》中指出：“试问以数达三千以上之代表，怎能集合一堂以讨论国家大事——立法原则或复决法律？以会期一年一次或数年一次的集合，又怎能以举监督政府之事呢？……故现行宪法的设计，有他匠心独运之处，并不是不合理的。”为现行宪法辩护。

四　总统选举和政府组成

在战争环境和交通落后的中国，国民大会的召集，很费了一番周折。开幕之后，这个国民大会却慢悠悠地开始举行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来解决国民大会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问题，即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

民国以来，立法意向，往往企图以法律制约现实的政治局面，而不是根据现实政治制定法律，因而法律和现实政治无法协调。人们明知法律超前，因而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为迁就现实起见，反应麻木，真正的法制社会也就无法建立。蒋介石面临的问题是，尊重宪法呢，

还是迁就现实？蒋介石先表示要尊重宪法，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3月30日下午3时，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据《胡适日记》记载："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31日晚上8点15分，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犹豫再三之后，经不住诱惑，表示愿意接受，但仍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但到4月1日，胡适又动摇了，告诉王世杰，他还是决定不干[109]。4月3日夜，蒋介石亲自找胡适谈话，胡适终于又上了圈套。第二天，胡适告诉胡颂平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说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我，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者由他当总统，要我担任行政院长。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110]象征性地进行竞选，实际上由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总裁、未来的行政院长遴选为总统，在"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就是民主？胡适忘记了他的朋友傅斯年的忠告，这位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士大夫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民主理念也仅此而已。

蒋介石劝了胡适之后，于4月3日就来劝李宗仁、程潜停止副总统竞选，他认为"军人不应竞选，免蹈民国初年军人把持政治之覆辙"[111]。蒋介石的这个理由很难成立，他本人不也是军人吗？难道他的权力不就是在军事权力之上建立起来的吗？大家都是过来人，他的要求，自然遭到李宗仁和程潜两人的断然拒绝。蒋介石当时是要孙科出任副总统，并根据国大代表纠纷的经验，主张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但这时，自由竞选的锣鼓已经敲响，难以收场了。尤其是李

宗仁，当时在国民党阵营内，人望甚好，美国方面对李也十分关注。据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葛鲁恩（Frederick Gruin）报告："有一件事情很确实：傅泾波与司徒大使坚决拥护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当蒋总统以高压手段干涉时，二人都感惊恐不已。他们对于李宗仁并不存有幻想——他从前是一位军阀，具有军阀的种种缺陷。但他们觉得他能虚心接受忠告。他是改革的真实象征，且能成为蒋总统与一般自由分子间的桥梁。"[112] 李作为桂系的领袖，竞选一个无权的副总统，在政治上别有深意。据黄绍竑回忆说，李宗仁有密信给他，李要竞选副总统的理由，其中有："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113] 也就是说他要在副总统的位子上等待机会，从蒋手中接收国民党的军政权力。所以，李宗仁一定要竞选副总统，而蒋对李之竞选十分不满。但蒋在事先并无准备，临时抱佛脚，就弄得手足无措了。当时，李宗仁认为，他对自己参加竞选，早就请示过蒋介石，蒋并无异议；而且，他事先还曾征求过孙科的意见，孙科曾表示不参加竞选副总统，对李竞选副总统表示支持，因此，他坚持要参加自由竞选[114]。据说，孙科决定竞选副总统之后，曾要求蒋介石于3月28日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决定用政党提名副总统的方式，通知发出后，于右任十分恼火说："这孩子连我的老帐也不买？要用政党提名来压倒我吗？我本来争不过你，不过你不能把我竞选的机会也拿去。"于是，于右任邀同李宗仁、程潜及一般党国元老晋见蒋介石，要求自由竞选[115]。

蒋介石既要胡适任总统，又要孙科任副总统，这一班子大概孙科是不会承认的，孙科之竞选副总统是以蒋介石任总统为前提的。那么，胡适任总统，谁来任副总统？从现有资料看，蒋介石并无以胡、孙为竞选班子的明确选择，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中的班子搭配，即孙任总统、李为副总统，或胡任总统、孙任副总统，不过是一种猜想[116]。因此，蒋介石劝胡适任总统，确实是权术之意味极大。胡适只

知道自己要当总统了，他的副手是谁？从现有资料看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胡适的学者气太浓，很容易受人愚弄，确实不是一个政治长才。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人选问题，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中委们普遍拥护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而对于副总统竞选问题，则见解不一。于右任、邹鲁、甘乃光等主张自由竞选，而王世杰、潘公展、张道藩等主张政党提名竞选。蒋介石在会上致词，还在作尊重法律的表示："我于审慎考虑之后，认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选择一能守法执法之人为实现民主之最好保证。（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真正之民主主义者始能充分了解独裁与立宪政府间之差异。（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共产党明显意欲破坏我国家的生存，且亦决心破坏我国之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他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117] 按照蒋介石的条件，这个人当然就是胡适。但是，中委们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赞成蒋介石的意见之外，仍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对于副总统候选问题，则大体上同意自由竞选。

当时制宪的指导思想虽然是责任内阁制，宪法条文也有相应的规定，但实际上，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相当于皇帝的权威。虚权总统的思想实际上并不为国民党人所接受。国民党军政界的普遍观念和宪法的政治规则是不协调的。而且，蒋介石正指挥三军，如果蒋介石不任总统而任行政院长，军事指挥体系显然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难言法治，人们宁肯迁就事实，而不愿去尊重一纸空

文。8日，丁宣孝等156人即开始联名签署推荐蒋介石出任首届大总统，他们认为："总统日理万机，责重事繁，非大才大德者不能胜任。"[118] 无论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在他们心目中，总统就是一个无上的权威。蒋介石本人也没有改变总统权威的观念，所以，他在4日的会上说："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119] 而如果按宪法原则，政党领袖自当出任行政院长。但显然，在中国政界心目中，这个行政院长的名誉是不够崇高的，也就是这个名义的权威性不足以震慑群伦。这是当时的现实政治思想。所以，尽管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按照宪法来"协助总统"，但显然和他的真实意愿相冲突。

5日，国民党中常会继续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蒋介石做足了尊重宪法的表示之后，就要部署现实的政治结构，让法律迁就现实。当时，蒋介石本人还是重视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的，所以，他不能在现存的宪法体制下出任总统。但当时民青两党不赞成修宪，蒋也不便于即行修宪。因此，要在现存宪法之下，让蒋介石出任一个实权总统，必须有个折中的办法。据程思远回忆，在5日的中常会上，张群起来解释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120] 6日，临时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办法找到了，会上最后决定蒋介石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对于竞选提名办法，则根据蒋介石的书面提示，决定："（一）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二）下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应于选举前三个月召开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党候选人，并由总统候选人推荐副总统候选人，通告全党同志一致遵照。（三）下届选举时，凡本党党员非经本党决定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者，不得自由竞选。"[121] 蒋介石不能不作出了一个迁就党内反对派的决定。显然，他已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控制选举的局面了。

当时，国民大会进程十分拖沓，开了好几天的会，还没有进入国民大会职权的正题。按照宪法，本届国大代表的职权仅限于选举总统、副总统，职能十分简单。但国民大会的这种简单职能同国民党统治危机异常严重的形势非常不合拍。代表们强烈地希望对当前局势发表自己的政见。因此，要求修宪、扩大国民大会职权的呼声也很高。这部宪法的可行性，真是大有疑问的。所以《大公报》社评指出："既是第一次国民大会，实际只有选举总统、副总统一项事情。每个代表只须在选举票上画两个圈，真是一举手之劳，最多一小时可了。而要开二十几天的会，自然就要在选主席、抽席次、订议事规则等等之上，来打发时间了。"社评以醒目的标题主张：《假若修改宪法——首先应该删去〈国民大会〉一章》[122]。

确实，仅仅选举总统，代表们大可不必千里迢迢来聚会，中国交通落后，许多代表还在途中，不能按时到会，既然长途跋涉来到首都，当然就要找事做。而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国民党中央也还没有准备好。代表们闲来无事，于是，在讨论议事规则时，不愿把自己的议题局限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8日，国民大会在《议事规则》的第一章总则中增列了一条："国民大会开会时，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得提出质询建议。"[123]自行扩大了职权。10日，大会才通过了会议日程表：17日讨论修改宪法问题，19日选举总统，23日选举副总统，24日闭幕。中间的其余时间听取军事、经济、政治报告。

蒋介石根据国民大会的要求，于9日代表政府向大会就经济和军事问题作了报告。当时，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代表们忧心忡忡。蒋介石向代表们担保说："大家要知道，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其在黄河以南整个集结的匪部。我对军事从不肯轻易预测，自剿匪以来，凡我所宣示的，无不如期达到。"[124]续后几天，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相继作了报告。代表们纷纷要求追究军事失利的责任，要求蒋介石明是非，信赏罚，挥泪斩马谡，事实上是指目陈诚。

最后，山东代表赵庸夫慷慨直言：“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125]赢得了全场的响应。湖南女代表徐慧玉在发言中要求“清算豪门和接收大员的资产”，全场为之大鼓掌[126]。当然，国民大会只是扩大了清议的职能，代表们的激动情绪，只要蒋介石一出场，就平静下来，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

4月15日夜，国大主席团发表了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介石获得了2489名代表的提名，居正获得了109名代表的提名。16日正式公告。为了满足蒋介石扩大总统权力的要求，在15日的会议上，由东北代表莫德惠等提出了一个《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王世杰作了补充说明：“本提案的用意，是要求行宪戡乱并行不悖。宪法对于政府的限制太严，在国大闭会后，没有适当办法使政府切实负责。要叫政府实行宪法，其结果不是（一）守宪守法，不能挽救危难，便是（二）为戡乱而蔑视宪法……总之，我们要行宪政府可以戡乱，戡乱政府可以行宪。”[127]

同时，张知本等689人提案要求修改宪法，原文为：“宪法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如左：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创制立法原则。（新增）四、复决有关人民权利义务之法律。（新增）五、修改宪法。六、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前项第三款至第六款之政权行使办法，由国民大会制定之。’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国民大会每二年集会一次，如届总统任满，该次集会应于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均由总统召集之’。”[128]

4月16日，第一审查委员会全天审查修宪提案，莫德惠案没有反对意见，张知本案遭到民青两党的强烈反对。在休息时间里，国民党的王宠惠、陈布雷、王世杰、谷正纲与民青两党的陈启天、孙亚夫等商量结果为：“一、制定临时条款，必须通过。二、国大两年后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129]修宪问题也就搁置了。

至18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权，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130] 也就是总统的处置，可以避开立法院，仅经行政院即可成立。虽然，宪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但蒋介石的现实政治生活，他要侵犯行政院职权，只是举手之劳，但对立法院职权，则心存顾虑。因此，这一条款，并无侵及行政院职权的文字。蒋介石出任总统的前提成立，19日，国民大会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陪选的居正仅得269票。于是，蒋介石从一个虚权总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独裁总统。《观察》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临时条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现了政府一只手颁布了宪典，另一只手又把它撕毁了。”[131]

同总统选举平淡如水相反，一个无关紧要的副总统选举却出乎意料的激烈。23日，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票数分散在六位候选人之间，没有一位候选人得到足以当选的法定多数，即国大代表总额的过半数。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居于前三名。按《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原定24日闭幕的国民大会只好延期。第一轮投票之后，竞选更为激烈。是日，南京《救国日报》登载了一篇披露孙科与蓝妮关系的文章，攻击孙科。于是，粤籍国大代表一百多人，由上将薛岳、张发奎等亲自出马，将救国日报社捣毁。同时，蒋介石也亲自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利用程潜的影响力，来分散李宗仁的选票，不让李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132]。4月24日，按规定在23日投票的前三名副总统候选人中进行圈选。结果，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仍然没有人获得法定的国大代表总额的过半数当选。按规定，必须在这三人中间再次圈选。

副总统的竞选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本来，副总统只是一个储备位

置，不应该发生激烈的竞争。但一则，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十分严重，蒋介石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因此，替补者的地位明显地增值了。二则，国民党内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即CC系的统制政策，已经十分厌恶，许多人希望利用副总统选举，对这种政策进行冲击。由党提名的方案，既已不成立，党内的反对派就有了活动的空间。这是国民党在危机面前的进一步分裂。副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后，蒋介石又要贺衷寒、袁守谦把他们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并示意程潜放弃竞选。结果，反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当时有消息说，支持孙科的方面，对李宗仁的攻击将大为强化，包括攻击李的夫人郭德洁贪污，给李扣红帽子（指李亲共），等等。24日，在国民大会上，有人散发了两份传单，一份题为“请代表先生注意！反对威胁政府贪污跋扈军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一份题为“‘加官以后’，就要接演‘逼宫’，李宗仁竞选内幕，请不要吃狗肉，不要吃‘糖衣毒药’”[133]。蒋、桂之间的角逐，形势对李宗仁不利。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黄绍竑主张以退为进，宣布罢选。但李宗仁一时不能接受。

24日晚，程潜招待其竞选团，正式声明：“本人已受命放弃继续竞选副总统。”但他的竞选团仍要支持程潜到底，如程潜放弃竞选，他们的六百多票，宁可全部作废[134]。于是，李宗仁方面再次研究面临的形势，到25日晨3时，也决心宣布放弃竞选。李宗仁正式致函国大主席团，指出“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认为“竞选已失其意义”，宣布“正式声明放弃竞选”[135]。李的助选团在报上登载大幅声明：“最近有人散发传单，公开攻击李宗仁先生，谓李先生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或三个月就要逼迫领袖出国……李先生为表明其光明磊落之态度，已向国大主席团正式声明，放弃副总统竞选。”[136] 25日上午，国大集会时，议论纷纷，许多人进场后没有签到。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当即动议休会一天。中午以前，孙科也宣布放弃竞选。

虽然，这届国大完全是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大，但为了摆出自

由、民主的样子，宣布自由竞选，然而又不愿放弃统制政策，国民党内部自身发生了矛盾、冲突和分裂。竞选的政治游戏做不下去了，国大就收不了场，国民党外的人士就来为国民党内的纠纷圆场。国大推举胡适、于斌主教等五人，分别和李宗仁、孙科、程潜接洽，希望他们三人继续参加竞选。蒋介石也不能不亲自出马，召见白崇禧，表示："党内同志参加副总统竞选，绝对可以自由竞选，外传的约束投票之说，完全无稽。"(137)

国大休会三天之后，至28日，重打锣鼓重开张。是日，举行了副总统的第三轮投票，结果，李得1156票，孙得1040票，程得515票，仍无人当选，不得不进行第四轮投票，进行最后的决选，即在前两名候选人中圈选，得票比较多数，即可当选。入晚，李宗仁在宴请国大代表进行竞选活动时，公开宣布："上月我与程潜先生同一天到达南京，当天我就去拜访程先生。我们两人对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都赞成改革应从人事着手，应该起用新人。我们两人曾早经约定，在这一次竞选中，谁的票数较少，就把谁的基本票让给对方。明天是最后一场的竞赛，中国的前途似乎都要在明天这最后几秒钟决定。"(138) 李宗仁得到程潜的支持，获胜就有了把握。4月30日，李宗仁以1438票对孙科的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这场政治游戏不过是两败俱伤而已。《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评论说："在现在的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政党，全党的人不作他图，专门找自己的麻烦，无缘无故制造一些不可解决的纠纷，企图毁灭自己。真是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139)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拉克（Lewis Clark）致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斯（W．Walton Butter worth）函中，反映蒋、李矛盾说："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是一个失败者。在选举之后，他每周遇见蒋介石二到三次，但他们除了天气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蒋介石拒绝和他商量任何重要的事情，并且，李也无权力做任何事情。"(140)

5月1日，国民大会走完了过场，丢下了它所标榜的在中国建

立“民主”的任务，终于宣布闭幕。翌日，《大公报》（上海）发表社评说：“（国大）在人民的观感上是个空虚……会里会外，原是很热闹的，怎好说是空虚呢？假使空虚之外尚有所有，那么：（一）显示国大的性质及其存在根本有问题；（二）代表们代表民意的百分比难以统计；（三）政党还不甚懂得它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尤其政党还不甚懂得它与民主选举的关系及其运用；（四）‘大’、‘小’代表们所表现的民主风度，似乎都还不够；（五）宪法已经戳了一个洞，它今后的形状将演变成什么样子颇为难知；（六）最后的副总统竞选给国民党本体划了一道刻痕。”[141] 《世纪评论》说：“有人作了一个比方说：我们的民主宪政，好像是一个十八世纪的乡下姑娘，硬要穿戴起二十世纪最新的服饰，远看很摩登，近看四不象，处处学洋化，举手抬脚就会露出破绽来。结果是既没有学到摩登，也失去了朴实的本色。”[142]

另据《黄炎培日记》记载：“徐子为自国大归来详谈。子为说：国大总费用9000亿，孙科竞选费2000亿，仅国防一部四月底止追加预算已达24万亿。”[143] 正是劳民伤财，徒耗元气，而又无补实事。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一书中，也就事论事地承认国大的失策：“我非常后悔，我不坚持改为遴选，是一生最大的错误，我违反了民主的原则，而要求同志们谦让，是一件不合人情的作法，其影响之大，我应该负责的。这个时候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这一下意气用事就出了毛病。我们大陆的丢失，这件事具有直接、间接的影响。”[144] 为了挽救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激化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只有在华的美国人对这场议会民主的游戏，由于李宗仁的当选而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美国学者指出：“司徒雷登的调查研究，日益迫使他重新估价蒋介石的领导。尤其重要的是，在这拼死挣扎的过程

中，蒋介石在1948年5月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和余汉谋为陆军总司令。司徒雷登把他们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一事无成和避而不战方面，有着悠久的和杰出的记录’。从这个结论出发，司徒雷登和他的首席助手、公使衔参赞克拉克，主动地给蒋介石物色非共产党的选择对象。对于许多观察员来说，在这方面，看起来前景是好的：尤其是在4月底的事件之后，当时，国民大会不顾蒋介石的积极反对，选举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副总统。”(145)

5月8日，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院又告开幕，而立法委员当选问题又起纷争。民青两党在事先曾就立委名额问题，与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负责）讨价还价。国民党中常会暨选举指委会于1947年11月22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曾决议：“与友党商谈原则，其让给名额以不超过立法委员总名额五分之一（总名额773名，五分之一，约合155人）为限，仍由吴铁城、陈立夫两委员代表本党妥为洽商。”(146) 国民党方面曾想尽办法，怎样避免国大选举的那种结果，保证民青两党候选人当选。但选举的实际结果，民青两党仅二十一二人当选，余皆落选。国民党中央企图以扩大立委名额的办法，来解决民青两党的名额问题，但遭到立法院的否决。5月6日，民青两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国民党方面“自食诺言”，并指出：“此次立委选举，系由政府配票，选票根本未到选民之手，故所谓票多票少，只是政府配票之结果，而非选民选举之结果。”(147) 对于国、民、青的纷争，《大公报》发表萧贤的文章，评判说：“事实是，保证名额兑现了，不合法的选举也算合法，保证的名额不兑现了，于是声色俱厉地来揭发别人的黑幕。这样的政党政治的方式，我们老百姓实不敢赞同，不知民青两党有何解释？最后，我们老百姓希望，三党的纠纷不要再扩大。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够低了，何必再加些丑事让人家笑话！”(148) 这一纷争直到7月才了断。

立法院开会后，院长、副院长选举在国民党内部又起纠纷。当时，国民党中央提名孙科、陈立夫出任立法院正副院长。孙科竞选副

总统失败后，竞选立法院长一职，已无问题，但陈立夫作为CC系的头目，出任立法院副院长，遭到一部分立委的强烈反对。他们准备推举傅斯年当副院长，由安徽省青年团省团部书记长汪少伦去和胡适商量。胡适不大赞成这件事，就去找夏鼐商量。夏鼐认为："立法院本届立法委员，CC派占过半数，拥护傅先生者，决不能成功；反以此致遭CC派之仇视，以为傅先生或傅先生之政界上朋友欲争立法院之天下。所谓'吃不着羊肉反沾了一身的膻'。傅先生是非梧桐不栖、竹实不食的鹓雏，然CC必以为傅先生来争他的腐鼠，最好能打消此一运动。"但要征求傅斯年的意见，时间上已来不及。恰好，傅斯年3月间有信给芮逸夫，表示不愿当立委，芮曾给夏鼐看过。胡适即按夏鼐的主意，依据这封信，写信给汪少伦，希望打消这运动。但反CC派仍干得很起劲[(149)]。15日晚，立法委员三百多人集会，由黄统主席散发了一份有296人签名的书面意见："关于副院长的人选，为了国家的利益、民主的前途，我们不欢迎一个讲统制、弄手段、阻碍进步的人。"也就是指陈立夫，他们建议推选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为副院长[(150)]。据程思远说："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151)]于是，胡适即向报界公布他给汪少伦的信，其中，傅斯年于3月11日致芮逸夫的信中说："我那一区在共产党手，他们无法选，即选我也决不干。此事去年早对山东当局说明矣。"[(152)]17日选举的结果，孙科、陈立夫分别以558票、343票当选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傅斯年以236票落选。

立法院正式开始行使职权，国民政府委员会即于5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宣告国民政府职权到5月20日终止，也就是所谓"训政"时期的政府组织宣告结束。国民政府，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产生的政府名称，至此正式取消，改称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公报》于5月20日起，也改称《总统府公报》。不过，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因为"行宪"的结果而有所改变，人们习惯上仍把这个"行宪"的中华民国政府称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5月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正式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是日晚，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征求对行政院长人选的意见。蒋介石提名张群或何应钦出任院长，而他自己更倾向于选择张群。张、何两人则均表示辞谢。但CC系本与政学系不和，因而动议在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中搞一次意向测验的假投票。21日晨，当举行假投票时，张群也离京飞渝。投票结果，何应钦得票较多。吴铁城即将结果向蒋介石报告，供蒋参考。于是，蒋介石于23日晚决定提名有自由主义者背景的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并于24日晨召集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通过这一提名，翁本人也只是当日晨才知道这一决定，表示愿意接受。然后，蒋介石将这一提名交立法院讨论。立法委员们在讨论时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应该信任总统，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敷衍一下。"(153) 所以，立法院也就没有请这位未来的行政院长发表施政意见，即进行投票，并以489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蒋介石提名一个没有政治实力、没有施政准备的人出任行政院长，而这个人，也就匆匆忙忙、糊里糊涂地接受这个任命，立法院则予以敷衍通过。按照宪法，采取的是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行政实权应该由内阁掌握。但我们从这个内阁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这个责任内阁的地位，同民国初年的责任内阁的地位，何其相似乃尔。翁文灏没有掌握行政实权的能力和可能性，行政实权仍然在总统蒋介石手里。这个宪法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6月1日，新的行政院组成。王世杰仍任外交部长，何应钦取代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并仍邀民青两党入阁，等等。但这个内阁马上发生危机。一则，白崇禧被挤出内阁，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华中剿匪总司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不放心桂系的两个实力人物同在中央供职。白崇禧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不肯就任新职。二则，民青两党由于立法委员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仍拒绝入阁。

直到7月初，青年党和民社党才与国民党就今后逐步解决立委问

题达成谅解。7月4日，青年党发言人王师曾发表声明："本党基于对国家之责任感，及接受友党合作之诚意，决定继参加监察院及提名司法院大法官、考试院考试委员之后，提出参加行政院之人选，继续参加行政院，以分担一部分之政务责任，期能对国事有所裨益。"[154] 5日，青年党的左舜生、陈启天到南京出任农林部长和工商部长。不久，民社党也发表声明："本党除以最大之信心，相信政府实现其最后之允诺外，凡本党当选立委，决定自本月十三日出席，依各国在野党不论议员多寡之成例，本党立委自应本人民之委托，期对于为民立法及监督政府有所贡献，以奠行宪之始基。"[155] 国大和组府的纷扰才告一段落。

至于用行宪的花架子来换取美援的打算，当然也就依然无法落实。美援姗姗来迟。连一向支持蒋介石的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努力，也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组织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当时通过发送邮件来呼吁援华（蒋介石政府），但据统计，自1948年3月到1949年4月期间，"尽管发送了超过145,000封信给从前的捐助者，但只成功地筹集到15万美元多一点。它的影响，很显然，已经因为蒋政府的崩溃而被损坏了"[156]。

---

(1) 《宣读军官团第一期开学训词后讲解》（1947年5月12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版，第105页。

(2) 张澜等提案：《政治解决党争以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1947年5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第4辑第5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

(3) The Consul at Peiping（Freeman）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Vol．7，pp．218-219．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1972．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5月24日条，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

(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27日条。

(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21日。

(7) 《大公报》（上海），1947年6月29日。《中央日报》（南京）刊登这一消息的版面、标题不显著。

(8)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30日。

(9) 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十编《日记》1947年7月1日，台北中研究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471页。

(10) 《国民政府关于通过蒋介石交议励行总动员进行内战提案的训令》（1947年7月4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国民政府公报》第2869号，1947年7月5日，文字有异同。

(11) 《国家总动员》，第16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7月。

(12) 《国家总动员》，第20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7月。

(13) 《行政院长张群在行政座谈会上的总提示》（1947年8月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

(14) 《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又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881号，1947年7月19日。按：上书第4册所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草案，措词和内容较公布本更为严峻。——笔者。

(15) 《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又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881号，1947年7月19日。按：上书第4册所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草案，措词和内容较公布本更为严峻。——笔者。

(1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8日。

(17)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7日。

(18) 《大公报》（上海），1947年7月9日。

(19)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7月11日。

(20) 《国民政府取消中共国民大会代表国府委员保留名额及现任参政员的训令》（1947年7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2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1日。

(22) 《白委员崇禧关于党团关系呈总裁之原呈》（1947年），全宗号三四（2），卷号6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3) 《三中全会各委员对党务检讨意见》，全宗号三四（2），卷号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 《蒋介石致白崇禧、陈诚卯皓侍宇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档案，蒋介石秘密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 《对党团合并的指示》（1947年7月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13页。

(26) 《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1947年6月3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89页。

(27)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国民党）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编，1947年，（国民党）党内刊物，第48页。

(28)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国民党）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编，1947年，（国民党）党内刊物，第49页。

(29) 《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开幕词》（1947年9月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34-238页。

(30)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0日。

(31)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记录》，1947年10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全宗号七一一（5），卷号1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2)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3日。

(33)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3日。

(34)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干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呈总裁兼团长致敬电》，《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3日第2版。

(35) 《大公报》（上海），1947年9月13日。

(36)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司徒雷登驻华报

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37)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第52页。

(38) 《预算审核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全宗号三四（2），卷号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9) 《三中全会各委员对党务检讨意见》，全宗号三四（2），卷号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0) 《三中全会各委员对党务检讨意见》，全宗号三四（2），卷号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1)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按：此段文字在收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时被删去。——笔者。

(42) 《傅斯年致胡适函》（1947年3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0-191页。

(43) 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世纪评论》（南京）第1卷第7期，1947年2月15日。参《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17页`。

(44)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0月2日。

(45) 《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3日。

(46)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0月4日。

(47)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0月14日。

(48)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0月27日。

(49)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0月28日。

(50)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34页。

(51)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0月30日。

(52) 根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最后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派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黄炎培同陈立夫单独办交涉，每天上午我们三人在国民参政会碰头，由黄介绍交涉情况。交涉结果搞成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蒋管区各报上发表的解散公告。据黄炎培说，陈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更动，发表的时候，如有只字变动

即全部作废。”（《我和民主同盟》，《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20页）查《黄炎培日记》，黄在南京谈判期间，除曾有一次拜访陈立夫未遇外，并未和陈有过接触，与叶的回忆几无共同之处，或许黄日记中的“某方”即为陈立夫，他在张群的背后拥有决定权。——笔者。

(53)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1月5日。

(54)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

(55)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61页。

(56)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1月2日。在《国讯》上发表时，文字有更动：“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寒叶正辞枝。　红黄匝地写秋容，点缀湖山枉自工；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春不老后凋松。　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天教草际留生意，百万虫儿蛰未迟。”（第439期）后来的不同版本，文字也略有差异。——笔者。

(57) 黄炎培：《我与民盟》，《国讯》杂志（上海）第439期，1947年11月15日。

(58)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59)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8月11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15-116页。

(60) 《魏德迈中将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47年8月22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718页，美国国务院出版品第三五七三号，远东丛书第三〇号，1949年8月发布，公共事务处出版科，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本。

(61) 《魏德迈中将结束赴华使命的声明》（1947年8月24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720-721页。

(62)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8月19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19页。

(63) 《四中全会之成就与本党今后应有之努力》（1947年9月1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44-245页。

(64) 章乃器：《我与救国会》，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

(65)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9月29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32页。

(6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0月16日。

(67) 《国民党中央临常会讨论与民青两党互争国大代表名额问题的报告纪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68)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11日、15日。

(69) 《各省市参议会反对大选采取比例制有关文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70)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15日，参校《申报》同日第1版。

(71) 《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19日。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1月8日条。

(73)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36页。

(74)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1月24日。

(75) 社评：《国大选举完毕》，《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25日。

(76)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1月29日。

(77)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24日。

(78) 《行政院新闻局揭露关于协助南京办理国大代表普选投票中种种弊端的签呈》（1947年12月17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79) 佳木：《民社党当前的心情》，《新闻天地》（上海）第34期，1948年2月16日。

(80)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81)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6日。

(8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30日。

(83)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13日。

(84)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1日。

(85)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23日。

(8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25日。

(87)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22日。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12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19日。

(90)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0日。

(91)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6日。

(92)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8日。

(93)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9日。

(94)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9日。

(95)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9日。

(96) 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3177页。

(97) 《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9日第2版。按：第二天，北平行辕新闻处副处长黄雪邨否认李宗仁有这一类的谈话，相关内容参《世界日报》1948年1月10日。——笔者。

(9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月15日。

(9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月16日。

(10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3月12日。

(10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3月15日。

(102)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3日。

(103)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4日。

(104)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6日。

(105) 《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年10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86页。

(106) 《张群在行政座谈会上的总提示》（1947年8月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

(107)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30日。

(108)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3日。

(109) 参《胡适日记》1948年3月30日到4月1日，手稿影印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110)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022-2024页。

(1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4月3日条。

(112)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按：高德裴尔系《时代周刊》外交编辑，鲁斯系《时代》、《生活》两刊主人，此电系密电，由董显光秘密获得，于1948年8月19日译呈蒋介石。——笔者。

(113)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29页。

(114) 参《李宗仁回忆录》、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王捷三：《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周一志：《孙科、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各回忆录所述内容各有出入，大体如此。

(115) 褚光明：《副总统争夺战幕后》，《世纪评论》（南京）第3卷第16期，1948年4月17日。

(116)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1948年4月2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22页。

(117) 《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之演词》（1948年4月4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23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未收入此演讲，《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4月4日条所载与白皮书有所不同，其中并有："近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余认为违反党纪。"

(118)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9日。

(119)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23页。

(120)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121)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7日。

(1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0日。

(123)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9日。

(124)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0日。

(125)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3日；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8页。

(126)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6日。

(127)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6日。

(128) 《第一届国民大会实录》，《国民大会实录》第一编，台北“国民大会”秘书处1961年编印，第217-218页。

(129) 《国民大会》，中华年鉴社1948年印行，第41页。

(130) 《国民政府公报》第3129号，1948年5月10日。

(131) 楼邦彦：《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观察》（上海）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132)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页。

(133) 祁又慈：《竞选副总统搬出杀手锏》，《新闻天地》（上海）第40期，1948年5月16日。参《观察》第4卷第10期、《新闻杂志》新第1卷第3期报道。

(134)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按：程在书面的声明中，并未写入“受命放弃”字样。——笔者。

(135)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

(136)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

(137)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7日。

(1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9日。

(139) 观察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上海）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140) *FRUS*，1948，Vol．7，p．332．

(141) 《国大观感》，《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2日。

(142) 志徐：《副总统选潮》，《世纪评论》（南京）第3卷第18期，1948年5月1日。

(143)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8年5月3日。按：原预算为999.6895亿元（《国民大会实录》第1编第96页）。——笔者。

(144)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59页。

(145) W．W．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69．

(146) 《国民党中常会暨选举指委会联席会议纪要》（1948年11月2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147)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6日。

(148) 《三党立委名额纠纷的评判》，《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4日。

(149) 夏鼐致傅斯年函（1948年5月17日），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台北1995年版，第230页。

(150)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6日。

(151)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1页，据前引夏鼐的信，是在安乐酒店开会。

(152) 转引自胡适致汪少伦的信，《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7日。

(153)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25日。

(154)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5日。

(155) 《再生》周刊第224期，1948年7月25日，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

(156) T．C．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55．

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

第一节　战略形势的转换

一　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

1947年5月，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灭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不得不暂时后撤，采取守势。但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仍居于兵力优势地位。蒋介石为再次组织进攻，严词拒绝了部下放弃莱芜、新泰，向安阳一线转用兵力的建议，要求部下坚守莱芜、临沂。

蒋介石一方面整饬军纪，处分救援张灵甫不力的李天霞，一方面为总结经验教训、研讨进攻战术，于5月底6月初，将进攻沂蒙山区的半数将领调到南京，参加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集训。蒋介石在研究班的历次讲话中承认："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敢缓急相救"，"各级官长缺乏研究精神，学术荒疏，官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1)] 他强调这次集训的目的说："此次不顾前方军事如何紧急，而将沂蒙山区半数以上将领调集来京接受为时两周之训练，主要目的，即在使各将领接受孟良崮之惨痛教训，而将个人之精神、思想、生活、行动，作一番彻底反省，彻底改造；对整个军队之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检讨，彻底改革。故此一集训，实为今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枢机，深望各将领一致醒觉，砥砺志节，记取教训，加强准备，以期达到雪耻复仇之目的。"[(2)] 但国民党军的风气已经养成，不是单靠蒋的几次训话所能改变，而蒋的训话在将领

们心中不过是“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3]。他的军事权威地位，由于历次的失败，已经严重下降。蒋介石对这一切已无可奈何，只是自己尽心尽力而已，他在日记中说：“余对前方将领之教训勖勉，心力已尽，未知果有效验否？”[4] 明显表现出缺乏信心。不过，这次集训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进攻沂蒙山区的各将领不敢过分懈怠，在后来的战斗中也有所表现。然而蒋介石已顾此失彼，无法照顾所有战场。

当时，山东战场是国共两军争战的焦点，正如蒋介石所说：“蒙阴山区战事为国军生死成败关头。”[5] 毛泽东也认为：“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6] 蒋介石在分析战略全局时认为，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的根据地，即：“（一）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二）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三）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7] 他的战略重心在于首先摧毁中共的根据地，他强调：“剿匪必须捣破他的巢穴者，即因为匪的一切物资粮食都储备在老巢里面，一个老巢被捣之后，他在短期内必无力重建，所有重要老巢捣毁之后，他就成为流寇了。”[8] 他计划攻占山东后，进一步进攻冀中、冀南、冀北、鲁北，“断绝其兵源补充，占领其粮食产区”[9]。这就是说，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第一步，摧毁解放军的所有根据地，迫使解放军与土地和人民脱离，陷入无后方依托、无后勤保障的境地；第二步，当解放军在流动中削弱了战斗力之后，政府军再进行生死的决战，就会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因此，他首先指挥政府军在黄河以南发动进攻，得手后即向黄河北岸进攻。

在解放军方面，当时华东野战军军力为全军之最，野战军兵力为27万人，承受着国民党军32个整编师、85个旅的攻击，其负担也为全军之最。毛泽东为打破蒋介石的战略图谋，指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作战略配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前线将领的电报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

（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6月1日——引者）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游或从上游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10] 陈谢，即陈赓、谢富治集团；陕北，即彭德怀所率西北野战军。毛泽东把刘邓大军作为战略机动部队使用到主战场，原计划6月1日以后行动，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推迟了一个月。

蒋介石在部署向山东重新发动进攻的时候，竟无力顾及刘邓这一支解放军的战略机动部队的使用方向。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已被迫采取守势，四平正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国民党内放弃东北的呼声甚高，对东北战局没有信心，主张撤守关内。但蒋介石召见孙立人等研究战局后，“决定仍固守长春，保卫沈阳。盖长、沈二地，如不被动摇，则东北形势仍可为我所控驭也”。他认为“此着关系甚大，应督饬集中全力沉着应战也”[11]。他为一时的利益所吸引，终于丧失了从东北撤退的有利时机。对于华北，由陈诚拟定、经蒋批准的北平行辕作战计划为：“保定绥署，应各以一部确保北宁路及其沿线榆关、唐山、大沽、天津、北平及保定诸要点，抽调第十六军、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暨六十二师之九十五旅在天津附近集结，配合张垣绥署主力，对津浦北段聂荣臻股匪主力断行攻击。石门守军应调整部署，以地方部队担任石门守备。集结第三军主力即日攻占正定，并行有限目标攻击；如敌转向平汉北段窜扰时，该军应在正定、保定间专任阻截。（二）张垣绥署应各以一部确保平绥路及其沿线张垣、大同、集宁、归绥、包头各要点，监视晋北贺龙匪股及外蒙匪军行动，抽调新二旅、新四骑兵师暨第五、第十一骑兵旅转用北宁线天津附近集中，

对聂匪主力攻击。（三）所有保定、张垣两绥署抽调担任攻击各部队均由李文兵团统一指挥，如敌转向平汉北段窜扰时，应即向沧县、保定以北地区跟踪追击歼灭之。（四）热西国军向南扫荡，牵制热、冀省界之敌。（五）太原绥署向娘子关方向出击，相机收复正太路。”[12] 对于山西，由陈诚拟定、经蒋批准的太原绥署作战计划：“延安收复后，共匪政治机构已东移五台山，故山西高原对匪政略上之威胁颇大，太原绥署不应消极专守，致匪军得藉山西根据地，以图喘息。兹拟指示太原绥署今后对匪作战计划事项：（一）以太原为中心，行攻击持久战，争取时间，培养战力。（二）不断乘匪空虚，竭力行牵制攻击，以策应北平行辕及西安绥署作战。（三）应主动攻击匪军，随时随地以轻装快速部队，毁灭其后方根据地。（四）不宜消极专取守势，坐失战机，遭受匪军各个击破。”[13]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继续集结优势兵力压迫中共中央机关；在山东战场，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而在豫北，国民党军自汤阴失守后，李振清率整编第四十师死守安阳，孤悬豫北，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驻守新乡，不敢北援，已经无力牵制刘邓大军的机动作战。蒋介石对刘邓大军的战略使用方向也一无所知，成为政府军战略布局中的盲点。

国民党军为防止刘邓野战军渡河作战，在菏泽设有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所部两个整编师，守备菏泽及郓城附近之要点、渡口；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所属整七十师在巨野、嘉祥间保持机动；并以整八十四师据守运河西岸梁山附近要点，以确保进攻山东各军侧后方的安全。5月底，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主张放弃莱芜，抽调兵力，以解安阳之围，巩固政府军在豫北的地位，牵制刘邓军的兵力转用。他在日记中写道：“安阳被围已久，如不计划速往解围，则一旦战力衰竭，可以急转直下，在刘伯承一度强袭下，即可能失守。如安阳被解决，则刘伯承海阔天空将兵力投入河北，则河北危急；投入山东，则山东不支。故余主张于山东放弃莱芜、新泰，抽出两师兵力车运豫北解安阳之围，以后即在豫北缩短防线，转用两个师至山东。”[14] 但蒋介石兵力不足，为倾全力进攻山东，坚主固守莱芜一线，作

为前进基地，不肯有所松动、转用兵力于豫北，而只好置刘邓所部于不顾，致使刘邓所部没有受到国民党军强大军力的压制而处于机动地位。

6月下旬，蒋介石重新部署对山东沂蒙山解放军根据地发动进攻，计划一举攻占南麻、鲁村，并以占领沂水为此次战役的目标。他在总结孟良崮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依余意，与匪作战，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主张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总之，对匪之攻防，应使360度均无弱点，始可操胜算。其法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15]。因此，作出了密集平推的兵力部署：（一）李延年兵团配置于临沂、汤头、河阳地区。（二）欧震兵团配置于桃墟、蒙阴地区。（三）范汉杰兵团，以黄百韬指挥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六十五师为右纵队，配置于蒙阴（不含）、新泰地区。以胡琏指挥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六十四师为中央纵队，配置于新泰（不含）、蒙阴寨地区。以邱清泉指挥整编第五师为左纵队，配置于颜庄、莱芜地区。（四）以整编第七十五师及整编第九师一部为第二线兵团，以夏楚中兵团之第四十五师置于潍县附近。整编第八师主力置于安邱，一部控制于临朐[16]。蒋介石在6月26日致第八军军长李弥的电报中指示作战机宜说："此次进剿鲁中共匪老巢，必须由潍县主力积极进取蒋峪、穆陵关，南至马站，北至临朐，勿使残匪经胶济线向北向东自由退却，方能收获全胜。故我进剿部队占领南麻时，第八军必须立即出击，而且要有夜间行动与袭击之准备，使匪不及防范，出其不意，直捣其蒋峪与临朐，则必克奏肤功。务须切实遵行，并望依照日前指示之要旨，不在占领城市，而在摧残其后方根据地之物资与阻绝其交通与通信之联系。总期前后呼应，双方夹击，达成此重大之任务为要。"[17]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先分散后围剿，使之各个就歼"[18]，也就是采取迫使山东解放军脱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迫使山东解放军不能退入胶东根据地，因而一反以往外线会攻或两翼包围方式，而以主力集中于一处，实施中央突破，期望一举深入解放军根据地，迫使解放军放弃根据地，分兵作战。同时，以有力一

部，占领外围战略要点，进行诱敌、牵制及策应[19]。一轮新的战斗即将开始，而战局也进入了转折的关头。但蒋介石对于解放军的战略转折计划一无所知，因而并无思想准备，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的主动权很快就要丧失。

二　七月山东战场的攻防战

6月18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分别下达命令，20日起各军开始行动，24日，主攻各师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同时，令张淦的第三纵队（辖整七、整四十八师）向莒县、沂水行广正面搜索，并轰炸坦埠附近，进行佯攻。蒋介石并令驻新乡的王仲廉部出击，指定由滑县北进，威胁刘邓所部解放军，掩护其西侧安全。25日，各兵团按命令发起进攻，虽然各自到达应到位置，但推进十分缓慢，日行仅10到15公里，并未发生战斗。同日，第四绥靖区（菏泽）副司令曹福林报告，所属驻东平湖第八十七团遭到刘邓野战军杨勇所部围攻，突围而出。这是一个警报，郭汝瑰对这方面十分忧虑，认为刘伯承部一旦渡河，则国民党军将手忙脚乱，无法应付。于是，即命令第六绥区（商丘）调第一五三旅控制在砀山作机动兵团，27日又续调整三十二师至商丘，防备刘邓渡河。

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由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指挥，以整编第五师（即第五军）及整编第二十五师为左纵队，沿蒙阴寨、松崮庄、牛排子山方向攻击，夺取鲁村；以整编第十一师及整编第六十四师为中央纵队，沿新泰、龙庭、大张庄、狗跑泉方向攻击，夺取南麻；以整编第六十五师及整编第九师为右纵队，沿马家庄向贾庄方向攻击，一面与中央纵队右翼六十四师切取联系，确实掩护中央纵队，保障中央纵队进出容易；另指挥整编第二十师第一二三旅由蒙阴以东向坦埠方向搜索前进，并相机占领而固守之，以掩护主攻兵团东侧安全；以第三兵团（司令官欧震）、第二绥区（济南）部队、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各部任外围佯攻和掩护部队。国民党军以六个

主力师，在不足百里（50公里）之内，齐头并进，密集平推，实施正面攻击。26日起发生小规模战斗，解放军以小部队进行牵制、阻击，边战边撤。28日，整编第二十五师占领鲁村，但师长黄百韬十分谨慎，他感到自己的部队过于突出，旋即将主力撤出，与十一师靠拢，至翌日才再进鲁村。29日，十一师于傍晚17时占领解放军沂蒙山区核心据点南麻，师长胡琏吸取了七十四师失败的经验教训，立即命令筑工固守。

在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集中攻击面前，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都在考虑调整部署的问题。毛泽东早已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两军作战略配合，当刘邓渡河作战时，毛泽东原指示陈粟转入外线作战。5月8日，毛在给前线将领的电报中说："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5月4日——引者）电，争取于巳东（6月1日——引者）前休整完毕，巳灰（6月10日——引者）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20] 外线出击，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开始考虑的一种战略方案。1946年6月22日，他就曾指示刘邓考虑渡淮南进，"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21]，但当时未能实施。这时，刘邓军于5月2日攻克汤阴后不久，又发起了包围攻击安阳的战役，但屡攻不克，直到5月25日才停止攻击，转入休整，因而推迟了渡河的时间。在此期间，陈粟军取得了歼灭敌主力七十四师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和前线将领都对自己的战斗力作了偏高的估计。5月22日，毛泽东对陈粟的指示，一方面改变了外线出击的指示，一方面对战局的前景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他说："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22] 但这时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平推战术，陈粟军在内线找不到战机，强敌压境，军情紧迫，不

能不考虑改变集中兵力在内线作战的方针，而分兵向外线出击，重新回到原来的战略方案。

据粟裕回忆："六月二十五日，敌军开始全力东犯，十八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一线，妄图迫我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由于当面之敌十分密集，无论是寻歼侧翼之敌或直取中央之敌都缺乏条件。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第六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第四纵队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汤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二十九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此电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23] 当时，陈粟部队包括后方机关，在内线大量集中，拥挤不堪，补给困难，粮食也吃光了。由于国民党军密集平推，一时既无法歼敌一路，不能不考虑分散进击。军委电报的战略意向和陈粟前敌将领的战役意图吻合。陈粟考虑到以往中央配合刘邓出击的指示，决定立即执行军委的指示，具体部署是：（一）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渠、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各部队根据命令于7月1日起执行，分头行动。

解放军的外线分兵作战的计划，在战略意向上，似乎是蒋介石实现其战略目的的结果，蒋介石此次作战的目的，就是要将解放军逐出山东根据地。问题在于，解放军的分兵，从总体上说，是战略上经过周密考虑、计算了利害得失之后的主动行动，出敌机先，并不是如蒋介石所预想的纯粹被迫行动，尤其是刘邓军的战略行动方向，并不在国民党军的预料之中。只是陈粟所部在战役行动中，原未考虑分兵的问题，在强敌压境之下，临时改变战役方向，计划不够周密，准备也不充分，未能在内线再坚持一段时间，在更有利的态势下出击，对以后的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于是，在6月30日至7月1日之际，在山东战场上，形成了攻防转换的局面，这一转换，不仅是局部战场的形势转换，而且是整个国共战场的战略形势的转换。这一战略转换的利害得失，和围棋中的转换一样，各自有得有失，而对得失的衡量，又各有权衡。虽然，军史学界对这种转换的评价尚需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解放军在战略行动上始终保持着主动，正是这种主动权，保证了战略的胜利。

刘邓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指示，于6月20日发布晋冀鲁豫野战军役字第十四号基本命令[(24)]，决心集结四个纵队的兵力，从张秋镇到临濮集间150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26日，刘邓作战命令强调："此次作战关键，首在迅速确实割裂包围散布之敌，各纵队在渡河后即应不顾疲劳地大胆实施这种割裂和包围，以便各个歼灭之。防止敌人向其西南逃走。纠正任何可能丧失战机的现象。"[(25)]

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以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分成左右两翼，在南岸两个独立旅的接应下，从孙口、林楼、于庄等八个渡口，强渡黄河成功，于7月1日包围郓城国民党军整五十五师，并前出至郓城、皇姑庵地区，准备阻援，力争迅速在黄河之南站稳脚跟。政府军河防十分脆弱，既不能在解放军半渡时予以截击，只好临时调兵，乘解放军立足未稳组织会战。于是，一面令四绥区司令官刘汝明死守，

令砀山的一五三旅进驻定陶；一面自豫北调整三十二师、整六十六师到金乡一线，与原在嘉祥一线的整七十师组成第二兵团，从泗水调王敬久前来指挥，增援郓城。但第二兵团虽系原有番号，司令部和部队却都是临时凑集，集结缓慢，战斗力也仅属二三流的队伍。蒋介石为集中兵力在鲁中作战，决定暂置鲁西于不顾，“以攻为守”[26]，命令十一师主力守南麻，以十一师一个旅及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向南攻击，七十五师配合九师、六十五师攻坦埠、朴里庄，继续深入解放军鲁中根据地，寻求陈粟主力会战。

7月2日，解放军陈粟军一、四纵队自沂水、坦埠间敌军空隙南下，攻击费县。3日，国民党军发现解放军主力进入自己的侧后，参谋们主张以主力部队右旋，与临沂部队配合夹击，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攻击东里店及坦埠的既定方针。是日，山洪暴发，给国共两军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5日，费县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岌岌可危。政府军已确认解放军主力在青驼寺、垛庄、界湖一带，前线将领则苦于大水阻滞，前进困难，而蒋介石仍主张进取沂水。顾祝同于是亲自打电话给参谋次长刘斐，请他请示蒋介石，让欧震向西南方向追击，刘认为：“匪如在此区域，自可独断向南攻击，并以张淦部北上夹击。”[27] 于是，顾祝同决心改变部队行动方向，调欧震所部南下夹击。翌日，蒋介石发现前线将领独断地改变攻击沂水的决心，十分震怒，打电话怒斥顾说：“攻击共军根据地沂水，是此次战役的既定方针，决不应有丝毫改变。为何不经请示，擅自改变，别说我是主席，就是朋友，也该商量商量嘛，你眼里哪里有我这主席！”顾被骂得面如土色，只是口中喃喃地埋怨刘斐：“刘为章怎么这样不负责啊！”即怪刘未向蒋报告。顾不得已，仍令欧震兵团攻击沂水[28]。

蒋介石的战略目的，首先在于摧毁解放军根据地，他认为国民党军如改变方向，回师攻击深入侧后的解放军，就会给解放军留有保存沂水根据地的机会，因此，不顾解放军主力的行动方向，继续向沂水推进[29]。11日，第九师占领沂水，解放军已先期撤出，留下一座空

城，国民党军歼击解放军的计划在这种行动方式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国民党军向沂水推进期间，陈粟军一、四纵队于7日攻克费县，9日攻克峄县，三、八、十纵队于10日攻克大汶口，威胁兖州、徐州敌后方基地。政府军整八十四师不得已后撤至滋阳（兖州），在豫北的整第三师改调徐州。刘邓军于渡河后一面围攻郓城，于8日晨攻克，歼敌五十五师师部及其两个旅；一面进逼菏泽，于6日攻克曹县，包围定陶，战至11日，敌一五三旅突围，大部被歼。至此，刘邓军于渡河后终于在鲁西南站住了脚跟。

这时，三十二师、六十六师已于7月8日分别到达独山集和羊山集，王敬久率司令部进驻金乡，以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驻在金乡城北万福河南岸，归其直接指挥，七十师开抵六营集。王敬久原在鲁中战场指挥第五军等一流部队，由于才力不足，部下不听指挥，蒋介石把他调来指挥二流部队，弄得他满腹牢骚，又对敌情不明，胆怯惧战，借口炮兵、工兵不足，迟迟不肯出发，将三个师自北至南，从嘉祥、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金乡摆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正好王是金乡人，老家新屋落成，率部在家庆祝乔迁之喜。解放军于攻克郓城之后，即乘敌不备，对王敬久兵团实施穿插分割。自11日起，第一纵队进至巨野东南地区，切断七十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的联系，第六纵队以一部切断三十二师和六十六师的联系，以主力协同一纵围歼七十师，第二、第三纵队分别由曹县、汶山集地区插向谢家集、羊山集，割歼六十六师，以独立第一、第二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阻击金乡北援之敌。13日拂晓，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分割包围态势。王敬久突然发觉处境危险，急令七十师、三十二师靠拢，南下攻击，救援羊山集。蒋介石致电王敬久说：“我鲁西各部如能早取攻势，积极进剿，当不致如今日之被动，反受匪部攻击，坐失良机，殊为可惜。惟既取守势，则亦唯有固守阵地，必使匪之攻势失败，乃可乘机反击，以期转危为安，万不可作突围苟免之计，须知突围必无幸

免之理，死守方有必胜之望。”[30] 但王敬久部士气低落，将无斗志，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竟违令反而自独山集向六营集撤退，并与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商定，要求向嘉祥、济宁撤退。结果，三十二师两个旅在撤退途中被解放军消灭，仅师长率直属队到达六营集。六十六师原奉命向金乡撤退，因等待三十二师接防，13日没有行动。14日，解放军分别包围了六营集和羊山集，入晚，对六营集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向济宁突围，大部被歼，陈颐鼎被俘，三十二师、七十师残部退入济宁。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率部死守羊山集。15日，王率新到的五十八师等五个团自金乡北进，企图解羊山集之围，但攻击无效。

蒋介石面对解放军深入敌后、鲁西告急、而占领沂水的战役目标已经达到的形势，于12日起，着手部署鲁中部队回师，计划首先对付陈粟外线五个纵队，然后再攻击刘邓军。于是，山东战局出现了犬牙交叉的复杂状态。

一方面，在西线，刘邓军围攻羊山集，屡攻不克。在中线，陈粟南路两个纵队，于14日起，一纵攻击滕县，四纵攻击邹县；北路三个纵队于16日起，攻击济宁、汶上。但时值大雨，攻城器械不足，在国民党军顽强防守之下，攻击受阻。在东线，即陈粟内线四个纵队，乘国民党军抽兵回援之机，于17日起，向驻守南麻的十一师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以邱清泉率第五师、七十五师，向泰安方向前进，解济宁之围。欧震率五十七师、八十五师向峄县、枣庄进击，解滕邹之围。以黄百韬率二十五师自东里店翻越九顶连环山回救南麻，以在张庄的六十四师北上，驻益都（今青州市）的第八军（未整编）经临朐南下，夹击围攻南麻的解放军。19日，蒋介石偕顾祝同飞开封，组织第四兵团，以王仲廉为司令官，从各地凑集整编第十师、青年军二〇六师、整编四十师等部，在柳河集中，救援羊山集。同时，命令张淦纵队向太平邑，围击陈粟军一、四纵队。在国民党军压力下，解放军外线各纵自20日起，被迫撤围。一、四纵原奉命加入南麻战斗，但为河水所困，竟孤悬鲁南敌后，处境十分危险。这一系列战斗，陈粟军因为缺

乏雨季作战装备，弹药受潮，对作战十分不利。

攻入南麻的整编第十一师，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师长胡琏战斗经验丰富，占领南麻后即筑工固守，一个村子有三四百个地堡，南麻周围筑有一两千个地堡。陈粟对敌情估计不足，对敌既设阵地，在没有充分准备和攻坚装备的情况下，贸然发起攻击，以第九、第二、第六三个纵队围攻，以第七纵队阻援。攻坚部队由于天雨，影响了火力的发挥，自18日起，血战三天三夜，给南麻守军以巨大的杀伤，但未能攻克。而且，由于战术训练不足，部队密集冲锋，伤亡很大。21日，蒋介石又调驻守沂水之第九师，即夜出发，经东里店向悦庄急进，会同第八军向南麻进攻。政府军第二十五师、六十四师，在九顶连环山突破第七纵队两处阵地，六十四师之第一五九旅突进，炮击鲁村[31]。敌援军逼近，陈粟军已没有预备队在手，21日夜，主动撤退。时李弥第八军在推进中态势孤立，陈粟军乘机围击，李急忙退入临朐固守，自24日夜，陈粟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以第九师、六十四师由悦庄东进增援，整五十四师由青岛西进增援。26日，蒋介石又令二十五师在悦庄集结，增援李弥。7月27日，蒋亲自打电话给李弥："第九师、第廿五师、第六十四师，因近日山洪暴发，延误时间。现已严厉督促兼程前进，务希固守临朐待援。"[32]经7天血战，陈粟军战力受损，不得不于30日撤出战斗，经益都到达陈家。

在南麻、临朐战斗的同时，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攻孤立无援的陈粟军一、四纵队，以欧震部五十七师开驻泗水，欧震统一指挥张淦、吴绍周两纵队东进，三面夹击。一、四纵队外线作战，补给困难，加上天雨，河水暴涨，行军转移，困难重重，环境十分艰苦。26日，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命令欧震指挥张淦纵队、吴绍周纵队兼程穷追解放军华野一、四纵队，"务于沂河两岸梁丘山地捕捉而歼灭之"[33]。同日，蒋介石认为解放军困难重重，士气低落，机会难得，命令各部："此战若予以彻底打击，则结束山东战事，指日可期。自明日起，各纵队即应逐渐与匪主动接战。"[34]但

翌日，即27日，解放军一、四纵队自滕县、官桥一线[35]，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不成队形，拼命跨越津浦铁路。国民党军以装甲列车开往官桥轰击，令八十八师一个旅前往截击，伞兵由枣庄经山口向西集追击，以五十七师车运两下店，南下向滕县攻击，并严令四十八师、七师、八十五师、六十五师四个整编师向滕县、官桥、韩庄之线急进。一、四纵队边战斗边行军，于8月1日通过泗河，与陈唐兵团会师，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但部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两个纵队各损失万余人，战斗力一时难以恢复。同时，北路的第三纵队也有重大损失。

这时，羊山集战斗已经结束。当羊山集激战之际，王仲廉率部东进，胆颤心惊，生怕所部被歼。7月25日，王乘坐吉普车遭到袭击，更使他提心吊胆，他在回忆录中还说："匪区行军搜索稍不注意，即为匪所乘，能不慎欤。"[36] 是日部队到达苒堌集，他再也不敢前进。国民党军方面原以为自己在鲁西南调集了优势兵力，刘邓军就会撤退。郭汝瑰说："羊山集共军仍未退，余甚以为奇。岂刘伯承尚欲在此与优势之国军决战耶！"[37] 但国民党军徒有优势兵力，将士不肯用命，也就无可奈何。宋瑞珂虽然顽强死守已达两个星期，无奈王仲廉、王敬久两路援兵增援不力，战力衰竭。27日夜，刘邓军鉴于敌援兵进逼，即以第二、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一部及军区榴弹炮营和第一纵队炮兵团对羊山集发起总攻，28日全歼守敌，宋瑞珂被俘。蒋介石在31日日记中只好悲叹道："瑞珂实为我军优秀杰出之将领，甚望上帝佑其生还也。"[38]

战后，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整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均被拘押，受到军法审判，但后来都通过各方面的疏通，保释出狱。

至此，山东战局告一段落。国民党军在鲁西南遭到惨败，而陈粟军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解放军外线作战的得失，一时存在着某种平衡。国共双方继续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部署作战计划，在中原一线，开始了更激烈的战斗。

三　解放军挺进中原

蒋介石在7月底，对全盘战局作了估计。7月26日，他在日记中认为："近日山东各地气候多雨，山洪暴发，鲁南之匪第一、第四各纵队皆阻滞于梁邱山区，其第三、第八、第十各纵队以汶河暴涨，不及向北逃窜，乃过袁口窜入鲁西，此乃天赐我灭匪之良机，战略上所预定之先分散后围剿，使之各个就歼之企图，完全形成。惜乎所部不力，亦为气候与地形所限，不能穷追密围，一网打尽，不胜遗憾焉。"31日又记道："（一）自上月杪，东北四平街解围，鲁中地区如期收复匪之南麻老巢以后，本月中，鲁西与鲁南之费县、郓城被陷，滕县、邹县、济宁、汶上、羊山集被困甚急，情势突告紧张，但皆蒙天佑，除羊山集外，其他各城皆能转危为安，而且均使匪蒙受重创。其间最足慰意者，为临朐与南麻之两次决战，使匪半年来所获得我军之炮弹枪械，皆已消耗殆尽。彼匪自诩为八月以后将开始作大规模攻城战、阵地战之鬼计，至此殆已完全打破。虽其第一、第四、第八各纵队之残部仍能漏网西窜，但最后卒为我包围于南阳微山湖滨，陷入泥淖，无法逃窜，此实天网恢恢、奸匪万恶之报应，若我各军将领果能努力奋斗，不失战机，则此理想之歼灭战，必予我以伟大之光荣也。"[(39)] 显然，蒋介石对毛泽东和解放军的战略转变，毫无准备，自然也就不能明了其利害得失，采取主动的应变部署，而只能在盲目乐观之下，作临时的应付。

尽管山东战场的形势错综复杂，但经略中原是毛泽东既定的战略方针，不以具体战场形势的变化为转移。7月19日，军委致电刘邓等指出："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40)] 同时，将赵基梅纵队、秦基伟纵队（九纵）、孔从洲、汪锋三十八军加强陈谢纵队，在陈谢指挥下一同南进。陈谢纵队原准备直接加入陕北作战，但陕北

给养困难，难以承受过多的军队；同时，刘邓进入无后方作战，也需要更多的支持，于是，改变陈谢的用兵方向，就兼顾了两个战场的需要。7月23日，军委指示刘邓、陈粟等："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同时，指示陈粟，令"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41]。7月29日，军委再次敦促前敌将领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42]

这时，蒋介石自我感觉良好，一方面命令二十五师进取蒋峪，命令第九师、六十五师进取益都，准备进一步攻取高密，打通胶济路东段，完成对胶东解放军根据地的进攻。一方面调集重兵，对鲁西南刘邓军和陈粟外线五个纵队进行包围攻击，企图压迫解放军北渡黄河。蒋介石的指挥作风，事无巨细，都想亲决，致使部下不敢临机独断。但他毕竟年老，精力有限，而战场十分广阔，不免顾此失彼。正在鲁西南战场决战之际，他大概对战局感到放心，即于8月7日飞抵延安，指挥西北战场。就在这一天，鲁西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邓军于郓城南的赵家楼地区挥师南进，按照预定计划，向大别山地区挺进。

在此之前，蒋介石将作战不力的第四兵团司令王仲廉撤职查办，以整编第十师师长罗广文升任兵团司令，于8月2日向新集进攻。3日，邱清泉率吴绍周、吴化文部向郓城、巨野索敌攻击。这时，陈粟外线各纵已越过运河，进入嘉祥地区，与刘邓军靠拢。5日，国民党军将五十七师归王敬久指挥，令其率五十八师、五十七师等部由独山

集向郓城攻击，令罗广文兵团、张淦纵队、刘汝明部趋水堡，完成包围攻击的部署。6日，蒋介石担心解放军越陇海路南下，指示变更作战部署，但徐州司令部认为解放军“北渡黄河之公算为大”[43]，仍作阻击北渡的部署。是日，吴绍周由大长沟渡运河到王家桥，邱清泉仍在袁口未渡运河，王敬久在独山集，张淦部到定陶、曹县，罗广文到郑家营，刘汝明到董口、鄄城，将刘邓军和陈粟外线各纵包围在郓城、巨野、嘉祥间狭窄地带。7日，国民党军各部分别向前推进，预期8日将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主力必然渡河北上。徐州司令部参谋长记道：“山东战事似已近尾声，共军主力渡河后，陆总部似已不必存在。余令第三处拟未来部署意见，呈总司令批准后，呈国防部参考。”[44] 但事实上，未来战局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更复杂的战斗。

当时，毛泽东指示陈粟率野战军直属部队和第六纵队去鲁西南，集中6个纵队的兵力，坚持内线作战，掩护刘邓南进。为此，陈粟军正组织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以西兵团在鲁西南作战，以东兵团在胶东内线坚持。8月7日，军委致电刘邓，并告陈粟：“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45] 但国民党军进展很快，陈粟一、四纵队战斗力削弱较之中央军委估计更为严重，无力阻止国民党军渡过运河，因而得不到休整。而且，当时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黄河有决口或被国民党军破堤的危险，不利作战和休整。在强敌压境之下，鲁西南解放军各部既不能在郓城、巨野间作战，也来不及北渡黄河，只有决心提早南下，执行既定的战略任务。同时，原定在内线作战的陈粟西线作战部队也不能不继续突围南下，准备进入豫皖苏边区进行外线作战。8月7日，刘邓向中央报告：“邱清泉、欧震主力昨日已过运河以西，罗广文兵团同日占临濮集东北之郑家营，其目的为郓城，估计明日可到达。我已以宋时轮、王秉璋两纵队与敌保持小接触，迷惑敌人。我两主力已向南移，宋王两纵亦适时转至敌侧背或外线。我们则顺此态势南下。陈唐则第一步在陇海两侧，第二步在陇海

路南，第三步转到鲁西南内线。”尽管部队存在连续作战一个月没有休整、新补充2.5万多解放军战士来不及训练、对跃进大别山还没有进行具体动员和充分准备等困难，但“我决心提前于八月七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电报发出约三小时，中央军委就复电批准了[46]。7日晚，刘邓军四个纵队分三路南下，从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包围圈，向陇海路疾进。以刘邓军第十一纵队佯渡黄河，以陈粟军阻击敌军，进行掩护。

8月8日，陈粟军第十纵队在运河西岸的蔡家林和国民党军第五军作战，陈粟曾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刘邓军协助上述部队打一仗再走。但刘邓已经南下，陈粟又于10日致电刘邓和中共中央军委，认为西线的陈唐部一时难以北返转入内线，建议继续随刘邓南下，在陇海路一线活动。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10日复电给刘邓、陈粟指出：“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47] 并指示陈粟所部西线的陈唐、叶陶部掩护刘邓南进后在陇海南北活动，陈粟率第六纵队及军直到黄河北岸，相机渡河，在鲁西南活动。陈粟10日电和中央意图吻合，军委11日再次复电：“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48]

同时，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9日指示陈谢集团：“为有力协助刘邓行动，我陈谢集团应提前于未灰（8月10日——引者）至未删（8月15日——引者）间渡河，首先控制潼洛段山区，再看形势决定下一步行动。”[49] 陕北方面则攻击榆林，吸引胡宗南军北援，策应陈谢南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邓军居中突前，向大别山既定战略目标挺进；陈粟军居左，分两个层次，陈唐两个纵队和叶陶两个纵队跟进掩护，在陇海路南北活动，宋王两个纵队在鲁西南活动，进行牵制，陈粟军部也相机进入鲁西南指挥西线部队，转入外线作战；陈谢集团居右，进入豫西山区活动，成品字形三路挺进，转入外线作战，

争夺中原战场。

当时，解放区经过一年的战争，人民战争负担已经超过了极限，难以长期坚持，解放军要想求得发展，必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寻求人力物力资源。8月1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华东局的陈毅、粟裕、饶漱石，说明中央的战略目的："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50] 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51]

刘邓主力军南下后，国民党军徐州司令部方面估计："余觉共军南下较其渡河为有利。因渡河后其兵力加强，而内线作战之地域广阔，我平津、安阳、保定等任何一方面均可各个击破也；其南窜全出于被动，经穷追必可使溃散。"[52] 8月11日，刘邓军越过陇海铁路，鲁西南部队在内线与敌军周旋，进行牵制，陈粟率野直部队在泮庄渡过黄河，进驻惠民。12日，陈粟的第十纵队在黄河与东平湖三角地带受到敌第五军的攻击，损失很重，退至北岸的张秋镇休整。13日，蒋介石即部署对刘邓军进行追击。陆总徐州司令部概定追击部署如次："一、第二兵团（辖整三、整五十八师）经砀山向亳县追击，第八绥区（驻蚌埠）以整四十六师至涡阳截堵。二、张淦纵队（辖整七、整四十八师）经柘城向淮阳追击，第五绥区（驻汲县）以整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至周家口截堵。三、罗广文纵队（辖整十、整四十师、第二〇六师第一旅）沿陇海路经郑州，转平汉路，铁运至郾城，严防匪军越平汉路西窜。"[53] 但这时，刘邓军已甩开敌军两日路程。不过，国民党军有铁路运兵的优势，便于转用兵力，能够部署前堵后追。

蒋介石在部署对刘邓大军进行追击的同时，他的作战重点仍然放

在山东，以继续贯彻摧毁山东解放军根据地的战略计划。8月14日，蒋介石决定胶东半岛进攻计划，并接见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令其准备行动。又接见范汉杰司令官，听取鲁中敌情报告，并指示对胶东进攻方略。当时，国民党军于8月6日攻克益都后，13日攻占临淄。14日，开始打通胶济路的攻击，以整编第二十一军军长夏楚中率整第八、九、六十四师由益都向西沿铁路攻击，以整第二十五师守益都、临朐，以陈金城率整编四十五师及四十二旅，由西向东进攻，会师张店后南下，协同胡琏所率整第十一师、七十五师，攻取淄川、博山。15日，陈粟部内线由谭震林、许世友率东兵团二、七、九纵队于寿光附近渡弥河进入胶东。于是，国民党军于17日攻克张店，19日会师周村，攻下淄川城，占领博山煤矿。21日，打通了胶济路，恢复交通。不久即转移兵力，向胶东进攻。当时，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都希望东兵团（二、七、九、十三纵及原一、四纵转回内线的两个师）在外线机动作战，担心转回胶东会被封锁在狭窄地带不能出来。但毛泽东主张东兵团一部在内线牵制敌人，东兵团主力在诸城一线配合，不要南下，而要陈粟率主力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运河以西的广大局面。

16日，刘邓军已进抵淮阳、郸城间，将105榴弹炮觅地掩埋，准备轻装前进。17日，全军克服重重困难，开始通过20公里宽、遍地淤泥的黄泛区，19日全军渡过沙河，进抵商水、项城、沈丘、阜阳西地区进行休整[54]。此时，刘邓向全军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鉴于前进途中还有多道河流阻隔，国民党军追兵紧逼，部队再次轻装，把重武器和车辆就地掩埋或炸毁，争取速度，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刘邓军以不惜一切牺牲的代价，实现既定的战略任务。

刘邓军渡过黄泛区后，蒋介石为防止刘邓军向西南挺进，于19日命令八十二旅开驻马店，整八十五师开确山，整六十五师开长台关。命令王敬久部迅速接替太和防务，令驻合肥的第八绥靖区司令夏威主

力移防固始、潢川。令第五绥区张轸（辖整十五师第六十四旅、整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交警第四总队）守洪河。20日，蒋介石判断刘邓军将经上蔡西进，张轸等则认为刘邓军不会到此方面来，必往南去。顾祝同原定八十五师开正阳，三列车已到确山，蒋为防阻刘邓军越铁路西进，命令八十五师速开上蔡，于是，又返回遂平[55]。八十五师一来一往，延误了超越阻击的有利时机。

22日，刘邓军第三纵队在淮河北岸的南照集、三河尖一线与敌四十六师激战。国民党军判断刘邓军将由三河尖至新蔡间渡河，23日即以六十五师在西平、遂平间和解放军地方部队魏凤楼部发生战斗。刘邓第三纵队边战斗边渡过淮河，第一、二纵队已渡过汝河前进，这时国民党军八十五师及八十二旅重又南开抵达汝南埠，和渡河的刘邓军第六纵队先头部队发生战斗[56]。中共中原局、刘邓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六纵队被阻于汝河北岸，罗广文、张淦两部正分别于上蔡、项城一线尾追南下，军情十分紧急。刘邓部队在长途行军以后已十分疲劳，一路上又掩埋了重装备。面对险境，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察看渡口，进行战斗动员，刘司令员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鼓励部队坚决实行强渡。23日夜[57]，刘邓军在已进抵南岸部队配合下，向敌八十五师发起攻击，杀开一条血路，强渡汝河成功。26日，刘邓部队进至淮河，当时淮河水涨，难以徒涉，再次濒临绝地。刘伯承亲自下河察看，恰巧正值两个洪峰之间，发现淮河可以徒涉。27日，全军渡过淮河。当国民党军追兵进抵淮河一线时，河水暴涨，被隔在淮河北岸，刘邓军得以顺利进入大别山预定战略锁钥地区。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于8月27日严令申诫：“（刘伯承部）自鲁西南窜以来，迭有伤亡，其战力已失，又临沙河、洪河、淮河之重重障碍，正是我歼灭刘匪之良机。乃各部队行动迟慢不前，损失战机，任匪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司令官、部队长，只借稳扎稳打，猬集一堆，未能区分多路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兹特

严予申诫，如再任匪逃遁而至平汉铁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均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58] 对于在自己亲自指挥之下，各部队仍战斗消极，错失良机，蒋介石深感痛苦，而又无可奈何。他在9月2日的命令中说：“尾追少数部队，裹足不前，逡巡迟疑，以致屡失战机，往往上午七时以前，下午五时以后，空军迭不见我军继续前进，尚属休息状态（缺十一码），形同旅次行军，何能歼灭共军，挽救危亡。每念及此，深为痛惜。”[59]

在刘邓军准备强渡汝河之际，陈谢集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于8月22日夜，右路第三十八军和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从茅津渡以东实行偷渡成功。23日晨，左路第四纵队从邵源以南的大教至官阳间实施强渡和偷渡相结合，第九纵队随后跟进，向陇海路发展。政府军只有地方团队，无力阻击，蒋介石的意图，“鲁西、豫南均将有决定性的战斗，不愿于此关头抽兵，宁让陈赓再渡些人过河”[60]。至31日，陈谢集团攻克会兴、新安、洛宁等地，一部围攻横水，威逼洛阳。这时，刘邓已进入大别山，国民党军不得不陆续调整第三、十五、四十一师和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各一个旅回援，连同原驻洛阳地区的4个旅组成第五兵团，并以胡宗南部组成陕东兵团，对付陈谢。9月2日起，陈谢集团主力自洛阳等地向西进击，歼灭陕东兵团大部。陕北、大别山、晋南诸地国民党军不得不抽兵调防西安、潼关。

鲁西南解放军在强敌进攻面前，盘旋打转，国民党军竟“已不能获得共军所在，故无接战”[61]。但毛泽东认为陈粟军作战消极，提出了批评，8月30日致电陈粟：“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五军、五十七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唐叶陶二十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62] 陈粟接电后，即于9月2日率部渡河，并于7日将敌整编五十七师包围在沙土集。陆总徐州司令部方面以为鲁西南解放军已甚残破，没有察觉到陈粟率主力南下，因此未能及时调主力第五军增援。

9日，整编第五十七师被全部歼灭，师长段霖茂被俘。国民党军被迫调胶东战场和大别山战场的整十一师、整七十五师、整第十师等前来支援鲁西南作战。然而，陈粟军以一部在鲁西南进行牵制外，主力及准备用于大别山的刘邓军第十二纵队向豫皖苏边地区挺进，转入外线作战。

在解放军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向中原挺进的时候，国民党军虽多次不得不追随情况，被迫分兵，但蒋介石仍坚持把用兵的重点放在胶东。当时，国民党军打通胶济路后，即编组胶东兵团，由范汉杰兼任兵团司令，辖整八、整九、整二十五、整五十四、整六十四及第五十七旅，于9月3日在北胶河西岸集结完毕，海军封锁海上交通，空军也投入支援作战。临沂的整编二十三军和第二绥区的整四十五师遥相策应。解放军由许世友率九纵和在胶东的十三纵在胶东作战，华东局也在胶东坚持，谭震林则率二、七纵及两个师在诸城，威胁敌之侧背。国民党军以四个师向平度东西之线密集平推，向胶东进击。但9日，国民党军进驻诸城的第二线部队一个旅，遭到解放军的围攻，攻击部队不得不先行解围，从而推迟了攻击时间。18日前后，在道头一线，整八师又受到解放军第九纵队的顽强阻击，伤亡严重。至20日，攻击部队才进至招远、毕郭集、莱阳亘五龙河右岸之线。

从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国共双方的战略目的都已十分清楚。蒋介石于9月15日在其日记中记道：近来黄河北岸中共军队“主力皆向南窜犯，其目的不外：（一）使我进剿胶东部队回援鲁西，不能进占烟台、威海卫、龙口各要港，企图保持其控制渤海湾旅大及烟台两岸之形势；（二）牵制我军不能向黄河北岸扫荡；（三）流窜长江以北各地，以威胁华中；（四）分股流窜，出没无常，一在牵制分散我之兵力，使不能集中；二在疲劳我之兵力，使无法解决战局。因此，我应严令胶东各军照原定目标与任务，专心挺进，勿为中原匪情所眩惑动摇”[63]。于是，国民党军统帅部命令胶

东兵团："该兵团应迅速夺取黄县、蓬莱，断匪海上退路，并以右翼适时左旋，包围匪军于姚村（烟台以南）、烟台以西地区而歼灭之。"[64] 胶东兵团即于22日发布命令，于24日发起攻击。而22日夜，解放军东线兵团第九、十三纵从敌整八、整九师的结合部突出重围，转入掖县东南的大泽山。国民党军以整九师追击，整六十四师北上夹击，而兵团主力仍继续推进，并于10月1日晨，整五十四师进占烟台，6日，海军陆战队进占威海卫。就在政府军方面庆祝攻克烟台的时候，10月2日，态势孤立的整六十四师主力在范家集被解放军包围，遭到沉重打击。政府军被迫调兵解围，但进展迟缓，畏缩不前，各部队战斗不能协同。陆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感叹道："我相信国军战斗力低落，一个师已打不赢共军一个纵队，共军为主义而战，国军不知为何而战，精神自然不同。"[65] 虽然六十四师顽强死守，得以解围，但一旅援军已被解放军歼灭。至此，胶东会战告一段落。

蒋介石对这一阶段的战略结局深表满意，对前途十分乐观。他认为："我早就预料国军捣入他的老巢以后，他就一定要像黄蜂一样，到处乱窜。""实际上他现在既无根据地，也无目的地，只是窜到那里就算那里，已经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了。"总之，认为中共军队主力已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66]。他强调："我们自从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向鲁中沂蒙山区匪军老巢进攻以来，到最近烟台克复为止，为时共三个月零六天。这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这次胶东作战是决定我们剿匪胜利一个重要的转捩点。"[67] 为此，蒋介石制定了他的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一是中共军队"根据地丧失，交通线切断之后，国军进一步目标，即在断绝其兵源补充，占领其粮食产区"，即继续向黄河北岸的解放军根据地冀中、冀南和鲁北地区进攻。一是中共军队"主力既已分散，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追剿，在实行追剿的时候，因为匪军飘忽无定，所以就不好再用中央突破的办法，而必须活用兵力，乃能捕捉战机，收获战果"。他估计："因为他的老巢已被打破，由于弹药、粮食和交通工具各种条件的限制，他要

集中三个以上纵队，五天以上连续作战，乃是不可能的事情。”[68]

这是一场战略的较量，看谁能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蒋介石虽然看到了解放军受到削弱的事实，看到了解放军外线作战中的弱点，但他没有看到解放军战略转变的主动性，更没有看到解放军在外线作战中的生存和复苏能力，尤其是没有看到解放军建立新的根据地、开辟新战场的能力。当然，蒋介石在胜利的错觉中，对前途仍有深深的忧虑，那就是国民党将领的士气已经难以挽救，国民党军事实上并没有在主动进攻中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9日，蒋介石在青岛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中说：“我现在最感苦闷、最觉忧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具有自动的精神、能够发展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中找不出一个来……如果以你们今天这种精神和能力，而我自己又不严格督导，那我们剿匪军事不知要演成怎样一种局势。”[69]虽然，毛泽东对解放军在外线作战中的作战能力也作了过高的估计，对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但由于解放军在战略上始终保持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之后，终于建立了战略的优势地位。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守势作战

一　国民党军日趋恶化的北方战场

蒋介石原希望在山东战场获得胜利以后，向东北和华北战场转用兵力。国民党军将领也以为：“如纯以军事论，则关内战事本年可以得一决定局面。”[70] 但是，解放军三路挺进中原，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根本地区，不能不使蒋介石深感忧虑。他说：“现在刘匪如果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71] 他不得不把主要兵力转用到中原战场，既不能增援东北，更不能向黄河北岸推进。这使本来就恶化的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形势更加逆转。

1947年7月，四平战斗撤围后，东北民主联军战力受损，北撤休整。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态势一度有所缓和。这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离职，而蒋介石亲自指挥军事后，陈诚的参谋总长一职形同虚设，陈即谋求赴东北一显身手。8月2日，蒋介石接见参谋总长陈诚，令其前往东北负责指挥军政。8月15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向统帅部报告："（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于未哿（八月二十日）撤销，并由马日（二十一日）起，东北各部队由行辕直接指挥。（二）编组四个兵团，以孙渡、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分任司令官，限八月二十五日按照集团军司令部编制编成。"[72] 29日，蒋介石即命令以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统一东北军政，熊式辉也不得不悻悻离任。陈于31日赴沈阳，9月1日接任。就此，陈诚小集团中的郭汝瑰评论陈诚集团说："余觉云瀚等以十一期为团结中心，局度太小，且如此朋党比周，排挤人才，此非为总长帮忙，实足败乃公事。余觉总长乃国民党之最进步者，尚且如此被包围，可知在现行制度下，国家、社会不会进步。"[73] 云瀚，即刘云瀚，曾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十一期，是指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生。当时，陈诚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形成国民党军中的小集团。

陈诚到东北，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肃清贪污，甚至把有功的四平守将陈明仁也撤了职，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将领。但毕竟他的局度太小，又不能审时度势、宽严适中，反而弄得东北军政人员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在军事上，原拟调关内的五个整编师（军）及一个炮兵团增援东北，但这时中原战场深感吃紧，仅调在苏北的整编四十九师北上。陈诚不得已就地大肆扩军，将保安部队先是扩编为暂编师，后又扩编成四个军，将青年军二〇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共达十四个军，并编成四个兵团。他将主力部署在长春、沈阳、锦州一线，以军为单位，重点守备，并雄心勃勃地准备"依托重点，向外扩张"[74]，改变其在东北的战略态势。

这时，毛泽东于8月29日指示林彪、罗荣桓："希望你们能于九月

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75] 即要求东北战场配合中原战场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是准备发起秋季攻势，计划先以本军南线部队对北宁路及两侧区域发起进攻，调动沈阳敌军主力南下，然后北线主力在中长路沈阳以北发动攻势。但陈诚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已先期主动发起攻击，以两个暂编师分两路由绥中、锦西向建昌方向扫荡。国民党军脱离既设阵地，兵力单薄，正好成为林彪、罗荣桓所率东北民主联军扑食的猎物。9月14至17日间，两师分别被歼大部。刚刚奉调北上、在葫芦岛登陆的四十九军（即整编四十九师，师改军），以各欠一个团的两个师，又奉命于17日自锦西西进，索敌攻击。21日在杨家杖子遭到林罗军的围攻，新登陆的该军第二十六师奉命增援，遭到阻击。战至22日，该军被迫突围，全部被歼。自29日起，林罗军主力在北线采取长途奔袭手段，分路向中长路沈阳以北各外围屏障据点的守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威远堡第一一六师主力、貂皮屯第一三〇师一个团被歼，林罗军占领昌图、法库军事要点，进围新开源。在沈阳之南，也攻占大石桥、海城，威胁抚顺。陈诚赶紧收缩兵力，新一军从长春南调四平，新六军从锦州撤回铁岭。同时，他于10月2日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解放军已发动攻势，请蒋电令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督促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迅速率部出关，协击北宁铁路附近的解放军。蒋即急电李宗仁转令预定出关各师限三日内开拔完毕。旋得李宗仁电复：“出关各师，已饬归陈兼主任指挥，刻大部被阻于榆关、前卫间，已再饬迅速推进。”[76]

国民党军被南线战斗所牵制，蒋介石在10月3日作战会报会上被迫决定：“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77] 随后，蒋即于4日飞北平，6日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8日偕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巡视沈阳，商讨东北和华北协同作战问题，决定由东北行辕负责肃清辽北法库东北林罗军第七纵队，再由傅作义部肃清热南解放军。

于是，国民党军在东北以第五十三军固守新开源，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南下增援，以新六军北上增援，并以傅部的暂编第三军及保

定绥署所属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各一个师出关增援，位于平承路的第十三军东援北宁路，10月中旬到达兴城、锦州一线。由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林罗军即放弃了攻占新开源的计划，同时，鉴于国民党军在东北进行守势作战，依靠铁路网，兵力转用迅速，缺乏野战歼敌机会，即改变部署，北上佯攻吉林，扫清外围敌军后进围永吉，围城打援。11月2日，歼敌援军一个团。但国民党军第六十军死守永吉，林罗军屡攻不克。这时，新一军已进入长春，林罗军即撤围休整。在辽西地区，林罗军一部袭占新立屯、黑山、阜新等地，歼敌一部，并破袭北宁路，一度占领锦州飞机场。正向沈阳前进的国民党军华北调来的两个师，驰援新立屯、阜新，在义县以西被林罗军包围，在突围途中大部被歼。至11月5日，林罗军停止了秋季攻势，转入休整。

陈诚趁林罗军攻击间隙时期，一面进一步扩军，一面调整部署，在铁路沿线战略要点分兵守备，在铁岭、沈阳间部署重兵机动。林罗军趁冬季河道结冰，便于机动，于12月15日起，发动冬季攻势。鉴于秋季攻势战果不大，林罗军改变战法，更注重集中兵力，在围城或打援间，机动作战，以期必胜。南下后即突然包围法库、新立屯，威胁沈阳。国民党军发现林罗军主力南下，即向铁岭、新民、沈阳间集结重兵。林罗军为诱敌野战，即以主力隐蔽集结，以一部兵力四出袭击，28日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27日攻击万金台，歼敌两个营，并佯攻沈阳。国民党军出动主力解万金台之围后，即于1948年元旦，集中十五个师的兵力，以新五军为左路，新三军和新六军为右路，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主力为中路，分由新民、铁岭、沈阳等地向彰武、法库推进，向林罗军主动寻战。林罗军果断地捕捉战机，于1月5日集中了四个纵队的兵力，将态势突出的新五军包围在新立屯南的万家山地区，激战两日，全歼军部和二个师，军长陈林达被俘。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统一称号。歼灭新五军后，林罗军转入休整。蒋介石因东北战局严重恶化，

于1月10日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召傅作义到沈阳，商讨增援东北方略。但傅一面回避增援东北，一面反而要求增兵华北。蒋坚持要傅抽兵三师，打通北宁路交通。同时，蒋认为东北行辕对作战指导无方，陈诚和东北将领之间又互相推诿责任，而陈诚又正患病，影响指挥作战。蒋返回南京后，即决定设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负责东北军事。同时，蒋又分电东北主要将领，抚慰有加，要他们“彻底执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78]。不久又决定以范汉杰的第一兵团部移驻秦皇岛，任范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并调五十四军到锦州，负责打通沈锦间交通。22日，卫由北平飞抵沈阳。2月5日，陈诚离沈回宁。3月1日，卫成立总部。4月1日，东北行辕撤销，由卫负责东北军政全权。

林罗军经过短期休整后，于1月20日重新发动进攻，26日攻占新立屯，又连下沟帮子、盘山等地。随后，以一部兵力钳制沈阳、法库国民党政府军，而以主力南下，2月6日攻克辽阳，20日攻克鞍山，25日围攻营口，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在北线，法库守军于2月17日弃城逃往开原，在途中被歼。27日，林罗军攻克开原，于是，进围四平。这是林彪第四次在四平指挥大战，他的部队已经空前强大，但屡经挫折之后，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他部署了三个纵队和强大火力攻城，以四个纵队阻击沈阳北援之敌，另以一部兵力阻击吉林、长春之敌。3月2日，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6日攻占机场和外围敌军据点，7日起开始攻城，12日发起总攻，13日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八师等部。在此期间，吉林守敌于3月9日逃往长春。

林罗军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处于完全机动地位，部署又十分严密。蒋介石于林罗军再兴攻势后，亲自写信给卫立煌和前敌将领，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全力出击”。但卫度德量力，吸取了陈诚盲目发动攻击受损的教训，复函蒋介石说：“我既居于不利态势，兵力火力，又俱感不足，如骤然采取攻势，纵能顺利，如不能将匪击破，解决战

局，陷于僵持，匪众我寡，势难应付，设遭顿挫，恐益陷于战局之不利，似宜谋定后动，先竭力完成作战诸准备，以策万全。”[79] 尽管蒋介石不顾东北军队的实力和将领的怯战情绪，一再要求卫立煌出兵增援被围据点，并打通沈锦交通，但卫按兵不动。卫告诫部下说：“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积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80] 于是，东北国民党军外围屏障尽失，不得不扼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还在陈诚2月5日回到南京的时候，向蒋汇报东北局势，蒋即感到从东北撤退的时机已过，十分忧虑。这时，东北的补给问题，又面临严重困难，沈锦交通已被切断，未能打通，而空运补给，能力有限。22日，蒋介石决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退至锦州集中。他一方面亲自写信给卫立煌，指示撤退要领，并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阔带往沈阳，要卫实施；一方面写信给李宗仁和傅作义，要他们抽兵出关接应，并让范汉杰到青岛、北平协调从山东、河北抽兵接应问题。但卫复信指出：“我军除留置坚守沈阳兵力外，最大限可以七个师实施计划，如在新民以西发生决战，我无获胜或安全脱离把握。”[81] 同时，蒋介石从山东和华北抽兵以及空运撤退问题都难以解决，从东北撤退的问题只好搁置，后来就成了将帅间争论不休、犹豫不决的一个严重问题。

在陕北战场上，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国共两军粮食供应均感困难。国民党军在兵力上仍占优势。1947年7月间，胡宗南正计划集结十个旅的兵力进行扫荡，陕北中共中央和解放军处境十分困难。毛泽东原准备调陈谢集团增援陕北，击破胡宗南部的进攻。但显然，陕北粮食本已严重不足，不利大军战斗。7月19日，陈赓到达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小河之后，毛泽东即决定改变陈谢集团的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为策应陈谢南进，毛泽东决定：“胡拟八月由保安向靖边，我军八月打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

增援，以利陈赓出潼洛。”[82]

这时，解放军编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贺龙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8月初，彭德怀集结三个纵队又二个旅共八个旅的兵力，北上攻击陕北重镇榆林，6日发起战斗。榆林守军为邓宝珊部地方部队，榆林为陕、绥、晋三省要冲，国民党军扼守榆林以隔断解放区的联系，并成为国民党军的联络枢纽。7日，蒋介石亲自写信给邓宝珊等守将令其坚守，同时，令胡宗南调兵增援。胡一面令安塞、保安（今志丹县）地区的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分两路向绥德、葭县（今佳县）方向急进，一面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驰援。钟松避开绥德、横山正面，循保安、靖边，出长城后，沿伊盟南端边缘挺进，出敌不意，进出榆林。彭德怀决心先克城，再打援，于10日发起强攻。但彭部装备差，攻城准备不足，攻击两日，未能奏效。又拟在榆林西南伏击援军，也告落空。12日，不得不撤围。但调敌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

钟松于13日到达榆林后，即奉命南进，与北进的刘戡所率二十九军夹击解放军。18日，钟师的一二三旅进抵乌龙铺，主力进抵沙家店。彭德怀军当即进行阻击，并于20日拂晓向沙家店发起攻击，一二三旅驰援沙家店，旋被包围于常家堡。整二十九军遭到解放军的阻击，未能推进以解钟松之围。当日黄昏，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全部溃灭，钟松得以逃脱。刘戡率八个旅不得不交替掩护，沿咸榆公路向南撤退，彭德怀即率部追击，在岔口地区，截杀其后卫部队。

在此期间，陈谢集团已在豫西渡河展开，胡宗南感到威胁，从榆林空运二十八旅加强西安。毛泽东为策应陈谢集团，要彭德怀向外线出击，以主力六个旅直取蒲城、白水，再分两路进击，进抵渭水北岸，与陈谢协同作战。但不久陈谢变更了行动方向，彭即建议改打延川、延长，准备一个月之后再向外线出击，旋于10月间，先后攻占延川、延长、清涧。同时，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分别向黄龙地区进击，转入外线国民党统治区域作战，先后攻克黄龙、白水、韩城、

宜川。

这时，榆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整编二十九军分散守备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地区，完全处于守势地位，十分被动。彭德怀决心集中6个旅的兵力再攻榆林。10月27日拂晓，开始对榆林外围阵地发起攻击。蒋介石被动应战，急电胡宗南转令榆林守军左世允军长、徐保师长，激励所部，固守待援，并电令空军昼夜助战，电请张垣绥署主任傅作义，设法就近派兵增援。30日，手中已无机动兵力的蒋介石，不得不四出调兵，向地方实力派求援。他致电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说："榆林自二十六日被匪围攻以来，守城左军长坚忍苦斗，至今屹立不摇，匪势大挫，唯旷日持久，恐难固守。如果榆林一失，则匪势蔓延，宁绥皆危，现在各方援军距榆林较远，且皆就地应战，故不能派遣大军。唯三边最近，而兵力又大，切盼即令三边所部提前赴援，一面增编强有力兵团兼程续进，期速解围，以安北圉。"(83) 这时，傅作义复电称："匪攻榆林虽急，自宝珊（西安绥署副主任邓）到扎（原文如此——引者），及我神木杨（仲璜）团于酉世（10月31日——引者）开入榆林后，已予守军鼓励，可望固守一时。至解围问题，唯有饬少云（马鸿逵——引者）就近直接助援，庶可救急。如能将暂编第三军调回，俾职以有力部队攻晋西北，同时，胡部进击绥德，以围魏救赵之法，可解榆林之围，复可捕歼其主力也。"(84) 以增援榆林为名，要求调回暂三军。蒋不得已，于11月1日电令陈诚，将出关增援的暂三军调回关内，俾傅作义可充分增援榆林。3日，马鸿逵即令整编第十八师、整编第十旅暨保安第二、第五两团即日出发应援榆林。傅作义也以暂编第十七师分由三边、包头出发，增援榆林。

西北野战军扫清榆林外围后，即于11月2日攻城，屡攻不克，伤亡严重，改由坑道作业，于9日晨爆破，仍攻击无效，但炸药已尽。榆林难攻，不得已，调整部署，改为围城打援。14日，西北野战军与马鸿逵部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严重。15日，马部西撤，16日，又

绕道援榆。西北野战军遂撤出战斗。20日，宁夏、绥远两路援军会师榆林。正北上的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转攻马部后路，28日，马部撤返盐池。此后，西北野战军转入新式整军运动，国民党军也无力战斗，一时战场沉寂。

在华北战场，至1947年夏，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调往东北，兵力削弱，只能采取守势作战，将主力控制在平津保三角地带。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于6月17日向蒋介石报告说："（一）查聂荣臻部十二个旅，由山东调来之一部，总计匪兵力有十万。本绥区兵力，除各重要交通线及据点守兵外，能抽调活用兵力，最多不过三个师，只有施行内线作战，先求自保。（二）冀察两绥区，原预定联合作战，今五三军调赴东北，且自滦东至临榆，今又划归本署，其原地守备部队五个团，均已先后调出关外，所遗防务，不得不由侯军派二十一师延接，该区以防广兵单，守备已感不足，该区时有被匪窜扰之虞。"(85)要求蒋介石增兵。

解放军总部为加强晋察冀地区的战斗力，着手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统辖3个纵队作战。8月初，国民党军以主力向大清河北进行清剿，但"此次国军唯一收获在于使冀中民众得瞻国军军容"(86)。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即于9月初攻击涞水，至8日攻占东南两关，双方伤亡惨重。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当即西援涞水，于7日已进抵高碑店，8日夜，三纵于调敌西援后撤出战斗。二、四两纵队于9日渡过大清河，攻击守备薄弱的昝岗和板家窝敌军据点，并分兵攻击霸县和开口。时值雨季，攻击不利。国民党军判断解放军主力所在后，即令第九十四军回援，并于12日与第十六军合力东援昝岗。国民党军又自保定车运第九十五师至白沟河，第一五七师由天津向霸县推进。解放军态势不利，即撤出战斗。

10月初，国民党军以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各一个师及暂编第三军转用东北战场，华北兵力更形薄弱。晋察冀野战军采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围城打援，向保定以北出击。11日发起战斗，以一

部袭击平保段，以一部围攻容城、徐水，而以主力部署打援。14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及从东北战场调回的第四十三师、独立第九十五师，共六个团，自固城南下增援。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师及第一〇九师共四个团自容城、杨村一线西援徐水。15日发生激烈战斗。由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解放军打援的目的未能达到，战斗呈胶着状态。17日夜，解放军主力向平汉路西撤退，诱敌追击。这时，保定绥署深感缺乏机动兵力，命令驻石家庄的第三军主力北调保定，自15日起，沿平汉路向保定前进，16日渡过滹沱河。晋察冀野战军得到相关情报后，当机立断，以一部继续围攻徐水，阻敌南下，命令主力部队以一天一夜急行军120公里以上的速度前进，南下至清风店地区，围歼孤立无援的第三军。19日下午，国民党军空军发现解放军南下，第三军即于清风店一带宿营，准备战斗。入夜，解放军各部将第三军包围，翌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至22日，第三军被歼灭，军长罗历戎被俘。

这时，石家庄守军仅第三军的一个师和一些配属部队，孤立无援。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1日决心乘虚南进，攻打石家庄。11月2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务望在北平附近立即抽调一部正规部队空运增强石家庄防务，切勿稍事犹豫，并告以北平、保定所需部队，已有具体计划，随时可以增加。但事实上无兵可派。5日起，解放军对石家庄外围据点突然予以分割包围，以坑道作业，进逼敌军据点，然后发起攻击。9日，蒋介石令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坚守，但自第三军失败后，守军士气低落，战斗至12日，刘英被解放军侦察兵俘虏，抵抗顿时瓦解。解放军占领了华北重镇石家庄。12月2日，又趁胜攻克元氏。国民党军在华北形势严重恶化。

11月26日，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北平巡视，27日，接见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北平行辕李宗仁，商决组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事宜。28日，蒋于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华北作战计划与改组军政机构。12月2日，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

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及绥远五省军事。保定、张垣两绥署同时撤销。傅作义受到蒋介石器重，职权扩大，于是积极筹划华北作战。

12月18日，蒋介石因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冬季攻势，电令傅作义抽调一个军增援东北，在华北暂取攻势防御。傅复电称：“已奉陈诚总长电，着由热河方面进击，明（19）日职赴承德部署，此一行动，可能东北、河北兼顾，并可完全主动。”[87] 傅作义在华北力图有所作为，力争主动，兼顾关内关外作战。他转变作战方针，以地方部队守备，并协同主力部队作战，而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战略要点，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运动对运动的机动作战，提倡集中兵力，战术包围，反对战略包围。为改善平津保态势，傅作义决心主动向易县出击，寻歼晋察冀解放军主力。12月25日，他作出部署：一、以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暂三军、第三十五军、骑四师及整骑十二旅等部队为攻势部队，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于12月28日开始，沿平保线以西地区南进，寻求共军主力而击灭之。二、以新二军任保定、固城、定兴、涞水之守备，并准备随时支援主力之作战。三、以第三十五军之暂十七师，控制于丰台附近地区，归“剿总”直辖。

晋察冀野战军为创造战机，开辟战场，逐渐击破敌平津保防御态势，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钳制关内敌军出关支援，决以全力出击平保段及平绥路东之南口、北平段。27日先敌出动，破坏铁路。傅作义发现解放军主力在平保段后，将原拟增援东北的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新三十二师自察哈尔南调平汉线，暂三军也由平津段向平保段运动。第十六军各部于28日晚靠拢，进至高碑店。晋察冀野战军以一部诱敌向易县前进，以主力集结待机。但国民党军兵力集中，推进谨慎，解放军即改变决心，佯攻保定，于1948年1月7日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主力当即沿铁路线南下增援。9日，政府军第三十五军率新三十二师进抵保定，解放军让其进入，于11日转兵攻击涞水。12日，一〇一师及新三十二师各两个团自保定北上增援。新三十

二师进至庄疃，一〇一师进至高洛、吴村地区被解放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新三十二师被歼灭，师长李铭鼎丧生，一〇一师被击溃。国民党军被迫撤退，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麐自杀。

在此期间，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留守晋南的部队发起了对运城的攻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去山东整补后，回抵晋南，也参加了战斗。12月17日起激战十余天，于28日全歼守敌。至此，国民党军在晋南仅留临汾一座孤城。

二　中原战场的拉锯战斗

1947年9月间，解放军三路大军以品字形在中原展开，贯彻了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后，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极为空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当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刘邓军以三个旅在皖西、二个旅在鄂东、九个旅摆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军，一面就地展开地方工作。不久，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也跟踪而来。刘邓军集中一部兵力，于商城、光山地区，歼击战斗力薄弱的滇系整编第五十八师。但部队在无后方作战的环境下，困难很多，战斗并不顺利，引起了情绪波动和纪律松弛的现象。9月27日，刘邓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严峻地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的错误思想情绪。刘伯承要求干部打仗时，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鼓励部队战胜困难，打好仗。10月间，国民党军又以重兵对光山、新县地区的刘邓军进行合围。刘邓军以一部牵制敌军，主力分两路向鄂东、皖西展开。国民党军仓促追击，迭遭伏击。刘邓军即进克广济、望江，向长江推进。国民党军深惧解放军渡江，急调整编第四十师主力及整编第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前进。10月26日，四十师等部盲目轻进，进入蕲春以东的高山铺，遭到预伏的解放军的攻击，被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追击受阻，刘邓军

得以顺利展开，并就地解决了急需的冬装。但刘邓军无后方作战，困难重重，部队大量减员，战斗力也大为削弱。解放军虽然两个月间占领了24座县城，建立了33个县政权，但尚不能够巩固。

解放军陈谢集团威胁潼关，国民党军分别从大别山、运城、榆林等地调兵到西安、潼关间布防，集结有十个半旅的重兵。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3日即令陈谢率主力东进，歼击国民党军第五兵团。10月2日，陈谢集团主力在铁门歼灭敌第五兵团所属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该师第六十四旅大部。10月中旬，国民党军从山东战场调整编第二十师到洛阳一线，在洛阳、潼关集结重兵，准备东西对进，打通陇海路。中共中央军委早就指示秦基伟的第九纵："必须使该纵干部明了，该纵后方不是新安、渑池，而是伏牛山，用全力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是为至要。"[88] 10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谢集团以一部兵力在陇海线牵制敌军，以主力分数路南进，"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89]，创建伏牛山根据地。至11月底，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8个专署和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成了8个军分区。

陈粟军在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之后，也向南进军。毛泽东曾以个人名义指示陈粟："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90] 这就是说，解放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原有的根据地已难以支持庞大的军队的需要，必须

以暂时牺牲战斗力为代价，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去求得解决。刘伯承指出："晋冀鲁豫区养八十三万军队，财政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严重。济源地区人民开始逃亡，演成中央苏区结局，实有可能。因此，中原区必须开辟新区，自力更生。"[91] 邓小平也指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92]

沙土集战斗后，陈粟军以一部牵制敌军，以主力五个纵队及李先念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越陇海路南下，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一部向津浦路东的泗县、灵璧等地出击。以各纵主力机动作战外，又分兵发动群众，从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新建立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三个专署和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11月初，李先念所率第十二纵队渡淮进入大别山。

在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军事形势下，国民党军原定向黄河以北进军的战略计划被打破了。10月3日，蒋介石主持作战会报决定："（一）勿使匪南越长江。（二）胶东、鲁南之匪既经驱逐以后，我军仍以消灭黄河以南股匪为主旨。（三）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93] 他不得不修改了渡河北进、破坏解放军华北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被动地追随情况，穷于应付，指挥陷于凌乱。同解放军各战场全局战略配合、各集团独立作战相反，国民党军各战场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顾此失彼，除了中原战场之外，蒋介石对其他战场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尽管刘邓、陈粟诸部在无后方依托的外线作战过程中，战斗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从战略全局上讲，解放军正向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而国民党军已无力实施其既定的战略方针。

10月间，国民党军鲁西南各部追击陈粟军，但因不明敌情，忽而调兵保卫徐州，忽而调兵到鲁西，忽而调兵到信阳、凤台、蒙城，阻击陈粟军向大别山前进。10月4日，蒋介石因东北形势吃紧，前往北平，旋赴沈阳。中原地区因蒋不在，至10月8日，竟至无法调兵："因主席不在京，十一师用法迄未决定，如此焉能捕捉战机。"[94] 9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才决定十一师追击由曹市集、小涧集东进的解放军，用兵十分迟钝。至11日国防部才表示（实际上当是蒋介石）："今后只指示方针，不干涉细部。"[95] 在陈粟军分散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也不能不分散运动，但攻击精神不足，难以捕捉战机。不过，在中原地区，国民党军可以运用铁路运兵，机动能力很强，对解放军在新解放区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陆总徐州司令部方面曾主张打鲁西，切断中原地区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认为："现在为物质战争，流窜无弹药、装具，即自趋灭亡。"[96] 这一条虽可一度削弱解放军的战斗力，但解放军已预有准备，国民党将领对解放军在外线生存的能力显然估计不足。11月1日，蒋介石研究敌情认为："（甲）建立大别山巢穴，以牵制我兵力，威胁我长江航行，并扰乱我后方政治经济。（乙）牵制我进剿胶东。（丙）阻碍我进兵华北与增援东北。（丁）目前陈毅与陈赓匪股之蠢动，当在掩护刘匪，但其次一目的仍必归还黄河北岸，以控制华北平原与晋南老巢，并决不放弃其割据华北与东北之根本计划。"他的因应计划是："（一）进军华北，使陈毅股匪不能不回顾其根据地。（二）彻底毁灭刘伯诚〔承〕股匪以大别山作根据地之妄想，以肃清我后方大患。（三）增援榆林。"[97] 但事实上，解放军南进后，威胁长江流域和作为南京门户的军事重镇徐州，他已无力抽兵北上，只能把重兵集结在中原。

11月8日起，陈粟军对陇海线徐州至兰封段、津浦线徐州南段，进行破袭战，并攻占砀山、萧县等地，威胁徐州。国民党军急从平汉线调整十一、整七十五师，从山东战场调整九、整二十五师到徐州一线，保护铁路和徐州重镇。部队长对于徐州司令部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十分不满；徐州司令部对于蒋介石"事无大小，均须遥制，实误

机宜”[98]、国防部下达命令迟缓，也十分不满。蒋介石则盛怒指责徐州司令部处置不当[99]，徐州司令部则埋怨部队长安全感太重，行动迟缓，骄兵悍将又不听命令。面临解放军机动灵活的作战，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手忙脚乱，凌乱无序。14日，蒋介石让参谋部次长刘斐传话给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在徐州须稳为第一，因部队过于庞杂，恐敌人一突入，即发生混乱。”[100] 15日，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五师自宿县乘车北上，反攻萧县，主力所乘列车在曹村遭到优势解放军的攻击，不得不后撤。至17日，陇海线被严重破坏，但徐州至蚌埠段被国民党军以重兵保护了下来。

国民党军在整四十师主力被刘邓军歼灭后，在大别山的军事态势恶化。11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大别山作战会议和湘鄂皖赣苏豫六省绥靖会议。当天，蒋介石接见国防部长白崇禧，指示在九江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负责进攻大别山。白崇禧本属桂系军人，任国防部长后有职无权。蒋介石在屡败之余，形势严重之际，不能不借助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力量，企图挽回败局，这使白崇禧得以重握兵符。对于白崇禧和傅作义这样的将领，蒋介石对前线指挥，一般不干涉细部，而是控制大局，让他们独断地指挥。当然，在他们指挥下的黄埔系军队，他们也不是能够随意调动的。

蒋介石为击破刘邓军，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确保南京、武汉和长江航运的安全，首先调集优势兵力，拨交九江指挥所。计有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第八绥区（辖整四十六师），第五绥区（辖整五十八师），新编第五、第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原在中原战场的整十、整十一、整二十八、整八十五、整五十二（欠第八十二旅）师、整二十一师之第一四五旅；并从山东战场抽调整九、整二十五师，从郑州调整二十师南下，归入九江指挥所序列。陆军兵力共达25万人，另有海空军配合作战。这样，原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大量部队调归白崇禧指挥，而白也只能分割顾的指挥权。结果，国民党政府军在中原战场的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从此遭到分割，尤其是徐州

方面的军力受到严重削弱，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也就前功尽弃，从此陷于被动。

11月22日九江指挥部在南京编组完成，23日到九江设立。白崇禧巡视战场后于27日到达九江，同日发表开始行使指挥权，当即集结33个旅的重兵，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命令于12月1日开始攻击。其方针为："本部为彻底围歼窜据大别山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即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101) 他以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并指挥续后到达的整二十五师，为西进主力兵团，夺取英山、岳西、立煌（金寨）；以第五绥靖区（辖新五、新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整五十二师第三十三旅）确保平汉路交通畅通，统一指挥整十、整十一、整八十五师，控制于潢川、罗山附近，阻止刘邓军北上和西进；以整九、整二十师向信阳、汉口输送，为总预备队，阻击解放军北上和西进；其余各部担任掩护和策应作战的任务。白崇禧于12月5日率指挥部前往武汉指挥，部署各军向光山地区集结的刘邓军主力合围，从此占据了武汉这一军事重镇的指挥权。

刘邓军鉴于敌军云集，山区运动不便，决定分散行动，即区分为两部，以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率第一纵队到淮西，开辟新根据地，12月10日晚由礼山县东北向潢川西北转移；以邓小平、李先念率前方指挥所，率主力三个纵队在大别山坚持。自8日至15日间，各纵纷纷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线进击。第六纵队一部于12月24日奔袭广济，歼敌一团。第一纵队北进时，于12月14日在光山北向店遭到整十一师十八旅的阻击，整十一师主力和整十师从龙升镇、宣化店赶来合围，一纵从砦河集突围，越信潢公路北进，第十九旅参谋长于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在分头突围中，于沙窝、双轮河一带迭遭损失，向岳西转移。二纵于8日袭击固始，歼敌一部，一度调动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从沙窝回援后，向三河尖、六安运动。内线的地方部队

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国民党军西进部队先后占领立煌、英山、浠水等地，自12月16日起，开始对大别山区进行扫荡。邓小平签发了刘邓指示的作战方针："部队应采取宽大机动，主动分遣攻取敌弱点。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也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102)

同时，刘邓军以新近运送补给品南下的第十、十二纵队越平汉路西进，分别开辟桐柏、江汉两个根据地。12月6日夜，第十二纵队向守备柳林的交警第四总队发起攻击，掩护十纵在柳林南侧越路西进。十纵先头越路后，即遭到适时到达战场的整二十师等部的阻击，8日晨，整十师西进至柳林东侧，将未能通过的解放军分割包围。解放军分别向西双河、谭家河南侧突击，战斗十分激烈。十二纵机动作战，向东回撤，逸出重围，后于14日在广水、花园间越过平汉路，到达预定地区展开。十纵战斗至9日晚突出重围，于途中遭到重大损失。

大别山刘邓军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协助刘邓军在大别山坚持战斗，陈粟军集结五个纵队破袭陇海路郑州、开封、兰封段及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陈谢集团集结二个纵队破袭许昌至信阳段。自13日至22日，迭克许昌、漯河、兰封、西平等地，包围郾城。国民党军即令孙元良兵团3个整编师自郑州南下，第五兵团率整三师（欠一个团）经驻马店北上，企图夹击解放军。陆总徐州司令部及郑州指挥所，担心三师兵力薄弱，屡请调整二十师协同北上，但白崇禧的汉口指挥部不许二十师北进。陈粟军在攻击途中，分割歼灭七十五师的计划，因阻击部队遭到第五军坦克部队的突破，未能实现。20日，粟裕和陈赓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协同歼击态势突出的敌整编第三师。24日，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率整第三师到达金刚寺、祝王砦等地，向郾城增援。25日，陈粟军第三、四、一纵，陈谢集团第四、九纵，刘邓军第一纵等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将敌第五兵团部及整三师分割包围，激战两日，予以全歼。29日，粟裕率部南下，攻击确山，重创整编二十师。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大别山区抽调整十、整

十一、整九师等部增援平汉线。解放军即于1948年1月2日撤出战斗。

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到汉口召开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他在会上鼓励士气说：“现在关内匪军的主力，可以说已被国军整个的打破了……他离开老巢之后，被国军不断的追击，在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敢久留，子弹粮食，打一天少一天，可以说现在黄河以南的匪军，真正已到穷途末路，快要整个崩溃了。”他指示摧毁解放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方法说：“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的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十里或二十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103) 不过，负责指挥大别山作战的白崇禧，虽然对战果也感到满意，但并没有如蒋介石那么自吹自擂。他认为：“一个多月来对匪第一、二、三、六、十、十二纵队均曾予打击，尤其匪第十纵队已被我大部歼灭，不过匪的全部主力尚未击溃，我们仍应继续努力来完成清剿工作……按过去豫鄂皖三省剿匪，当时我以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尚费时三四年，今天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清剿的全功。”(104) 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形势也十分清楚，他的乐观情绪已经一扫而空。他在年底自记说：“（一）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唯听之天命而已。（二）运城失陷，实为军事上之最大损失，陇海、平汉两路中心——郑州、许昌、开封——铁道完全被匪拆毁，军事上更蒙受重大之打击，第三师几乎全部损失，莱阳被陷，未能克复，东北、华北形势皆甚紧急，本月份以军事最为不利也。”(105) 他已失去信心了。

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分散，邓小平指挥的二、三、六纵又回到大别

山区活动。1948年1月8日，白崇禧执行分区清剿计划，划分为三个清剿区、二个守备区，进行围剿堵追。其方针为："本部以彻底肃清大别山区刘匪之目的，应依各部队一定之责任地区，彼此紧密协调，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次向心清剿，压缩匪军而聚歼之。"(106) 针对敌军方针，刘邓军以第二纵队转战至淮西与一纵会合，大别山部队化整为零，与敌军周旋，将敌军重兵牵制在大别山区。陈粟军及淮西部队转入休整。

1947年底，中共中央给解放军中原各部队的战略任务是：刘邓"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107)。陈粟"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八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108)。陈谢"十二月你们应以配合刘邓破击平汉路及歼灭土顽为中心，明年一月起，准备打胡宗南。最近你们歼灭很多土顽，有大的战略意义"(109)。总之，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西北战场处于被动、防御战斗的时候，在中原战场尚保持着兵力的优势，对刘邓大军进行攻势作战。解放军中原各军在外线战斗过程中，面临优势敌军，在无后方作战和创造根据地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部队对反攻信心不足。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缺乏后勤保障，环境艰苦，产生了各种思想问题。有些部队纪律不好，侵犯群众利益，侵犯工商业，违反城市政策。部队减员很多，不少团已不能作战。同时，部队在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犯

了“左”倾错误，造成了树敌过多、脱离群众、破坏经济，给自己造成了后勤供应的严重困难，根据地也不能巩固。结果，敌人作战比以前猖狂积极。

4月18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报告中概括了战场形势：“（一）……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110)

因此，中原战场作为主力战场，国共双方一时间陷入了拉锯战斗，呈相持局面，就看谁能灵活地改变用兵方向，争取战略和战斗的胜利。

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控制平汉、陇海两铁路，将豫西、豫东地区解放军分割，形成所谓“十字架”式分割。陆总徐州司令部制定作战方针说：“本部对陈毅主力采取堵截、追剿、封锁、破坏诸种手段，断其人员、物资之接济，使其野战军疲劳、饥饿、弹药缺乏、士兵逃散，易于消灭。故以现有兵力扼守郑、汴、洛、商丘各点，并掩护津浦路之安全。俟增加兵团到达，以有力一部扫荡鲁西之共军，截断其河北交通，破坏其鲁西根据地；另以一部由豫北方面向大名、濮阳、

寿张间地区发展，破坏敌后方组织，以主力由平汉线项城、周家口及鹿邑、亳县间地区，三面不断围剿，使其流窜无门，战力竭蹶，而适时消灭之。”(111)

毛泽东对中原战场前敌将领，一再要求他们首先分兵建立根据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不要总是想打大仗。但前线将领在建立根据地和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方面，兼顾为难，外线作战困难重重，因而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各部集中兵力，协同作战，争取打大的歼灭战。1948年1月中旬，各部原拟集中协同行动，刘邓军也已集中，但由于陈粟军改变用兵方向，白崇禧指挥所部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军被迫重新分散行动。

鉴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兵力极端空虚，毛泽东早在1947年7月，就有令叶飞、陶勇两纵队渡江南下作战的计划。这一计划放弃后，又有1948年8月后，让刘邓、陈粟所部抽兵渡江南下作战的战略设想。这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的优势地位未能击破，刘邓军在大别山处境不利，毛泽东不能不考虑采取新的战略措施。他和正在陕北的陈毅商量后决定，一是令粟裕率主力向南阳、襄樊方向作战，一是令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从山东南下苏北作战。关键的战略措施，则是于1月27日电示粟裕，令其“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提出了下月、4个月后、秋季渡江三个方案，供其选择，也就是在湖北地段选择渡口，进入湘西、鄂南，在湖南、江西机动作战，随后跃进至闽浙赣建立根据地，估计“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也就是迫使国民党军放弃中原战场的攻势，从而确立解放军在中原的优势地位。(112) 不久又决定，粟裕率上述叶飞的第一纵队、王必成的第六纵队、陶勇的第四纵队北渡黄河先行休整，5月初再南下作战。

与此同时，2月间，邓小平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大别山野战部队主力，暂时离开，集中作宽大机动，便于中原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既能协同，又能独立作战。他强调指出：大别山腹地，粮食已发

生困难，野战军常在边沿寻食，不能获得休整，在游击环境中，必增多消耗又减弱了野战力量。2月20日军委表示：“同意你们四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113] 于是，邓小平留三万兵力在大别山坚持，随即率主力渡淮休整，于24日到达临泉县境与刘伯承会合。

是年初，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也在调整部署，部分整编师改为军，二团制的整编旅改为三团制的师，充实战力。同时，以两个整编师（军）为单位，编组兵团，便于协同和指挥。但是，国民党军在其他战场不断失利，尤其是东北战局恶化，不能不于1月间决定调山东范汉杰率部到东北。这样，陆总徐州司令部的兵力更感不足，对陈粟军穷于应付。徐州司令部认为“国防部之计划空洞，无法实施，然本部计划则仅增加数点，大体不加改变”[114]，所部在鲁豫皖间扫荡，毫无战果，“国军战术及战斗技术均不如共军，胜利自然渺茫”[115]。2月11日，蒋介石自记方略说：“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所得结论，应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动来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后再予以反击，清剿当易为力也。决照此意断行，即先以战略取攻势，而后再以战术取胜，积小胜为大胜之法制之。”[116] 据郭汝瑰日记：“曹运湘由牯岭来电话谓：‘主席今后将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待第二线兵团训练完成，再全面进攻’云。余以为如此则大事不可为矣，南宋偏安之局也不可得也。”[117] 前引蒋介石“战略取攻势”当系“战略取守势”之误，他已气衰力竭了。

3月9日，蒋介石率国防部幕僚及蒋经国等到徐州检阅部队，同意徐州司令部以第五军、第七十五军、第八十四军为主力，穷追陈粟军第一、四、六纵队而击破之。蒋并指示：“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118] 10日，蒋介石检阅第三快速纵队，并向战车第一、二、三团授旗。但国民党军对陈粟军意图不明，战斗意志消极，虽一度截断

粟裕军一部，但最终只能任由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北渡休整。于是，中原战场的战斗显得比较沉寂。4月19日，郭汝瑰对国防部三厅二处处长曹运湘评论战局说："国防部将五军、十八军、五十八师、七十四师等置于无为境地，坐视共军整训壮大，不知趁此时共军黄河南岸劣势之时机予以打击，乃狗屁战术。"(119)

3月中旬，国民党军政当局召集华中绥靖会议，通过"华中总体战方案"，大要是："（一）调整绥靖区机构，武汉行辕撤销，成立华中绥靖公署。（二）各省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筹措；各县成立保安团队，其经费由地方筹措。（三）授权绥靖区司令，负责统制绥靖区物资，避免资敌。（四）实行战士授田法。"(120) 国大期间，蒋介石在向国大代表作报告时，还在幻想采取新战略："今后为使剿匪军事早日胜利，当着重消灭共匪兵力，因此，对于不必要的地点，在不妨碍国军进展的情形之下，将自动予以放弃，俾能集中兵力机动使用，随时以二三倍优势的力量，主动出击，歼灭共匪。"做着"肃清中原"的迷梦："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有整个师或整个旅的存在。"(121) 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智穷力竭，这一切都已于事无济，大局很快就要急转直下。不久，解放军就在中原战场实现了战略转变，迅速确立了战略优势地位。

三　解放军战略优势地位的确立

尽管解放军中原各军面临重重困难，但经过各部队的顽强努力，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态势仍有了很大的改变。

1948年1月初，中共中央军委部署西北野战军准备以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建立渭北根据地，威胁西安，直接配合中原战场作战。2月12日，西北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24日，包围宜川，并准备打援。胡宗南即令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二个师四个旅轻装驰援，27日到达瓦子街地区。彭德怀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九个旅的兵

力，阻击刘戡。刘戡不明敌情，于29日轻进至铁龙湾绝地，这里，四面环山，路窄沟深，部队难以展开，遭到西北野战军的坚强阻击，后路瓦子街南高地旋被解放军占领。刘戡陷入重围，被迫分路突围，遭到解放军的严密堵截，至3月1日，全军覆没，刘戡和师长严明被击毙。3日，解放军占领宜川。

胡宗南主力被歼，关中空虚，不得不调洛阳、潼关间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于是，洛阳空虚。正在郑州、潼关间活动，掩护刘邓军、粟裕军休整的华野的陈士榘、唐亮兵团及陈谢集团，即乘虚发起洛阳战役。3月11日开始攻城，战至14日，全歼守敌青年军二〇六师等部。国民党军以胡琏兵团（整十一师为主力，改称第十八军）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不及。解放军撤出洛阳后，国民党军复占洛阳，仍留兵驻守，至4月5日，又被解放军围击歼灭。自此，国民党军才被迫放弃洛阳。刘邓军一部及华野十纵等部于3月29日晚攻击阜阳，陆总徐州司令部急调新二十一旅、九十六旅车运宿州、开蒙城集中，与整编七十四师会合增援，并令第五军向亳州集结。同时，由信阳的第五绥区司令张轸组成淮北兵团西援，并命十八军集结东援。4月3日，刘邓军撤出战斗。淮西国民党军远道增援，重兵密集，而行动迟缓，毫无战果。此后，刘邓军主力、陈谢集团和华野第十纵队等部，进入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宛西作战，迭克重镇。国民党军淮北兵团等部又西进追随解放军寻战。

在华东战场，解放军华野东兵团于1月底奉命抽调第二纵队南下，与第十一、十二纵队会合组成苏北兵团（即四兵团），其余三个纵队改称山东兵团（即二兵团），仍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他们积极作战，支援中原战场。3月间，山东兵团在胶济路西段连克张店、周村，包围淄川，国民党军不得不从中原战场调整编七十五师会同整七十三师东援。但援军不敢轻进，21日，山东兵团攻克淄川。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兵力减弱，形势恶化，济南的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不得不收缩防区，加强津浦路中段防御。于是，鲁中重镇

昌乐、潍县孤立。4月初，山东兵团围攻昌、潍，国民党军不敢积极赴援。26日，山东兵团攻克潍县，俘政府军守将、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苏北兵团组成后，力量增强，于3月中旬发起益林战役，歼敌一部。国民党军对苏北形势十分敏感，调集十个整编师的重兵进行清剿。3月底，陆总徐州司令部决定，先集中力量击灭苏北兵团，从中原战场调整编二十五师与整四师组成南兵团，从山东战场调整编八十三师、整编七十五师组成北兵团，南北对进，向盐城、阜宁夹击。但国防部仍调七十五师控制兖州，以第五军位于商丘守备。4月9日，国民党军在苏北开始清剿。苏北兵团于5月23日在盐南歼敌一部后，即分兵转移。

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虽然处于优势地位，但战斗消极。4月20日，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向徐州司令部建议，“主张渡河攻击，使共军陈毅部受牵制，不再渡黄河南下”[(122)]。但当时国民党军正受到解放军山东兵团攻击潍县的牵制，不能不调兵赴援，而用兵又十分迟缓。徐州司令部深感奇怪：“余甚怪国防部之作战指导，何以初不同意本部救援潍县，以后又将七十五师、八十四师投入，如大胆将此两师投入他方面决战，则听昌潍失守，亦非大过。计不出此而迟疑反复，毫无定见，可恶殊甚！”[(123)] 由于担心粟裕兵团由青城攻击王耀武兵团侧背，徐州司令部命令第五军准备加入战斗，并且，由于徐州司令部已经没有控制部队，不得不命令整二十五师暂留浦口待命，防备粟裕兵团渡黄河南下。因此，粟裕兵团在濮阳整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积极准备渡长江南进。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兵团休整到5月15日为止，出动南下作战。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中原地区创造根据地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于5月12日向毛泽东报告：“整个中原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现在为我控制者约两千万，计有豫陕鄂七百万（有政权有工作者五百万），豫皖苏九百万（能收税的），但仍是敌来我往的拉锯局面，江汉有三百万，桐柏两

百万。其余一半人口的区域，极大部分有我部队和政权活动。大别山地区斗争仍极艰苦，但是我们确实已站住了脚，敌人把我们打不出来了。而四个野战纵队抽出后，减轻了人民负担，拖出了三个师，加上最近策略的讲求，更便于大别山的坚持。”

最为关键的是，在近一年的战斗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军委和前敌将领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实现了中原战场战略方针的转变，从而加速了中原战场的战略优势地位的确立。

粟裕在部队整训期间，对中原战场和全盘战略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4月初，陈毅从陕北经华北来到濮阳，回到华野军中。粟裕即将自己的战略构想和陈毅作了探讨，然后向刘邓作了报告。前线将领本来都深感外线作战的困难和不利局面，期望中原三方面部队集中协同作战，因而对粟裕的战略设想十分支持。

4月13日，毛泽东经过长途行军，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所在地。4月18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斗胆直陈”，力求改变毛泽东渡江南进的战略计划。他根据几个月外线作战的经验，指出了外线作战和建立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强调在外线兜圈子中的兵力消耗，与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在同等消耗下并不合算。而且，大军渡江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桂系的两个整编师，蒋介石不会放虎归山，调往南方。由于军事的原因，蒋介石嫡系重装备的两支主力部队，即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也不会调到南方水网地带作战。而这四个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如果继续留在中原，那么，“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根据上述分析，粟裕建议，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

（陇海路北）作战，力求在雨季与夏收以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铁路东西两侧）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为实现上述设想，粟裕还向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承诺，即以华野主力攻击济南，吸引第五军北援而歼灭之[124]。刘伯承、邓小平于同日给军委和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支持粟裕的意见，认为“过江很少把握”。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认为，过江要作好充分的准备，政治上要有信心，纪律好，政策好，组织上减轻装备和军事上山地战的训练。“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而在季节上说，以秋末冬初为有利。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毛泽东召陈毅和粟裕到驻地会商后，考虑到华野的困难，在不放弃渡江战略构想的前提下，终于同意粟裕推迟渡江、集中兵力依托后方作战的要求。毛泽东起草的军委致刘邓电中说：“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125] 尽管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的战略构想，但事实上，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战略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转变。

战争的相持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军都在改组军事机构，力求争取胜利。国民党军方面，5月间，陈诚辞去参谋总长一职，12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调任参谋总长。这时，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后，蒋介石出任总统、李宗仁任副总统。蒋介石不放心两个桂系巨头在中央联手，即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于31日任命白崇禧为华

中“剿匪总司令”，削去了在中央的职权。白一气之下，一再要求辞职，跑到上海去，甩手不干。驻守信阳的张轸于6月12日急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转白崇禧劝驾：“忽阅本月十二日报载，钧座赴沪，军心惶恐，群情瞻依。”[126] 要求白迅速赴任。蒋介石委托桂系旧人黄绍竑、李宗仁派遣邱昌渭分别于6月12日前后到上海劝驾。黄则以桂系利益来说动白崇禧就职：“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127] 这样，白崇禧才又回到南京，向蒋介石要求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后，于6月26日通电宣布先行就职[128]。这时，豫东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与此同时，6月9日，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匪总司令”，于6月14日由南京飞徐州接管陆总徐州司令部。刘峙庸懦无能，国民党方面对作为南京门户的徐州很不放心。郭汝瑰对顾祝同说：“南京不少人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不派一只虎将镇守，也应派一只狗守门嘛！怎么派一条猪呢！’”[129] 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制度陷入了死胡同。

这时，中共中央也于5月9日改组了中原地区组织，成立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组成中原军区，刘邓军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调陈毅到中原解放区工作，出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粟军称华东野战军，陈毅仍兼任司令员，由粟裕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强化了指挥和协同作战关系。5月12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达濮阳华野军中，对正在整补、训练、反对军阀主义、加强纪律教育的部队，进行动员，并部署歼击政府军主力整编第五军的方案。

5月下旬，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等部准备渡河，计划先以三、八两纵由许昌一带越平汉路东进淮阳一线，吸引第五军西进。以中野有力一部牵制十八军。以山东兵团进击泰安、大汶口，兵逼兖州。然后于27日、28日出动，29日晚前渡河，奔袭城武，吸引五军回援，在陈唐兵团配合下，歼击第五军。

中野主力于5月25日发起宛东战役，包围确山，吸引十八军自临颍南下，南阳张轸兵团东进，并在赊旗镇、唐河一带设伏。张轸率部东援确山，28日进抵兴隆镇后，与解放军激战，攻击锐利，至30日迫使当面解放军后撤。但张轸随即发现中野后续部队正在挺进，自己态势不利，即于31日拂晓，乘隙西撤，逸出中野伏击圈。仅张兵团后卫五十八师主力，遭到中野割断包围，张轸率部回救，五十八师在突围中溃散。

粟裕所率华野主力准备渡河之际，陆总徐州司令部已发现了粟裕所部南渡及攻击泰安一线的企图。27日，“鲁西据刘汝明报告，已有共军一个纵队渡河到郓城附近，又二绥区报，共军已于泰安与我军小接触，津浦兖济段大有山雨欲来之势”[(130)]。国民党军已如惊弓之鸟。中原形势告急，国防部即令五军在柘城停止。31日，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开回商丘，七十五师开回杞县。国民党军已先期到达战地，粟裕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5月30日、31日渡过黄河后，感到战机不利，未敢轻进。毛泽东体谅前敌苦衷，指示前敌将领：“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131)] 并令粟裕所部休整，等待陈唐兵团东进后协同作战。

6月初，陆总徐州司令部令第五军（包括七十师）、整编第七十五师集结后索敌攻击，但五军行动慎重，并不积极推进。邱清泉以解放军正面工事强固，而华野三、八、十纵及陈赓九纵又已进到淮阳、太康地区，并认为先头已到杞县（实际上陈唐尚未来，而系豫皖苏独立旅，奉命破坏汴商段铁路），以解放军将与其决战，决调整部署，采取守势。两军在菏泽、巨野间相持，双方均不敢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为应付未来的大战，11日，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七十五师靠拢，准备从苏北调整编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到鲁西，以黄百韬为兵团司令，七十二师集结待命，以六十三师一旅开砀山，并准备调十八军和六十四师到鲁西战场。但蒋介石未令十八军起动。12日，邱清泉报告，准备八十三师加入后再真面目攻击，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七十

五师应速靠近，准备决战。但七十五师于14日晚撤退，准备整补后再向城武前进。15日，徐州司令部不知道七十五师去向，出动空军也终日没有找到。直到16日，邱清泉电告徐州司令部："沈渐之（整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引者）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请予以处罚。"[132] 刚刚到任的徐州"剿总"刘峙，于6月19日飞郑州指挥，刘回忆说："我欲放弃豫北，以救开封，俾利尔后之索敌攻击，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获实现。"[133] 国民党军内部协同出现了深刻的矛盾。

粟裕屡次准备出击五军，均因敌军密集、战机不利而放弃。为此，毛泽东指示前线将领，缩小歼敌目标："此次战役目的，只在歼灭七十五师，不要企图打五军，待七十五师歼灭后再作打别部之部署。"[134] 6月15日，粟裕鉴于国民党军将向鲁西南进攻，为避免正面作战，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以东进的陈唐兵团攻击开封，以主力阻援，并待机歼敌。16日，因军情紧急，粟裕未待军委命令即独断地命令各部出击。是日夜，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即对开封发起强攻。徐州剿总调兰封的整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西援，郑州的四十七军东援。东援部队遭到中野第九纵队的阻击。陈唐兵团经洛阳战役后，攻坚能力迅速增强，攻城部队18日即突入南关，19日占领市区大部，守军仅困守西北一角。五军、七十五师18日起向曹县、定陶一线进攻，遭到顽强阻击。这时候，国民党军在战地组织兵团，以原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驻商丘的第六绥区副司令区寿年为兵团司令，率整编七十五师、七十二师、新二十一旅等部，19日，令区兵团拘束当面之敌，而令五军和刘汝明四绥区主力西进，以解开封之围。同时，蒋介石于15日电令十八军由驻马店向商丘增援，但20日至上蔡一线仍被汉口指挥部调回。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矛盾，对当前军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21日，蒋介石亲往郑州指挥，并到开封上空视察，命令邱清泉无论开封情形如何，必须兼程急进[135]。但邱部遭到顽强抵抗，进展迟缓，已无力挽救开封守军。22日，开封失守，守将李仲辛被击毙。

徐州“剿总”仍以五军向开封、陈留攻击，以区兵团向杞县推进。解放军占领开封后，即搬运军需物资，准备在运动中歼敌。至25日，五军被阻于曲兴集以西，区兵团被阻于睢县以东。徐州“剿总”建议以五军向杞县，协同区兵团歼击当面之敌；或者改取守势，转向兖州作战，但决策迟缓。26日，解放军撤出开封，五军先头旅随即进驻，主力向通许方向追击。28日晨，国民党军统帅部方才讨论作战方案，《郭汝瑰日记》记载：“六时半，去国防部见方天逸后，再往谒顾总长，将徐州所拟方案呈出。伊乃请何部长、刘次长、毅肃、天逸等研究。刘为章不同意以区、邱两兵团于柘城附近取守势，而主张继续南下协同十八军方面夹击陈毅主力。余乃告以十八军十天亦不会到达沙河以北，吾人指导不可不注意及此。”(136)

正当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作战方针犹豫不定之际，自开封南下的邱清泉兵团（辖第五军；整七十师，即七十军；整八十三师，即一〇〇军）与在睢杞徘徊的区兵团之间，出现了40公里的空隙。华野立即抓住战机，自27日晚出击，至29日晨，隔断了邱、区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将区兵团分割包围，予以歼击。邱清泉遭到三、八、十纵及两广纵队的阻击，竟声称不能援助七十五师(137)。区兵团被围后，徐州“剿总”即令邱兵团（第二兵团）东进，黄百韬兵团（第七兵团）西进援救，并令第五绥区部队自上蔡一线北进。7月1日，蒋介石严令邱兵团增援：“据报弟今日只派第二百旅与第八十三师向东进攻，而仍留主力在西面，未参加向东增援作战，故桃林岗、许村仍难攻克，无任骇异。当此革命战争同生死、共存亡之际，对沈师长等切勿稍存意气，更不可报复前嫌，免致为匪各个击破，同归于尽。”(138)邱清泉本人则对参谋本部的指挥十分愤慨，曾集合兵团重要干部，痛斥上级指挥的失策，竟停止与参谋本部的通讯联络，独断专行(139)。黄兵团远道赴援，行动十分积极，30日在商丘集结后即于7月1日起广正面猛烈推进。华野于分割包围区兵团后，先行集中兵力歼灭新二十一旅，而当面压力尚不严重的整七十五师竟只图自保，不肯积极策应作战。兵团司令区寿年对所部指挥不动，“忧愤难抑”(140)。战至7月2

日，整七十五师主力被歼灭，区寿年和师长沈澄年被俘。

这时，黄兵团到达帝丘店附近，向华野进逼。张轸兵团向北推进时，遭到中野的阻击，先行向北推进的十八军，只好回援张兵团。粟裕考虑到战后脱离战场的困难，决定乘黄兵团处于运动之中，战力削弱，以一部兵力围歼七十五师残部和监视七十二师，以主力转移包围歼灭黄兵团。7月2日晚，华野向黄兵团发起猛烈攻击，黄兵团被迫迅速收缩至帝丘店，密集固守，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惨烈。邱兵团在蒋介石严令之下，随即以第五军之四十五师及整编八十三师编成左翼迂回兵团，摆脱当面阻击部队，向北迂回，再南向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6日，邱兵团进至尹店东南，第四绥区增援部队也沿陇海路南东向逼进。同时，白崇禧已令十八军不顾当面情况，兼程北援，张兵团击破中野阻击后也向北推进。华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一时无法解决黄兵团，决定放弃歼灭黄兵团计划，于7月7日晚向北转移，撤出战斗。华野撤退后，邱黄两兵团未敢追击。

由于整编第二十五师被调到豫东战场，华野山东兵团于7月13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二师，孤立了济南。在豫东会战之际，中原野战军乘汉水流域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以第六纵队为主力，于7月2日长途奔袭襄樊。国民党军困守孤城，战至7月16日，城防崩溃，守将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被俘。

豫东战役是解放军进入外线作战以来，在中原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役。虽然围歼黄百韬兵团和张轸所部吴绍周兵团的战役目标并未达成，但仍取得了攻克开封、歼灭整编七十五师的重大胜利。解放军在中原这一国共角逐的主力战场，粉碎了蒋介石“肃清中原”的梦想，确立了战略的真正优势地位。为此，毛泽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8月间，他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军于雨季转入休整，入秋之后，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开始了。

豫东战役后期，邱兵团解黄兵团之围获得成功，国民党军也在宣传豫东会战的胜利。蒋介石认为："周初军事，以杞、睢为最危险，幸至周中，仰赖天父佑华，使我空军发生绝大威力，董店一带陈毅股匪之主力，几乎全军尽墨，一场恶战，乃得转危为安。"(141) 他甚至认为："经此一役之后，共匪武力实属脆弱，其不能与国军抗衡，业已充分证明。"(142) 但事实上，国民党军参谋部了解事实真相，不能不承认战局的结果："陈毅第七、九、十三、新八、新九、渤海等纵队未受甚大损失，今六、十纵队又退运河以东，此八个纵队预料两个月即可恢复战力。"郭汝瑰承认："豫东会战，国军当然系一大失败。"(143) 战后，邱清泉因"解围不力"，被记大过处分，黄百韬则因作战积极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为此，邱于9月1日请长假离开了部队，由杜聿明接统第二兵团。国民党军从此在中原战场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在中原战场进行主力会战期间，其他战场上，解放军的优势地位在继续扩大。在东北，东北野战军于5月24日奔袭长春西郊，歼敌一部。不久，东野鉴于攻坚困难较大，即转入部署对长春的长围久困，并在毛泽东的再三敦促下，准备南下北宁路作战。

在华北，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使晋察冀野战军感到歼敌困难，难以扩张战果。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该军，出击平绥线，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军分散。晋察冀野战军即以主力分成两翼，出击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于3月20日出动。左翼兵团攻占天镇后，向归绥进军；右翼兵团攻占广灵、阳原等地后集结待机。傅作义因他的根据地受威胁，以主力第三十五军及骑兵部队西援归绥，以暂编第四军进至天镇、西湾堡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右翼兵团即北上歼击暂四军，该军发觉后，退守柴沟堡（怀安），西援主力东退兴和。华北"剿总"兵力集中，绥远地方组织强固，又于4月5日车运骑兵第十二旅至天津、静海集结，自9日起，袭占解放区的大城、青县、河间、任丘，威胁石家庄，破坏解放区后勤机关。晋察冀野战军在外线立足不住，不得不撤退。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孤立据点临汾发起围攻。国民党军阎锡山系统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率第六十六师及整编三十师一部作了顽强抵抗，徐向前所部战斗力比较薄弱，屡攻不克。统帅部门有放弃攻击、回调保卫石家庄的意见，但徐向前决心继续攻击，不愿半途而废。经过大量的坑道爆破作业，72天的战斗，终于在5月17日晚，全歼守敌，解放临汾。

5月间，中共组成华北解放区，设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下辖二个兵团、七个纵队，分别由徐向前、杨得志任第一、第二兵团司令员。5月中旬，第二兵团主力向热河西部出击，转战至冀东，策应东北作战；另一部在保定以北作战，分别切断平绥、平承（承德）、北宁、平汉铁路，使华北“剿总”疲于奔命。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等部发起了晋中战役，于6月中旬，进入产麦区汾阳、孝义、灵石。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即组织闪击兵团，向高阳镇推进，争夺麦收，遭到解放军的围攻。阎锡山即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原日军将领元泉馨，率领以原日军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增援，也遭到解放军的包围。至7月16日晚，阎锡山南进各部被全部歼灭，赵承绶被俘，元泉馨被击毙。太原绥署所属第七集团军总部、四个军部、九个师、二个总队被消灭。太原陷于孤立。

在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于宜川大捷之后，于3月间进围洛川，久攻不克。4月16日转兵分三路向西府地区（在泾河和渭河之间）长途奔袭，会攻宝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中兵力，调裴昌会兵团和马继援部分两路援救宝鸡。国民党军后方空虚，解放军于4月21日收复延安，25日解放洛川。西北野战军于26日攻占宝鸡，但敌大军轻装急进，协同攻击，于27日即兵逼宝鸡。西野无后方作战，态势不利，被迫于28日撤出，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损失重大，撤至黄龙地区休整。

(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1日条。

(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7日条。

(3) 《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0页。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7日条。

(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5日条。

(6) 《不要打无把握之仗》（1947年6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7) 《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9页。

(8) 《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1947年7月1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18-219页。

(9) 《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95页。

(10) 《刘邓陈粟晋南陕北各部队的作战任务》（1947年5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0页。

(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20日条。

(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24日条。

(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16日条。

(14)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31日，摘抄打印本。

(15) 《主席对沐河及孟良崮战役胡、黄师长琏、伯韬报告后之讲评及训示》，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第1册，第49页。

(16) 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30日条。

(17)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26日条。

(19) 参《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260页。

(20) 《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的部署》（1947年5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64页。

(21)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4页。

(22) 《在山东战场打破敌人进攻的作战方针》（1947年5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81页。

(23)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10页；文内引文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13页。

(24) 《晋冀鲁豫野战军役字第十四号基本命令》（1947年6月20日），杨国宇编：《刘伯承用兵要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此命令列为22日发，未注出处。——笔者。

(25) 《晋冀鲁豫野战军役字第十六号作战命令》（1947年6月26日），杨国宇编：《刘伯承用兵要旨》，第420页。

(26) 《郭汝瑰日记》1947年7月1日，摘抄打印本。

(27) 《郭汝瑰日记》1947年7月5日，摘抄打印本。

(28)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29)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11日条，原编者说明："公鉴于×向我空隙全力窜扰，眩惑各方，乃其企图保留沂水老巢之狡计，故始终督令我军向坦埠、东里店与沂水进剿。"

(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13日条。

(31) 参《认清战局　改进工作　争取胜利》（1947年9月3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327页。据粟裕报告："我们打援的部队不大得力，甚至在敌我相等的兵力下还堵不住他。"又据粟报告，有两个阵地被突破。但《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270页记述："迄二十一日午，增援南麻之国军，九顶连环山方面仍无进展。"——笔者。

(32) 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3) 顾祝同7月26日电，《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第2册，第98页。

(34) 《刘邓南下以来蒋介石重要命令》，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制件。

(35) 据《郭汝瑰日记》；并参《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36) 王仲廉：《征尘回忆》，台北1978年版，第572页。

(37) 《郭汝瑰日记》1947年7月24日，摘抄打印本。

(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31日条。

(3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26日、31日条。

(40) 《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1947年7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3页。

(41) 《对确保和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7-148页。按：据《叶飞回忆录》说，他当时不知道毛泽东有令他们出闽浙赣的指示，看来，这一指示陈粟大概没有同意。此外，后来陈粟主力也转入外线作战，改变了在内线作战的意图。——笔者。

(42) 《刘邓陈谢等部的作战任务》（1947年7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58页。

(43)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6日，摘抄打印本。

(44)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7日，摘抄打印本。

(45) 《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钳制敌人》（1947年8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79页。

(46) 分别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4页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柯岗等著：《刘伯承中原逐鹿》，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47) 《刘邓南进决心完全正确》（194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3页。

(48) 《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统归刘邓指挥》（1947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7页。

(49) 《陈谢集团应提前渡河》（1947年8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1页。

(50) 《总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947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9页。

(51) 《总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947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6-227页。

(52)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9日，摘抄打印本。按：从上下文意看，“有利”似为“不利”，或系誊写之误。

(5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632页。

(54) 据《刘伯承中原逐鹿》第70-71页所载刘邓过沙河后部署。

(55)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0日。

(56) 据《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3日，又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八十二旅参战，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634页。

(57)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第151页记述，刘邓军渡汝河为24日夜。按：该书同时记述23日刘邓已抵汝河北岸，敌追兵相距仅20公里。据前述，23日第六纵队前锋已渡河发生战斗，刘邓似无在汝河北岸滞留一日一夜之理，如滞留一日一夜，其后卫部队与敌追兵的前锋部队必然发生激烈战斗。据刘伯承回忆，8月23日下午，中路先头部队抢占了汝河南岸的大雷岗，但即被敌军围攻，当时，“留在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的兵力。而紧跟在我背后的三个师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我们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刘伯承军事文选》，第769页）显然，刘邓部只能在北岸滞留数小时。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165页，为23日夜。又据《陆军整编第八十五师战斗详报》，解放军第六纵队十六旅于24日1时，偷渡汝河，攻击其第一一〇旅。另据《郭汝瑰日记》，刘邓军24日主力向息县、正阳方向急进，应已于23日夜渡河。——笔者。

(58) 《刘邓南下以来蒋介石重要命令》，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印件。

(59) 《刘邓南下以来蒋介石重要命令》，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印件。

(60)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4日，摘抄打印本。

(61)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9日，摘抄打印本。

(62) 《毛泽东关于立即渡河全力配合刘邓致陈毅、粟裕电》（1947年8月30日），《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6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9月15日条。

(6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19页。

(65)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6日，摘抄打印本。

(66) 《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页。

(67) 《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年10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7—287页。

(68) 《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95—296页。

(69) 《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年10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7—287页。

(70)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30日，摘抄打印本。

(71) 《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1947年11月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15页。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8月15日条。

(73)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9日，摘抄打印本。

(74)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7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0页。

(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2日条。

(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3日条。

(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月12日条。

(7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2日条。

(80)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8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28日条。

(82) 《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1947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60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30日条。

(8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1月1日条。

(85) 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3105页。

(86) 天津《大公报》，转引自《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3116页。

(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2月18日条。

(88) 军委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1947年9月8日）。

(89) 《陈谢部休整后的行动部署》（1947年10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09页。

(90) 《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1947年9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36页。

(91) 《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1948年6月5日），《刘伯承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页。按："八十三万"，数字似有误，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军队总数为42万人。——笔者。

(92)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9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3日条。

(94)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8日，摘抄打印本。

(95)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11日，摘抄打印本。

(96)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14日，摘抄打印本。

(9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1月1日条。

(98) 《郭汝瑰日记》1947年9月29日，摘抄打印本。

(99) 《郭汝瑰日记》1947年11月12日，摘抄打印本。

(100) 《郭汝瑰日记》1947年11月14日，摘抄打印本。

(10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343-344页。

(102) 魏锦国：《大别山前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刘邓大军风云录》（上），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103) 《清剿大别山匪军之方针》（1947年1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60-361页。

(104) 《白部长训词》，《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纪实》，（国民政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编印，第9-10页。

(1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2月底条。

(10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363页。

(107) 《刘邓军明年的任务》（1947年12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38页。

(108) 中共中央致粟裕电（1947年11月28日），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6页。

(109) 《陈赓部队目前的中心任务》（1947年11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34页。

(110)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报军委并华东局电》，《粟裕军事文集》，第353-354页。

(111) 《郭汝瑰日记》1948年1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12)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71-272页。

(113)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5页。

(114) 《郭汝瑰日记》1948年2月6日，摘抄打印本。

(115) 《郭汝瑰日记》1948年2月20日，摘抄打印本。

(11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11日条。

(117) 《郭汝瑰日记》1948年2月13日，摘抄打印本。

(118) 《郭汝瑰回忆录》，第283页。

(119) 《郭汝瑰日记》1948年4月19日，摘抄打印本。

(12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20日条。

(121) 《对国民大会施政报告》（1948年4月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44页。

(122) 《郭汝瑰日记》1948年4月20日，摘抄打印本。

(123) 《郭汝瑰日记》1948年4月24日，摘抄打印本。

(124)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报军委并华东局电》，《粟裕军事文集》，第353—356页。

(125) 《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9页。

(126) 张轸致吴国桢转白崇禧电（1948年6月12日），档案号

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127)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0页。

(12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7日。

(129) 《郭汝瑰回忆录》，第285页。

(130) 《郭汝瑰日记》1948年5月27日，摘抄打印本。

(131) 《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1948年6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74页。

(132) 《郭汝瑰日记》1948年6月11-16日。

(133) 刘峙：《我的回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63页。

(134) 《待歼灭七十五师后再打别部》（1948年6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82页。

(1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6月21日条。

(136) 《郭汝瑰日记》1948年6月28日，摘抄打印本。

(137) 《郭汝瑰日记》1948年6月30日，摘抄打印本。按：据《国防部第三厅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本部以梗陕督电指示区兵团向杞县、太康，邱兵团向陈留、通许方向索匪追剿，后陈匪主力即向鹿邑、柘城方面东窜，当时我区兵团以追击姿态向东南转移，因而与邱兵团分离，致遭匪主力将我两部隔离，而行各个包围。"此说似为沈澄年开脱，从各种资料反映，沈澄年一直作战消极。沈被包围后，邱清泉也拒绝国防部东向增援沈澄年的命令。——笔者。

(1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日条。

(139) 《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五部——戡乱》，第483页。

(140) 《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五部——戡乱》，第470页。

(14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0日条。

(142) 蒋介石手启午咸府贰电（7月15日）致各省政府主席各市政府市长，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3)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9日、8月4日，摘抄打印本。

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一节　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国民党的对策

一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共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著名的《五四指示》之后，即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土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7年4月，刘少奇在从陕北渡过黄河东进途中，对土改运动作了一些调查，发现："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他指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1)

7月初，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后，即着手组织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于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各解放区领导人和代表107人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毛泽东于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

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犯过‘左’的错误，一是在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现在我们是一律平分；二是在城市中没有建立统一战线，不团结民族资本家，现在我们是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2)] 7月25日，毛泽东在上述刘少奇的信上写了批语：“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他要求各解放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3)]。

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由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公布。这个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4)]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解放军口号，首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同时提出“农民分土地，耕者有其田”、“国民党士兵分田废债”等土地改革的口号，进行解放战争的政治动员[(5)]。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土地改革运动即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的革命创造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据估计，到1949年6月，解放区有229万平方公里土地，总人口2.7亿，农业人口2.15亿、耕地面积5907万公顷，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达农业人口1.2463亿，耕地面积3919万公顷，没收分配土地2469万公顷。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6)]。翻身农民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但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采取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对生产造成了不小的危害，在后来才得以逐步纠正。而

且，1947年底的土改高潮中，“左”的错误比较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造成农村中的恐怖气氛，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不少，特别是一部分老区，如平鲁逃亡最严重。边沿区如怀仁三分区，全家逃亡和个别逃亡的有128户，其中中农就有86户。左云三区逃亡234户，其中中农就有92户，贫农有17户。”[(7)] 如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8)]。一些解放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左”的错误也影响到部队，造成官兵之间关系紧张。挺进中原的部队，一度急于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犯了“左”的错误，未能及早建立起真正的群众基础，刘邓在大别山一时也未能站稳脚跟。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中原各部解放军和占优势的国民党政府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斗，没有能够大量歼灭敌军。

国民党方面，对解放区在土改过程中一度出现的混乱，以为有机可乘，感到兴奋。傅作义于12月15日在北平演讲时夸大其词地说：“过去有地位、有声势之人士，为安定民生，曾努力于和平，因此全国意志不易集中。时至今日，共党恐怖残暴之狰狞面目，已完全暴露，各方鉴于共匪残暴，必能协助政府，此乃不可估计之力量。……此种力量不仅可以戡乱，且能促成民生主义之实现。政府力量充实之后，共祸自可消灭于无形。”因而他对“戡乱”的前途表示乐观。[(9)]

但中共在战争的严酷环境下，迅速地着手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即开始注意土改中的错误倾向，会议对土改政策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讨论的结果，于

1948年1月18日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土改工作迅速走上了健康的轨道。自1948年初到1948年底，各地展开了改正错定的阶级成分，补偿被侵犯的中农和工商业者，以及安置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的善后工作，安定了解放区的秩序，发展了生产，实现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任务：“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0)

二　国民党对中共土地改革的对策

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土改政策对于农民的革命动员作用，因而一直在研究对策。国民党方面的基本设计，是以国家政策实现和平的有偿的地权转换，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30日制定公布二五减租办法（即从现纳佃租率的50％中，减少25％），1946年4月29日公布的《土地法》，其立法意图，据《修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说明》：“三、扶植自耕农。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之原则，实符国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张。本草案为使佃农有变为自耕农之机会，并使具有耕作能力之人民，成为自耕农，特分别增订其获得土地来源之条文，并规定设立土地银行，俾购地之资金，有所借贷，以期土地政策得以实现。四、照价收买私有土地，为国父所主张。本草案为防止土地投机集中，及促进土地利用并防止所有权人逃避地价税起见，特增定私有逾额之土地、不在地主之土地及空地、荒地与短报地价之土地，均得由县市政府照价收买等条文，免除土地征收之繁重手续。但各附以条件，用示限制。盖于推行政策之中，仍寓保护私权之意。”(11) 这个土地法规定，“省或院辖市政府对于私有土地，得斟酌地方情形，按土地种类及性质，分别限制个人或团体所有土地面积之最高额”(12)，但事实上并未付诸实施。

针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行政院于1946年10月25日制定公布了

《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对于已经中共实行土改的地区，在国民党军占领之后，采取了折中地主和农民利益的办法："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其约定以钱币交租者，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折价。""在变乱期间，农民欠缴之佃租，一概免予追缴。"同时，规定无主或地主逃亡土地，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征收，以缴价承领的办法分配给农民，等等[13]。地政署于是年底在讨论蒋介石交下的《对共经济作战方策建议案》时认为："今日之绥靖区土地处理方针，应从实施减租到普遍扶植土地小私有制，使农民成为自己耕作之主人。绥靖区之迫切工作，应为地权之清理与调整，加于农民身上之任何限制，动机纵系良好，亦必将招致农民之反感。原方策所拟处理土地办法，不仅与现行法令不合，且普遍保持租佃制度，于今日的农村亦实无如何之裨益。"因此建议："一、在共党实行减租减息之地区，应以维护农民既得之减租利益为方针，继续实施减租，并严禁追索欠租。二、在共党实行分田之地区，应以土地归于农民为方针，对于原土地所有人可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偿付地价。三、推行合作农场制度，应从奖励诱导入手，不宜过事强迫。"[14]

但是，国民党实际上没有可供驱策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去实施上述政策，他们在占领解放区之后，所能依靠的力量既然只能是地主，那么，也就只能去保护地主的利益。有报告说："查收复区最近发现两种怪现象：（一）查封奸匪家属全部财产并驱逐之。（二）本年地租地主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上述两种现象，现江苏萧县第九区大都如此……查各地方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15] 有一位在苏北的人民服务队队员报道还乡地主逼租的残酷情形说："我亲眼看到一个地主，借着某方势力，任意拘捕佃户，不下有百余个，强迫清缴租谷，不然的

话，则施以吊打、火烤、灌水等毒刑。势弱无能的佃户，此时呼天不闻，呼地不应，只有随其摆布支配，只有呻吟待死。”[16]

尽管如此，国民党内人士仍在理念上十分关注土地问题的解决。1947年2月13日，正在美国的何应钦写信给白崇禧、陈果夫、陈诚、吴铁城、陈立夫等强调说：“此邦（指美国——引者）舆论多谓平均地权原为国民党良好政策，但国民党政府竟不敢实施，而任共产党施行此项政策，以争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强之农民。《纽约时报》及《先锋论坛报》且批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于土地政策未提出具体办法，故弟觉关于土地政策、农民福利问题，似有迅速研究有效办法、积极实施之必要。”[17] 而且，从理念和法规上讲，是向更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发展的。1947年4月23日，行政院修正《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第七条为：“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18] 续后又修正《绥靖区施政纲领》第八条为：“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应由县政府征收，其地价应依法估价，折合农产物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给予合法所有人分年偿付。”[19]

9月29日到10月3日，国民党举行了全国地政检讨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吾人应深刻反省，认清事实，必土地政策有确切之执行，斯国家建设方能奠不拔之基础……尤其对于绥靖区之土地行政，必应根据既定政策，恪遵现行法令，坚定信念，讲求技术，打破困难，忠实执行，庶可遏止目前乱萌，确立复兴基础。”[20] 张群在闭幕会上也说：“本党从事革命，已有五十年历史，在若干方面颇有成就，但在最重要之民生主义，如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方面，则仍为一种口号，以致民生问题迄未解决。吾人实应迅拟方案，加强实施。”[21] 但这次会议本身除作报告，提出各项提案，要求修改《土地法》之外，并无具体成就。

蒋介石曾命令地政署（后为地政部）指定几个实验县来实行。据《大公报》报道：“据地政部发言人对记者称：‘自绥靖区土地处理办

法实行后，已有若干县拟具计划试办，成绩甚佳。根据此项办法，凡绥靖区已经非法分配之土地，国军收复后即由县政府征购，并重予合理分配。其要点为：（一）补偿地价，由县政府邀集地主、佃农及有关机构组织评议会，分区评定。（二）评定后之地价，由省府核定后即由农行以现金配发土地债券，给予原来地主。（三）承领土地人之资格：（1）变乱前之原来佃耕人。（2）现在之耕种人。（3）具有耕种能力之退伍士兵或抗战军人家属。（四）承领土地面积一般为每户廿亩至四十亩。现已依照此项办法试验实行者，全国共十二县，即江苏之东台、兴化、宿迁、淮阴，山东之临沂、济宁，河北之昌黎、丰润，察哈尔之张北、涿鹿，安徽之天长、泗县。’”《大公报》同日报道，淮阴的实验，在三四月间进行，清理地权，评定地价，办理租约登记，基本上是恢复了地主的所有权。虽经减租，但规定：“过去欠租一律不准追索，此后保证佃农交租。”而实行征收放领示范区彻底平均地权的面积，仅1.8万亩土地。[22]

前项工作，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恢复地主土地所有权本身就十分复杂，纠纷不断，国民党哪里有这个组织力量和财政力量去调和租佃矛盾，安定社会？结果当然只能失败。汤惠荪在《绥靖区土地处理及战士授田的实施问题》一文中说：“于是指定淮阴、宿迁、东台、兴化等县为实验县，后又指定山东临沂、济宁及河北昌黎、丰台二县，与安徽天长、嵊县，及察哈尔涿鹿、张北二县（原文如此，地名有误——引者），为实验县。但是，这十二县，都没有做什么事，工作没有推动。据我知道，有几个县，共匪又窜来了。同时地方反对，因为难民多半是地主阶级。他们还乡以后，佃农又把土地交还地主。所以他们说，没有土地问题，因此不能推动工作。谈到土地债券问题。在苏北南通、海门等县的大地主，他们愿意把他土地征收了，想卖得几个钱，投资到别的地方去，但该项土地债券，必须能向农行抵押始可。我们本来预备能够抵押，农行也愿意抵押，可是农行自己无钱，要向中央银行转抵押，而中央银行说是不行，要等财政部的政策决定后才可以。结果本案还搁在四联总处，也没有人说可以，也没

有人说不可以。”[23]

蒋介石在1946年11月18日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他要求部下表现出良好的成绩来：“过去共产党毁谤本党和政府，说我们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说我们军人和公务员是最懦弱最贪污的军人和公务员，这种污蔑和毁谤，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我们将绥靖区共匪的武力肃清了，我们可以在绥靖区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这就是我们表现能力和成绩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乘此机会用事实来打破共匪虚伪的宣传，证明本党一切法令政策的确是以人民的福利为依归。本党一般干部人员的确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力。”[24] 但事实证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它在地主利益和农民利益的选择上，政策混乱，而结果仍只能倾向于地主阶级，维护其利益。1947年11月底，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后，发布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的措施方针，仍然采取了收复区农地“仍然归原业主所有，但应佃给现在耕种的农民继续耕种”的政策，而没有按征收放领的办法实行。[25] 在国民党系统办的《土地改革》杂志上，万国鼎指出：“土地制度相帮着造成了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阻碍土地改革。”萧铮则更坦白地说：“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26]

1948年1月28日，在美国政府将向国会提出援华计划的时候，行政院长张群发表了中国政府关于美国援华问题的声明，提出了十项财政经济改革计划，其第九项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经济，并实施土地改革。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之建议，其可提前实施者，即予采行。”[27] 对此，陈果夫在他的日记里批评说：“今日一切事均为被动。如农贷与地政，均为美贷款之条件，而后我之声明始有此二条，若美方不说，我当局亦必不说。如此被动，国何以立？”[28] 马歇尔在2月2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听取各方面对于美国援华计划的意见时也说：“中国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而不应以一小集团为

限。尤其我以为国民政府对于土地情形与农民问题，应有所动。在下层阶级中，时常有一种感想，以为政府对于人民或他们的问题，置之不理。”(29)

到1948年5月绥靖区政务研究会议时，蒋介石不能不承认：“本党今日唯一之病源，即在不能实行。各级干部，遇事不能自动负责，实事求是，对于法规命令之推行，并无固定之程序。上级对于下级，既无技术之指导，亦少切实之考核。致勇于任事者，困难重重，无法解决；阳奉阴违者，敷衍塞责，功过不分。此病在县级以下各级机构，尤为显然。此种办事作风，如不彻底改革，则任何法令，必成具文，而剿匪军事亦必陷于停滞。”(30)

三　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的立法努力

尽管国民党连已有的政策也不能贯彻，但在立法上仍想有所作为。1948年3月间，华中区绥靖会议时，又把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作了修改，最重要的是，不分非法或未经非法分配的土地，凡超过其人口最高额者，即予征收，也就是限田制度：“一、切实执行三一缴租，并实行保租，以改善佃农生活，维持地主生活。造成阶级协调，根除阶级斗争。二、实行限田：地主超额土地，一律由政府用土地债券征收放领，以培养自耕农，达到‘耕者有其田’。三、提倡合作农场，尽量利用农业贷款，技术指导，打破小农经营，达到利用近代科学之集体生产。”(31) 为了应付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国民党系统方面，于1947年4月成立了土地改革协会，并于1948年2月19日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3月20日，理事长萧铮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发表。这个方案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土地改革协会有鉴于我国当前土地问题之严重，已成为一切祸乱的根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而政府现行有关土地的政策与法令，并不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急求彻底而普遍的改革，实有非常可怖的后果。”因此，这个方案采取了急进的措施，其前二章为：

第一章　土地改革的目标

土地改革的目标之一为耕者有其田，所以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

第二章　终止佃耕制度化佃农为自耕农

现在佃耕他人土地之农民，分年清偿地价，取得土地所有权，化佃农为自耕农。

上项地价为现租额之七倍，分十四年交纳，但现租额以不超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之[32]。

对于这个方案，萧铮在答复责难时说："老实说，一切土地改革方案，没有替地主打算的道理。但我们是小地主多的国家，地主的生路亦不能不稍为顾虑……地主如再一定要保障既得利益，不肯走这条和平改革的路，恐终有一日，要保障生命安全亦不可能。现在共党所引导的农民叛乱，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吗？"[33] 土改对国民党的生存如此重要，据萧铮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亦揭载全文，并著论谓此项改革方案，甚为重要，应视中国政府能否实行，以为美国对华继续援助之条件。"[34]

正如前面所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本来就和地主阶级合为一体，国民党想进行土地改革，如何进行动员是一个大难题。在土改的问题上，国民党像乌龟那样极其缓慢地爬行，它和中共进行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龟兔赛跑。国民党并非没有土改的计划和意愿，它也明白土改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意义，但国民党只进行了一点一滴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当中共以暴风骤雨之势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国民党对土改方案尚议而不决。龟步而行的国民党，在这场赛跑中失败已成定局。

7月初，国民党在豫东战役中惨败，中原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已

经丧失，济南、徐州均处在解放军的威胁之下，崩溃之势已成。萧铮希望立法院迅速立案，实行土改。他回忆说："于时局十分紧张中，我们愈感有迅速实行土地改革之必要，尤其是农地改革，是防止共党扩张之重要武器，故自本年三月廿日本会发表土地改革方案后，继之以各种座谈会及讨论会之互相交换意见，佥认为应为更具体之规定，称为《农地改革法案》，故于七月四日，由余以行宪后之立法委员身份，领衔正式提出于立法院。"(35)

萧铮的提案，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土地改革方案草定的，由张道藩等84人联署，提案规定："本法颁布之日起，各省市政府应于六个月内拟具详细施行计划及施行附则，于一年以内实施完成。"(36) 且不说国民党有没有进行土改的组织力量，就是军事形势，也等不得一年的时间了。而实际情况则更为糟糕，立法院对这个提案进行了长期的辩论，最后也没有作出结论。萧铮回忆说："首先有陈紫枫委员之大声疾呼，谓余案为'违宪'，'根本不能成立'，又认为'我国土地问题，根本并不严重'，又谓'提倡土地改革为共产党之尾巴'，并列举其所谓'本案缺点甚多，如实行可引起严重影响'。继之有刘士笃委员谓本案可能制造混乱，而甘家馨委员又责本案不够彻底，孟广厚委员则说有若干点之建设性批评。而孔庚委员则提案谓应将生产问题同时解决，范声委员则提议应先实行都市土地涨价归公，黄统委员则提议应实行土地国有，金鸣盛委员则提议应先制定都市土地使用条例。其他各委员在大会讨论时发言反对者更众，甚至有人主张本案应不予审查。惟潘委员廉方所提之《实行农地农有、市地市有、富源地国有》案，以及吴望（人及）委员所提之《拟具佃农减租条例改善佃农生活》案，牛践初委员之提议《绥靖区及非绥靖区土地改革应同时普遍实施》案，则与本案同其意旨。余于反对声中，曾再写一文：《论农地改革法案——兼答刘士笃、陈紫枫、甘家馨、孟广厚诸先生》加以辩解，其余在立法院讨论中，口舌之争辩，几又演'舌战群儒'，此案作大体讨论贯半年之久，至是年十月一日，卒以'并付审查'了之。而国事已不可为矣。真所谓'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37)

当时，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减租减息、战士授田及土地改革的方案及活动。例如，傅作义主张“发展中层”，1948年3月19日，河北省军政会议原则决定，“保护自耕农，将富农无力自耕之部分割出，交由劳力有余之贫农耕种”[38]。但点点滴滴的活动，并不能减轻农民的痛苦，更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自然无法抵抗中共的土地改革对农民的普遍的动员作用，以及对国民党士兵的争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士兵在中共土地改革的感召和政治攻势之下，大量地倒戈。解放军更大批地以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教育后充实自己的队伍，从而使解放军的军力得以迅速壮大。而国民党尽管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由于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它的兵源补充十分困难。

1948年8月，中美设立基于美援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以蒋梦麟为主任委员，于是年底到1949年间，在西南地区，以向地方当局提供农复会资助的条件，要求地方当局推行二五减租，先后在广西、贵州、四川推广。台湾则于1949年8月15日在全省开始换订租约，实行三七五减租，即佃租不得超过正产物的千分之三七五，也即二五减租的原理。但这些局部行动已无补于国民党崩溃的大局。

第二节　总体战和国统区统治的强化

一　总体战

国民党政府虽然于1947年7月下达了总动员令，但实际上并无成效。一年后，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说：“总动员的办法，是去年七月间才决定的，过去没有下动员令，大家不动员，犹有理由可说，现在动员令已经颁布快一年之久，事实上还是没有动员，因此军队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军队无论到什么地方，找不到夫子，买不到粮食，或者在追击防守的时候，补给困难。于是军队就不得不自由行动，去找粮食、找蔬菜、找夫子，因此就影响军队纪律。”也就是“政治不能配合军事，党务、政治、经济、军事、民意机关，不能互相协

调，不能以剿匪工作为重心，来切实合作”。“六省主席会议决定，对大别山的匪，马上进行清剿。但是大别山的匪，被我们打跑了，行政院的命令还没有下去。这就是政府不能适应剿匪的缓急需要，因此，才有九江会议、徐州会议的召集，但对剿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主席最后决定召集华中区绥靖会议，把八个省主席和绥靖区的司令官都找来开会，主要就是研究总体战的政策及其实施方案”[39]。

当时，国民党将领中，非黄埔系的傅作义、白崇禧有比较强的独立作战经验，他们更懂得如何依靠地方社会组织与中共作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中共的作风。傅作义主持的张垣绥靖区（张家口），“你所看见的军政人员，都好像是士兵和夫役。因为武职人员，无论军长师长，一律都穿着草绿色粗布的士兵制服；文职人员，无论厅长处长，一律都穿着夫役式的黑色粗布制服；一般高级人员的装束，和士兵夫役，丝毫没有差别。傅主任本身也是如此。”傅作义标榜说：“共产党人是表面的待遇平等，实际的享受不同；我们是表面的待遇不同，实际的享受平等。”傅作义十分重视对地方组织的控制：“对乡县人员编组保甲的要求，是‘人必归户，户必归甲’，不许有一个人遗漏在保甲组织以外，保甲组织发挥的力量，要求到什么程度呢？是要‘一个坏人不能隐藏，一句流言不能传播，一个逃兵不能走脱’。”[40] 傅作义在出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之后，寻求对付解放军的办法。他认为，在北方，军事及政治配合的方略，“一为封地道，一为捉干部，一为搜存粮”，以此摧残解放区，切断解放军的后勤补给。据报道：“（傅认为）欲军事有办法，必须配合政治推进，故渠现正研究一种土地政策，藉以抗共匪之分田政策。傅氏并称，匪区目前农田均已荒芜，壮丁且均逃尽。彼等所标榜之一亩半分田政策，实为欺人之说。惟欲挽救人心，则我们不能不另谋良策，使人民有所依归。”[41] 当然，中共的土改政策深入人心，他是找不到什么“良策”的。白崇禧在一次讲话中则强调：“欲肃清政治性之匪，确需军政配合，军民合作，方克奏效。希望地方父老一致起来，领导民众参加省县自卫组织，充实地方武力，协助正规军发挥全面清剿之最高决

策。”[42] 他特别强调“组训民众，使男女老幼人人皆兵。平时共匪无由煽惑，紧急时可以动员起来”[43]。在白崇禧的指挥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和解放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展开了严重的斗争。

1948年3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华中区绥靖会议，指示“达成总体战及党政军一元化，应明确规定绥靖区司令官之职权，以收统一指挥之效”[44]。会议决定了华中总体战方案，大要如下：“（一）调整绥靖区机构，武汉行辕撤销，成立华中绥靖公署。（二）各省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筹措；各县成立保安团队，其经费由地方筹措。（三）授权绥靖区司令，负责统制绥靖区物资，避免资敌。（四）实行战士授田法。”[45] 会议决定组训民众，建立地方武力，“以‘自清自剿自卫自富’之‘四自政策’为号召，以打击匪方求兵求战求食三求战略。（一）自清。发动自卫队及驻军、保甲，实行乡镇户口总清查，并随时突击抽查，以切实防杜奸宄，廓清闾里。（二）自剿。做到有民皆兵，人不离枪，枪不离手，随时痛剿。（三）自卫。以卫身卫家卫乡号召民众，无分男女，无分老幼，全体动员防匪，绝不使之入境。（四）自富。寓兵于农，寓农于兵，不误农时，竭力耕耘，增加农产，以裕粮糈，促进建设，解决民生，自筹合理财源，减少中央负担”[46]。会议至20日结束，颁订了《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至5月，国防部又召集各绥靖区主管人员来京，举行绥靖区政务研究会议，讨论具体措施。

所谓总体战，就是“今后戡乱作战，必须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之总体战，以军事为主体，配合政治经济同时进剿，务尽诸般手段，充实战力，以摧匪之战力，庶可革新当前之局势，完成戡乱建国之大业”[47]。其关键，则是在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加强地方武装，控制基层组织。白崇禧说：“在政治方面，则须组织民众，使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分力量。能够如此严密组织，然后才能实施总体战，发展全面战。”[48]

虽然，蒋介石号召党政军一元化，实际上，国民党方面仍然只能以军事首长为中心，强化军事控制。《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规定："为加强总体战效能，应建立绥靖区党政军一元化制度，绥靖区司令官，有统一指挥监督辖区内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及人民团体之权。发挥总体战战力，绥靖地方，举办清乡，并协同进剿部队之作战。"[49]《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规定："为适应戡乱剿匪总体战之需要，特设绥靖公署或剿匪总司令部，承最高统帅部暨行政院之命，指挥并督导辖区内剿匪绥靖事宜。"[50]

蒋介石就任总统前夕、国民党政府行将结束之际，发布命令："国民政府现经改组，国民政府主席各地行辕，亟应随同调整，所有东北行辕之职权与业务，着即归并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北平行辕之职权与业务，着即归并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武汉、西北、重庆、广州各行辕，均着改为绥靖公署。"[51] 所谓"还政于民"的结果，乃是强化了军事统制制度。

《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重申了以往土地改革的政策。来南京参加绥靖区政务研究会议的著名地方领袖、华北第十区专员王凤岗认为："只要政府实行民生主义，用合理的办法，使贫雇农能解决其生活问题，社会即可趋于安定进步。"宛西民团指挥官丁叔恒则说："我们组训民团，实行了以下三大原则：（一）官绅合作，否则扞格不通。（二）士兵授田，每一名给十亩地安家。这许多地是由有地的捐出。我是有地的，我首先捐出一部分。（三）团结民心：（1）富人也要出钱出力，实行累进负担。（2）三村互助，救济贫民，有一人饿死，村长连带负责。（3）请国军整顿军风纪。"[52] 但国民党无论怎样费尽心机，它所依赖的保甲、地方父老，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都是地主阶级的组织系统。它要依靠这个系统去与中共战斗，又怎么可能完成土地改革？国民党强化地方组织和土地改革存在着先天的矛盾。国民党的总体战，在中共克服了"左"的错误之后，就无法再与中共发动群众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抗衡了。

二　国统区的强化统治

国民党政府自实行“戡乱总动员”之后，即着手强化自己的暴力统治。一方面于1947年11月间通令成立由各级民意机关议长主持的省市县“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以分负各地动员民力的责任，同时并授权地方各级行政首长，指挥辖区内所有保卫武力，以加强军事政治的配合。国民党又在各地组织集会，进行“戡乱”动员，大造声势。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强化战时经济体制，镇压革命运动，进行最后的挣扎。

1947年9月5日，行政院发布命令，公布《后方共产党员处置办法》，明令镇压共产党员。其中第六条规定：“各地政府应会同治安机关定期公告，所辖境内之共产党员及其工作人员，凡愿遵照本办法办理脱离共产党手续者，应自动觅具妥实保证，依限申请登记。前项申请登记之人，于必要时，得令其缴出有关共党秘密文件。”第八条规定：“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工作人员，潜伏后方，不为第六条登记之申请，应由当地治安机关一律予以逮捕，于法定时间内，移送有审判权机关，依刑法及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之规定惩处之。其有阴谋活动者，并从重惩处。”(53) 至12月，进一步修正为“于法定时间内移送军法机关”(54) 。但另有命令指示：“各在校学生之犯有共产党嫌疑者先送司法机关审理。”(55)

10月21日，首都卫戍司令部、南京市政府发出布告：“凡潜伏本市之共产党徒，自应依法申请登记。兹遵照该项办法第六条之规定，订定南京市共产党分子脱党申请登记办法公布施行。限自布告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为办理申请登记期间。如逾期不履行登记手续，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56)

为了控制工人运动，11月1日，行政院制订公布了《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禁止工人罢工、怠工。该办法规定，在工交事业发达地区，设立劳资评断委员会，隶属于市县政府。第七条规

定："雇主或工人在未经劳资评断委员会评断以前，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停业关厂或罢工怠工。"第八条更进而规定："劳资评断委员会之裁决，任何一方有不服从时，主管机关得强制执行。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依照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罚之。"(57)

为了控制学生运动，教育部于12月6日发布训令，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了一系列扼杀学生运动的条例。第二条规定："学生自治会以根据三民主义培养学生法治精神促进其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目的。"第四条规定："学生自治会为学生在校内之课外活动组织，不得参加校外各种团体活动，或有校与校间联系组织。"第五条规定："学生自治会应由学校校长及主管训导处或教导处指定每年级或每院系学生二人至三人先成立筹备会，于两星期内登记会员，召开大会，订定办事细则，推选职员，正式成立。"国民党对于这样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还不放心，第九条规定："当选之理事，其操行学业成绩及领导能力经学校审核不合者，应以得票次多数之适合标准者依次递补。"第十五条更规定："学生自治会之决议，以在规定之任务范围以内为限，不得干涉学校行政，有违反上项情形者，学校得撤销之。学生自治会如违背校规，情节重大时，学校得解散之。"(58) 教育部制订如此严峻的规则，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同学生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除了暴力之外，它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来控制学生运动了。

为了强化对人力、物力资源的征集，行政院于12月9日制订发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规定根据军事需要，对人力、物力的强制征发。对所谓绥靖地区则进一步强调："为动员戡乱绥靖地方，得依军事需要，动员全国各县（市）民众武力，依照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组织自卫队及常备自卫队，分别担任清剿零匪、警卫地方及情报、向导、运输、通讯、守望、盘查、工程、救护暨机动剿匪，配合国军作战，各县（市）已受训之国民兵，应加入自卫队组织。"(59)

12月25日，即1947年1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生效的一

天，国民党政府命令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针对中共的地下活动，加重刑事处分，并于第八条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除军人由军法审判外，非军人由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之。前项特种刑事法庭之组织，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60] 也就是说，12月公布的将破获的中共地下党员交付军法机关审判的办法，也不能满足强化统治的需要，而必须特设专门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

1948年3月25日，立法院讨论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辩论十分激烈，多数委员根本反对这种法庭的成立。孙九录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根本反对这件事。胜利以前，立法院化了好大功夫，才将所有特殊法归纳在普通法里，今天我们忽然又要开倒车了。"刘不同说："以上海的情形说，舞女打架要送特种刑庭，两个银行行员为了要求加薪而怠工也送特种刑庭，这像什么？特种刑庭就是墨索里尼的办法，而民主国家的法制应该是有系统的。"谭惕吾说："我们既以民主号召，就不应再有这种法西斯的制度。"立法院长孙科亲自起来警告持反对意见的立法委员说："特种法庭是拿来审共产党的，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现在共产党已经到了长江边上，等他占了南京，你们看他设的是什么法庭？现在不应该再有同情共产党的言论，你们同情共产党的，可以立刻退出去，不要等在这里。现在是戡乱，这个乱不戡，大家都等不下去。现在的局面不比一年以前，你们不要糊涂了。"虽然立法院终于通过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但仍作了两项修正，一是将一审终结改为两级制，一是五年以上徒刑可请复判。根据通过的条例，特种刑事法庭分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及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由中央庭复判高等庭判决的案件[61]。

《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及《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公报》于1948年4月2日刊布，但国民党政府至4月21日才命令于21日起施行[62]。

此外，国民党政府为实行总动员，强化战争机器，还颁布了《粮食流通管理办法》（11月22日公布）、《全国花纱布管制办法》

（12月26日公布）、《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12月23日公布）、《厉行消费节约办法纲要》（8月19日公布）等等，以便集中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力图挽救行将崩溃的统治。

第三节　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以总体战，实施高压政策，企图巩固其统治区域。但恐怖政策历来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假民主，没有为它争得群众，也没有能够扩大统治基础，反而弄得其内部更离心离德，而国民党的恐怖政策，更只能使它丧尽人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据中统局情报：“据报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向驻京苏联大使馆报告，关于中国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后，北方青年之反响，谓：‘平津一带青年原希望和平迅速到来，能有安定生活可过，不料国民党竟准备长期战争下去，且关闭和平之门，直置华北人民死活于不顾，青年学生激于义愤，纷纷准备向中共区投效，以打击国民党之坏政府’等语。”(63)

“五二〇”运动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大批学生被开除出校，总动员令颁布后，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法令出台。但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总动员令的实施，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依然此伏彼起。白崇禧在南昌号召组训民众、人人皆兵时，七十八岁高龄之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力行日报》为此也发表评论，呼吁：“不要造匪，更不要因剿匪而造匪。”(64)

1947年10月25日深夜，浙江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陈建新、黄世民从上海来杭州，与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郦伯瑾四人，在大同旅社秘密商议展开学生运动、反对总动员令，被保安司令

部破获逮捕。26日，浙大学生得到消息后，即要求学校当局转请治安机关于24小时内移送法院办理。经竺可桢校长奔走于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之间，历90小时未有结果。29日夜，于子三在狱中被折磨惨死，但当局并未搜到证据。消息传出，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于31日起罢课三天，并发布告同胞书，抗议当局非法拘捕四同学、惨杀无辜，要求保障人权。告同胞书说："政府说什么要保障人权，而摆在眼前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执法的在毁法，做贼的喊捉贼，这就是宪政，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这就是保障人权。"(65) 浙大教授会也为此作出决定于11月3日罢教一天。

11月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继续罢课，为于子三治丧，并酝酿游行，呼吁人权保障。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忧心忡忡地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业与校方洽商制止，劝令复课。但自治会操诸共匪民盟之手，能否生效，实无把握。"(66)

同时，上海、南京、北平、厦门等地学校，纷纷响应浙大学生的呼吁，罢课抗议，反对国民党各地当局逮捕屠杀学生，要求保障人权。

这次学生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当局利用学校内的国民党党团学生和军警配合，破坏学生运动，一批学生被校方开除学籍。至月底，学潮进入尾声。

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之后，又激起学生的广泛抗议。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发布告全国同学书，指出："那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他治'而非'自治'、'他主'而非'自主'的'御用'规则，这是政府有计划的摧残教育、奴役学生的毒计，也是更进一步剥夺全国学生自由权利的信号。这样产生的自治会是不可能代表同学的自由意志，也不可能为同学谋取福利的，因此我们坚决表示反对。"(67) 不久，同济大学即为反对这一规则发生了更

大的风潮。

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组织濒临崩溃，各地屡屡发生抢米风潮。12月间寒潮袭击上海，一夜之间，冻饿而死的人即达四五百人[68]。国民党政府已如此不得人心，高压政策也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了群众风潮。1948年1月底到2月初，在短短的五天内，上海即发生了同济大学的学潮，舞女捣毁社会局的舞潮，申新九厂工人罢工的工潮。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8年1月13日，同济大学学生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扰，选举成立了新一届、即第三届学生自治会。为此，校长丁文渊于14日开除了二名学生骨干。学生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承认学生自治会，遭到校长的拒绝。校方继续开除左派学生，并宣布禁止自治会一切活动。中共地下党认为：“这一切表明敌人决心镇压，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坚决反击敌人，并提出‘反迫害，争民主’的口号，在斗争中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教师的同情。”[69] 19日，同济大学学生举行系科代表大会，作出了三项决议：无限期罢课，如无结果，去南京请愿，要校长丁文渊引咎辞职。同济大学学生的斗争，得到上海各校同学的广泛支援。而同济大学校方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决心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政策。

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集合，准备前往南京请愿，上海各校同学前来送行，在同济工学院所在的其美路（今四平路）上，会合的各校学生有四千多人。国民党当局出动了近万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如临大敌，以武力阻止学生前往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到达第一线指挥，各校中共党员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都到现场解决学潮问题。吴国桢要求学生退回学校，坐下来谈判，学生们则要求：“立即撤退军警”，“反对开除学生”，“保障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吴国桢指出：“游行请愿是非法的。”学生当即打出标语：“宪法第十条：人民有游行请愿之自由。”僵持到下午，学生请愿大队决定出发，遭到军警的阻拦，骑警向学生队

伍冲击，学生们即以石块还击。吴国桢在学生队伍面前被冲倒，在吴周围的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为避免事态扩大，即将吴保护起来，吴也举手呼叫军警："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从而避免了更大伤亡的发生。这一天，学生有69人受伤，4人重伤，33人失踪，是为"一二九同济血案"。

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学生，但始终未能破获中共地下组织，抓不到证据，经过三次审判后，被迫将所有被捕学生释放[70]。

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政府为集中财力，用于"戡乱"，制订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一条是"禁止营业性之跳舞场"[71]。上海是舞业集中的地区，影响到几万人的生计，因而这一决定受到舞业上下的广泛反对。个别舞厅索性改成了妓院。上海市政府方面一时也不敢执行。但行政院方面坚持禁舞的命令，上海市政府方面于是决定各舞厅抽签后分批停业。1月31日下午，舞女和舞业工作人员在新仙林舞厅开会，反对抽签停业。会后舞业群众万余人前往上海市社会局，向局长吴开先请愿。吴与潘公展等正在开会，拒绝接见。愤怒的群众即冲进社会局，捣毁门窗杂物。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这批弱女子和舞厅工作人员逮捕了797名之多[72]。事后，吴开先发表谈话："今日该暴徒等，并未经由正当之请愿方式，陈诉理由，而出以聚众暴动，公然捣毁行政机构，且敢殴辱警卫，目无法纪，显系匪党有组织之行动。"宣铁吾表示"必须严办这次事件的首领，否则不能维持地方政府的威信"[73]。区区受屈辱的舞女，为了生存进行的微弱的反抗，国民党当局也要给戴一顶红帽子。在群众性的反抗面前，国民党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只有在这些谋生乏术的可怜的舞女们面前逞威的能力了。

当时物价飞涨，政府方面虽然采取了规定生活指数、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配给实物等措施（参第六章），但工人生活仍难以得到保障。1月30日，在申新九厂中共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申新九厂7500多工人举行罢工，组织纠察队，提出了七项要求："（一）旧历年底

每个工人暂借薪两个月。（二）十一月、十二月份所扣所得税，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还。（三）年赏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给。（四）女工因生产请假不得限期，也不能扣薪。（五）政府配给物品，未发的要补发。（六）工厂管理的条规，要劳资双方同意。（七）去年所有被开除的工人应准复工。”[74] 31日，厂方和工人谈判没有结果。

2月2日上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介入调解，也未得结果。于是，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总工会、社会局、工人福利会、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都派人到申新九厂，解决工潮。但被工人阻挡在申新九厂的第四道铁门之外。下午1时，社会局发出命令，限即日复工，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社会局长吴开先在1947年11月间即得到情报，中共地下党将发动年赏斗争，最近又发动年底借薪斗争，因此，他认为局势严重，非警局帮助不可。近下午5时，警察开始冲门，遭到罢工工人的反击，发生冲突，军警开枪射击。6时多，军警以装甲车冲开大门，迫使工人停止抵抗，列队举手走出大门。工人被打死3人，打伤36人，被捕300多人。罢工工人十分之九为女工，男工仅十分之一。这就是“申九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竟然就今后上海市军政当局处理群众激烈行动的紧急措施声明说：“群众如果再有像申新九厂的工潮情形和同济的学潮情形，一定命令军警当场开枪，必要的时候，并请示中央临时戒严。我们宣布在先，以后有同样事情发生，军警开枪，政府不负责任。”[75]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委组织全市工人对被捕的申新九厂工人进行声援，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工人[76]。

2月3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统治区崩溃的局势，感慨地记述道：“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其对剿匪戡乱信心，以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其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

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共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77] 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已经穷于应付。

在北平方面，北平警备总司令部于3月27日接到行辕转中央电令，以学生联合会为中共所策动的组织，各地都已查禁，而“北平学联尚在公开活动，应立即依法严禁”，即通知各学校查禁。[78] 而北平无北平学联，当局误称华北学联为北平学联。3月28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万余学生，包括天津学生五百余人，举行营火晚会，华北院校自治会保卫自治权利联合会宣布成立。29日，就在行宪国民大会开幕、所谓“还政于民”的那一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北大沙滩区，查禁华北学联。北大等七校代表认为“政府查禁学联之措施，直接违反宪法”，决议4月3日起总罢课三天，表示抗议，并组成保卫学联联合会。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员工的工薪难以维持生活，原来配售的两袋面粉又被停售，生活难以为继。自6日起，清华、北大讲师、讲员、助教、职员工警及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开始罢教、罢研、罢工斗争，要求配售实物、以生活指数调整工资和研究经费，形成了北平地区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高潮[79]。

4月7日凌晨，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和北平市长何思源，以“华北学联首要分子，鼓动罢课罢工”的罪名，限北大学校当局于7日12时前交出柯在铄、田余庆等十二名同学。但这十二位同学被同学们保护了起来，校方则要求当局循法院传讯手续。当局被迫放弃了逮捕的计划。但8日深夜，几十名特务暴力袭击了北平师范学院，击伤多人，逮捕了八名同学。师院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几百人的队伍，到北平行辕请愿。各校同学也纷纷赶来支援，新华门外集结学生达五千多人。北大教务长郑华炽、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荪等约同师院训导长温广汉等与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市长何思源等交涉，要求释放学生。至9日晚9时半，温广汉终于接回了被捕学生，

并送医院治疗。

本来事态正在平息，但11日国民党方面组织反游行，冲击北大，捣毁吴恩裕教授住宅。12日，北大教授决议罢教七天，以示抗议，并发表宣言："教育需要安定与自由，学府之地位必须尊重。师生既无保障，校舍时受袭击，同人自难安心教学。宪警无故包围学校，武装暴徒于深夜戒严时间，捣毁学校、制造血案，地方治安当局纵非主使，亦难辞纵容之咎。""罢教决非同人所愿，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暂时忍痛出此，以维护学府之尊严，并争取安全之保障与讲学之自由。"(80)

李宗仁于南京得到北平学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电北平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说："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当兹生活困难、社会不安之极，学生由于苦闷之情绪，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发生轨外行动，授奸人以挑拨煽惑之机会。务望兄等与院校当局协同一致，妥慎处理，使学生了然于政府之困难与爱护青年之意，自可觅取解决之途径。至伤人滋事各节，应即依法处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陈继承、何思源则于15日向师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仄。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81) 于是，事态逐渐平息。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中叙述他对学潮的方针说："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忿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82)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美国心目中的价值日益低落。美国为了和苏联抗衡，越来越倾向于扶植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倾向于扶植日本。对日本战犯的审讯，越来越流于形式。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而向中国方面引渡的战争罪犯，寥寥

无几。5月19日，美国陆军部次长德莱勃（William H．Draper，Jr）领导的对日本的调查团，于19日公布报告，此报告称德莱勃报告，又称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报告，主张削减日本的战争赔偿数额，促使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饱尝日本侵略的痛苦，美国的扶日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安。于是，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10万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签名运动。平、津、唐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上海各大学教授338人于5月底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Harty S．Truman）、国务卿马歇尔，要求美国政府放弃扶植日本的计划，集中力量，以更多的物资加速援华，使中国早日步入建设之途。[83] 工商教育界人士281人联名于6月4日发表《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列举了大量充分的事实，指出“美国援助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84]。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四五月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J．M．Cabot）先后三次发表讲话，对中国人民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情绪横加指责。他甚至说：“不幸，中国学生却被另一暴戾政治歪曲宣传之诱惑，而在参加反美运动。他们的首领是从一个由美国捐款而支持之大学中出来的……很多人力斥此辈中国学生，不应如此侮辱及反对美国。良以此等学生之教养费用，皆出于美国农民汗血所得，及纳税人慷慨贡献，故他们有一种感情冲动，要求停止美国的援华计划。”[85] 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为美国对日政策辩护，对中国学生团体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表示遗憾，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行威胁：“余所确知者，即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司徒无视中国人民的尊严，竟以美援为口实，指责中国人民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批评：“尤令人遗憾者，乃此种举动竟于美国现正着手于广泛而郑重之计划，以协助陷于悲惨环境中之中国时发生，亦即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复兴全球被毁区域之际。且本人有可申述者，即此举亦美国人民之所乐为者，而彼等对于此项努力，竟报以无理及不负责之攻击美国政策，殊属不

解。”[86] 葛宝德的谈话和司徒的声明更激起了广泛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浪潮，各方面人士纷纷联名对司徒声明表示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表现软弱，不敢公开抗议。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表示：“美国并未扶植日本。”[87] 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至于美国政府对于斯揣克报告及德莱勃（或称约翰斯敦）报告之态度，吾人迄今尚未接获美国政府之任何官方表示……本人深信中美两国政府均决无纵容日本重整军备之意念。”[88] 这样的软弱态度，连国民党内的人士也普遍表示不满。

6月5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准备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校同学准备前往集合地点时，遭到军警的阻截，多数学生不能出校。到下午2点，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及各中学生零星到达外滩的有四千多人，但被军警马队层层包围，未能移动游行，到下午7时多分批解散，54人被军警逮捕。

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司徒曾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等12院校为反对美国扶日政策、抗议司徒雷登声明、声援上海学生，决定9日起总罢课两天。9日，各校学生离校，中途受到军警阻拦，后分别在西四牌楼、东华门集合。部分院校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后，召开反扶日示威大会，楼邦彦教授出席演讲，针对军警阻扰指出：“政治学上从没有说人民不能公然反对政府的。”[89] 对国民党当局阻扰游行示威表示抗议。

由于美国使领馆人员以美国救济物资为词，责备中国人民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天津北洋大学于6月中旬拒绝接受美国的营养品。北平方面起而响应。6月17日，燕京大学230人发表宣言，拒绝接受美国救济团的营养救济品。清华大学张奚若、金岳霖、朱自清等110位教授也声明表示拒绝：“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即葛宝德——引者）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

国人民的污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90] 当时，朱自清教授正身患重病，急需援助，出于民族的自尊，断然拒绝美援。所以毛泽东评论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91] 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浩然正气。

在这场反美扶日运动中，昆明学生于6月17日罢课一天，并举行游行示威。但游行结束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警察和宪兵竟逮捕了一千多名师生，直到1949年4月15日才全部出狱。

北平的学生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解放军在东北已占有优势地位，解放了大批城市。一大批对解放军感到疑虑的东北学生，纷纷盲目流落到关内。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开设临时大学和临时中学来收容他们，但规模太小，许多学生无法上学，生活困苦。然而，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决议，要电请中央，将东北学生交傅作义予以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要查考他们的背景、身份、学历，成绩不合格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同时要求中央将东北各校一律停办，将经费交给傅作义，再贴补给东北在平学生和临大[92]。东北学生原希望当局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学问题，对这一荒谬决议，感到十分气愤。

7月5日上午，东北学生四千多人高呼反迫害、反饥饿、打倒参议会等口号，到市参议会请愿。但久久无人接见。愤怒的学生冲进门里，将市参议会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同楼的北平市戡乱建国委员会北平市民众清共委员会的门窗玻璃、家具什物捣毁，将市参议会门额改为“土豪劣绅会”、“三老四少会”。中午时分，学生队伍到李宗仁官邸请愿。李因结束行辕事务，正好在北平。李宗仁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他们的一些要求，但学生要求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到李的官邸门前向学生道歉，李表示副总统没有权力要求民意机关来道歉。学生对李的回答感到不满意，就又赶到东交民巷1号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公

馆，要求接见。但许避而不见。下午2时半，军警局部戒严。傅作义虽然反对学生游行请愿，但“指示治安机关，对学生行动始终采取容忍劝导方针。警备总司令部曾命令警宪人员，凡与学生接近者，一律徒手。从早8时直至下午7时，整整十一个钟头，饿着肚子，徒手劝导，维持秩序……警宪人员始终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容忍态度，希望学生接受劝导，避免发生意外”[93]。

尽管有此指令，但属于中央系统的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认为局势严重，以电话请傅作义派部队警备，傅指示“士兵不准带枪，更不许打学生，士兵伤亡重赏重恤”[94]。陈继承即调中央系的青年军第二〇八师搜索营及装甲车四辆于下午5时半先后到达现场。这时，现场还有宪兵十九团、警察和保警队，十分庞杂，而仅以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为最高指挥。搜索营到达后，将学生分隔成东西两部分，竟荷枪实弹以战斗状态配备，机枪手伏地扣机待发。下午7时多，白世维走向西边的学生劝导回去，学生正准备整队返回，突然东边发出一声枪响，然后搜索营的机枪扫射，白呼叫不要打枪，已无法阻止。东边学生中弹数十人，血染遍地。事后调查死亡学生八人、商人一人，受伤十多人。[95]

血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这些学生本不是左翼学生，政府方面是把他们归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不仅学生对当局感到愤怒，即各方面的东北籍人士，也认为北平方面歧视东北，予以强烈谴责。东北朝野都声援东北学生。北平中共地下党学委事先不知道东北学生游行，事件发生后，决定秘密发动，于7月9日游行请愿，抗议“七五血案”，支援东北同学。当天，北平和东北在平二十五个单位的同学一万多人，到北大民主广场集合，举行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惨案”哀悼控诉大会。大会举行之前，一万多学生举着“反剿民，要活命，大请愿”的大旗，先到副总统李宗仁官邸请愿。学生代表连续三次请愿，李都予以接见，他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只能尽量帮忙，向地方及中央转达。”最后，同意学生要求，撤退开到官邸附近的战车。于是，游行

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途中高呼“严惩七五惨案凶手傅作义”、“枪毙傅作义”、“枪毙陈继承”。当天，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遵照命令，“均系徒手，对学生自早到晚抱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之态度，纪律甚为良好”[96]。学生方面也比较克制。有记者问白世维：“今天游行会出事吗？”白回答：“有北大领先，清华断后，今天不会出事，他们都是游行的油子了。”[97]

国民党当局对“七五惨案”相当重视，蒋介石先后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来北平调查，东北方面、监察院方面都进行了调查。最后将陈继承和青年军第二〇八师调离了北平。

8月14日，秦德纯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事件作出判断说：“‘七五’当天，学生之行动，相信其单纯，‘七九’之游行，证之其表现之方式与所呼口号等，已变质而复杂者。”[98] 当时，教育部行政机关统计资料称：共产党“职业学生一年半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十八重要都市”[99]。17日，行政院发布命令，为“安定秩序，肃清匪谍”，严禁罢工罢课游行，决心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日，北平方面公布传讯和拘传学生名单250人，南京方面发出传票147份。于是，中共地下党即部署黑名单上的学生在广大同学掩护下撤退。中共中央于8月22日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防止冒险倾向，并指示说：“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100] 此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即转入配合解放军的进军，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并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工作了。

国民党政府也强化了新闻封锁。黄炎培主办的《国讯》，于1948年1月17日出版的第446期上，以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公开刊布了中共的《土地法大纲》，进行讨论。4月9日出版的第457期发表了本社的评论《土地改革决定一

切》，认为："从军事方面看，国共两党在进行着全国性如火如荼的国内战争，双方的胜负，主要并不是决定于武器、配备和兵数，而决定于谁能实行土地改革。"但就在出版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勒令停刊。在此之前，《时与文》曾遭停刊一个月的处分，《观察》杂志遭到警告。7月间，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新民报》、《观察》杂志及真理社（通讯社）。7月7日，南京《新民报》被处永久停刊，《观察》一时幸免。甚至言论谨慎的《大公报》（上海），也屡被警告。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在野党的特权》，指责《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君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8月7日晚，在汉口景明大楼，美国空军人员举行的舞会上，突然熄灭电灯，将陪舞的中国妇女二十多人集体强奸。各大报刊都被禁止刊登这一消息，企图以此避免激起群众反美浪潮。《时与文》杂志对此事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9月间，内政部行文上海市政府，勒令《时与文》永久停刊："查上海发行之《时与文》杂志，屡作歪曲事实为匪宣传之言论，前经予以停刊一个月处分在案。兹查该刊不改前非，仍屡作歪曲事实言论，为匪宣传，动摇人心，意图破坏公共秩序，尤以最近数期言论更趋偏激，兹依据出版法第卅二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101] 但仍允许于9月24日出版停刊号。12月间，《观察》上刊载了揭露国民党军失败的军事消息，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下令交与顾祝同，饬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追查"泄密"者。《观察》杂志于12月24日被查封，编辑部同人全部被捕，主编储安平正在北平，得以幸免。直到南京解放，《观察》杂志被捕人员才得以全部出狱[102]。

二　民主党派的斗争和新政协运动

国民党的内战和独裁政策使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矛盾日趋加剧。国民党政府的总动员令遭到民主党派的普遍反对。魏德迈访华时，李济深发表声明："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今天中国人民的力量也已经足以完成自己的愿望。要解决中国问题，离开了政协路线，

排斥中共及各民主党派，违反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是绝不可能的。如美国不改变其现行政策，继续支持独裁内战，则中国人民必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其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103]

李济深、何香凝、朱学范等在1947年5月初开始酝酿成立革命组织，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作为政治目标。5月4日，李济深在香港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等到他家中聚会，正式开始筹备[104]。当天成立了筹备小组，并决定写信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同志来香港参加。后来，他们经再三斟酌，在白绸巾上写了一封密信：“平山、亚子、春涛、真如阅。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划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香凝、济深。”[105]原准备请朱蕴山送到上海去，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未能成行。李济深等决定改用分头托人带口信的办法。柳亚子、陈铭枢、谭平山得到消息后先后来到香港[106]。同时，由朱学范到美国和冯玉祥联系。

10月26日，李济深等十五人举行筹备座谈会，何香凝根据宋庆龄的意见，主张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上，李济深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领导，于是，由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联名上书给孙夫人：“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指孙中山——引者）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107]

10月31日，民革举行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会上，通过了上书宋庆龄，由梅龚彬交给中共党组织由香港送往上海[108]。筹备会委托朱学范转请曾作过宋庆龄秘书的中共地

下党员俞志英专程赴沪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作了汇报，得知中共地下党已与宋庆龄谈了此事，俞就没有去上海[109]。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那一天，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会上讨论了《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在讨论革命组织的名称时，一些人不赞成再用国民党的名称，但何香凝坚持要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李济深解释说："我们是靠国民党内民主派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来实现推翻蒋政权的；同时，今天这个会议也叫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所以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是很合适的，民主人士不仅不会心存疑虑，而且还会坚决拥护。"[110]

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要梅龚彬协助自己推动李济深筹建民革。民革的宣言就是由梅龚彬起草的，但宣言的观点还是按照李济深一派的思路写的。梅龚彬回忆说："统战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起草《宣言》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写，必须考虑到李济深等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说实在话，我对《宣言》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指内容，有些提法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民革成立在即，时间不允许慢慢讨论，有些问题只能留待以后解决。我曾把《宣言》草稿给潘汉年和连贯两同志看过，他们都同意求同存异的做法。"[111]

谭平山、陈铭枢等于11月12日以后才赶到香港，他们谈到："孙夫人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连收信会友的自由也没有。上海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选她当总主席未免有欠考虑。"[112]于是，这一提议就被搁置了。李济深、何香凝为尊重民联的意见，又于11月25日召集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联合会议，推定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1948年1月1日举行民革成立大会。

民革成立大会如期召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告本党同志书》。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及执委会

等组织机构，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民革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联合组织，李济深在会议过程中尽力调和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使民革得以顺利成立。《行动纲领》规定："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以经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代替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权，在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未成立以前，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期间之最高政治权力机关。"[113] 《宣言》则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吾人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并认为："过去吾人仅为党中之小派别，今则党中干部与党员志愿参加者日多一日，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中共已发展成为独立革命政党，中共以外更有民主同盟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党派，故容共政策，亦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之政策。"[114] 《告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员起义，推翻蒋介石政权，"救党救国"[115]。

在2月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单独发布的行动纲领中，主张"反对一党专政，国内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16]。

民革成立时，于1月4日成立了秘密的军事小组，由李济深任组长，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李向各方面发出了很多信，有的写在白绸巾上，鼓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推倒蒋介石政权。民革对于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宋子文、陈仪、程潜、卢汉，以及原西北军系统的国民党将领，做过大量的策反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民革对军事策反雄心勃勃。民革和民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蔡廷锴在4月17日曾"极有把握地宣称，宋子文在最近的谈话中告诉李（济深）将军，政府有可能在大约三个月内崩溃，并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政府希望立刻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蔡还宣称，孙逸仙夫

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并在军队、政治和教育各界获得广泛支持。蔡暗示李济深希望在六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117]。在进行策反过程中，民革重要成员余心清、王葆真等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孟士衡等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民革在外交工作上，还希望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支持中国建立没有蒋介石的和平和联合政府。5月10日，李济深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进行了谈话，叙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计划。司徒在向国务卿报告中说：“李声明，委员会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代替由委员长、CC集团和某些军事领袖构成的领导。……他说明打算带着组织联合政府的观点，在国统区与共产党进行协商。他没有证明这一行动是在他的新政府组成之前还是之后，但他说会议将由他召集或领导。他说明有必要与共产党和解的两个理由：首先是任何主权政府或守信用的政府，无论它在什么条件下结束内战，都必定得到人民的支持；第二点，必须结束内战，以便给他的或其他人的政府以机会，在政治和军事上重新将国民党分子统一起来，能够有效地抵抗共产党的发展。”[118] 司徒估计：“鉴于李济深在军队的基础和他是委员长之后在中国较年长的军事指挥官这个事实，并考虑到他与各省政府现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他的运动可以证明是国民党内意见不同分子的结合点。如果他的运动从香港移到国民党地区，可以吸引足够强大的支持，使之能够产生有效的政府。”[119]

李济深、冯玉祥等想利用美国国务院和司徒雷登促蒋下台，由李、冯主政，下令国民党军停战，不听命者武力解决。他们把计划通过吴克坚转告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方面转告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120]。李济深直到进入解放区以后才改变了他的观点。

在民革酝酿成立的同时，民盟在被迫解散以后，除张澜等主要领导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软禁外，各地民盟成员纷纷转入地下进行

秘密活动。民盟总部跨党的中共党员，在民盟被迫解散前，已纷纷撤退。民盟解散后，民盟重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民盟在港中央委员多次举行谈话会，推举沈钧儒、章伯钧为召集人，着手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筹备组分三个小组，沈钧儒负责盟务组，章伯钧负责政策组，周新民负责总务组[121]。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29名中央委员本人或其代表出席了会议，各支部代表12人列席了会议。沈钧儒在开幕词中强调说："这次三中全会负的使命，是要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我们要想恢复总部，重新展开工作，就不能不就过去工作加以检讨。过去本盟参加政协时曾因一二同志政治认识不够而影响到对国民党之态度，甚或影响到本盟中央之举措，这些经验教训必须接受，而后始能保证今后的政策方针的正确。"[122]

全会发表了紧急声明："我们认为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对于本盟合法地位的取消，是根本违法的"，"我们更代表本盟全体盟员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与声明"。"同人等兹依遵本盟组织规定程序，召开本届全会，恢复领导机构，决定继续奋斗方针。"[123]

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并就今后的方针，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自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而对于美帝国主义所企图导演、以'反蒋''民主'为旗帜的'调解''和平''政府改组'，尤须提高警惕，并及早揭穿其阴谋诱计。"他批评了中间路线："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

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强调指出：“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同时，我们也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124)

全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同时，对于最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新生，也是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复活，本盟亦致其深挚的期望，并愿与共同奋斗。民主和平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实现，是有赖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亲密合作，才能达到的。”(125)

全会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主同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领导机构，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领导。

民盟总部在香港恢复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于2月13日作出决议：“香港民盟分子恢复组织及活动，纯系章伯钧等在共匪策动下所组织之军事间谍机构，其宣言内容已明白说明与共匪取同一态度，公开声明粉碎中立路线，配合共匪武装叛乱及非法活动，以颠覆政府。此项分子与共匪应同受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之惩处。”(126)

但无论是民革还是民盟，内部成分都很复杂，在他们的纲领中，还没有明确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中间路线的思想倾向仍有一定的影响。民革民盟成立后，中共指示党内：“（一）对酉感指示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

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和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127]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128]，开始进行一系列新的军事和政治部署。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准备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129]。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告诉他准备邀请张东荪、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准备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130]请他首先告诉张东荪，同他商量应该告知和邀请的人选。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当天，通过并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口号，公开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5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沪局、港分局，政治协商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

起”，并拟邀请一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开会，请他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131]。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等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同时发布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赞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申明中共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132]。

此后，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各自纷纷发表声明，响应新政协运动。民革在6月25日的声明中表示“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发表之主张，我们仍愿提出供全国人民和新政协之采择”，要求各阶层人士尽量提出意见，“务使今后的新中国成为一个全国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号召反对美帝国主义，“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声明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毅然接受孙先生遗教和本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加速卖国独裁政权的灭亡，而站到人民方面来！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来！”[133] 民联在5月的声明中批评了中间路线，并指出：“我们今天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是为着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诚意地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爱国分子，共同分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总而言之，就是要彻底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完成国民党历史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推翻某某个人的政权。”[134] 中国致公党在6月9日的声明中明确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是无资格参加，而一些采取某种隐蔽政策的政党与官僚集团，阴谋混进这个新政协也是绝不容许的”，“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

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135] 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125名在港民主人士，在6月4日的声明中赞扬“中共一步步的开明措施”，指出，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这证明了中共并不如反对者之所恶意中伤，企图再来一个一党专政。本来，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团一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以实现换朝代的封建把戏的”[136]。

8月2日，周恩来电嘱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周恩来拟定了一个77人的邀请名单[137]。自8月起，一批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来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等人。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经海路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10月21日，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约集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中共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举行了第一次座谈。10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电，将修改过的前述文件转发给他们，并要求抄送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十一人，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138]。

11月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分局，要他们邀请还在香港、上海的李济深等一批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李济深等一行三十多人，于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10日到达沈阳。在此之前，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和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于11月25日，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的协议，为新政协筹备会议作了准备。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5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

和》一文，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认为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建议联衔发表严正声明[(139)]。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第八条即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40)]。16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再次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主张联衔通电响应毛泽东声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当天复电表示赞成，并即开始起草文件。1月22日，李济深等到达解放区的五十五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声明反美反蒋，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141)]这一切都为新政协奠定了政治基础。

---

(1) 《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1947年4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7-488页。

(2)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86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48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1-554页。

(6) 参《各解放区土地改革情况表》，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7) 《（晋绥）五分区代表团关于土地改革整党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0月），转引自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页。

(8) 习仲勋：《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1948年1月19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50-451页，《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9)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6日。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6页。

(11)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2) 《国民政府公报》（重庆），1946年4月29日。

(13)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4) 《地政署致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公函》（1946年12月21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5) 《第八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代电》（1946年11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6) 谭棠洲：《代苏北佃农们喊冤》，《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

(17) 国防部档案，全宗号三四（2），卷号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4月26日（五），第2809号。

(19) 参傅毓衡：《论绥靖区土地事例办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30日。

(20)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30日。

(2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0月4日。

(2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8日。

(23)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版，第75页。

(24)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6册。

(25)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30日第2版。

(26) 分别引自《土地问题与官僚政治》，《我们抽出社会革命的旗帜——创造新中国的前途》，《土地改革》第1卷第1期。

(27) 《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9日。

(28) 陈果夫日记1948年1月31日，转引自徐咏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947页。

(29)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22日。

(3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版，第1页。

(31)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40页。

(32)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台北1980年版，第286页；又参《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1日。

(33)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94页。

(34)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88页。

(35)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4-305页。

(36)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9页。

(37)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5页；参《土地改革》第1卷第12、13期。

(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1日。

(39)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20-26页。

(40) 王汝章：《张垣绥靖区作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6日、7月8日。

(41)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18日。

(4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8日。

(43)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4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17日条。

(4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20日条。

(46)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0日。

(47) 《总体战方略》，《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9页。

(48)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7页。

(49)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1页。

(5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5页；又《国民政府公报》，1948年5月11日。

(51) 《总统府公报》第2号，1948年5月21日第1版。

(52)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3日。

(53)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9月8日。

(54)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5日。

(55) 国民政府训令处字一三〇四号，《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

(5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12页。

(57)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1月4日第3版。

(58)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10日。

(59)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10日。

(60)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25日。

(61)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6日。

(62) 《国民政府公报》，1948年4月22日。

(63) 《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对总动员令颁布后之谈话》，《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7册。

(64)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65) 《浙江大学全体同学为抗议浙江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四同学并惨杀于子三君告同胞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66) 《沈鸿烈电》（11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4册。

(67) 《中央大学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告全国同学书》，《五二〇运动资料》第2辑，第499页。

(68)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694-695页；又据《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6日第4版报道：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拾路尸共一百多具。

(69) 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70) 参《上海学生运动史》。

(71)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8月19日。

(72)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3)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1日。

(74)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6) 参《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

(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3日条。

(7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3月29日。

(79) 参《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参《世界日报》（北平）报道。

(8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14日。

(8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16日。

(82)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1980年版，第867-868页。

(83)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1日。

(84)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4日。

(85) 《申报》，1948年5月31日。

(86)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5日。

(87)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4日。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6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10日。

(9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6月20日。

(91)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92)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7月4日。

(93) 傅作义7月6日谈话，《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7月7日。

(94) 《监察委员谷凤翔、胡文晖调查七五事件报告》，《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28日，8月29日。

(95) 第一枪问题，最后没有调查清楚，官方认为是学生队伍中开出了第一枪，学生认为牌楼内一穿马靴之军官发出，装甲车未发一枪。学生中获有警方遗失的枪一支，少子弹一颗。——笔者。

(96)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10日。

(97) 佘涤清、杨伯箴：《第二条战线上的先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9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15日。

(9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15日，转引南京《和平日报》14日消息。

(100)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页。

(101) 《时与文》停刊号，1948年9月24日。

(102) 《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观察》（上海）第6卷第1期（复刊号），1949年11月1日。

(103) 《李济深就魏德迈来华发表声明》，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104)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105) 《何香凝李济深给谭平山柳亚子等的信》，《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12页。

(106)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6-28页。

(107) 《上孙夫人书》，《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10页。

(108) 据《梅龚彬回忆录》第120页注（3），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109)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61页。

(110)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55页。

(111) 《梅龚彬回忆录》，第118页。

(112)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62页。

(11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24-125页。

(11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同上书，第112-123页。

(11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同上书，第130页。

(116)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行动纲领》，同上书，第131页。

(117)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4月17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89-190页。

(118)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5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11-212页。

(119)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26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20页。

(120) 《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1948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7页。

(121) 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群言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22) 《沈钧儒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369页。

(123)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63页。

(124)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79-398页。

(125)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74-378页。

(126) 《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致行政院新闻局电》（1948年2月18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册。

(127) 《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2页。按：酉感即1947年10月27日指示，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态度较本次指示严峻，参上书第16册，第572页。——笔者。

(128) 据《周恩来传》和《聂荣臻回忆录》为11日，现据《毛泽东年谱》。

(12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04页。

(130)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1948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3页。

(131) 《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9-150页。

(132)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1948年5月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3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2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52-156页。

(134)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年5月），《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63-165页。

(135)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年6月9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69-173页。

(136)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4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79-182页。

(137)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66页。

(138) 参《周恩来传》及《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

(13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140)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141)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16-219页。

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

第一节　战略决战的准备

一　战略决战的酝酿

豫东战役期间，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重，在7月3日的日记中说："战局已至严重之阶段，应作最后万一之准备：（甲）津浦南段之部署；（乙）京、沪、芜之守备；（丙）长春撤守之督导；（丁）沈阳撤退之方针。"[(1)] 豫东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战略态势，即在中原一线也已陷入被动，从总体上说，它已丧失了进攻的能力。但统帅部还不愿意承认这个严酷的事实，蒋介石于7月10日仍命令杜聿明率部进攻，截断陈毅部队的归路，"予以一网打尽"[(2)]。企图调整部署，发动攻势，以挽回败局。

当时，东北战场是国民党军最薄弱的环节，一个沉重的战略包袱，几十万精锐部队陷入长春、沈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如欲坚守，则补给困难，而如欲撤退，在野战中难免遭到被解放军击溃的命运。从统帅部来说，全局形势紧张，兵力竭蹶，迫切希望从东北抽兵入关，拱卫南京；而从前敌将领来说，宁肯死守，渐图补救，不愿在仓促的野战中承担失败的责任。任何一个方案都缺乏成功的把握。在当时的战局和补给、运兵能力的条件下，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将帅之间，争论不休，举棋不定。而由于国民党军在蒋介石指挥下屡屡损兵折将，他决策和命令的权威性已经大为削弱，因而受到部下的冷落，这使蒋介石本人，在部下的抵制下，对作战部署也难以作出最后

的决断。

早在1948年3月初，据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说："当共军在冬季攻势后把主力自长春与沈阳附近撤离时，我坚决敦促蒋委员长利用这个机会渐进地撤出满洲。他对这种建议表示惊愕，声称：没有任何情势诱使他去考虑这样一个计划，希望获得一个折衷办法。我建议把长春、吉林和四平街的守军撤入沈阳。蒋委员长答复说：政治上的考虑使他不能放弃长春，长春原为满洲的都城，但是，他愿意考虑把吉林守军撤入长春的计划。"[3] 国民党军失守四平之后，蒋介石于1948年3月13日亲自写信给卫立煌，要他将主力提前西进，集结于锦州附近[4]。3月31日，卫立煌从沈阳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研究东北战局。蒋介石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不愿意冒野战的风险，向蒋介石作出承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这样，蒋介石又向卫立煌作了让步，同意卫在整补完成后再打通沈锦线。卫立煌随即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原则上同意提供帮助[5]。当时，巴大维已于3月29日答复蒋介石："正在将一百万发零点四五口径的子弹供其使用，16到20架美国C—46式运输机的转移已经得到同意。"[6] 即将上述飞机从日本转交给政府军，以便向沈阳运输粮食。卫立煌回到沈阳后，积极整训部队，希望能从美国方面获得10个师的装备补充。

5月初，东北战场比较沉寂，蒋介石又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秘密通知卫立煌到南京面商。但卫鉴于与蒋介石的分歧过大，没有前去，而是派廖耀湘代表他前往，并派参谋长赵家骧、军长罗又伦随同廖前往。卫立煌认为，现在把沈阳主力撤出，无异是抛弃长春守军，而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解放军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如果蒋介石一定要撤退沈阳主力，那么，就要请蒋介石增派三

个军的部队到东北。廖耀湘等到南京后，向蒋介石陈述了东北将领的意见，蒋介石考虑到必须增派军队，支持卫立煌救出长春守军，同意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些时日[7]。当时，巴大维一直主张东北国民党军乘解放军战斗间隙，发动攻势，打通沈阳到锦州的交通，他于5月5日参加了与东北将领的会议。会后，蒋介石又和巴大维商讨东北战局。据巴大维说："我遂建议在那个时候发动进攻——如果这不能做到，那么应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撤出满洲。我指出：满洲共军的实力正在增长，如果这次胜利不能确保，以后就确定地不可能了。我进一步指出：长春和沈阳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蒋委员长说，因为傅作义将军那时不能从华北抽出两个军来增援锦州守军，而增援正被认为是战事胜利所必需的，他已决定将进攻延至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进行。"[8] 蒋介石为了准备撤退，又指示廖耀湘，重新编组沈阳部队，以一个军为防御兵团，以主力六个军加二〇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但这一方案分割卫立煌的兵权，所以卫不愿意立即成立机动兵团。6月间，廖耀湘看到东北解放军主力未在辽南活动，建议卫立煌出兵袭取营口，依托营口，撤退沈阳主力。但卫仍不愿意背负丢失东北的罪名，只是整补部队，等待关内增援。而事实上，关内兵力空虚，蒋介石已无力抽兵增援[9]。

蒋介石既拿不出一个完善的方案，在部下的反对下，难以顺利地推行自己的作战计划，卫立煌既持不同的作战方针，蒋对卫也只好听之任之。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要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于是采取了超越指挥体制的办法，直接向卫立煌的部下下达指令，以便级别较低的将领接受自己的命令。他一方面提高廖耀湘的兵权，让他统率沈阳主力；一方面又提高范汉杰的兵权，让范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驻扎锦州，负责打通沈锦交通。据杜聿明回忆，范汉杰曾对他说："南京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沈阳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以我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将权力交给我。"[10] 当范汉杰

到锦州时，已从山东调第五十四军到锦州。他既负有打通沈锦线的重任，就不能不继续到处请求抽调部队，但到6月间，仅从山东调来以第一六六师为基干的黄淑第九军到锦西附近，以第四十二师为基干的周开成的第八军到秦皇岛附近，准备整补训练后投入战斗。然而，就是这两个军，不久之后，因为南线吃紧，又随李弥兵团调到苏北战场去了[11]。东北国民党军仍然只能困守孤城。

豫东战役后，形势急转直下，济南已经孤立无援，蒋介石不能不如上所述，考虑调整战略计划。7月19日，卫立煌奉召到南京见蒋介石，他仍坚持己见，向蒋“报告东北我军已恢复其战力与精神，而沈阳独立守备计划之宗旨，亦已达成，除长春国军粮煤不济以外，并无其他顾虑，故坚决表示不愿放弃沈阳”[12]。蒋即晚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讨放弃东北方针与撤退部署。商讨结果，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卫立煌总司令坚决反对放弃沈阳，且谓所需粮煤彼可自给无虞。对于试图打通锦沈路，以为此时士气与将领心理，不仅为绝不可能，且徒损兵力，反增沈阳危机。若责其固守沈阳，则彼坚称确有把握。于是最后决定准其暂时固守沈阳，而不必急于出击，以图打通锦沈路。并限其于三个月内，在十一月封冻以前，积极整顿补充，恢复战力，然后出击，并作全军撤集关内之准备。而长春守军，务令其相机撤至沈阳，并速作接应之部署，毋再延滞。”[13] 郭汝瑰日记也记道：“晚于总统官邸，饭后研究东北作战，决定暂取守势，待秋收后作大吃小之远程奔袭。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14] 范汉杰的司令部原由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卫立煌担心华北“剿总”从锦州一线抽走部队，在南京时，经蒋介石同意，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卫原请将指挥所设于葫芦岛，但蒋坚持设于锦州。这样，国民党军在东北对于解放军未来的进攻处于消极待变状态，并无积极的应变部署。

当时，国共战斗的重心仍在华中战场。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

维曾建议从济南撤退，但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仍主坚守济南。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对今后作战方针持积极作战的态度，于7月16日草拟计划如下："本厅研究共军经去岁南麻战役后，毛泽东根据其江西经验以主力南窜，自命为反攻，实则系避免退入黄河以北，故政府军应在作战原则上确定：1．打破共军根据地；2．驱之流窜，使成流寇；3．防止其再泛滥我军守备区，使其人力物资枯竭；4．指导小型歼灭战，俾将来主决战绝对优势。根据上述四原则，余令起草计划，以彻底攻破陈毅为方针。"在7月17日的官邸会报会上，郭汝瑰进一步解释："力主计划打大名、濮县等地区，力追陈毅部不舍，不使有补整余地；并以胡宗南主力东向中原与华中总部协力进攻刘、陈（赓），一面准备以压倒优势之兵力在苏北演一歼灭战，前方一面作战，一面将各师扩为九团制；后方一面成立后调旅增加兵力，准备渡河攻击。"[15] 但此时国共两军士气和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谋部成员多不同意这一计划。参谋部次长刘斐主张："全局取守势，并主张收复兖州以支撑济南。"[16] 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等也不同意，他们认为："国军已孱弱，不能徒劳无益的追击，主张战略守势。"[17] 蒋介石则表示"将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18]，仍想尽力有所作为，挽回败局。

最后，国防部于1948年8月4日制定了华中作战计划，规定："华中国军为增强战力，堵匪流窜，逐渐削弱匪军力，准备大举进剿之目的，将主力分置于陇海、津浦、平汉及汉水、丹江各要点，编组进剿兵团，先充实战备。在整备未完成前，全般战略暂取守势，在战术上则仍取攻势，配合绥靖区积极清剿，肃清散匪、残匪、潜匪，消灭其地下政治组织，巩固我地方政权，建立总体战之基础。一俟整补完成，实力充沛，战力较匪优势后，立即大举进剿，分别围歼匪军，尔后再准备进出华北地区。本计划进剿准备时间预定三个月完成（三十七年十月底），进剿实施日期另定之。"这个计划于9日向蒋介石进呈，17日经蒋介石批准，19日交第二处（当属国防部第三厅）逐次下令实施[19]。对于当前的战斗，国防部要求于9月上旬完成下述计划

的准备："华中国军以各个击破匪军之目的，目前乘匪整编之际，应以一部监视陈毅匪军，以主力与西安绥署东进部队协力乘机打通陇海路及陇海中段后截断伏牛山区匪军后方补线，先击灭刘伯承、陈赓匪军主力，尔后转移兵力于黄泛区及鲁西地区，给陈匪主力以击破。另以有力一部沿津浦路前进，相机收复兖州。"[20] 这一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贯彻，解放军对济南、锦州的猛烈攻击，就把国民党军对作战形势的设想彻底打破了，这一计划成了根本不切合战场实际的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议，7月23日起，先开预备会议，8月3日正式开会。蒋介石致开幕词，他不能不承认国民党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他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一方面又向他们打气："我要求大家认清我们目前剿匪首要的急务，是改造我们一般官兵的精神和心理，要恢复我们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这时，国民党军的士气低落，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在无奈之中，不得不抛弃革命的空话，以生存的渴望来作激励士气的最后努力，他说："我个人的事业，自抗战胜利以后，实已对国家尽到了责任，如为我个人，我今天实在无所求了。其所以如此忍辱负重，毋敢或懈者，第一就是为我多年来受我领导患难相从的官兵和党员，总要率领他们达到成功之路，使他们有着安身立命之所，不致为人轻侮，为人唾弃。"[21] 但是，会议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战略战术上都无法找到出路，只能流于空谈，成了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前的一次绝望的努力。8月7日检讨会议结束，蒋介石自记道："对军事检讨会议，自问已尽心力，然恐听者藐藐，未能有动于中耳，余惟有以'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引为自慰也。"[22] 在这次军事检讨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大而无当的决议案，在政略上继续实行总体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划分战区，各置统帅，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番号，军以3.5万人定编，实行三三制，加强战略城市的守备，组成机动兵团，为保持500万人的总兵额，编练

战略预备队150万人，编组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等等[23]。后来，巴大维曾批评国民党军的计划说："这是中国当局作冠冕堂皇的计划，而往往不顾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的又一例证。"[24] 郭汝瑰回忆说："这次会议名为检讨会议，实际上是以蒋介石向将领们打气为重点。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中间并无重大决策。"[25] 这样，国民党军在军事态势十分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已找不到对策，只能用空谈来坐待失败，在具体的军事部署上却完全处于麻痹状态。

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对战局十分乐观，积极要求各部扩大战果。在华东战场，毛泽东于7月8日要求粟裕部撤出战场后十天内完成再战的准备。7月14日，在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即将攻克兖州之际，毛泽东于7月14日要求"许谭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26]。16日又要求许谭不顾疲劳，以主力抢占济南机场，迅速完成攻击济南的准备。同日得到攻克兖州的报告后又要求许谭部争取十天内外夺取济南。中原野战军在豫东战役胜利的鼓舞下，也积极寻战，刘陈邓于7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华野第一、三两纵队西进，配合他们寻歼胡琏兵团一、二个师。

同时，在山西，徐向前指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等部取得了晋中战役的大胜之后，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到太原，调陕西的整编第三十师空运增援太原。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战役行将结束之际，于7月16日要求徐向前、周士第抢占太原机场，争取十天内外夺取兵力空虚的太原。

不过，在事实上，解放军各部经过大战之后，各军战力疲惫，已难以胜任毛泽东提出的出击要求了。粟裕于7月16日报告说："部队本身困难，难以连续作战"，"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27] 徐向前也认为："蒋匪三十军

（即整三十师——引者）由空运增援，城郊城内敌守备很严，我们估计当时不能打下太原，战役即此结束。”[28] 解放军各部队于是普遍转入休整，在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检讨会议前后战斗一时趋向沉寂。

华东、中原野战军转入雨季休整后，仍积极备战。8月10日粟裕等向中央军委请示，提出了雨季休整后的三个作战方案，并建议执行第三案，即“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实施9月攻势。同时建议“中原军区以主力向信阳或南阳汉水流域进击，以吸引十八军南下，使其不易北援。同时建议以陈谢有力一部位于郑州附近，使郑敌不敢来援”[29]。刘邓陈也向中央军委报告配合华野的秋季作战计划：“总之，我刘邓、陈谢两部应担任对张轸、杨干才、孙元良三部之钳制，并寻歼一部，自应以对张轸集团为主要对象。”[30] 中央军委于8月12日复电华野将领，表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31]。

当时，毛泽东对于全局的战略部署，在南线的华东战场，以攻克济南为主要的军事目标，在北线的东北战场，以占领锦州为主要的军事目标。但他对于各个战场仍然是分别考虑，各自为战，他对各战场之间的要求，仍停留在疏松的战略配合上，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系统的完整的战略构想。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济南战役正在部署之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一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

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32] 对于华野攻击济南一役，中共中央和前敌将领对于军事部署比较一致，济南本已陷于孤立，局面比较明朗。而对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攻击锦州一役，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前敌指挥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之间，一度分歧比较大，对战役部署尚未达成一致。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认为东北“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他考虑到蒋介石曾准备撤退全部东北兵力至华北，强调“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因此倾向于东北野战军南进到阜新至滦州一线作战，以应付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33]。林彪2月10日给毛泽东的复电，同意把国民党军堵留在东北，但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34] 对毛泽东的远景指导性意见，前敌将领持不同意见，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常见的事情，将帅之间，从战略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研究和磋商，常常形成了最佳的战役方案。4月间，东北野战军决定集中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并认为如南下作战，“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35]。毛泽东迁就了前敌将领先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同时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36]。但5月下旬林彪以一部兵力试攻长春的结果，发现强攻长春的把握不大，决定“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37]。东北野战军由于一时没有战机，从6月20日起，即转入练兵。这是解放军进入东北后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和比较长期的练兵，经过四十天攻坚战练兵，部队在战术和技术方面都有大的提高，尤其各级指挥员对战术概念弄得比较清楚。

林彪在东北指挥作战，两次四平的阵地战斗均遭挫折，尤其是1947年6月对四平的攻坚作战失利，使林彪对攻坚作战采取了十分持重的态度。他一方面加强部队攻坚作战的训练，而另一方面则又尽量避免攻坚战斗，尤其不愿意将部队投入长距离奔袭的攻坚战斗。解放军在东北作战的特点是：东北形势，敌处中心地区，并有铁路迅速调动和集中兵力向我进攻（过去）或增援（现在），我根据地和我军，则处于敌周围，中间由河流和敌人隔断，又因系在敌占区，行动无法保持秘密，故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的战役。林彪既不愿意攻坚，又无野战战机，东北野战军休整完毕，拥有12个纵队，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17个独立师，共为53个师，70多万人，加上地方军，共为105万人的强大武力[38]，却仍处于战斗方向不明的休整状态，一时无用武之地，为全军所瞩目。东北野战军将领为积极寻战，几经考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0日致电军委，希望到8月中旬，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作战，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守备薄弱的五城敌人，然后转攻承德，并要求华北的部队配合作战，但仍采取避免对锦州进行攻坚作战的方针。毛泽东鼓励林彪南下作战，并指示华北的杨成武兵团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准备出动，策应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但他认为："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39]他从战略利益出发，坚持要求东北野战军进行攻坚作战。

解放军将帅正在运筹帷幄之际，东北降下了五十年未有的大雨，冲垮了林彪所部的后勤补给线，致使林彪无法确定行动日期。为此，毛泽东于8月12日对林彪"出动遥遥无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40]在这里，毛泽东对林彪所部的后勤补给问题显然未予充分考虑，尤其是东北地广人稀，大兵团作战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后勤补给线，沿袭原先的就地补给方式，是不可能支持大规模战斗的。当时，东北野战军所具有的装备，每个纵队

平均3.8万多人，马4700余匹；一、二、三、四、六各纵是4.3万人；主力纵队，迫击炮每团六门，六〇炮每营九门，如果没有比较固定的用火车、汽车运输的补给线，几十万大军集中作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铁路运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东北主力一时无法南下，只能加紧抢修铁路。这使东北战场出现了相当长的沉寂时期。但解放军各部从上到下求战心切，同国民党军消极应付，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场决战正在酝酿之中。

二　战略决战的序曲——济南战役

在东北野战军因天雨推迟了北宁线作战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正积极准备攻克济南的战斗。攻占济南，将华东、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为南进夺取南京门户徐州开辟道路，是解放军在南线作战的战略性要求。国民党军方面，王耀武曾于5月15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军情，并建议放弃济南，将济南部队撤至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一带的部队联成一片，并巩固徐州至兖州的铁路交通。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为了不让华东、华北的解放区联络，坚持坚守济南。但不久，兖州、济宁即为解放军攻占，济南、临沂、青岛成为国民党军在山东的三个孤立的据点。8月间，统帅部获得了解放军积极备战的情报，指示济南守军“增强守备力量，确保济南，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采取机动防御，加大围攻济南共军的死亡，削弱其力量，尔后再配合进剿兵团内外夹击，打败共军”，并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与华野作战，以解济南之围。杜聿明即至济南与王耀武等会商作战方案，王提出：“解放军的作战力量已大为增长，固守济南必须调整编七十四师或整编八十三师来增防，否则没有把握。”在王耀武的坚持下，蒋介石为加强济南防务，于8月26日决定命令正在苏北作战的整编第八十三师到徐州集中，准备空运济南。是日，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到济南视察防务，他向王耀武表示，如果共军进攻济南，国防部可于十天内空运八十三师到济南增防。但后来刘峙担心徐州一带兵力削弱，向蒋要求先向济南运输弹

药、装备，暂缓运输八十三师，因此，在战前仅向济南运到该师的第十九旅[41]。

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筑有坚固工事的城市，解放军从未攻击过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而徐州又有国民党军的三个精锐兵团，因此，攻济打援是一场严峻的战役。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对战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心的部署，并作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曾指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42] 华东野战军于8月20日在曲阜举行前委扩大会议，东西两兵团将领一起会商攻击济南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又于8月22日提议华野"在申删（9月15日——引者）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申删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申删以前进入指定阵地"[43]。8月31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华野关于济南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对攻城和打援作了机动灵活的部署。[44] 9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的作战部署。同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即发出济徐作战预备命令："a．组成北线攻城集团。以原东兵团之九纵、十三纵、渤海纵队共二十四个团为攻城之东兵团，由许、王直接指挥（由东及东南向济南攻击）；原西兵团之三、十纵及鲁纵共十九个团（由西及西南向济南攻击），归十纵宋司令、刘政委指挥，组织成为攻城之西兵团。该两攻城兵团统归许世友司令、王建安副司令统一指挥，担任围攻济南，并应首先攻占济南城西南郊飞机场、辛庄兵营及济市东郊及东南郊外围阵地，后协同向纵深发展，攻歼济南守敌，夺取济南。具体部署由许司令、王副司令决定。b．以原西兵团之一、六、四、八、（中野）十一纵队（属中野建制，当时归华野指挥——引者），原东兵团之七纵队及苏北兵团之二、十一、十二纵队（欠三三、三四两旅）并冀鲁豫军区之独立第一、第三两个旅，鲁中南之四个基干团共七六个团（原文如此，当系七十六个团——引者），组成南线阻援打援集团，负责阻援打援，保

障攻城作战之完全胜利。”[45] 预定9月15日前后发起战役。

当时，粟裕考虑到王耀武指挥较有才干，徐州一线国民党军兵力还相当强大，可能迅速增援。而华野西兵团七个纵队自睢杞战役后，部队极不充实，尤其干部伤亡太大，至今无法补充。因为战斗激烈，伤亡严重，团以下干部存在害怕牺牲的“保命”思想，战斗力受到影响，需要多做政治鼓动工作。东兵团则养精蓄锐，战力比较充实。为保证攻济战斗有充分的时间，华野以总兵力的44%弱，约十四万人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强，约十八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在进行战役部署期间，许世友于8日曾向粟裕“建议将攻济西兵团之两个纵队中抽一个纵队至铁路以东，以便集中兵力”。但粟裕则认为“总以能迅速攻占飞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的”，以便断绝敌军空援，因而要求东兵团的第十三纵队“协同鲁中之四个团，沿津浦路东向党家庄、凤凰山、七里山之线攻击，以协助三、十纵达成迅速攻占飞机场之任务”[46]。11日，许世友致电中央军委，虽然接受了既定的部署，但仍批评当前部署“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47]。为此，中央军委复电许世友，指出：“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解释了攻城和打援部署的原因，并着重指示说：“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军委明确指示：“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48]

正当华野部署攻济之际，不确定地获悉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一个旅已增调济南，一度对攻济部署产生疑虑。华野原来获得的情报，济南守军仅七个正规旅，现增加八十三师一个旅，以及由保安旅改编为正规旅的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实际应为九个正规旅的兵力。当时，攻济部队处于主动地位，又有后方根据地的强大支持，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部署，所以，中共中央军委经过分析，指示攻济前敌将领说：“只要你们在八十三师加到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仍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

打援为适宜，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二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除非你们对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二个旅左右业已完全无把握，那就只好根本放弃攻济计划，而另作其他计划。但即使如此，亦不妨试攻一次两次，假如试攻无效，对我亦无大损失。”(49)

国民党军在济南的总兵力有十一万，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为对付解放军的进攻，将济南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重点置于飞机场的以西以南，以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为东地区指挥官，以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为西地区指挥官。9月10日以后，解放军向济南外围运动。济南形势吃紧。14日，王耀武到南京求援。统帅部见解放军攻济征候明朗，才下令开始空运第八十三师。然而，这时候八十三师已为徐州剿总调往丰县、鱼台。15日，王耀武面见蒋介石，要求增援，同时指出过去政府军对解放军阻援力量估计得太小的教训，认为：“如济南被围攻，陈毅部的主力极可能布置于兖州、济宁及其以北的地区，阻我援军北上。又加我军士气不振，增援部队力量太小了，很难完成任务。”(50) 蒋介石不得不于临战之际，改为将七十四师由徐州空运济南，并答应准备强大部队增援济南。王耀武即由南京飞回济南。同日，蒋介石命令“下令空运七十四师去济南”(51)。蒋介石的这一命令是下给第三厅的。济南军情已经十分紧急，而统帅部指挥仍十分迂缓。

16日17时，在解放军攻击济南前数小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召集会议研究作战。当时，北宁线战斗也已经打响，参谋部才“决定训令卫立煌、范汉杰，令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对于共军攻济南则用七十四师入济南以求固守，然后以大军向鲁西进攻，求逐步歼敌”。16日午夜，解放军开始攻击济南，17日10时，据《郭汝瑰日记》，国民党军统帅部“于总统官邸会报，将徐州及锦州方面之作战意见报告后，总统均一一认可，本厅起草命令下达后，总长并约杜聿明来第三厅，由余面告总统之企图，令

其明日即速返徐州按指示指导作战”。而七十四师自丰县返徐州耽搁一日，至17日，第七十四师空运抵济南仅为二千余人[52]。即该师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七个连，不足一团兵力。显然，国民党军的行动部署步步落后，不仅仅是慢了一拍。

9月15日夜，解放军攻济东兵团渤海纵队占领龙山镇、三官庙，主力抵达济南东郊。16日拂晓，西兵团包围长清，主力进至长清东南的宋村、讲书院地区。东西两兵团进迫济南。16日夜24时，解放军东西两兵团向济南外围阵地发动全线进攻。战斗十分激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西面，为保护空运机场的安全，即令整编第二师师长晏子风率总预备队第十九旅、五十七旅向古城以西增援，策应长清作战。此前，解放军地下工作人员对济南西区指挥官、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作了大量策反工作。17日拂晓，吴通过联络电台向解放军密报：“王（耀武）命晏子风率六个团于十六日夜援长清以东，望注意。晏在古城预备于十七日解长清围。”[53] 解放军西兵团即于17日晚全歼长清守敌，并击退晏子风一个团，各纵顺利推进，济南守军的王府庄、藤槐树、讲书院、古城、段店、东山等据点相继失守，保四旅放弃齐河，未奉命令偷偷渡过黄河撤至济南近郊。

根据中央军委和华野部署，解放军东兵团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只是助攻部队，西兵团则是目标飞机场的主攻部队。但前线将士战斗情绪高涨，对攻克济南充满信心。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主动挑起主攻济南的担子，在向各师团下达作战命令时，竟将“助攻”改为“主攻”，并指示所部：“助攻不是佯攻，是真攻而不是假打。我们全力以赴，整个战役稳有胜利把握。”[54] 因此，东兵团攻击十分猛烈。经一夜战斗，解放军即占领了坚固设防的济南屏障茂岭山、砚池山。为了阻止部队溃退，王耀武枪毙了一个营长。东郊屏障失守，东面战斗比西面更为激烈，打乱了王耀武的部署，也使他对敌情产生了迷惑。王即令十九旅和五十七旅回调东援，并令七十三师预备队及十九旅向解放军反攻，企图夺回茂岭山、砚池山阵地，但均被解放军击退，伤亡惨

重，不得不撤至马家庄阵地继续抵抗。

18日，解放军西兵团继续推进，用炮火控制了飞机场。国民党军空军被迫停止空运第七十四师增援部队。17日夜，解放军西兵团已逼近吴化文部阵地。吴化文原属西北军系统，在国民党军中是杂牌军，在解放军的策反下，有起义的愿望。18日凌晨，济南中共市委交通员李如刚赶到吴部，传达解放军要求："当前方部队接触时，贵军应迅速后撤集结。"但吴化文尚在动摇之中，回避撤出阵地，要求在原地集结，请解放军转向商埠进攻。策反工作进入极为紧张复杂的阶段，因此，西线战斗一度比较沉寂[55]。由于吴的拖延，妨碍了解放军的推进，18日夜11时，解放军西兵团向吴化文部簸箕山阵地实施炮击，施加军事压力。经过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吴化文终于下了决心，于19日晚召开军官会议，全军两万余人宣布起义，撤出阵地。西兵团乘势全部占领了飞机场，并控制了商埠以西地区。

吴化文部起义使济南的防御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战局严重恶化，王耀武张皇失措，对防守济南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一方面调整部署，收缩阵地，一方面分电蒋介石、刘峙："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20日凌晨，蒋介石命令王耀武坚守待援，并说："我已严令援军星夜前进，以解济南之围。"[56]王即将外围部队调入内城，以内城为主，固守待援。

20日晚，西兵团从南、西、北三面向商埠进攻，21日突入商埠，展开巷战。王以自己指挥过的七十四师空运至济南的部队，扼守原绥区司令部驻地邮政大楼，在22日商埠被解放军占领后，仍顽强死守，血战至23日，被解放军歼灭。22日夜，东兵团向外城发起攻击，至23日予以占领。国民党军退守内城。至此，解放军战局进展十分顺利，为了不给济南守敌以喘息机会，23日晚，解放军东西两兵团同时向内城发起总攻。东兵团第九纵队向城东南突击，遭到敌第十五旅的顽强阻击，三次攻击均遭失利，伤亡严重。司令部不能不考虑是否撤出战斗，调整部署后继续攻击。前线指挥员经过研究，决心重新组织

火力，再次突击。24日2时25分，解放军第九纵队第七十三团终于英勇地突入内城，转入巷战。不久，西兵团第十三纵队也从坤顺门突击成功。是日晚9时，解放军完全占领济南，济南战役胜利结束。王耀武化装潜逃，至寿光县，被解放区公安战士查获。

济南战役进行过程中，杜聿明企图等待解放军攻城部队遭到严重杀伤后，再率援军北进，夹击战力衰竭的解放军，所以，计划于解放军攻击济南后第五天令部队出动。他对解放军的攻坚能力显然大大低估了。济南局势急转直下，杜聿明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不得不提前北进。但解放军阻援部队已严阵以待，杜聿明部推进十分小心，加上天雨路滑，每天仅前进数公里。济南很快失守，迫使杜聿明急忙率部回撤，以免受到解放军打援部队的攻击。

解放军以14万人的攻城部队，对国民党军十一万人的守城部队，在兵力上并无优势可言，但仅经过八天战斗，就攻下了国民党军长期经营、坚固设防的济南，这给解放军各部队以巨大的鼓舞，对国民党军的士气也予以严重的打击。济南战役的胜利，构成了解放军战略决战胜利的前奏。战后，蒋介石对美国顾问巴大维表示，他“对济南之战的结局深表失望”，“该城失陷实出意料之外”，“必须研究中国的战略与战术以及野战部队的组织与训练，藉使在济南所犯的错误不致重复”，“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强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57)]。然而，蒋介石焉有回天的灵丹妙药？

第二节　辽沈战役

一　锦州攻防战

1948年8月间，东北因为大雨，林彪无法率部南下作战，在一段时间内战斗趋于沉寂。国民党军方面借着这难得的喘息机会，盘算着如何摆脱在东北的困境。国防部第三厅草拟了东北作战计划，认为无

法向长春空投足够的粮食过冬，主张长春守军于10月间向南突围，沈阳部队适时攻击，加以援助。25日，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去北极阁宋子文官邸向蒋介石报告对东北作战的意见，蒋指示："先电长、沈，告以十月打通长、沈交通，俟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锦线，如共军向辽西移，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58)

9月10日，郭汝瑰经蒋介石允许，带着第三厅策定的东北作战方案飞赴沈阳，与卫立煌协商实施。当日晚，郭与卫见面，卫立煌深知东北各军战斗意志十分消沉，因而"反对长春突围，认为突围二日即将被全部歼灭"，同时"认为如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亦必乱得站不稳脚"(59)。11日，郭与卫再次商讨作战方针，经卫同意，由郭代拟如下："长春应尽最大努力固守以牵制敌军，沈阳部队则力求战力恢复，粮食自给，候机击破敌一、二个纵队之后再北上解围，而挽回东北局面。"东北将领廖耀湘等则认为："沈阳久守不攻非计，东北安全并非由于我取守势，而系匪无力取攻势之结果。伊等均主张打通营口至沈阳之交通。"于是，郭汝瑰拟定东北作战指导腹案如下："国军应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形成有力之攻势兵团，于冬季前进出开源、昌图附近地区寻敌决战，以解长春之围。辽西则仅保守葫芦岛、锦西，冀东则保持秦皇岛及其以西交通。秦锦间铁路可先拆除以减少损失。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渡过严冬，可能时则与北上部队夹击敌军。"(60)

12日，郭汝瑰由沈阳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军事。傅主张"华北唯有实行攻势，方可支持，一守即不可收拾"，并准备进攻石家庄，同时在南口设伏，得到郭汝瑰的赞成。(61)

郭汝瑰回到南京后，于14日、15日间，先后向刘峙、顾祝同、蒋介石及美国顾问报告东北之行及上述腹案，得到各方的支持，蒋并令郭本此方针详拟计划呈核。但事实上，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于9月12日发起北宁线战斗，上述方案闭门造车，完全脱离了当前敌情，根本无力应付即将来临的战局。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东北的战局尚未来得及

作出反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即于9月16日夜发起攻济战斗，进展十分迅速。蒋介石和统帅部对济南形势十分着急，忙于调兵增援，暂时顾不上东北的战斗，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上，更陷入了消极麻痹状态。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克服了水灾，修复了铁路线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9月3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62] 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前线将领的作战计划，同时指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要他们歼击从天津到锦州互相孤立的敌军，并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可能从沈阳来的增援部队，准备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因此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保持向两翼机动的地位。此外，中共中央军委估计："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63]

9月7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林彪，主张将原部署在新民以北的主力进一步南移，一则增强攻击锦州至唐山一线的兵力，一则将部队部署在离沈阳较远的地区，便于引诱沈阳卫立煌部增援，并强调说："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64] 林彪于9月10日对毛泽东7日申虞电表示"完全同意"，但仍将三个纵队部署在新民附近，准备"随时协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或歼灭由沈阳北上策应之敌，又能掩护北宁线之作战，并随时按北宁线之需要增

加北宁线”[65]。林彪对北线安全存有顾虑。在这场战役方针的讨论中，统帅部对战略利益看得比较重，对战略重心看得比较准，而前敌将领对战役安全看得比较重，对敌情的变化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在国共双方都存在。在解放军方面，攻济战役过程中和辽沈战役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这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当时，解放军在战略上已处于主动地位，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之间关系和谐，对战役方案商议得比较透彻，因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于是，解放战争时期，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正式启动了。9月7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北宁线作战的政治动员令，9月10日，大规模军运开始，南下部队一度在四平滞留隐蔽，待12日战斗打响后，继续南进。已在南线各部于9月12日以奔袭动作，向北宁线锦州外围诸点展开攻势。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六、八师和炮兵旅首先包围兴城、绥中，锦西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南下增援，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撤兴城之围，集中攻击绥中。13日，解放军十一纵向昌黎挺进。14日黄昏，昌黎守军突围时被歼灭。同时，第九纵队于12日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义县守敌退路。16日，第四纵队到达，将义县包围。20日到23日间，自西安（现辽源）、四平一线南下的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以及炮兵纵队一部到达义县地区，接替包围义县的任务，第九纵队继续南下进逼锦州，第四纵队南下攻击兴城。原在北线的第八纵队自八面城南下，第七纵队自四平继续南进。2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离开哈尔滨到双城指挥各部运动和包围敌军。自25日至29日间，解放军先后占领锦、义间的葛王碑、帽儿山要地，攻占锦州和锦西间的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并攻占了兴城和绥中，孤立和切断了义县、锦州和锦西的联系，先后歼灭敌军两万人。29日，解放军以炮兵火力袭击锦州飞机场，击毁敌机5架，封锁了锦州机场。这样，东北野战军第一阶段奔袭作战，即将唐山至义县间国民党军各据点分割包围，截断了华北国民党军北援之路。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酝酿期间，即策划以华北军区部队出击绥远，策应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但由于林彪推迟了南下时间，华北野战军也不便轻进。9月初，东北野战军南下在即，由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即向平古路南段、平北地区出击，吸引敌军。9月中旬，傅作义即以暂三军、第十六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北山区攻击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深入解放区达90公里，被解放军击溃。在第二兵团掩护下，由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率领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于9月5日自易县、完县地区出发，向晋北集中，23日发起察绥战役，24日克丰镇，27日克集宁，28日克卓资山，控制了大同、旗下营至集宁间的广大地区，28日包围归绥。解放军威胁傅作义的根据地，他急忙于24日飞抵归绥部署，先后以主力三十五军等步骑九个师的兵力西援。10月2日，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策应第三兵团出击赵川堡（据二兵团报告为贾家湾，地点有出入——笔者），歼灭政府军暂三十一师主力，迫敌第三十五军主力回援。9日起，第二兵团再次破袭平张路，敌主力只好东归。于是，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再次以主力回攻集宁，敌不敢恋战，于7日先期撤退。第三兵团即进击兴和，而敌于9日主动东撤。12日，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第三兵团继续西进，威胁归绥，以吸引傅作义部主力于察绥一带。

在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经向北宁线出击，北线主力分头南下，攻击部署即将完成之际，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才着手研讨对付方略，战略上十分被动。当北宁线战斗发生之后，国民党军参谋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以为解放军“将打击范汉杰部，该部似宜集中兵力以攻为守”[(66)]。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南线本没有强大兵力，所以郭汝瑰还在考虑以攻为守，显然对东北野战军已经全军南下的军情和战略意图还毫无所知。16日，顾祝同召集参谋们研究东北和济南作战，决定训令卫立煌、范汉杰，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17日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正当统帅部聚精会神注视着防卫济南的战斗的时候，锦州一线形势迅速恶化。9月24日，正值济南失守之日，卫立煌才奉蒋介石之召，从沈阳飞抵南京，报告东

北军事。26日，蒋介石才把注意力从济南战役转向东北战场，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卫立煌等研讨东北战局。

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同卫立煌研究战局时主张："共军如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不顾，据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之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际，长春应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仅系虚张声势，则国军可袭击彰武，歼灭一部有生力量，并破坏铁道后撤回沈阳。此时如判明敌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突围。惜卫终无决心，只知固守，而于锦州失陷后之后果，则全不计及。"[67] 26日，蒋介石支持第三厅的作战方案，"严令其（指卫立煌——引者）照此方针实施。卫乃求总长同往"[68]。当时，解放军方面，毛泽东要求攻坚，而林彪愿任野战，避免攻坚；国民党军方面，蒋介石要求野战，而卫立煌愿任守备，避免野战。国共双方统帅部和前敌将领都有战略性的分歧。但解放军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又先敌研究、展开和部署，经过充分的协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而国民党军方面，士气低落，战略目标和实力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在两难的战略方案之间，选择十分困难，又着着落了后手，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战略分歧无法磨合，导致了迅速崩溃的严重后果。

9月26日，卫立煌由于不愿意承担执行统帅部方案导致失败的后果，邀顾祝同一起前往沈阳指挥，同日决定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加强防御。27日拂晓，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开始起运，军参谋长周声夏同去锦州指挥，28日继续空运该师第二三七团和师部及直属部队。但29日拂晓，解放军炮兵火力控制了飞机场，空运被迫停止。同济南一样，国民党军增援行动落后了一步，加强锦州守备兵力的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卫立煌曾向顾祝同建议，命令范汉杰放弃锦州，退守葫芦岛。但顾祝同表示未经蒋介石批准，不能下达命令[69]。顾祝同到东北，奉蒋介石之命监督命令的执行，要求东北主力立即行动，"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

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的问题”。但东北将领普遍认为，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水，侧敌行军，有被解放军围城打援、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卫立煌仍坚持固守沈阳，但考虑到蒋介石的命令，主张“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70]。即“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援锦州”[71]。廖耀湘从消极撤退的角度，主张先出营口，进退有据，依托海口，然后由营口北出大洼、盘山，向沟帮子、北镇前进，以拊敌之侧背，或海运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顾祝同坚持要求卫立煌按蒋介石命令立即行动，卫立煌气愤之极，激动地对顾祝同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这是土话，即写军令状画押之意）！”[72] 最后，东北将领不得不表示一面命令部队先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一面继续要求蒋介石改变作战方案。

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是一位用兵灵活、积极的将领，有增援东北的建议。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于9月25日也曾主张集中华北兵力参加辽西会战，并于26日研究作战方针时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未获总部的批准。29日，郭汝瑰依据傅的建议，重新提出，“主张由海上运一个军去葫芦岛，以稳定该方面之战局，然后以三四个军由陆上沿北宁路东进，与锦州守军内外协力击破当面敌军，然后配合东北国军于辽西作战”。郭约国防部长何应钦一起去见蒋介石，蒋终于同意了这一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计划从华北抽调新五军（正改编为第八十六军，驻山海关、秦皇岛）、独立第九十五师（驻昌黎一带）至葫芦岛，归范汉杰指挥，而关键是调承德、冀东一带的第十三军、第十六军、第六十二军及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到秦皇岛及其以东地区集中，由李文统一指挥，增援锦州。这一方案规定：“沈阳部队击破彰武、新立屯方面共军后，俟傅部东进兵团进出锦西时，再向西疾进，与之协力求敌而夹击之。”[73] 这一方案，避免了让卫立煌单独出辽西所可能遭遇的风险，接受了卫立煌要求华北增兵、东西对进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求战的方案。

根据郭汝瑰29日日记，这一方案“余二十六日即已提出，惜今日批准，已损失三日时间矣”。那就是说，在26日决策时，蒋介石是命令卫立煌以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没有从华北抽调重兵到葫芦岛的方案。蒋的这一方案遭到卫立煌的强烈反对，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林彪主力部署在新民附近，正准备打击沈阳援军。毛泽东曾向林彪指出，“如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所以，他要林彪把主力进一步南移，“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74)]。这都是知彼知己的谋略。卫立煌一贯主张固守整训，虽然在当前作战形势下，不能不放弃固守的主张，但仍反对单独出辽西。他强调：“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提出了增兵葫芦岛、东西对进的要求[(75)]。蒋介石在26日决策时，为什么没有接受从华北抽调重兵的建议，这在《郭汝瑰日记》中找不到答案，而其结果，则是引起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激烈争论。29日的决策，自应是吸收了东北将领的意见和要求，才勉强取得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的意见一致。但一则，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关系矛盾重重，要想真正落实这一决策，并非易事；一则，这一决策已为时过晚，解放军的攻击部署已经充分展开，和解放军比较，大大落了后手，在行动上已不可能争得主动。所以，这一表面上相当完善的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就破绽百出。

作战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于9月30日亲自出马，飞往北平，与傅作义协商实施这一作战方案。傅作义虽然支持总部积极求战的计划，但对归绥、承德顾虑很重，认为“归绥方面未得决战之前，只能抽调六十二军、十六军”[(76)]。也就是不愿意放弃承德。这样，按照参谋作业，东进兵力显得不足。10月1日，蒋介石鉴于傅作义抽不出三个军的兵力，最后商定，先以独立九十五师、第六十二军海运葫芦岛，续调驻冀东的第九十二军及驻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去葫芦岛，并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统一指挥葫芦岛各军增援锦州。同日，

顾祝同偕卫立煌由沈阳到北平谒见蒋介石，报告东北作战计划，表示“东北已决定以十四个师向彰武取攻势，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始攻击后即突围”[77]。

10月2日，蒋介石电示范汉杰（范回忆系空投亲笔信），略谓“正督促沈阳方面，抽调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以求夹击匪军主力，一鼓歼灭之”，并指示机宜说：“估量本身战力，如能坚守，则固守待援；如自量不能持久，则可转移至葫芦岛，以取得海上连络线。”[78]但范汉杰愿意坚守待援，吸引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同日，蒋介石由北平亲自飞往沈阳与前敌将领研讨作战方案。据《郭汝瑰日记》：“十五时总统召集东北军长以上军官会议，廖耀湘等均认为不能向新立屯及其以西深入，而主张打通营口，求一海口，并都认为锦州如不能固守，则西进并无意义。总统令余说明由华北抽四个师先稳定锦、葫，然后再由华北及山东各抽一个军运葫芦岛，以适时配合沈阳兵团之西进。余并要求沈阳出击兵团能在彰武、新立屯附近实施小型歼灭战，苟能歼敌一个纵队则全局均好转无疑。于是所有军长、司令官等始转忧为喜。”晚餐后，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他面对着信心失堕、士气低落的部下，企图以哀兵之心，来激励士气，挽回败局：“沈阳不可再弄成长春局面，辽西会战如有失败，则与各位无见面期矣。”[79] 翌日，卫立煌、赵家骧（东北“剿总”参谋长）向蒋介石报告作战计划，5日集中完毕，6日开始行动，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可集中十二个师出击，其攻击目标为彰武。蒋介石根据罗泽闿的意见，认为非攻下新立屯即无作用，即命令非攻新立屯不可[80]。守备兵团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10月3日即飞回北平，5日前往天津，从塘沽乘重庆号军舰，于6日到达葫芦岛，部署作战，激励士气。他临时直接作出决定，葫芦岛军队由侯镜如指挥，在侯镜如带队未到以前，暂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在此之前，卫立煌决定在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以陈铁任主任，负责统一指挥援锦

部队，10月4日，指挥所在葫芦岛正式成立。但蒋介石到来后，把这个指挥所撇在一边，越过卫立煌，直接任命指挥官。7日，蒋介石回到北平。8日，傅作义表示希望蒋介石能注意太原方面作战，并希望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是日下午原有军事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但蒋表示有私事要到上海，撇下严峻的军务，于下午2时离开北平。事后得知，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要办捣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飞到上海后，即于9日同宋美龄一起把孔令侃接回南京。傅作义感慨系之，事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去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81)] 国民党系统将帅之间离心离德，已经无可挽回。

在国民党军决策期间，解放军对北宁路作战的战役目标和战役部署又作了新的调整。9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军委先后两次电告林彪，主张首先歼灭锦州到塘沽一线十九个师的国民党军，并占领这一线。毛泽东从战略全局上看到，无论是东北，还是华东徐州一线，甚至作战一贯积极主动的傅作义，都处于麻痹状态，没有积极的军事部署，对解放军歼击敌军十分有利。林彪一方面按照军委指示，部署三、四、七、八、九、十一纵队及二纵五师、热河三个独立师等部在北宁线作战，待"义县、高桥解决后，准备接着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但另一方面，他仍以"一、二、十纵准备集结于黑山、新民、彰武、法库地区打援"。而五、六两个纵队则部署在更北的开原、昌图和长春南地区，对付长、沈之敌[(82)]。将东北野战军部署成层层掩护南进的姿态，一旦卫立煌全力出援，或南下部队攻击不利，也可进退自如，尚未决心按毛泽东的要求，倾东北野战军的全力，悬军南下，争夺锦州这座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27日，军委指示林、罗、刘，以沈阳之敌处于麻痹状态为前提，主张先打锦州，然后完全肃清锦、塘线，直迫天津城下。28日，林彪也调整了部署，他考虑到先攻锦西，敌第五十四军战斗力比较强，又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

敌的队伍，于是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但这时，中共中央军委获得了卫立煌到南京商讨军事的情报，判断一定是决定接应长春突围和增援锦州。为了准备大规模的会战，军委于29日要求东北野战军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军委指出“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以争得主动权。为此，要求他们加强攻锦兵力。毛泽东对敌情的变化显然感到着急，批评东北野战军：“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廿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83)

华东野战军以八天时间，攻克了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济南，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攻坚作战的勇气。9月29日，林彪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调整了部署，作出了以五个纵队攻击锦州，以一个纵队对付锦西，以六个纵队打援的部署，这是针对现有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所作的攻锦部署。他充分明白锦州战役的战略意义，不免对这场恶仗存有疑虑。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已动员军队，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准备进行大恶战。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从上首到锦西敌人过多时，则使我军陷于被动地位。否则，就有充分把握攻占三点，与大量歼灭沈阳与突围之敌。”(84) 9月30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双城乘火车经昂昂溪南下，指挥锦州战役。10月1日，林彪完成了攻锦州的部署后，命令所部一举攻占义县。是日，炮兵纵队司令朱瑞在视察义县突破口时，中地雷牺牲。

10月2日，林彪乘列车进至郑家屯（即双辽）以西，获得了国民党军新五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情报，出现了29日估计的敌情变化的可能性，即所谓“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办”的问题。锦州、锦西间国民党军阵地间隙仅二三十公里，无险可守，敌

从锦西集结重兵增援，解放军阻援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国民党军的实际计划，比当时林彪所获情报还要多出两个军。林彪既担心阻援的困难，又担心攻坚的困难，即在敌援到达之前，能否迅速攻下锦州，因而一度犹豫不决。林、罗、刘于2日22时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仍攻锦州和回师攻长春两个方案，请军委同时考虑和指示。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经过11个小时的犹豫，于3日9时，未待军委复电，再电军委，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作出了新的部署："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85] 毛泽东接到林彪2日22时电，十分焦虑，于3日17时、19时连发两电，严词批评："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同时，批评东北野战军指挥所未能及时到达锦州前线，要求他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毛泽东得到林彪仍攻锦州的复电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除了指出东北野战军在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的错误外，欣慰地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86] 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对战役部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是一场力量和速度的较量。国民党军事实上计划以四个军增兵葫芦岛，甚至还有以四个军沿山海关东进的计划。如果国民党军能够按照参谋作业，协调一致，而锦州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东北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并非无隙可乘，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对攻锦战斗顾虑重重的原因。一场力量均衡的决战，胜负难以预料。但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决策上已经落后，部署又十分迟缓，更何况既定的增兵计划也未能完全实现，也就没有力量与解放军抗衡了。

锦州守军有第九十三军、新编第八军等八个师，一个师已在义县

被歼灭，均系云南的部队，战斗力比较弱，沈阳空运的第七十九师仅到两个团。第六兵团司令官为卢浚泉。范汉杰为黄埔系，但原属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瓦解。范在锦州指挥，没有基本部队。范汉杰和卢浚泉间上下级不同心，“向来也没有开诚布公地交换过意见”[87]。锦州四面环山，七个师的兵力，环城部署，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粮弹储备均感不足。在解放军对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之前，约10月6日至8日间，范汉杰一度召集军事会议，准备突围到锦西，与关内部队会合，但卫立煌来电话说：“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88]于是中止了撤退行动。

东北野战军在本年度内进行了长时间的攻坚训练，临战之际，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对战术问题又作了明确的指示，要求所部掌握四快一慢原则，吸取不良战例的教训。10月4日，组成了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分别由韩先楚、邓华指挥，前线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土工作业，尽量逼近敌军阵地。战斗组织十分完善，士气高涨。10月5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锦州前线，在锦州西北、离锦州仅十多公里处的牤牛屯设立前线指挥所，并在锦州北面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设置了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10月7日、8日，林彪率司令部成员会同前线纵队司令员两次亲临前线勘察，确定了主攻方向和突破地段，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9日开始向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

锦州战役进入了关键时刻，但廖耀湘率辽西兵团5个军12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计约十五万余人，迟至6日才下达集中命令，7日至巨流河设立前进指挥所。9日起开始攻击，以新三军攻击彰武，新一军指向新立屯。辽西兵团不敢由新民沿北宁线攻击黑山、新立屯、沟帮子直援锦州，而取巧攻击彰武，企图截断东北野战军后勤补给线，迫其回援，以解锦州之围。但解放军后勤补给早已作了充分准备，敌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对攻锦部队不构成威胁。

按前面所述，蒋介石本有攻占新立屯的命令，但很显然：既命令

同时攻击彰武，则攻击新立屯的命令并不坚决，前线将领顾虑自己安全，更不愿坚决执行。11日，辽西兵团未经激烈战斗占领彰武。12日，锦西战局恶化，蒋介石才命令卫立煌转令廖耀湘一意西进："此时我沈阳出击部队不可再作等待两锦部队东进会师之打算，应即乘此匪攻两锦疲困之机，不问两锦如何恶化，廖司令官所部应一意西进，勿再犹豫，万一锦州不保，亦须尽其全力，负责恢复，此为东北整个国军生死存亡之关头，亦为今日唯一之战略，接电应立即遵行，切勿延误，并盼立复。"[89] 这时，葫芦岛东进兵团在塔山受阻，锦州危急，卫立煌与罗泽闿等到新民前线视察。廖耀湘和卫立煌从自身安全出发，主张辽西兵团应控制于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万一锦州失守，则渡新开河西进的辽西兵团，就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廖更希望锦州万一失守，则把兵团主力拉回辽河东岸，经辽中撤往营口。但罗泽闿反对，认为这和蒋介石的意旨不合。10月14日，锦州危在旦夕，在沈阳督战的参军罗泽闿向蒋介石电告："廖耀湘部须在一星期后作进攻新立屯之准备。"并称："卫总司令及廖司令对增援锦州，均不欲冒险前进，现锦州已电讯中断，我南北兵团向锦州夹击计划，恐难实现，请速定尔后新方略。"蒋即电令卫立煌并转廖耀湘："此时我军向锦州挺进，切莫仍作增援锦州之观念，而应先下收复锦州之决心，但前进愈速，则危险愈少，尚可望解锦州之围，故最迟务于19日以前到达锦州，在此期间，无论锦州如何变化，而廖司令官之惟一任务，应一意挺进，限期收复锦州也。届时，烟台第八军及第九十二军必可集中锦葫，仍可夹击两锦附近之匪，予以歼灭，完成最大之使命也。"[90] 据廖耀湘回忆，蒋介石接到罗的报告，即严令廖耀湘亲率辽西兵团主力星夜渡新开河进占新立屯，再向锦州前进。廖耀湘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不得不于14日晨下达作战命令，他知道，兵团渡过新开河以后，行动就失去了自由，再没有向沈阳回顾的余地，只有经新立屯、阜新直向义县挺进。15日，新一军占领新立屯，到达黑山外围，廖耀湘当晚命令各部向阜新挺进，但为时已晚。16日拂晓前，廖得到了锦州失守的消息，十分惊惧，不得不命令各部停止攻击，等待命令，自己当即赶回沈阳，商讨对策

[91]。

在辽西兵团行动迟疑的同时，葫芦岛增援部队也未能适时集中。第六十二军10月9日才首先全部到达葫芦岛，这时，锦州外围战斗十分激烈，范汉杰屡屡呼援。阙汉骞主张9日开始行动，但六十二军刚到，喘息未定，需要稍事整顿，只好推迟到翌日进攻。10日拂晓，以第六十二军进攻大台山，以第五十四军的第八师攻击塔山，以暂编第六十二师攻击铁路桥头堡。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即仓促上阵，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严重，不得不于上午11时停止攻击。下午，代表蒋介石前来督战的罗奇随同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到达葫芦岛。11日，阙汉骞继续指挥两军攻击，再次受到挫败。同日下午，葫芦岛东进兵团指挥官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到达葫芦岛。原计划系全军增援，但傅作义迟迟未派兵接替九十二军防务，而蒋介石再三来电催促，侯只好先率一师赴援，而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也迟迟没有起程。侯镜如到达后，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但各军只图自保，侯镜如也并无积极作战的意愿，他的作战部署意图是："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92] 所以采取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以主力沿锦葫公路、铁路进出，并决定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12日休战一天，进行作战准备。

13日，葫芦岛东进兵团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以六十二军攻大台山，以第八师攻铁路桥头堡。独立第九十五师采取了波浪式冲击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用一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使用，掩护步兵连前进，向塔山攻击。血战经日，攻至解放军阵地障碍物边缘，即遭到解放军强大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进退两难。解放军阵地筑工坚固、隐蔽，政府军炮火无法破坏，攻击十分困难。14日，东进兵团继续攻击塔山，战斗更加猛烈。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报告，该师一个营攻入塔山阵地，要求使用预备队，侯镜如即令第二十一师准备出击。但旋得消息，解放军集中火力向第八师和独立

第九十五师反复猛烈反击，该师退回原阵地，侯即命预备队停止待命。血战两日，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过大，每团缩编成一个营，已无力再战。这时，第三十九军及原定的战车部队尚未到达，尽管锦州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但东进兵团仍决定15日休战一天。东进兵团兵力集中缓慢，号称四个军，除守备部队和预备队外，攻击部队不足二个军，海、空不能协同作战，逐次投入兵力，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下，在并不险要的塔山阵地前寸步难行。

东北野战军乘敌两路援军进展迟缓之间，积极攻击锦州，进展顺利，至13日，各部经过激烈战斗，夺取了锦州外围高地。14日11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南北两集团在炮火掩护和坦克支援下，迅速突破城垣，展开巷战。经过仅三十一小时的战斗，至15日18时，全歼守敌。范汉杰、卢浚泉被俘，锦州守军十万余人被歼灭。

二　长春之围

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攻击长春，占领大房身机场，截断长春空中通道。但林彪鉴于长春守军仍有顽强的战斗力，而解放军攻坚能力不足，对长春改取长围久困的方案。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东北野战军的意见，“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93)]。当时，由萧劲光任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司令员，以第十二纵队的第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第六纵队的第十八师，以及第六、七、八、九、十等几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为围城部队。野战军主力由东总直接指挥，集结于沈长路两侧准备打援。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在第一线阵地上构筑了较坚强的工事，在第二线阵地上也构筑了工事，对长春进行严密封锁。7月20日，林彪担心重蹈去年四平之战的覆辙，攻城未下，敌援已至，不得不撤出战斗，因而主张率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得到军委的同意。林彪即停止了攻城的计划，而准备以二三个纵队和九个独立师，歼灭长春突围之敌。8月，以围城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

9月3日，东北野战军准备南下作战，决定“以十二纵及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敌退则配合六纵及南面之五纵及在新民附近之主力全部歼灭长春退却之敌”[94]。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关于长春守军准备突围的情报，调整了围城部队的部署，以六纵两个师进至通江口附近（另一师南下锦州作战），令第十二纵队南进至开原，指示围城部队：“你们围长的各独立师在西面、北面留下足以控制飞机场的力量即够，其他部队应集结长春以南进行两条战术原则的演习。”[95] 10月3日，东北野战军为了集中全力攻击锦州，重新调整部署，以第十二纵队加入对沈阳援军的阻击，仅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10月8日，十二纵到达开原。围城第一线部队，加上后调来的第十一师仅六个独立师，这些部队多半系新成立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较弱。

长春守将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下辖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兵团部直辖部队约六万人，其余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新七军的新三十八师，原为驻印军新一军的老部队，最为精锐。第六十军是云南的部队，属于杂牌，但尚有一定的战斗力。郑洞国将长春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由第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由新七军负责，积极“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96]。但长春守军自被包围、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只好靠空投补给。

长春守军在解放军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之下，战斗力日渐衰落。粮食成为严重问题，后来燃料也成了问题。据计算，长春“每日约需军民粮三百三十吨，只能空投一百一十吨，冬季燃料更属毫无办法”[97]。空投补给，每天需要二十架次的飞机运输，开始每天有十一二架次飞机空投，以后长春困难加重，空投却减到每天三四架次，而且一逢阴天就停飞。由于空投不准，一些粮食误投到解放军阵地上，而另一些粮食则投到了接受空投的控制圈外，引起饥饿的军民的争抢，虽经严令禁止，但在求生欲望之下，再严的纪律都已无

法约束。为了争夺粮食，新七军和六十军之间也屡起摩擦。长春守军，在围城之中，毫无希望和前途，因此，国防部第三厅主张“于秋季高粱收后，由沈阳出击，以迎长春部队突围”[98]。但国防部的突围计划，遭到卫立煌的反对，结果，未能采取任何行动。不久，解放军即打响了北宁线战斗，第三厅的计划也已不能适应战场形势。

至九十月间，长春已届冬令，军民饥寒交迫。国民党“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当时，长春军民有70万人，市内存粮估计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从6月到9月粮价上涨了700倍，后来到了有价无市的地步。金子也不值钱了。加上饥军抢劫，人民甚至有粮也不敢举炊，根本无以为生。长春市内惨绝人寰。六七月间，在长春郊外的洪熙街（电影厂所在地），塞满了数万难民，处于国共两军的阵地之间，进不能，退不得，死亡枕藉。据郑洞国回忆，“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99]。第一批为贫民，第二批为无业者，第三批为公教人员之家属及被裁之公教人员。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9月11日也有命令给围城部队：“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100]但实际上执行过程中有很多难题。结果，“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101]。在市内，“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102]。“无辜人民饿病而死者达十二万人”[103]。

北宁线战斗发起后，郑洞国眼看着援军无望，决心突围，但李鸿、曾泽生两位军长对突围都无信心。在郑的坚持下，10月3日起，抽调新七军的第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的第一八二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先作试探性突围，计划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空军接应下全军突围。但长春守军饥饿过久，体力不支，运动很慢，无力突破解放军防线，伤亡很大，士气非常低落。至7日，曾泽生、李鸿两军长再也不愿战斗，要求把部队撤回，郑洞国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104)

10月10日，蒋介石手书致卫立煌，严令长春部队突围，同日，飞机向长春空投下蒋介石分别致郑洞国、李鸿、曾泽生的亲笔信，要他们突围。但将领们认为，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即使突出去了，官兵腿脚浮肿，七八百里地，不要说打仗，连走路都成问题，一致反对突围。15日，蒋介石又亲赴沈阳指挥，16日，向长春空投命令和亲笔信，严令突围："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105)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郑洞国不得不准备突围。

但这时，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决定起义。中共利用长期以来滇军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的严酷事实，在滇军中做了许多策反工作。面临长春守军毫无前途的命运，军长曾泽生和师长陇耀、白肇学于9月23日决定起义。10月14日，曾泽生、陇耀、白肇学三人写了联名信，派人和解放军接洽。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虽然存有系突围诡计的可能，仍决定接受第六十军起义，但要求六十军配合解放军消灭新七军。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东北局林、罗、刘，同意争取六十军起义，同时指出："惟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

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106]

16日夜，曾泽生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到各师部署起义，向新七军布防，并写信给郑洞国，劝他同襄义举，但遭到郑的拒绝。17日夜，第六十军毅然起义，向解放军交出防地。解放军进城，使新七军一片慌乱。是日晚，新七军将领背着郑洞国与解放军接洽投诚。18日，周恩来致信郑洞国，表示“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107]。至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但郑洞国和兵团特务团仍据守中央银行大楼。郑决心自杀，于20日晚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21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大楼，郑洞国企图自杀，为部下保护，面对现实，他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长春遂和平解放。

三　廖耀湘兵团的覆灭

在锦州战役期间，国民党将领对蒋介石的战役部署毫无信心，消极应付，各图自保。蒋介石作为统帅指挥作战的权威地位，早已为历次作战的失败所动摇，在历次战斗中，他无法协调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前线将领和前线将领之间的矛盾，步调凌乱，造成损兵折将。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不顾士气低落的严重事实，以死中求活的精神，进行战役部署，结果，更加激化了和前敌将领的矛盾，致使部队进退失据，步调更加凌乱。

10月15日上午，锦州已经情况不明。蒋介石召集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及第三厅厅长等研究葫芦岛及沈阳作战。据《郭汝瑰日记》：“余告以双方均应不迟疑的向锦州放胆攻击，总统意葫芦岛方面可改取守势，余力陈不可，何部长、刘次长均支持余之主张，结果决定三天内决不令葫芦岛方面停止攻击。”[108]但事实上当天锦州失守，这一方案前敌将领再也不可能实施。是日14时，蒋介石第二次飞沈阳亲自部署指挥，同时，他派了一架飞机到徐州，把正在部署徐州

军事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接到沈阳。这一步，又影响了以后徐州一带的军事行动。当时，蒋介石的意图，即使锦州失陷，东西两兵团援军仍应照原定计划继续前进收复锦州，否则东北主力部队将无法撤回关内。[109] 但卫立煌仍坚决反对辽西兵团继续西进。16日上午，蒋介石分别召见各将领，并令杜聿明到新立屯同廖耀湘一起视察后向他陈述作战意见。蒋介石随后飞离沈阳，在锦西机场停留，召集各将领训话，怒斥阙汉骞连一个塔山都攻不下，改任陈铁为葫芦岛指挥官，即飞往北平。这时，锦州失守情况已经明了，陈铁只是让部队在原地待命。

杜聿明奉命于16日乘火车到达新民廖耀湘的指挥所，即同廖一起到新立屯视察。廖认为蒋介石要与东北解放军求一决战的决心本来就行不通，现在更行不通，所以，不愿意继续向锦州进兵，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先救出辽西兵团主力。杜主张出敌不意，迅速出北票，绕过义县、锦州以西地区向葫芦岛撤退，葫芦岛主力北上接应会师。但廖认为长途侧敌行军太危险。另一方案是退回沈阳，但这是一个慢性自杀的方案，廖也不愿意。廖最后提出由新立屯兵团主力现在地区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向大洼、营口撤退的方案[110]。当日晚，杜和廖一起回到沈阳。17日，廖耀湘即向卫立煌报告他的作战意见。卫本主张退沈阳，最后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但卫不敢独断专行，必须取得蒋的同意。廖耀湘当日回到前线，即部署攻击黑山，等待命令立即实施。

辽西兵团孤悬在新开河以西，面临东北野战军回师攻击的危险局面，时间对他们十分不利，必须立即行动。但将帅间意见分歧，决策迟缓。18日，蒋介石得到长春曾泽生部起义的消息，十分焦虑，再飞沈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等商讨作战方略。蒋介石根据空军报告，解放军正向北票、阜新撤退，以为解放军不会守锦州，企图侥幸撤出沈阳主力，强要卫立煌将第五十二军、第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

锦州。卫与蒋分歧严重，一再受蒋的责备，不再多言。当日决策未定蒋即飞回北平。

20日，蒋介石召卫立煌、杜聿明到北平，商讨作战方案。卫、杜都主张辽西兵团向新民撤退，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则坚持要收复锦州。经杜聿明的再三陈说，蒋介石才改变了直取锦州的计划，口头指示卫、杜："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回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要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但蒋介石没有下达正式的作战命令[(111)]。同时，蒋介石的腹案是要放弃沈阳，但又不采取彻底放弃沈阳的步骤，还留有相当兵力保卫沈阳，尤其是无明令卫立煌放弃沈阳，卫立煌负有主管东北战场的任务，也就不愿负放弃东北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坚持集中兵力守沈阳。这里，不仅有战略思想上的分歧，还有军事政治责任上的分歧。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20日曾"以部长名义（即何应钦——引者）请求总统放弃沈阳，以东北部队扼守锦葫走廊，俾华北得以余力应付聂荣臻之攻击，或转取攻势"。23日，他从罗泽闿那里获悉蒋介石对东北作战的方案："1．令廖耀湘继续向打虎山、黑山攻击；2．以五十二军向营口攻击，俾取得一海口；3．锦西方面攻势防御以牵制敌军；4．如敌攻沈阳，则回师救援，目前沈阳以三个师守备。"对此，他在日记中评论说："余以为此种不彻底之办法最易误事，如认为共军已攻占锦州，夹击共军的机会已失，则沈阳转取守势亦无不可。如仍需攻击，则应下大决心放弃沈阳，以全力于辽西求一胜利。总统不此之图，而来毫无丈夫气之缩头战略，则一旦失败，必不可收拾。反不如在辽西硬拼，可以取得相当代价，虽全军覆殁，亦可赢得若干时间之喘息机会。"[(112)]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

当日，卫立煌、杜聿明回到沈阳，即召集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口头命令要旨："（一）要廖耀湘以全

力攻锦州，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二）廖兵团除现有兵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及骑兵重炮战车等）外，增加第六军第二〇七师沿北宁路向黑山、大虎山之敌攻击前进，并确保营口后方交通补给线。如黑山敌人被击退（蒋介石判断解放军要退的），即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助葫锦（西）部队收复锦州。如黑山、大虎山敌人顽强抵抗，并有增援模样，即向营口逐次抵抗撤退。（三）在廖兵团向黑山、锦州攻击的同时，第五十二军先占领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并与廖兵团联系。（四）第八兵团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及在沈的其他部队守沈阳（周的命令是次日补下的）。”[113] 各将领不敢再反对蒋介石的命令，只好分头执行。卫立煌看到廖兵团处境十分危险，即布置工兵在辽河上架几座桥，以便在危急关头仍接廖兵团回沈阳。

当廖耀湘兵团孤悬在新开河以西进退迟疑之际，东北野战军对作战方向迅速作了调整和部署。当时，东北野战军在攻击锦州时，士气、战术、技术、土工作业都大为提高，在总攻击发动前地面上看不到部队，从而得以避免被敌机、敌炮大量杀伤，进攻前注意地形侦察，进攻中注意疏散队形，又以绝对优势兵力协同作战，一举发起攻击，大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并使部队很快就能恢复战斗力。林彪报告说：“锦州战斗十五日解决，我伤亡约二万四千余，目前正在补充伤亡的干部，恢复组织，数日后可出动继续作战。”[114] 突破了大战后解放军总是要作长时间休整才能继续作战的惯例。军委致电前线将领说：“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115] 东北野战军处于主动求战的有利地位。

关于作战方向，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7日致电东野，主张休整15天左右后，先打锦西、葫芦岛，引诱沈阳敌军增援，待营口封冻，使沈阳敌军不能从营口撤退。而东野将领则主张先歼长春突围之敌，同时佯攻锦西，引诱沈阳敌军深入大虎山、沟帮子、锦州之线，予以歼灭。长春六十军起义后，东野将领估计沈阳敌军不敢再按原计划向

锦州前进，所以，一度觉得只有攻锦西、葫芦岛为好。但军委方面接到可靠情报，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而长春有望和平解决，因此，十分担心沈阳敌军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要求东野部署兵力，控制营口。廖耀湘于17日部署攻击黑山之后，林彪即考虑先歼灭廖耀湘兵团，并在军委决策之前，预先作了一些部署。19日21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军委，考虑到锦西敌兵力强大，地区狭隘，攻击不易，建议先歼击廖兵团："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征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116) 尽管军委有锦州各部至少再休整一星期的指示，但东野积极求战，已准备立即出动，抓住廖兵团。20日4时、7时，军委两次电示同意东野建议，并指示说："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同时授权前敌将领临机决断："关于具体部署，由你们根据情况相机处理。"(117) 军委提出的具体意见，仅供前线将领参考，灵活运用。

正当10月20日蒋介石在北平向卫立煌、杜聿明下达口头命令之时，林彪也向各纵队下达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命令，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进行部署。首先，在北镇、沟帮子一线的第十纵队及第一纵队第三师，原为诱敌深入，从黑山、打虎山后撤至此。林彪命令其当日黄昏出发，重返黑山、打虎山（即大虎山）南北地区隐蔽，如新立屯之敌前进，则退至黑山、打虎山一带阻敌南进；如敌向新民撤退，则立即插上，截断新立屯敌军退路。命令在阜新的第五纵队当日黄昏出发，秘密移至广裕泉西南接敌，如敌撤退，则迅速插至新立屯以北，截断新六军退路。以第六纵队在彰武东北待机包围彰武。命令锦州地区的主力，分两批出发：当日黄昏，第八纵、一纵、三纵及第六纵的第十七师秘密出发北进；21日黄昏，第二纵、七纵、九纵、炮纵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命令

辽南独二师向营口急进布防，阻击海陆敌军。命令第十二纵队及原包围长春的各独立师迅速南下，首先包围铁岭地区的第五十三军所部，拖住沈阳地区敌军。命令塔山地区的第四纵、十一纵及两个独立师继续阻击锦葫敌军东进。林彪指示各部，战局“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万一敌向营口撤退，则主力由沟帮子迅速东进过河至营口、牛庄间歼灭敌军。[118] 同日，东北野战军首长下达了政治动员的命令：“必须像锦州战斗一样，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119]

22日，林彪根据在辽阳的敌第五十二军等部到达巨流河的不确实情报，判断沈阳敌开始向锦州总撤退，命令辽南独二师回师北进至新民以西，参加在新立屯、黑山地区与敌军的决战。大战在即，23日，林彪进一步发出指令，激励士气，并谆谆指示部属以作战机宜，特别强调注重战术：“此次大战只要我各级干部严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打胜仗……我们所最担心就是怕部队不实行这个打法而将仗打坏。”[120] 24日，敌第五十二军先期占领营口，毛泽东十分着急，于25日晚严厉批评林彪是“一个不小的失着”，担心敌以全军东进营口，正面无重兵堵击，要求东野令长春各独立师兼程南下，收复营口[121]。但这时，东野各部已扭住敌军，大局在握了。

廖耀湘对林彪的部署一无所知，以为林彪重兵集结锦州，自己尚有足够的时间机动地向营口撤退。20日晚，他从沈阳接受杜聿明转达的蒋介石的命令之后，即命令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于21日拂晓开始攻击黑山。当时，他并不知道解放军第十纵队等部已重返黑山地区，还以为黑山兵力不大。但21日，第七十一军的攻击受到了顽强的阻击，毫无进展。廖耀湘不得不命令新一军准备接续进攻。22日，七十一军在重炮支援下，继续强攻黑山，但仍遭到了坚强的抵抗和反击。23日，新一军投入攻击，廖耀湘期在必得。

黑山、打虎山，山势连绵，南濒沼泽，中间为一狭窄的通道，占领黑山，进可攻锦州，退可掩护向营口撤退，而如果未能占领黑山、

打虎山，则解放军居高临下，对在狭窄走廊中行进的部队将构成严重威胁。但廖耀湘投入重兵之后，经过整日血战，阵地得而复失，解放军且有猛烈的反击，敌情异常严重。同时，廖耀湘得到了锦州地区解放军已到达北镇的情报，不敢继续恋战。23日晚，廖耀湘不得不下达向营口撤退的命令，以新六军、四十九军为先头部队，沿着黑山、打虎山以东的狭窄走廊撤退。为了掩护主力撤退，廖耀湘命令新一军等部继续攻击黑山，并攻击打虎山。24日，进攻黑山的部队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反击，走廊的安全受到威胁。廖耀湘率兵团部随新六军行动，撤至胡家窝棚后，命令新六军停止前进，增援黑山的战斗，并攻击打虎山，建立侧卫阵地。同时，更改部署，命令第四十九军并指挥紧跟在后的新三军第十四师为兵团先头部队，新三军主力到达后，待新一军及七十一军撤下攻击阵地后，随第四十九军之后跟进，实行逐次撤退。

25日拂晓，第四十九军前卫团在台安西北遭到自盘山北上的辽南独立第二师的伏击，而跟随其后的部队还不知道前面发生战斗。第四十九军随即遭到独二师及北进的第八纵队第二十三师的阻击，南逃的退路被截断。军长郑庭笈未能与廖耀湘联络上，对当面敌情也没有摸清楚，未能以全军之力杀开一条血路，即向卫立煌报告。卫立煌接到郑庭笈的报告，即令郑率四十九军两个师，新六军的新二十二师与新三军的第十四师退回沈阳。但郑因等待和廖耀湘联络，没有立即行动。同日晚，奉命南下阻击的解放军第六纵队插至北宁线的厉家窝棚、姚家窝棚一带，袭击新三军后尾师，第五纵队各部插入二道境子、郑家窝棚之线，截断了廖耀湘兵团退往新民、沈阳之路。

据廖耀湘回忆，当时，他对上述严重情况毫无所知，而仍决心向营口撤退，并于25日晚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停止攻击，部署后撤。26日拂晓，七十一军在胡家窝棚兵团指挥部西部高地接替新六军等部防地时，发生混乱，解放军第三纵队一部乘机插入胡家窝棚，消灭了廖耀湘兵团的指挥部。当时，廖耀湘本人正离开新六军军部视察战况，

新三军军部、新一军军部及新六军军部，正在行军状态下，被穿插进来的解放军先后打散。通讯联络和指挥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廖耀湘对部队的掌握陷入了困境，他只好到新三十师师部和各军重新建立联系，但各部队都在苦战之中。黄昏时刻，廖耀湘到达新二十二师师部，与郑庭笈取得了联系，当时，退营口已经不可能。由于地图上的沼泽地已经成为农田，向沈阳撤退的道路尚好，他在向沈阳撤退或就地抵抗之间犹豫不决。旋接卫立煌命令向沈阳撤退，即决心遵卫命令部署各军经老达房向沈阳后撤。但这时，解放军主力先后到达战场，在廖耀湘兵团各军之间，大胆穿插，分割包围，廖兵团各军一片混乱，已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激战至28日拂晓，陷入绝地的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十万人马迅速瓦解，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廖本人被俘。

在辽西激战之际，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于25日晚截断铁岭敌军退路。27日晚，林彪完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包围之后，即令第十二纵队主力向沈阳机场前进，并令辽南军区部队迅速架设浮桥，以便大军向鞍山、海城前进，截断沈阳残敌退路。10月31日，解放军第一、第二纵队到达沈阳西郊，第十二纵队位于沈阳之南，各独立师到达沈阳东郊、北郊，南北各路大军包围沈阳。另一部解放军第七、第八纵队和辽南独立第二师占领辽阳、鞍山、海城，第九纵队直逼营口。

杜聿明于10月21日到达葫芦岛，这时，第三十九军已从烟台运到。杜即部署锦西、葫芦岛部队再攻塔山，但各军士气低落。23日攻击开始，仍受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至26日，解放军主动撤出塔山阵地。27日晨，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北平，要他部署东北残部的撤退事宜，但仍要沈阳部队归周福成指挥死守。杜聿明先回锦西，命令部队退守原阵地，严防解放军反攻，随后到沈阳，命令周福成部署守备。30日，杜聿明再次奉命前往沈阳，但飞机已经无法降落，只好转回北平，向蒋介石请示撤退营口、葫芦岛部队。同时，王叔铭也向蒋介石请示对卫立煌的安排，蒋才指示令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于是，卫立煌得以乘最后一架飞机脱离沈阳，到达锦西。11月10日，蒋介石命令

将卫立煌撤职查办。

11月1日，解放军向沈阳发动总攻。沈阳守军，士无斗志，纷纷向解放军接洽投降，仅第二〇七师顽抗死守，遭到解放军的攻击，至2日，终于被解放军歼灭。同时，11月1日，解放军突入营口，2日，予以占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主力，眼看全局崩溃，在海军接应下，慌忙丢下辎重逃生，军部和第二十五师于1日登轮撤至葫芦岛，第二师所乘宣怀轮起火沉没，全军仅撤走万余人。[(122)] 11月2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前往徐州指挥。他即部署从海上撤退葫芦岛军队，以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归还华北建制，运秦皇岛；以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五十四军撤至上海、南京一线。自11月2日至10日全部撤离，共动用船舰四十四艘，撤出官兵13.78万人，其他人员三千余人[(123)]。

解放军随即于11月10日占领锦西、葫芦岛，12日占领承德。至此，东北和热河全境解放。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了空前的辉煌胜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连同其他部队共47.2万余人。国民党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而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了300万人，超过了国民党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终于建立了优势地位。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兵败如山倒，实力和士气，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解放军的连续攻击下，形成了连锁反应，迅即出现了雪崩式的总崩溃。

第三节　平津战役（上）

一　辽沈战役期间的华北战场

在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抽调第六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及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到葫芦岛增援。因华北兵力显得空虚，

未敢抽调第九十二军全军赴援。因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挺进绥远，迫使傅作义本部军队西援，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平张线的活动，威胁张家口，又使傅作义东西难以兼顾。10月5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又发起了太原外围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进迫太原。华北国民党军态势也逐渐恶化。但傅作义用兵灵活，仍能与华北解放军对抗。10月8日，傅作义向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表示，“希总统能注意太原方面之作战，并希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郭“拟劝总统开作战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以免以后又居被动”[(124)]。但蒋介石为孔令侃之事，离平返沪，使傅作义大为失望。

1948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指挥员的意见，以第三兵团西进绥远，以一部控制兴和、台基庙、集宁地区，以主力西进，相机攻取包头，企图吸引傅作义部暂四军、第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策应第二兵团作战。15日起，第三兵团西进作战，相继克复陶林、托克托河口、乌兰花、武川、萨县，23日克包头，一部继续西进，歼敌一个团，直达包头西的公庙。然后回师准备攻击归绥。傅作义对第三兵团的西进，未予置理。11月5日，第三兵团各部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拟11日向城关推进。9日，毛泽东考虑到打援没有把握，建议第三兵团东转至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休整。

在第三兵团准备西进的时候，第二兵团为策应第三兵团及东北作战，于10月9日起再次破袭平张路，主力则隐蔽集结，寻机歼敌。11日占领青龙桥、八达岭，并向居庸关发展。12日，位于康庄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东进，企图重占青龙桥，为解放军击溃。同日，位于宣化的第三十五军增援康庄。毛泽东于13日指示第二兵团：“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即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所率的第三兵团——引者）在绥远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125)] 14日，暂三军也由下花园东

进，遭到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的阻击，但此时，在康庄、南口的三十五军、十六军也集中五个师东西对进，向青龙桥一线进攻。第二兵团拟集结七个主力旅围歼康庄东进之敌，但第三纵队二个旅未能赶到，经两日血战，未能歼灭被包围的敌军，而西进之国民党军已占领青龙桥，第二兵团于15日晚不得不撤出战斗，主力转至路北休整。

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康庄两次战斗，未能达成歼灭敌军一部的目的，自己也有相当损伤。傅作义认为战斗获胜，向国防部报捷。19日，国防部第三厅建议："华北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126)] 于是，傅作义乘解放军主力远出、冀中解放区中共中央和华北机关腹地空虚，策划围魏救赵之计，集结重兵，企图偷袭石家庄，直接攻击位于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首脑机关。24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即第一〇一军）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即骑二师鄂友三部），配属汽车500辆，组成所谓"援晋兵团"，自涿县南下，26日进抵保定。第三十五军、十六军也南调平汉线作为后援。但傅作义的作战方针是："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127)]

中共中央很快就获得谍报，紧急动员就近的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和地方武装进行阻击，同时，于25日命令第二兵团星夜急行军南下回援。"援晋兵团"行动迟缓，至28日才从保定出发，前锋在方顺桥和解放军发生战斗，29日进抵望都。这时，解放军第二兵团先头第三纵队于30日赶到定县、唐县地区，沿唐河布防。"援晋兵团"进抵清风店，直趋唐河，他们看到解放军已经沿河布防，一面派出小股部队抢渡，一面就是否需要全军强渡在河边犹豫不决。3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揭露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军事密谋。是日晨，傅作义鉴于华北解放军主力已经南下，偷袭计划已经泄漏，不得不命令

所部撤退：“敌三、六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三十五军接应。”[128]“援晋兵团”即于是日午后退至方顺桥。此后，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即驻守在曲阳一带。

在“援晋兵团”南侵之际，解放军辽沈战役已胜利在握，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毛泽东为打击“援晋兵团”及集结在平汉线的敌军重兵，于10月29日致电林罗刘，请他们考虑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调到三河一线，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威胁北平。当日林彪即复电，可以将在锦西附近的第四纵、第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日内即开始向山海关、冀东方面前进，威胁敌人。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但仍要求他们把部队部署在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北平，并在那里休整。于是，程子华、黄志勇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首先入关至北平近郊作战。

蒋介石自10月15日从南京飞沈阳，16日到北平，一直在北平指挥东北作战。至30日，东北大势已去，他在北平也已无能为力，只好回南京去了。临行之际，要求傅作义“速筹巩固华北计划，并付以华北军事全权”[129]。葫芦岛决定撤退后，傅作义十分焦急，请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转告蒋介石，要求将葫芦岛所有部队尽留华北，否则他就不愿守平津，即以所部活动作战[130]。11月3日国防部作战会报，何应钦主张傅部南下袭击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旋又主张以傅部运青岛。4日，傅作义到达南京，与统帅部商讨华北军事[131]。5日晚，在何应钦家，白崇禧、顾祝同、傅作义和郭汝瑰等研究华北作战。郭“同意多留部队于华北，但希傅能各个击破绥远及太原共军，傅不肯为，且只要求五十四军留大沽”。郭“觉傅尚不够魄力，伊此时实应举全力以击破聂荣臻、徐向前”[132]。11月6日，蒋介石与顾祝同、何应钦商讨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傅作义固守华北，并增加其兵力。蒋又接见傅作义，指示华北必须固守，并授予处理全权[133]。

关于傅作义作战方向，大体说来有三种选择：一是傅作义率本部军队退守绥远，中央系军队任其南撤；二是固守平津塘；三是所有华北“剿总”部队放弃平津南撤。在这次会商中，傅作义究竟如何主张，说法不一。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叙述：“蒋介石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惯伎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绥远老巢。但这时，蒋、傅又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要到次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在东北我军入关之前，凭傅部实力尚能应付自保。而暂时守住平、津对于蒋、傅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我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时间；对傅作义而言，则可以争取到美国的直接军援，便于西撤绥远，自成局面。因此，蒋、傅最后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134) 《平津战役·综述》：“傅一到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便转达蒋介石要他率部南撤，并畀以‘东南军政长官’之意。会上，傅作义以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倚海作战’的主张，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蒋介石也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致遽受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野战部队南下，对南线作战也属有利。据此，会议确定了固守平津，置主力于津沽，以利尔后行动的方针。”(135)

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记述，“最高统帅”即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傅作义选择，第一案：放弃华北，将冀热察所有部队从塘沽海运青岛，配合徐州作战。第二案：固守津沽，将冀热察部队，主动速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依托海上为后方，采决战防御，万一不利，则由海上撤退。蒋“恐傅氏仍心怀故旧，向绥远撤退，负隅自固，因此特示意傅氏，为接受美援装备，须以海港为后方，且许以如采第一案，则改任傅氏为徐州‘剿匪总司令’；如采第二案，则除酌留一部于匪后游击牵制外，应断然放弃张垣、北平，主力

彻底集中津沽”。傅未采第一案，而对面允采行之第二案，亦加以变更，将保定第一〇一军北移涿县与北平间地区，第十三军由承德南移北平东郊通县附近，以第十一兵团守张垣，十七兵团守津沽，控制第三十一、第三十五、暂三、第一〇一、第十六等五个军于北平附近，保持机动[136]。

郭汝瑰回忆中则说：“傅作义终于同意放弃绥远、张家口，在形势危急时，甚至弃北平，只固守津、沽，保持一海口，以维持长期补给。对此华北战略决策，蒋介石回南京后也完全同意。开始，傅作义执拗地要交出部队，后又在两个美军枪械的诱惑下愿各个击破共军。因此我对傅变化莫测的态度深感疑惑，以为所谓‘各个击破’，不过是受两个美军军械的诱惑，改变态度，怕人取笑用以搪塞我的假话。但后来傅回北平，确募集了三个军的部队，等待用美械装备。以后新保安之战，他确实想各个击破，我才相信他所说是真。‘各个击破’确实是他那时的指导思想。”[137] 郭的这一说法与前引郭日记有别，但和台湾版战史近似。真情究竟如何，尚待更可靠的资料刊布。

不过，当时美国方面对傅作义的作战能力是比较重视的，希望加强对傅部的援助。1948年6月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时，和傅作义进行了长谈。司徒雷登对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傅部的战斗精神及傅作义的土地再分配方案，表示欣赏。6月3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他（指傅作义——引者）急需装备（包括弹药），他企图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以当地产品作交换，进行价值一千万美元的交易，但他只能通过天津的一些声誉不良的外国代理商来进行。我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助他，而不要把他赶到那些代理商那里。自然，那得先行征得蒋总统的批准。”[138] 据美国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J．Forrestal）1948年11月3日致代理国务卿的复函中说，驻在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海军司令白吉尔上将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陈明：“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同意把补给优先供应山东和华北。”陆军部已经被告知，“按目的地来说，各个港口船运物资

的百分比大约如下：天津——30%（船运经过青岛），青岛——10%，上海——60%”[139]。所以海口对傅作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之争是一个历史积累下来的无可救药的顽症，傅作义以其实力和才华，从蒋介石手中赢得了华北地区军队的指挥权，但派系的区别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央系军队听从他的指挥是有条件的，一旦形势变化，派系的分界就会明朗化。据谍报消息，傅作义是年6月间在一次讲话中就透露过：“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密约，一面听命于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140] 因此，他本有交还中央系军队，率本部三个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的考虑[141]，要他真正作出放弃绥远的决断毕竟是很困难的。结果，华北“剿总”所部从张家口到塘沽排了个一字长蛇阵，似是灵活机动，实则进退失据，处于麻痹状态。傅作义在严重恶化的军事态势面前，已经江郎才尽。

二　平津作战的决策

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平津地区敌军孤立无援，而淮海战役已经顺利展开之际，解放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从全局战略利益出发，对华北的局势十分关注，谋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已经可望的全国性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后休整一个月，然后至平津一线作战，并要求向全军公开提出打平津及在平津战役中歼灭傅作义主力的任务。而东北野战军各部大战之后，喘息未定，内部整理任务繁杂，纷纷要求延长休整时间。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华北作战方针一时未能确定。

11月7日，毛泽东指示林彪等东北、华北各野战军将领，分析了傅作义的三种可能选择，指出“固守平津，如敌取此项方针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要他们密切注意华北国民党军动向。[142] 11月9日，军委考虑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如攻击归绥傅作义根本之地，有促使傅作

义部提早西退的可能，而三兵团又没有打援的力量，同时，太原阵地坚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攻城兵力也不占优势，眼下伤亡严重，因此，指示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东撤至归绥、集宁间休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准备参加太原作战，争取在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13日，军委指示先期入关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华北作战“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143]。

这时，国民党军徐州形势危急，为防止傅作义放弃平津撤退，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5日向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包围敌军一部，迫使傅作义不能丢下部下不管而径自撤退，策略比较粗糙，军委没有采纳。但前线将领作战积极，士气旺盛，军委即于16日同林彪等商量：“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即先行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然后休整。林彪等考虑到部队困难较多，一时没有同意，但答应以两个纵队尽可能先出动，同时，仍主张关内部队先包围一部敌军的策略。东北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也建议东北伤亡小的部队先行入关，同时，也不赞成军委令华北二兵团西进打太原的方案，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傅作义。解放军将帅之间，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绞尽脑汁，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妥善的方案[144]。

傅作义于11月6日从南京回到北平之后，在军事上进一步作了收缩，11月9日，驻保定的第一〇一军除留一个师守备外，军部率新编第三十三师（即二七三师）退守涿县。11月12日，第十三军撤出承德，驻守通县附近。这样，他的部署为：北平地区：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第三十五、第一〇四（即暂编第三军）、第十六、第三十一、第十三、第一〇一（即新编第二军）等六个军，一个新编骑兵第四师，一个补给区司令部等；张家口地区：第十一兵团，第一〇五军（即暂编第四军），第五、第十一两个整编骑兵旅；津塘地区：第十

七兵团，第六十二、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等五个军，第三二六、第三三三、独立九十五等三个师，一个交警第三旅，一个交警第十总队[145]。傅作义指挥的部队有四十四个师，除归绥四个师外，中央系二十四个师，本部十六个步骑师，他以本部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西地区，以中央系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由于蒋介石付以军事全权，傅作义也极力分割部署中央系军队，以便指挥。他的作战计划，事先也不报告国防部，《郭汝瑰日记》说："华北作战，一直是由傅宜生全权主持，伊之作战指导，事前并不报告本部。"[146]蒋介石对中央系军队的指挥，常常干涉细部，引起部下的不满，也引起前敌将领对统帅部幕僚的不满，但他对属于其他派系统率一方的将领的作战指挥，倒是比较放任的。

鉴于东北野战军不久必然南下，平津地区在军事上毫无出路，傅作义不能不作撤退的部署。他既承允固守津沽，保持海口，适当时机撤出北平，为此，"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如修筑平津段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以准备转移平、张兵力和物资，派出先遣指挥所（副总司令宋肯堂）进驻塘沽，并预定必要时将'剿总'总部移驻天津，以及将平津张等地的一部分眷属先搬到了天津等等"[147]。11月13日开始，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军属和机关人员分批乘车向平津撤退。但傅作义顾虑军队南撤时，中央系军队有海运的便利条件，而本部军队并无自己能够控制的船只，海运比较困难，加上撤退眷属的负担，海上撤退并非易事。因此，他同时又通知张北、兴和、尚义地方政府秘密准备粮草供应大军，作西撤的准备。但西撤没有海口，不可能接受拟议中的美式装备，而且西撤与西北马家军关系复杂，回旋余地也小。而过早放弃北平，对他个人能战的声誉也不利。傅作义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犹豫不决，而且，他显然没有估计到东北野战军有迅速入关的可能，因此也不着急迅速作出决断。

傅作义面临着军事上的严重危机，深感单纯从军事上难以找到出路，就希望从政治上想想办法。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我

即向傅建议，我们的方向要及早决定，适时去做，不能等待。如等到张垣附近发生情况时，势必又要派些部队去，那时就不能自由行动了；如果平、津再发生情况，这些部队又要调回来，而且平、张间道路随处都可能遭到截击，将形成不好收拾的局面，那时可就晚了。傅作义对此也表示同意，只是对张垣放弃的问题不能作出决定。傅作义对于军事部署，如此拖延搁置，整天却在接见政界人士、名流学者，非常忙碌。当时，我认为傅作义对人民力量的伟大、对蒋介石王朝日趋崩溃的情形，比我认识的更深刻，必是在政治方面另求出路。其次，我觉得在军事上已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令实行了某些措施，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关于作战问题，傅既不问，我也不谈。”(148)

傅作义尽管由蒋介石授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处境是很复杂的。早在1947年7月初，美国驻北平领事弗里曼曾获得情报，有一个第三党运动，由冯玉祥指挥，第一方案，就是“对中央政府宣布独立”，准备由某一位拥有实力的将军首先宣布，作为“第一颗炸弹”，其他将军追随行动。情报说，“傅作义也许是采取这个步骤的第一个人”(149)。东北形势吃紧之际，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于9月间对傅作义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傅作义在谈到苏联的内外政策时，据齐赫文斯基（С．Д．Тихвинский）回忆，“对苏联的武装力量的历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原先沙皇的、然后是白军的军官和将军参加红军队伍的情况”。齐赫文斯基介绍了这些将军在红军中忠诚服务、建立战功的情况，“傅作义非常注意听着我的陈述，对我所说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150)。这是一种令人寻味的心理状态。11月初，傅作义到南京时，从李宗仁和司徒雷登那里，接受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计划，准备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观念，期待与全国一致达成和平。据《徐永昌日记》，他在1949年9月19日在包头与傅作义对谈时，傅痛苦地说：“去年十一月不去南京，决不会有此错失。因当时李德邻、司徒雷登皆言政府必须求和，和亦有把握。比〔彼〕时想，既然和有

把握，何必再北走或南走，此错失之所由来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界，正在试图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有一种以非黄埔系，即傅作义、白崇禧、张发奎、西北马家军的联合，取代蒋介石，与中共抗衡，达成和平的活动（关于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请参阅第七章）。傅作义当然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当时，傅作义在获得了蒋介石的授权之后，华北平、津、冀、晋、热、察、绥七省市参议会于11月2日在北平成立了联合办事处，表示：“际此东北逆转，华北紧张，应以民众代表身份，成立联合办事处，俾发动全华北民众力量支持傅氏。”[(151)] 3日，他们晋见傅作义表示：“今后，七省市民意可以反映给剿总，剿总希望民意机关协助者，亦可予以全力协助。”傅除表示“对华北有通盘计划，军事有把握”之外，对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联合办事处的成立“表示兴奋”[(152)]。11月7日，又有冀省国大代表联谊会成立华北自救委员会之类。这些组织成了傅作义可以运用的传达政治意向的工具。此外，傅作义还一再发表激烈的反共演说。11月12日，他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公开演说：“中国今日的戡乱战争，不是简单的普通内战，不是政权的争夺，更不应该是为保护豪门，保护特权，而是民主、自由、和平与极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153)] 他的演说获得了国民党舆论系统的一片喝彩。

然而，在幕后，傅作义也开始了和中共接洽和平的活动。这时，民革主席李济深在同彭泽湘谈话时，问彭能否再去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劝傅脱离反动政府，反对内战，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合作”。据彭泽湘回忆：“我当时答应了，但同时提出做这个工作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和取得联系，李济深的回答是，他设法告诉中共在港的同志，替达中共中央。我带着李济深给傅作义的信到北京后，找到侯少白。侯少白是傅作义的老朋友，反对内战，曾力劝傅不就华北剿总职务。所以他对这一工作，很热心奔走。侯同傅谈了以后，告诉我：傅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同我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委托

侯少白作他和我的联络人，双方意见由侯传达。经过几次间接交换意见后，傅作义就表示愿意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这时我就约民盟在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和我共同进行。同时我找到符定一，由符定一帮助我和中共取得联系。”[154] 符即赴石家庄与中共面谈。同时，傅作义让他的政工处处长王克俊与傅的朋友刘厚同商议，与中共联系。王与傅商谈的结果，据王回忆：“先设法通过中共地下党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联系。我拟就电文便交给了傅先生。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并报告了傅在北平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电文郑重表示：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作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后来知道此电由傅先生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大概在十一月十七日发出了，但未获回音。”[155] 此电未见公布。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传阅傅作义1948年12月23日致毛泽东电抄件时，在电文上加注说“傅作义前曾来电赞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之主张”[156]，或许就是这一电。

内战已经进行两年半了，解放军已经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以美国为背景、企图保留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已经不会接受。但傅作义在这时提出和谈要求，表明了傅作义已经发生动摇，于是，毛泽东迅速作出决策，利用傅作义的和谈心理，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首先解决中央系军队。1月18日，确定了一系列军事措施，抑留华北“剿总”系统部队在平津地区予以歼灭或迫降，一是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击傅军向绥远逃跑，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避免刺激傅作义早日向绥远逃跑；一是命令正向太原前线开进的华北第二兵团在阜平待命，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击，协同华北第三兵团阻止敌人逃跑；一是命令东北野战军：“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廿一日或廿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

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157]

翌日，林彪接电后遵令动员部队于22日出动（后因具体困难，经军委同意改为23日出发），同时建议，由东北第二兵团于24日包围唐山、滦县，拖住敌人，等候主力到达。但军委考虑到“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人为强”，担心过早包围唐山会迫使傅作义集中全力接出唐山守军后由海路南撤，因此要东北野战军推迟包围唐山的行动，并要求东北野战军先以五个纵队秘密入关，不走山海关而走热河进喜峰口、冷口，与东北第二兵团协同同时隔断北平、天津间，唐山、天津间，天津、塘沽间的联系[158]。从22日起，军委在林彪等建议包围一部敌军的基础上，调整策略，先后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于25日从现地出发，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26日从曲阳出动，进抵涿县、涞水间待命，必要时加入平张线作战。27日又命令东北第二兵团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军委对西线的整个作战意图是：“如果杨成武包围了张、宣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时，则程、黄从蓟县，杨、罗、耿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协同杨成武歼灭该敌。”军委谆谆嘱咐上述三兵团：“你们任务是务必包围几部敌人，以便调动东面敌人西援，故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你们包围几部敌人之后，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至要。”并令程子华、黄志勇统一指挥平张战役[159]。至此，毛泽东经过周密的考虑，终于作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的决策，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　平津之围与接洽和谈

11月29日，杨成武率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发起进攻。张家口守将、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现杨成武兵团从绥远回师攻击，深感局势严重，要求傅作义派兵增援。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率三个纵队，战力有限，攻击保定的华北第七纵队这时减弱了攻击，使守敌第

一〇一军的第二七二师得以于11月22日安全撤退。对于华北“剿总”来说，平津周围一时并无严重敌情。傅作义当时对张家口的撤退事宜尚未落实，张家口既出现敌情，于是即调主力第三十五军率二个师、怀来一〇四军一个师分乘汽车和火车增援张家口，于30日下午全部到达，同时，调在昌平的一〇四军主力到怀来，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一线，以确保平张路畅通。是日，杨成武部攻占万全、柴沟堡、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合围。

12月1日起，在张家口一线，国民党军对解放军进行猛烈反击，解放军在强敌压迫下被迫后撤，张家口的局势趋于缓和。据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田士吉回忆：“三日，天气晴和，张家口附近无情况。”[160]这几天的战况资料互有矛盾，但三十五军到达后，张家口各军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恐系事实。11月4日，傅作义飞抵张家口作军事部署，当时无重大战斗，主要是商讨从张家口撤退事宜。据孙兰峰回忆，傅作义说：“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我们要在此实行‘荣誉交代’。在张家口撤退时，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他财产要造具清册，留人向中共交代。但目前要秘密进行，以免搅乱军心。”[161] 于是，傅作义只是关照说，“张家口是否撤退，何时撤退，等我到北平研究之后，再行电告”[162]，而未作出撤退部署。对于第三十五军的使用方向则表示：“林彪进关尚需时日，这方面仅聂荣臻的部队。留下第一〇五军及原有部队，就能够应付裕如，第三十五军可于明日（五日）返平。”[163] 显然，傅作义对解放军的作战部署还毫无警觉。但等他回到北平后，12月5日，解放军东北先遣兵团在前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两个团大部，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同时，他又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内外，平津形势趋紧，当晚即命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但没有告诉他们密云出现的敌情。

当时，第三十五军十分麻痹，撤出张家口时，行动十分迟缓，直到6日午后，才上车起程。一路上经过沙岭子、宣化，畅通无阻，直

到下花园附近才遭到阻击，道路已被破坏，通过后已到黄昏时刻，军长郭景云即命在鸡鸣驿宿营。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当时由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三令五申要华北第三兵团以一个纵队切断张宣联系，必要时加强阻击兵力，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12月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即程黄第二兵团）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要求各部坚决抓住并包围歼灭由张家口出逃的敌军。但华北第三兵团在敌军压迫下违令撤出了阻击阵地，而华北第二兵团至6日各主力纵队尚在向涿鹿、下花园前进途中。12月7日，毛泽东对华北第三兵团违令放掉第三十五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严令第三兵团继续包围张家口敌军，不使逃跑，如果逃跑则坚决歼灭，不得违误；同时对华北第二兵团违误军委到达前线的时限提出批评，严令阻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164)

这时，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尚未渡过大洋河，杨得志一面命令部队强行军前进，一面命令在新保安附近牵制敌人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第三十五军。郭景云没有料到敌情十分严重，7日夜攻入新保安后，仍命令部队休息，拂晓攻击，以为可以冲过小部队的拦截。8日晨，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到达新保安镇外，将新保安团团围住，9日，击退了敌怀来出援的第一〇四军及新保安出击的第三十五军的两面夹击，至10日，华北第二兵团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同时，东北先遣兵团也于9日到达了康庄、怀来地区。在此之前，华北第三兵团歼灭了从宣化向张家口撤退的一个师，紧紧把张家口围住。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主力军，拥有的400辆汽车是傅作义灵活机动作战的命根子，为其所必救。毛泽东把三十五军包围住，也就使傅作义失去了资本，不可能再决心从北平经津塘南撤。果然，傅作义于9日命令张家口的第一〇五军、怀来的第一〇四军东西对进，增援新保安。虽然，一〇四军攻至马圈与三十五军可以遥遥相望，但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不敢力战，无法会师。9日晚，东北先遣兵团对康庄第十六军发起攻击，至10日歼灭其主力，占领康庄。第一〇四

军后路受到威胁，被迫撤退，至11日，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被歼灭大部。由于北平空虚，傅作义不得不将第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六十二军等部调入北平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傅作义的指挥空前凌乱，他已无力控制战局了。

在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包围傅作义部主力的时候，东北野战军正日夜兼程向平津挺进。12月7日，林彪遵照军委命令先期率指挥机关到达蓟县以南的孟家楼，由于大军入关已无秘密可言，命令最后尾三个军（解放军统一番号，纵队已改称军），经山海关入关。12月11日，毛泽东就平津作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包围、隔断华北“剿总”系统的所有部队，并命令解放军华北部队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基本方针是：“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165) 对于傅作义的和谈，则着眼于在军事上牵制住他，而不是在政治上和他讨价还价：“傅作义代表正在由涿州来平山途中，我们仍本前告策略和他谈判，要他抓住中央系各军不放，便于我先解决中央系。”(166)

在解放军部署的同时，傅作义鉴于形势严重，也赶紧收缩兵力，先期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唐山、芦台、汉沽诸点，实行分区防守，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城防司令官，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区司令官。为加强津塘力量，从唐山一线撤下的第八十六、八十七军调到塘沽、天津，将调到丰台的第六十二军主力调回天津。平津局势危急，蒋介石命徐永昌到北平传达自己的意图，说服傅作义南下。13日下午1时，徐飞抵南苑机场，但通往城内的道路已十分危险，无法与傅作义见面，只好通电话。蒋介石要徐转达的意见是：“一、北平二百万人口，设被围，决难持久，所以，只可留

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出战皆易。二、切嘱宜生勿太焦急，革命不是定要在某一地，勿以社会感情、当前毁誉与患得患失之心而左右应当决定的大计。三、准备失败不败。”等等。傅作义向徐永昌陈述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徐永昌未能说服傅作义向天津转移，当日即自南苑机场飞回南京[167]。

与此同时，傅作义继续和中共接洽和谈。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平明日报》社采编主任李炳泉通过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和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天津《大公报》社记者傅冬菊自12月8日开始“劝说傅作义投降”，到10日傅作义提出条件如下：“（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168] 在争取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中，傅冬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月犁回忆说：“我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与傅作义谈判工作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地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169] 据当时任苏联驻天津的副领事季托夫（A．Тцтов） 回忆，北平解放后，傅东（即傅冬菊）告诉他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父亲放弃自杀念头，并劝说他与中共方面开始和平谈判。北平地下党和她建立了联系，指挥她动作。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她告诉父亲，自己是中共不公开的党员并与北平地下党有联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就停止军事行动开始和平谈判。此前，据傅东说，她父亲的态度有点儿冷淡，长时间的沉默，看得出，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共产党不会饶他，最

好的下场是审判后将他关进监牢，这种后果他不能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他问傅东，怎么才能保证与他保持联络的现地下党人不是国民党特工机关的间谍呢，同时，他指出，在共产党员中也有这种间谍。傅东说，看来他担心，蒋介石的特工机构是否在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他的可靠程度。由于和傅东保持联系的几位地下党员，早先她都不认识，因之，傅作义坚持认为，傅东办事不牢靠。在这种情况下，她告诉父亲，自1948年秋便秘密地与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保持联系，并告诉了他与副领事几次谈话的内容。傅东说，直至这时，她的父亲才有些放心，而后又思考了一阵子才同意与中共和平谈判。”[170] 当然，从前面所述，傅作义和中共的联系，并非只有一个渠道。

就在接洽过程中，东北野战军迅速进迫平津。12月14日，西路解放军各部分别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州、黄村、采育镇，切断平津联系，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机场。傅作义曾极力企图重占丰台、南苑军事要地，但均被解放军击退。至20日，东路解放军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堵绝了傅作义系统的海上退路。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完全失去了和谈的资本，在军事上已毫无办法，在和谈上也没有眉目，“心里着急，神经错乱，每日啃扫帚”[171]，对自己军事失策十分懊悔，痛苦达于极点。《郭汝瑰日记》说：“郑（长海）告余，此次华北失败，主要在傅宜生不肯早放弃张家口。及共军攻三十五军又违背作战方针，派兵西进，逐次增加，以后凡有人论及此点，傅宜生辄自打嘴巴，以致人不忍再提此事云。”[172] 14日晚，他作出让步：“（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173] 同时，不得已主动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出城，准备前往石家庄，希望见到毛泽东，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塘全线和平解决。但崔李两人遭到解放军的拦截，被送到东北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翌日20时，纵队指挥员向林罗谭发电报告了此事，16日8时，林罗刘向军委转报了十一纵来电，同时令将崔李两人送到平津

前线司令部附近，由参谋处长苏静接待，开始接触。[174] 但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傅作义要求减轻军事压力的让步不能信任，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猝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军委指示林罗刘：“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这里不是指起义——引者），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175] 19日，刘亚楼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崔载之、李炳泉进行了初步谈判，双方所提条件差距极大。

在接触和谈期间，解放军加紧了军事部署，华北第三兵团为应付张家口守敌突围，要求增加兵力，16日，林彪等同意将在南口的东北第四纵队，全部开赴张家口，归杨、李指挥。20日，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天津守敌的退路之后，军委即命令华北第二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攻击。21日，华北第二兵团即扫清外围据点，22日晨7时发起总攻，至17时即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张家口守敌看到自己已经孤立，即行突围，受到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部队突出大境门后陷入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遭到解放军的围歼，全军覆没，仅少数骑兵突出重围，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走小路逃脱。

这时，崔载之通过电台向傅作义作了初步谈判经过的报告，23日，在军事溃败之际，傅作义又向毛泽东发出了求和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

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176]。

傅作义在这封电报中，并未改变政治立场，仍以为人民自居的姿态，对毛泽东施加政治压力，在军事上要求解放军后撤，这都是同中共中央军委迫傅作义放下武器的基本方针相冲突，因此，不能为解放军所接受。崔载之为此十分着急，连电傅作义，劝傅不要发通电，否则谈不成。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署名给崔复电说“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仍求在政治上留有回旋余地，并令崔速回城汇报[177]。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发言的方式，宣布了43名战犯名单，把傅作义包括在其中，以剥夺其政治上的发言权。当时，傅作义对和谈的性质很敏感，他对他的参谋长说：“（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鉴于双方差距太大，傅作义便嘱咐参谋长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178]北平和谈一时没有进展。

---

(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3日条。

(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0日条。

(3)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

第268页。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13日条。

(5)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页。

(6)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0页。

(7)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2-155页。

(8)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1页。

(9)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2—155页。

(10)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3页。

(11) 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7页。

(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9日条。

(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9日条。

(14)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9日，摘抄打印本。

(15)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6日，摘抄打印本。

(16)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7)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20日，摘抄打印本。

(18)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9)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济南会战〉》，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241页；又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第4册。

(20) 《敌战略部署摘记》，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印件。

(21) 《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83-489页。

(2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8月7日条。

(23) 《国防部三十七年下半年度计划纲要》，转引自王道平等：《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3页。

(24)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4页。

(25) 《郭汝瑰回忆录》，第295-297页。

(26) 《许谭兵团宜攻击济南分散敌人》（1948年7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14页。

(27)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报军委电》，《粟裕军事文集》，第371页。

(28) 《徐向前晋中战役总结报告》（1948年8月9日）。

(29) 《粟陈唐张钟给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并告山东兵团、苏北兵团的电报》（1948年8月10日），《济南战役》，第55-59页。

(30) 转引自《刘邓各纵似以待机歼敌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82页。

(31) 《对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67页。

(32)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页。

(33) 《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2月7日），《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4) 《林彪关于决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致毛泽东电》（1948年2月10日），《辽沈战役》，第51页。

(35)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敌我形势和攻打长春的意见致毛泽东等电》（1948年4月18日），《辽沈战役》，第52-53页。

(36) 《毛泽东关于同意先打长春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等电》（1948年4月22日），《辽沈战役》，第55页。

(37)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进攻或围困长春方案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6月5日），《辽沈战役》，第66页。

(38)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39) 《中央军委关于先取锦州唐山再打承德张家口致林彪、罗荣桓、刘

亚楼电》（1948年7月30日），《辽沈战役》，第80页。

(40) 《中央军委关于对部队南下无期等问题的批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8月12日），《辽沈战役》，第89页。

(41) 参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5-11页；《郭汝瑰回忆录》，第298页。

(42)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

(43) 《关于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问题》（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73页。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48页注（9），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北京）1981年版。

(45) 《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预备命令》，《济南战役》，第80-84页。

(46) 转引自《粟裕给许谭并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9月10日），《济南战役》，第91页。

(4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注（3）。

(48)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

(49) 《攻济打援以按原计划进行为宜》（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9页。

(50) 《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2页。

(51)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5日。

(52)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6-17日。

(53) 蒋方宇：《吴化文起义始末》，《济南战役》，第522页。

(54) 聂凤智：《回忆解放济南战役》，《济南战役》，第486页。

(55) 蒋方宇：《吴化文起义始末》，《济南战役》，第522页。

(56) 《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20-21页。

(57)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69页。

(58)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5日。

(59)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0日。

(60)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1日。按：根据中共情报："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指定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有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中央军委9月3日电，《辽沈战役》，第96页）——笔者。

(61)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2日。

(6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预定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3日），《辽沈战役》，第97页。

(63) 《中央军委关于秋季作战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5日），《辽沈战役》，第100页。

(64)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锦榆唐及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第103-104页。

(6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对北宁线敌情估计及我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10日），《辽沈战役》，第110-112页。按：此电一开头即说"我们完全同意军委鱼十三时电的指示"，我们未见军委有鱼十三时电，而林彪等有致军委的鱼十三时电，军委申虞电即系对林彪等鱼十三时电的答复。据此，上述林彪等电中开头一句似应为："我们完全同意军委对鱼十三时电的指示。"——笔者。

(66)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5日。

(67)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5日。

(68)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6日。

(69) 郑庭笈：《辽西兵团的覆灭》，《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22页。

(70)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9-160页。

(71)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页。

(72)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1页。

(73)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5-30日。

(74)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锦榆唐及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第104页。

(75)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0页。

(76)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30日。

(7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日。按：据多种回忆，顾祝同系1948年9月29日回到南京，向蒋报告。但据《郭汝瑰日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顾与卫系于10月1日同赴北平，回忆有误。——笔者。

(7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65页，并参范汉杰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

(7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日。

(8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3日。

(81)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7-18页。

(8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锦州地区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6日），《辽沈战役》，第127页。

(83) 《中央军委关于作战重心应放在攻占锦州、义县、锦西三点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2-133页。

(8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攻锦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7页。

(8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仍攻锦州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辽沈战役》，第147页。

(86) 《中央军委同意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的部署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0月4日），参《辽沈战役》，第149-153页。

(87) 卢浚泉：《锦州国民党军被歼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85页。

(88) 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

(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2日条。

(9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4日条。

(91)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7-170页。按：据廖耀湘回忆，前引蒋介石14日命令系在14日以前所发，他接获命

令后于14日晨命令部队渡新开河，15日占领新立屯。如蒋的命令系14日发，廖部15日就不可能占领新立屯。据毛人凤1949年1月5日呈蒋介石的情报：廖耀湘“十日克彰武，十四日拂晓克新立屯，并进逼芳山镇”（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本，《戡乱军事概况——东北方面》下一第16册，第600页）。又，林彪曾报告，国民党军17日占领新立屯（《辽沈战役》，第212页）。另据东北解放军《阵中日记》：“（10月17日）沈阳西进之敌，于今（十七日）十六时进至新立屯。”“（10月18日）昨占新立屯之敌，新一军、新三军今续向阜新前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038-1042页）。杜聿明、廖耀湘回忆16日到新立屯视察，17日又似太晚。待考。——笔者。

(92) 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7页。

(93)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打长春第三方案及攻城、阻歼援敌作战方法等问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6月7日），《辽沈战役》，第69页。

(9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预定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3日），《辽沈战役》，第97-99页。

(9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防长春敌突围部署致第一兵团等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5页。

(96) 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0页。

(97)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1日。

(98)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1日。

(99)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100)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周桓关于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致萧劲光、肖华等电》（1948年9月11日），《辽沈战役》，第113页。

(101)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102) 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1页。

(103) 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2页。

(104) 《我的戎马生涯》，第506-508页。

(105) 《我的戎马生涯》，第510页。

(106) 《中共中央同意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的方针致东北局等电》（1948年10月16日），《辽沈战役》，第193页。

(107) 《周恩来致郑洞国信》（1948年10月18日），《辽沈战役》，第205页。按：郑洞国回忆中未提是否收到周恩来的信。——笔者。

(10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5日。

(1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5日条。

(110) 据廖耀湘回忆，杜聿明“要求我退到营口地区之后，再经盘山、沟帮子向北打，与他指挥的东进兵团在大凌河会师。我认为这一案可以实行”。按：这时杜似尚未得到蒋介石的授权指挥东进兵团，时间回忆有误差。参《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廖与杜的回忆文章。——笔者。

(111) 参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9-31页。

(11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3日。

(113) 参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1页。

(11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沈敌动向及我军对策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2页。

(115) 《中央军委关于急速截断沈敌向营口退路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7页。

(116)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打沈阳西犯之敌的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6页。

(117) 《中央军委关于全歼廖耀湘兵团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及《中央军委关于以九个纵队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9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19-221页。

(118)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围歼廖耀湘兵团部署致各纵队等电》（1948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23-225页。

(119)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1948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30页。

(120)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乘敌撤退与敌决战致各纵队等电》（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第234-235页。

(121) 《中央军委关于再调部队南下阻敌向营口退却致林彪、罗荣桓、

刘亚楼等电》（1948年10月25日），《辽沈战役》，第240页。

(122) 日期据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2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为10月31日晨1时第五十二军各部开始登轮（第4册，第118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为11月2日到达葫芦岛（1948年11月4日条）。——笔者。

(1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9日条。

(124)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8日。

(125) 《望杨罗耿部歼敌十六军一部》（1948年10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4页。

(12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9日。

(127) 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128) 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1页。

(12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30日条。

(13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3日；《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

(131) 日期据《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5日第2版报道。

(13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5日。

(13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6日条。

(1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第286页。

(135)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13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174-175页。

(137) 《郭汝瑰回忆录》，第344页。

(138) *FRUS*，1948，Vol．7，p．329．

(139) *FRUS*，1948，Vol．8，pp．189-190．

(140) 《北线敌情摘记》（1948年5月至10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1) 《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

(142) 《中央军委关于对蒋介石、傅作义动向的分析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1月7日），《平津战役》，第52页。

(143) 《中央军委对尤重在抑留傅作义于平张津保地区致程子华、黄志勇等电》（1948年11月13日），《平津战役》，第57页。

(144) 参1948年11月15日至17日中央军委和前线将领间往来各电，《平津战役》，第60-69页。

(145) 侯镜如等：《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5页。

(14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4日。

(147) 侯镜如等：《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页。

(148) 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经历与见闻》，《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67-268页。

(149) *FRUS*，Vol．7，p．220．

(150) С．Тихвинский：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т．4，1989，ctp．108-109．

(15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3日。

(152)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4日。

(153)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13日。

(154)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5）》，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55)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81页。

(156) 参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注。

(157) 参《中央军委关于防止敌人从平津张唐逃走的部署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电》、《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立即入关包围唐塘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1月18日），《平津战役》，第70-71页。

(158) 《中央军委就推迟包围唐山和隐蔽入关问题致林彪、罗荣桓、刘

亚楼等电》（1948年1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东北主力入关时间和路线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1月21日），《平津战役》，第75-77页。

(159) 参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致前线将领各电，《平津战役》，第81-89页。

(160) 田士吉：《新保安战役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1页。

(161) 孙兰峰：《张家口战役概述》，《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08-109页。

(162) 靳书科：《国民党军张家口被歼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37页。

(163) 靳书科：《国民党军张家口被歼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1页。第三十五军撤出张家口时间，据《毛泽东军事文集》为12月6日13时（第5卷，第337页）。——笔者。

(164) 《华北部队应遵军委命令阻敌东逃》（1948年12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37-338页。

(165)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62页。

(166) 《关于平津地区的形势及部署》（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59页。

(167) 《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168) 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平津战役》，第177页。

(169)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页。

(170) 季托夫：《回忆1948年我在天津认识的一位中国朋友》（米镇波译），《党史资料与研究》（天津）1996年第1期，第53页。

(171) 《平津战役》，第177页。

(172) 《郭汝瑰日记》1949年1月26日。

(173) 《平津战役》，第177页。

(174) 《平津战役》，第177页；又参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25页。

(175) 《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原则和策略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1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49-50页。

(176) 《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1948年12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1页。

(177) 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27页。

(178) 李世杰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70页。

第五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

第一节　淮海—徐蚌战役

一　国共攻防计划

济南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所谓优势地位已经丧失，军事危机空前严重，士气低落。国民党军以一定兵力坚守战略要点，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置于外线，待解放军攻击战略要点受挫时，即以机动兵团和守备兵团内外协同，予以夹击，这一战略战术，由于济南守备兵团不能持久抵抗，证明已经无效。但徐州一线尚有国民党军的精锐兵团，在豫东战役后经过整补充实，济南战役时，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因而保存着完整的战斗力。而且，在南线，解放军华野和中野共23个主力纵队，总兵力约60万人，国民党军有主力24个军，总兵力约70万人，从兵力上尚有一定优势[(1)]。深得蒋介石信任、担负实际作战指挥重任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因此尚存力挽狂澜、一战扭转战局的幻想。

杜聿明认为“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他企图集中徐州国民党军主力，乘华野和中野东西分离作战、尚未集中协同之际，突击歼灭华野的一部分，以振奋国民党军的士气，改善战略态势。为此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以华中的黄维兵团牵制中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中野作真面目的战斗，以徐州前进指挥部集中四个兵团进行突击，企图歼灭华野一部，一举收复泰安、济南。10月3日，杜聿明到北平将这一计划报

经蒋介石批准，准备实施，并经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华中“剿总”白崇禧商量，白同意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华中“剿总”部队牵制解放军中野部队[2]。10月11日，驻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开始东运柳河集结，白崇禧则命令黄维、张淦两兵团由确山、遂平一线向唐河、赊旗镇一线前进，扫荡豫西。但这时，东北形势紧张，蒋介石与卫立煌又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蒋颇为顾此失彼，竟于15日电令杜聿明对上述计划不要执行，随他去东北指挥作战。

徐州“剿总”刘峙，是国民党中一员资格老而能力薄弱的上将，以资格而出任方面，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他并不放心。杜聿明则是蒋介石信任的一员战将，以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的名义，担当着实际指挥徐州军事的重任。但蒋介石在东北危急之际，急于用人，杜聿明原本就指挥东北军事，蒋也就顾不得暂时缓和的徐州军事，把杜调走，致使徐州军事顿失重心。蒋介石本人的精力也为东北军事危机所牵制，一时无力顾问徐州军事，杜聿明一走，更使徐州的军事指导思想模糊不清，军事部署再次陷入举棋不定的麻痹状态。

在解放军方面，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在望的时候，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攻济战局发展十分顺利，粟裕估计国民党军北援部队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北援，华野打援兵团也就不需投入打援战斗，因而可以不必休整，继续作战，而攻济部队伤亡也有限，稍加休整后也可以连续作战。为了扩张战果，为以后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他即于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目标为攻占淮阴、淮安（两淮）及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以后全军再转入休整[3]。显然，由于济南战役原设想的作战规模大大缩小了，华野战力有余，但这一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粟裕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有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而淮海战役计划是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尽管如此，军委接到建议后，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但对战役目标仍感到不能满足。由毛泽东起草的军委对粟裕建议的复电，肯定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休整的计划，

但显然考虑到部队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的事实，因此，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目标之外的严重任务，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4)]。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黄兵团在国民党军中虽不是一个最精锐的兵团，但黄敢于死战，很有战斗力。所以，粟裕自己提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硬任务，并且毛泽东把粟裕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把淮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歼黄”战役。因此，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战役性质有着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严重性，在9月28日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5)] 为此，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机动地推迟了出动的时间。军委于9月底又改变了原先不休整的计划，指示华东部队休整二十天左右[(6)]。

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严重任务进行了多次研究，直至9日晚各纵主要干部会议后，才放弃了在华野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采纳了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于12日上报军委。中央军委和华野将领就作战部署进行了反复磋商，至14日，华野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作战部署，决定于11月5日开始攻击，并于15日上报军委，17日即得到军委的批准。至此，解放军完成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的决策。

中共中央军委为贯彻淮海战役的方针，指示中原野战军：“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7)] 于是，中原野战军决心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攻击郑州。这时，解放军统帅部根据谍报，判明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

进攻（按：杜聿明原计划集中四个兵团），认为“孙邱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一）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惟王宏坤南进各部可迅速动作。（二）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8)]。但事实上，杜聿明于15日去东北后，徐州“剿总”部队并未出动，中原野战军为执行牵制任务，于是分兵两路，在南线，由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指挥，发起虚张声势的攻击，以第二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吸引张淦兵团至大洪山区，以第六纵队、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抑留黄维兵团至桐柏山区。白崇禧即令张黄两兵团向刘伯承部寻战。在北线，摆脱了黄维兵团之后，由陈毅、邓小平率四个主力纵队攻击郑州。21日夜，中野对郑州发起攻击，22日，守敌二个师弃城北逃，被解放军歼灭。24日，国民党军主动撤出开封。陈邓率中野主力四个纵队，于27日起由郑州东进至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准备攻击宿县、蚌埠一线，或者歼击孙元良兵团，策应华野全军发起淮海战役。

这时，国民党军在徐州一线，既无明确的作战方针，又无能干的方面大将，在紧迫的军情面前，进行着没有成效的争论和商议。杜聿明是主张主动出击的，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也是主张积极寻战的。但郭汝瑰在10月14日拟订的中原作战计划就与杜聿明相反：“甲案，徐州对陈守，华中对刘攻；乙案，放弃郑州，以孙元良等部守淮（阜阳一带）。”[(9)] 似乎郭汝瑰还不知道杜聿明以四个兵团突袭华野一部的作战计划。不过，15日蒋介石已令杜聿明停止执行预定计划。郭汝瑰的计划，不如杜聿明冒险，得到统帅部的支持。22日19时，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刘斐和郭汝瑰讨论中原战场作战计划，“伊等俱同意余之主张，以二军、十五军加入十二兵团随刘伯承主力北移，即进出周家口追随刘主力不舍。伊等并主张由白统一指挥”[(10)]。23日，郭汝瑰飞赴北平向蒋介石请示，蒋批准了郭草拟的作战方案，并指示：“1．徐州方面应攻势防御，刘汝明部最后应固守商丘，李振清可退黄河北岸，以后打游击（事实上李部22日撤出郑州后即被歼灭

——引者）。2．华中可由白统一指挥。3．二军、十五军可归入十二兵团，必要时可放弃南阳，进出周家口，以蹑刘伯承之后。4．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副总司令，十四兵团可由霍揆彰、吴绍周选任一人。5．应令徐州限期恢复宿迁。”[11] 郭汝瑰遵照顾祝同的叮嘱，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而蒋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于是，何应钦于24日即致电白崇禧，告诉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部队的决定，何并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了作战指示。[12] 但白辞而不受。2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劝驾：“华中和徐州军事，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兄兼顾华东，对于华中之进剿任务，仍可进行无碍也。务希照敬电从速实施，望能分中之忧劳，勿再言辞。”[13]

国民党军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迭受挫败，9月24日失济南，10月15日失锦州，19日失长春，军事危机十分严重，已经直接影响到统帅部的战斗意志。早在济南失守之后，据说何应钦、顾祝同、刘峙三人在徐州开会，曾向蒋提议放弃徐州、开封、郑州一线，将部队撤至淮河以南，沿蚌埠线加强江防，蒋未批准。何应钦有牢骚，认为“统治阶级爱面子，不愿将军队南撤，怕失体面，结果将来被迫还是丢掉，还要损兵折将，不了解蒋介石是何主意”。10月22日，国防部长何应钦邀郭汝瑰谈话，“主张订一南京失守、迁都广东组织军政府继续作战之计划”[14]。28日，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京沪不保时应有之计划，决定：“1．政府应迁广州；2．政府应为军政府；3．缩减政军机构；4．调整部署：（1）东北部队撤华北，华北守唐山、津沽；（2）徐总以一部守青岛、海州，主力守京沪以南，华中守武汉、宜沙；（3）西北守陇中及陕南。”[15] 这表明，国民党军统帅部在中原战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已经动摇。

对于中原作战，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于23日作成了一个方案，但并未真正实施，而解放军中野部队已经东进，战场形势更为不利。29日，国防部第三厅讨论中原战场作战方案时认为：“对中原作战均已

认为不能取攻势，而只能于陇海两侧行攻势防御，或消极的退保淮河流域。如须于陇海路作攻势防御，则黄维兵团必须向周家口方向进出，以配合徐州方面之作战。”[16] 下午，顾祝同邀何应钦、刘斐等继续研究。何应钦在会上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原则，对上述两方案进行了研究。结果，会议认为：“退守淮河，则尔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共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我军更为不利。”，因而采纳了在津浦铁路两侧行攻势防御的方案，即：“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解放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找共军决战。”[17] 当日，参谋部即令徐州方面，一〇〇军不再去海州，海州准备放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必要时可以放弃商丘，并要求蒋介石将葫芦岛的第三十九军调运上海转驻蚌埠。

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决定了徐州一线的作战方针，但预定由白崇禧到蚌埠指挥的问题尚未落实，军事部署也就拖着没有进一步调整。30日，白崇禧由信阳到达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天，白崇禧“高高兴兴地参加，满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上蔡、太和地区，他还自动提议以第三兵团（即原来张淦的第三纵队，辖第七、四十八两个军）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也就是作出了准备统一指挥华中、徐州军事的态势。何应钦、顾祝同等催促白崇禧赶快到蚌埠去指挥，他们甚至说“非你去指挥不行了”，“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希望他力挽狂澜[18]。这时，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败局已定，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南京。第二天，即31日统帅部开会时，白崇禧突然改变了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部队，只同意调动黄埔系的第十二兵团，并以第十四军、八十五军替代原拟的第二军、第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序列。据华中“剿总”作战处处长覃戈鸣回忆，他们认为解放军已掌握主动权，败局已定，白崇禧对徐州“剿总”部队的指挥官不熟悉，很难指挥，大战

在即，临时到蚌埠组建指挥机构也来不及，而且，战败的责任太重，直接关系南京安危。覃认为“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和南京陷落的责任，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白对此表示同意：“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华中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19] 而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已开始活动逼蒋下野，创议和平，不愿再为蒋效力。当天，白崇禧仅命令黄维兵团立即东移确山，轻装开太和、阜阳地区集中，11月10日集中完毕，并令第八十五军、第十四军移确山归还第十二兵团。他自己不久即返回武汉，没有同意到蚌埠指挥。

徐州大战在即，临战之际，尚无一员能战之将。蒋介石原准备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而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白既不愿担任，蒋就不能不另行选将。东北既已崩溃，杜聿明在东北已经无关紧要，于是，蒋介石决定召杜回徐仍担任副总司令职务，而令宋仍任原职。11月1日，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前往葫芦岛传达撤退部署，并带去蒋介石的亲笔信，征求杜聿明是否愿意到徐州指挥。杜虽然同意到徐州指挥，但以部署葫芦岛撤退为由，拖延未行。结果，当解放军摩拳擦掌、积极部署进攻之时，徐州部队仍由无能的刘峙看守着，在陇海一线麻痹地呆着不动，东西距离遥远，呼应困难，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所谓徐蚌会战计划，简直是纸上谈兵。

11月4日，蒋介石鉴于徐州无大将，不得不准备亲自前往部署，但临行之际，另有别事，只好让顾祝同代他前往徐州调整部署。翌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根据前述“守江必守淮”的方案，调整部署，并决定于必要时徐州“剿总”移蚌埠指挥。11月6日补发了正式命令。部署调整情况如下：

10月24日后调整的部署：

1．海州连云港由九绥区李延年率四十四军驻守，并以一〇〇军加强之。

2．黄百韬第七兵团集结于新安镇附近。

3．李弥十三兵团集结八义集附近。

4．邱清泉第二兵团在砀山、黄口附近。

5．第四绥区刘汝明部驻商丘附近。

6．总部及七十二军在徐州。

7．交警二总队及二十五军的一个后调师驻宿县。

8．孙元良兵团正向蒙城运动。

9．一〇七军孙良诚部驻睢宁。

10．九十六军于兆龙部驻蚌埠。

11月5日部署调整计划：

1．徐州守备部队应切实加强工事，坚固守备。

2．第七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绥靖区、第三绥靖区密切联系，并在运河以西地区清剿。

3．第二兵团以永城、砀山地区为中心集结，并在附近清剿。

4．第十三兵团应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并在附近清剿。

5．十六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路之安全。

6．第四绥靖区移驻临淮关，以原第八绥靖区为该绥区的辖区，原第八绥靖区着即撤销。

7．淮阴守备由第四军担任。

8．海州方面由海上撤退（补发的正式命令改为由陆路撤退。九绥靖区人员到徐州待命，四十四军受黄百韬指挥，一同退过运河）[20]。

当时，国民党军完全不知道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只是盲目地收缩兵力，还以为解放军“全面攻势开始时间，当在十一月十日直后”[21]。本来下达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为时已晚，但国民党军在执行过程中依然行动迟缓，连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也未及执行完毕，即遭到解放军的强有力攻击，仓促应战。

二　黄百韬兵团的覆没

正当国民党军准备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之际，解放军已完成了作战部署，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4日，粟裕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22]。依据预定方案，华野以十一个纵队自临沂一线南下，分四路围歼黄百韬兵团；以山东兵团三个纵队自临城、枣庄一线南下，攻击韩庄、台儿庄、运河沿线、贾汪地区，从侧面佯攻徐州，迷惑敌军，不使敌过早察觉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并牵制徐州部队不敢轻易援救黄兵团。同时，陈毅、邓小平指挥东进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准备攻击在商丘集、马牧集一线的刘汝明四绥区部队，同时指挥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等部自鲁西南威胁砀山、黄口一线的邱清泉的第二兵团，牵制邱兵团东援。

国民党军虽然感受到了解放军南下的威胁，但对临战的迫切性仍十分迟钝。对于解放军的战役计划并无确实的情报。按照徐蚌会战计划，正调华中“剿总”的黄维兵团到徐州战场，以对付东进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但黄兵团自向豫西泌阳、唐河、南阳一线扫荡扑空后，正回驻确山、驻马店一线，11月四五日尚在集结整理，未能即时开进。而陈邓所率中野4个纵队已经威胁徐州。刘伯承部第二、十纵队，得到黄维东调的情报后，正积极准备围追堵截。一慢一快影响到会战全

局和后来黄维兵团的命运。原在柳河一线的孙元良兵团已南调永城、宿县间，正向蒙城要地开进，刘汝明部也已奉命南撤，但刘部一八一师米文和部，归邱清泉指挥，于6日放弃商丘，掩护物资东撤。李弥兵团以第三师驻守官湖，掩护黄兵团西撤。

黄百韬位居东侧，本来态势就比较孤立，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10月底即向刘峙建议："（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合其在苏北的三个纵队，夹击职部，而刘伯承部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则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周围，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23] 这里所称陈毅部，系指华东野战军，并非陈毅作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当时所指挥的中原野战军部队。黄百韬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升任兵团司令，原辖三个军，因决定放弃海州，原定去海州的第一〇〇军也划归黄百韬指挥。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本拟由海上撤退，因调船不易，于6日临时改为迅速从陆路撤退，也暂归黄百韬指挥。这样，黄百韬从指挥三个军扩大为指挥五个军，成为徐州"剿总"最大的一个兵团。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黄兵团西撤后，黄百韬于5日下午从徐州回到新安镇，翌日上午召开本部军事会议，决定西撤部署，各部队于7日上午5时开始行动。

黄百韬从徐州回新安镇时已深感军情紧迫，他在火车上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恐怕撤退不及了。"[24] 6日深夜，黄百韬已获得情报，华野主力急行南下，兵团处境危险。他与从海州撤退经过新安镇的第九绥区司令官李延年、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劻长谈，心情十分悲怆。他指出为掩护四十四军撤退贻误戎机的危险："陈毅的部署是想先打第七兵团，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立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且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我已命第六

十三军从窑湾镇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要掩护第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不能贻误戎机，否则全兵团将被围，陷全局于不利。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他预感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对李以劻说：“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25)

华东野战军各部5日间正向前进位置运动，6日晚开进接敌。黄百韬兵团正好于7日凌晨起离开既设阵地，侧敌运动。由于晚了一天的行程，黄百韬兵团与驻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也未能靠拢，以便团集一起撤退。黄兵团这样的态势，正好是最容易受到割裂攻击的态势。国民党军统帅部不明敌情，指挥凌乱，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后果。

11月6日晨，粟裕率华野司令部到达临沂，各纵队都已全部完成展开，进入开进攻击准备位置。当晚，华野先以一部兵力扫清前进途中的国民党政府系统地方武装和敌外围阵地。第七、第十纵队向临城、枣庄一线国民党军第三绥区运河防线进攻。第三绥区部队系原西北军旧部，和黄埔系部队矛盾很深，当时指挥所设在贾汪，司令官冯治安长住徐州，由副司令官何基沣在前线指挥。另一副司令官张克侠原系中共党员。张、何多年来和解放军建立了联络，11月5日军事会议后，他们深感大战将临，是起义的好时机，积极进行准备。解放军向临、枣一线推进时，何基沣即命部队后撤，但在动员起义时，一些高级军官仍心存顾虑，犹豫不决。11月7日晚，解放军第七纵队即强攻运河防线，迅速攻占了万年闸，歼敌守桥部队一个营。万年闸是台儿庄到韩庄间唯一的桥梁孔道，设有桥头堡。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后，第三绥区部队前面有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后面有国民党黄埔系部队的逼迫，进退无路。于是，原先动摇的军官也决心起义。师长崔振伦说：“国民党多年来干的是什么？他们幸运的时候我们巴结不上，现在他们要送丧了，我们犯不着给人家戴孝帽子。老蒋要我们给他看大门，他的嫡系部队好安全地向南跑，我们再也不干这种傻事

了。把大门敞开，躲在一边凉快去，还可以看个热闹。”[26] 8日，在解放军的接应下，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三绥区第五十九军全部和第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及三十七师一个团共三个半师，2.3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前线起义成功。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率残部5000人南逃。徐州门户洞开，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迅速推进，直达陇海路，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黄百韬兵团以第六十四军为前锋，于7日凌晨西撤，兵团部继进，以一〇〇军进至炮车，掩护兵团北侧，并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运河铁桥，第二十五军接应第四十四军西撤通过阿湖后跟进，第六十三军担任兵团左侧掩护，然后在窑湾渡河。兵团原准备渡河至碾庄圩集中后继续西撤。第六十四军于8日黎明全部通过运河，到达碾庄圩一带后即迅速筑工固守，策应全兵团撤退。是日兵团部及直属部队也撤过运河。但第四十四军撤退时，有随军撤退的机关人员和当地平民数万人，携带行李杂物，行动迟缓，8日晚才开始过桥，又秩序混乱，堵塞交通。第二十五军为接应四十四军，至8日才开始撤退，是夜渡河时，即遭追上的解放军攻击，直到9日晨才渡过运河。

11月8日上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黄百韬兵团西撤的情报，即命令各纵队以猛烈的动作迅速截歼黄兵团。入晚，华野第四纵队前锋即与黄兵团第一〇〇军后卫掩护部队发生战斗，主力包围了在官湖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的第三师，并在第三师突围时予以重创，一部攻击正在过桥西撤的第二十五军，重创该军的第一〇八师。华野第八纵队于9日赶到前线，奉命抢占运河铁路桥，围歼黄兵团第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师担任后卫的两个多团。敌纵火焚毁铁路桥。解放军各部一面修桥，一面涉水抢渡[27]。华野第九纵队于8日奉命南进越过铁路西向追击，黄兵团第六十三军行动迟缓，其先头部队于7日到达窑湾时，即遭到已占领运河西岸的华野苏北第十一纵的坚强阻击，架桥未成。前来接应的黄兵团第六十四军也被十一纵驱逐。九纵到达新安镇时，六十三军主力离开仅两小时。8日夜，九纵于堰头镇

包围六十三军一部，军长陈章逃到窑湾，9日晨，九纵即追击抵达窑湾，将六十三军主力予以包围。不久，奉命移交给第一纵队予以围歼，九纵即西渡运河追击。至12日晨，六十三军在运河以东被全部歼灭。这样，黄兵团在撤退过程中，即有一个军被歼灭，二个师受到重创。

由于8日何基沣、张克侠起义，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南下，黄口邱清泉兵团遭到解放军的攻击，米文和师又在张公店为中野部队包围歼灭，徐州“剿总”刘峙感到徐州两侧均受威胁，极为恐慌，无法正确判断敌情。为了徐州的安全，他赶紧收缩兵力，命令李弥兵团自八义集回守徐州，孙元良兵团自蒙城经宿县调徐州，邱清泉兵团自黄口向萧县夹河东侧地区间集结。9日晨，李弥兵团撤至徐州，拉开了与黄兵团的距离。10日下午，突破运河防线的华野山东兵团第七、第十三纵队挺进至陇海路八义集一带，李兵团已经撤走，仅黄兵团后卫掩护部队第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师余部，正调徐州整补，李兵团第九军第三师一个团，撤过运河后归还建制，及第四十四军前锋一部，先后到达八义集一带，与解放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即团集八义集抵抗，战斗至11日，被全部歼灭。解放军切断了黄百韬兵团和徐州的联系。

10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召开作战会议，正式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负责指挥徐州方面的作战，并对徐州“剿总”下达如下指示：

1．应本内线作战的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而歼灭之。为求决定性的胜利，宜尽百般手段，迟滞阻击由西东窜之共军第三、八、十，三个纵队越过津浦南段参加其主力军之作战。

2．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

3．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作战。

4．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

5．徐州守备部队应坚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对共军之攻击，形成战场之坚固支撑点，以利决战。

6．孙元良兵团应即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阻击共军三、八、十各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

7．刘汝明部即集结于固镇、宿县维护交通，并清剿铁路两侧共军[28]。

是日，蒋介石又电催黄维东进，“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即阜阳、太和地区；同时有亲笔信给黄百韬，决心集中兵力进行决战，“期在必胜”[29]。

刘峙对徐州西侧解放军的威胁十分忧虑，因而不赞成这一作战方案，于是日晚8时复电称：“徐州以西之匪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以策应黄兵团之作战，以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匪。”[30] 杜聿明回忆说，他到徐州后，提出第一案，先集中力量，攻击中野一部，刘等不赞成。但事实上，杜说的第一案，正是刘10日电的方案，当时杜尚未至徐州，可见，整个战役中，刘、杜、邱顾虑徐州安全是一致的。但刘峙的方案遭到蒋介石的申斥，11日“戌真午防挥督电”指示：“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戌蒸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匪，以免黄兵团先被击破。”[31] 然而，蒋介石的命令并没有摆脱国民党军固有的战略缺陷。当时，解放军正集中华野全部、中野主力参加会战，而国民党军要顾及徐州等地的守备，不能集中全力进行野战，以争取战斗的胜利。统帅部“坚工

固守”徐州的命令，本身就分散了兵力，而到了前线指挥官那里，守备徐州的责任，成了比统帅部更严重的一个包袱，因而不能彻底执行统帅部的命令，统帅部既不能帮助他们放下这一包袱，也就不能解开这个死结。后来，刘峙、杜聿明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依然围绕着保卫徐州这个死结旋转。

解放军自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对于淮海战役已无后顾之忧，全军上下十分振奋。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东进之后，已能同华东野战军直接配合战斗，战役形势更十分有利。淮海战役的实际展开，必将超过预定规模。10月31日，粟裕请示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32] 11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33]。陈邓复电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34] 事实上，后来两战场的协调仍然是通过中央军委进行的。

战役发起后，中央军委即于11月7日对战役提高了要求，希望用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敌黄百韬、李弥、冯治安、刘汝明各部21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35]。据粟裕回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都十分有利，“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36]。因此，粟裕、张震于11月7日、8日连电中央军委，就全局战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在8日电中认为，蒋介石一个可能继续在江北同解放军作战，另一个可能是撤守长江，“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因此主张：“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

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37]

中共中央军委支持前敌将领的建议，于9日指示：“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要求调整部署，在长江以北全歼敌军。当时，国民党军刘汝明部已经撤退，孙元良部也已撤至蒙城，中野未能按原计划歼灭该两部敌军，军委指示：“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军委号召全军：“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38] 入夜，军委以简短、明确的电文指示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39] 表达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10日，中央军委连续两电致陈毅、邓小平，要求集中全力迅速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至此，解放军统帅部完成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和部署。这一决策最终指导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一决策在战役和战术部署上，对敌军就地抵抗的能力未予充分重视，为此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黄百韬兵团主力于9日撤至运河以西，大约是10日上午即召集各军长研究继续西撤的部署。多数人主张按兵团既定部署西撤，但部队完整、筑工已经完成的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不同意西撤，主张就在碾庄圩决战。他“认为要打就打，何必走东走西、走去走来，企图快

些决战，挽回劣势，不让共产党独霸天下，自己可能因此扩充势力，把广东外调部队抓在手里组成一个兵团，败则抱着一个够本两个有赚，到处黄土可埋白骨”[40]。当时，各军在解放军追击下多有损失，据黄百韬报告，第二十五军伤亡失踪官兵约二千人，第一〇〇军五千余人，第六十四军千余人，第四十四军损耗千余。并且，各军秩序混乱，六十三军已遭解放军包围，该军和六十四军同为粤系部队，所以，刘镇湘尚希望予以营救。如上所说，这一天，蒋介石已命令“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另据陈士章、刘镇湘分别回忆，国防部、刘峙都有令黄百韬独断专行的指示，于是，黄百韬即决心在碾庄圩固守待援，并庆幸地向蒋介石、刘峙报告说：“仰赖钧座德威，幸未遭匪算。”[41]

当时，解放军的追击部署已经完成，华野第七、十、十三纵队正奉命挺进陇海路，阻击黄兵团退路，分割李弥、黄百韬兵团，威胁徐州，苏北第十一纵自南向北挺进，与南下部队协同阻击。苏北兵团率二纵、十二纵及中野第十一纵经宿迁向睢宁、徐州间大王集、双沟镇方向急进，迂回堵击，并威胁徐州，侧击徐州东援兵团。因此，黄百韬在撤退过程中，必将遭到解放军的急袭、分割、包围，有溃散的危险。黄百韬既决心就地抵抗，即将兵团指挥部设于碾庄圩，第二十五军在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四十四军在南，第一〇〇军在西，猬集一团，组织防御。当解放军追击部队抵达时，黄兵团即依托既设阵地进行顽抗。这一措施，使黄兵团得以避免如六十三军那样迅速溃散。

华野于10日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之后，即组织第四、六、八、九、十三共五个长于攻坚的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各部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追击敌军，迭有斩获，士气高涨。但黄百韬兵团迅速转入阵地防御，解放军各部仍以急袭手段攻击敌军，进展缓慢，伤亡严重。华野司令部虽曾指示所部，“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则应完成包围，绵密侦察，组织火力，在统一号令下（纵或

师），一举聚歼之”[42]。但这一指示，显然仍对黄兵团阵地抵抗能力估计不足，因此，粟裕于13日部署各军于当日晚歼灭二十五、一〇〇、四十四军的任务未能达成。14日晚，粟裕召开歼黄各纵干部会议，改变战术，部署攻坚，并决定歼黄各纵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15日15时，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至此刻为止，黄兵团之一〇〇军已全歼（正、副军长被俘），四十四军、二十五军各歼约半，六十四军亦已歼灭五分之二。因此，该敌至此只有四个旅兵力，以碾庄为中心，占有十二个村庄。因其部队密集，并已筑好了工事，不易分割，必须逐一攻击，且因后方炮弹接济不上，致延时日。”[43]

杜聿明于11日凌晨从南京乘飞机到达徐州指挥部，当即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东援黄百韬。下午，他查明邱清泉兵团西侧并无严重威胁，即决心将邱兵团东调，以第十六兵团及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归前进指挥所指挥，展开于团山以西南北地区，以第二兵团的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九里山附近。12日部署完毕，13日9时，在空军、炮兵掩护下开始攻击前进。是日下午，蒋介石因黄兵团危险万分，电令刘峙、杜聿明、邱清泉“星夜挺进，务于本夜到达碾庄附近解围”[44]。杜原计划集中兵力，寻求迂回击破解放军之一翼，以解碾庄之围。邱清泉部下也曾建议避开正面，迂回攻击。但都因考虑到自身部队的安全，仍采取正面攻坚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虽然，两个兵团有六个军，但第九军的第三师已经残破，第十二军缺乏战斗力，第七十四军又作了预备队，实际用于攻击的仅第八军、第五军、第七十军。邱清泉更消极自保，不肯力战。经两日战斗，进展迟缓。杜聿明即把第七十四军调到右翼潘塘一线，准备迂回侧击。战后，国民党军方面总结教训说：“邱兵团到达徐州东南地区后，迟至十三日始向东攻击，且并未遵本部指示，以全力求匪攻击，以致匪得获时间转用兵力，阻我东进，实因徐州剿总作战指导之失当。”[45]

14日，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乘飞机到战场上空视察，发现“徐州无乾坤一掷、向东解围之魄力。且东进兵团仅八、五、七十、七十四四个军，七十四军且系侧翼掩护，用兵如此不彻底，胜利何由而来”[46]。是日，蒋介石才两次电令“徐州方面应尽量减少守备部队，彻底集中兵力向东挺进”，并令将守备徐州的七十二军投入使用[47]。翌日，顾祝同、郭汝瑰奉蒋介石之命到徐州视察，“促邱兵团迅速东进，并增加部队投入攻击”。郭主张迂回攻击，但杜聿明考虑部队和徐州安全，仍坚持逐村攻击前进。他提出：“目前徐州方面的作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保住徐州，并救出第七兵团；中策是牺牲第七兵团，保住徐州；下策是第七兵团救不出来，徐州也保不住。”郭汝瑰深感“徐州各将领均对于徐州安全感甚大，无肯冒险挺进者”[48]。

15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预计17日晚可以全部解决黄兵团，同时报告：“邱、李兵团连日来，除以小部队出击外，其主力不敢猛进，我正面阻击及歼灭黄兵团均无问题。”粟裕根据军委吸引邱、李兵团东进，予以合围的要求，令第十一纵稍向后撤，但“邱敌尚无动作，而李兵团之八军反向后收缩”[49]。当时，邱兵团右翼掩护严密，军委估计，不一定能截断其退向徐州的后路。为此，粟裕命令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率领苏北兵团的第二、十二、鲁中南及中野第十一纵队四个纵队挺进至徐州以东及东南地区后向东攻击，并调第三、两广纵队归还建制，到徐州以东，先行攻击。于是，15日晚苏北兵团在潘塘镇一线，与出击的邱兵团七十四军发生激战。邱清泉感受到侧背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分兵抵抗。由于国民党军密集固守，苏北兵团未能突入分割敌军。

此时，中原野战军已东进攻击孙元良兵团后尾第四十一军，并于16日晨攻占津浦路敌重要补给基地宿县，截断津浦路。于是，徐州“剿总”刘峙命令蚌埠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经固镇、大店集，向褚兰北援徐州。黄维兵团过阜阳后继续前进，增援徐州。

中原野战军攻克宿县之后，解放军掌握了战略枢纽，决心扩大战役规模，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在北线续歼邱清泉、李弥兵团，在南线歼灭刘汝明、黄维、李延年兵团。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筹全局。

华野对碾庄圩的攻击十分艰苦，尤其是“攻歼六十四军，逐屋、逐堡争夺，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出现了少数松劲泄气表现”[(50)]。“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51)]。

15日晚，解放军因伤亡严重，攻黄各纵休息，停止攻击，补充弹药，调整部署，准备17日晚总攻碾庄。16日晚，华野司令部将攻黄各纵交付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粟裕率司令部移双沟附近指挥第七、十、苏十一三个纵队及韦国清、吉洛指挥的四个纵队，围歼邱、李兵团，并准备从攻黄兵团中抽出六、十三两纵西移，以总预备队第一纵队加入对邱、李作战。徐州“剿总”对解放军调整部署的计划一无所知，以为解放军准备撤退，即谎称徐州大捷，舆论大肆渲染，演出了一幕闹剧。17日，解放军为诱敌深入，阻援各军奉命后撤至大许家一线。邱、李兵团即向东推进至大许家以西南北之线。至18、19日间，国民党军方面对解放军动向依然迷惑不解。徐州“剿总”判断解放军退却，但18日，第五军在大许家一线的攻击仍遭到坚强阻击，蒋介石命令第七十二军加入李弥兵团左翼进攻，黄维兵团向宿县前进，李延年兵团向宿县攻击。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以为：“共军已退，特其后卫坚抗或佯动，使其主力可脱离战场耳。”[(52)]“共军似尚有意以刘伯承部阻止黄维，而以陈毅部第一、七、十纵队与邱、李作持久战，以便解决黄百韬，或将主力撤离战场。惟共军主力已甚自由，似无须再如此坚强抵抗。余以为如不为解决黄百韬，则必另有企图，特未知其兵力消耗究如何耳！”[(53)] 对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估计严重不

足。

17日晚，解放军总攻碾庄，占领大牙庄、前后黄滩，歼灭敌四十四军，俘虏军长王泽浚，但攻击碾庄圩未奏效。18日晚攻下小牙庄，19日晨，黄兵团一〇〇军残部反击小牙庄，为解放军歼灭。黄百韬率残部困守碾庄圩核心阵地，依然进行顽抗。由于敌军顽抗，华野攻黄各纵除十三纵于17日撤出休整、然后西进外，攻黄部队未能按计划结束战斗转移兵力。

19日，黄兵团危在旦夕，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飞临碾庄上空，与黄通话，传达蒋介石意旨，再死守一天。是日晚6时，蒋介石电令刘峙、杜聿明及援黄各将领说："第七兵团在碾庄仍为匪围攻，情况危急，中至为焦念，万一碾庄第七兵团为匪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严督所部，兼程东进，限哿日前与第七兵团会师解围。"[54] 据邓文仪回忆说，蒋介石是日"急电刘峙，要第二兵团集中全力救援黄百韬，即使徐州有失，也在所不计"[55]。但据上引电，蒋介石似从未有可以放弃徐州的指示。20日晨，据在徐州的邓文仪回忆，"当我们正要上车，杜副司令请示总司令：'究竟守徐州要紧，还是救黄百韬要紧？'刘总司令明快的说：'徐州都不守，救了黄百韬又有何用。'"到了前线，"邱司令官问杜副总司令，总司令对救黄百韬与守徐州有何意见，杜以总司令的话告诉他，总司令认为守徐州要紧，就凭这句话，邱司令知道刘总司令看重守徐州，他的快速进攻的决心就犹疑了"[56]。

19日晚，解放军强攻碾庄圩，至20日晨，结束战斗，占领碾庄圩，黄百韬率残部撤至大院上继续抵抗。当天，郭汝瑰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奉命到徐州研究战法，先飞至碾庄上空视察，发现碾庄失守，即至徐州，深知黄百韬已无法持久。刘峙向郭汝瑰要求："1．总统亲往指挥；2．速空运两个军增加；3．请总统下决心以全力东进，对徐州安全可置不问。"[57]

当时，黄百韬兵团仅剩第六十四军军部、二十五军第八十师师部等残部，全兵团已被消灭殆尽。尽管徐州“剿总”制定了中央突破战法，但各军并不力战，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无法突破。战至22日，解放军攻占大院上等第六十四军残余阵地，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俘，黄百韬自杀。第七兵团五个军十个师被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粟裕正指挥各部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19日晚在潘塘一线发起真面目攻击，倾全力进攻，严重威胁徐州。但邱、李对自身安全组织严密，粟裕未能达到截断其退路的目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坚持救黄，不允许部下见危不救，是他的一条原则。但国民党军已形成恶习，蒋介石已无可能严肃军纪，造成统帅部命令和前敌状况严重脱节。而且，蒋介石始终未给予徐州将领放弃徐州的机动权力，致使徐州各将领不能不首先顾虑徐州的安危。他们早已对胜利失去信心，也就难以指望他们能用兵彻底，增援黄百韬。据《郭汝瑰日记》记载：“胡翔归报，徐州将领咸欲求徐州安全，不诚意援救黄百韬。”“余认为杜聿明、邱清泉等不着眼大局，坐令黄兵团损失，其罪不可逭！”(58)

三　黄维陷围和徐州弃守

淮海—徐蚌之战，国共两军态势犬牙交错，十分复杂，战斗也空前酷烈。国民党军统帅部在10月底计划作战部署时，深恐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东进，徐蚌一线兵力不够，决定调黄维兵团至徐蚌一线参战。豫东战役时，第十八军（现黄维兵团主力）即因北援迟缓，影响战斗。但决定黄维东调之时，该兵团正被刘伯承的佯动，牵往豫西。黄维兵团回师确山、驻马店整理后，于11月8日才开始东进，未能按原定的11月10日到达太和、阜阳地区集中。这时，陇海—运河一线战斗已经十分激烈，中原野战军已有四个纵队到达徐州以西，投入战斗。黄维兵团东进时间已经嫌晚。早在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已接获白崇禧命令黄维兵团东进的情报，即指示中野，既要牵制邱兵团不能东

援，又要阻击黄维兵团。中野即部署以二、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等部尾追、侧击黄维兵团，并令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坏道路桥梁，袭扰迟滞敌军。刘伯承于11月5日离开宝丰，10日到达柘城，与陈毅、邓小平会合。

中野陈邓所率四个纵队，并指挥华野三、广纵队等部，牵制邱兵团，原计划围歼刘汝明部及孙元良兵团，但均因刘、孙两部先期撤退，没有达到目的，即一面威胁徐州，一面围攻宿县。14日，黄维兵团到达驿口桥，先头到达阜阳。黄维兵团东进时，自恃拥有重炮、坦克，认为“刘伯承部不能阻止其前进”[59]。但在阜阳渡颍河时，即遭到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的阻击。是日，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当面敌情出发，认为黄维兵团处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一个军尚未到达，态势孤立，向中央军委建议，集结他们所指挥的八个纵队兵力，“歼击黄维为上策”[60]。但这一方案有两个前提：一是黄维兵团不是出蚌埠或滞留不动，而是出永城、宿县；二是华野必须在16日以前消灭黄百韬兵团三个军，抽出部队接替中野四纵及归中野指挥的华野三、广纵队牵制邱、孙两兵团的任务。但一则敌军动态尚未明了，二则黄百韬兵团抵抗顽强，华野未能迅速解决战斗，而且要求调三、广两纵归还建制，所以中野仍只能在南线担任牵制、阻击任务。

黄维兵团虽然是美式机械化重装备，但战地道路不良，河道阻隔，且步兵未能使用汽车运输，结果反而行动迟缓，不能轻装迅速前进。18日，黄维兵团到达蒙城，中野第一纵队已经在涡河北岸布防，黄维兵团先头第十八军即实施攻击，强渡涡河。是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解放军全面退却，邱、李兵团向大许家进击，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自蒙城）、李延年率第三十九、九十九军（自固镇）向宿县进攻。黄维鉴于中原野战军主力已经在涡河一线布防，尾追部队自西北侧威胁兵团，而兵团的第二梯队、即第八十五军及所附第十八军后调师尚未赶到，即在蒙城观察形势，一方面等待后续部队，一方面向统

帅部要求向蚌埠靠拢，仅以小部队出击，对解放军进行侦察。但徐州一线战斗十分激烈，统帅部要求黄维按原定路线继续挺进。黄维在蒙城滞留两天，后续部队也已经靠近，至21日全兵团渡过涡河、北淝河攻击前进。这时，战场形势和解放军的战役部署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原野战军从自身所处战场环境出发，曾主张以全军之力割歼黄维兵团。但中共中央军委和华野原定部署系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即从现地扩张战果，包围歼灭邱、李兵团。粟裕正指挥各部按预定部署攻击潘塘镇，力图达成截断邱兵团和徐州联系的目的。当时，李延年兵团奉命迂回北进，对潘塘镇一线的华野苏北兵团构成严重威胁，所以，粟裕于18日晚，要求谭震林、王建安于21日晨全歼黄兵团，抽出兵力南下打援，并要求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东进阻击李延年兵团。华野须待全歼黄百韬兵团之后，才能配合中野歼灭刘汝明兵团、李延年兵团或黄维兵团。当前一时无力兼顾。刘伯承鉴于本军六个纵队兵员不足，除四纵外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二万人，炮兵很弱，同时阻击黄维兵团和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兵力分散，难以兼顾，因此，于19日部署主力第三、四纵队阻击黄维兵团，希望集中五个纵队，先割歼黄维兵团一两个军。除按照华野要求以中野第九纵队牵制李延年兵团外，要求华野能以自身力量对付李延年兵团。同时，对北线作战，刘伯承认为，华野以攻坚作战能力强的几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历时十二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华野各部“刀锋似已略形钝挫”，要续歼邱、李兵团“诚非易事”，如华野能包围邱、李兵团，自应继续歼击，但如邱、李退回徐州，则主张华野主力抽出兵力，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李，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61)]。

但当时，战场形势尚未十分明朗，中共中央军委从当前兵力部署出发，于19日10时发电，也要求中野以主力三、四两纵配合华野战役预备队第一纵队先行歼灭李延年兵团，解除对苏北兵团的威胁，认为

这是“极关重要的一着”，待引诱黄维至宿县地区，正好歼黄各纵转移兵力，协同中野全力打黄维[62]。军委的要求只是咨询意见，并非正式命令，接到刘、陈、邓19日连发的两电后，知道中野已经改变部署，当即尊重前线指挥员的临机处置，指示华野抽出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同时，指示华野缩小歼灭邱、李两兵团的目标，保持机动兵力。

粟裕指挥华野各军按照军委要求部署作战，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十分艰苦，未能按预期尽早解决战斗，19日晚苏北兵团对潘塘镇一线的真面目攻击，也未能达成包围歼灭邱、李两兵团一部的目的。战局如刘伯承所预料，华野续歼邱、李诚非易事，包围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战斗已经打成僵局。20日晨，粟裕回复中央军委19日10时电，表示完全拥护军委指示，即对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的方针。但20日晚，粟裕接到刘、陈、邓及中央军委续后指示各电后，当即根据战场形势，变更部署，对徐州改采大弧形包围，阻敌南援，抽调四个纵队兵力阻击李延年，同时，接替中野九纵任务，让其西进，参加攻击黄维，并准备二个纵队的兵力，在必要时支援中野，归刘、陈、邓统一指挥。粟裕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63]。华野解脱了歼灭邱、李兵团的任务，才有力量协同中野全歼黄维兵团。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根据敌情和战场变化，不断地探索着最好的作战方案，用兵机动灵活。

当时，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曾预计，如黄维兵团向蚌埠靠拢，则解放军将转入休整待机。但国民党军统帅部对战场形势的变化反应十分迟钝，解放军已经着手调整部署，而黄维兵团仍向解放军预设战场前进，国民党军的部署正向着解放军最理想的方向发展。21日晚，中原野战军向后收缩一线，以主力第四纵队在南坪集一线构筑坚强阵地，诱敌深入至南坪集以南地区予以包围歼灭。黄维兵团即分两路挺进，23日上午9时，以第十八军一一八师为主力，在二十多辆坦克掩护下，向解放军第四纵队南坪集阵地进攻，激战竟日。午后，第

十八军一部在南坪集以东强渡浍河。

是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得悉黄百韬兵团已经失败，何应钦、顾祝同等研究决定，命令徐州“剿总”部队以主力向南击破当面之敌，与黄维兵团配合打通徐宿交通。但蒋介石认为要等待徐州以东敌情明了，再行下令。津浦线刘汝明兵团和李延年兵团均迟迟不进，仅推进至任桥一线。同一天，即23日夜，中野决定放弃南坪集，退至浍河北岸布置囊形阵地，吸引敌十八军渡河，以四、九两纵吸住十八军，以五个纵队于24日夜向浍河南岸出击，利用浍河，割断十八军和南岸三个军的联系，以求先行割歼黄维兵团二三个师。刘伯承一面调原在华野参加战斗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归建参加战斗，一面要求华野第二纵队在西寺坡一带构工阻断刘、李两兵团和黄兵团的联系，同时要求华野除对付刘、李外，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灭黄维的战斗，认为“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要求军委批准这一计划[(64)]。粟裕接到刘伯承电令后，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除调中野十一纵、华野二纵外，命令华野六、七、十一纵兼程向宿县急进，准备参加打黄维的战斗。七、十一两纵且准备歼灭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接到刘伯承等电报后，即于24日15时复电批准，“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授权“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65)]。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由于军情飘忽而犹豫不定的作战方针，至此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24日，黄维兵团第十八军、第十军分东、西两路渡过浍河，向朱口一线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第十军且占领孙疃集大部。这时，黄维眼看到战斗十分激烈，兵团态势孤立，处境危险，准备向固镇靠拢，但迟疑不决。蒋介石于是日召集刘峙、杜聿明到南京研究战局，商决徐州主力向褚兰进攻至时村、符离集一线，黄维、李延年兵团向宿县进攻。但是日晚，空军报告解放军四万多人由大李集向宿州、任桥、固镇等地前进，威胁李延年兵团侧背。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即建议

黄维于南坪集占领桥头堡，佯攻，掩护主力由浍河右岸向蕲县集以东地区转移，向李延年兵团靠拢，避免被解放军隔离[66]。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已停止前进。黄维当时本身已经决定行动，是日下午，浍河北岸部队开始后撤。但黄维的撤退部署出现了严重错误，他不以在前线的第十军、第十八军为后卫部队，逐次撤退，而以没有投入战斗的第十四军、八十五军北进至东坪集对岸至南坪集，沿浍河南岸掩护第十军、十八军及兵团部转移。结果，入夜之后，部队在运动交接中陷入混乱，遭到解放军追击部队的袭击，损失惨重。黄维兵团撤至双堆集一带，即于26日凌晨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仅第四十九师逸出重围之外，不久在大营集被歼灭大部。

27日晨，黄维趁解放军筑工尚未完成、包围圈未巩固之机，以四个主力师部署突围。但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以担当突围先头部队为由，乘机通过解放军防线后起义。解放军随即封闭口子，阻击后续突围部队。黄维兵团第十四军遭到解放军的攻击后，陷入混乱，致使解放军突入，威胁到正在攻击前进的第十军，经过激烈战斗，才稳定阵脚。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即被破坏。28日，蒋介石即命令黄维固守待援。

郭汝瑰评论说："此次黄维兵团孤立向宿县挺进，为我战略上之失策。惟共军内线（似为外线之误——引者）作战如此灵活，则殊使人佩服。黄维兵团命运大约十日即可见分晓，万一失败，则政府军将无以善后，长江天堑亦未知能支持几许时间，可慨！黄百韬渡运河后，国军原可依内线作战要领，各个击破曹八集一带共军，但邱清泉等不机动，不了解此次战略意义，未能执行。现共军则由甚远途程集中优势兵力，以图各个击破我黄维兵团，陈毅之部队由碾庄及徐州外围各战地转用，动作如此迅速，执行任务如此坚决，国共两方将领对照之下，不必战斗，而胜负已可见矣！"[67]

徐州"剿总"部队于24日起开始向南攻击前进，但进展甚微，复遭到解放军的反击，形成拉锯战斗。黄维后撤被围，李延年兵团更不敢

向前推进，从固镇一线仓促后撤至淝河南岸，依靠河流，避开了华野的攻击。鉴于徐州陷于孤立，淮河防线吃紧，国民党军统帅部于27日命令徐州“剿总”刘峙飞蚌埠指挥，徐州方面部队由杜聿明指挥。28日，刘峙抵达蚌埠[68]。同日，杜聿明到达南京，与统帅部商讨挽救军事危机的办法。杜聿明在和顾祝同商量时主张：“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上是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69] 杜聿明因对第三厅长郭汝瑰不信任，没有在作战会议上讨论，仅就24日南进计划表示，“要求粮弹足后再动，继又欲避战，由双沟经泗阳趋五河”[70]。旋杜聿明和蒋介石密谈，经蒋批准，按杜聿明所拟计划，从徐州撤退。为了保密，这一行动没有经过国防部下达正式命令。

当天，杜聿明回到徐州，向刘峙报告后，徐州“剿总”总部人员即开始空运蚌埠。而这一军事保密行动，在国民党上层当天即传开，有人通知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要尽先撤退，引起一片混乱。是日晚，杜聿明即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司令，部署撤退，命令各军于30日对当面之敌发动全面佯击，是日晚撤出徐州。杜聿明命令第十三兵团派出一个师于29日晚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隘路，掩护主力撤退，第二兵团主力30日晚开始撤退，务于12月1日晚到达瓦子口、青龙集附近，掩护全军右翼安全，尔后经王寨、李石林到达永城以东及东南关地区，第十六兵团主力于30日黄昏后开始撤退，经萧县、红庙、洪河集，向永城西关地区前进。第十三兵团主力30日晚开始在第十六兵团后跟进，向永城北关前进。命令各兵团留下后卫掩护部队迟滞敌军，于12月1日黄昏后撤退。各兵团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行进。但徐州各兵团加上机关、民众，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心急慌忙，各图自保，只想尽早脱离危险，秩序非常混乱，徐州至萧县的公路上，车辆杂沓，道路堵塞。孙元良、李弥为了本兵

团尽早撤离，竟尽量避免和杜聿明联系，他们的后卫掩护部队也未按命令阻击解放军，全军主力尚未通过即行撤退。杜聿明对各部队的情况不明，联络困难，李弥兵团的后卫师擅自撤退，在杜聿明的严令下才返回阵地。

杜聿明的指挥部于12月1日晨撤离徐州，2日，他得悉部队在撤退中十分混乱，各部也要求稍加休息整理，同时，空军也发现解放军大部队由濉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为避免在战斗中发生混乱，遭到损失，即改变原定的是日晚继续向永城撤退的计划，就地休息整理，至3日白天，才向永城继续前进。结果，耽误了一夜的行程。

解放军华野各部追击李延年兵团受到河流阻隔，未能达到围歼目的。各部队处于待机状态，一面协助中野歼击黄维兵团，一面准备攻击徐州。30日间，华野估计徐州“剿总”动向，认为一是可能南援黄维，一是可能倾全力退走两淮，而西走武汉，东走连云港，因路程过远，可能性较小。军委估计也以徐州之敌的逃跑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于是，华野南线主力开始北撤，集结待机。12月1日上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已判明徐州敌军决心放弃徐州，但对敌运动方向尚不明了，深感敌全力南犯，对付困难，有被敌突出一路的可能。正研究部署中，是日中午，华野发现邱兵团主力到达徐州西南地区，即判明敌将沿萧县、永城南靠第十二兵团，并有敌将至阜阳的消息。粟裕为保障中野歼黄部队的安全，决心追歼杜聿明集团，除以六纵监视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以七、十三两纵在南线配合中野歼敌外，部署华野各纵分路追击，以尾追、侧击和超越追击手段，进行拦截，并部署了两个纵队向永城、涡阳急进，迂回拦截。当日晚，华野各纵奉命奋勇追击，一部占领徐州，翌日占领萧县。

2日晚，蒋介石发现解放军部署对杜聿明集团的追击，即电令杜聿明改变消极撤退部署，在战斗中求一生路：“据空军今日至晚综合报告匪情，睢【濉】溪口约一万余人，其东南地区约五千人，其西北地区之马庄、吕楼一带约二万人，合计全数不到四万人，其对蚌埠匪

部约有一个纵队，已向宿县方向行进，此股将为增援其睢【濉】溪口方面之匪部，吾弟应速决心于两日内迅速解决睢【濉】溪口、马庄一带匪部，为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之匪必于三日后麇集弟部周围，又处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切勿再作避战迂回之图。又弟部十五万众，皆聚集在大吴集周围地区，此最为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匪合击，否则臃肿滞延，又将坐待被围矣。如欲占领永城，则只可派一有力部队进占，切不可全部进攻。据空军报告，马庄匪之先头部队，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则我军又落后一着，若再用主力攻城，是最不上算，此时应决心觅匪之主力而歼灭之，为唯一急务也。”[71] 3日晨，空军又投下了蒋介石的手令：“本日空军报告，匪对弟部又将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无任系念。务望严督各军，限两日内分路击破当面之匪，严令其达成所赋予之任务，若时日延长，则二十万以上兵员之粮秣弹药，决难空投接济，惟有上下决心，共同以死中求生之觉悟，冲破几条血路，对匪反包围，予以歼灭若干纵队，乃可解决战局。”[72]

如纯以军力对比来说，杜聿明集团有三个兵团，十个军，又集中一处，解放军分多路追击，力量分散，杜聿明集团按内线作战原则，似有力量击破解放军一路，从而击退解放军的追击，进而解黄维兵团之围。但事实上，国民党军屡败之余，士气低沉，攻击精神极差，各部队争相撤退，协调困难，难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解放军则正相反，士气高涨，战力坚强，指挥统一，部队运用十分灵活。所以，国民党军已根本不可能完成蒋介石所期望的任务，但蒋不顾所部战斗精神的衰落，只要存有一线希望，就坚持要求所部将校通过力战求生，不甘心消极撤退。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惊惧万分，他“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73]。他本想独断地继续向永城挺进，但看到解放军已经部署追击，自己已没有把握安全地撤退全军，因而不敢违令独断处置，不得不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召集兵团司令到指挥部商讨决策。司令们看了蒋介石的手令，面面相觑，默不发言，独邱清泉表示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鉴

于蒋介石的严令，杜聿明及各司令官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以求得部队不被冲乱。这也就是说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分路合击。

是日，杜聿明集团滞留在孟集为中心的芒砀山、薛家湖、大回村、青龙集、张寿楼之间地区。杜聿明于12月3日、4日连电蒋介石，说明徐州原无存粮，撤退时多有损耗，目前已无法维持，要求空投补给。但蒋介石于12月4日复电竟称："弟部粮弹无法空投，切不可存此希望，应勇敢迅速突破当面之匪南下，与黄兵团会师，勿延为要。"[(74)] 蒋介石已经乱了章法，只是凭着侥幸心理在指挥作战了，气得邱清泉看完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能打仗呢？"[(75)]

3日晚，华野各纵先后和杜聿明集团接战，歼敌甚众。4日晨，华野先头第九纵队已超越杜聿明集团到达薛家湖地区，向芒砀山攻击，合围之势已成。邱清泉按昨日部署，在青龙集两侧向南攻击，但华野已筑工防御，进展甚微，而杜聿明集团的掩护阵地，则屡屡为解放军突破。战斗至6日，蒋介石再次电示作战方针："据报：弟部本日匪我两方态势，对我北面压力较大，中意此时我军既被匪包围，不宜急求突围南下，如不先彻底击歼匪之主力，则我军虽向南挺进，行动仍不能自由，故此时应觅匪主力所在方向，先行决战，必须消灭匪之主力，乃可解决一切问题，南下自不成问题矣……总之，必须彻底歼灭任何一方面匪之主力，以求根本解决，不然，如只想突围而不求决战，则断难达成南进任务也。"[(76)] 但国民党军已无攻击精神，根本不可能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进行战斗。孙元良、邱清泉看到无法达到预定目的，又改变主意，要求杜聿明部署突围。杜聿明认为全军安全撤退的时机已经错失，预计到突围后果不良，对突围并不积极，但他仍迁就了部下的要求，命令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下午，各兵团即布置突围，但经侦察和突击，发现解放军阵地重重，无法突出，邱清泉惊慌失措，再次改变主意，要求停止突围。杜聿明商得李弥同意

后，再次迁就部下要求，放弃突围计划。但孙元良没有接到命令，于黄昏后未经周密部署即钻隙突围，在解放军的阻击下，全兵团溃散，孙元良仅率数十人逃出重围。

华野在追击过程中，毛泽东于4日凌晨电示华野指挥员："此次对邱李孙作战，我各纵应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分离各军，以利歼击。这就是东北打廖兵团的办法。务必不要使敌结集成一个大集团，旷日持久，难于歼灭。"[77] 但杜聿明吸取了廖耀湘兵团失败的教训，始终团集一处，掩护严密，筑工抵抗，华野无法予以分割。杜聿明且采取了集中火力于一点进行突击的战法，压制了解放军的兵力优势。由于南线黄维兵团尚在顽强抵抗，华野不敢采取收缩南面阵地诱敌深入的战法，只能部署主力正面阻击，同时部署多路出击，以分散杜聿明部的突击能力[78]。杜聿明以一面攻击、三面掩护战法，企图突围，而粟裕采取了一面阻击、三面攻击战法，压缩包围圈，战斗十分惨烈。孙元良兵团突围溃散后，杜聿明不得不收缩阵地，调整部署，华野巩固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

四　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覆没

黄维兵团自11月26日陷围后，即全力企图突围，遭到中野的顽强阻击。中野力图以急袭手段，分割、包围歼灭黄维兵团，但遭到黄维兵团凭借既设阵地的顽强抵抗。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廖运周率一一〇师起义后，刘伯承以为敌军已经动摇，且在突围运动之中，即于27日下午向中央军委报告，十分乐观地估计，歼灭黄维兵团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并指示粟裕等立即开始部署歼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为此，刘伯承准备将华野第七、十一纵归还韦吉苏北兵团建制。但经27日战斗，黄维兵团依托阵地固守，攻歼困难，解放军伤亡严重，中野不得不于28日拂晓前停止攻击，等待弹药，调整部署，改变战术，采用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战法。并且对战斗的艰巨性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歼灭黄维兵团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为此，

中野仍留华野七纵作总预备队。此后，各部均加强近迫作业，并作局部攻击。中央军委于4日就战术问题也指示说："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79)

黄维兵团于28日转入固守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命令其扩大守备区域，以利持久。30日，蒋介石电示黄维："弟部占领区域狭小，如被匪多方炮火围击，则状至危险，故应积极向外扩展阵地，务望时时研究匪情最薄弱之一点，或其最弱之匪部，集中有力部队，彻底歼灭其一二个纵队，否则能歼灭其一二师或一二个团，亦可增加我士气，而使匪势大挫，总之，必须以攻为守，方能持久，万不可消极株守也。"(80) 原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兵团组建时未能升任，仅任兵团副司令官，在兵团开赴战区前，因父亲病危（旋即病故），离开军中。11月22日，郭汝瑰要他回到军中，但胡琏要去上海治牙，没有答应。黄维兵团被围，蒋介石令郭汝瑰把胡琏从上海找来，令他飞入双堆集，协助黄维安定军心，鼓励士气，坚持战斗。蒋并嘱胡琏："要固守下去，死斗必生！"(81) 胡琏向郭汝瑰表示："临难不苟免！"(82) 12月2日即飞抵军中。

黄维兵团为以攻为守，一度集中兵力、火力，向解放军阵地据点突击，扩大占领区域。但战斗的结果，伤亡很大，而且，阵地扩大后兵力显得单薄，不得不又收紧阵地。黄维兵团一度与解放军形成拉锯战斗，不久即不能支持，至3日，损失兵力已达3万人。

黄维兵团处境日趋困难，黄维与胡琏商量后，让胡琏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军中实情，同时觉得"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嘱胡琏留在南京不要回来。4日，胡琏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据《郭汝瑰日记》记载："（黄维兵团）拟向西打击刘伯承一、二纵队，以后即向蒙城、涡阳方面突围。总统令向东南攻击，配合李延年兵团夹击。最后又令伊依状况可以自行决定攻击方向，局部歼灭共军，以待李兵

团夹击。李兵团今日似在曹老集一带，为此滞留不前，恐一旦逸失战机，则无法援救黄兵团矣！”[83] 4日起，李延年兵团以从葫芦岛调来的第五十四军、三十九军及九十九军等三个军七个师由蚌埠怀远之线越淝河北进，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率战车第二团配属第六兵团，配合步兵作战。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协同作战。5日，进至仁和集以南、曹老集以西及苏集以北之线。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为保障围歼黄维兵团部队的安全，急调中野第二纵队、华野渤海纵队一个师及张国华部军区部队奔赴南线增援，有力地阻击了李延年兵团。李兵团在战车配合下，于10日一度进展较大，攻抵常刘家、钱家湖、崔圩子之线，但这一带系河网地带，战车不易发挥作用，第二天即难以继续进展。至16日才推进至西新集、人和集、高皇集之线。黄维兵团覆没后，即于17日撤回蚌埠。

中野从12月3日至5日进行了攻击准备，鉴于敌多已残破，能用于突围的兵力不过六个团，决定使用战役预备队，即华野的七纵、十三纵投入战斗，并将中野第十一纵归还中野，同时抽调华野第十一纵、七纵及特纵两个美榴炮连（八门）、两个日榴炮连（六门）、一个野炮连（三门）统归中野指挥。军委且一度要求华野以第十纵队及炮纵全部投入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但国民党军自徐州撤退后，华野进入追击，即调整部署，以七、十三纵归中野指挥。5日11时零5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要求各部于6日午后4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并要求连续攻击，直至任务完成，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并规定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要求“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的协助友邻争取胜利”[84]。6日，陈赓、谢富治指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等部组成东集团，陈锡联指挥中野第一、三纵队和华野第十三纵队等部组成西集团，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中野第六纵队、华野第七纵队和陕南十二旅等部组成南集团，环攻双堆集一带黄维兵团。

黄维兵团在解放军强有力的攻击下，阵地连连失守，连电向蒋介

石告急。这时，李延年兵团在解放军的阻击和袭击下，迟疑不进。蒋介石正向华中方面抽调第二十军、二十八军及第二军到蚌埠一线。但调第二军遭到白崇禧的强烈反对，12月7日第二军尚在襄阳、沙市一带。而二十军先头师则于9日到达浦口。胡琏向蒋介石请示后于6日回到军中，8日重新飞回南京，向蒋介石要求突围，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于9日又回到军中。胡琏和黄维商量后认为，蒋介石并无策应突围的部署，黄维回忆说："蒋方寸已乱，已经没有整个部署，而是零碎应付了。我们认为如果只是自行突围，将不可收拾，至少要空军有力的掩护，否则宁可坚持下去，打一天算一天，以免杜聿明立即跟着垮台。我把上述意见一面电报蒋介石，一面督饬部队继续坚持固守。"[85]

由于黄维兵团固守顽抗，中野兵力不足，缺乏重武器，虽经华野支援，战斗仍十分艰巨。国民党军已从华中抽调两个军到达浦口，不久即可在蚌埠一线投入战斗。同时，国民党军随时有可能从平津塘一带抽调兵力海运南下，而华野全军包围杜聿明集团，歼灭尚需时日。为了争取战场的主动权，解放军淮海战役总前委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大约12月10日，陈毅打电话给粟裕，指示华野调兵，刘伯承形象地表述了当时的作战方针："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10日，粟裕决定抽调第三、十一及鲁中南纵队（三个纵队相当于两个纵队的战斗力），外加一部炮兵，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的战斗[86]。

黄维兵团骨干第十八军和临战前调归第十二兵团的第八十五军，在国民党军中不属一个系统，第八十五军的第一一〇师起义后，该军余部即遭到怀疑，第二十三师被分割使用。包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与第十八军等的矛盾也更为尖锐。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之下，军心动摇。10日晚，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二十三师及该军第二一六师一个团、军辎重队、卫生队等部一万多人，向解放军投诚。

第八十五军成了空架子，黄维兵团更是雪上加霜，兵团防线洞开，主力第十八军阵地直接受到解放军的攻击。由于黄维要求空军掩护突围，蒋介石曾指示空军投放毒气弹，并向黄维兵团投放了使用和防护说明。但蒋介石经俞大维劝阻，没有付诸实施[87]。空军仅向黄维兵团投下了催泪性和喷嚏性瓦斯弹，交部队使用，但实战作用不大。11日，解放军对据守杨围子的第十四军进行总攻，军长熊绶春战死，十四军即被歼灭。黄维兵团仅剩第十军、十八军残部。

11日、12日、13日间，作战厅长郭汝瑰一再向蒋介石建议，以第二十军加入李延年兵团作战，同时建议，尽量集中京沪一带可用之兵力，以于宿蚌间决战，不能顾虑江防以分散决战兵力。蒋介石没有同意，仅于14日令第二十军开曹老集，但这时黄维兵团已难以支持。

刘伯承和陈毅于12日致书黄维，敦促其投降。但黄维仍据守阵地抵抗，还不时发动逆袭。13日，解放军为迅速解决战斗，重新调整部署，加强兵力，以华野第三纵队投入战斗，以华野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南集团华野三纵、七纵、十三纵及中野六纵等四个纵队，向双堆集附近敌核心阵地发起总攻。14日晚，各纵经过激烈战斗，大量歼敌后向前推进，华野第七纵队攻克了双堆集坚固设防的制高点尖谷堆，黄维兵团部和第十八军军部都进入解放军火力威胁范围之内。黄维和胡琏觉得兵团再行抵抗已没有价值，决定突围。15日下午，战车营未待黄昏预定突围时间即提前行动，搅乱了突围部署，各部争相逃命。突围行动很快被解放军发现，遭到坚强堵击。至深夜，黄维兵团全部瓦解。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被俘，仅副司令官胡琏乘战车逃出重围，多处负伤，于翌日到达蚌埠。

杜聿明集团自12月6日突围未成之后，仍调整部署，向南攻击，但各军士气低落，进展甚微。杜聿明打电报向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

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蒋介石复电无可奈何地表示：“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88] 解放军华野自10日抽兵增援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之后，对杜聿明集团仅以四个纵队在南面阻击，采取局部攻势，以三个纵队积极进攻，对杜聿明集团进行压迫。11日，中共中央军委为配合平津作战，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指示淮海前线将领，对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89]。此后，军委一再指示粟裕，围歼杜聿明集团各纵，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就现地进行休整，并对杜聿明集团进行政治攻势。因此，战斗规模大为缩小，战场比较沉寂。

杜聿明得悉黄维兵团突围后覆没，深感沮丧，内心责怪蒋介石未令自己与黄维同时突围，现在处境更加孤立，于是，他再次向蒋介石电陈，要求调兵与解放军决战。18日，杜聿明奉命派参谋长舒适存飞南京，面见蒋介石，商决行动计划。黄维兵团覆没后，蒋介石已令李延年兵团等部后撤，正在部署江淮防线，无法抽调兵力以解杜聿明集团之围，只好指示杜聿明，在空军掩护下，施放催泪性毒气突围。19日，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飞回军中，商讨陆空配合行动，进行突围。但是日晚起，风雪大作，直至28日，空军无法出动。而在包围圈内，粮食、燃料极端缺乏，士兵们饥寒交迫，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士气迅速瓦解。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原解放军司令部、华东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希望将领们爱惜士兵的生命，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90]。陈毅也写信给杜聿明本人劝降。

28日，天气转晴，国民党军空军恢复对杜聿明集团的空投，首先投下了黄百韬的纪念册和列有杜聿明在内的中共宣布四十三名战犯名单的报纸，以坚定高级军官的战斗决心。当时，杜聿明在军中疾病缠身，邱清泉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即电示：“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

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邱清泉也力劝杜聿明回京，但杜对邱表示：“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决不忍心。”即复电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即杜关于调兵决战的建议——引者），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91]

空投恢复之后，蒋介石既无力调兵，也未同意杜聿明坚守的建议，只是命令突围，力图侥幸保存一点实力。但杜聿明根据经验和部队状况，对突围深感疑虑，因此仍拖延部署突围。他认为：“因为统帅部、前方指挥官与部队长三者之间，各部队与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对于蒋的突围指示，各有成见，无法坚决执行，总是在互相矛盾斗争中，最后只有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迅速消灭。”[92] 国民党军中的派系人事冲突，已成痼疾，加速了军事的崩溃。1949年1月3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官兵饥饿过久，加以空投失散于各处之损失，官兵仍不得一饱，务恳明日内投足四百吨食粮，使官兵得一次温饱，五、六两日则粮弹并投，以便及早完成任务。”蒋乃决定4日至6日空投粮食三天，七八日空投弹药两天，于9日开始实施突围[93]。

华东野战军察觉杜聿明集团正等待空投补充粮弹后突围，决心乘敌军粮弹两缺、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之际，全歼杜聿明集团，即于1949年1月2日发布命令，部署各部队统一于1月6日16时发起战斗，首先攻击战斗力薄弱的李弥兵团。是日战斗发起后，各纵队进展迅速，李弥兵团阵地纷纷瓦解。至7日晨，李弥兵团被迫撤入邱清泉兵团防区。第十二军于一凡师一个团投降，于本人及另一个团被炮火隔断，未能如约投降，延迟至10日晨投降。8日，解放军调整部署。9日上午，杜聿明集团发起攻击，企图突围，遭到解放军阻击。是日黄昏前后，杜聿明同邱清泉到陈庄第五军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及战车部队在陈庄以西集结，准备10日在空军掩护下突围。但各将领深感阵地崩溃迅速，很难坚持，纷纷要求于夜间突围。杜聿明见部队已无法控制，只好同意各部分头突围，并最后发电向蒋介石报告称：“职等与

各将领报国有心，无如部队精锐伤亡殆尽，目前状况，已无法达成决战任务，只有督饬所余将士死拼到底。”蒋介石即复电杜聿明：“无论本日战况如何，明晨决派机接弟来京诊治，前方部队概归邱司令指挥。”[94] 但事实上已不可能。入夜，杜聿明集团各部一片混乱，各自钻隙突围，解放军乘机强攻，国民党军士无斗志，土崩瓦解，成师成团向解放军投降。第五军军长熊笑三未等杜聿明部署，即只身潜逃出重围，邱清泉在突围过程中被击毙，第七十二军军部投降。杜聿明身患疾病，行动不便，走到天明被俘。

10日上午，战斗基本结束，杜聿明集团仅第七十四军残部在刘集、第九军第三师残部在周楼坚持。至14时，刘集残敌被歼灭，16时，第三师师长周藩率残部在周楼投降。李弥在周楼躲到最后，化装潜逃。至此，杜聿明集团被全部歼灭。

国民党军自1948年11月5日徐州会议作出收缩兵力、进行徐蚌会战的部署，即于6日起遭到解放军的攻击，至1949年1月10日整个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在南线的精锐师团被歼灭殆尽。这一场战略决战，规模空前，解放军投入了60多万人的兵力，国民党军先后参战兵力达80万人。战役结果，解放军共歼灭（包括起义和投诚）国民党军一个前进指挥部、五个兵团部、一个绥区、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55万余人。此后，国民党军在军事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部署长江防御和阻挡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了。

蒋介石在10日自记：“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但已尽我心力，对我将士可无愧怍。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95] 杜聿明集团覆没，蒋介石也就不能不下野了。

第二节　平津战役（下）

一　天津之战

1948年底，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之后，傅作义的基本部队第三十五军、第一〇四军、第一〇五军、第一〇一军的第二七一师及二个骑兵旅等部被歼，精锐殆尽。傅作义用以困守北平的仅第三十五军的第二六二师（作为傅作义的警卫部队）、第一〇一军二个师、一个骑兵师等部。中央系部队第十三军被歼一个师，第十六军被歼二个师。退守北平的中央系部队有第十三军四个师、第十六军一个师、第三十一军一个师、第九十二军三个师、第九十四军二个师及第六十二军未来得及调回天津的第一五七师。上述这些部队加上重建部队，共二十五个师，25万人。中央系部队为北平城防的主要部队。傅作义将第十六军、三十一军等部部署在城北，将第十三军部署在城东，将第九十四军部署在城西，将第九十二军部署在城南。将本系的第一〇一军部署在广安门外，重建的第一〇四军二个师沿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外布防在第一线，以便和谈人员出入的方便，将自己的总预备队部署在内城。他将中央系部队依城布防，将中央系军、师司令部设在临接各自部队的城内，再在内城部署傅作义嫡系部队，以监督中央系军队的指挥系统。当时，蒋介石把指挥权都交给了傅作义，傅对中央系部队也常常直接指挥师团长，分割使用，以加强控制。因此，傅作义对中央系军队也具备相当的控制和指挥能力。

津塘部队名义上归津塘防守司令侯镜如统一指挥，驻在塘沽。但实际上，津塘防守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由傅作义直接指挥，塘沽防守司令段沄有事也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而侯的基本部队第九十二军被调往北平，他的第十七兵团的建制部队则驻守天津，侯镜如在塘沽就很难指挥所部军队。平、津、塘被解放军隔断后，更只能各自为战。

塘沽守军有从唐山、滦县一线撤下来的第八十七军、交警第三旅及第九十二军一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天津守军有从北平调回天津

的第六十二军二个师、从芦台撤退下来的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九十四军留津的一个师，为守备主力，加上其他扩编、新建、重建的部队达13万人。塘沽守军依托海口，随时有从海上撤退的可能，但天津孤立无援，只能作困兽之斗。陈长捷认为，天津弹药、粮食相当充足，照明器材、通信设备也数量充足、使用方便。平津塘间有无线电话和埋线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天津本身防御工事完备坚固，因此认为可以坚守三四个月。平津一体，天津的问题要待傅作义来解决，否则要影响傅作义同解放军谈判和平的“政治解决”。当解放军着手向天津外围攻击的时候，陈长捷一再接到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传达的傅作义的指示：“坚定守住，就有办法。”[96] 决心以坚守天津作为和平谈判的筹码。

1948年底，傅作义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传递信息，他没有讨价还价的政治意图。前引傅作义12月23日电就表示无任何政治企图。傅作义的主要意思是不想造成军前投降，只要如何给他一个台阶下，所以，中共中央对谈判前景比较乐观。

同时，解放军已经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部队，对平津也作好了充分的兵力部署，至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才认为可以认真考虑对傅作义进行策反的工作。为此，军委于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电示林彪，做好傅作义的工作，指示说：“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也就是和傅合作，里应外合，解决中央系国民党军队，和平解决北平。军委指示林彪，要北平地下党派出可靠同志，直接面告中共对傅作义的六点方针，并要傅保守秘密：

>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己）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97]。

毛泽东提出的这六条，一是要傅作义打消独自的政治要求，中共不会和他在政治原则上有所谈判。二是要傅作义协助中共解决北平地区的中央军，亦即将中央军缴械。但对傅作义总的态度是温和的，条件也比较宽松。

当时，白崇禧已经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各方面的和平运动十分活跃。傅作义也想发表通电，创议和平。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不得不作出愿意与中共和谈的姿态，而在开国纪念典礼上则

表示“不能战，就不能和”，“能战才能和”[98]。3日，蒋介石又分别致书傅作义、李文、石觉、侯镜如、陈长捷、邓宝珊、孙兰峰，企图以空言激励士气：“今我挟优势之兵力，守土御匪，益以傅总司令之指挥，本其平素负责从事之精神，策划督战，期在必胜，所望我将士团结一心，服从命令，认识此战不仅为保卫平津华北之战，乃我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成败之战，亦即争取我国家民族独立生存之战，此战而胜，即为全般战局最大之转捩。”[99] 鼓励傅作义和北平中央系军队继续抵抗。

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下达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奉命派李炳泉面见傅作义作了转达，据说“傅作义听了这六条意见后如释重负，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未表示完全接受我方条件的决心”[100]。事实上，要傅作义完全放弃政治上的要求和缴中央军的械，对傅作义来说，都不是容易下决心的。

为此，毛泽东于7日指示林彪：“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101] 毛泽东要求林彪准备武力解决，炮击机场，认为只要能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必能迫使傅作义就范，按照中共方式和平解决。当时，毛泽东对美国策动第三条道路，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制造反对派，保持着极为敏感的警惕性，极力阻止傅作义可能存在的企图，即将他的部队变为第三条道路的军事力量。

据王之湘回忆，他当年参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商议时，听邓宝珊说，当时确有人教傅作义提出政治条件：“有人向傅将军建议，作为和平解决北平的条件，要提出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即由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以及志愿参加的国民党人士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保留傅作义的现有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维持治安。据说这是为了‘缓和国内战争，防止国际战争’的暂时办法，将来如何，要看局势

而定，如能达到国共合作，就成立统一的联合政府。”据王回忆，蔡运升告诉他，附条件的方案和美苏必将发生战争问题，傅作义说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和建议的，傅“虽然明知附条件的方案人民解放军决不能接受，但对美国武装干涉和引起美苏战争的说法，还是对傅作义有影响”[102]。这个方案如果出自燕京大学教授，自当是张东荪，但从时间上判断，应属出自中共当时判断的彭泽湘。详情待考。

这时，傅作义通过他的一位老朋友侯少白的推荐，请燕京大学教授、民盟成员张东荪帮忙，与解放军谈判。傅作义亲自宴请张东荪，同张交换了意见，要张代表他出来谈判，但张表示：“你是蒋介石的官，我是民主同盟的分子，我不能当你的代表，我只能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对方。”张东荪愿意居间促成和平，但要傅作义派一个代表同自己一同去和解放军谈判。于是，傅作义选择了周北峰。周系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土地处处长，以往傅与中共方面联络，多由周作代表。经过傅作义方面和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崔月犁的安排，周北峰和张东荪两人于6日10时出城，穿过火线，路经清河镇，第二次与解放军进行谈判。

林彪认为傅作义没有决心缴枪，准备13日总攻天津。中央军委于7日15时电林彪、聂荣臻，要他们让周、张对六点意见表示态度，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

（1） 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2） 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3） 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

（4）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103]。

7日晚，张东荪、周北峰到达林彪驻地附近，8日晨，聂荣臻先和他们谈判。张转述了傅作义的几点意见：

（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张谈：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陪衬语）；（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当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104]。

1月9日2时，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复林彪、聂荣臻电，就傅作义所提条件作出明确的指示：

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105]。

是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从孟家楼司令部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东荪开始正式谈判。在会谈中，林彪表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毛7日电，不能称起义，显系回忆时误称——引者），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

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此后的会谈，周北峰根据傅作义的指示，商谈改编的具体问题。同时，周北峰还转达说：“傅还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106]

在谈判期间，傅作义于1月9日通过北平《平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转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关部队问题，“亟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订”[107]。

同时，蒋介石于6日派特工头目、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赴北平慰劳各军将领，并同傅作义长谈一次，要傅与蒋的和平取一致步骤，并空运军队至南方。郑于7日晚回南京[108]，翌日向蒋介石报告平津局势已经严重，天津近郊已发生战斗。蒋介石与傅作义商量，决定令北平各军由空运撤退至青岛[109]。9日，白崇禧向蒋介石呈文，表示“我非运用国际力量，不能阻止中共行动”，希望通过国际力量，阻止解放军的进军[110]。

在这种形势下，解放军前线将领林彪、聂荣臻和统帅部的毛泽东都认为傅作义命令中央系军队出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而也不相信傅作义关于为打通思想做说服工作需要时间、希望顾及事实的要求。他们判断傅作义关于能够控制中央军的说法，不过是一句空话，除了借此拖延时间之外，别无意义。尤其是傅作义的9日电，更加深了这种疑虑。但毛泽东认为，傅作义既然提出了离城整编的问题，解放军就可以将计就计，同意离城整编，一旦军队离城，就有办法缴械，这样可以争取谈判中的主动；如果傅作义做不到，就揭露傅作义的欺骗性，使人们觉得解放军已经仁至义尽。而对于傅作义在政治上的表白，毛泽东十分反感：“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后来事实说明能指挥——引

者）。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111]

10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午后，解放军方面整理了一份《会谈纪要》，由双方签字。纪要规定，1月14日以前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解放军方面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签字，傅作义方面由周北峰签字，张东荪因是民盟成员，不能代表傅作义，所以，没有同意在纪要上签字，并表示要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第二次谈判即告结束[112]。11日，傅作义电告林彪，将派邓宝珊作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加强平津战役及平津塘地区的领导，于1月10日组织总前委，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林彪为书记。随后，平津前线司令部从孟家楼移到通县附近的宋庄。

这时，解放军已作好了攻击天津的准备，即将天津问题作为试探傅作义诚意的筹码。11日，军委答复林彪、聂荣臻关于和傅作义代表谈判问题的请示说：“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113] 12日，毛泽东虽然已经知道傅将派邓宝珊出城谈判，仍不敢松懈，指示林、聂，要在谈判中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9日电所持立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

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还指出：“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114)

天津城防，筑有环城碉堡工事千余座，外侧筑有护城河，引进运河水源，水深可达3米。天津南北长达12公里，东西宽仅5公里，海河贯流南北分割市区，在城北与北运河会合。陈长捷以第八十六军守备河东，指定一个加强团死守阵前东局子据点，以第六十二军守备河北，以一个加强团据守宜兴埠，重点保持在西侧的西营门方面，以第九十四军的第四十三师及收编溃军而恢复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守备西营门以南的西南地区，以河北保安团据守东南方向的灰堆据点。在东西蜂腰部的民族门和西营门令八十六军和六十二军在第二线上控置有力部队，以免被南北截断。准备以两个护路旅和静海保卫团等为预备队。

12月21日，东野第九纵队占领咸水沽，截断了天津守敌的南面退路。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感到兵力不足，宜兴埠孤立，即令守军撤退。守军撤退时竟纵火焚村，陈长捷得报，即令第六十二军及市消防队全数出动，但已扑救不及，造成灾民遍地。林彪和毛泽东原计划首先攻击塘沽、军粮城，但经东野第七纵队侦察，塘沽系水网地带，兵力不易开展，敌指挥机关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撤退，如进行攻击，伤亡大而收获小。同时，林彪察觉平津之敌有突围迹象，而当时东野兵力分散，南线杜聿明集团尚未歼灭，有被敌军突出重围的危险。因此，林彪于12月29日，将准备攻击塘沽、大沽的部队移到天津附近，并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放弃攻击两沽计划，准备集中五个纵队攻击天津，同时，调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会攻北平，阻敌南逃。

1949年1月2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以刘亚楼为前线总指挥，设司令部于杨柳青，着手扫清天津外围阵地。5日攻占灰堆，7日攻占东局子，9日攻占鲁西义地、安徽义地及丁字沽一线。至10日前后，扫清了敌外围阵地，直逼城防工事，于13日完成了攻击准

备。

当时，天津各界如工商界的李烛尘等也在运动和平。1月9日天津市参议会代表丁作韶、杨云青、胡景熏、康相九四人出城谈判，提出天津和平解决的意愿。10日刘亚楼与他们谈判时提出四点："（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盼和平解决，藉免遭受战争破坏。（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人民解放军停战二十四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使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115)] 但这些谈判均遭到天津军方的破坏，没有结果。

11日，解放军向陈长捷送达了林彪签署的致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的信，最后劝告他们放下武器，限12日晚答复。陈长捷在和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商量时表示："还是等待北平和谈成功，一起行动。"陈长捷打电话向总部请示，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决心再顶一段时间。为了拖延时间，复信敷衍说："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如果共谋和平解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116)] 这里，天津国民党将领所谓和平解决，是指让他们全师回南方，和平让出天津。

陈长捷拒绝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解放军即决心攻克天津，以军事威力，促进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当时，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已到达林彪驻地附近的五里桥进行谈判。邓宝珊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林彪说："三天。"邓宝珊说："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但实际上，林彪的决心和估计是"战斗开始后，最多三十小时可以全部解决"[(117)]。

林彪对于天津的攻坚战斗，已于1月7日作好部署，集中了第一、二、七、八、九等五个纵队的兵力及特种兵大部。当时，东北野战军

兵员充实，战力强大，用兵十分富余，因为第十二纵队要求参加攻坚锻炼，增加了该纵一个师，又因刘亚楼的要求，增调第六纵队长于巷战的第十七师参战，总兵力达二十二个步兵师，共34万人。林彪以攻击天津蜂腰部、突破后分割天津守军，然后先弱后强，即先南后北，全歼敌军为战役指导思想。以两个纵队攻击西营门一线，以两个纵队攻击民族门一线，以一部兵力在南北两端进行攻击。在攻击准备阶段，各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攻坚演习。由于天津守军拒绝投降，林彪于13日19时，向刘亚楼发布了14日开始攻击的命令。

14日10时，解放军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击，八个突破口，经步、工、炮和坦克兵的协同作战，一举突破成功，即向纵深大胆穿插，然后分割包围，对敌强固据点组织攻击。天津守军主力第六十二军的第一五一师，为解放军北面佯攻所迷惑，不敢移动，置于无用之地。天津守军在解放军的分割包围下，迅速瓦解，许多部队未经抵抗，即纷纷投降。是日夜，陈长捷用电话召集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商量对策，决定放弃“核心抗拒”计划，停止抵抗，就地放下武器。杜建时即于深夜邀请李烛尘、杨亦周（参议会议长）商量，于15日凌晨由杨亦周广播和平宣言。但为时已晚，15日晨，东西对进部队在市中心金汤桥会师。8时，攻占市内最坚固的支撑点海光寺。这时，傅作义从无线电广播中得到解放军宣布突入天津市的消息，急忙亲自用无线电与陈长捷通话，这是天津被围后，傅作义和陈长捷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话。陈长捷报告了天津战况和会商的结果，傅作义即表示：“可以接洽和平吧！”[118] 正在这时，约上午10时，解放军冲进了天津警备司令部，俘虏了陈长捷。至15时，解放军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战斗结束。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均被俘虏。

16日，津沽防守司令侯镜如向蒋介石报告解放军进逼塘沽，战况激烈。蒋即复电询问并指示说：“傅总司令有否电令撤退？如万不得已时，一面向傅总司令请示，一面撤退可也。”[119] 17日，侯镜如接

到北平转来的蒋介石电报，于是，立即撤守电台，命令各部上船，撤往上海。

二　北平和平解放

周北峰于1月10日回到城里后，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并交呈了《会谈纪要》。傅看完后只是唉声叹气，最后说："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120] 同时，傅准备派周北峰和邓宝珊再次出城谈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私交很好，又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不过邓是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的过时的将领。他驻守榆林时，和延安中共的联系相当密切。所以，傅作义于1948年12月28日用飞机把他从包头接来，作为真正能够代表他进行谈判的人选[121]。邓宝珊到北平后，傅作义和他及马占山进行了多次商谈。傅作义深感和战两难，迟疑不决，甚至希望发一个和平通电后，即将军队交给李文，自己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一走了之。他既不愿承担死战破坏古都的责任，一时也不愿按照中共的条件交出军队。他在13日、14日间，还对周炳琳等大学教授说："今天需要和平，人同此心。谈和平是要和的和平，在和以外的无法谈，而且和平之权〈在〉对方。"[122] 也就是拒绝投降。

13日，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代表傅作义进行第三次谈判，经清河镇到达五里桥。14日，首先由聂荣臻同邓宝珊、周北峰谈判。聂荣臻在谈判时态度严峻，痛斥傅作义罪大恶极，仍然企图走中间路线，指出唯一出路就是坚决地遵照中共的六点指示去做，中心是里应外合解决中央军。只有这样，才能立功赎罪。这时，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聂荣臻向邓宝珊指出，由于傅拖延太久，解放军才攻击天津，傅应对天津的战争损失完全负责，要傅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由于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傅作义所要求的平、津、塘、绥整个和平解决和平津问题先停战三日已经做不到。

与此同时，傅作义仍未断绝和蒋介石的联系。根据蒋介石的要

求，13日起北平部队空运青岛计划开始实施。蒋介石为了阻止傅作义实现平津和平，嘱国防部长徐永昌致函傅作义，“希其率部移防青岛，予以指挥豫鲁军事之全权”[123]。傅作义又于14日致函蒋介石，建议一是向津塘方向出击，二是空运转移，同时表示：“共匪对职仇恨甚深，实无能完成此最后任务，初步安排后，请即调职赴京，追随左右，另行指定人员，指定部队，在平办理。”[124]他给自己仍留着一条脱身的后路。为此，蒋介石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平安排，16日傅作义向蒋介石报告说：“王副总司令叔铭昨飞抵平，交示钧谕，敬聆种切，谨遵指示，即按第二案实施。惟天津情况影响北平士气民心，至为严重，社会言论竟明示对守城者之怨怼，部队士气消沉，亦无法鼓励，瞻念前途，焦虑无似，为实施第二案，请饬派大批飞机尽量尽速来平空运，争取时间，俾求达成预期目的。”[125]但同时，傅作义让周北峰通知解放军，炮击天坛机场，迫使空运飞机不敢降落，阻止了蒋介石的空运计划[126]。

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傅作义在谈判中已完全没有力量。15、16日间，毛泽东连续对林、罗、聂就谈判方针作出指示，并为林彪、罗荣桓草定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书面通牒，即《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毛泽东指出：“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127]16日，毛泽东要林彪于当日将这封书面通牒面交傅方代表，要傅作义方面在“决心和平缴械或决心和平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决中央军”，三项方案中选择一项。要傅方“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毛泽东指示说：“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同时，毛泽东要求前线将领积极准备攻城[128]。

不过，在北平前线，和平解决的谈判这时进展顺利，开始迅速达成协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15日同邓宝珊、周北峰在五里桥的谈判，“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129]。16日，解放军迅速攻占天津的消息，也已通知了傅方代表，大势已无可逆转。是日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再次同邓、周等会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林彪出面采取了和缓诚恳态度（不盛气凌人），劝告傅方代表和平解决。同时提出：“限本月二十一日，首先开出一个军至北平城外三十里至六十里间地区（除宛平、通县两方面外，任何方面均可），以后再陆续开出。”邓宝珊表示接受。邓要求解放军派代表同他一起入城，林即派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为代表。邓随后询问了傅作义将来的出处，林回答：“傅之位置有二：一去台湾，一留北平。”这次会谈的气氛良好，林、罗、聂对是否交出措辞严厉的通牒很是踌躇，但邓宝珊要走了，不允许再考虑，即照中央命令“机械的递出”。然后嘱咐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130]。

在此同时，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及北平各界人士也参加了和平运动。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的北平市前市长何思源，为了免除北平200万人民的战争痛苦，保护几千年的文化古迹，也积极奔走和平，希望傅作义不要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并向军师长们游说。1月15日，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16日，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等七人也通电呼吁停战，但他们附有政治条件，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认为：“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生活自由，既为人民共同之要求，又与贵党主张最为接近，同人等站在人民观点，极望早日实现和平，共谋合作。”也就是“今日与傅作义先生合作，正为贵党主张之试验，亦为影响全国之契机”。通电在政治上对中共要胁说：“总之，人民所希望于贵党者，为博为大，如贵党昭示于人民者，为褊为狭，则向日输心

同情于贵党者，势将失望而去之。谅为智者所不取也。”[131] 许惠东一类政客的主张，当然不为中共所欢迎。

17日中午，在傅作义的支持下，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聚餐会，到会的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和代表、北平市工商、教育界的代表、北平市前市长何思源、市长刘瑶章，中央系各军官长、傅作义总部将级军官，共五桌，约五十人，还有许多记者。会上发言者一致要求和平解决，军人们则一言不发。会议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十人为和平代表，准备于18日出城向解放军正式请求“停战十日，进行和平谈判”[132]。18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安放在何思源家屋顶上的两颗定时炸弹爆炸，造成何一家六口一死五伤的惨剧。何不顾伤痛和家人的死伤，仍坚持和代表们一起出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莫文骅接待了他们，他们要求解放军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希望双方谈判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

苏静随同邓宝珊于17日到达北平后，即与傅方代表崔载之等根据城外达成协议的基本精神，商议具体条款。双方先草定了“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之疑异，需傅适时对部队及机关说明和准备要点”，共十四条，由苏静于19日22时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报告，林彪、罗荣桓于20日11时半转报中央军委，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请中央逐条指示答复。中央军委于21日4时逐条予以答复[133]。最后形成了一个十八条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并于21日由苏静作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作为政府军华北总部代表正式签字[134]。

20日，傅作义派飞机赴重庆接回了家属，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和平协议。中央系军官在既成事实面前已无力抵抗，协议宣读后，李文、袁朴等痛哭流涕：“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最后，他们希望能够让他们走，得到傅作义的同意[135]。22日下午6时，傅作义向各界并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北平和平的文告，并公布了部分协议条款。文告说：“为迅速缩短战争，

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云云[136]。按协议书规定，“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137]。而《世界日报》在22日的消息报道中还杜撰说：“闻对方同意傅作义将军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生活自由之主张，深愿与其携手。”

22日上午，傅作义开始执行协议，傅作义的亲信部队骑兵第四师、第一〇一军首先开出城外，其余傅系和中央系部队在以后几天里，也陆续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准备接受整编。至1月30日，除殿后部队外，都已出城，31日，殿后部队第一〇四军及十七师全部开出[138]，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即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于31日午后1时先开一师进城。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

就在北平宣告和平的前一天，即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但他仍手书傅作义、李文：“余虽下野，希嘱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139] 至24日，蒋介石仍希望顾祝同令李文指挥中央各军积极准备战斗。但北平和平已成定局。于是，蒋介石于26日向傅作义提出要求：“（甲）中央各军分途突围，作九死一生之计，与其坐任共×宰割侮辱，不如死中求生，发挥革命精神。（乙）如甲项已不可能，则要求傅负责照原定方针，先让国军空运南撤。（丙）如乙项亦不可能，则必须将中央军各级官长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傅编配。（丁）为实行丙项之方针，其意即宁可全军交傅，而不愿由×整编，以保留国军革命之人格，此为对傅最低限度之要求。（戊）如丁项亦不可能，则要求其将师长以上各高级将领，空运南归。”[140] 当时，解放军采取了“兵收留、官放走，不安于位的并表示可以让他们走”的方针[141]，于是，傅作义经解放军方面同意，让李文、石觉等

军师长，及挑选的部分军官携带轻机枪数十挺，乘飞机离开北平，于1月31日前往青岛。

傅作义的部队开始出城后，傅作义和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东单机场也没有关闭。26日，解放军方面参加联合办事机构的成员陶铸进城准备接管事宜后，傅本人也多次向陶铸表示，愿意作为促进中共和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和平谈判的桥梁。傅作义虽然在军事上接受了出城整编的方式，但在政治上，中共方面认为他还没有靠拢，还在搞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傅与李、白拉紧，想把南京一些人弄进来，以壮声势，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最近并用推迟我之进城时间，对部队发两个月的饷，对被拆毁房户进行赔偿救济，并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142] 对此，中共当然不能允许。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必须叫邓宝珊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或前一天，把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交给傅作义，以便新华社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公开发表。这封公函历数傅作义作为战争罪犯的罪行，要傅作义遵照解放军的条件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求自赎"[143]，以此攻破傅作义的政治立场。在政治原则上，毛泽东要求傅作义公开声明反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政府，表示今后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事业服务，并承认以往进行反革命战争是绝对错误的，愿意痛改前非，将功折罪。

邓宝珊当时担心和局有变，没有把这封林罗公函交给傅作义，苏静接到林彪的指示后，即敦促邓宝珊转交，据说邓又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托她转交[144]。2月1日这封林罗公函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同时，毛泽东则为新华社写了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对傅作义文告中的政治性表白进行了批驳，只是指出："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

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145] 傅作义见了林罗公函，写了一封长信给林彪、罗荣桓，说明自己一直没有看到这封信，只是于1月31日晚，他同苏静、邓宝珊谈话时才知道有这封信，并表示如指定一投案地址，他在一小时内一定前往投案。对此，毛泽东指示林彪于入城后，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146] 后来经过林彪、聂荣臻及叶剑英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也亲自和他谈话，才缓和了他的情绪。直到4月1日，傅作义才发表了关于北平和平的通电，反省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147] 打消了傅作义分享政权的念头，毛泽东则对傅作义的通电表示欢迎。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政府军一个“剿匪司令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除归绥已在和平协商范围内之外，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太原一个重要的孤立据点。

---

(1) 淮海战役参战部队双方均非一次性投入战场，而是逐次抵达战场，总兵力只是个概略的计算。据刘峙《我的回忆》说：“会战初期，仅2CA三个军，7CA两个军，13CA两个军，16CA两个军，合共九个完整军，兵力与匪廿三个纵队相较，我为绝对劣势。”刘峙的说法，纯系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则国民党军徐州一线兵力远不至此数，二则华中部队本负有钳制刘伯承所部的任务，三则解放军二十三个纵队也不是都齐装满员，会战初期刘伯承部到达徐州一线仅四个纵队。而从实际战斗来说，刘伯承部主力用于对付黄维兵团，尚感不足，仍要华野支援，根本不存在刘伯承部以全力与粟裕部合力对

付刘峙九个军的战场形势。——笔者。

(2)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3) 《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9页。

(4) 《中央军委关于批准举行淮海战役及战役第一个作战应歼灭黄百韬兵团致饶漱石、粟裕的电报》（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1册，第52-53页。

(5) 《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27页。

(6) 参何晓环等：《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7) 《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的几点意见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0月11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63-65页。

(8) 《推迟攻击郑州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1948年10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83-84页。

(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5日。

(1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2日。

(11)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3日。

(12) 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2页。

(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28日条。

(14)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2日。

(15)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8日。

(1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9日。

(17) 郭汝瑰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3-54页。但据郭汝瑰29日日记："刘为章即强调退守淮河耳。"

(18) 《郭汝瑰回忆录》，第323-324页。

(19) 覃戈鸣：《桂系在淮海战役中的态度及白崇禧“备战求和”阴谋的幻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27页。

(20) 《郭汝瑰回忆录》，第322-326页。按：据刘峙回忆：“国防部拟撤守淮河，但各兵团司令官以为时机已晚，敌前撤退，最为不利，不如决一死战。乃决定‘备战退守’，即一面先集结兵力，准备应战，一面撤退物资，并将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军，改向徐州陆路撤退。”（《我的回忆》，第165页）10月24日部署系按照蒋介石“酉敬防挥中电”，参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据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藏重新打印件）。——笔者。

(2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154页。

(22) 《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1948年11月4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17-121页。

(23) 陈士章：《第七兵团的毁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90页。

(24) 陈士章：《第七兵团的毁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91页。

(25) 李以劻：《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69页。

(26) 何基沣：《运河前线起义》，《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42页。

(27) 这次战斗，有关回忆录资料和粟裕报告有所不同，如粟报告为八纵歼二十五军，而回忆录系四纵歼二十五军一〇八师，八纵歼一〇〇军四十四师两个多团，此从回忆录。参《淮海战役》资料，不一一注明。——笔者。

(28) 郭汝瑰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7页。按：即“戌蒸防挥督电”，参《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西的部队实际上仅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笔者。

(29) 转引自王道平等著：《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132页。

(30)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31)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32) 《粟裕关于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10月31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03页。

(33) 《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统一指挥问题致陈毅、邓小平、粟裕的电报》（1948年11月1日），《淮海战役》，第107页。

(34) 《陈毅、邓小平关于钳制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的新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2日），《淮海战役》，第111页。

(35) 《中央军委预计第一仗歼敌二十一、二个师第二仗打黄维、孙元良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的电报》（1948年11月7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29页。

(36) 《粟裕谈淮海战役》，《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37) 《粟裕、张震关于敌可能采取的方针及我之对策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32页。

(38) 《中央军委关于破坏敌人总退却计划歼敌于淮河以北致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1948年11月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36-137页。

(39) 《中央军委关于勿使徐州敌人南窜致粟裕、张震的电报》（1948年11月9日），《淮海战役》，第138页。

(40) 刘镇湘：《第六十四军碾庄圩覆没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32页。按：刘回忆会议于9日上午召开，各回忆录有出入，按各部队运动状况，推算为10日上午的可能性较大。——笔者。

(41) 黄百韬1948年11月10日致蒋介石、顾祝同、刘峙电，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50页。

(42) 《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1948年11月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35页。

(43)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五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原局、华东局电》，《粟裕军事文集》，第409页。

(44)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45)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4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4日。

(47)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4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5日，并参郭汝瑰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8页。

(49) 《粟裕军事文集》，第409—410页。

(50) 《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1948年12月31日），《粟裕军事

文集》，第446页。

(51)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1949年1月20日），《粟裕军事文集》，第464页。

(5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8日。

(53)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9日。

(54)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55) 邓文仪：《革命英雄邱清泉》，《邱清泉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56) 邓文仪：《革命英雄邱清泉》，《邱清泉传记资料（一）》，第75-76页。

(5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0日。

(5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1日、22日。

(59) 《郭汝瑰回忆录》，第332页。

(60)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歼击黄维兵团之作战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14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54页。

(61)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歼击黄维、李延年兵团之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决心先打黄维兵团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1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70、175页。

(62) 《中央军委关于下步作战目标致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1月1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72页。

(63) 《粟裕、陈士榘、张震关于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兵团的部署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11月20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81页。

(64)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歼击黄维兵团的部署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1948年11月23日22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89页。

(65) 《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兵团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11月24日），《淮海战役》，第197页。

(6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5日。这时黄维已开始撤退行动，郭的建议当系24日夜发。——笔者。

(6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7日。

(68) 据刘峙：《我的回忆》，第166页。

(69)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页。

(7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8日。

(7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日条。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3日条。按：据杜聿明回忆，手令在前，电令在后。这里据长编稿。——笔者。

(73)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4页。

(74) 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206页。

(75)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7页。

(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6日条。

(77) 《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以利歼击》（1948年12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13页。

(78)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亥时报军委电》，《粟裕军事文集》，第436页。

(79) 《中央军委关于打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12月4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229页。

(8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30日条。

(81)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90页。

(8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日。

(83)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4日。

(84)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布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1948年12月5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233页。

(85) 黄维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91页。

(86) 《粟裕、谭震林等关于增调三个纵队参加打黄维兵团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234页。按：陈毅打电话的时间，回忆不一，此按电文情理推断。——笔者。

(8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3日）：“总统曾授意空军投糜烂性

毒瓦斯，闻经俞大维劝阻乃止。”

(88)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0页。

(89)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62页。

(90)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17-418页。

(91)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5页。

(92)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6页。

(9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3日条。按：据杜聿明回忆，定10日白天在空军掩护下突围。——笔者。

(9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9日条。

(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0日条。

(96) 陈长捷：《天津战役概述》，《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82页。

(97) 《中央军委关于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平津战役》，第231-232页；又据《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4-55页。按：两件文字有异同，引文作了校对。——笔者。

(9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日条。

(9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3日条。

(100) 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28页。

(101) 1949年1月7日5时中共中央军委复林彪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0—431页。

(102) 王之湘：《傅邓马会谈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40-341页。

(103) 《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四点意见的电报》（1949年1月7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6-57页。

(104) 据林彪、聂荣臻1月8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注（1）。

(10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

(106) 周北峰：《北平和谈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98页。

(10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3页注（2）。

(108) 郑介民回南京日期，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8日。

(1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8日条。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9日条。

(111)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1日致林彪、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2页。

(112) 周北峰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99页。按：日期按297页注修正。——笔者。

(113)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1日复林彪、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3页。

(114)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2日致林彪、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3—434页。

(1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4页注（1）。

(116) 杜建时：《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20-221页。

(117) 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32页。

(118) 陈长捷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84页。

(11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6日条。

(120) 周北峰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01页。

(121) 邓宝珊到北平时间，据《新闻报》（上海）1948年12月30日报道。

(122)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5日。

(1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3日条。

(12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4日条。

(12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6日条。

(126) 王克俊、周北峰回忆（参《平津战役亲历记》），时间有误，实际阻止空运当系13日之后，与李文等撤走无关。——笔者。

(127)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7页。

(128) 《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指示的电报》（1949年1月1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0-61页。

(129) 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33页。

(130)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邓宝珊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情况报告》（1949年1月17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6-67页。

(131) 《世界日报》（北平），1949年1月17日。

(132) 《世界日报》（北平），1949年1月19日。

(133) 《军委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给林彪、罗荣桓的指示》（1949年1月21日）及附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63-71页。

(134)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8-71页。按：该件署为1949年1月19日，实际拟定及签署当在谈判代表接到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21日4时复电之后，如第十五条、十六条，即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定。签字日期据苏静回忆。另据苏静回忆，“毛主席对条文内容和词句作了一些修改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台发回，遂成正式协议”（《平津战役》，第635页），但上述中央军委电系原则指示，我们未见到毛泽东修改后发回的文本，定稿经过待考。——笔者。

(135) 参安春山：《退守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前后》，黄翔：《第九十二军在北平和平起义经过》等，《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82、401页。

(136) 《世界日报》（北平），1949年1月23日。

(137)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8-71页。

(138) 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1页。按：未查到十七师番号，疑为一五七师之误。——笔者。

(13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21日条。

(14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26日条。

(141)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1页。

(142)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1页。

(143) 《林彪、罗荣桓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函》（1949年1月16日），《平津战役》，第250-251页。原注：这封公函新华社于1949年1月31日播发。

(144) 据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40页。

(145) 《平津战役》，第268页。

(146) 《中央关于向傅作义及其左右说明我之态度等问题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08页。

(147) 《傅作义将军通电》（1949年4月1日），《平津战役》，第278-279页。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一节　财政金融的严重危机

一　财政收入状况的严重恶化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一度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力。一是拥有9亿美金的储备；二是拥有黄金410万两；三是出售敌伪产业，1945、1946年两年约有1.2万亿元以上法币；四是联总的救济物资，合计有3.7245亿美元；五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除去上述的联总部分，达17.05亿美元[(1)]。这笔可观的资产，如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用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完全可以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良性轨道。但是，国民党依仗其拥有的军力和财力，一心希望速战速决，解决中共的问题。而结果，在军事上损兵折将，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在财政上耗尽了国库。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战争仍在继续，国库则已难以为继。

1947年2月黄金风潮之后，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60%，无法再用出售黄金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宋子文不得不下台。由于美国的压力，4月间政府改组，扩大统治基础，吸收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加入政府，张群于4月17日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俞鸿钧为财政部长。蒋介石希望以此获得美国同意予以财政支持，美援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挽救财政危机的唯一希望。

5月7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向国务会议报告，目前财政部的中心工

作系设法使本年预算收支接近平衡。财政部预计当年支出须20万亿元，收入仅10万亿元，不足之数，以发行美金债券、出售敌伪物资等予以弥补[2]。但张群在财政金融方面并无实力，黄金外汇已经空虚，他无可奈何地说："蒋主席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蒋主席经济上没办法，我也无办法。"美金债券的发行，曾有江浙财团的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寄庼、杜月笙等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行销不到5000万美金，因此形成一个空前的滞销局面。张群内阁借内债遭到挫折，美援一时无望，仍然只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3]。

据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4]，是年预算执行情况如下表（单位为法币）：

预算岁入	73,600亿元	执行结果	138,300亿元
预算岁出	93,700亿元	执行结果	409,100亿元
赤字（债款）	20,100亿元	执行结果	270,000亿元

岁　入	百分比	岁　出	百分比
总数 138,300 亿元	100%	409,100 亿元	100%
赋税 91,400 亿元	66%	军费 213,100 亿元	52%
赋税以外收入（敌伪物资、剩余物资、黄金售价、国营事业收入） 28,700 亿元	21%	政务费 100,800 亿元	25%
		事业费 56,200 亿元	14%
		省市补助费 29,300 亿元	7%
		债务 9,900 亿元	2%
债款 18,100 亿元	13%		
收支差额（银行垫款）	占岁出百分比		
270,000 亿元	66%		

到1948年上半年，实际支出高达340万亿元，而赋税收入仅为50万亿元，赋税收入占支出的比例降到了14.7%[5]。

造成赋税收入不能支持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因是通货膨胀，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庞大的财政赤字，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1948年出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说：“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况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飞涨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6)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赋税收入，中央税收以关税、盐税、货物税（抗战胜利以前称统税，系由厘金演变而来）、直接税为四大税收体系。盐税和货物税均为间接税，都是消费税，都可以转嫁到普通人民头上，占了四大税系收入的一半以上。对农村维持征借征实，进行掠夺。税法落后而繁重，苛捐杂税，税率重而征不足额，中饱严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侵扰，而国库依然空虚。因此，一方面人民深感苛捐杂税的痛苦，而另一方面政府赋税的实际收入日益下降。

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舆论对当局的税收制度和状况深感不满，尖锐地指出：“现在每一个人，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生活，简直是无一不捐，无一无税。现在大家都说，中华民国‘万税’，我想即便没有‘万税’，至少‘千税’是有的。”“正当工商广大农民为其课征对象，但税率越重税法越繁，造假帐逃税的行为必定越多，贪官污吏乘机敲诈中饱的恶习亦必越盛。因此辗转循环，互为因果，遂成百姓出十，政府得一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的收支，在此情形之下也就越来越加无法维持了，最后终非全部宣告崩溃不可。”“这种苛征重税，逼得家家工厂都非造假帐不可，目前上海的工商，至少都有两套帐簿，要是一套帐簿早就关门了。”(7)

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仍然在强化税收。关税税率并不重，但走私十分严重。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8年3月20日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走私影响关税收入尚在其次，其妨害国民经济，实最重要”(8)。6月间订定加强华南缉私方案，加强海关缉私力量，并由海军总司令部调派炮舰协助查缉，缉获走私案件2300余件，货值达3170余亿

元。1948年初一个半月，缉获走私案件2900余起，货值1000余亿元。1948年1月，并与香港方面订立中港关税协定，以便在香港进行缉私。由于税率偏轻，中国方面准备在联合国贸易就业会议之后，协商修订关税税则。1947年已恢复了汽油、柴油的进口税，提高了煤油的税率。但是，“在目前输出入货物继续采行全面管理制度之下，关税收入自难望大量增加”[(9)]。

盐税于1947年实行了改革，3月12日公布《盐政条例》，采用民制、民运、民销政策，而由政府在产销方面予以调节管理，废除了专商引岸制度。税率于年初和8月间两次调整，但仍不及物价增长指数之半。税率于1947年8月15日全国划一，食盐税率调整为每担10万元，续后追随物价，一涨再涨。12月28日调整为25万元。1948年2月28日，为配合“戡乱”，补助地方自卫经费，每担食盐征收附加税10万元。3月26日，又调整盐税税率为每担35万元。盐税上涨赶不上通货膨胀，于是到1949年1月1日当局公布了《盐税计征条例》，改为从价征收，以平均盐价减除实需成本数，每担食盐，海盐征70%[(10)]。

货物税由厘金演变而来，包括统税、烟酒税及矿产税，已经跃居税收的首位。1947年间，适应通货膨胀的形势，调整税价税额，简化品目，甚至采取了规定卷烟、火柴等厂的最低产量来保证税收，并于1948年4月修正公布了《货物税条例》、《国产烟酒类税条例》。尽管税收仍然跟不上物价上涨，但“这些工厂已经被长期的通货膨胀弄得朝不保夕，征收货物税不过是竭泽而渔，这是在摧残生产，摧残税源”[(11)]。由于卷烟厂减产停工，1948年4月份税收与3月份持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税收减少。后来币制改革时，就是因为增加卷烟税，突破了限价，诱发了全面的抢购，成为币制改革失败的导火线。1949年2月，当局再次进行财政金融改革，由于税收跟不上物价上涨，竟决定货物税改征实物。

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和印花税。直接税一般不能转嫁，由纳税人负担，属于良税。但民国以来直接税的推行一直

并不成功，未能成为主要的税种。而到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已经建立起来的直接税体系也被破坏殆尽。营利事业所得税，本分成多种级距，税率不同。但由于通货膨胀，级距变得失去意义，税负加重。一般工商业者，由于货币贬值，帐面上出现虚盈实亏，没有盈利还要负担重税。1947年3月间，虽然调整税法，规定对所得税免税额及税率每年按物价指数调整一次，以缓和纳税人的负担。但物价上涨太快，既无法控制，调整也就无济于事。而当局由于征税迟后，层层上交之后，已经所值无几。为了增加税收，1947年2月间，竟改为严格申报，实行先缴后查，并恢复查帐核税。结果，遭到工商业者的普遍反对，而税局也没有足够的查帐人员，未能真正执行。“明为查帐，实则估计，全凭讲价还价，劝导商民纳税，全失查帐之本旨”[(12)]。到1948年2月7日，财政部公布了《三十七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稽征办法》，采取了估缴制度，“将1947年度核定各纳税义务人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与利得税之总额，暂照六倍缴纳”[(13)]。到1949年索性再变为分摊包缴，完全失去了立法的原意。至于由抗战时的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改变而来的特种过分利得税，始终遭到工商业者的普遍反对，认为工商凋敝，何来特种利得？而且和营利事业所得税重复征收。由于纳税人的坚决抵制，到1948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只好明令废止。

至于薪给报酬所得税，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下，所得无几，徒滋纷扰。1948年4月修正《所得税法》后，当局明令自4月起，恢复课征公教人员所得税。本来公教人员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大公报》发表社评说：“综观全部所得税，以薪给报酬所得最易课征，其中尤以普通公教人员的薪给，全为机关所控制，扣缴最便。故创办所得税，先向公教人员开刀，现在扩大课征，还得靠公教人员做榜样。但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公教人员生活和现在相比，恍如隔世，真有天渊之别。而税政精神，迄未能走上轨道，仍循阻力最小的途径以争取比额为目标，不免令人惋惜。”[(14)] 印花税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也被破坏无遗，从以营业额推算应纳税额，发展到有的包征勒

派，有的越境推销，致使优良的税种名不符实。

1947年度国民政府四项主要税收的实收数及其所占的百分比：[15]

项目	1946 年度			1947 年度		
	数　额（法币亿元）	百分比 %	实收为预算的倍数	数　额（法币亿元）	百分比 %	实收为预算的倍数
总数	11,323	100.0	1.81	104,030	100.0	3.11
货物税	3,975	35.1	1.96	46,910	45.1	3.76
关税	3,166	28.0	3.17	23,370	22.4	3.76
盐税	2,323	20.5	1.16	17,830	17.1	3.33
直接税	1,859	16.4	1.51	15,920	15.4	1.69

当时，一般人民甚至一般工商业者，税收负担很重，而发国难财者，财富一增再增。自抗战中期以后，社会舆论一再要求征收豪门资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民政府财政部在舆论压力下，曾拟议征收“财产税”。但是，谁是豪门资本？他们在国外的资产怎么办？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当局也想一次性征得一笔巨款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有人曾提出用“提名告密方法征收”，这个方式显然很荒唐[16]。贪污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方式当然更行不通。后来一度改为“建国特捐”，还是无法推行。一变再变，于1948年1月制定了一个“救济特捐”。按《救济特捐办法》，“救济特捐以用于举办救济事业及赈恤难民为限”，由各区募集委员会拟定本区内认捐人名单及捐额[17]。当时总目标为10万亿元，上海地区的捐额为5.5万亿元，至5月间增加到8.5万亿元。但救济特捐进行得冷冷清清。上海方面，市长吴国桢先捐5亿元示范，但无应者。至6月12日，参议员姜怀素捐1000万元。当时救济特捐规定的捐额为5亿元以上，区区1000万元，根本不成气候。而吴国桢已在计划把捐款充作警备旅经费[18]。直到币制改革失败，通货膨胀更加迅速，捐款变得轻微之后，才募集足额，达到115,952亿元。[19]

救济特捐尚未成功，立法委员刘不同等又在立法院提出《临时财

产税条例草案》。这个名义上反对豪门资本的方案，实际上是普遍掠夺民间资本以支持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个荒唐计划。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在国内外，及非中华民国人民在国内所有不动产，合于本条例者一律征收之。"最高税率达60%[20]。刘不同认为："我的办法并未消灭资本，只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非但不致妨害生产，反由于资本的集中与国家化，而可增加生产。"[21] 立法委员崔书琴认为："共产党今日所藉以号召的，就是平均财富，不过他们所用的手段太残酷了。我们为什么不用合法合理的手段来达到这伟大的目的，而让共党去用残酷的手段达到相同的目的呢？"刘不同等的提案在立法院中遭到强烈反对。薛明剑等六人在书面意见中强调说："立法院为全国民意机关，不应协助政府榨取人民。"骆清华指出："刘委员的提案，在性质上是没收，是掠夺。"他指责提案人的意向说："征收豪门资本，一变再变而成为今日的救济特捐，由于施行上的重重困难，而原提案人既然向豪门屈服，而另外想出现在的临时财产税来，把目标转向已经奄奄一息的工商业身上来了。"[22]

6月12日，上海市商会致电南京总统府秘书长转呈总统，对征收临时财产税表示强烈反对："救济特捐先以劝导，继以募派。其征募之对象为同业公会或同乡会，其征募标准则个人财产凡在50亿元以上者征收其十分之一。以同业公会为对象则所征收者非豪门而为工商业。以50亿元为起征点，按照战前米价比例，仅等于民国二十五年时之六七千元。是征收之对象非注重于巨富，而普遍于小康。此项异名同实且已变质之财产税，平津沪汉蓉穗各处正在实施征收之中。临时财产税既系国家遭遇非常时变为摊征一次，藉以补苴之计，断无前者办理方在开始，后者又络续而来。"商会电报指陈严重后果说："工商业于敲骨吸髓之余，如再欲强制其交纳重床叠架之财产税，逆料将来唯有以厂房、土地、机械、工具、实物抵缴，藉偿税负。其结果促使资金再逃避，工商业破产，而生产大部停顿之余，税收必因之减少，失业必因之增多。"电报指出："目前财富集中不在于工商业，而在于特权阶级之少数豪门。闻立法院立法委员中有组织清查豪门资产委员

会之提议，如能贯彻，继续昔年国民参政会未竟之志，则探骊得珠，庶几无损国脉，有裨岁收。”[23]

尽管临时财产税没有实现，但最后在所谓币制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对民间财富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掠夺。

此外，国民党政府尽管债信已经丧失殆尽，但仍想有所罗掘。1948年4月30日，国民党政府为调节金融、吸收游资，由中央银行发行短期国库券，分一个月期、二个月期、三个月期，月息五分，八七三折扣发行，以高利率吸引游资。当时，《大公报》社评认为：“这是两年余来，我国财政金融政策上的一件可注意的事”，“能借款实较发行为佳”，表示欢迎[24]。但事实上，财政赤字巨大，又无生利事业，高利借款，很快又会增加财政负担，不可能解决战争费用的重负。短期国库券先在上海发行，但并不理想，6月1日起，扩大到天津、广州、汉口、重庆、南京五大都市同时发售。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达不到引收资金的目的。并且，直到是年底，才制定了一个《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条例》，1948年1月16日又制定了《民国三十八年黄金短期公债条例》[25]。然而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彻底崩溃之际，债信也崩溃无遗了，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得不到社会上的支持。

田赋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为支持其内战政策，继续实行征实征借。但征借办法，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1947年春曾一度决定停办征借。“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为支持军粮的需要，又于第七次国务会议上决定续办征借。1947年7月间举行的粮食会议上决定三十六年度（粮食年度）征实征借配额总数为6165万余石。是年度征实征借实物实收达3449万余石，另有折征货币折合实物492万余石。超过了三十五年度的3153万余石[26]。但这些粮食仍不能满足需要，当局另要向人民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征购。立法委员张道行在对翁内阁施政方针进行质询时指出：“征兵征粮就是制造共产党的措施……名曰征购，实际是抢劫老百姓的粮食。”[27] 随着国民党政府军事的失败，

统治区域的缩小，粮食越来越紧张。1948年5月间，当局更决定扩大对粮食的掠夺性政策，举办“戡乱”特捐，以征一借一捐一为原则。粮食部呈行政院文说：“查戡乱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军粮需要至为迫切，加以配售公粮，民食需粮尤巨，故三十七年度征集粮食范围必须略予扩大，以期掌握粮源，应付艰巨。本年田赋征实除前方各省仍按上年成例办理、后方分年免赋各省一律恢复全额征收外，征借粮食拟一律按征一借一征收。并为充裕地方自卫、国家戡乱粮源起见，拟加办戡乱特捐，专以大户为对象，累进征收。本年应还到期粮食库券本息及本年应还到期征借粮食拟参照此次国大代表提议，发动人民捐献政府以作戡乱之用，不再抵缴田赋。”估计中央政府征得实物3400余万石[28]。不过，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的进一步掠夺计划，随着军事的崩溃，也就难以实施了。

至于非税收入，随着黄金停止出售、敌伪物资等出售的高峰已过，也已难以成为大宗财政收入的来源了。

二　对美援的失望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国民党政权由于不能打击豪门、从事现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不能完成战争的经济动员，而对人民普遍性的掠夺政策，又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它仍坚持其内战政策，造成了浩大的军费开支，致使财政上难以支持，形成恶性的循环。当时，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兵员负担，据张公权（嘉璈）估计，达450万到500万之间[29]。据行宪内阁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士兵约有四百万人，文武职员一百一十多万，计中央文职人员三十三万，地方十一万余人，武职人员六十余万。”[30]据此，军队人数当为460余万人。军费支出，不但列入总预算，还专门列有特别预算。首届行宪内阁行政院长翁文灏报告1948年下半年预算时说：“我们要提到特别预算，诸位从特别预算草案里可以看出，特别预算开支中多数为戡乱时期军事费用，属于国防部使用的……特别预算收入方面，是指临时税的收入，包括日本赔偿

物资，美军剩余物资出售价格，以及实施粮食征实征借所得物资价格，这一类临时性的收入，总计可得二〇七六七〇〇余亿元。”特别预算支出约达600万亿元法币[31]，为普通预算的二倍。但由于物价飞涨，所谓预算从来不能实现。1948年下半年预算，据王云五报告：“包括普通及特别预算两个部门，合共不过九百万亿法币，但七八两月执行结果，除了征粮部分之外，已经开支二亿六千一百余万金圆，按三百比一折合法币已达八百万亿元，加上军粮部分，实不止此数。”[32]

政府支出以军费为大宗。据张公权推算，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1946年为59.9%，1947年为54.8%，1948年1月-7月为68.5%。据吴冈统计，1947年总支出为40万余亿元，军费支出为18万余亿元，根据蒋介石手谕从中央银行支出的特别支出六万余亿元，两项支出占总支出的59.8%。据杨荫溥估计，“本期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开支，和它的财政赤字一样，可肯定其经常在岁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33]。

收入的萎缩，支出的扩大，造成了巨额的赤字，据张公权统计，1945年至1948年7月中央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如下表[34]：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　份	支出额	增长倍数	收入额	增长倍数	赤字额
1945	2,348,085		1,241,389		1,106,696
1946	7,574,790	3.2 倍	2,876,988	2.3 倍	4,697,802
1947	43,393,895	5.7 倍	14,064,383	4.9 倍	29,329,512
1948(1—7 月)	655,471,087	——	220,905,475	——	434,565,612

尽管美国在战后曾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但自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失败后，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援助处于停迟和消极状态，正在重新审查对华政策。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则始终把缓解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以扩大统治基础的姿态，希望获得美国的同情和援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的

恶化，这个改组的政府也得不到美国的信任。

5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把“拟议贷款的正式备忘录送给了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预付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材料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后者在三年之内有效”。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援助国民政府存有顾虑，尤其对陈立夫这样的一批“反动分子”非常不信任。顾维钧回忆马歇尔和他的谈话说：“他们（指原文文意中的‘反动分子’——引者）会向蒋委员长说，用不着向共产党让步或者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美国鉴于中国在对付苏联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管怎样总要帮助中国的。但是国务卿说，那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并不是非帮助中国不可。”美国替代的战略选择，就是扶助日本。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说，“中国与日本打仗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长，战后得不到援助；然而日本在美国援助下，经济上却建设得远远超过了中国。因此，他说，一个敌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反而比一个盟国为多”[35]。

进出口银行并没有答应中国大使馆的申请，认为中国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之内，实际上并无希望可以使中国接受或者有效地运用这5亿美元的贷款，以推行建设计划，它反而决定原经指拨的款项于6月30日满期以后即不展期。进出口银行在6月27日的声明中仅表示：“本银行对于中国的特种计划，仍准备考虑给予贷款。”[36]

为了考虑对华援助问题，马歇尔派魏德迈再次访华，由马歇尔起草的总统指令说“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37]。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官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回国后仍支持援助国民党政府。

张群内阁成立之后，美国开始着手对国民政府恢复提供有限的援

助。1948年初，美国国会在讨论援华问题时，马歇尔表示："美国应该给予援助，以延缓目前经济迅速恶化的速率。"[38] 6月间，魏德迈代表政府向国会表示援华意见，据顾维钧报告，大意为："近月来中共军事得手，势力膨胀，我国大局已难挽回，此时予我经济援助，等于浪费，徒尽人事，不克收实效。若予我军援，在我国现状下不仅耗费巨款，无裨我国军事，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究竟应否援华，任凭议会决定云云。"[39] 如此而已。自1947年4月起，美国无偿转让它在华北所趸储的军火，总计有6500多吨弹药。5月26日又取消了对国民政府禁运武器的命令，以原价十分之一，即65万多美元，让售1.3亿发7.92毫米子弹，10月21日，让售$8\frac{1}{3}$空军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10月27日，美国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12月间，又额外拨付给国民政府1800万美元的临时援助[40]。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至6月最后核定为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别赠款1.25亿美元。7月3日，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但是，正如美国参议员康纳利所说："对整个中国来说，5.75亿美元（最后落实为4亿——引者）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41]

从国民党政府的预算来看，1948年下半年总支出按金圆券比价计算不过相当于7500万美元，1948年1月-7月的赤字额也不到4000万美元，4亿美元的援助似已十分可观。但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准确，而预算更无法执行。时人评论说："抗战后的岁出，政府及一般专家，有个一致的说法，都说抗战以来的岁出实值，较战前为减少，这大概都是就岁出所列的法币数字与物价比较所得的结论。抗战以来的征收实物，列于岁出上的法币价值既不可靠，实物以外的国外援助是否计入岁出及以何种价格折价为岁出，尤其是由军事机构直接接收的国外物资援助，是否也折价作为岁出，都是使岁出实值估计不易的原因。所以抗战以来的岁出，是绝不应只凭岁出所列法币数字，即骤为论定其实值较战前为减少的。关于这一点，王云五财长的报告已足

以证明，他说战前平均为五亿美元，战后为十亿美元，即连美币贬值的因素加入，也是不较战前为低的。我们每于看到有人说，中国的财政赤字，每月有很少的美元即可弥补时，常觉得好笑。”[42] 美援既无法填补国民党政府的无底洞，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军事、经济的总崩溃就来临了。

美援姗姗来迟，又属杯水车薪，国民党当局维持财政开支的办法，越来越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1947年，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7,07,，033百万元法币，钞票发行增加29,462,400百万元。1948年1月-6月，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高达166,185,674百万元，钞票发行增加163,332,800百万元[43]。

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恶化、物资匮乏，使物价如脱缰的野马。1948年6月间，物价上涨的速度突然加快。6月25日上海物价狂跳，商店每隔二三小时更改一次标价，虬江路及金陵路上几家商店贴着红纸布告：“货价飞涨，暂停营业。”[44] 正好上海市议会在此期间开了十天的会，7月1日议长潘公展在休会时说：“开了十天会，上海物价波动极大。十天比过去三个月涨得更令人惊心。如米价，过去三个月涨了四倍，而这十天就涨了三分之一，照这样下去，大家都不能生存了。”[45] 6月28日蒋经国到达上海，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物价。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召集军警宪各单位首长开紧急会议，企图通过武力来抑制物价，把物价上涨的责任归咎于投机商人，警告说：“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46] 总动员令、总体战，要把国家经济完全转入暴力控制下的掠夺经济，但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暴力掠夺的举措，也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在讨论征收临时财产税时，有人说得明白：“经济已要崩溃，只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亡图存。大家要看得远一点，美援四亿，只合法币四百万亿，而本年预算是八百万亿，美援并无大用处，必须自助。”[47] 现在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也就要不顾任何经济后果，劫夺社会财富，支持战争，挽救国民党的失败。但所谓自助，豪门资本既不愿出钱，屡受侵

凌的民间资本自不愿与国民党同归于尽。怎么办呢？局势逼得国民党当局走上冒险蛮干的道路。

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形势，参见本章附录一、附录二表列数据。

第二节　掠夺性的币制改革

一　币制改革的酝酿

法币超高速膨胀，发行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物价飞涨，社会经济混乱。法币濒临崩溃，赤字财政难以支持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国民政府时期，原就有币制改革的拟议。早在张群内阁成立之初，即1947年6月18日，蒋介石就曾向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征询有关币制改革的意见，但遭到张的反对。据张的日记记载，他向蒋陈述了三要点："（1）无现金银准备，而以新纸易旧纸，千万不可施行。（2）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办法，至少须有三亿美元借款作为准备。（3）若改用银本位，至少须有价值五亿美元之生银贷款。因此又提及中央银行政府垫款，必须有限制，与财政部尤须划分界线。若中央银行长此为财政部之附庸，予取予求，无论用金用银，均无办法。不久币制仍将崩溃。"[48] 行宪国大之后，翁文灏内阁成立，就由财政部长王云五筹划币制改革，企图控制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筹措战争经费。

王云五原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以企业管理有效而著名，1946年间，以非国民党员的社会贤达身份出任经济部长，在张群内阁中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他和财政金融界素无关系，那里原是孔、宋两家控制的部门。不过，他在张群内阁任职时就留意币制改革。王云五回忆说："原来在张内阁时期，当美援发动之初，我曾极力主张美援应以协助我国改革币制为主，因为国家收支，民间生产，无不因通货膨胀

而遭遇重大困难，我国复员之初，外汇充裕，正是可以改革币制之时，既已失了良好的机会，目前为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仍须以获有稳定的币值为枢纽；而欲使币值稳定，莫如使无准备、无限制与不公开的发行，变为有准备、有限制及公开的发行。换言之，即筹措充分之发行基金，在有限制与公开的发行下，改革币制。如此，则币值可望较为稳定；同时辅以平衡国家收支的必要措施，并极力增加生产，节约消耗，则财政经济始有改善之望。……当美援决定，并获得我国赴美代表的报告，知币制贷款无望后，我便转向自力改革币制，俟初步成功，再求外援继续维持的方面。”（原文如此，“方面”似为方案之误——引者）[49]

翁文灏受命组阁后，王云五原打算退出官场，但蒋介石授意翁文灏邀请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蒋强调：“此席须由与金融界无关系而能大公无私者来担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当为可以向金融界开刀筹款。当翁邀王去见蒋时，蒋表示：“军事好转与美援发生效力，物价当不致象过去几个月一般的狂涨。”[50] 另据阮毅成记述王云五的谈话称：“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51] 当时，国民党军统帅部正陷于自欺欺人的豫东大捷的幻觉之中，王云五经不起蒋介石的劝诱，并在企图尝试一下自己主张的欲望支配下，作为一个金融界的门外汉，不知深浅地出任财政部长一职，来主持币制改革。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所以，有人估计：“也许他早有腹案，密向蒋介石献策，得到蒋的赏识，才当上了财政部长。”[52] 而王云五一上台，张公权就在6月1日的日记里忧虑地记道：“微闻王部长为主张取消法币改发新币之人。深望新内阁对于此举慎重考虑。”[53] 看起来，蒋介石事先应该知道王云五关于币

制改革的基本观点，选择他当财政部长并不是盲目的。

5月31日，王云五正式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即将财政部中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都找出来加以研究，亲自考虑并秘密起草改革方案。王云五回忆说："偶然有出题目征取意见的必要时，我也只将有关征取意见之一点，托辞属人研究，却没有透露全盘的关系。"7月7日，王云五即将秘密起草的改革方案交给了翁文灏。8日，翁文灏偕王云五向蒋介石面报，逐条申述理由[54]。蒋介石本人对王云五的改革方案原则上表示同意，同时指定徐柏园、严家淦、刘攻芸三人组成专家小组，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一起，协助翁文灏和王云五对这一方案作进一步研究，并草拟各有关方案的详细办法[55]。翁文灏同时向蒋报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对经济和币制改革计划不甚赞同，以致处置为难。蒋介石即于9日接见中央银行理事席德懋，询问外汇存数并研究发行新币事宜。蒋介石听了金融界的意见，"以兹事关系国计民生者匪浅，不可轻率更张，故再三考虑，卒以尚非其时而决定暂缓实施也"[56]。但这时，物价已如脱缰的野马，狂涨不已，迫使蒋介石不能不采取蛮干的经济措施。

王云五的改革方案以币制改革为中心，以控制金银外汇、整理财政和管制经济相配合，企图从根本上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财政经济危机。这一方案，采用管理金本位制，发行中华金圆，与美币联系，十足准备，不兑现，黄金外币一律收归国有，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必须登记，转入国家指定的银行，严格控制工资和物价，增收节支，平衡国家预算和国际收支。王云五认为："我之所以亟谋改革币制，即以自三十七年四五月以后，我国因通货膨胀已达于恶性时期，以致币值之低落，物价之高涨，初则一月数倍，而循着几何级数之进程，预计不久将变为一星期数倍，或一日数倍之状。到了那时，人民根本已不承认旧有的货币，不是把一到手的旧币，急遽兑成其他可供交易媒介，便是立即易取实物。到了那时，政府纵不想改革币制，也不得不改，则不如早为之计，而作自动的与有计划的改革。"[57] 据张公权

说："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期间，金融界领袖已经向政府力争恢复整个经济之稳定，为此必先紧缩政府开支。新任财政部长（指王云五）却认定：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之前，国家财政是无法进行改进的。他相信：改变货币本位是可以恢复经济稳定的，而国家预算亦可因之而自动达到平衡。他遂拟订了一项用新通货取代法币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积极支持。在该方案尚未付诸实施之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过，法币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但他们这些反对意见竟被斥为陈词滥调，不足取也。"[58] 但事实上，紧缩开支既做不到，法币的崩溃就在眼前，这就为冒险者提供了一个尝试的前提。王云五本人或许有种种理论的幻想和合理的图上作业，但从当时实际政治经济形势出发，这只能是一个以暴力为后盾，以政治干预经济的方案，因此是一个野蛮掠夺的方案，是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时的垂死挣扎的金融措施，失败也就是可以预期的。

7月26日，蒋介石偕夫人到莫干山避暑，考虑对时局的决策。29日，蒋介石下了决断，在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淦等，商谈币制改革问题，决定实施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改革方案。蒋介石在紧迫的形势之下，仓促地推出币改方案，连印刷新钞票的准备时间都没有，俞鸿钧就决定动用抗战初期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的20亿元分别印有孙中山像、蒋介石像和林森像的钞票。因为当时这批钞票面额都是1元至100元的小票，跟不上货币贬值的形势，一直没有发行，这时就拿出这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秘密送到各省分支行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所以，这批钞票上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59]。当天，蒋介石自记道："今日对于剿匪方略之修正，与币制改革、经济管制之措置，皆能作一大体之拟定，此为半年来所未能决定之问题，而山居三日，居然整理就绪，足征静处冥思之效大矣。"[60] 然而，实际上是形势迫使他作出孤注一掷的决断，贯彻的结果，只是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所谓大效无非如此。

二　币制改革方案的发布

蒋介石、翁文灏等于7月30日先后下山，返回南京。在途经上海时，蒋介石曾召见张公权，张的日记说："总统告我，目下法币日跌，钞票发行日增，致钞票来不及供应，势非另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问我意见。当即答以如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银和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方可行之。否则等于发行大钞。如谓大钞面额太大，人民将失去对于钞票之信用，而换发一种新币，而又不能有充分准备金，则至少必能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使新币不再贬值。同时须注意东北流通券能否不因换发新币，而遭人民拒绝使用，及广东省人民因此欢迎港币而不愿收受国币。总统唯唯未置可否。"蒋介石于8月9日又至庐山避暑。张公权应蒋之召于17日到庐山，并于17、18日两次向蒋介石陈述反对意见。据张17日日记："总统仍以币制不能不改革为言。我告以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总统云：物价必须管制，使其不涨。现决定各大都市派大员督导，彻底实行。我答以：中国地大，交通又不方便，无法处处管制。仅在几个大都市施行管制，无法防止内地各县各镇之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及于都市，或则内地物产不复进入都市市场。故期期以为不可。"18日又记："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圆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再我所最顾虑者，人民对于法币已经用惯，若对于新金圆券不加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若四亿人民弃纸币而藏货品，则情势实不堪设想。故请总统慎重考虑。"[(61)] 但蒋介石主意已定，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了。

为了避免立法院的反对和泄密，蒋介石专门选择了立法院休会期间来决定和宣布这个改革方案。18日，蒋从庐山回到南京，19日下午3时，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对原方案稍作修正后通过。随后，翁文灏于下午6时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内阁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也通过了这个不能不通过的改革方

案。紧接着，蒋介石就动用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不经立法院批准，即发布总统命令：

>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左：
>
> 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
>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
>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
>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
> 基于上开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62]。

此令总统蒋介石签署，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副署。文件所署日期为8月20日，实际于19日夜签署后向全国广播。

根据上述各项办法的规定，以新币金圆为本位币，每圆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金圆券则是代表金圆的不兑换纸币，不打折扣，十足流通行使，发行总额法定以“贰拾亿元为限”，“采十足准备制”，与法币之比为1：300万圆，与美金之比为4：1。办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如发现金圆券之准备不足，

或金银外汇之准备不及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之百分比时，应即通知中央银行停止发行，收回其超过发行准备之金圆券，并分别报告行政院及财政部”，“中央银行接到前通知后，应即兑回其超额部分之金圆券，或补足其发行准备；非经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认可后，不得继续发行。”这就是说，这次币制改革，按照设计蓝图，自然就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为了全面控制金融市场，防止游资冲击，又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持有者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为了缓和人民的反对，规定人民可以选择购买美金债券或折合成美金存储于中央银行。总之，是要全面地将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和外币控制在政府手中，仅将现有金银首饰允许民间继续保留、转让和以官定价格买卖。否则，一律没收。对于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规定必须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申报登记，除生活等费用可以保留外，均应以原币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存款之使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拒绝申报及转移资产的，将处以徒刑和罚款。

上述办法对社会经济生活强化了国家垄断和统制，按照规定，要增加收入和节省支出，监控对外贸易和外汇收支，由官方严格管制各种物品和劳务价格，不得擅自加价，停止以生活指数发给薪资的办法，禁止囤积居奇，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继续管制金融业务，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等等。

总之，这次币制改革，并不仅仅是一次货币制度的更新，而是以管制经济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强烈变动。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币制改革为出发点，建立起强力的支持内战的社会经济动员模式。这个模式，是以上海为中心，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指挥，予以强行建立的。虽然，币制改革方案是王云五草定的，但整体的构思和指挥，实际上是由蒋家父子来进行的。蒋经国在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动员说：“这次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性的革命运动，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制

度。我们要当做是自己的事，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应替上海五百二十万市民着想，不惜任何牺牲彻底消灭经济的反动力量……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63)

为了保证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行政院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8月21日，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以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运用政治控制力量来保障币制改革。上海则是主要的经济管制区域，蒋介石实际上是派蒋经国负主要责任，以便雷厉风行“打老虎”，以民间实业界为主要对象，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戡乱军事的需要。所以，蒋介石当日自记说：“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明知此于其个人将为怨府与牺牲之事，但除经儿外，无人能任此事，故不能不令其负责耳。”(64)

这次币改，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因为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是比较好地保守了机密的。但仍然发生了币改前夕，上海股市抛售永纱一案，后来就查出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漏币改机密一案。但范围很有限。蒋介石命令发布后，一般经济学界并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一个方案出笼。“因为在半年以来各报纸杂志上所载各经济学者的论文，讨论币制改革问题者，真如汗牛充栋，然而大多数总觉得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美国对我改币的借款，亦始终未有具体的表示，所以即是具有眼光的人，也不能断定当时盛传的新经济改革方案，即是现在实行的币制改革方案”(65)。

蒋介石命令发布后，王云五于19日晚即发表谈话，解释币制改革方案。他指出：“本紧急处分令包括四种办法，以改革币制为出发点，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而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家岁出入预算及平衡国际收支为主要措施。”他申述币制改革的理由说：“政府就当前局势深思熟虑，认为法币之发行，最近虽急遽增

加，然以美金比值，只需要五六千万美元已足收回其全部。我国国库目前所有黄金、白银与外汇，虽未必甚丰，然以之应付此举，实绰有余裕。况且国家其他资产可供发行准备者尤多，在理法币不应如是贬值，惟是由于平时发行之未采公开制度，发行准备亦未确定，人民之信心既失，与其强就原有法币恢复其信用，事倍而功半，何如根本改革，自始即确定充分准备，建立公开发行之基础，并严格限制发行数额，以昭信于国人。”他承认：“关于平衡岁出入总预算者，改革币制而不能平衡预算，纵可收效一时，断难维持永久。此固不易之论，亦即对改革币制怀疑者之有力主张。”但他认为，币值稳定后，税收增加，可以接近平衡，再以美援和金圆公债来抵补赤字，可以达到平衡预算的目的[(66)]。

方案出台后，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无疑的是当前政府对财政经济措施的最后一张王牌”[(67)]。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整个计划一直是保密的，对中国来说，一件事能做到保密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在采取这项措施的前几天，行政院长向我透露了这一秘密，我感到非常满意。正如我向他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只有严格实行有关措施，赢得人们的普遍支持，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该项计划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他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计划落空，那他们就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68)] 然而，币制改革的前提条件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币改方案遭到国民党内外的普遍怀疑和批评。

蒋介石于命令公布后，曾召见卢郁文等七位立法委员，征求意见。立委黄元彬曾提出过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在当时形势下，他的方案当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这个金圆券的方案，他向蒋介石严重指出：“我敢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他解释说：“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

是没有丝毫疑问的。”[69] 留沪立委于20日正好有个座谈会，沪上行政首脑也参加了。市长吴国桢首先不客气地说：“要抑平物价，先决条件要政府能够把握物资。”而事实上，当时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屡遭失败，社会生产萎缩，物资紧张，这一条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也说：“就我个人做过财政部长经验，不设法紧缩开支，实在难以维持。”事实上，军费开支不是财政部长管得了的。后来王云五也说：“我最感苦闷者，即在我国现行制度之下，财政部长只能主管岁入，而不能主管岁出。”[70] 显然，在国民党当局不能停止内战的形势下，军费是无法控制的。立法委员黄绍竑则指出：“问题在许多人民把黄金美钞掉换金圆券后，是不是和信任黄金一样，把它放在保险箱里？他们可能把所有掉换的金圆券，拿到市场上去抢购物资。万一造成这种现象，物价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种人干脆不去掉换金圆券，难道要经济警把豪门之流的房子都拆掉去检查？刚才俞总裁说，政府发行金圆券已经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既然准备得这样充分，何以要收兑人民的黄金美钞呢？所以我觉得执行得不好，一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71] 这一切怀疑都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社会上的各种评论就更尖锐了，有评论指出：“在军事与政治危机的压迫下，政府自不能不于财政上寻求一自救之道。本来，停止内战是挽救危机的‘釜底抽薪’之计，但政府既已决心戡乱到底，这当然是一件绝对办不到的事。因之，政府只有设法进一步收集人民的财富供继续戡乱之用，八月十九日公布的币制改革方案，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逼出来的。这一点早经财政部长王云五氏道破：‘法币经八年抗战，与战后数年动荡不安之情况，逐年递增其发行，致人民对法币之信心远逊于实际发行膨胀之程度。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形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而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倘坐待收支完全平衡，然后改革币制，则币值愈落，物价愈高，收入愈减，支出愈增，将来纵拟改革而不可得。’从王部长的谈话

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下面这一事实，就是：政府此次改革币制的主要目的，不在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而在满足戡乱财政的需要。”[72]

国际上的舆论也认为，“经济改革，似应与政治改革并行，始可收效”，“我们觉得良好的新币制或新的经济命令，若不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军事改革方案的支持，将不能成功”[73]。他们对金圆券的保值措施表示怀疑，指出：“虽说新币有百分之百的准备，但中国当局是绝不会把这些财源真正用来保卫通货的。准备额的数值，只可当成心理的作用。”“如果没有办法能使金圆券在国内自由兑现，中国人民对于新币不久就将失去信心。这样，过去的物价飞涨，又将重现。”对于法定的20亿元的最高限额，也表示怀疑说：“在这样艰苦的局面下，中国政府是否真有决心与能力来实行它，实为疑问。”[74]

实际上，王云五原方案以为可以有折合成3亿美元的现货准备，以与美元3：1的比例，发行9亿金圆券，也就是全部现货准备。而当他实际查询的结果，中央银行未通知财政部，已将1亿美元拨作他用，消耗殆尽。结果，改为发行20亿金圆券，与美元为4：1。2亿美元的发行准备，只是四成现货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愿意拿出硬通货来保卫币值，而且也没有力量来保卫币值。

按照规定的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当时发行的600万亿法币，只须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完毕，而法定金圆券限额一下子定为20亿元，超过了十倍。一方面政府发行，一方面收兑金银外币发行，形成双重发行，预定了金圆券的膨胀是必然的。金银外币人民可以作为储藏手段，并不一定是一只出笼的老虎，而金圆券则不同，人民一旦对它失去信任，就会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垮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秩序。关键当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从根本上无法平衡预算，只能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样，金圆券就必然步法币的后尘，走上通货膨胀的老路。

三　以强力贯彻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好像一支兴奋剂，给财政经济一个强刺激，社会一下子好像强壮起来，待兴奋剂的药效一过，就一下子瘫痪了。

在币制改革方案即将实施之际，8月19日下午，上海方面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召集上海市首长及金融界领袖开会。开会前，因俞奉急召赴京，由副总裁刘攻芸代表俞主持会议，宣布："奉财政部代电，定本年八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两日，为银钱业临时休假日期，上海及全国各地银钱两业、信托业、信用合作社及证券交易所等，应一体遵照办理。"[75] 21日，行政院于上午召集国家银行各领袖，下午召集京沪两市银钱业各领袖，说明政府改革币制之重要原则。蒋介石随后召见各领袖发表谈话说："政府于抗战胜利之初，即已开始准备改革币制，终因种种顾虑，迟迟未能实施。此次翁院长、王财长等毅然决定实行币制改革，事关国计民生与农村复兴，希望诸君以及全国人士对此措施建立互信心理，并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之信念，群策群力，迅赴事功。"[76]

8月21日，蒋介石为贯彻币制改革方案，向各省政府主席、各市政府市长发出措辞严厉的手启，他表示："深信循此办法全般实施，不惟民生疾苦将获苏解，即国家大计之财政基础，亦得奠定。"他严厉警告说："倘有投机囤积，怙恶不悛，敢于违反法令，以图自私自利者，则是自绝于国家民族，无异为奸匪作伥，其罪行即等于卖国之汉奸，无论其凭借何种势力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应即当机立断，执法以绳，严加惩办，不容稍有宽假。所望各级政府切体时需，自懔职责，以决心建立事功，以强力打破障碍。无论遭遇任何困难，中央必为全力支持。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致法令不能贯彻，或对所属执行人员监督不严，考核不力，致所属违法舞弊，影响法令之实效者，则各级主管应负失职之咎，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77] 8月22日，蒋介石又发表文告，否认有关和谈的谣传，坚持"戡乱"政策："如果国家的统一独立一日没有完成，匪区同胞的苦痛荼毒一日没有解除，则我爱国军民剿匪戡乱的职责亦一日不能放

弃。”文告强调金币制的意义说：“过去十年，法币制度已完成其支持抗战建国的使命，深信今日以后，金币制度亦必能助成建国的大业底于成功。”[78]

8月23日星期一，各银行钱庄复业，中央银行开始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及法币。第一天，市民排起长队，踊跃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情形颇为出乎当局者意料之外。11时左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79] 这第一天，中央银行共收兑黄金7748.36两，白银8776.96两，银元28，361元，美钞819，631元5角，港币136,702元，共兑出金圆券5,013,777元3角9分[80]。第二、第三天，市民甚至清晨6点即到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换金银外币。市民之所以踊跃兑换，一则受到国民党政府严令的威胁，过期持有即为非法。一则普通市民原受通货膨胀的痛苦，从市面上以700万法币兑来1元银元，现在不能流通，不得不再次亏本兑出，以维持生活。一则因为金钞收兑价已经相当于甚至略高于原来的市价，商民以为“黄金一时不会涨，现在拆息多么高，搁在那里不合算，不如卖掉了还债。或做生意买别的东西”[81]。此外，也容或有投机的因素。

黄金、白银、外币的兑换期，原定到9月30日结束，此后，人民持有黄金、白银、外币即为违法。财政部发言人于12日发表谈话宣布：“收兑金银及外币日期，原定截至九月卅日为止，到期决不延展。如逾期尚未向中央银行或其指定代理收兑之银行兑换金圆券或公债或存储，则持有者即属违法。”[82]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普通百姓纷纷如期前往兑换。上海一地，29日、30日的兑换达到了高潮，30日成绩为兑出金圆券3600余万元，是最好的一天[83]。据翁文灏报告，到9月底止，“收兑黄金、外币折合美金一亿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十四点一七元，经收外币存款折合美金一千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五十五点六一元，出口外汇收入折合美金三千五百七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点二一元，华侨汇款收入折合美金一千一百十六万三千四百

十九点二〇元，总计收入折合美金一亿九千零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九点一九元，进口结汇折合美金一千二百五十万一千九百十二点六九元，政府机关结汇折合美金一千零三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九点四六元，总计支出二千二百八十七万零二百十二点二五元，以上收支两抵，净收入折合美金一亿六千三百五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七点零四元。”[84] 当时，发行的法币折合美金也仅5000万元，而在币制改革的四十天之间，即收入了黄金、外币1.6亿多美金，达法币发行额的三倍。

要贯彻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关键在控制住上海的经济。1948年8月20日早晨，蒋经国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表后即赶到上海，开始作管制上海经济的准备工作。为了有一支自己指挥的力量，蒋经国把在唐山的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第六大队调到上海。“戡乱建国总队”是蒋经国为建立实验绥靖区而策划建立起来的，归入国防部名下。他们本来的任务是协助军队组训民众，参加绥靖区地方行政。这时，蒋经国为了对付上海的工商界，把这支本来是对付中共的有组织力量，调到了上海。21日即着手制定“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27日，“戡建大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宣称，到上海来的任务，“一方面对付共党，一方面对付奸商”[85]。本来是用来审判共产党的特种刑事法庭，也成了审判资本家的专制工具。新经济政策一开始执行，就把上海资产阶级推向了中共一边，把自抗战以来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同情，推向了高峰。

22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协助俞鸿钧督导上海区。23日，就在开始兑换金圆券的那一天，在上海中央银行会议室举行了首次督导会报，蒋经国和上海当局商量了执行方法和分工。他认为：“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86] 蒋经国在

上海决心不顾一切，实行管制经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是做不通的，我亦认为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87] 于是，他便动用全部力量来管制物价、物资和金融。

8月24日，上海社会局、全国卫生局、财政局、警察局经济大队等单位，召集副食各业商人谈话，社会局长吴开先硬性规定，要他们照8月19日的价格出售，以后如果超出19日售价，轻则吊销执照，重则将依法严处。当天，粮食价格，以白粳为例，退入了20元以内。蒋经国本人连日召集会议，讨论稳定粮食、纱布、日用品价格的办法。警察开始监督市场，拘捕违法商人。26日上午，蒋经国召集各有关机关会议，到有金融管理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团、江海关、两路局警务处、港口司令部等单位代表，作出决议：“（一）统一检查机关，由蒋督导员统一指挥，统一执行，切实发挥经检力量，绝不许扰民……（二）凡违背国家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其商号吊销营业执照，负责人送特刑庭法办，货物全部没收。”同时决定自27日起，开始普遍检查。检查对象则“以巨商大贾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而免徒滋纷扰”[88]。大概是这一提法，后来被社会上称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为了达到管制经济的目的，蒋经国不仅动用既有的权力机关，而且策划由戡建大队着手组织人民服务站，“希望能做到发动民众协助政府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89]。到9月25日，在复兴公园举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开训典礼，受编人数达12,339人，由蒋经国出席致词。但这个青年服务队还没有发挥作用，经济管制政策就破产了。

当时，经行政院批准，成立了上海区物资调节委员会、上海区检查委员会、上海区物价审议委员会，实施全面管制经济，首先限制纱布南运，暂行停止食油及油料出口。30日，蒋经国召集上海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宣布了上述三个委员会的功能，他强调：“过去

币制不改革，物价管制无效，此次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同时并行，严格执行，各地物价应以八一九价格为标准，不得变更。”蒋经国严厉指责商人的囤积居奇：“最近查出有些货物存仓时间不但在三月以上，而且有从日本投降囤积迄今，实在太不应该。政府为执行政策，对存储三月以上者应依法予以惩处。”最后他警告商界说：“若干商人闻已雇用专人，准备吃官司坐牢。但政府洞察其奸，故以后各商店如有违法情事，决拘捕老板予以严办。”[(90)] 9月3日，蒋经国又召集各工业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严厉警告说：“这次改革方案，是国家的生死关键，故只许成功，否则就不堪设想。这是国家的命令，亦是国家根本大问题。所以全国上下均应绝对遵行……我知道我在上海再住下去，一定有很多人会讨厌我的，但是假若大家都老老实实，查仓库这些工作本来可以不必麻烦了。现在查出来的，还有日本人时代所囤的货物在内，迄今尚未卖出，昨天发现有人到厂买货，发票开的是八一九价格，另外仍贴了黑市，以及米商的用厚麻袋，糖商用衬纸等，无异是抬高八一九粮价，这叫我不能不扳面孔了。”[(91)] 这几天，各军警机关也全面出动监督、检查，在各区公所面前设立告密箱，厉行“打老虎”，拘捕工商界人士。

蒋经国的所谓扳面孔，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惩罚“奸商”，以警察行动来维护行不通的管制经济。9月1日，他提出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并开始行动。当日晚，蒋经国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2日，他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会后即向市政府提出大户奸商等各种违法行为的证据，并建议立刻逮捕”[(92)]。2日当天，经济警察即传询沪上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巨商盛苹臣，暂准交保释放。案由是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前，大量抛售永安纱厂股票。同时，以囤积罪拘押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郭答应尽量抛售，才交保释放。是日晚，泄漏经改秘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南京被捕。陶妻李国兰也因永纱案在上海拘押。因私套港汇一案出走香港的申新纱厂总经理、棉纱大王荣鸿元，于2日晚回到上海，3日即遭逮捕。同日，杜维

屏因被发现在证交停业后做场外交易，与证券商林乐耕同被逮捕。此外，纸张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永泰和烟公司黄以聪、囤布大王吴锡麟被逮捕，送特刑庭办理。食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起及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均受到警告。已经被捕在案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一案，于9月3日被判死刑，至24日执行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也因贪污舞弊罪被处死。被捕商人共达六十余人[93]。蒋经国日记记道："（9月4日）××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9月5日）×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9月8日）今天早晨遇见×××，他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他软下来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由此可知官商勾结力量之大矣。"[94]"×市长"即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他本来就不相信金圆券政策，这时候，他在蒋经国眼里成了资产阶级在政界的代表人。

尽管收兑金银外币和控制物价取得了相当成绩，蒋介石并不感到满意，还要向上海商业行庄勒逼外汇。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责骂上海银行界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存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而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95]于是，蒋经国"决定加以说服，将他们的外汇移存国行。直至今晚（8日）止，已经拿出了三千万美金"[96]。11日，蒋经国又在乐义饭店先后约见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因事未到），以极为粗暴的态度，向他们勒逼金银外汇。蒋对李声色俱厉，争吵声

达于户外，对周则屡屡扬言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他拘留起来，对戴更指责其联合上海商业银行逃避大量金银外汇[97]。上海各商业银行在蒋介石父子的勒逼下，被迫和盘将所存黄金、白银、外币和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银行。只是由于币制改革的迅速失败，政策改变，这些外汇资产没有来得及转账过户，仅少部分为中央银行收购，多数仍为各商业银行所持有。

9月12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峻的讲话，在这篇后来题为《上海往何处去？》的讲演中，他严厉地抨击了“投机奸商”：“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他强调：“今日的抑平物价，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工作，而真正的目的乃是在消灭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更确切的说来，就是不允许社会上滋长着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向上海市民号召说：“我们自开始以来，即主张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并应告诉人民，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起来完成，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98]

蒋经国对于管制经济的一时成就深感满意，9月15日，他在上海市参议会上发表演说：“这三星期以来的工作，给我一个教训，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的。这三星期的成绩，是上海六百万人民赤诚拥护政府的表现，也是参议会同人的功劳。今后希望上海商人，不要抱观望的态度。我是奉政府法令，专来惩办不法的商人。”[99]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捉黄牛”，“拍苍蝇”，“要把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上海人的乐园”，一时被誉为“蒋青天”。如果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当时蒋经国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演讲词，足以被人扣上一顶红帽子了。但是，上海工商界心中有数，于是，他们通过反击豪门

资本，来进行自卫，也看看蒋经国的高调能唱到几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个人在国外的外汇资产，不但条件宽松，而且始终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流向海外、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的这些外汇资产，一般舆论认为，大体上是豪门向海外转移的资产。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国内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方面，都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打内战，就应该动用这批资产，而不应该专门向国内经济濒临破产的企业搜刮。《大公报》上一再指出："富户并未拿出存金来，而是平时保存了三五枚银元、美金，以保存些微购买力维持生活的小百姓们，因不敢违法，才去兑换的。"[100] "大多是零星小户，黄金没有超过百条，美钞没有超过千元，真正的大户还没有拿出来。"[101] 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市场上固然有老虎伤人，豪门中也有老虎噬人。市场上的老虎虽已打了几只，豪门中的老虎却还逍遥自在。这使老百姓心里未免不甚痛快。"[102] 《大公报》发表社评："今天所做的仍有美中不足者，众目昭昭。真正的豪门，仍逍遥自在。'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这一着，最关重大。改制最终的成败，与此辈豪门是否爱国及拥护政府有关。此关打过，则人民无话，工商心服。若打虎至牛而止，不进山林虎穴，精神一松，功亏一篑，那就太可惜了。"[103]

据说，蒋经国在召集上海工商界开会时，杜月笙将了他一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104] 郭旭的这篇回忆，并非亲历，而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其中明显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很多。但这段传闻，无论是否属实，还是可以反映上海工商界对蒋经国以强力管制经济的抵抗情绪。在上海工商界的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由此引出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一案。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打老虎”政策，在政治上导致对蒋氏姻亲集团的反冲击，在经济上形成物资匮乏，生产萎缩，游资充斥，市面萧条，危机因素迅速积累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控制系统本来就相当松弛，并不能做到全面控制统治区域的经济。蒋经国在上海控制经济的结果，使内地和上海的物价结构，形成倒挂。控制力不强的内地的原料、粮油价格高过了上海的市场价格，造成上海原料、燃料缺乏，生产削减，粮食和副食供应紧张。由于生产萎缩，政治形势恶化，投资热情下降，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却强化起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人多起来了，反过来，又强化了对市场的冲击。因为收兑金银外币，游资充斥市场，找不到出路，至9月中下旬，争购消费品的现象就已开始出现。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本无系统的计划和部署，只是看一步走一步。他面对着经济流程遭到阻断的局面，不思反省，企图以进一步强化对经济的管制来摆脱困境，结果，在管制经济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他在9月中下旬，一再召集上海工商界人士举行会议，一方面强化对他们的压力，一方面寻找疏导经济的方法。他本着管制经济的思路，于9月21日向商界代表宣布：“一、所有商人存储日用必需品及原料，限期向市府登记，以便知悉实际数量。二、自备外汇开放，限于工业原料及机器。三、上海工业产品有多余的，在不影响限价条件外，由产销两地密切联系，不容许投机、抢购、囤积，否则从严处罚。四、为使各工厂不发生困难，允各厂申请所需原料向产区购买，或联合采购。”[(105)] 自23日起，限五天内，向各同业公会登记，五天后，由军警普查所有仓库，如发现有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续后，又宽限延期到月底。对于日用品决定采取配给的办法，对上海市民重新登记身份证。对于粮食甚至考虑与产区采取物物交换办法，来保证上海的粮食供应。禁止市民携运日用重要物品出境。10月3日，蒋经国在上海区检查委员会第九次例会上决定将检查的范围扩大到京（宁）沪、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上海物资向外地逃避。他对经济的控制权大为扩大了。但是，国民党及其政权本缺乏严密控制经

济的功能，在军事溃败、人心解体之际，单凭蒋经国的努力，要想达到全面管制经济的目的，犹如白日做梦。一进入10月份，蒋经国的管制经济就被民众的抢购风潮冲垮了。

第三节　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一　币制改革的失败

王云五虽然是以发行金圆券为中心的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者，但他作为一个并无政治实力的财政部长，并不能控制币制改革的进程。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蒋经国在上海的管制经济能否成功。当时，正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监事会第三届联合年会即将举行，中国财长轮值担任大会主席。王云五在一片成功的祝贺声中，对于适当调整物价的政策作了布置后，即于9月18日离开南京到上海，并于21日自上海出发，赴华盛顿与会。但当他于10月10日回到上海后即发现，他的币制改革已经濒临失败。

本来，王云五草定币制改革方案时有个基本前提，即“国家局势不致恶化”，但改革才实施一个月，军事形势即严重恶化。9月24日，济南失守。首都南京的门户徐州就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济南有重兵镇守，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守将王耀武在国民党将领中以能战著称。但解放军攻击济南，仅用了八天时间即全歼守敌。济南失守，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马上动摇。

同时，由于财政收入未能如预期增加，而支出则根本无法收缩，公营交通公用事业补贴和军费增加，造成发行加大，已达12亿元，即达法币实值的六倍，影响到人心和物价。

金钞的收兑期，原定到9月30日截止，9月30日这一天，人民害怕非法持有金钞，仍到中央银行蜂拥兑换金圆券。但过了期限，中央银行却于10月1日发布公告：“查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前经规定至

九月三十日为止。兹奉行政院核定，收兑黄金、外币展期至十月三十一日；收兑白银、银元、银角，展期至十一月三十一日为止。特此公告。”[106] 据王云五说：“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谓上海工商界要求收兑金钞延期一个月截止，予以同意。”[107] 本来，民众对于改革方案不能打击豪门资本，已经深表不满，而延期措施等于承认豪门资本存储黄金、白银、外币的合法地位，法令马上失去了信用。10月1日起，中央银行门前，求兑者寥寥无几。

本来，一刀切的“八一九”限价，并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它也影响到政府当局的财政收入和政府系统经营的企事业的利益。限价政策刚刚实行，国民党系统的报业主管们就纷纷来要求加价[108]。经营不善的公营事业，更使财政补贴成为当局的沉重负担，不能不考虑加价，转移负担。王云五临出国前制定了一个适当调整物价的方案，但蒋经国坚决反对。9月27日，他写信给南京当局说：“就政策言，改制后金圆券信用之树立，并非因发行数量较昔为少（法币仍在流通），而实有赖于限价政策之坚决执行。今限价甫及一月，忽由政府率先变更，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率先涨价，民信能无动摇……闻政府尚有定于十月一日通令准许涨价之说，如非传闻失实，亦请惠予考虑。”[109] 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陷入了两难的处境。由于济南失守，人心动摇，南京当局一时不敢执行一个全面调价的政策。

但是，上海当局仍然出台了一项增税方案。10月2日，上海对卷烟、薰烟叶、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烟丝等七种商品，改征税额，增幅达7-10倍。2日、3日，商人因增税不增价而停止营业。3日，上海社会局不得不核定允许香烟价格上涨一倍多，4日起照新价营业。这一消息传出，限价政策的信用立即崩溃。饱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上海人民，自3日上午起，即上街抢购物资，自静安寺到南京东路，一路上，商店货架被抢购一空，到下午3点左右，商店不得不拉起了铁门。这股风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抢购日用的比较值钱而又容易保存的纱布呢绒一类物品，随后又抢购米煤日用

百货。尽管当年粮食收成尚好，米的来源却日益减少，城市很快出现粮荒现象。煤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人民无法按限价购到日用必需品，管制经济形成了货品严重短缺的经济局面，社会秩序更加动荡起来。

蒋经国面临这种经济现象，内心十分恐慌，日夜不得安心。10月6日晚，他向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企图遏制抢购风潮，力挽狂澜。他向上海市民说："今后上海的市民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就是保持表面的繁华，有钱的人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再让投机的市场发达起来，逃避到香港、杭州、苏州和莫干山的投机家重回上海，再来兴风作浪，捣乱市场，使得物价高涨，民不聊生，这是第一条道路；第二条路就是能够忍耐一时的痛苦，经过一个困难时期，甚至经过一时不景气现象，而使得经济走入正轨，使得人民能过安定的生活。"(110) 但无济于事。24日，他又发表了《向上海市民进一言》，漫言道："我们可以确实相信，上海并非无货应市，而是商人看涨，不愿将存货拿出来，以致造成今天的所谓缺货现象。今后我们必须要他们将货物拿出来，照限价供应市场。"他承诺政府将实行限购、配购、统购政策，来保证供应，他不无恐惧地说："现在有许多人，看见了困难，好像已在那里开始恐惧了，甚至于开始摇动了自己的信心和决心。这是目前最大的敌人。"(111) 然而，真正摇动自己的还是他自己。10月初的扬子公司一案，使得"蒋青天"的神话，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

扬子公司一案，具体经过，人言纷纷，全部真相已不易查明。据现存的事后报告，查处扬子公司一案，起于9月14日上海警察局经济警察队队员赵洪宽口头报告，扬子公司囤积大量物资，队长程义宽即命其秘密侦查。但直到9月29日，才由秘密侦查转为公开彻查。据报告："该公司始行发觉，曾有一大卡车货物于是日下午五时外运，当即拦阻追回。"而事后查点，这一卡车货物"除有：（一）小型机器脚踏车二十四辆；（二）西装乙木箱（计四十四套）；（三）玻璃木梳乙木箱（计五九四打）；（四）玻璃板六大箱等四项货物，未曾登记

外，与该公司呈报经管督导办公处之物资清册核对，俱属相符，并无缺少。”至10月27日调查，扬子公司存货超过规定的三个月以上货物有：一、天津烧碱及美国烧碱五十六桶；二、糖九十五吨；三、火油二七四箱（自用原料）。上海市政府辩称：“查督导会议（由俞、蒋两督导员主持，参加者有吴市长、潘议长、徐副议长、方主委、刘副总裁攻芸、林局长崇墉、李处长立侠等）曾决定物资按照规定限令登记，但不咎既往，因此物资登记者之来源如何、时间久暂，均不在追究之列。”[(112)] 蒋经国自己就在日记中（10月8日后的上星期反省录）为扬子一案辩称：“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113)]

上述种种均有事后粉饰的可能，法律的辩护，本不是问题的根本，杜维屏、荣鸿元也并未服罪。豪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一上任，就要严惩大资本家和大商人，“从‘坏头’开始”。但为什么不从人人侧目的豪门开始？1947年六七月间，李宗仁草拟的上蒋介石书中也曾提出：“我政府亟宜以革命之精神与决心，厉行民生主义：一、节制资本，取豪门之财富，充实国库，课资产以重税，平衡收支，又何止五亿美元？更何须仰美人鼻息？二、平均地权，分地主过量之土地，归诸佃户，纳于公仓，则粮产增而无囤积，出粮出兵，自易举办。政府掌握全部物资之后，物价必然下跌。再取缔私营行号，严禁操纵居奇，发行新的货币，规定利率标准，则币值亦随之而稳定矣。”[(114)] 豪门问题，社会上从抗战期间开始，年年议论纷纷，蒋经国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如真要想有所改革，就必须从打击豪门着手。而他到上海后却从杜维屏（以杜月笙为目标）和荣鸿元身上开刀。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违法经营，企业就不能生存，目标是可以任意选择的，罪证是一定可以抓到的。抓什么人，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如果一开始就想抓豪门的问题，恐怕是不必等到9月29日的。从前述《大公报》舆论显然可见，蒋经国之所以不能不抓扬子公司，是出于舆论的压力，包括上海工商界的反抗，

甚至包括自己的部下在他的激进言论影响下对豪门横行霸道的痛恨。然而，统治基础已经十分脆弱的国民党政权是不能承认豪门问题的，这已经不仅仅是家族的私人感情问题，封住豪门问题的突破口，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蒋介石本人就曾亲自为宋子文辩护。抓不抓豪门问题，对于蒋介石父子来说，成了一个两难问题。

蒋经国于9月29日公开查处扬子公司，相传蒋经国要严办公司经理孔令侃，孔向在南京的宋美龄求救。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M．Panikar）记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席[115]。查《大公报》，宋美龄乘专机由南京到达上海是10月1日晨。但宋美龄未能说通蒋经国，只好直接向蒋介石求援。8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从北平乘专机飞往上海，亲自处理亲属之间的纷争。这时正值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翌日即9日，解放军就发起了攻击锦州的战斗。据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说他八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116] 不久，孔令侃于10月28日飞往美国。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另有两名监察委员到达上海调查扬子一案，此事轰动全国，蒋介石再次亲自干预此事。10月18日，他急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117] 尽管后来监察委员们仍不依不饶，但此案终于不了了之。

宋美龄、蒋介石干预扬子一案的消息传出，蒋经国立即名声扫地。他在10月8日后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118] 其实不仅社会上对蒋介石的统治感到绝望，就是国民党系统内的重要人物也由此而离心离德。如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就怨愤地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不久就和中共接洽和平。蒋介石的亲随幕僚陈布雷，因向蒋进言要孔、宋两家出钱助饷，遭到蒋的严词斥责，而于11月13日绝望自杀。蒋经国的部将贾亦斌，为扬子案与蒋经国当面拍桌子翻了脸，自此走上了起义的道路[119]。

当时，北平地区粮食依赖解放区，限价后粮食短缺，黑市价格暴涨，人民生活尤其困难。10月24日，北大教授沈从文等八十三人为生活所迫，发出停教宣言，定25日起停教三天，进行借贷。宣言指出："我们绝不能照限价购得我们的食用所需。"[120] 各地罢教、罢工、怠工风潮迭起，人心解体。

王云五归国后还想采取挽救措施，提出了"调整物价、工资及公务员待遇办法"和"预结外汇维持币信办法"。经过中下旬的多次讨论，王云五的主张得不到支持。10月27日-29日，行政院召开了经济管理问题会议，据王云五回忆："粮食部长则强调目前毫无粮食可以控制，不仅民食堪虞，尤以军粮无法供应为重大威胁，认为无论如何合理调整粮价，粮食仍不能恢复供应，只有听其自由定价，始可望恢复粮源。"[121] 蒋经国也到南京向翁文灏一再有所陈说，10月21日，前前后后谈了六个小时，但毫无结果。经管会议蒋经国也参加了，虽然尽力有所陈说，但已无力挽回，物价管制政策不能不宣告失败。王云

五因为币制改革失败，也不能不于10月29日提出辞职。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六大都市配售粮食，仍由政府继续办理”，其他重要物品价格继续管制，调整公用交通事业价格，调整公教待遇及工资，调整税收[122]。11月2日，翁文灏在立法院承认“币制改革完全失败”，他指出：“关于收支平衡这一点，可说是完全失败了，其原因是国库开支太大，许多重大开支无法减少。”[123]同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向总裁报告：“（金圆券）现在实际发行，截至本日止已达十七亿余元，照趋势，旬日之间恐即到限……万一到限不能发行，对于业务军政用款延迟支付，影响至巨。”[124]要求会同财政部商定合法手续。也就在这一天，蒋经国发表书面谈话《敬致上海市民》，黯然宣布失败下台。此后，被捕的商人也陆续交保释放。

限价政策取消后，物价暴涨，上海粮食价格，由原来的白粳每石20元左右涨到11月6日的每石250元，还难以买到。而公教人员待遇只涨一倍半，一时还领不到工资。到处出现抢米风潮。上海同济师生一度断炊。人民平时的积蓄，因为强兑金银外币而被掠夺一空，生活无以为继。在限价政策下，工商业损失惨重，流动资本濒临枯竭。社会经济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为此，上海《大公报》于11月1日发表社评《政府放弃了限价政策》，指出：“币制改革才两个多月，便招致了经济上这样大的变故，完全是以非经济的办法处理经济问题所闯出来的乱子。在战乱盛行经济紊乱的时候，本来还未具备改革币制的充足条件，但若遵循经济学理以行，可能有较好的收获，至少不致弄成这样人仰马翻，焦头烂额，苦了人民，也害了国家的景况。第一，以金圆券换法币，迫兑金钞，而不于此时机冻结游资，以致突然放出五六倍于旧法币的通货，有如洪水泛滥。这是最大的错误。第二，万万不该强力限价‘八一九’。在重庆时代也曾限过价，就未办通。明明办不通的事，而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去干，一面商民畏死赔售，一面金圆纷飞，于是便演成

这全国城市抢购一空的惨象。”

经此一劫，国民党彻底丧失了人心。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于11月4日发表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指出：“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党匪徒最大的帮手和功臣，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11月11日，蒋介石批准了王云五的辞职。同日，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改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并实际铸造金圆，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除银币外，禁止买卖流通，但规定了存兑金银的办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则可以由命令规定。自8月23日至10月31日，中央银行共收兑金银外币折合美元达1.68296390亿元[(125)]。遵纪守法的人民手中的通货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分之四。但实际铸造金圆，只是一句空话，兑现金银存款的问题，只是一时的缓冲政策。很快，由于人民的挤兑，而不能不严加限制，最终又停止兑换。此后，金圆券迅速膨胀，其速度之猛远远超过了法币。由金银外币换来的金圆券，变得一文不值，人民手中的积蓄，由此而被掠夺一空。蒋介石用来装饰门面的翁文灏内阁也已无法维持，不得不于11月26日辞职，由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二　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和财政的总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使国家经营的企事业迅速膨胀起来，垄断了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对外贸易。战后的官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64.13%，民族资本占24.66%，外国在华资本占11.21%[126]。但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经营困难。资源委员会接管了全部敌伪钢铁企业，而设备利用率只有12%。电厂恢复得最好，但国营省营占全国设备容量的73.5%，而发电量只占全国的60.9%。战前，民营资本在纺织业占有优势，战后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垄断了纺织工业的一半左右。纺建公司拥有全国华资工厂纱线锭的39.7%，布机的60.1%，1947年纱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6%，布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8%。1947年产纱仅为全国纱产量的39%，产布仅为全国布产量的40%。都低于其设备所占比重。台湾糖业公司的设备利用率则仅为35%[127]。资源委员会1949年度本要求各事业建设经费金圆1.8557亿元，而收入以局势稳定为前提，估计可达10亿。但事实上盈利极微。据报告："资委会各事业因遵守限价，利润甚少。若干单位且常有亏损。但历年应解政府官息红利，均经扫解国库。卅六年原奉核定盈余收入法币五百廿亿元，现已缴库法币三千七百余亿元。卅七年上半年并已预缴盈余金圆二万余元。"上述核定收入，到币改前的比值，折合已不足2万金圆[128]。

在内战和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国营企业不仅不能支持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48年鲍国宝等报告华北国营工业危机说："华北各厂，多属于重工业，其生产品既不如日用品之易于销售，而定价更不能随物价指数比例增高。因之成品堆积，资金短绌，无力购贮原料，而各料均随时狂涨，以致若干产品之售价不敷再生产成本，长此以往，何堪设想。"员工生活困难，情绪更形低落，影响生产效率。平津十个事业单位要求贷款共15390亿元法币[129]。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的价格及补贴问题，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948年9月份，上海公用事业各公司，即自来水、电力、电话、煤气、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小

火车，就由中央政府核准给予补贴800万金圆[130]。蒋经国一再上书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对各大都市交通公用事业的补贴方案，反对率先涨价，导致冲破“八一九”限价线。但国营事业本身也已坚持不住，要求取消限价政策。

币制改革时，原计划出售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的部分股票，来拨充发行准备，并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当局未能建立信誉，股票未能顺利售出。至10月12日统计，仅售出409万金圆[131]。当时中纺一家就准备出售股票4.2亿金圆，已出售数微不足道。同时，出售敌伪资产，也未能达到目的。结果，金圆券发行过大，不能回笼，通货膨胀激烈，游资充斥市场。

民间私营资本，在战后备受官僚资本和美货的压迫，经营困难。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后方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本国资本工厂职工人数的53.8%[132]。在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民间私营资本更感经营困难。由于原料和产品价格交替上升，在经营过程中，核算成本、预计盈亏，深感困难，常常形成账面上虚盈实亏的局面，而工厂仍要负担纳税的重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各企业为了生存，普遍制造一本明账，一本暗账，以资应付。为维持战时经济，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强化对经济的管制。1947年12月，行政院决定对花纱布改采“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政策，经济部改组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行全面管理，“掌握棉布及棉织品，统筹配销，专以配销于各地布商，平价供应于一般人民，以平物价。对于军需及公教员工之需要，特别优先供应”[133]。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的机构，效率极差，“购运棉花，则屡失时机，取少遗多，造成纱厂原棉之恐慌；代纺代织，则鲜花纱之掌握，更乏技术之配合，一再迁延，终未施行”。而配销部分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营，“敷衍搪塞，而犹以独占牟利为策”。这个公司由此掌握了纱源达全国总产量的75%，操

纵市价，摧残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要求取消这个机构[134]。民营工厂经营日趋困难，1948年6月15日，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南京工商部要求救济说："近年来，国货工厂对内贸易因在举国烽火之下，交通阻塞，运输困难，民生凋敝，购买力日趋薄弱，对于外销，则因外汇牌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结汇限制綦严，使国产出品益处于内外滞销之厄境。加以职工生活指数逐月递涨，原料缺乏，生产成本激增，往往出售成品之结果不足抵补再生产之成本价格，以致各厂存底日益空虚。且一般工厂资本因产销停滞，周转困难，不得不求之市场游资，不但利息高昂，且多短期拆放，使企业家日营于调换头寸之疲繁，焉有余力从事生产之扩充与改良。"[135]

由于工业生产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形成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严重局面。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战后出现逆转，由战前的50.55%增至66.69%[136]。这里还不包括投机商人资本。正常的经济秩序难以维持，各行各业，无论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界，甚至是普通的群众，为了维持币值，以维持生活，也投入到投机的狂潮之中。随着国民党政府军的失败，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资本，无法从事经营，更普遍地变成投机资本。生产萎缩，投机盛行，经济形势越来越混乱。黄金、美钞、证券、百货和房地产都成了投机的对象，买空卖空。走街串巷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豪门官僚资本，则是最大的投机资本，乘机大发横财，屡屡为社会各界所指目。民营企业也靠从事栈单、股票、外汇投机，来获取利润，划入暗账。

生产萎缩，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动荡不安。据对上海福新二、八厂工人工资的调查，按米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1946年为100，1947年则降为74.9，1948年更降为69。据对申新九厂一个老工人的统计，1947年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指数仅为64.1；1948年币改前，6月份的收入指数仅为31.1；11月份仅为15.2；1949年4月仅为11.7。其间，工人为维持生

活水平，屡屡掀起工潮[137]。

为了对付投机，控制物价，1947年初的黄金风潮之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开始加强管制经济，控制外汇，限制物价，工资按照1月份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1947年2月17日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取缔投机，禁止外国币券在国境内流通，限制携带出境数量，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外汇。结果，固定的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外流。1947年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中央银行所拟定的外汇管理办法，对外汇的机动管理，除官价外，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来调节外汇供需，确定市价，随时调整汇率。但是，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局势下，市价汇率担心刺激物价，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不敢追随黑市市场价格。到1948年5月，官定的市价汇率占市场汇率的百分比，由1947年8月的90.36%，降至34.19%[138]。是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结汇证明书制度，收购由出口获得的外汇和海外汇款，经核准后可以转让，作为补救办法，但未能发生效果。管制外汇的结果，造成外汇收入减少，出口贸易下降。

1947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间，十周时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百。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一则使物价失去平衡，二则国库不堪负担，被迫于6月19日取消。同时于5月间对生活费指数予以解冻，上海市政府每月公布生活费指数一次，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月按生活费指数调整一次。这个方法，遭到经济效益日趋低下的资方的反对，而劳方对指数的编制方法也不满意，劳资冲突加剧。7月间，为了缓和生活费上涨的趋势，稳定社会生活，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由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上海市政府的代表组成配给委员会，收购工作由国营的中央信托局负责。分配商品为大米、煤球、食油，分配对象限于公教人员和国营工厂工人。大米配给对象后来扩大到产业工人等。1948年1月1日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

但是，这种配给制，只是限于少数地区、少数人员，并不能普遍

解决物价上涨和人民生活普遍恶化的问题。北平地区公教人员生活更成为严重问题。进入1948年，物价继续暴涨，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也纷纷要求实行配给制。4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争取合理待遇，实行罢教、罢工、罢研，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起而响应。师院告社会人士书说："原来每月配发面粉两袋，生活已不易维持，近两月来竟行取消，而物价因通货膨胀，高涨不已。"北大等院校向当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一、自三十七年二月份起，仍按一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并实行配发其他生活必需品。二、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三、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139)] 1948年1月16日当局召开物价委员会会议议定五大都市配粮办法，至3月间成立粮食调配委员会，实施五大都市配售粮食，3月25日决定配煤制度。当时美援面粉开始到达，但北平、天津、广州地区因筹备不及，到4月份才开始实行配粮[(140)]。

管制经济的结果，致使流通不畅，生产萎缩，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限价政策屡屡失败，物价飞涨。当局经过一次失败，并不能吸取教训，而仍然希望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经济形势，最后导致了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经济总崩溃的局面。

"八一九"限价，无视经济规律，出现了价格奇低的现象，主要商品的批发市场几乎停顿。一方面物价空前便宜，一方面人民因兑换金银外币，手中持币增加，9月间，消费增加，吃喝玩乐的现象增多。同时，开始排队争购物资。饱受长期通货膨胀痛苦的人民，重物轻币，在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内战政策的恶劣环境下，对金圆券不予信任，是十分自然的。蒋经国亲自看见，"（9月25日）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141)]。工商界在当局的高压下，被迫按低价出售商品，但很快，零售商向工厂补不进商品，工厂补不进原料，粮食、煤、原料来源中断，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工。申新四厂的瞿冠英致李国伟的信中说："在此局面下，做工厂者实属为难，成品固须依

照限价，燃料等均有黑市，各厂原料告罄，亦不敢照黑市收买，眼看坐待停工，而限价之成品又各方抢购，其中难于应付之苦状，实难于言喻。”[142] 孙晓村在《大公报》座谈会上说：“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社会现象勤于消费，懒于生产。”[143]

10月1日，蒋经国已经发现粮食开始出现问题。10月3日起出现了疯抢的局面。张公权记述当时情形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大批大批的人群疯狂地冲进商店，不管是食品还是奢侈品，见了东西就抢购。起初，商店是缩短营业时间，迟开门、早关门，接着便把所有的存货都收藏起来不卖。穷人买不到米，面包房买不到面粉，豆腐坊买不到大豆，饭馆因买不到食物而关门，甚至连药品都买不到。市场为之一空，商店关门或是被警察强迫开门数小时，货架上却是空空如也。上海这种停业情况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大城市。”[144] 北平教授朱光潜、郑华炽、王聿修、贺麟等十七人于10月下旬，草就《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苦难与不平》，由胡适呈交蒋介石和翁文灏。呈文说：“生产减少，物资缺乏，货币流通区域缩小，战乱不安的心理影响，都同样可以使物价上涨。城市限价两月的结果，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成了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升斗小民，可怜已极，有的披星戴月，排队等候，如果一连数日买不到，饥饿痛苦的惨剧，已屡见报端。”[145]

蒋经国虽然还在努力强化管制经济，企图通过统购、配给来维持经济秩序，但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国民党的组织和政权运转方式，也做不到对经济的全面的统制。蒋经国在上海的局部努力，根本无法驾驭全局。管制经济的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10月31日当局取消限价，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物价立刻暴涨达10倍以上。金圆券雪崩式地暴跌。币制改革成了一场无耻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即使在国民党的上层，对这场公开的掠夺，也深恶痛疾。王云五自己说：“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146]

物价暴涨形势参下表[147]：

	大米（每石171磅）	面粉（每袋，计49磅）	食油（每桶22加仑）
1948年8月23日	20元金圆券	7元金圆券	58元金圆券
11月 6日	240元金圆券	73元金圆券	550元金圆券

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遭到警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148] 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继续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149] 不待解放军兵临城下，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这时徐州一带的会战已经开始。南京、上海、平津一带先后戒严。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非常重要，所以本市实行戒严，以防意外。但是，戒严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了维持治安，昨天本人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逞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150] 国民党统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总崩溃几乎同时发生了。

上海资产阶级在币制改革过程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据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3日报道："纱厂在'八一九'之后，大约照限价售出了五万件棉纱，棉布数十万匹，如照昨天的核本定价，总损失当在五千万金圆以上。目前上海各纱厂的原棉存底平均不到半月，棉纱存货则空空如也，反亏欠行总、外销会和美援华纱布联营处二三万件，因此，许多纱厂开出的栈单都提不到货。以上海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申新九厂来说，三十五年底存棉最多时达十六万担以上，现在则存棉仅二万二千担，亏欠棉纱四五千件，流动资金已捉襟见肘。据说该厂在这次改币过程中，共损失五百多万金圆之巨。"据统计，上海申新各厂因限价售纱、售布损失，折合10月份市价损失共达25,895,960金圆[151]。上海工业生产自1948年4月以来，一直趋于下降，"据一般估计，十二月份上半月各种工业产量平均仅及通常产量五六成左右"[152]。荣鸿元被捕后，荣家为营救他，用去贿赂估计就约合美金50万元。11月18日，荣鸿元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二年，准予交保释放。荣出狱后不久就到香港去了[153]。

在国民党当局采取管制经济和内战政策的经济环境下，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资金纷纷自北向南流动，并寻机逃往国外。自1946年6月内战发生后，资金南流现象已经出现，但以经济因素为主。1947年7月以后，由于管制经济，造成资金大量南流。至1948年2月，据估计，"每期少则一二千亿，多则六七千亿，绝少回流。"（每期大约十天，货币单位为法币，下面引文也同此）。1948年2月以后，资金南流加剧，据估计："南流资金除套取金钞外，则多外逃香港及美洲、菲律宾、南洋等地。其南流方式，现钞、汇兑、物资均有。南流数额，四月份平均每日二三千亿；四月以后、六月中旬以前，平均每日五六千亿；六月中旬以后，平均每日八九千亿；六月廿六、廿七两日最高记录，每日约一万五千亿。情况之严重，日甚一日。""三十六年香港增加工厂达四百余家，大部分为上海帮资金设立。""据估计，截止本年（1948）六月底止，流入华南之资金达二十万亿元，目前广州游资在三十万亿元左右。"[154]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尽管采取了交通管制的措施，仍无法阻止大量资金的外流。据上海《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报道："近周沪资金南流，约在五千至一亿金圆，此批资金，或在广州搜购黄金，或套汇来港。"[155] 据《申报》1948年10月23日报道："平津游资大量南流，人亦随之南去，寻觅安乐窝。此为平津银根特紧，因而牵住物价之原因。南流程度，两地每日约百余万金圆，并以台湾为倾注最大目标。""沪、汉、湘、赣商人蜂拥而下，偷运香港，或抢购物资。"[156] 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报道："这两星期来，上海阔人源源抵港。据经营旅行社的人士说，人数大概约有一万左右。他说这是个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了。尚未把一般经常来往港沪的旅客计算在内。"[157] 据解放后统计，上海申新各厂逃资总计达新人民币2529万余元[158]。由于资金外逃，到上海解放前夕，申新系统的整个企业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据张公权估计，在1947年到1949年间国内向香港的逃资约计港币5亿元（即1亿美元左右）[159]。另有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结果，造成了国内流通资金的枯竭。

这时，蒋介石在战略决战中面临彻底失败，即于11月间命蒋经国到上海组织将金银运往台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着手部署执行。据中央银行发行局11月29日密呈俞："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七百七十四箱，合纯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六。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负责移运的台北代表沈祖同、粤行经理丁某——引者）通知：洽妥'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卫，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12月31日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关于职行库存金银，前奉钧座面谕：应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等因。经已先后妥运台北黄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广州银币一千万元，前经呈报在案。日前又奉钧谕：应再筹运一批前往厦门妥存。等因。自当遵办。经已准备完成，为慎密起见，仍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合纯金五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市两，银币一千箱合四百万元。"1949年1月2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报告，1月21日起运厦门"计装'海平'轮

二千伍百箱，‘美明【朋？】’舰二千箱，共四千五百箱，计值一千八百万元”[160]。但据蒋经国说，当时中央银行方面，“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工作迟缓。他于1949年1月10日奉命到上海，要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16日，蒋介石又亲自约见俞鸿钧和席得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直到2月10日，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161]。与上述报告有出入。

此后，在上海解放前夕，由继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主持，根据汤恩伯的指令（根据各方回忆记述，刘也系奉蒋介石的旨意），中央银行于5月18日复电汤恩伯，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万余两，银元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安全地点”[162]。据王致冰、庄培昌近年研究统计，中央银行分三批将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运往台湾，1537万余美元运去美国，存入美国联邦银行[163]。不过，1949年5月3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外存金银明细表，与上述的统计数有出入，原表[164]转录如下：

品名	原币	置放所	备注
黄金纯金市两	245,293.853	纽约联邦银行	金圆券准备金
黄金	9,271.984	伦敦大通银行	同上
黄金	2,294,206.687	台湾	同上
白银纯银市两	463,059.050	纽约大通银行	同上
白银	1,216,401.250	伦敦萨缪蒙塔古公司	同上

如按上述资料和统计，那么运台的部分黄金似又转存美国，或至5月间已经消费相当部分，详尽当另行研究。至于国民党系统各地方当局，在撤离大陆过程中，自然还有黄金、白银、外汇运存台湾或香港、国外。从大陆转移、撤走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总数，当然要超过上述统计数字。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破坏，经济已经十分衰弱，再经此一番资金的大逃亡，留给

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流通资金，显然是异常拮据的了。

后来，蒋介石就以这批从全国集中起来的财政力量，作为退守台湾一隅之地的资本。所以，蒋经国说："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165] 有说者为金圆券政策辩护时甚至说："要是覆巢之祸并不那么单纯，那末丢了黄金，大陆又沦，政府没有这批黄金带来台湾，经济哪来迅速长成？相信我们真的要啃香蕉皮了。"[166] 可见，这批黄金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后来发展是多么重要。不过，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沈云龙有很公允的议论："聚敛千万人之膏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尚有何是非公道之可言耶？"[167]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财力为之一空，他没有力量支配在台湾存储的财富。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国民党的所谓土地改革，始终只能托之空言。在"戡乱"总动员令下，国民党更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控制，搜括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农村经济和社会更加动荡和破败。

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溃败之余，强化了征兵事务，对农村造成了巨大的骚扰和恐怖。据3月26日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指出："查本年征兵紧急，各地办理，多有未善，强拉舞弊，以致人心不安，先后据各方报告，内容大致相同。"姜乾在报告中陈述宝山情况："1月26日清晨，办理拘捕壮丁人员率领自卫队、警士下乡，强邀当地保长分往各村民户，拘捕壮丁。其时各家尚未起床，大体均能捕获。拘获后用绳扎住臂膀，两人连绑，押着解走。"本来规定，先征志愿兵，不足之数，再行抽签，但实际上并未先征志愿兵，而是秘密进行，突然拘捕。而遭拘捕的壮丁只有一部分解走，其余的人等候谈判。"抽壮丁本为各地各级人员弄钱之最好机会，此为公开之秘密"。据说当时"对方讨价为棉花十五担至二十担，或白米廿五石"。结果造成"各乡壮丁甚至卅岁以上者，均有戒心，或避往上海，或寄宿他处，不敢住家"[168]。据《大晚报》刊载读者周兴来信，崇明地

方“强捉硬拉，不问及龄，捉一批赎一批，循环兜转，漫无满额，人心惶惶，逃避一空。现在已到捉无可捉。不料乡镇公所又出一种花样，凡有及龄壮丁，都要挪出米来，预备买丁充数，最少征米一石五斗”[169]。当时，“在征兵与志愿兵并行之制度下，不肖兵役人员勾结兵贩子，竟以此为营业。故各地乡保派款买丁已成为地方机关一大事务，而诈欺纠纷几于无日无之”[170]。据上海《大公报》报道：“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壮丁会’。”凡壮丁都入会，一个人中了签，其他人便要合出壮丁钱给他，壮丁各地身价不同，有的论黄金，每名自一两五钱至二两，有的算谷物，每名约两千市斤。每年征兵至少两次，没有应征的壮丁就要出“安家费”两次[171]。

白崇禧在南昌动员“戡乱”、组训民众时，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172]。江苏临时参议会议长冷遹指出：“江苏之乱不在于匪，而在于军政”，“官与兵为致乱之源。”[173]上海《大公报》报道以安徽舒城为例，戡乱借款及今夏的购买机枪款，“规定向大户征借，而权势士绅，大都漏网，孤儿寡妇，甚至出征人的眷属，皆在征借之列。于是民怨四起，哀号遍野”[174]。

赋税的苛扰，一如既往。据福建地区典型报道，田赋征实，分两项：征购、征借，附加也两项，积谷、公学粮，征购数量按土地等则计算，多则四五十斤，少则一二十斤，征借量同。积谷为征购之二分之一，公学粮又占积谷之二分之一。三加四合，每亩田地须纳粮自四五十斤至百余斤[175]。广大农民辛劳一年，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赋税役政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响应解放军。

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于1949年2月25日发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到4月16日，又经立法院修正，政策到了朝令夕改的程度，也就完全失去了信用。按照这个方案，财政支出，以银元为标准计算，货物税征收实物，人民要以金银外币换取关元交纳关税，

修正后允许以金圆券换购关元。金融币制方面，准许黄金、白银买卖，银元准许流通买卖，政府准备鼓铸银元[176]。

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甚至赶不上印刷成本，各地钞荒严重，中央银行又发行大额本票，物价飞涨。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比1948年8月份时上涨了11万倍以上[177]。“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人们拿到金圆券不敢落袋，市场上或以黄金、美钞喊价，或以银元标价，农村物物交换盛行，邮局和铁路收费亦改以银元为准，公用事业中不但水电等费用以美金价格为基础而日常变动，就是人们每天乘坐的公共车辆票价也往往隔日有变而无从预计。”[178] 到解放军渡江前后，各地人民纷纷拒绝使用金圆券和央行本票，银元、外币成了交易的筹码，甚至恢复到了物物交易的程度。至6月25日，逃往广州的行政院明令规定以金圆券5亿元兑银元1元。财政上等到税收收交入库，金圆券贬值几等于零。财政部也不能不以硬通货支出。财政部长徐堪于7月16日报告[179]：

> 金圆券现为人民拒用以后，民间日常所需，以及工业商业交易媒介，必须有代用之物，始克支应。其时内地各省最普遍流行者，则为旧铸之银元，通商大埠则以美金、港纸等外币代之，各种旧有铜镍辅币亦随时随地作价为流通之筹码，甚至各商店、各学校亦多以纸片记数，加戳以代筹码，紊乱现象达于极点。其时政府各种军政支出由于不容一日停顿，为环境所迫，只得以库存外币、黄金、银元以为支应。四、五、六三个月中在国库方面先后付出者，计：
>
> 1．银元三千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元；
>
> 2．白银七十万两；
>
> 3．黄金十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两；
>
> 4．台币四千四百三十五亿余元；

5．各种外币折合美金二千四百六十万零五千三百九十六元。

7月3日，鉴于财政金融秩序全面陷于混乱，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实行银元本位制，并发行银元兑换券。结果，这种纸币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用，根本就发行不出去。

附录一　**1945年12月至1949年6月货币发行额** [180]

时间	货币发行额（十亿元）	
1945年12月	法币1,032	
1946年12月	3,726	
1947年12月	33,189	
1948年8月19日	604,534	
1948年8月	金圆券0.544	
9月	1.202	
10月	1.850	
11月	3.394	
12月	8.320	另一统计
1949年1月	20.87	20.8
2月	59.73	37.0
3月	196.13	120.0月
4月	（15日）760.74	1,531.2
5月		56,539.2
6月		130,304.6

附录二　**1946年1月至1949年4月上海物价指数**

（1937年1月-6月＝100）

年代	指数	年代	指数
1946年1月	160,315	7月	3,359,400

2月	273,550	8月	3,649,300
3月	344,383	9月	4,635,700
4月	325,986	10月	7,293,400
5月	360,485	11月	8,261,300
6月	378,217	12月	10,063,000
7月	403,982	1948年1月	14,074,200.0
8月	439,300	2月	20,155,200.0
9月	503,122	3月	32,576,900.0
10月	612,071	4月	37,764,200.0
11月	626,614	5月	54,281,300.0
12月	681,563	6月	197,690,000.0
1947年1月	817,750	7月	287,700,000.0
2月	1,309,848	8月	186.3
3月	1,386,593	9月	197.0
4月	1,669,900	10月	220.4
5月	2,584,000	11月	2,543.1
6月	2,905,700	12月	3,583.7
1949年1月	12,876.2	3月	405,320.0
2月	89,788.0	4月	20,957,009.0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42-243页资料改制。原书注：1948年8月物价指数的猛降是改行金圆券折兑的结果。1946年、1947年的数字，是简单几何平均数，1948年、1949年的数字是加权几何平均数。

---

(1) 孙晓村：《论两年来的中国财政》，《合作经济》新1卷第5、6期，转引自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164页。按：其中租借物资74,700万美元和出售的

剩余物资82,400美元，有不同的估算数字，并且系军需物资，并非纯经济援助。——笔者。

(2) 程悠等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3) 万麟：《孔宋张三氏理财之比较》，《经济导报》第32期，1947年8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159-160页。

(4) 《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财政金融部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5) 参《半年来中国经济的总结》，《经济周报》第7卷第1、2期合刊，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04页。

(6)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7) 参《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11-219页。

(8) 参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上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78页。

(9) 《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财政金融部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10) 参《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

(11) 张俊德：《论货物税之调整与实施》，《经济周报》第7卷14期，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1页。

(12) 《钟孟谋视察长沙税务报告》（1947年11月15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49页。

(13) 《钟孟谋视察长沙税务报告》（1947年11月15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第149页。

(14) 《恢复课征公教人员薪资所得税》，《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8日。

(15)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05页。

(16) 参《第十七次国务会议讨论建国特捐条例草案之发言记录》俞鸿钧发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5册。

(17)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册。

(1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19)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6日。

(20)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21)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8日。

(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23) 《上海市商会致总统府秘书长转呈总统电》（1948年6月1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5册。

(24) 《短期国库券发行了》，《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3日。

(25) 参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

(26) 据粮食部关于1947年度粮政报告，粮食部田赋署1947年度田赋征实征借收起数额比较表，粮食部1947年度上半年征实征借的工作实施与检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6册。

(27) 《行政院关于立法委员对翁内阁施政方针粮食部分质询的答复稿》，《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4辑第26册。

(28) 《粮食部陈送1948年度征集粮食办法的呈文及附件》，《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4辑第26册。

(29) 张公权（嘉璈）：《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30) 《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立法院第二会期第一次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平衡预算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1) 《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在第一届立法院第一会期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关于1948年度下半年度国家总预算编审概况的报告》（1948年7月2日），支出数据9月间改编总预算草案说明书折算，原草案为730万余亿元，《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2) 《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立法院第二会期第一次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平衡预算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3)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2页；《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

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34)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1页。

(35) 分别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33、14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3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303页。

(37) *FRUS*，1947，Vol．7，p．640．

(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21日。

(39)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48年6月14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

(40) 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45页；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2-264页。1.3亿发子弹价刘稿作减为美金5,909,931元。

(41) 《杜鲁门政府与中国》，第83—85页，转引自《中美关系史》，第456页。

(42) 康永仁：《财政赤字问题》，《世纪评论》第4卷第10期（1948年9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194页。

(43)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55页。该书第110页表所列数据有所不同：1947年，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9万余亿元，钞票增发额为29万余亿元。1948年1月-7月，银行对政府垫款为434万余亿元，钞票增发额为341万余亿元。——笔者。

(44)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6日。

(45)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2日。

(46)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9日。

(47)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7日。数据因币值变化而与前述估价有所不同。

(48)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0页。

(49)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83页。

(50)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82—483页。

(51)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1984年8月号）。

(52) 参黄元彬：《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又参《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

(53)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第1008页。

(54) 《岫庐八十自述》，第495-498页。

(55) 专家小组人员，《岫庐八十自述》隐去人名，此据《徐柏园先生有关“金圆券”的记录》，《传记文学》（台北）第44卷第4期（1984年4月号）。——笔者。

(5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9日条。

(57) 《岫庐八十自述》，第508-509页，王云五的币制改革草案，见第495-498页。

(58)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57页。

(59) 参李立侠：《金圆券发行前的一段旧事》，《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14页；又参张志超编：《民国中央银行关金券、流通券、金元券、银元券图鉴》，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6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29日条。

(61)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1014-1015页。

(62) 《总统府公报》1948年8月20日第1版。内列四项办法，均见同日《公报》。

(63)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报道，文词与15日所载正式文本有所不同。

(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8月21日条。

(65) 言诚辑：《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银行通讯》新第34、35期合刊（1948年10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2页。

(66)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67) 严凌：《看这次的币制改革》，《经济周报》第7卷8期（1948年8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4页。

(68)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69)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57-58页。

(70) 《岫庐八十自述》，第540页。

(71)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1日。

(72) 粟寄沧：《币制改革案的本质》，《新路周刊》第1卷20期（1948年9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8-359页。

(73) 分别据伦敦《金融时报》、上海《大美晚报》，转引自《岫庐八十自述》，第534页。

(74) 据《经济导报》第90期（1948年9月28日）报道英国经济报刊评论，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594页。

(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76) 《岫庐八十自述》，第531页。

(77) 《蒋介石饬各省市严格执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手启》，《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78)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3日。

(79) 《岫庐八十自述》，第535页。

(80)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5日。

(81)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6日。

(82)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

(8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8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07页。

(85)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8日。

(86) 蒋经国：《沪滨日记》1948年8月22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563页。

(87) 蒋经国：《沪滨日记》，第566页。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7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8日。

(90) 召集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记录，档案号，6-2-21号，原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

(91) 召集各工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记录，档案号，6-2-21号，原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

(92)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68—569页。

(93) 据寿充一回忆为六十多人，《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江南：《蒋经国传》记述为64人。

(94)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69-571页。

(9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7日。

(96)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71页。

(97) 参寿充一、戴立庵文，载《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98)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

(99)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6日。

(100)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3日。

(101)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102) 徐学禹：《更彻底改革经济措施》，《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3日。

(103) 社评：《币制改革以来》，《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4日。

(104) 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10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2日。

(106) 《申报》，1948年10月1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56页。

(107)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

(108) 当时，上海主要大报如《申报》、《新闻报》在战后都为国民党

系统所控制。据《痛定思痛》所载《沪滨日记》1948年8月24日记："十八时半，同俞鸿钧先生在中央银行接见报业代表。那里知道第一个想冲破限价的竟是报业界！"转引自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2期。此段文字，收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的《沪滨日记》中，不知何故被删去了。该书对已公布资料多有删节，使学者征引十分困难。——笔者。

(109) 《上某先生意见书五则》，《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464页。

(110) 《关于经济管制——蒋经国昨晚播讲词全文》，《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7日。

(111) 蒋经国：《向上海市民进一言》，《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24日。

(112) 《扬子公司囤积案史料》，《档案与历史》（上海）1989年第2期。

(113) 《沪滨日记》，《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88页。

(114) 《李宗仁上蒋介石书稿》，《档案与历史》（上海）1988年第3期。按：文内有"上月学潮骤起"，学潮起自1947年5月20日；又文内已有"戡乱"字样，据此当写于1947年六七月间。——笔者。

(115) 转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76页。

(116)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页。

(117) 《扬子公司囤积案史料》，《档案与历史》（上海）1989年第2期。

(118) 《沪滨日记》，《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92页。

(119) 参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页；贾亦斌自述：《半生风雨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6页。

(120)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31日。

(121) 《岫庐八十自述》，第544页。

(1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1日。

(12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3日。

(124) 《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1948年11月2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06页。

(125) 《金融周报》第19卷第20期，1948年11月17日，转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61页。

(126) 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6页。

(127) 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615-625页。

(128) 《资源委员会卅八年度概算及施政计划》，《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0册。

(129) 《资源委员会鲍国宝等请挽救华北国营工业危机的有关文件》（1948年3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0) 《申报》，1948年10月22日。

(131) 《出售国营事业股票统计底稿》（1948年10月1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2) 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9页。

(133) 《经济部三十六年度重要行政措施检讨报告》（1948年2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0册。

(134) 《上海市各织造同业公会致行政院呈文》（1948年），《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3册。

(135) 《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请求救济的代电》（1948年6月15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34页。

(137) 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0-744页。

(138)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03页。

(13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7日。

(140) 参《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27-233页；《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1947年度物价波动概况的报告（1947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1948年1至5月份物价波动概况的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2册。

(141) 《沪滨日记》1948年9月25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80页。

(142)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18页。

(14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4日。

(144)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35页。

(145) 《申报》，1948年10月26日。

(146) 前引阮毅成文，《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

(147)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35页。

(148) 《申报》，1948年11月3日。

(149) 《沉痛告读者》，《大学评论》（南京）第2年第7期，1948年11月16日。

(150)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27日。

(151)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20页。

(152) 《大公报》（上海），1948年12月18日。

(153)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13页。

(154) 《总统府第二局致中央银行总裁函》（1948年7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551-554页。

(155) 《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经济版。

(156) 《申报》，1948年10月23日。

(157) 《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

(158)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70页。

(159)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08页。

(160)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31-632页。

(161)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29、132、151页。

(162)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究竟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9期。

(163)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究竟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上海党史资料通迅》1989年第9期。

(16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34页。

(165) 《风雨中的宁静》，第52页。

(166) 周启范：《读〈王云老与金圆券〉有感》，《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4期。

(167) 《复萧铮先生并再论周恩来函及金圆券案》，《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6期。

(168) 《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1948年3月26日）及所附姜乾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69) 《大晚报》读者来信抄件（1948年5月3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70) 《国民大会浙江代表团提出关于赋税役政苛扰的提案》（1948年4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71) 今吾：《看看农村，救救农人》，《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

(17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173)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6日。

(174)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1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按：这里的征购似即征实——笔者。

(17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15、618页。

(177) 参本章附录二。

(178) 洪葭管：《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学术月刊》1965年第12期。

(17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47页。

(180) 据《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596-597页资料改制。

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谈判

第一节　和平运动和蒋介石引退

一　和平运动与白崇禧主和

尽管内战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国民党内主张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策略思想，在不同的派系中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崩溃，主和派开始抬头，逐步发展为一场“和平运动”。

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已经从国民党内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但他们同国民党内一些集团的联系仍相当密切。李济深在民革成立后，一直在进行策反活动，鼓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来反蒋，希望争取国民党内的多数，替代蒋介石，进而与中共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1948年夏，李济深曾与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联系，向中共中央转达：李济深、冯玉祥想利用美国国务院及司徒促蒋下台，由李济深和冯玉祥下令国民党军就地停战。据司徒雷登报告，李济深一直在策动成立联合政府，10月14日，司徒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李济深将军从香港发来一封私人信件，总领事馆已译成英文。信的大意是，他声称在以后数月中将宣告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据称，济深要求司徒雷登将此消息向美国国务卿转告，敦促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1)] 李济深于11月2日回答美联社记者和《德臣西报》记者访问：“问：很多外国观察家以为中共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李将军以为他们仍将组织联合政府否？答：我深信中共不会变更他们的政策。

……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临时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我认为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2)]

李济深原是桂系的老大哥，所以，民革成立后，他一直在策动桂系反蒋。据朱学范回忆：“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军事小组成立后，李济深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军人，希他们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来靠拢人民，就是唯一的出路。”[(3)] 李济深虽然多次与李、白联络，但李、白正在与中共作战，未予答复。据白崇禧于1949年1月22日复李济深函说：“启汉同志带来手示，语重心长，至深感奋。禧对于革委会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等革命主张，素表赞同，建立真正民主和平之中国，尤早具决心，只以过去处境困难，未能完成志愿。”李宗仁同日致李济深函则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处境困难，未获裁复，实深抱歉。”[(4)] 结果，李济深希望“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的政治目标[(5)]，在事实上不能实现。民革并没有形成举足轻重的力量，李济深本人在中共争取下，于1948年12月27日离开香港，前往解放区，参加筹备组织新政协的工作。当李宗仁、白崇禧于是年底从事倒蒋活动，希望借助李济深的政治力量时，李济深已经进入解放区，开始接受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张治中鉴于国民党日趋溃败，企图补救，一贯主张和谈。由于当时战争十分激烈，他觉得恢复和谈一时没有可能，就希望从打开中苏僵局入手。1947年12月18日，他写了一个机密建议给蒋介石，“认为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独立自主之精神，不符合国家现实利益，建议排除‘美国吃醋’的顾虑，径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打开中苏僵局，并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蒋介石当时

也有打开中苏僵局的意向，要张治中从侧面进行。1948年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Н．В．Рощцн） 回国之前，张治中曾和他有一次长谈。张治中表示："在我个人的意见，中国应该采取善意的中立。既不联合美国对苏联作战，也不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怎样才能够使中国做到善意的中立？首先要做到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然后才能消除一切足以妨碍中国善意中立的因素。怎样才能使中国内部和平统一？我认为首先要改善目前中苏的关系。就是要多方设法打开目前中苏的僵局，恢复在广东时代和抗战初期中苏间友好合作的关系。"为此，张治中也向邵力子、黄少谷、熊式辉、白崇禧、陈诚私下商谈和平问题。白崇禧同意张治中关于蒋介石失败业已注定的观点，同张研究"蒋失败后怎办？对于收拾残局不能不有一个准备"。6月27日，张治中在西安和蒋介石面谈时，再次力陈"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他认为："现在在八年抗战三年内乱之后，国家元气大丧，人民痛苦不堪，政府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愿意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表示不愿再以战争解决问题，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首先主动停止战争。"[(6)] 有人分析张治中的政治主张说："张治中认为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狄托，他具有祖国观念，与民族热情，想说服毛泽东能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国策上，成立国共两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国民党仍以蒋总统的力量为代表，共产党则以毛泽东的国家共产主义者力量为代表，不依附苏联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自力更生，共同对国际干涉主义者作战。"[(7)] 这一评论不免多臆测之词，但这种思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则相当流行。邵力子也是一位主和派，据说他甚至主张"无条件投降"[(8)]。他们是从对国民党政策的反省出发，主张和平，因此仍和蒋介石及国民党上层保持密切联系。

宋子文、孙科等人也活动过主和。宋子文主粤后，刘航琛曾于1947年10月间，策划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作为宋的代表和李济深系统联络。宋子文本人也和李济深直接洽谈过。孙科在国民党军事崩溃

之际，于12月20日组成内阁，未及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即向外界宣布："此内阁为一战斗内阁，将继续与共匪作战，直至获得光荣之和平为止。"[9]"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这不是投降内阁。"[10]他一面宣言主战，但又不能不谈所谓和平。据估计，"内阁极可能鉴于继续作战之无益，而决定和平……一般估计，共产党鉴于渠等之军事胜利，将要求国民党投降，此则非孙科所能接受者"[11]。民社党的刊物《再生》上发表社言《光荣的和平是什么？》对孙科的主张进行评论，他们认为："今日祸变之来，不论站在任何立场，国民党皆应有深痛的责任感，在上者领导政权到这个地步，试问除毅然让退外，更有何术可谢天下？……共产党如果不愧对所揭橥的民主二字，则应绝对根据政协的基本原则，不以'打到底'使人民陷溺至无噍类，而发扬坦白伟大的精神，以民生与国家建设为目标。"[12]回唱起中间路线的调子来。

此外，国民党政界，如立法院、监察院，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主张和平。

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倪青原、郭中一、刘不同等四十多人，分别上书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停战"。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吾人认为解救之道，惟有立即停止内战，图谋和平，政治实现民主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今日欲以武力建立一党独裁政权，固非世界潮流之所容许，而以武力保卫落后的官僚资本者，亦将为时代所淘汰。"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先生及所领导之中共，倘以解救人民痛苦，增进劳苦人民福利为职志，则停止内战，图谋和平，此其时矣。吾人认为图谋和平之道，惟有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民主主义之政治及社会主义之经济……倘计不出此，欲继续以武力作战到底，希图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之政权，则不仅与中共所标举之民主政治相背谬，且将造成人民更深之痛苦，空遗国家以莫大之忧患。"他们要求国共双方与自由进步的各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重行和平协商，组织民主的多党联合政府"[13]。这个自居于中间立场的和平呼吁，受到蒋介

石的直接抨击，蒋在8日的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演讲中说："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14] 南京《中央日报》刊出社论《知识分子还在梦想和平》，指责刘不同等为"国际间谍"。而新华社电台广播也予以严厉地批判："刘不同为国民党特务分子"，"要想保全反动势力。"[15]

国民党内真正有力量的非蒋介石系统，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领袖的桂系军政势力。随着国民党军事态势的恶化，他们也一直在考虑主和的策略，而且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据美国记者秘密报告，8月间，司徒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有如下的方案："（甲）蒋总统亲自出来主持，发动党的革新，使自由分子跃居首要地位，产生了司徒所喜欢称呼的'自由革命'。（乙）蒋总统对改革问题妥协，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中在李宗仁领导下的集团将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迫他退休，实施革新方案，并与共产党谈判。（丙）国民党政府将如石普勒（似为Philip D．Sprouse——引者）备忘录中所预测的分裂而成若干区域。"在同一报告中指出："李宗仁与他的支持者，可能正在等待时机，届时便能以将领政客与学者所组成的强有力统一阵线，施加压力于蒋总统，要求他自愿让位于合法当选的副总统。"[16] 济南失守以后，桂系的主和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此前，李宗仁自当选副总统后，变得无权无势，过起了悠闲的生活。10月间，他回到南京，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重危机形势下，开始公开亮出和平的主张。

11月8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O．Edmond Clubb）向国务卿报告，据提供情报的人说："徐州前线现在正受到威胁，这些政府军队的毁灭，将意味着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最后一线的黄埔系军事力量不复存在，而如果傅作义能够撤退，西部的权力将掌握在非黄埔系的手中，也就是在傅作义、白崇禧和西北马家军手中。南京政权以为不能忍受这样的打击，因为非黄埔系将军将成为非共产主义中国的支配者。那些人很可能一有机会就会向中共求和。"[17] 司徒于11月10

日也向国务卿报告："上周，张治中致电委员长，敦促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委员长将张召至南京。大概由于与委员长颇有交情，张抵南京后，即被授命向苏联大使谋求和平方案。张表示，虽商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将继续会谈。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原译为刘峙，误——引者）也与苏联大使馆进行了一次类似会谈。副总统李宗仁也倡议停战和谈，并声称委员长是和平解决的唯一障碍。"[18] 司徒雷登在15日的报告中又说："李宗仁上星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长谈中的主要意思是，委员长继续留在这里，有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美国的态度对他有巨大的影响，他应该被告知，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军事上彻底失败之前，马上离职，并在国家和政府中让位给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那将是对人民最好的服务。而这些新领导人需要美国明确的支持，这将使人们能从华南和西南取得真正的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以北。14日，副总统派了一个密使到我这里，重申他的看法，并确切地阐述了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如果任随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他指出，他将失去现在所拥有的，或者在委员长自动离开后可能获得的任何政治影响力，那么，他除了回广西老家之外，别无选择了。"[19] 同一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向国务卿报告了民社党的张君劢同他的谈话，并转交了张给马歇尔将军的节略。张君劢在谈话中说："委员长必须离开，并且远离正在削弱的反共阵线，如果委员长从舞台上消失掉，那将在实际上加强这个阵线的那些领导人如傅作义和白崇禧的力量。如果委员长离去，只要美国继续援助，反共的将军们能够稳定军事形势几个月。这将使他们有可能得以实现和平。"在致马歇尔的节略中，张君劢指出："如果美国不介意反对派对蒋介石的伤害，并且直接给予白崇禧将军和傅作义将军以充分的鼓励和有效的援助，并保证援助薛岳将军和张发奎将军，张将军尽管被蒋介石剥夺了指挥权，但仍能征召和组织军队，特别是广东的军队，这是能保证有效地运用美国武器的最后一条战壕。"[20]

此后，主和的人日益增多，尤其在湖北方面特别活跃。12月初，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刘先云在武汉召集黄埔系、复兴社、三青

团、国大代表、中央立监委员中赞成和平主张的三十余人，秘密誓约同心同德参加“拥李主和”运动[21]。大约在12月17日前后，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会晤。他认为仗已经打不下去，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因为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这个看法[22]。

早在8月间，国民党的一位重要部长对美国记者表示：“在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所有日子中，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可是，现在我们心中的沉郁却似乎已经无法摆脱了。人们对政府几已绝对的丧失了信仰。人人觉到大祸即将临头，人人都在坐待祸患的魔影的到来。在普遍的悲观情调笼罩之下人们争辩着指责着，但仍找不到出路，他们走向政府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而决不是全心全意去拥护它的。”[23] 当币制改革之初，人们还对打击豪门资本存有一线希望。金圆券的崩溃和军事崩溃同步出现，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彻底瓦解了。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据估计，1947年9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不管怎么说，它或许会带来安宁和较好的生活。那些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人，对国民政府一旦垮台将会出现的时局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24] 这一切，构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形形色色的主和运动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在军事崩溃、党内威信失落、党内各派和平呼声高涨的形势下，也不得不考虑引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观察形势的变化。据张治中回忆：“孙阁组成了，据他说曾先请蒋指示，蒋说：‘内阁组成之后，由你们去研究，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25] 另据程思远回忆，12月4日晚，吴忠信即向李宗仁转达蒋介石要吴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的话：“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十天后，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

忠信见李宗仁，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洽商，经过两次会谈，成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是蒋介石准备下台的重要人事安排。据吴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一九四九年元旦，同日由李接任。"[26]

美国方面也在策动国民党牺牲蒋介石和中共和谈。10月23日，司徒请示，是否可以劝告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其他人，其中一种选择："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么？"但国务卿回答说："美国政府不能自居于劝告蒋委员长退休的地位，或推荐任何中国人作中国政府的元首。"[27] 这是作为美国政府的一种公开政策。而事实上，据顾维钧回忆："（12月14日）据凌道扬说，在白宫讨论外交政策的那批人认为委员长应该让位，让其他人设法治理中国。他们认为只要委员长在位，他们便对中国无能为力。他们属意于李宗仁或任何其他人。他们并不十分反对委员长本人，而是反对他的亲属和周围的人。"[28] 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对孙科表示："一、美国政府希望蒋总统下野，二、希望新阁主和。"[29] 司徒本人也对孙科说："彼以美国大使之地位，虽不便发表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赞助和议运动。"[30] 随着国民党军事的崩溃，美国不再愿意积极援助没有希望的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也持观望态度，"铁托主义者的假设，是国务院中国政策的基础"[31]。美国方面的政策是："尽管谨慎地避免加以干涉，我们仍将随机地通过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国的其他派别之间的任何分裂，无论是在共产党组织的内部还是

外部。”[32]

最后，国民党内倒蒋主和的活动，由在武汉地区拥有军事实力的白崇禧首先发难。

先是在武昌有一个“十人座谈会”，从座谈时事到主张和平。其中周杰等是省参议会议员，他们就在省议会里提出和平的动议，但第一次讨论时，意见分歧很大。白崇禧知道后，即对和平运动表示支持，于是，湖北省议会里的空气大变，原来倡议和平的几个人就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行，省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在倡议和平的提案上签名。同时，白崇禧又派李品仙去见老同盟会员李书城，李品仙说：“这场战争是毫无胜利希望的，但蒋介石毫不觉悟，还要继续打下去。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武汉人民也是一样，如果本地士绅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各省人民将纷纷起来响应，可以凭全国人民的意志，强迫蒋介石停战言和。如他违反民意，则可联合各省军民迫令他辞职，由继任总统出来主持和议。”李书城即出面和周杰等主张和平的省参议员商量，请出德高望重的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发起和平运动。李书城又应白崇禧的要求，到长沙和程潜联络，共同发起和平运动，联合倒蒋[33]。白崇禧在平时谈话中也声言：“国民党北伐以来的家业，都给蒋介石一人快败光了，难道他真要搞到家光业尽才放手吗？现在还保有半壁山河，真能与民更始，还有可为。”[34]

白崇禧于武汉运动成熟后，即派代表邓汉翔到南京见张群、吴忠信，希望张、吴劝蒋介石从速下野。22日张群、吴忠信进谒蒋介石，蒋表示：一、如欲其辞职，必须先有安国保民及不受中共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能如此，则其亦必甚愿辞职也[35]。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亥敬电，正式向蒋介石发难，主张和平：

>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

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当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先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电话加英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以上所陈，伏乞鉴核察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36]。

白的这封电报是打给张群和张治中两人转交蒋介石的。据张治中回忆："（白）同时在汉口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蒋应该让别人来谈。他意在倒蒋是很明显的，我和张岳军还约了吴礼卿三个人研究之后，认为姑不论白的用意如何，但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便拿了白电去和蒋谈，一连谈了十天，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最后蒋同意下野，由李宗仁继任。"[37]

当然，要蒋介石下野并不那么容易。但军事形势已经十分紧迫，解放军随时可以兵临长江。白崇禧电发出后，湖北省参议会也发出呼吁和平的艳电，要求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38]。30日，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通电响应湖北省参议会电，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同日，白崇禧也再次致电蒋介石："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39] 同时，白崇禧且召集湘、鄂、赣、豫、桂五省参议会会长到汉口开会，成立"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制造民意的声势。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也在南京制造舆论，主张和平，"（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5）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

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并要“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40]。为了加强力量，白崇禧还尽力争取过去的同盟者何应钦的支持。他于12月28日致电上海吴国桢转何应钦电说：“8165密亥回秘电奉悉。方今时局日趋严重，谋国端赖老成。拨乱反正，匪异人〈任〉。禧夙隶帡幪，当始终拥戴也。”[41]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政势力，是国民党内一股有实力的地方势力，在历史传统上和蒋介石系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多次分裂和合作。在国民党军事崩溃之际，蒋介石系统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桂系的军事力量，由于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尚无大的损伤。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足以与中共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相对抗。他们为了不同蒋介石系统同归于尽，就希望通过逼蒋下野，与中共和谈，以联合政府的政治形态，保存自己及国民党系统的政治和军事势力，至少以和谈来赢得喘息的时间。但是，李、白的政治基础和政治魄力，从此后的事件进展中表明，显然不足以与蒋介石系统抗衡，他们的威望也不足以联合非黄埔系军政势力，事实上并没有形成前面所述的那种非黄埔系的联合局面。有评论说：“白健生的路线，无疑地是在尽量设法巩固桂系自己的实力与地盘，意图在将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桂系始终成为不倒的主角。因此，白健生拉拢了控制着湖南和江西两省的程潜，也和一向在四川有着决定力量的张岳军表示了联系，这样桂系的力量除了本身已经控制的安徽、广西和湖北以外，又加上了湖南、江西及四川，这些就是桂系将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本，也就是今日李代总统的有形力量。”[42] 这种力量当然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桂系想在夹缝中寻找独立生存的余地，只是死中求活的一种勉强的努力。而且，桂系虽以李宗仁为首，但当时的军事实力掌握在白崇禧手里，因此，和战的决策又实际为白崇禧所操纵。危机的严重性，力量的单薄，政治经验的不足，都使白崇禧表现得十分浮躁。

蒋介石在其主力部队被解放军歼灭之后，要以现有的政治和军事形态，指挥对中共的有效抵抗，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桂系要真正倒蒋实力并不充足。不过，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内的分裂，在他的一生中，再一次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决心“下野”。事后，蒋经国追述蒋介石的策略心态说：“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牛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43] 但这三条不过是事后的溢美之词，当前的政治利益，在于避开国民党内和美国方面攻击的锋芒，让主和派充当前台，等待主和派的失败，为自己重新集结残余势力、组织抵抗的前提。蒋介石毕竟比桂系有着更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

这时候，中共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国民党内以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为前提的和谈活动，早就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于中间派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也持严峻的批判态度。早在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曾就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对党内发出指示：“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请蒋暂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这是一箭双雕办法，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以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之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拉拢之理。假如这个界限不分清，我们的反蒋统一战线必致为敌人钻入利用，不仅真正的反蒋运动不能开展，人民中的反蒋观念也会被模糊，对于推动革命高潮，开展反攻胜利是极端不利的。”就是对于李济深的反蒋活动，中共中央都持警惕态度：“我们根本不应对他们存什么幻想，相反，要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更是

十分必要。因此，对于这类代表人物如过去的孙科现在的冯玉祥、李济深，都不应过分宣传，只能拿他们反蒋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当作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举例。”[44] 不过，在后来1948年8月的指示中，毛泽东采取了对中间派更灵活的争取政策，强调说：“我们对于李济深、冯玉祥一类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不要无分析地一概反对，而应告诉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45]

针对国民党内和平运动的发展，中共于12月25日以陕北权威人士名义，公布了蒋介石、李宗仁等四十三名战犯名单[46]：

蒋介石　李宗仁　陈　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　群　翁文灏

孙　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　峙　程　潜　薛　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王叔铭　桂永清　杜聿明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　琦

张君劢

是年底，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明确地阐述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他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他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抨击了以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为目的的和平阴谋，也严厉地批评了中间道路："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道路'。"(47)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十分强大，政治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在未来国家政权的方针、路线问题上，已经不存在任何调和的余地，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能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但是，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对中共的方针反应十分迟钝。他们总以为自己还有实力与中共讨价还价，而对战争的前途又缺乏信心，在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理下，对与中共谈判，建立如白崇禧所说的"对等"的联合政府存有一线希望。国民党各派系，当时已陷入了既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困境而尚缺乏自知之明。

二　蒋介石引退和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12月31日，是民国阳历纪年的除夕，总统府在阴霾的政治气氛中仍布置了火树银花，粉饰着升平气象。蒋介石以过年为由，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五院院长等到总统府聚餐。饭后，蒋介石即令张群宣读元旦文告的草稿，表示了下野谋和的意向。国民党内CC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等发言反对蒋介石下野，甚至痛哭流涕。蒋介石趁势愤愤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矛头直指李宗仁。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48]。

1949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转折的年代降临，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蒋介石在文告中对自己的独裁和内战政策毫无反悔之意，仍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共，但他不能不表示了下野谋和的意向："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49] 这一文告虽然在事实上向国民党内主和派作了妥协，但蒋介石本人的意向仍在主战。除了文告之外，蒋介石对主和派的方针一再提出了警告。当天，他主持开国纪念典礼，并在元旦团拜典礼后致词说："常言道'不能战，就不能和'，亦就是说'能战才能和'……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50] 2日，蒋介石复白崇禧电说："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

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致张轸电更进一步说：“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51] 蒋介石空言战斗力量，当然无补溃败的事实，但他指出了桂系以区区有限的力量，企图与中共讨价还价的虚妄。

蒋介石元旦文告发表之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即后来题名为《评战犯求和》的文章予以痛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52] 当时，国民党方面，由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月8日分别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大使馆，希望通过四大国的调停，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苏联方面接到中国政府方面的照会后，斯大林（И．Сталин） 于1月10日发了一封长电给毛泽东，商讨对策。斯大林以征询的口吻说：“我们考虑拟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曾经主张，并继续主张中国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但是，苏联政府在表示自己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希望了解，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为此，苏联希望，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的通报，并就苏联进行调停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们打算这样回答，并请通知我们，你们是否同意这样的答复。如果不同意，请惠告我们更合适的答复。”对于中共如何回应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斯大林就自己的设想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同时设想，如果征询你们的答复（指国民党方面的征询——引者），大致应该如下：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内战不是由中共发动，而是由南京政府发动的，南京政府应该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进行和谈，但是在那些挑起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不参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的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亲自参与中国国内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外来大国，不可能进行调停，因为那样的大国，在结束中国战争的行动中，不可能被认为是中立的和公正的。”

斯大林设定的答复，充满了外交辞令，真实意图含而不露。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电报发得不完整。毛泽东接电后，对斯大林的立场大为不解，因此，于1月13日回复了一封措辞严峻的电报。关于苏联方面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毛泽东直截了当要求措辞如下："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仍然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政府认为，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参加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认为，如果采取斯大林1月10日电的立场，"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可能以为，参加调停是合适的，并导致国民党获得借口，污蔑我们是蓄意的好战分子"。毛泽东认为，解放军的胜利已成定局，而美国方面是否还愿意继续援助蒋介石是一个疑问，因此，仍然采取迂回的政治策略，只能是弊大于利，即使同非战犯的国民党分子进行和谈，也是有害的。他说："是否可以允许南京政府人士，包括战犯在内，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对此还需要考虑。现在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了中国人民尽快地获得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我们认为，如果现在同张治中、邵力子和这一类人士进行和平谈判，这些人作为代表同我们一起建立联合政府，这正是美国政府的愿望。而这将在中国人民、民主党派和人民解放军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并对我们现在采取的正义完全属于我们的立场，造成很大的损害。"因此，毛泽东主张"义正辞严地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

斯大林于1月11日续完了1月10日的电报，1月11日电明确地阐明了他的立场："我们所拟的您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稿，目的是打消和平谈判。"他估计国民党不可能接受中共的条件，这样就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国民党头上，"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手腕将被打消，您也就可以继续进行胜利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1月11日电后，显然感到欣慰。14日，毛泽东复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表示："在基本方针上（打消同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同您完全一致。"[53]

于是，苏联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于1月17日由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А．Я．ВъІшинский） 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文，大意为："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谈及的调停，不认为是合适的……恢复中国作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而这种统一，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以中国内部的力量，多半要通过各方面的直接谈判，方能达到。"[54]

同时，毛泽东也根据斯大林来电的精神，改变了直接拒绝谈判的政治策略，于1月14日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和国民党军政势力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55] 中共中央在1月15日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前委的通知中指出：毛泽东在时局声明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因此"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56]。

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蒋介石显然不能接受，国民党主战派认为这是"教政府完全投降"[57]。但他们又没有继续战斗下去的有效力量，为此受到国民党内主和派的强大压力。当时，"所有的人民以及国府的大部分官员们，大家都要和平"[58]。蒋既不能战，又不肯和，一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声明，除宣布毛泽东的条件，以向党内主和派施加压力外，只好先听听内部的意见。

这时，国民党军徐蚌会战已经以彻底失败宣告结束，天津已经失守，北平危如累卵。国民党内许多人明知无法战斗，只有对和谈存有一线希望，尽管毛泽东的条件十分严峻，主和的空气有增无减。邵力子公开表示："毛泽东提出八点和平条件，意味着结束内战的谈判的

门户已开启……他相信，毛泽东的条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59]而国民党统治区社会上各种民意代表的和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在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会议中，有人已经敢于公开“诽谤”蒋介石，立法委员中有五十多人主张和谈[60]。对于南京政府外交部于1月8日提出的调停国共关系的要求，四大国也已先后答复，拒绝出任国共和谈的调停。同时，蒋介石对桂系的军事压力也存有顾虑。于是，决心下野，让李宗仁到前台主持和谈，自己转入幕后操纵政局。

此前，白崇禧接蒋介石复电后，即邀张群、黄绍竑去汉口晤谈。1月8日，蒋介石即命张群前往，黄也同行。张传达蒋的旨意：“（一）余如果引退，彼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61]对白崇禧提出警告。张群旋赴长沙会见程潜后，即回南京复命。白崇禧与蒋闹翻，已势成骑虎，即与黄绍竑商讨对策。白虽长于军事，有小诸葛之称，但对政治并不内行，为了在政治上有活动的余地，即主张“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62]。即请黄前往洽谈，如李不在，即设法与中共联系。14日，黄绍竑写信给李济深：“竑齐日应邀抵汉晤健兄，佥认为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特托竑为其全权代表，负责向公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兹请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临行并郑重表示：（一）欢迎中革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63]

黄绍竑到香港时，李济深已前往解放区，黄即设法与中共驻香港

的负责人联系，经向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得知白崇禧联络反蒋，即复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刘当时是白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64]。据学者杨奎松研究，当时黄绍竑经黄琪翔接洽，和潘汉年会谈，“黄对潘讲，白已决心和平，并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仍无成功可能。黄并且说，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前已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杨援引1949年1月20日文义致竺声电说：“与此同时，李宗仁见到毛泽东1月14日声明之后，也通过刘仲华秘密转告中共上海方面的代表，说明他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动作。若程潜不肯联合，则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65] 同日，毛泽东为周恩来、李克农起草的复潘汉年的电报，答复黄如下：“（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66]

对于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活动，蒋介石方面很快获得了有关情报。据蒋经国说：“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续与共匪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匪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67] 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也说：“还有一种公然的威胁，谓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68] 1月19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商谈时局，向李表示“引退”之

意。蒋又召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谈话，据张治中回忆：“（蒋）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半晌没人说话，蒋就一个个的问，记得吴铁城曾说：‘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最后他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69)]

21日下午，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宣读了下野的文告，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国民党的孤臣孽子、CC分子谷正纲等痛哭流涕。国民党的失败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失败的痛苦，也只是自作自受罢了。所以，外界传述蒋介石的话时，变成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某人打倒的”[(70)]！当天，蒋介石即飞离南京前往杭州，转赴奉化家乡。

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发表的宣布“引退”的文告中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廿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由蒋介石方面代拟的李宗仁文告，也宣布李“代行总统职权”[(71)]。本来，李宗仁所要求的是，蒋辞职引退，李正名继任，但蒋最终仅

给以代行的名义，为自己留有余地[72]。同时，蒋介石仍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他不仅要用他的影响力也要用这个身份来继续指挥国民党余部。当然，在引退之前，他对军政各方面都作了布置，以便在幕后继续指挥。

第二节　李宗仁的求和活动

一　初步的接触

蒋介石走了以后，李宗仁立即开始自己的求和活动。1月22日，李宗仁发表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文告："宗仁当兹视事之初，愿为我全国同胞告者，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此一任务明知异常艰巨，但为国家为人民，宗仁必竭尽一切努力以赴。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国家能早日步入和平建设之坦途，宗仁个人进退绝不计及……兹为表示诚意与决心，政府将从事废除一切和平障碍。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销停止，冀能培育国内和平空气，使和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兹已派定代表，俟得中共方面答复，和谈即可进行。"[73] 当日，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决定派遣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并对中共广播，盼中共约定和谈地点及日期，以便进行谈判。

同日，李宗仁分别致电已经进入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表达自己对于和谈的诚意，并争取他们对自己和谈活动的支持。他在致李济深电中说："现中共方面已表示愿意商谈，果能相忍为国，不难获致成功。弟对此不特愿尽最大之努力，且具有无畏之信心。吾兄频年倡导和平，苦心孤诣，举国敬佩。值兹艰危之际，尚乞详以示知，俾资循率。如能邀约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以慰众望，而弟亦得早日卸仔肩，尤所企幸。"

[74] 同时，李宗仁又分别写信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张君劢、罗隆基、黄炎培、章士钊、陈铭枢等中间派人士，派甘介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于23日到上海面交，征求他们对促进和平问题之意见。而“各方对孙夫人嘱望尤殷” [75] 。李致孙夫人的信上说：“弭战谋和，已成为全国一致之呼声。仁决遵循民意尽其最大之努力。惟兹事体大，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乞即日命驾莅京，使获随时承教。” [76] 24日，南京政府又派邵力子、张治中前往上海，征求中间派人士对和平问题的意见。张治中曾向李宗仁建议：“最好把孙夫人和李任潮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77] 李宗仁希望和中间派人士联合，在中间派人士的支持下，造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赢得中间派的同情，1月24日，李宗仁令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项事宜：（一）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行取消），（三）裁撤戡建大队，交由国防部另行安置，（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同时，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78] 。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指挥，李宗仁除做到了第一条改个空名以及释放了少数政治犯以外，一件实事都难以做到。

中共对于南京方面的“和平攻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抨击，并对中间派做了许多工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声明的立场，同时，又动员在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做工作，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 [79] 。中间派对形势的判断，因此比较清楚，对李宗仁的和平动议并不积极。民盟自解散以后，在上海的原民盟领导人处境已很困难，盟员则转入地下活动。而在香港

恢复的民盟组织则重新审议了政治路线，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里来了”[80]。张澜、罗隆基、黄炎培与甘介侯面谈之后，复信给李宗仁，表示目前不能来京，并表示：“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柱下名言，窃愿为我公诵之。”[81] 对李宗仁所持的强烈的功利心提出了忠告。据甘介侯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说，中间派领袖们告诉他：“共产党人有三项必要条件，第一，没有‘中间道路’，所有的政团和派系，对中共都必须采取如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那样的态度。第二，不助长美国在中国事务中的影响，不助长和美国的接触，包括任何团体都不接受美国的援助。第三，不和任何团体在它所拥有的军事和辖区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仅仅和个别人，按照他过去政治表现和现在的政治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82] 甘介侯和李宗仁都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和中共很难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派出了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以便和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在这种秘密联系中，李、白与中共就合作反蒋问题进行了磋商。

先是李济深未去解放区以前，于1948年底见到桂系的立法委员黄启汉，又写了一封信给白崇禧，托黄带交。信中说：“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83] 黄绍竑到香港后，虽然见到了黄启汉，但彼此在政治活动上没有交底。黄启汉于1月19日到达汉口，白对李济深的来信喜出望外，即要黄启汉和李书城一起北行与中共联络。但这时蒋介石宣布下野，白崇禧即改变主意，要黄到南京飞北平，找中共联系仅请湖北省和平运动代表李书城于1月23日自汉口出发前往接洽。李的代表性不够，且行程缓慢，并没有起到联络军事的实际作用。

1月22日，黄启汉从汉口飞抵南京，李宗仁即约见黄和刘仲华，

要黄和刘作为他自己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去北平，和中共取得联系，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3日，黄和刘飞抵北平。这时，北平和平协议刚刚开始执行，解放军尚未进城，黄和刘来平意向，由傅作义方面电告林彪，转达毛泽东。毛即电令：“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84]

在此期间，由于李宗仁有就中共所提八项条件进行商谈的表示，南京政府并派定了和谈代表，中共发言人于1月25日发表谈话，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揭露南京政府放出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一方面同意南京政府在接受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同时，中共发言人还暗示，要公布一个大大超过12月25日公布的四十三人名单的战犯名单[85]。26日，陕北广播电台，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一方面又宣布了蒋经国、潘公展、胡适等三十七名战犯名单，要求李宗仁如有和平诚意，“第一步应立即扣留战犯”[86]。李宗仁的和平呼吁得到了中共的回应，尽管态度严峻，但李宗仁仍给予了积极的回答，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电中就中共所述与美国勾结问题，断然予以否认[87]。

但这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1月26日宣判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28日，中共发言人发表严厉的谈话，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要求逮捕国民党

内战罪犯。尽管李宗仁曾命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而上海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并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将已宣判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监押。为此，中共对南京方面的和谈诚意再次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使南京的主和派十分被动。

在北平方面，经过傅作义方面的联系，1月27日，叶剑英即与黄启汉、刘仲华面谈。黄即把白崇禧和李宗仁给李济深的信也交给了叶。白的信上说："去岁华中军民曾数以坚强语气电蒋建议和平停战，并请其早日引退，以谢国人，旋更联络各方施以压力，以扫除和平之障碍。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决择。务恳我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李的信上说："兹者蒋已引退，弟勉支危局，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88] 他们向叶剑英转达了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而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一）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89] 另据《叶剑英传》记述："他们谈到：李、白同意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的'惩办战争罪犯'等八条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特意先派他们来北平同中共进行联络，表示'求和诚意'，希望中共方面能尽早与李、白进行谈判。李、白愿与中共达成默契，在京沪一带作战中与中共军队相配合，具体方案要等待叶剑英参谋长指教。"[90]

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叶剑英的电报中，要刘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

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西西，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西西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91)]。但事实上李宗仁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据此，叶剑英再次同黄、刘谈话，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对此，李宗仁很高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92)]但李宗仁关心的停战问题，中共并未给予明确的答复。这时，解放军已经开入北平，2月1日《人民日报》以“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为题材，向南京方面展示了北平方式。

与此同时，潘汉年在香港于1月24日与黄绍竑举行第二次会晤，向他转告了周恩来1月20日电的大意，促其立即电白崇禧，派刘仲容去郑州和刘伯承、邓小平联系。黄表示满意，并希望潘汉年派人和他一起去北平，转赴中共中央，“得一和平基础协议草案”。黄认为“李、白可考虑”。潘回答他：“李如能效法傅作义，先具体接受八条为先决条件，然后好谈和平解决方案。并告：目前李在宁之一切空谈，都是无法解决的。时机迫切，仍以劝白与我刘邓洽商军事反蒋为最实际。由于局部洽商如能成功，将可以发展到全面和平。”[(93)]刘仲容奉白崇禧之命，也从武汉经南京到上海和中共地下组织联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吴克坚：“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94)]

二　南京主和派的和谈方针

李宗仁、白崇禧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联络反蒋，实际上并不愿意完全切断和蒋介石的联系，更无论同美国的关系。他们仍希望在各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利益。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后，1月23日，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等

在和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谈话时，“他们谈及将尽全力为和谈而非为投降”，李宗仁召见傅泾波面谈时也“表示他将只为谋求和平而尽全力，倘若共方执拗如故，他便将撤退至珠江岸继续干下去”[95]。但是，他们仍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努力，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推迟中共渡江的时间。由于没有力量防守长江，他们希望沿着浙赣线和南浔线与白崇禧的江西、湖南防区汇合，建立抵抗线，“政府将持久坚守这一线，期待美国的援助，包括军事代表团”[96]。李对中共“压迫我完全脱离美国为唯一条件”，感慨系之。白崇禧于2月11日致电蒋介石：“中枢不惜一再委曲求全，作最大忍让，固已仁至义尽，乃中共迄无诚意接受，仍继续其军事进攻。揆其近来所提条款与广播，变本加厉，蛮横无理，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迷信武力，违反民意，和平前途，殆将绝望。”要求蒋有所指示[97]。

对于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即以蒋根本无法接受的八点作为政治上的回应，完全立足在战斗上。但对于李、白桂系的求和要求，尤其是军事合作反蒋的要求，则表示了有条件的重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采取了对于傅作义的求和要求大体相同的策略，也就是要求李宗仁、白崇禧配合解放军解决蒋介石系统，并且在政治上也完全站到人民一边，立功赎罪。对于李、白采取的与傅作义相似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则在政治上坚决予以打击，不允许他们继续保存其军政势力的图谋。中共的既定策略是：“在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未被推翻以前，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是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及中产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孤立，他们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以便时机一至，好与美蒋（或蒋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革命。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到那时，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会主张只牺牲蒋介石个人及其少数追随者，并利用帝国主义关系，照旧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结束新民主革命。”[98] 所以，中共一面同意与李、白合作反蒋，一面要求李、白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同时，中共对

李、白真正意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防止李、白拉拢中间派，构成中共的反对派，与中共在政治上抗衡。当时，北平和平协议正在执行中，如前所说，中共基本上要求李、白效法傅作义，但为了击破傅作义还想站在南京方面走中间道路的政治立场，公开发表了林、罗致傅的历数其内战罪行的通牒，这也是给南京李宗仁方面的一个警告。

为此，中共十分注意加强对中间派人士的争取工作。当时，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人，已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声明，拥护中共的领导，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并表示："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辛亥以来，历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是障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敌人，倘不加以彻底廓清，则名实相符的真正和平，绝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我们确信，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99)] 李宗仁为争取中间派而致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的信件，经中共方面转交之后，中共中央于1月24日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将李宗仁致李、沈、章、张电报送交他们是对的，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是必然要继续进行的，企图破坏在我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这不仅是李宗仁个人的活动，而且是蒋介石匪帮有计划的活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但蒋介石匪帮大势已去，依附蒋匪帮没有最后出路，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争取李沈章蔡（按：指蔡廷锴，张系蔡之误——引者）及其他诸人站在二十二日他们自己的声明的立场上，和我们一道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是完全可能的。"[(100)] 1月25日又指示党内，强调"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指出："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

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101)

在国民党方面，对于和平谈判有着自己的政治意向。白崇禧的态度，据刘仲容回忆：“蒋介石引退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白崇禧急忙飞到南京同李宗仁会谈。桂系内部认为，摆在面前的紧急任务是：（一）同中共举行谈判，结束内战；（二）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必须阻止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三）寻求美援，制止通货膨胀。……临行前夕，白崇禧和我谈了话，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102) 据黄启汉回忆：“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103) 白崇禧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阋墙三载，创痛已深，但求和平实现，解除人民痛苦，中共所提各项条件，均可商量。今和平之门既开，惟望双方推诚相见，早日促成和平大局，以后并切实做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建立新中国。”(104) 在先他更表示过：“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105)

李宗仁就和谈方针与刘斐也进行了对谈：

李说： “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说：“若还不行呢？”

李说：“那以后再说嘛！”并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说：“我有决心！”

我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106)

后来的南京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于1月23日对记者谈话时说：“（一）惩办战犯——因为蒋已离开南京，关于其他四十二个中共所提出的战犯，政府正在等待中共方面表示他们的意图如何；（二）取消宪法与国民党交出政权——政府认为，组织了联合政府就自然会修改宪法，并由国民党交出政权；（三）根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军队——政府认为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应一律改编，以便根据一九四六年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及张治中）所提出的原则成立国家的军队；（四）没收官僚资本与土地改革——政府完全同意中共的意见；（五）取消违背中国主权的条约——政府准备审查现有的条约，其中重要的只有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两种；（六）召开没

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政府对此完全同意。”[107]

司徒雷登也曾估计：“目前共产党显然正迅速取得军事优势。但他们面临内部的政治、经济困难。随着军事局势的发展，其地盘日益扩张，但问题也将会增多、复杂。解决问题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多在非共产党地区，他们或者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国民政府的职员。因此，倘若共产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取代国民党，并与这一改组过的政党建立联合政府，这将有利于共产党，行政问题将得到解决，而后他们再逐渐取得对行政的控制，同时会造就一个多党制的具有民主色彩的政府。这将是他们极可能采取的、合适的行动方针。”[108] 但美国连这样的联合政府也不支持：“虽然目前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似乎很可能，但我们相信就美国立场来说这是最非所愿的。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包括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历史，很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用政治手段控制整个政府及进行获取某种国际承认的能力。我们怀疑一个共产党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联合政府外还能够借其他方式获取全国政权。”[109]

因此，李宗仁及主和派方面的策略，是以中共尚无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控制全国的形势估计为基础而制定的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是以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为范本的，也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中共方面在抨击张治中上述谈话时，指出其改编国共军队的方案是“依据从未生效并早已作废的一九四六年二月马歇尔方案”[110]。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这条政治原则也就破产了。中共一再批评了中间道路的幻想，抨击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教。何况，这时候中共已经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将革命进行到底，无须再考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迂回策略。李宗仁方面重新回到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上来，当然既不会为中共所接受，也不会为中共所信任。至于李宗仁方面所说的中共军队不过江，划江而治，在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上，并非是建立南北朝的谈判，而是在联合政府的

前提下，各党派对地方的自治，仍然是1946年政协的原则。但这种迁就实际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事实上做不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当然会造成国家的分裂。不过，政治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李宗仁、白崇禧既表示了反蒋的意向，中共在政治原则上不让步的前提下也就力争他们与蒋介石决裂。

李宗仁上任后的基本政策，在2月15日夜的广播中表示："第一是谋取和平，第二是革新政治。"(111) 而他在同美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人赖普汉（Roger D．Lapham）谈话时阐明其政策说："如果和平可能达成固然好，万一不能达成，便只有在南方、西南、西北各地，就军事、行政等方面力谋改革，藉以赢取民心，然后跟对方抗拒周旋到底。"(112) 当然，无论是实力、时间、观念、组织方式和社会基础，李宗仁都不能胜任自己提出的任务。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企图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起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在中共和蒋介石集团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余地，以应付几乎令人绝望的时局。对此，连司徒雷登也对他存有希望："他仍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全中国的和平愿望。只要李的和平努力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或能成功地阻止中共跨越长江，他将能维持并利用人民对他的拥戴。李也意识到他的劣势，但他很精明地利用那些视他为和平希望之星的人们的支持，以便既弥补他与广东集团的裂缝，又可以尽可能多地赢得国民党实权人物的拥护。他向我们表示要求援助，并计划经济与政治的改革，以努力巩固他的地位。这些努力的成功程度将会奠定他的强大实力，这可以使他与共产党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或者，在共产党恢复攻势时，他继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抵抗领袖。"(113)

三　和平代表团与和平内阁

李宗仁为了促成和中共的和平谈判，先后组织了两个民间代表团前往北平。一是由南京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组成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

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114]，于2月1日由南京飞青岛，和中共联络后准备续飞北平。他们准备了一个由张君劢参与制定的《和平谈判纲领》，提出了“六六比例制”的政治体制设想[115]。一是李宗仁于1月31日到上海，与沪上社会名流恳谈，并邀请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为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晤谈，探明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意向。

中共同意他们作为私人资格来北平，也试图从中探明宁沪方面的意向，争取以北平方式解决南方各地。新华社于2月2日发表重要评论，认为：“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要他们援引北平为例，和平解决[116]。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让刘仲华回到南京，转达中共的意图：“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117]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尚未成行，甘介侯代表李宗仁继续在上海组织代表团，一度改组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侯德榜、欧元怀、凌宪扬，邵力子和甘介侯自己也准备以私人资格随行。甘介侯于2月5日在上海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谈判。”[118]对甘的“敲门”说，中共发言人给予猛烈的抨击，指责其为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表示不欢迎他到北平来，同时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119]把他们和南京政府区别对待。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经过中共方面的同意，以私人资格于6日从青岛飞抵北平。等候两天后，叶剑英、徐冰、戎子和、陶铸按照中共中央回复的指示，与代表团接谈。代表团递交了《和平谈判纲领》，主张“即刻停战”，对于未来的政治制度，主张“和谈后，即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构成分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成‘六六比例制’”。在接谈中并建议：“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旧中央，因旧中央已为国际及民众所承认，占据旧中央便于顺利占据全中国，更便于号召全中国及发布讨伐令。”[120]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彭真、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指示谈话方针：“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121] 代表团成员虽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不同，但大都对蒋介石的统治深感不满，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只是希望中共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各地，对此，中共也表示了和平解决的诚意。代表团即于2月11日回到南京。代表团多数人员回到南京后，既没有透露和中共的谈话内容，也没有晋谒南京当局，仅吴裕后到处活动和演说，并晋谒李宗仁和孙科，受到代表团多数人的公开批评。

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时，李宗仁又于8日偕甘介侯到上海，最后决定上海和平代表团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同时，叶剑英也通知南京方面三条注意事项：（一）双方谈话要守秘密，非经许可不得向报界发表；（二）不准新闻记者随行；（三）以私人资格来平，不得代表政府[122]。由于中共拒绝甘介侯前往北平，李宗仁就要黄启汉再次陪同代表团赴平，并驻平联络，同时要他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并且要黄口头向叶

剑英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123]

上海和平代表团原拟9日启程，但中共方面要等到和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谈话结束，因而推迟了行期。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自上海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启程。颜惠庆在机场表示："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124] 代表团先飞青岛，14日抵达北平。同行者除代表外，还包括4位代表的秘书，颜的保健医生，负责联系通航的电影演员、清华事业公司代表金山，央航公司职员二人，刘仲华、黄启汉已决心投靠人民，家眷也乘机同往北平，共达十九人之多。连同机师达二十五人。中共中央指示北平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125]。

15日晚，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设宴款待代表团，林彪等在平中共要人均出席作陪，并邀请了傅作义等北平和平解决有功人士出席。上海和平代表团大体上劝中共步子不要走得太快，调子不要唱得太高，要争取联桂反蒋，不赞成中共激烈反美，认为将来建设需要美国，章士钊更告诫中共，"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毛泽东依据中共的既定方针，在政治路线问题上毫不让步，认为四位代表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126]。毛泽东采取了对待傅作义的相同策略，一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痛驳，一方面予以争取。毛泽东指示在北平的中共领导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

白、张、邵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有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127) 这是争取李、白接受北平式的和平，而坚决拒绝李、白在政治上任何讨价还价的企图。

20日下午3时，中共在北平的负责人林彪等宴请民主人士386人，上海和平代表团也应邀参加。林彪在席上致词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邵力子虽和中共有不同的政治思想，但他不赞成国民党继续抵抗，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他表示：“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128)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人，应毛泽东之邀，由北平飞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毛泽东、周恩来和代表团广泛交换了对和平谈判的意见，关于中共和谈代表人选及和谈地点，允于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对南北通邮、通航的问题也作了原则性的安排。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的非正式的谈判，达成了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

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129)] 同日，代表团飞回北平。

上海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接洽，进展良好，李宗仁曾向外界透露：“据接近李代总统人士十九日晚谈：只要毛泽东正式的延请，李代总统可以考虑亲自到北平一行。”[(130)] 2月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从北平飞回南京，刘仲华也随行，以便向李宗仁汇报。代表团发表了早已准备好了的书面谈话：“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可告终了，因即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项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131)]

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平期间，李宗仁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孙科在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即已经和李闹翻。他在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局势的复杂多变，一直未能提出施政报告，在蒋介石下野前，即内定迁都广州，并给驻华使馆打了招呼。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之后，正从事和谈活动，不赞成政府南迁，以免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但后来还是作了让步[(132)]。孙科“经面请代总统于1月25日核可”政府南迁事宜[(133)]。1月26日，孙科在行政院会议上就此提出报告，经阁员一致同意，决定各机关于2月5日在广州正式办公，并正式通知了驻华使馆。1月29日为旧历元旦，孙科及行政院长官们即悄然前往上海过节，离开了首都南京。当时，政府各部门早已开始疏散，纷纷在广州作安顿的部署，连立法委员们也领了疏散费各奔东西。据报道，留在南京的立委仅数十人，在上海的有130多人，到台湾的有120名，到广州的有62名[(134)]。但政府南迁并无总统的明

令，1月31日李宗仁到上海时，又和孙科、吴铁城就政府南迁问题作了口头商量，据报道，“李代总统一日晚已下令行政院迁回南京”[135]。然而孙科仍于4日从上海飞抵广州，主持行政院工作。结果，南京人去楼空，冷冷清清，只剩一个光杆代总统，象征着首都仍在南京。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本以和平谈判和革新政治相号召，企图将国民党和中间派势力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取代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孙科内阁南迁，等于拆了他的台脚。政府南迁后，国民党内主战的声音又高涨起来。孙科在广州一再发表讲话，声称：“新内阁之主要任务乃在谋取光荣之和平，使国内问题能求得一公平合理之解决方法。惟本人曾特别强调新的内阁决非投降内阁……政府迁穗办公之目的，亦为避免遭受炮火威胁，而作城下之盟。”并声称：“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对不能接受者。如此仅系争执上之讨价还价，则容可商讨。”[136] “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共党不能以战胜者姿态迫令吾人投降、完全接受其条件。”[137] 9日，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也发表书面谈话，强调说，（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言和，能战方能和。“鉴于北平局部和平骗局之可怕，为求得平等的全面的有条件的真正和平，政府唯有积极备战，始能言和，亦惟有能战始能和”[138]。这对李宗仁的和谈方针也是一个严重的牵制。

2月16日，在广州的行政院会议上，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突然免去本兼各职，由周嵒继任。这是一件令国民党军政界震惊的事件。陈仪虽然是政学系的要角，一向亲蒋，但为人爱国，廉洁，私德很好。这时候他对蒋的信心已经动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决心反蒋。陈仪和汤恩伯情同父子，据陈仪说，“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仪对汤之“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是托何应钦、张群等人疏通的结果”[139]。所以，陈仪敢于直接策动汤恩伯起义。1月28日，陈仪派自己

的外甥丁名楠到上海见汤恩伯，递交了一张开列条件的纸片："甲：（1）释放政治犯。（2）停止修筑工事。（3）保护一切属公财物，不得破坏。乙：（1）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取消×××（按指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丁遵陈仪嘱咐，还向汤口头提出："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汤回答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140]。但汤恩伯出卖了陈仪，向蒋介石告密。陈仪被免职后，仍不相信汤会出卖他，以为是平常的任免，当蒋介石打电话要他去奉化时，他不愿意去，找借口先到上海。2月23日，陈仪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拘捕，后被押往衢州监禁。1950年6月18日在台湾被杀。对于陈仪的撤职拘捕，李宗仁竟在事先一无所知，完全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141]。

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是支持李宗仁的和谈主张的，反对孙科将政府南迁，并主张立法、监察两院在南京复会，而孙科则要求两院同时迁往广州。于右任、童冠贤曾于2月7日前往广州，争取两院在南京复会，但一时没有结果，至12日回到上海。在南京、上海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纷纷指责孙科将行政院擅自搬到广州，造成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在京、沪的立法委员即决定在南京复会。

政府分裂，对李宗仁的总统地位和施政方针的贯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孙科把政府机构迁往广州，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不得人心，普遍认为这是阻碍和平。为了赢得必要的支持，李宗仁一方面派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黄绍竑先后于8日、9日到广州，弥缝矛盾，邀孙科早日回京，并和粤系将领商谈粤桂合作。一方面通过阎锡山向蒋介石疏通，解决府院矛盾。蒋介石于2月17日爽快地向阎锡山表示："立法院地点仍设广州，行政院重要部会主官应驻南京，但其机构仍在广州。李宗仁既欲变易孙科院长，与其另觅人选，协调府院，反不如由李宗仁自行决定行政院长，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142]

各方面协调成熟，2月20日，李宗仁飞抵广州，开始南巡。据公

开消息报道：“李代总统此次赴穗，系邀孙院长来京共商大计，并邀请在穗立委来京，并征询渠等对当前大局之意见。”[143] 李宗仁在广州发表谈话称：“今全国人民既一致主张消弭战祸，则继续战争即为违背民意，因之余不特愿为和平尽其最大之努力，而对和平之必然实现，抱有无限信心。余更相信在全国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中之今日，无论任何党派必须接受大多数人民之和平要求，否则民怨所集终必失败。余极望全国同胞为谋自身幸福计，共同奋起，协助政府促成和平之实现。”[144] 桂系和粤系将领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反蒋的合作，李宗仁到广州争取到粤系将领的广泛支持，迫使孙科同意返回南京。22日李宗仁飞往广西桂林，安排后方，24日到长沙与程潜洽谈，25日经武汉回到南京。他在武汉表示：“努力谋和，亦为政府今后重要措施。只要全国上下能集中力量争取，相信和平终必实现。”[145]

2月28日，立法院终于得以在南京召开第三会期第一次院会，同一天，孙科也回到南京。南京有了一丝生机。3月1日，李宗仁召开非正式会议，指定孙科、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吴忠信、何应钦、刘斐、朱家骅、钟天心等十人负责研讨起草和平方案。当时，孙科的主战倾向不得人心，受到广泛的指责。有立法委员甚至斥责孙科内阁是最近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及最恶劣者”，并且是“和平之障碍”[146]。孙科失去了立法院的支持，即于3月8日到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同时提出辞职。

对于新内阁人选，李宗仁选择了何应钦。何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属于蒋介石系统，在军中影响广泛，但何在历史上和桂系有过合作关系，与蒋介石也有很深的矛盾，当时处于无权的闲散地位。李出任代总统后，桂系方面对跑到上海养病的何应钦一再劝驾，极力争取何的合作。白崇禧于1月22日、29日两次致电何应钦，在1月29日白崇禧率华中将领致电上海市政府转何应钦电中说：“自总统蒋引退，副总统李继任，局势艰危，严重未减。当前和平未定，亟应备战谋和，藉策安全。我陆海空勤关于军政军令必须有统一指挥，俾能适应事机。

我公功昭党国，同深景从。务乞出承艰巨，领导群伦，国家民族实深仰赖。”[147] 同日，李宗仁也致电何应钦：“吾兄公忠党国，久共患难。顷闻必不忍使弟独跳火坑，务请即日命驾入京，共支危亡。”[148] 李宗仁看中了何的微妙地位，希望借助他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蒋介石系统的力量。但何应钦并不敢于脱离蒋介石，不能不看蒋的颜色行事。当时的局势十分严重，国民党内的矛盾又十分尖锐，普遍认为组阁犹如跳火坑，因此何一度坚辞。

蒋介石身居幕后，依然举足轻重，李宗仁对于请何组阁一事，也不能不一再向蒋介石请示。当时，张治中正在溪口，蒋介石一度不太同意，经过张的劝说，蒋才表示同意，并亲笔写信给何应钦说：“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分散，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149] 11日，何应钦正值六十大寿，到杭州避寿。但李宗仁派了白崇禧赴杭州祝寿，并劝驾组阁。张治中、吴忠信、顾祝同等也前往杭州祝贺。何应钦这才同意出任组阁，并表示三求三裁的施政意向：“求和平，求进步，求团结”，“裁军队，裁经济，裁机构。”[150]

3月12日，李宗仁向立法院提名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得到立法院的通过。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后，对于和平谈判问题，先后向外界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问：新阁所争取的和平是什么？答：是合情合理的永久和平，合乎人情合乎人民的意思，如此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和平内阁。”[151]

何应钦内阁组成后，李宗仁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但中共对李宗仁任命蒋介石系统的何应钦组织内阁十分不满，为此，李宗仁致电黄启汉向中共解释说：“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

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152]

奇怪的是，李宗仁对刚刚发生的陈仪事件似乎无动于衷，竟然自我感觉良好。即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仍认为“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153]。说得不明不白。李宗仁应该明白，陈仪事件最足以说明李宗仁根本无法控制蒋介石的军警特务系统，那么，他为什么对陈仪事件那么麻木？这一问题，按回忆录的解释，是别人劝阻的结果，但以政治论，江浙联系密切，李宗仁如果对作为浙江省主席的陈仪都没有争取合作的强烈愿望，那末，他的政治力量从何而来？由此也可见桂系领袖政治能力的薄弱。

第三节　北平和平谈判

一　和谈酝酿成熟

当时，蒋介石还在幕后指挥一切，李宗仁对国民党军政事务在事实上指挥不动，中共对桂系迁就蒋介石的政治主张进行猛烈的抨击，指责“李宗仁的‘和平’宣传至今并未超出和平攻势的范围”[154]。蒋介石还在继续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一方面对付桂系，他甚至准备“命令胡宗南及其二十万部队空运广州，图阻李宗仁的势力”[155]。桂系与主和派方面，希望设法让蒋介石出国，以免蒋介石成为当前和平决策的障碍。据司徒日记，2月20日，“从何应钦方面传来消息，要美国帮忙促请蒋介石出国”。2月21日，“白崇禧到访，谈了一个半钟头，还是关于促蒋氏离开中国的同一问题”[156]。

最后，张治中决心自己去劝蒋介石出国，以便李宗仁放手去做，促进和平。经与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商量，张治中于3月3日与吴

忠信一起动身到溪口看望蒋介石。但劝蒋出国的消息事先已被甘介侯披露出去，南京《救国日报》于4日发表社论《人民要求政局明朗了》，5日又发表社论《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结果，《救国日报》被当局扣上“侮辱领袖”的罪名，停刊三天[157]。当张治中、吴忠信面见蒋介石的时候，蒋即愤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先把他们的嘴封了起来[158]。

张、吴在溪口住了五天，和蒋介石长谈。关于南京方面对于和谈的最低限度条件，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如下：“南京方面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把全国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至于联合政府问题，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议六六制的，不外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至于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张治中认为“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159] 据中共在香港办的报纸《华商报》披露：“据蒋方消息：‘今后和谈，将以马歇尔方案为基础。’此一消息如果确实，完全证实南京反动政府绝无和平的诚意。”[160] 南京方面尽管得到中共和中间派人士的明确警告，仍然抱着1946年政协时期的多党民主的政治原则，去和中共进行谈判，在实际上不愿意认真考虑中共的条件。

中共对黄启汉、刘仲华能否确切地反映李宗仁、白崇禧的意图，没有把握，急切地指示地下党要刘仲容早日动身北上，以便了解李、白的真实意图。李、白也要刘向中共做工作，劝阻中共军事渡江。刘

仲容作为双方可以信任的秘密使节，于3月13日在南京与刘仲华一起，与李宗仁商谈了和平条件，李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刘仲华明确告诉他，中共方面已再三警告过，不要向中共提出不过江的问题，中共军队不仅要过江，而且台湾、海南、广州、昆明都要去。”[161] 3月16日刘仲容从南京回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谈后约20日间到驻马店前往北平洽谈和平条件。但由于交通阻隔，直到3月30日才到达北平。这时候正式谈判也已准备就绪。

3月23日，何应钦宣布内阁改组名单，24日即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由于中共拒绝接纳彭绍贤、钟天心，而邵力子力辞首席代表，经事先征得中共同意后，确定为：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增补刘斐为代表。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面临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决定了有关的方针政策。3月25日，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毛泽东、朱德乘车检阅了部队。中共方面准备就绪，即于26日就和谈问题发布对南京政府的广播通知：“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之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162] 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

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

在何应钦主持下，南京方面就和谈问题举行了四次集会研究，决定国民党中常委和中政委从广州迁回南京开会，组成和谈的指导委员会，而最重要的是决定“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仅《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这一腹案共九条，基本上是1946年和谈的政治原则，仍希望以对等的方式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是”，“重订新宪法”，而“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对于至关重要的军队问题，主张“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在未来的政协和联合政府中，国方和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等等。同时要求“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此外国防部另有《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163)

行期决定后，张治中于29日自己决定到溪口去看蒋介石，探问蒋介石的态度。蒋对“腹案”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确实，张治中要完成这个“腹案”的任务，作为一个战场上的失败者，无疑比登天还难。蒋介石在和张治中谈话时，“他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治中听了很高兴，征得蒋的同意，随后在3月31日的报上发表。蒋经国则狠狠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164)

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南京政界既兴奋又忧郁，各派系的心情固然不一样，但即使在主和派里也一样忐忑不安。有人分析：“和谈成功所必要之心理准备，在共党方面，应放弃其革命到底之思想（即清除一切之反对派，成立一党专治），在国民党方面应接受战败党之地位。”(165) 显然，这两条很难做到。顽固派以各种组织和名义发表文电，反对废除宪法，变更国体，反对追究战争责任，要求无条件停

战，力求平等的和平，反对“苟安”和“投降”，等等。张治中于31日应邀在立法院演讲，慷慨激昂，表示乐观，“一般人认为比较麻烦的问题，如整军及联合政府等，他相信在双方假如都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166]，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但在何应钦为代表们送行的晚宴上，“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张治中本人在对上海《新闻报》负责人俞树立谈话时，也忧郁地表示：“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167] 下午，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军政要员的谈话会，他表示：“过去军队不能战，至今亦然。经济竭绝，金元券不值钱，公教人员以及工人滋扰，不得已而谋和。”白崇禧在会上报告：“安庆打了十天，得到敌人文件，要乘江水未涨前过江。昨又得文件，限今晚拿下安庆。所以本人要求先停战，不要一面谈，一面打，以成其打过长江来解放全中国。”他一再为军械问题与顾祝同发生争执。深夜，南京政要与和谈代表还在李宗仁住宅商谈和谈方针与和战形势。李宗仁表示：“即使决裂，也要在联合政府时再决裂。”[168]

二　北平和谈初期的意见交换

1949年3月31日，秘书长卢郁文率工作人员等十人先行前往北平。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及顾问、随员一行十九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飞机启程前往北平，翁文灏（代表李宗仁）、何应钦等到机场送行，立法院特休会半天，也全体到明故宫机场送行，对和平谈判的成功寄予很大的希望。张治中在登机前致词，表示要“不负各位先生的盛意和全国人民热烈的期望”[169]。同时，代表团发表了书面的谈话。与南京的“热烈”气氛相反，北平接待的气氛十分冷淡。张治中原以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西苑机场迎接，实际上只来了秘书长齐燕铭等寥寥数人，而且，南京代表们多不认识。张治中的情绪顿时低沉下来。到了住地六国饭店，一进门就看到了“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标语。又是当头一棒。张治中悄

悄地对屈武说："看起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所怀疑的。"[170]

张治中和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显然缺乏研究。民革和民盟等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的中间路线倾向都已受到中共的一再批评，从而改变了立场，接受中共领导。代表团带着划江而治、对等的联合政府等等企图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的方案，来北平谈判，怎么可能受到中共的欢迎？傅作义交出军队，接受北平和平协议时的政治态度，尚且受到中共的严厉驳斥，何况南京保存军事和政治实力的野心？南京代表团带着要求中共改变政治路线、讨价还价的谈判方针而来，在中共看来，又有何和平诚意可言？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已经不会向任何人让步。南京政府代表团简直是熟视无睹。

中共的和谈方针，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确定，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171] 而具体的谈判策略，仍与北平谈判及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谈判时相似。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首先以严峻的态度，指出国民党的内战罪行，剥夺他们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发言权，然后再以温和的态度，指出出路，给予宽大的待遇，以求和平解决问题，而在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幻想。

当日晚，公宴之后，周恩来、林彪即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一开始就以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据张治中回忆："周首先提出质问：'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认为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大表不满，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溪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溪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

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172] 看来，张治中始终不明白，他的溪口之行，正是给了周恩来一个绝好的口实，以堵住他宣扬其多党民主的政治路线之口。

当天，张治中避开更敏感的政治问题，向周恩来陈述他对未来国家外交政策的见解，主张“平时苏美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驳。以后他还一再有所陈说，但终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173]。

对于和谈问题，由于南京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周恩来表示：“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174] 由于南京代表团的代表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派系、政治思想和经历，分别交换意见显然有利于中共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做工作。从第二天起，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

按照中共方面的要求，谈判是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但在中共方面的见解，是以南京方面接受八项条件为前提的；而在南京方面的见解，是依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也就是围绕着八项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南京代表们对于惩办战犯表示在事实上做不到，在军事上，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对于战犯问题毫不放松，对于渡江只表示谈判期间不渡江，对于整军，必须改编为人民军队。中共对于南京代表团的立场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态度，形势紧张。周恩来把黄启汉叫来，要他就两个问题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周恩来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

么进行呢？”[175]

此外，南京学生于4月1日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搞真和平，不要搞假和平，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拦截毒打，造成伤亡。对此，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严厉的责问。这一切，使正式会议未能如原设想的那样在5日举行。

在非正式会谈期间，毛泽东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于4月5日发表，严厉抨击李宗仁、何应钦政府鼓吹“平等的光荣的和平”，要求他们处理4月1日的南京惨案，逮捕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等人，或者协助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逮捕，“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并且指出：“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评论文章更强调指出：“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176] 新华社甚至发表直截了当的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177]。

中共对南京代表团严厉地阐明了政治立场之后，就来向南京方面说明宽大的底牌和桂系首脑的个人地位安排，以争取桂系同意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底牌通过两个途径去疏通，一是正式的途径，由毛泽东亲自和代表团谈，然后正式谈判，形成书面协议。一是通过李、白公开和秘密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直接去向李、白解释。

4月3日，周恩来对黄启汉交待转告李、白的几点具体意见：“（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3）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

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李济深、邵力子也来向黄托话。李济深要黄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并告诉他毛泽东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支持李宗仁将来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支持白崇禧继续带兵。邵力子则认为蒋介石死硬派没有希望，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接受局部和平。黄启汉3日到南京，5日到武汉，分别向李、白作了汇报[178]。

与此同时，4月2日，毛泽东亲自向李、白的密使刘仲容作了交待，要刘转告李、白，大意是：“（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毛主席还谈到：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179]

4月5日，刘仲容和民主党派方面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共四人一行秘密飞抵南京，一起去向南京政府方面做工作。

经过这一番布置以后，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于4月8日上午亲自与张治中谈话。他采取了与傅作义谈判时相同的先紧后松的策略，在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进行了多天的严厉抨击之后，由自己亲自出面，改以温和、闲畅的态度，谈宽大的条件。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180) 张治中在正式会议时转述和毛泽东的谈话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少次交换意见中，我已一再希望不要作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态度。""毛先生表示说：'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许要两个月或三四个月后都说不定。在这时期中，你们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还特别加重语调说：'不要散掉了，要他们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意思非常明显，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181) 南京方面接到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主要是："（一）战犯在条约中，不举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责任字样。（二）签约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吴忠信等皆到北平参加；（三）改编军队，可缓谈。（四）共军必须过江，其时期在签字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五）联合政府之成立，必须有相当时间，甚至须经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致社会秩序紊乱。"(182) 毛泽东和其他代表也分别陆续进行了交谈，南京代表们大体对毛泽东的谈话感到满意。

张治中看来对中共的路线和政策相当生疏，与毛泽东谈话后竟产生了错觉。据说，他表示："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

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183] 他显然对战犯问题所包含的战争责任和迫降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旧政协及联合政府和新政协及联合政府的政治性质，缺乏仔细的逻辑分析。南京代表们向李宗仁、何应钦作了报告，并准备达成协议，为防蒋介石破坏，议定派黄绍竑回南京阻止南京当局再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

李宗仁在接到黄启汉、刘仲容的报告后，于4月7日致电毛泽东，进一步表示谋和诚意：“凡所有之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184] 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185] 两电词意温和，似乎为和谈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实际上，双方的政治观点依然尖锐地对立，一落实到具体问题时也就依然无法折中。

中共自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对中共和他们联合反对蒋党的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决定采取实际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一方面于4月3日批准了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报纸上强烈宣传解放军的渡江准备活动，一方面和刘仲容商定了解放军不逼近武汉的军事界线，准备和平接收。对于安庆，要求桂系军队撤退，4月10日，又根据白崇禧方面的请求，同意停止攻击，以待和谈解决。而南京方面对和谈的态度实际上十分严峻。

白崇禧在武汉听取了黄启汉的报告，仍坚持以长江为界，划区而治。不久即到南京，听取刘仲容的报告，并和李宗仁商量。白崇禧听了刘报告的毛泽东所谈条件后，坚持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

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186] 显然，白崇禧意在保存桂系的军政实力，不会接受中共的宽大的投降条件。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在对北平和谈施加压力。4月6日，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向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补充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匪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187] 何应钦6日到广州，7日国民党中常委即通过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并决定五项和谈原则，由何应钦于9日转告张治中。8日，又决议设立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又称指导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依据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之原则，协助政府负责处理和谈有关问题，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孙科、张群、吴铁城、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十一人为委员，由李、何召集。当时，李宗仁觉得北平和谈十分困难，于10日间，致书蒋介石，由阎锡山于11日带往溪口说，共产党“节节进逼，陈兵江北，所提条件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万一和谈破裂，实难肩此重任，请公预筹应付之策”。蒋复电李宗仁，要他“在个人惟有不失道义，对党国不失志节”[188]。张治中在北平深感蒋介石在阻碍和谈，于13日曾致电蒋说，“到北平后，共党言论态度，意在逼降”，劝蒋“毅然放下一切”[189]，并作长信劝蒋出国[190]。当然不能为蒋所接受。

12日，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在南京作出了五项决议，对代表团报告的毛泽东谈话作出回应：“（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191] 由何应钦电达代表团。分歧似乎仅在渡江问题上，但实际上如上所说，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对毛泽东谈话中对人事和步骤的宽大条件，误解为政治前提的让步。这个决议与和谈情形，李宗仁托居正到溪口向蒋介

石汇报。蒋介石在知道中共突然放松和谈条件后，深恐和谈成功，嘱蒋经国电约何应钦、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到杭州会商对策，“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反共”[192]。

三　北平和谈的破裂

当南京代表团就解放军渡江问题希望找到一个和缓的方案的时候，和谈的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13日一早，毛泽东就写信给周恩来，指明“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193] 于是，周恩来即于同日早上向南京代表团递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并通知13日晚9时开始正式会议。张治中看完后，尚存的一丝幻想都破灭了。这个协定正如4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总前委电中所述：“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十五或十六日签字。”[194] 张治中当然不是抱着投降的意愿到北平来谈判的。对此，张治中回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像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固然，和谈是以毛先生元月十四日所提的八项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195]

南京政府代表团对草案很被动地、匆忙地进行了研究。尽管如此，当时南京代表团同人大体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不希望国民

党继续作无谓的抵抗。张治中回忆说："当时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些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对中共方面，认为是必然胜利的，但如果在达成成功的途径上，能够减少国家元气的凋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更好吗？"[196] 因此，一方面他们愿意接受中共的条件，另一方面仍希望中共作出让步，以便尽可能说服南京方面接受。

13日晚，中共和南京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概括的说明，主要是关于必须叙述南京国民政府担负战争全部责任的理由，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战败求和的事实；关于惩办战争罪犯，对宽大和严惩作原则规定的理由；关于成立以中共代表为主、国民政府代表为辅的整编委员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以和平方式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的理由；关于人民解放军开进、和平接收和讨伐叛乱，也就是接收国民政府权力的程序的理由，等等。张治中继起发言，表示"对于自己的错误，我们今日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来承认"，但要求避免过于刺激的字句；对于整编委员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表示"值得考虑"；对于条款中"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认为这样的体制很不好；对于接收问题，坚持主张"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反对让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南京的太上政府，等等。总的意思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和政权，向联合政府移交，而不是直接向中共移交。他对南京方面人士参加政协和联合政府要由中共方面保举推荐也表示异议。南京政府代表团原打算与中共谈判联合政府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容谈判的问题，他们对未来的政协和联合政府没有发言权。张治中在发言中，一方面"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另一方面仍希望"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作中共一个友党"[197]。

14日晚，张治中向周恩来送交了南京代表团的修正案，中共吸收了修正案的若干意见之后作成《国内和平协定》，于15日晚7时送交南京代表团，并定当晚9时即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向张治中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问周："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张说："也好，干脆！"在当晚的会上，周恩来对协定作了说明。先是说明了所作的让步，主要是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作了妥协，"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整编委员会上面也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但对"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则拒绝继续让步，认为"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周恩来强调指出："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这个协定上。"

此外，周恩来在协定文本之外，就解放军渡江接收问题表明了态度。第一，谈判期间暂不渡江，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之后。第二，协定签字之后，解放军必须和平渡江，首先接收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县、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八县，以保证和平协定的实施。第三，其他地区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个会在协定签字后几天内成立。第四，为了讨平叛乱，解放军不能约束在上述十个县之内。第五，南京政府对于协定的回答，中共愿意等到20日，希望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五位到北平来参加签字[(198)]。

因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最后通牒性质的，所以张治中只是简单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和感想，不再作实质性的答辩，并声明明天即派人

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最后，张治中发挥个人感想说："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对此，张治中的发言遭到周恩来的严词反驳，认为国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199]。

当晚，南京代表团经研究，决定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于16日派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当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听取黄的报告和审阅《国内和平协定》文件。黄绍竑回忆说："他们听了我的报告和看了文件，大家都默然久之。何应钦说，这个重大文件要拿回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我看当场情形不妙，不但何应钦、白崇禧的神色不好，就是李宗仁也默默无言。"[200] 据黄启汉回忆则是在召集的桂系将领会议上："白崇禧一面听黄的讲话，一面翻阅黄带来的《国内和平协定》。他看完之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他站起来向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201] 又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作最后总结说："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致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202] 屈武回忆："大家看了文件，面面相觑，无人发言，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了沉寂，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何应钦接着说：'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研究。'李宗仁和黄旭初一言不发，大家垂头丧气地散了。"[203]

南京政府方面的立场，蒋系自不必论，而桂系方面，无论据黄启汉的回忆，还是刘仲容的回忆、刘斐的回忆，以及张治中保存的谈判

腹案，确实本没有投降的思想基础，和谈是有政治和军事条件的。桂系确有联共制蒋的打算，并愿意在军事上作出让步，但这并不是准备投降。中共方面一再陈述的要求桂系里应外合，多少是出于单方面的设想，也许是中间人传话中的误导。据张治中说，李宗仁确有和平的诚意，而据刘斐回忆，即使条件不好他也愿意签字，但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政治前提的。根据《国内和平协定》第八条第二十三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204] 那样的话，桂系不仅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将不存在，而且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不复存在。中共私下疏通的条件，仅仅是对桂系领袖的个人安排。这对这个仍然拥有重兵、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几复几起的军政集团来说，要他们接受这样的条件，确实是不可想象的。同意接受协定的南京代表团成员，大体上并不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他们作为个人，自然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政治态度。

4月17日，何应钦派专机把《国内和平协定》送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据说，蒋阅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5] 并自记说："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回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206] 显然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执会于18日发表声明，重申和平谈判应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时，李宗仁一方面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复职，如要他主持作战，"必赋予全权"[207]。一方面要求中共方面展缓签订协定日期[208]。南京代表团为此致电李宗仁："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209] 但事实上，李宗仁的立场已无回旋余地。他后来在回电中说，立法院秘密会议时，"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不敢有所主张"[210]。

南京政府经过多方面的紧张磋商，意向大体决定之后，李宗仁于19日上午主持了11人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阎锡山也参加了会议。首先由黄绍竑报告北平和谈经过，继由屈武加以补充，下午继续进行[211]。南京政府拒绝协定的意向从多种渠道向社会上传出。20日，何应钦又到立法院秘密报告北平和谈经过。李宗仁、何应钦拖到20日深夜，才向南京和谈代表团发出正式答复。复电对协定表示反对："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因此，要求中共"重新予以考虑"，并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的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212]。代表团于凌晨将南京政府的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但不久，街上就传出了号外，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于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北平和平谈判宣告正式破裂。

---

(1)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48页，又参《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29页。

(2) 《华商报》（香港），1948年11月3日。

(3)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88页。

(4)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9—10页。

(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1948年1月1日在香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

—185页。

(6)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59、764、774页。

(7) 《“联合政府”面面观》，《中国新闻》（南京）第3卷第7期，1949年1月11日。

(8)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33页。

(9) 《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12月21日。

(10) 《新闻报》（上海），1948年12月21日。

(11) 《新闻报》（上海），1948年12月23日。

(12) 《再生》（上海）第245期，1948年12月27日。

(13) 《大学评论》（南京）第2卷第6期，1948年11月6日。呼吁书发出日期据《申报》11月8日第1版报道。

(14)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9日。

(15) 参倪青原：《和平——人民的意志》，《大学评论》第2卷第8期，1948年12月24日。

(16)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按：此系国民党情报机关收集的情报。——笔者。

(17) *FRUS*，1948，Vol．7，p．547．

(18)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58页。

(19) *FRUS*，1948，Vol．7，p．569．

(20) *FRUS*，1948，Vol．7，p．568．

(21) 梁上贤：《解放前夕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第159页。

(22) 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47页。按：17日系回忆估计日期，是日白崇禧似未到南京，或系回忆有误。——笔者。

(23)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

(24)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25)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1页。

(26)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6-77页。

(27)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32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91页。

(2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18日条。

(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2日条。

(31) R．M．Blum：*Drawing the Line*，W．W．Norton & Company，NewYork·London，1982，p．35．

(32) *Drawing the Line*，p．32；*FRUS*，1949，Vol．4，pp．491-495．

(33) 参李书城：《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会前后》；周杰：《“十人座谈会”与和平运动》，《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

(34) 吴相和：《白崇禧在武汉解放前夕的阴谋活动》，《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第153页。

(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2日条。按：此段文字系原编者叙述，故变通引用。——笔者。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6日条。

(37)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2页。按：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6日条仅提及张群、吴忠信两人持白电见蒋，未提张治中，并令张群、吴忠信两人与李宗仁商谈，希李能代理总统职权。又按：上述资料与前引程思远回忆在细节上也难以合拍，详情待考。——笔者。

(38) 艾毓英：《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第65页。

(39) 程思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9页。

(40) 据《风雨中的宁静》，第125页。

(41) 档案号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42) 《李汉魂北来，黄旭初南下，何应钦晋京》，《新闻杂志》（南京）新第2卷第8期，1949年2月23日出版。

(43)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5页。

(44)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577页。

(45) 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1948年8月2日），参《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0页。

(46)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215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48)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2年版，第509-510页；参程思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80页。

(49)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1日。

(50)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日。

(5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2日条。

(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

(53) С．Тихвинский：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No．4-5．

(54)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17-1957*．cb．Документов．М.，1959，стр．209．

(5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页注①。

(57) 据邵力子1月15日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6日报道。

(58) 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7日条，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59)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6日。

(60)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33页。

(6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8日条。

(62)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3页。

(63) 转引自杨奎松：《1949年国共和谈始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5页。

(64) 《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6页。

(65) 转引自杨奎松：《1949年国共和谈始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5-6页，黄绍竑与潘汉年对话，杨未注明引自何种资料。

(6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1页。

(67) 《风雨中的宁静》，第129页。

(68)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第511页。

(6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2页。

(70)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2页。

(7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2日。

(72) 参《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23-929页。

(73)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3日。

(74) 《中央日报》（上海），1949年1月23日。

(75) 甘介侯对记者谈，《中央日报》（上海），1949年1月24日。

(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24日。

(77)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4-785页。

(78)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5日。

(7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60页。

(80)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31页。

(81)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9年2月3日。

(82)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8，1，1949，*FRUS* ，1949，Vol．8，pp．93-94．

(83)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4页。

(8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

(85)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80-81页。

(86) 《人民日报》，1949年1月27日。

(87)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8日。

(88)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0页。

(89) 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7页。杨所引资料未注明出处。

(90)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7页。

(91) 参《周恩来年谱》，1949年2月1日条，第811页；前引杨奎松文。按：据杨文和周谱内容，两者自当均引自《中央致彭、叶并告林、罗、聂电》（1949年2月1日），但文字有出入。全文尚未刊布。——笔者。

(92) 参《叶剑英传》，第427页；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2—13页。按：黄回忆为1月29日回南京，时间似有误。——笔者。

(93) 《潘汉年致周恩来并中央电》，1949年1月25日，中央档案馆藏。

(9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8页。

(95) 《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23日条，第28-29页。

(96)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8，1，1949，*FRUS*，1949，Vol．8，pp．93-94．

(9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2月11日条。

(98)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3页。

(99) 《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73页注①。

(100) 《中央关于争取李济深、沈钧儒等反对伪和平的指示》（194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72页。

(101) 《中央关于广泛揭破美蒋和平阴谋的指示》（1949年1月2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82页。

(102)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48-49、54页。

(103)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9页。

(104)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2日。

(105)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5日。

(106) 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3页。

(107) 《华商报》（香港），1949年1月25日。

(108)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50页。

(109)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43页。

(110) 陕北观察家评论，《华商报》（香港），1949年1月27日。

(111) 《新闻报》（上海），1949年2月16日。

(112) 《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25日条，第29-30页。

(113)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84页。

(114) 名单见《人民日报》1949年2月13日。

(115) 《和平谈判纲领》初稿，《大公报》，1949年1月17日。

(116) 《华商报》（香港），1949年2月3日。

(11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1页。

(118)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6日。

(119) 《中共发言人对甘介侯声明的声明》（194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15页。

(120) 《和平谈判纲领》，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8-9页。有关建议杨文未注出处。

(121) 《中央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194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21页。

(122) 参《叶剑英传》，第427-428页。

(123) 据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16页。

按：据杨奎松文，内容有出入：李宗仁得到黄启汉的汇报后，表

示："（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不成问题；（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五）对蒋问题，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李宗仁同时表示，他对中共反对隔江而治的主张不表示反对，惟希望中共八条中有关战犯一条能够略加变通，因此项目前事实上难以实现，非新政府去作不可。李宗仁甚至表示很想能和毛泽东密谈一次。"（《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8页，杨文未注明出处）

又：《李宗仁回忆录》列有五点回答共产党，叫刘仲华带到上海交人民代表团，内容也有所不同："一、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三、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四、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五、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下册第934页）按：当时刘仲华并未南返，回忆有误。——笔者。

(124) 张丰胄：《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72页。

(12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6页。

(126) 参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10页。杨文未注明出处，非正式引文。

(12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9—460页。

(128) 张丰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74页。

(12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61—462页。

(130) 《大公报》（上海），1949年2月20日。

(13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28日。

(132) 参《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26日条，第30页。

(133) 《行政院施政报告》（1949年3月8日），《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9日。

(134) 《透视立法院集会地点之争》，《中国新闻》（南京）第3卷第11

期，1949年2月21日。

(135) 《大公报》（上海），1949年2月2日。

(136)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7日。

(137)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8日。

(138)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10日。

(139) 胡允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65页。按：回忆似有误，似为出任京沪警备总司令，而不是后来扩大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笔者。

(140) 丁名楠：《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59页。

(141) 参《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58页。但所叙多与事实不符。

(14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2月17日条。

(143)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21日。

(144)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21日。

(145) 《大公报》（上海），1949年2月26日。

(146) 《新闻报》（上海），1949年3月7日。

(147) 档案号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148) 档案号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14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3月10日条。

(150)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13日。

(15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16、19日。

(152) 《李宗仁致黄启汉电》（1949年3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12页。

(153)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59页。

(154) 《人民日报》，1949年3月1日。

(155) 《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2月13日条，第36页。

(156) 《司徒雷登日记》，第38页。

(157)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7日。

(158)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6页。

(15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7-789页。

(160) 《华商报》（香港），1949年3月2日。

(161) 参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12页。杨文未注明出处。

(162) 《人民日报》，1949年3月27日。

(163)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2—793页。

(164) 《张治中回忆录》，第796-797页；余湛邦：《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165) 《新闻报》（上海），1949年3月30日。

(166) 《新闻报》（上海），1949年3月31日。

(167) 余湛邦：《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第90页。

(168) 《徐永昌日记》1949年3月31日。

(169)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4月2日。

(170)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4页。

(17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页。

(17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8页。

(173)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8页。

(174) 《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第95页。

(175)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6页。

(17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4页。

(177) 《人民日报》，1949年4月6日。

(178)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7-28页。

(179)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51—52页。

(18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6页。

(181)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17—821页。

(18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8日条。按：据杨奎松概括毛泽东、周恩来谈话要点如下："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5页）有待资料公布后复核。

(183) 参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5页，引文未注明出处。

(184)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4月9日。

(185) 《人民日报》，1949年4月10日。

(186)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54页。

(1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6日条。

(18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2日条。按：李宗仁作书日期据《风雨中的宁静》，但该书文字有异同，且称李函为电文，内容尚有"决心引退，以谢国人"。（第177页）——笔者。

(189) 《风雨中的宁静》，第177页。

(190)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00-804页。

(191) 《敬之致文白兄电》，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6页。

(19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2日条。

(193) 《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22页。

(194) 《军委关于推迟至四月二十二日渡江的指示》（1949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19页。

(195)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04-805页。

(196) 《张治中回忆录》，第824页。

(197)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05-823页。

(198)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25-835页。

(19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35-843页。

(200) 黄绍竑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66页。

(201)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36页。

(202)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6页。

(203) 屈武：《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6页。

(204)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8页注①；《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

(205) 《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第107页。

(2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7日条。

(20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8日条。

(208) 《风雨中的宁静》，第180页。

(209) 转引自《5月18日邵力子、章士钊给李宗仁信》，见张丰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88页。

(210) 《李宗仁致行严兄、邵代表电》（1949年4月21日），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10页。

(21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4月20日。

(212) 《张治中回忆录》，第843—847页；《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2日。

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一节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

一　国民党军的江防计划和形势

国民党军在淮海—徐蚌会战之前，统帅部许多人就对战争失去了信心。国防部长何应钦就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思想，并曾主张迁都广州，成立军政府，他的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线，与解放军决战，但一交手，即遭败绩，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即被歼灭，26日黄维兵团又被解放军包围，会战败局已定。

12月1日，蒋介石在败军失将、将才凋丧之际，重新起用孟良崮战役失败后被撤职的汤恩伯，任命他兼任京沪警备总司令。在此之前，汤仅担任着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并不重要。这时，解放军主力即将饮马长江，南京不久就将面临解放军的火力威胁，京沪警备总司令一职的重要性，已非平时可比。

杜聿明集团覆没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尽，已无重兵来沿江布防和保卫首都南京，蒋介石也不能不准备“引退”下野。他为了在幕后继续操纵政局，在军政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1949年1月18日，他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同时撤销衢州绥靖公署，由汤恩伯来指挥国民党军残部，负责长江防线及苏浙皖赣军事。与此同时，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朱绍良为主

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接替宋子文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

汤恩伯于1949年1月3日召开江防会议，国防部第三厅也起草了江防计划，但统帅部已因军事危机陷于混乱，一时无意作出江防决策。1月25日，引退后的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防线划分的方案，蒋介石派专人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汤恩伯的作战方针，对李宗仁、白崇禧是保密的[(1)]。

在一次有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出席的国防部讨论江防计划的会议上，继郭汝瑰出任第三厅厅长的蔡文治，判断解放军主力将在芜湖以西渡江，他提出的江防计划，主张把防守重点置于芜湖方面，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但是，蒋介石的意思是把江防重点放在扬中方面，以江防作为前哨，退而坚守上海[(2)]。蒋经国对李以劻说："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3)] 也就是以残剩的兵力，集中守卫上海，依托海口，在台湾基地的支援下，争取持久战斗，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候，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国民党一直指望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只要美苏之间的对抗加剧，美国就会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

因此，汤恩伯策定的长江下游作战指导腹案如下：

1．于江防线上尽量阻止敌军，尔后向东南转移。

2．上海为尔后决战及掩护军队物资转移之要区，应就地利用一切力量，构成坚强据点。

3．江防部署重点，在京沪线中部，机动部队应能增援江阴及控制太湖西南与杭州而位置之。

4．皖南部队于江岸阻止敌之渡江，不得已时应竭力利用山地，迟滞敌之向东及南进，并依徽州附近部队之策应，向浙赣线转移[(4)]。

蔡文治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无论从战略战术上都是下策，和汤恩伯发生激烈争论，遭到汤恩伯的无理责骂[(5)]。

汤恩伯强调：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均系敌主力渡江区域，国民党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长久阻敌渡江及有利决战。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大军转移困难；苏南则较容易，尚有另策后图之自由。因此，国民党军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以南[(6)]。

后来由于国防部的坚持，汤恩伯仍从东面抽调二十军驻芜湖，九十六军驻青阳，加强皖南方面的兵力部署。蒋介石也认为，解放军在合肥、巢县及芜湖对岸集结，如果渡江，必将先行占领皖南，进击浙赣路上的衢县（衢州），成为政府军最大的弱点。3月18日，汤恩伯到溪口晋谒蒋介石，蒋对汤“决心固守上海，甚以为然。但认皖南防御薄弱，惟有于战术上与方略上图谋补救之耳”[(7)]。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已在三大战役中丧失殆尽，要想沿江直接配备，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已经做不到，更没有充分兵力部署间接配备，而没有纵深间接配备的兵力，千里长江是根本守不住的，一处遭到突破，整个防线就要崩溃。汤恩伯以十三个军直接沿江配备，阻击解放军渡江，以三个军守备上海，以四个军分散在丹阳、句容、宁国、徽州附近，作为机动部队。除上海一时没有战争威胁外，沿江守备和机动兵力均十分薄弱。尤其是纵深配备的机动兵力，过于薄弱和

分散，无法对突破长江的解放军进行反击作战。指望解放军因缺乏渡船而推迟渡江，也只是一小部分国民党人的侥幸心理。

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人心解体，分崩离析，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策反活动也在积极展开。

2月7日，驻守长江南岸芜湖至繁昌沿江地区的一〇六军二八二师五千余人，在师长张奇率领下起义，陆续渡江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加入了解放军[(8)]。

1949年2月间，在民革中央常委兼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准备策动南京卫戍部队和警察举行暴动，扣押国民党政府要员，迎接解放军渡江，上海方面也予以响应。但这一计划未及实施，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2月24日，王葆真在上海被捕，民革在南京、上海两地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人员孟士衡等数十人被捕。3月3日，这一京沪暴动案在报上披露。王葆真系国民党元老，经各方面营救，被判死刑后没有执行，上海解放后出狱，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于5月9日在上海被杀[(9)]。

是年初，“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士兵成立有两个组织，酝酿起义。2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停泊，奉命开往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2月25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组织起义，得到舰长邓兆祥的支持，在邓的指挥下起锚，于翌日开往烟台。起义成功后，国民党军出动空军轰炸，3月20日“重庆”号在葫芦岛沉没[(10)]。

3月25日，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率师部直属队和两个团，从江宁防区渡江起义。由于起义组织活动在事先泄漏，王一度被软禁，脱身后于24日晚仓促率部渡江，未能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天明后，国民党军空军向起义部队散发传单，策动部队回返。由于这是一支国民党系统的警卫部队，缺乏起义的思想基础，部队迅速哗溃，王宴清率一百多人到了解放军防地。尽

管如此，九十七师作为国民党军中枢的“御林军”，其起义行动对国民党军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1]。

4月7日凌晨，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在嘉兴起义。这个预干总队成立于1948年11月，为新建的30个军训练下级军官。贾亦斌原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将，这时，对蒋氏父子深感失望，决心组织起义，并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但贾的活动受到蒋经国的怀疑，至3月中旬，贾的预干总队的职务被撤销。4月2日，贾亦斌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于4月15日在嘉兴发动起义。但在起义动员过程中秘密泄露，于是提早至4月7日晨起义。这支“太子军”起义，震惊了京沪一线，国民党军出动重兵围剿，12日在吴兴（湖州）妙西山良村将起义部队击散，贾亦斌本人突出重围找到了中共的游击队[12]。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的这一系列暴动和起义，发生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和直属部队之中，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十分脆弱，而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正在继续积极有效地进行着。

毛泽东早在淮海战役的后期就开始着手考虑渡江战役。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电，请刘伯承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中央军委就今后作战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和我们过去与陈、邓、粟三同志所谈者有些不同，请你们于伯承动身前加以考虑。”[13]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华野、中野各部即转入休整，并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在淮河一线的部队相继撤退，解放军前线部队于1949年一二月间先后进占蚌埠、滁县、两淮、扬州、南通、舒城、巢

县、庐江诸地。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据有两浦（浦口、浦镇，驻有一个军）、安庆（驻有一个师）及在崇明岛驻军一师，其余则占领桥头堡阵地，只能配备一个团甚至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

这时，李宗仁正在接洽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并有撤退至浙赣线布防的计划。中共中央获得了相关的情报，于2月3日指示前线将领作好准备，应付国民党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线的两种可能情况，如国民党军在京沪线抵抗，则华野和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如国民党军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准备3月即行渡江，同时要求各中央分局，立即组织训练干部，准备接收江南广大地区。[14] 为此，邓小平、陈毅于2月4日向中央建议："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建议林彪、罗荣桓部抽调五个军、六个纵队，计40万人，提前南下至安阳、新乡休整，待华野、中野渡江时，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所部，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15]。这时，中共中央已把注意力转向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工作，在考虑军事行动时，更加侧重于考虑与城市接收工作同步进行，因此，复电指示各部，一方面同意华野和中野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同时要求"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16]。

2月9日，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主张"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并继续要求东野出动三个军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保障华野、中野行动[17]。2月1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计划，并重申"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8]。翌日，又命令东野先出动两个军约12万人，于3月底夺取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钳制白崇禧，以利华野和中野夺取南京[19]。

2月24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达成了一个八点秘密协定，一方面考虑与南京方面和平谈判，一方面于25日要求前线部队于

3月中下旬攻击浦口、炮击南京，向南京方面施加军事压力。3月初，华野和中野开始出动，向长江沿岸开进。3月19日，在前线部队即将到达渡江准备位置时，中央军委指示前线将领要根据谈判情形和军事上的需要，考虑是否攻占两浦，除此之外，即要求准备渡江战斗："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此日期要待三月二十五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20] 最后，由于军事上的理由，确定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4月2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4月15日发起渡江战斗[21]。

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22] 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这时候，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于3月30日到达北平，中共中央根据刘的陈述判定，中共决定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计划已有初步认识[23]。4月4日，白崇禧有致中共中央支电，毛泽东于5日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复白崇禧一电，指出："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仍与刘仲容商定了一个军事安排，通知白崇禧说："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

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24] 中共中央军委并就此通知了前线将领遵照执行。但白崇禧复电表示，安庆归国防部管辖，要求“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25]。当时，二野开进后，一度攻击安庆，但安庆易守难攻，而对解放军渡江的妨碍并不严重，刘伯承等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即于4月4日决定，暂不进攻安庆，仅以一个军包围监视，以便集中精力渡江作战。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即十二兵团的两个军已迅速南下，4月1日占领信阳，一部已越武胜关南进。于是，刘伯承即调在麻城的陈赓的第四兵团至宿松、太湖一线，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十二兵团则向广水、河口、黄安、中馆驿线推进，掩护四兵团侧背的安全。4月8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各自下达了渡江作战的部署。

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之际，中共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也有进展，中共中央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有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为了和谈的需要，向前线将领征询推迟渡江的可能性。但总前委认为，长江5月初发大水，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而且，目前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都很困难，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情况下，才能推迟时间，或者不得已时，推延至秋后渡江。因此主张：“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26]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意见和谈判进展情况，于4月11日电令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廿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且命令各部于4月11日至16日不要发生任何战斗[27]。军委告

诉前线将领，南京主和派即将签订的和平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但军委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要求前线部队不要松懈士气[28]。

4月15日晨5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总前委，当天将向南京代表团送交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因此，军委命令：“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廿日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29] 军委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准备用战斗方式渡江，一方面再次向总前委征询意见，如果和谈成立，并有必要，是否可以推迟三天渡江。对此，总前委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廿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廿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30] 同时，粟裕、张震向军委报告，为了按时发起渡江战役，要求提早于16日攻占永安洲，以便届时船只入江。军委当日复电：“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洲。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31]

解放军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军组成了三个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口岸段（即江阴至扬中北岸）实施渡江；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

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裕溪口至枞阳镇段（芜湖、铜陵、贵池北岸）实施渡江；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分别在安庆以东至枞阳段、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望江至马珞段渡江。国民党军在西段的江防兵力薄弱，而东段江防有重兵镇守。因此，解放军的渡江重点置于安庆至芜湖段，以第三野战军的第七、第九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作为渡江的第一梯队，期望首先突破政府军长江防线。总前委估计："因敌江防西段较弱，故二野与七、九兵团突破较易。东段敌较集中，八、十兵团必须准备连续恶战数日，方能突破立足。"(32) 总前委认为，渡江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对进会合，围歼南京、镇江方面敌军主力，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发起战斗，以吸引和分散敌军的注意力。4月18日9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渡江各集团指挥员："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廿号（卯哿）开始攻击，廿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33)

至4月19日，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余安庆、长生洲、黑沙洲、西梁山、北新洲、六圩、扬中沙洲、两浦（浦口、浦镇）及崇明岛等9处。国民党军海军在长江下游配备了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拥有26艘军舰和三个艇队，但海军在北岸已经失去了掩护阵地，航线受到严重限制，并遭到解放军短兵炮火的袭击，已很难在长江上发挥战斗作用。

二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对于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拖延到1949年4月20日深夜，才复电给在北平谈判的代表团，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要求成立临时停战协定，继续进行谈判。南京代

表团于21日上午9时向中共代表团抄送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复电，于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4月21日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宣布“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4]。命令发布之时，解放军渡江的先头部队已经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阵地，在长江南岸登陆。

根据总前委的决定，解放军各部于20日晚开始攻夺各江心洲的战斗，21日至22日正式发起渡江作战。20日晨，正在各部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渡江之际，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经过南京政府同意，自上海上驶，准备与在南京的“伴侣”号换防。他们抱着老殖民主义的思想，不顾解放军即将渡江的军事形势，继续在长江上游弋。当“紫石英”号进入三江营江段时，正在临战状态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不明英舰企图，即发炮警告。但英舰傲慢地不予置理，继续上驶，超越炮三团三江营左翼炮位。炮三团随即发炮攻击，“紫石英”号遭到攻击后即行还击，发生激烈的水陆炮战。当时江面平静，别无船只。“紫石英”号在炮战中受到重创，被迫悬起白旗，驶靠南岸。下午，“伴侣”号增援“紫石英”号，与解放军炮兵展开激战，受伤后下驶。21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上驶，至下午4时，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斗，炮六团奉命发炮攻击，与英国海军激战。英舰受伤后被迫下驶[35]。

在东线偶发的中英军事冲突之际，中集团已经横渡长江。4月20日20时，在江岸强大炮火掩护下，中集团先头突击各军发起渡江战斗。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并肩渡江攻击黑沙洲和鲫鱼洲。原计划是日仅为攻占江心洲的前哨战斗，但战役发起前，第九兵团向

总前委请示："拟于20日夜与打黑沙洲同时全部渡江，如此较有把握。"得到总前委的批准[36]。于是，九兵团连续突击，当日即在南岸突破敌第八十八军防地，相继登陆，迅速扩张战果，于21日间攻占繁昌、荻港、旧县等地。第七兵团第二十四军同时渡江，在闻新洲和紫沙洲登陆，继而强渡夹江，突破敌八十八军防线，于21日占领铜陵，与九兵团二十七军会师，右翼二十一军突入长生洲等江心洲集结。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战斗力薄弱，防广兵单，面临解放军两个强大兵团的突击，未经坚强抵抗，即纷纷溃退。解放军顺利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驻芜湖的第二十军只能在三山街一线抵抗已经渡江的解放军的攻击，无力增援第八十八军收复阵地。21日，汤恩伯到芜湖指挥，命令驻汤山的九十九军两个师增援芜湖，但当该军到达时，解放军已大批南下，该军即向宣城撤退。

21日黄昏，解放军东西两集团全面发起渡江战斗。西集团三个兵团相继渡江，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九十六军、六十八军诸部纷纷撤退，安庆守军也于22日夜渡江撤退。解放军于22日晚占领安庆，渡江部队转入追击。东集团第十兵团21日晚在天生港一带广正面渡江，迅速建立了滩头阵地，与敌第二十一军、五十四军等部发生激烈战斗。21日晚，解放军渡江时，中共地下组织已控制了江阴要塞，向北岸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阵地发炮。22日凌晨，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要塞总台长唐秉琳等集合队伍宣布起义，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随即占领了要塞，要塞炮转向攻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阵地，迫使其向无锡方向撤退。第八兵团先头军于21日晚渡江，22日攻占扬中岛，守敌第五十一军渡江南逃。同时，第三十五军于22日间攻击浦口、浦镇。第三十四军起渡，进击瓜洲，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军渡江南撤。右翼担任策应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也发起攻击，向长江北岸推进，钳制武汉、九江守敌，保障渡江部队的侧翼安全。

解放军东集团渡江后，汤恩伯调在常州北的第五十四军主力和九

十九军一个师增援江阴，但22日解放军各部陆续强渡，并向纵深发展，对南京形成包围态势。是夜，汤恩伯仓促命令各军后撤，命令扬中以东四个军，即五十四军、五十一军、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向淞沪地区撤退，镇江以西十二个军（即第四、第九十九、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第二十、第八十八、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第一〇六、第七十三军），分别向浙赣线撤退。汤恩伯率司令部从南京直退上海，准备淞沪防卫，而对向浙赣线撤退各军，既无预定撤退计划，又放任各军自行行动。第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已先期向无锡撤退，第一二三军未经激烈战斗，顺利退守常熟一线，第五十四军在常州阻击之后，与第五十一军沿太湖西岸，经宜兴、吴兴、嘉兴，边战边撤。镇江以西4个军即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军撤退时，各军争先恐后沿着京杭国道撤退，秩序非常混乱。

解放军迅速抓住国民党军后撤的征兆，改变部署，转入追击。第七、九兵团渡江后，即归还三野建制。22日下午，粟裕根据谍报，敌有撤退迹象，即于17时命令第七、九兵团分别向郎溪、广德、宣城方向追击，24时又命令第八、十兵团转入追击，计划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23日晚至24日晨，粟裕“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急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急进，务于25日、26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区担任警备任务”[37]。西集团第四兵团原有接管南京的任务，这时敌江防崩溃，全面溃退，23日，总前委决定扩大战役规模，命令第四兵团改为沿五兵团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三兵团进击徽

州，五兵团进击衢州，追击逃敌。

22日至23日间，南京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撤逃，23日晚，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南京宣告解放。

23日深夜，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长期工作，国民党军海防第二舰队在司令林遵率领下，于南京附近的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共有二十五艘舰艇（内军舰九艘）参加起义。拒绝起义的“永嘉”等军舰则向下游突围，连同在镇江、江阴一带的海军军舰共十三艘，驶出长江口，有四艘军舰为解放军炮火击沉。海军在江防战斗中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国民党军在撤退过程中，士气低落，组织混乱，在解放军强大兵团的追击下，纷纷溃散。第二十军及九十九军一部从芜湖向宣城撤退，24日，在湾沚镇被赶来的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包围，大部被歼，军长杨干才被击毙。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奉命继续南下追击敌第六十六军。第六十六军自当涂南撤，秩序混乱，经溧阳附近时，即被解放军击散，转入山地。国民党军第四军奉命经句容掩护南京退却部队，然后转京杭国道。25日下午到达溧阳北的南渡时，解放军已先期占领宜兴、溧阳，截断了京杭国道，第四军不得不改走宜兴以西的山区，第四十五军随第四军跟进，有时互相穿插，道路堵塞，同样被迫进入山地。27日，解放军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和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在吴兴附近打通了联系，封闭了合围口。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最后撤退，途经宜兴西的山地时，正值解放军围歼第四军、第四十五军，即被卷入包围。至29日，上述国民党军，连同第六十六军、第二十军残部及第五十一军一部共十万余众被歼。

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撤至宣城后组织抵抗，遭到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的攻击，撤出宣城后部队溃散。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本系杂牌部队，战力不强，解放军渡江后，即望风逃跑。刘汝明率五十五军自贵池一线向徽州撤退，与第八十八军会合，一路上人员散失，到达福建后，

五十五及八十八军仅各余二千人。第九十六军向祁门、第六十八军及跟进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向浮梁撤退，遭到解放军追击部队的围堵、袭击。第一七四师在吴田铺、牌楼街地区于24日被解放军第十一军包围歼灭。第九十六军第二一二师一路上被解放军截歼，26日退至祁门，被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等部割歼一部。第一四一师撤退至婺源，于5月1日被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歼灭大部。残部经玉山、广丰撤至福建。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遭到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和十五军的追击，后尾部队多次被截歼。4月29日在乐平一线，第一一九师被解放军第十三军歼灭大部，5月3日，第八十一师在弋阳投降。5月4日，第一四三师在德兴被解放军第十五军包围歼灭。国民党军在第二线的第一〇六军和第七十三军，解放军渡江后，并未向前开进，即行撤退，后卫部队遭到解放军截歼。

国民党军江防各部，仅扬中以东四个军先后撤至上海，还保持着战斗力。

解放军渡江各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旬日之间，挺进千里之遥。第三兵团于4月28日进抵徽州，5月2日另一部进抵休宁、屯溪，5月6日进击浙赣线上重镇金华。至5月15日，兵团集结在金华、江山、兰溪一线。第五兵团于5月1日占领婺源，5月6日占领衢州、江山，前锋进击福建北部。至5月20日，兵团集结在上饶一线。第四兵团为战役右翼兵团，负有隔断白崇禧部和汤恩伯部联系的任务。4月29日进抵乐平，5月4日进抵横峰、上饶，5月5日进抵鹰潭、东乡，截断了浙赣路。前锋部队于5月14日直达福建南平。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各部在进行了郎广围歼战之后，第七兵团即向杭州挺进，5月2日进抵余杭，3日首先抢占、保护钱塘江大桥，然后攻击市区，黄昏时占领杭州。7日在诸暨与二野三兵团会师。第九兵团于5月初在太湖南岸集结，准备进击上海。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南进，于4月27日占领苏州。5月初，十兵团各军在苏州、无锡、常熟集结，准备进围上海。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之际，进行侧翼掩护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也向监利、孝感、黄冈、蕲春一线推进，兵逼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但当时第四野战军主力尚未南下，所以仅系牵制性质。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28日指示前线将领，对于白崇禧部，“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导致解放军仓促接管武汉三镇，引起管理大城市的困难。但同时要求前线将领和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猝接收，毫无准备”[38]。4月29日，第四野战军以先遣的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向武汉进击，第十三兵团为右路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向武汉以西前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由平汉路以东，向九江前进，第十四兵团由中路南进。5月初，林彪率第四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军委所获情报，“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要求四野在前线的部队先期渡江[39]。于是，林彪于5月10日命令第十二兵团：“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望注意采取多路前进、宽正面的袭抢船只和利用敌人窜逃的方法，求得袭渡成功。”并要求尽量提早过江[40]。

白崇禧鉴于解放军已在长江下游胜利渡江，解放军右翼兵团且自彭泽渡江，对自己防区的东侧和后路构成威胁，当面第四野战军已直接威胁武汉三镇，即于4月28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将北岸主力撤至南岸，将襄樊地区的第十五军撤至宜昌，归入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序列，撤销第十五绥区。然后，白崇禧又决定于5月15日从武汉地区撤退，在汨罗江、通城、平江、修水、奉新、高安、清江（今樟树）一线布防，主力在长沙、株洲地区集结，以宋希濂的鄂西绥靖司令部担任巴东至沙市的江防[41]。长官公署移驻祁阳。解放军渡江后，临时成立的国民党军南昌指挥所（主要辖重建的胡琏第十二兵团）主任方天，以“本所督训各部队，战力均未长成，似难骤负重任”，要求免去保卫南昌的任务，将指挥所移驻吉安[42]。得到统帅部同意后即于5月6日移驻，而把九江到南昌的防务全部交给了白崇

禧所辖的第八绥区部队（以第四十六军为主，后改第十兵团），致使白崇禧右翼十分空虚，不能不全面收缩。正当白崇禧部署撤退之际，驻在贺胜桥、金口一线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决心起义。14日，白崇禧从广州飞回武昌，召见张轸，迫令他命令所部后撤。白对张已经有所怀疑，张设法脱身后，直奔金口，白崇禧则包围了张轸在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勒令缴械。15日晨，张轸在金口率一个军部、四个师，约2.5万人宣布起义，并派兵袭击白崇禧后撤部队。白崇禧部无心恋战，予张部反击后，即加速后撤。

解放军第十二兵团于14日发起战斗，顺利占领团风、黄冈、兰溪、蕲春等北岸沿江地区，15日晨，第四十三军在兰溪及其东西地段渡江，并先后占领大冶、九江诸地。第四十军一部进击汉口，敌先期撤逃，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汉阳，一部随四十三军渡江，17日占领鄂南重镇贺胜桥。为配合第四野战军在江南的挺进，第二野战军命令第四兵团向南昌方向发展，于5月22日占领南昌。

三　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

李宗仁既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即决心继续作战。4月18日，他派人请傅泾波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迁往广州[(43)]。19日，从上海无线电广播中已传出政府南迁广州的消息。20日，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吴忠信、王世杰等拜访了李宗仁[(44)]，显然准备合作抵抗中共的进军。

4月21日晨，解放军已在荻港一线突破江防，南京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院长及秘书长开会讨论紧急疏散事宜，李宗仁也下达了中央各机关南迁广州的命令。除国防部迁往上海外，总统府、行政院各部会及立法、监察两院都迁往广州。

是日上午，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汤恩伯等在国防

部开会，会商今后战略。国防部次长萧毅肃、第三厅厅长蔡文治报告，解放军在第八十八军防区突破江防，第七兵团司令官张世希报告“如无大量援兵，无法恢复”[45]。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调六十六、九十九军前往增援，李宗仁表示赞同，汤恩伯“即请政府早迁，俾无顾虑的调京浦之六十六及九十九军等往援”。下午，他们又继续商量调动驻新疆的部队到内地参战，并商量甘青两马的军队出击方向，但没有结果[46]。

蒋介石在先几日已邀约李宗仁晤谈，面临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的严重形势，李宗仁即于22日偕同白崇禧、何应钦等飞往杭州，与蒋介石会晤，蒋则自溪口飞杭，商讨拒绝中共和平协定后的时局和应付方策。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也与会。行前，白崇禧向李宗仁表示：“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产权全部交出。”[47]会商时，李宗仁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公复职。”[48]蒋则表示：“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49]并且主张必须表明反共到底的态度，仍让李宗仁处于前台，承担抵抗解放军推进的责任。蒋、李在政权崩溃之际，仍然同床异梦，互不相让，难以合作。蒋介石利用李宗仁和谈政策的失败，乘机在会上决定，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由此来“协助李宗仁”[50]。这样，李宗仁不仅没有从蒋介石那里要到实权，反而更方便蒋介石利用党权来操纵国民党残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继续抵抗。

在此次杭州会议上通过决议：“（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何院长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

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李宗仁同日发布命令，特任何应钦为国防部长，改变指挥体制，以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的幕僚长[51]。

同时发表通电明示：“由于共党毫无诚意，和平谈判已告决裂，中华民国特昭告全世界，此后将继续抵抗共产主义侵略，从明日起，政府迁往广州办公。”[52]

当晚，李宗仁仍飞回南京，但这时军队已在部署撤退，李即召见汤恩伯。汤报告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53] 这时，中共方面仍在通过南京代表团向李宗仁做工作，希望李宗仁留在南京，签订和平协定。邵力子、章士钊致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必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54]。李已决心战斗，即“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55]。当时在南京的阎锡山怀疑李宗仁仍要谋和，徐永昌解释说：“将来不知，此时实无。”阎仍有所怀疑，徐表示：“此而看不出，是连自己也不信。”[56]

23日晨9时，李宗仁经汤恩伯催促，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乘专机飞离南京，他愁肠满怀，在南京上空转了两圈，只见钟山屹立，长江如练，而硝烟弥漫，炮火连天。驾驶员前来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对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操纵深感疑虑，于是，他没有让驾驶员飞往政府南迁的广州，而是飞往自己起家的根据地桂林。

南京各机关于22日铁路被解放军切断后，沿京杭国道撤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23日先飞上海，24日飞广州。

当时，国民党军曾企图破坏南京，一方面中共地下组织正发动群众予以保护，维持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进行破坏活动。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覃异之和总司令张耀明

商量，由张耀明和马青苑等联系，成立维持治安组织。同时，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团于23日晚上也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联系，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是日下午6时，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致电毛泽东："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原文如此——引者）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57] 翌日晨，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电告总前委和粟裕、刘伯承等前线将领："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58]

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在国民党军撤退后，占领浦口，但没有渡船，至23日黄昏，只是以两只小船首先渡过十八个侦察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以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为首的第一批巡艇到浦口迎接，并继续组织渡船。是日深夜至24日凌晨，第三十五军顺利进占南京。

2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闻报道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59] 以代总统李宗仁为首的由国民党执掌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首都南京撤逃，是中华民国败亡的标志。国民党军政残部则继续在广州、重庆等南方地区组织抵抗。

对于在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团，李宗仁、何应钦于21日电询张治中："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这时候，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等一再对南京代表表示挽留，"以保留和谈线索"，"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60]。毛泽东早在4月13日就函示周恩来说："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

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果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61] 张治中是首席代表，他认为，“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但在中共的诚意和善意的劝说下，又深感犹豫。24日南京方面派出的飞机来平，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张治中的眷属竟随机来平。于是，张治中“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暂时留下来了”。当时，民革李民欣带来了何应钦致张治中转各代表的信：“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南京代表们经过中共代表的劝说，决定留下，复信说：“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这架来接南京代表团的飞机，就只好带上这封信，独自飞回去了[62]。

代总统没有撤往广州，部分国民党人在广州集会，要求蒋介石前往广州领导全党。但这位国民党的总裁，注意力仍然放在军事上，25日，决定离开故乡溪口，前往上海指挥残部。他深知此行一去，故土难归，两度展谒母亲的坟墓，迟迟而行。他到象山港登上了“太康”军舰，于26日驶抵上海复兴岛。27日进驻上海金神父路励志社。他一方面与汤恩伯等研究军事部署，一方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鼓吹反共。他在文告中侈谈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诬蔑中共是第三国际（已经解散）的第五纵队，毫无根据地武断说：“（中共）妄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前，控制全中国，为共产国际充实其应付世界大战之人力物力与资源，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中国剿共最后胜利的把握……不出三年，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63] 尽管他仍然大权在握，但他重登前台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伪善地表示：“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64] 直到5月6日，蒋介石才从市区撤往复兴岛，登上“江静”轮，并于第二天开往舟山。

国民党政权一派败亡景象，下野的国民党总裁在前线指挥战斗，而负有行政责任的代总统，躲到离前线十分遥远的后方。他们都想收拾残局，但又各存私心，依然无法通力合作。和谈的失败，使白崇禧对李宗仁也很失望。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对他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65] 桂系既缺乏力量，也缺乏施政的魄力，广州群龙无首。4月25日，国民党中常委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一）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任务终了，立即撤销；（二）推派李文范、吴铁城两委员赴桂，促请李代总统宗仁同志早日来穗。"[66] 李宗仁在桂林也电召白崇禧前往商议。白于4月29日从武汉起飞，因气候原因，未能飞往桂林，改飞广州。5月1日，何应钦和政要们谈话，认为"蒋先生要干即来，不干则将钞权拿出来，不必管事"。会上"各夸功德而怨尤他人"，阎锡山把它称之为老鼠会。他解释说：群鼠会议制猫，以为如以铃拴猫项，则各得警觉。询谁去拴，则皆不愿[67]。

5月2日，广州方面公派的李文范和作为私人身份的居正、阎锡山一起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前往广州主持，白崇禧也随机同往。居正等三人向李宗仁表示："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68] 5月3日，李宗仁复信给何应钦，并附有谈话记录一份，转达蒋介石，提出了六点要求[69]：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以应政府急需。

（三）所有前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指挥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李宗仁曾召集桂系骨干商量这份记录，“白崇禧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是很大的。’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70]。当时，白崇禧尚雄心勃勃，企图一战，力主李宗仁赴广州主持。阎锡山认为李的这份记录刺激性太大，劝李宗仁予以修改，但李没有同意，阎即以自己是私人资格来桂，没有同意带转，即由李文范带回，由何应钦转送给蒋介石。[71]

6日，蒋介石向李宗仁回复了一封长函，由林蔚文带到广州交何应钦，转交李宗仁。蒋介石在信中一派冠冕堂皇的话，认为一切由代总统依法行使，自己引退后，对存台金钞“未尝再行与闻”。国防部事务，已“无权过问”。对于非常委员会认为可以复议，但他强调：“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为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蒋在信中强烈表示拒绝出国，并声明：“中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72] 其实，他刚刚部署好上海军事后从上海撤走，进行着东山再起的图谋。他预定：“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

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73] 他把台湾作为他的最后根据地，全力经营，台湾事务以及转移到台湾的财政部库存，李宗仁根本无法插手。何应钦接信后，召集十数人研究，多数人请阎锡山带往桂林，“仍劝李来穗，勿因是而负气”[7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

7日，阎锡山偕朱家骅、陈济棠及白崇禧再次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阎说明蒋介石“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而不发牢骚还好”[75]。所谓半条，就是未允出国。当时桂系骨干都主张李宗仁去广州，李得了面子，对未来存有一线希望，即于5月8日自桂林飞往广州。

李宗仁到广州后即于当日发布命令宣布：“政府以和谈无法继续进行，畿辅又突遭侵袭，遂不得不于四月二十一日令饬尚在南京之各中央机关迅即全部迁至广州，并责成军事主管妥慎规划集中力量缩短防线，续为保障民主自由与国家独立作自卫之抵抗。在此期间广州即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除前已由外交部照会各国驻京使节外，特此通令昭告全国。”[76]

同时，立法院也于5月6日在广州复会。逃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残部又正式运转起来。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

一　上海战役和太原战役

在江防计划上，如前所述，蒋介石指令汤恩伯把防守重点放在南京以东，以便退守上海。当时，蒋介石已在精心经营台湾，海空军已逐步南撤，他的注意重点在保持海上交通的便利，以便进退有据，一方面利用上海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尽量延缓失败的时间，一方面尽

可能将上海地区的物资财富转移到台湾，把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不同。他们不能掌握海军和空军，而台湾完全在蒋介石系统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的注意重点是退守西南。李宗仁回忆说："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77] 结果，两种战略设想都不能彻底贯彻，江防摆了个"死蛇阵"（刘伯承语）。除东面的四个军尚能转移兵力，其余江防部队大量被歼灭或溃散，未能主动转移和撤退。解放军迅速占领了杭州，切断了浙赣线。这样，上海的汤恩伯部既失去了腹地的掩护而陷于孤立，武汉白崇禧也面临被解放军切断退路的危险，不得不向浙赣线以南地区部署撤退。蒋桂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拥有最丰富的物资和最强的生产能力，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淮海—徐蚌战役即将溃败之际，着手在上海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4月下旬，上海、吴淞周围地区的永久性阵地工事已经完成，计钢筋水泥碉堡4200座，计划供十个军使用，主阵地全长约80公里，纵深8—15公里[78]。

在江防部署时，上海附近配置了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及江苏保安队改编的暂一军（驻崇明岛）。4月中旬，成立淞沪防卫司令部，任命石觉为淞沪防卫司令官。石觉即原第九兵团司令官，北平和平解决后乘飞机离开北平，到上海负责指挥野战部队，即第三十七军、七十五军、五十二军、交警第二总队、第三五三师（属十二军），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各特种兵部队[79]。同时成立上海市战地政务委员会，由汤恩伯兼任主任委员，以强化控制。解放军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将司令部从南京撤到上海，同时将在鹰潭接兵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和在浙江临海整补的第十二军（仅四个团兵

力）调入上海，并令江防四个军向上海撤退。当时，汤恩伯确定，以“确保淞沪反攻基地，以待新生力量之成熟，及国际情势之有利变化”为作战方针，在淞沪地区，以永久工事为骨干，构成环形阵地，预期使用陆军十至十二个军兵力，除淞沪原有三个军外，其余大部由江防部队转移之[80]。但在撤退过程中，各军损失重大，第二十一军、五十一军各存四个团兵力，第五十四军损失一个团，第一二三军仅存2000兵力。而向杭州方向撤退的四个军已被解放军歼灭。退守上海的总兵力仅九个军，二十四个师，以及其他部队，总计22万人[81]。

解放军百万雄师顺利渡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进展十分顺利。从军事上说，解放军向上海进兵，击败汤恩伯残部已经毫无问题。但是，解放军在进军占领工商业城市的过程中，虽然不断有所进步，但仍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造成城市工作的混乱。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后，曾发生几个下级干部士兵违纪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严重事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接收工作十分复杂，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因此，为了主动地有秩序地占领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一再要求总前委作好充分准备。总前委也于4月30日建议：“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部队）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卅五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卅五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82]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建议，于5月3日指示总前委、华东局和粟裕、张震，一方面要求用十天时间作好准备，让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以便在汤恩伯撤退时，不得不去占领；同时要求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83]。同时，中共中央仍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但为了迫使敌人接受和平，并阻止国民党当局从上海大量搬走物资，中央军委于5月5日指示前线将领，先行

占领吴淞、嘉兴，切断敌从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

5月7日，粟裕、张震作出部署，以第十兵团攻击吴淞，以第九兵团攻击嘉兴，先以钳形攻势切断上海敌军海上逃路。但在兵力配备上，仅以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主攻吴淞，以三十军一个军主攻嘉兴，如敌向南汇、川沙撤退时，进入浦东断敌退路。这一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要求二十九军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三十军先头部队于16日晚占领川沙。

当时，汤恩伯以仍有战斗力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和一四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在沪西沿吴淞外围至莘庄一线部署，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部署在浦东沿江地区，以第一二三军残部部署在外围的昆山一线，以第五十一军残部部署在南汇、川沙。蒋介石于4月26日到达上海，27日进驻市区，亲自督促防卫上海的战斗。当时，浦东方面三个军战力不强，沿江阵地纵深仅五公里。他意识到浦东兵力薄弱，是部署上的弱点，但也无可奈何。同时，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肆搜捕残杀学生运动骨干、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制造了严厉的白色恐怖。4月25日晚至26日晨，一次就逮捕了学生352人[84]。据《上海战役》一书所列，1949年1月—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烈士有100人。其中有：工人运动领袖钟泉周等公交三烈士，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台长李白等地下工作者，学生运动领袖穆汉祥等（交通大学），参与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张权、陈尔晋等，转入秘密斗争的民主党派成员黄竞武（民建，黄炎培之子）、谢超逸（民革）、虞键（农工民主党）、林绍禹（民盟），等等。

5月12日上午，解放军各部发起攻击，但当解放军攻击至月浦、杨行、刘行等敌既设阵地之前，即遭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伤亡很大而进展迟缓。当时，解放军自渡江以后，进展顺利，且不断有敌将逃跑和起义的不确实情报，所以前线将领存有

轻敌情绪，对战斗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据叶飞回忆：“常熟到吴淞口距离一百二十多公里，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才能到达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为什么命令西路军由常熟出发，限两日内到达吴淞口呢？这是因为轻信了情报，说是敌军准备起义，因而认为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仗打。”[85]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因所部攻击受阻，于14日晚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难于一下插入吴淞”[86]。粟裕、张震研究了前敌攻击受阻的情况，认为：“该线现为淞沪敌主阵地，必须有准备之攻击，方易奏效。”于是，改变部署，以敌人防守薄弱的浦东为主攻方向，命令第九兵团，无论哪一个军在前，即“应以最先头军，力求迅速攻占川沙、高桥，并确实控制东沟镇以北与全国轮船检查处（吴淞右岸）之间，以炮火封锁江面，但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轰击外国兵舰”。要求九兵团大胆迅速推进。十兵团则以两个军攻击前进，力求开辟通道，以炮兵封锁江口[87]。总前委得到前线报告后，即指示前敌将领攻沪战役不要性急，十兵团、九兵团两方面都要作充分准备[88]。于是，奔袭式的钳形攻势转入逐点逐堡的攻坚战斗。国民党军以海空军支援陆军，死死保障吴淞口两侧阵地，确保其出海口。

当解放军第十兵团在月浦、刘行一线陷入了艰苦的攻坚战斗之际，第九兵团在浦东乘虚迅速推进。第三十军于14日占领南汇，15日晨超越川沙城区，推进至顾家路，切断第十二军和五十一军的联系。第五十一军从川沙城撤退后在小营房一带布防，解放军第三十军主力占领川沙城区后继续追击，在小营房、白龙港包围了第五十一军。吴淞口面临威胁，于是汤恩伯在浦东临时组建了浦东兵团司令部，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任司令，驻高桥指挥驻守浦东的三个军。16日晚，第五十一军被歼灭，军长王秉钺被俘。形势趋紧，汤恩伯、陈大庆于是日晚从市区撤到了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设立指挥部，同时即以刘昌义出任第五十一军军长，收容残部，驻守市区。同日，解放军第

三十一军占领周浦。17日晚，第三十军向高桥推进，第三十一军在左翼展开，占领东沟镇段江面，18日占领高行，协同攻击高桥。汤恩伯为保护吴淞口阵地，以确保从海上撤退的通道，即调市区的第九十五师增援，续后又调第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并以海军舰炮支援，拚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这一带处于江海之间的狭窄地带，攻击部队难以展开和运动，伤亡严重，进展缓慢。直至23日，第九兵团重炮兵到达前线，向敌海军发起攻击，控制了江面，攻击部队的态势才得以改善。

当时，解放军攻沪的大部队，因为接收上海需要时间准备，正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没有配合钳形攻势出击。钳形攻势部队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多面展开攻击。国民党军得以集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海空军支援下，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死守吴淞口两侧狭窄阵地，确保其出海口。粟裕鉴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进展缓慢，于5月18日向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要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89)]。这时，接收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5月20日，中央军委即指示前线将领，可以总攻上海，并指示要作好充分准备，考虑到前线部队的困难，军委爱惜前线将士，特别指示对于吴淞要塞，“可以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90)]。

于是，粟裕、张震于5月21日制定了调集十个军的重兵总攻上海的部署，22日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23日晚即发起总攻。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军力压迫下，向苏州河以北退缩。24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翌日晨，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是日中午，汤恩伯下令撤退。当晚各军在混乱中登船，撤运行动计有海轮十四艘，登陆艇四艘。5月26日拂晓，船队全部驶离吴淞口[(91)]。解放军第三十、第三十一军于25日晚占领高桥。26日，第十兵团占领吴淞、宝山。当时，汤恩伯在撤退之际，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指挥殿后部队。26日，处于绝境的刘昌义率部四万多人向解放军投诚。27日，汤恩伯留下的掩护部队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一军等部纷纷瓦解，中午，

最后一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二三〇师在杨树浦投降。解放军将上海市区敌军全部肃清。

上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五十一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二三军之各三个师及暂八师全部，第七十五军一个师，五十二、十二军一部，五个交警总队，共15万人。汤恩伯仅得以从上海撤走第五十四军、十二军、五十二军等部主力，及第七十五军一部、第九十九师、第二十一军和一二三军军部，二个炮兵团，共五万多人。(92)

国民党军在长江防御崩溃之际，其孤悬华北的最后重要据点太原也失守了。太原是阎锡山长期经营的据点，拥有独立的军工体系和完整的城防工事。阎锡山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控制系统，成为山西的“土皇帝”。这一军政集团在濒临覆灭之际，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948年7月，阎锡山部在晋中战役失败，拥有的十五个师被歼灭十个，太原已经陷于孤立，它同外界的联络主要依靠空运。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赴太原，为阎锡山鼓劲。太原守备兵力经整补后为两个兵团，五个军，约九万人，加上其他武装力量，总计14.9万人(93)。太原三面环山，城南平坦无险，汾河纵贯南北。以王靖国的第十兵团担任城东、城南地区的防御，以孙楚的第十五兵团担任城西、城北地区的防御。以蒋介石从胡宗南部调入的第三十军、第八十三师，由敌伪军改编而来的独立第八、第九及由留用日军作骨干的第十总队等部及特种兵为总预备队。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推行党政军一元化，实行总体战。但太原粮食缺乏，空运能力有限，士兵营养不良，多患夜盲症。

由于晋中战役中阎锡山部主力被歼，太原孤立，兵力空虚，毛泽东于7月16日曾期望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并争取阎锡山归降。但当时战役尚未结束，部队伤亡很大，需要休整补充，而蒋介石从西安抽调整编第三十师四个团，从7月17日起空运

太原，加强了太原的防卫力量。7月21日，徐向前、周士第向中央军委报告，太原外围阵地坚固，阎锡山部至少有六万人以上，各师补充及时，兵员充实，而华北一兵团各纵兵员不充实，“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因此，确定作战原则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94)] 军委同意这一方针，令徐兵团全军转入休整，准备攻取太原，并令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徐向前为书记，统一指挥。

解放军攻击太原的部队计有：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辖三个纵队），晋绥军区（后改属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和晋中军区部队，共十七个旅，十万余人[(95)]。华北第一兵团在解放军中并非主力兵团，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来，原来的基础薄弱，在一年多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以10万兵力攻击坚固设防的太原，兵力显然不足。但当时各地战斗激烈，不久辽沈战役开始，所以，华北第一兵团准备独力完成攻克太原的任务。前委于9月28日制定了攻取太原的作战方案：“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攻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96)] 这一方案，鉴于太原缺粮，机场受到解放军炮火控制，敌有战斗力的部队无多，因此对敌顽强抵抗的能力估计不足。正在石家庄养病的徐向前接到这一方案后认为：“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97)]

正当华北第一兵团诸部积极准备攻城之际，阎锡山于10月1日派

出了七个师，脱离既设阵地，出城破坏解放军攻城准备，抢夺粮食，于10月4日间南下至小店、南黑窑、秋村、西温庄一线。一兵团迅速抓住战机，隐蔽集结了四个纵队，于10月5日发起战斗，包围歼灭了敌第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全部，歼敌万余人，占领了华北最大的武宿机场和太原外围的重要据点石嘴子、凤阁梁。太原守军损失严重，解放军乘机提早发起了攻取太原的战斗，但因此更改了原定部署，并抱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即打了以后有利再打，未有成算。

前委原作战方案，主攻方向在城东南，在初期战斗中发现，城南工事坚固，配有重兵防守，因此把主攻方向转向东山。东山是太原的主要屏障，攻占东山就可以控制太原的命脉。阎锡山在东山构筑有四大要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10月16日，解放军开始行动，18日拂晓，西北第七纵队一部以奇袭手段夺取了牛驼寨，但因其他部队未能跟上，态势孤立，遭到太原守军的强力反击。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和第十总队三个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重占牛驼寨。解放军第十三纵队攻击马庄也未得手。但对东山进行了面的占领。

华北傅作义为了配合山西和东北战场，组织所谓援晋兵团，企图偷袭石家庄，但未能实现。国民党军统帅部也曾希望傅作义能向太原一线解放军实行攻击，各个击破[(98)]。但解放军不久就兵临北平城下。10月21日起，蒋介石令第八十三师从榆林空运太原增援，但遭到邓宝珊的反对，“据空军报告，榆林邓宝珊不许再运，并称如必再运，即将以武装阻止”[(99)]。

鉴于第一次攻击失利，解放军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火力，攻击四大要点。太原守军也将城防兵力集中到东山要点上，以第十总队及第六十八师一个团守牛驼寨；以第四十师一个团及保安六团一部守小窑头；以第八总队及保安六团大部守淖马；以第九总队及第七十三师、四十九师一部守山头。以第三十军全部、第四十师二个团组成机动兵团。11月初，蒋介石从榆林抽调第八十三师空运增援太原，并于

11月9日加入机动兵团作战。解放军计划以西北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向陈家峪发展；第八纵队四个团攻取小窑头向杨家峪发展；第十五纵队攻取淖马向伞儿村发展；第十三纵队攻取山头向双塔寺发展。10月23日，兵团颁布了总攻击令，26日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太原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在执法队的严厉督战下，死打硬拼，各据点反复争夺，血战空前。

在东山前线血战之际，从西安调入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原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准备里应外合，攻取太原。但在起义前夕，该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11月2日，黄樵松和进城联络的解放军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被捕，后被押解到南京杀害。戴炳南则在太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捕获处以死刑。

战斗至11月12日，解放军攻占了东山全部四大要点，俯瞰全城。经此一战，太原守军仅剩约六万残兵，陷于孤立。但解放军十万之众，伤亡已达二万[(100)]，也难以继续承担攻城战斗，不能不进行休整，并要求中央军委增加兵力。中央军委即令华北第二兵团西进参加攻取太原的战斗。但这时，东北野战军将领林彪、程子华等都不赞成华北第二兵团西进，要求停止攻击太原的战斗，集中全力对付华北傅作义所部。中央军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即于11月16日征询太原前线将领的意见："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101)] 于是，太原前线解放军停止战役攻击，围城待援，部队转入休整，同时，对太原守军下级官兵进行政治攻势，先后瓦解敌军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决，平津战役结束，中央军委调序列改编后的第十九

兵团（即原华北二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即原华北三兵团，杨成武为司令员）和第四野战军的第一炮兵师增援太原，华北一兵团改为十八兵团。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成立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总兵力达十个军三十七个师，共32.8万余人，炮1300余门。太原守军经整补后为六个军十三个师，共7.2万余人，解放军以4.54：1的兵力比，占据了绝对优势[102]。

这时，彭德怀于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于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准备于太原战役结束后，调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到西北作战。徐向前正患病在身，无法到前线指挥，于是请彭德怀留下指挥攻城，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仍以徐向前名义下达命令。3月30日，总前委制定了作战方案，并经彭德怀同意，“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103]。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预计半个月解决战斗，但作一个月作战的准备。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作战方案，同时要求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北平和谈期间，也有同时解决太原问题的磋商。尽管阎锡山已于3月29日乘飞机离开太原，太原守军仍顽固地拒绝接受和平。4月14日，徐向前等向军委请示提前发起攻击，4月17日军委复电授权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104]

4月19日夜，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了攻城战斗，以插入分割战法，先以第二十兵团、十九兵团为主，从南北两面攻击，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即原西北七纵）主力佯动，待南北两路顺利进展后，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即于20日下午5时半投入战斗，向城东郊攻击。至22日上午9时，城郊敌军全部肃清。

阎锡山本是奉李宗仁之召，参与和平谈判问题的商议，一去不归，在南京用电话指挥。他原发誓要与太原共存亡，而至此太原即将失守之际，仍滞留南京。蒋介石、李宗仁都劝阎锡山留在南京。直到

解放军炮火完全封锁了太原机场，阎锡山才故作姿态，谋求用民航机空降太原，自然难以成行[105]。尽管阎对自己部下违背了诺言，但他在4月20日左右，仍电其五妹（山西省妇女会理事长、国民大会代表阎慧卿）、梁化之（代省长）与某特务长，嘱他们自杀。[106]

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解放军炮兵火力集中猛轰太原城垣，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第十九兵团、第二十兵团分别从东、南、北三面攻城，一小时后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太原守军土崩瓦解，至上午10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孙楚、王靖国、太原绥靖公署总顾问岩田（日人）等被俘，梁化之、阎慧卿等自杀。部分顽固不化的军政人员集体自焚。第十总队司令、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官今村被俘后也服毒自杀。最后攻克太原一役，解放军歼敌七万余人。

阎锡山后来以“太原五百完人”鼓吹他们的忠烈，并屡屡喜作道德说教。但他自己却屡败屡逃，在台湾安度余生，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厚颜强辩而已。

二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上）

解放军于上海战役之后，各部均转入休整状态。毛泽东对美国干涉、协助国民党军队袭击解放区后方的可能性，心存顾虑，保持警惕。早在平津战役之后，毛泽东就指示华北军区：“（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107]因此，一直在沿海地区布有重兵。渡江之后，毛泽东以第二野战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停留在浙赣线上，5月23日，毛泽东规定二野的任务说：“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

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108)

5月28日，毛泽东更作出具体部署如下：“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109)

当时，青岛驻军于是年2月间即有撤退的准备，但驻青岛的第十一绥区司令刘安祺与美军驻青岛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会谈时，美方曾表示：“一、国军如不撤退，则美军决保留现状，不再作撤离之准备。二、如×来犯时，美军决不中途撤离青岛，必要时，且愿提供援助。”甚至有“如×大举来攻时，则由关岛、东京调集援军，亦甚便利”的表示(110)。但在解放军攻击上海之前，原在上海黄浦江的美国军舰已撤至公海，美国驻青岛舰队也于5月21日撤走。青岛国民党军两个军及其他人员12.2万余人也于6月2日登船撤退。解放军随即进占青岛。美军干涉的迹象很快就消退了，但应付美军可能进行干涉的部署，自然影响到解放军进军的速度。

国民党军于江防失守后，对于退却方向，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

应钦曾打算：甲、左路鄂西方面，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乙、中路粤汉线方面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击，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丙、右路江西方面，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111]。

针对何应钦的部署，毛泽东估计“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为此，于5月17日指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除留守和侧翼部队外，在中路集中主力八个军，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西路以二个军向宝庆推进，“歼击白崇禧部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112]。当时，白崇禧部是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总兵力除后来脱离指挥关系的宋希濂部外，有33万人。不过，这时候，四野主力尚未渡江。上海攻克在即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23日，对各野战军向全国的进军作出了总体的部署：以三野一部于上海战斗解决后向福建出动，以二野西进，经营川、黔、康，以四野向湖南推进，于年底占领两广，以一野进军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113]。

当时，陕西胡宗南部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春季攻势的打击下，撤退至渭河以南，太原失守后，因全盘态势不利，进一步向泾河两岸撤退，西安绥靖公署也南撤至汉中。第一野战军未待第十八、十九兵团到达，即先行发起陕中战役。战役一开始，胡宗南部即于5月17日全线西撤，解放军于18日占领咸阳，19日占领扶风，5月20日占领西安，22日占领凤翔，胡宗南部撤至秦岭以南。为了彻底歼灭胡宗南部，防止胡部向四川、云南撤退，毛泽东在上述部署中，计划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除二野进军贵州外，要求四野在消灭白崇禧部、占领广西之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114]。此外，毛泽东已部署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沿汉水西进，截敌退路，在安康一线与胡宗

南部反复争夺。各野战军即按毛泽东的总体部署，分别部署进兵。

在西北战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实力尚未受到损伤。解放军占领西安等地，胡宗南部后撤，二马防区受到解放军的威胁。当时，二马于5月5日在甘青交界的享堂举行会议，议定推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联合作战。张治中留在北平后，撤退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副长官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但马步芳蓄谋取而代之，要郭率部入陕作战。广州当局为利用二马作战，即于5月18日发表由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6月中旬，二马与胡宗南合作，联合反攻西安。但三人同床异梦，难以真诚合作。青马在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下，直攻咸阳，但宁马与胡部李振兵团分别在乾县和盩厔（今周至）逗留不进。解放军以新到的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增援，6月13日一战，击溃了青马的进攻。这时，解放军增援部队源源抵达前线，胡、马各部不得不停止进攻，纷纷后撤。

鉴于国民党军已不敢积极推进，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集结有四个兵团，决心利用胡、马的矛盾，“钳马打胡”，发起扶郿（今扶风、眉县）战役。毛泽东指示对于胡宗南部“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115]。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醉生梦死。7月11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三个兵团发起攻击，胡宗南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解放军第二兵团先期秘密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从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的结合部，通过大沟悬崖，于12日拂晓出奇兵袭占罗局镇，从胡宗南部第三十八军后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前敌将领竟不相信自己已经遭到解放军的袭击，迟迟未采取应变措施。[116] 胡部第十八兵团被压缩在渭河河滩绝地，不得不勉强渡河突围，除李振和第六十五军军部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被歼。7月14日，解放军占领宝鸡。是役，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共4.4万人。

胡宗南失败后，二马向陇东、平凉撤退。李宗仁、阎锡山等认为，胡宗南和马步芳不能合作，致遭失败，希望徐永昌前往指挥。但徐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说：“实则，胡、马除蒋先生（即蒋介石

——引者）外，谁的指挥也不受。”[117] 面对着解放军强大军力的进击，二马之间仍希望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协力抵抗。7月24日，由马步芳的参谋长刘任在静宁主持了二马两部之间的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保卫甘肃、保卫西北”的《关山会战指导复亲计划》，协同进行平凉决战。会议决定以卢忠良率陇东兵团（即宁马的宁夏兵团改称）固守陇东和平凉，以马继援指挥陇南兵团（即青马的青海兵团改称）和中央系三个军扼守天水、陇西、定西等兰州外围地区，青马主力由安口窑西移六盘山，待解放军进击平凉时，迂回至左侧进行反击。但这一部署，使宁马首当其冲，而马鸿逵所谋求的甘肃省主席一职又迟迟没有发表，对马步芳部西撤存有疑虑。解放军采取了“钳胡打马”的部署，集中兵力，求歼二马。当解放军于7月24日向平凉进击时，马鸿逵电令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青马兵力暴露，也不得不向静宁撤退。解放军即分兵三路，进军陇东追击，将二马分割，至8月11日攻克平凉、天水等重镇，占领县城22座。青马退保兰州，宁马退守宁夏。[118]

8月14日，李宗仁在广州召集西北联防军事会议，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等出席，计划在兰州决战，以青马在兰州牵制解放军主力，马鸿逵部转用于兰州，胡宗南部出陇南，围击解放军，并出动空军支援，且要徐永昌前往指挥。翌日，胡宗南见徐永昌，指责昨日会议“大家说官话”，并断定“马步芳决不打，必后撤青海，保存实力”[119]。至21日，即成立国防部长西北边区指挥所，由徐永昌任指挥。

解放军于8月9日分三路向兰州进军，首先歼击青马。至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兰州，第一兵团兵逼临夏。胡宗南、马鸿逵对马步芳不信任，没有出兵支援。攻击兰州部队担心敌人撤逃，丧失战机，21日即发起攻击，遭到兰州守军的坚强抵抗，伤亡严重。于是，解放军调整部署，准备攻坚，并准备以第一兵团占领临夏后，加入攻击兰州的战斗，切断兰州守军西退新疆的道

路。24日，马步芳要求马鸿逵速出靖远，胡宗南急攻天水。但宁马和胡部遭到解放军阻击后即分别停止于海原以北、宝鸡虢镇以南，屯兵不进。25日，解放军攻兰部队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兰州外围主要阵地。在兰州指挥的马继援丧失了坚守兰州的信心，是日晚，部署经黄河铁桥全线北撤。但解放军很快发现了敌军的撤退行动，马上组织追击，以火力封锁黄河铁桥。26日占领兰州。马继援率残部向永登、西宁逃跑。27日，马步芳因主力被歼，即飞离西宁，逃往重庆，31日马继援也飞逃香港。是役，解放军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攻占秦岭，打开了通往汉中的门户。

兰州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残部已丧失战斗力，分别向西宁和河西走廊溃逃。解放军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于9月5日占领西宁，然后以第二军冒着风雪严寒，翻越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出奇兵于9月19日占领张掖，第二兵团于9月4日分兵两路，向河西走廊挺进，至21日在张掖与第一兵团会师，然后继续西进。9月24日，国民党军三万多人在酒泉起义，27日，解放军进驻酒泉。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于9月2日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宁夏兵团在马敦静指挥下，设置了三道防线，进行抵抗。

早在发起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于8月6日就指示彭德怀，对于西北地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主要是利用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利用傅作义解决绥远和宁夏问题[120]。毛泽东原拟利用傅作义和马鸿逵的把兄弟关系，解决宁夏问题，但事实上马鸿逵正部署抵抗，和平解决比较困难，而且，马部在陕北杀人甚多。因此，毛泽东于9月4日又指示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但“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121]。马鸿宾在宁夏受到马鸿逵的排挤，他拥有一个军的实力，曾亲自到包头与傅作义联络，谋求和平改编。

解放军首先突破靖远、同心防线，进击中宁，守敌贺兰军逃跑。马鸿宾之子马惇靖所率第八十一军于9月19日起义。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在金积、灵武一线继续部署抵抗，但20日，马敦静即搭乘前来督促抵抗的徐永昌的飞机前往重庆。所部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联名通电向解放军求和。但所部仍在抵抗，解放军即进击吴忠堡，于21日攻克。金积、灵武守敌溃散。22日，马鸿宾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名义，召开军政会议，派出代表到中宁，于23日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签订《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同日，银川守军溃散抢劫，马鸿宾从银川向解放军告急。解放军即星夜进驻银川，上述协议也已无法执行。

绥远问题在北平和平谈判时，本有同时解决的拟议，北平问题解决后，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即于1月22日飞到北平与傅作义面谈。此后，傅作义有以“易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要求，毛泽东原则上同意暂时保存绥远军队，原封不动，过相当时间之后，再去改编，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绥远方式。傅作义在北平西郊总部附近，留有一条长仅500米的跑道，1月30日，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夕，他派出一架飞机到绥远，临行约定，他何时有电，这架飞机即飞北平，在这条跑道上降落。3月初，这架飞机因需修理，飞到南京。23日，傅作义发电调这架飞机24日到绥远，25日到北平，接他到绥远。这时，正好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到北平，原定着陆场附近解放军增多，已无法降落。傅作义出走的企图不久也被中共中央所发现，空中渠道被截断了[(122)]。4月1日，傅作义正式发表了接受北平和平的通电。

绥远问题从3月23日开始，由傅作义派周北峰、阎又文和解放军方面的李井泉、潘纪文在北平开始第一次谈判，到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同日生效。根据“暂维现状，以便改造思想准备将来作进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就“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界内“由董其武将军管辖”。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协议，但表示：“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

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123] 7月8日，董其武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了协议内容，并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一直在对绥远进行威胁、拉拢和分化的工作，要求董其武率部西撤，并断绝了对绥远的经费接济。8月1日，徐永昌到达陕坝，董其武等前往周旋。徐劝董其武率部西撤，助二马作战。他估计傅作义指示董其武退河西，力言“万不可退至河西，河西死地也，不足有为”。“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124]。徐永昌回去后，广州方面补发了绥远的军饷。但董其武已决心走和平道路。当时，毛泽东于8月6日电告彭德怀说：“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125]

8月24日晚，傅作义、邓宝珊等携带大批现金由北平乘火车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推进绥远起义。人或疑这样将“放虎归山”。当时，毛泽东对傅作义已极其信任[126]，据董其武回忆说：“毛主席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127] 9月10日，傅作义和董其武一起进驻包头，以自己的威信，说服所部，筹备起义事宜。

傅作义到绥远后，李宗仁、阎锡山等力谋争取傅作义率部归来，派徐永昌前往包头会晤傅作义。徐到重庆后，蒋介石也写了亲笔信给傅作义，交徐永昌带往。但蒋“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徐也同感，且对前往并不积极[128]。因为天气的原因，徐永昌迟至9月16日从重庆飞宁夏，17日到包头，与傅作义长谈。但傅作义最终拒绝了徐永昌希望他率部西撤的要求。19日，徐即飞回宁夏，转飞重庆。是日

下午，董其武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经过傅作义的说服，一直犹豫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也在通电上签了名。傅作义完成了组织绥远起义的任务，当天即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到达酒泉后，开通了进军新疆的道路，新疆和平解放的形势也趋于成熟。当时，受周恩来的委托，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于北平和谈破裂后，从南京返回新疆，策动新疆起义。中共中央致力于与新疆维吾尔族的合作，来迫使国民党新疆当局就范[(129)]。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作联络员，率四人小组带上电台，于8月15日由苏联抵达伊犁，与新疆三区人民革命和民族军建立联系。8月18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出五位代表前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后来阿哈买提江等五人在前往北平途中，因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而牺牲[(130)]。

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于新疆问题一直流于清谈，8月19日行政院会议上，仍在讨论新疆撤兵问题。但实际上撤兵十分困难，同时担心撤兵后中国会失去对新疆的主权，所以未能采取行动。

在解放军攻克兰州顺利挺进河西走廊期间，陶峙岳等新疆军政人士于8月底举行正式会议，讨论继续支持蒋介石还是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问题。会上除青海马步芳系统的马呈祥“对此问题没有表示正面意见而要把他的力量退回青、宁外，其他的人都一致同意实现局部和平”。他们通过苏联在迪化的代表，来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131)]。

当时，新疆和北平方面的通讯比较困难。张治中自5月以后，和新疆未能建立联系。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要他给新疆方面发电报，动员起义，由在伊犁的邓力群的电台转交迪化。9月10日，张治中给西北军政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

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132]。9月11日，又就新疆准备起义的具体问题，致电陶峙岳，详细磋商。9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邓力群前往迪化：“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133] 邓力群即于9月15日到达迪化进行联络。陶峙岳、包尔汉当即于9月17日复电张治中，说明新疆和平转变问题已经安排妥当，并已“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毛泽东——引者）”[134]。

在此期间，陶峙岳一方面派驻酒泉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司令曾震五到兰州与彭德怀会晤，一方面耐心地做反对和平转变的将领的工作。最后，胡宗南系统的将领叶成、罗恕人，马步芳系统的将领马呈样，均同意放弃部队离开新疆出走。

9月24日，曾震五等在酒泉，以陶峙岳领衔，率部通电起义。25日，罗恕人、马呈样等离开迪化，不久，叶成也追上他们一起离开新疆。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领衔，各师旅长签名发布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135] 但此电以早一天，即25日的名义发表[136]。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领衔通电起义。10月5日，彭德怀在酒泉与陶峙岳会晤，并进行了会谈。10月10日，解放军先遣支队从玉门起程，10月20日进抵迪化。

三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下）

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期间，东南地区解放军处于休整状态，国民党军残部虽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内部分崩离析，整理无方，对于战略方针，派系分歧仍然十分严重。据台湾方面战史叙述：“（解放军渡江后）李代总统，仍存有与×和谈之幻想，指令白部于不得已时，仍以确保广西为和谈最后之凭借，对于国防部建议‘华

中主力，于不得已时，转移入黔，与四川国军凝为一体，确保西南半壁，徐图再举’一案，延不批准。”[137]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认为：“至五月中旬（解放军）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细研全局，我深觉他（蒋介石）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138]

迁往广州的国防部，基于白崇禧的要求，对在宜昌一线的宋希濂指示作战方针说：“京沪转进后，国军作战方略，持久消灭敌军为目的，着重以空间换时间，及小型歼灭敌军为手段，在有利条件下，务寸土必争，积小胜为大胜，更须于必要时派有力部队向匪后发动反击，诱敌深入。”国防部要求宋希濂除确保川东门户外，确保湘西，“主力务须坚守于公安、渔洋关、三斗坪以北亘朋山之线，并集结有力兵团适时侧击向公安南窜长阳西之敌，不得放弃有利地形，畏缩于恩施附近”[139]。但不久，蒋介石即命令宋希濂部入川，敞开白崇禧的左翼，并将宋部划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脱离了与白崇禧的指挥关系。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主张保卫华南，将台湾的军事、经济力量集中到大陆上，使用飞机作战略轰炸，海军进行偷袭战，陆军在大陆上以攻为守。白崇禧原则上主张守衡阳，不得已时炸毁粤汉、湘桂两铁路西撤向广西或贵州山地。有消息甚至说，白崇禧准备长征到西北，与马步芳、马鸿逵等合作。蒋介石、陈诚、顾祝同主张若华南不能守，则撤至台湾、四川，使用海空封锁沿海，并保持沿海主要桥头堡，在大陆上布置游击，保持四川山地[140]。6月5日，蒋介石对即将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阎锡山提出：“一、东区沿海以舟山、

台湾、琼岛、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二、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141] 蒋、李的战略方针是从派系利益出发的，彼此不能合作，区区残存的力量继续互相抵消。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后，起草了《保卫华南西北案》，强调“所谓争时待机，含义有二：一是培养新生力量，以待反攻之机；一是等待国际转变，以待援助合作之机”。这篇总体战方案，长篇大论，却是满纸空言，在国民党濒临崩溃之际，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具体方案。徐永昌评论说：“渠近日每每自拟方案，连篇累牍，有如太原时之开会，甚或因之旷废有时间性之公事，殊可忧虑。余于阎先生之开会、拟方案，以为亦如蒋先生之检讨会，其与学生们贴标语好不了多少。”[142] 但其保卫台湾一案的指导思想值得重视。他认为台湾“在我们争时待机的政策上，实为最有价值的省份。但在广州，接见各方人士，见百人，百人言台湾不能独存；见千人，千人言台湾不能独存。假使不幸而大陆不能确保时，若台湾又不能独存，我们争时待机之政策，何以实现”。他十分担心解放军先攻台湾：“估计共匪今日的政略，可能看台湾比大陆重，可能先攻台湾，再攻大陆。因他占了台湾，我们即无远景。”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今日应赶紧的巩固台湾。”[143]

上海战役后，解放军第十兵团承担向福建进军的任务，但部队需要战后休整，从整体形势上看，进军福建的战斗任务也不严重。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前敌将领的意见，延长休整的时间。同时，军委于6月14日指示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144] 进军台湾的问题，是解放军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军事课题。此后，驻在上海、吴淞的第九兵团即承担起准备攻击台湾的任务，而以第七兵团主力进击舟山群

岛，其余部队进行剿匪和发动群众，拱卫后方。

为了准备进击台湾，7月25日，毛泽东在发给秘密访苏的刘少奇转达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对台湾的战斗，将在建立了航空部队之后进行，这大约只能在明年的下半年。"并且，他不无忧虑地要刘少奇询问斯大林："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反美运动可能发展起来，在美国和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运用苏联的帮助（即：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准备飞行员，并出售给我们飞机，还可能请求苏联向我们派遣苏联的航空、海军专家，以及参加军事行动的飞行员），以占领台湾，那样，是否会损害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相互关系？请您就此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以便他斟酌我们的计划，他们是否可行？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行的，那么，我们打算立刻向苏联派出学员。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拟订，然后通知您。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您可以回国。"[145] 随后，刘亚楼奉命访问苏联，准备组建空军部队。

解放军第十兵团于7月2日从嘉兴地区出发，开始向福建前线运兵。7月9日，蒋介石亲至福州部署军事。7月21日又到厦门，与汤恩伯、朱绍良等将领会商防卫方略。李宗仁也于7月26日巡视福州，会晤朱绍良。当时，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以李延年的第六兵团驻守福州地区，以刘汝明的第八兵团驻漳州地区，以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驻厦门地区。国民党军各部，兵力残破，屡经编并而成，士气低落。朱绍良、李延年都无战斗决心，主张从福州撤退，但蒋介石认为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146]。为此，福建绥署曾令第九十六军北进，但部队战力薄弱，甚至对处于军事真空状态的古田，也始终不敢前出占领，而解放军一时也无意与敌接触。

8月初，解放军第十兵团三个军及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一部到达福建前线，在建阳、建瓯一线集结。8月6日，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兵分三路，以第三十一军为左路军，进击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以第二十九军为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出奇兵袭占福清，断敌向南撤退的道路；以第二十八军为中路军，由古田向福州正面进击。另以第二十一军进攻三都澳等地。三路协同作战，进展顺利，8月16日，左路军进克连江、马尾，以炮火封锁闽江，并由马尾西向攻击福州，中路军进迫福州外围，右路军占领福清，构工固守。福州国民党军队就这样消极地等待着被解放军包围歼灭。8月17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敌向闽江以南撤退，为二十九军阻击，予以包围歼灭。是日，解放军占领福州，歼敌四万余人。朱绍良、李延年于16日午后乘飞机逃到厦门，连省府大小印信都来不及带走[147]。

当时，国民党军残部于8月15日新成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陈诚为军政长官。蒋介石以朱绍良、李延年作战消极，由汤恩伯代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旋改东南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并任福建省主席，驻守厦门。同时调整了部署，以第二十二兵团守金门，以第八兵团守漳州、厦门，以第十二兵团驻守潮汕。

解放军第十兵团攻占福州后，一边分兵占领闽中各地，一边进行休整，准备渡海作战，进击漳州、厦门。9月中旬，第十兵团发起漳厦战役，首先扫清厦门外围，9月16日占领平潭岛和南日岛，19日占领漳州，22日占领集美等厦门外围要点，厦门孤立。9月26日，第十兵团决定同时攻取金门、厦门。但至战役发起前发现，各军渡船不够，于是改变部署，首先攻取厦门。10月10日，第二十八军先行攻取大小嶝岛。15日，第三十一军及二十九军发起攻厦战斗，先以一部佯攻鼓浪屿，吸引敌军增援。登岛先头部队在敌军全力围攻下全部牺牲。调开敌军重兵后，解放军主力强攻厦门北半岛，16日拂晓，突破敌前沿阵地，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汤恩伯把已南调的部队北调反击，已经为时过晚。战斗至17日，解放军分别占领了厦门和鼓浪屿。汤恩伯乘军舰逃走。解放军漳厦战役歼敌五万余人。

国民党军于厦门失守后，全力增防金门。原驻金门第二十二兵团的兵力薄弱，即于10月上中旬调第十二兵团的第十八军增防。除第五

军防守小金门外，主力防守大金门。10月20日，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全部撤离潮汕，胡向蒋介石请求调运台湾，但蒋严令其前往金门。10月25日，该兵团第十九军船运到达，但登陆困难，行动缓慢。

解放军第十兵团以第二十八军为主攻部队，并配属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共七个团攻击金门，以第三十一军一个加强师攻击小金门岛。当时情报估计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决于24日夜发起攻击。由于船只不足，先以三个团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要待第一梯队船只返回后继续输送。25日凌晨1时后，分属三个师的三个团分别抢滩登陆，突破敌第一线防御。但登陆部队没有师级干部直前指挥，未能统一行动，登陆后也不懂得海陆作战的特点，没有巩固滩头阵地，即向纵深发展。结果，遭到纵深配备、机动使用的敌第十二兵团的猛烈反击。登陆部队的渡船因缺乏指挥，落潮后搁浅，为国民党海空军全部击毁。登陆部队兵力不足，处境危险，但第二梯队四个团因缺乏渡船，竟眼看着前方苦战，无法增援。经紧急动员船只后，26日仅输送了四个连的兵力增援，无济于事。至27日，战斗结束，解放军登陆部队7430余人全部损失。

解放军自渡江以来，国民党军望风披靡，第十兵团一路上顺利进军，不免产生了轻敌的情绪，以为可以不必经过严重战斗，即能攻克金门。加以从北方南下的部队，缺乏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而且，解放军尚无正式的海军舰艇投入战斗，也缺乏海上登陆作战的系统训练。高级将领忙于巩固新占城市，处理陌生而复杂的问题，忽略了战役的指挥。结果，导致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渡海登陆作战因为指挥混乱而失败 (148) 。

在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的同时，解放军第七兵团于7月间攻占宁海、象山，控制了浙江全省大陆。8月间，山东部队攻占了长山列岛，全部控制了渤海。

在中南地区，5月初，北平地区原国民党军的改编任务基本完成

后，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十三个军，百万之众，南下两湖、江西作战，目标是歼灭指挥灵活、作战顽强的桂系白崇禧所部。先头两个军于5月中旬渡江占领了武汉诸地。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命令第二野战军在江西丰城一线的陈赓兵团，归林彪、罗荣桓指挥，协力歼灭白崇禧主力。但第四野战军主力到达长江以北后，粮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不得不休整就粮，未能立即进兵[149]。

白崇禧撤退到长沙之后，仍积极部署抵抗。7月4日，他从长沙到常德，与宋希濂一起召开湘西善后会议，收编地方武装，组织地方抵抗解放军的进军。7月9日，又在长沙召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配合研讨会，至11日闭幕。他在会上提出三大公开，即意见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实行空室清野。会上制定了军政配合方案，划分绥靖区，实行总体战[150]。就在会议期间，解放军准备就绪，发起了进攻。

这时，中共中央军委为抑留白崇禧集团，曾命令第四兵团在赣江以东集结待命，不要过江，以便麻痹敌军，等待四野主力到达，协同作战。白崇禧部也一直滞留在湘赣边山地。6月下旬，驻守宜昌一线的国民党黄埔系的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命令所部进占当阳、荆门、远安，侦察敌情，抢运粮食。7月4日，林彪、邓子恢（四野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向军委报告，决心在东西两线同时发起湘赣边战役和宜沙战役，歼灭白崇禧和宋希濂两部，计划以先头部队迂回敌之突出部分，断其退路，但围而不攻，以麻痹其后方的敌军主力，然后我军各部自两侧向敌深后方迂回，完成包围后再组织攻击[151]。这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正同中共方面洽谈局部和平，毛泽东电令林彪、邓子恢等与程潜联络，争取实现和平。因此，此次军事行动，解放军不向长沙正面进攻。

7月9日，宋希濂部第二军自当阳北进，与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先头部队遭遇，战斗提前打响。十三兵团即下令各军迂回包围敌军，但宋希濂发现解放军主力南下后，即下令撤退，在宜昌外围依托既设阵地

进行抵抗。同时，他立即从常德赶到枝江，改乘军舰于15日赶回宜昌。这时，解放军正包围攻击宜昌、沙市、江陵，第一一二师突破江防，由古老背渡江，准备截断宜昌敌军退路。宋希濂鉴于态势严重，即命令部队向巴东、野三关一线转移，指挥所暂撤到三斗坪。解放军未能围歼敌军主力，7月18日即停止追击，乘胜向常德、松滋等地推进。

在东线，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先头军进击高安，然后以第十二兵团由通城经长寿街直插浏阳、万载，第四兵团渡赣江向宜春、万载以西前进，在高安、万载、伊春之线，三个强大兵团合击白崇禧主力。但当向高安挺进的第四十三军于8日到达九仙汤以南地区时，白崇禧部即发现了解放军的企图，于9日拂晓，从高安、奉新、上富镇南撤。解放军三个兵团即转入追击。7月13日，白崇禧命令在萍乡一线的所属部队连夜后撤至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解放军推进至浏阳、宜春即停止了追击。

鉴于林彪所部第四野战军主力南进，白崇禧于7月21日部署继续后撤，其指导原则为："本公署以巩固湘西、湘南，屏障粤北、川东两大门户，并诱歼犯匪于衡东湘赣山地之目的，即向湘东转移，缩短防线。"(152) 并决定于7月22日将指挥所自长沙移至衡阳。白崇禧对程潜不放心，也令长沙绥靖公署移至邵阳。7月21日，程潜在陈明仁的劝说下，从长沙前往邵阳，由陈明仁代理湖南省主席。程潜离开长沙后，白崇禧才感到放心，即于22日离开长沙，移驻衡阳。

当时，白崇禧以宋希濂部为其左翼屏障，曾电令宋部撤退方向为："应以有力之一部，撤守澧水南岸，与在石门整训之第一二二军，重新建立抵抗，拒匪沿沙（市）常（德）公路南犯，巩固湘西，并掩护华中主力军左侧背安全。主力则分别凭借武陵山、大巴山天险，构成重重抵抗，逐次拒匪西犯，以屏障川东门户，并适时侧击沿沙、常公路南犯之匪，期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153) 但宋希濂效忠蒋介石，拒绝接受白崇禧的指挥，逐步向四川边境转移，驻在恩

施。至8月初，国防部命令宋部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与白崇禧脱离了指挥关系[154]。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强大军力，在东西两路发起进攻，均未达到歼灭敌军主力的预定目的。毛泽东重新考虑对白崇禧的作战方针，并于7月16日指示第四、第二野战军前线将领说："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155]

这时正值盛夏季节，第四野战军各部自东北转战至江南，水土不服，疾病盛行。7月23日，林彪、邓子恢等向军委报告，部队已改为旅次行军和三伏休整，除各兵团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后撤外，主要是抢占地盘、调整部署。

就在这一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组成了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平江，与程潜代表刘纯正谈判。翌日，刘即赶回长沙，向从邵阳赶回长沙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汇报。在先，毛泽东于接到程潜关于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原则谋取局部和平的备忘录后，曾于7月4日复电程潜，表示："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156] 起义酝酿成熟，7月29日，程潜秘密从邵阳回到长沙，受毛泽东委托南来的程潜旧部李明灏也到长沙与程潜、陈明仁会晤。

为阻止程潜在长沙起义，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于7月30日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同意程潜辞去湖南省主席，专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以陈明仁任湖南省主席。翌日，即31日，又撤销了长沙绥靖公署，阎锡山并派黄杰、邓文仪持函于8月1日自广州到达长沙，劝阻程潜，并邀程潜赴广州，拟任其为考试院院长。但已无济于事。8月1日，程潜即向国共双方军政界发表个人声明，历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弃于民，呼吁道："当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积极和谈，则全国治安，固可立时恢复。如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幡然悔悟，立致祥和。"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告湖南将士书》，宣布脱离广州政府起义，翌日又发布通电："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157) 8月5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支持设立由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机构，并表示："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同庆。南望湘云，谨致祝贺。"(158) 同一天，程潜、陈明仁等再次联名发布通电，阐明宗旨，毛泽东、朱德于8月16日再次复电表示祝贺。(159)

程潜和陈明仁所能控制的本部军队很少，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所属各部在第十四军军长成刚、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锷、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等率领下，纷纷南逃。为控制局面，8月5日，解放军前锋部队迅即进入长沙，各部发起追击。第四十九军向宁乡、湘乡，第四十六军向衡阳，第四十八军向茶陵、攸县，第十八军向茶陵、安仁挺进。同一天，广州政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8日又重组第一兵团，由黄杰任兵团司令官。是日，黄到达芷江，设立湖南省政府。

在长沙起义、解放军重兵追击的严重形势下，白崇禧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以第一兵团、湘鄂赣边区绥署部队在邵阳、祁阳地区整

补，成立湘西绥靖司令部，后又组建第十七兵团，以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分别部署在衡阳以北、以东山地，阻击解放军南下。

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四六师在追击过程中于14日占领永丰（今双峰），15日轻敌深入青树坪地区，在界岭一线遭到白崇禧所部第四十六军一部的阻击，第一四六师仍图突进，结果受到白部第七军的反击，伤亡严重，入夜，突围而出。当时解放军主力正在休整，未再南进，仅在江西地区，以第四兵团第十八军先遣师向粤北大庾、南雄、始兴前进，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向赣州前进。8月16日，在敌后游击的解放军粤赣湘纵队的北进支队占领入粤的战略要地大庾，旋在新城和南进部队会师。至8月底，占领江西全境，为入粤作战开辟了道路。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宋希濂所部在湘西作战，作自己的西侧屏障，撤退至潮汕一带的胡琏兵团及从青岛撤至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至粤北作战，作自己的东侧屏障，以粤北、赣南、湘南、湘西组成一条防卫线。但蒋介石蓄意守卫海岛，要以刘安祺两个军的力量控制海南，使与台湾成犄角之势[160]。在西南则把重兵驻守川东、川北，以保守四川，听任桂系在湘南陷于孤立。大约7月间，蒋介石要到广州，因不能不应付粤桂方面的要求，他才密电调刘安祺部主力到广州，并告诉他："你不去，我不方便。"[161]但部队移动十分迟缓[162]。8月13日，白崇禧为组织反攻，曾主张调刘安祺兵团到耒阳作战。据《徐永昌日记》，当天在李宗仁主持的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认为："敌人深入，兵力分散，我邵衡间军心士气可用。所以拟抽衡阳以东几个师至永丰一带谋反攻敌人，且谓千载一时，决可打个胜仗，歼灭敌人一部。不过右翼后方实嫌空虚，拟调广州一带之三十九军及新由海南抽穗之刘安琪部到耒阳一带以为援应。国防部则为保广州若干时间之安全，只允调至英德、韶关间。"[163]

广州地区是传统上粤系和桂系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在事实上不愿以自己的力量替桂系作战。8月11日，蒋介石在台北对来谒的顾祝同

表示："不可将广州防卫撤空，以免政府根据地发生动摇；并以为此次广州改设卫戍总部与集中兵力乃为计之得者，切不可变更部署轻易放弃广州。"[164] 8月23日，蒋介石到广州，会商保卫广州战略。24日，他接见顾祝同、余汉谋等，"指示改正部署，切嘱勿将刘安祺所部北调，而使广州防卫空虚，任令犯匪长驱直入。盖国防部前为保卫广州，曾令电刘安祺所部至广州担任守备，而李宗仁等竟欲令调该部至广东省境以外作战，置政府所在地之广州安危于不顾"[165]。事实上，白崇禧的部署本是为了积极防卫，但蒋介石不愿与桂系积极合作。8月24日，蒋介石又从广州飞到重庆。

鉴于解放军屯兵不进、处于休整状态，8月中旬，广州国民党政府根据白崇禧的主张部署反攻。据宋希濂回忆："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166] 8月20日，白崇禧部第三兵团由永丰（双峰）北进，第一兵团向新化、湘乡攻击。但宋希濂仅派小部队出击试探，白崇禧孤掌难鸣，不得不撤回原阵地。9月初，白崇禧鉴于解放军调动频繁，即将南进，即部署抵抗，于9月10日制定作战方针为："本署以诱歼衡阳以东匪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企图诱匪于衡（阳）郴地区包围歼灭之。"[167] 但蒋介石并不支持白崇禧积极作战的方针，9月8日，他从重庆致电顾祝同叮嘱说："（一）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战略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则可扩充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此乃兵力使然，只可如此，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放弃京沪重地，以致守江部队几乎整个被歼之覆辙。（二）现驻粤中第五十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三军、第一〇九军之建制，切勿分割使用，处处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应照此最高指导原则实施，勿再举棋不定，俾得确保革命基地，希以此意转达余汉谋长官为要。"[168] 广州政府方面，当时有以广州部队向广西

撤退，与白崇禧部会合的考虑。这时，解放军已准备大举南进了。

为准备进军并接管广东，中共中央新组建了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自北平到达赣州后，即于9月7日召集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负责人，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等举行作战会议，决定各部必须于10月底在预定地域完成集结，准备分兵两路进攻广东。叶剑英部署既定，毛泽东即于9月上中旬之际，分别指示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将领歼灭白崇禧所部及进军西南的部署。毛泽东令陈赓指挥本部三个军、四野邓华部二个军，自赣南进击，占领广州后，由陈赓率本部三个军进入广西作战，续后向云南挺进。四野以主力五个军沿湘桂铁路南进，与陈赓部南北配合，迫使白崇禧最后不得不进行决战。其中，四野主力以第十三兵团率二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以四野十二兵团率三个军经湘潭、湘乡进攻宝庆（邵阳），与第十三兵团呼应，待白崇禧部南撤时跟进。在正面仅派队监视衡阳白崇禧部。然后上述三路八个军先在广西站稳脚跟，再寻白崇禧部主力决战，予以歼灭。第二野战军二个兵团于10月间在湘西集结，然后向川、黔进军，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孤立重庆及川东的孙震、宋希濂所部，然后东向进占重庆。第四兵团于完成广西作战任务后，继续西进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并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169)]。二野在华中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

9月13日，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三十九军由常德、桃源地区出发，先期行动，向柳州方向挺进，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战力薄弱，被击破后退入贵州。至10月2日，第十三兵团推进至芷江一线，5日占领会同，兵逼靖远，切断了白崇禧部和宋希濂部的联络和白部入黔的道路。当西路第十三兵团到达芷江之线时，萧劲光率领的中路第十二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等三个军向青树坪、永丰、白果市攻击前进。陈赓率领的东路两个兵团分三路向广东境内

挺进，兵逼韶关。中路军突破皂角坳阵地，迫敌第一兵团退守界岭、巨口铺等地，解放军前锋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向灵官殿地区突进。同时，解放军在衡阳正面以第四十六军及二野在湘的第十八军进行牵制。

正当解放军大举挺进之际，白崇禧在广州还在主张反攻。在10月2日有蒋介石、李宗仁出席的非常委员会军事小组会议上，白崇禧报告军事，大意为："总之，我军兵力优于敌人，且颇集结。敌人则分散。惜湘西宋希濂部不听调遣，粤北刘安琪部北上迟缓。要求蒋先生暂不离穗，督促宋希濂部出击，刘安琪部速北上，并拟撤曲江一带华中军，北出夹击湘乡，可以在此打一胜仗。然后南下侧击南雄西南犯之匪，俾由被动转为主动，否则处处待敌优势兵力来攻，岂非坐以待毙。"(170) 但蒋介石既不合作，时机也已丧失。白崇禧发现解放军南进后，即调位于后方乐昌、仁化的第四十六军、耒阳的第四十八军一部向衡阳附近集结。10月5日，又命令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指挥上述两部向江伯堰推进，准备协同第七军夹击渣江方面的解放军。是日，林彪发现白崇禧部并未撤退，反而向前推进，有与解放军决战模样，即命令中路军主力在现地停止待命，如遇敌进攻，即诱敌深入。命令西路军停止前进，由芷江、会同折向宝庆、祁阳间前进，令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向耒阳、常宁西进，准备在衡宝地区寻敌决战。但第一三五师在突进中没有接到命令，继续挺进，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围攻，陷入苦战。

10月6日，白崇禧研究敌情，发现解放军大迂回的形势已成，后路危险，即于黄昏时分命令撤退。7日，林彪发现白崇禧撤退，即命令第十二兵团发起追击，命令第一三五师坚决阻击敌军南逃。白崇禧以向渣江攻击的第七军指挥本部第一七一、一七二师及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一七六师为后卫部队，该部分两路纵队，以军长李本一率一七二、一三八师为右纵队，以副军长凌云上率一七一、一七六师为左纵队，分别经黄土铺、祁阳向广西境内撤退。但沿途高山峻岭，道路

狭窄，行军速度很慢，行军序列拉得很长，态势不利。解放军第一三五师在敌后的阻击，有效地迟滞了敌军行动。至10月9日，李本一所率四个师在祁阳北的白地市、黄土铺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包围。10日，解放军集中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军，以4个军的强大兵力发起总攻。战斗至11日，除李本一及第一三八师一部逃脱外，白崇禧部战力坚强的主力四个师二万多人被歼灭。衡宝战役，解放军共歼敌4.7万人，白崇禧部的战斗力受到沉重打击[171]。

林彪指挥中路军包围了白崇禧部主力四个师后，态势十分有利，他于10月10日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攻占广东，以免敌向广西撤退，造成敌之兵力集中和我之兵力分散，建议陈赓兵团由现地（英德、韶关）沿公路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部。他认为“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172]。当时，白崇禧部有回头北援其被围的四个师的模样，正好陷入解放军大包围之线。因此，林彪同时命令第四兵团停止待命。中央军委同意林彪的意见，以第四兵团西进，并指示第十五兵团等部相机夺取广州。

叶剑英和东路各将领，鉴于各部已与敌军激战中，前出很远，敌已增兵守备广州，且有调胡琏部参战模样，而第四兵团远赴桂柳，较之第十八军、四十六军及第十三兵团还远，时间上赶不及，有两头落空的危险。所以，建议以四兵团直下三水，攻取广州后由水路运输，经梧州直取南宁。12日，中央军委同意陈、邓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但指示以一部兵力直出广州、梧州间，断敌向广西的退路，如敌向广西逃跑，陈赓兵团即跟踪入桂。这时，白崇禧坐视被围部队被歼灭而不救，11日，战斗结束。林彪原来的设想已与战场形势不符，即根据前敌将领意见和敌情的变化，在接到军委指示之前，先期于11日下午和夜间连续两电命令第四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173]。

广东方面，国民党军于8月底成立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以余汉谋为长官，当解放军推进时，以第四、第二十一兵团共六个军，沿粤汉路韶关至广州间布防，企图“集中兵力，确保广州”[174]。以第十二

兵团二个军位于潮安、汕头，以第三十二、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位于湛江、海南岛。国民党军在粤北兵力薄弱，解放军第四兵团于10月7日占领韶关，第十五兵团进占翁源一线，向英德、佛冈挺进。10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三军残部不支后撤。11日，广州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广州，逃往重庆。13日，各部队开始撤退。第二十一兵团逐次由新会、高明附近向雷州半岛撤退，第四兵团经高要、罗定向湛江撤退。第一〇九军等部经珠江口由海上撤退。至14日下午炸毁海珠铁桥后，全部撤离市区。续后，第十二兵团未经参与广州战役，即从海上撤至金门。

10月14日，解放军右路第四兵团和中路第十五兵团进占清远、花县、从化、增城，左路两广纵队并指挥粤赣湘边纵队及粤桂边纵队逼近博罗，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广州。是日晚，第十五兵团前锋进入广州。第四兵团立即转入追击，15日占领三水，迫敌一个师投降，另部占领佛山，16日占领四会，17日占领高要，各歼敌一部。17日，中央军委指示第四兵团乘胜追击。第四兵团即分三路进行长距离追击作战。20日，发现敌第二十一兵团等部尚滞留在开平、恩平地区，解放军第四兵团即动员各部不顾一切进行追击，严令右路截断敌西逃之路。至23日晚，将敌第二十一兵团等部包围在阳江、阳春地区，25日发起总攻，至26日将被包围之敌歼灭。刘安祺率残部在海军支援下突围抵达海陵岛。至月底，广东省除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外，全部解放。解放军广东战役共歼敌6.2万余人[175]。

四　广州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纷争

李宗仁到达广州之后，广州国民党党政军方面决心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军。立法院于5月13日院会上通过决议，支持政府对中共继续作战到底。是日，还通过了白大诚等四十九名委员的临时紧急动议，向宋子文、孔祥熙及张嘉璈三氏征借10亿美金，藉以挽救危机，半作军费，半作整理金融基金[176]。当然，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三氏似

也无此巨大财力。张嘉璈于5月18日即致函行政院，声明他一生服务社会，“皆系担任以薪金为收入之职务，并以提倡奉公守法、确立会计出纳材料工程等管理制度为任务，从未自营任何产业。除中国银行离职时，董事会给予退职金十六万元，作子女教养费外，并无任何私人财产”[177]。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议决，请政府通令全国，如再有倡议“和平”、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叛逆，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178]。当时，广州方面国民党中，对于李宗仁到广州后的政治态度，“多数人不同情其最近文告，以为仍将受共党欺骗而先摇了人心。尤其军事受害特大”[179]。于是，李宗仁于5月21日再次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在此，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全国同胞，从今天以后，我所领导的政府，对于抵抗这个暴力的压迫（指解放军的进攻——引者），具有坚强的决心，虽至一兵一卒亦决不放弃我们的责任；同时并要排除任何阻力，来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革新，务必使政府一切措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要求，以期严整政府阵营，充实政府力量，来从事于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反共战争。”[180]

然而，尽管蒋介石作了承诺，但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指挥，李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拥蒋的势力依然是李宗仁所无法对付的。5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5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定阎锡山、吴铁城、李文范、吴忠信、白崇禧、王宠惠、陈济棠等七人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加强团结计划，必要时赴台湾晋谒蒋介石[181]。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听命于蒋介石，引起白崇禧的不满。李宗仁要行政院长何应钦免去顾祝同的参谋总长职务，由白崇禧继任。何应钦两头为难，表示要辞去行政院长。广州国民党政府内一片混乱。

5月17日，阎锡山和朱家骅、陈济棠一起去会晤李宗仁，询问李宗仁致蒋介石函是否已经起草完毕，以便去和蒋介石商讨。据徐永昌

记载："（阎锡山转述）见面之场合，渠（指李宗仁——引者）发牢骚中有西南各军需现款一百五十万元，而财部发不出。要何敬之免顾职（易以健生，华中总司令由李鹤林接，顾转西北长官）而迟迟不见发表。此何意也。阎先生以为，先与蒋晤或能说的通。李谓不通即走。言下愤愤。陈朱提倡走时，阎先生仍要早写函而出。按：（系徐永昌按语——引者）李到穗第二次会时，即有提议首须团结白健生，建议李蒋晤面，吴礼卿加实其需要，阎先生促成之。遂推阎朱（骝先）陈（伯南）先晤蒋，规定见面地点，并携李函前往。因李自动述出不但中国反共，并且要提倡亚洲其他国家联合反共，云云。阎先生即乘之，以为用此意拟之函中致蒋，蒋无不赞同一致。李当时亦乐，允即办者。并闻李左右策士，劝李要蒋先办到前此所许各节，否则不要见面。又吴礼卿坚不参加该项运动，所谓二陈派亦不希望李蒋见面。李德邻亦云共党即要我们两分。云云。此日来政局暗潮也。"(182)

当时，蒋介石于5月17日自舟山飞临澎湖马公，据蒋经国说："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也。"(183) 其实，蒋介石一刻也不愿也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25日抵台湾高雄，继续干预军政事宜，当日并派蒋经国飞往上海，对汤恩伯传达自己的意旨及处理物资疏运事宜。只是汤恩伯部已经抵抗不了，被迫撤退，蒋经国才未能在上海降落(184)。

5月26日，于右任、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携李宗仁函飞赴台湾，会晤蒋介石，调解蒋李矛盾。27日，蒋介石自高雄到台南，与于右任等相见。晤谈之后，蒋介石对李宗仁来函并不满意，不愿和解，即以"不再闻问政治之决心"加以搪塞(185)。当时会见情况，据徐永昌记阎锡山所述："先出党的决议案（即前之第三案）并展转出李德邻书（一、简化政府，二、整顿金融，三、核实军额，四、何敬之辞或请问何人继之，五、政府迁何地）。蒋先生初置各函

件不之阅，继经解释乃阅。阅竟谓都好。更询第四人事问题谓：我已引退，决不管。中间曾因吴铁城之解劝，乃答以申斥之语意，又因朱骝先之申述，乃竟责至其教育办到如斯之不堪。云云。末以将有亲笔信李代总统而作结束。渠等五人尚拟作再度晤谈，而下午蒋已他飞。渠等乃于今下午归。阎先生并述陈辞修单独转达蒋意，请阎早去台，又蒋先生曾说到渠实无面到外国去。”(186)

蒋李矛盾难以调和，何应钦内阁于5月31日总辞职，李宗仁提名没有政治实力的居正为行政院长。但立法院投票时，因CC派的反对，未获通过。当天，发票303张，同意票151张，不同意票143张，仅差一票，未超过出席委员之半数，遭到否决。桂系在政治上能力薄弱，投票之前，对立法院的状况掉以轻心，致以一票之差失败，李宗仁的威信也由此受到打击。当时，阎锡山在蒋、李之间，处于居间调解的地位，大部分立法委员瞩意阎锡山。6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推举阎锡山为行政院长，李宗仁屈服于CC的压力，于3日向立法院提名，以254票同意对56票不同意，绝对多数通过。从此，蒋介石就通过阎锡山来贯彻自己的意图，以制约李宗仁。

这时，阎锡山因私事到了台北，6月4日前往高雄晤蒋，蒋尽力对阎施加影响。据徐永昌记述阎锡山所述：“在高雄晤蒋先生，对渠组阁颇乐观，财政拟以全部作两年准备。去时李提拟以邱昌渭长外交，蒋不可（恐其乱更换驻外大使，设驻在国不表欢迎，延宕三个月，则国家损失太大矣），要阎自兼。对国防部要余担任。询以何敬之，谓亦可。且云不可令白到国防部。”(187) 蒋又向阎提交了他所拟的非常委员会名单。阎锡山回广州后，李宗仁提名要白崇禧任国防部长，而何应钦畏难，坚决不就国防部长之任，最后蒋介石电示阎锡山，不得已时由阎自兼。

李宗仁对阎锡山亲蒋的态度有所不满，曾约见徐永昌，认为阎被CC派所包围。他对徐出示甘介侯从美国来的电报，大意说：“已晤杜鲁门总统，谈及胡适、顾维钧皆拥蒋之人。蒋在主持中国军政，无望

美援来华。”李又告诉徐，美国公使克拉克日前在桂林对自己说：“何不令蒋先生出国，与令CC脱离现政府，以新美国人民耳目。不然，李代总统无能为也。”[188] 而CC派也因否决居正、通过阎阁，向阎邀功，谋取部长席位。11日，李宗仁仍反对阎锡山兼国防，要白崇禧专任，并拟就电稿给蒋介石，要蒋同意。然而阎锡山表示：“如不发表兼国防时，其府令送稿副署时，当将阁命一并送回。该电则决不发。明日将亲送回，劝其从新考虑。”12日，阎锡山会晤李宗仁时，李表示要将这一电文“公布天下而去”，阎答应就此事进行疏通，兼职时间“当然愈短愈好”[189]。这样，阎锡山内阁才勉强组成，6月13日，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兼外交部长，不久电请胡适担任，胡虽一度答应，但终未到任，由叶公超代理。阎在就职典礼上声称：“锡山此次承代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于国家危难时期，组织战时内阁，国计民生，万端待理，惟当前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190]

李宗仁实力不足，无法摆脱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控制，不能不谋求蒋介石的合作和支持。阎内阁组成后，李宗仁、阎锡山于6月16日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命驾莅穗，使仁等得以就近联络一切”。《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说：“李宗仁对内对外，皆束手无策，故不得不要求公莅穗，就近指导，以挽救当前危局也。”[191] 这也许就是当年蒋介石对李宗仁处境的一种估计吧。区区桂系的实力和人望，难以在国民党的残局中摆脱蒋介石的影响，达到美国人所期望的效果。

但是，蒋介石还不愿意马上去广州，他还要看一看桂系到底有多大的能耐。6月18日，他对吴忠信表示：短期内可以赴穗，但必待台湾军事检讨会议与处理防务完毕，始再定行期[192]。同日，徐永昌到高雄见蒋，“（蒋）复询李白是否尚能回至合作，答以健生或能。渠似不谓然……询对渠赴穗有何意见。答以不如且缓。缘磨擦之局，既无法消弭，不如待李阎磨擦至无可开脱时再往，岂不多延宕破裂之时间”[193]。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残部实际上是分裂的，台湾是蒋介石

完全控制的地盘，号称引退、不管政务的蒋介石，对台湾事务巨细必问，代总统李宗仁是一根针也插不进去的。至于大陆的烂摊子，以李宗仁的实力，只在两广可以发挥作用，也折腾不出什么名堂，蒋介石控制着财权和黄埔系的兵权，仍然可以牵着桂系的鼻子走，尽可让李宗仁在名义上再顶一阵子。

当时，蒋介石着意经营台湾，黄金外币运台后，蒋介石控制着这笔财产，稳定台湾的经费就有了着落。尽管李宗仁曾“出一清单，谓政府尚有四亿资金”[194]，但广州国民党政府无权自由动用这笔钱来应付大陆的军政支出。6月15日，台湾省政府宣布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由中央划拨经费来源，抵付在台军公垫款，并将进出口贸易之外汇管理，交由台湾省统筹调度，同时拨付黄金80万两，以为改革币制基金，另拨借美金1000万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资金。当时，国际上有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谣传。蒋介石决心坚持下述主张和立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匪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与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与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195]

在大陆，蒋介石利用阎锡山来制约李宗仁，李宗仁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吴忠信、袁守谦面见阎锡山时，转达了蒋介石的关照，吴说：“总裁说：阎先生为我们保持生命线，我们要全力支持。”所谓生命线，即由阎锡山消弭与代总统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袁守谦说，“总裁命令黄埔军官一致服从我（阎锡山——引者）的命令，以支持我主持的战时内阁的一切措施”[196]。于是，蒋介石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为重登前台作准备。6月22日，他向吴忠信表示，将于下月初到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巡视重庆等地。24日，他从高雄到达台北，定居阳明山，建立他的指挥中心。同日，他通知在广州的国民党

的秘书长郑彦棻，定于7月1日起设置总裁办公室。他以强化党权的方式，来强化他对政局的操纵。在这个办公室下面设立设计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文化宣传等六个组。7月4日，蒋介石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坦然以最高领袖自居："自孙总理逝世以后，余即继其为领导国民革命之领袖，早已献身于国民革命，以谋中国人民之自由与国家独立。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之地位，自将继续完成此一付托之重任……故余个人之地位，决不在于政治上职权与名义之有无，而对于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则始终不容放弃。"(197)

7月14日，蒋介石于访问菲律宾回国后即赴广州，翌日与李宗仁会晤，然而两人隔阂很深，谈话不得要领而散。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政治委员会职权。4月22日蒋、李杭州会议时的拟议得以落实，蒋介石也就名正言顺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重新公开出来指挥全局。李宗仁在政局中的分量也就越来越轻了。

当时，桂系刻意经营两广，白崇禧认为广西部队必须入粤保卫两广，因此，急切要求重掌国防部，以便调动兵力，进行部署。7月3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到广州向李宗仁陈述。蒋介石到广州时，李宗仁又提出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的问题以及保卫广东问题，与蒋商量。当时两广将领希望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后，把沿海主力兵团如胡琏、刘安祺兵团等部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他们不赞成蒋介石把兵力部署在沿海某些据点，忽视广东的保卫。但蒋介石只是答应考虑。

这时候，解放军夏季休整，国民党方面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李宗仁到各防地出巡，决定到台北再与蒋介石商量悬而未决的问题。7月27日到达台北时，受到陈诚安排的热烈欢迎，蒋介石、蒋经国也到机场迎接。在台与蒋介石前后长谈五次。据程思远回忆，"李重新提

出以白崇禧长国防和集中兵力保卫广东问题。蒋对白长国防部，借口胡宗南、宋希濂反对，谓目前不能有此任命。对保卫广东，说是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198]。李宗仁一无所获，于30日回到广州。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蒋介石获得有关消息后，曾企图阻止白皮书的发表，但一直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参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打电报给蒋介石，认为这样的请求书，会给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印象带来不良的影响，它“会被解释为一种认罪书”[199]。蒋介石和广州国民党政府只能对白皮书低调处理，而不敢加以驳辩。李宗仁则似乎增加了获得美援的希望。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说：“白皮书即时产生的一种结果，便是使李代总统更公然反对蒋总统。李氏的一个亲信顾问甘介侯……现在他劝告李氏说，美国政府‘不拟援助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李氏认为自己可以获得美援，于是对许多有关政策的问题，大胆与蒋总统争持。李氏与蒋总统对防卫的战略，不久便显然分歧。蒋总统认为在锐减中的政府军队，应集中防卫几个要点，如广州、海南岛及台湾。他很怕国军力量因散布于宽广的阵线而趋于稀薄。但李氏亟欲采取较大胆的途径，欲在湖南与江西坚守据点，促请把现在台湾的空军与孙立人所训练的新军移调至衡阳地区。后来，蒋总统的意见占优势，台湾的防务也就没有削弱。”[200]

到9月间，桂系对于国防部长一职等得不耐烦了，阎锡山并未兑现他的诺言。李宗仁托邹鲁向阎锡山传话：“请阎院长辞国防部长兼职，并以白健生接替。”但阎锡山表示强硬：“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201] 对此，徐永昌批评说：“余于国防部事，以为如不能核实军队，提高待遇，进有功，去不才，仅为蒋先生便利而兼之，必不为人所原谅。盖国事败坏至今，十之九因军事。若依然过去之军事，则势不至败坏完尽不止。所以若决心不辞职，必须立即做应做的事。渠对李之相迫，少自责而多尤

人，余颇不能平。”[202] 当时，蒋阎方面认为，白崇禧如就任国防部长，必至免胡宗南，免汤恩伯，甚至免陈诚，蒋介石“如抗不令交代，竟下令通缉蒋，以争取正统，皆能做到”[203]。尤其是胡琏兵团从江西败退广东后，被调到潮汕一带，引起粤、桂方面对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强烈不满，认为“胡氏一走，就是政府不保卫广州”。余汉谋也因指挥不动中央系的三个兵团，即刘安祺兵团、胡琏兵团、沈发藻兵团，而迟迟不肯就任华南军政长官的职务[204]。军事指挥权问题，实际上是国防部长一职纷争的关键。

广州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百无聊赖，竟于9月2日发出通缉令，通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九名中共军政领导人。阎锡山只是空话连篇，在广州残局中声望日益下降，桂系和立法院中正在酝酿倒阎风潮。阎正在设法应付，恋栈不去。徐永昌劝其趁机卸职，以免溃灭的责任，但阎不听，大言要“人定胜天”[205]。

8月23日，蒋介石从台北到达广州，事先并未通知，仅蒋经国前往迎接，开始了他对西南地区的巡视，部署抵抗解放军的进军。24日到达重庆，他在书面谈话中声言：“今日重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206] 侥幸地希图重庆发挥抗战时期的那种作用。他在重庆连日分批接见西南地区军政人员，安抚四川方面的地方领袖。29日，他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仅云南省主席卢汉未至。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207]。“以保卫四川为核心”[208]，“决定拒×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区”[209]。当时，胡宗南主张在西南的国民党各将领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心里明白，四川的战略价值已经很有限了。

当时，被蒋介石用阴谋赶出云南的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和中共方面，都在策动云南省主席卢汉反蒋起义。在龙云主政期间，民盟在云南十分活跃，中共对云南各界也有很大影响，中共的游击武装也有很可观的力量。卢汉一时难下决心。蒋介石到重庆后，于9月1日召见卢汉的代表朱丽东，要卢汉到重庆商谈。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主张以鲁道源任云南省主席，免去卢汉职务。蒋介石认为："吾人本欲以滇省做剿共基地、政府后路，彼（指卢汉——引者）若据滇西以扰我，是仍不能作基地与后路也。"[210] 他一面让徐永昌去广州，向李宗仁、阎锡山建议广州政府方面用怀柔方法安定滇局，一面命令李弥率部回滇，监视卢汉。卢汉犹豫再三，于9月6日冒险前往重庆。蒋介石尽量安抚卢汉，要他肃清内部，并要他立即行动。9月8日，卢汉从重庆返回昆明，保密局长毛人凤随后即率领大批特务到达昆明，于9日夜进行大搜捕，时称"九九整肃"。反蒋的军事学家、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闻变先期出走香港，9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卢汉一方面镇压反蒋活动，一方面又保护一批反蒋的人，并继续和中共联络。蒋介石于9月12日从重庆前往成都，对四川地方势力进行安抚，活动五天后于17日回到重庆。21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拿了自己的亲笔信先行去昆明见卢汉，翌日，蒋亲自偕张群、萧毅肃等飞抵昆明，与卢汉面谈，力图笼络卢汉。但蒋介石不敢久留，当天即离昆明前往广州。

蒋介石这次在广州多住了几天，对白崇禧多方笼络。他建议于非常委员会中设立军事委员会，使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及白崇禧都可以参加。他答应等华中战事结束，再提议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211]。据说，蒋且答应白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所部交白崇禧指挥[212]。但白崇禧没有答应蒋介石的方案，当时薛岳正在活动两广联合倒蒋。白崇禧因李宗仁魄力不足，连他出任国防部长一职都解决不了，渐渐生出离异之心。

国民党残部失守福州之后，蒋介石私自令国防部任命汤恩伯为福

州绥靖公署主任，但李宗仁认为，汤恩伯失守京沪，应受处分，且蒋介石无权任命将领，因而拒绝签署任命令。10月2日，蒋介石接到汤恩伯来的电报："李宗仁发表公开反对行政院任其为福州绥靖主任之声明，使彼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决战，决自今日离职远行。"[213] 汤以一走相要挟。而蒋介石则替他吹嘘说："厦防已布置妥当，如再能将胡琏部某军加上，相信防守三年无虞。"[214] 当时，白崇禧还斗志旺盛，准备在湘乡打一胜仗，当面要求蒋介石留在广州，督促宋希濂部出击，刘安祺部尽速北上。但蒋没有同意，答复说："汤恩伯这个东西那里，非得我去一趟不可。"李宗仁说："他能不守纪律？"蒋以叹息的声调说："现在只好多用情感……明早即去厦转台，很快的反【返】来。"[215] 事实上，蒋介石先派了谷正纲去安慰汤恩伯，正当解放军大举南进之际，他于10月3日飞回了台北，迟至10月7日上午才乘军舰到达厦门巡视，召集驻军官长训话，要他们"在汤将军领导之下，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组训民众，加强战力，确保金厦，来奠定反攻胜利的基础"[216]。当晚即离开厦门回台湾。10月11日，他又到定海巡视。显然，广州是蒋介石的反对派，即桂系和粤系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广州的防卫问题并不是蒋介石关心的焦点。

解放军向两广挺进，李宗仁无法维持残局，又派吴忠信去台北询问蒋介石，或者直接出来以总统身份负责，或者交出款项来。蒋答应予以考虑。徐永昌估计："余以为必无结果。盖出山恐美援因之不来。亦不放手财权。"[217] 10月8日，洪兰友致电蒋介石："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顾祝同也有电建议："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218] 蒋介石系统趁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灭之机，希望蒋介石尽早复出。

广州对于国民党政府残部早已不是久留之地。5月16日，国防部已决定迁往重庆。19日，行政院也决定迁重庆[219]。但一时局势和缓，没有行动。8月1日起，广州国民党政府开始部分迁往重庆，国防

部分渝、穗两地办公。8月13日，中央机关在渝办公布置委员会主任马国琳对记者声称："中央分地办公的决策，表示有保卫重庆及四川乃至整个西南之决心，政府稳定，必能获得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220] 10月11日，解放军已兵临广州城下，李宗仁于12日零时发布总统令，宣布"中央政府定于本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所有保卫广州之军政事宜，着由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负责统一指挥"[221]。阎锡山则早早地于11日离开广州，飞到台北。据说是去向蒋介石要钱，因七八月军费未发清，9月、10月军政费没有着落。但当时蒋介石到定海视察去了，不在台北。阎锡山直到14日才见到蒋介石，结果要到黄金40万两，但被东南军政长官部就地要去了12.5万两，其余从台北带到了重庆。这点钱只能开放军政费到本月13日[222]。13日，李宗仁撤离广州，飞往桂林，其他行政长官直接飞往重庆。14日，李宗仁从桂林飞抵重庆，阎锡山则在台北滞留至15日才直飞重庆。

---

(1)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3页。

(2) 《郭汝瑰回忆录》，第352页。

(3)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2页。

(4) 参张秉均编著：《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第81—82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12月31日版。

(5) 参前引侯镜如文，及《郭汝瑰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

(6) 参张秉均编著：《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第82页。

(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3月18日条。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

第628页，1949年10月版。

(9) 梁佐华等：《解放前夕“京沪暴动案”亲历记》，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王葆真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页。

(10) 金洵、刘盛容：《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11) 刘瑞年、陈欢敏：《江宁起义》，《百万国民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第701页。

(12) 《半生风雨录》，第165—223页。

(13) 《中央军委关于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致总前委电》（194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页。

(14)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致华东局等电》（1949年2月3日），《渡江战役》，第59-60页。

(15) 《邓小平、陈毅关于部队于三月初向南行动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2月4日），《渡江战役》，第63页。

(16) 《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在整训中的任务致邓小平、陈毅等电》（1949年2月8日），《渡江战役》，第64页。

(17) 《总前委关于渡江作战问题的讨论情况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2月9日），《渡江战役》，第66—68页。

(18) 《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诸问题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渡江战役》，第72页。

(19) 《中央军委关于四野先出两个军钳制白崇禧部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渡江战役》，第74页。

(20)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两浦夺取江北敌据点致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等电》（1949年3月19日），《渡江战役》，第94页。

(21)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关于推迟两天渡江等问题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3月26日），《渡江战役》，第102页。

(22)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关于推迟两天渡江等问题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3月26日），《渡江战役》，第109页。

(23)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3月30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2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4-475页。

(25) 参《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7页。

(26) 《总前委关于推迟渡江的不利因素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4月10日），《渡江战役》，第155页。

(27) 《中央军委关于推迟一星期渡江等问题致总前委等电》及又一电（1949年4月11日），《渡江战役》，第156-158页。

(28) 《中央军委关于推迟一星期渡江等问题致总前委等电》及又一电（1949年4月11日），《渡江战役》，第156-158页。

(29) 《中央军委关于准备二十日确实攻占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敌据点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15日），《渡江战役》，第170页。

(30) 《总前委关于建议从速渡江及渡江后的部署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4月17日），《渡江战役》，第174页。

(31) 《中央军委给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第二野战军电》（1949年4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32) 《总前委关于江北敌据点兵力分布情形及对敌作战意见呈中央军委电》（1949年4月15日），《渡江战役》，第89页（档案出版社本）。

(33) 《中央军委同意渡江作战部署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18日），《渡江战役》，第181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6-1388页。

(35) 参陈锐霆：《大江炮兵显神威》，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渡江战役》，第767-78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6)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

(37) 粟裕：《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渡江战役》，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8) 《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2-563页。

(39) 《关于第四野战军应提早渡江及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1949年5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80页。

(40) 《林彪、萧克关于提早渡江致萧劲光、陈伯钧等电》（1949年5月

10日），《渡江战役》，第278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33页。

(4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69页。

(43) 《司徒雷登日记》，第58页。

(44) 《司徒雷登日记》，第59页。

(45)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1日。

(4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1日。

(47)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7页。

(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

(4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7页。

(5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

(51)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3日。

(52)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但未说明以什么名义发布，我们未查到报纸刊布文电。——笔者。

(53)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9页。

(54) 程思远、张丰胄：《邵力子、章士钊先生力促国共和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55)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9页。

(5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2日。

(57) 转引自《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949年4月24日），《渡江战役》，第21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5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87页。

(59)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949年4月24日），《渡江战役》，第21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60)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47页。

(61)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9页。

(6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48页。

(6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7日条。

(64)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8日。

(65)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3页。

(66)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6日。

(67)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日。

(68)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976页。

(69) 《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本，《戡乱时期（蒋总统引退与后方布置）》上二，台北“国史馆”藏，第337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所载有所不同，《徐永昌日记》5月3日记则有：“请蒋先生即出而指挥作战，渠即出国办理国民外交”，“不要成立所谓最高决策委员会”。

(70)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0页。

(71)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309页。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6日条；《风雨中的宁静》，第190—192页。

(73) 《风雨中的宁静》，第198页。

(74)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6日。

(7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1页。

(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9日。

(77) 《李宗仁回忆录》，第966页。

(7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04页。

(79)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1949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战役》，学林出版社（上海）1989年版，第440页。

(8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12页。

(8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97页。按：第一二三军撤退比较主动，似应保有更多的部队。存疑待考。——笔者。

(82) 《总前委关于推迟进占沪杭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4月30日），《渡江战役》，第24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3) 《中央军委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致总前委电》（1949年5月3日），《渡江战役》，第260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4)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7日。

(85) 《叶飞回忆录》，第5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按：据王致冰等考证，叶飞回忆有误，第一线部队距吴淞口约50-70公里，但当时存有轻敌情绪，当系事实（参《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90年第2期）。——笔者。

(86) 《粟裕、张震关于攻占川沙、高桥、宝山、吴淞的部署致第九、第十兵团首长等电》，《渡江战役》，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7) 《粟裕、张震关于攻占川沙、高桥、宝山、吴淞的部署致第九、第十兵团首长等电》，《渡江战役》，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8) 《总前委关于攻沪作战应作充分准备不要性急致粟裕、张震、唐亮、钟期光等电》（1949年5月15日），《渡江战役》，第295页。

(89) 《粟裕、张震关于对沪全面攻击的部署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5月18日），《渡江战役》，第301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90) 《中央军委关于接收准备已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致粟裕、张震等电》（1949年5月20日），《渡江战役》，第304页。

(9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41页。

(92) 汤恩伯部撤退人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台北版《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则为7.9万多人。

(9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253页。按：据《解放太原》一书，一说为9.9万（28页），一说为11万（36页），显系部队太杂，统计上自然有所不同（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中央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89年4月版）。

(9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

(95) 部队人数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

(96) 《华北一兵团攻取太原作战方案报告》（1948年9月28日），《解放太原》，第29页。

(9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773页。

(9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6日。

(9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1日。

(100) 《东北主力是否早日入关为好》（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

(101) 《推迟攻取太原》（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8页。

(102) 兵力比参见《解放太原》第90页，又参《历史的回顾》。

(103) 《徐向前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年3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26页注（2）。

(104)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军委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解放太原》，第12页。

(10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01页。

(10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30日。

(107) 《防止敌袭扰我后方的部署》（1949年2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1页。

(108)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页。

(109) 《预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对策和部署》（1949年5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卷，第600-601页。

(110) 引自《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77页；系转述，并非原文。——笔者。

(111) 转引自《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页。

(112) 转引自《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页。

(113)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页。

(114)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592页。

(115) 《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2页。

(116) 李振西：《国民党军扶郿战役的溃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720页。

(117) 《徐永昌日记》1949年7月18日。

(118) 参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19)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5日。

(120)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4-656页。

(121) 《毛泽东关于解决宁夏马鸿逵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949年9月4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99页；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284页。

(122) 《徐永昌日记》1949年3月6日、24日、26日。

(123)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261页。

(124)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

(125)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4页。

(126) 《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2日），《戎马春秋》，第290—293页。

(127) 《戎马春秋》，第288页。

(128)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129) 《毛泽东关于向新疆进军和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新疆军政委员会及新陕甘青省政府人选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949年9月26日），《“立群电台”文电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页。按：“立群电台”疑为“力群电台”之误。——笔者。

(130) 据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3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5页。

(131)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讨论和平起义的一些情况》（力群致

中央电，1949年9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2页。

(13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2页。

(133)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邓力群去迪化商讨和平解放新疆等问题致邓力群等电》（1949年9月13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6页。

(134)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6页。

(135)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8页。

(136) 《彭德怀关于陶峙岳通电起义等致毛主席电》（1949年9月27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21页。

(13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5页。

(138) 《李宗仁回忆录》，第980-981页。刘安琪，应为刘安棋，以下引文中的误写同此。——笔者。

(139) 1949年8月3日，《国防部对宋希濂作战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0) 《蒋军事计划部署情况摘记》（1949年8—12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5日条。

(142) 《徐永昌日记》1949年7月16日。

(143) 《保卫华南西北案草案》、《台湾保卫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4) 《军委同意十兵团延期入闽致粟裕、张震等电》（1949年6月14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20页。

(145) 毛泽东致刘少奇转达斯大林电（1949年7月25日），А．Ледовский：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05，1996，с．88-90．

(146) 李以劻：《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37页。

(147) 参《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9月27日。

(148) 参《叶飞回忆录》，第606-607页。

(149) 《粮食困难行动时间可酌情推迟》（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13页。

(15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10日。

(151) 转引自陈赓：《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页。

(15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41页。

(15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39页。

(154)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15—20页。

(155) 《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5页。

(15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6页。

(157) 《人民日报》，1949年8月25日。

(15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2页。

(159)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7日。

(160) 张玉法、陈存恭：《刘安祺先生访问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53页。

(161) 张玉法、陈存恭：《刘安祺先生访问录》，第134页。

(162)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31日。

(163)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3日。

(1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11日条。

(16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24日条。

(166) 宋希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7—8页；时间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宋回忆有误。——笔者。

(16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14页。

(16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9月8日条。

(169) 《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1949年9月9日），《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1949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67-670页。

(170)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171) 参《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回忆录资料。

(172) 《林邓谭萧赵关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意见报军委电》（1949年10月10日），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战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173) 《林彪关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策略报毛泽东电》（1949年10月12日），《广西战役》，第47页。

(17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51页。

(17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作歼敌十三兵团、二十一兵团等部。按：《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未见有第十三兵团序列，第二十一兵团部似也未被歼灭。——笔者。

(1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14日。

(177)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5月19日。

(1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16日条。

(179)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1日。

(180)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22日。

(18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2页。按：时蒋介石尚未至台湾。——笔者。

(182)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7日。

(183) 《风雨中的宁静》，第201页。

(184)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作22日飞上海，26日至马公，有所不同。

(1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27日条。

(186)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8日，三案为：一、成立革命反共政府，以蒋先生为大元帅，二、恢复总统，三、甲．总裁领导革命戡乱，乙．李代总统领导政治、革新政治，丙．成立最高决策委员会。

(187)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5日。按：《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为在台南见蒋，《徐永昌日记》为高雄，当时蒋介石住在高雄，阎谱为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作5日，据《徐永昌日记》当系4日。

——笔者。

(188)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0日。

(189)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1日、12日。

(1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8页。

(19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6日条。

(19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8日条。

(193)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8日。

(194)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2日。

(1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8日条。

(196) 《阎锡山日记》1949年6月28日，转引自《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25页。

(19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7月4日条。

(198)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13页。

(199) Telegram，Judd to Chiang Kai-shek，July30，1949，Judd Papers，box 163，*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p．176．

(200)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第531—532页。

(20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1949年9月4日条，第2338页。

(202)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4日。

(203)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日。

(204) 章味方：《“抗共名将”胡琏》；司徒昌：《广东政局的暗流》，《新闻天下》（成都）第6期，1949年9月25日。

(20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日。

(206)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25日。

(207) 《郭汝瑰回忆录》，第366页。按：原文10月当系8月之误。——笔者。

(208) 宋希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9页。

(2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29日条。

(210)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日。

(2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9月29日条；另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日：据阎锡山述："前日，蒋坦白的语白曰：过去君曾公开反对长官，今若遽长国防，恐将领群起效尤，不如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我主持，君任参谋长，如此过一时期，以使将领知君我已合作，然后再由君全权负责。"

(212) 参梁升俊：《解放前夕蒋李争权、李白内部矛盾片断忆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2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0月2日条。

(21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21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216)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9日。

(217)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0日。

(218) 《风雨中的宁静》，第246页。

(219)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9日。

(22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14日。

(221)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13日。

(222)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5日。

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

第一节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一　魏德迈使华

从马歇尔调处结束以来，国民党政府不断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47年一二月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再约见司徒雷登大使，并提交正式照会，申述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要求美国尽快提供粤汉铁路借款和1亿美元的棉花贷款。中国需要购买进口棉花使纺织厂有活干，而制成的纺织品的出口可以偿还外债。马歇尔认为提供大规模贷款的时机未到，但他仍然指示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以他的名义去与进出口银行商量，希望能向中国提供用于粤汉铁路、塘沽新港和重建煤矿业的贷款[(1)]。但进出口银行行长不同意贷款，他对国民党政府偿还债务的前景表示悲观，而且进出口银行正要修改章程，向中国贷款时机不对[(2)]。

三四月间，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也为了讨好美国，实行了所谓改组，由政学系领袖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并吸收了一些美国政府所欣赏的自由主义人士，如陈光甫等参加政府。司徒雷登对这次改组极其满意。他向国务院报告说："组成新国府委员会的分子，无论从国民党还是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我们有理由指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与实质性的改革。"[(3)]

马歇尔调处的失败，宣告了美国既支持蒋介石又企图避免国共两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避免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政策的落空。早在1946年7月，马歇尔就曾表示，如果国共谈判破裂，他要建议用二三个月的时间来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马歇尔于1947年1月21日就任

国务卿后，立即吩咐其下属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新研究。2月上旬，范宣德拟就了备忘录。马歇尔将此备忘录转发政府各部门征求意见。陆军部长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场辩论。两者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否应当继续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范宣德赞成这样做，因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军方本来不赞成马歇尔使华，如今调处已经失败，他们自然更认为国共谈判是行不通的了。他们认为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实际上是让中共控制政府或破坏政府，最终导致在中国出现一个共产党政权[(4)]。二、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范宣德等认为，这个政府如不实行剧烈的政治与军事改革，清除弊政，提高效能，美援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自然对这种改革应抱同情的态度，而不苛求其效果。军方认为不能等待国民党政府取得肯定的政治进步才提供援助，他们建议派遣经济顾问团去中国帮助国民党政府[(5)]。三、是否应当对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远东司官员反对这样做，因为过早提供军援只能使国民党中顽固派更不愿实行改革，使中国人民中现存的反美情绪变得更加强烈，并成为美苏关系中的刺激性因素。军方认为国民政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至今仍有义务支持它；既然派了军事顾问团，就要给予军援；对于苏联，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是否刺激它，而是“遏制其扩张”。[(6)]

要求援蒋的呼声不仅来自行政机构内部，而且来自国会。在1946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一些本来对蒋介石不抱好感的民主党议员落选，国会中亲蒋势力增强。在对华政策方面，在众院主张援蒋最起劲的是周以德（Walter Judd）和沃利斯（John Vorys），在参院起主要作用的是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和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在马歇尔调处的1946年，周以德与沃利斯已经对政府对

华政策迟迟举棋不定越来越不耐烦。到1947年初，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在援华方面采取措施。范登堡和布里奇斯对中国都了解不多，没有什么直接的经验。范登堡认为，美国应当为其在海外承担的义务感到光荣，对中国承担的义务也不例外。范登堡还接受了陈纳德对中国时局的看法。陈纳德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年深日久，并于1946年10月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订立合同，成立“行总”空运大队，包运联合国救济物资。他的商业利益已与国民政府休戚相关。他在1947年1月17日致函范登堡兜售看法。信中写道，美国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的努力只是帮助了共产党人，美国必须放弃这一鼓励国共谈判的政策，全力以赴地支持国民党，不然中国就要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就将大大加强苏联的地位，苏联便有可能在欧洲对美国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范登堡感谢陈纳德使他对原先自己所抱的观点更加坚信了[(7)]。他认为，“对我们来说，坚决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在各条战线上同样开始迎接共产主义的挑战”[(8)]。在1947年、1948年，范登堡是杜鲁门两党一致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是在援蒋问题上民主党政府与共和党国会之间的协调人。布里奇斯从1945年12月开始明显地表现出亲蒋倾向，他赞同赫尔利（Patricu Hurley）的看法，认为国务院官员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有着某种阴险的目的，表明国务院自己是不健全的。他在1947年1月31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必须保证支持“刚刚通过了民主宪法的”国民政府[(9)]。由于他身居要位，他的意见是不能被忽视的。

3月，美国政府提出了杜鲁门主义，扬言要“帮助各国自由人民维持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以抵制企图将极权政体强加于他们的种种侵犯行为”[(10)]，反共的意识形态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国民党政府从杜鲁门主义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提出经济和军援要求。3月底4月初，外交部长王世杰要求提供1亿发7.92毫米中正式子弹，这些子弹是战争期间美国陆军部准备运往中国作为租借物资的，但实际一直存在美国陆军部的仓库里。4月22日，他再次向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提出此事，并称美国“应以杜鲁门主义的精神来考虑

此事”。4月27日，宋子文及蒋介石于同日约见司徒雷登，提出一系列要求。蒋介石解释说，中国的财政与经济状况在迅速恶化，因此急需棉麦贷款；下级军官也已知道弹药缺少的情况，这影响了他们的士气，特别是在东北，他要求美国迅即提供弹药；中国的飞机都是老式的，飞行员不敢飞，他希望美国完成$8\frac{1}{3}$空军大队的装备；他还要求派一高级军事顾问来华，帮助他完全重组中国军队[11]。5月8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向马歇尔提出财政援助要求。他说，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改组都已完成，新政府将尽快开始经济复兴工作。美国的财政援助不会用于弥补预算赤字，它将全部用于经济复兴，如从美国购买器材和设备。中国政府认为单靠进出口银行最初指定用途的5亿美元贷款是不够的，他受命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这笔贷款一半用于购买美国机械设备，一半用于恢复和发展交通，建立发电厂和一些小型企业，及恢复农业，特别是兴修水利和生产化肥。马歇尔表示，他一直是迫切希望援助中国的，并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改组为提供援助创造了一个好时机，但他仍需与有关政府机构商量，并研究恰当的方式方法[12]。1946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给予国民政府5亿美元贷款，由进出口银行办理。但进出口银行有权确定何时提供贷款。按照银行章程，提供贷款的条件是：受援国确有把握偿还贷款，贷款能促进国际贸易。这笔贷款的拨款期到1947年6月为止。顾维钧所提的5亿美元就是这笔贷款，他还希望马歇尔能设法延长贷款的拨款期。但马歇尔没有能这样做。这笔贷款从未拨付。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也使国会中亲蒋派议员更加兴奋起来。就在3月12日国会辩论总统咨文时，周以德攻击马歇尔使华是“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少数派进行推翻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应当为此感到遗憾。次日，参议员布鲁斯特（Owen Brewster）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一边援助希腊反共，一边“敦促蒋介石拥抱共产党人”，岂非咄咄怪事。当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提交国会时，一大批共和党议员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质问政府，既然要在希腊和土耳其抵御共产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不这样做呢？在众院外事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周以

德与富尔登（James G．Fulton）咄咄逼人地要副国务卿艾奇逊解释这一“矛盾”。艾奇逊辩解说，中国已经从美国取得了大量援助，何况希腊、土耳其政府已接近崩溃，而中国远不是这种情况[13]。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在国会是通过了，但国会在中国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是政府不能置若罔闻的。

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院外援华集团在马歇尔使华失败之后也大大活跃起来。说晚一点，这个集团是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开始着力培养的，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国民党政府的成败兴衰息息相关，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集团中既有靠从事对华贸易和投资发财的实业家，如纺织品进出口商科尔伯格（Alfred Kolberg）和经营制铝业的雷诺兹（William Reynolds），也有在中国或亚洲任过职的将领，如陈纳德、麦克阿瑟和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C．Badger），也有教会势力或传教士的后人，右翼政客。他们与国会内的亲蒋议员及军方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互相交换情报。科尔伯格常常直接间接地向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A．Taft）、布里奇斯等兜售他亲蒋反共的观点。右翼舆论界，如“卢斯（Henry Luce）帝国”、赫斯特（William R．Hearst）报系、斯克里普斯一霍华德（Scrips—Howard）报系在制造舆论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卢斯在战时就着力塑造蒋介石的“英雄形象”，他把蒋政权的危机视作他一生“最宏大计划的危机”。马歇尔调处失败后，他的《生活》杂志就断言，“美国最终必将全力支持国民党”。5月，他见到马歇尔时声称，即将掀起一个联合的援华运动，他希望马歇尔采取主动，发表一个支持声明，并威胁说，如果政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他的杂志就要对政府进行批评了[14]。

在国内一片援蒋的喧嚣声中，美国政府在四五月间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4月上旬，当中共军队向大沽美国海军陆战队军火库发起进攻时，马歇尔下令把军火堆栈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军，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大沽。马歇尔自以为，这既可以表示美国不愿卷入中国内战，又

可以表示，美国这样做是被迫的，不是为了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为向国民党军队移交军火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借口，还能向中共表明，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只能引起对国民党有利的结果，实在是一举多得。稍后，他又批准将北京机场的军火转交给政府军[15]。5月26日，马歇尔下令取消自1946年8月起实行的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的命令。他首先批准以原价十分之一（65万多美元）让售1.3亿发7.92毫米中正式子弹。这批子弹于7月14日、8月11日分两批从西雅图装船。还批准继续交付属于$8\frac{1}{3}$空军大队项下的运输机[16]。

从1947年1月回国到5月取消武器禁运，马歇尔逐渐使美国对华政策由鼓励国共实行联合（起码公开宣传的政策是这样），向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战争转了弯子。他以象征性的事实向国民党政府表明，美国将在中国内战中作它的后盾。但美国所给予的援助与国民党政府的需要来说相差太远。1947年，中国内战的形势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国民党军的战略攻势已经难以为继，战场上的溃势促使它发起新的求援攻势。6月18日，蒋介石约见司徒雷登，向他通报了东北战场的危急局势。6月23日，顾维钧在华盛顿会晤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普（Williard L. Thorp），25日又会晤马歇尔，要求延长5亿美元贷款的拨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亿美元贷款。但这两者国务院都办不到[17]。马歇尔对开始一项新的大规模的援蒋计划仍然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宣布一个新的赴华使团，尤其是以一贯亲蒋的魏德迈为首的使团，对各方面都可以应付一番。由于魏德迈一直与蒋介石合作得很好，“深受委员长的尊重”，他的使华还可能鼓舞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退一步说，不管这个使团能取得什么实际结果，它至少可以为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作出新的重大决定之前赢得一个喘息之机，对国会内亲蒋集团和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对政府的攻击提供一个挡箭牌。

7月11日，白宫未经事先与国民党政府商量宣布了派魏德迈使华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官员虽然对此感到恼怒，但仍然对魏德迈访华表

示热烈欢迎。他们对魏德迈的政治倾向十分清楚，对他不同意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的态度也很明白。因此魏德迈使华被国民党政府普遍看作美国政策向大规模援蒋反共转变的开始。有人甚至指望，魏德迈可能取代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须知赫尔利就是这样取代高斯（Clarence Gauss）的。

在马歇尔起草的给魏德迈的总统训令中说，魏德迈应当向国民党政府表明，他的使命是“调查情况”，“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导致中国恢复元气的有效措施”，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马歇尔仍然以国民党政府实行提高效率的改革，作为提供美援的前提。训令不让魏德迈向国民党政府就美国可以提供的援助作任何承诺，而要他对可能提供的援助的性质、程度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并估计提供或不提供援助的后果[(18)]。可见，魏德迈使团充其量只是一个情况调查团。魏德迈自己则认为他负有双重的使命：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提供证据，美国的援助不会被浪费掉；说服华盛顿，必须提供这样的援助[(19)]。

魏德迈使团中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官员及专家，人员多由魏德迈亲自挑选，即他认为对中国事态“没有先入之见”的人。使团人员作了详细的分工，分别调查中国的货币情况，清偿债务的能力，使用美援的能力，与美国政治体制合作的可能性，各种建设工程（包括开矿、电力、水陆交通、农业、垦荒，等等）计划的可行性，以及失去东北对国民党政府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调查团于7月22日抵华，8月24日离去，一个月里访问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青岛、济南、沈阳、抚顺、台湾等地，分头进行了繁忙的活动。其实，关于中国的情况美国并非不够了解，使团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美国政府以前不知道的重要问题。连魏德迈自己也明白，情况到处都一样，只是为了“心理的原因”才多走几个地方。魏德迈在到中国一星期后便向马歇尔报告说：现在的情况与你1月离开中国时所描述的情况极为相似，自然比那时更恶化了，“中国的国民党

人精神上已经瓦解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死或作出牺牲。他们已经对他们政治和军事领袖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预见到彻底的失败。于是那些在位者就贪污腐化，趁着尚未垮台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国民党的士兵也反映了这种总的态度，他们简直不想打仗”。还使魏德迈感到忧虑的是，国民党人把使团看作“治疗所有中国病症的万灵药”。尽管如此，魏德迈仍然希望他的使团能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些可供考虑的建议[20]。

8月8日，魏德迈向国务院又发去一个报告。他断言东北是守不住的，如果国民党硬要从华北、山东调兵去守东北，那么长城以内，尤其是山东的局势就会迅速恶化。因此国民党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要么为死守东北损害华北局势，要么放弃东北巩固华北。他还说，苏联确实想在内蒙、新疆、东北及朝鲜建立其卫星国。国民党……知道美国在西欧与巴尔干的努力，知道美国要在苏联集团之外建立健全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因此希望依赖美国来反苏反共，而自己规避责任，不作出努力。魏德迈还报告说，“许多在民政和军事负责岗位上的中国官员都认为，中国的贪污腐败状况是不可救药的，虽然他们以前在这一方面操守清白，但现在他们决定乘着尚未垮台尽量捞一把”。有的人不是想要发财，但通货膨胀使他们无法再保持清白[21]。

在魏德迈离华之前，他应邀在国府委员会和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魏德迈每次出访后回到南京，都要会见蒋介石，向他讲述自己的观感。因此蒋是知道魏德迈可能讲些什么的。他当面要魏德迈坦率直言，“有什么说什么”，同时又托司徒雷登向魏德迈打招呼，不要过多指责政府，遭司徒雷登婉拒。魏德迈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在国民党政府大员云集的聚会上，历数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弊端，诸如贪官污吏当道，苛捐杂税深重，军队骄横粗暴，百姓畏之若虎，政府部门重叠，工作效能低下，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成风，国家精神破产，等等。一个外国人在另一国家的政府最高会议上作这样的讲话大概是史无前例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当时就痛哭流涕，在会

外说，我们对不起中山先生，没有把中国治理好，让一个外国人跑来这样教训我们。魏德迈24日离华前发表了同样性质的声明。这一篇讲话和声明着实使国民党政府感到不满。9月2日，王世杰致电顾维钧说，蒋介石及政府其他负责人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并指示他停止催办已向进出口银行提出的各种项目[22]。

9月19日，魏德迈向总统提出了一份长篇报告。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估量中国的战略意义，认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是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让其落入共产党手中。他写道，一个友好的中国能向美国提供“重要的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并能提供“亚洲沿海的重要海军基地”，以及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反之，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的政权”所控制，中国就将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这些财富，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基地。他自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进行改革，但不同意以这种改革作为美国提供援助的前提而建议立即开始给国民党以长期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主张派遣大量美国顾问指导其经济部门，强化美军驻华顾问团，将顾问团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后勤部队、训练营和战场的军事行动。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一个割裂东北的建议，即由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要求，促成停止东北战事，并请求将东北置于五国监护之下，不然，就按照联合国宪章予以托管[23]。

魏德迈希望他的报告能作为新闻发布，甚至在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当时马歇尔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他紧急致电国务院，这个报告不许扩散，然后又把魏德迈召到纽约，叮嘱他不要随便向人透露报告内容。随后，马歇尔又要求魏德迈删去报告中的若干段落，魏德迈不同意，马歇尔也没有坚持。于是，就像魏德迈自己叙述的那样，他们让“我呆在国务院优雅的办公室里，我无事可做，闲得发慌，直到最后，我才明白，我的全部工作都是毫无用处的，我抱着极大希望提出的建议被无声无息地忽视了”。他的报告一直到1949年8月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时才被公诸于众。魏德迈在后来写作回忆录

时不无懊悔地说，早知道他的报告会被国务卿压制，他决不会在南京作那样的讲话得罪国民党政府，因为他的两个目的是相互联系的[24]。总之，魏德迈访华在美国对华决策中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二　美国1948年的《援华法》

1947年下半年，美国国会中的亲蒋议员与院外援华集团更加起劲地展开活动。在魏德迈访华同时，卢斯派蒲立德（William Bullitt）来华，为《生活》杂志撰写专稿。蒲立德在二战时曾任驻法大使等职，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很深。他在中国活动了两个月，写成了《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在10月13日出版的《生活》上发表。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国民政府垮台，苏联就将控制整个亚洲，并动员亚洲的人力物力资源反对美国，那样，过不了一代人，美国的独立也将不保。他鼓吹给国民党政府以13.5亿美元的援助，并建议派麦克阿瑟去中国帮助蒋介石指挥作战[25]。这篇文章在美国影响甚广，在为援蒋制造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大。亲蒋议员也纷纷跑来中国。10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四名代表访问了中国。他们在访华期间就迫不及待地给杜鲁门打电报，要求政府“刻不容缓地援助中国”[26]。周以德在魏德迈回国后来中国，从北平到上海跑了不少地方，几次见到蒋介石，还到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商谈。回国后，他于11月8日约见巴特沃斯（W．Walton Butterworth）。他唯恐这位国务院远东司的新任司长对中国了解不够，便不嫌其烦地给他上了一个半小时的关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将来的课。他的长篇大论归结到一点：“中国形势需要美国采取紧急的行动。”他强调，日本与朝鲜的安全需要在中国维持一个非共产党政权；中国现政权虽然不好，但维持它总比让它垮台而由一个共产党政权取而代之好；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的内战不能结束，共产主义不能被遏制；而美国的援助必须是全面的，包括道义、军火的援助以及大规模训练军队[27]。

在一片要求援蒋的压力之下，马歇尔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

一、他在9月中旬解除了范宣德远东司司长的职务。从抗日战争末期以来，范宣德一直反对无条件地援助蒋介石，反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因此遭到政府内外及国会内外亲蒋分子的忌恨，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被称为国务院里的“红色细胞”。如今马歇尔把他打发到瑞士当公使，这既是对亲蒋势力的重大让步，也排除了实行援蒋政策的主要障碍。第二、马歇尔于10月21日批准让售$8\frac{1}{3}$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为了避免在行将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上受到苏联的指责，他要求对这一转让及其他一切援蒋事宜都不加声张。11月25日到12月15日的战后第五次四国外长会议毫无结果，不欢而散，这更使马歇尔下决心援蒋。会议一结束，12月16日，他就电示国务院，夏威夷群岛及美洲大陆的战斗机亦可转让。两天后，副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Lovett）通知司徒雷登大使，$8\frac{1}{3}$大队项下价值2650万美元的物资将以原价17.5%的价格售予国民党政府。稍后，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又以原价2.1%的价格从战时资产管理总署购得C—46运输机150架。根据1948年1月7日的合同，马里安纳岛上的一切剩余弹药以原价的1%让售，与赠送无异[(28)]。第三、10月27日，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1947年春国会划拨的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第四、马歇尔虽然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及魏德迈关于派军事顾问团到国民党作战部队去的建议，但批准顾问团到台湾训练中心去训练国民党部队，并对后勤部队实行改组及监管[(29)]。

除了上述各项，美国政府正在酝酿的一个更重要的援蒋措施是在实行援欧计划的同时提出援华计划。在11月11日的参院外委会上有人问到援华计划，马歇尔说，具体数字尚未确定，大约是在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的15个月中提供3亿美元。这个数字比蒲立德所建议的13.5亿少得多，自然不能使亲蒋议员满意。正式援助计划的确定需要时间，杜鲁门、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决定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向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提供临时援助的法案。12月中旬，行政当局提

出，向法、意、奥及中国提供5.97亿美元，其中给国民党政府1800万元。12月23日，1800万美元拨款获国会批准[30]。

得知美国即将大规模援华，国民党政府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2月间，国民党政府不间断地提出各种援助要求，以12月22日向司徒雷登大使递交的关于美国援华的几个基本考虑的备忘录最为全面。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实行一项为期四年、总额15亿美元的援华计划，条件应与援欧方案大致相同；中国将雇佣有经验的美国管理人员，协助中国政府设计关于财政、货币以及其他行政方面的改革，并雇佣美国技术专家参加建设；美国应允许中国向美国政府以贷款方式购买剩余军火及其他军用物资，1948年该项贷款总额拟为1亿美元[31]。1947年冬，美方在拟定援华方案时曾与国民党政府的两位代表——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Young）及外交部特派代表李幹进行了多次会商。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又向美国派出以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为首的技术代表团，为接受美援作准备。该团与国务院、财政部、商业部、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问题专家及有关人士进行广泛接触。1月28日，行政院院长张群迎合美国意图发表十点“自助方案”，宣示国民党政府进行行政、财政、经济、军事各方面“彻底改革”的决心。

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经过紧张磋商与反复的讨价还价，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为期15个月，以其中的5.1亿美元购买民用物品，主要是粮食和工业物资，其余6000万元用于少数特定的工业及交通的复兴项目。[32] 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还有2亿多美元的外汇储备[33]。马歇尔的用意是，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买军火，美国对它不作军事上的承诺。2月20日，马歇尔向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阐述政府的援华政策。魏德迈出使中国归来后无声无息，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纷纷就此事诘问政府。马歇尔乘此机会辩解说，很多与援华有关的文件虽然其内容极为正确，但一旦公布，“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士气，必将遭受重

大的打击”。他列举了自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援助，强调说，国民党政府要支持下去，不能依赖别人，主要只能靠他们自己，任何人也不能越俎代庖。在目前政府贪污腐败、软弱无力、纪律废弛的情况下，“美国援助中国政府抵抗共产党的任何大规模的努力，均将成为美国直接参与的工作及责任，美国就得承担遥遥无期地供给大量兵力和资源的义务”，从而使美国不能将其资源用于更重要的地区，在那里美国更有可能遏制共产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对俄国人有利，或者引起一种反作用，极可能导致另一种西班牙式的革命或广泛的战争”[(34)]。美国决策者的矛盾心理在马歇尔的这篇讲话中表露无遗。美国是愿意并必须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但又不能大规模地、全力以赴地给予支持，主要是因为它自己不争气；美国的力量不是无限的，它应当把资源用于更有把握遏制共产主义的地方；美国不愿意因为中国内战问题与苏联发生冲突，他关于中国内战可能导致西班牙式的战争的担心与大战期间罗斯福的担心不谋而合。马歇尔的讲话阐述了美国有限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的方针，其调子与后来的《白皮书》是一脉相承的。

军界及一些亲蒋议员对政府的方案仍不满意。他们力图把若干经援改为军援，众院外委会要求把5.7亿中的1.5亿作为军援。但参院外委会（包括一些亲蒋的议员）一致认为国民政府是无望的，他们削减了援助的款额，并且避免使用军援的名义。结果达成的方案是：经援3.38亿元，特别赠款（即军援）1.25亿元。《援华法》作为《1948年援外法》的一部分，于4月2日由国会通过，4月3日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但是年6月众院拨款委员会又把经援减为2.75亿美元，从而使援助总额减为4亿美元。这样的《援华法》表明，战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具体化为这样一种政策：用美国一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一定数量的军事顾问）尽可能延长注定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的寿命，纵然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要在这条道路上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给中国共产党制造尽可能多的困难。

《援华法》的实施在美国由经济合作总署负责。1948年5月原旧金山市市长赖普汉（Roger D．Lapham）被任命为该署中国分署署长。6月7日，赖普汉到中国，分署正式开始活动。国民党政府方面成立了美援物资委员会，行政院长张群亲自出任主席，委员包括外交、财政、交通等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资源委员会主席、上海市长等。由委员会的组成已足见国民党对美援的重视了。中国分署在1948年底共有美籍人员89名，非美籍人员355名。为了实施《援华法》，中美双方又于7月3日订立《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8月5日换文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由美方二人、中方三人组成）。根据这两项协定和其他有关照会，中国政府的财政、经济、贸易及统治区的经济生活完全置于美国的监督之下，美国还取得了不少新的特权。

1948年《援华法》的经援部分包括商品、工业复兴、农村复兴三个方面。其中购买物资的款项为2.038亿美元，用于工业交通复兴的为6750万美元，用于农村复兴的为250万美元，其余120万美元为经济合作署的行政费用。从美国购买的商品主要是粮食、棉花、肥料、石油、煤、医药、农药等。到1949年4月3日《援华法》满期时已拨出2.15亿元采购物资，其中1.392亿元物资已经运到中国[(35)]。

关于工业复兴方案，美国组成了一个复兴考察团，于1948年6月随赖普汉来中国。该团发现，中国面临着双重的问题：中国的重建极需购置机器设备，但中国又极端缺乏工程与技术管理人才。考察团对6750万美元的使用提出了初步建议，大部分用于基础工业与运输业，诸如发电、煤矿、铁路、化肥等。考察团准备让美国公司作“项目工程师”，协助中方设计项目，购置设备，培训人员。经合署及中国政府并准备聘用一家美国管理公司来主管整个项目。但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经合署署长不得不于1948年12月21日宣布，工业建设及重置机器的方案，除某些已经进行到很高程度的工程计划需要继续完成外，其余一律停止。事实上，东北及华北的某些工程的预备工作早已停止。工业复兴方案基本上还停留在计划阶段，并未动用任何款项购

置物资[36]。

农村复兴计划的命运与工业复兴计划相仿。1948年8月5日，中美双方通过换文，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由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任主任，另有中美双方委员各二人。该委员会总部设在南京，1948年12月迁往广州，在长沙、重庆、桂林设有地方办事处。委员会下设若干专家小组。其时，东北、华北已被解放，该委员会在西南和华南进行了调查，打算在四川、湖南、广西、福建、台湾等省进行一些项目。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农村复兴计划基本没有实行。1949年3月拨款期满后，1948年《援华法》中未动用的款项继续拨付，大多用于台湾。

《援华法》中1.25亿美元的军援是以中国政府委托美国陆军、海军、空军部采购军用物资的方式提供的。到1949年3月也没有用完，剩余部分继续拨付。1949年6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致函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说，这1.25亿美元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已于“行宪”后结束，这里是对国民党政权的习惯称呼——引者）使用的，“国务院不认为”要对“国民政府”使用余款购买军火“定出一个截止期限”，军火可以一直供应到1.25亿美元用完为止[37]。

据美国方面统计，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政府批准的对华经济及军事援助共20.077亿美元，其中15.967亿为赠款，4.11亿为信贷。而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仅为15.157亿美元，只及战后援助的四分之三。此外，美国还将原购价为10.781亿美元的剩余物资作价2.32亿元卖给中国政府[38]。可见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之巨了。

第二节　对日和约和战争赔偿诸问题的处理

一　对日和约问题的初步讨论

1945年7月盟国的《波茨坦公告》从原则上规定了战后盟国的对日政策，包括永久剔除军国主义；占领日本领土，直至制造战争的力量彻底摧毁之日；限制日本领土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他盟国决定的小岛；解散军队；严惩战犯；战争赔偿等项[(39)]。早在日本投降前，美国国务院、陆、海军部联席会议就拟订了《美国在战败日本初期对日关系》的文件，其中指出，美国对日本的总目标是：1．依据《开罗宣言》及其他盟国间的协议，剥夺日本的领土及托管地；2．创造条件，保证使日本不再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3．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此政府应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和日本的国际义务，并支持联合国章程所提出的理想与原则[(40)]。日本投降后，美国不容任何对日作战盟国插手，垄断了受降和占领日本的大权。8月30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飞抵日本，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9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阿瑟的指令中说："日皇和日本政府是在你作为盟国最高统帅的隶属之下，被授以治理国家的权力的。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力，只要你认为这是执行你的使命所适宜的。我们和日本的关系不是以契约、而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基础的。你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权限方面无须接受日本的任何异议。"[(41)] 9月7日，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成立。盟总除参谋部外，还设立了全面控制日本的民政、民间情报、经济科学、天然资源等九个局。这些机构以"盟总指令"或备忘录方式指挥日本政府，使盟总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占领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与其他盟国从总体上说并无原则分歧，但美军单独占领日本和在对日管制问题上独断独行，引起苏联和英联邦国家的反感。8月22日，美国向中、苏、英三国提出成立十国远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由于各国意见不一，美国方案搁浅。各国经过数

月磋商，直到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外长才达成协议，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中、苏、美、英、法、荷、加、澳、印、菲及新西兰共十一国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制定日本履行投降条件规定的义务时应遵守的政策及标准；2．对盟国最高统帅所颁布的命令及盟国统帅的措施进行考核；3．考虑各参加国提交给该会处理的事务。但委员会不能对军事行动及领土调整提出建议，委员会的决议案须经全体大会多数通过，中、美、英、苏有否决权。另在东京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麦克阿瑟或其代表任主席，中、苏各派委员一人，英、澳、新、印合派委员一人组成，最高统帅在颁发有关实施投降条款及占领与管制日本的重大命令与指示前，应与该委员会商讨；在实施远东委员会有关管制制度的变更、日本政体和政府的变更的决定时，如委员会成员与最高统帅发生意见分歧，在远东委员会关于此事未有协议之前，应暂缓颁发关于此问题的命令[(42)]。

国民党政府任命驻美大使顾维钧兼任中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并派代表常驻东京，参与远东委员会及管制日本委员会的工作。但这两个委员会的职责范围纠缠不清，实际上一切工作仍然取决于麦克阿瑟的盟总。中国驻远东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也认为，委员会的实际功能是为美国独揽对日管制大权起一种掩护与开脱作用，因此各国对此一直颇有非议[(43)]。

1947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文件的宗旨是要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非军事化的主要内容是："全部解除军备；改组经济，以剥夺日本之作战力量；消灭军国主义之势力；严厉审判战犯"；"严格取缔一切表现军国主义与侵略精神之制度"，以便"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民主化的主要措施是：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尽快建立一个和平民主之政府，在国际上，"履行其国际责任，尊重他国权利并支持联合国之目标"，"而与各国维持永久的和平关系"；在国

内，“鼓励日本人民发展个人自由与尊重基本人权之愿望，尤其信仰、集会、结社、言论与新闻之自由；并鼓励其组织民主与代表民意之机构”，等等。文件还对军事占领、盟总与日本政策的关系、联合国权益的保护、解除武装与废弃军备、严惩战犯、解除经济武装、恢复和平的经济活动、赔偿与归还、金融财政政策等项作出规定[44]。随后，远东委员会又对摧毁日本军需工业（1947年8月14日）、禁止日本军事活动与处置日本军事装备（1948年2月12日）、对日贸易（1948年11月18日）等问题作出决议。

然而，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这些文件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推行了一些民主化改革，包括逮捕战犯，进行整肃，解散财阀，农地改革以及制订和平宪法。新宪法保留了日本天皇制，但规定天皇只是作为国家及国民整合之象征而存在。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45]。但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及冷战的开始，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的颓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对日政策随之发生了转变。本来美国是指望中国成为它战后在亚洲实行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的主要稳定因素，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国民党在内战中的不断失败使美国原来对它的指望落空，美国乃考虑由日本来替代国民党中国承担这一角色。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转变，即由摧毁一个敌国变为建设一个盟国，由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基础的民主化政策改为重建日本的扶助日本的政策。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文件的话说，“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日本能重新自立”[46]。这一转变在亚洲各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

1947年7月11日，美国致函远东委员会，建议委员会各国代表于8月19日在美国举行缔结对日和约预备会议，并提出会议通过决议的方式应采取三分之二表决制。美国这一建议违反了波茨坦会议上确定

的对日和约由中、美、英、苏四国外长会议进行准备的原则。显然，在这十一国中，美国自以为要控制三分之二是不成问题的。英联邦国家在十一国中有五个，谁也不能以三分之二票压倒英国。而苏联则可能陷于孤立境地。22日，苏联复函美国，表示“不能同意召开对日草拟和约会议，在片面形式下由美国政府决定，而不经与中苏英各国政府作初步之商讨”。苏联坚持由四强外长会议草拟和约，并坚持四大国的否决权，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47]。

国民政府在接到美、苏等国的照会后，于9月14日、19日、30日三次邀集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知名学者举行座谈会，征询对于对日和约问题的意见。国民参政会也就对日和约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案。一些社会团体以及报界也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综合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意见：

（一）关于对日和约起草形式与顺序。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颇为一致，即应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先作初步会商，再提交十一国会议讨论；在整个讨论签订过程中，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即四大国一致的原则，坚持中国的否决权，否则不能维护中国的利益及远东的和平稳定。于树德等认为，对日和约与中国之存亡及发展的关系较任何一国更大，和约中如有任何妨碍中国发展、危害中国生存的条款，中国即不能同意。如果没有否决权，在十一国会议中，中国势孤力单，极易为人操纵，极易被三分之二做成不利于中国的决议，却又不能维护自己利益。他们认为在否决权问题上应该不避与苏联一致的嫌疑。否决权不仅是大国自卫的武器，而且是世界安全的保障。如大国之间不能同意协议，而强迫其接受，则大国团结必然破裂，而且可能招致战争。褚辅成等还认为，和会必须有四强全体参加，尤其在远东，中、苏、日三国壤地错综，无苏联参加，势将使远东局势益陷于纠纷。王芸生等进而认为，中国对日利益与美国不同，也与苏联不同，在谈判对日和约时极需谨慎严正，着眼于今后百年国运，忠实于独立外交，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而不可做美国尾巴，如一切点头

诺诺，则仍难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势必后患无穷[48]。

（二）关于领土问题。《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早已对日本领土作出规定，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归还中国，朝鲜独立，千岛群岛划归苏联，有争议的是琉球、小笠原群岛、伊豆七岛、济州岛、竹岛、对马岛、千岛群岛南部小岛。当时讨论得最多的是与中国有关的琉球的去向，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强烈主张收回。张其昀、胡焕庸等认为，由历史、地理、经济、民族文化来看，琉球均有归属中国的理由及证据。琉球是中国东海的屏藩，海上的长城，其与台湾岛的关系，犹如海南岛之有西沙群岛。琉球与中国关系，始自隋代，自明洪武五年正式列于中国版图，两年一贡，历五百年而不辍。七十年前日本悍然以武力攫取，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之先声。琉球为中国失地之一，自当由中国收回。琉球对中日两国皆有重要战略意义。琉球掌握在日本手中，在消极方面掩护日本本土四岛的安全，在积极方面作进而侵略中国东南沿海的跳板。鉴于其重要军事价值，中国在收回主权后，可同意经由联合国的程序，供国际军队使用，藉以保障远东和平[49]。另一种意见认为，琉球应恢复为主权国家。琉球在被日本吞并之前是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其人种、其经济都是独特的。明清五百年间，中国是琉球的宗主国，但现在恢复宗藩关系与时代潮流不符；另一方面日本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兼并琉球，琉球应恢复历史上的古琉球国，以独立的姿态耸立于西太平洋，成为一个和平与安定的因素，而不能再作侵略的跳板。中国可同意美国在琉球建立基地的计划，如果要对琉球实行托管，中国应起主要作用。[50]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对琉球实行托管，具体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由中国托管，将来适当时候获得独立或成为自治领；一种是交联合国托管，中国保有一份权力[51]。讨论中还提到一些别的岛屿。济州岛“本来就是朝鲜的地域，应该与朝鲜各道一样属于朝鲜政府的行政权范围”。竹岛原属朝鲜江原道，日本吞并朝鲜后，改变该岛隶属，现在自应将主权返归朝鲜。即令朝鲜不能派代表出席和会，中国应以第三者的立场代为主张。对马岛不是日本固有领土，其形势极为险要，“既控制日本与朝

鲜两陆地，又扼制旧日本海与西太平洋两水域”，为东亚及世界的安定起见，对马岛应设置守卫治安及国际社会秩序的警察[52]。

（三）关于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问题。中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创巨痛深，各界对于如何使日本军国主义不能东山再起的问题十分关心，并大致表达了这样几点意见。第一、废除天皇制。舆论一致认为，天皇是日本法西斯最后的独裁者，是领导侵略的权威，裕仁天皇对一切侵略战争所负的刑事罪责，应交付盟国远东法庭公正审判，并予惩治；天皇制是绝对主义的君主制，是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要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必须废除天皇制[53]。第二、惩办财阀。财阀是教唆军部从事战争、并竭力为军部撑腰的；而军阀侵略是为财阀打天下，财阀是真正的侵略势力，是日本侵略的动力，是左右日本政治的真正力量，是阻碍日本经济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严惩。有论者认为，盟总对于解散财阀“只做了一些浮表的工作”，与发动战争进行侵略直接有关的财阀没有一人被起诉的，这方面工作太不彻底。对日和约应该明确规定解散日本财阀[54]。第三、革除其他封建势力。日本的土地关系是封建的寄生的土地关系；日本排斥外来宗教，提倡国产的神道，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带着封建神秘主义，这些都要进行改革，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结社必须禁止[55]。第四、和约中应当规定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对日本进行再教育的时期，以便消灭日本的侵略思想。应该消除一切有关军国主义的心理、思想和制度，中小学教本和各种刊物、杂志、报纸中的此类思想必须消除，中小学教科书应该经过严格的检查[56]。

（四）日本战争赔偿也是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详见下一目。

1947年10月18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例会上报告政府政策方针，就对日政策报告说：“对日和约态度，美国认为起草对日和约只要远东委员会十一国中之多数赞成即可，我则主张所谓多数须包括有否决权之四主要国家在内。中国愿看到日本之和平实

现，但反对日本成为和平之威胁；不采取报复手段，但要求应得之赔偿。日本领土问题，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已有规定，现仅若干岛屿未有决定。琉球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故我主张应归还我国。赔偿方面，中国损失最大，调查困难，损失数字约为美金五百余亿元。参政会对于对日和约之建议与政府之政策，甚多符合之处。总之，我国对日之基本原则仍为宽大。”(57)

国民政府参考综合了各界表达的意见，提出了种种折中的方案，力图促成对日和约的早日缔结。《外交部三十七年下半年度施政计划纲要》规定：“七、促成对日和约之签订。对日和约之签订，自宜早日完成，以彻底铲除日本侵略主义，摧毁日本军事经济工商作战潜力，达成我国最大比额与优先受偿之赔偿原则，并监督日本政府完成真正民主化。惟为达到此种目的，中国必须于未来和会中获得其应有之特殊地位，中国不能放弃此种地位，以求和会之早开与和约之早订。”但由于美苏在此问题上意见尖锐对立，不能调和，和会迟迟未能举行(58)。

二　战争赔偿与索还劫物问题

战争赔偿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之一。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国民政府就着手进行战争损失调查，为日后索赔作准备。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他在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议案，建议政府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着手进行调查，以作为战后向日本索赔的依据。行政院于1939年7月制颁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抗战损失查报须知》，通令所属各机关及各地政府分别具报调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编所有调查资料。主计处从1940年起每隔半年将所有各种损失数字累计汇编一次。战争临近结束，国民政府对这项工作有所加强。1944年2月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翁文灏为召集人。该委员会修订以前颁布的调查办法，使调查工作得

到改进。1945年4月起调查委员会改隶内政部，内政部长张厉生出任主任委员。及至秋季，国民政府外交部得悉美国总统战争赔偿专使鲍莱（Edwin W．Pauley）即将来华商讨有关日本战争赔偿事宜，便于11月13日召集各部委代表会商，会议决定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名为赔偿调查委员会，改隶行政院。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三项：一、调查我国抗战损失；二、调查日本赔偿能力，并确定日方赔偿之种类与数量；三、调查中国已接受之日本公私财物。远东委员会成立后，国民政府为了与该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名称一致起见，于194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继续调查抗战损失，并负责处理日本赔偿事务[(59)]。

作为美国对日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关于日本赔偿政策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战争结束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即任命鲍莱为战争赔偿问题的私人代表出访东亚各国，拟订关于日本赔偿的方案。经总统批准，鲍莱于1945年10月31日发表了《美国关于日本赔偿的政策》，其中指出，“日本赔偿的问题是一个旨在促进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稳定及政治稳定的问题”，整个东亚都需要走上政治稳定与和平进步的道路，需要复兴经济生活，赔偿不是为了使日本贫困化，但也不能允许日本经济复兴到使之能对其邻国实行控制或对邻国保有优势。因此赔偿政策应当是：1．削弱日本的工业，使之不再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2．将日本的工厂设备运至各有权利得到赔偿的国家，以促进其经济的完善；3．日本可以留有最低数量的工厂，以生产换取必要的进口产品（如粮食）的出口物资，等等[(60)]。1946年4月，鲍莱向杜鲁门递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指出，绝大部分的日本工业设施都是为进行战争而建立的。尽管这些设施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破坏，但日本仍然保留着较日本在和平年代为生产国民的消费物资多得多的工厂设备，这部分多余的设备必须拆迁。计划主张保留日本1926至1930年的工业水平，将日本的陆海军工厂、飞机、轻金属、轴承工厂的全部，以及钢铁、机床、造船厂、火力发电厂的大约一半，作为赔偿设备予以拆迁。同时鲍莱方案主张全部保留日本的轻工业和民生工

业。这样整体来说，日本的工业能力将削减30%。这既是为了使日本不能再发动另一次战争，也是为了使每一个日本人明白，日本是战败者，所以应该受到惩罚。被日本侵略摧残得最厉害的中、菲两国，可以得到日本的化学、钢铁、造船、电力以及机械制造工厂作为赔偿[61]。这是美国关于日本赔偿的几种方案中最严厉的一种。1946年5月远东委员会一致通过这一计划。

在提出这个方案之前，鲍莱鉴于制订赔偿方案牵涉面多，手续繁复，而赔偿问题对剥夺日本的战争潜力、对东亚受日本侵略各国经济复兴又关系密切，急于处理，便先于1945年12月提出了一个临时赔偿拆迁方案。这个方案以整个日本赔偿额的大致30%作为先期拆迁计划，以赔偿直接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他在6日给麦克阿瑟的信中说："我倾向于认为，虽然我们有打破日本财阀的计划，但照着日本人现在追求的政策，大财团将会接管整个国家，从而使为消除日本战争潜力而应予拆除的那些机械工具很难被拆迁。果真如此，日本战争潜力的最重要部分将完整无损地保留在那些使日本陷入战争的人手中。"12月21日，杜鲁门批准了鲍莱的计划，并希望尽快予以实施[62]。

中国官方及民间一直十分关心日本赔偿的问题。在讨论对日和约问题中，赔偿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中国各界所关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日本应维持何种生活水平，中国应在总的赔偿额中得到多少份额。远东委员会1946年2月通过保持日本1930至1934年的生活水平，中国各界普遍认为太高。理由是，这比同期的中国的生活水准为高，更比战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要高，而德国所保留的是1930至1938年生活水平的55.5%。在远东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提出将日本的重工业保持在1914年水平，但未获通过[63]。关于各国赔偿的份额，《波茨坦公告》规定应考虑各国受到日本侵略的人员与物资损失的程度，及各国对战争作出的贡献。中国各界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中国都有权利得到最大的份额。按照行政院赔偿委员会1946年五六月间向国民

参政会提出的报告，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9月3日中国在战争中的各项损失是：全国公私财产直接间接损失合计为559.43844亿美元，全国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其中平民伤亡9，134,569人，军人伤亡3,650,405人[(64)]。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应当占日本赔偿总数的50%。在1947年远东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所提赔偿额为日本总赔偿额的40%，并声明，如依损失及贡献而言，中国有权要求更大的百分比。当时各国要求的赔偿额相加为200%多，于是新西兰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将各国的要求大致减半。美国在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巴尼特（Robert W．Barnett）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方案。在这两个方案中，苏联的比例都由原来要求的14%降到了3%。因此两个方案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中国也表示不能接受将中国的比例降到百分之二十几。关于赔偿分配比例各国意见出入甚大，讨论迁延不决[(65)]。

1946年底，远东委员会在华盛顿讨论赔偿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提出《责令日本政府赔偿说帖》。这是中国政府关于赔偿问题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方案要点如下：1．日本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其军需工业，日本平时生产量应以1914年为标准；2．日本赔偿由两部分构成：国内之存金、现款、工业设备以及现在及将来可供赔偿用之物资；日本在中立国、轴心国及未被日本占领各同盟国内之存金、现款及资产；3．日本在中国境内包括东北、台湾及澎湖的现有产业、物资、存金及现款等，以及日本在上述各地所经营的事业存于日本国内的产业、物资、存金、现款均应作为日本对华赔偿之部分，但不计入赔偿总额之内；4．日本境内指定为对华赔偿之工业设备，中国对其拆迁时期、利用方法及技术人员等，得设定必要条件；这些设备运往中国指定地方，所需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5．赔偿工厂，如属必要，可在日本境内利用日本人力开工生产，所有产品，由中国政府出资运往中国，但以不超过最后赔偿会议之日起五年为限；五年后该项设备仍由日本政府出资运往中国；6．日本在东北之工业设备及其他非战利品之物资，经苏联搬移者，应有公平合理之措置，使中国对此应得之赔偿不致无着；7．日本从中国掠夺去的古物、艺

术品及其他物资，中国伪组织及台湾政府、台湾银行所存于日本之一切资产、物资、存金、现款应归还中国，而不视为赔偿；8．日本在占领中国期间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自然资源、工业计划等技术及经济资料，应包括在赔偿计划之内[66]。中国的上述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而且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由于各国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利益观点不同，由于苏联坚持把东北日本产业看作战利品，特别是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中国的上述主张几乎无一顺利实现。中国实际得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先期拆迁设备。

鲍莱早在1945年底就提出了先期拆迁的设想，但美国到1947年春才决定予以实施，1947年4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了关于先期拆迁的指示。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盟总于9月开始采取行动，以十七所日本兵工厂的机械设备等作为第一批赔偿物资，以后又将兵工厂内的试验设备及电气设备列为第二、三批赔偿物资。接受赔偿的国家为中、英、荷、菲四国，分配比例为3：1：1：1。中国接受的这三批赔偿物资总额仅为2207万美元。此外，1947年春，盟总决定将日本残存的自驱逐舰以下的军舰（航母等战舰已为美国沉毁），按抽签法平均分配给中美英苏，分给中国的第一批日舰八艘于1947年7月3日驶抵上海，第二批八艘于7月28日抵沪，第三批八艘于8月27日抵青岛[67]。

1947年初，美苏关系已近恶化，冷战初露端倪。3月，美国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从此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美国以日本占领费用庞大及经济恶化为由，提出修改赔偿政策。一二月间，美国陆军部派遣以过去一直处理对德战争赔偿问题的斯特赖克（Cliford S．Strike）为首的调查团赴日本调查，并于1948年2月公布《日本工业赔偿报告书》（又称斯特赖克计划）。鲍莱方案与斯特赖克计划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前者主张进行拆迁赔偿，而反对以劳力、生产品、现存货物支付赔偿，以避免日本保留过高的生产水平；后者恰恰相反，反对拆迁赔偿（主要的战争工业除外），赞成采用生

产品和劳役的赔偿制度；第二、前者保持日本1926年至1934年工业水平，后者主张照日本1935年的生活水平保持其工业水准，不但水平提高了，而且工业水平是固定不变的，而生活水平却需要加上人口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其他因素；第三、大幅度减少赔偿数额，斯特赖克确定的赔偿额是16.48亿日元（1939年价格），其中工业设施1.72亿元，基本战争设备14.76亿元；而1947年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通过的一份文件规定的拆除额为24.66亿日元[68]。

对于斯特赖克大大削减了的赔偿方案，美国陆军部仍不满意。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美国军方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日本战争赔偿政策。1948年3月，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莱勃（William H．Draper，Jr．）又亲自率团前往日本，5月公布了由该团团员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起草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把从日本的拆除赔偿额减少到6.62亿日元，该报告书还主张："日本在国外的资产，如中国东北、台湾及其他地区的资产，已入苏联及中国手中者，均应正式认作赔偿而抵消之。"报告书不仅反对将发展日本经济及美军占领所需的工业列入日本赔偿品之中，不仅反对冻结日本工业水平，而且主张"应听其在不从事军事工业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甚至主张美国在五年内向日本注入16亿美元资金，并要求亚洲各国与日本恢复贸易等经济合作关系，特别是将多种原料售予日本[69]。连国务卿马歇尔也觉得约翰斯敦方案过于宽宏大量，认为在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时必须作若干修改，如：1．将原报告的主张只有日本陆海军军火库用作赔偿改为一切"基本的军事设施"，除陆海军军火库外还包括私人军火工厂及飞机厂；2．原报告主张日本保持年船舶制造能力65万吨，马歇尔认为40万吨足矣，其余设备能力用作赔偿；3．原报告提出不将日本钢铁工厂及设备用作赔偿，马歇尔主张所有超过年产50万吨的钢铁工厂设备均应用作赔偿。但陆军部却认为"特别难于"接受马歇尔关于日本所有基本军事设施均用于赔偿的意见，因为拆迁基本军事设施将对日本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70]。显而易见，美国对日本的目标已经正式改变为积极加速日本工业的重建与扩展了[71]。

在进行赔偿同时，索还日本战争劫掠物资的工作也在进行。中国提出的归还被劫掠物资而不视为赔偿的原则得到各国赞同。1946年7月远东委员会通过了《劫物归还政策案》，但由于各国对具体执行计划意见分歧，归还工作长期不能实施。直至1948年3月，美国政府才向盟总颁布劫物归还的临时指令。盟总乃令日本政府将劫掠物资集中于若干大城市及港口，由盟国代表前往核查认领。截止1949年9月，归还中国的劫物有：1．书籍158,873册，价值180,964美元；2．古玩2000件，价值110,891美元；3．货币11,083吨，价值5,246,356美元；4．整厂机器设备两厂，价值442万美元；5．机器2545件又一套，价值2,238,202美元；6．汽车18辆，价值18,830美元；7．船舶20,676吨，价值2,162,657美元；8．工业原料2，335,809美元；9．贵金属17,594,709克，价值404,502美元；10．杂项1,013,709美元。此外，中国政府还委托盟总在日本经销部分物资。以上各项共计18,132,357美元[(72)]。毫无疑问，这些仅仅是被日军劫掠物资的极小部分。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的末路外交

一　难以挽回美国从中国脱身

1948年美国《援华法》的通过，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互相妥协的结果。但国民党当局知道，民主党政府对于援华的态度是不积极的。早在马歇尔在华调处期间，蒋介石对他就很不满意。马歇尔于1947年1月回国就任国务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杜鲁门在外交方面对马歇尔言听计从。蒋介石更把美国的消极援华态度归咎于马歇尔，他在1948年6月下旬与张治中的一次谈话中说，“马歇尔完全持一种反蒋倒蒋的态度”[(73)]。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如密歇根州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加州参议员诺兰（William F．Knowland）、新泽西州参议员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脱

（William H．Taft）、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John Dewey）都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反共亲蒋情绪，攻击杜鲁门政府在欧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同时，却在亚洲放任共产主义。6月下旬，杜威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杜鲁门政府对华援助过于吝啬，美国必须帮助“国民政府”维护它的自由，到了适当时候，他一定要改正现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他把对中国友谊与援助当作竞选演说的主题[74]。当时，杜威当选的呼声很高，国民党政府当局于是把赌注压在共和党身上，竭尽全力地调动在美势力为杜威竞选摇旗呐喊。孔令杰就是积极活动的人物之一。杜鲁门采取哀兵策略，出乎意料地以微弱多数当选。国民党政府一时处境相当尴尬。

及至1948年冬，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决策者相信，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马歇尔在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了。”[75] 在此之前，9月8日，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已经提出了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订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76] 194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十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与中国恢复一般的经济关系等手段，增强能导致中共与苏联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的力量，以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另一方面，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77]。这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从中国内战脱身，尽可能离间中苏关系；硬的一手是继续与中国革命为敌，尽可能给中国新政权制造困难。在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两手同时在起作用，但后一方面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

为了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战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帮助国民党政府改组军事指挥机关、建立军校、建立训练中心、训练军官及作战部队。尽管美国作了这些努力，国民党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却日趋下降，成建制地投降或起义已经司空见惯。到1948年11月上旬，驻华美军联合顾问团终于得出结论，在中国现时这种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形势下，除非使用美军在中国作战，不管美国给多少军事援助，都不可能挽救国民党政权，而他们知道直接派遣美军作战不是美国的政策[78]。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济于事。1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从中国撤出顾问团。国民党政府反对这一措施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就在11月初，在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蒋廷黻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向马歇尔提出要求，希望美国派军官实际指挥国民党政府军作战，并派一高级军官率一特别使团来华。马歇尔答称，要一个新到中国的外国军官对中国政府提供行动建议是太困难了。蒋廷黻碰了钉子之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他在11月9日给杜鲁门的信中提出了三项紧急要求：迅速增加并提供军援，发表支持国民党的声明，“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作战”。显然，蒋介石是想死死地拽住美国，更深地把美国拖下水去。但这与美国的政策不合。杜鲁门在回函中实际上对蒋的要求一一予以拒绝[79]。顾问团撤退工作于12月开始，至1949年3月1日完成。

《援华法》通过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通过实施该法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方面与美国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里应外合，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新的援助要求。上述蒋廷黻向马歇尔的口头请求及蒋介石致杜鲁门的函中，都是把军事援助与军事顾问一起提出的，而马歇

尔及杜鲁门也都是两者一起拒绝的。杜威落选，杜鲁门的总统新任期即将开始，国民党当局处境更为困难，于是，宋美龄于1948年12月1日亲自赴美求援，再作一次绝望中的努力。她要求美国政府在三年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30亿美元援助，美国政府不予理睬。就在她到华盛顿的翌日，杜鲁门拒绝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对华提供新援助问题发表意见，并断然否决了将派麦克阿瑟去中国的谣传[80]。想当初，1942至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时是何等风光，简直在美国卷起一阵旋风。如今时过境迁，国民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宋美龄的访问也显得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杜鲁门政府没有把她当作官方客人接待，没有让她住在白宫，而1943年她曾在白宫住过。马歇尔也只是把她当作私人客人，安排她在利斯堡的家中下榻。而她的美国友人则早早地劝告宋美龄不要在利斯堡住到不受欢迎的时候。宋美龄在华盛顿的活动没有多少成果，1949年1月上旬她就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去了。宋美龄以纽约里佛代尔孔祥熙家为总部，越过驻美大使馆召集国民党在美政要举行“每周战略会议”，分析形势，制定在美宣传口径，统一活动步调，加强与院外援华集团的联系。宋美龄的活动对维系崩溃中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关系起了一定作用，但她的求援活动却处处碰壁，受尽冷眼。她的活动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甚微。

1949年1月下旬，杜鲁门第二任期开始，艾奇逊（Dean Acheson）接替马歇尔为国务卿。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又发起新的攻势。2月7日，51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函杜鲁门，询问政府援华计划，并要求总统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问题并提出报告。24日，艾奇逊会见了其中的30人。他就中国的局势发表评论说，当森林中有一棵大树倒下，在飞扬的尘土落定之前，人们无法看清破坏的程度。第二天，传媒就把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描述为“等待尘埃落定”[81]。共和党参议员麦卡伦（Patrick Mc Carran）随即提出议案，建议向“国民政府”提供15亿美元援助，其中5亿美元用于购买白银作为货币改革之用，3亿用于经援，7亿用于军援。这一议案在国会引起相当的附和。3月10日，50名参议员致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Tom

Connally），要求国会就麦卡伦议案举行听证会。艾奇逊对该议案不加考虑。他在15日给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的巨额援助肯定会被浪费掉……而且美国将可能被直接导致介入中国的内战”，“这与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和美国利益是背道而驰的”[82]。22日，前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军援和中国军事状况作证，据顾维钧得到的报告说，巴大维“作了一个悲观的、完全认输的报告，说无论何时共产党要夺取全中国，都已无法阻止，现在再给军事援助也无济于事”[83]。

2月15日，顾维钧求见艾奇逊，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反应。艾奇逊说，从马歇尔使华以来，中国政府自作聪明地犯了那么多错误，以致其军队已拒绝与共产党打仗。现在中国形势之严重远非马歇尔出使之初可比，他不知道美国还能进一步做些什么来援助中国。他希望中国能不受外来的控制或统治，但他不知道美国该怎样帮助中国。顾维钧希望美国发表一项对华政策声明以鼓舞中国的士气，艾奇逊迟迟疑疑，不作明确答复。这次谈话给顾维钧总的印象是，艾奇逊已经对中国问题有了某种结论，他没有把中国局势放在重要地位，而是全神贯注于欧洲局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4]。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短短四年就迅速土崩瓦解，其原因何在，是否如美国国会及院外援华集团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对共产党手软所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有一个说法。况且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转变之中，对这种转变也必须有一个说明。为此，艾奇逊上任后不久就开始组织班子，编制《美国对华关系——着重1944至1949年时期》（又称《美中关系白皮书》）。这个班子先由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Walter W．Butterworth）为首，后改由无任所大使杰塞普（Philip C．Jessup）负责。杜鲁门把此事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再指示编辑工作要加快进行，并要求已经退休的马歇尔通读全部文件[85]。

国民党鉴于军事上形成了大崩溃的形势，除继续想方设法争取美援外，还在设想中国内战国际化的方案，即请各大国出面调停，企图赢得喘息的时间。早在1947年12月，张治中就与苏联大使馆有过接触。据美国大使馆得到的消息，苏联甚至表示可以劝告中共停战。但蒋介石不同意张治中的活动。1948年12月25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又向蒋介石发出和平谈判的建议，司徒雷登大使也有此意[86]。马歇尔曾经在战后调处过国共冲突，但没有成功。美国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此时已与战后初期大不相同，美国单独进行调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国民党政府于是设想请美、苏、英、法四大国调停。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文告，声称只要能保障宪法、法统等，“个人更无复他求”。然后，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月8日分别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大使馆，声称“战争的摧毁，继以国家经济生活的急速恶化，使尽速恢复和平成为当前的急务”，政府愿向各国“保证其与中共为和平解决的真诚意愿”，欢迎各国政府提出“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并准备通过各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87]。司徒雷登本人对国民党政府的试探颇有兴趣，他“请求四国政府单个行动或采取共同的步骤从中斡旋，以求把敌对双方撮合到一块”。但这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1月12日，美国政府训令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拒绝中国政府的请求：“美国政府不相信，在当前的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目的。”同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往访代理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Lovett），提出如果美国不同意调停，可否发表一项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是真诚希望和平的。顾维钧的要求同样遭到拒绝。美国官员对中国大使采取了空前冷淡的态度[88]。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分别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调停建议。1月17日，经斯大林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之后，大体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接见中国大使傅秉常，答复说，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苏联进行居间调停是不合适的[89]。英国复照称：“对目前阶段的斗争进行干涉，除了违反莫斯科宣言

外，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因此英国政府抱歉地决定拒绝干涉。”法国也作了类似的答复[90]。

四国干涉方案胎死腹中，顾维钧在上述和洛维特谈话中，关于中国政府方面把实现和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意图，也遭到美国方面的冷遇。但到1949年2月9日，由澳大利亚外长提出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并称“联合国为协助调解，促成问题之解决，挽救无数之生命，实完全符合联合国之原则”。联合国秘书长赖依（Trigve Lie）也表示，他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美国一些观察家也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秘书长有权采取行动。2月11日，行政院长孙科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欢迎联合国调处，并称这或许是“获至我国国内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91]。2月13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干涉之议随即销声匿迹了。

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认为美援是唯一能使国民党政府这个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把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作为他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他就任之初便接见司徒雷登，正式请求他敦促美国政府给予10亿美元贷款，或至少5亿美元，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保证有效地使用美援。他还说，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化100亿美元，美国青年还必须为此流血，而且难以奏效。司徒雷登表示，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政府，中国的局面不会有什么起色；美国的远东政策已定，现在不能有什么改变，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92]。

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解放军迅速突破国民党政府军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李宗仁将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继续抵抗。但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依然十分严重，他感到亲蒋的顾维钧对他完全采取敷衍态度，一味听命于蒋介石，便于5月派他的亲信甘介侯作为私人代表赴美活动，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甘介侯抵美后四出奔

走，频频会见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官员、无任所大使杰塞普（Philip C．Jessup）、副国务卿韦勃（James E．Webb）、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A．Johnson），以及已经离开政府但仍然保持着影响力的马歇尔，并拜会杜鲁门本人进行游说。他竭力兜售李宗仁的防御计划，他解释说：虽然长江防线已被突破，但白崇禧还有30万大军，与其他部队结合起来，国民党军系统还有50万部队，可以守住长沙以南的中国大西南地区；西北则有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可以依恃。他强调现政府财政拮据，蒋介石把美元、黄金都带到了台湾，中国的资源不能用来防守大陆，甚至士兵的饷银都发不出来；白崇禧的部队没有从《援华法》的1.25亿美元军援中得到任何军火弹药，部队极端困难的供给状况进一步影响了士气。他请求美国政府向李宗仁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并称如果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李宗仁政府将用美援购买白银，制成银元，给士兵发饷，因为纸币已一文不值。他还提出，李宗仁政府可以保证美援物资不被浪费，美国可以为其提供的经济及军事援助提出任何条件，并成立机构，以监督援助的分配及使用，也可以向任何地方当局提供援助，“中央政府”不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他还希望美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斗争；希望司徒雷登大使离华返美时途经广州，造访南迁的国民党政府，以示道义支持。但甘介侯的活动像顾维钧一样没有收到什么成效。杜鲁门在6月22日接见他时，对于从东北到长江流域如此广阔的土地以及美国的军火弹药如此迅速地落入共产党手中表示极其失望。他说：“我是密苏里人，我希望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军队仍然准备和愿意打仗。”[(93)] 美国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新的援助。但到9月上旬，国会在讨论军事援助计划将近一个月后，终于通过一项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的新拨款。这项紧急援助可以用于支持中国的反共势力，也可以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残部在大陆被解放军迅速歼灭，这项拨款后来主要用于亚洲别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很少的钱用于在中国搜集情报。

二　美国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

1949年春夏，美国国务院正忙着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这一工作遭到行政机构内的军方、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21日在给国防部长的长篇备忘录中系统陈述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白皮书》上千页文件的总体效果是“极度贬损蒋委员长和中国的国民政府的”，公布《白皮书》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总目标背道而驰，它对公众情绪产生的影响将损害美国决策的灵活性。此外，发表这些文件还涉及解密的问题。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老资格的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认为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相当大的地方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这时发表《白皮书》可能对台湾形势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他还威胁说，公布《白皮书》可能大大损害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国民党方面更是竭力想阻止《白皮书》的公布，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董霖威胁说，如果美国公布《白皮书》，国民党政府将公布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有关文件。杜鲁门、艾奇逊不为所动，杜鲁门认为，“公布《白皮书》是必要的和适宜的”[(94)]。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回到美国的当天，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白皮书》。艾奇逊在为《白皮书》的公布致杜鲁门的信中道出了《白皮书》的中心思想，即中国事态的发展超过了美国的控制能力，美国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国民党的垮台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与领导错误所致。杜鲁门在发表白皮书的前一天发表声明说：“本政府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受到了相当多的误传、误解和歪曲，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本政府不愿意揭示那些事实，揭示那些事实会加速目前中国事态的进展。但在当前局势下，美中两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坦率地讨论这些事实。只有这样，我国人民及其在国会中的代表才能获得对我国在东亚的政策的健全发展所必须的理解。”[(95)] 美国政府本来想以此为其战后对华政策进行辩护，但结果适得其反，国会内外的援蒋势力掀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高潮。《白皮书》发表后五天中，国会中已有二十三篇声明，其中只有四篇是倾向于同意《白皮书》观点的，十九篇都是表示反对的[(96)]。

国民党政府认为《白皮书》的发表对它不啻落井下石。蒋介石“痛惜”美国决策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97]。但毕竟美国是国民党在危难之中的唯一依靠，国民党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因此蒋介石决定吞下这个苦果。他决定，第一，国民党对美国暂不请援；第二，由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明“国家立场”，但“勿对美国作意气之辩论”[98]。8月7日，顾维钧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白皮书》主要表示的是美国的观点，中国政府正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并将表达自己的看法，以便对《白皮书》作出补充；一方面对艾奇逊信中所说的“中国的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的说法感到鼓舞[99]。8月16日，广州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声称对《白皮书》“在意述方面或论据方面，实有不能不持严重异议之处”，并且“不得不于适当时期，将所持观点及有关事实，对中美两国人民作详切之申明”；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吾人雅不愿使两国政府间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传统之友谊，以及民主国家所维护之共同目标。”[100]

这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迁居台湾，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他除了指挥操纵宋美龄等人在美活动外，还自己直接走到前台，从事反共的外交活动。他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中得到启示，认为在亚洲未始不可成立一个类似的反共联盟，于是便在一些亚洲国家中积极活动。但美国既然对中国形势抱着一种等待尘埃落定的态度，自然不会积极支持这种反共联盟。艾奇逊在5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美国不会加入太平洋防御联盟，因为亚洲国家内部的混乱使成立这种联盟为时过早[101]。尽管如此，蒋介石却不甘心坐待失败。7月10日，蒋介石携前外长王世杰等到菲律宾访问。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Quirino）在会谈后于11日晚发表联合公报，其中说，鉴于远东各国“过去缺乏密切之合作，以及考虑及于今日各国独立自由所面临共党威胁之严重，余等认为，此等国家应立即组成联盟，藉以达到休戚相关、互相援助，以抵制并消除共党威胁之目的”[102]。8月上旬，

蒋介石又出访韩国（南朝鲜），并于8日发表与李承晚会谈的联合公报。公报声称："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吾人坚决相信，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而一半则为奴隶。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103)] 这个公报表示坚决拥护蒋介石——季里诺7月12日的联合声明。在蒋介石看来，成立一个军事政治联盟性质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组织可以达到几重目的：第一，蒋介石残存的势力势必在这个联盟中处于中坚地位，这将在他危难之中增加他的政治资本，提升他追随者的士气；第二，他不但可以以中国的代表而且可以以这个联盟的代表的身份与美国打交道，从而增强他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能像介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介入这个联盟，那就会重新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但以上考虑无非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菲律宾内部对这一构想就有不同意见。7月28日，菲律宾外交家、菲律宾驻美国大使洛慕罗（Romulo）在归国后就向季里诺进言说，这样的联盟应当是非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反共产主义的，往后有朝一日也许可以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消除殖民主义应当是这个联盟的目标之一；应当首先征求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意见，以免让人产生这是一个反白种人运动的错觉。洛慕罗并表示，除非季里诺同意他的意见，他不会为此进行外交活动。

季里诺坚持他原来的主张。为了游说美国政府，他于8月9日到美国活动。11日，美菲两国总统联合公报发表，关于所谓的联盟，其中只有一句话："美国将继续以同情的态度注视着亚洲人民为加强经济合作的纽带，为加快自治政府的进展，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而作出的努力。"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改变原先的立场，第一，它只是"注视"，而没有说要参与其事；第二，其中根本没有提到联盟之类，而只说要加

强“纽带”；第三，没有明确提到反对共产主义，更没有说是什么性质的。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从中是得不到什么鼓舞的。

亚太地区各国也都不支持太平洋军事联盟计划。印度认为共产主义的问题要由各国通过社会进步的办法分别予以解决。泰国关心本国共产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国际公约却没有认真考虑，而且认为美国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印度尼西亚明确表示不参加这样的联盟。澳大利亚仅仅表示要密切注视事态发展，而不愿作出任何承诺。新西兰认为没有美国与英国的参加，这样的联盟是没有意义的。缅甸表示要“十分谨慎地注意事态发展，不能让这种联合为某个国家的利益服务”。总之，不少亚太地区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这一政治军事同盟疑虑重重，态度冷淡，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虽然忙碌了一阵，但最终却不了了之[104]。

第四节　走向“一边倒”的中共外交政策

一　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

早在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蓝图。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而蒋介石则是中国的领袖。为了实行这种政策，美国需要在国际上孤立中共，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美国同意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还保证，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共产党[105]

。

这样，美国、苏联与执掌国民政府权力的国民党协调各自的政策，联手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作出了安排，其中没有共产党在国际外交上的地位。按照这个安排，共产党只能对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这种安排在战后头半年中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支持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苏联迫使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解放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亿以上人口，组织了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实力雄厚的大党，尤其在抗战末期，中共已经明确地向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提出了挑战，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美国、苏联与国民党所达成的安排的。中共坚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106] 它决心不让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半途而废，而要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并通过这场革命给中国一个新的光明的前途。

要这样做，首先就要突破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而主要的是要使苏联相信，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不仅不会导致美苏在中国迎头相撞，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恰恰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在对战后世界形势及中国局势进行全面的观察与严肃的思考后，于1946年4月到1947年2月发表了一系列指示、谈话和文章，包括8月6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谈话，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些观点：一、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也就是"中间地带理论"；二、美苏之间必定妥协，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三、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四、这些国家反对美国扩张及本国反动派的斗争是世界民主力量增长的表现，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五、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们

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107]。这就告诉苏联，中共是不会受雅尔塔格局的限制的，苏联不仅不应反对中国革命，而且应当责无旁贷地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的反美斗争取得胜利，苏联的安全才有保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的斗争也是为着世界和平，为着苏联的安全的。这样，毛泽东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与美苏之争的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打破了大国体系的束缚，使中国革命能根据其内在的规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上独立自主争取胜利的道路。“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意义至关重大。

中共明白自己的处境，在战后初期谨慎地处理对外关系，在对蒋斗争中努力实行中立美国的方针，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尽力配合调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中共一度对马歇尔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美国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继续给蒋介石以各种援助，以致使蒋介石有恃无恐，终于在1946年中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对马歇尔调处十分失望，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八九月间，毛泽东分别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与斯蒂尔（Steel），强烈谴责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调处进行公开的严厉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108]中共通过其机关报昭告国内外：中共抱着美国执行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109]。这可以看作中共放弃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公开宣言。从此以后，中共在反蒋斗争中必然连上美国，必然美蒋并提，把蒋介石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而且把蒋介石出卖中国利益给美国、以换取美国支持其进行反共内战，作为动员人民的一个重要根据。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

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110] 这里所说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显然是针对着《中美商约》及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在1946年、1947年签订的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这不仅表示中共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否定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而且表示中共已经下定决心与美国决裂，与美国斗争到底。

与此同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地密切起来。中苏两党的传统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联结两党的纽带。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的实际援助是中共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苏军向中共提供了它在进驻中国东北后所控制的大量武器。据华西列夫斯基（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 元帅的回忆，“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万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关注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111] 。正是苏联留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使其成为中国各解放区装备最好的部队。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辽南中共军队时，驻旅顺口的苏军与国民党军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八至十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政府军不得越过。苏军则让中共部队自由出入，从而使该线至旅大辖区之间八至十公里的地带成为辽南中共党政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苏军还将旅大地区（包括旅顺、大连、金县）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中共，使旅大地区成为苏军控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这样，辽东半岛南端就被封死了，美军和国民党军不能插足这一战略要地，无法在这里登陆，抢运部队，也不能由此撤兵。而中共却得以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起一块稳定的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不但对东北战场，而且对华北、华东战场进行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中共旅大地委在大连建起一批兵工厂和其他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各种重要物资，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重要的供给基地。中共还在这里培训各类干部和技术兵员，如通讯兵、装甲兵骨干等等，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的后方培训基地[112] 。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

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首先，苏联所给予的上述种种帮助，对中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政人员度过1946年春至1947年上半年的困难时期不啻雪中送炭；其次，不使苏联支持中共原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结盟的根本目的，现在中共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动摇了这个同盟的根基；第三，苏联在中国的利益逐渐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结合了起来。

1947年3月美国提出了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只要美国认为哪里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它就可以进行干涉。接着，美国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美国的外交攻势，苏联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促使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并加强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9月，苏联等九个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10月，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美苏之间的冷战在欧洲全面展开。

国际形势的上述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推向前进是一股难得的东风。虽然还不能因此就说苏联已经完全放弃了与美国谋求妥协的政策，放弃了远东的雅尔塔格局，但这至少表明，苏联已经开始放弃仅仅通过谋求大国妥协来维护力量平衡的政策。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革命的行动不仅与苏联在中国的具体利益是吻合的，而且与苏联的全球革命战略也逐渐一致起来。但对这一点，中共党内并不是马上就完全一致地领悟了。在1947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就有不同看法，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与会者认为，国际形势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形势发展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机遇，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仅明确表示接受关于两个阵营的提法，并且对情报局的宣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在

这篇檄文面前惊惶失措”。毛泽东进而对宣言中的观点加以发挥，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13]。这样，毛泽东因势利导，使党内对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更充满了信心，也使中共与苏联结盟有了新的基础。

苏联在欧洲与美国对抗的同时，也发起外交上的攻势，强烈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曾经达成协议，美苏两国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军，盟国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成立统一的民主的国民政府。但美国迟迟没有从中国撤军，而且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在1946年9月下旬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 以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大量材料说明，美国使中国问题复杂化，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1947年4月初，参加莫斯科会议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 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表示，苏联仍然坚持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确认的原则，并强调履行包括“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等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信中还说，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已经将近一年，而美国何时履行从中国撤军的义务，现在尚无迹象[114]。11月，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 在联大会上发言，指出美军继续留驻中国使中国内部问题复杂化了，也给中国造成了特殊的国际地位，美军驻华问题成了一个突出的国际问题。他质问，是什么理由使中国政府非有外国军队不可？苏联的上述表态使美国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本来美国政府内就有一种意见，即“避免使中国问题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主要刺激性因素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115]。所以苏联的这种态度也就对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制约。

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以及两个阵营的形成，从客观上限制了美

国对中国事态的干涉能力。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美国决策者中的主流派，如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乔治·凯南等都是重欧轻亚的，他们认为，西欧与美国休戚相关，如果失去西欧，美国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胁。相反，即使失去整个亚洲大陆，美国仍能生存，或许能重整旗鼓把它夺回来。在1947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逐渐把美国对华政策从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转变为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实行有限度的支持。这种支持离国民党及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相去甚远。

苏联与中共东北根据地的关系在继续发展。及至1948年春，东北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于8月南下至锦州、山海关一线作战，但当时东北连降暴雨，铁路和桥梁破坏严重，恢复交通成为当务之急。应中共请求，苏联派出以茹拉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必要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至同年12月共修复了1500公里的铁路线和9000多米大中型桥梁，保证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苏联还与东北民主政权互通有无，进行经贸合作，于1946年底、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签订了两个贸易合同及一个换货协定，总交易额为4.49亿卢布，东北向苏出口粮食和土特产，进口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及东北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116)]。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直抱有疑虑。1948年夏的苏南冲突为中共消除这种疑虑提供了契机。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认为南共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中共主动站在苏联一边，随即作出反应。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情报局的决定，并表示要从南共领导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中共随即在党内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

工作，要求全党“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的主力军与领导者……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117]。稍后，毛泽东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机会，撰文盛赞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高度评价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严厉批判关于“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指出：“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毛泽东强调，中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决不会走南共的“第三条道路”[118]。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其中指出，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中立是不可能的，“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中共的这些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怀疑。

斯大林接纳中共为其盟友的一个重要表示是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在访问期间米高扬每天向斯大林汇报情况，苏共政治局也经常及时进行商讨，或给以指示。毛泽东首先给米高扬讲中共党史，讲王明的错误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危害和他本人长期受王明打击的情况。米高扬没有对王明作任何议论，实际认可了中共对王明路线的清算。米高扬出发以前便已决定不与王明发生接触，他在西柏坡时确实与王明并无往来。毛泽东谦逊地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只是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没有作什么理论上的丰富。米高扬表示不能同意这一意见，指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承认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消除了毛本人与斯大林感情上的隔阂。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

命一部分的指示以及对南斯拉夫外长希米奇的批判是特别珍贵的，从而又一次表示中共要与南斯拉夫划清界限。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表示，苏联在那里保留军事基地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苏联的军事基地可以继续保留下去。斯大林得知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后，于2月5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军撤离日本，苏联就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把苏军从旅顺口撤出。但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从旅顺口撤军是可取的，苏联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苏联这一表示对于中共与苏联结盟是至关重要的，中共将可以在全民族面前表明，中共与国民党不同，它不是靠让与国家主权来与外国结盟，反之，中共与苏联结盟的直接结果是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了回来。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担保说，苏联不赞成新疆独立，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意图，新疆无疑应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关于蒙古，毛泽东问道，苏联对内外蒙古合并的问题持何态度，米高扬答道，这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毛泽东说，如果合并后纳入中国版图？米高扬称，这不可能，因为外蒙古已经独立很久了。毛泽东表示，中共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希望在中共建立新政府后，苏联能立即带头承认。对于别的外国，中共表示不急于求得它们的承认，但若它们表示愿意承认，也不加以拒绝。米高扬向中共领导人建议，要尽快攻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然后立即成立政府，那样中共就不仅是以爱国者的身份行事，而且是以政府出面了，在国际关系中是需要这样的。在会谈中双方还确定了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中共建议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应中共要求，与米高扬同来的科瓦廖夫（И．Ковалев）被斯大林派作私人代表留在毛泽东身边[(119)]。可以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二　中共的反美斗争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表明，中国革命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承认。这无疑大大

增强了中共的信心，使中共在反美斗争中采取更坚定的立场。此后，中共把与外国建交的方针具体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其前提是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帮助国民党[120]。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也考虑与其建交。但中共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中共的政策，因此，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121]。

中共不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而且为了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共通过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ngus Ward）事件的处理实际确定了挤走美国外交人员的政策。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指示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决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122]。中共中央对此的反应是于11月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123]。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台，随后总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起来。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和传递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且与美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124]。美国国务院曾经多方设法试图与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均无结果。1949年5月底，国务院宣布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125]。鉴于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驻南京、上海、北平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

方式试图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要求解除对沈阳总领事馆人员的软禁，中共的反应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

中共虽然确定了“挤走”西方外交人员的方针，并在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明确规定：坚决否认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的地位和权利，留在被解放城市的外国记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只给予外国侨民待遇[126]。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是留有余地的。上述指示发出后不到一个星期，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中就作了两项变通规定：一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127]。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似乎表明美国尚有曲折承认未来新政权的可能性。3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与中共方面谋求疏通和解。陈铭枢派人从上海到北平报告说，司徒雷登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于3月25日、26日与陈密谈，希望陈向中共解释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雷登表示对中共有两点顾虑：“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雷登并表示，美国希望中共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只要中共真正实现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128]。紧接着，毛泽东又接到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有关政策的复电。斯大林建议，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正式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

往来，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129]。

司徒雷登的试探与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共得以在适当时机运用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五六月间，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及南京市委的指示，数次会见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在这几次谈话中，黄华强调的是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应立即停止这种援助，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撤退驻华军队，以实际行动表明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而司徒雷登按照艾奇逊的指示称，现在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很多地方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等以后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拥戴的政府，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问题自然解决。司徒雷登还一再强调，希望中国新政权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黄华答道，中国政府的人士组成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130]。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进一步表明，中共与美国之间在根本立场上相距甚远，几乎没有和解的可能。尽管如此，当傅泾波表示司徒想在回国之前访问燕京大学时，中共仍然认为可以考虑。但这一动议为美国最高当局所否定。而在6月30日后，中共也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已不再有任何兴趣。

由于美国步步为营，试图阻挠中共解放全中国，而且迟迟不撤出它在华北的主要海军基地青岛[131]，中共一直把美国直接出兵进行干涉这种可能性估计在内，并从具体的战略部署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共制定了乘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战略。在渡江战役以后，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屯兵江西，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在三野解放上海、福建、青岛等地，美国直接出兵中国的疑虑消除后，再向西南进军。5月28日，毛泽东又指示各大野战军首长：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我们的“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

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132]。

在具体行动上，中共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1948年9月济南解放。由于美军驻扎在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向青岛进军。渡江战役以后，4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军区，可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133]。上海战役时，一部分美军又撤向青岛。5月13日，黄华在会晤司徒雷登时，后者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说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黄华乘机提出，既然这样，就应将美国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134]。5月21日美国舰队撤离青岛，驶往日本和其他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于6月初解放青岛。在解放上海前夕，毛泽东也于4月29日指示有关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5月6日又再次指示：“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135] 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情况是，解放军打到那里，美军即从那里撤退。解放军没有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与外国军队的唯一正面军事冲突是在长江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小规模炮战。

4月20日凌晨，正是在渡江战役开始前一天，从吴淞口溯长江西行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驶入江阴以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地。在“紫石英”号此次航行之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已经发出报道，国共军队在长江地区已有战事。“紫石英”号也作了各种准备。8时许，“紫石英”号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闯入作战地区，受到解放军炮火打击。9时半，英舰驶到三江营附近解放军阵地，双方展开炮战，英舰中弹三十余处。英舰被迫停在新坝岛西150码的泥岸中。下午1时40分，英国驱逐舰“伴侣”号由南京方向驶来救

援，与解放军发生激烈炮战。在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救援没有成功，“伴侣”号乃驶往江阴。入夜，“紫石英”号进行了抢修，并把所有可以丢弃的东西都扔下舰去，以减轻重量，终于在半夜得以从淤泥中冲出，继续溯江而上，停在镇江附近江面。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号的情况后，副总司令梅登（Alexander Madden）海军中将立即乘旗舰“伦敦”号并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并与21日晨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英舰置解放军警告于不顾，双方发生炮战。“伦敦”号与“黑天鹅”号被迫放弃救援企图，掉头驶回上海[(136)]。4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批驳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W．Churchill）和首相艾德礼（C．Attlee）为英舰所作的辩护，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137)] 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与“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John Simon Kerans）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其中心问题是，中方要英方承认侵犯中国的内河及解放军的阵地，并向解放军道歉；英方竭力回避，并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7月30日，“紫石英”号乘一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逃脱。“紫石英”号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但英舰明知长江正有战事，却又冒险驶入，足见其仍然抱着老殖民主义的态度，盛气凌人，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解放军捍卫自己的领水和防区，给了英国军舰和所有外国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信号：外国炮舰可以在中国水域任意游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舆论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共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托（И.Тито）抱有希望。1949年上半年，《新共和国》、《堪萨斯城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捷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大量

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或专栏文章，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共与苏联之间将在许多方面产生摩擦[138]。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幻想“向美苏两面靠”。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批驳和澄清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和错误，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对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新政权的外交格局大致确定下来。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对此十分重视。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诬蔑为是“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而且写道：“我们仍然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最终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和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139]这就表明，虽然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是失败了，但美国并不甘心，并不就此罢休，它还要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美国恰恰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这不能不使中共格外警惕。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140]毛泽东在规划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筹建新政权的百忙之中，亲自执笔，从8月12日到9月16日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六篇社论，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酣畅淋漓地揭露和批判了一百多年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揭露和批判了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似乎要把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中积郁的愤懑统统地倾倒出来。毛泽东特别指出：“先进的人们……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争取了他们，帝

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141]

中共对白皮书的批判成为一场中国国耻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育运动，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成为肃清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影响的“打扫干净屋子”的运动。整个八九月份，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掀起了批判白皮书的高潮，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人民日报》隔两天就以大版大版的篇幅刊登有关的消息和文章。毛泽东十分关心这个学习运动的进展，尤其是为艾奇逊所瞩目的对美国民主尚有一些好感的人们的反应。8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了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其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他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142]。毛泽东看到这个声明十分兴奋，当即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同日，毛泽东致函民建领导人黄炎培，高度评价民建声明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起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143] 如果说“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表明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取向，那么对白皮书的批判则是表明了新政权的价值取向。中共利用白皮书的发表加强了中国广大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使他们从思想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接受和支持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大概是艾奇逊始料不及的。

---

(1) *FRUS*，1947，Vol．7，pp．1045-1054，1085．

(2) William W．Stueck，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41．

(3) *China White Paper*，p．746．

(4) *FRUS*，1947，Vol．7，pp．790，800，843．

(5) *FRUS*，1947，Vol．7，pp．788，791-797，802-804．

(6) *ibid*，pp．786-789，792，804，834-848，846-847，851．

(7)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p．42．

(8) Authur H．Vandenberg，Jr．，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Boston，1952，p．523．

(9) 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448．

(10)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Arthur Schlesinger，Jr．，*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V01．2，pp．309-313．

(11) *FRUS*，1947，Vol．7，pp．813，823-824．

(1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31—135页。

(13)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449；*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p．44．

(14) John F．Melby，*The Mandate of Heaven．Record of Civil War in China，1945-1949*，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71，p．275；W．S．Swanberg．，*Luce and His Empire*，New York，1972，pp．252-254，265-267．

(15) *FRUS*，1947，Vol．7，pp．957-960．

(16) *FRUS*，1947，Vol．7，pp．833-834．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54-160页。

(18) *China White Paper*，p．255．

(19)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8，p．388．

(20) *FRUS* ，1947，Vol．7，pp．682-684．

(21) *FRUS* ，1947，Vol．7，pp．713-715．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3页。

(23) *China White Paper* ，pp．772-774，808-814．

(24) *FRUS* ，1947，Vol．7，pp．777-781；*Wedemeyer Reports* ，pp．388-397．

(25)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hina”，*Life* ，Vol．23，No．15．

(26) *FRUS* ，1947，Vol．7，p．892．

(27) *FRUS* ，1947，Vol．7，pp．917-918．

(28) *FRUS* ，1947，Vol．7，p．932；（*China White Paper* ），p．975．

(29) *China White Paper* ，pp．348-350；Ernest May，*The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1945-1949* ，NewYork，1975，p．26．1948年3月，马歇尔又批准顾问团去南京训练中心，7月，批准其去广州、汉口、成都等地训练中心。

(30) John Campbell，*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7-1948* ，NewYork，1948，p．471；《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75、278页。

(31) *China White Paper* ，pp．376-377．

(32) *ibid* ，pp．379-380．

(33) *ibid* ，p．1006．

(34) *China White Paper* ，pp．380-384．

(35) *China White Paper* ，p．436．

(36) *ibid* ，pp．1011，1030．

(37) *FRUS* ，1950，Vol．6．pp．351-352．

(38) *China White Paper* ，pp．1042-1044．

(39)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1961年版，第77-78页。

(40) *FRUS* ，1945，Vol．6，p．609．

(41) *FRUS* ，1945，Vol．6，p．256．

(42) 人民出版社编：《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1951年版，第17-19页。

(4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页。

(44)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20-30页。

(45) 转引自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46) *FRUS* ，1948，Vol．6，p．1011．

(47)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39-40、277-278页。

(48) 《对日和约问题》，第6-8、13-14、22—23、25等页。

(49) 《对日和约问题》，第68、73、76—80、84页。

(50) 《对日和约问题》，第81—90页。

(51) 《国民政府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2页。

(52) 《对日和约问题》，第73、76页。

(53) 《对日和约问题》，第183、185、190、195等页。

(54) 《对日和约问题》，第180、186页。

(55) 《对日和约问题》，第182-183、186页。

(56) 《对日和约问题》，第187页；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4页。

(57) 《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19日。

(58) 档案号十八，31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按：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美国于1950年9月再次提起，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五十二国参加的对日和会。由于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被排除在和会之外。9月8日，会议举行和约签字仪式，苏联、波兰、捷克拒绝签字。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旧金山和会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中日两国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笔者。

(59) 台北“国史馆”藏有关档案，转引自郭希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损失调查及赔偿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60) *FRUS*，1945，Vol．6，pp．997-998．

(61) *ibid*，p．1007；《对日和约问题》，第146、174页；参见刘士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当代亚太》1996年第6期。

(62) *FRUS*，1945，Vol．6，pp．1006，1012．

(63) 《对日和约问题》，第138-139页。

(64) 参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这一统计显然是很不完全的。首先，“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的损失没有统计在内；其次，东北地区、台湾、澎湖以及广大敌后根据地的损失没有统计在内。据199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书刊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笔者。

(65) 行政院新闻局：《日本赔偿》，1948年3月版，第8-9页；《对日和约问题》第141—142页；*FRUS*，1947，Vol．6，pp．395-396．

(66) 《日本赔偿》，第4-6页。

(67)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军事报告》，1947年9月9日国防部编印，档案号七一一（5），1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FRUS*，1947，Vol．6，pp．376-380．

(68) 参见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5页、114-115页。

(69) 《对日和约问题》，第145—146页；《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15页；《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8-669页。

(70) *FRUS*，1948，Vol．6，pp．1009，1015．

(71) 1949年5月美国停止实施先期拆迁计划，原定拆迁计划只实施了10%。在旧金山和会期间又重提赔偿问题。美国当时为应付朝鲜战争，急需扶植日本，力主盟国放弃对日赔偿。台湾当局的生存本身也有赖于美国支持，对于美国的这一主张难以反对。1951年1月22日，台湾当局代表顾维钧在向杜勒斯递交对美国关于对日媾和七原则的答复时表示，台湾准备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必须以其他国家也同样放弃为条件。和约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提出放弃其他赔偿，只要求日本提供劳务补偿。日本坚持在华财产作为赔偿已经足够，拒绝台湾当局要求。1952年3月20日，美国国会批

准对日和约。台湾当局被迫作出全面让步，放弃包括服务补偿在内的一切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台湾当局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1972年，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笔者。

(72) 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70-671页。

(73)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75页。

(74)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488页。

(75) Papers of Mathew Connally，Box 1，Harry S．Truman Library．

(76) *FRUS*，1948，Vol．8，pp．146-155．

(77) *FRUS*，1949，Vol．9，pp．826-834．

(78) White House Summary of Telegram，November 8，1948，RG 59，Records of Office of Executive Secretary，State Department，NARS．

(79) *China White Paper*，pp．286-287，888-889．按：巴大维只领少将衔。

(80)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93页；*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p．491-492．

(81)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499；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Inc．，1969，p．402．

(82) *China White Paper*，pp．1053-1054．

(8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1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44-48页。

(85) *FRUS*，1949，Vol．9，pp．1368-1369；*Present at，the Creation*，p．397．

(86) *China White Paper*，pp．265-266，896．

(87) *China White Paper*，pp．920，922．

(88) *China White Paper*，pp．291-292；《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611—614页。

(89) 参见本书第七章。

(90) 参见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并参见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3页。

(9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集》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7-488页；并参见《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773页。

(92)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48-949页。

(93) *FRUS*，1949，Vol．9，pp．699-721；《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27-155页。按："我是密苏里人"的意思是，我是讲求实际的；而杜鲁门恰恰是密苏里人，因此在这里是一句双关语。——笔者。

(94) *FRUS*，1949，Vol．9，pp．1369，1373，1385-1390．

(95)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August4，1949．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38页。

(97) 《风雨中的宁静》，第227页。

(98) 参见梁敬錞：《美国对华白皮书之经纬与反应》，《传记文学》（台北）第33卷第1期。

(99) Statement by Willington Koo on White Paper on China，August7，1949．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100) 《大公报》（重庆），1949年8月17日。

(101)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59．

(102)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12日。

(103)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9日。

(104) Fisher to Butterworth：*Chiang Quirino Proposal for a Pacific Union．Chronology and Developments*，July 15，1949；Ogburn to Butterworth：*Chiang Quirino Proposal for a Pacific Union，and Quirino Romu-o Proposal for a Southeast Asia Union*，August24，1949，Melbey Papers，Harry S．Trumen Library．

(10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7-1328页。

(106)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4页。

(10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5—1161页；并见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1947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13—726页。

(108)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6页。

(109) 《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10)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111) Ю．В．ЦуАбдеев，реяд.По лоротам Кцтая （1937-1945），338．ctp.1989．

(112) 韩光：《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辽沈决战》上册，第585页。

(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1204页。

(114) 葛罗米柯等主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第5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1—186页。

(115) *FRUS*，1947，Vol．7，p．786．

(116) 参见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17) 《中共中央关于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1日），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273页。

(118) 《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57页。

(119) А．Ле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1-2，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2-3，1995．

(120)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0-1404页；《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

(121) 《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态度问题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28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122) *FRUS*，1948，Vol．7，p．826．

(123) 《周恩来年谱》，第796页。

(124) 参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25) *FRUS*，1949，Vol．8，p．960．

(126)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4-49页。

(127)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78-79页。

(128) 前引《历史研究》1994年5期杨奎松文；*FRUS*，1949，Vol．8，p.174．

(129) И．Ковале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1-3，1992г．

(130) 《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内容》（1948年6月7日）；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页。

(131)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477页。

(13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06-507、510-511页。

(13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90页。

(134)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6-27页。

(135) 《新中国外交风云》下卷，第491、497页。

(136) Malcolm H．Murfett，*Hostage on the Yangtze．Britain，China，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Annapolis，Marylan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1，pp．50-76；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新中国外

交风云》，第33-35页。

(13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4—86页。

(138) Nancy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49．

(139) *China White Paper*， XVI．

(14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8页。

(141)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5页。

(142)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4页。

(1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54—555页。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第五项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是年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批民主人士开始进入解放区，酝酿成立新政协。

辽沈战役胜利之后，新政协成立的条件趋于成熟。1948年11月25日，在哈尔滨，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为代表，同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几次商谈，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商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计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其任务为：“（1）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2）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3）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新政协召开的时间订在1949年，具体日期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协议商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1)]。筹备会原定在哈尔滨召开，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平津地区，许多民主人士直接去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

县。北平和平解放后，进入东北的民主人士也转赴北平。

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他预计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2)] 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就在北平展开。

不久，南京、杭州、上海于四五月间先后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就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6月11日，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新政协筹备问题的第一次预备会，毛泽东、周恩来及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仅救国会代表缺），大体议定了新政协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会议分组，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筹备会常务委员人选及日程，等等[(3)]。正式开始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在举行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了议事日程等案之后，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式，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名代表，会议主席周恩来宣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他满怀胜利豪情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

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4] 筹备会推选了常务委员，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就有关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分组，并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讨论，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会后，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六个小组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周恩来兼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组长，并亲自执笔起草。

毛泽东在面临着胜利的时刻，对新中国的政治路线问题非常重视，对中间路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正在起草共同纲领期间，他于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他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他阐述了近代中国走过的道路，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因此，毛泽东郑重表明了“一边倒”的路线：“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5] 这篇文章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当时，在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传话的陈铭枢，于7月10日，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司徒解释说：“‘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有依赖别人的意思。”[6] 陈铭枢本人在上海解放以后，写作并印刷了《论国共再合作》一文，他认为：“现在革命的领导，虽然是工农阶级，革命的先锋虽然是共产党”，“但是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

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7] 显然，他当时对人民民主专政还不理解。不过，这本小册子在朋友的劝告下，没有散发。他给司徒的备忘录，则是他到北平和毛泽东、周恩来长谈之后的体会。

确实，美国方面正在中国活动形成“第三种力量”。据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资料，1949年6月间，司徒雷登就授意他在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中国朋友：“深入到新的国家机关里面，然后据有巩固的地位，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影响中共的政策，使他对于美国不那么危险，而共产党人本身也变得温和起来。”1949年11月17日，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同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通报说：“目前，美国的情报中心，已从驻华的美国大使馆转移到了香港，美国人在那里成立了专门的‘远东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研究委员会’在自己的骨干面前，以及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特务面前，提出的首要任务，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美国特务的主要干部，来源于在美国、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华侨，以及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潜在的基础，美国人在那里能够招募到自己的特务，同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主党派的右翼活动家，例如，罗隆基、张东荪和其他人，也在被关注。”[8]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毛泽东针对白皮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白皮书中宣扬的民主个人主义。他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要求先进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9]。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作了一系列的阐述，已经不容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8月13日，黄绍竑等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

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10] 对于这个声明，上海《大公报》上于8月17日发表短评：《拿出行动来》，认为他们虽有进步，但思想尚有问题："他们是准备与共产党'彻底合作'的，不是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直到9月2日，《人民日报》上才发表消息表示欢迎。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孙文主义同盟等小党派组织，前来联系参加新政协的问题。当时，民社党革新派已同张君劢一派分裂，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孙文主义同盟成员，曾在南京、镇江、荻港、江阴等地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其成员朱大同、张达生、陶鸿钊、中委陈惕庐等，在上海被汤恩伯捕杀。6月初，孙盟骨干又被逃往广州的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并由法院依法办理[11]。对于他们的要求，新政协筹备会方面，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报告说："关于民社党革新派的问题，根据第一次预备会议的意见，我曾和汪世铭谈过话，当面指出，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能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五一'口号时，还是动摇的，故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其一二人参加。谈过不久，忽然发现了民社党革新派的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反动，我曾质问汪世铭，汪表示确实不知此事，并也认为措词偏激，足为解决问题的阻碍，他曾去信上海查究。我向他指出告同胞书不但是反动的内容，而且是反动的行动，如他愿意时，希望能公开驳斥，他又来信说有同感，且已反驳，但驳的地方甚少。他的来信现都存在，将来当印出来，分发各位。对于此事，汪世铭曾写信给沙彦楷，沙已有复信，说他当时卧病不知道，事后已处置并开除数人。北平市公安局举行反动党团登记时，曾要汪世铭登记，他请求免予登记，我曾告汪：告同胞书确是反动的，不过汪既称不知道，又愿公开驳斥，则可由汪向公安局声明其

已解散，即不必登记。从这些事来看，作为一个党派，太不像样了。至于汪世铭个人尚老实，所以名单上已经列了名，是否应该请他参加，请各位考虑。其次，关于孙文主义同盟，许闻天已经统战部同意邀来北平，我曾和他谈过话，许说明他们的反蒋斗争和转变，而且是牺牲了不少人。孙盟中如陈惕庐今天是被反革命杀了，过去也确是有罪的叛徒；又如刘不同，直到1948年下半年，还在南京写文章，一方面骂蒋介石，一方面骂中共和毛主席。作为团体来说，我曾劝其结束，并个别加入民革。至于许闻天本人，还有侯雨民或邓昊明则可以考虑。”[(12)] 这两个组织及另一些分子复杂的小组织先后解散。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共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书记、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周恩来对于新政协的组织问题多次作了阐述。6月22日，他在党组会上作了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指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前进[(13)]。

为了筹备新中国的成立，刘少奇于6月21日从北平起程，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中共代表团就建国的方针政策向斯大林作了书面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上作了批语，肯定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其中就国家性质阐明说：“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对！）在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对！）这是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以及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对！）”[14]

7月5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并于7月7日发表，宣言指出：“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宣言强调指出：“当我们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力量认为必须引起全世界注意：为了最后实现抗日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致要求迅速签订对日和约；我们一致主张在准备对日和约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照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的程序，并且必须由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派遣中国的全权代表。”[15]

8月26日、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周恩来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6]。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指出，只有“愿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才能代表人民。所以，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根据，是以工

人阶级、农民阶级为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方面。他强调指出，人民政协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它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集中表现。在未能实现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17]。

9月17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为政协会议作好了一系列准备，这次会上，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9月20日，最后确定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五大类，共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共计代表662人。至此，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政治、法律、体制建设和政府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筹备就绪。

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的各党派团体的代表634人，应邀来宾300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郑重宣布："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庄严地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8] 在当天的大会上，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先后发了言，对人民政协的召开十分兴奋，祝贺新中国的诞生。

9月22日，周恩来代表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他解释了为什么在总纲中没有明确写入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的问题："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解释了"人民"和"国民"的不同定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改造成为新人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他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

关于国家名称的问题，筹备会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在《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

解释说："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了。"[(20)] 当时，在人民政协文件原稿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词后，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后来经讨论决定取消这个加括弧的简称，与旧中国的国号彻底割断了联系。

9月27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入了第七天，在这一天，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毛泽东为这一文件的制订作了大量理论上、宣传上的准备。周恩来在政协筹备期间亲自起草了这一文件，并进行了多次充分的讨论。

《共同纲领》在序言部分阐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这就以法定的形式，否决了旧民主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

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21)

《共同纲领》第一章为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第三条从总体上规定了国家经济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共同纲领》第二章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第十三条规定了政协职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共同纲领》第七章规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第五十六条规定了新中国的建交原则：“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22]

在这一天的政协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选举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65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23] 最后，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4]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各自就职，决定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

下午三点整，毛泽东和新中国的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城楼上高挂着八盏传统的大红宫灯，城楼上下，红旗招展，鲜花盖地，天安门广场五彩缤纷，30万群

众集会，情绪昂然，热血沸腾。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即按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声炮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二十八个艰难岁月，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接着，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的建国工作，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25)

随后，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在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之后，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26)

在开国大典进行的时候，原国民党军残部尚据有西南和华南地区，以及台湾、澎湖、舟山、海南等岛屿。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正向衡阳、韶关一线进击，第三野战军一部正向厦门一线发起攻击，第二野战军主力正向湘西集结，准备

入川作战，第一野战军则正在准备和平进驻新疆。胜利之师，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尚未解放的各地进军。

第二节　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溃灭

一　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衡宝战役和两阳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残部之华中白崇禧部和华南余汉谋部受到沉重打击，各部士气和战斗力都严重下降了。尤其是白崇禧主力被歼灭之后，国民党军最后一部有战斗精神的力量，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尽管还据有西南和广西的广大区域，拥有上百万的军队，但分崩离析，各自为谋，难以协同作战。

当时，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一部进至廉江、信宜一线，余汉谋的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于11月3日从湛江移设海南岛的海口，所属第四兵团等部占有廉水之线及以西地区。白崇禧部退入广西，进行整补，长官部移驻桂林。不久，广西绥靖公署移南宁，省府迁往百色。广西各部向东南沿海撤退的道路已被解放军截断。贵州绥靖公署谷正伦拥有第十九兵团二个军和保安部队九个团。国民党中央系残部数十万人集中在四川一带，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指挥，扼守四川。国民党政府也已撤至重庆。

早在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政府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仅云南省主席卢汉未至。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以罗广文部从川东北的大竹一线，经50天行军移防川西北，10月中旬行至绵阳时，军情变化，又向南改开贵州桐梓，布防娄山关。并以原有的第一〇八、一一〇军及新拨第四十四军组成第十五兵团，任命罗广文兼任兵团司令官，一路上疲于奔命[27]。

入川道路除川东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外，主要为南北两路，北路

由汉中经剑阁入川，南路由湘西入黔，经黔北直趋重庆。而国民党军在南路的防御十分空虚。9月下旬，参谋本部曾建议华中及西南两战场，归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一指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至少以五个有力之军，配置于平越、都匀、独山之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于贵阳，以昆明为后方”[28]。但桂系方面没有接受这个在大陆作战、没有海口联络、为蒋介石系统扼守四川南方门户的方案。11月初，阎锡山又建议以“国防部长”一职让白崇禧兼任，并拟将黔桂两省划入华中军政长官辖区，主要目的是要白崇禧堵住芷江这个口子，不让解放军由湘西入黔，威胁重庆。但白崇禧“坚不接受”[29]。白崇禧一直谋求国防部长一职而不得，这时候也就不愿为蒋介石扼守四川门户。何况，当时白崇禧已经直接接受美援[30]。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集军事会议，会上参谋部门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向南转移，于广西地区策划持久，不得已时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第二案：向西转移，进入黔、滇与西南地区兵力会合，以策后图。”[31] 会上，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和李品仙赞成第二案，多数人赞成第一案，最后由白崇禧裁决：“华中主力，准备向南转移，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32]

不过，在相当时间内，解放军对四川蓄势待发，屯兵不进。国民党军也仅消极备战。在第四野战军进行衡宝战役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向西南进军也开始进行部署。在北路，10月10日决定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第十八兵团入川，在安康一线作战的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及第七军等部配合对汉中胡宗南部作战。以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在常德、湘潭一线集结，准备入川，于12月间进抵叙州、泸州、重庆一线，待二野达到上述一线后，贺龙部向胡宗南部发起攻击，并进击成都。二野第四兵团入桂作战后，明年一二月间进入云南。同时，确定了西南地区的领导成员，以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为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33]。

10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北京乘车出发，翌日到达徐州，率

野战军司令部及第三兵团司令部乘火车经郑州前往武汉[34]。23日发出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第五兵团应于11月15日前攻占贵阳，兵团主力于25日攻占毕节，12月10日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带。第三兵团应于11月15日前攻占思南、永绥（今花垣）、永顺之线，25日攻占遵义、黔江、彭水之线，兵团主力于12月10日左右攻占泸县、江津地带。但命令第三兵团右翼不要过于突出，在第五兵团未到毕节之前，不得先到黔江，以免宋希濂、孙震部过早撤退，对以后作战不利[35]。列车经过郑州时，刘伯承公开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了一副沿陇海路从徐州经郑州、西安，将由北路入川的模样，而部队则早已在湘西秘密集结。

与此同时，当陈赓兵团向两阳地区追击的时候，林彪主要是担心两广残敌向云南撤退，所以仍以第十三兵团向柳州方向前进，以大迂回方式，绕过桂林、柳州，直插果德、南宁之线，截断敌向云南的退路，准备在二野到达贵阳时，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灭敌人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林彪建议二野以第五兵团先占昆明，断敌退路，但毛泽东鉴于粮食困难，敌情不会太严重，仍指示仅以第四兵团经营云南[36]。为了集中兵力歼灭运动灵活的白崇禧部，林彪决定增调第四十六军两个师和第四十九军全部参加广西战役。10月29日，林彪率指挥机关从武汉出发，于11月1日到达衡阳，就近指挥各军。10月3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以陈赓、程子华两个兵团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崇禧部的任务，同时，在白崇禧部向云南、越南撤退的道路被截断的情况下，有向东突入广东的可能，因此，指示华南分局，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必须全力镇守广州、韶州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37]。11月4日，第四野战军作出了分三路进军的部署，“第一步求得首先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其部署为第十三兵团二个军，攻击通道、靖县，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11月10日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

防敌退雷州半岛。尔后或向南宁，或向钦州、廉州前进截敌。中路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路超出后分沿湘桂路及其两侧推进[38]。

11月6日，西路军自湘西武冈、洞口地区出动，10日，南路军向廉江、信宜北前进。13日，林彪根据谍报，白崇禧有向雷州半岛及越南撤退的计划，即命令第四兵团向信宜、茂名集结，廉江一线筑工固守，并调广州的第四十三军参战。16日，命令中路各军出发追击。

当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向贵州进军，白崇禧于11月9日命令桂林附近的第一兵团、三江附近的第十七兵团驰援贵州，但行动落后，贵州方面已经无法支持。白崇禧针对南路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前锋部队兵力薄弱，计划集中兵力予以攻击，进而开辟海上通路。11月21日，白崇禧命令第十一兵团由容县向信宜攻击，第三兵团向化县、茂名攻击，余汉谋部第四兵团则配合作战，向廉江攻击。同时，因解放军推进迅速，即命令第十兵团放弃桂北撤退，命令第一兵团、第十七兵团放弃援黔，协助第十兵团撤退，掩护南路军的安全。24日白崇禧南路各军于拂晓同时发起攻势。林彪得悉白崇禧将于南路发起攻势后，即于22日动员各部进行“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39]，并部署以第十三军一部在廉江牵制余汉谋部，集中三个军首先围歼敌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但陈赓认为廉江方面过于危险，主张就现态势首先歼灭张淦兵团，然而林彪坚持原定部署，不容变更。陈赓将自己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为协调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思想，指示适当调整部署，置重点于左翼，并指示中路、西路各军迅速分数路南进。当时，林彪与陈赓之间作战指导思想不易沟通，他与第四兵团及各军电讯难通，各部位置不易查明，陈赓即独断指挥。

解放军西路军除一部向百色挺进外，主力东转寻敌，中西路各军推进迅速，迫敌仓促溃退，22日进占桂林，24日占领思恩，25日占领柳州、梧州。白崇禧面临腹背受敌，仍力求向海岸突进，26日发起全面攻击，与解放军第四兵团激战。而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奉林彪命令

正向敌左翼迂回，围歼第五十八军之二二六师。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被迫北移，张淦的第三兵团陷于孤立，至27日，陈赓兵团第十四、十五两军乘隙包围了第七军的两个师。国民党军陷入一片混乱，各部失去了通讯联络，只好各自为战，力图突围逃生。战至30日，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突入博白，歼敌第三兵团部，俘虏兵团司令官张淦，第四兵团歼敌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大部。余汉谋残部逃往海南岛，解放军旋即占领雷州半岛。12月2日，解放军各部继续发起追击，至11日占领凭祥和镇南关，14日占领爱店，控制中越边境，白崇禧部主力被歼灭殆尽，白本人逃往海南岛，仅第一兵团黄杰等部二万余人逃往越南，被驻越法军解除武装。广西战役解放军共歼敌17.3万人。

第四野战军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抽调了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及湖北军区部队等九个师，加入第二野战军右翼围歼宋希濂集团的战斗。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在500公里的地段上，越过崇山峻岭，出敌意料之外，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以杨勇率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的第十军分由邵阳和桃源出动，进行大迂回作战，从锦屏、天柱西进，击破敌第十九兵团的抵抗，10日前即占领镇远、三穗地区，15日分别占领贵阳、思南。以陈锡联率第三兵团主力为左集团，主力由永顺出发，向秀山、永绥进击，以第十一、第四十七军向龙山、黔江前进；以第五十、第四十二军及湖北军区部队为右集团，由王宏坤指挥，分路渡江后向建始、恩施、宣恩进击，并以一部进击巴东，对宋希濂部实施钳形攻势。至7日，右集团攻占恩施，左集团攻占秀山。宋希濂于11月7日在来凤召集各将领会议，发现形势极为严重，即将陷入解放军的大包围之中，当即命令各部向彭水撤退，沿乌江西岸布防。12日，解放军左右两集团所部在咸丰地区会合，切断川湘公路，将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兵团的五个师包围于宣恩、咸丰、鹤峰地区，除一个师突围外，四个师被歼灭。解放军各部迅猛追击，于15至17日间，分别进至利川、鱼泉口，威胁川东孙震集团，并进占彭水、酉阳，进抵乌江东岸，第十二军前锋于龚滩强渡乌江，

威胁敌之侧后。宋希濂率部于16日火焚彭水后逃至乌江西岸，在江口布防。17日，蒋经国到前线劳军，宋希濂在江口与他会见，公开表明："大家多已丧失信心，战斗意志是不坚强的。"[40] 这时，尚在东岸阻击的宋部第十五军受到解放军的攻击，于20日退到江口西的中官渡，宋希濂指挥部受到威胁，即命令第二军撤退至白马山，扼守川湘公路要隘，准备向南川方向撤退。21日，宋希濂即撤离江口。

解放军进展迅速，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本于解放军攻势发动后，从川北调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南下阻击，这时即在宋希濂部掩护下向南川集结。同时，已于11月14日从台北飞抵重庆亲自指挥的蒋介石，急忙于11月19日调胡宗南部第一、第三军增援重庆，并命胡部撤入四川。但这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也对胡宗南部展开攻击，进行牵制，使胡部感到威胁，难以立即后撤。直至11月25日才开始撤退，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即尾敌跟进，但未予追击，以待大迂回的完成。

刘伯承估计宋、罗兵团可能向重庆或泸州方向撤退，尤其是向西经泸州、宜宾撤至昆明的可能最大，因此11月21日指示说："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他估计敌如11月25日撤退，则12月1日可达叙永，因此要求第五兵团及第十军确实计算行程和时间，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三兵团从正面多拉住敌几天，以第四十七军向涪陵前进，要求在长江南岸地区包围歼灭敌军[41]。

但事实上，国民党军残部已不堪一击。21日下午，解放军前锋渡江控制了白马山，阻击向西撤退的陈克非的第二军。22日，解放军第三兵团各军及第四十七军，分路向乌江渡口挺进，敌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至乌江东岸的渡口白涛镇指挥残部抵抗，被解放军俘虏，十四兵团溃灭。第二军除军部千余人外，大部被歼，残部找小路逃走。第二十兵团也瓦解了。宋希濂率残部万余人由南川向綦江逃跑，准备不理睬统帅部，经西昌向滇缅边境自谋生路。

正当宋集团溃散之际，罗广文兵团正奉命由南川一线北进。21日，罗兵团右翼在南川之北即遭到解放军第十二军的攻击，23日，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主力自白涛镇渡江，攻击罗广文兵团。罗兵团被迫向长江边转移。25日，解放军除围歼罗兵团外，分兵占领南川[42]，27日占领綦江，29日前锋进抵重庆长江南岸的南温泉，与胡宗南部第一军激烈战斗。而罗广文兵团在南川之北，被歼大部，罗广文率残部5个团渡江北逃。解放军占领江津，北渡长江。30日，国民党军从重庆撤退，孙元良兵团也自万县西撤。当夜，解放军即提前完成计划，进占重庆。

解放军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奉命向川南挺进后，于21日占领遵义，28日进占毕节，30日占领叙永。12月2日，黄埔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本已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即命令在泸州南江门布防的部队，向宜宾撤退。12月9日在宜宾宣布起义。解放军即向威远、荣县前进，直趋成都外围。

当时，在川东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第十五兵团残部、二十兵团残部及第一军等纷纷向成都平原撤退，第三军在向重庆前进途中也折向成都。胡宗南以第七兵团残部七个师及第三十八军为后卫，主力向成都撤退，军心瓦解，士无斗志。为了迅速瓦解敌军，刘伯承、邓小平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忠告，要求国民党军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经过长期的酝酿，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雅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等地宣布起义。在续后的战斗中，包括中央系（黄埔系）将领也纷纷停止抵抗。

为了统一指挥进军四川的战斗，11月25日，军委同意林彪的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即第四十七、第五十、第四十二军等部七个师）。11月27日军委又决定贺龙、李井泉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部队，“应受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指

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43]。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5日，贺龙即下令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于是，北路各军于7日起，从慢慢跟进，变为以日行百里以上的速度挺进。12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五兵团及第十军，抢占乐山、井研、荣昌等地，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命令第三兵团第十一、十二两军向西延伸至铜梁、大足、内江，与第十军靠拢，互相策应。命令第五十军在垫江集结待命[44]。续后，又命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成都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合围成都地区集结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各部队在崎岖的山路上，以日行60—90公里的速度连续行军，神速推进，超前追击，迫敌在溃退中无法集结整理组织抵抗。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于12月16日占领乐山，前锋于19日在金口河地区渡过大渡河，歼灭宋希濂残部，宋本人被俘，20日占领浦江地区。是日第十军占领眉山。第三兵团第十一军于12月15日占领简阳，第十二军于20日占领大邑、邛崃，第五十军前出遂宁。自东、南、西三面包围成都。第十八兵团等部于12月14日占领广元，17日占领四川门户剑阁，20日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自北路威胁成都。解放军各部完成了追击任务，将敌军包围在成都周围地区，12月21日，刘伯承命令各部准备围歼被包围的胡宗南部，他要求各军“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为此，命令第十一军停止进攻新津，决定由杨勇、杜义德统一指挥第三、第五兵团，协同作战[45]。

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下，胡宗南已无力抵抗，12月22日，他在新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于23日22时开始突围，以李文的第五兵团向西昌突围，以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向昭通突围，以罗广文、陈克非两部向东突围，经泸州向毕节前进，实际上是作为主力突围的牺牲品。他本人于23日由成都飞往海南岛的海口，未奉统帅部命令，擅自逃离战

场。军心全盘瓦解。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回忆说："这时我思想上又起了一个急剧的变化。顶在我头上直接指挥我的上司都飞跑了，剩下的只有我和罗广文这两个替死鬼。"[46] 他和罗广文商量的结果，都不愿做枉死鬼，决心停止战斗，举行起义。李振也回忆说："当时我很难过，很愤慨，心想：你们高高在上，情况一急就远走高飞，老祖也不再做傻子了。"[47] 23日晚，裴昌会在德阳率第七兵团起义。25日，罗广文、陈克非率第十五、第二十兵团残部在郫县一带宣布起义。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于21日率四个师脱离兵团司令孙元良，从广汉撤至什邡，并于26日正式宣布起义。27日，李振率在成都以东的第十八兵团等部起义，鲁崇义的第三十军也同时起义。仅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七个军分两路西逃，于25日攻击解放军邛崃一带阵地，遭到坚强阻击。26日，各路解放军发起总攻，李文率残部放下武器，仅一部逃往西昌。27日解放军占领成都，30日贺龙率部举行入城式。

在成都战役期间，贵州省主席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逃到晴隆，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逼谷正伦把绥靖公署主任一职让给他。谷正伦设计杀了刘伯龙，自己经昆明逃往香港，躲避开了蒋介石对他的处分。12月下旬，第十九兵团代司令官王伯勋在普安、盘县地区宣布起义。贵州全境解放。

解放军进军川黔一役，共歼敌（包括起义部队）90万人。

云南省主席卢汉在"九九整肃"时，设计放走了中共地下党员和反蒋骨干，对于军统特务、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提出的杀人方案，一再借口拖延，不予执行。11月3日，代总统李宗仁到云南与卢汉联络，尚希望与云南联合，把云南作为桂系撤退之地。卢汉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乘机组织人民团体，请愿从宽处理"九九整肃"被捕人士。李宗仁给了一个顺水人情，在请愿书上批了"交卢主任从轻处理"。于是，卢汉即将被捕人士一一无保释放[48]。卢汉不稳的消息传到在成都的蒋介石那里，12月7日，蒋派张群到云南安抚卢汉，并要求把政府迁

到昆明，对此，卢汉大发牢骚："保卫云南所必需之各项请求，皆未获解决，云南即无法保卫，且有作向西撤退打算，政府迁昆实为徒劳。"[49] 张群当时已辞去西南军政长官职务，答应商请有关主管予以解决。8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召，偕同云南三军长李弥、余程万、龙泽汇（卢汉系统）返回成都，由蒋介石予以召见。9日，张群与三军长同回昆明，卢汉即将张群软禁，并以张群的名义于当晚召集会议，将余程万、李弥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七人扣留，联名宣布起义。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即复电表示欢迎。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建议军委，以汽车运输，令陈赓率先头军提早入滇，令在贵州的第十七军派一师护送宋任穷与第四兵团先头军会合，配合行动[50]。

卢汉起义后，于第二天即礼送张群去台湾。李弥部第八军即进攻昆明，营救李弥、余程万。16日卢汉释放李弥，希望策反第八军，但李弥回部后，即策动所部继续进攻昆明。当时，撤往台湾的"国防部"已命令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指挥进攻昆明。19日拂晓，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协同进攻昆明，卢汉在昆明人民支持下指挥所部抵抗，陷入苦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出击扰乱敌之后方，予以支援。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3日曾命令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暂时停止前进，而命令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占领金平、河口，断敌向越南逃跑之路，命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向蒙自前进，迂回包围[51]。由于昆明形势严重，20日，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才令第四十九师兼程驰援昆明，至22日进抵曲靖。卢汉因国民党中央系军队攻击猛烈，于20日下午释放余程万，并给了他4万银元[52]，余回部后，即将第二十六军撤退。第八军孤立，不得不也向后撤退。昆明形势缓和。28日，解放军滇桂黔边纵进驻昆明。

第二十六军、第八军从昆明先后撤到蒙自一带。1950年1月8日，"国防部"命令第二十六军空运台湾，并以汤尧兼第八兵团司令官，指挥滇南残部[53]。这时，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于1949年12月26日起，由百色一带向老街以北前进，于1950年1月11日进抵河口、屏

边，断敌向越南的退路，继续向北挺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于1月1日从南宁出动，向开远、蒙自前进，兵团部和第十四、十五两军于5日出动，向昆明前进。正当空运第二十六军之际，解放军第十三军以强行军赶到蒙自，于15日夜发起攻击，16日占领蒙自。李弥率第八军向思茅方向撤退，中途遭到袭击后向元江方向逃跑。25日，解放军于元江歼灭汤尧所部主力，汤本人被俘。李弥率残部渡过红河后于2月间为解放军歼灭大部，仅一小部逃出国境。

胡宗南飞逃海南后，蒋介石派人在三亚找到了他，即令胡飞回西昌，胡不得已，只好于12月30日飞回西昌，收拾残部。西昌系抗战时期备用的迁都之地，原驻有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的一个多师，胡宗南到达后，即收容川西突围部队，并扩军备战。1950年3月12日，解放军西南军区集中了十三个团的兵力，进攻西昌。27日，胡宗南、贺国光乘飞机逃离西昌，残部向山区逃跑，不久即被歼灭。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有组织武装，被全部消灭。

这时，国民党军残部仍据有台湾、澎湖、舟山、海南等海岛。海南于1948年8月升格为海南特别行政区，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后，为联络粤系将领，于3月初任命一直赋闲的粤系宿将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总司令。白崇禧向海南撤退的计划失败后，仅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残部撤往海南，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于广州失守后已先期撤往海口。国民党军在海南的指挥系统和部队系统庞杂混乱，10月28日，蒋介石派陈诚到海南，策划撤销广州绥靖公署和海南警备总司令部，另设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以薛岳任总司令，于12月1日成立。薛岳即将所部各军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防卫军。桂系既未能将主力撤往海南，也就无力控制海南岛，零零落落撤往海南的号称五个军八个师11万之众，战斗力已十分薄弱。

林彪于广西战役基本结束后，即于12月10日，命令第四十三军东移廉江、信宜、化县地区休整，准备攻取海南岛，命令第四十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准备协同第四十三军攻取海南岛的作

战[54]。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得到林彪报告后，即于12月18日特别指示林彪要吸取金门作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根据渡海作战的规律，进行准备和部署。尽管估计海南敌军战斗力比较差，但毛泽东仍强调“不可轻敌”[55]。不久，解放军即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十五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统一指挥，在雷州半岛集结。是年底，邓华制定了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但特别指示：“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56] 此后，即推迟了出击的时间。林彪于1949年12月中旬从衡阳前线返回中南局驻地武汉，攻取海南岛的任务由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统一领导。1950年2月上旬，叶剑英于广东召开了作战会议，考虑到渡船十分困难，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57]。

当时，解放军在海南有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人数达1.5万余人，以五指山为革命根据地。薛岳为阻击解放军的进攻，策定作战指导如下：“本部应把握当前外匪（系诬指雷州半岛一线的解放军正规军——引者）与内匪（系诬指冯白驹部——引者），尚呈分离之不利态势，依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土共，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匪。”[58] 1950年1月25日起，薛岳开始围剿冯白驹部琼崖纵队，一个月内进行了八十六次搜剿和扫荡，均遭失败。3月1日，动员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进行了历时十天的最大规模的扫荡，也未成功。这时，从3月5日起的一个月内，解放军组织了四次偷渡，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成功地向海南岛输入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与琼崖纵队会合，加强了解放军在海岛内的力量。4月16日下午，琼崖纵队主动向大云、板桥等地发起进攻，接应大军渡海。

4月16日夜，解放军渡海兵团主力两个军，以木帆船为主，配以

部分机帆船，分东西两路发起强渡，以两翼船队担任掩护，与敌海军舰艇作战。17日凌晨，突击部队在海口市以西至临高角一线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在岛内部队接应下顺利登陆，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并向纵深发展，于18日在福山与琼崖纵队会合。20日，薛岳调第六十二、第三十二军各一部，在美亭地区向解放军登陆部队实施反击，被解放军击溃。薛岳受岛内解放军的牵制，缺乏纵深间接配备部队，解放军登陆成功，士气立即瓦解。当薛岳向台湾要求增援，但蒋介石的答复是让他撤往台湾。22日，薛岳下达了“放弃琼北，退守琼南，再策后图”的撤退命令，准备撤离海南[59]。23日解放军占领海口，24日解放军第二梯队在天尾港登陆，同日占领文昌，控制了海南北部海岸线。海南残余各部不顾薛岳退守琼南的命令，纷纷转向港口撤退，不经组织抵抗，希望尽早逃离海南，沿途遭到解放军的袭击，损失严重，撤至港口的部队仓皇登船向台湾撤退。薛岳也飞逃台湾。至5月1日，解放军全部控制了海南，战役结束，共歼敌3.3万余人。

在海南作战的前后，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和南澎岛等岛屿。1950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准备进攻舟山定海本岛，蒋介石为集中力量据有台湾，调集载重15万多吨的舰艇44艘，于5月13日起，秘密将舟山国民党守军全部撤退。19日，解放军进占舟山群岛。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了第七舰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原承担的攻取台湾的任务，旋被解除。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残部即据有台澎金马诸岛屿。

在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在外国势力策动下，出现了分裂倾向。1949年7月8日，西藏摄政大札（又译达扎）在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里查逊（Hugh Edward Richardson）（英国人）策动下，突然切断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系，以西藏噶厦政府名义，通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章，以西藏境

内的汉人中有共产党为由，限期驻拉萨的中央政府办事处人员撤离西藏，完全封闭汉族学校，驱逐汉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平措旺阶（汉名闵志成）。这就是著名的“驱汉事件”。7月17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以及学校、电台、医院均被关闭后，130余名驻藏人员开始撤离拉萨，并于8月底到达印度。广州国民党政府接到了西藏噶厦公所于7月9日自科伦坡转发的要求中央驻藏人员撤退的电报，8月6日，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电复噶厦公所，强调其要求“于法于理，殊多未合，即希体察目前形势，撤销前议，迅再通知各驻藏人员仍回拉萨，执行职务”。同时，阎锡山就此事发表声明：“切盼西藏地方当局体察目前情势，一本过去团结精神，勿为他人利用，迅予纠正此项措施。”[60] 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揭露英国、美国、印度策动西藏7月8日事变。

这时，第十世班禅于8月10日在青海塔尔寺大金瓦寺诵经堂举行坐床大典，广州国民党政府派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马步芳为副使（由马继融代）主持大典，宣读总统命令后即行颁赐礼。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的时候，毛泽东就指示彭德怀，要与班禅取得联系。不久，青海解放，10月1日，班禅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61] 同日，毛泽东即指示彭德怀作出经营西藏的计划。

彭德怀经研究后复电毛泽东，认为由青海、新疆入藏有很大困难。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自苏联致电中共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作出建议和指示，他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

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确定由西南局承担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62]。1950年1月间，组成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承担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的任务。5月17日，中共中央又确定了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政治争取的工作，力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南局草拟了与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其中包括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军事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西藏改革事宜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等等[63]。但西藏地方当局仍企图抵抗解放军的进军，拖延派遣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扣留和驱逐中央人民政府派往西藏联系的人员，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前往觐见达赖喇嘛，刚到昌都即被软禁，旋即被英国特务福特毒死。

担任进藏任务的解放军各部及有关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军事、政治、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准备，至1950年10月初，各部向第一线推进。西藏地方当局将藏军十四个代本（每代本约500人）扩充为十七个代本，以十个代本布防于昌都地区，凭金沙江以扼进藏咽喉。10月6日，解放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分南北两集团，分多路迂回包围昌都，至19日截断了昌都藏军的退路。20日，在解放军的争取下，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部停止抵抗。是役，包括起义部队，解放军共歼敌十个代本5700余人。

藏军主力被歼灭后，西藏地方当局一片混乱，决定由达赖喇嘛亲政，藏历10月8日，举行亲政典礼。经过多方联系和大量的工作，西藏地方当局终于派出了一个五人代表团，于1951年4月间先后到达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至5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

藏宣告和平解放。5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命令各军以“战备进军”入藏[64]。1951年八九月间，进藏部队分批出发。10月26日，第十八军进驻拉萨，其余各部也先后到达指定地域，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二　蒋介石退据台湾

李宗仁自衡宝战役中桂系主力遭到损失，广州失守，进退失据。广州失守之前，程思远曾向李宗仁转述了顾孟馀的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应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分界线，另搞一套。”但是，财权仍在蒋介石手中，李宗仁没有办法，他回答说：“如果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65]同时，据李宗仁对程思远说：“吴礼卿行前来见我，问我‘有无知难而退之意’？我对他说：‘我不准备引退，如果蒋先生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吴不得要领走了。看来吴是受蒋之命前来试探的。”[66]但据蒋经国说：“（10月9日）下午吴礼卿先生来见父亲，报告与李宗仁谈话经过，李希望父亲‘复位’。吴先生亦以为一旦广州失守，政府迁渝，情势更为混乱，父亲倘不复出，将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可收拾之境。”[67]

重庆是蒋介石系统控制的地区，台湾更是蒋介石控制的地区，蒋介石又正在谋求复职。李宗仁在广州尚且无法有所作为，在重庆更难以有所作为，如在大陆失败，又无法退往台湾，因而心情十分苦闷。他曾对一些立委表示，“蒋先生以国事困难，令其出而负责，但又不令管事。彼自己既不来，亦不交出钞与权。如行政院何敬之时尚于不能做的明言不能做，阎先生则一切不回复。汤恩伯事至今无下文，广州市长原说以薛岳兼，渠迟回多日，至于濒失广州时方解决。国防部问题亦然。参谋总长事究竟如何，亦在搁置。广州失守之责，行政院长应负责。时局至此，令人愤闷不已”[68]。而且，他已到了不顾身份，唠唠叨叨，逢人便说的程度。

阎锡山从广州到台北时，台北方面，张厉生等一些人举行了一次

座谈会，主张蒋介石复职，继续担任“总统”[69]。10月18日，据蒋经国记载：“上午十一时，父亲与张晓峰先生谈及出处问题，旋即召集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讨‘复行视事’问题之利弊……大多数皆主张父亲‘复行视事’。晚间，父亲又约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礼卿诸先生，商讨此项问题，佥认必须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再行‘复位’。”[70] 显然有所顾忌，不敢太无法无天了。据《徐永昌日记》所记，大概是同一天的事，蒋介石亲自出面召集的座谈会，把上次座谈会上不赞成蒋介石复出的张道藩排除在外[71]。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与李宗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也是主张蒋介石复职，只是不能出两个总统。白崇禧对李宗仁没有魄力解决和蒋介石的矛盾，也已感到不耐烦，从部队实利出发，桂系既无法同蒋介石决裂，他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愿意缓解同蒋介石的矛盾，因而也开始主张蒋介石复职。他认为：“总之出而复职，可，不露面的牵线亦可，唱双簧即然，不能两人皆露面，不成体统，腾笑国际。”[72] 白曾请“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要李宗仁就此时机让蒋复职[73]。但蒋介石对于复职的时机，还是有顾虑的。一是重庆、成都眼看保不住，二是担心得不到美援。美国公使克拉克曾对人说，“失败了的马，再跑无人买票”，暗示美援看人而施[74]。当时，陈纳德正在活动援助国民党，准备以大部援助白崇禧和海南岛的陈济棠[75]。不久即向白崇禧提交了98万港币，约合15万美元[76]。

四川与广州不同，粤桂在历史上曾多次联盟，而桂系对四川是无法插手的，蒋介石的军队部署在整个四川境内。李宗仁有职无权，百无聊赖，10月23日，曾致电蒋介石，促蒋来重庆商讨军事、财政、外交等问题，但蒋介石一时还不愿意去重庆。李宗仁担心蒋介石复职，先于11月2日让夫人郭德洁飞往香港，11月3日，他自己也就躲离重庆，与张群一起去了昆明。本来，李宗仁与桂系想把云南划为桂系的控制区域，去卢汉而代之以鲁道源，作为桂系撤退的根据地，但蒋介石对卢汉采取了安抚政策，把云南作为自己的后方。李宗仁在万般无奈之中，又想和卢汉联络，为桂系找一个退身之地，但卢汉正和中共

接洽起义，只是让李宗仁在昆明游山玩水。

白崇禧仍想调和蒋、李矛盾，于11月3日晚提出了一个方案："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但蒋介石不赞成李宗仁出国，同时也不同意白崇禧以出任"行政院长"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77]。这样，白崇禧的方案就被蒋介石否决了。

11月11日，军事吃紧，阎锡山连电要求蒋介石来重庆处理。同日，李宗仁离开昆明，前往桂林。阎锡山电请他回重庆处理总统公务，但李宗仁以巡视各地鼓励士气为由，拒绝回去。12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骨干商讨时局对策。据程思远回忆："会上提出了两个做法：积极的作法是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自力更生，同蒋介石划清界线；消极作法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由白崇禧妥筹善后。"[78] 李决定赴美就医，13日，曾复电重庆方面说："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79]

这时，解放军向川黔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形势吃紧，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往重庆，亲自出马指挥四川的作战，并电约李宗仁返回重庆。但李却于是日前往南宁，并一度往海南岛巡视。蒋介石系统对李宗仁和桂系的失败，不免幸灾乐祸。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连桂林失守的时间都搞不清楚，11月14日记道："本日桂林失守，李宗仁自桂林飞至南宁。"[80] 其实，这一天攻广西的解放军中路部队，尚在全县、东安一线的湘桂边境地区集结，至22日才攻入桂林。真不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记录的，这也表明国民党内派系利益倾轧之激烈，两派均不肯顾及大局。

11月20日，李宗仁以十二指肠溃疡出血，飞往香港就医，并准备出国治疗，托白崇禧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表示："在治疗期间内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

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81] 李不放弃“代总统”职务，而以治病为正当的理由，拒绝回到他不能有所作为的重庆。蒋介石得报后，对此大感意外，十分被动，21日约白崇禧谈话，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82]。但桂系方面谁也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承诺了。是日，蒋派居正、朱家骅等五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回到重庆。李对来人很淡漠，甚至连信也不想回。但他想出国，据外交人员回复，须对方同意，美国国务院亚洲司方面则表示要请示。于是，他不能不留有余地。11月24日，李宗仁约见朱家骅、洪兰友，表示：“其胃疾施行手术，绝非一二周内可以痊愈，或须两三月后始可健复。惟中枢不可久陷于此一状态，益增总裁负责之困难，拟请总裁即日复位，主持大计。如就个人健康计，虽副总统一职冀能容辞脱，第恐国人疑涉意气，拟取消代字，仍为副总统，今后愿以副总统名义赴美，一面疗疾，一面接洽美援，希为代达此行同来诸同志，会同转陈总裁许诺，再商进行步骤。”[83]

于是，蒋介石拟定了三个对策：“一、仍请李归，二、行政院长代行总统事，三、复职。”[84] 11月2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委员们主张蒋介石早日复位，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复位，但认为时机问题尚要研究[85]。而阎锡山则坚决拒绝代行“总统”职务。会议只好决定先仍促请李宗仁回渝视事。这时，重庆已无法坚守，国民党残部的政局只好僵持在那里。反正，蒋介石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早已在前台指挥残部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常委议决“中央政府”迁至西昌，但可暂先移至成都办公。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濒临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屠杀。9月6日，军统特务在中美合作所杀害了参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10月2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于大坪杀害了中共党员陈然、陈善谋、王璞等十人。11月24日至27日间，军统特务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江竹筠

等三百多人，进行集体屠杀。

还在11月23日，阎锡山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政府实行战斗体制，缩编人员，随军行动[86]。把政府部门的人员，一部分编入军队，一部分遣散。11月28日，一直要自杀殉职的阎锡山又早早地逃离重庆，飞到成都。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从容撤退，各部门丢弃部下不管，甚至遣散费都没有着落，引起职员们的强烈愤怒，纷纷包围待逃的主管人员，造成一片混乱。11月29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蒋介石怆然离开住地，前往机场，一路上残兵败将拥塞道路，一度不得不步行前进，旋改乘吉普车，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距解放军先头部队仅十公里。11月30日飞抵成都。蒋介石已经丧尽人心，四面楚歌，他自记道：“国内则李德邻勾结共匪与滇卢，国外则艾其逊利用桂系，史达林笼络毛匪，其共同目标，不惟欲消灭余之革命历史，且欲彻底毁灭我党而后已。”[87]

朱家骅、洪兰友再次到香港要求李宗仁先回重庆，安排好政务后再行赴美，但这时李宗仁已安排好赴美事宜，不愿自投罗网，再回重庆，也拒绝先辞去“代总统”职务，坚持以“代总统”身份赴美治病，并争取美援。12月3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作出决议，“决定依照本会十一月廿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接受李宗仁同志十一月廿四日对朱家骅、洪兰友两同志之表示，恳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同志以副总统地位出国就医，并致力于外援之争取等语”，并通知了李宗仁[88]。于是，国民党党政系统纷纷再次要求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务。但蒋介石还要再看一看美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4日在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时仍表示：“此次入川，系应李代总统之邀。正值共匪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份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军民共同奋斗。”[89] 12月5日，李宗仁赴美就医，并致电阎锡山：“成都阎院长百川兄勋鉴：亥江电诵悉，仁以胃病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

至于重大决策，仍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中枢军政情形，并随时电告。李宗仁亥微。”[90] 李宗仁不放弃“代总统”头衔，尽管这个头衔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它仍可以牵制蒋介石，不让蒋为所欲为。

这时，解放军正迅速向成都地区挺进，成都地区的地方部队正酝酿起义，国民党残部在成都地区也已很难立足。12月7日，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会议，通过“政府”迁设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指挥作战。同日，以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以胡宗南为副长官，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12月8日，这位要组织战斗内阁、随军行动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又早早地逃到了台湾。他在寓所招待记者，宣告“政府”今起移台办公，并表示：“战时内阁，系重庆弃守后，考虑战略问题，咸认应实行面的战略，决定组织战斗内阁，以一〇七人组成，随军行动。战斗内阁由各部会人员组成，配合作战之需要，政府组织仍为总统府、五院及各部会。七日晚，为各方与政府联系便利计，决定政府迁设台北，由军事人员组织大本营，指挥作战。今后，政治中心移至台湾，军事方面将加强游击战，实行面的战略。”[91] 这个战斗内阁在哪里？西昌大本营又在哪里？真是天晓得。这位言行不一、苛责部下和同僚、爱恋权位和生命的老军阀，已经脸面扫地，在国民党系统中也遭到了多方面强烈的谴责。

蒋介石在成都势单力薄，难以颐指气使，命令不能生效。他仍尽力企图笼络川中将校，但以往与川中将校积怨甚深，何况今日一败涂地之时，因而并无成效。12月9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分别宣布起义。解放军尚未兵临城下，蒋介石在成都就已无法立足，12月10日，即黯然飞离成都，到达台北。1950年3月1日，蒋介石终于排斥李宗仁而自行复职，再任“总统”，割据台湾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了除台湾省之外的祖国全部领土，国民党在大陆的军政势力被彻底消灭。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中华民国，

中经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华民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统治集团一再更替，但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走上了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历史伟大的新时代。

---

(1)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8年11月2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21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页。

(3)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9年6月11日。

(4)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44-24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0页。

(6) 雷晓霞译：《1949年司徒雷登同陈铭枢的会晤》，《党史研究资料》第3期，第27页，1991年5月20日。

(7) 非正式出版的铅印本。

(8) Б．Кулик：*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КНР．1949-1952*，Новая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No．5，1995，стр．24-26．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2-1425页。

(10)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

(11) 见《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6月2日。

(12) 李维汉：《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1949年8月18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92-293页。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第64—65页。

(14) 刘少奇：《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1949年7月4日），《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按：斯大林的批语，见俄文杂志《远东问题》1996年第4期所刊刘少奇报告的俄文本。——笔者。

(15)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88-289页。

(16) 《周恩来年谱》，第838页。

(17) 参《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80页；《周恩来年谱》，第839页。

(18)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

(1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369页。

(20)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20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

(22)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479-491页。

(23)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2-563页。

(24)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0页。

(25)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5—566页。

(26)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27) 参《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20日第3版报道；赵秀昆等：《罗广文在四川编练新军和率领第十五兵团起义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2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8页。

(29)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4日。

(30) 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记，白崇禧已得约15万美元。

(3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9页。

(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9页。

(33) 《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25页。

(34) 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说刘、邓率有第三兵团，但第三兵团应已在常德一带集结，不可能从徐州出发，当系率第三兵团司令部之误。——笔者。

(35)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向川黔进军的方针致杨勇、苏振华、陈锡联、谢富治等电》（1949年10月23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66-567页。按：原文渐南系思南之误。——笔者。

(36) 参《林邓谭萧赵关于广西作战计划报毛泽东电》（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关于川、滇、桂、黔作战给林叶陈的电报》（1949年10月19日），《广西战役》，第51-54页。

(37) 《毛泽东对两广战役及国防部署的意见》（1949年10月31日），《广西战役》，第63页。

(38) 《林谭萧关于广西作战部署报军委电》（1949年11月4日），《广西战役》，第71—72页。

(39) 《林谭萧关于阻歼敌鲁道源、张淦及余汉谋部的电报》（1949年11月22日），《广西战役》，第120页。

(40)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39页。

(41) 《进军西南总结》（1950年1月），杨国宇等编注：《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

(42) 占领南川日期，据刘伯承1949年11月26日电，《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1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为24日。

(43) 《军委关于四野以七个师入川作战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5日），《军委关于贺龙、李井泉所部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电报》（1949年11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4页。

(44)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20页。

(45)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21页。

(46) 陈克非：《我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77页。

(47) 李振：《起义前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32页。

(48) 参杨肇骧：《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220页；沈醉：《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29页。

(49) 《张群委员对云南局势演变情形之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960页。

(50)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我军应提早入滇致军委、林彪并陈赓等电》（1949年12月11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70页。

(51) 赵晓澜、蔡惠霖：《昆明起义》，《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第1190页。

(52) 曹天戈：《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83页。

(53) 曹天戈：《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84页。

(54) 《林谭萧关于战后休整问题给各部队的电报》（1949年12月10日），《广西战役》，第218-219页。

(55) 《关于渡海作战等问题给林彪的电报》（1949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1页。

(56) 《关于同意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的电报》（1949年12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3页。

(57) 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5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48页。

(5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55页。

(6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7日。

(61)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

(62) 《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8页。

(63) 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342-343页。

(64)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79页。

(65)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27页。

(66)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28页。

(67) 《风雨中的宁静》，第247页。

(68)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3日。

(69)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0日。

(70) 《风雨中的宁静》，第250页。

(71)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9日。

(72)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9日。

(73)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

(7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8日。

(7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0日。

(76)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

(77)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4页。

(78)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5页。

(79) 《风雨中的宁静》，第258页，系据张群电转告。

(80) 《风雨中的宁静》，第259页。

(81)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1月21日。

(82) 《风雨中的宁静》，第261页。

(83) 《居正委员等代表中央赴港敦促李宗仁早返陪都情形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第957页。

(8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27日。

(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1月27日条。

(86)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59页。

(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1月30日条。

(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第965页。

(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2月4日条。

(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62页。

(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63页。

参考文献 (1)

中文档案文献

中央档案馆藏档，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北京

上海档案馆藏档，上海

《郭汝瑰日记》（稿本），军事博物馆藏，北京

《黄炎培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文著作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长舜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半生风雨录》，贾亦斌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出版社，1979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88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88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马寅初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陈果夫传》，徐咏平著，台北，正中书局，1980

《陈毅传》，胡石言等编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成败之鉴》，陈立夫著，台北，正中书局，1994

《从延安到北京》，刘武生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牛军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纪实》，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编印，出版地不详，1948

《党史研究资料》（5），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47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编，南京，出版时间不详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渡江战役》，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编，北京，1951

《对日和约问题》，亚洲世纪社编，出版地不详，1947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风雨中的宁静》，蒋经国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

《傅斯年全集》，陈槃等校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台北，1995

《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广西战役》，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自治区党史办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北京，1961

《国家总动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出版地不详，1947

《国民大会》，中华年鉴社，南京，1948

《国民大会实录第一编》，“国民大会”秘书处，台北，196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1989

《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

《胡适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淮海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淮海战役史》，何晓环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济南战役》，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蒋经国传》，江南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2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1981

《解放太原》，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中央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出版地不详，1989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董志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刘秉麟著，北京，三联书店，1962

《救国会》，周天度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决战的历程》，陈廉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孔祥熙其人其事》，寿充一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行，南宁，1980

《李宗仁先生晚年》，程思远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辽沈决战》，陈沂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沈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刘安祺先生访问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刘伯承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刘伯承用兵要旨》，杨国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杨国宇等编注，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

《刘伯承中原逐鹿》，柯岗等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

《刘邓大军风云录》，杨国宇等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

《论国共再合作》，陈铭枢著，出版地不详，1949

《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梅龚彬回忆录》，梅昌明整理，长春，团结出版社，1994

《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于群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民国中央银行关金券、流通券、金圆券、银圆券图鉴》，张志超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邱钱牧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平津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邱清泉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日本赔偿》，行政院新闻局，出版地不详，1948

《日本政治概论》，蒋立峰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防部政工局编印，出版地不详，1948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国防部政工局编印，出版地不详，1948

《上海学生运动史》，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司徒雷登日记》，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粟裕军事文集》，孙克骥主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楚青整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刘凤翰编著，台北“国史馆”，1993

《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台北，1980

《王葆真文集》，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外交史》第5卷，［苏］葛罗米柯等主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我的回忆》，刘峙著，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我与民革四十年》，朱学范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

《五二〇运动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西北五马》，吴忠礼、刘钦斌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

《徐永昌日记》，徐永昌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叶飞回忆录》，叶飞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叶剑英传》，范硕等编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

《曾琦先生文集》，陈正茂等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余湛邦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王道平等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阵中日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征尘回忆》，王仲廉著，台北，1978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陈昭桐主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北京，群言出版社，199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刘伯承等主持编辑，秦基伟等主持修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出版地不详，1949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成汉昌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著，杨志信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吴东之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张秉均编著，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大事记》，金鑫主编，程悠等编纂，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4辑，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金鑫主编，刘燕明等编纂，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外交史》，石源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中美关系史》，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薛衔天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编印，北京，195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朱德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中文报纸

《大公报》，上海、天津

《华商报》，香港

《解放日报》，上海

《申报》，上海

《世界日报》，北平

《人民日报》，北平

《新闻报》，上海

《正言报》，上海

《中央日报》，南京、上海、重庆

中文期刊

《传记文学》，台北

《大学评论》，南京

《当代亚太》，北京

《党的文献》，北京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党史资料与研究》，天津

《观察》，上海

《国民政府公报》，重庆、南京

《国讯》，上海

《近代史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上海

《世纪评论》，南京

《时与文》，上海

《土地改革》，南京

《新闻天地》，上海

《新闻天下》，成都

《新闻杂志》，南京

《学术月刊》，上海

《再生》，上海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中国新闻》，南京

《总统府公报》，南京

英文档案文献

Melbey Papers，Harry S．Truman Library．

Papers of Mathew Connally，Harry S．Truman Library．

RG 59，Records of Office of Executive Secretariat，State Department，National Archive and Record Service．

英文著作

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英文报刊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hina”，*Life*，Vol．23，No．15．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Vol．6．1969；

1947，Vol．6．1972；Vol．7．1972；

1948，Vol．6．1974；Vol，7．1973；Vol．8．1973；

1949，Vol．8．1978；Vol．9．1974；

1950，Vol．6．1976．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China White Paper*）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

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Inc，1969．

Borg，Dorothy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Campbell，John，*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7-1948*．New York，1948．

May , Ernest ,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 1945-1949* . New York , 1975 .

Murfett , Malcolm h . , *Hostage on the Yangtze . Britain , China , 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 . Annapolis , Maryland : Naval Institute Press , 1991 .

Jespersen , T . C . ,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 1931-1949*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Melby , John F . , *The Mandate of Heaven . Record of Civil War in China , 1945-1949* . Garden City , New York : Doubleday and Company , Inc . , 1971 .

Schlesinger , Jr . , Arthur ,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 1945-1973 , Vol . 2 .

Stueck , Jr . , William W . ,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 1947-1950* . Chapel Hill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981 .

Swanberg , W . S . , *Luce and His Empire* . New York , 1972 .

Tsou , Tang ,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 1914-1950* .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3 .

Tucker , Nancy , *Patterns in the Dust .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 1949-1950*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Vandenberg , Jr . , Authur H . , ed . ,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Boston Houghten Miff Lin Company , 1952 .

Wedemeyer，Aldert C，*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8．

俄文文献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17-1957 ．Сб．документов．Изд．Наука，Москва，1959г．

Чудоеев，Ю．В．ред．По Дорогам Китая，1937-1945 ．Изд．Наука，Москва，1989г．

Ковалев，И．，*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1-3，1992г．

Ледовский，А．，*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1-2，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2-3，1995г．

Кулик，б：*США ц Тай вань КНР*． 1949—1952，Новая ц Новейшая цсторня，No．5，1995г．

Ледовский，А．，*Виэ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 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5，1996г．

Тихвинский，С．，*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4，1989г．

Тихвинский，С．，*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Новая новейшая ицстория，No．4—5，1994г．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 (1)

A

阿哈买提江

阿沛·阿旺晋美

艾德礼（C．Attlee）

艾奇逊（Dean Acheson）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B

巴大维（David Barr）

巴尼特（Robert W．Barnett）

巴特沃斯（Walter W．Butterworth）

白崇禧

白大诚

白吉尔（Oscar C．Badger）

白世维

白肇学

班禅喇嘛

包尔汉

鲍莱（Edwin W．Pauley）

鲍国宝

贝祖诒

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

布鲁斯特（Owen Brewster）

C

蔡松坡

蔡廷锴

蔡文治

蔡运升

曹福林

曹云湘

曹振铎

陈　诚

陈　赓

陈　然

陈　铁

陈　仪

陈　毅

陈　章

陈布雷

陈长捷

陈春霖

陈此生

陈大庆

陈尔晋

陈光甫

陈果夫

陈济棠

陈继承

陈建新

陈金城

陈克非

陈立夫

陈林达

陈明仁

陈铭枢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陈其尤

陈其瑗

陈启天

陈锐霆

陈善谋

陈绍禹　见王明

陈士榘

陈士章

陈惕庐

陈锡联

陈锡章

陈新桂

陈雪屏

陈颐鼎

陈裕光

陈紫枫

成　刚

程　潜

程思远

程义宽

程中行

程子华

储安平

褚辅成

崔书琴

崔月犁

崔载之

崔振伦

D

达札　见大札

达赖喇嘛

大　札

戴炳南

戴传贤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立庵

戴戎光

德莱勃（Wliliam H．Jr．Draper）

邓　华

邓宝珊

邓初民

邓汉翔

邓昊明

邓季雨

邓力群

邓文仪

邓锡侯

邓小平

邓颖超

邓兆祥

邓子恢

丁名楠

丁叔恒

丁惟汾

丁文渊

丁宣孝

丁治磐

丁作韶

董　霖

董必武

董明德

董其武

董宋衍

董显光

杜　鼎

杜　威（John Dewey）

杜斌丞

杜建时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

杜鲁门（Harry S．Truman）

杜维屏

杜义德

杜聿明

杜月笙

段　沄

段霖茂

多洛非也夫（Дорофеев）

F

范　声

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

范汉杰

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

方　方

方　天

方　治

方天逸

冯白驹

冯玉祥

冯裕芳

冯治安

弗里曼（Fulton Freeman）

符定一

福　特

福雷斯特尔（Jamels Forrestal）

傅秉常

傅冬菊

傅泾波

傅斯年

傅作义

富尔登（James G．Fulton）

G

甘家馨

甘介侯

甘乃光

冈村宁次

高　岗

高　斯（Clarence E．Gauss）

高崇民

高存信

高克林

格达活佛

葛宝德（John M．Cabot）

葛鲁恩（Frederick Gruin）

葛罗米柯（A.A. Громыко）

耿　飚

谷正鼎

谷正纲

谷正伦

顾孟馀

顾维钧

顾祝同

关吉玉

桂永清

郭　旭

郭德洁

郭棣活

郭寄峤

郭景云

郭沫若

郭汝瑰

郭中一

郭紫峻

H

韩先楚

何　惧

何基沣

何绍周

何思源

何香凝

何应钦

贺　麟

贺　龙

贺国光

贺衷寒

赫尔利（Patrick J．Hurley）

赫斯特（William R．Hearst）

洪兰友

洪学智

侯德榜

侯镜如

侯少白

侯雨民

胡　琏

胡　适

胡　翔

胡海门

胡焕庸

胡景熏

胡乔木

胡颂平

胡宗南

华　德（Angus Ward）

华西列夫斯基（A．M．Васццевскц）

黄　华

黄　杰

黄　诺

黄　淑

黄　统

黄　维

黄百韬

黄大能

黄竞武

黄琪翔

黄启汉

黄樵松

黄少谷

黄绍竑

黄世民

黄旭初

黄雪邨

黄炎培

黄以聪

黄元彬

黄志勇

黄子华

霍宝树

霍揆彰

J

姬鹏飞　见吉洛

吉　洛

戢翼翘

季里诺（Quirino）

季托夫（А.С. Титов）

贾亦斌

江　庸

江问渔

江竹筠

姜　乾

姜怀素

蒋介石

蒋经国

蒋梦麟

蒋廷黻

蒋纬国

蒋匀田

杰塞普（Philip C．Jessup）

今　村

金　明

金　山

金侯城

金鸣盛

金岳霖

晋　夫

居　正

瞿冠英

K

康　泽

康纳利（Tom Connally）

康同璧

康相九

柯乐博（Edmond O．Clubb）

柯在铄

科尔伯格（Alfred Kolberg）

科瓦廖夫（И.В. Ковалёв）

克拉克（Leweis Clark）

克仁斯（John Simon Kerans）

孔　庚

孔从洲

孔令杰

孔令侃

孔祥熙

L

赖　依（Trigve Lie）

赖传珠

赖普汉（Roger D．Lapham）

蓝　妮

雷　震

雷诺兹（William Reynolds）

冷　遹

冷御秋

黎　玉

李　白

李　达

李　幹

李　鸿

李　弥

李　铭

李　涛

李　文

李　振

李　蒸

李　中

李本一

李炳泉

李承晚

李德全

李富春

李馥荪

李国兰

李国伟

李鹤林

李济深

李井泉

李俊龙

李克农

李立三

李立侠

李良荣

李民欣

李明灏

李铭鼎

李品仙

李如刚

李世杰

李书城

李腾九

李天焕

李天霞

李维汉

李文范

李先念

李延年

李以劻

李章达

李振清

李仲辛

李烛尘

李宗仁

里查逊（Hugh Edward Richardson）

郦伯瑾

连　贯

梁化之

梁培璜

廖耀湘

廖运周

林　彪

林　森

林　遵

林伯渠

林崇墉

林乐耕

林绍禹

林伟俦

林蔚文

凌道扬

凌宪扬

凌云上

刘　斐

刘　戡

刘　仁

刘　任

刘　英

刘　哲

刘　峙

刘安琪

刘伯承

刘伯龙

刘不同

刘昌义

刘纯正

刘达逵

刘东岩

刘攻芸

刘航琛

刘厚同

刘清扬

刘汝明

刘少奇

刘士笃

刘士毅

刘文辉

刘先云

刘亚楼

刘瑶章

刘玉章

刘云瀚

刘镇湘

刘仲华

刘仲容

刘子毅

柳亚子

龙　云

龙泽汇

陇　耀

楼邦彦

卢　汉

卢　斯（Henry Luce）

卢浚泉

卢郁文

卢忠良

鲁崇义

鲁道源

鲁英麐

吕　复

罗　奇

罗　申（Н.В.Рощин）

罗广文

罗家伦

罗历戎

罗隆基

罗荣桓

罗瑞卿

罗恕人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又伦

罗泽闿

洛慕罗（Romulo）

洛维特（Robert Lovett）

骆清华

M

马步芳

马呈祥

马惇靖

马敦静

马光宗

马国琳

马鸿宾

马鸿逵

马继融

马继援

马青苑

马全良

马文车

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ell）

马叙伦

马占山

麦卡伦（McCarran Patrick）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毛　森

毛人凤

毛泽东

茅　盾

梅　登（Alexander Madden）

梅龚彬

孟广厚

孟士衡

米高扬（А.И. Микоян）

米文和

苗迪青

闵志成　见平措旺阶

莫德惠

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

莫文骅

穆汉祥

N

南汉宸

倪青原

聂凤智

聂荣臻

牛践初

诺　兰（William F．Knowland）

O

区寿年

欧　震

欧元怀

P

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

潘朝栋

潘迪华（K．M．Panikkar）

潘公展

潘汉年

潘纪文

潘廉方

潘尼迦　见潘迪华

潘文华

裴昌会

彭　锷

彭　真

彭德怀

彭泽民

彭泽湘

彭昭贤

平措旺阶

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

Q

戚再玉

齐赫文斯基（С.Д.Тихвинский）

齐燕铭

钱新之

钱之光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秦邦宪

秦德纯

秦基伟

覃道善

覃戈鸣

覃异之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邱昌渭

邱清泉

邱致中

屈　武

阙汉骞

R

饶漱石

任弼时

戎子和

荣鸿元

茹拉夫廖夫（А.Ф. Журавлёв）

阮毅成

芮逸夫

S

赛鼎福

沙彦楷

邵力子

沈　醉

沈澄年

沈从文

沈发藻

沈鸿烈

沈慧莲

沈钧儒

沈云龙

沈祖同

盛苹臣

盛紫庄

石　觉

石普勒（Philip D．Sprouse）

史　良

史达林　见斯大林

史密斯（Alexander H．Smith）

舒适存

司徒雷登（John Stuart）

司徒美堂

斯揣克　见斯特赖克

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

斯蒂尔（Steel）

斯克里普斯 - 霍华德（Scrips-Howard）

斯特赖克（Cliford S．Strike）

斯特朗（安娜·路易斯，Anna Louis Strong）

宋国枢

宋肯堂

宋美龄

宋绮云

宋庆龄

宋任穷

宋瑞珂

宋时轮

宋希濂

宋子文

苏　静

粟　裕

孙　楚

孙　渡

孙　科

孙　震

孙九录

孙兰峰

孙立人

孙连仲

孙良诚

孙起孟

孙晓村

孙亚夫

孙元良

孙中山

索　普（Thorp Williard L．）

T

塔夫脱（Robert A．Taft）

谭　政

谭冠三

谭平山

谭惕吾

谭震林

汤　尧

汤恩伯

汤惠荪

唐　亮

唐　星

唐秉琳

唐天际

唐永良

陶　勇

陶　铸

陶鸿钊

陶启明

陶希圣

陶峙岳

田士吉

田余庆

铁　托（И.Тцто）

童冠贤

W

万国鼎

万墨林

汪少伦

汪世铭

王　明

王　璞

王葆真

王必成

王秉钺

王伯勋

王长海

王宠惠

王春哲

王凤岗

王抚洲

王宏坤

王家善

王稼祥

王建安

王近山

王敬久

王靖国

王克俊

王绍鏊

王师曾

王世杰

王叔铭

王宴清

王耀武

王聿修

王云五

王芸生

王泽浚

王之湘

王致冰

王仲廉

韦　勃（James E．Webb）

韦国清

维辛斯基（А.Я. Вышинский）

卫立煌

魏德迈（Wedemeyer，Albert C．）

魏凤楼

温广汉

文　义

翁文灏

沃利斯（John Vorys）

吴　晗

吴鼎昌

吴恩裕

吴羹梅

吴国桢

吴化文

吴开先

吴克坚

吴礼卿

吴绍周

吴士文

吴铁城

吴锡麟

吴贻芳

吴玉章

吴裕后

吴哲生

吴稚晖

吴忠信

伍宪子

X

希米奇

席德懋

夏　鼐

夏　威

夏　衍

夏楚中

夏元芝

向凤武

萧　克

萧　贤

萧　铮

萧俭魁

萧劲光

萧毅肃

谢超逸

谢富治

解沛然

熊式辉

熊绶春

熊笑三

徐　保

徐　冰

徐　堪

徐柏园

徐傅霖

徐慧玉

徐寄庼

徐向前

徐永昌

徐元璞

徐子为

许惠东

许朗轩

许世友

许闻天

宣铁吾

薛　岳

薛明剑

Y

严　明

严家淦

岩　田

阎慧卿

阎锡山

阎又文

颜惠庆

晏子凤

杨　格（Arthur Yoang）

杨　虎

杨　杰

杨　勇

杨伯涛

杨成武

杨得志

杨干才

杨赓笙

杨汉烈

杨虎城

杨翘新

杨亦周

杨荫溥

杨云青

杨仲璜

叶　成

叶　飞

叶笃义

叶公超

叶剑英

叶企荪

叶秀峰

于　斌

于树德

于一凡

于右任

于兆龙

于子三

余程万

余汉谋

余家菊

余楠秋

余心清

俞大维

俞鸿钧

俞济时

俞叔平

俞树立

俞志英

虞　键

元泉馨

袁　朴

袁任远

袁世凯

袁守谦

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

约翰逊（Louis A．Johnson）

Z

曾　琦

曾　生

曾甦元

曾泽生

曾震五

曾资生

翟宗涛

詹佩霖

张　淦

张　继

张　澜

张　奇

张　起

张　权

张　群

张　轸

张　震

张达生

张道藩

张道行

张东荪

张发奎

张公权

张国华

张际春

张君劢

张克侠

张厉生

张灵甫

张难先

张尼亚

张其昀

张世希

张奚若

张晓峰　见张其昀

张学良

张耀明

张岳军　见张群

张云川

张知本

张志让

张治中

章伯钧

章汉夫

章乃器

章士钊

赵承绶

赵洪宽

赵基梅

赵家骧

赵遂初

赵庸夫

郑长海

郑洞国

郑华炽

郑介民

郑天挺

郑庭笈

郑彦棻

钟　彬

钟　松

钟赤兵

钟泉周

钟天心

周　藩

周　杰

周　兴

周　嵒

周北峰

周炳琳

周恩来

周福成

周建人

周骏鸣

周开成

周声夏

周士第

周新民

周以德（Walter Henry Judd）

周至柔

周作民

朱　德

朱　瑞

朱大同

朱光潜

朱家骅

朱丽东

朱绍良

朱学范

朱蕴山

朱致一

朱自清

竺　声

竺可桢

庄培昌

邹　鲁

左世允

左舜生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

第一卷
(1905—1915)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一卷

(1905—1915)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编著者名录

1905—1910年　韩信夫　刘明逵

1911年　郭永才　王明湘　齐福霖　范明礼

1912年　张允侯　张友坤　章伯锋　胡柏立

耿来金　刘寿林　钟碧容

1913年　胡柏立　耿来金

1914年　章伯锋　张允侯

1915年　钟碧容

1916年　郭永才　王明湘

1917年　韩信夫　范明礼

1918年　刘寿林　钟卓安　章伯锋

1919年　张允侯　张友坤

1920年　钟碧容

1921年　齐福霖

1922年　陈　崧　王好立

1923年　朱信泉　任泽全

1924年　蔡静仪

1925年　韩信夫　丁启予　陈永福

1926年　严如平　柏宏文

1927年　吴以群　罗文起

1928年　查建瑜　韩信夫

1929年　娄献阁　白吉庵

1930年　李静之　张小曼

1931年　任泽全

1932年　石芳勤　徐玉珍

1933年　江绍贞

1934年　熊尚厚

1935年　吴以群　刘一凡

1936年　郭　光

1937年　郭大钧　王文瑞　李起民

李隆基　常丕军　刘敬坤

1938年　陈道真　韩信夫

1939年　李振民　张振德

1940年　梁星亮

1941年　陈仁庚　梁星亮

1942年　董国芳

1943年　李振民　张守宪

1944年　梁星亮　张振德

1945年　齐福霖　王荣斌

1946年　查建瑜　任泽全

1947年　陈　敏　章笑明　汪朝光

1948年　卞修跃　贾　维　陈　民

1949年　江绍贞　朱宗震

审　订　李　新　韩信夫　姜克夫　齐福霖　吴以群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学庄　江绍贞　刘敬坤　朱宗震　朱信泉

孙思白　汪朝光　李振民　严如平　杨天石

杨光辉　邱权政　张允侯　陈铁健　郑则民

尚明轩　周天度　查建瑜　贾　维　梁星亮

章伯锋　曾业英

校　阅　王述曾

修　订　韩信夫　江绍贞　齐福霖　孙思源

出版前言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是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基础上经过修订而成。

《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始于1972年9月。当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编撰中华民国史的任务，随后，在李新先生的组织和领导下，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负责大事记编撰工作的同志们仍然尽心尽力，在1973年12月编辑完成、由中华书局内部出版发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一辑。其后，我们不断积累研究的成果（至1990年共计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31辑），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于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大体已如李新先生在1997年为《中华民国大事记》出版所撰“序”中所列明，总体要求是：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取材方针是：大事突出，要事不漏。这样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反映了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撰写和编辑过程中，我们以此为指导，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科学的标准决定事件的取舍，避免主观随意性，对所用材料认真审查核对，不能确定者则宁可存疑，从而保证了编写工作的质量，也体现了“大事记”编写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者，主要是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也有一些室外和所外研究机构的学者，先后参与其事者有50余人，还有20余人参与审订与校阅。韩信夫主持大事记的编纂，负责审稿及定稿。姜克夫在分管大事记编纂工作期间，尽心尽力。章伯锋负责初期规划及组织编写。齐福霖、吴以群对大事记的编纂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述曾为大事记审稿贡献殊多。我们谨对所有为“大事记”编纂付出辛劳和贡献的学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是对大事记的编撰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李新先生、姜克夫先生以及编纂者中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更当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也对《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纂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中华民国大事记》出版后，我们不断收到各界读者的反馈，提出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随着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民国史资料的不断开放，民国史研究环境的不断变化，已经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也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诸如一些历史事件的收录还有缺失、冗余之处，一些史实还有讹误之处，有些事件的排列顺序可能不够精确，有些文字也还不够简练平实，等等。我们本有在适当时机进行修订的计划，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这样的殷切期望。因此，2009年，我们决定对《中华民国大事记》进行全面的修订，主要工作是：增删一些历史事件的条目，补正缺失、错讹之处，调整一些收录事件的排序，统一全书的技术格式，等等。我们认为，应在修订过程中，尽量利用近些年来新开放的民国史资料，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尽力做到客观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此为这次修订工作的基本方针。不过，考虑到修订工作的时间有限，篇幅亦不能扩充过大，我们大体维持了原先的篇幅，而着重在内容和文字方面有所增删、调整。

此次《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由韩信夫负责，韩信夫、江绍贞、齐福霖、孙思源分工承担，全部修订文稿由韩信夫通读订正。参加修订工作的诸位先生，均已退休多年，本应安享晚年，但他们克服年高体弱的困难，本着退而不休、善其始终的精神，继续担任修订工作，分工合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计名利，完成了本书的修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及近代史所科研处、图书馆和所内外的诸多学者，一如既往，对本书的修订工作大力支持。我们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过此次修订，《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收录的事件更全面，征引的资料更丰富，文字表述更简练，并采用统一的编排方式，重新排印为12卷。至此，我们堪可以新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告慰于民国史研究事业的诸位开创先进、学界同仁以及广大始终关注并支持民国史研究事业的热心读者。

对于出版民国史研究室的系列著作素有渊源，贡献良多，并曾对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付出甚多辛劳的中华书局，此次克服诸多困难，慨然承允接手，出版本书。中华书局编辑部历史编辑室诸位先生对于本书的编辑成稿多有贡献。值此《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修订工作完成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编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虽已告成，但是我们深知，囿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个别历史事件或有缺失，利用新出史料尤其是海外史料还有不及，叙述还存有当年时代的痕迹，文字叙述还可以更精益求精，等等。所有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我们今后应当着力改进的方面。我们希望每过若干年，都能对本书进行新一轮的修订和增补，使其不断完善，成为学界研究民国历史和社会各界了解民国历史的可靠的、必备的参考著作，并经此而使民国史研究事业生生不息，代有传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2011年5月28日

序

李　新

《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经过24年的编纂，终于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

1972年9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9月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成立之始，就制订了编纂一部书（《中华民国史》）和三部资料长期规划。这部《中华民国大事记》，便是规划中的三部资料之一。

大事记义属编年史，编年史在我国历史载籍中是最早出现的一种体裁。流传至今的我国第一部史书鲁《春秋》，就是编年史。实际上，年代更早的殷商卜辞、西周金文，如果不是零章断简，将之按时间的顺序编排起来，也有如今天所说的大事记。现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历史科学的进步，编年史这种体裁在历史著作中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但由于它有着史实包容量大、客观性相对较强、形式稳定、便于查检等特点，也还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最初决定编一部大事记，就是想利用这种传统体裁的优点，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一部可供查考的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的历史，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终结，前后只有38年。考虑到民国的创造经历了漫长的革命岁月，这部大事记将上限推前到1905年孙中山手创同盟会之日，共计44年。无论是38年，还是44年，比较起纵贯百年、千年的编年史，这部大事记须加处理的史事自然要少得多。但是，编写民国大事记，以至进行民国史研究，也有其艰难之处。民国是距今最近的一个朝代，亿万人数十年活动遗留下来的文献，虽经时间消磨，战乱毁损，

依然浩如烟海，尚未很好地爬梳整理。并且，当时的社会斗争深刻地影响着不止一代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几乎每一个稍微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引起激烈的争议。即使不顾及这些，中国的社会生活发展到20世纪，其内容之丰富，其方面之广泛，也绝非是百年、千年前所能比拟的。所以，当1972年决定开展民国史研究，决定编写这样一部大事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诚惶诚恐的，尤其是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不过，我们认为：一门学科的成立，犹如一座大厦的建造一样，总要先打好基础，我们就决心来做打基础的工作，埋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好这件事。不仅这部大事记是这样，我们的《民国人物传》和专题资料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史》也带有这样的性质。

为了便于编写工作，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中华民国史以研究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为中心内容。它是断代专史，而且主要是断代政治专史，还不是断代通史，因此，我们的大事记只能围绕这一中心内容进行编纂，这是由于当时研究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民国大事记纪事范围较广，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外交，还涉及经济、文化，甚至天灾地变；不仅包括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还涉及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自发反抗。可以说，为有利于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它提前向断代通史先走了一步。

在明确编纂指导思想后，我们草拟了《关于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要求》。这份要求明确地规定这部大事记是供人们查考的参考资料书，同时提出“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的总体要求，以及“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取材方针。此外，考虑到兹事体大，决定以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室）为基础，广泛寻求协作，并将工作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先编成征求意见稿，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即“丛稿本”大事记）的书名，在中华书局出版，共35辑，约600万字；第二步再根据“丛稿本”及各方意见加以修订，分册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即“修订本”大事记）。因为

情况发生变化，“丛稿本”大事记仅出版了26辑，“修订本”第一册发稿后还未及出版，便告中止。有鉴于此，我们从去年春天开始，组织同仁，分途审订已经出版的各辑大事记，对尚未出版的初稿进行加工修改，仍定名为《中华民国大事记》，全书共800余万字，改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编写民国大事记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全体参加者筚路蓝缕，齐心协力，没有因其是参考资料书而掉以轻心，没有因经验不足、条件欠备而裹足不前，而是兢兢业业，孜孜以求，把这部资料书的编纂工作当作一项专门的研究去做，努力发掘史料和考实辨伪，注意把握民国史发展的线索，注意摸索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勤加斟酌史实的取舍，叙事的详略，文字的繁简。编年史入手虽易，出手却很难。但这部大事记，包括“丛稿本”，因为经过这样反复的修改，我们对其质量还是具有信心的。诚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部大事记就不存在弱点和失误了，它的得失，还有赖于读者和专家们认真的批评指正。

《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全稿杀青，距开始这项工作已经24年了。时隔24年，本书最初的编写者，有的已经辞世，有的离开了工作岗位，即使当时的青年人，现在也都年过半百，白发苍颜。想起大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宝贵年华，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和不安。对于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这部书编写、出版的同事们、朋友们，我们也怀抱着同样的心情。近年，民国史研究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著不断出现。它已逐渐从“险学”发展为“显学”。看到这种繁荣的景象，我们非常兴奋。我们相信：民国史将来必会成为一个不朽的史学分科，许多研究者将在此成就他们的事业。但我们仍将一本初衷，继续埋头去为未来华美的大厦做好基础工作。尔后，如果有人觉得我们今天的工作曾经激发过他们对于民国史的兴趣，曾经对他们的研究有所助益，那我们，这部书的全体编著、审订、校阅和所有为这部书出过力的人，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1996年5月

凡例

一、本书起止日期为：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9月30日中华民国历史时期结束。

二、本书以反映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为主；人民群众的活动（诸如：革命斗争和自发反抗，科学发明，文化艺术活动等）亦作相关的反映。

三、台港及华侨大事适当列条；世界大事凡与我国相关者适当列条。

四、本书不同于年表、月表，以记事为主，适当兼顾记言。记事要求有本有末，记言适当引用原文。

五、本书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取材方针，努力做到“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

六、本书条目按逐年、逐月、逐日排列，并依次以大事、要事之重要程度为条目排列次序之标准。

七、本书采用公历纪年，夹注民国年代；中华民国成立前（1905年8月20日至1911年12月31日）采用公历纪年，夹注清代年号；月日采用公历，夹注农历月日。

八、清政府称“清廷”。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称“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政府称“北京政府”（其中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时期称“北京临时政府”，张作霖统治时期称“北京军政府”）。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的护法政府称“广州军政府”。蒋介石等在南京建立的政府称“国民政府”，或习称“国民党政府”。日伪政权分别称为“伪满洲国”、“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及“汪伪政

府”。在有关涉外条目中，把当时为国际上承认的代表中国对外的中央政府一概称为“中国政府”。

九、人名一般用本名，但对某些历史人物（如蒋介石、汪精卫）习用其字或号者，则沿用其字或号。首次出现于条目的人物冠以职称。

十、地名用当时的名称。凡已改名的地方适当夹注今名。村镇地名注明所属之省县（市）名称。

十一、外国人名、地名、国名、机构及职官名称，凡一名多译者，取其标准译名。今译与旧译不相同者，取今译名，或夹注今译名。

目录

编著者名录
出版前言
序
凡例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9年（清宣统元年）
1910年（清宣统二年）
1911年（清宣统三年）
1912年（民国元年）
1913年（民国二年）
1914年（民国三年）
1915年（民国四年）
返回总目录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8月

8月20日（七月二十日）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在孙中山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开正式成立会，到百余人，通过会章，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国内外设支部，各省设分会。

△　抵制美国迫签华工新约风潮，5月间开始以来，至7月20日因拒用美货而进入高潮。是日，湖南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在长沙开会，到4000余人，议决成立湖南办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

△　驻沪美总领事罗志思照会署两江总督周馥：上海及各口岸抵制美货，实违中美约章，请设法制止。

8月21日（七月二十一日）　上海公忠演说会、文明拒约社及医药、煤业、书业等团体代表联名在《时报》上刊登广告，号召国人坚持不用美货，不买美货，直到美国将华工新约改良为止。

△　广东学界在广州创刊《美禁华工拒约报》（即《广州旬报》），总编辑为黄节。每月三期，11月出至第九期，因美领干涉被迫停刊。

△　清廷以禁用美货“有碍邦交”，谕各省督抚晓谕商民，务令照

常贸易，对滋事者“从严查究”。

8月22日（七月二十二日）　财政处、户部会奏，遵旨设立天津银钱总厂（即户部造币总厂），并拟定《天津银钱总厂开铸，酌拟简明章程》，凡八条。

8月23日（七月二十三日）　江宁学商界700余人举行演说会，主张不用美货，戮力同心。

8月24日（七月二十四日）　江苏扬州开办酒捐，各酱坊、酒店罢市。

8月26日（七月二十六日）　外务部照会驻京美公使柔克义，排斥美货系商民行为，与政府无关。

△　商部奏准浙江士绅筹办全省铁路，以汤寿潜为铁路总理。

8月27日（七月二十七日）　同盟会本部干部会议议决《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交接办法，推宋教仁为移交者，黄兴代表同盟会接收。

△　外务部电咨出使美国大臣梁诚通告美政府，声言业已示谕商民停止禁购美货，请速妥订工约。

△　署两江总督周馥奏报查明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所产银、铜、煤、铁各矿，苗质甚旺，拟招商集股试办，并出示禁止私售。

8月28日（七月二十八日）　日本政府以“妨害安宁秩序”为由，下令禁止宋教仁等创办之《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第二期发行。

△　安徽泗州（今泗县）农民暴动。

8月29日（七月二十九日）　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清廷付偿金675万美元，将铁路收回

自办。

△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兴筑滇蜀铁路，设立公司，由滇、川、黔三省官民集资合办。

8月30日（八月初一日）　厦门商民因反对常关洋税务司苛税，举行罢市，聚众数千人捣毁该关，外国水兵竟枪杀华人四人，伤二人。

△　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8月11日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表示不计个人安危，决以身许此运动后，各地民众纷纷著文来函劝慰激励。是日浙江崇德石门镇集会宣讲《留别书》，听者纷纷下泪，情绪激昂。

8月31日（八月初二日）　上海公忠演说会召开力维抵制美货大会，反对疏通销售积存、已订美货，到千余人，议决办法四条，决心不用美货，坚持到底。

△　清廷谕饬各省督抚晓谕商民与美“照常贸易，共保安全”，“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弥隐患”。

9月

9月1日（八月初三日）　胡汉民、廖仲恺在东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

△　清廷接出使美国大臣梁诚电奏日俄和约成立，即召各王大臣开御前会议，决宜速与日本议订东三省条约。

△　清廷谕各省多派学生游学欧美，并令各出使大臣认真监督考察。

9月2日（八月初四日）　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清廷诏准废科举，自丙午（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

△　晚，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命广州府县，乘拒约会开会，逮捕其领导人马达臣、潘明信、夏重民。

9月3日（八月初五日）　宋教仁在东京向黄兴办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移交手续，孙中山出席监收，并倾谈同盟会会务。

△　浙江京官学生在京师集议，主废除杭甬铁路草约，招股自办。

9月4日（八月初六日）　留日学生会馆干事会开会，商议对付日政府取缔留学生及《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禁事宜。

9月5日（八月初七日）　山东郓城县农民暴动。

△　浙江湖州（今湖州市吴兴区）巢湖帮盐枭击败官军。

△　《日俄和约》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规定俄军撤出东三省，将在南满之权利转让于日本。

△　驻京日公使内田康哉往谒总理外务部庆亲王奕劻，陈述日俄和约成立情形，宣布日本政府将与清政府协商东三省问题。

9月8日（八月初十日）　孙中山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到香港、广州、澳门一带组织同盟分会，并为当地主盟人。

△　曾铸致书美商，指责美使胁迫清廷压迫拒约风潮，要求美国修改条约。

△　公忠演说会召开“敬释谕旨大会”，解释抵制不违谕旨。

△　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大会讨论抵制美约问题，主张彻底

废约，并上书外务部，致电美国总统。

9月9日（八月十一日）　江苏上海县士绅集议，选举董事创办地方自治，为全国首次举办地方自治之创例。

△　张之洞在汉口与香港英政府签订《香港政府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总额110万英镑，用于赎回粤汉铁路。

9月11日（八月十三日）　奉天马贼齐国泗、金生等月初攻入朝阳，转攻新丘（今建平县）。是日大败，齐等被杀，金等受伤而死。

△　驻京日、俄公使照会清外务部：日俄和约签押，两国准将东三省境内兵队定期撤退，地方权利交还中国。

9月13日（八月十五日）　上海复旦公学开学，校长马相伯。

9月15日（八月十七日）　清廷谕开放东三省，着内阁指定地界，多开场埠，推广通商，并饬地方官举办各种实业，以兴商务。

△　清廷谕各省清理矿产，切实探勘，并按两江集股试办、禁止私售之办法，迅即筹办。

△　日、俄两军签订停战条约，自16日起停止在东三省全部之战斗。

9月16日（八月十八日）　练兵处、兵部奏准颁行《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补官体制摘要章程》。

9月17日（八月十九日）　清廷为变法振兴，于7月16日特简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及绍英为钦差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分赴东西洋考求一切政治，是日载泽等五大臣请训陛辞。

△　清廷谕开办热河围场屯垦，派袁世凯督办。

9月18日（八月二十日）　清廷命出使各国大臣会同考察政治载泽等五大臣博采各国政情，悉心考证，以资详密。

△　出使美国大臣梁诚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谈美排华法案引起之中国抵制美货风潮。

9月21日（八月二十三日）　菲律宾华侨、南海冯夏威，为抗议美国华工禁约，7月16日在驻沪美领馆前自杀，灵柩南归。是日，广东学界在南武公学举行追悼会。

△　署两江总督周馥奏准开设江宁银行。

9月23日（八月二十五日）　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创办之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开学，另一会员陶成章制订章程，该校旋成为光复会活动据点。

△　清廷命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收回前与英商所订《苏杭甬铁路草合同》，由浙江绅民自办。

△　清廷允户部奏，永远停铸当十大钱。

9月24日（八月二十六日）　清廷出使各国考察政治载泽等五大臣自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乘车出洋，革命党人吴樾携预制炸弹登车行刺，炸弹遇撞引爆，伤绍英、载泽，吴樾当场死难，五大臣出洋改期。

△　南京商学各界2000余人举行第二次抵制美约会议，决定处理违约办法。

△　清廷谕令署两江总督周馥、江苏巡抚陆元鼎设法赎回宁沪铁路。

9月25日（八月二十七日）　清廷谕内阁责成步军统领衙门等严

拿谋炸五大臣之革命党人。

△　清廷命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总理福建铁路事宜。

△　商部顾问张謇、四品卿衔汤寿潜、候补道许鼎霖等奏准创设上海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两。

9月26日（八月二十八日）　北京户部银行开市，资本50万两，是为清政府试办国家银行之始。

9月27日（八月二十九日）　清廷谕令盛宣怀，全浙铁路由绅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之《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应迅即撤废。

△　外务部与各国驻京公使《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在北京签订。《条款》规定归中国自办。

△　湖广总督张之洞借英款100万两兴办自来水。

9月29日（九月初一日）　抵制美约运动团杭慎修等在北京联络宗室、满、蒙、汉军与22省代表1500余人致书美公使柔克义，声明一日不废苛约，誓一日不用美货。

△　江苏留日学生刊物《醒狮》创刊，同盟会会员高旭等主办，主要撰稿人尚有柳亚子、朱髯侠、高吹万等。

△　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电外务部，严防俄国侵略伊犁。

9月30日（九月初二日）　孙中山复函新加坡陈楚楠，告以近日在留日学界组成秘密团体及将赴安南（今越南）西贡筹款事。

△　商部奏准闽省绅商自办铁路，连接赣、浙、粤三省，举陈宝琛为总办。

是月　秋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旋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　四川留日学生刊物《鹃声》创刊，同盟会会员邓絜等主办，主要撰稿人尚有雷铁崖、张光厚等。

△　日本在辽阳设置“关东总督府”，以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总督，将南满置于日军政管理之下。

10月

10月2日（九月初四日）　京（丰台）张（家口）铁路动工。全长130余公里，詹天佑为总工程师。是为中国自筹工款自修铁路之始。

△　商部尚书载振往晤驻京法公使吕班，法使提出以每年减少庚款十分之三为条件，由法中合股经营广西铁路、矿山。

10月6日（九月初八日）　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召开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到会者逾千人。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在演说康梁保皇及立宪之谬误时，指斥自立军起义，与黄兴等两湖革命党人当场发生争论。

10月7日（九月初九日）　孙中山自横滨乘法邮船赴西贡筹款，同盟会东京本部会务由黄兴代理。

10月8日（九月初十日）　清廷设巡警部，以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补授该部尚书。

10月中旬　孙中山乘船往安南，船过香港，为冯自由、陈少白等加入同盟会主盟。

10月11日（九月十三日）　孙中山船泊吴淞口，会见来访之法国情报军官布加卑上尉，商定派员陪同法国军官视察南方各省革命力量，以争取法方援助事。

10月12日（九月十四日）　　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奏陈俄国改行立宪，我国亟应仿行，以保自立，而免受俄国或他国侵犯。

10月15日（九月十七日）　　是日至17日，广东各界在华林寺为冯夏威举行追悼会，往吊者每日逾万，呼吁抵制美货到底。

△　据修律大臣伍廷芳等奏请，谕准派刑部候补郎中董康等，前赴日本调查法制刑政。

10月16日（九月十八日）　　冯自由在香港与陈少白成立同盟会香港分会，陈少白任会长。

△　苏松太道袁树勋派李平书为总董，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佩珍为办事总董，姚文枏等33人为议事经董，上海内外城厢总工程局成立。该局内设代议机关议事会、执行机关参事会，此系用民主制度管理行政事务之地方自治机构。

△　浙江东阳县大开和尚率数千人抢夺富户，新昌县官吏恐慌，下令关闭城门。

△　旅沪浙江四明同乡召开拒约会议，议决抵制美货，坚持不用主义。

10月20日（九月二十二日）　　清廷据练兵处、兵部奏呈筹办贵胄学堂章程，谕令王公大臣遣子弟入学。

10月22日（九月二十四日）　　清廷再开御前会议，讨论辽东半岛租借、减缩撤兵日期及东清铁路三事。

10月23日（九月二十五日）　　陆军在河间府会操，共有二镇四协计3.32万余人，清廷派阅操大臣袁世凯、铁良前往校阅。25日会操结束。

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　安庆高等学堂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举行罢课。

△　清廷谕准江苏海州自开商埠。

10月26日（九月二十八日）　上海工界和平社在豫园开抵制美约大会，一致表示继续坚持拒约斗争。

△　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10月27日（九月二十九日）　蔡元培在上海由黄兴主盟加入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

10月28日（十月初一日）　广东廉州2000余人举行赛会，美国教士干涉，激起众怒，烧毁城西美国教堂、医院，死美教士五人。

10月30日（十月初三日）　陕西巡抚曹鸿勋奏请试办延长石油。

10月31日（十月初四日）　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开幕，资本400万两，官商合办，总办为张允吉。

△　英提督卧克纳率兵到日喀则札什伦布寺，迫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度。

10月下旬　孙中山抵西贡，联络堤岸侨商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等，组成同盟会分会。

是月　株（洲）萍（乡）铁路建成，全长39.7公里。

11月

11月2日（十月初六日）　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15条。

11月3日（十月初七日）　清法律馆派员赴日本调查法律。

11月4日（十月初八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川汉、汉粤铁路局。

11月6日（十月初十日）　清廷谕准于苏、皖、赣三省设矿政调查局，派矿务议员督查矿务。

11月7日（十月十一日）　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照会外务部，满洲日兵可于六阅月内撤退，惟俄兵亦须如期照办，方能允许。

11月12日（十月十六日）　浙江天台县法国教堂被焚毁。

11月13日（十月十七日）　清廷以英国政府已承认中国为西藏主国，允代偿英军兵费之要求，是日电寄驻藏大臣有泰，此次西藏对英赔款120余万两，由国家代付。

△　清廷命外务部加派译员，选呈东西各报。

△　四川总督锡良奏准于成都创设银行。

△　山东华德合资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创办人张翼，股本40万元，添招新股160万元，华、法股本为3：2。

△　卢汉铁路黄河桥举行落成典礼，全长三公里。

11月14日（十月十八日）　因谋炸出国考察政治五大臣案被捕之革命党人张榕被处永久监禁。

△　中英会议藏约，因英使费利夏迫清议约大臣张荫棠于约稿上签字未遂，罢议。

△　俄公使璞科第往晤庆亲王奕劻，力劝中国向日本收买东清铁路，若中国需用资本，则俄国当向美法两国商借款项。

11月15日（十月十九日）　外务部照会驻京英公使萨道义，择期会议苏杭甬铁路废约事宜。

11月16日（十月二十日）　祝大椿等在上海创设公益机器纺织有限公司，集股本100万元，纺织棉纱及原白、印花各布，是日商部批准立案。

11月17日（十月二十一日）　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开议东三省条约事宜。

△　《日韩保护协约》在汉城签订，日在韩设置统监府。12月3日，清廷令撤回驻韩使臣，改置总领事。

11月18日（十月二十二日）　清廷谕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

11月19日（十月二十三日）　清廷明定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为国币，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铜元、制钱相辅而行，以整齐圜法。

11月20日（十月二十四日）　财政处电各将军督抚对各省铸造铜元予以限制，规定江苏、湖北、广东每月造数不得逾百万，直隶、四川60万，其余各省30万。

11月21日（十月二十五日）　杭州烟业工人同盟会罢工，要求店主增加工资。

11月22日（十月二十六日）　江苏泰兴县2000多人反对抽牙帖捐，将高等小学堂砸毁。

11月23日（十月二十七日）　户部招考司员50人，派赴日本学习财政法律各学门。

11月25日（十月二十九日）　清廷命各省严禁革命排满说，严拿革命党人。

△　清廷谕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各国政治。

11月26日（十月三十日）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撰写发刊词，阐述同盟会纲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　中国留学生就读之日本东京各校是日一律贴出告示，限令中国学生本月29日前呈报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项，“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

△　清廷以日俄战事后，俄于蒙古有扩张权利之事，命肃亲王善耆往蒙古查办事宜。

11月27日（十一月初一日）　苏州城内染坊工人罢工，并印发传单，要求绸缎庄增加工资。

11月28日（十一月初二日）　《中德会订胶、高撤兵善后条款》在济南签订，德国允将1900年派往胶州、高密之军队撤回青岛。

11月29日（十一月初三日）　商部尚书载振奏请改革官制，将各部院官制及满蒙汉八旗官制逐一改正，并请将诸堂官兼差旧例统行革除。

是月　出使美国大臣梁诚与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领衔，联合前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和新任出使大臣刘式训、前出使比利时大臣杨兆鋆、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新任出使德国大臣

杨晟入奏，目前应急需实行三事，以树基础：一、“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誊黄刊贴”；二、“布地方自治之制”，“克日颁发各省督抚，分别照行”；三、“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迅即颁行。“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12月

12月1日（十一月初五日）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及全体留日学生向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具陈《学生公禀》，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

△　中德《会订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在北京签订，德国交还海关。

12月3日（十一月初七日）　东京宏文学院等八校中国留学生代表在留学生会馆筹商对策，决定次日赴驻日公使馆请愿。嗣后，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即以各校代表作为领导集体，渐扩充至十余校，形成留日各校学生代表联合会，以胡瑛、韩汝庚、宋教仁、田桐、秋瑾、吴玉章等为负责人。

△　江苏清江浦（今淮安市淮阴区）开设官盐局，私盐贩生计被夺，数百名妇女进城抗议。

12月4日（十一月初八日）　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取缔规则”，开始陆续举行罢课。

△　留日女学生集会宣布罢课，推秋瑾为总代表。

△　晚，留日各校学生代表推举胡瑛、韩汝庚等为总代表，集体赴公使馆请愿，次日再往。

12月5日（十一月初九日）　留日学生300余人在东京富士见楼

集会，商讨反对“取缔规则”对策。秋瑾在会上痛哭演说，提议联合罢课。会上，通过声明《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之驳议》。

△　中英议定藏约，中国新增四款，力保主权。

12月6日（十一月初十日）　东京各校中国留学生联合罢课，并制定《自治规则》，各校自推纠察员，组成纠察部。

△　清廷颁谕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并令国子监归并学部。

△　旅沪皖、赣、闽、浙四省士绅集议设铁路总会。

△　驻京德、法等国公使就中日交涉会议事，分别往晤庆亲王奕劻，要求与日本利益均沾。

12月7日（十一月十一日）　钦差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离京启程，16日抵上海。19日自上海放洋。

△　京都中国留学生全体罢课。

△　东京反对罢课学生发起维持留学界同志会，次日会议于清风亭。

△　闽广农工路矿大臣张振勋呈请商部转奏，请修筑广（东）厦（门）铁路，以保路权，先筑广（州）（黄）埔一段，并请将黄埔辟为商埠。是日，清廷颁谕允准。

12月8日（十一月十二日）　同盟会员陈天华因反对日本“取缔规则”，在东京愤而赴大森投海自杀。

△　官眷黎黄氏携带奴婢到沪，公共租界巡捕房以串拐罪捕交会审公堂审讯，会审公堂以此案证据不足主张释放，驻沪英副领事德为门令捕头、巡捕强夺人犯，双方引起冲突，酿成大闹会审公堂案。

12月10日（十一月十四日）　数千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留学生会馆集会，胡瑛主席，决议一致归国。

12月11日（十一月十五日）　孙中山与西贡华侨商议后成立广东募债总局，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发行千元票面债券2000张，拟向南洋富商募集革命活动经费。

△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自北京启程。

12月13日（十一月十七日）　东京留日学生220人为抗议日本“取缔规则”，首批集体退学回国。至20日归国留日学生逾2000人，后络绎回国者仍不绝。

12月18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海商民以英副领事德为门不法，主权受辱，相率罢市，毁坏捕房六间，外国水兵上岸镇压，枪杀华人11人，伤数十人。

△　出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乘美国“西伯利亚号”轮船自上海放洋，先经日本赴美洲考察，再赴德、俄、意、奥等国。

12月19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汉口商人胡德隆、朱益敬创办瑞丰面粉公司。

△　日本反对党进步党决议，试于国会提出取消“取缔规则”。长冈护美子爵等时亦出面斡旋。适日本内阁及文部相更迭，当局暗示暂缓执行“取缔规则”。

12月20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山西大学堂等校千余名学生禀请外务部赎回福公司山西矿权。

12月22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在北京签字，俄国按照《日俄和约》让与日本之东三省一切特权，清政府概行允诺。

12月24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维持留学界同志会设立会所，公布会章，提议劝告各校学生一体上课。该会代表理事多为立宪派，同盟会员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蒋尊簋等亦与之合作。随后联合会归国后与维持会复课派展开激烈辩论。

△　浙江宁波铜元贬值改行银元计价，群众损失甚大，数千人逼令商店罢市。

12月25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张之洞以留日学生风潮为革命党孙文煽动回沪实行革命，电请川、豫、鲁、黔各省督抚迅速派员各就本省留日学生开导解散会商办法，以弭后患。

12月28日（十二月初三日）　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以日本暂缓执行“取缔规则”，是日致函日本各校代表人、早稻田大学学长青柳笃恒，声明复学。

△　浙江余杭县城当十铜元改当九文用，农民捣毁商店四家，激成罢市。

△　粤汉铁路动工兴建。

12月31日（十二月初六日）　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商决复课日期。

是月　黄兴自日本经香港抵桂林，在随营学堂发展革命组织，次年春成立兴汉会，郭人漳、蔡锷、林虎、赵声等80余人加入。

△　日商大仓组与奉天官方订立合同，成立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资本400万元。

△　刀客张黑子、潘占魁、王天纵等在河南汝州鲁沟地方聚众起事。

是年　冬，同盟会会员吴春阳返国，建立江淮地区外围组织武毅会。

△　刘光汉（师培）自芜湖安徽公学因事至上海，由蔡元培、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蔡、黄并以安徽革命事相嘱。

△　同盟会会员李自重在原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与李是男等组织台山联志社，参加拒约运动，密谋革命。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1月

1月1日（十二月初七日）　　孙中山以总理名义签名的中华革命政府公债券开始在南洋发行。

△　清廷饬商部编纂全国铁路矿产表。

△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准奉天设商务总局，调查全省矿产及各项商业。

1月2日（十二月初八日）　　中英藏约会议，以英人增索矿权暂行停议。

1月3日（十二月初九日）　　清廷派李有棻总办江西全省铁路事宜。

△　赵尔巽奏准设立奉天银行。

1月5日（十二月十一日）　　清廷授端方为闽浙总督，庞鸿书为湖南巡抚。

1月6日（十二月十二日）　　外务部复照驻沪俄总领事阔雷明，同意出示晓谕百姓与从重惩办刊送罢市传单之戈忠等人，禁止演说和报馆登载有关政治得失以及中外全局之报道。

△　清廷调吕海寰为兵部尚书，以陆润庠为工部尚书。

1月7日（十二月十三日）　留日学生各会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会商结束取缔风潮事宜，获得协议。

△　清廷授那桐为大学士，学部尚书荣庆为协办大学士。

△　商部电告四川总督锡良，开成都为商埠。

△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商准法领事立即撤退广西柳州驻兵。

1月9日（十二月十五日）　清廷补授徐世昌、铁良为军机大臣。

1月10日（十二月十六日）　清廷徇外人之请开放山东济南、周村、潍县为商埠。

△　清廷改世续为东阁大学士，授那桐为体仁阁大学士。

△　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操练陆军、修筑铁路、移民实边、自开商埠等项，全力经营东三省。

1月11日（十二月十七日）　清廷在江苏创行征兵。

△　张之洞以中国矿务章程正章74款、附章73条呈奏清廷。

1月12日（十二月十八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抵美国旧金山，旋赴芝加哥参观工厂。

△　清廷谕令准班禅额尔德尼由印度启程回藏，照旧恪供职守。

△　山西省绅民代表呈外务部，请饬令福公司照章退让，由该省绅民自办矿务，以挽利权。

1月13日（十二月十九日）　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电请外务部索还俄国在黑龙江所开金矿。

1月14日（十二月二十日）　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嗣后所订开矿合同如已期满不办，不得再请展限。

△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乘法国“喀利力连”轮离上海赴日本。

1月15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各校留日学生复课。取缔风潮结束。

△　山西绅商直隶补用道董崇仁、吏部郎中孙笥经等集股银30万两设立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扩充开采晋省平、盂、泽、潞、平阳等处煤矿，呈请立案。

1月17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陈：留日学生罢课反对日本文部省所订整顿学校章规，现已平静，已将为首滋事之胡瑛、宋教仁等19名革退。

△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抵日本神户。1月22日抵东京访问。

1月18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皖绅吕珮芬等以外务部与英商订立铜官山矿合同已逾期未开，具呈该部请将英商合同作废，由绅民自办。

1月19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廷电谕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除考察政治外，其关系一切权利及财政等项事宜，不准与议。

1月20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同盟会员秋瑾由日本乘“长江号”轮抵上海。

1月22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报》第二号出版，刊载寄生《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等文，继续宣传革命宗旨。

1月23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抵华盛顿。

△　署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与驻京俄公使璞科第开议中俄条约。

1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一号始载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一文。

1月28日（正月初四日）　留日学生张继、赵保泰、韩汝庚、夏道南、吴玉章、曾鲲化等与日本学生代表联合发起华日学生会，促进交流。是日在东京本乡座剧场举行成立典礼，日本大隈重信、寺尾亨、福本诚等出席，大隈、马相伯、程家柽等发表演说。

△　清廷要求俄公使璞科第明订交还东清铁路股本500万两合同。

1月29日（正月初五日）　出使英、法、德、美各国大臣声明，五年内中国必能改行立宪制度。

1月30日（正月初六日）　清廷谕准广东息借外款500万两筹办粤省要政。

1月31日（正月初七日）　同盟会员胡毅生离粤赴桂林访黄兴，为法国情报军官调查革命实力。

2月

2月2日（正月初九日）　清廷谕内阁：嗣后各省将军督抚等保荐人才，务当力除积弊，不得徇私滥保，并着政务处会同吏、户、兵等部妥议限制章程。

2月3日（正月初十日）　粤省绅商集议筹办粤汉铁路，即日认股300余万。

2月5日（正月十二日）　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请外务部转商驻京英公使萨道义，减少进口印度鸦片。6日，英公使萨道义答复限制印度鸦片事，须俟中国自限栽种罂粟有效，始允照办。

2月6日（正月十三日）　福建漳浦县因天主教会掳掠教民，发生教案，教堂被毁。署闽督崇善应驻厦门英领之请派兵镇压，枪毙14名，并派员与英领商议办法，以赔款了结。

2月8日（正月十五日）　清政府照请法国撤退龙州驻兵，法另索浔州（桂平）一带之内河航利以为抵制。

2月9日（正月十六日）　外务部电请两广总督岑春煊就近与英商磋议自办广九铁路事宜。

2月10日（正月十七日）　清廷着户部按年筹给军机处王大臣等养廉津贴，以禁绝贿赂之风气。

2月11日（正月十八日）　袁世凯奏设高等师范学堂于天津，鲁、豫、秦、晋、奉天等省均可派生附学。

2月12日（正月十九日）　中日签订《奉新电线借用合同》。奉（天）新（民）电线原系中国产业，后为日军占用，经清政府派员交涉，日方仅允中国借用，双方乃签订此项合同。

2月13日（正月二十日）　孙中山离西贡。16日抵新加坡。

△　广西容县、藤县一带民众反抗清兵，同防营交战。

△　载泽、李盛铎、尚其亨自横滨乘船前往美国。

2月14日（正月二十一日）　外务部电告云贵总督丁振铎，勿许英人承筑缅甸至腾越铁路。

2月15日（正月二十二日）　戴鸿慈、端方在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考察后，自纽约乘轮赴欧洲。

2月16日（正月二十三日）　议约大臣张荫棠致书外务部，陈述英国谋藏及建议增兵入藏，优封达赖、班禅等项治藏政策。

△　浙江省士绅于杭州集议筹商撤废苏杭甬铁路草约事宜；同日，浙路总办汤寿潜、刘锦藻电外务部、商部说明应废约之原因。

2月17日（正月二十四日）　清廷派员出关收回东三省电报局，以结束日俄战后南北满分由两国代管局面。

△　袁世凯奏设矿务总局于天津，严禁私售矿产于外人。

2月18日（正月二十五日）　清廷命陈夔龙为江苏巡抚，张人骏为河南巡抚，恩寿为山西巡抚；命戴鸿慈升补礼部尚书，清锐为兵部尚书，松寿为工部尚书。

△　张之洞奏报鄂、湘、粤三省官绅修筑铁路，议定14条款；又奏湖北境内川汉铁路修建办法大纲。

△　安徽留日学生为支持各省收回矿权电请外务部，请拒铜官山英矿展限。

2月19日（正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军机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瞿鸿禨为协办大学士。

2月20日（正月二十七日）　英公使萨道义照会外务部，请开南宁为商埠，以防法国独占利益。

2月21日（正月二十八日）　慈禧太后面谕学部实兴女学。

2月22日（正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执行部外务程家柽应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聘返国。

2月23日（二月初一日）　中国公学于上海正式开学。该校为13省留日学生抵制日本“取缔规则”归国后创办，两江总督署补助经费，郑孝胥任监督。该校成为同盟会在上海活动的据点。

△　外务部与英公使萨道义开议滇缅划界事宜。

△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请严定选派留学生出洋章程，并请严惩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案首倡退学之韩汝庚、胡瑛二名及随声附和者宋教仁等17名。

2月25日（二月初三日）　南昌民众因法国传教士王安之在22日行凶刀刺知县江召棠致死，群情震怒，起而捣毁教堂，殴毙法教士王安之等六人及英教士三人。

△　山西省同乡京官集议决定筹款自办同蒲铁路。

△　河南巡抚张人骏奏请商办洛（阳）潼（关）铁路。

2月26日（二月初四日）　财政处奏准《整顿圜法》八条。

△　日公使内田康哉劝告清政府请饬各省督抚设法防止排外举动。

2月27日（二月初五日）　清廷谕令江西巡抚胡廷幹督饬严拿南昌教案首要，按律惩办，仍将各处教堂极力保护。

△　政务处、兵部奏准裁撤绿营办法，在各省挑选绿营改编为巡警队。

△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抵美国访问。

2月28日（二月初六日）　各省旅沪绅商分别电南昌巡抚、县令及商会，要求南昌教案“据理力争”，并劝戒群众切勿暴动，“以免外人口实”。

是月　刘静庵在湖北武昌正式开会成立日知会，孙武、张难先、曹亚伯等百余人入会。

3月

3月1日（二月初七日）　山西留日学生总会禀外务部，请撤废英福公司开办山西矿务章程，以维护主权。

3月3日（二月初九日）　清廷以诚勋为江宁将军，恩铭为安徽巡抚。

3月4日（二月初十日）　孙中山自法国马赛启程东返。孙曾于巴黎谒法属安南总督杜美，商协助中国革命事。海行途中，偶遇旅法古董商人张静江，彼此畅谈后，张甚愿为革命工作略尽力量，以在欧洲经商营利贡献。嗣后，张“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3月5日（二月十一日）　清廷谕禁士民昌言排外，并请各省将军、督抚严饬文武各官切实保护外人财产及各教堂。

3月6日（二月十二日）　清廷派陕甘总督升允、陕西巡抚曹鸿勋办理陕甘铁路。

3月7日（二月十三日）　戴鸿慈、端方抵柏林，旋即参观官署、学堂、工厂。

3月9日（二月十五日）　江苏巡抚陈夔龙恐南昌教案波及上海，急电松江府尹通令所属各厅、州、县，保护教堂、教士，“勿任滋生事端”。

△　《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总第七十六号）刊出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反对排满革命。

3月12日（二月十八日）　载泽等奏称，考察日本政治，其富强之效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尤在教育普及。

3月13日（二月十九日）　日本交还新（民）奉（天）铁路。

△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随员杨守仁（笃生）、戢翼翚等在日本组织留学生翻译各国政治制度图籍，留学生赖译费以为学费、日用。是日，杨交《英国制度要览》一书与宋教仁译，译费88日元。宋氏经手诸书，后均由北洋官书局出版。

3月14日（二月二十日）　豫、晋、陕三省留日学生电请清政府撤销英福公司办矿合同。

△　载泽等离美赴英，22日至利物浦登岸。

3月15日（二月二十一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首创会员600人。

3月16日（二月二十二日）　浙江镇海英国教堂被毁。

3月17日（二月二十三日）　商部议准东三省设立轮船公司。

3月20日（二月二十六日）　商部会同修律大臣奏报《破产律》69条。

△　美公使柔克义照会外务部，拟招募华工开凿巴拿马运河，外务部照复以俟禁约改后再议。

3月23日（二月二十九日）　河南西平县“仁义会”反抗官府勾结教堂欺压百姓，在会首吴太山、苗金声领导下，拆毁衙署、教堂。

△　清廷命张之洞会同外务部妥为商办民教相安之法。

3月24日（二月三十日）　清廷谕各省将军督抚，嗣后各关道遵照限期按结具报洋税、常税。

△　戴鸿慈、端方谒见德皇。德皇论及中国变法应以练兵为先。

3月25日（三月初一日）　清廷谕示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着学部通饬遵行。

△　吉林、黑龙江绅商电禀商部，集议自办铁路、矿业、森林业及各工艺。

△　署两江总督周馥奏请永禁买卖人口，并拟定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六条。

3月26日（三月初二日）　商部奏准筹办商船公会，酌拟简章咨行沿江沿海各省督抚饬属筹办。

3月28日（三月初四日）　赵声、柏文蔚、林之夏、伍崇仁、林述庆等联合军队将校数十人，设革命机关部于江宁。

△　西北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豫晋秦陇四省协会，发表《成立通告》。

4月

4月1日（三月初八日）　卢汉铁路建成，全线正式通车，改名京汉铁路，自北京前门西站至汉口玉带门车站，全长1214.5公里。

4月2日（三月初九日）　德兵自山东高密县撤退，前高密知县与德员所订租地合同一并索回。

4月4日（三月十一日）　学部电嘱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兼行考察各国女校。

4月5日（三月十二日）　　《民报》第三号出版，刊载胡汉民所撰《〈民报〉之六大主义》，阐发同盟会理论及对内对外政策。

△　上海太古码头工人罢工，反对工头减少工资。

△　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电请预定立宪年限。

△　外务部再次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嗣后矿约限满即废，概不展期。

△　程德全奏请自开黑龙江矿务，先开金矿六处。

4月6日（三月十三日）　　孙中山自欧洲至新加坡，于晚晴园设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选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此系南洋第一个同盟会分会。

△　同盟会会员、留日归国学生姚宏业因为中国公学筹款受阻，愤慨国事，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

△　清政府允拨官款80万两协助吉林绅商自办吉林至长春铁路。

△　清廷通饬各省，改课吏馆为法政学堂。

4月8日（三月十五日）　　留日归国江苏学生高旭等在上海组织之健行公学开学，王培孙任校长。教员高旭、陈剑虹、朱少屏、柳亚子为首之同盟会江苏分会，即以该校作为活动据点。

△　署法公使顾瑞访晤外务部议及南昌教案，法使提出不认江（召棠）令被刺及索赔等五款，外务部不允。

△　英公使萨道义照会外务部，滇缅边界以北纬25度以至30度为两国分界处。外务部即电饬云贵总督查明具复。

4月9日（三月十六日）　政务处奏准绿营一律改为巡警。

4月10日（三月十七日）　外务部电各边吏，重行具报边境矿产。

△　周馥奏请自开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为商埠。

4月12日（三月十九日）　考察蒙古事务大臣肃亲王善耆离京赴蒙古，清廷指示考察要事为联络蒙情、训练蒙军等五端。

4月13日（三月二十日）　同盟会湖北主盟人余诚负建立湖北分会任归国，四处访问同志。是日，会晤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庵，二日后又往访刘氏。后同盟会即以日知会为其活动基础。

4月14日（三月二十一日）　贵州毕节县“义和拳”千余人进城纵火焚烧。

4月15日（三月二十二日）　工部奏准设立工艺馆。

△　山东全省兴办征兵。

4月16日（三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由新加坡泊香港。

△　戴鸿慈、端方在德参观克虏伯炮厂、调查工矿及阅视西部各省兵操后，是日离柏林赴丹麦。

4月17日（三月二十四日）　孙中山自香港赴日本，临行嘱冯自由函知新加坡同志，告以孙文抵日活动之后，再到新加坡、河内布置吾党所经营各事。

△　中国至美国之太平洋海底电线铺成。

4月18日（三月二十五日）　外务部电饬各省督抚，嗣后如有未与立约国人犯案，即立派兵拿交海关道署或洋务局照例判断，无庸他国领事干预。

△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离英抵法访问。

4月19日（三月二十六日） 外务部电嘱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顺便考察各国教例。

△ 禹之谟在长沙由易本羲介绍加入同盟会。

4月20日（三月二十七日） 戴鸿慈、端方游历瑞典。

4月21日（三月二十八日） 贵州独山、都匀农民反抗官府压迫，攻破都匀府署，释放囚犯，并发布揭帖反抗教会。

△ 山东巡抚杨士骧与德商采矿公司总办贝哈格签订开办山东临沂、沂水、诸城、潍县、烟台五处矿务草约。

4月22日（三月二十九日） 驻沪法国领事约见孙中山，“提醒他注意小心从事，并说明法国在处理他的问题上是十分谨慎的”。

△ 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奏准裁撤勘矿总公司，由各省自办矿务。

△ 安徽巡抚恩铭奏，皖省举办新政，拟将皖产土药膏税加征每年10万两左右。

△ 中英议定合办广九铁路。

4月23日（三月三十日） 刑部派员司饶麟昌等三人赴日本考察法律。

4月24日（四月初一日） 孙中山抵横滨。

△ 英国公使萨道义致函外务部，英商开办川矿，请地方官竭力保护。

4月25日（四月初二日） 清廷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提

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

△　修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试办刑事、民事诉讼各法。

△　江都学绅、《扬子江丛报》、《扬子江白话报》编者杜课园，忤常镇道陶森甲，是日被诱捕，禁于丹徒县狱。

4月26日（四月初三日）　戴鸿慈、端方赴挪威。

4月27日（四月初四日）　湖北汉阳兵工厂驻守营兵与工人发生冲突，工人举行罢工，并拆毁营房。工厂会办张彪、提调黎元洪迫令工人复工。

△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北京签订，英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　袁世凯派武备学生分赴德、奥学习陆军。

4月28日（四月初五日）　《民报》发行第三号号外，揭载《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12条，声明自第四期以下分类与《新民丛报》辩论，吁请“国民平心公决之”。

△　孙中山至东京，在民报社与宋教仁等讨论事务。

△　江西星子县知县苛征激起民愤，吕留蕃率会党一二千人起事捣毁衙署。

4月29日（四月初六日）　上海中国公学同人召开姚宏业、陈天华二烈士追悼会，该校内务总干事、同盟会会员张邦杰主持。

5月

5月1日（四月初八日）　戴鸿慈、端方自挪威返德，复往萨克

森、巴延访问。

△　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来奉天游历，赵尔巽电军机处、外务部报告与西园寺公望商谈东北问题六事。

△　英公使萨道义照会外务部，以大金沙江及龙、潞二江之分水岭为滇缅分界处。9日，外务部复照驳复英使。

5月2日（四月初九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奏请切实保护出洋华商。

5月5日（四月十二日）　安徽建德县时山地方“洪莲会”聚众数百人起事，打毁各地教堂。

△　外务部与驻京英公使萨道义交换西藏条约。

5月6日（四月十三日）　同盟会东京总会改订《中国同盟会总章》，凡24条。

△　宁调元等在长沙由易本羲介绍加入同盟会。

△　外务部照会各国，嗣后不准外国人擅自在西藏经商。

5月7日（四月十四日）　戴鸿慈、端方抵瑞士。

5月8日（四月十五日）　《复报》创刊，由同盟会会员高旭、柳亚子等在上海编辑，寄日本东京出版，主要作者尚有陈去病、赵正平、马君武、高吹万、高增等。

△　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在保定成立，段祺瑞任督办。

5月9日（四月十六日）　载泽等离法折回英国，继续访问。

△　戴鸿慈、端方抵奥国京城维也纳。

△ 清廷命铁良充督办税务大臣，唐绍仪充会办税务大臣，海关华洋人员统归节制。

5月10日（四月十七日） 厦门《福建日报》言论得罪福建水陆提督马金叙，被营弁封闭。

5月上旬 中国在法留学生向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提出召开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要求。

5月11日（四月十八日） 清廷命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顺道往荷兰考察。

5月15日（四月二十二日） 商部奏准统筹全国铁路线路，嗣后各省官绅请办铁路，应就该部所绘全图分别缓急，指明段落，集资认股。

△ 学部奏准各省提学使到任前先往国外考察三月。

△ 华工1500名由秦皇岛开赴南非洲。

5月17日（四月二十四日） 戴鸿慈、端方在奥地利、匈牙利考察后，于是日离奥赴俄。

5月18日（四月二十五日） 湖南长沙商会为粤汉铁路事开特别大会，议仿粤省章程招股，一俟招足即请商部准归商办。

5月19日（四月二十六日） 戴鸿慈、端方抵俄京彼得堡。

5月22日（四月二十九日） 杭州市民反对米商囤积不售，发生抢米风潮，后由官方出面出示平价，禁止米商闭籴，风潮始息。

5月23日（闰四月初一日） 长沙数千名学生白衣素幡，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岳麓山爱晚亭畔，禹之谟等在葬仪上发表激烈演说。

△　清廷准学部奏，将各省贡院改为学堂。

5月25日（闰四月初三日）　江苏绅商集股设立苏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清廷从之。

△　载泽、尚其亨抵比利时访问，李盛铎已于20日先往安排。

△　清廷电饬袁世凯、赵尔巽、程德全等协力进剿马贼。

5月26日（闰四月初四日）　练兵处咨行新疆、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各省，按照定章编练新军。

5月27日（闰四月初五日）　中日两国代表在东京开议东三省电报交接事宜。

5月28日（闰四月初六日）　奉天日军滥伐木材，强行征税，民众愤激，奋起夺回木材。

△　戴鸿慈、端方抵荷兰海牙。

5月30日（闰四月初八日）　刑部奏请免除虚拟死罪条例，戏杀改为徒罪，误杀、擅杀一律改为流罪。

5月31日（闰四月初九日）　云南腾越干崖傣族土司刀安仁，在东京由吕志伊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

是月　陈家鼎携回黄兴手书，委周震鳞为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

△　禹之谟、陈家鼎等设同盟会湖南分会，禹、陈相继任会长。

△　长沙绅士及各学堂监督因阻葬陈、姚于岳麓山未成，分别禀请湖南巡抚，请求饬令速为迁葬，并惩办倡首滋事者。旋长沙学生集会天心阁，商讨对付办法，发表激烈演说。

△　湖南学务处札饬长沙、善化两县，饬陈、姚两家克期迁葬，并出示晓谕，如有违抗之人，严拿到案惩办。

6月

6月1日（闰四月初十日）　奉天日兵撤退至铁岭、抚顺地界。同日，日本公布奉天开埠。

6月2日（闰四月十一日）　上海祥丰、德丰、安吉、仁和、萃丰、合丰等14家成衣店雇工600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6月3日（闰四月十二日）　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各大臣，询及南昌教案、关税问题及中俄交涉事宜。

6月4日（闰四月十三日）　商部奏准何福堃总办山西同蒲铁路。

6月6日（闰四月十五日）　清廷谕内阁开办考察政治馆，将中外政治悉力考核，详加编纂，用备甄采。

△　戴鸿慈、端方抵比利时，与正在比京之载泽等晤商考察事宜。

6月7日（闰四月十六日）　日本发布敕令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　载泽、尚其亨离比取道法国东返，李盛铎留任出使比国大臣。

6月8日（闰四月十七日）　上海虹口密勒路瑞丝厂女工千人罢工，抗议资方克扣工资。

△　上海浦东陆家嘴美商晋隆洋行烟厂男女工人约千人罢工，要

求增加工资。

6月9日（闰四月十八日）　杭州机户工匠万人联合罢工，抗议物价上涨，向绸缎庄店主索加工资。

△　江苏东台县米价上涨，农民聚众捣毁当地富绅、地主多家及所办之学堂。

6月10日（闰四月十九日）　载泽、尚其亨离马赛返国。

6月11日（闰四月二十日）　清廷谕各省将军督抚振励官方，整顿吏治。

6月12日（闰四月二十一日）　政务处议准饬禁官民买卖妇女。

△　学部奏准派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

6月13日（闰四月二十二日）　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马队1200人剿办马贼。

△　外务部奏准拟调用人员办法，并设立储才馆，又奏请按年选派留学生，由储才馆负责办理。

△　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

△　日本政府公布《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条例》，资本二亿日元，日清两国政府各半，总局设于东京，支局设于大连，男爵后藤新平为总裁。

6月14日（闰四月二十三日）　商部奏准各省所设机器局兼造各种机器；若工匠及出洋毕业生果有能力制造机器，可奏明准酌借官款，俾助其成。

△ 丁振铎奏请滇省干支各铁路均归铁路公司承办。

△ 戴鸿慈、端方抵意大利罗马。

6月15日（闰四月二十四日） 直隶平山、灵寿两县举办警察，抽收捐款，农民聚众反抗，拆毁衙署大堂，殴击知县，捣毁学堂两所。

6月17日（闰四月二十六日） 陇海铁路汴（开封）郑（州）段竣工通车。

6月19日（闰四月二十八日） 上海租界工部局工程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6月20日（闰四月二十九日） 安徽南陵县农民截夺过境谷米，并捣毁衙署。

△ 浙江仙居县灾荒，饥民抢米，商店罢市。

△ 中法订立《江西南昌教案善后合同》，清政府赔款25万两。南昌教案了结。

6月21日（闰四月三十日） 德国设置牛庄领事，兼管东三省商务。

6月24日（五月初三日） 奉天辽阳州（今辽阳县）农民焚毁州署。

6月25日（五月初四日） 法国新简公使巴思德抵任，是日呈递国书。

6月26日（五月初五日） 云南绅民请滇督致电外、商两部，向驻京法使交涉收回本省路权自办。

△　外务部照会英公使萨道义，拟退还英商承租安徽铜官山矿区银两，并将矿约作废。

6月28日（五月初七日）　浙江新城县（今属富阳市）红帮黄道士等200余人焚教堂，攻县城。

△　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北洋银圆局立案开办劝业铁工厂。

6月29日（五月初八日）　章太炎自上海刑满出狱，蔡元培及孙中山所派代表龚炼百等人至上海迎章至东京。章抵日后，“与胡汉民、汪精卫诸人每日恒至孙（中山）宅叙谈”。

6月30日（五月初九日）　禹之谟率湘乡中学堂师生数十人，赴湘乡县衙，请愿提取盐厘充学堂经费。7月10日，湘乡知县陶福曾上禀控以“哄堂塞署”。

7月

7月1日（五月初十日）　法国情报军官欧极乐由同盟会会员乔义生陪同，于6月29日抵武昌考察革命势力。是日，日知会开大会欢迎欧极乐，纷纷发表热烈演说。

△　浙江新城县民众起事约期攻城，为官兵击败。

△　中日两国在安东（今丹东市）签订《鸭、浑两江军用木植合同》。日军从鸭绿江、浑江放下木植抽收军用木40万连，照价给发。

7月2日（五月十一日）　湖南常德府开埠。

7月3日（五月十二日）　革命党人邹容墓及纪念塔在上海落成，蔡元培等30余人于墓前开纪念会。

△　浙江武义县履坦庄会党抗捐，冲击县署，释放监犯，焚毁勒

捐之徐氏群英学堂。

7月4日（五月十三日）　商部奏准铁路占用地亩，应纳赋税，请申明由公司完纳定章，通饬一律遵守。

△　商部奏准《全浙铁路公司章程》，并准予立案。

7月6日（五月十五日）　江苏山阴县饥民抢米。

7月7日（五月十六日）　章太炎在东京由孙毓筠介绍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主盟。

△　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数千农民进城，要求减征，并抢火药库，毁断电线。21日，清廷谕令江西巡抚吴重憙弹压。

△　学部咨请各省添设政法学堂。12日又咨请各省举办实业学堂。

7月8日（五月十七日）　四川绅商以英商立德乐开设华英煤铁公司，所订开采江北煤铁矿合同满限，禀请清廷废约。

7月9日（五月十八日）　岑春煊以香港各报指责其计划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违法占权，是日下令严禁港报入境。

△　商部奏准于陕西加征土厘作为西潼铁路路股。

7月10日（五月十九日）　上海英租界日商三泰纱厂工人罢工，抗议日本工头虐待，要求改善工作条件。

△　江苏宝应县因米价昂贵，富绅居奇，激起众怒，农民捣毁绅宅12家。12日，汜水镇又发生同类事件。署两江总督周馥、江北提督刘永庆派兵前往弹压。

7月12日（五月二十一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

亨归抵上海。

7月14日（五月二十三日）　日本新任公使林权助抵任。8月21日呈递国书。

7月15日（五月二十四日）　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欢迎章太炎，到2000人，章氏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提出：爱惜汉种的历史，增进爱国的热肠。

7月16日（五月二十五日）　江苏扬州饥民发生抢米暴动。同日，泰州官盐栈被抢。

7月17日（五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自日本赴南洋，是日抵芙蓉埠，召集同志谈革命形势。指出：近一二年，革命“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清廷始为保子孙帝业，下诏维新，继则宣布立宪，“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又谓，惟有革命可以不招瓜分。

7月18日（五月二十七日）　江苏扬州府城内外饥民抢劫米行，仙女镇巡检衙署亦被打毁，邵伯镇一律罢市。

7月19日（五月二十八日）　江苏镇江米价飞涨，群众捣毁运米船只。

7月20日（五月二十九日）　安徽霍山张正金联合湖北英山、麻城、蕲水、罗田会党2000余人，攻清军防营。

△　学部准美国在北京设立协和医学堂立案。

7月中旬　孙中山赴南洋，船过上海，约熊克武、秋瑾等相见，请秋代筹1000元款。

△　孙中山船过香港，约见同盟会会员，调解《有所谓报》与

《中国日报》关于参加拒约运动、争路运动与否之争论。

△　孙中山抵新加坡，寓晚晴园，凡往来南洋各埠，均以星洲为基地。旋改组同盟会分会机构，以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

7月21日（六月初一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归国抵上海。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先后四次谒见，“竭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

△　《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一号（总第八十三号）刊出徐佛苏《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要求《民报》停止与《新民丛报》论战。

7月22日（六月初二日）　江西余干县黄花墩等地连日聚众反抗开办白土统捐，是日又有千余人参加。

△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法国撤减直隶驻兵，交还廊坊、杨村、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各处兵营。

7月23日（六月初三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抵北京，即赴颐和园觐见两宫复命。

7月24日（六月初四日）　是日及次日，慈禧太后召见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详细回答了慈禧的询问，并上折奏请立宪，请“明发谕旨，布告立宪，酌定若干年为实行之期”。

△　商部奏准将北京西山山北产煤地之门头沟铁路支线归并京张铁路，一并由国家投资兴修。

7月25日（六月初五日）　外务部、商部奏准《华洋合办热河霍家地金矿合同》。

7月26日（六月初六日）　清廷谕署两江总督周馥严惩抢米饥民，以靖地方。

△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札拿《时敏》、《亚东》两报主笔，《时敏》以罚款获释，《亚东》被封。

7月28日（六月初八日） 学部奏准《教育会章程》，凡15条。

7月29日（六月初九日） 户部、商部奏准岑春煊就地筹款，兴办铁路。

7月31日（六月十一日） 日本裁撤奉天军政署，开原、抚顺、铁岭、瓦房店之军政署亦同时裁撤。

8月

8月1日（六月十二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在沪分电各总督，商定立宪期限。

△ 日本政府公布“关东都督府官制”，改“关东总督府”为“关东都督府”。9月1日，任命大岛义昌大将为关东都督。

8月2日（六月十三日） 同盟会本部干部宋教仁、康宝忠、董修武、孙毓筠、匡一等八人会商接待四川会党首领佘英（竟成）事。

8月3日（六月十四日） 商部奏报湖南商董请湘境粤汉铁路归商筹办。9日，清廷谕仍应官督商办。

△ 清廷命吴重憙为江西巡抚。

8月4日（六月十五日） 董修武、宋教仁、胡汉民与章太炎会商《民报》事务，决定以章太炎为总编辑。

△ 学部议定《女学教育章程》。

△ 南书房行走、编修吴士鉴奏请试行地方分治。

8月5日（六月十六日）　　岑春煊派留日法政速成毕业生分赴两广各属宣讲法政。

8月6日（六月十七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到达天津，同袁世凯讨论筹备立宪及改革官制等事。

8月7日（六月十八日）　　同盟会吉隆坡分会成立，孙中山主持创始会员宣读誓词，陆秋泰为会长，王清（清江）副之。

8月8日（六月十九日）　　岑春煊奏请饬吏部拣选知县50员来粤，务要年在40岁以内，俾得派赴法政学堂学习，以兴举要政。

8月9日（六月二十日）　　天津学生上书过津之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请速定立宪。

△　袁世凯会商两大臣奏改官制，并饬办学各绅商会议地方自治制度。

8月10日（六月二十一日）　　同盟会会员禹之谟在长沙被捕，旋移解湘西靖州（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监禁。

△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自沪抵京，即赴颐和园觐见两宫复命。

△　日公使林权助与练兵处开议征剿满洲马贼及关于满洲诸种问题。

8月11日（六月二十二日）　　商部颁行《独资商业注册呈式》。

△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抗议在东三省设置“关东都督府”。

8月12日（六月二十三日）　　四川会党首领佘英（竟成）在东京民报社访晤宋教仁，讨论联合实行革命事。

8月13日（六月二十四日）　清廷准由大达轮步公司息借款项营建江苏通州天生港商埠。

8月17日（六月二十八日）　山西左云县“义和拳”进入县城，强迫知县供给粮食。

8月18日（六月二十九日）　巡警部查验各厅警官执照，防止革命党混入。

△　督办铁路大臣唐绍仪商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所有铁路警察请一律归巡警部办理。

8月19日（六月三十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端方等奏请实行立宪政体，并请宣示天下，以定国是。

△　佘英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8月20日（七月初一日）　云南全体学生代表全省人民电政府，诉云贵总督丁振铎昏髦庸劣，内政外交俱归失败，请据实密查严参。23日再电政府，请换丁振铎以挽危局。

△　户部饬各地海关所过货物一律抽税。

8月21日（七月初二日）　署两江总督周馥奏准机制棉纱出口常税，拟请改照洋关税则征收，华洋一律办理。

8月22日（七月初三日）　孙中山自南洋返抵日本。四川会党首领佘英谒见。孙命佘归，向川中会党喻以反清大义，且谓谢奉琦、熊克武曰：吾国革命用兵，当在长江流域，四川其上游也，宜急图之。旋佘与谢、熊同归四川，积极策划起义。

△　清廷置川滇边务大臣，派赵尔丰充任。

8月23日（七月初四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端方等联名电

请速定立宪大计。

△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奏陈改行立宪政体，请先除满汉界限。

△　出使欧洲各大臣合词电请速定立宪大计，以图自强。

△　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设立全省巡警学堂。

△　袁世凯委周学熙、孙多鑫收回唐山洋灰公司。

8月24日（七月初五日）　江苏崇明县数千人捣毁学堂。

△　清廷谕伊犁将军长庚、陕甘总督升允、陕西巡抚曹鸿勋、新疆巡抚联魁妥筹兴办陕、甘、新疆三省工艺局。

△　岑春煊奏，嗣后无论何国，未经官家允诺，不准于中国境内擅行招工。

8月25日（七月初六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联名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为立宪之预备，缕陈“略仿责任内阁之制”、“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中央各官宜酌量增置、裁撤、归并”、“裁判与收税事务，不宜与地方官合为一职”等八条。

8月26日（七月初七日）　安徽霍山县张正金率众千余人围攻千畈岭教堂。

△　清廷谕派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鼐等暨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公同阅看考察各国政治大臣条陈各折件，请旨办理。

△　端方奏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编定颁布，以弭鼓动排满之乱党。

△　驻广州美总领事雷优礼照会岑春煊，请禁抵制美约会。

△　清政府通告各省，凡创办电话均归电报总局办理，拒绝外人干涉。

△　商部奏准汉口设立商务总会。

△　日本经营奉（天）新（民屯）铁路修竣通车。

8月27日（七月初八日）　慈禧太后召见袁世凯，袁面奏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

△　醇亲王载沣等在外务部会阅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条陈各折，讨论立宪事宜。多数同意改为立宪政体，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由荣庆草拟预备立宪谕旨。

△　陕西巡抚曹鸿勋奏请陕省改练新军，省屯军改编为巡防队。

8月28日（七月初九日）　清廷帝后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直督袁世凯等，讨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条陈各折件，商讨实施立宪事宜。

8月29日（七月初十日）　清廷帝后再召见诸大臣。诸大臣请求朝廷颁行宪政。实行立宪就此决定。

8月30日（七月十一日）　清廷诸大臣在外务部公所会商预备立宪谕旨稿，交庆亲王奕劻定稿。

△　外务部复照英公使萨道义片马国界事。

8月下旬　光复会会员徐锡麟至奉天彰武，访晤东北马贼首领冯麟角，谈及反清革命大业，相约“南北呼应”。

是月　秋瑾由南浔抵上海，与陈伯平、姚勇忱等，设蠡城学社，

联络浙江会党首领敖嘉熊、吕熊祥等，筹划起义。

9月

9月1日（七月十三日）　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命先将官制议定，详慎厘定各项法律，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　日本外务省照会各国，声明自是日起将中国大连港开放为各国通商自由港。

9月2日（七月十四日）　云南留安南学生上书清政府，言滇事危迫情形，请练军以固国防。

△　清廷为厘定官制，派载泽、世续、戴鸿慈及袁世凯等14人公同编纂，并命端方、张之洞等六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是日至10月7日，编纂诸大臣接连在朗润园会议官制。

△　巡警部得东京密探电，云孙文偕一日女赴京勾结杭辛斋（慎修），警官史太龙是日率兵警至中华报社，捕去自日本归来之藤堂调梅（即同盟会会员任天知）及其日本妻子，报主彭翼仲（诒孙）、杭慎修保释未成，次日刊出《巡警部捕拿孙文始末记》一文予以披露。

△　端方调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补授闽浙总督。

△　张之洞电湖南巡抚庞鸿书，凡新选新补州县官，均须先自费出洋考察。

9月3日（七月十五日）　京师学界全体开大会庆祝朝廷颁诏立

宪。

9月4日（七月十六日） 官制编纂大臣于颐和园开第一次会议。6日，官制编制馆成立。

△ 清廷以岑春蓂补湖南巡抚，庞鸿书补贵州巡抚。

9月5日（七月十七日） 商部奏准广西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立案，于式枚为总理。

9月6日（七月十八日） 户部造币厂定议铸造重一两、五钱、一钱之银币。

△ 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奏，拟请颁行地方自治制度。

9月9日（七月二十一日） 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绅商会议庆祝预备立宪。

9月10日（七月二十二日） 直隶试办地方自治，天津官绅设自治局。

9月11日（七月二十三日） 黄兴自新加坡与孙中山筹商方略后，取道香港、上海，是日返抵东京。

△ 岑春煊调云贵总督，周馥调两广总督，丁振铎调闽浙总督。

9月13日（七月二十五日） 江苏震泽县震泽镇民众捣毁平粜局及米店。

△ 清廷据袁世凯奏请于奉天省安东县大东沟设海关分卡，归安东关兼辖。

9月14日（七月二十六日） 浙江德清县饥民数千人进城捣毁库总、库书数家。

9月16日（七月二十八日）　　上海《申报》、《中外日报》、《时报》等联合发起在张园举行报界庆祝立宪会，到千余人，要求清廷迅速实行立宪。

△　学部编纂白话教育歌颁发各省，开发民智，以为立宪之预备。

△　唐绍仪与俄使璞科第在外务部开议中俄条约。

9月17日（七月二十九日）　云南留日学生电请外务部，力拒法人要求澂江府矿权。

△　财政处、户部会奏归并各省铜元局为九厂，共有九所，清廷谕派陈璧前往考察办理。

9月18日（八月初一日）　浙江乌程、武康、德清等县水灾，饥民暴动，抢粮及抢县吏多家。

△　编纂官制大臣载泽等奏报厘定官制宗旨五条，参仿君主立宪国官制，先就行政、司法各官依次厘定。

△　驻昆明英总领事务谨顺照会滇督，请中英合办腾越铁路。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极力拒绝。

9月19日（八月初二日）　江苏创办宪兵。

△　新任英公使朱尔典呈递国书。

△　清廷谕内阁严禁吸食鸦片，并禁种罂粟，以十年为限，饬财务处拟章具奏。

9月21日（八月初四日）　奉天铁岭、法库门（今法库县）、通江三处，宣布开作商埠。

9月23日（八月初六日）　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在东京成立。

9月25日（八月初八日）　宋教仁访晤黄兴，告以东北吉林边境韩登举事，黄兴亦告南行经过。

△　山东烟台华商反对西人设立工部局，联禀外、商两部及北洋大臣、山东巡抚、东海关道等，请主持力争。

9月26日（八月初九日）　孙中山自西贡致函苏忠汉，请唤起爪哇华侨爱国意识，促其与吾党合作，共图救国义举。

△　袁世凯刊刻各国官制大略及组织之用意，分送各王大臣及政界中人。

△　前出使意大利大臣、候选道许珏递呈陈言中国士大夫如不洗心涤虑，澄叙官方，虽欲仿行外国宪政，亦无所施。

△　吏部通咨各省，嗣后仕途人员，以学堂卒业生与候补官并用。

9月28日（八月十一日）　御史蔡金台奏，改革官制宜限制阁部、督抚、州县权限。

9月29日（八月十二日）　北京《中华报》被封禁，主笔彭诒孙、杭慎修被捕，彭旋遣戍新疆，杭递解回籍。

△　学部派张元济、林灏深赴东西洋考察学制，并往南洋察阅华侨兴学情形。

△　外务部与日公使林权助会议交还营口，日使允按约实行。10月25日，营口归还中国。

9月30日（八月十三日）　户部尚书铁良反对改革官制，与袁世凯大起冲突，镇国公载泽严劾铁良阻挠立宪。

△　御史刘汝骥就所闻厘定官制大臣会议情况奏称，总理大臣不可轻设，以杜大权旁落。

△　（北）京张（家口）铁路首段（丰台至南口）工竣通车。

是月　　秋瑾与陈伯平等在上海虹口祥庆里寓所试制炸药不慎爆炸，陈伯平眼睛炸伤，秋瑾手臂受伤。

△　同盟会会员李实谋在四川江油起义，事泄，率众退至剑州小燕山，旬日之间，发展至千人以上，铁良调巡防营围攻，李不幸牺牲。

10月

10月2日（八月十五日）　　新授云贵总督、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致电外务部请代奏，孙文在南洋一带售卖军务债票，有意煽乱，请饬属严为拿办，并请电饬出使英、荷各国大臣照会各该国外部，设法禁止解散。

△　云南省城陆军、政法各学堂学生上书政务处，陈滇省学务军政腐败废弛情形，请改良整顿，以救滇危。

△　学部奏报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于每年八月举行，考列最优者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及中等给予举人出身，酌予实官。清廷从之。

10月3日（八月十六日）　　外务部奉清廷谕旨，着岑春煊及各省督抚查缉孙文之活动，并电出使英、荷两国大臣汪大燮、陆徵祥切实商请两国外部，对孙文之活动设法禁止解散。

△　署吉林将军达桂奏报创设巡警学堂。

10月4日（八月十七日）　　清政府拟定整顿滇省要政七条：一、

清吏治；二、整军备；三、设巡警；四、兴学校；五、保护法人铁路；六、调查全省矿产；七、扩张东昭铜厂等。交新授滇督岑春煊酌核办理。

△　御史杜本崇奏称官制不可全事更张。中称厘定官制大臣十数人，“惟有权力者主持其间，余则随同画诺”。

10月5日（八月十八日）　学部新定章程，凡外人呈请在内地开办学堂者，概不允许立案。

10月7日（八月二十日）　清军在萍乡、浏阳、醴陵交界之麻石搜捕会党。会党首领李金奇投醴陵白兔潭死难。

△　江苏海州（今东海县）会党领导饥民数百人暴动，安东、阜宁、盐城等县饥民响应。

△　御史王步瀛奏称，设内阁总理不若现设军机三五臣工参酌办理之为得。

△　商部奏准《奖给商勋章程》八条，对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分别酌予奖励。

10月8日（八月二十一日）　御史赵炳麟奏，民智未开，下议院未能成立，大权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将成大臣专制政体。

10月9日（八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自西贡抵日本。船泊吴淞口时，因清政府防范甚严，不得登岸，分召蔡元培、高旭、陈其美、秋瑾、宁调元等上船会见。

△　御史张瑞荫奏，军机处关系君权，不可裁撤。

△　内阁学士文海奏，欲去军机大臣，设大总理，是欲学从前之日本权在大将军，请即行裁撤厘定官制馆，并请饬袁世凯速回本任。

10月10日（八月二十三日）　　山东曹州马在田、朱明等聚众八九股，每股百人以上，转入河南永城、夏邑等县活动。

10月11日（八月二十四日）　　巡警部订定《报刊应守规则》九条，规定“不得诋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害治安”。

△　御史石长信奏称，内阁官制设总理大臣一人，迹近专制，拟请军机处仍旧。

10月12日（八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在寓所接待日革命评论社同人。17日，收到宫崎寅藏送来的《革命评论》。

△　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议立总理大臣统一枢务，无论用亲藩，用满汉大臣，皆可恣睢弄权，启奸人窥伺之渐。

△　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权归内阁，流弊太多，下无政党，上下议院不克成立，不能仿行责任政府。

10月13日（八月二十六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军政、教育，拟请择要取法各国。

△　学部举办第二次游学毕业生考验。包括上年举行的考试，至1911年，共举行七次，考验及格者1388人，其中留日1252人，留欧美136人，给予进士出身者16人。

10月15日（八月二十八日）　　云南留日学生主办之《云南》杂志于东京创刊，吴琨编辑，每月一期，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

10月16日（八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致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张永福，促其在新加坡速印《革命军》，并鼓吹革命。

10月17日（八月三十日）　　袁世凯编刊《立宪纲要》，颁发直

隶各属。

10月18日（九月初一日）　湖南籍同盟会员陈家鼎、宁调元、傅熊湘在上海编辑《洞庭波》杂志，寄东京印行，仅出一期，被官府查禁。

△　岑春煊电奏，孙文派党人向河内法商订购军火，并派邓子瑜回港潜谋起事，请饬下外部照会英、法公使分致港督、越督设法禁阻。

10月19日（九月初二日）　清廷以盛京将军赵尔巽奏奉省应办事宜为难，谕军机大臣等奉省所用人员，准其奏咨调往，所需款项随时咨商户部设法协济，并勉赵尔巽力任该职，所有练兵、理财以及农工商业，务当认真筹办。

10月20日（九月初三日）　宫崎寅藏以“火海”为笔名在《革命评论》第四号发表《孙逸仙》一文，介绍孙中山的履历、主义、思想、精神，评称：“孙逸仙是要把中国变成自由共和的新天地……具有非为其战斗到底不可的命运和自觉降生此世的战斗的人物。”“孙逸仙是中国稀有的人物”，又“实在具有大本领的世界的大人物”。

△　上海道瑞澂奉外务部电令分别致书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会审公堂，派员检查各书坊，禁售《南昌教案纪略》。

10月21日（九月初四日）　孙中山在民报社晤见来访之宫崎寅藏、和田三郎、池亨吉。27日，又与平山周、伊藤京重至革命评论社。

△　唐绍仪奏陈与俄使璞科第议约开放北满洲，俄使已承诺。

△　醴陵会党首领李金奇副手张折卿被捕，11月5日被害。

10月22日（九月初五日）　新建陆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大

典，袁世凯、铁良为总校阅官。25日举行阅兵仪式。

10月23日（九月初六日）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进呈《欧美政治要义》一书，为清廷预备立宪参考。

10月26日（九月初九日）　中意商约在上海开议，意力索上海至绍兴航权，并开无锡、安庆为商埠，清议约大臣力拒之。

10月27日（九月初十日）　广东香山县申明亭乡农民千余人涌入自治公所，反对开办地方自治。

△　清廷从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奏，通饬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公园。

10月28日（九月十一日）　江苏巡抚陈夔龙密函瑞澂，告以孙中山“在各省沿江一带勾结会匪私运军械，意图起事”，令饬属认真防范。次日，瑞澂知照驻上海防营严密查拿。

△　《竞业旬报》在上海创刊，为竞业学会刊物。初由傅熊湘主编，1908年4月第十一期起由胡洪骅（胡适）、张丹斧主编。该刊注重思想道德风俗的除旧布新，间亦有民族民权主义宣传和对立宪派的讽刺。

△　陕甘总督升允与德商天津泰来洋行订立《德商承造兰州黄河铁桥合同》。

10月30日（九月十三日）　户部咨外务部，请照会俄公使转饬，迅将瑷珲属地全数交还。

△　萍乡知县张之锐闻有会党开堂，率勇搜查萍实里一带，查悉孙绍山邀请姜守旦、蔡绍南等参加明日开立复龙山事。浏阳知县亦在四乡巡查。

10月31日（九月十四日）　　达赖喇嘛自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抵青海西宁塔儿寺。达赖于1904年英军进攻西藏时出亡蒙古，事平后启程回藏。

是月　　湖南省城长沙警察局查获《革命军告白》、《革命军洪示》。后者有“军兴革命，挽回在天；复我汉祚，势所必然”语。

11月

11月2日（九月十六日）　　奕劻、孙家鼐、瞿鸿禨奏呈厘定之各部官制通则清单、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确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设内阁总理大臣。

△　大学士孙家鼐奏称，改定官制当从州县起，地方自治为宪法初基，将欲责放于台司，莫若试行于州县。

△　御史史履晋奏，改革官制宜先州县，后京师；先立议院，后立内阁。

11月3日（九月十七日）　　肃亲王善耆奏陈经营蒙古策，分屯垦、矿产、马政、铁路、学校、银行等八事，主开放蒙古荒地以实边。

11月6日（九月二十日）　　清廷下诏厘定官制。命“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则着照旧行”，否决设总理大臣统率责任内阁原议。其余，外、吏、学、礼各部照旧；新设邮传部；巡警、户、兵、刑各部分别改为民政、度支、陆军、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各部（除外务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

△　清廷谕令陆续编订各直省官制，妥议州县官制及办理地方自治事宜。

△　清廷命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均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补授军机大臣；吏部尚书鹿传霖、学部尚书荣庆、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户部尚书铁良开去军机，专管部务。

△　署醴陵知县汪文溥出示严禁会党，解散胁从，令已入会者速缴票布自首，旋又派防营清查四乡。

11月7日（九月二十一日）　贵州省贵定县苗民举行反洋教起事，各苗寨百余处数万人加入，旋即遭官兵镇压，首领罗法先死难。

△　清廷新授鹿传霖为吏部尚书，溥颋为度支部尚书（未到任前着铁良兼署），溥良为礼部尚书，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尚书，张百熙为邮传部尚书，寿耆为理藩部尚书，陆宝忠为都察院都察御史，沈家本为大理院正卿，奎俊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唐文治兼署农工商部尚书，毓朗暂署民政部尚书。

11月8日（九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致函旅日俄国民粹派《民意》报主编鲁赛尔，希望“由于您的善意号召”，全世界大公无私的人们将会逐渐理解中国问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

11月9日（九月二十三日）　清廷谕改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　清廷谕都察院纠察行政，责任綦重，应如何慎加遴选，着军机大臣妥议具奏。

11月10日（九月二十四日）　外务部复照日公使林权助，表示断难承认日本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11月11日（九月二十五日）　浙江仙居方锡汉因米贵，联合温州、处州两处农民起事。

11月13日（九月二十七日）　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奏请与土耳

其、波斯（今伊朗）、暹罗（今泰国）立约通好。

11月14日（九月二十八日）　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东京二重桥水池死，值晋人反对福公司攘夺晋省矿权，留东学生遂借作宣传，伪造绝命书二份，誉为争矿烈士，隆重追悼。

11月15日（九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与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在东京会谈，主张在中国实施立法、司法、行政、考选、纠察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　江苏淮阴、海州水灾，饥民流落扬州就食者近两万人，两淮运司强行遣送回籍，饥民聚众抗拒。

△　吉林长春府开作商埠。

11月16日（十月初一日）　潮（州）汕（头）铁路通车。全长42公里。南洋客属华侨张榕轩、张耀先兄弟投资兴建，此系中国第一条华侨自建之铁路。

11月17日（十月初二日）　山西太原士绅学生集会，反对福公司侵夺山西矿产，议决以死力争，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请咨晋抚保护弹压。

△　新疆巡抚联魁奏新省改练新军，步队三营为一标，马队两营为一标，共为混成协，暂名新疆陆军，请饬立案。

△　清廷令广州将军寿荫来京当差，调江宁将军诚勋为广州将军，以正黄旗汉军统领清锐为江宁将军。

11月18日（十月初三日）　浙江萧山县新坝镇农民反抗巡警压迫，捣毁警察局。

△　袁世凯片请开去参预政务等项兼差，又请将陆军第一、三、

五、六各镇归陆军部统辖，直境第二、四两镇由其统辖督练。

11月20日（十月初五日）　清廷准袁世凯片，开去各项兼差；并谕全国陆军均归陆军部统辖，第二、四两镇暂由该督调遣训练。

△　北京滇学会因英人强索腾越铁路，上禀外务部请向英使交涉，转电阻驻滇英领，并切陈办法。

11月21日（十月初六日）　江苏长洲县农民数百人结队到县署报荒，要求地主停止征租。

11月22日（十月初七日）　孙中山复张永福、林义顺函称："此间现拟设一大事务所在东京，为各省会员交通之地。"并谈及筹款事。

△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进呈编辑政治各书，计30种。

11月23日（十月初八日）　汉口江报馆因言论激烈被查封，经理李伯敬被拘。

11月25日（十月初十日）　东京留日学生会湖南分会会议自治章程，黄兴主持会议，宋教仁等出席。

11月26日（十月十一日）　孙中山复函鲁赛尔，指出近期中国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将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　革命党人秦力山在云南干崖病逝。

△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东京开成立大会。寺内正毅为委员长。次年4月1日开始营业。

△　孙中山复函鲁赛尔，指出美国资本家不可能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如果我们要走这条道路，"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

11月27日（十月十二日）　吏部奏准添设学治馆。

11月28日（十月十三日）　黄兴归国赴粤活动，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等在民报社为之饯行。

△　豫陕两省京官联名具禀邮电部，拟合豫陕两省之力筹筑洛潼铁路。

11月30日（十月十五日）　清廷颁布《禁烟章程》，凡10条，定期10年禁绝鸦片。

△　浏阳捕获洪江会坐探，供称姜守旦等已约期劫狱起事。

12月

12月1日（十月十六日）　外务部咨行各省，新开商埠，无论华洋各物，除照定章纳税外，均额外加征码头税。

△　广州将军寿荫等奏广州旗营改练新军，编订步队三营，炮队一营，其满汉制兵编为巡防枪队八队，炮队四队，并设讲武堂一所。

12月2日（十月十七日）　同盟会本部在东京举行《民报》周年纪念大会，到6000余人，黄兴主席，孙中山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演说，阐明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之概要。

△　谭人凤在东京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

△　学部奏定《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凡40条，准于驻日公使署内设留学生监督处，由出使大臣兼任监督。

12月3日（十月十八日）　醴陵会党连日制造旗帜、号补、刀矛等军用品。是晚，防勇在邓家渡抄获所制刀械。被捕会党供称，萍乡、浏阳、醴陵三处会党约期十月二十日（12月5日）左右同时起

事。

△　湖南巡抚岑春蓂派巡防队三队，1200余人，赴浏阳、醴陵镇压会党。

12月4日（十月十九日）　署醴陵知县汪文溥再次出示解散会党，并派勇搜查邓家渡、板山铺、沩山一带。晚，洪江会头领廖淑保集众数千首在萍、浏、醴三县分辖之麻石发难，会合浏阳会众抢占浏阳高家头。萍浏醴会党起义爆发。

12月5日（十月二十日）　萍乡、浏阳、醴陵洪江会分头起事，浏阳金刚头、萍乡高家台被起义军占领。醴陵防营再搜板山铺，抄获窖藏枪械，捕会党头领陈显龙等。

△　安徽繁昌县荻港商民罢市，反对官卡苛征。

△　中日双方在营口签订《交收营口条款》。次日，营口商埠地面由中国接收管理。

△　兼理挪威国事务英国公使朱尔典、比国驻京公使柯霓雅呈递国书。

△　清廷命驻藏办事大臣有泰来京当差，以帮办大臣联豫为办事大臣，张荫棠为帮办大臣。

12月6日（十月二十一日）　萍浏醴会党起义军龚春台部由醴陵占领上栗市，夺取守军枪械。江西宜春慈化市、萍乡桐木等处亦被他部起义军占领。

△　醴陵起义军李香阁等部集中西路神福港，瞿光文等部集中东部官寮，晚间分向县城前进；李部中途被巡防队击败，各路均退。

△　江西巡抚吴重熹派新军第一标第三营500人由南昌赴萍乡，又

命驻新昌之该标第二营200人就近赴萍乡上栗市。

12月7日（十月二十二日）　会党起义军集中于浏阳县境。上栗市龚春台部大队转向浏境，并调醴陵李香阁等部赴浏。姜守旦、陈绍庄等部由金刚头进至三口、永和市，夺取团局枪械，毙团总李得中等，占领该市。巡防队来攻，起义军败退。

△　驻醴巡防队赵春霆部进击西乡神福港起义军，新到巡防队一哨进击东乡官寮起义军。

△　湘抚岑春蓂加派新军第一标统带吴绍璘率该标第二营崔朝庆部赴醴陵。

△　奉天安东县老爷岭一带农民四五百人抗人警捐。凤凰城、九连城抗捐。

△　御史赵启霖奏请饬学部、农工商部合力筹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

12月8日（十月二十三日）　纽约《中国维新报》刊出康有为10月21日所作《布告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

△　龚春台、姜守旦部聚集浏阳牛石岭，列阵迎敌，败，退枫林铺，清军返县城外南街市，龚、姜等乘机回击，双方鏖战，清援军至，复败，陈绍庄重伤。

△　湖南巡防队吴廷瑞营250人抵醴陵，分队前往接迎神福港、官寮方向清军。

△　萍乡巡防队胡应龙、朱鼎炎部移驻县北案山关防堵。

△　铁路大臣裁缺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奏，京汉铁路干路告成，计

长2500余里，历时七八年，用款5213万余两，动借比款为多。

12月9日（十月二十四日）　上海宪政研究会开成立大会，马相伯被选为总干事，雷奋为副总干事。有会员300余人。刊行《宪政杂谈》月刊。

△　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新军第八镇十五协协统王得胜，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率步兵三营、炮队二队赴萍乡，会剿萍浏醴起义军。18日抵萍。

12月10日（十月二十五日）　赣、湘巡防队会攻上栗市，起义军头领沈益古率五六百人拒战，死伤甚众，上栗市为清军所夺。

△　湖南新军崔朝庆营抵醴陵，即由官寮、麻石赴援上栗市巡防队。次日抵达，清军已胜，即赴浏阳境内，与赵春廷、梁国桢、徐振岱部巡防队，连日分击零股起义军。

△　清廷命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岑春蓂、江西巡抚吴重憙等分头剿捕萍浏醴会党起义军，并传旨申斥吴重憙。

12月11日（十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岑春蓂迅派得力营队，会剿萍浏醴起义军，并着江西巡抚吴重憙速饬臬司秦炳直选带精兵，前往萍乡一带相机堵剿。

12月12日（十月二十七日）　湖南徐振岱部巡防队连续击败浏阳枨冲、东稔、小源、大圣庙等处零股起义军。

△　醴陵北乡起义军头领谭石基见清军移往浏阳，是晚率部再举，自官庄图攻县城，与清军赵春廷部遭遇于芦福岭，战败。

△　两江总督端方派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该镇艾忠琦标步队三营及炮、工、马、辎重队共2500人赴赣。25日，前队抵安源。

12月13日（十月二十八日）　江西巡抚吴重憙派臬司秦炳直再带省城防常备军一标第二营300人启程会剿萍浏醴起义军，22日秦率队抵萍乡。

△　东三省照中日条约开埠16处，计奉天六处，吉林六处，黑龙江四处，准于明年1月14日先行宣布吉林、哈尔滨、满洲里等处开埠日期。

△　北京滇学会上禀邮传部，承认愿筹集向法国赎收滇越铁路路款。

12月14日（十月二十九日）　姜守旦率起义军2000余人据守浏阳大溪山寨，是日为清军徐振岱部攻破，退往永和市。

△　湘抚岑春蓂派道员俞明颐赴浏阳、醴陵，择要驻扎督办，以一事权。

12月15日（十月三十日）　清廷谕江西巡抚吴重憙严饬各军，赶紧合力剿捕萍浏醴起义之萍乡会党。

△　湖广总督张之洞续派第三十二标统带白寿铭率领所部全标三营暨炮队一队驰往浏阳，会剿萍浏醴起义军。

△　云南留日同乡会派代表一人赴北京向清政府直接交涉腾越铁路、滇越铁路、七府矿约、滇缅界务四事。

△　清廷谕军机大臣应即督饬各省切实筹办编练新军。

△　清廷谕驻藏帮办大臣着联豫暂行兼署；所有亚东关开埠各事宜，着张荫棠妥筹办理。

△　清廷设立印刷官报局于京师。

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日）　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设立“预备立

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是为国内立宪派第一个团体。

△ 《预备立宪官话报》在上海创刊。系月刊。发起人庄景仲，以鼓吹君主立宪，提倡社会改革为宗旨。

△ 姜守旦、龚春台部起义军据守永和市二日，战不利，退大光洞，旋又由大光洞退往平江县境。

△ 萍浏醴起义军头领沈益古被害。

△ 陕西扶风县按亩加捐，筹办铁路，激起民愤，武举张化龙领导千余人围攻县城，迫使知县接受所提条款。旋遭凤翔知府逮捕。

△ 清廷谕内阁着各直省督抚切实推广农林，详查所管地方官民各荒，并气候土宜，限一年内绘图造册，悉数报部，由农工商部详定妥章，奏明办理。

12月17日（十一月初二日） 黄兴在东京晤宋教仁。宋问及湖南暴动事，黄告以“已派多人往各省经营”。

△ 清廷命瑞良为江西巡抚。

12月18日（十一月初三日） 清廷以萍浏醴起义军大多趋浏阳，谕仍着端方、张之洞、吴重憙、岑春蓂“严饬各军，合力防剿”。

12月19日（十一月初四日） 梁启超在神户须磨策划组党。夏历本月初，致书康有为，报告与杨度、蒋观云、徐佛苏、熊希龄等联络外界筹组政党事，拟以“尊崇皇室，扩张民权”，“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为宗旨，载沣、载泽为正副总裁，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赞助人，并请康退居幕后。是日，再致书报告进展。

12月20日（十一月初五日） 姜守旦、龚春台率残部400余人退

至平江沙铺，为清军追及，伤亡惨重，姜守旦、龚春台越岭逃出。萍浏醴会党起义失败。

△　陕西渭南县群众抗捐，捣毁厘金局、缉私卡、土药统捐分卡。

△　广东学绅商界公电政府，力争广九路约，承认自行建筑。

12月21日（十一月初六日）　黄兴往民报社晤宋教仁，告以“将有广东之行”，邀其“同往襄助”。

△　湖南巡抚岑春蓂奏称，有孙文会党王胜隐伏长江一带，已密饬严拿，并电知鄂、江两督。

△　端方奏称已商请袁世凯先后调拨“海圻”、“海筹”、“海容”、“海琛”、“飞鹰”五舰入江，以资镇慑。

12月22日（十一月初七日）　清廷谕端方、张之洞、岑春蓂，着严饬各军合力兜剿，并严密查拿王胜。

△　修律大臣议复前两江总督周馥奏请禁革买卖人口一折，应准照行，并拟办法10条。

12月24日（十一月初九日）　安徽宣城县官府残酷镇压抢粮闹事事件，杀害20余人，饥民800余人起而反抗。

△　广西巡抚林绍年奏准，招粤绅梁廷芳查勘富川、贺县、南丹州锡煤矿，设法试办。

12月25日（十一月初十日）　江苏嘉定县南翔镇饥民数百人抢粮。

△　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会党首领萧克昌被清军诱杀。

△　新任德国公使雷克斯呈递国书。

12月27日（十一月十二日）　清廷谕岑春蓂、吴重憙及沿江海各省督抚，着严饬各军合力搜剿，“毋留余孽”，并防范查拿各处会党。

△　旅美华商请国内绅商再行停销美货，并劝国人勿应巴拿马河工。

12月28日（十一月十三日）　清廷谕吴重憙、瑞良防范江西会党。

12月29日（十一月十四日）　清廷谕吴重憙仍着各军搜捕窜匿会党，并会同岑春蓂清乡。

12月30日（十一月十五日）　清廷以萍浏醴会党披猖，各省伏莽尚多，通谕各省督抚整饬吏治，兴办巡警，预遏乱萌。

△　陕西华州农民解法正等领导数千人进城捣毁西关盐局及厘局。

△　清廷谕山东巡抚杨士骧赶紧督饬各军迅速剿办曹州匪党，并会同河南防军合力围捕，歼除首要，务绝根株。

△　清廷升孔子为大祀。

12月31日（十一月十六日）　刘道一在长沙遇害。

△　靖州知州金蓉镜提审禹之谟，追究其与革命党关系。

是月　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宁调元、胡瑛、孙毓筠等多人相率自日本回国，试图响应萍浏醴起义。

△　湖广总督张之洞札湖南、湖北按察使，饬悬赏严拿会党，并

开列赏格：拿获王胜、陈金、姜守旦、陈绍庄，各赏银1000两；拿获宗黄、刘家运、曹玉英、黄庆武、柳际贞、刘林生、郑先声、李燮和、朱子尤、萧克昌、卢金标，各赏银500两。

是年　春，安徽革命党人在芜湖安徽公学成立岳王庙，以陈仲甫（独秀）为会长。

△　夏，同盟会福建分会成立，原由学界、会党组织之汉族独立会全体加盟，独立会代会长郑祖荫任分会会长，林斯琛任总干事。

△　朱执信、李文范、古应芬、张树枏、何公博等返国，任教广东法政学堂等校，组成同盟会广东分会，仍以何公博为主盟人。

△　黄格鸥自日本归国，在南昌成立同盟会江西支部，任支部长。

△　原公强会负责人、同盟会会员章宪章、陈崇功归国，联络公强会成员杨庶堪、朱之洪等，设同盟会重庆支部。

△　陈兆雯（幼云）自日本归国，任教保定崇实中学，发展师生入同盟会，成立河北支部。

△　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开学，钱鼎等在校建立同盟会保定分会，以钱为会长，会员多时逾百人。

△　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11项文件。

△　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温靖侯、谢逸桥、饶真等在广东嘉应松口设初级师范讲习所，以举人饶集蓉（芙裳）为监督，发展饶与学

生张谷山、姚雨平、张酿村、梁龙、丘哲等加盟。

△　刘冠三在山东济南设山左公学，聘归国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徐镜心、齐树棠、左汝霖、邦文翰等为教员，刘与许多学生旋亦入同盟会。

△　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谢鸿焘与邹秉绶、李廷璧等在山东烟台设东牟公学，徐镜心、陈幹、胡瑛、陈家鼎、陶成章等均曾来任教或留住，师生多人加入同盟会。先后而起者，尚有即墨胶莱公学、高密英林公学、曹州普通中学、掖县掖西中学、临沂沂州公学、惠民棣州公学、诸城东武公学等，均为革命分子所掌握。

△　直隶留日学生刊物《直言》创刊，同盟会会员杜羲主持，仅出一期而止。

△　山西保晋矿务股份有限公司在平定县成立，资本库平银300两。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1月

1月1日（十一月十七日）　清廷谕内阁命大小臣工讲求教育，整顿财政，培养将才，慎重名器。

△　清廷自开广西南宁为商埠。

1月2日（十一月十八日）　清廷命护理贵州巡抚兴禄严拿贵定苗民起义首领罗朝印、罗朝安。

△　驻京德公使雷克斯请在胶州湾兴筑船坞永久屯驻海军，外务部拒之。

1月4日（十一月二十日）　光复会会员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会长。

△　清廷谕端方仍着会同岑春蓂督饬认真清乡，并密拿萍浏醴起义首领。

1月5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在东京访晤日本作家池亨吉，告以萍浏醴起义后，“风云忽急，全国震荡”，吾党决乘此时机，“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刻举事”，占据广东省城，黄兴将先期前往，并邀池亨吉参加举事活动。

△　黄兴赴香港筹划革命，宋教仁代理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

1月6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被遣回籍灾民抢劫米店。同日，安徽宁国县冒埠饥民暴动。

△　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开成立大会，到者百余人，公选公毓为会长，庆山、文禄为副会长。该会以预备立宪，准备地方自治，养成立宪国民为宗旨。同年5月，入会者达700余人。8月，该会修改简章，改名为吉林自治会。

△　清廷谕考察政治馆分行各省督抚，妥筹办理救荒三策（筹蠲恤，招商贩，办工赈）及备荒三策（重农桑，兴利源，设局厂）。

△　清廷谕内阁着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曲阜学堂。

1月7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会党头领黄易、张宝卿等在上海被警探捕获，29日各国公使接受外务部照会，令驻沪领事将黄、张二人交还清政府，旋该二人被解往两江督署。

1月8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清廷谕湖南巡抚岑春蓂，即着飞咨沿江沿海各督抚严缉会党；浏阳会党业经击散，仍着实力清乡。

△　清廷电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夔龙密拿萍浏醴起事党首刘震、黎兆梅等，务获惩办；并着会同沿江沿海督抚一体严捕。

△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山东巡抚杨士骧严饬各军迅将曹州一带“各匪悉数扑灭”。

△　江南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抵江西萍乡，会同秦炳直进剿湘赣间洪江会。

△　陕西巡抚曹鸿勋奏，陕省兴办铁路，宜联豫、甘两省通力合作，请简大员督办。

1月10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以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

统名义照会各地同志会党，速举义师，并严禁侵犯奸淫及妨害外国人之情事。

△　宋教仁在东京访徐佛苏，徐代梁启超向宋疏通，愿与革命派和平发言，不相攻击。

△　广州商民复倡禁用美货，两广总督周馥严禁之。

△　出使德国大臣曾广铨条陈政府，请派学生留学德国学习实业，并令研究德国制造枪炮学。

1月11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在东京晤宋教仁、胡汉民等，商讨梁启超所提《民报》与《新民丛报》双方“互不相攻击”之要求。孙反对调和，坚持将论战进行到底。

△　端方密电奏陈，萍浏醴起事实为留学生主动，刻各校学生已纷纷回国，请饬下日使杨枢查明姓名，开单分电各疆臣，以便严拿。

△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甘督升允认真整顿甘肃农工商矿各事，以兴实业。

△　张之洞奏请将湘省商办铁路改为官督商办。

△　农工商部尚书载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面奏东三省情形，长春南、北分为日、俄势力范围。

1月12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各省将军督抚速办警察，裁撤差役。

△　邮传部决议拨50万两建筑张（家口）库（伦）铁路。

1月13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清廷着南北洋大臣，派员赴新加坡侦探革命党举动。

△　张之洞派兵逮捕刘静庵，封闭武昌日知会。

△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直督袁世凯迅饬提督夏辛酉统带原统队伍，前往山东督办兖（州）曹（州）剿匪事宜。

△　清廷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绍仪任人瞻徇情面，屡招物议，着传旨严行申饬。

1月14日（十二月初一日）　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月刊。发行两期，3月停刊。

△　宽城子、吉林（永吉）、齐齐哈尔、哈尔滨、满洲里开为商埠。

△　清廷重行申明教育宗旨，并命学部会同张之洞议订曲阜学堂规则，慎选师儒，注重行谊。

1月16日（十二月初三日）　清廷命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严饬认真兜剿马贼。

1月18日（十二月初五日）　清廷在保定设通国武备学堂，附属陆军部，学生由各省保送，每省限定百名。

1月19日（十二月初六日）　陕西武功、富平、郿县、葭州（今佳县）、蒲城、高陵、临潼、渭南、潼关、朝邑等县农民反对开办亩捐，修造铁路，纷起反抗，焚捐局，拆学堂，毁电线。

1月20日（十二月初七日）　清廷谕内阁，据载振、徐世昌查勘东三省奏陈各节，着盛京将军赵尔巽慎选廉吏，广辟利源，豫谋生计，以期渐臻富庶。

△　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奏称，库伦屯垦，难以进行，惟速修铁路，开采金矿，较为利多弊少。

1月21日（十二月初八日）　清政府密电四川总督锡良、湖广总督张之洞、安徽巡抚恩铭，命饬省内各府州县严密搜索革命党，有所发现立即捕拿，而于军队学堂警察部内等处，尤须加倍严查。

△　江苏省铁路公司举行沪嘉铁路开工典礼，该路由上海至枫泾，全长53公里。

1月22日（十二月初九日）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两广总督周馥督饬提学使认真整顿广东学堂。

△　驻京各国公使以官场电传革命党联络外人，得外人承认，群赴外务部声辩，称纯属虚诬。

1月23日（十二月初十日）　汉口道捕获谋在汉口起事之革命党朱子龙、胡瑛等。

△　江西铁路总公司与日本大成工商株式会社订立入股合约，大成工商株式会社加入江西全省铁路股本上海规银100万两。

△　河南汴（开封）洛（阳）铁路通车。

1月24日（十二月十一日）　张之洞派第三十一标到黄州府捕缉革命党。

1月26日（十二月十三日）　清廷自开河南开封府南关为商埠。

1月27日（十二月十四日）　端方捕获同盟会会员孙少侯（毓筠）。3月26日判孙监禁五年。

△　清廷命署吉林将军达桂、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迅速妥筹，于俄兵撤退后，即派得力兵队填扎，并认真剿捕土匪，务保治安。

1月29日（十二月十六日）　党人徐敬吾在上海老北门被督辕缉匪委员捕获。次日，上海县知县王念祖用小轮解往两江督署。

△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派员分往日本各校侦查革命党学生。

△　学部奏请派梁庆桂赴美筹办华侨兴学事宜，派董鸿祎总理南洋各埠学务。

1月30日（十二月十七日）　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民众500人围攻教堂。

1月31日（十二月十八日）　俄兵自哈尔滨撤退。

是月　孙中山就日本报纸攻击诽谤同盟会一事，对东京同盟会员发表谈话，指出“常人毁誉，无足轻重者”。“吾党行事，一本义理，义理所在，虽毁何伤？悬此目的，务使达到而后已。天下后世，自有定评。日报所称，何足芥蒂！”

2月

2月1日（十二月十九日）　同盟会会员秋瑾抵浙江金华、兰溪联络会党，访龙华会首蒋乐山，谋浙江举义。

△　清廷谕令吉林提督马玉崑拨10营填防黑龙江省，交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妥善布置，认真防剿“胡匪”。

△　驻京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提出以赔款、惩办首犯、查办上海道袁树勋三条办法解决1905年上海“会审公堂案”。旋由某官捐私产五万金作赔款，不符之数由清廷承担，了结该案。

2月2日（十二月二十日）　清廷蠲缓山西阳曲等27厅州县、河南永城等44州县被淹地方钱粮。

2月3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东京革命党人举行刘道一追悼会，孙中山作七律一首以挽之。

△ 度支部奏准于热河创设官银行。

△ 农工商部通咨各省，查禁诱招华工至美洲开凿巴拿马运河。

2月6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山东巡抚杨士骧奏称："官军剿办曹匪，击散大股，擒获匪首郑四妮等，现与提督夏辛酉商办清乡事宜。"

△ 日本宣布中国留日学生共1.786万人。

2月7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廷准外务部、邮传部会奏《中英公司订定广九铁路借款合同》。

△ 清廷谕内阁，着各省将军督府督饬所属封禁各省烟馆，递年减种罂粟，并限10年以内将洋土药尽绝根株。

2月8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消除革命党在海外活动，向清廷献"拔本塞源"四策。其中第一策："与日政府交涉，驱逐孙文，查禁革命党。"奏称"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为不轨实迹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办"，"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使逆酋无托足之区"。

2月9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日订立《推广汉口租界专条》。

2月12日（十二月三十日） 清廷命班禅额尔德尼，俟藏务大定后，候旨陛见，并命达赖喇嘛现在留住西宁，着暂缓来京。

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 清庆亲王奕劻遵西太后谕旨，致函日本韩国总监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伊藤博文与内田良平计议，决定劝孙中山自行离开日本。

△　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国称“中华帝国宪政会”。

△　陕西扶风、武功、岐山、郿县10多万农民包围扶风县城，要求释放上年12月16日扶风起义领导人，凤翔知府采取欺骗手段，秘密杀害张化龙，起义失败。

2月15日（正月初三日）　黄兴抵香港后，因广东戒严，香港亦难居，遂返抵东京，当即向孙中山报告在港活动情况。

△　法公使巴思德向外务部要求与华商合办广西省铁路。越二日，广西留学生公电外务部，阻止法人要求广西铁路建筑权。

2月17日（正月初五日）　江苏阜宁县灾民1000余人涌进县城，捣毁仓书陈某和县书潘某两家。次日又聚2000人抢经、谷两家。23日约5000余人到县署大堂“滋闹”，抢走警察号衣、洋枪。

△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循出使日本大臣杨枢之请，开除与革命党有关系之中国留学生39人。

2月18日（正月初六日）　清廷谕内外大小臣工，办事用人务求实际，一秉大公。

△　上海轮船招商局开股东会议，议定按照商律改归商办。

2月19日（正月初七日）　孙中山派许雪湫谋举义于广东潮州，因泄露风声，卒不果动。

△　流入江苏扬州之外地饥民拒绝遣返，聚众殴官。

△　外务部复照法公使巴思德：北海至西江修建铁路应由中法公司合办，已咨粤督查明备案。

△　两江总督端方奏请将江南关所属支应、筹防、筹款三局归

并，改设江南财政总局，以继昌为总办。

2月21日（正月初九日）　吉林将军达桂电外务部，俄骑兵携带巨炮侵入蒙古境内。

2月23日（正月十一日）　税务处奏准裁撤粤海关广属各口。

2月24日（正月十二日）　黄兴邀宋教仁等商谈运动辽东马侠（即“马贼”），参加革命。

2月25日（正月十三日）　日人内田良平在东京赤坂三河屋设宴为孙中山饯行，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宫崎寅藏等出席。

△　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电外务部，条陈治藏刍议19款，其要旨为：改定官制，扩展军事，建设交通，推广学校，整理财政，振兴商务。

2月26日（正月十四日）　江苏如皋县石庄镇官盐分栈巡缉私盐，欺压平民，农民7000余人抢盐场、当铺，砸学堂，并改立年号为“顺德元年”。

△　江苏扬州饥民暴动，焚劫米店。

2月28日（正月十六日）　黄兴在东京因国旗图式之设计，与孙中山争论激烈，并欲退出同盟会。旋为顾全大局，勉从孙意。

△　河南修武绅民抵制福公司开办铁矿。

3月

3月1日（正月十七日）　俄兵自北满洲全部撤退。同日，南满洲日兵撤去第十五、第十六两师团。

△ 外务部奏准变通出使事宜。

△ 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设本社于大连，支社于东京。

3月2日（正月十八日） 湖北武昌被遣散之恺军要求发饷银一年，连日闹事，抢劫店铺。商店停业。

3月3日（正月十九日） 安徽灵璧县民众暴动。

△ 清廷谕云贵总督岑春煊与四川总督锡良互调。

△ 道清铁路通车，全长183公里。

3月4日（正月二十日） 日政府允清政府所请，馈金劝孙中山离境。是日，孙中山偕胡汉民启程取道新加坡至河内。同盟会总理职务由黄兴代理。

△ 清廷命闽浙总督丁振铎开缺，以察哈尔都统松寿为闽浙总督；以广州将军诚勋为察哈尔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景沣为广州将军。

△ 四川总督锡良奏报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改归商办，举定乔树枏为总理，并续订章程59条。

3月5日（正月二十一日） 江苏高邮县饥民数万人捣毁囤米富绅杨福臻住宅。

△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照两江总督端方所请，购办洋米，运回平粜。

3月6日（正月二十二日） 《民报》第十二号出版，发表汪精卫、胡汉民文章与《新民丛报》论战。

3月7日（正月二十三日） 浙江余杭县闲林镇纸行工人联合贫

民2000人砸毁米店。次日，知县前往查勘，兵役鞭挞民众，激起公愤，纷纷抢夺兵役枪械。

△　外务部与中英有限公司于北京订立《广九铁路借款合同》，款额150万镑。

3月8日（正月二十四日）　　清廷以东三省日俄两国兵队已将撤尽，谕军机大臣着盛京将军悉心筹划应办事宜，力戒因循。

△　礼部、学部奏准由学部附设礼学馆。

△　学部奏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及《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

3月9日（正月二十五日）　　广东东莞县饥民数千人抢米，警兵弹压，毙2人，伤十余人，商店罢市。

△　浙江象山县民众攻击教堂，并掳牧师一人。

3月上旬　　秋瑾至浙江诸暨、义乌、金华，4月中旬赴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函召金（华）、处（州）各会党首领入绍兴谋浙省举义事，前后来会者百余人。

3月11日（正月二十七日）　　吴淞沪宁铁路制造机厂工人罢工，反对厂主改革新章，要求如数偿还被扣除之年股及星期日工资。

△　浙江萧山县闻家堰饥民乘难民过境，聚众抢米店17家，各铺一律罢市。

△　江苏阜宁县、甘泉县邵伯镇饥民聚众抢米。

△　外务部照会英公使朱尔典，英商摩根未尽合同所载开办川矿之义务，决定将原订合同作废。

3月12日（正月二十八日）　外务部致英公使朱尔典节略：驻藏江孜商务委员并非禁止英员与藏民直接交易，尚希转饬在江孜英员，以后务要和平办事。

3月13日（正月二十九日）　浙江杭州饥民聚众抢米。同日，余杭、绍兴等府县饥民捣毁米店。

△　盛京将军赵尔巽、直隶总督袁世凯联电外务部，请与日使议订《满韩陆路通商详细专章》。

3月15日（二月初二日）　娄县、上海、青浦三县交界之小渡船数百名饥民抢米。次日，青浦县打铁桥饥民因抢劫富户，与知县所率民团发生殴斗，县令轿子被毁，打死团勇一人，打伤水师数人。

3月16日（二月初三日）　江苏如皋县白蒲镇饥民抢米。同日，安徽太平府饥民千余人抢河内米船。

△　浙江余姚县竹山港饥民千余人捣毁厘局、土药局。

△　清廷谕林绍年署邮传部尚书。

3月17日（二月初四日）　赵尔巽札行各州县，通谕民间禁止售地租地于外人。

3月19日（二月初六日）　上海县虹桥、嘉定县纪王庙镇饥民抢米。同日，安徽霍山、六安、寿州交界处之隐贤集饥民抢米。

△　端方奏请筹建南洋大学。

3月20日（二月初七日）　黄兴与宋教仁、白逾桓及日人末永节、古风在东京凤乐园共进午餐，商赴辽东运动绿林武装事。

△　端方于扬州杀害自东京回沪运动苏浙两省同志及会党起事之同盟会会员杨卓霖。

△　端方于南京捕获革命党多人在辕严讯，是日缚出留学生一人于篁桥市杀之。

3月22日（二月初九日）　清廷谕两江总督端方侦缉革命党人黄兴，务获惩办。

3月23日（二月初十日）　宋教仁离东京赴辽东，筹划在东三省联络马侠举行起义。

△　是日至4月2日（二月二十日），帝国宪政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各埠代表大会，康有为作报告，会章确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具体纲领为尊帝室，扩民权，监督政府，讲求宪政之事。

3月24日（二月十一日）　江苏如皋县贫民千余人抢米。同日，浙江长兴县属李家港客民抢米，拒捕伤勇，客民亦毙二人，获九人。

3月25日（二月十二日）　日清轮船公司成立，资本810万元，日本政府出资80万元，有汽船29只。4月1日开业。

3月26日（二月十三日）　民政部奏准饬查各省社仓，并妥筹办法。

△　端方电上海道瑞澂，令其严厉镇压抢米风潮，“如聚数十人以上”，“首要就地正法”，其他仍照法办理。

△　山西省士绅以英商福公司背约开矿，是日宣布对抗福公司意见书，要求废除原办矿合同。

3月27日（二月十四日）　河南开封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反对取消官费。

△　安徽芜湖一带连日发生抢米案。

3月29日（二月十六日）　都察院代奏直隶、江苏、山东三省京官筹款自建津镇铁路，清廷谕军机大臣着袁世凯、张之洞妥商办理。

3月30日（二月十七日）　清廷谕军机大臣电寄两广总督周馥，唐绍仪现有要差，不能赴粤，该省铁路事宜着另筹商奏明办理。

△　日本兴业银行与日商上海大成工商会社订立《江西铁路公司借款契约》，借上海规银100万两。

3月31日（二月十八日）　上海地方自治研究会在张园举行周年纪念会，到千余人。

△　清廷谕军机大臣电寄山东巡抚杨士骧，着即认真赶办清乡。

△　张之洞电邮传部，请于筹赎京汉路借款总额内代借英款千万或1500万修筑鄂境粤汉、川汉铁路之用。

3月下旬　孙中山在河内设立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之总机关，河内、海防等地相继成立同盟分会。

是月　阙麟书由日抵沪，与秋瑾、陈伯平、尹锐志等光复会会员多次聚会，旋偕秋瑾赴杭，与张恭、竺绍康、王金发等人密谋浙江起事。

4月

4月1日（二月十九日）　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接收铁道及其附属各事业。

4月2日（二月二十日）　《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为社长。

△　安徽繁昌县饥民抢米。同日，浙江奉化县饥民抢米。

4月3日（二月二十一日）　宋教仁为联络东三省马侠举义，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是日偕白逾桓自日本抵安东县（今丹东市）。

4月4日（二月二十二日）　清廷谕准伍廷芳筹办广九铁路事宜。25日，复谕准伍廷芳、张振勋权理粤汉铁路公司事宜。

4月7日（二月二十五日）　外务部与英公使朱尔典商订藏印商务章程事。

4月8日（二月二十六日）　辽宁凤凰厅（今凤城县）大孤山马侠李逢春邀宋教仁上山面谈，表示赞成同盟会宗旨，愿一致行动。

4月9日（二月二十七日）　宋教仁致书马侠李逢春等，劝“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合为一团”。表示“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

△　南京下关忽来饥民2000多人，沿途抢食。次日又在水西门抢米店。

△　周馥颁谕限制报馆，除现有各家外，不准复开。

4月10日（二月二十八日）　安徽当涂县饥民千余人抢过境赈米。同日，江苏泰兴、丹阳等县农民四五千人烧毁地主住宅多家。

△　清外务部派库伦办事大臣延祉与俄人订立外蒙古车臣汗伊鲁旗金矿条约。

4月11日（二月二十九日）　江苏江都县（今扬州市）瓜洲镇过境饥民数千人抢米。同日，江苏宝山之罗店镇饥民抢米。

△　清廷命豫陕甘三省督抚妥筹由洛阳至甘肃铁路。

△　盛京将军赵尔巽电告外务部：日本驻屯满洲军队，除铁岭、奉天两处铁道守备队外，已全部退完。

4月12日（二月三十日）　法部尚书戴鸿慈致书梁启超，请解释法部与大理院权限及开办地方审判办法。

△　江苏江宁县饥民抢米。

4月13日（三月初一日）　奉天奏报马贼肃清。

△　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奏请使用金币。

△　外务部以日军已撤离奉天，照会日公使林权助，请裁撤奉天城内及小西边门外警察署及派出所，以维中国自治全权。

4月15日（三月初三日）　外务部尚书那桐与日公使林权助在北京订立新（民屯）奉（天）、吉（林）长（春）铁路借款合同。

△　广西那地州兵变，州判杨璪荣被戕。

△　河南开（封）郑（州）铁路通车。

4月16日（三月初四日）　外务部照会日公使林权助，南满铁路应按中俄原约，由中日两国集股合办。日方置之不理。

4月18日（三月初六日）　广东琼州南路续备军第五营因管带克扣月饷，士兵哗变，杀死哨官、管带，附近居民响应。

△　外务部照会俄公使璞科第，请速饬俄商交还黑龙江新旧各金矿。

4月19日（三月初七日）　署吉林将军达桂奏，吉林、长春、哈尔滨自开商埠。

4月20日（三月初八日）　清廷谕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

分任之。

△　邮传部议定嗣后各省借外款开矿筑路，不得以路矿抵押。

4月21日（三月初九日）　清廷命大学士那桐兼署民政部尚书。

4月23日（三月十一日）　汉口杨家河米船上黄陂、孝感两帮雇工数千人要求加工资，将黄陂公所捣毁。

宁沪铁路工人数百人砸毁镇江洋务局。

△　清廷命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臣。

4月25日（三月十三日）　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临时增刊——《天讨》一书，内有“中华国民军政府”署名之《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等革命文件多篇。

4月29日（三月十七日）　广东钦州三那（那彭、那黎、那思）府吏苛征糖捐，民众二三千人组成“万人会”，举豪族刘思裕为首领，聚众抗捐，起兵攻城，破牢劫囚而去。

△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准将陆军第三镇及第二、四、五镇内抽拨步炮马各队成立两混成旅，移驻东三省，填扎外兵撤退地区。

是月　秋瑾手订光复军制，与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马宗汉等开会商讨通过。将嵊县、金华府属五县及缙云、武义、永康等地会党编为八军，行军路线及起义日期亦有部署。

△　陶成章与章太炎、张继、苏曼殊等在日本东京发起“亚洲和亲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该会由中印两国志士发起，设总部于东京、中国、孟买、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参加者有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马来亚、朝鲜、日本等国志士。

△　直隶静海县农民数万人进城抗议摊派牛马捐。

5月

5月1日（三月十九日）　孙中山致函陈楚楠、张永福，请转李水龙速赴香港加入革命活动。

5月2日（三月二十日）　日公使林权助照会外务部，称日本于奉天设警察署及派出所，于中国行政权“毫无侵涉”。7日，外务部复照林权助，日在奉设警察署及派出所，与现行条约不符，坚持应按约撤出。

5月3日（三月二十一日）　清廷以四川总督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裁缺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

△　清廷任命梁敦彦充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大臣。

5月5日（三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庆亲王奕劻管理陆军部，并察核各衙门事务。

5月7日（三月二十五日）　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夤缘无耻，以天津歌妓献于载振，并以10万金为奕劻寿礼，遂得署黑龙江巡抚。是日，清廷诏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

△　清廷谕令收回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成命，以程德全署黑龙江巡抚。

△　清廷调出使荷兰国大臣陆徵祥充保和会专使大臣，遗缺以钱恂继任；李经方充出使英国大臣。

5月9日（三月二十七日）　外务部电前盛京将军赵尔巽，日商私订开矿合同，应切实谕禁，并照会日领事声明不认。

5月10日（三月二十八日）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抗议晋抚取用公款赞助保晋矿务公司购买机器，以抵制洋人在晋之商政，并续索取偿款。

5月11日（三月二十九日）　日公使林权助照会外务部，声称抚顺千山台煤矿，烟台尾明山煤矿，按照日俄和约矿权应转属日本，否认华商对该二矿之所有权，拒绝交还千山台、尾明山两矿。

5月12日（四月初一日）　福州将军崇善奏准招募公债120万两，为开办农林实业之用。

5月14日（四月初三日）　周馥派防军标统赵声（同盟会会员），统领郭人漳会同总兵何长清镇压三那起事。赵密遣人与刘思裕接洽相机举事，事泄，赵急讽刘逃走。刘不肯，旋为何长清所杀。三那起事失败。

△　法部奏准《司法权限章程》，凡12条。

△　清廷命库伦蒙古办事大臣绷楚克车林会同库伦办事大臣延祉督办矿务。

△　沪宁铁路常（州）无（锡）段工竣通车。

5月15日（四月初四日）　清廷命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严防私运军火，以消隐患。

△　民政部奏请通饬各省酌裁民壮各役，募练巡警。

5月16日（四月初五日）　清廷以御史赵启霖奏参段芝贵夤缘亲贵不实，革职。次日，都察院各御史为赵启霖革职事集会商讨。

5月17日（四月初六日）　江西九江南昌间铁路工人因索取工资，捣毁新坝分局。

△　清廷准载振奏请，开去其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各差缺。

△　袁世凯派蔡廷幹统带军舰“海容”、“海圻”两艘游历南洋，借以保护华侨。

△　赵尔巽电外务部，请照会日使，禁阻日人越界收取黄海、渤海及山东沿海一带渔利。

5月18日（四月初七日）　清廷以镇国公载泽为度支部尚书，调度支部尚书溥颋为农工商部尚书。

5月19日（四月初八日）　粤汉铁路武（昌）岳（州）段开工。

5月22日（四月十一日）　同盟会黄冈之役。革命党人余丑、陈涌波奉孙中山命率会党700余人发动潮州黄冈起义，是晚9时攻城，血战一夜，次晨攻占黄冈。

△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准东三省官制，奉、吉、黑三省各建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设二厅、七司。

△　广东合浦县农民千余人进城大闹县署，次日抢教堂。

5月23日（四月十二日）　黄冈起义军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余丑为正副司令，并以“大明都督府孙”或“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文告及颁布纪律十余款。

△　浙江嵊县“乌带党”起事。

△　西藏江孜开埠。英公使朱尔典请予藏民以划押全权，俾与印员直接交涉。外务部却之。

5月25日（四月十四日）　黄冈起义军由陈涌波率一部向潮州、汫洲进发，清将黄金福率兵驻守，陈部进击不胜，黄冈余丑闻报披发

誓师，攻洪仍不取胜。次日，清援兵大集，起义军与敌激战数小时，死伤甚众，乃退回黄冈。

5月27日（四月十六日）　余丑、陈涌波等会议决定解散黄冈起义军。余等由海道往香港，陈等藏匿于黄冈附近南岭山。黄冈起义失败。是役死难者94人，事后被捕牺牲者60余人。

△　清廷谕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迅速会剿黄冈起义军。

5月28日（四月十七日）　清军进入黄冈，搜获余丑等遗落之党人名册，按名逮捕，惨杀200余人。次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部赶至黄冈，又捕杀起义军多人。

△　清廷开缺两广总督周馥，补授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次日以陈璧为邮传部尚书。

5月30日（四月十九日）　清总税务司赫德与日公使林权助在北京签订《修订大连海关试办章程》。

5月31日（四月二十日）　中德两国在北京签订《中德会定电报事宜合同》。

6月

6月1日（四月二十一日）　邮传部派周长龄从日本接收新（民屯）奉（沈阳）铁路。

6月2日（四月二十二日）　惠州七女湖之役。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奉孙中山命派陈纯率会党百数十人在惠州府归善县（今惠州市）七女湖起义，夺取清兵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兵多人。

6月3日（四月二十三日）　四川开县农民和“红灯教”徒2000余

人，反抗苛征猪捐、土膏捐、学捐，拆毁各地教堂、学堂及教民住宅。

△　福建建宁府（今建瓯市）商人罢市，抗议米价上涨。

6月4日（四月二十四日）　　清廷命前两广总督周馥严饬各军赶紧剿办钦廉一带抗捐民众，“务令早日敉平，毋任滋蔓”。

△　周馥电外务部，告以孙中山、邓子瑜住香港，“招引香港匪徒，入内地勾引乱民滋乱”。请求密商英公使转电英政府，饬港督速将孙、邓逐出，以保中外治安。

6月5日（四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函张永福，告以广东全省风动，粤事机局宏远，大有可为，请其“力任义务，以相协助”。

△　惠州七女湖起义军进攻泰尾，越二日克杨村。

△　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准由奉、吉、黑三省合办新民、洮南、札赉特、瑷珲等处铁矿。

△　外务部照会日公使林权助，东三省日兵业已撤退，其铁路界外之军线电局，请一律撤去。

6月7日（四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电日人平山周，两广义师已分道并起，盼资助械款，并指示汇款运械之联络办法。

6月8日（四月二十八日）　　惠州七女湖起义军进至柏塘，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

△　周馥电外务部，告以孙中山已到河内，要求“迅商法使，饬查驱逐”。

△　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以兴本利而固边卫。

6月10日（四月三十日）　　“女子复权会”机关刊物《天义报》（半月刊）在东京创刊。此系近代中国最早之无政府主义刊物，刘师培负实际责任。

△　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拟预备立宪阶段，设资政院及谘议局；清廷谕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其外省设谘议局各节，各省督抚妥议具奏。

△　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规划全国铁路，统筹全局，以京师为轨枢，分东西南北四大干线，并派员勘明缓急，次第兴修。

△　“日法协约”在巴黎签订，声明“维持两缔约国在亚洲大陆各自之地位与权利”，互相承认两国在华之权利与势力范围。

6月上旬　广东南雄县百顺司地方“三点会”千余人暴动。

6月11日（五月初一日）　同盟会香港分会派刘师复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弹在寓所不慎爆炸，刘被捕入狱。

6月12日（五月初二日）　惠州七女湖起义军林旺所部于八子爷截击清军管带洪兆麟，所部死伤甚众。旋因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部增援，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于梁化墟附近宣布解散。

△　张之洞奏湘鄂各军剿平萍浏醴会党情形，请奖出力员弁；清廷谕旨：“仍着严饬缉拿匪首姜守旦、龚春台等，务获惩办，以净根株，请奖各员，着该部议奏。”

△　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官督商办，资本300万两。后改名“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

6月13日（五月初三日）　清廷诏令嗣后不得徇情滥保。

△　日俄于圣彼得堡订立满洲铁路条约，规定南满与东清两铁路

联接之处。

6月14日（五月初四日）　孙中山电日本同志平山周订购械弹。

△　山东济宁州官吏收粮苛索铜元折价，农民万余人起而反抗。

6月15日（五月初五日）　外务部电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自藏赴印会议中英通商章程。

6月16日（五月初六日）　云南、贵州交界处苗民数万余人起事，广西庆远、柳州汉、壮等族农民予以支援。

6月17日（五月初七日）　端方电瑞澂，告以孙中山“在外洋私购军械，拟欲偷运回国”，“意图五六月起事”，要求严密搜查到沪各轮，发现形迹可疑者，立即捕获，从严惩办。并密电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谳员至宁，会商查拿革命党。

△　清廷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徇私溺职”命开缺回籍。朝野为之震动，是为清末“丁未政潮”。

6月18日（五月初八日）　清廷命两广总督岑春煊认真剿办钦州三那起义刘思裕等“著名各首要，均勿任漏网”。

△　外务部电滇督桂抚，严防孙中山由河内入滇。

△　清廷以吕海寰为外务部尚书，善耆为民政部尚书。

6月19日（五月初九日）　清廷实授吏部尚书鹿传霖为军机大臣，以陆润庠为吏部尚书；庆亲王奕劻请开去军机大臣要差，着毋庸议。

6月中旬　河南陕州“大刀会”数百人抢劫运往新疆伊犁之军装、枪弹等军事物资200余车。

6月21日（五月十一日）　　清廷命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

△　民政部奏请由修律大臣厘定民律，颁布施行。

6月22日（五月十二日）　　光复会会员陈伯平偕马宗汉由安庆抵上海购买武器，不几日，秋瑾从杭州抵沪，告知陈伯平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约定7月6日同时起事。

△　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杂志，该刊宣传无政府主义，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版121号。

△　清廷命商约大臣盛宣怀在沪与各国续议商约。

△　奉天辽阳州苛征捐税，农民2000人起而反抗，入城拆毁衙署，商店罢市。

6月25日（五月十五日）　　清廷谕各省将军、督抚切实办理禁烟事宜。

△　滇督锡良电告外务部，“查孙（中山）已潜往新加坡，自未入滇，惟早遣党分赴广东等处，自应严密查拿，以消隐患”。

△　农工商部咨文各省，严禁奸商招华工往智利国。

6月26日（五月十六日）　　清廷谕军机大臣等，着周馥督饬文武妥办清乡，“匪首刘思裕、黄世钦等是否阵毙，确查具奏”。

△　学部奏派张謇、王先谦等为江苏、湖南等省学务公所议长。

6月27日（五月十七日）　　英国外相令英公使朱尔典向清政府抗议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非法干涉藏事，忽视条约。

6月28日（五月十八日）　两江总督端方奏，筹拨官款开办赣州铜矿。

6月29日（五月十九日）　京奉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50公里。

6月30日（五月二十日）　法公使巴思德要求广西浔州西江航权，外务部拒之。

是月　浙江绍兴会党裘文高召台州义军由东阳至嵊县，扎营西乡二十八都村，树革命军旗帜，与清军交战，杀死清军哨官数人、士兵数十人。

△　杨度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国宪政讲习会，该会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选举熊范舆为会长。

△　项世澄、鲍咸昌等在上海等地设立五洲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100万两。

7月

7月1日（五月二十一日）　浙江武义党案发。秋瑾自绍兴发布五月二十六日起义命令，事泄，知县急报浙抚求援，清兵搜出会党名册，牵连大通学堂及金华等地会党，党人聂李唐等死难。

△　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供出该会部分会员别名或暗号。

△　清廷以广东钦廉起事，钦廉道王秉恩、北海镇总兵何长清贻误军机，未能迅速扑灭，均着即行革职，钦州知州顾永懋大负职守，着革职永不叙用。

△　大连关及安东关正式开埠。

7月2日（五月二十二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与德华银行总办柯达士面议津镇铁路借款自办大纲。

7月4日（五月二十四日）　　浙江定海厅民因加征粮耗滋事，4000余人进城捣毁厅署、学堂及教堂，全城罢市。

7月5日（五月二十五日）　　光复会会员陈伯平、马宗汉由上海抵安庆，即与徐锡麟密议，言秋瑾定二十六日起事，请践约同举。遂决定于翌日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起义。当夜，徐锡麟、陈伯平分别草拟起义文告，陈草拟《光复军告示》，以“光复汉族，翦灭满夷”相号召。

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　　徐锡麟安庆之役。上午，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等到堂。典礼开始，徐锡麟拔枪击毙恩铭，随即喝令学生整队出校，进攻军械所，旋与清军激战数小时，陈伯平牺牲，徐锡麟、马宗汉等被捕，徐锡麟当晚遇害，起义即告失败。

△　安徽藩、臬两司电告端方，将徐锡麟立予正法，剖心致祭。

7月7日（五月二十七日）　　绍兴知府贵福得劣绅胡道南密告秋瑾、竺绍康等私藏军火，是日赴杭州面告浙江巡抚张曾敭请兵往大通学堂掩捕。

△　军机处电传皖抚恩铭被戕，沿江沿海党徒素多，亟应严密防范，着各该将军督抚妥为布置，认真逮捕，勿任漏网，以弭隐患。

△　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安庆徐锡麟举义，即派令第八镇统制张彪、湖北候补道李孺率新军两营、炮兵一队并兵轮两艘赴皖弹压。

△　清廷为实行宪政之预备，谕内阁变更外省官制，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道缺，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择地

试办，其余各省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15年内一律通行。

△　御史赵炳麟奏请遵祖训，以消党祸而延国运，令京朝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警心，预防流弊。

7月8日（五月二十八日）　清廷就徐锡麟安庆举义事谕令两江总督端方妥为布置，散胁擒渠；电寄沿江各省督抚严密防范，以弭隐患。

△　清廷为预备立宪命各省官民，凡有实知预备立宪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条举以闻，由都察院、疆吏甄录代奏。

△　清廷以冯煦为安徽巡抚。

△　中俄两国在北京互换《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

7月9日（五月二十九日）　浙江巡抚张曾敭饬属缉拿徐锡麟父母家属，查抄其家产，并将大通学校及明道女学校一律封禁拿人。教员学生被杀者二人，逮捕者13人。

△　安徽涡阳县千余人自称革命新军起事。

△　度支部、邮传部会奏宜联豫、陕、甘三省合办西潼铁路。

7月10日（六月初一日）　外务部以中俄北满洲税关章程业已互换，咨南洋大臣端方、北洋大臣袁世凯，北满洲税关定期开关。

△　清廷令安徽布政使吴引孙为福建布政使，福建布政使连甲为安徽布政使；福州将军崇善因病解职，以镶黄旗蒙古都统特图慎为福州将军。

△　广东铁路公司于广州召开特别大会，通过议案九项，公举罗光庭为总理。

7月11日（六月初二日）　徐锡麟之弟徐伟在九江被捕，皖省司道即派“南琛”兵轮迎归案讯办。

△　清廷为修明礼教，谕准礼部奏设礼学馆。

△　外务部电饬出使美国大臣梁诚与美政府商议华工禁约，若美政府延宕不决，万一再有抵制美货事，中国政府不负责任。

7月12日（六月初三日）　秋瑾指挥大通学堂学生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及办事人员，待王金发嵊县兵到，再图举事。

△　清廷命李家驹充出使日本大臣兼留学生监督。

△　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

7月13日（六月初四日）　王金发从嵊县抵绍兴，同秋瑾商定于18日统军袭绍城。下午，清兵进入绍兴，贵福率兵包围大通，秋瑾被捕。

7月14日（六月初五日）　左都御史陆宝忠奏请严禁党援，广开言路，清廷谕将原折下考察政治馆知之。

7月15日（六月初六日）　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　度支部奏陈预备裁制外债，请旨饬下各省督抚，嗣后兴办一切，应就地筹拨，不得轻易息借外债，以防危害而维大局。

△　外务部电饬出使美国大臣梁诚，速与美商议华工条约。

7月17日（六月初八日）　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声称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已销声匿迹，孙中山亦被驱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以往，决不复能为患矣。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待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 清廷命两江总督端方会同沿江督抚及水师提督，妥议巡缉长江章程。

7月21日（六月十二日） 浙江海宁州长安镇农民因反对路局征购土地，聚众万余人捣毁铁路工程，并殃及学堂、教堂。

△ 安徽巡抚冯煦电两江总督端方，请通缉徐锡麟案之革命党方世钧、沈钧业、陶成章、陈志军、龚味荪、陈德稿、徐振汉（徐锡麟之妻王氏改名）等人，以遏乱萌。

7月22日（六月十三日） 浙江留日全体学生电浙江巡抚张曾敭，略谓皖案惨戮株连，显背去年旨谕，挑拨祸端，为大局危，乞公三思。

△ 清廷谕军机大臣等，东三省兴办一切要政，务将详慎妥筹，息借洋款须有把握，且应陆续议借，随时奏明办理。

7月23日（六月十四日） 清廷授协办大学士张之洞为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以鹿传霖为协办大学士。

△ 张之洞奏准于湖北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以保国粹而息乱源。

7月26日（六月十七日） 湖北潜江县郭家嘴数百人反对教会。

△ 清廷以山东提学使朱益藩为京师大学堂总监。

7月27日（六月十八日） 清廷以孙家鼐为武英殿大学士，世续为文渊阁大学士，那桐为东阁大学士，张之洞为体仁阁大学士。

7月28日（六月十九日） 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与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召开特别会议，议决致电农工商部、商约大臣，要求允许商人派代表参预商约。

△ 袁世凯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条陈管见十事，其要旨为：

建政府；设资政院；办地方自治；普及教育；融化满汉界限。

△　袁世凯奏请简派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考察宪法，并请简择王公近支聪颖特出者遣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助预备立宪之施行。

7月29日（六月二十日）　张静江至香港，晤胡汉民、冯自由，补行入同盟会手续。

7月30日（六月二十一日）　出席海牙保和会专使陆徵祥、出使荷兰大臣钱恂电外务部，请代奏再行确实宣布立宪宗旨。

△　《日俄协定》与《日俄密约》同时在圣彼得堡签订，宣布尊重彼此在中国之权利，划分在南北满势力范围，俄承认日在朝鲜之地位，日承认俄在外蒙之利益。

8月

8月2日（六月二十四日）　清廷命各省将军、督抚极力振兴实业，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从优奖励。

△　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与英国公司代理人熙礼尔会谈苏杭甬铁路事宜，并面交苏杭甬路商议大纲三条。

8月6日（六月二十八日）　军机处以安徽巡抚被戕事，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严防“沿江各省匪徒”，以弭隐患。

8月7日（六月二十九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以革命党各处横行，人心惶扰，奏请特颁谕旨，化除满汉畛域，令内外各衙门详议切实办法，迅速奏请核定施行，以靖人心，而伐逆谋。

△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驻奉天美总领事司戴

德签订备忘录，由哈利曼投资修建新（民屯）法（库）铁路。旋因美金融恐慌，改请英商投资。12日，日代公使阿部守太郎就此事照会外务部，提出抗议。

8月9日（七月初一日）　福建铁路公司开股东会议，公举胡国廉、叶崇禄为协理。

8月10日（七月初二日）　清廷下诏化除满汉畛域，并谕内阁着内外各衙门妥议切实办法。

△　清廷电张之洞迅速到京陛见，湖广总督着李岷琛暂行护理。

△　法部奏请将各级审判次第设立，以期司法行政切实施行。

8月11日（七月初三日）　御史赵炳麟奏请组织内阁宜确定责任制度，以为立宪之精神。

△　邮传部奏称京汉铁路与比公司借款筹办，利权外溢，拟限明年十二月以前退还洋款收回。

△　邮传部奏准改津榆铁路为京奉铁路，派施肇基会办。

△　江南水师提督程文炳奏报，巡阅长江各营，为安徽戕杀巡抚事赴皖协同防捕。

8月12日（七月初四日）　安徽芜湖三山镇农民聚众打毁米店及三山公所，各行商店罢市。

△　清廷以河南巡抚张人骏为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安心调理；以林绍年为河南巡抚，未到任以前，由袁大化护理。

8月13日（七月初五日）　清廷谕内阁，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所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事宜，改由内阁办理。

8月14日（七月初六日）　清廷调吴引孙为湖南布政使，尚其亨为福建布政使。

△　日、俄两国公使同赴外务部，宣布《日俄协定》内容。

8月17日（七月初九日）　外务部电知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出使日本大臣杨枢，《日法协约》内所称中国地面，中国自有保护和平、维持秩序之责，他国不应干预。

△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奉省速行开放政策，使成为各国通商重镇，并大借外债，为银行、铁路、开矿、垦荒之用。

8月18日（七月初十日）　天津县议事会成立，选出正、副议长。

△　《英俄协约》在圣彼得堡签订。该约由“波斯条款”、“阿富汗条款”及“西藏条约”三件组成。关于西藏条约，两国均认中国在西藏有宗主权，尊重西藏领土之完整，不干涉其内政。

8月19日（七月十一日）　湖北随州洪江会起事。

△　日本借口保护流寓于延吉（间岛）之韩人，即由驻韩统监府派日本宪兵及韩国警察越境侵入延吉地方。是日，日代公使阿部守太郎就此事照会外务部。

8月20日（七月十二日）　同盟会之《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创刊，田桐、王斧任编辑，胡汉民撰写发刊词。

8月21日（七月十三日）　清廷以南洋华侨商会成立，派杨士琦往南洋各埠考察商务，奖励华侨回国投资，并饬地方官妥为保护。

8月22日（七月十四日）　中德在济南签订《华德采矿公司勘办山东五处矿务合同》。

8月23日（七月十五日）　孙中山自河内函张永福、陈楚楠，在新加坡筹款万余元支援潮惠，再图大举。

△　清廷谕令各省督抚设法解散革命党，严密查拿党人，其被胁迫及家属不知情者，概免株连。

△　浙江巡抚张曾敭电瑞澂，告以革命党人王金发、竺绍康已由宁波赴沪，要求侦捕拿办。

8月24日（七月十六日）　安庆徐锡麟起义之革命党人马宗汉在安庆狱前就义。

△　清廷命张荫棠为全权大臣，与英国议藏印通商章程。

△　清廷电召直隶总督袁世凯入京陛见。30日，袁入京。

△　清廷以前云贵总督丁振铎于练兵兴学课吏理财各要政多不讲求，命交部严议。并严令各省督抚刷新精神，维持大局，痛除因循之习，以立富强之本。

△　端方奏陈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四条。

△　外务部照会日驻京代公使阿部守太郎，声明延吉为中国领土，来照所称统监府派员一节，中国断难允认。

8月25日（七月十七日）　汪康年主持之北京《京报》因登载议立储事，并屡揭庆亲王奕劻政以贿成各节，是日被民政部勒令停刊。

8月26日（七月十八日）　端方奏帝国宪法与皇室典范相辅为用，请饬编定颁布。

8月27日（七月十九日）　外务部照会驻京日公使，要求撤回延吉日军。

8月29日（七月二十一日）　陆军部奏报拟定《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练章程》，规定除近畿四镇、直隶两镇业经编定外，江苏、湖北各两镇，山东、山西、陕西、新疆各一镇，四川三镇，限三年；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热河各一镇，限四年；广东、云南、甘肃各两镇，广西、贵州各一镇，限五年；浙江、福建、奉天、吉林、黑龙江各一镇，限二年，一律编练足额。清廷从之。

8月30日（七月二十二日）　袁世凯奏请以天津为模范，计划全省自治办法，期以三年一律告成，以为预备立宪之基。

△　中俄签订《吉林省中东铁路公司购地合同》、《黑龙江铁路公司购地合同》、《吉林铁路煤矿章程》、《黑龙江铁路煤矿合同》、《吉林木植合同》。

8月31日（七月二十三日）　留日学生张继、刘师培在东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此系中国最早之无政府主义组织。出席者有日人幸德秋水等90余人。该会系张继、刘师培等不满于孙中山的美国式民主主义而组成。

△　农工商部奏准颁行《华商办理农工商实行爵赏章程》10条。

是月　张百祥、焦达峰等在东京成立革命团体“共进会”，张百祥任会长。

△　叶景葵等在汉口设立扬子江机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机器制造钢铁器具，资本银118万两。

9月

9月2日（七月二十五日）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裁撤驿站，设立文报局。

△　度支部奏准开采江西、云南两省铜矿，以为造币之用。

9月3日（七月二十六日）　同盟会防城之役。同盟会会员王和顺奉孙中山命率革命军二三百人于广东钦州府属之王光山起义，以“中华民国南军都督”名义发表《告粤省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9月4日（七月二十七日）　清政府照会日本驻京临时代办阿部守太郎，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七种杂志。照会称：“此项杂志均系本国乱党在贵国境内出版发行之件。其中倡导革命，措词狂悖者，不胜枚举，若听其展转流传，煽惑人心，实于本国治安大有妨害。”

△　上海道瑞澂令上海会审公堂将陶成章所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查明销毁。

△　清廷命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开缺，充会办税务大臣，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任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为军机大臣。

9月5日（七月二十八日）　王和顺率起义军攻占钦州府属之防城，生擒知县诛之，乡民携械从军者甚众。当日即转攻钦州，冀郭人漳率部响应。

△　清廷以山东巡抚杨士骧署直隶总督，山东布政使吴廷斌署山东巡抚；调四川总督赵尔巽为湖广总督，以江苏巡抚陈夔龙为四川总督；调浙江巡抚张曾敭为江苏巡抚，以陕西布政使冯汝骙为浙江巡抚，未到任前以浙江布政使信勤暂署。

△　民政部奏准重订《报馆暂行条规》，凡10条。

9月6日（七月二十九日）　上海道瑞澂派侦探在上海闸北拿获革命党人袁瑞庭等人。

△　出使奥国大臣李经迈以母病解职，命外务部右丞雷补同充出使奥国大臣。

9月8日（八月初一日）　端方以孙文时至南洋各埠演说革命宗旨，摇惑人心，奏请饬下杨士琦前赴南洋各岛时，宣布朝廷德意，以维侨情。

9月9日（八月初二日）　王和顺率起义军500人抵钦州城下，郭人漳内应不成，起义军不得入城，遂改趋灵山。

△　清廷命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督饬各军迅速剿办防城起义军，并着张鸣岐会商合力防剿。

△　清廷任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学部右侍郎达寿、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分别充任出使英、日、德三国考察宪政大臣。

△　察哈尔都统诚勋奏请改察哈尔、绥远、热河为行省，分设总督、巡抚各员，其张家口并先行自开商埠。

9月10日（八月初三日）　清廷令将贵州布政使兴禄即行革职，遗缺以贵州按察使松堮继之。

9月12日（八月初五日）　王和顺率起义军进攻灵山，遭清军截击。14日，王率20余人入安南，残部退向三那。

△　中英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开议藏印通商章程。

9月13日（八月初六日）　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告以防城起义，革命军一举破城，“现时弟欲急筹妥军饷、军械、外交等事，始入内督师”。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关于日本之运动，请宫崎一人全权办理，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同日，孙中山委任宫崎寅藏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

△　留日学生总会电军机处、外务部，日俄法协约成立，将有瓜分之祸，日本强争间岛（延吉），实其先导，请万勿让步。

9月14日（八月初七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湖南巡抚岑春煊会奏粤湘川鄂四省于武昌城外新河地方合资兴建工厂、制造粤汉、川汉两铁路所需钢铁各项材料，请予立案。

9月15日（八月初八日）　革命党人葛廉臣在上海西门外被巡警捕获，旋乘“江宽号”轮解往江宁。

△　安徽芜湖万顷湖佃户千余人抗租及反对夺佃、抢富康公司稻谷，抗击前来镇压之军警，捣毁垦殖公司办公处。

△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研究会、江苏教育总会、商务总会等12团体在总工程局开会，拟订谘议局章程草案，21日通过。

△　民政部奏报开收铺捐，并创办京城地方自治。

△　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与英国代表拟定《藏印通商章程》22条，是日电外务部核定。

9月16日（八月初九日）　浙江淳安县农民反抗征收学捐，聚众捣毁学堂、围县署。

9月17日（八月初十日）　防城起义军在三那宣布解散，由梁建葵率数百人退入十万大山，徐图再举。

9月18日（八月十一日）　清廷以防城失守，谕军机大臣电寄两广总督张人骏查明驻防衡军为革命军内应事，并仍着督饬各军分路追剿。

△　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创设国会。

9月19日（八月十二日）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云南提督夏辛酉即迅统带所部酌量添募营队，前往长江一带扼要屯扎，专作长江游击之师，并会商沿江各督抚筹办江防事宜，以防革命党起事。

△　外务部以日本派斋藤中佐统带日兵及朝鲜巡兵300人，驻扎六见沟（属延吉厅）一带，电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转商日外部派员会勘延吉边界，并撤退驻军。

9月20日（八月十三日）　清廷谕内阁设资政院，着派溥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着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详细院章，请旨施行。

△　农工商部、外务部奏准《大清矿务正章》74款，并《大清矿务附章》73条。此系中国近代第一部法定之矿业法。

△　清廷命山西按察使丁宝铨来京，会商福公司开矿事件。

9月21日（八月十四日）　清廷命大学士张之洞管理学部事务。

9月22日（八月十五日）　福州人民集会反对《日法协定》。

△　浙江秀水县乡民万余人进城，向县署报荒。

9月23日（八月十六日）　清廷任前刑部左侍郎伍廷芳充出使美、墨、秘、古国大臣，吉林哈尔滨道萨荫图充出使俄国大臣。

9月24日（八月十七日）　清廷以日兵越占边界，赏前邮传部右丞陈昭常副都统衔，前往吉林延吉厅与日本会勘界务。

9月25日（八月十八日）　江西南康、赣县教民不法，打死六人，群众愤极，是日焚毁教堂杀死教士江睿烈及教民数十人；旋各处闻讯响应，南康至赣县教堂、教民房屋多被焚毁。

△　都察院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

△ 中英互换《藏印通商章程》拟稿。

9月26日（八月十九日） 法部派麦鸿钧至日本考察审判制度，及监狱改良事件。

9月27日（八月二十日） 广西梧州厘局勒索，商店罢市；同日，南宁各店亦停业。

△ 清廷诏裁旗饷，将原有马厂庄田，分别计口拨给旗丁耕种，不足则添购民田给之；归农以后，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与齐民无异。

9月28日（八月二十一日） 龙华会首领朱宝卿（朱鸿钧）等拟在河南新野、湖北襄阳起义，事泄，失败。

△ 日代公使阿部守太郎请求购湘米100万石接济日本水灾，清廷允协济30万石。

9月29日（八月二十二日） 江西南康县数百人攻赣州府城，遭清兵镇压，失败。

△ 清廷谕军机大臣着端方、瑞良认真查办南康教案，代理南康县知县杨寅揆革职留缉并着严饬印委各员切实保护弹压。

△ 陆军部奏准建设军官学堂。

9月30日（八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京外各官慎选人才，研究宪政，严禁谬说淆乱国是。

△ 清廷命学部通筹教育普及善法，编辑精要课本，民政部妥拟地方自治章程，饬各督抚择地试办，以为召集议院准备。

10月

10月1日（八月二十四日）　孙中山致函何佩琼，特派汪精卫、黄龙生、刘岐山三人来西贡、堤岸两埠，设法速筹巨款，接济军需。

△　清廷通谕调和民教，着各省督抚迅将中国与各国所定约章内传教各条，分发所属各官，随时剴切晓喻，使民教各安本身，化除忿嫉。

10月2日（八月二十五日）　清《刑律》草案告成，凡53章387条。

10月3日（八月二十六日）　清廷以江苏布政使陈启泰署江苏巡抚。

10月4日（八月二十七日）　清廷命宁夏将军色普增额开缺，以前盛京将军增祺为宁夏将军。

10月5日（八月二十八日）　清廷谕陕西巡抚曹鸿勋开缺，另候简用，以恩寿调补陕西巡抚。张曾敭调补山西巡抚。

10月6日（八月二十九日）　晋人因福公司案开会集议，公举代表至京，并立矿务公所，以图抵制。

△　给事中忠廉等奏，立宪政体宜特设下议院，不可以都察院更改。

10月7日（九月初一日）　政闻社机关报《政论》创刊于上海。月刊，蒋观云主编。梁启超于创刊号发表宣言书，详述该社成立原因，提出该社所持之主义四条：一、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　吉林自治会简章公布执行。会长仍为松毓，副会长为庆山。该会编辑《自治报告书》，月出三册。1908年6月，《自治报告书》

（第七期）改名《公民日报》发行。

10月8日（九月初二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知钦州、防城起义情形，并指示筹款事宜。

△　浙江提学使支恒荣为大通学堂秋瑾密谋起事案，札饬各府县侦拿革命党人。

△　美国陆军部长塔虎脱抵沪，在沪绅商欢迎大会上重申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10月9日（九月初三日）　清廷谕内阁着礼部暨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

△　清廷谕令农工商部会同度支部限六个月内考定度量衡划一制度，详拟推行章程，请旨裁定颁行。

△　外务部以日兵官斋藤在延吉六道沟举动愈形强横，电令出使大臣杨枢商日外部禁止，将宪兵巡警撤回，并否认间岛名目。

10月10日（九月初四日）　浙江东阳县民众结党起事。

△　清廷诏自此次降旨之日为始，再行展期三个月，一体将烟瘾戒除净尽。内务文武各大员，凡有嗜好者，迅即照章自行陈明。

10月11日（九月初五日）　香港政府颁布《禁止刊布逆言条例》，禁止革命党人在港从事反对清廷活动。

△　清廷谕内阁着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充修订法律大臣，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奏明办理。

△　清廷命度支部于六个月内查明洋药进口、土药出产及行销数目，妥拟官膏专卖办法。

△　清廷命度支部限两个月内拟定印花税办法章程，以资抵补洋土两药税厘。

10月12日（九月初六日）　孙中山自日本秘密购械运粤，谋作起义之用，由日轮“幸运丸”运抵广东汕尾（海丰县属），因被清军巡逻艇侦知，未克起卸，“幸运丸”乃驶香港。

10月13日（九月初七日）　日轮“幸运丸”抵香港，冯自由急邀胡汉民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人开会，决定择定惠州平海卸械，与岸上党人联络图大举，旋因日驻港代理领事知悉“幸运丸”运械事，乃饬该船速离港，计划又告失败。

△　清政府议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先借外债千万，办理东三省新政。

10月14日（九月初八日）　侍讲学士朱福诜奏，预备立宪，宜明定宗旨，以平政党而慰舆情。

△　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呈统筹西北全局策六条，仍以改行省为变通之计，兴交通为根本之图，先筹巨款以定方针，储边才以图宏济。

10月15日（九月初九日）　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设立，资本总额四亿元，旋于杭州、南京、汉口、天津、北京及郑州等地设分行。

10月16日（九月初十日）　清廷谕令两江总督端方，南康匪徒滋事，各路防营约已到齐，应严饬各文武迅即剿灭。

△　沪宁铁路上海至镇江段通车。

10月17日（九月十一日）　政闻社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该社发起人梁启超登台演说，鼓吹君主立宪，遭同盟会会员张继等人殴打，会场亦遭破坏。

△　清廷诏令各地方大吏修明政事，思患预防，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惟该督抚是问。

△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将广西铁路改归商办，并拨助该省上年实官捐款100万两，以资提倡。

10月18日（九月十二日）　浙江新昌、嵊县一带会党首领竺绍康领导民众暴动。

△　福建学生会电外务部，日僧在闽布教滋事，干涉内政，请据约力争，令其撤回。

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　孙中山为防城起义事，致函日人宫崎寅藏，请接济革命军饷械。

△　清廷下诏求贤，命内外大臣访荐人才，每署、省至多五人，至少一人，限六个月内具奏，分别量才破格擢用。

△　清廷谕饬各省督抚速设谘议局于省会，由绅民公举议员，以备资政院选举议员时公推递升，并预为筹划各府州县议事会。

10月20日（九月十四日）　江苏扬州警兵聚众反抗官长。

△　清廷命外务部派员与英商妥议苏杭甬铁路借款详细章程。

△　农工商部奏定《农会简明章程》23条。

10月21日（九月十五日）　江西南康教案议结，赔偿法国教堂七万两，教民损失9.2万元，赔偿英、美教堂损失1.9114万元。

10月22日（九月十六日）　清廷以革命党人于防城起义，命署广东提督秦炳直驰往钦、廉办理清剿事宜。

△　清廷谕饬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10月23日（九月十七日）　　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创设殖务部，专管东三省、内外蒙古及新疆、伊犁、西藏各行省。

10月24日（九月十八日）　　江苏铁路公司代表王清穆、张謇等致电署江苏巡抚陈启泰，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请由商办商借。

10月25日（九月十九日）　　清廷以外务部奏日本水灾乞籴，谕令江南皖赣共运米30万石，鄂湘两省共运米30万石，妥速办理。

10月26日（九月二十日）　　《政治官报》在北京创刊。此系清廷为预备立宪而刊行，由宪政编查馆开办。

△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奕劻、袁世凯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夤缘比附。清廷诏以其摭拾空言，有意沽名，传旨申斥。

10月27日（九月二十一日）　　上海商务总会以苏杭甬路原已奏准商办，不收外股，现忽改借款抵押，电农工商部指出此举将“失信商民”，动摇东南商界。

△　直隶鸡泽、平乡两县商民罢市，反对统捐，农民逐走局员。

10月30日（九月二十四日）　　邮传部奏正（定）太（原）铁路工竣，全长242公里，派铁路提调梁士诒验收。

10月31日（九月二十五日）　　英代表戴诺于中英藏印商约会议提出第二次草约16条，要求约中以中、英、藏三方并列，坚持英藏直接交涉。

11月

11月1日（九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处分防城失事之官吏，仍着张人骏会商秦炳直妥筹剿抚钦廉革命党人，务期尽绝根株。

△　江苏铁路协会在沪成立。

11月3日（九月二十八日）　山西太原举行绅民大会，议决撤废福公司办矿章程。

△　清廷命宪政编查馆会同吏部详订切实考验外官章程。

△　清廷谕整顿理藩部，责成该部尚书、侍郎将从前所有痼习迅予革除净尽，另定妥善规条，通饬所属员司实力奉行。

△　外务部就俄公使璞科第声称黑龙江东岸六十四屯，条约实系俄界，无从归还一事，电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确查核办。

11月4日（九月二十九日）　清廷以革命党人在安南秘密布置，准备再度起义，着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认真堵截，切勿稍涉疏虞。

△　浙江同乡会京官朱福诜等请拒铁路借款，是日由都察院代奏。

11月6日（十月初一日）　四川同盟会会员佘英、谢奉琦、熊克武等谋于11月14日庆贺西太后生日之际举义于江安、泸州。预定先在江安发难，再直趋泸州，因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提前举行，为江安清吏侦知，是日江安起义未发而败，泸州起义遂未发而止。

△　广东地方自治社开成立会，与会者90余人。发起人梁庆桂并作报告，宣读章程草案。10日召开第二次会议，选举梁庆桂为社长。

△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英国保龄公司订立修筑新（民）法（库门）铁路草合同，借款50万镑。

11月7日（十月初二日）　陆军部奏准拟订《考验陆军军队章程》，凡49条。

11月9日（十月初四日）　政闻社在东京召开全体会议，议决支持江浙两省人民力拒借款筑路；开展国民运动，要求召开国会。

△　江苏铁路协会在上海张园召开苏杭甬铁路拒款大会，到2000余人，马相伯挥泪演说借款修路之危害。

△　清廷调西安将军恩存为荆州将军，以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凤山为西安将军。

△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拨款50万两开办富贺两县交界处西湾一带煤矿。

△　外务部电两江总督端方及江浙巡抚冯汝骙等对苏杭甬铁路借英款案，剀切开导绅民，以释群疑。

11月10日（十月初五日）　外务部照会法公使巴思德，请饬越南官员驱逐孙文党羽。

△　旅沪浙人及浙江各府所派代表集会反对苏杭甬铁路举借外款，当场认捐2700万元。

11月11日（十月初六日）　两江总督端方电促上海官绅商早日派员赴京询商苏杭甬铁路案。

△　安徽铁路公司在安庆召开大会，反对江浙铁路借款，并力争自办浦（口）信（阳）铁路。

11月12日（十月初七日）　孙中山在河内接“日本来函必欲派一人回东，以维报局，而固人心”。乃与黄兴、胡汉民详议，决定派汪精卫赴东京处理《民报》事。是日，孙致汪电，告此意图，望其于年底回东京筹款。

△　清廷以江浙绅民纷争苏杭甬铁路借款不已，命端方严防乱党

从中煽惑。同日并着两江总督、江浙各巡抚、杭州将军迅速多方劝谕商民，勿任轻信谣言。

11月13日（十月初八日）　江苏铁路公司股东在上海开苏杭甬铁路拒外款特别大会，公举王文韶为代表入京力争。

△　上海集成储蓄公司成立，总资本一亿美元。

△　湖广总督赵尔巽电请外务部力阻日人在汉口租界外购地。

11月14日（十月初九日）　四川成都同盟会会员张培爵、余切、黄方等人谋以新军及会党借西太后寿辰发难，11月6日各路会党约4000人集中成都，分住于小天竺、安顺桥、茶店子等处，“相约闻警即发”，事泄，杨维等六人被捕，时称“六君子”。

11月15日（十月初十日）　外务部电咨各省督抚征求延吉、东三省矿权及与各国协约三事，各具说帖寄京，以资参证。

11月17日（十月十二日）　福建寓沪同乡开会，讨论收回建、邵、汀三府矿权，议决分别致电闽省教育总会、铁路公司及闽督，宣告废约，收回自办。

11月18日（十月十三日）　同盟会防城之役领导人王和顺自河内赴广西那模同凭祥土司李佑卿联系，订于是日率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旋因李与王意见分歧，不听调遣，王折返河内。

△　旅京江浙两省八校学生共600余人，上书力争自办苏杭甬铁路。

△　盛宣怀奏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归并为一大公司，名为汉冶萍煤铁有限公司，定招股2000万元。

11月19日（十月十四日）　陈惠普、李戒欺发起，是日广东省

城七十二行商人和九大善堂善董数百人集会，决定致电政府反对英国干涉我西江缉捕主权，函电中外同胞力争，同时议定此会为“粤商自治会”。确定该会宗旨：遵旨预备立宪，先与同胞谋自治；调查工商实业之利弊，以谋地方之公益。

11月20日（十月十五日）　　《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失败，是日停刊。该刊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共出96号，创办人梁启超。

11月21日（十月十六日）　　裘文高率浙江台州义勇数百由仙居取道东阳入取嵊县，与清军接仗，斩清军将领刘庆林，军威大震，杭城戒严，浙抚急调严州等地清兵攻嵊，文高拒战不利，复由嵊县退军至东阳入仙居而散。

△　11省寓沪士绅开谈话会，议决联合各省成立路矿总会。

11月22日（十月十七日）　　京师各学堂学生1800人联名奏请拒款，清廷以学生不得干预国政，严行申斥。

△　曹鸿勋奏报陕西延长石油矿日产原油3000余斤，主设立公司，广招商股，不收洋股，不借洋款，官督商办或归商办。清廷命新任陕西巡抚恩寿妥筹办理。

11月26日（十月二十一日）　　浙江嵊县会党起事，转向兰溪县马铃山一带，浦江、金华、兰溪等县同时戒严。

11月27日（十月二十二日）　　安徽师范学生罢课要求废除铜官山和浦信铁路两项出卖利权合同。

11月28日（十月二十三日）　　江浙铁路代表王文韶入京，专折痛陈苏杭甬铁路两省拒款决心，请坚拒外款，力保主权。

△　四川在京铁路股东邓代聪等呈请另派重臣督办川汉铁路，并

将汉口至宜昌段铁路招股与川省合办。清廷不允。

11月29日（十月二十四日）　香港政府颁布条例严禁中国革命书报，违者监禁二年并充苦工或罚银500元。

△　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报赴德考察宪政情形，并拟订办法宗旨。

△　外务部以江浙官绅请拒苏杭甬铁路借款，磋商为难，奏请电致江浙两省公举数人来京咨询路事。

11月30日（十月二十五日）　上海宪政讲习会会员方表在沪联络发动国会请愿。

△　清廷命秦炳直督饬各军早日肃清廉钦革命军。

△　清廷命商约大臣盛宣怀迅速来京，预备召见。

12月

12月1日（十月二十六日）　同盟会镇南关之役。是夜，革命党人黄明堂奉孙中山命，率游勇80余人攻关，清守兵百余人略抗即降。次晨占领镇南关炮台三座，附近游勇闻风响应。

△　东京中国留学生2000人开苏浙铁路拒款大会。

12月2日（十月二十七日）　外务部以法商承办之福建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务合同限满作废，通知法公使巴思德如期收回。

12月3日（十月二十八日）　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抵镇南关指挥革命军，全军鼓舞，黄明堂奏乐欢迎。

△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国会咨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款，作为

中国发展教育之用。

12月4日（十月二十九日）　清援兵开到镇南关，发起攻击，革命军反攻，孙中山、黄兴亲临阵地参战，日人池亨吉（孙中山英文秘书）同行。

△　四川革命党人黎靖寰、杨维等谋于成都举事，事泄被捕。

12月5日（十一月初一日）　清军参将陆荣廷派人持函登镇南关炮台，表示愿率600人投效革命军。孙中山读函后和黄明堂等商议，决定复函陆氏，使为内应。当晚，孙中山、黄兴等下山回安南河内筹款购械。

△　外务部奏准派贵胄游学英、美、德三国，肄习陆军、政法。

12月6日（十一月初二日）　贵州巡抚庞鸿书奏陈化除畛域管见。

12月7日（十一月初三日）　清廷以广西镇南关右辅山炮台失守，命桂抚张鸣岐交部议处，着即督饬各路统将协力进攻，即日克复，并责成龙济光统率前敌各营奋力图功。

△　上海基督教徒开会成立“上海基督教徒保路协会”，选举俞宗周为会长。

12月8日（十一月初四日）　镇南关起义失败。革命军与清兵相持七昼夜，伤亡敌兵数百名，终以军火不继，寡不敌众，于是夜弃台，退入安南。

△　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500万两，并派李经楚、周克昌分充银行总、协理。

△　度支部奏准印花税则及办事章程。

12月9日（十一月初五日）　　孙中山在安南与一法国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代募军债2000万元，于占领龙州之日交付第一批款项。是晚获悉炮台失守，谈判遂即中止。

△　浙江教育总会在杭州正式开会，举张元济为会长。

12月10日（十一月初六日）　　江苏铁路协会欢送苏路代表王同愈、许鼎霖、杨廷栋等赴京请愿。2000余人在码头上送行。

△　清廷命广西巡抚张鸣岐仍督饬龙济光等择道分兵，相机合攻镇南关革命军，如边事逾紧，应责成桂抚亲赴前敌，督率防剿。

12月11日（十一月初七日）　　清廷以镇南关右军山炮台业经克复，传谕嘉尚张鸣岐，赏给陆荣廷“捷勇巴图鲁”名号，在事兵弁由广西藩库拨赏银二万两，以资鼓励。

12月12日（十一月初八日）　　孙中山发给日本友人池亨吉证明信，授予其全权执行为中国革命事业筹款事宜，并为同一目的募集粮秣和军需品。

12月13日（十一月初九日）　　张人骏电奏广东钦廉起义革命党人刘渊明已被拿获，党人黄世钦被击毙，余党已散。

12月15日（十一月十一日）　　“政闻社”在东京开会欢迎该社总务员马良（相伯），并决定将本部迁设上海。

△　陕甘总督升允以敦煌民众抗粮，奏准派兵勒缉首要。

△　升允奏陈青海缓改建省，先行试垦。次年1月23日，会议政务处议奏，认该督所奏较为切实易行，迨至蒙番一心，振兴实业，再为徐议建置。清廷允之。

△　清廷命盛宣怀会同外务部妥筹办理苏杭甬铁路草约合同。

△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陈整顿土属办法，拟饬就土官子侄中，按年选送四至六人来省就学，以毕业最优者分别承袭。

12月16日（十一月十二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以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今汪精卫与邓子瑜同赴庇能、吉隆坡及各州府，与诸同志面商，设法速筹巨款，接济军需。

△　江浙铁路代表王同愈、许鼎霖、杨廷栋等人抵京，25日赴外务部要求遵旨商办，不借外款。

12月17日（十一月十三日）　上海旅沪皖省人士召开保卫路矿大会，反对清政府出卖皖省路矿利权。

12月18日（十一月十四日）　署广西提学使李翰芬奏陈宪政预备实施管见八条。

△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遵旨复奏西藏地方不宜骤设行省，驻藏大臣名目不可忽改总督巡抚。

12月21日（十一月十七日）　中国同盟会庇𦣞埠（槟榔屿）分会成立，邓泽如为会长。

12月23日（十一月十九日）　清廷颁布“报律”，凡45条。

12月24日（十一月二十日）　清廷谕令各省绅商士庶不得干预内外政事，并着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拟定关于政事结社条规，迅速奏请颁行。

12月25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清廷谕令整顿士风，命学部严申学堂禁令定章，不准学生干预国政，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妄言。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自河内为汕尾运械事件致萱野长知书慰劳，并嘱“幸运丸”军械再度运来澳门附近海面，以商议再求他举之计划。

△　上海黄浦江东岸南北各渡口，增加渡资，引起附近过往农民反抗，是日数千人捣毁路政公所收钱处。

△　吉林自治会召开周年纪念大会，提出争“间岛”和收回吉（林）长（春）铁路修筑权。

△　清廷以京师有聚众开会演说等事，令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一体严行查禁。

△　清廷以广西谅山有密谋起事之事，电谕广西巡抚张鸣岐，严防革命党人再度起义。

12月27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外务部照会法公使巴思德，以革命党人王和顺等屯聚谅山一带密谋起事，请电安南总督严饬捕追。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山东沂水、莒州、临清等州县民众暴动。

12月30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清廷降旨饬议币制，命于一月内电奏改革币制之法，以期划一全国币制。

△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报，“刑律”分则草案告成，合诸总则凡53章387条。

是年　同盟会海防分会成立，侨商刘岐山任会长。

△　出口货值银2.64380697亿两，进口货值银4.16401369亿两，贸易逆差为1.52020672亿两；全国征货税银3386.1346万两。

△　南洋兄弟烟草无限公司在香港成立，资本100万元。

△　张謇在崇明创设大生纱厂，资本100万两银，纱锭2.6万支。

△　侨商顾润章、王光等人在汉口创办扬子江机器厂，资本45万元。

△　英国人A．斯坦因掠走敦煌莫高窟写本文书24箱和绘、绣的佛画五箱。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1月

1月1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瑷珲（今爱辉）县城军队400人哗变，攻墨尔根城，被巡防队击退。

△　中英订立试办禁烟章程，定10年禁绝。

1月3日（十一月三十日）　　孙中山致函日人萱野长知，嘱出售汕尾未及起卸、原船返日滞留神户之“幸运丸”所载之军械。

△　学部奏，日本文部省允于15年内于官立高等学校内收容中国学生每年100名，由中国给予经费补助。

1月4日（十二月初一日）　　杨度改“宪政讲习会”为“宪政公会”。3月，杨度回国，在京设立宪政公会本部。6月30日（六月初二日），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立。时有会员54人，旋召开评议会，重订章程，其宗旨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选举总事务员为熊范舆、杨度任常务员长，沈钧儒任干事部干事长兼评议部评议长。

1月5日（十二月初二日）　　同盟会会员吴永珊（玉章）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2月29日出至第三号，被日本政府查封。

△　浙江海宁州漕折苛刻，农民万人奋起捣毁学堂、教堂及警察、厘金、邮政、铁路、轮船各局，钱庄、店铺多处。

1月6日（十二月初三日）　　江苏青浦县三家湾地方有大帮“盐枭”调集船只70余艘与清军交战。

1月8日（十二月初五日）　　浙江桐乡县与海宁州农民六七千人联合攻破桐乡县城，烧教堂，毁学堂，拆毁县署、监狱，释放囚犯。湖州、孝丰、安吉等地纷起响应。

1月11日（十二月初八日）　　清廷据奏报海宁民变，江浙人心思动，是日旨电端方及苏浙两巡抚着实力剿捕，早日肃清。

1月12日（十二月初九日）　　两江总督端方、浙江巡抚冯汝骙、护理江苏巡抚陈启泰以苏杭甬铁路借款事起，两省人心不靖，为防滋生变乱，是日联电外务部请暂缓签押正约。

△　清廷实授陈启泰为江苏巡抚。

1月13日（十二月初十日）　　清廷以浙江海宁、桐乡等地发生民变，命甘肃提督姜桂题统率所部豫军各营并由第二、四、六各镇内各拨步队两营编配带往，会同江浙督抚办理清剿事宜。

△　清廷以山东曹属郡县数百人强劫勒赎，命署山东巡抚吴廷斌迅速认真剿捕。

△　清廷命已革陕西布政使樊增祥着开复革职处分。

△　督办铁路大臣、大学士张之洞等奏准（天）津镇（江）铁路改为（天）津浦（口）铁路，自行修建，与英德两公司改订合同。

△　外务部与上海德华银行、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款额500万镑。

1月14日（十二月十一日）　　清廷以浙西枭盗充斥，地方官吏养痈贻患，命浙江巡抚冯汝骙查明具奏。

△ 清廷电谕冯汝骙保护教堂、教士，并告已派姜桂题统率12营限半月内赴浙，办理剿抚事宜。22日，清廷据报鄂军已有声援，令姜军暂缓开拔。

1月16日（十二月十三日） 清廷奖励击败广东钦廉起义军有功人员，已革陕西补用道郭人漳开复原官，留粤补用。

1月19日（十二月十六日） 清廷以广西沿边一带革命党人活动日烈，是日电令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转饬道员庄蕴宽，迅速率军驰赴龙州一带巡阅布置。

1月20日（十二月十七日） 清廷命前福州将军景星、前江苏巡抚陆元鼎、前云贵总督丁振铎、前山西巡抚俞廉三协理开办资政院事务。

△ 山西省与英商福公司签订《赎回山西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合同之合同》12条，收回福公司攫取晋省之全部矿权。

1月21日（十二月十八日） 清廷派吕海寰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并着直隶、江苏、山东督抚会同办理。

1月22日（十二月十九日） 闽浙总督松寿奏请裁减浙省绿营兵额，改编巡警。

△ 清廷命大学士那桐充督办税务大臣。

1月24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外务部照会德公使雷克司，胶澳铁路应归入津浦路线办理。

△ 清廷谕山西巡抚张曾敭因病解职，以宝棻为山西巡抚；按察使丁宝铨为布政使。

1月26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川同盟会会员谋举义于叙府，推谢奉琦入叙主持，佘英、熊克武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发动会党，并由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等，因刘被捕，起义中止。

△　清廷以庞元济创办机器造纸公司，赏正一品封典；刘世珩、祝大椿创办公司及兴办实业，分别赏正二品封典、二品顶戴。

△　张之洞、袁世凯、梁敦彦会奏呈津浦铁路官商合股办法。

1月27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清廷派江苏布政使瑞澂督办苏松、太杭、嘉湖缉捕清乡事宜。同日，又命赏总税务司赫德尚书衔，副总税务司裴式楷布政使衔。

△　英国政府下令撤退驻西藏春丕之英军。

1月28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黄兴命谭人凤入郭人漳行营，求接济弹药。

1月29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清廷以江浙盐枭日益猖獗，两江总督及江浙两省巡抚端方、陈启泰、冯汝骙疏于防范，行不践言，应一并先行交部察议。

是月　台湾同盟会员罗福星赴河内见孙中山，面陈抗日复台大计，并自告奋勇，愿效前驱。

△　交通银行在上海创办，实收总资本8.7亿余元，旋于苏、浙、皖、鄂等14个行省设立分行。

2月

2月2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　清廷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

2月5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　清廷据奏报嘉兴、湖州一带青红帮聚众抢劫，持械戕官，打毁教堂、学堂，请酌用清乡之法，以绝匪踪，是日着两江总督端方会同江苏巡抚陈启泰、浙江巡抚冯汝骙妥筹办理。

△　广东海关缉获日轮“第二辰丸”私运大宗军火，予以扣押，并卸下该轮所悬日本国旗。

2月7日（正月初六日）　奉天广宁县（今北镇市）北界蒙古之医巫闾大山蒙民聚众起事。

2月8日（正月初七日）　孙中山致函池亨吉，告以因清政府要求法国政府下驱逐令，故离开河内，仍留黄兴及胡汉民，委以当地及广西一带之筹划事宜。

△　清廷命甘肃提督姜桂题统率5000人开往长江一带扼要屯扎，专作游击之师，仍会商沿江各省督抚筹办江防事宜。

2月9日（正月初八日）　端方奏报苏、浙捕务，嘉、湖交界处所，盐枭猖獗，请添置兵轮快炮，派兵治枭。

2月10日（正月初九日）　端方奏请先就江宁省城设局，筹办地方自治；又奏请地方自治局内附设谘议局，以为议会之预备。

2月12日（正月十一日）　清廷命农工商部详细考察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集图说，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由各该省督抚等督率认真提倡，设法改良。

2月13日（正月十二日）　浙江青浦、嘉善，江苏金山等县夏竹林、余孟享、江北阿四等帮盐枭聚众连日与清军交战。

2月14日（正月十三日）　清廷以制钱日少，物价腾涨，命各省铜元局加铸三成一文新钱。

△　日公使林权助照会外务部，抗议广东扣留“第二辰丸”。

2月15日（正月十四日）　外务部奏报，山西矿务局与福公司订定赎回合同12条，并前案一律议结。

2月16日（正月十五日）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举行会议，议决在沪创设法政学堂，并请国会“遍设宣讲所”。

△　清廷谕令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照会法国外交部，查封《新世纪报》。按：该报系由砐法革命党人张静江、李石曾、吴敬恒等所创刊（周刊）。

△　清廷以沈曾植为安徽提学使，并署理布政使。

2月17日（正月十六日）　清廷决定再加20万悬赏缉拿孙中山，并以孙中山利用安南作滇桂起义的指挥所，向法国当局要求逮捕引渡孙中山，遭安南总督拒绝。

△　清廷命陕甘总督升允密筹防范宁夏匪徒煽惑，并严饬地方官，无论汉民、回民暨新旧两教，均属一视同仁。

△　度支部奏准《大清银行则例》24条，《普通银行则例》15条，《殖业银行则例》34条，《储蓄银行则例》13条。

△　邮传部奏准《官商铁路完纳地税章程》10条。

2月18日（正月十七日）　驻京葡萄牙署公使柏德罗照会外务部，望饬速释放在葡国所领海面被捕之日本“第二辰丸”轮。3月5日，外务部复照葡公使，“第二辰丸”被扣处，系在中国领海。

2月19日（正月十八日）　陕甘总督升允奏陈筹改甘省厘金，试办统捐，拨办农工商矿务要政，并拟造兰州跨黄河铁桥。

△　升允奏陈甘省设立农工商矿局，并次第创办劝工厂、农事试

验场、矿务学堂、农林学堂，以及官报局、商品陈列所、官铁厂、织布、裁绒、丝绉、玻璃各厂，其商业总会、农业总会，亦皆赓续成立。

△　驻京日使林权助请外务部转告两广总督张人骏释放日“第二辰丸”，并索赔偿。

2月22日（正月二十一日）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豫省潼洛铁路工程浩大，拟酌加盐捐以济需要。

2月23日（正月二十二日）　浙江寓沪学会开会，到六千余人，来宾2500人。会长周晋镳号召浙省同乡继续努力集股保路，勿稍疏懈。

△　清廷以天津、保定两处铜价尚贱，与京市之悬殊，命直隶总督杨士骧妥筹整顿，务使钱价一律平等。

2月25日（正月二十四日）　杭州风林寺召开追悼秋瑾烈士大会，秋瑾至友徐寄尘与学界男女400余人参加。

2月28日（正月二十七日）　法公使巴思德就镇南关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党人退入越南一事照会外务部，主由两国政府明定条规，禁止中国革命党在中越边境活动。

是月　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往上海。社员发展到500余人。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到沪主持工作。

3月

3月1日（正月二十九日）　四川同盟会会员谋举义于广安，由熊克武组织同盟会会员为突击队进攻广安州署，佘英率会党攻巡防营，秦炳集合会党、学生增援。当夜，熊克武率队入城，突进州署，

因佘英所部受阻，熊克武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脱险出城，起义失败。

△　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处杨集镇大刀会、白莲教、联门教联合起事。

△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编定现行刑律。

3月3日（二月初一日）　外务部复照林权助，允释“第二辰丸”，对下日旗事道歉，所载军火则予扣存，并提议由英人公断。

3月4日（二月初二日）　孙中山致函苏门答腊岛流石同盟会会员，对该埠同志热心公义，协力筹款以助革命军之用一事表示欣慰。“深望始终勿懈，益求进步”。

△　日公使林权助就“第二辰丸”案会晤军机大臣那桐、袁世凯等，反对具结释船、扣存军火，并转告日本政府回训不同意公断。

3月5日（二月初三日）　外务部就“第二辰丸”日旗被撤下一事，照会林权助表示歉忱，并告将惩戒办事失当人员。

△　清廷以河南布政使袁大化署山东巡抚；调陕西布政使朱寿镛为河南布政使，以广东按察使王人文为陕西布政使。

△　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奏准在京设立津浦铁路总公所，于南段、北段设立总局，会同聘用之德、英两公司分别办理。

△　上海公共租界有轨电车正式通车。

3月6日（二月初四日）　外务部、邮传部与中英公司在北京签订沪杭甬（即前苏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150万英镑。

△　清廷赏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尚书衔为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

△ 清廷调湖广总督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四川总督陈夔龙为湖广总督。

3月7日（二月初五日） 孙中山自河内致函邓泽如，告以决意来新加坡筹款10至20万元，运动清军归降，“而兵不血刃以取南宁、龙州为革命军之根据地”。

3月8日（二月初六日） 伊犁将军长庚奏准新疆库存黄金留备该省办理新政之用。

3月9日（二月初七日） 清廷命新任驻藏办事大臣赵尔丰将藏中应办各事通盘筹划，详拟章程，次第奏请施行；并着度支部按年筹拨的款银五六十万两，俾济要需。

△ 康有为致书梁启超，力主联络肃亲王善耆以打击袁世凯。

△ 农工商部奏请整顿全国棉业，拟分调查、提倡、保护三期进行。

△ 邮传部奏报，疏浚运河事宜应由沿河各省督抚体察情形，分别办理。

3月11日（二月初九日） 宪政编查馆奏准订定《结社集会律》35条，其中规定现任职官亲莅各社会研究政治学术者，必须向本管长官陈明。

△ 云贵总督锡良奏称，滇省绿营官兵分别酌拟裁留，并将腾出饷需作为添练新军，扩充巡警之用。

3月12日（二月初十日） 清廷通谕法部、大理院及各省督抚着即通饬所属各员，实心清理讼狱。

△ 端方奏请裁撤两江矿政调查局，改设江南矿政总局。

3月13日（二月十一日）　外务部复照法公使巴思德，提出补订《中越边界会巡章程》，防范革命党人以越南为据点，在滇桂边境起事。

△　日公使林权助照会外务部，提出解决“第二辰丸”案五项要求：一、道歉；二、赔款；三、惩官；四、释船；五、收买被扣军械。越二日，外务部复照林权助接受五项要求。

△　清廷据盛宣怀奏，谕准汉冶萍煤铁矿合并，招股扩充，以盛宣怀兼任经理。

3月14日（二月十二日）　宪政编查馆奏准《报律》45条。其中规定：各类报纸，应“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

3月15日（二月十三日）　新加坡革命同志以孙中山抵埠咸感振奋，是日举行第二次革命演说大会。清廷命驻新加坡总领事向海峡殖民地总督要求驱逐孙。新加坡当局曾传问孙，但并未下逐客令。

△　姜桂题率豫军南下镇压江浙太湖一带“盐梟”，路经安徽和州大肆骚扰，戕毙民命，群情激愤，商民罢市。

△　旅沪两广同乡会开特别大会，讨论“第二辰丸”案，决议倡导抵制日货。

3月17日（二月十五日）　孙中山在新加坡函约苏汉忠晤面。

△　日公使林权助照会外务部，对外务部接受“第二辰丸”案五项要求之解决办法，日政府无异议。此案遂告议结。

3月18日（二月十六日）　直隶隆平县知县吕调元因举办四乡巡警兼筹学堂经费勒收捐款，引起民众不满，东北乡枣林村等十余村农

民数千人进城要求免捐，知县关闭城门，农民立向城上投掷砖石，伤巡官李道明，坠落城下。警兵开枪，打死农民五人，伤六人，农民愤激攻入城内，毁巡警局，释放习艺所犯人。

△ 北京风雅报馆因言论激烈被查封。

△ 粤商自治会因“第二辰丸”案，在广州召开大会，议定以17日（释放“第二辰丸”日期）为国耻纪念日，声明决不承认赔款。会后率万余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粤督张人骏拒绝接受日本各项屈辱要求。

△ 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报考察南洋侨商情形。

3月19日（二月十七日） 清廷谕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因病解职，以奉天左参赞周树模署黑龙江巡抚；实授朱家宝为吉林巡抚。

3月20日（二月十八日） 粤商自治会为“第二辰丸”案在广州举行大会，到数万人，当场烧毁日货，决定推行维护主权，抵制日货运动。

△ 外务部电两广总督张人骏，将“第二辰丸”案结办情形晓喻绅民，平息罢市暴动。

3月21日（二月十九日） 外务部据日公使林权助之请，电两江总督端方，禁止抵制日货。

3月22日（二月二十日） 新疆维吾尔族群众两万余人暴动。

△ 清廷据外务部奏请重申禁烟，着民政部、度支部迅即会订稽核章程，严加执行。

△ 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奏请妥定臣民国籍条例。

3月23日（二月二十一日） 外务部电上海道梁如浩，令其设法

禁阻粤商抵制日货。旋梁如浩致书商务总会，劝告广东寓沪绅商，停止抵制日货。

△ 清廷命外务部右丞胡惟德为出使日本大臣。同日又命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回京供职，改派出使日本国大臣李家驹为考察宪政大臣。

△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请改旧设仕学馆为法政学堂。

3月24日（二月二十二日） 调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赵尔巽奏报，湖北设立谘议局，先行筹划选举区域，设法政学堂，省城设立全省地方自治局，并于法政学堂附设自治研究所，另设调查局一所。

3月27日（二月二十五日） 黄兴奉孙中山命，率黎仲实及华侨200余人自安南进攻钦州，乡民纷燃爆竹欢迎，沿途击溃小股清军。

3月28日（二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出使意大利大臣黄诰来京，调出使荷兰大臣钱恂为出使意大利大臣，又命保和会专使陆徵祥为出使荷兰大臣。

3月29日（二月二十七日） 清廷命京外各厂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俟铜元价值稍平，察看市面情形，再行复铸。

3月30日（二月二十八日） 黄兴率革命军击溃钦州清军一营。次日，革命军进至大桥，再败清军两营。

△ 上海新租界聘自尔电车公司工人罢工，要求缩短工时。

4月

4月1日（三月初一日） 孙中山复函邓泽如，托其转交吉隆坡大侨商陆弼臣书一封，并拨冗专为此事一行，为革命军集资。并告不日将遣汪精卫来芙蓉“与兄相会，面筹一切”。

△　同盟会会员王群携同盟会本部委任证书，由东京到缅甸仰光发展会员，徐赞周、陈守礼等十余人入会，设立同盟会缅甸分会。

△　清廷调浙江巡抚冯汝骙为江西巡抚，以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为浙江巡抚，仍兼督办土药统税事务。

△　清廷从湖南绅商请，湘路公司总理袁树勋着仍充总理，回湘主持铁路事宜。

△　沪宁铁路工竣通车。

4月2日（三月初二日）　黄兴率革命军在钦州马笃山大败防营统领郭人漳部清军，伤管带一人，毙清兵200余人，清军三营溃散。黄兴此后率部出入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大小数十战，历时40余天，威名大著。

△　清廷谕禁京城钱业架空出票，扰乱市面，责成顺天府迅即详订章程，严立限制，并着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协力查禁，认真整顿。

4月3日（三月初三日）　浙江各界士绅代表在杭州召开铁路保存会。

△　查办西藏事件大臣张荫棠条陈兴学、练兵、整顿实业、统筹经费等项西藏善后事宜，清廷命赵尔巽、赵尔丰等会同悉心妥议，奏明请旨办理。

4月4日（三月初四日）　考察商务大臣杨士琦奏请与暹罗订约通使；同日并奏请于西贡、海防设领事，爪哇设总领事。

4月5日（三月初五日）　广州妇女2000人召开大会，抗议日本政府借“第二辰丸”事件公然侵犯我国主权。

△ 预备立宪公会举行常会，决定设立国会研究所。27日，国会研究所开会讨论国会下议院议员名额分配方法。

△ 浙路公司在杭州开股东会议，并举施肇基为沪杭甬铁路总办。

4月7日（三月初七日） 清廷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办资政院事务。

△ 清廷派景星、丁振铎充办理禁烟大臣，严定章程，认真摘发素染嗜好各员。

△ 清廷命度支部筹拨的款银五六十万两，以济西藏要需，并命四川总督赵尔巽随时接济。

4月8日（三月初八日） 邮传部奏准萍（乡）（湘）潭铁路改归该部管辖。

△ 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南洋闽商胡国廉集资创兴琼崖地利办法；又奏，请饬各省督抚勿派员前往南洋各埠劝捐。

△ 清廷以民政部左侍郎袁树勋署山东巡抚。

4月9日（三月初九日） 安徽芜湖磁船帮聚众捣毁巡警局。

4月10日（三月初十日） 御史黄瑞麟奏请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各省城、府城各设女子师范学堂一所，以为振兴女学之地。

4月11日（三月十一日） 北京京华报馆因转载《世界日报》新闻，涉嫌同情革命，顺天府奏准封禁京华报馆，社长唐继星监禁10年。

△ 清廷以隆平县乡民抗捐警费，聚众持械，命直隶总督杨士骧认真查办。

4月13日（三月十三日）　廓尔喀（今尼泊尔）所遣使臣至北京入贡清廷。5月2日，廓尔喀贡使觐见，清廷赏戴花翎。

4月14日（三月十四日）　赵尔丰奏请暂缓停铸铜元，是日度支部奏复仍遵前旨暂行停铸。

△　商约大臣盛宣怀奏准创办公司，请筹的款以充公股。

△　端方以江西赣州各属拳匪仇教，尚未烬灭，奏准仍派江苏存记道俞明震会同查办。

△　津海关道蔡绍基与德商汉纳根在天津订立《井陉煤矿合同》，由直隶井陉矿务总局与德商井陉矿务公司合办。

4月15日（三月十五日）　清廷调陕西布政使王人文为四川布政使；四川布政使许涵度为陕西布政使。

4月17日（三月十七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请其将5000元早日筹便付来，以便转汇军前，令立行事。

4月18日（三月十八日）　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准每年冬季酌派南北洋各舰游历南洋各埠，由农工商部遴员随同前往。

4月20日（三月二十日）　查办西藏事件大臣张萌棠与英国全权大臣韦礼敦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凡15款。

△　江浙铁路自上海至松江段，竣工通车。

4月22日（三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致函庇勝同盟会会员，收到军费银1000元，现时广西营勇约降，云南待举，钦军加补子弹三宗共需五六万元，请其继续筹款。

△　广西雒容县徭民千余人起事。

4月25日（三月二十五日）　安徽绅民集议商请开民选议院，并推举代表入京上书清廷。

△　农工商部奏准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华股洋银300万元。

4月30日（四月初一日）　同盟会河口之役。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领革命军200余人，于是日凌晨2时举义于云南河口，激战数小时，占领山上炮台，清军防营归降，防务处督办王镇邦伏诛，革命军完全占领河口。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宣布军律，发表告各国宣言。

△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请力劝侨商陆弼臣赞助革命军饷。

是月　阙麟书由杭抵沪，先后会晤陶成章、王金发、竺绍康、陈其美等人，共谋浙江起事。

5月

5月1日（四月初二日）　东清铁路哈尔滨总工厂与该路工人及市农工商学各界万余人，于松花江江北太阳岛召开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　清军管带李兰廷率全营归降河口革命军，缴枪200余支，子弹三万，稻谷百担。

△　安徽英山县农民聚众毁天主教堂，劫狱焚署。

5月2日（四月初三日）　关仁甫率河口革命军400余人自河口攻蛮耗，4日占新街。

△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英日合办安徽铜官山矿务。旋外务部复照否认。

5月3日（四月初四日）　　黄兴率革命军退出钦属，余众多归十万大山，黄兴退返安南。孙中山自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各军。

△　清廷以直隶布政使增韫为浙江巡抚，柯逢时开缺，仍督办土药统税事务；调山东布政使吴廷斌为直隶布政使，福建按察使朱其煊为山东布政使。

△　云贵总督锡良电军机处、外务部，报告革命党千余人自越边来扑，鏖战一昼两夜，河口失守，河口副督办委员王镇邦遇害。并称刻已飞饬前敌各营痛击，“务期迅扫边氛”。

5月4日（四月初五日）　　王和顺率领河口革命军1500余人往攻蒙自，关仁甫部亦由蛮耗往攻，会师蒙自。

△　清廷以河口失陷，命刘春霖帮办云南边防事务，节制前敌各军，会同锡良妥筹防剿事宜。同日，并命开化镇总兵白金柱往援。

△　外务部电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请商法政府勿许革命党潜匿越境。

5月5日（四月初六日）　　外务部电刘式训要求法外交部严饬越督，切实查办河内革命党人自安南经铁路运军械至云南。

5月6日（四月初七日）　　锡良电军机处，报告分头迎剿革命军之作战部署，并请饬广西提督龙济光率军入滇夹攻。

△　刘式训电外务部，报告法政府同意清廷要求，捕拿圈禁窜入越境之革命党，并严饬文武官员认真防范。

5月7日（四月初八日）　　黄兴自海防入河内，就任云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赴前线督师，既至抵河口晤黄明堂，促其进攻昆明，黄明堂不从。黄兴旋即率革命军前进，终因士兵疲倦不听调遣，不得已

于9日折回河内。

△　王和顺督部于4日沿滇越铁路进攻，是日占南溪。

△　清廷命署广西提督龙济光率部由桂边星夜驰赴开化边境，相机进剿河口革命军。

5月8日（四月初九日）　日代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外务部称，广东排斥日货事，系康（有为）党主谋，地方官宪暗中煽动，要求迅施确实有效之手段，以全两国之邻交。

△　直隶总督杨士骧委周学熙为滦州煤矿公司总经理。

5月9日（四月初十日）　清廷电寄锡良，略授三路直捣河口革命军机宜。

△　宪政编查馆核订《违警律》10章45条，奏准颁布施行。

5月11日（四月十二日）　黄兴由河口至安南老街，为法警扣留送往河内，被解出境。

5月12日（四月十三日）　孙中山以河口起义急需军饷，是日致函邓泽如，催其竭力劝募。

△　革命军攻占云南开化镇，败清总兵白金柱部，清军五营尽数归降。

△　浙江宁波各店户罢市，反抗征收清道捐。

5月13日（四月十四日）　汉口巡警局禁止设摊，小贩万余人反抗，合镇罢市，夏口厅出动防营和警察弹压，群情愤激，捣毁各警察分局，追打警察，湖广总督陈夔龙派武昌四十二标、四十九标至汉口镇压，各国水兵亦上岸防“乱”。

5月14日（四月十五日）　锡良赴通海县督师，进攻革命军。

△　外务部与林权助订立《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

5月15日（四月十六日）　驻京日公使林权助离任回国。

5月16日（四月十七日）　清廷电锡良，嘉慰知府王正雅督会各营收复三岔河，着锡良督饬王正雅，迅即简拨精锐，奋力攻克打拉山。

5月18日（四月十九日）　清廷命广西巡抚张鸣岐飞饬龙裕光兼程前进，克期到防，着锡良、张鸣岐仍当和衷协力，共济时艰。

5月20日（四月二十一日）　清廷密电端方，告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潜向长江通商各埠购买枪械弹药运往云南、贵州边境，令派密探抵沪严查，长江往来轮船由税务司缉查。

△　各国驻京公使允禁各该国军舰随意游历中国内地，清廷命各省查照。

5月中旬　河口革命军攻占蒙自。

5月21日（四月二十二日）　清廷以滇边河口起事业经两旬，官军未能十分得手，是日命锡良严饬各路将领迅即相机规复失地。

5月22日（四月二十三日）　黔军两营、川军两营、桂军三营先后往援云南，会攻王和顺部革命军，在泥巴里附近相持20天。是日，王和顺以子弹日竭，前往河口与黄明堂磋商后，向河口退却。

△　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凡各国政府与中国商民及蒙古王公所订物权抵押贷借契约，如未经外务部及理藩部承认者，概无效力。

5月24日（四月二十五日）　云南清军攻陷南溪，革命军300余

人阵亡。

△ “中国留日学生全体大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开会，到800人，章太炎、宋教仁等人讲话，大会就河口起义作出云南独立等四项决议。

△ 清廷命各省速将应裁守巡各道裁撤，增设巡警道。

5月25日（四月二十六日） 清廷以总兵赵金鉴督率各营收复滇边四隘，着先赏给“靖勇巴图鲁”勇号，并着云贵总督锡良严饬赵金鉴等乘势长驱，克复灞洒，以期与白金柱两路会合，早奏肤功。

△ 署直隶总督杨士骧奏报，北洋政法专门学堂开办半年，渐著成效，请饬部立案。

5月26日（四月二十七日） 河口被清军赵金鉴部攻陷，黄明堂、王和顺率部600余人突围撤入安南，被法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河口起义失败。

△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查明豫省驻防，并无马厂田庄可拨。目前酌筹生计办法，惟有注重练军、兴学、劝工数端，似较驱之归农尚易为力。

5月27日（四月二十八日） 清廷电锡良，嘉慰赵金鉴由西路收复河口，王正雅由中路攻克老范寨，着锡良督饬各路将领并力合剿，以竟全功。

△ 上海《神州日报》载两广总督张人骏、云贵总督锡良等分别所发公告，悬赏购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田桐、刘揆一、谭人凤六名革命党人，赏格分别为：黄5000元，胡4000元，汪以下各2000元。

5月28日（四月二十九日） 清廷以白金柱攻陷大小南溪有功传

旨嘉奖，赏银两万两，并赏给督带官胡兴“捷勇巴图鲁”勇号。

△　清廷通电各督抚转饬所属设立议会，遴选正绅充当会员，惟不得干预词讼。

5月30日（五月初一日）　清廷谕内阁，以锡良镇压河口起事调度有方，殊堪嘉尚，并着锡良督饬文武印委各员，妥筹布置滇边防务暨一切善后事宜。

△　锡良奏陈滇边防务善后事宜，劝谕各乡团自为教练，捍卫乡里，调拨新练陆军驻扎蒙自，居中策应，并添募游击一营，上下梭巡，以期兵民相辅。

6月

6月1日（五月初三日）　清廷以规复云南河口、南溪，予出力将弁开化镇总兵白金柱等奖叙有差。

△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巴塘、里塘改土归流。

△　汉口后湖乡农民数千人反对清丈局新章，防营和巡缉营镇压，击伤、砍伤共六人，民众愤激，打伤营兵四人，捣毁清丈局。

△　英公使朱尔典为英日合办铜官山矿再照会外务部。13日外务部再分别向英日驳复。

6月2日（五月初四日）　民政部咨请各省督抚遍设地方议会，以立国会基础。

6月3日（五月初五日）　徐世昌奏陈设立奉天法政学堂，实行考验本省官吏。

△　察哈尔都统诚勋奏陈张家口设立察哈尔矿务总局。

6月6日（五月初八日）　　广东士绅派代表至京呈递召开国会请愿书。

△　湖广总督陈夔龙议借民债50万，筹办新政。

6月8日（五月初十日）　　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奏准查验章程10条。

6月9日（五月十一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谈筹款之经验教训，指出先集备大款，然后举事，乃可乘胜趋利；若举事后方筹款接济，则多迟延失机。

6月10日（五月十二日）　江西萍乡乡民反抗教堂。

△　端方奏报，江苏省城设立自治、谘议两局，遴选官员，先行开办。

6月12日（五月十四日）　云南京外同乡官吴炯等以滇越铁路关系西南大局，请饬部速与法人磋商改约，收回自办。

6月13日（五月十五日）　清廷谕内阁嗣后州县官着将部选旧例限三个月后即行停止，所有各班候选州县，由吏部分别查明，会同军机大臣迅速妥拟章程具奏。

6月16日（五月十八日）　江苏寓沪士绅开会研究国会问题。21日又举行会议，孟昭常宣读请愿书，与会者一致同意。

6月17日（五月十九日）　农工商部奏准变通新定矿章及筹议畿辅农田水利办法。

△　邮传部奏请扩充电政，拟归官办。

6月18日（五月二十日）　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称中国实行宪法不须求之外洋，立宪必先正名。

6月20日（五月二十二日）　清廷命直隶总督杨士骧派员开办滦州煤矿。

6月21日（五月二十三日）　直隶蔚州农民数千人抗捐，进城捣毁巡警传习所，释放被押苦工。

△　徐世昌奏请改练兵所为宪兵学堂，酌拟试办章程八条，设立讲武堂，缮具章程36条。又奏设立吉、江两省电线，兼筹修腹地线路，并推广电话。又奏奉省设农事演说会暨植物研究所。

6月23日（五月二十五日）　美国会正式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罗斯福退还庚子赔款余款，共退还1471.7353万美元。

6月25日（五月二十七日）　清廷命邮传部派员确实查勘各省商办铁路工程，严定期限办理完竣。

6月27日（五月二十九日）　邮传部奏陈，路款短缺，续拟筹借英公司银100万两。

△　湖广总督陈夔龙奏准粤汉铁路需款紧急，请于湘省境内行销川淮粤盐，每斤加收口捐钱四文。

△　日代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外务部声称，中国不顾帝国政府警告，兴筑新（民）、法（库门）铁路，与南满铁路竞争，日本断难承认。

6月28日（五月三十日）　清廷命广西巡抚张鸣岐回省，防范窜匿越境之河口革命军伺隙再扰桂边。

6月29日（六月初一日）　安徽滁州商民罢市，反抗设捐卡。

△　津浦铁路北段开工典礼在天津举行，督办大臣吕海寰、直隶总督杨士骧莅会。

△　清廷据端方奏报江南财政窘迫已极，是日着照所请，按盐斤再加两文，以资接济。

6月30日（六月初二日）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及张謇、汤寿潜等电宪政编查馆，请清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　湖南湘乡县知县与钱店、米店偷运谷米出境，致使大米涨价，民众数千人愤起反抗，将甘和米店七家及官当局、钱店捣毁。

7月

7月2日（六月初四日）　　江苏扬州巡警罢岗，抗议饷银照七折扣发。

△　政闻社致宪政编查馆电，请宣布于三年内召集国会。

△　中瑞（典）《修改通商条约》在北京签字。

△　外务部照会驻京日代公使阿部守太郎，重申延吉（间岛）确为中国领土。

7月4日（六月初六日）　　学部奏准拟定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章程，切实办理，并令各省法政学堂划一办法。

△　学部奏准于京师设立女子师范学堂。

△　徐世昌奏报奉省设立工艺传习所、造砖厂、官纸局、官牧场。

△　驻藏大臣赵尔丰奏，西藏通商章程有失主权，请酌议修改，并恳筹拨的款，仍饬原议大臣留藏。

7月7日（六月初九日）　　吏部右侍郎于式枚奏，立宪不可施行

太急，应以保守渐进为宗旨。

7月8日（六月初十日）　张鸣岐奏准免征广西矿产出井、出口两税五年。

7月10日（六月十二日）　山东海宁州（今烟台市牟平区）农民数万人涌进州署要求废止学堂、惩办绅董及豁免亩捐三事，商店罢市。

△　安徽凤阳府、颍州府有大盐帮“盐枭”与清军交战。

7月11日（六月十三日）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等再电宪政编查馆，请清廷以两年为期，召集国会。

7月12日（六月十四日）　河南代表胡汝霖等呈递召开国会请愿书。

7月13日（六月十五日）　江苏寓沪士绅举行会议，欢送雷奋等赴京呈递请愿书。17日，雷奋等与安徽请愿代表许承尧、方皋等由沪启程赴京。

△　与吴樾在北京火车站谋炸出使各国考察政治五大臣之张啸岑，是日在上海西门外为巡警总局巡警拘捕。

7月14日（六月十六日）　吉林公民保路会成立，计划自造吉长铁路，公电清廷争路权，反对中日合办。

7月15日（六月十七日）　直隶蠡县地方官吏擅自规定百姓以制钱向官府缴纳税款，且以制钱七文抵铜元一枚，激起民愤。农民遍发传单，三日内聚众万余人，将县署捣毁。

7月18日（六月二十日）　清廷派军机大臣张之洞兼充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所有路务大端由该大臣通筹三省全局，体察情形，随时主

持裁定。

7月19日（六月二十一日）　浙江乍浦商人罢市，反对铜元之折作九文。

△　清廷命达赖喇嘛来京陛见。

7月20日（六月二十二日）　清廷以美国减收庚子赔款，赏奉天巡抚唐绍仪尚书衔，派充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

△　清廷派唐绍仪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历赴日本及欧洲诸大国，调整经理财政办法，并相机提议与各国商订免厘加税之约，早见实行。

△　外务部以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奏请每年派遣赴美留学生百名。

7月21日（六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宪政编查馆、资政院迅将君主立宪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择要编辑，并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各事分期拟议，胪列具奏呈览。

△　江苏请愿召开国会代表雷奋、孟昭常，安徽许承尧等抵京。29日呈递请愿书。

△　清廷命直隶大臣杨士骧迅速设法收回开平矿产。

△　清廷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兼署奉天巡抚。

7月22日（六月二十四日）　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办齐。

7月23日（六月二十五日）　清廷实授杨士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树勋为山东巡抚。

△　清廷命安徽巡抚冯煦解职，调吉林巡抚朱家宝为安徽巡抚，未到任前，以甘肃布政使继昌护理，以前邮传部左丞陈昭常署吉林巡抚。

△　升允奏准试垦青海牧地，筹拟设局驻兵办法，恳饬理藩部转谕青海蒙古王公等报出可垦地段，招民开垦。

7月25日（六月二十七日）　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并劾于式枚阻挠宪政，请予革职以谢天下。是日，清廷以陈所奏谬妄，命革陈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旋舆论哗然。

7月26日（六月二十八日）　湖北“军队同盟会”成立于武昌，议决采用同盟会章程，以同盟会之领导为领导，由任重远负责联络。

△　湖南第二次国会请愿代表陆鸿第等抵京，8月2日呈递请愿书。

7月27日（六月二十九日）　出使美国专使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唐绍仪奏请以一两定为银币本位，早日宣布，以利与各国商订加税之约。

7月31日（七月初四日）　清廷命发帑银六万两赈湖北水灾。

△　新任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抵东京。8月11日呈递国书。

是月　旧金山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联合海外200埠侨民上请愿书，主张迁都江南及改大清国号为中华国等数款。

8月

8月1日（七月初五日）　孙中山复函邓泽如，请芙蓉埠诸同志设法挪借2000元以济眉急。

8月2日（七月初六日）　　京师士民孙毓文等，直隶士民刘春林等呈递国会请愿书。

△　山西巡抚宝棻奏报创办谘议局，附设自治研究所。

8月3日（七月初七日）　　翰林院编修喻长霖条陈日本今法，海陆军、学务、工商等五端急宜仿行，开国会、改官制不可遽行。

8月4日（七月初八日）　　新加坡星洲阅报书社举行演说会，邀请胡汉民、汪精卫讲述民族主义之本旨与革命排满之必要。听众400余人。

△　清廷饬会议政务处等从速妥议币制。

△　云南耆民呈诉土司暴虐，惨无人理，请改土归流，以救民生。清廷命照锡良所筹办法，认真办理。

8月5日（七月初九日）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奏报，井陉煤矿与法商井陉公司订立合同，互换函稿。

8月6日（七月初十日）　　在此前后，日人宫崎寅藏在日《目觉新闻》连载经宋教仁修改过的《孙逸仙传》。

8月7日（七月十一日）　　出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自日本归京复命，是日奏陈改立宪政体、钦定宪法、预定国会、先立内阁等四端。

△　徐世昌奏请奉天设立森林学堂，种植公所，渔业公司。

8月8日（七月十二日）　　山东代表于洪起及八旗吉林士民呈递召开国会请愿书。

△　广西桂平县大湟江圩巡防营勇哗变，杀官吏，抢铺店、枪械等。

8月10日（七月十四日）　　胡汉民以“去非”之笔名于是日至20日，在新加坡同盟会所创办之《中兴日报》刊登《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一文，申述革命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共和立宪之说，与保皇派主张仿效日本、行君主立宪之说论战。

△　会议政务处提议组织新内阁问题。28日，续议组织新内阁。

△　候补四品京堂劳乃宣奏陈《简字谱录》。

△　土耳其专使到京。9月12日离京。

8月11日（七月十五日）　　由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发起，豫、苏、皖、湘、直、吉、鲁、晋、浙等省立宪团体代表蒋艮等43人，在北京联合上书宪政编查馆，请速开国会。

8月12日（七月十六日）　山西国会请愿代表常松寿等到京，18日呈递请愿书，签名者二万余人。

8月13日（七月十七日）　　清廷以政闻社“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为由，命民政部、各省督抚严行查禁，缉拿其社员。

△　乌里雅苏台将军马亮奏请新疆改练新军，就地筹款，酌拟办法五端，清廷命会议政务处会同伊犁将军、陕甘总督、新疆巡抚迅即妥议具奏。

8月15日（七月十九日）　汉口《江汉日报》因刊载海外华侨要求召开国会请愿书（此举系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之“中华帝国宪政总会”所为，海外200埠华侨加入），是日遭查封。

△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请复开铸当十铜元。

△　清廷从学部奏，明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200万两。

8月16日（七月二十日）　江苏丹徒县各机户向各绸户要求增加工资，绸户不允，遂一律罢市，并捣毁绸业董事曹森家。嗣后，又有八九百人至道署要求增加工资。

△　四明银行在上海开业，创办人李厚祐、孙蘅浦为总经理。资本总额2.25亿元，旋在宁波、南京、汉口等地设分行。

8月19日（七月二十三日）　胡汉民在新加坡《中兴日报》发表《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说》一文，22日载完全文，揭橥种族革命主义，驳斥革命可召瓜分之说。

8月20日（七月二十四日）　缅甸仰光同盟分会机关报《光华日报》创刊，居正、杨秋帆任主笔。

△　浙江代表叶景莱呈递召开国会请愿书。

△　达赖来京，清廷命山西巡抚宝棻会商直隶总督妥为照料。

8月27日（八月初一日）　同盟会在缅甸仰光所办之《光华日报》创刊，主编杨秋帆。该报出版后会务大振，会员由30余人发展为400余人。

△　宪政编查馆、资政院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清廷诏命依限举办，自是年起，以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各项事宜，届时即行颁布宪法，召开国会。

8月28日（八月初二日）　浙江武康县农民2000余人进城报荒，捣毁虐民官吏家宅。

8月29日（八月初三日）　清廷调河南巡抚林绍年为仓场侍郎，以邮传部左侍郎吴重憙为河南巡抚。

8月30日（八月初四日）　清廷从徐世昌、朱家宝奏，创设吉林

实业学堂及法政学堂。

8月31日（八月初五日）　清廷以镶红旗蒙古都统葛宝华署法部尚书。

9月

9月2日（八月初七日）　河南邓州（今邓县）知州滥开田亩及骡马税捐，激起民变，民众2000余人毁署劫狱。

△　徐绍桢奏陈拟取法日本清查户口，为新政之本图，请饬下部臣通筹全局，详议章程，实力举办。

△　吏部奏准州县官改选章程。

9月3日（八月初八日）　外务部以日本增兵延吉事，饬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向日外交部严词诘问。

9月6日（八月十一日）　福建建阳县农民立“五谷会”（神农会），聚众三四千人，向县署提出四项要求：一、蠲免各项苛捐；二、降低盐价；三、释放监犯；四、拆毁学堂。当地会党数万人响应。

9月9日（八月十四日）　军机处为筹备立宪事分电各省将逐年应办之事，妥速筹议，并迅办谘议局。

△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报会筹开办边务，拟定章程四则。

9月10日（八月十五日）　清廷命福建巡抚松寿严饬印委文武各员迅速扑灭建阳会党起事。

9月11日（八月十六日）　奉天度支使张锡銮与日驻奉天领事冈部三郎订立《采木公司事务章程》。

9月12日（八月十七日）　　孙中山在新加坡《兴中日报》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指出："近数年来，西土人士，无贤不肖，皆知瓜分中国必不能行之事……不意中国人士至今尚泥于拳变以前之言，真可谓不识时务者矣！"

△　浙江归安县城厢内机工7000余人，反对各机户克扣工资举行罢工。

9月15日（八月二十日）　　孙中山在《中兴日报》发表《平实尚不肯认错》一文，驳斥平实"引孔孟天命之说以文饰……以满人侵夺中国亦为天命之自然"之谬论。

9月18日（八月二十三日）　　两广总督张人骏电请外务部通知英、日两国公使，声明蒲拉他士岛（东沙岛）系中国领土。

9月19日（八月二十四日）　　江苏全省绅民大会于上海决议，呈请督抚催办谘议局。

9月22日（八月二十七日）　　专使美国兼考察各国财政大臣唐绍仪奏陈，订立商约要旨六端，请饬议施行，并速定币制。

9月23日（八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陆军部右侍郎荫昌充出使德国大臣。

9月24日（八月二十九日）　　清廷派御前大臣博迪苏前往保定劳问达赖喇嘛。

△　端方电请外务部依据《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宣布东沙岛为中国属岛。

9月25日（九月初一日）　　法公使巴思德照会外务部，送交所拟《中法滇越会防章程》五款，以防止中国革命党人在越南之活动。30日，外交部复照巴思德表示同意。

9月26日（九月初二日）　清廷从礼部请，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文庙。

9月27日（九月初三日）　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考察德国宪法成立情形及普鲁士宪法解释译要。

△　端方奏请于江南设农工实业学堂。

9月28日（九月初四日）　农工商部奏，遵旨设立统计处，编成第一次农工商统计册，填注全国实业概况。

△　清廷命江西布政使沈瑜庆开缺来京，以云南布政使刘春霖为江西布政使。

10月

10月1日（九月初七日）　江苏征仪县十二圩盐民船户数千人，反对往湖南运盐，强迫商店停止营业。

10月2日（九月初八日）　驻广州日领事濑川浅之进照会两广总督张人骏，为避免广州民情忿激，再有抗议事件发生，同意撤销“第二辰丸”案之赔偿要求。

△　日本政府任命伊集院彦吉为驻华公使。26日，伊集院接任视事。

10月4日（九月初十日）　张百麟发起的贵州自治学社开成立大会。该学社以赞助地方自治，仰体国家预备立宪为宗旨。有社员98人。1909年与1911年之交，有分社50余处，社员十万之众，为各立宪团体之首。

10月5日（九月十一日）　清廷命度支部划一币制，计分一两、五钱、一钱、五分四种银币。

10月8日（九月十四日）　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与美国务卿路特在华盛顿订立《中美公断专约》。

△　邮传部为赎回京汉铁路，与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北京订立500万英镑借款合同。

△　邮传部奏准举办公债银圆1000万元，赎回京汉铁路。

10月10日（九月十六日）　奉天商人罢市，反对征收房捐。

△　广东博罗县商人罢市，反对军队骚扰。

△　江苏谘议局开局。

10月11日（九月十七日）　孙中山致函南洋同志林义顺，嘱速集资兴办中兴石山公司，安置被法国殖民当局遣送新加坡之600名河口革命军。

△　唐绍仪抵东京。12日晤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及首相桂太郎，谈中日邦交。

△　清廷以吉林自治会会长松毓请缩短国会年限，命解散该会，并查禁其所出之《公民报》。

10月12日（九月十八日）　日本宪兵大尉平田美次郎等37人，在吉林省延吉茂功社修造分遣所房屋，不听地方当局阻止，竟向巡警、宪兵开枪，击毙巡警两名，伤及多人。

△　中日在东京订立“中日电线条约”八款。依照该约，清政府允许日本在旅顺至烟台敷设海底电线。

10月14日（九月二十日）　达赖喇嘛抵北京，觐见清帝于仁寿殿。

10月16日（九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致函檀香山同志，告以不久将再次发动起义，需军饷10万元，请在一两个月内筹足此数。

△　端方奏陈军政大纲，恳请择要施行。

△　外务部就延吉茂功社日兵枪杀中国巡弁之案，电专使唐绍仪（时在日本）会同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向日本外务省严词诘问，并由双方派员会同前往闹事地方查明核办。

10月18日（九月二十四日）　湖北士绅就湖广总督陈夔龙改湖北谘议局为筹办处事，会于武昌黄鹤楼，柬请筹办处总办、会办以下官吏进行质问。

△　唐绍仪同日本外务大臣小村谈延吉问题及新法、吉长等铁路问题。

10月19日（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警视厅允清使之请，下令查封中国同盟会本部机关报《民报》。

10月20日（九月二十六日）　外务部就延吉茂功社日兵枪杀中国巡弁案，电饬唐绍仪会同胡惟德向日政府提出惩凶、抚恤、撤兵等五项要求。

10月21日（九月二十七日）　湖北绅民开会，决议川汉路仍归商办，认股400万两。

10月22日（九月二十八日）　清廷以檀香山发行之《自由新报》倡言革命，命沿江沿海各地严禁行销。

10月23日（九月二十九日）　清廷谕内阁各部院衙门按照宪政编查馆、咨政院所奏筹备立宪格式统限六个月内，各就本管事宜，将九年应有办法分期胪列奏明。

10月24日（九月三十日）　台湾全岛铁路告成礼在台中举行。

10月25日（十月初一日）　清廷以巴黎《新世纪报》（主持人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倡言革命，命沿江沿海各地严禁行销。

△　清廷以川边三崖、德格两处藏民煽乱，命四川总督赵尔巽、驻藏大臣赵尔丰严密整备，勒限责令解退，倘执迷不悟，惟有奋力驱剿，并饬达寿、张荫棠责问达赖喇嘛。

10月27日（十月初三日）　清廷以藏兵煽乱，命驻藏办事大臣赵尔丰会商赵尔巽，先行开导，继以兵威，但不可孟浪从事。

10月28日（十月初四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自新加坡抵芙蓉。次日抵吉隆坡，商筹赴法旅费。

△　清廷以粤汉铁路事权纷歧，议论淆杂，命督办大臣张之洞通筹全局，严定限期，并命邮传部及湖北、湖南、广东督抚实力协助，各省原派之总理协理，均听节制。

△　驻藏办事大臣赵尔丰奏报，全藏僧众以传闻西藏将改为行省，聚众数万暴动，形同反叛，请裁训应否厚集兵力，痛加剿灭。

10月30日（十月初六日）　云南官兵追逐河口失败之革命军，越界至越南大肆焚扰，经法政府抗议，是日清廷颁诏惩罚滋事官兵。

△　清廷以藏兵攻三崖等处甚急，令驻藏办事大臣赵尔丰速将该案设法办结，再相机规划。

10月31日（十月初七日）　香港华商以日人污辱讽诋华人，发生暴动。

△　清廷以赵尔丰连电藏乱情形紧急，命妥慎布置，并命理藩部转商达赖，速电藏僧等解散乱党。

是月　湖北因筹办省谘议局首次普查人口，共2477.0961万人，其中江夏县（今武昌）、汉阳县、夏口厅（今汉口）共132.1229万人。

11月

11月1日（十月初八日）　清太后传谕达赖速即回藏。

11月2日（十月初九日）　孙中山自吉隆坡抵巴罗（坝罗）。次日自巴罗致函邓泽如等，谋改良扩充吉隆坡团体，以求其进步。

△　香港华人抵制日货与日人冲突，被捕数十人。

11月3日（十月初十日）　清廷颁发宪政誊黄（即九年立宪筹备事宜清单）。

△　清廷谕加封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按年赏给禀饩银一万两，仍回西藏。

11月5日（十月十二日）　孙中山自巴罗抵庇胼　。8日返新加坡。

△　法公使巴思德照会外务部，粤省统兵大员在中越边境建筑炮台，违背1895年6月20日中法议定之对泛章程，请严饬粤督将此炮台工程立即停止。

11月7日（十月十四日）　中日两国在东京签订《中日满洲陆线办法合同》及《中日烟台关东水线办法合同》。

11月8日（十月十五日）　专使美国大臣唐绍仪自日本启程赴美国。

11月10日（十月十七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以将离新加

坡前往暹罗，并催其速筹款。

11月12日（十月十九日）　中日两国在北京订立《新奉、吉长铁路借款续约》。两路借款额共计247万日元。

11月13日（十月二十日）　慈禧太后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11月14日（十月二十一日）　清光绪帝载湉病逝于瀛台。

△　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　慈禧太后以嗣皇帝尚在冲龄，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嗣后所有军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

11月15日（十月二十二日）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病逝。

11月17日（十月二十四日）　驻日公使胡惟德到日本外务省，要求拒绝孙中山来日。

11月18日（十月二十五日）　清廷钦定建元年号曰“宣统”。

11月19日（十月二十六日）　光复会会员、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发动起义，率马、炮营士兵千余人攻城，因城中内应误事，不克，旋皖抚朱家宝调江面兵舰炮轰起义军，击毁营垒，起义军渐不能支，退走桐城、舒城一带。

△　康有为、梁启超通电讨袁。谓两宫祸变，袁世凯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

△　新加坡保皇派为追悼光绪帝及慈禧太后，与革命派发生冲突，当地英政府请孙中山出示布告，约束部众。

11月20日（十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赴曼谷，居10

日，发展萧佛成等20余人为同盟会会员，组成同盟分会，萧佛成为会长。

△　熊成基率起义军残部由桐城退至庐州（今合肥），清军提督姜桂题率部追击，起义军溃散，熊成基脱身，旋东渡日本。

△　清廷告诫群臣，嗣后王公百官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监国摄政王。

△　日本外务大臣以“清皇帝驾崩”，向内务大臣、北海道厅长官、警视总监、各府县知事等发出《关于清国事件取缔之件》，要求约束日人援助中国革命党的活动。

11月21日（十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安徽巡抚朱家宝迅速扑灭安庆起义。

11月22日（十月二十九日）　清廷以安庆兵变虽已剿平，但孙文有回国之说，命各省督抚认真防范查拿。

△　端方自太湖到安庆，会晤朱家宝，筹商剿抚安庆起义。次日与朱家宝出城抚慰地方，并派兵至庐州一带堵击起义军。

△　端方派宁军三十四标，由标统带艾忠琦督率，又江北步队第四十五标、马队第七标第一营，由协统徐瞻凤督率，均于是日抵安庆，以剿抚熊成基起义。

11月23日（十月三十日）　驻日公使馆向日本外务省转交外务部一封电报，内称孙中山确抵东京，已有三日，希即查探踪迹，设法驱逐。

11月24日（十一月初一日）　专使美国大臣唐绍仪抵美国旧金山。30日抵华盛顿。

11月26日（十一月初三日）　　东京地方法庭裁判庭审理《民报》案。此前，黄兴、宋教仁通过宫崎寅藏延请日本律师花井卓藏、后藤德太郎向日本法庭起诉日本政府之违法。

11月27日（十一月初四日）　　清廷据朱家宝奏称，皖北叛兵余党尚有五六百人之多，是日电端方严饬派出各营兼程追截，迅速歼除。

11月28日（十一月初五日）　　清廷谕内阁，十一月初九日登极颁诏，所有一切应办事宜，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11月30日（十一月初七日）　　内阁奏准宣统建元鼓铸银铜币制。

△　两广总督张人骏电外务部，香港华商排斥日货，与内地无关。

12月

12月2日（十一月初九日）　　清帝溥仪即位，以明年为宣统元年，行大赦。

△　清帝命邮传部检查海外“逆党”寄来汉文函件，一俟发现，一律焚毁；并着民政部、步军统领、顺天府暨各督抚随时派员认真查访，严禁传送悖逆各函件。

△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四川设全省矿务总公司，集股银300万两。

△　《美日协约》公布，凡五条，其中规定“保全中国独立及领土完整”，并维持各国在华之商工业。

△　唐绍仪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

12月3日（十一月初十日）　清廷重申九年筹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八年（1916）颁布宪法，召开国会。

12月4日（十一月十一日）　御史赵炳麟奏请规复军机署名旧制，并请以摄政王总统禁卫军。

12月5日（十一月十二日）　陆军部奏准设海军贵胄学堂。

△　容闳致函美人荷马李及布思二人，建议邀请中国各地秘密会党首领至美国开会，商组最高会议、顾问委员会、临时政府诸事宜，并同意任命荷马李为联合军总司令，布思为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兼顾问委员会主席。邀请名单中列有革命党首领孙文。

12月6日（十一月十三日）　预备立宪公会开年会，议决明年以提倡地方自治为主，设立宣讲所，宣讲宪法，以造成立宪国民之资格。

12月7日（十一月十四日）　同盟会会员葛谦、谭馥在广州谋运动巡防营，组织“保亚会”散放票布，密谋起义，事泄，葛谦等遇难。

△　清廷令端方等务将安庆叛兵首犯熊成基擒获惩办。

12月8日（十一月十五日）　清廷上光绪帝谥曰景皇帝，庙号德宗。

12月9日（十一月十六日）　张之洞奏调湘鄂人员曾广镕、高凌霨到京，与中英公司经理濮兰德开议粤汉铁路借款。

12月12日（十一月十九日）　东京地方法庭裁判庭宣判《民报》停刊，并课《民报》主编兼发行人章太炎罚金150日元。

△　内阁等衙门会奏陈摄政王礼节总目16条，清廷命各该衙门一体遵行。

△　日本将驻华近畿各军裁减大半，是日起实行。北京、山海关各留兵队130名与30名。17日自京津及山海关各撤兵队260名、160名及140名，均经秦皇岛回国。

12月13日（十一月二十日）　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在武昌成立群治学社，通过宣言、简章。

△　同盟会缅甸分会成立，庄银安任会长、卢喜福为副会长。

△　清廷上慈禧太后谥曰孝钦显皇后。

△　邮传部奏报沪宁铁路全线工程完竣。该路自上海宝山县附近至南京下关，全长310余公里，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8月开工，至是年11月竣工通车，历五年之久。

△　徐世昌奏报，奉省原设谘议局，改为谘议筹办处，并附设自治研究所。

△　湖北士民再开川汉铁路大会。

12月14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因暹罗当局勒令离境，是日偕胡汉民自曼谷返回新加坡。

12月15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致函侨居暹罗之海南籍同盟会会员符树兰等，指出各处同志争欲起事，琼州形势，最有可为。嘱努力“联成海南同志，扩充团体”，并速汇款为其赴欧美之经费。

12月16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各省督抚司道认真考察吏治。

12月17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清廷派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大学士那桐、侍郎宝熙、熙彦、达寿总司变通旗制处。

△ 清廷命那桐、荣庆、梁敦彦、瑞良、严修、俞廉三为第三期查验询问保荐人才大臣。

△ 清廷谕内外臣工尚节俭，戒浮华。

12月18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清廷申谕各衙门遵九月二十九日（10月23日）谕旨，分期胪列筹备宪政九年应有办法。

△ 清廷定津浦铁路为官商合办，命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劝导直、鲁、苏、皖四省绅商协议筹集铁路股款，以备十年后赎回自办。

12月19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商《中兴日报》扩充股份办法。

△ 清廷命庆亲王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载洵、载涛加郡王衔，张之洞、袁世凯等加太子太保衔。

12月21日（十一日二十八日） 度支部奏财政急当整理之事六端，清廷命会议政务处速议。

△ 达赖喇嘛离北京回藏。

12月23日（十二月初一日） 同盟会会员杨振鸿等在云南省城起义未果，因愤于举事失败于次年1月2日逝世。

△ 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电告外务部："孙文已由暹罗返坡，党势渐衰，谣喙寝息。"

12月25日（十二月初三日） 清廷设立禁卫军，派贝勒载涛（摄政王之弟）、毓朗、尚书铁良充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此项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载沣自为统辖调遣。

△ 日本外务省致清政府驻日公使馆觉书，言明孙中山实未来

日。

△　台湾北部高山族起义，反抗日本侵略军，连日获胜。

12月26日（十二月初四日）　清廷申谕变通旗制宗旨，尽力妥筹教养之方。

12月28日（十二月初六日）　清廷派张之洞兼督鄂境川汉铁路大臣。

12月30日（十二月初八日）　清廷派端方赴沪出席在沪召开之万国禁烟大会。

△　外务部奏准自本年十二月初十日（1909年1月1日）起，所有吗啡及吗啡之药针，概行禁止运入中国。

△　湖北蕲水、罗田，安徽英山、太湖等县留学生黄某（改姓石）等鼓吹革命，倡立“义学会”，加入者数千。

△　宁夏口外蒙族民众抗捐。

是年　河南留学生杜潜归国，召集学界同志杨源懋等20余人集会于开封中州公学，成立同盟会河南总分会，先后加盟者200余人。

△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成立中国同盟会分会。

△　秋，孙中山通告南洋各埠同盟会分会负责人邓泽如等，设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于新加坡，订立中国同盟分会总章16条及通信办法三条，特派胡汉民为支部长。

△　冬，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等在西安集会，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推李仲特为会长。

1909年（清宣统元年）

1月

1月1日（十二月初十日）　　清廷向比国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由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同比国正式办理接收手续，注销各项合同。

△　民政部奏准颁布《调查户口章程》，凡11章40条。此为清廷九年筹备立宪事宜中，第一年应发表筹备事宜之一。

1月2日（十二月十一日）　　袁世凯权势膨胀，遭摄政王载沣嫉恨，是日，清廷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现患足疾，命其着即开缺，回籍养疴。

△　宪政编查馆奏准于馆内设立专科，考核九年限内逐年应行筹备立宪事宜。

1月3日（十二月十二日）　　清廷以梁敦彦署理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23日实授为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

1月4日（十二月十三日）　　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中越交界禁匪章程》，凡五条。同日，外务部咨文两广总督张人骏、云贵总督锡良、广西巡府张鸣岐称，已与法使巴思德商订该章程，以防止革命党在越境活动。

1月6日（十二月十五日）　　湖南衡州改门税为落地厘金，较前增加10倍，商人散发传单，全体罢市。

△　邮传部奏报派员分别与俄、日商订合同，收回东清全路日、俄电报。

△　邮传部奏报，注销京汉铁路借款行车各合同，收回全路管理权。

△　徐世昌奏报裁改奉军办法，划分中、前、左、右、后五路，每路九营，共马步45营，统名曰奉天巡防营。

1月8日（十二月十七日）　清廷就江西大庾边界聚集四五百人，焚毁教堂、巡署，图攻郡城事，命两广总督张人骏、江西巡抚冯汝骙会同妥速筹办，认真剿捕，务绝根株。

1月9日（十二月十八日）　端方奏陈军政大纲四条，内有颁征兵诏令风厉天下一节，清廷谕陆军部按所陈各节，次第筹备。

1月11日（十二月二十日）　度支部奏准《清理财政章程》，凡八章35条。此为清廷九年筹备立宪事宜中，第一年应发表筹备事宜之一。

△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等五团体联合电清廷，催宪政编查馆九年筹备立宪本年应发表之筹备事宜。

1月12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徐世昌以奉省匪徒敛迹，奏请令甘肃提督张勋所部淮军调回北洋防次。清廷不从，命张勋所部淮军仍暂留东省办理剿抚事宜。

1月14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御史谢远涵奏请严行整顿吏治。

1月16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度支部奏准统一财权办法六条。

1月18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容闳父子与美国人艾伦晤谈，双方对康有为表示不满，决定赞助孙中山实现其理想与计划。容闳提出

援助500万美元、10万支枪、一亿发子弹之“中国红龙计划”。

△　清廷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凡九章112条，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迅速筹办城乡地方自治。此为清廷九年筹备立宪事宜中，第一年应发表筹备事宜之一。

1月19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专使美国大臣唐绍仪由美启行回国。

1月22日（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日）　清廷以大学士那桐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

△　《女报》在上海创刊，陈志群、谢震为主编。以“提倡中国女学，扶植东亚女权”为宗旨。

1月23日（正月初二日）　端方电外务部，安徽铜官山矿，英人招日本入股，与原合同不符，主张中英合办矿务。

1月25日（正月初四日）　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就“第二辰丸”事件所引起中葡交涉澳门勘界问题电外务部，告以葡萄牙外部所允之争论地方由双方遴派勘界员会查核断等五条件。

1月27日（正月初六日）　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电外务部，告以革命党由美运炸药回国希图举事，请密饬严防。

1月28日（正月初七日）　清廷命度支部电知各省迅将应解赔款数目按期汇沪。

1月29日（正月初八日）　浙江天台县会党徐亦楷率众围县城。

是月　湖南会党首领杨玄德在湘、黔、粤、桂拥有会员两万余人，酝酿在柳州起事，事泄被捕。

2月

2月1日（正月十一日）　外务部照会俄公使萨因图，要求赎回东清铁路自行管理。3日，俄使复照称，须奏明国主，交各部会议，方可定夺。

△　第二次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开幕，英、美、法、德、日、俄等12国与会，发起国美国勃伦脱主教主席，清廷派端方为代表大臣出席并发表演说，通过逐步禁吸鸦片等议决案。26日大会闭幕。

2月3日（正月十三日）　锡良奏陈滇省改设巡警学堂，并酌设巡警教练所。

2月4日（正月十四日）　清廷令会议政务处再行妥议划一币制章程。

2月5日（正月十五日）　各省谘议局举行初选。

2月6日（正月十六日）　御史吴纬炳奏请严行禁革置买奴婢恶习。清廷命宪政编查馆拟订禁革之法。

△　日公使伊集院向外务部提出东三省六悬案节略：一、新法铁路；二、大营支路；三、京奉路车站；四、抚顺烟台煤矿；五、安奉路沿线矿务；六、间岛问题。

2月7日（正月十七日）　清廷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嗣后奏调咨调各员均由吏部切实考核官阶履历，裁汰兼差薪金，厘定官员薪费。

2月8日（正月十八日）　清廷命邮传部尚书陈璧革职，以镶红旗汉军都统李殿林署邮传部尚书。

2月9日（正月十九日）　清廷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邮传部尚

书，调云贵总督锡良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以前广西巡抚李经羲为云贵总督，未到任前，以布政使沈秉堃暂行护理。锡良、李经羲均着迅速来京陛见。

2月10日（正月二十日）　　梁启超致书肃亲王善耆论调查户口事。指出“调查之举，不办则已，既办，则似宜勿仅限于户口。盖今后无论欲举何种新政，皆须经一次详密之国势调查，然后得精确之资料，以供斟酌损益之用”。

△　清廷从外务部奏，批准《中美公断专约》。

△　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公使伊集院谈判东三省六案交涉。

2月11日（正月二十一日）　　清廷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前往广东同葡萄牙国所派之员办理澳门勘界事宜。

2月12日（正月二十二日）　　清廷命广东、湖南、江西各督抚照端方所拟清乡办法八条，认真筹办。

2月13日（正月二十三日）　　清廷颁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谥号曰：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　内阁侍读学士占凤奏，预备立宪，请从整饬学务办起。

2月17日（正月二十七日）　　清廷命各省一律举行谘议局选举，俾可依限开办资政院。

△　清廷谕修订法律大臣，凡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为修订法律宗旨。

△　邮传部奏准筹议修筑西北铁路，分东西两干线，东路由张家口至库伦，西路由洛阳至西安、兰州至伊犁。

△　梁敦彦与伊集院再度谈判，伊集院表示中国如将各项问题让

步，日本允认中国在延吉地方有领土权。

2月19日（正月二十九日）　　清廷颁诏景皇帝（德宗）谥号曰“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

△　清廷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按照善耆所奏各节，妥慎筹划海军基础。并开去铁良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之差，俾得专心擘划。

△　山东巡抚袁树勋奏报山东省创设图书馆。

2月21日（二月初二日）　台北、南台直通电话线路开通。

2月24日（二月初五日）　孙中山派胡汉民自新加坡赴仰光，筹措赴欧美旅费。

2月25日（二月初六日）　外务部电饬出使日本国大臣胡惟德商请日外务省驱令孙中山出境。

2月27日（二月初八日）　清廷命修订法律大臣会同外务部迅速妥议国籍法。

△　先施百货公司在香港正式注册为有限公司。

3月

3月1日（二月初十日）　　吏部奏准考核调用人员切实办法10条。

3月2日（二月十一日）　孙中山应黄兴之请，致函慰谢日人宫崎寅藏，并告以近接欧洲一名商来信，将赴欧商议经济计划。

3月5日（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致函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庄银安，介绍日人岛让次加入同盟会。

△　度支部、学部会奏准设立财政学堂，进呈《财政学堂章程》七章50条。

3月6日（二月十五日）　　清廷颁诏宣示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

△　清廷从驻藏大臣联豫等奏，以西藏亚东为税务司，江孜、噶大克两处暂作为分卡。

3月8日（二月十七日）　　外务部电粤、桂、滇、黔各省督抚称，孙中山由日运枪万余支经缅甸潜到滇桂，速饬严密稽查，认真防范。

3月11日（二月二十日）　　直隶蔚州（今河北蔚县）农民抗牲畜捐，数千人毁县署。

3月13日（二月二十二日）　　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电外务部，请示应否雇密探跟踪革命党。15日，外务部电复胡惟德，嘱应继续雇密探侦查。

3月14日（二月二十三日）　　两广总督张人骏电外务部称，东沙岛为日商西泽私据，请与日使交涉商令撤回。

3月17日（二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致函邓泽如，告以为借款及外交两事将往欧洲一游，南洋党务托诸胡汉民经理。

△　陕甘总督升允奏报青海试垦，业于西宁设局，派员总办垦务。

3月18日（二月二十七日）　　外务部参议曹汝霖往晤伊集院，面

交节略两件，答复日本东三省交涉六案，若谈判仍无结果，将送交海牙和平会公断。

3月19日（二月二十八日）　广东铁路公司股东董事大会，反对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派设驻粤分局总办，坚持商办。

3月22日（闰二月初一日）　直隶总督杨士骧奏报改设巡警学堂，暨各属设立巡警教练所。

3月25日（闰二月初四日）　孙中山致函张永福、陈楚楠，请速改良《中兴日报》，成立有限公司。

△　清廷宣谕各部院衙门堂官、各省督抚大吏，举凡应办要政及一切关于预备立宪各事宜，皆当次第筹划，督率所属官员认真办理。

△　清廷命进讲诸臣，嗣后务当于各书中有关一切新政宪法之处，详慎采择，剀切敷陈。

3月28日（闰二月初七日）　宪政编查馆奏准《大清国籍条例》，凡五章24条。

3月29日（闰二月初八日）　邮传部奏陈日本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订立接联营业合同16条。

3月30日（闰二月初九日）　清廷颁诏奖励扑灭安庆炮马营兵变之督抚以下各员弁。

4月

4月2日（闰二月十二日）　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奏报，接达赖喇嘛文称，如将呼图克图名号斥革，即速回藏，否则回藏即无定期。

4月3日（闰二月十三日）　四川总督赵尔巽致清廷电称，闻达

赖喇嘛聘俄教习，购俄军火，请将其截留甘省，以消大患。

△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奏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确定十进位。

4月4日（闰二月十四日）　　端方派密探到沪搜捕革命党人。9日，吕煊等三名革命党人在上海闸北为巡警总局逮捕。

△　度支部奏准颁行印花票税。

△　清廷谕饬理藩部传谕达赖迅速启程回藏，毋许藉词迁延，任意逗留。

4月5日（闰二月十五日）　　清廷命赵尔丰驻扎巴塘，将察木多（昌都）拨归管辖，藉为藏援，所请调知府钟颖统领兵弁，着即照准。

4月6日（闰二月十六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致邓泽如函，告以在坡穷困绝粮，请其从速筹300元汇来，以应燃眉之急。

△　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电告外务部，日本在延吉增设所谓间岛事务官。9日，外务部就此事照会伊集院提出抗议。

4月7日（闰二月十七日）　　出使英国考察宪政大臣、邮传部左侍郎汪大燮奏陈编纂《宪政要目问答》等书籍14种。

4月8日（闰二月十八日）　　清廷谕饬设立贵胄法政学堂，派贝勒毓朗为总理。

△　农工商部、邮传部分奏预备立宪逐年应办事宜。民政部（13日）、理藩部（14日）、陆军部（16日）、吏部与法部（均17日）、外务部与学部（均18日）、礼部（19日）各就该项事宜分别入奏。

4月11日（闰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绅民及旅沪各省绅商集会反对英人扩展租界，议决电请外务部始终力争，以保主权。

4月12日（闰二月二十二日）　浙江萧山县“沙民”二三千人反抗清丈旗地，各持枪械、洋油草料，将办理清丈之戚、姚两绅房屋焚毁，并毁差船一只。

4月14日（闰二月二十四日）　伊集院复照外务部，称“间岛”属中属韩“仍系未决之问题”，中国对日之要求如不让步，则不能承认该地为中国领土。

△　两广总督张人骏奏报，改设省城高等巡警学堂。15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报，改设高等巡警学堂。

4月19日（闰二月二十九日）　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陈东三省危迫情形，主张采取开放政策，借债筑路，广招欧美商民，以打破日俄拓殖相持之局、内外合谋相济，以固我边疆。

4月22日（三月初三日）　浙江巡抚增韫奏请浙省创设图书馆。

4月23日（三月初四日）　邮传部与巴黎银公司签订正太铁路垫款合同，款额150万法郎。

4月25日（三月初六日）　广东市民就澳门划界事召开正式大会，议决根据国际法及十三年中葡和约条文，请清廷据理力争。

△　江苏丹徒县顺江洲地方农民二三千人捣毁学堂。

4月26日（三月初七日）　浙江萧山县“沙民”数百人捣毁瓮山富绅汪望庚家。

4月27日（三月初八日）　大理院奏报筹备立宪事宜，清廷谕饬会同度支部妥为筹商具奏。

4月29日（三月初十日）　江西南安府（今大余县）会党起事。

4月30日（三月十一日）　江西九江水木工人2000余人罢工，抗议英巡捕杀死同胞余万程之暴行。

△　安徽全省绅商学界及沪宁、江西等地皖绅代表在安庆举行大会，力争铜官山矿案。

5月

5月5日（三月十六日）　宪政编查馆奏准核复《自治研究所章程》，凡14条。

5月6日（三月十七日）　上海新垃圾桥北裕慎丝厂缫丝女工500人向厂主索取工资，厂主要求捕房弹压。次日，女工拥至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公堂派差知照厂主迅速发还积欠工资。

△　清廷命理藩部再行严催达赖喇嘛迅速启程回藏，不得违延。

5月8日（三月十九日）　陕西盩厔（今周至县）、鄠县（今户县）、邠州、岐山以西八州县“义和拳”扩大传习活动，地方官吏不能制止。

△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报整顿税契章程28条。

5月9日（三月二十日）　清廷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兼署奉天巡抚。

△　锡良奏陈筹办东三省开银行，修铁路，开商埠，办实业，开屯垦，筹边驭蒙诸大政，清廷命军机处、外务、度支、陆军、邮传各部会商锡良妥定办法。

△　锡良奏准派陆军协统吴禄贞充督派吉林边务，以两协之兵归

其节制。

5月10日（三月二十一日）　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俄国东清铁路总办廓索维慈在北京订立《中俄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即《东清铁道内组织自治会预定协约》）。

5月上旬　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建议，由新加坡迁至庇槟。

5月11日（三月二十二日）　胡汉民赴香港，策应广州新军运动及扩充南方党务，南洋支部事务由邓泽如主持。

△　清廷以前外务部左参议杨枢充出使比国大臣。

△　外务部奏准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处开埠设关。

5月14日（三月二十五日）　张人骏电外务部称，日领面交条款，承认东沙岛为中国所属，惟须予日人西泽以利益。

5月15日（三月二十六日）　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在上海创刊《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至8月14日终刊，共出版92期。

△　学部奏准变通中小学课程，中学分为文科与实科，初小分完全科（五年毕业）及四年、三年毕业之简易科。

5月17日（三月二十八日）　外务部奏陈，东三省铁路界内设立公议会，经理地方自治，与俄使商定办法，已签字盖章。清廷允之。

5月18日（三月二十九日）　蒙人陶克陶在奉天、吉林两省边界起事。

△　农工商部奏准分咨出使各国大臣调取各国森林专章，遴员派往日本考察造林之法，并请饬各省将军督抚将所辖境内适于造林之区

域，与国有天产之森林，详查造具图说报部，俾订专章，奏请颁行。

5月19日（四月初一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赴欧洲筹措革命经费。

5月20日（四月初二日）　　河南各界绅民在开封集会，筹商抵制英商福公司办法，到5000余人，旋组织河南保矿公会。28日，该会派人赴道清铁路一带福公司售煤处，联络绅商，实行文明抵制。30日，又派人到郑州、许州各铁路车站，阻止福公司售煤。

5月23日（四月初五日）　　清廷以前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署奉天巡抚。

5月24日（四月初六日）　　清廷命各省财政统归藩司或度支使经营，并着各省督抚于一年内次第裁撤关涉财政一切局所。

△　度支部奏准设币制调查局，并暂铸通用银币。

△　杭州将军瑞兴等奏报，“沙民”阻挠清丈旗地，经派员督办，将滋事之人从严惩治。清廷谕饬瑞兴及浙抚增韫督饬该道妥慎办理。

5月25日（四月初七日）　　清廷颁诏，所有各直省民欠钱粮即着度支部酌核奏请蠲免。

△　美公使柔克义访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提出美国加入英、法、德三国对川汉铁路借款之要求。

5月26日（四月初八日）　　江苏巡抚陈启泰奏报苏省建设商品陈列馆、农业试验场，清廷勉以一切新政自当勤加筹划，次第兴办。

5月28日（四月初十日）　　邮传部奏准陕西设立铁路公司事，拟先设西（安）潼（关）铁路有限公司。

5月30日（四月十二日）　　商办江苏铁路沪嘉路（沪杭甬铁路之

一段）工竣通车，全长56公里。

5月31日（四月十三日）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就河南省不允福公司就地售煤事，要求赔偿损失。

6月

6月1日（四月十四日）　河南绅商林严等80人呈外务部称，英商福公司在怀庆开矿，违约就地售煤，请以理拒之。

6月2日（四月十五日）　江苏举行谘议局议员选举，选出议员黄炎培、马良等68人。

6月3日（四月十六日）　广东新宁县（今台山县）绅商陈宜禧等商办之新宁铁路工竣通车。

6月4日（四月十七日）　湖南寓沪同乡会召开会议，议决组织湘路协会，联合各省湘人共同筹划，致电邮传、度支各部，声明不认外款。

6月5日（四月十八日）　清廷拨库银六万两赈甘肃旱灾。

6月6日（四月十九日）　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与英、法、德之上海德华银行、伦敦汇丰银行、巴黎东方汇理银行在北京订立《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湖广路）借款草合同》，款额550万英镑。

6月11日（四月二十四日）　清廷以礼部尚书葛宝华署法部尚书。

6月13日（四月二十六日）　江苏省谘议局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到各县议员230余人，举张謇为会长。

6月17日（四月三十日）　清廷谕内阁责成禁烟大臣咨行京外各衙门切实考察调验，外省文武职官学堂责成督抚暨将军确查严禁。

6月18目（五月初一日）　浙江归安县农民数千人进城至县署报荒。

6月20日（五月初三日）　孙中山抵法国马赛，转往巴黎。

6月21日（五月初四日）　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陈普鲁士地方行政制度，又奏各省谘议局章程权限，与普鲁士地方会议制度不符。

6月22日（五月初五日）　清廷以江苏布政使瑞澂为江苏巡抚。

6月23日（五月初六日）　清廷以陕甘总督升允奏阻立宪，并即恳请开缺，迹近负气，殊属非是，着照所请，即行开缺。

6月24日（五月初七日）　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陈考察立宪官制，计有《日本官制通释》（三册）、《官制篇》（二册），附《中国内阁官制草案平议》（一册）、《自治制篇》（一册）、《官规篇》（一册）。

6月25日（五月初八日）　锡良向日本领事小池提出安奉铁路办法10条。

6月26日（五月初九日）　安徽旅沪路矿公会职员会电军机处、外务部，要求铜官山收回自办。

6月27日（五月初十日）　于式枚奏陈普鲁士议院制度及议院选举法。

△　邮传部奏报，京汉铁路近已收回管理，宜亟制订整顿扩充改良办法；又奏京奉铁路整顿情形及其成效。

△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帮办大臣温宗尧会奏筹办西藏事宜，列

举开商埠、练新兵、兴学堂、垦荒地、开矿山五端，并请添参议一员驻后藏。

6月28日（五月十一日）　清廷调两江总督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到任前，以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署理；调两广总督张人骏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未到任前，着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护理，以山东巡抚袁树勋署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着广东布政使胡湘林护理。

是月　福建永定县三点会起事，以“仇学、锄官、排外”三者为宗旨。

△　直隶遵化县农民聚众反抗“新政”，驱逐巡警。

△　直隶临榆、昌黎、抚宁等七县盐价腾贵，激成民变。临榆等三县农民鸣锣聚众，集数千人或百人不等，将三县盐店抢空或捣毁达十余次，损失盐300余万斤。

7月

7月3日（五月十六日）　清廷命农工商部再行严催各省督抚将应办农林工艺各项迅速分别举办，毋再因循悠忽。

△　清廷命新任陕甘总督长庚着速兼程赴任，至九年内应行预备之各项立宪事宜，尤不可视为缓图，到任后即将应办各事次第举办。

7月4日（五月十七日）　华文《美洲少年》在美国旧金山创刊。周刊，主编温雄飞。鼓吹革命，抨击君主立宪。

7月7日（五月二十日）　浙江德清县农民聚众进城报荒，要求放谷，捣毁漕总等绅董三家住宅。

△　清廷开复故革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原官。

△ 农工商部奏准筹议农林工艺要政，并拟大概办法。

7月8日（五月二十一日） 专使美国大臣唐绍仪回到北京。

△ 锡良奏报吉林省城创设图书馆。

7月9日（五月二十二日） 肃亲王善耆奏准遵筹海军基础办法。

7月10日（五月二十三日） 是日江西宁都州，12日江西丰城县，14日江西崇仁县，先后发生农民聚众反抗调查户口事件。

△ 外务部奏准于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肄业馆。

7月12日（五月二十五日） 梁启超致书其弟仲策论时局，谓“兄年来研究政治问题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归我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政，亦无能为矣”。

△ 河南巡抚吴重憙奏报豫省防军改编情形，统计通省巡防步队28营，马队12营，全年薪饷需银587100余两。

7月13日（五月二十六日） 浙江乌程县（今湖州市）北乡佃农千余人进城报荒，大闹县署。

△ 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陈川滇会筹大举剿抚凉山猓夷（今彝族）办法。

△ 日公使伊集院照会外务部，请饬令东三省总督从速办理安奉铁路改筑之事。

7月15日（五月二十八日） 清廷颁诏，依据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所载，清帝溥仪为大清帝国统率陆海军大元帅，未亲裁大政前，暂由摄政王代理；并着先行专设军谘处，通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即着贝勒毓朗管理军谘处事务。

△　清廷以毓朗现派管理军谘处事务，着开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以镇国将军载搏继任。

△　清廷派郡王衔贝勒载洵（载沣之弟）、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

△　浙江德清乡民进城告灾，闻绅士与书吏吞没历年带征积谷款项，愤而捣毁三家房屋。清政府派兵镇压，捕30余人，杀一人。

△　日本宪兵闯入延吉和龙峪府经历衙署，击毙营兵曲得胜，砍伤外委张景泰。

△　美总统塔夫特致书清摄政王载沣，要求中国借美资建筑湖广铁路。7月18日，载沣电复塔夫特称，已令外务部与美驻华代办会商，以便做出适当决定，并据以采取行动。

7月16日（五月二十九日）　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炼染工人数百人反对铜元折价，要求提高待遇，举行罢工。

△　清廷添派郡王衔贝勒载涛管理军谘处事务；又谕贝勒毓朗仍留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之差，以资熟手。

7月18日（六月初二日）　江西丰城县乡民因调查户口，连日发生骚动，殴官杀人，纠众毁屋。南昌、都昌、崇仁、安义、广昌、宁都、雩都、新淦、石城等县，近日均有同类事件发生。

7月20日（六月初四日）　外务部、学部在北京招考第一次留美学生唐悦良、梅贻琦、胡刚复等47名。

7月21日（六月初五日）　孙中山在巴黎活动借款不成，是日抵比京布鲁塞尔。

△　外务部电出使日本国大臣胡惟德，请就延吉和龙峪事件向日

外务省严重交涉，要求惩办，并再次声明界务未决以前彼此维持现状之宗旨。

7月23日（六月初七日）　清廷准庆亲王奕劻开去管理陆军部事务。

△　度支部奏准厘定章程，限制官商银号滥发票纸。

△　驻京日使伊集院彦吉就和龙峪事件向清廷外务部抗议，谓吴禄贞办事“迹近挑拨，贵国政府倘任其所为，我国官宪不得不采用适当之措置”。

7月25日（六月初九日）　清廷实授程德全为奉天巡抚，陈昭常为吉林巡抚，周树模为黑龙江巡抚。

7月26日（六月初十日）　湖广总督陈夔龙奏陈鄂省遵设自治研究所。

△　川督赵尔巽以川军入藏订于本月起程，惟虑藏人阻挠，究竟应否准其迎头痛剿，转战前进，抑或停顿半途，另筹进步等事，是日致电枢垣谨请代奏清廷，请旨示遵。

7月27日（六月十一日）　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出兵征讨川藏军事重镇格德土司之乱，是日讨平，将格德全境收归政府直辖，设官治理。

7月30日（六月十四日）　驻奉天日领事小池会晤锡良，面交说帖一纸，要求将安奉路10项办法收回，同意实行改筑，如此则日政府对于各条件，可以互行商议。

是月　贵州自治学社机关报《西南日报》创刊。

8月

8月2日（六月十七日）　　清廷着开去吕海寰督办津浦铁路大臣，派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督办津浦铁路事宜。

8月3日（六月十八日）　　《民呼日报》被搜查，主笔于右任、陈飞卿在沪被捕。

△　中巴（西）两国在北京订立《公断条约》四款。

△　清廷拨帑银六万两赈吉林水灾。

8月4日（六月十九日）　　香港筹设大学校，以便内地学生入学，港督卢嘉函商设法筹助经费，清廷命袁树勋妥筹接办。

△　张人骏奏报，日人占据东沙岛，现已据理力争，即可将该岛收回；又查有西沙岛共有15处，业已逐一命名，以便书碑，岛产有矿砂，拟即设厂开采。清廷命袁树勋妥筹布置。

△　外务部以日兵于上月26日由朝鲜会宁渡江越界向延吉添兵运械事，照会伊集院提出抗议，请迅速撤回该处日兵。

8月5日（六月二十日）　　上海梧州路勤昌丝厂女工百余人举行联合罢工，反对增加工时。

△　管理军谘处事务载涛率同军谘官员前往南苑点验禁卫军。

△　清廷以日人在延吉添兵戕弁，意图挑衅，命东三省总督锡良严饬吴禄贞妥为应付，力求稳慎，毋得稍涉大意，以防叵测。

△　清廷拨库银六万两赈湖北水灾。

8月6日（六月二十一日）　　北京、天津及东三省等地民众为安奉路交涉问题，开始抵制日货。

△　署山东巡抚孙宝琦奏报，山东省师范学堂改为优级师范，各

府直隶州亦饬令各设完全初级师范。

△　日公使伊集院照会外务部，日本政府决自行改筑安奉铁路之路线。同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亦以此意面告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

8月7日（六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自布鲁塞尔抵伦敦。

△　外务部复照伊集院，安奉铁路允改宽轨道，如需更正路线，可照约妥商。同日并电锡良、程德全与日领事小池议定细目。

△　外务部致伊集院节略，对东三省六悬案，日本如将延吉一案按照中国之意全行让步，则其余各案中国亦当互让。

8月8日（六月二十三日）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报，遵章设立法政学堂。

8月9日（六月二十四日）　清廷命河南巡抚吴重憙照外务部与英公使所订福公司续约办理，并严饬所属撤销福公司售煤之禁，一面晓谕商民毋得阻抗。

8月10日（六月二十五日）　云南布政使沈秉堃奏，请饬黔、川、陕、甘、晋五省统限于本年一律禁种鸦片烟。清廷命军机处速议具奏。

8月11日（六月二十六日）　锡良奏陈整顿东三省内政四端：一、考核官吏；二、推广审判；三、振兴教育；四、筹办实业。

8月12日（六月二十七日）　上海密勒路瑞纶丝厂女工百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清廷命出使美、墨、古国大臣伍廷芳、出使意大利国大臣钱恂回京候简，分别以署外务部左丞张荫棠、署外务部右丞吴宗濂继

任。

△ 度支部奏陈，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应力求撙节，以维大局。清廷命各部院衙门、各省督抚详细阅看。

8月16日（七月初一日） 同盟会会员谢心准、周之桢等在新加坡创刊《星洲晨报》。

△ 锡良奏陈吉林省巡警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

△ 邮传部奏准展筑京绥铁路计划。

△ 《图画日报》在上海创刊。上海环球社发行。1910年8月停刊。共出404期。

8月18日（七月初三日） 邮传部与南满铁道会社订立中日吉长铁路与新奉铁路借款细目合同。

8月19日（七月初四日） 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与日驻奉天领事小池签订安奉铁路合同。

8月20日（七月初五日） 中、秘两国于利马签订《废除苛例证明书》，凡九条。

8月21日（七月初六日） 江苏丹阳县西门乡民千余人反对征收钱粮铜元按八折扣，酿成暴动。次日，乡民3000人冲进城内捣毁粮柜及县署，合城罢市。

8月23日（七月初八日） 资政院奏陈续拟院章并修改前奏各章，清廷命京外各衙门一体遵行，其各项细则章程仍着迅速筹拟，奏请宣布。

8月24日（七月初九日） 清廷遣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巡视沿江沿海各省武备。次日到天津，29日到上海。

△ 管理军谘处事务载涛奏准《军谘处暂行章程》。

△ 护理两江总督樊增祥奏陈江南水师学堂改为南洋海军学堂。

8月25日（七月初十日）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陈重庆江北英商开采龙王洞煤铁矿，由华商江合公司收回自办。

8月26日（七月十一日） 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报编成《日本司法制度考》，分订两册呈进。

8月28日（七月十三日） 江苏镇江机户千余家工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 清廷派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为南洋劝业会会长，并着各督抚筹办协会出口各事，所有赛品，准其分别豁免税厘。

8月30日（七月十五日） 陆军部尚书铁良奏准商明度支部筹定经费，向德国购买二十九倍口新式陆路快炮54尊交近畿各镇练习，另购六尊交各局厂仿效。

△ 清廷派内阁学士那晋充陆军贵胄学堂总办。

9月

9月4日（七月二十日） 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抵福州视察，9日抵广州。

△ 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驻京日公使伊集院订立《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条款规定：一、中国如造新（民屯）法（库门）铁路时，允与日本先行商议；二、中国认将大石桥至营口支路为南满铁路支线；三、中国认日本开采抚顺、烟台煤矿，日本尊重中国一切主权；四、奉安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沿线矿务，由中日两国合办；五、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一节，日本允无异议。

△　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使伊集院在北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凡七款。规定“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

9月5日（七月二十一日）　清廷据外务部奏陈图们江中韩界务暨东三省五案条款事，谕令东三省总督锡良称，朝廷顾念根本，慎固邦交，于此事权衡轻重，一以和平为宗旨，该督抚亦当共体此意。

△　清廷命四川总督赵尔巽传谕达赖喇嘛，准由德格取道察台回藏，勿得任意绕行，致多滋扰。

9月6日（七月二十二日）　汉口居民反对拆迁民房，千余人捣毁警局。8日又聚众千余人至夏口厅要求释放被捕诸人。

△　吉林全省绅商电外务部，反对签押东三省交涉条约，要求乘尚未签押之际取消此议。

9月7日（七月二十三日）　度支部订定《通用银钱暂行章程》，凡20条。

9月8日（七月二十四日）　外务部为德国续招华工数百名前往南洋萨摩岛一事，奏请派林润钊为署理驻德属南洋各岛领事，前往萨摩开办，所有应募华工统归管辖。

9月9日（七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在伦敦访问日本驻英大使馆山座圆次郎参事官，希望日本政府许可回到日本寄住。遭拒。

△　学部奏准，筹建京师图书馆，并以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监督；赏给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宋元旧刻藏书，以及《永乐大典》一并交图书馆储藏。

9月10日（七月二十六日）　上海租界乾康丝厂女工数百人控告资本家扣发工资。

△　民政部奏陈京师地方自治暨选举章程。

9月上旬　直隶迁安筹备地方自治，派董事胡某及施某去冷口等地调查户口，强行摊派自治经费，各村农民聚众反抗，知县派差役拘捕首要，滥施酷刑，激起公愤，口外农民鸣锣聚众万余人围困县城，并捣毁胡、施两家住宅。

△　江西南昌、都昌、临川、临江、石城等县因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接连发生殴打办事差役，捣毁调查员家，聚众夺回调查册籍等事件。

△　甘肃、蒙古边界蒙民联合甘肃饥民数千人暴动。

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　湖北应城县盐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9月15日（八月初二日）　江西宜春县官绅借办学为名，勒收米捐，遭乡民反抗，是日，由北乡乡民首先发难，数百人入城，要求惩办祸首，巡防营开枪毙伤乡民多人。16日，宜春民众数千人持械攻城。19日再攻，同巡防营激战，兵民均有重大伤亡。

△　清廷以泄露交涉机密为由，谕饬民政部封禁《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报馆。

△　福州风火巨灾，毁房屋千余户，死伤2000余人，财产损失数百万，船只丢失2000余艘，实为百年未遇之巨灾。

△　邮传部奏陈光绪二十四年（1898）与中英公司订立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业已注销，合同了结。

9月16日（八月初三日）　江苏省谘议局开会。张謇当选为议长。

△　外务部与学部录取首批庚款游美学生梅贻琦、王士杰等47名。10月12日，梅贻琦等47名连同加派之秉志等三人，共计50人放洋。

9月17日（八月初四日）　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自上海溯江西上视察，24日离汉口回北京。

9月18日（八月初五日）　出使意大利国大臣钱恂奏陈意国国税八端，以备整理财政之参考。

9月19日（八月初六日）　热河平泉州宽城镇农民千余人暴动。

△　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准，筹办墨尔根属嫩江上游甘河地方煤矿，拟修路购轮，并预筹扩充办法。

9月23日（八月初十日）　清廷以藏民阻截川兵进路一事，谕饬四川总督赵尔巽传知统领钟颖相机驱剿，并晓谕达赖约束藏民，毋得滋生事端。

△　清廷以候补内阁学士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务。

9月24日（八月十一日）　江苏巡抚瑞澂奏陈由谘议局筹办处兼理自治事宜，并附设自治研究所。

△　江苏巡抚瑞澂奏陈苏省整顿吏治、整顿军政、整顿巡警情形。

△　京张铁路全线通车，全长177公里。历四年修成。

9月25日（八月十二日）　清廷以江西宜春县北乡因办学抽捐，遭乡民反抗一事，命巡抚冯汝骙迅速督饬弹压解散，严拿首要，并加意保护教堂。

9月26日（八月十三日）　湖广总督陈夔龙奏陈于署内设立宪政

筹备处。

△　湖南巡抚岑春蓂奏陈湘省常宁县水口山龙王山铅矿、平江县黄金洞金矿、新化县锡矿山锑矿开采情形。又以湘省矿山甚多，奏请圈划示禁，不得私行开采。

9月27日（八月十四日）　宪政编查馆奏陈，复核各衙门九年筹备未尽事宜，分别厘正，开单呈览，请饬各该衙门将所复核各节，另行奏明办理，并于每年冬间将次年实行办法及预算款数，先期奏明办理。清廷从之。

△　筹办海军大臣贝勒载洵奏报出京巡阅沿江沿海九省武备经过及海军建设要事七端。

9月28日（八月十五日）　外务部奏准于北京西直门外清华园建游美肄业馆。

△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昆明成立，高尔登任总办，李根源任监督。

9月29日（八月十六日）　直隶丰润县知县以筹集办学堂、巡警等新政经费为名，在丰台镇（地处丰润、宝坻、宁河三县之中）勒收席捐，激起织席农民反抗。是日，宝坻县盘龙庄地保召集32庄4000余人开会，成立“得胜会”，发表抗捐宣言。

9月30日（八月十七日）　河南巡抚吴重憙奏陈于署内附设筹备宪政考核处。

是月　直隶遵化县农民数千人进城反对新政，要求撤销学堂、巡警。

9月至10月　陶成章抵槟城，联合李燮和等七八人，以七省同志名义，起草一份《孙文罪状》（《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罗列罪

状21条，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同时，章太炎刊发《伪〈民报〉检举状》，配合陶成章攻击孙中山。

10月

10月1日（八月十八日） 浙江乌程县农民千余人赴县署报荒。

10月2日（八月十九日） 京张铁路通车典礼在南口举行，到中外来宾万余人，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工程师詹天佑等发表演说。

△ 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与驻奉天美领事司戴德订立《锦（州）瑷（珲）铁路借款草约》。

10月3日（八月二十日） 《民呼日报》被查禁后，是日改名《民吁日报》在上海发刊，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范鸿仙为社长，仍由于右任实际负责。

10月4日（八月二十一日） 内阁大学士张之洞在北京病逝。6日，清廷谕张之洞谥文襄公，晋赠太保，赏银3000两治丧。

10月5日（八月二十二日）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与日本代领事濑川签订东沙岛协定。日本承认东沙岛为中国领土。中国付给日本广东毫银19万元。

△ 农工商部奏准仿欧洲各国先例，试办劝业富签公债票，发行债票1000万张，每张售洋一元，共1000万元。

△ 新疆巡抚联魁奏陈新疆遵设高等巡警学堂。

10月6日（八月二十三日） 上海《民吁日报》发表于右任撰写之社论《中国改革谈》，揭露清政府实行新政以来官吏昏暴、人民受苦之状况依然如故。指出：“吾然后知政府之所谓改革者，不过欲借此名目收揽人心，使不为党人所煽惑。”

△　清廷以热河都统廷杰为法部尚书，未到任以前，以法部左侍郎绍昌暂行署理。

10月7日（八月二十四日）　清廷命将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事宜归邮传部接办。

△　清廷调察哈尔都统诚勋为热河都统，以礼部尚书溥良为察哈尔都统；以镶红旗蒙古都统葛宝华为礼部尚书。

△　湖广总督陈夔龙奏陈鄂省试办公债票。

△　湖广总督陈夔龙奏陈在武昌城设立武汉劝业奖进会，并附设南洋出品协会。

△　山东济宁州（今济宁）全体绅商学界3000人在谘议研究所开特别大会，议决推举代表赴京，力争津浦铁路干线仍取道济宁，不应改道曲阜。

10月8日（八月二十五日）　直隶宝坻县盘龙庄“得胜会”会众4000人，与清兵激斗，兵伤20人，民伤更甚。次日，乡民闻大军将至始散。

△　江西安福县农民千余人反抗调查户口，毁统计处绅董萧家。

△　湖南铁路公司电邮传部反对湘路借款。14日，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亦电邮传部，请罢议该项借款。

△　两广总督袁树勋电外务部，报告与日本商议收回东沙岛条款情形，并定本月11日划押互换。

10月上旬　湘民千余人拆毁广西富川县西湾煤矿分厂。

10月12日（八月二十九日）　清廷谕令宪政编查馆核议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所编订之现行刑律。

10月13日（八月三十日）　清廷降谕告戒各省谘议局议员，于地方利弊情形切实指陈，妥善计划，各督抚尤应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

10月14日（九月初一日）　各省谘议局开幕。全国22省，除新疆缓办外，其余21省谘议局均于是日开幕。是为中国有地方议会之始。

△　浙江嘉善县农民千余人至县署报荒。

10月16日（九月初三日）　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自上海启程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事务。

10月18日（九月初五日）　外务部奏准批准海牙各国保和会条约。

△　出使意大利国大臣钱恂奏陈意大利宪法及法律，清廷令交宪政编查馆参研。

10月20日（九月初七日）　清廷以四川总督赵尔巽兼署成都将军。

10月22日（九月初九日）　前韩国统监日人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东三省，是日抵奉天。23日，东三省总督锡良会晤伊藤博文。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击毙。

10月24日（九月十一日）　江西吉安府学界数百人在南昌百花洲举行大会，联名控告南昌知县强买吉安府公产、拘留学生。

10月26日（九月十三日）　资政院奏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计：《宗室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凡九条），《满汉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凡九条），《外藩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凡八条），《宗室觉罗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凡26

条），《各部院衙门官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凡26条），《硕学通儒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凡八条），《纳税多额者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凡26条），《各省谘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章程》（凡19条）。

10月28日（九月十五日）　杭州商界代表数千人至抚署示威，要求蠲免警捐。

10月29日（九月十六日）　孙中山函告南洋同盟会会员在欧借款未达目的，将于明日起程往美。

△　学部奏陈开办编订名词馆，派严复为总纂。

10月30日（九月十七日）　孙中山自伦敦赴美国。

是月　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

11月

11月2日（九月二十日）　清廷授协办大学士鹿传霖为大学士，命吏部尚书陆润庠协办大学士。6日，又授鹿传霖为体仁阁大学士。

11月4日（九月二十二日）　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市）地方钱店擅发钱帖，不予兑现，引起农民不满，是日，千余人捣毁商会。

△　民政部、修订法律大臣会奏，拟订《禁烟条例》，凡14条。

11月5日（九月二十三日）　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张伯烈、夏道南邀请省谘议局全体议员、教育总会、宪政筹备会、武汉两商会职员在武昌召开“湖北商办铁路协会”成立大会，举刘心源为会长。

11月7日（九月二十五日）　黄兴自东京复函孙中山，反对陶成

章、章太炎在东京的分裂活动。同日，黄兴致函美洲各埠中文报社，为孙中山赴美活动扫清障碍。略谓：“望我各位同志乘孙君此次来美，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是所盼祷。”

11月8日（八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自伦敦赴美，是日抵纽约。此行任务是在美国建立同盟会，筹集大款，以谋国内大举。

11月9日（九月二十七日）　驻伦敦美大使李德奉国务卿诺克斯之命致英国外交部备忘录，建议满洲铁路中立。25日，英外交大臣葛雷照复李德，表示赞成满洲铁路中立原则，惟英国不愿参与，并建议日本加入锦瑷铁路建筑。

11月10日（九月二十八日）　驻沪日领事永泷久吉致函上海道蔡乃煌，诬指《民吁日报》“煽惑破坏”，“有碍中日两国邦交”，要求严厉惩办。

11月11日（九月二十九日）　直隶抚宁县乡民数千人反对盐店哄抬盐价，遭官兵武力弹压，枪杀乡民七人，重伤六人，直督派兵星夜驰往，乡民闻讯散去，旋官兵捕去七人，指为“匪首”，就地正法。消息传开，长城口外为之震动，即传帖纠人，创立庄连会，加入者达万余人。

△　军谘处奏准，拟订各项各级军官特简奏补及委充章程。此乃对前练兵处奏定陆军人员任职等级及补官摘要章程之改订。

11月12日（九月三十日）　清廷命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切实开导达赖喇嘛，晓以利害，俾令感悟，免生事端。

11月13日（十月初一日）　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发起在苏州成立文学团体南社，到17人，同盟会会员占多数，该社以文学鼓吹革命为宗旨。

11月16日（十月初四日）　上海道蔡乃煌致书公共租界会审公

堂，声称《民吁日报》所载各论“实属有意挑衅，损伤邦交”，要求查封该报馆。

11月17日（十月初五日）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帮办大臣温宗尧电外务部称，达赖调兵抗阻，开导无效，已饬四川陆军标统钟颖率兵从速入藏。

△　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奏报在秘鲁办理交涉情形，已将该国虐待华人苛例分别驳改，并订立证明书互相签押。

11月18日（十月初六日）　　各省谘议局代表集议上海，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到奉、吉、直、陕、晋、鲁、豫、湘、鄂、赣、皖、浙、闽、粤、桂、苏16省55名，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发起，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事宜。

11月19日（十月初七日）　　上海《民吁日报》连续发表报道及评论揭露日本侵华阴谋，驻沪日领事照会上海道蔡乃煌提出抗议，是日该报被查封，主笔范鸿仙被传讯。

11月20日（十月初八日）　　清廷赏加协办大学士荣庆太子少保衔，大学士鹿传霖太子太保衔。

11月中旬　　孙中山函复同盟会会员张继，断然拒绝来函所提退隐深山，及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之两项要求。

△　四川大竹县会党联合农民数千人抗捐。

11月21日（十月初九日）　　保定、北京、天津各学堂学生胡荣铭（鄂公）、熊得山、钱铁如等在保定组织秘密团体“共和会”，以“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为宗旨，举胡荣铭、熊得山、钱铁如、覃秉清等九人为干事，胡荣铭为干事长。

11月23日（十月十一日）　　清廷命直隶总督端方即行革职，调

陈夔龙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瑞澂署湖广总督。

△　清廷以江苏巡抚瑞澂署湖广总督，调山西巡抚宝棻为江苏巡抚，以山西布政使丁宝铨为山西巡抚，实授孙宝琦为山东巡抚。

△　锡良奏称，延吉厅亟应设官建制，拟即将珲春之东南道移驻延吉，并筹拨银100万两编练陆军一镇，仍令吴禄贞督办边务，专管延、珲全境军政事宜。

11月24日（十月十二日）　外务部以英商开平煤矿与滦州矿务公司迭起争执，奏准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妥筹办法。

△　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报，江省改编巡防队，练足马队16营，步队7营。

11月25日（十月十三日）　孙中山自纽约复吴稚晖函，告以抵埠以来，美洲东方一带，革命形势渐有转机；并表示拟重新组织团体，以便在欧洲仿行。

△　清廷命各部院堂官、各直省督抚实心实力次第兴办立宪事宜，并着宪政编查馆随时稽核，如有错办迟逾或因循敷衍毫无实际者，如实参奏，按照溺职例惩处。

11月26日（十月十四日）　孙中山致比利时同盟会会员函，告以美各埠康梁保皇党“人心大为瓦解”，指示预防之办法，使康梁不回北京为患于革命党。

△　清廷从宪政编查馆奏，命各省督抚将各州县事实表册据实造报，严定等第。

△　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奏准于哈拉格囊围地方设厂开采金矿。

△　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因病解职，清廷以归化城副都统三多署库

伦办事大臣。

11月27日（十月十五日）　山西巡抚宝棻奏报，晋省陆军混成协业已成立，计步兵两标六营，马炮各一营，工辎各一队。

11月28日（十月十六日）　各省谘议局代表在沪会议结束，通过10项议案，举孙洪伊（领衔代表）等26人进京请愿速开国会，于二年内召集之，明年先开临时会一次。

△　云南按察使汤寿潜奏陈存亡大计。治标之策四：一、提早国会；二、急筹公债；三、联盟美国；四、锐意断发。治本之策四：一、注重典学；二、独断用人；三、通筹财政；四、议决币制。清廷命政务处议奏。

△　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任可澄为会长。任可澄在成立大会上宣称，该会是“以预备立宪为范围”的“政治团体”。

△　《神京白话报》因刊载清宫廷大事传闻被封禁。

11月29日（十月十七日）　大学士、资政院总裁孙家鼐在北京病逝。次日，清廷谕赠孙家鼐谥文正，晋赠太傅，赏银3000两治丧。

12月

12月1日（十月十九日）　四川总督赵尔巽电告外务部：川兵已到察台，藏兵甚多，必有梗阻，赵尔丰现已亲赴察台，督率筹划，设有阻遏，拟前进驱剿。

12月4日（十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复函吴稚晖，谈陶成章、章太炎之谣言攻击及其应付之办法。指出应蓄养革命党之势力，舍此无他法。

12月7日（十月二十五日）　达赖喇嘛派人至江孜托英商务委员

代发电致英、俄、日、法驻京公使，抗议清廷派大批军队入藏，要求撤退川军。

△　西藏公会电外务部，请辅助佛教，撤回联（豫）、赵（尔巽）及其入藏川兵，否则藏众必将反叛。

12月10日（十月二十八日）　奉天前统领冯麟阁部六七千人哗变。

△　商办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在宜昌举行开工典礼。

12月11日（十月二十九日）　四川总督赵尔巽电告外务部，藏人在察台外聚兵阻抗，如理谕不从，只得遵旨驱剿。

12月13日（十一月初一日）　孙中山致吴稚晖函，请其在巴黎《新世纪》杂志对章太炎发表于《日华新报》的论文再加评论，使人不为所惑。

△　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公使，指出俄国关于中俄所订铁路公议会大纲之传单，与公议会大纲宗旨不符；声明中国保守应有之主权并维持与通商各国之利益。

12月14日（十一月初二日）　南昌各学堂学生500余人于百花洲召开全省学界大会，声援省医学堂被无辜开除之学生及其他学堂罢课学生。高等、优师等学堂学生自16日起罢课响应。

△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陈达赖喇嘛决意拦阻川军入藏，请饬赵尔巽、赵尔丰速拨边军作为后援，并严防俄人私济军火。

△　邮传部奏准振兴船、路、电、邮四政，拟给奖牌，以资鼓励。

12月15日（十一月初三日）　江苏镇江外来饥民抢米。

12月16日（十一月初四日）　孙中山自纽约抵波士顿，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并筹款。

△　清廷颁诏拟定皇太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

△　章太炎攻击孙中山之《检举状》业已见诸报端，是日孙中山再函吴稚晖，请《新世纪》杂志全文转载，并加以公评。

12月18日（十一月初六日）　联豫、温宗尧电清廷称，达赖欲图自立，联豫事事欲挽主权，遂至积不相能。

12月19日（十一月初七日）　江北四五百人连日在江苏长洲县向街、白马涧、黄山等处抢米。

△　民政部奏陈《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凡90条，清廷命宪政编查馆复核具奏。

12月21日（十一月初九日）　达赖喇嘛抵拉萨。

△　美国代办费来齐照会外务部，提出满洲铁路中立计划。

12月23日（十一月十一日）　美人布思接容闳电报：孙逸仙到纽约，请与荷马李一同前来纽约或哈特福德会商。旋布思复函容闳，告以荷马李生病，请容闳偕孙西来洛杉矶晤聚。

△　锡良奏请允向英美贷借巨款修筑锦瑷铁路，以森林、煤矿及垦牧之余归还本息。

12月24日（十一月十二日）　孙中山自波士顿返抵纽约。

△　湖北铁路协会会长刘心源等赴京请愿废止粤汉铁路借款草约，在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私宅绝食达七昼夜。

△　汉口被火篷户灾民千余人捣毁英租界万顺行及其附近店铺。

12月25日（十一月十三日）　　孙中山在纽约设立“美东同盟会”（同盟会纽约分会），赵公璧等16人入会，公推周植生为会长。此系美洲的第一个中国同盟会分会。

△　孙中山自纽约函复同盟会会员王子匡，告以联络商、学界组织团体事。

12月26日（十一月十四日）　　湖南巡抚岑春蓂奏陈湘省绅士商民皆愿集款自办湘境粤汉铁路，经谘议局议决湘路限年赶修办法四条、筹款办法十条，请饬部设法取消借款。

12月28日（十一月十六日）　　上午，上海中国公学开会欢迎各省谘议局代表。下午，浙江旅沪学会与江苏教育总会招待16省请愿国会代表，决定30日赴京，设通讯总机关于上海，每年6月，各省谘议局选派代表赴沪商讨共同问题，以谋一致。

△　候补四品京堂劳乃宣奏请推行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所定官话字母。

12月29日（十一月十七日）　　清廷命陆军第六镇统制官赵国贤赴广东湖州镇总兵本任，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段祺瑞充陆军第六镇统制官。

12月31日（十一月十九日）　　中德在济南订立《山东收回德商五矿合同》。

是月　汪精卫偕黎仲实、喻培伦、陈璧君赴北京，设守真照相馆于琉璃厂为掩护，策划暗杀清廷首要。

△　楼景晖等在浙江杭县设立大有利官商合股商办电汽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100万元。

△　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创立，官商合办，实收资本两亿元。旋

于杭州、汉口设立分行。

是年　贾汪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直隶天津设立，经营开采烟煤制炼焦炭，资本200万元。

1910年（清宣统二年）

1月

1月1日（十一月二十日）　　清廷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陆润庠为大学士，法部尚书戴鸿慈为协办大学士。

1月2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护理云贵总督、云南布政使沈秉堃奏准滇省筹办锑矿，暂免出井税项，并免提官股红利各五年。

△　清廷命正黄旗汉军都统李殿林为吏部尚书，贝勒载润为正黄旗汉军都统。

1月3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致函吴稚晖，告以美洲人心大局渐有转机，昔日章（太炎）陶（成章）之流言，无甚大碍，请在《新世纪》“多发辟邪之言，以为助力也”。

△　清廷授世续为文华殿大学士，那桐为文渊阁大学士，鹿传霖为东阁大学士，陆润庠为体仁阁大学士。

1月4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致函王子匡，告以抵美洲两月，“人心日有转机，若有人时时鼓吹，将来必能成一大助力也”。

△　清廷从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责成三品京堂张翼、前署直隶臬司周学熙随同直督妥筹办理开平矿案。

1月6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浙江湖州府乌程、归安两县农民

数百人抗交漕粮，捣毁带头交漕之地主家，抢吃大户。11日，农民张贴传单，千余人欲进城焚仓毁署，府城戒严。

1月7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长纶丝厂百名工人齐赴会审公堂控告厂主任意扣罚工资，要求捕房释放无故被捕工人。

△　清廷根据川兵已由三十九族间道入藏，命边军遥为声援。

1月8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都察院奏准《各部院衙门官互选资政院议员详细规则》，凡23条。

△　奉天劝业道与中英美矿务公司订立《海龙府金矿合同》，资本银100万两，开采奉天省海龙府境内香炉碗、海仁社金矿两处。

1月9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浙江德清县东门外乡民抗完漕粮，聚众数千进城，要求重惩库书，免征荒田，减征熟田三四成。17日，西北各乡农民蜂拥入城抗漕，商店罢市。

1月10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自纽约致函芝加哥基督教牧师萧雨滋，告以一俟日间事妥，“当改道过贵埠与诸君子相会，详筹光复大计也”。

△　学部奏准筹办京师分科大学，计设经、法政、文、格致、农、工、商、医八科，其经科大学准令外国人入学。

1月12日（十二月初二日）　达赖喇嘛使者抵俄国京城圣彼得堡，谒见俄皇。

1月14日（十二月初四日）　清廷谕饬言官及上书诸人，倘敢怀挟私见及毛举细故，不知大体，必予惩处不贷。

1月15日（十二月初五日）　福建建宁府洋口、黑心地方黄肇祥等2000人暴动。

1月16日（十二月初六日）　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孙洪伊等至都察院呈递召开国会请愿书，要求清廷定一年以内即开国会。是为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

1月17日（十二月初七日）　浙江德清县西北乡抗漕农民200余人进城，捣毁店铺，商店罢市。

△　浙江桐乡县抗漕与江北饥民五六百人抢吃大户，次日增至3000余人。

1月18日（十二月初八日）　孙中山抵芝加哥，在欢迎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旋即成立同盟会芝加哥分会，入会者梅光培等12人，公推萧雨滋、梅乔林为会长。

△　清廷以沿江各省谣传外人占据东三省及俄、法、英进兵瓜分之说，谕饬各省督抚严禁谣言，如有发布传单、开会演说等事，应迅速解散。

1月19日（十二月初九日）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选举朱福铣为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

△　清廷从闽浙总督松寿奏请，谕饬浙省裁撤绿营，编练陆军为一镇。

△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陈签定收回德商勘办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五处矿产合同。

△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陈厘定直省官制要义四条：一、确定督抚权限；二、申明司道职守；三、加重知府责任；四、除州县回避之例。

△　美代办费莱齐照会外务部，要求速定锦瑷铁路借款合同。次日，东三省总督锡良与美国纽约摩根公司等四大银行在奉天签订《锦

瑷铁路借款草合同》，款额2000万美元。

1月21日（十二月十一日）　孙洪伊等谒军机处王大臣，请速开国会。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均表赞同，惟鹿传霖持异议。23日再谒世续，得其赞助。

△　俄、日两国答复美国，反对满洲铁路中立计划。至是，美国务卿诺克斯之提议，遂归于无效。

1月22日（十二月十二日）　西藏公会电请外务部，将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及其兵队撤回查办。

1月23日（十二月十三日）　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邀，自东京启程赴香港，策划广州起义。

1月24日（十二月十四日）　孙洪伊等通告各该省谘议局，已在京组织“速开国会同志会”，要求联合同志，上下呼应。

1月25日（十二月十五日）　黄兴过神户赴香港策划军事，因资金短绌，临行致书日人萱野长知托为筹款。

△　浙江桐乡县乡民数千人鸣锣抗纳漕粮，入城毁仓闹署，焚船夺械，遭驻防水师排队弹压，击毙乡民一人，伤二人。

△　会议政务处奏准将四川德格土司全境改土归流。

1月26日（十二月十六日）　苏州商人为抗议巡警局拆除沿街柜栏、逮捕店主，举行罢市。

1月27日（十二月十七日）　孙洪伊等谒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泽，均辞不见。又谒贝勒载涛、载朗，均表竭力相助。

△　外务部照复美代办费莱齐，锦瑷铁路借款合同应由东三省总督同美英公司妥商改订。

△　学部奏准《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凡20条。

1月28日（十二月十八日）　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团谒资政院总裁溥伦，溥伦以资政院与国会无异，不主急开国会；又言如果奉旨准开国会，我亦甚愿。

1月29日（十二月十九日）　黄兴抵香港。

1月30日（十二月二十日）　光复会员熊成基在哈尔滨，谋纠合同志，以图大举，事泄被捕。

△　清廷就孙洪伊等呈请速开国会一事，传谕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

△　宪政编查馆奏陈《禁烟条例》，清廷谕饬宣布京外，一体实行。

△　宪政编查馆奏准饬京外各衙门一律设立宪政筹备处。

1月31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公使伊集院就中美锦瑷铁路借款一事，照会外务部提出警告，要求审慎从事。

△　印度政府接到达赖喇嘛之乞援电，内称中国军队正向西藏进发，建议印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觉书，言明此种行动违反中英藏间一切条约精神及保持藏政府现状之协定；如果藏局长此混乱不安，印将不得不向亚东、江孜增加卫队。

是月　同盟会南方支部运动新军总主任倪映典由广州至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广州新军起义条件业已成熟，要求订于正月十五（2月24日）元宵节前后发难。旋南方支部电孙中山筹款两万元作起义经费，并电黄兴等来港主持。

2月

2月2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川同盟会员发动嘉定起义。税钟麟、秦炳、程德藩等数百人分路夺取嘉定童家场等处团练局枪弹，于新场正式起义。随即顺流东下，直趋嘉定。次日与清军在嘉定宋家村激战，旋因腹背受敌，起义军向屏山撤退，突围四散。是役，死难同盟会会员与会党200余人，佘英率残部退走叙州图再举，被捕遇害。

△　前考察各国财政大臣唐绍仪奏陈各国财政要政七端：公债、划一币制、定虚金本位、造币、修改税则、保护民间财产、国有营业。

△　俄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要求关于锦瑷铁路之事，非先与俄国商议，万勿从事。4日，再次出同样之照会。

2月4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黄兴以革命军人才缺乏，自香港致书日人宫崎寅藏，请速招步炮工佐尉官多名来援。

△　民政部六品警官黎宗岳等在京城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嗣即致书各省谘议局，希联合各地方自治宪政会等设立“国会期成分会”，举代表入京请愿。

2月5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谭人凤应黄兴电邀抵香港，参加广州新军起义。

△　外务部奏准以52000镑向英商赎回安徽铜官山矿地，而结束中英有关该矿权之纠纷。

△　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报，进藏川军已过察木多（昌都），由三十九族间道入藏，边军仍遥为声援。清廷命钟颖督饬所部妥慎前进，倘有番众抗阻，即设法开导解散。

2月6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孙洪伊等电各省绅商学团体，暂以京师代表团为“速开国会同志会”总部，即请各省赶设分会，举员到

京再上请愿书。

△ 福建平和县民众起义，攻破县城。

△ 安徽凤凰颈厘卡农民数百人抢米。19日又有千余人抢米船40艘。

△ 宪政编查馆奏陈《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凡八章105条及《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凡47条，清廷命民政部会同各督抚按照定章督饬各该地方官切实施行。

2月7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安徽巡抚朱家宝将光复会会员熊成基在长春就地正法。27日，熊成基就义。

△ 宪政编查馆奏报《法院编制法》，凡15章164条，及《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凡14条，《司法区域分划暂行章程》，凡10条，及《初级暨地方审判厅管辖案件暂行章程》，凡12条，清廷谕令颁布，并责成法部会同各督抚对其应设之各级审判厅切实筹设。

△ 学部奏准《增订各学堂管理通则》，凡13章144节。

△ 达赖代表抵京。21日晤英公使朱尔典求援。

2月8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浙江台州府仙居县朱溪乡民因盐商枉杀购盐农民，是日聚众暴动，捣毁盐号，官兵借机残杀乡民，至11日，乡民被杀达34人。

△ 上海云南路瑞顺丝厂缫丝工人百余人，抗议资本家克扣工资。

△ 俄公使廓索维慈致函外务部，中国在满洲欲借款造路，应先商之俄国。

2月9日（十二月三十日） 广州新军二标士兵与警察交哄，当

晚，倪映典急至香港报告，黄兴与胡汉民等商议，决定广州新军起义提前于正月初六日（2月15日）举行。

△　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拉萨布达拉宫会晤达赖，商讨川军入藏事宜。

△　据海关统计，宣统元年洋货进口，共计银4.1815亿两；中国土货出口，共计3.3819亿两。入超8000万两。

2月10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　孙中山自芝加哥抵旧金山，同旧金山同盟分会会长李是男、书记黄伯耀谈话，指示："扩大少年学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并称："你们想办法把这两件事办好，这就是我来金山大埠的宗旨。"

△　广州新军二标士兵数百人入城，殴打警察，捣毁警局数处。粤督袁树勋闻变下令弹压。当晚，倪映典赶回广州，决定起事。

△　达赖喇嘛向清廷报告安抵拉萨。

2月11日（正月初二日）　苏州新军二十三混成协四十六标扣压军饷引起哗变，毁日商三家，并波及附近商店。13日又有百余人打伤巡警。

△　达赖喇嘛约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于布达拉宫相见，商讨和平办法。达赖面允调回各处阻兵藏众等三事，温宗尧亦允不侵损达赖固有教权等四事。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　同盟会广州新军起义。是日，倪映典入新军兵营发动起义，被推为司令，率兵千余人攻省城，事败，倪映典殉难，起义士兵牺牲百余人。

△　川军马兵480名、步兵200名先行抵拉萨，全藏震动。午夜，

达赖偕各大臣由200名卫队护卫自拉萨出逃。

△　英、法、德三国公使照会外务部，表示中国商办湖广境内川汉、粤汉铁路有碍借款合同，本国政府不能承认。

2月13日（正月初四日）　河南巡抚吴重憙奏陈豫省办理巡警，裁撤巡警总局，改设警务公所，省城及淅川一厅、许州等五直隶州、淮宁等八首县并周口镇，均一律办齐，其余各州县仍严饬及时赶办。

2月14日（正月初五日）　日公使伊集院致外务部节略，提出建造锦瑷铁路条件：一、日本参加承办；二、南满路与锦瑷路建一支路，以相连贯。

2月15日（正月初六日）　清廷为广州新军起义事，命军谘处、陆军部、南北洋大臣，于所有新旧各军严密稽查，其逆行显著查有实据者，即严行惩办，并严禁聚众开会演说。

2月16日（正月初七日）　容闳致孙中山函，提出“红龙计划”及进行步骤：“（一）自银行贷借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活动基金；（二）成立临时政府，任用有力之人以管理占领之城市；（三）任用一有能力之人统率军队；（四）组训海军。”

△　孙中山改组少年学社为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加盟者16人，公推刘成禺、黄魂苏、李是男为会长。孙中山主盟，改誓词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中国同盟会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

△　孙中山致函纽约同盟会会员，告以同盟会广州新军举义，需款甚急，望各同志速向大众华侨筹捐，以救此急。同日并以同一内容函复纽约同盟会会员赵公璧。

2月17日（正月初八日）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陈沪商与英美商联合组织公司，开采奉天省海龙府境内金矿；并称为牵制日人，须招来

欧美人多投资本。清廷从之。

△ 锡良奏准裁撤吉林边务督办。

2月20日（正月十一日） 立宪派报纸《国风报》在上海创刊。系旬刊。编辑兼发行人何国桢，总撰稿人梁启超。至1911年7月停刊，共出52期。

△ 达赖行抵亚东，当即托英商务委员转告藏方，称本人决往印度就商英印政府，将向英政府请求“保护”。

2月21日（正月十二日） 清廷命驻藏大臣联豫等即迅跟踪寻觅达赖，派员迎护回藏。

2月22日（正月十三日） 孙中山致函赵公璧，表示拟久留美国，到各埠联络同志成大团体，以筹巨款。

△ 广西永淳县农民抗学捐，聚众入城拆毁学堂。

2月23日（正月十四日） 英外交大臣就川军入藏一事，训令驻京代办莫勒向外务部提出抗议，声言英国“须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其利益”。

2月24日（正月十五日） 孙中山抵旧金山即接荷马李来信，是日复信表示，一俟旧金山事务安顿妥后，即尽早前来与荷马李及布思晤聚。

△ 湖北沔阳州（今仙桃市）一带饥民数千人至汉阳求食，围闹县署。

2月25日（正月十六日） 清廷以达赖喇嘛出逃事，命革去达赖喇嘛名号，视与齐民无异，并着驻藏大臣联豫迅即另立新达赖。

△ 度支部奏准安徽试办公债票，款额银120万两。

△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陈于长春设立农产公司，收购粮豆，免受洋商预购之害。

2月26日（正月十七日）　清廷以达赖已革去名号，温宗尧开缺赴川，所有藏中一切善后事宜，即责成驻藏办事大臣联豫悉心经理。

2月27日（正月十八日）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要求召开国会，于北京增设事务所，会报迁至北京出版发行。

△　清廷命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协办大学士。

△　清廷派盛宣怀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　外务部以书面答复英公使，声明派兵入藏系维持治安，保护商埠，并监视藏人履行条约。达赖无端出走，应认自动放弃职责，中国政府决不因达赖个人之去留而变更西藏政局。

△　达赖行抵大吉岭，锡金政务官柏尔前往叩谒，达赖述及出亡原因及经过，声言本人特来印度求助英方以反抗中国。

2月28日（正月十九日）　孙中山在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论述革命必要性，着重解释“革命”二字意义，谓此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也”。

△　管理军谘处事务、贝勒载涛奏准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

△　俄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达赖，愿中国抚绥藏事，勿用强硬手段。

是月　光复会重建，在东京设总部，以章太炎、陶成章为正、副会长。

3月

3月1日（正月二十日）　孙中山自旧金山复函纽约同盟会会员赵公璧，重申拟在美久留，以联络同志，“借集大款，然后迟谋再举”。

△　孙中山自旧金山致函同盟会南洋支部负责人邓泽如，告以“美洲华侨前时多附和保皇，今大为醒悟，渐有倾向革命之势，不日当可联成各埠为一大团体，以赞助吾党之事业”。

3月2日（正月二十一日）　俄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仍反对锦瑷铁路计划，要求建造张（家口）恰（克图）铁路，其中库（伦）恰（克图）段应由俄商承建。

3月4日（正月二十三日）　给事中忠廉等53人奏：言论无所遵循，势将阻塞，流弊滋多，请明降谕旨。清廷诏命建言诸臣恪遵祖训，谨守台规。

3月5日（正月二十四日）　上海协和丝厂女工200余人聚会，控告该厂经理克扣工资。

3月6日（正月二十五日）　吉林珲春县商人罢市，反对设关征收出口税。

3月7日（正月二十六日）　法部奏派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徐谦前往美国参加万国刑律监狱改良会，并拟令分赴东西各国调查司法应行改革各事。

3月8日（正月二十七日）　江苏宜兴县张家村调查户口，勒索钱财，激起农民反对，图董住宅被毁，附近张渚、和桥等镇农民响应，捣毁学堂及图董绅士住宅数十处。

△　邮传部奏报派员勘明开（封）徐（州）海（州）清（江）路线，该路工款共需银140万两，自应及时筹划，拨款建筑。

3月9日（正月二十八日）　　外务部向驻京各公使宣布达赖喇嘛应废理由，声明所有藏中交涉事宜，中国政府照旧实行。

△　陆军部奏陈设立宪政筹备处，并陈分期筹备大概情形。

3月10日（正月二十九日）　　根据容闳之“红龙计划”，是日至14日，孙中山在洛杉矶的长堤与美国友人荷马李及布思举行会谈。“长堤会谈”的要旨：一、中国革命党暂行中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二、由中山先生以“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委任布思先生为“海外财务代办”，赋以全权，俾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三、运送在美训练的中国军官若干人，到中国国内充实革命武力；四、贷款总额共计350万美元。

△　清廷降旨通谕：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奏陈事件，一律称臣，勿称奴才。

3月11日（二月初一日）　　《天铎报》在上海创刊。汤寿潜发起，陈布雷为经理。1913年停刊。

△　清廷命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

△　驻韩总领官马廷亮与日本统监府外务部长、统监府参与官小松绿在汉城订立《仁川、釜山、元山清国租界章程》，凡14条。

△　清廷命嗣后武职各员引见，口奏履历，仿文职例，应称臣者称臣，不应称臣者称名，满员仍称阿哈。

△　清廷命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已代理达赖，其噶布伦以下各藏官均着照旧供职。

3月12日（二月初二日）　外务部电锡良，锦瑷铁路日俄两国要求甚多，其余各国意见尚未得实，合同应从缓议。

△　山西巡抚丁宝铨奏陈新军训练、军官任免、各省征兵办法，请饬下军谘处、陆军部酌订章程，通行遵守。清廷从之。

3月13日（二月初三日）　山西省交城、文水两县乡民聚众万余人，反对禁种烟苗。23日，省城派兵镇压，击毙四五十人，逮捕百余人。

△　民政部奏设立图志馆，续修一统新志。

3月14日（二月初四日）　达赖在加尔各答晤印度总督闵陀，要求英方击退中国之势力，恢复当年达赖五世之地位，非待一切问题获得解决，决不回藏。

3月15日（二月初五日）　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厘定币制，进呈单数本位币一等、银币四等、镍币二等、铜币五等及纸币两种清单。

3月16日（二月初六日）　江苏常州武进县渡桥乡农民反对征收学捐，捣毁学堂。

3月17日（二月初七日）　孙中山致函容闳，告以曾向布思提出贷款1000万美元之建议，交换条件是：如有一省光复，即委任美国财务管理人为中国海关税务人员，并给予几项工商业专利权。

△　清廷准陆军部尚书铁良以病解职，以陆军部左侍郎荫昌为陆军部尚书，未到任前，仍以左侍郎寿勋署理。次日，改荫昌为署任。

△　军机处电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切实整顿藏中内政，遵守条约，维持黄教。

3月18日（二月初八日）　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棠就孙中山在旧金

山倡言革命事电告外务部，经密商美外部将孙驱逐出境，美外部表示此事与美例不合，碍难照办。

3月19日（二月初九日）　黄兴致书日人宫崎寅藏，陈述广州新军起义失败经过，并称革命党势力已遍及于全军队，此次失败不过解散一部分，而其主力仍在。

△　清廷命驻藏大臣联豫，达赖喇嘛名位不可久虚，着传谕各呼图克图等认真访寻灵异幼子，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

3月20日（二月初十日）　管理军谘处事务贝勒载涛，离北京赴欧美各国考察陆军。

3月21日（二月十一日）　孙中山自洛杉矶抵旧金山。次日赴檀香山。

△　清廷以内阁侍读学士梁诚为出使德国大臣。

3月24日（二月十四日）　杭州城内日本商人欺侮中国学徒引起公愤，四五千人捣毁日人商店、药房等。

△　邮传部批准湖北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立案。

3月25日（二月十五日）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陈，外洋学子侨民日多，邪说流播，易滋煽动，请严密查禁。

3月27日（二月十七日）　清廷据传孙中山在日本储枪三万余支，派人运往缅甸，潜到云贵广西，是日诏命严密稽查防范。

3月28日（二月十八日）　孙中山抵檀香山。同日，孙中山致书黄兴，告知“长堤计划（即长堤会谈）”要旨，并就建立基地以训练革命党人和贮藏从海外输入之武器事，征求意见。

△　安徽南陵县禁米出境，商人罢市抗议，农民数千人捣毁商

会，大闹县署。

△　管理军谘处事务、贝勒载涛抵东京。

3月30日（二月二十日）　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准滇省筹办滇蜀、滇桂两条铁路，惟路款一项，应由邮传部借款，不宜由滇捐集。

3月31日（二月二十一日）　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中华商务总会代表陆乃翔抵沪。4月11日，上海报界开欢迎会，马相伯演说希望政府给予言论自由权，参预政治，保护国家利益。旋陆乃翔离沪赴京，请速开国会。

△　南京城内饥民抢米。

△　清廷命两江总督张人骏限本月二十五日（公历4月4日）以前将安徽铜官山矿案津贴银5.2万镑筹拨英人，并着外务部知照英使，迅速收回矿权。

△　清廷谕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今日治藏要图，重在整顿，不重在改革。

是月　孙中山以美国同盟会旧金山分会，作为全美总会，通称美洲同盟会总会，下辖纽约、芝加哥及加州各埠分会，举张蔼蕴重新起草章程。新章程依据美国宪法的精神，设立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建立三权分立体制。

4月

4月1日（二月二十二日）　清廷调学部尚书荣庆为礼部尚书，命吏部左侍郎唐景崇为学部尚书。

4月2日（二月二十三日）　同盟会会员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在北京甘水桥谋炸摄政王载沣，未遂。16日，汪、黄被捕。

△　外务部函复俄公使廓索维慈，俄方所拟试办松花江行船章程，实难允从。

4月3日（二月二十四日）　　孙中山在檀香山出席火奴鲁鲁荷梯厘街华人戏院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听众2000余人。当晚在自由新报社召集会议，将中华革命军改组为檀香山同盟分会，令一律改写盟书，补行同盟会入会手续。同盟会誓词为“废除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18个字，推梁海为会长，加盟者20余人。

△　上海勤昌丝厂数百名缫丝女工罢工，反对厂主延长工时。

△　国会同志会上海支部成立，举干事长一名，设庶务、书记两部。规定每月举行谈话会二次。

△　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请饬邮传部迅将滇蜀铁路收归国有，并先将滇桂铁路设法筹办。清廷命邮传部妥速详议具奏。

4月6日（二月二十七日）　　管理军谘处事务、贝勒载涛离日赴美考察陆军。

4月8日（二月二十九日）　　浙江武康县乡民反对警捐，聚众二三千人，拥入县城，殴伤知县。次日，又有3000人入城，捣毁县署大堂。

△　清廷据电奏喇嘛在西库伦木铺酗酒行凶滋事，聚众拒捕事，谕令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抚辑蒙众，循序整顿，毋稍操切。

4月9日（二月三十日）　　江苏吴县香山乡农民反对调查户口、摊派经费，聚众五六百人捣毁自治分局办事员住宅。

△　御史赵炳麟奏劾庆亲王奕劻十二大罪状，吁恳罢其政权，议其罪案，以协人心，而彰国法。

4月10日（三月初一日）　孙中山致函荷马李，通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原因及国内革命运动近况，并询问荷马李、布思在美活动有何进展。

△　浙江武康抽收警捐，发生暴动，毁县署，殴知县。

△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律师，请饬下法部订定律师专法颁行。

4月11日（三月初二日）　江苏镇江府太平厅农民千余人捣毁房屋，围困厅署。

△　英代办莫勒照会外务部，声明西藏内政如有变更，英政府不允妨碍廓尔喀（尼泊尔）、布丹（不丹）、哲孟雄（锡金）之国体。

4月13日（三月初四日）　湖南长沙爆发抢米风潮。长沙城内饥民万余人，聚集巡抚衙门，要求开释被捕者及减价粜米，巡抚岑春蓂下令开枪，击毙14人，伤40余人，激起众怒，打毁衙门，米店100余家抢劫殆尽。

△　河南密县绅民，抗议知县借筹备地方自治等“新政”加捐，聚众1700余人进城，拆毁县署，知县携印逃往省城。

4月14日（三月初五日）　湖南长沙全城罢市，饥民暴动，焚毁巡抚衙门，城内各教堂、学堂、洋货商店、洋行、领事署，均被捣毁或焚毁，官僚、绅商私宅亦遭抢劫。岑春蓂奏请撤职，以藩台庄赓良代理巡抚。

4月15日（三月初六日）　清廷命湖南巡抚岑春蓂弹压省城抢米饥民，并以该抚未能事先预防，着交部议处。

4月16日（三月初七日）　江苏东台县米价高涨，县城罢市，农民捣毁学堂及绅董住宅多处。

△　湖广总督瑞澂派鄂军2000名抵长沙弹压暴动饥民。

4月17日（三月初八日）　江苏清江浦（今淮安市淮阴区）饥民2000余人抢大丰面粉厂。次日，饥民又拦截海丰公司采买豆、杂粮船只。

△　清廷为长沙饥民暴动，命海军迅速派兵轮，刻日驰往长江一带，归两江总督张人骏暂行调遣。

△　清廷命湖南巡抚岑春蓂先行开缺，听候查办。湖南巡抚着杨文鼎暂行署理。

△　外务部电告出使美、俄、日等国大臣，长沙饥民暴动并非仇洋，各国官商教士均经保护无恙。

4月19日（三月初十日）　浙江慈溪县农民抗学堂捐，聚众捣毁学堂。

△　李经羲奏请拨借部款二三百万两开办滇矿，以实业救滇。

4月21日（三月十二日）　浙江长兴县官吏勒索柴、炭及船费，激起民愤，农民聚众捣毁厘局、巡船、警局、商会。

△　江苏阜宁县群众因反抗知县，捣毁县署，拘知县李绍卿，商人罢市。

△　清廷命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将已革达赖诱回内地于山西五台山寺庙安居，或诱回西藏择一寺庙令其静坐，一面设法保护。

4月22日（三月十三日）　宫崎寅藏偕儿玉右二受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之托，离东京赴香港约晤黄兴，调查中国革命党情况。

△　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饥民两万余人抢海丰面粉厂。

4月24日（三月十五日）　　江苏震泽县梅堰镇农民反对调查户口，聚集千余人殴打绅董，拆毁房屋。

△　江苏宿迁县农民抢粮。27日，万余人抢永丰面粉厂。

4月25日（三月十六日）　　江苏扬州城内各瓦木工匠要求增加工资，罢工三天。

△　江苏盐城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殴打调查员，毁绅董住所、劝学所、学堂、教育会、自治公所。

4月26日（三月十七日）　　清廷以沿江各省米价腾贵，人心浮动，命张人骏、瑞澂迅即会同商榷办法，详细电奏。

△　清廷命河南巡抚吴重憙到京另候简用，调宝棻为河南巡抚，程德全为江苏巡抚，未到任以前，以陆钟琦暂行护理。

△　锡良奏为时局艰危，密陈救亡图存三策：实行宪法，慎选亲贵出洋，实行地方分权。

△　李经羲电外务部称，英人借口片马事件，争夺野人山界址，请照会英使派员重勘。

4月27日（三月十八日）　　江西抚州府（今临川市）乡民要求禁运米粮出境，聚众万余人包围县署，抢劫米行13家。

4月28日（三月十九日）　　清廷命奉天巡抚缺着即裁撤，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兼管奉天巡抚事。

4月29日（三月二十日）　　清廷命将谋刺摄政王之汪精卫、黄复生交法部永远监禁，罗世勋监禁10年。

5月

5月1日（三月二十二日）　台北医学校学生翁俊明，经福建漳州赴台湾之同盟会员王兆培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台籍会员。

△　湖北广济县武穴饥民抢米。6日，广济垅坪地方饥民抢米。

5月4日（三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函复芝加哥同盟会会员梅培，勉励吾党同志“各竭其能力，从种种方面以助革命之进行”；并告以檀香山加盟者现已达800余人。

△　云南昭通府鲁甸厅、恩安县农民反对调查户口、编钉门牌、征收果捐，聚众数千人捣毁主持抽捐士绅住宅。

△　学部奏报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度），各省学校数3.7888万所，学生数102.4988万人。

5月5日（三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函复纽约同盟会会员，指出长沙抢米风潮，有利于吾党。并谓“起事之前未有所闻”。

5月7日（三月二十八日）　邮传部奏准《各省大小轮船公司注册给照章程》。

5月8日（三月二十九日）　浙江巡抚增韫奏陈浙省米价奇昂，请截留漕米两万石，接济平粜。

5月9日（四月初一日）　浙江德清县农民毁新市镇警局。

△　清廷降旨定本年八月二十日（公历9月23日）为资政院召集之期，九月初一日（公历10月3日）为第一次开院之期，并公布钦选宗室王公世爵、各部院衙门官及硕学通儒议员87人名单。

△　天津《北方报》创刊，因其广告内有“监督政府”字样，被直隶总督陈夔龙下令封闭。

5月12日（四月初四日）　布思致函孙中山，希望嘱部属加强组织，勿急于行动，以俟时机成熟；因每一次失败在美国报纸刊登，令人失望，影响借款计划。

△　宫崎寅藏偕儿玉右二抵香港，同黄兴谈中国革命形势问题，为时一周。是日离港返日。

△　御史萧丙炎奏称，各省厘金积弊太甚，请饬各省督抚严加整顿，并请饬下度支部会同税务大臣速定税章，将各省厘卡概行裁撤。

5月13日（四月初五日）　黄兴自香港致书孙中山，详述革命大计。提出由广东省城下手，联络各省军队与会党，待筹借巨款成功，先刺杀李准一人，然后发动军队，占领广州。

5月14日（四月初六日）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广东大学，先办法政分科，续办商工两分科。

5月15日（四月初七日）　清廷颁行《现行刑律》。

△　直隶总督陈夔龙以时局阽危，奏陈管见四端：一、镇抚民气；二、挽救士风；三、整顿军纪；四、规划财政。清廷命各部按照所陈，查核情形具奏。

△　清廷以山西文水、交城两县反抗禁种烟苗酿成重案，命将山西巡抚丁宝铨交部察议，在事文武官员分别革职撤差。

5月16日（四月初八日）　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鸡地戏院演说，并宣布成立檀香山同盟会希炉同盟分会，宣誓入会者385人。

△　京、津、保各学堂学生胡荣铭等33人在保定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共和会”，通过该会总章52条，举胡荣铭为干事长。

5月18日（四月初十日）　清廷以各省添设巡警、劝业两道缺，

皆属新政要图，命各督抚悉心考核该两道已补之人员。

5月19日（四月十一日）　清廷以沿江地方不靖，讹言繁兴，各国咸有戒心，伏莽时虞蠢动，命两江总督张人骏调两营弹压江宁劝业会场，如果不敷分配，仍着酌添水陆数营，随时严密梭巡，加意侦缉。

△　察哈尔都统溥良奏陈设立宪政筹备处。

△　清廷谕饬督办盐政大臣载泽会商各督抚，所有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仍照奏定章程办理。

5月20日（四月十二日）　同盟会通告各国驻京外交使团，将准备起事推翻清朝，请其保持中立。

△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陈在藏西、北、南、东及三十九族地方各设委员一员，管理刑名词讼，清查赋税数目，并责成委员切实筹办振兴学务工艺，招来商贾，经营屯垦，调查矿山盐场。

5月21日（四月十三日）　莱阳爆发抗捐抗税斗争。山东莱阳县知县朱槐之藉辞办理新政，苛征捐税，名目繁多，民不堪其苦，爆发抗捐抗税斗争，联庄会会长曲诗文率领五六千人包围县署，向贪官劣绅清算积谷，追回各项捐款。朱槐之逃匿，由劣绅代为答应乡民所提五项要求，乡民各自散去。

△　上海美纶丝厂女工百余人罢工，前往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厂主拖欠工资，要求迅速发还。

△　河南伊阳（今汝阳县）、西平两县有人劫狱释囚。次日，河南汜水县发生劫狱释囚事件。

5月22日（四月十四日）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等15个团体开会欢送第二次请愿国会代表赴京。次日，第二次国会请愿代表沈缦云等离

沪北上。

△　度支部奏请将各省所设银铜各厂分别撤留，所留汉口、广州、成都、云南四处之厂，专归天津总厂管理，东三省之奉厂基址，暂改设分厂一所，其余各厂，一律裁撤，以一事权。清廷从之。

△　奉天交涉司韩国钧与日商大仓喜八郎在奉天订立《本溪湖煤矿合同》。

△　锡良奏请饬拨款筹办葫芦岛不冻口岸。

5月24日（四月十六日）　孙中山致函荷马李谈在广州湾地区建立训练基地及同香港某商号订购军火事，并告拟于本月30日赴日本，为未来计划作准备。

△　清廷从度支部奏颁行厘定币制则例，规定国币单位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是为中国改革币制之一大关键。

5月25日（四月十七日）　孙中山致函纽约同盟分会会员，告以近接东方来信，知中国内地各情更急，遂决于本月30日赴日本与同志商办善后事宜。并谓“现时美洲各埠华侨渐有归心革命之趋势，望各同志务要乘机鼓舞，使革命思潮日进不已”。

△　清廷钦选纳税多额之孙以芾等10人为资政院议员。同日，资政院奏陈各省谘议局议员一律选定。民选议员定额100人，选定98人，新疆二人未选。钦选议员101人（内总裁、副总裁、秘书长各一人），定额100人，二人缓派。

5月26日（四月十八日）　清廷以邮传部左侍郎汪大燮充出使日本国大臣。

△　日本实业考察团近藤廉平一行13人来华访问，抵北京。

5月27日（四月十九日）　清廷命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杨文鼎照会奏所陈筹办湘省一切善后事宜，相机妥速办理。同日，又以湘省肇乱，分别革职议处办理不善之文武各官员，挟私酿乱之绅士王先谦、叶德辉等。

5月28日（四月二十日）　梁敦彦因病给假，清廷命外务部左侍郎邹嘉来署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

5月30日（四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乘“蒙古”船离檀香山赴日本。

△　清廷以广东新军滋事，该管官措置失当，饬将协统张哲培、一标统带刘雨芾拿解大理院治罪，两广总督袁树勋交部议处，其余分别革职议处。

6月

6月1日（四月二十四日）　湖南湘潭县花市乡民四五千人要求团总出粜，并抢地主米店多家。

△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准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土归流，设道府州县，设登科府、德化州、白玉州、石渠县、同普县，并于登科府设分巡兼兵备道一员，名曰边北道，统辖各府州县。

6月2日（四月二十五日）　浙江嵊县北乡剡坑庵檀越王姓族人聚众数百名屯聚城外，仇学滋事。次日众乡民直闯入县衙署，要求拨还学堂所占田亩，知县应允，乡民始散。

6月3日（四月二十六日）　清廷以湖南省城肇事，朝廷处分官绅，省谘议局请旨复查，系属逾越权限，借端干预，命传旨从严参撤

议长谭延闿。

6月5日（四月二十八日）　　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南洋劝业会被誉为“中国之万国博览会”，场内分设农业、医药、教育、工艺、武备、机械、美术、通运八馆，及各省陈列馆、各国参考馆，以及劝工场等。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会长。展期六个月。

6月6日（四月二十九日）　　山东海阳人民抗捐。山东海阳县知县借口新政，私行加赋，勒索杂捐，激起风潮，乡民聚众攻入县城，守城警兵枪杀乡民四人。

△　安徽和州（今和县）饥民千余人进城抢米，抢各富绅家，捣毁自治公所。

6月7日（五月初一日）　　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报，该省筹办仓谷，省城设常平仓，呼兰、绥化、海伦三府及肇州、大通、青岗、拜泉各厅设社仓。同日又奏报该省创办官报。

△　江苏丹阳县农民反对抽捐和调查户口，聚众打伤知县。

6月8日（五月初二日）　　锡良奏报，收回本溪湖煤矿，中日合办，订定合同，定股本200万元，各出其半。

6月10日（五月初四日）　　孙中山抵横滨，与黄兴和各省在日本之部分革命党人秘密会晤，提出本年冬季前暂缓举行全面起义，俟布思在美筹得巨款后再行发动。

△　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井陉煤矿抵押合同》。

6月11日（五月初五日）　　孙中山由横滨抵东京，与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等开始密商革命进行方略，谋在东京设立秘密机关，以为联络及统一各省团体行动使归趋一致，并函请檀岛同志筹捐经费。

6月12日（五月初六日）　山东莱阳县乡民因知县朱槐之未实践诺言，征收杂捐如故，聚众万余人冲进县城，包围县署，知县诿咎诸绅，乡民遂将乡董房屋焚毁。

△　清廷实授瑞澂为湖广总督，杨文鼎为湖南巡抚。

△　上海轮船招商局在张园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到500余人，选举盛宣怀为总理，并推派张志潜、李国杰为赴京代表，要求争回商办。

△　广东香山县僧道聚众反抗庙捐，捣毁自治公所及盐栈等多处。

6月16日（五月初十日）　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孙洪伊等80余人第二次向都察院递请愿书10份，请速开国会。是为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

△　山东莱阳知县朱槐之派代表与乡民代表曲诗文等在城郊九里河议和，是日达成官民和约，县令被迫出示接受乡民要求，乡民遂即解散。

6月20日（五月十四日）　湖北房县饥民打毁县署。

6月21日（五月十五日）　湖北沔阳饥民千余人抢劫富户，遭官兵弹压，饥民持土枪鸟枪抵抗，互有杀伤。

6月22日（五月十六日）　孙中山复函布思，告以抵日本与同盟会部分领导人会晤，已将布思建议转告各省，今年冬季前停止举事。

△　孙中山自东京致函纽约同盟会会员，指出“长沙排外事件，此纯属饥民举动，不是革命党所为”；并告可能离开日本。

△　度支部奏陈厘订兑换纸币则例19条，并规定限制官商行号发行纸票。

6月23日（五月十七日）　　广东罗定县劣绅调查户口，称系为“将来抽人税之张本”，是日，聚众数千人殴伤户口调查员。

6月25日（五月十九日）　孙中山离东京赴新加坡。

△　山东莱阳县新任知县奎保接印视事。次日下令照收旧有各项捐税，并出示缉拿联庄会会长曲诗文。

△　安徽和州民众以调查户口发生风潮，是日捣毁户口调查员住宅。

△　清廷命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于本月二十一日（6月27日）预备召见。

6月27日（五月二十一日）　清廷就都察院代递谘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呈请速开国会事，降旨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定期召集议院，并命孙洪伊等毋得再行渎请。

6月28日（五月二十二日）　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候补道杨耀琳率兵数营前往镇压莱阳农民暴动。莱阳联庄会闻讯立即广散揭帖，号召乡民揭竿而起。数日间，四乡响应者达四五万人。

6月30日（五月二十四日）　四川夔州府城内商人罢市，反对厘金。

6月下旬　应布思之请，孙中山自横滨寄去同盟会17省代表签名书（由黄兴等签署），确认孙中山之领袖地位，作为向美国财务人之保证。

7月

7月1日（五月二十五日）　　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开会，讨论第三次国会请愿办法，议定联合全国军学绅商各界结成一大

团体，支援第三次请愿。

△　日本将租借之旅顺口开为万国商场。

7月2日（五月二十六日）　山东莱阳知县奎保派兵协同候补道员杨耀琳赴乡拘曲诗文，乡民群起阻挠，与兵格斗，伤官兵数人，乡民死者23人，伤者倍之。

7月4日（五月二十八日）　山东莱阳人民愤官府食言、官兵杀伤乡民，聚众数万，围困县城。

△　日俄两国在彼得堡订立第二次与满洲有关之“协定”及“密约”，规定彼此承认各自势力范围内之权利，必要时得采取保护此种利益之措置。

7月6日（五月三十日）　农工商部奏准修订公司律，作为商法暂行章程。

△　两广总督袁树勋奏陈广东械斗，拟分别治标治本惩治办法。民政部以其严苛，与立宪精神不符，奏准更正办法。同日又奏报办理广东三点会等会党办法，清廷谕令自首免罪，以期解散胁从。

7月7日（六月初一日）　安徽宣城县饥民千余人抢米，巡防营开枪毙一人，伤二人。

△　锡良奏陈东三省铁路计划，以日俄近来邦交亲密，俄对我国西北野心叵测，请及早将东之锦瑷铁路、西之张恰铁路同时提前并举。

7月9日（六月初三日）　安徽巢县富绅盗卖仓谷，激起商人罢市。

7月上旬　广西南宁农民六万余人反抗新增苛捐。

7月11日（六月初五日）　孙中山自东京抵新加坡，随即函邀各地革命党人前来会商革命方针。

△　山东陆军第五镇第十协统领叶长胜、登州府镇总兵李安堂应地方绅民之请，出示限莱阳暴动民众于初七日一律解散，若至限不散，初八日准即进剿。

△　清廷派内城巡警总厅厅丞章宗祥赴德国充万国卫生博览会监督，并考察各国警政。

7月12日（六月初六日）　贵州古泥地方群众要求免征人头税，数千人毁学堂、自治公所及教民住宅。

△　河南开封各界连日开大会，反对邮传部借款修筑开（封）徐（州）及开（封）济（南）铁路。

7月13日（六月初七日）　清廷以山东莱阳乡民滋事，命山东巡抚仍饬派出营队，严拿首要，勿任再事滋扰蔓延。

△　出使俄国大臣萨荫图电外务部，告以日俄协约内容，并称两国协力经营满洲，有进无退，请从早筹划赎回路权，尤应切实整顿东三省内政，以期抵御外力。

△　李经羲奏请试办滇矿公债，清廷命度支部议奏。

7月14日（六月初八日）　孙中山致函南洋各埠同盟会会员，告以此次南来，“欲重新整顿团体，以求吾党势力之进步”。

△　山东陆军第五镇第十协统领叶长胜、登州府镇总兵李安堂所部官兵在莱阳城外与数万暴动民众激战，施放大炮，轰击柏林庄等13村，击毙乡民四五百人，伤者千余人，曲诗文率残部退走。次日，官兵又将附城村庄焚毁一空，余众遂散。

7月15日（六月初九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致函美国友人布思，说明今后行止，并询其近况。

△　出使英、日、比等国大臣电外务部，《日俄协约》英、法欢迎，美、德、奥反对。

7月16日（六月初十日）　外务部电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称，驻京法使密告孙文革命党由暹罗运械赴滇。

7月17日（六月十一日）　澳门葡兵连日攻剿过路环（距澳门四英里，本为中国地界）海盗，开炮轰击居民多人，房舍亦多被毁。

7月18日（六月十二日）　广东新安县妇女数千人包围县署，抗钉门牌。越二日，省城派营拿办，始行散去。

7月19日（六月十三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赴庇㶎，重整当地党务。重新议订分会总章，并依照美洲及檀香山同盟会之例，改良盟书，其誓词为：废除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　浙江余姚县乡民滋事，聚众千余人，殴辱县差，毁学堂。

△　汪大燮进考察英国宪政编辑各书。

7月20日（六月十四日）　孙中山自槟榔屿致函吴稚晖，请与欧洲同志密商营救汪精卫。

△　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奏准前往美、日两国考察海军。

7月21日（六月十五日）　外务部照会日、俄公使及其他各国公使，声明按照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及中日《北京条约》，应维持中国主权及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主义，开发东三省之工商实业。同日并电告出使各国大臣。

7月22日（六月十六日）　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大钱庄倒

闭，亏欠中外公私款项数百万，市面大震，清廷谕饬江苏江海关道维持上海市面。

7月23日（六月十七日）　河南长葛县因筹办巡警，增加亩捐，农民万余人捣毁县署。是日，省派兵弹压，众即解散。

△　山东巡抚孙宝琦以莱阳县民变，请旨开缺，听候查办；9月4日又奏请罢黜，另简贤员接替。清廷均谕令毋庸议。

△　英代办莫勒照会外务部，声称英国现正派兵驻于那塘保护驻藏英国官员，若达赖回藏以后，西藏发生变乱，则英驻那塘军队立即入藏保护英人。

7月24日（六月十八日）　孙中山致函新加坡同盟会会员黄甲元，请筹款3000元，与同志新军队官张伟吾共同整顿南洋《中兴日报》。

△　四川大足、铜梁等县造纸厂厂主罢市，反对征收纸捐。

△　清廷命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贝勒载洵充参预政务大臣。

7月26日（六月二十日）　清廷授邹嘉来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

7月27日（六月二十一日）　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借办理学堂、巡警、自治等新政，筹款加捐，激起民愤，是日四五千人焚毁自治局、中学堂，并向知县提出不再敛派钱文、不许再办学堂、巡警等八项条件。

7月31日（六月二十五日）　清廷以各省督抚劳于行政，亟于筹款，而疏于察吏，吏治不修，则劳民伤财，乱端且从此起，新政何由而行，传谕各督抚加意慎选州牧，以修明吏治，绥靖地方。

△　日公使伊集院报外务省：北京盛传黄兴及多数党员入北京，恐慌异常，各军机大臣私邸均派巡警警戒。

是月　贵州贵阳王有义聚众数万人企图起事，省城戒严。

8月

8月1日（六月二十六日）　清廷谕各部院堂官、各省督抚严治贪官污吏。谕曰："遇有贪官污吏，及办理新政，或承办要工人员，查有吞款入己等弊，务即罗列款目，据实奏参，一面追赃，一面按律从重治罪。"并谕饬自贵戚以下及内外各大臣，敦品励行，整躬率属。

△　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京汉赎路公债票售与敦菲色尔公司合同》，中国向英国伦敦敦菲色尔公司借款45万镑，收赎京汉铁路。

8月2日（六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派格兰回海南考察，以建立"他日响应两粤之地"，是日致函同盟会会员符树兰等，望为"一臂之助"。

8月3日（六月二十八日）　英、德、法公使与美公使分别照会外务部，促请批准宣统元年四月十九日（1909年6月6日）所订《湖广境内粤汉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8月4日（六月二十九日）　黑龙江省谘议局致函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表示将联合多数绅民鼓吹速开国会，以为第三次请愿之后盾。

△　上海道台蔡乃煌为维持上海市面，与外商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各银行签订《上海道台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

8月5日（七月初一日）　　邮传部奏陈江苏铁路公司私向外国借款，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迅速查禁。

△　驻京英署使向外务部要求，西藏内政改变，不得妨害尼泊尔、不丹、锡金。13日，外务部答复英署使，申明尼泊尔为我属邦。

8月6日（七月初二日）　　福建诏安县会党数千人起事，树“奉天命明朝军”大旗，省派新军三路会剿，毙会首一人，会众六人，官兵亦有伤亡。

8月8日（七月初四日）　　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俄署使世清在北京签订《中俄松花江行船章程》。

△　湖广总督瑞澂奏请湖南举办清乡，清廷命照所筹办法切实办理。

8月9日（七月初五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速开国会等议案。到直、浙、闽、川、鄂、奉、黑、苏、赣、桂、湘、鲁等省正副议长或谘议局代表多人，举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推选孙洪伊等九人为审查员。

△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奏陈疏浚淮河办法，请特派通晓河务人员会同地方官筹议实行。清廷命两江总督张人骏及程德全、朱家宝照所奏各节查明办理。

△　周树模奏报，黑龙江省编成宣统三年（1911）预算表册，计全省岁入银540万两，岁出银581万余两。

8月10日（七月初六日）　　新疆省城新军管带擅杀士兵，激成兵变，并与民众联合暴动，围攻衙署及其所属各局所，并焚毁百数十户商号，新疆巡抚联魁饬令卫兵开枪，击毙数十人。

8月11日（七月初七日）　　孙中山致函荷马李，告以原订延至今

冬的长江起义，将继续延期，直至募款计划成功为止。请其继续执行原订计划。

△　清廷谕令兴办矿业，着农工商部会同各省督抚调查详悉，熟筹办法，集股筹款；华股不足，亦可附入外股，惟须咨商外务、度支两部会同办理。

8月12日（七月初八日）　广西全州署牧周登岸借办新政敲诈勒索，是日乡民聚众万余人将清乡巡检曹骏置猪笼中，示威游行。16日，乡民数百人手持竹牌，上书“官逼民变，绅逼民死”字样，押送曹骏到省城，控告官吏扰民罪行。

8月13日（七月初九日）　清廷命各督抚查造官民荒田及气候土宜图册，并兴举工艺实业，报农工商部。

8月14日（七月初十日）　浙江天台县会党何元旺和嵊县会党竺绍康联合起事，攻击卡勇、防营。

8月15日（七月十一日）　国会请愿代表团开评议会，议决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如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即不承认新租税，各局亦同时解散。

△　邮传部之交通银行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北京签订《京汉赎路公债票与正金银行合同》，借款220万日元。

8月16日（七月十二日）　湖南浏阳县大仙洞一带饥民暴动。

△　管理军谘处事务、贝勒载涛奏准军人犯罪，统归军法会议处审断。

8月17日（七月十三日）　清廷命大学士世续开去军机大臣，专管内阁事务；授贝勒毓朗、协办大学士徐世昌为军机大臣。

△ 清廷命候补侍郎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未到任以前，以署邮传部右侍郎沈云沛暂署。

8月18日（七月十四日） 广东潮州大埔县乡民反抗调查户口，聚众千余人与官兵接战，官兵毙四名，乡民毙者甚多。

△ 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离京赴沪，21日由沪启程前往美、日考察海军。

△ 清廷开去军机大臣毓朗训练禁卫军大臣及步军统领差使。

△ 外务部奏准各省设立交涉使。

8月19日（七月十五日） 清廷从锡良奏准东三省实业订立借款合同，借外债银2000万两，以1000万两设立东三省银行，以500万两为移民开垦之需，以500万两为开矿筑路之用；至东省设立垦务局一节，俟借款议定，再行请旨办理。

△ 清廷命瑞澂到京陛见，湖广总督由王乃澂暂行护理。

8月20日（七月十六日） 美国旧金山同盟会员李是男等出版之《美洲少年周刊》改为《少年中国晨报》，推黄伯耀为总理，黄超五为总编辑。

△ 清廷据农工商部奏报，命该部通饬各省切实筹办农林工艺。

△ 湖南巡抚杨文鼎奏陈，湘省试办公债票，款额银120万两。

8月22日（七月十八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五次会议通过速开国会案，并通过拟定请开国会公呈人选。

△ 开缺江西提学使、浙路总理汤寿潜电军机处，斥责盛宣怀为浙路风潮罪魁祸首，要求将盛“调离路事，以谢天下”。次日，清廷以汤寿潜率意妄言，命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政。

△　日本驻韩国统监寺内正毅与韩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日韩合并条约》。

8月23日（七月十九日）　浙江长兴县农民反对查户口，发生暴动，打毁学堂、教堂，围困知县。

△　江苏丹徒县东乡上党地方农民聚众拆毁清荒局。

8月24日（七月二十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为避免南洋各殖民地政府之干涉，指示重新改订盟书，其前之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今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

△　清廷为山东莱阳、海阳两县民变事，将莱阳知县朱槐之、海阳知县方奎革职，并将登州府知府文淇开缺另补。并命山东巡抚孙宝琦严拿两县民变首犯曲诗文等人按律惩办。

△　清廷派金巩伯、李楠方赴美出席万国监狱协会，调查各国刑律。是日，金、李二人自沪乘“满洲号”轮放洋。

8月25日（七月二十一日）　清廷命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

△　清廷命新疆巡抚联魁到京另候简用，以甘肃布政使何彦昇为新疆巡抚。

8月28日（七月二十四日）　河南巡抚宝棻奏陈，当今新政，不外增税、加价、募集公债，恐利未见而害丛生，宜变通办理或从缓办理。

△　清廷命大学士陆润庠充禁烟大臣；派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充荷京万国禁烟大会全权会员。同日又命外务部参议上行走沈瑞麟为出使奥国大臣。

8月29日（七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致函檀香山同盟会会员，请

筹款维持香港支部及营救汪精卫。

△　广西思恩府都阳土司辖境内农民数万人起事，冲进土司衙门，杀死土官。

8月31日（七月二十七日）　各省谘议局第八次会议通过请速开国会，及国会未开前不得收商办铁路为官有案等14件议案。

△　锡良奏陈奉省葫芦岛筑港工程，宜与锦瑷铁路兼营，关系东省全局，请筹款开办。

9月

9月1日（七月二十八日）　考察海军大臣载洵等抵日本大阪，4日赴美。

9月2日（七月二十九日）　开缺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密陈西藏情形，主张趁美俄各有忌惮之时，急整西藏内政，恢复主权；不必遽改为行省，当以呼图克图分任藏事，永废达赖之制。至于练兵、兴学、开矿、垦荒、通商、殖民诸政，则当循序进行。

△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陈，川省财政困绌，请先练陆军一镇，其余一镇暂从缓办。清廷不允。

△　闽浙总督松寿奏报，闽省裁撤绿营，改编巡防队，本年先裁一次，共分三次，于宣统六年裁尽。

9月3日（七月三十日）　直隶遵化县杨渠源（杨六）聚众万人抗收警捐、学捐，包围县城三天。

△　江苏溧阳县代埠镇因军队开枪打死打伤民众数人，全镇商人罢市。

△　军谘处奏准嗣后一切军费，均应一律专归军用，不准挪作他用，关乎旧军各项事宜有应裁改整顿者，亦由军谘处、陆军部会商办法，不得任意裁并。

9月4日（八月初一日）　　孙中山自槟城致函布思，促其先寄五万美元，以便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9月5日（八月初二日）　　孙中山致函荷马李，请设法寄五万美元，为广州起义之军火费用，并相约“当我收到此五万美元时，即可启程，与你在英会合”。

△　“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6日议决该会章程，全国各地40家报馆入会。

△　安徽蒙城、凤台、涡阳、怀远、凤阳及宿州各县饥民万余人，由李大志、张学谦率领暴动，安徽巡抚朱家宝派兵前往镇压，击毙李大志，击伤饥民多人。

△　度支部奏准厘订国家税与地方税章程办法，于宣统四年同时颁布。

△　度支部、外务部奏准东三省借外债兴办实业。

△　度支部核议湖南试办公债票事，以该省兵荒之后，财政万分匮竭，应姑允所请。清廷准之。

△　陕甘总督长庚奏报甘肃设立高等巡警学堂。

9月7日（八月初四日）　　清廷以上海银根奇绌，谕准由沪道提放债票。

△　江宁将军清锐因病解职，清廷以前陆军部尚书铁良为江宁将军。

9月8日（八月初五日）　　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各督抚，谓近日大病在无人，大难在无主脑，改革不从简单入手，请于维新根本，各贡条陈。

9月10日（八月初七日）　浙路维持会在上海开成立会，到2000余人，举朱桂卿为会长。

△　锡良奏请借外债10万两兴筑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四条铁路。度支部议从缓办。

9月11日（八月初八日）　　清廷严饬两江总督张人骏、安徽巡抚朱家宝派出军队，赶紧扑灭皖北蒙城、凤台各县饥民暴动。

△　浙江铁路股东在上海开会，到1200余人，议决要求清廷收回浙路总理汤寿潜革职成命。13日，浙路诸股东到杭州面谒浙江巡抚增韫，要求代奏。16日，清廷以增韫代奏不合，传旨申饬，并严禁该省人民聚众纷扰。

9月12日（八月初九日）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陈，开平矿案经派洋员与英外交部交涉，将矿产收回，英索回公司股本178万镑，换给国家担保之赎回债票，期限为30年，矿产收回后，仍准英商附股，拟请饬外务部、度支部、农工商部分别预为妥筹接收办法，清廷令各该部妥议具奏。

9月14日（八月十一日）　清廷谕准邮传部派员查勘云南铁路。

△　两江总督张人骏奏请江苏省试办公债票，清廷命度支部议奏。

9月15日（八月十二日）　　山东省旅京各官绅联合京内著名鲁商号3000余家，公举代表至都察院公呈莱阳县民变调查报告，称曲诗文毫无劣迹，又官兵炮击村庄死伤四万余人，巡抚孙宝琦所奏，与官绅所见全出两歧，恳代奏请旨另派公正大员，再往彻底查办。

△　广东连州农民反抗调查户口、钉门牌，聚众焚毁学堂、酒甑公司、房捐公司。

△　清廷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充资政院副总裁。

△　美国西部实业团一行13人，由普慈率领，应邀来华参观南洋劝业会并进行考察。是日抵上海。在沪期间，实业团参观了求新机器厂、江南船坞、机器制造局及商务印书馆等。

△　驻京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分别照会外务部，请催邮传部与四国银行团直接开议粤汉、川汉铁路借款事。

9月17日（八月十四日）　外务部电饬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切实驳斥不丹归英人管理之论，以维主权。

△　清廷以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充出使英国大臣。

9月18日（八月十五日）　湖北新军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更名为“振武学社”，在武昌召开成立会，推杨王鹏为社长，通过章程。

△　美国陆军部长狄金生抵北京，21日入觐摄政王载沣。

9月19日（八月十六日）　理藩部为筹办蒙务，奏准变通蒙古旧例，将“禁止出边开垦”、“禁止民人聘娶蒙古妇女”及“禁止蒙古行用汉文”各条一并删除。

9月20日（八月十七日）　安徽芜湖万顷湖佃户抗租，数百人在湖内杨青渡夺取布政使余诚格“屡丰公司”所收稻谷，捣毁装稻谷船只。

9月21日（八月十八日）　清廷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充训练近畿各镇大臣。

△　清廷以柯劭忞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9月22日（八月十九日）　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拟援均势主义输入外资，除日俄两国外，欧美列强均可投资合办矿业，并拟借外债2000万两，专为兴办各项实业之用。

△　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各省督抚，主张先设内阁国会，再行借款筑路。

9月23日（八月二十日）　资政院召集第一次会议，到议员154人，由总裁、贝子溥伦、副总裁沈家本主持。

9月24日（八月二十一日）　美国实业团考察南洋劝业会。次日游明陵。26日考察各机坊、参观两江师范学堂及海军学堂。27日至10月24日，实业团先后到镇江、芜湖、九江、大冶、汉口、北京、天津、唐山、烟台、福州、厦门、广州等地考察。

9月25日（八月二十二日）　清廷据熊希龄奏陈朝鲜既并，满洲益危，非大变政策无以图存，密陈管见四条，着锡良照所陈各节逐一复陈。11月17日，锡良奏称熊希龄所陈四端，皆以满洲为开放主义，所见远大，请列入颁定之政策，依此实行。

9月26日（八月二十三日）　清廷令所有近畿陆军第一、二、三、四、五、六镇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裁撤近畿督练公所，第三、五两镇仍驻扎山东，第二、四两镇仍在直隶驻扎。

9月27日（八月二十四日）　清廷授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为大学士，以吏部尚书李殿林为协办大学士。

9月28日（八月二十五日）　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徐世昌、帮办津浦铁路大臣沈云沛与上海德华银行代表人柯士达及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代表人梅尔思在北京订立《津浦铁路续借款台同》，款额480万镑（实交300万镑）。

9月29日（八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复函荷马李，表示如布思筹

款计划未能成功，则我党财政代表之委任不得不予以撤销。

△　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举行特别会议，商讨第三次请愿召开国会办法，由孙洪伊提议，议决五项上书办法。

9月30日（八月二十七日）　外务部奏准续订矿章，计矿务正章14章、81款，附章九章、46条。

10月

10月1日（八月二十八日）　广（州）九（龙）铁路建成通车，全长182公里，香港英政府承修深圳至九龙段，计36公里。

10月2日（八月二十九日）　直隶张家口蒙民数百人捣毁盐局。

10月3日（九月初一日）　资政院开院，到议员154人，庆亲王奕劻宣读敕谕，摄政王载沣致训辞。同日，各省谘议局开第二届会议。

10月4日（九月初二日）　清廷以东三省筹借外款2000万两现由度支部与美使议借，谕令锡良毋庸议借。

△　邮传部奏准驿站不能遽裁，驿站事宜仍请暂归该部管理。

10月5日（九月初三日）　李经羲、瑞澂以“旧政轮廓难存，新政支离日甚”，主张先设内阁以立首脑，开国会以定人心，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

△　天津召开国会请愿大会，到2000余人。大会举定入京请愿代表，旋列队前往督署面见直隶总督陈夔龙，陈允向朝廷代奏国会请愿书。

10月6日（九月初四日）　四川定乡左营三哨士兵500余人哗

变，窜至云南丽江府中甸，联合喇嘛，是日攻破城垣，同知姚宗奎被掳。7日，清廷命云贵总督李经羲严饬防营迅速堵剿，毋任四窜。

10月7日（九月初五日）　孙洪伊等会同直隶代表共23人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民政部尚书善耆接见并允代转请愿书。是为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10月8日（九月初六日）　孙洪伊等再赴资政院呈递请愿书，请于明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

△　清廷据资政院奏报，广西谘议局以该省禁烟展限，全体议员辞职，谕令广西巡抚张鸣岐仍照上年公布办法妥速办理，并饬令谘议局迅速召集，照章议事。

△　上海源丰润银号倒闭，全市震动，共亏公私款项2000余万两。

△　满洲里开始流行鼠疫，11月7日蔓延至哈尔滨。次年1月2日传入奉天，16日传入吉林。据统计，是年冬至1911年春，四个月内，奉天疫毙7137人，吉林21880人，黑龙江13739人，共计疫毙42756人。

△　清廷拨库银10万两赈苏北徐州府水灾。

10月9日（九月初七日）　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业领袖开临时特别会议，旋电军机处等，略谓："沪市日来庄汇不通，竟如罢市，上海工厂数十家，工人二三十万人，一经停工，于商业治安，均有关系，事机危迫，应请代奏，请敕下大清、交通两银行，迅速筹款500万两，交由商会散放，以挽危局。"

10月10日（九月初八日）　清廷命度支部尚书载泽、邮传部左侍郎盛宣怀为查办开平矿案事务大臣，确切查复，据实具奏。

10月11日（九月初九日）　同盟会员于右任在上海筹办之《民立报》创刊，主笔为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叶楚伧、邵力子等人。该报以“唤起国民责任心”为宗旨。

△　浙江黄岩县数百人暴动，抢富户。同日，广西全州农民2000余人焚劣绅26家庐舍。

△　翰林院编修王会釐奏请精练陆军，兼兴海军，并制造飞行艇机，以图自强。

10月12日（九月初十日）　蒙古实业公司在北京开幕，由科尔沁亲王发起创办。

10月13日（九月十一日）　清廷以上海汇号倒闭，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设法维持上海市面。

10月14日（九月十二日）　清廷据两江总督张人骏奏称沪市面危急，议借洋款酌济，并就近拨运库银50万两分发济急，命即照所请迅速办理。

10月16日（九月十四日）　孙中山致函檀香山同盟会会员告以与各地商议，已决策定计，不久再举。提出举事预备之费需10万元，务望即日举行开捐，凡我汉人，皆当助成此事。

△　河南开封各界绅民3000余人举行国会请愿大会，会后游行至抚院，巡抚宝棻接见代表，允代奏请愿书。

△　锡良以日俄订立协约告成，吞噬东三省之心日炽，东省兵力仅二镇两协，不足以言战守，奏陈亟宜练兵造械，倾全国之力以保东三省。

10月17日（九月十五日）　英代使莫勒照会外务部，抗议中国对不丹直接行文，提出嗣后中国政府对不丹政府文牍，须经英国转

送。

10月18日（九月十六日）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参加运动员150名，分田径、足球、篮球、网球等比赛项目，至22日闭幕。

10月19日（九月十七日）　直隶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

10月中旬　广西泗城一带“哥老会”有号称“明永历王”后裔者，聚众6000人起事。

10月21日（九月十九日）　清廷从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奏请，命各省将军、督抚认真查禁鸦片，切实整顿禁烟事宜。

10月22日（九月二十日）　资政院开会讨论速开国会案，根据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孙洪伊等之要求，议决起草专折请速开国会。

△　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分别照会外务部，请按照宣统元年四月十九日（1909年6月6日）张之洞原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办理。

10月23日（九月二十一日）　考察海军大臣载洵自美国抵东京。

10月25日（九月二十三日）　锡良与湖广、两广、云贵、吉、黑、苏、皖、鲁、晋、豫、新、赣、湘、桂、黔各督抚及伊犁将军、察哈尔都统共18人联电军机处，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

△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陈，时事艰难，宜先组织内阁为行政枢纽。

10月27日（九月二十五日）　　陕西巡抚恩寿奏请先立责任内阁，再定召集国会日期。

△　度支部与美国财团订立借款草合同，借款5000万美元，为清政府支用。

10月28日（九月二十六日）　　清廷以顺直各省谘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锡良等电奏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开设议院，是日命将折电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预备召见。

△　资政院总裁溥伦将资政院请速开国会奏稿连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提案、孙洪伊等请愿书、汤觉顿代表海外华侨上请愿书三个附件，一并上奏朝廷。

△　清廷以杨枢因病解职，命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充出使比国大臣。

△　外务部就英代使莫勒17日抗议中国对不丹直接行文之照会事，照复声明不丹、尼泊尔为中国属邦。

10月29日（九月二十七日）　　四川成都国会请愿同志会召集开会，到3000人，通过请愿书，旋列队游行至督署，请总督赵尔巽代奏。

△　清廷以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因病解职，命张鸣岐署两广总督，未到任以前，由广州将军增祺暂行兼署。沈秉堃补授广西巡抚。

10月30日（九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九府二州各界代表三四千人在省城开会，要求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会后游行请愿，总督松寿允代奏请愿书。

△　河南巡抚宝棻奏请提前颁布钦定宪法，清廷谕令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阅看。

是月　孙中山函邓泽如，表示决意不再外求他人，而欲尽吾党之力，以图再举。现在时机之好，10万之数便可预备一发，此款冬间当要需用，请与各同志预为设法。并告以将于一二月内亲往小吕宋“以集此资”。

11月

11月1日（九月三十日）　锡良领衔再次联合各省督抚电军机处，辨明不可先立内阁后开国会，重申内阁国会同时并立。

11月2日（十月初一日）　顺直谘议局议决开平矿产亟宜完全收回以保本省利权案，呈请直隶总督陈夔龙公布施行。

11月3日（十月初二日）　浙江遂昌县农民千余人暴动，捣毁学堂、监狱及巡警总局。

△　摄政王载沣召见军机、会议政务处王大臣等，垂询讨论速开国会与组织内阁问题。

△　考察海军大臣载洵离日本回国。

11月4日（十月初三日）　清廷谕令缩期召开国会，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在国会未开前先将官制厘定，预行组织内阁。同日并谕令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喻请愿召开国会之各省代表，即日散归，各安职业。

11月5日（十月初四日）　清廷派资政院总裁溥伦、度支部尚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

11月6日（十月初五日）　清廷开释汪精卫、黄复生。

11月7日（十月初六日）　清廷据山东巡抚孙宝琦奏复莱阳、海阳肇乱情形，谕令各官绅分别革职，孙宝琦免议。

△　江苏、浙江两省谘议局分电资政院，祝贺国会缩期召开。

11月8日（十月初七日）　孙中山复函布思，告以如在今后三个月内不能筹募所需款数，我们将不再等待，而将自行采取措施。

△　资政院奏报，湘省发行公债，巡抚杨文鼎未交谘议局议决，有违定章，请旨裁夺。清廷以该抚系属疏漏，惟以此件既经度支部议，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

11月9日（十月初八日）　广东省谘议局开议，禁赌案被否决，发生风潮，议长易学清、副议长邱逢甲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

11月10日（十月初九日）　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关于中国铁路借款协定在伦敦成立。

11月上旬　云南全省学堂罢课，抗议清政府出卖本省矿产。

11月12日（十月十一日）　清廷谕饬各部将宣统五年召集议员以前必须完备各事宜，分别最要次要，奏明请旨办理。又谕令各省督抚，凡开设议院以前应行提前赶办事项，速即切实进行。

11月13日（十月十二日）　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出席，决定筹款谋在广州起事。并决定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另择革命党500名充当先锋，占据广州后，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　清廷命前山东巡抚袁大化补授为新疆巡抚。

△　资政院议员及北京绅学各界60余人，为缩短禁烟年限及争废中英鸦片条约，是日开会成立“中国国民禁烟总会”。

11月17日（十月十六日）　　江苏巡抚程德全奏请于开设议院前，应即速钦派总理，预设内阁，修改筹备清单。

△　闽浙总督松寿奏准将各种彩票一律禁止。

11月20日（十月十九日）　　孙中山致函坝罗同盟会分会负责人李源水，谈筹款以谋举事。

△　资政院为云南盐斤加价，滇省谘议局与总督异议，及广西筹办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桂省谘议局与巡抚异议两案，具奏请旨裁夺。清廷分别谕饬督办盐政大臣及民政部察核具奏。

11月中旬　　孙中山召集槟榔屿同盟会会员开会，作募捐动员。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即席认捐8000元。旋各同志往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

11月25日（十月二十四日）　　河南叶县筹办自治等新政，绅士下乡筹款，增收酒税等杂捐，农民一二万人进城示威，要求取消自治。河南巡抚得禀后，即日派兵前往弹压。

△　资政院因政府将云南盐斤加价及广西学堂是否限制外籍学生两案交盐政大臣及民政部察核，全院议员大为愤怒，指为蹂躏院章，违法侵权，显系军机大臣“辅弼无状”所致。是日开会讨论弹劾军机大臣，议决举定起草员上折弹劾。

△　李经羲电外务部称，顷据腾越税司密称，缅已派兵500名往北界巡驻，请照商英使电咨缅政府仍守小江北流为界。

11月26日（十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致函坝罗同盟会分会负责人李源水、郑螺生，告以日间即须动身亲往欧美，已电召胡汉民到坝罗协办一切。

△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李梦生，指出大举时机既近，吾人决为

破釜沉舟之计，望加紧筹款。

11月27日（十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致函日人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告以“弟今重作欧美之行，以十二月六日发途，数月内当可东还，应期举事”。希望在日作援臂一助。

△　云南大姚县乡民反抗拔除烟苗，聚众数千人，在陈大可与会党首领邓良臣率领下攻入县城，毁警局，杀绅士，知县潜逃，旋与官兵接战。越三日，官兵破城，乡民始散。

11月28日（十月二十七日）　民政部以“彩票一项，名为筹款，迹近赌博”，奏准禁止各省彩票行销京师，“以挽颓风而维国体”。

11月29日（十月二十八日）　河南叶县、裕州（方城）聚二万之众反抗加税。河南巡抚宝棻得报后，派陆军开拔一营，前往弹压。

11月下旬　云南华坪县（今迪庆藏族自治州属）知县袒护教民，农民数千人围困县城。

是月　孙中山为贯彻槟城策订之起义计划，函美洲致公堂同志，请筹捐经费10万元。要求美洲各埠同志，各尽义务，惟力是视。

△　中美两国商团在上海开会。中国商团议长张振勋与美国商团议长穆尔商定筹办中美银行、中美轮船公司，并由两国商会互设物品陈列所，互派商务员调查商务。

12月

12月2日（十一月初一日）　奉天省城学生到谘议局面见副议长袁金铠、张百科，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代表进京。

12月3日（十一月初二日）　庆亲王奕劻在北京什刹海遇刺，未中。

12月4日（十一月初三日）　是日及6日，奉天全省各界绅民一万余人，手执请开国会旗帜，聚集公署之前，由谘议局长吴景濂面递公呈，请求锡良代奏明年八九月召集国会，以救危亡。

△　清廷裁撤陆军部尚书，改设陆军大臣；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大臣，以尚书荫昌、贝勒载洵分任陆、海军大臣。

△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陈建筑胶沂铁路，拟借公债800万两。清廷谕由该抚向大清德华银行商明办理。

12月6日（十一月初五日）　孙中山自槟榔屿启程赴欧美筹款。

△　清廷以开设议院既已提前，所有筹备立宪事宜，自应将原定年限分别缩短，切实进行，着宪政编查馆妥速修正，奏明请旨办理。

△　江苏巡抚程德全以上月十六日（11月17日）电奏未奉明谕，是日再请速简总理，组织内阁。

12月7日（十一月初六日）　李经羲奏报，大姚县起义事经派令巡防各队赴援，击毙会众百余人，生擒数十人，县城收复。

12月9日（十一月初八日）　闽浙总督松寿奏陈，闽省财政奇窘，恳饬部酌拨银100万两以应急需。

12月10日（十一月初九日）　孙中山抵科伦坡。同日致函邓泽如，告以此行有特别之外交问题，须往英京，顺此赶赴美向华侨筹款。

12月11日（十一月初十日）　奉天省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进京，各界群众集会送行，多人写血书鼓励代表。学生组织下乡进行国会请愿之宣传。

△　锡良奏陈奉天绅民因时局迫不及待，要求明年即开国会。清

廷不允。

12月14日（十一月十三日）　清廷据宪政编查馆派员考察东三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筹备宪政情形，谕令分别奖惩各省筹备宪政之主管人员。

12月15日（十一月十四日）　军机处代呈陆军大臣、副大臣荫昌、寿勋说帖，内称资政院开院以来，所议殊多逾越，若不及时预为限制，将来国会成立，必至与政府冲突无已，因以酿乱召亡。

12月16日（十一月十五日）　孙中山复函布思，告以现正采取独立措施，于数月内大举，望其解囊相助。

12月18日（十一月十七日）　资政院奏劾军机大臣奉职无状，不负责任，有参预之名，无辅弼行政之实，持禄保位，背公营私，蹈常袭故，请迅即组织内阁，并于内阁未成立以前，明旨宣示军机大臣必应担负之责任。清廷以黜陟百司为朝廷大权，非该院所得擅预，命所请毋庸议。

△　资政院奏准遵章议决《著作权律》，凡五章55条。

12月19日（十一月十八日）　资政院就弹劾军机大臣奉旨不准事进行讨论，议决第二次弹劾，遂指定六人起草，从速具奏。

△　陕甘总督长庚奏报，甘肃铁路由归化至兰州2000余里，需银二千数百万两，请暂借洋款修筑。另又奏请借洋款接筑归化至新疆铁路，期以10年告成。

12月20日（十一月十九日）　天津学界联合谘议局、商会、县董会，聚集3000余人开大会，决请直督陈夔龙再次代奏请愿书。陈被迫应允。

12月21日（十一月二十日）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陈，顺直谘议局议长呈请定明年即开国会。清廷不准。

△　农工商部奏报，京外宣传剪发易服，清廷谕令应恪遵定制，不得轻听浮言。

12月22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天津学生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陈夔龙派总兵张怀芝率队以武力驱散学生。

12月23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已出示晓喻，不准聚众集议，“请愿同志会”亦饬解散。清廷命严饬各员对请愿运动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查拿严办。

△　清廷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官。

12月24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要求速开国会代表迅速送回原籍，并命京外各官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当查拿严办。

12月25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清廷令宪政编查馆迅速拟订筹备立宪清单，并将内阁官制一并详慎纂拟具奏。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庆亲王奕劻奏请开去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事务要差，清廷命毋再固辞。

12月27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广西思恩、宜山等县农民起义，次日攻入安化厅治，焚同知衙署。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抵巴黎。

12月29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四川全省学界罢课，要求速开国会。

12月30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资政院以议事未竣，奏请延会

10日。清廷准如所请。

△　资政院奏请明谕剪发易服，清廷命应即毋庸议。

是年　　孙中山致函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告以数月间大军即可发起，为兹预函告我同志，俟一得义师发起之电，即宜速力运动筹划，无复迟疑。要求该埠同志举出妥员数人，专任运动筹款之事。

△　孙中山致函暹罗同盟会会员，告以将赴美洲、南洋筹款之事专托胡汉民，深望鼎力相助。

△　春，孙中山同旧金山致公堂《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谈五权之原则。指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为世界国家所有；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他日五权风靡世界，当改进而奉行之，亦孟德斯鸠不可改易之三权宪法也。"

△　春，梁启超自日本上书即将赴日本及欧美考察陆军事宜之管理军谘处事务、贝勒载涛，历陈立宪应如何进行之策。指出："窃以为中国危急存亡之机，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

△　学部奏准禁止东西洋游学生与外国人结婚。

△　南京汇文、宏育（光绪三十三年由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两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

△　青海办事大臣创设青海蒙番学校，专收蒙番族子弟入学，为青海学校成立之始。

△　黑龙江开办政法学堂。

1911年（清宣统三年）

1月

1月1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江苏苏州马车夫抗捐，一律罢工。

1月2日（十二月初二日）　　清廷以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各学堂罢课、散发传单，要求速开国会，谕令严禁学生干政。着各省督抚随时弹压，并严饬提学使等，随时开导查禁，防范未然。

△　邮传部奏准于宣统三年正月初一日（1911年1月30日），各省官办电报一律由部接收。

1月3日（十二月初三日）　孙中山自巴黎赴比利时。

△　英兵2000人，由缅甸密支那出发，越野人山，进占云南片马。

1月5日（十二月初五日）　　江苏宜兴县数千人示威，抗议巡警打死农民之暴行。

1月6日（十二月初六日）　　清廷命署邮传部尚书唐绍仪开缺，补授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

1月7日（十二月初七日）　　四川同盟会会员温朝钟率七八千人，号称国民军，在黔江起义，攻克县城，捣毁监狱局所。

△　上海租界商人罢市要求减轻房租。

1月9日（十二月初九日）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陈，天津请愿国会同志会会长、天津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通电各省同时罢课，意图煽惑，请严行惩儆。清廷令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1月上旬　　直隶保定各学堂罢课，预备第四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1月11日（十二月十一日）　　清廷以资政院会期延长10日，现已届满，谕令是日闭会。

△　资政院奏，议决修筑蒙古铁路三条：一、张（家口）恰（克图）铁路；二、张（家口）锦（州）铁路；三、库（伦）伊（犁）铁路。请饬邮传部先将张恰、张锦二路从速筹办，一面测量库伊路线，俟明年开院，再交会议。

1月12日（十二月十二日）　　四川、湖北宜昌间民众拆毁川汉铁路局，焚教堂。

△　清廷命四川总督赵尔巽来京陛见，以布政使王人文暂行护理四川总督。

△　浙江巡抚增韫奏报创办高等医学堂。

1月13日（十二月十三日）　　清廷就四川黔江县温朝钟起事一案，命四川总督赵尔巽迅拨就近营队，并电催鄂、湘、黔各督抚派队合力兜剿，迅即扑灭。

△　清廷派锡良、陈夔龙、张人骏、瑞澂参订外省官制。16日，添派李经羲参订外省官制。

△　清廷以东三省鼠疫流行，命在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毋任传

染内地。

1月14日（十一月十四日）　孙中山委钟华雄为同盟会深水砏主盟人。

1月15日（十二月十五日）　外务部奏，熊希龄所陈四端，东三省实行开放以不损主权，邻近之邦与欧美各国能达均势为紧要关键。

1月16日（二十月十六日）　民政部奏报第二次调查全国人户总数清单。

1月17日（十二月十七日）　宪政编查馆奏陈修正逐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清廷允之。

△　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增祺奏准香洲自辟商埠，定为无税口岸。

1月18日（十二月十八日）　黄兴抵香港，月底与赵声等人成立统筹部，策划广州起义，黄、赵被举为正、副部长。

△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陈官军光复黔江县治。清廷命严饬各军认真搜捕革命党。

△　驻京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声明尼泊尔为自治之国，不丹与英有特殊关系。

1月19日（十二月十九日）　孙中山自欧洲抵纽约，开始了他对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次访程。孙中山此行的任务是为黄兴等人再次发动广州起义而紧急筹款。

△　考察日本国宪政大臣李家驹奏陈所纂《日本租税制度考》10册、《日本会计制度考》四册。

1月20日（十二月二十日）　浙江石门县西南乡地主向佃户增加

租额，农民数千人进城请愿，要求减租。

1月21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自纽约函在巴黎之张继，嘱其吸收欧洲学界加入同盟会，谓："此为革命党增长势力之第一法门。"

△　资政院奏整理边事办法10条，请饬会议政务处会同军谘处筹办。

△　清廷以东三省鼠疫盛行关内，命外务、民政、邮传各部随时会商，切实稽查。天津一带，如有传染，即将京津火车一律停开。

1月22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抗议英人踢死人力车夫吴一狗暴行，驻汉英领法磊斯调泊长江英舰水兵上岸武装镇压，当场开枪击毙7人，伤14人，酿成流血惨案。

△　清廷以英兵占云南片马，命李经羲密饬地方文武，妥慎防维，并着外务部磋商办理。

△　农工商部奏准本年筹备立宪应办事宜三项：拟订奖励棉业章程14条，化分矿质局章程11条，工会章程25条，由该部通行各省办理。

1月23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自纽约赴旧金山。

△　武汉各界数万人集会，抗议英兵枪杀中国人力车夫的暴行。

1月24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报，温朝钟在破水坪生擒正法，清廷命护理川督王人文会同瑞澂弹压搜捕，以清黔江起事余党。

1月25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廷命瑞澂对于汉口人力车夫事件，加意防范弹压。

△　清廷颁布新刑律暨暂行章程，并命修订法律大臣按照新刑律迅即编辑判决例及施行细则，以为将来实行之预备。

△　李经羲以英占片马，奏请督军备战，并拟亲督三军，驻永腾，誓以身殉。

1月26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学部奏报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度），学校数4.7995万所，学生数130.0739万人；并奏准改订筹办教育事宜，改订中学文实两科课程及劝学所章程。

1月27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军机处电李经羲，滇缅界事件外务部已照诘英使，并电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先商退兵，希遵旨妥慎规划，计出万全。

1月28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呼兰县城贫民3000余人抢劫富户，袭击知府衙门。

△　清廷颁布宣统三年（1911年）总预算案：岁入3.01910296亿两，岁出2.98448365亿两。

△　法部尚书廷杰病逝，清廷以绍昌为法部尚书。

1月29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清廷颁布《报律》，凡42条。

1月30日（宣统三年正月初一日）　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黄鹤楼成立，举蒋翊武为社长，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尧澂。该社由振武学社改组而成，有新旧社员800余人。

1月31日（正月初二日）　孙中山由纽约抵旧金山。晤黄三德等，筹款得2000元。23日赴加拿大。

△　广西南宁府新军数营约同起事，事泄失败。

2月

2月3日（正月初五日）　孙中山自旧金山致函日人宫崎寅藏，为便利革命运动，表示愿到日本居留。请设法向陆军大臣处运动。

2月4日（正月初六日）　孙中山自旧金山赴加拿大温哥华。此行系应温哥华《大汉日报》主笔冯自由之邀。冯电孙中山，谓旅加华侨多倾向革命，保皇会势力大减，此时向之筹款，大有把握，请于渡美途中来温哥华。

△　孙逸仙署名之同盟会传单在俄国《星报》（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发行）刊出，号召人民铲除清朝专制制度。谓："清朝压迫者是一群丧失天良不顾死活的人。他们实行完全敌视我们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必须铲除。"

△　同盟会会员谭人凤至香港与黄兴、赵声商议起义计划。次日携2000元返两湖。对南京第九镇，则派郑赞丞驻沪，设机关从事运动。

△　外务部以英兵占领片马事，电催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速与英政府交涉，务先撤兵而后勘界。

2月6日（正月初八日）　孙中山自旧金山抵温哥华，连日在致公堂及戏院演说，听者二三千人。旋开展募捐活动，冯自由提议设立洪门筹饷局，致公堂首捐一万港元，维多利亚致公堂公产楼宇抵押计得三万港元，多伦多致公堂公产抵押获一万港元，加之各埠华侨捐款，加拿大共汇统筹部七万余港币。

2月8日（正月初十日）　上海协和丝厂女工300余人罢工，反对减发工资。

△　长春以北鼠疫蔓延数十州县，死者近万人，是日，东三省总

督锡良奏请饬大清、交通两银行各拨50万以应急需。清廷允之。

2月10日（正月十二日）　黄兴以广州大举在即，致书南洋同盟会会员邓泽如，催请速筹军费。

△　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奏陈筹备立宪宜防内阁大臣代负责任、奸民暴动、国民担负义务、组织政党、中央集权、司法行政分权六项弊端。

2月12日（正月十四日）　孙中山致函吴稚晖，请其赴美洲就任《少年中国报》主笔。

2月13日（正月十五日）　孙中山出席温哥华华侨欢迎会，发表演说揭露清廷施行宪政、开设国会之虚伪性。指出清政府“对于施行宪政，开设国会，无一毫之诚意”。

△　度支部奏准试办全国预算及维持预算实行办法。

2月14日（正月十六日）　黄兴致函邓泽如，催促南洋汇寄起义款项两万元。

2月15日（正月十七日）　孙中山复函日人宫崎寅藏，请与政府交涉，允许到横滨驻足。并请其与犬养毅、头山满代为竭力图之。

△　御史胡思敬奏称新官不可滥设，旧官不可尽裁，拟请严饬宪政编查馆臣，不得援引日本法规，扰乱大局。

2月16日（正月十八日）　班禅为达赖乞恩，清廷谕令只准达赖管理教务，不准干预政权，着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就近筹商。

△　俄公使廓索维慈向外务部提出免税自由贸易、治外法权等六项条款，要求全部承认，否则即证明中国政府不遵守1881年中俄商约，俄政府将采取自由行动。

△　清廷以补用参将张绍曾充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官。

2月18日（正月二十日）　陆军大臣荫昌奏陈，时局阽危，宜早定军国大计，胪举筹办征兵、购制军械、修筑铁路、急筹开矿、奖劝工商、注重外交等十端，请饬廷臣协议，早决大计。

2月19日（正月二十一日）　清廷谕令锡良会同外务部妥速布置在奉天举行之各国防疫会议，并派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届期赴奉莅会。

△　李经羲奏陈滇缅界务，请饬外务部速与英使磋议审查，并请简员赴界测绘。

2月20日（正月二十二日）　清廷以东三省鼠疫蔓延关内，令民政部、东三省、直隶、山东各督抚，督令所属赶紧清理，务期早日扑灭。

2月21日（正月二十三日）　军谘处以现今俄国沿边增兵运械，时局日形紧迫，奏陈边事亟宜筹备，请饬下军机大臣、外务、度支、陆海军、邮传各部会同该处详细筹商，妥拟办法。

2月23日（正月二十五日）　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奉黄兴之命由香港抵汉口，召集革命党人居正、孙武等开会，筹商响应广州大举之计划。

△　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自西贡致函邓泽如，报告筹款经过，决定近期返港。

2月24日（正月二十六日）　江苏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千蒲镇、新桥镇商人抗捐，举行罢市，捣毁新桥自治局。

△　清廷从法部奏，通谕停止刑讯，永远革除一切非刑、私刑，有关死罪人犯应行刑讯者，务须恪遵现行刑律办理。

△　锡良奏报，安插华工兴办实业，请饬部先速借拨银300万两。清廷谕饬度支部速议具奏。

2月25日（正月二十七日）　　锡良奏报，东三省防疫，糜费甚巨，请径向各国银行先借银200万两，由东三省自办赈捐弥补。

2月26日（正月二十八日）　　由同盟会会员刘揆一等人发起在东京召开全体留日学生大会，反对俄国侵略新疆、蒙古，反对英国侵占片马，议决设立救亡机关“留日中国国民会”，派代表回国以省为单位组织国民军。旋留日中国国民会提议各省设分会，上海设总机关。

2月27日（正月二十九日）　　陈夔龙、孙宝琦奏报，东海关因办防疫，交通尽隔，烟台贫民聚集，无可谋生，请饬部拨银数万两，以工代赈。清廷谕饬度支部议奏。

2月28日（正月三十日）　　外务部奏报，会勘中俄边界，将次告竣，与俄使商由两国各派大员，将已勘各界条款图说详细查核，会同议定。清廷派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充会勘边界大臣。

是月　　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托人致书同盟会会员居正，指示联络武昌新军响应。

3月

3月1日（二月初一日）　　江苏南汇、川沙两县农民反对筹办自治等新政，打毁绅董房屋，焚毁学堂。

△　湖南湘潭县商人抗捐，举行罢市。

△　陈夔龙奏报直省实施检疫防疫情形，山海关、长城各口、秦皇岛、天津、保定等地，派医设局，切实防范。清廷令仍须迅速清理，以卫民生。

3月2日（二月初二日）　　直隶遵化农民反对官吏借办新政搜刮民脂民膏，千余人攻城。

△　民政部奏陈《户籍法》，凡八章184条。

△　江皖查赈大臣冯煦奏请赶办春赈，以治其标；广兴实业，勤修水利，以治其本。清廷命督饬员绅，分别轻重，核实赈济。

3月3日（二月初三日）　　清廷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早日禁绝京城鼠疫，并严饬防疫人等，务当慎审从事，毋得藉端骚扰，其商民人等，亦不得轻信谣言，致滋摇惑。

△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调查户口、编订户籍，为实行宪政之根基；川省调查户口，一律报齐，复核无误。

3月4日（二月初四日）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报，提前裁撤绿营，改练巡防，扩充陆军办法。清廷命王人文接续筹办。

3月6日（二月初六日）　　孙中山自洛杉矶致美国友人布思告以将于一周内抵纽约，如届时筹款仍无所作为，则务请退还吾党同志签署之文件。

△　黄兴、赵声、胡汉民联名致函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收到汇来三万元，报告国内起义之事“俱已着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

△　四川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流，设边北道及登科府。

△　清廷改巴塘为巴安府，打箭炉为康定府，并新设康安道。

3月7日（二月初七日）　　清廷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所奏，特派候补三品京堂张煜南考察南洋各埠商务，并招集华商，经营长江一带实业。

3月8日（二月初八日）　上海闸北协和丝厂女工300余人同盟罢工，抗议资本家克扣工资。

3月9日（二月初九日）　李经羲奏陈英占片马一案，请饬部坚持声明办法，并交海牙保和会公断。

3月10日（二月初十日）　同盟会会员陈与燊奉派自福建赴台北，募得3000日元，作为林文、林觉民回国参加广州起义之川资及购械之用。

3月12日（二月十二日）　黄兴、赵声、胡汉民自香港统筹部致函旅加拿大同盟会会员冯自由，告以各地筹款情形，惟以加属所得为巨，推崇冯氏贡献最大。望各地筹款相助，使得速举。

△　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在上海出席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会，对千余名与会者发表演说，详述英国侵占片马，俄国侵略新疆、蒙古情形，谓“灭亡瓜分之祸，悉系此焉”。

△　台湾新竹厅地区大安溪上游山胞聚众千余人，袭击日军警，同日军警展开激烈战斗，日军警损失惨重。

3月13日（二月十三日）　李经羲奏报越南苗民聚众窜扰边界，严饬防营扼要堵剿。

3月14日（二月十四日）　黄兴致函邓泽如，催速筹款，决心起义并赠相片一枚，表示必死之决心。

△　俄公使廓索维慈照复外务部，声言如不完全允诺要求，势将自由行动。20日，俄政府声言于七日后取自由行动。27日，外务部完全允许俄国要求。

3月15日（二月十五日）　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举行代表会议，蒋翊武主席并报告会务，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

并议决该社章程。

△　农工商部奏准，华商试炼纯锑，仿照成案酌减出口税项。

3月20日（二月二十日）　中国敢死团在上海开成立大会，推朱家骅为团长。参加者有学生、军警、官员。

△　出使美墨秘古国大臣张荫棠奏请组织内阁，明定责任。

△　署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奏报，蒙地密迩俄边，亟宜筑路调营，以固国防。清廷命军谘处、会议政务处妥议具奏。

3月中旬　广西贺县农民攻占县城。

3月22日（二月二十二日）　清廷以大学士世续为资政院总裁，侍郎李家驹充副总裁。

△　清廷以贝子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刘若曾充修订法律大臣；溥颋为热河都统。

3月23日（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由孙洪伊领衔致电各省各团体，请各省谘议局议长即时入都，共拟国是办法。

△　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陈，纂拟新律，应请申明宗旨。又请饬礼学、法律两馆以大清律例为本，参考各国法律，勿为邪说所惑。

3月24日（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南汇六灶乡渔民400余人反对渔业公司垄断渔利，焚毁渔业公司、自治公所。旋大团乡民发出揭帖，约期焚毁局、所、学堂及绅董住宅，数日间，张江栅、周浦、杨家等镇渔民纷纷响应，捣毁渔业公司多处。

△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北京订立《邮传部借款合同》，款额1000万日元，作为偿还铁道借款及政府其他用途。

3月25日（二月二十五日）　　湖北天门县饥民十余万人聚众抢米。

3月28日（二月二十八日）　梁启超自日本抵台湾，考察财政并筹款。

3月29日（二月二十九日）　湖南南州厅农民禁米出境，数百人围困并焚毁衙署。

3月30日（三月初一日）　出使日本国大臣汪大燮奏请饬下学部通行内外各学堂，仿照日本，一体添设国语科，授以官音以统一全国语言。

3月31日（三月初二日）　同盟会本部派谭人凤赴湘联络同志，谋响应广州起义，是日在长沙开秘密会议，刘文锦报告革命宗旨，计划运动军队发动起义。

3月下旬　湖南饥民三万余人聚集岳州、华容、南州等地，捣毁厘卡分局。

4月

4月1日（三月初三日）　　清廷赏云南陆军统领钟麟同陆军副都统衔充陆军第十九镇统制官。

4月2日（三月初四日）　　度支部奏议复准湖广总督瑞澂向英、法、德三国银行借200万两，清偿旧欠。

4月3日（三月初五日）　　万国防疫会在奉天开会，中、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11国特派医生参加，摄政王载沣电谕致贺。此系我国近代召开之首次国际学术讨论会。

△　清廷颁发陆军训谕六条：尽忠节，守礼节，尚武勇，崇信

义，敦朴素，重廉耻。

4月4日（三月初六日）　德公使雷克司呈递国书。

4月5日（三月初七日）　国际防疫所落成，各国医学专家及中国伍连德博士等，迁入北京国际防疫会所，从事研究工作。

4月6日（三月初八日）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报，驻藏绿营官弁制兵1000余名，现拟一律裁撤。

4月8日（三月初十日）　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刺毙兼署广州将军副都统孚琦于广州东门城外。温当即被捕，于15日英勇就义。

△　黄兴在香港统筹部召开发难会议，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之计划。黄兴亲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总督署，其余各路分由赵声、徐维扬、陈炯明、黄侠谷、姚雨平、李文甫、张六村、洪承点、罗仲霍率领，并推定赵声为发难总指挥，黄兴副之。

△　吉林巡抚陈昭常奏，开办吉林图长航业有限公司，集官商股各24万两，航线由上海绕道日本长崎达图们江坡。

4月9日（三月十一日）　外务部奏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

△　江苏巡抚程德全奏报，苏省筹办统捐，拟分三期办法，并请将卡捐改为进出口捐，实行新订捐则，悉裁腹地各卡。

4月10日（三月十二日）　甘肃甘州（今张掖）乡民要求种烟，聚众三万余人进城围署，毁统捐局。

△　邮传部与英国大东电线公司、丹麦大北电线公司订立整顿电报电话借款合同，款额50万英镑。

4月11日（三月十三日）　清廷通谕嗣后内外诸臣，务当共体时

艰，力图振作，倘再有托故请假，借图安逸者，定即严惩。

△　江苏巡抚程德全奉清廷之命札行上海道刘燕翼转饬各属，认真查禁各界组织义勇军、敢死团。

4月12日（三月十四日）　广东四会县民众反对酒捐，拆毁酒捐分局及巡警局。

△　湖南巡抚杨文鼎奏，湘境铁路湘人力能自办，无须借款，绅商环请陈奏，请饬部设法维持。

4月14日（三月十六日）　安徽谘议局在安庆开临时会，学生罢课，抗议巡抚朱家宝迫害学生。

△　清廷补授张鸣岐为两广总督。

4月15日（三月十七日）　度支部尚书载泽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订立《大清政府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五厘递还金镑借款合同》，款额1000万镑（5000万元）。

4月16日（三月十八日）　邮传部奏准在吴淞创设商船学校。

4月17日（三月十九日）　清廷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严查革命党。

4月18日（三月二十日）　黄兴致函李源水等，请竭力速筹款项，支援广州起义。

4月19日（三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自加拿大抵纽约。当晚函告芝加哥同志，刻在纽约处理紧要问题，事毕即赴芝加哥。

△　清廷派出使德国大臣梁诚出席海牙万国禁烟会议。

4月20日（三月二十二日）　清廷授四川总督赵尔巽为钦差大

臣，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同日谕准锡良开缺回旗。

4月中旬　宋教仁、陈其美先后应邀自上海赴香港，参与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

△　湖南华容县会党联合饥民万余人抢粮，冲入县城。

4月21日（三月二十三日）　清廷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四川总督，任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　海参崴三万名华工被俄驱逐出境，返抵山东芝罘（今烟台市）。

4月23日（三月二十五日）　黄兴离香港抵广州，布置起义军事。频行，致绝命书于海外同志，以示牺牲之决心。

4月24日（三月二十六日）　两广总督张鸣岐获悉革命党人即将起事，调兵防守广州。

4月26日（三月二十八日）　黄兴电召在香港之敢死队员悉数进省，准备发难，改为四路进攻广州：一、黄兴攻总督署；二、姚雨平攻小北门、飞来庙；三、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四、胡毅生以20人守南大门。约定二十九日（27日）下午五点半一齐发动。

△　湖北宪政同志会在汉口为谘议局局长汤化龙赴京争路权饯行，与会者发表演说，抨击清政府，反对铁路国有化。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广州起义。下午，黄兴率120人攻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旋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与清军巷战，因寡众不敌而失败，黄兴负伤脱险，同盟会会员喻培伦、林时塽、林觉民、方声洞等86人牺牲，事后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郊黄花岗。是役亦称“黄花岗之役”。

△　浙江嘉善县农民数千人捣毁学堂、自治公所。

4月28日（三月三十日）　赵声、胡汉民闻广州起义讯，率留港党员200余人到省增援，清晨登岸，始知事败，胡汉民等回港，赵声至广州河南晤黄兴，当夜亦返港。

△　广东顺德民军数百人响应广州起义，竖旗举事。越二日，攻入佛山，不久即失败。

△　孙中山自纽约抵芝加哥。从报上获悉广州起义失败，当晚即电香港胡汉民探询同志安危及善后办法。

4月29日（四月初一日）　清廷谕令两广总督张鸣岐认真督饬文武，搜捕广州起义之革命党人。

△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到12省代表，重要议决有请学部施行变更初、高等教育方法等五案。

4月30日（四月初二日）　黄兴由徐宗汉护送至香港，入医院割治右指伤。住院期间，黄兴以左手书告海外同志，说明是役失败之原因。

△　孙中山出席芝加哥同盟分会欢迎会，演说革命救国道理，与会者踊跃捐款。

△　清廷召见王大臣，商议内阁官制。

是月　孙中山在芝加哥逗留期间，谈及他一生的使命就是推翻满清王朝，并且预计革命会早日取得成功。并说："革命有三个目的：推翻满清政府；创立共和政体和按照美国政府一样的方针组织国家。"

5月

5月1日（四月初三日）　　湖南巡抚杨文鼎以湘省会党充斥，伏莽遍地，奏准暂缓裁撤防绿各营。

5月3日（四月初五日）　　湖北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出席，孙武提出两湖首先起义，各省响应，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

△　江苏谘议局以两江总督张人骏有意破坏该局议决之预算案，议长张謇及常驻议员愤而全体辞职。

5月4日（四月初六日）　　孙中山接胡汉民复电，获悉黄兴、朱执信等安全脱险，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并为死难烈士筹集抚恤费。

△　清廷谕令所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1000万镑、日本横滨银行1000万元，专备改定币制、振兴实业及推广铁路之用，不得移作别用。

5月5日（四月初七日）　　芝加哥同盟会开会，请孙中山指示筹饷方法。孙中山提出“集合巨款，分途举义”，暂以100万美元为目标。议决设立革命公司办理。同日，由孙中山通电全世界，布告革命宗旨。

△　清廷从给事中石长信奏，颁布国家铁路政策：将全国重要之区定为干线，悉归国有；其余支路，准由各省绅商集股办理。

5月6日（四月初八日）　　杭州机业工人反对劣绅盗卖粮食，囤积居奇，是日联合贫民千余人捣毁审判厅及米店40余家，并殴打知县及巡警道。

△　清廷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请，所有三省用人及各项要政，均准其便宜措置。

5月7日（四月初九日）　　孙中山致函谢秋，检讨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在于金钱不足，告以芝加哥成立中华实业公司，革命成功后专办开矿，欲筹资本百万元，供充革命军费，嘱将此事通告同志。同日，孙中山离芝加哥赴波士顿。

△　清廷谕令奖励扑灭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事之有功员弁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人。

5月8日（四月初十日）　　清廷授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授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别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各部大臣。清廷“皇族内阁”组成。

△　清廷裁撤原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设立内阁，颁布《内阁官制》19条。

△　清廷设立弼德院，颁布《弼德院官制》24条。陆润庠授为弼德院院长。

△　清廷设立军谘府，授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为军谘大臣。

△　清廷以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辞职一事，谕令张人骏明白宣谕该局，一切务须遵守定章，不得逾越权限，倘仍不受该督劝告，应即奏明，请旨裁夺。

△　中英续订禁烟条件（英称“鸦片协定”），规定英国每年递减鸦片输出量，至1917年停止，惟中国应于限期内自动将土药概行禁绝。

△　出使荷兰大臣陆徵祥与荷使贝拉斯在北京订立《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

5月9日（四月十一日）　　清廷颁布铁路干路国有化政策。干线归国有，支线仍准商办。命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5月10日（四月十二日）　　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召开代表会议，决定设立起义领导机关于武昌小朝街85号，并决定同共进会联合。

△　浙江绍兴府临浦、柯桥镇农民数百人捣毁米店。

△　清廷以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为资政院第二次开会之期，降旨仍于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召集议员。

△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以内阁总理大臣断难胜任，奏请收回成命。清廷不准。

△　邮传、度支两部致电粤汉、川汉两路有关之湘、鄂、川督抚，传达5月9日上谕，请“遴派大员”查明各省商办铁路帐目，“迅速电复”，“以凭请旨办理”。

△　湖南省谘议局电鄂、川、粤等省谘议局，吁请共同力争取消铁路“国有”政策。

△　英公使朱尔典再次声明否认不丹、尼泊尔为中国属邦，如仍有干涉，英国即取对抗行动。

5月11日（四月十三日）　　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开第一次协商会议，双方代表发言坚持联合以我为主，各执一端，未获结果。

5月12日（四月十四日）　　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在北京开会讨论国事。要求清廷改组新内阁，收回亲贵充任总理大臣之成命，否则，各省谘议局将联合宣告各邻邦，凡清廷对外借款，概不承认。

△　清廷密谕东三省士民镇静图功，充实内力，共济时艰。并着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进行要政，曲通民隐。

△　奉天交涉使韩国钧与驻奉天日总领事小池张造订立《抚顺、烟台煤矿细则》。

5月14日（四月十六日）　湖南长沙各界万余人集会，主张坚持湘路“完全商办”，要求清廷“收回成命”，否则将“立即集全力抵抗”。

5月15日（四月十七日）　湖南巡抚杨文鼎电邮传部，告以湘路改归官办后，群情愤激，全体哗噪，筹商办法，惟有设法转圜，徐图就范，请勿操之过急，致酿祸患。

5月16日（四月十八日）　湖南长沙株洲筑路工人万余人进入长沙示威，反对铁路国有，前往巡抚衙门，迫使巡抚杨文鼎代奏挽回。

△　湖南浏阳县农民聚众进城抢米，并捣毁警察总分各局。同日，新化、溆浦两县县署被毁，知县潜逃。

△　四川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电邮传部，要求“俯顺民情”，维持商办成案。

5月17日（四月十九日）　资政院奏请开临时会讨论预算、借款两事，清廷以此两事尚非紧急，着毋庸议。

5月18日（四月二十日）　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再次集会讨论国事，决定质问政府，并主张全国举办民团自保身家。

△　同盟会会员赵声在香港病逝。

△　清廷派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5月20日（四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分别致函宫崎寅藏、萱野长知，请向日本新内阁交涉其再入日本问题。

△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德、英、法、美四国银行团在北京订立《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及鄂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简称“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款额600万英镑。

△　湖南谘议局会同绅民千余人齐至抚署请愿，要求巡抚杨文鼎代奏，恳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

5月21日（四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赴华盛顿，希冀美政界人士实力援助中国革命。

△　清廷以河南布政使沈庆瑜为贵州巡抚，贵州巡抚庞鸿书解职。

5月22日（四月二十四日）　清廷以铁路国有，湘省群情汹惧，命该省巡抚杨文鼎严禁刊单传布，聚众演说，倘若扰害治安，准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

△　清廷以铁路改归官办，谕令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

5月23日（四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以江省现有兵数仅4000余人，不足言国防、制内匪，奏请暂免裁汰防营。

5月24日（四月二十六日）　外务部以片马事起，滇省绅民对该部多有责望，密陈历年与英交涉滇缅界务之经过，请速定办法。清廷命内阁议奏。

5月25日（四月二十七日）　清廷以湖南浏阳县民因米贵暴动，捣毁警察总分各局，拥入各碓坊米铺及绅士家中闹事，夺取防队兵勇枪械，命巡抚杨文鼎查办，并严密防范，毋任再生事端。

5月27日（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旅蜀同乡黄德润等愤英兵占据片马，会议应付方法，由护理川督王人文代奏。清廷谕饬外务部知

道。

5月28日（五月初一日）　成都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及各团体代表会议，到720人，议决奏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并暂缓派员接收。

△　浙江鄞县余家湾农民数千人捣毁米店。

△　邮传部接管邮政事宜，由邮传部左侍郎李经方兼邮政总局局长，派法国人帛黎为总办。

5月29日（五月初二日）　清廷派陆军四十二协统领官萧星垣充陆军第二十一镇统制官。

5月30日（五月初三日）　清廷命两广总督张鸣岐严防革命党，“严密查防，切实剿捕，毋得稍涉松懈”。

△　清廷命湖南省因筑路所抽收之米、盐、房捐，概行停止。

5月31日（五月初四日）　孙中山复函旧金山同盟会会员李绮庵，对其热心筹办革命公司，从事筹款和习练飞机回国杀敌表示嘉许。

△　湖南巡抚杨文鼎代奏湘路自办，清廷着传旨严行申饬。

△　学部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制订章程14条。

是月　加拿大同盟会支部成立，冯自由为支部长，周连盛为副部长。温哥华加盟者百数十人，维多利亚加盟者数十人。

6月

6月1日（五月初五日）　文学社在武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议决成立阳夏支部，以胡玉珍为支部长，并在汉口设立交通处。

△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会电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宣布处分川路股款办法：所有川路现存及已用之款，一律更换国家保息股票。

6月2日（五月初六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据四川谘议局呈称，川省绅民纷纷函电，请饬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请缓刊誊黄。清廷传旨严行申饬。

6月3日（五月初七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复盛宣怀、端方电，主张对于川路存款700余万，应尽还川人。已用之款，则照度支部所议办法，全换给铁路股款。四国借款合同，但有拘束四川铁路财政之力，川人万不承认。

6月4日（五月初八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讨论组织政党，将帝国统一会改为宪友会，是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开正式成立会，举雷奋、熊佛苏、孙洪伊三人为常务干事，决定总部设北京，各省设支部，拟定章程29条、政纲六条，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责任内阁”相号召。

△　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电外务部报告墨人排华，侨民被害316人，损失近百万，墨政府同意抚恤、办凶、保侨等五条。

6月5日（五月初九日）　　广东南海县佛山镇商人反抗酒捐，焚毁包办酒捐之康永公司，捣毁米店，散布揭帖，号召人民起事。

△　出使俄国大臣萨荫图奏请由农工商部筹募公债一二千万元，专为创办工业之资本，日后逐渐推广，并选派工业毕业学生，分赴各省调查工料物产，办理局产事宜。

△　出使美墨秘古大臣张荫棠奏请整顿财政，宜速定为金本位，改铸法币。

6月6日（五月初十日）　　广东粤汉铁路公司开股东大会，到千余人，表决收归国有案，结果全主商办。大会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又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依，希予支持”。大会并定十五日（11日）继续开会讨论办法。

△　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自汉口乘京汉铁路火车北上，赴北京陈请组织中国报聘美国团及中美联合兴办航业公司事。次日，至河南彰德，晤袁世凯，交换对于时局意见。

6月8日（五月十二日）　　孙中山抵洛杉矶。次日致函旧金山致公总堂，对其有意实行赞助中华革命事业表示赞赏和欣慰。

△　张謇抵北京。越二日，谒内阁总理大臣奕劻。

6月9日（五月十三日）　　两广总督张鸣岐发布告示，取消初十日（6日）粤路公司股本会议表决案，并禁止十五日（11日）预定召开之股东会议。

△　邮传部通饬电局，禁止收发关于路事之通电。

6月10日（五月十四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以皇族内阁“反君主立宪之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呈请都察院代奏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6月11日（五月十五日）　　中国国民总会在上海张园开成立大会，到5000人，推沈缦云为会长，会员多系同盟会会员。

△　两广总督张鸣岐奏陈，铁路干路收归国有，请从速决定归还股本办法。清廷命度支部、邮传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妥议具奏。

6月12日（五月十六日）　　革命党人、日知会会员刘静庵因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捕，定为永远监禁，是日卒于武昌模范监狱。

6月13日（五月十七日）　摄政王载沣召见张謇于勤政殿。张謇历陈外交之危险，内政应以注重民生，实行宪政为要务。并陈“外交有三大危险期，内政有三大重要事”。

△　两广总督张鸣岐奏陈，粤人为抵制收回粤路不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票领银，牵动市面，拟向外国银行订借现款500万两，以备周转，并请早定归还股本办法。清廷着外务部、度支部速议具奏，并与督办粤汉川汉大臣妥速奏议还股办法。

6月14日（五月十八日）　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开第二次联合会议，达成联合初步协议。

△　度支部大臣载泽约见邮传大臣盛宣怀及张謇，讨论收回四川铁道为国有方法。张謇建议，应将川路现存已用及亏倒各款，一律允还川人，平息保路风潮。

△　邮传部奏准厘定全国铁路轨制。按照川汉所订之英式为定式，逐渐改归一律。

△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陈，宗支不宜预政。清廷以“措词失当”，传旨申饬。

△　两广总督张鸣岐奏陈粤民对于路事抗拒情形，请坚持国有政策，准令商股悉领现银。清廷饬令度支部、邮传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归并前案，妥速议奏。

6月15日（五月十九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以请督察院代奏两折，反对皇族内阁，皆留中不报，是日，致电各省谘议局，径电内阁请愿。

△　清廷谕准两广总督张鸣岐订借外银500万两周转市面，并着该督认真防范，如有不逞之徒，倘敢纠众作乱，准如所请，格杀勿论。

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　四川铁路公司召开大会，到四五千人，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

△　黄兴、胡汉民致书加拿大各埠同志，告以广州起义失败后党人在新军中势力甚大，而铁路国有问题激动民心，使广东、两湖、浙江、四川五省反对政府之气益炽，殷实商人愿附吾党者日众，决心乘此时机，卷土重来，深望美洲同志早作筹款之预备，切勿坐误事机。

△　度支部、邮传部会奏，筹划收回川粤汉干路详细办法，对于川路现存之700余万，悉数更换国家保利股票，五年后分作15年还本；粤路每股先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分10年摊还。

△　清廷命湖南布政使赵滨彦着开缺来京，另候简用；湖南布政使着郑孝胥补授。

6月18日（五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在旧金山建议美洲同盟总会与致公堂联合，经多次会商，是日发表联合布告，全体同盟会员加入致公堂。

△　清廷以陈宝琛为山西巡抚。

6月19日（五月二十三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以四国铁路借款合同丧失路权国权，欺君误国，严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请速治罪，然后修改合同，以救危亡。

6月20日（五月二十四日）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从移民垦荒入手，筹办东三省实业，奏准在奉天省城设屯垦总局，为三省移民开垦总机关。

△　御史陈善同奏陈，近年银号票庄屡见倒闭，请速行保商政策。

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　摄政王载沣在京召见新任湖南布政使郑孝胥。郑以急造恰克图铁路及借债造路两策为召对之语。

6月22日（五月二十六日）　革命党人《天民报》在广州创刊。越二日，广东巡警道以该报“鼓吹革命，扰乱治安”为由，勒令永远停版。

△　江西抚州城（今属抚州市）米价昂贵，地主囤积居奇，农民四五千人捣毁积谷绅富家及米店。

6月23日（五月二十七日）　中俄勘分呼伦贝尔边界会议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举行第一次会议，中方出席者为勘界大臣周树模等八人，俄方为界务专员菩萨罗夫等六人。

6月25日（五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在同盟会美国葛仑分会成立大会上演说国家与个人之关系，激励侨胞反满救国。

6月26日（六月初一日）　浙江温州饥民捣毁米店、抢富户，全城罢市。越二日，又有万人哄闹厅署，拆毁法庭。

△　清廷命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会同内阁总协理大臣妥速改订资政院院章。

6月27日（六月初二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四川绅民罗纶等2400余人奏请谕令速将四国借款合同即行废弃，尤恳严治盛宣怀误国殃民之罪，以重国典。

6月28日（六月初三日）　四川重庆召开铁路股东分会，到4000余人，宣布成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

△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通过《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公约》，选出总干事及评议员。

6月29日（六月初四日）　清廷派广西提督龙济光充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官。

6月30日（六月初五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宣言，通告全国，指出铁路国有化政策失信于国人，反对皇族内阁。略谓：今日政府失信于国人者，约有下列数端：一、借债政策；二、改定币制政策；三、兴业政策；四、铁路国有政策；五、禁烟政策；六、外交政策。并谓：今日之政府“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君主立宪国皇族不能充当内阁”。

6月下旬　湖北宜昌府城川汉铁路股东联合农民2000余人，捣毁该地铁路公司机器房，商人罢市。

是月　江西建昌府（今南城县）农民七八千人打毁盐局，捣毁南城县署。

7月

7月1日（六月初六日）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将关内各省移民分配东三省各地：直、鲁、晋、豫之移民分配吉林、黑龙江，鄂、苏、浙、粤之移民分配奉天、洮南府及东边一带。

7月2日（六月初七日）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南校场召开大会，三万余人欢送赴京请愿代表刘声元等三人。

△　邮传大臣盛宣怀、度支大臣载泽、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电赵尔丰，指出：“朝廷收回国有政策已定”，“万无动摇之理”，希望迅速由藏赴川就任署四川总督。

△　湖南衡州农民数千人捣毁太平圩食盐官运分局及税局。

7月3日（六月初八日）　清廷颁布《改订资政院院章》，凡65

条。

7月5日（六月初十日）　孙中山函复党人郑占南，告已收到付款及今后行止。

△　都察院第二次代奏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呈称，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行组织内阁。

△　张謇致书摄政王载沣，提出国事三策：一、请发表政见；二、实行阁部会议；三、广开幕府。

△　张人骏奏准准募公债，扩充浦口商埠；又奏准缓裁绿营，俟至宣统六年一次裁尽。

7月6日（六月十一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开秘密会议，商讨进一步反对皇族内阁办法。

△　礼亲王世铎等奏称，八旗预算核减，碍难实行，着照向章办理。

7月7日（六月十二日）　湖广总督瑞澂奏陈，中国会计年度，应以7月1日为始。清廷令度支部核议具奏。

△　江西巡抚冯汝骙奏请赣省试办公债；又奏，遵筹统一国库，发行国币，恳请提前办理。清廷下内阁会议具奏。

7月9日（六月十四日）　驻藏大臣联豫奏报西藏波密地区藏民暴动，现经调动分路剿办。

△　清内阁电各省督抚严禁谘议局开会。如谘议局议员藉词开会，鼓动风潮，即随时查禁。

7月10日（六月十五日）　孙中山在旧金山倡议设立“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由朱三进、罗怡任

正、副主席。孙中山手订《筹饷局章程》，凡12条，规定革命军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

△　江亢虎倡导之社会主义同志会（亦名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上海张园开成立会，发行刊物《明星报》。

△　内阁会议，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演说政纲。

△　出使奥国大臣沈瑞麟以外患日亟奏请定联盟政策，联络德、美以遏英、日、俄、法之侵略。

7月上旬　江西乐安县米谷奇贵，农民数千人捣毁县署。

7月11日（六月十六日）　清廷以江苏布政使陆钟琦为山西巡抚，直隶提法使齐耀琳为江苏布政使。

7月12日（六月十七日）　广西巡抚沈秉堃奏请整顿教育，特设银行，以振兴实业。

7月14日（六月十九日）　上海城西门外挑粪工人千余名罢工，并大闹县署大堂。

7月15日（六月二十日）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电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告已与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商定，修筑川汉铁路宜昌秭归段之事，由部委其主持，以现存川股700万两为其费用。

△　清廷令陕甘总督长庚严办丹噶尔厅及西宁县聚众起事各犯，嗣后仍着意防范，免再滋生事端。

△　中央教育会议在北京行开幕式，17日正式开会，推张謇为会长，共开会18次，议决12案，至8月12日闭幕。

7月16日（六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致函日本友人宗方小太郎，

深望结合所识名士，发起提倡日本、中国人民之联络，启导贵国之舆论，游说贵国之政府，使表同情于中国革命事业。

7月18日（六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以旧金山筹饷情形，并告嗣后当再往东美欧洲，以办外交要件。

7月20日（六月二十五日）　度支部通咨各省，自宣统四年（1912）开始，全国实行新币制，其兑换率为新币一圆合库平银七钱二分，含纯银质九成。辅币凡三种，计：五角币、二角半币、一角币，均含银质六成。

7月21日（六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立“美洲洪门筹饷局”（亦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手订《洪门筹饷局缘起》及《革命军筹饷约章》。筹饷局议决由孙中山、张蔼蕴、黄芸苏、赵煜四人分途游美国南北各埠演说筹饷。

△　清廷以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签押决无反汗之理，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渎奏，殊属不合，着仍凛遵迭次谕旨办理，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该护督是问。

△　王人文奏，四川绅民罗纶等以收路国有办法，对待川民未为持平，请裁察。清廷诏切责之。

△　上海《民立报》刊载税务处调查全国人口统计表，全国实有4.38425亿人。

7月22日（六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致函同盟会会员李是男，促其立即开办新筹饷局，由其管库，新旧两局银钱、帐目分清。

7月23日（六月二十八日）　四川派赴两湖代表江潘等三人，与湖北省谘议局副议长夏仲膺等会商联合反对清廷借款收路，决定联合湘粤，组织反对借款之联合机关，共同行动。

△　清廷增设荷属爪哇岛总领事一员，泗水、苏门答腊正领事各一员。

7月24日（六月二十九日）　山东巡抚派员与德国驻济南领事、德国华德矿务公司代表在济南订立《中德收回山东各路矿权合同》。

7月28日（闰六月初三日）　孙中山致函越南同盟会会员刘易初，告以胡汉民将赴越南筹划军费，希望倡导，共襄大业。

△　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电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度支部大臣载泽，报告川人反对铁路国有，定初十（8月4日）开会，如系开保路同志会，应行切实严禁，请饬地方官出全力解散。

△　直隶易州修崇陵土工7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清廷谕令查明首要，交地方官从重惩办。

△　广东新会县泗冲堡农民反对勒收沙捐，聚众数千人，拥至筹办处、沙捐局，声称誓死不允缴捐，并焚毁各捐局，张鸣岐派兵镇压，毙三人，重伤七八人。

△　陈夔龙奏请将烟潍铁路收回官办，以保利权。

7月29日（闰六月初四日）　陕西临潼县举办地方自治，勒派亩捐，农民千余人反抗，商人罢市。

△　清廷以湖北布政使余诚格为陕西巡抚，未到任前以布政使钱能训暂行护理。

7月30日（闰六月初五日）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度支部大臣载泽电四川署理布政使尹良，严禁川民集会反抗政府。

7月31日（闰六月初六日）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开成立会，到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29人，举陈其美、宋教仁、谭人

凤、潘祖彝、杨谱生分任庶务、文事、交通、财务、会计各干事，通过总会“章程”和“宣言”，设总机关于上海，各省设分部。

△ 清廷命四川总督赵尔丰赶于本月初十日（8月4日）川人开会以前抵省，并饬属开会之期多派员弁，实力弹压。

8月

8月1日（闰六月初七日） 四川保路同志会代表白坚、龚焕辰、陈育到广州。越二日，开谈话会，粤省谘议局议长卢乃潼等莅会，白坚提议川粤联合共同破约，及联络湘、鄂四省共举代表赴京设破约总机关部一致进行。

△ 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电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川人争路请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

△ 邮传部照会浙路代表，已与英使磋商，允将沪杭甬铁路合同作废。

8月2日（闰六月初八日） 湖广总督瑞澂借口“莠言乱政”，下令查禁汉口革命党人创办之《大江报》，该报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拘。

8月3日（闰六月初九日） 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全体大会欢迎川路公司股东代表，到会近万人，股东代表张澜发表演说，号召股东代表与同志会诸君，共同排除障碍，破约保路。

△ 江苏丹阳、武进两县农民反对调查户口，成立“公议团”抵制官绅，反对自治局。

△ 督办津浦铁路事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奏，津浦铁路南段淮河桥工告成。

8月4日（闰六月初十日）　　同盟会会员秦载赓召集各地哥老会首领在资州罗泉召开“攒堂大会”，决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于阴历七月间，在各地组织起义，推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南起义，张达三、侯治国主持川西北起义。

△　上海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致电成都总公司，告以旅沪川人已成立保路协会，“以作臂助”。同日，留日四川全体学生致电邮传部及成都川路董事局称：“川路国有，阴即外有。川人危极，速死力争，死不承认。”

8月5日（闰六月十一日）　　川省铁路公司开特别股东总会，通过《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铁路仍归商办意见书》，举汤颜楷、张澜为正、副会长。

8月6日（闰六月十二日）　　同盟会会员杨笃生因广州起义失败及列强有瓜分中国之说，在英国利物浦愤而投海自杀。

△　上海闸北协和、晋昌、长纶、锦华四丝厂女工，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勤昌、久成两丝厂女工响应，总计罢工人数为三四千人，坚持10天，丝厂总公所允加洋1分。

8月8日（闰六月十四日）　　江苏句容县农民反对办垦务，聚众五六万人，冲入城内，焚毁店铺、商会、自治公所、学堂、巡警局及天主堂等处，烧毁城外垦牧公司。

△　摄政王载沣面谕阁臣，各省纷纷自借外债，于国家前途异常危险，嗣后无论何省，不经政府同意，擅借外款者，国家不认偿还。内阁即电各省督抚遵守。

△　清廷命湖南巡抚杨文鼎与陕西巡抚余诚格对调。

8月10日（闰六月十六日）　　孙中山复函荷马李，告以国内运动新军发动起义。谓：“在北京以外的有十余镇以上确有把握，而首都

的所有各镇亦皆大有希望”，同志吴禄贞已被任为第六镇统制。又谓：“近日我收到大量来函，催促我尽快东返并从速发动起义。当前未办之唯一急务仍在设法为起义筹集必要的资金。”

△　川路公司开股东会，以川路驻宜分公司总理李稷勋，未经股东会议决，即呈邮传部定接收办法，决议辞退。同日并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私相授受”、“违旨盗权”之罪。

△　清廷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于永平附近，举行大操，派管理军谘事务、贝勒载涛为校阅总监。

△　农工商部奏准南洋各埠亟应筹办者三端：一、维持华商学堂；二、保护各埠华工；三、优待回国商民。

8月11日（闰六月十七日）　孙中山函复同盟会会员郑泽生，指出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已若大旱之望云霓，望纠合同志，竭力资助。

△　全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章程，举张元济为会长，伍建光、张謇为副会长。同日，张謇发起之全国师范联合会在北京成立。

8月12日（闰六月十八日）　学部大臣唐景崇通电各省提学使饬各学堂注重实业。

8月13日（闰六月十九日）　同盟会会员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南门内双门底炸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林当场牺牲，陈被捕。11月7日，陈敬岳遇害。

8月14日（闰六月二十日）　湖广总督瑞澂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及美国银行家在汉口订立《湖北省七厘银借款合同》，款额200万两。

△　端方电盛宣怀，川人赴各省运动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署川督

赵尔丰须“宽猛兼用”，始可收拾。

△　清廷以豫东归德府连遭荒歉、抢案迭出，命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河南巡抚宝棻协力捕拿，以靖地方。

△　新疆巡抚袁大化奏准新省缓办新政，先行办理垦荒、开渠及采矿等事宜。

8月15日（闰六月二十一日）　民政部奏准整饬地方自治办法。

△　清廷调善耆为理藩大臣，以桂春署民政大臣。同日调凤山为广州将军，以寿耆为荆州将军。

8月16日（闰六月二十二日）　两广总督张鸣岐奏准再添勇10营，防备革命党。

△　御史萧炳炎奏准各省除省城商埠业经设立审判、检察厅外，其余概从缓办；各省查照奉天办法，设特别地方审判厅。

8月17日（闰六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命美洲同盟总书记林朝汉复函古巴华侨黄鼎之，委任黄为当地主盟人。旋古巴同盟分会于哈瓦那成立。

△　梁启超致书联络陆军第六镇统制官吴禄贞，此书由潘若海面递吴禄贞，并委潘与吴面详一切。

8月19日（闰六月二十五日）　安徽繁昌县荻港协和煤矿公司数百名工人反对克扣工资，遭清军镇压。

△　内阁奏准本年七月一日（8月24日）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以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24日，《内阁官报》出版。

△　清廷谕饬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转饬李稷勋，仍驻宜昌暂管路

事，并责成该督迅速会同端方，将所有收款，分别查明细数，实力奉行。

△ 内阁会奏准裁汰府城首县，筹设各府地方审判厅。

8月22日（闰六月二十八日） 山西蒲州临晋、虞乡两县加派亩捐，农民数千人反对，各行一律罢市。

△ 赵尔巽奏报整顿奉省旗民各地粮租，改征国币。

8月24日（七月初一日） 川路特别股东会在成都召集紧急大会，到数万人，全场愤激，痛哭失声。下午续开大会，数万人拥入会场，全城罢市、罢课、罢税，街衢皆搭席棚，均供奉“德宗景帝万岁”牌举哀。

△ 新疆巡抚袁大化电内阁，拟向美国银行借债500万两，以为垦矿事业之用。

8月25日（七月初二日） 清廷以四川铁路股东会议后忽有传单鼓动罢市、罢课，令赵尔丰严行弹压，并保护各领事馆、教堂及重要局库。

8月26日（七月初三日） 盛宣怀电赵尔丰称，“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罢市、罢课首倡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宁事宁人”。

8月27日（七月初四日） 四川荣县党人王天杰、马蛮子领导罢市、罢课、罢税，率民军训练所学生万余人，接收经征局，扣留县官局委，旋以总团长名义，在五保镇号召民团千余人，枪数百支，托名保路，宣告起义，旋向成都进发。

△ 奉天庄河厅潘永忠等抗纳警学各捐，捣毁复州自治议事会，包围府署。

△　浙江镇海县山北东绪乡农民反抗征收肉捐，千余人捣毁自治公所，围城、毁学，各行罢市。

△　外务部照会驻京英使朱尔典，自西历9月11日起禁止印度鸦片运入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四川五省。30日，朱尔典复照外务部，表示同意。

8月28日（七月初五日）　孙中山复函郑占南，告以收到来函及1500元，并告“礼拜四即初九日动程往砵伦并东方一带，不日或由纽约往英京”。

△　盛宣怀电瑞澂，商请抽调鄂军入川，保护商埠，以作声援。

△　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崑等奏请川路暂归商办，将借款收路事件，分别交资政院、谘议局议决。

△　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致电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季帅（署川督赵尔丰）掌兵执法，不能保全治安”，建议请旨撤换赵尔丰，特派袁世凯赴川查办。

△　俄公使廓索维慈晤外务大臣，称中国近在蒙古移民、练兵，整顿吏治，蒙民不安，俄不能漠视，将筹对付方法，请中国将办理蒙事宗旨，明白宣示。

8月29日（七月初六日）　瑞澂电盛宣怀，允派鄂军入川，并主严旨责成赵尔丰惩办川人。

△　端方电内阁，严劾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俟部署略定，再行简派川督，并治赵尔丰以应得之处分。

8月30日（七月初七日）　孙中山应黄兴要求，经洪门筹饷局汇去一万元港币，以供暗杀机关经费。

▵ 清廷命邮传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将川路路款佷 佌 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群疑，并饬赵尔丰剀切开导，俾各安心静候，照常营业。同日，又谕令成都将军玉崑协力维持，毋令滋生事端。

▵ 内阁电赵尔丰，称收路借款不交资政院、谘议局议，朝廷不能收回成命，已将收路查款两事极力变通，大可借此转圜，深望川人顾全大局。

▵ 赵尔丰电内阁，对于川人不可纯用压力，仍主交院、局分议，拯救眉急。并告英领来函议及路事，建议川路由川自修。

▵ 两广总督张鸣岐与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及德国德华银行在广州订立《广东省七厘银借款合同》，款额港币500万元。

8月31日（七月初八日） 孙中山自美国旧金山致函吴稚晖，以黄兴为革命成败之关键人物，不宜再演汪精卫之悲剧，行个人暗杀主义。

▵ 成都成立“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会”，维持市面秩序。

▵ 瑞澂、端方电盛宣怀，川事为赵尔丰败坏至此，自非有威望重臣往为镇慑，难望收局。

▵ 清廷以世续现在赏假，命李家驹署理资政院总裁。

9月

9月1日（七月初九日） 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通过抗粮抗捐四项决议：一、不纳正粮；二、不纳捐输；三、不买卖田地房产；四、不认国债。

△　清廷派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张鸣岐、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湖南巡抚余诚格，各于粤汉、川汉所辖境内，会办铁路事宜。

△　成都将军玉崑、署四川总督赵尔丰等电请内阁代奏，参劾盛宣怀操纵酿变。自请罢斥，另简重臣来川，以图补救。并恳请特开御前会议，迅求救急弭乱之法。

△　清廷据广东京官李家驹奏称，粤省兵扰民迁，大局岌岌可危，命两广总督张鸣岐将迅即恢复省城秩序办法奏明办理，并分饬李准、龙济光等约束所部，如再有滋扰情事，从重治罪。

9月2日（七月初十日）　孙中山偕黄芸苏离旧金山，赴美国北部各地筹饷。

△　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迅速前往四川，认真查办铁路事宜。

△　清廷命署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川中罢市罢课之举，切实弹压。

△　赵尔丰电内阁，力陈挽救川局办法，实行改革主义，主张川路仍归商办，先定人心，徐图收拾之策。

△　四川各府县电内阁，请求俯顺舆情，速开阁议，将路款各事，交资政院议决施行。

△　奉天交涉使许鼎霖、邮传部特派工程师孙多钰与日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代表掘三之助在奉天订立《京奉铁路延长协约》。

9月3日（七月十一日）　四川保路同志会代表白坚、龚焕辰等联络粤人在香港开广东保路会成立大会，通过章程28条，并派代表刘少云等三人赴京请愿，遣人赴南洋联络华侨。6日，端方电盛宣怀，请转商外务部与英使磋商，严禁川人在港开会。

△ 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电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度支部大臣载泽，请求朝廷准其酌带鄂军入川，并请得随时调遣川中水陆新旧各军；如川人不听劝谕，有暴动情形，准其执法惩办。

△ 江苏新阳县巴城镇农民聚众二三千人抢米店。

△ 内阁以俄使面告奉政府训条，称中国近在蒙古办理新政，蒙民深滋疑虑，电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后举办新政，务先婉切开导，审慎办理。

9月4日（七月十二日） 全四川股东保路同志会发出宣言，反对清廷“不依法律而举债，不依法律而收路”，宣布“今自初九日（9月1日）起，实行不纳租税，已纳者不解，既解者不交，万众誓死，事在必行”。

△ 清廷以川路风潮剧烈，命端方懔遵前旨，迅速前往四川查办铁路事宜，不准藉词推诿延宕，如须酌带兵队，着就近会商瑞澂办理。

△ 清廷命四川提督田振邦，严饬各营妥为弹压地面，以保治安，倘弁兵有勾通匪徒情事，定惟该提督是问。

△ 清廷以赵尔丰、玉崑等奏请川路交资政院议决暂归商办，传旨申饬。并谓现在省州县已有烧毁局所之势，仍着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

△ 湖南同盟会会员刘安邦在长沙开会，到200余人，密谋乘四川保路风潮之机，联络新军举事。

△ 广东东莞县石龙镇农民千余人拆毁自治公所及捐局。

9月5日（七月十三日） 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召开大会，讨论应付端方带兵入川查办之办法。会上同盟会会员朱国琛等散发《川人

自保之商榷书》，号召在“自保”名义下，举行武装起义。

△　署四川总督赵尔丰奏称，“谨当懔遵谕旨，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并谓如川人不听解散，势必剿办，请朝廷主持。

△　端方奏请另派重臣赴川查办。清廷不准。

△　内阁会同度支大臣载泽、邮传大臣盛宣怀联电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迅速赴川省，坚持铁路国有政策，持平办理。

9月6日（七月十四日）　清廷命军谘府、陆军部电饬川省水陆新旧各军暂由端方随时调遣。

△　中俄议约大臣陆徵祥奏报与俄议新约五条，其中规定：俄领驻地准俄人置产，其余各地只准租地；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航权另议。

△　清廷调陆徵祥为出使俄国大臣，以刘镜人为出使荷国大臣。

9月7日（七月十五日）　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等9人，成都数千人手捧光绪帝牌位涌入督署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下令开枪，32人死难，酿成“成都血案”。

△　四川京官在全蜀会馆开大会，议路事维持办法，决定上书摄政王载沣，并奏请暂归商办，另派大员赴川查察抚慰。

△　广西巡抚沈秉堃奏准密捕革党以防煽惑等维持右江地方治安办法。

9月8日（七月十六日）　四川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双流同盟会会员向迪章分别发檄起义。次日，两军向成都南郊逼进，前锋队

与清军在红牌楼激战。清军将领姜登选、方声涛、程潜、张次方、陈锦江等皆革命党人，奉令督战，因同情同志军，密令所部只取自卫，勿伤害平民，同志军势大振。

△　同盟会会员、华阳县中兴场同志协会会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率同志军千余人，经中和场、琉璃厂，抵成都东门外牛市口，在大面铺、西河场、赖家店一线与清军作战。

△　甘肃西宁府农民数千人起事，占领府城。

△　清廷以川人抗粮抗捐，倡言自保，罪无可逭，令赵尔丰迅速查拿，将首犯正法，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

9月9日（七月十七日）　　四川保路同志会代表刘声元至北京地安门上书摄政王载沣，请收回成命，并治当事大臣以应得之罪。

△　清廷命瑞澂遴派得力统将，酌带营队，迅即开拔赴川，暂归赵尔丰节制调遣。该署督务当督饬兵队，相机分别剿办。

△　四川谘议局副议长萧湘由京抵汉，瑞澂下令拘拿，发武昌府看管。

△　清廷从湖南京官、大理院少卿王世琪奏，准将湘路公司股票换给国路股票，一律分红分息。并令邮传部会同督、会办铁路大臣，即日派员接管湘路。

△　都察院全体会议联名奏参粤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杀戮无辜，致酿地方变乱，又复遇事张皇，欺君邀功，请加处治。

9月10日（七月十八日）　　四川保路同志会代表刘声元赴庆亲王府向奕劻跪哭请愿，呈递内阁代奏挽救川事文，围观者数千人。

△　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带鄂军三十二标两队，由鄂

乘“楚同”舰启程赴川查办。

△　奉天庄河厅福来社农民三四千人反抗调查户口，并烧毁自治公所、巡警局。

△　川粤汉铁路长沙、株洲段通车。

9月11日（七月十九日）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督大队攻成都，战斗失利，退至仁寿县借田铺设东路民团总机关，未几，各属来会者，众逾20万。

△　清廷命学部严饬各学堂认真约束学生，不准随意出堂，干预外事，并着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严行禁止聚众开会，多派兵警，加意弹压。将四川代表刘声元严密查拿，押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　御史陈善同奏陈，川省路事日棘，请将办理不善之大臣盛宣怀量予惩处，并饬妥速设法维持，以安人心而弭巨变。

△　端方电盛宣怀、载泽，主张粤路仍归粤办，但须责以三年告成，以防川粤联合有危大局。

9月12日（七月二十日）　孙中山致函日人宫崎寅藏，告已抵西雅图，探询日本西园寺公望新内阁对中国革命党之方针，并望再托犬养毅向新内阁交涉准予入境事宜。

△　四川巡防军第八营书记周鸿勋发动兵变，枪毙管带黄恩瀚，在邛州（今邛崃市）宣布起义，响应同志军。

△　清廷以川人散布《自保商榷书》，命赵尔丰严饬新旧各军“将倡乱匪徒及时扑灭，勿任蔓延”。并令川省绅民照常开市、开课。

△　摄政王载沣面谕阁臣电致赵尔丰、端方，严拿首要，切实劝

导商民毋得违旨倡乱，如有暴动，准予格杀勿论。

△　清廷命此次赴川鄂军，均准暂由端方节制调遣，所调陕西入川军队，暂令在川陕交界扼紧填扎。

△　御史温肃奏，川民借端煽乱，恐牵动大局，端方前往，恐不能了此大事，宜简派威信素著之大臣，率同四川京官，抽调湖北、江南诸军约10营入川，以遏乱萌。

9月13日（七月二十一日）　民政部大臣桂春奏报，四川保路同志会代表刘声元已被拿获，即日押解回籍，并饬外城巡警总厅严禁聚众开会演说等事。

△　盛宣怀电请赵尔巽电商瑞澂，会同电奏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

9月14日（七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复函萧汉卫，四川革命军业已发动，全国各省当急起援应，将不待筹款之成，立即回国。

△　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开第三次联合会议，刘公主席，议决派居正、杨玉如二人赴沪邀黄兴和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谭人凤到汉主持大计。

△　清廷以四川数万人，四面围攻省城，命瑞澂严饬所派赴川军队，不分水陆，设法兼程前进，务令克日抵川，迅平此乱。

△　盛宣怀电云贵总督李经羲、贵州巡抚沈瑜庆，请调近川之处滇黔军队千人，入川镇压保路同志会。

△　四川同乡京官乔树枏、曾鉴、施愚等22人电四川各府厅州县，宣称铁路国有政策，使“国家兴利”，“不令吾民吃亏”，吁请同乡父老“从速解散”，静候查办，“万勿自误”。

9月15日（七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开缺两广总督、前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启程，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　内阁电端方，距成都附近之镇道内，如有可援军队，并希就近调遣，迅解城围。

△　鄂军第十六协三十一标共1400名军兵，由协统邓承拔率领乘“江和”轮离汉启程赴川，弹压保路运动。

△　邮传部奏准，审定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改良办法。

9月16日（七月二十四日）　居正、杨玉如受文学社、共进会委派赴沪，催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鄂主持大计，并携款到沪购买手枪，以备举事之用。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居正等连日在陈其美住所召集上海机关部会议，决定沪、宁同时发动，并由吕天民携函前赴香港，同黄兴联系。

△　四川温江同志军统领吴庆熙率部在辜家碾与巡防军激战六小时。越二日，又会同崇庆同志军西军统领孙泽沛在温江三渡水伏击新军，毙敌八九十人，彭县同志军首领刘丽生率众会合后，夜击清军于温江北街进行巷战。

△　福州轿夫数百人反对轿捐，举行罢工。船户聚众抗船捐。轿夫、船夫联合烧毁警局、警道署、审判厅、拘留所，释放监犯。19日始平息。

9月17日（七月二十五日）　四川旅沪保路协会开特别大会，到千余人，议决举代表面谒岑春煊，请勿带兵入川。

△　办理四川剿抚事宜岑春煊自沪电蜀中父老子弟、士农工商，望各安其业，一切未决之事，春煊一至，即当开诚布公，共筹维持挽

救之策。又电四川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自此电到后，地方人民，苟非实行倡乱，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亦不得擅行杀戮。

△　岑春煊电内阁代奏川事办法，并请抽拨滇兵两营随行入川，以备调用。

△　张鸣岐电邮传部，川代表在港煽动勾结，实为隐患，拟请设法妥商英使转电港督，请其驱逐离港。

9月18日（七月二十六日）　清廷电岑春煊，所陈川事办法尚合机宜，准拨滇兵随行入川，所有川省水陆各军及各省所派赴川援军，俟岑春煊抵川后统归其暂行节制调遣。

△　清廷命岑春煊未到任前，仍着端方督队趱程前进，迅解成都之围。

△　清廷命贵州巡抚沈瑜庆酌派得力兵队，迅即开拔抵川，暂由赵尔丰节制调遣。

△　赵尔丰电内阁请代奏，成都已陆续开市、开课，惟外县暴动纷纷继起，前仆后起，遍地皆是。我军兵本不足，难于充补，已有不暇兼顾之势，请饬下鄂督瑞澂，再增派步兵两标，克期驰援。

△　新疆巡抚袁大化以新疆地荒人少，财政支绌，奏请文武官员无论垦牧矿工，确有成绩者，分别奖叙。“并破除服官省分不准置买产业之例，以资鼓励，而广招徕”。

9月19日（七月二十七日）　岑春煊电内阁代奏治标治本之策。请明降谕旨，暂行酌量保释被押诸绅，为治标不可缓；敕下邮传部将收回国有各路商股均照十成现款给还，并由朝廷下罪己诏，为治本不可缓。“标本兼治，迎刃而解”。并告次日乘轮赴鄂。

△　广东归善县淡水圩梁子云宣传革命被捕，农民多人夺回梁子云，拆毁司署大门及酒捐公所。

△　清廷从御史路士桓奏，命各省督抚各饬所属，加意防范，遇有借川路为名开会演说情事，即行解散禁止，沿江沿海一带暨滇越各界，尤宜严防军械输入，接济四川同志军。

9月20日（七月二十八日）　清廷谕令赵尔丰严饬各军，分路剿办四川同志军。

△　赵尔丰电内阁请代奏，成都现已解严，人心渐觉安定。同志军最有势力者，惟温江县、双流县两处。“我军攻击，甚觉费手”。

△　岑春煊以成都同志军已被击退，赵尔丰力能镇压，是日电内阁代奏拟请收回成命，毋庸春煊再行往川。次日，清廷命岑春煊仍当遵旨迅速赴川，相机办理剿抚事宜，所请收回成命之处，着毋庸议。

△　江苏震泽县农民抢米，捣毁自治公所。

9月21日（七月二十九日）　端方行抵万县，并出示晓谕川人迅速解散。

△　清廷从赵尔丰奏，命军谘府迅速电商瑞澂，再增派兵两标，克期援川。

△　清廷从张鸣岐奏，派滇军分统候补参将黎天才统率两营前往四川。

△　闽省轿夫聚众抗收轿捐，焚毁巡警道署，释放囚犯，打伤巡士61人，清廷谕命闽浙总督松寿严行防范，查拿首要，尽法惩治，毋令再生事端。

△　浙江山阴县西塘“沙民”2000余人捣毁绅富数家。同日，江苏

吴江县农民聚众抢米。

9月22日（八月初一日）　端方电盛宣怀、载泽，指责岑春煊收回成命之请“不顾大局成败，且使朝廷无立足之地”，主张坚持铁路国有政策，反对清廷下罪己诏，并斥岑春煊此等居心乃专想作内阁总理。

△　荆州右翼副都统松鹤奏请罢邮传大臣盛宣怀，简派前督臣锡良或江苏巡抚程德全，前往四川查办。

9月23日（八月初二日）　赵尔丰电内阁代奏，报告川省战事。并谓新津、彭山已被同志军占领，成都附近各县到处有同志军，官军地广兵单，顾此失彼，势处两难。

9月24日（八月初三日）　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开第四次联合大会，讨论起义计划，到60余人，孙武为临时主席。会议通过军政府组成人员（总理为刘公）名单，确定10月6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迅电湖南焦达峰，同时发难。决定组织临时总司令部，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

△　武昌南湖新军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三营左队士兵与排长刘步云发生冲突，霍殿臣等拥入军火库内抢夺大炮，准备暴动，因无炮弹，霍等遂弃炮逃走。党人起义消息泄露，武汉戒严。

△　清廷命赵尔丰督饬军队，早日击散温江、双流两县同志军。

9月25日（八月初四日）　孙中山复函荷马李，告以四川保路风潮“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

△　办理四川剿抚事宜岑春煊自上海乘轮赴川。

△　清廷以温江、崇庆、新津、彭山等县为同志军所据，命赵尔

丰督饬军队迅速扑灭，并着端方督率鄂军前进。

△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电内阁，主张划分办理四川剿抚事宜岑春煊、署川督赵尔丰权限。岑驻重庆，办理东南镇抚事宜，或令驻宜昌。兵事仍听川督命令。并仍饬赵（尔丰）、端（方）勿得姑息长乱。

△　福建莆田县农民抗警捐，捣毁禁烟公所及各绅董家，各行罢市。

△　江苏元和县车坊乡农民数百人到县署报荒，并抢米店。

9月26日（八月初五日）　侯宝斋率四川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南郊回师，攻占双流，与周鸿勋所部会师新津。各方应召来新津者，号称十万，侯、周分任川南全军统领、副统领。

9月27日（八月初六日）　江苏苏州黎里乡农民数百人捣毁自治公所。

△　贵州巡抚沈瑜庆电盛宣怀，援川黔军统带董福开部已抵达重庆。

9月28日（八月初七日）　湖南同盟会会员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奏请开缺回籍。清廷不准。

9月29日（八月初八日）　岑春煊电盛宣怀，告已行抵武昌，表示川路如不全还路股，则仍必极力请退。

△　庆亲王奕劻奏请开去总理大臣管理外务部差缺。清廷不准。

9月30日（八月初九日）　黄兴致函冯自由，请转致孙中山，设

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四川保路运动。

△　湖广总督瑞澂致电邮传部称，在武昌与岑春煊论川事意见不合，岑所挟宗旨“则平川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请阻止岑春煊入川。如将“其所请各节，量为驳议”，则岑氏势必力辞，“趁此降旨照准”。

△　邮传部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订立《厦门鼓浪屿水线合同》。

是月　江西兴国州劣绅开煤矿侵占民田，附近居民数百人捣毁煤矿公司。

10月

10月1日（八月初十日）　清廷命端方饬令所派军队扼沿江驻守，严密防范，勿使四川同志军向东发展。

△　清廷命英人安格联为总税务司。原任赫德9月20日卒于英国。

10月2日（八月十一日）　浙江镇海县农民反对征收警捐，各行罢市。

△　岑春煊抵鄂，旧病复发，奏请开去差使。清廷命其暂缓赴川。

10月3日（八月十二日）　黄兴自香港函复同盟会中部总会，赞同武汉起义计划，并告以南洋筹款事尚难定行止，盼居正先来港一商。

△　四川同志军胡潭（重义）率队5000余人，占领嘉定府。

10月4日（八月十三日）　黄兴急电邓泽如等，告以武汉新军发

动在即，将往策应，请速筹款。

△　赵尔丰电内阁代奏，请饬湘抚于川湘接近之处，选派精壮兵队两三营，迅速援川。

△　清廷颁布国乐专章。歌词曰："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此系我国正式颁布之第一首国歌。

△　广（州）九（龙）铁路通车，全长163公里。

10月5日（八月十四日）　黄兴得居正由沪派人来香港报告，知武昌起义事在必行，是日致函旅居加拿大同盟会会员冯自由，请转电孙中山，急筹巨款助之。

△　清廷谕令本年九月四川谘议局常会俟军事稍定，道路畅通，即行召集开会。

△　外务部以意大利、土耳其两国宣战，通饬各衙门，饬令所属一体遵守中立。

10月6日（八月十五日）　黄兴致函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居正等，告以"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凡事先重计划，计划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

△　四川同盟会会员邓絜、邓树北等率革命军攻占屏山，宣布独立，旋失败。

△　清廷以川省同志军此起彼伏，蔓延可虞，命赵尔丰饬各军分路认真剿办。

△　湖广总督瑞澂恐党人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起义，下令武汉特别戒严。

10月7日（八月十六日）　黄兴致函美洲华侨伍平一、黄芸苏、李是男等，告以四川铁路风潮其势甚急，湘鄂军队极表同情革命，请竭力筹款。同日以同样之内容致函美洲致公堂及筹饷局。

△　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居正等在上海陈其美宅会商，派谭人凤当晚乘火车赴宁，约革命党人举事。

△　清廷命端方立即赴川，与赵尔丰妥筹布置一切事宜，到成都后，赶将路事妥速筹议具奏。

△　清廷命瑞澂、余诚格，于川湘接近之处，酌量选派得力湘军两三营迅速赴川，暂归端方、赵尔丰节制调遣。

△　清廷命张鸣岐，所有派往援川粤军着即回粤，暂缓入川。

△　川督赵尔丰致电内阁代奏，报告各地战事。略谓："灌县不守，知县被禁。汶川有匪数千人，烧毁县署，知县无着。川东各州县，多有请兵保护者。"又谓："邛州下路巡防第八营兵变，营官黄恩翰惨遭毙。"

△　清廷颁布《盐政院官制》，改盐政处为盐政院，管理全国盐务，以度支大臣载泽兼盐政院大臣。

△　清廷从江西巡抚冯汝骙奏，暂缓裁撤赣省防营。

10月8日（八月十七日）　端方电内阁，报告四川同志军活动情形。嘉定文（十二日，即10月3日）失守。"现在匪情，军多即避，军过则起，军弱则接仗"，请派重兵"节节防剿"。

△　清廷从张鸣岐奏请，命粤省防营暂缓裁减。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　共进会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总机关部配制炸药，不慎爆炸，孙面部受伤，被送往医院，俄捕

闻声前往搜查，捕党人刘同、王炳楚等，搜走党人名册、旗帜、印信、文告等。

△　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蒋翊武、刘尧澂（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获悉汉口机关失事，决定于当夜12时发动，拟定命令，以武昌南湖炮八标鸣炮为号，各营同时起义。

△　夜，武昌小朝街机关部遭破坏，刘尧澂、彭楚藩等被捕。此前，杨宏胜因演试炸弹爆炸，亦为巡警捕去。次晨，彭、刘、杨于督署门外遇害。

△　清廷以四川同志军近日蔓延多处，并有占据嘉定等城池之事，命赵尔丰严饬各军，迅将失守地方克复，并即与端方和衷商办，妥为布置，以期川乱早日廓清。

△　清廷命端方，彻底查明川省“商榷书”及“同盟符”。

△　清廷从岑春煊奏，准回上海就医。

△　赵尔丰电军谘府，告以省城附近州县温、郫、灌等处，“大约不下万人，日有围攻省城之惊”。“嘉定、眉州、彭山、仁寿等处，一片贼氛”。“由新津以西，直至清溪、荥经，地为匪据”。又谓：“小北川、顺庆、潼川一带同志会前往勾煽，亦有跃跃欲动之势。”请多派客军入川。

△　邮传部奏准西潼铁路收归官办。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义爆发。夜，共进会工程营总代表熊秉坤率领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城外塘角辎重营举火起义，由李鹏昇、余凤斋分别率队奔赴楚望台，占领凤凰山。文学社社员蔡济民、彭纪麟分率第二十九标、三十标，方兴、李翔东率陆军测绘学堂学生齐集楚望台。南湖炮八标徐万年、蔡汉卿率800名士兵进入中和门，同工程、辎重两营会师。各队起义新军共

约2000人，举工程营左队队官、日知会会员吴兆麟为总指挥，兵分三路于10时半进攻总督衙门，与清兵彻夜激战。瑞澂逃登“楚豫”舰，第八镇统制张彪率残部窜汉口。

△　清廷以鄂境粤汉川汉铁路接收完竣，瑞澂“办事明敏”，“不负委任”，是日，传令嘉奖。

△　清廷命赵尔丰激励将士，早日克复四川失守各地方，端方日内即可抵渝，着即会商该大臣，分路进剿。

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　武昌起义新军攻占总督署，武昌全城光复。是役，起义新军死伤20余名，督署守兵死40余名，伤30余名，旗兵共死500名，俘虏300余名。

△　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麟在武昌阅马厂谘议局召开会议，到革命党人及谘议局正副议长、议员及以绅耆共数十人，议长汤化龙主席，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鄂军都督，汤化龙为总参议，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都督黎布告》，宣布起义宗旨，号召推倒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

△　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致各省谘议局通电，告以武昌光复，望各省“同心响应”，“奋起挥戈”，“立举义旗”。

△　夜，清军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率兵百余人进攻都督府，都督府铨叙长李翊东指挥守卫80余人，击退郜兵。

△　孙中山抵美国科罗拉多州典华城，译读黄兴十余日前从香港发来之密电：“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

△　日知会会员梁钟汉发动湖北汉川举事，汉川光复。次日成立汉川军政分府，举梁钟汉为总司令。

△　四川同志军文显模等率二三百人占领隆昌县城，建立革命军

司令部，隆昌独立。

△　清廷从外务部奏，墨西哥、秘鲁专派驻使，西班牙、葡萄牙共派驻使一人（使馆设西京），巴西以驻法国使臣兼辖，以驻俄使臣兼辖瑞典，驻荷兰使臣兼辖丹麦。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　湖北军政府发出《布告全国电》等10道通电，宣告武昌光复，请即同时响应。同日，又电上海黄兴、宋教仁、居正来湖北，并请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

△　湖北军政府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声明清廷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各国既得权利及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同时宣布，此后清廷所为，“军政府概不承认”。

△　湖北军政府编组各军队成立四协，举宋锡全、何锡藩、邓玉麟、张廷辅分统之。20日复扩充分四协，派熊秉坤、杨载雄、涂镇坤、罗鸿升统领。

△　孙中山在美国典华城从报纸上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之报道后，决定放弃在美筹款计划，往纽约转赴英国从事外交活动。

△　清廷命湖广总督瑞澂革职，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并令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由陆军部大臣荫昌督率，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会同长江水师，即日赴援。

△　文学社赵承武率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二标二营在居仁门发难，响应武昌起义，光复汉口。14日，湖北军政府任命詹大悲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何海鸣副之。

△　文学社阳夏支部长胡玉珍率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二标一营起义，光复汉阳。

△　清廷为严防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命张人骏、程德全、朱家宝、冯汝骙加意防范，并令各省督抚严密侦防，以免海外革党潜入内地，滋生事端。

△　清廷命直隶总督陈夔龙、河南巡抚宝棻、署湖广总督瑞澂加派军队，认真保护京汉铁路，并令宝棻专派得力兵队，保护黄河铁桥。

△　清廷命赵尔丰严防川省响应武昌起义，并令俟黔湘军到，即分途剿办。

10月13日（八月二十二日）　　下午，湖北军政府开军事会议，黎元洪当众宣布赞成革命，“成败利钝，生死以之”。

△　湖北军政府派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亲信齐宝堂携黎元洪函渡江，招降张彪。遭拒。

△　清廷以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官张彪，仓皇弃营逃出，命即行革职，并着瑞澂责令迅速痛剿，克复省城。

△　孙中山由美国圣路易抵芝加哥，为芝加哥同盟分会代拟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通告。大会于15日举行，“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

△　胡石庵主编《大汉报》在汉口创刊。同日，《民国日报》在汉创刊。

△　河南巡抚宝棻派标统张锡元率新军二营、巡防一营抵汉口。张到汉因慑于革命军之声势，遂派人同革命军讲和，诈称归降。军政府派李国荣等携洋数千元犒赏豫军。

△　驻汉口英、法、日、俄、德五国领事举行领事团会议，接受法国领事罗氏建议，各国保持中立，对革命政府不加干涉。

△　清军第十七镇朱庆澜所部自10日进攻四川新津城，与同志军激战多次，是日攻陷县城。20日，清廷传旨嘉奖。

△　清陆军部大臣荫昌派员赴日使馆恳请青木少将由日本火急购买炮弹30万发，枪弹6400万粒，步枪1.6万支。16日，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复电日使伊集院，决定“予以充分援助”。

△　度支部奏准《调查官有产业简章》，凡10条。

△　两江总督张人骏奏准借洋款500万两，24日又奏准加借洋款200万两，均以应紧急军需。

△　俄国代理外长尼拉特夫电驻京俄使廓索维慈，借中国爆发革命之机，迫清廷“承认俄国在蒙古的既得权益”。

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日）　　清廷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

△　黎元洪派夏维松、李国镛至汉口晤各国首席领事俄领敖康夫，请其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

△　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居正奉黄兴命抵武昌，召集党人开会，议决即请谭、居二人速回上海，请黄兴、宋教仁来鄂，并促各省响应。

△　湖北军政府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请即时将停泊汉口租界六码头之“楚豫”兵舰（瑞澂伏处该舰）驱逐出境，希于24小时内答复，过时我军将开炮轰击。次日，革命军炮兵于武昌塘角射击“楚豫”舰，未几该舰即鼓轮向下游逃遁。

△　湖北军政府出示招募新兵，武汉工农踊跃从军。

△　柏林《每日报》刊载孙中山致英国金融界代表函，呼吁伦

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来亚等地财政金融界人士给予中国革命财政支持。同时表示："共和国承认满洲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

△　清廷补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

△　清廷命编组陆军第一、二、三军，派荫昌、冯国璋、载涛分别督率，以第一军赴鄂，第二军备调，第三军驻守近畿。

△　张謇至南京，促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湖北，并奏请清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越二日，张謇至苏州，与程德全再商奏稿，程乃联合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具奏，要求改组内阁，宣布立宪。

△　学部奏报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度），各省学生为162.672万人，岁出经费为2073.9992万两。

10月15日（八月二十四日）　湖北军政府据报荫昌所带队伍先锋已抵武胜关，是晚开会讨论作战计划，决先击攘汉口之敌，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

△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颁布"刑赏条例"告示及"豁免恶税"布告。

△　美国芝加哥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赴会者有留学界、工商界侨胞，极一时之盛。

△　同盟会会员、共进会会员刘英等率乡勇千余人在湖北京山举事，19日攻克天门县。

△　清廷命开去王人文川滇边务大臣，遗缺以赵尔丰充任；岑春煊未到任以前，着赵尔丰兼办川中剿抚事宜。

△　陆军大臣荫昌率队赴鄂剿办革命军，17日抵河南信阳。

△　清军统带马继增率步队第二十二标抵汉口江岸。20日，第三协统领王占元率队抵汉口滠口。

△　端方抵重庆。

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　湖北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凡六章24条。

△　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张樾任主笔。

△　黄兴自香港致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同人函，告以鄂军克复武昌，南方各省若不急起，不足以固后路，请“力汇巨款，协谋图粤”。

△　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密令伊集院向清政府表示，日本政府已采取措施，保证日商供给军火“讨伐”革命军，希望清政府改变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地位。

10月17日（八月二十六日）　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祭告天地、黄帝，行誓师礼。全军提枪三呼“中华民国万岁！”

△　黄兴自香港取道上海赴武昌，行前致函美洲筹饷局，“望海外同人尽力相助”。途中致电日人萱野长知，嘱“即采购炸药，携往武昌相助”。

△　驻汉口各国领事公推英领事馆职员潘恩持公函至武昌军政府谒黎元洪，声言领事团“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次日，驻汉英、法、俄、德、日五国领事正式会衔布告严守中立。

△　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抵汉口。20日，黎元洪致函劝萨镇冰率海军响应革命。

10月18日（八月二十七日）　湖北民军进攻汉口丹水池清军，

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开始。张彪率部与民军激战，民军失利，退至大智门一带，清军攻陷刘家庙。

△　孙中山在华盛顿致书美国务卿诺斯克，要求作一秘密会晤。

△　黄州光复。湖北军政府派黄楚楠、彭汉率同李长庚等往黄州（今黄冈）招抚，经与黄防营同志联络，于17日夜发难，清官吏先期逃匿，是晨黄州光复，成立鄂东军政府，黄、彭分任正、副主任。旋派兵将鄂城、蕲水、大冶、黄石、蕲州、阳新、广济等县一并收复。

△　四川保路同志会发布檄文声讨赵尔丰，要求川民“谨守秩序，不可夺城池，侮官长，打教堂，扰平民，以文明之义师，声讨赵逆之罪状”。

△　湖南同盟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等百余人在长沙密议，定于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起事。

△　荫昌致内阁代奏电，告以于17日率队抵信阳，暂设行营于信阳。

△　度支部奏请“试办宣统四年全国预算”，岁入银2.33956655亿两，岁出银2.1891959亿两。

△　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库存现银不敷备用，奏准向德华银行借银300万两。

10月19日（八月二十八日）　　民军攻克汉口刘家庙，清军退滠口。百姓闻捷，燃鞭庆祝，欢声动天。

△　文学社社员、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唐牺支等率赴川新军于18日夜在宜昌起义，是晨，宜昌光复。唐牺支任司令部长。

△　湖北军政府檄电各省汉人督抚，无拘君臣小节，复兴大汉河

山。

△　清廷谕令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归湖广总督袁世凯节制调遣。

△　清廷命荫昌、袁世凯、岑春煊、端方沿途宣布朝廷德意，妥为抚辑，并剀切晓谕军民人等，“勿为邪说所诱，随声附和；勿为谣言所惑，徒事张皇”。

△　清廷谕令各省绿营巡防队一律暂缓裁减。

△　端方奏劾王人文、赵尔丰，请予释放蒲殿俊等人。

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日）　湖北军政府颁布告示，为惩暴安良，特设执法支部。

△　孙中山自华盛顿抵纽约，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促其速率所部反正。

△　庆亲王奕劻派徐世昌到河南彰德与袁世凯密商，袁世凯提出就职条件六项：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起事之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

10月21日（八月三十日）　清廷命荫昌迅筹布置，妥速进攻革命军，并着炮队即日开赴前敌助剿。

△　清廷从袁世凯奏请，命副都统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军谘府正使、副都统冯国璋迅赴彰德，筹商一切；已开缺奉天度支使张锡銮、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山东军事参议官陆锦、直隶补用副将张士钰、直隶候补知府袁乃宽，均准其调赴前敌，差遣委用。

△　清廷从袁世凯奏，谕令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壮丁

12500人，编集25营，作为湖北巡防军，并令度支部拨款400万两。

△　清廷命李经羲、赵尔巽分别派拨数营援川。

△　张謇与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谓："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

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　湖南光复。同盟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率长沙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占领军械局围攻抚署，杀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巡抚余诚格潜逃。是晚，各界集谘议局，举焦达峰、陈作新为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

△　陕西西安新军起义，推陆军混成协司令部参谋官兼管带张凤翙为指挥，攻占军装局及各衙署，护理巡抚钱能训潜逃，西安将军文瑞率旗兵退守城中之城满城顽抗。

△　资政院第二次院会开会。协理大臣那桐宣读清廷谕旨，礼亲王代摄政王莅会致训词。

△　大学士陆润庠以军事孔棘、财力枯竭，奏请停办新政。

10月23日（九月初二日）　江西九江新军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于是夜10时率部起义，攻占道府两署，并湖口、马当两要塞，九江光复。次日成立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举马毓宝为都督。

△　陕西光复。西安新军攻破满城，文瑞自杀，钱能训被拘，前陕甘总督升允逃往甘肃，革命军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名义张贴安民告示，成立陕西军政府。

△　湖南都督府参议院成立，谭延闿为院长，颁布《参议院各项条规》，规定："参议院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府命

令须经该院同意并由该院发交各部执行。

△ 清廷命署江北提督段祺瑞酌带得力将弁，迅赴湖北前敌，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 陆军部同日本泰平组合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签订借款273.364万日元《武器买卖合同》。

10月24日（九月初三日） 黄兴抵上海。当晚晤宋教仁，历陈进取沪宁及武汉方略。

△ 清廷命拨出宫中内帑银赈济直隶、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湖南、广东各省水灾，每省三万两。

△ 日本内阁通过“关于对清政策”决议，其要旨为：一、设法延长满洲租借地期限，并取得一切铁路铺设权；二、维持日本在中国一切优越的经济地位，如有不测事件发生，日本政府当采取断然措施。

10月25日（九月初四日） 湖北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凡四章15条，规定撤销政事部，内政、外交等六局一律正名为部，并与军令、参谋、军务三部，均归都督统辖。

△ 湖南岳州（今岳阳）新军起义，岳州光复。

△ 清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由沪抵广州赴任，被党人李沛基炸毙。

10月26日（九月初五日） 孙中山在纽约秘密会见日人鹤冈永太郎，谈称：目前华中起义，系由本人所指挥；本人将于近期内经由伦敦转赴欧洲；预定自欧洲经印度洋返归亚洲；日本政府如能同意本人不更名而登陆，则将再度取道美国，经西雅图前往日本。

△ 蔡元培致函孙中山，联系在德国购炮，以作攻打北京之用。

△ 资政院奏请严惩盛宣怀、赵尔丰、瑞澂，妥拟铁道国有法案

及铁路公债条例，释放四川谘议局议长等，招抚川鄂乱民，组织责任内阁，提前于明年召集国会。

△　资政院上奏弹劾盛宣怀，清廷命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日补授唐绍仪为邮传部大臣，未到任前，由吴郁生暂行兼署。

△　清廷命开释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九人，前护四川总督王人文、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内阁议处。

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　汉口民军自刘家庙进攻，攻至三道桥附近，清军分两路反攻，民军退守刘家庙。复敌舰三艘助战，民军自刘家庙败退，至大智门。民军临时总指挥张景良逃匿，后为兵士诛毙。下午，清军再攻，民军伤亡千余人，复退至歆生路及刘家花园一带。

△　云南腾越同盟会会员张文光联络新军、防营起义，总兵自杀，官吏逃散。越二日，张文光被推为滇西都督。

△　清廷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

△　清廷命荫昌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再行回京供职；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　清廷拨宫中内帑银100万两专充湖北军饷。

△　度支部奏报军需紧急，与法国资本团代表男爵勾堆、华法公司代表甘锡雅草签9000万法郎借款合同，年息6厘，60年还清。

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　黄兴、宋教仁等由沪到武昌。黄兴到都督府与黎元洪会商军事，被推为全军总司令，当夜渡江赴汉口前线督师，设总司令部于满春茶园。

△　汉口民军自歆生路反攻清军，居正督师，下午克大智门车站，追击至刘家庙遭清军机枪猛击，死伤甚众，居正中弹受伤，复退回原阵地。

△　湖南军政府派王隆中率第四十九标出发赴鄂，11月2日抵汉。

△　湖北施南革命党人向炳焜等发动新军管带李汝魁等反正，获得成功，是日施南反正。李被推为分司令部长。

10月29日（九月初八日）　　山西光复。太原新军起义，攻占抚署，杀巡抚陆钟琦，太原光复，成立山西军政分府，举标统阎锡山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

△　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与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电奏要求改革政治之“政纲十二条”，请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　同盟会会员、四川东路革命军副统领王天杰与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共同策划，决定率荣县同志军撤离成都回师荣县，知县闻讯仓皇出逃，王、吴召开大会宣布荣县独立，举同盟会员蒲洵主持民政。

△　上海《民立报》刊载《鄂人致袁世凯书》，敦促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作“汉族之华盛顿”。

△　上海市面遍传“江南公民”致江督、皖抚、苏抚书，劝“明建义旗，宣告独立”。

△　袁世凯派刘承恩致函黎元洪，要求早息兵事，和平了结。次日都督府开会讨论，孙武、胡瑛主张复信谈判，以反对者众遂作罢论。

△　清廷谕张人骏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

△　资政院呈递封奏三件：一、请组成完全内阁；二、请资政院协赞宪法；三、请速开党禁。

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　　云南昆明爆发重九起义。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与同盟会员、新军军官李根源、唐继尧等决定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并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当夜，蔡锷指挥昆明新军起义，次日进攻军械局、总督署，及五华山清军阵地。

△　湖南都督焦达峰在谘议局召集会议，商讨都督府各机关之组织，议决取消参议院。

△　湖南都督焦达峰派杨任（晋康）为西路招抚使，前往常德招抚，是日杨率50余人抵常德，商民揭白旗欢迎，常德光复。

△　湖南宝庆（今邵阳）同盟会会员邹永成等联络巡防营起义，知府、知县均逃走，宝庆府城光复，成立宝庆军政分府，推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

△　清廷下诏罪己，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表示同全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　清廷从资政院奏，拟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

△　清廷命溥伦等依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钦定颁布。

△　清廷从资政院奏，开放党禁，赦免党人。

△　资政院总裁、大学士世续“因病乞休”，清廷允之。同日以学部右侍郎李家驹充资政院总裁。

△　清兵舰三艘炮袭武昌，遭民军回击，激战数小时，清舰始向下游退去。同日，清陆军据硚口炮击汉阳兵工厂。

10月31日（九月初十日）　江西光复。南昌新军起义，占领各衙署，巡抚冯汝骙逃走，次日成立江西军政府，推协统吴介璋为都督。

△　蔡锷指挥昆明起义新军攻占军械局、总督署，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处决，总督李经羲护送出境，昆明光复。

△　湖南立宪派煽动黄忠浩残部在长沙发动政变，杀副都督陈作新于北门口，又拥至都督府杀都督焦达峰，迎谭延闿为都督。

△　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两件：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

△　清军向汉口民军左翼硚口一带，右翼张美之巷，中央阵地满春茶园一带，分途攻击，战至下午6时，民军不支，放弃汉口，退守汉阳。

△　孙中山自美国纽约电旅居伦敦之荷马李将军，告以即将回国组织政府，并托其在英洽商贷款。

△　宋教仁自武昌致函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等，告以武汉战事吃紧，望南京、安徽尽速行动，以牵制清军。

△　湖南衡州同盟会会员周果一发动会党起义，衡州知府兼衡永郴桂道禄显逃走，衡州光复。

△　袁世凯自彰德南下抵信阳接任视事。荫昌返京。

△　清廷命余诚格赶速召集湘军旧部，举大绅旧将统之，一面扼

守衡永宝附近，一面进攻长沙，以期早日规复。

△　清廷准河南自行开铸当十铜圆，以应鄂豫军需。

11月

11月1日（九月十一日）　清军冯国璋部攻占汉口，黄兴率民军退守汉阳。清军在汉口市区纵火焚掠，火势延烧三日不止，繁华商店化为焦土。

△　孙中山自纽约电荷马李，告以黄兴已安抵汉口，国内形势大有改善。明日可乘轮赴伦敦。

△　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钮永建、李平书等集议，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行动方案，以支援武昌。

△　袁世凯第三次致书黎元洪，提出清廷已下罪己诏，决定实行立宪，要求黎“务宜设法和平了结”，保证“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

△　清廷准奕劻内阁辞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织完全内阁，仍节制调遣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

△　清廷以庆亲王奕劻充弼德院院长，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协办大学士荣庆充弼德院顾问大臣；以前两江总督魏光焘为湖广总督，以荫昌为军谘大臣，仍暂管陆军大臣事务。

△　清廷据奏报，京师市面日见恐慌，令民政部亟行出示剴切晓喻，以安定人心。

△　留日学生及沪宁等地学生300人乘日本“大利丸”轮到汉口，加入民军。

△　云南临安（今建水）新军七十五标起义，次日成立南军军政府，推民军统领朱朝瑛为统领，新军教练官、革命党人赵复祥为副统领。

△　安（东）奉（天）铁路全线通车。

11月2日（九月十二日）　黄兴自汉阳返武昌，与黎元洪共商应敌之策，并在军政府紧急军事会议上报告军情，会议举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民军总司令。

△　孙中山自纽约赴伦敦。

△　清廷命资政院起草《大清帝国宪法》。

△　清廷谕湖广总督魏光焘未到任前，以前署江北提督王士珍署理。

△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自石家庄电内阁及资政院，请大赦革命党，速停战争，饬冯国璋军队退出汉口，愿只身赴鄂，以扶危局，并严惩在汉口烧杀之清军将领。

△　苏、浙、闽三省旅沪人士在《民立报》刊登《警告苏浙闽父老书》，反对清廷以三省地丁作抵押，为筹措军费，向外人借款1200万元。

11月3日（九月十三日）　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举行登坛拜将仪式，将战时民军总司令印信、委任状授予黄兴。下午，黄兴率参谋人员到汉阳接防备战，设总司令部于汉阳昭忠祠。

△　同盟会会员陈其美率领商团、学生、敢死队及部分军警在上海举事，进攻江南制造局。陈只身进入局内说服该局总办张士珩及兵士投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起进攻，各处民众及反正军队争先往援。

△　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改原谘议局为省议会，张惟聪为议长。

△　清廷依资政院奏，颁布《宪法信条》，凡19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26日又以宪法19信条宣告太庙。

△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自石家庄电告军谘府、陆军部、资政院，凡有运往战地军火、子弹，暂行扣留，以消战争而保和平。

△　驻沪英总领事法磊斯派“万国义勇队”侵占沪宁铁路，并借口“中立”，禁止民军经该铁路运输军队、军火。5日被迫退出沪宁路车站，该路交由民军管理。

△　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以“上海局势危急”电英海军部要求同美、日、德、法等国会商，各派1500名步兵来沪，保卫租界安全。驻华日、德海军司令亦以同样内容，电各该国政府。

△　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伊集院，告以“政府方针是务必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望遇事依此方针妥善处理”。

△　上海《时务报》总理汪康年病逝于天津。

11月4日（九月十四日）　上海光复。上海商团及部分军警攻占江南制造局，张士珩逃走，陈其美遇救，光复会会员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驻局办事。

△　吴淞光复，设吴淞军政分府，举黄汉湘为总司令。9日由李燮和继任总司令。

△　贵州光复。自治学社党人张百麟运动贵阳新军及陆军大学堂学生、哥老会起义，巡抚沈瑜庆出逃，军学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宣布独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举同盟会员新军教练杨荩臣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

△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自石家庄至娘子关与山西军政府都督阎锡山会晤，议定组织燕晋联军，直取北京，推翻清廷。吴被举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燕晋联军副都督兼副总司令。

△　云南大理光复，成立迤西自治总机关部，举赵藩为总理（未就），由云龙、李福兴为协理。

△　清廷准袁世凯奏请，令汉口各军停止前进，并命各统兵大员宣布朝廷德意，妥速安抚。

△　清廷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山西巡抚。

△　驻泊上海清海军“南琛”等各舰艇反正。

△　驻沪美国水兵450人上岸游行示威，虹口一带日水兵群集“护守”。法国商团、巡捕及水兵在租界日夜巡行。

11月5日（九月十五日）　浙江光复。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赴杭州联络党人与新军约期起义。4日晚新军分路进攻各衙门，蒋亲率敢死队猛攻抚署，俘巡抚增韫，省城光复，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成立浙江军政府，举汤寿潜为都督。

△　江苏光复。江苏巡抚程德全应苏州绅商各界之请，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军江苏都督府”，程德全为都督。

△　山东谘议局议长夏继泉召山东各界联合会开会，议决八条，要求清廷罢战，接受革命军要求，宪法定中国为联邦政体，本省自由规定本省宪法及练兵。巡抚孙宝琦允代奏。

△　浙江宁波光复，成立宁波军政分府，举新军统领刘询为都督。

△　浙江绍兴光复，成立军政分府，推原任知府程赞清为民政

长。

△　四川龙泉驿新军队官、同盟会会员夏之时起义，众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当即率兵东下，直趋重庆。

△　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同盟会会员郑彼岸发动前山新军起义，进兵石岐城，占领县署，香山光复。

△　清廷以资政院奏请速开国会，谕令迅速拟定议院法、选举法办理选举，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

△　清廷准资政院奏请开放党禁，所有此次革命党人均着按照法律改组政党。

△　清廷从资政院奏请，命袁世凯迅速确查，将惨杀人民及焚烧街市之汉口官军按律治罪，人民损失财产由国家一律赔偿。

△　江亢虎在上海改中国社会主义同志会为中国社会党，通过“党纲”两项，“政策”七项。主张土地及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

11月6日（九月十六日）　　沪军都督府（亦称上海军政府）成立，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兼任，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任外交总长，李平书任民政部长，沈缦云任财政部长，王一亭任交通部长，毛仲芳任海军部长。

△　章太炎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称“探悉大革命家孙君逸仙已于前日乘船回国，不日即可抵埠。请贵处派员妥为招待，以便与之协商北伐攻宁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苏民困”。

△　江苏无锡光复，举同盟会会员秦毓鎏为军政分府总理。

△　江苏松江府光复，成立松江军政分府，推钮永建为军政部长。

△　江苏清江浦新军攻占淮阳道署，全城光复，12日举蒋雁行为江北都督。

△　江苏太仓、昆山光复。

△　浙江湖州光复，举沈谱琴为民政长。

△　清廷开释前谋刺摄政王载沣之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遣。

△　梁启超自日本返国。行前三日致书徐勤（君勉），谓此行目的，乃假手资政院，取“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方针，实现“拨乱反治之大业”。

△　张謇电告袁世凯，清廷有“他狩之说”，促其迅速北上，“入定京师”。

△　清廷命袁世凯迅速来京，所有前敌事宜，着先交署湖广总督王士珍接办。

△　清廷命张勋充会办南洋军务大臣。

△　清廷授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宣抚大臣，驰赴长江一带，宣布朝廷德意。

△　清廷令李纯为第六镇统制官，潘矩楹署第二十镇统制官。

△　清廷命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暂行署理四川总督。

△　清廷准天津向各洋行商借银200万两，以本省实业官股及烟酒税为抵押，一年归还。

△　驻沪领事团开会，借口清廷已不履行职权，议决将上海关税收暂交英商汇丰银行代管。

11月7日（九月十七日）　广西光复。桂林新军将领拥巡抚沈秉堃独立，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桂军为国民军，以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

△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死难。

△　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织政府意见，以便各国承认为交战团体。

△　黎元洪接见清方信使刘承恩，提出说和必须推倒清廷，并表示管皇族吃穿居住。

△　镇江光复。江苏镇江新军于岘凉山起义，围攻镇江城，驻防副都统载穆自杀。次日全城光复，成立镇江军政府，举同盟会会员林述庆为镇江都督。

△　江苏扬州贫民孙天生联合驻防清军起义，光复扬州。次日，孙天生以扬州军政府都督名义颁发文告。20日清缉私营统领徐宝山攻杀孙天生，成立扬州军政分府，徐为军政长。

△　浙江嘉兴光复。浙江军政府派新军赴嘉兴，赶走巡防营统领沈棋山，成立军政分府，同盟会会员于笥任民政长。

△　浙江衢州光复。

11月8日（九月十八日）　安徽光复。安庆士绅在谘议局开会宣布安徽独立，举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　资政院开第八次会议，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　张謇致电袁世凯，请其赞同共和，“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

△　清廷谕准河南巡抚宝棻奏请，派农工商部右丞袁克定赴河北

一带召募防军，办理团练。

△　湖南军政府第二批援鄂湘军第二协四个营由甘兴典率领到达汉阳，驻美娘山、三眼桥至扁担山一线。

△　两广总督张鸣岐（由胡铭盘代表）召集各界在谘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独立。

△　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部起义，自秣陵关进攻南京雨花台，因弹药不济，分向镇江、芜湖退却。

△　江苏南通独立，成立通州总司令处，推张謇为总司令长。

△　江苏常熟、江阴光复。

△　浙江温州光复，成立温州军政分府。

△　英公使朱尔典电告英外交大臣葛雷，英领并未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同时并通知驻汉领事葛福，英国目前不宜承认此事。

11月9日（九月十九日）　广东独立。广州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到数千人，议决宣布共和独立，举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蒋尊簋为军事部长。旋因发现张已逃往沙面，龙不允就任，改举胡汉民为都督，胡未到任前，蒋尊簋为临时都督。

△　福州新军起义，福州将军朴寿率驻防旗兵2000余拒抗，双方接战，旗兵不支乞降，闽浙总督松寿自杀。

△　黎元洪再电独立各省，请速派全权代表来鄂会议组织临时政府。

△　黄兴致函袁世凯，劝袁“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表示南北各省当“拱手听命”。

△ 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 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发动淡水起义，是日光复惠州，清提督秦秉直献城归降，举陈炯明为惠州军政府总司令。

△ 驻虎门清军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部队反正，集所部舰队于省河，迎新举之都督胡汉民归省接任。

△ 安徽合肥光复，成立军政分府，推党人孙万乘为司令。

△ 安徽芜湖光复，成立芜湖军政分府，举吴振黄为总司令。

△ 江苏常州光复，成立常州军政分府，举同盟会会员何键为司令，屠敬山为民政长。

11月10日（九月二十日） 福州清旗兵反攻，民军再战，败之，朴寿被杀，旗兵缴械降，省城光复。次日，军政府成立，举孙道仁为都督，传檄各州，克期反正。

△ 福建厦门光复，次日成立厦门军政分府。同盟会会员张海鹏被推为统制。

△ 广东汕头光复。

△ 清廷授世续总管内务府大臣，开去继禄总管内务府大臣。

11月11日（九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由纽约抵英国伦敦。在伦敦逗留期间，与吴稚晖研究建国大计，计议仍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 上海都督陈其美分电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并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旋程、汤迅即复电赞同。

△ 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主在上海设立临

时会议机关，并拟订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四条。

△　广东潮州光复。

△　清驻汉口兵舰“海琛”、“海筹”、“海容”三大舰，及“江贞”、“楚豫”等舰，鱼雷艇“湖鹰号”驶往九江，于途中起义。

△　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廷幹至武昌与军政府洽和，刘、蔡声称只要赞成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争。军政府请刘、蔡转达袁氏，倘能赞助共和，将推为汴冀都督。

△　清廷命军谘大臣毓良开缺，以大学士徐世昌充军谘大臣。

11月12日（九月二十二日）　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分电各省代表赴沪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　镇江都督林述庆电上海军政府，同盟会会员张海珊被推为统制。主由各都督特派代表在沪开特别大会，公议建设政府地点，并举临时大总统。

△　奉天国民保安公会成立，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伍祥祯为副会长，通过独立宣言书12条。

△　江西都督吴介璋辞职，由彭程万继任。

△　浙江军政府以上海都督陈其美倡议组织联军会攻南京，即成立浙军混成支队，朱瑞为支队长，是日自杭州出发，加入苏浙联军序列。

△　湖北军政府派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23日，季率属员抵沔阳县仙桃镇设立行署。

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在伦敦委托英国维加炮厂

总理道生为代表，往晤英外相葛雷，递交一份由孙中山与荷马李共同签署的备忘录，表示中国政府与英、美结成联盟。并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中国的革命政权，而在孙中山担任总统的新政府成立后，将给予英、美超过其他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种种特权。

△　沪督陈其美电光复各省，请派代表赴沪议建临时政府。

△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在镇江设司令部，以陶骏保为参谋长。先后加入联军序列之各军为镇军、浙军、苏军各3000人，淞军、沪军先锋队各600人，以及松江、江阴等地之巡防营，总兵力万余人，决定四路会攻南京。

△　山东绅商学界开联合保安会，议决独立，设临时政府，举巡抚孙宝琦为大总统，贾颉卿为副总统（旋改大总统为大都督）。

△　山东烟台光复，举“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司令。

△　安徽大通光复，设立军政筹议局，举九江军政分府黎宗岳为首领。

△　清驻镇江“镜清”等13艘兵舰宣布起义，27日在镇江军政府开海陆联军联合大会，誓师会攻南京。

△　江苏高邮光复，举王梓为军政事务所长，黄国栋为军政司令长。

△　拉萨驻藏新军起事响应革命，拘留清驻藏参赞、统领，旋攻占清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官署，抢劫军火、库银。

△　袁世凯自汉口率队抵京。

△　清廷命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军队，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 清廷令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

11月14日（九月二十四日） 江苏都督程德全电各省都督，公请孙中山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

△ 清廷召见袁世凯，命勿再辞，敦促到阁办事。

△ 清廷命各省公举代表三五人克期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

△ 清廷派张謇、汤寿潜、江春霖、谭延闿、梁鼎芬、赵炳麟、乔树枏、谢远涵、柯邵忞、渠本翘、王人文、高增爵分别为苏、浙、闽、湘、粤、桂、川、赣、鲁、晋、滇、陕省宣慰使，迅赴各属，宣布朝廷实行改革政治宗旨。

△ 署湖广总督王士珍因病解职，清廷任段芝贵暂护湖广总督。

△ 清廷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

△ 清廷命开缺驻奉天第二混成协蓝天蔚统领官，以聂汝清接充，并赏给陆军都统衔。

△ 湖北军政府派代表李国镛、孙发绪、夏维松在汉口俄领署与清军代表王遇甲（第四镇统制）、易甲鹏会谈，鄂方主建立民主共和，清方表示此与宪政不合，不能协议。

△ 湖北郧阳光复。驻守郧阳新军后队官沈权在地方参事会支持下筹划反正，是日参事会邀各界人士集会，议决成立军政分府，知府伍铨萃因表同情，被推为分府总裁，沈权任司令官。

△ 江苏徐州光复，成立军政分府，在籍道员段书云为民政长，原十三协统领徐占凤任军政长。

11月15日（九月二十五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等七处代表参加，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电伦敦孙中山，敦请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

△　杨度、汪精卫在天津组织“国事共济会”，发表宣言，主张双方停战，召开临时国民会议，公决君主、民主政体。

△　安徽寿州（今寿县）革命党人张汇滔、王庆云等发动武装起义，清文武官吏潜逃，寿州光复。旋成立淮上军司令部，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张伦、袁家声为副总司令，并兵分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光复六安、怀远、凤阳、蚌埠、霍丘、阜阳、涡阳等地。

△　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电英驻华公使朱尔典，表明英对袁世凯“怀有极其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自伦敦电民国军政府，告以已循途东归，并谓“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

△　黄兴下令反攻汉口，当夜亲率民军分三路自汉阳渡河反攻，主力队占领居仁门一带，清军向刘家庙退却。

△　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在镇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商进攻南京方略。浙军由中路自麒麟门攻占紫金山；苏军任南路由句容占雨花台炮台；粤军攻北路占乌龙山、幕府山两炮台；镇军攻占天堡城炮台。总兵力约两万人。

△　袁世凯组织内阁，推举国务大臣：外交梁敦彦（胡惟德暂

署），民政赵秉钧，度支严修（绍英暂署），学务唐景崇，陆军王士珍（寿勋暂署），海军萨镇冰（谭学衡暂兼署），司法沈家本，农工商张謇（熙彦暂署），邮传杨士琦（未到任前由梁士诒暂署），理藩达寿。

△ 吉林保安会成立，以巡抚陈昭常为会长。

11月17日（九月二十七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电请黎元洪、黄兴，即派代表来沪与会。

△ 奉天党人组织奉天省联合急进会，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李德瑚、张根仁为副会长。

△ 清廷以第二军总统段祺瑞署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以前陕甘总督升允署理督办陕西军务。

△ 杨度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上陈情书于资政院，建议南北双方停战，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旋资政院于下旬三次讨论此陈情书，无结果。

△ 黑龙江保安会成立，以巡抚周树模为会长。

11月18日（九月二十八日） 九江都督马毓宝派海陆军总司令李烈钧抵安庆，被举为全皖大都督。嗣因当地官绅反对，李于28日返回九江。

△ 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各省，筹组北伐联军，共分三军，由京汉、津浦及海道分路进攻。

△ 梁启超电袁世凯，恳辞司法副大臣，并建议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政体问题。

△ 张謇电清内阁，主张共和，促请清帝退位。

△　日公使伊集院往访袁世凯，探询袁对时局之方针。袁主中国应行君主立宪政体，日使表示“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

11月19日（九月二十九日）　黎元洪通电各省都督，中央临时政府暂分七部：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政、司法，其外交首长除多数省仍已举伍廷芳、温宗尧外，其余各首长应请协举电知，并推举张謇为财政首长。

△　宁夏银川会党首领刘华堂率民军举事，清兵及贫民响应，宁夏道台、知府逃匿，宁夏光复。21日成立革命军政府。12月19日，陕甘总督长庚率部攻宁，起义失败。

11月20日（九月三十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各代表所推定之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

△　下午，袁世凯会见英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两人就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各自发表见解。莫氏极力说明君主立宪制不适于当时的中国，而袁则认为共和制会导致瓜分之祸。

△　奉天庄河、复州联庄会首领顾人宜在顾家岭率众举事，27日庄河军政分府成立，顾任关东第一军司令。

△　袁世凯派代表刘承恩与黎元洪代表孙发绪在汉口俄领署谈判“议和”，未成协议。22日，俄领敖康夫提议双方先罢兵，后议和。

△　香港印刷工人为抗议殖民当局逮捕该业同盟会首领，举行同盟罢工，是日起英、汉、日文报纸全部停刊。

11月21日（十月初一日）　孙中山自伦敦抵巴黎。居留期间孙中山还访问过《欧洲信使报》，并接受巴黎《日报》记者的访问。孙

中山表示：一、中国同欧洲一般大，不适合中央集权，拟仿照美国实行联邦制。二、欢迎外国资本及工程师为中国开矿及筑路等。三、将在中国实行五权宪法。四、尊重清政府与外国所缔结的条约及借款。

△　袁世凯答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问，声称一旦灭除清政府，恐起内乱，召干涉瓜分之祸，主张君主立宪保全中国。

△　清军由蔡甸进攻汉阳，民军失利，退守三眼桥。同日，黑山对岸清军架设浮桥，以备偷渡，被民军炮火击毁。

△　广西军民联席会议议决推陆荣廷为广西大都督，军政府设于南宁，陆自率兵北伐，由民党通电促王芝祥离开广西。

△　川北民军攻占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举曾省斋为蜀北都督。

△　中华银行在上海开业，沪军政府创办，资本500万元，官商股各半，开始发行军用票及定额1000万元之公债。

△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清外务部，借口保证偿付到期各国外债与赔款，要求将中国所有各口岸关税收入完全置于总税务司控制之下。27日，外务部复照同意。

11月22日（十月初二日）　　重庆同盟会会员张培爵联合起义新军夏之时部光复重庆，成立蜀军政府，举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并通告全国，公布《蜀军政府纲领》，凡10章51条。

△　四川布政使尹良等与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在成都签订《四川独立条约》，凡30条，赵尔丰提出11条，蒲殿俊、罗纶等提出11条。

△　清军自蔡甸、舵落口西、北两路分向汉阳三眼桥及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北路清军由汉口灰面厂渡河占琴断口。

11月23日（十月初三日）　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到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大会据居正之请，议决同赴湖北组织政府。

△　孙中山访问法国众议院，向议员提出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的要求。

△　孙中山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谈话，商谈法国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借款事，遭拒；要求代转法政府施加影响，阻止日俄两国结盟，亦遭拒。

△　驻北京各国外交团电汉口领袖领事，谓各国外交团代表对于清政府感情甚恶，因其残杀无辜，惨无人道，以致各国愤怒。各代表请鄂军政府担负汉口租界交涉全权，并向清政府要求重大赔偿。

△　北京外交团会议，借口形势危迫，决定向北京增兵。增兵员额，以1901年所保持的人数为准。

11月24日（十月初四日）　孙中山由马赛乘船回国，未了之事，由同盟会会员胡秉柯代办。

△　山东取消独立。28日，孙宝琦电清内阁，声称前次独立“自系误会”。

△　伍廷芳、张謇等致电忠告摄政王载沣，谓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君主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倘能幡然改悔，共赞共和，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　广西副都督陆荣廷通电全国，宣布沈秉钧率师往援湖北，都督一职由己接任。

△　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乌龙山炮台，乘夜往攻幕府山炮台。

△　湖南军政府派总指挥官刘玉堂率步队一协抵鄂，进驻汉阳，

攻击仙女山清军，当夜刘玉堂中弹阵亡。

11月25日（十月初五日）　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幕府山。下午占领南京马群、孝陵卫一带。

△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有一人留沪，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后会援。

△　清廷命张謇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共和政体及政治改革事宜。

△　清军攻陷汉阳三眼桥、汤家山、仙女山、美娘山、锅底山、扁担山、磨盘山，民军退守十里铺。

△　湖北安陆新军起义，进攻府署，知府满人桂荫仓皇逃出，随即成立军政府，新军二十九标三营管带张楚材自称大总裁。

△　四川万县同盟会会员熊晔等策动该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反正，称下东副都统，万县光复。

△　日海军大臣斋藤电训第三舰队司令官川岛，汉阳铁厂“与帝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清军或革命军如欲破坏，“应立刻派出陆战队担任警护”。

11月26日（十月初六日）　袁世凯会见英公使朱尔典，请出任调停，表示愿与武汉达成停战协定。朱尔典电令英驻汉总领事葛福，将此意转告黎元洪。

△　清军自汉阳磨盘山、仙女山向十里铺进攻。下午，十里铺、黑山相继复失。援鄂湘军第一协退武昌，湘军第二协退鹦鹉洲旋即返湘。

△　四川内江光复，举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为行政部长。

△　同盟会员杨兆蓉、邓西林等运动川南防军、永宁道卫队及炮队起义，并促永宁道刘朝望反正。是日泸州光复，成立川南军政府，举刘朝望为都督。

△　同盟会会员卢师谛自武汉回川，联络巫山团防孙吉五及巡防军百余人在夔府发难，是日扣押夔府知府，夔府光复。

△　山西巡抚张锡銮抵石家庄与段祺瑞晤商防剿事宜。

△　梁启超密函杨度，表示“确信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

△　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告驻奉天总领事落合，帝国政府决定向京津地区增兵，合该地原有华北驻屯军共为1243名。

11月27日（十月初七日）　　成都光复。赵尔丰被迫宣布四川自治，交出军政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　清军自黑山之线向汉阳进攻，克龟山，民军不敌，汉阳失陷。

△　黄兴返武昌，在军政府紧急军事会议上报告汉阳失守经过，并主放弃武昌，往援南京。张振武等主坚守武昌，获通过。

△　黎元洪电各省都督，告以汉阳失守，请速派兵援鄂。

△　黎元洪派外交次长王正廷往访驻汉美总领事顾临，请其斡旋停战三日，并表示愿接受“建立君主政体”，与“官军议和”，如遭拒绝，“即无条件让出武昌城”。

△　广东都督胡汉民命姚雨平组织北伐军，任命姚为北伐军司令。

△　镇江都督林述庆电请各省都督会同加电闽、粤，“拣选劲旅就海道猛攻天津，直捣伪京，以图牵制汉阳北军……以救危局”。

△　江西军政府派冯嗣鸿率步队一协援鄂抵湖北黄州。黎元洪饬即分驻阳逻仓子埠一带。

△　湖北沙市光复，清旗兵向荆州退去。

△　入川鄂军在资州杀川督端方，全军反正，拔队东下。

△　清外务部暂署副大臣曹汝霖访晤日公使伊集院，告以关东临时都督蓝天蔚在大连准备举事，东三省各地十数处亦有随时举事之势，“请电致本国政府转饬有关当局予以相当援助”。

△　清廷命撤销第三军，所有各营交袁世凯调遣。

11月28日（十月初八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电武昌黎都督，报告赴鄂代表本日启行；通电各省都督府谘议局，报告各省代表赴鄂议组织临时政府，沪设通信机关于西门江苏教育总会。

△　黄兴辞职赴沪，军政府以蒋翊武护理战时总司令，守御武昌。

△　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发布各军联合攻南京城命令，规定夜12时开始实行。

△　安徽各界公举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为都督。

△　驻湖北老河口新兵与会党举义，光化光复。

△　民军游击队占领湖北黄陂县城。越二日，清兵来攻，黄陂失陷。

△　江苏常熟“千人会”抗租举事，举孙二为都督，宣布抗租宗

旨，焚毁地主住宅。旋遭江苏都督程德全镇压失败。

△　陆军第二镇统制马龙标因病解职，清廷以陆军统领王占元充之。

11月29日（十月初九日）　　黎元洪派特使往访驻汉英总领事葛福，要求先行停战三天，以便商谈长期停战条件。葛福当即转知冯国璋，冯提出完全交出武昌城等三项谈判条件。

△　浙江都督汤寿潜电黎元洪，协举中央临时政府各部首长：内务程德全、教育章太炎、财政张謇、交通詹天佑、军政黄兴、司法汪精卫；并主改各部名称：内务为内部，外交为外部，教育为学部，财政为计部或户部，交通为邮部，军政为军部或仍兵部，司法为法部。

△　袁世凯之子、农工商部右丞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持汪精卫函往见黎元洪，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立即召开会议，军政府表示赞同。

△　梁启超再电袁世凯坚辞司法副大臣，并建议清廷“皇室定姓，改号中国”，并召集国会，“以顺舆情定国体”。

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继续开会，公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答复清军统领冯国璋停战条款。

△　江浙联军进攻南京紫金山天堡城。

△　清军炮击武昌，督署被毁，黎元洪拟奔葛店，旋由张振武等追及，阻止于洪山附近。

△　湖北襄阳光复，成立襄阳军政分府，举张国荃为总司令。

△ 江西援军3000人抵鄂。

△ 清第三镇统制曹锟率部自奉天抵天津。

12月

12月1日（十月十一日） 江浙联军与南京清军经一昼夜激战，是晨6时攻克天堡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托美领事求和。

△ 黄兴自汉阳抵上海。当日接见《民立报》记者，告以“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上之统一”。

△ 各省代表联合会致电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否认资政院代表民意，“并请万勿再持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歧说，以为全国舆论之公敌”。

△ 广东都督致电黎元洪，提议临时政府各部长人选。计内务汤寿潜，军政黄兴，财政张謇，司法王宠惠，交通詹天佑，教育汪精卫，外交伍廷芳。

△ 汪精卫邀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在天津开会，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白任参谋长，彭任军事部长。

△ 山西大同光复，成立大同军政分府，举李德懋为都督。

△ 安徽军政府派兵两营往援湖北。13日复派兵1500名往援。

△ 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政府策动下，于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组织政府，驱逐清办事大臣三多。

△　袁世凯电令第一军总统冯国璋，停止渡江进攻武昌。

△　清内阁电冯国璋，提出停战条款五条，规定息战之期为三日，两军不得于此期内开战；息战之约须有驻汉英总领事官划押为中证人。

△　清廷命署汉黄德道黄开文兼办武汉交涉事宜。

12月2日（十月十二日）　南京光复。江浙联军以张人骏、铁良拒受议和条件，遂开炮攻南京城。张人骏、铁良、张勋分途逃窜。拂晓，淞军炮轰狮子山炮台，清军揭白旗献炮投诚。苏军复攻占雨花台。10时，联军分别自各门入城。全城居民悬白旗欢迎。

△　拂晓，镇军江北支队骤袭浦口张勋残部。下午张军溃逃，浦口光复。

△　驻汉口英领事葛福派员分别与武昌军政府及清汉黄德道黄开文磋商，南北双方首次达成停战协议：自3日早8时起至6日早8时止，武汉地区停战三日。

△　黎元洪于武昌洪山召集党代表会议，改组军政府。杨时杰任内务部长，李作栋任财政部长，李四光任实业部长，杨玉如任都督府秘书长。

△　汉口各省代表团举雷奋、马振武、王正廷三人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委员，并议决如袁世凯响应革命，即选举为临时大总统。

△　宋教仁起草之《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在上海《民立报》公布，6日续完。

△　胡鄂公等召集京、津、保、滦（州）、通（州）、石（家庄）等地革命同志代表50余人在津开会，议决为统一革命指挥，在天津设总指挥处，由胡兼任总指挥。

△　清廷添派大学士徐世昌充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　袁世凯召日人坂西中佐密谈，探询日本向革命党首领调停及军费、财政困窘之补救良策。

△　梁启超自日本再派盛先觉归国鼓吹“虚君共和”，是日盛抵上海。7日盛致函梁，告以此说遭章太炎冷遇，并谓“革党万不能就虚君共和之策，较温和如章太炎者所说犹然，况其余乎？”

12月3日（十月十三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通过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凡四章21条，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　程德全改任江苏都督，6日自苏州抵南京视事。

△　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召开共和建设会正式成立大会。宣布以研究共和政体，咨询国民公意，条陈政府以备采择为宗旨。

△　江苏军政府将江苏官银号改组为江苏银行，资本总额100万元。总行设苏州，另在上海、常州、无锡、镇江等地设分行。1912年2月总行改设上海。

△　清廷派寿勋会同袁世凯、徐世昌筹办军务。

△　清廷以河南巡抚宝棻因病解职，任命布政使齐耀琳为河南巡抚，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帮办河南军务。

△　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再电清内阁，请罢兵息战，由朝廷宣布共和。

12月4日（十月十四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并致电留沪各省代表：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

各省军政府之权。仍推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总、副长，并请粤、赣、滇、蜀、晋、陕、甘、黔、东三省迅即派定代表径赴南京。

△　留沪各省代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　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黄会首领乔寿山、哥老会首领任得惠率城南元山尔庄农民千余人举事，旋遭西宁镇总兵张定邦镇压，失败。

△　清廷命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革职查办，派帮办大臣绷楚克车林掌库伦办事大臣印信，即剀切晓谕哲布尊丹巴，毋得轻举妄动。

12月5日（十月十五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议和条件："一、推倒满洲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并密电伍廷芳来鄂，与清方代表议和，公举胡瑛、王正廷副之。

△　留沪各省代表开会欢迎黄兴大元帅。黄兴致答词，主以黎元洪为大元帅，复经劝说，始允暂时勉任。

△　黄兴电胡汉民，请出师北伐。旋胡照会上海都督陈其美及黄兴，告已举姚雨平为北伐军正司令，定于二十日（10日）出发北上。

△　清内阁电开停战条件五条，提出停战三日，期满续停15日；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唐绍仪充总理大臣之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

△　上海千余人在张园开北伐联合会成立大会，举程德全为会长。11日该会宣布章程，宣布以联合各省都督府都督会同北伐，统一军机，共谋光复为宗旨。

12月6日（十月十六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答复清内

阁所提停战条件五条，答复条件为：“一、停战三日，期满续停战15日；二、全国清军民军均按兵不动，各守其已领之土地；三、清总理大臣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

△ 隆裕准监国摄政王载沣“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并谕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

△ 广西民军1000名离南宁往援湖北。

△ 驻汉口英署总领事葛福分别与南北双方约定，自6日早8时起，至9日早8时，武汉停战延期三日，是为第二次停战。

△ 清廷从袁世凯奏请，将湖北巡防军改名为武卫右军。

12月7日（十月十七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闻上海有推黄兴、黎元洪为大元帅、副大元帅之举，议决由黎元洪电沪军都督，查实如有人在沪推举大元帅副大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并议决各省代表于8日同赴南京。

△ 清廷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由袁委派代表人驰赴南方讨论大局。

△ 清廷以摄政王业经退位，命所有陆海各军暂责成现行专司诸大臣督率管理；其向归摄政王管辖之禁卫军，着专司训练大臣督饬认真训练。

△ 清廷谕准臣民自由剪发，并改用阳历。

△ 河南省谘议局致电清内阁，请求承认共和，免致再开战祸。

△ 英外交大臣葛雷电驻法、德、美三国英使，令向各该国政府提议，由四国银行团立即向袁世凯政府提供财政援助。

12月8日（十月十八日） 黎元洪通电各省留沪代表，请设法取

消已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之事。

△　江西都督彭程万辞职，改举九江都督马毓宝继任。

△　姚雨平率广东北伐军8000人（中有华侨炸弹队300人）在广州誓师。18日抵上海。

△　成都兵变。赵尔丰阴谋复辟，乘蒲殿俊校场阅兵之机，唆使成都巡防营哗变，蒲逃匿。

△　唐绍仪自北京致电上海密友赵凤昌，转请张謇、汤寿潜赴汉口参与和议。10日赵电复，告以伍廷芳及张、汤“均不能远行”，请唐来上海开议。

△　清廷以第一军总统冯国璋为察哈尔都统，未赴任前，以署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署理。

△　上海招商局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借银150万两合同，以该局所有各埠栈房及市房等财产为担保。其中有40余万两言明为沪军都督所借。

12月9日（十月十九日）　南北双方再次议定，自9日早8时起，至24日早8时止，各战场均停战15日，是为第三次停战。

△　黄兴电复汪精卫，支持袁世凯为大总统。略谓：“项城（按：指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众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　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一行离北京，11日抵汉口。

△　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自凤凰山率部入城平乱，次日军政府重建，举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

△ 清内阁电各省督抚，令各路防军仍严密整备，毋因停战稍涉疏懈。

△ 清廷派冯国璋充禁卫军总统官。

△ 清廷命冯国璋兼充第二军总统，筹备畿辅及海防一带；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兼充第一军总统。

△ 清廷以记名副都统良弼为军谘府军谘使。

12月10日（十月二十日） 留沪各省代表议决于二十一日（11日）同赴南京。

△ 伍廷芳电黎元洪，谓因留沪代表挽留，碍难赴汉。12日，伍以“驻各国领事极望在沪谈判”为由，再电黎请唐绍仪速来上海。

△ 奉天急进会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在宁远州（今辽宁兴城市）密谋举事，事泄被捕。经孙中山与袁世凯交涉，次年2月获释。

△ 河南鄢陵县黄道会起义，13日与16日起义军数千人分兵攻打太康、开封，遭清军镇压，失败。

△ 倪嗣冲所部清军违约攻陷安徽太和。15日再陷颍州。

12月11日（十月二十一日） 伍廷芳致函驻沪美领事，请电转美使就商袁世凯，令唐绍仪来上海议和。

△ 唐绍仪在汉口会见黎元洪代表王正廷，王告以伍廷芳不能来汉，约唐同往上海开议。

△ 李烈钧率援鄂皖军一标抵武昌，黎元洪命驻阳逻一带。

△ 清军统领赵倜部违约攻陷潼关。

12月12日（十月二十二日）　黎元洪在武昌会见唐绍仪，商定上海为议和地点。

△　湖北军政府在武昌举行特别会议，增补议和代表孙武、孙发绪、谭人凤、蓝天蔚、郑江灏、时功玖等六人，赴沪参加议和。

△　章太炎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

△　山西高平县农民牛春发等率干草会众2000余人入城举事，知县被迫承诺免粮免税。斗争随之波及长治县属，后遭阎锡山镇压，失败。

△　清廷命河南巡抚齐耀琳管辖筹办皖北各属吏治军务，并着倪嗣冲兼署安徽布政使。

△　日公使伊集院访晤袁世凯，探询国体问题意向。袁表示主君主立宪，并称，如唐绍仪交涉不成，将烦劳各国从中调停。

△　清军第六镇统制官曹锟部违约攻陷山西娘子关，进逼太原，阎锡山北逃宁武。

12月13日（十月二十三日）　云南都督蔡锷致电各省都督，主从速组织中央政府。提出国家组织纲要：一、国名定为中华民国；二、国体为君主立宪；三、建设有力之中央政府；四、划定地方区域，设都督专治兵事；五、缩小行政区域。

△　湖北荆州光复。12月9日，唐牺支率宜昌革命军进攻荆州城，清将军连魁乞降，是日双方达成协议，16日革命军入城，成立荆宜司令部。

△　陈其美诱杀镇江军政府参谋长陶骏保于沪军都督府。

△ 清廷谕内阁电寄各省督抚，各省举办乡团，由地方官督察。

△ 陆军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因病解职，清廷以步兵第八协统领陈光远充任。

12月14日（十月二十四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南京选举汤尔和为议长；王宠惠为副议长。并议决于二十六日（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 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及军政分府，告以唐绍仪本日离汉赴沪，袁氏狡诈多端。并谓："此次议和之优劣，端视进兵之迟速及兵力之强弱为转移，总乞各处援兵火速来鄂，以为最后之猛击。"

△ 孙中山经庇𦣞返国，是日致电邓泽如，相约在新加坡晤面。

△ 胡鄂公等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协会，宣布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三民主义为宗旨。胡任会长。

△ 贵州都督杨荩诚率兵3000名，离贵阳往援湖北。后闻武汉停战，遂暂驻湖南常德。

△ 内阁奏准颁布施行"募集爱国公债办法"章程14条。

△ 英借口"保护"租界，自香港派陆军162名抵汉口。

12月15日（十月二十五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黎元洪来电称"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议决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次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追加条文后，增加一项："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权。"

△ 孙中山抵新加坡，次日与邓泽如晤谈迟迟归国原因，在破坏

清政府之借外债及谋新政府之借入，并称“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

△ 广西省议会电各省都督府、军政府，谓“袁贼分路寇颍，议和实中奸计。乞速会兵北伐，勿再信和，免误大局”。

12月16日（十月二十六日） 黎元洪电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主提前议定邮政暂行办法，先定邮政总机关，及邮票式样，以绘民国旗帜为宜。

△ 上海《民立报》发表《告唐绍仪》社论，谓“吾深有待于唐绍仪之婉转陈达，俾袁氏迫令满虏以退让为能，则民国之建，无以为梗。吾族健儿必乐予满虏以特别之优待，而总统之席袁氏终有时当选”。

△ 日公使伊集院访晤英公使朱尔典，密商中国国体。朱尔典提出册立孔子后裔，拥为皇帝，征其同意；伊集院则以设置“摄政会”方案，就商英使。

12月17日（十月二十七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推举黎元洪自代，遂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黎大元帅暂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 唐绍仪一行在王正廷、谭人凤等陪同下抵上海。

△ 云南都督府军政总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李根源奉蔡锷命至大理，节制滇西军政。

△ 山东巡抚孙宝琦因病解职，清廷以山东提法使胡建枢为山东巡抚。

12月18日（十月二十八日） 民国总代表伍廷芳与袁内阁全权

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开南北议和首次会议。伍提出9日停战协议必须切实遵守，俟得袁世凯承认后，方可正式开议，唐允将此意立即电袁。

△　湖南都督谭延闿电伍廷芳，提出“倘袁使不能承认颠覆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即请毋庸开议”。并谓“盖民国不成，第二次革命当继起。此刻断不容稍留君主政治余毒，以作第二次革命之资料，而令吾同胞将来再相残杀，致受无穷荼毒”。

△　伍廷芳电袁世凯，责各地清军违约攻袭民军，请饬令各地清军，凡与民军相持地方，一律实行停战。

△　直隶革命党人率众500余人在任邱起义，占领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派清军前往镇压，起义军退雄县，20日陷雄县，起义军遂失败，死难者百余人。

△　驻美日代办照会美国务卿，提议建立一个名义上之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列强保障。

△　袁世凯电复伍廷芳，正式承认停战令，擅自行动之军队，定行处以严罚。

12月20日（十一月初一日）　　南北双方在沪举行第二次议和会议。协议自23日早8时起至31日早8时止，各战场继续停战七日。是为第四次停战。伍廷芳坚持下次开议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唐绍仪答须电袁世凯征询其意。

△　驻上海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以同文照会分别递交伍廷芳、唐绍仪，谓“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使外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请南北双方尽速达成协议，停止冲突。

△　廖宇春得段祺瑞支持，抵上海与黄兴代表顾忠琛秘密议和。是日达成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五

项协议。

△　清廷谕袁世凯，于奏事章程未定之前，举凡国务暂呈内阁核办，毋庸上奏。

△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函请黄兴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又以汤尔和、王宠惠均留沪，另举景耀月代理议长。

△　江浙联军在南京开军事大会，议决北伐，并举徐绍桢为北伐总司令。

△　美洲华侨代表冯自由抵上海，参与筹组临时政府。嗣后南洋华侨代表吴世荣亦到。

12月21日（十一月初二日）　黎元洪电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

△　孙中山返国抵香港。胡汉民往迎，即同赴上海，陈炯明代广东都督。离港赴沪途中，孙中山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　孙中山致电横滨华侨，谈南北议和问题。谓：“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近已由议和谈判之结果，可见其成立矣。更望诸君大表同情，注视其成行。”

△　纽约华侨全体电国内各报、各团体，谓“希勿受袁愚，速以灵敏手段布置周密，庶可制北满死命，寝袁之皮”。

△　清廷派车臣汗部落盟长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为查办大臣，前往库伦，查办蒙古独立事件。

12月22日（十一月初三日）　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等联

合学界、警界、民团代表，在优级师范学校密谋举事，事泄，张等11人被捕遇害。

△　四川军政府捕杀前川督赵尔丰于成都。

△　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等赴上海往迎黄兴，请早莅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答以因财政困难，人才缺乏，刻下正在此间筹划，一俟就绪，即行前往。

△　福建都督孙道仁等致电陈其美，谓“闽主张除共和无所谓和议”，并谓“袁党诡谲……亟宜协力共谋抵制”。

△　江北北伐军总司令林述庆自无锡致电伍廷芳等，亟言和议须以“推倒异族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政体”为宗旨。

12月23日（十一月初四日）　沪军政府财政部发行定额1000万元公债票。

△　北京外交团在清外务部谰言赞成中国和平停战，实行君主立宪。

12月24日（十一月初五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接沪电称孙中山将到沪，决由代理议长指定马伯援等三人赴沪欢迎。

△　上海《民立报》发表同盟会本部宣言，表示愿“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

12月25日（十一月初六日）　孙中山抵上海，黄兴、陈其美及各界人士热烈欢迎。

△　黎元洪通电各省，驻京英美公使正式表示武汉三镇不再作为战场；并告全省军事机关，已拟定敌兵须全部退出武胜关以北及敌兵撤退、我兵不追等四项办法答复英领事。

△　清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出使荷兰大臣刘镜人联衔电外务部代奏清廷，请速下大计，诏准民主。

12月26日（十一月初七日）　夜，孙中山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商讨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问题。孙中山不同意内阁制，众从孙意而行。

△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于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并通电各省，作战计划仍宜继续进行，并推定谭人凤、马君武、王正廷面谒徐绍桢，商议作战计划。

12月27日（十一月初八日）　黄兴与宋教仁由沪抵宁，向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提议三事：一、改用阳历；二、改为中华民国纪元；三、政府组织取总统制。

△　孙中山会见各省代表团，谈组织政府问题。孙中山主张选举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并提出改用阳历，本月（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1月1日，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

△　唐绍仪电请袁世凯代奏，民军坚持共和，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

△　袁内阁开全体会议，以南方坚持共和，和议难以进行为由，议决总辞职。次日，袁世凯于御前会议提出，清廷予以慰留。

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会，马君武报告在沪与孙中山接洽经过。

△　新疆迪化革命党人刘先俊等联络哥老会举事，遭巡抚袁大化镇压，刘等百余人死难。

△　清廷从袁世凯奏请，命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着袁将此意电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并速拟选举法，协定施行。

12月29日（十一月初十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到会代表17省，孙中山16票当选。

△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电各省都督府，每省派遣参议员三人，来南京组织参议院；参议员未至以前，每省暂留代表一至三人驻宁，代行其职权。

△　孙中山电各省代表及都督、军司令长，表示接受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之选举，刻日赴宁就职。

△　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告以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乃权宜之计，并谓“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　孙中山出席同盟会本部欢迎大会，发表演说，指出：“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二者虽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

△　南北双方在沪举行第三次议和会议，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及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清军在五日内撤离原驻地百里以外等协议。

△　袁世凯以伍廷芳宣言必须承认共和，唐绍仪请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之事，奏请召集宗支王公会议，以定大计。

12月30日（十一月十一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唐代表毋庸再开，因已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

△　孙中山答复上海《大陆报》记者，说明日间将赴南京举行接任式，并组织新政府。

△　孙中山致电邓泽如，告以“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

任阁下向南洋华侨征集大款”。

△　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团结同志宣言。

△　南北双方在沪举行第四次议和会议，拟定召集国民会议办法四条。

△　袁世凯电唐绍仪，告以承认第三次议和协议。同日又电唐，否认第四次议和所议办法。

△　清廷以军饷无着，准袁世凯等奏请，将盛京大内及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变价充饷。

12月31日（十一月十二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称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

△　南北双方在沪举行第五次议和会议，伍廷芳提议于次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旋将此意电达袁世凯，袁接电后，即将内阁所拟国民会选举法九条电唐，并力主国民会议在北京召开。

△　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等13人，因议和条款不为袁世凯认可，联名电袁请辞。

△　孙中山与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谈话，表示赞成社会主义，主张“广为鼓吹，使其真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

△　俄公使廓索维慈照会清外务部，提出中国不得干涉外蒙内政，不得驻兵外蒙，准俄在外蒙修筑铁路及外蒙任何改革均应得俄同意等五条要求。

1912年（民国元年）

1月

1月1日　　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自沪抵宁，当晚10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誓曰：“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同日并发表《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宣布内外施政方针。

△　唐绍仪再电袁世凯辞议和代表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开议”。

△　中华书局在上海开业，创办人为陆费逵等，资本2.5万元，各地设分局30余处。

1月2日　　孙中山通告各省，宣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

△　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

△　孙中山电复袁世凯，澄清误会。谓“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则总统一职，“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并表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

△　孙中山电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

△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临时参议院成立前，由该会代

行职权，并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

△　袁世凯电伍廷芳否认唐绍仪签订各条，并告已准唐辞代表职，嗣后应商事件直接电商。

△　袁世凯电伍廷芳，停战期限展延15天，自上月31日上午8点钟起至1月15日止。

△　清军姜桂题、冯国璋、张勋、曹锟、张作霖等15名将领电内阁，誓以死战反对共和，并请旨饬亲贵大臣将银行所存现银三四千万两提充军费。

△　清河南省谘议局电袁世凯，人民切望共和，如和议变动，“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

△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论，攻击孙中山“独裁”，实行“寡头政治”，即将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远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1月3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是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孙中山所提各部总次长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同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凡五条。

△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

△　孙中山任命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11日，改任南京卫戍总督。

△　孙中山任命钮永建（兼）、温宗尧（兼）、汪精卫、王正

廷、胡瑛为议和参赞。

△　孙中山聘章宗祥及日人寺尾亨、副岛义一为法制顾问，犬养毅为政治顾问。

△　孙中山任命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兼北伐军第二军总司令。

△　直隶滦州新军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

△　伍廷芳电袁世凯，声明唐绍仪签约有效，并请履行所订退兵办法，饬各军队于五日内退出驻地百里以外。

△　章太炎联络江浙清季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张謇、程德全、汤寿潜、汤化龙等在上海开“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章、程被举为正、副会长。

△　陕西民军攻占河南灵宝，赵倜所部清军退陕州，据守渑池。

△　北京外交团开会，谋置中国盐税于海关控制之下，议定由英、日、俄、奥等国公使组成委员会研究处理。12日，该委员会就此事以备忘录送清外务部。

△　乌里雅苏台扎萨克汗宣布“独立”，要求清廷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苏于五日内离境。

1月4日　孙中山电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指出“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令速出兵北伐。

△　孙中山电伍廷芳，盼将国民会议地点、时期及退兵办法电告。

△　袁世凯电伍廷芳质问各省代表“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并称“孙文受任总统

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

△　滦州起义军乘火车扑天津，次晨与清军战于雷庄，因寡不敌众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死难。

△　清署邮传部大臣杨士琦请解职，清廷以梁士诒署该职。

△　上海南汇地区大团等处沿海“沙民”千余人抗租，沪军都督府派陆军及水师前往镇压。

△　英、美、德、法、日等国驻华军队司令官开会，借口滦州新军起义，决议向京奉铁路京榆段沿线派驻军队：北京—杨村驻英军366名；杨村—北塘驻法军44名；北塘—唐山驻德军94名；唐山—滦州驻美军200名；滦州—山海关驻日军599名。

△　法外交部照会驻法俄使，表示法支持俄在中国北部之特权利益扩张至北满，并至蒙古、新疆。

1月5日　　孙中山举行临时政府各部委任礼，各部总次长黄兴等出席。

△　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书》，声明：凡革命前清廷与各国所订条约、所借外债、所认赔款及让与各国或个人之种种权利，民国均予承认、保护。

1月6日　　孙中山咨复参议院征询和战问题，内称：现在用兵方略，当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表示：“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饷源一事，业令由财政、陆军两部会同筹划。”

△　伍廷芳电促袁世凯早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会议地点宜在上

海。

△　临淮总司令林述庆谒见孙中山，面陈北伐计划。

△　清甘肃省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以陕、甘、新三省绅民名义电袁世凯，坚主立宪，否认共和。

1月7日　　黎元洪整编在鄂民军为北伐三军，以吴兆麟、李烈钧、赵恒惕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军总司令官。

△　伊犁新军起义，杀将军志锐，焚将军都统署。次日组织军政府，举卸任伊犁将军广福为大都督，并进军迪化，与新疆巡抚袁大化所调之清军相持于精河、西湖间，至4月始休战。

1月8日　　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一亿元，实发737.115万元。

△　孙中山通令各省：产盐运盐，统归盐政总理督率办理。

△　伍廷芳电复袁世凯，同意自12月31日早8时起，至1月15日早8时止，各战场继续停战15日，是为第五次停战。

△　伍廷芳电袁世凯，议和之事，请亲来或另派全权代表到沪，勿再电商。

△　唐绍仪电清内阁，告以内外情势紧迫，和议勿再不决。

△　康有为撰《共和政体论》一文，鼓吹“虚君共和”，是日起在北京《正宗爱国报》连载。

△　日本友人犬养毅在南京访晤孙中山，转达日本政府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推进君主立宪政体之方针，同时建议联合岑春煊及康有为等人共同对抗袁世凯，遭孙中山拒绝。

1月9日　孙中山任命黄兴兼临时政府参谋总长。

△　孙中山派黄复生、熊克武到沪接收川路股款，筹办蜀军。

△　陕西民军克渑池，次日与清军战于英豪、观音堂间，失利后退灵宝、函谷关一带。

△　袁世凯电伍廷芳，勿再坚执唐绍仪所签条款；不必另派代表；北京为国会开会地点，万无更易。

△　清廷任命朱益濬署湖南巡抚。

1月10日　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12日，孙中山以五色旗为国旗取义不确，咨请临时参议院暂勿颁定施行，俟民选国会成立后讨论。

△　马君武在临时参议院报告，陆军部作战计划已定，拟分五路进兵，如和局破裂，即行宣战。

△　伍廷芳电复袁世凯，唐绍仪所签之约为不可移动之条件，上海为国会开会地点亦万无可易。

△　谭延闿电孙中山，请即与袁世凯严重交涉，如停战期满而国体问题尚未解决，即令各路开战。

△　张謇密电袁世凯，谓“现以纱厂事需亲赴鄂，拟藉与段芝泉密商”，以南北军人名义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政体。张抵鄂再密电袁，请其就商北洋将领通电拥护共和，迫清帝退位；并谓“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25日，袁电复张，告以“连日协商，渐有头绪”。

△　成都民军克雅安，清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被俘。

1月11日　孙中山照会各国政府，声明已建立临时政府，选举临时总统，组织内阁，要求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　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浙省各府代表改举蒋尊簋继任。

△　袁世凯再电伍廷芳，国会地点在北京，万难更易。

1月12日　孙中山命北伐沪军及“海容”、“海琛”、“南琛”三舰统归关外都督蓝天蔚节制。

△　梁士诒会见英公使朱尔典，探询列强对袁世凯于清帝退位后组织临时政府之态度，英使表示“袁世凯拥有列强之信任”。

△　清署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电内阁，表示“察防臣民全体不承认共和”。

△　清王公宗室良弼、载涛等为维护清廷、反对共和，在北京秘密组织复辟团体“宗社党”。该党活动范围遍及奉、吉、直、鄂、鲁、豫、陕、甘、苏、浙、皖、闽等10余省。

1月13日　伍廷芳就袁世凯以土匪之名加诸北方诸省民党，及置十一月初一日（阳历12月20日）之条约于不顾，攻击陕西民军两事电袁质问。

△　山东同盟会会员邱丕振攻占登州（今蓬莱市），俘清军统领王步清，组设军政府，公举连绍先为鲁军司令，邱丕振为北伐军司令。

△　美国务卿诺克斯电示驻汉口美总领事顾临，可与当地民军领袖保持非正式关系，但此种关系不得认为美已承认民军政府。16日，复电示美公使通知各地美领事均照上述办法执行。

1月14日　孙中山电复直、豫两省谘议局，告以所开议和条件，早经临时政府宣布，不必置疑。并谓：“须知民国以专制为敌，而权位非所争，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不分畛域，自是平等之本怀；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

△　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禁止滥捕嫌疑犯，略谓：“嗣后各地如有嫌疑告密之事，应先令查根凭实，再交审判厅确实查核，庶刑当其罪，法允于平。”

△　袁世凯、伍廷芳经电商决定，自15日早8时起，至29日早8时止，各战场继续停战14日。是为第六次停战。

△　伍廷芳电内外蒙古各王公，申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各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毋惑浮言，自相疑贰。

△　唐绍仪通知伍廷芳，清廷正筹商退处之方，探询清帝退位后举袁世凯为总统事。次日，孙中山电告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　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次日，孙中山电令陈其美严缉刺陶凶手。

1月15日　大连民军抵登州，清吏迎降。次日，民军派队赴黄县，宣告和平光复。

△　北方革命协会通州革命党人密谋举事。事泄，蔡德辰、王丕承等七人被捕，17日遇害。

△　成都军政府发行军用银票，定额300万元。至年底，发行逾千万。

△　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额鲁特、陈巴尔虎两蒙总管胜福、车和

扎等，受俄国唆使、暗助，占海拉尔，宣布“独立”。清呼伦道尹黄仕福率队避入东清铁路界内。

△　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及唐文治等五人电请清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特授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

△　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于是日及17日两次电驻汉口总领事松村，令速派海军陆战队开赴大冶铁矿，以阻民军进驻，并配备内河炮舰一艘就近“警备”。

1月16日　京津同盟会会员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于北京东华门投弹谋炸袁世凯，不中，三人被捕死难。

△　南京临时参议院据孙中山交议拟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议决此为中央政府借款，数额100万镑，签约事由中央财政部会同鄂军办理。

△　袁世凯与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清廷，谓大局危迫已极，民军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望宣布共和，请开皇族会议速定方案。同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袁再次请辞内阁总理职。

△　袁世凯就民军自武昌、上海北上，且占登州事电诘伍廷芳，并要求立即撤回各军。

△　蓝天蔚率北伐沪军分乘“海容”、“海琛”、“南琛”三舰自上海抵烟台。

△　清军陷灵宝、函谷关，陕西民军退据潼关。20日，张钫率民军再弃潼关，退驻华州。

1月17日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是日及19日两次要求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均未得复。

△　清隆裕太后召近支王公开御前会议，奕劻、溥伦主接受共和，其他王公亲贵咸表反对，争论甚烈。次日再议，仍无结果。

△　清军陷大同。嗣大同复遭清军围困，民军据守40余日，因弹尽援绝，是日弃城转移。

1月18日　孙中山召开内阁会议，集议清帝退位条件，议决致电袁世凯提出四条要求，其中言明：清帝逊位并弃让所有大权；临时都城不得设在北京；袁世凯非俟列强承认共和政府及民国建设完全之后，不得预闻临时政府政务。

△　孙中山两电伍廷芳，告以清帝退位及皇室优待条件，请转告唐绍仪。

△　孙中山电复上海商务总会等团体，陈其美督苏应由省议会正式选举。

△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颁布《暂定维持治安临时军律》，凡12条。

△　清廷谕民政部、步军统领、顺天府、军统冯国璋、提督姜桂题，饬设法保护京师地面平安秩序，勿稍疏忽。

△　清廷命直省将军、督抚暨顺天府府尹、各路军队统将，凡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为保护。

1月19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咨请大总统立即进兵救援山陕案。

△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凡14条，规定各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均改称校长；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　山东文登县同盟会会员丛绾珠率众举事，光复县城。2月9日，遭地主武装镇压，50余人死难。

△　清隆裕太后召近支王公开御前会议，国务大臣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列席。赵提出袁世凯拟设临时政府于天津，并同时取消北京、南京两政府，遭王公亲贵反对，会议无结果。22日再议，仍无结果。

△　宗社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各王公贵族中开展赞成君主立宪签名运动。

△　清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再次电外务部代奏请清帝逊位，明降谕旨，慨允共和。嗣后，出使意、日、美、德、奥等国大臣亦就此事迭电奏请。

△　美兵600名自马尼拉抵秦皇岛，并分调200余名开赴京榆铁路唐山、滦州一带。

1月20日　孙中山复电伍廷芳两电，重申五条件，坚持以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为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条件；并提出民国未举袁之先，袁不得接受清朝统治权以自重。

△　孙中山将清帝退位后优待条件六项电黎元洪，并谓："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请仍照前电准备。"

△　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电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　民社于是日及次日分别在上海《民立报》公布"缘起"及"规约"，申明以卢梭《民约论》为宗旨。此系武汉人士拥黎元洪为中心之政团。

1月21日　孙中山主持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议决大事三

项：一、议行政方针，主张中央集权；二、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1000万；三、和议大定，清帝退位，袁世凯来南京，以就此间政府。

△　徐企文等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工党，是日开成立会。推定朱志尧为正党长，徐企文、钟衡臧为副党长。嗣后于南京、芜湖、苏州、杭州、唐山、长沙等地设支部，并发行《觉民报》。

1月22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提交之议和五项条件：一、清帝退位；二、袁世凯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三、俟接获退位布告，大总统即行辞职；四、参议院另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五、袁须誓守参议院所定宪法，乃能接受事权。

△　中国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到18省会员2000余人。胡汉民代表孙中山正式提议修正誓词为："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获一致通过。

△　清隆裕太后谕饬内阁诸大臣胡惟德等，仍按召集正式国会与革军接议。

△　袁世凯致电伍廷芳，重提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次日，伍廷芳复电袁世凯，谓：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再行召开"。

△　"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闻朝廷将有退位之举，电清内阁称："东三省勤王军队业经组织，预备开拔，赴汤蹈火，惟听钧命。"

△　出使意大利公使吴宗濂、出使日本公使汪大燮，分电清内阁，请代奏速宣布共和。

1月23日　　孙中山电伍廷芳，嘱电清内阁请实践停战条约，派得力专员星夜驰赴山、陕战地，宣令停战。

△　清廷以会办江防事宜、江南提督张勋护理两江总督。

△　清廷以署山东巡抚胡建枢因事解职，实授山东布政使张广建兼署山东巡抚；赏协统领吴鼎元陆军副都统衔，会办山东防务。

△　宗社党上书清内阁，意谓欲将我朝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

△　中、德、美、法、英、意、日、荷、波斯、葡、俄、暹罗12国，在海牙签订鸦片公约，凡六章25条。

1月24日　　孙中山同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指出："袁世凯如实行共和政体，则余亦退让之；若袁世凯仍为满人效力，则余未便轻让。"

△　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任命吴鼎昌为监督。2月5日，该行在上海正式开业。

△　清廷谕内阁告戒军民勿得轻信浮言，转相煽惑，以维秩序。

△　江西公布省临时宪法。

△　日本黑龙会干事长内田良平受陈其美委托，以"沪军都督代表"名义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借款30万日元合同，旋以此款在日购置军械。

1月25日　　黄兴、陈锦涛、蔡元培、马君武、王宠惠、魏宸组等出席内阁会议，议决推行公债票、发行军用钞票、征收地方租税问题。

△　袁世凯奏请修改国会选举法，开会地点及国会会员人数酌予变通办理，并谓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

△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访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赵表

示："为维护清国国家之尊严与安全，除保存君主外别无它策；共和制度不但不能维持国家安宁，反而会迅速造成瓦解之局。"

1月26日　京津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在北京红罗厂宗社党首领、清军谘使良弼私宅投掷炸弹，彭当场以身殉。良弼重伤，越二日死。清王公贵族闻风丧胆，纷纷出京，潜赴青岛、天津、大连等地。

△　孙中山电陈炯明并广东省会及铁路公司，告以"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目前政府急需用款，拟以广东铁路为抵押，订立合同，务望赞同借款。

△　黎元洪电孙中山，若清帝不退位，请通告各国停战不再展期，所议优待条件一律取消，并表示鄂中全体军士预备作战。

△　云南都督蔡锷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表示"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愿亲率精兵，结合湘鄂，会师中原。

△　清廷诏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奏请收回封爵成命。

△　清廷准资政院议长李家驹解职，以许鼎霖继任。

△　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北洋军将领42人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月27日　孙中山以停战期届，咨商临时参议院解决主战抑主展期，乃派胡汉民到院陈述意见。是日参议院议决主战。同日，孙中山电告伍廷芳，"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并谓："此番开战，其曲在彼之真相，对于内外正式发表。"

△　孙中山致电各国公使揭露袁世凯在议和中之种种反覆失信。谓：袁"既知民国必欲其实行赞助共和而决不肯贸然相让，坠其诡计，则袁氏又复变态矣！盖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

△　伍廷芳电清内阁，谓："若停战期满（按：指29日），尚未得清廷退位确报，则前此所订优待条件，即全行作废。"

△　南京临时政府由江苏铁路公司出面，以上海至枫泾间铁路为担保，与日本大仓组签订借款300万日元合同。

△　山东即墨革命党人班麟书率民军举事，光复即墨。31日，驻青岛德军胁迫民军撤退。经交涉无效，2月3日，孙中山令该处民军退出即墨。

△　山东高密革命党人率众举事，驱逐县令，举王麟阁为临时司令。旋张树元所部清军来攻，起义人员向诸城一带转移。

△　北伐民军光复安徽固镇。

△　卢永祥所部清军自太原南下陷霍州（今霍县）。30日陷赵城，直趋平阳（今临汾），围攻该城，民军退平陆。

1月28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出席议员计17省38人。孙中山率同各行政官员莅会，亲致祝词。次日举林森为议长。

△　孙中山电陈炯明并各省都督，嘱勿仇杀康、梁保皇党人。略谓："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借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恕。"

△　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调和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两会会员歧见。略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

△　孙中山电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人，解释推翻清朝之目的是"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祈将区区

之意，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

△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保护财产令》，凡五条，规定“所有私产均应由人民享有”；清廷官吏财产除坚决敌视民国者须予查抄外，余均保护。

△　袁世凯密调嫡系部队曹锟第三镇抵京，驻扎天坛等处。在此前后，袁曾由二、四、六等镇调兵入京。

△　云南都督蔡锷应贵州立宪党人之请，借名北伐，派兵入黔。是日先遣队离昆明出发，次日唐继尧率大队启程。

△　清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军政大员奏陈解决时局办法10条，主张隆裕太后退居颐和园或“北狩”热河；速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

△　段祺瑞前以“巡警”名义留驻汉阳、未依停战协议撤退之千余清军全部反正。

1月29日　孙中山电北军将领王占元、姜桂题等10人，请效法段祺瑞，转敌为友，宣布赞同共和。

△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创刊。4月5日停刊。

△　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开军事会议，举孙岳为浦、镇、扬联军总司令，即日部署各军北伐。

△　盛宣怀与日商代表在日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合同》，股本3000万日元，中、日各半，合办期30年，并规定须经中国政府同意及汉冶萍公司股东半数以上赞同，始签定正约。

△　清度支部以救济京、津市面为由，自德商瑞记洋行两次借款75万英镑，约定以崇文门商税为担保。后以半数向德、奥购置军火，余款由度支部移作别用。

△　杨度等14人在北京组织共和促进会，并发表“宣言书”，谓目前主君主立宪为时已晚，国家危亡在即，为“保全皇室”、“保全国家”计，应速实行共和。

△　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与内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在北京签订协定10条，规定内蒙古联合组成一强固团体，以保障蒙古利益及援护大清皇位的存在为目的；喀喇沁王以川岛为总顾问，参划商量一切文武事宜；内蒙古团体成立后，倘受他国侵略难以自卫时，须首先请求日本援护。

1月30日　孙中山咨请临时参议院审议《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凡七章55条。次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改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推定马君武等四人另行起草。

△　清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奕劻、载沣主张逊位全终，亲贵全体唯唯其词，皇太后决定自行颁布共和。

△　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宣布以“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为宗旨，举李四光、万葆元为正副会长，马君武为名誉会长。

△　清廷以督办边防大臣张怀芝为安徽巡抚，未到任以前，仍由河南巡抚齐耀琳兼辖。

△　北京外交团为攫取中国海关税款所拟之《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八条，经清外务部同意，是日开始执行。其中规定：各海关净存税款每周汇解上海，由总税务司分存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银行，并依委员会所列次序按期偿还外债。至此，关税实权遂全部为外人所操纵。

1月31日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请各省保护外侨。

△　浙江石门县（今崇德）鸽子浜乡民因地主逼租并扣押佃户，

聚众千余反抗。县署派军警镇压，开枪打伤乡民多人。

2月

2月1日　　清隆裕太后召集各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开御前会议，拟定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并筹商宣布召开国会、颁发君主不干预国政诏旨等事宜。

△　黎元洪电孙中山报告段祺瑞派全权代表吴光新、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代表孙武等接洽情形。双方商定：清军北上，促进共和，如阴历年内（即公历2月17日以前）不能解决国体问题，民军“即当前进，以资援助”。

△　孙中山以段祺瑞军赞成共和，经与湖北军政府协商，是日电嘱黎元洪：彼军退时，可勿相逼。

△　孙中山以旅宁粤人推荐冯自由督粤，电广东临时省议会转同盟会、商会及各社团征询意见；又电告汪精卫为广东都督府高等顾问。

△　驻安徽寿州、正阳关民军二次光复颍上。

△　张勋所部清军违约陷安徽固镇。次日，广东北伐民军来援，败张军，克复固镇，进攻徐州。

△　清廷以山西布政使李盛铎署山西巡抚；原山西巡抚张锡銮着即日交卸，迅赴奉天会办防务。

△　俄军暗助蒙军袭击胪滨府，遇守军抵抗，激战数小时，俄蒙军队被击溃。

2月2日　　孙中山电黎元洪，请饬鄂省财政部取消没收汉冶萍公司所属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令，俾以此矿抵押借款，以济军需。4

日，黎电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万难认可。

△　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通电各省都督速立实业司，以切实经营实业。

△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电各省，重申一概不准招募民军。

△　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正式合并为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双方议定由成、渝两都督尹昌衡、张培爵分任正、副都督。

△　贵州宪政预备会首领刘显世等以巨款收买省巡防军东路分统谭德骥叛变，杀贵州革命组织自治学社社员、五路巡防军总统黄泽霖，逐枢密院长张百麟。

△　烟台北伐民军大队在辽东半岛貔子窝附近登陆，与当地民军会合。3日在花园口一带大败清军，10日攻克庄河厅（今辽宁庄河县）。清方旋增兵来援，两军成对峙之局。

△　民军光复诸城。次日成立山东军政府诸城分府，举王长庆为司令长。10日晚，清军反攻，11日晨诸城复陷。

△　山西安泽县城乡民众2000余人集于县城，焚烧城门，要求蠲除一切杂税，遭县署镇压失败。

△　清廷以王赓（揖唐）为军谘使。

△　袁世凯拟定汉阳、汉口退兵详细办法六条，电令段祺瑞与黎元洪就近磋商。

2月3日　　孙中山在南京同日本三井物产社员森恪会谈关于租借满洲问题。森恪转达桂太郎所提租借满洲之方案，孙中山同意，提出以2000万日元将满洲租让给日本，如日本同意，则派黄兴赴日与桂太郎缔结租借满洲之秘密协定。旋因英国及袁世凯施加压力，未能实

现。

△　孙中山接见社会党江亢虎，谈宣传社会主义，“使一般人可解宗旨为入手第一义”。

△　孙中山与王宠惠联名致电烟台都督杜潜，命迅饬所部民军按光绪二十四年“中德条约”暂行退出即墨，等待与德国交涉。

△　陆军部总长黄兴布告，声明大元帅名义已取消，各方函电请称现职，以尊民国体制。

△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保护人民财产令》五条。

△　清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清帝退位条件。

△　袁世凯电伍廷芳提出清帝退位条件：（甲）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乙）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丙）关于满蒙回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

△　清廷任命张镇芳代陈夔龙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　清军将领傅良佐等16人发起组织“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提出“组织大纲”三项，通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请转达各军，征求赞成者。同日，陈其美通电予以转达。次日，黎元洪率在鄂将校复电赞成。

△　中华民国自由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到千余人。宣布以“维持社会之自由，扫除共和障碍”为宗旨。上海《天铎报》社长李怀霜为主裁。

△　京奉线山海关141号铁路桥被炸，火车出轨，死伤150余人。5日，日“元老”山县有朋致函前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请力促内阁以

此事为借口，立即增兵满洲。

2月4日　　孙中山接见《字林西报》记者，告以一俟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辞临时总统职，并建议临时参议院举袁继任。

△　孙中山、黄兴联名电伍廷芳，请电告袁内阁，时局至此，已非停战问题，乃在南北合力，一致联师北上，以实力定大局，并允与袁就所开条件商优待清室问题。

△　清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64人电伍廷芳，提出与袁世凯相同之清帝退位条件。

△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电各省都督及财政长，吁请统一借款，以免外人高抬利息，使借款丛生窒碍。

△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电各省都督，重申严禁私筹军饷，并借端招摇撞骗。

△　伍廷芳电袁世凯请共谋和平解决山西省清、民两军冲突。旋双方商定停战12信条。至是月下旬，山西战事平息。

△　阎锡山所部民军攻占托克托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旋以清方援军进逼，乃于7日南移河曲（今山西省河曲县）一带。

△　民军光复徐州。旋为张勋所部清军夺占。

△　俄、蒙军队合围胪滨府营，府守多方交涉无效，被迫将枪马交与蒙方，率兵离署，胪滨府遂为俄、蒙军队侵占。

2月5日　　孙中山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南北联合及清帝退位问题，议决五项，其要旨为：一、清帝年俸，须经参议院通过，方能定夺；二、清帝逊位居北戴河或热河，均听便；三、清帝逊位书发表

后，参议院始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须到南京莅任。

△　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孙中山咨转袁世凯交来清帝退位条件，通过对该项条件之修正案。次日，伍廷芳将修正案电达袁世凯。

△　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九人联衔电袁世凯代奏清廷，痛责二三王公迭次阻挠颁发共和诏旨，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　袁世凯为保有号令北方之权势，采亲信幕僚王锡彤“请愿共和而不独立”之献策，授意河南巡抚齐耀琳以省谘议局名义奏请清廷即时宣布共和。

△　烟台民军连日与清军激战于登州（今蓬莱县），是日清军大败。

△　上海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开始营业。吴鼎昌为监督。

2月6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孙中山交议统一军政、民政、财政办法案，议决请即饬陆军、内务、财政三部会电各省都督即日撤销军政分府。21日，孙中山转令三部照办。

△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电各省都督、各军总司令及驻沪购办处，重申非经由该部认可给予凭照者，不得私行采办军械。

△　清出使德国大臣梁诚、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电外务部，请代奏清廷俯顺舆情，速颁诏旨，决定共和，以保中国，而维危局。

△　孙中山函复上海基督教美以美会，同意自立中国耶教会，表示人民信教自由，一切平等。

△　孙中山聘章太炎、张静江为枢密顾问。

△　章太炎抵南京，次日谒见孙中山，商谈组织政党事。

△　河南民军光复罗山，焚毁县衙，释放狱犯。

2月7日　奉天民军光复凤凰。守城清军200余名全部反正。

△　华侨联合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宣布以“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及研究侨民之利弊”为宗旨，举汪精卫、吴世荣为正、副会长。

2月8日　孙中山会见美国国务院代表邓尼及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要求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邓尼表示美国坚守中立，在中国和平与秩序恢复以前不可能承认；麦考密克面交国务卿诺克斯致孙中山函，并声称，如中国划分为二，各自建立一个政府，就会得到承认。

△　孙中山令内务部分电各省都督，将各省都督府所属之行政各部统一改称为司，庶使中央各部与地方各部有所区别。

△　孙中山命伍廷芳与袁世凯交涉严行约束张勋、倪嗣冲两部，并催促早定清帝退位事。

△　袁世凯派梁士诒携其所拟之清帝退位条件入觐隆裕太后，请旨验准。隆裕坚持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三项条件。梁随将此意转达袁世凯，并密电唐绍仪请其“务必劝伍（廷芳）迁就”。同日，梁又电唐请与南京临时政府切商统一办法，提出：“政府人员似可多用南方人”，惟政府地点必设北京，“决不可移易”。

△　袁世凯电唐绍仪转伍廷芳，对优待清室条件有所修正，表示“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万难更改”；“逊位”二字改为“致政”或“辞政”。

△　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64人电伍廷芳，称优待清室条

件中“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原文，万勿更易。逊位一语，军界同人极为骇异，应请修正”。“其余各节，均听袁内阁与贵代表协商”。

△　北面招讨使谭人凤电孙中山，反对优待清帝条件，主张停战期满，“惟有激励各军，同时北上”。

△　张勋遣代表至宿州（今宿县），与民军代表协商议和地点及停战办法。

△　清新任陕甘总督升允电奏清廷，力陈和议之五不可，请即罢议。同日复分兵两路，进犯陕西乾县、凤翔，与民军激战至15日，终未得逞。

△　蔡元培于是日至10日在《民立报》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为今后之教育方针。

△　“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于是日及10日连续开会，议定中国急需偿还之债款七项，共387.1093万英镑，并规定付款日期及逾期偿还加息办法。旋于12日将此项决定通知上海关税务司照办。

△　美国务卿诺克斯应德国政府之请致函德驻美大使柏恩斯多夫，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时局之态度，主张列强“保持共同行动之政策”，反对“单独行动以及干涉中国内政之举”。

2月9日　　孙中山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地方官制，各省军政、财政等统一办法，教育与内务两部权限之分划，法制院官制草案，拓殖部之添设，以及侨民等问题。

△　孙中山致函聘赵凤昌为枢密顾问。赵辞不就。

△　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电达袁

世凯，将“逊位”改为“辞位”，“关于皇族之待遇条件及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均无异议”。并声明“决难再让”。

△　段祺瑞自保定电孙中山、黄兴、伍廷芳，提议“宣布共和之日，两方政府同时取消”，“即以退位之时，为共和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并须预行商定临时总统及临时政府必要人员与地点。

△　清督抚张镇芳、张勋、段祺瑞、齐耀琳、张广建、张怀芝、张锡銮、李盛铎、陈昭常九人联衔电内阁代奏，请“速降明谕，宣布共和，悉以政权公诸国民”。

△　河南布政使倪嗣冲遣代表至正阳关，与民军代表协商旧历年底前停战办法。11日，双方议定停战办法七条。至此，皖北地区遂罢兵休战。

△　清廷以热河都统锡良因病解职，任命崑源署热河都统。

2月10日　孙中山再次会见美国政府代表邓尼，重提请求美国承认事，仍遭拒绝。

△　袁世凯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开会，讨论并通过南京临时政府9日提出之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

△　唐绍仪急电袁世凯，告以“14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并谓“若少不忍，转生大乱。言尽意竭，乞勿再赐电商”。

△　张謇急电袁世凯，告以“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嘱袁“万勿迁延两误，败破大局，追悔无及”。

△　陈其美呈请孙中山撤销沪军都督。

△　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电孙中山，推荐袁世凯为统一新政府临

时大总统。14日，孙中山电复蒙古王公，已向参议院提出辞表并荐袁。

△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总理盛宣怀在日本与横滨正金银行签订《汉冶萍预借矿砂价值合同》及《汉冶萍中日合办特别合同》，约定以大冶矿山铁路作抵，借款300万日元。后盛为使其私产免被没收，将200万日元转借南京临时政府。

△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山下町发表演说，对南京临时政府大肆诋毁，竟谓“其腐败百倍清廷，吾恐亡中华者非清廷，实今新政府”。

△　清军叶长盛部陷山东黄县。14日，沪军刘基炎部反攻黄县，清军退守北马镇，黄县再度光复。

2月11日　隆裕太后认可优待条件，决定清帝下诏退位。

△　袁世凯将清廷待颁之清帝退位诏旨电达唐绍仪、伍廷芳并转孙中山、黎元洪及南京临时政府。同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并谓：“大清皇帝既明诏逊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　孙中山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饬所有北伐军悉改名为讨虏军。

△　同盟会所属之东部同盟会发布启事，宣告在南京设东部同盟会事务所，另在上海、杭州、苏州、安庆、福州五处设分事务所。

△　伊犁民军与新疆清军协统王佩兰部在乌苏厅西百里之四棵树迤西古尔图地方遭遇。民军因寡不敌众失败，阵亡数百名，被俘130余名。

2月12日　清帝溥仪退位。是日，隆裕太后下诏三道：一为退位

诏，二为公布优待条件之诏，三为“劝谕臣民”诏。其退位诏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至此，统治中国268年之清王朝宣告结束。

△　袁世凯令将原清内阁各部大臣改称各部首领，各驻外公使改称临时外交代表。

2月13日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附条件三项：“（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同日并以咨文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

△　孙中山复袁世凯两电。其一告以即行引躬自退，践约辞职。其二告以“现即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表，推荐执事”，并就袁于清帝退位诏中所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予以批驳，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电中并促袁“即速来宁”。

△　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布清帝业已退位，民国统一，定本月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庆典。

△　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布告原清廷内外大小文武官员，“所有旧日政府，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

△　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布告军警，“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

△　袁世凯迫于情势，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电令北方各督抚及所辖各军队，嗣后勿得再捕拿革命党人，“其已拿者，均须一律释放”；“至实系土匪，扰害地方，即不得借党人为名，自应从严惩治，以维秩序”。

△　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令原度支部大臣周自齐速电饬天津造币厂停止使用清国祖模鼓铸银铜各币。

△　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将清帝“退位诏书”分别照会各国公使。同日，外务部亦依袁世凯令以同样内容向各国公使分致照会。

△　袁世凯令将原清政府之《政治官报》更名《临时公报》，继续发行。

△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参谋二部通电各报馆，称共和成立，清帝退位，袁世凯“实有莫大之功能，为万世所钦仰，希即宣扬盛德，俾众咸知”。

△　孙中山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内务二部速派妥员会同教育部调查员“前往各处学堂及前查封充公之家屋内，妥慎照料保护，毋任毁坏散失，以重文教而保公产”。

△　章太炎在上海《大共和报》发表《致南京参议会书》，力言建都南京“五害”。同日，上海《民立报》发表空海《建都私议》一文，陈述必于北京建都理由八点。由此建都南北之争逐形表面化，全国掀起建都问题大辩论。

△　日本关东都督借口辽东半岛为中立地区，迫民军在17日前与北军停战，并在七日内撤离该地。25日，北伐民军及部分关外民军共3000余人一并撤至烟台。

2月14日　孙中山至南京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推荐袁

世凯继任。参议院议决接受，并决定于次日开选举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及议决在新总统未莅任前，孙中山暂不解职。

△　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讨论建都问题，议决临时政府改设北京。15日，经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表决结果，始确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电各省，令各地方官各守本业，负起保卫地方之责。

△　同盟会本部以清帝退位，民国统一，通电勉励同志以后对于政治统一之方针，国利民福之政策，尚希同心协力，一致进行，期达民权、民生之伟大目的，巩固民国根基。

△　大本营总兵站在南京成立，黄兴任总监，专司军队所有运输筹备事宜，并在上海、镇江、下关、蚌埠分设支站。后于3月底撤销。

△　袁世凯密遣曹汝霖、胡惟德分访日、美两公使，就其南下与否征询意见。曹、胡告两公使谓，如袁南下，北方必起动乱，各国利益定受影响。意在求列强出面干预。

△　湖北省临时议会开成立大会，黎元洪莅会并致祝词，议决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力争建都武昌。

△　驻俄日使电日外务省称，据俄外交大臣面告，俄对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决与日本取一致态度，而目前则暂不承认。次日，日外务省电复驻俄日使表示同意。

2月15日　孙中山出席南京庆祝中华民国统一大庆典，并发表演说。同日，全国各地举行中华民国统一大庆典。

△　孙中山率临时政府官员200余人，军士数万谒明孝陵，以清帝

退位、民国统一昭告明太祖。

△　下午，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旋电袁请即日来宁受职。同日，孙中山亦电告袁当选及临时政府地点确定南京事，并言已派专使北上迎接。

△　袁世凯就孙中山促其“即日来宁”事通电全国，以北方危机隐伏，若“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为词拒绝南下，并诡谓“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　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建都南京后，上海部分社团及多数重要报纸是日联名急电指责参议院“为政府所牵制，舍北取南”；并通电各省，“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自是日始，报刊所载争议建都南北之通电几无日无之，袁在北京宣誓就职后，辩论始息。

△　孙中山闻奉天行宫珍宝私售德国，换取银500万两事，急电袁世凯请“严饬禁阻”。次日，袁电复“已电奉查禁”。

△　荷属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升旗庆祝祖国共和统一大典。殖民当局派马队强迫下旗，并撕烂国旗多面，刺伤数人，捕数十人。

2月16日　袁世凯分别电复孙中山及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愿受临时总统职，并再次强调南下为难。

△　袁世凯会见各国公使，就建都地点与各使达成默契。各使咸表示，必在北京建设共和政府，否则断不承认。

△　袁世凯电示山东巡警道吴炳湘，对“东省所来南人……迅即用力抵御，严拿监禁勿退让”。

△　袁世凯电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镇压革命党人，“如省内有借

名革命紊乱秩序者，均认为马贼，即行弹压勿贷”。

△　民国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参赞温宗尧、汪精卫，以和议告竣，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请辞议和代表职。17日，孙中山电复同意。

△　潜入哈尔滨进行秘密活动之安徽革命党人梁擎宇率众举事，夺据滨江厅及电报、邮政各局所，假自治公所设立机关部。20日晨，北军围攻自治公所，相持一时许，梁等七人死难，13人被捕。

△　工商勇进党在上海成立。26日发表宣言及简章，宣布以“振兴工业，扩张商务，扶持工商上之建设”为宗旨。

2月17日　　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通告，申明“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大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

△　袁世凯准北京陆军部首领王士珍辞职，以段祺瑞署理。

△　孙中山再电袁世凯促南下就职。

△　总统府连日接反对举袁世凯为总统之函电百数十通，孙中山于是日及21日分电劝解，牵延多日之风潮始息。

△　南京临时参议院以清帝退位，特议决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五条，提请孙中山查照施行。

2月18日　　孙中山电告袁世凯，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为欢迎员，同往北京迎袁南下。

△　孙中山布告宣布中华民国完全统一，今后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丕振实业，促进教育，维持世界和平。

△　陕西民军东路都督张钫与清毅军司令赵倜、第六镇协统周符麟于潼关签署和议条件，并商善后事宜。次日，毅军退出关城，民军拔营入关。至此陕西东路战事遂息。28日，张钫率华阴各处民军西援。

△　河南南阳宣布独立，举吕霞迺　为豫南军政府临时都督，韩邦孚为民政长。

△　前清陕甘总督升允闻清帝退位，遣甘军陆洪涛部猛攻醴泉。是日，甘军破醴泉，进逼咸阳。23日拂晓，甘军攻咸阳，大败而归。27日，民军攻醴泉，亦失利，遂成相持之局。

△　中国同盟会江西支部在南昌成立，举吴铁城、易次乾为正、副会长。

2月19日　　袁世凯设立临时筹备处。该处为袁未就职前“备咨询筹划之机关”，下设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六股。各股办事员由袁选其得力幕僚44人充任。

△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以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战事已将告终，通电各省请裁撤军政分府，缩减军队。

△　康有为通知各埠会员将“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

△　广东香、惠两军不满袁当选临时总统，决意北伐，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急电请柏文蔚、姚雨平、蒋雁行、徐宝山等劝阻。电文中有“项城处两难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等语。

△　胡瑛应山东巡抚张广建之请，是日派代表三人赴济南协商。张佯举胡瑛为都督，并承认宣布共和，阴则图谋自立，次日即将胡之代表押解出境，调兵围谘议局，占济南电报局。21日复围商会，并据袁电令饬吴炳湘捕杀革命党人数十名。胡瑛闻讯，即电张提出抗议，并限日内答复所提三项要求。

△　陕西略阳革命党人康炳熙、张俊彦、刘丽川等率民军3000余围困县城。县令桂超佯允25日开城迎降，至期背信，偷袭民军。民军无备失败，康等死难。3月11日，四川党人熊会昌率川军来援，克略阳，众举熊为知事。

△　孙中山电唐绍仪，以北军陷娘子关后四处抢掠，山西民众极为不满，嘱电袁令北军悉数撤出。

△　张勋所部北军依双方所议停战条件，撤离徐州并皂河、窑湾一带，改由民军进驻。

△　河南民军占领宛陵（今长葛）。

△　荷属爪哇岛泗水埠华侨升旗燃炮庆祝祖国共和统一，遭殖民当局无理禁止，当场被荷警枪毙三人，伤10余人，拘捕多人。旋华侨电南京政府请求保护。

2月20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举黎元洪再任临时副总统。

△　袁世凯令山东北军退驻莱州，并改悬五色国旗。至此山东战事遂息。

△　女界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议决向临时参议院及临时总统递交请愿书，要求参政权。

△　民社总部机关报《民声日报》在上海创刊。

2月21日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与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签署借款150万镑草约。27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旋因各方纷电反对，3月8日，袁世凯电复上海各团体，告以此项借款“已归无效”。

△　孙中山就粤中有人议举胞兄孙眉为都督事电孙眉，谓：“弟以

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不必当此大任。”同日复电广东各界团体并各报馆劝阻。

△　湖北省临时议会通电各省临时议会，倡议每省选举10到12人，齐集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旋苏、湘、皖、赣、浙、粤、直、豫、鲁、晋、陕、奉、吉、黑14省临时议会或谘议局复电赞同。3月16日，湖北省临时议会又电各省临时议会，请迅即选举议员，齐集北京组织临时中央议会。

△　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令驻英、美、俄三国公使，向三国政府征询日本政府所拟承认中国新政府先决条件之意见。条件内容有：一、继续尊重外人之一切权益；二、承认偿还以往之外债；三、各国对承认取一致行动。

△　霍守华在芜湖设立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1914年10月，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矿石买卖合同，约定该矿所采矿石全部供应日本，有效期14年。

2月22日　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发布告，令各地方军政长官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　女子同盟会发表宣言书，宣布“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会长吴木兰。会所设于上海西门内曹家桥。

2月23日　白朗起义。河南宝丰县大刘庄白朗（狼）起义军会同鲁山、临汝、郏县各路农民起义军围攻鲁山县城，凡10余昼夜，旋退往城外各乡。按：白朗起义日期不可考，此系报纸最早之报道。

△　袁世凯电饬奉、吉、黑、直、鲁、晋、豫、热、察等省地方官绅维持现状，共保和平。

△　孙中山任命汪精卫为广东都督，未到任以前，由陈炯明代理。

△　孙中山以奉天、哈尔滨、黑龙江等处官吏反对共和，惨杀民党，是日电袁世凯“祈速电阻妄杀，并将段军就近弹压，保护大局”。

△　孙中山令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立案。

△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将新编历书颁行全国。此为中国第一部阴阳合历历书。

△　梁启超自日本致函袁世凯为其出谋献策。除请袁“立一有系统的财政计划”，以取重于外人，广借外债外，力劝袁以“服从舆论之名”而行“开明专制之实”，并进而建议袁合旧立宪派及旧革命派中愿听命于袁者，组织一“健全之大党”，以与始终不与袁妥协之革命派争，使“彼自归于劣败”。

△　日本政友会开会讨论在华设立经济机关问题，决定今后不仅须注重于金融机关之设立，举凡企业、贩卖及其他足供日本经济界发展之事业均须经营。

2月24日　孙中山令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知各官属，嗣后官厅人员一律取消“大人”、“老爷”称谓，咸以官职相称；民间则以“先生”或“君”相称。

△　神户、大阪华侨千余人在神户中华会馆召开中华民国共和祝贺会。入夜举行提灯游行。进行中遭日警强力阻止，迫令解散，并拘捕发起人。

2月25日　黄兴、蒋作宾等174人发起组织陆军将校联合会，是日在南京开成立会。4月25日，因“南北军界统一”，宣告解散。

△　同盟会会员宋世杰率民军攻入大同，与淮军杨荣泰部相持二昼夜。28日，杨军东逃，民军再次收复大同。

△　荷属泗水殖民当局连日搜掳华侨已达千数，是日复将进口船

中百余华侨全部拘禁，并胁迫华侨书报社承认前被捶毙之华侨乃因“谋为不轨”使然。华侨急电国内求援。

△　孙中山就荷属爪哇殖民当局迫害华侨事件召集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开会，议决照会荷政府提出释放被捕者、赔偿损失及恢复人权等四项要求，并限一星期答复，否则将禁阻通商，不准民国悬有荷旗。

△　荷兰政府外交部复照北京驻荷临时外交代表刘镜人，就爪哇殖民当局侮辱国旗、虐华侨事强行诡辩，竟谓“不应将改建国体事通告华侨”。

2月26日　孙中山电袁世凯，谓升允反对共和，已破醴泉，攻咸阳，省城危急万分，请速为援救。同日又电嘱陕督张凤翙就近商袁部合击升允。

△　《大公报》发表章太炎致袁世凯电，主“内官拟设总理”，“各部总长、次长以下，设参事厅，主讨论；设佥事厅，主执行”；“外官废省存道，废府存县，县隶于道，道隶于部。其各省督抚、都督等改为军官，不与民事，隶陆军部”。“参议院应由国会推举，不得由内外行政长官指派”。

△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派重兵乘南满火车进攻开原。

2月27日　迎袁专使蔡元培一行抵北京，旋即下榻迎袁代表招待所；下午谒袁世凯递交参议院举袁为总统之选举状及孙中山请袁南下就职之手书。次日，袁邀蔡等茶会。

△　武昌文学、群治二社社员所组织之改良政治群英会，为反对孙武与黎元洪勾结排斥异己，联合军界及其他团体约数千人，在近卫军协统黄申芗、向海潜领导下，是日晚举行暴动，包围孙武住宅，宣布罪状，扰攘终宵，次日始渐告平息。此即所谓“群英会事件”，亦称“湖北二次革命”。

△　孙中山以陈其美辞意甚坚，并请撤销沪军都督府，是日电陈慰留。

△　唐绍仪电告王宠惠，荷公使贝拉斯允以“私意”就商荷属爪哇殖民当局，请其“不禁升旗，并允将所捕之人酌量释放”。29日，王电复唐，指出“现下所亟应力争者，不在升旗问题，而以释人、索偿、废除虐例为最要”，“仍希据理力争，毋任狡赖”。4月18日，荷殖民当局始认可释放被捕华侨，按律惩治枪杀华侨之荷官，厚葬、抚恤、医伤、赔偿等项要求皆允照办，并允此后不再虐待华侨。

△　荷属泗水粤侨全体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告以“荷兵逐日围捕，专捉粤侨工商，已达2000余”，“请速设法解悬”。

△　驻汉口湖北陆军第二镇统制张廷辅被刺身亡，凶手为该镇第二协第八标第一营管带王童刚及第一营队官刘子英，均系宗社党分子。

2月28日　孙中山就武昌群英会事件电鄂省同志，务望以和平为主，毋伤同胞同志之意，毋启外人干涉之端。

△　孙中山以中央业已发行公债票，批示沪军都督陈其美将上海公债票即日停止发行。

△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自上海拨银200万两，交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此款系袁世凯令唐绍仪与该银行团商借者。后四国银行团又于3月9日借予北京政府银110万两；5月17日借银300万两；6月12日借银300万两；6月18日借银300万两。合前后五次共借银1210万两。后此款在1913年5月31日由与六国银行团签订之“善后大借款”中扣还。

△　广西省议会全体议员因省防统领秦步衢率兵蹂躏会场，逮捕议员，是日宣布总辞。

2月29日　　北京兵变。晚8时，北京城内枪声四起，曹锟第三镇第九标炮营要求免裁津贴，自朝阳门外相率入城，同禄米仓辎重营相约同时举事，挨户搜索，旋至东四、崇文门、正阳门大肆抢劫，东华门外集成钱号被变兵打死者六七人，东城及前门一带火光烛天，东安市场火势彻夜不灭。变兵又因袁世凯克日南行、北军将被解散之谣传，遂窜至煤渣胡同迎袁专使驻所持枪抢掠，蔡元培等仓卒逃出，仅以身免。

△　袁世凯致电孙中山、黄兴，告以段祺瑞与蓝天蔚代表戴季陶、范熙绩磋商奉省善后办法业有头绪，并已于28日电饬赵尔巽“对于民军派员和平接洽”。

△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就华人赴美护照由税务司代发事电北京外交首领胡惟德，请迅向美使交涉收回发照特权，“毋任国权操诸外人”。后几经交涉未成，此事遂暂行搁置。

△　上海总商会正式成立，原商务总会宣布取消。

△　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李平书发布通告，在上海南市市政厅及闸北各设华洋混合裁判法庭一处，此后遇有租界以外华洋混合公诉私诉，即依中国法律在各该法庭进行审理。

△　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三团体在上海联合组成统一共和党。

△　中华民国女子教育研究会本部在苏州正式成立。

△　美国参议员威廉苏沙在参议院提出“电贺中国人民案”。参议员达尔沙起而赞成，并发表演说，谓：“中国宣布共和，为世界上极大之事。吾人深知中国人有自治之资格，此案应通过，并望不日且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3月

3月1日　　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报告北京兵变情形，表示已派员妥为照料蔡元培一行，并声称“严惩乱兵”。

△　迎袁专使蔡元培电孙中山、参议院，报告北京兵变情形，称变兵“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

△　受北京兵变影响，是日通州兵变。次日，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亦发生兵变。

△　受北京兵变影响，是日夜保定兵变。变兵抢劫藩库，焚毁各司道衙署，城内各铺户民宅多遭抢掠。乱事延续两昼夜，京保路沿线市镇亦受其害。

△　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与日本大仓组天津支行正式签订借款九万日元合同，以卓索图盟所有矿山作抵押。按：此款实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提供，由黑龙会重要分子川岛浪速居间撮合，作为支持内蒙王公阴谋独立之用。同日，该行另借予巴林王二万日元，用途相同。

3月2日　　孙中山令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饬所属，严禁买卖人口，并责成该部制定有关暂行条例，违者严惩不贷。

△　孙中山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今后一概不准使用刑讯，所有刑具悉行焚毁。

△　孙中山通令严禁鸦片。6日，又令内务部，迅查前清禁烟各令，其可施行者即转饬各省仍旧厉行，勿任废弛。

△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致电各省都督，告以高等以上学校规章尚未颁布，应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

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之课程，须一律废止。

△　受北京兵变影响，是日天津兵变。变兵四出烧杀掳掠，京奉、津浦铁路局及正金、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造币厂等均遭抢劫，民房铺店被焚毁甚多。

△　唐继尧所部云南北伐军是日占领贵阳各机关，宪政预备会推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　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开会，议决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更名为统一党，举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

△　北京公使团开会，借口北京兵变，决定从天津迅调军队“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次日，英、美、法各从天津调入200名，德国从青岛调入100名，共700名军队在市区列队示威。

3月3日　　中国同盟会在南京举行本部全体大会，到数千人。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制订《中国同盟会总章》，凡七章34条，其“总则”规定：“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政纲”分列“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等九条。通过将同盟会由秘密团体改为公开政党。

△　受天津兵变影响，是日小站兵变。次日，津北蔡村、津西杨柳青、沧州，津东大直沽等地均遭变兵抢劫。

3月4日　　蔡元培以北京兵变，“大局之危，直如累卵”，电孙中山，提出准备与袁世凯最后之交涉主旨两条：“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并谓“其达此主旨之方法，大略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

△　贵州省议会推举云南北伐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临时都督。同日，唐继尧电告云南都督蔡锷被黔人推为贵州临时都督，声称情词恳

切，“只得允许暂行担任”。

△　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侨”，决定再由南满调兵千名至京津地区。是日，日公使伊集院就此事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告知已由南满调日兵二大队至京津地区，继调一大队即可，多则易启各国疑虑。

3月5日　　孙中山令内务部通告各省都督，凡未去辫者，限令到之后20天内一律剪除。

△　孙中山同《字林西报》记者谈话，谓北方兵变不足以阻碍对袁世凯之信任，并表示南京决予袁协助。

△　蜀军政府以滇军抵渝，索饷40万，并欲驻扎城内，恐滋惊扰，电孙中山请示方略。8日，孙中山电驻川滇军司令长，令该军确遵参谋部电令，由郧阳或襄阳接陕，不可任意索要军饷，致伤邻谊。

△　日兵1200名由旅顺抵天津。至此，京津地区所驻日兵总计约2400余名。

△　日驻俄公使本野向俄外交大臣萨沙诺夫提议，日、俄两国参加四国银行团目前对华政治借款，但须以此项借款不涉及两国在满蒙特殊利益为条件。16日，俄照复同意。

3月6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一、由参议院电知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电复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就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六、临时总统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

△　袁世凯电孙中山、南京临时参议院，请黎元洪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内阁总理俟凯与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商定其人，协行提交参议院请求同意”。

△　前清甘肃布政使赵惟熙、谘议局长张林焱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国体。

3月7日　　孙中山电告袁世凯，请黎副总统代行一节可以取消，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袁在北京受职；并请速电报国务总理、国务员名单，俾参议院同意，克日派遣来宁接收交代，早定大局。

△　张凤翙以各省战争相继告停，是日遣人就商升允罢兵休战。升允认可。越日，甘军退出醴泉。12日，升允率陆洪涛部回甘。至此陕西西路战事息兵。

3月8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袁世凯将大总统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次日，孙中山循参议院之请，将誓词通电全国。同日，参议院电袁“认大总统为受职”。

△　袁世凯告电孙中山，依据南京临时参议院所拟第四条办法，拟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次日，孙中山咨送参议院请开临时会议议决。

△　江西改举李烈钧为都督，原都督马毓宝辞职。

3月9日　　四国银行团致函袁世凯，就北京政府借款事提出四项条件：一、自3月至6月或延至8月，分期给予紧急借款；二、北京政府以盐税担保；三、具体条件待日后签订大借款合同时另行规定；四、此后北京政府所需之垫款及善后大借款应由四国银行团尽先供给。同日，袁世凯就借款事函复四国银行代表，言明“中国政府向银行团等保证，如条件与其它同样有利，银行团等有决定承担大规模改革借款与否之权”。

△　孙中山为尊重言论自由，并以内务部所订《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令该部予以取消。

△　陈炯明解散驻省各部民军，惠州民军统领王和顺起兵反对。因陈事先密为布置，王部被包围缴械。陈随即电南京临时政府，指控王和顺纵兵抢掠，擅自招募兵士，私购军械等五大罪状。是日，孙中山电复令即严行搜捕该部溃兵。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声称："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并表示："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

△　袁世凯颁布《大赦令》，宣布"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

△　袁世凯颁布《豁免钱粮令》，规定凡民国以前完地丁正杂钱粮实欠在民者，均予免除。

△　袁世凯发布通告，以民国法律尚未议定颁布，前清诸法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之条应失效外，其余一律延用。

△　袁世凯聘香港高等裁判所所长、英人裴科达为新政府法律顾问。

3月11日　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56条，申明正式宪法未产生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通信、迁徙、信仰等自由，以及选举、被选举等权利。

△　孙中山电告袁世凯，临时参议院本日常会同意唐绍仪为国务总理，请即行任命。

△　北京政府外务部电驻外各临时外交代表照会各驻在国政府，中华民国统一临时政府业已成立，袁世凯已就临时总统职；所有前清与各国缔结之条约，中华民国政府均承认继续有效。同日，外务部并

将上述各情电达荷兰万国保和会，请予立案。

△　孙中山令内务部咨行各省都督慎重农事，保护与救济农民。

△　孙中山令南京临时政府内务、司法二部通饬禁止体罚。

△　黄兴致电袁世凯，劝止增招新兵，请速发命令移南军填扎北省。

△　秦州（今天水）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举黄钺为都督，向燊为副都督。后该军政府于6月7日被袁世凯以兵力胁迫解散。

△　上海民生国计会等10余团体致电袁世凯，请取消现行米谷杂粮等项捐税。

3月12日　蔡元培发表向京津同胞告别书，说明北上迎袁之经过及对于未来之希望。13日，蔡元培一行离京返宁。

△　南京临时参议院制订临时政府各部暂行官制通则，规定临时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10部。各部设总长，下设承政厅及各司，司下设科，分掌事务。

△　袁世凯令禁绝贿赂。令曰："现民国创兴，必须涤荡秽恶，以正百官而惩乱本，所有苞苴贿赂亟应一体禁绝。"

△　前清新疆巡抚袁大化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国体。

△　四国银行团代表在伦敦开会，议决给予北京政府6000万英镑借款，并同意日、俄两国银行团参加此项借款之要求。

3月13日　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　袁世凯发布整肃官常通令。谓近岁以来，钻营奔竞之风大

开，此等恶习自应痛加湔涤，务绝根株。并谓自今以往，“倘属员对于长官再有钻营奔竞情事，必当重予惩戒，以肃官常”。

△ 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革除缠足恶俗。

△ 南京临时参议院通电敦促各省参议员迅即到院。

3月14日 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与比国财团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国库券、京张铁路财产及余利担保。19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在京集议，决定停止预付之款以为抵制。4月18日，四国公使联合照会外交部，正式声明中止借款。北京政府被迫取消与比国财团签订之合同，并于27日由外交部照复四国公使。

△ 袁世凯令开缺凌福彭直隶布政使职。

△ 袁世凯令重申从前禁鸦片办法。

3月15日 袁世凯令各省总督、巡抚均改称都督。

△ 袁世凯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

△ 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于是日咨送袁世凯拟派12部国务员一案，与“各部官制通则”原案所定国务员数不符，电袁仍请按原定10部开明姓名电交本院同意。

△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通令全军申明军纪，要求军人各革其心，各爱其身，各守区域，各尽责任，勿以无安插而自惊，勿以有勋劳而自足，勿攘夺私利而操同室干戈，勿把持财产而蹙中央之命，勿遗同志之耻，勿动全国之愤。

△ 上海中国共和研究会更名国民公党，举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为总理，温宗尧为协理。

3月16日 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署直隶都督，赵惟熙署甘肃都督，

阎锡山署山西都督。

△　袁世凯令绍英开去度支部首领，委周自齐暂行管理该部首领事务。

△　上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正式成立，宣布以“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实业，养成共和国高尚纯全之女国民”为宗旨。

△　美参议院通过祝贺中华民国成立案。

3月17日　孙中山据财政部呈请，通令各省停止发行债券，以统一全国财政。

△　孙中山颁布开放“蜑户”、“惰民”令，规定：凡在历代封建统治残酷压迫下受特殊限制，不得与平民享同等待遇之阶层，如福建、广东之“蜑户”、浙江之“惰民”、河南之“丐户”及所谓“义民”、“薙发者”并优娼隶卒等，予以开放，使其享有选举权、参政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自由权利。

△　孙中山赞同胡汉民、黄兴等请设国史院之议，咨请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

△　孙中山在南京参加追悼武汉死难诸烈士大会，并致悼词。

3月18日　袁世凯通令各地迅速选派参议员赴会，俾参议院组织完备。

△　袁世凯通电各省将省谘议局改组为临时省议会，在各省议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未经公布以前，暂由各省议事机关协商自定简易办法。

△　拓殖协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举黄兴为会长。该会拟自东北入手从事垦殖，继及于新疆各处，以实践民生主义，开发国家资源。

△　国民协进会在天津正式成立，举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等18人为常务干事，宣布政纲三项：一、巩固共和政治；二、确定统一主义；三、发达社会实力。

3月19日　袁世凯令各省在官制未公布前，尽力维持现状，勿再纷举都督。

△　孙中山令外交部严禁奸人拐贩“猪仔”（契约华工），并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同日并令广东都督严禁“猪仔”出口。

△　孙中山以邮政总办帛黎于前清邮票上擅自加盖“中华民国”“临时中立”八字，“实属有碍国体”，急电袁世凯请令取消“临时中立”四字，方许发行。22日，袁电告已将此种邮票停发。

△　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湖北省议会召集临时中央议会一事，分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议会、谘议局，宣布此举为不正当行动，断然无效。

△　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以安徽都督孙毓筠与日商三井洋行私签《中日合办铜官山铁矿草约》，群起反对，是日电孙即刻取消此约。

△　直隶谘议局公举驻宁第三军军长即广西副都督王芝祥为直隶都督。

△　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唐群英等10余人至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23日，唐群英等上书孙中山，要求将女子与男子平等款，明文规定于《临时约法》。

△　胡敦复在上海创立大同学院。1922年更名大同大学。

3月20日　孙中山令内务部总、次长慎重用人，务当悉心考察，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引，各部荐任各员不得兼职，以肃官方而饬吏治。24日，孙中山又将此令发至各部总次长知照。

△　孙中山复函海外华侨及电国内各法团，解释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之理由，略称："前日之袁君为世界之一人，今日之袁君为民国之分子，量才而选，彼独贤劳"，望国民"责之以尽瘁，爱之以热忱"。

△　孙中山电袁世凯，主张各省都督由各省人民公举；直隶谘议局已公举王芝祥为都督，请照案加以委任。

3月21日　袁世凯颁令：民国刑法未布以前，治罪之法除与国体牴牾各条外，暂行适用新刑律。嗣后地方遇有此等犯罪行为，犯罪照新律各本条分则审断。

△　北京政府与英公使换约，规定开平、滦州两煤矿合办，易名为开滦煤矿局，盈利四六分（开平六、滦州四）。

3月22日　袁世凯电复南京临时参议院，接受参议院否定湖北省临时议会筹组中央临时议会之决定，又电各省依照"临时约法第18条之规定"办理。

△　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讨论盛宣怀与日本所订《汉冶萍中日合办特别合同》，议决反对改为中日合办，即由股东会电盛取消此约。

3月23日　袁世凯将民国借债办法照会各国公使，告以今后借用外债，均以总统签字为凭，其以个人名义私行借债者，概不承认。

△　袁世凯电孙中山、黄兴、胡瑛，请约束山东民军，勿令进兵济南，并告以将派员前往查办。

△　孙中山以袁世凯于3月10日颁布大赦令系在约法实施以前，是日咨请南京临时参议院予以追认。29日，参议院通过追认案。

△　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咨请设立稽勋局案。

△　孙中山通令各省都督劝办赈捐，以济灾黎。

△　黄兴与蔡元培、宋教仁、刘揆一等在南京发起组织中华民族大同会，黄兴被举为总理。

△　云南都督蔡锷以和局已成，毋庸北伐，是日电告黎元洪，入川滇军开始离渝撤返云南。

△　台湾南投沙连堡羌仔庄农民因日总督批准竹林与三菱会社，庄民生计受迫，激起民愤。是日，刘乾发动山民起义，袭击顶林派出所，杀警官三人，嗣后刘乾等八人被当局处死。

△　日本政府继2月21日向俄、英、美等国提出承认中国新政府先决条件后，是日又拟具详细四项条件，包括新政府承担并履行从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偿还外债，确认治外法权及其他种种特权等内容，令驻外使节照会英、美、俄、法、德、意等国政府，并提议俟承认中国新政府时，各国皆以同文照会分别递交中国政府。

3月24日　孙中山据司法部呈：前清民刑各律及诉讼法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及关于内乱之罪死刑不能适用外，余皆继续有效，俟民国法律颁布即行废止。是日孙中山将此案咨请参议院审议施行。

△　孙中山令教育部准佛教会立案。

△　袁世凯任命周渤署山西民政长，原任李盛铎请假照准。

△　中华共和宪政会在上海改名为中华民国宪政党，举伍廷芳、李平书为正、副领袖。

3月25日　北京政府新任国务院总理唐绍仪为组织内阁抵南京晋见孙中山，商议向参议院提国务员名单事。孙中山以民国政治体制应以法制为据，即令法制局迅拟国务院官制，咨请参议院审议决定后，

再行依法提名。

△　袁世凯以驻京扎萨克喇嘛等组织“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核其宗旨，系为宣布五族平等，伸我蒙藏人权起见，应准其先行立会”，俾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与内地平等。

△　黄兴电各省都督，谓风闻宗社党人现从北方潜来，往来于南方各处，煽惑军队，颇思扰乱，图谋不轨，凡我军界指挥与军事当局应速设法严加防范。

△　中华全国军界统一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议决会纲，并派员前往南京促成统一政府。

3月26日　袁世凯任命彭英甲补授甘肃布政使。

△　孙中山以民国统一，战事终结，令参谋部裁撤大本营名目。

△　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议决财政部拟订之《金库则例》，法制局拟订之《法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及《法官考试令草案》，内务部呈《暂行传统病预防法草案》。

3月27日　袁世凯任命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

△　孙中山函复佛教会，阐释约法中信教自由之精神，并对各国政教分离之美风表示赞赏。

△　自安徽寿州调还苏州之军队，因减饷闹事，是晚哗变，焚掠店铺多处，损失达百余万元。28日，代理江苏都督庄蕴宽派兵镇压，始平。

△　唐景崇、唐文治、严复在上海创办之神州大学开学。

3月28日　袁世凯令署山东都督张广建来京，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未到任前，以余则达署理。

△　孙中山通令各省都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务须严饬所属，勿许越法肆行，一面晓喻人民，许其按照临时约法，对越法行为进行控告。一经调查确实，立予尽法惩治，并将罪行宣示天下。

△　前清隆裕太后以清帝退位后，贵族中有人组织宗社党，反对共和，北京谣传颇盛，特令世续传谕速即解散。

3月29日　唐绍仪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发表政见，并提出10部总长名单，经参议院投票表决，除交通总长梁如浩外，余均多数同意。

3月30日　袁世凯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未到任前，由胡惟德署理），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

△　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统辖布置两江一带军队，黄辞不就。4月1日，袁改任徐绍桢为参谋总长。

△　唐绍仪由蔡元培、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主盟。

△　袁世凯以北京谣传宗社党谋变，人心不靖，特出示晓谕，并禁止造谣。

3月31日　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

△　同盟会公饯孙中山，到千人。孙中山于公饯席上演说，阐述民生主义，勉励同志实行。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4月

4月1日　孙中山莅临时参议院行解职礼，解卸临时大总统职，

并致解职词。略谓：“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同日颁布“解职令”，宣布即日解除总统职，“以后国中一切政务，悉取决于政府”。

△ 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凡18章105条。

△ 中华民国铁道工会在南京成立，举史青为会长。

4月2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同日并通电宣布：4月8日休会，21日议员齐集北京。

△ 俄驻京代办谢金会见袁世凯，要求两国政府尽早达成外蒙协议。袁表示赞同。

4月3日 孙中山离南京赴上海，南京万人送别。抵沪后，在南京路同盟会机关部发表演说。指出：“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家民族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

△ 袁世凯通电各省催选参议员。

△ 西藏地方政府受英方唆使，自3月起派兵连续进攻江孜驻军。是日，驻江孜英商务专员麦克唐纳与廓尔喀（即尼泊尔）代表拉巴哈达出面斡旋，驻军被迫将武器售予藏军，撤离江孜。

4月4日 上海自由党公宴孙中山。自由党副主裁李怀霜致颂辞，请孙中山莅主裁任。孙中山致答辞，指出“共和时代，党派多少，足觇人民程度高低”。并谓政党“有互相监督、互相扶持之责。政府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

△　孙中山在上海同《文汇报》记者谈话称："社会革命今已告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大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之事业，不用兵力而用和平方法。"又谓："余实为社会党人，颇信亨利佐治（即亨利·乔治）所操之主义实施于中国。"

△　山西都督阎锡山自包头返抵太原。

4月5日　袁世凯令准徐绍桢辞参谋总长职。

△　孙中山同《大陆报》记者谈中外合资问题。回答外国资本家投资问题时，表示可组织中外联合公司，定一期限，若干年后归共和政府。

△　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电袁世凯，条陈筹办藏务情形，请委钟颖为西藏行政使。9日，袁世凯复电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处理藏务。

△　民国法律学校在上海开学。

4月6日　袁世凯任命姜桂题为热河都统，未到任以前，仍由崑源署理。

△　黎元洪宣布解大元帅职。

△　参议院将全体参议员名单咨文交国务总理唐绍仪。唐即将参议院咨文、各省到院参议员49人名单清册一本电告袁。

△　统一党在上海开会欢迎孙中山，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胡汉民等出席，孙中山即席演说民生主义之要义，并盼该党趋重民生主义，以谋取国利民福。

△　安徽大通军政分府黎宗岳因不遵令裁撤，陆军部派柏文蔚率队前往镇压，并电皖督胡万泰发兵防截溃兵，是晚黎避往建德。

4月7日　　袁世凯补授曹锐为直隶布政使。15日又任命曹锐署直隶布政使。

△　孙中山由沪抵宁，应黎元洪电邀，当日乘“联鲸”兵舰赴武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28人同行。

4月8日　袁世凯任命施肇基为交通总长。

△　女子参政同盟在南京成立。10日发表《女子参政同盟宣言》，宣布以争取女子国民参政权为宗旨。

4月9日　　孙中山应黎元洪邀请抵武昌，受到黎元洪及各界万余人热烈欢迎。

△　黎元洪电唐绍仪与各部总长，敦促组织政府。

4月10日　　孙中山在湖北军政各界代表欢迎会演说共和与自由之真谛，指出：“此次革命，乃国民的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福。”“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应牺牲自由，为民尽职。同日又出席武昌13团体联合欢迎会演说社会革命。

△　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袁世凯之代表赵秉钧出席并宣布政见，举赵秉钧为总理，陆建章为协理。

4月11日　　袁世凯派范源濂、张大昕携其手函至武汉欢迎孙中山北上。次日，孙中山电复袁世凯，因急于返粤，缓日北行。

△　孙中山赴汉口出席武汉商会等15个团体联合欢迎团举行之隆重欢迎大会，发表演说，谓“文今日并非功成身退，其实暂离此职，再与诸同胞共筹此举（按：指社会革命）”。

△　广东省议会电袁世凯弹劾都督陈炯明违法滥用军律，杀害广

州《独立报》发行人陈听香。

△　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举蔡锷、张凤翙、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

△　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

4月12日　孙中山在湖北同盟会支部欢迎会上演说国都问题，认为北京在外人势力范围之下，主张建都武昌。

△　孙中山离武汉返上海，临行前布告答谢武汉各团体，并致函武汉报界联合会，留临别赠言。

△　黎元洪发出救时通电，痛陈时政十害，主张将军事、民政划分两途。

△　凌晨，驻南京赣军第二十五、二十八两团士兵3000人因减饷发生兵变，抢劫铺户，南京留守府当即派兵敉平。

4月13日　袁世凯任命黎元洪领参谋总长事。

△　袁世凯令准江苏都督庄蕴宽辞职，遗缺以程德全继任。

△　袁世凯颁发汉、满、蒙、回、藏各族联姻劝谕。

△　黄兴电袁世凯报告南京赣军哗变原因及处治办法，略谓："查此次起乱之原因，匪徒勾结，并有宗社党从中煽惑……借减饷为名，忽尔倡乱。"并告已于次日将哗变之赣军第二十五、二十八两团兵妥协送回赣省遣散。

△　安徽宗社党分子张鹏（即张达）纠集同党二三十人，在南京、浦口一带散布谣言，煽惑军队，图谋起事，被破获。安徽都督孙毓筠将张鹏宣布死刑，饬令枪毙。

△　共和建设讨论会在上海成立，通过会章，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

△　山西临时省议会成立，举杜上化为正议长，王用宾、陈受中为副议长。

4月14日　　袁世凯公布《南京留守条例》，凡七条，规定："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

△　孙中山自武昌返抵上海。

△　南京留守黄兴查禁军人组织"大公党"。越二日又取缔青帮首领章武组织之"青帮改进会"及无赖流民所组织之"渔业统一党"。

4月15日　　国务总理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两总长联袂离沪赴天津。17日，袁世凯准唐请假五日，并令外交总长陆徵祥暂行代理。

4月16日　　袁世凯通令劝农保商。责成各省都督，"劝谕农民及时耕种，严饬兵警镇慑地方，保护市面，使农勤于野，商悦于途"。

△　四川西征军先锋支队标长朱敦伍率队向西藏进发。

4月17日　　孙中山出席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宴会，发表演说指出："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当晚离上海赴广州。

△　孙中山在上海接见社会党江亢虎，交谈甚久，仍申前说拟编辑社会主义讲义。并称："定于六月一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

△　下午，尚贤堂中西董事会开会欢迎孙中山，到十五国之外国人与外交官以及中西绅商共200余人。该堂督办、美人李佳白与孙中山分别演说。

△ 山东省临时议会成立，举张映竹为正议长，刘恩锡、王讷为副议长。

△ 中华进步党在上海开选举职员会，公举谭人凤、李经羲为正、副主裁。

4月18日 孙中山在上海出席自由党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出："当此共和时代，无论政党、民党有互相监督、互相扶持之责，政府善则扶植之，不善则推翻之。"

△ 苏州同盟会会员、北伐先锋团重要成员柳承烈、蒯际唐等为反对都督程德全，秘密组织"洗程会"，谋驱程。事泄，蒯遇害，北伐先锋团被解散。

△ 新任驻京俄公使库朋斯齐到京。

4月19日 袁世凯任命樊增祥为湖北民政长；丁道津署山东布政使。

△ 袁世凯明令取消扬州军政分府。

△ 驻奉天省城混成协第三标为反抗官长指派国民捐，于夜晚哗变，抢劫银行票号，纵火焚烧房屋百余家，被抢者400余家，经派队防剿，至天明始分途逃窜。

4月20日 同盟会代表张绍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访晤袁世凯，声明同盟会国务员决议全体总辞，并称同盟会主采完全政党内阁，反对混合内阁。袁表示不同意政党内阁。

△ 国务总理唐绍仪与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抵京。

△ 孙中山于赴粤途中抵福州，各界团体3000人在明伦堂开盛大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共和政府如国民公仆，国民可组织政

党监督政府。格致书院主理美国人弼履仁演说中美友谊，并赞孙中山为“中华华盛顿”。

△　沪军都督陈其美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借银15万两合同。是为第一次“沪督三井借款”。

4月21日　唐绍仪在总统府主持首次国务院会议，中华民国国务院在北京成立。

△　袁世凯令总统府设秘书厅及军事处，裁撤原设临时筹备处、军事争议处。22日，任命梁士诒为秘书长，冯国璋为军事处总长。

△　南京留守黄兴令自即日起各省驻宁军队陆续遣调回籍。

△　山东省同盟会支部在济南成立，举蒋洗凡为会长。

△　俄公使库朋斯齐谒见袁世凯，谈外蒙独立问题，提出中国取消外蒙独立应先承认外蒙与俄所订一切条约皆当有效等三项条件。

4月22日　袁世凯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不设理藩专部，各该地方应办事宜归并内务部接管。

△　国务院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各省军政、民政分治事项。

△　贵州省议会成立，举孙贻、欧阳朝相为正、副议长。

△　湖南都督谭延闿因近日谣传有宗社党多人来湘潜谋不轨，召集各将校开军事会议，妥筹消弭办法。

4月23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官员不得自为风气，各顾其私。设有阻挠侵越，致妨大局，是为人民公敌，决不姑息迁延。

△　袁世凯令各省速行参议员选举，并催参议员迅即赴京。

4月24日　袁世凯特邀唐绍仪到总统府会商实施军民分治办法。决定："一、通饬各省暂行官制一律仿照湖北办理；二、饬令该省会成立一月之内即举定民政长，电请本大总统正式委任。"

△　孙中山由福州抵香港，受到各界团体热烈欢迎。香港当局不允登岸，乃乘"宝璧"舰赴广州。

△　同盟会在上海成立总机关部。

4月25日　袁世凯令准袁大化辞新疆都督职，遗缺以袁鸿祐继任。同日并任命杨增新署新疆布政使。

△　孙中山抵广州。次日，出席广州军界欢迎会，演说军人之本分，指出："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全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

△　中国同盟会本部迁往北京。

△　国务院通电各省停止购运军械。

△　内务部奉袁世凯谕通饬各省，将共和大义撰成白话告示，遍贴村镇，俾使家喻户晓。

△　黄兴以国务院通令停止购械目的在于削弱南方民党实力，电复国务院，请变更原令，各省所购军械应请税司一律免税放行。

△　广东都督陈炯明忽于夜间离职出走香港，行前以咨文致省议会称："公事暂请胡君汉民代行，俟汪君精卫回省乃交卸。"

4月26日　袁世凯令财政总长熊希龄未到任以前，着施肇基暂行兼署。

△　袁世凯任命柏文蔚署安徽都督。次日又令兼署安徽民政长。

△　袁世凯任命唐继尧署贵州都督。

△　财政总长熊希龄由京抵宁，奉袁世凯之命同黄兴会商解决南京留守府经费问题。5月3日返抵北京。

4月27日　袁世凯令准齐耀琳辞河南都督职。

△　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演说治粤方针，并请即举胡汉民为都督，以安大局。

△　下午，孙中山在广州招待粤记者，以“言论一致”为题，发表演说，望报界与共和政府合作为方针。指出：“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故今日报纸，必须改易其方针，人心乃能一致。”

4月28日　广东省议会开会，到议员118人，正式公举胡汉民为粤都督。并推汪精卫为参谋，陈炯明为军政。

△　袁世凯令杨荩诚开去贵州都督缺。

△　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追悼史坚如烈士大会，并倡议为史坚如造像建祠。

4月29日　临时参议院在北京行开院礼，袁世凯偕国务员莅会并发表宣言，提出财政计划大纲及其他要政方针。

△　孙中山在广州答香港电报公司代表问借款事，表示：“倘四国（银行团）利用中国现今财政困难而阻中国之进步，则国人必将发愤自助，设法在国中募集公债，以济目前之急。”

△　黄兴通电全国倡议劝募国民捐，减少外债之输入，以解决财政困难。

△ 上海华侨联合会致电袁世凯，要求派代表出席临时参议院。

4月30日 云南都督蔡锷因藏兵进至察木多，进逼川界，是日电请袁世凯、尹昌衡、张培爵加强西藏边防，并请详示藏事计划，用释悬局。

△ 北京“军界统一会”通电宣布解散。

是月 陈万远、沈九成、沈启涌在上海创办三友实业社，资本450万元。最初只制“金星牌”棉线烛芯；1917年始织毛巾，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毛巾织造厂。

5月

5月1日 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会，改举吴景濂、汤化龙为正、副议长。

△ 袁世凯令裁并江北军政府，该处军政、民政归江苏都督管辖。

△ 国务总理唐绍仪同六国银行团（俄国华俄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美国摩尔根银公司）商交款事宜，要求先交付3500万两，自本月起至10月止，每月交付1000万两。

△ 直隶都督张锡銮与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签订银10万两借款合同。

5月2日 袁世凯通令各地方长官禁止武力胁迫议会；如有侵扰或聚众胁迫议会者，立即酌派得力军警前往保护，并逮捕犯人，交司法衙门按律审办。

△ 总统府接西藏联豫电称，藏人与汉兵在拉萨开战，藏人死900

名。

5月3日　　唐绍仪与银行团之英、美、法、德、日五国代表在国务院开第二次借款会议。各代表提出监督财政条件，唐绍仪力拒，无结果。

△　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同日，袁世凯任命严复为校长。

5月4日　　国务院会议讨论财政及蒙藏边务，决定发行不兑换纸币；与俄、英公使交涉，并派张绍曾、温宗尧分赴蒙藏安抚。

△　孙中山出席广州新闻界欢迎会，演讲“平均地权”，其办法为：一、照价纳税；二、土地国有。

△　黎元洪电请袁世凯、参议院、国务院迅速颁布划一官制。

△　中国同盟会总机关部在上海开会，议决更名为中国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举姚勇忱、吕天民为正、副部长。

5月5日　　孙中山在广州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解决民生问题须从地税入手。同日又出席潮州旅省同乡会欢迎会，演讲“地方自治”。

△　浙江都督蒋尊簋与德商礼和洋行签订600万马克借款合同。

△　同盟会湖南省支部成立，举洪荣圻为支部长，谭延闿、陈强为副支部长。

5月6日　袁世凯任命周渤为山西民政长。

△　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演说提倡女子教育，指出：“女子师范尤为重要。”同日，孙中山在广东同志竞业社欢迎会演说，希望洪门会改变立会方针。

△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陆宗舆、任凤苞为协理。

△　署安徽都督柏文蔚与日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签订25万日元借款合同，以铜官山铁矿担保，该矿由中日合办。

5月7日　　临时参议院议决，国会采两院制，定名为参议院与众议院。

△　袁世凯令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到任以前，以王正廷署理。

△　袁世凯任命魏宸组为国务院秘书长。

△　袁世凯任命冯自由为临时稽勋局局长。

△　唐绍仪于5日函告银行团，借款事由熊希龄财政总长一手办理。是日，熊希龄代表中国政府与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事宜。

△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演说“非学问无以建设”。

△　新疆南路喀什噶尔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率众举事，杀新任都督袁鸿祐。嗣后，边、魏聚众成军，编为地方治安营。俄国乘机增兵喀什噶尔。

△　驻镇江江苏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顾忠琛以宗社党人潜入该地，妄思扰乱治安，是日示谕各界人民一体知悉；并号召宗社党人输诚自首，否则国法具在，决不宽赦。

5月9日　　共和党在上海成立。该党系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系中华帝国宪政会改组而成）、国民共进会六政团组成，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那彦图为理事。

△　袁世凯任命驻藏军协统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

△　孙中山出席广州耶教联合会欢迎会，主张基督教徒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

△　英增兵进入片马。16日，外交部接滇督蔡锷电，请与英使严重交涉。

5月10日　临时参议院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

△　袁世凯令陕甘经略使胡瑛改任新疆青海屯垦使。

△　同盟会河南省支部成立，举上官邦彦为支部长，王傑、周维屏为副支部长。

5月11日　袁世凯以捕人索银事迭有所闻，通令各省长官及各军队长官应遵守《临时约法》，恢复秩序，尊重人权，切实保护人民财产，实行法治，以巩固共和基础。

△　山东省临时议会成立，举张映斗为正议长，刘冠三、王讷为副议长。

5月12日　袁世凯通谕私立团体不许干政。略称："现在各省临时议会，皆依迭次法令组织，职权既有专属，舆论得所折衷。地方官厅，按法应受省议会之监督，亦惟省议会乃得直接行此法定之职权。其以私立团体对于立法、行政两机关，尽可陈请建言，以资博采，不许动辄干涉，致妨进行。"

△　南京军界成立同袍社推黄兴、王芝祥为正、副社长。

△　教育部决定将京师督学局及八旗学务处合并为北京学务局；将财政、法律、银行三学堂合并为法政学堂；八旗高等学堂及八旗各学堂仍准设立，惟将"八旗"名称取消，五族皆可入学；另贵胄法政、陆军两学堂即行废止，两处学生并入新立之法政及陆军学堂。

5月13日　国务总理唐绍仪及各国务员至临时参议院宣布政见。唐说明政府财政窘迫，“现虽全国统一，而农废于野，工荒于肆，商贾滞于途，求有敷于政府所规划之用，茫然无所取给”。因租税、公债、金融等事，缓于济急，“故不得已，惟以输入外债，以救急需”。

△　袁世凯令湖北民政长樊增祥未到任以前，由刘心源暂行署理。

△　孙中山在广州对报界发表谈话，指出平均地权乃以土地之利，还之大众。

△　黄兴电袁世凯、国务院请裁撤南京留守职，并告遣散军队情形：“已经遣散者，约计不下二万余人。此外减缩军队之各种办法，已迭次与各军、师、旅长等公同妥协，依次进行。”

△　南京留守府及沪军都督与日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签订借银35万两合同。

5月14日　临时参议院再议国旗统一案，议决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以国旗为商旗。

5月15日　是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为广州起义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在广州亲率同志及粤省文武官员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北京、南京分别举行黄花岗纪念大会。

△　陕西省临时议会成立，举杨铭源为议长。

△　上海豆油饼行业因反对江苏都督颁布增税新章，举行罢市。18日捣毁货物税总所。

5月16日　南京各界成立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

5月17日　财政总长熊希龄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300万两垫款合同。合同计四条，监视开支章程七条，由银行团于北京、上海各付150万两。

△　孙中山出席粤路公司欢迎宴会，力言：挽回粤汉铁路利权，应速开收三期股本，“鄙人当发电各埠力为鼓吹”。随即拟定致各埠电文，交公司拍发。电谓：“弟顷到商办粤路公司，提倡速收三期股款，联合湘、鄂，推广进行，国利民福，望速图之。”

△　宗社党荆州支部首领、前清荆州将军连奎之子化名傅凤池潜伏汉口租界，密谋颠覆武昌都督府，被捕，搜出手枪70支、子弹三万发。经军法审讯，傅供出同党军官20余人，均于当夜枪决于武昌。

5月18日　袁世凯令大理院正卿更名为大理院院长，任命许世英为院长。

△　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任命潘震为新疆布政使。

△　袁世凯任命王丕煦署山东布政使。

5月19日　袁世凯派陆军次长蒋作宾乘专车南下挽留黄兴。

△　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所办《新世界》半月刊在上海创刊。7月15日该刊第五期首次全文译载恩格斯著《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5月20日　参议院开秘密会议，讨论借外债事。国务总理唐绍仪、财政总长熊希龄列席会议作说明。

△　孙中山离广州抵香港，对《士蔑西报》记者谈话，主张借用外资兴办实业，“如建设新城邑，开通全国及建筑铁路等，皆为要政”。

5月22日　　袁世凯通令劝谕军人卫国保民，“保全荣誉，巩固国基”。

△　袁世凯派袁大化督办南疆剿抚事宜，所有省垣及南疆军队均准节制调遣，会同杨增新妥为办理。

△　孙中山在香港与《南清早报》记者路威臣谈话，反驳所谓黄祸论，指出：“惟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欧人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果尔，将来事势所趋，则难预言。”

△　黄兴电袁世凯称，非裁撤军队不足以救危亡；并报告所属军官愿先解释兵柄，以为天下倡。

△　外交总长陆徵祥自俄返国，是日由津到京。6月10日到部视事，表示将以要求列强承认民国为第一急务。

△　河南布政使王祖同得其侄王汝桂探报：“白朗，宝丰县西乡二十四里大刘庄人，巢穴在本街，带70余人，快枪36根。”按：此系官方文书中，最早有关白朗起义的记载。

△　上海《民权报》主笔戴天仇（季陶）遭英租界捕房拘禁。

5月23日　孙中山自香港抵澳门。25日视察澳门镜和医院。

△　黄兴电袁世凯反对政府擅借外债，主张发行不兑换券及国民捐，以救危亡。次日将该电通电各省，请一致进行，并攻击袁世凯，陈述募集国民捐及办国民银行办法。

△　中国同盟会与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是日下午两会开全体职员会，筹商一切事宜，并订定合并条款12款，其中规定：“自合并之日起，凡会员行动均须在同盟会宗旨、政纲及一切决议案范围以内。”

5月24日　　袁世凯据融洽汉满禁书会发起人陈其美、王人文电呈，通令禁售排满及诋毁前清各项书籍。

△　财政总长熊希龄通电各省都督，说明财政困难及借款苦衷，略称：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不及六万，“东张西借，寅食卯粮，危险之状，不敢告人”；银行团300万两垫款，并非正式合同，各都督如能于数日之内设法筹定，使南北军饷每月700万两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

△　黄兴就募集国民捐及办国民银行事，致函袁世凯陈述办法。

5月25日　袁世凯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正监督，筹备银行开办事宜。

△　袁世凯任命溥砯为乌里雅苏台将军。

△　福建省临时议会成立，举宋渊源为正议长，刘映奎、曹振懋为副议长。

△　胡汉民通电全国，力陈大局之危，主张分权于各省。

5月26日　孙中山返回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故乡，并出席孙氏家族欢迎恳亲大会。

△　中华民国回教联合会在南京成立。

5月27日　　财政总长熊希龄以借款事受舆论指责，是日通电宣布“已上书自劾，即日辞职”。

5月28日　财政总长熊希龄通电提出发行国民公债办法，向各省征询意见。

5月29日　孙中山抵广州，同日电约黄兴同赴北京，调和党派及提倡国民捐。

△　孙中山致电北京国务院，主修筑滇桂铁路，“如中央政府力不暇，乃请由滇、黔、桂三省都督自行筹备”。

△　黎元洪照会驻汉日总领事，请令驻大冶铁矿日军从速撤走。

5月30日　农林总长宋教仁向国务院会议提出大政方针，主张实行军民分治，集中军政、财政于中央政府；并提出12条，包括官制、行政、裁兵、财政等项内容。

△　黎元洪通电请速统一币制。

5月31日　袁世凯令准黄兴辞南京留守职，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

△　袁世凯任命柏文蔚为驻江宁一带之第一军军长，徐宝山任第二军军长，该两军及第三军之八师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其余留守所属之江苏地面部队，均归程德全接收，按原计划切实裁汰。

是月　台湾同盟会员罗福星由胡汉民陪同向孙中山请示，孙对其解救台湾的意愿和决心表示同意，并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

△　刘师培在广州发起组织晦鸣学社，此为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团体。

△　厦门电煤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资本30万元。

6月

6月1日　国务院就四川民众激烈反对借外债事，电成都尹昌衡都督、张培爵副都督及重庆胡景伊镇守使，令晓喻民众释其疑窦，以遏乱萌。

△　滦州矿务公司与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合并为开滦矿务总局，是日在天津签订正式合同，资本200万英镑。

△　沪军都督陈其美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借银10万两合同，是为第二次“沪督、三井借款”。

△　俄政府又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入侵伊犁。旋外交部向俄使提出交涉。

6月2日　袁世凯颁令保护八旗人民私有财产。

△　袁世凯任命王永江署奉天民政使。

△　国务院电直隶都督张锡銮转各镇及各统领，重申军人不得干涉政治。

△　北京中央新闻社因刊载宗社党消息及内务总长赵秉钧营私舞弊事，是日被步军统领衙门将该社经理张萼华、编辑郑翰之等12人悉行逮捕。后经于右任说项，5日获释。

6月3日　孙中山电袁世凯及参议院称，实行国民捐实为救亡要策，盼极力提倡，并指出须由参议院采累进法颁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

△　川督尹昌衡以打箭炉外风声日急，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派员请援，令朱文玉率兵一标赴拉萨，是日出发，并令打箭炉外顾统领为后援。

△　黄兴再次倡议不借外债，力主发行不兑现纸，募集国民捐，以济财政困难。

6月4日　临时参议院以《临时约法》早经颁布，议决各省不得自行订定省约法。10日，国务院通电各省遵照。

△　国务院通令禁止行政机关人员兼差。

6月5日　　南京留守黄兴派卫兵捕获宗社党多名，经审讯发现一“渔业统一党”，人数甚众，期以沿江、沿海一带为举事区域，并与北方宗社党人联合，谋颠覆共和政府，奉戴大清皇帝正位。审讯后枪毙11人。7日，黄兴通电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上海，饬将各省区之“渔业统一党”一律解散。

△　云南都督蔡锷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请“大总统敦请梁启超回国，优予礼遇。应如何倚任之处，伏恳大总统卓夺施行”。

△　高翁主编《真相画报》在上海创刊。该画报共出17期，1913年3月1日停刊。

6月6日　　广东都督胡汉民以袁世凯曾电各省都督，请解款中央以资襄助，是日汇解北京政府银100万两，并建议将军、财两权授予各省都督，由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

△　山东都督周自齐电袁世凯及国务院，申明赞同柏文蔚所提借款与国民捐同时并举之主张。

6月7日　　四川政务处以藏兵进逼河口，打箭炉危急，是日会议决请川督尹昌衡率兵入藏平乱。

6月8日　　袁世凯公布国旗、商旗及陆海军旗式。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　袁世凯派驻荷兰临时外交代表刘镜人出席海牙万国汇兑统一章程会议。

△　孙中山提倡开发东沙岛。是日广东电，入股之人极为踊跃，现已入股500余万。

△　川督尹昌衡召开西征会议，讨论征藏军事。会上尹发表演说，表示自愿率兵前往，亲冒矢石以定边乱，恢复西藏，并计划于10日内先遣支队一二出发，别设断后军一镇。

△　江西南浔铁路同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在上海签订第一次借日债500万元合同。

6月9日　　袁世凯以前清外交延用外人为顾问，遇事密报其本国，非谨慎外交之道，是日谕国务总理唐绍仪、外交次长颜惠庆等，应速查所聘外人合同，年限满者即行辞退，未满者，酌给薪金婉言谢绝。

△　孙中山在广州与各界开谈话会，讨论平均地权及地价抽税问题，指出：平均地权不是使土地“从实均分”，而是“确定地税，照价增收一层，实行单税法”。至于土地国有，则“地不必尽归国有”，而是“收取其需用之地……确定公道之价”，进行赎买。

△　各省联合总会在南京成立，举孙中山、王芝祥为正、副会长。

6月10日　黄兴电教育总长蔡元培，阐述教科书编纂原则，主张小学应废读经，用国语教授。

6月11日　袁世凯申令禁止私种鸦片。

△　参议院讨论行政俸给，议定国务总理月俸2000元，各国务员月俸1500元。

△　沪军都督陈其美通告收回中华银行所发军用钞票。

△　袁世凯电蔡锷，令“取道巴塘，救藏之急”。

6月13日　陆军总长段祺瑞出席临时参议院宣布裁军方法，提出

分驻各省军队，仍按前清时代原有兵数。

△　沪军都督陈其美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借银10万两合同。是为第三次“沪督、三井借款”。

△　甘肃都督赵惟熙通电，秦州临时军政府取消。

6月14日　南京留守府撤销，黄兴解职。当晚即离宁赴沪。

△　尹昌衡、张培爵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告以尹不日将率兵入藏，兵额在一万数千人，每月军饷约30余万两，川省每月仅能担任10余万两，不敷甚巨，请袁电令各省都督量力分担。

△　统一党暂行总理章太炎发表宣言，宣布该党脱离共和党，嗣后仍称统一党。

△　为解决原贵州都督杨荩诚率北伐黔军自湘回黔，滇军限期自黔撤退，经黎元洪调停，鄂、湘、黔三省四方代表于湖南洪江开会，16日达成北伐黔军回黔，驻黔滇军限期尽退等八项决议，各方代表共同签订《洪江条约》。旋唐继尧通电否认《洪江条约》有效，滇黔两军遂在贵州松桃、铜仁一带发生军事冲突，黔军失利，退往四川秀山，北京政府支持唐继尧，下令解散黔军。

△　山东济南东门外第六路防营兵因欠饷哗变，攻入城内，围攻都督府及各衙署，焚烧房屋，抢掠铺户，第五镇统制马龙标率自带兵平息，当场击毙变兵百余名。

6月15日　袁世凯一反前与唐绍仪所定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之议，改派王为南京军宣抚使，并未经内阁副署，即将此令擅行颁布，唐于当日辞国务总理职，愤而离京赴津。

△　孙中山到香港，答记者提问，提出中国必将裁去通商口岸之租界，开放中国各地。

△　西藏骑兵千人攻入里塘（今理塘）。

△　日本贵族旅行团抵京，次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欢迎。7月6日该团回国。

△　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更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6月16日　四川西征军先遣队第一营由标长朱敦五率领向西藏进发。

6月17日　袁世凯令准唐绍仪请假赴津调治，任命陆徵祥暂行代理国务院总理事务。

△　孙中山与港商谈中外合资银行事。

△　四国银行团以300万两垫款交中国政府以济急需。

△　下午，英公使朱尔典会见陆徵祥，称英在片马增兵2000人，系“保护”侨民，“本使于上午致电驻片敝国军队速行退回”。

6月18日　财政总长熊希龄对德文报记者称中国目前唯有借外债度过财政困难，切望巴黎银行团代表会议妥定续借款项，预计7月至10月四个月，每月需银1000万两。

△　孙中山离香港赴沪，21日抵达。

△　沪军都督府虞洽卿与荷兰银行签订一万两借款合同。

△　自由党本部自上海迁北京。

6月19日　陆徵祥拟定禁烟办法：先电各省实行禁种、禁吸，以杜外人口实；并照会英使自7月1日始，所有无印花之印度土药不准运华。

△　驻奉天大北关外混成协第三标，因官长强派国民捐而哗变。省城400余户遭抢掠。

6月20日　中国同盟会代表张耀曾等四人会见袁世凯，表示今后应采完全政党内阁，如仍采混合政党内阁制，同盟会员将不再加入。袁表示“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

△　共和党北京本部电上海该党称，唐绍仪离职赴津，同盟会员不宜再任总理，当推定交涉员游说同盟会、统一党，应由无党派者任超然总理。

6月21日　黎元洪通电忠告党人化除畛域，扶颠救危，永固国基。

△　工商总长陈其美、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分别向袁世凯呈辞。次日，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亦分别向袁世凯呈辞。

△　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在京开联合会讨论第二任内阁组成之办法。同盟会主张用国民信仰之人为总理，共和党主张用总统所信任之人。

△　江苏都督程德全致函黄兴，力劝其速往北京联络北方军界。

6月22日　袁世凯与国务员会议西藏问题，议定达赖喇嘛仍为全藏教主，仍其名号，以调和藏人等四项解决办法。

△　孙中山同《民立报》记者谈话，表示期以10年完成全国铁路事业。

6月23日　上海各界举行欢迎孙中山、黄兴大会。孙中山因事未出席，请黄兴代表。黄即席答词称：“以今日之现象观之，非政见相争，实以党名相争，前途非常危险。”

△　同盟会在京开全体职员会，决定第二任内阁应为纯粹政党内阁，若仍为混合内阁，本党决不加入。

△　共和党在北京开会，决定阁制应为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如由纯粹政党组织，本党誓不出席参议院表决。

△　中国社会党与中华民国工党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切实联合，一致进行。两党事务所可自由归并。社会党党员与工业有关者，得同时为工党党员；工党党员了解且信从社会主义者，得同时为社会党党员。两党对外交涉，并力行之。

6月24日　十三世达赖喇嘛吐布丹甲错在驻印英军武装庇护下，自噶伦堡启程返藏。

△　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六国银行团代表谈判大借款，熊以对方条件苛刻，即日停议。

6月25日　袁世凯因近来有人以拿破仑第一之故事捏造讹言，通电全国辨明谣诼，重申“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凡我国民“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

△　孙中山对《民立报》记者谈振兴中国问题，指出：“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少定之”，并提出修筑全国铁路之计划，其中干路分三条：一、南路：起于南海，由粤、桂、黔，走滇、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苏、皖，而豫、陕、甘，越新疆而达于伊犁；三、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蒙、外蒙，达于乌梁海。

△　财政部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催缴自上年阴历八月起截至本年阳历6月止，各该省应解外债赔款数目（全国共为一千七八百万两）。

△　同盟会陕西分会改为陕西支部，举井勿幕为支部长，张凤翙为副支部长。

6月26日　袁世凯公布《国务院官制》，凡12条。

△　黎元洪向德商捷成洋行借银300万两，用于湖北官钱局资金及购置采矿机械。

6月27日　袁世凯令准唐绍仪辞国务总理职。

△　袁世凯令准施肇基辞交通总长职，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代理交通总长。

△　同盟会驻沪机关部电北京本部，倡议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无论何党，惟须得国民多数之信用，吾党均宜赞成之”。并声明如共和党愿出组阁，同人拟代推荐黎元洪为总统。

6月28日　袁世凯命梁士诒邀请参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汤化龙到府，说明拟以陆徵祥继任总理，征求同意，并嘱其疏通各党，免致分歧。吴、汤均无反对意见。

△　中国同盟会本部开临时全体职员大会，议决会员决不参加混合内阁，纯然居于在野党监督地位。

△　湖北襄阳民军司令张国荃拥兵独立。黎元洪派兵征讨，张逃郧阳。

6月29日　临时参议院举行特别大会，袁世凯派梁士诒出席报告，拟任命外交总长陆徵祥为国务总理。经投票获半数以上通过。

△　袁世凯特任陆徵祥为国务总理。

△　袁世凯令准工商总长陈其美辞职；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均予挽留。

6月30日　袁世凯通令禁止勒派国民捐。

△　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开夏季常会，黄兴代表孙中山莅会发表政见，阐述民生主义，略称："民生主义，孙先生曾屡次演说，惟外间尚未明晰。……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

△　袁世凯任命那彦图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兼办理图什业图、车臣两部事宜。

7月

7月1日　袁世凯令准孙毓筠辞安徽都督职，遗缺以柏文蔚继任。

△　中国同盟会本部通电宣布政见：绝对主张政党内阁，本会会员不得自由加入陆徵祥超然内阁。

△　孙中山复函陈其美，表示我国必须加强军备，方能避免强邻"吞食"，保障国家独立。

△　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以"交换智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为宗旨，是日开成立大会。

△　四川临时省议会开幕，选举骆成骧为议长，邓孝可、胡骏为副议长。

7月2日　蔡锷电袁世凯、国务院，提出两项任用地方官吏主张：一、自知县以上宜由任用，不宜推选；二、可用本省人，而不宜用本属人。

7月3日　袁世凯令准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辞职，以王广圻继任。

7月4日　　芜湖驻军两营因欠饷于凌晨兵变，抢劫铺店27家及军械库，天明即渡江逃散。

7月5日　　《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章士钊在该报发表《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国内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然后在一定时间内各抒政见，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此系轰动一时之“毁党造党说”。嗣后引起争论多日始息。

△　袁世凯任命倪嗣冲办理河南边界善后事宜。21日令准倪嗣冲辞河南布政使职。

△　江西都督李烈钧电告国务院，改赣省铁路公司为江西南浔铁路有限公司，并由铁路总监彭程万、名誉总监陈三立到沪与日商兴业株式会社借500万日元，以铁路机器材料作押，合约不日签押交款。

△　川省边军统领顾占文率兵收复里塘。

7月6日　　北京《国光新闻》报经理、同盟会会员田桐等至共和党机关报国民公报社，责问该社总理徐佛苏讥评同盟会及指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并呈请警察厅予以取缔。

7月7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电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未得复。

△　上海制造工人同盟开成立大会，到会员800余人，来宾500余人，举俞惠民为会长。

7月8日　　江西南浔铁路总监彭程万等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社长古市公威等在上海签订南浔铁路第一次借款500万日元合同。

△　袁世凯令甘肃布政使彭英甲调京。

△　上海《民立报》发表谭人凤所写之粤汉路事说帖，主张铁路国有，并列举国有政策合于世界趋势之理由七端。

△　驻洛阳防营军因陕西民军第二镇统制张钫率队抵洛，恐遭遣散，当夜哗变，肆行抢劫。嗣经协统周符麟调兵镇压，次晚平息。

△　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银行团代表再就善后借款问题向北京政府提出七项条件，其要旨为：指定借款用途并监督使用范围；由六国设立特别机构监督盐税；在善后借款债券未发行前，中国不得与六国银行团之外银行借款。财政总长熊希龄仍以借款条件过苛，并遭各方反对而拒绝磋商。

△　俄外交大臣沙佐诺夫与日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在彼得堡正式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再次划分两国在内蒙及东三省西部之势力范围。

7月9日　　袁世凯通令劝告各政党蠲除成见，勿启党争，互相提携，同扶大局。

△　英、法、德、美、俄、日六国公使会见财政总长熊希龄议借款事。熊商先借1000万英镑，因六公使坚持监督条件，无结果。

7月10日　　教育部在京召开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议决重订学制，制定“学校系统表”，并在武昌、南京、广州各设大学一所。8月10日闭会。

△　四川总督、征藏总司令尹昌衡奉袁世凯命，率川滇军2500人自成都出发西征。

7月11日　　津浦铁路督办朱启钤与柏林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签订津浦铁路临时垫款合同，款额四万英镑。

7月12日　　袁世凯分别任命黎元洪、谭延闿、孙道仁、蒋尊簋、

李烈钧、尹昌衡、张凤翙、胡汉民、陆荣廷、蔡锷为鄂、湘、闽、浙、赣、川、陕、粤、桂、滇10省都督。同日又以尹昌衡出差查办边事，仍着胡景伊护理川督。

△ 袁世凯任命张培爵为四川民政长。

△ 袁世凯通令各省遵守从前与各国所订条约，勿得稍有违犯。

△ 袁世凯通令各省行政长官及省议会共体时艰，互相提挈。

△ 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致北京、上海《亚细亚日报》、《北京时报》等报公开信，就报界称其自谋为总理，排斥唐绍仪出走等事辩诬，并表明本身立场："窃谓今日党争之法只宜以政见为标准，即有人欲组织内阁，只问其政见之宜不宜，不当问其人之属于何党。鄙人无似，实不敢有此希冀，目下之计，只欲闭户读书，以预备将来，何必如是咄咄逼人耶？"

7月13日 驻美代表施肇基电告外交部，美政府改订待遇华工新律，规定华工来美，概不禁制；此后在美作工华人，照别国同一待遇。

7月14日 袁世凯令准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辞财政、司法、教育、农林、署工商总长职；任命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财政总长。16日，袁世凯令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各部部务着各该部次长暂行代理。

△ 袁世凯为拉拢同盟会组织混合内阁，拟以同盟会会员胡瑛、沈秉堃、孙毓筠分任教育、农林、工商总长。是日，同盟会开全体职员会，决定胡、沈、孙均不加入内阁，以为抵制。

△ 黎元洪在武昌组织东亚大同社，是日发表成立宣言，并派员赴上海设立该社交通部。旋该社上海支部改组为大公社，举黄兴为总社长。

△　步军统领乌珍病逝。是日，袁世凯任命江朝宗署理。

△　袁世凯令准西宁办事大臣庆恕辞职，以西宁镇总兵马福祥兼署，改称青海办事长官。

△　陆徵祥派外交次长颜惠庆与俄公使库朋斯齐磋商取消外蒙独立事，俄使提出外蒙与俄所订条约皆作有效等四项条件。

7月15日　列宁在《涅瓦明星报》第十七号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高度评价孙中山民主主义纲领，提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7月16日　中国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讨论改组问题。宋教仁等提出之改组同盟会案遭到强烈反对。多数会员认为现值各党竞争激烈之时，同盟会改名"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宋之提案未获通过。

△　袁世凯任命靳云鹏为陆军第五镇统制，并会办山东军务。

△　西藏达赖喇嘛致袁世凯电称，不愿涂炭生灵，乞停战议和。

7月17日　袁世凯令改东三省都督为奉天都督，毋庸兼辖吉林、黑龙江两省。

△　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举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会长。

7月18日　袁世凯公布《各部官制通则》，凡20条。

△　陆徵祥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宣布政见，并将阁员补充名单提请表决。议员以陆出言无状，全院大哗，阁员名单未付表决。次日，临时参议院表决陆徵祥内阁阁员六人名单：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沈秉堃，交通总长胡惟

德。因未得半数同意票，全部被否决。陆即称病不出。

7月19日　立宪党人张君劢、吴贯因、梁文卿等，月初以来接连函促梁启超归国。是日，梁文卿函中有云："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于反掌。"

7月20日　参议院否决六总长后，共和党于19日发电指责中国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欲陷国家于无政府"，是日，中国同盟会通电辨正事实真相，指出共和党煽动党争，嫁衅他人。

△　美政府电示驻英、法、日、德、俄、意各国美使，立即照会各驻在国政府，鉴于目前北京政府已能有效行使职权，美国认为应按照国际法予以正式承认。

7月21日　袁世凯邀参议院77人至总统府开茶会，协商内阁问题，要求各议员与政府同心协力，维持大局。副议长汤化龙表示政府如能确定方针，参议院当可勉予同意。

△　中国同盟会本部举行夏季会员大会，出席会员500余人。代理总干事魏宸组报告并就改组问题提请公决，多数会员仍不表同意。次改选总务、财政、政事三部主任干事，宋教仁、孙毓筠、张耀曾分别当选。

△　统一共和党开会讨论内阁问题，议决先让共和党组阁，共和党若不同意，则由同盟会任之。

△　共和建设讨论会通电宣布陆徵祥如去位，该党主张：一、新总理论人不论党；二、总理既定，所提各总长概予同意；三、认现在情形，议员必不可入阁。

△　陕西都督张凤翙接陆军总长段祺瑞密电称，舒景福、王耀武勾串宗社党，于阴历五月二十八日（7月12日）到陕甘活动，图谋不

轨，除致电甘肃都督赵惟熙查拿外，着陕西严加查缉。次日，张派卫队将舒等四人拿获，搜出宗社党简章多件，当将四人处决。

7月22日　袁世凯将参议院否决六总长情况通电各省，宣布不准陆徵祥去职，仍主组人才内阁。

△　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在上海开会欢迎孙中山、黄兴。孙中山出席发表演说，申述“我国10年之内，必须有50万里铁道，方能立国”。

7月23日　袁世凯向临时参议院咨送第二次补充阁员名单，请任命周学熙、许世英、范源濂、陈振先、朱启钤、蒋作宾为财政、司法、教育、农林、交通、工商各部总长，征求同意。

△　袁世凯令准浙江都督蒋尊簋辞职，遗缺以朱瑞继任。

7月24日　北京各军界团体散发传单，指责参议院否决阁员名单，对投反对票之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议员大肆恐吓，有谓“若再不牺牲党见者，将以炸弹从事”。次日，北京军警会议公所开特别会议，议决请袁世凯劝告参议院勿持私见，否则解散参议院。

△　国务院奉袁世凯令电各省都督遴选代表三人到京，以备咨询。

△　河南省议会电临时参议院，请消释党争，顾全大局，迅建政府。

△　章太炎自北京到武昌晤黎元洪，倡黎、袁合作。8月7日，章致函江西统一党支部，称“以（黎、袁）二公左提右挈，中国当不致沦亡”。

7月25日　毅军总统姜桂题、直隶提督马金叙、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拱卫军翼长段芝贵与同盟会会员陈策宴请参议院议员及新闻记者，劝告各党各报蠲除党见，完成内阁。次日，北京军警界代表40

余人赴国务院谒国务总理陆徵祥表示支持，要求陆千万不可去位。

7月26日　参议院在军警监视下屈服于袁世凯之压力，表决第二次陆徵祥内阁名单，除工商蒋作宾被否决外，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五总长均获通过。袁世凯于当日发表五总长任命令。

△　袁世凯任命章宗祥为大理院院长。

△　孙中山复函上海中华银行董事局，允任总董。

7月27日　袁世凯令陆军、内务两部传谕禁止军警干预政治。

△　参议员谷钟秀、刘彦以陆徵祥出席参院演说，出词鄙俗，不谈政见，所提国务员名单，杂奏成章，致涉纷更，军警干政，诿为不知，提出弹劾国务总理失职案，因不足法定人数未能开议。

△　河南省议会开会，突有刺客二人闯入议厅开枪射击，议员八人受伤。次日，国务院电示署河南都督张镇芳详查严办。

7月29日　袁世凯颁布《勋章令》，凡八章17条，规定勋章等级有大勋章及一至九等嘉禾章；分给资格为有勋劳于国家者及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者。

△　袁世凯任命姚锡光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

△　袁世凯任命赵均腾为贵州宣慰使。

7月30日　孙中山在上海视察中华银行，并召开会议，议定中华银行改为完全商办，扩大召股，在各埠设分行。

△　经廓尔喀驻藏代表调停，西藏地方军与钟颖部队实行停战，并商定：北京政府驻藏官吏仍留拉萨，驻藏兵员除少数卫队外，余均交出枪械，撤归内地。

△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病逝。次日，外交部照会驻京日公使，中国政府将为明治天皇举哀27日。

7月31日　沪军都督府撤销，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接收。

△　袁世凯任命王祖同为河南布政使。

△　烟台都督府撤销，山东都督胡瑛解职。

△　福州《群报》因“揭载当局之短”，被福建都督孙道仁以“扰乱治安”罪名查封。主笔苏鉴亭被捕。

是月　福建都督孙道仁与美孚石油公司签订借款30万元合同，用于发放所欠军饷。

8月

8月1日　中国银行在北京开幕，原为大清银行，资本3000万元。

△　袁世凯聘伦敦《泰晤士报》前驻北京记者、英人莫理循为中华民国政治顾问。

△　驻浦口第一军第一师步一团第二队士兵因欠饷哗变，抢劫扣存饷银及商铺多家，旋即逃散。同日，驻滁州第四团两连士兵亦因欠饷哗变，抢劫该团枪械并焚掠商店，旋即逃散。

8月2日　袁世凯任命刘揆一为工商总长。

△　袁世凯公布教育部官制。8日公布修正内务、农林、工商三部官制。19日公布交通部官制。

△　孙中山、黄兴联名电告袁世凯，拟缓数日即偕同北上。

8月4日　　中国邮政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举梁士诒为会长。该会宗旨在收回中国邮政权，由国人自行管理。

8月5日　　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会商合并，定名为国民党，确定政纲五条，孙中山、黄兴、岑春煊、蔡锷、吴景濂、张凤翙、宋教仁七人为理事。

△　袁世凯任命徐鼐霖为黑龙江民政使。

△　驻武昌第一镇二协三标兵士因不满协统强行裁汰，是日抢夺军械房枪支弹药，相率哗变。黎元洪闻讯，派兵包围变兵，变兵陆续回营，乃告平息。

8月6日　　袁世凯接驻英代表刘玉麟密电报告，各国在伦敦会议处分中国问题结果，暂不承认中华民国；中国借款或购买军火须严加限制。

8月7日　　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推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代表杨南生起草宣言。同日，在京之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亦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

△　上海同盟会、社会党、自由党、东亚大同社等团体，以盛宣怀将招商局船产卖与日商，是日与9日召开维持招商局救急大会。

8月8日　　袁世凯公布勋位令，凡八条，规定凡民国人民，有勋劳于国家或社会者，授与勋位。勋位分为大勋位及勋一至勋五位。

△　袁世凯令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官潘矩楹开缺来京，另候任用；任命卢永祥为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官。

△　袁世凯任命吕公望为浙江第六师师长，仍兼充第十一旅旅长。

△　国务院致电各省都督，嗣后商办铁路借用外款统由中央负责，各省不得“自由行动”。

△　黎元洪借口汉口《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图谋不轨”，派兵将该报查封；次日并通电缉拿该报主笔何海鸣、编辑凌大同。

8月9日　袁世凯任命吴庆桐充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官。

8月10日　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凡22条，其中规定民国议会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同日并公布《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　袁世凯饬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声明自蒙古独立以后与各国所订条约合同，中国概不承认。

△　中国同盟会开会讨论与他党合并事。总务部主任干事宋教仁报告孙中山、黄兴来电提议改组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并说明与该三党交涉经过及合并之必要。结果大多数赞成合并，公推张继等三人为合并交涉委员。

△　武昌首义功臣、总统府军事顾问张振武为筹划边事，应袁世凯电召偕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人自武昌到北京。次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诬陷张振武“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请“立予正法”，并诬指方维系属“同恶相济”，要求“一并处决”。

8月11日　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在京举行合并筹备会。举宋教仁为临时主席。到会各党派代表均赞同合并，议决发表宣言，并决定内部组织机构。

△　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20万日元合同。

8月12日　司法部公布《暂行新刑律施行细则》，凡10条。

△　云南都督、统一共和党总干事蔡锷以内阁瓦解，改组綦难，实因政党为之厉阶，是日通电历数政党之弊端，主张解散政党，并自行宣告脱党。

△　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议决请政府将该公司收归国有。

8月13日　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宣布合并为国民党。

△　中国同盟会本部在京开会，选举筹办国民党事务所干事，宋教仁等16人为筹备员，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声言反对与他党合并，并因不满纲领中删去男女平权一条，殴打会议主席宋教仁。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示驻英、日、俄三国临时外交代表，向各驻在国政府声明中国对满、蒙、藏之主权五事，其要旨为："满蒙各地为中国完全领土，凡有关满蒙各地之条约，未经民国承认，不得私订"；"民国对于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现蒙藏反民国，是为国际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其主使者。"

8月14日　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中国同盟会海内外各支部，宣布赞成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及所订之纲领，并说各党彼此所提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请各支部务求同意。同日，同盟会本部亦电请各支部予以赞同。

△　孙中山致函宋教仁，表示"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10年之中，筑20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并告"拟先来北京一行，以觇人心之趋向"。

△　外交部电驻各国代表及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声明满、蒙、藏为中国领土，各国私订条约均无效。

8月15日　袁世凯令准潘震辞新疆布政使。

△　驻安庆第一旅第三营左队因欠饷哗变，该旅闻讯，派队驰往解散。

8月16日　袁世凯应黎元洪电请，下令枪毙应召来京之张振武，造成轰动全国之“张振武案”。先是，15日夜，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方将校，10时左右，张振武返寓途经正阳门，被段芝贵指挥之军警截获，绑赴京畿军政执法处。是日凌晨1时，在执法处枪毙。是夜，方维在旅馆被捕后，亦解往城外杀害。

△　黎元洪通电宣布张振武罪状，除重弹11日致袁密电诬陷张、方之词外，并称此次张振武赴京“显露逆谋，图翻全局……万不获已，只得电请大总统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严饬查拿，按军法惩办”。

△　参议院鄂参议员邓玉麟、刘成禺、郑万瞻、罗虔等为张振武被枪杀事致函质问黎元洪：“何以阳托劝导之名，阴行杀戮之谋？”

△　藏兵再陷里塘。18日陷巴塘。

8月17日　袁世凯任命施愚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

△　国务院致电各省，关于军民分治问题，决定在过渡之始，各省都督、省尹得互相兼任；都督兼省尹，则于下设民事长；省尹兼都督，则于下设军事长。

△　英公使朱尔典为西藏问题照会外交部提出无理“抗议”，干预我国内政，声称：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不得改设行省；中国不得派无限制之军队驻藏；中国军队擅自断绝印藏交通，此事应由中国负责；英现认定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应要求中国缔结新约；并称如中国不承认英之要求条件，英国绝不承认民国新政府。

8月18日　黄兴电袁世凯，张振武枪毙未见司法裁判，请明白宣布罪状，以释群惑，并告推迟北上行期。次日，袁世凯电复黄兴称，张振武案因黎元洪电请，自应即予照办，至原案颠末已电黎明白宣布，仍请即日启行。

△　上海《民立报》发表《论张振武被杀事》社论，指出张振武以莫须有之罪名被非法枪杀，黎氏假刀于袁氏，互相利用，锄灭有功之人，实令吾民寒心。

△　孙中山应袁世凯电邀自上海启程赴北京。

8月19日　参议院开会，议员张伯烈等20人提出质问政府枪杀张振武案，议决咨行袁世凯，请国务员于次日答复，如不能满意，将提出弹劾案。

△　黎元洪通电加张振武令方维“分设机关，密谋起事”等十大罪状，诡称：“鄂中亲故多碍情面，虽稔逆谋难予显戮，一击不中，大局遂危，倘非请由中央明正国典，何以昭示天下？”

△　袁世凯公布陆军官制表。军官仍采用三等九级制，上等为将官，中等为校官，初等为尉官，每等分上中少三级；军队名称：军、师（即镇）、旅（即协）、团（即标）、营、连（即队）、排。

△　沙俄策动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三札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叛变，分三路进攻奉天省洮南府，并发表“东蒙古独立宣言”，宣称：“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给以援助，故宣告独立，同中国断绝关系。”镇国公旗旋亦附逆，攻陷镇东，后为奉军统领吴俊陞部击溃，乌泰逃往库伦。

8月20日　袁世凯咨复参议院称，张振武案已电达黎元洪，候其电复，再行答复。参议院是日开会决定再咨袁世凯饬陆徵祥、段祺瑞于次日上午出席答复。

△　王芝祥、蔡元培、吴稚晖等17人组织法律维持会，讨论袁、黎违法枪杀张振武案，决定电参议院严重诘问。

△　袁世凯以国务总理陆徵祥因病请假五日，任命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

△　蒙兵侵袭奉天省洮南府。同日攻陷科布多。

8月21日　临时参议院开会，袁世凯派法制局局长施愚到院，会中未准其发言，由各党议员自行集会商谈弹劾政府案，议论纷云，无结果而散。

△　袁世凯为张振武案邀湖北议员刘成禺、张伯烈、郑万瞻等至总统府谈话，要求刘等在议会疏通，和平解决。

△　黎元洪通电再加张振武十四大罪状，又以全国“函电纷驰，诘难群起”，被迫承认“杀非其地，杀非其道”，诡称纵诸公不加谴责，亦“愧悔难容”。表示对张振武当优加抚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亲往奠祭，开会追悼，以安哀魂”。

△　中国同盟会本部为张振武案决定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

△　袁世凯通令各地方行政长官按照法定程序认真监督国会议员选举事宜。

△　袁世凯公布《蒙古待遇条例》，规定嗣后内外蒙古不以藩属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及在本旗所享特权概仍其旧，名号世爵相承不替；内外蒙古对外交涉及边防事务统归中央政府办理。

△　孙中山抵烟台，在烟台商会午宴发表讲话，指出“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称赞张振勋创造张裕公司，“以一人之力，即

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旋参观张裕酿酒公司。

8月22日　临时参议院为张振武案开谈话会，继续讨论弹劾案。表决结果，多数赞成弹劾陆徵祥、段祺瑞。

△　英公使朱尔典为防张振武案影响使馆区安全，邀各国公使商定增加戍队保护使馆，并拟界内戒严。

△　山西浮山县洪汉军（哥老会）首领陈采彰领导农民起事，攻入县城，开仓济贫，打击附近地主劣绅，知事段田逃走，卸任知事张雝被杀，平阴镇守使张煌、潞泽辽沁镇守使杨芳圃先后来攻，陈率部在山区活动。

8月23日　临时参议院开会，陆军总长段祺瑞出席答复张振武案。议员质问为何不经审判秘密杀人？段无以应。

△　下午5时，孙中山乘“安平”轮抵天津，受都督张金波及各界热烈欢迎。对记者谈称：“余之来意尤在振兴实业，但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路入手。”至资金筹划，主张“大借外债兴办”。

△　鄂军界黎天才等通电宣布张振武罪状，警告参议院议员“不得为罪人辩护”。

8月24日　孙中山抵北京，受到政府官员及民众万余人热烈欢迎。

△　夜，孙中山往总统府访袁世凯。袁设宴款待，并作长时间谈话，以时事日非，向孙求教。孙中山认为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赶筑全国铁路，望袁力为赞助，早日观成。

△　袁世凯任命罗文幹为总检察厅检察长。

△　参议院开会，弹劾政府案因不足定额人数，未能成立。

△　直隶通州姜桂题部毅军因传闻强迫剪辫哗变，大肆纵火抢劫。

8月25日　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通过国民党名称及规约，选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九人为理事，胡瑛、张继、于右任、胡汉民、唐绍仪等29人为参议，魏宸组、殷汝骊等12人分任总务、政事、文书、交涉、会计各部主任干事及政务部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居正、蒋翊武分任沪、汉交通部部长，张继、阎锡山分任燕、晋支部部长，马醴馨、王伯群分任美洲、东京支部长。

△　下午3时，孙中山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发表演说称："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

△　中国同盟会本部开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致词勖勉同盟会对会外人一视同仁，互相亲爱，以巩固中华民国。

△　黎元洪自承张振武案失察铸成错误，通电请罪。

8月26日　袁世凯回访孙中山作第二次谈话。双方谈及欧美各国政治学术之本原及国内财政、外交情形。

△　国务总理陆徵祥扶病谒孙中山，请示巩固民国之手续。孙谓：巩固民国，不外整顿内政及联络外交。能维持现状，实践约法，即为现时整顿内政之要着。至联络外交一项，最要之问题，即系承认民国。

△　云南派兵协征西藏，是日滇军收复川边特别行政区盐井。

8月27日　袁世凯再访孙中山作第三次谈话，讨论蒙、藏问题。袁近因蒙、藏宣告独立，岌岌可危，应否以兵力对付，特请问于孙中山。孙谓："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

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袁氏韪之。

△　参议员刘星楠等六人为张振武等案向临时参议院提出咨请政府查办黎元洪案。略谓：“乃黎元洪任意行使其参谋总长之权力，竟以就地正法四字，为其杀人之惯例，是显然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凡属国民，人人得而诛之。为此遵照约法提议，咨请政府严行查办，以维法律，而巩固民国之前途，即俟公决。”以弹劾案未成立，决定缓议。

△　黄兴以北方谣传张振武案与其有关，电袁世凯彻底查办。孙中山北上自天津电沪上黄兴，谓闻总统府一秘书言，曾在张振武被执时，搜出一致黄兴书，提及暗杀黎元洪事业已布置就绪。又见沪报载《文汇报》北京电云，张振武谋第二次革命，黄兴实与同谋等语。是日，黄兴电袁世凯，务请彻底查办。越二日，袁世凯电复黄兴并各报馆代为辟谣。指出，此系幸灾乐祸之徒，凭空捏造，诬蔑英豪，损人名誉，淆惑是非，应嘱亟为更正，而破谗构之诡谋。

8月28日　　袁世凯盛宴孙中山。席间，袁对孙中山备极推崇，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为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致答词，主张练兵百万，振兴实业、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词毕亦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　袁世凯与孙中山作第四次谈话，袁就内阁问题问计于孙中山。孙中山表示政党内阁抑超然内阁，请袁裁夺。

△　孙中山对《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表示“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

△　参议院开会，议员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12人以张振武案陷袁世凯于违法地位，陆徵祥、段祺瑞应负其责，提出弹劾陆徵祥、段祺瑞案，出席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未能开议。

△　交通总长朱启钤与英商华中铁路公司签订借款30万英镑合同。

8月29日　孙中山访晤袁世凯作第五次谈话，讨论内政、外交问题，袁请问整理蒙藏办法。孙中山谓：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为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孙中山提出10年内袁世凯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500万，己则表示于10年之内筑路20万里。孙又谓迁都至武昌或南昌、开封。袁世凯请复游欧美接洽承认民国问题。

△　孙中山出席国务院各总长宴会，席间议及张振武案，孙中山允任解释。

△　孙中山电黄兴，告以“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促黄速来京一行，以实现南北统一。

△　孙中山出席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既贫且弱，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重申10年建筑20万里铁路之主张。

△　孙中山出席广东公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希望广东解决政治、经济、军队三大问题，谓广东“对于政治应求良美，对于经济应求活动，对于军队应求拣遣，保全地方治安，维持中央政府”。

△　孙中山与日本《新支那》社之安藤及《朝日新闻》之神田晤谈，主张北京迁都。同日又接见德文某报记者，亦谈及迁都事。

△　袁世凯令黑龙江民政使秋桐豫仍回提法使本任视事。

8月30日　袁世凯与孙中山进行第六次谈话，关于铁道、外交、实业、党派及集权、分权等问题，多有所探讨。

△　下午，孙中山出席北京学界欢迎会，发表演说，谓“学问为立国之本”。

△　驻英代表刘玉麟代表北京政府与英商克里斯浦公司签订借款1000万英镑合同。

△　天津《民意报》被袁世凯指为言论激烈，勒令停办。

8月31日　袁世凯与孙中山作第七次谈话，讨论西藏等问题。孙中山表示反对以兵力从事，主张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与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

△　参议院举行孙中山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说，力主迁都，以防外人束缚手足。

△　袁世凯任命廉兴为青海办事长官。

△　奉天都督赵尔巽电告政府，日俄在东省驻军已逾约章规定数额，俄兵三镇，日兵3.5万余，屡次与两领事交涉无效，请即与两公使严重交涉。

9月

9月1日　孙中山访袁世凯作第八次谈话，孙中山提出借巨款筑铁路计划，袁甚韪其说。

△　孙中山出席蒋翊武等欢迎晚会，演说铁道计划，指出：“凡世界所有者，我们还要求精；世界所无者，我们为其创。”

△　孙中山出席北京军警界欢迎大会，演说军警界之责任，指

出："我国共和制度尚在幼稚时代，我军警界同胞只宜扶持之、保护之，决不宜鞭笞之、摧残之。"

△　孙中山出席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之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出，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吾应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

△　驻藏办事官钟颖电政府，达赖喇嘛派堪布二员前来议和，提出恢复达赖教权、加崇封号、西藏不得改设行省及撤退征藏兵队等五项条件。

△　统一党开全体大会，讨论总理章太炎宣告脱党，并将该党员名册送交共和党独断合并之事，议决听其脱党，另举王赓（揖唐）、王印川、汤化龙、张弧、朱清华为总理，并推岑春煊等九人为名誉理事。

9月2日　　袁世凯与孙中山作第九次谈话，协议约黎元洪、黄兴共同发起救国社，以化除党争，共扶危局。

△　孙中山出席北京报界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出，修筑铁路实为目前惟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重申募集外资60亿，10年内筑路20万里。

△　国民党理事七人互选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

△　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及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9月3日　　孙中山往访袁世凯，作第十次谈话。孙力主迁都开封，袁表示此着为事实上所万不能行。

△　孙中山访四国银行团，表示："鄙人此次北来，实欲与列邦诸

友共相携手，以联中外之好，并愿贵国银行诸君，有以扶助之。”

△　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表》，规定小学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是为“壬子学制”。

△　川军西征军收复里塘。

9月4日　　袁世凯访孙中山，作第十一次谈话，就财政困难与借债问题，请示善策。孙中山表示：公债、国民捐输入有限，而民力实已告竭，中国今日非借债万难立国，“故不当空言拒债，以自促灭亡”。“为今日计，宜令外交部开通商埠，工商部广开矿产，农林部伐采森林，交通部推广电路，尤在财政部开源节流，综挈大纲，次第发办，富强可期”。

△　孙中山出席共和党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出，民生主义并非均贫富之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为防止资本家专制之害，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

△　袁世凯公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凡七章99条。

△　国务院布告，人民如有民刑诉讼，均应遵法起诉，无论何项行政机关，均不得侵越干涉。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组织征蒙决死军，举王天纵为总司令，并电请袁世凯及参议院召集军队，奋勇北上。

9月5日　　袁世凯以连接蒙古新疆警电，与孙中山作第十二次谈话，共商对策。

△　孙中山举行茶会，招待国务员、参议院议员及各团体人士，演说外交问题，主张门户开放主义。略谓：“鄙人主张用外人办理工商事业，乃订立一定之期限，届期由我收赎，并非利权永远落于他人之手。……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难，惟有欢迎外资，一变向来闭关

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

△　孙中山复电赵尔巽，告以因事不克赴东北之行。按：孙中山本拟往东三省游历考察，袁世凯以东省现正多故，竭力劝阻，故有“惟刻有张家口及太原之行，归尚无日，容订期再复”之复电。

△　孙中山出席基督教等宗教团体欢迎会，发表演说称：“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辅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

9月6日　孙中山自北京赴张家口视察京张铁路。7日抵张家口、宣化，受到各界热烈欢迎，下午抵八达岭，登万里长城。

△　黄兴离上海赴北京，陈其美同行。

9月7日　袁世凯授黎元洪、黄兴、段祺瑞为上将。

△　袁世凯任命许崇智为陆军第十四师师长。

△　驻湖北沙市第七镇第二十五标第三营士兵因赎当殴伤店伙被拘押，发生兵变，捣毁监狱，抢劫商店，旋即敉平。

9月8日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仍兼禁卫军军统；张锡銮改任东三省西边巡抚使。

△　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发起开北十省议员谈话会讨论蒙古事宜，促政府以和平方法直接解决蒙事，严词拒绝俄人调停。

△　国务院会议就达赖喇嘛所提议和五项条件作出决定，其要旨为：恢复达赖教权可照允，惟不准其干政；西藏改建行省，达赖不得干涉；川军缓进，另派兵赴藏镇抚。

9月9日　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　袁世凯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

△ 张謇应袁世凯之召抵京，次日谒袁协商改良盐政办法。

9月10日 黄兴赴京途中于9日抵天津。是日出席天津18团体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前途全赖工商业之发达，而工商必以农林为前茅。兄弟此后愿随诸君从事实业，以巩固国家根本。"

9月上旬 孙中山在北京迎宾馆与梁士诒谈话，孙谓："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梁称："项城（袁世凯）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也。"

9月11日 黄兴偕陈其美抵京。署国务总理、各国务员、议员及各界代表数千人到车站欢迎。下午5时，黄兴偕陈其美往总统府会见袁世凯。

△ 孙中山出席广东旅京同乡欢迎会，主海南设省。同日与广东同乡梁士诒等36人发起撰写《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提出为巩固海防，开发天然富源等五项改省理由。

△ 孙中山访晤前清摄政王载沣，对其代表清政府和平交出政权表示慰勉，并望今后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共跻富强。

△ 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为第二十八师师长。

9月12日 前清皇族开会欢迎孙中山、黄兴，并设宴款待。

△ 孙中山、黄兴由前清皇室世续陪同，游览清内宫与颐和园。

△ 浙江都督朱瑞通电宣告脱离共和党籍。

9月13日 贡桑诺尔布谒袁世凯陈述治蒙政策，主张先安抚内蒙，然后进图外蒙。至于用兵专以东三省协力为主。

9月14日　孙中山招待北京报界，论述修筑铁路之政策，提出借款办路及批给外人承包，其理由为："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三、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

△　黄兴出席京师报界欢迎会，发表演说主张中央集权，以图全国统一。

△　黄兴访袁世凯陈述征蒙意见，主张由中央派精兵分前中后三队前往。

9月15日　孙中山举行茶话会招待参议院议员并发表演说，谈修筑铁路及实行地价税问题。关于修路问题，指出造路20万里，需款60万万，势非吸取外资不可。吸取外资之道，约分三种，即甲：借款自办；乙、华洋合股；丙、外人包办。甲说不可用，乙说恐难办到，丙说有利无弊。

△　袁世凯任命谷如墉为山西民政长，原任周渤辞职照准。

△　北京国民党本部开会欢迎孙中山、黄兴、贡桑诺尔布、陈其美。黄兴演说大政党与国家关系。

9月16日　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饯别宴会，并作最后一次谈话。宴毕，袁世凯与孙中山、黄兴商榷内政方针，袁提交八条大纲进行会谈，孙、黄皆同意。

△　袁世凯任命梁如浩为外交总长；刘镜人为驻俄公使。

△　13国公使谒孙中山，对孙所言铁路政策表示称赞。

△　署国务总理赵秉钧向临时参议院报告蒙藏问题，就蒙古所提三项要求及西藏所提四项要求提请研究磋商办法。财政总长周学熙报告伦敦1000万镑及银行团六亿两借款事。

△　国民党理事会开茶话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七理事出席，各部主任干事及该党议员列席，讨论对政府态度。决取稳健态度与袁世凯提携。国务总理人选以赵秉钧较为合宜，并举黄兴晤袁代达上述主张。

△　宋教仁致书各报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事辟谣，声明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孙、黄并无冲突，党内亦无内讧，切盼各党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与离间。

△　黄兴出席旅京湖南同乡会欢迎会，发表演说，表示："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

9月17日　孙中山应阎锡山邀请离京赴山西游历考察，18日抵太原。

9月18日　参议院开会继续讨论蒙藏问题。赵秉钧、段祺瑞出席报告不主用兵，直接与蒙古活佛及西藏达赖办理。议决赞成政府所定政策。

△　黄兴出席共和党欢迎会发表演说，表示决应张謇之请提倡实业。同日又在社会党欢迎会演说，指出我国此次革命乃是社会革命。

9月19日　孙中山出席山西同盟会欢迎会，演说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第一件事；平均地权即按价收税，非为计口授田。

9月20日　袁世凯通令申明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

△　国务院电西藏及科布多两办事长官，以英、俄对蒙藏已持干涉主义，决定暂不用兵。

△　蒙藏交通公司在北京成立，举伍廷芳为总理，王人文、温宗

尧为协理。

9月21日　　袁世凯招宴黄兴。席间，袁致词称，“时至今日我国非采用共和国体不足以巩固国基”。黄吁请各界“须出真实爱国之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使中华民国与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

△　孙中山自山西抵石家庄，次日抵天津。

△　陆军部公布《陆军军官学校条例》。该条例指定校址设于保定。“保定军官学校”由此得名。

9月22日　袁世凯令准国务总理陆徵祥辞职。

△　熊希龄通电宣布伦敦1000万镑借款成立，首批50万镑业经交清。

△　黄兴出席北京铁道协会欢迎会，发表演说主张实行孙中山的铁道政策。

△　章士钊主编《独立周报》在上海创刊。章以“秋桐”笔名撰写发刊社论。

9月23日　汉冶萍煤铁矿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袁思亮、杨廷栋、叶景葵三人将股东大会要求将该公司财产收归国有之决议递呈国务院。

9月24日　孙中山乘车离开天津前往唐山、开平、滦州、榆关等地考察。

△　教育部通令各省，10月17日为孔子诞日，全国各校届时均举行纪念会。

△　农林部公布《农会暂行规程》。

9月25日　袁世凯与孙中山、黄兴协定内政大纲八条，并经黎元洪电复赞同，是日袁世凯通电各省宣布。内容为："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　袁世凯特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

△　武昌南湖马队第一、二标暴动，炮击武昌城，激战数小时，旋即平息。

9月26日　袁世凯任命孔庚为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　孙中山抵济南访问。次日在济南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铁路批归外人承办，限年无偿收回之主张。

9月27日　民主党成立。该党系由共和建设讨论会汤化龙等发起，与国民协进会（范源濂领导）、共和统一党（孙洪伊领导）及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国民新政社六政党合并组成。

9月28日　袁世凯公布参议院议决国庆日纪念日案，规定10月10日为国庆日；1月1日及2月12日为纪念日。

△　孙中山自济南抵青岛，视察胶济铁路，并在各界欢迎会上，重申修建铁路之计划。

9月29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严禁秘密结社集会。

10月

10月1日　袁世凯任命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

△　袁世凯令准北京大学校校长严复辞职，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校长。章固辞不就。

10月2日　袁世凯公布省议会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及《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实施细则》。

10月3日　国务总理赵秉钧向参议院宣布政见，对内政策采取维持现状主义，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

△　孙中山自青岛抵上海。次日接见铁道协会人员，谈全国铁路进行事宜。

10月4日　袁世凯饯别黄兴，席间袁表示正式国会成立，举定新总统，将效法孙中山退为国民，惟此数月内深望能取消蒙古独立，消纳军队，庶几可以安心。

△　黄兴举行叙别宴会，招待国务员、国民党议员、各部主任干事及报社记者，宣布经商请袁世凯赞同，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并谓本党惟一宗旨在于扶助政府，深望诸同志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俾成强有力政府，各国早日承认。

10月5日　袁世凯任命赵理泰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　黄兴偕陈其美离北京抵天津。黄、陈在津时与宋教仁同访唐绍仪商组阁事。唐劝宋组阁，宋仍请唐力荐黄出任总理，唐、陈均极赞成。

10月6日　孙中山在上海出席国民党选举大会，报告北上情况，略谓："余在京与袁总统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不能全采新法。……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

△　宋教仁答《民立报》记者关于内阁变局之问题，述及陆徵祥辞职至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之经过，证实袁曾属意其组阁，因临时政府期内不能多所展布，及难以调和南北感情，故坚辞拒绝，并力荐黄兴担任内阁。

△　袁世凯令准国务院秘书长王广圻辞职，以张国淦继任。

10月7日　　孔教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会。陈焕章等为发起人，宣布“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

△　袁世凯下令革去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郡王世爵，任命镇国公衔鹏束克署理。

10月8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妥慎办理众议员及各省议员选举。

△　袁世凯通令各省行政长官不得追论反正以前罪状。

△　袁世凯公布《外交部官制》，凡10条；30日公布《参谋本部官制》，凡10条。

△　袁世凯以京师赌风日炽，令内务部重申赌禁。

△　梁启超自日本返国抵天津。

10月9日　袁世凯发布国庆赠勋令，特授孙中山、黎元洪以大勋位；特授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给予赵秉钧一等嘉禾章。

△　孙中山致书南洋同盟会同志，说明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嘱即日改称为国民党南洋支部，并告以近承政府委任筹备全国铁道事务，一俟部署稍清，即将游历欧美，筹资开办。

△　黄兴返抵南京。次日出席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大会，讲述革命历史，并推程德全为国民党南京支部长。

△　工商部电请各省保护回籍华侨。

10月10日　　全国各地举行中华民国成立周年庆典。此系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节。袁世凯在北京阅兵。

△　孙中山出席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主办之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民国虽成立，而今尚在危险时代，内乱未靖，外患频闻，“愿吾同胞，自今以后，亦须有冒险心、坚忍心，协力赞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头等大国。”

△　孙中山为上海英文《大陆报》撰稿，题为《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

△　津浦铁路济南以北泺口黄河铁桥竣工，全长1244米。

10月11日　　黄兴电复袁世凯，拒不接受“勋一位”。当晚由宁赴沪。

10月12日　　袁世凯令准绥远城将军堃岫辞职，任命张绍曾署绥远城将军并督办垦务。

△　国务院奉大总统令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弭盗。

△　孙中山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悲观之心理为民国最危险之事，希望报界“将悲观之心理打除，生出一极大之希望，造成一进取之乐观，唤起国民勇猛真诚之志气，则于民国建设前途，实有莫大之利”。并主张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收回领事裁判权，使中国成为完全独立之国。

10月13日　　社会党在上海《民立报》、《天铎报》刊登广告，宣布邀请孙中山于14—16日讲演社会主义。14日起孙中山应邀在社会党本部连续演讲三天。

△　孙中山致函荷马李，称“此次北上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此次北上使南北双方取得了好多的谅解”。

10月14日　　孙中山在社会党演讲《社会主义派别与批评》，听众1600余人。演说解释“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之定义，分析社会主义之派别为：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指出：“厥后有德国马克斯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　孙中山电袁世凯，告以“筹划全国铁路机关急待成立，兹遵照前令，暂于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即日开办”。

△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孙中山任总理。

10月15日　　国民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通过议员会章程，选举谷钟秀等五人为总务干事。

△　孙中山在社会党演讲社会主义，到2000余人。孙由社会主义说明经济学原理，由分配问题，提出英美各家之主张。

10月16日　　袁世凯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官俸法。官等法规定除特任官外，分为九等，第一、第二等为简任，第三等至第五等为荐任，第六等至第九等为委任。官俸法规定，国务总理月俸1500元，各部总长月俸1000元，简任官以下分为12级，月俸自600元至50元。

△　孙中山在社会党演讲社会主义，出席者3000余人。孙叙述我国实行社会主义之政策，除解决资本与土地问题外，并提出教育、养老、医院等社会福利事业。略谓：“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呻吟，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各尽其

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 袁世凯任命何奏篪为甘肃布政使。

△ 奉天都督赵尔巽与日本大仓组签订借款100万日元合同。

10月17日 黄兴致函北京国民党本部陈述对蒙事之意见，主张用兵，北兵为先锋，南兵为后援，国民踊跃非常，饷项自能源源接济。

10月18日 袁世凯任命马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 袁世凯派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 孙中山应赣督李烈钧之邀，离上海赴江西视察。

△ 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出京赴湘省亲，并布置选举事宜。

△ 国民党本部开会欢迎章嘉及甘珠尔瓦两活佛。两活佛演说表示必设法取消外蒙独立，同享共和幸福。

10月19日 孙中山抵江阴视察炮台。同日并在江阴各界欢迎会上演说修筑道路的重要性。

△ 袁世凯加封章嘉呼图克图宏济光明名号；加封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圆通善慧名号。

10月20日 梁启超自天津抵北京，当日下午出席共和党欢迎会，以“政治上公开与政治之统一”为题发表演说。

△ 孙中山抵镇江视察象山、焦山炮台，并在镇江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

△　保定军官学校举行开学礼，陆军总长段祺瑞出席致训词。

△　吉长铁路全线通车。

10月21日　袁世凯公布《印花税法》，凡13条。

△　袁世凯以前清陕西巡抚升允联络库伦活佛反对共和，颁令拿办。

△　孙中山抵南京视察狮子山、幕府山炮台。

△　国民党理事张继抵南昌，出席国民党江西支部欢迎会发表演说，阐述国民党关于地方自治、省长选举、政党内阁等主张。

△　梁启超出席北京报界欢迎会，发表《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之演说。

10月22日　南京国民党、两广同乡会、铁道协会联合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来宾到六七千人。孙中山发表演说，略谓："以我国地方之大，人口之众，物产之丰，人才之众，革命之后，若能一心一德，从事建设，必能为世界第一最富强之国。"重申担任铁路一事，"愿以十年为期，建造全国二十万里铁路"。"此铁道政策，采取开放门户主义"。

△　民主党开会欢迎梁启超。梁以"政党成立之标准"为题发表演说。

△　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凡12条。

△　山东省议会代表路振岐等七人到京，向总统府递呈弹劾都督周自齐案。

△　鄂、豫两督电请政府速与驻京各使交涉，令撤退驻避暑胜地鸡公山外兵，收回主权。

10月23日　　孙中山抵安庆，在欢迎会上演说，建设事业分兴利除害两端。略谓：“建设之事可分为两大端：一兴利，一除害。除害之事很多，最要紧的就是禁烟。”“兴利之事亦很多，最要紧的就是修铁路，开矿产，讲求农业，改良工艺数大端。但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

△　阿尔泰帕勒塔军恢复科布多，蒙军退向库伦。

10月24日　　孙中山抵九江，在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收回治外法权。

△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凡22条。

△　俄密派前驻京公使廓索维慈赴外蒙活动，是日抵库伦。

10月25日　　浙江都督朱瑞联合鄂、苏、皖、直、豫、川、鲁、晋、甘、陕、奉、吉、黑、桂、黔15省都督电参议院，反对省长民选，主张省长简任。

△　孙中山抵南昌，次日出席国民党赣支部谈话会，演说迁都问题，力主迁都南京。

△　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联合大会，江亢虎为主席，通过《中国社会党宣言》，宣布该党宗旨为“于不妨碍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

△　俄国作家高尔基致函孙中山，略谓：“我祝贺您的工作的卓越成就，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士都怀着关注、兴奋及敬佩之情注视着您这位中国的海格立斯（按：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工作。”并请孙中山为其所编的《现代人》杂志撰文。

10月26日　　乌里雅苏台将军那彦图上书袁世凯，条陈取消外蒙独立意见，请改内蒙古为行省。

△　黄兴抵鄂，出席江汉大学欢迎会发表演说，勖勉学生潜心力学，切戒浮动。

10月27日　　孙中山出席南昌各界联合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详论人民平等自由幸福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

△　国民党本部开会欢迎新入党党员章嘉活佛、贝子溥伦等人。章嘉活佛演说以取消蒙古独立及力劝西藏承认共和二事自任。

10月28日　　袁世凯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

△　袁世凯令复封达赖喇嘛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

△　黄兴在汉口国民党鄂支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国民党成立之由来及对民国建设事业之方针。

△　内蒙哲里木盟盟长郭尔罗斯齐公发起蒙旗会议，约集该盟10旗王公在长春开会，袁世凯派阿穆尔灵圭及吉督陈昭常、东三省宣抚使张锡銮莅会。

△　日本众议院议员来华考察团抵京，次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欢迎。

10月29日　　袁世凯任命沈秉堃督办浦口商埠事宜。

△　财政部向袁世凯条陈整顿税务六项办法。

△　袁世凯据山东都督周自齐电呈，令饬各省剪发事宜应由各省行政长官实行劝谕，不得停止未剪发者选举权。

10月30日　　参议院通过追认伦敦1000万镑借款案。

△　袁世凯欢宴日本众议员考察团。

△　袁世凯令夏寿康署湖北民政长。

△　孙中山抵芜湖，出席各界欢迎大会，发表演说指出，君主专制既已推翻，凡我同胞均从奴隶跃处主人翁之地位，当各具一种爱国心，将国家一切事件，群策群力，尽心办理。

△　国民党人士胡瑛等假北京六国饭店欢宴梁启超。梁以《政党作用之精神与组织之艰难》为题发表演说，认为共和政治必赖政党始能运用，而政党之作用，则以各行其是以导国家之进步，并避免因政争以致流血。

△　内政部通咨各省，保护庙产。

10月31日　孙中山返抵上海。

△　黄兴抵长沙，受到湖南都督谭延闿及军警商学各界数万人热烈欢迎。

△　梁启超在京为答谢各界举行茶话会并发表演说，谓返国以来，考察国中政治、财政、外交，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中国前途，“惟有悲观而已”。

△　梁启超在北京大学校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大学之目的，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并以服从、朴素、静穆三要事勖勉诸生改善学风，“为我国学问之前途争光”。

△　工商部议定整顿矿务办法五则。

△　直隶都督冯国璋以本月20日在省议会宣布政见未获同意，是日电袁世凯及国务院，表示难负其责，请另简贤员接充。

△　长春内蒙10旗会议继续开会，陈昭常宣布大总统优待蒙古条

件，与会各旗王公一致拥护。

11月

11月1日　工商部在北京召开工商大会，各省派代表参加，工商总长刘揆一说明开会宗旨及全国工商政策。

△　梁启超离北京返天津。

△　孙中山军事顾问荷马李在美逝世，遗嘱骨灰安葬于中国国土。16日，孙中山致函荷马李夫人，表示哀悼。

11月2日　袁世凯公布《财政部官制》，凡14条。

11月3日　俄国密使廓索维慈与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擅订《俄蒙协约》四条，其中规定：俄国政府愿极力赞助蒙古政府，并为其编练常备军，助其禁止中国军队及移民入境；俄人在蒙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人所享有之权利；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政府不得与中国或其他外国订约。《俄蒙协约》并附《商务专条》密约17条。

△　袁世凯令准奉天都督赵尔巽辞职来京以备咨询；任命张锡銮暂署奉天都督。

△　孙中山致函袁世凯，主张各省行政长官民选，以示中央政府拥护民主之真意，于统一实大有效力。

△　黄兴在长沙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明党纲，指出："本党党纲，其特别之点在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

△　全国工商大会选举李镇桐、吴鼎昌为正、副会长。5日，李镇桐自请辞职，经开会公决以吴鼎昌为正会长，胡瑞霖为副会长。

△　国务院会议议决招商局不收归部办。

△　币制委员会开会，讨论币制顾问卫林斯所提采用虚金本位与虚金汇兑本位之币制改革意见书，结果赞成、反对各半。

△　中华民国工党在南京召开全国各支部第一次联合大会，选徐企文、龙璋为正、副领袖，孙中山为名誉领袖，议决加入万国工党。

11月4日　袁世凯授刘冠雄为海军上将。

△　自武昌起义后停工之汉阳铁工厂，是日第一座化铁炉修复开工生产。

11月5日　袁世凯为冯国璋与省议会冲突事，电斥省议会不得干预用人行政。

△　黄兴出席湖南政界欢迎会，发表演说，谈教育、实业及市政建设问题。其中指出“欲谋国家之发展，莫先于教育。自宜竭全力运筹，而以国家资财充其经费”。

△　交通总长朱启钤通电各省试办裁驿归邮。

11月6日　袁世凯公布《公文书程式》，其中规定：凡法律、教令、国际条约、预算及特任、简任、荐任官之任免等，由总统公布之；院令、部令分别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署名盖印。

△　袁世凯通令各省切实保护回籍商民。

△　熊希龄自上海通电中央及各省，条陈发二亿元之整理金融公债办法。

11月7日　袁世凯宴英公使朱尔典，谈藏事及大借款问题。

△　外交部照会驻京俄公使库朋斯齐，抗议《俄蒙协约》，声明

外蒙与外国订立无论何种协定，中国不能承认。

△　黄兴出席长沙茶业欢迎会，演说湘省实业宜从茶矿两大宗着手。

△　广州丝厂女工5000人为反对资本家苛待及纸币折价，举行同盟罢工。

11月8日　交通部向国务院提出创设八所无线电站计划：一、自直至豫；二、自晋至秦陇；三、自京至奉吉黑；四、自鲁至苏皖；五、自浙至赣闽；六、自鄂至湘；七、自粤至桂；八、自黔至滇。

△　俄公使库朋斯齐将《俄蒙协约》送交外交部。

11月9日　袁世凯布告重申解散秘密结会。

△　孙中山电袁世凯，提出三事：一、“今日弭患要图，非速行迁都，则宜急联日，二者必行其一。”二、设立中西合股银行；三、“铁路筹划，刻须开始”。

△　广州大火，晚8时起火至次日下午2时半始灭，毁房数百家，数千人无家可归，损失财产1500万元。

11月10日　总统府召集赵秉钧及蒙藏局贡桑诺尔布等人开边事会议，讨论蒙、疆、藏边事。

△　国务院开特别会议，议决划一币制手续：一、限制银元进口；二、各省不准再铸铜元；三、各省不准再发军用纸币，各国通行纸币酌量收回。

△　陆军部会同参谋部拟定《暂行军律》四条颁行各省，嗣后军队有结党持兵暴动者照此律处断。

△　农林部决定农林进行办法六条，其中规定改良农林种植、派

员出国考察农林业等项办法。

△　上海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联合开会欢迎日本众议员考察团，孙中山主席，三政党致欢迎词，考察团致答词。越二日，日本众议员考察团离沪返国。

△　中国佛教总会会长天童方丈八指头陀寄禅大师在京逝世。

11月11日　　外交总长梁如浩亲至俄使馆，要求俄公使库朋斯齐电告俄政府速即取消《俄蒙协约》。俄公使声称《俄蒙协约》已签字公布，不能取消。

△　黄兴在长沙报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今日报界之天职，第一宜指导舆论，启牖国民；第二宜监督政府，时加督责。"

△　热河都统崑源电告政府，蒙兵愈聚愈众，日内当有战事，兵力单薄，恐难与敌，请迅派兵前来，免误戎机。

△　外交总长梁如浩以《俄蒙协约》交涉失败，深受舆论攻击，提出辞职，将部务交次长颜惠庆，潜赴天津。

△　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博多噶台亲王阿穆尔灵圭与蒙古联合会代表齐贝子到京谒袁世凯，陈说对付《俄蒙协约》办法。

11月12日　内务部奉大总统令通咨各省都督严行查禁鸦片。

11月13日　　外交部为《俄蒙协约》向俄公使库朋斯齐提出第二次抗议书，指出外蒙为中国领土，无论与何国缔结何种条约，中国绝不能承认。同日，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俄蒙协约》。

△　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联衔电袁世凯，主张集合全国军队克期征蒙。

△　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开联席会议讨论蒙事，咸主用兵。

△　阎锡山派员拿获倡谋“二次革命”之王锡山、金子通等，电袁世凯请照军法枪毙。袁电复照准，是日执行。

△　工商大会为《俄蒙协约》事议决上书袁世凯，决计主战，战费由全国工商界设法募集。

△　袁世凯据交通部呈请，指令照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　黄兴在长沙接见工商部查办汉冶萍公司委员余焕东，指出：“在湖南言实业，以开矿为第一。”

11月14日　　袁世凯召集赵秉钧、段祺瑞、陆徵祥、陈宦及各省代表商议对俄蒙方法。袁说明俄公使所提五条要求已为我严词拒驳，并宣布对付方法，取得同意。

△　袁世凯令准外交总长梁如浩辞职。

△　孙中山接受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后，即于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旋拟定《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凡八条。

△　教育部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凡16条。

△　黄兴赴湘潭、萍乡等处视察矿务。21日回长沙。

△　黄兴北上到京后，曾邀杨度加入国民党，杨未允，旋黄又托胡瑛与杨商。是日，杨度电黄兴，提出以国民党相信袁世凯及取消政党内阁为入党条件。

△　陕西西安驻军步队五标三营兵变，斩关而出，旋经招抚，多数归营，余均逃散。

11月15日　袁世凯特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　国民党本部讨论对待《俄蒙协约》问题，议决对政府主维持；对库伦主以兵力取消其独立；对俄主外交解决，以军备为后盾。

△　粤省开军事大会讨论蒙事，议决将粤省陆军两师一旅拨归征蒙之用。

△　蒙古王公联合会通电声明，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妄称独立，伪立政府，蒙古全体并未承认，库伦伪政府近与俄国擅订协约，自应无效。

11月16日　袁世凯为《俄蒙协约》事迭电黎元洪提出对策，是日，黎电复同意用兵入蒙。17日，袁电邀黎入京筹商应付办法。

△　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奉天都督。

△　孙中山自上海密电袁世凯，华日联盟大有希望，《俄蒙协约》万不可承认，目下尽可以不理处之，以观俄政府之行动。

△　孙中山电参议院，请“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

△　袁世凯任命张元奇为福建民政长。

11月17日　袁世凯与各国务员会议决定直接电达库伦活佛为最后之忠告，劝其取消独立，不从决以武力解决。

△　袁世凯密令各省暂缓实行原定遣散军队办法，并责成各该统兵大将认真训练，听候中央调遣。

△　东扎鲁特旗协理官保扎布叛变，胁迫该旗贝勒勾结东西扎鲁特、科尔沁各旗，攻占热河开鲁县。

△　袁世凯指令蒙藏事务局准予创办蒙藏回白话官报。

△　法公使康德邀16国公使开会，讨论《俄蒙协约》与中国利害及与各国关系，决定办法两条：一、电本国政府请示办法；二、具函俄政府诘问理由，以便调停。

11月18日　袁世凯公布《国籍法》，凡五章22条。

△　俄国政府开会讨论对华方针，议决八条，其中规定：要求中国政府以大戈壁为中俄两国之分界点；废弃中国在俄蒙边界驻扎军队之权利；添派军队分驻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处。

11月19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至俄使馆交涉解决《俄蒙协约》问题。俄公使斯库朋斯齐以未奉本国命令，表示未便开议。陆以所拟开议办法四条，请俄使转电俄政府。

△　陆徵祥访英、法公使谈对于《俄蒙协约》意见，声明库事为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根据中俄条约与俄国郑重交涉，总期和平解决。

△　救蒙联合会代表徐绍桢等五人谒袁世凯，询问对俄、库（伦）意见。袁答库事当能和平了结，现法公使出而调和，俄政府答复亦愿和平解决，谅无意外。又称库事解决以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为依归。

△　救蒙联合会代表徐绍桢等五人谒赵秉钧，要求政府将对俄蒙交涉大势即日宣布，俾国民有所协助。赵说明俄蒙问题由来及政府所取之解决方针。

△　袁世凯任命应德闳为江苏民政长。

△　国民党参议胡瑛应犬养毅、头山满邀请离京赴日，29日抵东京。

△　姜桂题所部毅军右路统领米镇标率领第十一至十四营及马炮兵各一队，奉命开赴热河开鲁。

△　奉天安东巡防右路第七营兵士因积欠兵饷，勾结宗社党突起兵变，抢掠银行、商店，并分攻道署，当即被警兵击退。

11月20日　孙中山在上海接见日本南满铁道会社副总裁国泽新兵卫。国泽新兵卫系18日抵沪，此行旨在同孙中山谈铁道政策并拟邀孙偕行赴日。

△　法公使康德往晤俄公使库朋斯齐，要求俄方和平解决《俄蒙协约》，先将该约取消，再另行开议。

11月21日　总统府召开征库军事会议，袁世凯及各国务员出席，提出征库大军统一之计划与行军条例以及进兵路线等事项。

△　袁世凯以哲里木盟长郭尔罗斯前旗贝子衔镇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维持东蒙大局，明令晋封贝勒。

△　16国公使在英使馆会议，议决各国驻屯军由北京至大沽并奉天沿线要隘及京汉各通都大邑皆派兵分驻等四项决定。

△　日本政府开会讨论对华方针，议定如中国政府对俄让步，日本即要求限制南满之中国兵额与废弃中国在日满边界筑造炮台权利。

11月22日　袁世凯任命胡惟德为驻法、日（日斯巴尼亚，今译西班牙）、葡国公使；魏宸组为驻荷兰国公使。

△　陆军部拟定派往保护全蒙各将校地点，并请任王天纵统外蒙全军，张锡銮统内蒙全军。

△　陆军部制订《取缔军火章程》四则，通电奉、吉、黑、直、晋、秦、陇、新各督与镇边使遵照。

△　晋省征蒙军步炮队各一营开赴包头一带驻防。

△　袁世凯任命王人文为四川宣抚使；孟恩远为吉林护军使。

△　黄兴复杨度寒（14日）电，解释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纯为救国，专取维持政府主义。“至来电以为与总统有妨，并指为不信任袁总统之证，于学理、事实均属误会”。并望对政党内阁予以赞同，“勿为浮言所动”。

11月23日　　袁世凯令国务院将公布之《优待蒙、回、藏各族条件》、《待遇蒙古条例》等命令，译成各体合璧文字，刊刻颁发各旗各城，榜示晓谕，以释群疑。

△　四川军界全体会议议决派遣刘存厚第四师出发征蒙。

△　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宴请外国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俄库条约损失蒙古领土，侵害蒙人自由，此吾人所以不得不一心一德以图取消此约。”

△　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中国图画学院（上海中国美术专科学校前身）。自任校长。此系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

11月24日　　国务院会议讨论袁世凯交议之临时蒙政会案，议决由内、外、陆、财、交、参等部及蒙藏局、总统府顾问、秘书处、军事处共同组织。

△　参谋次长陈宦上书袁世凯，条陈征库意见，主张征库军队每省4000人，22省共8.8万人，进兵路线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至土谢图汗西北行抵库伦。

11月25日　　陆徵祥邀俄公使库朋斯齐在外交部举行《俄蒙协约》第一次谈判，日、法、美公使亦参加。谈判无结果，然仍各允开送条款以资磋商。30日，俄公使提出“确定蒙古之自治基础”等四项交

涉条件。

△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段祺瑞、陈宦等参加，讨论“俄库事件”，结果仍主和平解决，并作出八项解决办法。

△　上海中国铁路总公司宴请商、学、报、实业各界团体，席间孙中山发表演说，强调指出：“中国无款办路，必须引进外资”，希望各界赞助铁路事业。

11月26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整顿吏治，嗣后任用府、厅、州、县知事，务当慎择贤能，悉以夙有政治经验及政治学识者为限。至现任各官，一律严加考核。

△　袁世凯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凡倡言革命者，即行按法严惩。

△　袁世凯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遵行统一官制、官规，各省行政长官、地方议会均不得擅越范围。

△　袁世凯公布《兴华汇业银行则例》，该行设总行于上海，资本1000万元。

△　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发行爱国军事公债案，总额二亿元，专为征库军用。

11月27日　　袁世凯训令国务院蒙藏事务局对于蒙旗人员“务当宣布公诚，优加礼意，力矫前此凌慢隔阂之习”。

△　袁世凯任命谭人凤为长江巡阅使。

11月28日　　袁世凯任命黄兴督办汉粤川铁路事宜。

△　国务院奉大总统令通令各省都督，此项征蒙筹备军事，全在各都督通盘筹划，相机进行，如有自由组织决死队或征蒙团勒捐财

械、妨碍军略者，一律严行查禁。

11月29日　在京之各省代表因须返各该省竞选，是日赴总统府辞行，袁世凯接见并发表谈话，称库事“和平办法若无美满结果，再以兵力继之”。

11月30日　袁世凯为统一财政计划，令嗣后关于借款事宜，应由财政总长周学熙一手经理。

△　俄外交大臣萨沙诺夫至中国使署表示，须由我外交部先声明外蒙某地允准开埠通商，并承认为俄租界地，方可取消《俄蒙协约》。

12月

12月1日　民国首次司法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央及地方司法官员70余人与会。司法总长许世英致开幕词，提出会议研讨之问题：一、领事裁判权；二、司法之统一；三、司法之改良。

△　旅日神户华侨千余人集会筹商对待《俄蒙协约》办法，议决成立“征库筹饷协会”，当场认捐，并电袁世凯表示咸愿节衣缩食，按月接济征库军饷。

△　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半月刊。该刊编辑为吴贯因、黄远庸。梁在发刊宣言中说，本刊之所以取名“庸言”，便是要以“无奇”、“不易”、“适应”为其立言宗旨。

12月2日　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中学校令施行规则》。

12月3日　孙中山发出“救亡策”通电，指出：“今者俄人乘我建设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故举国

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观之，民气如此，实足救亡，惟必出非常之策，事乃有济。”提出两项主张：第一，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第二，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次日电梁士诒，谓：“昨电‘救亡策’一道，望竭力提倡，以速进行。”

△　袁世凯任命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

△　袁世凯明令豁免民国成立之日起各省地方官吏因公亏累之款项。

△　蒙藏交通公司以库事日急，呈请政府修筑张（家口）库（伦）轻便铁路。

△　广西各界万人在南宁集会议决组织拒俄征库广西同志会。

△　黎元洪撤销盛宣怀汉冶萍公司督办职，另以孙武接充。

12月4日　孙中山在上海出席实业银行、信成银行欢迎南洋华侨会并演说，希望联合多数银行与法资本家合资创办一巨大银行，发行债票，输入外资，举借外债。

△　袁世凯任命庄蕴宽督办浦口商埠事宜。

△　外交次长颜惠庆访晤英公使朱尔典，询问英政府能否允准我册封达赖专使假道印度前往西藏，英使允假道，惟不允携带兵队。

12月5日　陆徵祥与法公使康德谈《俄蒙协约》事，法使提出调停之四项折衷条件，其中要求先取消《俄蒙协约》，由中俄两政府派全权专使另订中俄外蒙新约。

△　孙中山电袁世凯，告以法国对六国银行团态度，并告现派王正廷、徐谦即日北上面陈铁道总公司条例事宜。

△　全国工商大会闭幕，通过议决案30起，送部参考案25起。

12月6日　袁世凯为《俄蒙协约》事提出拒俄联美主张，电商黎元洪。8日，黎电复表示同意，并荐伍廷芳赴美进行联美活动。

△　袁世凯公布《陆海军勋章令》、《陆海军奖章令》、《陆海军叙勋条例》。

△　驻芜湖士兵因欠饷哗变，商店均停止营业，交通断绝。

12月7日　俄公使库朋斯齐谒袁世凯面递俄国第一次正式通牒，内称：《俄蒙协约》乃划清俄国对于内政自主之蒙古政府权利及俄人在蒙古之商权，若中国政府承认此约本旨，俄政府决不阻挠中蒙结约。

△　北京市民为抵制《俄蒙协约》，连日持票往华俄银行提取现金达百余万元之多。天津、上海、香港、烟台亦呈挤兑之风。

△　上海银楼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9日，罢工达到高潮。后遭当局压制，罢工失败。

12月8日　袁世凯公布《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

△　孙中山应浙督朱瑞邀请，自上海抵杭州。次日在杭州对51个团体演说，提出民生主义四大纲领：一、资本；二、土地；三、实业铁道；四、教育。

△　湖南长沙各政团召开“征库联合大会”，举谭人凤为总理，黄钺、龙璋分任军务、筹饷协理。

△　黄兴与谭延闿联名电政府，提议办理中央银行，整理财政，以振兴实业。

△　国民党上海分部开成立大会，选举王一亭为正部长，沈缦

云、朱葆三为副部长。

12月9日　13省都督联名电请政府以联美为民国外交大方针。

△　驻京英使朱尔典向外交部“抗议”禁烟。

12月10日　国务院开会讨论孙中山“救亡策”，各国务员分为四派：一、赞成派为赵秉钧、陆徵祥等四人；二、反对派为段祺瑞、周学熙二人；三、中立派为朱启钤、陈振先二人；四、旁观派为刘揆一、董鸿祎。终因意见分歧，未有结果。

△　孙中山在杭州共和、民主两党浙江支部欢迎会上演说，政党竞争应以党德为前提。指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惟政党竞争，以道德为前提；所有政策，一秉公理，然后以之谋国，其国以强；以之谋党，其党以昌。”并谓：“今之政党，往往争夺政权，逸乎范围之外，不知有在朝党，必有在野党……一旦舆论民心易其向背，则在野党进，在朝党退，迭为消长，政治日进于文明。”12日，孙离杭返沪。

△　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凡86条。

△　滇督蔡锷电告政府，俄蒙协约发生后，英驻片马兵士增500余名，请与英使严重交涉。

△　南昌兵变。驻南昌一旅一团二营五连官兵联络当地洪江会党在府学宫纵火，谋劫军械，焚督署，赣督李烈钧率护军镇压，次日事平。

12月11日　陆徵祥与俄公使库朋斯齐举行《俄蒙协约》第二次谈判，因俄使不肯废除《俄蒙协约》，谈判仍无结果。

△　袁世凯布告各省都督、民政长，通饬所属认真保护归国侨民。

△　袁世凯任命李鼎新为海军总司令。

△　袁世凯任命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

△　司法部通令法官不得加入政党，凡未入党者不得挂名党籍，已入党者须即宣告脱党。

△　汉阳兵工厂工人为反对总办刘庆恩虐待工人，克扣工资，举行全体罢工，捣毁机器过半，并坚持必将刘撤职，始行复工。

12月12日　　袁世凯任命徐鼎康为吉林民政使，原任韩国钧令准辞职。

△　乌兰察布盟反正，该盟之茂明安旗及乌喇特旗均同时取消独立。

12月13日　　国务院决定招商局改组问题准由该局董事会与新公司接洽办理。

12月14日　　俄公使库朋斯齐向我外交部提出续开中俄交涉六项条件，其要旨为，中俄未缔约以前，俄国已承认蒙古为自主国；道胜银行之损失，应由中国赔偿。并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即作为默认。

12月15日　　袁世凯颁布《戒严法》，凡17条。规定“遇有战争或其他非常事变，对于全国或一地方，须用兵备警戒时，大总统得依本法宣告戒严或使宣告之”。

△　袁世凯布告议员竞争选举，务须于法律范围以内行使公权。

△　袁世凯电召张振勋入京，共商国是，聘其为总统府顾问，派往南洋考察商务，并联合侨商筹办内地开埠事宜。

△　袁世凯令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赵理泰辞职，以蒋方震（百里）继任。

△　袁世凯任命杜持为第十四师师长。

△　国务院会议议决承认俄公使所提修改《俄蒙协约》条件之第三条，取消该约以库伦舆论多数为转移。

△　直隶都督冯国璋应袁世凯召抵京，当晚赴总统府晤袁商对待库伦事件办法。

△　驻西藏办事长官钟颖电政府，英派步兵四联队、骑兵三中队侵入拉萨，请速与英公使交涉。

△　华法联进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赵秉钧、法公使康德出席大会并演说。该会为中法交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团体。

12月16日　袁世凯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

△　袁世凯公布《修正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修正省议会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

△　达赖喇嘛抵拉萨。

△　上海各界集会欢迎爱国志士万福华出狱。万福华于1904年11月19日在沪谋刺前广西巡抚、赴俄专使王之春未遂，被捕入狱，判刑10年，是日释放出狱。

12月17日　袁世凯据新土尔扈特盟长亲王密西克栋回鲁布等电称蒙部同戴共和，于库伦独立始终并未赞成，是日颁令由阿尔泰办事长官传令嘉奖。

△　国民党特派员于德坤返黔组党，行至玉屏县被害，是日孙中山以国民党理事长名义电袁世凯、赵秉钧，指出此案系黔军军务司长刘显世主使，请彻底根究，公平处决。

△　黄兴自长沙赴汉口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12月18日　　英、法、德、美、日、奥、意七国公使邀俄公使调停中俄库伦交涉案，俄公使坚持不设官、驻兵、屯垦三原则，必中国均许始能开议。

△　袁世凯任命周学熙为税务处督办，孙宝琦为会办。

△　教育部为贯彻教育宗旨，通令所属重视体育，提倡运动。

12月19日　　赵秉钧对《德文报》代表谈话，告以国会选举进行迟缓，政府不得已展期三个月。又谓俄国近日对蒙古问题似较和缓，宣言取消库约，而不然必将该约修改。

△　江苏金山县县署征租过昂，杨柳谷率乡民七八百人入署请减租米，被县知事逮捕入狱，引起众愤，该知事竟饬警开枪击毙乡民一人，重伤数人。众益愤，坚持数日不散。后混成第三旅调兵镇压，乡民被迫散去。

12月20日　　陆徵祥晤库朋斯齐，指出俄所提六项条件若不修改，则永无谈判之地步。

△　国务院会议通过孙中山所提《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

12月21日　　袁世凯电四川护理都督胡景伊转达赖喇嘛，已饬钟颖停战，静候中央解决，希达赖亦转饬所属停战。

△　袁世凯以蒙古土观呼图克图、察罕殿齐呼图克图翊赞共和，颁令分别加给圆觉妙智名号及普应真如名号。

△　袁世凯以旧土尔扈特汗王贝勒贝子暨13旗王公台吉等电呈称归附民国，颁令由新疆都督传令嘉奖。

△　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二师长彭光烈、三师长孙兆鸾、四师长刘厚存、五师长熊克武联名电袁世凯、国务院，决备两师待命出发

征蒙。

△　驻英公使刘玉麟代表交通部与英国城市平安储备银行签订借款15万英镑合同。

△　粤省破获日人伪印广东纸币案，捕获日人六名，搜获伪印纸币200万元。

12月22日　　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未到任前，仍由崑源署理；段芝贵为察哈尔都统，未到任前，仍由何宗莲署理；溥伦为镶红旗满洲都统。

△　袁世凯据交通部呈，指令改粤汉铁路会办为汉粤川铁路会办，任命詹天佑为会办。

△　机器公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出席，演说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望以聪明才力发明机器，庶几驾乎各国之上。

△　云南征藏军返省。

△　浙路杭甬线举行开车礼。

12月23日　　袁世凯任命刘若曾为直隶布政使，原任曹锐辞职照准。

△　袁世凯任命孙多森管理中国银行事宜。

△　袁世凯下令裁撤仓场衙门以及外省转运各局并管理漕粮各官吏。

△　袁世凯以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喀尔喀右翼达尔汗贝勒蕴端旺楚克翊赞共和，颁令晋封为郡王。

△　袁世凯以郭尔罗斯后旗扎萨克贝子布彦朝克赞助共和，并不

承认库事，颁令由黑督宋小濂传令嘉奖。

△　外交部复照英公使朱尔典8月17日抗议：中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甚无根据，中国对西藏并无即时改设行省之意；中国并无派无限制之军队驻藏事，惟照1908年通商条约，中国于西藏各要处当然派遣军队；中英西藏交涉已经两次订约，并无改订新约必要；中国政府并无有意阻断印藏交通之事，以后当更加意保护，断不阻碍交通；英承认民国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

△　中国政府代表周学熙同英国克利司浦公司代表巴纳斯在北京签订取消1912年五厘金镑借款（1000万镑）合同。

12月24日　　外交部开会，通过中英鸦片、中英西藏、中英片马、中俄库伦四项交涉决议案。

△　法公使康德邀英、意、奥三国公使在美使署讨论《俄蒙协约》调停最后办法，商定否认库伦有订约资格；俄如不承认，即分别电各该国政府联合讨论办法。

12月25日　　袁世凯通令：纸币则例未定之前，先行通用中国银行所发之兑换券，所有官款交纳，商民交易，均准一律行用。

△　袁世凯任广东护军使陈炯明兼充广东陆军军长。

△　驻日代表汪荣宝电告外交部，日首相桂太郎分别电告驻华、俄两使，如俄在外蒙攫取特权，日可在南满、内蒙照办。

△　新任美公使嘉乐恒抵京。

12月27日　参议院通过六国银行团2500万镑借款条件。

△　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北京政府，告以俄现由海参崴调兵一联队强据呼兰府，请与俄公使严重交涉。

△　孙中山电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请向财政部设法转拨五万元交国民党本部收用。

△　外交团会议讨论中国商请庚子赔款展期一年缴付事，因俄公使坚持不允，未获结果。

12月28日　外交部拒绝德公使所提山东地方权益之无理要求。

△　吉林都督陈昭常电告北京政府，俄人在长春招募华工千余，哈尔滨募七八百，拟修俄京至库伦轻便铁路，劝阻不理，请与俄公使严重交涉。

12月29日　袁世凯令准北京大学校校长章士钊辞职。

△　袁世凯任命王广圻为驻比利时国公使。

12月30日　袁世凯任命张瑞玑署山西民政长，原任谷如墉辞职照准。

△　袁世凯任命张锡元为河南第一师师长。

△　山西河东观察使张士秀拥兵割据，倡言独立，自任民政长，李鸣凤自为都督。

△　旅京美国绅商电本国政府，请速承认中华民国。

△　袁世凯颁令优奖首赞共和之喀尔喀扎萨克亲王那彦图、喀喇沁札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

△　交通部与德商瑞记洋行签订借款4.7万英镑合同。

△　孙中山致书福建省议会，调查闽路情形，并请举贤赞助。

12月31日　应江苏都督程德全邀请，是晚，孙中山乘专车离上

海赴南京。

是年　全国户口统计：共7696.105万户，4.13638462亿人。

1913年（民国二年）

1月

1月1日　　中华民国开国周年，总统府举行庆祝典礼，文武官员及议员到千余人，赵秉钧致颂词，袁世凯致答词。

△　“共和纪念会”在北京先农坛开中华民国开国周年庆祝会，祭诸先烈，自由演说，到三四万人，自是日起举行10天。大会主席通电各省都督于10日派各省驻京代表莅会。

△　孙中山偕陈其美、伍廷芳由沪抵宁。下午，出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周年典礼，并发表演说。

△　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1009公里。

△　黄兴等29人发起成立中华汽船有限公司，在《长沙日报》刊登招股广告，申明以“收回外溢之利权，扩张自由之实业”为主旨，股本200万元，除已认股本外，余待招股本50万元。

1月2日　　袁世凯宴请各国公使。除俄使外，各国公使均到。袁表示中国政府对各国力主和平，向具信心；各国之对东南亚力保和平，冀其持公评断。同日晚，袁世凯宴国务员及参议院议员，宣布对俄库问题意见，称政府“只宜镇静交涉，不能轻举妄动”。

1月3日　　财政部编成民国二年预算：岁出9.03亿元，岁入7.25733208亿元。尚有赤字1.78余亿元。

△　英公使朱尔典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称，接英外交大臣爱特华德两电：其一，前进拉萨英军已全退出藏地；其二，英政府决

不再派兵入藏，照《中英藏约》尊重中国在藏主权，以保全英国在藏埠商权。

1月4日　　国民党江西省支部以民政长汪瑞闿离省请兵，通电揭露汪氏罪行，俾中央勿中其狡谋，各省明白真相，维持江西。

△　谭延闿、王芝祥、赵恒惕、黄兴、蔡锷等34人发起成立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是日在《长沙日报》刊登招股广告，申明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补助军需为宗旨”。股本20万元。

△　“中美国民同盟会”在北京开成立会，到200余人。该会以“增进中美两国国民睦谊；互换智识利益，维持世界和平”为宗旨，举孙中山、罗斯福为正会长，丁义华、丁韪良、吴景濂、金鼎勋为副会长。

1月5日　　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袁世凯、北京政府及各省都督，恳请于正式国会、省议会成立后，实行军民分治。于此数月内，暂负军民要政完全责任。

△　上海《华字日报》公会致电英国下院，吁请协助完全禁止鸦片贸易，并望竭力鼓动英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　烟台关外士兵千余名因不满被遣散，是日哗变，放火劫银，全埠闭户。后经“海圻”、“飞鹰”两舰并海军练营士兵及部分鲁军联合镇压，次日始平。降回士兵六七百名皆被押上日船，运往大连湾遣散。

1月6日　　袁世凯以北京民见报社刊行《开国纪念十日刊》，内载《不堪回首之南京政府》一文，鼓吹“二次革命”，饬内务部查办。

△　袁世凯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及统兵将领：“盐务收入各款，应自民国二年一月份起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

△　宋教仁、陈家鼎等发起筹建民国史馆，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均致电赞同，是日在北京开筹备会，草拟章程，确定该馆任务为撰修民国史。

1月7日　　北京政府司法部近因各省都督多沿军政府时代习惯，对于烟赌各犯，动辄枪毙，实属违背法律，是日致电各省提法司，谓嗣后遇有烟赌案件，由审判厅或州县查照暂行新刑律办理。

△　山西洪洞汉军首领陈采彰率部攻克绛县东关，远近一带农民纷纷加入陈军，曾达到3000人，活动范围达到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绛县、翼城、安泽、沁水等县，坚持达三四年之久。旋因阎锡山派重兵进攻，陈于1915年8月7日病逝，起义不久即告失败。

1月8日　　袁世凯发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除蒙古、西藏、青海三地外，其“已设民政长省份，以民政长为该省行政长官”；“未设民政长省份，以都督兼任民政长为该省行政长官”。各省设行政分署，其下统一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司。

△　总统府接鄂湘等17省都督联名电陈三事：一、请袁世凯速定征库方针；二、报告各省商定联军办法；三、条陈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军政财政两项收束办法。

△　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抵长沙，是日国民党湘支部开欢迎大会。宋在会上发表演说，主张“政党内阁”，通过选举成立“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党党纲五条，并谓：“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划皆可施行。”

△　国民党江苏支部部长陈陶怡发表宣言书，吁请化除地方观念。

1月9日　　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向北京政府报告称：英国在藏八地连续增兵，计亚东1100余人，噶大克（今葛尔雅沙）300余人，江孜

600余人，拉萨700余人，日喀则510余人，加托克（今夏卜喀）1230余人，聂拉木260余人，察木多（今察木达）360余人，共5000余人。是日，袁世凯特召集内阁及有关人员会议，决定于上述八地险要地段派兵驻守（后并未派兵）。

1月10日　　袁世凯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规定令发之日起，“限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所有当选之参议院议员及众议院议员均须一律齐集北京，俟两院各到有总议员过半数后，即行同时开会”。

△　袁世凯通令各省行政长官定期召集省议会，省议会开会翌日即先举行参议院议员选举。同日并公布修正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实行细则第13条，规定现任官吏须于选举前一日辞职方可应选。

△　袁世凯令：除江苏、江西、福建、湖北、山西、四川等省业经任命民政长外，其余各省，应由各该都督暂行兼署。

△　袁世凯令：在纸币则例未经规定以前，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应按照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

△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开恳亲大会，到千余人。孙中山出席演说《党势之盛衰全视党员智能道德之高下》，告诫全党：“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

△　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帝国皇帝”名义致电袁世凯，谓北京政府不应干涉库伦当局“乘时立国”。26日，袁世凯电复哲布尊丹巴，重申“库伦不宜与中国分裂”，民国“承前清之旧区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理应接管”。

△　日本新任内阁总理桂太郎对路透社记者谈对中国之态度，称中国大局隐伏危机，急当奋发图强，脱离阽危之境，日本切愿竭力扶持中国，俾纾中国之困，并绝对否定希图吞并满洲。

1月11日　直隶都督冯国璋以上海欢迎国会团主张第一届正式国会开预备会于上海，开成立会于南京，是日通电反对变更国会地点，请政府及各省行政长官设法限制；并望当选各议员依限齐集北京。

△　陆徵祥以英公使朱尔典不日回国，是日至该使署提出承认民国及退兵西藏等四条要求。

△　中法实业银行公布章程，资本暂定4500万法郎，其中三分之二为法国资本家所有，三分之一为中国政府所有。总行设巴黎，于北京设营业局。后设分行于上海。1921年停业。

1月12日　俄籍间谍佐治野夫代表西藏喇嘛与库伦当局私订《蒙藏条约》九条，其要者为："西藏达赖喇嘛承认蒙古自治权及……黄教首领活佛独立之宣言"，"蒙古政府承认西藏之自治权及宗教首领达赖喇嘛之独立"；"两国政府于内忧外患危险之际永久互相援助"；"两方贸易自由，并互设新商业机关"。

△　袁世凯与赵秉钧、陆徵祥商定保护在俄华工办法六条。

△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凡四章28条，其中对于大学分科、各科分门、修业年限及入学资格等均有规定。

△　库伦当局以"答谢俄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为名，派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为专使率15人赴俄，请求俄方代练蒙军，支援枪械，并商互派专使等事。是日杭达多尔济抵彼得堡。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予以接见。

1月13日　袁世凯以吏治隳坏，贿赂公行，下令整饬官常，"京外有职人员如有容受赃贿，一经发觉，立即按律惩治"。

1月15日　驻美公使张荫棠电告北京外交部，美第一国家银行总经理巴克对孙中山拟招股建筑铁路一事极为赞成，愿将该行公债8000万元投半数于中国，请即将此意转达孙中山。

△　袁世凯接秦、晋、陇、新、热河、察哈尔、阿尔泰、绥远、东三省、古北口12处将军、都督、都统等电请三路征库。

1月16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与美商摩根公司签订借款20万美元合同，以退还之庚子赔款为担保，用于留美学费垫款。

△　袁世凯任命高鲁为中央观象台台长。

△　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学规程》，凡14条。

1月18日　江北护军使刘之洁派代表张福增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10万元合同，以军需公债票20万元担保，用于购置日本军械。合同规定须聘该行所属旭公司经理福间甲松为财政顾问。

1月19日　财政总长周学熙函告六国银行团代表熙礼尔，“现在本国用款万分急迫，如垫款不能克期交付……自本日起，本总长有自由借款之权”。

△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恳亲茶会，孙中山以国民党理事长身份亲临主持，并即席演讲《政党宜重党纲党德》。强调使朝野政党“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更有进步”。

1月20日　中华民国学生会在北京发起组织，是日公布《缘起》及《暂行简章》，宣布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发达教育，开通社会”为宗旨。该会于4月上旬成立，举吴稚晖为正会长，公羊寿文、徐中晟为副会长。

△　袁世凯准设立蒙藏招待所，对蒙藏王公、活佛、官吏、商民“以示招徕”。

1月21日　日公使伊集院赴长春晤日新外务大臣加藤，讨论中国局势，行前与袁世凯晤谈。

△　袁世凯将内城巡警总厅更名为京师警察厅，改任原厅丞王治馨为京师警察厅总监。

1月22日　袁世凯任命钟鼎新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苏慎初为广东陆军第二师师长。

△　陆徵祥为片马交涉案致函英公使朱尔典，提出片马案移京交涉，以前清光绪三十四年议案为起点等六条主张。

1月23日　袁世凯任命赵渊为山西民政长。

△　河南都督张镇芳以开封《自由报》抨击其统治，是日派军队数十人逮捕该报总编辑贾英，31日复将该报封禁。

△　教育部令师范学校、中学校、小学校及与此同等各学校，务须监察学生，不论在校内校外一律禁止吸烟。

1月25日　江西都督李烈钧为陆军部扣留所购军械事通电说明该省购械系前督马毓宝订购，事阅一年，南北军部案据确凿，运购手续完备，指责陆军部扣留之不当，要求发还，以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隔膜。

1月26日　袁世凯复电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略谓："库伦本为民国领土。""库伦王公喇嘛等，或亲身赴京，或遣代表前来，献荩输诚，络绎不绝。贵喇嘛何得以一隅之地，冒称蒙古全国。"并谓："望贵喇嘛之悔悟，甚盼熟筹利害，使我民国受于前清之领土及统治权完全无缺，民国当优礼有加，尽泯前嫌，共葆黄教之发达，永保全国之和平。"

△　黎元洪通电调停北京政府与江西之龃龉。提议请政府调回停泊九江之军舰，发还扣留之军械，再饬赣省撤去驻扎要隘各军，并由李烈钧及省议会公派代表往迎汪瑞闿莅职，以平争议。

△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开欢迎黄兴大会，黄兴在会上演讲宪法问题。谓国民党“依政党政治之常规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不可轻易主张急进”。

△　同盟会广东支部更名为国民党粤支部，仍以胡汉民为支部长。

△　中国社会党上海支部机关刊物《人道周报》创刊。该刊由安真编辑，共出九期，于3月30日停刊。

△　俄兵300余人经奉天辽原州（今双辽）侵入宾图王府。

1月27日　新疆都督杨增新以库伦蒙军头目丹柏江村率队千余人进逼布尔根河，急电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拨队往御。

△　内务部准蒙藏事务局所办《蒙藏回白话报》备案。按：该报申明以“开通风气，灌输边地人民知识”为宗旨。

1月28日　袁世凯令准教育总长范源濂辞职，特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教育总长。

△　袁世凯任命罗佩金为云南民政长。

△　袁世凯任命黎本唐为湖北第一师师长，蔡汉卿为湖北第二师师长，王安澜为湖北第三师师长。

△　国务院布告查禁卖官鬻爵劣行。略谓：近日有人在外招摇，声称“京外官缺可以金钱代人运动”，特颁布告，嗣后如有前项情事向人招摇撞骗者，无论何人，均准其向该管官厅指名告发，悉予彻究严办。

1月29日　袁世凯令准汉粤川铁路督办黄兴辞职。

△　袁世凯任命颜惠庆为驻德意志国全权公使。2月3日，再令颜

兼任驻丹麦公使。

△　国务院奉袁世凯令通电各省，声明中央与江西之误会，皆因赣省要员蔡锐霆、陈廷训等人之播弄，要求赣省都督、议会按照黎元洪办法，公派代表往迎民政长汪瑞闿莅职，并饬令江西省撤去各要隘军队。

△　孙中山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法人密议合办中法银行，与本人在沪同巴黎联合银行磋商办理合资银行一事，条件相差甚远，事关国体利权，是日密电袁世凯暨周学熙，请舍彼就此，以利国福民。

1月30日　伍廷芳、陈锦涛、温宗尧、王宠惠、王正廷等代表天津北洋大学全体师生，联名呈请教育部取消北洋大学合并于京师大学之议案。

1月31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省议会暂行条例》议决公布前，暂照前清谘议局章程分别办理。

是月　法军2000余人侵入云南富州以南田蓬地区（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以南）。蒙自关监督闻讯，急电省府请与法方严重交涉。

△　加入中华民国工党之长沙全体染工700余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遭各店主无理拒绝，举行同盟罢工。各店主以停业半年相威胁，工人遂联合组织染业同意工厂（后改称辉光染厂），独立经营，坚持斗争。

2月

2月1日　袁世凯与顾问各员商议对待库伦当局办法，决定暂不用兵，以免遭致俄方干涉，并初步拟定招抚办法五条。其要旨为：与哲布尊丹巴以旧有教权并加封号，岁与津贴36000元；加伪总理大

臣、二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以徽号，岁与津贴8000元；任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为库伦长官；一切善后事宜由北京政府酌派阿穆尔灵圭前往库伦办理。

△　袁世凯令东三省各都督会剿胡匪，以保护商旅。

△　宋教仁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号召通过国会竞选，取得半数以上议席，组成国民党责任内阁；指出要警惕袁世凯的破坏，袁撕毁约法、背叛民国之日，即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之时。

△　党人宁调元自南昌电湖南都督谭延闿等，指责袁世凯“采用积极专制手段，实行破坏共和，虽赵匡胤黄袍尚未加身，而拿破仑雏形已具”；建议“湘人上下团结为一气，与各得力省协筹对付之法”。同日又电国民党粤支部转粤督胡汉民，力主“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袁世凯之办法。

△　农林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林联合会，“以谋全国农业改良发达，令各处农界代表周知全国农业情形，交换各地农业知识为主旨”。到各省代表89人，举叶可梁、黄召棠为正、副会长。会议历时月余，3月4日闭幕。

2月2日　　国民党湘支部在长沙教育总会召开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大会，唐群英主席。

△　浙江省调查户口事竣，呈报北京政府：杭州共计18.7841万户，50.4912万人。

2月3日　袁世凯任命岑春煊督办汉粤川铁路事宜。

△　南昌20余团体召开拒汪（瑞闿）大会，到者万人。通过决议四项：一、反对中央擅布官制；二、反对李（烈钧）督主张军民分治及不承认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三、请陆军部迅饬浔关发还枪械；四、请海军部撤回军舰。

△　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派出代表36人参加，获四项冠军，13项亚军，七项第三名，总分第二。

2月4日　北京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胜，共得392席，占绝对多数。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223席，其他兼党者及党籍不明者占255席。

△　孙中山电袁世凯，告以定于是月11日由沪起程往日本，“以个人名义，联络两国感情”，并望详为指示政府对日、对俄方针。

△　福建民政长张元奇率卫队60余人出城与日人密商借款，回署道经万寿桥时，突遭炸弹轰击。卫队、随员及行人等死伤数十人，张幸免。

2月5日　财政总长周学熙致函六国银行团，谓贵团不能践约借款，中国需财孔殷，若以盐课作抵押向他团借款，则以后当不得不减缩向贵团借款，鄙人初不欲声明此节，惟因贵团延宕，多方作难，故实不得已而为之。

2月6日　吉林延吉府第一路防军哗变，杀死统领王文治并四出劫掠。吉林府尹率巡警前往镇压，被击退，府尹亦被缚。7日，变兵继行抢劫。8日，珲春军至，哗变平息。

2月7日　宪法讨论会在北京开成立会，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代表均到会。举孙洪伊为主席，审订章程，推汪荣宝、易宗夔为常驻干事。

△　内外蒙古赞成共和各王公在阿拉善地方集会，议决事项11条，其要者为：内外蒙古均应悬挂五色国旗，要求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五族统一；蒙人应遵守中华民国律例；内外蒙均不得私借外债，私造枪械；由北京政府派兵驻守内外蒙各要塞，与当地蒙民共同巩固边防等。

2月8日　　袁世凯召集会议，内阁各员及蒙藏事务局正副总裁均出席。先由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徵祥分别报告大借款问题及关于外蒙问题与俄使之交涉；继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报告近日外蒙各旗相继归附等情。袁世凯表示，非迫不得已，不愿加兵力于库伦，并决定向反正各蒙旗预发饷银等事。

2月9日　　驻俄外交代表刘人镜电北京外交部，告以俄政府提出“优待蒙王公”四条及“优待蒙人民”六条。

2月10日　　袁世凯召集内阁各员及蒙藏事务局正副总裁商讨对待英、藏办法。议定对英办法为：一、电驻英公使刘玉麟向英政府声明西藏为中国之领土，英国幸勿干涉，致碍邦交；二、由陆徵祥向英使朱尔典交涉，将增驻拉萨、江孜等地之英军撤离西藏；三、派全权委员办理中英关于藏事之交涉。对藏办法为：一、电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宣布优待藏民条件；二、电尹昌衡率兵驻扎里塘，以遏达赖之逆谋；三、派专使赴藏阐明北京政府对待藏事之方针，以消除误解。

△　外交部于1912年12月23日曾就西藏问题正式照复英公使朱尔典，迄未得英方回复。是日，外交部奉袁世凯指令再次照会英使，询问英政府对西藏问题之意向。17日，英使往见外交总长陆徵祥，佯称英政府嗣后对于藏务严守中立；北京政府如再派兵入藏，英国决不干预，旋即提出请允英政府修筑自印度直达西藏铁路之要求。陆未应。

△　沈霭苍、虞洽卿等10人在上海《时报》刊登筹组北京华商电车有限公司招股简章及招股章程，确定股本为350万元，承包北京内外城全部电车之敷设，预期一年内竣工。

2月11日　　孙中山为考察日本铁路及工商业状况，乘“三城丸”邮船离上海赴日。随行有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五人。

△　滇越铁路全线竣工。此路系借法资修建，共用1.58466亿余法

郎。

△　蒙古联合进行会在北京开成立会，袁世凯派代表梁士诒出席。该会宗旨为："一、保存蒙古权利；二、发展蒙古政治；三、促进蒙古教育；四、振兴蒙古实业。"会上举那彦图为理事长，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为理事，并举讷谟图为评议长，张文德、金永昌、恩华等为评议员。

△　冯国璋、吴景濂、沈云沛等创办民富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公报》刊登招股广告，标榜"振兴渔业，增进渔民生计，抵海产之舶来"。企业资本100万元。总公司设天津，分公司设北京、保定、奉天、济南等11处。

2月12日　各地举行南北统一共和周年纪念。

△　国民党汕头支部机关报《大风日报》创刊，申明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

2月13日　孙中山抵长崎，旋赴东京。途次与来迎之日本友人、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泽村幸夫谈话，表示愿注全力于中国之铁路建设，并谈及对中国币制改革之看法。

△　宋教仁抵九江，国民党浔交通部开欢迎会，宋在会上发表演说。

2月14日　孙中山抵东京，日本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及留日学生2000人热烈欢迎。

△　驻迪化俄领照会北京政府陆军部，谓中国与俄国停兵议约之际，中国军队不得进兵科布多。当经陆军部将此照电达新疆都督杨增新。杨于17日分别照复驻乌鲁木齐及科布多俄领，告以"库伦及科布多蒙兵意图西窜阿尔泰山一带，本都督及中国带兵官……有防守阿尔泰责任"。"现在新疆兵队驻防察罕通古、布尔根河一带，原系为防守

阿尔泰山起见，并无进取科城之事”。

2月15日　　孙中山出席东亚同文会晚宴，讲述中日两国“互为提携”对维持东亚和平之必要性。

△　教育部为“筹议国语统一之进行方法”，召开读音统一会。与会各省代表及特邀代表共80余人。举吴稚晖为会长。会间拟定拼音字母39个。5月26日闭会。

△　云南都督蔡锷因英又在我片马、蛮允（今曼允街）大量增兵、运粮、筑营、设垒，并将大量武器弹药运存他戛（今称戛），是日急电北京政府请设法防御。

△　宋教仁抵沪。19日，出席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大会，发表演说，提出政党内阁与省长民选之主张。

△　江苏都督程德全抵济南，同鲁督周自齐商讨两省边境剿匪事宜，议定联络办理。

△　夜11时，驻热河（今承德市）第三营士兵乘当地大部驻军调往开鲁之际，在革命党人协助下举事，杀连、排长及军需官并焚营房，随即破军械所，得枪百余支、子弹10余万发，并奔赴银库，夺得库款1.9万余两。复焚电报局、兵备处，并攻财政局、都统衙门。都统崑源急调邻近庄头营子驻军驰往镇压，激战数时，举事一方不支，阵亡、被俘数十人，余四散。16日晨，事息。

△　《法学会杂志》在北京重新创刊。按：法学会成立于1911年10月，“以研究法学，赞助立法、司法事业为宗旨”，会长沈家本。该会曾出《法学会杂志》五期，并组织法政研究所。1912年初会务中辍。同年10月20日召开会员大会，恢复会务，该刊重新创刊，主要为发表各方有关宪法问题之主张而设。

2月16日　　王芝祥、孙毓筠等19人发起国事维持会，是日在北京

开成立会并发表宣言，宣布该会以调和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党与政党之冲突为宗旨。次日，国事维持会开会选举王芝祥、孙毓筠等五人为理事，并致函赵秉钧，请取消军警联合会，以杜武人干政。该会于11月17日由孙毓筠宣告解散。

△　俄政府与库伦当局密订《俄蒙旅协定》，其中规定：俄政府为库伦当局装备一旅，包括二骑兵团、一机枪队及拥有1900名士兵之炮队。该旅教官均由俄军官充任。并规定库伦当局应交俄政府35万卢布，充作组织该旅之全部费用。3月10日，陆徵祥就此事诘问驻京俄使："俄政府何故以武力助外蒙及售与军火？"俄使竟谓："俄以武力助蒙载在协约，此次经俄皇允许，系属当然之事。……至借款购办枪械，亦自是应有之事。"

△　俄马队1200人擅入我海拉尔，并驱逐当地居民。

2月17日　江西都督代表彭程万、贺国昌谒袁世凯，方陈该省反对汪瑞闿乃反对汪个人，并非反对中央命令。袁答称业已派员查办，将来必可和平解决。

△　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在东京密谈，希望日本协助中国国民革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日两国互相信赖，共同努力，以阻截英国在亚洲之称霸。桂太郎赞同孙中山所作之劝告，提议中日两国联好，以保东半球之和平。并谓"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次日，孙中山电上海同志告以"现由首相桂太郎发起中日同盟会，约两周内举行成立大会"。

2月18日　袁世凯接见华侨选举代表，并发表讲话称："余夙愿侨民参与政事，同心协力，以达救国之目的。"

△　孙中山访日本参谋、陆军两部部长，参观炮兵工厂及火药

厂，出席外务大臣加藤午宴，下午出席日本邮船会社招待会，并演说航路与铁道之关系。

△　福建省议会开预备会，宋渊源为临时主席，就袁世凯电令省议会法中央未颁以前适用前清谘议局章程一案进行讨论，公决此等电令不能承认，并一面电询各省意见。

△　北京政府因俄政府擅将中俄合办之库伦华俄道胜银行改为俄蒙银行，是日授权外交总长陆徵祥向俄使库朋斯齐提出质问。

2月19日　袁世凯公布《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条例》，凡16条。公债定额二亿元，用以“拨充中国银行之资本”、“整理各种零星短期借款”及“整理各省从前发行之纸币”。旋以善后大借款成立，此项公债遂未正式发行。

△　袁世凯令设财政委员会，筹划全国财政，派梁士诒、周学熙、梁启超等八人为委员。

△　孙中山出席日本众议院议长主持之欢迎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日本两国有数千年亲密关系，种族、文字相同”、“两国和睦相亲，互相提携，不仅在东亚和平上，且在世界和平上实有必要”。

△　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北京政府称，俄人在库伦设一军司令部，颁新令五条，其要旨为：库民非经该部许可，不得收藏军械及其他禁物；旅库外人非有该部旅行证，不准自由行动；库民生命财产经清查注册后，均受该部保护；民刑诉讼概由该部执行裁判，王公不得干预。

△　汉冶萍公司经理孙武电袁世凯，主张一律改归商办。

2月20日　孙中山出席日本铁道会欢迎会，演说中国铁道政策。同日，又出席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所举行之“中国兴业公司”发起人会议，拟定《中国兴业公司计划书概要》，规定该公司为中日合办之股

份公司。

△　国民党本部以共和党报纸诬指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抵借日款，购备枪械，割据东南，是日通电辟谣。

△　袁世凯任命谢汝翼为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

△　内务部通告各省都督、民政长，并请转饬所属，“切实保护祠庙”。文内最为强调者乃保护孔庙。

△　司法部据《临时约法》第48条关于组织法院之规定，通令各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及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参照北京各级法院改组办法，改组各省法院，即分别将各省高等以下原有审判、检察人员重新考核，然后报部核定，再请任命，以符约法。

2月21日　宋教仁抵杭州，23日在国民党浙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目下大局岌岌，国民党党员应时时存救国民之责任心。

△　孙中山出席东京实业家联合欢迎晚宴并致答辞，指出中国天然资源丰富，且拥有数亿人口，将来定能成为富强之国。希望日本“能助我一臂之力”。

△　署教育总长刘冠雄呈请袁世凯批准临时稽勋局所拟变通留学办法：此后“有功民国人员”呈请派遣留学者，由该局“给予证书，使得分入本国相当学校，则经费既可节省，而于育才、酬庸两事均有裨益”。是日，袁将此呈批交国务院查照办理。

2月22日　逊清隆裕太后病死。国务院通告各官署，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待遇，一律下半旗27日，现任官及现役军官均佩黑纱27日，“以志哀悼”。

△　驻英外交代表刘玉麟电北京外交部称，英廷对于库藏协约颇不满意，而达赖已有电致英政府，要求承认独立，提出六项条件：

一、西藏宣告独立之后，一切军械由英廷接济；二、西藏为报酬扶助独立起见，特承认英廷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三、英廷须借300万镑于西藏，抵押任由英廷指定；四、民国军队如至西藏时，英须担保抵御之责；五、西藏宣布独立后，英廷须首先承认，并担任介绍各国承认；六、西藏持门户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

△　内务部下令将长江及其他水师一律改为水上警察。

2月23日　孙中山在东京出席留日学生欢迎大会，发表演说，勉励“学生须以革命精神努力学问”。

△　中日新闻记者俱乐部总会在北京开成立会，宣称“以加强中日两国亲睦，保持东亚和平为宗旨”。到会中日记者60余人，临时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等亦到会。

2月24日　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

△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凡35条。

△　司法部据调查报告，河南未设审检厅各州县，有擅行枪毙人犯，不遵赦令，及不废刑讯，积案不理等情，是日训令各省司法筹备处转饬各州县，务须遵照法令，执行职务。

△　江西省正式议会开成立大会。该会曾于22日开会选举正、副议长，任寿祺被选为正议长，23日及是日再选副议长，颜炳麟、欧阳莘当选。都督李烈钧出席并致祝词。

2月25日　孙中山出席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茶话会和东京市长阪谷的宴会，称颂中日两国友谊，“窃望莅会诸君此后益主倡中日提携之论，以谋东亚之幸福，及世界之和平”。

△　俄哥萨克马队500人、炮队一营，携机关炮三尊、炮弹200箱进驻哈尔滨。

2月26日　　日本20余团体在东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桂太郎主席，通过承认中华民国及确保中国领土完整议案。

2月27日　六国银行团总代表熙礼尔为大借款事于驻京英使馆开茶话会，英、法、德、日各使意见不一，无结果。

2月28日　云南都督蔡锷因英兵200余人并测绘人员40余人擅入我国云南腾越（今腾冲）地区肆行勘测，是日遣员与英领交涉。其后复交涉多次，英领均置之不理。

△　英国向西藏增兵2000人，旋西藏办事长官钟颖电北京外交部，请速向英公使严重质问。

△　中华民国蚕丝总会在北京成立，以“确定蚕丝业进行之方针”、“力图蚕丝教育之普及”、“扩张海外生丝之销场”、“调查世界蚕丝业之现状”为主要会务，举陶昌善为会长。

2月下旬　孙中山在日本获悉日新内阁俟中国正式政府成立，当首先承认，电广东都督胡汉民，请联络南方各督支持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电谓“国会将开，选举总统，宜先预备，现任袁总统，雄才伟略，薄海同钦。就任以来所有措施，中外慑服，请联络南方各督共表同情，一面怂恿国会赞成，务使人心一致，藉支危局”。

△　英政府与达赖擅订《通商协约》。约共六款，其中规定：“英、印在西藏有优先权，货物进出概行免税”；“英、印在西藏得开设银行”；“西藏境内主要物产……概归英人管理，其矿产森林等亦由英人投资开办”；“中国在西藏之权利一概取消，若喇嘛阳奉阴违，查出严罚”。

是月　《震旦》月刊在北京创刊。该刊由赵管侯、李梦林编辑，统一党政务讨论会发行。

△　《孔教会杂志》在上海创刊，由该会会长陈焕章主编。

3月

3月1日　　东京国民党支部、共和党支部、广东同乡会联合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到40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经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和平办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并论述两党制之必要性与党德之重要性。

△　梁启超在《庸言》半月刊第一卷第七号发表《敬告政党及政党员》一文。

△　赣事查办使王芝祥抵南昌，受到赣省各长官热烈欢迎。王表示：“今中央政府使吾来赣，原为解释一切误会。”

△　财政总长周学熙与德商瑞记洋行签订借款30万英镑合同，以契税收入为担保，用于支付军政各费。

△　山东银行成立，资本总额定为500万元，实收141万余元，总行设济南。

△　山西省议会选举杜上化为正议长，张瑞、高洪为副议长。3日开成立大会。

3月2日　　英人数名在汉口华景街后试放猎枪，竟击毙运土工人一名，伤二名。在场工人立即集合当地数千居民，将该英人扭送警察第十五署。汉口镇守使杜锡钧闻讯，即会同警察厅率队前往镇压。

3月3日　　袁世凯任命章梓为江苏陆军第一师师长，章驾时为江苏陆军第二师师长，冷遹为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　黎元洪电袁世凯，条陈调停赣事办法：一、即令李烈钧兼署民政长，另予汪瑞闿位置；二、令李烈钧取消蔡锐霆、陈廷训兵权。

△　参议院开会讨论任命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案，到58人，赞同28

票，反对29票，1票作废，未通过。次议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因议员人数不足，未付表决。

△　孙中山访日本新首相山本权兵卫话别，表示中日联好之愿望。

△　北京公使团就六国银行团监督大借款之人员问题达成协议，并通告北京政府，内容为：要求盐税稽核处聘英人为主办，德人为副办；国债局聘德人为总办；审计处聘俄、法各一人为顾问。北京政府以借款谈判时未曾提及为由，加以拒绝。

3月4日　　袁世凯任命高凌霨督办改组各省银行及推行纸币开办金库事宜，并由高松如会同办理。

△　参议院讨论宪法起草会章程议案，赞成反对各半，旋由议长加入反对一票，此案遂未通过。

△　国务院以福胜招募胡匪4000名，图夺取黑龙江省为根据地以为库伦之保障，并煽惑军队，暗杀要津人员，是日密电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自即日起在黑龙江全省戒严。

△　孙中山出席日本外务大臣牧野之午宴，并访松方，请其协助订立中日商业条约。

△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抵广州，广东都督胡汉民设宴欢迎。旋胡访梁商谈要政：一、整顿税源；二、整顿盐政；三、琼州开埠；四、维持纸币；五、建设大学；六、办警剿匪；七、安置军队。

△　全国禁烟联合会在北京开会。该会由万国改良会中国总会会长、美国人丁义华发起，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会间议决禁烟事件12项。6日闭会。

3月5日　　直隶都督冯国璋以上月28日北京《中国报》蔑称其与

倪嗣冲上表劝进，请袁总统改为君主，以成子孙万世之业，是日通电宣布提起诉讼，与该报主笔严重交涉，并呈请袁世凯饬部彻究，按法惩办。7日，倪嗣冲亦发同样内容之通电。

△　俄公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对北京政府在东三省、新疆等地调兵设防、购置军械等事横加干涉，并威胁云："设中国政府不及早设法阻止，则将来俄国同等办理，双方均无利益。"10日，继续开会，陆徵祥对俄使干涉中国内政之蛮横举动未敢予以严辞驳斥，仅谓："黑龙江添兵不过两千余人，购买军火并无其事。"

3月6日　上午，孙中山自东京抵横滨。下午，在国民党横滨支部欢迎会上演说"政党与政府之重要关系"。

△　驻日公使汪大燮电告外交部，日本首相山本对华政策与桂太郎不同，鼓吹中日联盟，以厚东亚势力。

△　天津矿务会举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会长。

△　国务院法制局聘日人有贺长雄为顾问，是日抵京。

3月7日　稽勋局通告北京及各省大学、专门、高等、中小学校"嗣后对于烈士后裔及革命出力人员贫苦不能自给者，持有本局证书，一律免收学费，按其程度分配何校何级，但学校以国立及各省官立为限"。

3月8日　孙中山抵名古屋，出席名古屋市长主持之欢迎会。

△　库伦当局聘俄陆军高级士官可路司笃哀为蒙军指挥教练，并订聘约10条，约中规定予可路司笃哀"以调用各盟部军队全权"。

3月9日　宋教仁于7日抵南京后，是日国民党宁支部开欢迎会，到3000人。宋发大政演说：政体主张单一国制，实行责任内阁，省行

政官民选，省为自治团体，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政策方面主张整理行政，划分中央地方之行政，整理财政，开发产业，振兴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振兴教育，统一司法，运用外交。

△　浙江省议会分别电国务院、参议院，谓谘议局章程非现行法律；政府忽以命令修改通行，违背约法，蹂躏民权，应请弹劾取消。同日又电各省参议会请协电力争，始终坚持。

△　山东都督周自齐密电北京政府称，德国派兵1300人来驻青岛，并调来巡洋舰八艘，请向德使交涉。

△　驻俄公使刘镜人电告北京外交部，俄政府与哲布尊丹巴暗相勾结，允派俄兵五万，助其对抗中国。

△　晚7时，云南剥隘驻军因欠饷全营哗变，先砍电线断绝对外之联系，随即毙伤哨长及管带，出营抢劫各商号，天明转入广西境内。

3月10日　参议院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议长于宣告延会之前，宣读袁世凯来文两件：一、增加盐价议案；二、中央学会选举参议院议员章程案，请诸议员务于12日一律到院公决。

△　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国务院提出生利政策四端：一、开辟商埠；二、推广路政；三、开采矿产；四、采伐森林。请外交、工商、农林、交通各部总长极力进行。

△　孙中山抵大阪，出席大阪市长主持的大阪市民欢迎大会，发表演说盛赞日本40年之进步发展，并望日本援助中国。

△　宋教仁自宁抵沪。12日在沪演说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划分之政见。

△　国民党赣支部公举贺国昌为支部正部长，唐国仁为副部长。

△　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德商捷成洋行签订借银20.4878283万两合同，以中国银行为担保，用于购置军械及栈租。

△　德公使哈豪森照会北京外交部，要求两事：一、准德人筑自胶沂经莱芜至济南铁道；二、德商有开采该路附近30里内矿产权。

3月11日　　赣事查办使王芝祥电北京政府称，此次江西拒汪风潮，实因汪瑞闿非赣人，众意不愜，并非李烈钧违抗中央命令，破坏军民分治，排斥汪民政长；并荐乡望素孚之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袁于是日复电照准，并颁布任命令。

△　驻迪化俄领照会新疆都督杨增新，无理阻挠新疆军队驻防萨克赛河。杨接得此照后，于12日急电袁世凯，请饬外交部严重交涉。

△　美国人穆德在上海召集外籍基督教传教士开会，到130余人。议决："为了保证名符其实的占领，传教军队的每一种武器都应得到巨大的补充。我们最伟大的责任，是训练将成为信仰基督教的中国领袖的中国男女。"会间并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会后大批美籍传教士接踵来华。

3月12日　　《民立报》发表宋教仁对该报记者之谈话，略谓宋表示希望黄（兴）、唐（绍仪）二公当选正式政府总理。

△　内务部通令各省民政长，禁止父母强迫子女为僧尼及官吏强迫僧尼还俗。

3月13日　　孙中山抵神户，在神户华侨全体欢迎会上演说，号召全国同胞"以爱身爱家之思想，合而爱国，则我国之富强，对内对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

3月14日　　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电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已发出紧急剿捕宋教仁之命令。谓："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　孙中山自日本广岛电袁世凯，陈述对大借款意见，略谓大借款关系外交与将来承认民国问题，资本团如此要挟，目前无妨停顿，惟不可遽行宣告决裂。

△　长沙成立孔道会，举舒礼鉴为会长。

3月15日　国民党本部通电宣布，晋支部长阎锡山政务繁重，兼顾不遑，擢选温寿泉接任，并称该支部无脱党情事，晋议员亦无一人脱党。

3月16日　袁世凯再电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独立，免受异族之灭亡”。

△　广东都督胡汉民召集粤省军事会议，议决10项，其要旨为：征库、征藏同时并举；粤省先备精兵二旅候令出发；请饬陆军部速定各省进兵事宜，通告全国。

3月17日　日本政府以辽东半岛租期将满，要求展期20年。是日，驻日公使汪大燮将此事急电北京外交部请示办法。

△　德公使哈豪森照会北京外交部，谓两国政府前曾有约合资修筑胶沂铁路（今山东胶县至临沂），今中国无力兴修，德国当实行约中所订下述二条：一、独资修筑胶沂路；二、该路附近30里内之矿产德商得自由采之。陆徵祥当即照复德使，告以此项条约应在修改之列。

△　蔡锷电告北京政府，暹罗（今泰国）派代表来省，力邀同盟，以保东亚大陆，请示遵行。

3月18日　宋教仁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发表演说，略谓：“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吾党现今应有之党略，亦当依此方针，以谋稳健之进行。”

△　各省军事代表在总统府开会，议决改组全国军队，减为34个师，规定大省2师，小省1师，边疆大省可增至14师；每连兵额平时126名，战时可增至170名，由退伍兵员内选充。

△　由各省都督发起组织之研究宪法会在北京成立，举杨度为会长、马良为副会长。该组织对外标榜“系纯粹学会性质”，“与政治无关，并不承何人意旨，不受何人质问，其范围仅止研究二字”，其实乃袁世凯御用机构。

△　各党议员开会讨论大总统之选举法，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均主以得票三分之二为当选，国民党提出以得过选举人半数者方为当选。

△　美总统威尔逊发表宣言，声明美国政府不再委托美国财团参加六国银行团对中国之借款。19日，美国财团正式通知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及北京政府，声明退出六国银行团。

3月19日　　袁世凯通告“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国议会开会礼”。

△　国务院将袁世凯交来徐绍桢“请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以孔子”呈文一件，转发各省民政长，令就此事“筹议呈复”。

△　袁世凯就湖北商人裘平治等17人上书请“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事，发布通令宣称“本大总统受国民托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荡涤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特饬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猖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

△　袁世凯令准兼署教育总长刘冠雄辞职，特任农林总长陈振先兼署。

3月20日　夜10时45分，宋教仁自上海乘车北上，在沪宁路上海

站遇刺，伤要害。入医院后，自分必死，遂立即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内中有云：“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　内务部接陆军部转来袁世凯指令：为防止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即转饬各报馆，“对于外交、军事秘密事件一律不准登载，违者按律严惩”。内务部旋责成京师警察厅将此令转知各报。21日，该厅发布通告，决定自即日起实行新闻检查。

3月21日　黄兴电袁世凯、国务院、参议院，报告宋教仁遇刺经过及住院治疗情形，并告“当场凶手窜逸，未及捕获”。

△　袁世凯接宋教仁遇刺电后，电复假意慰问，内中有云：“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同日，又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交涉使陈贻范、上海县知事及沪宁铁路总办，令“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并派陈贻范及上海县知事前往医院“慰问”，以掩世人耳目。

△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电袁世凯、国务院，报告宋教仁遇刺；同时并电上海县知事及南北警察局长等，应一体严督探警侦缉，务期必获。

3月22日　晨4时47分，宋教仁不治身死。黄兴随将此耗电达袁世凯、国务院及参议院。

△　孙中山自日本长崎电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痛悼宋教仁，“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

△　国民党本部为宋教仁逝世特开职员会，议决定于30日开追悼大会；通电各省支部抱定本党政见，继承宋教仁未尽之志；并举代表

四人谒袁世凯，表明本党对宋案之态度。

△　黄兴、陈其美致函上海总巡捕房，悬赏银一万元，缉拿宋案正凶。

△　黄兴以迭接都中诸友来电，殷殷垂询宋案真相，特致电北京《民主报》主持人仇蕴存，说明宋教仁被刺身死经过情形，“乞登报章，以慰哀感”。

△　袁世凯得宋教仁死讯后，再佯饬程德全、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随后复以“疏忽过甚”罪名，令国务总理赵秉钧、交通总长朱启钤“将沪宁路总办、站长及巡警人员分别议处”，“悬赏缉凶”，并令赵、朱二人“分饬各铁路局及沿路巡警局，于国会各议员暨各政党重要人物来京时，特别加意保护。勿任再有疏忽，滋生意外事端”。

△　国民党本部代表吴景濂、张继、殷汝骊、张耀曾面见袁世凯，要求追查宋案正凶。袁表示将责成苏督严拿正犯。

△　国民党东京支部急电北京参议院，请严缉宋案凶手，谓“勿论凶手何人，恳严彻办，以杜危机”。

△　《不忍》月刊在上海创刊，康有为作序，谓民国成立后，“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此所以为不忍杂志耶”。该刊以宣扬尊孔读经为惟一职志。

3月23日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宋教仁殡仪，由医院殡殓移往湖南会馆暂行厝葬，伍廷芳等数千人送殡，党员1500人执绋，沿途

10余里，道旁观者男女老幼万头攒动。黄兴、陈其美在会馆前迎候，行礼致哀者络绎不绝。

△　上海英法二租界捕房据可靠线索，逮捕宋案同谋犯应夔丞。次日搜查应宅，于宅内捕获刺杀宋教仁之正凶武士英（即吴福铭），并搜得密谋刺宋之确凿证据多件，由此谋杀宋教仁之凶犯乃尽行暴露。

3月24日　袁世凯任命胡万泰为安徽陆军第一师师长；黎天才为江南留鄂陆军第一师师长。

△　参议院吴景濂等72名国民党议员为悼念宋教仁，电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并转黄兴，表示“贯彻吾党主张，确定共和之宪法，借慰英魂于地下”。

△　库伦蒙军进犯大王庙，与驻当地新练骑兵一团战于距该地60里之锡林郭勒河。是役因团长沈某调度失宜，几全军覆没。幸赖援军大败蒙军于距经棚（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40里之沙托子，始挽回战局。

△　浦口承揽搬运之民生公司强行开除两班湖北籍工人。工人不服，前往公司理论。公司即电浦口路局调派警兵镇压，枪杀工人两名，刀伤并拘捕多人。

3月25日　孙中山在日本获悉宋教仁遇刺身死，是日返抵上海。当晚与黄兴等党内领导人商讨对策，“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袁排斥之”，计划由参议院预期集会，提出弹劾袁世凯案。

△　上海会审公堂对宋案初步审讯，主使犯应夔丞狡赖，凶犯武士英供认不讳。

△　江苏都督程德全应黄兴电邀由宁抵沪，督率各员亲自办理宋

案。27日，江苏民政长应德闳亦赴沪吊唁，并会同程德全办理宋案。

△　驻湖北樊城第二十一团一、二两营士兵，因被裁撤，要求发饷一年，团长不允，遂于夜间9时哗变，放火劫掠，后被该团第三营协同驻襄阳第十八旅驱散。

3月26日　袁世凯任命张謇督办导淮事宜。

△　宋案主使者、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离京出逃，袁世凯命令拿捕。30日，洪犯在青岛为德租界工部局拘留，次日取供后释放。

△　日公使伊集院彦吉访陆徵祥，称奉日政府令，要求详订东三省地方条约，并面交日方草拟条约六款："一、黑龙江一带为中日公认商民同利之航路，不准他国同沾利益；二、东省地方办理新政及垦务须向日本借款；三、沿南满铁路线内及由长春至大连租界内所管地，须永远租借；四、限制南满中国军队；五、日人在奉游学及游历须切实保护；六、宽甸、怀仁（今桓仁）、通化、临江四县内二十余处矿产归日人开采。"

3月27日　国务院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录宋案要犯应夔丞23日函及该函所附《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宣告文"除指明暗杀宋教仁外，并将梁启超、孙中山等各方重要人物均列为暗杀对象，要求各省密查防范。

△　参议院开会议决两案移送政府公布：一、通过铁路总公司条例案；二、省议会暂行法。

△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宴请国会议员，孙中山即席报告访日观感，讲述中日关系。

3月28日　袁世凯据稽勋局呈请，批准优恤宋教仁，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

△　赵秉钧谒袁世凯，谓现在宋案外间竟有人疑彼主使，彼万难缄默，拟即辞职往沪与凶手对质，以期水落石出。袁予以劝慰。

△　达赖自1912年底胁迫驻藏办事长官钟颖撤离拉萨移驻靖西后，复以兵力逼钟离藏。是日，钟被迫再移往中印边境之那当，旋至印度噶伦堡，复遭当地政府驱逐，5月15日抵印京德里。6月1日，钟接国务院转达袁世凯令，着其“回国听候查办”。6月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钟颖遂于6月6日将印信交陆兴祺，旋即离印返国。

3月29日　工商总长刘揆一离京赴沪吊唁宋教仁，并会商身后事宜。

△　河南警察厅长严觐光呈都督张镇芳，告以白朗军从确山窜至桐柏、泌阳、确山之界山谷，被泌阳、信阳两军夹攻，复窜入石磙河（距确山县城60里），驻确山城外第八镇陆军步队二连奉命连夜开拔往剿。

△　俄公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再次无理干涉北京政府在中国边省添兵布防，并威胁云：“本国对于此事异常郑重，中国果有征蒙之举动，本国便不能不视之为两国之争端。且贵国边界军队不啻公然预备战事。本大臣敢断言，本国政府不能不有相当之预备也。”

△　外交部接库伦电称，若中国政府欲库伦解除《俄蒙协约》，须履行下述条件：一、库伦政府永久保存；二、中国不遣官吏干涉蒙事；三、中库各遣代表订立专约；四、双方军队自行撤回；五、中国政府不得阻止库伦向外国借款；六、库伦政府自行委任蒙官，中国政府不得干预。

△　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举盛宣怀为总理。

3月30日　　孙中山电请袁世凯与北京外交团交涉，宋案收回自办，勿在上海会审公堂审问。

△　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到者千余人，吴景濂、张继、林述庆、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孙毓筠等均与会。吴景濂宣布开会主旨，指出宋教仁之死，非独国民党死一理事，实中华民国死一伟人；宋为政见而死，“吾辈当继先生未尽之志，庶先生虽死犹生”。李肇甫陈说宋之历史。赵秉钧派代表王治馨出席大会，谎称洪述祖系个人主动，大总统、赵总理“毫未预闻”，并将洪来电及应氏电文交吴景濂存查。

△　国民党横滨、神户两支部分别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4月3、6两日，东京、大阪两支部分别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

△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接署名“混同党支部”恐吓信，警告“宋案不事深求，彼此均存颜面”，“万一颜面竟破，转瞬兵端即见”。

3月31日　　宋案在上海会审公堂进行第一次预审，观审者极众，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延请德雷斯与哈华托两大律师承办此案，主使犯应夔丞、凶犯武士英委请爱理思、沃沛、罗礼士三律师辩护。应、武两犯被押送至公堂，公堂正会审官、关谳员与驻沪英副领事宣读应夔丞运动王阿发谋刺宋教仁及唆使武士英行刺宋教仁案，旋被告律师要求延期两周审讯，经辩论后改订于4月4日审问。

△　袁世凯公布《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凡13条。

△　驻北京外交团，就宋教仁遇刺逝世，向中国政府表示哀悼。

3月下旬　　党人宁调元在沪会见孙中山、黄兴，力言东南各省已趋一致，袁世凯自绝于民国，建议迅速举兵，北定中原。

是月　　王锡蕃等在山东济南发起组织孔道会。8月20日，王等上书袁世凯，力言成立该会之必要，并请袁“鼎力维持”。9月12日，内

务部批准该会立案。

4月

4月1日　袁世凯公布《行政执行法》，凡11条。

△　袁世凯加班禅“致忠阐化”名号。

△　国民党鲁支部在济南开追悼宋教仁大会，会上党员相继演说，礼毕读哀词。

△　梁启超在《庸言》半月刊第一卷第九号发表《暗杀之罪恶》一文，为宋教仁被刺表示“哀愤”。称颂宋教仁是“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指出“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

△　《言治》月刊在天津创刊，由北洋法政学会编辑。

△　葡萄牙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提出澳门划界事以光绪十三年（1887）所订两约为条件：一、中国承认葡人有永居权；二、葡人不得中国许可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

4月2日　袁世凯公布《省议会暂行法》，凡五章41条。

4月3日　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偕国务院秘书程经世奉政府委托至山东交涉洪述祖回京归案。5日，言、程抵济南晤鲁督周自齐，始知洪已为德人拘留。8日，言、程在青岛往见洪，促其回京，为洪所拒。

△　午后6时45分，南京、上海均发生较强地震；7时，镇江地震，倒塌房屋甚多。6日午后6时许，地震波及苏州、松江等地。8日午后5时，扬州亦震，倒塌房屋数处。

4月4日　　宋案在上海会审公堂进行第二次预审，观审者数千人，凶犯武士英供认行凶系一人起意，一人行动；又谓“宋教仁要做国务总理，所以我要刺他”。

△　各省军事会议代表在北京发起军界回袍会，是日开成立会。

△　直隶都督冯国璋遣代表沈瑞麟与比利时证券银行及安华士银行签订借款50万英镑合同，以直隶省烟酒税为担保，用于该省行政费。

4月5日　　宋案在上海会审公堂进行第三次预审，双方律师互辩，原告律师请公开搜查所得之电报密码、往来电报信件及手枪等各项证据，英副领事以此事关系政事，须请命于领事团，辩论未决。

△　中央佛教会在北京开成立会，到者千余人，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多致祝词，各部总次长等亦多派代表往贺。

4月6日　　袁世凯调其驻彰德嫡系部队入京，为选举正式总统时进行弹压之用。

4月7日　　宋案在上海会审公堂进行第四次预审，证人王阿发供认受应夔丞之雇刺杀宋教仁，并谓应说“办到手，可得一差事，并得洋1000元”。

△　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归附民国后，旋与俄、库阴相勾结，谋复亡清，是日潜抵库伦。

△　德公使哈豪森自3月17日向外交部提出准德国独资修筑胶沂路等无理要求遭拒后，继又强行要求四事：一、德国在山东得修筑四处铁路；二、中德合资开采胶州矿产；三、中国不拘何地均应准德人自由航行；四、德侨在中国内地得自由营业。经国务会议否决后，是日外交部以“有损国权，碍难照准”复之。

4月8日　　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在北京开会，到会议员682人，其中参议员179人，众议员503人。袁世凯委梁士诒送颂词到会。按照《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临时参议院于同日宣告解散。

△　巴西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此为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始。9日，国务院、教育部分别通告各官署、学校，于12日悬中巴两国国旗志庆；各校并放假一日。

△　国民党赣支部在南昌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到千余人，支部长廖国仁宣布开会宗旨，俞应麓等演说，表示决心继宋教仁之志，前仆后继，百折不回。

△　日军300余名借口保护日商，强行进驻延吉。

4月9日　　宋案在上海会审公堂进行第五次预审，讯问证人王阿发、吴忠华及主使犯应夔丞。

△　袁世凯召见九江镇守使戈克安，面询江西情况。

△　秘鲁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　上海《中华民报》发表题为《强盗政府》社论，揭露袁世凯政府“日以杀人为事，其行为无殊于强盗”。社论着重指出：“强盗政府一日不仆倒，则共和即将断送。……袁世凯乎，实为全国人民之公敌也，手不操戈矛之大盗也。共和政治之能在于中国否，当视此大盗之能驱除否。”

4月10日　　袁世凯公布《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法》，凡四条，其中规定：“西藏参议院及众议院议员之选举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西藏之选举监督以蒙藏事务局总裁充之”。

△　财政、海军二部经德商瑞记洋行与奥国下奥证券公司分别签

订借款120万英镑及200万英镑两项合同。此项借款名为订购舰艇，实乃济北京政府穷蹙之开支。

4月11日　宋案在上海会审公堂进行第六次预审，讯问应夔丞与武士英、王阿发之关系及有关“毁宋”等电文之何指，应仍未供认犯罪事实。

△　袁世凯以其御用报纸《国报》刊载诬陷黄兴、柏文蔚、李烈钧造反消息，是日故作震惊，佯指该报“情词荒诞，任意造谣，淆惑众听”，令内务部“饬查根究，以靖人心”。

△　外交总长陆徵祥就买卖城（今阿尔丹布拉克）华商屡遭俄人驱逐事，照会俄公使库朋斯齐，谓此举实有背于1860年11月14日所订之中俄《北京续增条约》，要求从速制止。

△　福建民政长张元奇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100万日元合同，以泉州、沙埕等五地常关收入年额30万元为担保，用于福建省行政费。

4月12日　宋案在上海会审公堂进行第七次预审，被告律师辩护被告为“政治犯”，应在租界内特设法庭讯理，不得移交与反对党之公堂。原告律师则认此为暗杀案。至移交事，经关谳员与英领事商议，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

△　国民大学在北京开学。黄兴继宋教仁为校长。是年秋，该校与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更名为私立中国公学大学部。

4月13日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假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到会者约三万人。黄兴因病未出席，追悼会由陈其美代为主持。会上发言致悼者有居正、徐血儿、吴玉章、于右任、沈缦云、伍廷芳、马君武等30余人。追悼会至午后5时许结束。17日，该交通部复于南市新舞台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到者5000余人。

△　国民党奉支部在沈阳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到3000人。同日，国民党晋支部亦开会追悼宋教仁。

△　中日国民同盟会奉天支部成立。参与成立会者，日方有驻奉天领事、三井洋行经理、南满铁路日本工程师等；华方有奉天交涉使、省议会议长、商会会长等。

△　英公使朱尔典邀美、法、德、日、俄、墨（西哥）、比、瑞（士）、奥、葡各国公使开会，讨论承认民国及借款两案。各使赞同英使意见，俟正式政府成立再行承认；借款事美使表示不预闻。

4月14日　　袁世凯据黎元洪9日电，以“潜谋内乱罪”下令通缉湖北革命将校季雨霖、熊炳坤、曾尚武、容景芳，着就地“组织军法会审”，将季等“先行褫职，归案查办”。

△　黎元洪以共和党理事长身份在北京公宴该党国会议员，到300余人。梁启超发表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之长篇演说。

△　俄公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再次就北京政府往黑龙江边界调兵一事提出质问，并无理要求双方协定中国在东三省驻兵数目。当陆徵祥问及为何俄在北满亦增派军队时，俄使竟谓“并无所闻”，并威胁云：“双方长此争执，本大臣实不敢保将来本国政府无此举动。”陆复告以热河大王庙、公鸡庙等处“到有蒙兵多人，势且内犯”，俄使当即予以否认。后于22日会间又诡称：“外蒙之兵不过抵御中国之攻击，并非内犯”，且再次催迫协定中国在东三省驻兵数目。

4月15日　袁世凯公布《中国银行条例》，凡30条。

△　国民党旅日各支部机关刊物《国民杂志》创刊，以“发扬党纲，阐明平民政治原理”为宗旨。该刊系月刊，在东京编辑发行。国内上海、南京、汉口、衡阳、北京、天津、奉天、大连等地均有代派

处。杂志社社长夏之时，副社长吴作镆，总编辑邓泽。该刊共出四期，7月15日以后停刊。

△　前镇江都督、克复南京首功之林述庆，8日在北京将校俱乐部赴梁士诒宴，归即病，医治罔效，是日夜12时身死。弥留时七窍流血，遍体皆黑。

4月16日　袁世凯召集各国务员及总统各顾问开会，讨论新内阁之组织法，议决请孙中山、黄兴至京，并由梁士诒代表政府向北京国民党领袖转请黄兴组织内阁。

△　汕头国民党机关报《大风日报》发表题为《万恶政府》之时论，历数袁世凯政府结党营私、丧权辱国、排除异己、杀戮党人之种种罪恶，指出："桀纣之世无比横暴，共和之政府甚于黑暗野蛮之专制。"

4月17日　国民党上海分部开追悼宋教仁大会，陈其美主祭，到3000余人，10余人演说，群情愤激，均主严究主名。

△　袁世凯任命陈炳焜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谭浩明为广西陆军第二师师长。

△　山东都督周自齐电告北京政府，德国胶督已讯洪述祖，直认刺宋不讳，并称纯系个人行动，并无政治关系。

△　上海《中华民报》再次发表题为《讨逆》社论，其中列举袁世凯10大逆迹，呼吁全国人民"诛奸讨逆"，"勿任彼逆贼断送共和"。

4月18日　工商总长刘揆一同英商薛福草签500万英镑借款合同，以东北矿产为担保，用于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并创办钢铁厂。

△　由国事维持会发起组织之宪法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举孙毓筠为会长，汤化龙、黄为基为副会长。

4月19日　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洪述祖所发电报中之要件抄录电告袁世凯及国务院，要求将洪犯迅速解沪质讯。

△　自是日起，广西桂林接连三日大风，并杂雨雹，风力之猛为历年所仅见。水东门外泊船毁数百只，文昌门外民房、税卡一扫而空，城内外数十年大树百余株尽皆连根拔倒。内城公廨、寺庙、民房、店屋、石坊吹倒者不可胜计，外城居民死伤尤众。

4月20日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共和党本部开联合会，初步议定三党合并，取名进步党。议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那彦图、汤化龙、王赓（即王揖唐）为理事。

4月中旬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北京外交部，英政府愿将片马归予中国，条件如下：一、扬子江流域不得对他国开放租界；二、准英国于内地开一特别通商巨埠；三、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永归英人充任。是月中旬，陆徵祥对上述条件答复四点：一、扬子江为我国领土，无论如何不得侵占；二、开放内地各口岸作为商埠，须俟交还片马始发生效力；三、聘用税司权自我操，无订立条约之必要；四、如六个月内不将片马交还，惟有请各国公论。

4月21日　驻美公使张荫棠电外交部，美国以宋案发生，决暂缓承认中华民国。

△　英在片马增兵，且拟于该处开筑军用铁路。是日，北京政府分电四川、云南二督，令“从实调查”。

4月23日　袁世凯接湘人章宗翊呈请劝进帝位，即电谭延闿逮办。

△　章太炎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发表演说，对于宋案主张“法律解决与政治解决相扶并进”；“政府宁可受人民堂堂正正之诘责，不宜防川致溃”。

△　夜12时，安徽都督柏文蔚在南京寓所遇刺，未中。

4月24日　国会参众两院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选举正副议长日期等案。

△　刺杀宋教仁之凶犯武士英暴死狱中。

△　国民党皖支部在芜湖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到3000人，咸主张请特别法庭从速宣布证据。

4月25日　参议院开会，到212人，用有记名投票法选举，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

△　新当选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获悉善后大借款之密报，即以正、副议长资格去见袁世凯，打算陈述反对违法借款之意见。袁托故拒见，张、王留书而去。

△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据袁世凯3月22日所发“穷究”宋案“主名”、“务得确情”令，经月余之调查，是日夜将宋案主要证据44件分电袁世凯、参众两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及各报馆。自26日起，各报先后将上述证据悉行公布，舆论大哗。

4月26日　夜，赵秉钧、周学熙、陆徵祥在北京汇丰银行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金额2500万英镑之《中国政府1913年善后五厘金币借款》（即《善后大借款合同》），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为担保。次日凌晨签订完毕。

△　众议院在北京开议长选举会，到550人，投票结果，因无人获过半数票，改期决选。28日，众议院开决选议长会，到543人，仍未选出议长。

△　袁世凯复书张继、王正廷，表示“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并派梁士诒前往解释。

△　宋案主要证据公布后，是日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各省议会、政团、报馆，请“严究主名，同伸公愤”。

△　黄兴就拟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无理阻挠一事电袁世凯，力言组织该庭之必要，略谓“此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即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于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为此请袁主持公道，“维大局而定人心”。

△　黄兴通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申明反对善后大借款，略谓：“今宋案证据已经发表，词连政府，人心骇皇，倘违法借款之事同时发生，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中事……此种举动，兴逆料国民决不承认。敢申忠告，冀幸当局者停止进行。”

△　袁世凯任命孙多森为中国银行总裁。

△　湖北大冶水泥厂前与日本三菱公司两次借款72万日元，因逾期未能归还，是日黎元洪应驻汉日领之要求，将该厂发封抵债。

4月27日　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以善后大借款未交院议擅行签字，是日联名通电全国，指责政府“违法专行”，并呼吁各方“设法挽救”。

△　谭人凤电袁世凯，谓宋案证据披露，人心愤激，“何法维持，希见示”。次日，袁复电承认应夔丞、洪述祖二人确与宋案有关，对“毁宋酬勋”电则表示“最为可疑”。

△　上海民众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内称“宋案铁证披露，涉及二公。望总统务以国法为重，挈同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裁判”。

△　由广东省议会发起之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在天津开成立会，以“联合各省，代表民意，求真正共和，作国会后盾”为宗旨。成

立次日即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

△　全国国民反对借款联合大会在北京散发题为《断送民国之借款政策》传单，其中指出："此种借款为中央政府一种断送民国之险恶政策。其利害影响关系于我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不得不抉发其罪恶，以唤起我全国同胞出而反对之、取消之者也。"传单历举袁世凯借款之阴谋，并呼吁议员"捐弃身家性命，力争废约"。

△　上海欢迎国会团致电参、众两院议员，痛陈该团对于时局之意见，内云：当兹宋案宣布之日，袁世凯非但"不思引罪伏法"，反"公然大借外债，购买大宗军械，嗾使段、冯、张、倪、徐五贼增兵转饷，准备与国民挑战"；并着重指出："袁逆固胆大妄为、奸诈百出者也。……以兵力威吓议员、解散国会、捕戮党人，意中事也。彼时乱机四伏，恐非本团所忍言。"电末恳劝诸议员"惩前毖后，殷鉴事先，速转马首而南，挽回大局"。

△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假张园举行黄花岗纪念会并追悼林述庆，到者数千人，由陈其美主持并宣读祭文。

△　南社社友在北京集会，与会者数十人，议决进行数事：一、设机关部于北京；二、重修《明史》；三、编《南明史》；四、征求太平天国之遗史；五、征求光复以前之殉难者；六、征集民国时人小像；七、征求宋遯初（宋教仁字）先生遗墨；八、编辑《南社》杂志。

△　孔社在北京开成立会，宣称"以阐扬孔学，融汇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为宗旨"。举徐琪为社长；徐世昌、世续、王闿运、赵惟熙、陈昭常等为名誉社长。是日，袁世凯派秘书夏寿田代袁往贺，并致祝词。

4月28日　　袁世凯复电黄兴，为赵秉钧开脱罪责，称"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电中并

诬黄“过于摧抑”司法独立之原则，且影射黄等潜谋“二次革命”。

△ 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通电为其谋杀宋教仁罪状狡辩，略称3月10日以前洪致应各函电，“皆于谋杀无涉”；“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演说”；“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于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又谓应犯3月13日以后致洪各电，“关系洪案，自出于本总理及政府意计之外，且洪述祖虽系内务部秘书，然内务总长于其行政法上之犯罪，虽有怠于督监之责任，于其刑法上之犯罪，则无代为受过之由”。

△ 湖北省议会电北京政府，反对善后大借款。同日并电参议院，请“死力抵抗，勿稍退步”。继之，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安徽、奉天、江苏、吉林、云南、陕西、甘肃、广西、福建、河南、贵州等省议会亦均通电反对。

△ 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电中指责政府借款不由议院议决通过，此乃“蔑视议会”；申明“政府今日之所为誓死以为不可”，要求袁世凯“为国法计，为人心计，立罢前议，以解天下之疑”。

△ 银行团于大借款中首交财政部50万英镑。该部得款后，立拨其中一部分寄张勋及徐宝山，名为军饷及裁兵费，实则为袁世凯发动内战进行准备。

△ 国务院及财政总长周学熙就黄兴26日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事，是日分别通电狡辩。二电均强言此项借款条件上年已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周电并诬黄兴所言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月29日 参议院以善后大借款未经该院通过，“与《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显相违反”，议决无效，并将议决结果通知袁世凯。

△　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电中指斥此项借款“不交国会议决，遽然签字，蔑视国会，违悖约法，丧失主权”，实为“灭国亡种借债”，要求袁世凯“速罢此议”。

△　晚，外交部照会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告以中国政府承认担负大借款之完全责任，将来政府递嬗亦无变更。

△　上海国民党人不顾袁世凯、许世英等之阻挠，径组织特别法庭，并令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杀害宋教仁之主谋犯赵秉钧到案受审。是日赵电复该厅，借口组织特别法庭未经司法总长许可，拒绝到案。

4月30日　众议院举汤化龙为议长。5月1日，举陈国祥为副议长。

△　孙中山同美国传教士柏锡福谈话，不同意柏氏用选举方法反袁之主张，指出“袁是决不肯自行退位而让别人当选为总统的”，并认为“如果发生内战……将以袁的下台而告终”。

△　司法部以“无法律可据”为借口，决定不得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令将该案“归上海地方审判检察厅审理”。

△　北京“国事维持会”发出“保全大局通告”，为大借款辩护，认为借款为时势之必需，而手续之不完，则由临时参议院之放弃职权，不能专责政府。

△　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借口“近来报纸每有非分之记载、图画，攸关国家政事，煽惑攻击公家，过分诽谤责备……似将扰乱治安”，是日发布通告取缔报纸言论自由。

4月下旬　俄公使库朋斯齐照会外交部，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请许俄人在黑龙江有开矿专权；二、居住哈尔滨之华人须纳捐于俄工部局；三、中国军队调往外蒙或通过哈尔滨，须先期咨照俄官；四、凡华人欲搭俄船，亦须咨照俄官领取执照。”

是月　　白朗军300余攻河南禹州（今禹县），守军弃城而逃。白朗军入据禹州，得手枪200余支、车200辆。

△　达赖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一面迭电袁世凯催派代表赴印度大吉岭议商藏事；一面召集藏官及堪布喇嘛开会，议决排汉办法四条："一、由内地来藏之汉人，限半年以内一律离境；二、汉人之为西藏土著者，限一年以内一律出境；三、三十年以内，藏地不得驻扎汉兵；四、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而阻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

△　湖南水灾，是月连降大雨，湘江水位猛涨三四十英尺，江水泛滥，上下游各县均被淹，灾情之重为1906年后所仅见。省城长沙自23日起，接连五日雨雹交作，继以大风，天气奇寒，无异严冬。江内沉船700余只，毁伤数千只。沿江一带水深四五尺，甚者一丈有奇。屋宇尽没，溺毙居民以数千计。城内电报、交通停阻6日。长沙附近所属各乡镇，田园屋宇亦尽行淹没，春秧俱萎，米价陡涨。灾民无以为食，往城内求生者日以千计，流离困苦达于极点。

5月

5月1日　　赵秉钧托病辞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职，袁世凯未准，令给假15日"俾资调理"；国务总理一职令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内务总长一职令次长言敦源暂代。

△　赵秉钧与日本正金银行签订借款八万元合同，用于行政费。

△　袁世凯准兼署教育总长陈振先辞职，令次长董鸿祎暂代。

△　袁世凯以甘肃都督兼民政长赵惟熙病假3月，令张炳华护理。

△　黄兴就4月28日国务院、周学熙分别通电为违法借款辩解事，再次通电指斥政府"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雠"，并严诘："倘以此

激动民心，酿成巨变，责将谁负？”6日，财政部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及省议长，对黄电所疑各节有所说明。

△　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电中指责北京政府此举乃“蔑视约法，弁髦议会”，粤人“誓死不认”，要求“立罢前议，勿失人心”。5日，再发通电，内称“正式参议院既经议决签约为无效，则尤无发生效力之理由”，并警告袁世凯“服从民意，立罢前议，勿使激成巨变”。

△　湖南都督谭延闿为宋案致电袁世凯，要求“厉行前次‘严稽主名’电令，迅饬组织特别法庭，秉公讯判，按律惩治”，并吁请参众两院、各省行政立法机关“主持公道”。

△　上海社会党、自由党、工党等团体为宋案、借款两事召开全国公民大会，到三万余人。大会首先宣布袁世凯三大罪状：一、暗杀国民党领袖人物；二、将以兵力蹂躏共和；三、擅借2500万镑外债，不待国会通过私令签押。继通过决议五条：一、要求国会即日提出弹劾袁世凯、赵秉钧案，令袁、赵即日去职受法律裁判，由副总统代行临时总统职权；二、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资格；三、不承认未经国会通过私行签押之大借款；四、各省暂行停解中央款项；五、各地不奉行中央所发之军事乱命。旋将此决议分别电告北京参众两院及各省，请协力进行；并另电袁世凯、赵秉钧，令其“即日解职候审”。会后，各团体组成固定机构，定名全国公民会。10日，公布会章，宣布以“巩固共和基础，扫除共和障碍，力谋国利民福”为宗旨。本部设上海，并拟于各省设立支部。

△　总统府秘书厅以4月29日北京《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所载评论宋案文章中有“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及“民贼独夫”等字样，是日特致函内务部，请对上述各报“严重取缔”。内务部当即通知各省都督、民政长及京师警察厅，令警告京内外各报馆，倘再故违，即行取缔。

△　中国社会党在上海举行“五一”纪念会，到500余人。社会党代表江亢虎，中华民国工党代表沈卓吾，自由党代表梁悦魂，蒙事演讲团代表及英国工党党员查克逊等均在会上发言。

△　《中华实业丛报》在上海创刊。该刊由吴稚晖、王幼安编辑，专事鼓吹实业救国。第一期《本报宣言》中指出：“凡强国所以致此者，其原千条万端，而悉归于实业。……实业者，得之则利重于丘山，失之则祸在眉睫，此本社丛报编纂之所由。”

5月2日　　袁世凯咨请参众两院，迅速选举正式大总统。略谓：“今正式国会完全成立，自此以往，临时之事业将终，正式之时代开始。深望国民代表，迅速选举正式大总统，以谋全国人民之福利，而固民国新造之宏基。”

△　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同日，墨西哥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　袁世凯令准财政部所拟《金库条例草案》12条，并令“由部通行各省，先行试办”。

△　众议院议员陈鸿钧、邹鲁、陈垣、谷钟秀等40余人，就政府违法借款事，对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提出弹劾。

△　孙中山自上海致电英国友人康德黎，请代发英文《告各国政府与人民书》。该文告揭露北京政府向五国银行团协议2500万镑借款之阴谋，指出政府此种独断与非法行为，加深了人民因宋教仁被刺案而起的义愤，如果银行家们向北京政府贷款，使其可能用于掀起内战，势必给人民带来灾难与痛苦。吁请各国政府与人民施加影响，以阻止银行家们供给北京政府以金钱，俾免其发动战争。次日，伦敦《每日邮报》发表孙中山《致各国政府与人民书》。

5月3日　　袁世凯借口4月29日路透社报道“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捐助筹饷，反对中央”，及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

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是日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饬各地方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

△　袁世凯发布通令，诬各方对宋案及善后大借款之强大舆论为“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令各省都督、民政长“通行晓谕”，不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

△　袁世凯就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李烈钧反对大借款通电事颁令特将大借款详情宣布大略，强言该案早经临时参议院通过，“政府对于此事，自问于约法毫无违反”；并诬胡、李通电“淆惑观听”。是日，国务院将此令电达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

△　袁世凯咨参众两院，请速选举正式总统。

△　中国社会党致电黎元洪，提出：“本党以宋案属法律问题……无论是非曲直，政府与人民均无应用兵力解决之理。”

△　广州各界召开大会，反对政府违法借款。会间议决成立拒债救亡会，举张寿荣为主席，并决定设总机关于上海，各省一律设分机关。随即以广东拒债救亡会名义分别通电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政团、新闻团、各报馆，请一致反对借款，“力持大义，共伸公愤”。又电美澳各埠华侨，“请协同电京力争”。同时并电五国银行团，告以北京政府违法借款，“国民决不承认，盐务抵押国民尤誓死不从，幸勿交款”。

△　财政总长周学熙在举国一致反对善后大借款之强大舆论压力下，被迫向袁世凯提出辞呈。袁未准。

△　刺宋主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自青岛通电，为宋案推卸罪责，声称彼与应夔丞之函电“强认为谋杀之证据，殊与事实不符”，并称“毁宋”二字“并无杀字意义在内”。

△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因天津《新春秋报》指斥袁世凯为“杀人卖国贼”，是日串通地方检察厅，借口该报“妨碍治安”，票传经理人到厅审讯，并拘捕卖报者数人。5月11日，更将该报封禁。

△　福建莆田农民武装——兴化民军攻占仙游。县知事、都司等均逃匿。该军入城高揭“官逼民变”旗帜，出示安民，令商家照常开市，居民完纳本年钱粮后蠲免三年。富户则须多捐助饷。19日晨，莆田驻军会同泉州、漳州驻军合攻仙游，农民军奋勇御敌。午后1时许，北门陷。农民军开西门突围出。官军入城后大肆屠戮，阖城尽遭血洗，十室九空。

△　古巴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5月4日　　黎元洪通电全国为“宋案”及大借款案辩护，略谓：刺宋一案，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加人以犯罪之名，先自居于违法之实；至借款一事，乃参议院通过，当责议院以丧权，不能罪政府以违法；主张“借款之案，稽之于议院；刺宋之案，诉之于法庭”。

△　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全体在津代表议决，是日由天津迁往上海。

△　广西参议院议员选举办理违法，内务总长呈请下令全体改选，是日，袁世凯为此发布命令二通：一、该省行政长官陆荣廷称病不能莅会，责成该省内务司长代理选举监督；二、定于5月10日举行改选。

△　沪上名流岑春煊、伍廷芳等10人致电袁世凯、参众两院、国务院、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省议会、各政团、各报馆，发表对时局四点主张：一、宋案词连政府，赵总理既涉嫌疑，届时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二、借款必须通过议院，否则亟应设法取消；三、制造宪法为国会完全独立之责，政府不得干涉；四、“议论贵乎正

确”，望各报“凭诸公理，按诸事实，毋为不经之谈”。

△　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驳斥国事维持会4月30日“保全大局通告”，谓“该会不以政府奇秘借债为破产亡国，反对参议院全国所争为破产亡国，倒行逆施，至于此极”。

△　南昌各党团为宋案、借款事召开公民联合大会，到5000人，会上通过与5月1日上海全国公民大会内容大体相同之决议。并电北京参众两院及各省，请协同力争。

△　国民党员、工商总长刘揆一借调和党争为名，集国民、进步两党党员30余人组织相友会，是日在北京开成立会，刘自任会长。

5月5日　　众议院开会，代总理段祺瑞出席答复质问，向议员表示“政府对于此借款手续实欠妥协，而其不得已之苦衷，尚乞诸君曲为原谅”。经过激烈辩论，以政府违法借款，决定将政府送达该院有关大借款之咨文退回，以示否认。6日，进步党议员出而阻挠，设法将此项决议推翻。7日再付表决。该党议员竟中途退席，使众议院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表决，以至咨文未能退回。8日，参议院于表决退回该项咨文时，亦因进步党议员阻挠而无结果。10日、12日再付表决。该党议员复中途退席，使参议院亦未能将该项咨文退回政府。

△　众议院开特别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送参议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

△　袁世凯令李纯所部第六师自保定移驻信阳。10日，再令该师进驻武昌。

△　国民党议员景耀月、孙毓筠等集国民、进步两党党员80余人组织政友会，是日在北京开成立会。宣称以“讨论政务，统一政见”为宗旨，并订会纲七条。会员中国民党人占五分之三，进步党人占五分之二，举景耀月为会长，于右任、彭占元为副会长。

△　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指出："宋案证据宣布，词连政府，有以巨金资助凶手之语，全国汹汹，方虞震动。今复不经院议违法借款，人心一失，窃恐虽有大力，无以善其后。应请大总统立罢前议。"并吁请各方"协力抗争，毋使民国因借款而亡"。

△　汉口国民大会为宋案、借款事召开特别大会，到5000余人。会上通过与上海全国公民大会内容大体相同之决议。

△　云南都督蔡锷、民政长罗佩金联名通电，主张迅速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彻底穷究，按法惩办"。

△　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盐商致电国务院，反对以全国盐税抵借外款。内称："盐为全国命脉……倘照条件所订，产盐省分设稽核分所，派华洋员协理，何异断送四百兆生命于彼手。……望从速改议。"

△　山东都督周自齐通电拥护大借款，略谓："政府履行参议院通过之案，乃外间竟有违法私借之言。苟非别有深心，定是故为高论。"

△　袁世凯聘美国人古德诺为宪法顾问，是日抵京。

5月6日　　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秘密会，为发动内战进行军事部署。其第一期总方略为："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京汉方面，对于湘、赣、皖取攻击目标"，以北洋第六师一部驻武汉三镇，为攻赣主力，河南第一师、毅军赵倜部、北洋第二师为预备队，另将倪嗣冲部及雷震春禁卫军一部集中河南郾城，以贾鲁河为补给线。并将黎天才第一师一部及雷震春禁卫军一部调驻湖北荆州（今江陵）、新沟、蔡甸（今汉阳县）一带，借以防湘。"津浦方面，对于苏宁取攻击目标"，以北洋第五师及张勋部为主力，北洋第四师为预备队，

以徐宝山部“为扰乱苏宁内部之牵制队”。此外，并拟将预备征蒙之何宗莲部经海路调粤，将福建驻军一部调沪，“如不可恃，则以驻西陵、南苑、定州等处第三师之一部充之”。

△　上海地方检察厅以“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均涉宋案嫌疑”，是日再发传票二张，函送北京地方检察厅请代传归案。

△　九江各界为宋案、借款事召开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赵秉钧。到8000余人。大会议决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请即提起弹劾，勒令袁、赵解职，并否认借款”；又电五国银行团，申明：“袁世凯私借巨款，不由国会通过，此等不法行为，民等死不承认。”

△　万国改良会会长美国人丁义华3日自北京致电孙中山、黄兴，对于宋案、借款二事极力袒护袁世凯，并影射孙、黄欲借此造成南北分裂，争权夺利。是日，孙中山、黄兴联名电复丁义华，就来电中恶意影射痛加驳斥，并揭露反动当局对宋案“强自辩护，不谋正当解决之法以平公愤”，对借款“不交国会议决，擅行签押”，望丁义华“能研究真相，发为正论”。

5月7日　　袁世凯以风闻有人潜谋内乱，难保无煽惑勾串军警情事，是日颁令军警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并令行各该管将领官弁严加防范，“遇有借端煽乱之人，应即按照军法尽法惩治”。

△　袁世凯咨文国会，声称大借款合同签字经上年12月27日参议院通过，并说明手续略未完备，未用书面提案，省去三读之经过，并称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望国会曲谅苦衷。

△　袁世凯以宋教仁被刺一案，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是日下令免去洪述祖本官，归案办理。

△　上海总商会就宋案及借款事电袁世凯、黎元洪、国务院、参众两议院，略谓该两案之争议，“致人心静而复动，国家安而复危，

金融尚未流通，贸易陡然阻滞，各埠成交之华物，纷纷函电止退，影响及于中外，危殆情形难以言状”。并谓“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迭据各业团体交相诟责，殊难缄默。务祈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议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民喘息余生再罹惨祸”。

△　外交部照会英公使朱尔典，提议修改1911年中英缔结之《禁烟条件》。

△　俄外交大臣萨沙诺夫密函俄公使库朋斯齐，令向北京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其按《俄蒙协约》原则与俄政府就外蒙问题达成协议。函中并令俄使照会北京政府：“如坚持拖延与俄国达成关于外蒙问题之协议，并继续在蒙古王公中煽动反俄，则俄国将与蒙古政府建立新关系，彼时将于全然不同之基础上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5月8日　　袁世凯向两院发出咨文，要求承认善后大借款，咨文称：“设再迁延，（列强）势必横加干涉，实行监督财政，致陷民国有破产之虞。……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

△　袁世凯下令对湘赣皖粤四督反对政府大借款之通电予以警告。称四督之电“雌黄信口”，“捏词耸听，淆乱人心”，“似此上无道揆，下无守法，人心一失，大命随之，该都督等亦难辞其责任”。是日，国务院将此令电达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省议会。

△　赵秉钧抗拒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并伪造证据，于是日致电该厅，诬陷黄兴与应夔丞有关系，“密与书信来往与银钱来往……煽惑苏浙皖徐军队，阴谋内乱”，并质问“何以黄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则必须质讯”。

△　袁世凯任命卢弼署国务院秘书长。

△　武昌各界原定是日假黄鹤楼召开公民大会，反对政府违法借

款，讵料黎元洪至期竟派武装士兵数百人强占会场，不准开会。群情激愤，遂致函省议会，请提出弹劾，“以伸民权”。

△　华侨联合会自3月8日起至5月8日止进行各埠投票，改选正副会长。是日开会公布选举结果，汪精卫、吴世荣再次当选为正副会长。

5月9日　　袁世凯就上海总商会阳（9日）电，要求“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借口，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开会聚众，散布浮言，潜谋内乱者，立予查拿惩办，以保商民而安市面”。是日，国务院将此令电达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

△　袁世凯通电各省答复上海岑春煊、伍廷芳支（4日）电所陈四事，并谓“诸公在沪言沪，或未悉原案实情，请约同志数人联袂来京，调查正确，必有真知灼见”。

△　袁世凯任命江畬经暂行护理福建民政长。

△　黎元洪电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谭延闿，再就宋案、借款二事为袁世凯开脱，内称：“今日舍借款无救急之方，舍五国无现成之款。……至于宋案，当然由法庭主持办理，政府有无犯罪，司法独立，自有特权”；并谓“项城为救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劝黄兴等勿“市虎杯蛇，疑心暗鬼”，而应“委曲求全”，“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解决，以免举国纷扰”。

△　前参议院议员那彦图、汤化龙、丁世峄等44人为政府违法大借款辩护，称此次善后借款，“确为前参议院通过之件，惟决议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然以参议院先例征之，则海兰铁路借款合同之议决，亦即如此”。

△　天津国民书社开始发行人物评品社所编《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一书。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于27日将该书社工作人员陈中学等

四人逮捕，书亦被禁。

△　俄公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再次催促协定中国在东三省驻兵数目，并进而威胁云：“本国陆军部拟派二师团至满洲，本大臣深不愿此举见诸实行。”

5月10日　福建公民大会在福州开成立会，到数万人。大会分电北京参众两院及五国银行团，申明：“临时政府借债条约未经国会通过，擅以盐税抵押，闽人誓不承认。”

△　《民权报》是日刊载荷属72埠代表钟幼珊、张俊臣等致参众两院、各党派、各报馆电，指斥“袁世凯、赵秉钧擅自签押苛刻大借款，违法卖国”，请“急拒以救危亡”。

5月上旬　蒋尊簋、沈定一、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弭祸会并发表公启，要求袁世凯退位以弭战祸，内称：“本会为保全大局，力求和平，惟有求大总统退位，并矢言不再任总统。……舍此以外，别无弭祸之方、济变之术。”

5月11日　南京各党团联合召开公民大会，反对政府违法借款，到者约万人。

△　天津女学生周予儆被袁党以巨金收买，是日至京畿军政执法处宪兵队“自首”，捏称：“一时受人之愚，投身黄兴所组织之暗杀团，今特自首赎罪”；“暗杀团潜在京、津组织血光党，以图炸毙要人，为颠覆政府、引起暴动之计。”并诬指参议院议员谢持为该党财政长。军政执法处据此诬供，竟于17日晨5时将谢非法逮捕。旋因参议院议长张继等提出抗议，谢于当日获释。23日再度被捕。

5月12日　北京《国风日报》刊载《忠告政府与军警同胞》一文。京师警察厅加该报以“煽惑军警，妨害治安”罪，于当日午后6时派军警宪兵百余名包围报馆，并将该报协理裴梓青、编辑郭究竟及社

员二人逮捕，交检察厅审讯。次日，《国风日报》出白版四页以示抗议，并于头版以头号大字刊登广告一则，文曰：“本报昨因军警干涉，自昼达暮声势汹汹，拘去协理及编辑人，扰攘竟日，不获事事。空白三页，阅者谅之。”19日，该报再出白版二页，头版内载《本报暂行停刊痛启》，宣告自即日起被迫停刊。

5月13日　　袁世凯以据报沿江各省日来颇有以私人资格结社集会，干预军事之举，是日电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认真调查，“如有以私人团体干涉军事，或关于军事之秘密结会者，即行勒令解散。如果有故为宽纵者，惟该督民政长是问”。

△　袁世凯据北京、汉口、上海、苏州等地商会电告，谓有鼓吹反对政府破坏大局，牵动商业情形，是日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查禁谣言，严惩勒捐，晓喻商民，照常营业，并着“各该长官督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

△　袁世凯令李纯加陆军上将衔。

△　袁世凯任命陈钰暂行护理山西民政长。

△　黄兴电复黎元洪，声明对时局之态度，重申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

△　陕西都督张凤翙、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山西都督阎锡山、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等10人，由张风翙领衔发出通电，诬指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欲借此淆惑观听，演出亡国恶剧”。“自今以始，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讹言起难端，以阴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吉林都督陈昭常、贵州都督唐继尧、广西都督陆荣廷、新疆都督杨增新随后亦列名该电。

△　湖南公民团在长沙开成立会，到万余人。会上就宋案、借款事通过决议五条，其主要内容为：“宋案一日不了，袁世凯一日不能行使总统职权，我湖南应不受中央命令，暂时脱离关系；违法借约一日不取消，湖南应停止中央解款，宣告永不负该款之义务”；“宋案如中央政府不允组织特别法院，应由本团联络各省公民共同组织。”

5月14日　山东都督周自齐以济南《齐鲁民报》8日发表《为宋案敬告北方军界同志》社论，指为“有意煽惑”，函令地方检察厅提起公诉，是日强行判决罚金百元，停版七日。

△　俄公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再次催促协定中国在东三省驻兵数目，并进而无理要求“此事至少贵国必须有一公文载明现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驻兵实数，并须担任以后有增添军队，按照条约知照俄国政府。至现在查阅实数，须有一俄国武备随员会同中国官员办理”。

5月15日　袁世凯令陆军部撤销黄兴陆军上将衔，并令“勿庸发给补官证书”。

△　中华实业银行在上海开业。该行系国内资本家与南洋华商合资创办，资本总额600万元，实收四成。总行设上海，分行设新加坡。总理沈缦云，协理吴世荣，经理席缙华。

5月16日　袁世凯准财政总长周学熙给假一月，令该部部务由署财政次长梁士诒（5月11日任命）暂行代理。

△　袁世凯任命饶怀文为南京军官学校校长，郑祖彝为烟台海军学校校长。

△　袁世凯公布《步兵操典》，凡三编390条。

△　北京政府为应付举国反对大借款之强烈舆论，是日由财政部颁发“布告第二号”，公布善后借款合同经参议院通过情形，“俾息污

言，而明真相”。

5月17日　　孙中山致函日人井上馨，望其支持反袁事业，略谓：“……敝国国民与现政府之冲突，自系敝国国内之事，惟有关世界大局者，尚望阁下有以维持之。即如交款一端……苟能限制不许充为战费，则袁氏或不致残民以逞。若敝国之和平可保，则东亚之和平即可保。”

△　总统府秘书厅奉袁世凯令，将各地赞成及否认大借款之来电逐一汇集，“以征舆论”。计自4月26日大借款签字之日起，至是日止，共收来电284件，其中赞成者105件，否认者179件。

5月18日　众议院议员邹鲁、李肇甫、伍汉持等18人，以宋案主谋犯赵秉钧抗拒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久不到案，是日向赵提出书面质问。

△　内蒙各部以库伦当局屡派军南犯，议决练兵自卫，是日将所拟具体办法七条交署绥远城将军张绍曾电达北京政府。

△　福建浦城、建瓯、崇安、松溪等县民众因米荒暴动，抢夺绅富。松溪县民并迫该县知事勒令奸商降低米价。福建都督孙道仁、护理民政长江畲经得报后，非但不设法解决米荒，反于是日及25日迭电内务部并转袁世凯，强诬饥民为匪，请批准“严拿为首倡乱之入，照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5月19日　国务院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解散省议会联合会。省议会联合会置之不理，并未因此令而解散。

△　自宋案、借款两事发生，举国愤激。北京政府为钳制舆论，特令各地报务员不许拍发有关宋案、借款及军队南调之电报。报务员群起反对，是日由上海电报学生会发起，约同上海、广东、汕头等地报务员举行同盟罢工，并声称如政府仍用专制手段禁发电报，则将约

同全国报务员一致罢工抵制。

5月20日　中俄双方于北京就外蒙问题初步达成协议六款，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整之一部分，中国政府给予俄民在蒙古商务利益。该协议于26日经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28日咨交众议院。30日，众议院开秘密会，由陆徵祥就协议条文进行说明。6月3日，参议院开秘密会，段祺瑞、陆徵祥均出席，会间陆就协议条文再度进行说明。

△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机关刊物《国民月刊》创刊。孙中山、黄兴分别为该刊撰写《出世辞》。孙中山在《出世辞》中，勉全体党员“以进步思想、乐观精神，准公理，据政纲，以达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目的”。该刊仅出两期。第一卷第二号于7月份出版，旋即停刊。

△　国民党在《国民月刊》创刊号发表反对政府违法大借款“宣言”及“通告”。“宣言”宣布：“为今之计，虽有政府迅将合同提交议院，本党亦无不力予维持，俾底于成。否则本党惟有终始一致，不承认此违法之签约，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尚存，则一日违法签约之合同即为无效，敢布区区，公诸国人。”

△　白朗在豫南西平、确山、桐柏、泌阳一带活动，舞阳、郾城、西平各地响应，旋又率五六百人进至确山一带。是日，豫南观察使吕调元条陈都督张镇芳，要求派兵往剿。

5月中旬　四川各界为宋案、借款事召开大会，到三万余人。会间议决成立四川公民会，并发出通电，略谓：“借款宋案二事皆系政府违法负我人民，而非人民违法开罪政府。……为政府计，此时既处于被控违法之地位，只宜引咎思过，将当时隐衷布告人民”，若“反诬人民为潜谋内乱”，妄图以此钳制人口，一旦激成众怒，必召大乱。

5月21日　袁世凯令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传语国民党人，

谓："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5月22日　上海地方检察厅电促北京地方检察厅，速提宋案主谋犯赵秉钧及其秘书程经世归案。

△　赣事查办使王芝祥返京，面见袁世凯力陈南方并无反抗中央情形，劝袁对赣、湘、皖、粤四督务持和平态度，以维持大局。

△　共和党甘肃支部田骏丰等，甘肃省议会议员马良翰等，由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代发通电，要求各方对于政府大借款予以追认，"勿使政府两难，处于悲境"。

5月23日　黎元洪串通驻汉口法领事强行限制在法租界发行之汉口《民国日报》。26日，该报遣社员二人往晤法领进行交涉，遭拒，该报乃决定移出法租界发行，社址则仍在法租界。

5月24日　袁世凯任命陈琪为赴美赛会监督，兼充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

△　晨7时许，驻扬州第二军军长徐宝山于宅内被炸身死。30日，袁世凯依段祺瑞所请，准将该军改编为江苏陆军第四师，并任命徐宝珍（徐宝山之弟）为该师师长。

5月25日　袁世凯为促使达赖内向，免犯川边，是日发布命令，责成川边驻军"抚辑番民，保护庙宇，僧俗人等毋得稍致损害。……凡附近各处番人无叛逆显状者，皆不得派兵前往。其各边军队有扰害番民者，准即呈诉。……僧俗人等亦宜各释疑虑，勿得阻兵持众，驱逐汉人，隔绝道路，以期永远相安"。

△　广西都督陆荣廷为大借款辩护，声称"借款问题，绝无反对理

由”，“纵令此案手续微有未具，为大局计，亦应曲谅”。

△　浙江杭州警察厅以5月24日《浙报》刊载《咄咄戒严期内之征兵》消息一条，透露浙省戒严、征兵乃为防止二次革命，遂加该报以违反政府新闻禁令、“捏造谣言”、“煽惑军心”、“有意扰乱治安，居心叵测”等罪名，强令自5月25日起停版三星期。

△　中日国民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宣称以“联络中日感情，图相互之亲善”为宗旨。会长张继，副会长汤化龙、严谷深藏。

△　库伦蒙军七八百名突袭哲里木盟科尔沁旗，大肆劫掠，抢牛羊数百头，占民房数十户，并纵火杀戮，肆意逞凶。后经奉天都督张锡銮派兵征讨，库军不敌，始行回窜。

5月26日　袁世凯任命驻德兼驻丹麦公使颜惠庆为全权代表，前往荷兰海牙出席万国禁烟会议。

△　进步党人张謇准备在南北之间进行“调停”，是日密函同党赵凤昌，请先与南京都督府陈陶遗、江苏民政长应德闳、苏路公司代表杨廷栋及刘厚生“密计手续次序”。

△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据周予儆诬供，指天津《民意报》主任赵铁桥为血光党副会长，是日派军警前往围捕。赵适外出，得免。军警竟将该报馆全部捣毁。《民意报》被迫停刊。

5月29日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经多次宣布合并，是日正式合并为进步党，宣布党义三条：“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人民公意，拥护法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同时公布对时局问题五点主张：“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现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那彦图、汤

化龙、王赓、孙武、蒲殿俊、王印川九人为理事；举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翙、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23人为名誉理事。

△　凌晨2时零5分，中华民国工党领袖徐企文手持书有“中华民国国民军”之白色旗帜，率七八十人攻上海江南制造局，旋被击退。徐等二人被捕，死难数人，余均逃散。次日，袁世凯下令悬赏缉拿为首诸人，并饬“严究党羽，尽法惩治”。6月3日，举事重要成员柳人环及其余12人在江西被捕。

△　前清陕甘总督升允自库伦分别致函新疆都督杨增新及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胁迫二人背叛民国，投靠俄、库。其后于6至9月间，复先后致函甘肃都督赵惟熙、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旅京蒙古王公那彦图、博迪苏、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署绥远城将军张绍曾、署热河都统姜桂题、甘肃陇东护军使张行志、兖州镇抚使张勋等人，请协同推翻民国，恢复亡清。

△　教育部代总长董鸿祎就北京大学预科学生反对升学考试事，向校长何燏时发布指令，命何“查明为首之人，立即斥退”。何燏时接此指令后，即于30日上午将此次学潮中之学生代表八人通告“斥退”，并通知军警入校“弹压”。午后，预科学生200余人齐至教育部，要求面见董鸿祎进行申诉。董借口未举代表，拒不接见。学生遂露宿部中廊下，至31日午后始行返校。

△　工商部咨各省民政长，请各地实力提倡设立贫民工场，俾对无业者教养兼施。

△　北京政府总税务司安格联与日公使伊集院代表中日两国签定《中日朝鲜南满往来运货减税试行办法》六款，其中规定：“凡应税

货物装货车由东三省运往朝鲜新义州以东各地方，及由新义州以东各地方运入东三省者，均应分别完纳海关进出口税三分之二，即较前减税三分之一。”该办法自6月2日起施行。

△　奉天都督张锡銮与南满铁道会社签订借款60万日元合同，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及商埠全部土地等为担保，用于该省军政费。

5月30日　临时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署民政长夏寿康，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冯国璋，奉天都督兼民政长张锡銮，吉林都督兼民政长陈昭常，黑龙江都督兼民政长宋小濂，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浙江都督兼民政长朱瑞，福建都督孙道仁、护理民政长江畲经，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周自齐，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山西都督阎锡山、护理民政长陈钰，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张凤翙，甘肃护理都督兼护理民政长张炳华，四川护理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兼民政长陆荣廷，云南都督蔡锷、民政长罗佩金，贵州都督兼民政长唐继尧，热河都统熊希龄23人，由黎元洪领衔致电参众两院，极言否认大借款之“六危”，略谓“当此公私交困、内外俱穷，舍借款无良方”；若“推翻借款，远患近忧、外争内乱，于势实万无可逃”，其结果必致“政府土崩”，“国会星散”，“国民流离旷野”，“同罹敲精补髓之刑”。电中并将政府违法借款之责，悉诬加于临时参议院“事先之同意”；进而要求反对大借款诸议员“推诚行恕，达变通权，念时局之艰难，加借款以承认”，勿“逞一时之快论，为万世之罪人”。

△　财政部公布《善后借款合同经参议院通过情形纪实》，声称善后借款经民国元年12月27日参议院通过，“当然发生效力”，“政府履行议决之案，是尊重立法，不得谓之违法”。

△　晨，京畿军政执法处派军警百余名搜查北京国光新闻社，肆行骚扰，后无所获离去。该报被迫停刊三日。

5月31日　北京地方检察厅据周予儆之诬供，借口黄兴“组织暗

杀团，谋炸要人”，特将该案移上海地方检察厅，由上海交涉使陈贻范转饬会审公堂“审理”。公堂立出传票，发交捕房，派探往传。领事团以该案“既无切实证据，原告又不到沪质讯，与租界定章不符”，遂令总巡捕房于6月5日将传票退还公堂。

△　汉阳兵工厂工人因该厂总理刘庆恩强以贬值纸币发放工资，举行罢工。早9时，工人2000余由总代表梁世显率领，渡江前往都督府，面黎元洪申述。黎拒不见。6月1日，刘庆恩竟指梁世显为徐企文同党，派兵将其解往都督府。黎元洪即将梁交军法课讯办，后并迭催“迅即正法”。14日，梁被害。10日，武汉各厂工人为梁世显被杀事举行集会，又遭黎元洪派军警镇压，群情益愤。刘庆恩因工人坚持罢工，竟将熟练工人千余名一体开除以相威胁。但工人在各方支援下，仍不复工，致使该厂陷于瘫痪。黎元洪无计可施，被迫将刘庆恩免职，并允将工资以银元、纸币分成搭配。汉阳兵工厂工人斗争终于获得胜利。黎元洪于工潮平息后，未几即将刘庆恩复职。

△　设于南京四象桥聚英旅馆内之革命党地下机关遭宪兵司令部破坏，二人被捕，所藏快枪47支、手枪11支、子弹万余发均被搜出。

△　工商部公布《意国奈波里埠中意商会宣言书》，内称该会以“扩充中意商业、工业上辑睦之交”为宗旨，其目的在使中意商人直接交易，以免外国在华商人、经纪居间渔利。华方会长为工商总长刘揆一，意方会长为农工商部长尼的。

5月下旬　　海军部决定分中国沿海为三大军区：一、自鸭绿江至烟台为北区，设司令部于秦皇岛；二、自烟台至三都澳为中区，设司令部于崇明岛；三、自三都澳至澳门为南区，设司令部于琼州岛（今海南岛）。

是月　　中国最近人口，据统计为4.42548128亿人。

△　驻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发出通电，诬指黄兴、李烈钧

等反对大借款，“无非欲推倒政府，自便私图”，提出“惩戒”黄（兴）、李（烈钧），“制裁”上海全国公民会。

△　升允在库伦连发檄文三道，妄图纠集20行省官绅，起兵推翻民国，恢复亡清。檄中扬言：“已与俄、蒙协约，同诛叛我清室者。”文末均署“宣统复辟，岁在癸丑”字样。

△　长沙和丰火柴公司工人开会集议，要求厂方增加工资。事为厂主所知，以“秘密开会，未报巡警，违犯法律，大干例禁”为借口，将为首者汤大安、谢六秋二人开除。工人全体罢工抗议。湖南都督谭延闿得报，勒令该公司“将滋事之人一律开革，另行招雇”，并令“警察厅转饬该区兵士随时查察，妥为弹压，如敢再肆刁抗，即行拿办”。该厂主在谭延闿庇护下，竟将工人全部遣散。

6月

6月1日　白朗军进攻河南唐河县，架梯入城，与驻军独立第五十九团激战。旋据县署，焚案卷，夺获大炮六门，机关枪两挺及许多枪械子弹，声势大振。旋主动弃城北上，连克数村镇，复经南召直攻鲁山。

△　陆军部以江南造船局发生工党领袖徐企文率众攻击事件，是日电令该局总督陈榥，将“凡有稍涉工党名义”之组织“一律解散”。

△　外交部函知内务部：湘、皖、鲁三省烟苗确已净绝，中英委派各员履勘完竣，依禁烟条件第三款，自6月15日起，准于该三省内禁运印烟入境。

6月2日　袁世凯鉴于北京大学学潮，深恐波及全国各校，是日通令整饬学风，“着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饬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主。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

随时斥退之，以免害群，以示惩儆”。同日，并令教育部将北大预科“滋事学生严切查办，毋稍宽假”。

△　蔡元培、汪精卫在德、法考察，因宋案及大借款案发生，时局危迫，迭接各方函电促返，于5月5日自巴黎取道西伯利亚返国。是日晨抵上海。

6月3日　　司法总长许世英发布限制新闻自由之通令。内称：“有闻必录虽为报界之通例，然传闻失实最足以淆乱是非”，“且报律、刑律均有应遵守之范围，是言论自由仍须以法律为标准”；“深愿发言论事勿为成见所拘，勿为感情所迫，勿伐异而党同，勿扬汤而止沸”。

△　袁世凯令准再给赵秉钧“病假”15日。

△　午后，章太炎离京赴东三省筹边使任。及至吉林，始知筹边使一职乃无任所之虚衔，遂转道上海。19日，电袁世凯辞职。

△　江南制造局奉陆军部电令，于午前11时以“南琛”舰将徐企文解往北京，交京畿军政执法处收押。

△　北京留法俭学会所办留法预备学校，第三班学生40余名预备期满，是日早8时离京赴法俭学。

6月4日　袁世凯令准赵渊辞山西民政长本职，以陈钰继之。

△　袁世凯令湖北第一师师长黎本唐调京候用，任石星川署该师师长。

△　湖南境内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交通部派员前往清理湘路公司帐目。

△　北京政府聘英人李佳特为盐税顾问，是日离伦敦来华。

6月5日　　汪精卫、蔡元培归国后，同进步党人张謇、赵凤昌谋

调和南北感情，是日电袁世凯劝其勿为已甚，并将于日内邀伍廷芳等北上，面陈南中情形。后因袁下令免赣督李烈钧职，遂作罢论。

△　赵凤昌自上海电告南京都督府陈陶遗：胡瑛来商，孙中山、黄兴已一致和平，并派汪精卫协商其间，请程德全、张謇速密电北京政府，“勿遽信伪谣，勿骤有更动”，免生阻碍。

6月6日　　教育部代总长董鸿祎为防止学潮继续扩大，是日再令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即将现时在校之预科学生暂行解散。俟暑假后开学时，除已被斥退之八人外，凡现经请假出校诸生均准回校”。

△　交通总长朱启钤与英国中英公司签订借款五万英镑合同，作为广九铁路追加借款。年息七厘，二年偿还。

6月7日　　浙江都督朱瑞、云南都督蔡锷、四川护理都督胡景伊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等，列举时局建言五端，要求袁世凯“整饬纲维，申明法纪，厉行整齐严肃之治，以收扶衰起敝之功”。

6月8日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联名复函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共和时代人人有拥护共和之责任，苟有立心不轨，破坏共和者，众当弃之，断不宜姑息养奸，自贻伊戚，此固全国人心之所同，然抑亦鄙人等之素志也。”

△　南京私立民国政法大学全体学生1000余人，因要求省议会准将该校改为官立，遭校方阻挠破坏，是日举行罢课。17日，江苏省议会将该校改官立案否决。午刻散会，学生拥至议长室据理力争。在场议员竟呼警察逮捕学生11人，解送警厅拘留。

6月9日　　袁世凯加李烈钧“擅自改编师团”、“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使戈克安离浔”、“调兵运械进逼鄂境”等罪名，令免其江西都督职。同日，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以贺国昌护理江西民政长；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兼充第一师师长，节制所有江西陆军

各营；任命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节制所有九江、湖口一带江防各营队。

△　袁世凯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查明上海全国公民会设立处所及所发宣言书等件，“如有妄谬不经，希图破坏大局，立即饬令解散”；并令各省都督、民政长“饬属严禁，不得任其设立支部、布散流言”。

△　白朗军3000余攻河南鲁山，未克。10日，分兵二路，一路往攻宝丰，一路由白朗亲率再攻鲁山，占该县附近之大营、狼店、逢窑等地，歼敌数百人。

△　晨5时半，澳门一带突起旋风，泊船撞毁极多，水道为之阻塞，综计溺毙者不下百人。

6月10日　教育部布告：准许私立大学附设专门部，惟学科、科目、年限等，均须按照专门学校规程办理。

△　外交总长陆徵祥与美国加尼吉平和社签订借款20万美元合同，用于支付留美学费。

6月11日　陈陶怡、刘厚生携汪精卫拟定之南北和平三条件抵南通，面见张謇。三条件大要为：一、国民党决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四省都督请总统于临时期内暂不撤换；三、宋案将来罪至洪、应而止，传赵到案之主张自然消灭。12日，张謇将此项条件函告袁世凯，谓“汪、蔡、孙、黄当面通过，确是同意”。

△　上海交涉使陈贻范征得领事团同意，饬会审公堂再出传票，传讯黄兴。黄立即到庭，但因原告未到，证据亦无，终不得开审，黄遂离去。

△　交通部聘日人平井一郎为铁路顾问，是日抵京。

6月12日　江苏省铁路沪嘉（沪杭甬）线收归国有，交通部派员

前往办理苏路清算事宜。

△　上海龙章造纸厂女工500余名，因反对工头任意毒打、罚款，是日全体罢工，要求开除工头、增加工资。罢工持续5日，至17日，在资方诱骗下，终因生活无着，被迫复工。

6月13日　袁世凯令准吉林都督兼民政长陈昭常辞职，以张锡銮兼署吉林都督，齐耀珊为吉林民政长，孟恩远为吉林护军使，节制吉林军队。

△　袁世凯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胡景伊为四川都督。

△　黄兴以湖南总银行电请沪行查询黄兴将常丰存米全数在沪抵押银两是否属实一事，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请查明何人发电，有何凭据，“彻底查究宣示，以杜诬蔑，而息谣风”。

△　张謇就汪精卫南北和平三条件事再函袁世凯献策；其内容为：一、“宋案既不可传赵，周（予儆）案亦不可传黄”；二、“赣省既撤，临时期中湘皖可不再提”；三、“申诫军人不干预政治”；四、“通令为孙、黄分辩……使不逞之徒无所假托”；五、“电请汪、蔡入都，俾使指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定一致，以示公之贤而亲仁，并无党见”；并谓：“謇于其党二年以来，独见汪之可敬可爱而已，公宜以诚礼待之。”

△　洛阳南城大街聚昶号商铺，因受司法巡警勒索，向地方审判厅提出控告。审判厅非但不责惩该警，反指该商铺为讹诈。洛阳各商铺极为愤激，于是日全城罢市，以示抗议。

6月14日　袁世凯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并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

△　袁世凯任命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17日，胡汉民电请袁世凯收回成命。

△　黎元洪密电袁世凯，报告其近日准备内战之五项措施：一、都督府戒严令增加附条五则；二、赶造油布桥为战时军队渡河之用；三、调李纯机关枪队驻武穴、田家镇一带；四、设马政局，委该府军事顾问龚光照任局长；五、令步队第七独立旅添练机关枪两队。

△　陆军部奉袁世凯令，电各省都督、军长：嗣后凡由中央已经任命之师长、旅长及司令长等，遇有更调，必先商明陆军部呈请核办。

6月15日　　进步党开会，梁启超主席并发表演说，提出总统推袁，内阁改组，先定宪法，后举总统主张；又谓宋案纯为法律问题，借款最要关键，则为监督用途。表决结果，多数赞成，即作为该党主张。

△　孙中山电复万国改良会丁义华，表示嗣后专办铁路，不愿闻政事。

△　陈家鼎集国民、进步两党议员数十人，是日正式成立癸丑同志会，宗旨为“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举刘公为会长，张我华、王湘为副会长，陈家鼎为政务部长。

△　白朗军千余人攻占禹县，知事弃城逃匿。白朗军入城后，打劫豪富，收缴枪300支，捆载大车200辆，随即放款济贫，乡民从者甚众，16日闻敌援军至，主动转至鲁山一带。自此白朗声振豫西，各地绿林附合者骤达2000人。

△　袁世凯宪法顾问日人有贺长雄于《法学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发表《共和宪法上之条约权》一文，对中华民国宪法之制定进行直接干预，并为袁世凯力争扩大处理外交事务之职权。

6月16日　　袁世凯电复张謇，指责孙、黄“佯谋下台，实则猛

进”，表示“为公为私，退无余地”，并密告已托梁士诒转约汪精卫北上。

△　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呈请免职，袁世凯批令再给假半月，所请仍毋庸议。

△　外交总长陆徵祥因病呈请准假10日，袁世凯批令病愈应即视事，毋庸拘定假期。

△　内务部公布编制各省区沿革一览表，按省、道编制，并有各县之新旧名称对照说明。

6月17日　共和党日前宣布脱离进步党，是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重振党务方法及以后政策”。27日，发布通告书，以进步党“专以取媚政府为事，毫无政党资格，与之合并实为大辱”等理由四端，申明“脱离腐败不堪之进步党”。29日，共和党在北京宣武门外湖广会馆正式复立会。

△　张謇接袁世凯16日电后，即转致赵凤昌，请赵转达汪、蔡诸人。旋赵与蔡元培等商议，俱认袁电意重在“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一语，表示“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并告以“汪已赴粤劝导同志归于稳定一致”，“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

△　袁世凯令准汉粤川铁路督办岑春煊辞职。

△　内务部再发限制新闻自由之通令。是日通告指责内外报纸对宋案，大借款案，外蒙事件等，“肆意诋毁，痛加诬蔑”，“流言所及，人心为之动摇”。“若不依法限制，实足扰乱大局，妨害治安”。并谓：“用特剀切布告各该报馆须知……倘视诰诫为具文，置法律于不顾，漫无抉择，率意登载，或昌言无忌，淆惑视听，则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断难宽容。”

△　卸任江西都督李烈钧抵安庆，次日乘“新丰”舰东下，19日抵上海。

△　川边经略使尹昌衡以川边赤地千里，经略之实万难践履为由，致电袁世凯请辞。后未获准。

△　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向袁世凯请辞。是日，袁批复不准。

△　内务部会同财政部拨银五万元赈济广西水灾。

△　午前11时，汉口人力车工人龚银保在俄界入厕，将车停于厕外。俄巡捕借口违章停车，竟将龚银保凶殴至死。在场人力车工人当将该犯扭送俄捕房。午后，汉口人力车工人全体罢工。驻汉俄领事闻讯，反调俄水兵上岸，以武力相威胁。黎元洪于舆论迫促下，派员前往交涉，均遭俄领蛮横拒绝。

△　万国妇女参政联合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中国派代表与会，并向大会献“中国妇女参政”旗。

6月18日　袁世凯据交通部呈请，准汉粤川铁路归该部直辖，无庸再派专员，并责成交通次长冯元鼎赴汉口接管，执行督办职权，所有该路工程事宜仍由詹天佑会同办理。

△　孙中山自上海乘轮抵澳门。陈炯明、胡汉民皆到澳门熟商。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因陆军部事事与之为难，愤而在校自杀，未遂。事后，该校职员张翼鹏等具呈控告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除斥异己，任用私人，刁难把持，诸事掣肘”，以至酿成此事。21日，袁世凯派荫昌、陈宦前往查办。蒋百里旋即提出辞职。

6月19日　国务院审计处派李景堃赴法、比、意，汪振声赴英、德、美考察财政。

△　为准备发动内战，镇压南方反袁势力，是日海军总长刘冠雄在大沽检阅海军，“海圻”、“海琛”、“海容”、“飞鹰”、“泰安”、“镇海”等10舰均参与演习。

6月20日　内务部公布《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凡七条。

6月中旬　梁启超致电云南都督蔡锷，谓“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

6月21日　袁世凯发布通令，告诫军人服从命令，勿得逾越范围，其非分之事慎勿干涉，致淆政体，“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

△　袁世凯以政府经济困难，债累山积，通令“由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以“裁兵节饷”；并令“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京外行政经费”。

△　孙中山在澳门约陈炯明在军舰上会面，促陈同意“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

6月22日　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内称：“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　袁世凯以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输诚民国，尊重中央，特电嘉慰。并谓：“务望振兴黄教，抚辑所属僧侣，保持藏和平。”

△　日本政府任命山座圆次郎继伊集院彦吉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

6月23日　袁世凯密遣孙宝琦、李盛铎赴日，7月2日抵东京。此行明为考察日本经济，实在诋毁孙中山、黄兴及其领导之国民党，为

袁世凯即将发动内战开脱罪责，并设法阻挠日本急进派协助南方反袁势力与袁为敌。二次革命起，孙、李于7月19日离日返国。

△　党人宁调元奉黄兴命偕熊樾山秘密赴汉口，组织鄂省反袁革命机关，是日乘轮抵汉。在汉期间，曾召集各方同志数十人紧急会议，派季雨霖、詹大悲、邹永成等指挥军队，皮宗石、李剑农等起草文告宣言，定期在武汉三镇同时发难。

6月24日　孙中山自澳门抵香港，当即对英文《早士蔑西报》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宋案发生以后之政见。

△　袁世凯令准财政总长周学熙再给假一个月安心调理，所请免官之处仍毋庸议。

△　袁世凯任命戴戡为贵州民政长。

△　武汉军警会同法国巡捕搜查汉口民国日报馆，逮捕编辑曾毅等四人，关押于法巡捕房。詹大悲见事已泄，于当晚督队攻汉阳制造局，失败。

△　驻汉英领事应黎元洪请，迫令《震旦民报》迁出英租界，该报于是日被迫停刊。

6月25日　众议院开秘密会，对北京政府未经国会通过，于4月10日私借奥款事提出质问，财政总长梁士诒出席作答。各派议员对梁之解释均感不满。后经查阅合同原稿，与梁所谈情况竟不相符。议员异常激愤，咸以政府所签是项合同为非法，相约提出弹劾。

△　宋案要犯洪述祖经外交部多次与德使交涉，均拒不引渡。是日，该使照会外交部，竟谓“中德并无引渡条约，势难办到”，只可将青岛法庭讯取洪之口供送达。

△　武昌数处发动反袁起义，党人及下级军官被捕者70余人，次

晨被杀于市。

6月26日　袁世凯再电张謇对其“苦心调和”南北，予以嘉许。并谓：“果如蔡、胡所云，是彼此释嫌，同图建设，如天之福，国赖以存。鄙人决不为已甚。汪何日回沪？孙、黄表示之法，甚所愿闻。”次日，张謇据以抄转赵凤昌，请与孙中山、黄兴接洽。

△　宋教仁葬于上海，送葬者达数万人，谭人凤、王宠惠、居正、胡瑛、章太炎等均参加葬礼。

△　党人宁调元、熊樾山在汉口被捕，搜出李烈钧签署之特别证件及密码本，讨袁临时鄂军机关总部事务人员名单及派人赴荆、沙等处及邻省各处川资清单等件。宁、熊被羁押于汉口德租界巡捕房。

△　白朗军攻河南方城县，获全胜，毙敌军统领牛得功。河南都督张镇芳闻报，急调师长张锡元率部1200名驰往镇压，并飞调驻防郏县一团、许昌一旅等部队前往合剿。

6月27日　黄兴致电陈炯明，请“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讨袁”。

△　刺宋逃之凶犯洪述祖在青岛经胶澳审判厅依法审讯于5月31日所录之德文供词，是日经外交部译送总统秘书厅。

△　财政部拨银五万元赈济安徽水灾。

6月29日　江苏省教育会开会，举张謇、黄炎培为正、副会长。

△　财政部拨款五万元赈济湖南水灾。

6月30日　袁世凯令免柏文蔚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改以陕甘筹边使虚衔委之。同日，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

△　参众两院开宪法会议，共选出宪法起草委员60名，两院各半，联合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其中国民党33人，进步党19人，共和

党七人，超然社一人。

是月　　国民党就北京政府违法借款发表宣言，声称：“为大局计，惟有政府速将借款合同提交议院。两院于借款合同即一字不易，亦为议院中自主之权，本党亦惟有力予维持，俾底于成。否则，本党惟有竭其力之所至，根据约法，攻击政府。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尚存，则一日不能承认此违法签约之借款。”

△　陈少白在广州创立粤航股份有限公司，承办轮船运送业务，本公司设于广州，分公司设于香港，资本银100万元。

7月

7月1日　　黄兴再电陈炯明，促速接任广东都督，宣布独立，联合讨袁，切勿再延。

△　夜10时，河南开封城西南火药局爆炸，局舍悉成深坑。留局人员14名均被炸死，附近民居、学校、庙宇亦遭波及。与火药局爆炸同时，远处城西北之国民党河南省支部亦发生爆炸。

△　热河都统熊希龄电袁世凯，报告战胜盘据乌泊罗河一带之库伦蒙军事，内称：“毙匪多名，并攻取匪卡五处，夺获枪械马匹多件。”

△　署绥远城将军张绍曾电袁世凯，报告战胜侵袭内蒙之库伦蒙军事，内称：“连日剿匪获胜，迭破板申图山口、丹伯岭诸要隘，肃清西苏尼特王府及滂江等处，擒斩200余名。”

7月2日　　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分电袁世凯、参陆两部及黎元洪，称九江、湖口“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炮台，克期举事”，请速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以资镇慑。4日，黎元洪奉袁世凯令，电饬驻湖北蕲春之李纯，“酌派军队前往镇慑”。

7月3日　　黄兴三电陈炯明，促速接任广东都督，指出：“再不接任粤督，独立讨袁，党人将不能相谅。”

△　袁世凯派海军中将郑汝成、团长臧致平率警卫队1300余名进驻上海江南制造局，并令协同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共谋镇压上海革命。

△　白朗军破河南荆紫关。守将王天佑大败，逃往淅川。

△　山西都督阎锡山电袁世凯，报告战胜入侵后套一带之库伦蒙军事，内称：“此次晋军赴援后套一带，先后剿平台梁、大奈太等处蒙匪，现又攻克苏白尔盖昭庙，并分援白灵，节节获胜。”

7月4日　　进步党与国民党协商决定弹劾政府。是日，国会各派议员对政府提出四大弹劾案：一、邹鲁等120人提出弹劾全体国务员案；二、张华澜等12人提出弹劾国务员违法案；三、何雯等18人提出弹劾财政总长违法擅借奥款案；四、李国珍等75人提出弹劾国务总理及财政总长违法擅借奥款案。

△　中国铁路总公司与伦敦西南区宝林有限公司，在上海签订筹建广州至重庆铁路及日后接展至兰州之简明合同。规定借款本息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保，兼允许以广州重庆铁路为特别抵押。

7月5日　袁世凯任命张凤台为河南民政长。

△　凌晨2时，库伦蒙军骑兵四五千名进犯阿尔泰察罕通古，与当地驻军接战。天明，蒙军败退。11日早8时，蒙军骑兵3000名再犯察罕通古，又被驻军击退。

△　袁世凯令陈威代理中国银行总裁。

7月6日　　豫南总司令李纯奉黎元洪命，派所部第六师第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于5日由湖北蕲春开赴九江，是日抵达。同日，江西

护军使欧阳武急电北京国务院及黎元洪，痛陈李部进驻九江之不可，要求“迅速调退北兵”，并电向袁世凯辞职。

△ 谭人风自汉口致函黎元洪，指斥其“近日政策，专以仇杀湖南人为事，而其被杀之人，则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此等暗无天日、惨无人道之举，即前清官吏如赵屠户（赵尔丰）其人者尚未闻”；“湖南人不可侮，请勿轻启衅仇，自祸祸鄂，兼祸天下”。

△ 俄政府以6月25日照会中要求赔偿、惩办诸事未得满意答复，是日遂调俄军3000名自哈尔滨开驻齐齐哈尔附近之富老儿庄，扬言非罢斥黑龙江都督兼民政长宋小濂，赔偿损失，即自由行动。北京政府闻讯急令外交部于10日复文俄使库朋斯齐，允予赔偿，并酌情惩办各地官吏。俄使始允电阻俄兵前进。袁世凯旋令准宋小濂因“病”离职，并于16日命毕桂芳暂行护理黑龙江都督及民政长。后于8月8日终将宋小濂免职。

7月7日 袁世凯据黎元洪呈报，是日下令通缉谋在湖北讨袁之党人夏述堂、王之光、季良轩（即季雨霖）、钟勖庄、温楚珩、杨子鬯（即杨王鹏）、赵鹏飞、彭养光、詹大悲、邹永成、岳泉源、张秉文、彭临九、张南星、刘仲州等人，着各该都督、民政长、将军、都统、护军使一体悬赏，饬属严拿。

△ 袁世凯令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兼领川边都督事。

△ 江西省议会议员颜丙临、欧阳莘等72人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要求转电黎元洪，“克日将抵浔，北军撤回，以免牵动全局”。

△ 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镇压上海革命，调“楚泰”炮舰、“海筹”巡洋舰驶抵上海。同日，江南制造局炮厂将七生五口径管退快炮10尊交陆军部拨解军用。

7月8日　　袁世凯召集全体国务员会议改组内阁问题，各员意见不一。段祺瑞等主张任命徐世昌或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各部总长仍旧；陆徵祥等主张仍由段祺瑞代理总理，内务、财政、教育三总长另简；梁士诒等主张全体改组，由赵秉钧领衔提出辞表。

△　众议院开秘密会，通过5月20日中俄双方就外蒙问题达成之协议六款。

△　李烈钧自上海潜抵江西湖口，约会第九、第十两团密谋举事，并调集辎重、工程两营分扼要隘，同时勒令各炮台司令交出炮台。

△　李纯率步兵一团、骑兵百余名、机关枪一连并携山炮六门进驻九江南门外十里铺。10日，欧阳武再急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并径电黎元洪，要求将李纯所部“即日调回”。

△　四川各法团联合会刊布都督胡景伊蹂躏议会，破坏法律等十大罪状。

7月9日　　交通部公布《铁路收用土地暂行章程》，凡八章55条，规定：铁路用地分国有、公有、民有三种；民有土地给价购买，国有土地不给价或呈部核办；公有土地按国有或民有土地办理。

7月10日　　12时及午后2时，驻德安赣军第一旅旅长林虎迭电护军使欧阳武，告以李纯所部袁军已由南康（今星子）及沙河两路进逼该旅防地，请速示办法。

△　国民党本部开参众两院国民党全体议员会商改组内阁问题，代理主席李根源，议决国务总理一席，绝对否认徐世昌、熊希龄，赞成汤化龙、蔡锷、伍廷芳、程德全。

△　阿尔泰护军使马福祥电袁世凯，报告俘获库伦伪东西盟统帅、东盟扎萨克旗佛僧班的达及其伪参谋彭素胡鄂木加、伪统领韩福

海、巴图得胜等人，并请解京备讯。

△　热河都统熊希龄再电袁世凯，报告战胜盘据浩落图庙地方之库伦蒙军事，内称：“统领米振标所部在浩落图庙地方与悍匪四五千人接仗，自卯至未，奋勇力战，连夺山险十余处，毙匪首七名，匪众二百余名。”

7月11日　李烈钧致电江西各界，痛斥袁世凯违反约法及派兵扰乱赣省之罪行，宣称“回赣随同军界诸君，声罪致讨”。

△　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10日分电袁世凯、黎元洪，告以湖口炮台已为民军所困，“恳添派军队及兵轮来浔”。次日，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亦分电袁、黎，告以“湖口风声益紧”，“恳即电饬李总司令相机前进”。是日，袁世凯遂以此为借口，电黎元洪转饬李纯部“暂缓撤回，借资镇慑”，并令黎“酌调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迅速赴浔”。

△　晚8时许，李纯所部袁军分两路向赣军林虎旅驻地行衅。护军使欧阳武得报，电饬该旅后退20里。

△　参议院开秘密会，将5月20日中俄双方就外蒙问题达成之协议六款否决。

△　陕西神木县乡民因当局只准官种罂粟，不准民种，生计顿绝，遂聚集七八千人前往县衙，杀知事及防营百余名，旋掠衙署、仓库、商号，并焚毁教堂。陕西都督张凤翙闻报，派兵驰往镇压。

7月12日　李烈钧湖口起兵，二次革命爆发。早8时，赣军林虎旅在李纯所部袁军节节进逼下，被迫奋起应战。至午，林军乘胜占领青山瓜子岭一带，并占金鸡炮台。午后再战，直至深夜，袁军退往赛湖。李烈钧于湖口得林虎与袁军开战消息，当即召集会议，议决宣布江西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略谓：“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

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同日并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

△　江西讨袁军电驻京各国公使及驻各埠领事，内称：“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本军因国民公意，兴师讨贼，以靖乱源。凡本军于战斗区域以内，势力所及之地，其居留地外人之生命财产无不加意保护，并于本军总司令部按照国际法及国际惯例处置一切交涉事宜。愿各公使、领事严守中立。”

△　黄兴自上海抵南京，连日召集第一、第八两师官兵开会，议决声援江西。

△　袁世凯接黎元洪、李纯、陈廷训报，知江西战端已开，急令海军部派汤芗铭乘“飞鹰”舰驰赴江西，督率各舰与赣军接战；并密电黎元洪，令驻湖北海军集中长江上游，以为江西袁军后援；同日并密令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督饬所属，备战待命。

△　袁世凯准黎元洪所请，令李纯署九江镇守使。

7月13日　　江西省议会开特别大会发表宣言，宣布袁世凯“为人民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本各界人民公意，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同日将选举结果通电各省，并宣告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

△　黄兴在沪接见南京第八师两旅长王孝缜、黄恺元，允赴宁主持讨袁军事。同日，黄往见孙中山，商赴宁举兵讨袁，旋嘱王、黄两旅长当夜回宁布置起义。

△　早8时，赣军林虎旅与李纯所部袁军在瑞昌附近接战，袁军节节败退，晚退入九江。李纯急将分驻武汉、蔡甸、岳口等处之第十一混成旅及新编黎天才、石星川两混成旅调入江西。

△　早8时，驻徐州之冷遹所部第三师讨袁军向驻山东韩庄之靳云鹏所部第五师袁军发动进攻，鏖战连日，冷军先处优势，后以兖州张勋军及田中玉军往援靳军，冷军遭数面夹攻，始退据山东、江苏交界之利国驿。19日，袁军陷利国驿。

△　袁世凯再令海军部电饬驻泊烟台、大沽之“海容”、“海琛”两舰即行南下，巡缉长江。

△　袁世凯通令告诫各政党咸趋正轨，共谋国利民福，并着陆军部严申军人入党之禁令，“如有军人收受党证者，立即销毁，从严革究”。

△　袁世凯通令振兴实业，“以裕国计”。规定：“举凡路矿林垦蚕桑畜牧，以及工艺场厂，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务须加意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未办者，亦应设法维持，善为倡导。”

△　俄公使库朋斯齐照会外交部，声明取消5月20日中俄蒙事协定，并另提“中国承认蒙古自治”、“俄国认中国为蒙古之上国”等四项条款以为重行磋商之根据。

7月14日　黄兴抵宁，主持讨袁军事。

△　月初白朗军破河南荆紫关后，自淅川进至湖北均县贾家寨。袁世凯闻报，立饬湖北、河南、陕西三省军队联合围攻。是日，白朗军与该三省联军大战于贾家寨东，白朗军胜，缴获子弹数十箱。

△　教育部批准武昌中华大学立案，并指定陈宜恺为该校代表人。

7月15日　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黄兴等人迫促下，发出通告，宣布江苏独立，委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并咨委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程德全、应德闳、黄兴旋将江苏独立事联名电告各方。

△　黄兴于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后，即日誓师，通电讨袁。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黄兴任命章士钊为秘书长。

△　柏文蔚在南京被举为临淮关总司令。

△　驻芜湖安徽第二旅旅长龚振鹏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十大罪状，请“与天下共弃之”。

△　江西79县公民露布讨袁檄文，宣布“义旗所指，除为其私党外，不妄戮一人”，“尚望我全国各省同胞闻风响应，协力同心，凡有阻我义师为共和障碍者，与天下共击之”。

△　袁世凯加李烈钧“背叛民国，破坏共和”罪名，下令褫夺其陆军中将并上将衔，着欧阳武、李纯“设法拿办”。

△　袁世凯以福建原任护理民政长江畬经病假，是日任命刘次源暂护福建民政长。

△　袁世凯再令海军部急调驻泊武昌之“江元”、“江利”、“湖鹰”、“湖隼”四舰驰赴湖口，镇压起义。

△　中、英两国第七次会谈藏事，北京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往英使馆会晤其署使艾斯敦，就代表任命状及签字方式交换意见，无结果。

7月16日　黄兴、柏文蔚等在南京开军事会议，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岑于18日自上海抵南京，19日就大元帅职。22日，省议会联合会开会，补行正式选举程序。18省代表一致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并规定“凡各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会后，省议会联合会备文咨达岑氏，告以“即照临时约法临时总统职权行使”，随咨并授以“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之印”一颗。

△　黄兴令驻南京之第一师一部开赴宿迁，第八师一旅沿津浦路开赴徐州，配合驻徐州之冷遹第三师防堵张勋所部袁军南下。同日，

又调第一师第二团之一部及第八师步兵一团附机关枪一连，开往临淮关准备北伐。17日，再调第一师一旅开赴徐州。

△　松江响应南京独立，是日组成讨袁军，举钮永建为总司令，葆安水师营统领沈葆义为师长，帮统何嘉禄为团长，当夜宣布独立。17日，松江讨袁军一部应陈其美借调开赴上海，计步兵二营、水师三营，约3000人，由总司令钮永建率领，何嘉禄任总指挥兼步兵团团长，午后4时许，陆续抵达。

△　袁世凯令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辞职。次日，改任赵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21日，再任赵为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并以陆建章副之。

△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因不赞成江苏独立，是日乘夜车离南京前往上海。17日，分别将行踪电告参众两院、北京政府、各省都督、民政长，借以表白。21日，袁世凯令程德全、应德闳“即在就近地方暂组军政、民政各机关、行署，并着程德全督饬师长章驾时等，选择得力军警严守要隘，迅图恢复”。

△　袁世凯发布命令，将挑起战端之责悉归诸李烈钧，并称“本大总统忍之又忍，为赣省生命财产计，不惜委曲求全。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谅”，为其称兵祸国推卸罪责。

△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一军军长，归副总统领湖北都督事兼领江西都督事黎元洪节制。同日并任段为江西宣抚使，令其驰赴江西，“沿途所至，宣布德意”。17日，再任赵惟熙为江西宣抚副使。

△　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以九江袁军连日败北，特令驻泊高昌庙之“肇和”、“应瑞”、“镜清”等舰及各鱼雷艇加强警戒。

△　江西省议会、督军、省长发出联合通电，请各省一致声罪致讨袁世凯，“划除专制，巩固共和”。

△　章太炎发表宣言，指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为四凶；同日并电黎元洪，称政府恶贯既盈，众怒难犯，亟宜厉兵北向，请诛罪人，以为南方指导。

△　国事维持会上海交通部通电调和大局，吁请黎元洪迅撤北军，以谢赣人；赣垣诸公，勿同室操戈，自取糜烂。

△　英政府借口保护旅藏教士及英商，自印度调英兵2000余入藏。

7月17日　安徽宣布独立。安庆军商绅各界会议决定即日宣告独立，推举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并举第一师师长胡万泰暂行代理都督，孙多森仍任民政长。21日，胡、孙先后离省，由宪兵司令祁耿寰暂摄都督事。后复举刘国栋代之。27日，柏文蔚携胡万泰自南京抵省，旋就安徽都督职，并组织讨袁军。

△　驻安徽之“建威”、“楚谦”、“楚泰”三舰，通电“与袁政府断绝关系”。

△　镇江各界响应南京，宣布独立。随后镇江炮台亦宣布独立。19日，派讨袁军1500名往援上海。

△　上海南商会为“临时维持地方治安”，特邀集商团公会、救火联合会、教育会开会，组成上海保卫团，举李平书为团长。18日，因上海宣布独立后淞沪警察厅厅长穆抒斋辞职，上海各团体举李平书暂代。

△　袁世凯以欧阳武不受笼络并通电发其隐私，是日发布命令，指欧阳武为“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

△　袁世凯令交通总长朱启钤暂代国务总理。

△　袁世凯任命刘若曾署直隶民政长。

△　国务院通电为袁提兵入赣辩解，宣称赣省如不取消独立，袁军“万难遽撤”。

△　北洋第二师第四旅由旅长鲍贵卿率领抵九江。该师全体旋亦开抵江西前线。

7月18日　晨，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通电讨袁，吴淞炮台同时响应。早9时，陈其美、钮永建、李平书及上海各团体代表在市政厅开会，商讨组织讨袁军、保卫地方秩序及敦促驻制造局之袁军归附等事。

△　晚8时，驻沪松江讨袁军总指挥兼步兵团团长何嘉禄率队抵龙华，封制造局火药厂，驻守该厂士兵并未阻拦。

△　广东都督陈炯明召集军事会议宣布独立。是晚，历数袁世凯十二大罪状，宣布“克日督率粤省六万健儿，北上讨袁”。陈仍任都督并兼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　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发布《告友邦书》，申明：袁世凯“不得以尺寸领土、丝毫权利割让列邦；列邦亦不得以金钱暨战品贷与袁氏政府。……苟其甘冒不韪，贷与金钱或输战品，是与袁氏个人交易之行为，与中华民国无涉，吾民决不承认”。

△　外交部密电驻日公使汪大燮，令照会日本外务省，请严禁日人协助讨袁军。

△　交通部训令各路邮电局在事员司人等“毋为乱党所利用”，报务员不得收转“叛党煽乱电文”，“并将中央发出各电故意秘匿”。“若果有附和情形，该管员司不仅予以行政上之处分，并应受刑事上之惩罚”。

△　袁世凯令准工商总长刘揆一辞职。21日令该部次长向瑞琨暂代。

△　袁世凯任命周肇祥署京师警察厅总监。22日，改令董玉麐代理此职。

△　汪精卫自上海发表宣言，提出“为今日计，袁氏宜即自辞职，国会速择选举地点，开会选举正式大总统。……今者欲解战祸，舍此更无他道”。

△　鄂赣两院议员郑万瞻等37人讨论江西时局，议决电请李烈钧、李纯双方暂停战事，并派代表见袁世凯请求和平解决。

7月19日　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福建都督孙道仁在福州浙江会馆召集各界开讨袁同盟会，许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孙仍任都督，宣布与袁政府断绝关系。20日，孙道仁、许崇智联名通电宣告独立，组织讨袁义军。

△　驻扬州江苏陆第四师师长徐宝珍颁布示谕，宣言与袁政府断绝关系。

△　浙江宁波独立，旅长顾乃斌电浙督朱瑞、师长吕公望等，促即日独立，宣布讨袁，慎勿观望。

△　陆军总长段祺瑞再增调2000名袁军进驻江南制造局。至此，该局驻军已达9000人。同日段复以“边防需用”为辞，饬该局赶造军械，并决定将该局全体办事人员、工人及驻军薪资、饷银一律增加，“以资鼓励”。

△　袁世凯令陆军总长段祺瑞仍行代理国务总理。

△　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天坛开会，举汤漪为委员长，王家襄为副委员长。另举蒋举清、杨铭源、黄云鹏、王家襄、夏同龢、杨永

泰六人为理事，分拟宪草。

△　蔡元培、汪精卫、唐绍仪密电袁世凯，劝其宣布辞职。22日，袁复电拒绝，并为其强据总统一席进行诡辩。

△　冷遹第三师因利国驿失陷退往柳泉，张勋所部袁军紧逼柳泉。双方激战至22日，讨袁军不支，再弃柳泉南撤。

△　江西德安全国公民讨贼团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请即领兵出发，直捣贼巢，“势必生吃袁贼、黎狗之肉”，“以伸共讨而快人心”。

△　上海保卫团团长李平书赴江南制造局，面商郑汝成、陈槐，请顾全大局，赞成独立，免开衅端。郑汝成佯示颇愿和平解决，实则蓄意扼杀革命。

7月20日　浙江都督朱瑞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并岑春煊、黄兴，宣告浙江“中立”，内称：“自今以往，但当一意保我治安，不问其他。如有乘机骚扰或派遣军队者，不问来自何处，凡妨害我浙生民财产者，一律视为公敌。”

△　广东旅港各大行商纷电北京政府，反对广东独立。

△　章太炎、蔡元培联名通电宣布浙督朱瑞劣迹，如其一意党附政府，延不宣告独立，应请浙人共逐之。

△　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派阎作霖、杨体锐携函往见白朗，告以东南各省独立形势，劝其相机进取豫省，多毁铁路，以分袁世凯兵力，而助二次革命，并立不朽之勋业。

△　上海全国公民会连发两电：其一通电各方，呼吁举国一致讨袁；其二致北京参众两院留院议员，请即日将国会迁出北京开议。电中并告上海已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务乞早来。

△　段芝贵率拱卫军第八营抵九江。

△　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上海江南制造局督理陈榥等得知龙华火药厂被松军封占，大为恐慌。午后依郑汝成策，李、郑、陈三人离制造局，同登“海筹”舰，并协同“肇和”、“应瑞”两舰开赴吴淞，阴谋抢先攻取吴淞炮台。

△　《民立报》刊载旅美华侨自旧金山来电，内称：“袁氏罪恶贯盈，侨民愿筹巨款为讨袁军后盾。”

△　京师警察厅查封北京日日新闻社，该报被迫停刊。

7月中旬　　参议院议长张继自上海电请参议院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

△　湖口开战后，驻防江西、湖北交界处之袁军1126人反正，并致函北方军界，内称：“此次战争，非南北战争，亦非党派战争，乃共和与专制战，公理与独夫战，人民与恶政府战”。“与其为袁世凯争皇帝而死，不如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而死”，呼吁“去逆效顺”，“共讨袁贼”。

7月21日　　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电上海各西报，历数袁世凯种种罪恶，并申明“自战事宣布后，北京政府已失其宪法上效用，请列强告戒各资本团，勿再付款项于北京政府”，此后“所订合同、借款等，无论如何一概不能承认”。

△　袁世凯通令禁止京外官员弃职潜逃，或附和二次革命，宣称“凡京外奉职人员，如有弁髦官守，任意潜逃或假借名义甘心助乱者，一经拿获，定必从严惩处，决不姑容”。

△　袁世凯发布“平叛”通令，宣称“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同日宣布在北京和湖口、徐州等战地戒严。

△　袁世凯通令整饬纲纪，以济时艰，宣称“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得以自恣”。

△　驻湖北荆门县沙洋镇之前第八师季雨霖旧部，在团长刘铁率领下起义，组成讨袁军，举刘为鄂西讨袁军总司令，连日攻占荆门、天门、钟祥等县署及电、税、盐各局，缴团警枪、弹无算。25日，刘铁电黄兴、李烈钧，告以“各军响应，听候调遣”。旋于31日率队数千人分东北两路会攻荆州（今江陵），与袁军苦战数昼夜。后以敌军增援，于8月2日失败。

7月22日　　孙中山发表宣言，促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同日，孙中山电袁世凯劝其辞职。电云：“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　留日学生开会讨论时局，通过请袁世凯速退临时大总统之位；请参众两院据法弹劾袁氏及请各省速行独立等五项决议。

△　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一切荣典、军职。随后又下令加黄兴以种种罪名，并诬指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等反袁活动为“明目张胆，倒行逆施”，“着冯国璋、张勋迅行剿办叛兵，一面悬赏缉拿逆首”。

△　袁世凯密遣蔡廷幹运动外交团，不准革命党领袖人物在各地租界居留，并允报以“特别利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旋于23日提出取消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岑春煊等八人租界居留权。26日，经驻沪领事团议决同意，并饬工部局出示宣布。

△　共和党本部开会讨论赣宁战事，会后通电各省该党党员都督

及师长等，令各严守中立。

△　交通总长朱启钤、代理财政总长梁士诒以修筑同成铁路（大同至成都）为名，与法比两国铁路公司代表陶普施签订借款1000万英镑合同，以同成铁路全部财产及收入为担保。因此项借款于8月间已挪作镇压南方讨袁军军费，同成铁路迄未动工修筑。

△　京师警察厅奉袁世凯令，借口20日北京《民国报》所发时评“扰害治安”、“鼓吹二次革命”，是日迫令该报停刊。同日北京《民主报》、《亚东新闻》两报馆亦均遭宪兵查抄，并同罹停刊之祸。

7月23日　　凌晨3时，陈其美派钮永建、刘福彪等率讨袁军分道向江南制造局发动进攻。驻防制造局内之六十一团及三十七团攻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松军、镇军攻击望道桥制造局正门，北军死战。海军李鼎新、郑汝成则自“海筹”舰发炮轰击吴淞炮台。接战5时许，讨袁军损失颇重。

△　袁世凯令“销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31日，又令“所有铁路公司条例内事权暂由交通部执行”。

△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

△　蔡元培发表《敬告各省议会》文，略谓：“吾意各省议会，悉宜宣布赞成讨袁之主张，以表示全省之民意。”并应电促本省议员南下，另择地点开议，改选正式总统。

△　北京《民主报》刊载《各地华侨讨袁宣言书》，历数袁世凯祸国殃民种种罪恶，并谓：“袁贼既先自开衅与我国民战，则共和政治已被袁贼蹂躏无余地。我海外侨民数十年来希望之初心至此已成为泡影，此我侪所万不能再承认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也。今者赣省义师既宣布讨贼，苏、皖、湘、粤、闽诸省亦相继响应，我华侨不乏爱国之士，允宜同伸义愤，共殛元凶。”

△　晚10时，袁世凯密遣军警数百人包围北京公余俱乐部，当场逮捕参议员冯自由、汤漪、王鸿庞、彭健标、李自芳、何士果、熊成章及众议员司徒颖等10余人。旋押解至侦缉队拘留。24日，转解京师警察厅。午后4时，该厅以“误会”为辞，将被捕诸人释放，惟留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一人。晚8时，新署内务次长王治馨及内务部参事程克先后来厅，迫冯“以稽勋局名义通电各省，反对此次南方举兵以表明心迹”。均为冯拒之。26日午，冯获释，即于是日提出辞呈，27日出京。

△　北洋第二师第三旅旅长王金镜率部进攻九江附近之姑塘，次日与伍毓瑞所率赣军守兵在狭市激战一昼夜，北军进迫姑塘。26日，第二师鲍旅分兵支援王旅，占领姑塘。

7月24日　　自柳泉南撤之讨袁军，于敌军马、步、炮各队追迫下，经徐州再往蚌埠撤退。是日午后，袁军陷徐州。

△　江西袁军主力马继增旅、张敬尧团于23日晚向湖口运动，是日陷新港、梅花树、灰山等要隘，晚逼湖口西炮台。

△　云南都督蔡锷电湖南都督谭延闿、长江巡阅使谭人凤，略谓国事阽危，不能诉诸武力；黄兴、李烈钧此举“铤而走险”，劝其勿“随声附和”，否则湘省将“三面受敌，其何以支”？并谓拟组织滇、黔、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

△　袁世凯令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要求各国勿借款予独立各省；如各省以某项收入抵押借款，政府“概不认偿还之责”。同日，省议会联合会亦电驻京各使馆，声明自讨袁军举义后，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借款条约，“国民概不承认”。

△　浙江都督朱瑞下令查封《平民报》、《浙报》、《天钟报》、《浙江民报》、《浙声》五报馆。各报被迫停刊。

△　应夔丞自上海越狱脱逃。

7月25日　湖南都督谭延闿在省内外反袁形势迫促下通电宣布湖南独立，与袁政府断绝关系。

△　程德全通电声明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等要求独立，经“严为拒斥，誓死不从”，并说明“十五以后，一切文电由宁递发者，均系假用德全名义”。旋即冒死离沪，谋图恢复。

△　凌晨4时，江西袁军马继增旅陷湖口西炮台。晚8时，湖口及东炮台在鲍贵卿混成第四旅及汤芗铭所率炮舰夹击下亦陷。28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着“先发犒赏银10万元”，并令“悬赏购缉”李烈钧。

△　江西袁军右翼支队陷姑塘。旋分三路往攻瑞昌、南康、德安。

△　蔡元培在《民立报》发表《论非常议会》一文，主张宜仿南京参议院前例，以省议会联合会代行国会职权，不必成立非常国会。

△　袁世凯任命应德闳兼会办江苏军务。

△　袁世凯以“附和乱党，背叛共和”罪名，下令褫革代理福建陆军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军职，并严行查拿。

△　袁世凯令京师警察厅逮捕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即陈意农），后加以秘密组织锄奸团、救国社并“联络外国党人潜谋不轨”等罪，于8月7日由京畿军政执法处“按照军法处以死刑”。

7月26日　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张勋进军南京：着张勋督率全军由水道取道清、扬，会合该处军队，进攻镇江；第二军着由铁路速取临淮，再趋浦口，与武卫军联络，恢复南京。

△　袁世凯下令褫夺陈炯明广东都督官职，并撤销陆军中将暨上

将衔，着龙济光督饬各师旅长派兵声讨，悬赏拿办。同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

△　梁启超致书袁世凯，提出“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并表示进步党正设法维持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留京，望速发议员公费，不可再缓。

△　程德全电黄兴，要求黄“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

△　新疆都督杨增新致电袁世凯，以布尔根河“地险兵单，万难守御”为由，呈报已将该地全部驻军马、步各一营撤退，并驻察罕通古。自此布尔根河一带即弃守。9月，库伦蒙军大队将该地区尽行占据。

7月27日　　袁世凯为使军警随时监视议员行动，下令军警各管官“随时认真保护议员”。

△　袁世凯任命倪嗣冲继孙多森为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

△　袁世凯任命彭光烈为川边陆军第一师师长，孙兆鸾为川边陆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为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熊克武为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

△　是日晨，租界工部局借口闸北中国商人请求保护生命财产，派遣总巡捕卜罗斯率马队30余人侵入中国地界，开往闸北南海会馆和湖州会馆，驱逐讨袁军。蒋介石所率原六十一团一部约207名讨袁军为英军缴械。于是，闸北一度为英、美军队控制。

△　新任日公使山座园次郎抵京。次日对《民立报》访员表示日本政府对中国此次战事严守中立，“不干预”中国内政。

7月28日　　晚，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以战事失利，弃南京潜往

上海。程德全随即通电宣告南京取消独立，并委杜淮川代理第一师师长，“先行赴宁，料理一切”。

△　岑春煊以南北决裂，和平无法维持，是日在上海发表声明，表示坚辞和议事；随即离沪赴粤。

△　伍廷芳以上海制造局战事，人民生命财产横遭兵燹，是日电请袁世凯和平解决。31日，袁复电伍，声称其“受国民托负之重”，“严防痛剿，责所难辞”，并邀伍来京面谈，“倘以电来，未便奉复”。

△　袁世凯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

△　袁世凯为便于防范并逮捕革命党人，与北京使团协商，请按1901年《辛丑条约》之规定，使馆界内勿准华人居住。是日北京使团通过此议，并命六国饭店老板，“所有现居该饭店之华将，一律请其他住”。

△　中英两国第八次会谈西藏事，外交次长刘式训往见英署使艾斯敦，交换中、英、藏三方代表地位之意见，无结果。

7月29日　岑春煊自上海抵广州，当日致电陆荣廷、龙济光、龙觐光，请宣布讨袁，并约陆“至梧州面筹一切”。

△　谭延闿、程潜等电重庆熊克武，告以“北军会攻九江，武昌空虚，我军正可乘机直取武汉。……万望尊处神速决断，全师直出荆湖，会攻武昌，不必请命于成都”。此电于31日被贵州都督唐继尧截获，并电告黎元洪。黎于8月3日将此电转达袁世凯。

△　中、英两国第九次会谈西藏事，外交部秘书严鹤龄往英使馆晤巴参赞，决定中、英、藏三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中均处平等地位。

7月30日　肇庆统领李耀汉、德庆县长廖迈都等奉龙济光密电，

率兵将陈炯明封锁封江、川口之江大炮舰夺获。泊于该地之“安南”、“瑞和”等四舰亦同时倒戈拥袁。夜，龙率所部抵肇庆。

△　原驻徐州冷遹所部江苏第三师讨袁军通电参陆两部，声明取消独立，并“特恳速令固镇以北军队停止前进”。两部旋电复三师，谓“该师轻听乱党伪令，突攻韩庄……即是叛逆，岂取消独立所可了事。如果真心服从，应诣冯军使前缴械，听候安置。倘仍狡辩游移，是自取灭亡”。8月1日，参陆两部电冯国璋转达袁世凯指令：“该师限一日缴械，酌给月饷遣散，违则进攻。”

△　参议院开会通过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7月31日　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　袁世凯着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赵秉钧传讯国民党干部人员，限令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一律除名”，并自行宣布“不预逆谋”。8月3日，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王正廷前往警备司令部，申明遵令将黄兴等五人开除出党。

△　袁世凯以欧阳武“自称江西都督，昌言北伐”，“实属甘心叛徒，罪不容诛”，下令撤销其护军使，褫去陆军中将并上将衔，着段芝贵、李纯“严行拿办”。

△　袁世凯以九江镇守副使刘世均率兵起义，下令撤销刘职，褫去军衔，并“着段芝贵、李纯、汤芗铭等分别督饬海陆军队，一体严拿务获”。

△　程德全、应德闳奉袁世凯电令，悬赏缉拿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钮永建、黄郛、章梓、居正、刘福彪等人，言明获黄兴赏10万元，获陈其美赏五万元，余均亦有赏。

△　浙江都督朱瑞派遣浙军开赴上海支援北军。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四艘舰船护送北洋第四师李厚基旅南下，陆续抵达制造局。讨袁

军自28日最后一次进攻制造局后，很快脱离了战线。松军被迫转移至吴淞一带。是日，制造局之役至此完全失败。上海讨袁军退守江湾—吴淞一隅。

△　福建讨袁军总司令许崇智，鉴于江西、上海等地讨袁军节节失利，而本省军队亦难于调动，是日乘轮离省。

△　北京《中央新闻》遭政府当局封禁，被迫停刊。同日，上海《民立报》亦被禁在北京发行。

8月

8月1日　讨袁军林虎旅与袁军于上月31日激战于庐山以南之黄老门，历一昼夜，林军不支退德安。黄老门、马回岭均入袁军手。是晨，林虎知德安不守，下令向建昌（今南城）、吴城转移，德安陷。同日瑞昌、南康亦陷。

△　夜，冯国璋率部抵安徽宿州，随遣其先头部队十九混成团于2日晨由固镇渡淮河进逼蚌埠。午前，蚌埠陷。讨袁军撤往临淮关。冯于当日进驻固镇。

△　袁世凯任命姜桂题署热河都统。

△　京师警察厅封禁北京《正宗爱国报》及《京话报》，并逮捕《正宗爱国报》编辑丁宝臣，交京畿军政执法处审讯。后该处加丁宝臣以“煽惑军心”、“妨害大局”及私通民国领袖罪名，于19日凌晨4时押赴刑场杀害。

8月2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乘德邮船离沪赴粤谋再举，3日抵福州马尾，得悉广州局势不稳，旋改乘日轮取道台湾，流亡日本。

△　晨5时，袁舰暗袭吴淞炮台。讨袁军开炮还击，中旗舰“海圻

号”瞭望台。战斗未及一小时，袁舰即遁去。

△　拂晓，安徽倪嗣冲所部袁军攻凤台。战斗历12小时，讨袁军失利，午后4时凤台陷。

8月3日　　袁世凯授意化名“寄吾”之亲信密电在香港之暗探谋杀孙中山，允事成之后，“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并奖洋十万元”。

△　袁世凯密电冯国璋、张勋：“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观望，仍以叛军论，勿稍姑息为要。”

△　袁世凯密电冯国璋、倪嗣冲，谓“宁垣取消独立，请仍饬各军迅速前进，克日到宁，以免旷日持久，别生波折”。

△　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

8月4日　　驻重庆四川第三师师长熊克武据蓬溪、西充、南充，定远（今胜武）、合川等县，宣布重庆独立，发表誓师文及正告四川军界同胞文，宣布“直接讨胡（景伊）间接讨袁”。熊被举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即日誓师，通电讨袁。随后，川东各县亦宣布独立。

△　四川革命党人张百祥于川西一带组织讨袁军。张被举为全蜀民军总司令长，是日发布檄文，历数袁世凯、胡景伊沆瀣一气，祸国殃川之罪；呼吁全川军民共讨袁、胡。

△　驻广东第二师师长苏慎初、第五旅旅长张我权倒戈拥袁，炮轰都督府。陈炯明潜往香港，广东取消独立。苏慎初被举为都督兼民政长。袁随即加苏陆军上将衔并给勋三位，提升张我权为第一师师长，以暂安其心。

△　云南都督蔡锷通电全国反对讨袁，声称：“讨袁之名，断难成立”，“讨袁之事，更属悖谬”；提出“所有此次为首发难之人，不能不

按法惩治，以为破坏大局者戒。其余附和者流，但能悔祸罢兵，似可概从宽免”。

△　月初，白朗军2000人与驻河南泌阳周符麟部7000人于泌阳附近百泉山接战。白朗与其弟白圃率部分路夹攻，终将周军击溃，缴获大炮数尊，枪、弹无算。是日乘胜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会师。

△　袁世凯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

△　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实业学校规程》。

8月5日　　黎元洪会同直、晋、鲁、豫、黑、陕、甘、浙、川、黔、滇、桂、闽及新疆14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参众两院，迫速举总统。略谓诸议员“应请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同心协力编制宪法，先将选举总统之一则，即从选举总统入手，或将宪法全部从速制定，即行选举总统。两月之内，一气呵成。国本既定，人心遂安”。

△　熊克武电北京参议院及各省，声明“4日督师宣告独立，期与各省义军共讨元恶”，并宣布本人已被推戴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主持民政。

△　广东省议会以苏慎初辞都督兼民政长职，是日改举张我权为都督兼民政长。

△　蔡锷电袁世凯暨国务院，提出内国战争不宜授职给勋，略谓：“军重在对外，凡非杀敌致果者，均不得荣膺上赏。”“内国战争，实出于万不得已……若胜者膺赏，是以国家品器奖励残杀同胞，恐此后人人只知内竞，无事对外。”又谓：“夫杀同胞之人，蒙非常之赏，得逾分之拔擢，将来对外有功，将以何项勋赏加之？”

△　北京公使团开会，议决对南方讨袁军“不认其为革命性质”，仍认袁世凯政府公文为有效；并应北京外交部所请，相约各国“严守中立”，如有破坏成议、暗助讨袁军者，即“按照国际公法，背约罚

办”。旋又通过决议一项：为便于袁政府搜捕革命党人，“凡华人之旅居北京租界内旅馆者，须逐一严诘”；其与讨袁军通声气者，“即行逐出”。会后并将此决定通示各国驻天津、汉口各领事署，饬“一律照办”。

△　早9时，倪嗣冲驱部众四万，夺占安徽讨袁军驻守之四顶、八公两山。午后4时陷寿州。6日陷正阳。

△　北京政府内务部警政司司长祥寿为该部草拟呈袁世凯密函一件，内称：京师警察厅已“先后将认为与时机有妨害之《民主报》、《民国报》、《亚东新闻》、《华报》、《京话日报》、《爱国报》一律令其停版。复以南京《中华报》、浙江《天钟报》、湖南《女权报》、上海《中华民报》、《民立报》并无在京发行所，经该厅通饬各派报处禁止送阅，并由该厅呈由司令官知照交通部，转饬邮政局勿为递送”。函中并谓：已训令京师警察厅暨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热河、察哈尔都统，对于造谣各报一体按照法律切实办理。

△　日本步兵大尉川崎亨一途经山东兖州，被张勋武卫前军疑为南方讨袁军所派密探，予以拘留，8日获释。此即所谓“兖州事件”。由此构成9月份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之一则借口。

8月6日　　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电驻成都彭光烈第一师、孙兆鸾第二师、刘存厚第四师及驻资州（今资中）周骏师，呼吁勿“为一二民贼守护，使军界同胞自相戕害，以见笑联军，重祸川民”，请尽速起兵，共讨袁、胡。彭、孙、刘、周等接此电后，均不予理会。

△　岑春煊以讨袁形势逆转，4日由广州乘船往澳门暂避，是日由澳门经香港转船赴南洋。

△　冯国璋所部袁军陷临淮关、沙河集，7日陷滁州。讨袁军退集浦口。

△　袁世凯加江西省议会以“谬举都督”、“破坏统一”罪名，令段芝贵、李纯将该议会解散，同时并令用兵各省行政长官或司令官等，停止各该省议会开会。

△　袁世凯任命郑汝成为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8月9日，以吴淞、宝山一带尚有战事，改任郑为淞沪一带接战地域司令官。14日，复令其兼上海制造局督理。

△　袁世凯任命周骏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

△　袁世凯以鄂豫招抚使蒋翊武布告讨袁，下令褫去其军衔、勋位，“由湖北、湖南、河南各都督严行拿办，并着各省都督一体饬属通缉”。9月9日，蒋翊武在广西境内被捕。广西都督陆荣廷奉袁世凯电令，旋将蒋翊武“就地枪毙”。

△　多伦镇守使王怀庆派淮军纵队司令李际春率混成支队往攻盘据内蒙正蓝、正白两旗之库伦蒙军，是日拂晓于正白旗接战。历9小时，淮军胜，蒙军退往正蓝旗。淮军复追至正蓝旗，自9日早9时起再战，连续两昼夜，至11日早8时共歼蒙军六七百名，蒙军不支，急往北路败退。淮军遂将正蓝、正白两旗全部收复。

△　四川都督胡景伊令军事警察厅厅长余司礼封禁成都《四川民报》、《宪演报》、《人权报》，并关闭重庆《新中华报》设于成都之分销处。各报工作人员事先闻风走避。

8月7日　凌晨1时，驻安庆第一师师长胡万泰、第一旅旅长顾琢塘等倒戈拥袁，率所部围都督府，并与讨袁军激战于城郊狮子山。历四个小时，讨袁军失利，柏文蔚率众200余向大通方向转移，旋抵芜湖。胡遂通电取消安徽独立，并电请袁世凯促新任都督、民政长从速来皖。28日，倪嗣冲率部抵安庆。

△　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发出檄文，声讨袁氏爪牙胡景伊，

要求全川7000万父老子弟亟起而共讨之。

△　沪军福字营司令刘福彪被袁世凯以巨金收买，倒戈拥袁。事为上海讨袁军侦悉，是日先行围捕。福字营不敌，溃败。泊于吴淞之袁舰闻炮声，误以为内应，发炮猛轰吴淞炮台。驻守炮台之讨袁军立即予以还击，重创“海圻”舰。余舰逃窜。

△　袁世凯下令查禁社会党，令称：“兹据京师、天津等处呈报，破获社会党秘密机关，搜出种种犯内乱罪证据，并查有勾结外国虚无党，妨碍国际和平情事”，着各省都督、民政长及各军司令官，将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一律严行查禁，并令分别解散及惩治一切“扰害煽乱”之党会。

△　驻河南宛陵（今长葛）刘凤同部起义，会同白朗军占领南阳，宣布讨袁。8日，驻新蔡阎子固部亦起义讨袁，并与刘部会合，一致行动。

△　日政府借口保卫南京领事署及日侨，派巡洋舰三艘、炮艇一艘抵南京。日水兵百余人随即登陆入城。

8月8日　　何海鸣为首之南京革命党人乘代理第一师师长杜淮川赴固镇之隙，率众据江苏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何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推驻南京第八师师长、冯国璋婿陈之骥为江苏都督。陈之骥闻讯，即率兵围都督府，拘何海鸣，余众被迫解散。南京二次独立仅数小时即告取消。

△　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福建取消独立。14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及各部总长，报告福建取消独立及一切复旧经过。

△　孙中山自台湾基隆抵日本门司港，次日抵神户。孙中山在台赴日舟中电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等，谓：“文如远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9

日船抵神户，并望与同志叙晤密商。”

△　袁军李纯部占领江西吴城，李烈钧部退向南昌。

△　胡景伊派川东宣抚使兼第一支队长王陵基率兵五营攻熊克武所部讨袁军。10日，王部陷南充，旋西充亦陷。12日，两军于烈面溪（今烈面镇）激战，讨袁军先胜后负，定远陷。

△　袁世凯加广东省议会以“甘心效逆”罪名，令龙济光“即援照江西办法”，“立将该省议会解散”；“其签名助逆各议员，犯有内乱罪名，应即一并确切查明，按律究办”。

8月9日　　江西宣布独立后，被举为该省都督之欧阳武、省长贺国昌，见袁军节节进逼，讨袁军处境日劣，是日离南昌潜往吉安。欧阳武只身逃走，赴青山自称“止戈和尚”。

△　袁世凯任命雷震春兼陆军第七师师长，王汝贤为陆军第八师师长。

8月10日　　袁世凯据黎元洪所请，准将居正、胡秉柯、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按照内乱罪犯，咨参众两院革除议员名籍；其得有勋位、军职者，一律褫夺，按律拿办。

△　袁世凯加谭人凤、程潜、陈强、程子楷、唐蟒以“谋叛民国”、“甘心叛逆”罪名，下令撤销谭人凤长江巡阅使，褫夺程潜等人军职，着湖南都督谭延闿饬所部“严拿惩办”，并着各省都督、民政长“一体严缉”。

△　袁世凯任命黄士龙为广东护军使。

△　浙江都督朱瑞加杭州《汉民日报》编辑邵振青以“扰害治安”罪，将邵杀害。

8月11日　何海鸣在南京第三次宣布独立。驻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将宣布独立之革命党人何海鸣拘捕后，是日凌晨渡江往谒冯国璋，请速派兵入城镇压。乃陈方出城，第一师第二十九团即将何海鸣释放并拥入都督府，仍举何为讨袁军总司令，再次宣布独立。是为南京第三次独立。二十九团随将第八师司令部封闭，击溃该师第三十一团及卫戍团，夺回天堡城。陈之骥见大势已去，乘日舰回沪。

△　李烈钧率部回防南昌，宪兵司令廖伯琅闭城不纳，李部越城而上，打开城门，迎李入城，廖即逃走。李烈钧在南昌重新整编部队，任伍毓瑞为南昌卫戍司令，向乐化、樵舍一线布置防务。

△　浦口讨袁军派代表往滁州向冯国璋“归诚”。12日，袁世凯令参陆两部电冯，告以“务先令其缴纳枪械，庶无后虑”，并嘱“仍饬我军迅速进发，妥为防范”。

△　龙济光率部自肇庆抵广州，逐苏慎初、张我权，旋与据守观音山之讨袁军激战。13日午后，讨袁军不支撤离。18日，袁世凯下令犒赏龙部，并下令将苏慎初、张我权“褫革军官军职及所得荣典，交龙济光认真查办”。

△　参议院议长张继自上海致函参议院全体议员，借口脑病，提出辞职。20日，参议院开会议决，同意张继辞职。

△　袁世凯令段芝贵兼安徽宣抚使。

△　日军中尉西村彦吉经汉口刘家庙袁军司令部，守军疑为南方革命党人伪装，将其拘留，旋被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开释。此即所谓“汉口事件”，由此构成9月份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之第二借口。

△　中日兴业公司总会在东京成立，资本总额500万日元，中日各半。按：该公司原为孙中山于是年2月赴日考察铁路及实业时所发

起，此次正式成立，原定举孙担任总裁，但因二次革命起，日本各大资本家咸以孙“处于嫌疑地位”，故将总裁一席暂空，待日后补选；副总裁由日人仓知铁吉担任。

8月12日　柏文蔚自芜湖行辕电安徽60县知事，历数胡万泰险诈百端、倒戈拥袁之罪，令各知事勿“为胡贼所煽惑”，并将“所有丁漕厘税赶紧摧解来芜，接济军饷”。

△　袁世凯加熊克武“附和乱党，图谋背叛”罪，令即褫革军官、军职，责成四川都督胡景伊督饬所部严拿惩办，并着黎元洪、张凤翙、蔡锷、唐继尧“会合兜剿”。

8月13日　谭延闿迫于各地讨袁军失利形势，是日出示布告，宣布湖南取消独立，呈请辞职。布告称：“现在闽、粤、宁、皖，已均各取消独立，大势所趋，皆以保境息民为主。湘省既不能以独立为支柱，又何可以全省为牺牲？……本都督已一面发布命令，即行罢兵，一面电达中央，静待处分。”

△　吴淞炮台失陷，上海讨袁军失败。早8时，刘冠雄所率海军会同李厚基旅夺占吴淞南北塘、狮子林各炮台。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宝山讨袁军司令钮永建率部千余人退守嘉定。陈其美逃入租界躲避。

△　张勋抵龙谭。次日拂晓，张勋所部武卫军偕第四师袭占紫金山。南京讨袁军守城部队发炮反击，中午夺回天堡城，轰击紫金山。下午6时，张勋部弃山而走。

△　驻隆城（今隆昌）川军步、骑、炮、工、机关枪队等共20连宣布归附驻永川讨袁军，14日夜正式通电讨袁。15日晨，永川讨袁军第一支队进驻隆城。

△　吉林当局奉北京国务院令，借口统一共和党吉林支部主办之《新吉林报》为“乱党机关报”，将该报封禁。

△　台湾同胞捐款百万元为讨袁军经费。

8月14日　　袁世凯通令缉拿安徽二次革命领导人龚振鹏、郑芳荪、张汇滔等21人，着各省都督、民政长饬属一体严拿。

△　武卫军陷镇江，张勋抵瓜州设营。

△　袁世凯令海军总长刘冠雄兼南洋巡阅使。同日，任命萨镇冰督办淞沪水陆警察事宜。

△　袁世凯任命李准为广东宣慰使。

△　黎元洪通电各方代为谭延闿“表明心迹”，电称“湘省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要皆谭督一人维持之力”，“仍请诸公再设法挽留，以平湘乱”。

△　香港英总督宣布：奉英政府训令，永远不准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胡汉民、岑春煊到港。

△　共和党在袁世凯授意下急电促章太炎入京。是日晨，章自津入京，住共和党本部。袁世凯令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派密探予以监视，继被袁软禁。

8月15日　　午前，武卫军前队自镇江潜抵南京近郊，乘讨袁军不备，突占紫金山、天堡城。

△　北京警备司令部据江西宣抚使段芝贵密电，以江西籍众议员徐秀钧系李烈钧同党，是日乘徐由津至京之际，将其逮捕，旋解往江西交段芝贵审讯，9月2日早8时徐被害。

△　孔教会代表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自8月21日至10月17日，浙江都督兼民政长朱瑞，山东代理都督靳云鹏、署民政长田文烈，临时副

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河南都督张镇芳、民政长张凤台，署湖北民政长夏寿康，福建护理民政长刘次源，吉林护军使孟恩远，广西都督陆荣廷，署江西都督李纯，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云南护理都督谢汝翼、署民政长李鸿祥等先后通电，促参众两院尽速通过陈焕章等“定孔教为国教”之申请。

8月16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湖南省议会。湖南省议会于7月29日致电参众两院及各省议会，请“由各省通电取消参众两院”。后该电被汉口电报局截留，呈报袁世凯。是日，袁加湖南省议会以“侵夺国会权限，违背约法”罪，着湖南都督谭延闿立将该省议会解散。

△　孙中山离神户赴东京，旋胡汉民、廖仲恺来同孙中山会合。

8月17日　广东新会东北之天河、周郡两围基决口，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至22日，水势继涨至9尺有奇，临近各地均遭波及，居民病饿淹毙者为数极众。

8月18日　南昌在袁军马继增旅与张敬尧团水陆夹攻下失陷。李烈钧率部千余人转移丰城。江西讨袁军失败。

△　夜，南京讨袁军发动反攻，20日晨复将天堡城夺回。天堡城五易其手。至21日午后，天堡城终为袁军所陷。

△　袁世凯令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暂行代理山东都督，田文烈署山东民政长。

△　孙中山、张继抵横滨，19日抵东京。

△　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加广州《平民报》以“袒护逆党”、“煽惑国民”罪名，迫令该报“永远停版”。

△　库伦蒙军千余名进犯辽源（今吉林双辽）。奉天都督张锡銮派步兵统领吴俊陞率部迎战。蒙军败，被歼40余名，余均逃窜。

8月19日　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应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何海鸣之请，是日夜率部2000人自芜湖抵南京。芜湖仍由龚振鹏防守。20日，柏率队入城。临时都督张尧卿及何海鸣开会欢迎，并举柏文蔚为江南大都督。柏随即发布《告军士文》，鼓励将士对袁贼“齐心合力，声罪致讨”，“扫除专制”，“还我共和”。旋又重新改组行政机构，由柏文蔚任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何海鸣仍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张尧卿任要塞司令。

△　冯国璋所部袁军前队由浦口渡江抵下关。驻守狮子山炮台之讨袁军俟其登岸即开炮轰击，冯军死伤甚众。

△　孙中山于东京致函日本《教会科学杂志》，内称：“此次中国战事全由袁世凯玷辱其总统之职而起……今袁世凯继满清而行专制，我必为国民之正义而战。现虽大受创挫，然最后之胜利决为吾人获之无疑。”

△　岑春煊抵新加坡。

△　黎元洪串通汉口日领事署，将设于日租界之革命党地下机关理发会破坏，捕17人，内有妇女四名。

△　北京国务院密电福建都督府，指福建《民报》、《群报》、《共和报》为“乱党机关报”，“确系有意煽乱”，着将三报“即日封禁”，“并将主笔苏郁文、黄光弼、陈群等严拿务获”。电中并令逮捕积极赞助福建独立讨袁之福州进步团体桥南社重要成员林斯琛、郑祖荫、彭荫祥、黄展云、刘通等人，着“尽法惩治，毋任漏网，并将乱党机关部及国民党克日查明封禁”。福建都督孙道仁接电后，即会同护理民政长江畲经饬属分别封禁、查拿。20日夜，福州警察厅将上述三报馆先后封闭。三报均于次日被迫停刊。28日，黄展云、陈群、祝茂郊等三人被捕，余未获。

△　河南商办洛潼铁路（洛阳至潼关）收归国有。

8月20日　黎元洪电复胡景伊，告以援川鄂军一团，克期由荆州赴川；陕省已派一师，22日前可达大宁；并拟电商滇黔两督拨派军队赴援。

△　午后，袁舰“海圻”、“海容”、“永丰”及水雷艇一艘抵镇江。23日，“南琛”、“楚有”、“镜清”、“应瑞”四舰及运载袁军之“新康”、“顺大”两兵轮继达，以备水陆会攻南京。

△　刘师复主编《晦鸣录》在广州创刊。此为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之机关刊物。《晦鸣录》系周刊，其中各篇均为中文及世界语两种文字对照。该刊仅出二期，即被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于9月8日迫令“永远停版”，晦鸣学社亦同时被封。12月20日，该刊转澳门出版第三期，并更名《民声》。《民声》继出二期后，龙济光奉袁世凯令，串通澳门葡萄牙当局又将该刊封禁。

8月21日　袁世凯加岑春煊以“反抗中央，图谋不轨”罪，着“沿边各都督、民政长一体拿办”。

△　袁世凯令周自齐署中国银行总裁。

8月22日　凌晨3时，熊希龄自热河抵京，27日正式受任国务总理职。

△　众议院粤籍议员伍汉持，前因请袁世凯辞职以免战祸，至获罪逃匿天津。是日，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秉承袁意将伍以“谋乱”罪枪毙。

△　驻法、德、比、俄公使胡惟德、颜惠庆、王广圻、刘镜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北京外交部、参众两院，请速先订定选举法，举定总统后再订宪法。

△　袁世凯令广东镇抚副使龙觐光兼管粤江水上警察，并节制内河外海各兵轮炮舰。

△　广东都督龙济光悬赏通缉该省国民党要员陈炯明、邓铿、朱执信、姚雨平、廖仲恺等10人。

8月23日　新任江苏交涉员（即上海交涉使）张煜全奉北京国务院令，加上海英租界《中华民报》以“假造事实，诋毁政府”罪名，是日饬会审公堂票传该报总编辑邓家彦到案，会同英副领事加以审讯，后竟强行判决将邓押西牢六个月，《中华民报》罚款500元。9月17日，该报终以债务关系被迫停刊。

8月24日　云南都督蔡锷致电袁世凯暨参谋部、陆军部，报告滇军援川情形，称滇军混成旅巧（18）日由省出发，9月中旬可分抵叙、泸，又防军两营巧日由昭出发，奉命暂驻滇边防待命。

8月25日　夜，冯国璋军大队在刘冠雄所派“海琛”、“应瑞”、“楚有”、“永丰”等舰掩护下，自浦口渡江，至下关登陆。

8月26日　晨，讨袁军于南京朝阳门城头高插张勋军所用旗帜。攻雨花台之张勋部炮队望见旗帜，误以为攻朝阳门之步兵业已得手，即嘱骑兵先入。及至骑兵拥入城内，讨袁军暗藏之机枪即猛烈射击，全歼张军一营。后到者再蹈前辙，复被城内外所伏讨袁军毙伤千余人。

△　袁世凯令贵州都督唐继尧兼滇黔援川军总司令，以镇压四川讨袁军。

△　浙江前处防统领、浙督朱瑞同学何知章电朱瑞，历数袁世凯六大罪状，斥朱瑞宣布浙省“中立”，“岂惟无勇，抑甚无耻”，促其“从速宣告独立”。31日，朱瑞发布通电，为其首鼠两端、宣布“中立”进行诡辩。

△　外交部任命周诒春为清华学校校长；周未到任前由赵国材暂行代表。

8月27日　　夜，袁军会攻南京。张勋军攻太平门，冯国璋军攻下关，雷震春部攻聚宝门，刘冠雄督舰助冯军攻狮子山炮台。讨袁军奋力防守，袁军终未得逞。

△　黄兴抵东京。当日与先期抵东京之孙中山会面，战友重逢，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意见分歧。

△　参众两院同时开会，讨论政府逮捕议员事，均异常愤慨，一致停止开会，举定王正廷为代表往见袁世凯，要求说明逮捕议员之理由。

△　袁世凯任命李纯兼江西民政长。

△　财政会议在北京开幕。北方八省代表出席，其他各省在京人员及财政部重要人员亦列席。财政次长梁士诒在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节饷、减政、整理旧税、增加新税四项政策。

△　北京警备司令部迭接段芝贵、雷震春、鲍贵卿25、26两日密电，指参议员朱念祖、赵世钰、张我华、高荫藻、丁象谦五人，众议员刘恩格、褚辅成、常恒芳三人，与南方讨袁军领袖关系密切，谋乱京师。是日警备司令部加朱等八人“串通乱党”罪，予以逮捕。

△　江西宣抚使段芝贵向袁世凯呈报：去岁6月7日被袁以兵力强行撤职之秦州军政府都督黄钺，自长沙去函指斥袁世凯调兵江西为“固君位”，并呼吁袁军“顿兵不动”，使袁难遂其谋。是日袁世凯加黄钺“背叛共和”罪，令湖南都督谭延闿“严拿惩办”，“并着各省都督、民政长饬属通缉”。

△　南京商会派代表出面劝讨袁军让城他去，并表示愿付巨款以酬，何海鸣愤极，即派卫队及炸弹队将商会代表驱走。

△　汉阳兵工厂工人联络当地部分驻军，约期于是日凌晨3时举事。黎元洪闻报，当即令护卫、近卫、巡缉各队分守要隘，并急电汉

口镇守使杜锡钧调驻汉口吴庆桐营士兵500名，于27日凌晨1时暗渡汉阳，占龟山。吴庆桐旋率部围兵工厂，捕杀为首工人三名，并将被害者家属拘禁。其后，复连抄工人住所40余户，捕56人，一并解往武昌，交军法课讯办。

8月28日　国务总理熊希龄开茶话会邀集参众两院议员各党代表发表政见，表示决定完成责任内阁，使中国为法制国。

△　袁世凯任命马继增为陆军第六师师长。

△　教育部代总长董鸿祎向各校职教员发布训令禁止学生入党，内称“遇有此等学生，务宜切实告诫，使之专心向学。如屡戒不悛，应即按照学校管理规程予以惩戒或径令其退学，毋稍姑宽”；职教员“毋得借学校机关，为党略上之作用”。

8月29日　芜湖于袁军汤芗铭、胡万泰部水陆夹击下失陷，龚振鹏出走。安徽讨袁军失败。

△　柏文蔚因与何海鸣、张尧卿意见不合，离南京潜赴芜湖，旋抵上海。是日早8时，离上海赴日。9月5日抵东京。柏走后，由何海鸣代理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

△　深夜，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秘密逮捕天津国民党交通部主任干事任知方及总务科主任干事邹耀廷，旋于30日下午解往北京，交京畿军政执法处。9月1日，未宣布任何罪状即将二人枪毙。天津国民党交通部亦被破坏。

8月30日　晨，何海鸣召集讨袁军各师高级军官会议，决定于31日晚9时分四路进击盘据紫金山、天堡城、幕府山及朝阳门外之袁军。届时，因一师违令不发，而其余各师亦均未得手，致扭转战局之计划未能实现。

△　内务部下令解散中华民国自由党。内务部秉承袁世凯既定意

图，借口自由党“擅用印文”，“所结党徒又多下流社会；当兹人心不靖，诚恐匪徒煽惑，滋生事端”，于是日下令将该党各省支部一律解散。

△　库伦蒙军头目烈拉玛、忙及巴图率队突袭途经内蒙正蓝旗属力不胡图格地方之多伦驻军，旋被击退。31日晨，烈拉玛等复率大股蒙军5000余名再袭多伦驻军于哈噶蹋拉地方。当由淮军纵队司令李际春等督队奋战。至晚，蒙军伤亡过半，急往大王庙方向逃窜。9月1日，淮军于奎素地方宿营。2日晨7时，蒙军800名突抄该军后路，经该军并力猛击，此股蒙军终被全歼。

8月31日　社会党在上海召集特别联合大会，出席党员代表百余人，议决请愿国会力谋恢复。

9月

9月1日　上午9时，武卫军以扬州徐宝珍第四师为前队，炸毁南京城垣入城。11时许，冯国璋军前队入太平门。旋雷震春部亦开入城内。下午5时，袁军大队经神策、凤仪二门入城。北极阁、富贵山、骆驼山、狮子山各要塞先后为袁军所占。讨袁军小部叛变降敌，大部且战且退，陆续自大南门及水汉两西门夺路而出。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失败。

△　冯国璋军火烧南京下关。烈焰三日不熄，大观楼至靖海寺，悉付之一炬。下关房屋十焚八九，居民无处栖身。

△　张勋军攻陷南京后，狂肆屠戮，日本侨民三人亦被杀。此即所谓“南京事件”。由此构成是月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之第三项借口。

△　西藏宣抚使陈贻范离京赴印度，与英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代

表会商藏事。

△　参谋本部于2月初在北京南苑开始筹办航空学校，是日正式开学，共有学员62名，秦国镛任校长。

9月2日　　晨，何海鸣率南京讨袁军余部自南门突围，旋潜赴上海。

△　凌晨4时，雷震春部及徐宝珍部合攻驻守雨花台之讨袁军。激战6小时，讨袁军失利。上午10时，雨花台陷。

△　李烈钧抵长沙，旋乘船潜往上海转赴日本。

△　倪嗣冲率部入安庆后，认为倒戈拥袁之第一师师长胡万泰手握兵权，事事掣肘，是日密电袁世凯，指胡反复无常，实为“皖乱”祸首，“现在乱事未平，固不得不笼络驾驭，借定反侧”，但嗣后胡“如再通电，务请置诸不理”。

9月3日　袁世凯令免江苏都督程德全职，以张勋继任。

△　参议院选王家襄为议长。

△　袁世凯任命朱熙署江苏陆军第二师师长。

△　袁世凯令免蒋百里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以曲同丰继任。

△　早8时，孔教会在北京国子监举行秋丁祀孔。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主祭，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前往献香，梁启超、陈昭常、王锡蕃、陈焕章及日本顾问有贺长雄等均与祭。会上梁士诒、梁启超等并发表尊孔演说。

9月4日　　袁世凯令准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辞职，以外交次长曹汝霖、财政次长梁士诒、司法次长汪守珍、农林次长罗振方、交通次

长叶恭绰暂行代理部务。

△　众议院开会，通过张耀曾、谷钟秀、郑万瞻提出之《议员保障法案》，凡四条。

△　晨，冯国璋、张勋入南京。

△　坚决讨袁之安徽宪兵司令祁耿寰，是日被驻安庆第一师师长胡万泰捕获杀害。

9月5日　　众议院议决先定总统选举法及其权限，于选举总统后再定宪法。6日，将此议案咨达参议院。8日，参议院议决通过。

9月6日　　袁世凯以张勋所部武卫军在南京奸淫抢劫，使北军“丧尽名誉，大干军律”，是日电令各该长官，对奸抢有据之士兵，立按军法严办。

△　袁世凯令免江苏民政长应德闳职，以韩国钧继任。

△　参议院议员周廷励、朱兆莘在北京发起组织集益社，是日正式成立。该社以广东省籍议员占多数。

9月7日　　袁世凯以北军在南京抢掠烧杀遭致外人抗议，是日令各统兵大员严申诫令。

△　铁路协会（负责人梁士诒）、潜社（由国民党分出，负责人马小进）、集益社（负责人朱兆莘）、超然杜（负责人郭人漳）、国会同志会（负责人李庆芳）等在北京组成袁世凯御用之公民党，该党以梁士诒为党魁，通电宣布政见，鼓吹从速举正式总统。

△　长沙革命党人地下机关于3、5两日连遭破坏，密谋举事之为首党人刘崧衡亦于6日被捕遇害。长沙驻军中谋举事者知事泄，乃急于是日傍晚提前行动，后遭镇压失败。为首诸人被处死，余均被迫缴

械。

△　袁世凯以南京“重遭惨劫”，电饬郑汝成运米5000石赶办急赈，并饬财政部拨银10万元，接济南京灾民。

△　南京日领事署传信员于传信途中被张勋军所阻，并撕毁、践踏该员所携之日旗。为此，驻南京日领向张勋提出抗议。

9月8日　　川军王陵基部攻合川。熊克武亲率讨袁军数千人与之激战于大石桥。讨袁军先胜后负，9日合川失陷。至此重庆屏障失，粮源亦绝。

△　重庆市商会暨农工教育各会代表通电陈述四川民生痛苦情形，望大总统、副总统遴派贤员调处，力取和平。

△　京畿军政执法处将5月29日为首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之徐企文、柳人环二人枪杀。

9月9日　　日本政府就兖州、汉口、南京三项事件特开阁议，训令驻京日使山座园次郎向北京政府正式交涉。10日，山座面晤袁世凯，就上述三事提出口头抗议，并于次日照会北京外交部，要求惩凶；赔款；严惩肇事有关人员；北京政府公开向日政府道歉；张勋须亲赴南京日领事馆道歉；行凶之军队须至日领事馆前行举枪礼以示惩戒。13日，北京政府照复日方，所提条件“一律承认”。

△　北京《国报》因日前发表社论，反对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文内并有“御用党”字样，是日凌晨1时被京师警察厅封禁。该报经理黎宗岳亦被捕，旋交京畿军政执法处讯办。

9月10日　袁世凯任命屈映光署浙江民政长。

△　冯国璋离南京北上，12日午抵北京。所部袁军均移驻浦口至徐州一线。是月下旬，冯返抵南京，后因与张勋不和，11月1日复离

南京改驻浦口。

△　陈其美、居正、田桐离上海，林森离北京，分赴日本。

△　自是日起，白朗军大队围攻河南泌阳，连续三昼夜。13日，参陆两部急电河南都督张镇芳，令速派军队驰往解围。

△　黎元洪电复重庆商会暨农工教育各会代表，称政府已调滇、黔、陕、鄂各军援川，川事自有正当之解决，望传语商民毋庸过虑。

△　北京军警联合会在街头散发传单，宣布议员九大罪状，并声称其有议员潜谋不法者，当与全国共弃之。

△　常州地方审判厅加当地《公言报》以“附和乱党”罪，迫令停刊。

9月11日　袁世凯任命熊希龄内阁各部总长：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工商兼农林张謇，交通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熊希龄兼。熊希龄内阁组成。

△　深夜，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弃重庆出走。

△　川边炉城（打箭炉）统领张煦响应熊克武，举兵独立，旋为川边经略使尹昌衡部在丁桥附近所败，张即遁走。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张煦。

△　驻京奉线昌黎站日兵一名，因强夺站上小贩食品，发生争执。华警出而排解，该日兵竟回营纠集同伙数十人，持枪前往警署，击毙华警五人。18日，北京外交部就此事向日公使山座园次郎提出抗议。山座坚持须实地调查，双方乃派员前往昌黎。

9月12日　援川黔军第一混成旅黄毓成部进据重庆，四川讨袁军失败，杨庶堪出走。二次革命至此结束。

△　午后1时，参众两院首次联合开会，决议咨请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五日内将宪法中有关选举总统之必要部分从速拟定，再交两院议决。

△　袁世凯就武卫军攻陷南京时杀害日侨三名并抢掠日商店铺，招致日方抗议事，下令“着江苏都督张勋迅速查明戕掠凶犯，按军法从严治罪。……所有被戕掠之日本商民，着李盛铎查明损害情形，按数赔偿，并妥为慰问”。

△　袁世凯任命马福祥为甘肃、宁夏护军使兼署宁夏将军。

△　北京军警联合会致函参众两院，警告该院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时毋掉轻心，并促加强中央政府权力，以谋统一。

9月13日　袁世凯任命李开侁署广东民政长。

△　北京政府分电四川、云南都督，西姆拉会议开议在即，请转告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勿得进兵西藏，以防意外。

9月14日　胡景伊以重庆已克复，电黎元洪，请转饬援川各军停止前进。

9月15日　何海鸣自上海密函潜迹北京之革命党人鼎公，同意按其所拟计划，于选举总统日设法炸毁会场。鼎公等接信后，即依所嘱与在军警界有年之党人某密谋筹划。旋经某与京师警卫队分队官陈周膺联系，陈允承担此任。后以携运炸弹之党人胡侠魂逾期方至，事未果行。陈周膺遂再谋10月10日袁世凯于太和殿就正式总统职时刺袁。10月9日，陈被派于次日司太和殿外戒备之职，乃要求警卫官改派殿内，致启其疑。当晚陈被捕，并于其之住所搜获炸弹多枚，事泄。陈于10月14日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杀害。

△　欧阳武在江西吉安青原山中被江西水巡局局长倪占魁逮捕，是日解至南昌交李纯收押。27日，李纯遣人将其押解北京，旋被陆军

部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9月16日　袁世凯以贵州党人方策、蔡奎祥、简书、许嘉谟四人在京组织冤愤团，散发宣言书，加以“昌言煽乱”、“甘心附逆”等罪名，下明令通缉。

△　袁世凯令准免四川民政长张培爵本职。

△　凌晨4时，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奉袁世凯令，分别加该省警察厅厅长陈景华、韶州清乡督办陈仲宾以“密谋煽乱，残害民命”及“私运军械，接济赣匪”等罪名，将二人杀害。

9月17日　袁世凯任命靳云鹏署山东都督。

△　袁世凯以贵州援川第一混成旅入据重庆，通令嘉奖该旅长黄毓成，特授勋五位，并任黄为重庆镇守使。

△　黎元洪电复胡景伊，谓已令援川各军停止前进，并另电黄毓成留渝，且俟后命。

△　孙中山在东京访日本财阀涩泽荣一，希望援助讨袁。

△　外交部就兖州、汉口、南京三事件，派代表前往日使馆向日本政府递交道歉书。同日，在南京日领监视下，两名武卫军处死，94名被判监禁两月，营长被判监禁10年，该营其余各官一律免职。28日上午，张勋亲赴南京日领事馆谢罪。下午，陆军中将白宝山奉张勋令率队900名至日领事馆前行举枪礼三次。北京政府承认赔款641845元。

△　广州兵工厂总理、美籍华人容闳之子，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指为与讨袁军有关，将其逮捕，并“蹴唾”其护照，加以虐待。美政府闻讯，于是月中旬电令驻京美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惩办虐待容氏之官兵、谢罪、赔款等项要求。是日，北京政府照复美使，对所提各条一

律承认，国务总理熊希龄并亲至美使馆道歉，其事乃罢。

△　奉天都督兼民政长张锡銮与日本南满铁道会社签订借款200万日元合同，以奉天烟、酒、牲畜等税为担保，用于该省行政费。

△　蔡元培抵新加坡，晤岑春煊后，即赴德留学。

△　教育部定旧历八月二十七日（阳历9月27日）孔子生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并在该校行礼，是日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请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9月18日　黎元洪电胡景伊、周骏、黄毓成，商重庆善后办法，主张由黄镇守使直接呈商胡景伊都督，川军周（道刚）王（陵基）两师长暂缓东下，以免川黔各军发生意外冲突。

△　川军第二师师长王陵基率部开抵重庆，黔军黄毓成旅关闭城门，不许川军入城。20日，川军周道刚第三师前队抵浮图关，同黔军发生冲突，城内外炮声不绝。

△　教育部公布《颁发历书条例》及《翻印历书条例》各七条。

△　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在北京复会，中国方面代表为外交总长孙宝琦，俄国方面代表仍为俄使库朋斯齐。会间，孙宝琦要求仍就5月20日双方初步达成之协议六款进行协商，俄使不允。

9月19日　袁世凯任命韦绍皋署广西民政长。

△　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陕甘筹边使。

△　内务部通令“京师及地方现任警察官吏均不得加入政党，其已经列党者迅即宣告脱离”。

△　黎元洪电令鄂省各知事，重申禁烟令，以免英国借口复运印烟入华。

9月20日　重庆镇守使黄毓成电黎元洪，告以川军刘（存厚）、周（道刚）两师前队已到渝，奉胡督命驱逐黔军，请速饬开抵夔府之鄂、陕军队，星夜前来，以武力促成川黔两军和解。

△　胡景伊电黎元洪，请转饬湘、鄂两省查缉熊克武、杨庶堪。

△　陆军总长段祺瑞据总统府军事会议决定，是日电张勋将驻南京第一、第八两师“一律缴销军械，即时解散”。

△　宪法起草委员会推定宪法草案第一至第九章各章起草人，至是该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草案工作。

△　上海自由谈话会所办《自由杂志》创刊，由童爱楼编辑。该刊多滑稽游戏之词，期以此术讥讽时政，免于被禁，然仅出二期即被迫停刊。

△　英公使朱尔典曾于3月间偕同英属波罗岛总督至外交部“声请召北省农户数百家前往波罗岛试行垦殖”。双方议定招垦条款13条及章程11条。经国务会议公决允行，并派谢天保充任驻波罗岛华民垦殖监理员。9月中旬，外交总长孙宝琦将此事经过各情及所订条款、章程呈报袁世凯。是日，袁批准照行。

9月中旬　广西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帮统刘震寰率部举事，攻县署，释囚犯，夺枪械，旋占全城，宣布独立；并设北伐军司令部，誓师讨袁。广西都督陆荣廷调兵星夜赴柳州镇压，经五昼夜巷战，讨袁军失败，为首诸人除刘震寰逃脱外，刘古香等六人均被捕遇害。

9月21日　凌晨1时，川军王陵基部与黔军黄毓成部为争夺重庆而互相火并。王部不支。午后，经驻重庆英、法、美、德、日五国领事及各团体出面调停，王陵基率部移驻江北。

△　重庆镇守使黄毓成电黎元洪，报告与川军王陵基部冲突情

形，并请大总统派员查办。24日黎复电黄，称已转知胡督，胡已允设法调停，仍请黄设法暂忍目前困难，竭力维持。

9月23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加推张耀曾、汪荣宝、黄云鹏、孙钟、李庆芳五人为宪法条文起草委员。

△　库伦蒙军大队乘驻经棚、大王庙之王怀庆军调防他往，接防之米振标军未到之隙，夺占经棚、大王庙。

9月24日　袁世凯任命陈廷杰署四川民政长。

9月25日　袁世凯任命饶汉祥署湖北民政长。

△　袁世凯任命汤睿为中国银行总裁。

△　四川旅宜绅商各界电陈该省受援川各军骚扰情形，恳责成川督胡景伊督率所部军队，迅清内匪，并恳分饬援川各军申明纪律，严惩抢劫。

△　白朗军2000余人攻湖北枣阳，夜12时占领该县。29日，黎元洪急电袁世凯、国务院及参陆两部“速赐救援”。

9月26日　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通过《宪法会议规则》，凡58条。

9月27日　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是日，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五人宣誓首批入党，孙中山为介绍人并为主盟人。

△　袁世凯公布《议院法》，凡19章94条。

△　黎元洪电北京参众两院，称颂袁世凯“雄才伟略”，“再造共和”，敦请两院速定大计，先选总统。

△　孔教会于孔丘生日在山东曲阜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正式成立总会，会址自上海迁北京，举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各省成立分会或支会，曲阜设总会事务所。

△　北京孔社开“孔子诞日纪念会”，连续三日。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内务部及署直隶民政长刘若曾均派代表参加。袁世凯并捐赠该会3000元以示支持。

△　黎元洪在武昌祀孔。湖北都督府各司长、各道观察使、中学以上校长均至孔庙行三跪九叩首礼。

9月28日　袁世凯令准云南都督蔡锷病假三月，令“来京调养”。云南都督一职由贵州都督唐继尧署理。唐未到任前，着谢汝翼护理。

△　袁世凯任命赵倜为河南护军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9月29日　袁世凯令准黎元洪辞“兼领江西都督事”，并令李纯署理该职。

△　袁世凯以库伦蒙军对河套以西与甘肃省宁夏北路毗连之厄鲁特阿拉善一旗侵扰日厉，特令该旗“就近归宁夏将军节制，以重责成”。

9月30日　袁世凯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代黄毓成为重庆镇守使。

△　袁世凯以盐务筹备处筹备事宜已竣，令将该处改为盐政署，任张弧为盐政署长。

10月

10月1日　交通部与日本递信省在北京签订中日《铁路联络条约》，凡六条，自是日起中日铁路开始联运。

10月2日　白朗军于湖北枣阳拘禁美国、挪威传教士八名。袁世凯闻报，急调河南、湖北两省驻军各一部，分途往攻驻罗山及枣阳之白朗军。8日，驻汉各国领事集议迫黎元洪尽速设法追还被拘之传教士，并将豫南及鄂北数十县之外国传教士154名接至汉口暂避。

△　福建德化县乡民焚毁莲山乡外国教堂两座。袁世凯闻报，令促福建都督孙道仁“添队剿办”。

10月3日　袁世凯令湖南都督谭延闿及各省都督、民政长查禁并解散党人谭人凤设立之改进会以及自由党、人道会、环球大同民党。

△　沈维礼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寰球尊孔总教会。

10月4日　宪法会议议决并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凡七条，规定“大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

△　袁世凯令准云南民政长罗佩金辞职，以唐继尧兼署云南民政长；唐未到任前，着李鸿祥护理。

△　北京政府代表萨福楙与日本政府代表田中次郎在东京签订《日本水线登岸合同》，其中规定：允许日本政府“将海底电线一条自长崎放至附近上海之一处登岸”；并允“于水线登岸之处至上海租界日本电报局，建设一相接必须之陆线”。

10月5日　外交总长孙宝琦与日公使山座园次郎秘密交换《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之文书，其中约定北京政府借用日资修筑四平至洮南、开原至海龙、长春至洮南、洮南至承德、海龙至吉林五铁路。

△　黄毓成率援川黔军离重庆回贵州。次日，川军师长刘存厚率部由永川开抵重庆。

10月6日　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两院议员出席703人。袁世

凯授意其亲信组成“公民团”数千人包围会场，胁迫议员举袁为总统。自早8时至晚10时，经三次投票，袁世凯始以50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　驻北京日斯巴尼亚（今译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俄国、丹麦、法国、葡萄牙、日本、荷兰、德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13国公使于接得袁世凯当选总统之正式通知后，同时照会北京外交部，称“奉本国政府训令，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　下午5时，白朗军自湖北枣阳突围与袁军接战，至晚向西转移。

△　河南革命党人阎梦松奉黄兴命在新蔡谋独立，事泄被捕，是日在开封遇害。同时遇害之革命党人尚有张蓉芙等29人。

△　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是日串通驻汉口法领事将5日于汉口法租界创刊之进步党报纸《中报》指为“言论不正”，迫令停版。

10月7日　　国会选举副总统，两院议员出席者719人，黎元洪以611票当选。

△　袁世凯任命王瑚署湖南民政长。

10月8日　　瑞士、脑威（今译挪威）两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　河南都督张镇芳以白朗军攻占湖北枣阳，拘禁外国传教士八名事，应驻汉英、美领事及传教士之要求，是日电外交、参、陆各部，提议办法四端，改进剿为和议。

△　江西都昌县城郊会党千余人举事。知事罗成藻闻讯，下乡“查办”，被杀。举事群众旋往攻县城，被李纯调水师镇压，失败。

10月9日　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与中法实业银行总理签订1.5亿法郎《实业五厘金币借款合同》，作为“兴办国家实业与建造公共工程”之用，并议定第一期工程系建造浦口商埠。同年12月5日，双方复补签该合同之附件，以明确原合同中之若干条款。

10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就中华民国正式总统职。同日，黎元洪在武昌湖北都督府就正式副总统职。

△　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借银30万两合同，以芜湖米捐为担保。

10月11日　袁世凯明令所有京外文武官员均着照旧供职。

10月12日　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致电袁、黎、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等，提议：一、首倡讨袁者“固罪在不赦”，即附从者亦应“轻则禁锢终身，重则立置法典”；二、现存社团、帮会“一律从严查办”；三、“请通令京外各处，将国民党一律解散”。

10月13日　中、英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问题。中国代表为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使王海平，英国代表为麦克马洪，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为伦兴香托拉。会议月余，毫无结果，于12月18日暂行停议。

△　袁世凯据署江西都督李纯、民政长汪瑞闿呈报，以参与二次革命之前江西省议会副议长颜丙临、欧阳莘、议员晁用中、吴鸿钧等17人“逆迹昭著，情节最重”，令李、汪等“严密查拿，按法惩办”；赞助二次革命之前省议会议长任寿祺、议员王光祖、涂树霖等17人“于乱事有密切关系”，投票选举李烈钧、欧阳武之议员叶含英、吴肇荆等12人“甘心从逆”，令李、汪等将此29人亦“一律拿捕，分别情罪轻重，讯明究办”。

△　袁世凯任命许世英为奉天民政长。

△　袁世凯令财政部拨银10万元救济安徽旱灾。

△　东蒙各旗第二次大会在长春召开。北京政府派蒙藏事务局副总裁荣勋参加，东北三省代表及各旗王公均与会。会间议商有关东蒙军政、财经数事，至16日闭会。

10月14日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脱稿，凡11章113条。

△　袁世凯任命李鸿祥署云南民政长。

△　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与比利时军火商汉斯·赫尔费德代表签订50万英镑《军事债票借款合同》。

△　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提议修改关税，进口洋货实行值百抽五税则。

△　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钟秀、汤漪、钟才宏、杨永泰、沈钧儒、孙润宇，进步党议员丁世峄、李国珍、蓝公武、汪彭年、刘崇佑等于14日发起组织民宪党，以“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宗旨。是日开正式成立会。20日，发表宣言，声明均“与旧党断绝关系”。列名宣言者除上述12人外，尚有解树强、曹玉德、张治祥等人。

10月15日　　北京总检察厅通缉孙中山、张继及二次革命首要，计沪宁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等36人；赣省李烈钧、欧阳武等九人；皖省柏文蔚等24人；闽省许崇智等七人；粤省陈炯明等11人；湘省谭人凤等16人；蜀省熊克武等二人。

△　袁世凯宪法顾问英人毕葛德、日人有贺长雄、美人古德诺在《法学会杂志》第一卷第八号上分别发表文章，对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之宪法草案肆意批评，为袁世凯扩张总统权力制造舆论。古德诺在《中华民国宪法之评议》一文中，指责宪法草案“欲使大总统处于无

权之地位”，“此种采用内阁制之宪法绝无设立之必要”。

△　白朗军攻克河南新野。

△　原倾附库伦当局之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旗首领那逊阿尔毕吉，率其所部申明拥护北京政府。是日袁世凯下令“晋封郡王，以示优异”。

10月16日　　袁世凯向众议院提出增修临时约法案，要求在新定宪法草案中明文规定大总统不经国会同意即可“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员”，“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并规定“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及“有紧急之需用而不及召集国会时，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

△　袁世凯任命吴炳湘为京师警察厅总监。

△　白朗军攻克河南邓县，旋分兵连克唐河、桐柏、裕州（今方城）、卢氏等县，并设大本营于河南、湖北交界之桐柏山。

10月17日　　农林工商总长张謇抵北京，当即发表农商政策，并于同日偕熊希龄、梁启超同访袁世凯，旋即发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

△　袁世凯令准免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职，改任陈汉第为国务院秘书长。

10月18日　　袁世凯咨宪法会议，指责该会公布《大总统选举法案》为非法，实乃借端与议会争宪法公布权。咨文内称：“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总之，民国议会对于民国宪法案只有起草权及议定权，实无所谓宣布权。”

△　政德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宪法公会诸小党，在梁

士诒操纵下联合成大中党，以夏同龢为干事长。旋即发表宣言书，主张“巩固共和，保持统一”；“采用国家主义，运政治于立宪轨道，以明纲要”。

△　内蒙东苏尼特旗首领扎萨克玛克苏尔札普，率部叛依库伦，是日袁世凯令褫革其亲王爵秩。

10月19日　袁世凯任命高增爵署陕西民政长。

△　袁世凯任命林万里帮办福建善后事宜。

10月20日　袁世凯令国务总理暨内务总长厘定各官吏到任凭限，并严定文官考试任用甄别惩戒各法，次第实行。

△　教育部通电各省，拟详细厘定留学生规程，并决定于新规程未公布施行前，暂停遣送学生出国留学。

△　《生活日报》在上海创刊，宣称以“开导社会，增进人民智识，研究生活问题”为宗旨，并声明该报“无偏无党”。

10月中旬　北京政府以各国均已承认中华民国，特照会各国政府，所有驻外临时外交代表一律改称全权公使。按：在此之前，全权公使一称于袁世凯命令中早已使用。

10月21日　何海鸣潜离沪赴日，是午抵门司，旋即转赴东京。

△　外交部就昌黎日兵枪杀华警事件向日方提出惩办凶手、抚恤被害者家属、调换驻昌黎之日军等六项要求。磋商再四，日方始允抚恤、道歉，但拒不惩凶。外交次长曹汝霖则蓄意袒护日方，竟谓“日兵无罪，何所用谢”。此项交涉旋又停顿，后不了了之。

10月22日　袁世凯以其向众议院提出之增修临时约法案中各条具体意见，并未被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接受，从而加入新拟之宪草，是

日咨达宪法会议，告知已特饬国务院派施愚等八人为委员，出席宪法会议，“代达对于民国宪法意见”，实欲强行干涉制宪。次日，袁世凯未得宪法会议之答复，即将施愚等八人派往该会。宪法会议予以拒绝。

△ 袁世凯聘英人吉利斯吉为总统府海军顾问。

10月23日 《新上海报》在上海创刊，由朱恨孟编辑，宣称以“发挥民意，鼓励民生，改良社会，提倡实业”为宗旨。

10月24日 袁世凯令湖南都督谭延闿、湖南查办使郭人漳“均来京另候任用”。同日令汤芗铭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并于湖南民政长王瑚未到任前，暂行兼理民政长职。

△ 袁世凯任命张鸣岐为广西民政长。

△ 袁世凯令将阿拉善旗、鄂尔多斯旗及伊克昭盟所属之乌审、鄂托克二旗均划归宁夏将军节制。

10月25日 袁世凯以宪法草案中于己不利之条文甚多，而派往宪法会议干涉制宪之各员亦遭拒绝，是日特通电各省军政官员，授意群起反对宪法草案。袁于电中指责该草案之制定悉为国民党议员所破坏，所定条文“直成为国会专制”；并谓“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务望逐条研究……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

10月26日 台湾革命志士罗福星、吴觉民、黄光枢等秘密联络台湾各地爱国人士，谋一举驱逐日本殖民当局，使台湾重归祖国。是日，罗等潜往新竹警察厅缴取枪械，被捕。日本殖民当局随即于台湾各地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先后被捕者共279人，于11月27日在新竹、苗栗两地组织特别法庭严加审讯。罗等慷慨陈词，谓“台湾人本中国人民，断无永久屈服日本之理”，吾等起事乃为“恢复台湾”、“夺回故

土”，今虽失败，将来中国必“重领台湾”。12月4日，罗等6人被判死刑，被判有期徒刑者131人。此即震动一时之“台湾事件”。

10月27日　　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列举财政困窘之情形六端，并吁请各省将应征之入款，“于谋自给而外，应悉数缴于中央”，以救财政危机。

10月28日　　直隶都督冯国璋、民政长刘若曾迎合袁世凯意旨，通电声称“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议草案，种种背谬，不堪枚举”，要求对于宪法草案行政权各条，“务宜殚心研究，详加修改”。

△　袁世凯任命赵倜会办河南剿匪事宜。

10月29日　　江苏都督张勋、江淮宣抚使冯国璋、江苏民政长韩国钧联名致电袁世凯，表明反对宪法草案，并请“从速禁除”国民党。内称：“宪法起草为国民党人所主持……剥夺行政权已尽。”“该党主张奇谬……非将该党从速禁除无以定国本之动摇。”“应请大总统明发命令，将该国民党本支各部一律解散。……一面切实察看该党国会议员，如有迹涉嫌疑者，即行依法究治，以伸国宪，而绝祸根。”

△　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等致电袁世凯，表明反对宪法草案，并请“迅将国会解散”，“驱逐”国民党议员。

△　河南都督张镇芳致电袁世凯，表明反对宪法草案，并请将国民党籍议员“概行开除”。

△　四川都督胡景伊致电袁世凯，表明反对宪法草案，并请“宣布国民党为乱党”。

△　浙江都督朱瑞、民政长屈映光联名通电附和袁世凯，称宪法委员会所拟草案束缚行政，要求参众两院“促其反省，以图补救”。

△　蒋介石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为国内最早加入该党之人。

△　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赵秉钧以是月21日北京《超然报》刊载《顺天府中之黑幕》报道一则，加该报“肆意诋毁军人名誉”，“实足妨害时机”罪名，令京师警察厅“即将该报馆停止出版，一面将该编辑人提讯，认真追究”。30日，警察厅奉令传讯《超然报》编辑章纵瀛，并将该报封禁。

10月30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天坛宪草》。

△　袁世凯任命朱庆澜为黑龙江护军使兼署民政长。

△　交通总长周自齐与中英有限公司订立《沪宁铁路购地借款合同》，借款100万英镑。

10月31日　署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芗铭致电袁世凯，表明反对宪法草案，并请“解散国会”。内称：“解散国会正合人民公意，应请大总统毅然独断，即时解散，并饬下各省切实搜捕乱党，以绝根株。”

△　广东都督龙济光、民政长李开侁通电附和袁世凯，要求制定宪法“须由总统参预”，“须经总统公布”，如各议员坚持反对，则恳请总统解散议员，另行选举；或执行国民总投票，以求真正舆论。

△　贵州都督唐继尧、护军使刘显世、民政长戴戡通电附和袁世凯，要求从速修正宪法草案，“如有谬执前议，敢于破坏者，立予解散”。

是月　陈其美、戴季陶等22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　江苏灌云县农民千余人由高五秃、李佩连率领，宣布讨袁。江苏都督张勋屡次派兵镇压，均被击退。11月底，张勋再调重兵前往。

△　宋案要犯应夔丞自青岛具呈北京国务院，并请转呈袁世凯，公然要求为其“平反”。呈中竟称：“宋教仁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

余荣；武士英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设当时无武士英之一击，恐今日域中未必能成具体之民国矣”；并谓：“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产，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至11月中旬，应竟离青岛抵北京，公然出入闹市。北京政府当局则听之任之。

△ 殷炳继等在北京组织大成社，以鼓吹尊孔读经、导引孝悌为宗旨。北京政府内务部随即批准立案。

△ 国务院指上海《飞艇报》“语多捏造，妨害治安”，令江苏民政长韩国钧“切实取缔”。

11月

11月1日 黎元洪通电附和袁世凯，称宪法委员会所订宪法草案可议尚多，务望两院诸公共体时艰，顾全大局，将宪法草案详加讨论，重行厘定。

△ 袁世凯明令特赦江西都督欧阳武。

11月2日 署江西都督李纯、民政长汪瑞闿联名通电附和袁世凯，称宪法草案“直同亡国之符券”，国会议员“直为造乱之妖孽”，事机危迫，“惟有仰之大总统力维大局，俯顺民情，立将国会宣布解散，另行组织，并将曾隶国民党素有暴烈行为者，通令各省查明，不准再选充议员”。

△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学。

11月3日 袁世凯公布《国籍法施行规则》，凡15条，其中规定有关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出籍、复籍等细则。

△ 教育部通告各省，教育经费不得挪作别用。

△ 护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炳华电袁世凯、国务院，声称宪法草

案“乖戾违法”，“决不能用”，根本解决办法应将两院议员，“凡在国民党籍者，概行开除，另行改选”。

11月4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令称：“此次内乱，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构煽”，“乱国残民，于斯为烈”，应饬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迅将该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仍通行各戒严地域司令官、各都督、民政长转饬各该地方警察厅及该管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决。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隶籍该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同日，袁世凯发布罗织国民党党员及该党议员“作乱及助乱情形、证据”之布告，以为取缔国民党之借口。

△　午后4时，京师警察厅派军警300余名包围国民党本部，连续搜查四小时之久。至晚8时，将该党党员名册及重要文件、档案等一并收缴。该厅并派出大批巡警，分头追缴国民党议员之证书、徽章。数日间，除将自湖口起兵之日起仍隶籍国民党之在京国会议员证书、徽章悉行追缴外，竟将湖口起兵前已声明脱离该党及兼党之在京议员证书、徽章亦概行追缴；并将离京国民党议员之证书等件一律注销。由此京内外被剥夺议员资格者共438人。另有国民党议员马君武等10人被指为“违法当选”，王人文业已“声明辞职”，亦均在“应行注销”之列，合449人。至此，国会遂因不足法定人数无从开议而名存实亡。

△　袁世凯以宪法起草委员会对于大总统“有”（25日）电所指出“荒谬有害”之条文，于二读、三读会时“不予修正改良，反较初次变本加厉”，再次通电全国，再度列举宪法草案之谬误，望各文武长官逐条研究，发表意见，以供参考。

△　云南都督蔡锷被调入京，12日自昆明启程北上，是日抵达。

11月5日　　袁世凯令国务院通电各省，分别举派二人来京，以便召开地方行政会议（后改称政治会议），议商要政。

△　冯国璋联合蒋雁行、徐宝珍等15人通电，指责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定宪法，“乃国民党之宪法，而非共和国之宪法也，乃取缔一人，务令终成为无政府之宪法，而非对我四万万人组织强有力政府之宪法”。要求重加修正，另定条款。

△　广西都督兼民政长陆荣廷通电要求大总统当机立断，定完善之宪法，如议会谬执成见，惟有申诉国民，将该会解散。

△　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公使库朋斯齐签押中俄蒙事声明文件五款，附件四款。声明规定俄国仅承认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而北京政府则被迫承认外蒙古之自治及《俄蒙商务专条》；此外，并于附件中认可“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之境均为外蒙古自治区域”。

11月6日　　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汤化龙报告国民党被解散经过，要求进步党员维持大局，“万不可以感情用事，飘然引去，置国事于不顾”。与会者通过要求袁世凯保留业已脱离国民党籍之议员、设法维持国会、防止株连等三项决议。

△　袁世凯通令各省行政长官，速修复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各“勋臣”祠，“以示优崇”。

△　凌越自上海赴日本东京，是日谒孙中山。是年冬，孙中山派凌越仍返上海主持联络白朗军事宜。

△　外交总长孙宝琦照会俄公使库朋斯齐，要求俄国政府施影响于库伦当局，勿再遣军骚扰内蒙。俄方旋照复北京外交部，以“无法保证我方劝说可产生任何效果”为借口，阴谋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中、俄、库三方会谈。

△　在上海法租界发行之英文日刊《民国西报》，因持论反对袁世凯，是日被驻沪法总领事迫令停刊。

11月7日　　参众两院议员开联合会，赞同进步党维持国会之主张。旋由王家襄、汤化龙两议长面见袁世凯，代表国会议员提出解决办法三项：一、江西起事以前脱离国民党，曾登报声明者，恢复其议员资格；二、其他反对江西事件，发表书状电文等证据明瞭者，恢复其议员资格；三、加入他党，其入党名簿记载其姓名者，不以国民党目之。袁表示此事关系颇大，须政府调查后方能决定。后国务院以调查方式困难，加以否决。

△　袁世凯下令禁止各省增发纸币，并饬财政部迅行派员分驻各省官银钱行号监视一切。

△　黎元洪、饶汉祥联名通电，主张整饬官常。电文列举民初以来各省布政理刑皆有土著官员，其流弊有三，其害有五；提出嗣后行政官吏，自简任官以上，均不得用本省人；司法官自荐任以上，均不得用本省人，各县知事均须距籍500里以外。

△　云南都督谢汝翼、民政长李鸿祥通电认为宪法草案“大背于法理”，应请大总统将“有（25日）电所指各条”提交议会，痛加修改。

11月8日　　北京内务部电告各省都督、民政长称，自各省奉袁世凯令解散国民党支、分部后，“如遇有意存煽惑，登载报纸或印刷品，或散布传单，是即以乱党自居。……应即严饬各地方官吏、警察厅署，一律严加取缔，并就近知照该地邮局不准递送”。

△　陕西都督张凤翙、署民政长高增爵通电指责宪法草案“搅乱政体”，“侮蔑国体”，当然无效，请大总统另设宪法起草机关，审慎定议草案，然后由国会通过，总统公布。

△　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等通电反对宪法草案，并主张“将误国殃民之国会立予解散；另行选举，其叛迹昭著之国民党，亦应一律解散”。

11月9日　黎元洪以“定孔教为国教”一议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是日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民政长，内称：“祀孔配天实为国家万年根本至计”，请袁于宪法未定以前，通令京内外各学校，一律崇祀孔子。

11月10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因国民党员被取消议员资格，不足法定人数，乃自行解散。《天坛宪草》归于流产。

△　奉天都督张锡銮、民政长许世英、吉林民政长齐耀琳、黑龙江护军使兼民政长朱庆澜联衔通电，指出宪法草案谬误八端，主张改良宪法草案。

△　国务院电令各省：“务于本年内按照《文官惩戒法草案》组织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

△　署广东民政长李开侁令警察厅将广州《中国报》、《震旦报》、《国民报》、《粤东公报》、《民国报》、《民生报》六种国民党报纸一律封禁，并拘捕各报主笔。

△　库伦当局伪外务大臣杭达亲王照会俄驻库伦代表密勒尔，表示不愿承认中国之宗主权。

11月上旬　库伦蒙军头目马龙甲率队2800余名猛袭张家口北200余里之驻军。驻军大败，死400余名，伤百余名。

11月11日　山东都督靳云鹏、署民政长田文烈通电要求大总统下令取消原宪法草案，另由各省遴选法理、政治富有经验之人员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

△　察哈尔都统何宗莲通电主张宪法起草委员会应随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之取消而连带取消；宪法草案全文，亦当然归于无效，俟递补议员到院后，另行组织起草。

△　白朗军围攻河南信阳。是日袁世凯急电黎元洪，令速调军队驰往镇压。旋由北京陆军部调拨奉天一混成团，会同河南陆军一旅及驻湖北第二师2000余人奔赴柳林、信阳，与白朗军接仗。自16日至18日，连续激战三日，袁军终未得手。后白朗军以弹药告罄，乃于18日晚主动向南阳转移。同日，白朗军宋老年、李鸿宾等部克河南宝丰。

11月12日　　袁世凯下令取消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令称："统查暴徒之阴谋，一面利用中央议会，一面复欲利用地方议会，无非为攘权构乱之私。若不及早廓清，诚恐地方高级议事机关，长为乱党所利用，影响大局，为害实多。除广东、江西、湖南等省议会附和独立业经饬令解散，另行选举外，仰各都督、民政长迅即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所有省议会议员籍隶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

△　黎元洪、饶汉祥联名通电主张援引大总统令，断自湖口倡乱之日起，所有湖北省、县议会国民党议员，一律追缴证书、徽章，限令即日出会。

△　袁世凯再令各省都督、民政长"通饬所属文武官吏，概不准干涉盐务。无论何项名目，不得丝毫拨用"。

△　袁世凯准署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辞职。13日，教育部委任北京大学工科大学学长胡仁源暂行兼管该校事宜。

△　北京内务部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法律上并无其名"为借口，令京师警察厅即将该会解散，并着饬各区如有该会支部，亦即解散。

11月13日　　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联合发表声明，内称："自11月4日大总统命令之结果，两院议员被取去证书、徽章，至400余人不能到院列席，迭次开会均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不得已于11月14日（星期五）起暂行停发议事日程。"

△　广东都督龙济光、广东镇抚使龙觐光、署广东民政长李开侁联衔通电指陈宪法草案之谬误，务求两院诸公痛加纠正，勿以草案已定之条文而稍涉回护。

△　上午10时，瑞典公使倭伦白向袁世凯递交国书。下午4时，德国公使哈豪森向袁世凯递交国书。

△　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密电俄公使库朋斯齐，令其警告北京政府不得继续镇压叛依库伦之内蒙各王公，否则俄政府将无法约束库伦蒙军进犯内蒙；并谓不能坐视俄在内蒙之贸易因中国军队之镇压而遭受损害。电中并指令库朋斯齐："鉴于内蒙昭乌达盟已为日人势力范围，故可会同日使联合进行干涉。"库朋斯齐接此电后，因恐日方将此预谋暗告北京政府以坐收渔利，乃于15日电尼拉托夫，请允与袁世凯秘密接触，以免北京政府倾向日方而不利于俄。18日，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密电库朋斯齐，准其所请，并嘱以"温和手法"进行之。库朋斯齐旋密晤袁世凯，将俄方意态转达。

11月14日　　袁世凯下令嗣后行政、司法各官吏均应蠲除省界；前经通饬各省民政长毋得以本县人充本县知事，仍应期在必行。

△　上午10时，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向袁世凯递交国书。下午4时，丹麦公使阿列斐向袁世凯递交国书。

△　袁世凯令准工商总长兼导淮督办张謇在北京暂设导淮总局，以便由该局出面，将淮河流域农产收入抵借外债。

△　财政总长熊希龄、交通总长周自齐与英国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代表梅尔思在北京签订300万英镑《浦信铁路借款合同》，用于修筑浦口至信阳之铁路。

11月15日　　内务部再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告以自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后，"凡开会演说反对政府命令者，照有意曲庇党人例拿

办”；“报纸如有登载失实，或故甚其词，任意捏造事实，或訾议命令，淆乱是非，有意为该党辩护者，亦照曲庇党人例拿办”；“凡该党被解散之强硬分子，须设法办理……凡有秘密结社集会者，宜加派军警严令查禁”；“发布广告、传单等项为该党辩护及意在煽惑者，即照妨害治安例，严令查拿”；“国民党支分部每以改一党名、易一匾额希图蒙混，名去实存，务宜清其本源，切实办理”。

△　上午10时，法国公使康德向袁世凯递交国书。下午4时，美国公使芮恩施向袁世凯递交国书。

11月16日　　驻守江阴炮台之海军陆战团第一、二营士兵，因不愿奉调开赴福建，加以接连三个月未发饷银，于当晚9时许哗变。变兵四出抢劫并焚毁商店、民居甚多，至次晨3时许始返。事后冯国璋奉袁世凯密电，于28日凌晨4时将该团团长郭以廉、副官张寿荣及有关各官兵一并处死，继将附近镇压不力之军队尽行解散。12月1日袁世凯始将此项命令正式公布。

11月17日　众议院议员邓毓怡等194人就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及取消国民党议员问题，联名向政府提出质问书，指出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至追缴证书、徽章，直至命令取消议员，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

△　上午10时，比利时公使贾尔牒向袁世凯递交国书。下午4时，日本公使山座园次郎向袁世凯递交国书。

11月19日　　吴俊陞、米振标率部收复前被库伦蒙军夺占之大王庙。

△　沙俄为垄断外蒙市场，以便倾销其商品，是日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密电库朋斯齐，令其尽速电示驻天津及其他各地俄领，以中俄关于外蒙问题声明签订后，尚未商定具体运华路线为借口，对途经

张家口运销中国内地货物至外蒙之商队停发许可证，以便俄国商品得大量输入外蒙。21日，俄外交部及尼拉托夫本人又分别密电驻库伦俄外交代表密勒尔，告知已训令驻外蒙各俄领，以停发许可证、断绝经张家口、海拉尔至库伦之商路运输及增抽赋税等手段，力阻中国内地货物输往外蒙。

11月20日　袁世凯任命汪声玲为福建民政长。

11月22日　国务会议议决，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由财政部咨送各省都督、民政长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11月23日　袁世凯宣告北京解严；并于同日命令该管军警对“不轨之徒敢于溷迹京师潜谋破坏者，即行设法查拿尽法惩办”。

△　袁世凯下令各军统将务以除暴安良为宗旨，所有安分蒙民，切当优加体恤，格外保护，不准丝毫骚扰。

△　孙中山电美国友人荷马李夫人，指出中国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斗争可能是持久而烦冗的，但必胜无疑，因为正义最终一定胜利”。

△　交通部奉袁世凯谕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并通令各电局：“各省议会与地方议事机关，其法定职权应以关系一省为限。所有国家大政及关系国家法令事件，均非各省议会所能干涉。……嗣后各省议会除报告开会、闭会及按法申请解释法令事件，准其电达政府、议院外，凡有干涉国家大政及抵抗中央命令各电，各局均不准转发。该管电局人员如敢故违，由部查明，从严惩办。”

11月25日　内政部发布改良各地看守所之训令，内称：“查阅近来京外各地方检察厅呈报看守所统计月表，收容人数强半逾额。少者数百，多者近千。地方湫隘，疾疫于以勃兴；秽恶郁蒸，死亡不时见告。是使被告人所受之痛苦，较之已决之囚尤为酷烈。”

11月26日　　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是日特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八人为政治会议成员；同时并令再由国务总理举派二人，各部总长每部举派一人，法官二人，蒙藏事务局酌量举派数人，会同各省所派人员，合组政治会议。

△　袁世凯下令厘定尊孔典礼。略谓："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并谓："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应由主管部博考成书，"分别厘定"。同日，袁世凯接见衍圣公孔令贻，授予一等嘉禾章。

11月27日　　袁世凯以前清陕甘总督升允依附库伦，图谋内乱，破坏民国，是日通令京外文武各官及汉满蒙回藏人等毋被摇煽。

△　江西都督李纯通电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国民党议员居最多数，今既解散该党议员，是宪法起草委员已无存在之理由，应主另行组织制宪机关。

△　孙中山致电嘉勉刘谦祥慨捐全年工金1000元助革命军义饷。

△　北京之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即伊斯兰教）等团体，组成宗教联合会，以抵制"定孔教为国教"之议。

11月28日　　署直隶民政长刘若曾通电认为立法不善，必贵治本，主张参议院亟谋改组，议员宜大加核减。

11月29日　　袁世凯令裁撤福建护军使，任命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

△　冯国璋奉袁世凯令，将扬州徐宝珍所部第四师裁撤。是日，袁世凯以"来京另候简用"为词，将徐调离扬州。

△　北京邮政工人因反对北京邮政总稽查马玉昆强行增加送信班次，举行全体罢工。马玉昆闻讯，竟于12月1日另召237人，并将首倡罢工之五、六两支局邮政工人尽行开除。但邮政工人不畏胁迫，坚持斗争。直至12月中旬，罢工仍未停息。

11月30日　　进步党在北京召开该党议员会，由汤化龙主持。会间议决五事：一、对于国会取绝对维持主义；二、请该党国务员表明赞同维持国会与否之态度，如不赞同，则应声明系个人行为，与党无涉；三、将维持国会之主张通知各支分部征求意见；四、向该党理事长黎元洪请示办法；五、该党议员于国会问题未解决前不得辞职或离京。

11月下旬　　潜迹香港之国民党要人朱执信，密遣党员卢作夫妇、谭柱、周义、冯桓、冯橙携运武器前往广东，拟与广州之党员梁秉铎等会合举事。卢等行抵江门（今新会），即被广东都督龙济光所派密探捕获，梁秉铎旋亦被捕。经审讯后，除卢作之妻因怀孕缓刑外，梁等六人均于12月初惨遭杀害。

是月　邓铿等57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　四川都督胡景伊通电，“应请大总统立颁明令，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凡国民党员在两院者，悉行勒令解职，另请非国民党籍之候补者充任。……至民国宪法，请仿法国先例，由大总统派员提出草案，庶良法可期制定，国家之幸，莫大于斯”。

12月

12月1日　　参众两院剩余议员300余人开谈话会，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主持。会上宣读前此公推丁世峄、黄云鹏就非法取消国民党议员所拟质问政府书，与会议员一致签名赞成。

△　袁世凯任命章宗祥为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12月2日　袁世凯公布《知事任用暂行条例》，凡七条；《知事试验暂行条例》，凡26条。

△　外交部就日本使馆照会抗议日船行驶扬子江屡遭搜查狙击事，函请浙江都督朱瑞及江苏都督张勋，加意保护外人商船，毋任军警骚扰，致酿意外。

△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董事会会长盛宣怀与日本国八幡制铁所及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在上海签订矿石价值900万日元之预付契约及600万日元之借款两项合同，用于大冶添设熔矿炉，扩充改良汉阳铁厂、大冶铁路电厂及江西萍乡煤矿电厂洗煤所等项。借款分40年偿还，以分批售予制铁所头等铁矿石1500万吨及生铁800万吨抵债。

△　康有为电袁世凯，请厘定祀孔典礼，增设经学课程，注意考核德行，规定道德方针。

△　奉天民政长许世英电袁世凯、黎元洪、国务院及各省都督、民政长，请袁“令饬教育部以孔道、孔学编入于伦理教科书，定为强迫教育中之必授之课”，不必将孔学定为国教载于宪法，以免“人心之离析”。

△　台湾志士赖来、谢石金、詹墩等10人，于台中武装袭击日本东势角支厅，赖、詹战死，其所率革命志士遂即崩溃。

12月3日　参议院议员张其密、籍宗寅、王家襄、丁世峄、龚焕辰等61人为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事向政府提出质问书，略称政府擅以命令取消与内乱无关的国民党籍议员400余人，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已一月于兹，约法犹在，政体未更，故提出质问，望政府速予答复。

△　参议院议员龚焕辰、郭同、汪彭年，众议院议员牟琳、萧晋荣、虞廷恺等在北京发起组织宪法期成会，是日开成立会，到130余人。主席汪彭年，报告开会之宗旨，会上散发宣言及会章。该会意在维持国会，修订宪法草案。因其宗旨与袁世凯图谋相违，未几即无形解散。

12月4日　上午10时，英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递交国书。下午4时，荷公使贝拉斯向袁世凯递交国书。

△　北京国务院下令查禁《社会杂志》。该杂志系汪精卫在法国巴黎所发行。除由外交部与驻京法使转商法政府禁止发行外，并由交通部饬邮政司电令各处邮局，对递送国内各地之《社会杂志》予以扣留，尤其行销之上海等地，应严加禁止。

12月5日　袁世凯令准福建都督孙道仁“电请来京面陈事件”，任命刘冠雄暂兼代理福建都督。

12月6日　库伦当局伪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抵俄京彼得堡，乞求帝俄给予军事及财政支持。俄政府对其笼络备至，并给予200万卢布新贷款。

12月8日　杨春魁率云南大理哥老会及驻军2000余人，声称“奉孙文、李根源等命令，二次革命”，发动武装起义，杀统兵官10余人，据大理、下关，成立同盟会独立总机关部和迤西总司令部，以杨春魁为云南独立同盟军迤西总司令，宣布脱离袁世凯，即日独立。旋攻占邓川、洱源、宾川、漾濞、剑川、永平、巍山、盐丰等县。云南都督唐继尧派兵镇压，次日大理陷，杨率部突围，旋被焚至死。

12月9日　袁世凯任命刘玉麟为驻英公使，陆宗舆为驻日公使，唐在复为驻荷公使，高而谦为驻意公使，沈瑞麟为驻奥公使。

12月10日　袁世凯令段祺瑞“暂兼代领湖北都督事”。

△　袁世凯令驻荷公使魏宸组开缺回国，另候任用。

△　袁世凯下令汉蒙人民悉泯畛域，同谋乐利，并着各边将军、都统及各路统帅等严切出示晓谕：如汉蒙人民敢有藉端报复扰害者，即按土匪惩办以靖乱源；其汉蒙官员、商民人等，有能劝谕相安，联络亲睦者，准予优奖。

△　署湖南都督汤芗铭封闭谭人凤在长沙创办之中华印刷社。

12月11日　黎元洪于9日晚应袁世凯召，是日晨抵京。

12月12日　袁世凯任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并特派杨士琦、饶汉祥为政治会议委员。

△　袁世凯特赦前湖南都督谭延闿，仍褫夺其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

△　袁世凯令准署湖北民政长饶汉祥辞职，以吕调元继任。

△　袁世凯通令严守军民分治，尊重法权，京外各军队长官务宜恪遵军纪，毋得误用职权，妄事干预。

△　北京孔社于孟轲忌日举行祀孟活动。会间宣读祭文，内称：“世无孔子，尧舜道泯；世无亚圣，孔子道隐”，“亚圣之功，不在禹下”。

12月13日　袁世凯以各界军警近仍有入党之事，再令严禁军警入党。略称：“凡各军警长官等务宜本身作则，未入者必力为屏绝，已入者即声明脱离，并严约所属人等一体遵照。”

△　前清光绪帝德宗及隆裕太后入葬崇陵。袁世凯特派赵秉钧、梁启超、梁士诒、朱启钤、荫昌、崑源、陆建章、马龙标前往致祭。国务院事先通电各省，是日一律下半旗致悼。教育部并通告京中各校

均停课一日。

△　中美国民同盟会在北京开会欢迎美国新任驻京公使芮恩施，到会来宾约600余人。

12月14日　　袁世凯任命张国淦为政治会议副议长，顾鳌为政治会议秘书长。

12月15日　　政治会议开幕。政治会议委员80人，出席69人，赴总统府居仁堂觐见。袁世凯致训词，要求委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切实负起责任，凡利之当兴，害之当除，群策群力，一致进行……转危为安，即唯君是望”。下午，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会式，李经羲致词，要求委员“无负大总统召集本会之盛意”。

12月16日　　22省都督、民政长、护军使等，迎合袁世凯急欲解散国会增修约法之意图，是日由黎元洪领衔电呈袁世凯，内称：国会“开会七阅月，糜帑数百万，而于立法一事寂然无闻”，“现在政治会议已经召集”，应“操制定宪法之全权”，“请大总统饬下国务院咨询各员以救国大计”。

△　袁世凯令免张勋江苏都督职，改任为长江巡阅使，并于同日令冯国璋署江苏都督，赵秉钧署直隶都督。

△　交通部因财政支绌，决定将全国45处邮政管理局缩减为23处，分辖全国7500所邮政分局。

△　库伦当局伪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于俄京致函俄外交大臣沙萨诺夫，告以库伦当局同意参加中、俄、库三方会谈，要求俄方于会谈中给予支持，并表示不承认中国对外蒙之宗主权，且欲并吞内蒙及呼伦贝尔。

12月18日　　袁世凯以黎元洪16日电呈为由，向政治会议各员咨询“救国大计”，令迅速讨论办法，详细具复。

△　袁世凯据四川旅京同乡黄大暹等呈控，川省官吏以搜乱党为名，非法苛勒，重庆株连300余家，是日令四川都督、民政长彻查。24目，川督胡景伊、民政长陈廷栋电呈袁世凯，对黄大暹等所控事实予以否认。

△　黔军旅长黄毓成与川军支队长王陵基于9月间攻陷重庆后，互相火并，至使重庆商民备受其祸，群情激愤。袁世凯迫于情势，是日令将黄毓成、王陵基“交陆军部分别严议惩处”，并着川督胡景伊对所有重庆被灾商民“妥为抚慰”。

△　淞沪警察厅厅长穆湘瑶奉江苏民政长韩国钧密令，上午11时携暗探、巡长、巡士数十名，至西门外打铁滨，包围民国法政大学，将设于该校之新同盟会机关部破坏，并搜得《新同盟会会章》、该会机关部旗帜及传单等件。当将该会成员李桢、姚文华、刘文瑞三人逮捕，后并逮捕该会负责人校长龚荫槐及李时戡，均解交镇守使郑汝成讯办。韩国钧旋将此事呈报袁世凯及国务院，并令将该校取消，校舍发封。教育部据此，决定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18所私立法政大学及专门学校概行停办改组，并派出临时视学员前往江苏等七省，专事检察私立法政学校，以资“整顿”。

12月19日　袁世凯令准黎元洪辞兼领湖北都督职。

△　袁世凯令周自齐暂兼代理陆军总长。

12月20日　意公使斯弗尔扎向袁世凯递交国书。

△　中俄两国政府为衔接两国边界电线，以便传递俄国与中国喀什噶尔境内各处往来电报起见，是日由交通总长周自齐与俄公使库朋斯齐在北京签订《伊尔克斯唐中俄接线条款》。

12月中旬　前清陕甘总督升允离库伦潜抵青岛。

△　美国旧金山华侨所办《中华民国公报》在上海发售。经内务

部检查，指为“语多悖谬，有害治安”，特令江苏民政长韩国钧转饬淞沪警察厅严禁发售。

12月21日　袁世凯任命张謇为全国水利局总裁。

△　深夜，云南昆明、宜良、昆阳、晋宁、姚安、通海、江川、河西、新兴（今玉溪）、嶍峨（今峨山彝族自治县）、个旧等地均有地震。嶍峨受灾最甚，公署、局所、学校、城垣、桥梁、寺观概行倾覆，民居被毁者十之八九，总计城乡死亡共942人，伤112人。河西城乡因房屋倒塌压毙344人，伤156人。新兴压毙16人，伤1人，通海县署、军械局均震倒，九街下甲汤家营、沈家营民房共倒千余所，压毙9人，西区董家营压毙5人，个旧倒屋无算，电局衙署亦均倒塌。

12月22日　袁世凯再次以16日黎元洪等电呈为由，借口“增修约法为当务之急”，而“国会现状一时断难集议”，特向政治会议咨询“增修约法程序”，令与前此咨询之“救国大计”“并案讨论办法，分别具复”。

△　袁世凯公布《修正各部官制通则》并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农商、交通等部官制及国务院秘书厅官制。

12月23日　国务总理熊希龄驳复众议院议员邓毓怡等194人及参议院议员张其密等61人先后就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及取消国民党议员问题提出之质问书，声称政府“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

△　袁世凯下令各省民政长会同国税厅整顿财政，所有各地丁漕粮租税课等项田赋，应由国税厅委令各县知事认真征收，民政长切实督催，解交国税厅分别支配。

△　袁世凯通令：“自民国元年起，所有进封蒙古各王公，均准其

照进封一位世袭罔替。其有进封二三次者，仍按原有封爵，准以进一位世袭罔替。所得逾格之封，但及本身，不得再袭，以杜冒滥。”

12月24日　袁世凯批准《政治会议规则》。

△　袁世凯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27日，农林、工商两部正式合并为农商部。

△　袁世凯公布《盐税条例》，凡13条。规定除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外，民国产盐销盐各地方均适用此条例。

△　袁世凯任命田文烈为山东民政长。

△　黎元洪通电脱离进步党，内称：“本月十三日明奉命令，严申诰诫，元洪身为军人，自应恪共服从，首先脱党。请自今始，凡从前政党理事长等项名目一概取消，所有党务不再与闻。”

12月25日　袁世凯派黄开文充同成铁路督办，施肇基兼充会办。

△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及南洋同志，告以二次革命失败后，内地各处革命分子较湖北革命前更多，且袁氏种种政策，害人终必害己。当此四方不靖之时，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

△　《雅言》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由康矿　宦编辑。该刊系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之工具。

12月26日　袁世凯令准云南都督蔡锷辞职。

△　袁世凯任命夏偕复为驻美兼驻古巴公使。

12月27日　袁世凯下令全国水利局从速筹办水利：大川巨工，以国家之力治之，其支流湖沼，宜由各地方组合，水利团体多开沟

渠。务令旱潦无虞，农产日丰，野少旷土，国无游民。其商埠海口关乎航路之交通，尤应切实考核，认真筹办。

△　袁世凯下令各省民政长、国税厅长条陈税法，限一月内分别拟议，详细呈复，以凭采择施行。

△　孔道总会于北京事务所开特别大会。主席王锡蕃报告总会事务所组织完成，各省分会成立甚多，北京总会成立刻不容缓。薛正清演说，孔子非为单纯宗教家，孔道会不反对宗教，却不专讲宗孔。河南、山东、陕西各省代表出席大会。

12月28日　　袁世凯据司法总长梁启超条陈，下令整顿司法。令称：司法独立之大义，始终必当坚持；法曹现在之弊端，尤顷刻不容坐视。该总长“所订计划具见周详，宜即实行，以观后效”。

△　袁世凯下令各边将军、都统、镇守使、司令、师长等设法招徕蒙民，加意抚辑。凡来归蒙民，原有耕牧之地者，均令照管业，困苦者优给抚恤，毁坏者酌为修复。该汉蒙各官经理著效者，应优予奖励；所有蒙古官民涉有嫌疑曾受胁迫者，均勿得复问。

△　袁世凯令简任官非觐见后毋许就职，并令国务院拟定简任、荐任官授职赴任规条。

12月29日　　下午1时，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18日及22日先后提交之“救国大计咨询案”及“增修约法程序咨询案”。与会各员均以两案关系重大，应先派员审查，然后议决。当由议长指定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并由蔡锷任审查长。定于次年1月2、6两日开审查会。

△　袁世凯据署湖南都督汤芗铭电请，是日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及各地方官转饬所属，严拿二次革命时赞助讨袁之湖南人士周震鳞等43人。

△　内务部公布《古物陈列所章程》及《保存古物协进会章程》。旋于北京成立古物陈列所，并附设保存古物协进会，以为筹办博物院之预备。

12月30日　　袁世凯据兼代领福建都督刘冠雄电呈福建财政困难，请裁去都督以节经费，是日下令“福建都督缺着即裁撤，交镇守使接管”；“刘冠雄俟经手事件清理完竣，回京供职”；原福建都督孙道仁留京任用。

△　北京政府拟于天坛祈年殿“尊圣配天”，是日将祭天祀孔案汇交政治会议讨论。

△　驻英公使刘玉麟代表北京政府与比利时证券银行代表在伦敦签订《军事债票借款部分发售合同》，其中规定北京政府特制面值62.5万英镑之债票，由比证券银行分期认购。第一期认购额为31.25万英镑，以95％之金镑交付。此项借款定于1918年还清，用于行政经费。

12月31日　　袁世凯公布《知事奖励条例》及《知事惩戒条例》。

△　袁世凯任命戴陈霖为驻日斯巴尼亚（今译西班牙）兼驻葡萄牙公使，陈箓为驻墨西哥公使，刘式训为驻巴西兼驻秘鲁公使。

△　外交总长孙宝琦与德公使哈豪森代表中、德两国政府议定济顺、高韩两铁路办法大纲，并规定两路行车总管、总工程司及总司账均须聘用德人。由此德国获得在山东修筑高密至韩庄与济南至顺德两路之权利。

12月下旬　　护理甘肃都督张炳华、前甘肃提督马安良、甘肃宁夏护军使兼署宁夏将军马福祥、新疆都督杨增新、伊犁镇边使广福等联衔致电袁世凯，请勿定孔教为国教，内称：“西北各边非蒙即回，

民情固执，以宗教为第二生命，倘有误会，必至贻忧大局。”

是月　　夏重民等113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月，陈德出等六人在大连加入中华革命党。

△　山东栖霞县农民为反对官绅以“验契”为名阴谋侵夺土地，聚众千余人，由宋金榜、李炳燧率领，进行抗验契斗争。该县知事俞庆澜派兵镇压，捕宋、李。旋举事农民将李炳燧夺回，并俘县役九名，扣劣绅八名。当地豪富均遭“劫掠”。全县震动。烟台镇守使聂宪藩闻报，急增调军队前往镇压，并于25日将此事电呈袁世凯及参陆两部。

△　英在片马增兵五六千名，旋分兵三路进据称戛、六库、腾越（今腾冲），并大肆侵扰滇西。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英兵始撤离云南。

△　上海时事新报馆编辑出版《时事汇报》月刊。该刊共出六期。次年5月停刊。

△　《孔社杂志》（月刊）在北京创刊，由该社社长徐琪主编，宣称“以阐扬孔学，融汇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为宗旨”。

1914年（民国三年）

1月

1月1日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驻京外交团由英国公使朱尔典领衔，向袁世凯大总统觐贺，参加者计有英、美、法、德、俄、日等14国。

△　袁世凯令黎元洪给予一等嘉禾章。

△　中国邮政改制，是日起实行新邮区制，每省为一邮区，独上海、东三省各为一邮区，全国共成立21个邮区。

△　由比款承造之河南汴洛铁路并入海兰公司办理。

△　沪嘉铁路收归国有，是日由交通部接收。

△　《中华实业界》、《中华小说界》于上海创刊，由中华书局编辑发行。

1月3日　　袁世凯批准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两县同名者74，三县同名者12，四县同名者4，五县同名者3，六县同名者1。两县同名，存其先置。

△　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至总统府求见袁世凯遭拒，遂大闹总统府，被软禁，旋移至北京龙泉寺。

1月4日　袁世凯特派许世英为政治会议委员。

△　袁世凯任命张锡銮暂兼署奉天民政长。

1月5日　　袁世凯以广东阳春县破获国民党机关，灵山、化县亦有国民党人联合“绿林”约期举事，令广东都督龙济光“查缉乱党”，“务绝根株”。

△　袁世凯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1月7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切实查禁国民党印刷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各种印刷文件”，从严惩办。

△　吉林延吉县韩侨数百人为反对官府不准擅自集会结社，赴县署滋事，并纠众2000人焚毁垦民会房舍，经调兵弹压，骚乱始平息。

△　袁世凯令准免广东民政长陈昭常本职。

△　袁世凯令朱庆澜加陆军上将衔。

△　袁世凯任命江朝宗为镶红旗汉军都统。

△　袁世凯任命王金镜为陆军第二师混成第二旅旅长。

1月8日　　袁世凯令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年俸及公费、交际费数额，据上年12月30日国务会议议决，大总统年俸定为36万元，公费每年150万元，交际费每年54万元；副总统年俸为12万元，交际费为24万元，不另开支公费。“本大总统欲躬行节俭，应减定为俸金月支三万元，姑按八成起支，公费月支四万元，交际费月支四万元”。

△　袁世凯令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多伦）、赤峰、洮南（今吉林洮安）、龙口、葫芦岛七处自辟为通商口岸。

1月9日　　白朗军在河南确山县新安店与陆军第二师王占元部激战，京汉路交通中断。10日，白朗军攻罗山未下，11日破光山，14日占潢川。

△　袁世凯通令各省严禁哥老会“设立码头暨开山立堂或另立共进、改进等项名目”；已设各处，“迅速解散，以杜乱萌”。

△　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因病辞职，袁世凯命刘长炳暂行署理。

△　袁世凯任命巢凤冈督办东三省官银钱局及广信公司事宜，并充东三省中国总分银行会办；潘鸿宾督办东三省中国总分银行事宜，并会办东三省官银钱号及广信公司事宜。

1月10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宣布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一律资遣回籍。

△　政治会议循袁世凯之意，呈请特设“造法机关”，修改约法。次日，袁命拟具具体办法呈报。24日，政治会议通过《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并呈报袁世凯。

△　袁世凯令陕西都督张凤翙严拿革命党，就地惩办。

1月11日　　袁世凯公布《契税条例》，凡12条；《验契条例》，凡17条；《所得税条例》，凡27条；《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凡15条。

1月13日　　袁世凯公布《公司条例》，凡251条；《公司保息条例》，凡18条。《保息条例》规定：政府发公债2000万元为保息基金，新设棉织、毛织、制铁、制丝、制茶、制糖等公司，开工三年之内，按实收资本可呈请保息。

△　袁世凯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着留京候用；设川边镇守使，任命张毅为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

△　袁世凯任命汪声铃会办福建军务。

△ 日斯巴尼亚（今译西班牙）国驻京公使白斯德觐见袁世凯呈递国书。

1月14日 湖南湘潭国民党机关被破坏，杨礼臣等三人被捕。杨于3月4日被杀害，余判徒刑。

△ 袁世凯任命宋联奎护理陕西民政长。

△ 袁世凯批准裁撤稽勋局。

1月16日 袁世凯以“近岁国家收入奇绌”，令各省按旧制新章“严定责成”，“优加奖励”，督催各项应征应缴之款。

△ 袁世凯公布《督征经征分征官解款足额奖励条例》，凡10条；《督征经征分征官额外增加奖励条例》，凡11条。规定自500万元以上起，各省除盐、关两税外，原有国税征收足额报解京师者，分别奖给劳绩金与奖章。

△ 白朗军破商城，次日攻固始，中途向南。安徽都督倪嗣冲急调皖军各营往六安、颍州、寿县防守。

1月17日 总统府召集财政会议，讨论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等案，国务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等40余人出席，梁士诒主席。

△ 袁世凯公布《文官甄别程序条例》，凡15条。同日批准定于本月25日开始甄别高等文官。

1月18日 山东兖州镇守使田中玉秉承袁世凯旨意，派军队驻曲阜保护孔林孔庙。

1月19日 白朗军在六安金家寨击溃巡防队一营，进入安徽省境。舒城韦道应、乔三等绿林队伍六七百人起而响应，白朗军声势更盛。怀远、滁县、定远等县群众武装斗争纷起，至6月间先后失败。

△　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觐见袁世凯呈递国书。

△　内务部通令规定保护宗教以有系统、有经典、有历史之宗教为限，其他秘密结社严为查禁。

△　刺杀宋教仁主使犯应桂馨（即应夔丞）在京津火车上被暗杀。按：应在青岛屡上书袁世凯请奖，袁为灭口，遂指使执法处特务将应刺杀。

1月20日　河南都督张镇芳以督剿白朗军不力，是日袁世凯令先行褫职，准其留任立功。

△　袁世凯委派陈锦涛赴欧美游说各资本家及工程家会商组织中、英、美、法、德五国国际建筑公司，承办中国铁路借款及包工事。陈在法国活动，消息外传，五国银行团大加攻击，事遂搁置。

1月21日　袁世凯令：江西民政长汪瑞闿紊淆财政，任用非人，颇滋物议，现经查属实，应即解任，付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议处；任命戚扬代理江西民政长。

1月22日　黑龙江省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400万卢布借款合同，作为军政经费，以全省金矿为担保。

1月23日　陈其美奉孙中山命偕戴季陶及日人山田纯三郎自日本神户赴大连策划讨袁军事。26日抵大连，27日接见当地诸同志，决从奉鲁方面着手运动。后因日本官厅受袁党运动，多方阻挠压迫，遂于3月17日还东京。

△　内务部通告《临时政府期内教会立案一览表》，自民国元年7月17日至二年10月13日，有“孔教”、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耶稣教及其他七类，团体最多者为“孔教”，最早批准立案者为“中国回教俱进会”。

1月24日　安徽都督倪嗣冲通电倡议修改约法，改行总统制。

△　白朗军23日破安徽霍山县城，是日攻占六安。27日弃城西走，活动于霍山、六安间，部众六七千人。袁世凯急令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会剿”。

△　袁世凯批准内务部规定每年农历元旦、端午、中秋及冬至节日全国官民休假一日。

1月25日　奉天溪碱（本溪湖至碱厂）铁路本溪湖至牛心台段建成，为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所建之轻便铁路。9月25日，满铁株式会社始与奉天巡按使及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签订溪碱铁路备忘录，规定该路由“满铁”与公司合办。

1月26日　袁世凯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凡22条。第一条规定：“约法会议以议决增修约法案及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为其职权”，由京师选出议员四人，每省选出二人，蒙、藏、青海选出八人，全国商会联合会选出四人组成之。

△　袁世凯任命赵倜“督办豫南剿匪事宜”，所有派往豫南“剿匪”各军均归节制调遣。

1月27日　袁世凯以“各省盗风未靖，匪警时闻，小之闻劫市乡，大之攻陷城邑”，令各都督及民政长严办“盗匪”，“慎选贤能，认真防剿”。7月20日又令各省地方官警与军队合力防剿。

1月28日　袁世凯批交内务部从优奖恤四川戊戌政变遇难者刘光第、杨锐，以昭激劝；并由该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广东各省民政长，迅即造具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各事实清册，一并交部，从优奖恤。

1月29日　内务部再次通令各省民政长迅速追缴省议会国民党议员证书，并查明是否尚足法定人数。

△　政治会议循袁世凯之意，议决祭天祀孔。祭天日期定为冬至，祭礼用跪拜，祭品用牲牢，祭服请大总统饬下所司酌古准今制定特别冠服。祀孔沿用清朝旧例，作为大祀，祭期仍用春秋上丁，礼节祭服与祭天同。

△　国务院以国家财政困难已极，凡内外官吏，应敦尚俭朴，爱惜公帑，以为崇实黜华之计，通令五年内京内外各官公署不得借口兴筑，“以节浮糜”。令曰：“乃近年从政者往往涂饰外观，罔知大体，动辄改建公署，广拓洋楼，土木丹青，经营无艺，多则数十万，少亦十余万金，大吏奢侈豪华，员司藉图肥己，兴言积弊，可为悼心。”由此披露北京政府腐败现象之一斑。

△　奉天省增设台安县，由辽中、黑山两县析置。

1月30日　北京政府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2000万美元导淮借款草约。5月12日垫款10万美元，后以欧战爆发，事遂中止。

△　白朗军在安徽六安县叶家集击溃赵倜两个营，折向六安以南地区话动。

1月31日　袁世凯以从前抡才试士，向有门生夫子之名称，恶习相沿，积重难返。现在法官甄别知事试验以及将来文官考试，不日次第举行，为正本清源之计，是日通令严禁门生夫子之名称。

是月　湖南国民党人邹永成、王道于日本东京发起组织“民义社”，以锄除民贼、巩固共和为宗旨，号召实行三次革命（后民义社集体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年春，该社成员纷纷回国组织反袁运动。

△　吴藻华、冯自由、周应时、夏之麒、居正等43人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　齐（齐齐哈尔）昂（昂昂溪）轻便铁路自红旗营子屯修至昂昂溪站，与中东铁路接轨。

△　热河道改为特别区域，设热河都统，辖承德等14县及卓索图、昭乌达二盟。

△　徐连鑫等集资20万元在黑龙江宁安县创办长宁面粉公司。

△　《正谊》杂志于上海创刊，谷钟秀主编。该刊以“负指导社会并忠告政府之责任”为宗旨。

2月

2月1日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湖北都督段祺瑞着即回京供职。

△　袁世凯公布《法律编查会规则》，凡14条。规定该会负责调查编纂民事、刑事等法规。原“法典编纂会”于3日裁撤。18日，“法律编查会”成立，梁启超任会长。

△　袁世凯令商办福建漳（州）厦（门）铁路暂归交通部管理。按：漳（州）厦（门）铁路自1905年招股商办，历年赔累甚多，铁路公司呈请收归国有。

2月2日　　前四川都督尹昌衡被控侵吞公款，私通革命党，在北京被捕。

△　汉口商民反对大冶水泥厂向天津法国保商银行借款，以偿日商三菱欠款。

2月3日　　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等10余省都督、民政长曾先后致电袁世凯，谓各级自治机关“良莠不齐”，“动称民权，不知国法”，请下令解散。是日，袁颁令停办各级地方自治会。

△　袁世凯任命龙觐光为广惠镇守使兼充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马存发为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段尔砺 为广东陆军第二混成旅旅

长。

△　袁世凯据国务会议议决，核准特设清史馆，延聘专家分任编纂。

2月4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严禁党人私立新同盟会机关，散布牌记，“一经拿获，立即就地严惩”。

△　袁世凯据各省都督、民政长之请，将暂行解散各省议会，重订组织方法，另行召集一案，交政治会议议决。

△　袁世凯公布《约法会议议员选举会选举日期令》，凡四条。

△　孙中山致书南洋诸同志，告以积极筹划讨袁事宜。

2月6日　　袁世凯命令停办京师地方自治会，其自治制度由内务部一并厘订汇案办理。

△　袁世凯以财政窘困，致电各省严征国税，“将旧税一一恢复”，并按新订各项税则切实征收。7日，派视察员分赴各省，会同地方当局议定财政办法。

△　陆军部电饬段芝贵严剿白朗军，谓白朗军进入安徽省后，“亳匪、乱党、青红各帮、饥民”纷纷加入，已由千余人增至六七千人。同日，白朗军占霍山。

△　袁世凯令裁撤伊犁镇边使，改设镇守使，以杨飞霞署理。

△　教育部公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凡七条。

2月7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崇祀孔子，以春秋两丁（即阴历二、八月上旬之丁日）行祀孔礼。20日公布《崇圣典例》，并通令全国以祭天之礼为通祭，各省每年冬至行祀天礼。

△　袁世凯就请定国教事，令称信教自由，未便特定国教，“致戾群情”。

△　袁世凯公布《国币条例》，凡13条；《国币条例实施细则》，凡11条。

△　袁世凯援前清旧例，明令进封和阗回部辅国公木沙为镇国公。

2月8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对各处教堂教士“一体加意保护”。

△　袁世凯令管理哲盟各旗寺庙呼图克图色旺诺尔布，给予达尔罕呼图克图名号，并赏用黄围车。

2月9日　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呈辞。同日，袁世凯令准免国务总理熊希龄财政总长兼职，特任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并仍兼代理陆军总长。

△　袁世凯特任朱启钤兼代交通总长。

△　孙中山为培植民国建设人才，与陈其美、黄兴、李烈钧、戴季陶、犬养毅、头山满、寺尾亨、副岛义一、林权助等30余人，在东京发起创立政法学校，推寺尾亨为校长，是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主持。入校学习人数先后达400余名。

2月10日　政治会议开会，议决10月10日为万年国庆巨典，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日，暨2月12日南北统一纪念日悉予停止，至各省独立纪念日则应通令禁止。5月9日，袁世凯批示：准如所议，俟参政院成立后并交修正。

△　北京政府与美商美孚煤油公司签订《中美合资创办石油公司合同》，使美国获得开采陕西延长、直隶承德油矿专利权。经勘探，美国以无利可图，于1917年宣布废约。

2月11日　国务总理熊希龄通令京外经手借款官吏，不得再有回扣情事，否则以赃私论，交司法机关严惩。

△　袁世凯核准贵州民政长呈请增设县治及移置县治案。增设邛水、大塘、长寨、册亭、三合、沿河、后坪、省溪八县；贵筑县移治札佐，普定县移治定南，都匀县移治平舟，改称平舟县，开泰县移治锦屏，改称锦屏县。

△　袁世凯特派张凤台为政治会议委员。

△　袁世凯任命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任命高景祺为山东民政长，未到任以前，着龚积柄暂行护理。

△　政治会议呈请规复文庙事，袁世凯批交内务部分别令行各省饬属办理。

△　交通部与法国中法实业银行签订钦（州）渝（重庆）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六亿法郎。旋因欧战爆发，仅付垫款3210.55万法郎。

2月12日　袁世凯令准免国务总理熊希龄本职，特任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

2月13日　袁世凯任命段祺瑞兼代领河南都督，留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准予离任。

△　袁世凯公布《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组织令》，凡九条。

2月14日　财政部公布民国二年度“修正全国预算”（1913年7月至1914年6月），岁入5.57296145亿元，岁出6.42236876亿元，出入相抵，不敷8494.0731万元。

△　袁世凯以司法独立为理由，严令禁止法官加入政党，其经名

列党籍者，应一律脱党。

△　交通部与中英公司签订37.5万英镑《上海枫泾铁路清还抵欠借款合同》，以此项借款清还1912年1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日商大仓组所借之300万日元。

△　交通部与商办江苏铁路公司在北京签订《赎回上海枫泾铁路议订条款》，将上海枫泾铁路收归国有，路款由交通部偿付。

2月15日　袁世凯训令河南民政长田文烈，谓河南为本大总统桑梓之邦，宗族亲旧，服官本省者当不乏人，“询考所及，黜陟进退，务须一秉大公，苟有庸劣官员，无论是否本大总统族戚，严行摈斥，毋使害群。其贪黩不法者，立即查明参办，勿瞻徇情面，勿顾畏人言，严杜干谒之风，力挽夤缘之习”。

△　财政部以本年旧历系有闰之年，是日通电各省本年粮租，仍照旧例加摊闰征收。

△　江苏东海保安营哗变，连长数人率全营官兵挟该营统领仲兆踞出营，向沭阳逃逸。

2月16日　内务部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各省应试者2068人。

△　广东因滥发纸币，月初币价跌至五成二三，商民恐慌。是日，官商集议维持办法，决设维持纸币委员会，发行公债，开放娼妓营业，并拨官产500余万元用作保证金。

2月17日　兼代领河南都督段祺瑞呈请准前河南都督张镇芳回任。是日，袁世凯令张镇芳仍留河南会办剿抚事宜，“所请回任之处，应毋庸议”。

2月18日　厦门鼓浪屿租界因印捕擅捕市民，激起公愤，发生冲突，印捕开枪击伤市民四人，捕九人。事件发生后，领事团拒绝将被

捕人等移交会审公堂，并强行驱逐公堂中国审员，又派巡捕占据公堂，遂起交涉。至5月11日领事团始将公堂交出。

△　袁世凯下令严禁上级官署对所属以及商民因公请求事项托故留难及需索费用，违者严惩，“以儆官邪”。

△　司法总长梁启超向袁世凯呈辞，并条陈司法计划十端，请饬继任者议行。

2月19日　袁世凯任命孙宝琦为高等文官甄别会委员长，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汪荣宝为驻比利时特任全权公使；特派刘若曾为政治会议委员。

△　袁世凯任命直隶都督赵秉钧兼署民政长。

△　教育部公布《半日学校规程》。半日学校为幼年失学者而设，入学程度为未入初等小学或已入而未结业者，修业期限三年。

△　教育部通令各省力筹普及初等小学义务教育。

2月20日　袁世凯令准教育总长汪大燮辞职，遗缺以严修继任，严未到任前，由蔡儒楷暂行署理。

△　袁世凯令准免司法总长梁启超本职，特任章宗祥为司法总长。

△　袁世凯任命董康署大理院院长。

2月中旬　英使馆武官罗伯逊往信阳王占元部活动，并于月底向北京政府提出围剿白朗军的“剿匪节略”，建议派轻便马队跟踪追击，配以步兵“围堵”。

2月22日　段祺瑞指挥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军队，在豫、皖两省交界之六安、商城、固始等地区，分兵驻扎，层层设防，拟将白朗

军歼之于霍邱、霍山、叶家集之间。是日10时，白朗军万余人由商城酆家集北面金刚山一带突围，激战一昼夜，次日黎明破围西走。27日出现于豫、鄂交界之武胜关，武汉为之震动。3月6日，段祺瑞急命鄂军总司令王占元率军返回湖北防守。

△　袁世凯任命石星川为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

2月23日　袁世凯任命董康为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2月24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民政长仿照四川方法，于各县成立警队，由县知事自行招练。3月19日又批转《改订四川通省团练章程》，令各省仿效执行。

△　奉天旗民因旗饷数月未发，聚众数百人至公署及内务司长私宅哭闹，官厅劝喻不听，调宪兵驱逐，并拘捕八人，余逃散。

2月25日　山东乐安县民众暴动，击杀赴乡督催验契之县知事王文域，岱北观察使带队驰往查办。

2月26日　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以议决解散各省省议会一案，呈复袁世凯称，“揆之法理，按诸事势”，各该都督、民政长等以解散各省议会为请，“均属可行”。“拟请大总统俯如所陈，将各省省议会一律解散”。

2月27日　直隶都督兼民政长赵秉钧暴死。袁世凯任命朱家宝为直隶民政长兼署理都督。

△　袁世凯令淞沪一带宣告解严，所有淞沪一带接战地域司令官着即撤销。

2月28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

△　白朗军突围返回河南，其大队往新野、邓县，另队于信阳以

南进入湖北省境应山、随县等地活动。

是月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上海、大连、菲律宾等地发展党员。陈中孚等30余人在东京入党；蔡突灵等20余人在上海入党；石磊等人在大连入党；吴宗明、郑国樑、黄汉卿等人在菲律宾入党。

△　黄兴与李烈钧在日本东京创办“浩然庐”，着意研究军事，培植革命力量。

△　内政、教育两部因地方自治会取消，特订定维持教育办法六条，内容包括经费照旧、校长不得率行更换、已规定计划依次进行等，通令施行。

△　吴家煦等在上海创设中华博物研究会。

△　俄公使库朋斯齐向外交部提出阿尔泰撤兵条件六条，内有不得勒收哈萨克牧地、承认俄人于阿尔泰区域享有不动产及任便居住渔猎耕种之权等，并声明中国如能确实施行，俄兵始能撤退。经双方往返磋商无结果。

3月

3月1日　北京政府照会瑞士政府，声明正式加入“万国邮会”。

3月2日　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凡41条，规定禁止“秘密结社”、“同盟罢工”、“同盟解雇”、“强索报酬”等。

△　袁世凯公布《商人通例》，凡73条。7月19日公布《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凡14条。

△　袁世凯特派蒋尊簋为政治会议委员。

3月3日　台湾新竹厅苗栗抗日起义（事在1913年10月26日）领

袖、同盟会会员罗福星，在台北监狱为日本殖民当局杀害。

△　安徽铁路芜湖至广德线于1905年准由商办，时逾十载，成路无多，股东请归国有，是日铁路公司与交通部签订合约，27日由交通部接管。

△　袁世凯公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凡四章29条，规定承垦人经官署核准，每亩纳保证金一角，开垦后按土质肥瘦分五等交纳地价，每亩由一元五角至三角，按等递减。

△　袁世凯任命汪度为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南剿匪事宜。

△　教育部通令各省推广高等小学及初等高等并设之小学。

3月4日　袁世凯公布《制盐特许条例》，凡18条。

△　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

△　公立台中中学破土兴建，至次年12月建成，为台湾第一所中学。

3月6日　袁世凯令护理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炳华来京另候任用，任命张广建为甘肃民政长兼都督。

△　山西盂县乡民抗交验契等税，聚众反抗，县署派兵镇压，击毙乡民40多人。

3月7日　白朗军过襄阳围攻老河口，次日攻克，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焚烧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及英美烟公司等。9日返回河南，13日围攻淅川，未下，破荆紫关，遂在内乡、南召一带活动。

△　财政部通电各省减轻契税，卖契税照契价9%改收2%，典契税照契价6%改收1%，以一年为限。13日电复各省，以税率锐减，恐碍收入，应在卖契6%、典契4%以下，及2%、1%以上，自订税率报

部核准施行。

△ 汉口英租界印捕因驱逐肩贩追至华界，与巡警冲突，英领调水兵、商团防堵，镇守使杜锡钧等亦率军警到场。经派员商诸英领，将英兵商团撤退，带回滋事印捕，事始平息。

3月8日 白朗军在老河口开军事会议，发出布告称："第一驱袁，第二建立良好政府，第三友善邻邦。"

3月9日 袁世凯令设清史馆。9月1日开馆，延聘赵尔巽为馆长。

△ 袁世凯任命孔庚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3月10日 广东饶平县黄冈驻军营长吴文华率兵举事，自称广潮总司令，宣布独立，称"三次革命"，旋败。国民党人朱执信、洪兆麟等乘机在惠州、阳江等地组织反袁武装。

△ 北京航空学校飞机三架，由航校校长秦国镛等三人驾驶，首次自南苑至保定试飞成功。

3月11日 袁世凯颁布《褒扬条例》，凡13条，规定：凡"孝行"、"妇女节操可以风世者"等由大总统给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受褒人及其家族"愿建坊立碑者，得自为之"。

△ 袁世凯公布《矿业条例》，凡九章111条。31日公布《矿业条例施行细则》，凡86条。

△ 袁世凯以围剿白朗军连遭挫败，致电段祺瑞，谓"发兵二万人，奔驰两阅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而老河口又发生"戕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命组织轻便部队"配利器"，"加饷费"，迅速围剿。

△　北京政府参谋总长黎元洪公布《陆军大学校条例》，凡45条。

△　中英藏西姆拉会议会商西藏问题已达四月，是日英代表麦克马洪正式提出调停西藏问题约稿11条，内容有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承认外藏有自治权等项。

3月12日　　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至北京孔庙代行“春丁祀孔”礼。礼毕，梁宣讲《论语》“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　袁世凯公布《会计条例》，凡九章36条；《审计条例》凡八章29条。

△　孙中山派夏重民约梁卫平、朱执信、邓铿等去香港部署反袁军事。21日夏等抵港，嗣在九龙设办事处，开展工作。

△　袁世凯令：知事任用，免试者审查宜慎，倘荐举非人，惟原保长官是问。

△　袁世凯任命颜惠庆为参加万国禁烟会议全权代表。

3月13日　　袁世凯通令查缉革命党人，着各省严密查拿，认真防范。

△　袁世凯令河南、湖北、陕西各省都督协力搜捕白朗军，务期“尽绝根株”，并妥保各国教士，“毋任稍有惊扰”。

△　四川都督胡景伊致电兼代领河南都督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段芝贵及陕西都督张凤翙，谓转奉大总统令，严防白朗军窜入川陕边界。

△　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党菲律宾联络委员伍平一，请其在南洋筹款。

3月14日　国民党议员林英钟、徐镜心、段世恒等五人，因与东京党人秘密联系，从事反袁活动在北京被捕，林、徐二人旋遭杀害。

△　袁世凯公布约法会议当选议员57人。

3月15日　袁世凯令准甘肃都督赵惟熙辞职。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次日推选周晋镳为会长。大会至4月11日闭幕，各地商会提出裁厘加税、修改海关进口税、减轻土货出口税等提案。

△　云南东川县李品正为抗拒铲烟，聚众2000余人举事，与守军力战数日，部众伤亡甚重，事败。

3月16日　奉天国民党人孙祥夫、刘芝舟、马明远等在大连、长春、公主岭等地设立机关密谋反袁。是日，大连机关遭破坏，马明远被捕遭杀害。

△　四川垫江县红灯教彭兴安等聚众六七百人举事攻城，为当地驻军所败。

△　俄公使库朋斯齐向外交总长孙宝琦要求获得修筑与经营海兰泡至哈尔滨和呼盟地区中东路各支线等优先权，并要求在各条铁路区域内拥有采矿、伐木的优先权。

3月17日　北京政府赔偿南京商民因去岁南京战事损失银150万元。

△　北京俄使馆撤退驻军，旋将前年调驻直隶之俄军队一律撤退。

△　奉天都督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联合召开“恳亲会”。此后每月17日开一次，故称“十七日会”。

△ 袁世凯任命张鸣岐会办广西军务。

3月18日 约法会议开会，举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议员57人，实到仅44人。

△ 白朗军万余人由富水关进入陕西境内，克商南。20日晨破龙驹寨（丹凤），陕督张凤翙亲率队驰赴商县防守。袁世凯命四川派兵驰援汉中。

3月20日 袁世凯以增修“约法大纲”咨交约法会议，规定该会“为中华民国特设之造法机关，其职权首在议决增修约法”。并提出增修内容七项：一、外交大权应归诸总统，凡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无须经参议院同意；二、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及任用国务员与外交大使、公使，无须经参议院同意；三、采用总统制；四、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由总统公布，正式宪法起草权应归于总统及参议院；五、关于人民公权之褫夺回复，总统自由决定；六、总统应有紧急命令权；七、总统应有财政紧急处分权。

△ 袁世凯令准免奉天民政长许世英本职。

△ 中国参加在东京开幕的日本大正博览会。其展品计有陶瓷、金漆、竹木、美术工艺、丝织品等8000余件。7月31日闭幕。

3月21日 袁世凯电饬段祺瑞、段芝贵等速平白朗军，略谓“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近日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

△ 袁世凯任命顾品珍为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

△ 黑龙江省行政公署颁布清丈兼招垦章程及招垦各规则。

△ 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在东京开成立会，举徐苏中为支部长。

3月22日　　白朗军占商城，24日破山阳，30日取孝义（今柞水），图汉中受阻，乃逾秦岭趋鄠县（今户县）。4月上旬前锋逼近西安，以“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名义在西安附近张贴安民布告。西安为之震动，袁世凯急调赵倜率精兵5000入陕。

3月24日　　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伦兴夏札，在印度德里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以秘密换文方式，擅自划定中印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将中印东段边境历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察隅等地区约九万余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印度版图。

△　袁世凯令国务院从优议恤前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并着内务部查取事实，宣付史馆。

3月25日　　袁世凯令广东都督龙济光严拿乘黄冈兵变在惠州等处“谋乱”之革命党人朱执信、洪兆麟、陆常等。

△　袁世凯任命王式通调充政治会议秘书长，顾鳌调充约法会议秘书长。

△　袁世凯任命戚扬署江西民政长。

3月26日　　安徽定远乡民组织“江淮义侠军”，于是日举事，29日攻占县城，31日遭镇压败散。与此同时，合肥广兴集亦有“义侠军”活动。

△　袁世凯任命宋联奎会办陕西军务。

3月29日　　新疆土鲁番维吾尔族农民艾买提率众举事，反对封建主伊明郡王的残酷剥削。吐鲁番县署派兵镇压，艾买提率众退入克孜里山坚持斗争，后转移至奇台县境天山活动。12月，艾买提被叛徒杀害，起义失败。

△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要求保护西安教士，剿办白朗

军。是日，袁世凯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严饬各军队“克期扑灭”。

△　教育部通令各省民政长加意维护小学，张作霖所请多设村塾以代小学事应毋庸议。

3月31日　袁世凯任命汪大燮为平政院院长。同日又公布《平政院编制令》，凡29条。规定平政院直隶于大总统，审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正行为。平政院设肃政厅，置肃政史，纠弹行政官吏之违反宪法、行贿受贿、滥用威权、玩视民瘼事件。

△　直隶民政长兼署都督朱家宝电请刻日奔丧回籍，袁世凯令给假一个月，直隶民政长着吴焘护理。

△　北京政府与中英公司签定800万英镑宁湘铁路（南京至株洲）借款合同，后因欧战爆发中止，仅垫款50万英镑。

△　袁世凯公布《权度条例》，凡24条，统一全国度量衡。规定：权度分甲乙两种：甲、营造尺库平制，长度以营造尺一尺为单位，重量以库平一两为单位；乙、万国权度通制，长度以一新尺为单位，重以一新斤为单位。

△　袁世凯公布《民业铁路条例》，凡65条。规定：“民国人民，集合资本，依本条例之规定，建筑铁路者，为民业铁路。”“铁路公司之组织，以股分有限公司为限。”

△　袁世凯任命宋联奎署陕西民政长，准免原署陕西民政长高增爵本职。

是月　龙济光借口顺德县上淇乡有“乱党机关”，派兵前往抢掠烧杀，毁房三四十间，杀害乡民数十名，伤者百人。

△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上海、大连继续发展党员。宋拼三等20余人在东京入党；金维系等20余人在上海入党；王良佐等在大连入

党。

4月

4月1日　　交通部创办京汉、京奉、京张、津浦、沪宁五铁路联运，自是日起实行。此为我国统一实行联运之始。

△　川省铁路收归国有，是日接收告竣。

△　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订立实业借款合同，总额1.5亿法郎。

4月2日　　袁世凯令从速设置平政院并于该院附设肃政厅，由各部院长官或最高咨询机关荐举彦良，出任平政院评事、肃政厅肃政史，“俾执法不稍旁挠，立言悉祛偏党，共扶国纪，用树风声”。

△　袁世凯公布《报纸条例》，凡35条。规定凡涉及“淆乱政体”、“妨害治安”等一概不准登载，违者重惩。

△　袁世凯以张謇出差，特任章宗祥暂兼代理农商总长。

△　袁世凯令改良教育，整饬学风。责成教育部分行主管司长，对于各学校力持严重主义，养成优美整肃之学风，编订教科书尤贵宗旨正大，以免纷歧。

△　袁世凯令准免署湖南民政长王瑚本职。

4月3日　　德国外交大臣雅哥电示驻英大使李绪诺维斯基，针对英、俄两国在中国西藏和外蒙古的活动，命其向英提出：门户开放原则应不仅适用于中国本部各省，也应适用于中国边疆各地区。8日，德驻英大使就此向英外交部提出。英外交部复称，各国在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范围，例如英人在扬子地区，德国在山东。表示拒绝。

△　袁世凯令调陆军总长段祺瑞回京供职；任命田文烈兼护理河

南都督。

△　袁世凯下令责成各主管部认真清理官产。令曰：“国家岁入，租税而外，官产亦属大宗，值此财政支绌之时，亟宜由各主管部，分类清厘，以裕国计。”

4月4日　　美国定明年在旧金山开设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特派爱旦穆来华劝导赴会，是日爱旦穆抵北京谒见袁世凯。

4月5日　　袁世凯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凡13条，规定未设法院各县之司法事务委任县知事处理。同日又公布《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凡13章48条，规定未设审验厅各县，第一审应属初级或地方厅管辖之民刑事诉讼，均由县知事审理。

4月6日　　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组成飞机支队前往陕西参加围剿白朗军。是日该校法式双翼飞机四架由京汉路转陇海路运至渑池，又以人力运抵潼关装配，26日起在陕西各地从事侦察。此为我国飞机用于军事之始。

△　奥斯马加国（奥匈帝国）驻华公使讷色恩觐见袁世凯呈递国书。

4月7日　　袁世凯公布《交通银行则例》，凡23条，规定该行可分理国家金库，资本定为库平足银1000万两，官四、商六。总行设于北京。

4月8日　　白朗军在陕西攻破盩厔，连下鄠县、乾县、永寿。袁世凯除急调赵倜所部入防西安外，又命京畿军事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率拱卫军12营并雷震春部8营沿京汉路南下入陕。

△　上海沪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员与驻沪法总领事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扩大法租界范围。

4月10日　袁世凯公布《纠弹条例》，凡14条，规定官吏有下列条款情事之一者，依本条例纠弹之：一、违反宪法事件；二、行贿受贿事件；三、滥用威权事件；四、玩视民瘼事件。

4月11日　俄皇决定以我国之唐努乌梁海为其“保护地”。6月出兵侵占该地，并任命格里哥列夫为乌梁海事务长官，组织大规模俄国移民。7月17日，沙俄正式兼并唐努乌梁海。

△　交通部与商办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代表虞洽卿等签订浙路收归国有合约，议定将杭州至枫泾、曹娥至宁波两段铁路及杭州江干至湖墅支线交归国有，公司所有股本由政府偿还。6月16日交通部派员管理。9月19日在北京签订《收回沪杭甬浙段铁路议订条款》。自此江、浙两省商办铁路全部收为国有，北京政府遂将沪杭、曹甬两段铁路及江湖支线与英人握有实权之沪宁路合并为沪宁、沪杭甬两路管理局，并修建一条两路联合线，于1916年完工。

△　袁世凯公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凡八条；《吗啡治罪条例》，凡12条。

△　袁世凯批准交通部呈请，嗣后关于借款修筑铁路，除已订合同或草约，暨业经计议所及者外，其余概缓筹办。

△　《民声》在上海秘密出版第五期。该杂志系刘师复主编《晦鸣录》周刊改名。是日由澳门转上海继续出版。为免再遭封禁，自是期起，托言于日本东京发行。

4月13日　袁世凯公布《修正知事试验条例》，凡28条。14日内务部公布《修正知事试验条例施行细则》，凡27条。

4月14日　白朗军破邠县（今彬县），次日与陕军陈树藩混成旅在太峪镇大战，双方伤亡均重。

△　去年9月昌黎县日军枪杀华警案，迭经外交部与日公使山座圆

次郎交涉，以日方允将滋事军人交审，给被害警长恤金6000元，巡警四名每名5000元而了结。是日，山座圆次郎至国务院向外交总长孙宝琦道歉。

4月15日　甘肃都督张广建调集甘军崔正午部援陕，在陇县、凤翔一带布置防守。另派提督焦大聚率兵驻通渭马营镇扼守通兰州之要路。是日，白朗军至长武为甘军所阻，南向破麟游，17日过岐山。

△　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议决：江西民政长汪瑞闿紊乱财政，任用非人，予以褫职。

4月16日　袁世凯令调陆建章为陆军第七师师长，18日加陆军上将衔。

△　吉林西南路观察使呈报，日本人在长春开设药铺40余家，“无不以私卖吗啡为主业”。

4月17日　云南临安县（今建水）驻军一营，与当地会党“大汉同胞会”、“共和会”联合举事，围攻驻军团部，占据县城。次日，驻军团长与当地官绅率民团联合镇压，事败。

△　袁世凯任命丁效兰为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

4月18日　孙中山自日本致书南洋邓泽如，说明筹组中华革命党主张，并望赞成其事，在南洋各埠成立支部。同日致书南洋华侨李源水，望其担任组织中华革命党支部。

△　袁世凯任命陆建章督办西路剿匪事宜，加陆军上将衔。同日任命赵倜会办西路剿匪事宜。

4月19日　德国外交大臣雅哥电示驻英德使李绪诺维斯基，谓德国不能承认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有一个独占权力的势力范围”，表明对华政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以保持中国的完整及在全中国为我们的

商业维持门户开放为原则”。

4月20日　白朗军攻破陕西凤翔，甘军崔正午部五营不战而溃。白朗军沿渭水入甘肃境，逼向通渭，赵倜率军跟踪。30日双方在通渭接仗，白朗军走陇西。甘军在秦州（今天水）、伏羌（今甘谷县）布防。

△　黑龙江省城巡防营第一路官兵数百人因裁汰军官不满，是晚哗变，持械进攻督军署，经旅长许兰洲等劝阻，始各回营。

△　陆军部颁布《宪兵学校条例》，凡30条。

△　教育部以前审定教科书稍失宽滥，亟应按切时势，妥为修改，是日布告所有民国二年以前审定之教科书，统限于三个月内送部复审。

4月21日　袁世凯任命潘矩楹署绥远城将军，准免原任张绍曾本职。

4月22日　袁世凯令：陆军少将赵恒惕等在湘省独立时“阴谋协助革命”，处以三等有期徒刑，并褫军官。

4月24日　袁世凯任命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官，吴光新署理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　袁世凯任命志锜筹办八旗生计事宜。

△　袁世凯令各省长官慎选心术纯正、操守廉洁，且富于政事学识及经验者，特荐免试知事。其非深知有素者不得滥予送试，倘或徇情滥保，致所保人员有贪婪不法情事，定将原保长官严惩。

4月25日　国民党人戴季陶主办之《民权报》于1913年停版后，该报成员刘铁冷、蒋箸超等编辑《民权素》杂志，是日在上海创刊。

序言称：民党机关报纸相继被封，“而抨击政府之最有力之《民权报》亦随潮流而去，独此《民权素》者辍于《民权报》之零缣断素，得巍然刊于世”。

△　袁世凯以四川省盐业维持会借口维持，阻挠整理盐务，特勒令将该会解散。

△　袁世凯任命朱启钤督办京都市政事宜。

4月27日　麦克马洪对调停西藏问题约稿提出修正案，在附图上将白康普陀岭、阿美马项岭东北之地划归青海。中国代表陈贻范被迫于约稿上画行，但声明画行与签约不同，签约须候政府训示。28日，中国政府接陈贻范报告，即去电声明：“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29日又通知驻英公使刘玉麟，希英政府电英员按中国政府业经让步办法接续磋议。

△　海军部与德商瑞记洋行签订50万镑第三次借款合同，作为海军经费。

△　袁世凯令设淮南垦务局，并派韩国钧为督办。

4月28日　袁世凯任命唐继尧兼署云南民政长，原署民政长李鸿祥着赴京觐见。

△　袁世凯令前江西民政长汪瑞闿即行褫职。

△　广东梅县驻军一营举事，营长王国柱自称“广东讨龙军潮梅总司令”，以革命军广东大都督陈炯明名义出示布告，29日攻入海阳城，未几败散。

△　袁世凯公布《公海渔业奖励条例》，凡11条；《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凡12条。

△　教育部令各省竭力维持教育，尤以小学乃国民教育根本，不容置为缓图。师范中学已设者维持，未设者暂缓。一省有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二所以上者酌量归并，农、工、商、医各专门学校有同类二所以上者亦酌裁。

4月29日　　约法会议议决以《中华民国约法》代替《临时约法》。

△　袁世凯任命戚扬为江西民政长。

4月30日　袁世凯令废除各省初级司法机关。

△　袁世凯任命田文烈兼署河南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

是月　　奉天省抚顺煤矿（1905年日俄战争后为日霸占，归“满铁”经营）古城子矿区建设东北第一个露天煤矿，1915年4月正式投产。

△　邓家彦、路孝忱等40余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赖天球等30余人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

△　伍廷芳、唐绍仪等在上海创办金星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人寿、水、火保险，资本100万元，总公司设上海，于国内各大城市设分公司。

△　俞家骥在山西大同创办大通机器面粉厂，资本五万两，总号设大同，于北京、张北、丰镇等处设立分号。

5月

5月1日　　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临时约法》。新约法凡10章68条，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总统权限，规定“大总统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总统对外代表国家，集行

政、军事、立法等项大权于一身，并“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开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布戒严，召集及解散立法院，“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

△ 袁世凯令废止国务院官制，设政事堂于总统府。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孙宝琦外交总长，朱启钤内务总长，周自齐财政总长，段祺瑞陆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章宗祥司法总长，汤化龙教育总长，张謇农商总长，梁敦彦交通总长。张謇未回京前，由章宗祥兼代。

△ 袁世凯特派戴陈霖为全权代表出席西班牙万国邮政大会会议邮政事宜。

5月2日 白朗军由陇西入宁远（今武山县），甘军统领陈正魁率部两营在宁远洛门镇防守，被白朗军设伏围歼，陈仅以身免。次日，赵倜部毅军四营自陇西来援，白朗军走伏羌。

△ 袁世凯任命杨士琦、钱能训为政事堂左右丞。4日政事堂成立。

△ 袁世凯任命梁士诒为税务督办。

△ 廖仲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5月3日 袁世凯通令赦免去年7月赣宁变乱之附乱人等，“或因事被胁，或无识盲从，应从宽赦免，予以自新，令各回籍安业”。

△ 袁世凯公布《大总统府政事堂组织令》，凡12条。规定：大总统府设政事堂；政事堂依约法设国务卿一人，赞襄大总统政务；政事堂设左右丞，赞助国务卿与闻政事。

△ 袁世凯公布《矿业注册条例》，凡三章49条。

△　袁世凯任命许世英为福建民政长，准免原任汪声玲本职。4日，又任命许世英会办福建军务。

△　袁世凯任命林长民、金邦平、伍朝枢、方枢、郭则澐为政事堂参议。

5月4日　白朗军由伏羌攻秦州，5日城破，甘军八营溃散，总兵马国仁被击毙。白朗军首领李鸿宾战死。白朗军旋即南下入徽县、成县，两县驻军闻风远遁，县吏迎降。

△　袁世凯令改蒙藏事务局为蒙藏事务院。

△　税务处令总税务司自6月1日起所有中俄百里交界取消免税，一律由滨江、珲春等关按章征税。

5月5日　袁世凯公布《禁种罂粟条例》，凡11条，规定如发现栽种罂粟，即速强制铲除，必要时得请驻军协助。

△　袁世凯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院总裁，熙彦副之。

△　袁世凯任命齐耀琳会办吉林军务。

5月6日　前云南迤西镇守使谢汝翼由滇越铁路入京，车行至阿迷县境，被已革连长何荣昌枪击殒命。是日袁世凯令谢汝翼照陆军上将例议恤。

5月7日　台湾六甲支厅罗阿头等率众发动抗日起义，袭击大丘园、王爷宫等地日本派出所，旋主动退入王爷宫造林地坚持斗争。嘉义、台南两厅调集大队军警分路“围剿”，罗阿头等数人弹尽援绝自杀，李岑等八人战死，其他百余人全部就逮，起义军失败。

△　驻黑龙江讷河县第二路防军第三营士兵30余人哗变，捣毁电报局，抢掠铺商。

5月8日　　袁世凯公布《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组织令》，凡12条，规定于大总统府设统率办事处，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皆为办事员，应每日入值。

△　袁世凯令嘉慰河南护军使赵倜，且以其攻白朗有功，前得褫职处分，应即开复。

△　袁世凯令：镶蓝旗满洲都统秀吉等朋分公款，有玷官箴，应即一并褫职；钟禄挟嫌控告，亦属不安本分，并交该旗严行管束。

△　袁世凯任命郑开文代理广东第一混成旅旅长；任命马龙标为京师军警督察长。

△　浙江杭县留下镇茶商，因县署派员勒派学捐罢市。茶农因新茶上市销路无门，遂聚千余人捣毁收捐委员住所，警察厅惧事态扩大，派员劝说各店照常开业。

5月9日　　袁世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特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12日，总统府军事处裁撤。

△　袁世凯任命荫昌为侍从武官长。

△　袁世凯令山东民政长高景祺准免本职，任命蔡儒楷为山东民政长。

5月10日　　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杂志于东京创刊，胡汉民任总编辑。各期所刊皆以反袁为宗旨，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媚外卖国，鼓吹“三次革命”。

△　章士钊主编《甲寅》杂志于东京创刊，在上海发行。创刊号宣告“本杂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

△　陆军第三师第五旅扩编为陆军第十师。是日，袁世凯任命卢

永祥为师长。

△　袁世凯令山东民政长蔡儒楷未到任以前，任命龚积柄暂行护理。

5月11日　孙中山致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望其助中国革命党倒袁，革新内政，以挽救东亚危局。

5月12日　袁世凯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组织令现已公布，令“本府军事处着即裁撤”。

△　袁世凯任命巴哈布为镶蓝旗满洲都统。

△　袁世凯任命尹同愈会办徐淮海一带清乡事宜。

△　教育总长汤化龙呈复袁世凯，报告对海外留学事宜之办法及对内教育方针。袁世凯批：“教育关系紧要，应由该部认真整理，用策进行。其海外留学事宜，并由该部与驻日公使随时妥商办理。”

5月13日　奉天安东县乡民抗纳牲畜税，官署派军警捕人，乡民聚众2000余人包围警局，并抢走枪械，后经当地商会出面调解了事。

5月14日　袁世凯以财政困难，负债累累，濒于破产，令将可稍从缓之新政暂行节缩；所有各项新政基础，仍当加意保全。

△　大总统府政事堂举行政治讨论会第一次会议。

△　白朗军破阶州（今武都），次日走西固。川军于21日陆续抵阶州防白朗军入川，白朗军趋岷州。

△　袁世凯任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为全权代表，会同颜惠庆前往海牙出席万国禁烟会议。

△　上海石油公司总经理曹锡圭，以暗通革命党人，接济款械，

经袁世凯批准判处死刑。

△　袁世凯饬令将第一次接见县知事时所颁训词，录登《政府公报》，俾众周知。并着各省民政长通饬各县知事，务各按照训词，躬体力行，勉为循吏。

△　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委员田桐通告各委员："顷得孙先生面示：本党干部未曾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以柏文蔚、周应时、陈其美、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越、文群、陈扬镳、张百麟、田桐等为筹备委员，本日上午八时半在民国社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

5月15日　2月18日厦门鼓浪屿事件，中英屡经交涉，是日达成协议：北京政府惩办肇事商民，会审公堂仍由中国地方当局派员出席会审，惟会审委员曹友兰不得复职。

△　江西南浔铁路公司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签订第二次250万日元借款合同。

△　江苏江宁县朱门镇国民党人联合当地帮会设立机关，密谋举事反袁，是日秘密机关遭破坏。

5月16日　财政总长周自齐奉准开设物产证券懋迁公司，资本100万元，官商各半，派王璟芳筹办。

5月17日　袁世凯公布《行政诉讼条例》，凡三章35条；《诉愿条例》，凡19条。

△　袁世凯公布《蒙藏院官制》，凡15条。

5月18日　第二届县知事试验完竣，是日分别榜示。县知事试验于5月4日举行第一试，6日举行第二试，14—17日举行口试，统计与试者2600余人，取录甲等49人，乙等295人，丙等128人。22日，知

事试验委员会主试委员长汪大燮呈报袁世凯，陈明办理情形，并开呈录取及格员名清单。

5月19日　教育部核准北京私立民国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明德大学、私立中国公学大学部四校立案。

△　教育部令各省民政长筹设商业学校，造就商业人才。

5月20日　袁世凯公布《地方保卫团条例》，凡六章27条，规定各县未设警察地方得设立保卫团。各县原有“乡团保甲”按此条例整顿。县内划分区团，各团按户指定一人编入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

5月21日　北京体育竞进会在天坛举行第一次全国联合运动大会。竞赛项目有田径、足球、棒球、篮球、网球等。

5月22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民政长：“务将所属现任知事，切实考核，严密查访，如有劣员，立时撤换，勿稍瞻徇，其人地相宜之员，务令久于其任，勿轻更调。现在第二届县知事考核竣事……自应先就分发到省人员，分别酌量荐委，勿任滥用亲私。”

△　黑龙江省城巡防营因有5月份薪饷暂不发给传说，二次哗变，在东门外纵火抢劫，并入城抢劫中小商铺数家，天明始出东门而去。

5月23日　白朗军破岷州（今泯县），25日克洮州（今临潭），筹集粮草发生困难，杀马匹充饥。

△　袁世凯公布《省官制》，凡16条；《道官制》，凡14条；《县官制》，凡9条。规定省设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各官及巡防营警备队等。道置道尹，县置知事。

△　袁世凯令各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令曰：“官制业经公布，所有各省民政长，应各就现在实缺、署理、护理之职，均改为巡按

使。”同日又令各省观察使改为道尹。

△　袁世凯令裁撤各省内务、教育及实业各司长。同日又令裁撤各省国税厅筹备处及财政司，其职务着归财政厅接办。

△　袁世凯令司法部通饬所属，凡关于官吏赃罪，在暂行新刑律未改定前，“应暂参用旧律峻法严惩，其有情节最重者，亦应处极刑”。

△　袁世凯令教育部分行各省民政长督饬所属，切实振兴小学。令曰：“各县知事为亲民之官，兴学尤其职责，遇有地方劣绅，借办学之名侵渔公款者，自应严予惩处，一面延纳公正绅士，商榷进行，以树教育普及之基础。”

5月24日　袁世凯公布《参政院组织法》，凡15条，规定“参政院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

△　袁世凯令：人民之自由平等，以法律为范围，其有假为新说，骫法乱纪者，不能曲宥。

5月25日　国史馆成立。6月17日开馆，王闿运为馆长。

△　袁世凯令各省严饬所属缉拿革命党人王榕、张声焕。

△　内务总长朱启钤订定《京畿游览场所章程》，凡10条，呈准所有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处，除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外，酌择一二处先行开放。

5月26日　袁世凯令：参政院现已成立，政治会议应即停止。同日特任黎元洪、汪大燮为参政院正副院长；陆徵祥、于式枚、瞿鸿禨、吕海寰、梁启超、王闿运、劳乃宣、赵尔巽、李经羲、锡良、荫昌、萨镇冰、蔡锷、熊希龄、周学熙、梁士诒、王家襄、施愚、汪有

龄、蒋尊簋、徐绍桢、王揖唐、李家驹、袁树勋、阿穆尔灵圭、张振勋、张荫棠等71人为参政。

△　袁世凯任命周树模为平政院院长，未到任前，原任汪大燮暂缓交卸；张国淦为参政院秘书长，未到任前，着林长民代理。

△　袁世凯任命顾鳌署法制局局长。

△　袁世凯任命金永、李国筠分别为山西、广东巡按使。

△　袁世凯令：三年度各省军政行政等费用，不准逾越核定概算，并切实执行各省筹款办法及增收节减支款计划，以济需要，而支危局。

△　袁世凯公布《大总统公文程式令》，凡11条；《大总统府政事堂公文程式令》，凡七条；《官署公文程式令》，凡12条。

5月28日　　袁世凯令准交通总长朱启钤所请，展修京都环城铁路，接通京奉东便门车站。

5月29日　　孙中山致函黄兴，称“二次革命”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对黄兴阻止起兵表示不满；望党人“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对黄之未参加中华革命党表示谅解，并提出“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

5月30日　　沪宁讨袁军第一路司令蒋介石谋起兵于上海，是日因小沙渡秘密机关被破获而失败。

△　袁世凯令准于国税项下拨钱一万串，赈济湖南醴陵、桑植两县水灾。

5月31日　　白朗军攻占洮州后，赵倜率所部并联合甘军，分别进

驻陇西、临洮、礼县一带策划四面包围。是日白朗军进至漳县，攻城不下，次日与赵倜军接仗，白朗军败走宁远。

△　江苏泗阳县金锁镇三元会会首苗立言自称“九省大元帅”，旗书“龙华大会”，以“灭袁扶明”为口号，聚众举事。县署派兵镇压，遂即溃散。

△　奉天西安县（今吉林辽源）税局征收牲畜捐，立逼改换新税票，“每猪征钱四毛，牲畜一头征钱十元有奇”，激起民愤，聚众2000余人齐集县署抗争。

△　安徽颍州大刀会举事，遭都督倪嗣冲派兵镇压，失败。

△　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以100万英镑为限之准备金，作为发行新币、收回广东旧币之用。

△　福安保险公司于天津创办，经营人寿、水、火灾保险，资本100万元。

是月　孙中山发出《讨袁告示》、《讨袁檄文》。

△　胡汉民、苏天涯、刘崛等30余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　杨云峰等集资30万元，在吉林省城开办“裕顺火磨公司”。

△　周肇昌、王敏公等集资250万元，在湖北沙市设立绩成纺纱股份有限公司。

△　梁士诒创办通惠实业公司，以孙多森任总经理。

6月

6月1日　　政事堂批令取消国税、地方税名目，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按：1913年实行划分国税、地方税范围以来，各省多将国税项内税收拨入地方税，中央收入“反少于前”。

△　湖北省清乡公所在全省69县设立清乡分所，以“调查户口，清除匪类”为名镇压“党人”，并于汉川、沔阳、潜江、天门、荆门、钟祥、京山、应城、云梦、安陆10县，分区驻扎军队重点清查，规定户族可指名报告或密告。

△　重庆警察厅悬赏缉拿“党人”，查获1名奖银1000元，4人以上者奖6000元；查获“匪犯者”100元，3人以上者每名各奖150元。

△　中国银行粤省分行成立，王璟芳为行长，兼理收回纸币事宜。维持纸币委员会于先一日解散。

△　《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二号发表中国侨民统计数字，据概略统计，中国国民显持国籍而蕃衍于外者，约540余万人。

6月2日　　袁世凯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全国共划分89道。7月6日又公布《修正各省所属道区域表直隶省口北道区域》。

△　黄兴函复孙中山，对上月29日信中有关宋案发生后之种种不满，有所裁答，并谓：“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　白朗军在甘肃伏羌与赵倜所部各军激战，再败，白朗本人负伤，退往秦安。

6月3日　　孙中山函复黄兴，略谓：“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

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又谓：“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

△　黄兴致函刘承烈，重申对党务态度。表示“……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于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

6月4日　　广东国民党人朱执信于吴川、电白、信宜三县地区组织反袁武装，是日龙济光派军队于黄坡分路“围剿”，驻广州湾法国侵略军会同堵截，朱执信败走海上。

△　白朗军6000余人破秦安，克清水，急欲东归，8日由宝鸡破围南走。

6月5日　　德驻英大使李绪诺维斯基就中英西姆拉会议事，向英外交大臣葛雷提出：德国政府认为西藏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德在华所享有之“无限制最惠国待遇，现在像过去一样，也适用于西藏。关于蒙古，我们去年11月对俄国也采取了同样立场”。

△　袁世凯公布《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凡10条。规定官吏犯枉法赃至500元以上者及卷携公款潜逃至5000元以上者均处死刑；不枉法赃至1000元以上者处无期徒刑；徒刑得遣赴新疆及极边烟瘴等省。

△　政治会议业经奉令停止，是日行闭会礼。

6月6日　　袁世凯令各省巡防警备队胥由巡按使管辖，如有特别情形，应候另案裁酌办理。

△　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希龄呈请柬派祝毓瑛、魏易、董显光及王鸿猷随同出洋考察实业，是日袁世凯批令照准。

6月8日　　袁世凯公布《平政院裁决执行条例》，凡五条。规定：“行政诉讼事件之执行，对于主管官署违法之命令或处分，得取

消或变更之。”“主管官署对于行政诉讼事件不按照平政院裁决执行者，肃政史得提起纠弹，请付惩戒。”

6月10日　广西西江流域是日起连降大雨，漓江、右江、左江水势暴涨，致西江水位高于平时数丈。梧州、浔江、柳州、平乐等道所属38县均被水淹，为1844年以来未有之大水。

△　财政部规定常关税率为海关税率一半，是日经批准实行。

△　留美学生在美国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

6月上旬　藏民占据三十九族全部，并欲逼迫川边军队退出昌都，声言已与北京政府议定，以昌都归西藏自治。边军因未奉政府命令，坚持不退。

△　直隶临榆县（今划归秦皇岛市和抚宁县）乡民群起反抗验契，聚众入城，全城罢市。永年县连年荒旱，聚众至县署抗税，并击毁公案。行唐县知事催促验契，乡民入城，声称将摘去县署之功德匾额，县警开枪击毙10人，伤五六人。

6月12日　袁世凯令：陆军少将衔续桐溪、步兵上校弓富魁在山西希图革命，一并褫革军官，由该省都督阎锡山严拿讯办。

△　袁世凯批准中国银行直隶财政部。

△　北京政府令鲁、豫、苏三省都督搜捕“万佛共和会”，并闻该会拟设分会于上海，特令上海镇守使一律防范。

6月13日　日本政府就传闻英国与中国政府商建由北京经热河至赤峰铁路事发表声明，重申“南满东蒙”日本有特殊利益，希各国予以尊重。

△　袁世凯令内务部会同税务处拟订限制古物出口章程，严格取

缔京外商民嗜利私售，并由各地方官实行禁止，以防散佚。

6月14日　袁世凯令准设察哈尔特别区域，辖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左右翼八旗，达里冈厓、商都各牧场，以及张北、独石、多伦（以上三县原属直隶）、丰镇、凉城、兴和、陶林（以上四县原属绥远）七县。

△　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6月15日　孙中山致书陈新政及南洋诸同志，论组织中华革命党之意义。称："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

△　自6日至是日，湖北武昌国民党反袁团体"讨袁党改政团"、"军政学社"、"义侠团"等所设秘密机关连遭破坏，40余人被捕，其中李和生、刘汉杰等八人于17日被枪杀。

△　袁世凯据江北护军使电称："睢宿泗县一带，三元会匪，聚众起事"，是日下令查禁三元会党。

6月16日　袁世凯电斥陆建章、张敬尧率队万余人在宝鸡"数十里内尚不能截剿残匪"，乃使白朗军破围而走，令"将路防纵匪各官从严参办"。

△　孙中山与陈其美、田桐、胡汉民等人在东京协商中华革命党干部人选，设总理、协理、各部部长。推孙中山为总理，拟推黄兴为协理（未定）。各部部长：总务陈其美，党务田桐，财政张静江，军事柏文蔚，政事胡汉民。

△　外交部商得英公使朱尔典同意，是日起禁止印度烟土运入浙境。

△　孙中山致书郑螺生等，告以派许崇智、宋振等人赴菲律宾、南洋等地视察党务，筹措军费。

6月17日　外交、海军、交通三部电令东三省巡按使将东三省之国际河流情况调查具报，以便拟定征收航税办法及各国军舰游弋专条，以固主权。

△　白朗军于宝鸡突围后，分前后两路东返，宋老年率一路在前开路，白朗一路尾随，共约三四千人。10日过盩厔（今周至）。13日由子午谷走镇安，是日破城，21日过山阳。

6月18日　袁世凯令内务部通咨各省详细调查各地社会情形，以及公益事宜管理方法等，作为厘订自治章程之依据。

6月20日　参政院行开院礼，出席参政44人，徐世昌代表袁世凯宣读颂辞，黎元洪代表参政院致答词。

△　袁世凯令陕督张凤翙入京觐见，任命陆建章署理陕西都督。

△　袁世凯任命施肇基为驻英公使；前任驻英公使刘玉麟奉令回国。

△　袁世凯任命丁振铎为审计院院长。

6月21日　孙中山在《民国》杂志社召开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党员大会，陈其美在会上作中华革命党总章的说明报告。

△　湖南长沙国民党秘密机关连遭破坏，被捕40余人，其中29人于是日及次日被汤芗铭下令枪杀。

6月22日　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举行选举大会，八省代表出席，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

△　农商部批准中日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中日各

半。本店设东京，于北京设总营业所，上海设分所。该公司成立后，即对安徽繁昌桃冲铁矿贷款，嗣又有电话借款、山东实业借款、汉口造纸厂借款。

△　袁世凯任命范守佑兼充湖北清乡总办。

△　凌霄等奉孙中山密派赴湘西截械起义，事泄，是晨被驻湘袁军逮捕。欧阳煜、李贵成、田文魁被处死，凌霄死而复苏。

△　袁世凯以参政院参政张荫棠、劳乃宣辞职照准，令钱恂、杨度为参政。

6月24日　　袁世凯颁令："嗣后肃政史封呈事件，有能献纳箴规，指陈利病者，本大总统必亲加省览，虚衷采纳，藉彰台官謇谔之休，力惩晚近阿谀之习。"按：袁曾对肃政史面谕："愿闻己过，直言无隐。"据此，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呈大总统请明令宣布，故有此令。

△　教育总长汤化龙通咨各省区，谓："本部拟于中小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中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曾经详具理由呈请大总统批准在案。""从前业经审定发行之本，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即妥慎改订，呈部审查，以重教育。"

△　广东入夏以来，连降大雨，西江水位暴涨，自是日至27日，高要、高明、南海、顺德、新会、三水、鹤山、四会等县共68围先后溃决，罗定、西宁、东安三县亦同时告灾，灾民达200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罕见。

△　赵倜率部抵陕西龙驹寨，立即派队在山阳竹林关、荆紫关布防。白朗军宋老年部是日在富水关突围，路经杨家沟与刘镇华之镇嵩军激战一昼夜。次日，白朗率大队亦至，遂破围而走。29日由荆紫关西坪一带返回河南。

△　张家口发生兵变，店铺被抢劫烧毁100余家。都统何宗莲派兵缉拿，25日至27日先后枪毙变兵百余人，并于7月1日将两连变兵诡称遣送回籍，驱上火车，载赴山谷地区，预先布置伏兵，全部击毙。

6月25日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就西姆拉条约事威胁中国政府“本月底再不签字，则英国政府将与西藏单独缔约”。

6月26日　粤省广宁、肇庆夏季大雨，河堤被决20余处，灾黎数十万。是日，袁世凯准拨银五万元赈灾。

△　江西霪雨积旬，南赣诸河及鄱阳湖泛滥，圩堤溃决，南昌、新建、建昌（今永修）等县尽成泽国，田庐人口漂没无算，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是日，袁世凯着财政部筹拨银三万元赈济。

6月27日　安徽国民党人在巢县密设机关，联络全椒、含山等县会党群众1000余人，预定7月举事。事泄，党人崔国栋等六人于是日被捕遇害。

△　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前顺天府府尹王治馨纳贿贪婪，赃款竟至数万元，是日，袁世凯着先解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职，交步军统领看管，并由平政院严行审理。

6月28日　袁世凯公布《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管辖军队权限条例》，凡六条。规定凡陆军节制系统办事权限，由主管部署及都督呈咨办理，巡防警备等队均归巡按使管辖。

△　奉天国民党人在开原联络当地绿林武装30多人图谋举事反袁，事泄，在四家子为官兵包围，仅10余人突围脱险。

△　革命党人李国柱奉孙中山命由日本潜返湖南，是日在湖南郴县组成讨袁军，旗书“中华民国民主孙”，布告远近，宣布讨袁。讨袁军击毙袁军五营营长吴万春，三营长企图调兵抵抗，而兵不用命，讨袁军迅速占领县城，湖南都督汤芗铭派兵镇压，讨袁军旋南下攻占宜

章。此为“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策划之首次武装讨袁起事。

△ 教育部呈准就北京国子监地方筹办历史博物馆。

6月29日　袁世凯令：立法院未成立前，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

△ 内务部呈准各省道尹所在地，并附道尹驻在地表。

6月30日　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于京师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督理各省军政。

△ 袁世凯特任陆军总长、陆军上将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上将张勋为定武上将军兼长江巡阅使。

△ 袁世凯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着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上将衔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特任陆军中将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特任陆军中将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靳云鹏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 袁世凯令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着加将军衔，督理河南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上将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朱瑞为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李纯为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上将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

△　袁世觊特任海军中将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

△　袁世凯令甘肃巡按使张广建着加将军衔，督理甘肃军务。

△　袁世凯令新疆巡按使杨增新着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上将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唐继尧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上将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兼热河都统，督理热河军务。

△　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蔡锷为昭威将军；特任陆军中将蒋尊簋为宣威将军；特任陆军中将张凤翙为扬威将军。

△　黄兴由日本去美国，行前于27日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叙别。孙中山集古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他国如于南满、东蒙地区经营铁路，须事先知照日本。

△　法国传教士彭茂美及仆从一名、护送人三名在川边喇嘛了附近遇匪被害，是日袁世凯下令勒限缉凶，并查办防范不力人员。

是月　湖南连日阴雨，湘、资、沅、澧各水暴涨，长沙、宝庆、新化、湘潭、衡山、益阳、道县、江华、祁阳、常宁、平江、攸县、

武冈、永顺、沅江、湘阴、醴陵等县皆被水淹。

△　福建闽中一带连日阴雨，上游建溪河水暴涨，下灌福州，福州全城被淹。

△　乐汝成等在山东济南创办泰康罐头食品公司，资本仅5000元，仿制饼干糖果及罐头食品，至1918年已遍销山东及平津等地。1921年在上海设批发所，1923年设总厂，资本增至15万元。1933年增至50万元。

△　华年人寿保险公司在汉口创办，资本100万元。

△　张绥铁路张家口至大同玉河西岸正站竣工通车。

△　曹亚伯等50余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7月

7月1日　　袁世凯令：各省都督现经裁撤改设将军，所有统系权限，仍适用前制定之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管辖军队权限条例。

△　政事堂礼制馆成立，内务部原设之编订礼制会即行归并。

△　中国银行广东分行是日起兑换新币，旧币限一个月内收回。按：广东分行成立后，由善后借款整顿盐务费项下拨100万英镑作准备金，发行“五元特别券”，旧币以五成兑换新券，同时并发行五元、一元新币。据该分行报告自7月1日至31日共收回旧币3164.5万余元。

△　顺天府府尹沈金鉴以南漕改折，粮运已停，而京师根本重地，民食关系綦重，拟具招商承运米数50万石办法，是日奉准施行。

△　驻日公使陆宗祥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惩治中国在日之革命党人。

△　湖北汉川县国民党人联合会党举事反袁，遭军警镇压，失败。

△　江苏嘉定县署在该县南翔镇地区茶叶税内附加学堂捐，加征10倍，后又改充警务经费，并派员勒索，该镇商店于是日一律罢市。

△　革命党人雷瀛奉孙中山命自日本回湖南策动武装讨袁，经半年策划，拥有桂阳县警两连及粤桂边境大山中之民军千余人，组成以雷英为总司令，自任参谋长之湖南讨袁军，是日在桂阳起兵，约定义旗一举，粤桂边境民军即攻占临武、蓝山、嘉禾等县，并南下袭取衡阳。

7月2日　　袁世凯公布《惩治盗匪条例》，凡10条，规定死刑九款，由巡按使核准即可执行；但在军队驻地“事机急迫”、“有劫夺之虞”等情况下，由军队长官审判执行。

△　袁世凯特派沈瑞麟为吊唁专使，参加奥国皇太子葬礼。

△　湖北国民党人在汉水流域各县联络退伍士兵1000多人，在脉望嘴（属汉川县）等处同时举事反袁，遭各地清乡驻军镇压，失败。

△　河南南阳镇守使吴庆桐向段祺瑞报告，白朗军返回河南家乡后，纷纷逃散，或弃枪回家，或分成小股，白朗率众数百人返回宝丰、鲁山、临汝一带山区活动。

7月3日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伦兴夏札在印度西姆拉擅自签订《西姆拉条约》，英国承认西藏自治。北京政府代表陈贻范根据指示，拒绝签字，并在会议上正式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3日和7日驻英公使刘玉麟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作同样声明。西姆拉会议自1913年10月召开，至此无结果而散。

△　北京政府赔偿辛亥革命时期各国寓华人士之直接损失，是日

开始交付德、英、荷、俄、美、意、奥七国赔款8284.7405万元。

△　袁世凯公布《警察官吏恤金给与条例》，凡14条。

△　参政院议事会讨论《违令惩罚法案》、《行政诉讼法案》、《诉愿法案》、《纠弹法案》等。

7月4日　袁世凯特任丁槐为奋威将军。

△　袁世凯令着前署云南民政长李鸿祥留京另候任用。

7月5日　内务部拟订祀天通礼，除规定祭礼、祭品外，复将祭冠祭服，自大总统以下，分为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委任官及士庶五等。是日，袁世凯批交政事堂礼制馆遵行。

△　奉天怀德县（今属吉林省）乡民为反对税局勒收人头税等（大口一元，小口五角，鸡、鸭、鹅、犬均令各纳三角），聚众捣毁税局。是日，张作霖派员前往处理，被迫同意停征苛税。

△　广西连日大雨，梧州、浔州（今桂平）、柳州、平乐等处河水骤涨三四丈至十余丈不等，雒容县（今合并于鹿寨县）城官署民房，均被淹倒塌，为数十年未有之巨灾。是日，袁世凯令财政部速筹赈款银五万元急赈，并筹运粮米妥办赈抚。

7月6日　袁世凯令改绥远城将军为绥远都统，下设绥远道，辖归绥等八县；于热河特别区域设热河道，辖承德等14县；察哈尔特别区域设兴和道，辖张北等七县。

△　袁世凯公布《都统府官制》，凡25条。规定热河、绥远及察哈尔各设都统一人，“都统统辖所部军队，管理该管区域内军政、民政事务”。

△　孙中山派蒋介石、丁仁杰、山田纯三郎赴东北进行反袁活

动。

7月7日　　袁世凯令各省节省军用，以裕国力，称：“近年库款万绌，外债日多，险象日现，几濒于危，而推究支出之巨，实以军费为大端。”

△　外交部照会日代公使小幡酉吉，日本擅将关东州租借地列入日本邮政区域，“实属有碍中国主权，未便承认”。

7月8日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开成立大会，到300余人，孙中山就任总理，入党者须立誓约，打指印，即颁布《中华革命党党章》，凡39条。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任命该党各部正副部长：总务部长陈其美，谢持为副；党务部长居正，冯自由为副；军务部长许崇智，周应时为副；政治部长胡汉民，杨庶堪为副；财政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副。

△　袁世凯公布《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令》，凡11条。7月17日派汤化龙兼充学术评定委员会委员长。8月7日，该会正式成立。

△　袁世凯公布《奖学基金条例》，凡13条。规定凡本国或外国高等学校毕业者提出论文或著述，经学术委员会评取后，每年得领学资400元，满四年为止，全国学资额1200名。

△　袁世凯以苏比利亚侨商捐款103万元，令财政部拨充广东水灾赈款。

7月9日　　蒋介石等奉孙中山命赴黑龙江省联络省巡防队，密谋举兵南下，是日自东京抵安东。24日到齐齐哈尔。28日以欧战爆发，急回东京复命，主张另辟革命途径。

△　黄兴抵檀香山，对侨胞演说，宣传讨袁意义。同日接见《太平洋商务报》记者，谈称：“中华民国必须要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共和国，她的人民能够像美国人民一样的能够享受广泛的自由。……我们将继续为自由奋斗到底。”并谓“吾人带有孙逸仙博士对美国人民的宣言，吾等希望美国人民了解真理”。

7月10日　袁世凯公布修正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教育部、农商部、交通部官制。《修正外交部官制》，凡17条，规定：外交部“管理国际交涉，及关于居留外人，并在外侨民事务，保护在外商业”；《修正内务部官制》，凡20条，规定：内务部“管理地方行政，及选举、赈恤、救济、慈善、感化、人口、土地、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礼俗、宗教、卫生等行政事务”；《修正财政部官制》，凡20条，规定：财政部“管辖会计、出纳、租税、公债、泉币、政府专卖、储金、银行，及其他一切财政，并监督地方公共团体之财政”；《修正陆军部官制》，凡23条，规定：陆军部“管理陆军军政”；《修正海军部官制》，凡21条，规定：海军部“管理海军军政”；《修正司法部官制》，凡18条，规定：司法部“管理民事、刑事、非讼事件、人户籍登记，监狱及出狱人保护事务，并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修正教育部官制》，凡19条，规定：教育部“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事务”；《修正农商部官制》，凡20条，规定：农商部“管理农林、水产、牧畜、工商矿事务”；《修正交通部官制》，凡22条，规定：交通部“管理路政、邮政、电政、航政，监督水陆运输，及关于电器事业，经画全国路邮航电各事项”。以上各部均直隶于大总统。

△　袁世凯令：办理验契人员不得蹈前征粮恶习，浮收勒捐，责成各巡按使、道尹严加考察参办，至劣绅土棍，藉端梗抗者，亦应重惩。

△　袁世凯命冯玉祥为陆军第十四旅旅长。

△　政事堂设立法制、政治、财政三讨论会。

7月11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取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活动。

△　袁世凯任命周树模兼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原兼委员长董康准予开去兼职。

△　袁世凯以各部官制业已修正公布，令于各部官制实施之日废止各部官制通则。

△　袁世凯令宁夏将军事务着即改由宁夏护军使管理。同日又令绥远都统所辖伊克昭盟所属之乌审、鄂托克二旗，仍暂归宁夏护军使节制。

△　袁世凯令准福建金门岛添设金门县。

△　停泊上海制造局江面之海军练习舰“通济号”因所储炮药受热爆炸，炸毁仓房，炸毙学生员司等32人。

7月12日　中华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举行“讨袁死难同志追悼会”，开会公启谓自二次革命以来，党人先后死难不下万人。

△　袁世凯任命胡忠亮兼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

7月14日　袁世凯公布《违令罚法》，凡五条；《拘押民事被告人暂行规则》，凡14条；《民事假扣押假处分及假执行暂行规则》，凡41条；《不动产执行规则》，凡五章42条。《不动产执行规则》规定：“本规则称不动产指土地房屋与其重要成分而言”；“对于不动产之强制执行以查封拍卖管理之方法行之。”

△　中法共订《上海租界管辖条款》11条发表，规定麋鹿路及肇周路以一半归法国公董局管理。

△ “满铁”以“振兴公司”为名，向农商部第二矿务监督署呈报《中日合办辽阳海城间之铁矿合同》。次年3月，北京政府以“铁矿国有”驳回。

7月15日 袁世凯任命刘心源为湖南巡按使；齐耀琳为江苏巡按使；孟宪彝署理吉林巡按使；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原兼署巡按使倪嗣冲准予开去兼职。

△ 黄兴抵旧金山，对《旧金山年报》记者谈称，此次来美的目的乃在研究美国的政治现势与政府制度，以备将来为中国为更大的服务。揭露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野心，指出：“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强人，他仅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袁世凯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对于袁世凯以及任何人想做皇帝，他们（中国人民）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

7月16日 吉林省城因松花江水陡涨，漫溢城区，水深数尺，吉长铁路停驶。

7月17日 袁世凯任命钮传善署陕西巡按使，原任宋联奎准免本职。

7月18日 袁世凯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凡10条，规定：“将军府直隶于大总统，为军事上之最高顾问机关。”

△ 袁世凯令：王占元、曹锟、杨善德、郑汝成加将军衔。

△ 袁世凯令：福建镇守使裁撤，任命李厚基为福建护军使。

△ 袁世凯令：京外各衙署局所，如有“督理”名目，着即一律更改。

7月19日 袁世凯公布《商业注册规则》，凡九条；《公司注册规则》，凡七条。

7月20日　　袁世凯公布《行政诉讼法》，凡四章35条；《诉愿法》，凡18条；《纠弹法》，凡13条。《纠弹法》规定肃政史对违宪、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及溺职殃民事件之官吏，均得依其职权径呈大总统纠弹。

△　袁世凯公布《官吏犯罪特别管辖令》，凡六条。

△　安徽休宁县屯溪镇华山驻军哗变，杀队长，下山抢劫，天明向浙江开化方面逃窜。

△　《学生杂志》于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主编。

△　孙中山函告在东北之山田纯三郎等人，一切讨袁计划，悉照前书施行。

7月21日　　为“围剿”白朗军余部，赵倜率所部毅军、镇嵩军等万余人，在河南鲁山、宝丰、临汝、方城等县村镇驻扎，“清乡严洗”。是日赵倜向袁世凯报告“清乡”情况。

7月22日　　袁世凯任命叶颂清为浙江陆军第六师师长。

△　袁世凯令热河、绥远、察哈尔都统府均改称为都统署。

7月23日　　日本政府任命日置益为驻华公使（原任公使山座圆次郎5月27日死于北京任内）。

△　袁世凯令准肃政史恽毓龄辞职，24日任命孟锡珏为肃政史。

△　袁世凯令再捐银三万元，发交财政部拨给广东、广西各一万元，江西、湖南各5000元，赈济四省水灾灾民。

△　美国西雅图国民党分部长伍曜南致函孙中山，告以该埠党员筹集革命军需美金30万元。是日，孙中山复函嘉勉。

△　黄兴移居旧金山郊外“太平洋林园”，26日在屋岑　华侨欢迎会上演说，指出“袁世凯所行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反袁革命，“应乎时”，“顺乎人”，势在必行。

7月24日　日本撤退驻津军队，25日又撤驻京军队，山海关、秦皇岛、锦州驻军亦同时撤退。至此，辛亥年以护侨为名进驻京津等地日军两大队已撤尽。

△　财政部奉准办理特种营业执照税。

7月25日　北京政府与英商宝林公司签订1000万英镑沙兴铁路（湖北沙市至贵州兴义及湖南常德至长沙支线）借款合同，后以欧战爆发，仅垫付五万英镑，事遂中止。

△　袁世凯令新疆活佛罗布桑呢玛给予默尔根绰尔济名号。

7月26日　革命党人陈校经、陈应品、邓蔚林在湖南临武起事，讨袁军杀官据城，陈校经率队出城入嘉禾县，占领县城，随又率军进攻蓝山。

7月27日　黄兴致书日人萱野长知，告以将向世人举发袁世凯之罪状，“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

△　奥地利国公使照会外交部，说明奥国与塞尔维亚断绝国交缘由。28日奥、塞相互布告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按：6月28日，奥国皇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塞尔维亚被指为暗杀之主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导火线。

7月28日　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令》，凡七条，分卿、大夫、士，以上、中、下列为九秩。

△　江西南昌“党人”组织“华民军”事泄，“华民军江西支部长”陈秀

伟等10余人被捕。

7月29日　孙中山致书南洋新加坡洪门同志，望“固结团体，振起精神，再做革命工作”。

7月30日　袁世凯公布《徒刑改遣条例》，凡11条，规定无期徒刑及五年以上特定有期徒刑，得改发遣。改遣犯人须出本省足3000里。

△　袁世凯任命张树元为陆军第五师师长。

7月31日　袁世凯任命萨福楙为中国银行总裁，原任汤睿辞职照准。

△　袁世凯令督理军务各将军与原设都督职权相同，着陆军部转行所属一体遵照。

是月　江西余江县会党于金谿、贵溪、余江三县交界山区马祖岩图谋举事，事泄，江西将军李纯派兵前往搜捕，会党转入临川县境，聚众数百人持械抗拒，后经军警镇压，败散。

△　黄天、在理、白莲、红灯、六门神等各会道门在东三省蔓延，尤以黄天教为甚，延及双阳、五常、德惠、长寿、长春等县。

△　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被窃，上海来青阁、六艺书局购入1300余册，范氏家族告官追究。

△　江苏省沭阳、东海、灌云一带连年遭灾，今年又旱，灾情之重为近几十年所未见。丹阳县旱灾最重，“贫者大都借草根树皮充饥”，灾民近30万人。

△　江苏省江都、高邮、宝应、沛县、铜山、阜宁、盐城、萧县、淮安、淮阴、泗阳、宿迁等县；河南省修武、沁阳、西华、郾

城、汲县、濬县、考城、虞城等县，蝗灾严重。皖鲁各省飞蝗遍食禾稻，尤以江北为甚。

△　江西霪雨浃旬，抚、赣诸江河与鄱阳湖水同时泛滥，南昌、丰城、建昌、遂川、清江、萍乡、宜春圩堤溃决，田庐均遭淹没，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

△　广东大水灾，梁士诒联合在京广东同乡募赈，并请北京政府拨税务巨款，集资百万，交凌润台、李守一归广东设救济公所赈灾，并修筑各属基围。

△　荣敬仁、丁梓江在上海创办福新第二面粉厂，资本10万元。后于1919年7月焚毁，1921年重建恢复生产，增加资本至60万元。

8月

8月1日　　日代公使小幡酉吉因奉天第二十八师随营学堂辞退日本教习渡濑二郎，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指此举为“排日”。

8月2日　　袁世凯令京外各官署，嗣后不得轻率请奖给，职官一经任命，不得任意迁调。

8月3日　　白朗为北洋陆军第三混成旅张敬尧部击伤，是日死于河南鲁山县石庄。刘镇华镇嵩军闻讯，于5日掘尸报袁请功。至此白朗起义军完全失败。

△　外交部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法、德、俄、日等国租借地交战。

△　驻美公使夏偕复照会美国政府，请欧洲交战诸国同意不在中国领土、租借地发生战争行为。美国据此分别于11日、13日与英、德磋商，无结果而罢。10日，日本代使小幡酉吉至外交部诘责“此等关

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

△　袁世凯下令查禁“人权急进社”活动。按：该社由张继、李烈钧、陈刚、居正及张静江等人所组织，设总部于法国，并于南洋群岛、日本、上海等处设置支部。

△　袁世凯公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凡16条，以整理金融、补助国库为由，发行公债1600万元。12月21日又追加募集额800万元。实际共募集2543.448万元。

△　袁世凯令：湖南、安徽、江苏、吉林四省巡按使及热河、绥远与察哈尔等处将军监督各该省处财政事务。

△　德公使哈豪森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告知德国已于本月1日与俄国开战。同日，俄使库朋斯齐亦就俄德两国开战事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

8月4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求见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提出当战争波及远东，香港、威海卫受到德国袭击时，英国希望日本给予援助。7日，英政府照会日本外务部，希日本舰队在中国海攻击德国舰队。

△　德公使哈豪森为德法开战，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日，意公使为意国中立照会外交部。

△　袁世凯据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呈报该省灾情，着财政部速拨银三万元，刻日汇豫，“特再由本大总统捐银一万元，一并汇交该巡按使，遴派妥员，分别散放”。该省先后遭风、雹、水、虫等灾害，灾区达45县，其中以邓县、方城、泌阳、南阳、淅川、遂平、潢川、息县、西平、确山、南召、罗山12县灾情最重。

△　财政部呈准设立内国公债局，10日开局，推梁士诒为总理。

8月5日　袁世凯任命商德全署理天津镇守使。

8月6日　袁世凯就欧洲大战爆发发表中立宣言，并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凡24条。

△　袁世凯令：奥塞等国失和，中国因皆系友邦，已布令恪守局外中立，凡通商口岸等处各国人民财产、教堂及各国使馆一体慎加保护。

△　外交部电驻日公使陆宗舆探询日本是否赞同由中、日、美三国共同劝告欧战诸国限制战区，勿及远东，以缩小战祸。8日，陆访晤日首相大隈重信，提议此事，大隈不纳，且言“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

8月7日　外交部就中国对欧战严守中立事照会驻华各公使，并抄送中立条规。12日，各使复照，各国政府承认中国中立。

△　袁世凯令：湖南、安徽、江苏、吉林、陕西等省巡按使监督各该省司法行政事务。

△　财政部与比国证券银行签订40万镑借款合同，以田赋及关税余款为担保。

△　财政部呈准《官产处分条例》，规定官产之处分，分别为变卖、租佃及垦荒三种办法。

△　袁世凯任命张子贞为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施从滨为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吴庆桐为第二混成旅旅长，张敬尧为第三混成旅旅长，伍祥桢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刘询为第五混成旅旅长，王金镜为第六混成旅旅长，唐天喜为第七混成旅旅长，徐占凤为第八混成旅旅长。

8月8日　财政部以各省自办内外各债，每有未经中央核准，径

自商办者，既乖财政统一之要旨，且或启交涉而堕国信，是日呈准嗣后非经大总统批准不得自行举办。

△　农商部呈准公布《东三省国有林发放规则》，凡18条。

△　袁世凯任命傅增湘为肃政史。

△　袁世凯公布《县佐官制》，凡六条，规定："县佐设于该县辖境内之要津地方为限，不得与县知事同城。""县佐承县知事之命，掌巡檄弹压及其他勘灾捕蝗、催科堤防水利并县知事委托各项事务。"

8月9日　　湖北兴山县知事阎凤冈借验契敲诈勒索，民不堪扰，是日及12日群众数百人哄闹县署，要求免征苛税，县警开枪镇压，逮捕10余人。

△　袁世凯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

8月10日　　袁世凯任命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原任唐继尧准开去兼职。

△　袁世凯以苏北一带数月无雨，天时亢旱，飞蝗成灾，着财政部拨银五万元赈灾。

△　袁世凯公布《巡按使委任道尹监督财政权限暂行条例》，凡18条。

△　新疆将军杨增新派马队两营在和阗捕杀哥老会首领刘镛等六人，严禁哥老会所立码头山堂。

8月11日　　北京政府中立办事处成立，袁世凯派梁士诒、孙宝琦等组织办理中立事务。

△　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奉准疏浚江北运河，委江苏内务司长马士杰为总办。

8月12日　　袁世凯令：中将衔陆军少将张敬尧、陆军中将刘镇华“前因堵匪不力曾经褫官，现白狼（朗）业经围剿殄除，均着开复原官”。

△　袁世凯任命丁效兰为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8月13日　　李根源等在东京之部分国民党人以讨论欧战为名，成立“欧事研究会”，是日草拟“协议条件”三条，主张“不分党界”，尊重孙中山，对国内取“渐进主义”。嗣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等地入会会员百余人。

△　德使馆参赞马尔参向外交部表示，愿将胶州湾租借地直接归还中国。是日，日代使小幡酉吉向外交次长曹汝霖提出警告，阻止中国接受德国建议。

△　袁世凯任命蔡成勋署陆军第一师师长。

8月14日　　袁世凯令：各将军、巡按使、都统晓谕商民，共筹保卫闾阎，认真办理原有民团、商团。

△　孙中山致函美籍友人戴屈克，请其劝阻美国银行家借款给袁世凯，并痛陈外国资本家借势操纵中国内政之非是。

△　袁世凯令授王士珍为陆军上将。

8月15日　　黄兴应旧金山共和俱乐部之邀演讲《共和政体下的中国》，抨击袁世凯祸国殃民。

△　袁世凯令：云南、陕西巡按使监督该省财政事务。19日又令云南巡按使监督该省司法行政事务。

△　日外相加藤约见驻日公使陆宗舆，面交日政府致德最后通牒抄件，并声称：“如德不允，即须开战。”“日英德即至开战，区域有

限，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惟若中国自生内乱不能自平时，日英为保持东亚和平，亦愿相助平乱，但并无从中图利之意。”

△　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无条件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交付日本，即时撤走德国在日、中两国海面上军舰，否则立即解除武装。以上两项8月23日中午以前如无满意答复，日本将采取必要措置。18日，英国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英日两国政府认为，英日同盟所预期为保护远东全盘利益有采取行动之必要。

△　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欧柏林城组织勤学会。后于1916年8月15日改名为“欧柏林中国学生工读会”，标明宗旨为“以半工半读为助成学业之方法，以节省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

△　清华学校首次选送女生汤蔼林等10人赴美留学。

8月16日　北京商民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开提倡内国公债会。

△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英国已对奥国开战。

8月17日　中国军警与日军在奉天昌图县八面城发生冲突，日本借此擅自向郑家屯（今双辽）派兵一个中队。

△　日代使小幡向外交部声明，日本政府前日致牒驻日德使，要求德国舰队于8月23日为限退出青岛，将该地交给日本，并声称以后中日两国各以诚心相见，日本必能尊重中国之中立。

8月18日　上海中华革命党人哈在田等拟于江苏南通举事反袁，图谋占领如皋、泰兴、扬州等地。是日“党人”四五十人到南通被发觉，遂在城下与袁军激战达数小时，伤亡10余人，被捕24人。

△　参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梁士诒等提出修正总统选举法案，决定不付审查，即咨政府转交约法会议增修。24日，袁世凯将参政院建议修正总统选举法议案咨交约法会议审议。

8月19日　　袁世凯公布《官吏违令惩罚令》，凡8条。规定：官吏故意违反或擅自变更教令，情节重者，处六个月以下之徒刑，因妨害内政外交及其他政务之事实者，处一年半以下之徒刑。

△　政事堂电令各省设立中立分处。

△　法公使照会外交部称，法奥两国外交关系于是月12日破裂，法国对奥宣战。

△　北京政府饬陆军、内务两部派军警1000名保护各国使馆。

△　署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因张家口兵变案被褫职。

8月20日　　德公使哈豪森照会外交部，请禁止外国军队经过中国领土，以维中国中立之立场。

△　德国青岛总督出示，限境内日人于23日前离开青岛。

△　海军部电令加派军舰驶赴秦皇岛附近，防护各交战国舰队侵越青岛附近各洋面。

△　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抵北京，26日向袁世凯呈递国书。

△　浙江余姚县乡民因调查学龄儿童与警备队格斗，伤毙哨长士兵10余人，县署派兵镇压，捕首犯数名解县正法。

8月21日　　美国照会日本政府，谓日德宣战后，希日本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维护各国在华商业利益均等；如中国内地发生动乱，日本采取必要措施时，应根据1908年美日《罗脱—高平协定》精神，事先与美国协商。

△　袁世凯下令开复前河南都督张镇芳褫职处分。

8月22日　　袁世凯令：“嗣后在职文武官吏，非有必须陈请之理

由，毋庸率请入觐，非先经呈准，不得擅离职守，违者提付惩戒。”

△　江苏泗阳县洋河地区会党首领丁三花、仲八等聚众千余人举事，占据仁里圩、闸塘周围20里村镇，活动于泗阳、安徽泗县交界地区，江苏防营屡攻失利。是日，苏、皖两省派兵“围剿”，会党溃散。

△　黑龙江省巡按使朱庆澜与东三省中国银行行长潘鸿宾签订由中国银行发行小洋券换回黑龙江官帖合同。

8月23日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约束党员规则四条，党员个人不得自由行动，不得发表违反党义言论。

△　袁世凯令各省巡按使督同财政厅长，认真考察官吏，不得违章征收国税，罔利营私，剥民肥己，违者严办。

△　英国驱逐舰夜间攻击青岛。

△　外交部照会德使哈豪森，抗议德国利用青岛港海陆军设备，捕获敌国商船，显系轶出条约范围。

△　日本对德宣战。25日，日使日置益以日对德宣战照会外交部。

△　财政部呈准试办江苏省清丈，并咨浙江省仿照办理。

8月24日　日公使日置益面见外交总长孙宝琦，无理要求北京政府按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域”，并撤退胶济铁路中国驻军。其后于25、26、29日一再催促北京政府接受日本上述要求。

△　英、德鱼雷艇队在胶州湾洋面交战。

8月26日　北京政府以日德宣战后，青岛战事在即，一面与日使磋商划定中立地点，一面派员赴山东筹备中立事宜。

△　政事堂礼制馆拟订《祀孔典礼》一卷，并附说明书，经国务卿徐世昌核定，袁世凯批令执行。

△　财政部制订《整理东三省纸币办法大纲》，规定由中国银行发行新纸币，换回流通之银元票、钱票、官帖等；各私立行号、铺商不得再发私帖。此大纲后未执行。

△　江苏省教育会开年会，选举张謇、黄炎培为正副会长。

8月27日　日本第二舰队司令官加藤定吉宣布封锁胶州湾，31日相继占领胶州湾附近各岛屿。

8月28日　外交部以欧战发生，国际款项业已停止支付，特照会各国公使，要求缓偿到期短期债款。旋经各国公使先后照复承诺。

△　外交部照会英公使朱尔典，抗议英国在威海卫、香港破坏中国中立。旋据英使照复声称，英国对于中国中立始终敬守。

8月29日　外交部就8月17日日军侵驻郑家屯一事，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

△　袁世凯令禁官吏牌赌冶游，淫佚骄奢，一经查实，定即严惩。

△　袁世凯任命麦秩严为肃政史。

△　袁世凯任命杨春普署第十九师师长。

8月30日　外交部通知驻日公使陆宗舆转告日政府：胶济路潍河以东至青岛路线“日人可任便布置”，希日政府“明我好意，勿为过分之举”。

△　日公使日置益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日本对奥国宣战。

△　袁世凯令：安徽今年夏秋之间风雹旱蝗，灾荒几及全省，特着财政部拨款银三万元，袁自捐银5000元急赈。

8月31日　江苏省咨请教育部就两江优级师范学校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于次年9月10日开学，后于1923年并入东南大学。

是月　黄展云、谢持、吴铁城、许崇智等百余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　直隶霸县黄坨镇河水决堤，雄县、蠡县等县均被淹。宝坻运河决口，全县被淹，灾民10余万。

△　浙江吴兴织绉机工数千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

△　安徽省财政厅及中华银行向日商三井会社借银20万元，作为行政经费。

△　刘长荫于浙江长兴创办长兴煤矿，后以资金不敷，1918年3月与朱葆三、刘万青组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50万元，总店设上海。

9月

9月1日　孙中山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通告海内外，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所有海外国民党组织未经解散者，“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民党名义）。指出此次组党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摒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号召党人“担负责任，切实进行”。

△　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居正公布主盟人，主盟新进时应遵守事项六条，及介绍人介绍新进入党时应遵事项七条。

△　北京政府为保守中立，派军舰防守领海，以防侵害，并规定

领海防守区域，北段由鸭绿江至芝罘，中段由芝罘至三都澳，南段由三都澳至头岬。

△ 政事堂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略称："本日下午，日置益奉其政府训令称，此次日本攻击胶澳，全系日、英同盟关系，决无野心于中国领土。"

△ 比利时公使照会外交部，奥国已向比国开战。

△ 革命党人韩恢在宿迁颍口联络绿林集众800余人发动反袁起义，旋因徐州派兵镇压而失败。

△ 袁世凯公布《狩猎法》，凡14条，规定每年狩猎时间自10月1日起至次年3月末日止。

9月2日 日军第十八师团2000余人在山东黄县之龙口（今龙口市）等处登陆，占龙口电局及黄县县城。次日，日军大队陆续上岸，强迫地方当局供应军需用品。

△ 袁世凯任命唐国谟为陆军第十混成旅旅长，王麒为第十一混成旅旅长。

△ 内务部呈准奉天省设双山镇改设县治。

9月3日 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声明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在山东省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地方为日德交战区，中国政府不负完全中立责任。

△ 德公使哈豪森照会外交部，抗议日军在龙口登岸，称此举妨得中国中立，德国政府必须自行设法对待。

△ 黄兴复函李根源等人，承认为欧事研究会会员。

9月4日 海军总长刘冠雄由京启程，亲赴鄂、浔、宁、沪等地

巡视，并示遵守中立。

9月5日　　外交部照会英、日、俄、法、德等国公使，请保护胶澳战区之中国人民财产。

△　内务、财政两部以康有为沉冤已雪，呈准发还没收之财产，并酌补其族人银二万元。

9月6日　　中华革命党人何海鸣、姜华廷等在东北铁岭、公主岭、四平街等地设立机关，策划举兵反袁，谋占昌图，事泄，姜等在开原被捕。

△　日军侵入山东莱州。

△　袁世凯令：裁撤陆军第九师师长员缺，任命黄国樑为陆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孔庚兼充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崇仁兼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

9月8日　　中俄及外蒙古地方当局代表三方在恰克图会商蒙事，是日开预备会。中国代表毕桂芳、陈箓，俄国代表亚历山大密勒尔，外蒙古地方代表达锡札布（后改为希尔宁达木定）。

△　袁世凯据“衍圣公”孔令贻呈请，批准曲阜孔庙祀田仍归孔府所有。按：孔府祀田，最多时达100万亩，遍及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安徽五省。

△　孙中山致函南洋邓泽如，望在南洋筹款，接济讨袁之需，并请到东京中华革命党本部，助理党中财政事务。

△　奉天本溪中华革命党人联络当地绿林队伍举兵讨袁，攻占县城，破狱释囚。张作霖派兵前往镇压。

9月9日　　日军对胶澳战区各县大肆骚扰，抢掠财物，奸淫妇

女，任意枪杀民众，无恶不作。

△　袁世凯特任那彦图为绥威将军。

△　袁世凯任命许兰洲署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

9月10日　在山东龙口登陆日军，是日侵占平度，12日抵即墨、高密，13日侵占胶州。

△　外交部驳复德公使哈豪森3日对于扩张山东战区之抗议，声明将来在胶州湾附近之交战地内，无论生有如何结果，中国政府概不负责。

△　袁世凯令各将军、巡按使认真保护各国留驻人民。

△　袁世凯特任蒋雁行为靖威将军。

△　袁世凯令热河都统、绥远都统、察哈尔都统监督各该管区域司法行政事务。

△　内务部奉令优恤先烈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并于京师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

9月12日　袁世凯公布《征收厘税考成条例》、《征收田赋考成条例》，对完成和未完成厘金、田赋征收额之地方官吏分别予以奖励和惩处。此项条例之实施使北京政府收入大增，据是年度北京政府概算所载，全国各省田赋收入较清末旧额增收加倍。

△　袁世凯公布《商会法》，凡三章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埠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商会”，“研究促进工商业之方法”。

△　黄兴复函谭人凤等赞同促进党内团结，一致讨袁救国；并表示：“兴刻在美，当极力为各方之调和，并一面揭开袁贼之黑幕，渐图挽回外人之议论，使表同情于吾党。”

△　王荆山在长春创办裕昌源火磨（面粉厂），资本50万元。

△　北京政府特赦参与湘省二次独立之赵恒惕、陈复初、江隽等人，准免执刑。

9月14日　袁世凯令河南省第一师改编为陆军第九师，任命张锡元为师长。

△　朱执信奉孙中山命至南洋筹款反袁，是日抵新加坡，旋偕邓泽如去各埠筹款，至10月1日返新加坡，共筹款四万余元。

9月15日　中俄及外蒙古地方当局三方恰克图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北京政府代表于会上声明："此次会议性质乃确定中央与自治区之交际，而俄国为之居间，与外交会议不同"，会议应以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为根据。

△　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解纷免战条约》，商定两国政府遇有外交所不能解决之争端，应由国际委员会查复，查复之际不用武力。

△　袁世凯令郭尊炘为参政院参政，原任参政吕海寰辞职照准。

△　日军在山东发行纸币，毁伤米稻，虐待居民，外交部向日公使日置益严重交涉。

△　山东省潍县、胶县、昌邑、平度、高密、即墨等县水灾，灾区面积东西300余里，南北百余里。是日，袁世凯令财政部拨银三万元，袁自捐银5000元救灾。

9月17日　北京政府与英商萨穆尔公司签订1000万英镑《汉口修建借款合同》。

△　袁世凯令：嗣后凡留学外洋归国，得有博士学士文凭者，均

应赴政事堂报名受验，以备任使。

△　袁世凯以甘肃巡按使张广建“于此次本总统生日祝寿呈文附有方物”，特传谕申斥，所呈方物，一律发还。“嗣后文武百僚如有借节祝寿为名，意存赏试者，以违令论”。

9月18日　第二批日军于山东半岛崂山湾登陆，次日占柳树台。

△　陆军第七师裁撤，改编为第十五、第十六两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分任旅长，原第七师师长陆建章免职。

9月19日　袁世凯任命李长泰为陆军第八师师长。

△　袁世凯通令告诫各县知事对其管区内之缉捕、审断、教养三事，应身体力行，不可自甘菲薄，玩视民瘼。

△　湖北告灾，江汉、襄阳、荆南各属30余县旱、虫灾严重，仅汉川、沔阳、随县、光化四县灾民即有60万人。是日袁世凯令，财政部拨银二万元赈灾。

9月20日　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中华革命党干部会，讨论“革命方略”，廖仲恺、胡汉民、田桐、谢持、许崇智、杨庶堪、居正、丁仁杰、戴季陶、王统一等11人出席，孙中山主席，至12月16日，共开17次讨论会。

△　革命党人范鸿仙在沪谋攻江南制造局，事泄，在上海嵩山路办事机关被刺身死。党人200余人先后遇难。

△　袁世凯任命赵倜督理河南军务，田文烈会办河南军务。

△　日军驱逐龙口中国税关人员，旋经交涉，10月7日回局办公。

△　奉天省与日商大仓组签订150万元借款合同，用于归还1912年10月16日借款及本溪湖煤矿增资中方股本。

△　川边乡城防兵营兵变，肆行劫掠后纷逃滇境，成都派军驰剿。

9月21日　外交部照会各交战国公使，声明胶济路除已划入交战区域一部外，归中国暂行保管。

△　袁世凯令：嗣后京外文武长官保荐人员，必须真知灼见，尤要在操守廉洁，心术端正，勿违公议而徇私交，勿采虚荣而忘实践，倘有滥举非人，劣迹败露者，定将分别惩戒原保长官。

△　农商部准日商大仓组在江西余干、进贤两县采矿。

9月22日　日外务省训令日置益公使立即向中国政府交涉，借口军事需要，日军将占领胶济路全线，并由日本经营管理。28日，日置益就此照会北京政府。次日，外交部指示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　革命党人林直勉、林树巍、薛岳等在广州湾被法警逮捕，孙中山驰电安南总督营救。后经多方营救，至次年9月始获开释。

△　袁世凯以欧战爆发以来，南洋华工陆续被遣回国，是日令福建巡按使于该省暂存候拨项下提银三万元，作为赈恤闽省回国华工之用。

9月23日　英军900人在山东半岛崂山湾登陆，助日军攻青岛。

△　革命党人程家柽讨袁事泄被捕，是日在北京遇难。

9月24日　袁世凯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凡11条。规定设总会于北京，置会长一人，各省设分会。

9月25日　袁世凯发布祭孔告令。内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

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规定9月28日“旧历仲秋上丁”中央与各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9月26日　日军400余人侵占潍县车站。外交部向日使日置益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退。28日，日使复称：胶济路系德国财产，故按站占领。

△　日军攻击青岛外围德军第一线阵地。27日，迫进青岛，占领孤山至巫山一带高地。28日，日第二舰队攻击胶州湾，第四舰队占领崂山湾。

△　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禁止外人游历交战区域，以免危险。

9月27日　袁世凯任命张元奇为奉天巡按使。

△　德公使哈豪森照会外交部，抗议日人进占潍县车站。

9月28日　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并文武官吏，着新式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礼。

△　袁世凯令：各省巡按使派定专员搜集有关清史资料，送交清史馆，以备审择。

9月29日　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政府抗议日军侵占胶济铁路。

△　黄兴抵芝加哥，力阻袁世凯之代表向美国借款。

△　南澳县奉准全归广东管辖。按：该县向归闽、粤两省分辖。

△　参议院代行立法院开议，审议《审计法》、《会计法》两案。

9月30日　袁世凯令：会办热河军务陈光远到京另有任用，会办一差裁撤。

△　俄国驻库伦总领事与外蒙古地方代表签订“铁道条约”、“电线条约”，使俄国在外蒙取得铁路建筑权，及由俄境伊尔库茨克省之孟达至乌里雅苏台电线架设权。

△　外交部向日公使日置益提出抗议照会，谓胶济路系中德商办产业，请转达政府速电将在区域外军队撤退。

是月　范旭东在天津宁河县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为我国精盐业之始。初时资本仅五万元，未及10年资本增至250万元，经理处及总店设天津，支店遍及国内各大城市。

△　周庆云在浙江杭县创办虎林丝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30万元。

10月

10月1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日军侵占胶济路会见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要求日军撤退。日方坚持胶济路为德国财产，当与胶澳一并占领，并要中国军队由上述地区撤走。

△　外交部致牒日德两国公使约束军队，不得占领电局，检查邮件，劫夺库银，逮捕华人胁其充兵。

△　广西南宁革命党人组织之“广西猛进会”遭破坏，会长李群、总指挥黄俊杰等五人被捕遭杀害。

10月2日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议，通过参政梁启超提议，对日英联军在山东破坏中国中立行动，向政府提出外交质问书。

△　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公使日置益会商，提出非正式之调停

案：一、战争期内中国政府不允将胶济路卖与或让与日本外之第三国；二、战后日德对胶济路有何协议，中国政府不持异议。日使称此时实无商量余地。

△　日公使日置益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胶济路实属德国公司，日政府因与德国宣战，不得不占该路。

△　袁世凯令教育部详细审查小学教科书，不得有排斥友邦之内容。

△　袁世凯公布《审计法》、《会计法》。《审计法》，凡19条，规定：审计院除法令规定之大总统、副总统岁费暨政府机密费外，应行审定者计有："一、总决算；二、各官署每月之收支计算；三、特别会计之收支计算；四、官有物之收支计算；五、由政府发给补助费，或特与保证之收支计算；六、法令特定为应经审计院审定之收支计算。"《会计法》，凡九章37条，规定："政府会计年度，以每年7月1日开始，次年6月30日终止。"

△　黄兴抵纽约，次日接见《纽约时报》记者，痛斥袁世凯暴虐，与民主之理想相违背。

△　袁世凯令准农商总长张謇给假两月赴淮北查勘水灾，总长一职由周学熙代理。

10月3日　日军由潍县沿铁路线西进，5日侵占青州车站，6日侵占济南车站，胶济路全线为日军占领。袁世凯命令中国驻军撤出铁路沿线地区。

10月4日　外交部电告驻日公使陆宗舆，德已允让出胶济路交中国接管，候战后解决。同日，陆电外交部称，松井外相对胶济路由中国接管，根本不能承认。

△　袁世凯令：各地方长官晓谕军民，加意保护外人游历，以敦

睦谊。

△　袁世凯令：各省将军、巡按使切实保护各地办理团练正绅之生命财产，使其毫无顾虑，一意图功，廓清匪孽，绥靖闾阎。

△　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辖大兴等20县，设京兆尹为行政长官。是日，袁世凯公布《京兆尹官制》及《京兆地方区域表》。

10月5日　日公使日置益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日既与德开战，举凡德人在东方所有权利，日本均可以兵力取得之；日为军事起见，实有占据胶济铁路全路之必要。

△　外交、交通两部分别派遣刘崇杰、权量赴济南，注意维持山东秩序。

△　新疆将军杨增新呈报北京政府，谓迪化县哥老会周乔生等开设山堂，散发票布，定于旧历中秋举事，刻已破获，首要枪杀，余众解散。

10月6日　外交部照会日公使日置益，抗议胶济路日军西进，要求从速撤回。

10月7日　外交部就日军非法侵占胶济铁路，再次向日公使日置益提出抗议。次日，日使复称：此为日本预定军事计划，至尊重中立，仍不渝初衷。9日，外交部再次向日使提出抗议。10日，日使复照外交部，声称："日军占据山东铁路，乃行军计划之一部分，开战之初即向中国声明。"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郑汉淇为马尼拉支部长，田桐为湖北支部长，杨益谦为云南支部长，徐苏中为江西支部长。

△　袁世凯特任李经羲为审计院院长。

△　袁世凯任命吕调元为陕西巡按使，段书云为湖北巡按使。

△　袁世凯任命张镇芳为参政院参政。

10月8日　袁世凯派朱启钤督办八旗生计事宜。

△　袁世凯令：顺天府府尹沈金鉴着改任京兆伊。

10月9日　袁世凯令：各省行政长官分饬所属，采访民国死难士民事实，汇咨内务部立案，以待褒扬，俾阐幽光，而垂久远。

△　袁世凯公布《修正各省所属道区域表》。按：此次修正道区域表计奉天、安徽、福建、贵州等四省共七个道。

10月10日　朱执信自南洋抵香港，与邓铿等策划举兵，东北一路（分惠州、潮州等四路）由邓派人负责；西南一路（分番禺、花县等五路）由朱会同各处同志办理。

△　日军非法侵占山东博山煤矿。

△　日海军舰队炮击青岛德军各炮台。

△　外交部以英助日攻击青岛，占领胶济路，特向英公使朱尔典提出抗议。次日，英使复照外交部，声称德人以胶济路供军用，日因正当防卫而占领，英不能干涉。

10月上旬　俄国撤退辛亥年（1911）派驻汉口之军队。

△　俄使署确认一月前该使署与北京政府订立以俄国资本敷设齐齐哈尔至瑷珲铁路之合同。

10月11日　中国、交通两银行筹集资本100万元设立新华储蓄银行，总行设北京，发行储蓄券，是日，袁世凯批准并公布章程。

△　内务部于北京故宫武英殿设立之古物陈列所开幕，售票供游人参观。

10月12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海内外各地支部长：巴东杨汉孙，江苏吴藻华，芙蓉伍憙石，新加坡张永福，檀香山谢已原，陕西宋元恺，河南凌钺，安徽张汇滔。

10月14日　　内务、陆军两部奉袁世凯令，会同颁发通告“揭晓孙黄罪状”，并劝令人民与军队切勿为“乱党煽惑”。是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此通告分饬所属张贴。

10月15日　　陆军第三混成旅及该旅备补营改编为陆军第七师，以张敬尧为师长。

△　税务督办梁士诒呈准减轻出洋茶税，以兴实业。

10月16日　　各省将军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与日方交涉自济南撤军。袁复电称英使保证日军于胶济路外不致有何行动，各将军务须镇静以待，不必惊扰，致碍外交前途。

△　袁世凯令奉天、陕西、湖北三省巡按使监督各该省司法行政事务。

△　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开祭孔大会，各省赴曲阜参加大会者，火车票七折优待。同日，孔道会、孔社在北京分别举行大规模“孔子圣诞纪念会”等活动。

△　郭福林等集资20万元在瑷珲开设永济面粉有限公司，兼营电灯业。

10月17日　　日外务省训令日置益公使：攻占青岛后海关应置于日军管理下，海关职员全部任命日人。日使随即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称，青岛未交还中国前，海关可暂用日人或英人。

△　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周应时自上海致函军事部长许崇智，报告江浙两省讨袁军事进行情形。

10月19日　日军在山东平度县出示“斩律五条”，内有“如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行动者，该村人民尽处斩刑”等语，舆论为之大哗，是日，外交部以此向日公使提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

△　蒙古实业公司自清宣统二年（1910）成立以来，耗银七万余两，但业务难以开展，是日股东临时会议决议停业。

△　交通部与美国培斯尔漠钢厂订立借款200万元合同，以部分付还京张铁路借款，余向该厂购买铁路车辆。

10月20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论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指出“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之事业已成功过半……无统一则有第一次之成功亦失败”。并告以中华革命党“自成立以来，各省已陆续统一，远至四川、云、贵、山、陕、甘肃，近至江、浙、闽、赣、两湖，皆惟弟之号令是从”。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函委任邓泽如为财政部部长，并以此名义在南洋筹款。

△　袁世凯特任孙武为义威将军。

10月21日　袁世凯令：王治馨在顺天府府尹任内，鬻官纳贿，处以死刑并立予枪毙。

△　智利要求北京政府互设公使署，派遣公使。

10月22日　中华革命党人夏之麒，16日召集党人决定于浙江举事，党人陆续集中杭州，谋先攻打将军署，杀浙江将军朱瑞。事为军警侦知，自是日起，秘密机关连遭破坏，先后被捕30余人，内有10余人遭杀害，夏之麒避走日本。

△　袁世凯以代理农商总长周学熙请假，农商总长特任章宗祥暂行兼代。

△　广东省为筹水灾善后经费，呈准设立水灾有奖善后议会，以七成开彩，五厘为会中经费，二成五充赈，致赌禁复开。

10月23日　　袁世凯成立模范团，第一期由袁自兼团长，士兵由陆军各师连排长和保定军官学校挑选充任，实系军官训练团，以备编练模范军之用。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刘崛为广西革命军司令长官，邓铿为广东革命军司令长官。

△　日本在济南设领事署。

10月24日　袁世凯任命李进才为拱卫军总司令官。

10月25日　　日公使日置益声明建筑龙口等处轻便铁路，本诸攻击青岛政策，不得不然，战局终结，当即撤除。

△　中华革命党人在广州成立敢死队、炸弹队，进行恐怖暗杀活动。自是日起广州城内连续发生爆炸案。

△　前西藏办事长官钟颖被控在藏劝捐敛财，纵兵抢劫，致西藏叛离，被军政执法处逮捕讯办。

10月26日　北京政府筹办盐业银行，令张镇芳主任筹办事宜。

10月27日　　袁世凯公布《立法院组织法》，凡九章50条，规定“立法院为民国议会”，由中央选出40人，各省、区选出235人组成。然终袁之世，并未实行，只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同日公布《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凡13章109条。

△　参政严复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

案》，主张以忠孝节义为立国精神，经参政多数同意，即日咨送政府。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

△　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在昆明遇难。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任中华革命党本部各部职员：总务部长陈其美，副部长谢持；党务部长居正，副部长冯自由；军事部长许崇智，副部长周应时；政治部长胡汉民，副部长杨庶堪，财政部长邓泽如，副部长何天炯。

△　上海油漆业工人以银价骤涨，铜元贬值，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是日资方被迫同意，允于11月7日开始增加。届时资方毁约，工人再次罢工。12月20日，上海官署惧事态扩大，出面调停，议定每工增加25文。

10月28日　　湖南革命党人所设反袁秘密机关14处遭破坏，被捕30余人。11月11日，赵荣等18人被湖南将军汤芗铭杀害。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黄甲元为烈港支部长，陈新政为庇能支部长，沈选青为巴城支部长。

10月29日　　日本黑龙会代表内田良平向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黑龙会《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通称黑龙会备忘录），共分三节：一、欧战与中国问题，二、中国问题与防御同盟——中日防御同盟秘密条款，三、中国问题和现内阁的外交。鼓吹乘西方帝国主义无力东顾之时，日本应建立侵略中国的优势地位，并附函称："今欧洲大战为解决本问题千载难逢之机遇，不可有一日之踌躇逡巡。"

△　察哈尔都统奉准未移驻多伦前，仍管理张家口行政权。

10月30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郑文炳为麻城支部长；高

建瓴为湖北革命军荆沙司令官。

△　袁世凯以立法院组织选举各法业经公布，自应分别举办，克期观成，令筹备立法院事务局及各省地方长官切实按法通筹办理。

10月31日　日军对青岛发起总攻。日英军舰炮击德军阵地。

△　袁世凯以广东、浙江、四川、广西、上海等省市，连续破坏中华革命党人秘密机关，案情均有“孙文主谋，构乱遣党”事，是日通令各省严密防缉党人活动。

10月下旬　洪兆麟领导革命军在惠州起事。同时，邓国平领导增城、龙门革命军攻东莞、石龙，激战一日，子弹耗竭，遂散。数日后惠州起事亦不得手，洪负伤逃香港。

是月　中华革命党为讨袁发表《告同胞书》，历数袁祸国殃民罪状，号召全国同胞“声罪致讨，共树白日旌旗，扫除独夫凶焰……重建共和，共襄义举”。

△　日本大仓组技师大日方一辅在热河阜新（今属辽宁省）调查煤矿，为胡匪所杀，引起交涉。中国方面被迫同意出让该矿开采权作为赔偿费，设立中日合办大兴、大新两公司。1916年由满铁株式会社经营。1936年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采掘。1944年成立阜新炭矿株式会社，管理阜新附近各矿。

△　高懿丞在杭州租用已停工之通益公旧厂（清末开设，为杭州最早的近代纱厂）设备，创办鼎新纺织公司，纱锭2.036万枚，资本20万元。

11月

11月1日　袁世凯任命林葆怿为第一舰队司令，饶怀文为练习舰

队司令。

△　殖边银行正式成立，资本2000万元，总行设北京。享有发行兑换券特权。

△　上海水木业工人40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24日，业主被迫同意每工增加30文。

11月2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苏无涯为广西支部长。

11月3日　袁世凯公布《森林法》，凡六章32条。

△　袁世凯颁“箴规世道人心”告令，批准参政院《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以忠孝节义为立国精神，勖勉国人。

△　袁世凯任命刘跃龙为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原任吴庆桐准免兼职。

11月6日　袁世凯颁令告诫统兵将校，嗣后如有隐饷自肥者，依法严惩。

11月7日　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德军投降。10日，日军正式接收青岛。16日9时，日本独立第十八师团入城。29日，日人擅自成立青岛市政厅，由日军师团长神尾光臣任行政长官。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郑汉淇为菲律宾支部长。

11月9日　河南中原公司（系由中州、豫泰、明德、凭心四煤矿公司合并组成）与英商福公司联合组成“福中总公司”，是日双方签订草合同，规定资本100万元，总事务所设焦作。

11月10日　外交部照会日公使日置益，要求拆除日军在山东胶州、即墨间所架设军用电线及龙口经莱州、平度所筑轻便铁路。18日又提出撤退青岛日军要求。日本对此均置之不理。

△　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加藤宣布解除胶州湾之封锁。

11月11日　　日本内阁通过“对华交涉案”（即“二十一条”），次日电召日置益公使回国。

△　袁世凯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颁布《军人训条》，凡10条，第一条称“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

△　袁世凯任命曾鉴督办四川筹备事宜。

△　日政府决议青岛善后，大战未毕前，青岛及交战地，概施行军政时期，山东路矿归守备队司令官监督，海关由日人管理。

△　朱执信在顺德县举事讨袁，是日晨千余人扑攻佛山，与当地防营激战，上午9时龙济光由广州派援军四营赶来，党人队伍撤退。

△　黄兴致书萱野长知，谴责日本内阁袒袁政策，“只顾目前小利，于黄种前途毫不思及”。

11月12日　袁世凯公布《官吏犯赃治罪法执行令》，凡七条。

△　陕西延长油井由美孚油公司提供第一批凿井机器大小1900余件，重1700余吨，已全数运抵延长，技师选定县西地点开始施工。

11月13日　　肃政史夏寿康呈请“严行查禁复辟谬说”，袁世凯批交内务部查照办理。

△　袁世凯任命龙建章署贵州巡按使。原任戴勘着赴京觐见。

△　袁世凯任命谭学衡督办广东治河事宜。

11月14日　　袁世凯任命张国淦为参政院参政；林长民为参政院秘书长。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戴季陶为浙江支部长。

11月15日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在东京召开各省支部长会议，总务部长陈其美患病，由副部长谢持主席。

△　北京《亚细亚日报》于是日至18日连续登载劳乃宣《正续共和解》、《君主民主平议》及劳致徐世昌、赵尔巽等人函，鼓吹复辟。

11月16日　　袁世凯召集军政要员开谈话会，决定制止复辟谬说办法三项。

△　司法部颁发《易笞条例》，凡11条，恢复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已废之笞刑。

△　朱执信遣陆志云率义军3000人攻占广东电白，18日因反正之陆军营长林成登叛变，激战两昼夜后撤退。

11月17日　　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呈请宣统复辟，称中国人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总统，即遭步军统领江朝宗逮捕。29日，袁世凯批令内务部将宋押解回四川富顺原籍。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安健为贵州革命军司令长官，阎崇义为山西支部长。

△　袁世凯以山西旗民生计困苦，令准于该省大盈仓存谷项下酌给2000石，以资赈恤，并着同武将军阎锡山，山西巡按使金永另筹久远生计，毋任失所。

11月18日　　袁世凯令徐世光督办直隶濮阳黄河决口事宜，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巡按使为会办。黄河于1913年7月在濮阳双合岭地方决口后，河堤迄未修复，今年水势复盛，濮阳、寿张、范县均遭水淹。

11月19日　　袁世凯美籍政治顾问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校演说“中国新约法论”，谓临时约法不合中国国情，“采用内阁制，事权集于国会，因之起党派之纷争，而总统反不足轻重”，新约法“所规定政府之形式与中国之历史习惯更为相合”，因“目前之中国人民无合群共动之能力”。

△　北京政府总检察厅通饬各省检察厅，严禁刊布书籍、文章煽惑复辟谬说，肆行煽惑者依法惩办。次日，内务部亦就此通咨各省将军、巡按使。

△　山东霪雨成灾，袁世凯特捐二万元并令财政部拨银八万元赈抚。

11月20日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因外面现在散布清帝复位流言，孙毓筠提议变更议事日程，提出“复辟谬说，淆乱国体，咨请查办”。获多数通过，咨送政府。

△　袁世凯令创立关岳庙制，由礼制馆妥议关（羽）岳（飞）合祀典礼。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宋瑞珊为高丽丸分部部长，陈槐卿为天津丸分部长。

△　农商总长张謇呈请辞职未准。

11月22日　　袁世凯令：各道道尹切实考察所属县知事，秉公举劾，振兴吏治。“嗣后各县知事如有婪赃骫法，罔上殃民情节较重之案，不由道尹举发者，将该道尹一并交付惩戒”。

11月23日　　袁世凯以近日有人倡“归政清廷之说”，通令各省严禁复辟邪说，如有“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

△　袁世凯令农商部迅议办法，厉行经济政策，整饬国货，以利民生。

11月25日　　山东地方政府与日军代表商订《胶济路临时治安条款》，凡15条。

11月26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张汇滔为江北皖北革命军司令长官。

11月27日　　袁世凯公布《惩治盗匪法》，凡11条；12月6日公布《惩治盗匪法施行法》，凡五条。

11月28日　革命党人赵壁12日在南京被捕，是日遇害。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叶独醒为宿务支部长，傅荣华为吉礁支部长，吴藻华为江南皖南革命军司令长官。

11月29日　袁世凯公布《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凡六条。

11月30日　　袁世凯令内外行政长官“剴切申明，严行督察，以古人尽瘁事国之义交相勖勉，以巩我新造之邦家”。

△　湖北将军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向袁世凯报告全省清乡成绩，谓“此次清乡重在清查乱党”，自6月以来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

△　法国主教林懋德觐见袁世凯，呈递教皇宾那第十五通告登极亲笔书衔主教、大司铎、秘书司铎名单：主教：林懋德；大司铎：德懋谦；秘书司铎：包世杰。

是月　　日本陆军大臣冈市之助向内阁提出《日华交涉事项备忘录》，其要点：一、延长旅大租借期限；二、租借吉林延边一带；三、南满、安奉两铁路永远为日本所有；四、吉长铁路让售与日本；

五、在南满、东蒙地区，日本得享有土地所有和居住自由并矿山采掘、铁路敷设等权利；六、在中国本部日本应有铁路敷设权；七、中国在军事和武器制造上得接受日本指导；八、若向外国借款或出让利权时，应事先与日本协商后处理。

△　孙中山通告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惟对外准暂用旧名。

△　邓铿、朱执信派人联络广州观音山炮兵内应，事泄，革命党人数十人遭龙济光捕杀。

△　外蒙古地方当局与俄国签订借款300万卢布密约，以“商税、金矿及各种出产为抵押”，作为训练军队（聘请俄国教官）、整顿财政之用。

△　交通部偿还铁路借款，9、10、11三个月共700余万元。

△　财政部向袁世凯呈报各省、区办理金库情形。已设分库有：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杭州、福州、广州、安庆等。代办金库机构有：东三省官银号、吉林官银钱号、黑龙江广信公司、陕西秦丰银行、甘肃官银钱局、湖南银行、湖北官钱局、江西民国银行、贵州银行、广西银行；河南、云南、四川为财政厅，热河为财政分厅，绥远为绥远署。

12月

12月1日　中华革命党各省支部长会议决议由总务部催戴季陶速将支部长会议章程草就，提交下次会议。

△　青岛日守备司令官神尾光臣通告：“因军事之必要，收管胶州海关。”

△ 袁世凯任命溥伦为参政院参政。

△ 四川达县防军一营哗变，川东道尹派兵查办。

△ 聚兴诚商号改组为银行，资本100万元，总行设重庆。

12月2日 日本内阁就“对华政策”（即“二十一条”）上奏天皇批准。

12月3日 日外相加藤高明以“二十一条”要求全文交日置益公使，令其回华相机向中国政府提出。

△ 农商部批准商人陈滔、胡奎文创办张（张家口）多（多伦诺尔）汽车公司，修建公路400公里。

12月4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卢伯筠为西伯利亚船分部长，黄林为地洋丸分部长，罗光汉为蒙古船分部长，蔡文修为中国船分部长，戴焯为满洲船分部长。

△ 袁世凯公布《出版法》，凡23条，规定文书图画有“混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等不准出版。

△ 云南将军唐继尧出巡滇越边境。

12月5日 日本新任关东都督中村觉向日本内阁提出“对华要求”事项：一、日本在南满及东蒙地区得享有居住、营业、不动产所有权，及开办铁路矿山并其他企业优先权；二、奉天巡按使聘请日本顾问若干名，以改进奉天政治、财政、警务、法律；三、奉天将军聘请日本军事顾问若干名，进行军事改革。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谢谦谐为巨港支部长。

12月6日 山东省各界发起组织“东亚和平维持会”，推定代表赴京上书请愿，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军用区域，交涉撤退胶济路日

军，在欧战议和以前调查损失，要求日本赔偿。

△　中国参加美国旧金山巴拿马赛会部分展品400箱由上海启运，另1600箱随运，监督陈琪及农商部委员陈承修随船赴美。

△　袁世凯公布《惩治盗匪法施行法》，凡五条。同日，袁世凯以《惩治盗匪法施行法》已经公布，令着京外文武长官迅速呈报各该地方现办盗匪情形是否适用该法，听候命令遵行。

12月7日　中国撤退山东战线区域驻兵，并通告日本政府请同时撤兵。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梁愚为日里属支部长。

12月8日　邓泽如在槟城敦劝陈炯明、李烈钧加入中华革命党，一致讨袁救国。陈、李以“总章不善，易惹国人反对”而未从。

12月10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梁允祺、刘福田为新加坡联络委员。

△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军事部长许崇智讨论苏省军事及西南川滇黔之决定事项。

12月11日　袁令内务部、财政部会同酌定清丈地亩办法，以期“田制精审，民累蠲除”。

△　邓泽如函孙中山辞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孙徇其请。邓函并称：“李烈钧绝不赞成将国外之国民党取消”，“李、陈（炯明）在欧已联络一气。”

12月12日　美国友人戴屈克受孙中山委托办理与美财政界接洽事宜，是日自芝加哥致函孙中山，报告在美策动反对借款及反袁世凯事。

12月13日　　袁世凯以广东将军龙济光、浙江将军朱瑞迭次破获革命党人反袁秘密机关，分别授予一等嘉禾章及文虎章。

△　外交部据外交文书所编《光绪宣统条约》成书。

12月14日　　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推荐青岛正副税务司及帮办八人，要求北京政府任命。外交部以违反中国海关用人先例，拒绝未允。后日本允以立花正树为青岛税务司，但其余应按日方要求任用，北京政府被迫同意。

12月15日　　袁世凯公布《文官任职令》，凡七条，并附《文官任职表》。

△　中华革命党各省支部长会刘大同报告东三省可着手运动张作霖。

△　日公使日置益自东京回北京。

12月16日　　孙中山召集之中华革命党干部会议举行第十七次会议，廖仲恺、胡汉民、谢持、丁仁杰、田桐、居正、王统一、何天炯、戴季陶等10人出席，孙中山主席，制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六编，以中华革命党总理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并代表中华民国为大总统。中华革命军之目的为：推翻专制政府，建立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中华民国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　中华革命党干部陈家鼐至东京本部报告，请派任烈回湖南运动军队。

12月17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张宗海为甘肃支部长，陈家鼐为湖南支部长，何天炯为广东支部长。

△　外交部致日公使日置益节略，抗议青岛日守备司令官神尾光臣侵占青岛海关，要求迅予交还。

12月18日　日军在龙口、高密间架设电线。

12月19日　袁世凯申令：外省官吏对上年“赣宁之乱”，除首要者依法严办外，不得株连无辜，诬良邀功。

12月20日　由林献堂与日人板垣退助等首创之“台湾同化会”总会是日在台北成立。1915年1月26日，被台湾总督府以妨害公安为由命令解散。

12月21日　袁世凯公布《扩充民国三年内国公债债额条例》，规定扩充债额以800万元为限，本银以京汉铁路余利为担保，并由政府保息。

12月22日　袁世凯公布《私盐治罪法》，凡10条。

△　中华革命党各省支部长在东京举行特别会议，推何天炯主席，原定讨论支部会议规定草案，会间发生争论，未得结果。

12月23日　袁世凯身着祀孔古装，模仿封建帝王，登北京天坛举行祀天礼。

12月24日　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依照《国币条例》开铸袁世凯头像银币。嗣后财政部南京江南造币厂亦开始铸造。

△　袁世凯任命鲍贵卿兼充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12月25日　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改选，覃振为支部长。

12月26日　袁世凯批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零款美金110万元拨充留美学费，并酌提款项拨充古物保存所经费。

12月27日　袁世凯令准币制局总裁梁启超辞职；同日又令币制局裁撤，归并财政部办理。

12月28日　　参政会代行立法院职权开会四个月，已届期满，袁世凯下令宣告闭会。

△　约法会议三读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将其姓名“亲书于嘉禾金简”，密藏石室，届时交付选举。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函邓泽如，改委邓为南洋各埠筹款委员长。同日又委王善继为河南军事联络员，白耀辰为关外军事联络员。

△　日本拒绝北京政府管理青岛海关。是日驻青岛日本侵略军司令部公布海关临时规则六条，擅自开关收税。

12月29日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通知日公使日置益，以青岛德军投降，决定声明取消鲁省所划战区。与此同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此问题照会日本政府。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电示日置益，采取强硬态度阻止北京政府发表此项声明。

△　袁世凯公布《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凡38条；《缉私条例》，凡八条；《证券交易所法》，凡八章35条。

△　袁世凯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凡15条。

△　肃政史傅增湘等呈准凡选举监督以下各职员，不得任用党人，已列名党籍者必先令其宣告脱离，方准任事。

12月30日　　孙中山以国民党理事长名义致函坝罗同志，告以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通告海外各埠国民党支部、交通部，“如有未经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务希填写誓约，照总章重新改组，外虽不妨暂仍其名，内必一律厉行其实”。

12月31日　　英文《北京日报》著文宣称《修正大总统选举法》

无论有何缺点，“须知此选举法应中国之特需，由是观之，则此法诚有利于中国”。

是月　教育部拟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教育三项要旨：一、注重自治教育，提倡民办教育；二、注重精神教育；三、注重全面教育，于学校教育外加入社会教育；并据此提出整理方案30条，其中第五条规定：“中小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大学院添设经学院，以发挥先哲之学说”，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　广东水上警察厅布告，本年共破获王铁军、邓同治、刘省吾、陈方公等革命党人机关10余起。

△　安徽省向北京政府呈报灾情，谓“今年夏秋之间，风、雹、旱、蝗灾荒，几及全省”，更以连年荒歉，急待赈济。

△　陕西省向北京政府呈报灾情，谓华县、略阳、平利、岐山、邠县、扶风、商南、醴泉（今礼泉）、武功等10县，本年7、8月间被雹被水成灾；又蒲城蝗灾，朝邑黄河决口。

△　直隶省向北京政府呈报灾情，以蝗虫、河堤决口“相继为灾”，请免宁河等47县本年各项钱粮。

△　甘肃省向北京政府呈报灾情，以渭源、狄道（今临洮）、陇西、临潭、大通（今属青海省）、金县（今榆中县）水患冰雹为灾，请免本年钱粮。

△　泰隆机器面粉厂创办于江苏无锡，资本20万元。1916年由茂新面粉厂租用，改称茂新三厂。

是年　5、6月间，直隶省临榆县（今抚宁县）商民为反对验契，全城罢市；永年县乡民因连年荒旱要求缓缴验契税，聚众数千人闯入县署；唐县乡民聚众抗缴验契税，包围县署，县警开枪镇压，打

死10人。

△　虞洽卿在上海创办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万元。初仅轮船一艘，航行于上海宁波间。1918年资本增至100万元。1919年增至200万元。先后购买千吨级轮船六艘，航线亦增加长江、南洋、北洋等线，并兼航海参崴、仰光、日本、南洋群岛各地。在长江各埠设有分公司、码头仓库、趸船等，在长江航线中与招商局、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等家轮船公司竞争。

△　英商香港染织厂迁上海，易名杨树浦纱厂，纱锭5.5632万枚。1921年该厂与公益、怡和二厂合并为怡和纱厂有限公司。

△　日商在上海设内外棉第五厂、纺织第二厂。

△　日商以75万日元在吉林省城开设火柴股份公司。

△　辽宁盖县师范语文教员蒋荫棠作《苏武牧羊歌》，音乐教员田锡侯谱曲，先在盖县传唱，后遍及全国。

△　读音统一会在京会员王璞等25人成立读音统一期成会，提倡在全国推行注音字母。

△　王纯根主编《礼拜六》周刊于上海创刊。该刊专载才子佳人式爱情小说，撰稿人多为鸳鸯蝴蝶派。

△　四川优级师范学校改称四川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后改组为成都师范大学及成都大学。

△　美国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于长沙联合创设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改名湘雅医科大学。1929年改名湘雅医学院。

△　周耀先于杭州创办哑童学校。

1915年（民国四年）

1月

1月1日　　袁世凯授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政事堂左右丞杨士奇、钱能训，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财政总长周自齐，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审计院院长李经羲，税务督办梁士诒，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文官高等惩戒委员长周树谟，参政院副议长汪大燮为中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均加上卿衔；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汤化龙，大理院长董康，都肃政史庄蕴宽为少卿，章宗祥、汤化龙加中卿衔。以作实行帝制之先声。

△　袁世凯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凡在1914年12月31日以前，“犯附和乱党之罪，凡系被胁或系盲从，查无扰害行为，而实非甘心从逆者，无论在国内国外，得因其自首特赦之”。

△　袁世凯申令“注重国民教育……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6日，教育部据此拟定《提倡忠孝节义施行办法》，经袁批准，并令应将《孟子》、《论语》分别列入初等及高等小学教科书。

△　交通部令全国各铁路即日起实行统一铁路统计年报。是为我国铁路有统一会计统计年度之始。

△　吴淞、广州两处无线电局建设工竣，是日开始收发电报与海上船舶通信业务，并公布《无线电发报章程》。

△　福建省金门县正式成立。

1月2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梁宗汉为湖北革命军司令长

官。

1月3日　北京航空学校首届毕业生34人举行毕业典礼。

1月4日　驻京日公使日置益访外交次长曹汝霖，转达日本政府拒绝立即取消山东交战区域。曹以北京政府迫于山东各界及地方团体之强烈反对，要求日本谅解。7日，外交部照会英、日两国公使，正式声明取消山东交战区，并告以“贵国现在该区域内之军队一律撤退，以符尊重中国中立之意”。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22次会议，通过：一、承认外蒙有办理内政及订立工商条约权；二、中俄不干涉外蒙自治内政。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李箕为广东游击司令。

1月5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刘光为山东支部长。

1月6日　袁世凯颁布《权度法》与《权度营业特许法》。《权度法》规定采营造尺库平制与万国权度通制并行。

△　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沥陈黔省财政困难情形，每年流出千四五百万，收入不过二三百万，相抵不敷一千一二百万，“再过三年，全省之金钱，搜刮一空，遍地饥民，尽成乞丐”。呈请袁世凯拨留黔省盐税，以延黔民生命。当经袁批交财政部核议。18日，财政部呈准由部筹发80万元，以资协济，所请留黔省盐税，碍难照办。

1月7日　袁世凯令各省切实查禁革命党人各种印刷文件，“从严惩办”。

△　外交部照会英、日两国公使，谓：“现在战事已终，双方交战国之军事设备，已完全解除，自无再行使用龙口及胶州湾附近一带，为行军地点之需要。”声明：“所有前次本国划出该项区域之通告，自应声明取消，回复原状。”

△　教育部通饬各校一律禁用翻版图书，如有误用翻版图书者，应随时纠剔，改用原本。

1月8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电示日置益公使，定期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交涉，催询已否约定会晤袁世凯日期，并电示“仍照原案及早尽速进行”。11日，加藤再次电示日置益，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尽量避免逐条讨论，应坚持按号（按：“二十一条”共分五号）交涉，一揽子解决。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23次会议，讨论北京政府驻库伦大员及其佐理专员所带卫队数目及俄国领事卫队数目等条款。

△　中华革命党党员张拱辰等在南通举事，因计划不周，为人告密而失败，刘桂山、宋守仁、章荣等被捕。

1月9日　袁世凯令裁撤上海中立办事处。

△　袁世凯授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广西巡按使张鸣岐为中卿。

△　舆地学家杨守敬病卒。

1月10日　袁世凯批准奉天开办全省官地清丈局，清丈官地。13日，新民县乡民二三百人执械围攻该县清丈局，相持两昼夜，遭巡警镇压。

△　南（昌）浔（九江）铁路竣工。2月4日全线通车。全长128公里。

△　俄国诱使外蒙古地方当局订立银行条约，规定在库伦成立俄蒙银行第一分行，总行设俄京，资本500万卢布，该行有权在俄国铸造蒙古货币，并以限制北京政府在外蒙古设立银行为交换条件。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刘大同为东三省支部长，何荫三为仰光支部长。

△　日公使日置益复照外交部，拒绝取消交战区。并声明日军行动设施“不能因此通告受何等影响，亦不能因此而受拘束”。16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使，重申7日声明。

1月11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覃振为湖南支部长。

1月12日　财政部公布《稽查造币总分厂简章》，凡11条。

△　袁世凯令开去田文烈陆军中将，授为中卿。

△　袁世凯为维行政系统，申令各省巡按使，各省水利分局局长员缺，由各该巡按使择相当之员，商明全国水利局，联衔荐任。

1月13日　模范团团副陈光远率领该团第一期全体官兵至北京关岳庙宣誓，袁世凯派荫昌监誓。陈宣读誓词，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　袁世凯以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办理成效卓著，特授该公司经理陈惟壬、李士鉴四等嘉禾章。

△　袁世凯任命江瀚为参政院参政。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沈鸿柏为麻六甲支部长。

△　奉天本溪湖煤铁公司制铁所于1913年兴工，1914年12月工竣，是日开始生产，日产生铁130吨。1917年12月第二座熔铁炉投产。

1月14日　水利局总裁张謇向袁世凯呈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筹办情形，聘前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为该校筹备主任。

△　财政部补订契税实施细则，通饬各省区财政厅转饬所属一体遵办。同日订定印花税法罚金执行规则，呈准通行办理。

1月15日　　国务卿徐世昌为公开甄拔留学生订定《甄拔考验规则》八条，公布施行。

△　财政部币制委员会成立，以章宗元为委员长。凡币制重要问题，悉付该会讨论。

△　日公使日置益照会外交部，坚持关东州租借地列为日本邮政区域，谬称："该地邮便悉由帝国机关施行，故当然将该地认为帝国邮政之一区域。"

1月16日　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外务省解释，山东战区必须立即撤销，如何撤兵仍可从长商量。

△　上海太古、招商等17家轮船公司堆装工人6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

△　袁世凯特任蔡锷督办经界局事务。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卢师谛为四川革命军司令长官。

1月17日　　袁世凯令各省将军、都统、巡按使、护军使及京兆尹，肃清盗匪，勿养痈为患，为害地方。

△　财政部为统一各省勘报灾歉办法，特订定《勘报灾歉条例》，凡18条，呈准通行办理。

1月18日　　日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袁"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袁接阅后答称："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号，主要内容是：第一号四条，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第二号七条，承认日

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各项特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筑路和开矿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至99年；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别国；第五号七条，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承认日本在武昌与九江南昌，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并承认日人在华布教权。

△　晚，奉袁世凯之命，陆徵祥召集孙宝琦、曹汝霖、梁士诒举行秘密会议，孙主席，讨论“二十一条”。孙、曹主张只有接受，梁、陆则认为应该谈判。未能达成一致。

△　外交部为能加入欧战议和大会，合理解决山东问题，密函驻外各公使密探驻在国意旨。

△　袁世凯颁布修正《崇圣典例》，将原定“孔氏各项祀田，由各该管地方官清厘升科，归国家征收”，改为“祀田租税仍由衍圣公自行征收，并着各该管地方官妥为保护”。

1月19日　　袁世凯接见其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拒日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声称：“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决不作高丽第二。”

△　孙宝琦向袁世凯报告昨晚会议结果，并向袁请示，袁亦主张与日方谈判。当夜，孙即递辞呈，并向袁荐陆徵祥继任外交总长。

1月20日　　日公使日置益亲往北京政府外交部补递“二十一条”条款，作为正式交涉根据。

△　日公使日置益会见陆徵祥，商讨“二十一条”会谈时间，订于2月2日下午3时，首开谈判。

△　《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并为该刊撰写发

刊词。

△ 蓝公武针对袁世凯尊孔复古活动，在《大中华》杂志著《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予以驳斥，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非今所可奉以为教化之法则”，今日改革之道“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礼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为表率，而欲奉世界之伟人为导师”。

1月21日 据奉天巡按使署报称：革命党人在大连设立机关，首领孟冠州等，参加者五六百人。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批准军事部长许崇智等所拟《中华革命军委任通则》，并委庞三杰为鲁豫淮游击司令官，领导丰、砀（山）、沛三县起义。

1月22日 驻英日使井上胜之助会晤英外交大臣葛雷，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一至四号秘密通知英国。25日，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将上述内容通知驻日英使格林。

△ 东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刊载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动大批警察予以没收销毁，但消息终于外泄。

△ 北京《亚细亚日报》与英文《北京日报》首先刊载“日本又向外交部提出新要求”（指“二十一条”）之消息。31日，《亚细亚日报》译刊《朝日新闻》号外全文。为此，27日及31日，日公使日置益及使馆书记官小幡分别警告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及外交部，曹允商请内务部取缔。2月2日，政事堂在各报刊登通告，严禁外交人员及各部院录事人等向报纸泄露中日交涉消息，违者依法惩治。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讨论税则问题，中方主张中国商货完全免税，俄蒙主张值百抽五，意见不一，议而未决。

△　袁世凯颁布《教育纲要》，申明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强调各校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

△　教育部通告著作人及出版人，应激励真诚，共图利济，凡所营作，一以裨益社会为归。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凌霄为贵州支部长；林天奇为吉礁支部名誉部长。

1月23日　四川成都《国民公报》登载袁世凯亲信陈宦即将入川任职新闻，当日即被以“无端造谣，煽惑军心”罪名封闭，报社主笔潜逃。

1月24日　英、法、俄驻华公使为“二十一条”事先后访问日使馆。英使朱尔典一再询问条款内容。日置益急电东京请示：万一英使复来追询第五号，将如何回答。次日外务大臣加藤电示：“一、严重提示中国政府泄露秘密后果；二、东京已于25日约见英使，只以第一至四号通告；三、万一朱使追问，可以个别悬案中二三事，系出于对华劝告性质，酌量回答。”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夏尔玙为浙江革命军司令长官。

1月25日　新任驻京德使辛慈向袁世凯呈递国书。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徐苏中为江西支部长。

1月26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电示日置益，“交涉迅速解决极为重要，中国政府希每周会谈一次，殊嫌缓慢。交涉一久，内容自然外泄，势将妨碍交涉进展，希贵官先要求中国政府对全部条款作主义上诺否的表示”。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蔡济民为湖北革命军司令长官。

1月27日　　袁世凯特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李兆珍为参政院参政。

△　袁世凯令准审计院院长李经羲辞职，遗缺特任孙宝琦继任。

△　袁世凯授陆徵祥、联芳、宝熙、郭曾炘、熊希龄、李盛铎、张镇芳、宋小濂、姚锡光、周学熙、李家驹、严修为中卿；梁启超、赵惟熙、曹汝霖为少卿，加中卿衔。

△　袁世凯据财政总长周自齐所请，准将善后借款停止四省（直隶、山东、河南、江苏）保息。

△　财政总长周自齐通令革除老少盐名目，以后小民肩挑背负，如有违章逃税情事，得按违警罚处。

1月28日　　第一师师长洪承点前以涉嫌“附乱”被通缉，是日袁世凯批令准予特赦，并销去通缉原案。

△　袁世凯任命徐廷荣为绥远陆军混成旅旅长。

△　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呈递备忘录，希望北京政府公布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争取世界同情中国。

1月29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批准《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

1月30日　袁世凯追赠赵秉钧上卿，宋教仁、沈秉堃中卿。

1月31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林森为美洲支部长，冯自由为副。

1月下旬　　统率处连接各地上将军及将军电询中日交涉近状及政府对策。袁世凯特谕该处复电，略称：“以外交政策自有相当办法，该上将军将军等应敬候中央政令，不得滥行干涉。”

是月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邀宴梁启超，探询改变国体意见，杨度亦在座。

△　《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国科学社主编。该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宗旨”。

2月

2月1日　袁世凯为中日交涉问题，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及各部总长开秘密会议。会上各部代呈各省商学各界及华侨各团体联名电请政府抗议中日交涉，严辞拒绝日本一切要求之电文130余件。

△　财政、陆军二部会呈缉私办法，是日袁世凯批令：枭风猖獗之处，如有持械拒捕，准其格杀勿论；当场拿获准其就地惩办。

△　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外党员严防袁世凯离间，并说明革命意义。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哈在田、臧在新、丁明钦、程壮、詹炳炎分任徐州、淮上、海州、通州、扬州革命军司令官。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28次会议继续讨论税则问题。俄使提折衷修正案：“中国商民运入外蒙货物，应照中国内地捐交纳；该内地捐价单，由外蒙官府规定，征求中国驻库大员同意”，货捐值百抽2.5。外蒙代表反对，谓货捐数目应由外蒙自定。讨论无结果。

△　山东峄县中兴煤矿矿井起火发生爆炸，炸死矿工400余人。

2月2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与日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在外交部举行关于“二十一条”第一次交涉。会上陆主逐条按顺序详细审议，日使坚持逐号一揽子讨论。会间，陆对第一号第一条提出修正，即日本将胶州湾交还中

国，中国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其他特权让与日本，当即为日置益拒绝。

2月3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约驻日公使陆宗舆密谈，暗示不坚持“二十一条”中之第五号。陆致电外交部转达加藤旨意，并称：“袁大总统如有意联交，即或遇革命纷乱之事，日政府自应中政府希望，尽力援助，并非干涉。”

△　日公使派使馆书记官高尾亨往访外交次长曹汝霖，指责北京政府对“二十一条”交涉故意迁延，催促从速进行。

2月4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电令驻俄大使本野、驻美大使珍田，将“二十一条”一至四号秘密通告各驻在国政府。5日，加藤又秘密将上述内容通告俄国、法国驻日大使。8日，通告美国驻日大使。

△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离东京回沪策动各地讨袁军事，是日自沪致函黄兴，首述过去惑于孙文理想黄兴实行之非，次则胪举党人有负于孙文者五项，并劝其自美言旋，共肩艰巨。黄兴不应。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郑炳垣为浙江革命军第一旅旅长，邵元冲、金维系分任浙江革命军绍兴、严州司令官。

2月5日　　中日“二十一条”举行第二次交涉。陆徵祥发表对全案的意见：对第一第二号部分条款提出修正，而对其余各号条款表示难以接受，并声明：“同意先就全部条款，分别说明意见，但中国政府于讨论细节时，逐条尚有意见提出。”日使要求北京政府提出修正案，陆允9日将修正案送日使馆。

△　袁世凯接见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谈话一小时，告知“二十一条”内容。

△　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商请外交部派员赴澳门查勘葡人新占、旧占界址。

△　孙中山派邓铿等由日本赴南洋，宣传中华革命党改组之意旨。

2月6日　日公使日置益致电日外务大臣加藤，报告两次“二十一条”交涉情况，提出为迫使袁世凯妥协，迅速全部地接受“二十一条”，要求授权对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7日，加藤电复同意。8日，日使访陆面告：“照上次会议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大纲，日本政府断不允接受。”并提出“警告”。

△　袁世凯密颁军令，通电各省将军称，日来关于外交方面谣传甚多，所有各省军队务须严防煽惑，如有发生意外之举，即以该将军等是问。

△　北京政府又接各将军巡按使等联衔密电，请政府宣布日本要求各条款之内容，以免纷纷猜疑，致酿风潮。7日，统率处分复各省将军，略称：“此次交涉虽属困难，并不似所传之甚。政府现正审慎筹划，决不轻弃主权。”

△　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未准。

2月7日　福建巡按使许世英昨今两日三次急电袁世凯，称闽省军警商民对中日交涉均极激愤，连日集议联合对策，若从严缔禁，恐激成反抗风潮，请示相当办法。袁复电指示设法劝导，力行防范，免生意外。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黄展云继许崇智为福建支部长，王敬祥为神户大阪支部长，盛碧潭为浙江革命军宁波司令官。

2月8日　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致函驻华公使芮恩施，谓“余感觉对于现在之交涉，予中国以任何直接劝告，或任何直接干涉，均属害多益少，且将引起日方之猜忌及敌意，中国将首蒙不利。……现在余正慎重注意情形，准备步骤于适当时机行之”。

△　川省都江堰工程年久失修，水溢成灾，署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呈报都江堰工办理情形，并请设局遴员，予以疏浚修复。是日，袁世凯批令内务部全国水利局速议具复。

△　袁世凯特任孟宪彝为吉林巡按使，并授少卿。

2月9日　　外交部对“二十一条”提出第一次修正案，日使以未能全部接受日本要求，表示大为不满，并以不开议为要挟。北京政府对日妥协，“允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展期99年，三、四两号亦允酌议”。经多次接洽，12日，日使始将一、二、三号修正案收下，转达日本政府。

△　外交次长曹汝霖电驻日公使陆宗舆称：“此次提案时，日本公使声明一、二两号绸缪订约，三、四两号互换文书，五号系劝告性质，希望实行”，故对于五号拟“坚持不议”。

△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富莱兹在东京访问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探询中日交涉日本所提要求真相。加藤透露除前密告驻日英使格林内容外，还有一些项目。

2月10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向加藤外相声明：英国政府关于日本对华要求条款漏告第五号，深表遗憾。11日，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将“二十一条”全文电伦敦本社。

2月上旬　　统率办事处密电直隶、湖北、奉天、山东、上海等省市，严防乱党以中日交涉为借口扰害租界，“应即严督所属各军警严行侦察缉办，以资防范”。

2月11日　　留日学生千余人冒雨在东京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大会决议：“（一）电请政府拒绝要求，并公布条件；（二）以文字警告劝导海内外国民；（三）拟定留日学生对外宣言；（四）设立分机关于京沪；（五）准备归国之办法。”14日选举

驻京、沪代表。15日成立评议部。20日各代表由长崎归国，分赴京、沪等地。

△　欧事研究会李根源、程潜、熊克武等在东京联名通电一致对外，称："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

△　驻荷公使唐在复签署荷京禁烟会议议决办法，并声明即日开始实行。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周知礼为云南支部长。

2月12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访晤日外相加藤高明，声明："政府允议至四号，让步已达极点，万难再议五号。"加藤坚持商谈第五号条款。

△　袁世凯公布《修正国籍法施行规则》，凡13条。3月2日，内务部改订发给关于国籍之许可执照简章八则，通令京外各行政长官并咨由外交部转给驻外各使领署馆遵办。

△　财政部整顿铜元，订定限制铜元办法，凡铜元充斥者实行停铸，以稳定币制。

△　袁世凯聘梁启超为政治顾问。梁未受命。

△　孙中山委张静江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廖仲恺为副。

2月13日　　财政部为各省查追官产，应归该管地方行政官厅办理，毋庸交由法庭审判。是日，袁世凯批示由部通行遵照。

2月14日　　方梦超、潘梦民、黄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对日同志会。

2月15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会晤日公使日置益，婉请不议"二十

一条”第五号，由日本撤回。日置益则称奉政府电训，对第五号极为重视，促速提修正案。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军事部副部长周应时兼任江苏革命军司令长官。

△　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将当日从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幹处获得的“二十一条”英译本，转交驻京英公使朱尔典。17日转交给《泰晤士报》记者端纳。24日寄给《泰晤士报》外事版编辑斯蒂德。

2月16日　日公使日置益访外交总长陆徵祥，一再迫议第五号，仍无结果。17日，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谓“昨日日公使奉训条来称，中国政府不能商议第五号理由，日政府殊难了解，力请对于第五号中国政府允以可与商议云云，答以第五号碍难商议”。

△　日本阁议通过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新修正案，加藤外相将新案训令日置益公使，后以迫议第五号无结果，未提交中国。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31次会议续议税则问题，中国专使声明，坚持在外蒙之中国商民应享不纳任何税捐之权。俄使坚持原议，称外蒙有自定货捐之权。外蒙代表亦称中国政府不应干预外蒙税则问题。税则谈判遂告停顿。

△　袁世凯任命阿穆尔灵圭为镶蓝旗汉军都统。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黄国华为福州革命军司令官。

2月17日　日置益公使电日外务省，主张先退还中国之修正案，迫使中国允对第五号作商议。

△　山西垣曲驻军一个支队哗变，击毙排长、什长，晋南镇守使董崇仁派兵弹压。

△　袁世凯令准将“自制工品”择要酌量减免关税。

2月18日　驻英公使施肇基与智利驻英公使艾德华在伦敦代表两国政府签订《通好条约》。

2月20日　美驻日大使询问日本政府对华要求中是否有第五号。从是日至27日，日本政府将第五号分别秘密通知英、美、法、俄等国。

△　袁世凯任命陈宦会办四川军务。

△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农商部派员参加。3月9日，中国馆开馆。

2月21日　加拿大温哥华华侨救亡会成立，以“合群御外，挽救危亡”为宗旨。25日，公举陈道之为会长。28日，开第二次大会，华侨2000余人参加，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　新华储蓄银行在北京正式开幕。

2月22日　中日举行第三次“二十一条”交涉，谈判第一号一、二两款，日要求一款缓议。中方接受第二款不将山东省内各岛屿及沿海一带土地让与或租与外国。

△　统率处通电江苏、广东、湖北、奉天等省将军，责成数事：一、中日交涉，不得妄事电争，顺从中央命令；二、必须严束军队，查禁谣诼；三、必须慎保外人，防范排外；四、必须严防“乱党”，以保治安。

△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派政事堂参议金邦平赴日活动，是日金抵东京。

△　英驻日大使格林访加藤高明，表示在对华交涉中希望日本尊

重英国在华既得权利及尊重中国“独立自主”。

△　税务处通电各海关，自3月1日起免征通花边等五宗物品出口暨复进口各税；外销草帽缏及地席减半征收出口税。

△　政事堂举行甄拔留学生考试，是日初试。其后经复试及两次口试，于3月19日揭晓，录取151名。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徐镜清为福建革命军第二师师长兼延邵司令官，沈国英为泉州司令官，江涛为兴化司令官，邹云彪为汀龙司令官。

2月23日　袁世凯授胡惟德为中卿。

2月24日　袁世凯颁布《修正觐见条例》，其中规定特任、简任、荐任“须于任命后觐见大总统”。

2月25日　黄兴在美国为“二十一条”交涉与旅居南洋之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往返函商，是日联名通电上海各报，谓“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主张“暂停革命”，一致对外。

△　中日举行第四次“二十一条”交涉。日本坚持第二号“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陆徵祥提出东部内蒙古除外，会议无结果。

△　蔡元培与李石曾等愤日人提“二十一条”欲亡中国，在法国巴黎组织“华人御侮会”。

△　袁世凯以预算不敷，谕令国务卿徐世昌裁汰冗员。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林德轩为湖南革命军司令长官，祁耿寰为关外革命军司令长官。

2月26日　约法会议自去冬闭会后，是日始行复会，由议长孙毓

筠主席，讨论国民会议组织法案，交付审查委员审查。

△　日军在山东益都金岭镇至铁山修筑轻便铁道竣工，该地居民集会反对，派代表赴省呈诉。

2月27日　　教育总长汤化龙以留日学生有全体回国共赴国难之议，特饬学生监督劝留日学生忍辱负重，力学救亡，“勿以一时之激刺，致干旷学之戾”。

2月28日　　中日举行第五次“二十一条”交涉，续谈第一号三、四两款，北京政府允许如需用外款建造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铁路之时，倘德国愿抛弃借款权，则尽先向日本借款，但未定案。关于第二号之优越地位及东部内蒙古问题，续行讨论，陆徵祥亦未允认。

△　欧事研究会会员钮永建在纽约第二次救国大会上演说，呼吁全国人民，“不论何党何派，应协力一致为政府之后援，俾政府得以全力为对日之交涉”。

是月　　袁世凯密令直隶等省将军，严防乱党以中日交涉为借口扰害租界，“应即严督所属各军警严行侦察缉办，以资防范”。

△　东京留日学生总会集会，推举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李大钊执笔草拟《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由李编印《国耻纪念录》，揭露“二十一条”侵华实质，号召国民奋起自救。

△　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

△　教育部核准上海神州法政专门学校立案。

△　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11月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3月

3月1日　留日学生回沪代表以全体留日学生名义发表《泣告全国同胞书》，揭露日本政府灭亡中国野心。表示拒绝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宁为亡国前之雄鬼，不为亡国后之遗民”。

△　江苏银行总行由苏州移设上海，是日开幕，资本定额100万两。

3月2日　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发布会员规约，宣称：“本会以结合群力，拥护国权为宗旨，凡本会会员必具爱国之决心，若遇国家外交受无理之胁迫时，誓以死救国。”

3月3日　中日举行第六次“二十一条”交涉。第一号第四款议定，中国允将山东省内主要城市辟为商埠，所有应开地点及章程，与日本公使预先妥商决定。第三款后议。第二号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铁路退还期限允展至99年。安奉铁路延期问题争辩无结果。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许崇智、何天炯、叶夏声为南洋特务委员，谭根为航空队司令长官。

3月4日　革命党人、前四川民政长张培爵从事反袁活动，1月上旬在天津被捕，旋即解北京军政执法处，是日被杀害。

△　北京政府代表海关监督安格联与俄国政府代表格雷夫在北京签订《关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第十四条所载免税物表之协定》。按照该协定，中俄又于7月27日在哈尔滨签订退还关税章程七条。

3月5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致电日置益公使，谓为迫使北京政府全部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将以换防名义向东三省、山东及京津地区增兵，进行武力威吓；并训令日置益促陆徵祥迅速“和平圆满地解决此次交涉”，否则，“日本政府不得已将采取必要手段”。

△　外交次长曹汝霖致函驻日公使陆宗舆，告以袁世凯派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就中日“二十一条”交涉问题赴日活动，“游说元老”。

△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部报告有贺长雄在日接洽情形，略称："松方（正义）自有贺报告后，谓中日邦交当惟大总统是赖，如五号一、三、四款有妨总统体面地位，当与山县（有朋）协力忠告政府，并劝止勿用武力伤感情。山县则谓旅大南满延期，誓达目的，用兵亦所不避；满蒙居住贸易可修正条件，使无妨中国主权及各国均等之约。"

△　袁世凯特任周自齐署理农商总长，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

△　司法总长章宗祥以选举、贪墨、赌博诸弊端最关治乱，饬令总检察厅转饬所属务宜注意，实心毅力，锐力排除。

3月6日　　中日举行第七次"二十一条"交涉，续谈安奉铁路展期、南满东蒙杂居问题，双方争持均无结果。

△　夜，中华革命党两湖招讨使罗石相率领部众60余人入湖北沔阳县城，破县署，释监犯，旋以无援自动撤离，罗等10余人先后在汉口被捕遇害。

3月7日　　袁世凯据陆军总长段祺瑞等所请，下令特赦黄英、范贤方、林支宇等15人，并一律销去通缉原案。

3月8日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外蒙界线条文。其与中国之界限，以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属，东与呼伦贝尔，南与内蒙，西南与新疆省之戈壁，西与阿尔泰接界之各蒙旗为界。正式划界由中俄两国及外蒙代表会同办理。

△　日公使日置益就"二十一条"事访曹汝霖，面告带有恫吓的声明道："会议迁延，使日本国军民，势难再忍，若于数日内对于重要各条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

3月9日　　中日举行第八次"二十一条"交涉，北京政府作重大让步，对旅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租借期均延至99年。

△　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令探听日方消息，谓“南满换防，本应四月底举行，此次提前换防，是否含有他种野心，抑仅作虚声，详探电复”。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函南洋同志，谓：“弟睹祖国之濒危，与海内外同胞所受之苦痛，以为非急倒彼恶政府无以挽救，而往事之失，则当引为鉴戒，是以一面日图进取，一面重整党务，以企完全负责统一进行。”

△　孙中山命中华革命军事部长许崇智等自日本赴南洋联络同志，扩大党势。

3月10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照会日本政府，提出日中“二十一条”交涉中第五号有关南昌至杭州、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潮州等铁路权，中英已订有成约，要求日本注意。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在东三省、山东、京津地区增加军队，对中国进行恫吓。11日，日本颁布“南满驻屯军”换防令。从3月中旬至下旬，日本向山东、东三省等地增兵。

△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部告以访晤日外相加藤情形，略称：“加藤谓中国政府真以诚意相见，余甚满足。深望来次会议，从速进行，自即圆满解决。”“此外，东蒙要件不能不议，三号当易商议，五号虽推诚后议，却不能全置不谈。”

△　袁世凯通令严禁官吏违法为亲故关说请托，以澄清仕路，使“用人者各举其职，居位者悉当其才”。

△　浙江绍兴船户千余人至警署请求免捐，岗警开枪恐吓，船民一拥入署，捣毁器物，折断枪支。县署派军队镇压。

△　孙中山命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出通告，揭露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与袁世凯阴谋称帝的关系，号召党员积极讨袁。

△　山西省撤销清源、平顺、马邑三县。

△　内务部呈山西省各县要津地方设置县佐，共36缺。

3月11日　中日举行第九次“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允许日方将前订安奉路99年期满无价交还事项删除。

3月12日　袁世凯颁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凡六章31条。

△　政事堂电布各省，称“一切排日举动务应力为谕止，现在交涉未了，民气不宜嚣张”。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36次会议，重行讨论税则问题，仍无结果。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熊秉坤、王华国、刘英分别为湖北第一、二、三区司令官。

△　湖南乾城煤矿工人因反对延长工作时间，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矿警将熊得生等三人逮捕，激怒工人焚毁警署，救出熊等。县知事派警备队弹压，工人相率避贵州松桃县境。

3月13日　中日举行第十次“二十一条”交涉，北京政府代表继续对日妥协，按照日本要求完全同意旅大租借地及南满、安奉铁路展期99年，并将南满铁路原合同36年后给价收回一节取消。日方态度忽趋强硬。

△　外交部照会日公使日置益，声明日本渔船不得越界渔捞。

△　菲律宾小吕宋华侨救亡团致电北京政府，谓：“日人无理要求，请拒绝，宁战毋让，侨誓以生命财产为后盾。”

3月14日　日本增派侵略军三万人来山东等地进行威胁。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公使日置益，质询增兵原因。

△　袁世凯通令各地方官对于整理场运，巡缉私盐各事宜，均应协力维持。各该巡按使表率僚属，责无旁贷，遇有协力盐务不力之县知事、县佐，立予参劾。

△　袁世凯批令江苏将军冯国璋法办江北巨匪千里驹。

3月15日　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创办之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日正式开学。

△　都肃政史庄蕴宽、肃政史王瑚等以交通部事权未统一，情面未破除，弊病未剔革，以致路政不修，特呈请大总统饬部彻查纠正。

3月16日　中日举行第十一次“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允许在南满、东蒙建造铁路日本有借款优先权。

△　“劝用国货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议事厅开成立大会，公举虞洽卿为会长。

3月17日　袁世凯派国务卿徐世昌至北京孔庙代行春丁祀孔礼。

△　日置益坠马受伤。18日，陆宗舆电外交部称：“小池言：日置乃轻伤，来周仍可列会，小幡可先与曹次长接谈。”

△　吉林驻军第二十三师改编为两个混成旅，以裴其勋、高凤城分任第一、第二混成旅旅长。

3月18日　上海绅商学界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在张园开国民大会，与会者三四万人，通过提倡国货、设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次日，“国民对日同志会”等团体致电袁世凯，谓“民等宁为战败忠魂，不作亡国奴隶，务乞速作战备，捍卫国家，人民誓死以赴国难”。

△　约法会议闭幕，议长、副议长、议员及国务卿、各部总长均到会，议长宣读袁世凯3月14日准约法会议咨请于3月18日闭会之申

令，国务卿代表袁世凯致颂词，议长代表全体议员致答辞。

△　奉天将军张锡銮电告北京政府，日军300名侵入奉天省城，另有1500名分驻铁路沿线。

3月19日　　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谓："日来据各方面报告，日本派多数军队向东三省、山东、津沽等处出发……希以政府训条向外部面询此次派兵用意之所在，以便安慰人心。"

△　袁世凯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中日交涉前途无论如何困难，宜防制人民，不得轻举妄动。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三十八次会议，仍议税则问题，中国与俄蒙各持己见，互不让步。

△　袁世凯以"要结乱兵，擅离职守"罪名，将前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处死。

△　孙中山致函康德黎夫人，请劝英人勿助袁世凯，谓如英助袁，等于间接助德，将会丧失英在中国之地位。

3月20日　　中日举行第十二次"二十一条"交涉。因日公使日置益坠马伤足，日方以使馆书记官小幡酉吉为临时全权代表，继续迫议在东部内蒙古享有特权利益问题。

△　财政部公告，赔偿英、德、法等13国因辛亥革命所受损失金额，共规银5080241.92两。

△　内务部遵议僧侣传授法戒，应任信教自由，依法保护，呈准施行。

3月21日　　农商部拟订各省财政厅长兼理矿务职守规则，呈准内务部通行遵办。

3月22日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三十九次会议续议税则问题。

△　司法总长章宗祥通饬各级监狱，应施监狱教诲，授以谋生之术，启其向善之机。

△　旧金山华商总会飞电各处，宣称抵制日货，是日致电广州商会、报界公会转华安公所，告以“敝处停办日货，乞鼓吹继续进行，力争国体”。

△　袁世凯授陆荣廷为陆军上将。

3月23日　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至日使馆，就日置益病榻举行第十三次“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允许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对东三省南部税课抵借外债或聘用顾问有优先权及指定区域内有开矿权。

△　驻京美公使芮恩施访晤袁世凯，交换对日交涉意见，袁以为美国若能予以协助，则一切危机，可能大部消除。

△　外交部及统率办事处通电各省，报告“二十一条”要求交涉情形，声称中日交涉开议，相持匝月，迄无头绪，现定敬日（24日）再议，“务期勿损国体，勿失土地”。

3月24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晤日外相加藤高明，面诘增兵理由。加藤声称系部队交替，稍增人员；又称“中国各处有排日骚动，自须相当警卫”。加藤并声言在满蒙拟请再开27处商埠。

△　财政部呈准在中国银行内专设一处办理货币交换事宜，并在各省设立货币交换所，使杂币得与银元纸币出入交换，以利货币流通。4月1日中国银行货币交换所筹办处开办。

△　袁世凯任命赵椿年会办中国银行事宜。

3月25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严禁人民抵制日货。着各将军、巡按使“认真防范，倘有乱徒假托名目，扰乱治安，着即严拿惩办”。按：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弥漫全国，日本对华输出商品锐减。1914年5月日本对华输出商品为1523.8万元，1915年5月减至939.5万元。

△　财政部以袁世凯3月10日申令：“嗣后各官吏有违法关说请托者，均准接受之人举法”，是日通饬属裁汰冗员，“自此次通饬以后，该厅长等务须实力整顿，勿再瞻顾情面，率引冗员滥竽充数”。

△　袁世凯公布《军刑改遣易棍条例》，规定犯陆军刑事条例无期徒刑及处三等以上有期徒刑者，得因其情节改为发遣；犯陆军刑事条例四等以下有期徒刑者，得因其情节易以棍刑。

3月26日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由于税则问题久议未决，中国专使陈箓电外交部请暂时撤使停议。

△　孔丘“忌日”，北京孔社举行纪念会。4月29日，该社成立二周年，开大会六天，举办图书展览及讲经等活动。

△　盐业银行开业，资本500万元，官股200万元，商股300万元，总行设北京，张镇芳、袁乃宽为正、副经理。

3月27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继续进行，中国提第三次修正案，允许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南部地方内地居住或经营生业，但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完纳一切赋税；如有民刑事诉讼，由中国法官审判，日方可派官吏听审。日方仍不同意。30日会议，日方态度转趋强硬，杂居之外，要求添开商埠，领事裁判则坚持向例，第三号亦甚坚持。

3月28日　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至北京关岳庙代行合祀关岳礼。

△　台湾台北新庄人杨临密谋起义抗日，事泄，被日人捕杀70余人，是为“新庄事件”。

3月29日　上海商界百余人在民国路举行第二次抵制日货大会。

3月30日　袁世凯申令告诫官吏戒偷惰，戒瞻徇，戒奢靡，戒嬉游，永作官箴。

3月31日　税务处督办梁士诒令饬总税务司安格联严缉私运吗啡、高根（可卡因）。

△　袁世凯派梁启超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梁未受命。

是月　孙中山致函黄兴敦劝即日归国讨袁。函中论述“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提出“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并述及讨论起兵讨袁时与黄兴之意见分歧，“推原其故，文之非欤，公之咎欤？”认定黄兴应负失败责任。

△　德国使馆参赞巴本希姆偕德人七名、汉人四名、蒙人一名，携带骆驼20只暨飞艇炸药等物，至内蒙谋招巴布扎布匪帮炸毁西伯利亚铁道，以断日俄交通。巴匪佯许以2000人相助，同时又阴令部下将此情况驰报海拉尔俄国领事，俄领事令速将德人等击毙，焚尸灭迹。巴匪遵照俄领指示即将德人等全部歼灭。德人所带银钱10余万及驼马、护照、军械等，由俄领悉交巴匪，分赏余党。

4月

4月1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继续举行，中国提第四次修正案，将日所提原案第二号之二、三款关于南满杂居问题，除土地所有权改为土地租借权；耕作土地加“另订章程”字样外，余均与原案同。惟附加一条，声明中国政府委曲求全之办法。

△　袁世凯颁布《四年内国公债条例》，定额2400万元，用于“整理旧债，补助国库”。

△　奉天省设立全省官地清丈局，拟订《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章程》，清查官地。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陈民钟为怡朗支部长。

△　孙中山嘱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谢持：“凡属江浙方面关于军事者，一律令于上海接洽。”

4月2日　　袁世凯令准甘肃靖远等县民国二年秋灾中被冰雹旱灾地亩蠲缓豁免钱粮。

4月3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曾杰为河南革命军司令长官。

4月4日　　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许崇智等抵芙蓉，携有孙中山致邓泽如函，告以“兹派许君崇智等南来，联络同志，扩张党势，并报告进行各情，到时请为接洽，并带往各埠介绍于各热心同志”。6日，邓泽如偕许崇智等赴巴罗，数日之间，晤区慎刚、郑螺生等，遍历高烟、巴厘、沙叻、吉隆坡、芙蓉、挂罗庇胜、麻六甲、新加坡诸埠，并往荷属诸埠。

4月5日　　浙江将军朱瑞电呈，孙文派人携款分赴沿江沿海各省，“乘中日谈判之机，图谋扰乱……冀酿重大交涉，以便两月内起事”。已侦破宁海、嘉兴等处中华革命党机关，“获犯薛常火、何贤能、周鼎臣、程训颐等，起出誓约、志愿书，并伪委任状……业经讯明先后枪毙”。是日，袁世凯特令各省将军巡按使“严加防缉”。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税则条文，规定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须按外蒙各项内地货捐一律交纳；外蒙商民运货入中国内地，亦应按中国所设各项货捐交纳；洋货由外蒙运入者，须照

光绪七年陆路通商条约办理。

△　袁世凯对经考试及第之留学生胡文耀、翁文灏、戴修瓒等151人，分别授予官秩，并令各机关妥慎遴用。

△　袁世凯令准长江巡阅使张勋将武卫前军改编为“定武军”。

4月6日　　袁世凯日籍顾问有贺长雄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回国游说“元老”，是日致电政事堂参议曾彝进告述活动情况，谓“松方意欲履行秘密一事，而以谈判未结，有所不便，极盼适当机会发生”。9日，曾复电，谓：“中国政府切望速行解决，只须日政府训令日置使，稍为让步，速予同意，便可了结”。

4月7日　　财政部、陆军部、上海制造局与上海顺发洋行签订借款规平银435547两合同。

△　陕西澄城县乡民权清彦等反对验契，聚众数百入城抗官劫署，道尹率警镇压，权清彦被捕遇害。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萧佛成为暹罗支部长。

4月8日　　虞洽卿等在上海发起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冀达人人爱国，人人输金之目的”。一个月间全国成立储金分事务所250余处。

△　袁世凯授王士珍为陆军上将。

△　旅京粤绅梁敦彦等以广东赌博最害人者为白鸽票及番摊，呈请大总统严饬永远禁绝，并不准设立名目，影射开设，以杜乱源。

4月9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外交部对南满、东蒙杂居问题再提修正案，并附理由说帖称：“日本政府应鉴中国政府之诚实，不应再借口领事裁判权，而并此最让步之办法而亦不承认也。”日使受

而未答。

△　中华游美实业团团长张振勋、副团长聂其杰率代表团17人，应美商之请，由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参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并考察商务。

△　中华革命党发布《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揭露袁世凯以日本赞助帝制，驱逐留日革命党人为承认“二十一条”之交换条件，号召党人“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

△　上海中国银行开始代收救国储金。上海设立事务所主持救国储金事务，各地已成立分所达70余处。

△　袁世凯任命陆承武为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　袁世凯令免周学熙参政职，并准瞿鸿禨、严修、柯劭忞辞参政职，遗缺任命王祖同、凌福彭、王劭廉、张凤台接充。同日又任命徐鼐霖、齐耀琳、袁金铠署理参政。

△　四川春旱严重，为数十年所未有，是日袁世凯令准拨银10万元，并准拨用路款赈济。

4月10日　　中日举行第二十一次“二十一条”交涉。关于南满、东蒙杂居问题，日置益谓未奉政府训条，搁置未议。关于第五号中福建一款，中国允诺日后照日方意愿另行声明。其他各款坚持不议。

△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部称：“有贺密告，松方甚感大总统盛意”，“松方并言万一谈判决裂，愿自行赴华解决，以全邦交。”

△　是日至17日，吉林省城学生连日上街游行，反对“二十一条”，并组织“国货维持会”，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准湖北革命军司令官蔡济民调整湖北

革命军各区司令官，以赵鹏飞、熊秉坤、刘英、曾尚武、王华国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区司令官。

4月12日　　袁世凯任命李士伟为中国银行总裁，免去其参政本职，所遗参政之缺，由萨福楙接充。

△　参政钱恂以浙江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尚缺200余种，拟予补抄完全，是日经袁世凯批令准其前往文津、文溯两阁传抄。

△　美国在长沙设领事馆，派代理上海会审公堂陪审官约翰生为领事。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陆孟飞为英国利物浦支部长。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准委魏诚为江西筹饷局长。

4月13日　　袁世凯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略谓："中日交涉刻正和平进行，我政府对于主权之侵害及与最惠国条款有妨碍之要求，业已竭力防遏。"

4月14日　　袁世凯颁布《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施行规则》，凡32条。

4月15日　　中日举行第二十三次"二十一条"交涉，日使提议东蒙问题，中国代表仍持不能与南满并论之旨。嗣谈杂居问题，日使则谓未奉训令，不与商谈。

4月16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夏之麒为江西革命军司令长官。

△　袁世凯以审计院院长孙宝琦请假，令着徐恩元暂行兼代审计院院长。

4月17日　　中日举行第二十四次"二十一条"交涉，日使仍迫

议“东蒙”问题，中国方面仍坚持东蒙与南满不能并论。日使声明“各事讨论，须俟政府训令”，会议就此中止。

△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俄使提出为保存内外蒙人民游牧，中国政府不在与外蒙交界之各旗殖民之要求。中国专使陈箓坚拒，会议遂告停顿。

△　司法部通饬所属，规定律师回避事项。律师执行职务时，如与审检厅长或厅员有家族（祖孙、父子及胞伯叔、胞兄弟之属）或姻亲（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嫡亲姑舅之子、己之女婿嫡甥及儿女姻亲之属）关系者，应即行声请回避，不得在该厅管辖区域内执行职务。

4月18日　山东济宁官吏强制推行印花税，全城商号2000余家全体罢市。

△　袁世凯颁布《电信条例》，凡22条，规定“电信由国家经营”。

4月19日　袁世凯派章宗祥充第四期知事试验主试委员长。

4月20日　日本阁议密定对华交涉让步条件。21日，陆宗舆电告外交部称：日阁议让步条件，内容为：1.胶澳还中国，开为商埠，日本设专管租界；2.南满警察规则，须与日本协议，裁判仍行会审；3.东蒙以四项条件解决：增开商埠；铁道不许与他国；租税不供担保；合办农业。4.汉冶萍由人民协议，政府惟同意尽力。四号宣言已足。5.福建因万国抗议，日已向美说明不许他国有军事经营，至经济经营则仍均等。五号各条只留会议记录，不强要求。

△　袁世凯令准财政部所请，将会计年度改为自四年起，以每年1月1日开始至12月31日终止。

△　袁世凯任命蔡成勋为陆军第一师师长。

△ 袁世凯令授绍英为中卿。

4月21日 北京政府派毕桂芳赴新疆伊犁会勘霍尔果斯河中俄河界。

△ 江南留鄂第一师改为陆军第十一师。

4月22日 袁世凯策令：南通县教育实业，及一切自治事宜，为全国之冠，农商总长张謇兄弟毅力热忱，洵堪矜式，着特给“观乡知道”匾额一方，以为热心自治者劝。

4月23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告外交部称：“顷悉元老与政府协议如下：日本将胶澳宣言交还中国，必一改从前态度，对我为大体之赞成。但改订要求中关于中国主权之点，特须考虑。”

△ 全国教育联合会于天津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代表51人，代表18省区。该会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为宗旨。会议通过将义务教育列入宪法，请设各省教育厅，改三学期为二学期等提案。5月12日闭会。

4月24日 陆宗舆电外交部称：“有贺君云：日内阁一变态度，轻减要求，虽有他因，而却以元老监制不能行最后手段之故。深望中国亦一变态度，顾全元老面子。”

4月25日 袁世凯谕令曾彝进电有贺长雄，嘉勉其为“二十一条”奔走之功绩。

4月26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自17日中止后，是日日使日置益复请谈判，并提出最后修正案24款，促北京政府速表同意。修正案将原案第五号改为照会或外交总长之声明方式，取消第三款合办警察及第二款寺院，第二号新增东部内蒙古要求四款。日置益声明“如中国政府将二十四款完全承认，则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一带之地，以适当机会，附加条件，交还中国政府”。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批准伍云坡代理广东支部长，龙光继任四川支部长。

4月27日　袁世凯令准张謇辞农商总长职务，仍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　袁世凯任命张謇为参政院参政，因张謇请假，以徐鼐霖署理。

△　袁世凯特任周自齐为农商总长，周学熙为财政总长。

4月28日　陆宗舆致电外交部，告以“顷急派周秘书赴英馆密告扬子铁路新案情形（按：指4月26日日本所提出‘二十一条’最后修正中有关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等铁路权条款），并探问意见。英大使甚感，特面告云：三日前英政府有一公文，详载扬子路线中英已有成约，请日政府注意”。30日，陆又电外交部，谓“南省铁路，已将中日并无约言一层密告英馆，使有准备”。

△　袁世凯以江苏宿迁等24县成灾歉收，申令蠲免本年钱漕，以纾民力。

△　财政部设立全国烟酒专卖局，是日奉袁世凯批准，并任命钮传善为总办。

4月29日　袁世凯申令整饬司法，着司法部及各省对法官“认真考察，不稍姑容”；“凡推检各官，治事未当，狱失其平，立予按法惩戒。其积案不办，托词玩忽者，亦须切实稽查，随时督责”。

△　袁世凯派蔡乃煌充苏、赣、粤三省禁烟特派员。

△　会办四川军务陈宦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祥芝等三旅抵重庆。是为北军入川之始。

4月30日　教育总长汤化龙呈拟义务教育施行程序31条，经袁世凯批准施行。

4月下旬　袁世凯酝酿帝制，梁启超备悉其事，致函劝其悬崖勒马，急流勇退。函称："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

5月

5月1日　外交部备文答复上月24日日使提出之修正案并说明无可再让之理由。日本外务省召集会议，决定发出最后通牒。

△　苏赣粤三省禁烟特派员蔡乃煌与英商沪港烟土联社各商行、公司签订《苏赣粤三省禁卖土烟合同》。其中规定，联社自愿捐款赞助北京政府在该三省严查违法售卖土烟，使现存沪、港6000箱印度鸦片能尽早售卖。本合同1917年4月1日起生效。

△　广州商民因财政厅抽收品茗捐全体罢市，持续5日，各茶馆派代表与财政厅交涉，该厅被迫暂行缓办，商民复业。

△　南京屠户因反对屠宰税罢市。

△　江苏扬州商民反对征收落地税全体罢市，县知事被迫允从缓办，次日开市。

△　袁世凯任命陈宦署四川巡按使。

△　袁世凯任命黎天才为陆军第十一师师长。

△　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上将安东贞美接任台湾总督。

5月2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部称："顷探闻今日阁议，将于

明日开御前会议，发最后通牒，有限期之说”；“有贺被政府派警护卫，拘束行动。”次日，陆又电外交部称：“又探闻日政府系先发警告，看中国形势。”

△　领参谋总长事黎元洪、管理将军府事务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率参谋陆海军三部职员等赴关岳庙举行宣誓，以示军人忠诚卫国。

5月3日　　财政部全国烟酒公卖局正式成立。30日，公布《全国烟酒公卖局暂行章程》、《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

△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调查黔省情形，拟具察吏、慎刑、除暴、理财、教育诸项整理办法，分目前与将来二计划。其目前计划为举办蚕业，举办棉业，强迫垦殖，提倡民矿，推广官矿，筹设兴业银行七端。至于将来计划，为疏通航运，举办森林，开采煤铁各矿，设立高等矿业学堂。是日经袁世凯批交内务、财政、陆军、司法、教育、农商各部核议。

5月4日　　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元老大臣会议，决定对华发出最后通牒并取消第五号。是日，陆宗舆致电外交部，谓“顷见新闻号外，有发最后通牒，事机切迫，请速示方针”。

△　袁世凯申令准前任江西民政长汪瑞闿开复褫职处分，听候录用。

△　英外务大臣葛雷致电驻日英使格林，请转告加藤：“英国对于中日两国国交决裂之推移，至为关切。”次日，英国通告日政府“如诉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

△　吉林六道沟、局子街日本领事馆召集日韩商人开会，通知中日交涉恐将决裂，嘱准备回国。

△　张振勋率中华游美实业团抵旧金山，参观巴拿马博览会及参

观工厂、游览市容。

5月5日　陆宗舆致电外交部，谓："昨今连日阁议，闻元老已赞成最后通牒，现正准备诸事。大隈口气坚强，无从再商。……我国内外局势，万不宜战，英美又无力干涉，若待其兵临占地索赔，所损匪细，且恐横生意外，大局不堪设想。望速定方针，先发电示，庶通牒交到时，舆可先面告以和平解决，冀免有军事行动，多生枝节。"

△　日本政府宣布"南满洲戒严令"。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张成谟为苏禄支部长，谭维洋为安徽支部长。

5月6日　午间陆宗舆致电外交部，称"同午开御前会议，决定最后通牒"。下午5时又电称"顷闻最后通牒，限9日午后6时答复，内容未详。惟望接牒后，先将诺否方针密示"。

△　司法部通饬各省高等审检厅长、审判处长、司法筹备处长，现在刑事诉讼审限规则业经公布施行，应即切实奉行，嗣后"如有积案不办，托词玩忽者，应即分别详请惩戒，以除积习，而苏民困"。

△　总统府召开紧急外交会议，决再对日让步。即由外交次长曹汝霖赴日使馆通知日方，曹称"纯系个人意见"。

△　外交部电示陆宗舆，谓"本日政府会议，决定再让步方针，训电即发，希先与加藤预约面晤"。

△　美国向英、法、俄提议，共同干涉中日交涉，遭三国拒绝。8日，日本驻美大使珍田请美国政府勿共同干涉日中交涉。

△　美国国务卿白里安致函大隈及袁世凯，望日中交涉和平解决。

5月7日　　下午3时，日公使日置益将最后通牒一件，附解释七条，送交外交部，限48小时内“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于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　夜，外交部派员前往俄使馆就“二十一条”要求事寻求支持，俄使库朋斯齐竟然要北京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　英外交大臣葛雷电示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京政府非正式提出“强硬劝告”，立即接受日本有关“二十一条”最后修正案。

△　袁世凯连夜召开会议，次日上午继续会议，下午1时袁世凯又召集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及参政赵尔巽、李盛铎、梁士诒、杨度、施愚等开特别会议，决定接受日本全部侵略要求，并拟定复文。

△　华商中原公司与英商福公司，在北京签订《合办福中公司合同》，双方议定两公司各出资50万元，专销两公司生产之煤炭。6月1日，福中总公司在河南修武、焦作开成立会。

5月8日　　英公使朱尔典访晤外交总长陆徵祥，力劝中国接受日“二十一条”要求，谓“中日交涉，竟至决裂……各国即同情，亦无能为力。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之一法，接受日本要求，以避危机”。

△　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及各部总长开紧急会议，先由陆徵祥报告上午会见英使朱尔典之情况，然后讨论，发言者大都迎合袁意，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惟独段祺瑞主张动员军队，对日示以强硬。最后，袁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决定忍辱接受日本最后通牒之要求。

△　下午5时，袁世凯派外交部部员持复文送交日使日置益征求意

见，日置益提出有关第五号添入“日后协商”字样，即可接受。

△　北京商务总会致电各省商会，谓：“日本利用欧洲战事，乘我新造国家，提出吞并朝鲜同一之条件，逼我承认，5月7日竟以武力为最后之要求，四十八钟内，倘不承认，立即进兵。……自本年5月7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永存此志，勿忘国耻。”

5月9日　　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日本“二十一条”。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亲往日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复文谓：“中国政府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对日本国政府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号中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以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并照日本政府所交最后通牒附加七件之解释，即行应诺。”

△　国民对日同志会、中华国民请愿会、外交后援会、女子救国储金会四团体，四五万人为反对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在上海法租界开国民大会，并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恳政府，本国民之决心背城一战，民等愿毁家捐躯后援政府”。全国各地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出现抵制日货高潮。

△　黄兴、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钮永建、程潜等17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提出：“当此举国听命、内讧尽熄之时，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他，条约既成，国命以绝。”

△　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　俄国边界官员锡特罗倭至库伦大员公署，告以中日交涉万一决裂，日英联盟，俄亦加入，中俄虽未失和，然亦不能漠视，“如中日两国不幸失和，则贵专使行辕与北京政府，便不能自由通电”。

5月10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等，谓袁将称帝，“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归于消灭，内地不平之声甚烈，即袁所部如冯、段辈亦表反对。……党中重要人物，已冒险深入内地，急思发动，成败在此一举，不能复待”。

△　中华革命党军务部副部长周应时自上海致函总务部副部长谢持，内称“沪上人心，恨日恨袁已达极点。时势既变，吾党之方针，自不能坚持不变。……务请力主开会讨论，公决施行”。

△　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呈递备忘录，建议针对日本政府1915年5月10日向全世界公布的声明，立即公布中国方面的详细声明。

△　日外相加藤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中日两国亲善。同日，外交总长陆徵祥电复加藤致谢，并称：“本总长盼望此后彼此睦谊益加巩固。”

5月11日　北京总商会发起救国储金，在中央公园举行大会，到会者二三十万人，储金100万元，并宣传抵制日货。5月23日开第二次大会，到会30余万人，储金近80万元，并宣传爱国自强，提倡国货。

△　袁世凯申令严禁陕西左近一带布种鸦片。

△　英驻日大使格林访晤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谓：英国政府对日中“二十一条”交涉圆满解决，表示满意。13日，日驻英大使井上代表日本政府对英国在日中交涉中给予日本的支持深表“谢意”。

5月12日　袁世凯为履行中日交涉诺言，授意梁士诒在参政院提议通过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租让与外国议案。次日，袁据此以沿海险要关系国家安危为由，发表申令，谓嗣后“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无论何国，概不允认租借与让与”。

5月13日　美国政府致中日两国政府照会送达外交部，宣称：如果中日两国所订条约有妨害美国在华利益，或有害于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者，则美国概不承认。15日，再次照会声明："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

△　外交部向各国宣布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历述委曲经过，以明最后通牒之接受，系迫不得已。并宣称："中国政府挽救之法已尽。……政府始终将能予允许之事，竭力退让，盖中国政府区区拥护之精神，仅仅保存自国主权之完全、各国在华条约上之权利与机会均等之主义而已。""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也。"

△　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会"庆贺中日交涉胜利，遭当地爱国青年阻止，全市商店闭门熄灯停止夜市。商民与日人冲突，捣毁日本商店，湖北将军段芝贵派军警弹压，旋即平息。15日，日使竟以"汉口暴动"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警告。

5月14日　袁世凯为接受"二十一条"，密谕全国职司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略谓："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功。"并谓："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嫚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　袁世凯令裁撤河南河北镇总兵员缺，改设豫北镇守使。

5月15日　外交部密电各省，严防"乱党乘机扰乱"。声称："此次交涉，倍极困难……中国经此番创巨痛深，自当坚忍，以图自强，不可徒逞一时意气，有类排外之举。……现在条约尚未签字，诚恐因此无意识举动，别生枝节，愈难收束。"

△　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在上海举行第二届远东运动大会。22日大会闭幕，中国优胜。

5月16日　河南洛宁县农民要求减免苛税，于14日起呈缴农具罢耕。是日，杨坡各里农民向驻军管带提出六项要求：1.验契从宽；2.印花缓办；3.房地契官纸白纸听民自便；4.警备队经费每两200文全免；5.上年分未完地丁不催；6.呈捐免缴。次日，再聚城外，该县知事带兵镇压，农民将县知事包围，被军警开枪打死一人。30日，县府又将农民马腾蛟逮捕枪杀。

△　袁世凯派张镇芳为福中总公司督办。

5月17日　安徽芜湖常关改定新税则，原定5月1日施行。商会要求展期未准，群情愤激，是日相约罢市，道尹被迫接受商会要求，遂于21日开市。

5月18日　湖南长沙一青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从天心阁跳城自杀。各地亦连续发生类似事件。全国对袁纷电指责。

△　内蒙古王公联合会致函蒙藏院反对袁世凯出卖东蒙权利，谓“近闻日本之要求，妄加威吓，而政府委曲迁就，将东部内蒙古之种种权利断送日人。……王公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为土地牺牲性命而不甘为他人之奴隶”。

△　汉阳发生排日风潮，日商日信洋行华工与司事冲突殴斗，汉口日本三菱公司厂房被焚。

△　袁世凯申令，准湖南长沙等县上年被灾田亩应征正赋按各该县灾歉分别蠲缓；又令将该省醴陵等县上年被水冲废田亩应完正赋租课自民国三年起永远豁免。

5月19日　北京私立新华商业专门学校设立校董会，推京师步兵统领江朝宗为总董，奉准教育部立案。该校前身为中央商业讲习所，

于民元8月在京创立，民三年3月改组为新华商业专门学校，设商业预科、铁道专科各一班，银行两班。

5月20日　奉天省增设瞻榆县（今通榆县）。

5月21日　都肃政史庄蕴宽等上救亡条陈，一曰救时弊，一曰图根本。是日袁世凯颁救亡令，着京外各署按照该都肃政史等所陈各节，实力整顿。

5月22日　农商部咨请各省，就本地特有物产，改良振兴，切实筹办，以利实业。

5月23日　政事堂礼制馆奉准制定国乐乐章通行。歌词曰："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颠，江河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出于荫昌手笔。

△　教育总长汤化龙恳请辞职，奉批慰留。

5月24日　中华革命党致函洪门会，劝仍以全体加入同盟。

△　湖南青年学生彭超愤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投湘江自杀。

5月25日　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暨交换。计条约二件，换文13条，即：《关于山东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事项之换文》、《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旅大南满安奉期限之换文》、《关于东部内蒙古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开矿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铁路税课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聘用顾问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商租解释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接洽警察法令课税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条约第二第五条延期实行之换文》、《关于汉冶萍事项之换文》、《关于福建问题之换文》、《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此约于6月2日经袁世凯批准，8日在东京换文。

△　袁世凯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关于选举施行细则》，并令定9月30日为国民会议暨立法院议员初选资格调查完毕日期。

△　袁世凯颁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

△　袁世凯令准湖南巡按使刘心源辞职，以陶思澄继任。

5月26日　袁世凯为签订中日丧权条约，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严令各省“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倘各该地方遇有乱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

△　参政院开会，外交总长陆徵祥出席报告“二十一条”谈判经过，略谓：“我政府对此交涉，历时三月余，正式会议至二十五次，始终尊重邻邦之意，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惜日本或藉词要挟，或托故增兵，终为武装之谈判，致不能达此目的。”并谓：“迨一经决裂，我国必难幸胜，战后之损失，恐较之现在所要求重加倍蓰，……政府反复讨论，不得不内顾国势，外察舆情，熟审利害，以为趋避……。”

△　中华游美实业团抵华盛顿，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待，威尔逊与张振勋分别致词。次日，实业团参观美国会，出席美商界宴会，张振勋与国务卿白乃安分别演说。

5月27日　外蒙古地方当局根据1月10日俄蒙双方订立之银行条约，是日在库伦开设“蒙古国家银行”。

5月28日　中俄蒙恰克图会议自去年9月至今，会议48次，是日正式通过全约22条及互换照会稿二件，并定于6月7日为签订之期。北京政府代表陈箓致电外交部报告会议结果，并呈请给予签约全权。

△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自上海致函孙中山，报告上海军事进行情形。

5月29日　参政院呈请制定“惩办国贼”专条，诬指革命党人“妄以辛亥革命冒为己功”，亡命海外，假借外力，号召内奸，“出而为卖国求荣之举，私与外人订立密约，或勾结外人扰乱本国”。“应请政府制定惩办国贼专条，并饬查近日乱渠中之实有此项卖国行为者，严行治罪，宣示全国，以昭炯戒”。袁世凯令政事堂饬法制局查照办理。

5月31日　山西和顺县人民反对苛捐杂税，29、30两日聚众800余人，各携木棒炊具集会于城西之扒头村，决议31日入城。四乡农民闻讯赶至者约万余人，要求县府豁免一切苛捐杂税，县知事假意允诺。是日首领张保寿等率众入城，焚烧盐店，捣毁厘卡，县知事派兵逮捕祁观音保、任小小等六人。6月22日张保寿率众3000人强救祁观音保等未成，祁等四人终被杀害。

△　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呈请开缺，袁世凯予以慰留，给假两月，并令特任王士珍署陆军总长。

是月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为缓和全国人民反对，通电各省，声称：“……此次交涉，大局虽无妨害，惟对满蒙山东等地之权利，大为丧失，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元元之民，行将通告天下，引咎自责。”

△　孙中山函复北京学生，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指出袁世凯“以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

△　革命党人金鼎隆在奉天开原县聚众500余人，占据孙家店，在南满铁路沿线开展反袁活动。

6月

6月1日　驻荷兰公使唐在复与荷兰外务大臣陆东在海牙签订《公断专约》，规定：“缔约国允将两国间将来或有之争端为外交上

所未能议结者交付常川公断法院公断。”

△　北京政府自辟江苏浦口为商埠。

△　奉天省警察厅发布禁止抵制日货之通告，宣称“断不可有排斥外货举动”。

△　据《申报》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中日交涉，各省官民函电交责，特通电各省自请罢职。陆电略称：“自念此次交涉虽非一人之咎，惟仍恋栈在此，则徒滋口实。”曹电宣称：“此次中日交涉和平了结，并完全承认日本之要求，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部长之公意……敢不唯命是听。”

△　中华游美实业团抵纽约，纽约市长接见。3日，张振勋与美商界代表会商筹办中美银行及中美轮船公司，达成初步协议。

6月2日　袁世凯任命驻日公使陆宗舆为中日换约全权委员。

△　革命党浙江宁波总司令王金发（王逸）在浙江进行反袁活动，为浙江将军朱瑞逮捕杀害。

△　江苏沪海道尹杨晟呈袁世凯，请分饬农商财政各部减收出品税，切实提倡劝用国货。

△　教育会联合会代表推陈宝泉等创办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

6月3日　陈光甫、庄得之、唐寿民等发起组织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资本10万元，陈任总经理。

6月4日　孙中山致函叶独醒请筹款反袁，谓“袁贼卖国，证迹彰明，内地人亦甚激昂，我党宜乘时奋起。惟款饷不足，令人焦愤。……还望兄等鼎力助我。今日根本救国，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

△　税务处厘定海关、常关名称，海关40，常关22，并编海关、常关地址道里表，是日经袁世凯批准通行。

6月5日　　交通部与川汉铁路公司续订收归国有有关款项支付办法。

△　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许崇智返回东京，向孙中山报告南洋情形。10日，许复奉命赴南洋活动。

6月6日　　黑龙江省城召开救国储金大会，绅学各界当场认储1.5万余元。同日，直隶救国储金团在天津举行救国储金大会，商学各界共储金27.7万余元。

6月7日　　恰克图会议结束，《中俄蒙协约》正式签字换约，共22条。其要点为：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声明另件；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国驻库伦大员卫队数目不超过200名，该大员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蒙古恰克图各处，每处卫队不超过50名；中国货物运入外蒙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运入内地，照中俄1881年陆路通商条约所定关税交纳。

△　中华革命党湖南南路总指挥胡昌坤等在新田部署起事，事泄被捕。是日胡等三人在新田遇害。

6月8日　　农商部为谋全国实业之发展，设置劝业委员会，嗣派雍涛为会长。

△　内务部电江苏巡按使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

△　据《申报》讯：据政府统计，全国共有官立学堂8.5998万所，收学生87.576万人。

6月9日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根据《中俄蒙协约》，电北京政府宣告取消独立。

6月10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部称："东报屡载，我教育部将中日国耻纪念编入教科书……彼国朝野惊骇，渐筹警备。窃意我国对于国耻，太觉铺张扬厉，甚恐内长虚矫，外速实祸。"

△　袁世凯令筹备立法院事务局及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迅速办理选举调查事宜，以便实行选举。

△　唐绍仪、伍廷芳等在上海发起中华共济会。该会章程称："本会以众志成城为正谊。"

△　中华游美实业团在纽约参观爱迪生电机厂，会见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

6月12日　　袁世凯策令外蒙王、公爵职及喇嘛各名号，"无论沿袭前清及得自外蒙者，均着一仍其旧"。

△　袁世凯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并任命徐绍桢、荣勋为册封专使。

△　袁世凯申令《中俄蒙协约》业经签字互换，外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并承认中国宗主权，库伦独立亦已取消，免究所有内外蒙人等干涉前清时代库伦独立情事。

△　内务部密饬各邮局检查反对中日交涉邮电，"若遇有此种通电函件，立予扣留销毁"。

△　中俄混合委员会委员在霍尔果斯议定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

界线沿该河道接至伊犁河。

△　南京英妇被士兵殴伤。旋英使照会外交部，要求缉凶严惩。7月19日，袁世凯令饬江苏省将军巡按使缉凶，务获严惩。10月，案犯王铎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6月14日　袁世凯批准广西省会仍建桂林，为巡按使驻扎地；将军仍驻南宁，以重防务。因有碍难情形，10月28日内务部呈准该省会缓迁。

△　袁世凯申令在政事堂设立筹办全国生计委员会，主持研究发达实业，改善平民生计。

6月15日　粤汉铁路广（州）韶（关）段竣工通车。

6月16日　袁世凯特任陈箓为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

△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票传《五七报》经理方天权、《救亡报》经理曾孟鸣、《爱国晚报》经理顾孟平到案，判曾、顾各押两星期，方押一月，报馆封闭。

6月17日　穆藕初等所办之上海德大纱厂正式开工，纱锭一万枚，工人500名。后于1925年售与申新纺织公司，改为申新五厂。

6月18日　美国波士顿华侨邝翥云等以该地施行苛例，华侨5000人将失业，特电请政府向美国政府交涉。

6月19日　教育部派本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筹设京师图书馆，以方家胡同前国子监南学为馆址。7月31日，袁世凯派夏曾佑为京师图书馆馆长。

△　沈阳日商延寿堂药店炸弹爆炸，四人受伤，日人谓系华人投掷。21日，奉天召开日居留民大会，决议要求日政府严重交涉，严禁

中国排斥日货，改良中国警察制度。26日，驻奉日警拘捕法政学堂学生三人，指为嫌疑犯。奉天巡按使电外交部向日交涉。

6月20日　袁世凯以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舞弊营私一案，牵及交通次长叶恭绰，令叶暂行停职。至10月19日复职。

△　袁世凯以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假公舞弊，下令免去本兼职务，以龚心湛继任。

6月21日　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希龄呈报陕西延长宜君油井停工，并拟在段家湾另辟新井。

6月22日　袁世凯为镇压革命党人，颁布《惩办国贼条例》，凡八条。

△　江苏将军冯国璋奉召抵京，参政院参政梁启超同行。同日，冯觐见袁世凯，向袁探听帝制虚实，谓："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斥欲改帝制传说纯属"谣言"，且谓："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

△　袁世凯任命四川巡按使陈宦兼行督理该省军务，次日授陈为毅威将军。

△　袁世凯令绥远都统陆军中将潘矩楹加陆军上将衔。

6月23日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以"印发对日传单并收藏抵制日货传单，有碍租界治安"罪，判处国民对日同志会和留日学生代表黄毅、方梦超、萧汝霖各交铺保500元，吴兆理交200元，苏理平、蔡屏藩、汉恒各交100元。

6月24日　热河朝阳县乡民为反抗拔除鸦片烟苗，聚众三万余人与官军作战，热河都统派兵镇压，并召绅民劝导，始渐平息。

△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在北京举行，自是日至7月31日，共开会13次。

△　上海军警机关派探在洋泾浜浦滩捕获党人李亚东、牛振寰。

△　袁世凯令授奉天将军张锡銮为陆军上将。

6月25日　　袁世凯申令：前兼代四川巡按使刘莹泽业经明令褫职，其任内保荐奖叙各案，应即一并撤销。

6月26日　袁世凯任命纳顺洪为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未到任前着李文富署理。

6月27日　四川峨眉县知事张伯英在眉山万年寺中拿获自称皇帝之朱复明，就地正法。

6月28日　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携西姆拉草约修改本与英使朱尔典协商西藏问题，中国要求附件所载“西藏为中国领土”一节以及“承认中国在西藏自治区域有宗主权”一项列入正约文中。8月7日，驻英公使施肇基电告外交部，谓英国不愿变更原案。藏事谈判复陷停顿。

6月29日　台湾爱国志士余清芳、江定、罗俊在台南西来庵谋起义抗日，事泄，罗于是日在嘉义竹头崎（今嘉义县竹崎乡）之尖山森林中被日警逮捕，余等逃入台南、嘉义、阿缑三厅交界之后堀仔山中。9月6日，罗被处绞刑。

△　袁世凯申令整饬司法，慎速审理；审理逾限，藉案营私，“立予严惩”。

△　袁世凯通令禁止抵制外货，“着各将军巡按使遇有抵制外货及排斥外人之举，务竭诚谕禁，遇有扰乱行为，切实查办”。

△　袁世凯授毕桂芳中卿。

△　直隶濮阳双合岭黄河决口工程合龙工竣。

6月30日　　袁世凯颁布《森林法施行细则》及《造林奖励条例》。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议决，抽签闭歇土膏店四分之一，计145家。

6月下旬　　皖、赣、湘、鄂各省霪雨日久，江西之新建，湖南之益阳，安徽之宁国、安庆，湖北之武昌均报水灾。

是月　　蔡元培、李石曾与华工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在法国巴黎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

7月

7月1日　　袁世凯申令参政院推举宪法起草委员，组织委员会，起草宪法。3日，参政院推梁启超、李家驹、杨度、严复等10人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

△　财政部派员分赴各省筹办烟酒公卖，电请各省巡按使都统饬属协助。

△　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改组，易名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资本100万元，官六商四，总行设杭州，分行设上海。1923年3月官商划分，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改组为浙江实业银行。

7月2日　　袁世凯申令严禁非法党会，各省如遇仁义会等秘密机关，即时破获，首要立正典刑，胁从即行解散。

7月3日　　袁世凯调张鸣岐为广东巡按使；调李国筠为广西巡按使，未到任前由陆荣廷暂行兼署。10日，陆荣廷辞兼职，由田承斌暂

行护理。

△　财政部批准商办富华殖业银行立案。该行由姚锡光、张殿英等集资创办，以“辅助国家调剂金融，贷款振兴塞北垦牧矿林等实业”为宗旨。

7月4日　袁世凯申令慎选法官。

7月6日　袁世凯申令诰诫经征赋税官吏严自检束，洁己奉公，慎防中饱；并声称：“自上年春间，誓不复借外债以供消耗，迭由财政部督饬经征官吏整顿旧税，推行新税，近来颇有起色，外债得以支付，国中秩序亦勉可维持，危亡之忧，庶几获免。”

△　袁世凯以宪法起草委员业经参政院推举为梁启超、李家驹、汪荣宝、杨度、施愚、严复、马良等10人，令由委员依法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

△　日警在台南厅噍吧哖（今玉井乡）支厅牛港仔山架设电线，与余清芳革命军一部遭遇，双方互有死伤，江定之子江怜战死。革命军退入甲仙埔（今高雄县甲仙乡）支厅大坵园庄方面。

7月7日　袁世凯令专门行政须用专门人才，不得以一知半解之徒充任。

△　中华革命党人、救亡会广东第一支部长伍钧甫在广东三水被广东将军龙济光部捕获杀害。

△　黑龙江巡按使呈报山东灾民移殖黑省情况，称先后已有212户，1141人移讷河、拜泉、肇东、通河等县安置。

7月8日　日本以袁世凯公布《惩办国贼条例》中有“私与外国订立契约”一条，认为与“合办事业”有碍，特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立即解释，说明其所适用之范围，并将说明书分送各国使馆。

△　袁世凯申令改良监狱，倡导作业感化，在监人犯习于勤劳，俾出狱后得以自谋生活，成为生利之人，永不再犯。

△　筹办全国生计委员会成立，以汤睿为会长。

7月9日　台湾余清芳乘日警出动围捕，率革命军袭击甲仙埔支厅大坵园、小张犁、蚊子脚、河清湖等警所，尽杀警员，并占领警所。14日，日警200余人反攻，革命军退回山地。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黄廷剑为关外游击司令官。

7月10日　湖南北伐军总司令熊镜生、旅长王玉林、敢死队队长梁有元及衡永郴桂军区长李坤密谋反袁，事泄，被汤芗铭捕获杀害。

△　袁世凯任命费树蔚为肃政史，原任程崇信辞职。

7月上旬　湖北蝗灾。是月2日以来，武汉上空无日不见大批蝗虫遮天蔽日。汉阳东家涝禾苗十食七八，汉川受害最酷，不独伤禾，已啮熟麦，该县黑牛渡几野无青草。沔阳、天门、潜江、夏口、黄陂、武昌、鄂城俱遭其灾。

7月11日　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

△　袁世凯令徐恩元暂行兼代审计院院长职务。

△　袁世凯申令禁赌，将嗜赌之前湖北财政厅长胡文藻褫职。

△　袁世凯令准农商部拟订之《小矿业暂行条例》通行。

7月12日　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致函梁士诒，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依赖列强的干涉，而应采取自救的方式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

7月13日　袁世凯令准广西省巡按使李国筠免职，特任王祖同为该省巡按使。

△　广州西关十三行发生火灾，连烧20余小时，焚去铺户2000余间。17日，袁世凯令财政部发银10万元并自捐一万元赈广州火灾。

7月14日　日本在九江、济南开设领事馆。

△　袁世凯任命李国筠为参政院参政。

△　“新泰”商轮载货超重，昨夜在吴淞口石坝头遇狂风袭击覆没，一百数十人遇难。

△　广东连日风雨，三江江水暴涨，南海、三水、高要、四会、德庆、新兴、茂名、吴川、化县（今化州）、信宜、合浦各县冲决围基、坍塌房屋、淹毙人畜、损害田禾不可胜计。省垣居民露踞屋巅，交通几乎断绝。灾区之广，灾情之重，为多年所未有。是日，袁世凯令财政部速发银洋10万元赈济。

7月15日　袁世凯任命裴其勋为吉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高凤城为第二混成旅旅长，徐世扬为第三混成旅旅长。

7月17日　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炸广东将军龙济光，伤龙左脚。钟当场被捕，次日遇害。

△　袁世凯据参政蔡锷呈请开发滇省矿产，以保利权，而纾财力。是日面谕国务卿徐世昌，命云南巡按使会商财政、农商两部，妥速核议办法，切实具复。

7月18日　袁世凯令准教育部设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9月6日，该研究会在京成立。

△　袁世凯授阮忠枢中卿。

△　教育部奉准在各省设立法政讲习所，以培养自治人才。

△　吉林通化警团围剿革命党武装于乱泥塘，旋在临江（今浑

江）小干沟交战，排长、团丁各一名被革命党武装击毙。

7月19日　袁世凯以近畿各属水利失修，夏旱秋潦，岁为巨患，特派徐世光督办近畿疏通河道事宜。

△　广西郁漓两水漫溢成灾，灵川、贵县、兴安、桂平、邕宁、横县、永淳（今并入横县、宾阳及邕宁）、平南、藤县、苍梧、上林、桂林等县灾情均重。是日，袁世凯令财政部速拨银五万元急赈。

7月20日　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平议》一文，反对取消国会。

△　前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因受贿枉法被平政院饬警解院讯问后收押，23日发交步军统领衙门看管。

7月21日　袁世凯下令划定京兆为特别区域，以作自治模范，并任王达筹办京兆地方自治事宜。

△　苏州机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道署拘捕陈全福等14人。经双方谈判，允加花缎织工每尺三分，素缎织工每尺二分（每分作钱七文），陈全福等14人释放，于23日复工。

7月22日　袁世凯申令在京师设立模范小学，为各省表率。所有建筑开办经费，由袁自行捐发，以树风声。

7月23日　教育部公布大学及专门学校名称。国立、公立大学及专门学校计有国立北京大学、公立北洋大学等53所；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计有北京私立中华大学、民国大学等21所。

△　李国筠与台湾银行签订借款40万港币合同，以小押饷、硝磺税及屠宰捐中每年划出28.5万元为担保。

7月24日　国民党美洲支部在旧金山开恳亲大会，各埠代表数百人参加，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电祝贺大会召开。黄兴被推举为名

誉会长。冯自由、林森等与黄兴、钮永建商谈“团结一致讨袁方策”。8月3日闭会。

△　江西赣县7月初旬大雨如注，山洪暴发，冲毁城垣，平地水深丈余，淹毙人口无算。万安、泰和、吉安适当其冲，吉水、新淦（今新干）、丰城、清江、南昌、新建各县同遭波及，上犹、雩都（今于都）、南康、会昌、瑞金、宜丰、奉新、安义、永修被水亦甚重。是日，袁世凯令财政部迅发银五万元赈赣灾。

7月25日　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奉召入京觐见袁世凯，袁慰赏有加，以示恩遇。9月，张具密电呈袁，劝晋帝位。

7月26日　中华游美实业团结束两个余月的访美旅程，是日，张振勋率实业团返抵上海。

7月27日　湖北将军段芝贵应召入京述职。

△　是夜至28日江苏、浙江两省飓风为灾，庐舍禾稼，人口牲畜，均受损害。

7月29日　袁世凯令河南陆军第九师改编为第一、二两混成旅，师部裁撤，师长张锡元调京另候任用。31日，任命成慎、柴得贵分别为第一、二混成旅旅长。

7月30日　《觉报》于昆明创刊，徐纂武任总编辑，宣布该报宗旨为“以造福国家、有益社会为目的，其他强权暴力，一概置而不计”。

7月31日　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校令》：改初等小学为国民学校，申明国民学校施行国家根本教育，以注意儿童身心之发育，施以适当陶冶，并授以道德、知识、技能为宗旨；并规定以读经列为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的必修课目。

△　袁世凯任命韩国钧为湖南巡按使；李兆珍为安徽巡按使，未到任前由徐鼎康护理。

△　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李家驹为主席。

△　农商部呈准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

是月　欧事研究会冯自由受钮永建等之委托，自美国至日本东京谒晤孙中山，商讨共同促进党内团结、推翻袁世凯之方略。

△　姚庭、杨海在浙江嘉兴组织救亡会，准备讨袁。

△　《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成书，经界局督办蔡锷作序。

△　教育部中央观象台编辑的《观象丛报》在北京创刊。

△　日人石本贯太郎在本溪成立“彩合”公司，资本10万元，经营无烟煤采掘、贩卖。

△　民国三年度（1914年8月至1915年7月）统计，全国大专院校共102所，其中：大学7所，学生730人；专科学校95所，学生31346人；中学784所，学生82778人；师范学校231所，学生26679人；职业学校82所，学生9600人；小学121081所，学生3921727人。

△　奉天新民大雨，江水漫决，被灾村屯130余处，淹毙居民甚多。盘山、沈阳、辽阳、海城、营口、彰武、兴城、凤城、黑山、宽甸等县均有水灾。吉林依兰、伊通、富锦、饶河及黑龙江兰西诸县发生水灾。

8月

8月1日　上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钱业公会是日起将以前所

开龙银行市一律取消，只开新币（袁世凯头像银元）行市。凡江南、湖北、广东及大清银币四种银元，均按新币行市通用，其他各种龙洋，得向中交两行兑换新币。从此全国银元市价统一。

△ 内国公债局总理梁士诒呈报民国三年内国公债办理结束，实收银元23908411.2元。

△ 财政部奉准贵州省发行实业公债100万元。

△ 《小说大观》在上海创刊，包天笑编辑，1921年6月停刊，共出15集。

8月2日 台湾爱国志士余清芳、江定率志士数百人袭击南庄警所，击毙日警11人，焚警所。

△ 黑龙江克山设治局改设克山县，由讷河县析置。

8月3日 袁世凯宪法顾问美人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谬称：中国“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 段祺瑞就与袁世凯关系事通电辟谣，略谓：“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属，情逾骨肉。”并谓：“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罔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谣言。”

△ 袁世凯申令各省加意防缉孙中山“遣人暗杀”。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林龙祥为山口羊支部长，陈铁伍为泗水支部长。

△　广西巡按使呈准将南宁道属安定、白山、古零、兴隆、定罗、旧城、都阳、归德、果化九土司改流，设置都安、隆山（今马山）、果德（今平果）三县。

8月4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复函巴东支部杨汉孙，再次说明中华革命党之组织原则，论述“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之重要性。指出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之理由是错误的。强调：“军事进行时期，党魁特权，统一一切，党员各就其职务能力，服从命令，此安得妄以专制为诟病，以不自由为屈辱者？”

△　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奉准试办自由开采锑矿，自设公司收买运销，并免矿产矿区两税。

△　台湾爱国志士余清芳率义军进攻噍吧哖支厅，与日警激战终日，牺牲309人，5日晚，日援军赶到，余率义军向东转移。

8月5日　　江苏巡按使齐耀琳、浦口商埠督办刘恩源会定将永生洲、九洑洲、柳洲划入浦口商埠范围。

△　江苏医学会成立。次日，公举汤尔和为会长。

△　直隶濮阳黄河决口。

△　《日本潮》在上海创刊，由群益书社编辑发行。

8月6日　　总税务司安格联与日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订《恢复青岛海关协定》四条，其中规定：在本协定有“德国”字样者，易以“日本”字样；关于青岛海关恢复与其规定及手续，中、日两国政府间俱认有效；原属税务司所管之海关公文簿籍、公款及所属财产，于日军占领时押收者，仍交还与总税务司。

△　教育部呈准施行《地方学事通则草案》，规定由自治区按照地方试行条例及关于教育之法令规程办理地方教育事务；在自治区未成立地方，由县知事督率劝学所处理。

△　吉林省城模范监狱囚犯700余人暴动，占领军械房，纵火焚烧狱室，与军警激战一昼夜，弹尽而失败，五六十人当场格毙，500余人处刑，员役及犯人数百人被杀。

8月7日　　兼署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呈准，匪类种烟，纠众拒捕，格杀勿论。

△　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呈报资遣出藏流落哲孟雄之难民190名，是日由印度搭轮回国。

8月9日　　袁世凯令湖南巡按使韩国钧未到任前，着严家炽暂行兼护。

△　袁世凯令财政部迅拨赈款10万元并自捐一万元赈上月27及28日江苏风灾。

8月10日　袁世凯令严禁侵占寺庙财产，违者依法治罪。

△　是日至28日，教育部召开全国师范校长会议，提出整顿全国师范教育意见书、女子师范特别注意之事项及师范教育进行方法意见书等。

8月11日　袁世凯特别委任湖南巡按使韩国钧、安徽巡按使李兆珍监督各该省司法行政事务。

8月12日　袁世凯以京张铁路纪纲败坏，路政泄沓，发生矿煤车票营私需索等案，将前铁路局长关冕钧撤职。

△　袁世凯令财政部各拨银三万元赈奉天、河南水灾。

8月13日　教育部通咨各学校得承领附近官荒山地，以收入作基本金。

△　杨度致函严复，解释近日商组筹安会，“实承极峰之旨”，并谓“发起人启事，明日将登报，已代署尊名”。

8月14日　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承袁意旨，在北京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公开鼓吹帝制。《宣言》声称“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据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为商榷，中国幸甚”。在此以前，杨度写成《君宪救国论》一文，托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鼓吹帝制。

△　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以商民季学缂、赵安桢集资创办余庆淘金矿至今甫及四年，于矿务财政两有裨益，近复创办裕源金矿，并帮办濬源公司事务，其经营实业之热心毅力，尤堪嘉尚，请分别给予七等、九等嘉禾章，袁世凯从之。

8月15日　蔡锷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反袁，梁谓“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并要蔡“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　贺振雄上书肃政厅代呈袁世凯，恳请诛奸救国，“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

△　袁世凯令被灾各省筹设水利分局或水利委员会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称：“各省水灾迭见，虽由雨泽过多，要以平日水利不修为其本病。”

△　袁世凯批准财政部呈请设立民国实业银行，并拟具章程及招股办法。9月，民国实业银行成立。12月25日，袁世凯命该行改名为中国实业银行。

△　《国货月报》在上海创刊，该刊“以发达工商，提倡国货”为宗旨，黄砺生编辑，泰华书局发行。

8月17日　据《申报》载北京电称：袁世凯就应否干涉筹安会答人称：“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

△　革命党人在沪法租界金利源码头掷弹炸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未遂，郑道华因该案被捕，11月26日被害。

8月18日　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李诲具禀京师总检察厅，请提起公诉，“将国贼孙毓筠、杨度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

△　袁世凯任命黄鹄举署四川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钟体道署第二混成旅旅长。

△　上海浦东陆行镇商民反对屠宰捐，全体罢市。

8月19日　袁世凯特任王揖唐为吉林巡按使，原任孟宪彝开缺，另候任用。

△　杨度致函王闿运，谓：“京华诸君子为措国家于磐石之安，置生民于康乐之境，爰有改制之议……如得我公一言欣助，不啻项城可释重惑，即万民亦皆额首。”

8月20日　筹安会宣告正式成立，杨度出任理事长，孙毓筠任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同日，筹安会通电全国，谓：“本会之立，将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

△　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八期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

题者》一文，反对变更国体，谓“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反对“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要求袁世凯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该文又发表在9月3日《京报》，次日《国民公报》转载，6日上海《申报》、《时报》、《神州日报》相继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载。遍传全国各大城市。

△　蔡锷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告以：“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兹拟令五峰（即韩凤楼）前赴滇、黔，切商一是。”

△　袁世凯公布《县治户口编查规则》，其中规定：“编查区域划定后就区内住户分编牌甲，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甲长、牌长由县知事委派。清查到“户内有曾受徒刑以上之刑事处分者；户内有素行不正或行迹可疑者；户内有多数非家属人杂居者”，由牌长另行记明于编查底册。同日又公布《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

△　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请假回籍，襄理地方水灾善后。

8月21日　交通部奉准试行《专用铁路暂行规则》。

△　财政部奉准中国银行增加官股1000万元，由官产收入项下拨给。

8月22日　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未到任前以王占元署理；段芝贵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

△　台湾爱国志士余清芳等一行八人在楠西乡被村民诈捕，移送噍吧哖支厅，9月23日于台南监狱被处绞刑。同时被判死刑者903人。

△　袁世凯令财政部拨银10万元赈浙江上月水风灾。

△ 袁世凯令财政部速发银三万元赈黑龙江水灾。

△ 意公使照会外交部，告以意大利与土耳其宣战。

8月24日 段芝贵、袁乃宽在京发起召开军警大会，雷震春、江朝宗等44人参加，讨论“筹安事宜”，一致签名“赞成君主”。

△ 筹安会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巡阅使、护军使、各省城商会，请派代表到京加入讨论变更国体问题。

△ 侵占青岛日军开始撤退。

8月25日 蔡锷邀请北京军界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等人在云南会馆开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蔡锷为打消袁世凯怀疑，率先签名。

△ 欧事研究会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等在上海发表《维持共和会宣言》，宣称“某某不忍乱亡惨祸之将至，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友鸿愿，力予维持”。

△ 山西将军阎锡山、河南将军赵倜、吉林巡按使王揖唐、福建巡按使许世英等电复筹安会，派代表入京参与“国体问题”的讨论。

△ 湖南将军汤芗铭致电袁世凯劝进帝制，谓：“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 袁世凯特任陈宦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 袁世凯特任胡景伊为毅威将军，并为参政院参政。

△ 袁世凯特别委任吉林巡按使王揖唐监督该省财政事务。

△ 汉口酒坊反对烟酒公卖举行罢市。

8月26日　署理湖北军务王占元、绥远都统潘矩楹等先后电复筹安会，谓“提倡君主立宪，极表同情”。

△　蔡锷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称：“筹安会发起后，京外多主张赞同，军界重要诸人亦皆预闻其事”，“该会即有电相嘱，仍以推举代表为宜”。18日再电刘：“国体事现仍进行，各省军、巡来电，主张均归一致，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

△　袁世凯任命张怀芝为察哈尔都统。9月9日，又特别委任张怀芝监督察哈尔财政事务。

△　袁世凯令准免吴光新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遗缺由范国璋继任。

8月27日　据《申报》北京讯：“政府就各省电询对筹安会之态度事复电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以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　党人黄少白、黄同生、周白雷在上海闸北华通坊为淞沪警察厅侦缉队捕获，旋押解南京讯办。

8月28日　袁世凯颁布《国民会议议员初选举施行令》、《立法院议员选举法第六章初选举施行细则》。

△　筹安会声明，谓古德诺对于君主或共和问题，除呈送总统之节略外，无他意见。

△　外交部订定聘用洋员合同条例五条，呈准通行各机关照办。该条例规定非必要时，不得聘用洋员；洋员只可条陈意见，不得干涉内政等。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函菲律宾宿务埠革命党人，揭露袁世凯“私与日人结托，急欲制其王冠”；勉以积极筹募讨袁经费。

8月29日　　筹安会发表第二次宣言，主张君主立宪，谓："日昨投票议决，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而后求其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

△　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拒不劝进，并迭请辞职，是日袁世凯令准免职，以王士珍继任。

△　中华革命党李萁、李海云、叶夏声等上书孙中山，请指派胡汉民赴港主持粤省讨袁工作。

8月30日　段芝贵、梁士诒、朱启钤等10人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假造民意，请愿改变国体，谓："现拟第一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底稿电闻，请将尊名并贵省绅商列入。"

△　外交部分电驻外使馆，称政府对筹安会并无成见，不加干涉。

△　财政部奉准筹设黑龙江采金局，以朱照为局长。

8月31日　　袁世凯申令："依约法第六十七条，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又依立法院组织法第八条，立法院之开会日期，自每年9月1日至12月末日止。本年之立法院犹未成立，所有约法规定属于立法院之职权，参政院应即按照会期代行之。"

△　袁世凯令：国民会议议员初选日期定为10月20日，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五日举行。

△　陈其美由沪至东京，与孙中山计议西南起兵讨袁。

△　《通俗杂志》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李辛白编辑。

是月　　湖南教育会会长叶德辉在长沙成立“经学会”，鼓吹“尊孔读经”，后又于12月上呈袁世凯，要求：“明定读经程序，妥订教授系统”；主张初等小学读《论语》、《孝经》，高等小学读《大学》、《孟子》，中学必读《尚书》、《左传》。袁于12月16日批示：“交教育部核议具复。”

△　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部长胡汉民自东京致书杨度，数其发起筹安会等罪状，并指出“民国确认足下为罪人，袁家究不以足下为忠仆，徒博得十万金一时之挥霍，而身死名裂，何所取哉”。

△　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密电袁世凯劝进，略谓：“东三省人民渴望甚殷。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虽刀锯斧钺加身，亦不稍怯也。”

△　驻海拉尔俄领事致函巴布扎布，赠送自来德手枪24支，并代向日本购快枪一万支。自是巴匪声势大盛。

△　甘肃庆阳、合水、环县等地爆发大规模抗捐抗税运动。张才人率众数千人在环县起义，戕官据城，于9月转攻庆阳焚烧教堂两所，后被甘肃将军张广建派兵平定。

△　中华农学会成立，由留日农业研究者数十人发起，张謇为名誉会长，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农学之发展及农业之改进为宗旨。

9月

9月1日　　留日学生侨商于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馆集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会者千余人。李执中主席，文群、覃振、戴季陶、田桐、陈家鼐、李根源、杨庶堪等发表演说，抨击筹安会，吁请全民一心，诛除袁逆。大会通过《留日学界侨商声讨筹安会宣言》，并致电北京、上海各报馆称：“筹安会反叛民国，大逆不道，请遵据约法，

大张笔伐，以息邪说，而伸正义。”

△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审议各请愿团实现君主制之要求。是日，有自称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公民代表”呈递变更国体请愿书。

△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密电国务卿徐世昌，痛陈变更国体危险，请“取消筹安会，以释群疑”。

△　袁世凯以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曲同丰另候任用，遗缺令王汝贤接充。

△　日本要求废除中日间岛协约，外交部拒绝。

△　长沙《大公报》创刊，李抱一、张秋尘任总编辑。

△　美国教会在南京设立金陵女子大学，是日开学授课，校长为德本康夫人。

9月2日　　段芝贵、龙济光、赵倜等19名将军联名密呈袁世凯劝进，恳请“改君主国体，以固根本，而救危亡”。

△　段芝贵、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10人联名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称：“共和不能适用，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望熟筹解决电复。”

△　财政部呈准中国银行添招商股1000万元。

9月3日　　张勋、冯国璋、齐耀琳密电政事堂，称：“京中有人发起筹安会……因此种举动仅由三五私人立会号召，何敢率行附和，致蹈越职违法之嫌。”主张此事应由国务卿领衔，联合京内外文武长官列名陈请，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议。

△　山西将军阎锡山电呈袁世凯，请求废除共和，改定君主立宪国体，声称：“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采取德日两国君主立宪法，不足以立国而救亡。”

△　孙中山致函荷属泗水中华革命党人，揭露袁世凯帝制阴谋，谓：“北京近有筹安会之设，盛倡帝制之说，有反对者竟被逮捕。袁氏积恶至此，将来反动，比之满清末年尤大。”

9月4日　　参政院参政汪凤瀛致书筹安会杨度，直言帝制之七不可，并称“就目前时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议更张，以动摇国脉”。

△　农商部与蒙藏院派员合组调查队三队，调查内蒙古矿业、森林。

9月5日　　袁世凯为加紧推行帝制，公布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日期暨筹备期限令，规定“国民会议议员复选举于中华民国四年11月20日举行”；同日并公布国民会议议员单选互选日期暨筹备期限令，规定“国民会议议员单选举于中华民国四年10月20日举行，国民会议议员互选于中华民国四年10月30日举行”。

△　政事堂统率处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镇守使、师长严防谣诼，略谓：“目下筹安会之学说风动全国……深恐无知愚民妄生谣诼，或有奸民乱党藉端煽惑，均未可定。”

△　中华革命军江西司令长官夏之麒自沪致函陈其美，请速示讨袁方针。

△　广西邕宁等30余县水灾，灾民流离数十万，庐屋冲塌10余万间，田禾财产牲畜荡然无存。是日，袁世凯令财政部发银五万元急赈广西水灾。

9月6日　　袁世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袁发表关于变更国体宣言，谓：“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

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

△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密电国务卿徐世昌，反对变更国体，称：“国体问题并无研究价值，俟天下太平再行提议”，“今日天下正大有可为之时，若因此停顿，殊为可惜，故期期以为不可。”同日，直隶将军朱家宝致电政事堂，表示变更国体“兹事体大，不得不审慎”。

△　驻日公使陆宗舆密电外交部，谓大隈首相言：“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问，惟万勿因此致乱，有妨邻国商务。”10日，陆又密电称：“伊集院密告：帝制尚非其时，即欲改制，亦以取法尧舜，示人无家天下之心为佳。”

△　崇明灾民数千人连日“闹荒”，县知事电请沪海道尹派员查办，内称：“警兵前往干涉，则持众抵抗，危急万状。”

9月7日　北京《天民报》以反对帝制被封。

△　五国银行团拨还中国善后借款余款55万镑，以充行政经费。

9月9日　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呈请袁世凯取消筹安会，略谓：“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长，唱此异说，无怪人民惊疑。应请迅予取消，以靖人心。”袁令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

△　广西将军陆荣廷致电政事堂，不同意变更国体，称冯电（按：指3日冯国璋等致政事堂密电）：“持论正确，先获我心，应请国务卿立断定夺，领衔陈请交议，以昭详慎。”

△　有自称京内外24处商会代表向参政院呈递变更国体请愿书，由北京、上海商务总会领衔。15日，上海总商会致函各报馆，否认有领衔24商会请愿之事。

9月10日　上海《亚细亚日报》创刊，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总理薛大可。次日晚7时，党人王道派杨玉桥投掷炸弹于该报社门内，发生爆炸，死伤数人。杨为英捕所执，旋被引渡上海护军使署。12月17日夜，该报编辑部再次被炸。

△　外交部与俄公使库朋斯齐交涉，制止俄人在外蒙随意开矿。

△　教育总长汤化龙因病请假，袁世凯特任章宗祥兼代教育总长。

△　袁世凯令前据肃政史夏寿康等呈劾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劣迹昭著，贻害地方等情，经查多属传闻，准予从宽免议。

△　总检察厅检察长罗文幹因欲查究筹安会叛逆责任未果，乃托母病请求辞职。是日，袁世凯批令准假两月，其职务派朱深暂行兼代。

△　两江优级师范学校改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校长江谦。1923年改为东南大学。

△　《中华国货月报》在上海创刊，李卓民编辑。

9月上旬　外交部抗议俄人在中东、南满两路及山东烟台、龙口等处招募华工赴俄开矿。

9月11日　云南将军唐继尧召集团以上军官在警卫混成团本部开秘密会议，发动讨袁，议决三事："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

△　黑龙江金矿试验场在汤原县成立。后于1918年改称梧桐河金矿局。

9月12日　政事堂知照内务部，筹安会只限于国体问题作学理之

研究，不得溢出范围。

9月13日　袁世凯派国务卿徐世昌至北京孔庙代行仲秋上丁祀孔礼。

9月15日　《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并撰写《敬告青年》一文，谓吾国社会之隆兴，“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提出“科学”与“人权”两口号，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审查国体请愿案，以此案关系国家根本，非立法院职权所能解决，建议召集国民会议取决。

△　天津绅商成立国土国权维持会，反对法领事越界在墙子河外老西开地方向居民收捐。

△　日军在昌图、梨树两县交界之勾界堡遭胡匪袭击，毙日兵二名。

△　孙中山派朱执信赴南洋筹款。

9月16日　山西将军阎锡山致电参政院，要求定君主立宪，迅予表决，声称：“自立之道，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定君主立宪，断不能收上下一致精神贯彻之效。”

9月17日　胡匪200余名攻占长白县城，中日商民10余人被掳。

△　财政、农商二部以湖南矿产极富，中路锑矿，南路锡矿，中西南三路铜铅煤矿，中南两路煤矿，水口山铅矿年产达三四百万元之巨，官矿矿地多达数百处，呈请简派大员前往督办，是日，袁世凯特命陶思澄督办湖南官矿事宜。

9月18日　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内外同胞，申讨袁罪。谓：“虽曰

民国，共和真髓，实无一存。……时事急矣，能速革命，而后有国，否则事机一去，噬脐不及。”

△　袁世凯特任奉天将军段芝贵兼署奉天巡按使。

△　内务部呈准将贵州仁怀县析置鲰水县。

△　交通部批准黄恩培等集资开办福建龙溪程溪墟至漳州灰窑轻便铁路立案。

9月19日　北京帝制派梁士诒等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推定沈云霈为会长，那彦图、张锦芳为副会长，并向参政院请愿，要求组织“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解决国体问题。

△　都肃政史庄蕴宽等呈请将筹安会克日取消，以杜观望，而靖人心。

△　内务部呈复袁世凯限制筹安会，称：“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项讨论界说、范围，亦已郑重声明。……倘认为有扰乱秩序之虞及其他秘密之行为，警察官吏自当加以干涉，俾有限制，而保治安。”

9月20日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决并咨请政府提前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之妥善办法以解决国体问题。

△　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条陈振兴云南矿务办法。滇矿以锡、铜、锑为大宗，宜先从金矿着手，次就铁矿经营。滇省财政支绌，开发之道，应筹借外债及招集华侨资本，并请特派大员来滇督办。

9月21日　冯国璋以各省纷电劝进帝制，是日密电袁世凯，请“俯同民好，早定大计，而奠久安长治之基”。

9月22日　袁世凯任命马继增兼帮办江西军务。

△　财政、农商二部呈请派大员督办湖北矿政。

△　前清崇陵工竣，列支工款达407.9867万元，由善后借款项下分批拨付。

9月23日　　是晚（阴历中秋）日本首相大隈邀陆宗舆在官邸赏月，告以可就承认帝制问题举行会谈，谓“总统如诚意联日，日本自当努力援助，可除一切障碍”。次日，陆即将大隈所言电告袁世凯。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胡汉民、宋亚藩（即宋振）、杨庶堪为菲律宾筹饷特派员。11月12日，胡等由日本启程赴菲。

9月24日　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递请愿书，指责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为越俎代庖，表示反对。

9月25日　袁世凯咨复参政院，于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

△　袁世凯公布《修正会计法》，规定会计年度以每年1月1日开始，12月31日终止。

△　袁世凯任命刘祖武为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

9月26日　筹安会副理事长孙毓筠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等提出包办选举国民会议办法，谓：“现拟另筹征求民意办法，由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就在省各县绅民中，每县择定一人，召集临时国民会议。”

△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次长曹汝霖，商派大员与日本密洽帝制。

△　袁世凯令准免湖南巡按使韩国钧本职，调京兆尹沈金鉴接充；并任命王达为京兆尹。

△ 政事堂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停止本年国庆日活动。

9月27日 福建省奉准增设东山县治，由漳浦、诏安两县析置。

△ 广东奉准变通铁矿开采办法，暂不实行封禁。

9月28日 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指定梁士诒、汪有龄、陈国祥、蔡锷、王劭廉、施愚等起草办法。

△ 昆明《觉报》发表反对筹安会社论《对于筹安会之商榷》；10月2日又发表《驳筹安会》，揭露杨度等“阳借筹安之名，阴行劝进之术”。

△ 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呈递备忘录，建议任用印度行政官员采行土地税改革。

△ 日本要求在赤峰、郑家屯及内蒙各处增设领事。

△ 陕西蓝田县农民反对税契，包围县城，县知事被迫宣布停收税契，缓征粮款。

9月29日 留美学生祁暄发明中国打字机器，农商部给予专利五年。

9月30日 政事堂密电各省查禁秘密党会，略称：“逆党组织秘密党会，意在倾覆祖国，邪说流行，殊为大局之害，应由各省从事严禁，慎毋稍予放纵，致使滋蔓难图。”

△ 袁世凯公布《文官高等考试令》、《外交官领事官考试令》、《司法官考试令》、《文官普通考试令》、《文官甄用令》，并通令此后无论何项文职，均以考试或甄用合格者为进身之正轨。

△ 袁世凯任命王广圻为驻意大利特任全权公使；原任高而谦因病辞职。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函告南洋同志，派陈其美、胡汉民、许崇智、杨庶堪、宋振、郑鹤年、邓铿七人赴南洋筹饷，并协理党务。

9月下旬　蔡锷密函黄兴，谈国内形势与袁世凯阴谋称帝情况，并告以即赴西南发难，征求黄兴意见。

是月　总统府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撰《新式国家三要件议》一文，进呈袁世凯，建议从速开设立法院，司法权独立，振兴小学教育。

△　段芝贵、姜桂题、倪嗣冲等以安徽“公民”名义具呈请愿书，谓“今日之政体，非君主立宪不足定国是，安人心”。同日，张作霖、冯德麟等也以奉天“公民”名义上请愿书。

△　直隶、河南孔社致电参政院，请“早定君主立宪”，“复尊君亲上之本”。

10月

10月1日　黎元洪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

△　《新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6月停刊，共出六期。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吴铁城为檀香山筹饷局局长。

10月2日　英公使朱尔典晋谒袁世凯，密谈有关帝制问题。袁称，对内可以放心，对外则不能不虑也。朱声称英国对袁进行帝制极表欢迎，“行君主立宪政体，是中国不能逃避之举，且系根本解决之法”。

10月3日　统率办事处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询治安及国体问题意见。

△　内务部密电各省“清除乱党，严防煽动”。

△　袁世凯特任郑汝成为彰威将军仍兼上海镇守使；杨善德为克威将军仍兼松江镇守使；曹锟为虎威将军；王占元为壮威将军。

△　袁世凯令青海办事长官一缺裁撤，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同日又任命马麒为该镇守使。

10月4日　　统率处据袁世凯旨意发出致各省将军、巡按使江（3日）电后，是日，长江巡阅使张勋复电，谓“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他省如有不虞，并可督饬军队以剿除自效”。5日，四川将军陈宦复电，谓“湖北将军当采兆民之公论，当机立断，速定大计以固邦本而顺人心”；段芝贵复电，谓“全省人民于改定国体问题，极为欢惬，齐心向顺无间，境内治安，芝贵可负完全责任”。6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复电谓：“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惟乞转主座，俯顺群情，速定大计。”

△　黑龙江省海伦县乡民数千人因不满货牙公司抽税，将该公司捣毁。

△　袁世凯授雷震春为震威将军。

△　教育部通咨各省区长官，请饬各学校注重体育，组织课外运动，在省城设公众运动场所，以为模范。

10月5日　　袁世凯令准教育总长汤化龙因病辞职，由张一麐继任。

△　袁世凯令着上将衔陆军中将何宗莲开复原官，并给还勋章。

△　财政部批准中美银行立案。该行由华商张振勋等联络美商所组织，资本1000万元，中美各半。

△　周学熙、孙多森、施肇曾为兴办农工商实业，集资银500万元组织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日成立，设总公司于北京，上海、汉口设分公司。

10月6日　梁士诒等为加速帝制进行，借口国民会议系决定宪法机构，不适宜解决国体问题，遂以参政身份，纠合数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是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通过此案，并咨请袁世凯公布。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黄绰民为横滨支部长。

△　山东中华民国救亡讨袁军发布《告示》，谓“兴师讨贼系国民应尽之义”，如有附和国贼者，“定与严诛”。

10月7日　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及周自齐、梁士诒等10人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谓：“国民代表大会拥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代表大会名义。……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后三日内必须电告中央，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

△　云南将军唐继尧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以武力反对帝制，并决定起义时机，若时机不成熟，则滇省宣告独立。

10月8日　袁世凯颁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凡16条。10日发布申令称：“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

△　袁世凯明令公布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关于请求由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决定国体之咨文。

△　袁世凯公布《农工银行条例》。17日设立农工银行筹备处。

11月7日农工银行在通县、昌平开始营业。

10月9日　以朱启钤等为首之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各省巡按使，预拟操纵选举国民代表办法："投票决定国体，必有全体一致之精神，方可以震动中外之耳目。然欲收此良果，必先于当选之人悉心考究，确信其能受指挥，方可入选。"未投票之先，"遴选妥员，分途联络……而礼貌之间，无损于威，酒酿之劳，无伤于财，必使下之身心乐为上用，而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　袁世凯令：前河南巡防营统领马云卿假权营私，误国害民，诬良为匪，勒索赃款六万余两，按法即行枪毙。

△　袁世凯给予总税务司安格联一等嘉禾章。

10月10日　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各省，声称："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

△　朱执信抵香港，与邓铿策划举兵反袁。10月下旬及11月上旬革命军相继起事于惠州、博罗、佛山。

△　袁世凯令福建护军使李厚基、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均加陆军上将衔。

△　澳门华民维持国体联合会发表宣言，号召中外同胞，"扬袂而起"，反对帝制。

△　《中华新报》在上海创刊，谷钟秀、杨永泰等主编。发刊词斥袁"于对外丧权辱国之后，乃为一姓之子孙帝王万世之谋，以二三近幸官僚之化身，悍然冒称国民之公意"。

△　比利时天主教神甫雷鸣远在天津创办《益世报》。

10月上旬　　陆军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刘冠雄、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纠约蒙藏部落及全国陆海军事长官、各省行政长官等数百人分批联名具呈袁世凯，请求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

10月11日　　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致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要求对选举密件应确守秘密，“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

△　朱启钤等密电各省：“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　旅美华侨丁义华，为文警告我政府与国人，指出：“溯自前月筹安会发生，其始立言，以研究学理，讨论民主君主问题为宗旨，故大总统发表意见，有国民如愿讨论此问题，未便禁止之语……岂料该会决非研究讨论，一意鼓吹速改君主，并预备宪法以辅之，大有共和国体已无讨论之余地，由此观之，足见该会早定目的，讨论研究，欺世之言也！”

△　日首相大隈重信致电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称：“由日本自身利害加以衡量，日本毕竟无法容忍事态（按：指袁称帝）之自然发展。”

10月12日　　政事堂电各省巡按使：奉大总统令，此次举行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非一人之关系，慎勿急遽潦草，致生流弊。

△　英公使朱尔典报告本国政府：中国帝制运动最近进行甚速，“各省将军、巡按使一致力促实行帝制”，此时不宜由外部进行干涉。

△ 袁世凯任命广西巡按使王祖同会办广西军务。

△ 袁世凯申令，晋北镇守使陆军中将孔庚着开复褫职留任处分。

10月13日 旅沪公民请愿团致电筹安会，告以该团成立，并推代表赴京请愿变更国体，领衔者百余人。但电文列名者大都称“不知其由来”。

10月14日 日本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到任，对华态度渐趋强硬。是日，日本阁议中国改变国体问题，决定干涉袁之帝制运动。

△ 袁世凯疑蔡锷反对帝制，是晚军政执法处派人闯入蔡宅搜查，无所获。次日，蔡质问执法处长雷震春，答系误搜，并于17日杀侦查人员以示歉意。

△ 中法派员会勘滇越边界。

△ 袁世凯加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督理军务衔。

10月15日 陆宗舆致电外交部，报告日本阁议中国帝政问题，谓：“昨石井到阁，会议对华问题，则谓中国因改帝制，形势不稳，关系东亚和平，不得谓仅关系内政，日本不能不问，或须先正式询问中国，一询究否改制；二是否可保平和；三与日本如何提携。”

△ 日本政府决定劝阻袁世凯复辟帝制，内阁会议决议邀约英、俄、法、美共同向袁提出警告。同日训令驻英大使与英政府磋商，共同劝告袁延缓实行帝制。

△ 筹安会改为宪政协进会，确定“此后本会方针，应注重立宪问题”。

△ 袁世凯公布《司法官惩戒法》、《审计官惩戒法》。

△ 中美邮船公司成立，中美各出资本100万元。

10月16日 袁世凯就蒙藏院呈报准伊克昭盟长派员进京请速定国体事批令称："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自应听之国民，前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行，应各保全治安，尊重民意，静候多数国民最后之解决。"

△ 前川边经略史尹昌衡因侵占公款处徒刑9年。

10月17日 袁世凯批准货币交换事宜归并中国银行办理，并于20日公布《取缔纸币条例》，凡九条，规定除中国银行外，凡官商银钱行号未发行纸币者不得发行，已发行者限满全数收回。

△ 奉天长白中日军警冲突，日兵开枪击毙中国警兵。后经交涉，日方反要求中方优恤日兵、惩办中国警兵、在采木公司驻兵等。

△ 中国帝政会要员蒋士立在东京赤坂寓所被党人吴先梅枪击，伤其胸腹。

△ 驻长春日本领事署以护侨为名，在张家湾强设警察分所，长春道尹要求撤销，交涉无效。

10月18日 袁世凯致电各省尊重法律，妥办选举。

△ 袁世凯特任龙觐光暂兼代理广东巡按使。

10月19日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决定国体投票之标题用"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只书赞成不赞成。

△ 津浦铁路积弊被纠弹案审理结束，是日袁世凯令该铁路局局长赵庆华交付惩戒，交通次长叶恭绰以无实据准免置议，销去停职处分。

△ 中华革命党檀香山希炉筹饷局局长黎协被刺殉职。12月14

日，孙中山特函希炉分部及筹饷局请从速催请法庭追查凶犯。

10月20日　　上海《字林西报》发表《喜剧欤，抑滑稽剧欤》之社论，斥袁以帝制“攫取大权以快私欲”，“结果必将获中国从未演过之最不幸的滑稽剧之报酬”。

△　周学熙、李士伟发起之华新纺织公司是日由袁世凯批准，资本定为1000万元。

10月22日　　袁世凯特派驻日特命全权公使陆宗舆为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大典庆贺专使。

△　袁世凯公布《土地收用法》，凡五章38条。其中规定：“凡得收用之土地，分国有、公有、民有三种。”

△　袁世凯令，前陆军次长徐树铮被劾一案，或由误会，或由传讹，免予置议。

△　中美《解纷免战条约》互换约本。

10月23日　　朱启钤等致电各省，规定劝进书中必须用国民代表“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字样。

△　袁世凯令派刘师培、谢桓武、王锡彤、林万里为参政院参政。

△　江苏通海镇守使管云臣密电北京统率办事处，谓：“此间谣言甚多，民党机关报有《爱国报》、《爱国晚报》两种，均为何海鸣所开。另有《中华新报》系谷钟秀主笔，持论均极悖谬。所闻如斯，请希防备。”

△　沪法新租界恺自迩路荫余里38号党人机关为法捕房破获，47

人被捕。次日，党人萧美成率百余人在沪起事未成，朱少春等被捕。30日萧美成、李洪在法租界被捕，旋于12月解护军使署，次年1月27日萧遇害。

△　日人强指辽河以西之锦县为南满地域混入杂居，房主被县署处罚，日领就此事向辽沈道尹荣厚提出抗议，为荣据理严拒。

△　党人朱耀南在沪以“图劫警区军械，定期起事”罪被捕，11月28日在西炮台被害。

10月24日　　袁世凯令福建巡按使督饬所属妥为保护回国华侨，以“收近悦远来之效”。

△　袁世凯令准平政院院长周树模因病免职，遗缺特任钱能训署理。

10月25日　　全国各省区按照袁世凯公布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进行“国民代表”选举。

△　驻日公使陆宗舆以帝制实情密告日外相石井菊次郎，并详述各省治安可靠证据。

△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

△　袁世凯令驻美公使兼古巴公使夏偕复开缺调京另候任用，遗缺以顾维钧继任。

△　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之科学发达”为宗旨，公举任鸿隽、赵元任等五人为董事，杨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1917年呈准教育部立案。1918年办事机构由美国移归国内，在上海、南京设立中国科学社事务所执行社务。

10月26日　　朱启钤、周自齐等10人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

谓："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君宪国体既定，不可一日无君，诸位代表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

△　财政、农商两部奉准发行有奖实业债券2000万元，用于兴办银行、煤铁矿、纱丝茶糖等厂及其他重要生利事业。

10月27日　　国务卿徐世昌称病续假，袁世凯特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暂兼代理国务卿。

△　外交部致电陆宗舆，嘱向日本外务部密告："近接各省官吏电信……大约主张君主立宪者必居多数，届时政府亦无权违拂民意……。此次改变，出于全国人民一致之意愿，政府顺从民意，秩序必不至扰乱。……特于未经决定宣布之前，以实情密告，以免误会。"

△　内务部电各省饬禁报载暴动谣传。

△　外交部令驻英、俄、法、美四国公使，将帝制进行情况密告四国政府。

△　日、英分别邀美一致劝中国延缓变更国体。11月4日，美复英、日谢绝参加。谓"中国变更国体纯属内政，任何干预均属侵犯中国主权而非正当"。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石蕴光、刘国佐、韩傧分别为四川川东、川北、川南各区司令官；赖天球为南赣游击司令官，嗣改委为韶赣游击司令官。

△　上海西洋泾浜永昌客栈党人机关被法捕破获，李德卿、阙朝书、王万英、杨文忠、余林、徐建侯六人被捕。12月22日，法租界公堂判李、阙引渡，余、王、杨押西牢两年。

10月28日　　自是日开始，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投票。

△　日代使小幡酉吉联合英、俄两国公使，就袁世凯称帝事至外交部提出联合劝告。略谓：“突建帝制，将惹起意外之扰乱，中国之不幸莫过于此，东洋之和平亦不无因是陷于危殆之虞。帝国政府以友谊劝告延缓变更国体，防祸于未然。”外交总长陆徵祥答称：“国体变更，全出国民公意，非政府所能禁止”，“各省官吏报告中枢，力任地方治安，并无变乱之虑。”

△　统率办事处电传军令，通饬各省军警长官务严一切防乱手续，以免滋乱。

△　袁世凯令：陆徵祥加上卿衔；徐邦杰加陆军上将衔。

10月29日　　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许崇智自沪上书孙中山，请陈其美留沪，略谓：“保皇、进步二党确有联合消息。吾党以周应时君独当其冲，恐应接不暇，拟留陈君驻沪。”孙见书允其所请。

△　统率办事处致电库伦办事大员公署，谓：巴布扎布屡在内蒙各处骚扰，曾于6月间由参、陆两部电告库伦，派兵助剿。现在巴匪仍在内蒙滋扰，已派兵剿捕，望即将详情转达库伦官府“设法截堵，勿令逃窜”。

10月30日　　江苏奉贤县清理沙田局，实行清丈，农民群起反抗，拥至局中请求缓办未准，群情愤激，是日聚众千人在十家村殴伤清丈员10余人，击毙一人。31日奉贤知事前往查勘，复被群众包围。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派兵前往镇压。

△　党人张秀全在沪公共租界被捕，旋解南京转押北京“讯办”。次年1月6日被杀害。

10月31日　　袁世凯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等认真

稽查选举，如有选举不合法或被选人不合格者立即饬令更正取消。

△　袁世凯令中国、交通两银行负责辅助划一币制与整理公债。

是月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命陈其美在上海，居正赴山东，朱大符（执信）赴广东，石青阳赴四川，夏之麒赴江西，于右任赴陕西，运动起兵讨袁。

△　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电复宪政协会，赞成袁世凯称帝，“并望劝进，早日登极”。孔又领衔以孔、颜、曾、孟四姓“奉祀官”名义电呈政事堂及统率办事处，谓“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惟我大总统……亟宜早正帝位，统驭群伦”。

△　原孔庚部班长卢占魁在包头兵变时收集变兵数百，并利用其在哥老会的影响，哨聚1000余人，骚扰包头以南地区，继由杀虎口、七墩口入山西，遭大同镇守使孔庚部堵截，至12月底始退出山西。

△　“满铁”向北京政府申请中日联合经营鞍山一带铁矿。1917年3月1日，奉天省署向“满铁”颁发许可执照。“满铁”攫取鞍山一带铁矿矿区八处，总面积2.15万多亩。

△　任天章等在吉林省城开设恒茂火磨有限公司，资本32万元。

11月

11月1日　外交次长曹汝霖往晤日、英、俄三国公使，口头答复10月28日之劝告，谓“国体改革取决于民，如有乱事，各省可负维持地方治安之责”。

△　法公使康悌至外交部，向外交总长陆徵祥劝告中国政府展缓改变国体。3日，康悌书面通告陆徵祥，奉本国政府训令加入日、英、俄对华之劝告。5日，意国公使华蕾亦至外交部作同样声明。

△　袁世凯任命钱能训兼任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　袁世凯批令全国水利局未便议并；该局总裁张謇呈请辞职应毋庸议。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梁丽生为海防支部长，汉雨翘为印度支部长，叶夏声为港澳支部长，郑螺生为怡保支部长，梁省躬为太平支部长，叶青眼为闽南支部长。

△　山东龙口开为商埠。

△　应袁世凯要求，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撰写了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十二条理由，并致力于敦促中国参战的工作。

11月3日　云南将军唐继尧密召所部军官举行第三次会议，续商反对帝制，要求“严防奸细，煽惑军心”，决定“讨袁关系重大，暗中积极准备，外示消极镇静”。

△　欧事研究会李根源、程潜由日本横滨乘船赴上海，南洋欧事研究会林虎、冷遹、章士钊等亦返沪，与上海欧事研究会谷钟秀、杨永泰、张季鸾等集会讨论国内时局，重新制定行动方针，决定同全国各界反袁人士“采取一致行动”；提出对敌策略为“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批准安徽同志组织中华革命军安徽机关部，以金维系为皖中司令兼任皖南事宜。

△　日外相石井晤驻日公使陆宗舆，谓：“此次日本劝告，全为各国商务及中国治安起见，并无丝毫私心。不意贵政府不谅各友邦诚意，竟尔拒绝，殊深遗憾，日政府自当另作计议。”

11月4日　日代公使小幡酉吉再赴外交部，要求以更明白之文，

答复日、英、俄三国之劝告。陆徵祥答称："国体投票各省依法办理，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本政府初无急速谋变更国体之心，现仍无此意。"

△　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已革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进京投诚。是日，袁世凯下令开复其郡王原爵。

△　袁世凯任命朱深为总检察厅检察长，原任罗文幹免职。

11月5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洪耀国为东婆罗支部长。

11月6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与俄公使库朋斯齐在北京签订《呼伦条约》八款，规定："海拉尔为直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之特区"；"海拉尔副都统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之，并行使巡按使之职权"；平时海拉尔一切军事均由旗兵担任，如有"变乱"，中央政府须知照俄国后得派军队前往，秩序恢复即行撤退；海拉尔税收归地方，关税及盐税归中央政府；将来海拉尔铺设铁路，中国政府首先向俄国借用资本；中国政府对于俄国投资家与海拉尔官署已经订立契约，凡经中、俄代表组成委员会审查者，均予以承认。按：呼伦贝尔蒙旗王公曾于辛亥革命时在俄国操纵下宣称"独立"，此时，俄国迫北京政府签约承认其在该地区之特殊利益及呼伦贝尔之特殊地位。

△　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面晤陆宗舆，严词再询改制事。当日陆致电外交部，谓石井宣称："如中国数月内仍改帝制，此时本大臣无以上对皇帝，下答议会，日本国民将认中政府为欺侮日政府之举。"

△　昆明《觉报》发表署名大觉之时评，号召人民奋起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谓"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

11月7日　朱启钤等密电各省，声称日借口中国恐有变乱，强拉英俄联合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

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

△　进步党孙洪伊等发表《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指出“帝制发生，人心愤恨，若不即此终止，灭亡之祸，无可幸逃”。次日通电各省分支部“及时奋起，共谋补救”。

△　英公使朱尔典、俄公使库朋斯齐联袂访梁士诒，磋商中国协助英俄，加入联盟，以贷款与中国扩充兵工厂为协助之条件。

△　中华革命党江西革命军司令长官夏之麒在沪法租界被袁党收买凶手湘兰所刺殉职。

△　袁世凯公布《著作权法》和《违警罚法》。

△　教育部颁布《预备学校令》，规定预备学校教育以预备升入中学为本旨，修业年限为前期四年、后期三年。

△　袁世凯特派董康为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

11月8日　筹备国民大会事务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通告，自10月29日至11月8日各省区依法举行决定国体投票数：计京兆20票，直隶119票，奉天56票，吉林37票，黑龙江22票，陕西90票，湖南75票，湖北69票，广东94票，江苏60票，山西102票，山东107票，浙江75票，福建62票，河南108票，安徽60票，江西81票，绥远8票，热河15票，察哈尔7票，共20处，已投决定票数1276票，“据各监督报告，均系一律赞成君主立宪”。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谢介僧为湖南革命军司令长官部副官长，林修梅为参谋长，仇鳌为军事参议。

11月9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北京政府命通告日政府，谓中国改革国体不于本年实行。

△　教育部派张渲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1月10日　　孙中山致函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帮助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略谓："我让位给袁世凯以后，立即完全脱离政治，潜心研究逐步的社会主义理想来塑造政治的最佳途径。在彻底体认我这一生奋斗的惟一目标和愿望之后，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并谓："我吁请你们协助我把中国建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你们的注意力和力量放在中国，提供各行各业的人才协助我们。我需要像贵局这样的机构，提供以人才，以便从事这项伟大的志业。"

△　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党某党人，谓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内部已造成分裂，彼虽派人与我党接洽联络，然"从来官僚不足深恃"，仍须"厚集吾力，乘此时机，先发制人"。"先从西南，造我根据；至长江各省，纵官僚反正，我亦必占据要地，不落人后。计袁贼之覆亡，不出数月，中原大局，不难定也"。

△　中华革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奉陈其美命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中弹毙命。王晓峰、王明山当场被捕，12月7日遇害。

△　外交部与统率办事处分别致电库伦办事大员公署，告以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军队于本月5日攻克白音皋，巴匪逃往游格吉庙，希外蒙地方当局协堵，"不使深入，免滋误会"。

11月11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邀日、英、俄、法四公使至外交部，声明国体改革已为大多数国民所决定，因准备头绪纷繁，急难实行，须稍延期，并称"意外之乱，果或猝起，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消除之力"。

△　据《大公报》讯：袁世凯亲笔撰稿通电各省，"国体仍未改革，勿可称帝称臣，淆乱耳目"。

△　经界局督办蔡锷化装离京赴天津，避日租界，旋于19日搭日轮“山东丸”离津，敢道日本赴港转滇，参与反袁之役。

△　袁世凯任命陆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暂行兼署上海镇守使。

△　教育部咨行各省区，请饬整顿实业学校。

11月12日　英国政府照会日本政府：为援助俄国对德作战，拟提议由中国政府供给俄国步枪和其他军需品，为此目的将给予中国一定财政援助，改良兵工厂，增加生产能力，同时进一步使中国对德宣战，就此事征求日本政府意见。日本借口维护“东亚和平”，反对中国参战。22日，英、法、俄驻日大使访晤日本外务大臣石井并递交照会，要求日本同意四国共同促使中国与德、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以防止德国在华对协约国之阴谋活动。日本坚持反对态度。12月3日，日本内阁对此正式作出决定，并于6日通知英、法、俄三国驻日大使。

△　意国公使华蕾照会外交部“请缓行帝制”。

△　袁世凯通令各省严禁“乱党”印刷品由海外寄往内地，查出立即销毁，“以遏乱萌”。

△　袁世凯公布《民业铁路法》，凡75条，其中规定“民国人民集合资本依本法之规定建筑铁路者为民业铁路”，设立铁路公司须创办人开具禀请书，请交通部暂行立案。

11月14日　奉天日商延寿堂被炸案解决，中方赔款2.2万元，被捕中国学生同时获释。

11月15日　孙中山书告菲律宾各地华侨：“今袁氏谋篡，事迹显然，惟众叛亲离，势当瓦解，今正讨贼之时，宜协力筹款相助。”

11月16日　袁世凯令封爵暂照前清各项世爵办理。

△　奉天将军段芝贵通饬所属，今后公文须改尊称，称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重体制。

11月18日　　日本内阁讨论对华政策，决定联合英、法、俄、意四国，就袁世凯帝制活动提出第二次劝告，并通知日本驻四国大使，分别向驻在国政府进行磋商。

△　英、法、俄驻日大使会商中国加入协约国。

△　袁世凯批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凡七条。

△　袁世凯批令：督办经界局事务蔡锷因病准予续假7日，俾资调理。

△　袁世凯令准肃政史费树蔚免职。

△　上海、松江两镇守使缺裁撤，改设松沪护军使，袁世凯令杨善德充任。

11月19日　袁世凯任命江朝宗为步军统领。

△　袁世凯任命徐源为肃政史。

△　蔡锷以就医为名由天津乘船赴日本。

△　上海小机业工人一千数百人因该业坊主购买日本机器，夺其生计，举行罢工。

11月20日　　中华革命党发布第十八号通告，指出郑汝成被击毙后，东南梗阻业已铲除，大江南北，势力磅礴，正宜乘时大举。

△　袁世凯令贵州巡按使戴戡开缺留京听候任用，特任龙建章继任；任命潘矩楹为绥远都统。

△　教育部呈准官吏不得兼充学校校长及限制兼任教员办法。

11月21日　　全国各省“代表大会”决定国体投票，均告完成，共计投1859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

△　参政梁启超呈请辞职，袁世凯令给假两月，俾资调理。22日，袁命戴戡署理参政。

△　江西万载县人民反对烟酒公卖，聚众将县署捣毁。警察到场镇压。

△　据《申报》讯：呼伦贝尔胜福之一部分羽党1000余名，已分别送内蒙扎萨克图旗原籍；余1000余人编为黑省巡防队，呼伦贝尔已完全投诚。

11月22日　　英、法、俄三国驻日大使拟妥对华要求：一、诱导中国与德奥断交，加入协约国；二、驱逐中国境内德侨；三、中国提供兵工厂与协约国，并供给俄国武器。是日，三国驻日大使向日提出要求，望日谅解与协助，日拒之。

△　日公使日置益向外交部责问中国参战事，外交部否认。

△　经界局周钟岳代蔡锷呈请袁世凯准予续假三月，并请派员代理经界局督办和参政院参政职务。

△　凌晨，察哈尔多伦镇守使萧良臣率兵攻外蒙游格吉庙巴布扎布匪巢，巴匪据庙抵抗，后逃往海拉尔为俄人所收容。是役巴匪被击毙千余名，生擒500余名，并将勾结巴匪之游格吉庙活佛拘留。27日，外蒙提出交涉。

11月23日　　唐继尧发布第一号饬令，命历年来凡曾在各军队充任中下级官长，因过撤销差使，或因故自请长假，而现愿投效者，速按表式填注履历事由，陈呈各有关长官，限10日内详保到署听候定期

查验。如才质可取，过差可原，即分别酌予任用。其赋闲日久，学术荒疏者，则令补习学术，以备异时补充之选。

△　公使团照会外交部，以推广上海租界为退回会审公堂交换条件。

△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受册封，外交部向俄公使库朋斯齐提出交涉。

11月24日　　袁世凯令蔡锷给假两月，所遗经界局事务以龚心湛兼署，参政缺以张元奇署理。奉天巡按使张元奇开缺。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临时大会，到代表80余人，改举张振勋为会长，讨论组织中美银行、中美轮船公司及中美商品陈列所等问题，获通过。30日闭会。

11月25日　　外交次长曹汝霖电驻日公使陆宗舆，探询日本对华参战意见。

11月26日　　黄兴致函张孝准，部署讨袁策略，计有发难地点、暗杀机关、争取冯（国璋）、陆（荣廷）及外交问题等。

△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复曹汝霖，称："昨某馆员密谈，英已将中国加入事情请日本赞成，日政府尚未答复……英政府意似日本即不允英中日三国同盟，而英中二国亦可另订密约。"

11月27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照会日本政府，否认有在北京进行"英中同盟"谈判之说，表示"英国若不同日本取得协议，无意与中国进行有关政事性的谈判"。按：据传英公使朱尔典与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为诱使中国对德宣战，在11月上旬向北京政府提出"英中同盟"的建议，其交换条件为：一、完全废除德国在华特权利益；二、中国作为交战一员，将以协约国同等资格出席战后和平会议。消息传出，引起日本政府极大注意。

11月28日　　驻库伦俄领事向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箓抗议派兵进入蒙古剿匪。

11月29日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箓电告黑龙江将军朱庆澜称，“巴匪余党已向洮南、海拉尔一带逃窜，请派兵设法堵击”。

△　上海法租界捕房饬派探捕查封《爱国报》馆，主笔王血痕解法公堂“讯办”。

△　北京“读音统一期成会”会员王璞等，呈请教育部立即将公布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国，并由会员在京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12月22日经袁批准立案。

11月30日　　督办经界局事务蔡锷呈称赴日疗养，袁批：“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是月　　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居正到青岛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并组成东北军两个纵队、五个支队。

△　奉天辽阳县72乡饥民八万余掀起“吃大户”抢粮风潮。

△　中和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总事务所设北京，办事处设河北磁县峰峰村，资本总额60万元，生产烟煤焦炭。

△　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公司成立，总事务所设天津，资本总额原定20万元，后增至280万元。

△　王郅隆等创立天津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纺制粗细棉纱附织布疋，资本银250万元。

△　外交部呈准在俄国伊尔库茨克及荷属南洋棉兰地方设立领事馆，并派管尚平为伊尔库茨克领事，张步青为棉兰领事。

12月

12月1日　登极大典筹备处在北京中央公园行开幕礼。1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成立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

△　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萨镇冰奉袁命到沪检阅海军，并命“肇和”舰于6日出海，开赴广东。

△　中国与巴西修改条约签字，其中规定“两国人民皆可侨居，须由本人自愿，均照最优国相待”；两国“互派使臣”；“两国通商照各国章程办理”等。

△　吉长铁路依“二十一条”要求签订新约，移交日本管理。

12月2日　袁世凯晋封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管旗章京富勒珲为辅国公。

△　上海人力车夫8000人，反对华、洋各公司增加租价，举行同盟罢工。是日至次日，公共租界捕房拘捕车夫100余人，分别判押一天至两个月。

12月3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朱执信为广东革命军司令长官。

△　袁世凯任命程克为副都统，充任阿尔泰办事长官。

△　前吉林巡按使孟宪彝在任内赌博狎妓，行为失检被劾，是日袁世凯申令移付惩戒。

12月4日　交通总长梁敦彦与英商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签订短期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上海规银210万两，以京奉铁路余利为担保。

△　袁世凯令：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鲍贵卿现充讲武堂堂长，准

免本职。

12月5日　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等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下午陈其美派杨虎带队夺取“肇和”舰，并由该舰炮轰上海制造局。同时，党人自陆上分别攻击淞沪警察局、电话局等重要机关；袁军大队赶来镇压，党人败退。

△　山东孔教会王锡蕃等致电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劝袁世凯早即帝位，略谓“君主问题业经表决”，“皆盼我皇帝应天顺人，不日即正大位”。

12月6日　袁军自“应瑞”、“通济”两舰炮击“肇和”舰，“肇和”舰发炮还击，战斗持续一小时，“肇和”舰多处中弹，舰上伤亡枕藉，杨虎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舰上数十人被袁军捕获遇难，“肇和”之役失败。

△　党人进攻沪西门外第二区警署，陈玉麟、鲍德俊等被捕。16日、20日，陈、鲍先后在西炮台被杀害。

△　袁世凯授南桂馨为陆军军需监。

△　内务部呈准警察如有叛乱、抗命、投敌、逃亡、违令、侮辱、暴行、胁迫等罪行，适用陆军刑律治罪。

△　袁世凯奖励兴办实业成绩较著之虞洽卿等29人。

12月7日　袁世凯据海军总长刘冠雄等呈请昭雪前清尚书陈璧，特颁明令，予以慰勉。11日任命为参政院参政，28日授为中卿。

12月8日　袁世凯晋封新土尔扈特旗头等台吉爱里宰德勒格尔为辅国公。

12月9日　党人金汉章因涉嫌刺杀郑汝成案在沪被警佐逮捕，次

日在西炮台遇害。

12月10日　　袁世凯令：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肇和”舰案自请处分，交海军部议处；练习舰队司令徐振鹏平时失察，一并由海军部议处，以示惩儆。

12月11日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举行全国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总开票，秘书长报告全国代表1993票，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向袁世凯上总推戴书，“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佯为推辞，将推戴书发还，并下令称：“推戴一举，毋任惶骇。……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同日参政院又上第二次推戴书，颂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之功，“尽瘁先朝”，“无负民国”。

△　进步党党员安致远等137人致电进步党各省分支部表示对王印川以进步党本部名义发表拥护帝制宣言“概不承认”，并谓：“吾党四年以来拥护袁氏，断送国家，应速忏悔，声罪致讨，以补前过。”

△　袁世凯任命黄振魁为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12月12日　　袁世凯颁令接受帝位，声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旋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箓接外交部电，谓俄使面称：“俄政府以巴布扎布防止德人谋炸东清铁道有功，碍难交出。巴匪现已穷蹙，拟在西伯利亚边地安置，与内蒙障隔，当可无事。”27日，车林多尔济至署面告“巴布扎布现受外人保护，前经派兵前往驱逐，亦无从措手”。

12月13日　　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同日并通令各省访查反对帝制，称改变国体出于“民意”，对于“好乱之徒”必须“严密访查，毋稍疏忽”。

△　日公使日置益为袁改行帝制事照会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答复。15日，日使联合英、法、俄、意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提出第二次劝告，称：“曩者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尝言固不急遽以从事，且声明担保中国疆内之治安。”并称“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外交总长陆徵祥答称“现在投票决定虽完，尚未正式实行帝制，盼各国尊重中国主权”。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伍发文为彭亨文冬支部长。

12月14日　　黄兴致电美国驻京公使芮恩施，请勿赞成袁世凯称帝，谓“吾国民断不能坐视袁氏任意复行帝制”。并表示：“此时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随革命军同事疆场，竭尽吾最后之气力，驱逐国贼。……使吾国人民得共享自由共和政体之福。”

△　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电请袁世凯“立下取消帝制之命”，或“申明延期，俟数年后斟酌国势，再议实行”。

△　袁世凯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即行推荐宪法起草人员。

△　美洲致公总堂会长唐琼昌上书美国总统威尔逊，请勿承认袁世凯复辟帝制，“免致革命党前功尽废”。

△　“肇和”舰水手冯汉祥、谢求、庄玉坤、余燎、莫振声五人以“附和党人运动”罪被松沪护军使杨善德杀害于上海西炮台。20日，该舰水手叶大秀、王大共、刘元洪又以同一罪状被杀害。

12月15日　　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受。19日，袁又申令“毋许固辞”。

△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肇和”舰起义失败经过。

△　袁世凯颁令褫夺“肇和”舰长黄鸣球官职，交海军部从严查办。

12月16日　袁世凯申令：“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

△　袁世凯令迅速筹办立法院议员选举，准于来年以内召集立法院，以期发皇宪政。

△　袁世凯令整顿厘金，特派田中玉、赵椿年赴各省考察，凡无关紧要之厘卡，分别裁撤归并，舞弊营私情事从严究治。

△　袁世凯特任前清资政院总裁溥伦为参政院院长。

△　黄兴致函张承槱，谓对“肇和”舰起义表示欣慰，并慰勉返回讨袁。

△　梁启超秘密离天津乘轮赴上海，与欧事研究会联系倒袁，18日到达。

△　詹大悲、温楚珩在沪公共租界被巡捕及长江巡阅使驻沪调查长拘捕。

12月17日　欧事研究会会员李烈钧奉黄兴命回滇策动讨袁，是日偕熊克武、龚振鹏等经香港、海防、河内秘密抵达昆明。云南将军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至老开迎迓。

△　德、奥公使访晤外交总长陆徵祥，对袁世凯接受推戴称帝一事表示祝贺，并要求谒见袁世凯。

△　自是日起，《政府公报》改大总统命令为“政事堂奉策令”。

△　财政总长周学熙、交通总长梁敦彦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签订《四郑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日金500万元，以四郑铁路一切动产、不动产及各项进款作为头次抵押。

12月18日　　袁世凯闻李烈钧等至滇，特于是日致电唐继尧，准“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倘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19日再电唐严密查防蔡锷、戴戡等行踪。唐置不问，于次日复电称：“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宗旨，如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

△　袁世凯申令：“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　袁世凯以有贺长雄发表《日本立宪而强》一文为帝制张目，特赏赐唐人墨迹，以酬其庸。有贺乃自称外臣，于是日具奏谢恩。23日，天津日侨集会，以有贺于日本未承认中华帝国之前，公然执外臣之礼，有玷日人体面，议决予以除名。

△　袁世凯申令：“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　袁世凯特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未到任前，以唐在礼代理。

△　黄兴致函国内友人，慨言去国既远，唯有尽力外交与筹款助国内讨袁，并望国人于此国家纷乱及从事创造之时，勿各树党援，乘时取利。

△　蔡锷抵蒙自，袁世凯密电阿迷县知事张一鲲相机暗杀。

12月19日　　蔡锷偕戴戡秘密由日本经越南抵达昆明，当晚与唐继尧等商谈讨袁计划。

△　袁世凯申令修改法令，声称：“立宪国首重法治”，“着政事堂饬法制局将民国元年以来法令，分别存留废止，悉心修正。”

12月20日　　外交次长曹汝霖访晤日使日置益，告知袁世凯希望至迟明年2月初旬（旧历正月初）称帝，并称："若正式宣布各国承认，则乱人自无，人心自安。"

△　梁启超致电唐继尧代转蔡锷："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

△　袁世凯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以尊国耆"。

△　江苏财政厅奉令自明年1月1日起货物税加征二成，上海各商自是日起群起反对。上海总商会连日召各行业开会，迭电北京要求免加，称此次加征为"政府欲置商民于死地"。

12月21日　　云南将军唐继尧邀集云南军政界要员开第四次反对帝制会议，蔡锷、李烈钧、戴戡、熊克武、王伯群、方声涛、但懋辛均与会，议定先电袁取消帝制，并惩办祸首，如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同日，唐拘禁袁驻滇省代表何佩文。

△　国民会议事务局通告各省将有关此次国体问题文件，一律查明烧毁，谓："此次文电无论如何缜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万望赶速缜密办理"。

△　黄兴自美密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庄蕴宽，揭袁称帝必败，并称："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望投入反袁称帝、维持共和国体之斗争。

△　梁启超在上海收到蔡锷来电，谓前队将于12月23日出发，出发20日之后发表滇省独立之通告。

△　袁世凯特任陆徵祥为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

△　袁世凯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等49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23日复封刘冠雄、雷震春、陈光远、张敬尧、张作霖等70余人爵位。

△　袁世凯令海军总司令李鼎新褫职留任，并褫去上将衔；练习舰队司令徐振鹏即行褫职，以示惩儆。

△　孟轲“忌日”，北京孔社举行祀孟礼。

12月22日　云南唐继尧召集第五次军事会议宣誓讨袁，“拥护共和，誓灭国贼”。

△　黄兴自美致书广西将军陆荣廷，促其兴师讨袁。谓：“袁逆谋叛民国，公然称帝……今日海内贤豪竭智并力，以正义讨昏暴，以人民公意诛独夫，义正言顺。……望足下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无使时机坐失，贼势日张，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

△　袁世凯令：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张锡銮着开缺留京当差。同日授张为振威上将军、参政院参政。

△　袁世凯申令永远革除太监，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

12月23日　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联名致电袁世凯，请取消帝制，诛除祸首，“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要求袁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同日，唐、任等联名将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

△　唐继尧致电滇军各师、旅、团、营长，说明电袁世凯取消帝制原委，令“各照常办事，禁绝浮言，各保地方之治安，静待兹事之解决”。

12月24日　蔡锷、戴戡致电袁世凯，请“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

△　夜，唐继尧在将军府召集军政与绅士50余人讨论独立事，蔡锷在会上宣读江苏将军冯国璋转来梁启超致蔡锷电，“大众以为任公已到宁，冯已同情起义可以响应”，全体议决：一、次日即通电各省宣布独立；二、废除将军、巡按使署，仍改为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三、组织护国三军，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

△　袁世凯重申鸦片禁令。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洪铨禄为纳卯支部长。

12月25日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指出“元首谋逆……帝制自为”，表示：“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护国战争爆发。

△　袁对25日云南宣告独立电未作正面答复，是日由政事堂致电唐继尧、任可澄，以“想系他人捏造”，“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寄京核转”为词希图转圜。

△　孙中山为讨袁筹款致电林森，谓：以讨袁事起，需款甚急，促速汇款。

△　袁世凯令永远革除挑选宫女之例。

12月26日　云南护国军总司令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各省，敦促同举义师，戮力同心，铲除帝制，重建共和。

△　是日中午12时，昆明政界各机关科长以上，各学校校长以上人员，齐集第一师师部大礼堂，听候唐继尧宣布独立事宜，蔡锷、李

烈钧演说独立宗旨。

△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梯团，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分任一、二、三梯团长，总计兵力约9000人。

△　广西将军陆荣廷佯拥帝制，通电各省，称已与王祖同会电警告唐继尧、任可澄。28日又电袁请“大伸天讨”。

△　孙中山致电旧金山中华革命党人，告以各省讨袁近况，谓：“云南确布独立，苏赣沪鄂皆备即发。”

△　黄兴在《费城新闻》发表《辨奸论》一文，驳斥外人为袁世凯辩护之论据，表明中国人民讨袁到底之决心，呼吁美国朝野赞助中国人民之共和事业。

△　袁世凯申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称，现常年会业将届满，特依约法宣告延长会期两个月。

12月27日　　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通电讨袁，历数袁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之罪行，望各省军民长官共同驱袁。

△　云南护国军发表讨袁布告，谓：“共和成立，于兹四年，各国承认，内外相安。元首违法，背叛誓言，自为帝制，擅行变迁。……军府为此，申明大义，忠言劝告，取消帝制，还我共和，恢张民气。凡尔士民，勿庸惊疑，各安生业，勿受谣欺。”

△　参政院奏请制定宪法程序，其步骤为：“一、中华帝国宪法，由特派宪法起草员起草；二、草案成后，咨询参政院审议；三、经参政院审议后，复奏皇帝核定，提交国民会议讨论，其讨论程序以法律定之；四、经国民会议讨论后，奏请皇帝公布施行。”

△　袁世凯致电云南以外各省军民长官，声称："唐继尧等曾迭电劝进，今忽反复，请取消帝制。诸长官有何意见，望速据实陈述，用备采纳。"28日，奉天将军段芝贵等奏称"愿率所部将士驰赴云南，殄此凶顽"。29日，安徽将军倪嗣冲电袁表示"愿整备三军，听候驱策"；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电请袁速行"天讨"。

△　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由刘云峰率队出发北征，昆明民众夹道欢送。

12月28日　孙中山电嘱上海中华革命党人待机反袁，谓："此间确息，唐、蔡已动。滇款无庸给。既有首雄，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

△　参政院因云南反对变更国体，提出关于外交事件之质问，要求政府答复，借以表白。外交次长曹汝霖至院答复，并决定将经过情形通电各省解释，谓各友邦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黄卓汉为峇眼亚比支部长，伍云坡为广东支部长。

△　因上海《亚细亚日报》馆爆炸案被捕之谭桂福在西炮台遇害。

12月29日　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唐、任即行褫职夺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褫职夺官，并夺勋位勋章，一并听候查办。

△　袁世凯令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着加将军衔，并特任其暂代督理云南军务；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

△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通电，请召开国民会议，将国体变更一事重付表决，或由元首宣布取消帝制。

△　袁世凯特任龚心湛督办经界局事务。

12月30日　　第三师师长曹锟自岳州通电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称："奉令讨贼，誓将出师，前队已拔，大军继发，天心既顺，荡平可期。"

△　广东将军龙济光等致电政事堂，谓："决定国体本诸国民公意，全国一致推戴，出自至诚，已无讨论余地。唐继尧等阴谋反复，久蓄逆谋"，"伏祈我皇上宸衷独断，于新历元旦诞登大位，以慰人心。"

12月31日　袁世凯申令改明年（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　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张子贞、刘祖武再次通电讨袁，并称："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

△　袁世凯令："派虎威将军曹锟为行军总司令，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官，督率第六师及第五旅由湖南经贵州向云南进发；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官，督率第七师及第六旅由四川向云南进发。该总司令由四川前进，务激励将士，联合进行，早奏肤功。"

△　云南将军行署、巡按使署照会各国公使及各地领事：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所订之条约继续有效，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所订之条约、契约及借款概不承认；在势力范围内居住之友邦人民之生命财产力任保护。愿各友邦共守善意中立，互敦永久睦谊。

△　暂行兼代广东巡按使龙济光与台湾银行签订广东水灾借款日金60万元合同，以卷烟、牛皮税及屠宰税为担保。

是月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

凯“暴行帝制”等种种罪行，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　唐继尧致函黄兴，略称“已于本月25日由尧率领全省健儿宣布讨贼，甚盼薄海豪俊，共襄义举”。

△　唐继尧、蔡锷等分电驻外各公使共申讨袁，谓：“公等衔民国之命，当必效忠宣勤，务望鼎力维持，同申烈愤。”

△　吉林延吉天宝山银铜矿开办，资本55万元，该矿名为中日合办，实际全为日商资本。

△　钱润清创办蒙古制碱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万元，本店设张家口，支店设北京。

△　清华学校编印《清华学报》（季刊），在北京创刊。

是年　欧战爆发后，铜价上涨，日商在我国东北、山东、天津、上海等处，勾结当地奸商大量收购制钱运往欧洲出售，牟取暴利。据海关报告：1914年制钱输出额天津230担，上海3902担；1915年天津增至18577担，上海增至26442担。青岛一埠1915年制钱输出额竟达44867担。

△　袁世传于江苏创办贾汪煤矿公司，总公司设天津，分公司设上海。1917年至1921年日产六七百吨。

△　直隶模范纱厂在天津创建，资本25万。1918年与恒源帆布厂合并，改为恒源纺织有限公司。

△　日商以“中日合办”名义重开延吉天宝山银铜矿，资本55万元。

△　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县组织裕华商业储蓄银行。

△　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大

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妇女杂志》、《英文杂志》、《辞源》等书刊。

△　福建省基督教会在福州创办福州协和大学，由庄才伟任校长。

△　由美、英五个教会和伦敦医学会合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校，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改名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二卷
(1916—1921)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
第二卷
(1916—1921)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16年（民国五年）
1917年（民国六年）
1918年（民国七年）
1919年（民国八年）
1920年（民国九年）
1921年（民国十年）
返回总目录

1916年（民国五年）

1月

1月1日　　袁世凯建元，以是年为洪宪元年。大典筹备处是日通告，即日起“所有奏咨暨一切公牍，只署洪宪元年某月某日”。

△　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在昆明正式成立，云南取消将军行署、巡按使署，改为都督府。举唐继尧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

△　昆明民众举行拥护共和纪念大会。

△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联名发表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叛国称帝”等二十大罪状，宣布要约五条：一、“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二、“改选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中华民国”；三、“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四、“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交之效”；五、“采取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

△　袁世凯将原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府内收发处改为“奏事处”，府内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　袁世凯公布“洪宪元年度总预算”，岁入4.71946710亿元；岁出4.71519436亿元。

△　袁世凯申令提高警权，以维秩序，力保公安。

△　袁世凯令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　袁世凯申令“立国根本在乎教育”，着教育部筹议整理扩充各省师范学校。

△　袁世凯任命徐时震为都护副使分充科布多佐理员。

△　丹麦在哈尔滨设领，由驻哈俄领代办。

△　北京环城铁路竣工，正式通车。

1月2日　　戴戡奉蔡锷派遣，率部前往贵州策应独立。24日抵贵阳。

△　袁世凯令外交次长曹汝霖仪同特任，以酬其庸。按：仪同特任者，系予以特任待遇。

1月3日　　袁世凯以凡书“洪宪元年”之对外文件均被退回，遂令对外仍暂用民国名义，对内则书“洪宪”，暂时不加“帝国”字样。

△　广西将军陆荣廷、巡按使王祖同为掩护广西独立活动，是日致电政事堂，请袁“早正大位，以定人心”。18日又电政事堂称：“近日沪上《中华新报》载有广西独立之耗，似此造谣煽乱，殊堪痛恨。”

1月4日　　统率办事处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进兵云南：川湘两路暂由第三师全部，第六、七师各一部编成，以曹锟为总司令，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由湖南经贵州进兵云南，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由四川向云南前进；粤桂两军合组之桂边一路军，以龙觐光为总司令，由广西百色向云南攻击。

△　黄兴复函彭丕昕，称蔡锷“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表示与美政界接洽，以为“财政之一助”。

△　袁世凯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以大总统所

佩之同等大勋章一座颁赠日皇，是日由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通知日本政府。

△　岑春煊抵上海，与梁启超密晤。

△　江苏将军冯国璋领衔联络各省军政长官42人，电请政事堂及统率办事处转请袁颁令讨伐唐（继尧）任（可澄）。

△　安徽将军倪嗣冲、巡按使李兆珍电请袁世凯“早正大位，以定名分，而安人心”。7日奉天段芝贵，湖南汤芗铭、沈金鉴，9日浙江朱瑞、屈映光，山东靳云鹏、蔡儒楷，陕西陆建章、吕调元，上海杨善德、卢永祥，山西阎锡山，10日湖北王占元、段书云，江西李纯、戚扬，广西陆荣廷、王祖同，11日四川陈宦，13日张勋等，先后电请袁“早登大位”，并对云南实行讨伐。

1月5日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通电讨伐袁世凯，并告誓全民四事：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建立名实相副之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大势；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

△　袁世凯颁令讨伐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待命。

△　袁世凯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勿受蔡锷等“煽惑”。

△　驻日公使陆宗舆访日外相石井菊次郎，征询日政府对袁世凯行帝制之意向。

1月6日　　广东中华革命党人朱执信及陈炯明等，相继在惠州等地举事讨袁，朱部号称中华革命军，陈部为护国军。是日，两军分别攻占九龙新城盐田税关和淡水（属宝安县），旋因兵力不敌，均被驻

军击退。

△　云南都督府委朱德充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旋改编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朱任支队长。

1月7日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函劝北方各师旅团营长，效鲁仲连之力拒强秦，取消帝号，法华盛顿之争取天赋人权，建树共和，共同讨伐袁世凯。

△　袁世凯申令龙济光、张勋、冯国璋等简拔精锐，听候调用。

△　参政院议决驳复贵州巡按使龙建章“艳”（上月29日）电所请另行表决国体问题，谓再付国民公决说、元首宣言取消说均不能成立。

△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密电四川将军陈宦、师长刘存厚，请一致反对帝制，速为策动。

△　政事堂以云南护国军实行讨袁，是日特通电各省切实查报地方治安情形。

1月8日　　外交部电驻日公使陆宗舆，告以赴日赠勋特使周自齐准24日抵东京，希知照日外部。

△　袁世凯任命王金镜为陆军第二师师长；特任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

△　中华革命党江苏司令长官周应时，苏州司令吴江左，清江司令臧在新计议起义讨袁，因镇江机关为敌侦破而失败。是日臧在新在阜宁被捕，旋被杀害。

△　党人50余人袭击上海漕河泾警察分所，黄得余等七人被捕，解松沪护军使署讯办。

△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致电南洋华侨筹饷，并函请柏文蔚任南洋筹饷总代表。

△　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突出修身、读经，强调涵养儿童孝悌忠信诸德，注重《论语》、《孟子》大义。

1月9日　唐继尧之代表李宗黄抵达上海，次日访陈其美商讨袁事宜，并托转寄唐致孙中山函，内称“如蒙训示，当由李君就近趋候，禀承一切”。

△　孙中山以日本政府派青木中将来华抵沪调查各派反袁势力，为争取日本援助，是日复电上海中华革命党人，称：“日府派青木中将来沪调查，而后定方针，宜秘密间接图利之。”

△　袁世凯任命吴敬修为肃政史。

△　内务部令江苏将军转饬所属，各报应改用洪宪纪元，“如再沿用民国五年，不奉中央政令，即照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

1月10日　俄驻英大使访英外交大臣葛雷，并递交照会，以袁世凯将行帝制，建议协约国予以承认，以免陷于被动，致招煽动“党人”起事反袁嫌疑。葛雷即表同情，并于次日将照会内容转告驻英日使上达日政府。12日，日外相石井答驻日英使称：无必要因德奥等国承认帝制而改变态度。此时，日使日置益亦报告本国，谓英、法、俄驻北京公使认为，若袁行帝制，应在适当时机予以承认，以免中国政局继续“动乱”。

△　护国军第一军右纵队先遣队董鸿勋支队离昆明，向四川进发。

△　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箓电政事堂称，外蒙官府所有公文

均已遵用“洪宪”年号。

1月11日　湖南长沙教育会长叶德辉等电请袁世凯“早登帝位”，并指责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扰已定之国基，树人民之公敌”，吁请“大张天讨”。

1月12日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等奏请将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从祀关岳庙。

1月13日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特派那旺那林、扎木彦多尔济，由库伦启程进京向袁世凯呈送礼品。

△　哈尔滨双合盛火磨以20万卢布买妥俄商地列金火磨，继续生产红鸡牌面粉。

1月14日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借出巡之名，潜离贵州。

△　海军总长刘冠雄赴上海及长江一带视察。

△　袁世凯任命李炳之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1月15日　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急电日置益公使，令拒绝庆贺日皇加冕特使周自齐赴日。16日，日置益照会外交部，请周暂缓赴日。

△　云南都督唐继尧与任可澄致书梁启超，谓“长江下游一有动摇，全局立可解决”，盼速定策发谋，并请策划外交及建国问题。

△　袁世凯以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滇乱未平，率行请假，“实属有意规避”，令着先行离任，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遗缺特任刘显潜署理。

1月16日　蔡锷率云南护国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由昆明出发向四川纳溪、泸州进发。

△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部，称日政府“此次拒绝周使，即是蔑视元首之发端。其机关报口气图画，已不以友谊相待”。

△　江苏南汇县张江栅等地饥民，反对屯田缴价，聚众起事，向富户索钱米。19日后，斗争蔓入上海、川沙两县，旋因力量分散，被军警击散。

1月17日　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刘云峰部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在新场附近首战告捷，攻克燕子坡。18日占横江。19日渡江直捣安边。20日进克柏树溪。敌军望风哗溃。

△　贵州省绅商农工各界数千人在省议会集会反对帝制，要求贵州“亟谋自主”，并公推刘显世为都督。

△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外交部，极力主张延缓帝制，使“乱事无从蔓延”。

1月18日　孙中山致书康德黎夫人，吁请英国官员停止与袁合作迫害党人。指出：“香港、上海及新加坡之英国官员，居然与袁世凯合作而热衷于迫害我爱国同胞……此种行径，必贻英国政府以不良之后果。”

△　驻沪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致电各国公使，谓袁僭称皇帝，已失其元首资格，凡有对外交涉均属一人之私图，我全国国民断无承认余地。

△　袁世凯申令废除各省例贡及清末年节寿期贡献。

1月19日　新华宫发现图谋刺袁事件，宫内查得炸弹50余枚。京师警察厅督察长袁英被捕，内史沈祖宪、内尉瞿克明等人亦有牵连。

△　蔡锷致函河内法总督，言明护国军起兵以后，袁世凯无代表国家资格，并望对护国军表同情之谊。

△　曹锟奉袁命，离岳州西上入川督战。

△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警告袁政府不得忽视南方动乱而实行帝制之决议。

△　袁世凯批准察哈尔地方官员得置买蒙荒。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郑绍本为三宝垄支部长。

1月20日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陈伯豪为宿务支部长。

△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以反袁斗争计划，并嘱其积极筹款。谓："云、贵独立后，鄂、赣、苏、杭等处均准备发动"，"刻下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一俟"南方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伐"。

1月中旬　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奉令攻滇，率部进入广西。

1月21日　蔡锷所部入川护国军刘云峰部攻占叙州（今宜宾）。

△　日公使日置益以护国战争爆发，要袁世凯延期实行帝制。同日，日外相石井通知陆宗舆："若北京政府无视各国劝告及国内动乱情况，实行帝制，日本政府决不承认。""若至国交中止，殊为二国前途忧虑。"

△　外交部通告各国驻华公使，袁世凯暂缓登极；并电驻日公使陆宗舆，声称："现因戡平滇乱，政务殷繁，元首不肯正位。二月初旬登极之期现已作罢。此间已密告驻使，希密与外部接洽。"

△　袁世凯令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请辞男爵。

1月22日　《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系中华革命党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创办。邵仲辉（邵力子）任经理，叶楚伧任主笔。

△ 护国军第一军朱德支队离昆明北上，兼程奔赴泸州前线。

1月23日 日海军中将青木宣纯奉令来中国“调查”政局，是日抵上海。次日与梁启超晤面。

△ 蔡锷电促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速作准备，克日发动。

△ 京张、张绥铁路归并办理，改名京绥铁路。

1月24日 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箓、电报会议委员郭世荣同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密勒尔签订《自治外蒙古电线合同》，凡15条。

1月25日 袁世凯以蔡锷所部进川，川南重镇叙州失守，急令“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

△ 蔡锷电劝四川将军陈宦发动讨袁。

△ 梁启超致书广西将军陆荣廷，敦促早日起义讨袁，谓“权谋不可不用，然亦不能久用；利害不可不审，然亦不可太审”。

△ 奉天省宽甸县乡民聚集万余人抗税，捣毁税局，殴打税局局长。

1月26日 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司令官刘云峰命邓泰中支队开赴叙北宗场迎战伍祥祯旅，29日战于斗牛岩，激战两昼夜，敌向自流井溃走。

△ 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由泸州进犯叙州。

△ 戴戡在贵阳绅商农学工各界欢迎会上演说，表示与袁决一生死。

△ 孙中山自东京复函神户杨寿彭，告捐款3000元收到，并称：“现在各省活动渐臻成熟，军需所急，端在巨款，尊处鼎力鼓

舞，其结果当不让南洋、美洲各埠”，“务望竭力相助，以资进行”。

△　袁世凯令陆军第十一师改为第九师，以黎天才为师长；张永成署第十一师师长，陈光远兼署第十二师师长。

1月27日　贵州宣布独立，原护军使刘显世称都督，以戴戡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另以王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出兵湖南，以拒入湘北军。

△　刘显世布告贵州都督府成立，并令委何麟书为民政厅长，张协陆为财政厅长，胡曜为军法局长，李映雪为军警局长。

△　欧事研究会成员程潜等10余人，由香港抵昆明，与唐继尧等共商讨袁事宜。4月30日，程赴湖南靖县组织讨袁军事力量。

△　袁世凯任命王懋赏为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

1月28日　梁启超致函日人犬养毅，综述反袁情形，并派周善培往见，“期于患难相扶”。

△　袁世凯以惠州反袁军被龙济光击退，加封龙郡王衔。

1月30日　广惠镇守使、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到达南宁，准备向云南进攻。

1月31日　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响应反袁护国，率部进驻纳溪。

△　护国军第一军董鸿勋支队占领四川永宁（今叙永）城。

△　护国军刘云峰部杨蓁支队在叙东白沙场与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遭遇，大战三昼夜，冯被击溃，率部遁去。

是月　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以李烈钧为总司令，

何国钧为总参谋长。

△　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居正奉孙中山命抵青岛，策划山东讨袁军事。

△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在加拿大成立，队员300余人。2月，分三批抵达日本横滨，扩充至500余人。5月初由夏重民率领入山东潍县，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受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

△　孙中山致书拥袁各将领，劝勿助逆，“倡树义帜，拥护共和”。

△　叶友才等在上海开设“华生电器厂”，初造小件电器用品，嗣后增资制造各种电风扇和电动机等。

△　王芝舫在汉口创立汉昌烛皂厂无限公司，制造肥皂、洋烛，资本2.4万元。

2月

2月1日　　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率兵反攻泸州。

△　中华民国四川讨逆第一军临时司令余成龙率众攻入隆昌县城。

△　袁世凯公布《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

2月2日　　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发布讨袁通电。次日率部队由贵阳向四川进发。

2月3日　　贵州护国军分兵三路攻入湖南西部。是日，东路军总

司令王文华部占领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

△ 《春声》杂志在上海创刊。姚锡钧编辑，文明书店发行。

2月4日 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第二梯团由永宁进驻纳溪。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郑成功为檀香山及希炉筹饷局长。

2月5日 护国军第一军董鸿勋支队会同护国川军刘存厚部陈礼门支队会攻泸州。6日，董支队攻克泸州对岸战略要地蓝田坝、月亮岩。

△ 护国第一军王文华部吴传声团克黔阳，次日克洪江。

△ 朱执信率党人数十人潜入广东番禺石湖村，指挥谢细牛部绿林数百和民军4000余人，解除福军和乡团武装。7日进攻石湖村兵工厂。8日遭龙济光军千人围攻。9日龙济光续派炮队增援，朱执信乃下令撤退。

△ 吉林省密山、富锦、虎林等县（今属黑龙江省）乡民万余人反对盐务缉私马队敲诈勒索，与警兵对抗。17日，赫哲族500人直扑缉私马队驻地，歼灭盐警数百人。

2月6日 护国第一军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击破袁军陈宦部于叙州，袁军四路窥叙计划失败。

△ 曹锟部吴佩孚旅王承斌团到达泸州。

2月7日 袁世凯命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率部前赴四川，加强守备。

△ 袁世凯令汤芗铭、马继增调拨军队分途进攻蔡锷护国军。

△ 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会见袁世凯，劝其放弃帝制。3月21

日，莫理循呈递《关于放弃帝制的备忘录》。

2月8日　　袁世凯下令查办刘显世，免其贵州护军使职，以唐尔锟为贵州护军使，暂署督理贵州军务；2月14日复令革夺刘显世官爵勋章，并派各路军队“进剿”，严拿惩办。

△　护国军董鸿勋部渡江取小市，进迫泸州。

△　云南交涉员徐之琛电蔡锷，报告“越政府（指河内法总督）暨本省外人对我态度及言论均极友好”。

△　袁世凯特任龙觐光为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

2月9日　　守泸州袁军旅长熊祥生率所部二营和驻川北军李炳之旅一营渡江占营盘山，10日拂晓向蓝田坝刘存厚部发起攻击，午后6时占领蓝田坝、月亮岩。护国军团长陈礼门退至纳溪斑竹林自戕，刘存厚退江安。

△　孙中山自东京致电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嘱与到上海活动之日本青木中将联络。

2月10日　　袁军旅长吴佩孚及所部团长王承斌进攻中兴场，李炳之旅直趋泰安场。12日，熊祥生、李炳之两部占领江南泰安场等要地，泸州围解。

△　墨西哥华侨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表示“不恤任何牺牲”，以维护共和制度。

△　袁世凯令准都肃政史庄蕴宽辞职，遗缺由张元奇继任。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马安良为甘肃省司令长官，张宗海为军事筹备委员及陆军师长。

2月11日　　袁世凯任命葛光廷兼充陕西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

△　川军第三混成旅暂编第三营在副官王先导和连长瞿豹岑率领下，于开往建昌抵御护国军途中之越隽起义，自称四川护国讨逆第二军，继被镇压。

2月12日　孙中山在东京与梁启超所派代表周善培及岑春煊商谈反袁事宜。旋又与周善培及岑之代表多次商谈。

△　袁世凯以四川师长刘存厚“潜引滇军，袭扰泸州”，下令褫刘军职，夺革官爵，并饬前方军队拿获正法。

△　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到京商出兵湖南。

△　袁世凯任命张镇芳督办河南六河沟煤矿公司事宜。

△　奉天省锦县辟为商埠。

2月13日　袁世凯任命蒋雁行为驻宁专员，是日蒋奉派由京抵宁，名为协办防务，实则衔命就近监视冯国璋。

△　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抵松坎。次日分五路进攻，先后占领九盘子、赶水、青羊寺、东溪等要隘。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杨广达为檀香山支部长。

△　江苏南县饥民300余人至七团镇“闹荒”，被防军击散。

2月14日　广西将军陆荣廷为团结内部讨袁，是日召集所部将领20余人宣誓：“一德一心，驱逐国贼。保卫民生，保障共和。”

△　护国第一军东路军司令王文华亲率袁祖铭第一营，在王天培部增援下，占领湖南沅州（即芷江）。团长吴传声阵亡。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特派冯自由前往南洋、澳洲等地，筹募讨袁军饷。

△　袁世凯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附滇有据”，令革夺官爵勋章，并着各路军队一体进剿，严拿惩办。

2月16日　谢兆鸾集合民军千余人在四川合州（今合川）成立中华民国革命军四川第一支队，自任司令官，黎握中为参谋，活动于合州、酆都（今丰都）、万县、云阳一带。

△　护国第一军东路军司令王文华部攻克湘西重镇麻阳。

2月17日　唐继尧之代表李宗黄持唐致冯国璋函是日与冯密商共同讨袁，冯以环境扞格未作表示。后复作第二次晤谈，冯始允严守中立。

△　朱德率部自昆明抵纳溪，代替董鸿勋任第二梯团第三支队支队长职务。旋率部开赴棉花坡参加战斗。

△　滇军华封歌支队抵松坎，协同护国第一军右翼戴戡部作战。

2月18日　武昌中华革命党人蔡济民等联络南湖马队起事，被防军王占元部击败。

△　蔡锷以罗佩金为护国第一军左翼总指挥，石陶钧暂代参谋长。

△　根据日本临时阁议决定，日本驻俄公使本野一郎向俄国外交部提议将中东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转让与日本，日本允向俄国供应武器，与俄订立同盟。

△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致函孙中山，报告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上海等地讨袁情形。

2月19日　蔡锷全军分三路反击：一路由禄国藩率一营由黄土坡向蓝田坝反攻；一路由何海清率两营由永宁河右岸向双河场进攻；一

路由朱德率两营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刘存厚以一部担任纳溪城内外及其附近市街之警戒及掩护，一部北渡长江，对龙透关急作佯攻。22日起各路暂取攻势防御，休整待命。

△　袁世凯设临时军务处于统率办事处内，负责调配防务，对付滇黔护国军。

2月20日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部自昆明出发，向滇桂边挺进，抵御袁军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部进袭。

△　夜，长沙党人李唐、金东舒等图狙杀湖南将军汤芗铭被侦探发觉，掷弹拒捕，同归于尽。

△　外交部奏准在英属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地区）设置总领事。25日派谢天保署理总领事。

2月21日　湖南中华革命党人杨王鹏等率领百余人攻袭长沙将军署失败。杨等数十人被捕遭杀害。殷之辂等进攻西长街，也失败被捕，40余人遇难。

△　蔡锷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未获答复。3月24日再电唐，要求将滇所储弹药悉数饬解毕、永分存，并“月拨送补充兵五百至千人”。

2月22日　陆荣廷之代表唐绍慧及唐继尧之代表李宗黄在上海晤梁启超，邀梁赴广西。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委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并负责联络湘鄂两省。

2月23日　袁世凯宣布延期实行帝制，申令“从缓办理”，并不许呈递“吁请早正大位”文电。

△　袁世凯下令兴建水利工程，以兴农业而辟利源。

2月24日　袁世凯任命范国璋为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　袁世凯下令扩充北京师范学校，调集各省学生入学，大省20名，中省16名，小省12名，以培育优良师资。

2月25日　袁世凯下令晓谕商民各安生业，“毋得轻听谣言，自受损失”，并着各省“严查造谣奸徒，立即拿究”。

△　中华革命党发布第二十号通告，指出云、贵举义以来，全国“几有登高一呼，众山响应之势”。号召国内外爱国同胞，“各竭财力，尽匹夫之责，成救亡之功”。

2月26日　袁军第六师师长兼第一路司令马继增以连遭败北，于湘省辰溪服毒自杀，全军残溃。3月19日，袁世凯派周文炳继任第六师师长。

△　教育部委汪济丹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校长。

2月27日　广西将军陆荣廷电请袁世凯速拨饷械，以备攻滇。

△　辛亥时期四川保路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在温江召集旧部响应云南起义，自称“四川护国军”。

△　袁世凯申令规划全国道路，着内务部迅即拟订修治道路条例奏办。

2月28日　袁世凯申令提前于本年5月1日为立法院议员召集期，并令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议员复选当选人。

△　袁世凯特派曹汝霖兼充外交官领事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长。

△　袁世凯下令于北京设立高等警官学校，以培育高等警察人才。

2月29日　袁军张敬尧派劲兵两团进袭纳溪，被护国军何海清支队消灭殆尽。

△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等详告军情，称："今昨两日，举全力猛攻，逆军阵线已成锐角形，其正面尚依然未动，良以地形艰险，守易攻难。现决心继续猛攻……如再无进步，为全军计，只有另择阵地扼守，一以伺敌以制胜，一以迁延时日，用待时变。"

△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宣告闭会。

△　袁世凯令将四川陆军第一师改为陆军第十五师，以原任一师师长周骏为师长仍兼重庆镇守使，并令将四川陆军第一混成旅裁撤，归并该师。

△　龙觐光率部进驻百色，与滇军李烈钧部相持。

2月下旬　龙觐光分兵五路进攻云南。第一路以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李文富为司令，出百色攻滇边剥隘；第二路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司令，间道入广南，相机会攻剥隘；第三、四路两路分别以桂林司令张耀山、田南道尹吕春琯为司令，作为后援；第五路以朱朝瑛为司令，趋黔边以阻滇省护国军南下，以保后路。

△　曹锟部第一路司令马继增、第二路司令张敬尧，相继率领陆军第三师、第六师、第七师及安武军等，分途进入湖南辰沅宝庆之间和四川泸州一线，进攻护国军。

是月　日本政友、国民、同志、中正等各政党议员，国民外交同盟会、对支联合会、浪人会等团体，以及企业、新闻各界人士召开"对支有志大会"，通过倒袁决议，并发表宣言斥袁称帝。

△　虞畊霞等在上海创立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机器制造棉线、烛芯，资本银三万元。

3月

3月1日　　日海军中将青木宣纯往访梁启超，商讨袁事，约以提供交通便利，助梁离沪赴桂。

△　袁世凯派肃政史王瑚、夏寿康、蔡宝善、徐沅分往各省考察经征情形，如发现有浮收巧取苛罚等弊，立即陈奏惩办。

△　孙毓蕃与日人佐佐江嘉吉在内蒙东部开办钱家店农场，占耕地4.8万余亩。

3月2日　　晨，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龙觐光所属第一路司令李文富部陷云南剥隘。

△　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再犯叙州。护国第一军刘云峰部以三营兵力在催锅山、光斗山和吊黄楼一带进行顽强抵抗，因众寡悬殊，遂于2日主动撤往横江。

△　袁世凯公布《外交官、领事官官制》，凡18条。

3月3日　　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攻陷叙州。7日占领纳溪。蔡锷率部移驻大洲驿。

△　袁军第一路司令周文炳是日起自辰溪分三支队向麻阳反攻。6日，麻阳失陷。13日，花园、武阳相继失陷。未几，绥宁、洪江、黔阳、怀化、芷江皆失。

△　留沪国会议员孙洪伊等在沪发表通告各友邦书，谓“袁世凯叛国称尊”，国民“决心除此残贼”，望各国亲善民国政府，“弃绝背叛之独夫”。

△　司法总长章宗祥通饬总检察长及各审检厅长查察审判衙门承发吏、检验吏、录事、庭丁、司法警察等积习，谓："近来此项吏役因犯诈欺取财等罪，检举者时有所闻，而被告诉告发迹涉嫌者，尤实繁有徒。假公职以逞私图，情节较常人为重，自非从严惩办，不足以清积弊。"嗣后"各该吏役宜戒慎自矢，该管长官尤宜防微杜渐，免蹈从前吏胥积习而维法庭威信。"

△　日军舰11艘由佐世保驶抵青岛。

3月4日　　梁启超应陆荣廷密约，偕同唐绍慧等乘日轮离沪前往广西，4月4日抵达南宁。

△　赵钟奇、黄毓成所部应李烈钧之请，分别于是日及次日自贵州黄草坝、兴义出发，南下会攻百色龙觐光军。

△　袁世凯申令国人"捐除一己之意见，融化一党之畛域，屏绝私人之感情，协力维持，以保国保种为唯一之天职"。

3月5日　　袁世凯批准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之施行办法。

△　交通部、财政部与比利时铁路电车公司签订陇海铁路七厘国库券合同，借款比金1000万佛郎，以该铁路财产收入作担保。

3月6日　　广东中华革命军在黄埔分袭"肇和"舰及长洲、鱼珠炮台。铁血团团长李天德攻下炮台后，即由马伯麟率铁血团成员成创周、温生及华侨"决死队"进袭"肇和"舰，旋即失败，成创周、温生等多人遇难。

3月7日　　袁世凯特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进兵贵州，以陈炳煜兼护督理广西军务。11日，陆率部由南宁至柳州，停师不前，策划反袁，并联络滇军，潜师围攻百色龙觐光军。

△　日内阁开会研讨中国局势和确定对华方针，决定乘袁世凯失势之际，“确立在华优势”，使袁“引退”；于适当时机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以民间形式出面，支持中国国内反袁活动。21日，外相石井特派森田宽藏前往中国，向驻华日使及有关领事转达上述决定。

△　袁世凯以冯玉祥攻叙“功劳卓著”，特封为三等男爵。

3月8日　　张敬尧部刘湘团进驻江安。次日占南溪。13日，袁世凯为此特授刘湘为陆军少将，勋五位。

△　教育部呈准《管理留美学生事务规程》，并改设留美学生监督。

3月9日　　孙中山在东京同久原矿业株式会社社长久原房之助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额70万日元。用作反袁经费。

△　龙济光密遣龙体乾回滇联络土匪，陷个旧、扰蒙自、围临安。21日被滇军击溃。滇军收复个旧，临安围解。

△　袁世凯申令：“现叙州先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张敬尧等“督兵苦战，卒得克捷”，晋授张敬尧勋三位，升授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

△　上海淞沪警察厅饬属严禁“乱党在沪组织共和维持会”。

3月10日　　护国第一军东路军司令王文华调集铜仁、晃县、芷江一带兵力近万人反攻麻阳，激战数昼夜未下。

△　江苏将军冯国璋宣布“政躬渐就平复，自即日起销假视事”。

△　袁世凯公布《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条例》，发行总额2000万元。

△　袁世凯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旋熊希龄复电拒绝受命。

3月11日　护国第二军第一梯团张开儒部驰防皈朝，旋与龙觐光第一路军李文富部血战七昼夜，大败龙部。

△　袁世凯公布《颁爵条例》，凡12条。明订世爵、世职之等分及俸给。世爵自亲王、郡王、一等公以至三等男，凡17等，岁俸自二万圆、一万圆、五千圆至一千圆不等；世职自一等轻车都尉至恩骑尉，凡六等，岁俸自八百圆至二百圆不等。其子孙承袭之原则为：先嫡后庶，先长后幼。

△　袁世凯特派曾鉴为川南宣慰使。

3月12日　陆荣廷、李烈钧所部及护国军赵钟奇部进攻百色。次日将龙觐光军包围，勒令缴械投降。

△　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王维纲部进攻长寿。16日由临江庙出发攻酆都（今丰都），次晨入城，杀县知事许石生。

△　孙中山复电陈其美，允汇款20万元作为江浙革命活动和运动第二舰队反正费用。

△　湘西大庸罗剑仇等联络地方团队300余人，在永顺松柏场起义讨袁，成立中华革命军湘西独立军，自任司令官。19日克永顺。24日占桑植。

△　袁世凯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凡25条。

3月13日　孙中山通告冀、鲁、晋各省中华革命党人，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嗣后居正即赴山东青岛活动。

△　孙中山电告居正各地讨袁军事形势，并望山东方面月内起事，夺取济南。

△　松沪护军使署在上海西炮台杀害图攻徐家汇警署之党人王知、戴光太、薛得胜、许荩臣。次日又杀党人吴金生、邬德胜、汤阿二、李永如。

3月14日　袁世凯颁立法院议员单选选举日期令；中央特别选举会之单选举于4月10日举行；蒙藏青海联合选举会之单选举于4月15日举行。

3月15日　广西宣布独立，陆荣廷为都督，梁启超为总参谋，并组军队进攻湖南。同日，陆荣廷通电宣布“誓除专制之余腥，重整共和之约法”。联合云贵声罪致讨，“诛彼独夫，载宣国威”。

3月16日　护国第二军第二梯团方声涛所率朱德、毛本良两营及张怀信警卫大队一个中队与黄恩锡部血战三昼夜，是日占领石洞、龙潭。龙觐光悬五色旗，遣使请暂停战。

3月17日　袁世凯召梁士诒入府商撤销帝制。袁以案上各省速请取消帝制，日本政府决派兵进驻中国要地及袁军战况失利之文电交梁阅看，且谓“事已至此，吾意决矣，今分数段进行，撤销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任之，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任之”。并嘱梁电陈宦与蔡锷议和。

△　蔡锷所部发起总反攻，是日朱德第三支队收复纳溪等地。北军张敬尧所部受挫，退守泸州。

△　龙觐光被迫缴械投降，并通电各省，宣布“辞云南查办使责任，赞助共和，以谢天下”。

3月18日　陕西中华革命党人王绍文、南南轩、杜守信等18人，因密谋讨袁，事泄被捕，在西安被陆建章杀害。时“党人”郭坚、耿直、曹世英、高峻等人，在渭北宣布护国，讨袁逐陆，连克同官（今铜川）、宜君、洛川等10余县。

△　湖南巡按使沈金鉴致电政事堂和统率办事处，称广西独立，致湖南“四路受敌”，“湘危则大局益不可收拾”，请速“以全力注意湘省，添调重兵”。

△　唐继尧照会英、法、俄、美、日公使及驻滇各国领事，声明：“本军政府起义以后袁政府所发之公债，以及中国、交通两银行所发之纸币，所收入之存款，均认为与袁世凯个人之交涉行为，本政府概不承认。”

△　教育部通知各省酌办露天学校。

3月19日　袁世凯任命周文炳为陆军第六师师长。

△　北京统率办事处电饬上海军政各机关查禁党人著作之书籍。

△　汤化龙电劝袁世凯退位，谓现已“举国成仇”，“急为退位之图，犹是自全之计”。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电请陈其美兼任江苏司令官。

3月20日　岑春煊、章士钊、张耀曾在东京与日商竹内维彦签订借款日金100万元合同，作为护国军行政费用。

△　袁世凯特任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

△　袁世凯特派凌福彭、蔡乃煌、李翰芬帮办广东防务。

△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幕。

3月21日　袁世凯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准陆徵祥辞去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

△　袁世凯特任李厚基为建武将军，仍督理福建军务。

△　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长江巡阅使张勋、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以平滇黔之气。

△　康有为致书劝袁世凯早让权位是为上策。

△　留沪国会议员孙洪伊等布告，誓除国贼袁世凯。

△　四川中华护国军第三支队卢师谛部占石柱。

3月22日　袁世凯被迫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仍称大总统。令曰：“着将上年12月11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并谓：“本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

△　袁世凯下令召集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临时会。并宣告于本月23日起开会。

△　山东肥城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举行暴动，焚毁县署及四乡丈量局。东平、东阿、平阴、新泰等县农民也继起举事。旋遭驻军镇压。

3月23日　袁世凯下令取消“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按：自“洪宪”建元始至是日，袁世凯称帝凡83天。

△　袁世凯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之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等，要求停战，派代表至北京商议善后。略谓：“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收干戈，共图善后。”

△　袁世凯令准冯国璋辞去参谋总长，仍督理江苏军务；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临时会议，因人数不足而散。

3月24日　云南都督唐继尧致电广西都督陆荣廷等，主张迫袁世凯退位。谓依旧约法及大总统选举法，袁氏犯罪当然丧失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而不容其姑以取消帝制为敷衍目前之计，仍 昄 颜就总统职。

△　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陆荣廷、总参谋梁启超檄告广东军民，谓："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张鸣岐竟昧天良，甘心从逆。本总司令、总参谋……今已统率劲旅，合围省垣。济光、鸣岐若能悔罪投诚，自当予以更新之路。倘犹执迷拒命，势亦难逃渠首之歼。"

△　袁世凯以康有为、伍廷芳、唐绍仪等为调人，出面致电蔡锷，谓："帝制取消，诸公目的已达，请从此罢兵息民，共维大局。"

△　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奉令电饬上海政警各署"严行查禁《中华革新报》"。

3月25日　袁世凯电令四川将军陈宦与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商议停战。

△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临时会议，国务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凯出席并致词。谓时事急迫，盼各参政为国宣劳。会议达成三项议案：一、咨请政府撤销国民代表大会公决之君主立宪案。二、取消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案。三、咨请政府恢复因帝制失其效力之民国法令案。

△　司法总长章宗祥通饬各省司法机关切实办理假释，饬各省检察厅长、审判处长"查明在监者，有无实心悛改可以假释之人，从前出狱者有无再犯之虞，应予以销假释之事，分别造具清册报部，以凭考核"。

△　留沪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50人通电各国公使，表示"誓

除袁氏，以靖乱原，断不取一时姑容，永贻后患”，并望各国“同情”。

△　江苏公民袁希洛等电袁世凯，要求“速将总统职务交由副总统摄行，静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

3月26日　孙中山致电上海革命党人，促早日发难。

△　李烈钧电袁世凯，指斥其取消帝制托人调停，乃“欲以市井无赖之口，矢约于义军之前，以再售其使贪使诈之术”。

△　唐绍仪电劝袁世凯退位，指出云南“此次举义，断非武力所可解决”，退位为“唯一良策”。

3月27日　袁世凯下令恢复因帝制失其效力之民国法令。

△　陈宦致电蔡锷，要求即日停战，妥筹善后，同时密遣雷飚至大洲驿晤蔡，面告“将一致倒袁，行联邦制，而举冯、段、徐为总统”，并称已得湘鄂赣三省赞同。

△　陆荣廷命朱超群率部向广东廉州灵山县进发，迫该县于次日宣布独立。

△　四川旅沪公民朱伯为等1583人致电袁世凯，称袁已成为“政治上之罪犯，应由副总统暂摄事权，即日退位，静候国民裁判”。

△　粤军驻潮州团长莫擎宇率部占领潮州城，宣布独立。30日，汕头警卫军响应独立，潮汕各界推莫擎宇为潮汕护国军总司令。

△　交通部、财政部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1916年中华民国政府滨黑铁路五厘息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000万卢布，挪作行政费用。规定以该路财产、收入作担保。

3月28日　梁启超电复陆荣廷，谓“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

△　广东钦廉镇守使隆世储宣布钦州、廉州独立。

△　袁世凯申令追赠前第六师师长马继增为陆军上将。

△　上海兴华银行开幕，资本100万元，总理张瀛亭。

3月29日　袁世凯令总统府焚毁帝制公文800余件。

△　袁世凯任命陈树藩兼充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　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与法人欧乐、穆岱等人，在巴黎召开“华法教育会发起会”，并推选干事，拟定会章，举蔡元培、欧乐为会长，汪精卫、穆岱为副会长。规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6月22日，该会召开成立会。

3月30日　袁世凯以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等，要求“罢兵”停战，称“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

△　贵州都督刘显世电唐继尧、陆荣廷等，主张由桂、滇、黔三省联衔通电迫袁世凯退位，请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并根据约法及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正式大总统。

△　北京统率办事处以“党人聚沪日多，谋变日急”，电饬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防缉”。

3月31日　蔡锷电复陈宦同意所率滇、黔护国军自即日起至4月6日停战一周。

△　护国军四川总司令刘存厚部占领四川南溪。

△　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密令关东军支持宗社党在东北加紧策划“满蒙独立”，由黑龙会骨干川岛浪速等人参与活动，拟于6

月间在庄河、复州（今复县）、辽阳、本溪湖等地举行暴乱，旋因袁世凯毙命作罢。

是月　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与护国军第一军左翼第一梯团长刘云峰部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共同讨袁。为暂时防止误会冲突，商定刘军不过安边场，冯军不过柏树溪，双方不越金沙江沿江之两岸。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书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嘱着意经营山东。

△　陕西、湖北、安徽、江西、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直隶、奉天、湖南、山东、福建、甘肃、四川19省公民井勿幕等41人联名主张以武力迫令袁世凯退位，拥护黎元洪副总统代行民国大总统职权。

△　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200余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与警察发生冲突。

△　奉天鞍山日中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成立，集资14万元开发鞍山附近铁矿，中日出资各半。

△　前清肃亲王善耆与日财阀大仓喜八郎男爵议订借款日金100万元，作为宗社党策划“独立”之军事费用，并约定事成后，以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一带森林采伐等各项权益，作为双方合办事业，委与大仓经营。

4月

4月1日　袁世凯下令国民会议与立法院之组织及其议员选举，“应恪遵各该本法所定程序”，分别办理。

△　袁世凯咨复参政院，在立法院尚未成立以前，仍以参政院代

行立法院职权。

△　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致电唐继尧等，谓袁世凯“业经宣布取消帝制，诸君志愿已达，尚望共济时艰，和平解决”。

△　陕西第一军总司令郭浤、第二军总司令焦子静传檄讨袁，先后占领朝邑（现并入大荔县）、郃阳（今合阳）、韩城和富平、蒲城、白水等县。

△　卢师谛四川护国军第三支队进入忠县，县知事附义独立。

4月2日　　政事堂奉袁世凯明令，公告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君主立宪国体案。

△　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电复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力主袁世凯“洁身引退”。称：“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靖，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4日，唐继尧亦复电黎元洪等指出：袁倘“真诚悔祸”，即应“毅然引退”。

△　蔡锷致电云南都督唐继尧等，称：“冯玉祥两次派人来言，渠已决心效顺，其主张在倒袁以推冯，并担任联络北军。……其部曲亦多识大义，现已嘱令速举。”

4月3日　　潮汕护国军总司令莫擎宇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间潮梅地区悉为莫部所占领。

△　内务部呈准改川边怀柔县为瞻化县。

△　法国巴黎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合办华工学校，是日开学，学生24人。该校办学目的，“意在选吾国工人之较有知识者，授以普通知识及中法文，使得分赴各工厂为译人，并以工余转为华工”。

△　山东曲阜“经学会”成立，孔祥霖为会长，聘“讲师”六人，常年讲经。

4月4日　广东“江大”、“江固”、“宝璧”三舰宣布归附反袁军。

△　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示“必占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并谓：“现在弟认济南为至重要地点，若济南一得，弟当亲来。大约得济南，则两师之军械，一二百万以上之现款，俱可于此间筹取。持此以往，足能号召天下，幸勿忽视。”按：居正统筹直隶、山东、山西讨袁军事。

△　北京统率办事处密令松沪护军使杨善德、副使卢永祥，“切实防范”党人在沪起事。

4月5日　孙中山是日及7日先后致电指示上海革命党人“相机而动”。

4月6日　督理广东军务龙济光被迫宣布广东独立，改称都督。次日，发表独立通电。“欲求保民息战，惟有由各省要请退位，否则各省独立，使袁知人心全去，不敢相持，自可得和平解决。粤省宣布独立，即本此意”。

△　上海广肇公所董事伍廷芳、唐绍仪等电广东都督，请速电京，“止派北军赴粤，并杀蔡乃煌以谢粤人”。

△　护国第三军赵世铭支队、第二军马为麟支队收复滇东竹园，8日收复十八寨，12日又收复弥勒和丘北，龙体乾、黄恩锡部相继败退。

4月7日　蔡锷通令续行停战一月，并命令罗佩金等“饬所属前线各部队，于原有阵地扩张强固工事，严密防守，不得稍有疏虞”，“并加意教练新兵，整理一切”。

△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致电唐继尧等反对与袁议和，称“停战之约，于袁有大利，于我则不利”；望“奋志扫除妖孽，建立新猷，永奠邦基，以解时危，以餍民望”。

△　广西都督陆荣廷电请北京政府，依据约法请袁世凯“速行宣告退位”。

△　财政部代表顾维钧与美国李·希格金逊公司于华盛顿订立《六厘金币库券合同》，借款美金500万元，作为军政费用。

4月8日　　陆荣廷、梁启超应龙济光与讨袁民军之请，率桂军约万人，由南宁启程赴粤，13日抵梧州。

△　松沪护军使署据报，沪上党人定于“即晚起事”，特颁临时紧急戒严令。公共租界亦派捕“严行防范”。

4月9日　　四川将军陈宦所派议和代表刘一清、雷飚到达永宁，接受蔡锷所提停战规约四条：一、两军暂守防线，不得进出步哨线外一步，如违约冒进，格杀勿论；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军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三、凡有着便服，携带器具，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间者，准予射击擒捕；四、此次停战自4月7日起至5月6日夜半止。

△　据吉林榆树县呈报：该县黄天教徒发表反对清丈“传文”，斥袁横征暴敛、出卖主权、复辟帝制等罪行，号召乡民“凡有身家者，皆宜操戈直向清丈所”。

4月10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等，认为帝制取消后，袁世凯必倒，“自取消帝制以来……顾我等责任，则由此益形重大，此盖鉴于辛亥之往事，以倒袁为成功者，实与往日以倒满清为成功者，同一比例，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一般官僚复活，即与第二第三袁氏无异……故吾辈须不避艰巨，努力赴之”。

△　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成立，石青阳为司令。次日，以石青阳名义誓告国人称："自今伊始，本军当贯彻唯一之主义：一、推翻专制政府；二、恢复完全民国；三、启发人民生业；四、巩固国家主权，以期大憝元凶殄而后已。扶持国体，生死同之。"

△　袁世凯特任张勋兼署督理安徽军务，倪嗣冲为长江巡阅副使。

△　《护国军纪事》在上海创刊，曾毅主编。同年12月停刊，共出五期。

△　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电令关东都督府次长西川虎次郎，声称此时应向张作霖"表示日本之真意，使他独立"，并将"尽力供给兵器、资金等"。

4月11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政府递交照会，要求对袁世凯"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将切实加强"两国亲善提携"。日政府表示拒绝。

△　华侨联合会致电袁世凯，谓侨众皆不认袁"仍为代表国家之元首，请速退职，以免辱国殃民"。

4月12日　　浙江宣布独立。先是驻省城旅长童保暄等谋求独立不成，遂于是晨率部围攻军署，将军朱瑞逃走。各界公推原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屈不就，允仍以巡按使名义兼总司令。旋屈密通袁世凯事发，被迫辞职。

△　是晚，陈其美在沪约陆军发动起义未果。次日约海军先发动，又未成。

△　广东各界在广州海珠召开善后会议，筹商反袁军与龙济光合作等事宜。旋因意见分歧，发生冲突，梁启超代表汤觉顿和陆军少将谭学夔当场被龙部警卫军统领颜启汉击毙。警察厅长王广龄及护国军

中路司令吕仲铭亦受伤未及救治而亡。是为“海珠之变”。

△ 四川陆军第二旅旅长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

△ 参政院参政杨度、孙毓筠、张镇芳呈准辞职。

△ 孙洪伊致函冯国璋，请其从速宣布独立。谓“若再迟疑，望之切者或将为苛责之论”。

4月13日 蔡锷等致电北京政府，谓袁世凯“违反约法，自召兵戎”，虽除帝号，“复据总统”，战事无法调停，应速行宣告退位。

△ 浙江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等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与护国军取一致行动。

△ 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歧宣布独立，旋派兵两营开进杭州，逼屈映光交出政权。屈被迫宣布正名为都督。

△ 袁世凯令任命驻德特命全权公使颜惠庆兼驻瑞典特命全权公使。

△ 旅沪豫省同乡1284人电促袁世凯退位，称“倘仍顽抗执迷不悟”，国人“自有最后手段”。

△ 护国桂军和护国黔军游击队占领湘南新宁县。

4月14日 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伪示独立，是日袁世凯特发布命令，称屈“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

△ 蔡锷致电四川将军陈宦，促其从速宣布独立，并派代表陈光勋赴成都与陈商谈。

△ 袁世凯特任黄国瑄署理四川巡按使。

△　唐继尧致书张继，请从速筹备召集国会，谓“需用旅费津贴及一切会中用耗，滇自当妥拟办法接济”。

4月15日　海军总长刘冠雄率“海容”、“新裕”等舰轮由塘沽启航运兵赴闽。22日至温州海面，舰轮相撞，官兵700余人死亡，余部在福建登陆。

△　黄兴自纽约致电唐绍仪、伍廷芳、张謇、梁启超等，重申反袁到底，称：“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

△　胡汉民自日本返沪，助陈其美策划讨袁。

△　吉林省设宝清县（现属黑龙江省）。

4月16日　江苏中华革命党人攻袭江阴，逐走守备军旅长方更生，宣布独立，公推尤民为护国军总司令。旋被驻军冯国璋部击退，尤民被捕遇害。

△　冯国璋电劝袁世凯“尊重名义，推让治权”。

4月17日　冯国璋、齐耀琳通电各省，提出调停时局大纲八条，其要旨为：一、袁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二、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四、仍用民国元年约法；五、各省将军巡按使仍旧；六、大赦党人。

△　冯国璋、齐耀琳电恳袁世凯仍任大总统，“勿因报纸之谰言，遽乖初志”。

△　袁世凯令准汪大燮辞去参政院副院长及参政本兼职务。

△　安徽中华革命党人联络大通陆路警察，占领榷运局，旋被驻军击退。

4月18日　滇、黔、桂、粤四省都督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

龙济光等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表第一、二号宣言，谓袁世凯“犯谋叛大罪”，现据民国元年《临时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资格，并领海陆军大元帅职。

△　陈宦致电黎元洪等，表示由于滇、黔两省拒绝承认袁世凯仍为总统的议和条件，他“实难独膺”调停之任。

△　钮永建派江苏护国军第一队队长何嘉禄等由沪往吴江发动水巡队起义，是日占吴江县署，宣布独立。22日，被冯国璋派兵击败。23日，水巡队长殷培六等被捕。

△　党人伏龙等由沪往南通发动起事，乘轮抵南通港时被捕，次晨被害。

4月19日　龙济光抵广东肇庆（今高要），同陆荣廷等协商军政事宜，并议定成立两广都统府、以岑春煊为都统、暂留龙济光都督地位、处死蔡乃煌、从速北伐等五项妥协案。

△　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上海绕道香港，转抵肇庆。

4月20日　伍廷芳致书袁世凯，劝其退职。

△　向瑞琨擅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名义通电全国商会征求意见，挽留袁氏，请勿退位。23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发表声明书，通函各报否认，要求“查究更正”。

△　宗社党善耆等人，在日人支持下，募集“勤王军”千余人，以日军人和浪人为骨干，在旅顺营城子练兵，伺机骚乱。

4月21日　袁世凯申令宣布恢复内阁制，依约法制定政府组织令，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各部总长皆为国务员，同负责任。同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凡七条。

△　唐继尧致函梁启超，筹商倒袁善后事宜和军务院设置等问题。

△　唐继尧致电各国公使，声明“誓不承认”袁世凯与美国所订借款新约。

△　袁世凯任命萨福楙为中国银行总裁，原任李士伟开缺另候任用；同日特派周自齐督办中国银行事宜。

△　江西庐山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奉准改组为中国第一林垦股份有限公司，兼营农业。

4月22日　袁世凯准徐世昌辞国务卿，特任段祺瑞继任，组织内阁。次日任命段祺瑞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段祺瑞新内阁宣告成立。

△　袁世凯特任倪嗣冲署理安徽巡按使，张作霖为盛武将军；次日又令张作霖暂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

△　袁世凯特任钱能训为平政院院长。

△　孙中山电告美国三藩市《少年中国报》，决意27日离日归国，东京本部及横滨交通部由谢持、谢心准分别主持。

4月23日　袁世凯特任庄蕴宽为审计院院长。

4月24日　孙中山决意回国主持讨袁，是日致电檀香山吴铁城，嘱转告黄兴“直乘原船到沪相会”。

△　江西革命党人占领玉山、广丰，宣告独立。27日进据上饶。旋被驻军击退。

△ 党人在江苏金山县策动军警起事，占领县署，宣告独立，旋即失败，士兵洪杏生、王更生等人被捕，29日被杀害。

△ 龙济光因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效忠袁世凯，反对广东独立，策划海珠事件，引起各界不满，被迫于是日将蔡枪毙。

4月25日 冯国璋通电未独立各省，主张“各省联络，结成团体，各保疆土，共维公安，扩充实力，责任同肩”，以便对于独立四省和袁世凯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审度国情，妥定方针，“融洽双方”；“四省若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

△ 袁世凯任命冯德麟帮办奉天军务。

△ 袁世凯任命财政总长孙宝琦兼盐务署督办。

4月26日 冯国璋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劝袁退位，称：“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外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若察时度理，见为无术挽回，无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

△ 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在永州（今零陵县）宣告独立，自任“湘南护国军总司令”。

△ 党人由沪赴太仓策动军队揭旗独立，旋即失败，七人被捕。

△ 袁世凯任命王揖唐督办京都市政事宜。

4月27日 唐继尧闻知冯国璋提出八项调停办法，是日复电声明袁必须退位，称：“项城一去，诸事立即解决，否则绝无解决之望。”

△ 龙济光率段尔源、郑开文、李嘉品等人与陆荣廷联名电奉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

△ 孙中山由日本启程返沪，廖仲恺、戴季陶同行。

△　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在上海病卒。

△　沪招商局因运送北军被人掷弹炸毁门窗墙壁，炸伤三人。

4月28日　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主张成立军务院，设于广东，由唐继尧、岑春煊分别担任抚军长、副长。

△　奉天桓仁县知事王济辉联合革命党人邵兆中等，率众起事，宣告独立，并组成“辽东护国军”，以邵兆中为总司令，发表讨袁檄文，号召东三省军人义士共同举义，讨平叛逆，保卫共和民国。5月1日攻占蒲石河，旋进至长甸与防营交战失败，退入安东（今东沟）日租界地，被日警解除武装。

△　在许兰洲策动下，黑龙江省宣布独立，举许为督军，朱庆澜被迫辞职。

△　冯国璋致电独立各省，要求“共念时艰，早作罢兵之计”。

△　冯国璋致电肇庆梁启超，“望命驾回沪，俾得就近商酌一切”。

4月29日　山东将军靳云鹏电劝袁世凯“辞职让贤”。

4月30日　萧德明于四川大竹宣布独立，自称中华护国军四川东路总司令。

是月　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农民掀起反抗“清丈地亩”运动。海龙县乡民3000余人，持械包围县署，清丈被迫中止。东丰县乡民聚众数千人，散发传单，揭露官吏“借端苛敛”，呼吁各乡坚持斗争，不达目的不止。绥中县斗争尤烈，抗丈群众千余人，夺取保卫团枪械，围攻县城。阿城、盖平、岫岩、兴京（今新宾）等县农民，也展开规模较大的抗丈斗争。5月，“反抗清丈风潮，无县无之”。三省当局被迫中止清丈。

5月

5月1日　　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

△　冯国璋就4月17日所拟“调停大纲八条”，重加参酌，提出解决时局修改办法八条，通电各省，反对黎元洪继任总统，主张以袁世凯为过渡总统。

△　袁世凯特任郭宗熙署理吉林巡按使。

△　中华革命党浙江司令长官夏尔屿由陈其美派赴杭州起事，是晨在杭城站旅馆被屈映光逮捕，当日在梅花碑被杀害。

△　四川广安、岳池独立。

△　北京政府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借款10万日元，用作留日学生学费。

△　汤芗铭应日本等国领事“特请”，自是日起，相继在湖南湘潭、益阳、安化、宝庆（今邵阳）、常德、岳阳、平江、澧县、衡阳、桂阳、沅陵、辰溪、会同、新化等县成立“华洋诉讼处”。

5月2日　　唐绍仪等以22省旅沪公民名义发表宣言，反对冯国璋所提八条解决时局办法，指斥冯电“庇护帝制罪魁祸首，嫁祸革命党人”。

△　袁世凯特任范守佑署理湖北巡按使，原任段书云免职。

5月3日　　岑春煊、梁启超致电黎元洪及南方独立各省，称舍袁退位外，更无弭兵之望，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大局即可迎刃而解。

△　袁世凯特任毕桂芳署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未到任前由

许兰洲暂行护理。

△　袁世凯令许兰洲帮办黑龙江军务。

△　四川将军陈宦电劝袁世凯退位，并称“应如何优待条件，宦与各省疆吏，亦必力争以报”。

△　湖南中华革命党人刘重等占领湘乡，宣布独立，7日进据新化，旋因安武军进攻，于9日退据衡山。

△　湖南保靖（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驱逐县知事，响应反袁护国。

5月4日　　居正所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及夏重民等人率领的加拿大、美国等地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进攻山东潍县，同北军第五师张树元部展开激战。

△　是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吴大洲、薄子明部攻占周村，宣布独立，另立旗号，改称山东护国军，吴自任山东护国军都督。

△　梁启超致电国务卿段祺瑞，要求迫袁世凯退位，称“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并称“能自退，则身名俱泰，最上也”。

△　梁启超自肇庆抵香港，拟往上海。经驻港日领事劝阻和撮合，次日赴广州与龙济光会商广东善后等事。

△　袁世凯特任蓝天蔚为达威将军，蒋作宾为翊威将军。

5月5日　　冯国璋抵蚌埠密晤倪嗣冲。次日冯、倪同赴徐州，与张勋策划召开南京会议。旋由三人联名电请袁世凯和未独立各省派代表赴宁，“开会协议，共图进止”。

△　熊克武旧部龙少伯联络川军于四川隆昌独立。

△　护国桂军进入湖南宝庆。次日占据武冈。

△　上海中华革命党人在吴淞口图袭“策电”舰，未成，姜永清等20余人先后被捕。

△　河北易县山北社千余人起义，抗阻清丈地亩，反对苛捐杂税，进攻县署、经界局。冀中十几县奋起响应，其中固安县斗争坚持到9月，卒以兵力不敌，被军警击散。

5月6日　陆荣廷电告岑春煊，准于7日由南宁督师出发，进攻湖南。陆于是月上旬率广西护国军攻入湖南，在衡州（今衡阳）、宝庆一线同北军周文炳师激战。6月初，周师以湖南独立，自行撤离。7月10日，陆由衡州班师回桂。湘南讨袁战事遂告结束。

△　湖南新化锡矿山工人罢工，并夺取新华昌公司矿警连枪支，宣布工厂独立，悬挂护国军旗帜。旋因力量不敌，被驻军击败，大部工人投党人刘重所部。

△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部自广西百色出发到达南宁。12日抵广东肇庆。

△　袁世凯令准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辞职，以李厚基兼署福建巡按使。

△　袁世凯任命王式通为国务院秘书长。

△　年初，梁士诒、叶恭绰依法使康悌建议，指派梁汝成、李兼善等与法国军部代表左治·陶履德上校订立在华招工合同，筹办惠民公司。是日，梁汝成等就此事呈报外交部立案，并将招工事宜悉归该公司专办。

5月7日　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与四川将军陈宦达成协议，继续停战一月，自是日起至6月6日止，两方饬令所部，非奉命令不得前

进。

△ 滇、黔、桂、粤四省都督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公布《军务院组织条例》，并宣布：为统一对袁军事和策划建国方策，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统筹全国军事，施行战时及善后一切政务，俟国务院成立，军务院即当撤废。

△ 蔡锷致电唐继尧等反对设置军务院，称“桂、粤议组政府，推举首长，实与现势不协”。同日又发一电，表示：“现接任公所草各宣言书及军务院条例全文，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亦尚说得过去。”

△ 驻沪国会议员256人致电滇、黔、粤、浙，反对停战，敦促“大举进攻，扫除凶逆”。

△ 袁世凯令准熊希龄开去参政。

5月8日 滇、黔、桂、粤四省在肇庆成立护国军军政府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摄行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吕公望、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

△ 护国军军政府宣布依法拥戴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 袁世凯令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为国务总汇之所。

5月9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主张“尊重约法”，一致讨袁。指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 黄兴由美国抵日本横滨，电促袁世凯悔罪引退。

△　护国军军务院通告各国公使，以后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

△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宣布陕西独立，自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16日率部进据西安。18日就任陕西都督，迫陆建章离省。

5月10日　程潜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　袁世凯裁撤采金局。该局事务，改归农商部办理。

△　湖南革命党人占领乾城（今乾州镇），宣布独立，以张学济为湘西护国军总司令。

△　中华革命军山东东北军第三支队司令吕子人克高密。

5月11日　军务院发布第一、二号布告，称“力求于国法不抵触之范围内，暂设此机关，以应事实上要求”。“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拥护国法而已”，号召各省国会议员迅速筹备恢复国会。

△　孙中山电促滇黔桂浙粤五省都督及各军司令一致讨袁。

△　抚顺东乡煤矿工人500余名，罢工三日，要求释放无故被扣押工人。

△　殖边银行上海分行发生挤兑，16日宣告停止营业。

5月12日　梁启超于肇庆致电冯国璋，坚持袁世凯退位、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主张，称“若退位继任两问题相持不决，则恐和平克服，永无其期”。

△　黄兴通电全国，号召各界一致讨袁。谓“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本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务希“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共趋正轨”。

△　陈宦再电袁世凯，促请即日退位。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布退位。

△　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钟体道于四川南充宣布独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并劝陈宦即日宣布独立。

△　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暂停兑现；并令各省“派军警监视”。

△　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召集全体股东集议保全上海中国银行，规定“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

△　北京政府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华宁公司库券合同，借款日金100万元。以该公司所采江宁凤凰山铁矿作担保。后改以国库券作担保。

5月14日　上海中国银行拒绝执行国务院停兑付现命令，宣布继续兑现。

△　天津惠民公司与法国军部代表签订招募华工20万赴欧参战合同，并于是日起至次年8月止，相继在天津、香港、浦口、青岛附设招工机构。此后，俄、英两国亦援例分别在哈尔滨、威海卫等地招送华工。

5月15日　南京会议因代表未齐延期举行，同日，袁世凯电饬冯国璋等，谓“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办法”。

△　唐绍仪等13971人联名致书冯国璋，驳斥其通电所提八项调停办法，认为“解决时局，于今日惟有袁氏引退，黎副总统依法继承”。17日又发宣言，揭其“直欲推翻宪法上继任总统，仍留袁氏以为傀儡，藉便私图”，必须以武力“扫除国家之障害”。

△　黄兴致电在沪国会议员，望速驱袁，“根据约法，解决一

切”。同日电告唐继尧等，表示愿为反袁斗争“补助进行一切”。

△　第五师师长张树元被迫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签订退出潍县议和条件15款。

△　居正所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与山东护国军吴大洲所部，于是日、25日和6月4日袭击济南，卒以兵力不支，均被防军击退。

△　上海汇丰、麦加利等外国银行决定筹银200万元贷与中国银行，以为兑换钞票支付存款之准备。

△　《民彝杂志》在东京创刊。8月12日第二号在上海发行。

5月16日　上海总商会分电国务院、外交、财政、交通、农商各部及中、交两行管理处，告以已先将交通（银行）钞票定期兑付，请速会商公使团转恳上海麦加利等添借70万元，以救危局。

5月17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辞职未准，袁世凯令暂给假一月；特任曹汝霖兼署外交总长。

△　梁启超离肇庆，20日到上海。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与美商裕中公司签订建造铁路合同，议定湖南衡州至广西南宁、山西丰镇至甘肃宁夏（即银川市）、甘肃宁夏至兰州、广东琼州至乐会、浙江杭州至温州各铁路，由裕中公司承造。经费由裕中公司借垫，并由该公司发行股票，总数不得逾美金1000万元。合同签订后，承造铁路起止地点，限于湖南株洲至广东钦州。

5月18日　南京会议正式开会。与会15省代表，多数赞成袁世凯退位，冯国璋以事关重大，未可冒昧表决，宣告散会。

△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寓所，被袁世凯

派人刺杀。

△　湖南湘西镇守使田应韶在凤凰县宣布独立，自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

△　章太炎欲以赴津治病为名逃离北京未果，被袁之暗探拥至巡警总厅。

5月19日　南京会议举行第二次会，倪嗣冲自蚌埠率三营卫队参加，倪在会上首先发言，主张不宜变更元首，在倪威胁下，多数代表转变态度，竟赞成袁暂不退位，会议未达成协议。

△　黄兴致函居正，询山东战况，并告陈其美在沪被刺，望暂抑哀情，仗义杀贼，以慰诸先烈之灵。又谓："中山先生此次宣言，闻国人甚为欢迎。弟意惟赴沪太早，今英士遭难，于进行不无妨碍。"

△　湘南镇守使汪学谦在衡阳宣布独立。

5月20日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电令刘云峰率何海清支队应陈宦之请赴叙州，以便策应陈宣告独立。

△　南京会议举行第三次会，冯国璋提出"袁总统本应退位，惟宜向国会辞职，本会碍难建议"。旋以此意拟稿通电各省，讨论电稿时，又有反对意见，冯决意取消由国会解决之说，代以分电独立各省，遣派代表前来开会，共商善后之解决，各代表皆表示赞成。

△　袁世凯特任周自齐署理财政总长。

5月21日　蔡锷致电罗佩金、陈宦，告以雷、刘两梯团归陈宦指挥调遣，以助其独立。

△　上海总商会分电北京国务院、江苏将军冯国璋，请敦促袁退位。

5月22日　陈宦被迫宣布四川独立，改任都督，通电宣称：“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至于地方秩序，宦有守土之责，谨当为国家尽力维持，俟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并即解兵柄以归田。”

5月23日　居正所部占领潍县，张树元率部退走。至此，山东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已分别攻占邹平、临淄、淄川、即墨、高密、安丘、莒县、诸城、平度、日照、昌乐等10余县。

△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致电田桐、居正、朱执信，要求“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并一律沿用五色旗，与云贵讨袁军一致。

△　孙中山致电两广都司令岑春煊，请约束龙济光部勿复与广东革命军生衅，“庶几同心戮力，共伸天讨”。

5月24日　袁世凯令陈宦开缺，迅即进京“筹商善后”。特任重庆镇守使周骏为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帮办四川防务。

△　袁世凯特任刘体乾署理四川巡按使兼理财政厅事务。原任署四川巡按使黄国瑄、财政厅长马汝骥开缺，入京另候任用。

△　袁世凯令内务、财政两部：暂停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项事宜；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也一律从缓办理。

5月25日　蔡锷致电陆荣廷等，推梁启超为独立各省总代表，“借联声气而资统筹”。

△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发表宣言，称：“本军以袁世凯背誓叛国，违法殃民，认为国民公敌，特与西南各省护国军互相呼应，一致讨贼。”“本军尊重民国元年约法……遵用五色国旗。”

△　福建中华革命党人吴适等攻占连江，宣布独立。旋因兵力不敌，被驻军击败。

△　袁世凯亲信阮忠枢函告张勋，谓：南京会议必无良好结果，即商请倪嗣冲“迅约各省代表，汇集徐州，结成团体，预备各种抵制宁垣之法”。“结成团体，即可联盟签约，推其中一二人为盟长副盟长”，“专以挽留”袁世凯“勿遽退位为惟一之根本主旨”。

△　张勋不满南京会议，通电称袁世凯“万无退位之理”，如和不成，必出以战，“勋虽不敏，愿任其难”。

5月27日　张作霖自奉天车站迎接日本关东都督中村归途中，遭日陆军预备少尉三村丰持炸弹袭击，死伤警兵10余人，张幸免。

△　中华革命党山东东北军第二支队李长乐入诸城，驻日照与莒县之袁军沂州防营及安邱袁军一营来攻，均被击退。

5月28日　军务院致电江苏将军冯国璋，拒绝调停，谓“非项城退职去国，时局断无从解决”。

△　巴布扎布在喀尔喀河阿木古郎吐祭告天地，聚众发誓讨袁，自称拥戴“大清”，改元“宣统”。

5月29日　袁世凯特颁告令，宣布所谓帝制案始末。

△　湖南将军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改称都督。

5月30日　山东将军靳云鹏自济南走避天津，袁世凯特任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署督理山东军务。

△　梁启超自沪电肇庆岑春煊等，请辞抚军、都参谋、政务委员长各职。

△　冯国璋召集第四次南京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称对张勋

主战，“不敢赞同”，“南省又未一致复电”，建议将会议暂时解散。各省代表多不赞成解散。未几，张勋复电赞成解散，而南方独立各省则拒绝与会，冯遂宣告解散南京会议。同时致电北京，陈述三项办法：“第一，或宣告退位，尚可继续开议；第二，或另订办法，以求转机；第三，如仍无相当手续，国璋能力只可维持江苏秩序，不至紊乱，其他未能兼顾。”

△　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冀寿伯，总行设北京，资本定额300万元。

5月31日　长春“义成公司”代表周冕与俄采办处代表达聂尔签订招募华工二万名赴俄合同。

5月下旬　滇桂粤护国联合军组成，直隶军务院，共九个军，由岑春煊直接指挥。

是月　廖仲恺奉孙中山派到青岛，慰问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6月

6月1日　岑春煊率两广军事将领致电独立各省，提出解决时局四原则：一、袁世凯不退位，绝无调停可言；二、袁氏退位，恭承继任黎大总统正式就职；三、在此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进行；四、拥护约法，保障国会。

△　袁世凯下令宣布中国、交通两银行所发行之纸币，“与现金无异，政府负完全责任”，务当依旧行使，用便流通。

△　奉天革命党人杨子元等率众400余人，在西安县小孤山起事，杨自称“东三省护国军北路司令”，发表讨袁檄文。后遭驻军镇压而失败。

△　湖南武冈农民暴动，破县城，释囚犯，获胜而归。

△　江苏吴县各机户因减少工价，举行罢工。

6月3日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奉令自肇庆率师北伐，是日发布出师布告称："奉军务院命，誓师援赣"，"只知有法，罔识其他。有蔑法者，视与贼等。"

△　军务院通告，戴戡、罗佩金所部军队在二师以上，"自应遵依条例为军务院抚军"。

△　袁世凯令加督理山东军务张怀芝陆军上将衔。

6月5日　　岑春煊致电独立各省，告以滇桂粤护国联合军成立，由滇军（第二军）、桂军（新编第三军）、肇军（新编第四军）、谭（浩明）军、林（虎）军、济军（第一军）、潮军（莫擎宇师）、程（子楷）军、张（习）军编成，直属军务院，由岑直接指挥，按期分道次第出师北伐。同日，发布《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北伐布告》。

△　滇桂军入赣先锋部队张开儒、申葆藩、江永隆各率所部由肇庆出发。

6月6日　袁世凯在北京病逝。

△　段祺瑞公布袁世凯"遗令"，宣布依新约法（即民国三年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　北京政府特任章宗祥兼署农商总长。

△　晨，日英法俄意比等六国驻京公使以袁世凯病危，齐集日本使馆谋划对策，决定袁死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午后1时，六国公使往见段祺瑞，告以上述决定，并要段留任总理，迅发正式通告。

△　日政府以袁死黎任大总统，急电日置益公使速见黎元洪，要

求“采取日中亲善政策”，并与南方妥协，消除动乱祸根，恢复国内和平，则日本将给予“直接或间接之援助”。同日，日外务大臣电饬驻上海、南京、广东、云南等地领事，迅将以上内容通知张继、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等，务请“支持黎元洪，努力收拾时局”。11日又电令日置益会见段祺瑞，转达上述对华方针。

6月7日　　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其就职令称“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同日颁布命令：“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仍旧供职。”

△　梁启超由上海致电独立各省，谓“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宜竭力援助段祺瑞，“毋令势孤”，“致生恶感”，即对袁世凯亦“不妨表相当之哀悼”。同日，梁并致电段祺瑞称：“扶危定倾，惟公之责。愿当机立断，宏济艰难。”

△　黄兴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主张从根本上扫除袁世凯余孽，称：“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

△　陕西都督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服从中央。

△　章太炎作书请见黎元洪，并求解禁。8日章被释。25日由京赴津转轮南下，30日抵沪。

6月8日　　军务院抚军副长、摄行抚军长岑春煊致电独立各省，称“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国法程序之所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若依据后起不正之法改为摄权，不仅于义军信誓有背，而大局或因此别生纷扰”，此为“生死存亡之点，急待磋商”。11日，汤芗铭复电同意电呈黎元洪，请颁令废止袁擅改之约法。

△　唐绍仪电请黎元洪遵照《临时约法》，“迅速召集国会，以决国是”；国会未开前，国务总理暂由段祺瑞代理。

△　陈宦宣布四川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

△　梁启超致电黎元洪，请以明令规复旧约法，克期召集国会，委任段祺瑞组织新阁，惩办帝制祸首。

△　梁启超电告蔡锷，主张蔡及戴戡、陆荣廷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直接会晤，以“解决时局”。

△　天津各界代表严修等电请黎元洪取消中交两行停止兑现阁令。

6月9日　　黎元洪致电汤化龙转商旅沪国会议员，推举数人来京会商善后事宜。

△　孙中山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略谓：“文志在共和，始终不贰。曩以袁氏叛乱，故誓为民国剪灭巨凶，今兹障碍既除，我国人当能同德一心，共趋政治之正轨，文亦将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献替之刍荛。”又谓：今求治无他，一言以蔽之曰，“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惟一无二之方。”同日并电请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

△　孙中山以“袁死，内外情势大变”，电令山东居正“按兵勿动”，候商黎元洪解决。10日、13日和26日，复分电广东、福建、四川朱执信等人照上述电令办理。

△　黄兴致电黎元洪，主张以明令规复临时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帝制祸首”。

△　张勋邀集出席南京会议部分代表在徐州开会，并提出解决时局“要纲”十条，主要内容为：“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保全袁世凯“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催促独立七省“取消独立”，否则“仍以武力解决”；“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经议决后，即日通电发表，会议结束。

△　蔡锷以滇黔护国军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各省蠲除成见，拥护中央，于最短期内解决善后诸事。

△　黎元洪任命田中玉署理察哈尔都统。

△　黎元洪令暂行委任吉林、黑龙江、安徽、湖北、福建、四川各省巡按使均监督各该省司法行政事务。

△　龙济光宣布广东“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

△　黎元洪接见外国顾问莫理循、有贺长雄、韦罗贝、精奇等人，莫理循表示希望外国顾问的才能能够得到发挥。

△　张作霖向日本朝鲜银行奉天支店借款日金100万元。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资产及商埠地产等作担保。

6月10日　黎元洪下令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所有原办事宜，分归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办理。

△　黎元洪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

△　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电请黎元洪恢复民元《临时约法》，速开国会，补选副总统，组织正式国务院，撤退各路北军，召集特别军事会议，解决善后军事问题，并重申俟正式国务院成立，军务院即行撤销。

△　旅沪国会议员致电黎元洪请明令恢复《临时约法》及民国二年大总统选举法，废除袁世凯“自造新制”。

△　护国军驻沪军事代表钮永建致电独立各省，称“黎大总统虽依法就任，帝制祸首依然盘踞军政财政”，“此间公议办法：一、回复旧约法；二、召集参、众两院；三、依法组织内阁；四、惩治帝制祸首”，请电军务院与北京“协议”。

6月11日　黎元洪电复孙中山9日电，表示请“左提右挈，共济艰难”。

△　梁启超电滇、黔、桂、粤、浙五省，建议由五省提出六项善后办法：一、复旧约法；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四、南省北军撤还；五、废将军巡按官制，一律改称都督；六、双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开善后会议直接晤商。

△　梁启超致电蔡锷，请勿轻许入阁，以督蜀为宜。

△　旅沪浙省议员电请黎元洪“严除伪制，规复临时约法”。

6月12日　陆荣廷电独立各省，指出段祺瑞6日通告援引经袁世凯修改之伪约法，倡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显系包藏祸心”，宜由岑春煊“主稿领衔辟其谬妄”。

△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电责山东将军张怀芝违令“进袭临朐，复窥安邱”，要求“退驻原防，毋启战端”。

6月13日　岑春煊、陆荣廷、汤芗铭、陈炳焜致电黎元洪重申四事，力请施行：一、黎大总统为继任，非代行职权；二、护国军拥护《临时约法》，非民国三年约法；三、恢复国会；四、组织新内阁，交由国会同意。

△　孙中山致电黄兴，征询解决时局意见，谓黎元洪如能恢复临时约法，召开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次日黄兴电复赞同，并望主持一切。

△　黎元洪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6月14日　蔡锷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召集国会，改组正式内阁；召开军事会议，惩办帝制余孽。同日致电张敬尧，称“独立各省亟应宣布取消独立”。

△　孙中山答上海《民意报》记者徐朗西问，称：“袁党依然盘据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斯时之民军，正未能从此息肩而即云国是已大定也。”

6月15日　冯国璋、齐耀琳电请黎元洪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速定宪法。

△　部分旅沪国会议员致电黎元洪，请明白宣告废除袁世凯“自造新制”，遵守《临时约法》，“否则从前讨逆战争将一变而为约法战争”。

△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电请黎元洪严电约束张怀芝部，称张“违命作乱，掠我临朐，继陷安邱，屠戮二百余人”。

△　留日中国学生“学术研究会”所办《民铎》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

6月16日　黎元洪下令停战，所有派出军队“克期撤退”。

△　黄兴致电旅沪国会议员，称：“北京召集各省代表议约法，意在破坏旧约法及国会，请沪同人择定安全地方早开国会，并速电请独立各省不派代表。”

6月17日　黎元洪电请孙中山派代表北上赴京筹商善后。23日，孙中山复电，谓已派萧萱、叶夏声前往会商。

△　梁启超电刘显世，谓恢复《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已成“舆论”，万不可倡议临时议会说；且独立各省不可与中央“太取对抗形式”，目前全权总代表不宜选派，善后会议也无召开必要。

△　程潜等力请蔡锷督湘，是日蔡以“川情复杂，未能即离，本军善后事宜亦须亲为部署，以全始终”，复电辞谢。

△ 居正再电济南张怀芝，请归还临朐、安丘，以维大局。

△ 俄公使库朋斯齐卸任归国。是日，新任公使库达摄夫向黎元洪呈递国书。

6月18日 黎元洪致书孙中山，派郭同来谒，“凡军国大计，统希指陈一切”。

△ 广东北江战事爆发。是日，龙济光密令韶连镇守使朱福全炮击韶州城外李烈钧部，激战两日，李部攻占韶州。

△ 旅沪安徽省议员管鹏等以倪嗣冲杀害党人张友烈等10余人事致电黎元洪，请“迅予解释”，并电肇庆军务院，请“电诘北京政府明白解释”。

6月19日 孙中山再电黎元洪，促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称：“约法停废、国会解散俱系前人越法行为，今日宣言承认遵守，不过以适法之命令，变更不法之命令……愿公无复顾虑”；并对张怀芝违令屠戮临朐、安邱事，请严电惩究。

△ 黎元洪令撤京畿军政执法处。

△ 驻北京各国公使分别觐见黎元洪祝贺就任大总统。

6月20日 张勋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声称：“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 黄兴致电黎元洪，重申恢复旧约法、召开旧国会之必要，谓“凡百建设鸿猷，当以此两事为最急切”，并派代表李书城入京表达此意。

△ 段芝贵、江朝宗在陆军第二、三、六、七、八师将校支持

下，于北京发起组织“军人同德会”，主张《临时约法》恢复后，国会应速定宪法，选举段祺瑞为正式大总统。

△　段芝贵奉准辞去督理奉天军务兼署奉天巡按使等职。

6月21日　黄兴函促段祺瑞恢复民元约法，并命李书城代表赴京联络。7月4日，段复函称：“约法国会，已定明令，大局一定，猜议冰释。”

△　黎元洪特任龙济光兼署广东巡按使；准免税务处督办、参政院参政梁士诒本职。

△　山东将军张怀芝部炮袭诸城，居正再电责张置停战令于不顾。

6月22日　段祺瑞通电各省，托辞政府不宜以命令“变更法律”，拒绝恢复《临时约法》。

△　黎元洪授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为卓威将军，次日策令开去原缺，留京供职。

6月23日　日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秘派西原龟三来中国“调查”政情。是日西原抵北京，旋即与日置益等研讨对华政策，并同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密相往来。7月11日西原离京返日，到达东京后，即向寺内提交“目前对华经济措施纲要”，主张组织财团，“实行对华实业投资”，提供借款，使北京政府得以整理中央及各省财政和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本位货币，以“促进日中货币混合并用”。

△　孙中山致书段祺瑞，劝其规复约法，尊重国会，“不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于纷纠”。

△　段祺瑞致电驻沪国会议员，请讨论约法问题。驻沪议员复电称：“临时约法为民国所由成，议会、总统皆由兹产出，其效力至尊

无上。”“今日以命令废止三年约法，乃使从前违宪之行为归于无效，更无所谓以命令变更法律。”

△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与吴光新等，在国务院召开拥段会议，并要求张勋、倪嗣冲、冯国璋、李纯、王占元、张作霖等予以支持。

△　黎元洪令准署财政总长周自齐辞职，特任陈锦涛为财政总长。

△　黎元洪令毕桂芳着加将军衔督理黑龙江军务，仍兼该省巡按使。

6月24日　黎元洪特任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该省巡按使；任命曹锟会办四川军务。

△　黎元洪电令周骏来京另候任用，所辖军队交王陵基接管。同日，任命王陵基为重庆镇守使。

△　梁启超致电唐继尧、任可澄，称：“时局变幻不居，虽未能确定何种办法，要在四省巩固其团结，蓄力观变。已进之兵宜勿退，未进者亦不可遽猛进，免授人口实。对此不必多所主张，免资人利用。”

6月25日　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加入护国军，宣称：“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

△　陈宦离川赴京，所部退出成都。27日，周骏率部进据，自任都督。

△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联电驳斥段祺瑞22日电民三约法不可废除之主张，称：民三约法“绝对不能认为法律，而此次宣言规复绝对不能认为变更”；并称国务院为“元年约法之机关，三年约法所

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

△　梁启超致电刘显世等，以军院行将解散，嘱严拒李鼎新加入抚军。

6月26日　孙中山以龙济光“在粤三年，无恶不作”，电请黎元洪明令罢斥。

6月27日　梁启超致电陆荣廷、陈炳焜速撤军务院，称“其时机当在约法既复、国务总理既任命之时，请联各抚军一致主张”。

△　蔡锷致电独立各省，赞同推举梁启超、唐绍仪为护国军全权代表，尽速解决“善后一切”，“临时内阁与军务院对立，本非所宜”。

△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致电张怀芝，诘责所部劫掠昌乐，请“严行查办”。

6月28日　旅沪国会议员代表张继、王正廷、谷钟秀等六人北上与黎元洪等就商善后。

△　梁启超通电独立各省，称“军务院宜亟图撤废”。

△　黎元洪任命徐恩元兼署中国银行总裁，原任萨福楙免职。

6月29日　黎元洪申令遵行《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速定宪法；裁撤参政院及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撤销有关立法院、国民会议各项法令；民国三年5月1日以后所有各项条约继续有效，其余法令除有明令废止外，一切仍旧。

△　黎元洪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6月30日　黎元洪令准各部总长辞职，特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

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唐绍仪未到任以前由陈锦涛兼署理，张耀曾未到任以前由张国淦兼署。

△　黎元洪令准驻日公使陆宗舆辞职，以章宗祥继任。

△　岑春煊宣布接受海军司令李鼎新为军务院抚军。

△　厚生纱厂在沪建成，穆藕初、薛宝润创办，资本120万两，纱锭1.6万枚。

是月　黄兴向日本三井洋行订借日金10万元，作为讨袁军费。

△　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通车，长224公里。该段铁路自1906年动工，工程时兴时停，至是始完工。

△　李樵石、铃木敬亲等在天津创立中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100万元。

7月

7月1日　梁启超致电唐继尧、岑春煊等称："我辈要求已达，军院宜立即宣言撤废"。2日，浙省都督吕公望通电响应，主张"请即由唐抚军长用军务院全体抚军署名，宣告撤销军务院"。

△　内务部通告，兹依《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8月1日起继续开会。特通告各议员自7月10日起报到，并催促在籍及旅居各省区之议员，迅速来京。

△　萨镇冰抵沪，奉北京政府命劝李鼎新取消独立。3日李谓萨曰："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次第实行，本可消释，惟既加入护国军，当与军务院一致行动，似难单独取消。"

△　黎元洪申令死刑非经司法部复准回报，不得执行。所有关于执行死刑之咨转呈请批准等程序，均应废除。

△　黎元洪电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6日，梁电辞不受。

△　库伦举行册封典礼，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箓代表大总统将印册授与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读册文。哲布尊丹巴率官员领受。

△　巴布扎布匪部3000余人，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黑龙会策动下发动叛乱，是日由日本骑兵大尉青柳胜敏指挥，自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喀尔喀河（即哈拉哈河）畔出发，向洮南窜扰。24日陷奉天突泉，26日为洮南镇守使吴俊陞所部击败，向郭家店（今属吉林梨树县）逃窜。

7月2日　　唐继尧致电独立各省，主张召开军事会议，解决军队编配及饷项问题。

△　钮永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称："上海北军林立，为人浮动之原，商务进行大为障碍"，请"迅饬撤回杨、卢两师，以靖地方，而顺民意"。

7月3日　　日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圣彼得堡签订第三次"协定"和第四次"密约"。两国相互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如遇第三国危及两国任何一方在中国之"重要利益"时，双方得协力阻止，以至共同采取军事行动。

△　李烈钧所部滇军攻占广东源潭，桂军攻占三水，龙济光所部振武军退守广州。21日，桂军进占佛山，两军在广州附近激战。

△　章太炎致电岑春煊，称："近闻道路传言，有取消军务院计划，斯事若行，则民气挫折，而奸回得志，元首等于赘旒，国会受其

蹂藉。”

7月4日　　居正、吴大洲各派代表至济南与山东将军张怀芝会议停战条件。8月5日，居、吴至济南与张怀芝代表商定：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山东讨袁战事至此结束。

△　晚，湖南都督汤芗铭在护国军逼迫下逃离长沙，转至岳州。当经省议会决定由湖南第一军总司令曾继梧代理都督。6日，程潜率军进入长沙，7日改举地方绅士刘人熙代理都督。16日，黎元洪特任刘人熙代理湖南督军。

△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整编山东部队，总司令居正令将第一本队及第五、六支队合编为东北军第一师；次日又令第三支队改编为东北军第二师。11日任命吕子人为第二师师长。13日，任命朱霁青为第一师师长。

△　黎元洪申令特赦前四川都督尹昌衡。

7月6日　　黎元洪令废止《颁爵条例》、《惩办国贼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和《纠弹法》。

△　黎元洪申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所有职权组织暂仍其旧。

△　黎元洪任命各省督军、省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督军，山东督军张怀芝、署省长孙发绪，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宦，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云南督军唐继

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直隶省长兼督军朱家宝，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

△　黎元洪特派龙济光督办两广矿务，并令在陆荣廷未到粤前，暂署广东督军。

△　黎元洪令授李烈钧勋二位陆军中将并加上将衔。

△　黄兴自日本门司启程回国，是日抵上海。

△　蔡锷电告梁启超，同意提前撤废军务院。

△　军务院派代表高尔登、方声涛进京谒黎元洪，陈述军院拥护政府，希望：一、肃清帝制余孽；二、内阁良莠不齐，应摒去不肖分子。

△　内务部通咨各省区解禁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民意报》、《共和新报》，一律允许自由行销。

7月7日　　唐继尧复电梁启超，重申军务院俟国务院正式成立始得撤销。

△　黎元洪特任周树模为平政院院长，原任钱能训准予免职。

7月8日　黎元洪令废止《文官官秩令》。

△　陆荣廷致电独立各省，同意速撤军务院。

△　黎元洪令兼署湖南省长陈宦未到任前特任陆荣廷兼署。

△　内务部通知各省、区，旧金山《中华民国公报》、《民国杂志》、《少年晨报》，仰光《觉民日报》，日本《民国月报》，香港《观象日报》、《泰东日报》应准予邮寄。上海《五七报》、《公论

报》、《甲寅》杂志、《正谊》杂志、《爱国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中国白话报》、《中华革新报》，广东《兢业日报》，四川《醒群报》，贵州《铎报》，云南《国是报》、《共和滇报》等报刊解禁。

7月10日　　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反对俟国务院成立始撤军务院，称："现危机四伏，似不宜久留此空名，以资口实。"

△　黄兴出席留沪国会议员欢迎大会，并致谢词，强调伸张民权。指出："凡一国民权被制于恶劣官僚者，其国必危弱；民权伸张，官邪扫荡，其国必强盛。"并谓："望诸君本前次奋斗之精神，引国家于轨道……兄弟不敏，愿竭诚尽愚，以随诸公之后。"

7月上旬　黄兴在沪对《民意报》记者徐朗西谈称："北京当局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

7月11日　　黎元洪令裁撤全国经界局，未竟事宜归并内务部办理。

△　陆荣廷、陈炳焜联电唐继尧等，请"领衔联名通电京省，将军务院刻日撤销，使国权统一，恢复和平"。

△　袭击"策电"兵舰在沪被捕之党人20余人，是日获准"取保开释"。

△　黎元洪任命李进才为陆军第十三师师长。

7月12日　黎元洪申令释放政治犯，"所有本年7月12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应即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但触犯刑事罪名者不在此限"。

△　黎元洪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孙洪伊未到任前以许世英兼署。

△　唐继尧电岑春煊、陆荣廷，反对速撤军务院。

△　惠民公司所招首批华工1698人，由天津大沽口乘船出发开赴法国。从是月起至次年12月止，赴法华工25批，共31656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赴欧华工总计约20余万人。

7月13日　黄兴在沪汇中饭店设宴欢送驻沪议员北上复会，孙中山、章太炎、唐绍仪等应邀作陪。孙中山即席演说，重申“共和政体”，“主权在民”，勉励北上议员“无所畏避”。黄兴致词，望议员“仍尊重责任之观念，勿轻背神圣之职守”。

△　梁启超复陈炳焜、陆荣廷电，称：“军院闻滇忽主缓撤，不解何故。中央举措虽多不满人意处，然各方面利用军院名义，行种种罪恶者，实大有人在。望两公更以己意警告莫公（唐继尧）勿代人受过。”

△　黎元洪令准免汪大燮交通总长；特任李厚基暂行兼署福建省长。

△　驻沪法总领事释放《爱国报》总理徐建侯。

7月14日　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李鼎新、罗佩金、刘存厚联名通电全国，谓“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适相符合”，宣布撤销军务院，“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次日，唐继尧等将此事通知北京公使团。

△　黎元洪令惩办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洪宪帝制祸首。

△　李鼎新通电取消海军独立。

△　湘省各界人士程潜、曾继梧、陈复初等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力请黄兴督湘。黄辞不就。

7月15日　驻沪粤籍议员假尚贤堂茶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发表关于实现民权之演说。指出："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故今后国民，当奋振全神于世界，发现一光芒万丈之奇采，俾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　黎元洪任命管金聚为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原任贾德耀准予免职。

△　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向黎元洪呈递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

7月16日　黎元洪特任刘人熙暂行代理湖南督军。

△　黎元洪令准免帮办四川防务张敬尧职。

△　黎元洪申令废止《报纸条例》。

△　陆荣廷、陈炳焜通电全国称："嗣后桂省军政民政，均一体服从中央命令，协心翊赞，共矢忠诚。"

7月17日　孙中山在上海邀请参、众两院在沪议员及各界名流于张园开茶话会，孙在会上演说《地方自治制》，主张学习美国，建立地方自治，谓"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全力于地方自治"，应视为今后"建设方针"。

7月18日　黎元洪电促在上海两院议员速赴北京。

△　黎元洪申令废止《官吏犯罪特别管辖令》、《官吏犯赃治罪

法执行令》、《徒刑改遣条例及施行细则》、《清查地亩诉讼变通办法》、《简任法官预保办法》、《道署暂设上诉机关易笞条例》。

△ 李鼎新致电黎元洪，称海军加入军务院业于14日通电撤销，自应卸责，请即派员接洽。20日，黎复电称："所请派员接洽一节，已交部办理。"

7月19日 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表示引退，称"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并推罗佩金继任。

△ 黎元洪令四川督军兼署省长蔡锷电呈因病暂难赴任，着给假一月，就近调养。

△ 黎元洪特任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陈炳焜兼署广西省长。

7月20日 孙中山在上海金星保险公司等欢送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演说"采用五权（即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权）宪法之必要"。谓："今以外国输入之三权（按：立法、司法、行政），与本国固有之二权（按：监察、考试），一同采用，乃可与世竞争，不致追随人后，庶几民国驾于外国之上也。"

△ 周骏、王陵基部退出成都，刘存厚部入城维持秩序。

7月21日 黎元洪申令嘉许撤销军务院，并称"大局虽宁，殷忧未艾"，"来日之难倍于往昔"，勉内外各官"同心协力，感致祥和，以成未竟之功"。

△ 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在汉口与中华革命党、革命军、护国军三大反袁组织代表议定给资解散办法。

7月22日 黄兴在上海报界欢送国会议员北上茶话会上发表演说，呼吁"舍私见而谋国政"。

7月23日　代理湖南督军刘人熙宣布湖南取消独立。

△　日本青木中将、有吉总领事在沪举行“中国国会议员欢送会”，张继、王正廷、谷钟秀诸议员及孙中山、黄兴等到会。有吉致欢送辞，要求“诸君赴京，切勿忘中日亲善一事”。

7月24日　湖北省长范守佑病故，黎元洪特任王占元兼署。

7月25日　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分部征求改组意见，并称：“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应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　黎元洪特任刘人熙暂兼代湖南省长。

7月26日　黎元洪申令开复留任绥远都统潘矩楹上将衔陆军中将原官，并销去褫职处分。

△　詹大悲自沪西牢被释出狱。

7月27日　黄兴答《民国日报》记者问，指出：“吾国今后教育为立国第一要者……其次则为实业。”

△　安徽报灾，谓自6月21日阴雨兼旬，山洪暴发，沿淮河霍邱、颍上、寿县、凤台、盱眙、怀远、凤阳、五河等县河堤漫溢，田禾庐舍尽被淹没，为四五十年未有之大水。是日黎元洪令财政部拨款救灾。

7月28日　黎元洪以新任平政院长周树模未到任以前，令张一鹏代理平政院长，张于本日就任代理平政院长职。

7月29日　蔡锷自泸州抵达成都接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旋因病委罗佩金暂行代理。8月9日离成都去上海，月末赴日本就医。

△　黎元洪特任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未到任前仍由陈树藩兼署。

△　黎元洪公布《公文程式》，凡六条，计分公文为大总统令、国务院令、各部院令、任命状、委任令、训令、指令、布告、咨、咨呈、呈、公函、批13类。

7月30日　驻法特命全权公使胡惟德致电黎元洪、参众两院及国务院，条陈治理五事：一、永保共和政体，于宪法中确定之。二、速颁民、刑、商法，实行司法独立。三、划分国税、地方税，实行地方自治。四、普通教育经费由国库开支，实行普及强迫之法，又体育应与德育、智育并重，以造成胆略强健之国民。五、力筹经济活动，应付世界潮流，提倡科学，开广富源。

△　日本军舰“嵯峨号”驶抵广州珠江水面，声称：“广东现有战争，特来保护本国侨民”，遭到广州及全国各地人民反对，外交部亦向日使提出抗议。10月10日，日舰撤离广州。

△　荣宗敬、丁梓仁于上海创办福新第四面粉厂，资本12万元。

7月31日　张勋、倪嗣冲、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通电全国，责难李烈钧滇军在广东进攻龙济光振武军，要求北京政府由江西、福建派兵入粤止乱。

△　黎元洪特任毕桂芳为黑龙江督军，张国淦为黑龙江省长。

△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自潍县赴北京商洽善后，总司令职务由许崇智代理，并以蒋介石为参谋长。

△　汉口、汉阳铁路巡警勾结帮会暴徒聚众纵火抢劫。当夜，在汉口华景街、汉阳东门外及鹦鹉洲等处同时纵火、抛掷炸弹，乘乱抢劫，焚去数百家，商民损失颇巨。

是月　农业储蓄银行于山东威海卫成立，资本50万元，于烟

台、上海设分、支行。

△　中日合资鸭绿江制材无限公司在吉林省城设分公司，资本100万日元，其中日资占四分之三，经营管理权悉归日人。

△　邵振青（邵飘萍）于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我国自办通信社之始。

8月

8月1日　　国会复会举行第二次常会（国会于1914年1月10日被袁世凯解散至是日复会）。参、众两院议员到会者368人。黎元洪、段祺瑞及各部总长均出席开幕式。黎元洪于会上宣誓就任总统职。

△　黎元洪特任谷钟秀为农商总长。

△　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应召入京，所部交钟体道节制。

△　奉天财政厅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200万日元借款合同，以该省烟酒契税为担保，名充救济奉省金融，实则用作军政费用。

△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向汇丰、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华比、有利、台湾等银行借款200万元，作兑换准备金。

△　倪德修在哈尔滨开设东兴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肥皂、蜡烛、牙粉等。资本80万卢布。

8月2日　　广东龙济光在滇桂军进攻下，是日电请段祺瑞派兵解围。4日段复电，谓李烈钧等“违令进攻”，“不顾大局”，“除以武力铲除外，别无良法，日前已电令赣闽星急出师，分道进攻，以救全粤”。

△　各省军政长官纷电国务院指斥李烈钧违令扰粤。江苏督军冯

国璋电请迅饬闽赣两省立解粤围；湖北督军王占元电请“申其罪状”，“共除公敌”；陕西督军陈树藩电称李“藐视中央，破坏大局”，请电龙李停止战争，听候处分。

△　陆荣廷通电全国，谓广东振武军炮轰驻韶关李烈钧滇军，激起三省义军公愤，故起战争，非为“扩张势力”。

△　黎元洪令司法总长张耀曾未到任前，该部部务暂由次长江庸代理。

△　黎元洪任命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帮办山东军务。

8月3日　　黎元洪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原任陈宦准予免职。

△　京兆尹公署令大兴等20县于9月15日以前，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培育注音字母师资。

8月4日　　黎元洪以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箓因病呈请辞职，任命陈文运为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俄公使库达摄夫借口简派驻库伦办事大员须先征得俄国同意，反对陈出任，直至1917年4月始改任命乌里雅苏台参赞陈毅出任此职。

△　孙中山再电居正收缩军事。

△　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致电国务院调停粤事，要求中央命令李烈钧停战，龙济光裁编所部，候陆荣廷赴粤交卸。

△　交通部与德华银行签订95万元借款合同，作拨付德华银行短期借款本息用，以京汉铁路余利担保。

8月5日　　四川督军兼署省长蔡锷调整川省军事：北军各师长陆续复员离川；周道刚继周骏任川军第一师师长；护国川军复员，编为

川军第二师，刘存厚仍兼师长；钟体道部恢复川军第三师名义；陈泽霈、卢师谛收编之护国军编为川军第四师；熊克武新收招讨各军编为川军第五师；驻川滇军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改编为驻川滇军第一、第二两军。

8月6日　　黎元洪令废止《觐见条例》及觐见礼；同日颁行谒见礼。

△　岑春煊电请大总统、国务院严饬龙济光约束部队，停止攻击李烈钧部，静候陆督军解决。

8月7日　　俄公使库达摄夫照会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将外蒙古议员取消。外交部以外蒙为中国领土，“选出国会议员，此系当然之权利”，严词拒绝。

△　重庆镇守使王陵基辞职，黎元洪令所辖军队由蔡锷派员接管，遗缺由熊克武继任。

8月8日　黎元洪任命谢远涵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

△　农商部准周厚坤华文打字机专利五年。

8月9日　　黎元洪任命贵州省长戴戡会办四川军务；贵州省长未到任前暂由刘显世兼署。

△　国务院委任陆军中将曲同丰赴山东办理军事善后。

△　财政部与美商花旗银行在京签订《垫款购买银条合同》，每月约购银条150万盎斯至200万盎斯，款由花旗银行垫付，作为天津、广州造币厂向美国熔炼公司购买银条之用，以国库证券为担保。

8月上旬　　张勋致电黎元洪并各省督军、省长，提出国会开会之前，应将议员中“附和帝制”及参与二次革命反袁党人“概予罢免”，“以

昭公允”；并攻击国会议员在上海开会等活动为“违法行为”，要求黎元洪速交有关机关对议员资格“详加厘剔”，“处分悉当”。

8月11日　黎元洪令桂、滇双方停战。令曰：“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在守土，自应约束将士，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严勒所部，即日停兵。”

△　黎元洪特派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

△　黎元洪特任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省长，原任张国淦准予辞职。

8月12日　浙省督军吕公望电邀孙中山莅浙，并派参谋张群往迎。

△　江苏水灾，北运河堤工出险，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东台等县灾重。

8月13日　奉天郑家屯（今吉林双辽）日人吉本因买鱼殴打中国儿童，驻军二十八师士兵出面劝阻，引起争执。事后日军结队至驻军某团团部寻衅，开枪攻击，双方互有伤亡。日军立即由公主岭、铁岭等地向郑家屯大量增兵，逼令当地驻军撤出城外30里，某团被迫撤出。辽源县知事赴日营协商被扣，次日始释。21日，日关东都督照会奉天督军张作霖，要求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内中国军队全行撤退，经交涉无效，沿线奉军被迫撤出。

△　黎元洪令各省严禁鸦片。

8月14日　黎元洪令各省省议会于10月1日由各省行政长官依法召集。

8月15日　北京教育会致函参众两院议员，要求将义务教育列入宪法，以巩固国本，发扬共和之精神。

△　黎元洪令授罗佩金为陆军中将并加陆军上将衔。

△　李鼎新宣布撤销上海临时海军总司令部，舰队静听中央调遣。

△　《晨钟报》于北京创刊，李大钊为总编辑。该报为宪法研究会机关报。

△　《旅欧杂志》于法国都尔创刊，蔡元培、李石曾等任主编。该杂志“以交换旅欧同人之知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为宣传留法勤工俭学早期刊物之一。

△　巴布扎布匪部在奉军追剿下，是日退据南满铁路线梨树县郭家店，洮南镇守使吴俊陞部将该地包围。奉天军事顾问日人菊池公开出面干涉。经交涉以巴布扎布匪部遣散归旗为条件，奉军即不加追剿。8月16日，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西川虎次郎与黑龙会头目会商决定，指示巴布扎布退出南满地区。

△　日商在上海开设东亚制麻株式会社，有纺锭3040枚，麻袋织机85台，麻布织机62台。

8月16日　孙中山由上海抵杭州，次日出席督署欢迎会，发表讲演，指出“建设以修治道路为第一要着”。

8月17日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通电解职离粤，将所部滇军交由参谋长成桄、师长张开儒、方声涛统辖。27日李抵肇庆。9月5日，滇军自广州附近退驻源潭，防地由桂军接管。陆荣廷、龙济光就接交广州事进行交涉。

△　黎元洪任命周道刚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

△　湖北沔阳县北乡农民要求缓征堤垸保护费，遭县署拒绝，并派警队强迫催征，乡民聚众3000余人，持农具抗拒，警队逃遁，堤工

局被捣毁。

8月18日　程潜宣布取消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所部改编为湖南陆军第四师。11月15日，该师又编入湖南第一师。

△　黎元洪令嘉慰海军中将李鼎新将海军归隶中央。

8月19日　黎元洪令各省军民两署划清陆军和巡防营管辖权限，陆军归督军管辖，警备巡防各营队归省长管辖。

△　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向黎元洪呈递国书。

8月20日　孙中山由杭州抵绍兴。同日出席浙江省议会，发表演说《办理地方自治是人民之责任》，指出：人民欲巩固国家，须先将地方自治建设完备，欲建设真正的共和国家，政府有政府之责任，人民亦有人民之责任。同日在陆军同袍社演讲《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

△　自是日至9月11日交通部向中日实业公司先后三次电话借款计300万日元，以北京、武昌、汉口、汉阳电话局全部财产及收入和营业权作担保，用以偿付津浦、京汉两路借款本息及购买电话器材。

8月21日　众议院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23日参议院亦通过此案。

△　黎元洪专函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问，是日孙复函辞谢不就。

8月22日　国会复会，原进步党议员分别组成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后两会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所谓“研究系”。

△　孙中山抵宁波，在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地方自治欲求有效，必须“振兴实业”、“讲求水利”和“整顿市政”。

△　新疆精河县兵民捕灭蝗蝻，黎元洪令准酌发食粮，由仓储项下开支造报。

8月23日　　松沪护军使杨善德、副使卢永祥公布《资遣党人简章》，遭党人群起反对。次日，韩恢等致函松沪护军使署，指斥该《简章》“立意既属荒谬，措辞尤觉离奇”，要求“速函报馆更正，以释群疑”。

△　汉冶萍煤铁公司与日商安川敬一郎签订《合办九州制钢厂合同》，并附《合办九州制钢厂生铁供应合同》。规定钢厂在日本九州创设，资本1000万日元，中日各半；汉冶萍公司保证供给钢厂生铁“以每年六万吨为最少限度”，铁价以伦敦市价八五折计算，半年一定。

8月24日　上海漆业工人7000余人为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至11月14日，店帮同意工人要求，罢工结束。

△　山东昌乐乡民抗税，与驻军冲突，乡民多人被杀。

8月25日　　黎元洪令粤闽巡阅使萨镇冰严重监视广东龙（济光）、李（烈钧）军队限期撤退，分别交卸。

8月26日　　黎元洪于是月内两次专函聘请黄兴为总统府高等顾问，黄兴均辞不受。是日，黄兴致函何成浚重申此意。

△　山东周村民军司令吴大洲用武力强迫解散步兵两团，发生激战，被解散之军队携械败逃。

△　教育总长范源濂电巴黎蔡元培，促归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8月27日　李烈钧抵肇庆谒岑春煊商善后。同日电告北京政府，因病不克入京。

8月28日　　中华工商研究会刊布宣言及章程，该会“以改良工艺、振兴商业为宗旨”，会长杨晟，会所设上海，分会设国内外各处。

8月29日　陕西旅沪公民徐朗西等致电参众两院陕西议员，反对张敬尧军队开赴西安，称：“张军祸蜀著名，何得再以祸陕？”“去陈（树藩）用张，亦等逐虎进狼。”

8月30日　　内务总长孙洪伊因与徐树铮积不相能，愤而呈请辞职，是日黎元洪指令慰留。

△　黎元洪任命陆裕光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　日本黑龙会骨干分子川岛浪速等前往奉天郭家店犒赏巴布扎布，并部署撤退事宜。日本关东都督中村觉以监视执行停战协定为名，公开由铁岭派日军一支队开赴郭家店。

8月31日　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陈中孚、朱霁青等人，指示鲁军应当遵照通告，和平解决，尤应服从居正主张，急办收束，不得固执己见。

△　马君武等在北京成立丙辰俱乐部，会员以旧同盟会员为中坚，居正、田桐、叶夏声均加入。

△　黎元洪特派谷钟秀充全国水利局总裁。

△　农商部令本部各员不准兼充各商业公司职员。

△　川边康定驻防川军两营哗变，肆意抢劫。川边镇守使殷承姈将变兵缴械，组织军法会审，于11月19日判处营长傅青云等41人死刑，另39人罚充苦役。

8月下旬　河南贾鲁河修复工程竣工。

是月　俄国哈尔哈拉、哈拉湖地方哈萨克等族牧民为反抗沙俄政府征兵举行暴动。沙俄政府派兵镇压，各族牧民纷纷越界进入新疆境内。至1916年底，前后逃至伊犁、塔城、阿克苏、喀什等地俄民不下30万人。新疆督军杨增新一面与驻新俄领交涉，严阻俄兵越境追捕，商讨处置办法；一面命各地方当局妥善安置，免生意外。1917年1月开始陆续分批遣返，至8月大部返回俄境。

△　荣宗敬、荣德生在上海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规定资本30万元，实收20.7万元，纺锭1.224万枚。是月正式开工。1917年改称申新一厂，创设布厂，有布机350台。

△　姚东彦、王锡彤、赵从藩、张紃、孙多森等在天津创办华新纺织公司，先后在天津、通县、正定、青岛、郑县等地设厂。

9月

9月1日　众议院通过北京政府咨送全体国务员任命案。国务总理段祺瑞出席说明追认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谷钟秀为农商总长之理由，咨请同意。4日，参议院亦通过此案。

△　山东军事结束。山东督军、省长派遣代表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民军司令吴大洲等人在济南会商善后，达成结束山东军事协议，民军改编，即由会办军务曲同丰协同督军、省长等赴潍县、周村点验。

△　《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是日发行，发表李大钊《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大胆向封建主义进攻，“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创造一个不断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斗争。

9月2日　　驻京日公使林权助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郑家屯事件八项要求，其要旨为：惩罚第二十八师师长，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必要地点派驻警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奉天督军亲往关东都署及奉天总领事署“谢罪”，对于被害者予以相当之“慰藉金”。

△　安徽督军张勋通电指责司法总长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要求将张驱出内阁。13日，张勋、倪嗣冲、张作霖、赵倜等15人由张勋领衔联名通电攻击张耀曾。要求即予罢斥，交法庭公审。

△　巴布扎布率残部在日军掩护下自奉天郭家店撤出，沿途烧杀抢掠。次日行至吉林怀德县朝阳坡，为当地驻军包围。日军出面干涉，并借口驻军枪弹射穿日本国旗，开枪挑衅。4日，驻辽阳日军500余人开赴朝阳坡，当地驻军被迫撤离该地。

△　日俄第四次密约签订后，两国即就转让长春至吉林省境松花江南岸段中东铁路事相互进行试探。俄国欲以出卖此段铁路，换取日本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日本企图乘机扩张和巩固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是日，日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电示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正式向俄国政府提出中东路及松花江航行权问题。12月7日，俄驻日大使库朋斯齐照会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就上述两问题进行谈判并提出具体条件。谈判延续至1917年11月22日始达成协议并秘密换文。

9月3日　　黎元洪派全国水利局副总裁潘复前往江苏一带会勘运河，统筹疏浚事宜。

△　祝大椿发起组织中国电业公司联合会，是日在上海开成立会，祝任会长。

9月4日　　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通电同意苏督冯国璋有（25日）电论列民选官吏八弊，略谓：“继尧、可澄迭更事变，稍习国情，于冯督军通电所言绝对同意，以事关安危大计，不惮费词，所望政府国会权衡至当，勿动浮言。”

△　俄国干涉外蒙古内政，驻库伦俄领借口蒙古官吏多系喇嘛出身，有害俄蒙国民亲睦，要求罢免现居要职之喇嘛官员。外蒙政府严词拒绝。

9月5日　　参、众两院开宪法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将1913年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凡11章113条）提交大会，由起草委员说明宪法条文。8日、13日继续开会，议决将宪法草案提交审议会审议。

△　广西督军陈炳焜因不满当局袒护龙济光，是日电请辞职，请以陆荣廷调任广西督军。

△　黎元洪特任唐继尧暂兼代云南省长，并令云南省长任可澄赴京。

△　海军部训令第一、二舰队及练习舰队司令，将该管区域划分地段，派舰轮流梭巡，以卫行旅。

△　农商部调查旅居海外之华侨人数，计8677000人。

9月6日　　四川省议会议长朱大钟致电黎元洪，否认主张军民合治，声称此项提议系“奸人窃用省议会及各法团名义致电中央”。

△　黎元洪令陕西财政厅拨款二万元赈济该省蝗雹水灾。夏间，该省渭河南北蝗灾，农田损失甚巨。随后蒲城、渭南、富平、华县、大荔、三原、韩城、郃阳（今合阳）、岐山、栒邑（今旬邑）、永寿、镇安、保安（今志丹）、镇巴14县被雹被水，毙伤人畜，居民失所。

9月7日　　北京政府举行祀孔，由教育总长范源濂恭代行礼，废跪拜仪式。

9月8日　　孙中山致函段祺瑞、孙洪伊，称派胡汉民、廖仲恺代表北上商洽国事。

△　黎元洪任命王文华为暂编贵州陆军第一师师长；熊其勋为暂编贵州陆军混成旅旅长。

9月9日　　原国民党议员张继、居正、田桐、谷钟秀、孙洪伊等为对抗“宪法研究会”，在北京组织成立“宪法商榷会”，原国民党议员多参与该会活动。

△　黎元洪任命周树模兼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　日公使林权助至外交部，就“郑家屯事件”再次提出谢罪、抚恤、处罚责任者、合办警察、东蒙南满军队聘用日本顾问等要求。外交部按条拒驳。

△　琼崖公民陈玉台、王清锦等联名电黎元洪等拒龙济光赴琼，称“中央许其率军五千，移驻琼岛，民等闻之，不胜惶恐”，“龙氏所部凶恶成性，所过为墟，区区岛地，何堪蹂躏”。

△　财政部、农商部与日本兴亚公司在京签订500万日元借款合同，以中日合办湖南水口山铅矿和安徽太平山铁矿为条件。嗣因国会及湖南、安徽两省民众反对及英、法、俄、德四国抗议，遂于本月25日改订契约，借款额不变，改以制钱精炼之利益偿还。此项借款主要移充军政经费。

9月10日　　广东前督军龙济光将督军印信交省长朱庆澜转交陆荣廷，并收束军队，广东纷争解决。

△　黎元洪任命陶祥贵署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　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党员自由储金救国。

9月11日　　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等上书参、众两院，请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　黎元洪任命童保暄为暂编浙江第一师师长，张载阳为第二师师长，俞炜为混成旅旅长。

△　松沪护军使署公布《办理在沪党人善后事宜简章》，并成立办理在沪党人善后事务所，由党人吴忠信、柏文蔚等八人任审查会审查员。

9月12日　驻汉口德领事借口“保商”要求汉口华景街警察权，遭当地商民激烈反对。德领事被迫于10月28日自动撤回此项要求。

△　湖南省长谭延闿电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声明水口山铅矿万无与日人合办理由。16日再电反对与日人正式签约。

△　著名客属华侨实业家张振勋在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公寓病逝。

9月13日　黎元洪令：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再给假三个月，安心调养。所请开缺，应毋庸议。

△　黎元洪特任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仍兼会办军务。

9月14日　交通总长许世英以铁路经营不善，亏损甚巨，是日训令各铁路局所刷厉精神，切实整顿，力求减少支出，增加收入。

9月15日　宪法审议会开会，20日开二次会议，议决：将宪法草案所有重大问题先行讨论。

△　黎元洪任命范一惠为正蓝旗蒙古都统。

△　《旅欧杂志》第三期发表蔡元培《对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指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

9月16日　黎元洪任曹锟为直隶督军。

△　教育部向比国义品公司借款20万元，用作北京大学校舍建筑费用。

9月17日　江苏县议员联合会电请北京内务部，请速颁明令，恢复县会及各级自治；又推代表赴宁面见省长齐耀琳，陈请回复县会及各级自治。

9月18日　黎元洪指令教育部分别废止或修改袁世凯1915年颁行之各种教育法规。

△　巴布扎布率部在长岭县喇嘛苍与驻军冲突，25日进攻瞻榆（今通榆）等地，被击溃。

9月19日　黎元洪重申烟禁前令，如有蔑视禁令者，“惟有执法以绳其后”。

9月20日　孙洪伊为整顿内务部，裁减部员60余人，被裁汰者祝书元等在徐树铮鼓动下，向平政院控孙违法。是日平政院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准被解职人员仍回内务部供原职。”

△　《时报》发表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

9月21日　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13省区督军和代表出席，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以巩固北洋团体、反对南方国民党势力为号召，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唐绍仪等参加内阁。会议至25日结束。

△　湖南各界激烈反对北京政府为向日本兴亚公司借款，以中日合办湖南水口山铅矿为抵押条件。要求废除契约，“以固国体”。是

日，长沙成立“公民保矿会”。

9月22日　宪法审议会开始正式审议宪法草案条文。会议继续审议至1917年5月。在审议过程中争议最大、冲突最烈者，为孔教应否定为国教及省制加入宪法两大问题。

△　英法俄德四国银行团向财政部提出质问，谓中国与日商新订借款条约，有背善后借款条约第十七条。财部答称此项借款系实业借款，与该约不相违背。

△　交通部令准柳江煤矿铁路（直隶省临榆县柳江村至汤河）通车营业。

△　教育部规定高等小学以上学生一律穿着制服。

9月24日　旅沪湘民200余人召开保矿大会，谭人凤痛陈“政府违法签约丧权辱国”，议决电请北京政府取消借约，收回成命。

9月25日　张勋等34人通电反对外交总长唐绍仪。天津亦发现以绅民名义诋毁唐之传单。

△　黎元洪任命齐燮元署理陆军第六师师长。

△　交通部通告称：粤汉铁路本月15日通车，广九、广三铁路一律开通。

9月27日　四川新津驻防川军发生兵变，抢掠后结队逃逸。川边镇守使殷承姈于泸定地方围捕变兵，11月25日，32人被处死。

△　教育部通咨各省，呼吁维持教育经费，力求恢复教育原状，称：“今日政局重新，推求国本，非先注重教育，断不足以救危亡。”

△　黎元洪令：特加吴光新、陈光远陆军上将衔。

9月28日　黎元洪令财部拨款八万元赈济淮扬水灾。苏省入夏以来霪雨连绵，淮扬各属尽成泽国。8月迭经骤雨，人口牲畜漂没无算，上游以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宝应等县，下游以高邮、兴化、东台、盐城、江都、江浦、六合等县为最。

△　财政部令禁所属收受回扣，称："在官人员本食国给薪俸，即应为公服劳，何可滥为染指。"嗣后应得回扣，须涓滴归公，不准私相授受，其他凡与外商交接款目事项，概从此例，违者重惩不贷。

9月29日　黎元洪训令禁止军人越权干政，谓"国势颠危，有如累卵"，惟少数人"每囿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为名，实召亡之渐"。次日，段祺瑞亦通电各省督军、护军使、各师长，谓"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

△　宪法审议会审议《宪法草案》第四章"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两院制主张。

△　黎元洪令准唐绍仪辞外交总长职。

△　黎元洪申令禁树植党援，越权干政。

9月30日　孙中山在上海张园欢宴慰问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全体队员，演说指出"心坚则不畏大敌"。

△　北京政府将广西省南宁、镇南两道所属忠州等10土司改置镇结、龙茗、思乐、绥渌四县。

是月　云南议员李燮阳在众议院提出查办张勋案，指斥张"力主复辟之邪说，身作复辟之保障。叛国逆贼，延为上宾，帝制余孽，悉成佳士，今日之徐州，竟成帝制之巢窟。阴谋会议，志存乱国"。

△　黄兴接见《民国日报》记者，告以今后将致力于实业和兴办

教育。

△ 韩恢在沪发表宣言，恢复中华民国工党。后改名“中华工党”，韩任总理。

△ 奉天营口各染房工人20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 郭子彬、郑培之等在上海创办鸿裕纺织公司，是月开工，纱锭43900枚，布机240台。1918年为永安公司收买，改称永安第三厂。

△ 中日合资50万元，于吉林延吉创办天宝山公司（采掘银、铜矿）。

△ 杨宗锡等集资五万卢布，在双城县开设兴华火柴公司。

10月

10月1日 湖北、安徽、江西、贵州、河南、吉林等省议会复会。

△ 陈独秀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指出：定孔教为国教，不但违反思想自由之原则，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

10月3日 众议院否决黎元洪所提拟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案。

10月4日 张勋、倪嗣冲、姜桂题、王占元、李纯、曹锐、朱家宝、张作霖、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赵倜、田文烈、张怀芝、张树元、张广建、田中玉、潘矩楹、杨善德等13省区督军省长致电黎元洪，请提议于国会，“照旧定孔教为国教，保存郡县学宫及其学田祭田，设奉祭生，行跪拜礼，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

△　前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已将军政事务移交完毕，是日离肇庆返桂西林原籍。

10月5日　　黎元洪令浙江台州镇守使移驻宁波，改称宁台镇守使。

△　俄国政府拨款补助俄皇家地理学会组织蒙古探险队，是日该队由彼得堡出发。

10月6日　　外交总长陈锦涛与日公使林权助就“郑家屯事件”正式开始谈判。

△　龙济光率所部振武全军退出广州，开往琼崖驻扎。

△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二厂2000工人罢工。

10月7日　　黎元洪通令改良赋税，严杜中饱，并减免地方苛细杂捐。

△　黎元洪公布修正勋章令及颁给勋章条例。

△　黎元洪特任孙发绪为山西省长，张怀芝兼署山东省长，原任山西省长沈铭昌辞职照准。

△　黎元洪任命蒋雁行为绥远都统，原任潘矩楹调京另候任用。

△　巴布扎布残部在热河林西县附近袭击当地驻军。次日攻林西县城，巴布扎布被击毙，余部退回呼伦贝尔地区，1917年为黑龙江督军收编。

10月8日　　黎元洪特任刘承恩署理广西省长。

△　黎元洪令特加张作霖、谭延闿、吕公望、陈炳焜、马福祥陆军上将衔；授陈树藩、柏文蔚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　上海地方自治研究会成立，以李右之为会长。

△　法国在沪招募华工600名，是日乘法公司巴尔勒加邮船离沪。

10月9日　黎元洪特授孙中山大勋位。同日授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勋一位；授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　黎元洪令抚恤民国五年以来死难将士。

△　司法部通令整饬司法风气，告诫司法官员“崇尚风节，屏绝纷华，一志澄心，为民造福”。

△　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并呈准废止《预备学校令》。

10月10日　北京南苑举行国庆阅兵礼。黎元洪亲诣大阅，段祺瑞陪阅，各部总长、陆军部、海军部高级军官、参众两院议长议员等，均应邀莅临参观。商民一律悬旗庆祝。

10月11日　黎元洪令山西省长孙发绪未到任前，着政务厅长孙世伟暂行护理。

△　黎元洪特授世续勋一位。

△　日俄英法四国驻京公使以新订中美铁路合同所载路线有碍各国权利，是日向外交部提出抗议。

10月12日　众议院决定各特别行政区域之监督权仍属原省议会。

△　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北京开第二次大会，到会各省代表50余人。25日闭会，通过注意贫民教育、请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速颁国歌等提案。

10月13日　　黎元洪特派冯国璋兼督办浦口商埠事宜，原任刘恩源免职。

10月14日　　广东督军陆荣廷自佛山率桂军进入广州，龙济光率振武军退虎门陆续乘船开赴海南岛。广东滇桂军与粤军战事至此终止。

△　财政部通电各省，以7月1日至次年6月末日为会计年度。

10月15日　　黎元洪令广东惠潮嘉镇守使一缺改为潮梅镇守使，以莫擎宇充任。

△　中国棉业联合会在沪成立，选沈润挹为会长。

10月16日　奉天财政厅与日本东京大仓组订立150万元借款展期契约，自是日起展期一年。

10月17日　众议院否决黎元洪所提拟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案。

△　法代理公使玛太尔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将天津老西开划为“法租界”，撤去中国警察，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自由行动。北京政府请求暂缓实行，法使不允，并于20日晚8时由法驻天津领事带领兵警至老西开，拆毁中国警局，捕去警察九名，以武力强占老西开。

10月18日　　黎元洪任命赵恒惕为暂编湖南第一师师长，陈复初为暂编湖南第二师师长。

△　黎元洪派江朝宗督办安徽筹赈事宜。

△　日公使林权助至外交部，面交关于派警问题之说帖，声称：“日本政府拟设警察官驻在所于南满及东蒙内地，系根据领事裁判权，其趣旨不过为完全保护日本臣民，并使各该处之中日两国官民之关系圆满良好，两国经济关系得以渐次发达而已”，请中国政府从

速承认此要求。

10月19日　　国务总理段祺瑞呈请黎元洪罢免内务总长孙洪伊，遭黎拒绝。

10月20日　　宪法审议会讨论“省制加入宪法”案。原国民党议员焦易堂、吕复、宋渊源等认为“宪法草案仅规定中央政府，独于地方政府付之阙如”，甚为不妥，主张学习欧美各国，将地方制度订入宪法，给予各省地方政府以一定自治地位，省长民选。宪法研究会汤化龙等反对。经多次讨论无结果。11月29日投票表决，赞成票反对票数均不足三分之二，宣布延会再议。

△　德公使辛慈照会北京外交部，抗议法国在华招工，谓此举“违背中立”。11月8日，外交部以华工系往法从事农业为由驳复。

10月21日　　天津市民数千人齐集商务总会开“维持国权国土会”，声讨法国武力强占老西开，表示誓死保卫“国权国土”，并议决派代表进京，请政府严重交涉。

△　贵州省议会通电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力陈省长民选之弊，称此制若行，“近之阻碍政务之进行，远之破坏国家统一”。

10月24日　　直隶议员王玉树就国务总理径自呈请罢免国务员是否合法问题，在众议院向段祺瑞提出质问。

△　黎元洪令准免陈锦涛署外交总长兼职，以外交次长夏诒霆代理部务。

10月25日　　孙中山复函郭标，指出：“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故凡百事业，须从整理党务入手。”并说明整顿党务办法，谓：“现方编订党纲及重订规程，所有党纲未寄到以前，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并告本拟应黎元洪邀请入京商榷要政，因忙于“规复党

务，筹办实业”等事，未克成行。

△　天津市民8000余人集会成立公民大会，一致通过六项决议：一、通电全国与法断绝贸易；二、不使用法国银行纸币；三、解散惠民公司，不准招募华工；四、中国货不售与法国；五、严厉处治为法人作侦探者；六、致电驻法公使要求法国政府撤换驻京公使与驻津领事。

△　黎元洪令北京中国银行现已实行兑现，北京交通银行之兑换券从速开兑。

△　黎元洪令开复前四川都督尹昌衡陆军中将暨陆军上将衔，并给还勋位勋章。

10月26日　　外交部抗议日俄两国无视中国主权，违背中东铁路约章，私相授受长春至第二松花江以南之铁路段。

△　天津法汉学校全体学生因老西开事件于是日起罢课，继有老西开高小、中学校罢课。

△　农商部致函驻英法等国公使及总统府、各部院等机关，推介安徽祁门新茶，以期增加出口，挽回利权。

10月27日　总统选举会通告定10月30日补选副总统。

△　青岛日军要求在高密胶济路附近租借民地。

△　江南造船所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30万银元，以盐税余款及国库证券作担保。

10月28日　　外交部次长代理部务夏诒霆赴津处理老西开事件，天津市民代表质问对法如何交涉，夏答以“尽力对待，如办不好不办”。群众大为不满，于次日召开市民大会，齐集天津交涉公署要求

公开答复。夏与直隶特派交涉员王麟阁等态度蛮横，群情愤怒，捣毁交涉公署，夏、王越墙逃遁。

△　松沪护军使署布告通知在沪党人“早日回归乡里”。

10月30日　国会参、众两院选举江苏督军冯国璋为副总统。

△　上海总商会以正副会长宋汉章、陈作霖辞不就职，是日特别选举朱葆三为正会长，沈联芳为副会长。

10月31日　黄兴在上海福开森路寓所病故。11月1日大殓，由孙中山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其他主丧友人为唐绍仪、蔡元培、柏文蔚、李烈钧、谭人凤。

△　俄国在黑龙江富拉尔基等地擅筑炮台多处。地方当局与俄人交涉无效。是日，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电请外交部并驻俄公使提出严重交涉。

△　吉林省各界成立“各团体联合会”，并派代表面见督军、省长，坚决反对日本借口郑家屯事件肆意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同时分函全国各省区一致力争。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响应。

△　财政部和北京中国银行向汇丰、东方汇理、华俄道胜、横滨正金四银行签订80万银元借款合同，以盐税余款作担保。该项借款用作兑换准备金。

是月　众议院议员邹鲁联合十数人在众议院提出查办张勋案，列举张私组军人团体，对抗中央，破坏统一；破坏制度，紊乱宪法；干涉内阁阁员任免，图谋颠覆政府；肆意攻击国会，违反共和精神等四大罪状。

△　蔡元培、吴稚晖、张一麐、黎锦熙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会章规定“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为宗

旨，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黎锦熙、彭清鹏等人著文提倡。

△　内务部通咨各省区劝禁妇女缠足。

△　内务部咨行各省严令查禁猥亵图画书籍，务期根株尽绝，用维风化。

11月

11月1日　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悼念黄兴逝世。指出黄兴“自创同盟会以来，与之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

△　副总统冯国璋复电国务院，表示：“必当竭尽愚诚，遵守国宪，遥赞中枢密勿，永励共和精神。”

△　地质调查局呈准改为地质调查所，是日农商部令派丁文江为所长。

△　黎元洪特派顾维钧、狄谷为中美国际公会会员。

△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发表《宪法与孔教》文，驳斥《宪法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之规定。

11月2日　天津公民大会召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万余人，由国会代表报告北京政府对法交涉情况。群众认为“法使允为暂时恢复原状”，“仍属空洞”，再次电请北京政府照原案要求条件“严重交涉”。各省商会纷纷响应天津公民大会决议，抵制法货。

△　黎元洪明令褒扬黄兴。令曰：“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创义旅”，“功在国家，薄海同瞩。”“本大总统患难与共，夙资匡辅，骤闻溘逝，震悼尤深！着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特给治丧费二

万元。”

△　内务部通咨各省，人民结社集会应呈报该管警察官署查核批准。

△　陕西督军陈树藩指使王砺廉等纠合百余人，假借“公民”名义闯入省议会，迫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李根源为陕西省长，遭拒绝。王等遂率众搜打议员，捣毁议会。7日，参、众两院议员咨请北京政府查办陈树藩。

△　俄兵在开原与胡匪冲突，俄兵多人被杀，俄公使库达摄夫向外交部提出交涉。

11月3日　黎元洪特任冯国璋领江苏督军事。

11月4日　新疆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致电黎元洪，反对省长民选。

△　周震鳞上书孙中山，报告国会党派之变化，请孙北上领导，略谓各党分裂变幻，“不外群龙无首，指挥之作用全无，乌合之众，不堪任战。长此不改，则议会之精神将无形丧失，政局前途益不堪设想矣”。

11月5日　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闿前电请由第一师长赵恒惕代行督军职务，政务厅长范治焕代行省长职务，是日国务院复电准如所请。

11月6日　孙中山致函黄德源、饶潜川等，指出政局变动非常，“我辈正须固结党员团体，益谋多吸集党员，扩张党势，以收他日有事时之效果”。并指示办法，谓“如有欲入党者，可照中华革命党旧章，用国民党名义收之，以便延揽人才。国内本部，亦当不久建立，届时再将修正之党章、各支分部规则寄上照行”。

△　英公使朱尔典以英、日、俄三国公使名义，出面调停中法天津老西开问题交涉，提出中法共管老西开。15日，朱尔典离京回国，“调停”亦遂中止。

11月7日　日本擅自在厦门设立警察处，福建特派交涉员向驻厦门日领事提出交涉，日方置之不理。12月18日，外交部照会日使林权助提出抗议，日使以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日本有权在厦门设警为词拒绝。

△　孙多森等在天津发起创办中孚银行，资本200万元，并于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分行。

11月8日　前云南都督、四川督军兼署省长蔡锷在日本福冈医院病逝。

△　蔡元培自法回国抵沪。

11月10日　黎元洪明令褒恤故前四川督军兼署省长蔡锷。令曰：蔡锷“年来奔走军旅，维护共和，厥功尤伟”，“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给银二万元治丧。

△　黄钺、李书城、许崇智、邓铿、朱执信、刘世均等前因参加讨袁，致遭褫夺官勋，是日，黎元洪令准开复黄钺、李书城等原官原衔。

△　江西督军李纯通电力陈省制入宪、官吏民选之弊。略谓：“近闻议会有主张省制加入宪法、官吏民选之说，宁、皖、鄂、豫、滇各督及黔省议会已先后通电，剀切痛陈，力揭其弊。公言谠论，足征大多数心理之同，以纯之愚，亦期期以为不可。”

△　司法部召开全国司法会议，会间通过改良监狱等四项决议。

△　奉票挤兑风潮愈演愈烈。张作霖为平息挤兑风潮，是日将勾

结日人进行挤兑活动之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等五人处决。

△ 日人在东三省郑家屯、昌图、盖平、掏鹿、八面城、农安等处擅设警察派出所。

11月11日 黄兴致祭仪式在上海举行。主祭官王芝祥代表黎元洪致祭，孙中山等中外来宾分别致祭。

△ 黎元洪令准免江苏省长齐耀琳淮南垦务督办兼职。

△ 财政部汉口造纸厂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200万日元借款合同，名为扩建工厂，实则拨付军政各费。

11月12日 天津法租界工人一千六七百人为反对法侵占老西开，自是日起罢工，直至次年2月。在工人罢工影响下，法租界华警全体罢职，商人罢市，商店和居民纷纷迁出租界，为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群众反帝斗争。

△ 参、众两院坚持定孔教为“国教”之议员100余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国教维持会，并通电吁请各省督军省长给予支持。

△ 黎元洪任命谭浩明为暂编广东第一师师长，马济为暂编广东第一混成旅旅长，莫荣新为暂编广东第二混成旅旅长。

△ 黎元洪任命刘世珑、党仲昭分别为陕西第一、第二混成旅旅长。

11月13日 黎元洪特任伍廷芳为外交总长。

11月15日 内务、财政两部以漕运局于6月停办后，京畿一带粮价腾贵，呈请复设漕运局，转运米粮，供应京津地区，是日黎元洪指令照准。

△ 黎元洪令准丁宝铨、冯煦开去江淮筹赈督办、会办职。

△　浙江督军兼署省长吕公望电陈省官制意见，主张仍以二年度颁布之制为宜。

△　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电力陈省长民选之弊。

11月16日　　10月间日本政府向驻日公使章宗祥透露：希段祺瑞“派一适当的人来日本”，“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具体办法”，并示意以曹汝霖“最为适宜”。段祺瑞遂决定借赠日皇大勋章为名，以曹为赠勋专使赴日活动。是日，段电告章宗祥就此事与“日本外交当局接洽”。

△　财政部与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储蓄银行签订500万美元实业借款合同，期限三年，以烟酒公卖税为抵押。

△　中华国货维持会在沪召开常年大会，选王文典为会长，伍廷芳为名誉会董。

11月17日　　日本东京各界人士数千人在芝区青松寺举行黄兴追悼大会，犬养毅致悼词。赵伸（云南省议会议长）代表中国友人述谢词。

11月19日　政学会于北京江西会馆开成立会，国民党议员300多人到会，选出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李肇甫、郭椿森等13人为干事。该会骨干分子多系原欧事研究会成员。

△　黎元洪令广东水灾善后有奖义会克日停办，称该义会“以二成五充振，五厘为经费，七成开彩，是直假慈善之名，行赌博之实，两年以来，流弊滋多”，“应与各项赌博一律禁止，以端风俗”。

△　上海拥护孔教会成立，以陈润甫为理事长。

△　天津法领事释放前在老西开拘捕之华警九名。

11月20日　　黎元洪下令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职，以内务次长谢远涵代理部务。

△　黎元洪任命马玉仁为江苏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　《新申报》在上海出版，由席裕福创办。

11月21日　　是日及23日众、参两院举行秘密会议通过中美实业借款案。北京《公言报》将合同全文泄露。

△　黎元洪指令《发还党人抄产办法》准予施行。

11月22日　　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为中美订立借款合同事向财政部提出抗议书，声称中美实业借款带有政治性质，侵害银行团之权利。12月1日，英、法驻京公使复提抗议，称是项借款以烟酒税为抵押，损及英法利益。

△　黎元洪令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辞职，遗缺以张国淦继任。

△　教育、内务二部通咨各省长、都统续修各省县志。

△　北京《公言报》因揭载北京政府拟向美秘密借款消息，被控泄密，发行人黄希文、编辑王德如被捕。

11月23日　　黎元洪令准财政部将各省烟酒厘税归并公卖，统一征收。

△　是日起上海全国烟酒联合会迭开紧急会议，反对财政部以烟酒公卖两税抵借“中美实业借款”，迭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公卖税，以苏商困”。

△　黎元洪令准云南省他郎县更名墨江县，休纳县更名玉溪县。

11月24日　　北京政府拟以任可澄继任内务总长，是日众议院予

以否决。

△　许崇智、蒋介石、吴忠信、杨庶堪等上书孙中山，请以12月5日，即“肇和”兵舰起义之日为烈士祭日。

△　农商部咨请山东、奉天、直隶、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广西沿海各省酌设水产试验场，研究渔捞制造及养殖新法。

11月25日　安徽省长倪嗣冲代表省议会致电黎元洪，挽留国务总理段祺瑞，称“前阅报载，段总理近萌退志”，请电达“力任艰难”，并请“勿任辞职”。

△　韩恢在沪发表中华工党总部恢复组织宣言。

△　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1000余人全体罢工，反对厂警搜身并污辱殴打工人。该所总办刘冠南被迫取消搜身制，将有关警员撤职。

11月26日　国务院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拟派曹汝霖为专使，呈递赠与日皇之勋章。章接电即访本野一郎外务相，说明派使诚意；翌日得复，称已奏明日皇，深愿欢受。

△　全国公民大会在北京江西会馆开成立大会，并通电全国坚决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天津老西开。

△　奉天召开公民大会，抗议日本挑起“郑家屯事件”。

11月28日　黎元洪令追赠蔡锷为陆军上将。

△　意大利驻京公使阿略第向黎元洪递交国书。

11月29日　黎元洪令加陈炯明陆军上将衔。

△　孙吉孚、陈保钦在上海创办物华丝厂，资本16万元。

△　日本住友银行上海分行开幕，支配人笠原正吉，总行设大阪，资本750万日元。

11月30日　黎元洪特派王芝祥为四川检察使。

是月　内务部令禁《绣榻野史》、《浪史奇观》，称此项奇情小说及浪史“意旨文词，备极猥亵”。

△　内务部为整理祖典行政，分别调查各孔子庙、关岳庙、忠烈祠、官有坛庙、公有祠宇，令京兆尹转饬所属详细填报。

△　内务部令京兆尹及京师警察厅分饬所属调查寺庙。

△　内务部以基督教活动范围日广，信徒日多，令京兆尹及京师警察厅转饬所属调查基督教会。

△　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等地成立“人群共进分会”，号召抵制俄币。

△　教育部召开教育行政会议，通过推广国民学校办法咨询案等多项议案。

△　孙尧卿等在北京创立开源矿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矿业，资本银30万元。

12月

12月1日　黎元洪令内务次长代理部务谢远涵，执行平政院关于“内务部违反法令擅退部员”一案应予取消之裁决。

△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主张抛弃封建时代之旧道德旧礼教。

12月2日　黎元洪令惩办河南省失职官员。省长田文烈经查明无溺职情事，免予置议。政务厅长陶珙检束不严，着即免职。卸任财政厅长顾归愚，办理捐税，多涉繁苛；警务处长王景福，各项报销，任意浮滥，待核明收支各款，有无侵蚀情弊，再行呈明办理。

△　直隶议员温世霖等以段内阁六项违法四项失职，在众议院提出弹劾段祺瑞案。

△　黎元洪令加刘存厚陆军上将衔。

12月3日　中国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等人发起成立丙辰学社。后于1920年10月在上海设总事务所；1923年6月改名中华学艺社。该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

△　日商三人私赴内蒙采伐林木，遇匪被劫，一人毙命。是日驻郑家屯日领向当地政府提出交涉。

12月4日　黎元洪派松沪护军使杨善德迎祭蔡锷灵榇。5日，由“海容”军舰护送“新铭”轮船运载蔡锷灵柩抵上海，各界迎榇者数千人。

△　林森自北京上书孙中山，报告北京政局变化情形。称：“在京政客之趋向，悉视驻沪各要人为转移。”“政局多变，亦缘未有雄大政党操提全局之故。是以在沪既决以大党为补苴，迅望奋励促成，以副众望。”

△　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已于6月29日裁撤，黎元洪令裁缺原任肃政史王瑚、夏寿康等16人，交国务院存记。

12月5日　国会通告本届常会会期延长至第三届常会召开之前一日。

△　中日改订吉长铁路草约，借款日币650万元，偿期40年。在借款期内，委托“满铁”代为指挥经理，俟清偿后交还。

12月6日　哈尔滨英商所办滨江物产出口有限公司门卫与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公司召俄兵干涉，开枪击毙中国工人四名，伤七名。是日，驻哈尔滨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就此事向英、俄两国领事提出交涉。

△　交通部训令邮政总局，洋员回国所遗之缺，毋再添用洋员。

12月7日　黎元洪严令预防参议院议员改选营私舞弊。

△　交通总长许世英诫勉所属职员敬业守法，称：“交通行政，多为世病，道路传闻，充站长至纳费数千；包饭车，竟赠贿巨万。其他工程之敷设，材料之购买，交易之出入，无不用其回扣，物腐虫生，穴空风至，耻孰甚焉。”“如有涉及前项情事，定即移送法庭或交付惩戒。”

12月8日　宪法审议会继续讨论省制加入宪法问题，是日表决“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命，地方制度加入宪法”提案，赞成票差四张不足三分之二。益友社（原国民党议员组成）议员指责宪法研究会投票舞弊，致起冲突，会场墨盒坐椅纷飞，双方被打伤多人。事后宪法研究会与益友社先后通电全国，相互诋毁。

△　奉天人民为愤郑家屯事件组“铁血团”反抗日本侵略，奉天督军公署逮捕其领袖等数十人下狱。

△　河南巩县兵工厂落成，次年1月开工生产。

12月9日　段祺瑞派曹汝霖赴日内幕事泄，参、众两院议员激烈反对派曹为赴日特使。段被迫改派熊希龄为特使。是日段电告驻日公使章宗祥“转商日外部”。次日章经西原龟三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透露此意。寺内等认为熊代曹来日“毫无意义”予以拒绝，“希望中国重新考虑”人选。

△　财政部以日商兴亚公司三月届满，辅助大借款未成立，声明解除中日借款条约担保责任。

△　沪抗、沪宁两铁路接轨通车。12日售票营业。

12月10日　　孙中山分函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通告讨袁战役中华侨从军经过及遣散情形。

△　戴戡在渝宣布就任四川省长。未到省前，省公署文件由政务厅长尹昌龄代拆代行。

12月11日　　宪法协议会、宪政讨论会、平社、苏园、宪政会、丙辰俱乐部、衡社、韬园、静庐九政团协商宪法审议会冲突事件善后办法，决议由各政团共同拟定地方制度草案，经研究会、益友社同意后，提交宪法审议会表决。

△　财政部颁行《银行稽查章程》，凡四章18条。

12月12日　　日本改筑南满铁路为双轨，任意侵占民田，奉天地方当局向日本提出交涉。

△　驻日公使章宗祥电国务院，称："顷见本野外相，当将改派特使事婉达。""窥其语气，似改派亦可接待，应请迅即明发命令，并转致熊君，预定日期，以便转达。"

12月13日　黎元洪令改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章于日皇。

△　孙中山电黎元洪及国务院，建议定云南起义日期为国庆日。

12月14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决定再次派西原龟三前来中国进行活动，"与中国要人及日本在华官宪商谈，以求打开局面"。18日，西原由东京启程。

△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潍县、高密、昌乐等县部队，先后

编遣就绪，是日居正通告取消东北军名义。

12月15日　　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致函交通总长许世英，商议订立《德华银行津浦铁路北段垫款凭函》，垫款金额英金900424镑6先令4便士，到期由津浦铁路进款余额项下提付，不敷之数由交通部担任。21日，交通总长许世英书面承认《凭函》所载各条件。

12月16日　　日外务相本野一郎面交驻日公使章宗祥节略，反对以熊希龄为赴日专使，称："关于熊氏任命，中国国内已有将发重大异论之状，即日本对于熊氏怀恶感者亦殊不少。……日本国民一般对于熊氏来使，倘或不以热诚同情相待，以至中日亲善之至要使命不但不能举其实效，反招两国国民相互不快之感触，此实不能无危疑之点也。"

△　安徽省议会反对繁昌县裕繁铁矿与日人合办。

12月17日　　宪法协议会等九政团联合函请宪法会议议长续开宪法审议会，先行审议地方制度以外各问题，计有"定孔教为国教"，"清室优待条件加入宪法问题"等四项问题。

12月18日　黎元洪令公布《国葬法》，凡八条。

△　国务院通令全国各机关，嗣后各官署兼职兼俸各员，一概不准兼领俸薪。

△　黑龙江省公署以俄领抗议人群共进会言论"损害俄罗斯帝国"，是日下令查禁。

12月19日　黎元洪令军人不得置身党会。

△　北京政府裁撤塔尔巴哈台参赞一缺，改设道尹于塔城县，加副都统衔，归新疆管辖。

△　财政部与全国商会联合会组织之保利银公司订立《收炼制钱合同》。财部向公司借款500万元，许予收炼制钱之权利。

12月21日　黎元洪令公布《民国纪念日修正案》，国会开幕日及云南首义日列为民国纪念日。

12月22日　黎元洪明令国葬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

△　是日冬至，祀天典礼奉准暂缓举行。

△　西原龟三第二次来华，是日抵北京，次日与曹汝霖、陆宗舆会晤。西原自称此次来华目的系就“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进行充分交换意见。25日，段祺瑞会见西原龟三。

12月23日　黎元洪令财政部拨银折美金2.5万元，赈济在墨被难华侨，并令切实保护，毋任失所。

△　黄兴灵柩自沪发引，由“长安”轮运载赴汉转湘。次年4月15日安葬于长沙岳麓山。

12月25日　全国各地庆祝云南护国纪念，黎元洪特颁祝辞。

12月26日　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将警务厅长夏超免职，引起浙江军警界反对。是日新任厅长傅其永到职，被警务厅官吏殴成重伤。杭州警察相约罢岗，督军署参谋长周鸣岐、副参谋长董绍祺、浙军师长张载扬、旅长韩绍基、宁台镇守使顾乃斌等相继提出辞职。杭州四处张贴反对吕公望传单。吕被迫于27日电黎元洪，称病请辞。

△　众议院通过政府所提拟任张国淦为内务总长案。29日，该案遭参议院否决。

△　四川督军罗佩金电揭川汉铁路股款积弊，并称：“总理时霖暨各职员均情虚潜逃，现正着手清理。”

△　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12月27日　兼领江苏督军冯国璋等21省军民长官联名通电忠告总统“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屏斥离间府院之政客；劝总理早定军政、财政、外交大计，收拾残局；并呼吁国会勿“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

△　宪法会议审议会讨论国教问题，议员王敬芳等提议于宪法草案中加入“国教”一章，法定孔教为国教，但仍许信教自由。何雯等部分议员反对。

△　宪法研究会及益友社致函宪法协议会等九政团，表示大体赞同九政团所拟地方制度草案。

12月28日　西原龟三在京与交通银行总经理曹汝霖及陆宗舆议定第一次500万日元交通银行借款。

△　上海黄兴、蔡锷追悼大会在斜桥湖南会馆举行，到千人。

12月29日　黎元洪派齐耀琳兼充淮南垦务局督办。

12月30日　黎元洪令财政部拨银二万元抚恤奉省巴匪扰害地方。

12月31日　道德学社在北京开成立会，标榜以“阐明圣学，敦崇道德，实行修身”为宗旨，社长王士珍。该社采用讲学、星期讲演会等方式，宣扬孔孟之道。1917年1月印行《道德学志》（旬刊）。1918年1月10日道德学社南京分社成立，江苏督军李纯任社长，并出版《道德浅言》月刊。

△　外交部接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电告：俄国发生内乱，逃入新疆之哈萨克人日众，俄兵越境追捕，请政府交涉制止。

是月　奉天黑山县爆发反清丈斗争，乡民各持枪械，将清丈委员公所捣毁。

△　日本在奉天铁西开办“南满洲制糖有限公司”，资本1000万日元。

△　张益亭、张行五在哈尔滨开办“广源盛面粉无限公司”，资本25万元。

△　周缉之、周志辅、周志俊等在无锡创立广勤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70万两。

△　《丙辰杂志》在沪创刊。

是年　“救世军”传入中国，开始在北京“传道”，随后扩展至天津、济南、太原、包头、张家口等地。按：“救世军”为基督教派之一，1878年创立于英国，组织形式模仿军队，宣称以“救济贫困”为宗旨。

△　俄国为供应欧战需要，在东三省北部各地设立采办处，以贬值俄国纸币大量掠夺军需物资。仅哈尔滨一地商民所受损失即达2000万元以上。

△　美国基督教会设立之岭南学堂成立文理科大学。

△　陶明浚在沈阳创办《新亚日报》，宣传三民主义。

△　财政部制作五年七月底（1916年7月31日）债款报告。计：一、长期外债，约合银元14.17679528亿元8角8分；二、短期外债，约合银元2700.2807万元6角5分；三、内债各款：1.内国公债，计银元7088.2120万元；2.短期内债，约合银元1198.6888万元4角9分；3.财政部各银行往来款，约合银元4391.5054万元2角；4.各局署垫款，计银元205.4820万元。内国公债、短期内债暨各银行局署往来垫

款，共计约1.28838882亿元。

1917年（民国六年）

1月

1月1日　　各省督军由冯国璋领衔联电北京政府，拥护段祺瑞内阁；并指责国会自恢复以来，“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侵越司法，干涉行政”。“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　段祺瑞往晤徐世昌，表示誓决解散国会，声称：“二十二省及三特别区之通电已显含解散国会之意，既有各省为我后盾，我料黎元洪将来亦无可如何。”

△　浙江省督军兼省长吕公望通电，历述因病请辞未准，承各界坚留，声明自即日起“力疾供职”。

△　黎元洪令准浙江督军兼署省长吕公望辞职；特任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省长。

△　黎元洪特任范源濂兼署内务总长。

△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出版发行，载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白话文体。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1月2日　　浙省军警长官及省议会、教育总会、总商会分别集会，议决电请中央收回杨、齐任浙成命。

△　四川德阳县城被匪200余人抢劫，杀警兵数人，县署及民居商店多遭焚掠，旋即遁去。

1月4日　　杭州各界4000余人开公民大会，要求浙人治浙，一致拒绝杨、齐，并公推章太炎等为代表，分赴南京、北京请愿。

△　贵州省议会、商务总会、省农会等团体通电为川省议会反对戴戡长川事辩诬，谓川省议会“称戴长黔时，贼民贪赃……不惟反诬戴君，抑且欺罔黔人”。

△　黎元洪任命张志潭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

1月5日　　日公使林权助与外交总长伍廷芳晤谈郑家屯事件，坚持于满蒙派驻警官。

△　台湾南投发生大地震，波及全岛，是日至7日上午，连续发生数次，房屋倒塌约千余户，死54人，伤87人。

1月6日　黎元洪任命卢永祥为松沪护军使。

△　梁启超由上海抵北京，调和各方政见，当即与黎元洪、段祺瑞详谈。

1月7日　“宪法促成会”在北京成立，举吴琴荪为会长。

△　巴布扎布余党巴拉金，率众2000余人，攻陷呼伦贝尔，将全城焚掠一空，旋向索伦山逃窜。

1月8日　　宪法会议审议会讨论以孔教为国教问题。众议员王葆真发言反对，指出若将孔教列入宪法，“将来仍恐难免帝制问题发生”。投票结果赞成孔教列入宪法者未获三分之二多数，被否决。

△　黎元洪令准内务部暂行适用民国元年官制。

△　全浙公民大会致电黎元洪，坚阻杨善德派军队入浙。

△　黎元洪任命达寿为镶白旗汉军都统。

1月9日　　张勋与各省督军代表在徐州开第三次会议，谋对付黎元洪与国会。段祺瑞派徐树铮、靳云鹏等与会。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及改组总统府等四项所谓解决时局主张。

△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对华方针，提出“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帝国政府将按既定方针逐步扩大、增进帝国的特殊利益”；“山东问题，应俟和平恢复后再求其最后解决。当前的问题，是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归于帝国所有”等项侵华策略。

△　众议院三读通过保利银公司借款合同及收炼制钱合同案。16日，参议院亦通过两合同案。

△　司法总长呈请整理各省司法机关，首从恢复原状入手，并请追认川黔湘粤浙等省独立期内所设各种司法机关。是日黎元洪指令照准。

△　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致电北京政府，以俄国军官皮其考甫擅自越境到我温宿县捕人，请政府同俄方交涉。

△　抗法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在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病逝。2月3日，黎元洪令拨银2000元治丧。

1月10日　　宪法审议会一读会结束。自上年9月以来，宪法审议会共开会24次，讨论宪法原案14项：通过者八项，删除者一项，未决者五项；议员提议增加者九项：通过者四项，否决者三项，未决者二项。其余无疑义之草案各条勿须讨论，皆付二读。26日开二读会。

△　驻京俄公使库达摄夫照会外交部，要求取消外蒙古选派国会议员。

1月11日　外交部答复美公使芮恩施上年12月21日照会，对美总统提议欧战讲和深表同情。

△　黎元洪任命杨祖德署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　抚顺煤矿大山窑瓦斯爆炸，900余名矿工惨死。

1月12日　黎元洪邀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吴景濂、王家襄、王正廷等入总统府共餐，会商于国会第三期开会前完成宪法。

△　杨善德不顾浙人反对，拥兵入浙，是日在杭州就任浙督，吕公望卸职。24日，齐耀珊到省接印视事。

△　众议院通过恢复地方自治案。

△　法公使康悌照会外交部，抗议云南地方德人煽惑“排法”运动。

△　外交部拒绝5日日使要求，对日在南满已设之警所不予承认。

△　黎元洪令准免齐耀琳淮南垦务督办兼职。

△　黎元洪指令将北京故宫端门、午门一带地方拨归教育部设置京师图书馆。

1月13日　步兵统领江朝宗派兵围搜前内务总长孙洪伊寓所，毫无所得。孙于日前离京，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国璋。

△　上海“中华自由党”总部开选举大会，以孙中山不兼主裁职，公推夏芷芳为理事，万世铎为临时主裁。

1月14日　广东省议会通过省长朱庆澜向荷兰商人保文氏借港洋300万元借款合同。

△　段祺瑞派吴光新同日公使林权助密谈，吴告诉林权助：“段曾拟认真与日本合作”，特派曹汝霖赴日，“其目的即就有关中日亲善的方法，与日本有关当局会谈”。

1月15日　徐世昌大宴议员，要求将优待清室条件订入宪法。

△　吴光新拜访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真臣，谓“（段）深知中日两国亲善为当务之急”，希望日方谅解其苦衷，并予以相当帮助。石光据此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报告：“吴一心为段谋与帝国接近，正向各方积极努力。”

△　汉口水电公司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签订日金100万元借款合同。

1月16日　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举行接受黎元洪所授大勋位仪式。黎元洪所派代表陆军中将高佐国将大勋位授予孙中山。居正、廖仲恺、朱执信等10余人出席。

△　冯国璋致电国务院，以制药为由，敦促政府收买上海洋商公所存土（鸦片烟），并建议在江苏、广东两省销售。

1月18日　国务院通过国内交通公债条例草案，总额二亿元。

△　冯国璋等以民元六厘公债、契债及印花税担保，向英商上海鸦片康采恩借规平银1000万两，是为江苏收购存土借款。

1月19日　黎元洪令内务部迅分别厘订地方自治制度及举行自治一切事宜。

△　黎元洪特任李烈钧为桓威将军，胡汉民为智威将军，柏文蔚为烈威将军，陈炯明为定威将军，李鼎新为曜威将军，吕公望为怀威将军，周骏为翔威将军，陈宦为毅威将军，汤芗铭为信威将军。

△　四川省议会议决反对戴戡出任四川省长，应即电大总统及参众两院等，宣布戴之罪状，务求正当解决。

△　西原龟三离京回国。

1月20日　　交通银行与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签订借款500万日元合同。此为“西原借款”之开端。

△　司法部公布北京朝阳大学、中华大学、明德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央政法专门学校、化石桥法政专门学校为审核认可之私立大学。

1月22日　　中日郑家屯交涉案解决。外交部与日公使林权助互换照会，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申饬第二十八师师长；二、酌惩有责任之中国军官；三、于日本臣民杂居区域内，出示告谕军民对日人礼遇；四、奉督向日方表示歉意；五、给日商吉本500元恤金。俟上述五项全部实行后，日本将撤退因郑家屯事件增派到四平至郑家屯一带之日军。27日，交涉案经国会通过。

△　黎元洪令地方官吏实力振兴教育，以固国本。

1月24日　　湘、鄂、赣、皖、豫、苏各省地震。鄂省最烈，阳新县大鸡山煤矿工匠40余人埋入矿内。2月22日，武汉、安庆又有地震。

△　成都滇军第二十三团因索饷哗变，彭县、什邡、灌县均受变兵骚扰。

1月25日　　福建同安县，浙江定海、建德、寿昌等县，广西贺县地震。次日，上海地震。

△　驻福建晋江县北军第十八团与警备队因赌起衅，是晚开枪激战，并抢劫县署商店民居，挟赃逃窜，伤毙人民百余人，兵士互相击

毙30余人。

1月26日　　交通总长许世英呈准周（河南周家口）襄（湖北襄阳）铁路归美商裕中公司承修，由株钦局长兼办，全长200英里。

△　外交部照会葡公使，抗议葡舰在澳门未定界约之谭仔湾停泊。

1月27日　孙中山复函中华革命党陕西支部长宋元恺，谈改组政党事，赞成组织政党，但因自身不欲入政界，表示决不加入。并谓："所有办党之事，悉已委之唐少川（绍仪）君。唐少川君本拟将旧国民党重行收集，立一新大政党……尊处同志将来宜加入该派，以收指臂之效。"

△　黎元洪任命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

△　黎元洪令准云南大关县治分设盐津县。

△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议改革大学学制。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另立独立之大学，并重定大学年限。

△　京师图书馆（位于北京安定门大街方家胡同）开幕。

△　英日谈判中国参战问题，日外相本野要求承继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太平洋各岛之权利。

1月28日　冯国璋与上海洋药商行签订《收买存土合同》。规定收购2100箱，每箱银8200两上海纹银，以中国政府六厘债券偿还。

△　国会各政团开宪法协商会议，22团体莅会，讨论宪法第十九条第二项（即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主张维持第十九条第二项原案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者，有宪法协议会等七政团；赞成维持第十九条第二项并赞成定为国教者，有研究会等四政团；反对第十

九条第二项并反对定为国教者，有宪法商榷会、丙辰俱乐部；宪友会、民彝社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对第十九条第二项主服从多数；政学会等三政团无定见。

△　山东民军首领吴大洲在北京被捕，5月26日判处无期徒刑。

△　废清庆亲王奕劻在青岛病死。

△　章士钊主办《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2月17日改为周刊。

1月30日　外交部密函沿江、沿海及东北各省督军、省长，外人来华招工，由地方商会出面办理，以免引起交战国一方之诘难，有碍中立。

△　黎元洪任命王丕焕为绥远陆军混成旅旅长。

△　《甲寅》日刊发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一文，指斥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为“怪诞之事实”。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外人选皮尔斯等九人为工部局董事。3月22日新董事会选皮尔斯为总董。

1月31日　黎元洪令改以7月1日至次年6月末日为会计年度。

△　德国拟厉行无限制潜艇战争。是日，驻德国公使接德外交部照会，望中国政府务先警告中国船只勿到限定区域之内，免生危险。

是月　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指责国会议员“排挤”段祺瑞，扬言对此“誓不能容”。

△　冯国璋致电段祺瑞，请裁全国镇守使。

△　中华佛教会上书国会，为避免“宗教战争”在中国重演，请勿定孔教为国教。

△ 杨翰西、周学熙在无锡创办广勤纺织公司，资本100万元。

2月

2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出版发行，载有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指斥儒家学说。

2月2日 德公使辛慈递送外交部关于德国新潜艇计划之照会，略谓德国将于2月1日以后采用海上封锁政策，对于中立国轮船航行于一定区域内，概有危险。

△ 日人在柳河县设警所，奉天省公署令交涉员向日本领事交涉。

2月3日 参议院讨论福建省议会关于日人在厦门违约设警事件，议决以原案咨达政府。6日，众议院复咨大总统，请政府与日本严重交涉。20日，外交部就此事向日使林权助提出口头抗议。

△ 黎元洪令准解除辛亥以后因改革政治、拥护共和被难诸人罪名，用示昭雪。

2月4日 美公使芮恩施照会外交部劝与美采一致行动，对德绝交。越三日，芮恩施再次往访段祺瑞促其作复。

△ 黎元洪任命许兰洲为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

2月5日　　交通部以川汉铁路股款为胡骏、施愚、顾鳌等所侵蚀，特派员彻查该路股款账目。

2月6日　　黎元洪指令段祺瑞，查办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案，因与事实不符，免予置议。

△　教育部下令重申禁止学生加入政党。

2月7日　　张勋、倪嗣冲以宪法会议审议会未能通过国教案，再电北京政府及各省，要求将孔教列入宪法。8日张作霖，9日曹锟、卢永祥，27日陈炳焜、刘承恩亦通电同此主张。

△　段祺瑞电嘱驻日公使章宗祥密探日本对华参战意见。9日，章复电称：顷晤小幡酉吉，谓“美既劝告，自以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

△　谭人凤、章太炎自上海致电黎元洪、国务院、参众两院，反对参战，谓“欧人交战各有利害，我无与焉”，要求“勿以国家为孤注”。

2月8日　　总统府会议，因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等之主张，决对德之潜艇作战提抗议。

△　驻陕西武关陆军一连哗变，勾结土匪陷商南县。

2月9日　　外交部复照德公使辛慈，就德国实行海上新潜艇政策提出严重抗议。

△　外交部复照美公使芮恩施，赞同美4日对德国颁行新潜艇封锁政策之通牒，与美共采一致态度。

△　驻日公使章宗祥就中国对德潜艇袭击公海商船提出抗议事，征询日本政府意见。是日，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召见章，表示“中国仅提抗议，于中国地位似非得计，不如即行宣布断绝国交，并不必俟

抗议回答”。

△　国务院电嘱驻日公使章宗祥探询日政府对于中国参战之意旨及一般舆论。是日，章复电告以晤日外务省政务局长小幡酉吉，彼答称：“美既劝告，自应与美取一致态度为宜。”

△　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召见英、法、俄三国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改变以往反对中国参战之立场，支持中国政府对德绝交。

△　粤汉铁路武昌—蒲圻段竣工通车。9月通车至岳阳。

2月10日　段祺瑞在参众两院会议上报告政府对德抗议理由。两院一致赞同政府对德方针。

△　中法合办之中法振业银行开幕，资本200万元。

2月11日　国务会议通过冯国璋《收买存土合同》。

△　段祺瑞致电章宗祥，令其探询日本政府对于万一中德绝交有何意见。同日，章使复电，称本野外务大臣深望“断绝国交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

△　“征兵学会”在北京成立，公举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会长。

2月12日　国会各政团开联合会议，议决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以研究对德通牒后外交之进行。

△　冯国璋电国务院，不以对德抗议为然，主张仍守中立。

△　日本使馆参赞芳泽谦吉往晤段祺瑞，告以日本政府希望中国迅速对德绝交。越二日，外交部电告章宗祥谓绝交事“政府现已决定，可不俟德国回答”，希日本政府对中国将向各国提出酌加关税及缓解庚子赔款事给予支持。

2月13日　万国改良会在上海开千人禁烟大会，通过致国会电，反对冯国璋收买存土。

△　日本总理大臣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第三次来华活动，16日抵京。17日，西原与曹汝霖、梁启超密谈，极力劝诱中国对德绝交。21日复与段祺瑞密谈。

△　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与各国驻日大使商中国对德问题，要求继承德人在山东权利。

2月14日　国务会议决议，如德潜艇再袭击中立船只时即与德国绝交。

△　汪精卫、王宠惠自北京往南京，谒冯国璋商对德绝交事。

2月15日　驻日公使章宗祥往晤日外务大臣本野，要求中国绝德后，日本给予财政援助，并请日本及有关各国同意提高中国关税税率和延期偿还庚子赔款。次日，外交总长陆徵祥亦向芳泽参赞提出同样要求。

△　曾贯吾等在沪发起中华国民禁烟会。18日推于右任为筹备会主任，发表《宣言书》，宣称以“请愿国会敦促政府取消收买存土之约”为宗旨。

2月16日　“全国禁烟联合会”会长柏文蔚致电北京政府，以沪上外商抬高存土售价，吁请政府派员切实调查。

△　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反对。

△　驻南京日领事高尾亨访晤冯国璋，谈中国对德绝交事。冯主慎重从事。

△　英国驻日大使葛林照会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称英国政府保

证和会中“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及在赤道以北各岛屿之领土权利；并经谅解，日本政府亦以同样精神，援助英国要求在赤道以南之德国岛屿”。

△　国务院外交委员会成立。

△　山东潍县民军王贯忱团被鲁督张怀芝缴械，王被捕。所部2000余人于19日遣散回籍。

2月17日　云南省兰坪县一带朱天王以反对禁止种烟聚众数千，号称“天主皇帝”，占据县城。是日，唐继尧电告中央，经大理驻军剿办，业已平息。

△　日本促中国早日对德绝交。是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日本对中国要求加税及缓解赔款两事表示赞成，惟“必中国与德断绝国交后，日本方易向各国启口代为周旋”。

△　上海商团筹备处决定发起组织外交后援团。

2月18日　国会部分议员在北京发起成立“外交商榷会”。

△　驻粤滇军第三师第三十一团第二营在南雄哗变，抢劫商店数十家，伤毙警兵商民10余人，旋被第三师师长南韶连派军镇压。

△　蔡元培、梁启超、严修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

2月19日　“两院各政团宪法协商会”讨论宪法第二十一条，一致赞成两院制。当日并交宪法会议审议会通过。

△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照会法俄驻日大使，要求在媾和交涉中，“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在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岛屿之领土及特殊利益”。次日及3月1日，俄、法大使分别复照本野，允于和会中援助

日本之山东领土要求。

△　德国政府通知中国驻德公使颜惠庆，拒绝中国政府2月9日抗议。

△　宗社党人在“北满”组织黑风会，黑龙江省当局严令查禁。

2月20日　众议院开会质问政府收买存土案。越二日，参议院开会继续质问。

△　段祺瑞挑唆督军团要求黎元洪罢免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是日，丁提出辞职书。25日，黎元洪批准丁辞职，以夏寿康继任。

△　参众两院会议公决，拒绝逮捕宪法会议斗殴伤人议员。

△　孙中山批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长陈树人函，指出“无政府主义之说，乃发生于最黑暗之专制国”。“无政府主义实不能行于今日”。

2月21日　孙中山在沪写成《社会建设》（又名《民权初步》）一书。自序指出：“今后民国之安危如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

2月22日　冯国璋以副总统府名义宣布：收买存土案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派员与外商磋商收购条件后定约签字，并称：“与其听其借词自销……不如政府收买。”按：自收买存土合同签订，截至本月23日，各省电冯反对者达二百数十起。

△　陆徵祥访协约国各公使商对德绝交条件。

△　内务部呈准合并广西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州，改设向都县（今天等县）。

△ 黎元洪指令准内务部创设警官高等学校。

2月23日 冯国璋抵北京。即日会晤黎元洪、徐世昌。晚段祺瑞招宴，席间段向冯谈绝德内情。

△ 张勋联合16省区督军、省长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速定孔教为国教”，否则即应“以简当手续直接取决于多数民意”，或者“另组制宪机关，作根本之解决”。

2月24日 农商部公布《实业协进会章程》，凡八条。该会以“联合全国有实业上之学识经验者，共同尽力促进实业之发达为目的”。农商总长兼该会会长。

△ 曹汝霖访晤西原龟三，希望日本政府以援助之好意在中国政府公布对德宣战以前，保证三事：一、延期偿还对协约各国之庚子赔款；二、永远撤销对德、奥之赔款；三、将关税按实价改定为成品按七分五厘、未成品按五分抽税。此外，作为宣战之预备金，希望贷款日金2000万元。西原表示将此意电告日本外务、大藏两大臣。28日，西原分别接到大藏大臣可接受贷款2000万日元及外务大臣关于宣战三保证之回电，当即通知曹汝霖。

△ 法公使康悌代表协约国各使通知外交部，如对德正式绝交，允考虑中国所提改订关税、延付庚子赔款之条件。

△ 内务部申明县知事回避本籍定章，是日黎元洪指令照准。

2月25日 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会议绝德宣战事。一致同意对德绝交并加入协约国。

△ 中华国民禁烟会在上海开千人禁烟大会，一致通过致北京政府及各省要求立即废约电，并举代表北上请愿。章太炎、唐绍仪被推举为该会正、副主任。

△　国民外交后援会在京开发起会，章程宣称该会“以研究外交，匡助政府为宗旨”。

2月26日　冯国璋致函众议院，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

△　冯国璋于昨今两次会晤黎元洪，进言加入协约国，黎均持维持中立主张，并表示：“即使辞去总统，亦不能承认。”

△　英在山东招募华工9000人赴欧参战。

2月27日　黎元洪特派汪大燮前往日本向日皇呈递大勋章。

△　黎元洪答记者问，称“不可以冒险投机之精神加入战争”，“对于此事之真正决断，必出之于人民”。

△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约见陆宗舆，称：“中国苟毅然实行（绝德），联合战团自表同情。中国希望之事，自有商量余地。今中国乃各处试探，又故意迟延，恐大陷于失策，望速下决心，勿使日本政府为难。”

△　黎元洪令准平政院院长周树模辞职，特任熊希龄为院长。

△　日本于热河特别行政区域赤峰（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设立领事馆。

2月28日　国务院全体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应由绝交而宣战，再加入协约国。黎主先征国会同意，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

△　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00余人通电全国，反对对德绝交，加入战团。

△　国务院以湘省迭报搜查出宗社党与沪上往来密函多件，训令松沪护军使卢永祥严密侦察，据实呈报。

△　新疆省长杨增新致电北京政府报告俄国回民因反抗俄征兵起见，自民五以来逃入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乌什、喀什者不下20万人，已“严饬所属文武极力防范，地方幸尚安静”。

是月　祝大椿在上海创设恒昌源纺织有限公司，并开始营业。

△　美商在上海开办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资本65万美元。

3月

3月1日　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开幕，讨论规定国家税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互相协济之政费等六项要案。17日闭会。

△　法日换文，法国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日本允许中国对德参战。

△　法舰“亚多斯号”被德潜艇击沉，死华工500余人。

△　《太平洋》杂志在上海创刊，李剑农任主编。

3月2日　段祺瑞向国会外交委员会报告对德外交关系问题。

△　黎元洪废止文官任职令。

△　黎元洪任命载涛为镶黄旗蒙古都统。

3月3日　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及《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

△　国民外交后援会在北京开第一次会，刘彦、梁启超、蔡元培等演说，主张对德参战。

3月4日　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段请黎元洪核准致驻日公使嘱令向日本政府磋商绝德后加入战团条件之电稿，黎以须经国会同意而

未准，段遂愤而辞职，即日赴天津。

△　上海总商会等10团体致电北京政府及各省，以加入协约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请“始终中立”。

△　奉天交涉员马廷亮、二十七师参谋长马恺赴旅顺，为“郑家屯事件”向日关东都督道歉。

△　山东、浙江等16省尊孔会社在沪代表发起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以“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为宗旨”，陈焕章为会长。设总事务所于上海。

△　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古学会，是日开第一次大会。该会以“欲联同洲之情谊”，“沟通各国之学说”，“研究亚洲文学、联络感情”为宗旨。

3月5日　　黎元洪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协商内阁事。黎请徐任国务总理，王任陆军总长。徐、王婉辞。冯等三人主段复职。黎被迫请冯、徐赴津劝段回京。

△　国会各政团协商时局问题，议决共举代表赴津留段（祺瑞）等三项解决办法。

△　日俄换文，俄允在和会中赞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及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岛屿。

△　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停办，呈教育部核准分办，改名中国大学。

3月6日　　段祺瑞回北京复任。冯国璋曾与黎元洪商订段复任条件：一、阁定外交方针总统不加反对；二、阁拟命令总统不拒盖印；三、阁训电各使、各督军省长，总统不加干预。徐世昌、王士珍据此已先电告段。

3月7日　　段祺瑞就复任事密电各省及各驻外公使，称阁议对外方针，黎表赞同，政府既定对德方针，“切勿再生异议，致碍进行”。

△　北京政府电驻协约各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声明，中国已决定对德绝交，赞助协约国方面，并磋商条件。

△　梁启超致函段祺瑞，陈述目前对外切要之事，提出即日将德、奥商船捕获，同时宣布绝交。

△　张作霖赴驻奉日总领署，为“郑家屯事件”向日领道歉。

△　吴稚晖、蔡元培、张继等在上海《中华新报》发表留法俭学会缘起及会约，鼓励青年留学法国。

3月8日　　国务院宴请国会政团领袖及反对加入战团之议员，交换对德问题意见，百余名议员出席。段祺瑞报告对德交涉经过及政府主张，允诺“尊重”国会意见，决定将此案提请国会议决。次日，复宴请国会议员，汤化龙要求议员支持政府方针。

△　国务院致电章宗祥，提出对协约国三项希望条件，令面交本野，“托其格外应援”。三条件大要为：一、庚子赔款德奥方面永远撤销。协约方面展缓十年偿还；二、现行进口关税值百抽五，改正价表后值百抽七点五，裁厘后值百抽十二点五；三、解除《辛丑条约》中国于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兵，并解除各国驻兵使馆及京津铁路之约束。20日，本野对章使表示：中国参加战团，则联合战团必须好意相商，若“抱有交换之隐衷”，必“无良好结果”。

△　梁启超致函段祺瑞，续陈内部整理之事，提出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若国会不以为然，则由总理兼代；宜设临时国际政务委员会，以为总理补助，由总理任会长，聘请朝野名流为委员；作速筹备新国会选举。

3月9日　　孙中山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望“勿以中国投

之不测之渊”；并电英首相劳合·乔治，盼勿怂恿中国加入协约。

△　段祺瑞宴国会议员于北京迎宾馆，疏通对德绝交意见。

△　日人在济南贩卖制钱，华警查验运钱车辆车捐，日人开枪击伤警察，捕去巡长，当由交涉员向日领署交涉。我国旋允将截获之制钱，交还日人，并定二个月后禁止收买。

3月10日　众议院表决通过对德国绝交。次日，参议院亦表决通过。

△　德公使辛慈致外交部复牒德政府，拒绝中国政府2月9日抗议通牒，称“碍难取消其封锁战略”。

△　上海总商会电请国务院对欧战保守中立。各地商会随即纷电响应。

3月11日　冯国璋离北京返南京。

3月12日　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推翻沙皇，15日建立临时政府。29日，外交部照会俄公使，正式承认俄国新政府。国会亦电俄国会致贺。

△　广东省政府向日本台湾银行订借日金300万元，以该省士敏土厂作抵。

△　外交部致电驻德公使颜惠庆，中德绝交后，所有驻德、驻比馆务，及侨民、学生等事务，托丹麦国照料保护。

△　唐文治、王丹揆、吴稚晖等在沪发起组织“扶持民德社”，是日发表简章，声称该社“以发达国民道德心为目的”。

3月13日　国务院成立政务评议会，以段祺瑞为会长，伍廷芳副之。另聘王士珍、陆徵祥、熊希龄、曹汝霖、汪精卫、汪大燮等10余

人为评议员。该会以研究对德绝交后之外交事项为目的。是日，开首次评议会。

△　张勋函邀杨度到徐商议国是。是日杨度复函称：“今日时局，内政不修，外交轻率”，劝张趁此“既绝交而未宣战之间……亟谋内政之改革”，“挽此将亡未亡之局”。

3月14日　黎元洪布告即日起与德绝交。同日，外交部照会德公使辛慈，令其出境。25日，德使启程回国，驻各地领事先后出境。

△　外交总长伍廷芳与协约国驻京公使谈判对德绝交后之条件，各使意极冷淡。

△　教育部改订大学制年限，定预科二年，本科四年，设文理二科，其法、农、工、商、医等科另设。

△　财政部通告各省及各地税务处停付德款，暂存中国银行。

△　厦门交涉员罗昌接收德国商船“姜维号”。同日，驻沪海军接管德国泊沪商轮。

△　上海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请保护工商业，勿使日本之进出口免税。

△　海军编为巡洋、长江、练习三舰队，以林葆怿、饶怀文、曾兆麟分任司令，分驻上海、南京、福建。

3月15日　湖北省奉命收回汉口德国租界，次日直隶亦收回天津德租界，更名为特别区。

△　荷兰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表示愿代理德国在华事务。

△　荣宗敬、祝大椿、刘伯森发起组织之华商纱厂联合会在沪成立。华商纱厂代表会议致电北京政府，请坚拒日本之棉花免税。

△　陆军部将中德断交后对德人临时检查办法及德国在华财产有关军用者处理办法电知各省区。

△　黎元洪指令黑龙江省索伦山宣抚局改为设治局。

3月16日　四川万县开为商埠。

△　荷兰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请展限济南德领撤离期限。同日，外交部致电各省交涉员，称德领出境，要求展限时，可通融办理。

3月17日　驻上海法代总领事那齐以“防范德人”为名，派警将同济医工学堂解散。旋经教育部派佥事沈彭年到沪与该校董事协商，收归华人自办，更名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并于同月31日将学校迁至吴淞中国公学旧址。

3月18日　废清陕甘总督升允在青岛进行复辟活动，是日访晤驻青岛日守备军司令官大谷，探询日本对复辟之态度，并要求给予支持。

△　财政部致电各省，通告停付德款，另款存储，不得挪用。

3月19日　英、法、日、俄、意、比、葡七国驻京公使致外交部觉书，劝中国加入协约国。

△　中华工党总部致书万国工党总会，表示“甚愿得我友邦工人之助，并愿加入贵总会”。

△　奉天第五十三旅汤玉麟部在新民屯哗变。张作霖撤销汤玉麟旅长、刘景双营长职务，并派第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率兵包围新民，监视汤、刘交卸。汤率所部偕“老二哥”、“钻天燕子”等股匪千余人奔广宁投冯德麟。

3月20日　内务部拟定《德国在中国财产处理办法》，通电各省查照办理，并咨外交部。

△　上海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公布《保护德侨办法》，凡六条。对在沪德侨居住、财产、职业以及出入境等均作规定。

△　川军军官电北京政府，要求川、滇军待遇一视同仁，或解督军罗佩金职。

3月21日　协约国驻京各公使照会外交部，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各国将以善意与中国商量所提条件。

3月22日　广州、武汉总商会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加入协约国，以免贻害商业。

3月23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组织之保利银公司宣告解散。自国会讨论保利借款以来，众议院对于收炼制钱合同多所修改，于公司不利，商人多撤回股款，保利银公司为之解体。是日，该公司发出宣言，说明解散真相。

△　湖南公民龙璋、刘重等人致电国会，请准将湘省公矿仍归地方公有，反对中央接收。

3月24日　外交部照会荷兰公使贝拉斯，准德领事馆下级官员留华协助处理在华事务。

△　驻沪法代总领事那齐布告，令沪法租界德侨“恪遵取缔章程”。

△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排字两部工人200余人为争取结社集会自由，反对无理解雇工人，举行罢工。越三日，罢工波及中华书局，人数增至700名。

3月25日　德公使辛慈离京南下，27日抵吴淞，乘荷兰邮船“莱姆白兰特号”回国。

△　交通部与日公使林权助订立《胶州湾租借地邮电暂行办法》。5月4日换文。

△　中华工党四川支部在成都开会，到50余人，宣布恢复活动，推萧植筠、袁践方为理事。

3月26日　广东督军陆荣廷入京，筹商广东军事、财政事宜。

△　梁启超致函国际政务评议会，主速对德奥宣战。29日，章太炎、谭人凤致电北京政府，斥梁参战主张。

△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约见章宗祥商谈中国参战条件，声称日本对中国并无野心，中国“果有信用日本之意，不妨将真意告知”，不必提出希望条件，“方可诚意接洽”。

△　日本陆军大臣大岛训令驻青岛日军守备司令官大谷转达升允，谓清室复辟“目下尚非其时”。

3月27日　众议院议决咨请政府不得收买存土，越二日，参议院亦通过该议决案。

△　外交部致函驻京瑞典公使，请该国政府代为保护照料中国在比国利益。31日瑞使复照外交部，表示“本国政府极愿照办”。

△　靳云鹏、李国筠等联合平社、澄社、宪政会、新民社、衡社、静庐、正社、友仁社、宪法协议会、苏园、尚友会11政团组织“中和俱乐部”。

3月28日　国务会议议决德国领事裁判权由荷领代理。

3月29日　陆军部致函外交部，称已择定安置德国在京军人于海

淀附近之朗润园收容所，于4月2日午前在中华门内集合，听候中国军官点收后引导前往。

△　直隶公民协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反对对德宣战，并通电各省省长督军等“通电力争，共救危亡”。

△　第五次中日铁道联络会议在东京举行。

3月30日　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内外党员，准备恢复国民党。

△　法公使康悌照会外交部抗议美商敷建株钦铁路。

△　四川督军罗佩金请假赴北京请训，其职务以韩凤楼暂代。

3月31日　黎元洪令准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文运辞职，遗缺任命李开侁继任。

△　康有为致书黎元洪、段祺瑞，反对对德宣战。

4月

4月1日　以中英禁烟条约禁绝鸦片之期届满，上海工部局收回租界烟土售卖执照，即日起各土栈烟膏店闭歇。上海禁止烟土入口。

△　经中东路回国之俄军在绥芬河、一面坡等地大肆抢掠，伤毙人命，是日吉林省长郭宗熙电请外交部交涉。

△　黎元洪任命杨桂堂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原任冯玉祥调京另候任用。

△　全国警务会议在北京开幕。5月8日闭幕。

△　江皖水利联合研究会在上海开成立会，选韩国钧、柏文蔚为理事长。该会以研究治水学术和联络督促苏、皖两省水利规划进行为

宗旨，会所设于南京。

4月2日　中国驻比利时馆员及华侨40余人撤往瑞士。

△　法国新任驻沪代总领事魏尔登抵沪，次日到任，16日代行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委员会主席职。24日，卸任法驻沪代总领事那齐回国。

△　广东省政府为解决士敏土厂营业资金，以该厂全部财产为担保，续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日金300万元借款合同。

4月3日　美孚公司请停办陕西延长油矿，由熊希龄呈请废约。

△　鞍山炼铁厂破土动工。

4月4日　荷兰公使贝拉斯致牒外交部，抗议收回德国在华租界，谓中德虽经绝交，并未宣战，不能适用敌国之待遇，遽将租界收回。

△　黎元洪令免陆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职，以孔繁霨继任。

△　法国在沪招募之华工首批100名放洋。25日，第二批100名启航。

4月5日　旅沪各省公民张人杰等致电北京政府，请勿对德宣战。

4月7日　荷兰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询问中国政府待遇在华德侨情形。

4月8日　冯国璋电北京政府，反对加入协约。

△　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再商中国参战条件。

4月9日　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到京商外交大计。

△　驻汉口、济南、天津、厦门德国总领事等由沪乘荷兰邮船回国。22日，驻川德总领事由沪启程回国。

△　四川省议会上书国会弹劾曹锟，列举曹勒索款项、纵容军队强迫服役等罪状，请即要求政府调查。

4月10日　黎元洪特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陈炳焜署广东督军，谭浩明署广西督军。

△　段内阁会议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无结果。

△　北京政府以行政处分与法律案有别为由，将国会议决之取消购买存土案退回。

△　冯国璋致电北京政府，告以将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会议，“所有中央计划自应遵照一致进行”。

4月11日　冯国璋通电各省，主加入战团。

△　美公使芮恩施通告外交部，美国于4月6日向德宣战。

△　荷兰公使贝拉斯为中国审理德人刑事诉讼暂行章程事，照会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

△　川军师长刘存厚、周道刚、钟体道、陈泽霈、熊克武联名电黎元洪、段祺瑞，指控川督罗佩金调集滇军，“于资、简一带，以钳制川军第一师；一方集兵力于成都附近，以进迫川军第二师，俨若大敌当前，准备征战”。

4月12日　是日及15日蔡锷、黄兴国葬典礼先后于湖南长沙举行。

△　外交部照会荷兰公使贝拉斯，告以停发德人在内地游历护照原由，称中德断交，德人任便游历，诚恐致生意外危险。

△　赴法华工800名自浦口放洋。

4月13日　日军撤离郑家屯。

△　外交部照复荷兰公使贝拉斯，声明中国对待德侨及其财产，悉照国际公法办理。

△　荷兰公使贝拉斯致函外交部，要求将德使辛慈回国通行券之限期取消。德国以扣留驻德公使颜惠庆等为质。

4月15日　川督罗佩金假裁军名义，指挥滇军袭击成都川军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师参谋长周绍芝被俘，全师官兵被缴械遣散。

△　陆荣廷不愿参加段祺瑞之军事会议，离京回粤。

4月17日　国务会议议决取消收买存土合同。

△　川军旅长刘湘、卢师谛、但懋辛等联名通电，抨击罗佩金偏私，因裁兵朦电中央，强力去刘存厚、陈泽霈，并勒令四师解散，请中央公平处置，以定川局。

4月18日　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为炼铜厂事受贿案，被黎元洪令免本职交付法庭依法办理。

△　驻成都川、滇军队开战。按：罗佩金奉北京政府令裁编驻川各军，靳云鹏将罗裁兵计划秘密泄与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引起刘的反对，衅端遂启。

△　李石曾在上海《中华新报》发表《移民意见书》，主张利用欧洲大量招收华工之际，办理移民事业。

4月19日　川军师长刘存厚围攻督署，通电宣布与“罗督军脱离关系”，并作正当防卫。是夜，刘军纵火焚烧成都皇城周围商民数百家，火势延烧三日之久。

△　阮忠枢（张勋代表）自北京密函张勋，略谓倪嗣冲之计划，“皆欲假手于我公，是利用我公”，并“于利用之中，且隐有倾陷之意”，建议张勋可派一代表“周旋其间”，而不必来京赴会。

△　张勋派商衍瀛到天津与张镇芳、雷震春密商发动复辟、控制北京计划。

△　交通总长许世英为津浦铁路正副局长购买机车舞弊案引咎请辞。次日，黎元洪致意挽留。

△　黎元洪指令停办国史馆。

4月20日　宪法审议会二读结束。二读期间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共89条，原案通过者53条，原案否决者八条，修正案通过者13条，悬搁未决者一章15条。

△　黎元洪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任罗为超威将军；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任刘为崇威将军；戴戡暂行兼代四川督军；另任刘云峰为陆军第二师师长。24日，唐继尧与滇省议会分别通电反对。

△　驻成都英、法、日领事邀督军、省长及刘存厚三方代表在法领事署会商调停办法，议定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队防区之间，使双方脱离接触。

4月22日　戴戡会同领事团及川省巨绅，邀集川、滇军队代表在省署会议调解办法，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约定川、滇两军三日之内退出城外。25日，滇军开始撤离成都，次日川军亦退出城外，省城战事乃告止息。

△　国务院查复参众两院咨请查办前四川将军陈宦案，称“经查明被揭各款，或传闻失实，或无事佐证，本日呈奉大总统免予置议”。

△　津浦铁路局长童益临以购车舞弊交法庭惩戒。

4月23日　黎元洪任命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张习为查办副使；同日并令川、滇两军停战。

4月24日　参议院开会，段祺瑞出席报告三案处理情形，略谓收买存土案已电南京设法取消，财政部受贿案已交法庭办理，交通部租车案合同已令取消。

△　黎元洪指令委任各省长、都统监督司法行政事务。

△　黎元洪以刘存厚违抗停战命令，令着即免去崇威将军，听候查办，并令成都川、滇两军开拔出城，不得再滋事端。

△　川、滇两军又在四川简阳发生冲突。国务院旋据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电告经过，即电饬戴戡查明阻止。

△　云南省议会通电痛陈川事，请大总统收回4月20日成命，仍令川滇两军停战，听候彻底查办。并称刘存厚叛政，“倘再姑息，祸不堪言”。

4月25日　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对德参战事，各省督军、省长及都统曹锟、孟恩远、王占元、李纯、阎锡山、张怀芝、赵倜、倪嗣冲、田中玉、蒋雁行及督军代表杨宇霆等26人到会，陆海军总次长、参谋总长列席。次日通过对德宣战案。

△　中孚银行上海分行举行开幕式。资金200万元，经理孙元方，总行设于天津，分行设北京、上海、武汉等处。

4月26日　外交商榷会通电各省议会、商会、农会等，反对对德

宣战。

4月27日　段祺瑞电驻日公使章宗祥，令将各省督军赞成对德宣战案通知日本。

△　黎元洪任命曾继贤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　湖南常宁县水口山矿工千余人要求加发红奖举行罢工。次日，矿当局被迫宣布加发红奖，罢工乃停。

4月28日　黎元洪令驻川滇军一师着编为陆军第十四师，任顾品珍为师长。

△　川籍国会议员李肇甫、孙镜清等10余人晤段祺瑞，请以岑春煊督川。

4月29日　刺杀宋教仁案要犯洪述祖因德商韦尔债案被控，在沪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堂逮捕。

4月30日　荷兰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抗议中国陆军部颁定《关于离华德人办法》及《保护现在中国之德国商人教士办法》，称其中规定显然违反条约中最惠国条款。

△　陕西郭金榜等聚众攻陷宜君、延长两县。

△　交通银行自去年5月间停兑后，是日上海、苏、浙分行恢复兑现。

是月　蔡公时等在北京创办之民国大学开学。

△　四（平）郑（家屯）铁路开工修筑，由“满铁”承包。11月竣工。1918年1月开始临时营业。

△　华宝谦记煤矿公司创设于天津，经营山东泰安矿区，资本100

万元。

5月

5月1日　　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旋由段祺瑞率同阁员面请黎元洪核准，黎谓“一俟通过国会，即将命令盖章”。

△　日公使林权助访晤黎元洪，警告中国政府：若议会否决参战案，将有使政局发生纷扰之危险。

△　财政部向法国中法实业银行借款1125万法郎，以钦渝铁路库券为担保，是为财政部中法资金库券借款。同日，又签订41万法郎钦渝息款垫款借款。

△　日商为操纵湘省金融，攘夺矿权，在长沙开设“中日银行”，资本10万元，发行钞票竟达200万元，是日强行开幕。后因湘人反对，旋即宣告暂停营业。

△　哈尔滨中东铁路机械总工厂中俄工人联合附近货栈、商店、作坊工人，聚集于秦家岗（今雨岗）教堂前，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后整队游行。

5月2日　黎元洪特任李经羲为财政总长。

△　四川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请饬滇军离川出境。

△　京师东路警备队司令高清山率警备队300余名哗变，向蓟州（今河北蓟县）盘山逃去。旋在芦台缉获。

5月3日　　段祺瑞宴请国会议员疏通参战案，要求议员认清世界大势，予以赞同。倪嗣冲等亦纷宴议员，为段疏通参战案。

△　倪嗣冲率督军团张怀芝等谒黎元洪陈述对德宣战问题，黎责

倪擅离职守，干涉外交。

△　奉天省议会及商工农学各界代表集会，一致反对对德宣战，并议决致电北京政府阻止。

△　黎元洪以津浦铁路租车、购车两案经派员查明确有弊端，责成交通部将前合同迅即取消，并将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王家俭、副局长盛文颐一并交法庭归案办理。

△　黎元洪令准交通总长许世英辞职，以代交通次长权量暂行代理部务。

△　四川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及各省，通告戴、刘之争始末及祸川惨状。据红十字会调查，七日之内，成都人民伤亡达5000以上。

△　内务部呈准恢复山西清源（今清徐）、平顺县治。

△　外交部致俄公使库达摄夫节略，同意成立中俄委员会，协商收回逃入新疆之俄国回民办法。

5月4日　　督军团宴请国会议员，为段祺瑞疏通宣战案，出席者300余名。李厚基代表各督军演说，以“为国民请命”自诩，扬言“不惜一时之名誉”，主张对德宣战，要求议员“务谅政府之方针进而赞助”。

△　高等检察厅逮捕许世英，旋即保释。次日，国务会议以许无罪证竟被任意逮捕，指责检察长杨荫杭滥用法权，议决令其停职查办。

△　江苏省嘉定县遭雹灾。是日，农民3000余至县署请愿，要求知县下乡踏勘，竟遭警士开枪捕人，群情愤极，拥入警署，被捕农民获释。旋知县许以惩凶、踏勘，农民始散。

5月5日　　旅沪各省公民团夏芷芳等2600余人致电北京政府，声

明“宁死不欲宣战”，并请国会“勿予通过”。

△　江西省议会通过弹劾省长戚扬案，并致电北京政府，谓戚“枉法蠹政之罪，罄竹难书”。

5月6日　国务院致电戴戡，挽留兼任代理川督。

△　丙辰俱乐部议决反对对德宣战。

△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推定王正廷、黄炎培等九人为临时干事。

5月7日　国务院对德宣战案咨送众议院。

△　国会政余俱乐部在北京成立。推定王正廷、胡汉民等人为总务干事。

△　北京政学会、益友社、讨论会、平社各政团讨论对德宣战问题。益友社反对宣战，其他政团主张交全院委员会。

△　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来华抵青岛，旋赴徐州、南京往晤张勋、冯国璋，18日到上海并参观兵工厂。6月5日，田中到北京，次日晤黎元洪。

△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北京病逝。

5月8日　众议院开秘密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段祺瑞出席敦促投票表决，结果议决提交全院委员会审查。

△　梁启超发表《外交方针质言》一文，在众议院门前散发，主张对德奥宣战。

△　在京各督军议定，如全院委员会不通过对德宣战案，当积极进行解散国会。

5月9日　政学会开会否决宣战案。

5月10日　北京公民请愿团围攻众议院。上午10时起，陆续有“公民”数千人麇集院门，各揭“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学军商界请愿团”、“北京学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白布旗，在陆军部人员指挥下，散发传单，迫令议员赞成政府宣战案。在场军警不予阻止，致有反对宣战之议员10余人被暴徒殴伤，议员被围困达10小时之久，至晚段祺瑞始派马队将“公民团”驱散。

△　谷钟秀为“公民团”围攻国会事件愤而请辞农商总长职。次日，张耀曾、程璧光分别辞司法、海军总长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亦微行出京，至是内阁仅剩段祺瑞一人。

△　黎元洪令准吉林省增设勃利县（现属黑龙江省）。

5月11日　黎元洪令司法部将“公民团”滋事人交法庭依法究办，并责成内务部饬警妥为防护。

△　孙中山、岑春煊、章太炎等致电黎元洪，请严办“公民团”。

△　孙中山就段祺瑞派员到沪疏通宣战案一事复段书，重申反对参战理由，坚持反对加入战团。

△　直隶省长朱家宝及张镇芳、雷震春等认为目前政局动荡，为复辟大好时机，派谢介石持密函至徐州劝张勋乘机复辟。

△　广东中国银行分行以该省盐税剩余金担保，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日金150万元借款合同。

5月12日　荷兰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转达德国政府仍盼了解中国政府对待德侨及德产之意向，再请特别声明。

△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遗体在沪法租界举殡。18日，归葬湖州碧浪湖。

△　兼代四川督军戴戡率黔军熊其勋旅到成都。滇军撤出成都，屯集简阳、仁寿。川军第二师撤至成都西门外。成都局势平静。

5月13日　　川省议会提出罗佩金弹劾案，称罗督川，“横暴阴险，较之陈宦尤甚”，并电请北京政府勒令滇军克日退出川境。

5月14日　督军团宴请协约国公使，李厚基致词表示政府愿加入战团，俟议会疏通即可表决。

△　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章太炎、温宗尧再电黎元洪，请严惩滋扰国会暴徒之主使者陆军部咨议张尧卿等六人及国务院参议陈绍唐。

△　宪法审议会否决“孔教”为国教，将《宪法草案》有关条文撤销，并将第十一条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陈焕章就此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唆使孔丘信徒“抵死力争，务使宪法规定孔教为国教而后止”。

5月15日　是日及16日，段祺瑞先后两次咨请国会从速议决对德宣战案。

△　督军团又宴请国会议员，为段祺瑞疏通维持内阁，实现对德宣战案。

△　日首相寺内致意段祺瑞，先稳固自己地位，再图参战。

△　川督罗佩金通电指斥国务院挑拨川军之事实，以听舆论。

△　金城银行开幕。周作民任总经理。总行设天津，于北京设立分行，并设分庄于上海办理汇兑事宜。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

5月16日　孙中山致电政学会等三政团并国会议员，力促否决宣战案。

△　张作霖致电段祺瑞，坚持宣战主张，表示“无论作何地步”，誓将“执鞭弭以从公后”。

△　内务部呈准黑龙江设立龙门（今海伦县）、绥楞（今绥棱）、通北（今并入北安）、泰来、漠河五县。按：该五县均由设治局改县。

5月17日　黎元洪令财政部迅即拨银10万元赈抚四川兵灾。

5月18日　英文《京报》刊登该报主笔陈友仁《出卖中国》一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中日借款一亿元密约。次日，陈被警厅逮捕，旋以“妨害公务”罪处以徒刑四个月。6月4日，黎元洪令特赦陈友仁。

△　督军团代表张怀芝竭黎元洪，请解散国会。黎不允。

△　黎元洪派范源濂赴津请徐世昌入京调停督军团干政，被徐拒绝。

△　法国在沪招募之第三批华工100名于沪上放洋。24日，第四批华工100余名亦由沪赴法。

5月19日　众议院以现内阁仅剩总理一人，不足信任，决定宣战案俟内阁改组后再议。

△　督军团借口宪法会议通过之宪法条文，将导致“议会专制”，陷内阁于“颠危之地”，呈请黎元洪即日解散国会，改制宪法。

△　孙中山致电国会议员，忠告两院应先否决宣战案，然后再议内阁存否。

△　外交部照会荷兰公使贝拉斯，抗议德国扣留中国留德学生及留比京学生。

5月20日　　张勋致电督军团支持解散国会，声称“勋当力持正义，为诸公后盾”。

△　湖南绅士在长沙召开公民大会，成立金融维持会，举陈炳焕为会长。24日，该会致电北京政府，请与驻京日使严重交涉，并咨行湘省长封闭“中日银行”。

5月21日　黎元洪召见孟恩远、王占元，告诫督军团切勿干涉宪法。

△　督军团呈请解散国会未遂，各省督军相率出京，赴天津、徐州等处开会。

△　段祺瑞访王士珍，请其代理总理职务，王推辞不就。

△　升允自南京到上海，晤郑孝胥等，商议复辟事。

5月22日　孙中山与岑春煊、章太炎、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议员，要求政府“遵守大法，消弭战争”，“若与政客交换条件，使少数人得被擢用，而以国家为牺牲，无论官僚、民党，悉为国人之所不容”。

△　山东省议会议长及绅商学界代表面诘张怀芝不该联名呈请解散国会，干预宪法，并称：“督军倘再赴徐州会议，发出种种违法之通电，我鲁省绅民即不复承认公为本省督军”。

5月23日　黎元洪令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着伍廷芳暂代；任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同日，黎通电各省阐明段免职原因，并派员赴津敦请徐世昌出任总理。

△　段祺瑞通电各省不承认免职令，声称免职令未经其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越二日，伍廷芳通电声明免职令符合约法规定。

△　张勋召集督军团开第四次徐州会议，10余省督军及督军代表与会，段祺瑞派徐树铮等参加。议定由津浦、京津、京汉三路进攻北京。张勋在会上提出复辟问题，各督军均表赞同。

△　黎元洪令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部务。

△　云南督军唐继尧致电北京政府及各省，反对督军团武力干政，宣布拥护国会。

5月24日　张勋致电黎元洪陈述徐州会议各督军反对免段职令，声称“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经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并以“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相威胁。

△　吴笈荪、饶汉祥奉派到津促徐世昌出任国务总理，徐以“杜门谢客，不能入京”为辞，拒不见面。

△　川滇军复起冲突，戴戡电京请辞四川省长兼代督军职。

△　湖南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督军团解散国会言行。

△　黎元洪任命王承斌为直隶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5月25日　黎元洪至王士珍私宅，劝王出任国务总理。王婉言谢绝。

5月26日　陕西砖坪县奉准更名岚皋县。

5月27日　黎元洪电请梁启超入京，梁复电谢绝。

△　英国在沪招募华工第四批200名放洋。按：前三批华工共400

名已先期启航。

5月28日　黎元洪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　张作霖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及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

△　蒙匪巴布扎布余部8000余人陷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弃城潜避。

△　四川懋功县察都和尚若巴僭称帝制，是日登极，伪号“大清”，改元“通志”，设立伪官。6月10日，伪皇帝发布招降川边22土司诏，妄称“推翻民国，重建大清”。据地数百里，拥众数万。经川省当局派兵进剿，至11月始平。

5月29日　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宣告安徽独立，宣布“自今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旋下动员令，并截留津浦路车辆，运兵北上。

△　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致电黎元洪宣告河南独立。

△　张作霖再次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删定宪法，组织“良好内阁”，否则“当率辽奉子弟，直捣京师”。旋于6月初，派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率同奉天独立军混成一旅向滦州进发，并令驻锦州第五十六旅开赴山海关。

△　安徽督军张勋致电杨善德、齐耀珊，敦促浙江宣布独立，声称“此事既经发动，决无游移，务祈克日进行，以期一致”。次日，杨、齐宣告浙江独立。

△　张嘉璈等在上海创办《银行周报》，诸青来等任编辑。

5月30日　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对于时局取旁观态度。

△　王士珍在北京召集军事会议，曹锟、李纯与在京高级军官出

席，议决致电倪嗣冲等主张和平解决时局。

△　奉天督军张作霖通电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

△　滇黔桂粤等省督军力诋倪嗣冲等叛乱行为。湘督谭延闿通电各省督军省长请“合力调融，用奠危局”。

△　日商开办大连交易所钱钞信托株式会社，资本300万元。

5月31日　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辞职，吴景濂当选为议长。

△　毕桂芳、许兰洲致电黎元洪，要求收回免段职令，否则“江省亦惟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进行”。

△　黎元洪通电冯国璋及各督军省长等，指斥倪嗣冲等倒行逆施，分裂割据。

△　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电攻击“国会专制”，宣布陕西将“与皖、鲁、豫采取同一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

△　山东督军张怀芝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重组内阁，否则山东将“对中央脱离关系，与奉、皖、豫、浙、秦等省为一致行动”。

△　驻岳军总司令吴光新通电称独立各省“已相继自由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宣布岳阳“自本日起，一律戒严，所有地方行政、财政、司法、交通、金融各机关，应移居于司令官监督保护之下”。

是月　日商在大连开办满洲制麻株式会社，资本100万元。

6月

6月1日　黎元洪令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共商国是。

△　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朱家宝等通电宣告直隶独立，并令驻涿州混成旅移驻长辛店。次日，复派驻保定第二十师七十七团连夜开赴良乡，威逼京师。

△　王占元、卢永祥分别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

△　驻河南洛阳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发出通告，声称：部分军队即开抵郑州，“静候徐、皖、鲁、直约定日期”，出师北上。

△　冯国璋致电各省，力主“调停”。

△　陆荣廷同两广督军省长联衔电请冯国璋，“解出蓁难，以固共和”。

△　李烈钧通电黎元洪、参众两院及各省，吁请“护法卫民”。

△　唐继尧致电黎元洪，促李经羲即日就职，组织内阁。

△　上海总商会以皖浙独立，商业恐慌，呈请护军使并电冯国璋等，要求“迅赐消弭，以救危殆”。次日，京师总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各省，吁请悯商民之痛苦，和平解决时局问题。

△　伍廷芳、黄炎培等44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宣言及组织大纲。

6月2日　　徐树铮策划独立各省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以徐世昌为大元帅，雷震春为总参谋长，并宣布另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

△　黎元洪提出解决时局五项条件，4日派钱能训赴津面告徐世昌。5日，徐亦提出解散国会等四项答复条件。

△　张勋电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为罢兵交换条件。

△　安武军“北伐总司令”倪毓棻奉命率队进攻北京，是日自蚌埠出发开赴天津附近之良王庄。

△　黎元洪以教育总长兼署内务总长范源濂因病请辞，给假“调理”，令张志潭、袁希涛两次长分别代理内务、教育部务。

△　研究系国会议员蒲殿俊、林长民等60余人，致书两院议长，声称反对派议员借“外患之起转为内讧之媒”，提出辞职。

△　广西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及各省，要求严惩倪嗣冲，以遏乱萌。

△　总统府顾问哈汉章、总统秘书黎澍、军事顾问金永炎等三人辞职离京赴津。

6月3日　副总统冯国璋致电参众两院提出辞职。8日，黎元洪电冯及各省，以约法规定，副总统未代行总统职权之前，“仅属荣名，无职可辞”，予以慰留。

△　王士珍通电各省，转告黎元洪解决时局办法：“解散国会，即筹适当手续。至总统地位，决不留恋”，要求各省速饬已动之军队，暂驻现至之地；未动之军队，仍行驻扎原处。

△　代总理伍廷芳电请督军团派代表入京商榷和平解决办法。

△　冯国璋派警察厅长王桂林赴徐往晤张勋，提出改组国会等三项解决时局办法。张勋表示：复辟是“一劳永逸”之解决办法。

△　山东督军张怀芝派旅长徐凤宾率一支队开赴天津附近之独流镇、良王庄一带。

△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第四次来华，8日秘密抵天津。西原此行目的，在于促进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权。

6月4日　　黑龙江省督军毕桂芳、师长许兰洲以胁迫黎元洪下罪己令，解散国会未遂，是日通电宣布黑龙江省独立。

△　晨，海军总长程璧光入见黎元洪，告以张勋复辟之严重性，促黎“急离京暂避其锋，免为要挟”。黎未决。

△　绥远口北司令兼旅长王丕焕致电北京政府称，绥远都统蒋雁行请假，自任都统，并宣布独立，与同中央脱离关系之各省取一致行动。

△　热河都统姜桂题致电黎元洪、王士珍，主张解散国会，以去纠纷，并宣布即日赴京调停。13日，姜抵达北京。

△　王士珍派员赴津与“总参谋处”磋商调停办法。参谋处称：各省开出之军队“万难折回”，并要求总统迅速退位。

△　曹汝霖入京往晤日公使林权助，告以：昨日（3日）曾在天津和督军代表等详细商讨，结果决定：“一、废除约法；二、使黎元洪退位，给予相当优待；三、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徐世昌为大元帅（徐已承诺）；四、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并谓：“此时绝对不实行复辟，目前正在说服张勋。”

△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徐世昌出山即能“收大局重谋建树”，并称应先消灭现政府，再谋建新政府。

△　黎元洪任命李思浩兼署中国银行总裁。

△　自1日起，北京《民国新闻》、《共和新闻》等八种报纸先后停版。是日《中华新报》亦以时局濒危，纵言无益，宣布停刊。

6月5日　黎元洪拟辞职，电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冯不允。

△　海军总长程璧光反对督军团干政离京，9日抵沪，谒孙中山。

孙促即出师讨逆。

△ 倪嗣冲复电王士珍，要求“严惩奸谀，解散国会，另组议宪机关，起用老成硕望总理阁员，除帝制嫌疑各人罪名”；并宣称其举兵系“为民请命”。

△ 鲍贵卿致电卢永祥，告以“昨奉命赴津，与军务处接洽，请各军暂勿前进，东海（徐世昌）愿出维持。候绍轩（张勋）北来，共商良策”。

△ 绥远都统王丕焕致电冯国璋及各省，反对共和，主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

△ 交通部致电天津“总参谋处”及独立各省，要求维持交通命脉，请勿扣车、截款及阻碍邮电。

△ 升允致函张勋，谓“今贼党内乱方剧，以足下宗旨素定，正宜建立龙旗，宣言复辟……将共和政体一概铲除”，否则“机会一失，身败名裂……悔之何及！”

△ 美公使芮恩施照会外交部，声称：“中国对德开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美国尤为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与单独负责之政府”。

6月6日 张勋致电独立各省，宣布7日“挈队入京，共商国是”，要求，“各省业经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驻处所，勿再进扎”。

△ 山东督军张怀芝通电各省，坚持“解散国会，重订宪法，组织责任内阁，芟除府中宵小”，反对另组政府。

△ 孙中山、章太炎致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督军省长，主张讨逆救国，指出“中立”实为“窃地拒命”，作“谋叛各省之屏蔽”。

△　曹汝霖以天津“总参谋处”名义，谋求各国公使支持“临时政府”。各使以听命于本国政府为由婉拒。

△　天津“总参谋处”陆宗舆、汤化龙等以争论复辟、共和问题，大启冲突。

△　前浙江都督汤寿潜在绍兴病死。

△　华侨集资创办之《民国大新闻报》在上海出版。《出版宣言》宣称该报“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宗旨。

6月7日　　直督曹锟、师长范国璋通电反对另组政府，指出天津成立“总参谋处”，是为别图拥戴，攫夺政权，要求“以议宪为正论，以国家为前提，抱定宗旨，共扶危局”。

△　广东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略谓逆贼叛国，“征诛而外，无它可言”；“退位”、“调和”，实为“亡国祸胎”，请“号令全国人民，声罪致讨”。

△　熊希龄通电北京政府及各省反对清帝复辟，谓“今南北各省，旱潦已成，赤地千里”，若“再有复辟之举，南方因以称兵，党人借以为名，振臂一呼，乱者四应”，则全国将“土崩瓦解，不可收拾”。9日，冯国璋复电熊希龄，诡称“日来绍帅（张勋）入京，必有最正当之解决，前次传闻之说，未足凭也”。

△　宁夏护军使马福祥致电黎元洪，诡称：国会“一日不散，人心一日不安”，要求总统“明令解散”，并请徐世昌与张勋“同任调护”。

△　黎元洪以农商总长谷钟秀因病请辞，着给假10日调理，令农商次长文群暂代部务。

△　中华全国学生救亡会发布《宣言书》，斥段祺瑞等“媚外以自固，瘠民以自肥”，宣称当前是“国家存亡之关键”，全国学生救亡会同

国人一起拯救国家。

6月8日　　张勋抵天津。所部定武军12营4300余，直开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

△　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奉黎元洪命到天津迎张勋进京。张提出“调停”六条件：一、实行责任内阁；二、解散国会；三、解散省议会；四、改定宪法；五、惩办群小；六、特赦政治犯。

△　孙中山致电西南各省，指出：倪嗣冲等“举兵谋另组政府，为复辟先声”，近又“借口调和，希图解散国会，推翻宪法”，“犹作以退为进之计”，要求“克日誓师，救此危局”。

△　李烈钧应陈炳焜邀请由沪抵粤，筹商出兵讨逆事。

△　黎元洪以张耀曾称病，给假10日“调理”，令司法部次长徐谦代理部务。

△　陆荣廷致电江朝宗，探询中央对于时局之主张，调停能否成功，“幸希密示，俾有遵从”。

6月9日　　张勋在天津电告冯国璋及各省，一俟解散国会命令宣布，即入都“调停”。

△　海军总长程璧光在沪召集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及各舰长讨论“对待时局办法”，决宣布拥护共和，即行讨逆。

△　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致电黎元洪，敦请“毅力主持，声罪致讨”，表示枕戈待命，愿为后盾。

△　浙江旅沪同乡会致电杨善德，宣布叛督附逆独立，浙人誓不承认。

△　俄国临时政府驻华公使库达摄夫向黎元洪递交国书。

△　美国人密勒创办之《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出版。

6月10日　孙中山、章太炎联名电劝黎元洪，勿为奸人所蔽，勿徇叛徒强请，“奉大法以治国，依民意以御暴”。

△　孙中山、章太炎通电西南各省，揭指“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若“任其调和”，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并谓各叛督及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梁启超、汤化龙、熊希龄等“有一不诛”，誓不罢兵。

△　孙中山与章太炎联名致电陈炯明，指出：“君在今日，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宜宣言拥护总统”。

△　陕西讨逆军王飞虎与严雨亭（驻潼关）、李襄初（驻蒲城）三团长及陕北镇守使井崧生、其弟关中道尹井勿幕等进迫省城，驱逐附逆陕督陈树藩，是日，陈树藩弃城出走。

6月11日　张勋在津迭催颁发解散国会令。代总理伍廷芳通电全国，以解散国会命令蹂躏约法，声明拒绝副署。

△　李烈钧、陈炳焜、谭浩明联电黎元洪等，宣布联合西南各省，兴师讨逆。

△　江西督军李纯致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主由冯国璋与张勋以“拥护中央为宗旨，维持大局为前提”调停时局。

△　驻日公使章宗祥致电陆宗舆，告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认为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时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俟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和，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仍非根本解决之道，嘱转达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参考”。

△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日本不支持张勋复辟活动。同日，又急电林权助，以“适当方法”表明日本态度。

6月12日　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并通电全国说明违法宣布解散之苦衷，要求各省长官“勿生异议”。

△　伍廷芳因不肯副署解散国会命令请辞。是日，黎元洪令准免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兼职。国务总理李经羲未到任以前，特任江朝宗暂行代理。江当即副署解散国会命令。

△　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通电全国，指出：“欲保障共和，必先保障国会”，要求西南各省“速兴义师，大张天讨，以全力拥护国会”。

△　唐继尧电告孙洪伊，滇省“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

△　海军总长程璧光电促皖、奉等省取消独立，并宣布海军拥护中央。

△　驻川滇军师长李伯庚、赵钟奇、姜梅龄通电岑春煊、陆荣廷、李烈钧等请速护法讨逆，并指出诸公“不宜自立于调人之地位”，若“我方隐忍以顾大局，彼益猖獗而行诡谋，必使已死之帝政复活”。

△　英国在沪招募华工第五批190余人乘轮赴英。

6月13日　张勋通电独立诸省“撤回军队，效顺输诚”。次日，又通电各省，吁请支持李经羲组阁。

△　李烈钧致电黎元洪，谓“元首、国会同时依法存在，国会可以非法解除，元首亦形同虚废，安时之利犹小，乱法之害实大”。望“坚持初旨，守正不移”。

6月14日　张勋在津与徐世昌、段祺瑞及帝制派诸人密谋复辟，迫令国会解散后，是日偕李经羲入京。

△　冯国璋致电黎元洪、江朝宗、王士珍、张勋，以国会解散

后，第一要着即请王、张致电独立各省“恢复原状，迅杜责言”，其他条件“仍于法律轨范内从容商榷”。

△　孙中山派胡汉民到广州，与陈炳焜、朱庆澜等商讨逆护法。

△　国会被迫解散，两院旅沪议员，是日在上海宣告成立通讯处，以便讨论护法事宜。

△　张作霖致电倪嗣冲，以李经羲与民党有“特别之关系”为由，反对李氏组阁，力主段祺瑞复职。

△　王占元致电倪嗣冲，反对李经羲组阁，提出徐世昌或王士珍出任“最为适宜”。次日，张怀芝通电赞同由王士珍组阁。

△　社会党通告在沪设立筹备处，推谢伯英为筹备主任。

△　黑龙江省督军毕桂芳为该省军务帮办兼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所迫，通电辞职。

△　由张肇达等发起组织之北京烟酒商业银行开业，资本500万元。

6月15日　张勋会见黎元洪，提出：一、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二、请定孔教为国教；三、请批准定武军增加20营。

△　曹锟致电张勋，声称现时“势必军人内阁，乃能统一兵权，大振国威”，主由王士珍出组内阁。

△　广东省议会开会欢迎胡汉民，胡在会上发表时局演说，指出此次事变，“祸机所伏已久”，“不过为帝制之余毒耳”。要求国人勿存“姑息苟安之念”，应尽护法之责。

△　驻粤滇军师长张开儒、方声涛等通电西南各省，出师讨逆卫国。

6月16日　陆荣廷致电黎元洪及各省，谓国会业已解散，各省应即罢兵，如“再肆行要挟”，则“只知维持共和，拥护元首，不恤其他”。

△　孙中山派戴季陶赴日调查中国复辟党在日之活动。戴于21日抵东京，数日后返沪复命。

△　国会议员吴宗慈访晤孙中山，商讨逆护法。

△　张勋着黄马褂密往清宫觐见废帝溥仪。

△　黎元洪令准司法次长徐谦辞职，任命江庸署司法次长代理部务。

6月17日　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指斥国会“无道”，“约法不良”，督军团“勒散国会”，“大有功于国民”，要求总统明令“开国民大会，以公议宪法”。

△　胡汉民奉孙中山命是日赴南宁邀陆荣廷去粤商讨逆。陆主张两广自主，乃托足疾拒行。

6月18日　张勋致电独立各省，以所提条件既经解决，请即“取消独立”，将军队调回原驻地点。

△　广东召开万人公民大会。声讨督军团祸国，通过不承认解散国会令、要求西南各省兴师讨贼等四项决议。

6月19日　是日安徽、直隶、河南、陕西四省，次日，奉天、山东、浙江三省，越三日福建省，分别宣告取消独立，“归附中央”。

△　旅沪国会议员致电西南各省，以解散国会命令违背约法，声明无效。

△　孙中山通电中华革命党党员，准备兴师讨逆，维持共和。

6月20日　粤督陈炳焜、桂督谭浩明联衔致电黎元洪、冯国璋及各省，宣布："国会未经恢复以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遇有重大事务径行秉承大总统训示，不受非法内阁干涉。"

△　黎元洪指令迅速设立内务部办理选举事务局。

6月22日　李经羲通电就任国务总理，宣布"任事之期，断以三月为限"。越二日到院接任视事。

△　天津"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内部武人派、阴谋派、帝制派、复辟派各抱宗旨，互相倾轧，矛盾重重，成立未及旬日，即发生内讧，是日由雷震春宣布撤销。

△　陈炳焜、谭浩明联衔致电冯国璋、王士珍及各省，以李经羲组阁"失所依据"，请速召集国会，依法产生内阁。

△　黑龙江省陆军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与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致电北京政府，以许兰洲胁迫督军退职，宣布与许断绝关系，要求将许调离本省，仍令毕桂芳督军复职。

6月23日　旅沪国会议员发表宣言，要求申讨"倡乱之倪嗣冲，主逆之张勋，以及为之主谋教唆叛乱者"；并谓"假词中立，暗阻义师，或托名调停，袒庇私党，罪与逆均"；声明国会既经解散，今后凡有用总统名义所下条教文电"均不承认有效"。

△　孙中山运动海军护法，是晚在上海哈同花园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海军总长程璧光"会商大计"。嗣由程召集海军将领会议，响应护法，反对督军团叛变。

6月24日　黎元洪特任李经羲兼财政总长，王士珍为陆军总长仍兼参谋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特派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

△　广东督军公署召开筹商讨逆军事大会，通过粤省自主十项条

例，决定从本省各军中编制若干兵力会同驻省滇军克日出师。

△　广东督军陈炳焜借口自主时期军事指挥权应当统一于督军，令高雷镇守使林虎接收警卫军。朱庆澜有滇军支持拒绝交出。

6月25日　“山西全省讨阎军总司令”景霭文自陕州（今河南陕县）通电，以阎锡山附逆独立，宣誓会集义师直捣太原，并请北京政府明令将阎褫职。是日，北京政府致电阎锡山令其和平解决。

△　粤督陈炳焜、桂督谭浩明通电主张恢复国会，解决国是，同日通电申明两广自主。

△　湘督谭延闿致电大总统，以倪嗣冲通电所提各条件，“不独陷命令变更法律之嫌，尤虑启人民破坏约法之渐”，主对修改约法宜加审慎。

6月26日　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在粤部署军事，准备出师北伐。

△　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财政部炼铜厂受贿案。受贿正犯前财政总长陈锦涛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行贿犯虞熙正、陈廷铭、张兴汉亦均被判有期徒刑。

△　上海国民护法会发表宣言，拥护民国约法。

△　黎元洪令准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在文科附设国史编纂处，处长由校长兼任。

6月27日　黎元洪派员赴粤，劝李烈钧从速进兵。

6月28日　康有为秘密至京，与张勋共谋复辟。

△　旅沪国会议员致电李烈钧等，促速率师讨逆。

△　教育部布告改订大学学制办法，规定大学修业年限预科两年，本科四年。

6月29日　　黎元洪令准免张耀曾司法总长职、谷钟秀农商总长职；任命江庸署司法总长，李盛铎署农商总长，龙建章署交通总长。

6月30日　　张勋在私宅邀集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等，密谋复辟。

△　张勋偕刘廷琛潜入清宫，与陈宝琛举行“御前会议”，将复辟行动计划告知清室。

△　黎元洪令准全国水利局总裁谷钟秀辞职，任命李盛铎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孙多森为中国银行总裁。

是月　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对日本扶持段祺瑞北洋军阀提出批评与劝告：“今者北洋军人，虽以武力破约法、毁国会、囚总统，有似优势矣，而其非能统一长久，亦已炳然。纵使贵国加以援助，终难使民心悦服，此贵国政治家所最宜注意之时机也。”

△　日商在天津开办东亚火柴株式会社分厂。是年又在沈阳、大连、济南开办分厂。四厂资本共40万元。

△　薛宝润等在上海创设厚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120万两。

7月

7月1日　　张勋在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凌晨，张勋、康有为等数十人同入清宫，谬称“共和解体，人心思旧”，奏请复辟。上午溥仪发布“即位诏”，诡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改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条列“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等九项施政方针。同日，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王士珍为参谋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各省原督军均为总督、巡抚和都统，张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

△　张勋等致电各省，谬称共和之不若君主，“相距天渊”。“为时势计，莫如规复君主；为名教计，更莫如推戴旧君”，宣布已于是日“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　黎元洪通电全国，否认还政，并谓本日张勋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复辟，经“严词拒绝，誓不承认”，要求各省“迅即出师，共图讨贼”，“复我共和”。

△　孙洪伊电促曹锟及近畿各师旅长讨逆，略谓元恶张勋，倾覆民国，公等“掌握重兵，坐镇畿辅”，应“速决大计，以拯危乱”。

△　梁启超通电反对复辟。指出就外交、财政、军事而论，“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苟延性命之理”。

△　旅沪公民邱啸天等1500人致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略谓“张逆盗国，亡清复辟”，吁请“迅出大军，顺天讨逆”。

△　中华全国学生救亡会在上海成立，名誉理事长王正廷，理事长孙漱岩。该会章程规定：“以联合学生，唤起国民，扶持正谊，拯救中华民国危亡为宗旨”。越二日，致电西南各省，吁请“克日誓师，肃清遗孽”。

7月2日　　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日公使林权助当即通告各国使馆及张勋，声明绝不允许黎作任何政治活动。

△　黎元洪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令准免李经羲国务总理职。

△　段祺瑞与徐世昌略事商量后，即偕同靳云鹏、张志潭、梁启超、汤化龙等从天津到马厂，组织讨伐张勋武力。

△　溥仪授瞿鸿禨、升允为大学士，冯国璋、陆荣廷为参预政务大臣。补授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劳乃宣为法部尚书，李盛铎为农工商部尚书，詹天佑为邮传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

△　湖南督军谭延闿，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四川督军戴戡及山东讨逆军总司令李统球分别通电反对复辟。

△　岑春煊、孙洪伊分别通电声讨叛逆，反对复辟。

△　旅沪国会议员致电冯国璋及各省，吁请国人迅速图起，声罪讨逆，捍卫民国。

△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讨逆檄》，宣布张勋、康有为已成民国叛逆，“再有言调和者，国民当以国贼视之”。上海《时报》、《中华新报》、《民国大新闻报》、《新闻报》亦纷载各界声讨张勋通电。

△　研究系《晨钟报》暂移天津出版。北洋派和交通系各报如《公言报》、《民言报》等停刊。

7月3日　段祺瑞于天津马厂召开军事会议，议决设“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分东西两路讨逆，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两路司令。

△　段祺瑞在马厂通电讨逆，略谓张勋倡此逆谋，将为清室“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祺瑞“曾受恩于前朝”，“不忍”听其“陷于自灭”。

同日，段在讨伐张勋布告中表示，对清室优待条件仍当“永泐成宪，世世不渝”。

△　段祺瑞以黎元洪失其自由，不能执行职务，电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

△　国会议员以非常会议之议决，电请黎元洪南下护法，“而策军事之进行”。宣称：“暂设军事上统一之机关，以达到恢复约法之效力，国会及大总统完全行使其职权为止。”

△　冯国璋通电各省兴师讨逆，略谓“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革命之人”，“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

△　孙中山、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就复辟事集议上海孙寓。程称奉黎元洪之命，“国家危急，嘱孙先生维持国事”。议决以军舰护送孙中山南下广东护法。

△　是日直隶、广东、贵州三省，4日山西省，5日山东、河南两省，分别通电反对复辟。

△　程璧光、卢永祥通电宣布愿率驻沪海陆军将士讨逆，“即日出师，挥戈北上，扫帝制之余孽，杜汉奸之蔓延”，“击楫中流，誓无反顾”。

△　上海召开海陆军大会，海军程璧光、陆军马鸿烈（代表卢永祥）参加，孙中山、章太炎、孙洪伊、林葆怿、萨镇冰等亦出席。议决由程璧光、卢永祥联名通电宣布讨逆。孙中山发言指出：此次讨逆，“匪特为国民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人主义之奋斗”。

△　前参议院议长张继由津抵沪，对来访者发表谈话，指出：段此次讨贼，假名窃义，完全欺人之举。

△　陆荣廷通电黎元洪、冯国璋及各省，声明日前入都述职，私谒故主，“不过摅恋旧之蓄念，并无别意存乎其间”，与张勋合词奏请复辟事，纯属捏造；并谓“荣廷素以拥护共和为职志”。

△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第三师师长张开儒、第四师师长方声涛通电宣布愿率“护国第二军，申讨叛贼”。

△　上海总商会致电冯国璋，请“代行大总统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以维国体”。

△　湖南长沙举行拥护共和万人大会。会间群情激愤，有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字，送会宣布。大会请求谭延闿实践“出师讨贼”之诺言。

△　上海各界6500人举行“中华共和保障会”成立大会，发表宣言书，表示“誓死讨贼”；并通电各省“捍卫国家，人人有责”，要求出师讨逆。

△　上海商界张文卿等144人发表敬告商界同胞书，请悬五色共和国旗，“以示我商民良心上之真是非”。4日起，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全市各商店纷悬五色共和国旗，以示拥护共和，反对复辟。

△　上海神州女界协济社通电表示“誓死效忠民国”，并愿“劝募军饷，以佐义师”。

△　蔡元培致书总统府，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

△　孔丘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电贺张勋“复辟”。6日，又函张勋恳求入觐溥仪，参加“中兴盛典”。

7月4日　　冯国璋、段祺瑞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破坏民国、“辜负先朝”、糜烂京师等八条罪状，宣布率师讨逆。

△　段祺瑞通告宣布军令六条；并致电张敬尧，望“克日拔队北上”。又电田中玉，称张勋“拟劫清帝西走内蒙”，务请会同第七师驻张家口骑兵“朝夕严防，毋令该逆幸脱”。

△　段芝贵东路“讨逆军”第八师自马厂出发，经天津转赴北仓，进驻落垡、廊坊一带。次晨在万庄击退张军，追至黄村以北。

△　曹锟西路“讨逆军”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卢沟桥一带。7日，与张军战于丰台，张军败退。

△　驻马厂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通电讨逆。

△　孙中山与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萨镇冰、章太炎等商迎黎元洪来沪设立民国政府，并发讨逆宣言。同日，致电两院议员盼南下护法，并通电西南六省各界盼速商建临时政府。

△　护国第二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通电主张迁都广州，遥戴黎元洪，维护共和政体。

△　程璧光电告冯国璋，海军仍直隶于黎大总统，“已派兵舰奉迎”。

△　吴光新通电冯国璋及各省，略谓“元首既失自由，应依法拥戴副总统继任，设立共和政府于南京，号令统治，合力讨逆”。

△　旅沪议员通告滞留各地议员来沪，以便择地正式开会，“根据法律讨伐叛逆，解决时局”。

△　前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通电反对复辟。声明“拥护共和，义无反顾，愿随海内，共张挞伐”。

△　贵州省议会通电反对复辟，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继续成立民国政府，并命将北伐。

△　李经羲通电历述张勋入京“调停”及发动复辟事，自认“躬与其事”，应受“重诛”，张勋“造恶构乱”，“罪不容诛”，但要求对张“开一面之网，容其穷蹙知归”。

△　孟恩远自北京电告吉林督军署，宣布即日就任清巡抚，并令“改用宣统正朔，悬挂龙旗”。7日，吉林省绅商各界召开大会坚决反对。

△　溥仪发布“谕旨”，着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各省派员三人克期来京妥议宪法、国会，并着民政部速议具奏行宪筹备事宜。

△　溥仪授徐世昌为太傅。

7月5日　　段祺瑞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自马厂移津，暂以直隶省公署为办事处，并称已电请冯国璋迅即“宣布代行大总统职权日期，早日莅津视事”。

△　段祺瑞致电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以攻城在即，嘱“所有京城地方秩序，使馆界内外之外人暨清室之安宁，均请执事竭力担任维持”。

△　张勋通电各省，略谓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参与策划复辟活动，“数年以来，密谋进行，全仗众力。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省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世昌）、朱省长（家宝）均极端赞助”；“芝老（段祺瑞）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并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倾，人心如此，实堪浩叹”。

△　倪嗣冲通电表白复辟之举“事前既毫未商明，事后岂甘心承认”，今后一切当随冯国璋、段祺瑞一致进行。

△　张作霖致电曹锟等，声称早具反对复辟决心，因“奉省处特别地位”，故“未能发难为天下先”。7日，通电否认参与复辟阴谋，并谓“此次复辟罪在张勋，清帝冲龄，毫无关系，优待条件，当誓共遵守”。

△　鲁督张怀芝等通电请取消帝制，暂由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以维全国统一。

△　浙督杨善德通电宣布：“已由本省第一、二、四各师抽编混成一旅队，组织完备，听候河间（冯国璋）、合肥（段祺瑞）会师致讨。”

△　冯玉祥通电宣布：“誓以铁血拥护民国”，拥段为讨逆军总司令，“誓师讨贼”。

△　驻北京北苑及通州之陆军第一师、近畿陆军第一旅发布讨张勋宣言，宣布“所有一切，均听段总司令指挥”。

△　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致电段祺瑞，表示愿“率飞行队与讨逆各军取一致行动”。7日派飞机投弹轰击清宫。

△　川黔军在成都开战。夜，黔军至北校场察看川军哨所，川军开枪射击，战争爆发。川军势孤，退守西门待援。

7月6日　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　冯国璋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　程璧光派军舰赴秦皇岛迎黎元洪南下，黎执意辞职，不肯南下。

△　孙中山偕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章太炎、陈炯明等由沪乘“海琛”舰南下赴粤护法。

△　冯国璋任倪嗣冲为“讨逆军南路总司令”，所有沪、杭、赣各师旅统归节制。

△　段祺瑞任李长泰为“讨逆军参赞”。次日，复任为“讨逆军东路副司令”。

△　段祺瑞于天津设国务院办公处，并发布惩办祸首令，令曰：“张勋应即褫去本职，并褫夺军职、勋章、勋位，着传知前敌各军严拿务获，尽法惩治。”

△　张勋通电辞“内阁议政大臣”等职，主由徐世昌组织完全内阁，徐来京之前，所有阁务统交王士珍暂代执行，并再次供称徐世昌、冯国璋对于复辟主张“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

△　李纯下令动员誓师北伐，宣布自任赣省北伐军总司令，编组一、二两军，先遣队相继出发。

△　浙督杨善德、省长齐耀珊通电拥护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并请段祺瑞统师北伐。

△　浙江督署开军事会议，议决编组混成支队出师讨逆。越二日，支队开抵上海转赴南京，编入南路北伐军，受倪嗣冲节制。

△　刘存厚增派部队进入成都，川黔军于成都巷战。次晨，川军占领东西两校场，黔军焚毁民房达六七千户，移入皇城固守。

△　贵州督军刘显世通电声讨刘存厚，宣布派遣黔军三梯团，分赴川境，增援驻川黔军。

△　中华全国学生救亡会发表《敬告国人书》，吁请联合西南，共锄群奸；又致函全国学界“群策群力，共拯危亡”。

7月7日　　讨逆军东路发起进攻丰台，西路各队及新加入之第十

二师陈光远部，倒戈之近畿第二旅吴长植部，从后夹击。张勋军向西北方面溃窜，讨逆军遂占丰台。

△　旅津国会议员吴景濂等65人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择地自行集会；请副总统继位，依法组织政府；组织神圣共和军；议定宪法；否认解散国会令，取消清室优待条件；惩办逆党；遣散非法军队等九项兴师讨贼条件。

△　旅津国会议员吕志伊等237人通电，主张“今日救亡大计，必当根据约法解决一切问题”。

△　外交总长伍廷芳抵沪，宣布照常行使外交总长职权，电告驻京各国公使及中国驻外使馆，否认伪外部，声明所有外交事件，仍由其直接办理。

△　旅沪安徽公民阚钧等通电，反对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略谓冯怀抱野心，欲利用时机推翻总统，其罪“不在张（勋）、倪（嗣冲）诸逆之下”，请各省“洞烛阴谋，一致反对”。

△　康有为致函徐世昌，力请维护复辟残局，谓“若公不能力争，致撤销复辟，则咎有攸归，情同附逆”。

△　冯国璋令褫去安徽督军张勋本职并军职、勋章、勋位，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齐耀琳暂兼代江苏督军；着免直隶省长朱家宝本职，以曹锟兼署。

△　冯国璋以讨逆军“荡平张勋逆军之期即在指日”，令所有各省军队，除业经调遣外，“均应各驻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并谕禁所在军民人等“勿得借端号召，致滋纷扰”。

7月8日　陕西讨逆军总司令张钫通电出师潼关，“遵令讨逆”。

△　溥仪发布“谕旨”，开去张勋“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职务，内阁政务暂由王士珍等办理，并俟徐世昌来京会同筹商善后。

△　留日中国学生1000余人在东京召开讨逆大会，戴季陶演说称：前清“遗孽一日不除尽，中华民国国基一日不能巩固”。何香凝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青年“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

7月9日　冯国璋令倪嗣冲节制张勋在徐军队。

△　冯国璋令免伍廷芳外交总长职。

△　讨逆军在丰台车站逮捕张镇芳、雷震春，在天津新车站捕获冯德麟。15日，冯国璋以张、雷、冯“背叛共和，逆迹昭著”，令褫夺官职、勋位、勋章，分交法庭依法惩办。

△　旅沪国会议员召开欢迎伍廷芳、程璧光大会，伍演说主张重办复辟，“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谭人凤称：“调停为自杀政策，海军有护法精神，应以炮火扫除妖氛。”

△　罗佩金通电宣布“即日西上”调解川、黔军队冲突，并分电戴戡、刘存厚“严束所部，立即停战”。

△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通电报告川黔军冲突情形，并提出川、滇军诸师长兼程赴成都，共谋解决川黔两军冲突，川中事务，仍由戴戡主持，请唐继尧、刘显世令滇、黔军队停止前进。

△　外交团照会步军统领衙门，要求一面解除张勋所部武装，一面让段祺瑞宣言担负保护张勋及其所属安全之责任。

7月10日　孙中山率“应瑞”、“海琛”军舰自上海抵汕头。12日，在汕头各界欢迎大会上演说，认为共和“非一蹴可致”。究其变乱原因，“在于新旧潮流冲突”，“新人物有新思想，新希望”，凡事“步步往前”；旧人物则“步步退后”。复辟发生，乃由“旧潮流造成”。断定张勋

复辟不会长久。并谓倪嗣冲、段芝贵等实属“旧流人物”，“今日反对复辟是假”，“争后来之势力是真”。号召国民为除尽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尽力。

△　徐世昌致电张勋，指出事机日迫，应“速图脱卸”，将军队交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解除武装，移驻城外”，“执事不操兵柄，自可不负责任”；并告经与段祺瑞商明，对其室家财产，“力为保护”。

△　段祺瑞通告，对清室惟求撤除帝号，优待条件继续有效。

△　伍廷芳等致电冯国璋、段祺瑞，称“今清帝僭位，优待条件当然无效”，“无论何人，不能遽以保全优待条件，宣布天下”；主张严惩复辟祸首，“然首祸者决不止张勋一人”，“为贼谋主，勾结共事者，岂能以胁从自解”。

△　旅津国会议员在天津设通讯处。

△　驻日公使章宗祥晤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同日电段祺瑞，谓寺内对“公重出山，使中国时局早日解决，至为欣慰。深冀速组巩固之内阁，对于两国关系问题，渠（寺内）必加以善意考虑”。

△　第十一师张永成部参加讨逆，与十二师合组讨逆军中路，由陈光远任司令。

△　段祺瑞派讨逆军交涉处长刘崇杰入京向张勋提出实行停战三条件：一、取消复辟；二、保全清室优待条件；三、在京定武军立即解除武装。张勋不从，谈判破裂。

7月11日　　段祺瑞派汪大燮往晤荷兰驻京公使，请其转告外交团，对张军将予武力解决，但战斗区域定设法限制，不至危及外人。

△　旅沪国会议员通电，重申解散国会命令无效及决定自行集会等五项护法主张。

△　吴景濂等致电冯玉祥，指出：“此时扬言反对（张勋）之人，多属始与阴谋之辈”，请于“戮张逆之后，并正倪（嗣冲）罪”。

△　山东曹县毛思忠所部“忠义军”千余人攻占县城，当由镇守使方玉善派兵镇剿，旋离城而去。

△　英国在汉口等地招募华工两批共530名，是日由沪放洋。15日又一批英国在汉口等地招募之华工150名由沪放洋。

7月12日　段祺瑞之讨逆军收复京师。晨，讨逆军迫抵都门，分三路攻城。张军屯聚天坛，密布炮位于天安门、景山、东西华门各处顽守。旅长冯玉祥、吴佩孚、张纪祥率部攻天坛，激战两小时，张军不支，提出以发给三月军饷为投降条件，段祺瑞允之，即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支付。上午7时，天坛张军投降。中路陈光远十二师、张永成十一师占领朝阳门。另有旅长商震率步炮各团营堵截西直门、阜成门；旅长王承斌所部占领宣武门，炮击天安门及南河沿张勋私宅。张由德人保护逃入荷兰使馆，其余各处张军相继投降。

△　段祺瑞任命陈光远为讨逆军中路司令，倪嗣冲为讨逆军南路司令。

△　徐州张勋辫兵两营哗变，被劫者百数十家，遭火者20余家，死10余人，财产损失数十万元。东海县亦有辫兵哗变。

△　讨逆军东路司令段芝贵以盐税担保，向北京日本正金银行借款银元八万元。

△　直隶财政厅以所有滦州煤矿股票及公积存款折担保，向天津日本三菱银行借款日金100万元，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

7月13日　驻徐海一带张勋辫兵统领张文生所部60营不受倪嗣冲招抚，约同哗变。

7月14日　段祺瑞由津入京，复任国务总理。黎元洪通电去职。

△　旅沪国会议员致外交团宣言，称段任总理及冯任总统均为非法。

△　北洋军界通电，提出取消优待条件、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及惩办叛逆诸元凶等四项解决时局办法。

△　冯国璋任命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原任张国淦免职。

7月15日　冯国璋令准免陆军总长王士珍本职，以段祺瑞兼任；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

△　孙洪伊、田桐、刘成禺等致电西南各省，称“乱法乱国均以段为首犯”，要求“即日出师”，通电内外，不承认非法伪内阁之行动。

△　冯国璋通令严惩复辟叛逆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并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

△　中华职业教育社选举黄炎培、沈恩孚、杨廷栋等12人为议事员。29日，成立议事员会。

7月16日　徐世昌由津到京。段祺瑞晤徐密商清室善后。

△　川军攻破成都皇城，黔军求和，双方达成黔军撤出成都四项协议。戴戡将督军、省长、会办三方印绶交省议会。

△　滇军分路进攻资阳、井研、仁寿、嘉定、犍为等县。21日占寿阳、眉山两县，26日占嘉定。7月下旬，相继攻破犍、井、资等县。

△　唐继尧通电讨伐刘存厚，宣布“刻即躬率三军，吊民伐罪”。

7月17日　孙中山抵粤，在广州黄埔公园欢迎大会上作护法演

说，主张电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在粤召集国会及请黎元洪前来执行大总统职务。

△　唐继尧通电否认段祺瑞之国务总理，随又数次通电反对段内阁，声明“决心自主，不认非法内阁之命令”，“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

△　冯国璋公布清室内务府咨达张勋率军入宫，矫发谕旨，擅更国体等情之声明，并令严缉与张勋同谋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

△　冯国璋任命段祺瑞内阁各部总长：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同时免去范源濂、李经羲、江庸、李盛铎、龙建章等人内务、财政、司法、农商、交通各总长职。

△　冯国璋令嘉奖段祺瑞及讨逆军前敌将士。

△　戴戡率黔军残部退出成都。刘存厚率川军入城，通电宣布“仍以军长名义暂维秩序”。

7月18日　段祺瑞电请冯国璋入京就职。

△　旅津国会议员60余人集会议决，不承认非法解散国会，宣布8月1日在上海开国会。

△　孙中山致电陆荣廷，请东下至粤，共商要政。

△　冯国璋令准免福建省长胡瑞霖本职，以督军李厚基兼署。

△　冯国璋以川黔两军冲突，令戴戡、刘存厚“各约束所部”，“静候中央处理”。

△　戴戡在仁寿县秦皇寺为川军击毙，黔军余部溃散。

△　江苏沭阳县驻军第十六营哗变，捣毁邮电局，抢劫商民200余家，与商民巷战八小时，不支乘夜纵火逃遁。

7月19日　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决从速宣布。

△　陆荣廷与两广督军、省长通电，主黎元洪复位。

△　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欢迎会上演说，提出再造政府、恢复国会两项办法，主张以粤省议会名义电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要政”。同日，广东省议会致电旅沪国会议员，欢迎来粤开国会。

△　孙中山电邀津沪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倡议于粤湘各省择地开会“行民国统治之权”。

△　孙中山自广州电斥段祺瑞“奖以（张）勋权，启其骄悍”，致成复辟之患；及至复辟发生，“以免职兴戎，而以复职自贵，狐埋狐搰，皆在一人”。继又抑止诸军，不容兴师致讨，反“以易成之绩，交与倡乱之人”。忠告段应讨伐群逆，诛戮溥仪，“保国赎愆”。

7月20日　孙中山在驻粤滇军欢迎大会上演说，指出复辟派中分为两派：一曰“激烈复辟派”，以张勋为首，康有为副之；一曰“稳健复辟派”，以徐世昌为首，段祺瑞、冯国璋、李经羲副之。段祺瑞等与张勋之战争，可谓“稳健复辟派与激烈复辟派之战争”。段氏逐张，纯为巩固北洋势力，免为民党推倒。

△　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躬率靖国军由滇启行入川，先平“川乱”。

△　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前滋扰众议院之“公民团”成员白亮等三人，各处拘役40日；潘伯禹、史浚民各处罚金30元。

△　丁槐携总统印到沪，在公共租界被捕。公堂决定将丁连同印信五颗，解交松沪护军使卢永祥转送北京。

△　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宣称：“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日中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得策。”

△　上海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公司纸烟厂锡包间女工千余名，因工资减少举行同盟罢工。8月9日复工。

7月21日　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响应护法号召，率队自吴淞口开赴广州，唐绍仪、汪精卫同行。

△　孙中山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上作题为《行之非艰知之维艰》之演说。指出共和政治已成时代潮流，“帝制实不能与共和竞争”。揭露段、倪等系“假共和”，张、康等系“真复辟”，“假共和之祸犹甚于真复辟”。故自今以后，“所患者，真共和与假共和之竞争耳”。

△　段祺瑞派靳云鹏至南京，促冯国璋入京。

△　冯国璋任命王克敏暂署中国银行总裁，原任孙多森免职；任命冯玉祥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　法国在沪招募之第五批华工100余名在沪放洋。8月23日，第六批150名放洋。

7月22日　程璧光、林葆怿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倪、张毁法叛国，宣布海军将士讨逆三大目标：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并谓“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皆无根据，发布命令之政府，当然否认”。

7月23日　旅沪国会议员发表对外交团宣言，不承认段祺瑞非法政府。

△　冯国璋令免程璧光海军总司令职，遗缺派刘冠雄暂行兼领。

△　李纯通电各省，呼吁一致促请冯国璋早日入都。

△　云南靖国军第三混成旅司令李友勋率队启程赴川。

△　山东督军张怀芝、财政厅长王璟芳，为解决军事费用，以山东货物税等五种税及注册费担保，向日本中日实业公司借日金150万元。

△　英在湘、鄂等地招募之华工200名在沪放洋。

7月24日　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召开临时参议院意见，声称国会业已明令解散，“断无重行召集之理”，“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

△　孙中山致电陆荣廷，揭露段祺瑞“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则美，其实尤窳。民国之号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指出国会为“民国之命脉所存”，护法必须拥护国会，并称一俟“布置既周，乃以海陆军护送国会至国都”。

△　荷公使贝拉斯拒绝引渡张勋。

△　冯国璋特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

△　冯国璋特派饶怀文署海军总司令，令免林葆怿海军第一舰队司令职，任林颂庄署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署第二舰队司令。

7月25日　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通电服从北京政府，称惟有秉承冯国璋意旨，“以服从中央，保卫地方”为职志。

△　贵州省议会通电，请缉获张勋及督军团肇乱各犯，“勿任元恶大憝逍遥法外，以清乱源，而维纲纪”。

△　冯国璋特任刘承恩为广东省长，未到任前以陈炳焜暂行兼

署；朱庆澜为广西省长。30日，朱庆澜以广东“自主”拒调，声明非法内阁命令无效。

△　胡汉民自南宁返抵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奉命邀陆荣廷来粤之经过。复至省议会，向外界宣称，陆荣廷于同日由邕乘轮东来，因事驻桂平镇守使署，三数日即可到粤。

7月26日　北京阁议，主无条件加入协约国。

△　冯国璋令裁撤讨逆军总司令部。

△　国会议员吕志伊等四人通电声讨段祺瑞，历数段破坏约法、蹂躏国会等六大罪状，并称：“杜绝乱源，在除首恶。”

△　梁启超、汤化龙等在北京召集宪法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讨论改组政党办法，议决“重整进步党”，取消宪法研究会。

△　旅沪国会议员发布公告，指出：“今日之情形，几为一九一三年之复演”，进步党中之顽旧派“与北方军人勾结，国会重被非法解散”，北京又“厉行武人少数政治”，复组“进步党内阁”，此为国会愿望实施之真正障碍。

△　冯国璋特任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暂行兼署省长，准免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职；特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暂行兼署省长，准免原省长李根源本职；特派张敬尧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

△　江西中国银行以省币制公债票150万元担保，向九江日本台湾银行借日金100万元。11月19日，江西财政厅又向该银行借日金50万元。两次借款，均充江西军政费用。

7月27日　张作霖、王占元分别复电国务院，赞同召集临时参议院。次日，倪嗣冲、杨善德、李厚基、阎锡山，29日孟恩远、齐耀琳，30日赵倜、田中玉，亦分别复电赞成。

△　冯国璋以刘存厚拒不遵命罢兵，令代理四川督军周道刚率师进解成都之围。

△　冯国璋任命陈光远为绥远都统，原任蒋雁行留京另候任用。

△　李烈钧到沪，促国会议员即赴粤。

7月28日　旅沪国会议员首批50余人启程赴粤。

△　倪嗣冲、阎锡山、杨善德、李厚基分别通电赞同国务院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

△　京兆所属14县水灾。自是月23日起，大雨如注，河水陡涨，是日永定河上游固安县北三工区决口。灾区延及大兴、宛平、永清、安次、武清各县。加之琉璃河、拒马河水溢成灾者，共达14县。其中尤以安次、武清、宝坻、香河、涿县为重。涿县水潦系从山西来，其势极猛，灾民12万。

7月29日　冯国璋通电北上，宣称：黎元洪“坚持引退，长此濡滞，则政令多歧，人心不定，进退维谷，负疚弥多。兹定于31日早自宁出发，至京后躬造黄陂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

△　刘存厚通电，决联合川中各师抵抗滇黔军，并“请中央迅颁挞伐，力遏横流”。

7月30日　陈炳焜、谭浩明致电湘、滇、黔三省督军，告以两广秉承陆荣廷意旨，黎元洪复任问题未决以前，“他事均缓置议”。

△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与李烈钧联袂赴粤。

△　外交部照会荷使贝拉斯，抗议德政府扣留中国留德、比学生及华侨。

7月31日　　孙中山在广州招待各报记者，称："今日救国之第一步即当恢复国会，尤宜在粤开会"，然后方有"统治机关，一切问题皆可由此解决"。

△　云南镇雄、昭通、大关等处地震。其中大关震轴内（纵横约百里）山岳崩颓，居民死者数千。入川靖国滇军十二团道经此地，压死者300余人。同日，四川合川、汉源、夹江、乐山、荣县、大竹、眉山七县地震。

8月

8月1日　　冯国璋抵北京。当即恭诣黎元洪寓所，敦请复位，黎坚不见允。

△　张怀芝、曹锟、陈树藩分别复电国务院，赞成召集临时参议院。

△　滇军自嘉定县进袭眉山县张家坎，川军二师由夹江县乘虚占嘉城。同日，川军三师复占资阳。

△　财政部呈准免除田赋遇闰加征制度。

8月2日　　滇军攻眉山，与川军激战一周，滇军伤亡惨重，是日川军乘胜进逼青神。

△　冯国璋任命孙烈臣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兼第二十八师师长。

8月3日　　外交部电驻奥地利使馆，"部署留奥学侨密令预备出境"。

△　川军7月底占仁寿，旋失。2日川军反攻，是日再占仁寿。

8月4日　旅沪国会议员180人启程赴粤。

8月5日　程璧光率海军舰队抵黄埔。次日，广东各界万余人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号召声讨段逆，拥护国会。

△　党人田璧成在沪杭火车站被松沪护军使署捕获，被判死刑。9月1日被害于西炮台。

8月6日　冯国璋在北京通电就任代理大总统。

△　冯国璋特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蔡成勋为绥远都统，特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

△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再电川滇两军将领，吁请停战。

△　驻川汉军统弁杨骁骑率部复占犍为县，滇军退叙府（今宜宾市）、屏山县。

8月7日　国务院组织“战时国际事务委员会”，取代原“国际政务评议会”，陆徵祥为委员长。

△　外交部电驻丹麦使馆，指示驻奥使馆撤离后，请丹麦照料保护中国在奥利益。13日，驻丹麦公使颜惠庆电复外交部称，丹外交部面允照办。

△　冯国璋任命陈毅为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原任李开侁免职。

△　罗佩金复电川军周、熊二师长，接受调停。次日，钟体道、张澜亦电告听候调处。

8月8日　国务院开会讨论四川问题。蒋百里报告川事经过及戴戡死亡情状。梁启超主张严惩刘存厚，段祺瑞不允。同日，冯国璋令

刘存厚、罗佩金即日来京，所有部队交由周道刚统辖，“其滇黔现调赴川军队，并应即行撤退”；并令财政部拨银20万元赈成都兵灾。

△　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英人莫理循收藏有关中国及东方图书文献，以35000英镑售与日人岩崎男爵，是日运日，充作东京东洋文库图书馆的基础。

8月9日　　吴景濂、王正廷两议长致电上海国会议员通讯处，请国会议员赴粤。

△　冯国璋特任张绍曾为树威将军。

8月10日　　谭延闿致电谭浩明，请桂省出师援湘。22日，再电陆荣廷及两广督军告急请援。

△　冯国璋令李纯迅赴江苏督军新任；陈光远未到任以前，江西督军着吴金彪暂行护理。

△　北京模范监狱囚犯暴动，毙看守所长，伤典狱长及员役数人，10余囚犯越狱逃逸。

△　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规约成立。总行设北京，资本1000万元。

8月11日　　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护法，阐明护法宗旨：一、“总统有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当以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仍应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解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九条第二项办理”；二、“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国会”；三、“国务员非得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不能认为适法”；四、“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惩办，以彰国法”。

△　岑春煊电请陆荣廷支持孙中山护法，邀陆“速抵粤城，共商大计”。

△　唐继尧电请刘显世派兵援湘，略谓：“北京政府逞厥野心，欲宰割西南，巩固东北”，分路出兵“窥伺蜀湘，助刘（存厚）作凶，夺谭（延闿）兵权，缺我唇齿，塞我门户”，请“由黔率旅以为协助”。

△　冯国璋特任段芝贵为辅威将军，陆建章为炳威将军，江朝宗为迪威将军。

△　冯国璋任命李长泰为步军统领，王汝贤为陆军第八师师长。

8月13日　　唐继尧致电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宣布“与两粤取一致行动”。17日，唐再电请粤省派兵会同驻粤滇军援湘。

△　川军占青神，滇军退走井研县。

8月14日　　冯国璋布告对德奥宣战。略谓：“自绝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宣布自“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并声明废止与德奥两国所订之一切条约。

△　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对德奥宣战。是日，日、英、美、意公使，次日，俄、比公使，分别复照外交部，允将中国对德奥宣战书转呈本国政府；并称，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

△　荷公使贝拉斯复照外交部。略称：“所有奥国在华利益，业经奥政府委托本国政府嘱令本大臣照料”，“望以后遇事对于本大臣当不得有所困难。”

△　陆军部通电各省区对德奥立于战争地位，并颁布修订《保护敌国人民出境办法》、《临时检查办法》，制定《俘虏收容所规则》、《解除奥国军人武装办法》、《处置敌国武器办法》、《处置敌国兵营办法》。

△　冯国璋公布《审理敌国人民民刑诉讼暂行章程》。

△　天津收回奥租界。海军在上海接管奥船三艘。

△　外交部将《审理敌国人民民刑诉讼暂行章程》送交荷公使贝拉斯。18日，荷公使以该章程侵犯敌国侨华人民法律上之地位及违反各国条约为由提出抗议。12日外交部复照荷公使作出答复。

△　内务部呈准设立天津、汉口两特别区市政管理局，管理该市接收之德奥租界区内一切行政事宜。

8月15日　冯国璋任命卢永祥会办江苏军务；吴俊陞为陆军第二十九师师长；申保亨暂行兼护绥远都统。

△　沪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上海德华银行。同日下午，上海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接管该行所存银洋押款及簿据。

△　北京政府派中国银行顾问法人巴塞里由京赴沪，会同宋汉章接管上海德华银行。20日，巴塞里抵沪。

8月16日　冯国璋任命夏寿康为平政院院长，准前任熊希龄免职。

△　罗佩金通电赞同唐继尧护法通电，要求政府迅即召集国会，解决总统继任、内阁组织及惩治叛徒各问题。

△　荷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转达德政府对侨德中国学生愿离境者毫不阻滞。

8月17日　冯国璋令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拨款一万元治丧。

△　上海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以中外合办汇业银行有碍金融主权，恳请坚持拒绝。

8月18日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公园宴请南下国会议员130余人，协议召开国会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主张先召开非常会议。

△　荷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抗议各地接管德华银行各总分行。28日，外交部复照荷使，称接收敌国银行，无违海牙公约，中国政府对抗议各节不能承认。

△　冯国璋特派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任命刘询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

8月19日　南下国会议员在广州开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事，议决通电西南各省，以莅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于25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

△　陕西焦子静、郭坚等率兵围攻西安，陕督陈树藩退走汉中。

△　广东督军兼暂署省长陈炳焜示谕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粤各国领事。

△　汉冶萍煤矿大火，焚毙矿工20余人，被焚矿地远至10里。

8月20日　广东督军兼暂署省长陈炳焜电请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出兵援湘。

△　国会议员吴宗慈、王正廷、马君武等至南宁，与陆荣廷商护法讨逆。陆以病躯未愈为辞，谢绝去粤主持讨逆军事。

△　农商部为调查全国经济状况，规划战时及战后经济之设施，在北京开经济调查会成立大会。魏宸组为会长。

8月21日　冯国璋复电唐继尧，以所谓旧国会“祸国殃民”，拒绝恢复。

△　外交部致函荷使贝拉斯，以敌国公使不能久留，促奥前使速

离华，并令驻华奥领事等同行。

△　社会党筹备处通告宣布展期筹办，“凡前曾经通讯诸君，概请先加入社会主义讲习会，以便将来党事成立，易于进行”。

△　内务、财政部呈准黑龙江添设林甸县。

8月22日　刘显世通电恳请冯国璋按照约法定期召开国会。

△　外交部照会协约、中立各国驻华公使，关于侨华德奥人民与协约中立各国人民民事诉讼，仍归各国驻华领事审理。

△　威海卫英公司在沪招募华工46名，是日乘奉天轮船开往威埠转轮放洋。

8月23日　冯国璋特派李纯兼督办浦口商埠事宜；任命夏寿康兼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　法国在沪招募华工115名，是日乘法船赴法。

8月24日　冯国璋任命张澜暂行护理四川省长，后于11月20日授省长职。

△　孙中山邀国会议员王正廷等于黄埔商谈组织政府事宜。

△　云南靖国第四军司令黄毓成自昆明率师启程赴川。9月22日，抵泸县。

△　卢永祥以“党人谋浙甚亟”，饬令对由沪运浙箱件包件，一律开拆检验。同日，上海电报总局实行电报检查；次日，上海邮务管理局实行邮件检查。

8月25日　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国会议员120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等莅会祝贺。

△　荷公使贝拉斯致函外交部，告知前驻华奥使及馆员、领事等约于下月15日前后乘荷轮离华回国。

8月26日　　朱庆澜辞广东省长职，声明："卸任之后，决不赴桂任，用符自主之旨。"次日，朱自广州启程赴香港。

△　驻意使馆电外交部，称驻奥公使及馆员以及留奥侨民，须驻华奥使等有离华确信，方能起程。旋外交部电令驻丹麦公使，请丹政府向奥严重抗议。

8月27日　　国会非常会议开首次会议，讨论《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

△　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奉命率部入川，是日抵广元县。9月23日，进驻成都。

8月28日　　财政总长梁启超以盐税和国库税担保，同日本正金银行签订借款日金1000万元合同，"作为四国银行团善后续借款之垫款"。偿还期限一年。该借款全部用作军政开支。

△　山东督军张怀芝向中日实业银行借日金150万元，用作军费开支。

△　黎元洪离京赴津，声明不与闻政治。

△　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省长。次日，胡致函省议会坚辞不受，推荐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为省长。

△　云南靖国第三军司令庾恩旸率部启程赴川。

8月29日　　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广州之国会议员。

8月30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

国军政府”，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

△　陆军部改编近畿陆军第一旅为陆军第四混成旅，以张锡元为旅长。

△　奉天辑安县（今吉林集安县）中韩人民冲突，日兵300余名包围县城，并拘捕中国警察多名。当经外交部向日使交涉，日军旋撤退，并释放被拘华警。

8月31日　冯国璋特任李耀汉署广东省长，准免督军陈炳焜省长兼职。

是月　滇军改称靖国军，朱德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

△　北京中华大学因款绌停办，学生并入北京大学及中国大学。

9月

9月1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　下午议长吴景濂、副议长王正廷及国会议员数十人，持《国会非常会议致大元帅书》至黄埔公园，举行大元帅授印礼。吴景濂致大元帅词，王正廷授印，孙中山受印后致答词，表示“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

△　陈炳焜通电声明，对于广州开非常国会及组织军政府之举“概不负责”。

△　谭延闿辞湖南省长，所部湘军向湘南、湘北退去。

△　鄂省督军王占元电国务总理报告鄂省各县水灾情形，江汉道属汉川、嘉鱼等11县，襄阳道属潜江、房县，荆南道属石首、公安等

七县均有灾情。襄河各县水患尤危。拟请优赐赈抚。

△　冯国璋令财部拨银三万元赈济贵州水灾。该省6月霪雨兼旬，山水陡涨。江口、松桃、铜仁、平越、绥阳、都化、遵义、印江、仁怀、锦屏等县，均被水灾，房屋倒塌，田亩淹没。

△　中日商人签订合办钢铁厂合同，由汉冶萍公司每月供生铁五万吨，日人安川敬一郎出资1000万元。厂设于日本福冈。

△　粤汉铁路武昌至岳阳段通车。

9月2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元帅。

△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于陈炳焜欢宴海军长官席间，重申省长由省议会选举等三事。并宣布："有破坏大局者，海军惟有准备武力对待。"

△　岑春煊电催陆荣廷援湘，力争湖南，巩固长江以南，否则北军南犯，粤桂受敌，大局堪虑。

△　云南国民后援会开成立大会，通电宣布支持唐继尧"出师靖国"，誓为靖国滇军后盾。

△　安庆安武军两营夜间兵变，统领李良臣被杀。

△　中国留日学生千余人于东京集会庆祝非常国会召开。

9月3日　　孙中山与国会非常会议分别电请黎元洪来粤共商护法。

△　孙中山电陆荣廷，望亲临主持军府，兴师讨贼。

△　孙中山电唐继尧，告以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为全权代表，

于是日由港来滇，共商护法方略。

△　冯国璋特任山西督军阎锡山兼署省长，准免前省长孙发绪本职。

△　罗佩金致电北京政府，告以拟于次日离叙府回滇，再北上入京。

9月4日　　陆荣廷、谭浩明致电国会非常会议，反对军政府及选举大元帅、元帅。略谓："顷闻议员开非常会议，有组织临时政府并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蓂赓及廷为元帅之事。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组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议……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深愿国会议员诸公，爱国以道，慎审出之。"

△　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抵汉口，当即赴武昌与王占元、傅良佐会商川湘鄂三省联防计划。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荷公使贝拉斯，请电达德政府，对愿离德、比之中国学侨，速发安全通行券。

9月5日　冯国璋令财政部拨银五万元赈济湖北水灾。

△　驻京荷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称，在华之荷国人民与德奥人民诉讼案件，不应由中国法院审理。外交部15日复照荷使，说明审理在华之德奥人民民刑诉讼，应由中国法庭审理，系因中德、中奥条约之废止，德奥在华之领事裁判权自应终止。

9月6日　　川滇军议和，滇军退出资中，悉数撤至自流井、叙府。川军一师前往接防。

△　驻京英署理公使照会外交部，要求说明英人在中国法院控告敌国侨民时应行之办法。20日外交部复照称，与中英人民互讼事件不

同。

9月7日　孙中山致函非常国会，定于本月10日就任大元帅。

△　安徽当涂定武军两营哗变，旋被平定。

9月8日　唐继尧致电非常国会不受元帅职。

△　冯国璋特任倪嗣冲为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其省长本职由黄家杰继任。

△　驻川贵州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熊其勋于川黔两军争哄时，出城行至九道拐，中弹身故，是日冯国璋特令照中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　协约国公使团访外交部，由法使康悌陈述协约国五项议决案，其大要为：关税实行值百抽五，庚子赔款除俄国外全数展缓五年，中国军队通过天津租界需向各国提出等。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荷公使贝拉斯，通知定于9月12日接收北戴河德国兵营及塘沽德奥兵房。

9月9日　广东督军陈炳焜宴请记者称：宣布服从冯国璋代总统，不承认非法之段祺瑞内阁。

△　英国在山东招募之华工1700人于青岛放洋。按：自本年1月2日始，英在鲁招华工10批，共45000人，已先期启航。

9月10日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黎元洪。是夜，广州万余人举行提灯会，庆祝大元帅就职。

△　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军政府各部总长：外交伍廷芳，财政唐绍仪，内政孙洪伊，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交通胡汉民。次日由孙中山照准任命，并任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参谋总长李烈钧，海军总

司令林葆怿，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李福林，大元帅府参军长许崇智。

9月11日　广（州）惠（州）镇守使莫荣新奉粤督命召集军事会议，议决“誓必推倒非法之段内阁，务使约法完全发生效力”，并致电陆荣廷等要求“传檄誓师”。

△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辞元帅职。

9月12日　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特任王湘为川滇劳军使，陈炯明为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

△　冯国璋任命王廷桢兼陆军第十六师师长。

△　北京政府财政部以期票担保，向法国中法实业银行借款789万法郎，是为中法实业息款垫款借款。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荷公使贝拉斯，为中国驻奥公使未能离境事再提抗议。

△　奉天模范监狱囚犯抢械越狱，军警弹压，击毙囚犯百余名。

9月13日　孙中山聘吴景濂为大元帅府高等顾问。

△　冯国璋令褫前四川巡按使陈廷杰职。

9月14日　孙中山任命冯自由、曹亚伯等为大元帅府参议。

△　奉天锦县中日军队因细故发生冲突，日人寺町毙命。18日，日使林权助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9月15日　孙中山在广州会见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希望日本给予军政府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并谓“这样，我们就能推进到扬子江流域，将我们的政府迁移到华中的某一战略要点，然后向北京进军”。末谓一旦任务完成，将与日本结盟，“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

管理”。

△　孙中山任命汪精卫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

△　冯国璋特派孟宪彝督办永定河工事宜。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荷使贝拉斯，德奥领馆留华人员可令其乘中立国船一律出境。

9月16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褚辅成为众议院副议长。

△　奥国公使离京赴沪。18日，德奥驻华使领及眷属61人，自吴淞乘荷轮回国。

9月17日　孙中山致电陆荣廷，对其“出师援湘”表示欣慰，并告“文正董率义师声讨国贼，期使国会更生，黎公复职。”

△　孙中山公布《特别军事会议条例》，凡六条。

△　荷公使贝拉斯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中国收管在华之德奥商船，要求立即取消收管，并赔偿损失及费用。

9月18日　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驻衡阳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湘南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并宣布衡（衡阳）、永（零陵）等湘南24县为戒严区。

△　孙中山将对德奥两国宣战之意见，咨国会非常会议请速公决。

△　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组织条例》，凡五章15条。

△　北京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员萨福懋会同租界当局查封上海

德、奥两领事馆。

9月19日　湘督傅良佐派驻湖南陆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率步炮四团往攻湘南。次日，李自长沙率队南下。

△　孙中山任命覃振、田桐、陈策等为大元帅府参议

△　冯国璋令财政部拨银一万元赈广西水灾。是年该省百色、隆安、邕宁、果德、桂平、藤县、苍梧、融县、岑溪各属，被水冲塌民屋，淹没田禾，灾情甚巨。

9月20日　冯国璋公布《侨工事务局暂行条例》。11月22日，任命张弧为侨工事务局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荷公使贝拉斯，中国法院审理敌国人民民刑诉讼，如在历经特许外国律师出庭辩护之特别法庭，得延用外国律师。

9月2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荷公使贝拉斯节略，提出解决张勋问题办法：请将张勋交出，中国政府担任保全其生命；或准其离去中国，安置一定地点。

△　孙中山与非常国会分别致电刘建藩、林修梅祝贺湘南自主。

△　湘督傅良佐颁布长沙戒严令。

9月22日　湘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与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各率所部在七里滩（衡阳城北40里）接战，林军获胜进驻衡山县城。护法战争爆发。

△　国会非常会议议决承认对德奥两国处交战状态。26日，军政府布告对德奥宣战。

△　滇军撤出内江，一路经自贡向宜宾撤退；一路经富顺向泸州

撤退。

△　孙中山特任徐谦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廖仲恺代理军政府财政总长，邹鲁为军政府财政次长，张继为军政府驻日外交代表。

△　戴季陶奉孙中山命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报告赴日之使命，谓日本朝野赞成西南举兵，日本外务当局亦谓民党反对段内阁如果理由正常，亦当赞成。民党议员议决宣战问题之后，日本亦可借款赞助，如承认为交战团体，则俟政府成立之后实行。

△　冯国璋往北京国子监祀孔。

9月23日　孙中山致函通知菲律宾同志，特派孙科、陈民钟、黄展云赴菲募饷。

△　武昌人力车夫举行全体同盟罢工，反对车帮公所增加车租。

△　天津暴雨成灾，市民流离失所者达数十万；津浦铁路火车停开。

9月24日　马济、林虎所部粤军11营在广州东校场誓师援湘。次日，由统领邱渭南、陈志先率师出发。

△　孙中山函告唐继尧，已成立军政府及派参议张左丞为驻滇代表，借资联络，并盼早日统军东下，会师中原。

△　北京政府财政部呈准，以前督办全国烟酒事务钮传善违法舞弊交法庭法办。

9月25日　军政府发布《军事内国公债条例》，总额5000万元，第六年全数偿清。

△　孙中山特任马君武代理军政府交通总长；王正廷署理外交总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荷公使贝拉斯，对抗议中国收管德华银行事，中国政府碍难承认。

9月26日　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抵昆明。

△　孙中山任命廖仲恺署理财政总长，居正署理内政总长。

△　冯国璋任命吴金彪帮办江西军务。

△　大理院判处复辟罪犯张镇芳无期徒刑。

9月27日　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抵衡阳。次日训示部下勿听妖言，免堕段氏“以湘治湘”之计。

△　孙中山任命吴铁城等为大元帅府参议。

△　新疆省长杨增新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称被遣回俄之哈萨克人，均被俄人杀害，请与俄使交涉，俟后回俄哈民毋得虐待。

△　北京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设文、理、法、商、医、农、工各科。修业年限本科四年，预科二年。

9月28日　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以国库券2500万元担保，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借日金2000万元，是为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亦即第二次“西原借款”）。

△　傅良佐任命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指挥湘南作战。同日，又密令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移驻宝庆，为攻湘南右路军。

△　李佑文所部湘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张振武不忍“以湘攻湘”，在石湾（衡山县城东北15里）起义，率该营及炮连、机枪连加入刘建藩、林修梅所部湘南护法军。第二团全体响应。李佑文败回长

沙。

9月29日　冯国璋对孙中山、吴景濂等开非常国会、设军政府事指为“擅发伪令，煽动军队”，“联络马贼，预备起事”，“紊乱国宪，逆迹昭著”，下令各省军民长官一体严缉拿交法庭依法讯办，并褫夺勋位、勋章。又令各省选派参议员到京重组参议院。

△　冯国璋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

△　孙中山分电陆荣廷、唐继尧，称军事内国公债可分给各省用作出师讨逆饷糈。

△　陆裕光所部援湘桂军由旅长贲克昭率领抵衡阳。

△　湘督傅良佐颁发讨伐刘（建藩）林（修梅）布告，宣称刘、林“图谋不轨，反抗中央，纠合‘匪徒’，倡言独立”，“特令第一师师旅各长官督率所部，先后开往湘南各属，伐罪吊民，相机剿抚，务将各该逆首等拿获严办”。

9月30日　冯国璋令免川边镇守使殷承瓛本职，调熊克武继任。10月16日，又以熊未赴命，另着陈遐龄护理。

△　俄军在海拉尔附近与蒙匪千余人冲突，借口追击蒙匪，强占该境。经中国当局交涉，促其退去，俄军不从。

是月　刘肖颖、刘啸镛在天津创立东方实业建筑无限公司，承办建筑工程，资本银50万两。

10月

10月1日　段祺瑞对《大陆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将“出师剿灭”南方粤、桂援湘之军队，对反对派诸领袖“政府必不宽宥”。

△　湘军第二师陈复初部第四旅旅长朱泽黄奉命率队抵湘乡。4日抵永丰（今双峰县）。

△　日本于青岛正式设民政总署。

△　蒋介石向孙中山上陈“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提出将南军主战场定为东南方面的闽浙沿海一带，对湖南取守势，而以上海为攻击目标。

10月2日　陆荣廷在南宁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陈炳焜、程璧光等参加。议决桂、粤共出援兵80营，组成五军，任谭浩明为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各军司令。旋改由韦、林（俊廷）、陆分任桂军第一、二、三军司令；马、林（虎）分任粤军第一、二军司令，另委沈鸿英为粤军第三军司令。林虎、沈鸿英因广东战事均未赴湘。

△　章太炎自云南致电孙中山，谓唐继尧“决心北伐，于军政府事亦赞同一致，绝无异论”。

△　湖南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一师团长宋鹤庚联衔通电宣告自主，声讨段祺瑞“蹂躏约法、解散国会”罪行及傅良佐为虎作伥，实行“以湘治湘”之祸湘计划，宣布“脱离非法政府”，“与西南各省及衡、永义师一致进行”。

△　孙中山致函岑春煊促主持正论，通电贯彻护法之初衷。

△　梁启超致电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怂恿陆等“熟筹利害”，反对护法，并称：“若使国会克期有成，而又留执政者以转圜之地，似可鉴谅细疵，顾全大局。”

△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驻岳阳北军吴光新所部排长秦怀德通告，揭露吴系段祺瑞妻舅，视士兵如奴婢，宣布不当“舅子兵”，“不与这舅子到四川去受无脸的炮子”。秦旋带士兵50余人密赴汉口。岳州

军心大为动摇。

10月3日　孙中山通令，自国会解散后，北京政府之一切命令概认为无效。

△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及西南各省，痛斥北京政府重开临时参议院之令“背叛约法”，指出此种悖逆行为与袁世凯自造之参政院“如出一辙”，要求一致通电反对。

△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缉拿乱国盗权祸首段祺瑞及倪嗣冲、梁启超、汤化龙、朱深。

△　程璧光、陆荣廷于南宁平塘开临时军事会议，决定：出兵援湘；以谭浩明为援湘联军总司令，陈炳焜仍任粤省督军；两粤长官联名通电罢斥段祺瑞等。

△　唐继尧通电北伐，派靖国第四军长黄毓成先行。

△　北军范国璋第二十师前卫第一旅自湘潭茶园铺往攻衡山，在七里滩与林修梅部前队接战，5日败于林军。

10月4日　冯国璋任命籍忠寅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16日，公布《制定筹备国会事务局条例》。

△　冯国璋令拨银一万元赈山西水灾。该省河流漫溢成灾，太原、榆次、祁县、文水、汾阳等九县村落被水冲决，田禾被淹没。

10月5日　湘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与周伟、宋鹤庚部在青树坪（永丰西南40里）接战，朱军获胜，次日占界岭（湘乡县属）。

△　英、日等七国答复中国对德宣战希望之条件，允开关税会议。

10月6日　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宣布段祺瑞罪状，称段纵容军人干

涉宪法，煽动诸将称兵京畿，胁迫总统解散国会，以酿复辟之变；今复悍然下令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毁法弄权。同日，并通电西南各省一致护法讨段。

△　北军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王汝勤与林修梅部在西倪铺（湘潭县属）接战，王军获胜，林军退至熊家桥。

△　湖南第一师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陆军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等通电宣布湘南自主，参加护法靖国，推程潜为护法军湘南总司令，湘南军民两政，悉听其指挥管辖。

△　“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在衡阳成立，总司令程潜履任视事。27日，为与两广联军一致，改名为护国军。

△　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湖南第一师师长赵恒惕联名电孙中山，声讨段祺瑞祸国，决心护法到底。

△　冯国璋以达威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蓝天蔚奉孙中山命，在奉天勾结刘景双、顾鸿宾、马金龙、金鼎臣等联合胡匪谋乱，是日下令褫夺蓝天蔚原官勋位并着各省督军、省长饬属缉拿，务获惩治。

△　荷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布告，是日起，“凡德奥人民必得有特别允准，始能进入公共租界，或在公共租界内居住”。照会认为上海公共租界系中国之一部分，此为越权违法行为，望酌定对待办法。

△　日公使林权助往晤段祺瑞，转达日本政府提供军械装备之决定。按：7月22日、25日，段曾先后派傅良佐、吴光新向日驻华使馆武官斋藤提出此项要求。

10月7日　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宣布北京政府另组新国会及重开参议院之悖谬，并以段祺瑞等背叛民国，下令讨伐。同日并电章太炎，嘉慰唐继尧赞同军政府及北伐决心。

△　协约国法国等七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自本年12月1日起，庚款延付五年。

△　程潜自衡阳电孙中山、陆荣廷、陈炳焜等，报告已就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

10月8日　孙中山电唐继尧请宣布就元帅职。同日并电章太炎，以“唐就陆（荣廷）必不辞”，“务望速为劝驾”。

△　川省义军代表范侠夫等致电孙中山，称川省已组成讨逆义师四万余人，公推夏之时为义军总长，请大元帅正式委任。

△　福州日本烟草商人因漏税被税吏扣留，日领向交涉署抗议，要求将该商释放。

10月9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援湘、攻闽战略。议决：一、派员与陆荣廷及两粤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等计划；二、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三、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四、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五、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　冯国璋授曹锟为陆军上将，卢永祥加陆军上将衔。

△　冯国璋任命周肇祥暂行兼署湖南省长。

△　林修梅与北军王汝勤战于护湘关（衡山县属），王军陷护湘关，林军退守石桥铺。次日王军陷石桥。

△　湖南永属区司令谢国光与湘军朱泽黄在马屋岭接战，次日朱军陷马屋岭，谢军退洪罗庙（衡阳县城西北）。

10月10日　唐继尧通电反对临时参议院，指出北京政府召集临时参议院系“假约法参议院之名，以行袁氏约法会议之实”。

△　湖南刘建藩部永属区司令谢国光部与湘军朱泽黄部在洪罗庙交战，朱军陷洪罗庙，谢军退台源寺。旋衡阳援军抵台，朱军久攻不克，改道西窥宝庆。

△　中国留日学生千余名在东京驻日使馆门前示威，质问公使章宗祥，对于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在美国倡言“远东门罗主义”，谬称日本有“保护中国权能”等侮辱中国之言论，何不提出抗议？章宗祥拒不置理，激成众怒，捣毁使馆玻璃门窗等物。

△　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杭州开会。27日闭幕。

10月上旬　段祺瑞下讨伐令，命湘南王汝贤、范国璋两司令分兵三路夹攻湘南：正面攻衡山，右翼攻宝庆，左翼攻攸县。

10月11日　广东援湘军第一军马济所部统领卓瀛洲率四营在广州誓师。26日抵衡阳。

△　周伟、宋鹤庚与朱泽黄复战于界岭，朱军连战皆败，15日退至青树坪，17日退守永丰。

△　北军王汝勤师陷衡山县城。14日，北京国务院致电嘉奖傅良佐，并授机宜，谓：“衡山既下，先声已振，取宝庆，下衡阳，即可并力攻祁阳。希即策力进行，稳攻稳守，期出万全，以竟肤功。”

10月12日　孙中山分电黄复生等，委任黄复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国民军总司令，卢师谛为副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招讨使。

△　湘南护法军与北军在衡山县萱洲铺开战。次日，护法军击毙北军团长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旋桂、粤军队从左右两翼增援。23日，北军全力攻右翼，湘、桂军竭力抵御。24日，北军改攻左翼，为粤军击退。是役历时12天，湘粤桂联军获胜，共毙北军约千名。

△　广东惠州清乡督办张天翼宣告独立。

△　梁启超、曹汝霖为筹吉长铁路建筑费用，以该路财产及收入担保，同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签订日金650万元借款合同。合同规定，铁路之工务、运输、会计三主任均用日人，借款期内委托满铁“代为指挥、经理、营业”。

10月13日　北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旅长张纪与刘建藩部在醴陵县乌鸦山接战，刘军失利，张军乘胜占朱亭（湘潭县属）。

△　广东援湘军第二军林虎部第三团自广州启程赴湘。

△　周道刚致电北京政府，请速令川、滇两军各自撤回，宣称如再违抗，即“率所部各军一致进讨”。

△　滇军占领四川内江。

△　浙江省嘉兴县新丰乡农民到县署告荒，遭拒。农民愤激，群起捣毁县署民庭桌案。21日，该乡农民一二百人，再至县署告荒，遭警队弹压，受伤者三四名。

10月14日　湘粤桂联军击败北军夺回衡山县城。次日，林修梅在衡山一线乘胜追击，连克护湘关、白果寺（衡山县属）、南冲铺（湘潭县属）。

△　孙中山特任许崇智署理军政府陆军总长，参军长一职着黄大伟代理。

△　孙中山致函唐继虞“望于川事布置稍稍就绪，即统雄师东下，共规中原，歼厥凶顽，拨乱反正”。并表示“文俟此间计划略定，亦当亲率三军之士，进取闽、浙、湘、楚”。

△　周道刚以滇军攻内江，通电宣布声讨滇军。同日，刘存厚、钟体道、熊克武联衔通电表示支持。

10月15日　　熊希龄为赈济直隶水灾，以盐税余款担保，向日、美、法、俄等国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华俄道胜、华比、正金、花旗等七银行借规平银70万两，是为天津水灾借款。

△　孙中山委任李国定、刘泽龙为四川劳军使。

△　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在天津马厂启程赴湘就任“湘南各军总司令”职。24日抵长沙。

△　冯国璋任命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为重庆镇守使。

10月16日　　章太炎电孙中山，称唐继尧已于7日亲受元帅印证；并望坚持“戡定内乱，恢复国会，奉迎黄陂（即黎元洪）”。

△　北军第八师王汝勤攻贺家山（衡山城西南23里），湘军零陵区副司令黄岱阵亡。

△　上海浦东各乡贩花乡民因不堪棉花检查局苛罚，聚众至县署呈控该局要求查办。次日又在南市各码头聚众罢市，要求对棉花检查局“严加整顿，勿使苛罚舞弊”。18日，县署被迫颁发布告，答应整顿棉花检查局，变通检查办法，并开释被捕乡民。20日罢市结束。

10月17日　　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致电冯国璋，请去段祺瑞职，并依约法解决国会内阁问题。20日，冯复电拒绝。

△　冯国璋以滇军黄毓成等“擅自越境称兵”，进攻内江川军，令其“严束军队，即日退出川境”。

△　孙中山任命林祖涵为湖南劳军使。20日又电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嘉许衡永自主“开天下之先”。

10月18日　　范国璋所部第一路军与赵恒惕部在醴陵县渌口接

战，范军失利，退回霞岭（湘潭县属）。

△　冯国璋特任孟恩远为诚威将军，田中玉为吉林督军；任张敬尧为察哈尔都统。

△　北京政府陆军部改编混成模范团为陆军第五混成旅，以魏宗瀚为旅长。

10月19日　　周伟、宋鹤庚进攻永丰之朱泽黄。适傅良佐派卫队一团增援，朱军获胜，周、宋部退至黑田铺（宝庆县属），朱军占青树坪。

△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林森为参议院议长。

△　陈复初湘军第二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是日冯国璋任命陈复初为陆军第十七师师长。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美国西方电气公司、日本电气株式会社订立合办中国电气公司合同，资本美国出100万美元，日本、中国各出50万元。

△　上海浦东陆家嘴英商祥生铁厂车床间200余工人要求厂方撤换工头，举行同盟罢工。

10月20日　　谭浩明就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通电誓师援湘，24日自南宁率师出发。

△　周伟与朱泽黄约定：周部退出宝庆，朱部阴守独立。是日，朱泽黄进驻宝庆。

△　林修梅与王汝勤战于高眉山（白果寺附近），林军歼敌千余名，王军退守画眉山。

△　冯国璋令拨银一万元赈济陕西水灾。该省蒲城等10余县霪雨

成灾，蒲城、富平、宝鸡、凤翔四县灾情尤重。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美国西方电气公司及日本电气株式会社订立合同，合办中国电气股份公司，专为制造电话、电报机械材料，供中国之用。

△　《教育与职业》杂志在沪创刊。黄炎培等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发行。

10月21日　　谢国光部进攻高山铺，朱泽黄卫队营退洪罗庙，当夜谢军进袭洪罗庙，兵临城下，朱军归降。

10月22日　　冯国璋令褫夺刘建藩、林修梅原官并勋章，着傅良佐严拿惩治。

△　刘建藩部永属江道区司令张建良率军与范国璋部第四路军，在衡山右侧之湘水沿岸接战，范军失利，退攸县。

△　山东陆军第五师徐鸿宾第九旅奉命启程攻湘。

△　陈炯明部粤军刘志陆、洪兆麟联合击败惠州宣告独立之清乡督办张天骥，克惠州。

△　川军占威远、内江，滇军退走自流井。

10月23日　　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自长沙抵常德，旋开湘西会议，洪江、辰州（今沅陵县）、凤凰、常德等地代表出席。陈提出湘西不对省独立，遭与会代表拒绝。

△　林修梅与王汝勤战于黄家山（即黄金坪），林军获胜，王军退至贺家山，次日，林军复于贺家山击败王军。

△　周伟、宋鹤庚与朱泽黄复战于青树坪，周、宋部连战失利，25日，朱军占洪罗庙。

△　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布告声讨陈炳焜，宣告与广东自主政府脱离关系，军政直隶北京政府，民政则商承省长办理，并即派兵攻惠州。次日，闽督李厚基致电支持，并告已电臧致平镇守使饬队进援。

△　安武军呈准改编为陆军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混成旅。

△　北京政府改编湖北省防两团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任命孙传芳为该旅旅长。

△　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军抵重庆。其先遣队李炳之混成旅已于9月4日到达。

10月24日　孙中山任刘存厚为军政府四川督军。11月11日，刘致电北京政府，表示“绝不承受”。

△　冯国璋指令直隶各路防营改为守备队，左右两翼改编为第四、第五混成旅。

△　冯国璋任命李奎元为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原任张永成免职。

△　北京政府以200万卢布向俄商赎回在黑龙江各地金矿开采权。

10月25日　广州非常国会致电日本政府，指出段祺瑞军械借款在于“屠戮异己，宰制国民”，请予严词拒绝。同日，致电冯国璋，并通电全国反对北京政府军械借款。

△　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衔北京政府攻湘令率队出发，11月7日抵岳州，旋即开赴湘乡、永丰一带作战。

△　广东护法第一军总司令马济亲率炮兵一营、步兵三营自广州出发援湘，28日抵湘南宜章。

10月26日　　孙中山召开大元帅府全体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其要旨为：一、再次派张继赴日，反对外国计划向北京政府贷款；二、派员分别请唐绍仪、伍廷芳、孙洪伊和胡汉民返粤就职；三、向西南各省和新加坡侨民劝募公债券；四、委任徐绍桢主管浙江讨贼军，委任柏文蔚主管安徽讨贼军。

△　谭浩明、程潜及粤桂联军诸路司令通电声讨段祺瑞，历数段氏威劫元首、构成内乱、垄断政权、故纵帝孽四大罪状，号召“湘粤师旅，共执鞭弭，以讨段罪”。

△　刘建藩部永属江道区司令张良建渡湘水攻株洲，两广护国联军第一军陆裕光协攻，31日湘桂联军与北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旅长张纪战于朱亭。

△　北京政府派安徽安武军一旅攻湘，是日该军总司令李传业率队先抵汉口。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公使朱尔典，允协约国租用中国收管之德奥船只。

10月27日　　冯国璋以粤督陈炳焜倡言自主，令即行褫职，任命省长李耀汉兼署，莫擎宇会办军务。31日，陈炳焜通电驳斥，称“中央此令，无非欲粤省自起内讧”，表示“决不堕其术中”。

△　孙中山电宁远屯殖使张煦，望与唐继尧联为一致，共同护法。

△　广西援湘军第一军司令韦荣昌率一营自桂平抵零陵。30日，桂军第二军司令林俊廷率队自桂林启程援湘。

△　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津浦铁路局租车购车舞弊案，局长王家俭等各处徒刑，并褫夺公权。

10月28日　　苏督李纯致电冯国璋，请政府明白宣示有无与日本商订军械借款及凤凰山铁矿条约事。越三日，赣督陈光远亦电冯询问军械借款条约是否成立。该二督并分别电直、鲁、苏、赣、豫、鄂六省，请一致行动。

10月29日　　宋鹤庚与陈复初战于宝庆白芍铺，陈军失利，宋军乘胜收复宝庆城，陈军退走手林铺、新田铺。

△　教育部派黄炎培在上海筹办暨南学校，次年3月1日开学。

10月30日　冯国璋令临时参议院定于11月10日举行开会式。

△　冯国璋令财政部妥订普通税则，颁行各海关。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公使朱尔典，请其领衔提出使团会议，按中国所提办法，将张勋、万绳栻一同安置于法属雷佑宁小岛，由法国监视。

△　孙中山电湖南督军谭浩明等，谓："顷得沪电，知北军陆续南下，宁已下动员令，战事当不远，望即率劲旅，迅攻岳州，分其势力。"

△　川军占合江、富顺两县，滇军退走泸县。

△　川军第一师梯团长丁泽煦在荣县宣布护法。

△　法国在鄂、豫、鲁三省招募之华工500余名在沪放洋。

10月31日　　北京政府派南苑航校飞机参加湘南战争，是日首批飞机二架在渣江上空助王汝勤部攻林修梅军。11月2日，复派飞机四架在界岭上空助朱泽黄部攻周伟军。

△　冯国璋以滇军拒不退兵，令褫夺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等官职，着周道刚"督饬所部，分路进剿"。

△　冯国璋任命曹锳为直隶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商德全为第五混成旅旅长。

△　程璧光在广州召集会议，就北京政府免粤督陈炳焜职一事，商讨维持粤省办法。议决四项：一、劝陈炳焜卸责；二、李耀汉不宜接代督军；三、希望当道慎选粤督之替人；四、将来海陆军吏须确实联络，以期为国宣劳。

△　周伟、宋鹤庚与朱泽黄战于衡阳县双山铺，朱军失利，自洪罗庙、马屋岭退至界岭。

△　川军占荣县。滇军占永川县，旋逼重庆。

是月　　刘建藩通电揭露北军暴行，略谓："自称兵入寇以来，所过湘潭、衡山、湘乡，向各商民饱财掠夺，得赃巨万，积累连舟，肆杀强奸无所不作，数百里人民呼号，各地十室九空，鸡犬耕牛一无存在。"

△　范旭东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股份有限公司，资本40万元，后增至1100万元，制碱厂设于塘沽。旋在江苏六合设铵厂，生产硫酸铵等产品。

11月

11月1日　　"湘南各军总司令部"在长沙成立。总司令王汝贤"训词"，声称"奉总统、总理命令，出总师干，惟期师武"，扬言为早日"敉平"护法军尽力。

△　广东援湘军第一军马济所部统领唐绍慧率六营武卫军抵郴州。5日，第二军林虎所部三团抵安仁县，次日，进驻攸县。

△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张群为大元帅府参军。

△　川边守军统领张煦率部在西昌独立。唐继尧将该部编为靖国第七军，任命张为总司令。

△　国务院通电各省，下达扑灭党人暴动赏格七条。

11月2日　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签订《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即《蓝辛—石井协定》），内中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地位”，日本承认美国对华“门户开放”及“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　云南靖国军第五混成旅由统领赵式铭率领启程赴川。

△　川军攻占自流井、贡井，滇军向叙府等处退走。

△　北京政府派靳云鹏、曲同丰赴日本，以观操为名，商订军械借款事。是日，靳等离京启程。

△　北京高等审判厅对陈锦涛贿案第二审判决，陈锦涛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褫夺其官员资格终身。

△　上海学生救亡会致电冯国璋，反对军械借款，“望勿盖印，以自绝于国人”。

△　日商开设大连信托株式会社，资本100万元。次日，复于大连开办满洲证券信托株式会社，资本300万元。

11月3日　颜德基以“四川靖国军临时司令”名义，在绥定（今四川达县）通电独立，声讨段祺瑞祸国殃川罪状，宣布与西南一致行动。

△　广东钦廉镇守使沈鸿英奉粤督之命，率师会同惠州督办陈志陆所部进攻潮、汕，次日抵惠城。

△　四川懋功匪首若巴据城戕官，僭称皇帝，蹂躏地方，被川军

捕获，是日在成都正法。

11月4日　湘桂联军克宝庆。自上月20日朱泽黄部进驻宝庆后，双方几经争夺，至本月3日，联军再攻宝庆，朱军弃城逃走。

△　北京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购买军械“纯系商业性质，毫无政治内容”，并称凤凰山铁矿问题，起源于袁世凯，政府未予承认，“现拟可以满意之方法解决之”。

△　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通知美公使芮恩施，中国愿出兵四万赴欧，盼美国予财政支持。

△　倪嗣冲部攻湘安武军司令李传业率队自长沙开赴醴陵，8日与护法军战于攸县之新市。

△　唐继尧率师自昆明启程赴川，滇黔联军总参议章太炎同行。

△　孙中山派孙洪伊为军政府驻沪全权代表。

11月5日　卢占魁在绥远宣布起义，组成西北靖国军。

△　22省旅沪绅商学界1200余人致电冯国璋，反对军械借款，并电各省督军、省长，“请免段职，以谢天下，希一致主持，以阻卖国条约，同挽危亡”。

△　冯国璋令将湖北第六混成旅混成第二团合并编为湖北陆军第十八师；任命陈光逵为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11月6日　日公使林权助将与美订立《蓝辛—石井协定》事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

△　广州军政府派赴湖南劳军使林祖涵致电孙中山，谓晤程潜等“转达尊意，极为感谢”。

11月7日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0日，上海《民国日报》等刊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

△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指出段祺瑞假托参战之名，向日本借取军械巨款，“用以压迫护法之国民”，邀孙联名电请日本政府“严词拒绝”。12日，孙复电赞同。

△　唐继尧通电冯国璋及各省，谓川乱之源出于段祺瑞。

△　北军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率师援潮，由闽攻粤。

△　吴俊陞第二十九师奉张作霖命进驻齐齐哈尔，解除驻军旅长英额、英顺兵权。

11月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蓝辛—石井协定》致美、日两国驻京公使《宣言书》，称中国政府对于“各友邦基于条约所得之利益，无不一律尊重”，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

△　冯国璋任命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着即赴京任职，特派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

△　冯国璋令李耀汉将驻粤桂军撤归该省，以保广州治安。

△　陈廷孚创设上海贸易银行开幕，资本100万元。

11月9日　湖南“宁乡护国军”数百名占领县署，宣告独立。傅良佐派兵前往镇压，“护国军”退据安化县一带。

△　上海总商会等10团体致电冯国璋“进陈危言”，称政府自对德、奥宣战以来“丧失种种主权”，要求“布告中外，誓除亡国政策，以保国本，而奠民生”。

11月10日　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会。14日，选举王揖唐、那彦图为正副议长。

△　陆荣廷在广西梧州召集军事会议，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出席。议决陆荣廷兼摄广东督军，陆赴任前暂由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委程璧光、陈炳焜分率海、陆军自潮、梅攻闽，以牵制川、湘北军。

△　攻湘安武军司令李傅业部占攸县。

11月11日　　驻川綦江黔军王文华部与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北军冲突。次日，两军在三百梯接战，20日，黔军占江津。

△　湘粤桂联军攻克衡阳。

△　孙中山电章太炎，论述两广局势，指出："日间决裂之势，益形岌岌，军政府既无实力，无从发言，所幸海军尚能自保。"并谓唐继尧"理应即日宣布就元帅职，以壮军威；并电促陆（荣廷），使其自觉孤立，非与军政府团结，则将为粤人所逐，自可审度利害，就我范围"。

△　山西督军阎锡山倡立"洗心社"，自任社长，总社设太原，各县设分社。

△　江苏吴县田泾乡农民因受灾秋收荒歉。是日，"催子"到乡逼租，农民千余名将"催子"捆打，并将地主租单撕毁。次日，知县派兵前往弹压，激起众愤，洋澄、车坊、斜塘、唯亭等七乡农民联合行动，将"催子"40余家房屋焚毁。

△　江苏松江县张泽镇乡民数千人"闹荒"，捣毁乡自治委员房屋。

11月12日　　湘粤桂联军林修梅、谢国光、宾华东率队分由梅子坳（永丰以南）、洪罗庙、青树坪夹攻永丰，与守军朱泽黄、商震及第八师一团接战，北军失利，联军占永丰。

△　攻闽粤军占海丰县，次日再占陆丰。

△　冯国璋特任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会办军务。

△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告以赞成组织西南军事联合会政务委员会，并电约岑春煊、唐绍仪、伍廷芳赴南筹商组织办法。

△　驻美公使顾维钧就《蓝辛—石井协定》向美国提出正式抗议。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支部发表《告满洲全体公民书》，号召在哈俄公民支援十月革命。

11月13日　湘南护法军周伟部攻占湘乡。

△　湘西守备队司令张学济与湘西镇守使周则范在沅陵宣告自主。

△　北京政府派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攻湘，是日张衔命自徐州率队启程。19日抵岳阳。

△　冯国璋任命王懋赏为陆军第十八师师长。

11月14日　北军湘南总、副司令王汝贤、范国璋自长沙通电停战，略谓："此次湘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同日，王、范自行停战，从衡山撤兵。

△　唐继尧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向刘存厚部发动进攻。

△　孙中山致电陆荣廷、唐继尧促西南联合，"即时发起西南联合会议，务期联西南各省为一大团体"，以资抵抗北逆。

△　段祺瑞之亲信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陆军特别大演习，日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

三，乘机向靳、曲渲染俄国爆发革命后德国有侵入东方的危险，暗示有必要加强中日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之东侵。

△　国会议员黄攻素、中国公民联合会代表谭延闿等联名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抗议《蓝辛—石井协定》。

11月15日　　段祺瑞请辞国务总理职，次日通电全国为其对西南用兵辩解，指责王汝贤停战系“为虎作伥”，“不顾大局”；声称“为免北方军人分裂”，呈请辞职。

△　湘粤桂联军再克衡山。按：上月14日湘粤桂联军夺回衡山，旋复失。是日，联军击败自萱洲铺来犯之北军，再克衡山城。

△　湘督傅良佐偕省长周肇祥于昨夜自长沙仓皇出逃。是日，省城绅商组织“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公推王汝贤为办公处主任。

△　孙中山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广东督军署，以驱逐陈炳焜。程璧光拒不执行命令，且将各舰调黄埔，宣布戒严。

△　江苏省江宁县地方公会、教育会、商会、农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合采凤凰山铁矿。

△　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订立第一次军械借款契约，总额日金1718.6461万元，折价交付军械。是为中日第一次军械借款。

△　日商在大连开办满洲贮金信托株式会社。资本200万元。

11月16日　　唐继尧电孙中山，报告滇黔军已克氓场、界石、三百梯、自流井、荣县等地。

△　湖南军民两政办公处派岳森等前往衡山与湘粤桂联军接洽，

谋求停战。

△　冯国璋任命蒯寿枢为青海甘边屯垦使。

11月17日　　冯国璋致电各省，宣布对国事近情之意见，声称政府对于西南“不得已而用兵”，现“川事颇为得手”，广东方面，因龙济光、李厚基、莫擎宇“倾向中央，暗中牵制”，故陆荣廷等“虽有援湘之兵”，“以是不能大举”；指责长沙求和通电未能“为中央留余地，保政府之威严”；要求各省提出挽救时局“高见”。

△　段祺瑞通电宣告，因冯国璋坚留，是日照旧任事。

△　湘粤桂联军与北军第八师王汝贤等部在易俗河（湘潭县属）接战，联军乘胜占领湘潭。同日，湘南护法军占朱亭。

△　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常德宣告自主。19日，该师第三旅五、六两团进逼师部，迫陈交出关防，随即收编军队，接收枪械，开赴湘阴。

△　军政府潮梅军第一支队攻占龙川属铁场、蓝关等地。次日至长安，19日克五华。21日，孙中山致电该支队长兼前敌总司令金国治祝捷。

△　滇军顾品珍部占领四川合江县。

△　江苏松江县五库乡遭受虫灾，乡民2000人拥至县署请愿，控告枫泾警察分所所长“匿荒”，并要求减免田赋。24日，枫泾、五库乡民2800余人复齐集县署，要求减租。县知事急出布告，不准再有聚众报荒情事，嗣又缉拿抗租农民10余人。

11月18日　　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联衔通电调停时局，主张北京政府及西南各省撤兵停战，表示愿任调停之责。

△　孙中山发表时局通电，反对南北调和。指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并希西南各省一致主张到底。

△　孙中山致电孙洪伊，谓护法原以“恢复约法效力及旧国会为目的，舍此不提，则吾人此次义举，即成为无意识之举动”，并指出，议和“当以取消非法机关，恢复旧国会为惟一无二之条件”。

△　孙中山通令坚决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望诸将士“一德一心，合力讨逆，以克竟军政府与诸将士拥卫约法国会之大责”。

△　王汝贤、范国璋撤离省城，湘南护法军前锋进占长沙。19日王汝贤退抵岳阳。

△　冯国璋令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免职查办；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湖南督军职务。

△　湘粤桂联军击败安武军，占领醴陵县。

△　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愿派四师兵力，自筹饷械，亲自率队攻湘。

△　法国公司在河南、山东等处招募华工1400余名，是日自上海乘轮放洋。

11月19日　　冯国璋令准段祺瑞辞陆军总长兼职，特任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准免奉督张作霖第二十八师师长兼职，以汲金纯继之；又令准免陆军次长徐树铮本职。

△　湖南军民两政办公处推举长沙讲武堂长彭廷衡、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为军民两政主任，维持长沙市面秩序。

△　岑春煊发出调和时局通电，要求大总统责成内阁“罢兵尊

法”，则西南各省“亦可徐图解决”。

△　江西财政厅为解决省内军政开支，以该省币制公债担保，与日本九龙台湾银行签订日金50万元借款合同。

11月20日　　粤督陈炳焜去职离省。次日，莫荣新奉陆荣廷电令正式代理粤督职务。

△　冯国璋特任张澜为四川省长。

△　北京政府于北京设侨工事务局。是日，冯国璋任命张弧为侨工局局长。

△　孙洪伊复电曹锟等四督军，指出必须坚持约法，否则“别无调停之可言”，提出罢免段祺瑞职、恢复旧国会、惩办倪嗣冲张勋三项主张。

△　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联名致电日本首相寺内等，促勿借款段祺瑞购械，压迫护法之国民。

△　冯国璋令公布《修正褒扬条例》，规定凡合“孝行纯笃”、“节烈妇女”等八条之一者，由部呈请褒扬。

△　熊希龄与美国广益公司签订《运河借款合同》草约，债额600万美元，利率七厘，以运河通航税等收入担保，作为整理直隶、山东省内运河之费用。次年7月20日，借款合同正式签字。按：美日两国于本年3月9日签订共同承担中国运河借款合同，由美国出面，600万美元借款中，250万美元由日本兴业银行担任。

△　教育部为支付留日学款，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日金10万元借款合同。

△　日本三菱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资本额定5000万日元。

11月中旬　财政总长梁启超编就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中央收支概算，密呈冯国璋、段祺瑞，陈述政府财政困难状况：中央各项收入，共约7000余万元，支出实已不敷3100余万元，筹补所得，共合银元2000万元左右。然自概算定后，经常费之意外短绌，各项不敷实达5000余万元。并以“财政困难实达极点”，“即请迅简贤能，尽月内接替”。

11月21日　国务院、陆军部任命鄂督王占元为在湘各军总司令，驻武岳军司令王金镜为副司令；免去王汝贤、范国璋湘南各军总、副司令职。王占元、王金镜分别电冯国璋力辞不就。

△　陆裕光、赵恒惕、周伟与宋鹤庚分别率湘粤桂联军（简称南军）第一、二、四军自长沙拔师往攻岳阳。邱渭南已于先一日率第三军离省城攻岳。

△　非常国会通电重申只有恢复约法，重集旧国会，组织合法内阁，方能“解目前之纷，弭将来之祸”。

△　陆荣廷致电黔督刘显世等，指出西南“亟应密为联合”，以“推倒段内阁，召集国会，恢复黄陂（黎元洪）自由”为主旨，并谓黎元洪“如果正式辞职”，冯国璋“即可依法继任”。

△　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自衡山抵长沙。

△　攻闽粤军攻占兴宁，旋退出。27日，再占兴宁。

△　川军第一师、第三师攻占泸县城，滇军退向兰田坝。

△　广东省长朱庆澜调拨警卫军20营归孙中山，以不得在广东驻屯为条件。

△　冯国璋特任郭宗熙为吉林省长。

△　冯国璋令财政、农商两部组设劝业银行。

11月22日　　冯国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特任汪大燮暂行兼代。

△　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兼军务会办。

△　援湘滇军支队司令官彭学游等电孙中山，报告联合桂粤，护国援湘。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梁启超、督办水灾善后事宜熊希龄以多伦、山东临清、山西杀虎口三地常关税收入担保，与日本银行团代表李士伟签订日金500万元借款合同，是为京畿水灾救济借款。

11月23日　　冯国璋通电各省说明段祺瑞辞职经过，并称："目前段总理虽暂时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总理扶持之雅，不异曩昔。"

△　李烈钧以滇黔全权代表名义电请西南各省及海军各派全权代表，克期集合广州筹商联合组织事宜。

△　安徽程蒯等以倪嗣冲倡言解散国会，阴谋复辟，是日通电护法，宣布成立"皖北讨倪军"。次日，攻占寿县。

△　孙中山以西南各路凯报迭至，粤省地方一致护法讨逆，令除潮梅外，一律停止招收民军。

△　北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致电曹锟，提出"南军退出湘境，始可言和"，而"谋南北之统一，则广东政府当然消灭"。

△　南军陆裕光部抵湘阴大荆驿。次日，与王汝勤部接战。

△　川军占纳溪县。

11月24日　　陆荣廷电复江苏督军李纯，赞成直隶等四督军18日停战通电，并望转呈总统以明令颁布。

△　孙中山电复李纯，谓“解决国内之争，只有法律二字”。

△　粤省督军莫荣新召集军事会议，议决海陆军联合攻闽，海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陆军分桂、粤、滇三路，以林虎、陈炯明、李烈钧分任总司令。

△　攻闽粤军占惠来，次日占普宁。

△　莫荣新邀集海军、驻粤滇军军事长官及各界要员会商西南联合事宜，并通电主张湘、粤、桂三省组都司令部，请陆荣廷任都司令。

△　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致电孙中山，表示誓死护法，并提恢复旧约法、旧国会等和谈十原则。

△　李耀汉通电辞广东省长职，并请冯国璋收回兼署督军成命。

△　南军邱渭南部抵华容。28日，与商震部在新洲铺接战，商军失利，邱渭南乘胜于本月30日及12月1日进驻淤嘴、小桑铺一带。

△　程潜在长沙就湖南省长职，湖南军民两政办公处宣告取消。

△　山东省城各界开公民大会，抗议日本在青岛等地设民政署，议决派请愿代表赴京，要求政府向驻京日使严重交涉，务使早日撤销，以保主权。

11月25日　　冯国璋通电宣布停战，要求各饬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进行，听候解决”。

△　陕西焦子静等在白水县通电宣布自主，组成“陕西护法军”，并发布讨伐陕督陈树藩檄文。

△　程璧光、李烈钧、吴景濂等电举胡汉民为广东省长。

△　谭浩明以未经北京政府任命为由，通电宣布“湘督一职，决不承认”。

△　“总统府统率办公所”成立，荫昌为所长，段芝贵为副所长。旋因皖、奉、闽、浙、鲁五省督军联衔反对，冯国璋遂电告仅为临时机构，并已改名军事处，派师景云为处长。

△　北军第八师团长梁得胜等16人自岳阳致电冯国璋等，请惩办傅良佐。

△　留日学生代表李国英致电冯国璋，谓“日美宣言，国势益急，速停内讧，以御外侮”。同日又电苏鄂赣直四省督军，“请遵约法，解决纠纷”。

11月26日　　浙江宁波驻军通电宣告自主，与浙省军民两署脱离关系，组成宁波独立军，设司令部于宁波，推前都督蒋尊簋为总司令。28日，温州、处州（今丽水）宣布独立。绍兴、台州（今天台）、严州（今建德）亦分别响应自主或独立。

△　孙中山致电襄阳联军总司令黎天才等，请与滇黔川湘桂各军合力并进，会师武汉，断敌归路。

△　闽督李厚基以粤军节节胜利，致电北京政府告急，要求速调兵力分布永定、上杭、诏安一带组成第二线，并请饬冯玉祥旅开往汕头应援。

△　荷公使贝拉斯照会外交部，为北京政府清理德华银行事再提抗议。

11月27日　　程璧光主持海珠军事会议，筹议攻闽方略。决议合海军粤军滇军分途攻闽，以程为联合军总司令官，李烈钧为总参谋，

汪精卫为总参议。海军总司令官林葆怿统率海军全部；征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统粤军20营；征闽滇军指挥官由李烈钧兼任，下辖靖国五军、六军等部。

△ 攻闽粤军占梅县，29日占揭阳。

△ 英公使朱尔典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告知驻京各使决定将张勋护送出中国领土以外。

11月28日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奉陆荣廷之命通电停战。同日又电催直、苏、鄂、赣四督军“通饬各军前敌军队一律停战，并将驻岳各军完全退出湘境，以示和平决心”。

△ 南军周伟、宋鹤庚部进抵湖北公安县。

△ 川军攻占叙府。滇军退庆符（今属高县）。

△ 江苏督军李纯致电孙中山，称：“纯勉任调人，力微责重……尚祈惠我南针，俾有率循。”

△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请坚持护法，声称：“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若执政者必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南方各省人民宁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能偷活于暴戾淫威之下。”

△ 孙中山接日议员菊池电请派人赴日商议中国和平事，内称：“昨阁议决定，与协商国商议，使南北妥协，中国早归平和。南方须多让步，勉求东亚大局一致”；并称：“代表南方各派，以在日有信用之张继、汪兆铭为宜。”

△ 段祺瑞访日使林权助，告以王士珍内阁即将成立，政策均无变化。

11月29日 孙中山电复李纯，称：“倘能约法、国会完全恢复，

创乱诸逆依法惩办，并由正式国会解决总统、内阁诸问题，则半国之兵不难一朝而罢。”

△　广东钦廉镇守使沈鸿英诱杀军政府潮梅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兼前敌总司令金国治，并将金军缴械遣散。

△　宁波自主军与浙江第一师在曹娥、百官接战，自主军败退宁波，旋由商会给资遣散。温、台、处、绍、严等地亦随之取消独立。

△　南军赵恒惕率队抵湖北通城县境，于白螺山、向家岭一带大败来犯之北军，次日占通城。

11月30日　　冯国璋令准免暂代国务总理外交总长汪大燮本兼各职，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准免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农商总长职。

△　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致电冯国璋，请派员南下面商调停之策。

△　云南省议会电孙中山，誓不承认段祺瑞非法订立军械借款密约，并请“迅速进兵，谋讨奸憝，以救危亡”。

△　冯国璋令曾述棨为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主任，李景铭、赖发洛为副主任。按：中国对德奥宣战，英、美、法、日等国允诺北京政府提高关税率，同意重新调查货价，改正税则，因有此委员会之设。

△　巴布扎布余部3000人，自称宗社党，攻入黑龙江景星县城（今并入龙江县）。经省派兵前往，旋即收复。

是月　奉天四（平）郑（家屯）铁路竣工。

△　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12万两，设总公

司于四川万县，分公司于重庆、宜昌。

△　沪通惠银号改组为通惠商业银行，资本100万元。

△　陆伯鸿、朱葆三在上海创办和兴钢铁厂，资本银50万两。

12月

12月1日　冯国璋任命王士珍内阁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务钱能训，财政王克敏，司法江庸，海军刘冠雄，农商田文烈，交通曹汝霖；准免王士珍参谋总长本职，以荫昌继之。

△　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今江陵县）宣告独立，并电请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取一致行动。

△　前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率旧部于鄂、豫边境宣布独立。3日，通电进驻随县、枣阳一带，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　武岳军总司令王金镜致电谭浩明、程潜，告以岳阳业已奉北京政府命令停战。

△　川军再败滇军，攻占庆符、高县。次日，占珙县、长宁。越二日，占安边（今宜宾县属）及滇属绥江。5日，占筠连。7日，占兴文。

△　是日起庚子赔款无息延付五年（每年2400万元）。

△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开成立会，15家纱厂代表参加。该会宗旨在于反对日商要求废止棉花出口税，选举聂云台、刘伯森等五人为议董。4日，推聂云台为总董。次年3月，选举张謇为会长。

12月2日　曹锟、张怀芝与山西、奉天、福建、安徽、浙江、陕西、黑龙江、上海、察哈尔、绥远、热河七省三区督军、都统、护军

使代表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15日，继续开会，适值北京政府电派曹、张出师令到达，作战计划遂定。越三日，会议结束。

△　孙中山将朱庆澜调拨之20营警卫军改编为“援闽粤军”，是日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许崇智为支队司令，先编成10营担任讨伐闽督李厚基之任务，进军福建。

△　李烈钧密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告以在京友人由外国使馆转来专电，谓：“段（祺瑞）去职甚郁愤，恨冯（国璋）入骨，其党羽在京布置，计划以武力倒冯；冯惧虑，亦有以武力扑灭段势力之势。”

△　冯国璋据黑督鲍贵卿呈请，以陆军第四旅旅长英顺“挟制长官，干没公款”，下令褫夺其陆军少将及旅长本职。同日又令准免黑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本职。

△　岑春煊致电北京政府，请速颁停战令。

△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冯国璋及各省督军省长，请顾念商艰，力主休战。

12月3日　冯国璋致电陆荣廷等，请“饬现在交战地点之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前进，听候解决，不过一星期当有分晓”。

△　徐树铮密电奉、皖、陕、甘、闽、浙、川等省督军，谓“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并谓段祺瑞虽暂时去职，日本此后对华方针，“仍认定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

△　黔滇联军三路袭重庆，吴光新军苦战经旬，力尽无援。是日，吴率师离重庆，督军周道刚亦乘夜逃遁。

12月4日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商会请熊克武出面暂行维持秩序。联军指挥官王文华、石青阳、顾品珍等率部相继入城。

△　攻闽粤军占潮阳。

△　唐继尧电告直、苏、鄂、赣四督军，已令驻川滇军停战，请代陈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

△　陕西龙驹寨（今丹凤县）驻军王时敏等，以护法军名义占据商（县）洛（南）一带。

△　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通电宣布讨逆，并于是日进据枣、随，与西南各省一致进行。

△　冯国璋特任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河南督军赵倜兼署省长；任靳云鹏为侍从武官长，萧耀南为直隶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12月5日　冯国璋任命恽宝惠为国务院秘书长，财政总长王克敏兼署中国银行总裁，阎相文为直隶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　湖南巡防各营营长唐天寿、田楚珩等致电孙中山，请准谭延闿回湘主政，以维湘局。

△　潭浩明致电唐继尧，要求“西南一致，以免纷歧”。

△　旅沪商帮协会致电冯图璋，再请“速颁停战命令”。

△　英公使朱尔典据哈埠英领电称俄共将派兵接收哈尔滨及中东铁路，特面告北京政府外交部，并促中国出兵维持哈埠秩序。

12月6日　谭浩明复电冯国璋，重申湘省停战须以北方撤出岳阳为条件。

△　程潜致电陆荣廷，“以武力解决岳阳问题”。

△　驻粤滇军在广州开军事会议，议决派第四师第八混成旅攻闽。

△　湖北第一师团长谢超在黄州（今黄冈县）宣布自主。

△　冯国璋任命刘存厚为崇威将军，仍留川会办军务。

△　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联衔电请北京政府颁令讨伐西南。

△　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在日与梁士诒晤谈，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望梁与段祺瑞任其事。

12月7日　冯国璋特任湖南省长谭延闿兼署督军。次日，谭复电提出北京政府所派军队撤离湘境及募足两师省防军等五项条件，并称如“中央不表同意，决不就职”。

△　非常国会致电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称北军“阳托调和，阴则厚增援兵”，望联合粤桂援军速攻岳阳。

△　驻粤滇军第四师伍毓瑞第八混成旅在广州誓师攻闽。滇军全权代表李烈钧宣读誓辞，号召将士诛逆护法，踊跃用命。12日，伍旅长率队自黄埔出发。15日，第九混成旅亦由石龙（今东莞县属）开拔攻闽。

△　海军“海圻”、“永丰”、“同安”、“豫章”、“福安”五舰由黄埔出发攻闽，旋因龙济光在琼州宣布就两广巡阅使职，龙军数个由琼潜渡登陆，深入内地，各舰乃回师定乱。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派兵进驻哈尔滨，由外交部电知吉林当局，如“俄人有暴动行为，即以武力对待”，并由国务院电奉、黑两省协助。

△　汉口各团联合会致电黎元洪及陆荣廷等，以川湘战事延及鄂境，要求将武汉“划为战线之外”。

12月8日　徐树铮密电奉、黑、陕、晋、豫、甘、闽、浙、沪各省督军、护军使，并吴光新、龙济光，谋倒王士珍内阁，逼苏督李纯下台，诡称“欲求国事进步，非先更易阁王、苏李，万无着手之地”，并迫冯国璋按武力统一政策行事，否则组织国会，立即选举大总统。

12月9日　冯国璋通电各省，以俄、德媾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英、法政府“深望我国与日本同一进行”，主张息争，助日攻俄。

△　陆荣廷与冯国璋暗中洽和，是日致电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等，称：“迭接冯代总统来电，主张调和，直苏鄂赣亦与前军提议停战条件。海军出发可否少缓日期，暂候解决，以免别生冲突。”

12月10日　程潜通电西南各省，指出北军陆续增兵岳阳，切勿“轻与议和，致中诡计”。

△　孙中山电促唐继尧等“迅出宜昌东下，进据武汉”。

△　唐继尧任命黄复生、卢师谛为四川靖国联军总、副司令，是日将此事电告孙中山。

△　湖北党人蔡济民率民军攻克广济，次日占黄梅，自称鄂军总司令。12日，在武穴（今属广济县）为防营挫败，广、黄复失。

△　广东矿务督办龙济光在琼州（今琼山县）就任两广巡阅使，宣称节制两粤水陆军警。

12月11日　龙济光自琼州出兵攻粤。14日，由阳江登陆。

△　陕西警备军分统领耿直在西安响应护法，围攻督署，陕督陈树藩仓皇出逃。越二日，警备军败逃，陈复还省。

△ 闽督李厚基为购买军火，以洪山桥（今福州市属）兵工厂担保，与香港台湾银行签订日金140万元借款合同。

12月12日 程潜自长沙率队开赴平江，指挥南军各部进攻岳阳。

△ 孙中山任命石青阳为川北招讨使。

△ 哈尔滨俄工兵苏维埃发布《告公民书》，称："自本日起，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即为国家主权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本委员会管辖。"

12月13日 滇黔军在重庆与川军熊克武会合。熊克武通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拥护护法，与西南一致行动。

△ 四川国民军总、副司令黄复生、卢师谛联电孙中山，告以经与唐继尧、章太炎商议，将"四川国民军"更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靖国军"，与"滇、黔、荆、襄各军联为一气"。

△ 川军占领西昌县，张煦率靖国第七军退会理。

△ 黑省滨江县警备队一营开进哈尔滨中东铁路界内。

12月14日 陆荣廷通电卸两广巡阅使职，次日致电冯国璋等，要求"罢兵息民，一致对外，化除畛见，同护共和"。

△ 攻闽粤军占汕头、潮安，莫擎宇退走。海军"海容"、"江亨"、"楚谦"三舰宣布护法。是日，沈鸿英部破饶平县，闽军退至大埔。

△ 陈凤石以"四川靖国招讨司令"名义在大竹县宣告独立，旋通电护法。

△ 熊克武致电周道刚、刘存厚等，劝川军参加护法。

12月15日　　国务院特任直督曹锟为攻湘第一路军总司令，鲁督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令各率所部“应援鄂赣，以定大局”。

△　粤督军莫荣新、省长李耀汉联衔通电全国，以两粤自主，不受非法内阁命令，宣布龙济光就任两广巡阅使无效，请陆荣廷收回卸任之通电。

△　程潜等通电公推谭延闿为湘省议和代表，旋又推举岑春煊为西南议和总代表。

△　滇军再次攻占四川纳溪县，旋攻永川。

12月16日　　湖北襄阳镇守使黎天才通电宣告自主，并就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

△　莫荣新、程璧光、李烈钧联电宣布：非俟冯国璋明令取消解散国会及召集临时参议院原案，不能停战。

△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等电孙中山声明决不承认龙济光就任两广巡阅使。

△　莫荣新召集军事会议，主出兵讨伐龙济光。是日，粤督军、省长联衔电告龙济光，如派兵入境，当以土匪论处。

△　莫荣新电告唐绍仪等，闽军退归闽境，粤军业已停战。

12月17日　　谭浩明抵长沙。次日，通电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程潜辞湖南省长职。

△　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成立，陶祥贵为总司令，么佩珍为副司令，高士傧为会办，负责护路。

12月18日　　冯国璋特派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准免王士珍陆军总长兼职，以段芝贵继之。

△　冯国璋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周道刚为保威将军。

△　孙中山致电唐继尧，称川局前途，殊多进步，“应请酌派劲旅二大队，一出宜昌，一下汉中，以收奇功”。

△　孙中山电贺湖北靖国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举义讨逆，并重申护法卫国。

△　川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旅长王奇在合川通电宣布护法。

△　何宗莲、张宗昌、陶祥贵等与被免职之旧俄驻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密谋遣散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中东铁路俄军，要求霍尔瓦特三日内将工兵苏维埃领导人留金及俄军解除武装，遣送回国。

△　日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新闻纸令》，以管制台湾报刊言论。

12月19日　　是日及21日，李纯、陈光远分别致电北京政府，阻张怀芝军假道苏、赣攻湘。

△　滇黔联军攻占泸县。21日复占永川县，川军退荣昌。

12月20日　　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黎天才攻豫，是日与豫军在南阳接战。23日，黎军占新野。数日后豫军复将新野包围，黎军退回襄阳。

△　粤海军于阳江捕获龙济光兵舰六艘。

12月21日　　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告独立，声明护法讨逆，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　攻湘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派师长吴佩孚率领第五混成旅自保定启程，25日抵湖北孝感。

△　攻湘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派兖州镇守使施从滨率山东暂编陆军第一师南下，30日抵安徽滁州（今滁县）。

△　熊克武通电宣布加入滇黔联军，推举唐继尧、刘显世为滇黔川靖国联军总、副司令，熊自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　孙中山致电熊克武，以川滇黔唇齿相依，“执事又与莫帅（按：唐继尧）为休戚相共，当此协同救国之时，务宜通力合作，以厚实力，会师东下”。

△　冯国璋特任李静诚兼署广西省长；任命徐孝刚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准海疆巡阅使萨镇冰辞职。

△　美国传教士、《北京晚报》主笔李佳白因言论亲德，被逐出境。

12月22日　　鄂、赣、苏三督王占元、陈光远、李纯通电，谓上月18日与直督曹锟联名之通电，系“仰体极峰（冯国璋）息事宁人之意，复承明谕放手进行”，及与同人往返电商一致意见。

△　山东党人邱子厚所部范玉琳，以“山东护法军第二梯团战时第一路司令”名义通电声讨鲁督张怀芝。

△　江西省议会、总商会致电冯国璋，反对张怀芝所部军队南下攻湘。24日，江西学界通电严拒张军入境。

△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国务院请示对待哈尔滨局势办法。

△　《北京时报》易名《经世报》，陈焕章为总经理兼总编辑。该报创刊号社论谓：“经世既为孔子之志，则吾人愿学孔子者，自当志孔子之所志，事以经世为事矣。此《经世报》之所以作也。”

△　日本三井银行上海支行开幕。资本额定一亿日元。

12月23日　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黎天才部占天门县。

12月24日　南军将领谭浩明、程潜等通电宣布北京政府罪状，誓告讨诛国贼，“以保障共和”，并称段“罢职仅去其名”，冯“言和难行其实”，“倘有战事发生，当必有尸其咎者”。并表示“我辈为家为国，自不得不捐弃顶踵以图保障共和”。

△　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布告，以12月25日云南首义日为国庆日。

△　孙洪伊电孙中山称，段祺瑞复出，谋先取南京，李纯已动员抵抗，盼西南各省一致进行。

△　孙中山电江苏督军李纯，称北政府“汲汲备战，不遗余力”，西南诸省“不能不谋自卫”，调停应以法律为重，力求持平。

△　国务院电示吉督孟恩远，对哈埠局势“相机应付”。

△　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部自重庆退至湖北宜昌。自本月22日，吴部先遣队抵宜后曾与荆州石星川靖国军接战。31日，石部击败吴光新部，乘胜占领宜昌。

12月25日　冯国璋布告弭战。略谓：“国璋夙以和平为主旨，久拟警告同胞，早弥战祸。……近日上将军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广西督军谭浩明等，均有遵饬所属各军停止进行之表示，陆荣廷且有劝告桂粤取消自主之宣言。此天心厌乱之机，即人事昭苏之会，中央与各省，均应表示同情。深望容纳劝告，解息纷纭，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

△　冯国璋公布《国定关税条例》八条，适用于无条约国，其中规定：奢侈品进口从价课税由30％至100％，普通商品由10％至

30%，必需品由5%至10%。

△　刘建藩率湘南护法军自长沙拔师往攻岳阳，27日抵平江。

△　吉省第三混成旅旅长陶祥贵与霍尔瓦特交涉驱逐俄兵出境办法。

12月26日　　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致电冯国璋，指出临时参议院为非法机构，解决时局关键在于“恢复旧国会”。

△　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张学济应石星川所请派队援鄂。是日，张军抵湖北监利县。

△　孙中山特任古应芬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

△　吉省中东路警备司令部派么佩珍团解除秦家岗559号俄兵武装；高士傧旅解除铁路大桥西668号俄兵武装。自28日起，被解除武装俄兵1800余人被运送出境。

12月27日　　孙中山致电章太炎，望促唐继尧早撤驻泸之师，挥师东下，期与黎（天才）石（星川）联络破敌。

△　冯国璋任命陈调元为陆军第七十四混成旅旅长。

△　富拉尔基、博克图、碾子山、扎兰屯等处俄兵哗变。29日被解除武装，遣送出境。

12月28日　　孙中山电章太炎，请告唐继尧转前敌将士与湘西林德轩靖国军提挈。

12月29日　　孙中山电唐继尧、刘显世，望赞同为滇川黔三省总、副司令，并望早日就职。

△　冯国璋任命郭宗熙为中东铁路督办。

12月30日　孙中山电唐继尧，深望克日东下宜昌，“以为宁赣之声援”。

△　北京政府派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南下攻湘，是日张部先遣队抵九江。

△　莫荣新任命沈鸿英为讨龙（济光）第一军总司令，林虎为第二军总司令。

12月31日　督军团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孟恩远、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16人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并请冯国璋“敦促参议院迅将政府提出之选举、组织两法克日施行，以为召集新国会之张本”。

△　刘显世致电冯国璋，请罢斥段祺瑞、段芝贵。

△　沈鸿英通电就任讨龙军第一军总司令，当即颁发讨龙布告，宣布龙济光祸粤殃民之三大罪状。

△　北京政府以俄国发生革命，通知税务司自本月28日起，对俄应付庚款暂予扣留。是日，俄使库达摄夫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提出口头交涉。

△　程璧光、莫荣新将修改后之《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条例》通电各省。

△　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理发工人同盟罢工。次年1月6日，工人与店主议定增加工资，罢工结束。

△　日商在青岛开办东和油坊，资本100万元。

△　王秉铨创设哈尔滨安裕面粉无限公司，资本30万元。

是月　北京孔德学校创办，蔡元培被推为校长。

是年　私立齐鲁大学在济南建立。该校由山东广文学校、济南共和医道学校、青州神道学校三校合并而成，设有文、理、医三学院。

△　7月以来，中国北部普降大雨，京畿、直隶各河水陡涨，泛滥成灾。至9月，直隶灾区105县，灾民430余万，为数十年所仅有。此外，山东、山西、陕西、奉天、吉林、热河、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等10余省均罹水灾。

△　沈知方创设世界书局，资本1.5万元。至1921年该局与广文书局合并，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扩大至2.5万元。发行所设于上海、北京、广州。

△　薛仙舟创设工商银行，资本500万元，总行设香港，分行设上海，1930年7月倒闭。

△　美商在上海开办美丰银行，资本200万元。

△　兴业银行在沈阳成立，额定资本100万元。

△　由奉省各界知名人士入股组成辽宁储蓄会，资本810万元。

△　王郅隆在天津创设裕元织厂，资本200万元。

△　日商在吉林开办富宁造纸公司，资本日金100万元。

△　日商在抚顺开办南昌洋行株式会社，开采煤矿，资本270万元。

△　山西阳泉创设保晋铁厂，资本75万元。

△　李镜轩、郑效三等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0万元，总公司设天津，分公司设上海。

△　杨济川、王星斋、苗杏村在济南创设惠丰面粉公司，资本30万元，日产面粉2500袋。

△　梁秩生等在上海创设中国兴华制面公司，资本六万元，日产面粉800袋。1922年，资本扩大至100万元，日产面粉6000袋。1926年停业。

△　上海中国美术专科学校举办人体素描展览，引起争议，出现“人体风波”。

1918年（民国七年）

1月

1月1日　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发出布告，勖勉全国军民在新的一年中奋发前进，“速图戡定内乱，回复和平，使法治之效，与并世列强同轨”。

△　云南都督兼省长唐继尧发出时局通电，历数段祺瑞之罪，并质问冯国璋前内阁违法诸端未闻纠正，近日政府所为，为何变本加甚。

△　吉林省长郭宗熙电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陈述办理交涉中东铁路办法，其要旨为：目前应向俄人接洽；此后依照合同暨公议会大纲办理；收回权利宜取稳健态度。

△　华侨学生会在上海成立，举伍廷芳、杨晟、黄仲涵等为名誉会长，谢碧田为会长。

1月2日　孙中山致函何成濬，指出北方对和议“绝无诚意”，并委其经营长江军事。

△　孙中山令川东招讨使石青阳改任川北招讨使。

△　冯国璋令吉林省长郭宗熙兼任中东路督办。

△　河南淅川县驻军宣告自主，后与湖北襄阳黎天才军联合。

△　滇黔联军攻占四川荣昌，3日占遂宁，6日占顺庆（今南充），8日占隆昌，9日占保宁（今阆中），13日占屏山、筠连，15日占内江等地。

1月3日　　为惩罚桂系军阀、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是晚，孙中山命海军“豫章”、“同安”两舰炮轰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孙中山登舰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数十炮，至拂晓始止。莫荣新因恐粤、滇两军起而响应，不敢还炮。世称孙中山“炮教莫荣新”。

△　曹锟等15省区督军、都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依临时参议院修改之法召集新国会。

△　山东各混成旅改为山东暂编陆军第一师，冯国璋任命施从滨署山东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

△　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奉军政府命率部攻闽，是日与福建汀漳镇守使臧致平部在诏安接仗。

△　滇军与川军刘存厚部在泸县接仗。

△　永亨银行成立。总行设上海，董事长施肇基，总经理朱蕙生。

1月4日　　苏督李纯、鄂都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联名电请北京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以示和平之旨”。

△　冯国璋令准交通总长曹汝霖续假20日，派次长叶恭绰暂代部务。

△　冯国璋为此次“甬兵叛变”事，明令褫夺宣威上将军、陆军中将蒋尊簋、陆军中将周凤歧、陆军少将徐乐尧、叶焕华、高尔登等人勋位、勋章暨原有军官，一并通缉拿办。

△　北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通电主和。

△　北京政府京津一带总稽察长王天纵在河南临汝宣告独立，并宣布宗旨：恢复旧约法，驱除逆凶，杜武人专横。

△　孙中山为莫荣新俯人调停炮击观音山事件，向莫提出：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之最高领导机构；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之全权；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等条件。莫表示须请示陆荣廷。并于同日亲赴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谢罪。

△　安徽督军倪嗣冲电四省剿匪司令张敬尧等，告以莫荣新、李烈钧全力对龙济光，专攻龙军，倘一旦龙军失败，西南各省永无统一之望，而大局前途必陷万劫不复之地；主张请曹锟主稿，联电中央，力陈利害，如果南方对龙仍不停战，即请宣布罪状，明令讨伐。

1月5日　　皖系各督军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15日结束。会议反对恢复旧国会，要求北京政府对西南速下讨伐令。

△　北京政府收到莫荣新、陈炳焜、李烈钧、程璧光、方声涛等来电，提出停战条件：一、召集旧国会；二、内阁改组；三、取消龙济光巡阅使命令；四、北军退出岳阳；五、莫擎宇军调往他处。

△　孙中山派遣国会议员朱念祖等持函往晤赣督陈光远，劝其“争回被毁之法”。

△　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开幕式，除中国代表外，另有英、美、日、法、俄、意、比、荷、葡、丹麦、挪威、瑞典、巴西等14国代表出席。17日开第一次会议，至12月22日结束。

△　北京政府财政部呈请暂缓偿还届期还本之民国三年有奖储蓄票1000万元，冯国璋指令照准。

△　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2500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及改以大洋发放工资举行罢工，造成机车车辆停修，向远东及西伯利亚停运粮食。12日，哈尔滨机车库700余人、车站装卸工1000余人举行声援罢工，迫使中东铁路俄方当局答应罢工要求。16日工人陆续复工。

1月6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与日本正金银行代表武内金

平在北京订立1000万日元善后续借款第二次垫款合同，以盐税和国库券为担保，用以拨还中国银行垫支军政费用，收回该行所发钞票。

△　冯国璋以绥远五原、萨拉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两县及包头一带发生鼠疫，派伍连德、陈祀邦、何守仁为检疫委员担任预防事务，由内务部饬令该员妥速办理，勿任蔓延。

△　孙中山任命林祖密为闽南军司令；李建中为湘西劳军使。

△　黎天才、石星川军攻占湖北宜昌，北军吴光新部败走。

1月7日　北京政府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订立200万日元印刷局借款合同，借款半数归财政部用以收回开滦股票，半数归该局偿还积欠经费。

1月8日　冯国璋电北洋各督，同意对西南诉诸武力。

△　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16省督军、都统等电催冯国璋速颁对西南讨伐令。13日再电促冯速颁对西南讨伐令。

1月9日　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事件经过，揭露桂系真面目。工商各界代表亦表示当赞助大元帅之主张，尽力辅助军政府。

△　陆荣廷电程璧光、莫荣新，对所提《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表示“极所赞同”，并“即请公决，速行组织”。

1月10日　北京政府参陆办公处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电令湘鄂援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克日分路进攻湖北荆襄地区石星川、黎天才自主军。

△　冯国璋令绥远五原、萨拉齐两县及包头镇为防疫施行区域，其东路之丰镇系交通孔道，应一并指定，以便先事筹防，由内务部督饬施行，并交外交、财政、陆军、交通等部会同办理。

1月11日　苏督李纯因力主调停受皖系主战派攻击，电冯国璋请辞督军职，谓："其始言调和也，实先秉承中央，乃敢进行；迨停战实行也，复经辞卸调人，以声明责任。……且观近日现状，隔阂益甚，势已无可疏通，而疑谤繁兴，诘责纷起，凡百咎戾，皆将集于纯之一身，既知任重力微，何敢有所留恋，以妨碍大计？惟有自请罢免，即时解职，以谢国人。"

△　章太炎自重庆电孙中山，报告川省护法情形。略称靖国军已进抵离成都约三里。川中人心多归熊镇守使，其军实亦较前大有增加，川局定后尚有余力东下。

△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在军署召开军政会议，会同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所派之道尹王树翰共同讨论中东铁路善后事宜，议决军事、警察、路政、税务、司法、交涉六案。13日，吉林督军省长将所有议决情形汇报北京政府，除税务一项应令财政厅即予照办外，余俟中央同意，当与江省互相提挈，渐次依据进行。

1月12日　湖北靖国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等电告孙中山称，"中央对于西南仍以武力解决"，且拟对岳阳暂取守势，先攻荆襄，一俟荆襄攻下，再联合宜襄部队取道湘西，同岳阳北军进窥长沙，并告"已电谭联帅、黎总司令请示机宜，并饬所部极力备战外，尚乞各方勿为和议所误"。

△　孙中山电复四川遂宁前卫司令李汝舟，望"奋勉戎机，俾川局内部融洽，一致向南，会师武汉，歼灭破法诸逆，促成真正共和"。

△　冯国璋派江朝宗充内务部防疫委员会会长。

△　冯国璋为北军会剿石星川、黎天才自主军，电催鄂督王占元将荆襄划为“治匪”区域。

△　冯国璋电饬直督曹锟、晋督阎锡山等，谓近日归化城发生鼠疫，传染甚速，绥远五原、萨拉齐等处定为防疫施行区域。现已由内务部呈请特派委员长，多派检疫员及医员分头前往检验。凡有疫病发生之地，相近处所地方官遇此项人员到时，亟须听从该员等切实检验，共同防范。

△　冯国璋派张一鹏充司法官甄录试及初试典试委员长。

1月14日　　冯国璋通电北洋主战各督，不允明令讨伐西南，并谓：“为维持国家秩序起见，以后倘各省抗命不从，有扰地方治安，即目为土匪，当命各省长官讨伐之，故不必明发讨伐令。”

△　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等12人联名通电，指出北京政府以临时参议院为立法机关实属非法，表示绝对主张恢复旧国会，并请冯国璋取消组织南征军队及任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刘存厚为四川督军诸命令。

1月15日　　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举行宣誓式，并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绍仪、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

△　孙中山欢宴援闽粤军将领、官佐，发表讲话指出：军政府得诸君拥戴，从此可望发展，并谓我正彼邪，我直彼曲，出师援闽“决无不克”。

△　驻丹麦公使颜惠庆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略称中东铁路合同，俄前政府屡次违背，现值俄两党斗争，建议暂将铁路收回，俟新政府成立时再商。

1月16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电令鄂督王占元及曹锟、吴庆桐、吴光新各派一混成旅进攻荆襄地区，并声明不涉及岳阳地方。18日，荆襄地区南北两军发生战事。

△　孙中山电抵达重庆之章太炎，请促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声讨刘存厚、钟体道，提兵进取成都，并商军政府委任川军总司令人选事宜。

1月17日　冯国璋公布《文官惩戒条例》，凡四章26条。规定“文官非依本条例不受惩戒，但国务员及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文官有“违背职务”、“废弛职务”、“有失官职上之威严或信用”情形之一者，应受惩戒。惩戒处分为：一、褫职；二、降等；三、减俸；四、记过；五、申诫。

△　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举行茶话会，旋又参加粤省议会谈话会及非常国会谈话会，发表讲话，均提出尽快在广东召开正式国会。

△　陕西靖国军占领三原。

△　美炮船“摩洛开细号”，英商船“江和”、“吉安”两艘分别在岳阳附近及监利县遭枪击，美士官一人殒命。是日，英、美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1月18日　孙中山会宴滇军将领，到李烈钧等五六十人。孙中山在宴会上演说，略称去岁西南创议，要求滇军各将士承认军政府，“一致进行，排除障碍，统一中国”。

△　龙济光部攻占广东化州，高雷镇守使隆世储战死，龙军乘胜进取高雷各地。

△　北京政府防疫委员会、内务部、财政部与道胜、汇丰、东方汇理、正金四银行签订72万两规银防疫借款合同，以上海盐余税款担保。

△　苏俄政府国民外务处函北京政府驻俄使馆称，俄驻华前任公使绝不代表现时俄国政府，并请中国政府组织中俄混合委员会，俾清理中东铁路问题。

1月19日　湘粤桂联军将领谭浩明、马济、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联名电孙中山，略称李督辞职，表明段党决心武力征服全国，以实行其一党统治海内之政策，表示和平固已绝望，护法初心，一息尚存，誓贯终始。

△　皖督倪嗣冲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速将客岁所颁之停战布告，实行收回，再颁明令声罪致讨（西南）”。

△　巴西新任驻京公使卜兰道在北京向冯国璋呈递国书。

△　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召开成立大会。2月1日开始营业。总行设北京。总理为陆宗舆，专务理事为柿内常次郎。9月25日于上海设立分行。

△　苏俄政府国民外务处远东股长伏涅新斯基通知北京政府驻俄使馆，现被派为驻华公使，且谓抵华后，将撤销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和退还租界。

△　俄公使库达摄夫访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高而谦，请转饬边地官吏严防俄共（布）党派员潜入中国鼓吹革命。库使并致外交部节略称，苏俄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作为运动革命经费，或将派员潜入中国。

1月20日　广东代督军莫荣新等13人联衔电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凡三章九条。《条例》称：“护法各省，为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戡定内乱，以巩固统一之基础，促进宪法之成立，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电文并谓：“北京组织非法政府，实为人民公敌，荣新等一息尚存，惟当本铁血之精神，作

法律之后盾，矫平内乱，以图国基，驱除祸首，以张法治。”

△　孙中山特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李安邦为大元帅行营卫队司令。

△　川军护法，举兵攻成都。是日，川军第五师克复成都，督军刘存厚、省长张澜退走。

△　北军第三师张学颜旅攻占襄樊。

1月21日　孙中山分函唐继尧、夏之时、石青阳、熊克武、吕超等，促其会师中原。

△　孙中山派殷汝耕赴日，将护法决心转告日本人士，并分函日友人头山满、菊池宽、犬塚木、寺尾亨、今井嘉幸、萱野长知等，望赞助中国护法，万勿使援段政策复萌。

△　湘粤桂联军与北军岳阳战事起。23日拂晓，湘粤桂联军攻击岳阳，占领岳阳江岸险要。

△　熊克武电请李烈钧为四川军事全权代表，参加正在广州举办的“护法联合会”。李烈钧表示同意。

△　吉林省长郭宗熙电北京政府外交部、交通部，告以俄京中东路总公司电哈尔滨霍尔瓦特总办承认中国在租界内有主权，并有权简派督办。

1月22日　孙中山函告孙洪伊，已委朱廷燎为苏沪军总司令，请其酌与苏督李纯接洽。

△　孙中山任命杨华馨为滇边宣慰使。

△　冯国璋特赦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及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

△　北军吴光新部迭与湖北靖国军石星川部接战，21日进入沙市。是日，吴军进占荆州，石星川率部退走湘西。

△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俄公使库达摄夫面告俄共（布）党派员至中国鼓吹革命并资助革命活动经费事，是日电驻库伦办事大员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督军、省长，阿尔泰长官及交涉员等严加防范，并与俄领接洽办理。

1月23日　孙中山宴请粤报记者发表讲话称，有同志老朋辈劝其下台，“余答以不必作此思想。余一息尚存，惟有打算上台，决不见难思退”。并阐述“行之非艰，知之维艰”之说。

△　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任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陆军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

△　徐树铮将中央议和意见密电皖系各督军：“一、国会以旧法新开；一、岳州北军调回，以西南人物督湘；一、陆荣廷如愿巡阅两粤，仍可复其原职，并兼督粤，龙（济光）则另作安置；一、川中许驻滇军一师半，划江为界。黔军亦可照前清保盐路办法，留驻一旅以上。”

1月24日　冯国璋访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商议对南方和议事。事后，冯以个人名义致电岑春煊，称中央讨伐荆襄，“实为被迫而然，且有不得已之苦衷。执事若能转知荆襄按兵不动，听候解决，则政府必当命鄂省不以治匪区域对待荆襄”。

△　石星川、唐克明联名电孙中山，告以荆沙失陷，退保江南，现在公安集合4000余众，望一致申讨北军。

△　湘粤桂联军攻击乌江桥，次日乌江桥北军被围。26日北军援军未达，乌江桥失守，联军直抵岳阳城下。北军攻岳总司令王金镜下令放火焚烧岳阳城。

1月25日　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出师援闽，是日电孙中山，表示为国讨贼，为民除害，非有誓守约法，恢复国会，确立共和之保证者，誓不还顾。

△　唐绍仪、胡汉民等组织南方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上海，拟与北方谋求妥协。

△　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第三团团长胡景翼部营长张义安在三原独立。27日，胡景翼与该混成旅第一团团长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县赶到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发表讨陈树藩檄文。曹、胡分任陕西靖国军左、右翼总司令，各自独立。后高峻、郭坚、卢占魁等部亦加入。

△　大连沙河口铁路工厂数千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1月26日　冯国璋以检阅军队为名离京南下，出巡济南、徐州、蚌埠，与皖系各督张怀芝、倪嗣冲以及李纯代表长江巡阅副使王廷桢等会商时局。

△　孙中山令准参军长兼署陆军总长许崇智辞陆军总长兼职。

△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称，中东铁路界内须有警察保护，应由中方主持，拟先于哈尔滨添置警察，俄总办添设俄警之要求断难轻许。

△　俄使库达摄夫会见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高而谦，要求撤退中东铁路之中国驻军，高以该路在中国地面，中国有维持秩序之责而拒之。

1月27日　湘粤桂联军攻占岳阳，入城后扑灭大火，收复全城，北军退临湘。是役北军1300余人被俘。护法战事再起。

△　北军吴佩孚第三师攻占襄阳，黎天才部退荆门。

△　冯国璋南巡阅军，东行至蚌埠，皖督倪嗣冲奉段祺瑞密令出而阻止，冯遂中止南巡，由蚌埠原车返京。

△　孙中山派军政府参议、江西省议员邓惟贤回赣并请孙洪伊作书介绍，联络赣督陈光远，赞助护法。

1月28日　谭浩明、陆荣廷、程潜等发表通电，表示决不进犯鄂境一步，并请李纯“毅力斡旋，促成和局”。

1月29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应参用实业专门人才；考察实业学校成绩之视学，须派实业人员，以谋实业教育之发展。

△　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电孙中山，报告已于是日抵达汕头。

1月30日　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着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

△　冯国璋特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

△　冯国璋特派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所有防岳各部军队统归节制调遣，迅图规复。

△　冯国璋特任曹锐署理直隶省长。

△　冯国璋令褫夺湖北襄郧镇守使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官职及勋位、勋章，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

△　冯国璋以湘省各路北军托故溃逃，颁令整饬军纪，“嗣后各路统兵长官，于所属官兵遇有不遵节制，无故退却等情，着即以军法便宜从事”。

△　广州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王正廷联衔电湘粤桂联军将领马

济、韦荣昌、程潜等，祝贺克复岳阳。并谓：“从兹进窥荆宜，会师武汉，肃清叛逆，还我法治，为期当不在远。”

△ 岑春煊通电提出南北划分之和平主张，略称：“现在全国和战之机，只在湘、鄂。岳固湘辖，北军原不必屯兵；鄂本主和，西南亦无须敌视。各守疆界，两不相侵。”

△ 滇军占领四川叙州。

△ 驻山东东部之陆军三营起义，反对北京政府，并集合民团2000余人进攻博山等处。

1月31日 江苏督军李纯致电孙中山，提出为今之计，双方“勿再前进”，乃“战和一关键”，请孙中山调停南北，“先各停战，双方限日提出一定条件，明白宣布，通告国人，必如此而后和”。

△ 唐绍仪抵广州，参加“护法联合会”。

△ 湖北黎天才军再次攻占宜昌，北军宋廷灿旅败退。

△ 广东讨龙军魏邦平部攻占阳江、恩平等县，龙济光军败走。

△ 华通物产贩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资本1000万元，经营国际贸易，本店设北京，支店设上海、香港等地。

2月

2月1日 孙中山复电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嘉贺联军收复岳阳，望率军会战湘、鄂，扼守武汉，进窥淮皖。

△ 徐树铮密电皖系陈树藩、阎锡山、李厚基及川督刘存厚等，提出引奉军入关，驱除王（士珍）、李（纯），拥段（祺瑞）、徐（世昌）计划。略谓：“现议由奉省抽调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

运京奉、京浦路次，强请明令罢李，李去后王必自退，不退再请罢之”，另选“耆德硕望之人，出任总理”；并告“以上办法，历经菊老（徐世昌）、芝老（段祺瑞）赞许，并促速行，以免武汉再有动摇，益形危殆”。

△　冯国璋令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严饬所属“随时切实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　唐继尧自贵州毕节行营电孙中山，陈述对川事意见，并谓“川局未定，窒碍尚多，以后进行如何，自当随时电达尊处”。

△　段祺瑞、张勋、冯国璋、倪嗣冲等与日本大仓组、棉花株式会社合办之天津纺绩有限公司开工生产。

△　中东铁路督办公所成立，冯国璋派吉林省长郭宗熙督办中东铁路公所事宜。

△　江苏省凤凰山铁矿筹备处成立。该铁矿曾于1915年由日商大仓组与中国合组华宁公司从事采炼。嗣因政局变动，停止进行，华宁取消。近来省议会及苏省绅商决呈请集股自办，农商部咨复先设筹备处，是日筹备处在宁开成立大会。

△　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开业，资本1000万日元，发行一元、五元、十元兑换券及一角、二角、五角辅币券。该行于1928年停业。

2月2日　孙中山致谭延闿函，指出：“最近冯氏（指冯国璋）南行，游说直鲁淮上，和议无效，战局复开，黩武穷兵，益滋纷扰。”表示：“文始终护法，罔识其他，区区之心，当为国人共亮。”

△　冯国璋以张敬尧上月30日通电首称岳阳失守，苏督奉有密电，仍主调和等语，是日通电否认主和密令。声称“前苏督以调人自处，不过默体鄙人爱重和平之意，初非中央先有委托”；“岳州之役，衅自彼开，鄙人痛愤填膺，引咎自责，方激励将士，亲自出巡，明令

主战，义不反顾，安有密令苏督仍主调和之理”？

△　程璧光、伍廷芳、唐绍仪等人邀请孙中山、莫荣新开会于海珠，讨论改组军政府办法：一、改元帅名称为政务总裁，设总裁若干人；二、联合会议之职，权限于军事范围，隶属于合议政府之下。

△　北京国务会议通过岳阳“讨伐”军费1000万元。

△　徐树铮密电奉、皖、闽、浙等省督军，转告王占元密告李纯倡议苏、赣、鄂三省联合条件：“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浦口；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四、海军第二舰队饷款由苏、赣、鄂共同担任”。

△　驻汉口各国领事鉴于南北两军可能在汉口作战，开会议决：一、将汉口划为中立地点，不得在租界内有战斗行为；二、各国商团及碇泊于汉口之各舰，须协同赴租界自卫；举日本驻汉口驻屯军司令官为总指挥。

△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电北京政府，陈述边防弭患办法六条及应行筹备事宜五项。边防弭患包括分饬中东铁路驻军严加防范，凡入境俄兵，一律解除武装及怀柔蒙古等。筹备事宜包括经营沿边重镇，注重兵防及增补武器，以对抗俄国等。

2月4日　　冯国璋据曹锟等呈请，下令洪宪帝制犯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三人，均准免予缉究。

△　苏督李纯复电冯国璋，否认奉有主和密电。谓：“张总司令‘苏督奉有密令’之言，不知何所根据，顷已去电致询，如系得诸传闻，或见之报章，自当通告更正，以证［征］事实而释群疑。”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陈报该部筹设铁路、电气两项技术委员会情形。铁路技术委员会遴派技监詹天佑充会长，电气技术委员会拣派署电政司司长周家义充会长，均经次第成立。是日冯国璋指令

照准。

△　北军攻岳前敌总司令张敬尧、湖南矿务总局聂仲邦，与日本兴源公司签订27万两规平银借款合同，以水口山铅矿砂6000吨为担保，借款用于湖南军政开支。

△　湖南长沙铜元局与日本古河洋行签订2.2万两规平银借款合同。

△　吉林督军孟恩远致电北京政府，请予中东路督办以专主事权，不为遥制，并请从速设立哈尔滨铁路警察。

△　新疆督军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俄属回民近日在新疆境内散发传单，煽惑当地回民脱离中国。

2月5日　　冯国璋布告罪己。首述对西南用兵停战经过，及此次战事再开之不得已；继谓傅良佐等偾事失机，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西南幸胜，反议弭兵，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末谓鄂疆再起兵端，“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生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

△　冯国璋以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暴邻疆，下令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等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

△　冯国璋令前湖南督军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前代理湖南省长周肇祥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

△　冯国璋以湖南长沙不守，岳阳失陷，下令褫夺王汝贤、范国璋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

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

△　冯国璋令褫夺江西督军陈光远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以策后效。

△　冯国璋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

△　冯国璋据署司法总长江庸呈称，前财政总长陈锦涛因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无确证，于是日下令特赦。

△　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访晤驻日公使章宗祥，略谓德国势力从西伯利亚侵入东方，“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谋共同行动不可”。章宗祥立即报告北京政府。此乃《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之发端。

2月6日　　苏督李纯通电表明心迹，略谓：对和战毫无成见。主张和平亦系个人政见，自提议调和以来，曾经迭电声明：以战为和后盾，“而于北洋团体尤深以破裂为惧……亦何忍燃萁煮豆，自迫同根，而反摇尾乞怜，向西南以讨生活耶？苟非丧心病狂，何致荒谬若此”。并重申未奉有主和密令。

△　黑龙江省成立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部，由督军署参谋长张焕相兼任司令。

2月7日　　孙中山在广州宴请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发表关于宪法问题演说，认为国家“强弱之点，尽在宪法”。主张五权宪法，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及监察五权。

△　岑春煊、谭延闿自上海电北京政府，主张南北和平。

△　北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自天津率部启程赴鄂。

2月8日　孙中山致贵州督军刘显世函，尚望“早日出兵夔、峡。

文亦将督师征闽，沿海而江，以期会猎中原。”

△　国会非常会议议决改组军政府大纲：一、采用合议制，改组军政府。二、以改组之军政府执行对内对外政务。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认为军事机关属于军政府。三、由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吴景濂四人通电护法各省征求同意，再由国会非常会议正式通过条文。

△　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联名电告西南各省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凡七条，并说明该修正案改组军政府之用意在于：一、改单独制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为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会议，共同负责；二、护法各省各军仍派代表组织联合会，其议决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

△　孙中山特任戴季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

△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电孙中山，赞成苏督李纯调和主张，并望西南护法各省一致主持。

△　奉天督军张作霖电责苏督李纯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并谓：“迨申讨令已下，而尊电仍和战并提，军人职在服从，毋乃贻我北系军阀之羞而为天下笑乎？”

△　北京政府与日本兴业会社签订10万日元南浔铁路借款合同。

△　驻华俄使库达摄夫会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抗议中国违反中东铁路合同，禁阻俄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编练护路军，并请早日取消禁令。

2月9日　　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吴景濂将国会非常会议决定之军政府改组大纲电告西南各省征求同意，并谓北京政府宣战命令既下，我护法各省非有统一机关，无以树对抗之形势，“尚希从速赞成，俾统一机关早日成立，则护法前途，大有裨益”。

△　中东路督办郭宗熙密陈北京政府，日俄业已缔约，俄确已将中东铁路宽城子至老少沟段售与日本，请联络美、英、法等国交涉牵制。

2月10日　　孙中山电复苏督李纯，指出此次战衅重开，罪在北京，“文与西南将帅切望和平，始终如一，所主张者，只废除一切不法命令，回复约法效力，与国会以永久之保障”。

△　孙中山派孙洪伊全权处理上海方面事务，并谓“近日盛传长江方面形势日佳，皆系我兄鼎力之结果，尚望努力进行，俾大局早定为盼”。

△　江西督军陈光远以北洋主战派势盛，极力攻击倡言和平者，“瞻念前途，曷胜杞忧”，是日称病电请辞职。

△　蒙古巴林王扎噶尔以耕地2500亩为担保，与“满铁”荒井泰治签订15万日元借款合同。

2月11日　　孙中山致函贵阳王文华，请联合黔、滇、川各省军民长官及诸将士，拥戴军政府，承认大元帅，并促唐继尧宣布就军政府元帅职。

△　冯国璋令陆军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着即免职，交由曹锟军前委用，以策后效；任命王占元暂兼陆军第二师师长。

△　冯国璋任命王怀庆帮办直隶军务。

△　内务、财政两部呈核黑龙江省望奎设治局改为望奎县，冯国璋指令照准。

△　广东代督军莫荣新以李纯上月31日通电主和，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于8日宣言响应，是日电请孙中山接受李纯调和主张。

2月12日　北京国务总理王士珍电复岑春煊、谭延闿，谓湘局主持无人，两军进逼，祸机甚易触发，此次变端之开，仍以湘为枢纽，促谭顾全大局，回湘莅任，并请岑力为劝驾。

△　北军南下总司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奉命自徐州启程，率部入鄂，15日抵汉口。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正金银行在北京签订260万日元四郑铁路短期借款合同。

2月13日　孙中山电汕头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促其力图攻闽，谓："冯既宣战，和议恐难成事，我军宜积极准备战事……文意此时攻闽……既以固粤防，亦以促浙动，故务宜力图。"

△　北京政府驻俄使馆就原沙俄驻日公使与日政府秘密订约出售中东铁路之老头沟至长春段事（1917年俄日换文议定），询问苏俄政府，据复称：原驻日俄使已被苏俄政府褫职，无权签订售让铁路条约，所订条约不予承认。

2月14日　援闽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在湖北广济县武穴通电罢兵主和，指出：最无意识无情理者，莫过此次战争，"现岳州虽归湘有，荆襄已为鄂得，各守疆圻，两不相犯，挽回补救，易于反掌，何仇何怨，必欲自残"；并谓"玉祥人微言轻，亦明知必触当轴主战诸公之怒，然区区天良，爱我国家，爱我总统，既有所见，不忍不言，多日欲言而未敢言者，今敢披沥痛陈于我大总统、总理及全国有道诸公之前。如以国家为可怜也，则请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如以国家为不足惜也，则请先杀玉祥，以谢天下"。

△　北京政府外交部据都护副使、恰克图佐理张庆桐电告，我在外蒙兵力有限，为防范俄"乱党"入侵，应竭力预速筹备，因于是日电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询问外蒙官府对于防范俄国"乱党"有无办法，若外蒙要求我国出兵，我当切商筹划。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外蒙恰克图情形日紧，而恰城公署只有卫兵50名，事急恐不敷保护，是日密函参、陆两部商洽派兵，出驻外蒙。16日，参、陆两部复函称，倘恰克图发生乱事，如外蒙请兵，当可照准。

2月15日　程潜自岳阳电复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吴景濂佳（9日）电，反对改组军政府。指出："我军所以有过去之胜利，在于冯、段分离之故……若遽另组政府，则彼先化除意见，合以谋我，则必至根本失败。"

△　北京政府内务部训令京兆尹王达及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查禁《秘密女子》等诲淫小说。

2月16日　熊克武电劝刘存厚参加西南护法。是日，刘存厚、张澜通电表示与西南一致，拥护约法。19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黄复生、副司令卢师谛、川北招讨使石青阳联名通电申斥刘存厚、张澜罪状，并声明否认其与西南一致之通电。

△　川军刘成勋、陈洪范两旅在四川乐山宣布拥护西南护法军。17日，川军一、三两师全体军官联名致电李烈钧，表示加入西南护法军。18日，川军一、三两师及刘成勋、陈洪范、汪可杰、舒荣衢各旅再次联名通电宣布与西南靖国护法各军一致，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　日驻京代理公使芳泽谦吉密电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报告徐树铮密谋引张作霖奉军入关，以武力迫冯国璋"退隐"，王士珍辞职，由徐世昌、段祺瑞出任总统、总理。20日，本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对徐树铮此举表示反对。21日，本野训令芳泽就此事向冯、段二人提出劝告，以避免北京政局陷于混乱，造成日本对华政策之"至大障碍"。

2月17日　冯国璋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修正

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法》。次日令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事宜。

△ 陕西靖国军曹世英、胡景翼、郭坚等部攻占西安，旋于3月27日退出。

2月18日 孙中山咨请非常国会采用美国大理院制度设立大理院，称："夫以护法之人，处护法之地，于护法之时，而转令人民失其法律之保护，为政不仁，莫此为甚。""克尽保护人民之责任，为人民谋享受法律之幸福，舍从速设立最高终审机关之大理院，其道无由。"

△ 冯玉祥于武穴再发主和通电，要求早开国会，罢兵休好。通电首述此次战争，"人以护法为名，我以北派为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南胜北败，"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指责主战者"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国家存亡，置之度外"；"空口言战，蒙蔽元首，乘机以扩充其势力，诈取军费"，此种战争"非惟误军，抑且误国"，"国亡种灭，势必旋踵"。"意气不可争，武力不足恃，为公理与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忿而战，虽胜必辱"，乞望总统、总理贯彻初衷，力全和局，解决国会问题。

△ 北京政府电令前线各军将领自18日起南北两军停战一星期；25日又电令再停战一星期。

△ 川军旅长刘湘等通电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 云南靖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庾恩旸在贵州毕节遇害。

2月19日 四川刘存厚、张澜及警备司令彭泽、城防司令田颂尧等，从成都向陕西边境撤退。同日，张澜委托潘大道代拆代行省长职务。

△ 日公使林权助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日中两国共同出兵西伯

利亚防敌之建议。

2月20日　冯国璋令国务总理王士珍给假休养，辞职之事着毋庸议；特派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国务总理。

△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岳州总司令程潜联名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主张“目前宜暂缓设立政府，而以（护法各省）联合会议主张一切……一俟实力既充，时机既至，再图设立政府”。

△　张敬尧通电为主战政策辩护，反对冯玉祥武穴寒（14日）电，声称“吾弟与尧同属军人，所统又系尧军，为国家计，为大局言，为我北系将士祖宗庐墓、生命财产计，当此之时，均不得出此不负责任之言论，以乱军心”，要求冯“服从命令，取消前言，同心同德，共济时艰”。

△　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部第九旅旅长吕超率部与滇、黔军进入成都。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宣布总揽川省军民统治权。

△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邀章宗祥公使作私人谈话称，使冯国璋、王士珍退隐，让徐世昌、段祺瑞掌权之计划，“决非适当措置”，对日中提携将“形成莫大障碍”，希望在冯、徐、段之间“充分疏通意见，取得同心协力，以谋求解决目前时局的办法”。

2月21日　孙中山派员携函同北军师长张敬尧接洽，函中重申西南兴师护法之主旨，劝其协同护法，共匡危难。

△　冯国璋特任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令率军入赣。

△　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入陕，被陕西靖国军举为该军总司令。

△　岑春煊近以和议四条征求各省同意：一、承认冯国璋为总统；二、国会问题交各省议会解决；三、以陆荣廷为粤桂湘巡阅使，

免龙济光职；四、以唐继尧为川滇黔巡阅使，免刘存厚职。是日，章太炎通电，指岑所提条件为莠言乱政，并逐条驳诘，揭露岑春煊本为宗社党人，除电请唐继尧否认外，应请宣布岑春煊罪状以告天下。

△　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与日本三井洋行在北京签订536267英镑无线电台借款合同。

2月22日　孙中山发表时局通电，主张息战罢兵，尊重国会，回复和平。同日又电西南护法各省，吁请各将帅贡献救济良策，倘能恢复约法效力，愿即引退。

△　孙中山宴请广东商界人士，演讲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指出：革命目的是“欲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勉励与会人士积极参与建设事业。

△　北军陈树藩部攻占陕西蒲城等县，靖国军胡景翼、曹世瑛、郭坚等部败退。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嘱向日本政府声明处理中、俄边事态度，“华境内中国自行处理，境外可与日本共同处理”。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外蒙拒我派兵入境，似应仍照原定办法，由库酌拨卫队赴恰会防，一面仍促察队出驻乌滂为库后盾。

2月23日　孙中山电章太炎，嘱联合川、滇、黔同志，以巩固军政府。

△　孙中山明令撤销地方行政长官监督司法，至于司法行政与筹备司法事务应暂由内政部管理。

△　孙中山电黄复生、卢师谛等，嘱速秘商推定川督人选，以谋统一而定川局。

△　奉军入关截留秦皇岛军械。奉天督军张作霖应徐树铮之邀，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旅入关进驻秦皇岛，徐树铮亦亲自到秦皇岛，会同奉军截留日本依据中日军事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枪支。25日，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劫走日本运来之步枪27000支，除阎锡山购械部分放行及以3000支分给直、阎外，其余17000支运往关外，装备奉军。

△　李烈钧电复川军钟体道、徐孝刚两师长，略称："诸公幡然护法，推戴锦公（熊克武）一致进行，苦心毅力，欣慰无涯。"

△　北京国务院通令长江沿岸各省军政长官，务望诫饬所部，对于各国轮舰毋得稍加干涉，滋生事端，尤当一体保护，无碍行驶。

△　北京政府内务、财政两部呈请将新疆省呼图壁县佐改升县缺，是日冯国璋指令照准。

△　日外相本野晤章宗祥公使，倡议中、日提携，共同对付俄、德，不分畛域。

2月24日　四川省议会电孙中山，请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

△　冯国璋令准免王克敏中国银行总裁职，遗缺以冯耿光继任。

△　龙济光部占领广东阳江。

△　长沙米荒，米价暴涨，贫民群起，勒令各米坊减价，按每升百文售米，风潮波及全市。地方当局被迫布告设局平价售米，每升150文。26日风潮始息。

2月25日　孙中山致四川招讨使石青阳等电，略谓："今成都既下，川事可望统一，尚望互相团结，一致进行，使川中布置稍就，即可协同北伐也。"并谓："诸君在川劳苦情形，文所深悉，甚思设法相

助。希仍努力进行，创造伟业，为民国国史之光，所厚望也。”

△　冯国璋以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通电主和，并在武穴勒提盐厘各款，令先行免职，交曹锟严切查明，呈候核办。

△　冯国璋任命董世禄代理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　冯国璋公布《督办参战事务处组织令》，凡七条，规定“参战督办直隶于大总统，综理国际参战事务”。该处下辖参谋处、外事处、军备处、机要处。

△　徐树铮为与张作霖筹商派奉军入关加入对南方作战事，是日抵奉天。

△　西南靖国联军总司令、滇督唐继尧由贵州毕节电令熊克武兼任四川军民两政。次日，熊克武在行营宣布就职。

△　北京政府督办参战事务处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615072.75日元又银元4.5万元购械合同。

△　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开抵滦州。

2月26日　段祺瑞电请张作霖，将奉军扣留之军械运至北京。次日，张作霖复电拒绝称，“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运京留奉，宗旨无殊”。

△　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在海珠码头被刺身死。

△　驻日公使章宗祥密电北京政府外交部，告以日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建议中日协定共同防敌两项办法，由中国自择：其一，先由两国外交当局订立共同行动之协约，其余军事布置由两国军事当局再商；其二，先由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外交当局但予认可，俟时机再订。

△　驻俄公使刘镜人率馆员撤离彼得堡启程归国，3月15日抵满洲里，25日到京。

2月27日　孙中山任命吕超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兼暂行代理四川督军，并电唐继尧等宣布此项任命，并谓川省军民事务之主持者，宜由川军各将领协同推举。

△　孙中山以程璧光被刺身故，是日咨请国会非常会议重新选举海军总长；同日并颁发训令，缉拿刺程凶手。

△　冯国璋令准籍忠寅辞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职，派于宝轩兼任。

△　冯国璋令准陆军第九师改编为第十七、第十八两混成旅，分任张联陞、赵荣华为旅长。

△　海军舰队司令林葆怿电孙中山，表示将率海军同志振旆待发，以继程璧光未竟之功。

△　山东靖国军攻破东平县城；3月29日再占东平。

2月28日　孙中山致程潜等，指出“吾辈起兵始于护法，当以护法终。约法无解散国会之条，解散国会，即破坏约法。吾人不能只要求恢复约法，反置恢复国会而不言。”并谓：“仍希督率各将校节节进取，不可以有议和伪令，致隳士气。”

△　冯国璋电饬张作霖召还滦州奉军，以资控制边圉。

△　冯国璋下令开释帝制复辟犯雷震春、张镇芳。

△　张奏壎、王郅隆等创办之丹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总公司设北京，资本120万元。

3月

3月1日　　孙中山电贵州毕节行营唐继尧，提出四川省长不由督军兼任，由四川民选，并促唐继尧速就军政府元帅职。

△　唐继尧电告孙中山，拟划拨靖国联军第一军东下援鄂，己则定于月之上旬由毕节进驻渝城。

△　督办参战事务段祺瑞任命督办参战事务处参谋、机要、军备、外事各处处长，并聘定各部总长为参赞，设机关于将军府，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

△　北军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电北京政府，抵死挽留冯玉祥，声明“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否则请将全旅官兵9553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

3月2日　　孙中山电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主川省应军民分治，省长一职自应委之川中民选，务望本此意义一致主张，并力劝唐继尧宣布就元帅职。

△　孙中山明令国葬故海军总长程璧光。

△　冯国璋公布《修正盐税条例》，凡七条。规定适用于全国产盐、销盐各地，新疆、蒙古、青海、西藏不在此限。

3月3日　　冯国璋公布《修正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及《修正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

△　谭延闿由沪抵宁，同李纯商谈时局，建议湘粤桂联军自动退出岳阳，北军亦不进驻，以为南北议和之前提条件。旋李电冯国璋转达谭意，冯复电请谭径自赴汉同曹锟协商解决。10日，湘北开战，谭离宁返沪。

3月4日　　孙中山致冯玉祥望主张恢复旧国会以纾国难书，略谓："阅报见执事巧（上月18日）电，热诚护法，努力救国，不胜为民国幸。""惟此次乱源发于蹂躏国会，根本解决舍恢复旧国会而无由。务望内察国难之原因，外究世界之趋势，以恢复旧国会之主张明白宣示全国。濒危之民国国脉，得主持正义如执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则国民必感伟功于永久矣。"

△　福建靖国军2000余人占领将乐县城，县知事计达三出奔顺昌。

△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日刊创刊，为我国报纸增辟学术副刊之始。

3月5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奉冯国璋命赴蚌埠，同皖督倪嗣冲讨论时局。次日，王电冯报告倪督请总统起用段祺瑞，罢免李纯。

△　张作霖电曹锟、张怀芝，表示"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并告以奉军"不日即可到徐，会合大军，敬听指挥"。

△　奉军一部由天津开抵廊房，并在车站上检查来往旅客。国务院去电说明廊房非戒严区，不能检查旅客。奉军置之不理。

3月6日　　冯国璋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二届选举日期令》，规定："各省区地方选举会之参议院议员复选举，暨蒙古、西藏、青海地方选举会之参议院议员选举，于民国七年六月二十日举行"；"中央选举会各部之参议院议员选举，于民国七年六月二十日举行。"

△　陆军部呈核黑龙江添编陆军第十九混成旅；冯国璋任命鲍贵卿兼代该旅旅长。

△　徐树铮在奉同张作霖商定，奉军共编为五旅，开赴奉、津沿

线，是日起陆续开拔入关。

△　北京政府内务部咨行各省，申明法令禁止败坏风俗之出版物，请转饬警察机关查照《出版法》规定，分别切实办理。

3月7日　　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王印川、郑成瞻等人为操纵国会选举，于是夜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宅开会，到10余人，组织“安福俱乐部”，以王揖唐为首领，徐树铮实际操纵。次日为正式成立日。

△　冯国璋通电各省督军、省长，请筹商解决时局办法。电文列举国会、财政、内阁及外交问题之种种困难，“瞻望前途，莫知所届”；表示“国璋既备尝艰阻，竟不获补救于万一，坐视既有所不能，辞职又无从取决，只有向各省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为国璋释重负，为民国求安全……特此飞电布达，务希于旬日内见复”。

△　曹锟、张怀芝分别致电张作霖，欢迎派奉军入关。曹电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另派一两个混成旅开赴汉口，加入第一路。张电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第一站。

3月8日　　孙中山特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杨未到任前，由四川靖国军总司令黄复生代理省长职。27日，熊克武电请孙中山收回成命。

△　孙中山电告唐继尧处理川军经过，盼协力维持川局，安抚川民，肃清余孽，克日整旅东下，会师大江，以竟护法之责。

△　孙中山布告：广东盐税收归军政府，嗣后盐商应缴纳之盐税，仍按向章向广东中国银行缴纳，倘有违抗或延宕者，定予戮缉严惩。

△　陕西靖国军全体军官会议，举唐继尧为川滇黔陕四省靖国联

军总司令。

△　张作霖电复冯国璋，谓：“当此千钧一发，其能力膺艰巨，勉维其难者，微我大总统其谁与归？”并请“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责任内阁，襄助大政，翊赞中枢”。

△　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谓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应“迅速决定实行，以免贻误时机”，并出示换文草稿，促北京政府照此拟写换文。同日，章宗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转陈本野所拟“共同防敌条款”两项：一、中日政府因德国势力东渐，和平及安宁被侵迫时，协同考量应行之处置；二、凡两国陆海军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随时协议。

3月9日　孙中山发布《鼓励义军作战电》，指出：“非法政府始终弁髦大法，毫无悔祸之诚，近且公然宣布伪国会组织法及伪参众两院组织法，重袭袁氏造法故智。积极违法，颠覆国宪，厥有常刑。……和平已属绝望”，希望各军“一致进讨，务完成护法之天职”。

△　孙中山通电，反对北京政府发行七年公债。称：“此项公债，非法政府冀以供其残杀国人，我国民自应一致反对。”

△　冯国璋密电各省，说明外交状况，谓“我国边防与俄接壤，自东北以迄西北，绵亘将及万里，犬牙交错，守御极难。如我政府能操统一之权，各省共切手足之卫，对于东邻力表亲善，协同动作，以预制德人东渐之势力，犹可设法图存”，嘱各省切实研究，共抒意见。

△　北京国务总理王士珍潜行离京赴津。

△　皖督倪嗣冲密电各省，转告奉军入关旨在团结北洋团体，削平内乱，及主张组织完全责任内阁，以统一国家。

△　福建改革盐务专卖制度，在古田、福安等31县地方开放商办，采用自由贸易制度。是日冯国璋据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王克敏

呈请指令照准。

3月10日　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电孙中山，请派胡汉民为粤军代表，参加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13日，孙中山复电表示同意。

△　北京政府电令察哈尔、绥远两都统各派骑兵两营出驻内外蒙古交界之乌得、滂江。

3月11日　北军下令总攻岳阳，占领羊楼司，湘粤桂联军陆裕光部第三军向南撤退。

△　本日与13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两次训令日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就皖系勾结张作霖连续派兵入关事，劝告徐树铮、张作霖勿采取过分行动，引起北京政局混乱。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示驻日公使章宗祥，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先由日政府来函，我再答复，行文以英文或法文为底稿，由北京日使馆递部。12日，章宗祥复电外交部，建议由我方主动，行文以华文为妥，由我交彼。

△　冯国璋令："本月二十一日为春丁祀孔之期，派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恭代行礼，由内务部敬谨预备。"

3月12日　张作霖、徐树铮联名通电宣布就任奉军总、副司令，设奉军临时总司令部于军粮城，由徐树铮代行总司令一切职权。

△　孙中山任命王安富为四川靖国军援鄂第一路总司令；任石青阳为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川北镇守使。

△　讨龙联军总指挥李烈钧颁布讨龙作战计划，规定"先歼灭阳江方面逆军，再进扫荡高雷、琼崖方面之敌"，并令李根源、林虎、魏邦平、刘志陆四路讨龙军总司令克期出发讨伐龙济光。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如俄旧党败兵退入华境，或谢米诺夫部队不受约束，均应解除其武装，以维护边局治安。

△　安徽含山县李雨春、陈紫枫等起事，称“护法讨倪（嗣冲）军”，攻占县城，释放囚犯。

3月13日　孙中山电陈炯明，准派胡汉民为代表出席西南联合会议。

△　孙中山电重庆靖国军总司令、代理四川省长黄复生，指出：“义师讨逆及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注意于西北边。”

△　章太炎在重庆通电主张广州缓开正式国会。

△　冯国璋任命李焕章为绥远陆军混成旅旅长。

△　苏督李纯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密议作战计划，表示如奉军沿津浦线南下，入侵苏省，将坚决以武力对抗。

3月14日　冯国璋访段祺瑞，出示皖、豫、浙三督电文，敦请再出组阁，段以无意复出婉辞。次日，冯通电盼各省区联名劝驾。

△　夜，徐树铮自奉天电曹汝霖，告以日公使林权助到奉，同张作霖及其本人会晤，表示日本内阁或有改组，但“于中日亲谊毫无损碍”，“仍暗中助我辈以便利”。

△　苏督李纯派军署顾问温世珍访晤驻宁日领事高尾亨，希望日本劝阻段祺瑞皖系勿采取过分行动。

△　驻日公使章宗祥电告北京政府，与田中义一商议中日军事防敌方针，计：一、关于一切行动，以两国平等为旨；二、区分将来彼我防战之区域；三、彼我司令部应互相派员驻扎，以便接洽。

3月15日　孙中山接见唐继尧之代表官其彬，并电复唐所关怀四

事，指出“岳州战衅再开，已无和议之可言。……况和战所争，均在根本大法，断不能因和议而稍事让步”。

△　冯国璋下令免于缉究民国五年7月14日及六年7月17日通缉之复辟案犯杨度、孙毓筠、顾鳌、夏寿田、薛大可、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10人。

△　奉军总、副司令张作霖、徐树铮电呈北京政府并通告各省，为指挥入关奉军便利起见，暂设奉军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徐树铮将于16日晨赴军粮城视事。

△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公议北京财政部所定《民国七年内国公债条例》，佥谓该公债违背约法、垄断发行，侵蚀国库，欺罔商民，议决予以取消。

△　孙中山函邓泽如，谓现粤势已称稳固，拟即着手展拓利源，设立矿务局，以统筹全局矿务，请邓氏早日归国主持矿务。

△　英、法、俄、日四国公使（日为代理公使芳泽谦吉）会议决定，为确保京津间铁路“自由交通”，就奉军进驻京奉线一带，对北京政府提出警告。

△　福建省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25万日元借款合同，以福建银行期票担保，用为福建省行政费用。

3月16日　孙中山宴请美国领事，国会议员及军政要员40余人作陪。孙中山致词欢迎，称赞“美国是新世界之老共和国，吾国为旧世界之新共和国”。“美国为先进文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尚希进而教之”。

△　张作霖电冯国璋要求段祺瑞组阁。

△　北军对岳阳发起总攻击，右路第一旅在舰队配合下攻陷要隘

城陵矶，先头部队突入岳阳城内，因恐联军埋伏，旋即退出。

△　徐树铮电皖系各督称，日使林权助表示对华亲善政策及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

△　冯国璋派陆宗舆为龙关铁矿公司督办。

△　福建长汀警备一团联合当地防军宣布独立。

3月17日　冯国璋亲访徐世昌，托代劝驾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并称当举国以听。次日，徐世昌晤冯面述段祺瑞辞意甚坚，略称："上次自请免职，实因审量才力不胜重任，并非有他方面之排挤始求去职。故对于总统参战督办之命，苟可担任，无不勉为其难。惟总理一职，困难无异于前，苟今日可以担任，则前日何必求去？"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示驻日公使章宗祥"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磋商要点：一、以书信式交换；二、彼来我复；三、双方同时宣布；四、另换函声明有效期间及战后华境内日兵一律撤退。

△　唐绍仪抵日本神户，连日鼓吹中日民间"经济提携"，并望日本在华投资时对中国南北两方"一视同仁"。

3月18日　各路北军于17日会攻岳阳，湘粤桂联军未经坚强抵抗，当晚弃城南逃，是日上午北军占领岳阳。

△　广州非常国会参、众两院会议议决，定于6月12日北京政府解散国会一周年之际，在广州召开正式国会。

△　冯国璋令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着即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暂准留任，交由曹锟节制调遣。

△　冯国璋令：署司法总长江庸因病给假，着派次长张一鹏暂行代理部务。

△　孙中山令：盐税收入由两广盐运使专管，规定该项收入每月40万中，以10万为国会经费，五万为军政府经费，13万为海军经费，九万为广东财政厅例拨还款，其余悉数拨给前敌军饷，由该盐运使向中国银行提款。

△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建议军政府和护法各省联合会合并。23日，陆荣廷复电反对。

△　四川靖国军郑启和部占领昭化、剑阁、梓潼。

△　西原龟三奉日总理大臣之命第五次来华抵达北京，20日会晤日公使林权助。

3月19日　　直、鲁、奉、皖、鄂、苏、赣、晋、陕、浙、吉、黑、闽、豫、甘、新、热、察、绥19省区督军、省长及松沪护军使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27人联电段祺瑞，敦劝出组内阁。略谓："顷奉大总统删（15日）电，亲诣寓邸敦请，未荷允诺。奉谕之下，焦灼异常。……锟等已互相约定，我公如允任揆席，则同人等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是全国之安危，同人之离合，均系于我公之一身，论情论事，皆当俯就。伏乞准如前所请，惠然出山。"

△　孙中山电唐继尧，授以攻陕方略，请就近与黄复生、石青阳妥商进行，并劝其就元帅职。同日并另电唐继尧，盼领衔发起通电，拥护6月12日非常国会正式会议。

△　唐继尧电孙中山称，已派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路总司令；石青阳为援陕第一路总司令。

△　孙中山闻驻京美公使确将于本周五（3月22日）到汕，逗留一日，即赴厦门。是日电陈炯明，"俟美使到，以礼欢迎，俾知军政府实力已到。且与联络感情，于前途当有裨益"。

△　驻日公使章宗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称，已得寺内总理同意，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照中国修正文句，由日先送，我再答复，至有效期由军事当局商定；关于战后在华日兵撤退事，日本另函声明。

△　日公使林权助向冯国璋提议，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　湖南谭延闿向日本兴源公司借款250万日元，以水口山铅矿砂为担保，作为湖南军政费用。

△　黑龙江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在满洲里与苏俄红军协议决定：红军不犯华境，华军不助白俄谢米诺夫部。

3月20日　冯国璋通电，宣称亲诣段祺瑞寓邸，敦请组阁，段坚辞不出。

△　西原龟三访晤段祺瑞，劝其出任国务总理，并允日本给予财政支持。西原称："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兵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以设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

△　日公使林权助访晤徐世昌，促力劝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　2日，日人犬养毅、头山满以世局纷纭，致书请孙中山赴日一行。是日，孙中山电犬养毅、头山满，询问邀请赴日原由，并谓："若为东亚百年根本大计，非与文面谈不可者，请即电复。"

△　直隶省与法商惠东银行签订100万银元借款合同，作为直隶省行政费用。

3月21日　孙中山电石青阳、黄复生盼速图陕，略谓："请缨援鄂，壮志可嘉。惟用兵忌攻坚，尤贵出奇。鄂中北军云集，可以智取，难用力攻；若阳言援鄂，而以精兵攻陕，则可拊鄂之背，取之自易。"又谓："现在陈树藩困守西安，旦夕可下。……若川军不进，则

西安恐垂得而复失，幸速图之。”

△　日公使林权助约晤王郅隆，盼段祺瑞出任总理，谓：“段前此推清政府，去岁驱张勋，皆独断独行，勇气可佩。此次关系国家安危，又有19省联电，何不毅然自出担任”，嘱王速见徐世昌、段祺瑞，请段以愿出任之言报知总统，冀免枝节。

△　奉军由津浦路开赴湘鄂，助北军进攻湘粤桂联军。

3月22日　奉督张作霖通电北洋各督称，“岳州早已克复，长沙不日可下，若一鼓作气，乘胜进攻，澄清中原，在此一举”，并请曹锟联合同志，统筹全局。

△　滇军李善本部占领四川马边，26日占屏山。

3月23日　冯国璋令准署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　冯国璋令署海军总司令饶怀文因病出缺，着派何品璋暂行护理海军总司令。

△　冯国璋特任刘镇华署陕西省长。

△　孙中山通告各国驻京公使，痛斥北京政府罪行。郑重声明：“北京非法政府违背约法而与各国缔结之一切契约借款及其他责任，本军政府概不承认。”

△　孙中山特任徐绍桢代理中华民国军政府卫戍总司令。27日任命徐绍桢兼充陆军部练兵督办。

△　北军攻占湖南平江。25日，谭浩明所部湘粤桂联军先后撤出长沙，桂军向湘桂边境退却，湘军退守耒阳和郴、桂一带。

3月24日　冯国璋令国务院秘书长恽宝惠准免本职，任命张志潭

为国务院秘书长。

△　梁士诒自香港到天津，徐树铮与梁晤面，挽其出任财政总长并邀赴奉。同日，徐以晤梁情形电告张作霖。

3月25日　《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同日外务大臣本野在东京正式换文。换文内容分为两项，规定："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决定"及早协同考量应行之处置"；"凡两国陆、海军对于此次共同防敌战略之范围，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

△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通电退出长沙，略称："兹者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岌岌不可终日。""浩明彷徨中夜，莫知适从，再四思维，与其进而促亡国，不若退而留一线生机，俾持报仇雪耻之说者有以餍其心，持恢复北洋名誉之说者有以塞其口，持不至长沙不止之说者亦有以偿其欲。而我辈始终希望和平之心亦可大白于天下。爰率各军安全退却，让出长沙，以待依法解决。"

△　孙中山电贵阳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指出："段逆于昨日复任伪阁，自此和议更成问题，欲达护法救国之初心，惟有根本解决一途耳"，促王克日率兵东下讨逆。

△　李烈钧指挥广东讨龙联军克阳江。

△　山西省呈请裁撤离石县碛石、柳林、方山三县佐，增设方山县，是日冯国璋指令照准。

3月26日　北京国务总理段祺瑞通电宣布已于本月24日就职，声称对于西南各省奉行武力统一政策，出于"必不得已然后用兵"；并谓目前时局未定，"所有前敌将帅，仍当振励士气，迅赴事机"。

△　北京国务总理段祺瑞召集国务会议，决定再次对南方用兵，声言要在三四个月内打下广东和四川。

△　北军吴佩孚第三师占领长沙、湘阴。31日，张敬尧第七师进长沙接防，吴佩孚师奉命南下。

3月27日　孙中山致黄复生、石青阳电，略谓："川局不靖，抢攘经年，其始皆由一二人权利之私，遂致酿兹浩劫。""川事赖君等维持，务宜力促熊（克武）受军府任命，以归一致。……川中若能一致坚决表示拥护军府，则唐帅（继尧）可息自树势力于川之私意，而有就任元帅以维大局之决心。望善图之。"

△　冯国璋特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谭延闿为省长，未到任前由张敬尧兼署。30日，谭延闿致电北京政府辞湖南省长职。

△　梁士诒建议段祺瑞，占领长沙后宜即调停，斡旋南北议和。次日，国务会议多数主张托梁出任调停。

△　北军张敬尧第七师占领湖南湘潭。

△　北军吴光新部占领湖北当阳，次日占远安。

△　四川援鄂军总司令黄复生与云南靖国军司令叶荃、王文华、顾品珍誓师东出援鄂。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福公司总董事巴森订立30万美元购车借款合同。

3月28日　孙中山复函头山满、犬养毅，谢绝访日邀请，告以特派朱执信赴日面陈一切，并申明"以拥护约法之故，诉诸武力，盖不得已耳。……故解决今日时局，以恢复国会为唯一之根本。只此一事，倘北方当局能毅然断行，则文已十分满足，不求其他条件也"。

△　孙中山电陈炯明，告以长沙失守后，桂系军阀托英公使朱尔典向段祺瑞求和。

△　冯国璋特任蓝建枢为海军总司令（原海军总司令饶怀文病故）。

3月29日　冯国璋特任段祺瑞内阁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政钱能训，陆军段芝贵，海军刘冠雄，教育傅增湘，司法朱深，农商田文烈，交通兼署财政曹汝霖。同日并令免王士珍前内阁各部总长职。

△　冯国璋特任孟恩远为吉林督军；田中玉着回察哈尔都统本任。

△　冯国璋任命齐燮元为陆军第六师师长。

△　国会非常会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电孙中山，反对段祺端复任北京国务总理，主西南护法各省、各军“整军经武，声罪致讨，灭此朝食”。

△　北军张怀芝第二路军攻占湖南醴陵，湘粤桂联军退守攸县。

△　湖北省与日本正金银行签订50万日元并50万银元借款合同，用于本省军政费用。

3月3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外务大臣本野解释，中国派舰保护海参崴华侨，“与共同防敌主义正属相合”。

3月31日　北军张敬尧第七师进入长沙接防，吴佩孚奉命率部南下。同日，张敬尧电请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会办湘省军务。

是月　简照南、简玉阶等创设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资本500万元，本店设上海，支店设北京、青岛、天津、汉口。

△　虞洽卿在上海创办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元。

4月

4月1日　孙中山电嘱张开儒速出师攻闽，并谓“海军得手后，大兵入闽，则武器购运俱便”。

△　冯国璋令财政部拨银四万元赈恤岳阳。次日又令拨银六万元赈恤长沙。

△　郑崇基等创办之上海鸿章机器织染厂开车生产。

4月2日　孙中山特任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

△　孙中山电唐继尧，改组军政府，必须坚持护法主张，并提出改组四事与唐商酌：一、改组如桂人不加入，各省是否仍有决心？二、改组如无桂人，各省仅派代表，是否能举共同负责之实？三、必须一致坚持护法主张，始可共议改组。四、改组名义宜用“护法各省联合军政府”。

△　孙中山电陈炯明，告以同唐继尧商改组军政府四事，并谓护法必须联唐，如唐不能出实力，则改组仍属空名，故此议必须唐有切实办法之电复，始可讨论。

△　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田文烈密咨外交部，略谓：“查唐努乌梁海一区，从前本归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所管辖，为中国外蒙领土之一部分。”请于唐努乌梁海设官，“以坚蒙人之内向，亦藉以杜邻邦之觊觎”。

4月3日　北京国务院、陆军部电张敬尧、陈光远、李厚基、张怀芝，指示“定湘救粤”之进兵方略，令“湘督所部速收宝庆，直趋零陵。张使（怀芝）所部取道攸、衡进衡南，直趋郴州，俾谭（浩明）逆所部不暇援粤；一面赣屯大庾，闽作声援，待张使抵郴，然后闽攻潮汕，赣下南雄，张使径出韶州”。

△　徐树铮抵北京，即谒段祺瑞，面商进兵计划。段主兵力直达川、粤，底定大局。同日，徐电陆军检阅使兼攻湘鄂援军第二路军总

司令张怀芝，告以段祺瑞进兵旨意，并谓“粤事一切均赖我兄持以坚定，乘胜直前，伟功立奏”。

4月4日　孙中山电龙璋，嘱维护湘局，并劝湘军辑睦。

△　冯国璋特授曹锟勋一位。

4月5日　孙中山电促汕头陈炯明速行攻闽，谓“援闽之举，准备已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诸君迭电讨逆，义勇奋发，当能合力猛进，迅奏肤功”。

△　曹锟电冯国璋请辞两湖宣抚使职。略谓：“所有第一路总司令任务，将次第告竣，其鄂湘两省善后事宜，应责成该省军民长官担任，若以宣抚使名义参预其间，转觉事权纷歧，责任不专，拟请免去两湖宣抚使本职，俾鄂湘各维秩序，渐复原状，于军务、政务两觉便利。”

△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吁恳（南北）双方停战议和”。

△　北京政府应海参崴各国领事团会议决定，派陆军和“海容号”军舰前往海参崴。

4月6日　两湖宣抚使曹锟通电饬北军各师旅积极进行，三路攻湘：张怀芝为左路，向攸县、茶陵前进；曹锟为中路，向衡山、衡阳前进；张敬尧为右路，向湘乡、永丰、宝庆前进。

△　绥远鼠疫肃清，防疫机关裁撤。

4月7日　滇军华封歌部攻占四川会理。

4月8日　原广东省长李耀汉自肇庆电北京政府称，将举兵驱桂，解决粤局。略谓：“闽督派员来肇，晤商援粤之策，耀汉当与切实筹画，部署就绪。”“耀汉即于明日返省，勖励所部，克期发动。惟

仍恳请中央迅饬赣闽两路援军，同时赴粤，使敌备多力分，为易得手。”

4月9日　北京政府公布《矿业警察组织条例》，凡七章19条。规定：“为维持矿区之秩序及安全，并保护矿业上之利益，得由矿业公司呈请设置矿业警察。”

△　北京政府派“海容号”军舰前往海参崴护侨。17日“海容”舰抵崴。

4月10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议员60余人，罗家衡等提出改组军政府案，赞成者40余人，居正、邹鲁等反对改组，遂由议长指定审查员20人予以审查。按：该案以多头式总裁制，易单一式之大元帅制。此系陆荣廷及政学系岑春煊所倡。

△　唐继尧通电主张成立护法各省临时统一机关，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或代理大总统，以岑春煊为总理。

△　冯国璋任命杨春普为陆军第十九师师长。

△　邓泰中密电唐继尧，谓西南“真护法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劝其与孙中山一致，对付段祺瑞之以武力平定西南。

△　吉林督军孟恩远电告北京政府，霍尔瓦特拟在哈尔滨组织政府，英、法、日、意各领事均表赞许，事关我领土主权、边省安危，务乞早日定议，指示方略。

4月11日　孙中山邀国会非常会议议员谈话，对国会未征求军政府意见而径行提议改组而付审查之事表示不平，并声明反对改组军政府，“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

△　冯国璋公布《电气事业取缔条例》，凡63条。

△　刘存厚自广元电北京政府，报告第三师及第三、四两混成旅驻绵阳之危迫情形。请求中央“俯念川艰，速拨援兵饷弹，邻省诸公笃顾唇齿，就近迅予援助”。

△　北京政府留守苏俄人员李世忠电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请中国政府勿续与俄旧政府驻华外交代表及领事交涉事务。

△　自称山东靖国护法军之郭安、史殿臣、范玉林、于三黑、顾得麟等部，近日活跃于滕县、峄县、金乡、蒙阴、禹城、平原一带，是日占恩县，14日占高唐西藏镇，15日占新泰县，17日占茌平和冠县，18日占临清县，后又进入直隶大名境内活动。

4月12日　广东讨龙军李烈钧部攻占电白。

△　日公使林权助将段祺瑞对南方用兵计划报告日本政府。20日，日外务大臣本野转达首相寺内的指示：“不管对南方的‘讨伐方针’，还是促进南北妥协，总之，要使中国政局迅速得以解决。”

△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电告北京政府，藏兵进犯川边，边防军力薄弱，昌察等县先后失守，势甚危急，请派军赴援。

4月13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审查会推褚辅成等五人谒孙中山，征询对于改组军政府之意见。孙中山再次明确表示：“改组事余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

△　讨龙联军总指挥李烈钧自阳江电授讨龙各军作战要略，规定讨龙军主力以在茂（名）化（县）之线以南地区为宜，联军最右翼部队应联络桂军左翼军，扼制化县东北部，联军最左翼部队联络海军，协同动作。

△　曹锟以攻湘鄂援军第一路军过于疲劳为由，电冯国璋请将吴佩孚第三师及其余各旅调回岳阳。

4月14日　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自武穴抵鄂，归湘鄂援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节制，派往嘉鱼驻扎。

△　西原龟三离京返日。

4月15日　北京政府电令北军向湖南衡山总攻。20日，吴佩孚第三师攻占衡山。

△　北军第一路田树勋部攻占湖南永丰，第二路攻占攸县。

△　北京政府内务部召开全国河务会议。

4月16日　冯国璋公布《修正陆军刑事条例》，凡103条，所订刑则有叛乱、擅权、辱职、抗命、暴行胁迫、侮辱、诈伪、掠夺、逃亡、军用物损坏、违令及有关俘虏之罪共12项。同日并公布《修正陆军审判条例》，计57条，规定军人犯罪，依陆军军法会审审判之，并对军法会审之组织、军法会审之权限、陆军检查、审问、判决、再审等，均有明文规定。

△　日本于山东坊子正式设立民政署，山东省议会电请北京政府速向日本政府交涉。

4月17日　军政府向日、美、法、意、俄、英、葡等16国发出通告，要求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之合法政府。

△　外交总长陸徵祥与日本斋藤少将在京讨论中日“共同防敌”各条款，谈及召开正式会议，各项细节及该协定之效期等。

△　浙督杨善德奉北京政府之令派师长童葆暄率浙军一混成旅援闽。

△　段祺瑞、倪嗣冲、王郅隆等投资创办之天津裕光纺织厂开车生产。

△　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工人数千，捣毁英电车六七辆，遭巡捕镇压。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苏俄政府派瓦希涅夫为驻库伦领事一事，电令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向外蒙古要求两事：一、外蒙不接待；二、应正式请求中央派兵驻扎。

4月18日　　岑春煊、张绍曾、卢永祥联名通电调和时局，指出："为今之计，解决时局，似宜首先停战，中央表示不再反攻，然后始有商榷余地。其次则为国会……一面复旧，一面召新，同时并行。……战事既息，国会重开，所余地方问题，迅开善后会议（解决）"。

△　赣督陈光远奉命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是日率兵出发，次日占领南雄。此后南雄为南北两军拉锯争夺之地：4月21日南军占领，29日北军占领；5月9日南军占领，旋又被北军夺回。6月3日、10日、23日又先后三次为南军占领。

△　北军鲁、赣两军进占湖南醴陵。

△　广东讨龙军刘达庆部攻占茂名。

△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组织新民学会。

4月19日　　皖督倪嗣冲于7日入都探询政见，分谒冯、段及各部总长朝野诸要人，是日返抵蚌埠密电北洋各督，陈述北京政府财政、军事情形，其要旨为：一、政府财政艰窘，每月政费实需1600万，近与日本议借，日人宣言，若政府不能戡平粤乱，此款尚不交付。二、坚持平粤政策，段表示"无论如何困难，必先戡定粤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　湖北督军王占元电北京政府，谓川省近日反抗中央，宜昌所销川盐，川军自行收取盐税，侵吞国税，拟请饬令宜昌榷运局将川盐

没收入官，以“断其饷源，促进和平”。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复北京政府外交部，称外蒙已正式拒绝苏俄派领事来库，至增兵驻库一节，现正在磋商中。

4月20日　孙中山电告陈炯明军政府酝酿改组情形，嘱其万不可赞同改组，并谓：“张开儒闻改组之说，立就陆军总长之职，所以明示反对也。兄当与张一致，以维军政府于不坠可也。”

△　段祺瑞以“犒师”为名，离京赴汉口，与曹锟、张怀芝、王占元、赵倜、徐树铮等密谋武力统一全国。

4月21日　冯国璋公布《侨工出洋条例》和《募工承揽人取缔规则》。

△　日公使林权助向日外务大臣本野提出解决中国时局的方案，认为：“目前（中国）政局，不仅是段内阁对西南政策的危机，而且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当前段祺瑞应“进一步南征，有必要向南方施加压力”，段政府在夺回广东和肃清四川以后，“再提出南北议和较妥”。林建议由日本提供讨伐经费的援助，估计需要“8000万元乃至一亿元的外债始能维持下去”。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第三次大会。会议举代表进京，陈请政府息争停战，并要求最近中日共同出兵交涉条件。

△　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

4月22日　军政府公布《大理院暂行章程》，凡八条，规定“大理院为最高审判衙门，于护法期内依法院编制法之规定，暂行设于广州”。同日公布《外交部组织条例》，凡14条。

△　广东省议会通电宣布誓不承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由衡阳退驻零陵县。

△ 李烈钧奉莫荣新命，率军回赣与北军作战。

△ 刘存厚军攻占四川梓潼。

△ 奉天财政厅长王永江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300万日元官银钱局整理借款合同，用以整理东三省官银钱号发行奉票资金。

△ 张家口至库伦公路通车，全长1085公里。

4月23日 湘军赵恒惕、刘建藩等部对攸县发起攻击，北军向醴陵、茶陵方向退走。次日湘军收复攸县，毙敌千余人，并索获飞机二架。

4月24日 段祺瑞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曹锟、王占元、张怀芝、赵倜、徐树铮等出席。议决：一、南征问题：湘南方面仍责成曹锟、张敬尧、张怀芝共同作战，以克复衡山、衡阳；鄂西方面令徐树铮与吴光新会合，以廓清省境；对于四川、广东预定进军计划，若西南再行反抗时，则断然进攻。二、国会问题：由各省电请中央，令临时参议院代行其职权，依程式选举总统。

△ 北军吴佩孚第三师占衡阳。

△ 留日学生救国团分电冯国璋、段祺瑞，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

4月25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别电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告以《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情形，称对于防御德力东渐，中日两国不能不有所协商，“现在由两国军事当局在北京交换意见”。

△ 北军田树勋部克宝庆。

△ 广东讨龙军攻占化县（今化州县）。

△　段祺瑞由汉口乘“楚泰”号军舰赴宁，其随员乘“楚材号”军舰同行，“楚材”在汉口附近撞沉招商局“江宽号”客轮，溺毙三四百人。

△　山东代理督军张树元电告北京政府，将潍县、烟台、武定、东昌、曹州、兖州、沂州等划为东、南、西、北、中五个“治匪区域”；济南施行“特别剿匪办法”。

4月26日　曹锟、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北方各督，请同意共同联名电冯国璋：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于实行选举新国会殊多影响，请令各省区依法定程序积极进行，俾期早日召集新国会，以符立宪国体而慰天下人心。

△　闽督李厚基奉令援鄂，是日电北京政府，告以亲赴厦门督师，军署委福建第一师师长姚建屏、省署委政务厅长王善荃代拆代行。

△　法国新任驻京公使柏卜向冯国璋递交国书。

4月27日　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程潜、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莫荣新联名电冯国璋，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密约。指出：“现在德方力战西欧，实无东侵之事，俄与德媾和，亦无助德攻我之心，既无共同出兵之理由，即无订立条约之必要”，揭露此密约“纯由段祺瑞及其二三武人主持”，“名为共同出兵防御德俄，实则假外人财力兵力，以压迫护法义师”，请严行拒绝，并明白宣示天下。

△　冯国璋公布《民国七年六厘短期公债条例》（发行额4800万元）和《民国七年六厘公债条例》（发行额4500万元）。

△　两湖宣抚使曹锟电北京政府，谓衡阳已完全克复，直隶第三师及第一、二、三、四混成旅之各部队业已停战，静待后命。

△　广东讨龙军攻占龙济光军根据地廉江等地，龙济光败走香

港。

△　中东铁路股东会议在北京开会，决定董事会迁京，选举郭宗熙为总理，沙俄原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为署理协理兼中东路总办。

4月28日　　段祺瑞返回北京。次日谒冯国璋，详陈南下经过情形。

△　湘粤桂联军马济部攻占湖南醴陵。30日，北京政府电令张怀芝、张宗昌等“务将醴陵于三日内克复”。

△　留日全体学生集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密约，参加者16省籍共千余人。议决：通电否认此亡国条约；派代表回国号召开国民大会；发表中、英两国文字宣言，警告全国父老，要求友邦支援，并议定一俟交涉无着，即应全体回国。

4月29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

△　广东督军署举行讨龙（济光）祝捷大会，讨龙军事结束。

△　南军攻占湖南浏阳，李传业所部新安武军败逃。

△　北军占领湖北巴东，次日占秭归。

4月30日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同中华汇业银行（中日合办）总理陆宗舆、专务理事柿内常次郎在北京签订有线电报借款合同，借日金2000万元。年息八厘，以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担保，用于改良有线电报及扩充资金（此系第三次“西原借款”）。

△　俄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布告铁路界内之俄侨严守俄国临时政府之法令。5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朱鹤翔面告俄使库达摄夫，谓俄国旧政府及克伦斯基政府业经先后推翻，霍尔瓦特不能在中

国境内行使其统治权，中国万难承认霍尔瓦特之布告。

是月　海南岛琼东县嘉积墟之警卫营长杨锦龙，率部联络当地黎民，宣布独立，反对琼崖镇守使龙裕光，并随即攻占万宁、陵水等县。

5月

5月1日　张怀芝以湖南军事失利，电北京政府辞攻湘鄂援军第二路总司令职，并推荐徐树铮继任；21日再辞湘赣检阅使职。

△　冯国璋任命姚建屏为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

△　全国商会联合会23省区商会代表84人联电北京政府，誓不承认中日缔结新密约，请严词拒绝，以救危亡。

△　湘军护法将领刘建藩自醴陵向攸县退却，于株洲渡河之际失足溺水身亡。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日本签订顺（直隶顺德）济（山东济南）铁路2000万元借款合同。

5月2日　冯国璋令准张志潭辞国务院秘书长职，任命方枢兼署国务院秘书长。

△　孙中山任命王天纵为河南靖国军总司令。

△　北军吴佩孚第三师占领湖南安仁，3日占攸县，4日占耒阳。

△　北京政府与美国广益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签订25万美元运河借款第一次垫款合同。

△　文学家苏曼殊在上海逝世。

5月3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卞荫昌、王文典等四人到京会见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出政府息兵，中日新缔密约及协约国禁运华茶三大请愿。段逐一作答：一、用兵西南政策正为求统一全国，若西南无悔祸之诚，政府则无息争之理；二、中日共同出兵问题尚在讨论中，设有妨碍主权，余自负全责；三、协约国禁运华茶，已由外交部严重交涉。

△　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就中日共同防敌事会见驻日公使章宗祥，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声称“在协定签订之前，不能指望日本方面提供贷款和武器”。

△　北京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公布《侨工合同纲要》，凡35款，附件三款。

△　北京政府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龄向美商广益公司商订借运何借款垫款20万美元，周息八厘。

5月4日　　广州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孙中山按照该组织法于是日通电辞大元帅职，并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　冯国璋以赣督陈光远克复南雄，明令给还上将衔陆军中将原官。

△　冯国璋令喇嘛印务处布告寺院，严申禁令，约束喇嘛违法行为。嗣后如有不守清规，违犯禁例情事，定即尽法惩治。

△　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吕逵先、副会长杨木森、赖恩培联名电北京政府，请求宣示报载中日缔结密约情形。

5月5日　　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各省各校代表会议，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决定组织“大中华民国救国团”，设本部于上海，推举王兆荣为干事长，并决定分批回国。

△　奉军张宗昌旅占领株洲，7日再克醴陵。

△　北军第一混成旅占祁阳，南军退守零陵。

5月6日　浙江省议会发出时局通电，略谓："同人忝为省议会议员，为民请命，义不容辞。今者民国之民，困苦颠连，已非一日，当局苟哀吾民者，务望先行宣布停战，共维国本。"

△　河南省议会电北京政府，谓："中日协约，报纸宣传如果属实，国将不国。真相如何，务祈明白宣示，以释群疑。"

△　驻澳洲总领事魏子京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自报纸宣布《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侨民恐慌，求示实情。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电称，协定尚未定议，希晓谕侨商，以免误会。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原沙俄驻华使馆：自是日起中国政府延付俄国庚子赔款。

△　上海泥瓦木工人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3日胜利复工，新定每工作日增加工资60文。

5月7日　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等27人电广州国会非常会议暨孙中山，挽留孙中山，不许辞职；并要求军政府改组案延期至6月12日正式国会召开时讨论。

5月8日　冯国璋特派驻日公使章宗祥为全权代表，与瑞士驻日公使萨利司商订中瑞《通好条约》。

△　南军攻占宝庆，北军田树勋部退守界岭、新化一带。

△　北军占领湖北兴山，南军王安澜部败走四川巫山。

5月9日　湖南督军张敬尧电段祺瑞，主从事调和，暂停战斗，使北军略示休养，以图补充，俟届时奉军全到，闽赣之师亦可齐集粤

边候命，“用此数路并进，逆军不难一鼓荡平”。

△　徐树铮电张作霖谈时局。略谓：“就时局而论，有战然后芝揆（段祺瑞）可以支持，选举可以赶办。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着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同日，张作霖据此致电靳云鹏，说明主战理由。

△　徐树铮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陞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

△　江苏督军李纯奉命派第十九师第三十八旅援赣。

5月10日　　陈炯明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指出：“此种合议制之组织不伦不类，将来结果，适当其反。”

△　陈炯明援闽粤军发起进攻，是日许崇智部占领武平。

△　粤督莫荣新解散军政府陆军部警备队，并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之招兵机关。

5月11日　孙洪伊电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反对改组军政府。

△　陈炯明援闽粤军与北军闽浙联军在潮州黄冈交战。

△　驻京日使署参赞芳泽谦吉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请设法禁止影响中日邦交之煽动性书报文字，并请从速议定军事协定。

5月12日　　段祺瑞复张敬尧佳（9日）电，不许停战调和，称“平定全粤，实为不易之道”，令其“万万不宜轻发此言，致生误会而懈士气”。

△　吴佩孚电北京政府，为策应攻南战事，请电张宗昌部向安仁、攸县方面攻击，以绝北军后顾之忧。

△　粤督莫荣新逮捕兼任军政府陆军部长和韶州镇守使之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并枪杀次长崔文藻。

△　日公使林权助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俄使已与日本政府签订出售中东铁路老头沟至长春段契约（上年11月俄日换文议定）。16日，俄使库达摄夫亦将此事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分别向日、俄使声明不予承认。

5月13日　北军攻占宝庆。

△　湖北靖国联军黎天才部、河南靖国军王天纵部攻占四川巫山险地。

△　广东中国银行奉总行命令停业。

△　上海皮匠业工人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25日，资方被迫同意增加工资15％，罢工结束。

5月14日　各省旅沪学生225人就《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事联名致书日公使林权助，声明："凡少数执政签字之条约，而未得依法组织之国会同意，我四万万国民誓不承认"，请其转达日本政府停止进行，以增进两国真正亲善。

△　龙济光以雷州失败，避入广州湾法租界。

△　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卞荫昌为会长。

5月15日　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程潜、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莫荣新联名电冯国璋，声明："今与中央约，中央果开诚布公，声明不签亡国之约，而对于南北持争之法律、政治诸问题，组织和平会议，解决一切，则我即当停战息兵，听我国人最后之裁判。"

△　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提出南北和议两项意见，其要旨为各省派代表至沪开善后会议解决法律政治诸问题。

△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抨击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5月16日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中方委员长、陆军上将靳云鹏与日方委员长、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字，凡12条，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为"共同防敌"之需要，可由两国总司令官临时协定行军铁路、电信、电话等项建设：两国互相供给兵器、军需品及其原料；一方可向他方请求辅助可供使用之军事技术人员；在军事行动区域内设置机关、交换军事地图及情报；为军事运输可使用东清铁路；该协定及其附属之详细事项，两国均不公布，按照军事秘密事项办理。

△　江苏省教育会电请北京政府速宣布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以平众怒。

△　直隶省与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签订100万日元借款合同。

5月17日　冯国璋公布《禁止与敌通商条例》，凡六条；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及在中国领域内之其他人民，禁止与下列之国与人通商：一、敌国；二、敌国人及敌国法人；三、敌国之同盟国；四、在敌国或其同盟国之占领地居住之人或法人；五、商店公司之全部或一部，由敌人管理，或其他事务隶属于敌人势力之下，曾经主管官厅揭示者。前项规定，其假手于中间人之通商，亦适用之。

△　冯国璋特派陈箓兼充外交官领事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长。

△　伍廷芳等13人联名通电，请各省护法议员于31日以前齐集广

州，参加6月12日开幕之旧国会。

△　北京政府教育部以留日学生为《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事引起回国风潮，是日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请训谕留学生“勿轻举妄动”。

△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后，以“中日新约”之名披露于报端，是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再电北京政府，声明全国商人誓不承认中日新约。

△　是日法公使柏卜，22日英使馆巴参赞，分别会见北京政府外交总、次长陆徵祥、陈箓，询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内容。

△　徐树铮电闽督李厚基称，宜乘西南内讧向潮汕进击。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公使库达摄夫节略，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在铁路界内组织类似政府之机关，既足骇人观听，而尤恐惹起事端，请转电霍氏“一切遵照合同办理，毋得再有前项轶出范围之举动”。

△　兼署财政总长曹汝霖呈准由部派陶湘等接收华新纺织公司。该公司于1915年9月由马莘　等发起，将及三年，仅收商股1.4万元，不及四分之一，领去官股120万元，并擅与外人订约借款，开工无期，全失政府设此公司之本意，奉准咨请撤销。

5月18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凡12条，规定：“军政府以由国会非常会议所选出之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行使其职权”；“政务会议以政务总裁一人为主席，由政务会议推定之。”

△　孙中山咨广州国会非常会议，派内政总长居正为私人代表，办理军政府交代事宜。

△　赣督陈光远电北京政府，请迅派兵支援赣防，并请电令闽军

进攻潮汕，龙军整戈东进，以收夹攻之效。

△　全国商会联合会24省区代表电北京政府称，商民誓不承认《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并请大总统拒绝盖印，“一面宣布条文，征求国民同意”。同日又通电各省，请速共筹挽回之方，并电北京各国公使，宣布“无论何种条约，未经国会通过，人民不能承认”。

5月19日　《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中方委员长、海军中将沈寿堃，日方委员长、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郎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字，凡九条。

△　上海工部局所属清道工人与修理沟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

5月20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开会选举总裁，出席议员120余人，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当选为政务总裁。

△　冯国璋令修改税则委员会主任曾述棨准免兼差，派蔡廷幹充修改税则委员会主任。

△　外蒙古古刚达多尔济亲王奉活佛之命，请北京政府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负责保护库伦。

5月21日　孙中山发表临行通电和《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通电要求国人务以护法为急务，贯彻始终；国会诸君负代表民意之责，使正式国会依期召开，以慰国人喁喁之望。“留别书”指出广东政局可谓“举全国所未有恶德乱政无不备之”，勉励粤人“夙夜孳孳而致力于所谓培养民力，扶持风俗，发展自治”。即日乘日轮“苏州丸”离广州赴汕头。

△　孙中山致函缅甸国民党支部，说明此次辞职不过在粤计划中挫，此后救国宗旨决无更变。

△　冯国璋公布《海军刑事条例》，凡110条；《海军审判条例》，凡59条。

△　段祺瑞分电曹锟、张怀芝、张敬尧、吴佩孚等，解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　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法政大学等校学生2000余名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举行示威游行，齐集总统府前，举代表段锡朋、许德珩、熊梦飞、邓翔海等13人向冯国璋请愿：一、《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拒绝盖章；二、公布该协定全文。

△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分电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林葆怿、伍廷芳、陆荣廷、岑春煊七政务总裁，请迅速就职。

5月22日　天津地区中学校以上学生约千余人，前往省长公署要求面见省长，请将不承认“中日军事协定”之要求转呈政府。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部妥商宣布“中日军事协定”之时间。28日，章宗祥电告外交部：日政府决定本月30日宣布，“应请中政府于同一范围内同时宣布”。

5月23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吕逵先、安迪生会见段祺瑞，询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字情形。段答“协定”已签字，事关军事秘密，无宣布之必要，并称协定规定之条件，于中国权利“无丝毫损失”。

△　徐树铮抵汉口，安抚北军将领曹锟、张怀芝，鼓励再战。曹力请罢去陆军总长段芝贵，否则“决不再打”。徐旋即赴武昌会晤王占元，请其“设法打动仲珊（曹锟），销其馁志”，并即日发电两通，将会见经过情形密告段祺瑞。

△　北军吴光新部李炳之旅进攻四川巫山，旋为滇军顾品珍等部击退。

5月24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就闽省募集地方公债事复电闽督李厚基：“尊处若能指定用途，悉数拨充军用，自当援案准募。”

5月25日　南军赵恒惕部和北军吴佩孚部双方代表于湖南耒阳县举行停战谈判。

△　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设立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六政考核处，筹补人民生计，是日冯国璋指令嘉许。

△　冯国璋任命刘佐龙为湖北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

5月26日　孙中山由广州抵大埔三河坝援闽粤军司令部视察，敦促陈炯明早日攻闽。

△　留日学生监督江庸召集归国学生谈话，敦劝留学生及早返东就学。留学生上请愿书，请政府正式宣布《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内容，以释群疑，徐图善后办法。

5月27日　曹锟、张怀芝、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六督军联名电请北京政府对西南取和平解决方针。

△　徐树铮自长沙抵衡阳安抚吴佩孚。徐许以补助军费及授予孚威将军名义稳定吴军，吴答应完全服从调度。

△　安福俱乐部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致电徐树铮称：“由闽来电，昨忽有人自京来称，两院选举中央不甚赞成”，请徐“迅电同志各省杜遏奸谋”。

5月28日　贵州督军刘显世通电吁请首先罢战，俾早得安内御外，共救危亡。

△　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限在京留日学生于6月10日以前各回原校就学，违者开除学籍。29日又布告：限在上海及原籍之留日学生于

6月中旬以前返日就学。

△　吉林省濛江林业局长陶昌善与日本大仓组、王子制纸会社代表、日本驻吉林领事深泽暹签订中日合办华森制材公司合同，借日款200万日元，以本公司制售木材收益为担保。

5月29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公使林权助在北京互换照会，两国政府承认《中日陆军、海军两项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　日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电林权助公使称："帝国政府为进一步密切日中两国经济关系"，决定：一、给予北京政府吉、黑两省森林金矿借款约3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约2000万日元；二、由日本借款设立炼钢厂，聘用日人为该厂会办、技师长；三、由日中银行参加成立铁路资本团。

△　两湖宣抚使兼攻湘鄂援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以"养病"为名，率第一路总司令部全体人员离武汉回天津，并于6月3日将该司令部设天津河北中州会馆。

△　日本政府派西原龟三携带方案第六次来华交涉，于是日抵北京。

△　直隶滦县人民暴动，攻署释狱。31日遭镇压失败。

5月30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使馆参赞船津晤谈，约定于5月31日双方同时宣布《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东京换文内容，惟日期仍标为5月30日。

△　日本外务省发表3月25日《中日两国共同防敌协定》东京换文，并声明除共同防敌外，未附任何外间所传之条款。

△　北军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占领湖南常德北70里之鳌山。

△　援闽粤军前敌总指挥邓铿等部占领福建永定县，旋即先后攻占武平、上杭等县。

△　日公使林权助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赔偿因西南战事所受之损失。

△　英公使朱尔典为陕西省破坏禁烟条约事，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

5月31日　冯国璋令财政部拨银三万元，赈济湖南长沙等县水灾。

△　北京政府陆军部奉准裁撤陆军第十七师，改为湖南陆军步兵第一旅。

△　徐树铮返回北京，谒段祺瑞报告南行安抚北军将领经过。

△　两广巡阅使龙济光抵北京，与北京政府筹商军事计划。

△　奉军许兰洲援陕军开抵河南渑池驻扎。

△　西原龟三电日大藏大臣胜田，报告同曹汝霖会商情形，提出“为维持（中国）现在政局”，本年内“至少希望达成7000万日元的借款”。

是月　袁乃宽等在河南安阳开设同泰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棉花、棉纱、油粮、毛皮、实业押款及矿务工厂，资本50万元。

△　裕津制革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资本100万元。

6月

6月1日　陆荣廷自广西贵县到南宁，是日通电就任军政府总

裁。

△　湘督张敬尧电北京政府要求“早日息争谋和”，并派衡阳道尹林树藩与南军磋商和议计划。

△　孙中山抵汕头粤军司令部，指示军略及编制；下午乘日轮“苏州丸”启程，经厦门取道台北赴日本。

△　贵州督军刘显世电复全国商会联合会，表示“夙爱和平，但使不相煎太急……无不乐于罢兵”，并谓“贵会即［既］提议议和，尚望设法疏通，贯彻始终”。

△　广东省长李耀汉电北京政府称，广东自改组新政府以来，“其粤桂派及孙派意见甚深，而非常国会与军队之冲突尤甚，大有誓不两立之势”，“请即转令闽浙各军速攻粤北粤东，一面再饬赣军入韶，必能立收早日荡平之效”。

△　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议，选举梁士诒为董事长。

6月2日　　徐树铮从前方返抵北京，往晤段祺瑞，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以离间曹吴。段深以为然，旋即与吴直接通电，以示优异。

△　留日学生全体代表王兆荣、阮湘等，具呈北京政府教育部申述彼等罢学归国，纯系爱国心之驱使，甚望政府谨慎外交，勿丧国权。同日并具呈北京政府请宣布中日军事协定，以破日本阴谋而安国人之心。

△　江西黄淦率众举事，称“赣北护法军”，联合鄱阳县兵警占据县城；6日又占都昌县。

△　北京政府财政部咨行各省分署，运销美国茶叶一律免厘放行。

6月3日　　全国各省议会代表在南京开预备会议，发表宣言吁请南北双方罢兵，“其有双方误会之点以及争执条件，不妨明白宣示，听全国人民之公断”。

△　冯国璋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

6月4日　　徐树铮电宜昌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称，“弟此次到衡与吴子玉（佩孚）联合，十分得力；曹使（锟）虽称病北旋，而战局毫无变更”；并谓“日昨归京，中枢计划仍积极进行，决不至因渠一人而有若何之影响也”。次日，徐树铮电各省督军，亦称“前方战局毫无变更”，“中枢计划，仍策励进行”。

△　援闽浙军向粤军陈炯明部发动总攻，连占饶平等地。

6月5日　冯国璋公布《刑事诉讼审限规则》，凡16条。

△　徐树铮电汉口湘赣检阅使张怀芝称，“攻粤计划，芝揆（段祺瑞）催队速进”；援粤总司令一席，“芝揆甚盼我兄慨允担任，以便早日定局”。同日又以“日内粤局已变，内讧正烈”，电张怀芝，请饬队前进。

△　湘赣检阅使张怀芝以军用浩繁，应核减饷需为由，电呈北京政府改编鲁军，拟以暂编山东第一师改编为两旅，一旅仍名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以潘鸿钧充任；一旅改为山东陆军第一旅，旅长以张克瑶充任。

△　云南旅京人士方敏中等123人通电，反对段祺瑞内阁私造非法选举，在西南各省，就旅京人士中指派议员，举办国会选举。

△　吉林督军孟恩远派兵保护中东铁路，并任高秀山为中东铁路司令。

△　梁士诒在北京开办证券交易所。

△　奉天殖边银行因滥发纸币被张作霖查封，并拘押行长岳春煊。

6月6日　　徐世昌应交通系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之请，出面斡旋南北调和，是日由天津到北京。

△　留日学生救国团召集全体会议，议决为抗议中日缔结密约，发表宣言，誓不再渡日本留学。

△　南军占安仁、茶陵，并次第占祁阳、常德、耒阳。9日，吴佩孚师败退衡山。

6月7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命令：吴佩孚代行攻湘鄂援军第一路总司令职，节制所有第一路军队。

△　张敬尧电请北京政府挽留曹锟、张怀芝，“以维各路军事现状”。

△　徐树铮密电有关各督，禁阻各该省议员赴宁参加各省议会联合会；已赴宁者，设法召回。

△　徐树铮电陕西督军陈树藩，告以此次选举，“某党（按：指国民党）系竞选甚烈”，请其“植兰刈艾”，“严切防闲”，勿令国民党人赵世钰、李述膺（均为第一届国会议员）等有一人入选。

△　闽军夺回援闽粤军所占之永定县。

6月8日　　北军湘鄂援军第二路总司令、湘赣检阅使张怀芝自江西启程回济南。

△　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自哈尔滨抵吉林，同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会商中东路公司改组及招兵事，10日结束。11日，郭宗熙电北京政府外交部、交通部报告会议情形。

6月9日　北军闽浙联军占领汕头，10月占饶平。

6月10日　段祺瑞召见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询问旧国会在广东活动情形，并威胁旧国会议员不得赴广州开会。

△　孙中山偕胡汉民、戴季陶经台湾换乘“信浓丸”赴日，是日抵门司。入夜搭车赴箱根，途中对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亚部顾问泽夫幸村发表谈话，分析“北方武人派”伪共和之实质。

△　四川熊克武部攻占广元，刘存厚退入陕西宁羌。

△　陕西靖国军占潼关。

6月11日　冯国璋指令照准改第一旅为陆军第二十混成旅，任命吴长植为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

△　皖督倪嗣冲抵津，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等会商时局，22日返回蚌埠。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与上海烟土联社签订《收购存烟第二次补充合同》（本合同为1917年1月28日所订合同之补充合同），以政府公债券将该社存烟1577.5箱，悉数收购。

6月12日　广州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正式国会（又称护法国会）开幕式，出席参众议员240名，吴景濂主席。

△　热河都统姜桂题以日驻赤峰参谋官菅野竹治等，借口中日协约成立，开始调查我国林（西）、开（鲁）、绥（东）、朝（阳）等地军情，实违反国际法，是日密电北京政府请示应付办法。

6月13日　南军退出湖南常德；次日北军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占常德。

△　章太炎在四川峨眉受戒，宣言不再与闻世事。

△　中瑞（士）《通好条约》在东京签字。

6月14日　徐树铮在天津奉军司令部诱杀炳威将军陆建章。陆为北洋系主和派之幕后活动者，早已被皖系视为危险人物。是日，陆应徐之请赴奉军司令部叙谈，被徐卫士开枪射杀身亡。此为轰动一时之“陆案”。

△　徐树铮电北京政府陆军部，报告“陆案”经过，诬指陆“勾煽军队，连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及“颠倒播弄，倾覆国家”，“当令就地枪决”，“请予追褫该员军职，用昭法典”。

△　徐树铮电奉、皖、直、鲁、浙、闽、湘、鄂、晋、陕、沪、豫、绥等省区各督军、都统、护军使等，密告其致陆军部报告“陆案”之寒（14日）电文，并称：“陆某罪恶昭著，久为同人所切齿。今兹自行送死，亦是恶贯已盈之证。”

△　倪嗣冲在天津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等续开会议，倪力劝曹、张再战，会中并对总统问题有所商讨。奉、晋、鄂、苏、陕、沪等代表杨宇霆、卢小嘉等人出席。

6月15日　北京国务会议决定继续“讨伐”西南。

△　北军吴佩孚部与湘军赵恒惕部两方代表在耒阳达成停战协议，规定自是日至8月15日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战。

△　冯国璋明令褫夺陆建章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按：此令系徐树铮自天津打长途电话嘱国务院秘书长方枢拟就命令，请冯盖印发布。

6月16日　北军王正雅部攻占湖北石门，南军林德轩部败走桃源一带。

△　英舰为英国教士格拉姆在福建福宁县属海港被杀案，自行在

闽浙海面剿捕我国人民。

6月17日　徐树铮电直隶省长曹锐，告以段祺瑞允助曹锟为副总统，“即嘱弟转知各同人分头进行”。

△　段祺瑞手谕徐树铮：湘督电催奉军即须前进，当立饬军队前往。

△　冯国璋令恢复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原官，并销去免职处分。

6月18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兼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代表真川孝彦签订1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按：此项借款系由西原龟三与曹汝霖秘密商订。吉会铁路由吉林经延吉过图们江至朝鲜会宁，与朝鲜铁路相接。此系第四次“西原借款”。

△　北军冯玉祥部攻占湖南汉寿。

6月19日　督军团再开天津会议，拥护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决定继续对西南作战方针。20日会议结束。

△　四川省议会电北京政府，反对指派旅京川人选举新国会议员。

6月20日　冯国璋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

△　孙中山由日本箱根抵京都。

△　四川靖国军向传义部攻占武平，川军张邦本、彭光烈败走茂县。

△　援赣粤军占领江西虔南县城；23日复为北军夺占。

6月21日　　奉天督军张作霖以徐树铮枪决陆建章“实属果敢可嘉”，电请北京政府传令嘉奖。

6月22日　冯国璋特派闽督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　孙中山自京都赴神户。

6月23日　孙中山由日本神户起程返沪。

△　留日学生救国团与上海绅、商、学、报各界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　上海南市摊户罢市，要求减收捐税。市政当局被迫减半收取捐税，28日复市。

6月24日　冯国璋令以7月12日为“国军恢复共和”纪念日。

△　冯国璋指令批准将陆军第五混成旅扩充为第九师，任命魏宗瀚为师长。

△　甘肃督军张广建电北京政府，报告已奉命特派左军统领吴常桂为甘肃援川总司令。

△　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京师学务局及各省教育厅，推广女子教育。

△　广东督署逮捕《民主报》主笔陈耿夫，并于25日枪杀。

6月25日　　孙中山自神户抵上海；同日对汪精卫表示，理想政治，断非其时，决心从事著述启发国民。

△　唐继尧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电主张武力解决南北之争。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同英、美、日三公使，分别商议解除白俄谢米诺夫军队武装，及俄人请求出兵西伯利亚事。

△　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京师学务局及各省教育厅，推出全国职业教育。

6月26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电令驻湘南、湘东各路北军，自26日起向各要隘开始总攻。

△　驻福建德化县闽军营长朱得才与驻晋江陆军营长陶质彬联合宣布独立，推陶为闽西护法军总司令。

△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陆军部，请迅速增兵外蒙，以益边局。

△　冯国璋指令批准通辽镇改设县治。

△　上年10月20日中日美三国订立合同合办之中国电气股份公司是日在北京开第一次董事会，推举交通次长叶恭绰为董事长兼总裁，美国人麦南为总理。7月20日，冯国璋指令照准。

6月27日　冯国璋指令批准陆军部裁撤山东暂编陆军第一师，改编为陆军第一混成旅及山东陆军第一混成旅，分任张鸿钧、张克瑶为旅长，原师长施从滨交援粤总司令张怀芝酌量任用。

△　援粤总司令张怀芝由济南赴汉口，7月1日抵达。

△　孙中山以北军连续派兵援粤援闽，电汕头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及蒋介石，主张“冒险进攻”，“以攻为守”，以免坐困，藉图生存。

△　徐树铮电告张作霖，已向中央、交通两行商妥，拨垫现大洋百万元，资助奉天殖边银行。

6月28日　冯国璋特任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护省长职。

△　北军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部攻占湖南桃源。

△　徐树铮为杀陆建章事致电安抚冯玉祥，内称杀陆“非个人有嫌怨”，“身后之事自当悉力筹维”。按：陆建章与冯玉祥为舅甥之亲。

6月29日　　徐树铮将国会议员选举情形电告皖系各省督军，略谓：“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

6月30日　　徐树铮电诘吴佩孚与南军议和事，略谓：“若以披坚执锐之身，亦习为和平之口，恐不免奸黠窃笑耳。”“何忽于此大功垂就，九仞一篑之时，出此疲薾之策？”并谓：“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吾兄前此功业尽逐流水，于国于身，宁有当乎？”

△　陕西省长刘镇华、督军陈树藩派全权代表张宝麟同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代理大仓组河野久太郎在西安签订“陕西实业借款合同”，款额日金300万元，为陕西办理铜元局及纺纱局之用，以该两局所得红利为担保，利息八厘。

△　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张梦九、雷眉生、周太玄六人在北京商议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公推王光祈为筹备主任兼会计，结合有志青年，相期以学术救国。

是月　　龙济光向日本三井物产会社借款500万日元，用于军费，以广东省矿山为担保。

△　薛宝润等创办之上海厚生纱厂开车生产。

7月

7月1日　　张钫联合樊钟秀部民军起兵陕西雒南，称陕西靖国军南路司令。河南省王天纵与张钫靖国军会合。

△　冯国璋任命商震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马开崧为第二混成旅旅长。

△　援粤总司令张怀芝到达汉口，4日向北京政府上报援粤军编制：奉军五混成旅为本队；赣军、鲁军各一旅，苏军一旅及近畿第六混成旅为右翼；安武军三十营，近畿第三师为左翼；第十一师、第二十师及第十六混成旅为预备队；并请政府任命奉军总司令孙烈臣为本队总指挥，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为右翼司令，安武军司令马联甲为左翼司令。援粤司令部暂设武昌，俟曹锟南下，即将司令部移南昌。

7月2日　　北京政府电令援粤闽军总司令李厚基、副总司令童葆暄速攻汕头、潮州。

△　徐树铮电告福建督军李厚基，冯国璋现派孙道仁于昨赴闽运动军队，破坏闽局，祈严密防范。

△　冯国璋批准中瑞（士）通好条约。

△　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称，“顷据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按：系沙俄旧部在海参崴设立）外交员来称，组织政府……愿中国政府有所表示。并请放运粮食三十车。尤愿非正式派员至北京，有所陈述”。次日，外交部电告邵恒濬，有关援助西伯利亚临时政府事，俟观察各协约国态度再定办法。

7月3日　　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由上海抵广州，筹组军政府。

△　湖南衡阳各界人士召开罢工息战大会，吴佩孚派员参加，表示支持。

△　徐树铮分电湖南督军张敬尧、安徽督军倪嗣冲，告以在沪国

民党首孙毓筠、李征五、孙洪伊等于6月17日秘密会议，设法鼓动陆建章旧部附和西南，反对中央，已派人赴湘皖等处从事运动，祈严密防范。

△　徐树铮电奉天督军张作霖，告以苏督署连续召集各镇使密议，以陆案为词破坏北洋大局，现已派人赴湘运动，又自沪召暗杀党60余人，已于上月25日分赴津京奉及湘省，祈密加防范。

△　北京农商部会同财政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草合同，商借日金3000万元。

△　香港英总督集捐赈灾巨款港银10万元汇京赈济京畿水灾。是日，冯国璋据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龄呈请，指令照准赠给纪念银鼎一尊。

△　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代表俄公使库达摄夫自哈尔滨通电宣布组织临时政府，并公布内阁名单及施政方针。

7月4日　冯国璋公布《修正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

△　冯国璋任命李庆禄为黑龙江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张明九为第二混成旅旅长。

△　孙中山致函孙科，表示“对于现在之时局，拟暂不过问”。

△　陕西督军陈树藩电北京政府称，石青阳谋窥陕南甚厉，特恳转饬许兰洲司令率军来陕援助。

△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采林在苏维埃第五次会议宣布，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

7月5日　军政府伍廷芳、岑春煊、林葆怿、陆荣廷及唐继尧五总裁在广州珠海举行政务会议，并联名发出通告，宣布：“由国会非

常会议选出之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行使其职权。……谨于本月五日宣布中华民国政府依法成立，即开政务会议。”

△　冯国璋令川军第三师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二十二师，任钟体道为师长。

△　李厚基致电北京政府，告以龙溪不守，省城危险，请速予援救。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武内金平签订1000万日元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合同。

7月6日　　陆荣廷电梁士诒，答复梁所提和平统一八项条件，表示决不任两广巡阅使，粤督由中央主之，惟龙（济光）则必当去；桂督仍以谭浩明任之；湘省护法军队，请谭浩明酌编为湘之国军；在粤李（烈钧）方（声涛）所领滇军，亦宜预编国军；桂军拟以沈鸿英、林虎、刘志陆各率所部队伍，随之留驻，其他在湘粤之桂军，全行回桂，暂编为国军；国会召集办法，由中央分饬名省酌定，多数取决，荣廷断无阻挠；并嘱“愿以此意并告芝老（段祺瑞）”。

△　吉林省城各团体在省议会开联席会议，讨论取消吉、黑两省林矿抵押借款事，议决各团体一律举代表赴黑、奉两省联络共同进行，并成立各团体联合会办事处。

7月7日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奉唐继尧命即将赴日之李宗黄，勉其考察日本地方自治，以为中国训政时期的借镜和参考。

△　北京政府驻哈尔滨交涉员李家鳌赴霍尔瓦特处阻止在路线内组织政府，次日并电请外交部速图收回中东路权。

7月8日　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在湖南常德宣布独立。

△　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加入该会之银行有上海中国、交

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10余家，选举宋汉章为会长，陈光甫为副会长。10月19日举行正式开幕礼。

△　日公使林权助促请北京政府依照1915年中日条约第六款之规定，开放承德、朝阳、锦州、开鲁及林西五处为商埠。外交部答以政府近来财政支绌，缓日实行。

△　美国借口援救西伯利亚境内捷克斯洛伐克军，向日本政府提议两国共同出兵干涉。17日，日政府照复同意。按：捷克斯洛伐克军原系战俘所组成，苏俄政府允许他们经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回本国，中途受社会革命党人和英、法等国利用，举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叛乱。英、法等国为干涉十月革命曾于6月7日正式要求日本出兵。日本亦早就此与英、法、美等国往返秘密磋商。

△　原俄驻华公使库达摄夫晤北京政府外交次长陈箓，商请准许白俄哥萨克军官武装通过伊犁、塔城等地。新疆督军杨增新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坚请拒绝。

7月9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决议先将张家口、归化城、洮南、赤峰、葫芦岛、多伦诺尔六处开放为商埠。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复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坚持反对霍尔瓦特在中国境内组织政府或类似政府之机关。

△　霍尔瓦特以“临时政府摄政”名义在四站（格罗结阔倭）布告成立全俄临时政府。

7月10日　陆荣廷通电推举岑春煊为军政府总裁主任。电称：“荣廷谨依组织法，推举岑公春煊为总裁主任，即请总裁诸公一致主张，即速推戴，俾其即日任事。”

△　吉林工、商、学各团体联合会在省议会召开全体公民大会，反对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到会数千人，在众愤之下，捣毁吉

林交涉署官员住宅。次日该联合会继续开会，提出停捐罢税；派代表赴奉、黑两省联络商讨办法；各界联电北京政府，誓不承认；公举代表进京誓死力争等项要求。

△ 美国务卿蓝辛致函英、日、法三国驻美大使，提出四国组织新银行团共同承担对华借款，嗣后各国即就此磋商。10月8日，美国就英、日、法三国政府所提出问题，发表一项关于新银行团计划正式声明：凡参加团体之四国银行应一律将在华所享之借款优先权让予新成立之银行团，借款范围除行政借款外，亦应包括实业、铁路等借款。各国银行团应得到政府支持。

7月11日 广州正式国会参、众两院假广东省议会召开谈话会，报告参加护法议员名额，众议院240人，参议院102人，并宣布议员递补办法及除名标准。

△ 四（平街）郑（家屯）铁路竣工通车，全长88公里。

7月12日 北京政府内务部致电各省区行政长官，着所有新选参、众两院议员务于8月1日以前齐集北京，定期开会。

7月13日 孙中山致函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主张“冒险求胜，规取闽中”，指出近时闽中志士纷纷举义，“如兄能直向福州方面进发，则彼等必纷纷来附……我军当能大占胜利”。

△ 冯国璋公布《修订法律馆条例》，凡18条。15日，冯国璋特派董康、王宠惠充修法律馆总裁、副总裁。

△ 各省省议会代表电北京政府、广州军政府，要求息兵休民，共筹对外。

7月14日 广州各界人士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开拒约救国国民大会，发表宣言，并成立各界联合会。20日，各界联合会开成立会，宣布该会“以振兴教育，提倡实业，拥护国权为宗旨”。

△　日公使林权助以北京政府所订《矿业条例》及《铁矿公司监督权限章程》不便于外人，要求外交部予以修改，遭拒绝。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北京政府，告以驻库俄领希望中国收容德、奥俘虏，业经当面拒绝，并闻该领已电驻京俄使，请即严词拒绝。

△　吉林督军孟恩远以柴赫队（即捷克军）13000人，要求假中东铁道赴满洲里站，霍尔瓦特声称业已与中国政府议妥一事，电北京外交部，请示“柴赫队假道赴满一层，是否准其过境，或严加以阻止”。16日，外交部复电拒绝捷克军假道。

7月15日　冯国璋特任姚震为大理院院长。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北京政府，谓居库俄武官不听中蒙抗阻，在库地擅自招兵，如不遵从，非以武力干涉不可，务恳顾念边局，迅饬火速派兵前往。16日，陈毅再电北京政府，库需兵甚急，请迅饬驻乌得军队火速开拔，限10日内到库。19日，北京政府电令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改派绥军高在田团两营赴库。

△　新疆督军杨增新饬令塔城文武官员，切实阻止白俄溃兵以塔城为根据地与苏俄红军开衅。

7月16日　孙中山函复广州正式国会，接受军政府政务总裁职，派徐谦为代表赴粤。

△　军政府政务总裁唐继尧通电推举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政务总裁。

△　北京政府外交部复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盐（14日）电，谓：“禁阻德、奥俘虏窜入蒙境，所见甚是。如俄使来部要求，自当设法拒绝。”

7月17日　北京政府添设驻罗马教廷特命全权公使，任命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兼任。28日罗马教皇遣使来华。8月6日，驻京法公使柏卜就此提出抗议。24日，北京政府遂决定在欧战期间暂不派遣；教廷派来公使亦不接待。

△　徐树铮为防止研究系人物当选新国会议员，是日电湖北武昌参谋长何佩瑢，称“该党（指研究系）野心不死，万不可引狼入室，致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为要”。

7月18日　军政府召开改组后第一次政务会议。次日开第二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任命章士钊为秘书长，伍朝枢为总务厅长。

△　北京政府农商部呈准组织龙烟铁矿官商合办公司。是年3月，徐绪直等组织官商合办龙关铁矿公司，经农商部批准，并派陆宗舆为督办。旋又在察哈尔宣化县烟筒山发现铁矿，陆宗舆咨请农商部将该矿合并于龙关公司，而梁士诒等则呈请另行组织烟筒山铁矿公司。农商部将该案提交国务会议，决议准将烟筒山合并于龙关铁矿公司，改组为龙烟铁矿官商合办公司，官商股份各半，由农商总长田文烈呈请冯国璋，是日农商部奉令批准，并派陆宗舆为督办，丁士源为会办。

7月19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延期一年偿还善后续借款第一次1000万日元垫款合同。

△　浙军童葆暄部在闽粤边境攻占广东大埔，陈炯明援闽粤军退守大埔三河坝。

△　法公使柏卜访北京政府外交次长陈箓，告以法拟派兵一中队前往海参崴，并询问中国是否派兵。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柏卜，中国已决定派1000至2000名士兵赴海参崴。

7月20日　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龄与美商广益公

司签订“运河七厘金币借款合同”，借款美金600万元，年息七厘。按：上年熊希龄与美商广益公司曾签订此条例草约，惟未经国会同意，迄未实行，经熊氏与广益公司再度协商，故于是日将原合同签字。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美、日商人合办中国电气股份公司，制造电话、电报机械材料，供中国之用，是日冯国璋指令交通部照准中国电气股份公司立案。

△　美代办马瑞慕访晤外交次长陈箓，谓中国欲于此时收回中东路，废1896年所订东清铁路条约，“实属不合时宜”。

7月21日　“少年中国学会”订定规约章程，凡70条，规定：“本学会本科学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王光祈、曾琦等并邀请李大钊入会，列名发起。

△　北京政府教育部密电各省，查禁各校学生组织爱国会或联合会等名目。

7月22日　冯国璋指令陆军部将湖南陆军步兵第一旅改编为国军第五混成旅，任命朱泽黄为旅长。

△　徐树铮电告国务院：“奉军即进安仁，迅扑永（州）郴（州），以便直出宜章，径固韶关。”

7月23日　北京政府任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援粤本队总指挥，安武军马联甲为左翼司令，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为右翼司令，悉归吴佩孚指挥，并令吴佩孚速反守为攻。

△　冯国璋指令陆军部，准将湖南步兵第四十二旅改编为湖南第一混成旅，并任命张敬汤为旅长。

△　冯国璋令财政部拨款二万元赈济山东兖州、济宁、泰安各属

村庄水灾。

7月24日　军政府唐继尧等七总裁联衔通告，历数段祺瑞罪状，重申护法，并宣布："果北廷悔祸，宣布遵守约法，恢复国会，自可消除兵气［氛］，共维国本。"

△　冯国璋任命高士傧为吉林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

△　困守雷州之龙济光军，在李烈钧所部讨龙军敦促下，是日开城悉数投降。

△　吉林督军孟恩远电北京政府，报告霍尔瓦特近况。29日，北京政府电复孟恩远，谓："我国对于霍氏固未便首先派援，万一霍氏退入我国领土以内，届时应饬五站军队加意严防，勿任俄新党侵入，以尽暗中扶助之义。"

△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训令驻华武官斋藤季治郎，要求北京政府根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与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7月25日　北京政府阁议决定，捷克军于俄乱期间可随时通过中东铁路。次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将此决议节略通知英、法、日、美、俄、意、葡、比各国公使。

△　徐树铮于23日抵京，次晨谒段祺瑞，是日电张作霖转达段祺瑞面告："定粤干力，惟恃奉军慎固大局；保内阁后盾，我亦惟雨帅（按：张作霖）是赖。"

7月26日　徐树铮电告驻香港办事员韩宾礼，"陈炯明遣陈觉民代表到港，商议输诚。请就近审察情形，酌与确议示复"。

△　北京政府内务部据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呈送由益都县知事查获四面刻佛古石及汉石等拓片事，咨山东省长请通令各县严禁毁坏盗卖古物。

7月27日　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将英文对外宣言书送达广州各国领事，要求协约各国承认护法军政府。

△　孙中山电广州正式国会，勉励议员“力持正义，努力进行”。

△　冯国璋特派熊希龄兼任督办运河工程事宜。

7月28日　张作霖赴天津会晤曹锟，密商进军计划，促其从速启程，并对于时局问题有所接洽。

△　岑春煊、冷遹等抵广西武鸣与陆荣廷会面，8月7日返回广州。

7月29日　北京政府训令驻哈尔滨交涉员李家鳌，就日领向俄领提出路权、警权、粮业、实业、币权五项要求一事，提出严重抗议。

△　俄谢米诺夫白俄军为红军所败，越境退入满洲里，黑省驻军勒令该部退往海拉尔，并阻红军越境追剿。

△　美国代理外长向驻美公使顾维钧面交致英、法、意出兵节略，并表示美欢迎中国出兵，日本拟派兵接收中东铁路，极盼中国设法自保。

7月30日　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黑督鲍贵卿、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蔡成勋、援粤总司令张怀芝、两广巡阅使龙济光、陆军总长段芝贵、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等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讨论选举总统、副总统及对南方用兵问题。共推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副总统暂不决定，多数主张派兵南下，如何派兵则牵延未决。

△　北京政府陆军总长段芝贵与日本泰平公司代表高木洁签订2364.3762万日元第二次购买军械合同。

△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各省长、驻各国公使，限制留学生与外人

结婚：官费学生与外人结婚，应即停止官费；身隶学籍来馆请给证结婚者，径予拒斥。

是月　湖北中华铁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汉阳成立，资本50万元。

△　上海英商创办之鸿源纺织厂，售与日华纺绩株式会社，改称日华纺织第一厂。

8月

8月1日　湖南省南北两军战争又起，双方在祁阳、酃县、宝庆等处接战。

△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采林复函孙中山，对“几个月以前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劳农政府的贺信”表示感谢，并介绍苏俄处境，呼吁中国兄弟共同斗争。

8月2日　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田文烈、财政总长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专理事务柿内常次郎在北京正式签订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合同（此系第五次“西原借款”）。

△　唐继尧通电反对梁士诒等倡导之“新国会选举总统，旧国会公布宪法，俟总统、宪法俱产出，两个国会同时解散，再依法另行选举，成立国会”之主张。

△　徐树铮密电驻港办事员韩宾礼严行监视梁士诒在港行动。

△　冯国璋指令内务、财政两总长，准予新疆省塔城县属额敉勒河增设县治，并定名为额敏县。

△　日本政府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5日，日使林权助将该宣言送交北京政府。

8月3日　　冯国璋令“海容”舰长林建章，着以海军代将节制派赴海参崴陆海军队。

△　美国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英军、法军是日与10日先后在海参崴登陆。19日，美军于海参崴登陆。

8月4日　　苏、赣、鄂、湘四省督军联名电复天津督军团会议，发表对时局意见，提出：一、对南方政策和战皆无所主张，唯侵入我辖境者讨伐之；二、总统、副总统听国会决定；三、出兵问题，承认中央决定。

△　陈炯明援闽粤军攻占大埔，6日破永定，8日占上杭。嗣后，长汀、武平、清流、平和、连城、宁洋、安溪、漳平、永春、大田、德化、仙游均入粤军之手。

8月5日　　冯国璋公布《法律适用条例》，凡27条，规定有关人、亲族、继承、财产及法律行为方式之中外法律适用条款。

8月6日　　北京国务会议议定“讨伐”南方，预定三个月为期，每月支出1500万元军费。

△　日外务大臣后藤新平训令日使林权助通知北京政府，日本将根据《中日军事协定》出兵满洲里。8日，日使林权助就此事访晤曹汝霖、段祺瑞。

△　广州正式国会众议院开第一次正式会议。8日，参议院开第一次正式会议。

△　西原龟三与曹汝霖在北京密商议定中国铁道资本团协定书及制铁厂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规定：由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给予北京政府一亿日元借款作为开办资金。此事后因寺内内阁于9月28日辞职而搁置。

8月7日　　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致电苏督李纯，指出中央此次武力平内乱是亡国政策："国亡于外，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

△　西原龟三离京返回日本。

8月8日　　陕西各路民军司令胡景翼、曹世英、郭坚、卢占魁、樊钟秀、高峻等推举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是日就职，设总部于三原。

△　徐树铮电皖系各督军，告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四督议定："大局非统一不能成国家，故战事非届统一告成决不歇手。"

△　日公使林权助晤段祺瑞，告以满洲里危险日迫，如遇有出兵必要时，日中两国政府必须出兵满洲里。段表示遇有危险而需派兵时，当然同意。

△　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吴恩华函告北京政府外交部，乌梁海之克穆齐克及贝子两旗均愿归属中国。

△　新疆英领事馆添驻卫兵，北京政府提出抗议。驻喀什噶尔英国领事馆向无卫兵，忽由印度派到卫兵一队。新督杨增新电请外交部向驻京英使提出质问。英使答以"新疆周边奥俘甚多，防务吃紧，特派兵保护，俟地方平复，即当撤退"。

8月9日　　冯国璋召集政府各部总长及中、交两银行当局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券问题。财政总长曹汝霖说明发行金券系改革币制，采行金本位的准备，并建议发行金券2.4亿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准备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券之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祺瑞表示同意。

△　广州正式国会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讨论国会在广州成立

之宣言书。

△ 山东文登县人民反抗缴纳盐税，杀死镇抚队队长，代理督军张树元派兵镇压。

△ 日本政府以国内米荒，人民群起斗争（米骚动），于是日及13日训令林权助同北京政府交涉紧急向日本输出米谷。北京政府决定以陆军部采购军米名义，由江苏购米运日。

8月10日 冯国璋公布《金券条例》，凡九条；《币制局官制》，凡九条。

8月11日 日军先头部队在海参崴登陆，北京政府派赴海参崴之2000名部队，其先头部队由南满铁路赴哈尔滨，本队第一批450名，于18日由团长宋焕章率领从北京出发。

△ 吉林督军孟恩远电告北京政府，日军第七师团以护侨及助捷军为名开赴满洲里，有损中国领土主权，请迅即筹示应付办法。同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电请北京政府对日军派兵赴满预为抵制，并告以即日赴京面请方略。

8月12日 新国会在北京开会，出席参议员106人，众议员358人。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冯国璋、段祺瑞莅会并致颂辞。因安福系议员占新国会议席百分之七十，故世称“安福国会”。同日，临时参议院宣告解散。

△ 冯国璋致各省督军、省长通电，表明告退之决心。略谓：“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和平，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幕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

△　日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致函北京政府陆军部称，日即将派兵至满洲里“保护侨民”，并进驻中东路。14日，陆军部以未经“正式见商”，复函拒绝。

8月13日　　各省省议会护法议员通电斥责安福国会为“非法选举之国会”，并通电否认北京政府《金券条例》。

△　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促请北京政府主和，自行决定即日起停战一个月。

△　江西财政厅江西中国银行与台湾银行签订30万日元借款合同，作为省行政经费。

△　上海日华纺织公司女工千余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

△　日本政府发表派兵满洲里宣言，决定调驻满洲守备军开赴满洲里，并称此次移动守备军，当“视为军事协约之行动”。同日，日本为配合出兵满洲里之军事行动，与中东铁路公司订立借用长春至满洲里电台合同。

8月15日　　段祺瑞召开国务会议，讨论日本出兵满洲里交涉案，议决和平对待。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专设新闻检查局，关于出兵及外交重要问题禁止刊载。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256.25万法郎中法实业利息垫款合同，作为拨付中法实业借款第九期利息及手续费。

8月16日　　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以北京政府公布《金券条例》未与该银行团协议为由，向北京政府财政部提出抗议。并称：“关于此问题，银行团已委任各关系公使与中国政府交涉。”

8月17日　南军进驻宝庆城。

△　驻京各国公使开会讨论出兵满洲里问题，美使主张协约国出兵海参崴范围扩大，与日本共同行动。各公使分别请示本国政府意见。

△　日公使林权助电告日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北京政府出兵海参崴及编练“参战军”急需军费，要求日本给予2000万日元借款。

8月18日　广州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议决政务会议条例。

8月19日　广州军政府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　广州正式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出席议员449人，议决：一、非法政府所公布之伪法律、伪命令，绝对不生效力；二、非法政府所缔结之条约契约及发布之公债，未经议决或同意以前，不得认为有效。

△　孙中山复函海外同志李襄伯等，谓：“救国之心，未尝少懈。返沪以来，力谋挽护，刻从根本着想，非整理党务，先固实力，不足以及时奋起。”

△　驻满洲里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张焕相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日军5000人由哈尔滨进至黑龙江省，分驻中东路各站。

8月20日　北京新国会众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议员278人，王揖唐当选为议长。次日，众议院开会补选副议长，刘恩格当选。

△　冯国璋任命么培珍为吉林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　北京政府致电吉、黑两督军，谓日使馆要求禁载日军在东三省“所有一切行动”消息，当地日领事“倘来接洽，即乞酌核办理”。

△　吉督孟恩远致电北京政府，日军在哈尔滨强索营房，擅设警

岗，“在我固力主和平对待，然退让亦当有范围，此事既据两国协同出兵之规定”，请速将协定条文，“迅密电示，俾资应付”。

△　北京参陆办公处致电武昌援粤总司令部，令其移驻南昌。

△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陆家浜成立“中华职业学校”，9月8日开学。

8月21日　　北军第三师长吴佩孚领衔与赵春廷、张宗昌、陈修德、冯玉祥等将领联名通电，恳请冯国璋颁布罢战明令，尤望曹锟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及各省区军民长官“群出赞助”；至选举问题，当此兵戈未息之时，“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尤为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帅及各省区军民长官所急应注意者也”。

△　侵驻满洲里日军强令当地驻军将营房全部腾给日军居住。黑督署参谋长、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张焕相电告北京政府，“欲求不开衅端，惟有容忍之一法”。

8月22日　　北京新国会参议院选举正、副议长，出席123人，梁士诒、朱启钤分别当选。

△　北京政府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曹锟通电，指责吴佩孚请元首罢兵议和之马（21日）电，“殊属不明事理”，“除电令吴师长勿得轻信阴谋，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外”，宣布“拟定于本月24日由津赴保，集合所部，即行南下，区区愚衷，惟知始终服从中央之命令，必不谕素日之宗旨”。

△　北京政府农商、财政两部呈请设立中华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为发行金券机关，是日冯国璋指令照准。

8月23日　　谭浩明、谭延闿电吴佩孚，对其罢兵议和主张表示“同深赞服”，并谓“顷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并通电西南各省以为洛钟之应”。

△　北京政府派赴海参崴参战之先头部队出发，是日上午抵哈尔滨，下午开赴海参崴。次日，第二批赴海参崴官兵668人，由哈尔滨转目的地。

△　日公使林权助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日本米谷缺乏，米价昂贵，穷民不堪痛苦，遂至暴动四起，要求中国政府将苏省所存米谷酌量供给日本，“以救日本穷乏”，“苏省一带数十万农民亦可免米谷积存之损失”，“此举诚于中日两国两有裨益”。

8月24日　北京政府发表《出兵海参崴宣言》，宣称中华民国政府“特派相当军队出兵崴埠，与联合各国取一致之行动……将来目的完成，所有派出军队即应撤退”。

△　冯国璋任命张景惠为暂编奉军第一师师长。

△　段祺瑞以出兵西伯利亚、编练参战军急需军费，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借款2000万日元。是日，日外务省致电日使林权助，告以借款可由北京政府向四国银行团提出，依据善后续借款垫款前例，由日本单独承担。

△　段祺瑞致电各省军政长官征询对南方意见。鄂督王占元接电后，即电曹锟及奉、黑两督，请速劝段中止内战，并于26日复段电称：“前方将士既无战意，再战无益。”

△　吴佩孚电曹锟转请北京政府将湘防“饬令湘督自行派队担任”。27日，段祺瑞复电，令吴“暂维现状，不得轻率离任”。

△　侵驻满洲里日军擅自警戒中东路，与当地吉、黑两省驻军发生冲突，双方互有伤亡。经交涉，吉、黑驻军暂退驻海拉尔等处。

△　北京政府决定存土制药专卖，由协济公司承包，共存土1577箱，每箱1.6万元，限销苏、浙、赣、鄂四省，令地方军民长官保护。

8月25日　安徽督军倪嗣冲通电北京政府及皖系各省督军，主张对西南作战。声称“国基所以不固，人心所以不安，外交所以困难，财源所以枯涩，维西南不靖是故”；“诉诸武力，正可促进和平；狃于和平，终必堕其狡计”，并表示“我辈宗旨既定，联络进行，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　湘督张敬尧至电段祺瑞，报告“祁阳方面军队，奉吴令撤退”。

△　前浙江都督吕公望、浙军第一支队长陈肇英等通电加入西南护法。29日，军政府任吕公望为援闽浙军总司令，陈肇英为混成旅旅长。

8月26日　曹锟再发通电，责斥吴佩孚“马电”破坏北洋团体，表示“鄙人一息尚存，决不忍坐视该师旅长等受人愚哄，陷国家于危亡”，“锟现在保定赶速部署一切，即日南下，策划进行”。

△　吴佩孚复电段祺瑞再进忠言，声明“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并谓：“深望我师改弦易辙，怂恿极峰速颁罢战明令，以息内争，以御外侮，以厚民生，以延国脉，则我师统一之能力，即民国不世之隆基，传诸万祀，永久无敎。”

△　北京政府派赴海参崴支队第三批官兵289人，第四批官兵333人，27日第五批官兵256人，均由哈尔滨启程赴崴。

△　川边巴塘驻军与藏军在昌都开会议和，议定停战退兵条约四款，规定停战一年，退兵日期自10月17日起至10月31日退完止。

8月27日　张作霖、赵倜、孟恩远、鲍贵卿、陈树藩等联名电请速选总统，以抵制长江三督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之主张。

△　河南省巩县、偃师、修武、武陟、孟县、浚县、许昌等县水灾。是日，冯国璋令财政部拨款二万元赈灾。同日，又令拨一万元赈

福建诏安、云霄等县水灾。

△ 北京政府陆军部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话有限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话60万英镑借款合同。

△ 北京中国银行与日本正金银行签订200万日元借款合同，作为维持京钞市价准备金及代垫政府军政各费。

8月28日 晚，段祺瑞于其私邸召集主战派密议对待吴佩孚办法，议决催派奉、皖军队前进，维持湘督张敬尧之地位，并重开天津会议。

△ 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电段祺瑞，表示“呈请罢战，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既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耿耿寸心，天日可表”。

△ 广东省“广通”巡舰由桂驶至粤省，在肇庆河面突起兵变，舰长谢兆昌被戕，该舰亦被击沉。

8月29日 冯国璋据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曹锟电请，明令开复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陆军中将，并给还勋位、勋章。

8月30日 孙中山自上海发出《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主重订党章，整理党务，略谓：“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

△ 冯国璋令：9月7日为秋丁祀孔之期，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恭代行礼，即由该部敬谨预备。

△ 岑春煊电复吴佩孚，赞成促进和平。

△ 许崇智部援闽粤军攻克龙岩。

△ 日、英、法、俄四国公使以实业借款（宣统三年同银行团签

订）及善后借款合同订明改良币制，银行团有优先实行之权为由，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质问《金券条例》。

8月31日　段祺瑞致电各省军政长官，表示政府改组后决定“引退”，“所有前敌各军队，希即转饬修明战备，严杜煽惑”。

△　曹锟通电段祺瑞及各省督军，表示对吴佩孚“宥（26日）电”已去电切责，并嘱吴“具电婉言谢过，慎勿再逞意气”。同日，吴佩孚复电曹锟，仍主和平，并谓：“一俟和局告成，诸事就绪，再北上自请抗言罪。”

△　军政府政务会议通电反对北京新国会选举大总统，表示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次日，广州正式国会亦通电否认北京选举总统。

△　援闽粤军击破北军闽军主力二混成旅，攻占漳州。陈炯明将总司令部移驻漳州镇守署。

是月　章锡琛等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

△　张敬尧开办裕湘银行，资本自称1000万元。

9月

9月1日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访徐世昌，敦请出任大总统。

△　北京政府督办参战事务处电告察、绥都统及吉、奉、黑督军对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应遵守事项，谓：“我军接待各国军队，和平为要，敬礼诚恳为尤要。”

△　许崇智升任援闽粤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

△　鲁督张怀芝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350万日元“山东实业借款合同”，以山东省内货物税、牲畜税、屠宰捐、牙税等为担保，并以嗣后山东省兴办实业时须先与该公司协商为条件。借款除扣还1917年7月23日旧债日金150万元外，全部移作军政费用。

△　奉督张作霖电请鄂督王占元致电中央特赦张勋，遣充边防，立功自赎。

△　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遇刺身死。

△　京绥铁路大同支线竣工，是日正式通车。

9月2日　　驻日公使章宗祥访晤西原龟三，表示北京政府同意以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由日本垫款修筑及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为条件，要求日本再借款4000万日元。

△　河南省第二届省议会开成立会，选举康世华为议长，孙正宇、王树玉为副议长。

9月3日　　安福俱乐部在北京太平湖分部举行“总统预选会”，出席384人，一致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　北京新国会宪法研究会（研究系）议员开会，决议推定徐世昌为大总统候补者，本会会员一致投票。

△　曹锟通电挽留段祺瑞，并表示“锟风雨同舟……共支危局”。

△　美驻日公使照会日本政府，提议将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交由美驻俄顾问斯梯文司所主持之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受理，以利铁路运输。6日，美代办马瑞慕亦向北京政府提出同样要求。

△　驻福州各国领事团开会研讨闽粤战况，决定由日本派军舰前来“保护侨民”。12日，日本派驱逐舰一艘开进福州港。

9月4日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开总统选举会，到参议员133人、众议员304人，选出徐世昌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　广州正式国会第二次发表宣言，否认北京新国会有选举大总统之权，略谓："北京非法国会，尚欲滥窃大权选举总统……无论选举何人，对内对外绝对不生效力。"

△　湘督张敬尧急电北京政府，报告湘南、湘东皆甚危急，如不确定援湘办法，则不能再负维持地方之责。同日，闽督李厚基亦急电报告漳州、福州、厦门均告危急。

9月5日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召开选举会，选举副总统，到会参议员34人，众议员64人，以不足法定人数宣告延会。

△　徐世昌分函参众两院及总统府、国务院并分电各省，佯称不愿出任总统，11日再次致电各省，故作姿态；12日发表政见，宣布定期就职。

△　曹锟电贺徐世昌当选大总统。次日，曹又复徐世昌"歌（5日）电"，敦请就职。

△　孙中山派邵元冲赴漳州慰劳援闽粤军。

△　山西省第二届省议会开成立会，举崔廷献为议长，刘懋赏、严慎修为副议长。

△　湖南省浏阳县团练与北军驻军发生冲突，占据县城。平江县团练起而响应，向浏阳进发，攻占江西省铜鼓县。

△　上海永安公司开张营业。

9月6日　北京政府陆军代表徐树铮与日本政府陆军代表斋藤季治郎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

定》，凡七条。规定："中日两国各派遣其军之一部对于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各取军事行动，其任务在救援捷克斯洛伐克军，并排除德、奥两国及为之援助之势力"，并规定该方面之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　冯国璋发出通电两通，劝告南北一致拥护徐世昌为第二任大总统。一致各督军、省长、各师旅长，"所望各文武长官，一致推崇，同词敦劝"。一致南方岑春煊、熊克武等，请诸公以国家为前提，法律问题姑待后来解决，"赞成徐公为第二任大总统"。

△　段祺瑞通电各省督军、省长，请徐世昌"俯从民意，如期就职，早奠国基，以慰喁望"。

△　北京新国会研究系议员黄群、王玉树、蓝公武等24人联名提出《质问政府书》，要求公开宣布：一、一年来之借款数目、用途及条件；二、中日共同新约之内容；三、对南方之方针。

△　龙济光招募之振武新军七八百人，由小站开抵塘沽，不肯登轮南下。

△　俄公使库达摄夫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声称恰克图以西，"俄过激派业已尽绝"，中国无派兵入蒙之必要。

9月7日　冯国璋特派张作霖为东三肯巡阅使。

△　北京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复函徐世昌，请"大总统毋泥虚文，毋守高蹈，俯允就职，以慰国人"。

△　福建督军李厚基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泉州等处危急。陆军办事处开会商定：电令松沪护军使急速派兵驰援，饬龙济光率在津振武新军开拔援闽，并电令李厚基坚守待援。

△　湖南督军张敬尧电北京政府，报告南军大部集中茶陵，意在

攻取醴陵，已责成鲁军严防，并令张克瑶旅由朱亭移驻醴陵。

9月8日　　北京国务院将闽、陕、甘、赣四省电请截留全数税款以充军费及行政费用事，批交财政部核议。是日，财政部议决准予各省挪用税款，但不得逾全额之五成。

9月9日　　英公使与朱尔典访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表示希望南北实现和平，以免危及中国国际地位，并谓伍廷芳“曾向本国驻粤领事声明数次，托其向本公使转探中央政府口意”。

△　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特任任可澄为内政部长，陈肇英为援闽浙军前敌司令。

△　闽军臧致平旅攻占同安。

9月10日　　湘省北军第三师吴佩孚部议和代表刘杰、包映芝与南军之湘军议和代表文鹿凤、刘钟衡联合通电：“诸凡法律政治问题，皆当付造法机关，听其裁定。”

△　唐继尧通电声明：西南各省既不承认非法之北京政府，其所订一切借款合同及条约等均归无效。

△　徐树铮致电张作霖，请辞奉军副司令，并荐孙烈臣自代。

△　北京国务院开会决定：中东铁路仍由中国自行管理，不可委诸他国。

△　北京政府内务部咨教育部称，关于儿童吸食纸烟一事，除令京师警察厅设法取缔外，请通令中小以下各级学校设法禁劝，提撕警觉。13日又咨请各省省长设法晓谕，严加取缔。18日，教育部分别训令各省教育厅及各高等师范学校转饬中小以下各校遵照严切奉行。

△　吉林省议会开成立会，14日选举于源浦为议长，刘哲、刘会

同为副议长。

9月11日　徐世昌通电接受国会选举结果，允就总统之职。

9月12日　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伍廷芳等致电冯国璋，声明徐世昌为非法国会所选总统，绝不承认。

△　北京政府决定由三路进兵援闽，一、江西抽调军队开赴上杭；二、浙江增派军队驰往厦门；三、海军派舰队驰入厦门。

△　李厚基从厦门逃回福州，电北京政府请辞援粤总司令职。

△　冯国璋令给银一万元为前内务总长汤化龙治丧，并查缉主谋凶犯。

△　湖南省华容、常德、宁乡、安乡、临湘、南县、沅江、湘阴、汉寿、益阳等县均发生水灾。是日冯国璋令财政部拨款二万元赈济。

△　张作霖任命孙烈臣为奉军副司令。

9月13日　吴佩孚复徐世昌“歌电”，力陈徐不可就任大总统，指出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卑劣不全之新国会，不能为全国民意代表，若“勉为就职，则民国分裂，乃由公始”，并谓“若我公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首领，并敦劝冯代总统颁布罢战明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德莫厚焉，功莫大焉。对于国会议员，通国另行改选，以期完美，届时国会有良好议员，重选总统，自然舍公莫属”。

△　徐世昌电皖、浙、闽、湘、鄂督军倪嗣冲、杨善德、李厚基、张敬尧、王占元，告以国务院已派马芹甫在上海设立中孚通讯社，已与中西各报洽妥，凡敌党诋毁中央及我军之稿，一律不登。同日又电李厚基，告以岑春煊9日密派姚致和、魏子浩赴厦，策动第一

舰队倒戈，请其设法查扣。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使芳泽声明：日俄两国如有售让中东铁路之协定，中国断不承认。18日，芳泽反责北京外交部向报界泄露俄国向日本售让老头沟至长春间路权。

9月14日　　曹锟通电痛责国内阋墙之斗和武人权利之争，指出："今日阋墙之祸，殆如狭路之逢，一言以蔽之，曰权利竞争而已。……内哄方殷，外侮将至，循此以往，立召危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切望当世明达，急起而共挽之。"同日又电徐世昌及国务院、参众两院，谓："地方之于中央，腹心所托，干城所寄。既担拥护之诚，为大局策万全，非为一方徇私意；为亿兆谋幸福，非为一人谋禄位"，其矛头指向段内阁。

△　广州正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以个人名义赴美，陈友仁同行。

△　北京政府派骑兵第四团团长高在田领兵四起开赴外蒙古库伦，是日第一起骑兵抵库，15日及18日第二、三起骑兵分别抵达。24日，第四起骑兵亦抵库。

9月15日　段祺瑞连夜召集要人在府学胡同私宅开紧急会议，讨论曹锟"寒（14日）电"。靳云鹏同徐树铮展开激烈争论，认为"非速退无以自全"。结果，段祺瑞决定下野，随即与徐世昌商量继任内阁人选问题。

△　逊清废帝溥仪与遗臣为维护清室利益，敦劝徐世昌勿辞总统。是日逊清醇亲王载沣访徐面促。次日，逊清军机大臣世续代为面奏溥仪请旨，声称"皇上准其就总统，并令速就任"。

9月16日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向徐世昌呈送总统当选证书。梁、王致颂辞，徐致答辞。

△　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伍廷芳电劝徐世昌勿就总统职，指出“如有谓公若将就职……护法各省如不服从，仍可以武力压迫者，此等莠言，皆欲踞公于炉火之上，而陷民国于万劫不复耳。愿公坚塞两耳勿听”。

△　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竣通车。该段铁路由英国投资承建，总工程师为英人福克司，华工程师詹天佑。

9月17日　冯国璋特派萨镇冰督办福建全省清乡事宜，派黄培松会办福建全省清乡事宜。

△　川滇黔护法军各将领在重庆集会，由川滇黔护法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主席，黄复生、王文华、熊克武、顾品珍、赵又新、黎天才、石青阳、颜德基等出席。议决以川军援陕。

△　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在山东招募土匪2000余人编成振武新军，仍以匪首顾德麟为营长。是日，该军在禹城县一带哗变，鲁省派兵往剿，捕顾德麟正法。

9月18日　冯国璋令梁朝栋、郑殿升、蔡平本、王良臣、刘香九分任暂编奉军第一、二、三、四、五混成旅旅长。

△　护法川军总司令熊克武致函广州正式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论攻守和战事宜。略谓：“为今之计，根据西南，秣马厉兵，进扫河朔，以求贯彻底之澄清，上也。划地设防，成对抗之局，徐待其敝，次也。双方迁就，出于和议，以求条件之优胜，又其次也。若乃因循坐误，汲汲求成，降心由我，操纵在人，斯则徒见欺而已矣！……要之，此后攻守和战之宜，除关于局部者外，一以取决于国会。”

9月19日　孙中山致函军政府，委派徐谦为全权代表参加政务会议。27日，政务会议复电同意，并任徐为司法部长。

△　谭延闿由湖南郴县赴永州，与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商谈解决时局问题。

9月20日　吴佩孚通电响应曹锟“寒电”，要求早息内争，促成和局，并提出请曹锟主持一切，请长江各督仍任调人，公推徐世昌为调人领袖。

△　军政府任莫荣新为广东省督军兼陆军总长。翟汪代理省长，原任省长李耀汉免职。

△　北京政府教育部制订《征集儿童玩具办法》，凡八条；并训令各省教育厅饬知各属克期收集儿童玩具，分别评定，以图幼儿教育之进步。

△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在三原遭诱执，被解往西安陈树藩督军署。

△　日政府照会北京政府：日军根据《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将在北满采取必要行动，旋即增兵北满。截至10月初，侵驻东三省北部之日军，已达六万人。

9月21日　冯国璋派喻毓西为驻沿海州中国军参谋长。

△　军政府外交部照会驻广东各国领事，以北京新国会选举大总统为非法，业由军政府开政务会议议决，绝对不予承认。请其知照驻华各本国使馆。

△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改组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部为东省铁路司令部，委车庆云为司令，驻满洲里；同时于督军署设立国防筹办处，委张焕相兼充处长，将从前设立之防务委员会归并该处，以一事权。

△　北京政府教育部再次密电各省查禁各校学生组织爱国会或联合会等名目。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请在库伦设立军事处。是日，北京国务院会议通过。

△　吉林实业厅与日本商人饭田延太郎签订合办吉林省延吉县老头沟煤矿合同。

9月22日　　徐树铮电杭州北军陈乐山旅长，坚持主战。略称："今日之局，和为必不可能，明眼人皆知之，而不许人言和，又为情理所不宜。惟我辈主战之人，只好姑从默尔，切整军实，专蓄战力，预作扶危定倾之备。我辈一开口言和，则将来气难再振，必陷逆党之计，他日即及转柁，亦不免反复之迹，非我辈所应出。"

9月23日　冯国璋授王怀庆为庆威将军。

△　江苏督军李纯闻奉军两旅会同皖军经陇海路转津浦路南下，即遣兵分驻各要塞，并拆毁花旗营附近铁路，严加戒备。次日，李电询北京政府："奉军开两列车于今晚抵浦……何故而来，请速明示。"

9月24日　广州正式国会以袁世凯称帝80日，不应加入总统任期内，议决自10月10日起延长总统任期80日，仍以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

△　冯国璋令："九月二十八日举行关岳秋戊祀典，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恭代行礼，由内务部敬谨预备。"

△　奉天省城及辽阳、海城等处均发生水灾，是日冯国璋令财政部拨款一万元赈济。

△　北京政府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以《亚陆日报》、《经世报》、《中华新报》、《国民公报》、《晨钟报》、《大中华日报》、《北京民强报》、《大中日报》等报纸转载21日北京新闻社所发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一文，是"故意造谣，泄露秘密"，将各家报纸查封，并传讯报纸编辑人。

9月25日　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处理山东省各问题，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东京正式换文。中国对日本所提七项条件，表示“欣然同意”。规定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一部外，全部调集青岛；胶济铁路之巡警队由中国担任，但队本部及巡警养成所应聘日人；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　滇黔川三省军事首长在重庆举行秘密会议，唐继尧及各军总司令均出席，议决战斗到底，对鄂取守势，对陕取攻势。

△　军政府政务总裁唐继尧派赵藩为全权代表出席政务会议，是日赵抵广州，旋被任为兼交通部长。

△　广东军警同袍社开成立会，选出李福林为社长，议决：军政府在法律上无任免省长之权。

△　徐树铮电山西督军阎锡山，告以“陕乱未平，川逆又复进攻，该省兵力自难兼顾，中央拨队又恐缓不济急”，请酌派一旅兵力援陕。

△　北京政府农商部咨各省省长，请令各道尹填报劳动工资调查表。该表分为农业、制造用品、制造饮食品、建筑业、制造器具业及各项杂业（包括造纸、榨油、油漆匠、雕刻、印刷、制革、制席等）等项。

9月26日　湘省南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赵恒惕、吴佩孚、张宗昌、冯玉祥等33人联名，由吴佩孚主稿，电请冯国璋速颁罢战令。略谓：“我双方前敌将领目睹地方之糜烂，生民之涂炭，决不忍再用武力相争，促国命而利强邻。为此恳请冯代总统不受非法之动摇，毅力主持和平，速颁罢战命令；东海先生不为非法所利用，出任调人首领；曹经略使及长江李、王、陈三督帅，岑、陆两总裁，仍本初衷，同担负调人责任，以期迅速解决时局，同谋对外，全国幸甚。”

△　冯国璋以湖南辰沅道尹张学济纵兵劫掠，自称省长，发行军用钞票，明令将其褫职，严缉究办。

△　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由参谋、陆军、海军三部会同核议统一军政办法。

△　广州正式国会议员叶夏嵐为军政府任免广东督军、省长事，联合民友社议员50余名向军政府提出抗议，指出军政府无权任免督军、省长及镇守使。广东省议会亦主张省长民选。

△　长沙笔业工人要求业主改发现金工资，业主不允，遂举行联合罢工。10月1日，业主勾结警厅进行镇压，迫令复工，并搜捕罢工首领。

9月27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分别照复日、英、法、俄四使，《金券条例》纯系内政问题，与善后借款及实业借款无关，亦不关系外交，对8月30日所提质问“碍难承认”。

△　冯国璋令准免奉天督军公署参谋长杨宇霆本职，由秦华继任。

9月28日　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朝鲜银行总裁美浓部俊吉签订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合同，以“将来整理新税之收入作为偿还财源”。合同附件规定：是项借款交由“中国国防军队直接主管机关”使用（此系第八次“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以此项借款编练“参战军”三个师又四个混成旅。

△　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日金2000万元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即：一、开原—海龙—吉林间；二、长春—洮南间；三、洮南—热河间；四、洮南、热河间之一地点—某海港间（此系第六次“西原借款”）。同日，章宗祥与小野英二郎又签订日金2000万元济顺（济南—顺德）、高徐（高密—徐州）二铁

路借款预备合同（此系第七次“西原借款”）。

△　唐继尧在重庆行营就任军政府政务总裁职。

△　北京新国会参议院议员陈焕章（孔教会主任干事）请定阴历八月二十七日（阳历10月1日）为孔丘“圣诞日”，经三读会通过后，于是日冯国璋明令公布。

△　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宋案”要犯洪述祖无期徒刑。

9月29日　日本寺内内阁辞职，原敬内阁成立。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总计3.8645亿日元。其中：对北京政府借款2.7986亿日元；对各地方政府借款1857万日元；对私人企业等借款8800万日元。内由西原龟三经手者共八项，计1.45亿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

9月30日　曹锟通电答复吴佩孚主稿之“寝（26日）电”，称：“当此递嬗之处［际］，惟有实力维持秩序，绥靖地方，至国家前途，必赖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倘为莠言所惑，日事纷呶，无补时艰。”

10月

10月1日　安徽督军倪嗣冲通电反对吴（佩孚）谭（浩明）“寝（26日）电”，声称本届国会选举大总统“无可非议……现在就职期近，应请积极筹备，俾固邦基，万不可因谭浩明一电致碍进行”。

△　长沙纸业工人派代表参加该行业主大会，要求增加工资；酒业工人在杜康庙集议，要求增加工资；漆业工人集会要求改发现金，增加工资。各业主勾结警察厅进行镇压。

10月2日　段祺瑞咨复北京新国会众议院议员籍忠寅、黄群、蓝

公武关于财政、外交及国内用兵之质问书。内称，一年来政府举借外债五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关系军事秘密，两国均不公布；武力统一政策“殊无错误”。

△　奉天督军张作霖通电反对谭浩明、吴佩孚“寝”电，声称政府主战政策，召集新国会选举总统，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岂得指为非法。

10月3日　湖南省南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吴佩孚、张宗昌、冯玉祥等33人联名电劝徐世昌“勿轻于就总统职，尤望先作调人，俾大局易于解决”。次日又将此电通告各省督军及南北两政府各总裁、总长周知，并谓：“总统大权旁落已久，恐东海（徐世昌）登台后为傀儡”，为爱戴东海，故发此电。

△　驻湖南南北两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吴佩孚、张宗昌、冯玉祥等33人联名通电全国，斥段祺瑞关于和战及选举总统之谬论，要求国人同心一致，早息内争，协谋对外。

△　安福俱乐部开茶话会，讨论副总统选举问题。众议长王揖唐宣读段祺瑞向国会推荐曹锟之荐函，内云曹锟“若能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王并称“芝老（段祺瑞）功成不居，推贤选能……我们应该顺从他的意旨”。会上决定于10月9日选举副总统。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关于中日共同防敌事宜由参战督办处主办，即以该处为最高统帅机关。19日，北京外交部将此决定函告日使馆。

△　孙中山致函阮伦，告以返沪以来，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故于军政府总裁就职问题，久未表示主张。并告知援闽粤军进展情形，指出“西南大势，在吾党掌握中，彼（按：指军政府）空言护法，以图割据之武人，亦弗敢任性妄为，莫不唯命是

听。吾党进取之时机已在目前。惟恳诸同志群策群力，从事于党务之扩张，慷慨储金，以为奋斗之预备”。

△　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宣抚使兼援闽军总司令。

△　顺直省第二届省议会开会，出席议员151人，选举边守靖为议长，王秉寿为副议长。

10月4日　孙中山派张继为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部长。

△　谭浩明、吴佩孚等南北军人通电各省，力陈徐世昌不宜就任大总统职。

△　四川省议会以川省议会任期已满，惟大局未定，改选需时，电广州正式国会请示解决办法。

10月5日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开选举副总统预备会，参议员205名、众议员184名出席，决定10月9日为正式选举日期。

△　奉天督军张作霖电北京国务院，声称：大局之统一必俟武力，今西南有内讧，正可乘之时机，徐东海就任后，宜即公布讨伐令。

△　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与日本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签订日军借用昂（昂昂溪）、黑（黑河）电杆架设军用电信、电话10条，规定共同防敌行动终止，即时将该两线撤收。

10月6日　安福俱乐部举行干事会议，段祺瑞命徐树铮出席，说明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理由，未为安福系议员接受。经王揖唐斡旋，决定由政府付还曹锟军费150万元，移作副总统运动费，规定每张选票2000元，当晚签发支票。

△　北京政府参陆办公处开会，决议令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陕西五省“前敌各军须维持现状，勿稍动摇”。

△　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承认在西伯利亚作战之捷克军队，为对德、奥正式从事战斗之联盟交战团，并与各联盟国军队为同等之待遇”。

10月7日　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怿、孙中山及莫荣新、刘显世、熊克武联名电参众两院，响应吴佩孚、谭浩明“寝”（26日）“江”（3日）两电，主张以求和平之根本解决为救国惟一之方针，“惟必须废斥首祸之人，实行罢兵之举，而尤以菊人（徐世昌）先生不就非法选举之职为要义”。

△　冯国璋通电，陈述代理总统一年来南北军政情况及当前时局，“通告国人，以期最后和平之解决”。

△　驻闽海军第二舰队“肇和”、“应瑞”、“通济”等军舰参加护法军。“肇和”军舰舰长林永谟由厦门率舰驶抵广州黄埔。当地军民开会欢迎。林永谟等发表“护法”通电。

△　龙济光新编振武新军在安徽宿州哗变。该军多系土匪，经皖省军队剿击，始各溃散。

△　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厂20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因罢工领袖被捕而失败。

△　福建省政府与各国驻福州领事团以及中外各商帮代表，为疏浚闽江由罗星塔至南台之航线，曾于9月17日、24日在福州开会，拟定疏浚闽江组织法及章程。是日，福建水利局、福州总商会、福州商船总工会联席会议，对该组织及章程表示同意。

10月8日　广州正式国会参众两院开第四次联席会议，讨论缓举总统及摄行总统职权问题，议决第三次宣言，自10月10日起，委托军

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权。

△　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联衔致电北京政府，强烈反对推举曹锟为副总统。内称：“若必欲强行推举曹氏，则长江督军当连袂而不承认副座。事若至此，则大势所趋，至不得已之时，竟逼于独立而否认徐氏之总统，亦在所不惜。”

△　北京新国会研究系议员开会，讨论选举副总统问题，决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反对选曹锟，并准备以不出席抵制段系选曹。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嗣后对于中日军事行动归督办参战处主办。

△　上海中外各界团体于上海青年会召开联合大会，要求北京政府取消购买烟土，并禁止种植罂粟及私运鸦片吗啡等。

10月9日　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承受参众两院第四次联合会议决议，自10月10日起，代行国务院职权及摄行大总统职务。

△　北京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向徐世昌递交辞呈，并于同日发表退职通电，表示以后专任参战督办，对于国内战争无权过问。

△　北京新国会再次选举副总统。研究系、旧交通系议员多不出席，因不足法定人数散会，议定16日再行选举。

△　冯国璋特任财政总长曹汝霖兼币制局督办，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

△　北京政府交通次长叶恭绰，以西原借款系政治借款，妨碍交通事业发展，且亦可能招致内乱，提出辞呈，是日，冯国璋准叶氏辞职，遗缺以曾毓隽继任。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签订20万英镑无

线电垫款合同。

△　湖南省《公言报》为湘督张敬尧查封，该报发行人及一工人被捕。《正义报》馆前亦以刊载《常德不稳》消息被饬令查封，该报馆经理被判处徒刑。

10月10日　　徐世昌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代总统、国会两院议长、议员、国务员及文武各官出席。上午9时，冯国璋向徐世昌行交代礼。10时，徐宣誓就职，宣读《大总统莅任宣言书》，表示“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10时半，各国公使入怀仁堂致贺，英使朱尔典代表外交使团致贺词。11时，清室代表入贺。

△　军政府通电指出徐世昌就任大总统，破坏国宪，盼及早觉悟，勿摇国本而自陷于危，并宣布：“本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法摄大总统职务。”

△　徐世昌令准开去国务总理段祺瑞职缺，着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

△　徐世昌令财政部拨银10万元赈济广东水灾。

△　川边特别区驻军与西藏地方当局于绒坝岔订立停战条约，规定自10月17日至31日双方退兵，汉军退出甘孜，藏兵退出德格，停战一年，听候大总统与达赖喇嘛和平解决。

△　北京政府交通部顾问权量与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通信部长古贺传吉签订《胶州湾租借地及胶济铁路间邮电事宜施行办法》，凡五章37条另附件七款，于11月1日实行。

△　日代理公使芳泽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以西原龟三经手所商订各项对华借款，有侵及他国在华“既得权利乃至特殊利益”之处，

遭各国反对甚烈，物议颇多，要求从速决定西原借款善后处理方针。23日、24日，芳泽又为此电催政府速作决定。

△　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召开。25日闭幕，并议决电促黎元洪、冯国璋并转南北当局牺牲各自之政见，抛弃极端之主张，以至诚维持危局。

10月11日　　徐世昌令准兼署国务院秘书长方枢辞职，以郭则沄兼代。

△　徐树铮、王揖唐会见梁士诒，请其为保存北洋系之大计，奋然容纳安福系之苦衷，从速选举曹锟为副总统。梁以“君等如仍坚持主战，终不退让，予将辞去议员资格”予以抵制。

10月12日　　北京国务院开钱内阁第一次会议。段芝贵病假，其余国务员均出席。钱能训讲话，请诸阁员在代理期内设法维持，待新内阁组成，一同辞职。会上讨论日人要求在满洲里架设无线电台案，因有《中日军事协定》之规定，遂照案通过。

△　北京新国会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召集有关人员商议以副总统一缺留与南方，徐树铮表示反对。

△　军政府代表章士钊抵日本东京，次日与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会谈南北议和事，14日与外务次官币原喜重郎会谈。

△　美国总统威尔逊电贺徐世昌就任总统，劝徐速谋中国统一。13日，徐复电谓：“本大总统被选之日，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理，以达此之目的。”

10月13日　　江西督军陈光远启程进京，17日抵达，18日面见徐世昌，要求从速解决时局，南北早告统一。

10月14日　　为抵制选举曹锟为副总统，周自齐邀一批议员去天

津，陆续到达者约140余人。旋开谈话会，计划联名提出促进南北和平及推迟副总统之选举两项建议。

△　广州正式国会通过由政务总裁组织国务会议；以总统名义颁布命令，由政务总裁副署。

△　四国银行团并英、法等国驻京公使开会，对北京政府公布《金券条例》再提抗议。

△　北京政府教育部为讨论中学教育，特召集全国中等学校校长在京会议。到会者59人，议决案共23件，11月2日闭会。

10月15日　　徐世昌以近年兵祸频仍，吏治一端未遑修举，是日明令各省整顿吏治：县知事职在亲民，应由各省长严其甄选；各省长身任监督，务当悉心督理。

△　徐世昌令各省防剿盗匪，嗣后责成各该管军民长官，凡有大帮土匪结队焚掠者，勒限剿平，勿稍姑息，即在军务省份，亦应分拨军队，兼管防剿，并着会商邻近省区各派劲旅，协力兜剿，克期扑灭。

△　北京国务院参陆部奉徐世昌谕，电令各省区经略使、巡阅使、督军、都统、总司令妥密布置地方军队，以巩国基，以固边圉。

△　北京政府西北国防筹备处成立，徐树铮为处长。

△　广州正式国会议员259人，以第三次宣言决议不足法定人数为由，联合声明反对军政府摄行大总统职务。

△　靖国军鄂军王安澜师于10日自陕西镇平出发，分三路进兵平利县，14日同北军在八里关（距平利45里）激战，北军不敌，是日王师占平利县。

△　银行团与外交团开会，继续讨论金券问题，以发行金券关系币制借款等项合同利权，决定提出第三次抗议书，即日送达北京政府外交部。日使以请示本国政府为名未参加。

△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

△　《京报》创刊出版，该报为北京新闻编译处主任邵飘萍主办。

△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原系英商鸿原纱厂，售与日商后改名日华纱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

10月16日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继续召开副总统选举会（此为第三次选举），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到会主持，坚持将该缺留给南方。是日因到会人数仍不足，遂又延会。

△　徐世昌晋授姜桂题勋一位。

△　曹锟自保定电徐世昌，称旧病复发，请假本月回津静养。

△　北京国务院函告外交部：中日共同防敌事宜经国务院议决，由督办参战事务处主办，即以该处为最高统率机关。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将国务院议决函告日使馆。

10月17日　北京政府顾问、美人韦罗贝向徐世昌提出南北调和意见书，主张由新旧国会选派同等人数之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大总统，选举南方领袖一人为副总统，俟宪法告成后，联席会议及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宪法重选新国会并表示美国当竭力援助，以促其实现。22日，韦罗贝又拟具南北议和详细说帖送交国务院。

△　北京国务院参陆部奉徐世昌令，以各省随地招募军队，专务

求多，无裨实用，通电各经略使、巡阅使、督军转达各省整顿军队，除有专案外，一律不得再行增募。

10月18日　　北京国务院兼代总理钱能训谒徐世昌，称代理逾旬，请速组阁。徐仍嘱暂代。

△　广州正式国会参议院选举林森为议长，替代未到会之议长王家襄。

△　广东省长李耀汉于15日至李福林司令部会晤翟汪，是日宣言解职，请翟汪代理广东省长。至此，北京政府在广州之权力遂告消失。

△　美公使芮恩施由美回任，是日谒见徐世昌，力言南北宜速统一，庶可维持国际地位。

10月19日　　徐世昌之弟世章奉令抵鄂，同鄂督王占元商议南北统一问题。徐世昌表示和平问题不先由政府提出，而托在野之名流疏通双方意见，取得双方同意后，再行具体之妥协。

△　徐世昌令：裁撤甘肃省提督，改设甘州护军使，以马安良充任；未到任前，着马麟暂署。

△　徐世昌任命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兼充滨黑铁路督办。

△　粤督莫荣新、财政厅长杨永泰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80万日元借款合同，以广东全省烟酒税为担保，用为维持广东中国银行所发行纸币市价。

△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非正式声明对华政策，表示今后对华不采秘密外交，不偏南北，并停止西原借款。

10月20日　　军政府政务会议以军政府已受国会委托代理国务院

职权，并代摄大总统职权，是日通电宣布嗣后西南各省文武官吏，悉由军政府任免。

△　上海总商会开选举会，选举朱葆三为会长。

△　由各团体组成之中法协进会在北京江西会馆开成立会。蔡元培与法人铎尔孟致开会词。法公使柏卜及梁士诒等到会演说。李石曾报告发起“中法学务联合会”经过。

10月21日　　徐世昌在公府居仁堂宴请外交团，国务员陪席，英、日、葡、俄、巴、意、荷、丹、美、比、法、日（即日斯巴尼亚，今译西班牙）等国公使出席。徐于席间表明政府正在急谋南北之统一，对各国之忠告表示感谢。各公使分别发言，转达本国政府意旨，希望中国早日回复统一。

△　法国总统普嘉赉致电徐世昌，祝贺荣任大总统暨中华民国国庆。23日，徐世昌复电敬达谢忱。

△　北京总统府召开军事会议，议决：一、以后各省不得随意招募新兵，否则立即命其遣散；二、前敌司令各严守现驻地，不得随意变更，如南军来袭即击退之，北军不得随意追击。以上两项即电各省及前敌各军照行。

△　北京政府兼署财政总长曹汝霖在财政部约见四国银行团代表，详细说明《金券条例》，声明此系内政问题，不能受外国干涉。

△　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唐绍仪未到任以前，财政总长由伍廷芳兼理。

△　陈炯明致电军政府，辞福建省宣抚使一职，仍总粤军援闽。

10月22日　　徐世昌召见孙宝琦，令其就南北妥协问题同美国公使芮恩施交换意见。

△　岑春煊致函张謇，提出建立久远和平二策，并谓：“目前法律问题尤当求一归宿，使西南不负护法之宣言，北方不与违法相终始，苦心斡旋尤赖群公之调剂，煊无时不以和平为志，区区之私，惟以乘此创巨痛深之余，为一劳永逸之计。”

△　奉派赴粤之总统特使赵炳麟，是日电徐世昌报告接洽情形，内称关于南北妥协问题，“岑（春煊）、陆（荣廷）皆有诚意，自不难解决，应请主持南北停战”。

△　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赴粤调查西南政局。事毕，于是日取道上海回京。

△　北京新国会众议院议长王揖唐赴津邀议员回京开会，下午往访梁启超叩询政见。梁谓目前解决时局之方法惟有出于和平，万一南方不就范，再行挞伐，则师出有名，所谓先礼后兵之策也。

△　北京宪政讨论会在本部开全体大会，发表和平宣言，吁请国人速捐成见，共济时艰。

△　上海求新厂自制之“安华”商轮一艘下水，载重3500吨。

10月23日　　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致电军政府岑春煊等发表和平通电，提出“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同日，北京国务院电北方各省督军省长，通报和平意旨，并希转饬前敌军队仍遵前令，修明戒备，妥慎布置，勿借口息争，致涉松懈。

△　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24人为早息内争，促进和平，通电发起组织“平和期成会”，宣称“不分党派，亦非政团，平和告成，本会即行解散”。

△　徐世昌据曹锟电呈，令准张勋免予缉究。

10月24日　　徐世昌颁布尊重和平令。略谓：“兵事纠纷，四方耗

致，庶政搁滞，百业凋残……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图，共销兵革，先以固国家之元气，次以图政策之推行，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同日，电召北洋军事将领赴京面商机宜。

△　以徐世昌于17日曾嘱苏督李纯转达议和电文于军政府政务总裁陆荣廷，是日，陆荣廷电复徐世昌，表示：“停战议和，当以法律为依归。”

△　冯国璋致电“平和期成会”，表示“倘有相需之处，必竭绵力以从”。25日王占元电“平和期成会”，“务望毅力进行，立解纠纷”。26日，曹锟、倪嗣冲、吴佩孚、齐耀珊等，亦分别电“平和期成会”，表示赞同息兵，促进和平。

10月25日　　徐世昌颁令剿办山东盗匪，责成代鲁督张树元详筹布置，切实剿办，限期肃清，其剿办不力或有意纵容者，均按法严惩。并由河南及江苏徐州接壤各处，各派得力队伍，合力兜剿。

△　军政府政务会议开会，通过司法部长徐谦提议四条：一、司法独立，司法官专归司法部监督；二、司法官任免由军政府行之；三、司法收入专供司法经费之用，由司法部统一支配之；四、设大理院。11月5日，军政府政务会议向西南各省通电宣布。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与中日实业公司签1000万日元扩充电话借款合同。

10月26日　　徐世昌宴请中外要人，宣布政纲11条，其要旨为：对内和平，对外亲善，输入外资，改善交通，普及教育，信教自由，注重农工，开采林矿，学校尚武，巩固国体以法治为归，改良法律，收回治外法权。

△　军政府政务会议通电西南各省定期讨论西南实行地方分权制度，并附会议简章11条，规定于12月1日在广东开会，各省议会、省

长、各省驻粤军队各派代表参加。

△　北京政府决定派许兰洲率两旅及张树元一旅援陕。

10月27日　　徐世昌向北京新国会众议院提交咨文，说明政府对德奥宣战后所办之事宜，并表示："本大总统素以阻遏战祸促进和平为宗旨，参战一事，自应赓续前规，力图进步"，咨请同意。

10月28日　　军政府颁发布告，将徐世昌紊乱国宪破坏统一罪昭告天下，表示"军政府惟有顺从民意，以维国宪，而固邦本"。

△　"五族和平合进会"在北京开成立会，满蒙王公、回藏教首、汉族要人百余人出席，通过章程，发表通电呼吁和平统一，争取国际地位。

△　上海第二纱厂因厂方拟订新章程，规定凡各女工如有停工不到者，即将临时替工补为常工。是日，该厂布机房女工300余人集议一律罢工。厂方被迫修改新章程，女工始于30日复工。

△　北京"平和期成会"开筹备进行会，讨论会章，严定入会条件，决定在各省一律设立"平和期成会"，并议决向徐世昌提出建议，主张南北双方以对等地位派代表召开和平会议。30日，该会议决纲领10条，作为活动方针。

10月29日　　徐世昌布告合国各省军民捐助红十字会款项，为远役西伯利亚之协约国士兵预备冬令必须之件，对于法国政府所发行之战胜公债亦应稍应绵薄，予以认购。

△　湘粤桂联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等复电熊希龄、张謇等，对发起组织"平和期成会"表示"极为赞同"，并望根本解决，庶容有永久之和平。

△　前代总统冯国璋乘京汉火车离京回河间原籍。

△　日本现内阁以前任寺内内阁支持北京段祺瑞政府，“招致各国疑虑”，结果对日不利，决定今后：一、中止对华各项借款；二、尊重四国银行团对华借款规约。次日，外务大臣将上述决议电示日代理公使芳泽谦吉，但指出“参战借款”除外。

△　日本政府任命小幡酋吉为驻华公使。

10月30日　　广州正式国会开茶话会，讨论发起组织护法后援会事，吕志伊在会上发言，主张以徐世昌退位、解散伪国会、恢复约法，取消去岁解散国会之伪令、惩办祸首为议和先决条件。

△　军政府议定派遣军事代表参与政务会议者所应具备之资格，共三条，旋即通电黎天才、柏文蔚、王天纵、李书城等，嘱速派代表一人来粤参与政务会议。

△　奉天省议会电北京政府与军政府吁请俯顺舆情，降心让步，迅弭政争，以全国脉。

△　萨镇冰等由福建致电北京政府，谓“已遵中央命令，与李厚基协议后，与南军磋议，从11月1日起双方停战”。

△　英、法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备忘录十二款，指责北京政府以缓交之庚子赔款用作党系斗争，所编参战军不参战，专从事于内争。

10月31日　　广州正式国会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褚辅成发表时局通电，指出“徐、段狼狈相依，师袁故智，僭号伊始，阴［阳］示好意，别布阴谋，近顷议和之声喧达全国，万一不审，堕彼奸谋”，望西南各省及诸帅将士勿为和议诡辩所混淆。

△　军政府复电“平和期成会”，希望和平服从护法之目的，为依法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而非为违法之和平、暂时之和平。并谓：“苟能以和平而达护法之目的，乃吾人年余以来日夜求之惟恐弗

得者，尚望诸公本救国之热忱，求根本之解决，尽国民之职责，提携从事，敢不拜嘉。”

△　段祺瑞宴应招来京各督军，发表对时局意见：一、希望南北从速统一；二、北洋系团结一致对待南方；三、南北妥协条件，务求不伤中央威信。

10月下旬　　北京政府要求公使团交付关税剩余金280万两。30日，公使团开会议决，在中国南北未统一前拒付关税剩余金。

是月　孟树村、蔡虎臣等在吉林滨江县设立滨江华商耀滨庆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200万元。

11月

11月**1**日　北京新国会开会。众议院讨论徐世昌对德宣战咨请同意案，因国务总理及外交总长不到会，宣告延会。参议院议决致电法、英、美各协约国国会祝贺欧战胜利。

△　军政府政务总裁唐绍仪电徐世昌，主张维持约法，取消新国会，对于主和表示极为钦佩。

△　徐世昌特任张树元署理山东督军兼署省长。

△　徐世昌指令批准察哈尔商都招垦设治局改为商都县。

△　都护使充驻库伦办事大臣陈毅与库伦行政厅磋商，决定由外蒙官府向北京政府借银100万元，收买俄钞（外蒙独立之初，借俄币500万卢布），以清宿债。为中国银行在库伦设立分行之交换。

11月**2**日　北京新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徐世昌咨请同意对德宣战案，北京政府派委员曾彝进出席大会说明一年来参战经过。出席议员244人，以242票通过。

△　徐世昌宴请新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席间发表演说，表示“鄙人既非揭橥平和，以邀时誉；亦不乐于重事兵甲，以益民艰”，望议员“济时何术，息乱何由，惠我好音，以匡不逮”。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致答辞。

△　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电复苏督李纯，表示同意“迅开和平会议”，请“当机立断”。

△　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发布联军统一指挥通电，谓：经重庆军事会议决定，“湘西各路军队统归刘联军副司令指挥；援陕各路军队，除叶、姚直隶本部外，其余统归熊总司令克武就近指挥；援鄂各路军队，暂以靖国第一军军长兼本部参谋长顾品珍临时指挥，并与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会商办理。以上各路统属于联军总司令部”。

△　谭延闿致电军政府，表示北方求和，非依法解决不能开始谈判。

△　美公使芮恩施会见徐世昌，敦请速谋大局之统一。

△　山东省与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订立合同，投资大洋12万元，建筑龙口商埠码头，限期于明年6月30日竣工，是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核准备案。

11月3日　徐世昌通令整肃仕途，凡有贪劣众著，经察觉或纠劾者，悉予按法从严惩治，各该长官徇情容隐或纠察不力者，并予究惩不稍宽贷。

△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限制增募军队，以节饷源。

△　张謇电劝南北政府及各省督军、省长，“一心放刀而立地成佛”，勿听偏心之政客鼓舌其间。

△　“平和期成会”在北京开成立会，选举熊希龄为会长、蔡元培

为副会长。

11月4日　徐世昌召见“平和期成会”会长熊希龄等，咨询该会对于时局谋和之方针。熊面陈南北妥协之意见，徐表赞同，且言将托苏督李纯为妥协之居间人。

△　湖北督军王占元会见徐世昌，面陈早和之必要，并将在鄂所收各界呈递求和文件一一呈核。

△　宪法研究会发出宣言书，要求南北双方“共弃前嫌，速为和平之谋”。

△　徐树铮由京赴日参观日陆军大演习，9日抵东京。

△　日本撤销在济南及潍县设立之民政署。

11月5日　北京新国会参议院讨论众议院移付之同意对德宣战案，出席议员104人，全票同意，一致通过。

△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和平文电，决定逾期不发布停战令，不采南北平等之和平会议，仍以积极疏通为入手办法。

△　军政府政务会议就议和方针事电唐继尧，以西南护法之举纯属法律问题，不同意北京政府所提“先就事实谈判，置法律于后图”之主张。

△　军政府政务总裁陆荣廷复电“平和期成会”，表示：“诸公提倡和议，极表赞同，切望积极进行，俾时局早得依法解决。”

△　广州正式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复函四川督军熊克武，指出北京政府伪言和平，此不过欲假托民意，迫西南义军就范，所幸军府暨两院同人业已洞烛其奸，皆誓持依法解决初衷，不汲汲以求成，望能含辛茹痛，坚持到底，则最后胜利，必在吾人。

△　军政府代表章士钊在东京招待日本报界代表，陈述南北无条件召开和平会议之方针，以定统一中国之根本方针问题。

△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以协约国及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均须利用中东铁路，日本意在独占，协约国要求均沾，国权攸系，自应及时急起直争，为此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筹议应付办法，主张若不能以独立为自固之谋，即应以开放保均衡之局，以维持我国路权现状。

11月6日　北京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嘱李纯邀岑春煊来南京洽商和平问题。李转致此意，遭岑拒绝。

△　总统特使赵炳麟于5日夜返抵北京，是晨向钱能训报告西南之行详情。

△　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北京《亚陆日报》等八家报纸登载“西原借款案”，新闻交通社主任何重勇处五等有期刑两月，其余各报馆记者等各处拘役20日，缓刑三年。

11月7日　北京政府据赵炳麟报告，西南主先决法律，后解决时局，经调解多主张法律事实同时解决。是日国务会议开会讨论，结果仍主先决事实，并以国务院名义详细电知沪宁方面，俾得依以疏解。

△　谭延闿电熊希龄，谓南北皆望和平，而当局确有难处，非组织会议机关仅恃函电决无希望，幸勿后时。

△　安福俱乐部开会欢迎各省督军，奉督张作霖在会上发言称，决无派遣代表同南方平等媾和之理由，新国会亦决无解散之理由。又谓吾辈只知服从中央。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四国银行团，同意币制借款展期六个月，即延至明年4月14日。币制借款系1911年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于本年10月15日到期。

△　日公使林权助由日返任，是日访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次日又见代总理钱能训，表示日本政府切望中国南北战争“以和平手段迅速谋求解决办法”。

△　北京政府海军部军需司、军械司与日本三菱公司签订140.0999万日元购买军火合同，规定签字后10个月内“军火全数交清”。

11月8日　徐世昌派军事顾问刘恩源赴宁征求时局意见，是日会见苏督李纯，谈及与西南接洽之真相及徐世昌对和平之办法等问题。

△　苏督李纯电钱能训，告以向西南接洽情形，岑春煊同意“迅开和平会议”。同日又电钱能训，谓岑春煊未必可以一召即至，惠然肯来。

△　北京国务院电告驻法大使胡惟德通知法国政府，中国决定加入协约国巴黎粮食会议。

△　军政府为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倡议，在国会议员俱乐部邀政绅商各界及各社团领袖开会，议决成立战地友邦兵工修养金团，募捐五万美金，并通电护法各省将应募之数从速电复。

11月9日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平和期成会”所提南北速派代表开和平会议问题，钱能训等赞同，讨论甚久，未能决定。

△　江苏督军李纯致电徐世昌报告与西南接洽情形。认为南方以“护法为名”，今若“劝其先议事实而徐求法律之真谛，势必不行”，须拟定一具体办法，俟洽商后公布。

△　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谒徐世昌汇报南方之行，介绍了南方督军的情况，建议邀请美国总统在中国对立党派之间进行调解。莫氏认为中国的和平局面将有利于中国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并于11日呈递长达11页的备忘录。

△　北京国务院核准由直、鲁、皖三省运盐五万斤，山东运米150万石，输往日本。

11月10日　“平和期成会”电军政府，告以北京政府已允开和平会议，并望对此事正式表示意见。

△　何应钦等50人发起成立少年贵州会。该会简章规定“以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报国之大义，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是日开成立大会，到会员2300余人，选举何应钦、刘敬吾等五人为理事。13日开理事会，推何应钦为主任理事。

11月11日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开联合会，梁士诒主席，议决援照民国二年先例，由参众两院各选30人组织宪法委员会，另行起草。

△　冯国璋致电徐世昌主张开国民会解决国会问题，暂缓制订宪法。

△　徐世昌授意代理总理钱能训，于“平和期成会”及全国和平联合会之外，更组织一和平统一会，以沈铭昌主其事，并令在各省设立分会。

△　北京“平和期成会”开第一次职员会，蔡元培主席，出席60余人，议决以正式公函呈递北京政府，要求南北各派全权代表一人速开对等之和平会议，会议地址于上海、南京、武昌任选一处，并决定在天津、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处设立分会。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自1914年7月28日奥塞宣战起，此次大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

11月12日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时局问题，议决开南北和平会议。

△　徐世昌致英、美、日本及法、比、意、葡、巴西各国电，祝贺协约国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胜利，表示中国将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

△　徐世昌令财政部拨帑银四万元，赈济福建水、旱、风及地震与兵荒灾等。

11月13日　　徐世昌与钱能训商讨和平问题，决定在会议中将法律与事实两问题同时解决。

△　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回南宁接广西督军任，军署事务由旅长李祥发代拆代行。

△　北京庆祝战胜德国，拆毁东单北克林德石牌楼。克林德系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为义和团所杀。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各国迫清政府建立此牌楼。

11月14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召集京内公私各校在天安门前开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60余校与会，学生及市民约三万人参加，教育总长傅增湘及美公使芮恩施等出席。学生手执协约国小旗，高呼："战胜万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是日起放假三天。各地亦举行庆祝活动。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派陆徵祥为专使，驻英、法、比、丹、意、西六国公使副之，出席欧战和平会议。

△　粤军四路围攻琼州，是日攻占府城海口，肃清龙济光残部。

△　简东浦、周寿臣、李冠春等发起筹备东亚银行，资本200万港币，总行设于香港，分行设于西贡。

11月15日　　徐世昌在北京召开督军会议，讨论和平及外交等五案。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皖督倪嗣冲、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

远、晋督阎锡山、吉督孟恩远、豫督赵倜、松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援鄂总司令张怀芝及黑、湘、甘、陕、苏、川等省代表、全体阁员均参加，段祺瑞亦应邀出席。徐世昌要求各督披陈收束时局之办法，与会者表示，如果“南方无过苛刻条件，愿服从总统方针”，同意发表停战令。

△　徐世昌电告苏督李纯，和平会议地点，一任在野诸公协议选择，南北当事者均不表示意见。

△　钱能训电苏督李纯，告以顷接唐（继尧）陆（荣廷）复电，欧战告终，内讧宜息，事实法律两问题不宜偏重，组织会议稍有异同，其间尚不能迅为解决处，特派施愚携函奉商。施今晨赴宁。

△　孙洪伊发出《致粤中同仁论时局书》，提出南北和平谈判三先决条件：一、惩办祸首段祺瑞、倪嗣冲、张作霖、徐树铮；二、取消伪国会；三、取消伪总统。

△　原靖国联军湖南第一军总司令兼湘西军政长田应诏、第二军总司令兼湘西民政长张学济、第三军总司令胡瑛、第一军副司令胡学绅联名电北京国务院代总理钱能训，请求弭兵。疏通各方，慷慨主持，为天下倡。

△　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共开两日。校长蔡元培于是日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次日发表《劳工神圣》之演说。陈独秀、胡适等11人亦出席并发表演说。

△　北京政府农商部咨呈国务院，拟在吉、黑两省设立金矿森林专局，并拟就两局条例草案，请议决公布。12月7日，北京政府公布吉、黑两省森林局、采金局两局长任命令。

11月16日　　徐世昌发布罢战退兵令。略称：“南北各军，莫非袍泽，徒以操戈同室，致使置身锋镝，暴露原野，揆诸胞与之谊，能无

悯恻之私，是宜鉴察人民之趋向，以除国内之纷争，促进政治之统一，以协友邦之希望。所有前方在事各军队，务当即日罢战，一律退兵。其各处地方治安，均由各该管军民长官派队次第接防，切实保卫。”

△　总统府顾问、徐世昌派赴粤疏通和平之关冕钧、林绍斐抵南京，旋即与苏督李纯商议和平办法。18日，关、林携带商定之条款转沪赴粤。

△　徐世昌召见钱能训，筹议裁兵程序，决定分四期：先输送队，次补充队，三新扩充兵队，四回复民国六年度预算之数。预定两个月内竣事。

△　督军会议继续开会，讨论新旧国会、收束军队及内阁问题。

△　熊希龄、蔡元培以徐世昌明令停战，致电军政府，谓“中央确有和平诚意”，望南方“同声相应，使国民知此后永久弭兵，止戈为武，德莫大焉”，并告以和平进行方法，请与苏督李纯商榷。

△　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发出通电，宣布自10月12日起，四川民政由杨庶堪担任；本省军务仍由熊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负责。

△　美驻广州总领事奉美使芮恩施之命，访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伍廷芳等，劝告息战。

11月17日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准段祺瑞招募国防军三个师。

△　北京政府特使施愚由南京电钱能训，报告与苏督李纯会见情形，并言李已将中央意思电达南方。

△　归国留日学生救国团致电北京政府、军政府及各省军政长官，请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退还青岛。

11月18日　　徐世昌设宴招待12省区军事长官，段祺瑞、倪嗣冲、张作霖等出席。段祺瑞提出解决时局问题办法：一、希望解决时局不牵涉国会；二、前方军队先小部分撤退。张、倪等皆表示赞成。

△　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声明：南方期保障国家之法治，为护法而战，所要求者只一般公平简易之条件，即国会须得完全之自由行使其正当之职权也。若此简易之条件尚不能办到，则吾人惟有继续奋斗，虽北方援引任何强力，皆所不顾。

△　唐继尧电告李纯，鄂西护法军于是日停止军事行动。

△　李纯致电岑春煊请劝促西南停战退兵。岑于25日电李质问，北京政府停战令“独置陕西于不论，是否陕西不在停战之例”？李于12月3日电复岑谓“不言陕者，谓因陕匪猖獗……不得不图绥戢，非有他意”。

△　熊克武任第五师师长吕超为援陕总指挥，统率该师及江防军余蕴兰部入陕，是日占领宁羌、沔县，进迫汉中。同日，熊克武通电表示“此次勉从护法之役，亦只仰求永久之和平，而谋正当之解决”。

△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29日复刊载《张敬尧祸湘又一幕》等文，历述张敬尧祸湘实状。

11月19日　　江苏督军李纯在宁召集各界代表开会，磋商议和事宜。到会者30余人，历时三日，至21日结束。李纯提出副总统须选南方人物、旧国会须补选徐世昌为总统等方案及川、滇、黔地方问题另行裁决等八项议和纲领。

△　熊克武致电钱能训，谓“南军先锋撤退，以待南北议和之决定”。12月10日，熊饬令所属停战。

△　驻广州美、英、法、意、日五国领事向军政府提出联合说帖，并推美领面交伍廷芳，劝告息争统一，指出中国内乱不停，损害

外国利益，妨碍中国与协约诸国实行合作。

△ 福建督军李厚基电商漳州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应如何根据大总统罢战退兵令撤退在漳州军队，望即电示，以便接洽。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将沪上存土尽行烧毁。该存土为1200余箱，价值1400余万金。

11月20日 广州正式国会参众两院开联合会议讨论时局。议决：解散北京非法国会及徐世昌总统退位为停战之两项先决条件，并由两院正副议长面告军政府，要求遵照办理。

△ 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徐世昌、钱能训要求和平之电报，多数意见因钱电仅列岑、陆、唐继尧三人之名，当视为个人私电，与军政府无关。

△ 徐世昌电军政府政务总裁唐绍仪，表示“秉和平统一之宗旨，以救时为己任”，希即“惠然来游，觌面商榷”。唐绍仪复电主张南北“必取对等之地位，各出相当之代表，为正式公开之谈判，和平之实现乃真有望”。

△ 美驻广州领事访晤军政府总裁伍廷芳，谓美对北京政府撤兵停战极表赞同，不知南方政府意见如何？伍答北方既息兵言和，南方无不同意，今正在采取南方公同意见，筹商办法。

△ 段祺瑞上徐世昌《统一意见书》，表示不赞成召开南北对等之和平会议及部分地先决闽、湘问题。

11月21日 徐世昌令准外交总长陆徵祥请假，派陈箓暂代部务。

△ 徐世昌任命龚心湛为安徽省长。

△　北京新国会众议院开会，选举宪法起草委员会，投票两次，票数与名次均不符。安福系议员指责旧交通系议员有意捣乱，大起争执，无结果而散。

△　军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督军，张钫会办军务。

△　军政府政务总裁唐绍仪自日本回国返抵上海。同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致电欢迎唐绍仪回国。

△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于兴平被害。

11月22日　　军政府响应北京政府罢战退兵令，通令前敌各军休战，与北方依法和平解决。

△　上午，军政府开谈话会，听取国会两院议长关于停战两条件之说明，讨论未获结果。下午，参众两院开联合会，林森报告与军政府接洽情形。旋参议会开会，议决停战前提条件两条：一、取消伪国会；二、取消伪总统。

△　以曹锟为首之在京督军团，于安福俱乐部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首勋大会”。31人与会。段祺瑞着陆军上将大礼服出席。曹锟致词，称“是当日对德宣战加入协商战团之日，即吾国国际上冀得荣誉之时，在今得此良果，实以合肥段公为首功殊勋。谨特为之庆贺”。

11月23日　　江苏督军李纯电告徐世昌，唐绍仪遣代表来宁，国会问题已允让步，请速颁议和明令。

△　苏督李纯密使李廷玉到京转达陆荣廷、唐继尧议和条件。

△　孙中山复函广州凌钺等称，“迩来杜门养晦，聊以著述自娱，对于时局问题，终以多数同志之主张为进退”；并谓胡汉民业已南旋，所有进行事宜，可与其洽商。

△　冯国璋致电李纯，请其同意熊希龄、张謇等发起组织“平和期成会”。25日，李纯复电谓：“极端赞同，一俟接电，遵当表示同意。”

△　直隶省长曹锐、财政厅及直隶银行与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签订150万日元借款合同。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声母二十四，介母三，韵母十二）。

△　天津三汊河口新开河工竣，举行开河礼。

11月24日　　徐世昌通令尊重法律，提倡德育。内称：所望制定法律，早日观成，次第颁布，“本大总统当与京外群僚共相尊重”。“着教育部通饬京外学校于修身学科认真教授，并酌择往哲嘉言懿行有裨德育者，编为浅说，颁行演讲，以资启迪。其或方隅敝习有待查禁，编氓潜德，宜予表彰，并由各地方官吏随时查明办理”。

△　徐世昌电军政府政务总裁唐绍仪，内称“昌自被举以来，瘠口哓音，事事盼人相见以诚。昨又有令罢战退兵，以示真意，协议办法一切均已由阁委托李督商洽办理，不久即将实现”。

△　唐继尧通电主张“宜仿辛亥成例，在上海开和平会议”。

△　江苏督军李纯电询钱能训，谓国会问题为今日南北两方之争点，此事须先决，中央究竟能让步至何种程度。26日，钱能训电复李纯，称政府断不能解散新国会，除非依国会之自觉自行解散，此外别无他途；至言中央让步当以令国会闭会为止。

△　北洋督军为巩固北洋团体，拥护段祺瑞复组内阁，在北京正式成立“戊午同袍社”，推曹锟为社长。旋改称“参战同袍社”，拥段祺瑞为社长。

△　奉军司令部由军粮城移至北京化石桥，于是日正式成立。

11月25日　　徐世昌授予曹锟、倪嗣冲勋一位，张作霖、陈光远勋二位，卢永祥勋三位。

△　孙中山致函湘西护法诸军将领张学济等，指示“此时首要为设立军事上统一机关，公推军政长为同志各军总领，使实力有所集中，精神十分团结”；并组织总参谋机关，为军政总机关之辅；设立民政总机关，公推民政长，为实力所及区域慎选县长，专任吏治，恢复各县令及其他自治机关，使人民享有法律内的自由；“此后湘西重要情事，并望随时详告，当极力设法相助，共达救国之素志”。

△　唐绍仪电徐世昌，提出解决时局办法，由南北两方派出同数代表，组织对等和平会议，不附加何种条件。

△　军政府司法部长徐谦电上海“平和期成会”会长马良，提出裁兵废督军两端为南北和议之根本和平条件。

△　北京政府撤销对德宣战后成立之战时国际委员会。

11月26日　　李纯致电岑春煊，谓北京政府已议定和平会议，双方各派代表10人，解决法律事实诸问题，以南京为会议地点。次日以同一内容致电吴佩孚。

△　徐世昌令安徽省长龚心湛未到任以前，着刘道章暂行护理。

△　英公使朱尔典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酌定日期再交涉西藏未决案件。

11月27日　　晨，徐世昌同段祺瑞商内阁问题。段谓钱内阁对于南方表示退让，实属损毁我北洋派之体面。安福俱乐部因此决定提出钱内阁弹劾案。当晚，钱能训向徐世昌表示将上辞呈，徐竭力予以抚慰。

△　孙中山函复上海王子中，指出：“倘西南各省及护法诸同志能始终坚持，务求贯彻护法之目的，则北方诸系以权利之倾轧，不久势必分崩，则最后成功必操之南方。”

△　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自是日起，为庆祝世界和平举行运动会及提灯会三日。

△　福建督军李厚基以现值奉令停战之际，粤军陈炯明部许崇智尚在涵江、莆田一带猛烈进攻，迄未停止，电北京政府乞示应如何办理。

11月28日　　北京国务院通告各机关是日放假一天，庆祝世界大战结束。同日，北京各界举行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中外来宾数千人出席，并在太和殿前阅兵，协约各国军队均参加，徐世昌发表演说。北京政府宴请各国公使。夜间，商界举行提灯游行。庆祝活动至30日，共进行三天。全国各地同时举行庆祝活动。

△　徐世昌令准交通总长曹汝霖派前次长叶恭绰前往欧洲考察各国交通。12月6日再派王景春、韩汝甲随叶同行。

△　上海交易所行开幕礼。12月1日开始营业。该所系中日合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资本3000万元，实收半数，经营棉纱、棉花及各种有价证券、股票等交易。1927年1月停业。

11月29日　　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就北军进攻漳州及陕西事电钱能训，指出：既渴望和平，即应实行一律休战，速开南北会议，不可节外生枝。

△　孙中山函复广州正式国会议员凌钺，指出欲贯彻护法初衷，仍宜托命于国会，国会同人诚能坚持到底，不为强力者所摇，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

△　陕西督军于右任电广州正式国会参议院，报告井勿幕于21日

被害，“务望火催援军早集关中，并请军政府于湘鄂方面，万勿误信和议，轻与罢战”。

11月30日　　军政府岑春煊等七总裁电徐世昌，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和平会议。略称：“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相等之人数，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公决。”

△　军政府政务总裁议决两事：一、赴欧和使，南北各举三人，求国会同意然后委任；二、促徐世昌速派员赴沪议和。

△　徐世昌召见段祺瑞讨论阁事，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均在座。段表示揆席非钱（能训）莫属，宜一致拥护；并自称无论如何不愿再出。

△　北京国务会议将福建之南军方声涛、许崇智部视为“土匪”，决定讨伐，并将此意电告闽督李厚基。

△　军政府任命林葆怿为福建省督军，陈炯明为省长；熊克武为四川省督军，杨庶堪为省长。

△　徐世昌以方今解决时局，渐就和平，振兴教育不容稍缓，是日通令各省区军民长官禁止借用教舍及挪用教育经费。

是月　　周学熙、杨味云等在天津创办华新纺织公司，资本200万元。后于1936年被日商钟渊纺织会社以120万元贱价收买，改名公大第七厂。

△　梁士诒、陈陶怡、孟昭常等集资创办戊通公司，于本年4月至11月先后三次与俄商索斯金公司签订购船合同，以170万银元购进轮船、拖船42艘，航行于黑龙江上下游。是月该公司在农商部注册备案。

△　张敬尧以收回长沙市面滥票为名，令湘南银行清理处发行所谓有奖惠民券200万张，每张按银元五元向商民强迫推销。

12月

12月1日　北京政府参加欧洲和会专使陆徵祥自北京启程由日本赴欧。

△　张謇电陆徵祥，陈述中国亟待巴黎和会解决者，惟改税法及撤销领事裁判权二事，而裁判权非旦夕所能行，商民所迫切祈祷者，在改协定税为国定税，吁请政府抱定根本主旨，勿以枝节自缚。

△　北京政府发表对德宣战各项文件英文白皮书。

△　孙中山所派代表曹亚伯在柏林活动，游说德国政府与军政府合作。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大仓组签订300万日元借款合同。

△　奉天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成立。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中国银行与库伦行政厅正式订约，规定在该地设立中国银行，通行中国货币。

12月2日　日、英、美、法、意五国公使晋见徐世昌，面交劝告速息内争说帖，内称中国内争危及国内安宁，损及外国利益，希望中国从速停止内战，参与世界和平事业。

△　驻广州日、英、美、法、意五国领事同至军政府，劝告中国即行停止内争，由英领宣读劝告文，并声明不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伍廷芳答称，南方已停战，请北京选择相当地点议和，但和局必须合法公允，否则不能承认。

△　英、美、法、日、意公使会议决定在中国南北未统一前停止给予南北双方借款。

△　江苏督军李纯电唐继尧解释北京政府主张于南京召开善后会议之理由，略称会议名为善后，“与公等护法救国之旨相符，亦与解决根本问题相合。若云和平，是所以会议者，仅为彼此息争而已……善后可以包和平，和平不能括善后”。“地点在宁，保护维持，纯之责甚重，在沪则纯可卸肩”，故不宜在沪而在宁。并希转向各方解释维持，期会议早日设立。同日并电劝岑春煊担任南方代表领袖。

△　刘存厚通电曹锟、张作霖、阎锡山等，略称唐继尧提出议和条件，有要求滇军一师常川驻扎川东南，并以顾品珍为四川军务会办，赵又新、王文华分任叙泸重庆两镇守使，唐继尧为川滇黔巡阅使，“似此侵略四川，破坏统一，川省军民誓死不认……诸公眷垂川局素具热忱，尚望代电主张，同伸义愤……拒绝唐氏非分要求”。

12月3日　徐世昌在总统府召开特别会议，全体阁员及张作霖、曹锟、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六督军出席，商讨南北议和问题。徐氏宣读五国劝告和平统一书，与会者一致表示服从总统命令，并同意广州军政府七总裁意见，在上海开南北和平会议。

△　广州正式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同东方通信社记者谈时局问题，对北京、上海和平运动所提先决事实后决法律之主张，表示绝不赞同；提出南北进行合法的议和，其先决条件在于取消非法国会、非法总统，而和平条件则为改革督军制度及裁减军备两项。

△　唐继尧通令所属各军一律停战。

△　徐世昌令收买存土定期悉数公开销毁。

12月4日　北京新国会参议院选田应璜为副议长。

△　在京各省督军于曹锟私宅会议，决议要求政府设法供应军

费。

△　刘存厚以熊克武派重兵逼临汉中，是日通电吁请总统明令派军来汉救援，并请“各省发纾义愤，勿误罔和大局”。

12月5日　　徐世昌电复军政府七总裁，告以“所有派员会议诸办法，已由国务院另电奉达”。同日，钱能训电复岑春煊等，主张议和地点仍在南京，请速派代表为先事之筹备，并表示“辛亥前例”已不适用。

△　孙中山函复广州正式国会，指出“美国政府有调停我国内争之举，欲强南方速与北方妥协，此实为其手段之错误”，并谓国会及军政府同人坚持护法初志，不屈不挠，则外人敬吾主义之贯彻，将协以助我。

△　广东和平期成会会长曹汝英、副会长陈其瑗等电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和平期成会，主张公推天津和平期成会领衔主稿，会同电促南北当局从速决定上海为议和地点。

△　日公使林权助卸任由京启程归国。22日，日新任公使小幡酉吉到京任职。

12月6日　　安福俱乐部开会，决议四项：一、赞成与西南议和；二、拥护徐世昌；三、保持修正之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四、时局未得解决前，不得更任各省督军或任命省长。

△　军政府诘问北京“平和期成会”，谓北京政府于停战令后为何仍出兵陕西、福建。

△　陈炯明与李厚基达成停战协议。

△　徐世昌据农商部呈请，令准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设立森林局与采金局。

△　四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维持政费开支。

△　上海旅沪商帮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中华工商研究会、华商旅沪维持会联合发起邀请上海各商团开会讨论对欧战和平会议之意见，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

△　英、日、法、俄等国公使就《金券条例》向北京政府提出第三次抗议。

△　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王家驹为京师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12月7日　　北京新国会众议院开会，议决会期至12月12日期满后，再行延期两个月，参议院亦于10日通过此案。

△　英、法驻云南昆明领事访晤唐继尧，并递交五国劝告南北和平照会。

△　唐继尧电告于右任，略谓："昨因北京电请停战，军政府业经同意，故对于援陕各军已饬暂守原防，兹悉北军破坏和议，图陕益急，闻之不胜骇异，已电由李秀山（纯）督军严诘北京是否如约停战，有无议和诚意，俟得复后再行定夺。"

△　北京政府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订立京绥铁路借款合同，借款300万日元，用为修建丰镇以西干线之工务费及材料费。

12月8日　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率部收复永泰。

△　北京政府农商部接收中德合办之直隶省井陉矿务局矿产。

12月9日　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南北议和问题，议决12项，其要旨为："不承认北方自用政府之名义"；"和议须以对等之地位且应用和平会议之名"；"议和地点须在上海，委员由双方各派十名，再选总代表一名"；"陕西、福建问题为和平会议之先决问题"。

△　美公使芮恩施据美政府指示向日代理公使芳泽谦吉提出：中国南北未统一前，美、英、日、法、意五国发表宣言，拒绝向南北各方提供武器。12日，英驻日大使亦就此照会日政府征询意见。26日，日政府以“宣言”显系针对日本，训令小幡酉吉公使，拒绝美国提案。

△　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谒徐世昌，对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问题发表意见，并推荐梁启超、王宠惠。徐邀请其参加巴黎和会，帮助陆徵祥工作，莫慨然应允。

△　熊希龄、汪大燮等在北京组织“协约国国民协会”，推熊希龄为会长，汪大燮及法人铁士兰为副会长。

△　徐世昌派财政部次长吴鼎昌赴欧美视察金融财政情形。

△　南京和平期成会电北京政府及军政府并通电各省，请双方释嫌，择相当地点和衷商榷，从速解纷，回复统一。

12月10日　　四川省议会通电全国，主维护约法，指出凡倡和议者断不能舍弃约法，当召集约法产出之旧国会选举总统，改组内阁，以及解决一切重要事件，“必如是乃不负护法之初衷，而共和之基础始得永固”。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延期一年偿还善后续借款第二次1000万日元垫款新合同（原借款合同系于1918年1月6日签订）。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陈广平为办理驻莫斯科总领事事务。

12月11日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特派朱启钤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为代表，并于同日电告军政府七总裁。

△　军政府电徐世昌，北军四路入陕，奉军由浙水路入闽，故意

开衅，何以言和，请明确回答。

△ 岑春煊电苏督李纯，指出和议须先解决陕西问题，主张由陕西南北两军指定驻兵地点，凡所驻区域内如有匪患，各自剿办，并请徐世昌明白电示，以释群疑。

12月12日 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派遣欧洲和平会议代表案，议决拟派孙中山、伍廷芳、王宠惠、王正廷、伍朝枢为代表。

△ 岑春煊电苏督李纯，主张由南北同遣派代表出席欧洲和会，请其加电促成。

△ 北京政府参谋、陆军两部通电各省，禁止私自招募军队。

12月13日 军政府咨请参议院，同意伍廷芳、孙中山、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为中华民国全权大使，出席欧洲和平会议。

△ 孙中山分函粤军将领邓铿、许崇智等，指出国内形势仍极严重，护法目的尚未达到，勉以加紧训练军队，准备斗争。

△ 邹鲁上书孙中山，陈述国是意见。略称，今日欲求全国之发展，除国会外，当谋广东之地盘，主张以胡汉民长粤。

12月14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通过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案，旋即移送参议院。

△ 广州正式国会议员焦易堂上书孙中山，请其接受赴欧洲议和大使一事。是日，孙中山复函称："欧洲议使，南方尚未得全国承认，当然无效。"表示欲以个人名义再游欧美。

12月15日 日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奉日外务省之命访晤张作霖，劝张停止有关妨碍南北议和言行。

△ 北军再次攻陷福建永泰。

12月16日　　钱能训电军政府七总裁，中央派军入陕赴闽，旨在剿匪清乡，并未令其作战。

△　曹锟通电北方各督军表示，唐继尧所提和议条件于统一大局有妨害，自当预为防范。

△　徐世昌任命张振声署理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校长。

△　徐树铮从日本回到北京，即谒段祺瑞密谈。

△　徐树铮与天津美商慎昌洋行签订200万银元短期借款合同，作为军火借款。

12月17日　　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以唐绍仪为议和总代表。

△　北京“平和期成会”熊希龄、蔡元培函北方总代表朱启钤，陕、闽剿匪安民，为大局善后要政，而划界停战则为目前待决之亟务，恳请毅力主持，勿令陕、闽纠纷影响和局。

12月18日　　北京新国会参议院讨论众议院咨请同意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案，徐世昌派政府委员吴笈孙长官说明理由，该案获得通过。

△　徐世昌通令各省行政长官整饬官方，“此后务各慎选良吏，勤求治理，为地择人，勿为人择地，贤能者不吝优擢，庸劣者立予纠惩，各秉官箴，用崇民治”。

△　徐世昌为调查审议对外事项，于总统府设立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熊希龄等14人为委员。

△　广州正式国会两院议员115人发出通电，声述北方政府进兵闽、陕无议和诚意，请通告外交团，明破坏和平责任，并速援陕、闽。23日，军政府致电外交团，指责北方借口剿匪违约进兵闽、陕。

△　岑春煊电告苏督李纯称，南方已拟定唐绍仪为总代表；陕西

问题，不得将护法军队名之为匪；陕有匪患，须俟和平会议解决大局之后悉心抚剿，勿以此牵动大局。

△　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联合组成“全国和平联合会”，是日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推蔡元培为总代表。

12月19日　　广州正式国会参议院议决咨请军政府于陕、闽、湘、鄂等处停战以前，不得先派和议代表，并请军政府电外交团严责北方借口剿匪进兵陕、闽、湘、鄂以阻碍和议之罪。

△　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通过《1919年改订输入税率并附属规程》，规定次年8月1日实行。与会英、美、日、法等14国委员同意中国海关改订输入税率按从价课税五分，以欧战前五年间之平均物价为基数；战后物价下落时，在和平条约签订二年后再行修正。会议于22日闭会。

△　北京政府农商部咨各省区，现值欧战告终，各国对于经济竞争尤为注意，吾国当急起直追，请速调查经济状况，迅报本部。

12月20日　徐世昌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12月21日　　徐世昌于总统府设财政委员会，周自齐任委员长，张弧为事务主任，梁士诒、汪大燮、陆宗舆、曹汝霖、李士伟、朱启钤、陈振先、吴鼎昌、张志潭、王克敏、徐恩元、张寿龄、叶恭绰等为委员。

△　北京新国会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梁士诒辞议员及议长职案。

△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银行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68.2625万日元延期借款合同，以为清偿旧欠借款。

△　北京图书馆协会开成立大会，选举袁同礼为会长。

12月22日　　钱能训电唐绍仪，表示上海不适为和议地点，陕、闽、剿匪清乡“为迫不容已”；并谓“此间代表各员不日南下，尊处想已派定，务望早日见示，定期集议，俾观厥成”。

△　军政府七总裁电徐世昌，指责钱能训来电所称派援军入陕、闽剿匪清乡一节，皆在设置障害，“再延战祸。……兹任唐绍仪为南北和平会议之南方总代表，在上海静候闽、鄂、陕西之军事解决，再谈和议”。

△　段祺瑞决定编练四个师，以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段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

△　李大钊、陈独秀发起之《每周评论》创刊。陈独秀撰写《发刊词》，称：“《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　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联合组织中华新教育社，是日在江苏教育会开成立会。该社拟编译书报，出版《新教育月刊》、《新教育丛书》。

12月23日　　徐世昌于总统府设善后事宜讨论会，以钱能训为会长，汪大燮等12人为委员。27日召开讨论会，讨论和平善后事宜。

△　孙中山函复林祖涵，谓借和议以遂其分赃割据之阴私者，吾党惟有竭力诛之。

△　孙中山函复陈炯明，奖勉其在闽措施，并谓“文对于种种建设，此时专期《实业计画》有所著述，此编告竣，始从事其他”。

△　张謇、朱佩珍、沈镛等于上海发起成立“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以要求本国议和专使在欧洲和平会议中主张税法平等为宗旨”。

△　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关海清与日商饭田延太郎签

订合办弓长岭铁矿无限公司合同，由奉天省实业厅与日商饭田共出资100万日元。后于1938年为昭和制钢所收买。

12月24日　　孙中山函复熊克武论和议应贯彻护法本旨。指出："近日国内虽和平之声日益加盛，然类多为苟且旦夕之谋，能为国家筹根本解决之计者，甚属寥寥。鄙意吾人创义目的既为护法，则解决办法亦自当以国法有效为根本；否则暴力犹存，法律仍将为所蹂躏，数年一乱，澄清难期，此甚匪吾人救国护法之本旨也。"

△　江苏督军李纯致军政府七总裁两电，提出解决和议僵局方案，主张一面定期会议，一面商决陕事。陕西宜划区各守原防，各自剿匪，如虑划分不易，不妨由双方或居间公团派员监督，秉公商定。

△　孙中山函复林修梅，指出北京政府"一面言平和，一面对陕、闽仍积极进攻，其无诚信可知"。勉其"必期达到真正护法而后已……万不可轻牺牲其主张"。

△　唐绍仪电徐世昌，仍主张和议地点在沪，并对进兵陕、闽事提出质疑。

12月25日　　于右任上书孙中山，认北方罢兵言和为一种策略，避实击虚，以逞其最后之阴谋，主张以武力求和平，电催援陕各军速进，然后出兵潼、洛。

△　蔡元培、王宠惠等组织之国民制宪倡导会在北京开会，并发表宣言。

12月26日　　陕西靖国军六路司令郭坚、樊毓秀等通电，揭露北京政府表面下令停战，实际派兵攻陕。

△　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离开北京，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身份前往欧洲。

△　徐绍桢、汪精卫、吕渭英等于上海发起成立世界和平共进会。

12月27日　　孙中山函勉云南刘祖武、田云龙等坚持护法，略谓："文与海军暨两粤诸将士誓非使国会恢复，得完全行使其职权，凡约法所规定，得保障其原有之效力，则决不为姑息调和之言所乘，致中敌人之奸谋，而再蹈为德不卒之辙。所望执事坚持到底，作一劳永逸之图。"

△　广州正式国会议员在上海东园俱乐部开谈话会。易次乾代表唐绍仪发表意见：一、代表应速派遣，陕、闽军队不得认为土匪；二、和议地点如不在上海，则辞去总代表职；三、国会必须恢复职权，解散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处，国会宜速规定全国军费；四、欧战和会代表由南北和会提前议定，双方委任，议和各种条件以国会之意见为意见。

△　日新任公使小幡酋吉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12月28日　　江苏督军李纯电岑春煊称，陕事一隅之争，似未可牵动全局，"我辈务当以全副精神，注重于根本问题，迅开会议，早日解决，以救国家之覆亡"。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规程"，凡14条。同日，该部通令吾省施行"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之各省区每年派员考察国外教育案。

12月29日　　北方议和代表团总代表朱启钤，成员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由京启程南下，于1919年1月2日抵南京。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为民国四年公债抽签归还本息及偿还陆徵祥赴欧经费垫借款，照会外交使团请提拨关余180万两。使团即于本月

31日开议，准允提用，并于次年1月10日照复外交部。

△　梁启超自上海乘船赴欧洲。目的为“关注欧洲和会，向世界舆论伸诉冤苦，以尽国民责任”。

12月30日　孙中山撰《孙文学说》成，倡“行易知难”说。

△　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谓“陕事不决，议和难行”。

△　李纯在南京设立和平会议办事处，委李廷玉为主任，齐耀琳为帮办。

12月31日　徐世昌令山东会同直隶、江苏、安徽各省，于津浦铁路沿线剿除“匪患”，认真防护交通。

△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通电指责北京政府于停战令后，“调七省之师分道并进”，进攻陕西，“张锡元、许兰洲由临渭进，鄂军由南山进，晋军占韩城、郃阳，甘军入邠州、长武。撤湘西之兵以图陕，乃战略变易，恶得谓停战”？

是月　山东省东阿、平阴、茌平、肥城等县有三阳教活动，会首为王会臣、李同升等，东阿县知事密派警队逮捕，该教与官军激战，李同升等13人战死，余逸去。

△　虞洽卿、谢莲卿向农商部注册在上海创设“鸿安商轮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元。

△　李盛铎于北京创办商业银行，资本100万元，设分行于天津。

△　吕文会于山东博山创办博山电灯有限股份公司，资本50万元。

△　陈文鉴于上海创办中国兴业烟草公司，资本20万元，北京、南京、天津、汉口、杭州等地均有分号。

1919年（民国八年）

1月

1月1日　　大总统徐世昌在北京怀仁堂接受官员朝贺毕，对新任国务总理钱能训表示，南京会议宜速决定国会与军队问题。

△　参战军第一师正式成立，辖步兵二旅，师直辖骑、炮兵各一团，工兵、辎重、机枪各一营，共一万余人。师长曲同丰。

△　《国民》杂志在北京创刊。月刊，系学生救国会机关刊物，旨在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刊物宗旨有四："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国民》共出八期，1921年5月第二卷第四号出版后停刊。

△　《新潮》月刊创刊，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新潮社出版物，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

△　日人安川敬一郎与通裕煤矿公司在天津开办奉天锦西煤矿有限公司，资本300万两，开采锦西大窑沟等处煤矿。安川敬一郎任日方总理，通裕煤矿公司代表陈应南任中方总理。

1月2日　　广州军政府岑春煊、孙中山等联名电徐世昌，不能以剿匪为口实，迁延停战时日。为避免争执，促进和平，特以三事相商。

△　广州军政府岑春煊等电江苏督军李纯，表示"非陕、闽、鄂西停战问题解决后，不得开议"；并提议"对于陕西方面，或由双方公推威信素符之大员前往查视，划定区域，以杜纠纷"。

△　李纯电张謇，请转向广州军政府代表唐绍仪疏通，勿因地点争执致碍南北和议之进行。

1月3日　　京绥铁路局向日本东方展拓公司借款300万元，以1918年所发公债券余额作抵，并言明日后须借款时，该公司有优先权。

1月4日　　唐绍仪自上海电北京政府议和总代表朱启钤，就奉军许兰洲、管金聚两旅参加陕战、蓄意破坏和局一事，痛加斥责；并请朱电告北京政府，明颁停战命令，惩办许、管，另将嗾使奉军加入战争之陕西督军陈树藩即日调离陕境，以遏乱源。

△　孙中山批复马逢伯函，指出：局部和议“乃徐（世昌）、陆（荣廷）之阴谋，吾辈当竭力打消之”。

1月5日　　徐世昌令发展国民经济，责成财政农商两部广兴航业，提前筹设劝业农工各银行，优奖土货，广设国际汇兑机关，提倡开采矿业，改良农业，推广林牧，奖劝机织。

△　徐世昌任命汪荣宝为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魏宸组为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

△　孙中山函复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勉其贯彻民治主义，望念国事之艰难暨西陲之要任，万勿遽怀灰心而有引退之意。

1月6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任钮永建、李书城、蒋尊簋、林虎、马济、刘祖武、陈强、金永炎、张孝准、吕公望、魏士厚、魏邦平、缪嘉寿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8日，决定由李烈钧任军事委员会会长，以蒋尊簋为常任干事，并补方声涛为委员。

△　孙中山函复在广州之闽籍国会议员，赞同在闽北军新增者先行撤退，为议和前提之主张。

△　孙中山函林森、徐谦、胡汉民，望设法疏通伍朝枢出席巴黎和会。

1月7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通过钱能训内阁人选。

△　广州国会开宪法会议，宪法会议审议长褚辅成报告审议地方制度经过，议决依审议会审议之结果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付表决。

△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声明，内称南北议和会议不日开幕，鼓吹和平之务业已告一段落，自本日起，即与平和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外交请愿联合会等谋求国内和平各团体，概行脱离关系。后以全国和平联合会具函挽留，蔡于10日函复，允不脱离该会。

1月8日　北京国务院将外交委员会拟定之巴黎和会中国提案电令议和代表陆徵祥等照办。

△　在北京政府特派焚土专员、司法次长张一鹏主持下，由北京政府指定之各有关方面代表开始在上海查验贮存鸦片烟土。17日起在浦东焚烧。27日全部焚毕。29日张返北京销差。验焚期间，弄虚作假，流弊百出。身为焚土特派员之冯国勋，亦竟利用职权贪污大量存土，转售奸商，从中渔利。群情愤激。而北京政府对此则不予认真究办。

1月9日　广州军政府委任伍廷芳、孙中山、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为出席巴黎和会专使。

△　广州军政府电北京政府，告以派定唐绍仪为出席南北议和会议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李曰垓、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为代表，“即日赴沪，听候陕、闽、鄂西问题解决，即行开议”。后因唐继尧不满李曰垓，遂于14日再电北京政府，告以李曰垓一席改派缪嘉寿充任。

△　北京国会参议院举李盛铎为议长。

1月10日　徐世昌令准财政次长李思浩辞盐务署署长及稽核总所总办兼职，改令张弧兼署。

△　徐世昌令将全国烟酒公卖局改组为全国烟酒事务署，以张寿龄督办全国烟酒事务。

△　山东省议会郑钦、王朝俊等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双方单独解决青岛问题，主张提交巴黎和会公议。13日，山东省报界联合会亦有同样之通电。

△　江西省议会选举正、副议长，饶正音、胡廷銮分别当选。

1月11日　北京钱能训内阁正式改组。徐世昌令准陆徵祥、钱能训、段芝贵、刘冠雄、朱深、傅增湘、田文烈、曹汝霖分别辞去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兼署财政各部总长职，特任钱能训、陆徵祥、龚心湛、靳云鹏、刘冠雄、朱深、傅增湘、田文烈、曹汝霖分别为内务、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总长。任命郭则沄为国务院秘书长。外交总长陆徵祥未到任以前，着由次长陈箓代理部务，财政总长龚心湛未到任以前，着次长李思浩暂行代理部务。

△　徐世昌任张怀芝为参谋总长；吕调元为安徽省长，未到任前由李维源暂代。

△　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军政府改名护法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会第四次宣言》。内称：两院联合会“议决修改军政府为护法政府案，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务、摄行大总统职务，以护法政府名义行之”。13日，将此项决议正式宣布。按：此项决议因军政府内各系军阀反对，并未见诸实施，后仍沿用军政府名称。

△　广州军政府电徐世昌，责问北军在谋和期间，何以在川、

陕、闽、赣等处增兵进攻，应请飞饬查明撤退，以昭大信。

△　广州国会电美国国会转美总统威尔逊，请其担任解决中国南北纷争之仲裁人。

△　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财政厅长费毓楷与日商中华汇业银行签订借款200万日元合同；2月7日，再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40万日元合同。两项借款均以该省契税、屠宰税及杂捐杂税为担保，并均用作该省财政经费。

1月12日　徐世昌令财政总长龚心湛兼任盐务署督办。16日，再令龚兼任币制局督办。

△　章太炎致函孙中山，反对南北议和。

1月13日　午后，广州国会两院指定起草委员会草拟《中华民国国会第五次宣言》，声明不承认北京政府所派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及其所订各项条约。18日，经两院议决后正式公布。

△　晋督阎锡山训令新任各区长于区内各设“洗心分社”（宣传孔孟思想之组织），每逢星期日集众讲演，实行自省。

1月14日　李纯根据南北双方意见所拟关于陕、闽、鄂西停战办法六条电呈钱能训请示。六条如下：“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准即停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备呈报备案；四、陕省内部由双方公推大员前往监视，以杜纠纷；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犯。反是者国人共弃之；六、以上各节一经双方承认宣布，即由苏、鄂、赣三督宣布在南京开议日期，不得再以他事别生异议，致会议停顿。”电中并请指定监视陕省划分停战界线之大员一二人，俾可与南方商洽。28日，李纯将上述六条电达军政府。

△　广州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伍廷芳提出议和意见六条：一、恢复旧国会；二、决定地方制度；三、决定军区及裁兵；四、补充护法各省经费；五、善后借款由南北共同办理；六、军政府命令仍有效。

1月15日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答辩书》，重申该杂志拥护“民主”、“科学”的立场。略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唐绍仪派郭人漳、唐宝锷赴宁晤李纯，坚持以上海为议和地点。

△　北京外交团电饬广州领事团通知军政府，如能于本月25日派出代表赴上海正式开议，则1918年关税余款1200万元，南北双方可照所定用途拨用；否则将自25日起，分批全部交付北京政府。此事虽经军政府一再反对，并要求延期一月，而外交团均置之不理，至期竟按原定方案执行。

△　朱启钤密电北方议和代表吴鼎昌，告以唐绍仪在上海声言：开议和会时必先解决国防军问题，“以解内外人心之疑”。电中言及靳云鹏现长陆军，可否按段祺瑞原意，将国防军“归纳部辖”，“实际上似无出入”，嘱吴就此与当道“密商先发制胜之策”。

△　美、日两国政府代表在东京擅行议定由美、日、英、法、中、俄、意等国合组协约国监管路政委员会，共同监管西伯利亚俄路及我中东路计划。2月17日，两国驻北京公使将此计划正式送交北京政府外交部。18日，北京政府召开阁议，被迫于原则上接受监管方

案。旋委派刘镜人为监管路政委员会委员，詹天佑为该会技术部代表。

△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10万元合同，以该校全部校舍为担保。此款用于补发所欠教职员薪金。

△　上海《时事新报》编辑张东荪于该报“时评”栏中发表《世界公同之问题》一文，提出防治“过激主义”。

1月16日　徐世昌令设置整理棉业局，振兴推广棉业，派周学熙为该局督办。

△　长沙造币厂与日商三井、久原、古河、高田、住友、东亚等洋行签订借银149.2263万两合同，用于支付购铜款项。

1月17日　南方议和代表纷赴上海。是日，胡汉民自广州启行。20日，章士钊、彭允彝、郭椿森、王伯群自香港启行。是月底，刘光烈、李述膺、饶鸣銮继到。

△　北京政府财政部电朱启钤，请曲予维持南北会议，以免公使团对放还关余税款再加留难。

△　广州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广东中国银行及地方实业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76万日元合同，以广州电话局、广东省烟酒税及纸币56.4万余元为担保。此款用于维持广东中国银行所发纸币。消息传出后，北京政府即向外交团声明，不承认此项借款。

△　章太炎等在广州发起组织护法后援会并发表宣言。其中指责先此成立之全国和平联合会、平和期成会等团体均为“首鼠两端之护法”；声称：护法后援会“要使僭伪不能生心，策士无所用力。……若干犯正义、为依违迁就之和议者，当与国人共屏弃之”。

△　万国禁烟会在沪开会，并焚毁政府在沪收买之存土1200余

箱，三日乃尽。北京政府特派专员张一鹏赴沪监视。

1月18日　巴黎和会开幕。北京政府代表陆徵祥、王正廷出席，并向大会提交取消外人在华特殊利益及废除“二十一条”。

△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请各省区转令各校厉行道德教育。

1月19日　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电北京政府，借口“结束湘事”，请速将吴佩孚所部调离湖南。

△　上海粮食研究会马良、冯煦、熊希龄等38人，基于日、英等帝国主义及自身利益，不顾江苏民众生计，是日联名电徐世昌、北京国务院及财政、农商两部，要求开放江苏米禁，豁除面粉照费，允许米面出口。

1月中旬　北京政府农商部与日本安川制铁公司签订借款300万元合同，以让与山西煤矿、铁矿开采为条件。

1月20日　北京国务院战后经济调查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由国务总理钱能训任委员长，孙慕韩、周缉之任副委员长。参加者150余人。

1月21日　徐世昌特派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出席巴黎和会全权委员。该名单直至28日始由和会正式公布。

△　广州军政府将陕西靖国军驻扎地点及将领姓名电告江苏督军李纯。

1月22日　朱启钤电钱能训，告以唐绍仪曾于21日来电，托汪精卫、谷钟秀、卢信三人赴宁，接洽并商讨关余税款使用情事。是日，谷、卢两人抵宁，要求将关余税款余额420万元均分。朱以养（22日）电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请示答复办法。

△　藏兵侵扰川边，已攻陷理化，巴塘、里塘均甚危急。

1月23日　孙中山致函黄复生、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等，勖协助杨庶堪治理川政。

△　北京政府循日公使小幡酉吉之请，允将苏米100万石运往日本，并声称："如英使援例请求亦照允。"

△　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组织全国中学校联合会。该会以研究改善中学教育为宗旨。决定"先办月报，以为交换知识、商榷方法之机关"。

1月24日　朱启钤委托王克敏、江绍杰自南京赴上海，将李纯所拟陕、闽、鄂西停战办法六条面交唐绍仪，并以北京政府拟派宋联奎为陕西划界仲裁人征询其意。25日，唐再晤王、江，告以宋联奎与陕督陈树藩关系至深，碍难同意。旋亦提出停战办法五项：一、明令停战；二、取消检查三原电报；三、须得三原总司令部停战之密电为证据；四、派员划界；五、建议派张瑞玑为陕西划界仲裁人。张现在粤，可由陕议员杨铭源先行代往。并谓，钱能训抚陕时张曾任首县，北京政府当可同意。

1月25日　徐世昌公布《管理敌国人民财产条例》、《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条例》、《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分局条例》、《遣送敌国人民事务局条例》。规定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直隶于国务总理，承各主管部总长之指挥，遵照《管理敌国人民财产条例》，办理关于敌国人民财产事宜"；各分局"掌理各该省区关于敌国人民财产事宜"；"于上海地方设遣送敌国人民事务局，直隶于国务总理，办理遣送敌国人民回国事宜。一俟遣送事毕即行裁撤"。

△　广州非常国会众议院协议派遣欧洲议和全权大使同意案，出席议员306名，孙中山得303票，伍廷芳得286票，大会通过孙、伍二人为派遣欧洲议和全权专使。26日，孙中山函复广州赵士北，告以不

欲担任赴欧代表事。

1月26日　徐世昌面谕国务总理钱能训，令转饬交通总长曹汝霖速谋交通要政。

△　徐世昌发布查禁私运盐斤令。

1月27日　出席巴黎和会美、英、法、意、日代表举行五国会议，讨论处置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应邀参加。会间日代表牧野伸显乘机提出德国在山东所占一切权利应无条件让与日本之无理要求。顾维钧当即声明：关于山东问题，“应由中国陈说理由后，再行讨论”。

△　岑春煊等电李纯，告以军政府拟推张瑞玑为陕西划界仲裁人，“如荷赞同，请转电北京一致推任”。28日，李纯电复岑等，主张仲裁人应由双方议和总代表公推。30日，钱能训电李纯，同意对岑等之答复，并谓“若竟照此办理，彼必借口于先决陕事，再行开议”；如“由双方总代表公同集议，正式推定，借可促成会议，且杜口实”。

△　陕西陈树藩、刘镇华等联名电北京政府，报告本日向三原于右任、张钫所部靖国军开始总攻，已全队渡渭河。北京政府竟电令“努力前进”。

△　江西铜元局与日商占河洋行签订借款50万日元合同，以铜元局全部设备及江西库券30万元为担保；并言明须以借款之一部自日本购入精铜及黑铅，余款用于添置机器及其他设备。

1月28日　巴黎和会美、英、法、意、日代表继续举行五国会议，中日两国代表就山东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顾维钧要求大会“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将德国在山东所占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而牧野则借口中日两国关于山东问题“已有成约”，坚决反对。顾维钧当即指出：日本代表所谓“成约”，“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

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牒，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不能认为有效”。

△　朱启钤接北京国务院唐在章密电，告以唐绍仪“近密致英公使一函，叙述议和意见，计列七款：一、撤参战处，废国防军；二、裁减军队；三、推行警察；四、去督军制；五、省长由民选；六、废厘金；七、改国会制。并谓总统目前仍受制武人，望协助”。

△　徐世昌派卢永祥督办遣送敌侨事务，蔡廷幹会办遣送敌侨事务；另派曾彝进为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局长。

△　瑞典新任驻京公使柏古通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1月29日　北京政府拟派宋联奎往陕主持划界停火，唐绍仪提出五项意见，并主派张瑞玑前往。

△　徐世昌据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呈，以欧战以来“侨工事务倍形繁重”，请准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设总领事馆，是日指令“准如所拟办理”。2月14日，任罗昌为驻伦敦总领事；廖世功为驻巴黎总领事。

△　北京政府财政、外交两部与北京汇丰、正金、麦加利、花旗、中法实业、东方汇理、道胜、华比八银行签订借款50万元合同，以充遣送敌侨归国之用。

△　台湾华南银行在台北创立。中日合办，资本1000万元，中日各半。总行设台北，于新加坡、广东、三宝垄（印尼）设分行，东京设办事处。董监事：中国16人，日本6人。

1月30日　唐绍仪委托章士钊、胡汉民、彭允彝、王伯群、李述膺、饶鸣銮赴南京，面晤朱启钤，转达其对议和会议两点意见：“一、地点在沪；二、会议时专由双方总代表发言。”朱启钤亦提出会议大纲办法四条：“一、议题由双方总代表协定后列入议案；二、会议时由双方总代表发言，但得委托分代表陈述；三、议案总代

表认为应准备或审查者，得开准备会或审查会，准备会或审查会得由两方代表联合行之；四、准备会或审查会拟议事件，仍由双方总代表取决。”当请各代表返沪代达。后以未见唐绍仪回电，乃于2月2日电唐催复。

△　徐世昌以南北停战，下令撤销援粤总、副司令，其所属军队，着由陆军部派员收束。

△　北京国务院电苏督李纯、省长齐耀琳，请设法通融，允准食米输粤。

1月31日　　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靳云鹏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借款350.52万元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用于支付参战军械价款。

2月

2月1日　徐世昌明令各省省长勤求治理，甄采贤才。

2月2日　　日本公使小幡酉吉会见北京外交部次长陈箓，就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新闻界宣言随时可将民国七年9月24日关于山东之中日密约文书发表一事，提出质问；无理指责顾维钧“未得日方之同意”即发表此项声明，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日本政府对此“殊不愉快”。特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并要求将此意电知中国代表。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大为愤激，纷电北京政府，要求公布并废除与日本政府所订各项密约。

2月3日　　北京政府议和总代表朱启钤派吴鼎昌赴沪，将所提议和会议大纲办法四条同唐绍仪面商，以取得一致意见。

△　各省旅京人士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按：是时该会尚未宣告正式成立）集议，筹商对付日方威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办法。决定即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名义，电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请向和会转达全体国民三点严正要求：“一、中国宣战后，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应直接归还中国；二、欧战期内凡各国所结密约，关于处分中国土地、权利者，擅观中国为买卖品，中国人民誓不承认；三、欧战后中日所订各约及各合同，皆由日本用武力阴谋强迫，应全取消。”

△　北京政府参战处派张斯麟任驻鄂木斯克（俄高尔察克伪政府所在地）军事代表。

2月4日　　孙中山函复陈炯明，告以和议难成，指示粤军整顿内部，充实军力。

2月5日　　北京政府参战督办段祺瑞命徐树铮同日本陆军部代表东乙彦商定延长《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关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战争终了协定》。

△　北京大学等校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取消中日所订‘二十一条’及军事协约……务望努力坚持。……学生等当联合国人，以全力为诸公后盾。”

△　山东旅京人士为力争收回青岛，组织外交后援会。

△　上海洋货商业公会、出口公会、广肇公所、全国和平联合会、浙江旅沪学生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绍兴同乡会等团体，联名电北京政府，要求严词拒绝日使无理要求，以保主权。

△　西藏地方军陷里塘。当地文武官吏及守军百余名均被缴械、拘禁。

2月6日　　李纯通电南北各方，告以前经其所拟陕、闽、鄂西停战办法，业经北京政府与广州军政府多次协商，一致同意，即日双方通令按照实行：“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闽

省、鄂西、陕南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上述停战条文，北京政府于13日始行公布。

△　唐继尧提出解决南北问题办法四条。其中包括有关制定宪法，选举总统，解散新旧国会，解决地方行政，划分军区，处理滇、川、黔、陕、鄂、豫、湘西联军范围以内善后问题等建议。

2月7日　　徐世昌据北京国会决议，公布7月3日（按：即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之日）为“民国纪念日”。

△　徐世昌公布中华民国邮旗。

△　孙中山自上海复函广州谢持，告以不能担任巴黎和会特使；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个人联名电北京政府时，以不列名为宜。

2月8日　　朱启钤所提议和会议大纲办法四条，经北方代表3日赴上海与唐绍仪面商修改后，取得一致意见。是日由章士钊、胡汉民、方枢、汪有龄四人共同草就会议细则，并确定于上海开议。

△　朱启钤电钱能训，请照李纯所提停战办法，迅饬前方各军停止前进。

△　徐世昌令内务、农商两部通行各省军民长官及国外各中华商会，设法招徕侨商集资回国，兴办实业，并由该部妥拟办法，予以优奖。

△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新石工人600余举行罢工，反对日资本家殴打工人、克扣工资、裁减老、幼、女工等，罢工持续七日。后以资方认可工人所提条件，始行复工。

2月9日　　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1.15万人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

请“保持国权”，“对于中日争执坚持到底”，并声言“誓为诸公后盾”。

△　熊克武就任四川督军。

2月10日　北京政府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许有随时宣布中日各项密约全权，并于同日授权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公布2日日使小幡与陈箓会见实情。

△　《民国日报》刊载山东省议会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电，内称“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对待”。

2月11日　北京新国会闭会。该会自去年8月12日开会，会期四个月，嗣经延长两个月，现复届满，于是日闭会。

△　国际联盟中国同志会在北京大学开成立会，推定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事长，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为理事。次日，通过九项议案。入会者800余人。

△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为掠夺中东铁路附近之森林，垄断该地电灯、制粉、窑作等副业，于哈尔滨开办中东海林实业公司。资本定额300万日元，中日合办，开设期限20年。后该公司转由日本纸器制造株式会社经办。

2月12日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公布中日各项密约，计有：《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之详细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说明书》及《中日解决山东善后条约》等。

△　徐世昌任沈铭昌为山东省省长。

△　华侨平和期成会在上海成立。宣称以“期成和平，协赞南北政府以谋统一，庶国内人民与海外华侨一致对外”为宗旨。会长李登辉。

2月13日　北京政府征得西南同意，将李纯所提五条办法电陕饬遵。

△　孙中山函复广州谢持，将暂不续派驻粤代表。函谓："护法政府代表事，此间仓猝实无可代之人，只好暂行听之而已。"

△　武汉各界连日集会，议商对中日交涉问题应取之行动。是日议决电北京政府，要求维护主权，并督励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尽力挽回一切利权。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闻讯，借口"此等交涉毋庸民间陈请"，竟禁止发电，并派警察四出取缔"谣言"。

2月14日　唐绍仪电徐世昌，指责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挑战"，吁请速罢兵诚意议和。徐得电后即批交国务院作复。次日，钱能训电复唐绍仪，谓"惟望双方竭诚商榷，早息纠纷"。

△　大战期间赴欧山东籍华工1200人，乘英轮"庇亚斯号"返抵青岛。

2月15日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长篇说帖，要求将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在山东强占之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

△　唐绍仪接于右任函告，陕西乾县、盩厔（今作周至）之围依然，陈树藩之旅长刘世珑仍在东路进攻。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借款256.25万法郎合同，以期票为担保。此款用于交付中法实业借款第10期利息及手续费。

△　北京政府陆军部设立军官补助团，选调各师、旅下级军官4000人进行为期四个月的短期训练。该团团长余晋和，总教官由日军大佐板西担任，另有教官10余名亦均系日本人。

△　万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在北京成立。举《京津时报》社长汪立

元为会长。

2月16日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举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严修、范源濂、庄蕴宽等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　北京政府议和总代表朱启钤离南京抵上海。

2月17日　　曹汝霖、陆宗舆以三兴公司名义与日人合办辽西新邱煤矿，资本3000万日元。

2月18日　　唐绍仪再电徐世昌，责其继续对外借款购械，并指出陕事罢战言和以后，奉、甘各军又加入攻击陕西南军。

△　孙中山函复于右任，表示陕事为议和第一问题，决不放松。

△　钱能训为首之和平统一会，改组为己未俱乐部。

△　北京国务院分函各有关部会，说明东清铁路路权应全部归我国收回自管。

△　徐世昌发布禁种鸦片令。

△　广州各界开国民大会，议商对外交问题应取之行动。主张：一、克日成立外交后援会，以为国民对外之机关；二、国民宜公推代表赴欧，请愿欧洲和会，废除中日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密约；三、电北京政府取消军械借款；四、撤销北京国防军（即参战军）；五、要求惩办与日人私订各种密约之罪魁，并将其罪状宣布中外。

2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陈箓对俄公使库达摄夫表示，我派员驻扎乌梁海，仅为履行中俄蒙之条约。

△　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电告北京政府，日本于该省沿途擅设军用邮局并代递商民信件，因此举有损中国主权，请示如何办理。

2月20日　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幕。南北双方总代表唐绍仪、朱启钤在会上致词。

△　广州军政府岑春煊等六总裁（按：七总裁之一孙中山是时居上海）联名电徐世昌，指责北京政府“增购军械，急急备战”，“言而不信，力攻陕西”，“假借国防名目扩充军队”，并详举1月21日于秦皇岛接受日本大批军火事以为佐证。钱能训于代徐电复中被迫承认，接受军火、扩充军队实有其事；然犹狡辩云：“此项军械久经订购，日人照约续交，未便停止”；“军队之招募，固属原定计划而不始于今日。”

△　广西梧州驻军马济统领所部士兵，与英领事署巡捕发生冲突，殴伤英捕一名。3月8日经粤桂当局与英领磋商，由马统领具书向英领事道歉，并亲向受伤英捕道歉；严办殴伤英捕之伍长及士兵；赔偿受伤英捕医疗费一万元。10日，梧州当局将伍长一名枪决，并将12名士兵解赴南宁永远监禁。

△　是日至23日，李大钊于《晨报》连续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号召知识青年“速向农村去”，“同劳动阶级打成一气”。3月14日至16日。李大钊复于该报连续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再次号召知识青年“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与劳动群众“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

△　协约各国驻北京公使，是日就京汉路久供军事运输，货车缺乏，致使各国货物积滞、贸易受损事，分别咨达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北京政府旋令外交部向各使道歉，并饬有关部门尽速整顿。

2月21日　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讨论陕西问题。唐绍仪要求撤换妨碍陕西停战之陈树藩，朱启钤则坚持照李纯6日通电宣布南北双方一致同意之陕、闽、鄂西停战之五条办法解决。

△　徐世昌据财政总长龚心湛呈请，准由陆军部确订裁减军队办法，以资收束；并责成各行政机关裁并办事机构；另酌增一二新税，以解决北京政府财政困难。23日，再据龚呈请，准“自本年3月1日起，将京外政军各费暂按八成支发”。

2月22日　南北议和第二次会议，续议陕西问题，双方共同推定张瑞玑为陕西停战划界监视员；次议军事问题，决定发电北京政府，要求宣布军事协约及一切附件，停止向日本支取参战借余额1700万元。

△　徐世昌公布《民国八年短期公债条例》，募集公债4000万元，以补政府“岁计不足”。

△　广州国会议员数百人联名发出通电，宣布对外交问题意见。其要者为：一、赞成国际同盟；二、欧洲和会中国代表应与他国同有发言自由权，不受他国干涉；三、欧战发生后，因威胁利诱而成之中日密约，应交和会公断。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已失效力，德国在华利益当然交还中国，他国不能继有。

△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各都统、省长及京兆尹，告以嗣后民间制历应统一采用新法，不得再以清代万年历书为根据。

2月23日　朱启钤电李纯，说明南北和议推定张瑞玑为陕西停战划界监视员，并告以张于日内到宁，请指示方略。

△　《民国日报》刊载留日学生《对外宣言》，主张破除中日“二十一条”，无条件归还青岛，解除中日军事密约，各种借款条约作废，撤退各地驻屯日军。

2月24日　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双方一致同意要求北京政府将中日军事协定“一切附件及关于该事之往返文牍，悉数抄寄”。唐绍仪对钱能训来电所称参战处“不容遽尔裁撤”事提出抗议，并要求“军事协约事项，应付本会解决”。唐、朱分别指定各自代表审查“湖南问题”及审查“八年公债案”。

△　钱能训电朱启钤，希望将裁兵委员会办法于开议时首先提出。

2月25日　朱启钤电钱能训，请再严令前方将领恪遵五条电令，免妨和议进行。

△　唐绍仪接于右任17日函，报告陕西仍有战事，且盩厔县靖国军已于16日退驻郿县。

△　上海日商三井物产会社所雇驳船伙友，因物价昂贵，要求增加工资三成，举行全体罢工。后资方被迫允加工资二成，风潮乃息。

2月26日　南北议和第四次会议，唐绍仪据于右任陕西仍有战斗之报告，要求撤换陕督陈树藩，并声明：“南方代表已决议，每日到会只待陈树藩撤去，不再讨论别事。”双方同意是日会议改为谈话会。

△　朱启钤电钱能训，告以唐绍仪要求非下令撤换陈树藩，决不再议他事，并希望速颁明令停止陕战，以免遭受中外舆论攻击。

△　唐绍仪电徐世昌，请北京政府停止参战借款并于次日再电徐世昌，要求裁撤参战军。

2月27日　北京国务院电陈树藩，令饬在陕北军遵照13日所颁五条办法即行停战。

△　钱能训电复朱启钤，对陈树藩进攻靖国军饰词系为“剿匪”，

并称“当此陕事未定，中央万无撤换陈督之理”。

2月28日　南北议和第五次会议，朱启钤报告收到中日军事协约全文，计《中日军事协定文书》、《陆军共同防敌协定文》、《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文》、《解释欧战终了文书》共四件，此外别无附件。唐绍仪声明陕西停战一事“从本日起48小时内，如尚未得北京政府圆满之答复，惟有向外交团声明停顿和议”。

△　出席南北议和之北方代表全体电北京政府辞职。3月1日，北京政府复电慰留。

△　唐绍仪接于右任19日快信称，北军均移集陕西东路，19日向相桥、交口、红崖头、千都村、兴市、关山等地开始攻击，战斗激烈。

3月

3月1日　北京新国会开第二次常会。

△　段祺瑞再派谢葆璋、陈恩寿与日本代表伊集院、八角三郎在北京签订《关于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战争终了之协定》。

△　徐世昌令陆军部通行各省区将领，不得任意枪毙人犯，“以重刑典”。

△　在中外舆论压力下，日使小幡酉吉遵照本国政府训令，派员往晤北京政府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告以日本政府决定暂停交付军械，至中国南北议和会议结束时为止，并希北京政府勿再提用存于北京朝鲜银行之参战借款。

△　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等人抵上海。7日抵北京，与有关各方商谈成立新银行团及对华投资等事。

△ “中日合办”宝山玻璃厂在上海成立。资本50万元。日人角田芳太郎出资27万元，为该公司代表。开设期限20年。

3月2日 南方议和代表以48小时限期已届，而陕西停战问题未决，乃发表停止和平会议宣言，指出：“盖所议者和也，和战不能并立。今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北京政府谋和之无诚意，即其威信之不能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南北议和会议遂告停顿。

△ 钱能训电朱启钤，表示对陕西停战可有明确答复，但不能承认哀的美敦书，并望转商唐绍仪赓续正式开议，裁兵、分治等重要议案应列入议程。

△ 徐世昌以南北和议停顿，电熊希龄、张一麐分作疏解。4日，徐、钱再电李纯，嘱转劝双方续开和议。

△ 徐世昌下令各省区军民长官惩禁私自运售吗啡。

△ 各地平和期成会代表在南京组成全国平和期成会联合会，是日正式成立。举熊希龄为会长，梁士诒、张一麐为副会长。

△ 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举林森为会长。

△ 是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刘泽荣）等应邀出席，于5日大会上致祝词。会议通过《共产国际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宣告成立。

3月3日 徐世昌下令陕西各将领停战。同日，北京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另发军令，饬照元（13日）电协定五条办法，停战划防，仍候张瑞玑抵陕区分后，再定后方剿匪办法。

△ 江苏民食维持会就北京政府1月23日向日本开放米禁事，是日致函省议会，请拒绝米粮开禁。次日，江苏省议会开会一致否决开放

米禁。6日，苏省议会电北京政府，请重申米禁。

3月4日　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军警月饷及军警官吏薪俸一律免予减支”。8日再开阁议，决定“各行政机关职员俸给自三月份起一律搭放八年公债二成，其财政部原定按八成发给之议实行取消”。

△　英国公使朱尔典访晤徐世昌，询和平会议情形，要求迅速恢复南北议和，并取消参战军。

△　奉、吉、黑省在粤国会议员吴景濂等51人恳请孙中山电达驻欧各使，请设法取消为害满蒙、吉、黑诸省之各项借款密约。

△　安徽芜湖民食维持会电北京政府，告以日商来芜购米，群情惶恐，请予拒绝。14日、16日两日，安徽省议会迭电北京政府，告以“日人运米出口，全会议决否认”，请严禁日本在皖、苏二省购米。

3月5日　陕督陈树藩、省长刘镇华联衔电徐世昌，告以奉到江（3日）电令，并声称业已通令所部遵令停战。

△　法国公使柏卜访晤徐世昌，劝中国政府勿因陕西局部阻碍全局，并希中国国内和平先于世界和平。

△　广州军政府成立大理院，任命赵士北为院长。

3月6日　北京国务院为南北议和事通电全国，推卸会议延滞之咎责，并对唐绍仪所提取消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及取消中日军事协定各端，以欧战尚未终了、“取消暂非其时”为辞表示拒绝接受。同时反责南方代表将北方代表所提“有关善后重要计划”之裁兵及军民分治各议案“束之高阁”。

△　援陕奉军攻占岐山。同日，陈树藩电饬张金印激励将士，赶掘地道，以期轰克乾城，并于次日派员携弹药前往助攻。

△　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会长、前代理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在上海病故。

△　吴佩孚自湖南电唐绍仪，告以和议停顿“系因某党派从中作梗，东海（徐世昌字）受困，威信不行”；请“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前一日，吴曾电曹锟，指责有人主使陕战、梗阻和议，请“切筹对付”。

△　北京政府举行春丁祀孔，由钱能训代徐世昌主持。

3月7日　　英使朱尔典、法使柏卜、美使芮恩施、意使华雷联袂至北京政府外交部，面递和平说帖，劝中国勿提用参战借款余额，并询及参战军何日撤销。

△　旅居英、法华侨10余万人自巴黎电北京政府，要求废除中日各项密约。

△　上海全市两万余人力车工人因反对增加车租举行罢工。10日，工潮平息。每辆仍日增租金一角。

3月8日　　北京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以南北代表在沪开议乃通电各省收束军队，并谓经国务会议议决，以裁汰输卒、核减军费为收束之先务。

3月9日　　唐绍仪通电声明，军政府决不承认北京政府募集八年短期公债4000万元。

3月10日　　唐绍仪偕全体南方代表往晤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就与南北继续议和有关之陕西停战及撤换陈督，中日军事协定与参战军，以及国会等问题了解情况，并交换意见。

△　北京政府电饬所辖各省当道，“设法遏止”旅俄华工归国，以免传播“过激主义”、鼓吹“均产”。11日，复分饬科布多、阿尔泰、乌

里雅苏台当局，“严查由俄入境华工”。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电有关各地，严禁俄人招工，“以遏乱萌”。

△　陈树藩军违约进攻乾县、凤翔、兴市及红崖渡等处靖国军。

△　北京政府教育部聘请范源濂、蔡元培、陈宝泉、蒋梦麟、王宠惠、吴稚晖等19人，并指派部员沈步洲、张继煦等九人组成教育调查会。26日，该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举范源濂、蔡元培为正副会长。

△　大陆银行成立，资本总额500万元，总行设天津。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英商福公司函订借款一项，以充道清铁路（河南浚县道口镇至泌阳县清化镇）添购货车之用。自是年7月16日起至1920年7月22日止，福公司陆续交与道清路局共12.6838万英镑18先令7便士。此项借款本息由该路局收入项下分期归付。

3月11日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电唐绍仪、朱启钤，责陈树藩无停战诚意，并请速电北京，严词阻止北京政府发给陈之大批军火运入陕境。

△　梁启超自巴黎电北京汪大燮、林长民，告以去年9月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私定密约，致使中国代表在山东交涉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之情况，指示汪、林采取补救行动。

△　奉天本溪湖煤矿大火，死矿工250名。

3月12日　徐世昌指令外交部“分别公布各种密约”。

△　北京政府财政部电朱启钤，并于同日发出通电，就唐绍仪追究北方发行八年短期公债事进行申辩。谓“非举债无以应付”，“断无黩武穷兵之理”。

△　曹汝霖、梁士诒等于北京梁士诒私宅邀集京津各银行代表，

商组大生银公司。曹汝霖、陆宗舆分别以交通、汇业银行总理身份与会。银公司预定资本总额1000万元，当场各银行认股已逾千万。25日午后3时，各银行代表再于梁宅集会，议决成立筹备委员会，推梁士诒为委员长，进行银公司各项筹备事宜。4月12日午后2时，银公司于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成立会。会间通过章程，正式定名为中华银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以承办或承募国家、地方及公司各种债款为营业”，总事务所设北京。随即组成中华银公司董事会，举梁士诒为董事长，周自齐、曹汝霖、陆宗舆、孙多森、冯耿光、吴鼎昌、周作民七人为董事。8月27日，徐世昌据财政、农商、交通三部呈请，令准中华银公司立案。

△ 徐世昌令准交通部设立航空事宜筹备处。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凡135条。

3月13日 于右任致函朱启钤，报告陕西东、西战场情形，指出：“陕战未停”，“陈（树藩）氏一方通电停战，实欺北京，并欺国人耳。”

△ 唐绍仪以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大仓组暗中拟定《中日合办南京凤凰山铁矿合同草案》损害国家权利，致函朱启钤，要求电北京政府予以阻止。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为厘订商船航律，设立航律委员会，派陆梦熊为会长。28日，公布《航律委员会章程》。

△ 墨西哥新任驻华公使罗梅路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 旅居吉林延吉数千朝鲜侨民，为响应朝鲜独立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当局开枪镇压，毙朝侨14人，重伤30人。

3月1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在京中外记者发布中日军事密约文书。计有：一、《共同防敌换文》两件；二、《撤退军队换文》两

件；三、《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四、《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五、《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说明书》；六、《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七、《中日陆军共同防敌终了时期之声明》；八、《中日海军共同防敌终了时期之声明》，并称中国与各国所订密约均将陆续公布，共有十五六件。

△　徐世昌任命张树元为山东督军。

3月15日　南方议和代表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北京政府言和无诚意情形再次通告全国。16日，正式发表第二次告全国书，其中仍着重揭露北京政府屡令陕西北军停战无效；继续增募国防军（即参战军）、提用参战借款；擅自发行八年短期公债等事。

△　于右任通电南北代表及全国各界，对上海西报所载靖国军出兵西安一事辟谣，并责北军仍违约进攻靖国军。

△　北京政府为纪念协约国胜利，午后3时于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公理战胜”纪念牌坊开工典礼。

△　晚9时许，重庆太平门外某宅起火。火势迅猛，由一码头转瞬延至二码头，并及城上房屋，白象街亦部分被焚。计城内外受灾铺户共千余家。据当时报载：“火光接天，全城震动，诚从来未有之大灾也。”

△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7日四国公使之说帖，认为提用参战借款为中国主权问题，各国不应干涉。

3月16日　旅居吉林朝鲜侨民，响应汉城三一独立运动，在吉宣布独立，吉林当局进行阻止，朝鲜侨民不服劝告，并起反抗，军警开枪毙伤数十人。

△　为摊派八年短期公债，北京政府司法部通知总检察厅，谓“公债发行如有不认购者，即适用民国三年妨碍内国公债条例办理”。

△　田什付沟中日商办煤矿公司在奉天本溪成立。资本60万日元，日人深川喜次郎及富华公司代表孟凌华出资各半。开设期限25年。按：此矿系日本帝国主义于“二十一条”中所夺南满九矿之一。

△　江苏省议会、商会、农会电北京国务院陆军部，坚决反对《中日合办南京凤凰山铁矿合同草案》，指出此项合同草案“实为和平障碍”，要求尽速取消。

3月17日　唐绍仪函朱启钤，指责北军在陕不遵令停战，略谓自去年11月16日北京第一次下停战令后，靖国军相继失去兴平、醴泉、武功、扶风、宝鸡、汧阳、陇县、盩厔、郿县等县；岐山、凤翔、乾县在包围中；交口、相桥、兴市、关山、修石头、红崖渡等处，战事尚极激烈；史家坡已于本月12日为陈军刘世珑所陷，“陈树藩实未遵令停战”，“此皆事实彰彰可考”。

△　徐世昌指令照准甘肃导河县太子寺添设县治，定名为宁定县（今广河县）。

△　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欧阳钦等89人，乘轮离上海赴法。

3月1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开始陆续公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与日、英、美所订各种密约，是日首次公布中美七厘金币借款合同（即《一九一七年中国政府整理运河七厘金币借款合同》）。

△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纾（琴南）函，申明北京大学教育方针系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日商合办中华电气制作所在北京成立，工厂设于上海，资本300万元，其中交通部出资150万元，以交通部电政司司长蒋尊祎为总裁。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分别签订借

款80万元及50万元合同，以民国七年八厘公债、盐余、烟酒税等为担保。此款用作财政经费。

△　上海“中日合办”兴发荣机器厂工人，因日本工头殴伤学徒，日本大班串通警察借端镇压、逮捕工人，自是日起全体罢工。

3月19日　于右任电唐绍仪，告以陕西东路为北军占去，靖国军关山吃紧，乾县之围愈急。次日又电称“各处战争，仍未停止”。

△　北京国务院公布《敌国人民财产清理规则》，凡19条。

3月20日　陕西停战划界专员张瑞玑电上海唐绍仪、朱启钤两代表，报告是日抵渭南，并称北手与靖国军在交口、相桥一带，均已遵令停战。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日币一千万元垫款合同》。

△　孙中山致函英人康德黎夫人，寄送《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书，并请复告英国朝野对“计划”之反应。

△　自称“振武军”之海盗，在广东雷州半岛之海康县属东海仔等处，焚掠13乡，毙52人，掳男女数十人。4月4日，窜至徐闻县属陈墟一带，焚掠300余户，毙400余人，掳男女百余人。

△　俄谢米诺夫白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幕后策划下，纠集内外蒙叛军及俄境西伯利亚布里亚特蒙古族反动分子，筹组“大蒙古独立国”。除2月间在赤塔举行会议外，是日又于中俄边境乌里亚举行第二次会议。谢米诺夫及内蒙伪代表觉赖博克、外蒙伪代表桑尔染喇嘛、布里亚特代表三比诺夫均出席。会议议决由觉赖博克于海拉尔筹设蒙古及布里亚特临时政府并预定正式设于库伦或海拉尔；派代表赴巴黎和会要求各国承认。

△　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刘师培发起筹办之《国故月刊》创刊。该

刊以反对白话文，宣扬封建道德文化为己任，攻击新文化运动。

3月21日　唐绍仪函朱启钤，揭露北京政府以大批军火运陕，不实行停战，请转电北京立即停止，以维和局。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日币一千万元第二次垫款合同》。

△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电北京政府吁请立即停战，并电催南北代表于7日内续开和议。

3月2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日币一千万元第三次垫款合同》。

3月23日　陕西停战划界专员张瑞玑于22日抵西安，是日以急特专电向南北双方报告陕西停战情形，称南北主客驻陕军约13万，集八省之兵，合数省之匪，星罗棋布于关内一隅。并告以一二日之内亲赴兴平、三原各战线与许兰洲、于右任各方接洽，商议停战划界事宜。

△　闽督李厚基电告北京国务院，福建划界事宜已由童葆暄、臧致平与陈炯明直接商洽。

△　全国教育会、商会联合会电巴黎和会，请协助中国收回青岛并废除“二十一条”及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所订各项铁路密约。

△　邓中夏等发起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正式成立。该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曾赴工厂、农村进行讲演宣传。

△　驻京英、美、法、日公使因北京政府以盐余担保八年公债，认为此举违反善后大借款合同，特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

3月24日　钱能训电朱启钤，称张瑞玑自渭南来电证明陕已停战，请上海和会先行开议。

△　英使朱尔典一再要求扩大上海租界，是日北京国务院开会，议决以人民反对为由婉言拒之。

△　北京政府恐西藏地方军叛乱引起英政府交涉，电请唐继尧、熊克武协助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从速平定。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民国五年《美商裕中公司铁路借款合同》。

3月25日　　张瑞玑电北京政府及广州军政府，主张陕西“战事既停，和会即当续开”。

△　北方议和代表汪有龄等访晤南方议和代表胡汉民等，商洽闽省划界事宜，汪表示北京政府已饬令李厚基遵照五条办理，希唐绍仪电军政府转令陈炯明依照办理。

3月26日　　上午，北方代表王克敏访晤唐绍仪，称张瑞玑既有来电证明陕省停战，拟请贵代表就此转圜，早日开议。唐以张电是否真诚，尚待证明，加以拒绝。下午，南方代表开会，交换对张电之意见，佥谓张电尚难征信，待张赴三原后来电证明停战，始可开议，并商请唐绍仪同意据此答复北代表续开和议之要求。

△　徐世昌令军事司法与普通司法各守权限，“嗣后各省区县知事不得以普通刑事案件请求划入军法范围，各军政长官对于不应归军法审判之案，亦不得率行受理”。

3月27日　　朱启钤访晤唐绍仪，希望谅解北方之困苦，早日续开和议。唐表示如陕西停战，参战军收束，参战借款停支，八年公债缓发，始能谈及开议。

△　陕西教育会、总商会联名发出通电，呼吁“和议即日赓续进行，以奠全局而苏陕困”。

△　北方各派系因八年公债分赃不均，形成内部利害冲突。是日，北京国会众议院议员周棠等百余人，借口龚心湛擅自发行该项公债，与法律甚相抵触，提出质问书，要求龚出席作答，并与保龚议员发生争执。29日，众议院议员杜棣华等14人复对龚提出弹劾案，罪名为："预算未交国会审议前，漫然发行公债，紊乱财政，辜负职责。"连署者40人。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民国七年财政部证券改借契约》。

△　北京政府大理院判决"宋案"要犯洪述祖死刑。4月5日执行绞决。

3月28日　朱启钤邀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代表谈话，告以已面请唐绍仪星期一（3月31日）开议，要求各代表再向唐敦促。

△　段祺瑞、徐树铮为保存并扩大参战军，以增加皖系实力，控制北京政府，并对南方继续称兵，经多次密谋，是日徐树铮将其所炮制之"西北边防计划"提交徐世昌批准。

3月29日　南方代表以商民迫切要求续开和会，是日集议商讨办法，决向朱启钤严重交涉，望对陕西划界、撤换陈督等要求作出明确答复。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民国七年10月9日在京签订之《马可尼无线电借款合同》。

△　徐世昌令何佩瑢署湖北省长。

△　驻京英、美、法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继承德国在川汉、粤汉两路原有之权利。4月26日，该部据阁议复准。

△　察哈尔龙烟铁矿（今属河北省）公司成立，官股128万元，商股212万元，日炼生铁200吨。

3月30日　徐世昌以陕西战事停止，令上海和会代表续开和议。

△　徐世昌任熊炳琦继胡龙骧为陆军大学校长。

△　安徽督军倪嗣冲无视举国对米粮弛禁之强烈反对，无视安徽省议会之抗议及芜湖民食维持会等团体迭电力争，竟将2.8万余石芜湖大米强行运往日本。

△　北京《国民公报》再刊载该报记者所撰《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一文。文章着重指出："思想自由，无论什么大力，是不可压抑的"；"新思想的进行，他们无论加以何等妨害，决不会戛然中止……决非压抑的力量所能打消。"

3月31日　唐绍仪函促朱启钤鼎力负责排除一切障碍，俾南北和议得以继续开议。

△　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电李纯，指责闽督李厚基对五条办法搁置不理，及北军越过原防向沙县、龙溪、莆田、仙游等地进攻。

△　奉天造币分厂工人400余名，为抗议厂长单伯宣扣发"红利"、延付工资、苛待工徒，举行全体罢工。后北京政府财政部被迫将单某撤职，工潮始息。

△　早8时，第二批留法勤工俭学生26人，乘日轮"贺茂丸"，自上海启程赴法。行前，有关方面曾于29日午后3时假法租界市政厅举行欢送会。吴玉章、朱少屏、彭志云（留法俭学会代表）等及法国驻上海总副领事均出席并发表讲话。30日午前11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复举行茶话会欢送。

4月

4月1日　北京政府电告朱启钤称，张瑞玑已由三原来电，望即

敦促南北和会开议。

△　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援粤军副司令吴佩孚、苏督李纯联名电促南北议和代表尽速继续开议。电中并建议："双方议题作一次提出，为一定范围"；"以今日时势及事实所必要，而确能办到者为标准。"

△　张瑞玑由三原返回西安，即日致电南北双方，报告陕西停战情况，称已与陈树藩商定，乾县战线均退后五里，关山退至关道及下邽，兴市军退至荆西北各村堡，并谓于右任已飞饬高峻速勒部下谨守原防。

△　张瑞玑电徐世昌、国务院，表示此次入陕，"只以息陕祸、促和议为第一义"，力辞留陕会同官绅办理赈务。

△　广州国会因议员离省者已200余人，致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开议，自是日起，遂接连召开两院联合会，议商促使各议员尽速返粤办法。后决定离省议员必须于一月内返回，逾期即取消议员资格。此外，尚议定具体措施多项。

△　北京政府盐务署与日驻济南领事及青岛守备军民政部签订《山东铁道运盐及取缔之协定》。

△　日使小幡酉吉至北京政府外交部，迫胁立即设法"遏止"延吉朝侨之爱国运动。扬言："倘中国无法遏止，日本不得已将派兵至延吉助华兵禁止。"北京政府当即电张作霖，令"剿灭满洲东部之韩人复国运动，并保护在满日领事及团体"。5日，北京政府再令奉、吉两省当道"尽保护日人之职；对韩民主倡暴动者，加以禁阻或驱逐"。

4月2日　北京政府电促朱启钤、唐绍仪续开和议，"倘再停顿，于国际和会必生障碍，中央准实践前言，完全负责"。

△　日本泰平公司理事须田次信面晤徐世昌，要求继续履行军械

借款合同。

△　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私设电话规则》，凡14条。

4月3日　　日本政府要求奉督张作霖取缔东三省韩民独立运动。是日，北京政府电告奉、吉、黑三督应严守中立，并禁韩民在境内进行谋划活动。

△　驻京俄使署为本月2日北京日报载将出兵外蒙古事，声称“违反恰克图三方面协约之义”，是日致外交部节略提出抗议。

△　北京政府电饬所辖各省当道，注意取缔“俄国过激党派”，并令外交委员会拟具详细取缔办法。

△　《民国日报》刊载北京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电，内称：“我等已再电和会，要求青岛等一切权利直接交还及取消1915年中日条约、1918年关于山东铁道各密约，请诸公等尽力主持。倘公等不能尽此职，请勿返国。”按：此电系汪大燮、林长民秉承梁启超3月11日巴黎来电之意旨而发。

4月4日　　南方议和代表开紧急会议，决定顺应舆情，定7日重开谈话会，旋将此议通知北方议和代表。

△　李纯电李厚基，请将闽省南北两军于上游划界之事早日议定，以息纠纷。同日，李厚基电复李纯称，闽省划界事宜拟定以厦门鼓浪屿为会议地点，先从海澄、江东桥及同安一带磋商，一俟下游一带议有办法，则将上游划界事宜赓续进行，并谓已商得陈炯明复电同意，已饬所派人员遵照办理。

△　陕西靖国军总、副司令于右任、张钫通电南北有关各方，告以“乾县敌军仍行攻击”。12日，于、张专电朱启钤，内称“乾县围尚未解……战事未已”，并谓陕西划界监视员张瑞玑处陈树藩势力范围

中，“其言论行动难保不为所利用，一切电函切祈慎察”。

△　徐世昌派沈步洲充欧洲留学生监督。

△　广州国会华侨议员李希莲等九人联名电南洋华侨各团体，请勿购买北京政府发行之民国八年短期公债。内称：北京政府向华侨劝募此项公债，“是扩充明和暗战主张，利用华侨膏血，残杀国民生命……希开会拒绝”。

4月5日　午后2时，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以梁启超潜往巴黎进行袒日活动，致使中国代表对日交涉深受影响事进行讨论。议决：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两院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

△　北京政府为防止“俄过激派内煽”，决定：“一、由沿边备省区酌布戒严令；二、商旅孔道设军警检查所；三、外部暂停发内地汉、回赴新传教护照。”

△　上海军警联合会策划防止“过激派”办法，决定从“严查轮站、禁止入境”入手。

△　福建省财政厅因需款甚急，与日人商定，以面值50万元盐公债券抵借20万日元，借期10月，每月行息一分三厘，另加经手费一万元。午后3时，由该厅科长陈翰代表厅长费毓楷签押成交。

△　驻京荷公使欧登科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4月6日　张瑞玑由西安电南北和议双方代表，告以陕西已无战事。

4月7日　南北和会代表恢复谈话会，决定次日续开谈话会，9日正式开议。

△　代理阿尔泰办事长官张庆桐以私印纸币发放军饷，激成兵变。变兵通电宣布独立。10日，北京政府举行阁议，决派新疆驻军前往镇压，并将张庆桐撤职。

4月8日　南北和会续开谈话会，就会议程序达成协议。

△　吴鼎昌自北京电朱启钤，内称：此次会议，“同人态度似应强硬，力往决裂一方做去，再以金钱为饵，或可使少川（唐绍仪字）就国会问题之范围，此事或有万一之结果”；并于同日另电称：“万不得已时，以代表决裂为政府留余地一节，昨已陈述府院，均以为然。”

△　山东省各界为向国外阐明山东问题真相，反映各界意愿并争取国际舆论支援，特举派代表孔祥柯、许天章二人是日乘中国邮船公司“南京号”轮离上海赴美、法、英三国。孔、许二人曾先后抵旧金山（圣弗兰西斯科）、芝加哥、纽约、巴黎、伦敦、华盛顿等城市进行宣传、申述，历时将近五个月，于8月30日返抵上海。另，该省各界于孔、许二人去后，复举派代表柯汉径往巴黎，为争回山东利权进行呼吁。柯于5月27日抵巴黎，随即电济南当道并转北京政府，力言勿签和约，以为日后补拯之路。

△　北京国民外交协会电在巴黎的梁启超，邀他为该会代表，并寄上中、英文请愿书各一份，请其转呈中国代表及巴黎和会。电文并谓：“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

4月9日　南北议和正式复会。午前9时，双方代表举行第六次会议。两总代表分别提出具体议题。唐绍仪首先提出需继续讨论解决之旧议题六项：“一、取消中日军事协约；二、裁撤国防军机关及所属兵士；三、参战借款不得提用；四、和平会议未终了以前，双方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五、陕西问题；六、湖南问题。”继提出新议题十三项：“一、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二、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

制度；三、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征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浚河道以安插兵士；四、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军费、军实；五、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六、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七、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八、指定专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九、整理财政，免除厘金；十、贩卖人口、贩卖烟土吗啡、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严行禁绝；十一、惩办祸首；十二、各省治安善后问题；十三、整顿海军问题。”朱启钤提出之议题为：“一、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束问题……；丙、军需独立问题。二、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丙、地方自治……；丁、发展国民经济……；戊、善后借款问题……”会间，朱启钤以“含有对抗形式”为由，要求唐绍仪将其所提十三项新议题中之第一、第七、第十一各项撤销。双方争执良久。后朱表示对于第十一项，即惩办祸首一项，“认为绝对不能列入议题”。午后2时，继续开议。唐同意第十一项暂不作为议题。旋会议改为谈话会。

△　朱启钤电吴鼎昌，告以“国会问题现已接洽，定为最后商议之案。除根本解决外，几无别法可想”。同日，吴鼎昌电朱启钤，内称：关于国会，“本日在院与揆席（按：指钱能训）讨论法律问题，决定采根本解决之法，不必迁就两会，致遗后患”。电中再嘱，“一面以强硬手段对付少川”，一面“牺牲金钱”，以利诱之。

△　南方将领林葆怿、莫荣新、李烈钧、李根源、吕公望、方声涛、程潜等通电，主张军人不干涉政治。内称：“和会已开，一切问题自有正当解决。惟吾辈军人有不能不速自反省者，法律一经解决，军事即须独立于政治之外，使军政分轨。”此电随即得到北方将领张怀芝、靳云鹏、曹锟、张作霖、王占元、田中玉、李纯、姜桂题、赵倜、张树元、陈光远、孟恩远、鲍贵卿、李厚基、吴光新、蔡成勋等分别通电响应。

△　湖南靖国军总司令程潜上书孙中山，请南方坚持和议初旨，

万勿轻易让步。

△　南北双方在厦门鼓浪屿举行闽、粤军划界会议，是日开议，至6月23日结束，决定划界条款八条，规定闽、粤军队一律严令前方实行停战。

△　江苏省长齐耀琳发布“训令”，严禁全省各校学生购阅进步出版物。

4月10日　钱能训电朱启钤，对双方议题改编为五案表示认同，并称“五案所有问题，大抵皆统一后实行之事，既云统一，自应悉由中央主持”。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民国七年《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及《中日间之铁路借款换文》。

4月1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民国七年8月27日签订之《马可尼无线电话借款合同》。

△　夜，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离东京返国。行前中国留学生30余人赶往车站，痛斥其卖国罪行，并以卖国贼呼之。

△　午前10时许，蚌埠大火。延烧1时50分之久。南自菜市，北至船塘，西至火星阁，尽成瓦砾。计死亡160余人，焚毁店铺千余家，损失约千万元。

4月12日　段祺瑞于私宅召集皖系要员会议，南北和会北方代表方枢报告称，对于国会问题双方代表多主张先恢复民六宪法会议，于南京开三读会，通过宪法，并追认徐世昌为总统。与会各人一致反对；并确定由参众两院议李盛铎、王揖唐面见徐世昌、钱能训提出质问，迫徐、钱表态。会间有议员提议取消朱启钤北方议和总代表资格。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民国七年《中日电报借款合同》及其附件。

△　全国和平联合会电出席巴黎和会之美、英、法、意政府首脑，声明誓死否认“二十一条”及1918年中日铁路密约，坚决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要求直接归还中国，请主持公道。同日就上述事项另发三电：一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据理力争；一电北京政府，要求将不平等条约一律宣布取消，以保主权；一电各省团体，呼吁速电中外，以示举国一致之民意。

△　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商会代表抵上海，向南北议和代表递交公函一件。函中请速电巴黎和会各国代表，声明否认“二十一条”及1918年中日铁路密约，并要求和会支持将德国所占山东一切权益直接归还中国。另请电促北京政府，立即宣布取消前项中日密约，以保主权。

△　广东省第二届省议会选举黄嵩龄为议长。

△　上海实行夏时制；天津、烟台相继实行。

△　俄谢米诺夫部白军在赤塔大肆抢掠华商，各金厂被劫一空。损失仅就已报商会者计，即达60万元，并殴伤华工40余人，劫持50余人。

4月13日　北京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谒徐世昌，陈述安福系反对上海和会所提南京制宪、追认总统等主张，希望徐予以支持。徐则表示：“余无成见，但既予代表全权，未便有所表示。”

△　朱启钤电北京政府财政次长吴鼎昌，告以南北和会第六次会议情形，谓“目下困难问题，仍在国会”。“同人窃揣，国会问题不能解决，则其他问题讨论审查即有结果，亦属泡影。现拟研究万一因法律问题无法进行，裁兵借款案，能否设法使之单独成立”。并盼其“即日

来沪，共商一切”。

4月14日　李盛铎、王揖唐会见钱能训，陈述安福系对时局之主张，并询问政府对国会之意见。钱表示国会为根本问题，万难动摇；南京制宪之说，政府已由朱总代表表示否认。

△　协约国共同监管西伯利亚俄路及中东路委员会召开各国武官代表特别会议，磋商护路军防守区域问题。议决中东路全线由中国军队防护。会间日本代表竟提出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须受日本联军总司令大谷指挥之无理要求。5月20日，英使朱尔典迫北京政府同意日方要求，并威胁云：“否则如延误运输，应由中国负责。”5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英使，华军守护中东路无碍运输，对日方要求不能同意。

△　钱能训电朱启钤，表示对南京制宪之说，中央已难赞同，希望南北双方代表拟定宪法草案及选举组织法，新旧两国会通过公布。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民国七年海军部与日商所订《中日无线电台正合同》及《中日无线电台附则合同》。

△　张作霖令东三省地方长官严行取缔“过激派”。

4月15日　于右任、张钫联名电唐绍仪、朱启钤，指责张瑞玑关于陕省停战通电，违背事实，蒙蔽和会，污蔑靖国军。

△　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提出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即“二十一条”）说帖，同时认为1917年二三月英日、英法之密约，应随中国对德宣战而作废。

△　北京国务会议批准张作霖与日商合办辽阳弓长岭铁矿。

△　全国报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发起人汪彭年，主要筹备者吴铁城，办事处设上海静安寺路22号。23日，该会选举叶楚伧

为书记长，并通过该会章程。

△ 遣送敌侨事务局因遣送事毕，即日撤销。

4月16日 巴黎和会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讨论山东问题。美代表提议德国在山东各项权益由五国暂收，“俟中国将青岛及山东省内要点，按照协约国另议之办法开作商埠后，即将前项各权利利益交还之”。日本代表反对。其余三国代表因事先各该国政府已与日方达成默契，故均不表态。

△ 南北和会讨论公推委员组织军事委员会，议决由双方总代表各推四人，于若干日内在北京成立。

△ 徐世昌核定全国军事改编议案，按省之大小及要塞多寡分配驻军。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次序表。

△ 广东省长翟汪令各县防范“过激党”煽惑工人。

△ 山东省长沈铭昌与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冈部三郎等，于济南签订山东短期借款第一次延期合同。言明1918年9月1日所订山东实业借款合同（款额350万日元）再延期一年，至1920年3月1日归还。此项借款仍以原合同指定之各项税金及山东省库券200万元为担保。约中并规定，日后山东省如调查及兴办实业，必先与该公司磋商办理。

4月17日 北京新国会议员王郅隆、李盛铎、王揖唐等330余人通电声明，南北和会不应涉及法律（即国会）问题。

△ 唐绍仪就南方代表在和会中提出法律案遭到北方代表抗议事，电广州军政府请确定应付方针。

△　午前11时，上海民议联合会、华侨联合会、对日外交后援会、陕西同乡会等七团体代表前往南北议和会议地点，向双方总代表递交公函一件，并附各团体决议五条。要求取消一切中日密约，取消参战军及参战借款，惩办卖国之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章宗祥、靳云鹏等人；并宣称南北和会议决之条件，倘有一方不予执行，即与全国国民共声讨之。

△　徐世昌据司法总长朱深呈，以“各省议会对于司法官吏时有咨请查办之举”，令重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勿相侵越。

△　北京政府财政部以民国元年、七年公债票面等项为担保，同日商东亚兴业公司签订借款300万日元合同，用作财政经费。

△　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8000余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厂方被迫接受工人所提条件，21日罢工胜利结束。

4月18日　广州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通电声明，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实为和议中之根本问题，表示对于法律问题，一致主张坚持到底，以符护法初衷。

△　北京众议院开质询会，钱能训率国务员出席，并发言表示维持新国会，不赞成以旧约法召集新国会及在南京开旧国会。

△　徐世昌批准财政部币制局所拟实行统一银币办法。19日，再批准该局所拟限定各种纸币及有价证券印刷办法。

△　于右任、张钫电唐绍仪，报告陕省“乾围未解，乾战未停”，并谓：陈树藩于北廷命令直弁髦视之，务望严重交涉，速解乾围。

△　陕西省议会议员杨直等18人电南北和会代表，历数陈树藩八大罪状，要求立即撤换陈树藩。

△　日人冈部三郎与奉天省公署合资开办福泉煤矿无限公司。资

本20万日元，冈部出资11万日元，奉天省公署出资九万日元。开设期限30年。

4月19日　北京政府陆军部总长靳云鹏、参谋本部总长张怀芝联名通电赞同军人不得干政。

4月20日　钱能训因安福系事事掣肘，向徐世昌提出辞呈。后未获准。

△　山东各界10万余人在济南南关演武厅前广场召开国民请愿大会，要求省长沈铭昌转电北京政府，坚持青岛及山东路矿由巴黎和会公判直接交还中国，并惩办祸首，废除非法密约。21日，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再以1.97万人名义分别电北京政府及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前电促徐世昌、钱能训等“俯顺舆请，恢复主权，并将外交方针明白宣布，以平众愤而释群疑”；后电要求各代表力争无偿还我青岛及山东路矿。

△　晚7时，广东善后协会在上海开正式成立会。该会由广东报界代表吴铁城、吴永生发起组织。因西南护法军兴，广东损失极巨，亟应妥筹诸项善后事宜，故成立斯会。该会公举徐绍桢为主席董事，并举廖仲恺、冯自由、吴铁城等40余人为董事。

△　驻湖北施南（今恩施）方面南军唐克明部与北军王懋赏部，于中立地点建始县划界停战，是日签字。

4月21日　广州军政府电唐绍仪，指示“国会问题关系护法主旨，务恳依照前所决定议和大纲，毅力坚持”。

△　钱能训函复新国会议员王郅隆等，谓：“此次上海会议，本为解决国内纷争问题，法律亦其一端。所派代表负有解决时局之责，对于此项问题自不能存而不论。”

△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开正式成立会。会前由北京政府

教育部指定张一麐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该会自即日起举行会议，至25日闭会。其间通过有关议案九项。

4月22日　巴黎和会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讨论青岛问题，上、下午会议分别邀日、中代表参加。日代表对青岛问题暂交五国（含日本）保管，再行归还中国之提议，不予接受。路易乔治提出：准许日本依中德条约享受在山东之权益；或依中日条约，承认日本在该省之地位。听由中国择定。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表示皆难接受。结果该问题交三国专门委员核议。

△　北京政府教育部举行会议，讨论通过国立大学之大学院得授予文理法商博士学位，社会有名望学者得授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　闽粤边防督办方声涛将所部军队改编为福建靖国军，是日就总司令职。

4月23日　西南五省各军代表电唐绍仪，请力争广州“国会完全自行行使其职权”，以符护法初旨。

△　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派方还为校长。

△　法舰在广东越界拘捕华商船只，广州军政府外交部就此向驻广州法领事提出交涉。

4月24日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向三国会议提出解决山东问题四项办法：一、胶州湾权益暂交付英、美、法、意、日五强，以便于五强还付中国；二、日本于一年后交出胶州湾；三、中国赔偿日本青岛战争之军费；四、青岛辟为商埠。

△　梁启超自巴黎电北京外交协会，报告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山东交涉遂告失败。提出“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　于右任电南北和会南方代表李述膺，报告陈树藩于是日下令猛攻乾县，声明非攻下乾县决不停战，并请奉军许旅助攻。于电并要求和会严惩陈树藩。

△　汉粤川铁路督办、北京政府交通部技术监督詹天佑病逝于汉口。

△　北京政府教育部与美商花旗银行签订借款30万美元合同，以关余为担保。此款用作该部所辖各校经费。

4月25日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训令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否认五国共管山东利权。

4月26日　北京外交使团会议，决对中国实行禁运军火，直至中国成立统一政府时为止。旋由公使团团长朱尔典将此项决议备文分达各公使征求意见，亦均获赞同。

△　中国实业银行成立，总行设于天津，官商合办，资本200万元。

△　广州国会粤籍议员俱乐部发表广东省37县因护法所受损失统计报告。计死亡6520人，财产损失7863.6880万元。

4月27日　广州国会议员49人联名电南方议和代表，请坚持惩办祸首。内称："民国八年，政变四作。始于毁法，终于大乱。则凡此毁法之徒，即为乱国之贼。置此不惩，后患无穷。"

△　徐世昌令：无约国人（即与北京政府未建交之各国侨民）"侨居中国境内，所有课税、诉讼等事悉应遵守中国法令办理。倘第三国有要求保护利益之事，应即根据成案一律拒绝"。并着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从速厘订无约国人民管理条例。

△　日本政府派军舰强行驶入我混同江（即松花、黑龙江会合处

以东部分，今统称黑龙江），阴谋侵占松、黑航权。黑龙江省民众急电北京政府，促与日方交涉。

4月28日　巴黎和会英、美、法、意四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提出对山东问题六款，其要旨为：将青岛还付中国，青岛开为商港，中日合办胶济铁路，聘日人为铁路警察教官等。日代表说明所提六条，表明日本对山东毫无政治野心，仅代享德国在山东之经济权而已。

△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55公团电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反对青岛由五国共管。要求“迅电巴黎和会各国代表主持公道，将青岛直接归还我国；并乞切电专使，坚持到底，勿稍让步”。

△　徐世昌据内务、司法两部呈报，令禁止兼理司法各县知事藉案勒索。

△　自是日起至8月16日，北京政府代理外交总长陈箓与日本正金银行陆续签订总额40万银元借款合同，以关余为担保。

4月29日　巴黎和会英、美、法三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美代表蓝辛提出日本表示将山东交还中国应以文字声明作保证。日本代表反对。

△　日本内阁会议议决颁布对中国实行军火禁运令。禁运种类包括步枪、机关枪、炮、兵工燃料、火药、军刀、刺刀及各种附属品。

4月30日　巴黎和会英、美、法三国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让与日本。此决定列入《凡尔赛和约》第八号第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条。中国对于山东问题之交涉失败。

△　广三铁路局与自商亲善公司签订借款10万元港币合同，以广三路收入为担保，充作购煤用款。

△　中法储蓄会在上海正式开幕。

4月下旬　　四川南军熊克武部与北军刘存厚部议定，各以原防线为界停战。

5月

5月**1**日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面告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之决定，以主权交中国，经济权付日本。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　北京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内称：“闻日代表强欲占据青岛及山东铁道，又欲承认一九一五年中日协约及一九一八年之密约，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此种要求，请以全力抗拒之。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名。”同日，该会另电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内称：“德国在山东省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如许日本在山东省有权利者，吾等决不承认。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电中并声明，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二十一条”及1918年之中日密约。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借款430万法郎合同。以尚未修筑之钦渝铁路库券为担保。此款用于购入中法实业银行第二次股本。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派湘鄂铁路局局长颜德庆继詹天佑任协约国共同监管西伯利亚俄路及中东路委员会技术部代表。6月19日，改派谢学瀛代理。12月15日，再派该部参事王景春继任。

△　北京《晨报》副刊出版“劳动纪念节专号”，此系中国报纸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　广东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因当地匪患“屡见迭出”，极为猖

獗，而驻军、官宪通匪纵匪者复比比皆是，民愤极大，是日再次会衔通电各属，提出规定四条，令“认真缉捕”，以缓舆情。

△　美国哲学家杜威应邀来华讲学抵沪。

5月2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决定致电巴黎和会，要求将山东直接交还中国。

△　总统府顾问、外交委员会干事长林长民接到梁启超上月24日自巴黎来电后，是日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又谓：“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召集学生代表百余人开会，讲述巴黎和会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情形，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　山东工人3000余人在济南举行演说会，要求收回青岛。

△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上海江苏教育会馆演讲《实验主义》，介绍杜威思想。

5月3日　　蔡元培得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走告：钱能训内阁密电巴黎和会代表签字于丧权辱国之山东条款，当即召集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宣布此讯，是晚北京大学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对策。高等师范、法政大学等校代表均与会，各校学生登台演说，决定原订于5月7日在天安门之游行大会，提前于4日举行。

△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干事长林长民为对付安福系光云锦等人拟提出《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之弹劾案，于是日自行解散外交委员会。

△　国民外交协会开全体职员会，讨论力争山东主权办法，议决于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发表正式宣言，并分电各省各团体

同日举行。

△　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谓：“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谨合呈大总统，请即开去全权。”旋国务院复电慰留。

△　北京国会山东籍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出查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长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总统速行下令将三人褫职交法庭严讯办理。

△　北京总商会电上海总商会、各报馆、各团体，吁请急电巴黎和会力争山东问题，并电嘱中国代表万勿签字。

△　新任意大利驻京公使嘎坝娑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徐世昌特派张謇督办江苏运河工程事宜；并派韩国钧为会办。

△　北京政府根据日本政府要求，是日通知日本政府，同意将所有经由珲春关及延吉分关输出、输入各种货物，均减税三分之一。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比利时铁路电车公司再次签订借款2000万比利时法郎合同，以在欧洲发行同样数额之七厘国库券为担保。此款充作陇海铁路经费。21日，徐世昌批准按既定借款条件发行该项债票。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政法专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汇文大学、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13所学校学生3000余人，手执小白旗，上书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字样，齐集天安门，发表演说，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2时半开始游行，沿

途散发传单，号召：“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召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各校整队出发前，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及教育部代表均闻讯赶到，力阻学生游行，当遭严词驳斥。游行队伍先至东交民巷西口，学生代表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向美国使馆递交说帖，旋赴其他使馆，遭守兵阻止，乃转赴东城赵家楼曹汝霖宅。曹闻讯逃匿，众遂痛殴适在该处之章宗祥，并火焚曹宅。警察赶赴现场镇压，捕去学生32人。

△　晚，钱能训于其私宅召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学生运动办法。会上，教育总长傅增湘受到指责，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等主张解散北京大学，傅表示反对，并以去就力争。次日傅增湘向徐世昌提出辞呈。

△　北京专门以上各校学生2.5万人电各报馆、各省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学校、各团体，吁请5月7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　留日学生救国团分电南北两政府，内称：“山东青岛系我生死，日使强争由中日解决，国命危在旦夕。乞电专使严拒签字。决裂宁勿屈，生等誓死为后盾。”另通电全国，呼吁一致力争山东，“并望各省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办法，电告政府始终坚持”。

△　午后4时，在北京之留学欧美人士开紧急会，议决“致电巴黎和会四大国代表，要求对于中国问题秉公办理”；另“致电巴黎中国委员，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

5月5日　　上午，北京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代表集会，议决：请各校校长见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由各校联合致函徐世昌，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各校自是日起开始罢课，至释放被捕学生为止；通电全国教育会、商界，请一致行动；电上海议和会议，请主持公理；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对青岛问题死力抗争，万勿签

字。下午，各校学生3000余人于北京大学开会，段锡朋主席，一致通过上述各项决议。同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　北京各学校校长闻悉学生被捕，在北京大学开会，到14校校长，推蔡元培等七校长为代表往京师警察厅要求释放学生，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告以此次捕人系出院令，遂又往教育部，因傅增湘辞职，乃转而赴府院请愿，徐世昌、钱能训托词不见。

△　是日及6日，北京总商会就爱国学生被捕事开紧急会议，议决："一、不购日货；二、急救学生；三、以本会及全国商会名义电欧会力争。"

△　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各校校长查明"五四"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并以部令威胁各校学生勿得再有所举动，否则亦以开除论处。

△　上海30余所大中学校、商业公团联合会、日报公会、律师公会等团体及全国平和期成会联合会、江苏省学界、教育会等，纷纷通电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坚决要求北京政府立即开释。

△　天津中等以上各校学生5000人于南开学校操场集会，筹商营救北京"五四"被捕学生办法，议决除吁请商界协助外，并推举代表往见署直隶省长曹锐，请其专电保释北京被捕学生等。

△　浙江杭州之江大学开全体会，议决联络杭州各校组织杭州学生联合会。12日，该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爱国示威游行。随即组织演讲团，深入工商界进行抵制日货宣传。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在爱国舆论压力下，被迫提出辞呈。8日，徐世昌指令慰留。

△　成都《川报》报道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消息。高师学生闻讯，立即议决拍电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要求北京政府惩办曹汝霖、章

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德和约。随后成都30余所大中学校数千名学生齐集至公堂前广场开会，发表演说，并举行爱国游行，赴军署、省署请愿。

△　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至11月11日停刊。

△　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发表题为《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捣乱》一文，诬指“五四”学生游行示威为“乱民之暴动”；为“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　新任古巴驻华公使何锡巴纳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5月6日　　徐世昌为“五四”北京学生游行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等情事，责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藉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

△　北京国务院函达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禁止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同日，吴炳湘奉徐世昌令，亦函该会申禁；并布告各界，届时“幸勿前往”，免遭“镇压”。

△　孙中山指示《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

△　朱启钤、唐绍仪分电徐世昌、钱能训，对“五四”游行示威咸表同情，并请对被捕学生从宽处理。唐致徐电中有云：“欲罪人民之以我犯禁，必先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　南北和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议决由朱启钤、唐绍仪联名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对于违反中国利益之和约，请勿予签

字。

5月7日　　北京被捕学生经蔡元培等保释，京师警察厅将所捕32人派车送返各校。

△　北京出现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传单。传单题为《青岛亡，山东亡；山东亡，中国亡》，呼吁四万万同胞“分头实行”组织救国十人团。传单并附“救国十人团的办法”，规定十人团成员应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提倡储蓄，准备组织“国民储蓄银行”及“国民实业总公司”。该传单自8日起由京、津报纸分别刊载，沪、渝报纸亦予报道。

△　北京国民大会因军警阻禁，会场由原订之中央公园改在先农坛举行，到七八百人，复遭军警解散，后举代表200余人至国民外交协会开会，通过取消“二十一条”，胶州、青岛直接交还中国等四项决议，电达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

△　上海各学校、团体为力争归还青岛、援救北京被捕学生，于是日开国民大会，到两万余人，举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为主席，议决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请力争青岛，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等四项决议。会后结队游行。

△　山东济南各界62团体开国耻纪念大会，到三万余人，议决发电四通：一、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二、电上海和会要求“力伸公道，维持国法”；三、电巴黎专使警告切勿“冒昧签字”；四、电北京大学表示声援。

△　湖南长沙各校学生闻青岛交涉失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　山西太原各校学生2000人于省议会开会，议决誓死力争青岛，并联合全国学界一致行动。

△　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协和女医学校、协和女子大学、贝满女

校、女师附中等女校学生代表40余人集会，商讨救国方法。议决以北京女校全体学生名义发电数通，其中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电要求于山东权力“祈力争，勿签字”。另发布通告，呼吁全国女界同胞勿甘落后，奋起救国。

△　上海杨树浦恒丰纱厂职工，是日在厂门两侧张贴标语：左曰“国耻纪念日”；右曰“禁止日本人进厂”。8日晚8时，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商讨抵制办法。会上宣布：“自今以后永与日人断绝工商关系”，并议决举代表与各纱厂及各界联系，以期一致进行。

△　江苏无锡爱国店员组成“五七团”。宣称：“组织斯会，誓尽匹夫之责，求补国事之艰。”该团初以组织演讲及印发传单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后于1920年9月25日创办《五七月刊》。声言：“本刊之作，实欲谋人类之觉悟，社会之改造。”

△　东京中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赴中国驻日使馆集会，商讨山东问题对策，被日本警宪所阻。学生不顾阻挠，奋力前进，日警竟猛击学生，彭湃等29人被击伤、谭政等36人被捕。消息传至国内，举国愤激，纷电北京政府要求对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因参加“五四”游行被军警殴伤，是日病故。全国各地掀起追悼郭钦光活动。12日天津学生数万人，18日北京学生5000人，24日济南学生数万人，26日广州各校学生，31日上海学生三万人，均先后举行追悼会。6月1日以后。追悼郭钦光活动，在各地继续进行。

△　日公使小幡酉吉因各省人民皆酝酿抵制日货，竟要求北京政府“先事预防”。

5月8日　　徐世昌下令将5月4日逮捕滋事学生，着由京师警察厅送交法庭依法办理，并着有关机关整饬各校学风。同日，教育部训令京内各校严整学风。

△　北京钱能训内阁提出总辞。次日，徐世昌将辞呈发还，并召见阁员面留。

△　胡汉民上书孙中山，报告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孙中山批复表示愿尽力赞助收回青岛运动。

△　国民党人张继、戴季陶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的要求表示愤慨，指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最后表示希望日本"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则中国"必能弃旧恶，以与日本国民相友善"。

△　北京学界全体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内称："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务恳力争，万勿屈辱签字。"

△　东京留日学生总会电上海《救国日报》并转各省有关团体，请一致电促徐世昌令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并惩办曹、章、陆。

5月9日　　蔡元培为形势所迫，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声明自即日起与北大"一切脱离关系"，随即搭乘早车秘密出走，回故乡绍兴隐居。

△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蔡元培辞职离京消息后，立即全体集会，议决致函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同日晚8时，该校教职员亦开全体会，议决举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赴教育部，要求傅增湘设法挽留蔡元培。晚10时，北京28校学生代表往见傅增湘，力请留蔡。

△　北京实行戒严。北京提督衙门、京师警察厅宣布自即日（9日）起实行戒严。自下午6时至翌晨6时为戒严时间。

△　为纪念“五九”国耻，上海各校均停课一日，并开国耻纪念会。上海南北市各大商号亦多停业。书、布、棉、糖、北货、五金、药、钟表、洋货、杂粮、麸皮、麻袋等行商，均全体停业。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亦停止交易。旅沪商帮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拟定办法三条：一、实行提倡国货；二、不装日轮；三、不用日钞。并议决非将青岛收回及与日本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取消，誓不中止。上海三友实业社千余名工人一致议决，自即日起每晚工余举行国耻纪念讨论会，并于每晨击竹梆59响，提醒同人毋忘“五九”国耻。

△　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于小营操场开国耻纪念会。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赴军、省两署请愿，提出要求五项：“一、力争青岛；二、宣布及废除中日密约；三、尊重我专使在巴黎和会上地位及尊严；四、要求维持北京大学及释放被捕学生；五、敦促南北和会速行解决各种重大问题。”

△　晨，苏州各校学生代表于遂园集会，议决由全苏学生联电北京政府，要求“宁撤专使，不签丧失国权之约”；“武人干政，请从此严禁”；“释学生，惩奸邪，以谢天下”。午后1时，各校学生自公共体育场出发，绕城游行。沿途散发传单多种。是日，各校皆茹素，以示毋忘国耻。

△　江苏无锡各界于老城隍庙开国民大会，到者约万人。会间群情愤激，誓为外交后盾，并要求惩治卖国贼。同日，江苏扬州、松江及嘉定各校均开国耻纪念会。嘉定并于会后列队游行，分电各处，力争青岛。

△　浙江绍兴、嘉兴、吴兴各校均开国耻纪念会。绍兴并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力争青岛；嘉兴会后游行演讲，听者甚

众。

△　安徽安庆各校学生代表开紧急会，议决即日通电全国，呼吁力争青岛，并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

△　为纪念“五九”国耻，湖南长沙各校均停课一日。学生不顾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所颁戒严令，全体着白衣冠，结队持旗游行，呼吁各界，毋忘国耻。

△　为纪念“五九”国耻，陕西西安各校均停课一日，并组成学生联合会。旋电北京政府，要求力争青岛，释放被捕学生。

△　河南开封女界于老府门女子师范学校开国耻纪念会，到千余人。会间宣传妇女爱国之重要，并磋商抵制日货办法。

△　广州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议议决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维持各校现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　江苏省议会电北京政府，要求“严电欧洲和会专使，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签字。并恳我大总统英断，立将卖国祸首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段祺瑞诸人罢斥惩办，以谢天下”。

△　山东兰陵各界举行国耻纪念会。旋组织国民大会，议决抵制日货，禁用日钞及进行演说。

△　梁启超电北京政府，指出“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出于“爱国热诚”，“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

△　陆宗舆在全国舆论强烈指斥下，被迫提出辞呈。14日，徐世昌指令慰留。

5月10日　唐绍仪以书面形式向朱启钤提出下述八条，要求双方

协同办理："一、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三、立即裁撤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四、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五、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无效；六、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七、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以上七条如北方同意履行，则第八条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止。"

△　济南各校学生1.3万人为力争青岛、严惩国贼，原拟是日于演武厅开联合大会，议商进行办法，因遭山东督军张树元、省长沈铭昌再三阻止，遂改于省议会开会。会间公举代表六人面见张、沈，要求转电北京政府，提出："一、速电巴黎专使，据理力争，勿轻签字；二、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诸卖国贼；三、电沪会代表让步息争，同御外侮。"会后分赴各街演讲。12日，济南学界联合会正式成立。

△　北京学生联合会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告以"无论何项条约，如与中国自主权有碍，及违背南京临时约法与国际公法者，国民全体誓不承认。宁退出和议，万勿签字"。又电巴黎中国使馆转和会，声明"无论何国与其他国间对于中国所订一切密约……吾人断不承认"；并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否认"二十一条"及高徐、顺济铁路密约。另通电全国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报馆、学校，呼吁一致力争国权。

△　河南学界全体就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电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要求"电饬巴黎专使据理力争，即脱会亦所不惜"，并声明"全豫人民誓为后盾"。

△　苏州中等以上各校推举代表，组成苏州学界联合会。议决以

讲演宣传、调查国货为急务，并联络当地总商会切实倡导。另发表公电，吁请各地学界共策进行。

△　吉林省议会及各团体电徐世昌及国务院，要求速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早释被捕学生，并于青岛问题“死力与争，勿甘退让”。

△　长沙《湖南日报》、《大公报》就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屡次禁刊有关山东问题及青岛交涉失败消息事，向张提出书面质问。

5月11日　广州举行国民大会，到10万人，会后游行，游行队伍前往军政府请愿，提出三条要求：一、取消“二十一条”、收还青岛；二、严惩卖国贼；三、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岑春煊、伍廷芳出见游行代表，允向北京政府力争。

△　旅京山东劳动者数万人在北京召开大会，商讨山东交涉失败之对策，通过致徐世昌书，要求电饬巴黎和会专使严重交涉，勿稍让步。

△　全国报界联合会通电有关各方，吁请联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国权；并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同日，该联合会召开第七次常会，议决“以劝告形式通告全国报界，在山东问题未圆满解决以前，对于日商广告一律拒登”。14日，《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同时刊登启事，声明自即日起，“停登日商广告并日本船期、汇市、商情”。

△　午后2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于寰球中国学生会内开成立会。会间议定进行方法多项，旋发表《宣言》并将成立消息电告全国各校。《宣言》内称：“谨以是日共组学生联合会，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远近各地请即日响应，互通声援，以为全国学生自动的卫国之永久组合。”

△　上海传教联合会1300名基督教徒集于慕尔堂，“为国祈祷和平”。次日，电徐世昌及国务院请罢免曹、章、陆，并请“飞电驻外代表勿签字于不公道之条约”。

△　晚，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离京出走，行前向徐世昌再次提出辞呈。

△　张謇电徐世昌、段祺瑞，责怨二人推行亲日政策，擅订济顺、高徐两路密约，以致“全国愤恨，愈演愈激”。电中婉劝徐、段，为北京政府计，为自身计，速“从根本解决”外交问题，以缓舆情，而平民愤。

△　美国濮洛维登斯（今译普罗维顿斯）华人联合会致电上海申报馆，内称：“吾辈吁请政府与国民，对于山东之解决奋力抗议。并请全国团结，务获公允之解决。保卫国家之权利，以免续被侵略”。

5月12日　北京政府邀请参众两院议员开茶话会，商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咸主拒签。次日，政府再次邀集两院议员商讨，议员仍主拒签。政府拟将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巴黎和会陆徵祥专使暂缓签字。

△　吉林各界千余人齐集省议会开国民大会，议决三事：“一、游行街市，分途演说，鼓舞民气；二、谒见当道，合力电争青岛；三、军政长官如不见许，学校相率罢课，商工相率闭市，以待后命。”会后游行示威。至督军署，即由代表往见孟恩远、郭宗熙，遂向二人提出电北京政府力争青岛。孟、郭迫于情势，当即承诺代达。

△　山东济宁各界因青岛交涉失败，议决取一致行动，是日成立学界联合会。由各校及各教育机关分举代表一人为驻会干事。其办事大纲有三：一、印刷白话传单；二、实行提倡国货；三、组织演讲团。

△　浙江杭州中等以上各校学生3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往省议会请愿，请弹劾卖国官吏。同日，杭州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并电巴黎和会专使，青岛不归还，切勿签字。

△　江西南昌17所学校学生3000人示威游行，先后至省议会、军署、省署请愿，沿途散发传单，呼吁“力争青岛”，“诛卖国贼”。

△　留日全体中国学生通电国内，呼吁各方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力争青岛。同日，《民国日报》刊载留日学生18人致该报及《中华新报》、《救国日报》电，请转南北两政府，要求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立正典刑，以谢天下”。

△　北京政府财政部由黑龙江省长鲍贵卿出面，与日商朝鲜银行签订借款500万日元合同，以民八内国公债担保。该款450万归部，余款归该省。

5月13日　午前11时，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八次正式会议。唐绍仪就10日向朱启钤所提八条逐一进行申述，并声明此为南方谋求统一之最后让步。朱启钤当即表示，第五条与“力谋统一之旨背道而驰”，“无可讨论”，并谓“此项不易，他项终无可议”。唐绍仪遂宣布即日辞职。朱启钤亦表示将“引退”。和议至此实已破裂。

△　南北和会南方全体代表电军政府辞职。次日，北方全体代表亦电北京政府辞职。

△　北京国务院电各省，说明巴黎和会近况，谓“近得陆使来电，美国以日人抗争，英法瞻顾，恐和会因之破裂，劝我审查，（青岛主权）交还中国一语，亦未加入条文”。并告以连日召集国会议员开谈话之情形及政府之态度，要求各省发表意见，并劝告国人“勿再借口外交，有所激动”。

△　山西督军阎锡山致电北京政府，认为学生因青岛而发生之过

激表现，原为爱国心所致，恳勿惩办。

△　江西全省女学界电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要求力争青岛，必达直接交还目的。另电北京学界，声明誓为后盾。

△　河南开封中等以上15校学生千余人，于法政专门学校大讲堂开联合大会。议决分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及徐世昌、钱能训，要求力争青岛，万勿自屈签字。另电唐绍仪、朱启钤，请早日解决时局，一致对外。

△　北京大学学生于该校文科大操场焚毁昔日购储之日货。清华、农专、工专、医专、法政、中国大学等校学生闻讯，均全体表决与北京大学取一致行动。18日北京大学、汇文大学、第四中学、工专等校学生齐集先农坛焚毁日货。其他各校因天雨，分别就地进行。

△　浙江杭州各校学生4000余人齐集公共运动场开学生联合救国会，会后列队游行，并向浙督杨善德、省长齐耀琳递交请愿书，要求力争青岛。杨、齐答允代达北京政府。

△　浙江海宁硖石镇召开万余人国民大会，公决“以后不认陆宗舆为海宁人，以为卖国者戒”。次日，并将此决议通电全国。

5月14日　徐世昌在总统府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上海南北和会问题，钱能训及各部总长、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议长均出席，议决拒绝南方代表所提八项条件。

△　徐世昌令京外各校学生“务各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同日，又令京畿警备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军警督察长、京兆尹等，共维京师秩序。

△　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密电北京政府外交部并转徐世昌、钱能训，请示对德和约究竟应否签字。电中有云：“祥1915年签

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约……时期日迫，关系至巨……万祈迅即裁定，立速电示，俾有遵循。”

△　午后5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于直隶水产学校开成立会。与会各校代表举高工学生谌志笃为会长，南开学生马骏为副会长。

△　北京学生联合会对于青岛问题议决二事：“一、请求全国各公团署名，登报声明不承认日本在山东之权利；二、致电巴黎和会本国专使，要求对于和约不得签字，或于签字时注明对于山东问题誓不承认。”

△　午后2时，南京下关各界群众万余人于大舞台开国民请愿大会。议决四条：“一、对外办法：请愿驻宁各国领事转驻京各国公使，再转各国政府，于巴黎和会凭公理裁判，究竟青岛应否归还中国；二、对内办法：请愿本省督军、省长，转请政府力争；三、维持国货；四、联合各省一致力争。”

△　武汉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宣告武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间通过武汉中等以上全体学生5174人致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电，要求电令巴黎和会专使力争青岛勿懈，并请勿镇压北京学生运动。

△　上海虹口吴淞路一带人力车工人结成团体，一致拒绝日人雇坐车辆。此种爱国行动至是月下旬已扩展至全埠人力车工人。

5月15日　　徐世昌令准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以次长袁希涛暂代部务。

△　徐世昌令交通次长曾毓隽继詹天佑兼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　钱能训电朱启钤，完全否认唐绍仪所提八条，并令北方代表“克期回京，另筹解决”。

△　唐绍仪通电全国，公布在南北和会第八次会上所提八项条件。关于第五条国会问题，唐强调指出：“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可知恢复国会为救亡最急要之图。”

△　湖南省议会、教育会、农会、总商会电巴黎和会中外代表，坚决要求青岛由德国直接交还，并嘱中国代表勿擅行签字。同日电北京政府，除要求令陆徵祥等坚不签字外，并要求速罢斥曹、章、陆以谢国人。同日，湖南衡阳、零陵、郴县、桂阳等县教育会、各校学生、农工商会亦联合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即行释放被捕学生，并置曹、章、陆于法。

△　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揭露北京政府自5月4日以来，“始则坐学生以纵火伤人之罪，横加拘辱；继则徇奸人之私忿，假政治之恶势，力抗教育之新潮流”；甚至“竟欲破坏最高教育机关，摧残士气，遏绝舆论，倒行逆施，以求一逞”。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离京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声称“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

△　是日及16日，山东烟台各校学生一律停课，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还我青岛”。

△　山东蓬莱各校学生愤外交失败，举行示威游行，呼吁各界力争青岛。

△　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电复北京国务院，表示对德和约“似以誓不签字，徐图事后补救之说为较善”。湖南督军张敬尧复电请“俯采民意，毅力坚持……不达收回目的，决不可迁就签字”。湖北督军王占元复电表示请速电陆、王两专使“暂勿签字”。

△　上海沪杭甬转运公会议决，自是日起一律禁运日货，“若货主将日货自行报装者，一概禁予卸料”；并“知照各客商勿再采办日本货

物，以保国民权利”。同日，上海华商杂粮公会通告全国各团体，该会为抵制日本夺我青岛，议决三事：“甲、不用日币；乙、不进日货；丙、不进日船装来各货。”另，是日南市各钱庄亦议决不用日币；东庄洋货公所议决，全体同业停办日货。

△ 5月4日北京各校被捕学生32人获释后，是日具呈京师地方检察厅，提出被非法传讯三大不平；并质问“所谓‘法律’二字者，宁复有丝毫价值之可言”。

△ 《新中国》月刊于北京创刊。此系综合性杂志。常为该刊撰稿者有北京各大报记者及北京大学师生。同年12月15日出版第一卷第八号，其中载有列宁著作《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部分译文（郑振铎译）。按：此为目前所见列宁著作之最早中译文。

5月16日 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到300余人，讨论对德和约签字问题，王揖唐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字”。

△ 唐绍仪在上海会见群众代表，高度评价学生运动，指出：“此次北京学生怒潮，实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并谓：“所可惜者，学生所揭橥之卖国诸人，仅仅指为曹、陆、章等，不知曹等犹为附从，真正祸首，则固另有人在。”

△ 江西督军陈光远电复北京国务院，要求青岛问题“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

△ 福建厦门各校学生4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单，呼吁力争青岛。

△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夺我青岛及山东利权，安徽芜湖各界连日进行爱国活动。《皖江日报》、《工商日报》自是日起停登日商广告、船期、商情。17日，芜湖总商会开特别会议，决定一致抵制日货。18日，栈业公会决定不代售日本船票，不上日轮接客，拒绝日本

旅客；划船帮亦决定不接送日轮旅客。20日，明远电灯公司工人将电灯杆上日商广告全行拆除；居民亦群起将墙壁上日本广告悉数刷去。

△　广东灵山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校全体学生致电唐绍仪及各报馆，请力争“释学生，诛曹、章”；并称：“生等愿投笔从戎，杀国贼，伸义愤。”

△　驻琼崖（今海南岛）澄迈县李永昌所部第六十二营官兵全体哗变。19日，驻临高县李部第六十三营及第六十一营一队全体士兵亦哗变。变兵抢掠城乡后，遂与土匪啸聚澄、临滨海一带，约三千余人，谋夺海口。20日，琼崖商学各界代表急电广州政府各总裁及广东督军、省长，请速派师督剿。

5月17日　　午后1时，福建漳州各校全体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各生手持书有“抵制日货”、“还我青岛”、“勿作五分钟爱国”、“诛灭卖国贼”等旗帜，沿途并分送《哀求同胞一致对倭文》。旋集队龙溪商会门前，举代表往见商会会长，要求抵制日货，并联合各界筹办国民大会，以为外交后盾。该会长等咸表赞同。队伍遂径往公园进行露天演说。各界听者甚众。全场万余人，园几为之塞。演说达四小时，始各整队归校。

△　安徽合肥各校学生4000人，齐集卫衙大关公共操场开学生联合会。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18日，商学各界再于公共操场开国民筹商大会。议决拍电力争青岛，禁用日货。

5月18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并函告徐世昌，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各校学生自19日起一律罢课。宣言书中陈述学生失望者三；致徐世昌函中言及不解者六。要求北京政府“本全国之公意，对于青岛问题出不签字之决心，以固民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力挽傅、蔡诸公回职，打消以田应璜长教育之议，以维教育；撤废警备学生明令，以重人权；向日政府严重抗议，释被拘学

生，重惩日警，以重国权；恢复南北和议，速谋国内统一，以期一致对外”。

△　安徽安庆15校学生2400余人齐集公共体育场，开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午后1时许，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单，进行演讲，“闻者皆为流涕鼓掌愤呼”。安庆总商会于学生爱国热情鼓励下，立发通知，抵制日货。

△　早8时，开封各界于师范学校操场开国民大会，到1.1万余人。议决办法四条：一、要求北京政府电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如日本不交还青岛，即退出和会；二、联络开封15校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为外交后盾；三、由商务总会通知各县商会，勿再贩运日货，违者处罚；四、要求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同意学生于假日进行爱国宣传。

△　北京学生代表是日抵太原。虽经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饬所属多方阻挠，各校学生赴车站欢迎者仍千余人。途中讲演者数十团，听者无不愤慨。19日，太原学生广贴爱国标语，呼吁“大家快快起来救国，抵制日货”；“请学生继续民众运动，请报界发表民意，请当道提倡民气，不要摧残了青年爱国心”。

△　保定总商会电上海全国和平联合会，内称：“青岛外交势将失败，此间学商等界愤激异常。请电巴黎专使，坚持力争，万勿签字，以期挽回。”

△　孙洪伊电曹锟、李纯、王廷桢、陈光远、张树元、赵倜、阎锡山、孟恩远、鲍贵卿、李长泰等及驻北京各师、旅、团长，“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党徒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

5月19日　　北京学生总罢课。是日，北京专门以上18校学生3.6

万余人，及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一致罢课。北京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并于当日组成北京学生护鲁义勇队。旋致函徐世昌，内称“青岛山东之主权不复，即中国灭亡之朕兆，亦即我四万万人作人臣妾、受人鞭笞之朕兆也。学生等洞彼奸谋……爰组织北京学生护鲁义勇队，以备抗御外侮之需，以尽学生等匹夫之责”；要求徐世昌“允于学生等正课之外，加以军事上之训练”。

△　由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外交商榷会等团体代表联合组成之85人赴京请愿团是日抵京。当即向北京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欧洲和约关于山东各条，拒绝签字”；二、“废除高徐、济顺铁路草约”；三、“惩办国贼”。20日，请愿团致电上海报界联合会、天津《益世报》并转全国各团体，吁请“协谋挽救”。

△　山东蓬莱各界为力争青岛，于城内北河开国民大会，到约1.3万人。会间40余人相继演说。旋议定进行办法三条：“一、分电京、省、沪一致力争；二、组织游行演讲团；三、组织国货维持会，并与敌人断绝关系。”

△　上海学生联合会自15日发表宣言后，越四日，北京政府对所提要求迄无何种表示，是日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凡入会各学校，应于是月之22日同时一律罢课”，以为“最后之对付”；会间议决“遣派代表分赴各省，联络公私各校一致进行”；另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照准傅增湘辞职之命令。后因江苏省教育会“恳请暂缓”罢课，上海学生联合会乃于21日再开职员会，议决即日电北京政府，要求“于三日内作明白正确之表示，允上海、北京学生所请。如无答复，本埠各校于下星期一（按：5月26日）同时罢课”。

△　江苏宿迁各界痛恨外交失败，于城西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大会，到约5000人，有当场撕毁个人穿戴之日货者。会后示威游行。

△　美国人司徒雷登牵头创办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正式命名，司徒雷登任校长。

△　交通部长曹汝霖再次提出辞呈。21日，徐世昌仍指令慰留，并给假20日，令交通部次长曾毓隽暂代部务。

5月20日　北京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出山东问题咨文表明政府方针：“现由专使等在会提出抗议，如果无可转圜，政府熟权利害，决定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

△　徐世昌以陕西等省复行种烟，外人迭有责问，是日下令重申禁令。

△　徐世昌令准于新疆和阗（和田）县境西北哈拉哈什地方设置新县，定名墨玉县。

△　北京总商会开全体大会，到50余行业。议决：一、各行业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止贩运日货，违者从重议罚；二、不用日钞；三、不阅日人在京所办报纸《顺天时报》，不在该报登广告。当场并宣告成立国货维持会。该会附属于总商会，各商董均为会员。自北京总商会议决抵制日货后，各店贩运日货者一律停止。日人所开店铺均无人问津。日货迅速跌价。各界持日钞往日本正金银行兑现者拥挤异常，且各店亦均拒绝收用。《顺天时报》销数亦大减。

△　沪北各校正式成立共同救国会。议决开展抵制日货、演讲宣传、散发传单、成立义勇队等项活动。

△　午后3时，武汉学生联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到16校代表。议决主要事项有：“各校自组讲演团，组成数个，再合组一大团体。每校以五人以上、十人以下为一组，游行演讲”；“疏通报馆不登日商广告”；“以印刷物劝告各商会及富户，不存款某银行，并拒绝行使某银

行钞票”；“印刷中国青岛地图，暂印3000份”。

△　汉口洋广杂货帮集会，议决各店此后一律改售国货，不得再进日货；并“公同拟具愿书，以示决绝”。

△　厦门各界二万余人再于同文书院操场开国民大会，“筹挽救青岛之策”。会间议决发电数通，分致南北政府、英、美、法、意驻北京公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及北京、上海各报界，以示力争青岛决心。

△　湖北督军王占元传令武汉各中等以上20校校长：“转戒学生，切勿再生剧烈事端。”

△　江西九江各校学生痛外交失败，拟于南伟烈学校集会，共筹救济方法。官厅及南伟烈学校校长（美国人）均不准，是日遂全体罢课。以城内不得自由集会，旋举代表数十人同往乡间濂溪墓集议。决定四项：“一、实行军国民教育，各校均加兵式体操；二、实行救国储金，并分途劝导：三、各校成立救国十人团；四、组织学界联合会。”并议决举代表赴南昌，“与省中各校接洽，联合一气”。另，九江各女校学生亦连日分赴各住户，劝导女界不用日货。

△　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通电国内云：“山东问题关系中国存亡，速筹最后对待方法。此间当为后盾。”

△　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抗议中国学商界抵制日货。

5月21日　上海《新闻报》刊载山东第五师全体士兵一万余名敬告全国同胞电。内称：“窃自我国外交失败，举国愤恨。……前次北京大学诸爱国学生等，击章贼之骨，焚曹贼之巢，军人等不胜欢跃钦佩。……足见我同胞心尤未死，国尚未亡。……军人等惟以铁血为诸君后盾。希望我全国军人猛醒，万勿以南北二字存心，自相残杀，徒为个人争名利耳。”并谓：“各国素云强权不压公理，请看今日巴黎和

会，公理安在？！”电中呼吁全国一致共御外侮，速除国贼。徐世昌、段祺瑞等见此通电，极为惊恐，深惧激起各方军人联电响应，遂于22日派员驰往山东，指令山东督军张树元胁迫该师立即“更正”，声明“此电系他人假借该师名义冒发，该师不负责任”。

△　午后5时，北京中等以上22校校长往见钱能训，就北京学生联合会18日所提六项要求征询钱意。钱虽逐一作答，然语多敷衍塞责，不着边际。夜，各校长归告学生，劝上课。学生以无满意答复，均拒不复课。各校长见调解无效，遂于23日再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辞呈。

△　江苏镇江商界开全体大会，到约千人，一致主张力争青岛。

△　青岛问题交涉失败消息传至福建泉州，是日午后1时，当地中小学15校学生千余人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并进行演讲。听者甚众。

△　广东梅县学生联合会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严惩曹、章；并要求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誓争回青岛，不达目的宁退出和会，勿签字”。

△　徐世昌为南北和会破裂事发布通令，指责唐绍仪所提八项条件“外则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显失国人想望统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进和平之本旨”，表示“政府毅力肫诚，始终如一，断不欲和平曙光，由兹中绝”，当剀切电商撤回条议，续开会议，仍期同心“振导和平，促成统一”。

△　徐世昌免李长泰步军统领职，遗缺令王怀庆署理。7月31日，正式任王怀庆为步军统领。

5月22日　　济南各界愤日本侵夺山东，是日于南门外大校场开会，议商对策，到者10余万人。会间各团体代表相继演说。最后一青年泥瓦工人跃登讲台，痛陈劳动者受日人侮辱情形；并谓青岛未亡已

受此种痛苦，倘一旦归日本所有，其痛苦必甚于今日，且不止劳动者受此侮辱云云。听者无不感动，相约誓死力争。同日，济南21校学生联合抵制日货。

△　午后2时，福建漳州各界于公园开国民大会，到万余人。议决："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国贼；三、抵制日货。"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　京师警察厅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物《五七日刊》"未曾立案，违背出版律"为借口，通令禁止发行。当日，北大学生徐骥等四人为此前往警厅理论，被拘。23日，该刊不顾警厅禁令，继续出版。警厅即派警察四出搜索，见有阅者即强行夺去；并将承印该刊之文益印刷局封闭，经理拘押。《五七日刊》被迫停刊。

△　京师警察厅决定，自是晚起派员监视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发稿，并进行新闻检查。23日，《国民公报》新闻栏有空白两处，稿件被删。

△　"中日合办"庆云制材株式会社在哈尔滨开办，资本定额200万日元。华人张岱杉任总裁，日人三井木材部长守冈多仲为副总裁。开设期限30年。

5月23日　北京政府电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指示对德和约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

△　徐世昌公布《审理无约国人民民刑事诉讼章程》，凡六条。

△　北京政府内务部通令各省区，诬学生爱国运动"招友邦之责言，贻国家以巨患"，要求转饬布告各属一体"弭患"。

△　全国和平联合会电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内称："巴黎和会草案所拟关于胶澳及山东问题之办法，全国国民誓死否认。一致主张我

专使不得签字。……乃闻政府竟有主张签字之说。……国民闻之，至为愤骇。”要求“电饬专使切勿签字，以为挽救地步”。

△　早8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表罢课宣言并将罢课决定电告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参加罢课者有天津中等以上15校学生万余人。宣言历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种种罪恶，声明决心“抵制日本，且杀尽卖国贼以自救亡”。致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电中提出六条要求：“一、请政府明白宣布，青岛由日本处置一条决不签字；二、请将中日二十一条协约提出巴黎和会，要求废止；三、请设法取消民国七年参战军密约；四、曹汝霖、章宗祥卖国国人共知，请斥罢交法庭严惩；五、傅总长、蔡校长教育界泰斗，请收回准免命令，挽留回任；六、日政府拘殴留学生并污（侮）辱国旗，请严重交涉。”并宣称，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另拟定罢课后组织通俗讲演团、专贩国货、发行日报、组织新剧团等六项办法。

△　保定中等以上各校学生2000余人，为与京津各校取一致行动，是日亦一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宣言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生职责所在，义不容辞。”“谨于四月念四号（按：此系农历，公历为5月23日）共同罢课，以图国家之幸福。”宣言并向北京政府提出四点要求作为复课条件：一、“电告巴黎专使，对青岛问题决不签字”；二、“严惩卖国贼”；三、“将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中日条约于巴黎和会提出否认”；四、“挽留傅总长及蔡校长”。

△　济南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一律罢课。当日以“山东中等以上学生全体”名义发表罢课宣言，并将罢课决定电告徐世昌。宣言揭露北京政府“并非诚意拒绝”签署对德和约，“揣其用意，不过欲卖我山东，媚外以自固而已”。致徐世昌电中宣布“爰于5月23日起全体罢课，专待大总统将外交问题决不签字作正式之表示”。

△　黑龙江学生联合会成立。议决力争青岛，营救北京被捕学生，抵制日货。

△　北京《益世报》自上海《新闻报》转载山东第五师全体士兵敬告全国同胞电。当日京师警察厅即奉令禁止该报销行。24日凌晨2时，警察厅准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函开，以“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罪，将该报强行封闭，并将主笔潘蕴巢逮捕，转交地检厅判刑一年。其余发行、印刷二人被判拘禁二月。北京《益世报》为继续出版，立即实行改组。自5月27日起，与天津《益世报》一并正式归由美商承办。8月1日，北京《益世报》复刊。经理仍由杜竹轩担任，主笔由邓家彦代理。

5月24日　段祺瑞通电北京政府所辖各省当道，主张放弃山东主权，无条件签署对德和约。诡称“欧约若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此乃“借爱国以祸国也”。电中竟谓“一般青年学子为人利用，罢学废时争执青岛，纵蹈法网、犯国交而不顾，风靡一时，谓之爱国”，实则“受人愚弄，徒长嚣张之气，误己误国”。电末鼓动各省当道“保持治安，赞襄政府”，坚决镇压群众爱国运动。

△　福州42校学生共数千人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保存国土”，“还我青岛”。

△　江苏江都各校学生2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勿忘国耻”、“不用日货”、“争回国权”等口号。同日，江苏海安各校学生亦举行示威游行。

△　山东兖州各校学生成立救国联合会，举行示威游行，学生400余人参加。26日，各校演讲团分赴城乡各处宣传提倡国货，勿忘国耻。

△　山东益都各界闻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愤激万状。是日午后1时，特于法庆寺开国民大会，到万余人。各界人士相继演说，一致要求力争山东主权，严惩国贼，抵制日货。会后各校学生并列队游行街

巷，进行爱国宣传。

△　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得知天津中等以上各校学生罢课消息后，是日晨6时即召开全体大会，议决“自本日起亦一律罢课，以资联络一气”，并将罢课决定通电全国。

△　河南彰德（今安阳）各界组织国民救国团，是日开成立会。决议进行办法，计有：组织十人团，派员演讲，调查日货等项。

△　湖南辰州（今沅陵）为青岛交涉失败开公民大会，到2500人，“佥以此事关系国权，疾首痛心，誓不承认”。旋于次日通电全国有关各方，呼吁“务乞大张公愤，始终坚持，以保领土而维国权”。

△　北京政府陆军部代表丁锦与英商马可尼公司签订借款10万英镑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此款充作该部与马可尼公司合办中华无线电公司应出股本。

5月25日　徐世昌再令北京及外省官吏“悉力制止”爱国群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并谓“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

△　北京政府教育部就北京中等以上各校学生罢课事，训令京师学务局局长及各校校长，“督促学生限三日内一律上课”。

△　午后1时，广州50余校学生5000余人，假小南门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大会。会间一致通过电巴黎和会力争青岛及取消各种密约等10项动议；当即决定由各校派代表一人共同商讨进行方法。会后发出挽留蔡元培电。

△　午前11时，四川成都学界于少城公园开外交后援会，到各校男女学生约6000人，其他各界共万余人。“议决争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电请欧洲和平会议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各条”。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至督军署，举代表请见，要求“根据本日议决各项通电全国”。

△　午后1时半，南昌学生联合会于百花洲沈葆桢祠开成立会。到会各校代表200余人。会间宣布宗旨、章程，并举丁伟、汪宏毅为正副评议长。

△　湖北督军王占元得悉其所部军队接获山东第五师全体士兵敬告全国同胞电，是日午间，急召驻武汉各师营长以上军官入署集议。决定“除面嘱武汉各防军外，并飞电各地驻防之军队”，传示“不准外出游行”；“禁止军人与学生间集会行动”。

△　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林长民，曾就山东问题发表文章，内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日使小幡酉吉竟为此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北京政府经阁议后，未敢对此项抗议略置一辞。林长民无奈，是日致函徐世昌，请“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27日，林长民辞职照准。

△　南北军将领谭浩明、吴佩孚等通电恳请南北和会双方代表顾念时艰，互相让步，再开和议，务期和议早决。

5月26日　　北京众议院讨论国务院送交山东问题咨文，赞成政府“保留签字”方案，但以该咨文并非条约，难以开议为由，拒绝列入议案，随将咨文退还政府。

△　陆徵祥电告北京政府：“现在备就公函正式致英、美、法三国，将非保留不能签字情形明显表示，以观其后。”同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向巴黎和会提出保留签字之要求。

△　北京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广州军政府岑春煊等七总裁，要求撤回南方代表所提八项条件，续开和会。

△　孙中山约见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何葆仁，赞扬学生“爱国运动很好”；并建议“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

△　《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发表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五四运

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一词之使用以此文为滥觞。

△　上海学生联合会因北京政府对北京、上海学生所提各项要求至期仍无答复，遂按原决定宣布，自是日起上海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学生一律罢课。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沿途观者达30余万人。上海学生联合会当日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吁请一致行动，并发表罢课宣言。宣言有云：政府“屡颁文告，严儆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获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是日晨，上海中等以上52校学生二万余人齐集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宣誓典礼。誓词为：“民国八年5月26日，上海男女各校学生二万余人，谨在中华民国国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谨誓。”

△　晨，太原中等以上10校学生共2000余人一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内称：“今我国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沦亡之祸迫于眉睫。我辈士子既为人民中坚，自当首图挽救。奔走呼号，情有难忍；废学休业，义不容辞。……苟可以达救国之目的，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旋组成讲演团25组，每日外出进行爱国宣传。

△　天津南开学校全体学生所办《南开日刊》创刊。该刊系由该校原有之《校风》周刊改组而成。宗旨为：“鼓吹同胞之爱国心，唤起同胞之敌忾。”同年8月12日第六十期出版后自动停刊。

△　江苏沛县各机关团体于体育场开国民大会，到千余人。议决组织推广国货团，当场并焚毁日货多宗。27日，商会开特别业董大会，议决抵制日货办法五条。各商号相约于30日起一律停进日货。

△　北京政府司法部咨请各省当道转令所属，遇有散发传单、集众演说、同盟罢工等情事，即“随事查缉，依法严惩”。同日，并训令总检察厅转饬所属京外各级检查厅，遇有上述情事，“务当依法严予

诉追，毋得瞻徇宽贷”。

△　安徽督军倪嗣冲诬指芜湖《工商日报》“立论偏激，淆惑观听”，电令芜湖道尹署警察厅严加制止；并谓“如该报不服制止，应即停止发行”。27日，警厅即函令该报馆特别注意发稿，并派员前往检查稿件。同日，《皖江日报》亦被检查。

△　驻济南日本代理领事山田，以山东人民连日抵制日货，拒用日币，致使日人于胶济路一带所营商业大受影响，是日特向山东督军张树元、省长沈铭昌提出书面照会，要求“严禁抵制日货”，“惩办运动抵制之人”，并禁止散布日本镇压朝鲜独立运动消息。文末竟威胁云：“若督军、省长不为之禁惩，则我方将自由行动。”

△　陇秦豫海铁路督办与比利时公司订立1919年陇秦豫海铁路七厘国库券借款合同，规定以中国政府名义在欧洲发行2000万法郎国库券，用以充该路经费。是日由徐世昌批准签字。

5月27日　午前，武汉26校学生代表于文华大学集会，议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具体办法多项。越一二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以“武汉学生全体5959人”名义，致函湖北督军王占元、署省长何佩瑢，就彼等屡借“有妨秩序”、“有碍邦交”，动则制止学生进行爱国活动事，提出驳斥及警告。内称：“近日累读训令……于生等种种自由未免束缚太过。生等一息未绝，万难承认。”“况生等此举纯出爱国热忱，不越正轨，殊无干涉之必要。”“若极端压制生等……盖生等非特不甘为共和国无自由权之学生，亦且不甘为共和国无自由权之平民也。”

△　浙江各县代表千余人于台州（今临海）集会，议决呼吁三事：“一、抵制日货；二、留日学生全体归国；三、南北宜速统一。”

△　浙江海宁各界开国民大会，到3000余人。宣言与京、津、宁、沪各地一致行动。演说毕，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还我青岛”，“惩办国贼”；呼吁：“毋忘国耻”，“抵制日货”。

△　江苏常熟商会、农会、教育会联合召开国民大会，到约2000人。议决一致奋起救国，力争青岛。

△　安徽六安商会通电，声明“坚持到底不购日货，以为外交后盾”。

△　广西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成立。该团成立后，曾发动团员外出进行爱国宣传，并组织振兴国货会，实行抵制日货。

△　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韦尔德发出布告，禁止于法租界内散发抵制日货传单及劝阻购买日货；并威胁云：如有此类情事，即“按照扰乱治安律解送公堂罚办”。

5月28日　　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主张恢复旧国会，指出：“至今和议不成者，罪在不求之于国家组织之根本，而求之于个人权利之关系”，“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因此“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

△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约签字问题。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明确表示反对签字，陆徵祥、魏宸组未明确表态。五名代表中，拒约意见占优势。

△　苏州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万余人，于吴县公共体育场集会，宣布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宣言痛斥北京政府袒护国贼，拘捕学生，摧残教育，禁止群众爱国活动，遏抑人民言论自由，听任日政府迫害留日学生等反动行径。声明：“为救亡图存计，为教育前途计，为保障共和计，为爱护留学生计，于5月28日全体罢课。”

△　安庆各校学生因安徽督军倪嗣冲严禁抵制日货及进行爱国宣传，并派警察沿街撕毁爱国传单，于是日全体罢课，要求倪嗣冲恢复传单原状，并要求言论著作自由、发电自由、集会自由、演说自由。29日，安庆学生联合会将罢课消息通电全国报界联合会并转各报馆、

各省学生联合会，声明“誓与北京各校一致行动”。

△　午后2时，杭州学生联合会开紧急会议，“决于29日起一律罢课，宣誓救亡”。旋发出罢课宣言，指责北京政府“邪正不辨，功罪颠倒”，“直以国贼应予优容，教育无足轻重”。声明：“自本月29日始，生等全体罢课……共图挽救于万一。”浙江省长齐耀琳闻讯，急召各校校长至省署筹商对策。晚9时，省署正式“训令各校校长，即日一律放假”。29日再发“训令”，扬言“如有学生抵抗放假情事，当处死刑”。警厅则派员分赴各校，迫令学生限日出校；并知照各旅舍，不准容留学生。杭州学生联合会为此发表第二次宣言，将官厅镇压学生罢课运动种种反动行径通告全国。同日并发出通启一则，重申：“5月29日，敝处中等以上17校学生3000人实行罢课，与全国同学诸君一致行动。”

△　江苏徐州商会发起抵制日货联合会，各界到数百人。议决抵制办法两项，并由学生代表进行演说。

△　浙江乍浦各界开国民大会，到千余人。会间20余人发表演说。

△　美国旧金山（圣弗兰西斯科）中国国际同盟研究会电广州政府及上海各报馆，内称：“请全国一致反对日本山东问题之要求，并除卖国贼。”

△　徐世昌令准参谋部续聘日人柳川平助为陆军大学校教官，期限一年。

△　徐世昌准交通部所设航律委员会筹拟编订商船法规。

5月29日　广州军政府总裁陆荣廷、广西督军谭浩明、桂林将领陈炳焜、广东督军莫荣新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双方代表屏除私见，重开南北和会；南北双方让步，以最速期间回复统一。

△　南京中等以上21校全体学生3413人一律罢课。当日发表罢课宣言并将罢课决定电告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宣言内称：随津沪之后，实行罢课；冀“合群策群力，以同赴国难”，奋起救国。致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电中则声明，直至北京学生所提各项要求得有完满答复之日始行复课。

△　午前11时，广州各校学生约二三万人，自天字码头出发，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还我青岛”，呼吁各界“不买劣货”，沿途并散发传单。“所经之处，万人空巷，鼓舞欢迎”。

△　早7时，江苏扬州各界开国民大会，到约万余人。场内设讲台六处，进行爱国演说。大会议决四事：“一、要求政府对青岛问题勿签字；二、请南北续开和议；三、不买日货；四、要求政府勿苛待学生，阻抑民气。”10时散会。各校学生随即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午后3时，国民大会所属通俗新剧团并演出爱国戏剧《亡国影》。

△　山东菏泽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力争青岛及山东主权，到5000余人。议决抵制办法三项：一、电达北京政府，转请巴黎和会代表，坚勿签字，力争主权。二、组织国货维持会。三、通函各县机关，请具仿照办法。

△　广西怀远学商两界开公民大会，到2000余人。议决抵制日货办法两项：一、联合各校组成学生演讲团，每星期日赴城乡各地演讲并分发传单。二、各商店不得再进日货。

△　上海中药店同业会与医药研究会共同议定：一律拒卖产自日本之药物，改用国产品代之，医生不得开日货药味之处方。

△　上海《时报》报道：“近日香港华人亦实行抵制日货。”

5月30日　陕西学界全体发布通启，呼吁各界一致力争青岛。

△　江苏泗阳各界于县城开国民大会，到约6000人。演说者一致

鼓吹提倡国货。当场焚毁日货甚多。31日，复于众兴镇开爱国讲演会，到约3000人。

△　留日学生总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5月31日　北京政府无视举国一致反对，是日及6月9日再先后电令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无条件签署巴黎和约。

△　徐世昌令自本年始“选用内外官吏务当注重考试一途”，停止举荐甄用。

△　广州军政府就北京政府要求继续和议事通电全国，指出“尊重和平之说果出室诚意，窃谓当先定继续和议之办法，然后递议条件，掬诚相见，自有解决之方”。

△　北京政府接广州国会议员联名来电，内称：“京校学生热心爱国，殴章焚曹，实出代表人民公意。曹、章、陆卖国，国人皆知，务请从实惩办，以谢国人。”

△　四川督军熊克武通电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内称：“此事关系全国存亡，非寻常外交可比，务望主张我国专使对于此等处分严词拒绝，一面设法挽救。”

△　河南开封各校学生一律罢课，并发出罢课宣言，宣言有云：“学生求学期以报国耳。今者栋折圮倾，国将灭亡，痛莫可言。焉能坐斗读佛，束手待毙。……谨于5月31号一律罢课。”

△　浙江宁波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因北京政府对北京学生所提各项爱国要求迄无完满答复，即日起一律罢课，以为声援。

△　午12时，南昌各界为反对省议会议员擅自加薪一倍，于百花洲沈葆桢祠开公民大会，到千余人。决定即派代表分赴军省两署及省议会请愿。代表至省议会，竟遭议员毒打。学商两界乃自6月1日起罢

课罢市。声言非撤销加薪原案决不复课开市。

△ 福建汀州（今长汀县）开国民大会，到各界万余人。议决："一、请欧专使誓不签字；二、请将二十一条取消；三、联合全国抵制日货。"会后示威游行。

△ 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九校学生开联合救国会，到3000余人。演说毕，举行示威游行。

△ 山东沂州（今临沂）各校学生2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宣传奋起救国，抵制日货。同日，商会通告各商店，于8月1日前所存日货概行处理，逾期没收，并鼓励创制国货以代日货。

5月下旬 福建福州青年会学生外出张贴抵制日货传单，遭日本浪人殴打，重伤八人，消息传出，福州33校学生七八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并焚毁大量日货于城内。

△ 英属马来亚雪兰莪州华侨通电国内，呼吁"如青岛不还，密约不废，国贼不去，全国人民停止纳税，闭市、罢工"。

△ 北京政府内务部先后通令查禁上海发行之《进步》、《民生》、《新中国》等刊物。

6月

6月1日 徐世昌公布青岛问题"真相"。其中除为北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丧权辱国之交涉极力狡辩外，并将曹、章、陆种种媚日卖国勾当誉为"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同时反诬广大群众力争青岛、抵制日货等项爱国活动为"外损邦交，内隳威信，殊堪慨喟"。重申禁止散发传单、集众演说，饬京外各官吏"切实办理"。

△ 徐世昌下令教育部及各省长、教育厅督饬各校职员约束学

生，即日一律上课，并切实查禁“联合会”、“义勇队”等团体。

△　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自即日起实行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和约，罢斥国贼，予学生以爱国自由。是日，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讲，鄂督王占元出动军警镇压，捕去学生数十人，学生被刺伤四人，被殴伤多人。

△　贵州开国民大会，议决通电中国专使力争青岛，并请取消“二十一条”及其他不平等条约，不达目的即勿签字。另电北京政府要求电饬专使力争国权，惩办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靳云鹏六人，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学生。

△　徐世昌令裁撤阿尔泰办事长官，所辖区域归并新疆省，改设阿山道尹一缺，所有该长官原管之蒙哈等事务均由该道尹循旧接管。

6月2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到20余学校，议决全省自6月3日起一律罢课。并发表宣言，向政府提出力争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及中日一切密约，惩办卖国贼等六项要求。

△　济南金融界代表于福德会馆开会议决：一、不用日钞；二、不与日商往来；三、断绝青岛金融；四、不用日货。

△　武汉各校校长齐往省督军署，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经力争，王占元始允下令将被捕学生释放。旋督军、省长再出布告，声称如再游行演讲，散布传单，“定必严拿究惩”。是日下午，省议会议长召集各校校长及学生代表开联席会议，商讨善后办法。会间学生代表提出由军民两长电促北京政府力争青岛及惩办卖国贼，二事解决始行复课。另要求官厅派员向各校学生道歉，承认学生联合会之存在，恢复一切自由等。议长等允备文咨达。同日武昌中华大学学生上街演讲，复遭警察保安队毒打，伤七人，内有李鸿儒一人因伤重致死。文华大学学生游行，亦被军警殴伤四人。3日，恽代英率中华附中学生外出演讲，再遭保安队殴打，重伤多人。湖南旅鄂中学等校学生亦因演讲

而遭砍刺、殴捕。

6月3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演讲团约千余人，至京城各处举行露天演讲，向市民宣传外交问题，警厅派出保安马队弹压，四处逮捕演讲员，共捕学生178人，送北京大学法科集中拘禁。

△　午后，芜湖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痛斥北京政府媚日卖国，庇护国贼，迫害爱国学生。申明组织该会在与京、沪、宁、皖各校学生取同一行动，以尽救国之责。

△　重庆川东学生救国团3000余人举行游行警告会，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和约，惩办国贼。

△　南通各校学生一律罢课，随即分赴城乡各处进行爱国宣传。

6月4日　　北京各校学生继续在街头演说，军警出动逮捕学生，共捕去788人，以北京大学法科不够容纳，遂分出139人改送理科羁押。而未被捕之学生演讲员多集于法科门外，与门岗冲突，学生多人受伤。

△　下午，北京15校女学生600余人齐集天安门，旋往总统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捕之男生，随后分别至街头演讲。

△　上海商界各业员工数千人于南市集会，商讨全市罢市问题。松沪护军使卢永祥、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派步兵及马队弹压。上海县商会正、副会长愤而辞职。

△　上海、天津学生联合会分别发出急电，呼吁全国各界火速援救北京被捕学生。

△　驻日本全权公使章宗祥向徐世昌提出辞职。

△　北京政府为延期偿还1918年于日本发行之甲号财政部证券，

是日财政部总长龚心湛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国政府民国七年甲号财政部证券改借契约》。约中规定1919年7月7日另发“中国政府民国八年甲号财政部证券”，面值1000万日元，“以中国盐税收入之全数为优先担保”，偿还期一年。

6月5日　　上海实行“三罢”（罢市、罢工、罢课），支援北京被捕学生。晨，上海学生联合会派出大批学生分赴商店、工厂动员罢市、罢工，获得响应。南市商店首先停业，至12时许，全市商店全部停业。11时半，日商纱厂5000工人开始罢工，纺织、机械、印刷、造船、铁路、电车等50多行业约七八万工人亦随之举行罢工。学生、职工纷纷走上街头，发表演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严惩曹、陆、章。

△　松沪护军使卢永祥以上海罢市，立即调遣军队四出弹压，当日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拘捕学生百余人。次日，卢召集徐国梁及代理沪海道尹沈宝且议商对策，卢指示“遇有学生游行演说，即由军警尽数拘拿……非至风潮平息，决不释放”。徐谓“警察近日多受传单感动，已呈靠不住之象……地方秩序非用陆军弹压不可”。卢当即允调龙华军队归徐指挥，开入市内进行镇压。

△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对付学潮办法，议决以和平方法对待学生，即日一律释放被捕学生，并准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以胡仁源继任；准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辞职，以傅岳棻署教育部次长暂代总长事务。

△　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学生5000人上街演讲，坚决要求罢免曹、陆、章，北京政府派马队将学生冲散，旋学生集合队伍前往北大法科门前示威，政府为避免事态更加激化，释放了被捕的近千名学生。

△　云南昆明各界开国民大会，到五六万人，研究外交、争回青

岛诸问题之对策。

△ 《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题名《心理建设》），由上海强华书局出版发行。9日《民国日报》刊登广告，谓孙文学说是“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

△ 英、法、日、意、美五国公使由英公使代表，向徐世昌提出劝告南北和会重开说帖。同日，英驻广州领事代表五国向军政府提出同样说帖。

6月6日 上海工人罢工风潮扩大，上海锐利机器厂、求新机器厂、英商生铁厂、华商电车公司全体工人，英美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部分工人，海关造册处全体工人、职员均举行罢工。

△ 徐世昌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 南昌、九江各校学生一律罢课。

△ 山东威海（今威海市）码头工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拒不为日船搬运盐包。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申令禁止于租界内游行演讲、散发传单、悬挂旗帜，并强迫各商店立即开市。威胁如有动员罢市者，即“拘送公堂严办，决不宽贷”。

6月7日 北京政府通电各省军民两长，说明对于时局问题之态度：一、声明中央对于教育始终维持；二、已电陆专使同英、美、法协商，对山东青岛问题达到保留目的；三、南北和议继续开议，并催朱总代表重负和议之责。

△ 上海沪宁、沪杭甬铁路总机厂工人全体罢工。

△ 卢永祥通令松沪戒严。并宣布戒严期间禁止集会结社及印发

一切“有碍时局”之宣传品；当局得拆阅邮信电报；必要时得侵入住宅、建筑物、船舶中进行检查等项规定，借以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同日，卢永祥召集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代理沪海道尹沈宝昌并上海总商会代表虞洽卿等策划破坏罢市办法。决定除由总商会发布“劝导”开市通告外，另由徐、沈、虞等分赴南北市各商店胁迫开市。卢永祥复于8日专门发出布告进行威胁。内称：“凡我商民务须即日开市。倘有暴徒阻止，强迫闭市，即属扰害公安，与土匪无异。本使有保卫商民之责，唯有尽法惩办。”

△　北京各界于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到3000余人。议决六项：“一、电欧使不签字；二、取消欧战中日本压迫我国成立之条件，抄没国贼家产偿还顺济铁路垫款；三、惩办国贼；四、维持教育；五、提倡国货；六、促进和局。”随将此议通电全国。

6月8日　北京政府电江苏督军李纯等，要求“对罢市各业切实开导宣示，务令即日一律开市”。

△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联名电北京政府发表对时局意见：一、请将曹、陆、章免职；二、对外交问题主张不签字；三、对南北和议主张按照原议，先解决国会问题。

△　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1.5万工人罢工。

△　成都各界于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到数万人。会间演讲者甚多。内容大致为：“一、北政府卖国贼之情形；二、山东青岛失败之关系；三、日本对付中国之情形；四、我们对付日本之方法。”会后并沿街散发抵制日货传单。

△　孙中山指派戴季陶、沈玄庐主编之《星期评论》（周刊）在上海创刊。至1920年6月6日自动停刊，共刊出53期。

6月9日　上海工人罢工斗争进入高潮。全市汽车司机2000余

人、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厂全体工人5000余人、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工人、江南船坞工人、各轮船水手、浦东美孚及亚细亚两火油栈全体工人、美商慎昌洋行电机工人、全市清洁工人及全体漆工等举行罢工。

△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题为《罢工问题的商榷》之社论，略谓："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因为能多出产许多国货，即所以抵制许多日货。"并谓："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碍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

△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作出中国即行退出巴黎和会等三项决议。

△　北军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等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促开国民会议，力争收回青岛，"以平民气，而救危亡"。

△　天津各界万余人召开国民大会，议决以罢市为手段，迫促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并明令保护各省爱国学生。当晚，天津总商会布告各商号，自10日起一律罢市，并将罢市决定及国民大会议决两项要求电达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

△　驻沪领事团借口上海连日罢市，影响各国侨商收入，是日开会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损失。同日，领事团复以防止"匪徒乘间暴动，扰害租界治安"为辞，除调集各捕房巡捕、万国商团马队外，并增调英美驻沪陆海军分布各要道，对各界爱国群众进行恫吓、镇压。

6月10日　徐世昌令准免交通总长曹汝霖本职，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本职及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本职。

△　安福俱乐部国会议员通电称："日前政府提交众议院请求同意之咨文，对于青岛问题曾郑重声明，主张暂行保留，以为异日挽救地

步”；但据“今国务院敬（24日）电所云，是青岛问题亦在签字之列，与政府提交众议院咨文全然不符，殊堪骇异”，并声明今后政府变更计划，议员“绝对不能承认”。

△　沪宁、沪杭两铁路工人全体罢工，交通断绝。同日上海电话局，各马车行、水木行业、荣昌火柴第一、第二两厂、华昌盒片厂、大有榨油厂等全体工人，美商奇异电灯厂全体女工，日商铃木洋行全体中国职工等同时罢工。

△　曹、陆、章免职消息传至天津，各界民众对未予惩办极为不满。午后，天津总会急电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说明“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现已发生不稳之象”，请明令惩办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

△　财政部为解救财政困难发行“定期有利国库券”1000万元。是日，经徐世昌指令照准。

△　自是日起，河南屡降暴雨，山洪陡发。刁、湍、沙、洧、伊、洛诸河相继泛滥。南阳、内乡、淅川、南召、邓县、方城、新野、滑县、长葛、鲁山、巩县、洛阳等县均遭重灾，就中以西南数县被灾尤重，平地水深八尺至丈二不等，田庐尽没，灾民达50余万。

6月上旬　福州发生霍乱，蔓延极速。据官方统计：“甫及兼旬，因疫致死者竟达1339人之多。”至7月上旬，城厢内外每日死者均数百人，旋于七八月延及上海、苏州、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天津、北京等省市。

6月**11**日　徐世昌以广大舆论坚拒签署对德和约，国内和议无成，是日咨达国会参众两院辞职。同日，两院退还咨文，请“照常任职”。次日，徐世昌将咨文通电各省，意在博得各省之同情与支持。

△　北京国务院派员抵天津，会同署直隶省长曹锐前往总商会乞

求开市，总商会遂发出暂行开市布告。各界民众闻讯，立聚万余人，声言北京政府“未能依法从严惩办卖国贼曹、陆、章，仅以免职卸责，又无明令保护爱国学生，似此不足达到罢市目的”。总商会复再发罢市布告。次日，各商号再度罢市。

△ 夜，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在北京游艺场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五项：“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同时声明：“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力图根本之改造。”陈散发传单时，当即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北京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经各方营救，陈被关押98天后，北京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于9月6日将陈释放。

△ 北京学生联合会议决，非蔡元培仍任北大校长，决不上课。17、18两日，北京政府代国务院总理、代理教育总长傅岳棻先后致电蔡元培，请其取消辞意，速行北上复职。

6月12日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区加意维护学生，电称：“此次各校学生激于爱国热诚，不得已有罢课请愿之举，固为国人所共谅。……国家注重教育，自当加意维护，以副兴学育才之意。”

△ 北京国务会议因近月来内外问题交相煎迫，罢课、罢市、罢工不断发生，各方责难讥议接踵而至，议决全体阁员总辞。除外交总长陆徵祥尚在国外，教育总长傅增湘、交通总长曹汝霖业已免职外，其余阁员均在辞职书上签署。

△ 晚9时许，上海法租界兴圣街商业联合会数百名工人、店员结

队游行。经带钩桥欲入公共租界，遭租界两捕阻拦，遂发生冲突。租界总捕头调大批巡捕、马队镇压，当场一人中弹死亡，九人重伤，造成带钩桥流血惨案。

△　曹、章、陆被免职消息传至上海，是日上海开市。上海学生揭橥“敬谢工商界，三国贼除，故请开市”之标语举行胜利大游行。

△　唐山开滦矿务局全体煤矿工人罢工。

△　广东督军莫荣新下令通缉前省长李耀汉，并由军政府下令免其肇军总司令职，任命林虎为肇阳罗镇守使，率兵入肇庆城，改编肇庆军队，取消肇军总司令部，将肇阳罗各军归林虎统率。同日，代理省长翟汪被迫辞职，遗缺由张锦芳暂行护理。

6月13日　徐世昌令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辞本兼各职，特任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内务部次长于宝轩暂行代理部务。

△　徐世昌特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24日任命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　徐世昌据内务、财政、农商三部呈请，准设立漕运局，并派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兼充该局总办。

△　山东工商联合会电北京政府，宣布全体罢市，提出四项要求：一、否认青岛签字，并废除“二十一条”；二、惩办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三、促进南北议和；四、释放被捕学生。

6月14日　福州学生代表向私运米粮赴日并囤积大批日货之总商会会长黄瞻鸿提出质问，并检查其兄黄瞻鳌所营恒盛布庄存有大批日货。黄谎称有土匪千余抢劫该店，请警察厅派军警镇压，代表10余人甫入店门，店内潜伏打手一拥而出，施以毒殴，三人被殴重伤，三人失踪，一名营救学生之工友当场被军警刺死。又有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拘捕市民五人，并将群众驱散。当夜，黄氏兄弟指使党徒将日间

劫持之学生代表三人杀害。次日，福州商民愤激实行全市罢市。

△　重庆召开国民外交后援会，15日开商学界联合会，每会均到万余人。议决一致对外，誓死力争青岛，实行提倡国货。

△　济南千余工人在普利门外青年会开会，议决三事：一、凡给日人做工者，当完全罢工；二、不充当日人仆役；三、不买日货。

6月15日　吴佩孚致电南军将领，建议南北将领通电反对签约，电称："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哀摧裂，誓难承认"；并谓："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6月16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到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济南、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宁波、河南、唐山、苏州、扬州等地学生代表及留日学生代表55人，各界来宾200余人，选举北京代表段锡朋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

△　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下令军警大肆逮捕学生千余人，予以监禁，并胁商店开市。18日，李厚基迫于情势，释放被监禁学生，将黄瞻鸿兄弟押送警厅，福州开市。

△　陕西高陵各界数千人开西北救国会成立会。决议誓讨国贼，力争青岛，抵制日货。会后示威游行。

△　徐世昌特任朱深兼署内务总长。

6月17日　北京国务院再次电令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签署对德和约。消息传开，北京学生联合会即发电严正表示："未经正式民意机关通过，全国人民誓不承认"，要求"速电陆、王撤回，以免贻误大

局”。

△　自是日起，山东各界代表连日于省议会开联合会，议商再组全省请愿团赴京请愿。至19日下午，109人请愿团组成。

△　长沙省立高等工业学校部分学生创办《岳麓周刊》。该刊以“发扬平等精神，倡导民生主义”为宗旨。同日，长沙明德学校部分学生创办《明德周刊》。该刊以“提倡国货，唤起爱国精神”为宗旨。

6月18日　　北京兼代国务总理龚心湛通电全国，呼吁“学工商各界爱国志士辨明方针，勿徒逞攘臂慷慨之豪情，而共图和衷救济之长策”，并着各省军民长官设法剀切劝导，以卫治安。

△　徐世昌令内务部拟订婚丧礼则。

6月19日　徐世昌令仍以郭则沄暂行兼署国务院秘书长。

6月20日　　山东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商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济南商会七团体公举代表85人组成请愿团，抵北京新华门呈递请愿书，要求拒绝签字，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惩办卖国贼。徐世昌未予接见。

△　徐世昌令准于京绥铁路八达岭建立詹天佑铜像，并颁给碑文。

6月21日　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接见山东请愿团代表，对于5月19日所提三项要求，表示均难办到。

△　徐世昌令张载阳仍回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原任；任潘国纲署暂编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

△　北京国务院因广东前省长在肇庆被围事，是日电苏督李纯设法解救。

6月22日　北京国务院通电申明徐世昌业已“取消辞意”。

△　孙中山与戴季陶谈三民主义。谓：“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

△　全国和平联合会通电历数安福俱乐部七大罪状，要求徐世昌“立将安福俱乐部封禁，查其名册，概予罢斥，严加惩处，以谢天下”。

△　江苏邳县各界万余人开国民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力争青岛，废除密约，惩办国贼，抵制日货。”

6月23日　徐世昌接见山东请愿团代表六人，各代表要求将5月19日85人赴京请愿团所提三项要求明白批示。徐力言外交困难，仅谓已电令陆徵祥缓签字，对惩办卖国贼、废除路约均未允行。

△　徐世昌公布《管理无约国人民章程》，凡11条。

△　北京国务院就签署对德和约问题征得段祺瑞及国会两院议长同意后，是日电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告以和约中“胶澳问题”“如实难办到，只能签字”。

△　段祺瑞自北京电上海孙中山、唐绍仪等，表示愿同舟共济，早见统一。

6月24日　北京国务院就签订对德和约问题通电全国称：“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艰”；并谓“京师地面现已严饬主管认真办理，倘各省有不肖之徒借端煽惑，务希悉力制止，用遏乱萌”。

△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顾维钧会晤巴黎和会秘书长吕达斯达，声明："兹遵政府训令，愿于德约签字时，将关于山东条款声明保留。"当日下午，吕达斯达约见顾维钧告知："贵国所愿将山东条件保留一层，已达会长，据云势不能行，只有签字或不签字之办法。"同日，法外长毕勋约见顾维钧，劝中国代表无条件签字。

6月25日　北京国会开会通过建议案，要求政府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　龚心湛接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声称："据路透电，和约于25日签字，我国专使签字与否，今尚未知。"

6月26日　徐世昌派梁建章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

△　中国代表顾维钧会晤巴黎和会法国外长毕勋，再次表示："此次和会解决山东问题，我侪认为不公道。……中国委员并非不愿签字，惟对于山东几款必须保留。"毕勋谓："贵使所云山东问题解决之不公道，亦可如此说，惟约内保留一层，殊多未便。"

6月27日　山东、北京、陕西代表联合前往北京新华门请愿，要求徐世昌认可三事："一、不保留山东，则和约决不签字；二、决定废除高徐、济顺两路草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徐世昌拒不接见。几百名代表在新华门前等候，次日天津代表亦加入。28日上午10时，徐始传代表10人入见。徐对代表所提要求答语含糊。陕西学生代表屈武愤而高呼："同一亡国，不如不签"，徐竟叱之。屈武随即头撞柱，流血昏厥。徐遽起入内，代表被卫兵挟持而去。

△　是日晚及28日晨，山东第二批请愿团108人先后抵京。是时，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第二次批示，承认山东问题如"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顺济、高徐路草约"力图收回，断不续定正约"。请愿团鉴于北京政府对前两项要求已"明示容纳"，遂留10人为驻京办事代表，余众于7月1日晨离京返济。行前发布《山东请愿团敬告全国同胞

书》，将请愿经过宣告全国，并呼吁同胞“共图挽救”。

△ 晚，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于对德和约签字前发表声明，全文如下：“今日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因该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兹特以其政府之名义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因对中国不公道之结果，将妨碍远东永久和平之利益也。”

△ 吉林省官银号与日商朝鲜银行签订借款100万日元合同，用于整顿该省大洋票及汇兑资金。

6月28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举国人民严厉督责下，拒签对德和约。至此，经历55天之五四运动遂告一段落。

△ 旅华法工三万余人和学生包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寓所，不准代表签字。并称：“如果出门，当扑杀之。”代表遂未出席和会。

△ 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四人联名将拒签事电告北京政府，略谓：“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碍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止，几成惯例。此次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并再次自请“开去差缺，一并交付惩戒”。

△ 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讨论揆席人选。先是，徐世昌以龚心湛代国务总理10日已满，急于求去，为尽快结束内阁危机，提出周树模、田文烈两人为国务总理人选，正式征求安福俱乐部意见。是日，徐树铮出席坐镇，并对周、田二人作了介绍。王揖唐宣布进行

辩论，最后进行表决，田文烈获多数通过。

6月29日　上海国民大会以北京政府卖国，通电与其脱离关系，并停止纳税。

6月30日　唐绍仪就南北和会事，对来访之北方议和代表汪有龄、江绍杰发表谈话。指出军政府对八条如有让步之余地，则和会当然再开。现南方代表仍留上海，北方代表已赋归，于此足征南方之诚意。

△　自是日起至10月25日，北京政府交通部所属各电话局与日本古河、住友两洋行陆续签订总额为4661188.76日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各电话局材料费。

是月　北京政府盐务署因改行“新税”，激成民变。山东即墨、海阳、莱阳等县盐民三四万人奋起进行抗税斗争，焚毁各县盐务机关，痛殴前往镇压之盐警，后“新税”暂缓实行，风潮乃息。

7月

7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光祈主席。总会设于北京，另于南京、成都设分会。该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42人。嗣后选举职员，评议部主任曾慕韩（琦）、执行部主任王光祈。15日，该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创刊，陈愚生任总经理，李大钊为编辑主任。

△　午前9时，上海全国和平联合会开第四十七次评议会。议决再电徐世昌。要求封禁安福俱乐部，严惩徐树铮。

△　上海工商学界为对德和约事，召开第三次国民大会，到约11万人。会间，上海各界代表李大年、留日学生代表凌炳、北京学联代表许德珩、天津学联代表沙主培等相继演说。一致主张实行国民自

治，奋起卫国，拒签对德和约。大会议决，如对德和约已签字，国民决不承认。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　济南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于纬五路日本货栈附近查询运粮车辆，为日人逮捕。学商各界闻讯，当集数千人前往省署，要求省长沈绍昌立即与日领交涉。次日，王被索回，众始散。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于北京、天津、太原、开封、济南、汉口、南昌、南京、上海、安庆、杭州等地开办邮政储金。

7月2日　　唐绍仪自上海电广州军政府，报告北方代表汪有龄、江绍杰南下，面述北京政府希望赓续和议，探询具体意见，请指示办法。

△　章太炎以护法后援会名义发表《通告国民书》。内称："北政府者，日本之外藩；徐世昌者，日本之土司头目。……惟有通电宣告不承认政府，不承认非法僭立卖国祸首之除世昌，而后签字归于无效。"

△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载左舜生《小组织之提倡》一文。文章鼓吹建立脱离社会之新村式小组织，作为理想社会雏型。该文发表后，曾引起广泛讨论。

7月3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唐绍仪电商北京继续和议案，议决俟北方代表全体南下，请即开议，至于条件退让问题，请唐研究电商。

△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免程潜湘南护国军总司令职，令赵恒惕继任。

△　湖南八团体代表开联合会，议决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签对德和约，收回青岛，废除各种密约，解散新国会，严惩安福系议员。同日，湖南省议会亦电徐世昌要求立即封禁安福俱乐部，解散新国会。

7月5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讨论政府提交西北筹边使官制案，己未俱乐部议员表示反对；与安福俱乐部议员冲突，互相殴击。

△　徐世昌令准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设立边业银行。

7月6日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劝阻排斥日货，并称“倘有奸人勾煽，应责成军警实力制止”。

△　徐世昌令吉林督军孟恩远到京供职；特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署吉林督军，未到任前，令吉林省长郭宗熙暂行兼署；特任孙烈臣署黑龙江督军。

△　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电请北京政府迅予省释陈独秀，以安民心。

7月7日　　继上海全国和平联合会6月22日电徐世昌，要求封禁安福俱乐部后，各地纷纷通电响应。是日，旅沪山东协会发出通电，历数安福国会种种卖国罪行，谓“新国会者中国之罪人、人民之公敌，新国会不除，中国无幸存之理”，要求徐世昌将新国会“立时解散，以顺舆情”。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云南省议会、旅沪四川同乡会；10日，全国学生联合会；16日，旅沪安徽协会；21日，江西国民大会等团体亦先后发出通电，坚决要求封禁安福俱乐部，解散新国会，严惩徐树铮。

△　湖南学生联合会、国货维持会等团体在长沙联合举行“焚毁日货游行大会”，参加者近万人，学生均肩扛日本布匹，绸布业店员及各界群众随行其后。游行队伍至教育会坪，将日布尽数焚毁始各散去。

△　北京政府通电所辖各省区，禁止抵制日货。

7月8日　　北京国务院规定人民请愿事件应向国会陈请，不得径电政府，是日电各省军民长官转饬各人民团体遵照。

△　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电告北京政府称，北方主张继续和议，南方甚表赞同，惟北方代表应迅速齐集沪上，与唐绍仪等磋商继续和议办法。

△　北京政府电促朱启钤总代表，早日自津赴沪重开和议。

△　徐世昌令准税务处于8月1日起实行新修进口税则。

△　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通电，声明："一、反对补行不保留山东三条签字；二、废除二十一条并不承认一切密约；三、青岛交还问题，反对中日两国间自行解决；四、取消高徐、济顺草约；五、宣告军事协定延长时效无效"。同时，各地爱国团体亦先后发表类似声明。

△　顺直水利委员会代表熊希龄与美国广益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签订借款35万美元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此款用作运河工程局经费。

7月9日　蔡元培自杭州致书北京大学学生与全国学生联合会，表示放弃辞职，希望学生安心求学。

△　北京各界13团体代表召开北京各界联合会成立会。会间通过简章并选举职员。申明该会"以超然于政党关系之各界团体组织之"；"以国民之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

△　湖南学生联合会为联络各界共同救国，发起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午后2时，各界代表于长沙开各界联合会成立会。由学生联合会代表彭璜主持。会间议商组织机构及进行方法等事。当场公举20人组成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并派出代表与湖南公团联合会接洽，要求一致进行。

7月10日　徐世昌为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事通告国人，说明拒签之经过，并告诫国人"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

张”。

△　朱启钤电复龚心湛，告以“弟现从事商业，谢绝政闻”，拒绝再任南北和会北方总代表职。

△　日本青木中将由华返日，向原敬首相提出日本援助徐世昌及亲日派之有关建议。

△　日本为操纵长春贸易，与华人合资开办长春仓库株式会社。资本定额30万日元。经营商品贮存、运输、购销及金融业务。董事会实权由日人掌握。开设期限20年。

7月11日　　广州各界曾迭次向军政府请愿，要求下令声讨卖国贼，坚持废除中日一切密约，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军政府对此未予明确答复，或竟置之不理，以致引起公愤，是日全市罢市。13日，电灯局及各机器厂工人一律罢工。

△　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欧美同学会等13团体，在上海组成国民教育促进团，举李登辉、沈恩孚为正、副主任，并发表《说明书》。内称：“救国之道固亦多端，而溯本追源，端惟教育。”故确定“从调查及演讲入手，促进国民教育”为该团宗旨。

7月12日　徐世昌特任曹锐为直隶省长。

△　都护使充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请北京政府派西北军第三旅入蒙，以防俄人入侵唐努乌梁海。

7月13日　奉天巡阅使张作霖电北京政府发表对时局之意见，要求速电令陆徵祥向各国表示，如青岛山东之交涉有转圜之余地，即可签字；请令朱启钤赶速筹划，早开和议，速谋南北统一，并称已将援湘各路奉军分别调回，以谋和议之进行，至其他驻南之奉军，现亦筹备撤退之手续。

△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为在四川传播新思想、开展新文化运动，创办《星期日》周刊。该刊存在一年，共出52期。

7月14日　《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主编并撰写《创刊宣言》以及大量文章、评论。其中《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第二至第四号连载），为各地进步报刊所转载。《湘江评论》共出四号。第五号印就未及发行，即遭张敬尧封禁。

△　广东广三、广九及粤汉铁路工人相继罢工。同日，广州工商学界数千人前往省议会请愿。广东督军莫荣新竟派军警数百人镇压，开枪击伤10余人，拘拿学生50余人。

7月15日　广州各界数千人开国民大会，遭军警殴打，捕去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庭等多人。次日，学生上街演讲，又被军警拘捕300余人。

△　五四运动发生后，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会分会为“唤醒同胞，以扶危局”，创办《南洋日刊》。内容以评论政治及社会问题为主。日刊发行16号后，是日改为《南洋》周刊。至年底止，该刊所涉主要问题为：学生之责任、教育改革、外交与国家前途、社会主义及劳动问题等。

7月16日　广州军政府通电宣布对德恢复和平，竟称对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一事，“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

7月17日　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促和。电称我国外交失败之原因，在国内未能统一，主张以今日外交之危机为促和之转机，南北双方互为让步。早释内争，毋招外侮，切盼上海和平会议赓续进行。

△　驻山东益都日兵突入该县省立第十中学肆行搜索，并捕去学生马忠怀。县学生联合会当将此事急告各界。随即联名电省，请与日领严重交涉。自是日起，该县工商各界全体停业以示抗议。随之青岛

亦罢市。

7月18日　孙中山自上海电责广州军政府拘捕国民大会代表之举动，请即予省释，并谓："盖民气以愈激而愈烈，若专恃威力，横事摧残，不惟为粤人之所公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

7月19日　吉林督军孟恩远被免职后，即与吉林第一师师长高士傧（孟之甥）合谋对抗。张作霖随即调兵进逼长春，并暗约日本关东军配合。是日，驻长春日军突于二道沟地方向高部寻衅，交战一时许，双方互有伤亡。21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就此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22日，徐世昌将高士傧免职，孟恩远亦被迫离吉赴津。

△　中东铁路哈尔滨站中、俄籍全体工人为拒用鄂木斯克高尔察克伪政府发行之纸币，举行大罢工。26日，该路司机全体响应，交通断绝。此次罢工有俄籍工人万余人参加。后以协约国监管路政委员会认可不再发放鄂木斯克纸币，8月18日始全路复工。

△　英属马来亚华侨自五四运动发生后，群起抵制日货，并通电巴黎和会及国内各界，力争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中日密约。是日至21日，英国殖民当局举行庆祝对德和约签字活动。半岛各地广大爱国华侨均拒绝庆祝。英殖民当局遂于28日午后搜查进行爱国活动最力之吉隆坡华侨学校。29日午后5时，拘捕该校校长宋森。同时拘捕吉隆坡华侨日报《益群报》编辑主任吴纯民，救国储金团发起人、电车商行工作人员黎希孟、杨耀光、赵士池及裕利酒栈爱国商人杨剑虹。8月1日，吉隆坡全体华侨一律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抗议。延至10月24日夜，宋森等6人竟被英殖民当局强行押解出境。华侨闻讯，冲破殖民军警阻挠前往送行者仍有数千之众。12月初，宋森等六人抵广州。

7月20日　徐世昌下令裁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并令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

△　北京政府就巴黎和会意大利代表提出要求"继承天津奥租界权

利”一事电陆徵祥，令“向协约国声明，天津奥租界应由中国收回后开作商埠，意大利不能要求继承此项权利”。

△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发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抛开主义，只注意眼前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并把谈主义诬之为“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7月21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周恩来主编，在其撰写的创刊号社论《革新·革心》中，申明“本革新同革心的精神为主旨”，“本民主主义发表一切主张”。

7月22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终止罢课宣言》，提出“为国勿废力学，力学勿忘为国”之口号，要求学生从火热的斗争中回到平静的书斋里去。

7月23日　广州军政府七总裁电北京国务总理龚心湛，请电示关于西藏问题交涉真相，俾筹对付。

7月24日　徐世昌据新疆督军兼省长杨增新呈请，令准该省设置布尔津河县治、布伦托海县佐。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法商施乃德公司、法国邮船公司分别签订借款41.0805万法郎及406.2375万法郎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此款充作法商合办求新机器厂股本。

7月25日　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军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所掠夺及占有的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

△　徐世昌据山东督军张树元之请，令准山东实行戒严。

△ 徐世昌为应付财政危机，下令整饬税务人员之风纪。

7月2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苏俄驻华公使库达摄夫致函抗议我国将派军舰航行黑龙江一事，是日，根据中俄《瑷珲条约》所载，中国应有黑龙江航权之规定，向苏俄提出反抗议照会。

7月27日 徐世昌令准山东省长沈铭昌辞职，以屈映光署山东省长。

7月28日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抵天津，与有关人员商军事政治问题。

7月29日 上海印刷业五彩制版工人300余人，成立上海印刷联合会五彩制版分会。按：此为中国五彩制版工人最早之团体。

7月30日 徐世昌令准免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职。

7月31日 徐世昌派顾维钧为国际保工会委员。

是月 张西曼与蔡元培、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设（科学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此系中国最早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秘密团体，其成员有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一百几十人。1920年12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开发表通告宣布成立。宗旨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8月

8月1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讨论徐世昌提交之《对德恢复和平案》咨文，宣告：自6月28日起，中德战事状态终止。是日，众院以227票赞成通过该案，次日获参议院通过。

△ 孙中山于上海创办中华革命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并为

其撰写《发刊词》。内称："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建设》共出二卷，每卷六期。1920年8月二卷六期出版后停刊。

△ 湖北各界联合会成立。该会由武汉学生联合会、律师公会发起，联合武汉教育会、农会、商会、各报馆等共同组成。旨在鼓吹救亡，激励民气，以挽救外交之危机。筹备期间，施洋被举为筹备员并任文书。该会宣言、章程、函电等多由其草拟。

△ 北京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互寄包裹章程修改条文》，是日起施行。

△ 北京国务院批准侨工事务局所拟《安置回国华工章程》，凡12条。

8月2日 广州国会两院议员开谈话会，确定目前国会方针为完成宪法。

△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通知各报馆："事关预审未经公判之案不得登载"，并令"勿将本厅此项布告刊登报端"。

8月3日 山东学生请愿团向督军、省长请愿，要求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人和释放被捕学生。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派兵强迫解散学生，学生坚持不让，被捕去16人。

△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在法国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学校正式成立，目的在使勤工俭学生互通消息，并以"创造及奋斗之精神相励"。该会无会长、干事、理事之分，一切事务皆由职员会处理。

8月4日 晚，外蒙王公齐集库伦举行全体会议，一致反对俄谢

米诺夫劝诱外蒙独立。13日，该王公会议正式照会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重申上述立场；并请转报北京政府，要求速派军队配合蒙军驻防蒙境，勿任白匪肆行侵犯。

8月5日　　济南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以“煽惑军警，危害治安”罪，枪杀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激起全国公愤，是为“马良祸鲁案”。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宣布于是日闭会，自8月6日起改名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并声明：“吾人一本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义，奋力为之，始终不渝。”

△　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会议闭幕，孙中山应邀到会演说，指出“革命为‘革命党’毕生唯一的事业”。

8月6日　　孙中山电成都志诚俱乐部，告以现在定救国方策在使国会完全行使职权。

△　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日本内田外相山东政策发表声明，宣布“予对于和约之山东条款虽同意，然予决非对于1915年及1918年中日两国间交换之文书同意也”。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自库伦电告北京政府，收复唐努乌梁海全境。

△　英国公使朱尔典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务次长陈箓提出处理西藏问题办法三项：一、西藏版图依中国之希望，以大吉岭会议所用地图为依据；二、西藏自治权、宗主权以西姆拉会议为依据；三、西藏自治及军备，由西藏代表会议自行决定。

8月7日　　孙中山自上海电广州国会参众两院辞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职。表示：“文决不忍与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兹特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以后关于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

△　孙中山致函川军将领刘湘，希望“联合俊彦，协谋匡救，持之以果敢，矢之以坚贞，则志诚所至，金石为开；异日奠真正之共和，拯斯民于水火，所属望于兄者，正甚远且大也”。

8月8日　　徐世昌批准司法部呈拟《高等审判厅办事章程》及《高等检察厅办事章程》。定于10月1日起施行。

8月9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硝石总厂代表朱耀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借款20万日元合同，以提交硝石100万斤及此后必须与日本陆军省缔结售买硝石契约为条件。此款用作该厂经费。

8月10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分别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及留法学生，要求拒绝并防止补签对德和约。

△　张敬尧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先是8月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调查员符契于长沙码头劝旅客乘坐本国轮船；日本船主戴生昌见状，竟指使雇役对符加以殴捕。学生联合会为此立即要求张敬尧与日领严重交涉。5日，该会发动各界举行示威游行，以抗议日人暴行。张敬尧得报，急令其弟长沙警备司令张敬汤率军警前往镇压，当场逮捕多人，诬为“乱党”。6日，张敬尧下令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该会置之不理。10日，张竟以武力将该会强行解散。

△　日本为操纵吉林四平街贸易，与华人合资开办四平街交易信托株式会社。资本定额50万日元。主要出资者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华人孙步瀛仅出资1.1万元。实权由日人把持。开设期限10年。

8月11日　徐世昌特任孙烈臣兼署黑龙江省长。

△　徐世昌改派鲍贵卿接替郭宗熙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并兼护路军总司令。

△　日本使馆参赞芳泽访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务次长陈箓，要求制止山东排日风潮。陈表示“现正筹有效取缔之法”。

8月12日　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电告广州军政府岑春煊等七总裁：特委任王揖唐为南北议和北方全权总代表，偕同代表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裕、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克期莅沪，“希告知尊处所派各代表接洽一切”。

△　北京新国会完成宪法草案全文，共101条。

8月13日　广州旧国会参众两院开联合会，议决挽留孙中山，并致电孙，“务恳取消辞职，贯彻护法初衷”。

△　浙江督军杨善德病逝。

△　全国学生联合会、商业公团联合会及全国报界联合会等在上海举行各界联合会，通过反对补签对德和约及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等案。

8月14日　南北议和新任北方全权总代表王揖唐发表政见，其要旨为：对外主御侮，对内主统一，法律事实同时解决。

△　徐世昌特任卢永祥兼署浙江督军。

△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陈毅等61人，乘“麦郎号”轮，自上海启程赴法。

△　北京中华博物协会举办博物展览会，是日开幕。为该会提供展品者有170校、八社会团体及个人。共展出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图表、模型等11132件。展览会于9月10日闭幕。

△　外蒙古王公代表车林等会见都护使充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表示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完全统一于中央。

8月15日　驻安庆倪嗣冲所部安武军，于是日及9月1日深夜，两次围奸蚕桑女校，对该校校长、教职员及全体女生遍肆兽行，致该女

校羞愤自杀者达10余人。11月27日，《字林西报》将此事披露，举国同愤，纷电诘责。而倪嗣冲及安徽省长吕调元竟于12月14日、16日两日先后电北京政府，矢口否认。电中除对该军兽行百般袒护外，反指报界“无中生有，任意栽诬”，甚至扬言欲“依法起诉”。此事后竟不了了之。

△　驻京美公使芮恩施致函赞扬《实业计划》，谓“蒙惠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次编，甚谢！仆信此开发商港一事，实为现今全世界上最重要之商务计划。以上海而论非此种工程，必不能达其为中国中央商港之目的矣”。

△　俄白军谢米诺夫入侵外蒙，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北京政府派兵往援。

8月16日　中华博物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议定章程10条。其宗旨在考察全国之动植矿物，增进学识，改良教材，启发实业。北京设总会，上海设分事务所。各地方设支部。选举袁观澜为会长，吴家熙、陈宝泉为副会长。

△　美国参议院通过对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之保留案。

8月17日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　孙中山复函湖南靖国军第二纵队司令林修梅，论述人类生存及对徐世昌、段祺瑞之态度。谓人类社会进化程序，“既由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虽农业之发达可以有限，而工业之发达实乃无穷。此后世界只有日趋向前，断不能废除现世之文明进步，而复返于原始状态也。”至询对于北方徐、段之政策，孙谓：必须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乃能引以为同志也”。

8月18日　广州旧国会否认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

8月19日　中东路罢工委员会于哈尔滨召开宣告结束罢工大会。大会进行中，哈市之俄白军讨伐队突向与会工人袭击，捕中、俄籍工人107名，余大部遭毒打。旋将被捕者驱入装甲车内。载离哈尔滨。行经一面坡站，中国军用列车上之士兵，曾向装甲车射击，意欲解救被捕者。白军即以机枪还击。中国士兵终以火力不及被击退，死60余人。后白军装甲车驶至拉兹多尔耶车站，将罢工领袖七人枪杀。

8月2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外蒙王公请求取消自治事，向国务会议提出蒙事说帖，对如何副外蒙之希望以及派军赴援设防等问题，提请国会解决。

△　徐世昌指令照准甘肃金县更名金城县。

△　吉林第一师裁编为混成旅，以诚明为混成旅长。

8月21日　北京国务院就外蒙取消自治恢复前清旧制事电令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转告车林，须先由外蒙王公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此项要求，再与妥商条件。

△　京师警察厅奉北京政府内务部训令，是日发出布告，以北京《京报》所载文字“多有触犯出版法及刑律规定之处”为由，饬令停止发行。22日，该报被迫暂行停刊。

8月22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会通过反对王揖唐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

8月23日　孙中山接见旅沪旧国会议员，表示救国惟在护法，对和议事不置一辞。

△　山东、北京、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30余人，齐集北京新华门前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惩办马良。徐世昌拒不接见。警察并将

请愿代表全部拘入警厅。

△　徐世昌令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杨祖德辞职，派贾德耀继任。

△　自是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河南督军赵倜、财政厅长郑焯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陆续签订总额100万日元借款合同。以郑州商埠地产、建筑物、营业收入以及中原煤矿公司股票100万元、全省牲畜税等为担保。并言明由河南省公署咨议韩懋斋与该会社合组河南东豫实业公司，承包郑州商埠建设、开封自来水、水力、电灯及黄河以南矿山采掘、铁路建筑等。此款除用于郑州商埠外，并用作东豫实业公司股金及豫泉官钱局准备金。

8月24日　　徐世昌任命张作相署奉天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同日，令准鲍贵卿开去陆军第十九混成旅旅长兼职，改任张焕相接充。

△　五四时期著名小型通俗刊物《新生活》周刊在北京创刊，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负责编辑。

8月25日　　苏浙两省各埠700余只米船船工，因要求增加水脚，举行同盟罢工。米船工人持续17日拒不装船。后各米行资本家被迫让步，罢工取得胜利，于9月11日始解缆装运。

△　晚7时至次晨3时，台风猛袭福建，来势为数十年所罕有。福州及福建沿海各县均被灾。仅福州城内即倒塌房屋三分之二，死亡三万余人。

8月26日　　北京、天津第二批请愿代表齐集北京，即赴新华门递交请愿书，徐世昌仍拒不接见，代表坚持至深夜因未见徐而拒不离去。

8月27日　　北京各校学生千余人及天津代表齐集新华门请愿。下午，北京政府派国务院秘书胡鄂公接见代表。代表坚持要求面见徐世

昌，入夜后代表露宿新华门前。

△　梁士诒等创设中华银公司，集资1000万元，设总事务所于北京，理事长为梁士诒。是日，徐世昌指令照准。

8月28日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将新华门前请愿代表强行押送天安门。晚8时，军队开进天安门，搜捕请愿总指挥、天津学生马骏，学生与军队冲突，男学生伤四人，女生伤二人，马骏被捕。

△　孙中山函复日本廖凤书，告近日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略谓："文近时观察国事，以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

△　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布告，要求各校教职员剀切开导学生务须安心求学，遵守校规。

8月29日　徐世昌公布《文官高等考试典试令》、《文官普通考试典试令》、《文官高等考试法施行细则》、《文官普通考试法施行细则》与《外交官考试法施行细则》。

△　孙中山函复广州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望国会能先将军政府取消，使不致为群盗所居奇，且为国家留一线之正气。

△　欧美同学会总会于上海青年会开成立会，举蔡元培为会长，通过会章24条。

8月30日　北京新国会第二届参众两院常会自3月1日起历时六个月，是日闭会，议题为制订宪法草案并宣布八年预算案。

△　天津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校学生是日外出演讲，向市民报告赴京请愿代表被捕、被殴情形，呼吁速请声援，以期释放请愿代表，取消山东戒严及惩办马良。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警察强行制

止，并将演讲学生48人拘入警厅。学生二三千人闻讯前往警厅质问，次日被捕学生获释。各校学生继续外出演讲。

△ 河南巩县兵工厂筹备处与丹麦文德公司签订借款171543.88美元合同。此款用于垫付巩县兵工厂购入机件用款。

△ 《每周评论》被北京政府封禁。该刊共发行36期。

8月31日 吴佩孚电湖南省长谭延闿，提出军事秘密条约《救国同盟条件》，规定以“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为“总纲”。具体条件共11条，其中对内条件规定“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等。谭即将《条件》全文密报云南督军唐继尧。

9月

9月1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直、鲁等地请愿代表团被北京政府囚捕事通电全国，呼吁各地即开各界紧急大会，派遣大队请愿代表克日北上，并要求北京政府外交公开，保证言论集会绝对自由，解除山东戒严令，严惩马良杀良民之罪。

△ 徐世昌公布7月3日为“恢复共和国纪念日”，原以7月12日为该项纪念之决定即行废止。

△ 中华实业协会刊物《实业旬报》在上海创刊。

△ 北京新学会出版物《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主编及主要撰稿者为张东荪、俞颂华、梁启超、张君劢等。该刊自第三卷第一号起更名《改造》。1922年9月15日第四卷第十号出版后停刊。

9月2日 孙中山自上海电广州旧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转议员刘治洲等，“所望诸公行使最高职权，毅然取消误国之军政府”。

△ 北京政府内务部通电各省，再次申令查禁《工人宝鉴》等七

种无政府主义刊物。

△　北京政府陆军部所属清河制呢厂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借款100万日元合同，用作驻北苑混成二旅军饷。

9月3日　　徐世昌下令裁撤京畿警备总司令部，改设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特派段芝贵为总司令。

△　徐世昌任命刘镜人为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

△　北京政府教育部转发京师警察厅公函，禁止学生集会结社。内称："近来一种风气，学生每好谈政治。本年以来此风尤甚。……若不从根本上严加干涉，于学风及治安前途均有莫大之影响。……嗣后各校学生应遵照治安警察法，不得为政治结社、政治集会。各该校如有在校内开会情事，应依照治安警察法先行呈报该管区署，听候派警监视。如有不行呈报或开会时有不合举动，暨学生有加入政治结社集会情事，经本厅查出即依法严重执行。"

△　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华侨联合会、上海青年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基督教联合会等10团体，因北京国务院8月28日发出禁止请愿布告，是日联名电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就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请愿一事予以驳斥。内称："今布告既不忘约法，则约法第六条所载人民各项自由权，政府应先尊重。……尚愿政府日诵约法以自省，幡然改计，依法严惩滥杀平民之马良及殴伤多人之巡警，以平民怒而彰法治。"

9月4日　　湖北靖国军第二纵队司令林修梅上书孙中山，议论上海和会与"联徐、联段"政策，孙中山批示："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我当引为同志也。"

△　云南督军唐继尧电孙中山，劝告以国事为重，不要引退隐默。

9月5日　　广州军政府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任命王揖唐为南北议和北方全权总代表。

△　广州军政府电龚心湛，反对补签对德和约。9日，龚电复否认，谓“德约并无补签之事”。

△　广州军政府致电挽留孙中山仍任政务总裁。

9月6日　　粤省长官以澳门葡人违约擅自填筑海面，是日照会葡领转达澳督要求拆卸。

9月7日　　午后3时，上海各界83团体及各校代表万余人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会，议决向北京政府请愿条件如下：“一、山东权利未收回以前不得补签德约，并不得与日本直接交涉；二、取消二十一条件、军事协定、高徐、顺济及满蒙四路条约及胶济路换文；三、取消边防处及西北筹边处，罢黜段祺瑞、徐树铮，解散安福俱乐部；四、惩办马良及张树元；五、外交公开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须有完全自由。”会间一致反对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并议决致函上海领事团，请其转致驻京各公使，勿贷款于北京政府，以免中国永久不得和平。大会旋将请愿条件通电各地，吁请推举代表，一致赴京请愿。

△　孙中山电复唐继尧，嘱其尊重民意，矫正一切。略谓：“鄙意大局日危，国民所企，乃在有精神之护法。今兹躯壳故存，而甚者乃假以图便其私，其所作为去民意逾远，此诚有识者之所愤慨”，并告“文复何能隐默？且意亦非以洁身自了为贤也。公此时方系中外重望，如何宏济艰难，必有异于常人者。尚祈深察民意所在，矫正一切”。

△　徐世昌公布《县自治法》，凡六章69条。

△　徐世昌公布《民国八年公债条例》。该条例规定，此项公债

定额“以二亿元”，暂先发行5000万元。

△　留日学生爱国团体——东京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声明，揭露北京政府所派留日学生监督江庸秘密收买留学生，另组所谓留日学生联合会，以图搞垮留日学生总会之阴谋。

△　上海法租界南北市城厢一带156家面馆之伙友千数百人，因要求增加工资不遂，举行罢工。店东串通捕房将为首伙友张阿毛、何友宝二人逮捕，胁迫复工。全体伙友不为所屈，坚持斗争，终取得胜利。12日，重行开业。

9月8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据河南成例，令所辖各省区财政厅长一律改办统税。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龚心湛、代理交通总长曾毓隽与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代理事川上俊彦在北京签订《四洮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额4500万日元，以准该会社发售同量款额之“中华民国政府五厘利息四洮铁路公债”为条件，并“以现在及将来属本铁路所有一切动产、不动产及各项进款作为头次抵押”。此项借款用于“四郑延长至洮南为止干线及由郑家屯起至白音太来为止支线之建造费、营业费”等。约中并言明：该路总会计、总工程司、行车总管等职均须由日人充当。

9月9日　　孙中山电复广州军政府告辞军政府总裁之决心，谓“文志已决，义不再留。救国文之本怀，尽力则不必在军府中也。所有八月十日以后发出文电署有文名者，概不能负责。以后希勿再加入文名，以昭实际”。

△　吴佩孚、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以安福系为吾国之祸源，联名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任命安福系王揖唐为南北议和北方全权总代表。

9月10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参加签署对奥和约。

△　徐世昌派李家鏊为驻西伯利亚高等委员。

△　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向参议院大会提出审查巴黎和约报告，主张将山东交还中国。

9月11日　蔡元培抵京。20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开会欢迎蔡元培。

△　王揖唐电南方表示诚意谋和。

9月12日　广州参议院议长林森致书孙中山，报告国会筹备制宪，望稍候时日勿再作决绝之表示。

△　美国公使芮恩施离任返国，公使职务由该使馆一等秘书丁家立代理。

△　法属安南殖民当局受日人贿买，于西贡、河内等地开始大规模排华。指使暴徒围困华侨商店，殴打前往购货居民，进而捣毁商店，毁弃货物。延至是月下旬，暴行愈演愈烈。当地华侨不堪忍受，遂致函广州报界公会，呼吁国内火速救援。

9月13日　广州军政府致函驻广州美代理总领事，声明军政府认为“新银团之政策含有扶助中国政治上及工业上之改革……不干涉中国之行政，且不有垄断利益”，故“本军政府实赞成此新银团之政策”，欢迎“新银团所包括之政治及实业借款”，并请将此意转达驻北京美使及美国务卿。

9月14日　彭程万函告孙中山，奉军政府命令，已就护法赣军总司令职。

9月15日　徐世昌发布命令宣告中华民国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　徐世昌以段祺瑞参战有功，颁令晋授大勋位。

9月16日　天津觉悟社成立。该社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骨干组成，主要成员有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12月29日，该社发表周恩来所拟《“觉悟”的宣言》，申明“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　外蒙正式照会俄领，声明蒙境铁路俄政府无权过问，如俄鄂木斯克政府以外蒙路权向日本请求协济，外蒙决不承认。

9月17日　广州军政府再电龚心湛反对王揖唐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要求北京政府改派总代表，促成和局，共挽危亡。

9月18日　徐世昌发布命令宣布：“对德、奥战争状态，业已完全解除。”惟对德奥人民所订各项章程，仍应继续有效。

9月19日　王揖唐率北方议和代表抵沪，在沪南方代表未允开议。

9月20日　徐世昌公布《管理特种财产条例》。

△　北京政府司法部呈准《地方审判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

9月21日　靖国联军湖南第五军总司令林德轩致函孙中山报告湘西情形，孙中山批复须先平桂定粤。

△　北京各校教员举行欢迎蔡元培茶话会。蔡在会上致答词，要求爱惜、保护学生的积极主动精神。

△　是日及22日，北京《惟一日报》连载题为《日本之危机》社论。日使小幡酉吉指为有辱日皇，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照会，要求处罚。10月9日，京师警察厅奉北京政府内务部训令发出布告，通令各报馆“嗣后关于此种论说务当加意审慎，不得轻意登载”，“以重国际礼仪”。10月24日，《惟一日报》被判罚金400元了结。

△　日本为操纵吉林公主岭之贸易，与华人合资开办公主岭交易信托株式会社。资本定额50万日元。主要出资者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华人徐会一仅出一万元。由日人藤井省策任专务董事。开设期限10年。

△　日本为包揽长春农产品之购销并进行农贷剥削，与华人合资开办长春实业粮栈。资本钞票银八万元。其中日本东省实业会社出资5.6万元，华人马金堂、李奎章出资2.4万元。虽由李奎章任经理，然实权仍操诸日人。开设期限10年。

9月22日　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王揖唐至孙中山寓所叩询对和局意见。孙指出现在惟一解决方法只有恢复国会，使其自由行使职权，若能办到此层，和局今日即可成立。王答称北方不能办到此层。孙说既不能办到，则无和可言。

9月23日　广州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致电上海国会议员，再次挽留孙中山勿辞军政府总裁职。

△　上海中华国民励志会召开紧急大会。通过决议如下："一、北京政府发行之八年祸国公债，我国民应当从大多数之主张一致反对，以保国家命脉；二、北京政府与日缔结之军事协约，今奥约签字已复和平，应请从速解除，以免后患；三、安福派之卖国国会应合力驱除，与国家政治共谋改良。"

9月24日　徐世昌令准代理国务总理、财政总长龚心湛辞职，以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

9月25日　徐世昌令财政次长李思浩代理部务。

9月26日　北京政府内务部电直隶、湖北、山西、浙江、安徽、河南、江苏等省督军、省长及松沪护军使，请"转饬该管地方警察官厅"，"分别解散或禁止"各界联合会。

△　徐世昌据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呈请，令准将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改为管理特种财产事务局。

△　徐世昌据新疆督军兼省长杨增新呈请，令准该省于布尔根河设治。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借款160万日元合同，以盐税、关税余款为担保。此款用作西北边防军维持费。

△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北京政府外交部，陈明蒙古王公同意一切政权归中央统辖。

9月27日　徐世昌令即行废止《遣送敌国人民事务局条例》。

△　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宣称“以各界合群互助，拥护国权，促进民治为宗旨”。

9月28日　广州军政府电请北京政府明令取消八年公债条例。

△　上海画家江新、丁悚、杨清磐等发起组织天马画会。以“促进我国美术之真艺术为宗旨”。是日午后2时，于西门外白云观图画美术学院开正式成立会。

9月29日　唐绍仪函告广州众议院：鉴于“和议固无进行之望”，已再次向军政府提出辞职，并已派人将总代表关防缴回军政府。10月2日，军政府政务会议协议挽留。

是月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出版。该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由李大钊主编。李大钊于该号及同年11月1日出版之第六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予以系统介绍。

△　穆杼斋、陈悦周等九人在上海创办恒大纱厂，资本总额50万

元，由穆杼斋任总经理。

△　天津南开学校增设大学部，是月正式开学。由张伯苓任校长，此为南开大学创立之始。

10月

10月1日　直、鲁、晋、豫、鄂、苏、浙、沪等省市鲁案请愿团入京，至新华门递交请愿书，提出五条之最后请求。自9月7日上海各界万余人集会，提出向北京政府请愿五条件，并电邀各地举派代表赴京请愿后，是日午前10时许，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浙江、上海、南京等省市代表施洋、郭隆真、黄爱等32人，齐集北京新华门请愿。提出与原定条件内容基本相同之五项要求，即“一、山东主权未恢复以前，不得补签德约及与日本直接交涉；二、取消二十一条件、军事协定、高徐顺济满蒙四路条约、胶济路换文与各种密约，以保主权；三、要求外交公开及言论、集会、出版之完全自由；四、解散安福俱乐部以清乱源；五、惩办马良、张树元并取消山东戒严令”。徐世昌拒不接见。各代表均坚持不去。至晚10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全体代表尽行逮捕，分拘于警厅、侦缉队、保安队三处。消息传出，各地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函电交驰，坚决要求北京政府立即释放请愿代表。延至11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始将请愿代表32人全部释放。

△　北京政府代表与英商费克斯有限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第一次飞机借款合同》。借款额180.32万英镑，用于订购该公司所制维梅式商用飞机100架及筹组地面设备。此项借款以发行同等数额“中华民国八厘十年英镑国库券”偿付。11月1日，广州军政府电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就此项借款提出质问，要求“早日作罢，以释群疑”。

△　日本于奉天铁岭开办铁岭商业银行株式会社，资本定额100万

日元。主要出资者为日人权田亲吉、下山恭次郎。六名董事及四名监察中华人仅各占一名，由下山恭次郎任该银行代表。开设期限20年。

△　上海民国路各店商集资创办《商业日刊》，“借以发扬实业，振兴国货”。

10月2日　徐世昌亲赴孔庙主持秋丁祀孔。

10月3日　徐世昌下令废止《审理敌国人民民刑诉讼暂行章程》，嗣后关于德、奥两国人民诉讼，均照《审理无约国人民民刑事诉讼章程》办理。

10月4日　唐绍仪自上海再电广州军政府请辞南北议和南方总代表职。

10月5日　《寰球中国学生周刊》在上海创刊。该刊“为全体会员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之机关”，并藉以传布寰球上海中国学生会宗旨。

10月8日　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演讲阐述“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扫除前清的遗毒官僚、政客和武人三种陈土，“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

△　俄国谢米诺夫白军在日方嗾使下，自满洲里开抵哈尔滨。13日，协约国监管路政委员会中国代表刘镜人就谢军入侵中东路事向俄方代表提出抗议。

10月9日　谢米诺夫率布里雅特蒙古兵1600名入侵外蒙，图犯库伦。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请北京政府速派援军。

10月10日　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规约规定“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并规定中国国民党设本部于上海，本部设总务、党务、财务三

部。

△ 《民国日报·国庆增刊》发表孙中山《八年今日》一文。文章着重总结中华民国成立八年来革命失败之教训，指出：党人“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以是对于开国之进行，多附官僚之主张，而不顾入党之信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悉置之脑后……此又何怪今日之民国竟变成亡国大夫之天下也”。继谓“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祸始，则政客实为万恶之魁”。文末号召：“凡今日承认民国者，必当服膺于革命主义，黾勉力行，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

△ 徐世昌颁布授勋令，特授张作霖以勋一位，世续、朱深、姜桂题、李纯、赵倜、阎锡山、张敬尧均给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 午后2时，天津各界联合会于南开学校操场召开共和纪念大会，到各界群众四五万人。会后举行庆祝游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立即派出保安队及武装警察强行禁阻，当场殴伤男女学生20余人。后游行队伍冲出军警防线继续前进，并决定前往警厅向杨以德提出质问。杨拒不见。群众坚持至夜10时始返。杨随即派出马队数十，于警厅前肆意冲驰。一时在场围观市民被踏、被击，以致被迫落水者甚众。杨以德镇压天津群众消息传出，举国愤激。各地团体纷纷函电徐世昌、北京国务院及直隶省长曹锐，要求撤杨，以平众愤。

△ 北京学生庆祝共和纪念日，展开广泛宣传新思想活动。事先各大中学校学生捐款定购面包17万个，上以红色分别印有“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推翻专制”、“打破军阀”、“不用仇货”、“互助”等字样。是日午前10时，5000余学生分途出发。将全市分为20余区，每区由学生一队，携面包两大车，沿途分送劳动者。同时并进行演讲，散发传单20余种，共30余万张。至晚10时始告结束。

△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于太原召开第五届年会，到各省区代表51人。会间议决事项共28件，其要者为：退还庚子赔款专办教育；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改革女学制度；改进学校体育；推行义务教育；改编中学校教科书；请设国立学术研究会；请分区筹设国立农业专门学校；请裁兵兴学；请变通规程选派女子留学；改良戏剧以重社会教育等。年会至25日闭幕。

10月11日　　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及财政总长特派代表徐恩元、驻美代办容揆，与美国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代表于华盛顿签订借款550万美元合同。此项借款原定以北京政府“烟酒公卖费全数为直接抵押品”，后因他方提出争议，遂改以河南、安徽、福建、陕西四省厘金及其他税收为担保，用于偿还到期1916年六厘金币借款库券。合同中并写明，北京政府此后将向美国“续借一批或若干批之借款”，总额为2500万美元。消息传出后，广州军政府于10月24日电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质问，要求“迅速停止”。

△　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8000余名工人与上海纱厂万余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同时举行罢工。

△　大中华纺织公司在上海成立，聂云台发起，股本银90万两，纱锭二万枚。

△　《民国日报》据法国巴黎《晨报》所载有关文章报道，当时在法华工总数共14万人，主要从事各项建设、开荒及清理战场等工作。

10月12日　　孙中山函复福建党人宋渊源，告以国内发展党务仍用中华革命党名义。

△　《人言周刊》在上海创刊。该刊宗旨为：研究“做人的生活、组织、事业、快乐”。“实写社会现状”，“批评七日的人事”。

10月13日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身份委任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务主任。

△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参加签署13国《国际航空条例》。

△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发布由周恩来草拟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男女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书中历数杨以德破坏共和，纵警伤人诸事，宣布自是日起各校一律停课，坚决要求曹锐撤惩杨以德。

10月14日　　蒙古王公大臣联名呈请北京政府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实现五族共和，共享幸福。

△　新疆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请速拨军械以固新疆省防。

10月15日　　北京政府陆军部与英商海尔签订飞艇借款合同，借款总额80万镑。

10月17日　　北京政府内务部通告："本年十月二十日，即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节。所有文武各机关、各团体均应放假庆祝，悬旗结彩，并准各项人员前往孔子庙自由行礼。"

△　是日及2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两次派代表往见曹锐，要求撤换杨以德。20日，曹迫于情势，允撤杨，约以10日为期，并要求学生复课。21日，天津学生发表《终止停课宣言》，宣布自是日起一律复课，静待撤杨。

△　夜，安徽蚌埠皖北镇守使署失火，延烧安武军第三路旅部、第七路团部及水利局等机关局所，并毁民房千余间。

△　北京政府呈准公布《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章程》，凡18条。

10月18日　　孙中山于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作题为《救国之急

务》演讲。内称："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惟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原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也。"而根本改革则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论及五四运动时指出："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10月19日　　出席巴黎和会中国全权委员以近日英、法、日、意等国已先后批准对德和约，特向和会声明保留约内关于山东之三款。

△　外蒙库伦当局要求取消独立。是日，北京政府收到正式呈文。

10月20日　　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电告北京政府，是晚在库伦举行庆祝外蒙取消自治晚会情形。

10月21日　　上海南北市及内城全体锯木工人一千数百名，因所得工资入不敷出，自是日起相率罢工。

△　中日盐业株式会社在济南开办，并于青岛设厂，资本50万日元。

10月22日　　广州国会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议决改组军政府，弹劾政务总裁主席岑春煊。

10月23日　　徐世昌特任徐鼎霖为吉林省长，令准原省长郭宗熙辞职。

△　徐世昌指令将甘肃省金城县更名榆中县。

10月24日　　广州军政府召集军事大会，岑春煊以书面提出辞职。与会者极力挽留。同日，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

△　京师警察厅封禁北京《国民公报》，传讯该报编辑孙几伊。12月，孙被判处一年零两月有期徒刑。此为轰动一时之“国民公报案”。

10月25日　广州军政府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

△　徐世昌批准内务部呈拟《管理印刷营业规则》，凡八条。

10月26日　北京政府赴美调查财政专员徐恩元同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草签烟酒借款2500万元合同。烟酒联合会商人致电政府反对。

△　徐世昌任陈兴亚为京师宪兵司令。

10月27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主席岑春煊通电辞职。

△　天津学生以曹锐延宕多日迄无撤杨以德令下，各校演讲团5000余人遂于下午3时半一齐出动，游行、演讲，揭露杨的种种虐政，以示斥杨决心。当日演讲共2501人，市民随行者万余人。

△　俄白军于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炮击北京政府派赴松花江之防舰。北京政府据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向鄂木斯克政权提出抗议。

10月28日　黑龙江省长孙烈臣将该省议会关于收回江东六十四屯土地，以符《瑷珲条约》之请愿案，咨送北京政府外交部。

△　徐世昌派驻日代办庄景珂为全权代表，与玻利维亚全权代表、驻日公使模罗斯签订《中玻平等通好条约》。12月3日，该条约在东京正式签字。

△　中日合资于奉天开原开办亚细亚制粉株式会社，资本300万日元，由王执中及日人川岛定兵卫分任正副社长。开设期20年。

10月29日　　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为外蒙取消自治事续电北京政府，说明外蒙土地人民以王公为主体，喇嘛不足代表外蒙。

△　中日合资于哈尔滨开办中东制材股份有限公司，专营木材及木材金融，资本50万日元。中日各半。由刘静安及日人大西库治分任正副经理。开设期25年。

10月31日　　北京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请北京政府撤废中日军事协定。

△　留法勤工俭学生李富春、张昆弟等150人，乘法轮“宝勒茄号”，自上海启程赴法。

11月

11月1日　北京政府派员收回自1900年起被美军占领之北京正阳门城楼。

△　《曙光》杂志于北京创刊。杂志社主要由北京中国大学、法文专修馆、俄文专修馆等高等学校学生组成。郑振铎、王统照、耿匡（济之）等均为该社成员。《曙光》宗旨为：“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该刊原拟以月刊形式出版，后因印刷耽延、经费困窘，经常愆期。至1921年6月终刊时，共出九期。

△　北京社会实进会出版物《新社会》旬刊创刊。该刊宗旨为：“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至1920年5月1日共出19期。后被警厅封禁。

△　济南《大民主报》创刊。该报为中美资本家合资创办。宣称；“本报无机关，无党派，以大中至正为宗旨，以发达民权、滋厚

民生为依归。而所以策励吾鲁民执殳前驱，共保土地主权，恢复自由幸福者，尤为目前当务之事。”

11月2日　北京政府农商部以部令废止工厂特别专办区域年限之条例。

△　日本为操纵奉天铁岭之贸易，与华人合资开办铁岭交易信托株式会社。资本定额50万日元。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出资半数，余由日人山田桂藏及华人郭信侯等分担。开设期限10年。同日，“中日合办”日华银行亦于铁岭成立。资金100万日元。主要出资者为日人松冈右卫门、山田恭致及华人刘芳斋。由松冈任该银行专务董事兼代表。开设期限20年。

11月3日　广东省财政厅与台湾银行签订借款10万日元合同。此款充作留日学生经费。14日，北京政府教育、财政两部亦与台湾银行签订一项借款合同。借款数额及用途与前者完全相同。

11月4日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外蒙取消自治案，议决以陈毅拟定之《外蒙撤销自治善后条例》为原则，交陈专办。

△　“中日合办”开原银行于奉天开原成立。资本定额100万日元，中日各半。主要出资者为日人川岛定兵卫、津田善松及华人王执中、米玉斋等人。以日人藤冈织太郎为该银行代表。开设期限20年。

11月5日　徐世昌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

△　曹锟、张作霖、倪嗣冲、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卢永祥、鲍贵卿、孙烈臣、张树元、阎锡山、赵倜、张敬尧、李厚基、陈树藩、张广建、杨增新、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齐耀琳、吕调元、何佩瑢、齐耀珊、戚扬、屈映光、刘镇华、曹锐、吴光新等联名电请徐世昌裁兵整税，内称：“侧闻中央财政，本年度预算不敷之额约达4000万元左右。……将欲权宜济变，势不外开源节流两端。如就各省

现有军队裁减二成……约计节省之数，岁可2000万元。一面由中央责成各省督饬财政厅，于丁漕契税各项及一切杂捐切实整顿……共计增入之款，亦当在2000万元左右。……庶可力扶危局。”

11月6日　徐世昌再颁发禁烟令。

△　徐世昌令郭则沄署国务院秘书长。

11月7日　徐世昌据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呈请，准于上将军及冠字将军两等之外，增设不冠字将军，列为三等，月薪600元至800元。18日，再据国务总理靳云鹏呈请，批准所拟任命将军命令程式。

11月8日　因徐世昌曾托人向孙中山转达恢复南北议和之意愿，是日，孙中山致函徐世昌陈述对时局之主张：一、希望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南北议和代表所允认；二、拟于明春赴欧美考察教育实业以贡献于社会。

△　广州学生黄复颜、范曾养、古太一、程万镒四人，因奔走抵制日货，积劳病故。是日午后2时，广州各校学生于东园举行追悼会，会后冒雨游行。队伍行至长堤先施公司门前，因该公司屡次不听劝阻，继续销售日货，群呼“抵制亡国公司”不止。公司雇员马旋德、欧耀二人闻声奔出，伙同警察，挥动刀枪向学生乱击。当即殴伤数人，内三人重伤。在场学生见状，即将马、欧二人拿获，送往区署。广东警务处长兼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得公司诬报，立遣武装警察数十人驰至，不由分说即举枪捣毁学生保存之肇事现场，并以刺刀猛刺学生，复重伤四人。学生愤极。被迫夺下警察手中枪支及带有血迹之刺刀以为罪证。旋举代表赴地方检察厅，请派员检验。代表甫去，警察即将公司前后门加锁，禁闭学生200余人于内。公司外之学生见状，均守候不去，直至次日天明。

△　孔子七十六世孙“衍圣公”孔令贻在北京病逝。19日徐世昌颁令优恤。

11月9日　广州旧国会粤籍议员林伯和等10余人联名电军政府及督军、省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及查办魏邦平。11日，广州各校学生数千人先后赴军政府及督军、省长公署请愿，军政府各总裁及莫荣新、张锦芳均托故不见，致无结果而返。

△　午前9时许，魏邦平再派武装警察百余人，齐上刺刀，自毗邻先施公司之东亚酒店直冲入公司内，复刺伤学生10人，并逮捕学生领袖张殿邦等11人。旋将8日殴击学生之凶器强行夺回，始开启公司大门，将学生尽行逐出。其中多名学生被警察直追至堤畔，逼落水中，二人竟因是溺毙。事后，魏邦平即将殴伤学生之凶徒马旋德、欧耀释放，并于当日出示文告，反诬爱国学生擅取公司食品，抢劫马、欧二人财物，勒令“务宜守法自爱，勿再盲从滋闹”。学生见此文告，即约集200余人前往警厅质问，并要求释放被捕同学。魏竟对学生大肆谩骂，声言必须交出抢劫马、欧二人之财物，始行开释。旋将张殿邦等11人押赴“惩戒场”监禁。广东学生联合会为此通电各机关并发表《粤学生泣告全国书》，阐明肇事真相；呼吁各界主持正论，群起声援，共除民贼。

11月10日　孙中山函复援赣第四军军长伍毓瑞，指出：“当今急务，在于先消灭桂贼，以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出师北上。”

△　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到各团体代表697人，其中全国13省27处派代表62人，孙中山亦派代表出席。通过《成立大会宣言》。该会为当时全国统一之民意机关，“以发展民生，促进民治，拥护国权为宗旨”。

11月11日　徐世昌令准滨黑铁路督办鲍贵卿辞职，令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孙烈臣兼充该路督办。

△　午后2时，福州帮商瑞顺洋行往桥北运送日本火柴，被学生马育才、谢翔高、陈公亮、陈杰等发现，当即迫往大妙山焚毁。12日，

驻福州日本领事据此向省政府提出三次书面交涉，无理要求逮捕、重罚爱国学生，解散学生联合会，赔偿瑞顺洋行损失，将肇事沿途站岗警察均予免职，并严惩刊载“劣货”字样之《健报》主笔。进而扬言：“现在福州之帝国臣民对于兹事忿怒已甚。将来倘遇学生等不法行为，两国人民激起冲突，不幸在路上见流血之重大事件发生，无非贵国官宪取缔排日团不充分肇成学生等不法行为，本领事全然不负责任。”

△　孙中山函复彭素民，告以“当今急务在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

11月12日　　广东省议会议员黄佩荃等25人联名电军政府各总裁及莫、张二人，要求立将学生提释，并将马旋德、欧耀及行凶警察拘送法庭，按律治罪。而莫荣新则偏听魏邦平谎报，竟于同日发出批示，诬指学生“恃众殴警，伙掠财物，围夺军械，实属不法已极”，并谓被捕学生张殿邦等11人“实觉情重罚轻”，“嗣后倘敢再犯，尤当从严惩治”。

△　广州10余种报纸报道警察殴捕学生之暴行后，是晚魏邦平派警搜捕《国民报》、《大同报》两报馆，并拘捕《国民报》主笔陈藻卿等五人，次日又派警搜查《羊城报》等10家报馆，连夜捕去主笔、记者25人及《粤报》印刷工人20余人。

11月13日　　徐世昌任命何佩瑢为湖北省长。

△　徐世昌派钱能训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

△　北京新国会众议院开会，对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进行读会，并对八年度路电邮航四政特别会计预算案作审查报告。

△　广州众议院开会，到议员200余人，通过查办魏邦平案。

11月14日　　徐世昌公布《修治道路条例》，凡15条。

△　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电北京政府，主张明令先行撤销外蒙自治，其余办法另行商定；并另电北京政府，认为陈毅在外蒙撤治事中对王公有所偏袒。

△　广东省教育会会长陈其瑗会同各校校长、教职员代表70余人前往警厅保释被捕学生。经与魏邦平多方争辩，直至15日凌晨2时，张殿邦等11人始释出。

11月15日　　广州国会粤籍议员、省议会议员、总商会董事及各校教职员拟于东园国会议员俱乐部开会，议商解决办法。魏邦平出动警察，断绝交通，禁止集会。为此，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及各地群众团体纷纷通电，一致声讨魏邦平滥用职权，拘辱学生、围抄报馆、捕押记者、摧残舆论种种罪行，要求广州军政府及莫荣新、张锦芳立即释放报社被捕人员，严惩魏邦平。

△　北京国务院电令各省转饬所属严密查禁秘密组织“狼头会”及该会所发鼓动回民独立建国之《我为我》一书。

△　湘西护国军第四梯团团长廖湘芸率部哗变，杀该军总司令周则范及第三梯团团长杨玉生，自任纵队司令。旋诬加周等以“通敌”罪名，通电全国。

△　旅法华人于巴黎创办《旅欧周刊》。该刊由周太玄主编。至1920年11月6日终刊时共出版52期。

11月16日　　下午6时，福州日侨数十人持械于桥南寻衅，无故击伤学生四人、市民一人、警察一人。警察驰往弹压，日人竟出手枪乱射，击毙一人，伤数人，造成轰动全国的“福州事件”（亦称“福州惨案”）。

△　长沙各校学生不顾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禁阻，集20余校代表重新组成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发表《湖南学生联合会再组宣言》。

11月17日　　库伦当局正式宣布外蒙取消独立，仍归属中国，并声明前与沙俄政府所订各项条约“概无效力”。

△　福州各校一律罢课，商界罢市，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下午，福州各界万余人召开公民紧急大会，议决要求日方撤领、谢罪、赔偿、审凶，旋派代表请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等转达北京政府，与日使严重交涉。

11月18日　广州国会开宪法会议，国会议员共出席592人，其中参议员188人，众议员404人。

△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通电西南各省，请督军、省长选派代表一人，省议会公举代表一人至粤组织建设会议。

△　徐世昌因前代理阿尔泰办事长官张庆桐以私印纸币发放军饷，激起兵变；并于未奉政府命令之先，擅与沙俄领事订立条约，是日明令着从严惩戒，并令新疆督军兼省长杨增新照会俄领，声明前约无效。

△　广州学生因屡次要求当局惩办魏邦平均无结果，是日中等以上各校一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声明“学生罢课，以依法惩办魏邦平为目的。魏邦平一日不办，学生一日不息”。罢课持续将近一月。其间游行、演讲接连不断，向当局请愿达10次之多。后因护理省长张锦芳出面保证，“愿以文书表明依法办理”，各校遂于12月15日复课。而张锦芳后竟自食其言，惩魏之事不了了之。

11月19日　　孙中山电请美国公使芮恩施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制。谓：“在中国，是民主制还是军阀制获胜，主要依靠阁下在这阶段对我们无援百姓的道义上的支持。”

△　徐世昌公布《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组织条例》，凡七条。

△　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电北京国务院，请分清西北边署与都护使

之权限。

11月2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务次长陈箓就福州事件向日使小幡酉吉提出口头交涉。小幡反诬福州学生“强夺商货”，“开枪互击”，要求“严重取缔”学生爱国行动。

11月2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福建交涉员王寿昌就福州事件向驻福州日领提出书面抗议。

11月22日　　徐世昌明令嘉许曹锟等电请裁减兵额、清厘税收之倡议，即着各该管官署会同各该督军省长总司令等，“妥速筹议，确定计划，克日施行”。

△　徐世昌以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是日明令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

△　外交委员会就福州事件向北京政府提出对日交涉六项条件：“一、更换驻闽日领；二、由日本政府谢罪；三、慰恤死伤者；四、惩办行凶日人；五、保证此后日商不得携带武器；六、惩办驻闽日领署警长。”

△　华盛顿国际劳工会议特殊国委员会，是日就中国劳动时间问题通过如下决议：“一、劳动时间以每日10小时、每星期60小时为原则。其未满15岁之劳动时间，以每日8小时、每星期48小时为原则；二、每星期得休息一日；三、凡工厂之使用工人在百人以上者，即得适用工厂法；四、外国租界上所有之工厂，亦适用此项同样之时间制；五、速行制定工厂法。”中国委员提出抗议。

11月23日　　吴佩孚与云南代督军唐继虞、贵州督军刘显世之代表在衡阳签订《救国同盟条约》。粤、湘、桂省代表及川省代表，亦随即在密约上签字。

△　全国各界联合会就福州事件向各地团体发出通告，呼吁“速开

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决不供给日本一切米粮煤铁及各种原料”。

△　午后2时，上海各界三万余人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暴行。大会议决对日交涉八项条件。其中除22日外交委员会所提六项外，另加如下二项：“七、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八、限日本军舰军队离闽。”当将八项条件电达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迅即提出交涉”。按：此八条后即成为全国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办法。

11月2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外蒙取消独立，是日照会俄公使库达摄夫，声明所有前订中俄蒙条约及俄蒙协约并中俄声明文件应即失效。

△　俄国公使库达摄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俄国与中国、外蒙所订蒙事各条约，“俄政府未允取消以前，仍应俱在”。

△　天津各校学生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福州惨案暴行，沿途演讲并散发传单，出发前公举周恩来等五代表前往省署请愿，要求电北京政府与日方严重交涉。

11月25日　由教育界知名人士黄炎培、袁希涛、邹楫、任诚、陈宝泉、孙其昌、杨若堃、金曾澄、谭锡恩等12人组成之欧美教育考察团，是日出国考察教育。

△　日本舰“嵯峨丸”奉日本政府令驶抵福州，是日该舰水兵60人全副武装强行登陆，上街示威。

11月26日　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财政总长李思浩与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借款550万美元合同，以北京政府烟酒公卖费为直接抵押，并言明由北京政府聘美国人一名任烟酒公卖会

办，以监督烟酒税收。此项借款系供北京政府“拨充欠发军费及清还到期债务之用”。

△　孙中山在上海与英文《大陆报》记者谈时局。指出南北议和“余之惟一条件为国会必须有全权行使职权，北京政府一经承受余之条件，和平可以成立”。

11月27日　午后4时，北京政府外交部就福州事件向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四点：“一、撤退福州领事；二、充分赔偿福州闹事中华人生命之损失，并给与受伤华人之医药费；三、按法严惩肇事负责之日人；四、福州日领事应向福州中国当道道歉。”抗议提出后，经接连三次催复，日使均以“须先取缔排货”拒之。

△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顾维钧、施肇基与协约各国代表共同签署对保加利亚和约。

△　北京政府财政部所属汉口造纸厂与中日实业公司同时签订借款51.6万日元及40万日元两项合同，以造纸厂全部财产为担保。前者用于订购机器，后者乃纸价预付款。

11月28日　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宣布福州紧急戒严。

11月29日　北京中学以上各校学生于天安门前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的暴行，并抗议日舰侵扰福州，会后游行演讲并散发传单。

△　南京各校学生3000余人分赴军省两署递交请愿书，提出解决闽事五项主张，要求电达北京政府与日方严重交涉。

△　云南督军代表韩凤楼电唐继尧报告吴佩孚与《救国同盟条约》签字代表举行“衡州会议”议决之五项条件，其中包括吴佩孚撤防。

△　是日及30日，旅法华工6600人分三批乘轮离法，赴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11月30日　　云南各界数千人于昆明召开全省各界联合会成立会并发表宣言，申明成立该会主旨为“一曰除国贼；二曰促和平；三曰御外侮”。

△　日公使小幡酉吉至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取缔“激烈传单”。

△　江苏交涉员杨晟在上海孔教总会建立会堂举行募捐会。会间散发孔教会会长陈焕章所著《孔教论》一书。陈并宣讲《孔子之道与今日中国之关系》。王揖唐、杨晟当场各认捐1000元，陈焕章捐2000元。

△　东蒙奈曼旗王公苏珠克图巴图尔，与日本大仓组代表签订借款200万日元合同，以全部领地永久租借权为担保。此款用于“兴办实业”。

11月下旬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曾毓隽与英国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在北京订立借款200万汉口通用银元函约，以京奉铁路余利为担保。此款用作湖广铁路湘鄂局订购机车12辆、货车90辆及就地各项开支。

12月

12月1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宣告各友邦文》。以中国国民名义提出希望四项：“一、取消欧战发生以后中日间一切不平之条约；二、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占有之一切权利；三、德约除一五六至一五八条三条，其余一概承认；四、我国合法国会未能完全行使职权以前，请各友邦勿供给军械、金钱于南北政府，并停付关税、盐税余款。”要求各“友邦”对上述各项“予以善意有力之赞助”。

△　全国学生联合会就福州惨案电各地学生联合会，请每日多派学生游行演说，抵制日货，并将解决闽案八条件急电北京政府，促其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　徐世昌令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善后一切事宜，所有原设办事大员暨佐理员各职一律裁撤，驻库伦办事大员公署归并西北筹边使署。

△　《闽星》半周刊于福建漳州创刊。主办者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陈秋霖主编。《闽星》编辑及主要撰稿人多为无政府主义者。陈炯明亲撰发刊词，主张破除国家主义。《闽星》共刊行三月，后因陈炯明率部开赴广东，即告停刊。

△　“中日合办”上海工商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制造珐琅器皿并承揽运输业务。资本定额50万日元。主要出资者为日人松本茂。董事五人中，华人只占一名。开设期限30年。

12月2日　长沙各校学生因福州事件举行焚毁日货大会，到各界近万人。张敬尧派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禁阻焚货，驱散与会群众，并逮捕五人，殴伤数十人。

△　上海75校万余名学生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的暴行，一致议决不用日货。会后游行，沿途四处搜寻日货，集中至公共体育场烧毁。

△　苏州20余校学生万余人为福州事件举行游行，沿途高呼“救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散发传单20余种，并举代表分赴省、军署及省议会递交请愿书，提出六项条件，要求转致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王鸿年、沈觐宸，教育部派徐鸿宝同赴福州，会同日方人员调查闽案真相，是日离京赴闽。

△　徐世昌特派徐树铮为加封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之册封专使。

12月3日　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改组。徐世昌令外交、陆军、海军、司法兼署内务、农商各总长陆徵祥、靳云鹏、刘冠雄、朱深、田文烈准免本职；特任陆徵祥、田文烈、李思浩、靳云鹏（兼）、萨镇冰、朱深、曾毓隽分任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交通各部总长，田文烈兼署农商总长；傅岳棻为教育次长，仍代理部务。

△　徐世昌任周自齐为币制局总裁。9日，令财政总长李思浩兼币制局督办。

△　山东济南中等以上16校全体学生游行演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之暴行。中午，各界复于省议会开国民大会，到数千人，议决再电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　英公使朱尔典往访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务次长陈箓，就西藏问题发表英国无侵略野心等五点声明。

12月4日　徐世昌令外交总长陆徵祥未到任以前，仍着外交次长陈箓代理部务。

△　徐世昌准教育部呈请，令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将柯劭忞著《新元史》列入正史。

△　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电谢美国参议院于上月15日通过对德和约山东问题之保留案。

△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倡议知识青年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之集体生活，以此作为理想社会雏型，通过广泛发展与联合，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

12月5日　　广州国会电北京政府，就解决福州事件提出四项条件，要求惩凶、赔偿及撤退登陆之日本水兵，保证以后旅华日人不得滋事；如日方不全照办，应即提交公使团“秉公裁断”。

△　日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就福州事件提出书面反抗议，指责此次事件皆因中国地方官不善取缔学生排日行动有以致之，并捏造事实，强诬“责任全在中国”。

△　陈炯明自福建漳州上书孙中山，报告在闽南“拟实施劳动教育，使劳动界皆识字，思想自可变迁，然后进图社会主义之实现，亦不难事”。

△　安庆省署卫兵于市间购物，与警察发生冲突。省长吕调元闻讯，即令其子率队前往弹压。安庆警察厅长刘道章在安徽督军倪嗣冲暗中授意下，借口警察受辱，提出辞职。9日，全城警察一律罢岗，市面呈不稳之象。吕调元无奈，被迫电北京政府辞职。倪嗣冲旋将此事电达北京政府。

12月6日　　湖南长沙学生联合会为抗议张敬尧禁阻焚日货并逮捕殴伤学生，是日宣布罢课，至8日各校一律停课，举出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进行驱张（敬尧）活动。当日晚，毛泽东率赴京代表团一行40人乘车北上。

△　河南开封各界数万人召开国民大会，工、农、兵、学、商及乞丐等均登台演说。大会声明拥护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八条件，并议定坚决抵制日货，限各商店于29日前将所存日货一律肃清。

△　留美归国学生及国内部分学者于上海创办《民心》杂志。该刊为大型综合性周刊，又名《民心周报》。宗旨有六：“一、提倡及研究所以发展国家自卫力之道；二、注意国民外交；三、发展吾国固有文化；四、提供健实主义及讨论做人方法；五、输入及批评欧美新思想与学说；六、陈献工商业计划及办法。”《民心》发行量甚大，

每期约三万数千份。

12月7日　北京各界10万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的暴行。大会通过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八条件，并议决力争山东一切权利，防止补签对德和约，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要求政府外交公开，不承认中日间一切密约，不用日货、日币，不准米粮出口，与日本断绝一切经济关系。旋将上述决议通电全国，并函告徐世昌，要求顺从民意，与日方严重交涉。

△　山西太原各校学生2000余人组织演讲团游行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之暴行。

12月8日　南京各界三万余人为福州事件召开国民大会，议决撤退日领、日舰、道歉、赔偿、审凶等六项条件，要求北京政府与日方严重交涉，当场并焚毁日货多起。

△　江苏如皋60余校学生万余人为福州事件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热心救国，抵制日货"口号，并将查获日货携至公园焚毁。

△　全国各界联合会开第十七次评议会，施洋主席，议决将张敬尧祸湘、倪嗣冲祸皖、陈树藩祸陕种种罪状通告全国，请一致声讨。

12月9日　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自马赛启程返国。

△　广州60余校学生9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之暴行。

△　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国民军筹备会，通过草章，规定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国民军，每校至少须编步兵一个排。

△　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南昌学生反对江西米谷开禁，派戒严司令及警务处长率士兵三连将南昌学生联合会强行封闭。次日，南昌各校

学生罢课以示抗议。学生联合会并发表《赣学生罢课宣言书》，揭露陈光远及省长戚扬擅开米禁，镇压学生等罪行。

△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聂荣臻等158人，乘法邮船自上海放洋。

12月10日　　日公使小幡酉吉遣使馆书记官深泽至北京政府外交部，捏造北京学生殴辱日侨学童，抗议7日北京国民大会抵制日货、日币之决定，要求北京政府“严加取缔，并饬岗警实力保护”。次日，靳云鹏“严重训令”警察总监、步军统领即行设法取缔。

△　武汉各校校长及学生代表在汉口举行联席会议，会间学生代表提出依北京国民大会通过之解决闽案八条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及允许学生联合会检查日货等四项条件，请各校长转致省长认可。省长何佩瑢声言绝对否认。14日，因武汉学生4900余人前往省署请愿，何被迫接受学生四项条件。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外蒙撤治事复照俄使库达摄夫，指出取消自治，实由于外蒙自愿，并于同日将此照会分发英、美、法、意、日、葡、比各国使馆。

12月1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设立滇、黔、川、陕、粤、桂、湘、闽八省铁道事务统一机关，任命政务总裁岑春煊为督办。

12月12日　　张敬尧密令湖南矿务局与美商在北京签订借款140万美元草约，以湖南水口山铅矿作抵。28日，湖南赴京请愿团毛泽东分函北京政府财政、农商二部，声明湖南人民对此草约“万难承认”。

△　午前9时，杭州各界二万余人为福州事件于公共运动场开国民大会。省议会议员90人亦旷会前往参加。会间通过决议10条，其内容除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各条件外，尚要求誓死力争山东主权、禁止衣食原料出口、惩办倪嗣冲等。旋举各界代表16人组成国民大会委

员会进行一切。会后各校学生并当场焚毁日货。

12月13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向各省各团体发出通告，历数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祸湘八大罪状，呼吁全国各界一致声讨，“以解湘人倒悬”。

△　苏州各界联合会开成立大会，10万人参加，一致议决自救救国，抵制日货，奋起援闽。

△　徐世昌令交通部署路政司长黄赞熙兼川汉铁路督办。

12月14日　　长辛店铁路工人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暴行，特邀集各界开国民大会，工、商、学、妇女等各救国十人团及市民千余人到会。大会重申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八条件，议商永久抵制日货办法并拟定致北京政府书。

△　江苏南通七校学生千余人为福州事件于县公共体育场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力救福建”、“提倡国货”、“毋忘国耻”等口号并散发传单。观者甚众。

12月15日　　奉天省城各校学生代表于是日及16日集会，商讨抵制日货办法，议决：一、学生不用日货；二、劝说商人不卖日货，各界不购日货。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日方于安东（今丹东）擅设兵工厂，向日公使小幡酉吉提出抗议。

△　北京公立大中小各校教职员因反对当局发放贬值纸币，要求以银元付薪，未得满意答复，是日起全体罢课。

12月16日　　武汉三镇各界万余人冲破军警禁阻，在汉口开国民大会，议商力争闽事办法，议决赞同闽案八条，并议决于商会内设立国民大会委员会事务所，以策励此后之进行。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正式照会，要求“取缔各地排日活动”。次日，外务省训令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递交该项正式照会。

12月17日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电广州军政府七总裁，表示希望协力提携，速促和议，“以互让之精神，谋简单之解决”。

△　全国各界联合会电各地团体，提出上街演说、游行，积极抵制日货，赶办学生军、商团、民团三项“自卫之方”。

△　成都学商两界代表联合召开成都商学联合会成立会，宣布“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实力救国，商学联络，一致进行为宗旨”。

△　路透社北京电：美国各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电致各报，谓：“闽案不堪忍受，宜力争赔偿。止内讧，共御外侮。”

△　北京政府教育、财政两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借款15万法郎合同，以期票为担保。此款用于垫付留欧学费。

12月18日　　午后，镇江各界5000余人为福州事件于城中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大会。与会多人相继演说，一致主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商会协理并当场签约，声明“以后如再有商人购进日货，该日货当立即检送公共体育场焚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次日商会即通告各商家：“自即日起各业一概不准再进日货。”数百名码头工人亦开会议决：“此后如遇大阪等船装货来镇，概不代为起驳抬运”；有当焚之日货，即义务搬运，不索分文。

△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以西伯利亚境内华侨生命财产迭遭抢劫与暗杀，是日电北京政府请准率兵保护俄境华侨。

△　日公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次胁迫北京政府“严重取缔”各地反日爱国活动。

12月19日　　徐世昌公布《特别区契税规则》及《特种财产契税规则》。

△　徐树铮所部驻洛阳西北军士兵一名，因往城西七里河村强奸妇女，被村民击毙。午后1时，该军2000余人竟蜂拥至七里河大肆淫掠。该村400余户妇女，不分老、幼、孕妇，无一得免，并枪杀婴儿八人。钱财衣物抢劫一空。与该村毗邻之兴隆寨，200余户妇女亦遍遭蹂躏。兽军围奸三日始去。

12月20日　　天津各界10余万人为福州事件、山东问题及抵制日货三事召开国民大会，随即焚烧日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北京政府内务部电告各省省长，禁止各省议会举派代表开省议会联合会，如有此项情事，即转饬该管警官厅严加取缔。

△　中国与玻利维亚两国驻日本公使分别代表本国签订《中玻通商条约》。

△　上海天马画会自是日至29日于江苏省教育会举办第一届绘画展览会。举吴昌硕等为国画审查员，刘海粟等为西画审查员。展品为国画、西画、图案画、折衷画四部。

12月21日　　徐州各界开国民大会，与会24团体共万余人。会间，农、工及各界代表相继演说，一致呼吁抵制日货，奋起救国。大会并电北京政府，要求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勿稍迁就。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呼伦贝尔护理副都统贵福等电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并请废除1915年沙俄政府胁迫北京政府所订呼伦贝尔条约。

12月23日　　清华学校学生激于福州事件，是晚开全体大会，成立学生会。校长张昶云闻讯，竟暗召驻北京海甸军队及地方武装小锣会入校进行监视，学生闻讯遂开临时紧急大会，议决自24日起全体罢

课以示抗议，后因有关当局允“公平查办”，29日学生复课。

△　徐世昌令各省行政长官整理行政诉讼。

12月24日　　济南各校学生一律罢课，并拟游行演说，山东督军张树元闻讯，即派武装军警禁止学生外出，学生坚欲出校，被军警击伤10余人，捕去四人。

△　旅美旧金山华商邝忠（译音）于华侨寓所界内焚毁价值数千元之日本丝织品及其他器物以为抵制日货者倡。华侨围观者数千人，且有留学生当众演说。

12月25日　　云南昆明各界二万余人为福州事件召开第三次国民大会，议决电请各省力争实现闽案各条件，电北京政府撤惩闽督李厚基，本省应力行抵制日货。

△　午后1时，第九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向警予、蔡和森、蔡畅及蔡母葛健豪等50人，乘法邮船“鸯特莱蓬号”，自上海启程赴法。

△　日本为掠夺内蒙巴林旗资源，与内蒙王公“合资开办”蒙古产业公司。公司总行设东京。经营项目包括采矿、农业、畜牧、森林、酿造及贸易等方面。资本总额150万元。其中巴林王等三王公出资45万元，日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等四个会社出资50万元，日人茂木惣兵卫10万元，荒井泰治10万元。以荒井泰治为该公司代表。开设期限30年。

12月26日　　徐世昌令免张树元山东督军职，调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继任。同日，调长江巡阅副使王廷桢继任察哈尔都统，并通令裁撤长江巡阅副使一职。

△　北京政府慑于日本政府一再胁迫，是日电令各省速禁抵制日货。

12月28日　　徐世昌公布民国八年度预算及同年度路电邮航四政特别会计预算。

△　前代理总统冯国璋在北京病逝。

12月29日　　旅京湖南同乡千余人开公民大会，议决电南政府请促北政府速撤张敬尧，电全国宣布张罪状，求国民公判，呈北政府即日罢张，并设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为去张机关，执行大会议决各事。

12月30日　　日本政府声明撤退在闽军舰，并在东京、北京、福州三处发表声明为福州事件派军舰辩护。

12月31日　　徐世昌令免安徽省长吕调元职，以聂宪藩继任。

△　广东地方实业银行以南海、番禺两县田赋收入及县衙全部建筑物为担保，向台湾银行借款23万日元。

1920年（民国九年）

1月

1月1日　　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颁令褒奖参战出力人员，特授王士珍勋一位，颁给梁启超“前识匡时”匾额一方。曹锟授为虎威上将军，张作霖、倪嗣冲、李纯均授为陆军上将，靳云鹏、刘冠雄、张怀芝、王占元、赵倜、阎锡山均晋授以勋一位。

△　外蒙古册封专使徐树铮在库伦佛宫正式举行外蒙活佛册封典礼。

△　济南学生联合会在城内第二区大舞台公演话剧，学生就舞台演说抵制日货。警察厅长金荣桂横加干涉，以武装包围大舞台，殴打学生，10余人受重伤。2日晨，学生要求惩治滋事军警，议决全体实行罢课，以相抗争。3日，济南全市教职员宣布“同盟罢工”，为学生后援。新任督军田中玉答应撤换警察厅厅长后，19日学生复课。

△　《钱江评论》创刊于杭州。该刊为青年学生和教师所办的不定期刊物，6月20日终刊，共出版13册。

△　江西财政厅与日商古河洋行签订规平银40万两借款合同，以江西金库券60元万为担保，用于发放军饷及扣还1919年1月27日所欠日金50万元本息。

1月2日　　湖南全省学校学生致电北京政府及广州军政府，声斥张敬尧摧残学生爱国运动，要求罢免张敬尧。略谓：“本月二日，维持会照章将查出劣货数事知照学生，携往教育会焚毁。各校学生为爱国运动均往观瞻……乃张敬尧忽派其弟敬汤，统索军队数千人，执械

汹汹，如临大敌，恣行殴辱，职员及学生受伤者，至数十人之多。……应恳大总统主持大法，将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即行罢职。”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驻华日公使正式质问抵制日货事，是日通电各省区设法禁阻抵制日货。

△　新疆督军杨增新电令防卡分统马朴仓等查阻俄人入卡，谓：“现在防务吃紧，无论何项俄人，非有本督军命令，或经喀什道尹核准，不得放入中境，以免奸宄混迹，贻误地方。至冒充中民之俄人，尤应严为查阻。”

1月3日　下午3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为支持湖南学生驱张运动，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举行湖南来京学生代表大会，北大方豪主席，中国大学祁大明及燕京大学瞿世英、朝阳大学崔学礼等先后演说，表示“与军阀派势不两立，讨伐民贼，责无旁贷”。

△　山东督军田中玉为镇压济南学生爱国运动事密电徐世昌，谓：“本月一日，各校学生在城内大舞台剧馆旧址演剧，警察厅前往阻止，彼此争持，致起冲突。据报警察伤二十余人，学生伤十余人。是日，警察并未持械，双方徒手扯扭，伤痕皆不甚重。”

1月4日　浙江嘉兴各界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1000余人，主席报告开会宗旨：联合会之组织，系共谋国是，为外交后盾，为人民造福。会议决定该会加入全国各界联合会。

△　驻北京南苑第十五师官兵因积欠军饷七个月，酝酿向商家“借饷”。是日，前门外廊房头条、大栅栏、前门大街一带商店纷纷闭门，以防变兵“借饷”。北京政府下令关闭永定门，割断通往南苑的电线，并令第九师严密监视第十五师。后经王士珍调停，由财政部拨发军饷60万元，晚8时风潮始息。

△　前清遗老梁鼎芬在北京病死。

1月5日　　北京各校全体教职员千余人至教育部请愿，要求撤换安福系走卒教育部代理部务次长傅岳棻。请愿旗上大书“寡廉鲜耻，恋栈不去”八字。

1月6日　　天津国民大会通电全国声讨安福系，谓：“自安福把持政柄，中央政局迄无宁岁，而受祸最甚者，莫过于山东。……更复外结日本，内压人民，凡遇有爱国行动，极力摧残，百端破坏。”

△　湖南罢课学生致电各省议会及各学生联合会等，声讨张敬尧运烟祸湘罪行。

1月7日　徐世昌令准新疆省精河县属大营盘地方增设博乐县。

1月8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国务院声援山东各界人民爱国运动，略谓：“日人环侵，主权旁落，齐鲁全闽，尤当其冲，挽救危亡，端赖民气。山东各界以切肤之痛，奋起抗争，爱国至诚，天日可誓。乃当局非但不予赞卫，且徇日使之请，横事摧残，恐众怒之难犯也。”

△　徐世昌命令维持教育经费。令称：“所有在京各校经费，着责成财政部妥为筹措，核议具复。其福建、陕西、湖南等处……务当随时拨济，俾无废辍。至教育基本金一节，并着该主管各部会商酌筹办理。”

△　徐世昌任命吴炳湘兼办京都市政事宜。

1月9日　　国务院总理靳云鹏接见北京教职员代表，答应薪金不搭纸币，并在最短期间撤换教育部代理部务次长傅岳棻。12日北京教职员停职风潮平息。

△　湖南去衡州请愿的学生代表要求见吴佩孚，吴派代表向学生表示同情，并于10日致电张敬尧请维持学校，勿再干涉学生爱国行动。

△ 徐世昌任命马良帮办山东军务。

△ 徐世昌特派叶恭绰为劝办各省实业专使。

1月10日 山西运城第二中学校长李林蔚禁止学生爱国运动，“擅行开除学生四十人，甚且恣意控告，以致学生会职员竟有被拘者”。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此致电山西省长阎锡山，要求“立将被拘学生开释，并令该校长将开除学生一律收回”。

△ 新督杨增新致电省议会，谓：“现拟由新疆自行派兵驻扎察罕通古并后路古城元湖一带，兵力足敷分布，已电达中央勿庸派兵前来协助。”

△ 出席巴黎和会代表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告以协约国对德和约已批准交换，中国拒签在前，仍未列席。美国因未经议会批准，亦未出席。

△ 驻日使馆武官与日本三菱洋行签订日金三万元借款合同。

1月上旬 上海车木胡芦店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全体举行罢工。各店主请中间人向工人调处，允许每个工人按月增加铜元1000文，工人同意，即行开工。

1月12日 湖南省城33校学生驻衡阳代表致电北京政府，揭露张敬尧摧残学生运动，要求罢斥，略谓：“湘督张敬尧莅湘以来，屠戮无辜，摧残舆论，借公肥私，腆颜媚外，席卷金融，勒种鸦片，无恶不作，罄竹难书。……此次学潮，远因于校舍被其部下占据，教师被其指名驱逐，无地求学，无学可求。近因学生爱国，致触张督之怒，打骂践踏，情实难堪。……泣恳诸公主持正义，斥去张督，以救湘人，以纾国祸。”

△ 北京教育界停职风潮，教职员提出五项要求，北京政府均逐条答复，教员遂于是日复课。

△　杭州学生联合会为声援北京教职员，是日起各学校一律罢课。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日金50万元借款合同，以北京中国银行钞票20万元及七年长期公债30万元为担保，用于拨还该行美金借款、海军部德奥船租保证金、京兆尹署、漳厦路经费等。

1月13日　广州军政府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迅速撤换张敬尧。同时北京安福国会湖南籍议员也加入驱张运动，表示不达到目的，即全体辞职，以谢湖南3000万人民。

△　黑龙江督军孙烈臣致电国务院，谓："呼伦贝尔撤销自治正式公文已于本日到黑，其派来之代表德成、凌升二人，即日由京奉车入都，将公文呈府。"

△　德国政府经由顾维钧转电北京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请中国对德国侨民财产勿再没收；二、准德人来华自由贸易；三、请即以前天津领事塞伯特及德华银行爱格林为驻华非正式代表。外交部议复婉拒。

1月14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拒绝日牒事通告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暨各界各团体，略谓："山东问题关系我国存亡，国民誓死力争，将及一载。'五四'以来，全国各界不惜为极大之牺牲，以从事于群众的运动，内则罢斥国贼，外则拒签德约，此所以保留山东问题一线之生机。……是故今日以后，真为山东存亡之关键，亦即为全国存亡之关键。我国民而忍坐视前功之尽弃，不思所以挽救者，则亦已耳，否则宜速群策群力，以监督媚外之政府，毋使其违背国民公意，以与日人为秘密之交结，因而断送山东于万劫不得之境。时机迫切，望速奋起。"

△　广州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密电唐继尧，谓："安福据阁，靳（云鹏）已软化，河间（冯国璋）新逝，直系骤无中心。……直系失

势，西南更危，双方处境相同，非彼此彻底联络，无以自存……此即秉成规联直制皖策略，务乞迅速协谋进行。”

△　孙中山接见加拿大回国华侨马立成等三人，力主驱逐桂系，大权还之民党，以挽民国危亡。

1月16日　　孙中山批复前兴中会员杨鹤龄两次求职来函，指出：“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

△　日本驻京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要求取缔反日、抵货运动。

△　北京政府海军部与日本川崎造船所签订日金500万元借款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用于订购军械。

1月17日　　驻军湘南的吴佩孚电请直督曹锟代为转达北京政府，要求自湘南撤防北返，北京政府未予批准。

△　成都四川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等20余校代表，在商会筹商学商联合事宜。共同讨论商学联合会简章，其宗旨为：“本会以抵制劣货，提倡国货，实力救国，商学联络一致进行。”商学各代表逐条讨论，均无异议，成都商学会宣告成立。

1月18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广州军政府，要求拒绝日牒，略谓：“和约我未签字，不受拘束。日人竟欲继承山东权利，实属违背公法，除电北京政府严重抗议外，务望一致力争，勿稍退让。”

△　四川旅沪各界联合会宣告成立，并致电四川省议会，谓：“以发扬民意，挽救危亡，并协谋桑梓利益为宗旨。”

1月19日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正式通牒，提出山东问题交涉案，要求直接交涉。略谓：“对德和约现已发

生效力，日本政府拟履行以前屡次宣言，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关于山东善后各事，拟由贵我两国组织委员会，商议解决。至山东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亦不必待新约成立即可撤退，希望贵国组织巡警队，保持铁路，惟组织未完备以前，日本军队仍暂保留。”外交部代理部务次长陈箓答以：“此案关系重大，暂不能将中国政府所持方针，有所表示。”此后，直接交涉问题引起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同日，该公使又另递照会，提议由中、日两国组织委员会协商解决山东问题，并主张暂行保留胶济铁路日本驻军。

△　上海各界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略谓：“顷闻日本将以继承山东权利，并开始归还青岛之交涉，通牒我国，不胜骇异。我国既已对德宣战，所有前订之中德条约，依法完全解除。巴黎会议之对德和约，我国又未签字，则德国前在山东区域占有之政治权、经济权，均应由我国直接收回，日本不得干预。倘公等始终仰日人鼻息，不惜违背民意，铸成大错，国民除否认外，不能置甘心卖国者于不问也。”

△　上海各界联合会致电广州军政府，谓：“中德条约已于宣战时解除，对德和约又由专使拒签，则德人前在山东区域占有之政治权、经济权，我国自当候由国际联盟会议直接收回。乃警耗传来，日本将以继承山东权利及开始归还青岛之交涉，通牒我国。北廷夙倚日本为生活，将来敷衍迁就，自在意中。务乞公等迅即宣言拒驳。”

△　岑春煊致电唐继尧转述章士钊策划联直制皖办法，内称：“叠晤秀山（李纯），告以盐（14日）电大意，彼甚喜慰。彼言苟和非计，徒使安福假借统一名义大借外债，又借政权排斥异己，非有切实之保障，和后仍无益于国。……秀山欲借张胡（张作霖）倾安福，情迹显然，又与徐（世昌）、靳（云鹏）似已通气。彼言解决时局必须三角同盟，缺一不可，即所谓北洋同志团体与西南及拥中央之靳、徐也。”此着若成，联直制皖即可收效。

△　参加巴黎和会专使王正廷返国抵广州。

△　湖南各界公民陈赞周、毛泽东等数十人电北京政府，历数湘督张敬尧十大罪状，谓："窃以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政府苟犹视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视湘民为中华民国之民，则去暴救民，职责固自有在，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钧院）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依法惩办，另委贤能接充，以全民命。"

1月20日　孙中山派令陈树人为中国国民党驻加拿大总支部总干事。

△　《秦钟》月刊创刊于北京。该刊宗旨为："第一唤起陕人自觉心；第二是介绍新知识于陕西；第三是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共出六期。

1月22日　北京政府陆军部咨请将军府查禁中华农工联合会。称该会为"上海工党"与美国来沪之"过激派"所组织。

1月23日　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陆荣廷、伍廷芳、唐继尧和林葆怿致电靳云鹏，要求更换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谓："国民心理渴望和平，速图解决，同人咸愿。因北方总代表迭请更换，未荷照办。此次尊处来电，仍无明决表示，惟云电知王某催速开议，一若迭次电商不见不闻也者，诚意谋和，似不应尔。务请查照前电，速换妥人，并盼明白示复。"

△　天津学生联合会学生范时久等在东门内卢家胡同魁发成料器庄检查日货，与店方发生争执，学生将该店裴唐仙等两人带往商会，次日经国民大会议决，将裴唐仙游街示众。警察署长蔡其钦令该会将裴交出，学生不允，被警察殴打，并捕去六人。

△　广州军政府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1月24日　广州旧国会宪法会议因政学系议员相率不出席，破坏会议，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及议员褚辅成等521人联名通电，指责政学系“破坏制宪”，并于是日宣告暂停议宪。

△　赴欧和议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回抵北京。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将“国文”改“国语”；并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以利国语教育之推行。

1月25日　陆徵祥谒徐世昌，报告巴黎和会经过。对日使要求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之议，暂予搁置。

1月26日　孙中山对京津《益世报》记者徐谦发表谈话，反对日本政府提出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通牒，并主张废除“二十一条”。

1月27日　北京政府陆军部汉阳兵工厂与日本东亚通商会社签订银元30万元借款合同，用于订购军械。

△　广三铁路局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日金15万元借款合同，以广三铁路局全部财产为担保。

1月28日　湖南公民代表与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三团体，分别至北京国务院请愿，要求撤换张敬尧，旋又去靳云鹏住宅请愿，靳避不会见。代表向靳宅递交请愿书，谓：“张敬尧入湘以来，种种罪恶，不可胜数。……代表等激于公忿，奔走来京，复经多次上呈请愿，守候月余，未闻后命，实深惶惑。”要求“在最近期间将张敬尧明令撤任，另简贤能接充”。

△　北京学生联合会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对于山东问题拒绝直接交涉，对于福建问题根据国民大会意见办理，对于天津问题一面惩戒该地长官，恢复国民言论聚会自由”。

△　广州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致电军政府督军、

省长、省议会，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略谓：“日本挟其强权，蔑视公法，对于山东权利，强欲承认，我国人民誓死不能承认。讵日本竟通牒北廷，借交还青岛为名，诱我直接交涉，彼之狡诈百出，前此二十一条之胁迫，军事协定之奸谋，丧权辱国。”

△　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呈请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并取消中俄会订条件。徐世昌批示照准。

1月29日　孙中山致函海外国民党人，促请发动华侨捐款，筹办英文杂志及印刷机关，函中赞许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　广州宪法会议议长林森、副议长吴景濂、代理审议长褚辅成联名通电，说明宪法会议纠纷真相，并“郑重声明：此次宪法会议破坏，实由于现居军府要职少数之议员同人不负其责任。现议定自24日起，宪法会议暂行停顿，以待彼等最后之觉悟，一旦彼等有出席之表示，即应继续开议，以副国人之期望”。

△　天津各校学生5000人，向直隶省长曹锐请愿，要求转电北京政府拒绝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并撤换杨以德，释放24日被捕学生代表，恢复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曹拒不见，且着军警镇压，打伤50人，学生代表周恩来、于兰渚、张若明、郭隆真四人被绑游街。天津学生遂全体罢课，以示抗议，是为一二九事件。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形成学潮。

△　曹锟、曹锐为天津学潮致电北京政府，谓：“津埠前因搜收日货，私押商民，日领有自由行使警权及调军队自卫之表示，不得已将滋事人等交警厅看管，并将联合会十人团各会所一律封闭。……今日学生又大出发，蜂拥来署请愿，一要求电争中日交涉。一要求联合会等一律启封。锐因卧病未能接见，传令先行解散，竟不听从，必欲拥

进署内。相拒既久，令本署卫队拔去刺刀，横枪堵挡，学生等竟敢以木石乱击，致卫队有重伤者。嗣经驱逐，将扣留首入闯进之男女学生各二人交警厅看管。”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各国声明关于中东路的防边护路办法：一、中东路属我国领土主权，不容第二国施行统治权；二、霍尔瓦特仅为铁路坐办，无担负国家统治之权能；三、按铁路合同，公司俄员及侨居沿线中外人民，应由我国完全保护。

△　北京政府教育部留日学生监督金之铮与日本第百银行签订日金8.5万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留日学生经费。

1月30日　　唐继尧就联直制皖问题电复岑春煊，略谓：“河间（冯国璋）新逝，直系顿失中心，如仍有一致倒段决心，西南亟当与之提挈。秀山（李纯）似尚有觉悟，惟遇事不免迟疑，请嘱行严（章士钊），告以西南愿与同心救国之诚，以坚其志。兹行严转述秀山意见，亦谓现对和会不必进行太急，并谓连结西南各帅为一团体，以便互相提携，与平日联直制皖主张甚为吻合。”

△　广州军政府决定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先付30万元，其余30万元留待开拔时付清。

△　徐世昌令准清华学校校长张煜全辞职，派罗忠诒继任。

1月31日　　下午1时，北京大学等39校学生万余人，为声援天津学生一二九事件。齐集天安门，冒雪大游行，表示抗议。旗帜上书“山东问题不得直接交涉”、“福建问题须根据国民主张办理”、“恢复天津各界言论集会之自由”、“营救天津被捕代表”等字样。

△　北京学生联合会为天津学生一二九事件通电全国，呼吁释放学生代表，声援学生运动。

△　下午2时，上海各学校及全国各界联合会等83团体，为山东问

题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大会，与会者三万余人。会后冒雨游行，群众手执白旗，上书“反对直接交涉”、“声讨卖国贼”，并通电全国。

△　北京国务院电复曹锐，谓：“如为维持秩序，势非戒严不可，届时应即就近参酌情形，依法宣布行使戒严职权。”

△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9000余人，要求日本资本家仿效英商分给花红，日方不允，反而殴打工人。工人忿而捣毁工厂家具、玻璃窗等，举行罢工抗议。厂方允发工人六天工资，2月8日，工人复工。

△　前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张汇滔在沪被刺，孙中山、廖仲恺等亲往慰问。

是月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苏俄马特维也夫—博雷德等，表示对俄国革命和列宁的钦佩和崇敬。

△　梁士诒致电巴黎和会英、美、法、日各专使，反对各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

△　中国“旅法华工工会”正式成立，总部设巴黎，分会36处，会员6000人。

△　《少年世界》创刊。该刊为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第二种月刊。

2月

2月1日　北京政府军警当局为镇压学生运动事举行秘密会议。段芝贵提出直接行动计划，决定质问教育部，如无办法制止学潮，将直接采取行动。

△　库伦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向北京政府呈报收复唐

努乌梁海情形，略谓：“查唐努乌梁海地方，在前清时向隶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该地在乌科北境，东西约二千里，南北约八百里，讫为外蒙屏障……物产丰盈，俄人向所垂涎。……迨宣统三年，外蒙变乱，俄遂乘机强占。……海人嫉俄甚深，同心效顺，备尝种种困难，卒告成功，收回八九年已失之领土。”

△ 湘军总司令谭延闿通电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略谓：“山东问题，自日人以直接交涉通牒北廷，国人奔走呼号，万口一声。北廷果以国家领土、人民公意为重，驳回通牒，只一举手之劳。乃近闻竟有承认直接交涉之倾向，是其心目中不知有国家，不知有人民，明矣。……今又欲以直接交涉，结彼之欢心，转瞬河山将断送于三数奸人之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务望以严重之干涉，阻北廷之进行。”

△ 奉天督军张作霖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时局，决议维持靳云鹏内阁，抵制安福系。

△ 湖南学生代表团在上海创办《天问周刊》，以揭发张敬尧祸湘罪行和呼吁全国各界援助驱张运动为主要内容。其中分评论、思潮、湘事述闻、国内述闻、外交述闻、诗、小说等。

2月2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为曹锐、杨以德镇压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事致电北京政府，略谓：“大好河山，将为公等卖却。国人为自卫计，作种种救亡运动。天津省署警厅既不能维持，反加之摧残，捕拿代表，并有杀戮之耗。……乞即严责曹锐，撤惩杨以德，释放代表，恢复会社，以谢国人。”

△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谓：“津学生被曹锐、杨以德殴绑游街，且有枪毙代表之说，摧残学生至此，是否政府决意与国民宣战？今特致忠告，请立即释放学生。撤惩曹、杨，否则全国国民将视政府为公敌。”

△　南京学生联合会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被镇压事，致函天津学生联合会转各界联合会，表示支持和慰问。

△　陕西各界联合会为山东问题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严词拒绝日本通牒，谓："山东问题，关系国家存亡，一涉错误，则遗害无穷。……近据报传日政府欲借交还美名，收实际名利，望当局诸公，严词拒绝。"

△　唐山各界联合会致函天津各界人民，对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表示支持。谓："彼警厅拘捕代表，是拘捕天津各界人民之代表也。其封闭各界联合会，是解散天津人民之组织也。省长不允恢复天津原状，是蔑视天津人民之人格。"

△　日公使小幡酉吉至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从严取缔学潮。

△　北京政府通告外交团：外商在华订立办矿合同须经中央政府核准。略谓："兹再预先声明：外商在中国订立各项办矿合同，均须经中央政府核准，方能成立；其未经中央政府核准者，无论与何省签订，经过何种手续，在中国法律上一律不能认为有效。"

△　北京政府教育部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校点符号全案，通咨各省区转发各校采用。

△　北京国务院函内务部查禁革命书刊及党人活动，称："俄国列宁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社会革命党人，颇为活动。……查单开过激主义印刷物传播于我国者，已达83种之多。至来华党人德籍者六人，俄籍者五人"，并希"查禁严防可也"。

△　天津当局为镇压学潮，借口冬防吃紧，宣布戒严。

2月3日　　傅岳棻召集各校校长会议，出示军警当局来函，要求各校长约束学生，否则引起风波，教育部无能为力。下午，各校校长

推派代表到国务院面见靳云鹏。靳表示政府目前不便释放天津学生，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已成定局。代表们当场予以驳斥。

△　全国各界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曹锟，要求撤惩曹锐、杨以德，释放被捕学生代表，恢复人民言论集会自由。

△　南京学生3000人举行游行，赴军民两署请愿，要求释放天津学生代表，惩办杨以德。

△　杭州学生联合会分别致电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声援天津学生运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代表。

△　广东督军莫荣新命令李根源将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与靖国联军第六军参谋长杨晋对调。

2月4日　北京学生3000人愤于日使取缔学潮之无理要求，在前门一带集会，游行演讲，指斥北京政府卖国。警厅派出军警镇压，将学生1600余人驱送天安门拘禁，并将方豪等40人逮捕。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致电上海《申报》转各团体，谓："本日京生为外交及津事全体出发讲演，悉数被捕。"

△　北京各校学生闻同学被捕消息后，于晚6时齐集北京大学第二院理科讲堂，召开特别紧急会议，讨论对付方法。

△　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举行国务会议，在安福系阁员的把持下，屈从驻华日使所提抗议的无理要求，通过从严处理学潮的决议。

△　北京政府内务部命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镇压学生运动，称："该厅相机设法制止，如有不服，或有扰乱秩序之虞，自可依法严重取缔，以重公安而维秩序。"

△　岑春煊致电云南督军唐继尧。谓："子玉（吴佩孚）派员来

粤，请款60万，为撤防之费，决开春即实行，衡州由湘军填防。”并告“款已付给，俟撤防时提用”。

△　北京政府财政部汉口造纸厂与三菱洋行签订例银33.9450万元借款合同，用于货价。

2月5日　　北京学生数千人继续上街游行讲演。北京政府将第九师士兵2500人埋伏在中华门内，俟学生集中时倾巢出动，打伤学生数十人，并逮捕学生代表43人。当晚军警当局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吴炳湘等与日本顾问开会，决定采取直接行动，严厉取缔学潮，并将所捕学生43人送交卫戍司令部收押。

△　山东省万余人齐集于省议会开国民大会，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并向全国发表宣言。

△　徐世昌就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事征求各省意见。是日，吴佩孚与鄂督王占元、浙督卢永祥联名致电徐世昌，陈述不能与日直接交涉的理由，反对中日直接交涉。

△　徐世昌任命贵福为呼伦贝尔副都统；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钟毓督办呼伦贝尔善后事宜。

△　徐世昌电令各省军民长官，谓：盐税关系外债，全数作为善后借款担保，各省“无论如何需要，不得再将盐款截留，并不得将食盐擅自加价，以维盐纲而保国信”。

△　因《珠江新报》2日登载“政学会捣乱西南大阴谋”一则要闻，是日，广州五区署奉军政府命令查封该报馆，拘留编辑李公采。

2月6日　　徐世昌令京外官员切实执行保安事宜，“凡有干纪构乱者，不论何项人等，一律依法惩处”。

△　徐世昌令禁止学生干政，称：“凡学生有轶出范围之举，立予

从严制止……其有情甘暴弃，希图煽乱者，查明斥退，情节较重，构成犯罪行为者，交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

△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关于山东问题当力持镇静，以俟政府之策划。并谓：“设有不逞之徒，利用时机，希图煽乱，各军民长官有维持治安之责，应即遵照迭次明令，分别制止逮惩，勿稍弛纵贻误。”

△　北京政府内务部通告各省督军、省长，谓：“外交部函称，本月二日，日使来部会晤，以学生等在京津等处骚扰异常，要求严加取缔。”

△　北京各学校均由军警把守，不许学生外出；电话线被割断；北大、高师两校被严密封锁。前门一带军警林立，如发现学生演讲，立即逮捕。学生无法进行活动。

△　上海华丰银行开幕，董事长王学侃，总经理许承之。资本60万元，专营商业银行各种业务，兼营信托及储蓄事务。1922年5月17日停业。

2月7日　　北京各校驻军撤退，由警察及便衣警察接替。电话恢复，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仍被禁止外出。

△　下午1时，苏州各界代表冒雪召开国民大会，到会二万余人。会后游行，各校学生手执书有“否认直接交涉”、“坚持到底”、“愿为后盾”等小旗，最后各代表议决一致否认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并致电南北政府力争；要求惩办曹锐、杨以德，以平公忿。

△　广州军政府致电北京政府，主张取消中日军事协定。

△　北京国务院电令奉、吉、黑三省，对俄国内乱，与各国一致严守中立。

2月8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为声援北京学生致电质问北京政府，并指出北京政府“如此恣睢暴戾，媚外虐民，国民自有最后之对付，诸惟自慎”。

△　云南督军唐继尧是日及10日两次电令解除李根源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职，并声明“驻粤滇军由本督直辖，并就近秉承李（烈钧）参谋长办理”。

△　广西梧州大火，所有泊抚河轮船、货船、小艇，瞬息之间化为灰烬。共计烧毁大筏10余坐，舰轮五六百艘，死亡120余人，损失财产约值40万元。

2月9日　　上海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津京学生，到会4000余人。会后列队游行，手执上书“驳回通牒”、“毋辱宁死”、“万众一心”等字样的小旗，并沿途演说。行至护军使、交涉使、道尹三署呈递请愿书，并请代电北京政府传达民意。次日，各界继续游行。商界全体罢市，门上多贴有“拒绝直接交涉”、“释放京津学生”等口号。

△　在全国爱国运动浪潮冲击下，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发生危机，是日起国务总理靳云鹏不到院办公。13日，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陈箓辞职，外交部因无人负责而停止办公。

△　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在南昌召开国民大会，各界男女人士到会者近万人，通过决议警告北京政府，山东问题不得与日直接交涉。

2月10日　　北京各学校解除军警监视，下午学生外出演讲仍受到军警干涉。11日，学生改为分散出发演讲，仍受压制。17日，学生决定停止演讲，恢复上课。

△　京津学生代表六人抵沪，报告军警蹂躏京津学界情形，吁请各界一致反对直接交涉。

△　上午10时，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及评议员开临时会议，决定请愿督军、省长，并具请愿书：一、反对山东直接交涉；二、惩办杨以德、曹锐及其他与曹、杨等罪者；三、恢复天津各界原状；四、闽案宜从民意严重交涉；五、抚恤死伤。

△　嘉兴学生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召开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并致电北京政府，请严惩曹、杨，并请拒绝直接交涉，以平民忿。

△　北京新国会第二届常会闭会。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签订有线电报扩充及改良借款合同，借日金1500万元，以有线电报全部财产及收入为担保，用于购买电信材料之用。

△　徐树铮与中美实业公司签订边防军美金200万元借款合同，以边业银行纸币300万元为担保。

△　唐继尧电令李烈钧为滇军总司令，撤销李根源之总司令部，委李为建设会议代表。

2月11日　江西九江学生联合会、国货维持会、教育会等团体代表，开会讨论时局，主张山东问题拒绝直接谈判，闽事严重交涉，惩罢曹锐、杨以德，释放代表，并致电北京政府，抗议逮捕京津学生。

△　江苏省长公署发布训令，禁止学生游行演说和检查日货。

△　粤汉铁路公司、广东路段与台湾银行签订港币10万元借款合同，以铁路公司土地建筑物一部分及收入价款为担保。

2月12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警告北京政府镇压爱国运动，指出："全国国民，为山东问题，罢市、罢工、罢学之举，数见不鲜。而牺牲之大，亦为前此所未有。……自京津惨祸发生以来，国民全体莫不痛心疾首，不胜其忿慨。……上海昨二日之罢市罢工，即其一

端。足见民气愈压愈烈，决非武力所能制服者。……姑贡此警告，以冀顽石之点头。”

△　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教育会等九团体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峻拒鲁案直接交涉，并速释被捕之学生，严惩不法之军队，以平众怒，以延国命。”

△　重庆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报告重庆火灾，谓：“渝城校场于11日突遭火警，延烧五千余家，失所灾民约数万人，恳请救助。”

△　新疆督军杨增新复电迪化道尹张键，谓：“此次窜入我境之俄哈……万万不准入境。此俄旧党已无政府，与俄领交涉无效，望即由中国自行拨队实力驱逐，不得容留。”

△　徐世昌特派张国淦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

2月13日　吴佩孚致电靳云鹏，痛陈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之利害，主张拒绝日方要求，驳还日牒，提交国际联盟，以释群疑而定人心。

△　上海工界代表致电北京政府，指斥曹锐、杨以德拘禁工人代表，摧残爱国运动，要求“迅即撤惩暴吏，释放代表，抚恤死伤，恢复会团，并取消非法戒严，拒绝直接交涉。……否则工人惟有自决，铤而走险，暴动罢工，恐其酿出激烈风潮，大局不可收拾矣。”

△　武汉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声援京津学生爱国运动，警告政府当局“速以全国民意为办理外交之指南，无任少数军阀从中左右也。如其不悟，国人将群起而攻之，决不承认此违反民意的政府”。

△　河南鄢陵县学生联合会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直接交涉，声援天津各团体。

2月14日　徐世昌以参谋总长张怀芝请假，特任荫昌暂兼署参谋总长职。

△　徐世昌派徐树铮兼任张（家口）恰（克图）铁路督办。

△　徐世昌令禁止地方长官干涉司法，称："嗣后各省军民长官，凡关于司法事务除有法令明文规定外，均应恪守权限，毋滋凌越。"

2月15日　北京警察厅张贴布告，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及"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解散。

△　徐州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5000余人召开大会，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声讨段祺瑞卖国，援救京津学生。

△　山西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报界协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主张应归国际联盟解决。

△　《改造》（原名《解放与改造》）月刊第二卷第四号出版，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此刊系进步党人创办，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撰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李达、陈独秀等著文驳斥，发起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法金5.15064099亿法郎借款合同，以期票为担保，用于交付实业借款第六、第十二期利息垫款。

2月16日　河北宝坻县灾民七八万人，赴县公署请求开挖新河，治理潮白河水患。谓："惟比年以来，受水患最重之区，厥惟宝坻县。现在浸没水中之灾民，尚不下数万户，流离颠沛，惨不忍言。"

△　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电宣布："所有滇军两师部队，仍应由李督办根源节制指挥。"21日李根源通电复职。

2月17日　徐世昌令准交通部募集“交通部八厘实业公债”3000万元。利息八厘，以12年为期，用于建筑石德铁路归还九年份应付各项债款。

△　四川督军熊克武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

△　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通电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提出四大理由和两步办法。

2月18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与日本正金银行代表武内、金平在北京签订日币900万元垫款合同，规定在日本发行中华民国政府九年国库券，以中国盐务收入为优先担保，专供本年支付二月份行政经费之用。

2月19日　徐世昌颁布《民国八年公债条例》，凡14条。其第一条为：“政府为补助预算不足起见，募集公债以5600万元为额，定名曰民国八年公债。”

△　徐世昌特任张寿龄为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任钱锦孙为全国烟酒事务署署长。

2月20日　孙中山以粤中滇桂冲突，是日电询陈炯明有否决心率部离闽返粤，“以收渔人之利”。并表示：“如兄已决心，文当能使两粤内部数处先发动，以扰乱而牵制之。”

2月23日　吴佩孚致电徐世昌、靳云鹏，反对吴光新督豫。谓：“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　莫荣新令撤销驻粤滇军第三、第四两师番号，将该两师改编为边防陆军三个旅及三个独立团。

2月24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团体，为反对各国借款与北京政府，致电各国驻华公使。略谓："频年日本以巨款借与北京政府，攫取中国之主权利权，冀实行其东亚门罗主义。……今北京政府媚日残民，有加无已。各友邦竟渐食前言，500万磅借款及4000万元借款之耗，同时传来，吾人闻之不胜惊愕。……望各友邦维持国际之信义，鉴谅吾人之诚意，立将所许于北京政府之借款，未定者停止谈判，已定者停止付款，并取销成约。否则吾人惟有按照临时约法，凡未经合法国会同意之借款，决不负偿还之责任。"

△　孙中山自沪致函李烈钧，贺其重握驻粤滇军兵权。略谓："今竟合浦珠还，用武有地，岂惟一人之庆，实亦邦国之光。……文深盼得如足下者群策群力，以达吾党最终之目的。"

△　广州军政府参谋总长兼驻粤滇军总司令李烈钧质问岑春煊，为何同意桂系消灭驻粤滇军的阴谋。岑空言敷衍，李托词巡视北江防务率部离开广州。

△　庆丰合资银行在上海开幕，资本20万元，专营商业银行业务，并兼办储蓄。经理郑声和。

△　广东省银行与华南银行签订日金15万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地方实业银行借款余额。

2月25日　河南旅沪各界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反对吴光新督豫、王印川长豫。谓："吴光新之蛮横，尽人皆知。王印川假安福以卖国尤为国人所唾弃。今报载政府将任彼等督长河南，噩耗传来，实深惶骇。豫人何辜而能受其苛虐。……务请公顾惜民命，遵从民意办理。"

△　河南旅沪各界联合会致电豫督赵倜，反对直接交涉案，反对吴光新入河南，要求将吴军全体驱出境外，并反对王印川充河南省长。

△　上海三新纱厂4000余工人反对裁减粗纱车间工人，全体罢工。后经双方协议，每辆车减去一人，三人管理两车，不再裁汰，工人始复工。

2月26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内阁请徐世昌盖印发表，徐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段祺瑞斥骂靳云鹏“如何配做总理”。

△　徐世昌特任王印川署河南省长。

△　美国裕中公司致函北京政府交通部，谓：“美国裕中公司兹续垫给中华民国政府美金15万元，以资测定按照中华民国政府与裕中公司所订铁路合同拟筑铁路（株钦）之用。”4月23日，交通部复函谓：“请以此函作为收到此项垫款美金15万元之收据。”

2月27日　孙中山致电贵州督军刘显世，盼出兵柳州，袭击桂系根据地，援救李烈钧。谓：“此次莫荣新挟李根源抗命，不啻破坏西南，形同叛逆。陆荣廷……佯为不闻，实欲乘此驱逐滇军，取消国会、军政府，单独投降。……文已电在粤海军同志，起救协和（李烈钧），共除桂贼。吾公为大局计，为蓂赓（唐继尧）并协和计，若令一军出师柳州以冲贼巢穴，则彼直无所逃命耳。”

△　徐世昌特派孙宝琦兼经济调查局总裁。

△　上海各界联合会发出通启，反对北京政府钳制舆论，剥夺人民自由的《治安警察法》。

△　江苏省教育会等九团体，通电全国反对鲁案直接交涉。

2月28日　李烈钧率驻粤滇军北巡沿途遇桂军沈鸿英、邓文辉等部阻击，是日突围进入始兴。同日，孙中山电唐继尧，促其火速出兵百邑，扑桂系老巢，以解李烈钧之围。

△　徐世昌派周肇祥督办奉天葫芦岛商埠事宜。

2月29日　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辞呈离职。

△　北京各界在先农坛召开国民大会，与会者20余团体，约千余人。议决向政府提出请愿条件：山东问题，不得直接交涉，驳回通牒，提交国际联盟；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及一切密约；释放京津被捕代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北京政府派武装警察数百人，强令大会解散并捕去公民及学生10余人。国民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北京政府镇压群众的罪行。

2月下旬　上海南北市绳索工人10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全体罢工。

是月　广东商办新宁铁路全线通车。

△　北京政府交通部株萍铁路与慎昌洋行签订银元1716.9868万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购机车两辆价款。

△　广东省长莫荣新与美商五金公司签订美金40万元借款合同，以兵工厂财产为担保，用于兵工厂订购机器未付价款。

△　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此为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始。

2—4月　陈独秀在上海多次会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军阀主义。

3月

3月1日　　孙中山在《建设》杂志第二卷二期发表《地方自治实行法》一文，指出地方自治“当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

△　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河南开封商务印刷所工人《罢工宣言书》，提出下列条件：“（一）要尊重工人的人格；（二）每日做工十小时；（三）每日工价须在四角以上；（四）薪金照时发；（五）星期停工1时；（六）补习常识；（七）得自由服务社会（但不妨正业）。”

△　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团体，对各国发表宣言，反对日本贷款与北京政府。略谓：“北京政府，纯为官僚武人所盘据，其对内对外之举动，荒谬颠倒。不似为民治主义之障碍，抑且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导线。吾人曾叠次电请各友邦，勿以款项借给彼辈。顷闻日本又垫日币900万元（与北京政府），此种借款，以法理言之，则未经我国合法国会同意；以事实言之，则不啻假强盗以杀人越货之武器；我国人民皆极端反对。”

△　湖南善后协会暨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致电广州军政府及各省督军，略谓：“张敬尧祸湘，罪大恶极，中外共知……近日摧残教育，罢学达万三千人。布种烟苗，运子至45袋，诸如此类，擢发难终。……本会所主张，在以湘人自力驱逐张敬尧，而乞各方共同援助，以武力为局部之解决，而无碍大局和平。”

△　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卸任回国。

△　北京新国会（安福国会）第三期常会开会。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中华三纱厂日金300万元借款合同，以中华实业公司纱厂全部财产及津浦路货捐为担保，用于承办纱厂资金，后挪用为政费。

△　《政衡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宗旨是："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

3月2日　北京外交团推举法国公使柏卜继朱尔典任领袖公使。

△　桂军沈鸿英、魏邦平部败李烈钧之滇军于北江。

3月3日　安福系积极倒阁，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相约不出席国务会议，次日提出辞职，以拆靳内阁的台。由于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电请挽留靳内阁，段祺瑞指使安福系三总长取消辞职，等待有利时机再次进攻。4日，靳云鹏回国务院复职。

△　新疆省议会通电反对国务会议任命吴光新接替豫督赵倜。

3月4日　唐继尧复电李烈钧，谓："筱（17日）电悉。滇军两师承公欣诺就近指挥，至深感荷。两师护国转战，卓著声誉。继尧当时忝长义麾，复亲送我公师以东出，私情公义均不能放弃不顾。统辖之权军纪所关，无论如何不能任其紊乱，请公一力主持。尧当尽力为公后盾。"

△　河南督军赵倜通电响应吴佩孚的主张，反对鲁案直接交涉。

△　驻美日使币原在纽约日本会社宴次演说，声称："日本对于山东问题，无论中国取何行动，决不变其方针。"

3月5日　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致电广州军政府、各省督军、省长，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表示"学生等抵死不能承认"。

△　四川督军刘存厚密电国务总理靳云鹏，谓："本日奉到宥（26）电，遵知即转饬所部加意严防。顷又据前线及川中各确报称：一、旧历腊月二十七日熊克武由成都派兵取消邓锡侯所部独立旅，双方业在仁寿开战，正月元日已有伤兵抬回省城；二、卢（师谛）、黄

（复生）、吕（超）前图倒熊（克武），已被侦知，各该军恐邓旅取消，将继邓后，倒熊趋势愈紧。三、石（青阳）、颜（德基）两军因争防地，业在营山大起冲突。……据此情形，川中难端已发，厚部地当前线，不能不未雨绸缪，前电请领饷械，伏望早日筹济，以期有备无患。”

△　梁启超由法国马赛于1月下旬归国，是日抵达上海。按：梁于1918年12月28日出国游历，遍经英、法、荷、瑞士、意、德等国，历时一年二月有余。

3月6日　　上海浦江驳船业由曹华章、江政卿、李关林等发起组织淞沪船驳公所，是日在法租界开成立大会。

△　挪威首任驻京公使米赛勒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3月7日　　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曹锐联衔布告取缔学潮，谓：“查青岛问题发生以来，京校风潮延及各省，津埠各校亦相率罢课要求。……近来学风日靡，邪说滋多，而不逞之徒又往往利用青年，借图煽乱。自非严重取缔，悉力防范，无以维秩序而靖人心。应即责成各警察厅局各道尹各县知事，此后无论何人，凡有借端滋事作奸犯科者，即行从速逮捕，依法惩办。”

△　下午3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工界志成会、法租界商界联合会等九团体为挽救危局，在青年会开会交换意见，与会者41个团体，决议：“（一）以今日到会各团体为中心，联络各团体；（二）传单悬旗讲演；（三）若至根本解决时机成熟时，到会各团仍须联络一致进行。”

△　河南省国民大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王印川为河南省长，声称：“王逆下车之日，即豫民杀贼之时，勿谓言之不预也。”

△　北京政府财政部规定各省官银钱行号“不准擅发纸币，其已发

者，应即遵照取缔纸币条例，确定限期，逐渐收回”。

3月8日　唐继尧通电：“……嗣因李根源特握军权，每为政党利用，并滥行引用本省通缉人员，继尧迭次诰诫。该李根源无悔悛之心，近更擅权调师长郑开文，继以杨晋。莫日初（荣新）方来电征求意见，而李根源令杨晋强占师部，宣布就职。抗令越权，莫此为甚。各师旅长全体来电声言，如不明令处置，即将以武力自由抵抗。继尧深念广东为护法中心，尚以滇军问题破坏粤局，将何以告无罪于西南。因特改派李根源为建设会议代表，而免其军长职务，并撤消滇军司令部。将该军队仍归继尧直辖，就近由参谋部李（烈钧）部长指挥。……乃莫日初不察实情，曲加庇护，擅将滇军任意改编，置唐继尧于何地，置法纪于何地。”

△　开封人民传闻王印川即日到汴消息，群情益忿，四处张贴拒王传单。下午2时，群众手执旗帜，上书“欢送国贼王印川”、“誓驱安福走狗”，排队出发，前往车站守候王氏，至晚未见王到，方整队而归。

3月9日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代表理事川上俊彦为四洮铁路短期借款，借日金1000万元来函。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复函：“此项办法，按照原开之条件，尚可办理，应即同意。”

3月10日　《民国日报》登载《段派与八省同盟》一文，揭露安福系密谋破坏“八省联盟”，略谓：“近日段派以八省同盟声浪愈唱愈高，若不早日设法破坏，则若辈督军以维持自己势力地盘关系，必致团结日坚，于己派操纵政权上诸多不利。近撤换赵倜之未能如愿者，即由同盟各省作梗所致。故特于前日在段宅召集秘密会议，讨论破坏同盟之策。遂决定遣派明敏能干者三百余人，带大宗现金分赴同盟各省，以离间为目的，散布种种流言，使之互相猜忌，发生内讧，则同盟之局，不攻自破。……现段派派赴各省者，计每省二十余人。”

3月11日　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屈映光致电北京政府徐世昌、靳云鹏，谓："鲁案自日政府致通牒后，此间人民甚为忿慨，均不赞成直接交涉。当经一再据陈在案。……应请中央克日驳回日本通牒，拒绝直接交涉，并恳宣示全国，以慰民望。"

△　岑春煊密电唐继尧，征求对李纯、曹锟、张作霖所提解决时局五项办法的意见。五项办法要旨是：新旧国会同时停会，西南取消自主；成立弼政院。

△　唐继尧委派唐继虞为援粤军总司令，率兵三师由滇东下，支援李烈钧在粤北之滇军。

3月12日　湘南国货维持会、湘南学生联合会、女子救国团等在衡阳召开国民大会，与会者万余人。会后举行游行，推出代表向师长吴佩孚请愿，并电北京政府，要求否认鲁案直接交涉；解散安福部；惩办卖国贼；恢复京津各界自由权。谓："山东问题关系全国，欧会既以拒签，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今日开国民大会，到者万余人，无不忿怒异常，一致反对。"

△　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报界联合会电北京政府，坚持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表示"宁化虫沙，不甘鱼肉，三千万众同此决心"。

△　孙中山将爱国储金奖章、奖状3000余份寄交在加拿大的陈树人，嘱其就近转发华侨，以示奖励。

△　日俄两方军队在俄领庙街地方（即尼港）发生冲突时，中国正有军舰四艘停泊该处。日本于事后指控中国军舰曾炮击日本军民，且供给俄军以武器弹药。中日两国因此发生庙街案交涉。

3月13日　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通电，严词指责桂系，目为蟊贼。

△　北京政府外交部应南洋荷属华侨之请，照会驻京荷公使，要

求修改《中荷领事专约》。

3月14日　唐继尧、谭浩明、刘显世、谭延闿、熊克武、陈炯明反对汉绥铁路借款，致电北京政府。谓："近迭接各方报告，北京当局以京绥、京汉两路联合抵押日本，借债30兆元，闻讯不胜骇异……各省疆吏，各方团体共起执言，借图补救。誓以解除条约保全路权为务，奋全国之民气，促执政之警醒，若必执迷不悟，孤行己意，继尧等愿以兵力为诸君后盾也。"

△　奉天督军张作霖派王乃斌带信给段祺瑞，请段信任靳云鹏。段大为不满，认为张干涉北洋派的事情。次日，靳去见段。段骂靳"到处求救兵，目无长上"，靳否认其事。段把张信掷在靳面前："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　唐继尧通电声讨广东督军莫荣新，谓："莫日初竟派兵四出，公然开衅。居心何在，不可测度。似此任意胡为，目无滇省，甘为戎首，破坏大局，继尧忝统戎麾，决不能坐视两师滇军受人侵夺。"

△　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等致电靳云鹏，请共同办理借款，要求"南北未统一以前，双方均不得自借外债，若事关全国利益，为目前财力所不能胜，而又不能不办者，应由双方会商妥协，共同办理"。18日，旅沪国会议员通电驳斥。略谓："军政府诸公果若知外债之可危，自当揭其奸诡，诉之国民，以待最后之裁判。……前虽以多债危国为忧，终复以共商借款相约，是不啻表示赞成卖国，特不许北方有此专卖权耳。"

3月15日　唐继尧通电宣布李根源罪状，下令通缉。谓："滇军问题，实系大局安危，护法关键端在乎此。现闻莫日初受某派蒙骗，始终不悟。有以滇军归军府节制，由某派操纵，而使协和护总指挥之虚名。此种办法，与继尧前令相背。混乱统系，至于此极。尚何纲纪可言，其阴谋作用，尤可推知。继尧现决意贯彻去逆之旨，已陈师掬

旅，为最后之一拼。除通电表示主张，并宣布李逆罪状，予以通缉外，仍祈积极推助，无任企盼。”

△　北京国务院密电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指示“藏事”方针。略谓：对藏事“自应妥筹应付方针。于达赖方面取怀柔主义；于厦旺噶布伦方面取压服主义”。

△　川督刘存厚电告北京政府，川中战端已启，应如何进止，乞速示遵。国务院以“按兵不动，守城卫民”电复。

△　万国新闻记者在北京本部召开选举大会，中外记者与会者46人，内有英、美、法、日记者16人。

3月16日　北京政府为上年11月16日福州惨案，向日使小幡酉吉提出撤领、赔偿、道歉、惩凶四项要求。

△　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王揖唐自上海急电北京政府，称：“西南内部发生内讧之际，各方面代表均来电揖唐为单独之接洽，应否接待，仍乞见复。”

△　长沙13000名学生发表宣言，揭露张敬尧“近欲掩其摧残教育之迹，遂一面饰词开学，冀惑听闻。一面罗致以前开缺学生准予复学，不足则又滥招新生，撑持门面。……张氏一日不去湘，学生等一日不返校。誓约具在，共见共闻，诚恐传言失实，特此郑重申明”。

△　山东铁路中俄工人同盟罢工，反对俄国铁路坐办霍尔瓦特。

3月17日　孙中山致电贵阳王殿轮（文华）总司令，谓：“惟有以剿平桂贼奠定西南为惟一之目的。足下逼近贼巢，一举足以冲破桂贼之腹。……甚望足下统率精锐，就近与唐（继尧）、刘（显世）二公协商出师方略，西南成败在此一举。”

△　孙中山电唐继尧，勉以按计划力促滇川黔各军出师援救李烈

钧部。

△　徐世昌派徐世章为浦信铁路督办。

3月18日　段祺瑞秘密到保定，要求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北京政府陆军部电复吴佩孚，在中央未有明令以前，不得自由行动。

△　吴佩孚复电曹锟，重申该师自湘南撤兵理由，并谓："若据中央来电，宣布劝慰，不惟无颜对数万军士，启口为难，且恐激出意外之事。""务恳据情转达中央，准予所请，幸勿耽延时日。"

△　张敬尧电告北京政府，吴佩孚军队已撤防北返，"前方防线顿行空虚，务恳查照迭电所请，速拨军队前来填防"。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中华汇业息款合同，借日金80万元，以盐余或关余为担保，用于林矿及电信两款利息及福建省实业借款利息。

3月19日　徐树铮邀集11省区督军、都统代表，在天津吴光新宅开秘密会议，商讨倒靳内阁事宜，经议决各电本省区陈述下列意见："（一）靳云鹏借关外声援，破坏北洋团体，兼负合肥（段祺瑞）；（二）靳谋牺牲国会及闽、湘、陕督军，见好南方，固自己地位；（三）吴佩孚撤防，亦靳主动，危害张敬尧位置，望速固结北洋派真正团体。"

△　吴佩孚致电岑春煊，告以："此次小徐回京，挟带各种阴谋。近以暴厉手段大捕学生，兵围各学校，断决交通，决定以强硬主持直接交涉。鲁案前途，危险不可思议，值此千钧一发，稍一失足，即无可挽回。务恳诸公以西南军府名义通告欧会各友邦，决不认其交涉为有效，以防其采迅雷不及掩耳办法，暗中断送也。"

△　河南泌阳县英国传教士孟恩赐被杀，英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严予究办"。

△　徐世昌令实施义务教育，着教育部将山西省所定办法通告各省参照，以便逐步推广。

△　梁启超抵北京，向徐世昌报告欧游经过。23日，与人谈及山东问题，认为："为国家人格计，余以为今日不可不先有拒绝直接交涉之决心。"24日晚，梁启超由京返津。

3月20日　　滇军警政学商各界通电指责李根源、莫荣新"任意横行，不顾大局"，表示"以全力维持我滇军之威令，杜绝彼李逆之野心"。滇省议会亦于同日通电声讨李、莫。

△　吴光新致电曹锟、张作霖、李纯等，否认督豫之命出于安福系主谋，并指斥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糊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

△　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在上海闭幕。是日晚到者共有千余人。由会长聂云台宣布开会宗旨，继由陈独秀作题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讲。

△　福州人力车夫反对增加车辆赁价，全体罢工，要求官厅解散联合车辆公司。

3月中旬　　日商上海第二纱厂女工数百人，因该厂日人不准女工携带小孩至厂哺乳，工人举行罢工。后经调停，厂方允许删除不准小孩入厂之禁规，罢工之日，给予半工，15日工人复工。日商上海第三纱厂工人千余名，因工人进厂稍迟，不准吃饭，罚扣工资，工人举行罢工。捕房得报，前往弹压，将工人赵无为拘押。

△　张敬尧电告北京政府，吴佩孚军队刻已撤退茶、攸一带，形势吃紧，"务请转催张师长宗昌即日返湘镇慑一切"。

3月21日　　驻扎黄河南岸郑州一带之第八旅士兵（旅长靳云鹗）因欠饷哗变，四处抢劫，毁去车站票房，砍断电线。

3月23日　京津各校被拘代表42人，由卫戍司令部移送高审厅，每一学生有两名兵士押解。学生行经街道时，态度激昂，沿途演说。行人伫足而观，群情激愤，无不痛骂军阀。

3月24日　唐继尧通电公开11日岑春煊秘密与北方接洽和议内幕文件（即解决时局之五项建议），指出岑之办法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应重开和会决定一切问题。

△　美国摩根财团代表拉门德抵京。

△　广东财政厅广三铁路局与华南银行签订日金15万元借款合同，以广三铁路局财产为担保。

△　北京政府电复广州军政府关于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之要求。称迨中国军队从西伯利亚全队撤回之日，即为军事协定终止之期。

3月25日　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何叔衡等致电各报馆、各地湖南同乡，揭露“湘事研究会”在驱张运动中“发布传单，以伪乱真，浮词耸听，声言力戒对人问题云云。……代表等以驱张除奸为职志，深恐莠言簧惑，淆乱听闻，词而辟之，义不容已。诸公明镜高悬，夭霾悉现，幸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

△　北京学生自被拘代表移送审厅后，纷纷签名集体自首以示抗议。截至是晚止，签名者已达46812人。学生们表示：“被拘代表，未扰治安，不涉刑事，决请律师辩护，迅予保释。”

△　唐继尧致电李烈钧，以李根源违抗命令，叛据师徒，扰乱军纪，罪恶昭著，“希即通饬各军严密拿办，就地正法，毋稍宽纵”。

△　滇桂军冲突，由岑春煊调停停战。27日，岑春煊亲至韶关迎接李烈钧。31日，岑得知伍廷芳出走，即先回广州，留李书城等候李烈钧。4月1日，李烈钧赴韶关，旋即返回广州。

3月26日　　孙中山电促王文华出师讨桂。指出吾辈“如言救国，则此根本为害之游勇（按：指陆荣廷之桂系），非先扑灭不可”。并谓：“足下智勇过人，知必抱最大决心，以先扫游勇为清内患之唯一任务也。”

△　绍兴学生联合会发表告全浙同学书，反对浙省当局摧残教育，解散第一师范。谓：“浙江第一师校，为倡导新文化的先锋，现在被迫停业了。官厅这种阴毒手腕，和去年提前放假同一步调，比较的更加残酷。生机勃勃的新文化，方才萌芽，不幸遭这黑暗势力的摧残。……本着良心，来和黑暗势力奋斗，要一致牺牲在新文化上面！”

3月27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抗议将被捕学生移送法院，声明：“似此任意摧残，与民为敌，闻者发指，孰肯甘心？如犹怙恶不悛，我全国学生磨励以待，为北京同志后盾。”

△　孙中山复函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促其奋起讨桂，并说明联皖排直之用意。谓：“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附从。”与段接洽，为“临机应变”，“使吾人计划畅行无阻而已”。

△　奉天督军张作霖在沈阳假做寿为名，邀集各省督军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应付皖系对策，决定：“（1）拥靳不反段；（2）解散安福系；（3）推荐张勋为安徽督军代替倪嗣冲。”

△　新疆督军杨增新致电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对于新疆各种民族，善为抚驭。谓：“保国即所以保家，爱民即所以自爱。毋坐待边局之败坏，而徒归咎于民之无良也。”

3月28日　　浙江第一师范全体学生因反对官厅撤换校长经亨颐至省署请愿，遭到军警凶殴，学生受重伤者二人，轻伤无数。次日派军警包围第一师范，绝其粮食交通，封闭浙江学生联合会。

△　前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旗和硕亲王帕勒塔在北京病卒。

△　上午9时，环球中国学生会举行大会，欢送本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30余人赴法留学。

3月29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伍廷芳与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反对岑春煊与北方直系勾结，携财政、外交两部信印及关余，离粤赴沪、港，脱离军政府。

△　浙江第一师范职教员会、学生会、全校校友会通电揭露齐耀珊、夏敬观于纵使卫队打伤学生多人之后，又“逼迫解散联合会，并派武装警察逼令一师学生离校，且贿诱转学。今已断食12时，拼命相持。……”

△　暨南学校校长赵正平等发起在上海创设商科大学，是日开会讨论进行方法，推黄炎培为筹备处主任。

3月31日　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秘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加入。此系中国第一个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之革命团体。

△　山东籍军人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四省经略使署参谋潘榘楹、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等48人，联名通电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主张提交国际联盟解决。

△　江西督军陈光远密电北京国务院，谓：“据探报称，李烈钧所部滇军，于敬（24）日攻入南雄。临时司令为鲁子材，所带一混成团。”

△　徐世昌派兼署参谋总长荫昌至北京关岳庙代行祭祀关岳礼。

△　广东财政厅、广东地方实业银行与台湾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广东财政厅借日金15万元，广东地方实业银行借港币八万元，以南

海、番禺两县建筑物全部及财政厅期票为担保，用于水灾借款、留日学费及高师借款应付本息。

是月　虞洽卿、靳鸣皋、李云书等发起组织劝业银行，资本总额500万元，分五万股，每股100元。总行设于北京，于10月20日成立，上海分行于12月6日开幕。总行行长张寿镛，沪行经理为石运乾，副经理陈淮钟。该行系照劝业银行条例设立，并兼营储蓄事务。嗣后因时局变化，宣告停业。1930年4月20日，该行上海分行又改组复业，次年复又停业。

△　交通部湘鄂路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英金11.4042万镑借款合同，用于购机车12辆，货车90辆。

△　北京大学本教授治校之宗旨，组织评议会、行政会、教务会、总务处四大部。

4月

4月1日　广州旧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出走香港，行前号召国民党议员一律到港集中，以示与岑春煊系决裂。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林森的指挥下，将两院卷宗封存，分批运往香港。

△　下午3时，上海抵制劣货联合会在事务所开临时紧急会议，到会者17团体，由张志鹏、朱仲斋二人报告赴九江扣留劣货经过，并会同该处学生扣留“德兴”轮大批日货等抵制日货活动情况。

△　第八次全国青年大会在天津开会，全国各地分会代表与会者共1100人。次日选举张伯苓为正议长，诚静怡、刘东生为副议长。下午由张伯苓和前总统黎元洪演说。

△　徐世昌制定《征收官任用条例》。

△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因受安福系逼迫，请假不视事。

△　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用新思潮来比洪水，把军阀比作猛兽。

4月2日　　是日及26日，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催议山东交涉。按：巴黎和约日本于三月内还我山东之规定，至4月9日期满。

△　孙中山召蒋介石商谈闽粤军事，劝其前往漳州粤军总部协助陈炯明策划作战。

△　孙中山电川籍党人张佐丞等，告以出师计划，以清除内奸为先，对付北敌为次。并指出："目前之为患者，心腹为大，外敌为小；而吾党现有之力，攻桂为易，攻北为难。此孔明所以未出中原先擒孟获，吾党今日正宜师之。"

△　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省参照山西推行义务教育办法，分期筹办义务教育，限八年之内全国一律普及。

4月3日　　苏俄政府致北京政府通牒，重申废止1896年《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条约》、1907年及1916年有关中国问题的日俄密约；中东铁路以及帝俄政府以掠夺手段向中国取得的各项权利，一律无偿交还中国；同时放弃1900年庚子赔款，勿以此款供前俄帝驻京公使及各地领事使用。北京政府因与协约国取一致步调，对此通牒未作答复。

△　北京全体学生为闽案电全国，指出："日本不但不能容纳吾人之意见，且反提出数项无理之要求，似此倚借强权，蔑视公理，吾人为维持东亚和平，不得不誓死力争，愿我同胞共起图之。"

△　香港机器工人由于低工资无法生活，加之外国资本家无理辞退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参加罢工者有海军船厂、煤气公司、电话公

司、水泥厂等企业工人，共5500多人，并发表罢工宣言。罢工持续16天，后经双方谈判，厂方答应增加工资20％—30％，罢工取得胜利。

△　日本政府声明接受美、英、法三国政府“不允许新银行团的活动范围妨及日本国防及经济利益”的担保，撤回对加入新银行的保留案。

△　岑春煊派宪兵搜查广州旧国会两院，发现国会重要文件已被运走，遂派警察严密监视两院。

4月4日　　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部驻河南信阳六团一、二营士兵，因八个月未发饷，是日晚10时哗变，割断车站电线，抢劫新凤祥银楼、元丰蛋厂等80余家，商民中弹者80余人。后经豫军第三旅旅长赵汇福率军出击，变兵四处逃窜。次日，变兵少数回营，其余携械向西北逃走，秩序逐渐恢复。

△　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不要因李烈钧与桂系调和归省，而放松斗志。

4月5日　　浙江督军卢永祥致电徐世昌主张召开制宪会议，略谓：“愚意似不如于新旧两国会中，各选出若干人协商组成宪法委员会，择一适当地点，速开制宪会议。如此则法律之纠纷既解，南北之内讧无名，促成统一，在此一举。此种办法如果为各方所赞同，可否即由南北两总代表依此方针速开会议，俾和局早观厥成，则亿兆同胞实利赖之。”

4月6日　　广州国会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廷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分别代行两院议长职权，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变志违法，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电文，一概认为无效”。

△　徐世昌任命马联甲帮办安徽军务。

4月7日　　北京中国大学校友会河南支会为信阳兵变事致电徐世昌，要求“迅饬所余未溃该军克期撤出豫境，以靖地方而安人心”。

△　顺直水利委员会与美商广益公司签订美金25万元运河借款垫款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用于支付运河工程总局经费。

△　北京政府盐务署拟照税务学堂例设立盐务学校，先设三科：一别科，三年毕业；一本科，四年毕业；一补习科，年限不定。是日奉指令照准。

4月8日　　曹锟为巩固直系势力，假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集八省代表会议，组织八省联盟。参加者有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豫督赵倜、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讨论应付皖系对策。会议决定：“（1）拥靳不反段；（2）直军撤防北归；（3）宣布安福系罪状，勒令解散。”

△　下午5时，全国报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特别会议，逐条讨论苏俄政府对我之通牒，决定发表致苏俄人民及苏俄政府书：“我们接受俄国劳农政府公正大则有力的通牒，无限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底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正义下面，以美满的友谊，致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　吴景濂由香港前往上海筹备旧国会在沪开会，带走国会存款50余万元。

△　广州军政府总裁主席岑春煊召开政务会议，议决免除伍廷芳的外交、财政部长兼职，保留总裁本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锦涛未到任前，由次长文群代理部务。

△　徐世昌指令照准北京政府内务、财政两部所呈新疆省增设焉

耆、和阗两道尹事。

4月9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为山东问题致电北京政府，作最后忠告。略谓："国人痛外交失败，切齿于公等之卖国久矣。鲁案之不能直接交涉，闽案之万难让步，军事协定之亟宜废止，国人早已坚决表示。……吾侪自五四以来，牺牲神圣之学业，从事于奔走呼号，无非为救国自卫计。今鉴时机急迫，国事颠危，用本初衷，作最后之忠告。兹限四日之内，先将日本通牒原封驳回，通告军事协定无效，以固吾领土而保主权。倘再推诿延宕，是公等甘作石敬瑭、李完用第二。"

△　伍廷芳在香港发通电，说明离粤经过，并否认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之决议。指出"廷芳离粤后，广州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一切行动概属无效"。

△　林森、吴景濂、褚辅成发出联名通电，宣布岑春煊违法祸国罪状，并声明国会将另择地点继续开会，以贯彻护法救国之初衷。

4月10日　　伍廷芳第二次通电称："自3月29日廷芳离粤以后，广州政务会议已不足法定人数，一切行动，绝对无效，任免官职，概属乱命。廷芳特将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携带赴沪。对于外交、财政两部事务，仍旧完全负责。"

4月11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就苏俄政府通牒事发表声明，内称："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　上海各界联合会就苏俄政府通牒事发表声明，略称："吾人谨愿根据此项通牒，正式恢复中俄两国国民之邦交，并声明接受俄国退还之各种权利。"

△　杭州学生联合会致电各地学生联合会，谓：“时至今日，国事愈危。直接交涉，秘密实行；闽案谈判，形成失败；天津之代表，且有绝食待毙之耗。卖国贼之忍心害国，一至于斯。而吾浙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复承若辈之意旨，以摧残我教育，压抑我青年，苟不早为之计，则前途有不堪设想者。敝会同人深悲夫此，爰决议自4月12日起全体罢课，作提醒国人之运动。”

4月12日　　杭州学生联合会就苏俄政府通牒事发表声明，略称：“顷接劳农政府通告，无限欣喜。俄国此次抛弃从前帝国政府所掠夺的种种特权土地……开历史之纪元，立和平之基础。凡是人类，孰不同情。”

△　上午9时，杭州各校学生2000余人手执小旗，上书“还我青岛”、“抵制日货”、“还我山河”、“大众速醒”等字样，列队游行，并至督军署与省议会递交请愿书。

△　伍廷芳致函岑春煊，谓“廷此次来港，公一面派员慰留，欢迎回粤；一面派员起诉控于港官。朝三暮四，出尔反尔，以廷之愚，窃所未喻”。

4月13日　　孙中山函促谭延闿速定攻桂大计。略谓：“西南护法，始终为桂系所梗，延至今日，遂成一不战不和不死不生之局。而彼最近对于滇军，野心阴谋，更复显著。……今则国会既去，军府无名，桂系遂为天下之公敌。”并谓：“鄙意以为专由竞存（陈炯明）先发，而湘为应援，滇、黔更以精兵覆其巢穴，如此则桂必败亡，而大局可望有根本解决。”“此时事机已迫，是非利害，均不待言而共喻。所望左右与同志诸公，速定大计，示我好音。”

△　李根源部将赵德裕借口追查逃兵，包围参谋部，鸣枪示威，入内搜查，无所获。同日，警备队队长进入赣军司令部搜索。此两处皆是李烈钧经常出入之地，为此李逃往海珠海军部暂避。27日李秘密

离穗到香港，5月30日由港抵沪。

△　全国学生联合会致电各报馆转各地学生联合会，谓：“本会致北廷最后之通电，业已四日，尚未见有顺从民意之表示，显见有意卖国，难于自新。特按照本会评议部议决案，请贵处于本月14日起，一致罢课，以从事最后之决斗。人心不死，公道犹存，毁法卖国之恶政府，决难长此存在。”

△　浙江绍兴学生宣布于是日起罢课。

4月14日　　下午2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学生实行罢课大会。到会者53校8000余人，演说后游行示威，并通电全国一致行动，即日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内称：“上海全埠学生，将于星期三晨会同全国兄弟姐妹共同罢课。……吾人之罢课，即反抗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各处之活动。此种活动，皆表示日人欲以高丽（朝鲜）待我中国也。”

△　杭州学生联合会致电上海各报馆、各地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表示响应全国学生联合会关于14日起，全国罢课，共争外交的号召，“与全国军政商学一致行动”。

△　朱执信致函孙中山，报告与闽督李厚基和臧致平商洽接济粤军弹药经过。

△　北京国务院以广州内部意见歧殊，通电各省“促进和平”。

△　广州军政府参谋次长蒋尊簋因李根源派队包围，搜查参谋部，通电辞职。

△　唐继尧通电否认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谓：“继尧承选为总裁，当经派赵藩至粤，代表出席政务会议。自本年2月，赵代表电请辞职，业经照准。嗣是继尧并未续派代表参加会议，是自赵代表辞职之日始，所有军府一切行动，继尧概不负责。……查军府政务会议，

向以至半数之出席人员为法定数。现继尧未派代表，伍（廷芳）总裁又复离粤，中山（孙）、少川（唐绍仪）两先生亦均无代表出席。是军府政务会议，已无成立之理由，所有一切政治行动，当然无效。”

△　苏州储蓄银行总行是日开业。资本50万元，专营普通储蓄及有奖储蓄。总董洪少圃，经理为吴伯英。上海分行设南京路，9月16日开业。1921年6月16日又于南市董家渡设立分行，经理有奖储蓄事务。1927年4月4日苏州总行因被军阀挪用款项而停业。4月7日上海南北两行也宣告停业。

△　济南中国银行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日金50万元借款合同，以山东金库券40万元为担保，用于营业资金。

4月15日　南京中学以上26校学生全体罢课。

△　江苏江阴学生全体罢课。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汉路局与三井物产会社签订日金52.8万元借款合同，用于1919年12月三次订购道木价款。

△　广东财政厅（地方实业银行转借）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毫银90万元借款合同，以财政厅官产处文明门外旧万寿堂军械东堤等处官产45亩为担保。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汉路局与芝加哥太康公司签订美金189万元借款合同，以期票为担保，用于订购货车600辆。

4月16日　安徽芜湖、江苏太仓学生均于是日起全体罢课。

△　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津浦路局与天津仁记洋行签订行化银

1.26330834亿两借款合同，以津浦路局收入为担保，用于定购钢轨及材料。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津浦路局与日商三井物产会社签订美金75.84万元借款合同，以津浦路局收入为担保，用于购买“柏昔非”机车12辆。

4月17日　广州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等自港抵沪，国会议员离粤到沪者亦近300人。同日，吴景濂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明离粤理由，并谓：“曩日之军政府，事实上、法律上均已消灭。”

△　江苏苏州、松江学生均于是日起罢课。

△　熊克武电告孙中山，已电请军府辞去四川督军职。

△　徐世昌晋封勒旺巴勒济特为亲王。

4月18日　下午1时，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等代表在上海开联合会议，筹备5月1日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由黄介民主席，特请陈独秀讲劳工运动要旨，大意是：“注意各业各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积极从经济方面着手，再图解决一切。”陈独秀、汤松被推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

4月19日　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曹锐致电北京政府，谓：“近日学潮陡起，公然通电约会全国学校，一律罢课。无理争持，动窝轨范。若不迅行遏制，势必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于国家前途影响非浅。除遵电通饬各属严密慎防外，谨复。”

△　南昌学生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掀起“抵制仇货运动”。学生赴各商店检查日货，计击破脸盆千个，焚烧火柴数十箱，事后举行示威游行。

△　上午8时，南京17校学生3000人结队游行示威。

△　河南学生联合会电告各报馆，于是日上午10时罢课。

△　4月20日　北京政府以近日沪杭皖各省学校相继罢课，沪上学生联合会且发出与政府决斗之通电事，致电各省督军、省长，称："似此不轨举动，显系奸谋鼓动，别有用意，仍希按照前电依法制止，用弭乱萌。"

△　唐山学生自是日起全体罢课。

△　江苏崇明高等小学以上男女15校，于是日起全体罢课。

△　山东省政府与日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日金350万元短期借款第二次延期合同，延期二年。

△　徐世昌令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袭封衍圣公。

4月21日　林森、王正廷、吴景濂、褚辅成四议长通电宣布，因孙中山、唐绍仪均驻沪，唐继尧所派列席政务会议之代表赵藩已辞职，伍廷芳又于3月29日离粤，自3月29日始，军政府政务会议已不足法定人数，"所有免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等职，及其他一切决议事件，概属违法行为，当然不生效力，一切外交、财政事宜，仍应由伍总裁兼部长负责"。

△　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向北京政府报告接收中东铁路经过。

△　英国新任驻京公使艾斯顿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　徐世昌特派戴陈霖、刘符成为全权代表，前往出席万国邮政会议。

4月22日　北京学生自是日起罢课，与上海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发表宣言：本会于4月22日议决，并实行全京一

致罢课。

△　下午，上海省立第二师范学生十余人，前往高昌庙一带演讲，被近处16团士兵殴打。二师同学闻讯，又去45人继续演讲，又遭殴打，重伤者五人，轻伤者十余人，被捕四五十人。

△　上海江南兵工厂工人5000人，为表示同情学生爱国行动，举行同盟罢工。

△　澳门中华民国外交协会古伯铨、中华各界联合总会张民权、外埠华侨联合总会黄白平致电驻京各国公使，谓："伪总统徐世昌、伪总裁岑春煊，窃据政权，瓜分民国，阳示议和，阴谋借款。……应请贵公使转达贵国政府"，"拒绝大小借款"。

4月23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为22日学生在高昌庙演讲被殴事致函卢永祥、何丰林，谓："昨日下午2时，敝分会有会员一队，在高昌庙一带演讲，乃贵部陆军十六团某营司务长无端命令士兵殴击驱逐。计身受重伤者五人、轻伤十余人。……学生因国事蜩螗，外交紧迫，不忍坐视危亡，爰本天良，奔走呼号，以冀我全国同胞根本觉悟，挽救危亡。"并提出两项要求：一、肇事之司务长兵士依律严惩；二、以后学生演讲，军士不得干涉。

△　上海南市商界因受学生爱国运动影响，于是日下午起罢市。

△　松沪护军使卢永祥为镇压上海各界酝酿"五一"罢工罢市密电国务院，略称："查阅各日学生会所出传单日刊，内有推翻政府。另建民国，罢工罢市，抗捐抗税等字样，形同内乱。……并闻学生等拟于五月一号开俄国劳动纪念会，乘机大举。英法两界，均已戒备；华界形势，尤为吃紧。兹为保全地方安宁起见，拟于敬（24）日宣布临时戒严，以资防范。"

△　广州军政府代表、督军、省长与香港承办事业公司代表人但

路易加士劳、岑伯铭签订双方合资开采广东全省煤矿合同，共22条。其要者为："公司资本1000万元，分为100万股，每股10元，中、英各占半数，须用英人一名充当会计。惟照第八条提付办理粤省教育及救济贫民100万元之款，得交中国管理。"

4月24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致电各省学生会，略谓："今日上午上海同学因赴华界分送传单，被军警痛殴，受重伤者数十人。现此间各界异常忿激，请一致声援。"

△　北京政府电复卢永祥，饬令加意防范，以资镇压。

△　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发布戒严令，内称："为布告事：照得沪上学生，近来借口外交问题，相率罢课，游行演讲。言词激烈。……且查阅本日学生会所出传单及日刊，内有推翻政府，另建民国，罢工罢市，抗捐抗税等字样。似此倡言革命，已构成内乱行为。……兹于四月二十四日为始，遵照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总统颁布戒严法，宣告戒严。"

△　卢永祥密电北京国务院，谓："昨晚复据探报，学生等顷在法界各联合会开紧急会议，提出办法四条：一、推倒南北政府，驱逐武人官僚政客；二、组织平民政府；三、要求各公使承认；四、不承认政府借款。以上各条准明日下午1时在西门体育场开国民大会表决。"

△　北京国务院密电内务部，谓："径密启者：'准卢永祥护军使漾（23）二电称，罢课学生结合流氓数百名，打毁电车，鼓动罢工罢市，并拟五月一日大举，拟宣布临时戒严，以资防范'等语。除复准予备案外，相应抄录往复电文函达贵部查照可也。"

△　谭人凤在上海病逝。

4月25日　　下午3时，济南各界联合会开会，与会者八九千人。由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北京罢课情形，建议山东应采取一致行动。决议

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一、驳回日本通牒；二、取消军事协定；三、释放京津被捕代表；四、取消检查邮电。"会后学生代表赴教育会密议罢课问题。

△ 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宣告脱离广州军政府。

△ 下午1时，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在中央公园宴请美国大资本家拉门德及驻京英使艾斯顿，宴毕同至武英殿参观古物。

△ 孙中山复电卢永祥，肯定其废除督军制度之议，并谴责沪杭军警仇视学生、压迫学生爱国运动。

4月26日 卢永祥密电北京国务院，谓："此间本日各商店已一律照常营业，市面完全回复原状。工界亦称平静，罢课学生已无游行讲演之事。"

△ 山西学生会召集各校代表开紧急会议，决定即时罢课。

△ 济南13校学生是日一律罢课。

4月27日 南昌各界人民为表示对日经济绝交决心，举行罢工、罢课、罢市。

4月28日 武汉学生是日起罢课，并发表宣言，要求政府立刻驳回日本关于山东的通牒，取消军事协定，用最坚决的方法办理闽案、苏案，与释放京津杭各处被捕学生。

△ 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工界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等发表劳动纪念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他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我们各业工人团体的目的，是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

△　松沪护军使署致电北京政府，谓："沪潮极力遏阻，渐就平息。但法租界学生联合会，近日仍有会密议散布传单。议定五月一日开俄国劳动纪念会，借以煽动工党。并定五月九日开国耻纪念会，意图起事。若不将该会勒令解散，终不免滋生祸变。迅请由部再告法使交涉，速电沪领协同取缔，以维治安。"

△　唐继尧电复伍廷芳，谓："广州事变迭出，军府为一二人所操持。公之去粤，良非得已，唯保存关税余款，为我公应负之责任。况志行坚洁，中外夙信。顷读通电，凡关于西南外交财政，仍由我公始终主持。"

4月29日　北京国务院以上海、杭州及全国各地各界联合会等承受苏俄政府对华通牒，致电各省查禁。并称："通牒果否可凭，尚属问题。"

△　苏俄首次派遣代表路博（原名普达普夫）将军到福建漳州访问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携带列宁给陈炯明的亲笔信，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对陈表示敬佩和鼓励，并请陈多做农民运动，注意发动群众，还说，如果需要，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陈当即设茶会招待并举行会谈。廖仲恺、朱执信、陈其尤在座。5月8日，陈复信列宁，对苏俄派代表前来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局势。路博在漳州逗留两周后，经厦门、香港返国。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全国各界、各团体、各报馆，声讨卢永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罪行，并揭露其所倡废督之说，"虽属娓娓动听，其实不过为促成分赃和议之饵，其居心殊不堪问。敝会固素主张废督去兵，惟对此等违心欺人之论，不得不揭其阴谋，尤希国人特别注意"。

△　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九团体致电北京政府，谓："近日报载，鲁案日本又催直接交涉，而中东路胶济路实权渐落

日人之手。数日以来，日人奋迅进行，政府迁延不决，致复酿成罢学风潮，几难收拾。此时政府尚不表示明确态度，但以正考虑等词，涂饰耳目。……务请从速宣布鲁案最近办法，以伸民意。”

4月30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谓：“中国不幸，法律失败。军阀官僚，擅据国柄，内政不昌，外侮斯亟。……此次罢课之目的，一以争国家之权利，一以促同胞之觉悟。……罢课迄今，既半月矣。此半月中，同人因讲演及赴国民大会，两次为军警所摧残，鞭击刀刺，血肉横飞。重伤者数十，轻伤者数百。……一息尚存，决不忍大好河山，断送军阀官僚之手。”

△　川军第五师长吕超、第二师长刘湘、第三师长向传义、第四师长刘成勋、第六师长石青阳等为驱逐熊克武通电，谓：“超等认为熊氏通电辞职之日，即其督军资格消灭之日。此后熊一切妄发之号令，及与任何人缔结之契约，一律无效。惟国是日非，出兵在即，川军众逾八师，不可无所统率。现既未有合法机关之主持，熊氏无再执行职务之理由。万不得已，特由传义、成勋、青阳、德基、洪范、复生、师谛等公推吕超为川军总司令，刘湘为川军副司令。……除联名专电呈请唐（继尧）联帅援从前熊氏出总川军成例明令，委任吕超、刘湘为川军总副司令，饬其克日就职，以奠川局，并勒令熊氏立即交代，听候查办。”

△　北京政府教育部留欧学生监督处与华比银行签订英金3000镑借款合同，用于支付留欧学费。

是月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五人到达北京。在北京大学同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沪会见陈独秀，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后又同李汉俊、俞松秀、李达、陈望道等多次座谈，交流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俄国现状。

△　古巴华侨爱国团代表致电北京政府，表示誓不承认“鲁案”由中日直接交涉。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绥路局与日商三井物产会社签订日金1.13991055亿元借款合同，用于1919年12月至1920年1月间三次订购枕木价款及输入费用。

△　梁士诒联合中国、交通、汇业、金城、盐业、新华、五族、大生、大陆、中孚、华孚、北京商业、广东实业13家银行，创办中华银公司，资本1000万元，承办、承募国家、地方及公司各种债款营业。总事务所设北京，梁士诒为董事长。

△　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再来南京高等师范长期演讲：一、教育哲学；二、实验伦理；三、哲学史。

5月

5月1日　　上海“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七团体5000余工人在陈独秀指导下，发起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遭到军警阻挠和干涉。会场几经迁移，工人坚持开会，呼出“实行三八制”、“劳工万岁”、“中华工界万岁”等口号。并发表《上海工人宣言》，抗议军阀与外国巡捕对大会的无理阻挠。同日，全国有七八个城市，五六万工人参加“五一”纪念活动。此系中国工人第一次较大规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

△　北京学生“工读互助团”是日雇汽车两辆游行，每车载学生四人，每人各执一旗，上书“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口呼“劳工万岁”，手散《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警察将该团学生八人拘捕。

△　北京大学于是日上午召开五一纪念会，到会校友和学生500余人。该校“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分五组沿街讲演，题目为：《劳动纪

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五一节的历史》等。

△ 广州、香港工人在广州东园举行五一节纪念大会，与会者1000余人；是晚举行提灯会，沿街巡游者达五万余人。

△ 广东汕头工人、学生3000余人，是日举行提灯游行。

△ 江西九江工人举行纪念大会，参加示威游行工人3000余人。

△ 松沪护军使卢永祥为镇压学生运动密电徐世昌、靳云鹏，谓："此次沪上得以从严办理，实因其行为已入内乱范围。自戒严令下，风潮遂告一结束。似宜乘此时机由中央明令，根据沪上学生图谋内乱情形，通饬本省取缔学生行动，并将学生联合会及各界联合会等机关，一律严行解散。"

△ 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为库券在鄂省发行失去信用，商民军心均起恐慌，致电北京国务院，谓："第二期库券展限三个月，商民惶惑，以此信用不坚，不敢收受。乃库券纷拥而来，既无止数，又无止期，罗掘俱穷，焦急万状。"

△ 唐继尧、刘显世就任川滇黔联军总、副司令。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比国铁路电车公司、荷兰建筑海口公司签订借法金1.5亿法郎、荷金5000万弗罗令合同，以陇海铁路财政收入为担保，用于造路、购物及付息费用。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法金1400万法郎借款合同，以钦渝库券、期票为担保，用于认购中法实业银行第二次资本及钦渝垫款利息。

△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劳动纪念号"出版，其中有工人生活图片33幅，12个工人的亲笔题词，并发表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历

史》一文，介绍五一节的来历及各国纪念的情况，是中国报刊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第一声。

△　广州中华工会刊物《工界》创刊。

△　复旦大学学生编辑的《平民》周刊在上海创刊。

5月2日　　徐世昌令准免孙宝琦经济调查总裁兼职，特派郭则沄兼任。

△　北京政府外交、交通两部会同答复英、美、法三国公使，声明湖广铁路德国债权已失效，所有各国从德国接得此债券，中国不能承认。

5月4日　　下午1时，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大学理科讲堂开五四运动纪念会。与会者3000余人，公推鲁士毅、瞿世英为正副主席。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次由瞿世英报告五四运动一年后之经过情形。军警当局派员监视，学生秩序井然，3时散会。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与女校联合会也分别于是日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

△　到沪国会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国会迁滇，并发表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与国会。

△　政学系召集留粤议员开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代替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

△　广东学生联合会分会、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等在东堤东园开五四救国一周年纪念大会。是日大雨滂沱，学生冒雨而立，参观者逾千人。

△　江西九江学生会在浔阳舞台开五四纪念大会，以马祖祯为主席，与会者5000人，由学生讲述五四历史。是日，工商学界一致行动，举行罢工、罢市、罢课。

△　济南第一中学、第一师范、齐鲁大学等校学生千余人，手执小旗，上书“驳回通牒”、“废除条约”、“五四纪念”等字样，赴省议会开五四纪念大会。

△　熊克武宣布复职，准备以武力驱逐滇、黔军。

5月5日　　全国报界联合会在广州开第二次常会，与会报社、通讯社代表112家，代表196人。

5月6日　　北京国务院电复卢永祥，谓：“东（1）日电悉。所陈解决学潮办法至为扼要，已通令各省切实取缔。至外交问题关系较重，闽案现正严重抗议，鲁案并无直接交涉之说。”

△　徐世昌指令照准陕西省增设镇坪县。

△　上海女界联合会、女青年会等10团体，组织“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举郑毓秀、周茭安为出席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

△　全国各界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团体，被法租界巡捕封闭。

△　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乌太病死。

5月7日　　河南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为学生呼吁，谓：“外交风云，日逼日紧。一发千钧，时不可待。……本会代表民意，深虑风潮扩大，愈难收拾。除一面疏通学生安业外，特恳钧府院念学生之牺牲，全属爱国热忱，速将救时方针，明白宣布，冀慰舆情而平学潮。”

△　靳云鹏再次请辞北京国务总理职，徐世昌不准，仅允许续假。

△　徐世昌任命齐燮元帮办江苏军务。

△　富华储蓄银行开业。资本总额20万元，总行设常州。后在上海设办事处，经营普通储蓄和有奖储蓄。1921年4月27日为推广业务，将上海办事处改为分行，行址设于江西路，以史雪舲为经理。嗣后以沪分行事务较简，将沪行裁撤。不久以常州纱厂借款搁浅而停业。

5月8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紧急通告："本会横遭摧残，而救国之志始终不敢稍懈。兹经评议部议决，坚持罢课，以促政府反省。"

△　北京政府致电驻丹麦代办公使曹云祥，转告苏俄政府派赴丹麦之代表，略谓："中国对劳农政府前日提议归还各种权利及租借地，以为承认莫斯科之报酬，感谢异常。惟中国为协约国之一，不能单独行动，如协约国能与俄恢复邦交与贸易，则中国政府对俄提议自当尊崇，希望劳农政府善体此意。"

△　西北边防军训练处与日商太平公司签订日金五万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购货价款。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将华俄道胜银行股本银500万两作为教育基金。

5月9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本地各地分会通告："今日评议部议决，官僚武人对本会取高压态度，致会所封闭。本会对此宜表与黑暗势力奋斗之决心，自明日起继续罢课。"

△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各地学生会，谓："本会因主张正大，触官僚武人之意，屡商法领，卒于本月6日将会所封闭。本会评议部，议决自10日起继续罢课，以争国家之权利，与人民应有之自由。"

△　广州6000学生在东园召开国耻纪念日大会，会上演说，指

斥“二十一条”及南北军阀，会后分13队游行，警察未敢干涉。

△　江西督军陈光远镇压南昌学生运动，解散学生联合会，武装包围中等以上学校，限制学生自由行动达七天之久。学生组织“十人团”进行自卫。

△　曹锟致电徐世昌，力陈靳内阁不宜更动之理由，谓：“一、西南各省首领与靳之联络，颇有进步，倘内阁突然改组，则前功尽弃；二、和议正在进行之际，倘内阁更动，未免受根本上之影响；三、若因一党之意见，更换阁揆，将来恐无人敢任阁揆。”

△　徐世昌任鹤春为正黄旗汉军都统。

5月1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日本在中东铁路沿线增兵。

5月11日　张敬尧为直军第三师撤防北返建议不发表明令，以免吴佩孚要挟，密电徐世昌，谓：“近日默察三师情形，退防之举其势已不可遏。所属之第二混成旅，日内已经开动，拟驻株洲易家湾，逼近省垣。且前令两次提议北旋，地方惊疑，谣诼纷起，因之商务金融两均停滞，市面暗中亏损，已属不资。今若再令勉强留防，则恐三次要求必接续而至，不但中央威信不能稳固，即湘省地方之损失亦所不堪。以尧愚见，今该师长既以撤防来相要挟，莫若趁此解决，使其撤退。如中央因财政困难，恐明令一颁，该师复以所欠军费饷项为词，故意留难，发生别故，则请暂不发表明令，但令尧酌量情形暗为接下，俾其再有何说？该师长此时自恃过高，几有天下无敌靡伊不能解决之概。故尧以为与其留防终为捣乱之媒介，不若趁此解决也。”

△　唐继尧、刘显世委任吕超、刘湘为川军总副司令。

△　重庆镇守使余际唐被迫离开重庆，准备调集江防军反攻。黔军自后尾随，余退出邻水、广安。嗣后刘湘与余际唐在邻水会合，击退黔军，夺回合川，进逼重庆。

△　美英法日四国对华新银行团成立。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经多次交涉，双方妥协。日本接受美英法三国关于组织新银行团之条件，对华新银行团遂宣告成立。

△　川战爆发，熊克武任命但懋辛、刘湘、刘成勋任川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军长，该各军军长联名通电，否认唐继尧为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并历数滇军割据川东南、破坏四川省政之罪。

5月12日　山东省议会通过将该会迁往北京，以监督北京政府，不许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案。

5月13日　徐世昌令准督办运河工程事宜兼督办湖南赈务熊希龄免去本兼各职，特派潘复督办运河工程事宜，特派王瑚督办湖南赈务。

5月14日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徐世昌特任海军总长萨镇冰暂兼代国务总理，陆军次长罗开榜暂行代理部务；特派张元奇为经济调查局总裁。

△　靳云鹏通电各省，谓："待罪枢垣，瞬经八月，才疏任重，无补时艰。近因患疾，迭请辞职。幸蒙批准给假，今日交卸。"

5月15日　北京政府对英日同盟续约发表声明：此次续约文内凡关于保全中国领土巩固主权，以及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字样，希望一律删除。

△　离粤广州旧国会议员在沪开谈话会，发表国会移滇开会宣言。宣言并声明所有广州政学系议员私选总裁及政务会议任免职官及其他一切决议，概属违法，当然不生效力。

5月16日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讲，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并批判了辛亥革命后曾一度甚嚣尘上的"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的谬论，认为“无论何时……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

△　远东共和国政府首次致电北京政府，附以独立宣言书，向中国及协约各国宣布建国宗旨。

△　广东留日学生监督熊退与第百银行签订借金32000元合同，用于留日学费。

5月17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发表宣言，声明于本月17日起一律上课，“同时对于救国事业，更当协同各界，积极进行”。

△　段祺瑞在北京南苑团河召集皖系军阀秘密开会，部署军事，准备还击直系吴佩孚第三师。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日本政府在西伯利亚撤兵宣言中将“满洲”与朝鲜并列，向驻京日使小幡酉吉提出抗议。

5月18日　四川省长杨庶堪以调解川局无效，通电辞职。

5月19日　北京政府应段祺瑞之请，电吴佩孚暂勿撤防。

5月20日　吴佩孚电复北京政府，说明请求撤防湘南理由，恳请徐世昌等俯准回防，并令湘督接防。

5月21日　孙中山批常州姚畏青上书，说明与段祺瑞联络乃为使真正之共和早日实现于中国。

△　上海绸绫染业工人因米价飞涨、生活困难，一再要求染业公所增加工资，未得结果，于是日举行罢工。

5月2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日本催议山东交涉案，内称：“因对德和约并未签字，全国人民对于本问题态度激昂，本国政府不容率尔答复。至贵国政府愿将胶济沿线军队撤退，此节与解决交

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愿贵国政府将战时一切军事上之设施从事收束，以为恢复和平之表示。”

△　熊克武下令进攻滇军，并宣布全省戒严。24日滇军顾品珍部放弃简阳，28日放弃资阳，31日放弃资中，6月1日放弃内江，一直退到隆昌、富顺。

△　吴佩孚率所部分水陆两路自衡阳撤防北上，受到当地各界欢迎。

5月24日　北京被拘学生拘役期满，全数释放。北京大学法科开会欢迎，与会者近千人。

△　上海中发、勤益织袜等厂，因厂主限制工人转厂及扣存工资问题，举行罢工，延续10余日。

5月25日　北京政府代表与英商费克斯有限公司代表续订英金100万镑借款合同，用于拟购飞机之配件、航空学校修建经费等，以中华八厘10年英镑国库券为担保。

5月26日　川军刘成勋、向传义、陈洪范、但懋辛、刘湘、吕超联名通电否认唐继尧、刘显世的三省联军总副司令名义。

△　湘南战争开始。湘军赵恒惕部为驱逐张敬尧，趁吴佩孚撤防，于是日发动攻击，占领耒阳、祁阳等县，前锋已到离衡州20余里之东阳铺。

△　北京新国会通过对奥和约。6月18日，徐世昌批准该约。

5月27日　张敬尧致电徐世昌，谓：“直军奉命撤防，回北休息。本日经过长沙，均未停泊。至午后四时，始行过毕，军纪甚属整齐。敬尧率领军民两政及绅商学界，齐集江岸欢迎欢送。惟祁阳、耒阳两县防地，已被南军强占，刻正交涉，特电奉闻。”

△　吴佩孚率旅长萧耀南、张福来、王承斌、阎相文等撤防过长沙。张敬尧陈师以待。

△　北京政府外交部呈准增设驻墨西哥、古巴、瑞典、挪威、玻利维亚五国公使。

△　新疆伊犁道尹兼办交涉事宜许国桢、交涉局局长孝昌、伊宁县知事牟维潼，与俄国特权外交委员黎玛列夫、特权商务委员列维塔斯在伊犁伊宁，开议“关于两国边界、伊犁与七河通商及俄败兵、逃民等回国各问题”。旋由新疆督军杨增新与苏俄塔什干苏维埃政府订立《伊犁塔什干临时通商条约》，凡10条。

△　岑春煊致电北京政府，谓：“张敬尧破坏和平，咎有攸归。此次湘衡属境腾出防地，自宜双方各守界线，共资保卫。乃张敬尧不顾大局，轻启衅端，务请迅速制止，以维和局。”

5月28日　　刘存厚密电徐世昌、靳云鹏及参谋部、陆军部，谓：“兹据派赴重庆、遂宁等地探称：‘一、重庆镇守使余际唐被黄复生武力迫胁，已于真（11）日潜逃。二、驻渝黔军已与熊部江防军，于久（12）日在江北县之寸滩及悦来场等处开战。三、昙山方面，滇军与熊部陈军尚在激战中。四、讨熊军总司令部设在遂宁。吕、石、卢、黄及伪省长杨庶堪、滇黔代表均在该处。五、双方主力军均趋集于赵家渡’。”

△　孙中山密电谭延闿，促其从速进行讨桂系之军事准备，谓：“西南护法，而桂系始终乱之。往昔行为，已为公论所不赦。最近对于滇军，贼谋益露。国会既去，军府无名，使人无复投鼠忌器之患。闻莫赓（唐继尧）已决从滇边进兵，贵州定与携手，竟存（陈炯明）亦拟回戈图粤。湘当其中，若与首尾相应，则彼必败亡。……兄与所部为国奋斗，久历艰瘁，今有机可乘，必能逐除民害，望速决定军事准备。”

△　张敬尧致电徐世昌，报告谭延闿、赵恒惕等“不但不将原防地点及祁、耒两县退出交还，且逼近衡阳，向我军开火，实属有意开衅”，望速决定军事准备。

5月29日　徐世昌召见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密谈军事问题，并促孙迅速回任，以资坐镇。

△　广州军政府海军部长林葆怿，为外间盛传海军归北之说，特召集在粤海军界人员在海珠会议，讨论辟谣，并发出宣言，“申明始终护法之旨”。

△　广东造币厂与日商广东实业公司签订毫银10万元借款合同。

5月30日　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致电北京政府，谓：“查直军撤防之际，由吴师长佩孚介绍，双方共订遵守条约，乃墨沈未干，张敬尧节节进逼，希图侵占。若因此发生冲突，则破坏和平之咎，张敬尧应负其责。”

△　徐世昌派驻意公使王广圻为全权代表与波斯（伊朗）签订通好条约。6月1日，王广圻与波斯驻意公使伊萨刚在罗马签订中波《友好条约》，凡七条。

△　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英人莫理循在英国病逝。

5月31日　吴佩孚致电张作霖、李纯、陈光远等，谓：“敝军全部已于今日安抵武汉。因兵士疲劳过甚，即暂停驻，借资休息。”旋进驻洛阳。

△　徐世昌召见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讨论湘省问题。

是月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会员有：李汉俊、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沈玄庐、李达、陈公培、沈仲久、刘太白、杨明斋、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 广东南海所属六乡藤器工人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 广州军政府任杨永泰为广东省长。

△ 孙中山复函王天纵，嘱继续努力实现护法救国目的。

△ 北京国务院管理特种财产事务局与东方汇理银行签订银元21.8237万元借款合同，以盐税余款为担保，用于政费。

△ 广西陆荣廷与日商津田晴胤签订日金200万元借款合同。

6月

6月1日 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实行废督裁兵，即日解除督军职务。

△ 江西督军陈光远因湘省发生战事，与赣有唇齿关系，是日宣布实行戒严，无论何种军队，不许进入赣省。

△ 徐世昌令准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兼护路军总司令鲍贵卿辞职，以宋小濂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张景惠为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6月2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云南代表在上海孙宅举行会议，决定由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军政府及在广州之国会，并责成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即日与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恢复和谈。

△ 护法湘军谭延闿部克宝庆，5日克安仁，7日克衡山。

△ 湘督张敬尧致电北京政府，请求下令讨伐湘军。

△　巴西新任公使阿威士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　徐世昌任命张学良为暂编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6月3日　　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及旧国会，决定移设军政府。谓："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议员同时他徙，而广州无国会……自今以后，西南护法各省区、各军，仍属军政府之共同组织。对于北方继续言和，仍以上海为议和地点，由议和总代表准备开议。其广州现在假托名义之机关，已自外于军政府，其一切命令行动……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在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

6月4日　　徐世昌特派袁乃宽持函赴南苑团河谒见段祺瑞，征询对湖南问题意见。

△　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匈和约于是日签订，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顾维钧出席签字。

△　上海浦东烂泥渡福昌米店，是日上午忽来穷苦老幼妇女三四百人，各持饭箩去米仓抢米，经长警亲往弹压驱散。

6月5日　　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拜访唐绍仪，双方谈论颇久，此为南北总代表第一次晤面。次日，唐绍仪前往哈同花园答拜。

△　唐山开滦全矿二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全矿停产六天之久，资方被迫允许增加工资：1元至10元者，加18%；10元以上至25元者，加13%；25元以上至40元者，按个人情形分别酌加。罢工取得胜利，11日工人复工。

△　江苏扬州药业工人组织联合会，订定会章12条，要求店东同意，而各店东否认，工人于是日一律罢工。后齐集埂子街旌德会馆内开会，决议对付方法，共同议定暂行闭市，停止交易。

△　上海、嘉定、青浦三县贫民约二三百人，各执饭箩奔至绅富之家强取白米，并将所储小麦与蚕豆一并抢光。

6月6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并通告北京政府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代表业经取消。"声明："孙、唐、伍等宣言及一切行动无效。"

△　李烈钧在沪发表通电，谓："现在滇军主力既已移驻衡、耒，即可协同维持。张督所部在湘原有防地，宜静候和会解决。鄙见所及，特电奉闻，并达滇军将领遵照。"

△　淮海实业银行开幕。总行设于南通。在上海设分行，9月17日开幕，资本总额500万元，分五万股，每股100元。董事长为张退庵，总经理为张孝若，沪行经理杨瑞生。1925年春，沪行奉总行令裁撤。

6月7日　徐世昌对上海和会态度极端冷淡。是日，徐令国务院致电王揖唐，向南方提出四项质问："一、唐绍仪之总代表，原系军府委派，今唐绍仪否认军政府，则唐总代表之资格是否存在？二、沪上，本非西南范围，孙、唐、伍诸总裁或久已辞职，或现已离任，此职仅以私人资格就沪上私邸集议，是否一致赞成？三、孙、唐、伍诸公既否认两粤机关，将来沪议有成，两粤能否一致奉行而更无激抗之举？四、唐总代表上年所提八条，中央迭次抗争，和议因之中梗；今少川（唐绍仪）宣言仍以八条为据，遽与开议，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

△　下午，安福系推举国会议员20余人见徐世昌，质问对上海和会的态度，徐不予接见。

△　北京京师警察厅因《顺天时报》、《蒙边日报》登载《政潮影响金融》各一则，记载不实，"淆惑人民听闻"，发出布告，责令该报馆"嗣后对于此项金融问题不得偶据风闻即行记载，并不得轻率登

载军务方面之事，以杜谣传而保公安”。

△　北京政府农商部与日商正金银行签订日金40万元借款合同，以盐税、龙烟铁矿股票100万元、汉冶萍官股利息为担保，用于农商部经费。

6月8日　　安福系骨干在太平湖开会讨论上海和会及应付徐世昌的问题。同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田应璜、刘恩格会见徐世昌。徐表示三点：“一、政府对王揖唐并无不信任之意；二、军政府发生内讧，政府当然可以置身局外；三、军政府改派温宗尧为南方议和总代表，政府尚未承认。”

△　北京政府外交部对英日联盟发表声明，宣称：“英日盟约中含有关于中国之条款，似中国已被视为签约国之领土。此项条约决难为中国所公认。将来凡国际会员所订关于中国之条约，若无中国承认，不能认为有效。”

6月9日　　孙中山对唐继尧通电解除督军职务，复电表示嘉许，并望唐“削平大难，贯彻主张，俾平民政治，由云南而普及于全国，则国民幸甚”。

△　北京政府代总理萨镇冰电复岑春煊，谓：“鱼（6）电悉。尊重和议，实国人心理所同，亟盼尊处速筹解决。惟王揖唐总代表一席，久经中央派定，驻沪以来，赞导祥和，备殚心力。现尊处既主张开议，中央依旧信任该总代表，断无临时更易之理。至于免唐易温，事属西南范围。惟唐总代表与孙中山诸君方有宣言否认广州军府，而军府又免唐职，两相抵牾，令人目迷五色。第和议关系全局，必须各方妥洽，乃无阂阻，亟望诸公兼顾并筹，庶可从速解决。”

△　吴佩孚致电张作霖、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赵倜等，谓：“佩孚佳（9）日早刻安抵郑州。敝军各部队即在直豫之交分布驻扎，借资休整。”

△　前海军总长刘冠雄退职返归福建省亲，兹奉徐世昌电召，于8日晚偕同美国公使柯兰抵京。是日上午8时入总统府向徐世昌报告一切经过情形。

6月10日　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一行抵买卖城，旋即致电北京政府，请发给通行护照，以便赴京接洽。

△　凌晨2时，北京东安市场大火，被烧商铺200余户，浮摊100余处，损失甚巨。

6月上旬　段芝贵、王怀庆、吴炳湘等37人，发表促和宣言，指责谭延闿“背约弃信，越防称兵，糜烂地方，罪无可辞”；吁请北京政府“正谭延闿之罪，迅复原防，一面敦促南北代表，本宣言即日开议，以决纠纷”。

△　江苏镇江人力车夫要求人力车公司减低租价，举行同盟罢工。

6月11日　川督刘存厚密电徐世昌，谓：“一、滇军自简阳退却后，因防线太远，已将资阳让出，扼守资中。二、五月敬（24）日，滇军与熊部陈师在荣县、威远激战。陈师败退，荣、威俱被滇军占领。三、黔军由长寿、邻水追击余际唐所部之江防军，连破广安、岳池等县。刘湘分兵攻取重庆，在悦来场、鸳鸯桥一带，被滇军田中谷旅迎击，迭受大创。”

△　护法湘军谭延闿部进占湘潭、宁乡。入夜，湘督张敬尧弃长沙逃奔岳阳。

△　孙中山接见《字林西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反对损害中国主权的英日同盟续约。

△　法国驻京公使柏卜，向徐世昌呈递国书。次日，美国驻京公使柯兰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北京政府外交部、财政部与醴陵美国教会签订银元8.3万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1918年5月醴陵教案赔偿费。

6月12日　　浙江省长齐耀珊电请辞职，18日北京国务院复电慰留。

△　上海水木作工人数万因要求增加工资不遂，于是日举行大罢工。

6月13日　　林森、吴景濂、王正廷、褚辅成联名致电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谓："奉江（3）日宣言，仰见不辞危难，力肩艰巨，护法爱国，始终不渝。……至和平固为国人所殷望，而永久和平，仍当求之于法治。故保全法系，正所以巩固国基。倘能重开，深冀体念国民多数之心理，贯彻护法救国之初衷，庶国脉可保，正义能伸。"电请移设军政府，克期成立。

△　甘肃督军张广建致电伍廷芳、唐绍仪请速开和议。

△　徐世昌令褫去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本兼各职，暂行留任。

△　徐世昌特派湖北督军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

△　吴佩孚自郑州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主张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是。

6月14日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致送山东问题交涉复文，再次催议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　靖国联军豫军总司令官王天纵致电唐继尧，谓："段贼于六月一日召集安福派诸要人，在团河秘密会议。……大要为：吴佩孚撤防，南军乘势进攻；恐有不虞，段督意欲督师南下。"

△　徐树铮自库伦电外交部，说明暂不允优林假道来京之原因。21日外交部电复优林无庸来京。

△　湘军赵恒惕部占领长沙，并以湖南督军谭延闿名义出示安民。17日谭至长沙。

△　北京边防督办处宣布废止《中日军事协定》。

6月15日　曹锟、吴佩孚在保定开会，商议对付皖系办法。

△　福建督军李厚基致函孙中山，表示："甚愿竭尽愚诚，以期共济。"

6月16日　曹锟致电北京国务院，请免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兼职。

△　吴光新致电北京政府辞湖南检阅使职。次日，再电请辞。

△　上海杨树浦英商祥太木行小工、木匠、铁匠等700余人，因米价昂贵，要求增加工资不遂，于是日罢工。洋经理答应每人按月贴给米价洋八角，工人复工。

△　苏州杭缎工人万余人，因米价昂贵，生活困难，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工人和警察发生冲突，由知事派人调停，分别增加工资，工人复工。

△　鄂督王占元致电北京政府，告以："自十四号为始，湘省溃败军队逃武汉者，络绎不绝，无法阻止。惟鄂省现状困难，既乏给养之力，又无遣散之术。情形骚扰，哗变堪虞。……仍请政府妥筹安置，并济巨款，以救危急。"

△　参谋本部、陆军部致电张敬尧，谓："据探岳州有放火抢劫杀伤教士洋商情事。该督职责所在，应即严申纪律，力保岳州地方，并

将实情飞电具报。”

△　北京新国会因民国九年度预算尚未能提出公决，议决会议延长两个月。

6月17日　孙中山致函李绮庵，告已派徐绍桢为两广各路讨贼军总司令，指挥讨伐桂系。

△　川督刘存厚密电徐世昌，报告川中军情。告以滇军顾品珍率队让出资中、内江、自贡，向叙、泸府退却，并通电与唐继尧断绝关系，闻系缓兵之计。滇军集中叙、泸、永川。黔军集中重庆等地，俟援兵大集，再行反攻。

△　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自库伦抵北京，次日向徐世昌陈述外蒙防务，并对湘南事情有所筹划，共谋对付直系方策。

6月18日　陕西省政府与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代理大仓组，在汉口签订追加添购铜元机器合同。

△　留日学生监督处与日本兴业银行签订日金45万元借款合同，以国库券、盐余为担保，用于支付留日学费。

△　新任比利时驻京公使艾维兹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顾维钧电告北京政府，对土耳其和约，因中土未曾宣战不能签字，已将此项决定通知和会会长。

6月19日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抵京，调解直皖之争。是晚8时访晤靳云鹏，要求靳勿再辞总理职。

△　徐树铮与安福系主要人物密商，拟以副总统一席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张作霖严守中立。次日徐树铮往见张作霖，张托故不见。

△　徐世昌准驻西班牙兼驻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戴陈霖免本兼各

职。

△　徐世昌特派张文生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

△　江西财政厅与九江日商台湾银行签订日金10万元借款合同，以江西币制公债20万元为担保，用于偿还旧债。

6月20日　晚间，徐世昌召见张作霖，咨询对时局之意见。张作霖请徐万勿准靳辞职。21日，靳云鹏回拜张作霖。同日，张作霖赴团河见段祺瑞。

△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拟定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推举陈独秀为书记。

△　是晚，施存统赴东京，与周佛海联系，旋成立了中共日本小组，陈独秀去信，指定施存统为小组负责人。

△　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第一、二、三等厂男女工人4000余人，因米价昂贵，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日方允照三新厂办法，出售平价米，少数工人上工。多数工人反对平价米，二三千工人相率拥入纱厂，将窗上玻璃千余块，电灯泡千余支，击碎殆尽。捕房闻警前往弹压，罢工持续10多天，后经双方协商，折衷解决。

6月中旬　徐世昌宴请梁士诒、周自齐、梁启超、汪大燮等，商讨时局问题。

△　上海浦东陆家嘴英美烟草公司园包车间女工300余人，因厂方减去贴封条女工工资，工人要求恢复原状未遂，相率同盟罢工。锡包车间女工3000人也群起响应。厂方除令长警就近弹压外，又令华人经理磋商解决办法，最后决定，每千包加钱五文。米价以八元一石为定，如涨洋一元，每人贴洋二角五分，工人复工。

6月21日　贵州督军刘显世17日发表废督通电，是日自行解除贵州督军职务，仍以靖国联军副总司令名义收束军队。

6月22日　下午7时，张作霖抵保定。曹锟设宴招待，吴佩孚及苏、赣、鲁、豫等七省代表亦参加。席间讨论解决时局问题，提出五项条件，请张作霖带回北京：一、解散安福系；二、靳云鹏复职；三、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四、罢免安福系三总长；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次日，张回北京。

△　上海绳索工人因工资菲薄难以生活，举行同盟罢工。后经调解，每日工价以大洋二角计算，事遂解决，工人上工。惟有小部专做沙船缆绳之各工人，尚未解决。

△　前法国总理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é）是日抵北京，交换中法教育之计划，并考察中国铁路情形。

△　为湘军骚扰日船舰事，驻京日使向外交部提出抗议；长沙日领事向南军司令部提出四项条件。

6月23日　段祺瑞在团河设宴招待张作霖，段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张可取得副总统地位；对保定会议所提解除徐树铮兵权一条，表示有困难。

△　段祺瑞致电孙中山，赞同孙中山等本月3日所发表的宣言，表示同意以过去议和条件为基础，重开上海和会。

△　日本对中东铁路提出要求：一、沿线设日本护路军队；二、沿线附设日警；三、如有匪警，须调日军会剿。北京政府予以拒绝。

△　中国邮政总局局长刘符诚、总办铁士兰与英国邮政局总办义林伟在北京签订互换汇票协约。

△　徐世昌令准浦口商埠会办温宗尧免去本职，派周嵩尧帮办浦

口商埠事宜。

△　徐世昌任命文年为正白旗蒙古都统。

6月24日　　徐世昌令："张敬汤、张继忠畏葸无能，贻误地方，厥咎甚重，均着即行褫夺军官军职"，并派员押解来京候令惩办。"张敬尧调度无方，业经褫夺官职。此次据呈检举，尚能不徇亲私，着从宽暂免置议，以观后效。"

△　徐世昌令山东省长屈映光调京另候任用；特任齐耀珊为山东省长。同日又任沈金鉴为浙江省长。

△　孙中山电复刘显世，对刘实行废督表示嘉许，谓："废督之议，酝酿数年，徒以积重难返，至辜民望。今唐公（继尧）与执事以身作则，毅然行之，诚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者。"

6月25日　　下午4时，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偕同各部总长设宴招待张作霖。

6月26日　　段祺瑞坚持己见不肯让步，反要张作霖设法疏通曹锟。是日张声言"不管闲事"，并命路局预备专车，作离京姿态，以对段施加压力。段祺瑞不得已，于次日来见张作霖，提出让步条件。

△　湘军赵恒惕占岳阳，张敬尧逃往汉口。

△　川督刘存厚密电徐世昌呈报川战情况。

6月27日　　北京政府派出非正式代表团，由陆军中将张斯麟率领，抵达上乌丁斯克。

△　台湾日本总督府公布地方制度，设台北、台中、台南、新竹、高雄五州，台东、花莲港二厅。下设三市、47郡、155街庄。

6月28日　　京兆尹、步军统领衙门、京师警察厅为湖南变故，京

师谣言纷起，出示会衔布告：“此次湖南变故，政府自有正当办法，于京师治安，决不致发生任何关系，更勿庸自起纷扰。兹为杜渐防微起见，不得不为布告。……其或有借端淆乱听闻者，即行严拿究办不贷。”

6月29日　　孙中山致函日本陆相田中义一，揭露日本的侵略政策，希望田中“鉴于世界之大势与东亚之安危，一变昔日方针”。

△　孙中山派朱执信前往漳州劝说陈炯明誓师回粤，讨伐桂系。

△　徐世昌以张敬尧“退出湘境，实属咎无可逭”，着令“毋庸留任”，所部军队交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接管，并令张敬尧于交卸后，“迅即来京听候查办”。

△　徐世昌令驻湘第二路总指挥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张宗昌、陆军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暂留原职，以观后效”。

△　徐世昌特任吴光新为湖南督军，暂行兼署湖南省长。

△　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张作霖至公府举行会谈，对保定所提五项条件提出折衷意见：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解除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关于内阁问题，靳云鹏既然不肯回任，徐世昌主张改提周树模组阁，靳在新阁中仍任陆军总长。

△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合会（即国际联盟）。

6月30日　段祺瑞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29日公府会谈情况。

△　下午3时，张作霖赴团河见段祺瑞。段称：“调停政局，乃极好之事。惟吴佩孚以一师长干预政事，要挟条件，此风一开，则中央威信扫地。”又称：“你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张以段“谢绝调停”，声称“即日出京”。

△　山东省议会代表郑钦等17人上下午两次赴公府求见徐世昌，陈述山东问题之意见，徐均拒不见。

△　上海苏、沪、宁、扬帮成农匠约万余人，要求店主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经同业开会讨论决定，自7月20日起，每月工薪五元者加二成，五元以外者加一成。但扬帮成衣店主违背公约，2000余人继续罢工一星期。双方相持不下，几经磋商，复由中国工会理事长陈国梁调解，“加资一节，自应按照公议”。工人均表赞成，遂陆续复工。

△　晨7时，江苏青浦县发生抢米风潮，当时由区长李某督率兵力弹压。计被提取白米、蚕豆、黄豆、小麦等200余石。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日金62.5万元借款合同，以国库款、盐税余款为担保，用于代垫中日实业公司所认资金。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日金223.1083万元借款合同，以国库款、盐税余款为担保，用于垫付满蒙及山东铁路借款、水灾借款及吉会铁路借款利息。

是月　　汉阳铁工厂800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厂方指挥警察将工人赶出厂外，与工人大起冲突，工人用铁矿石、石灰石、生铁作武器，击败警察后，相率离厂而去。工人停工24天，厂方损失巨大，不得不答应每工加钱百文的要求。工人回厂，化铁炉于6月22日开炉。

△　特种财产局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银元20万元借款合同，以北京德华银行房产为担保，用于支付政费。

△　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嘉兴等地作有关教育学和哲学问题的讲演。

7月

7月1日　　孙中山命朱执信、廖仲恺至漳州催促陈炯明率师回粤，并许以经济上之援助。

△　北京政府停付俄国庚子赔款。23日，驻京俄公使库达摄夫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　曹锟、吴佩孚等发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军将士书》，和《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指出南北战争，卖国媚外，国危民痛，“追源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直军为助元首而除段、徐及声讨安福，系为救国。号召北洋军人，遐尔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外御其侮，内息阋墙，“绝不堕其收买离间术中”。

△　安福系开会，决定请段祺瑞组阁及惩办吴佩孚，作为抵制直系进攻之方针。

△　福州各校教员因官厅不发给教育经费，教员薪俸无着，举行同盟罢课。

△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开幕。资本总额500万元，营业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理事长虞洽卿，理事闻兰亭、赵士林、盛丕华等六人。此为中国有交易所之始。

△　广东官煤局与日商三井物产会社签订港币11.5万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货价欠款及利息。

7月2日　　徐世昌令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鹏辞本兼各职；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松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改设松沪镇守使；调任何丰林为松沪镇守使。

△　上海商界联合会为租界行使印花税问题，开会一致反对。

7月3日　　曹锟、张作霖、李纯联名通电，宣布徐树铮卖国媚外六大罪状，并谓“扫清君侧，奠我神京。伏望全国士民，一致声讨”。

△　段祺瑞密令督理边防军训练处，谓：“据宪兵司令部密报，吴佩孚由第三师各营挑选资深头目百余名，穿着便服赴京畿一带煽惑军队等语。除分行外，合亟密令该处即便密饬严行查拿，如获其人，即以煽惑军队宣布罪状，按律处置，切勿稍涉轻纵，是为至要。”

7月4日　　徐世昌特任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总司令职，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护理；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受办理。

△　浙督卢永祥致电北京政府，以“松沪地方重要，未便骤事更张”为词，拒绝接受裁撤松沪护军使命令。同日，何丰林致电北京政府不接受松沪镇守使职。

7月5日　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

△　侨俄华工数十万选出代表，开第三次全俄华工大会，议决通电孙中山转全国同胞，提出四事：请求全国同胞团结，大力协助中国青年革命事业；请求我国即行承认劳农共和国，并请我国对于反对俄国之列强勿施以援助；请求我国即派正式全权代表来俄，以结邦交；请求我国对在俄侨民之欲回国者予以便利。

△　直皖战争前夕，徐树铮迭召旅团长会议讨论对待办法。据步统领衙门军事科搜集情报，谓：“7月4日，据报称，徐筹边使以吴佩孚干预内政，得寸进尺，有非战不能之势。然战则出师无名，不战则势必瓦解。是以迭召所属旅团长会议讨论对待办法，决议数端：一、持镇静态度以避其锋；二、暂取守势以待动静；三、密令驻洛阳西北军两混成旅牵制吴军；四、密电吴光新调队信阳，遥为声势；五、密

令吴光新坚辞湘督任，南军扰鄂侵赣，以分其势；六、遇事请示段督办，以资服从而无遗恨。故近来对于政潮绝不发言，不过暗令军队严为防范。”

△　徐世昌宴请张作霖，对张“奔走京保，勉作调人，颇表感谢”。

7月6日　　驻北京西北边防军改称定国军，以段芝贵为总司令，向保定出发，准备与直系曹吴作战。

△　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数百名与海军发生冲突，伤毙工匠三名，工人举行罢工。8日，所长请惩办凶手以平民忿，海军当局故判重责军棍数百下，并至各厂示众，工人复工。

△　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由湖南常德、桃源退至鄂境。湖南境内已无北军。

7月7日　　张作霖以调停失败，深夜不辞而别，乘车离京，在军粮城下车，随即宣布“局外中立”。

△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电北京外交部，促请开议。同日，北京国务院致函外交部，对优林不宜过于拒绝。

7月8日　　曹锟急电徐世昌，谓：“顷据确报边防军第一师已下动员令直趋保定。警讯传来，殊深骇异。该军未奉明令，骤尔开拔，无端自由出发，示威压迫，俨如敌对行为。对于保定方面意在开衅，究持何种理由？锟备位畿疆，应负捍卫地方之责，如该军有轨外行动，宜速定对待方针，保境卫民，责无旁贷，惟有仰恳钧座主持，迅示机宜，俾资应付，事机迫切，飞电驰陈，伏候训示遵行。”

△　晨6时，段祺瑞自团河入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并呈请徐世昌“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并称：“兵队现经整

备，备齐即发，伏祈当机立断。”

△　张作霖在天津省公署开紧急会议，讨论直皖战争问题，曹锟、吴佩孚及八省同盟均派代表参加。吴佩孚在会上发言分析直皖力量对比，指出“段派实如瓮中之鳖”，“一临战地，溃散立见”。曹、张等均表赞同。

△　长沙滇军旅长鲁子材发出通电，声明不受广东节制。

7月9日　　段祺瑞在团河组织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

△　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开赴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

△　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宣言“亲率三军，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所部称讨贼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孚兼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王承斌为后路总指挥。

△　徐世昌令开去吴佩孚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

△　北京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如果战事危及外侨生命财产，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北京附近30里内，不得有军事行动。

△　江苏督军李纯令苏常镇守使兼苏军第二师师长朱熙派兵一团进驻昆山。10日，拆毁黄渡至陆家浜一段路轨，是晚沪宁路火车中断。11日，上海宣布特别戒严，浙军向南翔集中，战机一触即发。嗣经外交团及地方团体迭向双方劝告，12日苏、浙两省当局成立“保境安民”公约，13日南翔沪军、昆山苏军均撤回原防，铁路修复通车。

△　天津学生联合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公开审判被捕天津代表，倘不能得到完满判决时，天津全体学生誓作最后牺牲，与黑暗势力相搏斗，并发出敬告全国父老书。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法庭开庭，宣布被捕学生代表五人无罪。到庭欢迎者百余人，并留影纪念。

7月10日　孙中山复电李绮庵，指示讨伐桂系军事事宜，并告以派居正来粤为总司令，黄大伟为参谋长，“望各同志一律称路，不得称军。而各路司令悉听总司令指挥，立功后乃再定等级”。

△　直军全体将士发表宣言，声讨安福系。

△　在沪广州旧国会议员，以参众两院名义宣告国会在滇成立，举孙光廷为参议院临时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临时主席，代理议长职务，开非常会议。

△　曹锟致函外交使团，列举日本有助段嫌疑，提醒公使团注意。英美各国对于日本久怀不满，日本有所忌惮，虽暗中助段，也不能不表示中立。14日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宣称否认助段。

△　9日，张作霖由军粮城抵沈阳，是日致电段祺瑞，指斥徐树铮，并称：“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

7月上旬　上海闸北缫丝女工，因米价昂贵举行同盟罢工。四区署长亲率巡官长警赶来弹压，将为首女工三人拘留。

△　上海杨树浦班达鸡蛋公司工人5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全体一律罢工。经过交涉，资方允许每人加工资1.5元，工人复工。

△　广州珠江电船公司工人，反对厂商增加工作时间，举行同盟罢工。厂商将为首者80余名工人，一律革退。

△　广东潮阳县船户反对民团局抽收苛捐杂税，相率罢工，停止

运载。

7月11日　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派兵一旅向德州开拔，以牵制直军后路。

△　张作霖召集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奉军总司令张景惠等在奉天省公署开会，决定派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师各出兵一旅入关，并随即下动员令。

△　曹锟电张作霖，希望在对皖战争中得到奉军支持，并联衔发表讨皖通电。同日，张复电表示赞同，告以“弟处已备二十七、八两师步队，兼以马队两旅，当能足用”。并称“愚兄以兵力论，我众彼寡，以公理论，我直彼曲，绝无不胜之理”。

△　上海江苏教育会等八团体通电：“报载边防军有赴保定开战之说。查边防军系根据军事协约，中有日本士官200余人充教练之职。德战终了，军事协约当然取消，日本士官亦当解雇。今仍以对外之防军，移为内讧，供人之武力，杀吾同胞。国民闻之，既骇且痛，应请协力劝阻，免为朝鲜之续。”

7月12日　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蔡成勋、马福祥、王廷桢联名致电徐世昌，宣告对段祺瑞作战。略谓：“讵倏传警耗，变出非常。合肥方面，以段芝贵为总司令，派边防军直趋保定，昌言与直军宣战，并计定攻苏、攻鄂、攻豫、攻赣，强迫元首，下令讨伐。……讵合肥欲施其一网打尽之计，是以有触即发，为徐树铮之故，为安福部之故，乃不惜包围元首，直接与锟等宣战，总施攻击。”并谓：“迫不得已，惟有秣马厉兵，共伸义忿，纾元首之坐困，拯大局于濒危，扫彼妖气，以靖国难。”

△　吴佩孚等直系将领联名通电对皖系宣战。内云：“元首罢除徐树铮，原为俯从民意。段氏以翦其羽翼，因羞成怒。团河会议，凶焰鸱张，特派徐树铮率军警包围公府，软禁元首，夺出印信，擅发伪

令，都门喋血，津保弄兵，谋为不轨。……为拥护元首计，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精神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

△　徐世昌令京外军民长官，对于外人在华生命财产，一律加意保护。

△　直隶省议会、天津总商会通电指责皖系，呼吁停战。

7月13日　段祺瑞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曹锳之传檄通电，指斥曹、吴、曹“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投派兵北进，不遗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杨村，进窥张庄，于两路之间作捣虚之计。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畿甸，已难姑容。……今尽京畿附近各师旅编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

△　吴佩孚出师讨段，通电各省督军、省长，谓：“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钧，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军队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救国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民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　张作霖通电宣布派兵入关，参加直皖战争，谓：“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哓音瘏口，出为调停，原期暂息争端，借以稍纾国难。……作霖为戴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

者，甚愿引为同胞，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

△　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黎天才致电唐继尧，请示目前时局进行方针。8月23日，唐继尧复电黎天才，略谓：“自长岳得手，北方突起内讧，此正予我以绝好机会。此间抱定先廓清川局之主旨，根基稳固，然后合三省之实力，号召同志斡旋时局争衡中原。”

△　浙江嘉兴新篁镇贫民1500余人，拥入八家米店。其时该镇绅董周嘉禄家，见势不佳，将门关闭。贫民打墙入内，取去食米100余担，警察前往镇压。15日东栅口镇，突来贫民五六百人，拥入鸿盛米行，县知事、警长亲往弹压，派兵驰往保护。

7月14日　　直皖战争开始。是日午后，段祺瑞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定立即对直军下达总攻击令。直皖两军之战区分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皖军东路指挥为徐树铮；西路指挥为段芝贵。直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东路总指挥为曹锟。

△　徐世昌令：“自此次明令之后，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以符本大总统保惠黎元之至意。”

△　晚8时，边防军第一师及陆军第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高碑店。同日，东路边防军在徐树铮指挥下，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直军进攻。双方胜负未决。

△　黎天才致电唐继尧，谓：“顷据京津探报，皖直两系已决裂，京汉、津浦两路已中断。天才窃谓现在北方情况，直系八督共同联盟，由东北奉吉黑三省结合直豫，达东南之苏赣鄂各省，联成一片，以期制段。……此间风传，直皖两系均竭力与钧座周旋，希图彼此携手，再奠国基。”8月23日，唐继尧复电黎天才，谓：“上月寒电悉。北方战争，现已停止，然地丑德齐，未必遂能相下。我军现只须团结一致，静待机会，以为发展之计。联皖联直，均非手段所必采，但视

机会如何。”

△　江苏督军李纯通电宣布经与浙督商定，实行保境安民宗旨。

7月15日　唐继尧邀请李烈钧、褚辅成至署举行会议，决定将军政府与国会移设重庆。

△　曹锟致电张作霖及各省督军、省长，告以皖系边防军分路进攻等情，谓：“边防军称兵以来，扰害商民，近仍进行不已。以众大之兵力占据涿州、固安、涞水等处，于寒（14）删（15）两日向高碑店方面分路进攻。东路则占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攻击。炮声猛烈，枪弹如雨。敝军为防御，未即还攻……实为有意开衅。”

△　湖北省议会致电徐世昌，要求勒令直皖双方弭兵息争。

△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144团体致电李纯、曹锟、吴佩孚及各省督军。谓：“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商学无日不企望国民年出数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

△　梧州公民是日续开第三次公民大会，与会者将近万人，反对展拓商埠。

△　江苏松江县发生抢米风潮。该处富绅囤米甚多，不零出售，于是乡人愤怒，即将富绅之米一取而光。警长率警前往弹压，乡人愈聚愈众，竟将警察局捣毁。次日，松江平粜局出售烂米，贫民愤怒，将米700余石抢走。18日，县署出示严禁。

△　李绮庵奉孙中山命策动粤海军“江大”等八舰起义，令攻广州桂军，事败。舰上将兵遂分乘舢板渡登九澳海岛，遭驻岛葡兵开枪射击，13人死难，23人被俘，李绮庵等九人乘渔船脱险。

△　浙江温岭、临海、黄岩、宁海等县，连日风雨大作，灾情奇

重，为60年来所未有。其中以温岭为最重，溺毙者约有3000名之多，总计灾民约达万余人。

△　直隶省财政厅汪士元与开滦矿务局代表杨嘉立在天津订立《秦皇岛官荒地亩租约》。

7月16日　　天津开到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二英里外，西北边防军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京津铁路因此不能通车。三天两战，直军皆败。

△　曹锟通电正式宣告对皖系作战，谓："自今日起，实行围困奸党根据地，必将凶残除尽，以固邦本。"

△　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致电徐世昌、段祺瑞，明确表示助曹讨段，谓："奉省获犯姚步瀛等，供认受曾云霈等指使并定国军第三军委任，来奉招匪扰乱地方等情。……群匪就擒，而主谋诸凶，尚复优游京邸，盘踞政权。此次共举义师，拥护元首，讨伐诸奸……即以保护路权，并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用再通电奉陈。"

△　长江上游总司令、新任湖南督军吴光新在武昌湖北省署被王占元扣留，其驻扎汉口卫队千余人亦被缴械。张敬尧闻讯，连夜仓皇逃离汉口。

△　广州军政府通电宣布段祺瑞罪状，支持曹吴讨段。

△　留日台籍学生团体"新民会"在东京创办之《台湾青年》杂志创刊，蔡培火为发行人，林呈禄等为主编。系中日文并载，至民国十一年2月15日，共出版18期，为日本政府禁止发行。

7月17日　　直皖战事西战场情形突变。吴佩孚退出高碑店，率领一部直军，绕道向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进行突击。皖军师长曲同丰及其高级将领战败被俘。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同日，东战场发生变化，奉军协助直军作战，驻廊坊边防军不战而降，

东路总指挥徐树铮逃回北京。

△　张作霖通电各报馆借口在奉天捕获安福系谋乱东三省之代表姚步瀛等13人，宣布讨段并加入直军作战。略谓："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铢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重旋乡里。"

△　苏督李纯致电徐世昌，声讨安福系。

△　广州军政府国会联合会议讨伐段祺瑞，决议："（一）通电全国，讨贼救国；（二）咨请军政府下讨伐令；（三）通电各国公使中立，勿助段祺瑞。"

△　天津领事团派出英美法日四国护路军，率同工程人员修复杨村铁路，京津火车恢复通车。

7月18日　直军第三师第六旅进占琉璃河。同日，西路皖军第十五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在高碑店联名通电停战。至此，西路已无战事。

△　绥远都统蔡成勋通电与直奉联军一起声讨安福系，并派兵参加直皖战争。

△　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派兵由济南开抵禹城、平原，与直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商德全部在德州对垒。是日，边防军第二师攻占德州，由于边防军第一师在涿州大败，马良不敢再进兵。

△　奉吉黑三省议会、教育会、工商会致电各省督军省长，指责皖系派遣姚步瀛等赴奉活动，谓："惟段、徐等不惟不知悔祸，且愈肆其毒计，不惜鱼肉国民，以求一逞。"

△　中华工业联合会致电徐世昌，要求将段祺瑞、徐树铮依法严惩，以谢国人。

7月19日　段祺瑞致电曹锟、曹锐、张作霖、李纯等自劾乞和，谓："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现在亟应沥陈自劾，用鲜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消。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直皖战争至此结束。

△　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

△　靳云鹏、姜桂题、傅良佐、张怀芝等六人受徐世昌委派，赴天津与直奉方面议和。所携段祺瑞同意的四条件为：惩办徐树铮解散边防军，解散安福系及罢免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解散新国会。直隶省长曹锐接见代表，表示"须俟各省公决"。曹扣押傅良佐，并缴械所带武装警卫170余人。姜等四人无结果返京，靳赴奉与张作霖磋商。

△　豫督赵倜致电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讨伐段祺瑞。

△　赣督陈光远致电曹锟、张作霖等讨伐徐树铮，谓："据谏（16）日第二路总指挥张宗昌等电称：'近因元首命令免其现职，彼果怂恿合肥，行使武力，宣言反抗。一面威胁元首，矫发命令，似此跋扈飞扬，将挟元首以令天下。倒行逆施，愈演愈烈。若不及时歼除，必陷国家于危亡之境'等语。……远治军江右，有捍卫国家之责。兹据各该将领合词电称，自应躬率三军，从诸帅后，共伸挞伐。"

△　陕西省长刘镇华致电各省督军、省长，呼吁直皖双方，勿令河南为战场，谓："迩来京保风云日趋险恶，中州腹壤，屯集重兵。战衅一起，将以大河南北为黩武之地。镇华忝隶军籍，原属豫人，以服从中央为天职，以保卫桑梓为宿心。……尤望吾豫同乡诸将领暨各

机关同声诉吁，协力维持，祛党系派别之见，抒保全乡土之忱，是全豫3000万人所叩盼者耳。”

△ 江苏督军李纯通电宣布，自18日起全省实行临时戒严。

7月20日 曹锟通电正式声明出师宗旨并否认复辟传说。电称：“查各省联军此次义举，纯为救国。”至“复辟一说，尤属无稽之谈”。

△ 张勋通电徐世昌及各省督军省长，否认勾结曹锟重谋复辟。声称：“勋年将七十，但得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于愿已足，当复何求。”

△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驻京日使小幡酉吉，谓：“贵国国民加入段军，业已证实。此举不特有背贵国严守中立之宣言，抑且贻贵国羞。倘不加取缔，敝国国民自有正当办法，以对此等非礼无法之举动，用先忠告，诸维鉴察。”

△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驻京使团，谓：“日人加入段军，事实昭然。此不但助长敝国内乱，抑大背国际成例。除由国民直接提出抗议外，望主持公道。”

△ 中华工会致电驻京使团，谓：“敝国皖直决裂，原属内争，与外人毫无关系。近有日人借饷助械，指挥边防军，长延战期，祸及中外。且日人炮轰直军，有违万国公法，破坏中立条例，目无公理，徒增我国民之恶感也。用特电请贵公使主持正义，从速向日使严重交涉，以维公理而遏强权。”

△ 海军总司令蓝建枢致电徐世昌及各省督军、省长，宣布安福罪状。

7月中旬 莫荣新与海（海军）、闽、浙三军开军事会议。议定两事：一、以海、闽、浙三军协同攻取厦门、泉州以进窥福州，而驱

逐李厚基，定一星期动作；二、预计粤军陈炯明如助李厚基，而攻海、闽、浙各军时，则由桂军袭击陈后方以牵制之。

△　吴淞铁路工厂机工500余名，因米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7月21日　徐绍桢等率数千人在江门起义，号称“救粤军”，并分五路攻袭广州，掀开讨桂战争序幕。

△　南北海军将校林葆怿、蓝建枢、蒋拯、杜锡珪等通电声讨安福党人罪恶，并称南北实力提携，共济艰难。

△　王占元派直军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进占信阳，吴光新所部两旅被包围缴械。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西北筹边使署，告以倘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改为商务委员名义，可允其来京。

△　驻京日使馆研究中国现状及将来派系趋势，阴谋分五路进兵，其情报内称：“到此之时，外人如不实行干涉，更无安静之时日。其时帝国作何样态度，能取优胜之地位，且预测将来，或中日之开仗，日美之开仗，恐或因此而起，然则帝国不得不预备，计乘机进兵于有关各地，以观形势之变迁，图进帝国之利益。进兵区域定五区：第一区长江沿岸；第二区上海；第三区济南、青岛；第四区山海关；第五区北京。”

7月22日　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表治湘宣言，宣布湖南自治。此为主张联省自治运动之先声。

△　徐世昌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

△　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师进驻康庄，与边防军、西北军在居庸关附近发生战事，察军战胜，边防军、西北军被解除武装。26日，察

军进占居庸关。

△　安徽督军倪嗣冲通电宣布自是日起全省临时戒严。

△　山东省议会通电吁请直皖双方停止鲁境作战，撤退在鲁直军。

7月23日　直军师旅长、镇守使吴佩孚、曹锟等14人，自琉璃河联名电北京步兵统领王怀庆，提出罢兵六条件：一、边防督办官制取消，边防军解散；二、西北筹边使官制取消，西北军解散；三、段合肥安置汤山，候国民公决；四、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审办；五、国会停会；六、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追交证书，永褫公权。

△　广东省议会致电徐世昌、驻京各国公使，谓："近日内部政争，京畿变起，日公使及外务大臣复宣言严守中立。不料边防军竟调遣入内与直奉军队交战。且昨阅报章，皖军有日本军官加入，败溃之时被获三人。京奉路线直军炮队为日本卫队司令拒却开离，而皖军进占未闻阻止。……恳请主持公理，阻止边防军移供内争，并请驻京日使力践迭次宣言，俾战祸不至延长。"

△　新疆省议会致电徐世昌、国务院，声讨段祺瑞、徐树铮，谓："南北之不能统一，党派之所以纷争，实段祺瑞一人有以激之，而实由徐树铮一人有以使之。……至于边防、西北、定国各军，应一律勒令解散，以息兵争，而除后患。"

△　直奉两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24日大队人马陆续开到，进驻南苑、北苑营房，相约不入城。

△　济南镇守使马良通电阻止直军通过鲁境进攻皖系。

△　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决议派遣外国军队维持京奉铁路交通，并将天津总站收归英人管理，如中国军队违反1902年之公约，便

以武力对付。

△　驻京俄公使库达摄夫抗议停付俄国庚子赔款。

7月24日　北京政府改组。徐世昌令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均免本职，派财政次长潘复、司法次长张一鹏分别代理财政、司法部务；特任内务总长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

△　湖南全省国民大会集会声讨安福系，并当场议决五条：一、解散安福系，严办安福系首领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朱深、曾毓隽、李思浩、张敬尧等；二、解散非法国会，剥夺安福议员全体公权；三、取消军事协定，及中日间一切秘密条约；四、不承认非法借款，并清查国家历年财政；五、铲除亲日派。

△　山东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促令直皖双方息争并撤回在鲁直军。

△　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密电北京政府及曹锟等，表示鲁省实行中立，庶免日本乘机进兵侵占。

△　徐世昌令准京畿卫戍总司令段芝贵辞职，特派王怀庆兼署京畿卫戍总司令；令准河南省长王印川辞职，特任张凤台为河南省长。

7月25日　奉军搜查安福俱乐部。

7月26日　徐世昌下令撤销本年7月9日关于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命令。

△　徐世昌令准京师警察总监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吴炳湘免本兼各职；任命田文烈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任命殷鸿寿为京师警察总监。

△　徐世昌令漕运局着即裁撤，所有该局事务仍由各主管部办

理。

△　靳云鹏偕张作霖至天津。是日，张对记者谈话，表示不与吴佩孚接洽，仅与曹锟接洽，谓“吴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并电邀曹锟来津举行会议。28日，曹锟应邀由保定抵天津。

△　孙中山为谢彬所著《新疆游记》一书作序，指出“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立心做大官”。

△　优林改用商务总代表名义，请发给来京护照。并声明此行宗旨，专为会商两国通商事宜。

7月27日　苏督李纯令苏常镇守使勒令苏州安福系之《苏报》停刊。该报经理王伯薇闻讯逃往上海，主笔朱梁任、编辑顾铎亭等被捕判刑。

7月28日　徐世昌令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本兼各职；准大理院院长姚震免本职，任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　徐世昌令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其所辖之边防军着陆军部即日接收，分别遣散。

△　徐世昌令撤销西北军名义，并责成陆军部将西北军所辖军队迅速收束，妥为遣散。

△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致电徐世昌，谓：“文等特本国民公意，用再宣言，无论北方内讧如何结束，无论当局者为何派何人，惟我西南护法救国主张，必始终贯彻。北方果有希望统一诚意，必须首先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并有宣布废止中日廿一条之表示，然后和议乃可赓续，而国本乃不至动摇。倘有违背护法救国主张，复假借名义以谋个人权利者，不问南北，不问派别，当与国民共讨之。”

7月29日　　徐世昌令通缉安福系祸首，谓："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世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分别褫夺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

△　徐世昌令："前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于此次徐树铮等称兵构衅之时，不知远嫌，有背职务，虽经免职，仍着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以示惩儆。"

△　徐世昌令："吴光新着先行免去湖南督军暨长江上游总司令各职，交王占元彻查确情核办。所有长江上游总司令一缺，应即裁撤。其所辖军队并由王占元妥为收束以节军费。"

△　徐世昌特任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理将军府事务；特派江庸充修订法律馆总裁。

△　张作霖、曹锟、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吴佩孚派代表出席。会议决定：一、解散安福国会，另行召集第三次国会；二、请靳云鹏复职；三、取消上海和平会议。

△　驻京日使对湘省日舰被击案，向北京政府提出八条要求。

7月31日　　驻洛阳西北军第一旅旅长宋一勤，闻皖军失败消息后，向商会筹款五万元以充军费，商会未允其请。是日晚全旅哗变，全副武装，肆行抢劫。至8月1日拂晓，奉军、直军先后到洛，合力痛剿，变兵不支，始向洛阳西南方向窜逃。

是月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银元20万元借款合同，以盐税余款为担保，用于京钞兑换准备。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津浦路局与慎昌洋行签订行化银1079.2962万两借款合同，用于购买料款。

8月

8月1日　　吴佩孚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提出大纲八条，其要旨为：定名国民大会；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宗旨取“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改选举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大会公决；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　川军总司令吕超电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入川组织政府。

△　冯玉祥致电徐世昌，反对起用复辟罪魁张勋督皖，中有“国家纵乏人才，何至以叛国罪魁复作封疆长官？且张勋如可起用，则讨逆者尽为多事，拥护共和皆为张勋罪人；起用张勋，不啻为张谢罪”等语。

△　甘肃督军张广建致电北京政府，告以前因西藏交涉，曾派员与达赖磋商一切，达赖要求在拉萨或印度开和平会议，并请英国作证。

△　侨美中国国民党在费城召开年会，与会代表50人，代表五万居美华侨。会后列队游行，旗帜上书“吾人必逐日人出山东”、“吾人必逐去广州军阀”等口号。

8月2日　　江苏督军李纯、省长齐燮元致电上海军警各机关：“顷接院电开：‘据上海护军使电称，全国各界联合会虽经解散，暗中仍积极进行……现各代表已分头出去。除随时侦察外，应请密电各省一体注意察查。如尚有各界联合会机关存在，即严行解散，以遏乱萌。’查

各界联合会既经解散，所有分布各省支部，自应一律查禁消弭，俾绝根株。希即严饬所属查照办理。”

△　在滇国会议员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国会移重庆开会，并请各总裁速将政府各机关随同移往，以应时机。

△　吴佩孚抵天津，会见张作霖，陈述召开国民大会意见，张即表示反对。

△　粤督莫荣新与英领事司拉在广州签订修正合资开采广东煤矿合同之附约，其中规定：“广东政府从此承认此约附加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合同，由督军省长签押盖印，担保证明。”

8月3日　徐世昌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令称：“政党为共和国家之通例，约法许集会结社之自由，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自为法律所不禁。年余以来，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纷陈，历举该部营私误国，请予解散。政府以为党见各有不同，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树铮、曾毓隽等称兵构乱，所有参预密谋，筹济饷款，皆为该部主要党员……是该部实为构乱机关，已属逾越法律范围，断不容其仍行存在。着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即将该部机关实行解散。”

△　徐世昌免京兆尹王达职，以王瑚继任。

△　徐世昌令第九师师长魏宗瀚免职，任命陆锦署第九师师长。

△　赴法勤工学生1000余人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分工作、书报、讲演、消息、会务五部。

△　北京政府司法部颁布《民事诉讼执行规则》，凡五章138条。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西北筹边代使路邦道，发给优林来京护照。

8月4日　　徐世昌改派李纯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同日，北京国务院撤销王揖唐北方总代表职务。

△　徐世昌以近日直皖喋血近畿，下令表示悔祸。称："假令制驭有方，亦何至有今日之横决？竟使士兵暴骨，商民涂炭，孰使为之，孰令致之，以酿成泯棼之局，反躬循省，疚悔何追！"

△　曹锟、张作霖等为直皖战争结束，否认外传为复辟派已占优胜致电徐世昌，谓："现在战事已告终结，善后问题次第解决。……近复造作流言谓，我国现状分复辟与共和二派，复辟已占优势，共和派亦将有所行为。蜚语流传，令人不寒而栗。……此等邪说，显系祸国诸奸力竭势穷，为最后图谋破坏之诡计，藉免其天下公敌之罪恶。……锟等为国家安全计，为人民幸福计，始终抱定拥护元首，服从舆论，造成真正共和国家之宗旨。耿耿此心，可质天日，谨抒诚悃，再为声明。"

△　北京政府内务部为徐树铮等逃匿日本使馆事，咨复京畿卫戍司令部，请会商外交、司法两部，向日使馆据理交涉，以便将徐树铮引渡归案讯办。

△　吴佩孚由天津抵达郑州，为争取舆论支持，向来访记者宣布四不主义："一不做督军，二不打内战，三不干政，四不扰民。"

△　苏州振亚织物公司工人，因反对资方虐待，举行罢工。

8月5日　　前美驻京公使芮恩施率美国议员团来华，是日抵上海。在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中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并宣称："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　曹锟见徐世昌，谈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徐表示："国民程度过浅，且此事为吴子玉（佩孚）一人之主张，各省未必全数赞同，究竟

能否实行，尚待研究。”

△　徐世昌令免全国经界局总办曾宗鉴职。

△　外蒙汗王贝子呼图克图等由张家口至京，是日徐世昌召见，27日返库伦。

8月6日　　唐继尧致电褚辅成、唐绍仪、孙中山，对国会移渝表示赞同，谓：“顷得两院江（3日）电开示，决议国会移渝开会等因。……尧宣言护法，忝任总裁，对此自应赞同。所望诸公从速赴渝，俾西南正式合法之机关早得成立，国家人民，实多利赖。”

△　吴佩孚应曹锟电召至京，同曹锟、张作霖讨论善后问题，提出“先开国民大会，后议内阁问题”。当晚，即离京赴洛阳。15日，曹锟再次电召吴至京，劝吴面见徐世昌，此后吴对总统问题闭口不谈。17日，吴离京赴郑州，决定以洛阳为练兵之地，以扩大直军势力。

△　蒋介石由鼓浪屿抵上海，即同廖仲恺谒孙中山，商谈国内大局。

8月7日　　徐世昌在公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解决时局问题。曹锟、张作霖、靳云鹏、萨镇冰、张怀芝、王怀庆等参加，会上一致同意靳云鹏组阁，因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决定由靳先行署理总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除曹锟未表示反对外，其余各人均持异议。

△　徐世昌令：“王揖唐经派充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着即褫夺军官，暨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

△　徐世昌令：“此次徐树铮称兵近畿，甘心助乱，以致士卒伤亡，生灵涂炭，均属罪有应得。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张树元，着即褫夺军官军职，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惩办。”

△　徐世昌令："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构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有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邓万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构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其余该部党员均照前令免予深究。"

△　徐世昌令山东省长齐耀珊迅赴新任，未到任以前由田中玉暂行兼署，屈映光应遵照前令交卸来京另候任用。

△　徐世昌令司法部通饬京外法官，不得列名党籍。令曰："应责成司法部，通饬京外法官，自奉令之日始，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者，概不得列名，其已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仍由部随时考察。"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公使团领衔法国公使柏卜，要求转达各国公使将藏匿日使馆之徐树铮等10人，引渡归案讯办。

△　在滇旧国会两院议员开联合会议，一致议决罢免岑春煊军政府政务总裁之职。

△　留日福建学生会发出呼吁书，揭露闽督李厚基祸闽罪恶，主张闽人自治，实行省长民选。

△　天津各界联合会通电声明，新国会非法组合，不能代表民意，并助纣为虐，应速解散。

8月8日　　徐世昌令："教育为国家要政，前以经费支绌，亟应设备基金，明令交部筹办。前据教育部呈称，华俄道胜银行股息，原俄专作教育经费，应请明令将此项股本，定为教育基本金。"

△　是日下午，胡适在上海一品香开茶话会，陈独秀、张东荪、沈恩孚、胡汉民、章行严、叶楚伧及学生代表等参加，讨论"力争自由"问题。

8月9日　徐世昌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

△　徐世昌派顾维钧为国际联盟代表；任命刘崇杰为驻西班牙特命全权公使兼驻葡萄牙国特命全权公使。

△　林森、吴景濂、褚辅成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谓："虞（7）日两院联合会，万议员鸿图等提案，岑春煊毁法误国，亟应免去总裁职务案，当付讨论，全体可决。除电西南护法各省外，专此奉闻，并请通告各国公使为盼。"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复照北京政府和外交部代理部务次长陈箓，拒不同意交出安福罪犯。称："徐树铮等九人均来本使馆请求收容，已将彼等收容日本兵营内。"

8月10日　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土和约签字。因该约规定仍保有列国在土耳其境内之领事裁判权，中国代表未签字。

△　熊克武退出川省后，向刘存厚乞援，刘率军由汉中进入川境。

8月上旬　美洲华侨电请孙中山讨伐桂系和北洋军阀，并表示"愿竭全力，为公后盾"。

8月11日　徐世昌特任靳云鹏内阁各部总长：颜惠庆署外交总长；张志潭署内务总长；周自齐署财政总长；靳云鹏兼署陆军总长；萨镇冰署海军总长；董康署司法总长；范源濂署教育总长；王乃斌署农商总长；叶恭绰署交通总长。

△　徐世昌令准内务总长兼署交通总长田文烈免去本兼各职；海军总长萨镇冰免去本职。

△　岑春煊令桂军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桂军以沈鸿英为总司令，下分三路，以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

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林葆怿率领海军前往诏安配合作战。

△　张敬尧之弟张敬汤被王占元逮捕，并于9月11日以煽惑军队、扰乱大局罪名判处死刑。

△　北京政府财政部汉口造纸厂与三井会社签订洋例银3443两借款合同，用于支付货价。

△　北京政府教育部、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英金7500镑借款合同，以盐税余款担保，用于支付留欧学费。

8月12日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孙中山命，在福建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回兵广州，讨伐桂系。以洪兆麟为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陈炯明兼任第三路司令，即日出发前线，指挥作战。讨桂战争开始。

△　陆荣廷电广州军政府，称："赞成急谋统一，但护法名不可损，和局尤重法律。"

△　驻近畿奉军三个师，陆续由南苑、廊坊撤防回奉天。

△　日军在吉林东宁拘捕居民300人。

△　优林等抵库伦。

8月13日　徐世昌令准外交总长陆徵祥免去本职。

△　张作霖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云："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个人主张，而吴不过别人的倪儡，他的背后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现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程度，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已经请曹经略使约束吴佩孚，不要让他再胡闹下去。"

△　驻京法公使柏卜访晤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务次长陈箓，询问苏俄派代表优林等来京事。

△　陆荣廷、岑春煊命令解散陈炯明驻汕头行署。

△　新疆省议会、总商会响应直隶议会、天津总商会8月通电，致电徐世昌请依法惩办段祺瑞，以顺民意。

8月14日　徐世昌特任王宠惠为大理院院长。

△　曹锟、张作霖由津入京，商决时局问题。

△　唐继尧急电唐绍仪，谓："现在皖直情势，已经明了，谋和声浪，又渐回复。顷已正式宣言，主张法律外交两问题仍从原议。此外废督裁兵，实行民治主义。切望一致进行，以免此后大局之纷乱，其余各端已分别电商，仍主和平解决。至于军府国会移渝，昨经决定，并将宣布。协和（李烈钧）上月即已赴渝，尧亦日内出发。"

△　闽督李厚基致电北京政府，呈请辞职。

△　在云南旧国会开非常会议，补选刘显世为总裁，以继岑春煊之缺。

△　美国国会议员访华团抵京。团长芮恩施会见徐世昌，表示赞同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的主张。

△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要求"将不适任之小幡公使撤回，从速将徐树铮罪魁等九名引渡于我国，以顾全两国邦交，以平我五亿公民之公忿"。

8月15日　徐世昌通令告诫京外官署重申优待内外蒙古令："共和肇造，五族一家，向来中央对于蒙民，无不优加待遇。各蒙古王公喇嘛等，亦多深明大义。故外蒙自治暨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均经先后呈请取消。……此后无论京内外官署，对于内外蒙古，均应加意抚绥。所有从前需索欺凌等弊，务当革除净尽，并当崇尚黄教，维持习俗，以顺蒙情，其有关蒙民福利者，尤必悉心筹办、俾图发达。……

此次改定西北筹边使官制，斟酌现在情形，采取汉蒙参用主义，妥慎厘订，呈候颁行，用示中央廓然大公之旨。”

△　徐世昌特任陈毅暂署西北筹边使。

△　《劳动界》周刊创刊。该刊是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个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的通俗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每星期日出版，由上海新青年社发行。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2.56410256亿法郎借款合同，以期票为担保，用于拨付实业借款第十三期利息及手续费。

8月16日　　曹锟致电各省督军、省长宣告对皖系作战，谓：“天祸中国，降此残凶，安福祸国，段、徐两逆种种罪恶，中外共晓。……自今日始，实行围困奸党根据地，必将凶残除尽，以固邦本。”

8月17日　在滇旧国会议决国会及军政府移置四川重庆。

△　李纯致电北京政府；谓：“广东军政府坚持法律问题，不易斡旋。”

△　粤军收复广东蕉岭、大埔、饶平。

△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函驻京日使小幡酉吉，要求：“将徐树铮等罪犯引渡惩治，以伸国法而全邦交。”

△　徐世昌令准免兼督办京师市政事宜田文烈兼职，任命张志潭兼督办京师市政事宜。

8月18日　　徐世昌令准教育部代理部务次长傅岳棻辞职；特任张弧为印制局总裁；任命潘复兼盐务署署长、稽察总所总办。

△　徐世昌颁发整饬官箴令，不准兼职兼薪，并裁汰冗员。

△　在滇旧国会议员公请滇省军政学警绅商报各界人士，在讲武学校开会，与会者三四百人。由众议院代议长褚辅成报告国会来滇情形，再申救国护法宗旨，及实行民治要着等等。

△　新督杨增新咨复交通部检查邮件仍应照旧进行文，内称："不仅检查邮件一端，而文字之传播最易动人，则检查邮件自必为不可少之手续。此俄乱一日未平，即新疆检查邮件之举一日不能停止之重要原因也。"

△　驻京美公使柯兰访晤陈箓，劝中国礼遇优林。优林等自库伦启程前往北京。

8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电驻英、法、意、比、荷各使，了解各国如何待遇前俄皇政府代表及对俄远东各临时政府之态度，以作参考。

△　陈炯明所部粤军右路攻占广东梅县。

8月20日　在滇旧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代理议长褚辅成暨全体议员等通电声讨徐世昌，略称："徐世昌以三朝元老，僭居元首。……卖国密约，徐所签订。军事协定，徐所主持。督团造反，驱逐总统，解散国会，徐实隐为指导。直皖战争，糜烂地方，重苦吾民，徐实从中挑拨。非法国会，全国唾弃，徐犹依为护符。肇乱武夫，罪不容诛，徐更恃为爪牙。种种逆迹，擢发难数。……国会为民国主权所寄，天职所在，讵敢放弃。誓必除？此元恶，扫犁？群凶，并消灭一切非法之举，以贯彻护法救国之初衷。"

△　徐世昌特任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同日，令将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一缺，即行裁撤。

△　徐世昌令从宽免究近畿乱事胁从人等。

△　张耀曾、谷钟秀、文群等发表宣言，解散政学会。

△　林森、褚辅成发出国会移渝之通告："国会议员，以川局大定，决议移至重庆开会。……现在北方不法武人，复自开战，扰害人民，危及国本。……定于本月28日移至重庆开会。"

8月21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通电："南中护法，于兹三载。不图奸人内讧，致兆离析，大法未申，嗟痛何似。乃者国会在滇宣言移渝，重建中枢，复欣诸君克仗斧钺，肃奠巴蜀。……文等谨当随诸君后，共奠邦家，以新国命。"

△　徐世昌令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梁建章免去本职，遗缺派孙培兼署；派关赓麟兼汉粤川铁路督办。

△　徐世昌颁令裁撤全国经界局；停办张恰铁路，并裁撤该路督办一职。

△　徐世昌任王耒为国务院法制局局长；唐在章为侨工事务局局长。

△　徐世昌令财政部分别拨银二万元赈济陕西旱灾，河南水旱兵灾；拨银三万元赈济山东兵灾。

△　北京政府交通部，呈准本国电报加入万国电报公会。

8月22日　李根源奉军政府令调防东江，总部驻增城。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小幡酉吉，表示不同意9日复照中所述各节，指出中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要求不要让各犯逃走，或迁移他地藏匿，以期归案讯办。

△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发起人：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任书记。

8月23日　　孙中山电复泸州滇军军长赵又新，谓："川乱原因，

洞见症结。兄以出师为救川救国，探本之论，确切不移，无任佩慰。即望亟行准备，并商告各军一致主张。俟协和到川时，即可实行出兵。……闻惠州桂军已有内变，不难克复。惠州既得，则广州可传檄定矣。甚望此时莫公（唐继尧）能以一部出击广西，使桂贼首尾受敌，一举歼灭，巩固西南，回戈北指，奠定中原。”

△ 白俄谢米诺夫部将恩琴率众3000人，西侵外蒙车臣汗。

8月24日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抵汕头，委洪兆麟为镇守使，邹鲁为道尹，姚雨平为潮汕卫戍司令。

8月25日 陈炯明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唐继尧等报告粤军战况，谓：“敝军哿（20）日克复汕头，马（21）日克复潮安。五日之间，将敌军完全扑灭。……潮梅地方秩序，安宁如常。炯明现驻汕头，并拟即赴前敌督师。”

△ 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在《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六号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分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A）消极方面：一、废止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治安警察条例》；二、废止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出版法》；三、废止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报纸条例》；四、废止民国八年《管理印刷业条例》；五、废止民国三年三月三日《预戒条例》；六、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B）积极方面：一、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制限的法律：（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结社自由；（4）书信秘密自由。二、应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三、应由无党派关系的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于选举时实行监督，并公请律师，专调查犯罪证据和管理诉讼事项。

8月26日 孙中山致函陈炯明，对陈部收复潮梅表示慰勉。谓：“粤军讨贼，数日之间，收复潮、梅，神速至此，真令桂贼破

胆。扫彼妖孽，还我河山，可预贺也。”

△　唐继尧、刘显世联名通电，宣布关于收束时局及刷新政治之主张，提出南北和平办法，由正式和会解决；废除督军；实行民治主义。

△　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等抵北京。

△　褚其祥致电北京政府，谓：“京畿战争以来，在库王公，勾结俄人，煽惑活佛，佛为所动。顷据密报，活佛与俄领事借洛夫及在库王公等谋二次独立，于半月前密派蒙人三人赴谢米诺夫处，要求马队来库协助。顷参陆处密电，谓‘谢氏军队三千人，已入车臣汗边境’等语。查谢队此举，颇与活佛方面情况暗合，并证以前者活佛托词游幸之事，处处皆属相符。征考以上种种，情节甚为急迫，若不事先防范，外蒙前途，深殊堪虑。”

△　山东兖州镇守使唐天喜所部第七旅士兵，于是日晚9时半哗变，大肆抢劫。商家损失总计20余万元。后由田中玉派兵前往镇压。

△　徐世昌令财政部拨银二万元赈济直隶旱灾。

△　四川省教职员联合会以教育经费无着，致电川滇黔军政各界，请为维持。

8月27日　　徐世昌令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钱能训免去本职，派王清穆继任。

△　日使小幡酉吉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次表示拒绝引渡安福系祸首。

△　广三铁路局与台湾银行签订毫银30万元借款合同。

8月28日　　孙中山复函四川吕一峰，阐述有关国民大会与解决

川、滇政争意见。

△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接见外报访员，称："关于国民大会，既缺法律根据，事实上亦难办到。余仍主张依旧选举法召集新国会，畀以制宪权。"

△　华大商业储蓄银行开幕。总行设上海。办事董事为顾履桂，经理为张文煜，专营商业银行一切事务及储蓄业务。资本总额定100万元，先收半数50万元。1929年因受时局影响而停业。

8月29日　湖南教育会、商会联合通电，要求将张敬尧加入祸首一栏，严加惩处。

△　山东国民大会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2000余人，学生占多数。

8月30日　徐世昌令湖北省长何佩瑢免职，派孙家振署湖北省长。

△　驻京意国公使杜腊酢向北京政府递交国书。

△　北京新国会第三届常会闭会。

△　粤军第二路司令许崇智部占领老隆；次日，占领龙川县。

△　北京政府外交部拟具说帖，主张先问优林是否有代表俄远东全部之资格，然后始作非正式谈判。

△　徐世昌令褫夺吴光新官勋，归案惩办。

8月31日　徐世昌令："此次外蒙撤销自治，各扎萨克汗王公等，同心内向，翊赞输忱，允宜普锡褒封，用宏奖励。所有外蒙古各扎萨克汗王公等，无论沿袭前清及得自外蒙者，均照现在封秩晋进一爵。无爵可进者，别封其一子。此外喇嘛等有呼图克图名号者，一体

量予加封，用慰倾向之忱。”

△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美国议员访华团团长芮恩施向靳云鹏提出之建议书：“鄙人今鉴于贵国目前之政治情形，谨对于时局有所建议，伏希贵内阁采择。……当今要务，莫过于由内阁从速发动‘国民制宪大会’，即请各处速选代表，迅开会议。”

△　靳云鹏致电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谓：“外蒙取消自治以来，五族一家，允宜蠲除隔阂，用息流言。谢党入蒙煽惑，实系离间作用，与我不利。务希屏绝此等使者，并不许其逗留蒙境。……遇有为难之事，不妨直达中央。”

△　徐世昌派唐在复为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

△　北京大学在第二院举行第一次授给名誉学位典礼，由校长蔡元培主持授予法国前总理、数学家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é）、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二氏名誉理学博士。我国大学以学位授予外国人始此。

8月底　陈独秀通过由沪返京之张国焘转告李大钊关于建党的意见。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苏、浙、皖等省组织发展工作，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建北京小组，然后向鲁、晋及津、唐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此完全赞同。由此，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共建中国共产党。

是月　陈道望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　孙中山为吴宗慈所著《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作序。指出：“宪法者……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只要为护法而努力奋斗，则“中华民国宪法，必有正式宣告于海内外之一日”。

△　陈独秀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给毛泽东，湖南开始

建团。

△　上海日商日华纱厂二场细纱部工人，因反对空锤的新罚金制度举行罢工。双方商议结果，厂方答应以增加赏工一日为施行新制度的条件。

9月

9月1日　　《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期出版。该刊从此期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机关刊物，大量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俄情况的文章。

△　靳云鹏致电唐绍仪、刘显世、李烈钧，商谈南北议和。

△　湖南中华工会成立，与会者59团体，宗旨为："专为输贯劳动界之知识为前提，务使工人道德增高，职业普及。"

△　闽省教育经费，因常被军人挪用，福州各校教职员生计无法维持，8月31日经教职员联合会决议，从是日起罢课。延至6日，薪俸仍未发出，复决议延至8日为止，并决定如再不发薪，则实行长期罢课。

△　陕西民军司令胡景翼在三原宣布讨伐陕西督军陈树藩。

△　徐世昌授意研究系湘籍阁员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谭赞成公开议和，反对局部谋和。

△　是日上午，湖北督军署军法会审判处吴光新徒刑15年。5日，派员将吴押交军法处执行。

9月2日　　徐世昌令吉林省长徐鼐霖免职，任鲍贵卿暂行兼署吉林省长；任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

△　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大二院邀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出席者有北京教育会、女界联合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八团体。1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邀请各报馆、各通讯社代表开会讨论筹备国民大会问题。25日，各团体在北京大学二院开会，宣告国民大会成立。

△　北京、天津各女校学生500余人，派代表四人至教育部提出要求：男子与女子中学课程一律；多设女子补习学校；学校经费与男校平均分配；留学官费名额须男女平分。

△　旅沪广东同乡会、广东善后公会致电谭延闿，敦促湘军讨桂。谓："桂贼为梗西南，破坏护法，早为天下共弃。今粤军讨桂，旬日以来，所向皆捷，粤人誓不再居陆荣廷、莫荣新征服之下矣。惟湘与粤邻，前此等受桂军荼毒，且狼子野心，几无时不视湘为外府。桂贼不除，湘人亦终不能安枕。……助粤即卫湘。"

△　粤军中路克福建永安；3日，左路进占平山。

9月3日　　川军第二军军长卢师谛以国会已由滇迁渝，电促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毋"早莅渝城，俾合法政府迅速成立"。

△　是日至5日，浙江台州（今临海）飓风大作，山洪暴发，平地水深四五丈，田庐人畜漂没无遗。各邑被灾人民，共有数十万之多。

9月4日　　曹锟、张作霖均于是日出京赴津，与靳云鹏商议时局问题。

△　旅沪广东公民大会李远才等5842人致电陆荣廷、莫荣新，历数二人祸粤罪行。略谓："溯公等入粤四年，语其治绩，舍开番摊，卖鸦片，抽苛捐，破官产，杀人民，毙记者，劫枪炮，掠银币，夺图书，吞钦廉而外，一无所有。……为公等计，宜亟解甲释兵，举粤省军权政权财权还之粤人。……倘仍执迷不悟，则为威廉、段祺瑞之续不远，勿谓秦无人也。"

△　李烈钧抵渝，代表孙中山筹备召开国会、组织军政府等事宜。

△　吕超从成都退简阳。次日，杨森、喻培棣、张冲、何光烈等部进入成都。9日，杨森等部占领龙泉驿。

△　鄂省旅京同乡会在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决议六项："（一）以鄂人治鄂；（二）主张废督以期树民治之基础；（三）推定代表向北京政府轮流请愿；（四）代表每县一人；（五）原赴国务院代表八人，全体加入；（六）一切未解决事件予代表会议以全权。"

9月5日　　梁启超、蒋方震创设"讲学社"，邀请各国学者来华讲学，每年由教育部补助二万元。

9月6日　　孙中山致电唐继尧，嘱调在湘滇军攻桂，谓："密。感电诵悉。公急于粤事，至抽调在川滇军，合力讨桂，至为感佩。……以现在形势，只令在湘滇军，移师攻之，已足制其死命。请公即日电在湘将领，返旆南征，使彼腹背受敌，粤事既指顾可定，山贼亦不能更为边患。此举关系至重，企速裁夺，立盼好音，以振起西南全局。"

△　广州重要社团开秘密会议，决定："（一）对于粤军，暗派代表前往接洽，并致粤人全体欢迎之意；（二）对于桂派，拟上书劝告，履行陆荣廷以广东还诸广东人之宣言；（三）对于粤籍官长，请从速表示态度，勿再猜疑，并责成保护粤中治安。"

△　朱执信奉孙中山命，运动广州虎门炮台驻军，是日宣布独立。

△　粤军军长许崇智致电上海孙中山、唐继尧、伍廷芳报捷，谓："于本月6日完全占领河源县。"

△　谭延闿向粤桂双方进行调解，主张“干老（陆荣廷）出而主持，以粤事还之粤人，确立粤省自治政府，竞公（陈炯明）爱国爱乡，亦当早息干戈，言归于好”。

△　谭延闿致电陆荣廷、莫荣新，劝其抛弃武力主义，主张粤人治粤。谓：“延闿之愚，以为今日解决国家问题，必以励行各省自治为急。一切纠纷，可以立断。一切战祸，无自而生，即可于西南各省为之首倡。……以粤事决之粤人，俾确立粤民自治政府。”

9月7日　粤军邓本殷、熊略部克惠阳。

9月8日　旅沪广东公民大会致电广州各团体，请共同驱桂，并以两事相约：“（一）凡粤籍之军官、行政官，如有希荣取宠，为虎作伥，以祸我粤人者，我全粤三千万人民，视为公敌，治以奸细之罪；（二）各行商如贪图折扣，先纳预饷，或筹借款项，或投承杂捐，供莫荣新屠戮粤人之用者，我全粤三千万人民，视为公敌，宣布其所缴之款项，一律无效。”

△　徐世昌任命王怀庆兼陆军第十三师师长。

△　新疆省政府与俄国土耳其斯坦政府订立《临时通商条例》，凡10条，是日，徐世昌核准暂行试办。

9月9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电促谭延闿出兵广西，捣桂系军阀后路，以收夹攻之效。

△　孙中山复函甘肃留日同乡会，谓：“救国只有二途，一为护法，一为革命。”而“护法一途，已有步步荆棘之象”。因此，“恐非革命无以成刷新之局”。

△　广东三水、东莞、宝安、新丰、开平等地民军起事。

△　鄂省议会召集紧急茶话会，反对孙振家任省长，决定：“孙氏

接篆暂不过问。惟接篆后省署与省会往来公文，签署省长孙某者，概不接受，以表示否认，并急电京抗争。”

△　徐世昌公布《库乌科唐镇抚使暨所属各官署组织暂行条例》。

△　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共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在上海省教育会欢迎前法国总理班乐卫。

9月10日　曹锟、张作霖、李纯、吴佩孚等31人，联名复电唐继尧、刘显世上月26日通电，希望迅速进行和议，依法改选新国会。

△　徐世昌特任陈毅为库乌科唐镇抚使；准驻日全权公使刘镜人免去本职，调胡惟德继任。

△　徐世昌任命郑士琦兼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原任唐天喜辞职）。

9月11日　徐世昌任命王继曾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兼驻古巴全特命全权公使。

△　徐世昌令速办直鲁豫各省急赈。

△　胡适在北京大学始业式上演说，反对新文化的普及运动。略谓：“现在实在是没有文化，更没有新文化……现在运动的方向却有两种：（一）是普及；（二）是提高。第一种方向我是不愿加入的，并且不希望大学同学加入，因为普及只是构出几个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到处供给别人……我们大学学生要赶紧做学问，打开学问的门径，我希望从此以后，努力做提高的工夫，不可做普及的工夫。”

△　《湖南通俗报》在长沙创刊，该报为日刊，由何叔衡主办。

9月12日　下午4时，济南工界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警察厅特

派巡警数十人临场警戒。工界代表演说，言及工界联合会有组织之必要，促工人自觉。16日午后2时继续开会，由青年会会长林济青演说，题为《世界工界之趋势与中国工界之现状》

△　下午1时，武汉各团体在堤口小关帝庙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军警界派员严密监视。临时主席施洋报告开会宗旨，略谓："吾辈皆系国民分子，对于国民大会，应抱定自动自由的精神，谋人群的幸福。"

△　川军总司令黄复生通电，谓："顷奉莫（唐继尧）、如（刘显世）两公宥（26）日宣言通电，对于时局，以法律外交两项，国本所关，仍主张由和会正当解决。对于刷新政治根本救国问题，则主张废督裁兵，实行民治。……复生不才，誓必遵守此旨，率履罔衍，诸公明达，德必不孤。"

△　粤军与闽督李厚基订立协定，粤军将闽南各地让还李厚基，而以接济臧致平旅军械来粤参战为条件。

△　徐世昌令裁撤帮办山东军务缺。

△　陕西教育经费支绌，积欠教职员薪水甚巨，教员生活难以维持，宣布停课。

9月13日　　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4000名工人，要求奖金罢工五天。后经调解结果，每天日夜班所出之纱达15000磅者，即给以特别赏洋。18日，工人全体复工。

△　驻京俄公使库达摄夫训令库伦俄总领事馆停闭。

△　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和约研究会。21日，派王正廷为会长，刘镜人、沈瑞麟为副会长。

△　谭延闿邀集在省官绅开自治会议，提出由省政府、省议会各

派10人起草“湖南自治法”。

△　鄂督王占元通令武汉军警机关，如以后再有结社集会发生，应依照《治安警察法》严令解散。

△　广三铁路局与台湾银行签订毫银四万元借款合同，以广三铁路及省河航政收入为担保。

9月14日　外蒙古库伦代理总务厅长桑宝致电北京政府，报告外蒙王公密谋“复治”原委，略称：“外蒙潜谋复治，莽赖王、哈丹巴格图尔王二人为倡首。昨得确信，即将莽王延到旅部，软禁优待。本日由宝邀往司令部公寓，劝慰相加，继复详询此次密谋原委。据称复治意，肇自活佛亲信之王公喇嘛，因前徐使（徐树铮）遇事强迫，众怨实深，日求左右佛汗许之，共开会四次。与会者当即派员分往乞助乌金斯克红党及谢军，得复赞许。该党又求得为后援，一俟事机成熟，由佛汗正式通告英、美、日及中央，要求赞成此举，继用武力驱逐蒙华官兵，以泄积忿。”

9月15日　徐世昌令准财政部所请，定民国十年1月施行所得税条例。

△　长沙《民国日报》、《新湖南报》、《觉民新报》、《大公报》、《湖南日报》、《新民国日报》、《民言报》、《大中国日报》等报记者与《学生周刊》代表等，在学生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恢复报界联合，力争言论自由，要求取消戒严法。17日，长沙报界联合会成立，并通过简章。

△　旅京广东公会同人，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请中央勿助桂压粤；二、声明岑春煊、陆荣廷不能代表粤省；三、不认陆为两广巡阅使。

△　陆荣廷急电陈炯明，表示“愿速弭兵修好”。

9月16日　徐世昌令准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倪嗣冲免去本兼各职；特任李纯兼长江巡阅使；特任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

△　徐世昌令："兹据财政部呈拟发行公债收毁京钞清理借债各办法，均属切实可行。即责成财政部督率该管理机关认真办理。自经此次整理之后，官商各界对于金融财政亟应合力维持。"

△　孙中山复电四川省议会，谓："西南自桂逆破坏，法统几乎中绝。幸贵省及时戡定，奠我宏基。自应本改造之精神，建民治之极轨。文虽不敏，愿随其后。"

△　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中俄谈判范围，仅限于商务贸易及保护西伯利亚华侨问题。

△　陕西省各县商会代表在西安召集各界开会，讨论驱逐陈树藩。会议决定：一、设立各界联合会，研究反对陈树藩善后办法，实行自治；二、公推代表入都，请北京政府速免陈氏之职；三、如北京政府不顾陕人，庇护陈氏，即停止纳税以为最后之抵制。

△　张謇等致电徐世昌，提出"苏人治苏"主张，要求"迅就苏人中择贤任命"为江苏省长。

△　浙江旅京同乡田文烈、孙宝琦、王克敏等致电上海各慈善团体，谓："北五省兵燹之余，旱蝗为害，流离载道；莴目怵怀。据外人调查，灾民竟达二千余万，荒像之烈，前所未有。我江浙人士，特约同各同志发起北省急赈协会。各就心力，先认垫款，切实举办，以补官赈之不及。"

△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会之简章，谓："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思想）为宗旨。"

9月17日　徐世昌任命陈箓为驻法兰西国特命全权公使。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面晤驻京美使柯兰，谈优林及库达摄夫地位问题。

△　广东地方实业银行与台湾银行签订毫银二万元借款合同，以福兴皮革公司全部财产为担保。

9月18日　　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谓："今日报载民军占鹤山，桂军缴械投降。……彼贼已无与我一拼之心矣。望毅力猛进，以搏最后之五分钟。"

△　徐世昌令准江苏省长齐耀琳辞职，派王瑚继任，王瑚所遗京兆尹一缺，任孙振家继任。特任夏寿康为湖北省长。

△　上午9时，粤事维持会在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粤人治粤问题，主张：一、废督以杜客军野心；二、民选省长，恢复自治；三、禁烟赌，除苛捐；四、一切募债借款鬻产，概不承认；五、客军未离粤境以前，停纳粮捐；六、凡海陆军助虐祸粤者粤人视为公敌，凡粤人隶客军者，应即反正；七、付托陈总司令（炯明）暂维全省治安，并将此项主张电达沪、粤各团体。

△　北京皖事促进会致电安徽同乡会，请一致反对张文生督皖。安徽旅沪同乡会复电表示支持。

9月19日　　徐世昌公布《整理金融短期公债条例》，发行短期公债6000万元。

△　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召开第一次理评联席会讨论加薪问题，并于25日发表呼吁书，提出设立劳动教育社等要求。

△　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等26团体致电北京政府，欢迎夏寿康长鄂，并促早日莅任。

△　东京台湾青年会发起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饥

馑救灾募集救济金运动，台湾募3450元，东京募1193元，交由中国驻日使馆处理。

9月20日　长沙举行护法战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由谭延闿主祭。

△　《新湖北》在上海创刊，并发表出版宣言。该刊为旅沪湖北自治协会主办之月刊。

9月21日　朱执信因调解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在虎门遇难牺牲。

△　熊克武部川军同滇军在成都东门外与龙泉驿之间进行拉锯战，从6日至18日，龙泉驿几度易手。是日，滇军战败，放弃龙泉驿。

△　徐世昌令桢威将军王廷桢来京供职；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第十六师师长。

△　万国救济会在天津成立。

9月22日　孙中山派蒋介石赴汕头参加讨伐桂系的战争。

△　广东讨贼第二军总司令李绮庵通电讨伐桂系，谓："溯自桂贼入寇粤省，凡百施为，无不本其强盗天性，行其暴民政策。视粤二千万方里为附庸，三千万人民为奴隶。……总之桂贼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等，祸粤祸国，罪无可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俟编竣队伍，即直捣羊城，扫平桂贼。"

△　安徽合肥屠宰捐极重，屠宰工人生活困难，相率罢业。

△　山西国民大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共20余团体。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地电报局，以后遇有俄国公使馆等来往密电，不再代递。沙俄公使库达摄夫对此事提出抗议。

9月23日　　徐世昌令："据外交部呈称，比年以来，俄国战团林立，党派纷争，统一民意政府迄未成立，中俄两国正式邦交暂难恢复。原来驻华使领官，久已失其代表国家之资格，无由继续履行其负责之任务，曾将此意面告驻京俄使。应即日明令宣布，将现在驻华之俄国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

9月24日　孙中山电复闽督李厚基，希命臧致平师助粤讨桂。

△　徐世昌令："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一差，着即裁撤。所有四省剿匪事宜，责成各该省军民长官妥为办理。"

△　北京公民要求恢复地方自治，曾于8月16日呈书内务部。是日，复再次上书内务部，并征求各省各团体意见，以期全国自治早日观成。

△　湘军总指挥赵恒惕致电湘军各将领，谓："张逆既去，湘境肃清。战事收束，总指挥一职，无存在之必要。……以后决不敢以此名自居，致贻陨越。"

△　驻京俄公使库达摄夫就停止领事待遇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同日，并照会驻京使团，告以"本人使华之任务业已结束。"

△　驻京俄使馆及各地领事馆，自是日起实行取消，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面晤驻京日使小幡酉吉，谈优林来京事。

9月25日　北京政府收回天津俄租界。28日，收回汉口俄租界。

9月26日　　孙中山致电粤军总司令行营转吴忠信，谓：“长江机会渐趋成熟，皖局尤佳，请兄速回沪助理进行，切勿延迟。”

△　广东省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广州对岸河南宣布独立，与陈炯明一致行动。

△　徐世昌公布发行《偿还内外短期公债八厘债券》，款额9600万元。

△　《劳动界》第七册刊载上海海军造船所工人所撰《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其中写道：“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利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

△　天津各界联合会为向群众宣传国民大会的意义，举办国民大会辩论会，到会者2000余人。

△　川军刘湘、杨森占资中，滇军败走。28日，刘湘、杨森占内江。

9月27日　　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中俄原有各种条约概为无效，俄国在中国之租借地概行退还，帝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党在中国所侵夺之权利，一并永远无偿退还中国”；希望中国政府与沙俄政府断绝关系，中苏恢复正常国交。北京政府仍然置之不理。

△　魏邦平宣布独立，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唐继尧，谓：“此次粤军持粤人治粤宗旨，整队由闽返粤，被桂军抵抗，相持于东江。糜烂地方，不堪言状。爰率所部及舰队，于沁（27）日陈师珠江，集中鹅潭，占领中流砥柱及车歪炮台各要隘，与福军一致进行。”

△　魏邦平、李福林致函莫荣新，促其“解除兵权，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

9月28日　　陈炯明致电林葆怿、汤廷光等敦促海军实行讨桂，谓：“虎门独立，魏厅长等继起讨贼，桂亡无日。务请诸公为粤援手……至海军出力人员，事定当有厚报，决不忘义。”

△　陆荣廷自南宁发出勘（28日）电，表示解决粤局意见。声称愿由粤人选任督军，维持治安，惟陈炯明除外。又谓一俟粤局底定，桂军即当全数调回。

△　驻沪安徽救国代表反对张文生督皖，致电安徽各界谓：“照寒电之主张，速开全省国民大会，进而实行根本改造者。如北庭不收回成命，张氏不知机早退，惟有罢工罢市，抗税抗捐，以与此万恶军阀，相见于正义公理之下。驱逐丑类，争复自由。同人一息尚存，誓与国贼不两立。”

△　广东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欢迎陈炯明回粤，并声明下列政治主张：“（一）惩办岑、莫、温、杨诸祸首；（二）没收各祸首及其他关系人之财产，拨充西南大学及粤省教育实验经费；（三）民选省长；（四）取消第二届伪省议会；（五）恢复民意机关，实行地方自治；（六）废督裁兵；（七）禁绝烟赌，灭除苛捐；（八）军权由陈总司令统率，维持粤省治安。”

△　日、英、美、法四国公使，正式通告北京政府新银行团成立，并附有银行团各项公文及四国公使说明书。

9月29日　　孙中山电复李福林、魏邦平，表示嘉勉，谓：“得丽兄（按：魏邦平本字丽堂）沁（27日）电，为之狂喜，剿除桂孽，还我河山，兄等之功也。闻莫贼尚有要求，缓兵待救，我宜急击勿失。盖为我粤安全及大局计，俱不能容此丑类，以遗后患。……领事团既向莫严重警告，彼必无力无胆与我抗也。”

△　孙中山致电周震鳞，谓：“沁日魏邦平以所部及江防舰队进省，与海军、李福林联合，限莫贼二十四时退出。闻莫尚抵抗，省垣已有战事。惟湘、赣各军，应早入粤边，吾辈望之如岁，请促其兼程并进。北江空虚已甚，可以顺流而下。此时形势，若只遥为声援，非所望也。”

△　徐世昌调任驻美公使顾维钧为特命全权驻英公使，特任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特命全权驻美公使。

△　广东省议会推举议长林正煊往见莫荣新，调停粤桂之争。莫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也不忍糜烂地方”，要“依陆巡阅使勘电执行”，“任何人都可以接任督军，只有陈炯明不能前来接任”。同日，又同魏邦平、李福林议定，同意用协商方式，解决桂军离粤问题。

9月30日　孙中山、伍廷芳、唐继尧致电林葆怿、汤廷光等，反对调停。谓：“桂贼视我粤地方为彼私产，视我粤人民为彼奴隶。贪淫残暴，无恶不为。……最近粤军回粤，持粤人治粤主义，人民望风归附，而桂贼倾其巢穴，以阻我师。……是以魏、李各军，仗义而起，联同海军，直取省城。志在歼厥罪魁，救民水火，露布传来，天下动色。惟闻莫贼尚有要求，以缓我师而望外救。查莫等罪在不赦，无调和之可言，其余众解除武装，亦不能附有何等条件。一日纵敌，遗患无穷。狼子野心，势难姑息，即我有一部之牺牲，歼灭奸凶，永除祸害，亦当为全粤父老所共谅。为此飞电我军，急击勿失，并布告粤城各界知之。”

△　孙中山分函赣湘军将领李明扬、林修梅，促入桂讨贼。

△　魏邦平、李福林在海珠召开会议，推举军政府海军次长汤廷光继任广东督军，另电请陈炯明主持粤局。

△　驻粤滇军蔡炳寰等在琼州宣布独立，通电表示与粤军一致行动，讨伐桂系。

△　徐世昌公布《库乌科唐镇抚使公署编制章程》，凡33条；《库乌科唐各理事官公署编制章程》，凡五条；《乌科唐各参赞公署编制章程》，凡八条；《恰克图民政员公署编制章程》，凡七条。

△　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宣布湖南废除道制，将道署机关一律裁撤。

是月　　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六人发起在武昌建立共产党武汉支部，包惠僧任书记。

△　广东十六路民军司令部发布讨伐莫荣新檄文："慨自桂系入粤，五载于兹。苛政暴民，擢发难数。诚上下数百年以来，凡督粤者，未有狼贪虎视如莫荣新之甚者也。然而天心厌乱，民怨难平，众志成城，无坚不破。观之往事，历历可征。本司令上为国家，下维桑梓，迭奉孙大元帅明谕，维持大局。用举义师，收回粤人自治之权，贯彻联省护法之旨。"

△　湘军整编后，成立12个防区：第一区司令吴剑学，驻宝庆；第二区司令张辉瓒。驻湘乡；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衡阳；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永州；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洪江；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醴陵；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郴州；第八区司令蔡巨猷，驻沅陵；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芷江；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澧县；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常德；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平江。

△　日本又召白俄首领谢米诺夫至大连密议，由日本供给款械，令其率残部与蒙匪勾结夺取外蒙。

△　北京政府教育部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银元20万元借款合同，以盐税余款为担保，用于支付政费。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与花旗银行签订银元30万元借款合同，用于

政费。

△　安徽芜湖学生联合会致电国务院，谓："吾皖苦军阀祸久矣。皖人为自救计，不达废督目的不已。任何人督皖，皖人皆一律拒绝之。今政府违反皖人公意，忽明令张文生督皖，皖人誓死不能承认。"

10月

10月1日　孙中山复函川军第六师师长石青阳，告以长江流域形势或有变动。嘱其待命直趋武汉。同日，又致函湘西将领田应诏，促其立即出兵攻入桂林。消灭桂系。

△　孙中山致电谭延闿，谓："据李国柱来信。曾迭请出兵攻桂。……除由文与唐（继尧）、伍（廷芳）诸公电告魏（邦平）、李（福林）速驱莫贼以安粤局外……迅饬所部，直下北江，驱逐桂贼。"

△　孙中山电陈炯明、许崇智，命长驱进入广州，以定粤局。

△　孙中山致函赵恒惕，促其乘虚进攻广西，谓："秋风劲爽，秣厉为劳。粤中自粤军鏖战惠州，桂省老巢，调遣一空。甚望贵省所派大军，兼程并进，犁庭扫穴，在此一举。大功之成，不特粤人受赐，国家实利赖之。兹因周君重嵩回湘之便，特托持函，并面为致意。即希察纳为幸。"

△　湖北第一纱厂鄂籍工人反对厂方减少工资。宣布罢工。

△　新银行团通告缩小范围，改为东三省除外，其条款：一、南满路已筑支路及近路矿产均在除外之列；二、吉会、郑洮、开吉、吉长、新奉、四郑均在除外之列；三、现时拟造之洮热路及其支路不在除外之列。

10月2日　居留吉林珲春地区之韩国革命党人朴东明、金永植等会同俄国人及中国人数百名，袭击珲春，并焚毁日本领事馆，日人死11名，伤10名，被俘1名，造成“珲春事件”。

△　外蒙活佛派代表至哈尔滨与日本密订借款合同，向日本特务局借日金600万元，限五年偿还，以图克勒图山脉一带森林、矿产作抵。

△　徐世昌下令裁撤长江巡阅使缺，特任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副使。

△　徐世昌令：“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灾情綦重，亟应妥筹民食。所有赈粜事宜，着各该省长督饬所属切实筹办。并着派何宗莲前往山东，吴鑫孙前往河南，田应璜前往山西，高增爵前往陕西，会办各该省粜赈事宜。”

△　莫荣新邀请广州总商会等团体举行会议，莫提出收束四条件：“（一）东江前方军队除海疆军外，不下二三万人，现尚在战斗中，应如何安置；（二）在东江军队撤移问题，应事先商定，以免误会而保安全；（三）分驻省城军队及各属防地军队，应如何接防、换防；（四）积欠之军饷，及移动之费用，怎样发给。”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与华俄道胜银行改定中东铁路合同。规定该路以营业性质合办，中国加入管理。将来该路改组，中国政府得派委董事。

△　北京政府财政部汪士元、北洋保商银行王麟阁与大仓组、台湾银行签订日金200万元借款合同，以盐余为担保，用于保商银行资本，一部分转借财政部使用。

10月3日　徐世昌特任张国淦为平政院院长。

△　徐世昌令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辞职，派汪大燮继任。

△　徐世昌任命章祖申为驻瑞典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挪威特命全权公使。

△　徐世昌令陈毅加陆军上将衔。

△　《劳动者》创刊。该刊每星期出一册，先由广州《天民报》经售，后由《群报》总经售。

10月4日　广州各团体代表开会讨论莫荣新索取开拔费等问题，议决：一、承认筹款50万元为桂军的“送行费”；二、莫荣新先交印，后交款；三、请莫三天内交印。林葆怿允劝莫实行。

10月5日　孙中山就日本对华政策问题函复日人宫崎寅藏，略谓：“此后吾党之患，仍在日本之军阀政策。倘日本仍行其扶旧抑新之手段，则中国之内乱，未有已期也。……深望日本民间同志，有以纠正军阀之方针，不为同洲侵略之举，而为同舟共济之谋。”

△　旅京广东公会致电陈炯明，反对与桂系妥协，略谓：“现桂系形绌势蹙，风闻以调合之说相饵。旅京同乡，深恐公为甘言所动，致令粤人自治，莫竟全功，恳公表示态度。”同日，又致电李根源、林葆怿、申葆藩、魏邦平等同一电。

△　前琼崖镇守使陆兰清通电宣布独立，反对桂系。

△　蒋介石抵汕头，电老隆陈炯明提出讨桂作战意见。6日，蒋介石赴潮安前敌，加入粤军右翼军。

△　日本政府派遣军队万余人，由朝鲜向中国延边及珲春进犯。旋占领珲春及附近各县，肆意屠杀旅居该地的朝鲜人民及当地中国居民，焚毁村庄。

10月6日　莫荣新为索取开拔费事，向广州各团体讨价还价，要求地方必须筹出200万元，并诡称：“这笔开拔费可以电请中央筹拨，

不必由广东人民负担。”

△　孙中山致电孙科，嘱传令琼州各军，即渡雷州，会合高、雷、钦、廉地区民军，进攻南宁。

△　湖北、湖南、江苏、福建、浙江等省旅京、津人士，在北京中央公园开会，讨论恢复地方自治问题。

△　北京欧美同学会开会，成立国际统一救灾会，到会者除中国方面18团体外，并有他国国家代表。

△　徐世昌公布《修治道路使用土地暂行章程》，共16条。

10月7日　徐世昌任命张国淦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王宠惠兼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　湖南学生联合会邀请各界开联席会议，讨论湖南自治问题。会间决定“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行大会，并公推报界联合会、省教育会、总商会、中华工会、学生联合会、工业总会之代表为筹备员。推举毛泽东、龙兼公为请愿书起草员。

△　广东学生联合会致电广州领事团，请勿容留桂系军政人员逃匿领馆。谓：“桂人祸粤，瞬已经年。凡百设施，无不实行其自私自利之策，冀达大广西主义之谋。……以图逍遥法外，再逞凶横，辱国残民。……凡有现任军官政客投请贵领事保护者，均请拒绝。”

10月8日　上午9时，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案之建议人400余人，在省教育会开全体大会。首由龙兼公报告开会宗旨，次由大会主席毛泽东报告：“今日应议决事项，最要者为拟定进行办法，及表决选举法及组织法要点。……湖南自治案，本首由湘政府发起，惟仅限于省政府与省议会合同制宪，实带有包办性质，于理论上很说不通。故省议会亦知难而退，然湖南自治问题，总算政府与人民一致表示赞同，故吾等因有此次议案之提出。盖于事实上既做得到，于理论上又

说得通。惟进行最宜迅速，不能过迟。”会议最后通过湖南宪法会议选举法及组织法，并定9日向省政府请愿。

△　川军师长杨森、田颂尧、邓锡侯攻占泸州，滇军第二军长赵又新战死，滇军被逐出川境。

△　汤廷光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接任广东督军。

△　莫荣新所部桂军将领沈鸿英等不承认汤廷光督粤，通电各省谓：“乃闻魏、李两军，忽举督军，强迫交卸……鸿英等统率三军，誓不承认。”

△　日本外务省发表出兵珲春声明书。

△　徐世昌派陈毅兼库伦所属图、车两盟金矿督办。

△　徐世昌令兼任特种财产事务局局长曾彝进准免兼职，派李钦接任。

△　徐世昌令准两淮盐运使段永彬免职，任命赵毓煊署两淮盐运使。

△　徐世昌令吴佩孚、齐燮元各加陆军上将衔。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华懋业银行签订银元80万元借款合同，以盐税余款、四年公债105万元、八年公债100万元为担保，用于拨还前债本息。

10月9日　　广州各团体代表为桂军开拔费事继续开会，决议“让城费”增加到150万元，不能再增。筹款方法，由省城商店居民各抽租捐一月，主客各半，赌馆捐三月，约40万元；其余向银行借垫，将来设法筹还。各团体代表将此决定面告莫荣新时，莫仍不满所欲，以“你们请放心，我不下命令，我的部下断不敢开炮。你们莫性急，

性急办不出好事情来”等语相威胁。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日本决定续派日军赴珲春龙井村平乱。同日，北京政府下令吉林省长官迅即剿办珲春匪乱。

△　徐世昌令交通部整顿中东铁路，谓：“此后该路事务，应由交通部率同该督办等，饬华俄各员认真整顿，力图改良。其该路一带公私财产，由东三省军民长官会商主管部妥筹善法，切实保护。”

△　徐世昌令：“近据吉林督军电称，据报告本月三日黎明，珲春突来匪徒300余名，肆行抢掠，并有毁伤领馆外侨情事。……该地外侨尤应切实保护，勿稍疏虞，是为至要。”

△　徐世昌派朱启钤督理印行《四库全书》事宜。

△　徐世昌任命毓朗为镶白旗汉军都统。

△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基与柏烈伟在上海会见吴佩孚的代表白坚武，就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交换了意见，并介绍了革命俄国的各种组织。

10月10日　湖南长沙各界约万人冒雨游行，旗帜大书“请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湖南自治”等语。各团体发布宣言，传单10余种。游行队伍齐集总司令部门前，呈递请愿书。彭璜代表全体发言：“今日市民请愿，第一项，系要求司令从速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第二项，系湖南自治不能由省议会及少数人包办；第三项，宪法会议之议员，大县八名，中县六名，小县四名；第四项，湖南宪法，应完全由宪法会议产生。”谭延闿答称：“诸君之意，完全采纳，不日即将实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

△　下午1时，袁家普、方维复等15名代表去见谭延闿，面呈请愿书及人民宪法会议之组织与选举各一件。谭答以：“此事愈速愈佳，

能如此办理，自属正当。”

△　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复日本政府出兵珲春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已于9日令吉林督军迅平珲春骚乱事件，日本出兵实有背中国主权。

△　徐世昌令：“虎威上将勋一位陆军上将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久领畿疆，勤劳卓著。……兹属国庆酬庸，论功行赏，特颁明令，以励殊勋。”

△　徐世昌特任张作霖为镇威上将军；李纯为英威上将军。

△　徐世昌令靳云鹏、王占元、赵倜、陈光远均授为陆军上将。

△　徐世昌特任袁乃宽为秉威将军；特派内务总长张志潭兼赈务处督办；任命黄荣良为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

△　徐世昌令颁给甘肃督军张广建、山西督军阎锡山、福建督军李厚基、新疆督军杨增新八狮军刀各一柄。

△　徐世昌特派刘式训兼外交官、领事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长。

△　中国铁路公司与北京政府订约，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政府管理。

10月11日　　北京外交团为北京政府停止俄国使领待遇事照会外交部，谓：“中国政府万不能永远取消俄人按约在中国所享之利益，此不过暂时办法，俟俄国将来政府成立经各国承认时，再行议定一切。”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称：“查本政府宣布停止俄国使领待遇，实因俄国使领久已失去代表资格，不能行使职权。故不得已，按照他国先例，有此停止待遇之举，以免除事实上之困难。现在适用一切办法，自属暂时，至俄国政府正式成立得中国承认时，再行议定一

切。”

△　林葆怿、蓝建枢等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及广州军政府，宣布南北海军统一。

△　莫荣新通电否认汤廷光督粤，声称决不轻弃职守，提出要求陈炯明退回漳州等四项新条件。

10月12日　　孙中山复电湖南省议会，盼督促湘军出师援粤讨桂。

△　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李纯自杀。

△　英哲学家罗素应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四团体之聘，来华讲学，是日抵达上海。

10月13日　　孙中山电邀李烈钧由渝赴沪，研究长江方面形势，“决定机宜”。

△　四川省长杨庶堪通电辞职：“庶堪七年（1918）一月蒙军政府委任承乏四川省。……护法之业不成，则国命一日不复，此堪之所以含忍尸位，凡以此也。……今当解职以去，以谢川人，并即取消前令政务厅长向楚代行之事。”

△　徐世昌令陆军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着免职来京另候任用；任命阎相文为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10月14日　　重庆旧国会议员因川省武人内讧不已，是日发表告别四川父老宣言，离渝他往。

△　广州海军全体军官在黄埔公园集议，一致反对南北海军统一。18日，海军全体官佐质问林葆怿，要求宣布“降北”条件。

△　代理江苏督军齐燮元发布全省戒严令：“李前督出缺，地方安

谧，秩序如常。第恐宵小生心，乘机蠢动。爰于即日起，本省应暂时施行特别戒严，以安人心而平谣诼。仰各该军一体查照办理为要。”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成立。与会会员及来宾约千余人，公推王儒堂（正廷）为主席。王报告开会宗旨：“本会因租界华人不能与西人享受同等之权利，系因租界向来有亏公道之故。”后由陈惠农报告：“华人徒有纳税之义务，不能享受纳税之权利，不平实甚。”并“要求华人参与上海市政，一面停付捐款”。

△　徐世昌令张文生加陆军上将衔。

△　是日午后，唐山开滦煤矿因沼气爆炸，工人死者420余人，伤者190余人，惨状目不忍睹。

10月15日　　曹锟、吴佩孚、田文烈、冯玉祥等在保定举行会议。决定：“（一）提倡国民大会速开；（二）请中央遴派议和总代表，以期南北早日统一；（三）推戴王聘卿（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四）提倡华界赈济直鲁豫三省灾民；（五）整顿各军旅，严加训练。”

△　徐世昌令：“据齐耀琳、齐燮元电呈，该巡阅使李纯……神经时复错乱。本月12日忽于卧室用手枪自击，伤及右肋乳下，不及疗治，登时出缺。……特任齐燮元代理江苏督军。”

△　北京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正式承认中国收回俄租界。

△　英、美、法、日对华新银行团在美正式成立，是日各国代表在协定上签字。

△　川军刘文辉部占重庆。

10月16日　　晨，粤军许崇智第二军克复河源城，桂军李根源、沈鸿英等部溃逃。

△　徐世昌公布《赈务处暂行章程》，派恽宝惠为赈务处座办。

10月17日　北京国务院严禁“复辟”传说，致函内务部，谓：“近有不逞之徒，造作种种谣言，希图煽惑人心，扰乱大局。其最甚者，竟敢语及元首政躬，牵及中国国体，生心害政，殊堪痛恨。……今虽南北尚未统一，而其尊奉共和之心则同。故复辟谬说，虽妇孺皆知，其谬妄实无辩论之余地。……应由京外军民长官转行该管官署，严切查禁。”并希该部“立即转行该管官署一面出示晓谕，一面严拿究办”。

△　桂军3000人，由博罗调往石龙。

△　蒋介石抵河源，报告陈炯明、许崇智关于今后作战之计划。

△　徐世昌公《直鲁豫巡阅使署组织令》，凡五条。

△　徐世昌任命王承斌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张福来为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萧耀南为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曹锟为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同日，又任命王用中为陆军第十二混成旅长，董政国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长，彭寿萃为陆军第十四混成旅长，孙岳为陆军第十五混成旅长。

△　北京大学举行第二次授予名誉学位典礼，由蔡元培主持赠予美人杜威以哲学博士；前美国驻京公使芮恩施以法学博士。

△　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邀请英人罗素在上海西门教育会演讲。

△　台湾青年谢文达驾驶老式飞机，在台北上空掠过，成为台湾第一位驾机飞上蓝天的台湾人。

10月18日　旅沪广东公民大会就南北海军宣布统一事致电指责林葆怿“阳作调人，阴为桂系鹰犬”，并称：“今桂军祸粤，盗憎主人，城市为空，全省糜烂，未闻公建一言，画一策，而顾通电中外，宣言南北海军统一，试问数年护法，所为何来？”

△　新任秘鲁驻京公使富瑞立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10月19日　　粤汉铁路机车工人，不愿运送桂系军队，全体罢工，并发表宣言："如有违抗众议，仍然行车者，誓以炸弹手枪对待。"

△　粤军会议研究作战计划，陈炯明主张攻博罗。

△　曹锟为陈光远推彼为南北议和总代表事，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推辞，谓："锟属军人，只知捍卫国家，苟利于国，汤火所不敢辞。至于周旋坛坫，实非所长。……自维驽钝，实属不敢担任。"

△　吉林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谓："日本借口珲春事件，进兵不已。种种要挟，实难忍受。应请中央严重交涉，勿稍退让。"

△　徐世昌派陆徵祥为赈务处会办。

△　徐世昌公布《办赈惩奖暂行条例》、《办赈犯罪惩治暂行条例》。

10月20日　　孙中山电促赵恒惕等克期援粤，并电湖南省议会，促湖南当局支持"粤人治粤"之宣言。

△　夜，桂军三四千人弃太尾，焚掠民舍，向惠州逃遁。

△　江苏省议会致电徐世昌，"请政府速颁明令，废置江苏督军，风示天下"。

△　徐世昌令准山东省长齐耀珊免本职；特任田中玉暂行兼署山东省长。

△　北京政府与各国政府在上海签订修改通商进口税则《善后章程》。

△　驻美公使顾维钧与美国特派外交总长柯尔培在华盛顿签订修改通商进口税则补约，共四条。其要者为：“本约所附通商进口税则及章程应自本约互换之日起，在中国与各外国通商各口岸及地方发生完全效力，非经双方订约修改，所有美国人民运货入中国，应照本约所附税则纳税；但订明：美国人民无论何时输纳税项，较之最优待国之人民所输纳者，不得加重或另征。”

△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江苏省教育会开第六次会议，到会代表32人，代表19省区，议决案24条。11月10日闭会。

10月21日　　吉林11校学生因日人进兵珲春，在法政学校开紧急会议，议决：“一、通电东三省各团体，请一致力争；二、协同奉黑两省，共派代表，分谒府院及外交部，请当局与日人严重交涉；三、致函本省各学校，请厉行抵制日货，组织演讲团；四、通电留日吉林同乡，请其鼓吹中国留日学生速争外交。”

△　外蒙王公电请北京政府惩办私借日款之喇嘛。

△　皖社开成立大会，安徽政、学、商、绅各界及省议员到会者200余人。首由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欧战停后，国民自决之声风靡世界。……我们组织皖社，原主张自治。现在全国人民，主张自治，即政府亦主张自治，惟自治进行，必须团结。此次组织皖社，即我皖人团结之表现。”

10月22日　　粤军在第二十军代理军长蒋介石指挥下，攻克惠州城，夺获大炮10尊，枪3000支，子弹30万枚。桂军余部向博罗退却。

△　广州沙面英领事逐温宗尧出境。

△　北京政府外交部咨复各国驻京公使，说明停止旧俄使领待遇之必要，并声明“俄国领事裁判权当然中止。”

10月23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致电徐世昌、靳云鹏，谓："莫荣新困守老城，负隅抗拒。岑、陆计穷力蹙，惧失地盘，先后派遣代表，星夜晋京，促签条件。……求与北方订约。以法律论，七总裁缺其四，广州已无军政府，岑、陆私人签字之条件，直等废纸，绝不生效力。"

△　岑春煊以广州陷入重围，自知无法挽回颓势，是日通电全国，宣布引退。

△　陈炯明在惠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总攻广州。计划右翼军扫除增城之敌，向龙门埔前进，至南村附近集中，进攻广州西北；中央军扫除石龙之敌，沿广九右方前进，集中龙眼洞附近，进攻广州之东；左翼军扫除东莞之敌，沿广九左方前进，至车陂、东圃附近集中，攻广州东南。

△　莫荣新以"现在省城报纸，造谣煽惑，无所不至"为借口，命令广州宪兵司令谢卓英将省城各报馆全部封闭。至29日，广州各报始一律恢复出版。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日本出兵珲春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书。

△　徐世昌派孙多钰督办浦口商埠事宜。

△　白俄谢米诺夫部将恩琴向库伦进迫，旅长褚其祥连电北京政府告急。

10月24日　　曹锟、吴佩孚、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阎相文等在保定巡阅使署举行重要会议，讨论要项如下："（一）废督事件，认为废督一事有缓行之必要；（二）援蒙事件，第一步先应由察绥两区就近出兵；（三）和议事件，桂系既希望原订和约条件，北庭允予提前签字，不妨允其所请，直隶全部将士决定为之后援。"

△　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急电徐世昌、靳云鹏，声明即日辞去总裁，解除军政府职务。同日，岑春煊乞英领事派兵舰保护离开广州。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为珲春事件致电各地学生会，谓："日人欲实行并吞满蒙久矣。此次竟因俄韩人骚扰珲春一事，乘机派兵数万，将吉林省吉延一带占领。北京政府两次抗议无效，野蛮凶狠，横暴已极。……我们现在要求全国同学一致提起热烈的精神来，一面迫促对外名义上的北京政府，一面直接向国际联盟会表示意见。"

△　长沙工界各业召开劳动发起会，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为宗旨。旋即发表《湖南劳工会的宣言》。

△　上海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为开滦煤矿沼气爆炸死难工人抚恤问题致电农商部，略谓："闻该公司拟每名四十元，直视同草菅，请贵部据理力争，以重人命而平众怨。"

10月25日　　广州学界30余校为驱逐莫荣新离粤，在高师学校开会商定实行罢课，并决定："莫氏一日未去粤，则各校一日不开课。"各校校长亦皆表示支持。

△　孙中山电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及湘省军界和报馆，嘱竭力声援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援粤讨桂义举。

△　广九铁路司机及所有机器工人，为与粤汉铁路工人采取一致行动，一律举行罢工，并宣称桂军不离粤，两铁路不行车。

△　粤军第一军进占石龙，桂军向增城、东莞退却。

10月26日　　白俄谢米诺夫部与蒙匪勾结进袭库伦，团长高在田电告镇抚使陈毅，谓："库防布置，步兵守御东方，职团守御东营子以北及北面大山。突然二十六〔日〕早二点，敌人乘夜袭攻库伦。以东面为诱敌，其北面为主攻，敌人兵二十余队，炮六尊，机枪七架。

……团长见势不敌，库将失守，不得不决一死战。……击毙敌人约数百余，敌势不支，向东北山林退却五十余里。”

△ 莫荣新急电徐世昌、靳云鹏，声明于24日起“率同将士宣布取消自主，粤事应听中央政府主持”。并表示：“为保粤民，减免战祸起见，于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所有维持地方治安事，应由粤民所举之新督负此责任。”

△ 徐世昌派何佩瑢督办湖北官矿事宜。

10月27日 苏、赣、鄂、豫、粤、甘、鲁七省代表等，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开七省自治废督联合会，孔庚任主席，宣称该会宗旨在于：“本互助之精神，谋共同之福利；共同之福利维何？即‘自治’是。然欲求自治，势必先去为自治障碍之督军。”广东代表发言，痛斥陆荣廷祸粤罪行。

△ 苏俄政府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愿派代表驻华。

△ 孙中山复函鄂西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蓝天蔚，指示以全力谋取两广。

△ 蒋介石率粤军攻占增城。

△ 旅京闽人组织的各县联合会举行第二次干事员会，讨论促进地方自治问题。

△ 莫荣新炸毁广州兵工厂后逃离广州，杨永泰通电辞广东省长职。

10月28日 陈炯明派队由东圃、车陂疾趋广州城，并向瘦狗岭、白云山追击。桂军万余人向龙眼洞溃退。

△ 岑春煊、莫荣新逃离广州后，桂军高雷镇守使林俊廷、琼崖

滇军将领赵德裕、何福昌等，均先后宣布独立。

△　孙中山派何成濬赍函赴湘晤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希出兵讨桂。函谓："兹特请何雪竹兄来湘请命，企多得部队，更为粤省援助，使桂乱早日肃清。"

△　徐世昌以炳威将军、督理陕西军务陆建章"被陷冤死"，是日明令昭雪，着即开复原官、勋位及勋章。

△　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八团体电徐世昌再请废督，并要求"先将出缺苏督勿予补授"。

△　扬州棉花店40余家弹花工人以薪酬微薄，要求增加工资，未得结果，自本日起一律罢工。

10月29日　　洪兆麟及魏邦平、李福林两军入广州，城内桂军向粤汉铁路西村退却，径趋肇庆。同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通电宣布克复广州，向孙中山报捷，并请孙中山同胡汉民回粤主持大局。

△　孙中山复函蒋介石，促以全力支持陈炯明所部粤军，表示："我望竞兄（陈炯明）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并赞蒋氏"勇敢诚笃，与执信（朱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　河南省立各学校教职员以薪金欠积数月，"山穷水尽，前途绝望"，通电宣布自本日起，"暂停职务，以待援救"。

10月30日　　徐世昌以岑春煊宣言引退，收束军政府，取消自主，是日颁布命令，宣布南北统一。并"责成国务院暨主管部院，会商各该省军民长官，将一应善后事宜，迅速妥筹办理"。

△　翟汪电请孙中山赴广州主持大局。广东国会议员谢英伯等亦于同日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提出解决粤局四项主张：一、

请三总裁即时回粤，主持护法政府，国会议员同时回粤集会，以为护法政府之后盾；二、督军一职，亟宜乘时废去；三、省长一职，请胡汉民回粤履任视事；四、解散广东省议会。

△ 徐世昌令内务部依民国元年《国会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督同各省区长官，将（国会）选举事宜，迅速妥筹办理”。

△ 徐世昌公布《修正审理无约国人民民刑事诉讼章程》。

10月31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通电否认统一。略谓：“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实思以伪统一之名义，希图借取外债，以延长其非法政府之命脉。……此次北方宣告，文等绝不承认，内而国民，外而友邦，勿为所欺。北方既毫无诚意，而用此种狡狯无聊之手段，使大局更起纠纷，咎有所在，为此通告中外知之。”

△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及唐继尧之代表王伯群等在上海唐绍仪住宅会议，商谈西南时局问题。并决议：一、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率广东水陆各军；二、免去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福建督军林葆怿本兼备职；三、任命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四、任命林永谟为海军总司令。

△ 苏俄外交部为张斯麟举行欢送会，契切林致词，切盼中俄携手解除外力干涉。

△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函孙中山，建议苏俄和中国间恢复贸易往来。

△ 徐世昌公布《东省特别区域法院编制条例》，凡13条。

是月 北京国务院议决以《卿云歌》为国歌，并定十年（1921）7月1日施行。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将国务会之决定通告各校遵照。

△　新加坡华侨陈嘉庚，认捐4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聘请黄炎培、余日章、汪精卫、蔡元培、李登辉、郭秉文、胡敦复七人为筹备委员。

11月

11月1日　广州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管理广东军务，全省所有陆海军均归其节制；免去海军部长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本兼各职；任命汤廷光为海军部长；任命林永谟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署理海军总司令。

△　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许崇智，指示速移全军进省，以定粤局，再行处置后方穷寇。

△　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率部进入广州。

△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通电驳斥岑春煊、莫荣新“自称取消军政府”、“自称取消广东自主”之通电。略谓：“岑、莫等之宣言，不过取消其所据之名器，取消其本身之人格，不能损军府和国会之毫末。”

△　林森、吴景濂、褚辅成通电驳斥徐世昌伪统一令，谓：“……不解此项伪令，容与国法民生，有何关系？寻其究竟，不过借和平统一之美名，冀骗取大宗外债，以增国民之负担，为武人扩张军备之用，此应与国人共讨者也。今日和平统一障碍，第一为徐世昌，与其所卵翼之督军武人。徐果真爱和平，真谋统一，应即宣告退位。其余问题，依法解决，和平统一即可实现。”

△　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湘、军长但懋辛为驱逐滇黔军出境致电北京政府，声称：“唐继尧一日不去，川滇黔一日不安。冀滇黔明达人士，爱国健儿，共锄奸凶，为三省真诚之携手，以共卫国家。”

△　上午11时，湖南中华工会开成立大会，与会者59团体，各界

代表39人。主席陈家鼐宣称，该会以“专以输贯劳动界之知识为前提，务使工人道德高尚，职业普及”为宗旨。

△ 改造广西同志会致电徐世昌、靳云鹏，否认与岑（春煊）、陆（荣廷）“分赃之和”。略谓：“近闻报载，尊处复与岑、陆两氏，秘密和成，赂金竟达千万，在尊处慷国民之慨，尽可乐为。但于统一前途，有无把握，吾恐转陷于不可收拾之境，是所谓促和者，适足以促亡耳。顾念前途，能无栗栗。现粤局已解，陆系已倒。其不能代表两粤，彰彰明甚，更何能代表西南。此次分赃之和，不唯滇黔湘粤不承认，即我广西全体人民，亦决不承认。……凡有尊处私与岑、陆所订一切条件，均作无效。”

△ 谭延闿通电否认岑春煊、陆荣廷取消自主之宣言，谓：“……军府为各省组合，非二三人所能消灭。各省主义，自然不能以二三人为转移。所有粤中岑、陆、林诸人宣言，当然不能承认，并不发生何等效力。”

△ 齐耀琳致电北京政府，促王瑚早日南下就任江苏省长，谓：“耀琳前蒙大总统恩准辞职，即经电催新任省长莅宁，冀释重责。……窃以地方情形而论，苏省关系，似比京兆不同，可否俯将京兆一缺，暂行派代，俾王省长早日南来之处，伏候钧裁。”

△ 上午10时，天津华北华洋义赈会，各团体商号30余团体，计万余人，组织游行大会，并代义赈会散发劝捐传单，宣传灾区惨状。

△ 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调查科开紧急会议，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本科自去年五四成立以来，与学生会协同进行，调查日货，不遗余力。抵制成绩，斐然可观。乃近来因调查少懈，以致一般昧利奸商，日货又复大进特进，非重行整顿不可。”会议决定，会同学生会通告各业，止进日货。

△ 下午4时，长沙报界联合会在总商会欢迎杜威等，并讨论湖南

制宪问题。谭延闿亦到会。

△　日本岗山第六高等学校留日中国学生，因该校于天长节举行运动会时侮辱中国国徽，向学校当局提出四项要求：“（一）要求此事责任者，向我国国旗表示敬意；（二）口头上向在日留学生道歉；（三）同时呈书面一个，表示悔过意；（四）保证今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学校拒绝接受。3日，该校留日学生全体罢课。

11月2日　列宁接见张斯麟，谓中俄将团结一致，促使帝国主义灭亡。

△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由石龙抵广州。

△　孙中山致电闽督李厚基，嘱速令所部援助粤军歼灭东江桂军。

△　广东学生联合会广州分会开评议会，决议：“（一）粤省实行废督及民选县长，不得以武人充当；（二）上书陈总司令，请其实践从前的宣言，赞助废督运动；（三）电请撤退驻校军队并各校从速上课，以期恢复教育原状；（四）定期召集各社团，开会讨论关于废督运动及民选县长事宜。”

△　谭延闿以湘军全体将领名义发表通电：“（一）湘军主张，与西南护法各省一致，一切问题，须由公开和会解决；（二）湘人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不受何方之干涉，亦不侵略何方。”

△　上午11时，云南高等军事学校开学，唐继尧出席演说，勖勉诸生，以保云南军界之光荣。

△　驻直隶河间十一师李奎元部，因欠饷哗变，勒迫商家捐款数千元，并拘留商会会长二人，勒捐一万元。城内之兵把持城门不准人民带物出城，城外之兵四出抢掠，惟冯国璋所设当铺独能幸免。

△　岑春煊、温宗尧、李根源抵沪。

11月3日　　孙中山致函林修梅，嘱其："联络湘中同志，统一湘西。与协和一致行动，并速派人与吕、石、卢联络，团成一片，巩固实力，然后相机解决大局，是为至要。"

△　孙中山致电许崇智，嘱再厉戈矛，迅图扫穴，进而解决大局。略谓："顷得粤讯，知兄于东（1）日抵省，士气旺盛，至为欣慰！……民国九年粤军战史，第一功当属兄矣。会当把晤，为兄策勋。尚希再厉戈矛，迅图扫穴，出桂人于强盗之手，使两粤联为一气，固我初基，进而解决大局，庶三民主义得有贯彻之日。"

△　孙中山复电曹锟、吴佩孚，主张化兵为工，讽其勿为军阀政蠹。谓："化兵为工之策，自信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鬼蜮政蠹之为国人厌弃固矣。军阀窃柄，尤易滥用权威，僭越非望。"

△　驻华法使柏卜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请加入国际著作权公约。

△　蒋介石下令进击清远，次日攻克。

11月4日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会议，发表演说，述明修改中国国民党总章及海外总支部章程之意义。指出："本党章程是在日本东京定的。""那时候都在海外亡命，和在内地办党的情形不同，所以当时章程只对准着海外情形来定的。现在我们既已能够在国内立脚，打算在国内进行党务，那章程自然有多少要修改的地方。"在详述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后，说："现在我们又渐渐恢复了，我们就赶紧在国内扩张起来实行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现在为便利起见，把从前的章程，大家来参酌修改。"

△　孙中山致电四川绥定颜德基师长，谓："……所望急将川局奠定，共出长江，企图远大，则于川于国，两有其利。"

△　孙中山复电翟汪，告以“莫（荣新）氏负固待援，希即协助魏（邦平）、李（福林），迅速扫除，毋谈调停，致滋棘手。”

△　江苏省议会致电徐世昌、靳云鹏，谓：“江苏省长问题，全省民意原主苏人治苏。嗣奉大总统令，以王瑚长苏。苏人为尊重中央威信起见，暂弃主张，委曲求全，当为中央所谅。惟命令发表日久，而王瑚到任无期。近日沪报且传有大总统阻令不来消息。现在本省吏治财政，亟待振刷，究竟王瑚何日到任，应恳迅即电复，以释群疑。”

△　吉林省各团体在省议会开团体联合会，讨论珲春交涉案，决定：“（一）定五日午后二时，各团体各选代表往见交涉署长，偕赴日本驻吉总领事署，商请退兵。（二）电奉张（作霖）吉鲍（贵卿），八条件如已允许，吉林人民誓不承认。（三）由学生联合会搜集日人违法事实，译登外国各报，请主公道。”

△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函浙江学生联合会，谓：“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开会，贵省教育会代表提出了荒谬绝伦的‘各学校利用星期讲授经子建议案’。……他们正式和我们宣战了，我们难道由他们侵害，不起反抗吗？……他们不知讨论教育若何普及若何改善的问题，却违反时代的潮流，通过一种万人唾弃的读经案。……我们赶快下全体动员令，和他们分辩一个清楚。”

△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对新银行团借款意见。谓：“近接驻美顾公使电告，现由银行团交到会议日程，中有数条，对于中国借款讨论，以地丁为担保，……其尤为重要者，调查中国最近情形，如南北统一，裁撤军队，确立宪法，选举国会，下半年之预算案，建设适当财政制度，监督借款用途，综其大要，不寒而栗，……竭诚相告，愿闻谠言。”

△　徐世昌特派张謇督办吴淞商埠事宜。

△　广西督军谭浩明通电宣布广西取消自主，一切政令悉听北京

政府主持。

11月5日　　孙中山、伍廷芳等电质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谓："奉卅一日尊电，藉悉壹是。……近者岑、莫避窜，情急求和。北方不察，竟据以宣言统一，中外各报，咸肆讥评，谓为滑稽，良非无故。……文等之愚，以为欲解南北纠纷，图全国事实上之统一，必自赓续和议，该军事协定乘时取消，各种密约完全废止，法律问题完满解决始。否则求统一而去统一愈远，言和平而破坏和平愈甚，天下其谓之何？辱承明问，敢布区区，言尽于斯。"

△　陈炯明通电主张和议公开。略谓："自兹以往，不议和则已，苟议和，则单独之接洽，暧昧之行动，宜绝对禁绝。惟以正式之会议，公开之方法解决一切，方能收快刀斩乱麻之效。南方议和总代表，向由唐总裁担任。倘北方鉴于往事之因循，必知改弦更张，万不容缓。即派遣议和总代表克日来沪，继续议和。"

△　林森、吴景濂、褚辅成电贺陈炯明回粤，谓："岑、莫等勾通北廷，破坏护法。凡有血气，罔不痛心。执事仗义回戈，趁除凶憝，师直为壮，逆众溃逃。……国家前途，实深利赖。"

△　唐继尧通电反对徐世昌统一令，谓："顷见北京国务院卅日通电，声言据岑西林等漾（23）敬（24）两电，取消西南自主，归附北廷等语。岑等盗窃名义，不能代表西南。"

△　北京国务院复电江苏省议会，谓："支电悉。江苏省长王瑚，一俟交卸京兆尹，即行赴苏莅新。现已催孙尹家振，迅速来京接任矣。沪报所传，并非事实，希即察照。"

△　山东督军田中玉致电北京政府请废除督军，并自请开去鲁督本兼各职，谓："督军制不适于今，无用异议。卢督首倡，时机未熟。今和平实现，此其时矣。惟废督必惟其实，各省宜一律裁撤，并勿再存留将军、司令名称，师旅统归中央节制。地方治安由省长负

责，训练武装警察，并请由山东试办。如有成效，再推行各省。乞迅提交阁议施行，并先开去中玉鲁督本职及署省长兼职。”

△　新疆督军杨增新电令新疆各道尹阻止俄败兵入境，谓：“查中国对于俄人国内战争，向取不干涉主义，无论俄人政策如何，各党胜负如何，中国严守中立，概不与闻。如有俄败兵入境者，不论何党之兵，概行阻止，不许入境。切勿稍涉游移，贻患将来。”

△　北京高师学生开全体大会，讨论珲春事件，决议全体出发讲演。8日下午3时，该校学生800人，分别在天桥、前门、顺治门、骡马市大街、大栅栏一带讲演，被武装军警横加干涉，并将旗子夺去，禁止讲演。

11月6日　　孙中山为李纯自杀复函齐燮元，谓：“顷奉手教，暨秀公（李纯）遗书一册。自秀公之死，北方有力者，屡遣人来，谓公自杀，并非实情，中有黑幕，言词之间，竟有所指。今得来函，并影有遗笔数通，以是表彰秀公而镇靖人心，诚不可少。惟遗书笔迹已见报章多日，何以北使纷驰沪上，造谤不休，想必有人欲攫取地盘而先陷当局者以莫须有之罪。世情崄巇，殊可慨叹！执事镇抚一方，责望綦重，而北方政出多门，更有人为之奔走捣乱，此恐非语言文字所能释谤而止纷。夫当非常之事变，要有非常之干略，彼人诪张为幻，且挟居高临下之势，不审执事何以应之？文好直言，既有所知，即无隐讳。”

△　孙中山复函蒋道日等，批准国民党古巴分部改为支部，并对侨胞为粤军讨桂捐款三万元表示感谢。

△　唐继尧、刘显世、李烈钧就北京政府宣布和平统一问题，电复靳云鹏予以驳斥：“……顾尧等虽夙爱和平统一，而尤不能不斤斤焉注意国本。国本不立，而苟焉以从命，则所谓和平统一者，特一时耳。暮四朝三，岂非多事。故尧等宥（26）电宣言，亦经斟酌情势，

衡量事实，已信于国家大计，颇能为根本解决。而真事之统一，永久之和平，非是不能巩固基础也。”

△　汤廷光宣布解除粤督职务，发表《敬告全粤父老昆弟书》，谓：“廷光受事伊始，早有宣言，谓当俟陈总司令返节粤垣，立行交替。现谨于本日，将督军省长印信，概行移交接管。”

△　徐世昌特派王宠惠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张一鹏为副委员长。

△　苏、鄂、豫、鲁、甘、赣、川、闽、粤、皖、晋、桂等十五省区代表在北京开自治联合大会，宣告各省区自治联合会成立。

△　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挑起了社会主义论战。

11月7日　徐世昌在北京召开统一善后事宜筹备会议，全体阁员出席，岑春煊亦派代表参加，决定由国务院设立筹备统一善后会议事务处，办理统一善后事宜。

△　唐绍仪复电靳云鹏，谓：“承西南公意，叠次宣言，均以军事协约，即行废止，法律效力，完全恢复，为和议条件之要素。……仪于和平统一，素所愿闻，惟夙昔主张，则罔敢或渝。”

△　法教育会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周恩来等197人，乘法轮“保尔到斯号”启程赴法。

△　中华机械工会在长沙成立，选举童锡洲为正会长，萧开桢、周文质为副会长。

△　沈恩孚、黄炎培等以报载张謇“又保齐燮元督苏，显违全省公意”，电张询问真相。同时致电北京政府就苏省废督事“再进忠告”。

△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陈独秀撰写发刊词《短言》，明确宣布：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使“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利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

△　《劳动音》周刊创刊。该刊为北京共产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读物，主要编辑人有邓中夏等。

11月8日　西南联军总副司令唐继尧、刘显世通电宣布将滇黔留川军队撤回边境。谓：“川黔滇三省因地理历史之关系，宜有相资互助之精神。频年国家多事，滇黔军暂留川中，以待国是有定，良非得已。而对于川中同志，亦靡不尽力扶持。至于川人治川，宣言已久，非特川人所应相谅，且为天下之所共闻。何嫌何疑，而屡施其排斥之计，且加以侵略之名。继尧等深悉夫人心之变迁，难贵有为，而军事之收束，所不容缓，已将滇黔留川军队撤回边境，实行裁汰改编，以符本年八月宥（26日）电之宣言。惟恐外间不明真相，特将数年来滇黔对于川省经过事实，为国人一详述之。”

△　沈恩孚、黄炎培致电徐世昌、靳云鹏，谓：“废督之请，全国一致，未见明令。苏省财源，为军人攫取殆尽。……倘苏省督缺复补，是显与苏人公意为敌。……现中央方宣布统一，岂可再为军人助长权力，以致作茧自缚。用特再进忠告，乞赐鉴纳。”

△　下午2时，山东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以田中玉既自请废督，“则政府似无所再用其顾虑”。

△　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师长赵恒惕等以全体湘军名义，发布“郑重宣言”，宣布“湘人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不受何方之干涉，亦不侵略何方”。

△　全国教育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裁兵废督实行法治。同日并通电各省，略谓：“学校经费不足养兵，被祸省区，全陷于无教育状

态。……为今之计，非速裁兵不足救国家之困；非速废督不足止祸乱之源；非速厉行自治，整顿选举，不足培元气，固国基。……切望同心一力，协请废督裁兵，复自治，严选举，以谋真正统一。”

11月9日　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联名致电西南各省各军，宣布桂系和岑春煊等破坏护法的罪状，号召西南各省各军坚持护法救国主张。谓：护法各省“宜本真正之民意，革故取新，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实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范。”

△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会议上解释“训政”意义。指出，本来政治主权在人民，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只好用强迫的手段，迫着他们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

△　孙中山修正和公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凡18条，规定“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本党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

11月10日　陈炯明通电就广东省长职，并布告主张废除督军。

△　林葆怿以军政府名义“与统一宗旨相背驰”，通电离粤。

△　刘显世致电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谓：“组公（谭延闿）东（1日）电悉。岑电取消西南自主，已为骇怪；北廷据以宣布统一，尤为滑稽。此间对于时局之主张，已于唐（继尧）公于宥电宣言，自当抱定此旨，贯彻初衷，特电奉闻。”

△　贵州护法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在贵阳发动兵变，逼走省长兼靖国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15日出任代理黔军总司令。

△　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致电田中玉，对田自请废督事请其“始终一致，言行相符，立即实行”。

△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因日军久据珲春未撤，特派于冲汉赴日交涉。

△　驻华日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提出珲春撤兵条件四项，并声明将来延吉方面若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仍可出兵。

△　北京政府教育部致函各学校，要求对珲春事件，务取镇静态度。

△　留日学生总会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主张全国各地应自省而县，组织临时外交后援会，监督政府行动，以为外交声援并厉行排斥劣货，断绝贸易关系，禁止对日输出。

11月11日　　江苏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五团体电促北京政府实行废督，谓："全国人心，痛督军攫取财权，拥兵肆虐，一致请废。……恳请从速明令实行，一以遵从全国人心。"

△　徐世昌公布《赈灾公债条例》。

△　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东方部长杨森致中国政府通牒："因为蒙古边疆中国军事当局的要求，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深愿派兵入蒙，一同扫除谢党……俄罗斯共和国既以保持他国主权为职志，当即停止派兵，并希望中国当局，速以严厉手段，将谢党一律扫除。"

△　夜，驻河南许昌军队哗变，抢劫天平街中国银行七八万元；德记、李正乾等六家商铺八九万元；盐店四五万元。至晨3时许，始行散走。

11月12日　　唐继尧、刘显世致电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对北京政府统一通电表示反对，并认为："自和会成立以来，中外瞩目，虽进行稍有障碍，而南北代表职责，依然存在，只能亟图恢复，岂可因噎废食，别图苟和之方？故继尧、显世本救国初志，又经于八月宥日通电，宣明宗旨，仍主由正式和会解决，以及废督裁兵，实行

民治等。……若徒以一二不负责任之言，遂谓西南已归统一，则继尧等爱国护法，始终不渝。此等暧昧苟且之行为，断难承认。”

△　谭延闿通电各县，立即召集各公团会议，征求对省议会制定“宪法会议组织法”之意见事，限三日答复。15日，湖南各界联合会反对“宪法会议组织法”之起草权与议决权归省议会，并揭露谭之限期三日“征求民意”是欺人之谈。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日公使小幡酉吉关于上年11月16日福州事件交涉换文结案，结果是：一、日本政府以公文道歉；二、日本政府给受伤人恤金1300元；三、津贴顺记饭馆800元。其处分犯人及善后事宜，俟两国政府查明后办理。

△　东三省旅京学生17校约千余人，为珲春事件举行游行示威。游行学生手执白旗，上书“力救珲春”、“抵制日货”等字样。

△　奉天省议会为北京政府征求各省对新银行团借款意见事，以此项借款不利于国，致复北京政府表示反对。

△　蒋介石抵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广东情形，旋返奉化原籍。

△　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出版。全书共36卷、88篇、600余万字。该书自台湾开辟至被日本占领前，凡经营、职官、户役、田赋及商务、工艺、风俗等有关情事，一一纂录。书之年限上自隋大业元年（605），止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计1290年。

11月13日　刘显世通电解除贵州军民两政职务，谓：“所有靖国联军副司令，着即撤废。至兼理省长一职，察全黔民意，主由民选。……所有省长职务，由政务厅长代理。”

△　河南自治改进会成立，次日议决四项办法：“（一）实行排除自治之障碍物；（二）提倡平民政治；（三）于各县设立自治会；（四）于京、津、沪、汉、开封等处，办理提倡之报馆。”

△　四川在京议员、学生成立“四川自治期成会”，从事废督裁兵运动。20日，该会开会通过周鸿昌、何恩枢等130余人提出的政治主张，作为该会宗旨，并决定编辑《四川自治旬刊》，宣传废督裁兵和民主自治的主张，以及各省自治运动的消息。

△　湖南各界联合会在长沙青年会开评议干事两部联席会，议决下列事项：注重通俗演讲，发刊报纸，兴办补习学校，促成同业组合会，而以贯彻自治为旨归。

△　夜，驻湘北平江之十二区司令萧昌炽所部士兵哗变。变兵围攻司令部，将萧昌炽（谭延闿派）拘留，次日将萧杀害，推营长于应祥（程潜派）为司令官，实行倒谭。

11月14日　北京国务院设立筹办统一善后会议事务处。

△宁波学生联合会致电靳云鹏，谓：“迩来珲春风云日紧，日人戎骑四布，阳借保护之名，阴遂觊觎之实。非我种类，逼处边陲。全国人士，谁不忿慨。执事领袖全国，岂忍大好江山，一旦沦亡耶？……务希大展经纶，猛勇交涉，解除军事协定，撤退珲春日兵，以慰国人之望。”

△　苏州东乡农民联合浒关第六、第七镇乡民，因抗租将黄埭警所捣毁，并将前往弹压的县知事温某围住不放。后经温某答应将前次拘押乡民释放，至豁免租米，允俟回苏后再行商定，乡民始散。

11月15日　孙中山电促唐继尧向桂边出兵，桂定则西南可固。谓：“歌（5日）电奉悉。……惟滇、桂密迩，可与粤成犄角之势，旋师稍息，尚望转向桂边，并图犁扫。桂定，则滇、粤脉络灵通，西南可成强固之局。彼盗国者虽百方控纵，莫能破我中权矣。希图利之。”

△　驻英公使施肇基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报载莫斯科无线

电称，‘中国军队请莫斯科政府共同出兵攻击谢米诺夫。……一俟击散，即当退回’。实情究竟如何？盼速电复。”

△　粤军占领肇庆。

△　国际联盟在日内瓦举行第一届大会，北京政府派顾维钧、唐在复代表出席。

△　海外国民党同志恳亲大会在广州亚洲酒店召开。出席者有陈炯明、邓铿、洪兆麟、邹鲁、孙科、冯自由、谢英伯等。陈炯明、孙科在会上演说。

△　贵州省议会、农会、总商会、教育会、工界联合会等团体通电，谓：“黔省自护国、护法以迄今日，军民两政全系刘显世一人主持。……现刘省长决意辞职，已由各界公推前云南省长任可澄接任省长，维持治安。……自今以始，吾黔惟本此真确民治，自动自决，立自治之规模，谋人民之福利。谨此宣布。”

11月16日　下午3时，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驻华日使，要求日本即日撤退珲春日军，并拒绝日方所提将来仍可出兵之要求。日使旋即请外交部“将派往珲春替代日兵之华军数目、种别及何日启程，驻扎何地一并复示，以便日军计划退兵”。

△　陕西靖国军总副司令于右任、张钫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之统一令，并声明以下各项主张：“（一）成立真正之民治政府；（二）解决国事，必由公开之和会；（三）助成各省之人民自治；（四）民党应化除意见，为主义上之大结合。”

△　陈毅电告北京政府要求援兵，谓：“敌于歌（5）日退据白彦皋地方，积储粮草，待援反攻。……查此项俄匪，既经蒙人勾引入境，默察现在情形，非达目的不已。且蒙心已变，一发难收……此项匪类，实非寻常可比。盖皆含有政治性质，未可等闲视也。……现弹

药款项粮草三者，均已罗掘将穷。接济不来，后援阻碍，孤城悬处，业至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况毅只身空拳，何以挽此危局？”

△　北京政府外交部布告外国人士在各地设立专门以上学校，得援大学专门学校法令呈核办理。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徐树铮由日本兵营逃走。

11月17日　　徐世昌令内务部着该管官署暨各省区民政长官，切实筹备地方自治；同日，徐世昌又令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

△　贵州代总司令卢焘、混成旅长胡瑛等致电唐继尧，谓：“现刘（显世）副帅决意归里，无术挽留，准于铣日出省。省长一席，已由各界公推志清担任，联军副司令昨奉副帅令着即撤废。……焘等公同议决，黔军总司令部，自11月18日为始，直接联军总司令部统归钧座直接指挥。”

△　粤军占领廉州。

△　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召开联合大会，决定推举代表要求政府废督裁兵，并发表宣言。

△　下午2时，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2.3万余人，为珲春事件，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学生手执白旗，除上书“力争外交”、“大家起来”、“抵制劣货”等口号外，并有“总理卖国，总长卖国，督军也卖国；山东失败，福建失败，珲春快失败”一联。

11月18日　　孙中山致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和旧金山等地华侨，告以进军广西及新政之设施，需款甚多，劝助军饷。

△　天津各界联合会举行评议会决定：关于徐树铮从日使馆逃脱事，应电请政府向日本力争，并将其余各祸首悉数引渡。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允撤退驻珲春日军。

△　北京外交团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遇有关涉俄人民刑各案件，应归其本国法庭按照该国法律审理，与其各国人民一律，此系俄人由条约所赋予之最重利权。"29日，外交部予以驳复，略称："俄侨民刑事件，按照条约，固应归领事裁判，但俄国领事既经停止待遇，已无能行使此项职权之人员。所有在华俄侨民刑事件之职权，自不能不暂时由中国执行。"

11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徐树铮逃出日使馆事，电令驻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徐树铮逃后，发生行动及影响，均日本负责；（二）日武官有纵逃形迹，应予处分；（三）向中国道歉；（四）余八人应速引渡，防再逃。"

△　上海学生致电各省各界联合会、省议会、学生联合会，谓："日使借口政治犯，容留安福罪魁，迭经我国抗议，乃欺我极弱，竟自一再拒绝。乃者徐树铮忽尔出走，显系故意放纵，其包藏祸心，助我内乱，已昭然若揭。请一致抗议，并促北廷引渡余犯。"

△　北京政府致牒日使署，要求撤退中东铁路一带之日兵，谓："其他协约国军队退离西伯利亚，并声明中政府现准备担负保卫铁路与边界之责任。铁路事务，现正在整顿中，日本已不再有驻扎卫兵于该路之必要。"

△　孙中山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凡六章30条。

△　陈炯明召集驻广州全体军官开禁赌会议。

△　王士珍应徐世昌之召入京。

11月20日　鄂军蓝天蔚等致电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表示不承认北京政府之统一令。谓："密奉十月卅一日通电，敬悉北方假

托岑、莫之谰言，遽下统一之伪令，诗张为幻，一至于斯。……蔚等待罪戎行，只知护法。如北方苟遵成约，由上海和会言和，自当固守原防，静待解决。……彼非法政府所下伪令，不独我护法靖国各军不能承认，外而友邦，内而国民，想不至为彼所欺蔽也。”

△　广东全省学生代表4000余人，在高师学校开欢迎粤军凯旋大会。陈炯明偕同洪兆麟、黄强、邓铿出席，并发表演说，提出改造广东，实行禁赌，要求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等项主张。

△　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代表朱和中等八人到公府请愿，陈述二事：“（一）说明自治联合会之组织，及裁兵废督实行自治之主张；（二）田中玉自请废督，应请照准实行。”总统府秘书长吴籍孙当允转达，各代表辞出。并至江西会馆开会，讨论下一步应付办法，结果决定将本日请愿情形，通电各省区地方团体查照，一面筹备二次向北京政府请愿。

△　上海劝学所开国语讨论会，教育部特派员到会，市立各校教员70余人参加。

11月中旬　　全国各界联合会电请河南督军赵倜维持豫省教育，谓：“此闻汴中各校，因当局停发经费，教职员不免枵腹，遂全行停课。摧残教育，贻害青年，莫此为甚。……尚望公等憬然反省，迅维教育现状，俾得渐图发展。”

△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忠告北京政府，迅即废督裁兵，谓：“废督裁兵，国人请求声浪，亦即高且嘶矣，而犹迟迟不见诸命令者，岂以为督不可废，兵不可裁乎。……窃以为今日欲图民治实现，国基巩固，舍废督裁兵外，无他挽救之术。万望我政府当机立断，勿再迟疑，受少数之牵制，背全国之公意。”

△　孙中山答《字林西报》记者问，声明：北方政府统一命令和缔借外债，决不承认。并谓：此次返粤“当竭力以民治主义，改革广

东，如上海、香港然”。“吾人当竭力整理护法各省之政治，俾人民蒙其福利，而得有为他省之模范也”。

11月21日　陆荣廷通电退出粤境，谓：“荣廷顾念邻交，不忍地方糜烂，当通电莫督，主张退让，交还督印，退出省区。……所有驻粤各军，现在已经一律调出粤境，此后粤省地方治安，即由粤人负责。桂省自收回军队，以后自当酌量改编，极力收束。……嗣后一切政争党系，概不与闻”。自8月12日开始讨桂战争至此结束。

△　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入会会员有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东洋纱厂等370多人，孙中山、陈独秀到会演说。孙中山指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

△　黄爱、庞人铨在湖南长沙发起组织“湖南劳动工会”，是日在长沙教育会坪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印刷、缝纫、刺绣、机械、翻砂、纺织、染色、矿工等代表。该会以“改造物质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为宗旨。

△　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济南成立励新学会。学会以新思潮互相砥砺为宗旨，会务主要是发行报章和举行学术讲演。学会会员主要来自省立一师、一中和育英中学的师生。12月15日出版会刊《励新》半月刊。

11月22日　黔省代理总司令卢焘通电：“黔省追随西南各省之后，宣布护法，历有年所。现联军副司令刘公（显世）辞职归里，所有全省陆军部整理事宜，交由黔军总司令继续担任。现在护法事业，尚未了结，本军对于大局计划，仍与西南护法各省一致主张，决不至有所变更。”

△　上海各区商界联合会为反对增加印花税及所得税问题，开联席会议，决定征求全体商界意见，并将商民痛苦转达北京政府，同时

向省议会请愿。

11月23日　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告以："桂军之退，万不可掉以轻心，测其用意，必为集中大力先将魏（邦平）、李（福林）击灭，然后对付粤军。粤军久战疲劳，不堪再遭失利。……务望促臧（致平）师全部速来为要，盖非此粤局必难遽定。"

△　谭延闿通电宣布："自本日起，将湖南督军一职，永远废除，公推赵总指挥恒惕继任湖南总司令。延闿即于是日解除湖南总司令职务。至省长一职，筹办自治，促成制宪，关系至重，亦非铨材所敢久窃，并咨省议会声明辞职，希望选举临时省长，以开民选之先声，俟省宪法制定，再行改选。"

△　赵恒惕通电："本日谭督应召集军政商学各界及各公团，宣布军民分治，废除督军，民选省长主旨，并郑重声明，即解除军民两政职任。总司令一职，交恒惕接任。省长一职，向议会辞卸。另举临时省长，树各省民治之先声。……恒惕庸驽，曷能堪此重寄。惟念全湘治安，关系甚大，暂以师长职权，会同在省高级军官处理军事，一面电商全省军事长官，公推军界中声誉崇隆者，出任总职。主持得人，恒仍愿竭绵薄，促成民治。"

△　湖南陆军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率全体官兵，通电反对谭延闿，谓："谭公巧（18日）电，辞去总司令一职，未始非最近之觉悟。但吾湘之患，不仅在军政一端……麟等血战数年，志在卫护桑梓，奠定国家，岂忍以保全个人权位，危及湘局，危及西南。故敢本爱人以德之训，拟请谭公速自审度，借息群喙。"

△　湘籍国会议员周震鳞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略谓："谭延闿态度不明，政章失当。湘局与护法大局，岌岌可危。湘军迫于公义，湘民激于众怒，覃（13）日于应祥起兵平江，诛谭党萧昌炽。……伏乞电令赵恒惕为湖南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湘民

幸甚。”

△　是日下午，长沙《民言报》被谭延闿勒令停刊。旋该报发表停刊宣言：“本报为代表舆论，监督政府起见，迭贡责言，以期觉悟。……此本月十九日本报所以有《谭延闿可以跑了》社论一则。孰意谭氏不自反省，大肆淫威，严饬省会警厅，勒令本报停刊。”

△　徐世昌公布“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各省众议员初选日期为民国十年三月一日，复选日期为同年四月一日。

△　徐世昌令准青海甘边屯垦使蒯寿枢辞职。

△　是日午刻，广州学生暨拒赌会、拒赌同志团、工商等界三万余人举行禁赌大游行，并赴省长公署请愿。陈炯明表示于12月1日公布禁赌命令。

△　开封学生因争珲春交涉，厉行抵制日货。大纶与永和商号私运日货，被学生查获，按例公罚，大纶商号拒不受罚，致起冲突。军警袒护奸商，借口扰乱市面，殴打学生，拿捕代表，并将开封学生会、国货维持会封闭。

11月24日　　湘西援桂总司令林修梅致电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谓：“湘桂壤地密迩，出兵较易。……兹值西南各军同声讨桂之际，湘军既属护法范围，岂能独辞其责。诸公西南砥柱，言重九鼎，务望电促谭公（延闿），力顾大局，克日就近出师，扫除桂贼。匪惟西南大局之幸，实亦湘人自卫之策也。”

△　唐继尧召集云南军政各界要人，在联部开谈话会，首由唐讲演此次关闭自治之理由，并郑重宣言二事：一、主张正义；二、坚持废督裁兵。应再宣布者：一、团结内部；二否认伪统一令；三、维持本省治安。

△　留沪护法各省各军代表通电挽留刘显世，谓：“读刘副帅元

（13日）电，卸去军民两政，不胜觖望。……时局正艰，讵宜听其远引，且总裁暨副司令两职，重关西南大局，不仅一省问题。除由同人等联电挽留，尚望诸公一致敦劝，俾竟护法大业。无任盼祷。”

△　桂军败回梧州后，颇多骚扰。梧埠各界联电吁恳谭浩明，迅将各军调离梧埠。

△　河南赵倜、张凤台等否认以郑州商埠抵借日债，谓：“现吾豫财政奇艰，商同议会借款，曾有此计划。惟以商埠抵借日款，并无此事。”

△　驻保定东关外之十一师军队，全体哗变，抢劫住户商号。曹锟派军队前往夹攻，擒获变兵两连，逃跑70余人。

11月25日　　孙中山偕伍廷芳、唐绍仪等由沪赴粤，同日，孙中山致电谭延闿、赵恒惕，告以“现已走赴粤，重组军府，共策进行”。

△　赵恒惕通电就湘军总司令职。同日，湖南省议会通过林支宇为临时省长。

△　王占元反对夏寿康接任湖北省长，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以此要挟。

△　青岛屠商85家，因内捐勒索太重，营业困难，要求减税，是日罢市。

△　徐世昌派王景春会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

11月26日　　上午11时，徐世昌宴请王士珍商谈维持时局问题，陪宴者为靳云鹏、姜桂题、张怀芝、张志潭、周自齐、田文烈、王怀庆等。

△　徐世昌任命色特那穆巴勒珠尔为唐努乌梁海盟长。

△　陕督陈树藩致电北京政府陈述实行废督四大理由，并称：“夫所谓宜废督者，乃督军之制度，非督军之名称。若存其实而易其名，其为实也如故。……如虑施行有滞，请自陕始。”

11月27日　成都资属中学及储才学校学生在少城公园赛球，遭在场操练的靖川军第六路士兵两连殴打，二人重伤，四人被拘于营房。是夜，各校学生2000余人，手持火把，到刘存厚司令部请愿，不得结果。29日，中学以上学生一律罢课。30日，小学生亦一致罢课。同日，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五人，至刘存厚司令部进最后之忠告，并限刘于12月1日12时以书面答复学生之要求：“（一）惩办肇事军官，解散士兵；（二）抚恤赔偿受伤学生；（三）公共体育游戏场，永禁军队下操。”如无圆满答复，学生即于1日游行警告。

△　谭延闿被迫由长沙去上海。

△　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在高师附中开全体大会，首由主席马叙伦报告前次代表与专门校长接洽情形。全体一致决议，先致书专门学校校长团，提出最后警告：“本月三十日以前，教育部如不补发积欠薪金，各校教职员即于一日全体辞职。”

△　苏俄政府以白俄恩琴败退，库伦形势缓和，声明暂不出兵。

11月28日　下午5时，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偕同唐继尧之代表乘专车抵广州。当晚孙中山在省署宴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吾国必须统一，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吾辈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和平统一之基础。”

△　北京政府派赴苏俄之代表张斯麟转来苏俄政府对北京政府提出之正式声明八款：“（一）凡旧俄帝制政府与中国订立一切条约，劳农政府均愿根本废弃；所有从前获得各种之权利，亦愿交还中国；（二）劳农政府愿与中华民国在最短期间内，恢复通商贸易；（三）

劳农政府愿中国政府禁止旧党在领土内为反对劳农之行动，遇有此种事实，请即解除其武装，交由俄国处置；（四）劳农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与旧俄帝制时所派遣之外交官断绝关系，极表满意，嗣后仍望坚持斯旨；（五）劳农政府愿将在中国领土内之治外法权完全撤废，留华俄人绝对服从中国法律；（六）劳农政府愿放弃庚子事件所得赔款；（七）劳农政府愿将中东铁路交还于中国，但关于直接利用，由中俄两国及远东共和国代表特别协议之；（八）劳农政府愿中俄两国互相派遣外交官，并设置领事。”

△　李仲麟致电赵恒惕、林支宇，谓：“麟意湘中政局，遇事当求公开，用人一端，尤须平慎。贤者能者，虽仇必录。贪者黩者，纵亲必除。不假阴私，庶自治理。……惟望顺应潮流，刷新庶政，本民治之精神，谋根本上之解决。并应迅制省宪，树联省自治之基。由湖南推及全国，是我三湘无上之荣誉，无量之幸福，皆由二公实肇造之。”

△　江苏公民监视选举团是日通告成立。12月1日，该团致电江苏60县教育会、商会、农会，谓：“历届选举，黑幕重重，代表不良，遗羞全省。本届选举，为日已近。同人等痛定思痛，以为根本救济，非从监视选举不可。以是集合江南北各县同志，组织江苏公民监视选举团，为各县倡。”

△　《越声》创刊。该刊为绍兴旅杭学生同乡会主办，以“联络乡谊，交换知识”为宗旨。

11月29日　　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等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并重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选定各部部长：内务部长孙中山兼任；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

△　下午1时许，孙中山视察广州军事要地观音山。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接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商订中俄通商办法。

△　湖南临时省长林支宇通电就职，谓："谭前省长主张民选省长，坚请辞职。支宇经本省议会选举为湖南临时省长，与辞不获。业于本日宣誓就职，一俟正式省长选出，即行辞职。"

△　国会议员高振霄等117人致电刘显世，谓："读元日通电，裁撤联军副司令一职，不胜失望。……特此联电挽留。务恳仍任联军副司令，与唐公共策大计，早就总裁之职，以西南局势，冀达护法目的。"

△　夜半，驻宜昌十八师与十三混成旅士兵，因欠饷数月，突然哗变。变兵四出焚烧抢劫，历两日之久。商号全被劫，外商亦受损害。经商会出面与军队协议，由中国银行拨款10万元，分配给十八师与十三混成旅，始告结束。此次全城损失约达2000万元。

11月30日　　中俄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谈。中国方面出席者为刘境人、朱鹤翔，远东共和国方面为优林及随员柯尚宁等。北京政府提出四项前提条件，待得有确实担保后，再行商议商务经济问题。北京政府关于缔结商约之四项前提条件："（一）在中国领土内，不为任何政治行为之鼓吹；（二）赔偿中国侨俄人民因俄国政变所受之损失；（三）担任保护现居远东各地华侨之生命财产，并予一切便利；（四）中国人民在新疆边地及后贝加尔湖地方，曾遇种种可憾情事，应明白处理，并须遏止此种情事重行发生。"优林表示承诺。

△　远东共和国驻华代表团致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宣言：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恢复两国领事制度；三、拒绝道胜银行要求；四、发展两国商业；五、恢复邦交，作为中俄谈判基础。

△　孙中山复电陈炯明，指出："此后战略宜大变更：集中全力，速趋省城为上策；集中全力，以扑灭麻子为中策；缩短战线，握要固

守，以保势力，而待援军亦为一策；惟不忍舍去地土，与敌相持，分薄兵力，则为下策。”

△　广东各界开会筹商12月1日庆祝禁赌事宜。

△　旅沪湖北公民大会汪鸿翥等213人致电徐世昌、靳云鹏，指责鄂督王占元拒绝省长夏寿康到任，谓：“天祸中国，督军跋扈。武人干政，请饷增兵，借示要挟。吾鄂夏省长奉中央命令长鄂，人民方庆得人，乃王督始则请假辞职，迫胁中央。继则于夏省长到鄂时，令各军官反对，以示拒绝。应请中央维持威信，速电王督上奉政令，下顾民情。”

△　孙中山在军政府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议决重组军政府后的事宜，并讨论西南有关政局的重要问题。

△　徐世晶派魏宸组为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豫督赵倜，谓：“此次河南学界因争珲春交涉，厉行抵制劣货。事不为商界所谅，致演罢市风潮。执事调节无方，复滥下戒严令，明纵军警，摧残学界。在学生手无缚鸡之力，奚事妄逞威权，此中岂具有难言之隐，得无畏豫学界提倡裁兵废督，清理财政，将不利于己，而故欲向学界行示威运动，虚声恫吓耶。自治自决，已成时代潮流，万难遏止。尚恳执事痛自反省，从速取消戒严，恢复学生自由，俾得发挥真正之民意。”

△　济南国货研究会及学生联合会，为志兴成商号私贩日货，议决罚款10000元，并以此款捐赈。

△　福建财政厅与台湾银行签订《福建省财政厅借款追加契约》，按原借款契约规定，增加担保。

是月　　陈独秀主持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内容包括：一、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二、共产主义者

的目的；三、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阐明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党的最高纲领。《宣言》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按照上述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产阶级斗争，并获得政权，像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宣言》没有对外发表，仅作为内部收纳党员的标准。

△　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向各支部发出《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各发展党员30人，组成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　北京共产党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该组织于本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参加。

△　孙中山于20日前后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是为共产国际使者同孙中山首次会见。会见时，孙中山询问了俄国革命的情况，以及如何同俄罗斯建立联系的问题；并告知几天之后，他将返回广州。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绥路局与三井会社签订日金14.7万元、美金1.9万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订购机车附件价款及运费。

△　北京政府审计院、财政部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审计院、财政部各借银元30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担保，用于审计院经费。

12月

12月1日　　中华民国军政府启用新印布告：“军政府新刊印信一颗，文曰：‘中华民国军政府’。已于本年12月1日启用。所有从前之军政印，即行作废，此令。特此布告。”

△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通电发布军政府建设方针宣言，略谓：“今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

△　《新青年》八卷四期出版，《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汇辑张东荪、陈望道等人文章，及陈独秀与张东荪来往信件共13篇，就中国发展道路开展了讨论。

△　陈炯明在广东省长公署举行禁赌庆祝典礼，各界除举行大游行外，并于是晚举行提灯游行。

△　广东省长公署颁发第三号布告：“赌博之祸，甚于洪水猛兽，而吾粤赌风之盛，尤甲于天下。……现省会十二月一日起，各县自文到之日起，无论何项赌博，悉予禁绝。自禁以后，如有再行犯者，概以军法从事。”

△　驻日本公使胡惟德向日皇递交国书。日皇因病，特令皇太子代为接见。

△　赵倜在开封下戒严令，禁止开会。3日晚，学生在某校秘密开会，决定：“（一）学生全体自首；（二）征收学生特别捐；（三）反诉商会；（四）促职教员赶组教育会向北京电告一切。”5日，警察将国货维持会封闭。6日，又将学生联合会封闭。11日，军警闯入学校，强迫学生离校，并宣布解散学校令，违者以过激党论处。

△　徐世昌令：“前于停止驻华俄公使领事待遇令内，曾剀切声明，凡侨居华境俄国安分人民，仍应照旧切实保护。惟恐各地方奉行

不力，拊循安集，或有未周。用再严申诰诫，着责成各地方军民长官督饬军警，对于侨居境内俄国人民，务当照旧切实保护，一体妥为待遇，用副本大总统保护外侨之至意。”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签订日金300万元借款合同，以财政部提交八年公债票300万元、国库券100万元为担保。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行化银15万两借款合同，以期票为担保。

12月2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复电贵阳卢焘代总司令等，谓：“诸君出任艰巨，对于大局计划，仍与西南护法各省一致主张，甚为佩慰。望即本此决心，共策进行。”

△　江苏省议会议决废止茧行条例案后，江宁缎业机工闻讯，痛切剥肤，即几次去议会请愿，并陈述意见，俱无结果。是日，机工数千人至省议会请愿。某议员厉声斥责工人请愿为“胡闹”。各机工遂群起鼓噪，一时秩序大乱。嗣由缎业各董事恳求官厅维持秩序，遂由江宁县长代表省长当众宣布，决定维持原案，始各散归。

△　湖南醴陵张智通电：“智自奉孙总裁命，同周道腴先生回湘组织援粤军队。时因谭延闿把持湘政，与桂系狼狈为奸。阳许智以援粤湘军游击司令之名，而暗中则遇事牵制，不使有发展之余地。……现在粤局敉平，湘事安谧。智不欲多树旗帜，为湘省增重负担，用将所部即日收束，还粤复命。尚望湘省诸公，本孙、伍、唐各总裁之主张，与护法初衷，不相违背。”

12月3日　赵恒惕致电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推荐程潜“出任长陆军”，谓：“现在军府成立在即，陆军部长一职，总握军事中枢，关系极为重要。……程公潜自湖南起义，转战千里，恢复长、岳，功在当时。倘以之出长陆军，必能胜任愉快。敬恳诸公酌裁，予

以特任。”8日，孙中山复电谓：“拟任程君为陆军次长。”13日，赵恒惕再电复孙中山谓：“程颂云潜兄，刚健笃实，晓畅军机。承畀陆军次长，为事择人，诚为恰当。”

△　徐世昌任命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任命齐燮元署江苏督军；任命何丰林为松沪护军使。

△　湖北旅京同乡会在湖广会馆特开紧急会议，决议五项：“（一）暂设省公署于汉口；（二）设立省参事会；（三）速设全省自治筹备处；（四）组织会议制的选举事务所；（五）设立财政委员会。”并一致决议要求解散孙传芳所属一师，更以孙传芳纵兵殃民之罪状，通电全国。

12月4日　广州军政府续开政务会议，研究刷新吏治、实行建设等问题。

△　下午3时，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于北京江西会馆开全体大会，鄂、苏、赣、闽、皖、晋、川、察、绥、京等十余省区之代表与会，讨论湖北、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等省提出之紧急事件。最后决议三条办法：“（一）通电全国，说明北政府故违民意之详情；（二）函请王士珍勿庸到任；（三）用书面向北政府请愿。”

△　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八团体致电徐世昌，请速予各省以自治实权，并将巡阅使、督军等职次第裁撤，以从民意。

△　东三省旅京学生代表祁大鹏等四人，为珲春事件赴外交部求见总长，不得要领，乃改赴靳云鹏私宅。靳派杨湘代见，代表提出质问六条，请靳逐条答复。

△　湖南总司令赵恒惕通令：“近查各军，间有无知之徒，被奸人所构煽，借名索饷，滋生事端。……其积欠饷项，亦令各部队速即清查，限两月内造册呈报，以便分期补发。……责成各该长官切实训

诫，务令人人共晓，众志成城。嗣后不致再有闹饷之事发生。”

△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岳维峻，因陈树藩造谣离间，诬其变节投北，特发通电辟谣：“自伪统一令下后，维峻随总司令于公通电表示，决不承认，当为海内所公见。……近阅报纸，陈树藩电达北廷，肆行诬蔑。谓峻将率队往归，陕局由伊收束云云。……诚恐蜚语流传，乱人耳目，谨布胸臆，诸维亮察。”

12月5日　　天津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国务院，要求“即日讨论合法军治，使一国军人直辖于中央陆军部；所有督军、巡阅使、镇守使、护军使、总司令等名目，一概取消”。

△　江苏省议会致电北京国务院、内务部，谓：“本会猝被暴徒捣毁，昨先陈大略。……二日近午，忽有数百人聚集距本会南首里许之鼓楼地方请愿。……午后一时许，忽来千余人。为首者手持请愿白旗，一方闯入会，守卫长率守卫拦阻无效。续来数百人高声喝打，将议场桌椅玻璃窗悉行打毁，逢人便殴。计议员施文熙、孔昭时等十人，秘书处职员黄端履等五人，均被围住撕殴。旋将诸人虏去，由本会直曳至城南三坊巷缎业公所。”

△　上午10时，苏、皖、赣三省代表在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事务所开联席会议，反对北京政府任命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议决：“（一）不承认苏皖赣巡阅使之命令；（二）通电苏皖赣三省各公团，若政府不收回成命，三省人民，应速起自决；（三）以书面劝告王士珍坚辞到底。”

△　张振武所部之第五团，因欠饷哗变，整队进入长沙，把守各城门，禁止出入，分队向各机关索饷，并包围财政厅。6日上午，将讲武堂（即总司令部驻地）打毁一空。下午，三旅补充团团长郭步高，率领多营闯入总司令部，驱逐部内各职员，赵恒惕并被监视。7日，各公团开紧急会议，由淮商公所拨洋五万元，先发11月欠饷，商

请两团退出长沙。

△　第一届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幕。

12月6日　　广州军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北方频年行动，最有害于国者三：一、利用军阀盗窃政权；二、以善后赈灾等为名，欲欺骗新银行团，而未经得国民承认之借款，擅加国民之负担；三、宣布伪统一令，自认非法，而又以无国法上地位之机关，擅令各省举行伪国会选举。凡此三者，苟有其一，已足破坏和平，陷国家于危境。本政府仍盼北方速行屏除军阀。停止借款，取消伪令，庶可相见以诚，继续开会，为正当之解决，以符人民之希望。"

△　中华工商研究会因北京政府通令加征赈税，各业万难负担，致电北京政府农商部请收回成命。

△　广州军政府下令裁撤广东各道道尹。

△　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邓萃英兼代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　京师警察厅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银元2.5万元借款合同，以八年公债票为担保，用于偿付财政部担保北洋银行欠款、警察服装价款。

12月7日　　贵州省议会全体议员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唐继尧、唐绍仪，表示不承认北京政府之统一令。

△　湖北旅京同乡会揭发鄂督王占元指使部属孙传芳以武装威胁鄂人，不准夏寿康接印长鄂代电："此次鄂人治鄂之请，特简夏寿康为本籍省长。王占元坚不同意，迭电请假以事挟制。漾（23）日下午六时，竟由王督部下暂编第一师师长孙传芳派营长王铸民至省长寓内肆行要挟。声言不准接印，速自为计。否则大兵一到不可测也等语。旋出孙传芳等公函内称，军气激昂，于执事不利，请缓到任。"

12月8日　旅沪安徽自治协会致电北京政府，请收回王士珍苏皖赣巡阅使成命。

△　甘肃旅沪同乡会通电本省各机关团体并致电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主张废督，实行自治。

△　徐世昌令裁撤帮办江苏军务缺。

12月9日　广州军政府海军部长汤廷光通电就职。

12月10日　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湘邀集川军各军师长在重庆开会，提出四川自治主张，决定分电刘存厚、熊克武征询意见，以期速解川局。

△　徐世昌派董士恩兼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处长。

△　上海总商会、县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请收回加征赈捐成命。

12月11日　曹锟、张作霖等北方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磋商统一问题。称：沪上和会，因事实分歧，此后只有意见之商榷，不必更拘形式，善后之事，自宜使国人共见共闻。

△　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在京开全体大会，由四川省议会代表报告川省最近形势，河南学生代表报告赵倜蹂躏学生详情，湖北代表报告地方糜烂，王占元不能维持治安情形。全体主张分省推定代表，并定于13日前往府院质问。

△　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开成立会。会后公布联合会宣言与简章。简章规定：本会以实行各省区自治，废除妨害自治之督军及类似督军等制度为宗旨。

△　北京学生联合会在燕京大学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宣传该会对我国内政、外交问题之主张。

△　甘肃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电复甘肃旅沪同乡会，谓："甘事纠纷，至今未决。废督一举，极表同情。兹卢（永祥）、田（中玉）、陈（陈树藩）三督通电主张，均经复电赞成。惟中央俯顺舆情，早罢张督（张广建），俾得实行自治。诸君关怀桑梓，尚祈共同进行，是所企盼。"

12月12日　孙中山由广州前往韶关，沿途视察并收编民军。旋即返广州。

△　江苏全省商会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财政部、农商部，请克日明令取消加征赈捐案。

△　广东公民陈其等数百人，控告《国华报》、《大同报》、《国是报》、《新报》等捏造事实，登载反对粤军之广告，暗助桂系，显犯有附逆之罪，请严予惩办。是日，粤警察传讯该报等，并由司法当局提出诉讼。

△　旅京江苏同乡会在该省会馆召开紧急大会，讨论下列各项：一、省议会被打问题；二、废督废巡阅使；三、苏警察归苏人自办；四、省会移置苏州；五、请求苏省议会迅速通过自治法案。

△　川军将领刘湘、但懋辛、刘成勋等通电主张四川独立自治，反对川督刘存厚。

△　上海银行公会以据闻天津造币厂有抵押日款之说，致电北京政府财政部询问究竟。

△　上午10时，上海经济研究会在总商会开临时干事会，与会者马寅初、刘南陔、盛丕华等，公推马寅初为临时主席，商讨进行方法及草订会章。

12月13日　上午9时，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代表朱和中等七人，赴新华门请见徐世昌，要求废督裁兵，徐称病不见。

△　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揭露闽督李厚基、陕督陈树藩逼民种烟，按亩勒税罪行，请各报馆各团体一致声讨。

△　优林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承认中国提出之四项条件（按：指11月30日中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中方所提缔结商约四项条件），并希早日开议。

12月1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徐树铮潜逃事件，再次照会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要求引渡安福系祸首段芝贵等八人，如再脱逃，日使应负全责。

△　全国学生联合会指斥赵倜镇压学生，摧残河南教育，呼吁全国各界一致主张，驱逐赵倜。

12月15日　中国当选为国际联合会行政院非常任理事。

△　孙中山就“自由贸易”问题发表意见，指出：“目下之税则，徒助励外货之输入，损中国之出口家，以利外商而已。”指斥“海关仅为外国入口家经营，以遏制华商为务”。

△　《评论之评论》是日创刊，其宣言声称：“‘评论’是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生命底唯一锁钥。”该刊为北京大学法科学生主办的刊物，由上海大东图书局发行。

△　中暹减税交涉结束。暹罗（今泰国）政府对于我国侨商征收重税，经北京政府外交部责成驻暹领事严重抗争，暹政府已允为减轻，计：一、入境人头税，全免；二、农税，每年每亩加课30铢，减为年课10铢；三、营业税，旧年课十分之一，减为年课二十分之一。

12月16日　　甘肃海原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8.5级，震中烈度达12度，地震持续了十余分钟，波及二万多平方公里，90多个县都有人在地震中伤亡。据各县报告，地震区内人民，共死亡23.4117万人，约占该地区人口三分之一。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

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海原大地震是人类有记录以来三次大地震之一（另两次为智利、墨西哥大地震）。

△　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聘，陈独秀离沪赴广州，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1921年2月起由李达代理）。《新青年》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负责编辑。

△　江西省议会致电徐世昌、靳云鹏，再次提出去戚（扬）拒丁（乃扬），赣人治赣要求。

△　熊克武通电赞成四川独立自治，刘存厚反对。

△　顾维钧在国际联盟会提出，对“鲁案”声明于下届国际联盟开会时商议。

△　顾维钧电告北京政府，国际联盟对于中国提议取消各国在华邮局一案，业已完全通过。

△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赵倜，声讨其“串通北廷”断送河南以及解散学校、蹂躏学生之罪行。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英国福公司签订清孟铁路英金8.9962万镑借款合同，以本支路轨道及收入为担保，用于建筑清化至孟县铁路支线费用。

△　北京政府农商部推行新制度量衡，订定于各省实业厅下附设官督商办之度量衡制造局等四项办法。

12月17日　湖南水口山矿工5000余名，因矿主拖欠工资，生活无着，全体停工。19日开全体大会，商议维持办法，全场议决：一、急向衡州等处商借谷米维持生活；二、公推代表赴省告急。

△　上午9时至下午4时半，北京37校学生3000多名，为旱灾纪念日沿街劝赈，售卖纪念章，并散发传单为灾民呼救。

12月1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将与优林谈判经过及准备开议情形，密呈徐世昌。

△　北京政府财政部原定于民国十年1月施行之所得税条例，因各省商会纷纷要求展缓，是日通令各省财政厅，暂缓于民国十年4月实行。

△　江西省议员龙钦海等致电旅京江西会馆同乡会，告以："本会本日提出省长民选，及弹劾省长戚扬两案，均依法通过。"

12月19日　　河南全省学生会豫西总分会在洛阳商场开公民大会，与会者2000余人。首由学生理事报告，继由公民代表发言，谓："此次赵倜摧残教育，盗卖郑州，实全省之公敌，应将学生二次请愿团，改为公民二次请愿团。"当即表决，办法有四："（一）二次致电政府，请严惩赵、张；（二）致电曹、张两使，责其渎职；（三）组织全省公民二次请愿团；（四）由各界推出代表二人，速组国民自治团，决于阴历十年元月一日起，实行罢工罢税。"

△　江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赣省自治问题，要求政府速去省长戚扬，选举赣人中最贤明者长赣。

△　广东各界联合会召集会议，通过议案三条："（一）请愿出师援桂；（二）要求外交团，将关余照前交回南方政府；（三）不承认莫荣新、杨永泰等未经人民同意及合法省会通过，私自押与外国银行之公产及赋税等等。"

△　李烈钧所部滇军从四川退出后，拟假道湘省入粤，连日与湘军在晃州、芷江等处接战。是日，李军占沅陵。

△　江西总工会筹备处开会议决向省议会请愿严禁米谷出口，以

维工人生计，并于次日将请愿书呈送省议会。

△　中国派往参加万国丝业博览会的代表团，乘“俄国皇后号”船启程赴美。

12月20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会议通过《官吏任职宣誓条例》，共四条。规定官吏“不得营私舞弊，滥受贿赂”。定于1921年元旦起实行。

△　旅沪改造广西同志会，为陆荣廷在桂成立国会选举事务所事致电徐世昌、靳云鹏，声明：“此等非民意之机关，他日所产议员当然无效。”

△　江西省议会通过民选省长、弹劾戚扬两案后，督军陈光远是日召集军政官员会议，竟指省议会为“非法会议”，声称：“以后如有非法行为，无论何人，不得瞻徇情面。”

12月21日　孙中山致函吴忠信，告军事发展计划，“首在攻桂，次则进取武汉，以窥长江，而定中原”。并望其声援。

△　北京国务院致电江西省长戚扬，指斥“该省议会擅倡民选之议，实为逾越权限。似此非法行动，自不能发生效力”。

△　吉林督军鲍贵卿、吉林官银号与朝鲜银行签订小洋200万元借款合同，以官银号不动产、吉林电灯厂财产及收入为担保，用于救济市面金融。

△　奉天各学生团，为要求早日解决珲春事件，全体罢课。是日学生出发游行示威，被学校当局阻止，回校后军警严密监视，把守校门，次日虽系冬节放假，仍不准外出。

△　厦门暨南总局教育会、总商会等团体致电华侨联合会，谓：“英属新加坡等处居留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条例，不日实行，目

的专在摧残华侨教育，经该属侨胞请求取消无效。……佥恳协力电请政府，严向英使交涉取消，并恳各团体各报馆鼓吹民气，以作侨胞后盾。”

12月22日　　上海南北两商会讨论赈税问题。各商界一致拒绝，要求两商会再电国务院，赶速收回成命。否则一致停止营业。

12月23日　　河南旅京学生在北京大学开全体大会，决定自本日起向府院请愿，并提出下列七项要求：“（一）撤惩赵倜、张凤台、龙敏修、柴得贵；（二）请饬河南军民两长即刻恢复教育原状；（三）即刻取消戒严令及逮捕令，并抚恤受伤学生；（四）保证河南教育经费永远独立；（五）保证河南永远不得再借外债；（六）惩办滋事奸商；（七）速筹废督裁兵办法。”

12月24日　　中日庙街交涉结束：一、由驻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本政府道歉；二、前尼港中国海军司令向日军总司令道歉；三、负轰击之责任者，应加惩治；四、以三万元抚恤误毙日侨家属。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并发布训令，说明国音系以普通音为根据，不含北京土音。

△　徐世昌为中国当选为国际联合会非常任理事，通令全国，勖勉国民“化除畛域，力图统一”。

△　吉林省议会与各界代表四人，为力争珲春案出发赴北京请愿，行至长春，被官厅逮捕。

△　赵恒惕以有重要军事相商为由，电召李仲麟等来长沙，当日深夜将李枪杀，其第四团团长瞿维臧亦被枪决。赵恒惕旋于26日通电宣布李、瞿“拥兵自恣，屡违节度，蓄意倡乱，破坏湘局……勾结军队，约期举事”罪状。

12月25日　　徐世昌特派顾维钧为中华民国国际联合会行政院代

表。

△ 《新安徽》是日创刊。该刊由旅沪皖人所主办，鼓吹安徽自治。

12月26日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为上海商界反对附征赈捐致电北京政府，请“查照该商会等屡次电呈，暂将上海一埠附征赈捐，缓予施行”。

△ 星期通俗讲演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该会以“利用星期日作通俗演讲，以启国民常识”为宗旨。

△ 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大学开成立大会，通过会章，并讨论日本在厦设警问题，议决四项办法：“（一）电厦门各团体先起抗争，以奋起全国之响应；（二）请闽省学生会在京代表共同鼓吹；（三）发行印刷品，引起国人之注意；（四）函请上海福建同乡会一致行动。”

12月27日 张作霖在使署召集文武要员40余人开政务大会，讨论：一、援鄂问题；二、编旅问题；三、珲春问题；四、吉防问题；五、学潮问题；六、警务问题。

△ 甘肃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等致电北京政府，声明与甘督张广建脱离关系，要求迅免张氏，另简贤能长甘。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电江苏省议会，要求省议会“咨请行政官厅，禁发出口护照，严查囤积居奇，以维民食而除大害”。

△ 黎元洪致电湖北旅京同乡会，反对王占元加发湖北官票1000万串，另增常年军费400万余元。

12月28日 徐世昌任命溥良为正红旗汉军都统。

△　广东财政厅与台湾银行签订毫银30万元借款合同，以旧军械局官地及东堤日字空地为担保，用于付息垫款。

12月29日　徐世昌令："据谭浩明李静诚电呈：'军府业经撤销，责任解除。特率全省文武官吏，宣言取消自主，一切政令悉候中央主持。并据耀武上将军陆荣廷电呈，军府收束，国是大定，亟盼从容措理，郅治观成。'……所有该省善后事宜，即着遵照前令，悉心妥筹办理。"

△　北京国务院为据步军统领王怀庆呈请饬订专条，从严取缔过激党煽惑劳工事，令内务部查核办理。

△　粤汉路工程部工人因欠薪举行罢工。

△　南洋英属新加坡等地华侨，为力争取消学校注册条例，公推回国请愿之代表余佩皋于27日到上海，是晚8时在青年会演说，呼吁政府提起国际交涉，并希同胞协助进行，并说明此条例将于明年1月18日实行，请政府先电英政府缓行，再图正式取消。

△　徐世昌特派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调任唐在复为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公使；调任王广圻为驻荷兰特命全权公使。

12月30日　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

△　徐世昌令四川省长张澜开缺，另候任用；特任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任命刘湘为重庆护军使。

△　徐世昌任命田颂尧为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唐廷牧为陆军第二十二师师长。

12月31日　徐世昌特任蔡成勋为甘肃督军兼署省长。蔡成勋未到任以前，由陆鸿涛暂行护理督军，陈阎护理省长。

△　徐世昌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

△　驻英中国使馆否认库伦中国官吏曾请苏俄政府出兵助剿白俄恩琴。

△　北京政府向苏俄政府抗议，否认曾请其出兵援助库伦。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法金5622.4566万法郎借款合同，以期票为担保，用于支付实业借款息款。

△　留美学生监督处与美京银行签订美金六万元借款合同，以期票为担保，用于支付留美学费。

是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财政部与华俄道胜银行分别签订借款合同，教育部借银元100万元，财政部借银元22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担保，用于政费。

△　北京政府代表与美国克荻士公司代表签订飞机借款合同，借美金200万元，以政府允发无记名八厘国库券为担保，用于修建飞机库、工厂、航空学校管理等。

△　北京政府财政部汉口造纸厂与慎昌洋行签订关平银27.7166万两借款合同，用于支付购料价款。

△　天津大丰机器面粉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倪道杰、赵德珍、王保新，资本银80万元。

△　浙江第一印刷公司工人创办《曲江工潮》。该刊以“革新旧工业，研究新艺术，图谋工界福利，增进工人知识”为宗旨。

△　上海印刷工会在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下成立，工人入工会者1600多人。该会出版刊物《友世画报》。

是年　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灾民2000万人，死亡50

万人，灾区共达317县。

△　到本年为止，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已有1759家，工人55.7622万名。

1921年（民国十年）

1月

1月1日　　广州军政府在广州举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周年纪念大会。广东省军政各界要人、国会议员、知名人士及群众1000多人与会。军政府总裁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主张"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

△　广东各界在广州举行禁赌、援桂及提倡国货游行，各团体数万人参加。群众手举旗帜，沿途散发传单，要求禁赌、出兵援桂、否认桂系军阀借款、令外交团交回关余。午后1时，队伍过军政府，各团体推举代表100多人，谒军政府各总裁，呈递各界联合会请愿书。当由孙中山、伍廷芳予以优礼接见。孙中山表示："余可完全答应，但诸君亦须合力相助乃可。"

△　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令准两广巡阅使龙济光辞职，特任为隆威上将军。

△　徐世昌令内务部组织地方行政会议，由各省及省议会各派一人赴京，讨论地方自治办法。

△　徐世昌令财政部拨银六万元赈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旱灾，浙江、湖南两省水灾，甘肃等西北地区震灾。

△　上海城厢内外闸北一带，各大商铺张灯结彩，庆祝元旦，除悬挂国旗外，并悬出白旗，上书"尊重约法，反对苛税"，抗议北京政

府假赈灾为名，实行加征赈捐、印花加贴及所得税。同时，天津、杭州、宁波、江苏及江西等地商人也纷起反对苛捐杂税。

△　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派邓中夏到长辛店机车厂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是日正式开学。补习学校分日校、夜校两部分。日校招收工人子弟入学，一般工人在夜校学习。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亦在纱厂集中地区小沙渡组织劳工半日学校。

△　袁玉冰、邵秀峰等八人在南昌发起组织鄱阳湖社（后改称改造社），发表宣言提出以改造社会为宗旨，主张“打破一切威权和阶级制度”、“劳工神圣”，出版《新江西季刊》。1922年在南昌中等以上学校发展社员，有方志敏等100多人参加，后又向各县发展。其后，大部分社员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　《国有铁路客车运输通则》、《货车运输通则》、《货车运输负责通则》、《统一使用公制度量衡表》等四种章则，开始在国有铁路一体施行。是为国有铁路客货运输制度和办法趋向统一之始。

△　北京、浦口间开行直达特别快车，是为各路间开行直达列车之始。

1月2日　　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抵广州，次日电请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偕在沪同人来粤开会。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就南洋华侨教育事，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及驻京英使艾斯敦，谓英在南洋群岛提出学校注册条例，“无异限制华人学校之发达”，要求将该条例暂缓施行。4日，华侨联合会开紧急会议，商定办法，吁请北京政府向英国交涉。

△　北京大学罗素学说研究会邀请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柏克莱讲演。罗素在讲演中宣称社会主义不能行于今日之中国，资本主义为必经之阶段。嗣后，罗素亦在各处做同样内容之演讲。

1月3日　　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成立。孙中山派张继为干事长，周震鳞为总务科主任，田桐为党务科主任，黄复生为财务科主任，邓家彦为宣传科主任。

△　晨，蓝天蔚率鄂西民军3000余人猛攻高店子，当地驻军败退。王占元急调孙传芳率队堵击。民军终因众寡不敌，械饷两缺，于是月下旬退入湘境。

△　厦门商民为反对福建督军李厚基增收柴米捐，全城罢市。至次日下午经道尹、知事及商会劝解始开店营业。5日各中小学校一律罢课，以示声援。

△　留英学生1000余人致电北京政府，告以英日联盟又有赓续之议，所订条约涉及我国之处，未得我国同意，有损国体，亟须反对。

1月4日　　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王伯群联名电促吴景濂速偕留沪议员来粤开会。到次日止，已有15省议员到粤。

△　海拉尔流行鼠疫。自上年11月以来，患者达200人，其中死亡者62人，除24人系死于他症外，余38人确系死于鼠疫。北京政府交通部决定自是日起，海拉尔东西三站间停售车票。同时海站戏馆、旅舍也一律歇业。

△　美国大通银行在上海设分行，美籍经理澳尔文劳杰司，华人经理张颂周。

1月5日　　广州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议决废止袁世凯公布之《惩治盗匪法案》，旋于8日由司法部通令废止。

△　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报》自是日起连载华北五省灾区惨状：元旦前后有千万灾民无衣无食，冻饿而死；豫北灾民约有千余万，豫北、豫西平均每日约死五六千人之多；豫省陕县、渑池两县人民食柿蒂、柿树皮、荆条子、石粉，“老人食不下咽，小儿

屎不下肛”。直隶受灾80余县，灾民以食蒺藜、草根充饥，直隶顺德灾民某妇烹食幼子。另据驻京美使克兰估计，去年华北灾情惨重，每日死者达万人。

1月6日　　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发表第二次宣言，表示愿与北京政府继续议和。

△　白俄阿年阔夫匪部700余人在新疆古城举行暴乱。经我驻军协力堵御，匪部不支，被迫解除武装，一半遣送甘肃敦煌安置，一半留新疆安置。按：阿年阔夫系沙俄七河省陆军少将，上年为苏俄红军击溃，率残部逃入我国新疆各地，先后为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兵解除武装，多数资遣返回俄境，所余不愿返回者被安置于古城等地。

1月7日　孙中山致电蒋介石，促速来粤襄助援桂军事。

△　徐世昌下令裁撤苏皖赣巡阅副使一缺。

△　徐世昌令裁撤宁夏护军使一缺；任命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

△　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与美商慎昌洋行签订《云南矿山借款合同》，借款2000万元，拟组织明兴公司由美商开采矿产。因滇人反对未成。

1月8日　　甘肃督军张广建特派古朗仓、李仲连等先后赴藏，与达赖喇嘛接洽，说明汉满蒙藏回本属一家，合之则足以抵外，分之则为人所弃，并宣示北京政府对藏之诚意。达赖闻之极为感动，因于日前委派喇嘛洛桑庚丁为代表赴甘答礼，陈述达赖对北京政府怀柔之意极表满足，并代述达赖内向诚意。有关西藏地方问题拟即直接派员赴京开议，无须外人作证。划地方区界一事如欲提前解决，请北京政府正式备文通知达赖即可和衷商办等语。是日张广建将详情电告中央，请示办法。

△　四川陆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湘、第一军军长但

懋辛联名通电宣布："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依据"川省人民公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政权"。12日，熊克武通电拒绝接受北京政府任为四川省长之命令。21日，刘湘、但懋辛等又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任命四川督军、省长，重申川省自治。

△　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派员到鄂会见王占元，商谈湖南取消独立条件。是日，王占元致电北京政府，告以赵恒惕可取消自主，惟以拨饷300万为条件，并须授赵为湘督。赵恒惕、林支宇旋于11日致电军政府，力辟投北谣言，谓"提倡民治"，"山河可移，此志不移"。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美商无线电联合公司在北京签订中美《无线电台借款协定》，借款美金462万元。后于9月19日中美双方又签订《无线电台修正协定》，承造上海无线电台及哈尔滨、上海、北京、广东分台。借款美金650万元，年利八厘，期限10年。借款期间合组中美无线电管理公司经营；借款清偿后收归国有。无线电台协定签字后，驻京日、英公使接连提出"抗议"，外交部在驻京美使的坚持下，以并无抵触英、日优先权之点复之。

△　吉林省当局与驻珲春日本军官商定日军继续撤退暂行办法四项。嗣接延（吉）、珲（春）五县公民报告，日兵昼撤，夜绕道复回原处，仅将表面军事设备解除，设警尤着着进行。

△　北京政府教育部以勤工俭学生在法谋工困难，通令各地暂行停送学生赴法。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哈尔滨戊通航业公司改为官办，收归国有。

1月9日　　白俄恩琴率领白俄及蒙匪3000余人，在参谋长山田（日人）策划下，使用日本供给的枪炮，再度大举进犯我国外蒙古地方。是日，褚其祥率第二十五混成旅在煤窑南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

同时急电援库总司令张景惠速派援军。

△　北京政府东省铁路督办宋小濂与远东共和国交通部长沙托夫在满洲里签订《东省铁路与俄国贝加尔路临时交通办法》，规定先通货车。

△　旅京江西同乡1000余人在江西会馆召开大会，主张“赣人治赣”，并决定致电赣省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及省议会。11日，江西省议会亦开会商讨“赣人治赣”，议决致电大总统、国务院，要求“选择赣人贤者，迅速任命为本省省长”。13日，旅京赣人代表在南昌邀集省公团领袖开茶话会，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赣贤长赣”。14日，省总商会、农会、总工会、自治促进会、各县联合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分别举行集会，要求“迅择赣人贤者简任，以慰众望”。

△　经济研究会在上海开成立会，推徐沧水为主席，马寅初、徐沧水、杨端六等为干事。

1月10日　湖南省议会通过《省自治法筹备简章》。21日，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与省长林支宇通电宣告湖南筹备自治。

△　国民大会策进会第一届各省区代表会在上海开幕。会议通过办事简章、组织法草案及宣言书，通告全国同胞郑重声明，欲救中国全在国民自决，欲求自决全在国民大会，事贵全国努力，非一部分所可胜任。于28日闭会。

△　京汉铁路与湘鄂轮渡联运在武昌举行开通典礼。

1月1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护法诸省之赈灾附加税直接交军政府，以救济西南历年受害灾民，并以此通告税务司。

△　徐世昌批准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改编川边陆军一师。

△　北京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俄公使库达摄夫即将离

京，所有俄使馆保管事宜公推驻京荷公使欧登科代表外交团管理一切。

△　北京政府海军部与英商亨得利乔公司签订129.72万英镑《水面飞机借款合同》，用于购买105架水面飞机。是日，由公司先交付垫款40万镑与海军部。

△　白俄谢米诺夫抵奉天。下午访张作霖，晚乘车赴旅顺，到后即拜访日本关东厅以下各衙署。

△　吉林督军鲍贵卿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200万元，利息五厘，以官银号作担保，并于是日电请北京政府备案。

1月12日　广州非常国会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到全国20省两院议员200余人，讨论组织正式政府及选举总统问题，席间对于总统选举意见分歧；决议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议员资格。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民国九年赈灾公债400万元，实际应募额仅216万余元，以各省货物税及关税附加税10％为担保。

△　广西靖国军在班香甫率领起事后进展迅速，是日约会龙州民军同时起事，占领养利，击毙陆荣廷部守军300余人。旋即往攻慈溪，相持数日后于21日占领慈溪，乘胜前进，攻下龙州，于月底逼近南宁。各地民军纷起响应。

△　四川督军熊克武通电主张自治，不承认北京政府所授四川省长之任命。谓：今川省已由反对联军统治，进而反对军治，且更进而反对特殊阶级。希望政府速自忏悔，并主张各省自制省自治根本法。

△　驻京俄使库达摄夫因北京政府停止俄使待遇而离任。

1月13日　广州军政府任命孙洪伊、张继为顾问。

△　湖北督军王占元电告北京政府称，鄂湘实行联防，援湘即以固鄂，请不必责湘取消自主，先饬支援。

△　湖南省议会讨论军费问题，请林支宇出席说明实况。议员谭奎炯质问：湘军六万人不过编为五师，照军制计算，年仅需银700万元，何以要1600万元之巨？林无言以答，只好表示无法核实开支，惟有包办，应需实数候再同总司令会商后再行确定。

△　北京政府交通部训令京汉、京奉、京绥、津浦路局及工程局，谓川汉铁路暂从缓办，先修粤汉铁路湘鄂线之株洲至衡州（今衡阳）段，全部工程需时三年，即从本年5月起由部指定京汉月拨现洋13万元，津浦、京奉各月拨现洋12万元，京绥月拨现洋三万元，交湘鄂工程局作为工程费用。

△　徐世昌以西北地震，陕、甘两省灾情綦重，是日，令该两省长官筹款急赈灾民。

△　北京政府交通部因各省偷运粮食出口致使米价暴涨，饬沪杭甬、京奉、津浦、沪宁各路局认真查禁。

1月14日　白俄恩琴率所部日、俄、蒙、藏兵5000人，分三路大举进攻库伦，驻蒙守军褚其祥第二十五混成旅奋力抵抗，伤亡官兵450人。褚急电北京政府请速予增援。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与远东共和国通商谈判，因西伯利亚华侨生命财产及赔偿问题未达成协议，谈判破裂。次日，外交部将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送部文书全部退还。

△　徐世昌下令裁撤河南暂编陆军第一师，调该师师长成慎为将军府将军；将该师改为河南陆军步兵第一、第二两旅，派岳宪玉、柴得贵分任旅长。

△　南洋华侨代表余佩皋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向英政府进行

交涉，暂缓施行英属地华侨学校注册条例。18日，外交总长颜惠庆派刁作谦与艾斯敦磋商此事，艾斯敦允电呈本国政府。

1月15日　延吉、珲春等五县代表抵京，上书总统府、国务院及外交部，痛陈延属五县人民受日军奸淫、枪杀、活埋、火烧、腰斩等蹂躏惨状，财产损失2000万元，人民伤亡将及万人，“请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撤退日军，赔偿损失”。21日，吉林旅京同乡会又具呈府、院及外交部，再次“请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表示“全吉七百万人誓为政府后盾”。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国内银行团签订600万元《购车借款合同》，作为京汉、津浦、京绥、沪杭甬四路购买机车车辆费用。此为国内银行投资铁路之始。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404.75万日元《电信林矿借款息垫合同》，以盐余库券为担保，作为拨付电信林矿借款利息之用。

△　日本政府决定在延吉、珲春留驻日军两个大队，其余日军即日撤退。

1月16日　前贵州督军刘显世在昆明宣布就任军政府总裁。

△　北京政府内务部经国务会议批准，设立著作及出版物研究会，专门搜集研究著作及出版物，以防止新思潮之传播。同时北京军警当局对外来邮电及印刷品进行检查，稍有涉及新思潮的电讯及印刷品即予扣留、没收。

△　国会在京议员在中央公园开新年恳亲会，呼吁北京政府恢复国会。

1月17日　旧历年关将临，各地军阀向北京政府索饷之电络绎不绝，仅是日就有曹锟、冯玉祥、鲍贵卿、张文生及驻陕第四混成旅等

数起。至21日达到高潮，各地索饷电达40余封。北京政府无法应付，只复曹锟一电。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就珲春交涉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赔偿、道歉等四项要求，当经北京外交部拒绝。

1月18日　　驻京英、美、法、日四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通告新四国银行团成立。

△　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张宗昌率兵自是日起在江西高安、宜春、上高、万载、宜丰、新余、萍乡等县闹饷，大肆掠夺，断绝交通，到处劫财。

1月19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汇丰、汇理、正金、花旗四银行签订400万元《赈灾借款合同》，以关税附加一成作担保，作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旱灾救济费用，并由银行团派人监督借款用途。

△　下午1时，北京中法实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先由外国侨民开端，继之我国商民亦纷纷持票兑现。到是日营业终了时，共支出现洋数万余元。

△　王占元索饷无着，北京政府允其就地筹款。王遂提出以造币厂余利作担保，募集地方公债200万元，是日咨交省议会通过。

1月20日　　新疆省议会及少数民族王公致电北京政府，反对熊希龄与英人合办新疆石油有限公司。是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此案尚未批准，尽可中止。

△　赣督陈光远急电北京政府，谓张宗昌借筹饷为名纵部勒索人民，势将激成变乱，请速将该师调离赣省。

1月21日　　广州军政府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之海

关，须从二月一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并于28日通告广州沙面各国领事，声明军政府决定收回海关管理权。香港英当局闻讯，竟派兵前往粤海关恫吓。

△　川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湘、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等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以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及杨森等九人为镇守使之任命。

1月22日　广州军政府发布命令，废止《治安警察条例》。

△　徐世昌任命王金镜为将军府将军。

△　上海会审公廨以伍廷芳现离租界为由，注销去年公廨谕令上海汇丰银行停止支付伍廷芳以私人名义存该行的广东关税余款的规定，将此案交北京政府办理。

△　孙中山接日人和田三郎来电，催促速派驻日代表赴日。

1月23日　法国各地工厂、学校勤工俭学生派代表齐集巴黎华侨协社开会，讨论解决勤工生生活困难问题。会间，代表们邀请驻法公使、华法教育会会长、留欧学生监督等人到会予以帮助，无结果。会议议决请北京政府每年津贴每人4000法郎，为期四年等三项办法，于26日闭会。

△　孙中山致词祝贺菲律宾华侨集资兴建的碧瑶爱国学校落成。

1月24日　孙中山函告加拿大陈树人有关广东经济近况，并指示致公堂成员入党办法。

△　《商报》在上海创刊，汤节之任总理。

1月25日　湖南成立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彭兆璜为主任，王正廷、蒋百里、石醉六、李剑农等13人为委员。

△　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急电北京政府报告后地失守，库伦粮绝，军心商况顿起恐慌，白俄蒙匪有克日会攻库伦之说，请迅电授库总司令张景惠速饬各援军星驰前进。但张托辞天寒不能急进，按兵不动。

1月26日　徐世昌特派张勋督办热河林垦事宜。任命发表，全国舆论大哗。次日，沪西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谓："勋非昔日通缉之罪人乎？缉之不得，赦之；赦之不已，又用之。刑赏儿戏，几无法律可凭。我不知政府不惜牺牲一国之法律，以殉张勋，何独对于勋之厚也。"接着有上海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江苏七个团体等纷起反对。张勋慑于舆论亦不敢就职，徐世昌只好准其辞职。

△　驻京外交使团电令广州领事通知伍廷芳，不准干预海关行政。

△　直隶省署与中英公司签订1000万元《沧石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年息七厘，限期20年，以沧石铁路担保。

1月27日　中国国民党交通部在广州开成立大会，军政各界数百人与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并强调："对于国家之改造与进步，尚须有卓绝之党人，负完全责任，运用机能，指挥群众。法俄等国，莫不皆然。吾党宜勉之。"

△　中日两国军事代表正式签字取消1918年签订的《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次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京日使小幡酉吉相互换文，声明该两项协定"自本日起完全失其效力"。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远东共和国提出签订通商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一、废弃帝俄时所有特权；二、废除1881年所订陆路通商条约；三、先订暂行通商条例；四、未订正约前两国领事只用贸易保护

官名义；五、通商草约依据新疆局部商约十条商定。是日送交优林。

△　陈光远、戚扬在南昌督署召集省议会、商会、农会、教育会会长及官绅30余人开茶话会，商讨对张宗昌师对策。议决联名通电北京政府及各省宣布张的罪状，同时由陈、戚明命张师即日解散。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就自治发表通告，谓“比者时髦官政客，辄戴一假面具，以加入自治运动。第彼辈之所谓自治，在以甲省之官僚政客宰割甲省，乙省之官僚政客宰割乙省”；并表示对于真正的自治“吾人亟宜促进地方自治之实现”。

△　前清礼亲王诚堃等致函北京国务院总理靳云鹏，要求参议院议员增设满洲议员专额五六名，“俾驻京宗室觉罗八旗数万人民得与闻政治”。国务院将原函抄送内务部查核办理。2月21日内务部致函清皇室内务府，谓“本届国会选举系依照元年八月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办理，各项法文未有满洲议员专额，行政机关对于各项法文无权增益”。

△　驻京荷兰公使欧登科函告外交部，谓德国归还庚子年劫去之观象台天文仪器已运至天津。当由外交、教育两部派员赴津接收。

1月28日　叶荃在云南寻甸召集李永和等旅长开会，密商袭取昆明，推翻唐继尧。会后李入省向唐告密。是日，叶荃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在寻甸以闹饷为名举行兵变。叶荃率部攻昆明，抵达杨林板桥即与唐军遭遇，激战数日，叶军败退，唐军尾追，至2月1日将叶军全部击溃。

△　陈光远所部赣军与张宗昌师在高安开战。北京国务院急电双方劝阻，并允拨借盐款10万元交张宗昌发饷。

△　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欠饷达十阅月，是日探悉京汉路局由汉口运解部款20万元，车经信阳，冯玉祥派兵截留充饷。同时电陈北京政

府声明不得已苦衷，请准将所借京汉路局之款由欠饷项内扣还。

△　代理黔军总司令卢焘等通电宣布贵州实行自治。

△　北京政府交通部将东省铁路沿线俄国邮务局全部收回。

1月30日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支部成立。孙中山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阐发三民主义原理。指出："第一，民族主义，非推翻满族主权便了，须使各民族都平等。第二，民权主义，须人民有普遍选举、立法、免官之权。第三，民生主义，须趁此资本家、地主不多之际，行资产国有制，借机器以兴实业，普利一般人民，消灭阶级战争。"

△　林献堂等178人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案。其要旨为："兹请议制定以台湾住民所公选之议员组织设置台湾议会，并付与施行于台湾之特别法律，及台湾预算之协赞权之法律。"

1月31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对俄方针，并致电张作霖。谓现在俄国旧党几于全灭，对于新党当有非正式的联络，对俄军入境应行拒绝，对谢米诺夫等只要无妨害我主权之行为，仍暂保持旧日态度。

△　陆荣廷密电北京政府将广西军队改编为边防军，是日，徐世昌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所有该省边防军队悉归训练调遣。

是月　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所得税分别先后征收税目》、《所得税条例施行细则》、《所得税调查及审查委员会议事规程》、《所得税征收规则》、《所得税款储拨章程》，决定所得税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　孙中山派李章达到远东共和国阿穆尔省考察。

△　黑龙江省议员马清濂等提出索还沙俄强占之江东六十四屯议案，经全体议决咨文省公署，再由省署咨文北京国务院提出严重交涉。

△　广东财政厅长廖仲恺定自是月起统一省库财政，厉行整顿各项赋税。预计收入总额，比较民国八九年可增加一倍。每月预算收入：赋税30万元、盐税70万元、烟酒25万元、杂捐25万元、厘金30万元，综计210万元。

△　广东设立全省教育委员会，以推动学校教育，发展社会教育为宗旨。汪精卫、金曾澄为正、副会长，陈独秀、戴季陶、许崇清为政务委员。

△　沈雁冰、郑振铎、孙伏园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后移到上海。参加研究会的前后共有170多人。出版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等。

△　赵恒惕将湘军二师五旅及12个地方军区改编为二师一旅及九个混成旅，把各军区司令改为旅长和镇守使。

△　王蕴侯与日人大仓喜八郎等集资500万日元，在吉林省城创办兴林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　周善培、朱庆澜等集资150万元，在江苏盐城县伍祐场创办泰和盐垦股份有限公司。

△　傅紫庭、胡养新等集资30万元，在江西九江创办利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　龚心湛、傅增湘等集资25万元，在山东烟台创办通益精盐股份有限公司。

△　卫燕平、崔召和、吴石公等集资10万元，在北京创办武学书局。

2月

2月1日　　晨6时，俄蒙匪1000余人，以一部向大毛笃庆防军驻地，以大部越向后方小毛笃庆褚旅防地，同时施行攻击。防军不支，大毛笃庆即时失陷。匪遂分兵以一部约300余人，由鲁布桑和沙基喇嘛率领，经汗山东南山巅，由南山口窜入，顺河套西至佛宫，与驻守兵二连激战。驻军因寡不敌众，内外夹攻，死亡殆尽。匪遂将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裹胁而去，送到库伦城外的满楚什里寺，让活佛发号命令，胁迫蒙古人向当地驻军进攻。

△　湖南造币厂及湖南总商会与日本三井洋行签订《一百二十万元借款合同》，以米输出120万包及水口山亚铅矿砂三万吨为担保。

2月2日　　徐世昌令准航空事务处改为航空署，9日公布《航空署组织条例》，于18日正式成立。

△　优林通牒北京政府外交部，否认远东共和国禁止华商贸易及侵犯华侨利益，并对北京政府允许白俄在中国活动、扣留俄国定购粮食及自由处置华境俄国财产等事提出质问。

△　中英公司代表达维森致函北京政府交通部，声称依据津浦暨沪杭甬铁路合同，中国银行团借款购车优先权应属于华中铁路有限公司及中英公司。

2月3日　　库伦失陷。恩琴白军及蒙匪猛犯库伦，以主力急攻东北面防兵，乌里雅苏台沟之褚旅防线不支，高在田团亦因之发生误会，乃同向二里半滩急退。原驻东营子之高团接济营亦同时纷纷退却。商人等随之而退，秩序大乱。东面敌人适于此时猛攻而入，东营

子遂失守。此时南山匪徒亦乘虚潜下，枪声四起，公署竟当炮火之中心。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犹传令褚旅急图反攻，而各军乘乱奔溃，大势已不可为。陈毅等官员及商民冒弹而撤，退向恰克图。褚旅退往后地。未及撤离的商民及受伤官兵约3000余人，均惨遭残杀。在商行的屋梁上、大门上、系马柱上，被绞死的中国人悬尸累累，触目皆是。

△　北京政府派遣办理总领事事务陈广平抵莫斯科，直到3月31日始受苏俄政府正式接待。

△　张宗昌受其部属团长王康福逼迫离赣，张师除王康福团外完全溃散。旋陈光远密电北京政府，报告张宗昌潜逃，并密保王康福升任旅长。

2月4日　　孙宝琦等发起组织全国急募赈款大会，推徐世昌为名誉会长。

2月5日　　徐世昌令设立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派滨江道尹董士恩兼局长，马忠骏兼副局长。

△　桂军游击第二十五营因欠饷在梧州哗变，营长廖汝龙被击毙，全营携械四出，沿途抢掠商店30余家。桂平镇守使韦荣昌闻讯派队追击，捕获变兵23名。

2月6日　徐世昌公布《蒙藏世爵世职暨喇嘛惩戒会条例》。

△　戚扬就英舰“乌的克”驶至江西内河鸡笼山停泊一事致电九江英领，请转告该舰长即日退出，并报告外交部请向驻京英使交涉。

△　蒋介石抵广州晋谒孙中山。

2月7日　　滇军军长顾品珍借回家省亲之名，密率所部由宣威县出发进逼云南省城，是日行至距昆明百里的杨林口。唐继尧因讨叶荃大军未回，即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次日仓皇出走。9日，顾

品珍入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维持秩序。

2月8日　　航空署飞机数架列队飞翔于北京上空，在总统府、国务院和航空署上空做低式之飞行及飞行技术表演。

2月9日　　浙督卢永祥致电请北京政府缓行国会选举。14日，赣督陈光远、闽督李厚基、陕督陈树藩均通电支持。15日，鄂督王占元亦通电赞成缓办选举，“借促统一”。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致电卢永祥，反对“北廷饰词统一，非法办理选举”。

△　外蒙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再次宣布独立，以俄人恩琴为总司令，日人山田为参谋长。

2月10日　　广州军政府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李根源、温宗尧、杨永泰等人。

△　广州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致电驻华各国外交团，要求照拨前派与军政府之南方关税13%，“若不交款，必派人接粤税关”。次日，外交团允交付关余于军政府，但因美使忽接美政府反对训令，事又搁浅。

△　四川省议会通电宣布，川省正积极实行自治及废督、裁兵、民选省长四项主张。

△　广西桂林、柳城各处民军在柳州举事，进攻来宾等县，于次日晨占领来宾。

△　日本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邀集林献堂等四人到总督府东京出张所，声明不容有脱离日本而为自治体之台湾议会设置。

2月1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将中国政府对苏俄1920年9月通牒（即《第二次对华宣言》）复文送交苏俄政府，表示同意“循此次宣言书中提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

并望善待我国侨民，建立恢复两国友好关系之基础。

△　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即商会）在上海召开联合会议，上海、大连、奉天、天津、汉口、青岛、北京、济南各商业会议所和实业商会代表30人出席，日驻沪总领事山崎亦列席。讨论设置对华贸易统一机关、组织对华投资团、设立中日合办之大银行、兴办教育机关及慈善医院等50余件议案。会议于14日结束。

△　广东援桂部署就绪，决定陈炯明督师，任命蒋介石为总参谋。

△　陈光远致电北京政府交通部，谓张宗昌部缴械遣散已办妥，请饬京汉、津浦各路备车运送士兵回籍。

△　上海新青年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捕房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强行封闭。

△　侨鲁日人侵占胶县民田，乡民联名呈诉督、省两署，经交涉员抗争，日驻济领事允每亩给洋50元了案。

2月12日　吴淞商埠局设立，张謇为督办。

2月13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就库伦失陷召开会议，决定由奉天、黑龙江出兵两师，由车臣汗盟径捣库伦。当即致电张作霖、曹锟等，同时电令陈毅、张景惠克日归复。此后参陆处接连开会议决收复库伦，但张作霖仍按兵不动。

△　云南省开军事会议，顾品珍、罗佩金及省议会议长等20余人出席。议决对北方坚主护法，积极拥护军政府，坚持自治方针及设立军事参议会，采公开主义解决一切问题等。

△　广州军政府决定讨桂，从高雷、钦廉、肇、梧四路出兵。

△　陆军第二十三师四十五旅八十九团二营士兵索饷未果，在保定东关哗变。变兵群拥出营，先割断电线，抢掠南关会成、永德顺粮栈等共11家，损失四万元。师长王承斌率队镇压，变兵往西南溃逃。

△　广东省议会批准广东省政府发行善后公债500万元，作建设费用，由省银行发行。

△　北京国务院管理特种财产事务局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签订《三百万元借款合同》，以武昌、汉口前德商工厂等为担保，作为接管前德商经营的各工厂经营费用。

△　《劳动与妇女》周刊在广州创刊，编辑和撰稿人先后有沈玄庐、陈独秀、谭鸣谦（即谭平山）、陈公博等人。第十一期后停刊。

2月14日　广州军政府开政务会议，讨论收回海关管理权问题，孙中山表示应组织正式政府，以利对外交涉。

△　陈光远致电北京政府，谓张宗昌逃汉，请下令遣散仍驻赣境及赣边之残部。旋又电北京政府，以粤防吃紧为由，请准将张残部扩充为师归其节制，并索款50万元。

△　北京政府电驻英公使顾维钧转告苏俄驻英大使，如苏俄保证其代表团来华不准传布与中国社会不相容之主义，免除在俄经商华侨一切强迫服役并赔偿华侨所受损失等四项先决条件，即可允准苏俄派遣代表团来华。

2月15日　陈炯明依据《广州市暂行条例》，委任孙科为市长，并委任蔡增基为财政局长，魏邦平为公安局长，程天固为工务局长，许崇清为教育局长，黄垣为公用局长，胡宣明为卫生局长。是日，孙科宣告就职，广州市政厅正式成立。

△　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正式接收哈尔滨各机关，改悬中国国旗。前一日董士恩曾分访驻哈各国领事，声明中国将继续尊重1914年

之英俄协约，是日又以同样内容正式照会各国领事。

2月16日　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丝市之回顾，略谓去年为出口商最不幸之年，尤以丝茶为最。查去年出口华丝，自6月至11月止共计11105担。其中白丝计4242担，黄丝计6863担；较前年同期，计白丝减少7141担，黄丝减少2990担。

2月17日　北京政府电令江苏省长查禁载有“过激党”宣传文字之书刊。24日，内务部通电各省区严防“过激党”及无政府主义印件。

△　孙中山在广州接见上海《字林西报》驻北京记者解尔般脱，谈与陈炯明的关系、广州税关及联合段祺瑞等问题。关于联段，孙谓段保证愿向日本提出取消“二十一条”要求及由此发生之各种协约，故“自愿与段谋和而共同行动”。

△　徐世昌任丁锦为航空署署长；又任程廷恒督办呼伦贝尔善后事宜，准钟毓辞职。

△　香港英当局应北京政府财政部之请，判决继续禁汇丰银行提拨伍廷芳名下存款，至中国审判衙门判决后为止。

△　上海《民国日报》报道疲弱已极之去年茶市，谓到货共有绿茶路庄16.2万箱，熙春2.5万箱，平水12.5万箱，红茶祁门6.1万箱，宁州1.25万箱，两湖4万箱。比之前年绿茶到货已减少6.6万箱，红茶到货减少12.5万箱，乃销路极疲；即此数万箱尚未销脱半数，绿茶销去50％，红茶则仅30％而已。

△　张勋抵京谋援库总司令，19日谒徐世昌密谈。

2月18日　广州军政府改组广州市政府，由军政府直辖，任命孙科为市政厅厅长，不受省长管辖。

△　刘湘、但懋辛、刘成勋等通电宣布川督刘存厚罪状，同时率

军分四路向成都进发，川战又起。20日占资州、内江，刘存厚部邓锡侯不战而退。21日刘存厚退至绵阳，并宣布下野。25日，刘存厚通电宣称，顺应川人“自治”主张，解督军本职。

△　湘西王育寅所部起兵反对赵恒惕，赵派省军分途进击，王部力穷受抚。各路司令开前方军务会议，决定由旅长唐生智收编王部。是日，督令王部由澧城移驻临澧接受改编，并由李抱冰派兵入城维持秩序。

△　优林面谒外交次长刘式训，谓库伦为恩琴所据，对俄华皆不利，本政府拟派兵入库，扑灭此祸根，愿向中国政府声明：一、不受报酬；二、不需交换条件；三、不生条约关系；四、事竣完全退出蒙古，不留一兵。当经刘式训谢绝。

△　广州军政府聘林修梅为顾问。

△　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致电广州军政府，表示尊重国法，服从民意。

2月19日　　北京国务会议通过财政部拟定之《整理内国公债办法》。会后，周自齐、叶恭绰至银行公会发表国内公债整理意见。谓自1912年至1920年公债发行总额已达3.15亿余元，政府急图补救，通过整理案。其整理办法规定：民元年、八年公债，均照四折计算，分十年抽还；民五年公债则俟三、四年公债抽后，相继抽签还本付息；其余七年长期整理金融公债等，悉照旧办理。

△　北京政府参陆办公处下令查禁北京、天津、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地俄国共产党设立之机关，并通告各地取缔共产党之宣传。

2月20日　　广州军政府在广州举行粤军阵亡将士追悼会，各界1000余人与会。孙中山主祭，并送挽联：“杀敌致果，杀身成仁；为民请命，为国捐躯。”

△　广东省教育会召集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举行宣传大演讲，孙中山演讲阐述三民主义。指出，民族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民权主义，“实行直接民主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谓：“兄弟做学生时代，早已觉中国政府腐败，想出一种治国之法，思有以替代之，其法维何，即五权宪法是也。”

△　甘肃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地震，城堞均被震落，城内房屋大部倒塌，地流黑水，人民死伤惨重。此次地震波及惠安堡、韦州、平安、镇戎（今予旺堡）、海城（今海原）等地。

△　华北五省大旱灾，全国赈捐大募集，于是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济南、开封、太原同时举行，至28日结束。

2月21日　徐世昌特任赵从蕃为江西省长，赵未到任以前由杨庆鋆暂行护理，着原任戚扬进京另候任用。又任兜钦为正红旗汉军都统。

△　外蒙成立“自治”政府，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重登大汗宝座，册封恩琴为亲王。恩琴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　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在巴黎举行。次日，我国代表顾维钧被举为修改国际联盟盟约委员会委员。

2月22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决议分四路援库：一、东路由张景惠亲往督战；二、北路黑龙江孙烈臣调一旅，绕由贝加尔至恰克图进攻；三、南路由曹锟指调冯玉祥全旅由张家口乘汽车开往防线；四、西南路新疆杨增新调军队由科布多前进。曹、张接电令后要索巨费而不愿出兵。

△　徐世昌任命龙体乾为将军府将军。

△　北京政府以俄国远东共和临时政府，已移建于赤塔，为应时势之要求，是日令将驻俄国领事馆升作总领事馆。

△　甘肃平罗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发生强烈地震，地陷，出黑水无数，该县及邻邑共压毙1.6万余人。

2月23日　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询问中国是否预备接待苏俄代表，限两星期内答复，否则即请北京政府驻苏俄总领事陈广平离境。此照会由北京政府驻英公使顾维钧代转。

△　夜、赵荣华及王汝勤两部士兵在湖北沙市哗变。变兵四处抢劫，烧焚店房，大火直至次日天明始熄，被烧者数百家，损失50万元以上。

△　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国有铁路货物联运审查会章程》，又公布《修正全国铁路线路审查会章程》。

2月24日　全美国民党恳亲大会致电孙中山、唐绍仪及国会，恳请“国会选举总统，成立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中心”。同时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华侨亦纷电国会，请选举总统。

2月25日　全粤海陆军同袍社在广州东园开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粤军回粤，只做到第一步，尚非完全成功”，号召军人“赞助组织政府”。

△　全国急募赈款大会定是日至27日三天在北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央公园、天坛、先农坛、午门历史博物馆开游览会，汇集中西各优美技术，发售游览券借以助赈。

△　北京政府航空署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意国赠送飞机接收典礼。按：1920年5月，意大利飞行家马西罗、发尔林两人用该机作罗马、北京飞航，意国航空总署将此机赠与中国留为纪念。

2月26日　徐世昌令所有直、鲁、豫等省赈粜粮石免税展限至本年2月底止，并着财政部饬属严密稽查奸商借端影射，希图渔利。

△　沧石铁路实行以工代赈办法招募灾民筑路。是日，北京政府交通部派员在石家庄设立沧石路工处，正式开工。

2月27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就库伦失陷通电各省、各团体，强烈谴责北京政府“有意断送领土”，呼吁推翻与白俄及日本互相勾结之北廷，督促爱国军人指日北上收复库伦，并责成远东共和国政府自行扫荡白党，然后撤师返俄。

2月28日　留法勤工学生因资斧断绝，是日在蔡和森、向警予带领下聚集400余人，至巴黎驻法使馆要求津贴。驻法公使陈箓口头应允立刻将全体勤工学生送进学校读书及每人每月由公使馆领出400法郎为生活费，维持三个月，至于善后办法须等北京政府回电后再作安排。勤工学生要求有更切实的保证，双方引起争执。法国警察出面干涉，用枪柄、警棍殴打学生并威迫学生退出中国使馆。

△　广州青年会定是日为“华北救灾日”，全市男女学生总动员，组成3000多人到街头募集赈款。

△　蒙古国民党在托洛依茨郭萨甫斯克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有托洛依茨郭萨甫斯克的党员和各旗的代表17人出席。会议讨论关于党的当前任务，关于建立军队领导机关等问题，决定由苏赫巴托尔等五人组成军队司令部。3月1日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有21人出席，大会批准国民党的政纲，并选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是月　赵恒惕派欧阳振声为代表赴四川同刘湘磋商“联省自治”及川湘联防问题，后刘湘亦派代表来湘。西南及长江流域各地方军阀皆纷纷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喧闹一时。

△　留法勤工俭学会周恩来、李富春、赵世炎、陈延年、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等在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与国内共产党中央联系，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少年》周刊（油印）。在该刊第二期上，周恩来以伍豪的笔名，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

文。

△　陈独秀致函赵世炎，嘱其与张申府联系，在巴黎组织共产党支部。

△　河南省东南一带白朗余部集合五六千人举事，号“黑狼”。赵倜急电曹锟求援，曹调驻郑州的张福来二十四师、驻顺德的萧耀南二十五师前往镇压。

△　鄂西施南县一带农民数千人举事，头扎红巾，自称“神兵”，反对军阀残暴统治。王占元令孙传芳率兵镇压，“神兵”被迫退至四川。

△　陈子彝、蔡裕焜等创办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资本200万元，经纪人规定100名，实为54名。交易物品有米、谷、杂粮、油饼各货。交易方法分现期买卖、定期买卖、约期买卖三种。

△　本年到期之外债有1.5亿元，其中日本即占1.4亿元。北京政府财政部因无款可还，拟定将利息转为借款再行订结展期合同；派日籍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少将回国同日本政府磋商，最后日本政府允展期一年。

△　菲律宾议会通过《簿记条例法案》，规定登记账簿须用法定文字（英文、西班牙文、菲岛土话）及违例处分办法，定11月1日实行。菲岛华商纷起反对，并迭派代表向美国政府及菲律宾总督提出抗议。同时国内华侨联合会及各民众团体亦起而声援，北京政府外交部亦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菲律宾议会被迫决定延缓至1923年施行。

3月

3月1日　　各省众议院议员初选定于是日举行，但仅有奉天、江苏、吉林三省届时举行。各地选举中违法舞弊事件层出不穷，民众纷

起告发。4月15日，上海地方审判厅被迫判决上海众议院议员初选无效。

△　徐世昌令准财政部将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改为全国农工银行事务局，并派王世澄为该局局长。

△　关税加征赈捐于是日开始。征数照该货所纳税银十分之一，征期以扣足12个月为限，限满即行停止。

△　湖北督军王占元约集川、滇、黔、桂、湘、赣等省代表召开联防会议，订立联防条约。

△　北京政府外交部认可美国增设张家口领事馆。

3月2日　　徐世昌公布《东省特别区域清理俄人旧案处章程》，凡18条。

△　北京政府外交部训令驻英公使顾维钧，谓苏俄“派一非正式代表来京接洽一切，本部并不拒绝，惟如有所商，先在英京接洽大概，然后派员，似较妥协”。又谓：驻伊尔库茨克领馆“去岁被地方封闭，现且将代理领事薛镛监视”，请与驻英代表交涉，“将领馆即速启封，并优待薛领”。

3月3日　　徐世昌令财政部会同内国公债局，“按照三、四年公债暨七年短期公债办法”认真办理。财政部随即拟定整理内国公债详细办法，于是月30日呈准施行。

△　浙江督军卢永祥再次通电，以举办国会选举有碍统一，主张缓办。旋李厚基、陈树藩、王占元以及卢焘、顾品珍、赵恒惕亦纷纷通电，反对举办国会选举。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币制局总裁张弧与国内银行团签订《上海造币厂二百五十万元借款合同》，用于造币厂购地建厂及购

置机器。财政部为此发行特种国库券250万元，由银行团发售。

△　徐世昌令内务部预备春丁祀孔事宜，并派国务总理靳云鹏恭代行礼。

△　上海法租界全体电车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经四天斗争，取得胜利，工人每人工资加一至二成，疾病给予半资，工伤给予全资。

3月4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电邀唐继尧来广州。9日，唐继尧自香港到广州晤孙中山，孙中山劝唐留粤参加军政府。

△　珲春案发生以来，驻百草沟、局子街等处日军诬当地商民、垦户为“股匪”，肆意搜捕拷打。是日延吉、珲春民众代表赴北京国务院请愿，要求日军退出该地。

△　北京政府电复陈毅，谓远东共和国自愿无条件援助无须拒绝，必须拟定防御线及区域，并作为临时协定；但应拒绝共同出兵。

△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设立宣传委员会，委徐谦、胡汉民、汪精卫等七人为宣传员。

△　广东省议会通过《县长选举暂行条例》。

△　开滦煤矿1000余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矿务处派保安队镇压，工人被迫复工。

△　东省铁路督办宋小濂致电北京政府，谓“迩来江省满洲里、海拉尔、扎兰诺尔各处鼠疫甚炽”，“哈尔滨及满、海、博扎、昂昂溪、满沟、安达、对青山八站均已设所防疫，实行检查。长春、二道沟亦经停车检验”。自开办防疫起至5月31日止，共发现患者2809人，送医988人，死亡1827人。

3月5日　徐世昌公布《物品交易所条例》，凡八章48条。

△　北京政府交通部咨内务部，谓九年份本部直辖各路局查获烟土各案，计京汉路55起，京绥路15起，津浦路八起，正太路三起，共计81起。

△　鄂西“神兵”乘船向四川进发，是日抵万县。上岸时，在城外向民众宣言，“神兵”专为讨伐军队，保护良民。万县川军龟缩城内，至次日晨始出城攻打“神兵”。两军激烈战斗，“神兵”败。7日“神兵”发起进攻，又不利，遂乘船向上游驶去。是役“神兵”死700余人，川军死90余人。

3月6日　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在广州开成立会，孙中山出席并发表演讲，论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指出：“民族主义，应废汉满蒙回藏五族名称，成一新中华民族”；“民权主义，应实现选举、罢官、创制、复决四权”；把民生主义的实施归结为解决土地和资本两大问题。

△　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日使先撤延属日军两连及散驻汪清、和龙诸县警察。8日，驻京日使小幡酉吉访颜惠庆，谓奉东京训令，延、珲日军3月底撤尽，但警察不撤。24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外交部，延、珲日军“撤尽”，暂留警察，后仍未撤。

△　北京政府电令黑龙江督军孙烈臣，谓白俄谢米诺夫将攻击新党，必影响我国边境，速于海参崴、双城子等处设防。

△　广东各界一万多人在广州东园开国民大会，要求收回关余，一致通过提取关余决议案，并呈请军政府与国会选举总统。

△　旅京湖北同乡痛心沙市兵变，举孔庚等10人为代表赴府、院请愿，要求撤换王占元。次日旅京、津湖北同乡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一、将王占元在鄂七年吞没军饷之证据宣布全国；二、将

屡次兵变人民受祸惨状调查清楚，一面向北京政府控诉，一面通告各地鄂人；三、直电北京政府，请求撤换王占元。14日，旅沪湖北同乡亦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要求撤王占元。

△　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有会员2000余人，领导人为苏兆征、林伟民。是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

3月7日　　白俄谢米诺夫的代表福列查斯基等人在北京车站就捕。前驻京俄使馆参议格拉卫等运动驻京公使团要求释放。3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特向使团声明：此次中国政府为执行国家主权，故将认为可疑之俄人暂为拘留，以便监视其行动，一俟适当时机即行释放。

△　黑龙江省署全权委员钟毓与远东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亮宾克夫在满洲里签订《中华民国黑龙江省与远东共和国开通边界条件》，规定边界往来及铁路交通为中华民国黑龙江省与远东共和国毗连关系，不与国际通商问题相涉。同日又签订《会订东赤两路开通车辆条件》，规定次日为货车开行之第一日，以后每星期暂通往返货车各二次，客车各一次。

△　丹麦新任驻京公使欧恩施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　林支宇因各界反对政府包办“省宪”及不堪军人排斥，向湖南省议会辞临时省长，携眷乘轮赴汉。

3月8日　　驻英公使顾维钧奉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邀请苏俄驻英代表克拉辛商谈，面致外交部《答复俄劳农政府宣言稿》副本及备忘录一件，并对加拉罕2月23日之照会提出口头抗议。同时电陈广平就近同苏俄政府接洽。

△　徐世昌特派夏寿康督办京东河工事宜；特任刘承恩为湖北省长。夏寿康卸职后，宣言决不复出。

△　徐世昌派王宠惠为修改国际联盟盟约研究会委员。

△　前清端王载漪由新疆潜回北京。3月27日，驻京公使团提出抗议，要求北京政府仍将载漪解回原戍。北京政府以载漪来京治病为由复公使团，后于9月12日方送回新疆。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库伦不靖，内外蒙均在军事范围以内，特电各省停发外人游历该地护照。

△　津浦铁路局致电北京政府交通部，谓昨接美医士柯德仁函告桑园及吴桥县境发现疫症。交通部当即发出通告：自9日起停售杨柳青至桑梓店各站客票。嗣于4月4日疫症减杀，自沧州以北德州以南先恢复售票。至5月9日方全部恢复售票照常通车。

3月9日　　北京政府循张作霖之请，将珲春交涉案移至奉天办理。是日，颜惠庆面商小幡酉吉，小幡表示同意。15日，外交部致电张作霖，谓珲春案日使前次态度视此案极重，近则又以此为“地方问题”，“由贵使与赤冢领事便可全权解决”，政府对于此案，只求“事实便利，不失主权”，在奉在京并无成见。22日珲春案卷全部移奉。

3月10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校部及经济部各科设北京，理工各科分设上海、唐山，另设附属中学及特别班。严修、唐文治、张謇、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等17人为董事。3月24日，徐世昌派叶恭绰为校长。9月1日正式开学。

△　徐世昌公布《证券交易所课税条例》，凡四条。

△　北京政府与法国政府在上海合办之通惠工商学院正式开学，该校以培养工商及铁道建筑人才为宗旨。

3月11日　　大股白俄蒙匪围攻叨林，我军奋起抵抗，经三昼夜激烈战斗，于是日失守，援库副司令邹芬退乌得。白俄蒙匪继续侵犯，

于13日攻陷乌得。

△　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谓英政府已同意我国在印度设立领事，现正选择地点筹建领馆。

3月12日　徐世昌特任孙烈臣调署吉林督军暂行兼署省长，准鲍贵卿辞职；又特任吴俊陞署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旋于20日特任鲍贵卿为霆威将军。

△　孙中山在广州与日人宫崎滔天、萱野长知谈话，指出三民主义没有更改的必要，并期待此一主义得以贯彻实行。

△　顾维钧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称：近日英国《每日捷报》等迭次载称“中国面粉不合卫生”，因访英外部商请由英政府自行解释。旋由英上议院议员克洛福男爵在院中演说，谓中国面粉“由政府之卫生部等选派专门人员详加查验，群谓并无不合卫生之质，深望一般人民不为该报所惑”。按：欧战以还欧洲食品缺乏，中国面粉价廉物美得以畅销。欧战后，英国面粉生产恢复，报纸乃捏造此项谣言来破坏中国面粉输入英国。从此，中国面粉在英国销路大减。

△　广东省财政厅公布本年度预算收入计3158万元，较去年决算增加143万元，其中尚少收赌捐1140万元。

△　美国总统哈定吁请美国人竭力救济中国饥荒。

3月13日　徐世昌公布《修正有奖实业债券条例》，凡14条。该《条例》称，政府为筹办兴办银行、兴办煤铁各矿、兴办纱丝茶糖等厂及其他重要生利事业，“特由农商部发行债券募集有奖实业债金，以二千万元为定额，名曰‘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

△　北京政府外交、内务两部会订《俄侨注册办法》，凡五条，公布实行。

△　上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是日开始，至19日结束。19日，上海各校学生约5000人，分200余队在城厢内外及各马路分途劝募，总共募得大洋7846元，小洋8.1622万角，铜元20.305万枚。此外，尚有童子军及约翰、复旦、同济各学校所收捐款未计算在内。

△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托洛依茨郭萨甫斯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临时蒙古革命政府，以苏赫一巴托尔、乔巴山等七人组成。

3月14日　北京大学、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全体教职员以政府积欠经费至三个半月及对于将来经费亦无确实办法，被迫举行同盟罢工。次日，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美术专门学校教职员亦加入同盟罢工。八校教职员强烈要求在铁路收入项下指拨专款，作为学校经费及发放教职员欠薪。

△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中俄通商后，将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归还中国。

3月15日　徐世昌以陆军第十一师兵变劫掠，下令取消该师建制，并褫夺师长李奎元、团长李式白、营长高文珊等人官勋。

△　北京大学等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在美术专门学校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八校教职员联合会，举马叙伦为主席。

△　徐世昌派靳云鹏至北京孔庙，代行“春丁祀孔”礼。

3月16日　孙中山与军政府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联名通电，否认北京非法国会选出的徐世昌总统。

△　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支持北京八校罢工，同时北京八校学生开全体紧急会议，支持教职员罢工。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呼吁援助北京八校教职员罢工。22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及旅杭北京学生致电徐世昌、靳云鹏，要求北京政府议决在盐余、关余或铁路

邮电收入项下每月拨定20万元，充八校教育基金。

△　中国与荷兰领事条约期满，北京政府外交部决定依照旧有条约继续订定。

△　下午5时，前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旅社门口被袁祖铭收买刺客刺毙，旋黔军总司令卢焘通电拿办袁祖铭。

3月17日　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马叙伦、陈世璋、姚憾赴府、院及教育部公呈北京八校教职员停职宣言，并交涉教育经费。

△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授张作霖以全权办理珲春案，要求日本迅速撤退军警。21日，东三省旅京学生联合会派赵柿霖、孟传文、孙玉岗为代表会同延吉、珲春五县公民代表张斌、温锡璋等至外交部，责问移奉交涉一事。颜惠庆秘书熊垓代见，“否认”移奉交涉。

△　山东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

△　唐山洋灰公司工人与厂外凿石工人共2000余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资方被迫同意工人要求后始复工。

△　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到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电，提议中俄开始交涉，互派领事。

3月18日　恰克图弃守。思琴部蒙古国民军及改穿蒙古服装的俄军3000余人，由托洛依茨郭萨甫斯克向恰克图进攻，迫令北京政府驻军缴械。恰克图防军及警备队败退，恰城于上午11时失陷。原退驻以不齐的库伦防军即向北增援，在距恰城五里迤南沃滂的小山上，架炮向恰城射击，下午1时将恰城收复。但因仅剩空城，无粮无草，仍自动弃守，退走满洲里。

3月19日　陕督陈树藩率兵自西安向渭河进发，攻打渭河以北的

郭坚所部民军。两军经一个多月战斗，陈军大败，退回西安。

△　徐世昌任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

△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电广西督军谭浩明，抗议桂军犯边，提出各守边防，不相侵犯。

△　午后4时21分，香港发生剧烈地震。

3月20日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演讲《五权宪法》，略谓："各国宪法只分三权，没有五权。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为什么要创立五权宪法呢？那是觉得美国的三权宪法"不完备的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亦不少"，故改创五权宪法加以"补救"。又谓："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末谓："甚望省议会诸君议决通过，要求在广州的国会，制定五权宪法，作个治国的根本法。"出席会议听讲的有2000余人。

△　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开会，起草《省宪法草案》、《省长选举法草案》、《省议会组织法草案》、《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县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草案》计六种，于20日闭会。

△　徐世昌任命鲍贵卿为霆威将军。

3月21日　　北京各界联合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开会，并上书府、院，痛斥北京政府弃蒙，希望"征调爱国军士会师北伐，以冀复国土而全责任"。

3月22日　　徐世昌派夏诒霆为参加秘鲁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专使。

△　北京外交团接受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决定将广州军政府总裁伍廷芳存入汇丰银行的250万两"关余"交北京政府。

3月23日　北京政府赈务处财政委员会决定以赈灾借款384万元交华洋义赈团体，分六大区散放：国际统一救灾会负责京兆、热河及直隶西部等处，赈款计76万元；华北华洋义赈会负责直隶东部等处，赈款计72万元；山东灾赈公会负责山东等处，赈款计54万元；河南灾区救济会负责河南等处，赈款计88万元；山西旱赈救济会负责山西等处，赈款计40万元；陕西华洋义赈会负责陕西等处，赈款计54万元。

△　广州军政府聘徐绍桢、林森为顾问。

△　徐世昌以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王宠惠充修改国际联合会盟约委员研究会委员，是日派法权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江庸兼代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

△　徐世昌派叶恭绰为交通大学校长。

3月24日　孙中山在黄埔检阅海军陆战队，并发表演说，指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

△　徐世昌下令取消湖北暂编第一师建制，恢复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建制，任命王都庆为旅长。又任命孙传芳为陆军第十八师师长，令准原任王懋赏辞职。后于31日又任命王懋赏为将军府将军。

△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催办选举，限于4月完成。浙江省复电主张暂行缓办，于是未选各省亦相率缓办。

△　远东共和国宪法会议致书中国政府及人民，盼恢复正当商业，订结条约，承认远东共和国。4月2日，优林将该书亲自递交北京政府外交部。

3月25日　恩琴俄蒙军攻陷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许多蒙古王公及蒙族人民退避新疆。

△　李云书、洪益三等在上海创办之民新银行正式开幕。资本总

额150万元，先收37.5万元，经营信托及商业银行业务。1922年6月因受交易所风潮影响停业。

△　天津各校教职员因欠薪全体辞职。

3月26日　广东省议会通过《市自治条例》。

△　徐世昌派张志潭至北京关岳庙，代行“春戊祀典”礼。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津浦铁路局与日商三井会社签订美金102万元借款合同，用以订购300辆高边敞车及货车。

△　远东共和国政府派出军队4500名侵入我国蒙古恰克图，进攻白俄军队。

3月27日　张作霖通电京、津、沪各警厅，否认帝制运动，命向各报馆更正复辟谣传。嗣于4月3日徐世昌通令各省严查复辟谣言。

3月2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及航空署就日本飞航学校飞行演习途经我国领空，拟定《临时限制办法》九条，经国务会议通过。

3月29日　孙中山就选举总统事发表谈话，谓：“此次费无数力，始得回粤。如不举总统，西南无发展之望。我今次回粤，具破釜沉舟与粤共存亡之意。”

△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来粤筹划西征。

△　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在国务会议上提出筹付北京八校教育经费问题，议决由交通部、盐务署自3月份起每月分筹25万元交付教育部；其从前积欠之60万元，分作数期陆续付还。同时由教育部劝令罢课各校职员克日恢复原状。次日，范召集八校教职员代表宣布阁议内容。下午，八校教职员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阁议。教职员以阁议尚未言及教育基金，表示不满。

△　徐世昌批准交通部为京绥铁路展筑绥远至包头镇路线发行短期公债500万元，以充工费。

△　徐世昌公布《官吏犯脏治罪条例》，凡七条。

3月30日　　广州1000余名妇女集会要求男女平权，提出“男女平等”、“还我选举权”等口号。会后列队游行赴省议会、省署、军政府请愿。此前亦有湖南女界联合会代表陈俶等致函省宪起草委员会，要求规定女子应有公权，男女教育平等，禁止买卖人口。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法金2500万法郎借款合同，作为拨付实业借款第14期利息之用。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与美商巴尔德威机车厂签订美金165万借款合同，作为订购30辆机车费用。

3月31日　　徐世昌任命李垣暂行代理库乌科唐镇抚使，下令褫夺陈毅官职、勋位、勋章；又特任孙烈臣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　顾维钧在伦敦会晤苏俄驻英代表克拉辛，转达北京政府外交部意旨，以交通梗阻保护难周为词，盼苏俄暂缓派代表来北京。

△　鄂西靖国联军总司令蓝天蔚为孙传芳部所败，退入四川，被川军但懋辛捕获，押至重庆，是日自戕。

△　徐世昌批准教育部编订的国乐、国歌正谱及燕乐、军乐各谱。

是月　　湖南第一纱厂竣工试车，有纱锭四万枚，每天可出纱140余包。是月华实公司正式接收。

△　孙中山在广州会见苏俄代表阿列格谢夫，交谈相互合作关系以及发动革命运动等问题。

△　青岛埠岸及大小港等处火车、轮船1000余名装卸工举行罢工，水陆交通停顿。日本驻青岛当局调军警弹压，捕去工人代表十数人。

△　长沙基督徒青年会借办理平民教育为名，在长沙开办平民学校，并在各小学及祠庙附设平民学校200余所，以美人兰安石为平民学校总校长，并邀晏阳初来长沙讲平民教育，实际上以宗教教育为主要课程。1923年为长沙民众封闭。

△　王克敏等在天津创办裕大纱厂，资本额定300万元，先收150万元，全部纱锭有三万枚，是月先行部分开车。直至1923年始全部开齐。

△　姚锡丹、杜少如等在崇明创办大通纺织公司，资本64万元，纱锭1.08万枚。

△　史量才、徐采丞等在上海创办民生纱厂，资本50万两，纱锭8500枚，用废花纺制粗纱。

△　许松春在上海创办永予纱厂，资本40万两，纱锭1.2万枚。

△　张东甫、洪筱之等集资40万元创办东兴盐垦股份有限公司，设本公司于江苏东台，分公司于上海、扬州。

△　杨树康等创办典业银行，资本25万，总行设江苏松江。1926年在上海设分行。

△　王泽宽等集资20万元，在直隶保定创办乾义机器面粉两合公司。

△　周钟岳、刘瞻汉等集资20万元，在江苏武进创办恒丰机制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4月

4月1日　　徐世昌下发说帖一件，称："劳农党在广东之举动各节，似应与俄新党代表接洽，侦察虚实，设法阻禁，以弭乱源。"是日，此项说帖，由署内务总长张志潭密咨外交部查照办理。

△　北京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为纪念中国创办邮政二十五周年，在全国各地邮局发行纪念邮票。按：我国邮政自1896年3月20日经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开办后，至是年底全国各省区大小邮局、所总计1.1032万处，邮路73.83万里，邮务人员3.1958万名。是年发行邮票约计票面价值8800万元。

△　北京政府因财政艰窘，于国务院设置减政委员会，由各部次长等25人组成，以郭则沄为会长。该委员会依据国务总理靳云鹏关于中央军费每月不得超过300万元、政费每月不得超过200万元的规定，拟定减政办法六条。

△　北京政府蒙藏院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法物展览会，为期五日。复于6日延会一日。嗣因中外人士要求参观者仍络绎不绝，于13日起又续行展延十日，至22日始闭会。

△　赴欧全权专使顾维钧电告外交部，国际联合理事会通过鸦片禁绝案，并指定英法中荷四国为执行委员。

△　日军在青岛台西镇设立无线电台，山东交涉员因屡经抗议无效，电请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驻京日使交涉。

4月2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改总裁制为总统制。

△　广州军政府特任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

△　贵州总司令卢焘、省长任可澄通电响应联省自治运动，并组织省宪法会议，表示与湖南取一致行动。

△　赴欧全权专使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缩减军备。谓国际联盟开会，欧美各国均以缩减军备为第一要义，中国亦当趁此时机与各国取同一态度，将现有军备就各省地域大小，实行缩减。

△　北京各界联合会开联席会议，商议库伦问题，一致谴责北京政府有意弃蒙。议决三项办法：一、警告曹锟、张作霖促其速行援救；二、派艾达天代表本会忠告蒙古各王公勿受奸人愚弄，玩误自身；三、派代表往谒徐世昌、靳云鹏，质问对库伦究竟有无办法，促其限期速派援蒙军队收复失地。

△　北京政府航空署在北京南苑机场举行航空游览，是日正式开始售票载客，先每周三次，后改为两次，至5月始停止。

4月3日　　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开成立大会，全省百余县派代表参加，通过吴玉章起草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和十二条纲领。

△　徐世昌下令严禁复辟谣言，略谓："近日竟有复辟谣言，腾载报章，传播京外，殊堪诧异。"声称："遇有此等造谣生事之人，立即缉拿究办，尽法惩治，勿稍宽纵。"

4月4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开会，议员周震鳞等提出立即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会议议决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

△　孙中山、唐继尧宴国会议员，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外交团将'关余'交北京政府，不啻对西南宣告死刑，我人不皆成土匪？救济方法，惟有快选总统。"大多数议员表示赞同。

△　中东铁路督办宋小濂致电北京政府，略谓，二月三日，库伦失守后，难民二万余人拟由俄境赴哈尔滨。该难民在俄行将绝粮，请即给予援助。

4月5日　　援库副司令邹芬急电北京政府，谓援军杳无音信，此间人困马疲，饷弹两缺，白俄蒙匪乘机进攻，若再延迟，内蒙亦恐危险。

△　孙中山电蒋介石、张静江、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告以国会昨日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希速来广州商筹大计。

4月6日　　南洋华侨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开办基金800万元，陈担负一半，余由南洋华侨捐助，聘邓芝园为校长，招收学生300名。校址选定厦门演武亭，校舍未落成前，先在集美学校开学。是日上午在集美学校举行开校式，3000余人与会。下午请杜威讲演《入学之旨趣》，杜威夫人讲演《女子教育之必要》。

△　湖南省议会开临时会议，举赵恒惕为临时省长。

△　广州市政厅公布《广州市施行义务教育暂行规程》及《第一期义务教育计划书》。

△　北京政府交通部电令各电报局，凡有非法团体拍发含有鼓动情词之电报者一律查禁。

△　我国有线电报加入万国电报公会。

4月7日　　广州国会召开非常会议，通过周震鳞等人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丁象谦当即依据组织大纲第二条，动议选举非常大总统，多数议员附议。大会随即采记名投票法进行选举，出席议员220名，孙中山以218票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选毕，粤省各军均向孙中山祝贺，市民结队游行，燃放爆竹，以示庆祝。

△　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北京八校，谓教育经费交通部已允特别协助，旧欠亦分批发还，望各校即日复课。

△　全国急募赈款大会报告，全国各地已募捐241.9234万元，全部交给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赴各灾区散发。

△　北京八校教职员以交涉经费无望，欠薪发放无期，通电宣布全体辞职，并告全国说明辞职理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王章祜因无法维持，亦先后引咎辞职。

△　赵恒惕以所谓“湖南各界”名义致电广东，反对选举总统。次日，赵恒惕又致电广州参众两院，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赵旋即以湘军全体军官名义通电反对。19日，赵恒惕又拍十万火急电致孙中山及国会，谓国会不足法定人数，选举总统违法。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撤退延吉、珲春日军。是日，日公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延吉、珲春领事馆及分馆所在地之日军亦一律撤退。

4月9日　外蒙活佛特使牛福厚持活佛意见书抵京，要求北京政府以恰克图条约为根据，订立条约承认蒙古属于中国，给汉族商人以贸易上之便利。但不许北京政府在蒙古地方驻军。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

4月10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指出成立正式政府的必要，说明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原委，并敦请孙中山就职，建立正式政府。

△　天津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国务院，支持北京八校教职员总辞职，要求政府速筹教育基金，解决教育风潮。此后，江苏教育会、北京各界联合会、山东学生联合会、安徽学生联合会等亦致电政府，要求立即照发北京八校教育基金。

4月11日　海外华侨得悉孙中山当选总统，纷纷拍电祝贺，迄是日止，收到纽约、加拿大、澳洲、菲律宾等华侨团体200余封电报。

△　下午7时，驻京领袖公使、西班牙公使白斯德在京病故。驻京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被推为代理领袖公使。

4月12日　北京八校全体学生2000余人赴国务院、总统府请愿，手执“读书运动”白旗，要求北京政府在最短期间内发放教育经费。同时北京各中等学校教职员以召开联席会议、赴院请愿、联呈政府等方式，声援八校教职员罢工。

△　甘肃平凉、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隆德（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各属又有大地震，每小时一二次，至13日尚未停止。会宁亦震。六盘山崩裂30余处，附近一带田庐、人民、牲畜损失无数，较前数月地震灾情尤重。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唐在复参加在荷兰召开的万国禁烟会。

△　广东省政府颁布男女同校令。

4月13日　孙中山假广东省财政厅开茶话会招待国会议员，并发表演说，二百数十名议员与会。孙中山指出：“国民望真共和，已如饥渴，吾人应竭力以应其要求”；“总统已经选出，正式政府即日成立”，希望大家“少做官，多做事”。

△　滇军总司令顾品珍等电贺孙中山当选总统。

△　北京政府交通部通告，距沟帮子25华里之罗家屯及高家屯两村发现疫症，已死亡20余人，决定将附近之双羊店等十站及营口支路沟帮子等五站暂停售票搭客。后于5月13日疫情停止蔓延，恢复售票。

△　北京八校向北京国务院提出两项要求：一、八校每月经费20万元，须由交通部收入项下拨付；二、从前积欠限三次发清。

4月14日　陈炯明暨粤军全体电贺孙中山当选大总统，略

谓："我公手建民国，肇造共和，全国人民，夙深景仰。今复当选，快惬人心。谨为我国前途贺。"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八校教育经费按照颁定预算发给，先发3月份一个月，自4月份起暂由财政部就交通部协济款内按期拨付，其积欠经费先发一个月，其余分六期拨付，并饬教育部传示各校促令上课。

4月15日　　孙中山电复国会议员，表示："所有设施，当依人民之授权及国会之付托，以为准绳，务期振法治精神，成强国政府。"

△　北京八校校长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具呈辞职，同时八校教职员派代表赴部，索取欠薪。

4月16日　　张作霖偕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抵天津。下午曹锟亦到天津。18日，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乘专车抵津，晤曹、张谈内阁改组问题，曹、张即通电各省表示维持靳内阁，靳即回北京。

△　原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潜赴彰德（今安阳），伙同该地河南第一旅一团长孙会友率部举行兵变，反对豫督赵倜。赵急调军队进攻，吴佩孚亦派兵助攻。20日成、孙兵败出走。后于5月3日徐世昌下令褫夺成慎将军府将军官职及勋章。按：彰德兵变首领成、孙同吴佩孚暗中早有勾结，此次发动意在夺取赵倜地盘。嗣因形势不利，吴又改变手段派兵援赵。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远东共和国宪法会议宣言以非正式公文复优林，表示充分谅解之意，俟远东共和国政府有正式请求，通商谈判即可正式开始。

△　苏俄驻英代表克拉辛致函顾维钧，再次要求与我国通商，重申派遣代表来华，愿予陈广平一切外交官特权。次日，顾维钧电告北

京政府外交部。20日，顾维钧复函克拉辛，说明中国政府立场，允苏俄政府直接派员来京。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英国政府签订《国际邮汇改进办法》，规定自是日起山东济南、威海卫、潍县、烟台四处与英国伦敦及爱尔兰直接通邮。

4月17日　徐世昌就各省筹备裁兵30万以上事，是日电令各省长官就地筹借巨款设立大小工厂，安置复原回籍之士兵入厂做工。此电实则一纸空文，各省既未裁兵，又未办工厂。

4月18日　孙中山对广州工人发表演说，指出民生主义应恢复工人人格及增进工界幸福。

△　孙中山电召蒋介石，望速来粤助理军事。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绥铁路局局长陈世华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代表桔三郎签订《京绥铁路绥包公债借款契约》，借日金300万元，作为建设绥远至包头干线工务费之用。

4月19日　孙中山电复陈炯明，表示当选总统，责不容辞。

△　东省铁路四站原沙俄官兵8000余人宣布独立，归附谢米诺夫。吉林督军孙烈臣饬令延边驻军一体严防。

△　北京各中等学校为声援八校教职员，举行罢课。

4月20日　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通过国会宣言，谓："民国之事，惟热心民国者方足与议，非遗孽废僚所能为役。今根据大纲选举总统，倘有犯顺效逆，当与众弃之。"

△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接待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此后，凡交涉重大问题皆由颜惠庆与优林直接商洽。同时，苏俄政府声明与各国

均采取直接交涉，优林无权代表苏俄政府。

△　新疆督军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谓盘据古城之白俄阿年阔夫在三十里墩地方，埋藏子弹12包，机关枪快枪13包及刺刀、马刀、炸弹等物，经我驻军搜出，已将阿年阔夫逮捕解省监视。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绥铁路局与美商芝加哥泰康洋行签订美金232.5万元借款合同，以京绥路局营业进项作担保，以支付订购600辆货车价款。

4月21日　陈炯明依据《县自治暂行条例》、《县长选举暂行条例》及《县议会议员选举暂行条例》，是日委定全省94县之县自治选举监督，令各县选举事宜按照条例程序妥速办理。各县随即先后举办选举，并将选出的县长报请委任。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采纳八校教职员要求，议定处理清还教育积欠经费办法三项：一、京师教育经费于一星期内先发3月份一个月。自4月份起由财政部就交通部协济政费项下每月按期拨付22万元，作为北京八校、北京师范及公立各中小学校经费；二、教育部向财政部额领之款以向来额领之数为准，由财政部筹定拨付；三、上年12月起至本年2月止，八校及中等各校积欠经费40余万元，先发一个月，其余分为三期，于4、5、6三个月各付一期。教育部即召集各校长会议，宣布阁议原委及三项办法，次日八校教职员开会讨论，多表赞成。

△　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

△　徐世昌批准外交部恢复元年官制。

△　徐世昌批准内务部厘订《废止限制药用鸦片、吗啡等品营业章程》，规定凡含有鸦片、吗啡及其他类毒品之丸散等药，一体禁运禁贩。

△　北京政府财政部会同内务、农商、交通各部及税务处就防止粮食由东三省出洋事，议决办法五条。

△　北京政府交通部发行定期支付券500万元，委托北京中、交两银行发行，月息1.2分，期限16个月，以京汉、京绥两路余利担保，交财政部作为军政费用。按：交通部事先曾据财政部函称，该部历年积亏极巨，预计本年3月至12月底收支相抵，至少约不敷1700万元之谱，要求交通部予以援助俾度难关。

4月22日　北京外交团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总统影响外国商务为由，特电粤领事声明否认。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中英公司签订借款英金50万镑、天津通用银200万元借款合同，用于京奉铁路由唐山至山海关添设双轨。

△　湖南省宪法审查委员会开谈话会，制定审查规则，自后继续开审查会，直至8月下旬始将草案修正完毕。

△　徐世昌批准开山东济宁为商埠。

4月23日　粤军第一、第二两师排长以上军官在广州东园开恳亲会。孙中山出席并发表演说，指出："军人宜以卫国卫民为天职，要发挥爱国思想，不可以兵为做官发财的业务。"

△　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在巴黎接受巴黎大学赠与名誉博士学位。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美国西方电器公司及日本电气会社签订《中国电气公司资金十万美元借款合同》，以中国电器公司股票1250张，计美金12.5万元为担保，作为1917年10月20日交通部与美国西方电器公司及日本电气会社合办中国电器公司之中方股金。

4月24日　孙中山在广东省财政厅欢宴海、陆军军官及警官并发表演说，指出："军人有成无败的事业，惟有革命"；"军人能顺应潮流

以革命，则得人民之助，必成功矣。”

△　湖南全省灾荒。湖南连年用兵，去年又遭灾歉收，加之谭延闿、赵恒惕将谷米150万担外运以裕军费，致今春全省各地即呈荒象。全湘72县，无县不荒，无县不穷。贫民采葛挖菜，其惨状较之北五省旱灾有过之无不及。是日醴陵北田区饥民蜂起，聚集二万余人，老弱蜂拥轨道，哀求附车运往他处觅食。此后，新化、安化等地灾民亦不断逃往各地。5月间，安化饥民领照逃食外地者二三万人。老弱妇幼未能出境者，即靠苦菜、蕨根、蒿子、竹笋充饥，饿毙者时有所闻。据华洋义赈会统计，全省饥民近200万人。

4月25日　孙中山发表英文本《实业计划》序，希望“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强调指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事业发展之一事也。”

△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邀请曹锟、张作霖、王占元等在天津举行会议（通称天津会议），商议内阁局部改组、武力“讨伐”南方及奉直两系军阀势力范围等问题，至5月4日结束。

△　陆荣廷积极布置图粤，陈炳焜率桂军集中梧州。是日，陆荣廷声言分五路攻粤，先入粤者即任粤督。

△　哈尔滨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发行钞票至20余万元之多，花旗银行亦擅出纸币，严重影响财政金融。是日，东省铁路督办宋小濂电告北京政府交通部，一律严禁外国银行在哈尔滨发行钞票。

4月26日　优林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访俄事委员会会长刘境人，磋商商约谈判手续。

4月27日　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卢永祥、吴佩孚等33人联名通电，反对广州非常国会另拟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旋卢永祥致电曹锟、王占元，对曹等代签此电表示不满。

△　北京政府交通部向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借款300万元，修建京绥铁路绥远至包头之延长路段。

4月28日　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报界记者代表谈当选总统后的国内情况，指出："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种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

△　天津会议讨论财政问题，直隶省长曹锐同靳云鹏发生冲突，靳声言辞职。次日，经王占元斡旋，由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通电拥护靳内阁，始了事。

△　吉林省长孙烈臣就日本强行设警情形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谓顷据延吉陶道尹有电称，阻设日警案已三次照会，日领迄置不答。"近据侦报，日本又在大都沟埠内及局子街埠外、县署前街添设日警派出所之举"，请部向日驻京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嗣于5月27日及30日又两次致电内务部，再次请咨外交部向日驻京公使严重交涉。

△　北京政府外交部呈准北京政府驻古巴公使由兼任改为专任。

4月29日　湖北官钱局将200万张纸张恶劣印刷不明，已报请作废的新式小票擅自动用，以致商民发生纠葛，是日省议会通过查办官钱局案。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20.2772万元借款合同，作为偿还前值卫粮饷总局马翰文欠发第十五、第十六两师欠饷之用。

4月30日　北京国务会议接受北京八校教职员关于教育经费议定办法之修正意见，决定照议定办法即日发给两个月经费，同时饬教育部慰留各校长照常任事。同日，教职员联席会议认为满意，决定复职。

△　北京政府外交部依据万国邮政大会《关于客邮撤废的决

议》，致函英、美、法、意、日五国驻京公使，请其遵照决议将在华邮局一律撤销；同时分电我国驻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饬向驻在国催促，终无结果。

△　北京政府交通部批准哈尔滨邮局与远东共和国邮政在满洲里及绥芬河两处互换邮件。

△　优林偕阿格辽夫至北京政府外交部晤刘镜人、朱鹤翔，递送《中俄通商协定草案》。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津浦铁路局与上海怡和洋行签订10.7785万英镑借款合同，作为浦口站电机及电料价款之用。

是月　中国联合军由恰克图南下反攻库伦，白俄蒙匪节节败退，联合军于是月21日前后逼近库伦。白俄蒙匪向中国军诈降，将联合军迎入库伦后，乘联合军不备发动突然袭击。联合军总司令张庆川及官兵多名被俘，收复库伦计划遂告失败。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召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荷公使唐在礼、驻意公使王广圻、驻瑞士公使汪荣宝、驻巴西公使夏贻霆，于暑期回国述职。

△　北京政府侨工局发表调查报告称：我国人民在欧战中，因战争死亡者已有1800余人，其生命、财产、工资、遗族等损失合计已达3000万元之谱，实为我国战时损失最大最要之项。

△　京奉铁路锦（州）朝（阳）支线动工。自锦州经义县、金岭寺至朝阳，长134.4公里。其中锦州经金岭寺至北票煤矿支线，长112.6公里，于1927年通车。

△　李厚基在福建省14个县派军队勒令农民栽种罂粟，征收烟苗税，每亩自三元至18元不等，总共收税67万元。另姜桂题在热河各县勒令农民种烟苗，每亩收费六七元，作为毅军军费。

△　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创办大康纱厂，纱锭5.808万枚，线锭7600枚，是月完工开车。又在青岛创办大康纱厂，有纱锭4.3548万枚，线锭6900枚，布机1204台，于10月完工开车。

△　叶恭绰在热河朝阳（今辽宁朝阳）创办北票煤矿公司，资本总额500万元，内京奉铁路局官股200万元，商股300万元。叶自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

△　廖仲和、叶崇禄等集资120万元在厦门创办厦门商业银行。

△　李云书、简照南等集资10万元创办南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轮运本国土产出口及欧美货物进口，设总公司于上海，分公司于美国纽约。

△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敷设长崎、大连间海底电信线。

3月—4月　　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酝酿建立广东共产党。陈独秀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广东共产党就此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确定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

5月

5月1日　　长辛店1000余铁路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工人亦派代表参加。大会通过成立工人俱乐部等决议。会后游行示威，工人高呼"劳动万岁！""五一节万岁！""八小时工作！"等口号。5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即工会）正式成立。

△　上海十几个劳工团体在法租界发起筹备五一纪念大会，筹备活动为法捕房察觉。松沪护军使通令各军警戒严，是日派警察和士兵荷枪实弹在各大马路梭巡，并在公共体育场架设机关枪，如临大敌。

筹备处临时决定分杨树浦、车袋角两处集会。届时杨树浦会场有万余工人，车袋角会场有数千工人。工人高呼“劳动万岁！”口号，提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的要求。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　广州各工团3000余工人举行庆祝五一游行，工人抬着“劳动神圣”大标语，提出“不劳动者不得衣食住”、“八小时工作”等口号，沿途散发传单。

△　京绥铁路丰台至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干线长1213里，支线长122里，全路竣工，通行工程列车，发售客货票。按：该路为我国自办之铁路，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兴工修筑，始由詹天佑总司其事，继由邝孙谋、陈西林二人负责修筑，历时10余年始修成。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整理六厘公债5439.2228万元，以关税剩余为担保，用于整理、掉换民国元年发行之六厘公债。6月间复追加发行六厘公债2560万元。

△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会议，决议建议北京政府废两改元，改铸旧币，停止滥铸铜元。北京政府未予采纳。

△　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提倡国语教育，训练内地国语教员，特举办国语讲习所。是日举行开学式，参加学员70余人。

5月2日　　桂林民军廖大鸣等数千人起事，占乐平。陈炳焜调梧州驻军前往镇压。

△　北京政府内务部训令京兆尹孙振家、京师警察厅总监殷鸿寿，谓直、鲁、豫、晋、陕等省区“灾民幼女多有被人掠买转入娼寮情事”，应由地方、铁路各警察从严查究。

5月3日　　北京八校教职员决定自是日起暂先留职，惟声明尚有

善后问题数端，一俟北京政府解决后，即行回复职务。

△　陈树藩部再次进攻聚集渭河以北的郭坚所部民军，又战败，其弟陈树滋毙命。

5月4日　　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联名通电，宣布："中华民国大总统已定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政府成立，军政府即应于是日取消，所有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是日应解除。"

△　北京政府内务部在北京故宫中和殿召开地方行政会议，章宗元、边守靖为正、副会长，总统府代表、各部总长及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北、江苏等14省代表与会。会议审订《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市自治法案》、《乡自治法案》等。25日，江苏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否认地方行政会议，撤回代表，后安徽、陕西两省亦相继撤回代表。会议于6月8日匆遽闭会。

△　北京政府内务部咨各省区规定发给护照办法，谓"嗣后除本部派员因公出差或运输本部官有物及其他必要情形由部发给护照，暨其他官署向有发给护照特例仍从其特例外，其余护照在京概由京师警察厅，在外概由各警察厅、局、所核准发给"。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中俄通商协定草案》事复函优林，允议通商；并于9日又将《致远东共和国宪法会议书》交优林，再次表示开始接洽商约事宜。

△　北京学生联合会不顾警察干涉，在高等师范学校开会纪念五四运动二周年。

△　山东省议会揭露山东财政败坏真相，谓教育经费拖欠四五月，几酿成罢课风潮；河工因欠款坐视堤防溃决；司法监狱欠款几至饿毙囚犯；士兵薪饷月需十余万元，仍经常无着。除向省长田中玉提出质问外，并电请总统、国务院严予申斥。

5月5日　　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在广州国会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发表就职宣言。略谓：“际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同人，幸共鉴之。”旋至北校场检阅军队。广州全市20万人执旗游行，晚间举行提灯大会，以示祝贺。

△　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表示：“列强及其人民依条约、契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当尊重之。”对国内天然利源的开发“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惟一之政府”。

△　孙中山致函美国总统哈定，希望美国承认并支持新政府。略谓：“中国人民咸认美国是民主之母，与自由正义的拥护者，值此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民主之胜利与否，端视美国对华之政策而定，故而盼望美国重申门户开放之精神，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予新政府承认及支持。”此函托马素于6月6日带往美国，面交美国国务院。美国务院未能转达，亦未作任何反应。

△　孙中山致电徐世昌，指斥徐为“承平时一俗吏”，“名为受人拥戴，实则供人傀儡”，促其“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　陈炯明通电揭露陆荣廷侵犯广东阴谋，表示决心自卫。27日再次通电，揭发陆荣廷侵粤阴谋。

△　靳云鹏回京，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应徐世昌邀，亦相继入京。

△　香港英当局禁止中国同胞祝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5月13日，广州政府外交部向驻粤英领事提出抗议。26日，香港总督向广州政府道歉。

△　全国道路建设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推张謇为名誉主席，王正廷为主席，内设测量、演讲、赛会、会计四股。

5月6日　　孙中山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南麓，组织政府，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徐绍桢为总统府参军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

△　孙中山在总统府召开军事、财政会议，议决：军事方面，将粤军民军混合改编为十个师作为国军；财政方面，发行纪念券200万元，十年公债券100万元，再由侨商及内地资本家筹集国民捐100万元。

△　孙中山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周年，亲往黄花岗致祭，广州各团体、机关、学校亦派代表参加。

△　北京政府就日本擅自派八名军事联络员分驻珲春、六道沟、头道沟三处事，令外交部向驻京日使交涉。

5月7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顾品珍为滇军总司令，卢焘为黔军总司令，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修正外交部官制草案》，令所属各厅、司职掌暂照修正官制草案办理；同时裁撤编译处，添设条约司，所有编译事宜归并条约司办理。

5月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王正廷任海牙常设公断法院公断员。

5月9日　　经孙中山一再电召，蒋介石于是日自奉化启程赴粤；5月24日又以母病回奉化。

△　陆荣廷、陈炳焜增兵梧州，准备攻粤。粤军叶举、黄大伟、

魏邦平、熊略等部亦向西江增防。

△　京师市政公所督办张志潭与中法实业银行代表赛利尔签订《北京电车合同》，借款200万元作为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官商合办的官股。

5月10日　徐世昌在总统府召集靳云鹏、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开联席会议，决定内阁部分改组，分别发给曹、张、王三人军费，通电各省促办选举，并划定三个势力范围：张作霖管辖东三省、内蒙三特别区，主持征蒙事宜，指挥热、绥、察各军；曹锟管辖直、鲁、豫、陕、甘，陕督更换，以二十师师长阎相文担任；王占元管辖长江及湘、川、滇、黔，并助陆荣廷攻粤，会议于24日结束。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中日两国警察会巡中日国境，并拟定办法草案15条。

△　李定庵、钱汝雯等在上海创办上宝农工银行，是日开业。资本额定30万元，实收15.8万元。1925年11月因巨款被窃，宣告停业。

5月11日　川军将领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逼走熊克武。徐世昌以川乱为名，令刘存厚进攻成都。

△　陈炯明请辞陆军、内务两部长兼职。

5月12日　赵恒惕受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之托，向陈炯明提出缔结两粤互不侵犯协定，为陈所拒。

△　北京政府币制局电令南京、安徽、湖北、湖南各造币厂，即日停铸铜元，并查禁轻质铜元。

△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反对矿局擅自增募保安队千余名下矿监视。矿局勾结官府，进行武力镇压，罢工持续三天后失败。

5月13日　徐世昌特任杨庆鋆署江西省长，令准原省长赵从蕃休假；又令准王士珍辞苏皖赣巡阅使职。

△　颜惠庆与优林会谈，商谈《中俄通商协定草案》及东省铁路问题。

△　日本内阁就满蒙政策作出决定，认为必须确保并努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益。同日，日内阁决定撤退胶济铁路沿线的驻兵。

△　中日合办的大东银行在北京设立，资本250万元。

5月14日　北京靳云鹏内阁第三次改组。徐世昌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颜惠庆为外交总长，齐耀珊为内务总长，李士伟为财政总长，蔡成勋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董康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王迺斌为农商总长，张志潭为交通总长。署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鹏、署外交总长颜惠庆、署内务总长张志潭、署财政总长周自齐、署海军总长萨镇冰、署司法总长董康、署教育总长范源濂、署农商总长王迺 斌、署交通总长叶恭绰均准免署职。

△　白俄诺马阔夫部3000余人由斋桑地区越界窜入新疆塔城，旋与原在塔城之白俄巴奇赤旧部合流，队伍扩充至万人，并在塔城地区残酷地烧杀抢掠。塔城地方当局一面劝令白俄解除武装，一面报告杨增新，28日杨电告北京政府请示办法。按：白俄巴奇赤部于1920年窜入新疆，被解除武装后安置于塔城。

5月15日　靖川军第四军军长邓锡侯通电宣布自19日起解除军长职务，所属靖川军第一、第十一师暨兼领第六师等部队，交由川军联合办事处处理。

△　北京八校校长以北京政府未履行发放教育经费诺言，再度提出辞职。

5月16日　广州国民大会通电痛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等32人

发出的通电，声明“公举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是大定，统一可期”。

△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电北京政府告急，谓藏人近分两路进犯，一由泥马宗趋雅江，一由康定属之甲埂霸直趋康定。

△　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电告北京政府，白俄谢米诺夫在满洲里组织政府，请速定办法，指示进行。

△　日本首相原敬在东京召集殖民事务大会（通称东方会议），与会者有内阁阁员、朝鲜总督斋藤、关东厅长官山县、海参崴派遣军总司令官立法、关东军司令官河合、驻青岛日军司令官由比、驻台湾日军司令官福田、驻京公使小幡、驻奉天总领事赤冢等。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坚持中日直接交涉，同张作霖保持亲善以经营满蒙，“满铁”贷款给东省铁路以取得“满铁”车辆进入长春、哈尔滨，并在上述地区扶植日本势力等侵华方针，于25日结束。

5月17日　日本内阁就对张作霖的政策作出决定：对于张作霖在东三省充实内政、军备的措施给予援助，但反对张作霖把势力伸进关内及中央政权，当日并将此决定通知东方会议。

5月18日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离北京返赤塔，其职务由阿格辽夫代理。优林旋出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

5月19日　北京国务会议以北京八校迄未开课为借口，推翻4月30日议决案，决定将职员薪资暂行停发，由财政、交通两部查照前议储款以待，俟各校开课再行照发，同时饬教育部转知各校督促上课。

△　北京政府设防灾委员会，徐世昌派陆徵祥、恽宝惠为正、副会长。

△　广州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与日商太平洋公司在上海签订800万元军械借款合同，以全粤矿山开采权为担保。北京政府外交部旋即向驻

京日使声明此合同无效。

△ 唐山、内丘、任县、巨鹿、平乡五县灾情奇重，灾童饿死1.2377万人，被贩卖5057人，代价1元至10元，或40元至50元不等。

5月20日 中德复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与德国政府代表卜尔熙谈判中德协约事，经50余次非正式会议完成草案，是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决定恢复两国外交及商务关系，并附声明两件：一为德国“凡因与中国订立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条约及其他一切关于山东省之文件而获得之一切权利、产业权、特权抛弃之”；一为德国取消在华的协定关税权及领事裁判权，承担《凡尔赛条约》对于中国应尽的义务。

△ 徐世昌公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凡五章24条。

△ 浙江省宪期成会在省教育会开成立会。

5月21日 徐世昌令准赤峰交涉员改为热河交涉员，嗣于5月28日以张翼廷充任。

5月22日 北京八校教职员发布第二次《全体辞职宣言书》和《敬告国人书》。同时八校学生代表开联席会议，议决派代表赴国务院请愿，挽留八校教职员。嗣于26日北京各中小学生以八校教育经费关系到北京教育界全体，议决全体罢课予以声援。

△ 南洋华侨代表余佩皋、廖衡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教育两部及驻英公使，谓“接新加坡电，学校注册条例六月一日实行，恳速挽救”。同时，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亦发电各地学生会，请求声援，迅速制止6月1日实行注册条例。

5月23日 广东省财政厅及广东烟税承包商有成公司与华南银行及台湾银行签订毫银20万元借款合同、毫银40万元借款合同、毫银三万元借款合同。

5月24日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以川省内讧未已，川边地方行政亦均独立，呈请北京政府依照四川省众议院名额划分若干名，由川边自行依法选举。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为添设京奉铁路唐（山）榆（山海关）段双轨，向中英公司借款50万镑，年息八厘，以京奉路余利担保。

5月25日　徐世昌特任阎相文署陕西督军，调陈树藩为祥威将军；周登皞暂行护理绥远都统。

△　靳云鹏召集在京蒙古王公会议商讨征蒙问题，议决先由在京蒙古王公派代表回库伦劝令活佛绝俄，服从中央政府，否则大张讨伐。次日，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蒙古王公，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均发表讲话，表示要平定蒙古叛乱。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日本准备在大连物产交易所改用日币金本位一事，电令奉天交涉员向驻奉天日领交涉。

△　驻京法使馆代办慕古海就中俄关系问题访北京政府外交部，颜惠庆告以中国在莫斯科仅派有办理总领事事务之陈广平一员，至于苏俄政府如派代表来京，须承认先决条件，视为非正式之代表。嗣于8月24日驻京英使馆参议克来佛亦访外交部，提出同样询问。

5月26日　孙中山在广州与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周某谈话，希望共同贯彻革命主张，“以救垂亡之中国”。

△　徐世昌、靳云鹏密电陆荣廷，表示对粤不另发命令，倘发明令势必承认广州政府为交战团体，授陆全权处置。

5月27日　陈树藩致电北京政府，谓奉命免职，自当部署回京，“惟七年军饷政费皆由地方挪借，计欠七百十五万，自应即日垫款，请拨付”。国务院电复，谓“欠饷当归垫，希与曹使、阎新任直接电商，仰即一面交代，一面将饷册送京，以凭核发”。

5月28日　孙中山命陈炯明率部出驻肇庆，以趋梧州。又命许崇智由北江入桂夹击，李烈钧率赣、滇军，谷正伦率黔军齐向桂林，并约湘军同时攻桂。

△　中意合办震义银行在北京开业，资本总额1000万元，收足250万元，总董张勋，总裁刘文揆。

5月29日　徐世昌令准王章祜辞职，任马邻翼署教育次长；在教育总长范源濂未到任以前由马暂行代理部务。

△　晨，北京八校教职员数十人至教育部静坐，要求发还欠薪，至晚无结果而归。次日又继续往教育部坐索。

5月30日　徐世昌颁布征蒙令，谓“此次库伦事变，实由少数外蒙莠徒勾结旧俄军官，劫持活佛，进扰蒙境，肆掠廛市，残杀商民”。本大总统“决定大计，整肃师旅，迅图戢定，兹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充蒙疆经略使，所有一切剿抚计划，付以全权，便宜行事。……各该特别区都统，应一并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一事权。至于后方策应，诸待援济，并应由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随时会商妥筹办理。”

△　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开幕，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参加。中国运动员124人，夺得足球、篮球、队球三个锦标，比赛结果菲律宾名列第一，中国第二，日本第三，于6月4日闭幕。

△　陈树藩致电北京国务院，谓俟新任到陕，即遵令交卸。同时陕军全体旅、团长张宝麟等致电北京政府，声称拥护陈树藩，请收回阎相文督陕令，“否则全体将士，誓死不承认”。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在东京东亚同文会发表演说，谓青岛距日本门司只有270英里，为日本赴中国之最捷径，日本欲图中国，宁放弃满蒙及西伯利亚，决不可放弃青岛及山东。并强调说：“予以为此

后对华政策以借文化宣传为第一步，效果必巨。”

5月31日　徐世昌通令禁烟，责成各省军民长官确实督察，并遴派大员分赴各省查勘，务使一律肃清。

△　北京各界联合会召集学生联合会、女界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北京教育会等八团体代表20余人假政法专门学校开紧急会议，讨论维持国内教育办法，决定举行北京市民维持国内教育大会。

△　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朱延昱、交通总长张志潭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长野村龙太郎签订《四洮铁路日金一千二百五十万元短期借款》，以偿还原借款，年利9.5厘，期限一年。

是月　粤军参谋长邓铿贯彻禁烟、禁赌法令，派专员到各地督促查禁。是月在广州晏公街缉获约200多担烟土，悉数押赴燕塘焚烧。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电沿海各省，谓巴西近年实业凋敝，华工失业者不下二万余人，望劝阻工人赴巴。

△　据环球中国学生会游学招待部调查，中国学生在美国研究专科者几千人，所学之学科有60余种。

△　贵州省上年先遭蝗、旱两灾，继以水灾，禾稼无收。入春以来，冰雹间作，全省81县，被灾者已达半数。有21县受灾最重。16县次之。灾区广袤3000余里，饥民多至300余万。卖子鬻妻，不供一饱，流离载途，死亡相藉。

6月

6月2日　安庆中等以上各学校教员及学生，以省议会十年度教育经费屡搁不议，是日下午，各校学生代表方乐周等10人，赴省议会请愿被逐。省立一师、一中等校学生闻讯，结队前往抗议。皖南镇守

使马联甲和凤阳关监督倪道烺下令毒打学生，当场打伤、刺伤学生40余人。姜高琦身受七刀，胸腹颈项洞穿，抢救无效，7月1日身亡。周肇基被殴，遍体鳞伤，亦于次年死亡。适法专校长光升到议会，见此惨状，即怒斥马联甲屠杀学生罪行，也被打。全城舆论大哗。

△　北京八校及中小学生代表梁铎等18人，就教育经费事赴国务院请愿，要求履行4月30日阁议三项办法。因拒不得入，守候一昼夜。

△　北京政府外交部议定解决中德间债票办法两项：一、凡国民与国民间、政府与国民间之债权券票另定办法；二、凡政府与政府间之债权券票，自断交、宣战之日起无效。

6月3日　上午9时许，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生40余名列队赴天安门，随后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学生、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京兆第一、第二中学、医学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等15校四五百名学生陆续到天安门集中，向北京政府请愿，无结果。各校学生又转赴教育部请愿，其时北京八校教职员马叙伦等亦在部坐索欠薪，于是邀马叙伦至新华门一同请愿。靳云鹏拒不接待，教员、学生据理诘问，同卫兵发生冲突，卫兵用枪柄、刺刀击伤师生。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马叙伦、李大钊等十余人亦被殴伤，造成“六三事件”。各界民众闻讯，愤怒异常。次日，北京各报一致谴斥军警横暴。北京各校教职员、学生分发传单，促市民起来维持教育，并通电全国请速为声援。

△　安庆各界在教育会集会，学生会代表报告“六二惨案”经过，会议议决派代表质问省长聂宪藩。同时各校学生一律罢课，发表宣言，要求惩办马联甲等人。省城各界为支持学生运动，举行罢工、罢市。嗣于11日安庆学生会、上海安徽六公团、南京安徽同学会等代表在安庆开联席会议，议决惩办凶手马联甲等四项办法。惨案发生后，芜湖、合肥、宣城、凤阳等地学生罢课声援。省政府被迫答应教育经

费由原来的70多万元增加到150余万元，将“六二案件”交地方法院审理，后又转到省法院审理，终无结果。

△　张作霖派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等三人为外蒙绥抚使，副总裁达寿等二人为外蒙宣慰使，赴蒙古劝谕蒙族同胞内向。

△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接见陈广平，口头承诺北京政府所提先决条件，表示即派非正式代表赴北京。次日，陈广平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

6月4日　　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北京政府及各省区，主张各省制定省宪。谓：“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改弦更张，斯入正本清源之道。”旋赵恒惕、卢焘、陈炯明、刘湘、顾品珍、陈树藩先后复电响应。19日，徐世昌、靳云鹏分别派遣吴炳湘、鲍贵卿先后赴浙疏通卢永祥，30日，卢永祥通电所属，主张从速制定省宪。

△　北京国务院连发两电致各省区，一为说明“六三事件”的经过，一为公布北京教育风潮的始末。电报诬称八校教职员“破坏教育，破坏秩序”。

△　晚12时，陆军第十八师第二十一混成旅一团在湖北宜昌哗变，反对王占元克扣军饷。变兵四出抢掠，中国银行分行、大来洋行、安地洋行及大商铺、货栈多被毁，海关亦被掠。房屋焚毁千余家，毙者多至千人，损失1000万元以上。旋经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王都庆督队弹压，同时英、日、法、美亦派舰开往宜昌镇压，变兵溃散。

△　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及自治同志会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援助北京八校教职员办法。次日，全国报界联合会议决派员慰问受伤之教员、学生，并呼吁全国声援。此后，山东各校联合会、山东学生联合会、山东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山西省议会、杭州教职员学生

联席会、上海复旦大学等校全体教职员等团体及个人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速定办法，明令宣示以安人心而维教育。

6月5日　　靳云鹏指使京师地检厅起诉，指控八校教员梁铎、马叙伦等妨害公务及公安，应依法讯办。八校教职员亦向京师地检厅控告靳云鹏破坏教育。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日本侨民擅自在厦门组织警备队事，向驻厦日领交涉。日领允撤去警备队。

△　北京警察厅禁止民众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是日在全城张贴禁止开会布告，断绝天安门交通，中央公园暂停售票，并派警察看守各校校门，阻止学生赴会，致国民大会无法召开。

△　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马邻翼呈请北京国务院严惩罢课学生，允许校长辞职，提前放暑假，改聘教员。

△　吉林绥芬河及黑龙江满洲里两站之苏俄海关，经我方一再要求撤除，已得远东共和国允许，饬令各该海关照办。惟各海关以扩充、修筑俄境税关为由，呈请展缓至9月底迁出。当由吉黑当局允许批准。

△　陆军第八师之一部士兵因索欠饷未遂，在湖北沙市哗变，放火抢劫，地方损失甚大。

6月6日　　川军混成旅旅长以上将领在重庆开会，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并于24日将此事通电全国。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职，发表宣言主张川省自治，同时取消川军联合办事处。

△　徐世昌特任陆洪涛为甘肃督军。

△　北京、上海、湖南、济南等地各界、各团体纷纷通电反对英日续盟，谓此项盟约内容与中国之安宁大有妨害，若任其续订，必将

助长日本对华之侵略行为，而扰乱远东之和平。

△ 北京46所小学教职员代表开会，声援八校师生，要求北京政府确定维持教育办法，否则辞职。

6月7日 孙中山致电北京八校教职员，指出：在北京政府下，“决无教育发展希望，况复摧残至此”，欢迎全体来粤，共商进行。

△ 援库副司令邹芬以白俄蒙匪猖獗，锡盟已陷八旗，张家口危急，急电北京政府请示办法。

△ 晚11时，第二师第二十一旅一团同关押的宜昌变兵一起在武昌哗变。变兵纵火抢劫，城内商店损失甚巨。银行、官钱局、造币厂亦被焚毁。武昌长街等处繁盛地方顿变焦土，大火至9日始熄。王占元派督署卫队团长刘国全带队弹压，黎明时变兵始分道回营。江中停泊的日本、英国和美国兵舰，全部生火待发。8日，王占元发出通电，诡言此次兵变系受安福党人煽惑。

△ 北京公使团复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绝不资助粤省。

6月8日 王占元假意让宜昌、武昌哗变的1200余名士兵回籍，每人发给二个月薪饷，并允许自由携带抢来物品，于是日下午备专车30节护送，同时密电第四旅旅长刘佐龙中途枪杀。晚8时火车到孝感站突然停车，9时起埋伏在车站的第四旅即开枪扫射，至次日早10时止除在混乱中走脱数十人外，大部分惨遭杀害。京汉铁路因之一度堵塞，至晚方恢复原状。

△ 陆荣廷以广西省议会名义通电主张实行自治。

△ 驻京美使馆代办芮德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谓宜昌六阅月中两次兵变，显系王占元不能约束部下，至令外人蒙祸，政府当负全责。同时英、日两使亦提出同样抗议。

6月9日　旅京湖北同乡近千人以鄂省兵变事在湖广会馆开紧急会议，推孔庚为主席，议决四项办法：一、请鄂籍各要人正式控告王占元；二、派代表向北京政府阐述兵变惨状，要求迅速撤换王占元；三、通电全国说明兵祸情形；四、通电号召湖北全省各界以罢工、罢课、罢税为驱王之武器。

6月10日　山东武定、东昌间汽车路建成，全长1200余里。按：该路为美国红十字会出资50万元，用以工代赈办法招募灾民修建。

6月11日　徐世昌命令王占元妥筹抚恤宜昌、武昌两次兵变受害之商民；查明此次兵变该管师旅长职名，呈候严惩；其肇事在场各犯即着该管长官严缉务获，依法惩办；并严令各路军队随地堵截，缉拿归案办理。

△　马叙伦在首善医院绝食，抗议北京政府摧残教育，虐待教职员、学生，指出在刀刺枪打之后，复以医院为囹圄，断绝交通，严重监守，待受伤的教职员俨同已决之死囚。北京教育界纷起声援。北京政府被迫于14日撤退首善医院监视的军警，劝令受伤教职员出院，于是马叙伦始进食，并迁往法国医院医治。

△　徐世昌令财政总长李士伟未到任以前，由财政次长潘复代理部务。

△　聂云台、王正廷、吴善卿等在上海创办华丰纺织公司，资本100万两，纱锭1.5万锭，雇佣工人1200余名，是日正式开工。后因经营失败于1924年由日华纺织公司承租，1926年租期满后又由日华纺织公司承购。

6月12日　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谓外蒙匪势既成，对内蒙影响极巨，嗣后宜采三种办法：一、劝慰两蒙王公，解除外患；二、严剿余匪，谋去枝节；三、先按和平手续，电令活佛投顺，如其不悟，再兴干戈，以示怀柔而息边患。

△　陈树藩致电北京政府，谓已预备卸任，新督到即交替，惟欠饷如何迄不得复，如再搪塞，将不堪设想。同时陈树藩又以陕西全体军官名义电北京政府，谓陕境安危，悉视陈去留为转移，务请收回成命；否则取必要手段，相当对付，惟力是视，不知其他。

△　奉天南满铁道西奉天窑业会社、大陆窑业会社、满洲窑业会社、大连建材会社、朝日炼瓦工场、松茂工业部土地建物株式会社、沈阳窑业公益炼瓦工场等各窑厂之华工3000余人，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6月13日　桂系军阀陆荣廷谋重得广东地盘，勾结直系，集大军于梧州，是日下达总攻击令，分三路进犯广东。

△　芜湖农业、女师、商业、工读、职业、教会等学校及各中小学生3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队前有旗一面，上书“杀死学生姜高琦之血衣”，有二人高举血衣随行，沿途散发传单及演说，谴责议会与军阀勾结枪杀学生。

△　北京政府电令驻赤塔总领事管尚平向远东共和国政府质询华船在黑龙江航行问题。旋据远东共和国政府口头复称：远东共和国政府实无不许华船在黑龙江左岸两个俄国口岸间航行的禁令。又于8月26日复照，谓对于中国轮船并无拘留不准放行等情节。

6月14日　孙中山收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于去年10月31日自莫斯科所发来函，赞扬中国之奋斗，建议恢复中俄商业关系，中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此为孙中山首次正式收到的苏俄政府来函。

△　徐世昌下令改延珲镇守使为延吉镇守使，以张九卿充任。

△　旅湘湖北同乡在长沙湖北会馆开驱王（占元）大会，议决三项办法：一、发出三封通电：致电广州政府、护法各省及本省各县，历诉王占元祸鄂罪状，请求援助逐王；致电北京政府，请速撤王；致

电湖北全省各团体实行罢税、罢业，合力驱王；二、推举吴醒汉、张华甫、夏斗寅、顾永鉴四人为代表，向湘省政府求援；三、组织委员会主持今后进行事宜。

△　广州一万多机器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机工起而声援。罢工坚持三天。经地方当局出面调停，厂主同意增加工资20％—50％。

6月15日　北京国务院就北京教育风潮再次通电各省区，谓少数教职员借端煽动包围新华门，击伤马（邻翼）次长，种种不法行为，业经构成刑事罪名，自应断之法律解决。

△　武昌1000余受兵变祸之灾民集会，要求省政府赔偿、抚恤、“办团”（意指组织商团自卫）三事。王占元对“办团”坚持不允。

△　浙江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举王正廷为委员长。

△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照会北京政府，谓恩琴之攻击已引起广大军事动作，使俄军不得不越入蒙古境内反击恩琴，俟目的一经达到，蒙占境内之俄军即行撤退。6月27日，克拉辛致函顾维钧转达苏俄政府再次会剿恩琴要求并提出中、俄及蒙古地方组织委员会，以期解决中国中央政府与蒙古地方之间一切关系之主张。同时苏俄派遣大批红军和远东共和国红军组成联合军侵入我国外蒙古。

△　日本关东厅不顾奉天地方当局的反对，竟令大连物产交易所改用日币金本位。

6月16日　粤军与桂军陈炳焜部战于广西灵山，粤军大获胜利。

△　徐世昌派唐在复为签订中国、波斯条约全权代表，并令就近在意京办理。

△　张作霖不就蒙疆经略使，通电吉、黑、新、热、察、绥等省

区，告以凡关蒙边军事，直接与国务院协商。靳云鹏电恳张作霖从速就职。

△　旅京安徽同乡1000余人开会，声讨马联甲惨杀安徽学生，议决要求北京政府惩办马联甲，并通电全国请予声援。

△　宜昌人民举行市民大会，议决仿照烟台华洋联合董事会办法，组织万国商团，实行武装自卫。

△　广西省长李静诚因军人索款甚急，无法应付，夤夜潜逃。

6月17日　徐世昌以上海商场铜元充斥，价格跌落，饬币制局令湘、皖、赣、宁各造币厂暂行停铸。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顾维钧，告以俟苏俄正式书面承诺中国所提条件，方可允其派非正式代表来京；召回陈广平，改派郑延禧办理总领事事务，前往莫斯科照料华侨。顾维钧即将外交部意旨转达克拉辛，27日克拉辛复函顾维钧，对中国所提条件表示异议，并谓华工在俄享有充分之平等与自由。

△　北京政府外交部对大连物产交易所实施金建制度一事，向驻京日使提出书面抗议。谓该金建制度扰乱我国东三省金融，驱逐反对金建的我国巨商李子明，违背条约，希即取消。

6月18日　孙中山下令讨伐广西军阀陆荣廷。

△　徐世昌公布《县自治实施细则》，凡21条；《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凡56条。

6月19日　夜，驻湖北武穴卢金山第三旅第六团一营在富池口哗变，营长出面阻止，当被击毙，并抢劫征收局、煤矿局及各大商店，损失近20万元。旋即分窜鄂东广济、蕲春各地。次日，王占元派鄂军团长谢超带队弹压，并令“江利”舰协剿，始告平息。

6月20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率所部粤军出肇庆，进攻梧州；令许崇智为第一路总指挥，率黄大伟等部由北江入桂，攻击贺县、怀集；委魏邦平为第二路总指挥，叶举为第三路总指挥，会攻梧州；命翁式亮为第四路总指挥，黄志恒为第五路总指挥，何国亮为第六路总指挥，分别出高、雷、钦、廉，合击桂军；由李烈钧率滇赣两军（朱培德、杨益谦等部）向桂林进攻；令谷正伦率黔军攻柳州。实行全线出击，以梧州为主战场，“荡平群寇”。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

△　陈炯明通电讨伐广西军阀，谓“桂贼无状，先开兵衅”，“炯明将大率三军保障乡土，歼除桂贼，以拯救桂人”；同时，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出师布告，随即亲自出发视师，设行营于肇庆。

6月21日　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会，议决反对英日盟约中侵及中国国权案。

△　粤军海陆空三军80余万人，全力进攻梧州。

△　旅京、津湖北同乡900余人在北京湖广会馆开驱王（占元）大会，会后赴新华门请愿撤免王占元。

△　第五次广东教育会议在广州召开，全省400名著名教育家参加会议。议决将教育行政与省政府脱离关系，设立教育委员会专司其事，为独立机关，不受政治上之干涉；教育经费亦特别规定，不得拨作他用。提议施行全省普及教育，增加小学经费，添设师范学校等项措施，于30日结束。

△　驻汉口领事团以宜昌、武昌兵变侨商损失甚巨，向王占元提出三项要求：一、侨民居地附近二十里内，不得驻扎军队；二、赔偿损失，抚恤受伤教士；三、增加领事馆卫兵一中队。

6月22日　谭浩明派代表向孙中山乞和，表示愿驱逐陈炳焜，恢复自主。孙中山告以欲和须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一律解兵，完全由桂民自治。

△　广东各界在广州教育会开国民大会，决心以全力作援桂军后盾。

△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召集临时阁议，讨论鄂陕问题，议决鄂督王占元之地位决不更动；陈树藩所提要求，交新任陕督阎相文处理。

△　京绥铁路机务工人为要求加薪举行罢工，并派代表向北京政府交通部接洽。旋交通部派路政司长王景春调解，路局同意加薪，25日始照常开车。

△　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大会，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派张太雷参加，于7月12日闭幕。

6月23日　孙中山致电蒋介石（时守母丧），促来粤助战。

△　桂军师长刘震寰通电宣布独立，与陆荣廷脱离关系，25日率所部步兵四营、机关枪一连攻梧州。

△　徐世昌公布《省参事会条例》，凡18条。《条例》规定省设省参事会，由省长及参事员12人组成，以省长为会长，筹划关于地方应行兴革及一切行政事项。

△　孙中山颁布《各部官制通则》，凡10条；《修正总统府财政委员会条例》，凡六条；《总统府秘书处官制》，凡14条。

△　北京政府司法部设立文官普通惩戒委员会，由司法次长余绍宋兼充委员长。

6月24日　徐世昌下令处分鄂省武（昌）、宜（昌）兵变各负责官佐，免去宋大霈、孟昭月旅长本职，孙建屏、穆思棠、王锡黄、彭德铨团长本职，此外团附、营长以下各员着湖北督军王占元详细查明汇呈惩办。26日，王占元拘捕营长以下军官14名。27日将贾世珍等六名枪决。

△　熊克武以考察湖南制宪为名到达长沙，与赵恒惕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

△　驻美公使施肇基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说，反对日英同盟。

6月25日　孙中山颁布《侨工事务局暂行条例》，凡10条；《财政部官制》，凡八条。同日，又任命内务次长吕东伊代理部务，陆军次长程潜代理部务。

△　蒙古“临时政府”就苏俄红军侵入蒙古向蒙民发布告示，称：“苏俄红军是支持我们国民军的”，“它力求消灭强盗匪帮”，“红军消灭了恩琴之后，就会撤回俄国。我们特此通告居民安居乐业，不用担心和怀疑。”

△　北京八校学生代表开联席会议，决议控诉靳云鹏，罢课期内各校组织学术讲习会，邀集各团体开茶话会请求援助。

6月26日　粤军经数日剧战并得刘震寰部配合，于是日上午9时占领梧州。梧州为广西门户，粤军既克，已成破竹之势，各处桂军急谋自保，纷纷与陆荣廷脱离关系。次日粤军将总司令部移至梧州。

△　广州各界三万人举行援桂大巡行。入晚得梧州克复之确报后，商民欢呼，举市若狂，西关、长堤、双门各繁华街道，均燃放鞭炮，至夜半犹未息。

△　下午，北京八校教职员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招待全国报界，有53家报社记者出席。教职员表示：同人于“六三”以前，只争教育经

费；“六三”以后，则并争教育人格。教育经费乃教育之生命，人格系教育之精神，两事缺一不可。此后即经费问题解决，若人格问题未决，同人必不承认。要求舆论界予以支持。

△　上海各团体5000多人开国民大会，反对英日续盟。原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因军警阻挠，改在地检厅前开会。决定三项办法：一、致电英政府请其取消；二、致电顾维钧公使请为力争；三、致电北京政府表示与之决裂。

△　旅沪广东同乡在上海广肇公所集会，抗议日轮“小川丸”载运北京政府陆军部助桂攻粤的银元、军火经上海运往广东钦、廉一带，并以上海广肇公所和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北京政府，请其迅即电饬该轮停航。

△　徐世昌派王宠惠为国际联盟全权代表，令准原任魏宸组辞职。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签订日金537.6167万元借款合同，作为支付满蒙、吉会、山东铁路借款利息。

6月27日　孙中山以梧州已克，令陈炯明率部荡平陆荣廷、陈炳焜等，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全自治，并慰劳前敌各军。

△　山东省议会通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

6月28日　驻粤美领事首次正式觐见孙中山，畅谈中美两国邦交。后美领事复到外交部拜访伍廷芳、伍朝枢。

△　孙中山任柏文蔚为总统府顾问。

△　陆荣廷急电北京政府，要求速接济饷械。靳云鹏复电，告以先拨款20万元，械弹已由沪兵工厂拨运。

△　山东学界为援助京、皖学界，举行罢课，发出宣言，称：“罢课目的，不仅是要求教育经费，还要求提高平民的觉悟，宣布政府的阴谋，运动平民自己起来办教育。”

△　南京4000多鞋匠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坚持四天，店主被迫答应增加工资。

△　陈箓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称：接法外交部照会，上议院已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拨充中国留法学生教育经费，自1922年1月起实行。

△　王占元派杨文恺、周英杰赴北京，要求取缔旅京湖北同乡驱王运动，并请准予动用汉口“关余”三个月，作为兵灾善后费。

6月29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意震义银行签订1200万吕耳（折合银元108.12万元）借款合同，作为拨付内债本息及陆、海军军费。

6月30日　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上演说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教育家必须提倡政治，实行改良政治”，“政治良好，则教育不成问题矣”。

△　徐世昌任命张鸿绪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顾维钧，饬将复苏俄电文转达克拉辛，谓“恩琴勾结蒙匪，盘踞库伦，中央业已特命东三省张巡阅使兼充蒙疆经略使前往痛剿”，6月15日来电所称，“因与恩琴作战计划不得不经过蒙境各节，惟事关领土主权，中国政府殊难承认”。

△　黔军谷正伦部攻占广西柳江。

△　北京政府海军部呈准设海界委员会，讨论划定领海界线事宜。

△　浙江省督军卢永祥通电所属，省选应否停缓，“应听人民之决诸公论”，至制定省宪“实为不可稍缓之事”，“尤期望其早日有成”。

△　留法学生总会、旅法华工会等五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一次拒款大会，通过宣言反对朱启钤、吴鼎昌与法国政府商议秘密借款。

是月　　唐保谦、蔡兼三等在无锡创办庆丰纱厂，资本80万元，纱锭1.48万枚，经过几次扩展，于1934年又添办漂染整理部，遂成为自纺、自织、漂染整理的完备工厂。

△　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实收资本50万元，规定经纪人55名，其交易物品为机制面粉及麸皮二种。开幕以后，营业逐年兴旺，1937年抗战爆发遂告停业。

△　龚心铭、施善畦等集资30万元创办祥新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设总公司于上海，分公司于上海、南京、浙江、安徽。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设大连至长春间特别快车，开始运行。

7月

7月1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总代表卜尔熙在外交部互换照会，彼此申明《中德协约》自是日起生效。

△　中法实业银行总行在巴黎倒闭，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香港等地分行亦相继停业。该行于1912年成立，专在中国经营实业投资，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郎暴落而陷于停顿。该行发行钞票为数甚巨，人心因之恐慌。经北京政府财政部与全国银行公会协商，决定所有中法实业银行发行，印有北京、天津、上海、汉口之钞票，自13日起由中国各银行暂行垫款代兑。

△　北京南苑机场举行北京济南航线开航典礼，同时办理航空客运及航空邮件。

△　王占元以禁止“乱党机关”为名，取缔武汉各地民众组织的自卫团体。是日至10日，在武汉取缔的自卫团体有50余个，捕杀70余人。后又通电缉拿90余人。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咨各省，施行经国务会议决定的“虞舜卿云歌”为国歌及新谱。6日，教育部复呈准施行国歌正谱及燕乐、军乐谱各篇。

△　华北银号改组为华北银行，扩充资本为100万元，总董张弧，总理张勋，设总行于北京，在天津、上海、汉口、济南设分行。

△　荣宗敬、穆藕初等创办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额定资本300万元，实收半数。经纪人数定棉花、棉纱各80名，棉布20名。交易物品为棉花、棉纱、棉布三种。交易方法专取竞争买卖，每日前后两市，各做四盘。定期交易至多以六个月为限。

7月2日　　赵恒惕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兵协助广东，讨伐桂系军阀，援助桂人自治。派第三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援桂总司令，第六混成旅旅长罗光闾为前锋总指挥，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为中路司令，宪兵营司令王德清为兵站总监。5日，赵恒惕、宋鹤庚、鲁涤平、田应诏、蔡巨猷、谢国光等发出援桂通电。

△　旅京湖北同乡500余人在湖广会馆集会声讨王占元。会后派殷鸿寿等为代表赴国务院请愿，要求撤去王占元。靳云鹏仅以“可告总统”相敷衍。8日，旅京湖北同乡复开会推定代表李继膺等10人，于11日再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不见，代表露宿新华门。12日晨，徐被迫接见，以“王占元固应免职，但责任内阁，予实无罢王权，可向总理请示办法”等语推卸责任。后湖北同乡代表复更番至徐世昌住宅。徐派人答称，撤王事已交院速办，望与靳接洽。代表又到国务院请愿，

虽据答复已在办理，实则互相推诿。

△　蒙古“自治政府”内务部发出告示，附有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教令，称：“近有一部分蒙古人，因尚未得知中央政权业已恢复，白匪军队及葛明（按：指北京政府驻军）已被驱逐出境的消息，竟赴北邻求援。”“这样，他们就将违反教令了。”“如你们赞同我的愿望，希即放下武器来归，当请你们协助国家和宗教事业。”

△　北京政府交通部以部款奇绌，发行第二期支付券300万元。

7月3日　　孙中山复函廖仲恺、胡汉民，告《外交政策》一书编写情况，略谓：“文所著之《外交政策》一册，乃《国家建设》全书之一也。……至于此书之思想及线路，一言以蔽之，求恢复我国家以前之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和恢复人民自由平等而已。”后由于入桂督师，这一著述计划未能实现。

△　孙中山任命刘震寰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　徐世昌公布《市自治制》，凡八章78条；《乡自治制》，凡33条。6日，靳云鹏借词自治制已公布，通令制止各省制宪。

△　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列举北京政府种种罪恶，大声疾呼“北京政府为腐败官僚武人之结晶体”，“吾人痛恨北京政府达于极点，将联合全国农工商学各界，为争自由与自治而战，无论若何牺牲在所不惜”。

△　旅京江西同乡500余人在江西会馆开会，推欧阳武为主席，议决驱逐省长杨庆鋆五项办法，并致电省各公团请取一致行动。后派代表赴国务院请愿，要求撤换杨庆鋆。无结果。

7月4日　　粤军光复高州、化州等地。次日粤军高大伟部进驻高州，邓铿部克复阳山，沈鸿英军大挫退连山。粤军三路入桂。

△　阎相文第二十师、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所部直军，向陈树藩军发动总攻击。

△　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及朱启钤拟向法国借款三亿法郎，是日陈炯明通电反对。

7月5日　　南洋侨商黄奕柱与史量才等创办的中南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资本2000万元，先收500万元，聘胡笔江为总经理，设总行于上海，在各地设分行。此为侨商组织银行之首创，资本之雄厚亦为商业银行所仅见。

△　广州各界召开国民大会，抗议日轮“小川丸”运输济桂军械。议决三项办法：一、忠告驻粤日领事，阻止“小川丸”运输济桂军械；二、请广州政府外交部严重交涉；三、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

7月6日　陈炯明通电就任粤湘滇赣黔五省征桂联军总司令。

△　北京政府电复苏俄，谢绝苏俄出兵外蒙，谓中俄国际关系现尚未能恢复，故无协定之可能。

△　苏俄和远东共和国红军以及蒙古军侵犯库伦。参加的部队有第五骑兵师、斯列钦第一骑兵旅、第一〇三旅、第三十五骑兵团、戚丁金的部队和蒙古军。是日苏军和蒙古军的先头部队侵入库伦。8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地方临时政府和蒙古军的领导人进入库伦。苏赫巴托尔召集王公、上层喇嘛和各部部长开会，宣布临时政府决定推举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为立宪君主。

7月7日　　阎相文第二十师占领西安，陈树藩向咸阳方向退却，阎通电到省接任视事。

△　徐世昌以中德邦交业经恢复，协商条款亦已批准互换，下令取消前颁之《禁止与敌通商条例》。

△　熊克武离湘，同日并密电但懋辛，告以已与赵恒惕商定川湘各出五混成旅援鄂。赵经熊游说，始决定援鄂。

△　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安福党人张春霆及王兰亭、李海亭、金光灼、朱琨甫、卢剑龙六人在江淮一带勾结土匪煽军图乱，经捕获后是日在南京枪决。

7月8日　　孙中山致函廖仲恺，指出："至今民国建元，十年于兹，中国犹未富强如列强者，皆以不实行予之救国计划而已。予近日拟著一书（按：指《国防计划》），以为宣传，使我国全国国民了解予之救国计划也。"

△　孙中山颁布《陆军部官制》，凡九条。

△　远东共和国炮舰一艘在松花江口，以我国"杭州号"汽船载有军队为由开炮轰击，至使三人死亡，八人受伤。旋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惩凶。优林答复对"杭州"轮损失表示歉忱，愿负责赔偿。

△　远东共和国政府催订中俄商约，表示愿将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全部归还。

7月9日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在旅沪广东同乡的请求下，扣留济桂军械。是日北京国务院电令何丰林放行。何复电称，各团体坚持扣留，无法起运。

△　各省区自治联合会通电促制省宪。

7月10日　徐世昌公布《民事公断暂行条例》，凡33条。

△　桂军右翼总司令沈鸿英在贺县通电宣布自治，声明与陆荣廷脱离关系，所部42营改称救桂军，与粤军一致行动，旋又叛变进据桂林，粤军回师平之。

△　日外相内田康哉向北京政府驻日公使胡维德要求，赔偿湖北兵变对日侨之损害。

△　中葡澳门划界交涉，北京政府外交部议定办法三条：一、认为租地非属地；二、以元年所划界为准；三、所有青州及扩充各地，一律收回。当即电知驻葡公使刘崇杰向葡政府交涉，葡对于首条不肯承认。

7月11日　　美国总统哈定倡议召集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讨论裁军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倡议发出后，即得到英、法、意三国赞同，惟日本至7月26日始正式照会美国同意参加，但提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之讨论，“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按：1920年美国否决巴黎和约，拒绝参加国际联盟，外交上各种问题遂成悬案。是年5月，美参议员波拉提出限制海军军备案，旋经国会正式通过，授权哈定总统召集国际军备限制会议。英国亦因英日续盟问题，向美国提议国际协商，于是华盛顿会议遂酝酿成熟。

△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库伦成立，仍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为元首，以鲍阮为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丹尚为财政部长，苏赫巴托尔为军政部长兼总司令，马克索尔任司法部长。

△　长江江水大涨，为近年所罕见，据水准标所示，已涨至50.6英尺，流速每小时八海里。是日，宜昌东门外岸堤崩塌，淹没沿岸土地一万多亩，损失甚巨。沙市下游发水，沙市与上海之电报因之中断。

7月12日　　孙中山任刘湘为川军总司令，管理全省军务兼四川省长。

△　徐世昌以丁锦出洋考察，任潘榘楹署航空署长。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京师学务局及各省教育厅，速设女子中学，或于相当学校附设女子中学部，惟男女同校未便照准。

△　驻京美代办芮德克奉美政府训令，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当即表示赞同。

7月13日　范源濂、张国淦、张一麐、傅增湘、汪大燮出任调解北京教育风潮之职，在中央公园董事室与八校校长、教职员、学生代表蒋梦麟、王兆荣、何玉书接洽。范源濂以书面正式提出经北京政府承认的解决教育风潮五项办法：一、讼案听法院处理；二、政府为解释“六三”新华门不幸事件，系出于一时误会，派员向教育界慰问；三、受伤者医药费照实数由教育部支给；四、政府筹拨价值200万元之证券存放银行，为京师学款之准备金，其银行存拨归教育部执管；五、八校临时费用由教育部依八年度预算，照历年支款办法付给。14日起，八校校长、教职员、学生分别开会讨论五项提议，到20日表示认可。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推广蒙养园，并拟订二项办法：一、女子师范学校应附设保姆科；二、除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讲习所应附设蒙养园外，每县至少须设蒙养园一所。

7月14日　孙中山致电李烈钧，告以沈鸿英部开往桂林、柳州、庆远一带，惟其人反复无常，万难深信。若滇、黔军到达桂、柳、庆时，嘱其尽可相机处置桂军沈鸿英部。

△　北京政府电促张作霖，谓赤塔出兵有难以遏止之势，倘外蒙入于新党之手，实非国家前途之福；“务请迅派大军征蒙，俾免贻外人以可乘之机”。

△　陆荣廷急电徐世昌、靳云鹏，请速下讨粤令，并饬闽、赣出兵支援，否则桂省难以支持。

△　北京政府农商部通令，取缔上海不合法之交易所。

7月15日　孙中山颁布《内务部官制》，凡15条。

△　菲律宾参议院议长等10人由香港来粤谒见孙中山，表示新中国前途极有希望。

△　广西护军使陈炳焜解职，即日离邕，所有军事统归督军谭浩明办理，并于次日通电宣布。

△　中国国民党广西支部在梧州设立。

△　北京国务会议通过发行十年八厘公债3000万元，用以整理内外债，并设基金管理处，于18日明令公布。

△　邓家彦在梧州创办《新广西日报》。

7月16日　粤军克复浔州（今桂平），柳州镇守使贲克昭宣告独立。

△　巴西新任驻华公使阿林助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就“小川丸”军火事复函广肇公所，谓事关人民公意，“鄙人无不竭力维持”。

△　陆荣廷致电北京政府辞职，靳云鹏复电慰留，并以援助不力致歉。

△　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关海清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签订《中日合办抚奉送电所合同》，规定中日合办抚奉送电所，供给奉天“满铁”用地内及现有各燃户并日本各工厂之灯光、动力用电。送电所建筑费用由满铁会社负担；建筑电柱用地由奉天政府设法，务令地户归送电所租用。所得纯益作四六分配，中方得十之四，日方得十之六。

△　北京政府财政部、农商部合办之农商银行在北京创立，齐耀珊为总裁，资本总额1000万元。

7月17日　　6月以来黄河流域大雨连绵，黄河上下游均出现险情。是日，上游黄花寺民堰被狂浪激刷，全堰浸透。次日，水又增涨尺许，大堰遂决40余丈。河水建瓴而下，堰内村舍田基悉被淹没。19日，下游公家道口水势漫堤，堤亦被冲决；中游杨庄石埽坝亦多陷失。

7月18日　　湖北督军王占元在武昌召集鄂、赣、桂、湘、黔、蜀、滇七省联防会议，决定劝告两广停战及赣、鄂、川、黔四省援助湖南赵恒惕，解除李烈钧军之武装。

7月19日　黄河利津宫家坝因暴雨昼夜不停，河水漫溢堤顶，抢护无料，于是日黎明溃决成灾。口门刷宽300余丈，水深约三丈余，口门水势占全溜十分之八。此次被灾区域有利津210余村、沾化80余村、滨县50余村，约计面积5400方里。所有灾民除稍有力者迁徙不计外，其无家可归、露宿大堤者约六万余人，公私急赈仅数万元，远远不足以应急需，淹死、饿死、病死者不可胜数。

△　陆荣廷通电宣布解除广西边防督办职务，赞成自治，即日退出南宁，退往龙州。声称由龙州镇守使黄培桂兼理军民两职，维护省垣秩序。

△　西北各地商会代表在北京总商会开会，决议抵制京绥路货捐，于是日起停运货物，至捐局撤销为止。8月1日，察哈尔都统张景惠致电北京政府，谓“顺从民意，暂将捐局封闭”。

7月20日　赵恒惕以欢迎蒋作宾为名，召集湘军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出兵两师援鄂，任宋鹤庚、鲁涤平为援鄂正、副司令，并饬财政厅长杨丙兼充兵站总监。

△　孙中山派廖仲恺、何香凝赴梧州劳军。

△　新疆督军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称，白俄诺马阔夫、巴赤奇残部败窜我国边境，占领阿尔泰城，阿山道尹周务学抗击白俄，誓死报国，自戕死难。旋徐世昌命令杨增新派员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准入祀忠烈祠。

△　上海英美烟厂老厂工人因反对洋监工虐待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26日，新厂工人继起罢工。8月5日，罢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喊“劳工神圣”、“争工人的人权”、“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口号。4000多工人坚持罢工20余日。8月10日经劳资双方谈判，厂方被迫同意撤换监工，工人每人至少加资五分，立即释放工人代表等八项条件。

△　远东共和国政府训令驻京代表阿格辽夫就白俄谢米诺夫及恩琴等在我国边境活动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六点质问，并声明远东共和国为军事上及政治上之必要，不得不出兵进击，一俟目的达到，立将军队撤退。

7月21日　赵恒惕下援鄂总动员令，任宋鹤庚为第一军军长兼总指挥，鲁涤平为第二军军长兼中路司令，夏斗寅为前锋司令，赵钺为左翼司令，叶开鑫为右翼司令，调集军队四万人向湖北挺进。

△　王占元密电靳云鹏，告以赵恒惕决心图鄂，已发动员令，进逼鄂境。旋又拍电诘问赵恒惕。

△　粤军攻占广西贵县，桂军将领秦步衢在桂林宣布独立。谭浩明退走。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上海造币厂与美商茂生洋行签订美金64.8828万元借款合同，作为订购机器价款及栈租保险等费。

7月22日　徐世昌特任蒋拯兼署海军代理总司令，并授为海军中

将；特任兰建枢为澄威将军。

△　徐世昌公布《民事诉讼法草案》及施行条例，凡六编755条。决定自9月1日起先在东省特别区域施行。

△　旅湘湖北同乡1.5万人集会，通过《湖北自治临时约法》，并依据《临时自治约法》公举蒋作宾为湖北临时省总监。

△　王占元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布置鄂军防守事宜。

△　夜，驻四川巫溪县城防军全连哗变，击毙连长李远芳，直扑县署，将枪弹、银钱、衣物等项搜索一空，同时将盐税局、邮政局及团局劫掠。随后向鄂境逃窜。

△　阿富汗遣使来华至新疆，要求与我国局部（新疆）通商。北京政府电新疆督军杨增新相机办理。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出席。张国焘任主席并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及会议讨论事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与会并讲话。

△　湖北督军王占元发布讨伐令，以通城、崇阳、蒲圻、嘉鱼、监利、石首等处为战时警备区域，饬该地军事长官刘跃龙严重防备；又以鄂军第二混成旅及十八师之部分，编成一混成旅配于各要隘，以示迎击湘军之势。同时又电请赵倜、陈光远及曹锟、吴佩孚等出兵援鄂。

△　张作霖在奉天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援鄂征蒙问题，决定征蒙延期。次日电令驻京、津之征蒙军中止开拔，并电知黑、吉、热、察、绥各处征蒙军司令，嘱暂候令，再定行止。

△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抵奉天访张作霖，会商库伦问题。张作霖抗议远东共和国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出兵库伦，并要求迅速将库伦交还中国。优林表示同意，至于交还办法日后在满洲里商议。次日晚，优林离奉赴京。

△　浙江省宪法会议正式开会，该会议由省议会议员及各县一名代表组成。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津浦铁路局与天津仁记洋行签订行化银322.4084万两借款合同，作为订购53辆全钢车价款。

△　王湘泉等发起创办的浙江储蓄银行在杭州开业，资本50万元。后改名为浙江商业储蓄银行。

7月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经过，开展活动的情况，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会议推张国焘等三人起草党的纲领及决议。

△　赵恒惕致电王占元声明误会，谓“敝部受人煽惑，局部发动，未及制止，比日即饬令撤退”。同时赵派参谋长唐一斌为代表来鄂见王占元，共商继续联防。王占元复电表示“执事如能约束所部，占元决不为已甚”。26日，赵又致电王占元，谓旅湘鄂籍党人已尽数监视，请照常通车；王复电照准，但须俟路轨修复方可通行。

△　北京政府履行范源濂等所提出解决教育风潮五项提议，是日派王芝祥在尚志学会举行教育界慰问会。会后，王芝祥又赴法国医院慰问马叙伦。同时，财政部以盐余200万元作担保，印发证券20张，每张10万元交教育部作八校教育经费之准备金。

△　驻京英公使艾斯敦向北京政府提出禁烟觉书，要求北京政府遵照《中英禁烟条约》，禁止陕西、甘肃、新疆、福建、湖南、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川边各省区种植罂粟。

△　驻通城的刘跃龙所部士兵哗变，城内外各殷实商店、居民被抢一空，随即持枪及金银财物投湘军阵地。

△　徐世昌任命魏宸组为驻德意志国特命全权公使。

7月25日　蒋作宾在长沙就任湖北省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发表讨王（占元）通电，略谓："七年痛祸，四境为枯，罪迹昭彰，中外共恫。……不仅吾鄂罪人，实全国祸首，凡我中华国民，人人得而诛之。"同时，湖北自治军及各团体代表孔庚等致电北京外交团、汉口领事团知照。

△　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军阀开会，认为此次鄂省变动与北洋全局有极大关系，决定出死力救援。计划分五路出兵：靳云鹗所部一混成旅为第一路，萧耀南之二十五师为第二路，第三路为宏威军赵杰之一混成旅，第四路为鲁军张克瑶之一旅，第五路为吴佩孚统帅之第三师。前方统辖四路之总司令以萧耀南充任。是日，曹锟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靳云鹗率第八旅南下援鄂。同时吴佩孚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愿自动救鄂。

△　优林抵北京，27日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访颜惠庆，要求谒见徐世昌，被拒。复与颜惠庆商谈商约、东省铁路及交还库伦问题，无结果。8月1日离京。

△　黄河上游伊庄、张庄、陈屯三处，是日先后开决，漫水直灌全堤夹河，由陶城埠泄入正河。自寿张直至陶城埠四十里远近一片汪洋，尽成泽国，田舍庐墓悉被漂没。

7月26日　川军将领推刘湘为援鄂军总司令，决定调二万大军攻打宜昌。是日，刘湘宣誓就职，宣称此行系援助鄂人驱王，既非广州政府之命令，亦非含有占领鄂境之意，俟王占元离鄂，扶助组织自治政府后，川军与湘军同时撤退。

△　赵恒惕召集全省少校以上军官在长沙湘军总部举行援鄂誓师典礼。

△　赵恒惕致电王占元，劝其“顺应民心，敝屣高位”。王复电称，“现复再电中央，力申前请，一俟有人接替，当即释戈解甲，归老田园”。29日，赵再电王，劝其“即日正式宣布去职，还政鄂人；并将戒备一律撤销，使全国共仰高风”。

△　北京政府农商部训令江苏实业厅、上海交涉员，谓对未经呈部核准，遽行设立筹备处，遍登广告之合众晚市物券等20个交易所，依照现行法令应从速分别严禁。

7月27日　是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讨论起草小组提出的会议文件。与会代表就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　北京政府派公府顾问周骏乘专车到鄂，指授对湘方略，并请王占元勿萌退志。旋又派将军府将军刘鼎臣来鄂与王协商鄂边防务。

△　张作霖致电王占元询问援军是否足敷分配，如尚嫌单薄，即调奉军来鄂协助。

△　靳云鹗旅到汉阳，进驻汉阳兵工厂。29日晚，萧耀南的二十五师到汉口，分驻刘家庙、谌家矶。

△　北京政府以英日续盟殊与我国主权及国际地位有关，电令驻日公使胡维德向日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　湖南岳阳、新宁、芷江、衡山电告旱灾。次日，宝庆、安化亦电告旱灾。据华洋义赈会统计，报告旱灾者，全省有50余县之多。收获多者三四成，少者只一二成，尤以湘西为最。每县灾民少者五六万，多者三四十万。

7月28日　　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谢持为总统府秘书长。

△　赵恒惕下达对鄂军的总攻击令，湘军分三路向鄂军进攻。午后3时，湘军中路夏斗寅部同鄂军宋大霈部在羊楼司枫树岭开战，湘鄂战争爆发。

△　王占元在督军署召集会议，商议维持武汉治安办法。议决四项：一、通告领事团勿留党人；二、悬赏侦缉谋乱机关；三、派军队搜缉潜藏痞棍；四、军警联防。同时决定自次日起武汉三镇特别戒严，检查往来邮电，派员监视武汉电话局。

△　王占元委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是晚孙传芳赴前线督战。

△　北京八校校长蒋梦麟、邓萃英、熊崇煦、王家驹、吴宗栻、俞同奎、张黻卿、邓锦通电复职，谓自是日恢复原状，校务照常进行，提前于九月一日开课，并即将招生。次日八校教职员亦宣言复职，至此，北京教育风潮解决。

△　徐世昌批准陆军部添设绥海镇守使，以石得山充任。

7月29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全权办理广西军事善后事宜。

△　北京政府开军事会议，决议分五路出兵援鄂，先以萧耀南为统辖四路总司令。次日，徐世昌正式电令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

△　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所属，谓各属人民对于省宪、省选问题争执益烈，暂将省议会复选展缓数月。

7月30日　湘鄂两军大战于羊楼司。鄂军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贞夜袭湘军，夏斗寅佯退十里，及至朱鹤镇，左右伏兵齐起，潘中弹受伤，士兵死300余人，余众缴械投降。鄂军受此大挫，退走80里，羊楼司险要已失，赵李桥险要亦不能守，鄂军大本营移驻蒲圻县城。

△　王占元电令孙传芳为新（堤）嘉（鱼）蒲（圻）通（城）警备总司令，蒲通镇守使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王都庆为右路司令，第十一师第四旅旅长张俊峰为后路司令，第二师八团团长穆恩棠为游击总司令；并令前线各军一律改取攻势，于31日实施对湘总攻击。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因受法租界暗探的侦察干扰，被迫休会，商定易地继续开会。

△　徐世昌批准陆军部添设洮辽镇守使，以阚朝玺充任。

7月3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游船上续开第七次会议。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纲领》规定："（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4.联合第三国际。（三）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下午6时，中共"一大"闭幕。

△　湘军复向羊楼洞、赵李桥等处进攻，经一昼夜激战，将两要隘占领。

是月　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创造社，成仿吾、郁达夫等参加。该社为文艺作家自由结合的团体，出版文艺刊物和文艺丛书。1926年4月1日成立出版部，9月6日被松沪警察厅查封。后乃继续出版文艺书刊，至1929年2月7日为国民政府封闭。

△　北京工人周刊社出版《工人周刊》，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宣传工人组织工会的意义和作用。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绥铁路局与美国钢铁公司、泰康洋行签订美金76.5315万元借款合同及美金42.78万元借款合同，作为购买1400吨钢轨及31万根枕木之用。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上海造币厂与美商华昌公司签订美金40.8545万元借款合同，作为订购机器价款及栈租保险等费。

△　张嘉璈、陈仪、黄溯初、徐寄庼等在上海创办通易信托公司，额定资本250万元，实收136万元。

8月

8月1日　　徐世昌特使朱启钤抵达东京，次日向内田康哉递交徐世昌关于山东问题的亲笔信。

△　萧耀南到鄂后，要求王占元支给两个月军饷及补给3000支来福枪。王占元由鄂省支给该师军饷17.5万元，并由汉厂补助该师快枪3000枝。萧耀南本无意助王作战，至此不得不勉为一行，定3日上午开拔一旅赴前敌。靳云鹗见萧发动，亦将驻汉阳第二团开往前方助战。

△　北京八校向中国银行领6月份经费无着，次日复往亦无着。旋据财政次长潘复答称，教育经费本筹定，已经鄂事挪用。教职员闻之极愤慨。

△　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与日商林熊祥签订《福建省整理借款契约》，借日金200万元，以全省茶税收入及闽侯县酒捐等为担保，作为整理各项零星借款之用。

8月2日　　徐世昌通令各省区印花税款拨充十年公债基金，嗣后各省区长官务当协力维持，不得率请截留，以昭信用。

△　徐世昌任命王景岐为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

△　湘军左翼孔庚、唐荣旸部，由华容县属焦山攻占石首县属之调弦口。旋又进据塔市驿扼河而守。后复进击公安、石首二县，连连获胜。

△　鄂籍国会议员刘英在汉口法租界为巡捕逮捕，解送湖北督军署。王占元以图谋不轨罪名，于4日晨在军法处枪杀。6日旅沪湖北同乡闻讯大哗，致电王占元质问；9日旅沪湖北自治协商会开会，议决致函法国政府、国会及驻京法使，抗议汉口法领事违反国际公例，引渡政治犯，致使刘英被害。

△　王占元发出紧急通电，表示决心坚守防地，“俟我增援队伍开到，即行进攻”。

△　优林再度抵奉。次日，张作霖同优林磋商交还库伦问题。优林提出交还库伦三项条件：一、承认远东共和国政府；二、会剿在东省铁路一带活动的白俄；三、远东共和国认为华军有实力接防蒙古时，乃撤退军队。张作霖对此表示不满，拒绝正式谈判。优林在奉逗留两旬，无结果，于23日晚前往大连。

△　粤军克复柳州。

△　江西督军陈光远电告北京政府称，赣西镇守使方本仁宣告独立，已派兵前往弹压，请予免职，改派萧安国充任。

8月3日　　湘鄂两军经一天的休整，鄂军加入近畿二师三旅六团，在赵李桥一带向湘军发起攻击。是日因大雨之后，北风颇劲，湘军作战不易，其势已稍逊；兼以鄂南有孙传芳在前督战，应战较为勇猛。激战五六小时，湘军军火不济，向后退却三四十里，赵李桥、霸王山等要隘均被鄂军夺回，湘军扼守羊楼司待援。

△　沈鸿英通电取消救桂军总司令名义，暂称广西陆军第二军军

长。

8月4日　　粤军占领南宁，陆荣廷等逃往龙州，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

△　湘军右翼以金华衮作前锋，叶开鑫为后应发起进攻，剧战竟日，占领湖北通城。未几，通山、崇阳二县亦悉被湘军攻占。崇通镇守使刘跃龙所部之第二混成旅全部被歼灭。8日，刘携残部百余人返武昌。

△　曹锟以鄂事危急，除加派二十四师一旅开拔赴援外，是日急电北京政府，请再由陆军部抽调一旅赴鄂协助。并以直军南下，直、豫“土匪蠢动”，特令驻正定第十二旅开赴彰德，第十四旅填驻正定，借资镇慑。

△　汉口各团体推70余名代表到刘家庙萧耀南行辕，请其维持治安，萧表示武汉治安万无危险。

△　顾维钧会晤克拉辛，商谈苏俄代表来华问题，谈判历时两个多月，未获具体协议。其间苏方屡向陈广平要求签发伊凤阁（北京大学俄文教习）、雪门（商务代表）来华之护照，为陈所拒。

△　日驻济南领事吉田茂访颜惠庆谈华盛顿会议问题，表示愿将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以前解决，颜未作具体答复。

△　上海三新纱厂4000余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罢工持续三天，7日，厂总办盛毓麟被迫同意每工增加工资三分及每两星期增加两日偿工。

8月5日　　王占元急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同时嘱省官钱局局长郭干卿将从前未经毁去之旧票重新使用，并派人将署中所有现款、行李一律护送运津，计有银钱箱160口，衣物箱80口，行李百余件。还令工厂赶造大木箱百余口准备装载各种古董、玩器、书画等。按：王

占元在鄂七年，搜刮了1000多万元，分储各外国银行。

△　靳云鹏电询张作霖对鄂事之意见，张复电声明王占元既无维持鄂局能力，中央自可罢免，继任人选请就近与曹使磋商。并表示无论以何人为鄂督，决不过问。

△　孙中山致函各地国民党同志，筹集款项兴建朱执信坟场及建筑纪念图书馆。

△　孙中山复函荷马里夫人，告知驱逐桂系军阀的斗争已取得巨大成就，并盼望她能来广州，“帮助我国妇女从事实业工作”。

△　湘鄂两军复行接战。湘军由总指挥宋鹤庚亲在羊楼司督队进攻，夏斗寅亦亲到前线指挥。鄂方守军已成强弩之末，虽有赵李桥高山险隘与精利枪炮，亦不耐攻击，即行退去，是役湘军进追数十里，前所失地均已恢复。鄂军退至茶庵岭，头道防线已迫近蒲圻。

△　徐世昌批准将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任命冯玉祥为师长。

△　夜，上海大风，浦江船只倾覆，闸北旧房屋倒塌多处。风雨持续数天未息，潮水大涨，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四乡田禾受损非浅。此次风雨大潮，为数年来所未见。

△　横贯曲阜、滋阳、泗水、邹县、滕县的泗河，因伏雨暴注，水满平槽，是日金口堤决口淹没村庄60余处，为民国以来未有之泗水水灾。

8月6日　　王占元获悉鄂军全线溃退，召开军政联席会宣布辞职，同时致电北京政府，谓“萧总司令按兵不动，靳旅不受调遣”，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不堪收拾，“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请查照前电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　北京政府电复王占元，嘱其暂维现状；同时密电萧耀南令其布置一切。萧耀南即率师移驻武昌楚望台、两湖书院等处。

△　湘军乘胜猛攻鄂军，时适大雨滂沱，路滑泥湿，鄂军大挫，弃茶庵岭败走。

△　北京国务会议决定组织渔业委员会，由海军、农商、交通、财政四部派员组成，征收渔业税充海军经费。

△　胶济线张店一带之河水因大雨漫溢，马尚河之铁桥受损。次日，青岛开往济南之火车被阻于张店车站。

8月7日　　靳云鹏命蔡成勋往保定同曹锟商定以萧耀南继任鄂督，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

△　湘军中路进攻湖北蒲圻，经数小时激战，鄂军炮兵连长翟连辉先遁，所有炮兵亦弃械逃。鄂军步兵见炮兵败退，失斗志，节节退却。荆港铺、韩家山及东西两路要塞音峰岭、紫金山相继失守，下午3时湘军占领蒲圻。

△　萧耀南接曹锟自保定来电，令赴前方布置一切，即赴督署见王占元，旋偕豫军旅长赵杰率卫队乘车赴蒲圻。是晚萧师九十七团进驻贺胜桥，次日续开两团赴前线。豫军亦开赴前线助战，直军第二十四师亦有一团到汉。

△　旅京湖北同乡在湖广会馆开会，公推李继膺为主席，讨论鄂事，议决通电全国要求双方停战。

△　中国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正式开幕，理事长陆叔同。

8月8日　　湘军中路左翼发动猛攻，连陷沔阳、嘉鱼；鄂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所部退至离省60里之金口。夏斗寅率所部攻鄂军，又胜于中伙铺，鄂军退守汀泗桥。夏又令湘军各持白刃浮河而渡，自

率敢死队随后督战。鄂军以势不支，退驻离桥五里，以待援兵。湘军得汀泗桥后已疲惫，且援鄂之直军又源源而来，乃宣告停战。

△　黎元洪、周树模、熊希龄、张国淦、陈宦、饶汉祥等电劝湘鄂双方停战议和。

△　西班牙新任驻京公使铎斯芬德斯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韩芸根、杜家坤、刘鸿生等创办上海煤业银行，资本额定80万元，实收半数。1931年修正章程，资本改为40万元。

8月9日　　徐世昌令免王占元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本兼备职；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

△　蒋作宾召集旅湘各界人士会议，抗议北京政府对吴佩孚、萧耀南之任命，次日并发出抗议通电，谓“凡以巡阅、督军名义奉北庭命令而来者，皆为吾鄂之公敌，自治之蟊贼，誓必扑灭之而后已”。

△　湖北省议会、自治公会、全省自治筹备处、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七团体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之任命，谓此次鄂人实力去王之主张“在联合自治，目的在废督裁兵”，“去虎进狼，鄂人至愚，何能忍受。……无论何人，有肆行侵略瓜分地盘之野心者，吾民虽弱，仍以王贼视之，纵牺牲至如何地步，誓必完全达到目的而后已”。

△　萧耀南召集各军将领开军事会议，决定前线鄂军一律后撤，由援军接防。由于大队未集，暂在汀泗桥扼守。划分防区如下：一、以靳旅为中路，守汀泗桥前线；二、以豫军赵旅为右翼，守铁道以北；三、以四十九旅为左翼，守铁道以南。此外二十五师除留一团保卫汉阳兵工厂外，全部开驻汀泗桥迤北，作为后援。

△　四川军阀派胡济舟为援鄂司令，率军由川入鄂，是日与施宜镇守使赵荣华所部第一团交战，占领湖北建始县。

8月10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田维纲等50余名议员提出的北伐请愿案，并咨请孙中山宣布徐世昌罪状，明令出师讨伐，以谋国家统一。

△　湘直两军发生冲突，此为湘直之第一战。湘军从中伙铺分三路向汀泗桥进攻。靳旅势不能支，纷纷退却，并纵火焚毁辎重，汀泗桥全镇亦付一炬。湘军进据汀泗桥后方15里，靳旅退至咸宁县城。

△　萧耀南派代表见湘鄂联军总司令蒋作宾谋和。蒋提出条件：一、王占元旧部一概撤离鄂境；二、直军不得进驻鄂省；三、组织联省自治，并表示如萧接受此三项条件，可承认萧为湖北督军。萧耀南接到条件后，表示决计与顽强之南军一战。

△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向蒙古地方当局保证：俄军暂不自蒙古撤退。

△　叶恭绰发起成立华盛顿会议讨论会。

△　黄磋玖等在上海创办日夜银行，资本50万元，以适应交易所日市、晚市、夜市的需要。1930年2月及5月又设立两分行。黄病故后，于1931年1月19日停业。

8月11日　赵恒惕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草拟各省宪法，于各省宪法制定后，再仿美国之例，制定中华民国之宪法。

△　晨，武汉各军警长官至督军署，向王占元告别。王当即离署赴文昌门，乘“楚振”舰经浦口转天津。

△　武汉民众在黄鹤楼开公民大会，通过议案要求没收王占元私人产业，以偿兵乱时民间之损失；并要求真正自治，军人不得干政。

△　美国总统哈定正式邀请中、日、英、法、意五国参加在华盛顿召开之华盛顿会议。

△　太平洋教育会议在夏威夷召开，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五人出席。会议就各国交换学生及教员等问题通过17项议案，于19日闭会。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东省铁路权业已收回，审判厅、警察局亦已次第成立，下令撤销中东铁路交涉局，所有案卷移交吉林交涉员管理。

△　吴佩孚下令扣留京汉铁路汉口至郑州段之营业收入充作军费，并派军队到各站强制执行。

△　大中银号改组为大成银行，资本额定100万元，先收50万元，设总行于北京，分行于上海、天津。

8月12日　孙中山以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任命谢持为总统府秘书长。

△　徐世昌特任蒋拯为海军总司令。

△　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取消上海会审公廨说帖。

△　晚，吴佩孚率第三师、第二十四师及鲁军混成旅计三万人抵汉口刘家庙车站，声称对湖北治安负全部责任，次日乘车赴咸宁视察前线，并重新部署兵力。

△　苏、皖、鲁、晋等11省区新当选的众议院旅京议员朱五丹、蔡培、王文渊、王执中等发表宣言，呼吁迅行召集新国会，速定国宪，厉行民治；同时通电新当选议员于中秋节前“齐集京师，商榷一切”。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访颜惠庆，对“鲁案”进行非正式之讨论。

△　苏俄红军侵入我国外蒙古追击白俄匪军，占领三音诺颜，白

俄匪军西走唐努乌梁海。

8月13日　吴佩孚在武昌督军署召集武汉各文武官吏及议会、商会、各团体代表200余人开会，议决：一、由武汉各团体致电赵恒惕、蒋作宾等，要求停战；二、电请京、津两湖要人从中调解；三、萧、吴两人及议会、商会各派代表二人赴湘接洽；四、在汉口召开和平会议。

△　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分电各方面，请速停战议和，并请北京政府令准各省自治，以遏止战机。

△　陕西督军阎相文诱捕民军将领郭坚，并以“啸聚土匪久为民害”之罪名，是日在西安将郭枪杀。

△　留法勤工俭学生及旅法华工又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驻法公使陈箓派一等秘书王曾思出席。王态度蛮横，遭到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反对中法借款声明。

8月14日　萧耀南召集武汉官商会议，声言：“吴巡阅使此来，力任调停，如湘省不加谅解，决以武力解决；尚有四师人数，当陆续到鄂。请当地商会筹借三百万元，以京汉铁路南段收入为担保，行息分半，六个月清偿。”会后，商会董事纷纷逃匿。

△　徐世昌任命刁作谦为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

△　邹鲁等在广州发起组织太平洋问题讨论会。

△　湖北襄河王家营新堤因去年修溃堤时减料偷工，工程草率，遇连日大雨，河水猛涨，于是日复溃。钟祥、京山、天门、潜江、汉川、沔阳、夏口、襄阳、应城、云梦、黄陂、孝感12县遭灾，除田庐牲畜不计外，人民淹毙当不下数千，往往全家无一得免。受灾最重的钟、京、潜、天四县，灾民以树皮草根为食，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

8月15日　孙中山下令驻桂各军均归陈炯明全权节制，民政由马君武治理，各军不得干涉民政，务须切实扶植桂民自治。

△　孙中山致电各省军政长官，告知拟在粤召开联省政府代表会议，届时请派代表出席。

△　山东南馆陶（今河北馆陶）王占元家乡卫队一营哗变。变兵首将营长赵启胜击毙，蜂拥而出，挨户搜劫。劫后变兵向西逃逸。

△　徐世昌会见日公使小幡酉吉，谈山东问题。

△　北京政府教育部职员因欠薪达五个月，是日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

△　吴佩孚自前线视察回汉口，下令禁止市民召开国民大会。

8月1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美公使施肇基照会美国政府，对美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表示接受。

△　吴佩孚扣留湖南谈判代表萧光礼，并提出两项条件：一、湘军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并表示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可由北京政府考虑。

△　广州二万多土木建筑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经过10天的斗争胜利结束。

8月17日　湘直两方同下总攻击令，两军在咸宁、汀泗桥、官埠桥等处进行激烈的争夺战。吴佩孚亲往官埠桥督战，令海、陆军向前夹攻。湘军无军舰掩护，势不能敌，大咀、宝塔州、嘉鱼均被直军占领，新堤至夜间亦被攻下。

△　直军进攻金口以上之湘军，吴佩孚密令将下沙湖口之江堤决口，水淹湘军。湘军窥知，退守高阜，但该地居民一千六七百户尽淹

没，溺毙3000余人。时值秋收，损失财产在数百万以上。不久，直军进攻簰州不克，吴佩孚再次密令将簰州北首横堤决口。江水骤至，湘军被迫撤退，人民不及迁避，又淹没老幼男女3000余人，所有堤内房屋、牲畜、禾苗、谷米均被冲走，受害人民怨声载道。

△　马君武宣布治桂方针：一、禁赌；二、裁兵；将桂军改编为二师；三、自治，于梧州试行市政，将来省议会亦移梧州。

△　苏俄红军攻击恩琴，占领我国外蒙古科布多。

△　农商银行由财政、农商两部合办，以齐耀珊、高凌霨为正副总裁，上月16日在北京开创立会，设总管理处于北京，是日北京分行先行开幕。资本总额1000万元，已收足四分之一，承办银行各种业务并有发行纸币及代理金库事务之特权。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中英公司续订川粤铁路湘鄂段85万元借款合同，充作湘鄂段购置车辆及其他一切开支之用。

△　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是日在上海开成立会，到22校代表，通过《简章》八条。

△　津浦路局因滁州以北铁路被水淹没，路轨冲毁60余里，决定是日停车。

8月18日　陈炯明电卢永祥，响应6月4日各省自定省宪之通电，并请其领衔通电全国，召集各省派代表到沪开会，制定宪法。

△　川鄂开战。援鄂川军占领巴东，旋直下攻占秭归，前锋逼近宜昌，施宜镇守使、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退守宜昌。

△　徐世昌令责成外交总长颜惠庆筹备太平洋会议一切事宜。

△　美国务卿休士向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斡旋山东问题。

8月19日　萧耀南在督署召集武汉绅商政学各界要人开会，商议对于鄂事和战之办法。萧表示同意自治，但时机未成熟，不能遽然做到。与会者一致主张湘鄂两军应早日停战，其议和条件可请有声望之第三者疏通。

△　直军在汀泗桥发动三面反攻，激战六小时，湘军因大炮缺乏，弹药不济，于傍晚退过中伙铺。

△　孙中山发布命令裁撤南宁、桂林等六道道尹。

△　赣军李明扬部占领全州，沈鸿英军退入湖南边境。21日，赣军追击沈军至黄沙河，沈军复向永州逃窜。

△　优林秘书葛雷带行李前往车站，经路警查出宣传文件多种被扣留。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为此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后于10月3日由刘镜人与阿格辽夫签订《中赤解决行李协定》，乃告结束。

△　徐世昌批准京汉路局续募400万元短期借款。

△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呈拟于下学年添设女子部，招收女生一班。是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准予试办（本年广东省立中学亦开始招收女生，为中学男女同校之始）。

△　北京八校教职员组织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推蔡元培、蒋梦麟为正、副会长，推李大钊、胡适、谭熙鸿为干事。

8月20日　直军进攻白螺矶，湘军全力迎战，两军均不下万余人，自拂晓至日中剧战数小时不分胜负。次日拂晓又继续战斗，至午间湘军不支，纷向城陵矶退却，直军占领白螺矶。

△　湖南省宪法审查会正式开会审查《湖南省宪法草案》，经三读通过。其附属之《省长选举法》、《省议会议员选举法》、《省议会组织法》、《县议会议员选举法》、《法院编制法》五种，亦一律

修正通过，于9月9日闭会。

△　广州非常国会议员凌钺、张凤九致函国会同人，宣布陈炯明罪状。略谓："本日各报内载陈炯明巧电（即民国十年八月十八日），请浙督卢永祥领衔通电全国，召集各省区代表到沪制定宪法等语"，"要知我国会集会广州，原为西南宣誓护法，昭信中外，曾几何时，陈炯明口血未干，狼心突起，以护法始，以毁法终，阴险狡诈，反复无常，胆大妄为，目无法纪……特专函议长速发通告开会，议决查办。"

△　陈耀垣等在广州发起组织中央筹饷会，所有筹捐款项专供广州政府北伐及统一国政之用。

△　中国科学社在北京清华园举行全国科学大会。

8月21日　倪道烺通过"公益维持会"，出巨款包办选举，选出倪系清一色的108个省议员，迫聂宪藩下令召集第三届省议会。聂不敢而辞职。倪又以40万元贿买靳云鹏，任命其老师李兆珍为省长。是日，徐世昌令准聂宪藩辞职，特任李兆珍为安徽省长。

△　滇、黔、湘、赣各军攻克桂林。

△　张作霖以兵士不服水土为词，电请撤回全部征蒙军队。

8月22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务会议，否认北京政府发行十年公债。

△　华盛顿会议讨论会在广州成立，举汪精卫、邹鲁为正、副会长，伍廷芳为名誉会长。

△　黄磋玖等又集资100万元，在上海创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

8月23日　湘直两军各有三万人在汀泗桥、中伙铺间官塘驿激

战，吴佩孚亲往督战。战至次日，直军大败，靳云鹗旅全部溃散，直军第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与第十三混成旅及豫军第一旅等均受重创。吴佩孚处决后退一营长，亲率卫队二连督队再次反攻，并令前敌军士手执刺刀砍刀冲锋，湘军不支，退保蒲圻。是役双方死伤者在四五千人以上。后吴佩孚收买湘军旅长葛豪为内应，再次发动进攻，湘军因受内外夹攻，于28日从蒲圻、嘉鱼等地退却。

△　蒋作宾通电痛斥吴佩孚决堤杀人，残忍已极，表示不驱公敌，决不罢兵。旋于27日旅湘湖北自治协会、改造湖北同志会、湖北公民会等纷纷通电，控诉“吴佩孚决金口堤及簰州横堤以灌南军，南军死者数百人，居民溺毙者五六千人，财产损失巨万以上，被灾区域纵横约数百里”。

△　陕西督军阎相文因军队索饷，无法应付，夜半服毒自杀身亡。

8月24日　北京各公团代表在中央公园开茶话会，讨论华盛顿会议代表问题，主张代表不由南北两政府选定，而由国民外交大会研究代表人选及提案。

△　葡萄牙驻京公使符礼德以领袖公使名义就湖北武、宜兵变事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条件三款：一、汉口租界不准有反对现政府政策之华人居住；二、宜昌官吏应负保护外侨完全责任；三、兵变军官逃入汉口租界决不容留。

△　晚，驻湖北孝感原属王占元旧部之第一混成旅部分士兵哗变，变兵乘车北去，在萧家港、花园、广水等地抢劫，并拆毁广水、萧家港一带铁轨，经萧耀南派兵弹压，变兵向云梦、德安、信阳等地溃窜。

8月25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务会议，商讨华盛顿会议事，决定发表国务会议宣言，主张出席华盛顿会议之中国代表应由广州合法

政府委派，不承认北京政府所派代表。

△　徐世昌特任冯玉祥署陕西督军。

△　留法勤工俭学生参加拒款运动，法国政府以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停止资助。是日，驻法公使陈箓电告北京政府，遣送一批学生返国。

△　安徽学生联合会通电，宣告“倪（道烺）、马（联甲）运动李兆珍长皖，学生等誓死力拒”。旋驻沪安徽救国代表团、改造安徽同志会、芜湖总商会等团体及个人纷纷通电，反对李兆珍长皖。

△　恩琴在海拉尔为苏俄捕获，旋解往尼古拉夫斯克，经该地法院判处死刑，于9月5日执行。

8月26日　徐世昌令准农商部取缔上海私设各交易所。

△　赴欧专使顾维钧向国际联盟提出说帖，请求代为转达分得庚子赔款之各国政府，退还部分庚款，以为中国留学经费。

8月27日　广州政府严申烟禁，各级官厅认真奉行，缴获烟土10余万两，是日上午10时在东校场当众焚毁，至次日始全部焚尽。

△　徐世昌令派王继曾为庆祝墨西哥百年共和纪念专使。

△　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议决，经费未发清之前，招生及上课延期。京师公立小学校亦因经费无着，延长假期。

△　夜，江西星子县白鹿洞被人纵火，全部被焚。白鹿洞为南宋朱熹讲学之所，藏有图书100余万卷，价值当在百万元以上。星子县及全省各界人士开会，要求北京政府查办此案。经调查此纵火案系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王经畬、星子县图书馆馆长梁亦谦、馆员胡亨所为。王经畬于是年夏奉命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私将藏书售与日人，得

20万元。回国后，即将此书秘密运出。后伙同梁、胡纵火焚毁白鹿洞，以图灭迹。

△　优林第三次来京，访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刘式训及刘镜人，谈东省铁路问题。刘式训驳斥优林关于合办东省铁路的要求，告以该路在中国土地上，应完全归中国办理，另定发行债票办法，以偿清俄人。30日，优林再访刘式训，谈商约开议问题，无结果，于9日离京赴大连返赤塔。

8月28日　孙中山函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陈述中国近情及通商问题，告之广州已建立正式政府，表示革命党的北伐事业一定完成。信中热切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最后向列宁以及所有致力完成为人类的自由事业而尽了最大的努力的朋友们致敬。

△　吴佩孚对岳州（岳阳）发动总攻击，令张福来督同海、陆军陷城陵矶，逼岳州。驻守岳州湘军因闻嘉鱼、蒲圻败退，军心动摇，全师退却，岳州于是日午后3时为直军攻陷。

△　徐世昌任命孙传芳为陆军第二师师长。

△　华盛顿会议后援同志会在北京成立，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周树模、张謇、陆徵祥、梁启超等25人为理事，罗文幹、张一鹏等68人为干事。

8月29日　孙中山发表文告，反对北京政府滥发公债，谓："伪廷徐世昌命令所发行之民国十年公债及其一切公债，未经合法国会通过者均无效。将来统一之后，政府不负偿还之责。"

△　吴佩孚抵岳州，即召张福来、杜锡珪及各旅长开会，并致书赵恒惕约休战二日。

△　沈鸿英率所部离桂入湘，就任湖南援鄂第二路军司令，是日

通电声明，嗣后一切进行，均听赵总司令命令，不干预政事，所有桂事亦概不过问。31日，陈炯明电赵恒惕，令将沈鸿英缴械。赵复电谓沈现为援鄂前驱，将功赎罪。

8月30日　广州政府驻美国代表马素电告广州总统府称，美国务卿表示美曾通知北京政府，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必南北兼派，北京政府回电称南方唐绍仪可充代表。是日，广州总统府发表通告，声明对于华盛顿会议代表“并未与北廷有一字商量”。

△　吴佩孚在岳州召集萧耀南、杜锡珪、张福来及各师旅长和湘军代表叶开鑫、王首斌开会，商讨湘直和议问题。订立四项协定：一、岳州、平江、湘阴均归直军驻防；二、维持赵恒惕地位；三、许湘省自治；四、湘鄂继续联防。并决定自9月1日起续停战七日。

△　徐世昌晋授吴佩孚勋一位。

△　徐世昌任卢金山为陆军第十八师师长。

△　赴欧专使顾维钧被国际联盟推举为行政会会长。

△　上午10时，青海西宁地震，房屋动摇，门窗裂声如狂风作势。次日及后日又发生地震，损失极重。

是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在上海创刊，为我国工会最早的一个刊物。发刊词指出：周刊“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希望“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1922年6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煽动邮务工人罢工”罪名，勒令停刊。

△　毛泽东在长沙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4月又以自修大学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和附设补习学校。1923年11月，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为词，下令封闭。

△　孙中山复函国会非常会议，告知关于选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事，政府正在筹备进行。

△　北京政府发表4月至今收支情况：收入450万元，支出840万元，财政赤字近400万元。

△　陈光远与奸商龚梅生等合组天昌米谷公司，偷运贩卖米谷给日本牟取暴利。消息外泄，激起群众愤怒。各校学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唯利是图。南浔铁路工人、沿江码头工人拒绝为天昌公司搬运，天昌公司因此倒闭。

△　皖北18县5月以来，连阴雨数十日，江河水飞涨，致成数十年未有之奇灾。据父老传闻，水量较清同治五年（1867）大出三尺有余。田稼淹尽，房屋冲倒，人畜漂流，灾民百万。

△　浙省中旬以来迭经骤雨狂风，鄞县、慈溪、奉化、绍兴、余姚、上虞、新昌、临海等县塘堤溃决，山洪暴发，人畜田庐多被冲没。其间受灾尤烈者为鄞县之鄞江桥，仅梓村一处人口150人，死伤即达117人之多。房屋倒塌殆尽，道路桥梁大半断绝，其他各村，类此者亦有。

△　苏省入夏以来，淫雨连绵。伏秋盛汛，淮、黄横决，中旬以后飓风暴雨，滨江沿运各县平地水深数尺，庐舍倾颓，哀鸿遍野，被灾至50余县之多。

△　陕西扶风等县入夏以来，冰雹成灾，又值苦雨兼旬，山洪暴发，河渠冲溢。洋县等18县受灾尤重，人畜田庐漂没无数。

9月

9月1日　　赵恒惕乘英轮抵岳州（岳阳），同吴佩孚在英舰议和，缔结暂时休战办法九条，湘军自鄂撤退，湘军援鄂之战结束。

△　川军三路进攻宜昌，驻守宜昌之直军被包围，战斗持续两昼夜，直军不支，萧耀南急调驻沙市之一团及十一师一旅赴援。日、英、美三国领事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水兵登陆。直军托三国领事出面调停，川军遂停止攻城。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理论书籍。到1922年9月，共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等15种。1923年与新青年社合并。

△　北京政府交通部发行600万元八厘短期购车公债，委托经募车债银行团代为经理，是日起开始募集，至30日截止。

△　中易信托公司是日在上海开幕，为我国信托公司之第一家，资本800万元，经理洪盛仑。

△　浙江鄞县东乡潘火桥蔡氏旅沪族人，以蔡氏宗祠惇叙堂堂名创办惇叙储蓄银行，资本额定10万元，实收4.36万元，资本薄弱为内国银行所仅见，是日开幕。嗣于1930年6月1日改称惇叙商业储蓄银行。

9月2日　　张绍曾承吴佩孚意旨在汉口发出通电，主张在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并拟定办法草案14条。直系军阀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等，以及赵恒惕纷纷通电表示赞成，其余实力派多持旁观。吴佩孚派人运动各省赞成，无应者，会议终未召开。

9月3日　　张作霖再辞蒙疆经略使，并派督署参谋长乔赓云赴京，将经略使印缴呈公府。徐世昌、靳云鹏磋商慰留办法，决定满足张作霖对热河的要求，委汲金纯为热河都统，调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同时电劝张作霖速行就职，出兵复蒙。

9月4日　　曹锟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曹锐、边守靖、吴毓麟等参加，吴佩孚派专员与会。会议商讨湘省局势、军费及防御南方问题，决定直军驻防于湘、鄂、赣三省：第三、第二十五师及靳云鹗、董政国两混成旅驻湘，第二十三、第二十六师及豫军一团驻鄂西，第二十四师及鲁军一旅驻赣。

△　徐世昌特任张文生为安徽督军，齐燮元为江苏督军。

△　旅沪国会议员杭辛斋等84人通电，谴责吴佩孚以召开庐山会议“欺骗全国，实谋割据，以扩地盘”。同时，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全国各界联合会、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旅沪川湘鄂公民等亦纷纷通电，反对召开庐山会议。

△　孙中山致函马君武，介绍陈楚楠赴广西考察农业。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应中国教育团体之邀，来华调查中国各地教育状况，是日抵沪。旋赴北京、太原、开封、南京、苏州、广州等地调查讲学，于1922年1月7日离沪返美。

△　薛文泰、秦祖泽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棉业银行，资本总额100万元，先收一半。1927年因时局变化，于3月13日经股东会议决解散，所有存款如数发还。

△　湖北自治军总部（设于长沙）撤销，蒋作宾偕孔庚离湘赴粤。

9月5日　　孙中山就华盛顿会议代表资格问题发表宣言，指出：“远东问题，实以中国为枢纽。”而“本政府职权，由法律所赋予，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将来华盛顿会议，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与会，则关于中国之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

△　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院告知只有中国南方合法正式政府有权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北方非法政府无派遣代表之权。此函由驻美

代表马素转递美国务院。

△　国际联盟第二届大会在日内瓦开幕。主席顾维钧致开会辞，谓今年会员已由41国增至48国。本届议事日程为组织国际法庭、选举审判员、缩减军备及修正规章，于10月5日闭幕。

9月6日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宴请各军将领200余人，以奖援桂之功，勉以北伐；并发表演说，指出："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又谓："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

△　孙中山特派周震鳞为湖南劳军使。

9月7日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处置案》（即"鲁案"第一次节略）九条，表示日本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中国将租借地辟为商埠，并于山东省内适当都市自行开为商埠；山东铁路、矿山中日合办；山东铁路延长线（指济顺、高徐两铁路线）之权利及烟潍铁路优先权让与四国新银行团经营等。15日，外交部将此案全文交各报社发表。

9月8日　北京国务会议，颜惠庆报告日公使提出"鲁案"经过，主张发表往来文件，视全国舆论再定迎拒办法。其他阁员主张通电各省区长官及法团征求意见，取决多数。

△　徐世昌任命赵杰为河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阎治堂为第二师师长。

△　驻华英、法、日三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东三省截留盐税，请予禁止。

9月9日　非常国会在广州发出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反对庐山"国是会议"。

△ 浙江省宪法会议制订《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凡18章158条及《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施行法》，凡23条，于7日经省宪法审查会三读通过，是日正式公布，后终未实行。

△ 北京政府在美国旧金山设立公断处，以处理华侨间之纠纷。

△ 庐山“国是会议”筹备处在汉口成立。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为京绥铁路须扩充营业资产，发行短期债款500万元，月息八厘。

△ 新任驻京墨西哥公使巴拉斯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9月10日 外蒙王公公举车臣汗王部属扎萨克郡王多尔齐为代表，请愿内向。多尔齐往呼伦贝尔向都统贵福表示：“上年库伦被俄旧党巴龙攻陷，蒙民受害非浅，今者俄新党又占库伦，蒙民等对于俄国新旧党之举动，概不赞成，仍愿归附中央，永受保护。”贵福即将详情电达黑督吴俊陞请示办法。旋活佛又派蒙员抵齐齐哈尔谒吴俊陞商蒙事，吴请其赴奉与张作霖接洽。

△ 安庆各团体民众齐集江岸，反对李兆珍就任安徽省长，预备李兆珍到时阻其登岸，至深夜始散；次日又如此，一直坚持到13日。

△ 天津26个团体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拒绝“鲁案”直接交涉。旋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工商研究会、中国工会、四川同乡会、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留日学生救国团等纷纷发出通电，反对直接交涉。北京学生上街演讲，山东各界召开大会，强烈要求日本将青岛及所占山东权利无条件交还中国。

△ 赵恒惕就实行裁兵事通电所属征求意见，旋得赞同，于9月20日特通令所属酌量改编。但湖南各地方军阀仍置之不理，裁兵有名无实。

△　徐世昌公布《县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区域；又公布“县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区域令：《县自治法》自民国十年十月一日于浙江省所属各县施行”。

△　徐世昌任命毅军军统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

△　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等通电赞成召开庐山“国是会议”。

△　北京政府财政部接受银行公会提议，裁撤全国印花机关，将印花票交邮局办理。

△　李祖恩、魏伯桢等在北京创办信中贸易公司，资本50万元，经办各种货物进出口，兼营存款、放款及国内外汇兑，买卖各种公债股票及有价证券。

9月上旬　孙中山会见来广州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出华盛顿会议是前巴黎和平会议的变相。

9月11日　徐世昌派靳云鹏至北京孔庙代行“秋丁祀孔”礼。

△　湖南各界发起裁兵运动，反对赵恒惕恢复溃散各军，主张裁减军费。14日，湖南各公团发出裁兵通电。

9月12日　新疆督军代表刘希曾与苏俄西伯利亚驻军革命委员会代表波戈金在塔城缔结《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军开入中华民国国境以剿灭阿尔泰区白匪部队之协议》，规定苏军自行自斋桑城地区实行攻击动作，中国军队负责防卫布伦托海地区及乌伦古河以东之后方；苏军自其开入中国领土之日起，一个月内由中国无偿供给粮食，军事行动结束后，苏军立即撤离中国国境。

△　美国新任驻京公使舒尔曼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舒尔曼赴北京政府外交部，递送华盛顿会议议事日程。18日，舒尔曼再赴外交部，声明所送华盛顿会议日程系试拟非确定，可酌商变更。

△　张作霖在奉天召集蒙古王公会议，议定宣抚办法。决定派宣慰使达寿会同各王公分途赴蒙宣抚；并拟定外蒙官制，专案呈请中央添设各族辅佐员，由汉蒙人员分任其职。

△　吴佩孚与赵恒惕和谈结束，是日正式签订和约。其内容为：一、岳州、湘阴为直军驻地，唯行政权仍属湘省；二、保留赵恒惕湖南总司令名义；三、承认湖南自治，如发生事变时，得由直军援助。

△　川军第二次进攻宜昌，川军援军唐式遵、张冲汉等部队由夔下驶，复由南沱溪分路反攻宜昌，鄂军节节退却，宜昌几不能守。直至次日晚，直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加入防线，堵住川军进攻。至15日，吴佩孚率所部主力军赶到，始将川军击退。

9月13日　蒋介石自沪抵粤，与孙中山、廖仲恺等议商出师北伐之事。

△　徐世昌下令添设潼关镇守使，以张锡元充任。

△　安庆数千群众在招商码头迎官厅示威，反对省长李兆珍到皖。李不敢登岸，于夜间扮成贩夫改乘小船，暗由小南门登岸，入省署接印。

9月14日　王宠惠被举为国际法庭副审判员。

△　奉天日本侨民在十间房一带举行祭祀活动，沿街挂七、五、三绳。我国人民以其用麻绳藁白纸有伤我国风俗习惯，由交涉署向日领提出请其撤去，日领不允。是晚，日人抬出樽神舆游街，并厉声叱责，足蹴观众，引起纠纷。日人遂唤日警及宪兵队数百名殴打群众，我国人民百余人受伤，但驻奉日领赤冢竟先向奉省当局提出抗议。

△　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出布告，反对北京政府滥发国库券。

9月15日　北京八校七月份教育经费经潘复约定于旧历中秋节前发出，到期又无着落。是日，教职员往教育部坐索，至夜始散。次日晨续往，仍无结果。后经校长团居中调停，马邻翼向财政部交涉，始得向中国、交通两银行各借5.5万元，先发半数。

△　华盛顿会议协会在上海总商会开会，议决本协会九个团体公推余日章、蒋梦麟两人为出席华盛顿会议国民代表。余、蒋于10月15日启程赴华盛顿。

△　吴佩孚率直军主力赶至宜昌增援，以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为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左翼司令，第三旅旅长卢金山为右翼司令，与川军激战，将川军击退。

9月16日　驻澳门葡萄牙海军在银坑越界干涉中国国防军缉盗，竟先行开炮。中国军队反击，伤葡萄牙水兵四名。

△　北京政府驻英、法、德、奥、荷、瑞典、瑞士、意大利、西班牙九国公使，以太平洋问题为列强争端之中心，中国实首当其冲，是日联名致电国内，劝告息争，使现在用兵各省，立即停战，“商议统一治国方法，一致对外，以为后盾”。

△　徐世昌特派田中玉督办宫家坝黄河决口堵合事宜。

9月17日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呈请辞职。

△　卢永祥致电张绍曾，谓2日通电仍有第三政府及党派操纵嫌疑。次日，张复电称，统一政府乃指国宪成立后，依法成立之政府而言，非第三非法政府可比，并告以赴沪、杭时再议。

△　安徽各界成立安徽公民拒李大会，发表第一次宣言，表示“誓死不承认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同时致李兆珍觉书，限即日出城，不

得逗留。19日又发表第二次宣言，谓“本会愤李贼之凶残，慨皖祸之日亟，业经宣言绝不承认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并一致主张拼死驱逐，期于实现皖贤长皖，自救皖危”。

△　北京政府陆军部调毅军驻北通州，促姜桂题速离热河。

△　远东共和国擅在齐齐哈尔设立领事馆，吴俊陞电告北京政府请示办法。

9月18日　孙中山与美国民治社驻芝加哥记者金斯莱会见，谈论中美关系等问题。

△　陈树藩联合川军由汉中分三路攻陕，东路出蓝田之阳峪口，中路出长安正南之子午谷，西路出宝鸡之南天门，同时派人联络陕中旧部以为内应。

9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华盛顿会议日程将中国与委任统治地并列殊非平等，是日一面通知美驻华公使舒尔曼要求改拟，一面电致施肇基令向美国政府详细声明否认之理由，并试拟华盛顿会议议事日程对案六条。

△　徐世昌下令添设安泰镇守使，以张奎武充任。

△　京绥铁路举行通车典礼。全路干线1213里，支路122里，历时16年修成。

△　江、浙、皖水灾义赈会是日在上海仁济善堂开成立会，推何丰林为名誉会长，朱葆三为会长，史量才、徐静仁为副会长，叶慎斋为坐办。22日致电北京江、浙、皖同乡，谓“本年江、浙、皖三省，惨遭水灾，灾区之广，灾民之多，为东南数十年来所未有”，望“俯赐赞助，共策进行”。

△　北京协和医院举行新屋开幕礼，颜惠庆代表总统致祝词，约

翰·洛克菲勒（美国石油大王之子）叙述协和医院成立之由来，谓北京协和医学校及其所附设之医院，原系英美六大教会所合办，现由洛克菲勒投资兴办。

9月20日　孙中山下令重申禁种、禁吸、禁运鸦片。

△　孙中山任王伯群为贵州省长，王未到任前着卢焘兼署。

△　北京各界联合会、国民外交协会、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北京教育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国民外交共进会、留学同志会等20余团体，发起成立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联合会《规约》规定，“以集合国民公意对于外交问题为一致之主张为宗旨”。旋致电上海华盛顿会议协会、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上海总商会、广州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各省区议会、教育会等，倡议在上海组织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

△　安庆全城各界举行罢市、罢工、罢课、游行，驱逐李兆珍。次日，商民、学生数千人拥至省署驱李，李嗾使卫队开枪行凶，打伤多人。同时芜湖亦全城罢市，商团组织巡街，各中学校学生1000余人举行联合大游行，一致驱李。

△　里昂中法大学开办，吴敬恒带新生100余人抵法。留法勤工俭学生闻讯，于是日推举代表116名赴里昂，要求吴敬恒从速解决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里昂政府以扰乱治安为名，令警察将勤工俭学生送入炮台拘禁。至10月10日，值当“国庆”，群情愤激，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0月13日，里昂政府以勤工俭学生屡次扰乱，且违犯警章，押解学生赴马赛强迫回国。

9月21日　冯玉祥同于右任达成协定，改编靖国军。是日，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召集靖国军所驻地区三原、泾阳等县公民开国民大会，商定并宣布取消靖国军。旋冯玉祥推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会

会长，并呈报徐世昌任命胡景翼为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　冯玉祥在西安督署以宴请为名杀张飞生，同时乘夜包围张飞生队伍，击毙100名，俘虏200名，其余600名逃往汉中投陈树藩。

△　菲律宾总督伍德将军来中国游历，于是晚抵北京，旋赴朝鲜、日本等处游历。

9月22日　孙中山召集国务会议，提议铸造中华民国国玺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印，获一致通过。

△　安徽省长李兆珍在安庆数千民众抗议声中，化装从旁门溜出省署，各商店即日恢复营业。次日，各界数千人举行庆贺逐李成功大游行。

△　北京政府内务部致电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湖北五省长谓，本年五省霪雨成灾，业经本部呈奉明令拨帑赈恤，“务希先就各省地方速先筹济，以惠灾黎”。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加拿大联合会银行签订加金300万元借款合同。同日又与英商费克斯公司（汇丰银行）签订120万银元借款合同，作为行政经费及支付借款利息之用。

△　天津八家纱庄钱号，每家筹款25万元，总计200万元，创办北洋商业第一纱厂，于是日开工，吉士箴、黄献忱为正、副经理，拥有纱锭2.5万枚，工人1600名。后因亏赔，于1930年11月由新记公司租办，改称北洋新记纱厂。

△　日本政府将成都日本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

9月23日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会见南洋学界代表廖衡，表示支持华侨教育，指出：“摧残侨民教育，无异摧残我国内教育，现政府誓与华侨同其祸福，据理力争，不为强暴所屈”；同时饬外交部向英

国交涉，保护南洋华侨教育。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至北京政府外交部催答“鲁案”，胁以倘再迟延，日本惟有公表其所处地位，将来由中国负一切责任。颜惠庆答以“值内阁动摇，阁议难决，所以迟未答复”。

△　宜昌直军借海军重炮及机关枪三路轰击川军，激战至25日，川军不支，由南津关、安庙、磨子山等处退驻南沱溪。直军继续追击，川军于10月中旬先后退出秭归、兴山、巴东等县。

△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哈尔滨、浙江、江西、南京、济南等地18名代表及北京政府财政部三名代表与会。会议发表对外宣言，阐明对华盛顿会议的观点，并就四国借款、铁路、币制等问题作出决议，最后推举冯耿光、沈步洲、罗鸿年三人为银行公会联合会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

△　山西平辽公路完工，自平定县之阳泉镇，经昔阳、和顺两县至辽县，计长240余里。

9月25日　　徐世昌在总统府召集联席会议，除靳云鹏、王迺斌外，阁员均与会。议决三项：一、决定阁事仍留靳云鹏主持；二、华盛顿会议代表以颜惠庆为首席，余为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三、“鲁案”据民意驳复。

△　安庆各界民众万余人齐集公共体育场，庆祝驱李运动胜利。会后举行盛大游行并散发传单，此为安庆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　湖南省议会商议湘鄂议和条款，以条款内容于湘省自治实多妨碍被否决，是日将否决理由咨复赵恒惕。

△　白俄谢米诺夫来沪，公共租界工部局派人保护，日本驻沪领事亦派兵前往戒备。

9月26日　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吉林、黑龙江两督军、总参谋长及各旅长均出席。会议决定：一、拥护靳云鹏内阁，惟对于财政易人问题仍主贯彻；二、西北各省督军、省长由张、曹两人保荐，请政府照前次名单分别任命；三、长江军事由直军担任，但奉军亦应出相当兵力，以资协助；四、将蒙古经略使改为蒙藏经略使。

△　广州政府对澳门交涉取强硬态度，谢绝第三国调停，并派两艘鱼雷艇前往澳门。同时，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召集各界代表会议，一致抗议葡萄牙侵犯主权，誓为政府后盾。

△　北京政府驻墨西哥国全权公使王继曾与墨外交总长巴尼签订《暂行修改中墨一八九九年条约之协定》，在答复其照会中指出：中墨两国政府商定，所有两国于1899年12月14日在华盛顿签订《中墨友好通商行船条约》之有效期间，应展限至两缔约国将来按照两国宪法所规定之手续，商定对于该约确定及正式之修改之日为止。在墨西哥国政府禁止外国工人入境期内，两缔约国各禁其本国工人入他一缔约国境内。

△　北京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陈威以事赴中国银行，适有毅军军需官持财政部支票索饷无着，与陈威发生冲突，将陈殴伤。次日，财政部全体员工停止办公，以示抗议。后由毅军统领姜桂题出面向陈道歉，徐世昌下令陆军部查办，遂告结束。

9月27日　孙中山任路孝忱为总统府参军，准李国柱辞职。

9月28日　徐世昌令添设豫西镇守使，以丁香玲充任。

△　济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在省议会召开大会，800余人与会。议决电北京政府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会后学生上街宣传，演讲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之宗旨。

△　北京政府内务部为孔子诞节发表通告：所有文武各机关、各

团体均应照章放假庆祝，悬旗结彩，并准各项人员前往孔庙自由行礼。

△　优林第四次来京，磋商解决车站检查扣留行李事件及谈判蒙古和东省铁路等问题。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日美两国敷设野普尔岛、上海间海底电线事提出抗议，声明此问题如无中国之允诺，即宣布无效。

9月29日　徐世昌特任许世英为安徽省长，准李兆珍免本职。

△　北京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第一批代表及随员70人，由北京启程转上海搭船赴美。

△　徐世昌批准《国际法庭规约议定书》及《国际法庭规约》，10月9日全文公布。

△　香港客系同人赖际熙、李瑞琴、黄茂林等136人，假西环太白楼召集客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客属团体，定名为“旅港崇正工商总会”，公举赖际熙为临时会长，李瑞琴、黄茂林为副会长，吴穟畴等六人起草会章。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20日，举行全体同人常年总叙会，通过修改之会章，正名为“崇正总会”。

9月30日　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军队与苏俄军队会剿白俄诺马阔夫、巴赤奇残部，自是月中旬起，在布尔津一带接战三次，擒毙白俄千余人，余众纷纷窜散，是日遂将阿尔泰全区克复。

△　粤军攻占广西龙州，陆荣廷逃往越南。至此，广西全省完全成为广州政府管辖领域。

△　孙中山委任苏福为中国国民党麻厘柏板支部正部长。

是月　孙中山为准备北伐，批准组织中央筹饷会，并致电海外同

志，望“合力共进，踊跃捐输，以助成统一”。

△　南京东南大学正式成立，是月开学，设文理、教育、农、工四科于南京，设商科于上海。北京政府教育部委郭秉文为校长。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并入该校。

△　秋，四川汉源县地震。马驿坊西四里朱家湾有200方丈之地陷落，此外场东亦有陷落。

10月

10月1日　广州政府就澳门事件向驻粤葡领提出四项要求：一、葡舰先开炮，应向我国道歉；二、惩办肇事军官；三、葡萄牙各种船只不得驶过银坑湾仔华界；四、澳门须定期禁赌。

△　孙中山复函章太炎，告知正筹备北伐出师计划，望以正谊之力，阻止北京政府的卖国殃民行为。

△　广州执信学校开学，孙中山亲临致词，称赞朱执信是“革命实行家，又为文学家”。

△　甘肃第三届省议会开会，选举杨思为议长，叶祺为副议长。同日，黑龙江第三届省议会选出梁声德为议长，潘万超、高家骥为副议长。

△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因学校经费无着，是日北上赴京请愿，并为此致电各报馆。3日到达北京，即与北京政府教育部交涉，无结果。6日整队游行请愿，行至教育部门口被警察阻拦，殴伤20余人。10日，高师师生赴院请愿，又被阻。北京学生联合会、全国教育会相继开会并发通电予以声援。后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商妥，并取得湖北当局承认，以10万元印花税票为担保品，自明年1月起，按月拨1.5万元作该校经费，风潮遂解决。师生于11月14日乘车回鄂。

△　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改为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派夏维松署理校长。

△　日本关东厅强行在大连实行金建制度后，奉省总商会与钱业决议，停止奉票对日金买卖之行市，以示抵制。又决定对于日本无论何种商业交易，均改为奉票来往。次日，总商会发表11条之排斥金票宣传文，呼吁各商号抵制金建。

△　江西省长杨庆鋆承陈光远之意，决定是日起实行盐斤加价，每斤盐于售价内加洋七厘。又将知事、财政局长两种差缺分等出售，购一等缺每年纳8000元、二等6000元、三等4000元，卖官鬻爵，以充私囊。

△　天津证券粮食花纱皮毛交易所开幕，理事长曹秉权。同日，广州交易所亦开幕。

10月2日　孙中山饬令海军派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

△　徐世昌派孙宝琦为防灾委员会会长，令准陆徵祥辞职。

△　徐世昌派蔡成勋至北京关岳庙代行“秋戊祀典”礼。

△　华盛顿会议外交商榷会在上海成立，有29个团体参加，推喻育之为主席。该会以商榷关于中华民国在华盛顿会议之正确主张及行动为宗旨。

10月3日　孙中山在广州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韩国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申圭植，表示北伐完成后当全力援助韩国的独立运动。

△　陈炯明自龙州凯旋南宁。孙中山派邹鲁赴南宁催促陈炯明回粤，以商定出师北伐事。

△　孙中山委任洪兆麟、许崇智、李烈钧分别为北伐前敌一、

二、三路司令。

△　颜惠庆与优林在北京就扣留行李、归还外蒙、东省铁路等问题举行第一次会谈。扣留行李一案双方已谅解，北京政府同意发还。归还外蒙问题，颜惠庆要优林表明态度，优林当即声称："远东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国对于蒙古之主权，并可撤去现在蒙古之俄国军队"；同时请北京政府派员赴满洲里具体接洽。至于东省铁路，颜惠庆坚持应完全归还，由中国自行管理。优林表示原则上可不表反对，但应予远东共和国种种经济上优越待遇。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哈连忒公司订立借款1500万法郎合同，利息一分八厘，以盐余为担保；又向汇理银行借款300万元，以盐余为担保，利息一分八厘。

△　晚9时，孙传芳第十八师一部分士兵在沙市哗变，焚抢兼施，后窜入豫南新野等县，经豫、鄂两省军队合剿，始弃械逃走。

10月4日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身份任命张继为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部长。

△　徐世昌批准外交部派张煜全为赴美参与华盛顿会议代表团专门委员，刁作谦为秘书长，曹云祥为帮办秘书长。

△　陈独秀来沪就医，于是日为法捕房逮捕，并将积存之《新青年》杂志及印刷品多种一并搜去。后法租界公堂以陈独秀著作为"危险文字"，有"扰乱社会治安之虞"，罚洋100元，查抄书籍一并销毁。

△　广州在野各名流及团体发起成立中韩协会，嗣于11月1日通电全世界各社团，陈述协会缘起。

△　国民党人方刚正等在汉口组织湖北国民第一军，希图大举，旋被警厅破获逮捕，是日方刚正等三人被杀害。

△　美驻华公使舒尔曼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华盛顿会议议事日程增加太平洋之电气交通一项。

△　颜惠庆与优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就海参崴政变、大连会议、黑龙江航行问题、接待苏俄代表办法等，广泛交换意见，中东路问题，尤为讨论重点，双方争执不下。

10月5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将“鲁案”复文分送驻京各使馆，适小幡酉吉赴外交部，当即面交。小幡不肯接受，抗辩许久始悻悻携去，仍言非正式收受。次日，外交部公开发表“鲁案”复文，对日所提《山东善后处置案》逐条驳斥，并声明中国政府保留将来遇适当机会谋解决此问题之自由。

△　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57人，自上海启程赴美。

△　孙中山发布宽免与释放罪犯命令。

△　日驻奉天总领事赤冢以禁止金建乃妨害自由通商，有碍日中国交，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作霖全盘接受日本无理要求，发出布告：一、取消奉天总商会散布之金票排斥宣传，今后再不许有此种行动；二、中国交易所之商品买卖，从素来之习惯，无论何种货币，均可随意，不准限制；三、关于金建问题，今后不准议论。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总商会开会，直、鄂、湘、晋、豫、皖、川、滇、闽、赣、鲁、浙、苏13省代表80余人与会。推聂云台为主席，讨论华盛顿会议及南北统一等问题，10日闭会。

△　颜惠庆与优林举行第三次会谈，仍以讨论中东路及蒙古两事为主。次日晨，优林出京，在沈阳与张作霖接洽关于东三省与俄边备问题，无结果。旋即返赤塔。

10月6日　徐世昌特委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参与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伍朝枢拒绝接受未赴会。

△　徐世昌特任潘龄皋为甘肃省长。

△　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开会，闽、苏、赣、湘、吉、鲁、粤、浙、鄂以及北京、济南等地代表与会，讨论华盛顿会议及国内教育问题，11日闭会。

△　国际赈俄委员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英、美、法、德等17国出席，北京政府派许毓章参加。

10月7日　徐世昌任吴新田为陆军第七师师长。

△　晚，陕西宜川强烈地震，七郎山之石窑、宝塔均被震倒。同时洛川中部（黄陵）亦发生地震，并有地声，震后三日内仍有小震。

10月8日　孙中山向国会提出北伐案，经国会非常会议通过，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乃令陈先返广州，主持后方接济。

△　孙中山特任柏文蔚为长江上游招讨使。

△　山东各界联合会开成立大会，商议对华盛顿会议之意见，并推定徐树人、王者垫二人为该省加入华盛顿会议代表，拟随同北京政府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

△　美洲华侨恳亲大会在积彩召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国家共300余名华侨代表参加，美国各埠、各团体亦派100余名代表参加，推举林光汉为会长。会议议定全体美洲华侨赞助广州政府，请求美国政府予以承认，并邀请广州政府派代表列席华盛顿会议。同时致电孙中山声明侨民愿为后盾，请坚持北伐，扫清妖孽。并决定组织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于11日闭会。开会期间，举行大巡游会，代表们手持中、美国旗及各种大旗，上书“孙逸仙总统为中国国民所爱戴”、“吾中国国民不承认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应有代表列席太平洋会议”等中、英文字样，并沿街散发广州政府列席华盛顿会议之十二点理由之英文传单。

10月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呈请徐世昌公布《国际法庭规约议定书》及《国际法庭规约》。

10月10日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庆祝国庆，后赴北校场阅兵，军民结队游行庆祝国庆。

△　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在长沙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嗣后，以支部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　孙中山为《实业计划》中文本作序，全书完成，是日在国内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　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联电赞成庐山“国是会议”，声称将来集会议成，可得多数之民意。

△　北京政府因财政困难，无法筹足赴美华盛顿会议经费，特电令苏、浙、鲁、豫等省协助经费。

△　潘龄皋至兰州接任甘肃省长；兰州各公团召开驱潘大会，会后围潘宅。14日，甘肃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谓本日省议会开议，人民聚集1.25万余人，要求本会呈请罢斥，请俯顺舆情，另简贤员。

△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公团组织数万名学生、工人和市民在长沙举行游街会，庆祝“双十节”。学生们要求裁减军队，并散发裁兵传单。赵恒惕以“学生侮辱士兵”为词，令士兵殴打学生，在水风井、小吴门、经武门、贡院街一带，打伤学生数十人。次日，又禁止学生上街宣传，并围打工业学校学生，教职员亦被打伤。12日，一师、雅礼、明德等校学生又被殴打，长沙八校被迫停课。赵恒惕复下令禁止学生集会，裁兵运动遂被镇压下去。

△　中国报界代表许建屏、董显光、钱伯涵、王天木、王伯衡、黄宪昭等，出席于檀香山召开之世界报界第二次大会。按：世界报界联合会于1915年7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　张嘉乐纠集悍匪数千人，数月来窜扰湘西辰溪县温和、中协和、雍和各乡，焚杀淫掠，无所不为，纵横数十里已成丘墟。是日，张嘉乐又统带悍匪千余人，从雍和、温和出发攻打县城。激战两小时，匪始败窜。次日，又在距城15里雍和乡境内，伏击防军，抢商船八只，被劫财物约计10余万元。后窜入芷江、麻阳、辰溪三县毗连之地及木叶溪等处盘据。

△　钱琳叔、于谨怀、江上达等创办常州纺织公司，于是日开工，资本60万元，置纱锭1.8万枚。

△　徐葆三、王启宇等在上海创办振泰纱厂，于是日开工，资本10万两，纱锭二万枚。

10月11日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会见美国石油大王之子约翰·洛克菲勒。

△　徐世昌授冯玉祥、萧耀南陆军上将衔。

△　北京政府交通部训令各路局，严密查禁私自运售鸦片、吗啡等物品，以绝来源而消隐患。

△　北京大学在第二院举行开学典礼。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指出："要研究高深学问须具有两种精神：一种是活泼进取的精神，一种是坚忍耐劳的精神。"胡适也在会上发言，说："以后中国的前途有许多的风潮，诸位要打定主意，不管国亡了，天倒了，我们只管研究我们的学问。"

△　日本在奉天召集在华中学校长会议，决定组织日华联合教育会，奖励派遣留学生及在普通教育之学校教以他国之现代语等，以配合日本对中国之国策。

10月12日　粤汉铁路湘鄂段800多名职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粤汉路局总管英人卡墨客尔不允，并将为首的工

人解雇。工人坚持斗争，后经湖北督军署和江汉关调停，承认工人的要求，于17日客货车始照常运行。

△　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直、苏、鲁、浙、川、闽等17省区代表70余人与会。会议就华盛顿会议问题发表对外宣言和对内宣言，并推举余日章、蒋梦麟为代表，赴美宣传民意。17日闭会。

△　徐世昌公布《邮政条例》，凡47条，规定各民局必须于条例颁行三个月内向邮局挂号。按：民局为我国邮政开办以前已存在的私立信局。

△　徐世昌授李鼎新为海军上将。

△　徐世昌特派驻西班牙公使刘崇杰出席万国邮政会议，签署《万国邮政公约》。

△　国立北京高师校长邓萃英因出席华盛顿会议提出辞职，北京政府教育部聘李建勋继任。

10月13日　孙中山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报告财政情况及将来方针，并说明出巡桂省原因，决定出巡期间由伍廷芳代理总统职务。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美国芝加哥银行协理阿卜脱在北京签订《中美烟酒借款草约》，借美金1600万元，用以偿还烟酒借款美金1100万元及利息等。此项借款由于徐、靳之间争夺佣金及全国各方面的一致反对未能实现。阿卜脱回国，旧欠托史蒂芬交涉。

△　优林返国途经哈尔滨对记者发表谈话，谓中国和远东共和国商约必得圆满结果，蒙古问题可望解决，远东共和国政府已正式命令撤退在蒙之俄军。

△　上午11时，广州西关同兴街万祥店起火，延及靖远、荣阳、

德兴、永安等街，至下午4时余才熄，统计此次共焚去铺屋200余，损失总计300万以上，为民国四年以后之最大火灾。

10月14日　　山西督军阎锡山派代表谒孙中山，表示山西省拥护新政府。

△　甘肃省议会开会，民众聚集一万余人，要求议会呈请罢斥省长潘龄皋，另简贤员。旋省议会决定停会一年，以示拒潘。

10月15日　　下午5时，孙中山由广州天字码头乘“宝璧”炮舰出巡广西梧州，各界一万多人热烈欢送。

△　蒋作宾抵广州，向孙中山报告驱王占元之经过。

△　徐世昌以杨增新在新疆古城粉碎白俄败兵暴动以及即时规复阿山全境有功，特授予勋一位。

△　徐世昌派汪荣宝为国际保工会委员。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顾维钧，准苏俄代表来京，顾维钧即通知克拉辛。10月24日，苏俄派巴意开斯为全权代表，自莫斯科启程赴北京。

△　宋鹤庚部士兵因欠饷及反对整编，在长沙附近之大托铺哗变，持枪抢劫，商民受害甚烈，经赵恒惕派卫队一营前往弹压始平息。

△　中央信托公司由上海绍兴帮30家钱庄联合发起，于是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资本总额1200万元，实收300万元，推田时霖为董事长，田祈原、王晓籁、孙铁卿、魏海涛等18人为董事。1935年改名中一信托公司。

△　广州总统府代理参军长林修梅在广州病逝。11月2日孙中山追

赠陆军上将衔。

10月16日　　江西省财政会议因入不敷出积成巨亏，决定自是日起向各属丁漕下滩派金融善后借款，每地丁一两，带征银元三角；米折一石，带征银元五角；无论新赋旧欠，一律带征至1927年底，自1928年起，即于所征丁米款内分年筹还。各县征解借款之数拨归各县，以为地方自治经费。

△　旅美华侨数千人在纽约城厅公园开公民大会，要求允准广州政府列席华盛顿会议，并为此致电美国务卿休士。会后整队游行，道路交通半为所阻，约历一小时之久，观者盈千累万。

△　驻防奉天东边道之第三营在通化县松树镇哗变，四出抢掠，商民损失甚巨。

10月17日　孙中山抵梧州，18日由梧州向南宁进发。

△　刘存厚乘川军在鄂西败退，运动旧部赖心辉等反对刘湘，是日赖心辉所部川军在资州、简州宣告独立。

△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通过在上海组织国是会议案，并通电各省区议会、商会、农会、教育会等团体征求同意。

△　徐世昌授予陆洪涛上将衔。

△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举林献堂为会长，有会员1000余人。

10月18日　　徐世昌就鲁、皖、苏、浙、鄂、陕等省水灾发布命令，派各该省省长督办本省赈抚事宜。旋于28日又令加派各该省督军督办本省赈务，随时会同省长切筹办理。

△　徐世昌指令照准司法部设立特种司法事务委员会，处理通商口岸特别区域之“关系外人司法事务”。

△　徐世昌任命张广建为正黄旗汉军都统。

10月19日　　冯耿光、曹汝霖代表银行界谒见徐世昌，表示非财政公开将不再垫款，并希望财政有确定具体之计划。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奉日本政府训令，再度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通牒（即“鲁案”第二次节略），促北京政府速与直接交涉。次日此项通牒全文由小幡公布，日本政府亦在东京同时发表。

△　徐世昌授森丕勒诺尔布为辅国公。

10月20日　　北京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事经徐世昌慰留后，是日通电各省区声明暂行视事，同时仍呈请徐世昌改组内阁，谓“身疾暂时维持，仍恳恩施择贤继任，俾得开缺调理”。

△　蒙古王公20余人在库伦召集会议，表示反对蒙古新政府。

△　北京政府外交部邀集朝野人士在外交楼商议“鲁案”问题，多数意见认为“鲁案”即使提出华盛顿会议，恐未必有利。北京外交联合会议决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北京各团体联合会议决“鲁案”提交华盛顿会议。天津26个团体亦电请府院拒绝直接交涉，并电全国一体拒绝。

△　国际妇女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开会，中国基督教妇女青年会江婉贞代表中国出席。

10月中旬　　孙中山致函邓宝珊，劝其奋力振作，“陕靖国诸君万不可稍自暴弃，功亏一篑”。

10月21日　　徐世昌特派齐耀珊兼赈务处督办，嗣于29日公布《赈务处暂行条例》。

△　夜，新安武军二路第三营因积欠军饷，在皖北定远县哗变。

10月22日　　湖南劳工会机关报《劳工周刊》创刊，主笔庞人铨。1922年1月，该刊与湖南劳工会均被赵恒惕强行封闭。

△　北京政府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高等顾问周自齐、屈映光、唐在礼及总税务司安格联等离京赴美。

10月23日　　孙中山抵南宁与陈炯明商北伐问题，反复说明北伐的迫切意义，表示此次决心讨贼，义无反顾，倘北伐不能，亦不回粤，希陈勿再阻挠。并与之商酌出发桂林之饷项。此饷已筹三四百万元，但大军出动，子弹之供给，米粮之储备，每月须请接济。陈允惟力是视。但孙中山至桂林半载，未见陈一粟一弹之补助。

△　广东省总工会成立，会员达数万人。

△　国际律师协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开成立会，菲律宾代表九人，朝鲜21人，日本78人，美国四人，苏俄五人以及我国代表百余人与会。该会以主张正义、拥护人权为宗旨，举日人增岛为会长。

△　广州政府驻美国代表马素致电陈炯明，请其说明与吴佩孚携手之真相。是日，陈炯明电饬省署复电马素，谓西报所载粤事及同吴佩孚携手之说，实属谣言。

△　库伦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代表章嘉，向张作霖陈述库伦受俄党挟制之情形及活佛倾心内向之诚意，并言此后绝对与俄人断绝关系，服从中央治化，同时提出十项条件。张作霖即派遣左参赞李垣将此十条呈递北京政府。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上海隆记洋行签订法金30万法郎借款合同，作为政府行政费用。

△　成都省立各校因经费无着，举行罢课。

△　前清两江总督周馥病故。

10月24日　上海英美烟厂机车车间500余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总管张文元无故开除和欺侮工人，罢工风潮蔓延全厂。26日，新、旧两厂一万余工人全体罢工，迫使厂方接受撤换张文元等六项要求，罢工始结束。

10月25日　吴佩孚电张绍曾速邀已赞同庐山会议之各省选派代表，开会筹备进行事宜。

△　归国华侨组织北伐决死团，并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北伐。

△　中国参加国际联盟之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代表，与各国代表在日内瓦订立《工业工人每周应有一日休息之公约》等四种国际劳工公约。

10月26日　孙中山在南宁作关于广西善后方针的演讲，指出："现时已将强盗扫除，自今日起，广西者真广西人之广西，而非强盗之广西；真中华民国公有之广西，而非私人所据之广西矣。""强盗与民国不能并容。今既驱之，即当共绝其根株，勿许再有第二次强盗治桂出现"。

△　江苏省议会议决发起组织全国省议会联合会，为华盛顿会议后援，为此通电各省征求同意。

△　日本中华取引市场株式会社和中华金银取引市场株式会社邀集日本纺织联合会干事及各棉业家，集资3000万日元，创办中国棉花股份公司，专以投资中国棉花种植业及其他农作物，操纵棉花产销。

△　"俄国灾荒赈济会"在北京开成立会，政、商、学、教（会）各界及中外慈善家百余人到会，选举熊希龄为董事长，蔡元培、齐耀珊等八人为副董事长，徐世昌、黎元洪为名誉会长，曹锟、张作霖等35人为名誉副会长。通过《俄国灾荒赈济会临时章程》，凡13条。

10月27日　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在广州举行，17个省区

派出代表35人参加，举汪精卫为主席。会议讨论改革学制系统、经费独立、援助华侨教育等案，于11月7日闭会。

△　徐世昌任命胡景翼为暂编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　李烈钧部在衡州（衡阳）与沈鸿英部接战，沈部溃败，是日晚李部完全占领衡州。

△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严复在福州病逝。

△　吴佩孚由宜昌乘舰回武汉，当日并通电全国，声称："川湘鄂战事之缘起，率由政客党人酿之，川湘战争之责任，当由政客党人负之。"

10月28日　徐世昌特任高凌霨为财政总长，令准李士伟辞职。

△　日本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以换防为借口增派军队，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员密查确实，饬交涉员向驻济日领抗议，同时致电北京政府。是日，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胡维德向日本政府交涉。

△　张作霖以吴佩孚截留京汉路收入之例，截留奉站北路收入充饷。

10月29日　孙中山从南宁返梧州。孙中山留梧期间曾对梧州国民党员发表演讲，指出："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原因，在于党员"感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论"，要求"大家要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主义，一力做去"，强调"应以主义维持国家，不应再持武力"。

△　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1920年中国和约研究会所拟提交国际联盟之《山东问题标准案》，以澄清日本第二次"鲁案"节略中"中国当局曾示以山东问题解决案"一语。

△　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日本自民国八年至今，利用案悬未决之机会，将在山东之各种事业尽力扩充。青岛一隅，商店栉比，工厂林立，各种会社已增至数十处，间接直接之投资已超过八亿元。

10月30日　江西第三届省议会选举戴秉清为议长，11月2日选欧阳华、李凝均为副议长。

△　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抵达华盛顿。

10月31日　唐继尧由粤入桂经柳州回滇，驻桂滇军总指挥杨益谦私自率队往护。广州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是日下令撤滇黔赣联军第二路总指挥杨益谦职，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并派朱率部招回杨部。孙中山得讯于11月1日致电李烈钧，批准撤销杨益谦及加委滇军各长官，并予嘉勉。

△　孙中山命令李福林率部赴韶州。同日，复电李烈钧，告知即将出发桂林。

△　广州政府参谋部收到特别报告，内称：陈炯明将与吴佩孚图政治上之结合，以解决中国南北分歧之局面，陈炯明将派陈觉民赴鄂接洽一切。

△　全国商会联合会干事会公布全国厘卡数目：江苏58处，江西47处，云南44处，贵州44处，福建45处，甘肃43处，山西42处，浙江42处，安徽42处，奉天34处，陕西30处，河南32处，黑龙江31处，湖南34处，广西30处，吉林20处，四川20处，湖北25处，广东29处，直隶15处，新疆11处，山东10处；以上22省，计728处。其余各省，尚未调查确数。

是月　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代表张继，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并表示希望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国民党邀请马林于12月去桂林访问孙中山。

△　京奉铁路大虎山至八道壕煤矿支线动工，长29.3公里，于1922年12月19日完工通车。

△　日人丰田佐吉等在上海创办丰田纱厂，于是日开车。资本1000万日元，收足500万日元，纱锭2.5万枚。1932年另于厂之东侧设立第二厂。

11月

11月1日　孙中山复函章太炎，告以即将督师北伐，望发谠论遏止北廷卖国殃民之行动。谓："他日收效之宏，当不让辛亥。"

△　甘肃省督署将收容在敦煌的白俄300余，自是日起每名给川资六两，分批解送回国。

△　徐世昌以蒙哈人民人生艰难，复罹兵劫，着财政部拨一万元，交由新疆省长遴委妥员，分赴各区，核实散放。

△　赴欧专员顾维钧业已赴美参与太平洋会议，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一席由唐在复代。

△　叶恭绰等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

11月2日　徐世昌令驻美国公使施肇基、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加全权大使衔。

△　徐世昌特任财政总长高凌霨兼盐务署、币制局督办。

△　北京国务院委任李垣办理接收库伦事宜。

11月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将答复驻京日使"鲁案"第二次节略送交日本公使馆，指出："胶济铁路建筑在中国领土之内，本系公司承办性质，并有中国之资本……且护路警察权完全属诸中国，日本占据

该路毫无军事上之必要。当时中国曾屡次抗议，日军实无占据该路之理由。”山东境内日军“自应从速撤退，所有铁路警备事宜，自有中国警察负其责任”。次日，外交部将复文非正式发表。

△　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民众万余人在前山福善堂开大会，商议对抗葡萄牙办法，决定自5日起，停止供给澳门食物和闭绝水道。

△　沈鸿英残部2000余人在湘东被赵恒惕围剿，败退入赣西。同日，北京政府参陆处电令赣督陈光远收留沈鸿英部，饷由陆军部发。

△　李瑞九等创办的惠工银行在上海开幕，资本总额100万元，先收四分之一。1922年1月又开办储蓄业务，嗣于1923年2月3日因内部周转不灵而停业。

11月4日　孙中山委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

△　吴佩孚在汉口召集长江联防会议，萧耀南、杜锡珪及苏、皖、赣、湘各省代表出席，议决鄂、湘、赣、皖、苏五省为联防区域，实行攻守同盟，以对抗广州政府北伐。

△　北京政府赈务处分电直、豫、鲁、皖、苏、浙、鄂、陕及湘、川、甘各省督军、省长，请调查各县被灾情形，列表克期送处，“并请先将贵省赈抚大概情形摘要电复”。

11月5日　孙中山派汪精卫、伍朝枢赴香港向唐继尧借款，并邀唐赴梧州会商出兵北伐事宜。

△　云南省议会暨各团体致电孙中山，请遏止滇省内争，谓“继尧图滇心切”，“一面煽惑驻桂滇军三路回滇，一面勾结土匪吴学显扰乱滇省内部，作内外夹攻之计”，望“消遏祸萌，力维大局”。

△　颜惠庆致电施肇基令其告诫团员，对美新闻界谈话勿表示对

日激烈言论。

△　苏俄与外蒙地方当局签订《苏蒙友好条约》，凡13条，规定互相遣使设领，“承认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为蒙古惟一合法政府”。

△　美驻京公使舒尔曼接美国国务卿休士电称，如中国对前两次烟酒借款及湖广铁路券息不履行债务，中国在美之财政及信用即将毁灭；且美政府将视北京政府为不复具有执行中国政府职务之资格，并令其将此电转送北京政府。

11月6日　　孙中山致电奉化蒋介石，“余拟于十五日与汝为（许崇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

△　孙中山委任丁惟汾为中国国民党山东主盟人。

△　徐世昌下令整顿盐政，严防走私漏税。

△　安徽泗县知事王以骧、赈灾分会会长沈廷杰等电告泗县灾情：泗县全区皆成泽国，淹毙1019人，牲畜7.0605万头，计灾区面积1.05005万方里，冲荡田地3.7199万顷，房屋20.5799万间，受灾者7100多户，人口36.6万余人。

11月7日　陈炯明自广西梧州回到广州。

△　列宁收到孙中山8月28日来函后致函齐契林，指示应与孙中山建立紧密联系，并经常通信联络。

△　徐世昌任命王汝勤为勤威将军，赵玉珂为贞威将军，王承斌为彦威将军，张宗昌为将军府将军。

△　徐世昌通令各省，重申禁烟。

11月8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否认北京政府发行之非法国库券。

△　施肇基等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谓：“芝加哥银行借款500万到期不还，美人异常重视。某国（按：指日本）乘此宣传中国财政将破产。不亟设法保全信用，太会（按：华盛顿会议）必受极大打击。”

△　美国务卿休士电舒尔曼转北京政府外交部，芝加哥银行借款失信用，将影响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地位。

△　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北京政府称，孙中山北伐以邓铿、赖世璜等三师集中韶州攻赣。邓部已开到南雄，扣留民船运兵，并派军官至黄坑等处察勘地势，赣南防务异常紧急。

11月9日　陈炯明在广州头门悬榜发表委任68县民选县长：南海李宝祥、东莞邓寄芳、顺德周之复、香山吴铁城、新会陈永惠、台山刘裁甫、三水陈剑虹、清远陈守仁、宝安何恩明等。

△　广东汕头300余名缝纫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每日10小时工作制，每月休息三天。资方被迫接受工人要求，于13日复工。

△　晚，陆军第十八师三十五旅第十连100余名士兵因索欠饷未得，在湖北武穴哗变，商店及居民被抢甚多，损失三四十万元左右。

11月10日　广东交涉员李锦纶谒陈炯明，报告澳门事件交涉经过情形，并请示办法。陈面嘱李锦纶对于日前照会葡领四项要求，一定坚持到底，不可稍让。

△　梁士诒应徐世昌组阁之请，是日离香港北上，12日抵上海，月底入京。

△　广州日报社社长谢英伯与流亡中国之朝鲜人金晋镛等，在广州发起组织中韩互助社，推谢英伯为社长。

11月11日　　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该会由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发起，全国各地118个团体300余名代表与会，通过致美国总统哈定及华盛顿会议各国代表团电。

△　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与太平洋问题各团体联合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开联席大会，通过对华盛顿会议中国提案之意见：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日本立即无条件交还胶州湾及在山东省侵占之土地、铁路、矿山以及关税自主。

△　广三铁路工人因反对铁路当局无故开除职员举行罢工。斗争持续10天，广东省政府被迫接受工人要求始复工。

11月12日　　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开幕。该会由美国政府发起，先邀请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参加，其后荷兰、葡萄牙以有属岛在太平洋，比利时以有经济利益在中国之故，均被邀参加。会议商讨限制军备暨远东及太平洋问题，推美国务卿休士为大会主席。美总统哈定发表演说，说明美国倡议该会之宗旨及期望。大会下设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和限制军备问题总委员会。北京政府全权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出席。

△　孙中山以许崇智因病不能督师北伐，委任蒋介石代理粤军第二军军长职务。

△　徐世昌任命张永成为将军府将军。

△　徐世昌批准将布伦托海县佐改为县治。

△　吴佩孚委张福来为湘鄂赣三省联防总司令。

△　山东巨野、定陶间聚匪千余人，扯起宣统十三年旗帜，肆行掠夺。曹州镇守使派一营军队往剿，为匪所败，营长被击毙。山东督军田中玉又派两团往剿。次日，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山东匪情，决定大举扑灭，立电田中玉执行，始将匪徒击溃。

△　朱吟江、顾吉生、金西林等创办嘉定商业银行，是日开幕，设总行于嘉定，办事处于上海，资本10万元。1924年增资为20万元。

11月14日　徐世昌公布《刑事诉讼条例》，共八编514条及《刑事诉讼条例及施行条例》，共13条；并规定此条例自次年1月1日起先就东省特别法院区域执行；又将前次公布之《民事诉讼法草案》改称《民事诉讼条例》。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全体员工因薪水积欠七个月，屡向次长马邻翼催促无效，于是日起一律停止办公。19日，北京高、地、审、检四厅推事、检察官200余名因三个月未发薪水，呈递总请假书。

△　蒋作宾、孔庚致电张绍曾，称“卿本佳人，何以从贼”，驳斥召开庐山“国是会议”之主张。

△　孙中山就北伐军事作部署，拟定北伐部队10万人，从六个方面集结统编。

△　华盛顿会议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提议，由九国全权代表组织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讨论远东问题；其下设置各种分委员会，探讨各种特殊问题。限制军备委员会亦提议，由英、美、法、意、日五国全权代表组织限制军备问题总委员会，其下附设各种分委员会。会议决定各种问题先由分委员会报告于总委员会加以讨论，然后提到全体大会讨论正式通过。

11月15日　孙中山由梧州出发赴桂林，组织大本营筹备北伐。

△　广州非常国会召开会议，通过宣布徐世昌、吴佩孚祸国殃民罪状。

△　孙中山致电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对该会通电反对北京政府滥发国库券表示赞许。

△　北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先是流传中、交两行信用不稳，外国在华银行、商店拒收两行钞票，于是各企业及市民纷纷持钞到两行兑换。人群川流不息，两行至深夜始闭门，次日挤兑更甚。仅两日两行共兑五六十万元。北京政府及银行界要人迭开会议，讨论救济办法。决定拨关余700万元，作为偿还两行公债还本付息之垫款；各商号、银行一律收存中、交钞票，作为现金定期存款，风潮因之缓和。北京中行于12月1日恢复原状。挤兑风潮并波及天津、济南、开封、汉口等地，旋皆平息。惟开封中、交两分行因现款一时无从调集，两行经理及官钱局局长面请军政两长出示停止兑现两个月。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115.2508万元之林矿借款息垫合同，以盐税余款作担保，作为支付1918年吉、黑两省林矿借款利息。

11月16日　　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北京政府代表旋肇基将芮恩施、蓝辛两顾问草订的内容非常空泛的所谓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十项一般原则提出大会讨论，各国代表及舆论对之甚为冷淡，而日本代表团闻之则如释重负。19日，开第二次会议，各国代表亦以空言相应。21日，开第三次会议，美国代表路德另提四项原则作为修正案，经各国代表略加修改即经表决通过。此四项原则中仅包括十项原则中第二条之全部及第一条之上半，后此决议案并入所谓《九国公约》。

△　苏俄《消息报》发表文章赞扬孙中山是“中国的激进分子”，同时批评吴佩孚投入世界反动分子和中国反革命的怀抱。

△　施宜镇守使赵荣华率队进攻鄂北建始，川军败退，赵乘胜进攻旋南。22日迫近施城，先将五凤山炮台占领，至24日夜施南川军由南门退走。

11月17日　　陇海铁路机务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比籍总管若里裁人减薪及虐待工人。20日全路数万工人起而响应，提出撤免若里职务，不准裁人减薪，每月休息两天，增加工资等项要求。斗争坚持10天，28日路局被迫承认工人的要求条件，始复工。

△　刘湘通电指责吴佩孚利用湘鄂用兵巧取武汉，其假面尽露后反归罪政客党人，应速辞去巡阅使职务，退兵北返，还政鄂民，否则对国事无发言资格。并称川军救邻义无反顾。旋但懋辛、唐式遵、李树勋、喻培棣等亦通电痛斥吴佩孚。

△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在高陵召集靖国军及陈树藩代表开会，决定团结反击冯玉祥部直军进攻。

11月18日　　美国前国务卿蓝辛致电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询解决南北之条件。伍廷芳复电开列二项条件：一、完全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其他相类似条约；二、徐世昌应去非法总统职。蓝辛即此电呈美国政府并转北京政府。

△　顾品珍电告孙中山称，已任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总司令，杨希闵为北伐第一路司令，杨蓁为第二路司令，金汉鼎为第三路司令，正集中出发；并称将亲自率师北伐，省政交政务厅厅长刘祖式代理。

△　北京政府致电直、鲁、豫、苏、皖省，凡有匪患之区，着各长官迅予剿除，并责成县知事筹办民团，以卫地方。

11月19日　　阿格辽夫赴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远东共和国军队已自蒙古撤退，满洲里会议已无举行之必要；至于库伦、恰克图的苏军撤兵问题，中国政府应同苏俄政府商洽。

△　厦门英商太古洋行于七八月间曾在海后滩擅自兴工筑桥，经厦门交涉员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后，太古洋行被迫停工。近该洋行又复兴工，群众得讯，异常愤怒。是日，有人将造桥监工朱一毛殴伤，太

古洋行即煽动工人持械登岸，肆意寻衅，并将工地附近的居民林在兴等两人抓走殴打私禁。驻厦英领事复令英舰上的水兵登岸示威。11月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此事向驻京英使提出抗议。但太古洋行仍置之不理，继续建造栈桥，以致厦门民众大动公愤，于12月决定三项抵制办法：一、不乘太古之船；二、客货不装太古之轮；三、不代太古轮装卸货物。英使被迫同意撤退军舰，全案移北京谈判。

11月20日　　曹锟召集保定会议。吴佩孚、高凌霨、张景惠及各省代表葛豪、郑士琦等37人出席。议决同张作霖携手共御南方；川湘赣防守由吴佩孚负责；直省实行亩捐，鄂省增加货税，截留京汉、陇海两路收入，以裕军需；对国会问题持旁观态度等，于26日闭会。

△　施肇曾、朱启钤、曹汝霖、章宗祥等创办震华制造电气机械厂，是日在北京开创立会，资本150万元，决定在江苏设厂营业。

11月2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领袖公使及英、法、意各公使，请转饬驻沪领事将不合法律之交易所一律禁止营业，对于未来之交易所亦请严加限制。

△　陈树藩宣布陕人治陕，移兵子午谷，继续发动进攻，于28日占领邠州。

△　山西汾军公路落成，举行通车典礼。此路以工代赈修筑，由汾阳经离石至军渡。

11月22日　　孙中山北伐途经昭平，在昭平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谓民国应“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此方为真正之民国”。并指出：“诸君既为广西之主人，更当尽主人之责。诸君今日当先尽之责，莫若开辟道路，切不可以无钱卸责，只须全体人民出力可也。”强调指出道路开辟，“一切工场、实业可以振兴，教育可以普及，盗贼可以潜消”。

△　孙中山复电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及汪精卫，嘱与蒋介石同为代表，与徐树铮磋商军事，南北一致，以定中国。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所提“十项原则”之提案。

△　下午7时，王汝勤第八师某团一部士兵因欠饷在湖北宜都哗变。

11月23日　　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第五次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正式提出“关税自主案”，此为北京政府第一次事实提案。此案提出中国有自行规定及区分本国税率之完全自由。议案一经提出，即遭到英、美、法、日等国反对，尤以日、英两国为最。会议六次，于1922年1月3日美国代表路德提出修正办法，最后始通过决议：有关各国立即派员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会议，切实执行值百抽五，满四年后得一修正，此后每七年修正一次。顾维钧提出保留案声明：“将来遇适当机会，再求考虑自主权问题。”后大会据此决议制定《中国关税条约》，并于1922年2月6日正式签字。

△　下午5时，留法勤工俭学生蔡和森、陈毅等被法国政府强制遣送回国，乘“波尔特加号”船抵沪。原为104人，途经新加坡、香港等地上岸者有罗学瓒等27人，抵沪者只77人。学生在马赛登船后，即在法国军官监视下，行动不自由；各人均只带随身衣服，困惫万分。过新加坡时，侨商胡文虎给予经济上资助，侨商林秉祥预电香港，俟船过港时各赠卫生衣裤一套。过西贡时，华侨商会又给予赠资，国民党西贡支部亦殷勤招待，并电粤、港嘱为照顾。船泊码头后，上海交涉署科员沈世成、环球中国学生会代表朱少章登舟慰问。晚间回国学生组织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举陈毅、喻正衡、金满城、马素征四人至《民国日报》馆介绍被迫回国经过，谴责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强迫遣送。嗣于30日回国学生邀请各界开茶话会，提出请各界致电质问法国政府及北京政府，抗议强制遣送。

11月2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阿格辽夫，再次抗议远东共和国政府擅自派兵侵入库伦、恰克图。指出：事前既未得中国之许可，又无若何之通告，此种举动，不独有损中国主权，且违万国公法，不顾国际信用。并促其速派代表赴满洲里与中国接洽交还库、恰事宜。远东共和国政府未作答复，因而满洲里会议未能举行。

△　徐世昌公布，定于明年（1922）4月1日起，于京兆特别区所属各县实施自治法。

△　潘龄皋电辞甘肃省长。

11月25日　　王宠惠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案。美国代表休士认为有调查中国司法之必要，将本案移交于领事裁判问题分委员会讨论。11月29日，分委员会提出组织一委员会调查中国司法状况之决议，提交总委员会通过。

△　施肇基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裁撤各国在华邮局案，除日本代表声明须候本国政府训示外，其他各国代表皆赞同。后委员会制成议决案经1922年2月1日大会通过。

△　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与太平洋会议各团体联席会议发起第二次国民大会，是日下午在中央公园开会，到四五千人。王玉圃主席，钟少梅、张维城、詹连芳等讲话，一致反对中日两国在华府直接交涉，山东应该无条件归还中国，并主张取消“二十一条款”，撤销亲日派所订借款合同的权利。

△　孙中山委任北伐军各军司令等职，并下令各军首领齐集桂林开预备会议，研究会师北伐问题。

△　徐世昌特派汪荣宝为全权代表签署国际交通新约。

△　北京八校因7月份下半月所欠之经费和10月份经费至今分文未发，11月份亦到期无着，加之教部罢工，部长辞职，异常窘困，殊难

维持。各校长于是日特呈北京政府速拨经费，并请任命教育长官。

△　休士、巴尔福、加藤友三郎于华盛顿会议外，举行关于山东问题秘密谈判。休士、巴尔福向加藤表示“将尽力使此问题不提上会议议程”，加藤对此深表感谢，并希望美英两国能促使中国同意和日本于会外直接解决山东问题。日、英、美三国遂就山东问题达成秘密协定。

11月26日　　刘湘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但懋辛为前敌总司令，大举反攻鄂西，并电商赵恒惕合攻宜、岳。

△　奉天总商会会长鲁棣琴与日商业会所石田武亥就取消大连金建案举行谈判，达成协议：中日双方交易，无论何时买卖何种货物均须以奉票为本位，惟买卖上一切货币，因三省情形不同，各地过去有惯例者，即按照惯例办理。

11月27日　孙中山偕许崇智抵平乐，下令各军在桂林集中。

△　舒尔曼晤颜惠庆商中日山东问题，颜惠庆表示愿受英、美调停。

△　陈树藩旧部张宝麟所部之第五、第六两团，向第七师吴新田部进攻，旋败退。吴军即进据东河桥、秦岭等处。同日暂编陕西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岳维峻率所部分三路进攻邠县，与陈旧部郭金榜所部激战两昼夜，郭以兵力单弱退守邠城。

11月28日　　施肇基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撤退外国驻华军警案。日代表埴原提出反对，并声明日本驻山东等地之军队皆出一时之不得已，至警察仅在于保护及管理本国侨民。旋肇基提出驳议。后经总委员会议定，由各国驻华代表调查翔实再行酌办，并制定议决案于次年2月1日经大会通过。按此时各国在华驻军约近万人，以日军为最多，约有4500人，其中2700人驻山东。驻华美军共

1504人，法军1214人，英军1044人，荷兰军队78人，意大利军队31人。此外，南满一带驻日警约1800人，亦无条约根据。同日施肇基又提出裁撤外国无线电台案，各国代表对此颇有争论，后由总委员会制定议决案，经大会于2月1日通过。北京政府代表团声明：不承认或容许任何外国在中国建设或经营无线电台之权利。

△　进攻鄂西的川军退驻巫山。

△　沈鸿英所部桂军在赣省无法立脚，由赣西窜入湘东，是日到达浏阳，要求给棉衣饷银后投降。赵恒惕以该军无理要求，决定以武力解散，于30日发动进攻，沈军败退。

△　王正廷、穆藕初、黄炎培等在上海创办中华劝工银行，于是日开业，资本50万元，分设商业、储蓄两部。1930年资本增为100万元。

11月29日　　孙中山途经阳朔，在群众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勉励当地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完成此次北伐之功，以建立真正的民国。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驻京英公使艾斯敦抗议驻新疆莎车英领事诱劝我国人民加入英籍，侵犯我国主权。

△　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电华盛顿会议，表示广州政府对国是之态度：一、须撤回承认徐世昌之统治权，应承认广州政府；二、列强不宜干涉中国内政；三、中国与列强及列强相互间之外交，宜取开放政策。

△　云南代理省长刘祖武电请孙中山早定北伐大计，并表示愿效前驱。

△　北京政府全权代表汪荣宝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签订《国际新交通公约》六种。

11月30日　　北京政府代表团欲将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解决，英美两国循日本之意出面“调停”，建议中日会外谈判解决，北京政府被迫同意。是日，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开会，施肇基提出“鲁案”。主席休士正式宣告：“鲁案”久悬实为中日两国之困难问题，今约同英国分向中日两国间力任调停，旋商定会外谈判。除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外，美国派东方股长马克漠及外交参事培尔，英国派代表朱尔典及东方股长兰朴生共同列席，并约定将谈判结果报告大会。

△　华盛顿中国国民代表团接国内来电，谓不日有绝大运动发生，积极反对直接交涉，誓不承认此亡国举动。接电后，国民代表团又在华盛顿作最后阻止，终于失败，即于是日晚发表宣言，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并电告留美学生华会后援会。后援会当晚亦发表宣言，绝对不承认山东及“二十一条”问题直接交涉，同时派出多人连夜赴华盛顿，联合各方面设法阻止。次日下午，后援会集会华盛顿、巴尔的摩、费城、纽约学生，齐赴华盛顿会议代表总部，表示反对直接交涉。

是月　　热河都统汲金纯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日金100万元借款合同，以热河烟酒税作担保，作为整理热河兴业银行及财政费用。

△　上海金业公会改组为上海金业交易所，实收资本150万元，经纪人名额为138人。交易物品计为：国内矿金、各国金块及金币、标金、赤金四种，而实际上市物品仅有标金一种。标金以上海通行九七八成色为标准，每平七条，以此为买卖单位。标金市价之涨跌，与外汇银价互为因果。当投机活跃之时，金业交易所之标金行市，具有影响世界银市及外汇之势力。

△　方寿颐、薛醴泉、贝润生等发起创办豫康纱厂，设无锡，资本80万元，置纱锭1.4万枚，是月先行开纺5000枚。

12月

12月1日　华盛顿中国留美学生赴北京政府代表团办公处，劝阻代表中止参加中日山东问题会外谈判。顾维钧、王宠惠声称："不能伤英美感情"，加以拒绝。学生怒斥顾、王为卖国贼。

△　第一次山东问题中日会谈于华盛顿大亚美利加馆举行，北京政府代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日本代表加藤、埴原、出渊，休士、巴尔福亦出席。美国马克漠、培尔，英国朱尔典、兰朴生列席。首由休士致词，继由中日两国代表致答词：加藤声明山东问题只牵涉全省土地千分之五与长二百九十里之铁路，与其附属之矿产，并不关系山东全省；施肇基声明山东问题为中国重大问题，希望早日解决。次日，进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山东问题之讨论以事实为根据。施肇基提出各事实案计11件进行谈判。

△　汉口租界数千名人力车夫因反对车行每乘加租200文举行罢工。4日工人开大会，集议组织工会，并要求将车租由900文减为600文。7日，工人手持白旗游行示威，在法租界同法巡捕发生冲突。后经汉口总商会等出面调停，于21日达成协议，同意车夫成立工会，车租照原价并免租金三日，工人始复工。

12月2日　孙中山抵良丰。次日，良丰各界开欢迎会，孙发表演说，表示北伐胜算可操，决不延滞。

△　广东省宪法草案审查完竣。宪法草案凡15章135条。

12月3日　徐世昌因府院之间关系恶化及财政穷困，通电辞职。5日齐燮元、赵倜等致电挽留，9日张作霖致电徐世昌劝勿辞职。

△　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案。日本代表埴原声明，日本对于旅顺、大连皆由日本牺牲许多生命财产，取自其他强国；又因领土接近，故日本在该地有关经济命脉及国家安全之生死利益，实无意放弃。英国代表巴尔福亦反对退还租借地，法国先同意后又反复，于是废止租借地案无结果。

△　夜，新疆援库军营长宋金山带领全营在新疆古城哗变，击毙参谋长杨式中，并强迫附近马、步、炮各营乘夜用梯登城，占据古城之满城。次日，又猛攻汉城。经古城司令杨应宽督饬所部竭力抵抗，变兵败退。

△　烟潍汽车路基工竣，北京政府交通部请山东省长招商购车营业。

12月4日　孙中山抵桂林，设大本营于桂王府，整军北伐。桂林各界举行提灯会，燃放焰火，热烈欢迎。7日，桂林军政学各界76个团体开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本大总统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形，以为实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才可以免将来的经济革命，这便是防患于未然"，号召到会各界人士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北京政府驻外各使馆五六个月经费未发，纷电催索，外交部复电令暂自行设法。

△　鲁迅以巴人署名的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至次年2月12日止，共登九期。

12月5日　北京国务会议决定铁路运粮赴水灾区域酌减运费办法：灾区以内五谷粮食免除运费，灾区以外收费二成。惟沪宁、陇海两路则按五折收费。

△　四川省议会通过省宪法会议组织草案，并于7日选定刘成勋、邓锡侯、但懋辛、向楚、石青阳、曾金森、肖德明七人为省宪法会议筹备处筹备员。

△　唐继尧应孙中山之邀由香港到梧州，并电告孙中山即行来桂

林相晤。

△　海军大批军舰赴鄂助吴，现留守长江者，尚有“楚有”、“江利”、“拱辰”、“湖鄂”、“江元”、“江复”、“楚谦”、“江鲲”、“烈字”、“江犀”、“永安”、“建中”12艘，因欠饷窘状已极。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是日特急电萧耀南，谓“全军积欠饷粮，已一年有奇，循兹以往，深恐军心愤激，抚慰无从”，请就近拨款协助。

△　中国留美学生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每人手执小旗，上书“无条件交还山东”、“勿与日本直接谈判”等字样。

△　美国旧金山商会游华团130余人，由亚斯宅率领到达广州参观访问。旋赴上海等地参观。

12月6日　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学生手持白旗，写“外交后援”、“国民速起”、“力争青岛”、“不用劣货”等字样。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代表谒颜惠庆，请电美阻止“鲁案”直接交涉；北京各团体联合开会，警告颜惠庆直接交涉违反民意。

12月7日　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代表刁作谦、王宠惠、施肇基、顾维钧等因“鲁案”交涉困难，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辞全权代表职务。北京政府外交部于8日、9日、10日三日连电慰留。

△　德国新任驻京公使博邺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陈树藩通电就西北自治军总司令，并电请西北各省会师北伐。

△　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声明，日本于1915年所提“二十一条”中关于旅顺、大连租借地之99年展期要求应属无效。

12月8日　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各国不得相互对华订约案。英国代表巴尔福反对，谓此等建议足以限制各国订约之主权。后经英国代表盖德士提出修正案，作为各国对中国原则之一，经总委员会通过。

△　上海召开国民大会，学生及商界四五万人参加，会后游行示威，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华盛顿会议决议。

△　孙中山任命刘震寰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　徐世昌任命米振标为将军府将军。

12月9日　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人民的“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就是要把“知之非艰，行之维难”的思想变成“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观念。

△　桂林500余名公民代表在总商会商议请愿事宜，议决迁省桂林、振兴实业、统一民政与财政、收复广西银行以维金融等13项。会后赴大总统行辕请愿，孙中山亲自接受请愿书，随即演讲：“方今之政府，乃中华民国人民之政府。政府受制人民之下，无异于人民之公仆。人民所请愿之事，政府当尽力为人民办之。”最后希望到会代表随时与政府共同出力。言毕，全体公民代表大呼：“新广西万岁！”“孙大总统万岁！”

△　唐继尧自梧州赴柳州准备回滇。孙中山曾派胡汉民到梧劝唐赴桂林就大本营参谋长职，为唐所拒。

△　靳云鹏向张作霖“控告”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张寿龄，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是日，徐世昌不得已准张寿龄以“病”辞职，任汪士元为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

△　据北京报纸报道，北京政府财政困难，财政总长高凌霨因部中债户如云，不敢常在部办事，暂以私邸为办公机关。高以库空如

洗，派员四出磋商借款，因无抵押甚少成就。现各处索款急于星火，鄂督一日间有数电催饷，奉天方面连日亦电索甚急。而各机关之索薪风潮，近日又有加无已。国务院秘书厅亦欠新三月，厅中各科人员已集会要求财政部速拨款发欠薪，否则惟有总请假。至素称阔部之交通部，前月薪俸尚无着落。惟闻张志潭又将京绥路资产债凭证100万元提出，向某银行抵押50万元，作为发薪等项急用。

△　孙中山训令外交部长伍廷芳，通电反对徐世昌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　驻日公使胡惟德电北京政府教育部，谓留日学生因经费无着，旅馆下逐客令，群趋使馆。嗣向侨商凑借三万元，并由何恩傅、张作相资助15000元，得暂息风潮。

12月10日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三军官佐千余人讲述“军人精神教育”，指出这次北伐是件非常的革命事业，是要“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个庄严华丽之新民国”。认为苏俄军人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农工联合而造成新国家。并表示相信“吾国今日之军人，倘亦具有主义及目的的决心，改造新中国，其效果必在俄国之上”。

△　孙中山电令南宁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整顿吏治，绥抚地方，“务令闾阎获享安宁之福，民治得有发展之机”。

△　济南召开国民大会，24个团体之六七十名代表及数百公民参加。会议决定致电华盛顿会议主席请主持公道，速将“鲁案”提大会公决；致电山东代表转中国国民代表团，请其就近监督；并致电北京政府，诘问“鲁案”为何不提大会而由中日直接交涉；同时电请南北各省商学各团体一致力争，以救危亡。会后复举行游行示威，并由各校组织讲演团，沿街演说及散发传单。

△　黑龙江省讷河省日昨突来800余名马贼，该县驻屯官军一中队

前往迎敌，众寡悬殊，为匪所败。马贼乘胜追击官军，除生擒外悉数击毙，县城陷落，知县衙门、各公署悉被焚烧，并将县署内全部犯人释放编入马贼团；又架巨户30余名勒限往赎。仅五小时，该城全成焦土，商民死者惨不忍睹。次晨，吴俊陞派兵往剿，马贼已远扬而逃。

△　全国铁路协会成立，举王正廷为会长。

△　华盛顿会议开第四次全体大会，宣布美、英、法、日四国协约成立。四国代表于13日在美国国务院前厅签字。

△　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通过《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议决案》，决议由美、英、法、日等八国政府组织一委员会调查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以及中国司法状况，提出方案建议各国逐渐或用他种方法放弃各该国之领事裁判权。

△　苏俄全权代表巴伊开斯抵哈尔滨，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称在外蒙问题上“苏俄从未怀有任何侵略意图”，“一旦在外蒙古敌视苏俄的组织所造成的威胁解除，吾人之军队即行撤退，自不待言”。

12月11日　　湖南省宪法经全省人民总投票通过，于是日举行授受典礼，省宪法筹备处将省宪法送达省政府。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中日“鲁案”交涉经过，略谓此次“鲁案”提交大会，“英美两国以大会待决问题正多，此案可由英美居间商榷，俾得从速解决”。政府详加审度英美两国主张，“未便置之不理”。而“此次英美出任调停，以提出大会为发端之始，以大会公认为解决之终；每次会谈均有英美代表之参预；即议而不协，仍以大会讨论为后盾，实与我国向来之希望尚无抵触”。

△　北京政府接驻法、意各公使电告，华侨对“鲁案”直接交涉表示强烈反对。

12月12日　　王宠惠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废除

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案。后由于日本反对及英国的两面手法，此案遂被搁置。同日，华盛顿会议通过撤销在华客邮案，其实行之期不得逾1923年1月1日。

△　法国新任驻京公使傅乐猷向徐世昌递交国书。

△　苏俄代表巴伊开斯抵北京，16日访颜惠庆作首次之会晤，并面递证书。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递还巴伊开斯证书，表示承认仿照优林前例，予以非正式接待。

△　张作霖抵天津，曹锐亲至车站迎接，住恒记德军衣庄。次日，靳云鹏亦到津，与张面商内阁问题，于15日返京。

△　刘湘代表张梓芳至宜昌与孙传芳会商川鄂议和事宜。19日，刘湘电令援鄂川军撤回川境。

△　下午2时，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民国大学及中大附中、山东中学等34校学生及北京女界联合会会员共万余人，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游行示威。学生们手持大、小旗帜，上书“宁可退出华会，不得苟且交涉”、“争领土”、“我们的外交，全靠民意”，沿途齐呼“山东问题，国民快起”。队伍行至外交部时，高呼“尊重民意，力争外交”。公推何玉书等四人进见颜惠庆，提出尊重民意、无条件归还山东、“鲁案”提交大会解决等四项要求，颜惠庆表示应允。学生高呼口号后，乃将警告外交当局之旗帜，插于园中之冬青树上，整队而回。

△　京绥铁路局职员反对局长陈世华欺压及索取欠薪，举行罢工。京绥路张家口、大同等站工人起而响应。经北京政府交通部派员解决，撤换局长，允发欠薪，始于18日复工。

12月13日　孙中山致电云南顾品珍，勉其率师北伐。

△　湖南省政府以财政奇绌，咨请省议会提征十一年田赋。议会

决定于1922年1月1日实行，并议决附带条件数款。

△　济南中等以上学校为反对日本侵略山东，决定停课10日。各校学生走出校门，分为上街演讲及调查日货二组进行活动。

△　北京八校经费又无着，只能坚持至月底，高师将断炊。各校长急呈徐世昌、靳云鹏，请速设法维持。

△　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出版《妇女声》月刊，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宗旨。

12月14日　　王宠惠在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取消日本侵略中国之“二十一条”。日本代表埴原反对“在大会内讨论”，会议主席休士宣布停会，此案遂被搁置（按：“二十一条”虽经国内民众强烈要求取消并经在华盛顿国民代表等催促，但北京政府代表团不但无提出之勇气，且无此要求。后美国代表休士忽示意北京政府代表团可以提出，因此时日代表对海军比率持延宕政策，故美国以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案来迫日本承认海军比率）。

△　黑龙江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告以日人在满蒙殖民计划，并请电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施、顾、王三人力争“鲁案”，并不得承认日人在满蒙享有特殊地位。

△　张作霖到北京，次日见徐世昌表示愿对于政治上发生之风潮及各方面的意见进行斡旋，绝不使政局再见动摇。

△　浙江绍兴、萧山两县农民因连年歉收及不堪地主重额课租之苦，于秋间组织农民协会。是日绍属九湾村农民单和澜等因要求减租，同地主周仁寿发生争执，周受伤控告于县署，县署出票传讯。17日，单和澜集各村农民千余人向绍城进发，绍城戒严司令官盛开弟下令闭城不准进入。18日盛开弟乘各村农民协会会长在萧属衙前村开会之时，派兵百余人包围东岳庙，将单和澜等三人抓走，并击伤农民三

人，农民减租斗争遭失败。

△　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招商局“广利”轮驶到汕头海面时，被乔装乘客的海盗劫持，肆意行劫，击毙一乘客，财产损失不下12万元。直到16日晚，海盗截三艇将赃物载走。

12月15日　　孙中山就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谈判山东问题事发表文告，斥徐世昌等出卖国家，表示将“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二十一条”，并号召举国上下对徐世昌及其党羽，“共起诛之”；同时训令外交部通电全国。

△　粤军总司令部、广东省长公署发表会衔布告，重申烟赌禁令。

12月16日　　汉口举行游行大会反对“鲁案”直接交涉，36个团体代表及各校学生近万人参加。大会通电反对直接交涉，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丧失权利。学生手执小旗，上书“废除二十一条”、“反对‘鲁案’直接交涉”、“收回胶济铁路”、“主张国际平等”，并沿途散发传单。

△　驻京英公使艾斯敦接英政府电，撤厦门水兵，海后滩案移北京谈判。

12月17日　　孙中山、伍廷芳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勿因海军减吨案以中国实权为牺牲；日本与北京代表所议妨害中国主权之条件，正式政府代表全国民意概不承认。

△　徐世昌派吴籍孙商请梁士诒组阁。次日，梁士诒对人言，以前组阁机会均谢绝，现政局已濒末路，非至愚何必自苦。若有法解决时局，或不惜牺牲；若责以维持现状，则谨谢不敏。

△　徐世昌令改黑龙江省奇克治局为县治，又令在吉林省乌株河镇、苇沙河镇添设治局。

△　英驻日大使爱理鹗发表英日同盟终结的声明，26日内田亦作同样声明。

12月18日　　徐世昌令准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特任颜惠庆暂行代理国务总理，颜惠庆表示只代理一周为限。

△　徐世昌公布《侨务局组织条例》，以郭则沄为总裁。

△　下午6时，多伦驻军五营因索饷哗变，持枪抢掠后满载回营。次日破晓复欲出行抢，当经镇守使李荣殿极力劝告，允速筹饷，始暂告平息。

△　中国留日学生假东京青年会开全体大会，誓死力争“鲁案”。广东学生郑苍生演说时，就演说席铺案之白布，断指血书：“护我主权，保我圣地，头可断，血可流，此心不可移。此心不移。大中华民国万岁！”会后在东京游行示威，并到驻日使馆质问外交实情。

△　天津召开市民大会，60余团体10万余人参加，公推李实忱为主席。大会议决反对华盛顿会议之会外交涉、取消“二十一条”、无条件收回山东权利、满蒙领土完整四项要求，并为此电知华盛顿会议国民代表团，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　北京公立各小学因经费积欠三月，经集议向学务局请求发薪，迄无确实答复，至是日已无法支撑，遂全体联名发表宣言，提前放假。

12月19日　　孙中山下令自1922年1月16日起停征海关、常关及邮电等附加赈捐。

△　曹锟抵北京，次日入府见徐世昌，面商内阁问题，对梁士诒组阁不加反对。

△　梁士诒见徐世昌，允组阁。

△　广东省议会通过省宪法草案，并将草案交省署另组宪法研究会研究。

△　华盛顿会议两湖协进会在汉口六渡桥开湖北国民外交大会，五万余人与会，通过反对四国协约、取消“二十一条”要求，会后举行盛大游行示威。

△　新银行团拉门德发表宣言，否认银团希图管理中国财政之说；并谓银团之责任，除保证供给之款仅允中国政府建设用途外，其余力避担负任何责任。

12月20日　徐世昌宴请曹锟、张作霖，商讨内阁事宜。

△　北京各团体外交联合会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外交大会，2000余人与会，推王玉圃为主席，园内四处张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府会议，消息紧迫。同胞速起，共谋救国”之警语。大会表示坚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并散发《中华国民答复日本国民书》、《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宣言》等传单。

△　华盛顿中日“鲁案”直接交涉，经过17次谈判，是日因胶济路问题意见分歧，中止谈判。

△　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在广州开幕，全省有45个县的美术协会参加。展出的绘画、雕刻、刺绣展品共1860件，其中以梅县、普宁、香山、兴宁四县为最，每县有一百二三十件之多。此外省内外个人或团体送来的绘画、刺绣各1000余件，雕刻500余件。

12月21日　驻京英公使艾斯敦访颜惠庆，询苏俄代表巴伊开斯在外交上之地位。颜惠庆告以巴伊开斯在外交上并无正式地位，其来京系为磋商交还库伦之手续，并讨论东省铁路问题。

△　北京政府教育部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通电全国声明北京政府摧残教育之罪，并上呈府、院全体辞职及索还欠薪。

12月22日　　段祺瑞派徐树铮抵粤。孙中山电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为代表，与徐商洽共同打击直系之军事计划。

△　孙中山在桂林召开国事会议，议决有关北伐问题。

△　蒋介石奉孙中山电召自奉化赴桂林，是日抵广州。

△　刘湘派代表张梓芳与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在宜昌签订《川鄂联防草约》，约定各守边境会同剿匪，川盐销鄂收入现款由两省平均分配。

△　留法勤工俭学生又一批被迫回国，是日抵沪，共29人，内有女生向警予。

△　上海《民国日报》调查北京各机关欠薪情况：参谋部22个月，蒙藏院七个月，教育部本部七个月，各校两个半月，海军部六个月，平政院六个月，经济调查局五个月，陆军部本部五个月，咨议差遣12个月，总统府四个月，国务院三个月，财政部三个月，内务部三个月，农商部三个月，审计院三个月，司法部三个月，大理院三个月，航空署三个月，警察厅官吏两个月，交通部一个月，京汉路局一个月。

12月23日　　孙中山在桂林会见经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进行多次商谈。马林叙述十月革命的情况，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要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深表赞同。

△　孙中山特任蒋作宾、吕超、孔庚、石青阳、陈少白为大本营参议，严鸣德为大本营咨议。同日，任命粤军第七独立旅旅长吴忠信兼任大本营宪兵司令。

△　广州排字印刷工人罢工，要求加薪五成，是日各报自行休

刊。旋经陈炯明调解，报界允加薪四成。27日，各报照常出版，惟印刷店未开业。

△　旅京第一届国会议员发表宣言，主张完成省宪，促进自治。旋卢永祥、赵恒惕、刘湘、刘成勋等先后复电赞成。

△　北京政府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秘书长刁作谦赴古巴任驻古巴公使，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尹鹤龄为代理秘书长。

△　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等九人为董事。

12月24日　徐世昌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

△　徐世昌令增设驻巴拿马公使，派刁作谦兼任。

△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反对北京政府加征田赋及“鲁案”中日直接交涉。

△　日本政府决定中止胶济铁路谈判，于是中日两国华盛顿谈判休会。

12月25日　徐世昌任命梁士诒内阁各部总长：颜惠庆为外交总长，高凌霨为内务总长，张弧为财政总长，鲍贵卿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未到任以前由董康署理），黄炎培为教育总长（未到任以前由齐耀珊兼署），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同日，徐世昌令准颜惠庆、齐耀珊、高凌霨、蔡成勋、李鼎新、董康、范源濂、王迺斌、张志潭分别辞去靳阁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总长职。

△　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为反对华盛顿会议发起工界示威运动，是日在长沙湖南教育会前坪举行，与会工人团体二十几个、工人数千

名。会议主席黄爱，总指挥庞人铨。首由黄爱作报告，讲述华盛顿会议由来和工界反对华盛顿会议理由以及工人应有的觉悟。随后通过致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代表电。会后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至日本及美国领事馆时，工人高呼："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资本！""劳工万岁！"

12月27日　　梁士诒召集内阁会议，研究财政问题。梁言财政支绌，半缘兵费之负担，半缘机关人员之浮费，需裁员。张弧首告财政部当首先提倡。是夜，张弧招集二三参事，审查全部人员名单，决定将税务征收检查处、德华银行清理处、德奥债务清算处、财政金融讨论会、全国所得税处、清理档案处、编纂处等七个机关裁撤，裁汰冗员400余人。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鲁案"由出席华盛顿会议三代表在华盛顿赓续办理。

△　梁士诒与张作霖在北京签订《交通银行借款合同》，奉天向交通银行贷款400万元，作为交行钞票的兑现基金，利息一分五厘，以交行官股作抵，并允由奉天派一人监察业务。

△　徐世昌特任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奉日本国政府训令，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关于华盛顿会议"鲁案"交涉之劝告，要求北京政府勿坚持无条件收回山东之意见。

△　陈树藩所部被直军第七师吴新田击败，退往广元，依附川军。

12月28日　　梁士诒会见外报记者，称新内阁外交方针及对内政策，均仍靳内阁之旧。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借庆贺梁士诒新内阁成立访梁，密谈胶

济铁路事。同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电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代表，告以“本日小幡谒内阁切询胶路办法，梁揆（按：即梁士诒）答以定借日款自办”。

△　朱培德部滇军在桂林加入国民党，以示决心北伐，决不回滇。

△　北京八校校长及京师学务局局长赴国务院谒梁士诒。法专校长王家驹首即声明辞职，并将辞职呈交与梁士诒；次请补发积欠两个半月。梁士诒极力慰留，并表示正竭力设法，在阳历年内当筹发一个月以资维持，至明年1月起，当设法按月照发。

12月29日　　梁士诒宴国内银行界人士，谈财政及借款问题，无结果。

△　滇军总司令顾品珍电孙中山，告以“各路动员已准备完竣，准予下月初旬次第开拔北伐”。

12月30日　　广州政府大理院发布通缉徐世昌、梁士诒命令，谓：“梁士诒为帝制罪魁，前经通缉，久已匿迹销声。乃近复敢在北京受徐世昌之命，组织国务院。查徐世昌与梁士诒均属从前袁世凯叛国称帝之谋臣，兹复沆瀣一气，公相号召，叛乱民国，罪证确凿，自应严拿治罪，以彰国法。”

12月31日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再访梁士诒询胶济路办法，梁士诒答将借日款自办，其一切细目由华盛顿会议商定。北京政府外交部又将此内容训令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代表。施、顾、王迫于当时形势，决定不照训令仍照前政策进行。

△　全国各界联合会宣布徐世昌四大罪，指出：“徐世昌为民治之障碍，早已电请新政府申罪致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　曹锟离京回保定，旋张作霖亦离京回奉。

△　北京政府狂借内外债，所欠债额，至是月止，为15.8885亿元。以四亿人计，每人已平均负担四元之债务。就中长期外债10.4669亿元，短期外债1032万元，内国公债2.6322亿元，所欠内国各银行、银号、公司短期借款8999万元，欠各处经费、所发库券4443万元。而所入各款惟盐余为可恃，盐余除去各项开支、外债利息及公债担保金外，月余仅约300万元。但短期外债与内国银行短期借款及垫款，总数已达2.345亿元。此种短期借款，利息轻者八厘，重者1.8分，平均以1.5分计，已月需347万余元。盐余付息，已不足47万元。

是月　孙中山为《黄花岗烈士事略》撰序，指出此次北伐，责任比十年前倍重，因此应本诸先烈的牺牲精神艰苦奋斗。

△　孙中山为澳洲美利滨中国国民党分部建筑物落成及恳亲会写训词，指出："作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如半途而中止，必养痈而贻患。……非俟澄清中原，我革命党人决无图卸仔肩之时。"

△　驻京美公使舒尔曼到顺承王府拜会张作霖，旋张作霖到东交民巷美国公使馆回拜。同时到日本公使馆、英国公使馆、法国公使馆访各国公使。当张作霖访英驻京公使艾斯敦时，艾斯敦即提出：贵经略使入京，一手改组内阁，不免有"武人干政"的名声；贵国政府正要裁兵，贵经略使却极力招兵，不合民心，而且奉省军队在京畿一带驻扎，名声很不好。

△　各地军阀借种烟以筹饷敛财，热绥两区较为严重。热河自1917年姜桂题任都统即令民间种烟，而以今年为尤甚。计今年一年间所得，已不下500余万元。此种种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均各有份地，地之多寡以位置大小定之。兵士则从中渔利，略有分润。烟税约分三等，一等14元一亩，二等12元一亩，三等10元一亩。收税方法，单据上不书明烟税而系写因烟被罚款若干。绥远都统蔡成勋任内以兵饷缺乏为辞，令种洋烟，河套南北、包头东西以及

武川、河口一带比比皆是，烟税所得亦不下数百万。

△　法商汇源银行成立，以经营有价证券投资为主要业务，设上海。

是年　　孙中山决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取消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并于1922年1月1日在桂林大本营举行升旗典礼。

△　据北京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非正式之户籍调查，北京及23个省区（缺蒙古、绥远、西藏、台湾）总计人口4.36094953亿人。

△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与比利时商业公司签订比金1201.6万法郎借款合同，作为订购客车60辆之用。

△　荣宗敬、荣德生在无锡集股创办申新纺织公司第三厂，是年工厂落成开工，有纱锭一万多枚，布机数百台。后连续扩展，至1937年已有纱锭七万枚，布机1478台，日产20支纱175件，12磅细布3000匹。时为无锡规模最大的纺织厂。

△　潮州商人陈玉亭等在上海创办伟通纺织公司，资本120万元，纱锭1.5万枚。1931年2月，陈以投机失败，公司宣告清理停工。同年11月，陈与永安纺织公司合资重开，改称伟通合记股份有限公司。1933年陈将所占半数股份也让给永安纺织公司，遂改为永安纺织公司第五厂。

△　穆杼斋、穆藕初等在上海创办恒大纱厂，资本50万元，纱锭一万枚。1928年由陈子馨、荣宗敬等租办，改名恒大隆记纱厂。1930年由陈子馨等收买，改称恒大新记纱厂。

△　冬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石器、骨器、陶器多种，距今6000年以前，是为“仰韶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三卷
(1922—1924)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三卷

(1922—1924)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1922年（民国十一年）
1923年（民国十二年）
1924年（民国十三年）
返回总目录

1922年（民国十一年）

1月

1月1日　　中国国民党澳洲美利滨分部党所落成，召开恳亲大会，孙中山特颁颂词。略谓：“美利滨分部成立后，同志益自策励，努力前进，建兹宏宇，蔚然大观；诸同志任事之忠且勇，矢志之远且大，方兴正未艾也。”

△　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令：对于直皖战争后所通缉之皖系要人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六人，“据参谋总长张怀芝等呈请，姑准免予通缉讯办，以示宽大”。曲同丰交直鲁豫巡阅使曹锟随时察看，其余五人交参谋部、陆军部随时调取察看。

△　徐世昌令饬地方官民推行地方自治。

△　湘督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令全省大庆祝三日。同日，该省议会选举事务所暨法制编纂会成立。

△　天津五万余人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在意、法、英各租界游行。武汉、西安等地群众游行讲演，开展救国运动。

1月2日　　孙中山在梧州任命陈白（即陈少白）为中央银行监督。7日又任命梁长海为行长。

△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离京返奉，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齐耀珊、察哈尔都统张景惠送至天津。

△　直系靳云鹗第八混成旅全部自鄂省撤防，准备赴豫。5日，吴佩孚派参谋长赴保定与曹锟磋商，调曹锳五十二旅守卫辉，王承斌四十六旅守新城。豫、直二省重要车站均派得力军队扼守。

△　北京大学、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美术专门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校教职员，是日及3日连续会议，决定催索欠薪及经费，并提出分期发给办法，分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交通总长叶恭绰、教育部次长陈垣，声明如10日前不发清欠费，决不开课。4日，陈垣答复八校校长，允10日前发去年11月、12月两月教育费39万元。

△　在华盛顿之中国国民代表20余人赴中国代表团，抗议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下午，国民代表团总部召开露天大会，并游行示威。

△　北京政府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与远东共和国代表阿格辽夫开始谈判通商事宜。俄方提出：一、中东路归中俄合办；二、中俄两国即日通商；三、赔偿远东政府维持库伦秩序之代价。中国提出：一、远东政府须保证外蒙不再发生骚乱；二、归还前清咸丰十年割让之六十四屯及三角洲土地；三、赔偿俄国革命以来中国商人所受之损失。

△　香港华商银行设支行于纽约，此为中国人首次在美国设立银行。

1月3日　徐世昌任命薛之珩为京师警察厅总监。

△　蒋介石奉孙中山电召，偕戴季陶自广州启程赴桂林，皖系代表徐树铮同行。

1月4日　广州政府国务会议议决通缉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

△　孙中山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上演讲，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新思想者即公共心”；“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何谓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是也”。“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

△　徐世昌令：东省铁路公司督办宋小濂免职，特派王迺　　斌接任。

△　中日代表继续在华盛顿就胶济路问题进行会外谈判。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训令参加华盛顿会议之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与日方代表谈判借日款赎路问题。因消息泄露，施等慑于国内舆论压力，声明不遵梁阁训令，仍依前案进行谈判。是日开第十八次会议，5日、6日又连续举行第十九、第二十次会议。日方坚主借日款赎路，并提出聘日本人为车务总管及会计主任；中国代表提出两种赎路付款方案，日方代表均不同意。因双方相持不下，中国代表拟请美国代表许士、英国代表贝尔福调停，日方反对，遂再次休会。

△　上海国民外交大会召开代表大会，并发出通电，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解决山东问题，反对四国协定；并表示：在相当期间，以上三项如不能解决，将设法抵制日本，并否认北京政府。

△　北京政府派唐在复赴日内瓦列席1月10日召开之国际联盟会议。

△　北京平民大学成立，林长民为董事长，张一麐为校长。

1月5日　　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致电美国总统哈定，抗议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支持日本，干涉中国。

△　吴佩孚通电反对梁士诒欲借日款赎回胶济路，斥梁“勾援结

党，卖国媚外”。直系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齐燮元、陈光远等亦先后通电响应。7日，梁士诒发出倒填日期（5日）之通电，否认借日款事。自是日，围绕梁士诒内阁去留问题，直、奉两系军阀间展开所谓“电战”。

△　唐继尧通电宣布：暂在柳州设总司令部，并就总司令职。同日，滇省议会暨各团体电请孙中山制止唐回滇。

△　华盛顿会议远东问题总委员会讨论中国所提关税案，议决要旨为：一、华盛顿会议闭会后四个月内，在上海开会修正税则，发表后两个月以内，按新税则切实值百征五，满四年后再修正，此后每七年修正一次；二、中外会商废除厘金后，关税可值百征一二·五；三、普通货增收值百征二·五附税，奢侈品增收值百征五附税。同日，撤退驻华外军案，议决由北京外交团与中国委员三人组成一特别委员会，先行调查。同时，华会英、美、法、日四国裁军委员会特议决劝告中国厉行裁兵，并于本日将决议案觉书送达北京政府。

△　徐世昌令：叶恭绰开去劝办实业专使职务，特派曹汝霖继任。

1月6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呈准裁撤财政金融讨论会及全国所得税处。

△　北洋驻沪舰队因欠饷已将一年，是日派舰艇八艘开赴扬州十二圩监截盐税，并由蒋拯、杜锡珪、杨敬修通电，声明此系不得已，暂将两淮盐税截留充饷。17日，驻京公使团为此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18日，英、法、日三使又正式通告北京政府，英海军司令并派炮舰开往扬州监视。21日，梁士诒内阁议定，以后海军军饷按月由盐署拨发17万元，并电劝海军速归原防。26日，外交使团再次照会外交部质问此事，谓：“海军行动，实牵动善后借款合同，如政府不能速将海军退出，各国当派舰实行保护盐税。”2月1日，北京政府财政

部允拨20万元发给海军充饷，所欠其余30万元由苏督齐燮元担任筹拨，经各舰队司令同意，将各舰队调离十二圩。

1月7日　　张作霖致电徐世昌为梁士诒辩护，并指斥吴佩孚“不问是非，辄加攻击”。

△　梁士诒通电自辩，谓吴佩孚5日通电均与事实相违，并对外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

△　广州政府驻美国代表马素急电广州政府报告：北京政府代表接梁士诒密电，谓已直接与日使小幡酉吉商妥借日款办法。

△　出席华盛顿会议之中国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告国内各公团关于华会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情况后，是日上海各界集会并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反对向日借款赎路和起用曹汝霖、陆宗舆。同日，天津商会等47团体亦为此事举行集会。

△　日本代表德川自华盛顿启程归国，中日胶济路问题会谈中止。

△　徐世昌任命高凌霨督办北京市政。

△　北京交通银行通告无限制兑现，以平息挤兑风潮。

△　华城银行开幕。该行由中国、挪威及丹麦三国商人合办，资本1000万元。1926年停业。

1月8日　　孙中山任命顾品珍为云南讨贼军总司令，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

△　徐世昌令：《中俄条约》暨《陆路通商章程》已届第四次10年期满，现俄国正式政府尚未成立，无从提议改订新约，自本年4月1日起应即毋庸继续履行，嗣后俄商由俄国运来货物及在中国运出各货

应完进出口税项，均照现行海关进出口税则完纳。

△　吴佩孚再次通电，斥梁士诒“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盗卖伎俩”。同日，张作霖致电徐世昌，请以布告为梁辩护。

△　浙督卢永祥致电北京政府，请宣布胶济铁路案，“以释群疑”。

△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致电徐世昌，报告上海对山东问题，民气激昂，请速令驻美代表坚持原案，“以定人心”。

△　上海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借日款赎路，起用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及举办9500万元盐余借款。同日，美国旧金山华侨20余团体举行游行并致电华盛顿会议和中国代表，反对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时评《讨伐徐世昌就是救国》。

1月9日　　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表《宣布徐世昌、梁士诒罪状通告》。谓：“徐为洪宪枢臣，靡恶不作，近更令梁为伪国务总理，同时令代表在华盛顿向日本代表秘密商妥鲁案问题，急谋向日借款。梁本帝制罪魁，民国五年曾明令通缉，徐竟使秉伪政。”并下令通缉徐、梁，号召“共诛危害民国者”，即日由广州政府用万急电通电中外。

△　孙中山为统一广西航政，下令取消梧州等地护商团。

△　上海国民外交大会开紧急会议，议决否认北京政府，主张暂由广州政府代行职权，并于13日通电华盛顿会议和各国政府、各国驻华公使。

△　华盛顿会议英、美、法、日四国组成之裁兵委员会以中国陆

军现已达130余万之多，电劝中国厉行裁兵。北京外交部通电各省巡阅使、督军及师旅长等注意华会裁兵委员会的意见。

△　吴佩孚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交通部用日本技师、日本电料敷设沪宁汉长途电话。次日，叶恭绰通电声明沪宁汉长途电话事乃民国八年国会所定，非本人经手。

△　吴佩孚密电岳阳防守军总指挥张福来，令其迅速返岳，将前敌各军竭力整顿，听命待发。张接电后专车返岳。15日，驻岳四十七旅由汉口乘车开赴洛阳。同日，驻岳直军旅长陈嘉谟、团长陈德麟均奉命到武昌商讨军事。

△　山东各界代表通电列举鲁督田中玉罪状五条，要求北京政府罢免。

1月10日　　吴佩孚据余日章、蒋梦麟电称“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一事，通电全国，指出：“查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凿。”并谓：“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当共弃之。”

△　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询问有无在京与日使开议事。12日，外交部复电声言“无此事实”。

△　上海学生会、江西华盛顿会议后援会通电，声讨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主张“罢斥梁士诒，以谢国人”。

△　京奉路解往北京政府交通部之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四十、第四十一批款共42万元皆为奉军扣留。

△　广州小学教员因要求加薪未遂，向该省教育当局提出总辞职。

△　北京国立八校，因11月、12月两月经费均已发出，是日同时

开学。

△　苏俄代表巴伊开斯赴北京政府外交部第一次与李垣、刘镜人等会商归还库伦、恰克图事宜。

△　沈鸿英部第二支队约一营人，在湖南平江城外哗变，抢劫商民，旋溃散，赵恒惕派宋鹤庚率部往剿。

1月上旬　　冯玉祥部与陈树藩部激战于陕南。冯玉祥分三路攻陈，陈节节退却。12日以后，川军与陈部会攻冯军，冯军退出南郑。

1月11日　　吴佩孚通电全国，迫梁士诒“自行辞职”，并声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同日，豫督赵倜、鲁督田中玉亦通电响应。

△　北京政府通电宣布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声称：一、胶济铁路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

△　中日代表经美代表许士斡旋，复就山东问题谈判，胶济铁路问题暂行搁置，先讨论他项问题。是日连续举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会议。议决胶济沿线日军于中国军警接防后六个月内撤尽，青岛日军于移交行政权后30日内撤尽。

△　中国工会上海总部、上海百老汇路商界联合会、中国学生会，通电声讨梁士诒。同日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新闸九路商界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亦通电讨梁。

△　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反对北京政府允借日款赎路，赦免安福系首领，起用曹汝霖。12日，留美学生亦发出反对梁士诒电。

△　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江苏自治期成会、旅沪湖北自治协会、留日学生救国团纷纷通电，讨伐徐世昌。

△　广州政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北伐方案。决定向赣、湘出发，李烈钧部为前锋，许崇智部为后队，李福林部集中韶州。

△　章嘉呼图克图活佛谒见徐世昌，陈述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近来极愿内属，北京政府若能助外蒙驱“俄党”，承认其信教自由及独立后之外债，可保“输诚来归”。

△　广西全省县自治联合会开成立大会，各公团均有代表到会，其中有邕宁青年社员男女20余人，手持白旗一面，上书“发挥自决精神，回复广西人格”。省长马君武讲话，提出“注意人才、经济两端”。

△　北京政府决定派王克敏赴法国交涉庚子退款用途。

1月12日　香港中国海员工人因要求加薪遭英国资本家拒绝，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罢工人数共约1500人。所有香港开往广东内地轮船及到港之英、荷、法、日、美各国轮船华工均一致行动。香港英国当局极为恐慌，16日宣布戒严令，17日又出一通告，内中提出船主允诺之条件，以期缓和罢工，均告失败。一星期内罢工人数激增至6500人，沿海航务几全停顿。罢工海员自13日起，分批抵广州，至19日已达5000余人，广州工人热情接待，组织游行以示声援，并在省总工会倡议下，全省27万工人每人捐赠一日工资供罢工海员费用。27日，上海工人组成香港海员后援会。同日，香港运输工人举行罢工支援海员，罢工总人数超过三万。2月1日，香港当局用武力封闭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并逮捕工人数名。3月1日，香港全市工人（包括邮局职员、银行职员、仆役、厨司、轿夫等）举行总同盟罢工，人数达10余万。

△　北京国务院通电全国，宣布“鲁案”中关于胶济铁路事件“真相”：“（一）政府对胶济铁路案件，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此案始终由外交部电知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三）我代表来电，主张筹付现款，或发行国库券

赎回自办，未变初旨。（四）关于胶济路案，国务院并无径行致电三代表之事。（五）政府并无借日款事。（六）二十八日小幡公使来贺任时，谈及胶济路事，总理只答以我辈方针，在筹集款项赎回自办……”

△　吴佩孚通电，揭露梁士诒上台十日之罪行，指出：“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　鄂督萧耀南在督署召集高级军官紧急会议，曹锟、吴佩孚派代表参加，商驱梁及湘、鄂直军北上问题。同日，萧通电攻击梁士诒向日本抵借沪宁汉长途电话款，声明“对此种外债不予以承认”。

△　中日代表就山东问题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胶济路延长线，日方允烟潍路由中国民间自筑，济顺、高徐线由国际银行团修筑。同日及13日，续开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次会议，中方允将胶州德国归还之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14日，开第二十六次会议，日方允将该租借地有关文件交付中国，但拒绝放弃在山东之土地及经济特殊利益。16日，开第二十七次会议，议决双方派代表组成委员会，订定归还胶州租借地细则。

1月13日　孙中山致电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北伐先遣军司令范石生等，以北伐军各路动员已经完竣，现在时机迫促，希即赶紧拔队前进。

△　北京银行公会召集与盐余有债权关系之各银行号（包括31家银行）组成“盐余借款联合团”，并决定自是日起不再承受北京政府以盐余作抵之借款，并请求北京政府不得再以盐余向中外各银行号及无论何处抵借款项，或充作担保，另决定与财政部商筹按月拨还盐余旧欠。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宣布“绝不借日债赎路”。

△　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等七团体通电，痛斥徐世昌身兼“帝制、复辟、内乱、卖国、僭窃”五罪，理应推倒。

△　湖南长沙第一纱厂2000余工人，因向厂方（华实公司）要求发给年终奖金及双薪遭拒绝，举行罢工。赵恒惕于14日派兵镇压，并捆打杀伤工人数名。16日，赵恒惕逮捕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17日凌晨惨杀黄、庞于长沙浏阳门外，并封闭湖南劳工会及《劳工周刊》。

1月14日　北京外交联合会推代表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依民意备款赎路。同日，驻华盛顿国民代表团通电力争收回胶济路。

△　北京政府交通部电促国民筹款赎路，主张“将该路归为民业，由人民筹款赎回，即由人民自行管理”，所需款项2700万元可悉行筹集商股，“如有不足，或另募内债，或添招商股，悉由银行公会等办理，政府可不经手”。

1月15日　吴佩孚致电梁士诒迫其迅速下野，惟措词较前通电稍缓和。同日，萧耀南、刘承恩、赵倜、张凤台亦电促梁士诒辞职。同日，徐世昌电曹锟，谓俟物色继任到，即免梁。17日，徐世昌按张作霖意，与曹、吴协商“去梁留阁”办法。19日，直系再次联电迫梁下野。20日，梁士诒谒见徐世昌，请退，旋于23日请假七天赴津。

△　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科学讨论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文化研究社诸团体，假宁波同乡会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大会，与会者500余人。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半月刊，在北京创刊。从第四期起改在上海继续出版，归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主办。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25期。

△　广东省议会通过省宪草案，全文凡15章135条。

1月16日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公布《大本营条例》，凡15条。《条例》规定："陆海军大元帅于战时执行最高统帅事务，设置大本营。"由"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大本营文官长，承大元帅之命，综理所主管各事宜"。

△　孙中山特任刘祖武代理云南省长。

△　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名义训令湖北盐务稽核所截留湖北全部盐税充军饷。20日，外国驻华使团决定直接干涉，英、日两使表示将调兵舰至武汉阻止截税。

△　顾品珍通电就北伐军滇军讨贼总司令职，以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宣布出师北伐。

△　华盛顿会议根据美国代表提议，议决重申中国"门户开放"原则，及中国铁路管理统一案。

△　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训令施、顾、王三全权代表坚持自行集款赎路，并将废除"二十一条"要求提交大会。

△　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王瑚通电提出赎路具体办法十一条。

1月17日　中日解决山东问题第二十八次会议，谈判矿山问题。18日，第二十九次会议，议决淄川、坊子、金岭镇三矿移归中国。同日，第三十次会议，议决：一、青烟、青沪间被德国侵占之海底电线归还中国；二、青岛、济南之日军撤退时，两处电台归还中国。

△　全国商教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之救国赎路集金会，是日开成立大会。

△　山东各界推代表赴京请愿，要求罢免梁士诒，并要求设赎路

筹款会。

△　川督刘湘通电响应赵恒惕关于反对北京政府实行每亩加赋四升之主张。24日、26日，滇刘祖武、金汉鼎，2月3日，黔督卢焘亦先后通电响应。

△　毅军军统姜桂题于北京病死。

1月18日　徐树铮自广州到桂林会晤孙中山。

△　北京政府司法部派员赴美调查监狱制度。

△　田中玉通电宣布山东全省担任赎路金300万元。

△　徐世昌令姜桂题着照陆军上将例从优议恤，并给治丧银一万元。派荫昌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

1月19日　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同李烈钧、许崇智、蒋介石等人会商北伐作战计划。

△　孙中山令改编援桂联军第四路司令谷正伦所部为中央直辖黔军，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　华盛顿会议远东总委员会通过两种在华铁路议案：一、英代表吉特士提案：由中国政府声明铁路对各国平等相待，有特别权利之各国亦为同样声明；二、美代表许士提案：实行由中国统一管理之铁路制度。

△　英使奉其本国训令赴外交部催促召开交涉西藏问题会议。是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备文答复英使，提出会议讨论内容：一、否认以西姆拉会议为口实；二、照民国五年中国提案进行讨论；三、西藏为中国之完全领土，界址按自然四至，不得更动；四、西藏之外交应由

中央主持；五、中国对西藏之交通、内政有自由之主权；六、亚东、江孜两地关税款，应由中国派员监视接收；七、藏边乱事，应由中国自行派员肃清；八、中国应在西藏驻兵设警；九、驻藏之中国大员有管辖全藏内政之权；十、西藏得派代表会同中英两国之代表讨论解决藏案之方法。

△　吴佩孚派专使黄申芗抵粤晤陈炯明。

△　北京外交部、交通部会商收回外国在华建立之邮局办法，决先设收回客邮委员会。

△　吴佩孚领衔，联合苏、赣、鄂、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齐燮元、王瑚、陈光远、杨庆鋆、萧耀南、刘承恩、田中玉、赵倜、张凤台、冯玉祥、刘镇华致电徐世昌，要求罢斥梁士诒。并谓："万不获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同日，又联电外交使团，声明："凡梁士诒内阁任内所有对外私订条约，概不承认有效。"

△　徐世昌接吴佩孚等罢斥梁士诒电后，亲批"交院"二字。梁士诒乃持该电谒见徐世昌面请辞职。并谓："第今日之局，个人进退本极裕如，若总统持正，稍抑武人跋扈之风，国脉尚不至斲丧而尽，士诒所以徘徊者以此。"

1月20日　徐世昌令：特任财政总长张弧兼币制局督办；刁作谦兼驻巴拿马特命全权公使。

△　华盛顿会议英国代表贝尔福对胶济路问题提出调停方案："中国政府发行债券三千万，十五年赎回该路，但在五年后中国如有现款，可以提前赎回。在未赎回时间内，仿照津浦等路的成规，用中国人为局长，用日本人为工程师、会计师。"22日，美代表许士同贝尔福逼迫中国代表接受调停方案，被中国代表拒绝。25日，许士请美总统哈定亲自出面施加压力。29日，三代表得北京政府电授权签字。

△　华盛顿会议远东总委员会通过恩德华代表关税分委员会所提中国军备缩减案，劝告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裁减各地陆军及军费。中国代表未投票。

△　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北京各界联合会等40余团体，联合发出通电，宣布梁士诒“亲日卖国”等十大罪状。

1月21日　唐继尧在柳州设滇军总司令部，图回滇。是日，宣布委任李友勋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

△　华盛顿会议远东委员会通过以下议案：一、到会诸国，凡有与中国所结条约，及各该国彼此所结关于中国之条约及约书者，均须交出，存入大会秘书处，以便查考。凡各国嗣后结立同样之条约时，签字后60天以内，亦须通知到会诸国；二、凡到会诸国与中国政府订立有开矿、筑路等各种公共事业合同，以及各种借款契约，均须于短期内交存秘书处；三、凡中国政府与他国所订各种合同及契约有上述之性质者，均交秘书处存案；四、凡与中国有约诸国而不列席此会议者，亦得承认以上议案。美国政府担任通知之责。

△　孙中山派张秋白出席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是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开幕式。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团员共30余人。孙中山派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列宁会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邓培、张秋白，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张秋白带去了孙中山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对列宁和苏俄政府表示敬意。

1月22日　孙中山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出师问题。西南各省及陈炯明、唐继尧均派代表参加，皖系徐树铮亦与会。通过北

伐联军分三路出兵决议，即：一、第一路李烈钧限二月初旬集中桂林，中旬向全州出发。第二路李明扬现已集中全州，应令分为两队，一由全州进驻零陵、黄沙河，一由双凤闸直入永州。第三路黄大伟拟随大本营于2月底向衡州出发。二、滇、黔各军应分路由黔边、桂边入湘，其出发期尽于3月1日以前在衡、永会合。三、川军应请刘（湘）、但（懋辛）仍由鄂西沿施鹤直下，期与湘南各军遥相策应。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特种盐余库券1400万元（亦名“一四库券”）。偿还日期为民国十二年9月，利率月息一分五厘，以盐税剩余为担保。其用途，以1100万元还各银行债，300万元作军政费。

△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工人八九百人，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

△　中华书局铅印部工人200余人，因年关迫近，要求加薪，遭资方拒绝，举行罢工。

△　天津国民赎路集金会开成立大会，各界代表到会约百人，议定集金章程11条。

△　张謇通电建议江苏赎路筹款办法。

1月23日　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成立，蔡元培、王家驹任会长。25日开会确定：总务谭熙鸿、郑锦，宣传祝椿年、李大钊，交际顾兆麟、马寅初、王家驹。

△　中日山东问题第三十一次会议，议决胶州湾盐田由中国付偿价收回，该处产盐酌量输送日本。

△　中俄通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刘镜人，苏俄代表阿格辽夫。中国提出十二款条件，其要旨为：赤塔政府应切实保护华民；中东铁路应归中国管理；库伦、恰克图无条件交还中国；前允六十四屯交还中国，应即履行；中俄蒙三方协约应即废除。苏俄政府将所派

来华代表阿格辽夫改为常驻北京代表。

1月24日　徐世昌令：特设侨务局，办理一切侨务。

△　中日山东问题第三十二次会议，日方允将胶济路电线随胶济路产一并交还，同时撤退沿线日邮。同日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中方对日政府及私人强占中国土地及华人财产要求赔偿问题，日方主张按“正当”法律手续办理，反对会议作任何处决，遂将双方态度记录备案。复议决：铁路之外其他未讨论问题，概由中日联合委员会解决，另定中日各三人为起草委员。

△　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各省，宣称华盛顿会议就中国关税问题所作决议，乃“成功”之举。

△　叶恭绰以贺旧岁为名赴奉天，为梁士诒进行活动。奉系表示华盛顿会未散，内阁不宜更易，促梁回任，并谓：“若有人敢反对，奉天可以流血为后盾。”

△　苏督齐燮元通电反对盐余库券。25日，冯玉祥、刘镇华亦通电反对。

1月25日　徐世昌令：国务总理梁士诒请假照准，特任颜惠庆暂兼代理国务总理。

△　徐世昌公布《民事简易程序暂行条例》，凡22条；《刑事简易程序暂行条例》，凡12条。

△　浙督卢永祥、省长沈金鉴对内阁问题通电表示：“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倘以‘为国锄奸’为名，反以为巧宦造机会，则我国人良知不昧，终必抵死力争。”主张继任内阁须实行：一、不借外债；二、财政公开。27日，何丰林通电支持。

△　直系召开保定会议，布置军事：直、鲁、豫三省直军均驻扎

于京汉路沿线，并于黄河南北两岸增兵驻守。

1月26日　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照会美国，要求承认在广州之中华民国政府。

△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国内外银行团签订9600万元盐余公债。双方规定以关税实行值百抽五所增加之收入为公债基金，分七年还清，利息八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此项公债主要用以偿还内债7000余万元，外债2600余万元。

△　美国总统哈定在白宫召见华盛顿会议之中、日代表，婉劝双方接受英、美调停，解决山东问题。

1月27日　徐世昌授予参加华盛顿会议之顾、施、王三代表以山东问题签字画押之权。

△　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

1月28日　唐继尧出发回滇。因黔军各旅扼守长安，唐军受阻，乃改道向西，分为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滇省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在庆远等地遇桂军残部，展开夺路夺枪之大混战。第一军军长李友勋战死，唐任命该军前敌司令龙云代理军长。

1月30日　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公布梁士诒办理山东问题交涉经过情形，并称："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若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愿钧座采纳卢督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愿钧座饬纪整纲，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

△　中日山东问题第三十四次会议，双方同意英国代表贝尔福于20日所提之调停方案。

1月31日　中日山东问题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次会议，议定将来组织两联合委员会，分别处理胶济路问题及其他问题；并议定通知许士、贝尔福牒文；山东全案条约、副约及附属了解事项。中国通知书对华盛顿会议“能予中日两国解决此重要国际问题之良机”，特别表示感谢。山东问题会议至此闭会。

1月下旬　驻广州英领事及英银行团代表访晤陈炯明，表示愿投资接通粤汉、广九两路，并请将黄埔开港。

是月　《俄国共产党党纲》由希曼（张西曼）翻译，广州（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至1927年3月，共再版六次。

△　《学衡》杂志于北京创刊，梅光迪、吴宓、刘伯明等编辑，每月一册，自第六十一期起改为每两月一册。以“昌明国学，融化新知”为宗旨。共出79期。

△　驻新疆英领事非法颁行英民国籍注册新例，诱迫华民入英籍。

2月

2月1日　张作霖再次致电徐世昌，“请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究竟有无卖国，昭示天下，以明真相”。同日，卢永祥亦致电徐世昌：“请将梁士诒经办鲁案情形，详为宣布。”

△　中国银行运往天津之盐税银14.8万两、银元万枚，被曹锟军队截留。吴佩孚借口军饷欠缺，强行提取汉口中国银行现款150万元、交通银行130万元。3日，英、法、日三国公使致牒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各省截留盐税。

△　湖南劳工会旅沪会员52人联名致函赵恒惕，提出：一、立即恢复湖南劳工会，并许《劳工周刊》继续出版；二、立即释放被捕工

人；三、替被杀害之黄爱、庞人铨铸铜像；四、抚恤黄、庞家属，并发表致湖南全省工人书、致全国工人书，为黄、庞呼冤。12日，该会开会议决：一、于2月17日出《劳工周刊黄、庞被杀纪念特刊号》；二、起草宣言，并预备成立湖南劳工会上海分会；三、添募劳工会分会会员；四、募捐。不久，汉口会员亦发行刊物一种，取名《血祭》。1日至6日，唐山职工会、湖南旅沪自治联合策进会、湘西旅沪自治策进会、中华全国电器工界联合会先后通电责赵恒惕残杀劳工。

△　南洋华侨3654人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承认广州政府为合法政府，并请孙中山克日下令北伐。同日，古巴中华总会总理雷溢潮等六万侨民通电声讨徐世昌“甘心卖国”。

△　华盛顿会议限制军备会议第五次全体大会通过处理在中国之外国邮局、撤退在中国之外国军队、统一中国铁路、裁减中国军队、中国及中国之现有成约、外国在中国无线电台移交中国等有关中国之六项议决案。

△　北京政府交通部通电催集款赎胶济铁路。

△　华盛顿华侨总商会通电，主张由商会、学生会发起组织“赎路救亡会”，进行募款。

△　吴佩孚派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抵京，是日谒徐世昌，并访步军统领署及毅军。

△　天津国民财政会、天津商会等团体揭露张弧发行1400万元盐余国库券内幕。3日，该会派代表10人往见张弧提出质问。

2月2日　孙中山委徐谦为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会长。

△　徐世昌派王怀庆会办毅军事宜。

△　英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谓：“京奉路关系外债，嗣

后不得运送军队及军用品，致碍收入，且为保护安宁起见三十里内，不得驻兵。”

△　日商上海第二纱厂1400多工人，因反对厂主拒绝工人家属进厂送饭，举行罢工，取得胜利。11日起，该厂工人为反对厂主拒绝增加工资，又举行罢工七天。

△　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27团体代表召开会议，商讨筹款赎路三方案：一、纯由国民自动筹款赎路；二、以增加关税之一部分为赎路之用；三、提存铁路余款一部分为赎路之用。

△　驻防山东之陆军第五师师长郑士琦等致电北京政府，请明令宣布胶济路永为民办。同日，赣督陈光远通电宣布赣省认募200万元赎路，并要求确定办法。皖督张文生亦通电认筹100万元。

△　华盛顿会议第三十次全体委员会开会，讨论关于中国要求废除“二十一条”问题。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声称，“二十一条”系中日两国之正式条约，反对会议“重新研究及审查”，仅表示日本同意放弃满蒙筑路借款、聘请顾问、教官等项的优先权，撤回1915年签约时日本政府对第五项之保留。次日，第三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即末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声明：中国对于“二十一条”始终视为事实上之压迫，不承认有法律效力，必须废止全约。美国代表声明：注重门户开放，要求利益均沾。关于“二十一条”之讨论以无结果告终，仅将三国声明载入会议记录。

△　华盛顿会议远东总委员会通过中东铁路议案：一、中东路管理之改善经由适当外交途径办理；二、各国承认中国代管中东路，但保留课责之权（即保留以后必须课中国对于中东铁路之外人股东债票执持者及债权者是否履行义务责任之权）。

△　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拒绝中东路共管。

△　浙江省长沈金鉴通电将全省75县划为施行自治区域，筹备县自治大会。

2月3日　　孙中山下令北伐，命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出湖南，直攻武汉。

△　湖南长沙第一纱厂在赵恒惕派兵监护下开工。工人被开除六七百人。并宣布自3月1日起，工人每日劳动工时加至16小时，将减少技工，加用童工。

2月4日　　华盛顿会议中日两国代表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主要内容为：一、胶州租界归还中国，开为商埠；二、德国所占之公产交还中国，日本所占有者低价收回；三、日军于六个月内撤退；四、青岛海关交还中国；五、胶济路由中国赎回，由日人任车务长，中日各一人任会计长；六、德国在山东之矿产，交中日合办之公司；七、青烟、青沪之海底电线交还中国；八、青岛盐场由中国赎回；九、青岛、济南之电台由中国赎回。

△　孙中山任命陈德春为中央直辖第四军军长兼粤东八属各军总司令。

△　张作霖召开吉林、黑龙江、绥远、热河代表会议，张景惠由京赴奉。

△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曹锟电请明令通缉陈树藩案，议决交陆军部核办。

△　哈尔滨市民为反对中东铁路共管，支持赎回胶济路，在总商会开大会。5日，举行第一次大示威运动，沿街演说，散发传单。参加游行者逾万人。10日，又举行第二次示威运动，参加者逾三万人。

△　北京学界开赎路集金会，议决分电京内外劝募，当场认股者

2000余人。

△　天津总商会发起“中华国民收路自办集金会”，是日开成立大会。

△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互助社、马克思经济学会举行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李卜克内西纪念会，林伯渠演说。会后工人自动举行示威，沿途散发《李卜克内西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传单。

2月5日　　孙中山任命吴介璋为北伐军兵站站长，赶设北伐兵站。

△　北京教育界召开教育独立运动筹备会，由蔡元培等向北京政府呈请将德国退回之庚子赔款3900余万元项内之400万元现金拨作八校教育基金。京师教育会、私立中央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亦要求援照国立学校例，每月拨款，以资补助。

2月6日　　华盛顿会议闭幕。参加会议之中、美、英、日、法、比、意、荷、葡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所谓《九国公约》），共九章。该约贯彻美国所主张“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之原则。同日，签订九国关于中国关税条约，规定中国关税由中国实收五厘，但须先行组织委员会裁减内地厘金；拒绝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中国代表所提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警两案，会议决定由各国代表另组委员会到中国“调查现状”后再议。中国代表所提收回租界、租借地案，美国代表许士以主席资格反对讨论。会议还通过了镇压远东人民斗争的《四国公约》和列强争夺海上霸权、规定海军力量比例的《五国公约》。《民国日报》于3月4日全文发表会议有关文件。

△　孙中山电促滇北伐军范石生克日在曲靖集中，第一路于本月16日以前，一律开拔至师宗、罗平一带集中；第二路于20日以前一律在沾益集中，第三路从速改编整顿，准备在宜良集中。

△　齐燮元、刘湘、刘成勋、卢焘等通电揭露梁士诒以整理盐务为名，与稽核所洋员秘密结约，允废引岸。

△　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召开会议，讨论：一、经费问题，二、基金问题，三、学制问题。有人提议中学文实分科，六年毕业，直入大学。

△　湖南城陵矶直军第十四混成旅二团一营两连士兵哗变。将该地厘金局局长刘雷戮毙，局款抢掠一空。

2月7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致孙中山函，略谓："收到了阁下的信并通过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国民党代表与国民党建立了直接的关系，这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同他讨论了所有的关于将来我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并谓："列宁同志曾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阁下的信，并热烈地同情并关注着阁下的活动。"

△　孙中山复电全国各界联合会，告以将届期督师北伐。略谓："文自广州出发，以赴戎机，至于桂林，搜讨军实，今已部署初定，将届师期矣。"并谓："文忠于主义三十余年，本革命之精神，断战胜乎一切。此次督师北伐，亦即吾人根本改造之道耳。"

△　孙中山复电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号召国民推翻徐世昌卖国政权。略谓："徐世昌以满清余孽，洪宪遗臣，为复辟之罪魁，实叛国之祸首。"指出，此次北伐，"特为四万万人讨卖国之贼，故不得已而用兵"。

△　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交通部次长郑洪年提案：一、从法国退回赔款中或增收关税中，各指定百分之几，作交通大学基金；二、交大开办费恢复原来所规定之106.34万元；三、交通大学经常费由58.3468万元又追加5.4万元。

△　徐世昌又派人赴保定，劝曹锟转劝吴佩孚及长江各督，“勿再发无谓之通电”，静候奉直协商。

△　上海大同银行正式开幕，总董事陶希泉，经理徐季凤。

△　陇海铁路工人曾于去年11月17日因反对洋员总管若里裁人减薪，举行罢工十天。在工人坚持斗争下，当局被迫承认全部条件，工人始复工。但事后该路督办始终未践诺言。工人复于是日递警告书，同时发表宣言：一、宣布洋总管若里罪状；二、向各路乞援；三、2月10日举行总罢工。该路督办不得已，始批准：一、准若里开去本职；二、所有要求优待条件，核准施行。

△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参加者有王若飞、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蔡畅等。大会通过“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目标。次日又到中国驻法公使馆游行。

2月8日　　张作霖在奉天召集军事会议，凡营长以上均列席。会议决定：各军整理军备，演习野战；军需处添备军粮、柴草，发放军饷；各军听候动员令下即分路出发。

△　上海香港后援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援助香港罢工海员方法，除捐款外，并电勉香港海员坚持到底。陇海铁路工会总会致函上海香港海员后援会，表示同情和支持海员罢工并捐款援助。湖北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湖北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等，均先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

2月9日　　广州国务会议议决，否认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议决案之签定。10日晨，外交总长伍廷芳电驻美代表马素，命其转告大会：胶济路德人所筑，战后德国在中国之一切财产应为中国所有；北京代表无代表中国资格，其所签字，正式政府完全否认。

△　广州国务会议通过大理院长徐谦请禁蓄婢案。24日，孙中山下严禁蓄婢令。

△　中国工会上海总部向南北两政府发出通电，要求罢斥赵恒惕，为黄爱、庞人铨鸣冤。

△　北京政府财政部自决定发行“九六公债”后，迭经长江各督反对，是日财政部特通电各省声明原委。同时，北京银行公会亦通电宣布“九六公债”内容及与财政部所订合同。

△　冯玉祥致电张弧，指责“九六公债”乃“巧取民财，以求苟且图生之计，是自杀”，劝张“万不宜独自为政，作此秘密之行动，以欺国家，以虐人民。请速打消此议，以免惹国民之反对”。

△　唐继尧进抵桂省泗城，12日入滇。顾品珍出兵抵御。金汉鼎于17日发表宣言，迎唐回滇。

2月10日　孙中山决定以一部分军队，出入于湘省衡山及宝庆。12日，北伐军前锋部队进抵湘境。改“攻击军”为“讨贼军”，又改“反对吴佩孚”口号为“讨伐徐世昌”。

△　徐世昌令：派蔡廷幹为修改通商进口税则委员会主任。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因各方要求财政公开，特将就任以来该部所有收支款项开列清单，呈国务院发交《政府公报》颁布。

△　梁士诒假满，仍续假10日。

△　林白水等所办《新社会报》，因登载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奉直形势险恶，及盐余公债黑幕等时局消息，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止发行，没收印章，并将经理移送法庭。

2月11日　徐世昌公布《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条例》，凡14条

（即《九六公债条例》），定额9600万元。

△　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会议，营长以上均列席。曹锟派王承斌出关调和张、吴矛盾，北京政府派赵尔巽调停，洛阳方面亦派车庆云出关调停，当日会毕，王返保定复命。

△　旅美华侨发表宣言，痛斥徐世昌控制下之北京政府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丧权辱国”、“借债卖国”以及“摧残教育”、“纵兵殃民”种种罪恶，要求广州政府和爱国者出兵讨伐徐世昌、梁士诒，实行救国大运动，组织统一政府。

2月12日　孙中山在桂林接见奉系张作霖代表李梦庚，洽商共同讨伐直系事宜。

△　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通电归附孙中山，取消广西自治军名目，改编所部为北伐军第一、第二两师，分驻黔、桂边界。

△　“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于北京开成立会。20日发表教育独立宣言书，内容包括：一、教育经费应急谋独立，脱离自治藩篱，明定预算，指拨款项，由教育界直接取用，共同保管，政府无取用之权；二、教育基金应急谋指定；三、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

△　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参加华会代表施、顾、王三人7日来电，报告关于废除“二十一条”讨论情况。日本在2日会上反对废除“二十一条”。13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及各法团在省议会召集会议，决定电请北京政府外交部急电施、顾、王三代表向各国宣布国民否认“二十一条”之宣言，并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

2月13日　广州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以香港当局因海员罢工，竟禁米、煤出口，近于报复，有伤两国感情，特致函驻穗英领事提出抗议。同日，英国政府电令香港总督速解决海员罢工事。

△　章太炎、谭延闿、柏文蔚等闻北伐军出湘南，是日联名上书

孙中山，建议改变战略进取江西。并谓：“南北相对，我弱彼强；乘衅为上，出赣为中，出湘为下。”

△　赣督陈光远急电北京政府，称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饬令各军分路出发。计第一路以李烈钧为总司令，统率滇、黔、赣各军进攻赣南，兼取鄂东，其前队已抵永州；第二路以许崇智为总司令，统率本部粤军联合湘军直袭武汉，其前队已抵宝庆、宁乡一带，情势万急，乞示方略。

△　吴佩孚通电指责“九六公债”“名为减息，实则竭源”。21日，再次通电反对。

△　鄂烟酒署黄永熙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吴佩孚训令筹款，兹将全省烟酒税作抵向某国银行借到60万元，解交吴。吴又令鄂省货物一概估本抽税。19日，吴又电萧耀南，勒索200万元军费。

2月14日　　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大本营文官长，孔庚为军法处长，陈少白为建设处长，林云陔为度支处长。

△　赵恒惕告孙中山代表：“如欲北伐，请勿假道湘省。”赵并派张其锽与吴佩孚接洽，吴允助湘饷弹。

△　北京政府交通部通电，重申赎胶济路“归为民业，由国民自办”，“业经本部今日提出国务会议议决照办”。同日，齐燮元、王瑚通电，续陈赎路九事。

△　浙督卢永祥通电主张财政公开，将一切内债、外债数目用途以及契约文件，分门别类登载公报；各省选派财政委员二人，组织全民财政委员会；募债增税，须交该会议决，至国会成立为止。22日至28日，张作霖、李厚基、赵倜、张凤台、孙传芳、田中玉、冯玉祥、刘镇华先后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

2月15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电各省，报告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

问题议决之内容。

△　北京政府财政部列表公布该部历次指定盐余抵借内外短期借款，自民国五年9月9日至民国十年12月29日止，共借款145起，共计银元1.04余亿元，实欠9600余万元。舆情大哗。

△　吴佩孚截留河东盐税21万元，财政部派员交涉，吴复称系扣抵直军欠饷。

△　国民监督财政会在北京成立。大会决定：发表宣言，反对盐余公债；调查盐余公债之内幕；警告银行公会；清查财政当局拍卖中国银行官股。大会并推举吴鼎昌等10余人为代表，赴财政部、银行公会交涉一切。

△　四国银行及美银团代表访问张弧，对于“九六公债”仅以三分之一整理外债，表示不满，主张俟将来以关余为担保，发行四亿元公债，张答以时机未成熟。同日，银行公会在上海总商会宴请汇丰银行爱狄思，爱演说谓：“国际银行准备与华人银行合力共筹中国财政困难之解决法。……中国已表明外人切实监督之不可少，因中国迄未有监督公款之满意办法。”

△　胡鄂公等编辑的《今日》月刊，在北京创刊。

2月16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仿照各国遗产税制发布《遗产税税则大纲》，通令各省照办。

△　国会议员吕志伊等20人通电全国，反对赎回山东铁路。大意谓：日本与中国，同为对德宣战之国家，然山东为中国之领土，且于胶济铁路敷设契约中，明白规定不许第三国之干涉，何有对日本占领之铁路与海关盐田等进行赔偿之理？“此丧权辱国之条约，今乃视为合意之条约，宛如曩日对于二十一条欣然表示同意，结果相同”。

2月1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取消华盛顿会议筹备处，另组华盛顿

会议善后会，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　北京政府特派董康为偿还内外短债委员会会长。22日，该会在银行公会开成立大会，通过九条章程，并规定该会职权为：一、清算欠款数目；二、监视偿还手续。

△　北京政府司法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华盛顿会议决议派员来华调查现状，通令各省改良司法、监狱。

△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致电徐世昌，请颁布明令：一、定胶济路为民业铁路，政府不得改为国有；二、所集赎路款项，专为赎回胶济路之用，不准别用；三、所集资金，作为商股，将来所得款利照公司条例，受法律之保障。

△　山东利津口上下游于是日先后漫溢，淹没三县一百数十村，成灾颇巨。

2月18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全体职员开索薪大会。21日、22日又续开紧急大会，决定派代表64人向财政部坐索薪金，如目的不达，即实行总辞职。

△　陕西陈树藩军队退入川省大宁，刘湘特电邓锡侯欢迎。

△　唐继尧因泗城方面不得手，是日抵百色。

△　北京政府接参加华盛顿会议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1月28日电，报告关于华会修改中国关税之决议案共八条。

2月19日　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会议，议决：一、决定设经略副使，4月中在奉天召蒙古王公开蒙务大会；二、定六区实行联防，许兰洲为总司令，准下月初大举清乡；三、决扩充奉天兵工厂，并于吉、黑添设分厂。

△　吴佩孚电请北京政府财政部将盐余支配公布；要求用“九六公债”发军饷，反对以盐余抵债。曹锟两次通电阻止，吴电复曹，指责曹锐与张弧分肥。22日，萧耀南亦通电反对“九六公债”。

△　山西督军阎锡山制定村葬办法五条，经省议会通过，作为省法令。

△　阿尔泰边境俄人要求通商，并提出13条办法，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员与议。

2月20日　　孙中山布告声讨徐世昌卖国罪行，指出：“华盛顿会议徐世昌所派伪代表与日本协定条件，违叛民意，丧失权利，甘为国民公敌。……若再姑息，势必益恣诡谋，偕亡无日。讨贼救国，愿与国民奋起图之。”

△　北京政府司法部为预防幼年犯罪或再犯起见，特设感化学校，并公布感化学校暂行章程六条。

△　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发行特种库券条例，定额为1400万银元，无折扣，发行期自是日至下年9月20日止，以盐余为担保。

△　广西省长马君武电告广州政府，唐继尧已过百色，顾品珍离滇北伐，滇事由金汉鼎调解。

△　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广州联络。

△　北京政府财政部设所得税委员会。

△　驻京英使艾斯敦根据《善后借款合同》第十七条，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九六公债条例》。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至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胶济路日军分期撤退，请派警填防。另据日本《时事新报》载称，日本军队在青岛及

山东胶济铁路沿线总数为3000名，外有宪兵约500名，驻屯青岛之军队约为四分之一。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鲁督田中玉，通知胶济沿线日军即日撤退，请速挑选干练警察或军队接防。

2月21日　　蒋介石在桂林谒见孙中山，陈述联奉击直之军事主张。

△　马君武以“逞兵抗命，扰乱秩序”罪名，通缉林俊廷。

△　留日学生总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一、通电中外，否认徐世昌政府；二、促进联省自治，成立联省政府；三、暂时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　北京国民财政大会通电反对“九六公债”。电文提出反对理由：一、违反约法，蔑视人民；二、此次公债为完全还清旧债之用，然此项旧债之用途，尚未审查，不得再举债弥缝；三、银行借款，皆与财政当局勾结舞弊，紊乱金融，并借此肥私，黑幕重重；四、国家财政应依预算之规定，预算收入之不足，再行举债，现在政府既未公布预算，绝无举债之理由；五、此项公债，扣至七年还清之后，本利计算共1.3亿余元，国民负担过巨；六、以一次发行之公债，便断绝七年以内进行要政之财源。

△　徐世昌命令：本月28日祀孔，派高凌霨“恭代行礼”。

△　驻华英、法、日三国公使电令驻汉军舰，遇必要时得派兵上陆，防止截留盐税，以保债权。

△　北京政府陆军部航空署向费克斯公司借款30万英镑，年息八厘，期限九年，以盐余为担保。其中五万镑为京兰航空线建筑费，19万镑为购机及材料费用，余为航空署经费。

2月22日　　吴佩孚电鄂督萧耀南，谓北京政局因安福派暗中之活动，情形一变，此时实力之充实殊为重要，望速筹军费200万元。萧

奉令，即筹款10万元，发给停泊武昌之各军舰为军费。

△　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要求发给归附直系之沈鸿英部军费20万元。

△　豫督赵倜、省长张凤台通电反对北京政府发行“九六公债”。24日，田中玉亦通电指责“九六公债”系“自欺欺人”，“名实不符”。

2月23日　直系召开洛阳会议，甘、陕、鄂、赣、苏、鲁、豫、直八省代表一致主张“对奉坚持到底”；对广州政府希其缓和北伐，不得已时，驻鄂直军拨一部分归赵恒惕指挥，以防御孙中山。同日，驻武昌二十五师炮队奉令准备赴岳。直军张福来部于25日移驻湘阴，并设司令部于城内。26日，赵恒惕派唐义彬至湘阴晤张福来，声明湘军“决守中立”。

△　朱培德、谷正伦等滇、黔军官通电，宣布唐继尧罪状，吁请孙中山下令讨伐。同日，孙中山电滇、黔、桂三省北伐军制止唐继尧回滇，痛斥唐“违抗命令，不顾大局”；要求各军迅速“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　徐世昌令：胶济铁路应决由人民筹款赎回，即定为民有铁路，永属民业，各地筹款于指定银行专款存储，不得腾挪提用。

△　广州女界联合会召集会议，到者200余人，讨论女子职业解放问题，并向广州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茶室酒楼资本家辞退女工之举。

2月24日　广州政府公布23日经国务会议通过之工会条例，凡20条。

△　上海国民外交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反对华盛顿会议所订《九国公约》。指出“机会均等主义”，“无异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共同侵略之场”。“各国当以平等待中国，取消势力范围及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撤退驻华军警，允许关税自

定。各国既不解除种种束缚，而独要求全中国开放门户，则中国人民之工商业，将反为各国所排斥”。宣言声明，否认北京政府及其代表签字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华民国之议决案。

△　修正税则委员会在上海总商会开成立大会。

2月25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宣告，北京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缔结山东问题之条约，系违反约法，未经国会议决，概不发生效力。

△　徐世昌为梁士诒受各方攻击事通电自责。谓：任梁去梁乃本人主张，“责无旁贷”，并声明“内阁虽屡有更迭，而对外政策始终一致”，无何变化。28日，上海《民国日报》为此发表时评《徐世昌的救命符》，指出徐之通电“想以太师的招牌，去调解一张一吴之怒，从文字内容上看，简直不知所云”；“把用梁引为己任，再把华会吹得震天价响，再把霉烂不堪的伪统一招牌抬出……至于他的总和，或者就是‘救命符’”。

△　徐世昌特任莫荣新为腾威将军。

△　吴佩孚通电，历数张弧发行“九六公债”弊窦，请“立即罢黜，交付法庭，以谢天下”。

△　吴佩孚派员从上海兵工厂提取自动制造枪弹机，计144件，运至巩县兵工厂应用。该机系民国二年袁世凯向美国定购。

△　吴佩孚急电萧耀南，商讨七省联合武力对付张作霖问题。萧接电后即召集军事会议，并令财政厅由关税项下拨40万元送往洛阳。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内国公债局总理梁士诒，呈准将整理金融公债万元票掉换成千元票。

△　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上书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将铁路附加

赈款改用为教育经费。

△　厦门当局与英领交涉海后滩案。双方同意：一、函件送存之日起，厦埠公民宽放抵制英货，并电各埠；二、租界大牌先行撤去；三、两个月内将短墙推却；四、海后滩管理权及飞桥办理，应待谈判后解决。3月8日，英领表示，同意太古行飞桥暂时停工，以待协议。厦门当局以英领既表示和平，遂即通告各团体取消抵制英货。

△　西藏地方部队在川边与北京政府所派之“驻军”冲突，“驻军”因久戍康藏，连年作战，伤亡颇众，且缺乏饷械，无力抵抗，康定已被围。

△　法国军事参议官霞飞元帅应北京政府邀请来华访问，是日到京，26日徐世昌设午宴招待。3月4日，霞飞赴天津专访段祺瑞。

2月26日　孙中山在桂林南教场检阅北伐军粤军第七独立旅等。

△　山东济南开胶济铁路筹款大会，表决会章，推靳云鹏、吴佩孚、田中玉等为名誉会长。

△　唐继尧率部回滇，是日进占滇边府广南。

2月27日　广东北伐军在桂林大本营举行誓师典礼。孙中山发表演说，表示：“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

△　旅沪四川自治期成会致电孙中山，列举唐继尧“假北伐之名，行侵略之诡计”罪行，要求讨伐。

△　张作霖电复徐世昌，请宣布梁士诒被攻击真相，“如梁无他，则宜复职，以全中央威信”。

△　四川军军长刘成勋致书孙中山，建议“联合西南诸将帅，秣马

厉兵”，“外戢戎心，内消隐患”，本人则“遥听号令”。

2月28日　吴佩孚下令取缔陇海路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

△　中东路问题经北京政府与苏俄、远东两政府代表屡次交涉之结果，协定大纲四项：一、中东铁路归中国政府管理，由中国政府特设管理机关办理；二、俄人所有该路股份由中国政府酌定时价于向后五年内收回之；三、该路未完全收回以前，苏俄、远东两政府之代表得派委员参与该路路政；四、中东铁路所负各国政府及外商之债，由中国政府完全负担，并由中国、苏俄、远东三国政府共同组织清算局整理之。

是月　吴佩孚以直鲁豫副使名义通电奉军，以“曩时川、湘有战事，托贵军暂代防务，今直军已敷分布”为理由，要求将京兆、直隶境内奉军移出关外或张家口。

△　英国外交大臣关于西藏问题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一、西藏外交完全自主；二、英国得修筑藏印铁路；三、赦免西藏独立运动诸人，不究其罪；四、西藏内政，完全自主。北京政府向英国外交部声明：第一项应改为外交由中国主持，第二项藏印铁路应由中英合办；第三项对于赦免西藏独立人犯可以照准，惟西藏亦须将从前拘禁之华员、华商一律释放；第四项应改为西藏内政得以自治，但须受驻藏大员之监督。

△　北京政府交通部通告，属于铁路财产之土地、房屋、轨道、车辆、船舶材料及证券等，悉为国家财产，由本部掌管，不得擅押或盗卖，如私自抵押或盗卖者，不论何种机关，一概无效。

△　由余天休主编之《社会学杂志》，于上海发刊。

△　天津裕大纺织有限公司成立，资本300万元。

△　湘省第一纺织厂成立，资本280万元。

3月

3月1日　　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鲍贵卿以祝寿为名赴奉，活动组阁问题。张作霖对阁潮表示不过问。

△　冯玉祥因陈树藩军队在陕南、鄂北纷扰，是日与萧耀南商定联防办法四条。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筹办《退款兴学委员会规程》，凡九条，规定该会专司筹划退还庚子赔款接洽事宜，并调查国内教育状况，决定退款用途及分配标准等。

△　北京政府司法部电令各省区恢复初级法庭，限7月1日一律成立。

3月2日　徐世昌下令授予施肇基、顾维钧一等大绶嘉禾章。

△　北京国务会议决定郑州开为商埠，任张凤台兼郑州商埠督办。

△　赵恒惕派代表江隽到湖北商联防事宜，湘军宋鹤庚、鲁涤平部已移往湘西。

△　接收蒙古事宜代表李垣以劳农政府代表巴伊开斯复函声明："劳农政府实无丝毫侵略蒙古之意思，并极盼北京政府与蒙人速行解决中蒙相互关系。"呈请北京国务院，据此声明，派唐努乌梁海参赞黄成垿及乌里雅苏台副参赞陈问策二人赴蒙调查，速行解决蒙事。

3月3日　徐世昌特任王正廷为鲁案善后督办，田中玉为会办。

△　湖南桂阳徐紫隆集党数千在常宁举事，占领新田。12日，进攻蓝山县。

△　北京教育博物馆筹办处与北京大学附设之教育博物馆合并为筹设教育博物馆委员会，拟订协同约定办法四条，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进行。

3月4日　香港发生“沙田惨案”。自1日起，香港饮食、运输、印刷、电讯等各行业工人，为支援海员罢工，相继罢工。3日，香港英总督下令戒严，不许居民出境、外人入境，渡船亦禁开驶。是日，香港工人2000余人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港附近的沙田，英国军警向工人开枪射击，死三人，伤数百人。

△　北京学界集股赎路会在美术学校开全体委员会，到会者计30余人。推蒋梦麟为北方筹款主任，张公权为收款主任。

3月5日　外国银行团警告北京政府，截留盐税如不加以制止，不但无盐余，且将有盐亏。

3月6日　署司法总长董康呈请徐世昌，以其主持之“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发现财政部弊端甚多，应即提交法院按条例惩办；又审计院审计之账簿类隔年案件，无从揭发伪证，呈请组织特别审查委员会，专司稽核逐日出入现款，倘查有不符，应依法办理。

△　董康向北京政府呈请提审财政总长张弧。同日财政总长张弧闻风，即刻提出辞呈，避走天津。

△　湖南督军赵垣惕电萧耀南，请将前线直军酌量撤退，如直军由汨罗向岳州退驻30里，湘军亦由白水向长沙退驻30里，以示双方退让。萧复电拒绝。

3月7日　月初，徐世昌曾派蒋雁行赴保定、洛阳，协商组阁问题。是日，蒋返京向徐世昌报告，吴佩孚为组阁问题提出三项条件：一、停止发行“九六公债”二、免梁士诒内阁职；三、同意鲍贵卿组阁。同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不反对鲍组阁，但以去张弧为条

件。

△　吴佩孚派张福来到湘阴布置防务妥后，于月初返岳州，派四十七旅杨清臣部驻湘阴。是日，张福来移军长沙城外，赵恒惕无表示。12日，萧耀南又奉吴令赴岳与赵恒惕面商湘局。13日，吴佩孚电令张福来守湘阴，勿入长沙，免蹈张敬尧覆辙。

△　毅军副都统白承颐在京被人戕杀。按：姜桂题病死前曾有遗书举白代毅军司令。

3月8日　香港海员罢工经过56天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6日，香港英政府被迫取消封闭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之命令，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资，抚恤死难者。是日，广州各工团约10万人集会东校场欢送海员，散会后举行大游行，沿途陆续有工团加入，游行人数达30余万。

△　北京中小学教员，派代表500余人赴北京国务院请愿，要求发给拖欠之三个月薪金，国务院拒绝接见。代表又赴教育部见陈垣，陈无法解决。请愿代表住宿教育部不散，要求三日内将积欠薪金及教育经费拨发。14日，各校校长向京师学务局提出总辞职。至18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始被迫将积欠发清。20日，教职员宣布复课。

△　曹锐又以祝寿为名，专车赴奉活动组阁问题。

3月9日　徐世昌通电催办第三届国会选举。略谓："本大总统任职已逾三年，所余仅一年有半矣。国会选举，倘能及时赶办，为时虽促，尚可不误总统选举之期……本大总统惟希望依照法律手续，得有继任之人，以维大局。"故"此次国会选举，乃全国所托命者，应如何统筹迅举，克日观成之处，端赖群谋，早绥国本，本大总统跂予望之"。

△　北京政府内务部公布《管理医师暂行规则》，凡28条；《管

理医士暂行规则》，凡27条。

△ “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声称：“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良善走狗，目的在吸取中国人民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

△ 江西省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因欠薪未发，决定实行罢课。10日，省立九校罢课，南昌学生联合会发出传单，定11日开紧急大会讨论。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以代理领袖公使名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质问直隶、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加征盐斤附税事。当经北京政府电令各该省查照。

△ 驻海参崴领事范其光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海参崴政府抗议我国停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请示办法。

3月10日 吴佩孚通电声明：一、反对梁士诒，乃反对其媚外，非反对其组阁；二、服从曹锟、张作霖；三、内阁失败，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是国家元气，内阁股肱。股肱有疾，进药石以救，讵有自戕元气之理；五、奉直实无畛域之见。

△ 川、滇、黔、湘、陕五省在重庆开第一次联合会，到会有川军总司令刘湘、云南代表徐虚舟、贵州代表李仲公、湖南代表刘问之、李湘皋、陕西代表张实生、高翰音等，定名为川、滇、黔、湘、陕联合会议。会议讨论问题为：一、五省既实行自治，以后应如何促成联省自治实现；二、五省联防事宜，及对大局应如何主张；三、援鄂援陕应如何进行。

△　董康以查债委员会名义，请地方检察厅传潘复、张弧、张仁普、张训钦、钮传善、陈威等到案。11日，吴佩孚致董康电，颂董为“包文正复生”。

3月11日　孙中山发表宣言，谓：一、北伐不能因奉直有代表而不积极进行，正式政府仍必执行为国讨贼之权；二、奉直两方如实心为国，宜服从正式政府命令，移兵为政府前驱，不得专顾个人军权地盘；三、望奉直为废去军阀盘据各省地盘之首倡；四、旧国会应解决中国纷乱政局，使中国成一永久宪法上之国家政府，巩固国基；五、以国家为重者为国友，争私人权力者为国仇。西南决不苟且结合，致蹈从前覆辙。

△　天津118个团体联合通电，支持董康审查财政舞弊案，并请董将审查之结果，详细通告全国。

△　驻京远东共和国代表阿格辽夫要求中国撤退海兰泡驻军。

3月12日　徐世昌以财政总长张弧因病请辞，令给假十日俾资调理。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钟世铭着暂代理部务。

△　徐世昌令刘镇华加陆军上将衔；派米振标为驻近畿毅军司令，常德盛为驻豫皖毅军司令。

△　皖督张文生致电北京政府，声称省长许世英不肯筹款，新安武军惟有自行筹饷。本月下旬，张又致电北京国务院，宣布截留全省烟、酒、印花等税款充饷。

△　安徽省长许世英以政潮无法解决，呈请辞职。

3月13日　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布告湘鄂地方长官，宣布北伐军行将动员自桂出发，取道长岳，以便会师武汉，直抵燕京，凡所经县境地方官厅，对于兵站所需夫役、品物等项，务宜联合绅耆，协同妥办。

△　张弧电董康拒传。略谓：“闻总检察厅受非法结合之国民财政会捏控，出票传敝人到案，本人受任两月，经手收支各款，无一文私弊，检厅如欲见问，请以公缄寄天津鄙寓，自当逐款奉答”；声称：“倘不问情由，先行传拘，蹂躏人权，心存成见，则鄙人绝对不能服从。”

△　唐继尧军占领蒙自，并在阿迷附近将铁路毁坏，顾品珍军背腹受敌，乃以罗佩金为昆明留守，亲往前线督战。省城人心惶恐。

△　山东78名省议员联合致电北京政府，控鲁督田中玉强暴横施、借债营私、迫加附捐、侵权违法等罪行，要求迅予撤惩。

3月14日　广州国会召开非常会议，议决：一、暂行新刑律二百二十四条，侵害人民自由，应予废止；二、致电英国，抗议香港英国警察枪杀沙田华人事件。

△　孙中山任命金汉鼎代理云南省长。

△　曹锐由奉回津，以电话向徐世昌报告此次赴奉之情形，谓张作霖对于吴佩孚之“误会”“刻已谅解”。

△　英国派巴尔敦赴洛阳交涉截留盐税问题。吴佩孚决定：一、宜昌所扣之款原存大中银行，复转入中行汇京，同时政府酌拨款项交孙传芳；二、宜、汉增加附加盐税即电萧耀南暂勿实行，另行筹款；三、河东盐款将尾数解京过帐，由财政部补一支付单，令由协直饷项下扣出归还该款。

3月15日　国民财政大会通电揭发张弧、潘复勾结发行之“九六公债”营私舞弊，要求北京政府停止发行，已发行者不能认为有效，并希望全国人民拒绝收受此项公债。

△　湖南各公团联合通电，根据湖南省宪关于“省内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军队非经省议会议决及省政府允许，永远不得驻扎或通过

本省境内”之规定，要求驻湘直军一律撤回鄂境。

△　北京国务院通电宣称，目前当务之急为“迅谋统一”，“厉行裁兵”，“整顿财政”，“增加关税”。

△　北京军、政、教育等70余机关、学校，组织“京师军政教育各机关交涉盐余代表联席会”，推沈士远、李大钊等五人为章程起草员，力争盐余。

△　由全国商教联席会议所发起之国是会议，是日在上海举行开会式，并正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通电各省区省议会、省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银行公会、律师公会、教界联合会八团体速派代表来沪，举行正式大会。

△　美侨公会晚宴美公使许满于广州亚洲酒店，许满发表演说，认为华会结果于中国有利，望中国勿悲观，早图和平统一。广州政府伍廷芳外长演说，声明华会无我国正式政府代表出席，大为遗憾，美国只请非法政府派代表赴会，尤违反华人公意；并指出，西南渴望真和平统一，各国倘早承认，此希望必已实现，今不得已出兵求统一，各国当任其咎。

3月16日　北伐军进抵湘南边境。赵恒惕力阻北伐军过湘，策动湘各公团出面反对，并派代表赴桂林，吁请北伐军勿入湘境。

△　北伐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率部自邕宁向桂林进发，是晚抵梧州。

△　董康再次通电，表示决心彻查北京政府财政部积弊。

△　湖南省各学校教职员因省教育厅拒绝补发积欠六个月的教育经费，举行罢课。

△　关于交还威海卫之交涉，中英双方决定在伦敦英国外交部谈

判，北京政府外交部派顾维钧前往出席。

△　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从4月上旬起，撤回青岛守备军之一部，然后撤退山东铁路沿线日本军队之一部；至5月4日为止，将所有铁路沿线日军全部撤退完毕。

△　大英银行上海分行开幕。该行为大英轮船公司于1920年在伦敦设立之银行，其主要业务为汇兑、贴现、运输及旅行业务。

3月17日　北京政府外交、内务、财政、农商、交通五部共同规定《胶济铁路定为民有办法大纲》，凡14条，19日经徐世昌核准。主要内容为：胶济路干支各线及附属产业，由人民集股赎回，永为民有；各省区股款收齐后应即召集股东会，组织公司；一俟公司路款交清、全路赎回后，即由公司接管该路，归交通部监督。

△　在京第三届国会议员召开紧急会议，到50余人，议决分电各地议员，于10日内来京，筹备开正式大会。

3月18日　鲍贵卿由奉到津访曹锐，辞组阁，并致电徐世昌请续假养病，“另简贤能”。徐世昌与鲍电话，劝速回京。鲍于19日到京，20日入协和医院。21日，徐再派员劝鲍组阁。颜惠庆亦向徐表示决不再代阁，如徐仍相强，即赴汤山，不再回北京。

△　徐世昌令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王迺　斌现未就职，特派王景春署理。

△　孙传芳电告北京政府川军内讧日急，夔、巫方面川军纷向重庆撤退。

△　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由靳云鹏、张怀芝、吕海寰、赵尔巽出面（日本人操纵）组织之“鲁大公司”。该公司主要承办经营山东铁路沿线各矿。

3月19日　徐世昌派其弟徐世章赴洛阳，就鲍贵卿组阁事征询吴佩孚意见。吴答，只须去梁士诒、叶恭绰，取消“九六公债”，其余均不过问。

△　张作霖设奉军总司令部于落垡，自任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总司令，分三路部署：以津浦线为东路，京汉线为西路，永定河为中路。集兵力共10万人。并通电声称，率军入关，愿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

△　济南万余人在商埠公园集会，反对鲁督田中玉预征丁漕、河工附捐、盐斤加价。大会并向徐世昌、北京国务院、财政部等发出通电，要求罢免田中玉。

△　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300余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民国日报》编辑邵力子等在会上讲话。

3月20日　吴佩孚再次致电支持董康，略谓：“愿公以无偏无倚之精神，为法界树一新纪元。”

△　北京政府与德国修订之中德新约，是日在北京换文。

△　唐继尧率部占宜良，22日入昆明，金汉鼎逃。25日，唐军吴学显部突袭包围顾品珍总司令部，顾及将佐20余人阵亡。

△　苏俄新任远东共和国驻京代表团副团长鲍罗廷抵京。

3月21日　张作霖致电徐世昌，陈述收回库伦、恰克图之意见。主张要求苏俄将库伦、恰克图无条件交还，由奉、吉、黑东三省派遣军队接防。如俄代表不能容纳此要求，即驱逐俄兵于蒙古境外。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小幡酉吉，抗议吉林六道沟日警武装部队深夜侵入垦民村庄任意拘捕伤杀村民；并电驻日公使胡惟德向

日本政府抗议。

△　中日南浔铁路借款应付利息已逾三期未付，驻京日使竟要求将该路照约接管。当经北京政府交通部电陈光远即令该路公司清偿外债利息，并改良路政。

△　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被陈炯明派人暗杀，23日不治逝世。

3月22日　徐世昌令张作霖给予一等文虎章，刘式训给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　川督刘湘得孙中山援助，分三路进攻鄂西，北京政府国务院电吴佩孚筹防。

△　参加华盛顿会议之王宠惠、王正廷回国，是日同车到北京。

△　湖南各公团致电吴佩孚等直军首领，要求所有驻岳直军退出，以“完成湘省自治”。

△　外蒙政府派代表达伦噶尔向张作霖磋商投诚条件：一、投诚后不废活佛尊号；二、此次变乱，不咎既往；三、中央须有相当保护，以脱离俄人势力范围；四、与内蒙王公享同一待遇。张允电北京政府商议解决。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之八厘公债票内，发现重号300余万，又空白债票300余万，董康以此事与财政部人员皆有关系，特交检查厅审查。

△　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赣督陈光远均电董康，表示对于查办财政舞弊案，当尽力援助。

△　《民国日报》公布北京人口新调查，除四郊不计外，在大城

以内者，共计91.3万余人。其中各省人约占十分之四，旗人约占十分之三。

3月23日　鲁督田中玉向徐世昌提出辞职。

△　前桂督陆荣廷抵津，与段祺瑞密谈。

△　东北大风，京奉小工票车开至山海关，冻毙小工300余人。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第2956号通告，公布“任何人印刷，或发行任何报纸、传单或其他项印刷物件，内载公共消息新闻或任何批评按语，而不在印刷之前向工部局注册其姓名者，罚款三百元，或予其他刑罚”。

3月24日　孙中山令追赠邓铿为陆军上将，派徐绍桢致奠，给治丧费5000元，由广州政府陆军部会同粤军总司令部派员经理丧务，并着陆部从优拟议恤典。

△　广州外交部次长伍朝枢赴奉报聘事毕返粤，是日向政府报告赴奉会商南北统一问题。

△　徐世昌令任吴新田帮办陕西军务。

△　唐继尧率军进抵昆明，宣布自任云南善后督办。

△　中日委员在北京外交部就撤退胶济路沿线日军之办法，举行第一次会议。日本委员提出下列提案：一、关于日军撤退之日期；二、铁路沿线官有财产之处分；三、关于日军撤退以后保护居留日本人问题。27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28日下午，在外交部签字，青岛日军司令部发表撤兵顺序。

3月25日　徐世昌令：颜惠庆给予一等文虎章；太平洋会议筹备处顾问汪大燮勋章无可再晋，着颁给“荩略匡时”匾额一方，以彰勋

绩。

△　北京银行界30余人致电代理财政总长钟世铭，催发“九六公债”。

△　北京政府外交部呈准派驻瑞士公使汪荣宝为代表，补签上年日内瓦会议议决之禁止贩卖妇孺公约。

△　黔军将领袁祖铭通电宣布组织“定黔军”，并称已占领青溪、玉屏、镇远、铜仁等县。

3月26日　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计划，下令全军回师返粤，改道赣南北伐。

3月27日　唐继尧召开全滇善后会议，各高级军官暨各机关人员、省议会各法团代表出席，由唐提出：一、废除总司令名目；二、省长民选办法；三、实行清乡。会议议决请由唐氏暂维现状，俟省议会制定省宪后，再行逐步实施。

△　北京政府交通部所设“鲁案”善后交通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

3月28日　徐世昌公布《县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区域令》，该法自是年4月1日于江苏所属江宁等37县施行。

△　中日胶济铁路沿线撤兵协定，经中日两国委员会商议妥协，于是日午后签字，内容共11条。

△　张绍曾电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三使，提出解决国事二策：一、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二、各省共谋根本改造。

△　皖南镇守使马联甲因旧安武军欠饷数月未发，在芜湖宣布与皖督张文生、省长许世英脱离关系，所有皖南各县丁漕税收全数截留

充作军饷。

3月29日　张作霖召集吉林督军孙烈臣、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暨各旅团长等，在督署开重要会议，商决对直系出兵问题。

△　远东共和国驻京代表阿格辽夫奉令调回本国，新派白克勤接替。

3月3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美两使：要求洋商货物交由华商在内地出售，应以华商商品论，遇有损害，不能由洋商出面要求赔偿。

△　北京政府陆军部员司因薪俸无着，全体停止办公。

3月31日　李烈钧致电陈炯明，谓："本部已进兵汝城，迫近赣界，请发兵同时进攻。"陈接电后于当日下动员令，严催苏慎初、陈炯光、钟景棠等部在三日向连山、连县、韶关、梅岭等处开拔，定于八日开始进攻。

△　上海修改进口税则委员会在总商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为中国、英吉利、日本、比利时、巴西、丹麦、法兰西、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共13国代表，计37人。蔡廷幹主席致欢迎词，要求与会各国"应请准予切实值百抽五"。

△　张作霖电告北京政府参、陆两部，添派第二十七师入关，卫护近畿。

是月　徐世昌派员赴河北正定邀王士珍来京商时局。

△　包天笑编辑之《星期》（周刊）在上海创刊。

△　崇明大通纺织有限公司成立，资本96万两，锭数1.4万枚。

△ 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成立，资本100万元，锭数9600枚。

4月

4月1日 孙中山计划北伐军改道攻赣，兵分四路：任命陈炯明为攻赣总司令，李烈钧为攻赣副司令，分由大庾、临汝进兵；派许崇智为先遣军总指挥，宋鹤庚为后援总司令，由株萍、茶陵入赣。大本营移往衡州。电请赵恒惕，严防岳州直军下窜。

△ 湘省军界在衡阳开会，自排长以上大半参加，用无记名投票公决对于“南北之倾向”，结果赞成广州政府者145票，守中立不准南北军假道者47票，赞成北京政府者16票。

△ 广东工商界所组织之广东全省劳工尊重省币联合办事处，是日于广州广西会馆开成立大会，议决通用纸币，不得用“纸折”。会场内外遍插“尊重省币”、“严禁纸折”、“灭绝银蠹”、“一元以上概用纸币”等旗帜。

△ 北京政府农商部成立“鲁案”林矿委员会，以黄义兼委员长。

△ 桂省林俊廷军与粤军在龙州开战，粤军退出雒容城。

4月2日 旧国会（民国六年国会）议员连日集会，并发表宣言，主张：一、六年6月12日关于解散国会之命令无效；二、旧国会行使职权，继续召开制宪会议。

4月3日 黔军旅长袁祖铭率“定黔军”由湘入黔，击败卢焘军，占领贵阳，驱逐黔军总司令卢焘，迎接刘显世回黔。

△ 11省直系军界约500余人，托词祝贺吴佩孚生辰，云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计划。

△ 北京政府参谋部全体职员因欠薪日久，宣布停止办公，并呈

请徐世昌“弥补旧欠”，“限三日答复”。

△　徐世昌据陕西省长刘镇华电称，陕南连年灾祲，凤留、宁略、西镇、褒洋、镇岚、安平等25县，灾民数逾百万，令财政部迅拨款二万元交该省长遴委妥员散放。

4月4日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我国到会400多名代表，外国代表为40余国家之学生146人。讨论中国平民教育、加拿大农业与教育、瑞典学界与劳工、南非等问题。

4月5日　　徐世昌令兼署山东省长田中玉准免署职，特任韩国钧为山东省长，田中玉专任山东督军；免去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本职，特任熙彦为蒙藏院总裁；特任贡桑诺尔布为畅威将军；分别任命罗昌、任璜、周启濂、桂埴、史悠明为驻新加坡、伦敦、加拿大、北婆罗洲、巴拿马总领事。派夏诒霆为庆贺巴西举行百年独立纪念专使。

△　偿还内外短债委员会开会，由审查委员报告审查各债款情形，计共审查完竣41案。此次会议通过30余案，其中较重要者三案：一、将通惠银行之借款合同解除；二、不承认劝业银行之借款；三、中国银行垫付新疆协饷库券，尚在复查中。大会并决定由董康将审查经过情形及通过各案呈报徐世昌。

4月6日　　广州市金融业为抗议纸币跌价，是日起一律罢市。旋经广东省政府出面调停，发出金融业保护令，全市金融业始于11日恢复营业。

4月7日　　陆军总长张绍曾通电主张由国会自由行使职权；由各省共谋根本改造。并谓：吴佩孚推重曹锟、张作霖两帅，对于时局，并无成见。

△　湘军在衡州召开军事会议，议决：一、湘军拥护孙中山北

伐；二、举谭延闿为湘军北伐总司令；三、驱逐政学、研究两系人物；四、设委员会执掌湘军政。

4月8日　　徐世昌令准免颜惠庆兼代国务总理职，齐耀珊兼署教育总长职；特任周自齐署理国务总理并署理教育总长。

△　孙中山自桂林启程赴梧州，北伐军大本营自桂林迁粤，孙中山指令各军集中梧州待命。临行前，孙中山对桂林各界特派代表表示：一、个人忠于革命主义，此次北伐成败利钝不计，只知发展民族；二、讨敌既为力争人格，无论如何，有进无退。厥希各处充作后盾，俾捣黄龙；三、护法为西南公意，余必须贯彻到底，使北方亦依此旨恢复国会；四、至于将来施行自治，一俟推翻恶劣政府，自有全国人民办，余即辞职。

△　云南省议会推举唐继尧为云南省长。

△　中日撤兵委员会议决关于山东撤退日兵问题：一、输送巡警队之列车，于10日午由济南出发到张店，双方委员视察各站之配置状况；二、4月12日，中日两国委员视察无线电信所；三、4月13日、14日，两国委员交接。

4月9日　　奉军开始入关。自是日起每日运送六列车，每列车25节，每13节可装步兵一营，暂时集中军粮城。

△　吴佩孚在洛阳编成少年军一团。此团多系由10岁至15岁之军人子弟编成。

△　京汉铁路工人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召开第一次全路代表会议，筹备成立全路总工会，全路计有十四个工人俱乐部代表参加，会期三天。

△　北京大学召开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会。中外人士到者千余人。会上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表演说。

△　上海商业总联合会向各省商业、金融机关发出通电，反对由北京政府设“鲁案”理事会，要求立即组成国民自动之赎路总机关。

4月10日　徐世昌宴请各国公使，颜惠庆及阁员均作陪。徐世昌演说“世界和平与中国之关系”，并称中国“政潮已平息，希勿误会”。各公使允电告本国政府。

△　吴佩孚提取京汉路收入款项共328万元。北京政府交通部令局长赵继贤函吴，请停止提取。

△　吴佩孚部在顺德（邢台）扣车备用。张福来之二十四师驻涿县，第三师由宜昌北上。

△　吴佩孚电鄂督萧耀南，嘱对周自齐组阁“暂取旁观态度”。萧耀南秉承吴意旨致电徐世昌，谓旧交通系盘踞内阁“非国家之福”，请速组织“超然内阁”，以促成南北统一。

△　奉军暂编第七旅一团第一、第二两营共千余人，进驻津浦线良王庄一带。12日，运枪弹16铁闷车赴军粮城。此后，卫队旅开驻津浦线；驻廊房奉军，开赴三家店；驻小站奉军，开赴德州；第一、第五旅开赴塘沽、天津一带。

△　曹锟曾以个人名义向张作霖示意，愿在张与吴双方间调停。是日，张作霖电复曹锟，谓“解决时局，端赖你我二人提倡”，并拟通电稿，请曹会衔。该通电要点为：一、请元首颁令，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二、请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允许梁士诒、叶恭绰、张弧自动销假。张电并说明：“以上各节，曹（锐）省长来奉时大致商量妥当，请即断行。”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告，5月1日将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此次大会内容为：一、纪念五一劳动节；二、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三、讨论改良工人生活问题；四、讨论各代表

提案。

△　鲁、皖、苏、豫四省自5月1日实行联防，规定砀山、鱼台、虞城为甲防，铜山、峄县、永城、灵璧为乙防，邳县、临沂为丙防，沭阳、泗县、郯城为丁防。

4月11日　周自齐至北京教育部就总长任，下午至国务院就总理任，并开国务会议。

4月12日　陈炯明调动军队，图阻北伐军回师广州。

△　张作霖请徐世昌明令召奉军入关。徐以无先例，改由参陆办公处“奉谕转电照准”。

△　张作霖致函颜惠庆，声明早已辞卸蒙疆经略使职务，对蒙案未便与闻，应由北京政府核办。

△　段芝贵到奉天与张作霖商奉军入关后之布置。

△　驻扎汉口之近畿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葛豪接吴佩孚电令，率重炮兵二连开赴郑州，其余步兵亦限令13日分四批北上。同日，张福来之第四十八旅由岳撤防，准备北上。

△　北京政府交通部因无法偿还到期铁路支付券800万元，与经募各银行磋商，订定展期换券办法12条，徐世昌指令照办。

△　长江下游治江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南通、靖江、太仓、常熟、崇明、宝山、如皋、江阴、海门、丹徒、武进等县均有代表列席，即日通过组织大纲，并议决请江苏省长缓筑南夹坝。

△　山东保安队于是日起担任济南、张店间胶济路防务。日本驻济南守备队第四大队及宪兵乘车赴青岛回国。

△　新疆督军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收复科布多。

4月13日　　廖仲恺致电陈炯明，劝其赴梧州会见孙中山，“面商一切”。

△　唐继尧通电广州政府及西南六省，声明“不改护法初衷，与西南一致行动”。

△　周自齐宣布维持梁阁原状，力请阁员及秘书长照旧帮忙，“勿萌退志”。同日，周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解决财政问题三项办法：一、军警饷及各机关薪俸，就盐余分配；二、银行索欠，请徐世昌谕董康速审查各债无弊者，发九六盐券清偿；三、财政部溢发三、四年公债，查出确数、筹款交税务司，充基金补救。

△　直系军官在保定会议，决定：“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曹锟当即授吴军事全权，并称“本人亦完全听令”。

△　吴佩孚致电徐世昌、曹锟，谓：“奉军入关，逼人太甚，佩孚为大局计，不得不有所准备。”

△　凌晨3时，直隶省长曹锐以奉兵源源入关，事态严重，打电话通知直隶警务处长杨以德，暂时不能回任，所有省长职务由杨以德代理，并会省府署员、财产、眷属即刻迁入英租界。

△　驻北京外交使团会议，就直奉备战提出四项意见：一、无论如何，不得截断京津间交通；二、天津10英里以内，不得作战斗区域；三、外人生命财产，绝对不得加以迫害；四、根据《辛丑条约》，离京30英里，绝对不许作战。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与苏俄代表巴伊开斯，商定恢复伊尔库茨克领事馆。

4月14日　徐世昌指令批准交通部设立电政会计委员会。

△　北京政府交通部通告：凡属国有路、电、邮、航四政范围内一切资产，不论国内外何项机关，未经该部核准擅自抵押售卖或任意处分者，一概无效。

△　驻京荷兰公使欧登科以领袖公使名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谓：外交团顷悉中国武装军队拟占据秦皇岛及塘沽车站，据1901年条约第九条，中国政府让予各国于该地驻兵之权利，以期维持北京至海通道；中国武装军队如占据此种地点，即系破坏上述条约。请严重注意此种举动所发生之结果，并希警告有关之司令部。北京政府外交部立即将此“照会”分电曹锟、张作霖查照。20日，外交团又提出一次警告，并声明：“如因乱事致外侨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中国政府负其责任。”

△　驻京英使艾斯敦奉本国政府训令，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交还威海卫条件：一、威海卫之行政权交还中国，由中国自行管理；二、威海卫附近之青龙岛作为英舰避暑之所；三、威海卫市政由中英双方派员共同管理；四、保障外国人权利。16日，艾斯敦照会北京外交部，请合组“中英委员会”赴威海卫实地调查，以便着手交还中国。

△　上海大中华纺织厂正式开业。该厂于1919年6月发起，10月12日开创立会，1920年7月1日在农商部注册，1921年11月试车，厂址在吴淞蕴藻浜，厂基150亩，资本200万元，有纱锭4.5万余枚，总理为聂云台。

4月15日　奉军进关部队定名为镇威军，置大本营于军粮城，所部分二路六梯队。东路三梯队，以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为梯队长；西路三梯队以张景惠、邹芬、郑殿升为梯队长，参谋长为杨宇霆，统归张作霖直接指挥。总兵力约12万。

△　徐世昌令准财政部拟订发放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办法。

△　吴佩孚由洛阳赴保定，商对奉战略。连日部署军队，以近畿

琉璃河、高碑店一带为第一防区，保定至顺德为第二防区，郑州、洛阳为大本营，曹锟、王承斌为正副司令，沿京汉路北接保定，迎击长辛店奉军。吴佩孚为南路司令，担任陇海方面，一方向徐州与江苏联络，控制皖、浙军队，一方沿津浦线北上，以直接攻奉军。

△　曹锟致电徐世昌，要求派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兼帮办直隶全省军务。

△　曹锐自保定电北京政府，以旧疾复发，请假20日，委政务厅长陆长佑代理省长职务。

△　上海俄灾赈济会发起举行游行大会，参加者有学生、工人、职员等三四千人。

4月16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许崇智抵梧州。旋即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决定“出师江西，悉命诸军集中韶关，以大本营设于韶关”。

△　孙中山电召陈炯明赴梧州，陈因与曹锟、吴佩孚勾结，拒不前往。

△　全国银行公会在杭州举行联合大会，讨论救济国家财政及维持社会经济，以及整理公债、划一币制、商业流通各项问题。20日，全国银行公会致函盐务稽核总所及税务司，并通电全国，宣布联合会公同议决巩固公债信用办法六项。

△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第一、第二两厂4000余名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自是日起实行罢工。22日，厂方与工人代表议增加工资条件及补偿罢工损失，至25日双方达成协议，26日傍晚复工。

△　曹锳　由马厂退回保定；其二十六师师长一职，由张国熔代理。

△　驻京使团以奉直将发生冲突，根据《辛丑条约》组织海陆联

合军，分驻京奉、津浦沿线要区。

4月17日　直军第十七混成旅是日由保定开向琉璃河、高碑店、涿县一带。第三补充团原驻高碑店，亦开至琉璃河与第二补充团联合一气，担任琉璃河第一线之防务。张福来驻岳之二十四师亦陆续北上，驻涿县。

△　张作霖急电北京财政部，索饷200万。18日，财政部向正金银行借款50万交奉军。目前，奉军将各旅欠饷一律交足，并发薪饷两个月。京师毅军饷亦归奉军支给。

△　江苏各界联合会通电全国各团体，呼吁奉直“两方释嫌归好”，“勿以鲁、苏陷入漩涡”。

△　鲁督田中玉召开军事紧急会议，声言“奉直两不袒”。然因去冬与曹锟结为亲家，近又以张宗昌在青岛活动将夺其位置，故实际决意助直，并以机关枪送吴佩孚。

△　上海总商会请苏、浙当局宣布政策，商同皖、闽两省互订约束，勿入奉、直漩涡。

△　江苏知名人士张謇、韩国钧、沈钧儒、黄炎培等致电卢永祥、齐燮元等，要求江、浙不介入奉直战争。

△　武昌造纸厂存储之子弹500余万发，运至郑州。18日，吴佩孚电汉阳兵工厂赶造械弹，厂长杨文恺请萧耀南拨10万元作夜工工资，已令官钱局拨五万，是日开始开夜工。26日，萧运送机关枪十架、弹六箱至郑州。后方总粮台即设郑州。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申明中东路主权问题，略谓：“该路主权之属于中国，不待辩而自明……各国不应于此时提议扩充技术部权限，以妨害路政之进行，有伤中国人民之感情。”

△　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员樊耀南，以苏俄代表要求在《伊犁通商条约》所载通商地点外，添设通商都市，是日向苏俄提出中俄临时通商草约之双方约定，新疆以塔尔巴哈台为通商都市，俄以斜米帕拉廷斯克城为通商地，互设商务机关，兼办交涉事宜。

4月18日　北京政府司法、内务两部人员因欠薪不发，于是日起停止办公。19日，司法部人员提出要求发三个月欠薪，22日，决定将收发室锁闭，一切收发文件完全停止。农商部人员于19日因欠发工薪亦停止办公。

△　张作霖致电赵玉珂、杨以德云："奉军入关，弟之本意为促成统一之后盾，对直对曹无丝毫恶感，将来到津，尚须与仲帅（曹锟）协商办法，稳健进行。如有以奉军名义动曹家一草一木者，均请一律严办。"

△　驻北京之第十三师、第一师、第九师部队组织同盟，推王怀庆为总司令，对直奉守中立态度，表示如有侵害北京治安者，即以公敌论罪。

△　田中玉强迫各县预征民国十二年之丁漕，鲁民一致反对。19日田又电催79县从速实行。

4月19日　徐世昌特派汪大燮、孙宝琦为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任命王承斌帮办直隶军务；郑士琦帮办山东军务。

△　张作霖通电声明率兵入关，"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同日，张以镇威军总司令名义，发入关布告。同日，吴佩孚通电指责"奉军大举入关，节节进逼"，要求"奉军一律退出关外，驻京奉军司令部同时撤销"。

△　吴佩孚调集各军，共六师另六混成旅10万余人，炮75尊，集中京畿琉璃河一带。共分两路部署：以张国熔为东路司令，所统帅之

军队为二十六师，葛豪之十二混成旅，彭寿莘之十四混成旅，董政国之十三混成旅及吴佩孚第三师之一部分，任天津一世防务；王承斌为西路司令，所统率之军队为二十三师，二十四师，第十五混成旅，第一混成旅，第三师之一部分，任京保一带防务，21日配备完竣。直军设司令部于保定，吴佩孚自任总指挥。

△　陕督冯玉祥率所部第十一师全部暨中央第四混成旅及督署卫队各队开拔离陕，于26日到达洛阳并就援直陕军总司令职。吴、冯两军既联合，一面指挥前敌，抵拒奉军；一面驻兵要隘防御豫赵（倜）。

△　鲁督田中玉通电宣布与吴佩孚一致行动，德县兵工厂供直军使用。

△　天津121团体组织3000人之“保卫团”，并发枪械服装，昼夜巡查，保卫地方。

△　苏俄代表巴伊开斯向北京政府提出两项条件：一、中东路准由驻蒙俄军协同防守；二、库、恰问题，现俄军即将撤退，勿庸列入会议之内。

△　外国军舰13艘到大沽口，声言系以武装执行《辛丑条约》。

4月20日　孙中山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省长及所兼内务部长职务，专任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属海陆军直辖于大元帅。特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兼卫戍总司令。

△　北洋军阀元老王士珍邀集曾任奉天都督之张锡銮、曾任东三省总督之赵尔巽，以及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等商议调停直奉纠纷问题，并分电曹锟、张作霖，请其各将前线军队撤退若干里，约日同莅天津晤叙，消除隔阂，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活动。22日又另致吴佩孚一电，谓“本拟奉邀，因恐洛阳重要，暂由两帅晤商后，再电

约”。张作霖复电声明：“前方军队不会逾雷池一步”，“如仲帅（曹锟）到津，自当即日就道，共商解决。”曹锟亦复电表示：“锟夙爱和平，今彼方实逼处此，激起部下之不谅，实无颜再为说法。”

△　奉军在马厂一带开始向前进展，直军为阻止奉军，将唐官屯、马厂、青县三站间火车轨道拆毁。

△　吴佩孚电萧耀南，命筹设总兵站费60万元。次日，鄂财厅急电各站局限七日内筹款30万元，五日内将征存之款提前解足。

△　北京政府侨务局训令苏、粤、闽、新、鄂、鲁各省特派员，照新订《国内侨务调查事项》逐一调查，按月呈报。该事项共20条，内容系调查每月出洋及回国人数、职业、产业状况。

4月21日　徐世昌令蒙藏院总裁熙彦准免本职，特任塔旺布里甲拉为蒙藏院总裁。同日，又指令《中波通好条约》既经互换，应即公布。

△　徐世昌分电曹锟、张作霖，劝双方退让，“悬崖勒马”。

△　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指责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

△　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响应张作霖19日电，并以调人身份致电曹锟、张作霖，建议定期在天津面晤，“共商国是，以息兵争”。何丰林、李厚基、张文生等通电附和。

△　奉直两军前哨在马厂小战。次日奉军占领马厂，直军退驻大城。

△　陈炯明率部退往惠州。陈炯明部将叶举、熊略、翁式亮、陈炯光、杨坤如等联名通电，由南宁还师广州。

4月22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许崇智自梧州抵广州，任命陈炯明为讨贼军第一军司令，许崇智为第二军司令，李烈钧为第三军司令；孙并派古应芬赴惠州促陈炯明回省。同日，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黄大伟、李福林等通电，请陈北伐。29日，陈炯明电复孙中山，辞北伐，只允陆军总长一职暂不辞，但仍请病假。

△　徐世昌令准署司法总长董康辞职，以王宠惠出任司法总长，王未到任以前，由次长罗文幹暂代。

△　曹锟通电反对张作霖武力统一之说，指责奉军“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促张迅令入关队伍撤回原防。

△　张作霖电复徐世昌，表示：“此次奉军入关之宗旨，纯为促进统一之后盾”，声明“关内各军，已饬严守原驻地点，不越雷池一步，敬待钧命”。

△　吴佩孚通电指斥财政总长张弧发行“九六公债”系“盗国通匪”。

4月23日　曹锟电复徐世昌，表示愿“严束军士，保护人民，静候奉军出关固防，以竟息事宁人之志”。

△　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之说，略谓：“奉军原驻关内，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大总统派鲍（贵卿）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留，电牍具在”；并指责曹锟将“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通电颠倒为“武力统一”。25日，张作霖再次通电，斥责曹锟22日通电“不合事实”，“断章取义”。

4月24日　孙中山任命吕志伊为内务总长，梁鸿楷为第一师师长。

△　赣督陈光远致电北京政府告急，谓孙中山轻兵回粤，李烈钧部已抵韶关，许崇智部已抵连州，赣边危急，乞速救援。

△　鲁督田中玉宣布戒严令，任施从滨为总司令。

△　浙督卢永祥电江苏省议会、上海总商会等，责苏督齐燮元不以地方为重，与吴佩孚联名通电，倾向一方，苏省治安将受影响，“苏有不靖，浙难独安”。

△　第三届众议院议员，以全体名义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

△　上海邮务工人700余人罢工。工人提出每月增加工资五元，工作时间由每日12小时减为九小时等要求，罢工两天半，局方被迫答应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二元五角，但不准组织工会。

4月25日　王士珍谒徐世昌，商调和奉直双方办法。徐世昌提出三项主张：一、奉军完全退回关外；二、吴佩孚回汉口组织巡署；三、近畿治安及善后诸问题，由曹锟完全负责。

△　岑春煊致电曹锟、张作霖调解奉直之争，主张各方撤兵，听六年解散之两院议员自由集会，一面由曹、张、吴发起召集全国会议，厘定军制，整理财政，废督裁兵，速办善后。

△　吴佩孚、齐燮元、冯玉祥等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祸国殃民十大罪状”：一、勾结叛逆，四出构兵，障碍统一；二、倒行逆施，危害国体；三、袒护梁士诒，勾通外人，贻祸祖国；四、违华会裁兵之决定，招匪为兵，负罪友邦；五、擅调军队，陈师入关，危及元首；六、盘据京师，白昼劫掠，跋扈恣睢；七、侵占直省管辖区和驻守区；八、劫掠饷械，形同盗匪；九、所有作奸犯科、亡命盗匪，无不收纳；十、残杀同类。

△　北京政府海军司令蒋拯自沪通电，反对奉军入关。杜锡珪亦通电反对张作霖。据26日联合通信社称，海军上将萨镇冰代吴佩孚来

沪运动驻沪海军参加战斗，已告成功。所有在沪之“海筹”、“海容”、“晋安”、“楚有”四舰，同时奉令于三日内开拔前往秦皇岛、大沽一带。各舰官兵皆给一月俸饷。29日，海军兵舰数只已由烟台开赴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拟断奉军归路。

△　吴佩孚偕冯玉祥由洛阳赴郑州。冯玉祥留郑负后方责任，吴佩孚即赴保定指挥军队。当日，吴抵保与曹锟商洽并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战事。26日晨3时半，吴佩孚下令各军前进，由琉璃河、固安、永清三路同时进攻，限一星期攻到天津。

△　许崇智、梁鸿楷、黄大伟等致电各将领云：“奉大元帅命令，着崇智、鸿楷、大伟督率所部，北征讨贼，兹已整顿部队，即日出发，集中韶关，听候前进。”

△　奉天特设置戒严司令部，任命陈兴亚为戒严总司令。是日，公布严戒令十条。

△　张作霖电复鲁省议会及田中玉、王正廷等，谓只须吴佩孚不犯鲁，则奉军决不先越鲁境一步。

△　北京政府交通部因曹锟命令保定、长辛店间各次列车一律停开，影响路务，交通断绝，商民亏损，电请曹准予照常通车。

北京国务院通电，宣布海军各舰饷项，除催拨盐余外，由财政部酌办。

4月26日　　徐世昌令奉直双方军队撤回原防，不得进入北京城，“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同日，徐世昌又向各省发出通电，令各省派遣军政、财政、民政三方面代表，克期来京开会。

△　徐世昌特派梁如浩督办接收威海卫事宜。

△　北京政府交通部电告曹锟：津浦铁路马厂至青县轨道及电报路签被直军拆毁、割断，青县附近铁桥、股道等亦被损害，均不准修理，影响至巨，请曹准予修复，并对施工工人等“妥为保护”。

△　静海奉军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急电张作霖，请速送军粮；声称该前线奉直军之距离，已迫至30华里。

△　下午，直军中路司令王承斌、总指挥张国熔在任邱、河间一带与奉军开火，约三小时之久。西路奉直军亦有小战。

△　吴佩孚派人至山西，要求阎锡山派兵二旅或接济军饷100万。阎婉言拒绝。

4月27日　吴佩孚抵琉璃河，该处有直军3000人，与奉军隔河对峙。

△　凌晨2时，直军第一、二、三、四补充团及第十三混成旅，在固安迎击奉军骑兵，至上午6时止，9时复战。涿州直军向固安东进。

△　吴佩孚派大批骑兵由京东出通州、蓟州，奔袭卢龙，断奉军归路。并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率第一混成旅，张国熔率第二十六师包围马厂，使奉军首尾不能兼顾。窦店方面，奉直双方哨兵遭遇，互有死伤。

△　河南督军赵倜任宏威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马灿林为河南援直总司令，率混成旅全部以及豫北巡缉营赴保定助战。

△　孙中山派温树德、陈策等接管驻黄埔北洋舰队，“海琛号”略有抵抗，经炮台及飞机示威，各舰次第服从。是日，陈策布告宣布驻粤海军奉孙中山令，收复“海圻”、“海琛”、“肇和”等舰。

△　奉军将领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吴俊陞等，通电宣布吴佩孚干政乱纪、倒行逆施、破坏统一、扰乱地方、欺世盗名、诈取勒

借等罪状。表示“作相等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特宣告天下，剪此凶顽。”

△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因前方军情危急，宣布津埠戒严令六条；检查来往邮件。28日，命保安队警队约2000人，携带机关枪及快炮游行示威。

4月28日　　张作霖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向直系宣战。略谓：“乃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表示“作霖当仁不让，嫉恶如仇”，“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

△　是夜11时，马厂方面，直军二十六师突向奉军攻击，奉军只有一团驻守，军力单弱，当被直军包围。相持两小时，奉军团长王永清率骑兵一团赶至，内外夹攻直军，直军旋即退却，至天明时马厂解围。

4月29日　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自军粮城下令向直军总攻击。直奉两军分三路开战：中路，奉军渡永定河与直军王承斌部大战，奉军占固安。旋奉军另一部再渡永定河，触地雷，退回固安。西路，奉直两军在长辛店附近南岗洼一带激战，吴佩孚在涿州督战。奉军分向卢沟桥、三家店撤退。当晚，直军进攻，奉军援军自通州开至，激战竟夜，双方在良乡、琉璃河对峙。东路，奉军围攻大城，直军死亡甚众。奉军一部攻静海，误中地雷，退回静海。

△　徐世昌令直隶、奉天等处军队近日“竟有发生冲突情事”，“着曹锟、张作霖等督饬所属军队立即停止攻击，仍懔遵前令将移调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听候查办”。同日令：“现在近畿发生军事，京师首善之区，治安秩序关系重要，着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兆尹、京师警察总监督饬所属，严重警备，认真防卫”，“如有疏虞，定惟各该长官是问。”同日令：“责成京外军民长官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

为保护，务令安全，勿使稍受损害，以重邦交。”

△　川督刘湘接孙中山及驻奉军代表电，催即日出师北伐。是晚刘召集军官开军事会议。会上一派主张暗中联络孙传芳反戈攻萧耀南，举孙为湖北督军，实行自治；一派主张支持赵恒惕举兵反对直系。多数赞成后者，并电赵。赵复电表示：“当戮力同心，一致行动，定期即日出兵。”

4月30日　直奉战争西路战场，奉军增加兵力，猛烈前进，直军向涿州方面徐退。此时在奉军后方长辛店附近之三家店，也发生战斗。直军正围攻该地奉军之弹药库，奉军由丰台开来二十七师一部，激战两小时，直军退往良乡。是晚，直军改守为攻，分三路向奉军袭击，正面直攻长辛店，右翼趋丰台，左翼向三家店绕击。奉军利用重炮向直军猛轰，第一师为直军所围，势渐不支。

△　驻京各国公使因直奉开战，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一、京奉路照约不得驻兵，并不得断绝交通，如有以上情况发生，中国政府须负全责；二、无论何方军队不得入京；三、交战时不得在城邑上掷放炸弹等物；四、京津外人生命财产如有损伤，须由双方统兵长官负责赔偿。

△　徐世昌批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　孙中山在梧州行营接见美驻京邮报记者，表示北伐之目的在于推翻北廷，使中国实现真正之民治政府。并谓：“美国自来对于中国毫无攫取土地之野心，亦未利用中国衰弱以营私利，故今日否认北廷，当然事也。”

△　粤军将领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黄大伟、李福林等通电敦促陈炯明出师北伐。

是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浦东纺织工人名义，召集中国劳工

同盟会、工商友谊会、中华全国工业协进会等九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为日华纱厂罢工工人组成“浦东纺织工人经济后援会”，支援该厂工人罢工斗争。

△ 大兴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本银100万元，本店设江苏常熟县，董事为杨孟龙、庞可庵、庞次淮等11人。

△ 武昌裕华纺织公司成立，资本156万两，锭数4.1518万枚。

5月

5月1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这次大会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出席大会代表160余人，其中除共产党外，还有国民党、无政府党和无党无派的代表，共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23万多会员。大会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消除各地工会行帮观念及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所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口号，以及八小时工作制、援助罢工案；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大会于5月6日闭幕。

△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李能至（立三）为主任，并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

△ 直奉两军东路于姚马渡、白洋桥等处，激战多次，直军占领大城县，并乘胜进取马厂。中路战场，吴佩孚自涿州出发督战，直军克固安，复为奉军夺回，霸县旋为奉军攻占。西路奉军自黎明开始进攻，激战多时，直军退琉璃河西，与奉军隔河对峙。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俄驻京代表巴伊开斯，抗议苏俄政府与外蒙私订条约。

5月2日 北伐军第二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孙中

山亲临授旗。广州市各工会特发起祝捷大会，庆祝许崇智军出师北伐。

△　直奉两军在中路激战，直军向固安、霸县奉军攻击，自晨至日中，两方死伤相继，仍不分胜负。吴佩孚调兵急攻永清，奉军败退，直军乘胜进占天津附近之胜芳桥一带，俘奉军千余人。东路奉军向杨柳青溃退，直军进攻马厂，奉军千余被缴械。西路奉直两军于长辛店附近发生炮战。

△　张作霖电复徐世昌，诿称："奉军入关本无战意"，指责吴佩孚"衅自彼开"，请饬曹锟等共遵息兵之命令。

△　徐世昌派王士珍、赵尔巽赴直军指挥部，劝吴佩孚停攻，吴未允。同日，徐世昌又电孙烈臣，盼劝张作霖议和。同日，张作霖致电调人张锡銮，声称："此次用兵，实非得已……自悔性太憨直，被请入关，误堕宵人诡计。仲帅（曹锟）如幡然悔悟，立将戎首缚送军前，交公民公判，霖复何求。"

△　在南京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派舰队赴秦皇岛，监视奉军增运军队。萨镇冰电杜告以亲率六舰分布山海关、秦皇岛、连山、龙口一带。

△　江西督军陈光远在南昌以"煽动劳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派军警六七十人封闭《大江报》报馆。

5月3日　　直奉战场，东路直军攻占马厂、青县。中路吴佩孚率第三师一部督战，直军获大胜。入夜，吴下三路总攻击令，集精锐于西路，亲自督战，派一营兵力向长辛店诱战，奉军先胜，直军被包围，旋直军援兵到达，迂回攻击奉军侧背，奉军不支，向丰台撤退。

△　张作霖致函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警告京津官商，如接济直军款项，即与吴同罪。

△　驻北京之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第九师师长陆锦、第十三师师长王怀庆等，以调停奉直两方争端为名，要求在京津间之奉军撤退，否则将实行武力调停。

△　粤军第一师全部向韶关开拔。同日，汪精卫赴惠州，邀请陈炯明速来广州。

5月4日　　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宣布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所认为民贼者，惟徐世昌及共恶诸人，师行所过，如有去逆效顺者，必视同一体，其毋自贰。"

△　直军在中路发动总攻，连克永清、安次，并乘胜追击，张作相逃天津，直军再克杨村、落垡。下午直军攻占静海，进逼梁王庄，奉军缴械者7000余人。西路直军于拂晓攻击奉军侧背，奉军邹芬第十六师在门头沟投降，张景惠闻战败下令撤兵，乘车赴天津。奉军无主秩序大乱，第一师及第二、第九两个混成旅涌向丰台、卢沟桥溃退，直军遂克长辛店。

△　北京政府财政部以金融危机，呈请徐世昌应否继续发行八厘公债券，是日徐指令照前案办理。

△　北京学生联合会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周年，发表宣言，声明："誓以五四运动底精神，采取适当有效的方法，打倒中国底军阀。"并散发小册子，痛斥吴佩孚"障碍中国统一"。

5月5日　　广州各界举行集会游行，庆祝孙中山就总统职一周年。

△　孙中山特任于右任为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陈树藩为第二路总司令；免去大本营第四路游击司令陈策职务，另任陈策为广东海防司令。

△　张作霖下令结束西路战事。败退西苑之奉军第十六师及第二十五旅、第二混成旅，由京畿陆军第十三师勒令缴械。败退南苑之奉军第一师及第二十八师一部并各混成旅，由京畿陆军第一、第九两师勒令缴械。黄村、丰台之奉军，由直军缴械，总计约三万人。西路奉军肃清。同日，直军占廊坊，中路战事告终。东路直军继续追击败走之奉军。

△　徐世昌电令曹锟、张作霖，迅即收兵办理善后，“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同日徐又令：“此次近畿发生战事……皆由于叶恭绰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

△　豫督赵倜通电宣布吴佩孚、冯玉祥罪状，声明对奉直战争守中立。

△　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召开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大会，参加者2000余人，会上毛泽东讲演《共产主义与中国》。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马克思纪念册。同日《民国日报》副刊专载《马克思学说》。上海学界亦在民强中学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及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到会1500余人，主席张椿年。

5月6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许崇智、程潜、黄大伟、蒋作宾、古应芬等，由广州乘专车赴韶关大本营督师北伐。

△　孙中山任命居正为内政部长。

△　徐世昌特任高凌霨兼代交通总长。

△　胶济路沿线日军撤退，我国接防事宜办理完竣。

△　东路奉军李景林部败退，静海、良王庄为直军占领，奉军7000人降直。同日，直军进驻军粮城。

△　驻河南直军靳云鹗部自信阳开赴石家庄，至和尚桥地方遭河南陆军第一师赵杰部攻击，退至武胜关。

△　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开幕。直、鲁、豫、苏、赣、湘、鄂、川、陕、闽、浙、粤等省，均派代表出席。

5月7日　　徐世昌令："此次京兆、直隶等处被兵，地方横遭蹂躏"，着内务部督同各该地方长官"查明各地情形，妥筹抚恤善后办法，先由财政部拨银十万元"交各该长官散放。复以近畿地方溃兵四散骚扰，着即责成该地各军民长官"严行检查"，"妥善办理，以弭隐患"。

△　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等为赵杰袭击靳云鹗事，致电冯玉祥、赵倜，愿"秉公"调解，请两方各遵防线，勿事冲突。

△　梁士诒改名高信，叶恭绰改名曾敏勋，张弧改名孙虚曲，自天津乘"芝罘丸号"邮船赴日本。

5月8日　　孙中山于大本营下讨伐总攻击令，令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军。任命李烈钧为中路总指挥，许崇智为右翼总指挥，黄大伟为左翼总指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三路总指挥。任命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同日，陈炯明部下叶举要求复任陈为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省长，免胡汉民职。

△　湖北省议会议员汪云骏等40余人，通电各界请促成省宪。

△　吴佩孚致电北京警厅查封《大陆》、《正言》两报，报界联合会要求启封，以保言论自由。

△　袁祖铭致电孙中山，报告滇军张开儒部经黔境入湘，会师北

伐。

△　北京政府根据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宣言，电令鲁省长及“鲁案善后督办处”，开张店、坊子、高密、潍县、淄川、博山、周村、青州八处为商埠。

5月9日　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　孙中山急电广州政府，令募夫役5000人赴韶关。各工会应募输运夫役极众，第一批千人，11日出发赴韶关。

△　蒋介石由上海致书廖仲恺，反对北伐，要求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5月16日，廖仲恺复电驳斥，并催蒋介石回粤。

△　陈炯明宣言，担保其旧部将领一致服从孙中山，如有一人不从，彼即自杀。

△　徐世昌令陆军总长鲍贵卿因病辞职，着给假10日，以次长金绍曾暂行代理部务。

△　曹锟通电宣称，此次直军胜利系“人心公理战胜强权……一俟直省全境宁谧，锟即解甲归田待罪，决不稍恋兵权”。

△　吴佩孚电北京政府财政部索饷，声称“直军现已无以为食，请速先发二百三十万，以资维持”。曹锟亦有电索饷，谓：“此次战事发生，一切饷款均由锟与曹锐以私产出押三百万，不足又另外挪借一百八十万，今锟拟辞职归田，请归还四百八十万，以免私人负累。”

△　北京第三届国会十一省区全体众议员通电斥责梁士诒“特赦安福，起用曹、陆，滥借外债，断送鲁案”，破坏国会选举等，并催请各省赶办选举，克期召开国会，以定国是。23日复发通电说明旧国会不能恢复之理由，请未举办选举各省于三个月内完成选举，早日召开新国会。

△　浙督卢永祥致电徐世昌陈述召开统一会议之意见：一、取平等会议形式，无所谓南北对等和议；二、由各省人民为会议主体，不受任何方面之操纵；三、会议目的，不限于立法行政一部，在谋制度上根本改造，以图民治之实现。

5月10日　徐世昌令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吴俊陞调署奉天督军；特任冯德麟署理黑龙江督军；特任袁金铠署理奉天省长；特任史纪常署理黑龙江省长；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又令：蒙疆经略使应即裁撤，所有蒙边一切事宜，即由国务院暨主管各部院妥筹办理。又令：河南督军赵倜免去本职，听候查办；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特任刘镇华暂行兼署陕西督军。

△　孙中山电令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进驻广州。

△　广州政府各路北伐军抵南雄、始兴、仁化、坪石者，共约七万人，即日开始总攻击。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增订注音字母四声点法。

△　北京政府司法各公署人员因欠薪半年，无法维持，联名向国务院呈请总辞职。17日，职工领得一月薪资，恢复办公。

5月上旬　孙中山致函张作霖，告以“不变初志，以践前约”，并派吴忠信为军事全权代表晋谒。

5月11日　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吕超为大本营参谋长。

△　徐世昌任命宝德全帮办河南军务；常德盛署归德镇守使；任马鸿逵为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　吴佩孚电萧耀南，提出解决时局三项办法：一、内阁暂局部改组，巩固中枢；二、开国是会议，召集合法国会，促成统一；三、国会未成立前，拥护现政府，维持国际地位。萧复电赞成。

△　东三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等分别通电不承认徐世昌所下之张作霖免职令，并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　全国劳动联合大会连日在广州开会，各处工团均有代表赴会，会上中华工会总会提出下列提案：一、组织永久全国劳动大同盟；二、普及劳工教育；三、组织工会法；四、承认南方政府为中央正式统一政府。

5月12日　孙中山任命刘震寰为广西绥靖处督办，令其派兵赴桂林接防。

△　吴佩孚与曹锟分率属员在保定会议，磋商关于战后收拾时局及军事等问题。

△　银行公会函诘财政次长钟世铭上月盐余应存150万元，不拨公债基金，流用何处，请即日答复。14日复又通电责此事。

△　奉军10余车自山海关开至滦州。到15日，奉军集中于该地有七万余人，连日在古冶、开平、滦州、昌黎一带掘战壕筑炮台，并来往运送军队及军需品，以备与直军再战。20日直军攻入滦州，奉军全部出关。直奉战争结束。

△　吴俊陞、冯德麟等由奉天公署通电否认徐世昌本月10日调署命令。

5月13日　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在北京《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政治改革最低限度的目标是“好政府”；“好政府”要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要求：“宪政的政

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具体主张为：一、“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二、“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和会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三、裁兵；四、裁官；五、改良选举制度，采取直接选举制，减少议员名额；六、财政，应彻底的会计公开，统筹国家的支出。

△　北京政府参陆处派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陆军第一师自内蒙南下，并佐以绥远第一混成旅、河南暂编第一师常德盛部，由湘入赣作战。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参与华盛顿会议各国关于来华考察领事裁判权及司法情形一事，是日致牒其美、法、意、日、荷、比、葡等国请展期一年调查司法。

△　李垣呈报与苏俄代表巴伊开斯谈判接收库伦、恰克图事，并谓应召外蒙代表来京解决。阁议议决照办。

△　审查短债委员会宣告结束，将潘复任内用途不明之款，移交“审核用途委员会”。

△　北伐军抵南雄者达四万人，齐向赣境开拔。

5月14日　吴佩孚致电各省直系督军征求恢复旧国会意见。苏、鲁、鄂均复电赞成，并拥黎元洪复位。15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主张恢复法统，召集民国六年国会，速制宪法，请黎元洪回任，以谋南北统一。

△　徐世昌以张宗昌在青岛附近招集土匪，希图骚扰，下令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各省军民长官通饬所属严缉惩办。又令：京师宪兵司令秦华准免本职，任命车庆云继任。

△　本年2月以来，川军内讧，夔、巫军队退重庆，是日刘湘电辞

四川督军、总司令兼省长等各职。24日再次通电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声明将军民政务暂交王陵基、向楚代拆代行。

5月15日　孙中山为出发北伐之李福林部主持誓师典礼。

△　孙中山分电赵恒惕、刘湘，训令湘川即日言和，期在武汉会师。

△　徐世昌令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准免本职；任命谭庆林暂行护理察哈尔都统。

△　旧国会议员王家襄、吴景濂等在天津息游别墅开谈话会，并在日租界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以通声气。连日京、津、保之间，旧议员往来不绝。

5月16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通电，宣布“九六公债”改为8000万元发行，其理由谓：发行八厘债券偿还内外短债，既可救济金融，复可整理债务，且化短期为长期，变重利为轻利，并可借此腾出部分盐余补充政费。

△　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联名电请王士珍组织内阁，收拾时局。

△　徐世昌任命权量暂行兼署交通次长，并派为吉会铁路督办。

△　北京政府交通部裁汰该部附设机关九处，计：铁路卫生联合会、电气技术委员会、铁路业务研究会、铁路文书会议、铁路财政筹议会、全国铁路线路审查会、编译处、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国有铁路货物联运审查会。

△　中日签订南浔铁路第三次借款合同，金额250万元，年息七分五厘，偿还期限15年。

△　四川省长刘湘电聘骆成骧筹备创办四川大学。

5月17日　孙中山任命柏文蔚为长江上游招讨使。

△　民国八年议员又电吴佩孚，谓：吴于“民国九年曾发电痛斥旧（六年）国会分子庞杂，人格丧失，为全国所不齿，其人格视卖国党更降一等；发电距今未及二年，当不致前后判若两人，且此次旧议员勾结梁、叶、奉张，事实昭然，若赞成复旧，是与若辈宗旨本无二致，何必多此一战，使死者含冤地下”。吴接电后，否认主张召集旧国会一事。

5月18日　叶举拒不就桂粤边防督办职，仍以第八区善后处长名义指挥所部军队，并于是日擅自进驻广州。

△　徐世昌将王宠惠等呈请严饬财政当局实行财政公开办法一案，交财政部办理。

△　北京政府审查内外短债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因各债案既经审查完毕，向政府条请清理财政、淘汰财政冗员、按适中利率借款、统一发行纸币、合并中交两银行五事。

△　冯玉祥电徐世昌辞豫督。

5月19日　奉天省议会宣布东北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举张作霖为三省总司令，兼奉天省长。

△　曹锟、吴佩孚等直系督军联名致电徐世昌促王士珍组阁。

△　徐世昌令派陆梦熊为交通大学校长。

5月20日　孙中山由韶关至南雄督师。

△　陈炯明所辖翁式亮、熊略、陈炯光、杨坤如、罗绍雄、何国梁、邱耀西各部70余营抵广州，分扎城厢内外。广州为陈炯明势力所

控制。同日，陈部军官及各要人在陆军忠烈祠会议，并致电孙中山要求：一、仍任陈炯明为粤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促其返粤；二、免胡汉民职。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北京外交团声明，以后张作霖对外一切行为，均不发生效力。

5月21日　　徐世昌公布《不动产登记条例》，凡五章125条；《财产登记通则》，凡29条。

△　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浦东中学开成立大会，到会者400余人，主席罗赤人报告开会宗旨，说明因要求精神之自由故反对基督教。

5月22日　　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等电复曹锟、吴佩孚，赞成恢复六年旧国会，速成宪法，善后问题各省派员开会解决。

△　北伐军许崇智、梁鸿楷两部占领江西龙南、虔南两县。

△　江西督军陈光远急电徐世昌，谓粤北伐军三路进逼，赣南电线已断，请拨饷械并派援军。

△　苏俄驻京代表巴伊开斯电促北京政府开议中东路问题。颜惠庆答复称，须王景春督办回京后再作决定。

△　广西省长马君武电广州政府辞省长职。

5月23日　　孙中山派程潜赴惠州与陈炯明磋商；汪精卫亦持孙中山函，赴惠劝陈。

△　叶举、魏邦平在广州会衔布告，声称由桂班师回粤，纯因整顿补充起见，故暂驻省城，俟补充完备，即分途出发，以重防务。未出发前，省城治安力任保护，对政治决不干预。

△　江西第二届省议会议员致电孙中山，欢迎北伐军入赣。

△　徐世昌任命陆洪涛为甘肃督军。

5月24日　孙中山电复叶举等，表示对陈炯明“始终动以至诚”。

△　徐世昌特任董康署财政总长；兼代交通总长高凌霨准免兼职；特任高恩洪署交通总长。同日又令，陆军第十六师裁撤，改编为第十五师。任彭寿莘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

△　民六国会议员王家襄等在天津开筹备成立会，议定进行方法，并发出通电声明自行集会。

△　11省民八议员联合发出通电，反对恢复六年国会。略谓：“夫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断未有十年以前之选举，代表十年以后之人民，开五洲各国未有之恶例，遗中国后世无穷之乱机。”

△　岑春煊通电赞成旧国会。

△　被迫归国之留法四川学生代表黎纯一、陈毅，回川与当局接洽留学经费问题，无结果。

5月25日　北伐军分两路进攻赣州，前队距城仅50里。

△　蒋介石又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要求回师广州，停止北伐。廖仲恺复电解释不能回师理由，并促蒋回粤。

△　徐世昌特授萨镇冰为肃威上将军。

△　直隶省长曹锐电北京政府国务院称病辞职。

△　北京午门历史博物馆，所贮明末及前清内阁档案、试卷等物，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派员督同该馆移交北京大学收管。

5月26日　叶举、魏邦平等联合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撤除廖仲恺、胡汉民等职务，并在省城北部布防。

△　上海北城商业联合会致电徐世昌，促其退位，听国民自决。

△　徐世昌令准免钟世铭财政次长本兼各职，任命严琚署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又令潘昌煦暂行代理大理院院长，任聂宪藩为前军统领。

△　张作霖、孙烈臣、吴俊陞联名通电宣布：自5月1日起，东三省一切政务由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并与西南及长江各省同志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

△　北京政府内务部员司复因欠薪停止办公。

△　北京政府参陆处函财政部，索50万元，为援赣经费。

5月27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督办两广军务”，并令叶举率部赴赣。陈、叶拒命。

△　徐世昌特任财政总长董康兼盐务署督办及币制局督办；特派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

5月28日　孙传芳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略谓：“广州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既复，责任已终。北京徐大总统新会选出，旧会召集，新会无凭。所望两先生及时引退，适可而止。”

△　徐世昌任命聂宪藩为步军统领；特派王怀庆为京畿卫戍总司令；任命胡龙骧为将军府将军。

△　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开紧急会议，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同日，曹、吴联名电复旧国会筹备处，对民六议员自行集会表示支持。

△　酝酿已久之“国是会议”于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到会者28人，代表十四个省区。会上选举黄炎培、韩希奇为正副主席。

△　澳门发生葡兵残杀华人事件。葡兵于当街调戏中国妇女，遭我工人痛殴，当时有三个工人被警察捕去，激起群众公愤，宣布罢工、罢市，万余人围集警署。葡兵亦大批集结，双方相持至29日上午，葡方竟下令开枪，工人市民死伤惨重。惨案发生后遂爆发了全澳大罢工。由于葡帝国主义破坏、镇压，罢工终归失败，各工会亦被解散。

5月29日　北伐军黄大伟部攻克崇义，中路军克新城（大庾），右翼许崇智部占领信丰、南康，向赣州合围。

△　齐燮元电请徐世昌退位。

△　徐世昌令热河都统汲金纯着免去本职，另候任用；特任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任命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任命米振标帮办热河军务；任谭庆林帮办察哈尔军务；任命马福兴为新疆喀什噶尔提督。

5月30日　徐世昌特任张景惠为安威将军。

△　刘镇华、吴新田、阎治堂、井岳秀、刘宝善、顾琢塘、石绍明、孙积孚、田玉洁等通电拥护黎元洪复位。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奉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撤退驻屯汉口日军之通告。

5月31日　徐世昌就孙传芳28日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事，通电宣称孙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一有合宜办法，即便束身而退，决无希恋”。

△　徐世昌特派傅增湘办理财政清理处事宜。

△　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邀集各界团体开紧急大会，共商澳门惨案对策，大会议决：一、请愿政府速行收回澳门；二、由人民方面取自动的态度与葡人断绝关系；三、不为葡政府作工；四、抵制葡货；五、通告全国揭露葡兵罪行；六、停运往澳门之蔬菜和米粮，停止供给澳门商品。

是月　　武昌震寰纺织有限公司成立，资本为122万两，锭数2.6336万枚。

△　《胡适文存》在上海出版。

△　张枕绿编辑之《良晨》（周刊）在上海创刊。

△　须弥编辑之《新小说》在天津出版。

△　胡适等主编之《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该刊共出75期，1923年10月停刊。

6月

6月1日　　孙中山自韶关返广州，镇抚陈炯明部，令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任命许崇智为粤汉路警备司令，并致电陈炯明“请速来省共商大计”。

△　徐世昌令币制局总裁徐世章准免本职，特任徐佛苏为币制局总裁。

△　陈炯明由惠州抵石龙检阅军队，事毕即回惠州。

△　韶关大本营接许崇智由信丰来电：一、北伐军已进至距赣州20里之地；二、敌退出信丰及南康时，焚掠一空，人民恨敌入骨；

三、我军新占领各地，粤币十足通用。

△　王家襄、吴景濂等在天津召集民六议员200余人开会，发表宣言。声明：一、六年6月12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无效；二、徐世昌之选举，属非法总统，应宣告无效；三、广州政府应告终结；四、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

△　吴佩孚电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促其劝徐世昌“及时自退”。

△　王士珍电复曹锟表示不愿组阁。

△　澳门当局下令，将凡与此次反对葡兵杀害华人风潮有关之工会一律解散，各商店限是日复业，否则不任保护。

6月2日　　徐世昌发布辞职令。略谓：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规定“本大总统现因衰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并于午后1时将总统印交国务院，出京赴津。是日，国务员周自齐、颜惠庆、高凌霨、董康、鲍贵卿、李鼎新、王宠惠、齐耀珊、高恩洪通告摄行总统职权，并通电两院议长及各省云：“暂以国民之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　孙中山在广州巡视观音山，发觉陈炯明部有谋叛布置。

△　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谓：“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

△　徐世昌下裁汰冗员令。同日又令：调任汪荣宝为驻日公使；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副总裁张嘉璈任期届满，准予解除职务；任命王克敏为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任命常德盛为河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

△　曹锟、吴佩孚、齐燮元、田中玉、阎锡山、孙传芳等通电请

黎元洪复职。萧耀南亦通电拥黎，并请孙中山“引退”。

△　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揭露吴佩孚标榜“恢复法统”乃“善传袁世凯之衣钵”。5日又开职员会议，议决：一、反对恢复六年国会；二、反对黎元洪上台，拥护孙中山统一中国任总统；三、要求收回澳门，要求驻澳葡领向中国道歉，恤慰死伤华人，惩办凶手；四、要求日领事道歉，惩办在汉口任意逮捕、欺压中国人之日警。

△　北京八校校长因要求经费无结果，实行总辞职。

△　澳门工会举代表陈根生、梁工侠等谒见孙中山、伍廷芳，要求派舰援助。孙、伍等表示支持。

△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北京政府外交部换文。9日，外交部全文发表该条约。

6月3日　　孙中山通电反对黎元洪复任总统，表示应由护法政府承继法统。同日，广州非常国会亦通电宣告中外，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筹备召集续开民六国会，声明中华民国合法大总统及合法国会均在广州。

△　孙中山任命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徐元诰为政务厅长，办理江西政务。

△　黎元洪电辞复职。同日，黎又以电话告周自齐，对旧议员拥护是否合法，尚有怀疑，请周力维现状，听候正当解决。

△　蔡元培致电孙中山劝停止北伐，实行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章太炎于6日电蔡元培，指责蔡以上主张乃“愿北军永据南省……欲作南方之李克用”。张继亦通电指责蔡元培“为人傀儡，阻挠义兵”。

△　卢永祥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声称：“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

卸责任……黄陂（黎元洪）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

△　改造湖北同志会警告黎元洪“勿再傀儡登场，自贻伊戚”。同日，中华平民社通电指责黎元洪“此次东山再起，无殊自暴其罪状”。

△　张作霖宴在奉领事团，宣布东三省自治，并声明以后满蒙交涉，由奉作主。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亦于是日发出内容相同之通告，并通电赞成徐世昌下野，建议“恢复旧国会，应以上海为开会地点，俾免武人之干涉”。

△　岑春煊以“首都无主，枢府虚悬”为理由，电促黎元洪“克日入都”就职。

△　章太炎致电黎元洪，略谓：“宜于金陵、武昌择地复职，切勿挂系北京，自同囚锢。”

△　广州政府为葡兵惨杀华工事向葡领提出最后警告。

△　上海各工团执行委员会，致电广东省长，就澳门葡兵惨杀我国劳工案，提出八项要求：一、政府应严重交涉；二、调查实在肇祸原因、死伤人数；三、惩办肇祸凶手；四、赔偿损失；五、向世界各国声明葡国无理；六、赞成广东国民大会提议，收回澳门自治；七、请北京政府派军舰镇慑；八、请全国当道一致服从民意；为国争人格。

6月4日　于是晨8日，高恩洪代表北京国务院赴天津迎黎元洪入京复职。曹锟派代表熊炳琦，吴佩孚派李卓章，亦到津迎黎。是日，高、熊、李偕同直、苏、鄂、赣、豫、皖、陕、甘、鲁、绥远、热河、察哈尔12省区代表往见黎元洪，敦促即日进京复职。旧国会方面亦派代表20人赴黎宅“促驾”。

△　江苏公团联合会通电“忠告”黎元洪，勿“重上政治舞台”。并

指出：“若先生甘居炉火之上，则南中义师所指，不在曹吴而在先生。”

△ 鄂军军长孔庚致电黎元洪，劝其“勿为他人所愚，以取一时之快”。

△ 张作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同日致电孙中山，表示与西南一致，并派王葆华赴湘考察省宪。

6月5日 广州政府内务总长居正通电列举黎元洪罪状，宣布黎“已满法定之任期……继任大总统之资格完全消失”。

△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致电吴佩孚，拥护徐世昌，反对黎元洪复职。7日，何又通电主张“目前救亡之策，唯有从速制宪”，“在未经制定宪法改选总统之前，应仍由旧政府维持现状”。

△ 王芝祥、董康、高恩洪电请吴佩孚赴津促黎元洪复职。6日，董康偕严璩赴津迎黎。

△ 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江苏公团联合会、民治急进社等，相继致电孙中山，反对黎元洪“盗窃大权”及王家襄等“冒用国会牌号”在津擅开筹备会议，吁请孙中山“乘胜赣之余威，全师北伐”，表示“誓为义军后盾”。6日，又通告各国驻华公使，声明黎元洪“不为我国人民所信任，与徐世昌无异”，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之唯一大总统”。

△ 赵恒惕通电主张实行“联邦制”，“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

△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通电，赞成恢复民六国会。

△ 北京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董康提出财政计划，建议由中外各银行合组一中外财政稽核处，所有政府应支经费，须经该处审查后方能发放。

△　广州工会召开大会，议决请政府收回澳门，并劝国人与葡当局断绝往来。8日，广州市千余市民开大会，声讨葡兵枪杀华人。

△　葡领事电复伍廷芳，称澳门为内部事，中国无权干涉，澳门并无任意枪杀华人事，词极蛮横。

6月6日　孙中山以“中国事实上、法律上惟一政府行政首领之资格”发表对外宣言，警告列强不可干涉中国内政，并着重指出：“假使列强现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则其行动仍为干涉中国内政，其结果将更劣于承认徐世昌也。”7日，孙中山在广东交涉署宴请外宾时再次表示希望各国勿再扶植北方恶势力。

△　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工兵计划宣言》，主张解决国内问题之途径，在于恢复约法，而对裁遣军队的安置，则宜实施工兵计划。宣言要求直系军阀“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以作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依次改编”。如能履行此项条件，“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否则，“决为国民一扫凶残”。

△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宣布黎元洪罪状：一、毁法：“黎于六年六月十二日竟下令解散国会，遂启南北连年战争”；二、叛国：“六年宣统复辟，黎氏徇张勋之请，将中华民国统治权交付宣统，签字盖印，首先称臣”；（三）辱国：“宣统复辟则中华民国既倾覆，元首有殉社稷之义，黎氏竟逃往日使馆躲避，受庇外人治下，污辱国体，莫此为甚。”

△　全国各界联合会通告驻华各国公使，声明“孙中山博士为中华民国惟一之大总统……凡国际交涉，应由孙大总统及伍廷芳外交部长负责，方为有效”。

△　黎元洪通电提出“废督裁兵”作为复职条件。电云：“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

指，久为弊病。”“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附听刍言，立释兵柄。”“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

△ 民六国会议员联名通电要求罢免徐世昌。

△ 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北京政府请辞职，推荐蔡成勋继任。

△ 萨镇冰、王承斌、熊炳琦、李卓章等同谒黎元洪请复职。是晚，黎邀各省区拥护自己之代表数人开茶话会表示谢意，并重申废督裁兵主张。

△ 程潜至广州白云山叶举驻地，与陈炯明部商谈，知其必叛，归报孙中山，请速回韶关。孙中山不许。

6月7日 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岑春煊、陈光远相继通电表示支持“废督裁军”主张，请黎元洪早日复职。

△ 民八国会议员邹鲁、马君武、居正等90人联名致电黎元洪，谴责黎为“国法之罪人”，劝黎勿与“直系武人同恶共济”。

△ 王家襄等在津通电宣布国会筹备处于6月11日结束，6月12日旧国会移京正式集会。

△ 北京政府特派王正廷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派何宗莲、唐在章、徐东藩为第一部委员，劳之常、陆梦熊、颜德庆为第二部委员。

△ 澳门当局派人晤工会首领，称愿取消前年逐谢英伯出境令，请谢赴澳门调停，为谢拒绝。

△ 华侨联合会、粤侨商业联合会致电广东省长，抗议葡兵惨杀

澳门华人事件。同日，旅沪粤人1000余人亦联名致电孙中山同致声讨。

△　广东省议会电请陈炯明主持粤局，另电请叶举在陈未抵省前维持地方责任。

△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电请王士珍、鲍贵卿、赵尔巽等人出面调和，促使直奉双方停战，以纾民困。

6月8日　北伐军大本营发表公报：一、北伐军右翼军5日午完全占领赣州，许崇智军于6日晨入赣州城，敌残部向万安方面溃退；二、朱培德5日电称，我军与敌鏖战于潭口、李家山一带，敌大败，现正追击中；三、赣军支队长易简3日占领会昌城，夺获枪支甚多；四、李福林5日电称，李芳占领老虎头、黄村、沙田等处。

△　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汪精卫等通电，主张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南京为总统府所在地。

△　奉军代表张学良赴秦皇岛与直军司令彭寿莘磋商议和。

△　唐继尧通电主张“速集南北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筹议建国大计”。

△　川督刘湘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

6月9日　北京政府令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汪士元准免本职。同日又令：批准设长江下游治江会。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

△　北京政府外交部太平洋善后委员会刊发广告，公开征求有关裁兵计划及善后办法。

6月10日　黎元洪在津通电宣布本月11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　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通电反对第一届国会在津集会，“违法发布通电，迫徐大总统（世昌）仓皇去位”。

△　天津商界30余团体致电黎元洪，反对其复职。

△　陈光远再次通电敦请黎元洪复任。并表示“首裁督军”。

△　广州政府外交部再次照会葡领，要求：一、由澳门当局派代表同葡领向本政府道歉；二、将杀人军警严办；三、优恤死者家属、伤者药费；四、非洲兵限日撤离澳门；五、禁止澳门赌博。

6月11日　黎元洪入京就职，暂行大总统职权。同日，黎令特任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并准兼署国务总理、教育总长周自齐、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署财政总长董康、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农商总长齐耀珊、署交通总长高恩洪均免本兼各职。

△　奉直两军和议未成，是日山海关附近激战，双方均有死伤。

△　吴佩孚分别致电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劝“北上共商国是”。

6月12日　黎元洪特任颜惠庆暂行兼署外交总长，谭延闿署内务总长，董康署财政总长，吴佩孚署陆军总长，李鼎新署海军总长，王宠惠署司法总长，黄炎培署教育总长，张国淦署农商总长，高恩洪署交通总长。谭延闿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代内务总长；黄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教育总长。又令：国务院秘书长一职着林步随暂行兼署。

△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阐述有关北伐问

题，并揭露陈炯明实行“武人专制”，阴谋篡权，希望记者以舆论压力迫使陈部退回东江。

△　上海各商民及各公团代表开会，议决：一、根本否认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不承认北京政府有合法代表中华民国之资格；二、根本否认王家襄、吴景濂等召集之国会为合法，不承认该国会对国内外一切言论与行动；三、完全服从孙中山及其政府之命令，并赞助北伐。

△　陕督刘镇华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废督裁兵主张。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澳门葡兵惨杀华人事件散发传单，号召全国各工会“召开会员大会，举行示威，向各地当局请愿”。

6月13日　　黎元洪明令宣布撤销民国六年6月12日之解散国会令。

△　北京署国务总理颜惠庆电邀伍廷芳北上，“主持阁事”。

△　北伐军攻克赣州，检获陈炯明与吴佩孚、陈光远图谋夹击北伐军的来往密电数件。

△　湘军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陈嘉祐通电表示，愿统率所部，拥护孙中山北伐，并推国会议员唐支厦为代表，晋谒孙中山请示方略。

△　孙洪伊致电孙中山，反对黎元洪上台，主张八年国会行使职权，南北合为一家，设临时政治机关，实行地方分权。

△　吴佩孚到北京贺黎元洪就职，密商国是，当天回保定。

△　浙督卢永祥致电黎元洪，承认黎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并赞成废督裁兵。何丰林亦电赞成统一。

△　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张作霖提出榆关战争影响国际列车安全之严重警告。

△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致电黎元洪主张奉直停战，并陈办法四条。

6月14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例会，黎元洪出席旁听，提出三大要案：一、通令各战区即日停战谋和；二、组织裁兵委员会；三、裁减各部预算。

△　吴佩孚致电黎元洪辞陆军总长。

△　廖仲恺应陈炯明电约前往惠州领取款项，甫抵石龙即被扣留，旋被押送到石井兵工厂监禁。廖被囚禁62天之久，经何香凝等营救始得释放。

6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当务之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战斗"。

△　北伐军前锋进入吉安，各县属纷纷组民军响应，声势大振。赣督陈光远弃职逃走。北伐军在韶关大本营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并分配任务：一、第二军第一师及福军各部，分两路向万安前进；二、滇、赣北伐军沿河左岸，向万安前进；三、第一路军由上犹、社溪圩等处进占遂川，与以上两军实行夹击。

△　孙中山特任谭延闿为全湘讨贼军总司令。同日，委任丁惟汾为山东中国国民党支部长，王用宾为山西中国国民党支部筹备处处长。

△　叶举受陈炯明密令，于广州白云山总指挥处召开军事会议，

策划围攻总统府。会议决定以熊略为攻城指挥官，指定洪兆麟部首先发动。会后，由叶举、洪兆麟、陈炯光等联名通电，迫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

△　黎元洪令，各省疆吏迅戢兵戎，力维国是，前方各队，一律停止战争。

△　黎元洪特任董康兼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特任汪大燮为平政院院长；特任罗文幹为大理院院长；特派张耀曾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特任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侨务局总裁郭则沄准免本职，持任饶汉祥为侨务局总裁；任陆徵祥为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

△　黎元洪令江西督军兼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准免本兼各职，江西全省军队着均归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节制；江西省长杨庆鋆准免署职，特任谢远涵署江西省长；调任韩国钧为江苏省长；调任王瑚为山东省长；交通大学校长陆梦熊准辞兼职，派关赓麟为交通大学校长。

△　北京国会参众两院分电各省长，称两院定于8月1日继续开会，请转知各省在籍议员于7月10日前到京。

△　浙江督军卢永祥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自称“军务善后督办”，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20日，又宣布：一、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涉；二、所部各军防地，暂仍其旧；三、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各机关均仍旧；四、合法政府成立，全国裁兵计划确定后，再实行裁兵；五、各军饷项及关于军事各项经费，仍在国税下开支。

△　曹锟、吴佩孚召开保定会议，决定：一、南北统一，与卢永祥、陈炯明谋疏通；二、与赣、湘、川及东三省和平停战；三、改组政府，以拥黎元洪为第一期，以组织正式政府为第二期，以选总统为第三期；四、废督裁兵，设若干军区，区置军区长。

6月16日　　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是夜，陈派4000军队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幸脱险，抵海珠海军司令部，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计议应变戡乱之策。随后，宋庆龄亦脱险，与孙中山会合。

△　黎元洪任戴陈霖为驻瑞典兼驻挪威、丹麦特命全权公使。

△　北京政府召开财政会议，财政总长董康报告财政收支状况，谓：预计所必须之行政费，及必不可少之军费。每月共需350万元，中央直接有收入之希望者每月亦不到100万元，所欠250万元，财政部实无法可想。会议讨论如何筹措250万元之法，决定：一、整顿盐税收入，每月可得数十万元；二、整理关税，每月亦可得数十万元。

△　徐世昌嘱前公府收发处处长朱宝仁向北京政府财政部催索积欠公府经费，共计242.7万元。

6月17日　孙中山改登“永丰”舰，亲率海军“永翔”、“楚豫”、“同安”等七舰由黄埔出发，炮击白云山叶举之总部。同日，广州政府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陈炯明。魏邦平、伍廷芳偕往黄埔谒孙中山，孙命魏率第三师协助海军收复广州，但魏按兵不动。胡汉民获悉陈炯明叛变，率大本营人员离韶关。

△　美洲华侨国民党员致电孙中山云：“闻粤变群情大愤，请速率大军，攻复广州”，“侨中民信赖我公，愿尽力接济，望公奋斗到底。”

△　黎元洪电请李烈钧、伍廷芳、章太炎来京，“共谋统一”。

△　旅京赣人代表谒黎元洪，请直军及蔡成勋一同撤回，由李烈钧主赣自治。

△　奉直双方由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王承斌、杨清臣代表直军在秦皇岛英国军舰“伽柳号”上签定和约八条，附约两条，规定双方自19日起撤退军队，直军司令部撤回天津，不得向东三省界内进兵；奉军出关，两军于三日内撤完。

△　黎元洪令：公布《市自治制施行日期及施行区域令》；京都市定为特别市，市自治制自是年9月1日于该市施行；京都所有市政督办各职应即裁撤，市自治机关未成立前由内务总长暂行兼理市政事宜。同日令：驻瑞典兼驻挪威特命全权公使章祖申着留京另候任用。同日又令：谢远涵未到任前，江西省长着何刚德暂行护理；江西督军一缺着即裁撤，督军署结束事宜责成何刚德妥筹办理。

△　京津汽车路竣工。

6月18日　黎元洪令直隶省长曹锐准免本职，特任高凌霨为直隶省长；特任张绍曾为陕西省长；特任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署奉天省长袁金铠着开缺另候任用，特任王永江为奉天省长。

△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孙中山，对陈炯明叛变表示愤慨，要求孙中山调海陆各军相机讨伐。同日，民治急进社通电谴责陈炯明“背叛民国，围公府，逐议员，动摇国本”。同日，美国华侨致电孙中山云：“炯明祸国，侨众共愤，请速诛，并继续北伐，侨等誓为后盾。”

△　陈炯明运动海军内变，未逞。陈并致电伍廷芳转请孙中山下野。

△　《民国日报》发表《中国女子救国会宣言》，指出：“本会以使女子对于国家负维持及发展之责为宗旨。”

△　北京政府司法部宣布取消《报纸条例》。

△　交通银行召开股东大会，改选张謇为总理，钱永铭为协理，施肇曾为董事长。

6月19日　孙中山密令李烈钧等守赣，其他各路北伐军迅速班师回粤，讨平叛贼；并派副官马湘赴港，筹措粮食、燃料及军费。

△　广东省议会与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请孙

中山下野”，迎陈炯明回省，并电请孙、陈双方停止战争。海军总长汤廷光要求各舰勿向广州开炮。

△　古巴华侨国民党支部致电孙中山，要求讨伐陈炯明。

△　东三省商工联合会通电反对“裁兵废督”，略谓：“东三省原有军队，一时断难迅裁，绝非废督裁兵四字宣言所能解决”，“所有东三省数十万军队，若非张公出而统率之，实不足以维系人心，现由三省省议会公举张公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陞为东三省保安副司令，以靖地方而维秩序”。

△　旧议员约90人在北京中央公园开会，宣布不信任颜惠庆组阁。

△　北京八校紧急会议，向黎元洪请愿，要求即日撤高恩洪代教育总长职。

△　广西沈鸿英通电请北京政府明令任命岑春煊为广西省长。

6月20日　黎元洪令特设立甄用委员会，以甄选停薪人员，特派平政院院长兼充委员长，各部次长兼充委员；特设立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特派顾维钧为该会委员长；筹备国会事务局着即裁撤。

△　北伐军李烈钧部分五路进攻南昌。

△　陈炯明部翁式亮、杨坤如等军进占韶关，大肆抢劫。

6月21日　汤廷光、叶举、魏邦平三人以陆、海军联合名义布告，要求停战，并吁请“孙中山下野”。同日，广州政府海军官兵各举代表，至“永丰”舰谒孙中山，表示决心讨伐陈炯明军。各舰长并联名通电，否认汤廷光具有代表海军同叛军议和之权力。

△　王永江致电北京政府，宣布不受奉天省长之任命。

6月22日　黎元洪令：前驻湖南岳州及在湘军队着即撤防，由警察维持秩序，毋庸再行驻兵，所有撤防暨善后各事宜着责成吴佩孚、萧耀南、赵恒惕等妥筹办理。同日令：任命汪大燮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同日又令：前代部务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钟世铭款项不明，着交法庭依法办理；经手参战借款之曹汝霖、陆宗舆均着交法庭依法办理。

△　北伐军将领电复孙中山，表示即行回师广东靖乱。

△　黄埔附近乡民千余人组织义勇队，与海军共同保卫黄埔。

△　王正廷通电各省，为民办胶济铁路招股储金及一切筹备事宜，向各界劝募。

6月23日　驻京各国公使暨代办拜会黎元洪，递交照会，承认北京政府。

△　孙中山派郭泰祺、刘成禺至香港令邓泽如筹集经费。同日，任命赵汉一为讨贼军别动队司令。

△　川军军实审查会曾于20日为召开各军事会议致电各军将领征求意见，是日，川军第一军长但懋辛、第二军长杨森复电赞成。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复渝各法团电，亦赞同在成都举行会议。为此，成都组织军事会议筹备处，推邓锡侯、赖心辉为筹备主任，由但懋辛、刘成勋、喻培棣、何光烈、余陈唐、陈国栋等通电各方。

△　广州政府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在陈炯明叛变时受惊，翌日即病，入东山公医院，旋闻叛军大肆淫掠，怒甚，病势日剧，于是日病故。

6月24日　黎元洪令直隶省长高凌霨准免本职；特任王承斌为直隶省长；同日又令批准王正廷呈报筹设胶济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交交通部查照。

△　孙中山于“永丰”舰上接见香港《士密西报》记者，申明照常行使总统职权，表示“誓必戡乱，以谢国人”。

6月25日　广州全体海军士兵加入中国国民党，填誓约，以表示服从孙中山始终不渝之决心。

△　孙中山密令粤军第二军、滇军、福军及粤军第一师返粤平乱。26日，各军由南安、信丰向南雄回师。其他各军归李烈钧指挥，暂驻赣境。27日，粤军第一师长梁鸿楷到达信丰后，潜往惠州与陈炯明会合。

△　中国国民党海外同志非常通讯处主任陈树人等，通告海外同志，宣布陈炯明叛乱罪状，吁请踊跃捐款，支持讨贼救国。

6月26日　孙中山致书刘成禺，委托全权办理和赣之事。

△　驻津英领事要求美、法、日三国总领事急开四国领事会议，质问北京政府，何以对直军妨害铁路交通之举置诸不问。28日，四国公使开会议决由四国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要求，无论中国何项军队，对于《辛丑条约》均应严守，不得任意破坏天津、山海关间之交通。

△　新疆督军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新疆裁兵29营。

6月27日　黎元洪任命罗文幹兼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　北京政府财政部自是日起发行“九六公债”。

△　胡汉民自韶关抵赣州，召集北伐军前线各将领开会，决定班师回粤救难。

6月28日　曹锟通电斥责兼代教育总长高恩洪任意迟发教育经费，高恩洪负气辞职。教育界致电曹锟表示感谢，并望其“帮忙到

底”。

△　吉林头道沟日本领事分馆遭到武装袭击。30日，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并云“为保护本邦人命财产起见，特由朝鲜方面派遣日警若干名，以谋应急之救济”，要求中国政府“火速督励地方官吏保护日本侨民”。

△　广东各界推广州卫戍司令、第三师师长魏邦平为省长，魏辞不就。

6月29日　孙中山拒绝黎元洪电邀北上之请，坚持戡平叛乱。

△　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自奉化经上海，于是日抵粤，谒孙中山于“永丰”舰。

△　“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会开会议决，青岛海关完全归中国管理，但仍用日语及保全日本特殊利益。

△　中国代表李垣就外蒙问题与苏俄驻京代表巴伊开斯会谈，巴坚持召开中、俄、蒙三方面会议。

△　苏俄外交部致函中国新任驻莫斯科总领事沈崇勋，通告将派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

△　唐继尧响应赵恒惕、陈炯明关于联省自治之主张，通电提议召开联省会议。

6月30日　黎元洪派陆徵祥、黄荣良为国际联合会代表。

△　孙中山下令加强黄埔戒备，防止叛军夺取长洲炮台。同日，陈炯明部用武力逼迫粤海军陆战队缴械，发生战斗，陈军溃败。陆战队收缴陈军快枪500余支，机关枪八架，集中黄埔。

△　吴佩孚通电军事收束，将于7月1日回洛阳“奉职治军”，并声

明不干涉政治。

△ “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二部委员会“铁路股”今日开第一次会议，发表公报，谓已商决下列数事：决定铁路问题讨论之手续；估计铁路产业价值；办理铁路产业移交事务等。

是月　　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主编之《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

7月

7月1日　　黎元洪迁入公府办公，并发布命令，表示尊重地方自治，略称：国会“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

△ 北京政府内阁总理颜惠庆通电就职，表示勉维国事至国会开会，并请全国助成统一。

△ 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持陈炯明手书谒孙中山乞和。孙谓，陈军退出广州，恢复政府，可和。魏邦平亦来谒，表示愿帮助调解。孙中山提出：一、6月15日袭击总统府事，陈炯明必须道歉，并惩办军官；二、广州恢复总统府。

△ 陈炯明控制下的广州议会通电赞成“统一”，并请孙中山下野。

△ 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发出通电，表示对废督裁兵之意见：一、各省区召开国民废督裁兵大会，请北京政府下令永远废除督军制及军区制；二、组织裁兵委员会，限制国军饷额；三、督军等官如不解职实行废督，国民应即与宣战，实行抗税罢市等。

△　上海工商研究会、国货维持会、全国工商协会、粤侨商业联合会、华侨联合会等八团体，发起裁兵联席会议。同日，粤绅商组织地方自治会，通电赞成统一，裁兵废督。

△　湘督赵恒惕通电主张建设联邦制之国家，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赵另有长函致曹锟、吴佩孚，论述“联邦制对中国有利无害”。

△　陈炯明通电赞成联省自治，并拟定“建设大纲”，通电西南各省，征集意见。

△　安徽高等审、检两厅职员，因欠薪九个月，是日宣布停止受理民刑诉讼案件。省长许世英召集职员开会，表示愿暂筹6000元。要求职员上班，但财政厅因无款可支，“无法遵办”，后决定由城内外各钱庄担任借款。

7月2日　　旅沪国会议员杭辛斋、凌钺等80人集会，发表宣言，反对“北方武人，嗾使三五不肖，冒集国会，拥黎（元洪）僭位”；并指斥陈炯明“称兵作乱，图覆国本”；主张“应由大总统（按：指孙中山）行使国会赋予职权”。

△　孙中山在“永丰”舰召集各舰长说明应坚守黄埔等待北伐军返粤之理由，各舰长表示服从。同日，孙中山任徐树荣为别动队司令，守卫黄埔。

△　北伐军回师入粤，决定由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组成三路军讨伐陈炯明，准备进攻韶关。

△　陈炯明至石龙，部署所部堵截张开儒、黄明堂及各路北伐军。

△　唐继尧在云南召集西南会议，到40余人，陈炯明亦派代表黄汉生参加。唐于会上提出结束护法，拟订最新同盟，研究是否施行联

省自治等四项问题。次日，致电黎元洪，废督销兵，“至以后大政如何进行，宪法如何制定，并请早定大计”。

△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以裁兵促进会理事身份具呈黎元洪，要求实现废督裁兵践言，并建议发明令：一、从是日始，无论如何情形，不得新招一兵；二、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三、即日召集全国裁兵会议。

△　旅京江西同乡在江西会馆开会，到者300余人，要求：一、撤退江西客军并罢免援赣总司令蔡成勋，请李烈钧回赣维持全省治安；二、惩办陈光远、杨庆鋆。决议所有两院赣籍议员悉数退出国会，并由赣省3000万人民援助李烈钧以武力收回江西。4日，旅京赣籍省议员谒见颜惠庆，请撤回蔡成勋，颜允商曹锟酌办。5日，旅鄂赣人集会亦要求北京政府撤蔡成勋、常德盛军，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

△　吴佩孚于是日率部返郑州，与冯玉祥、张凤台会晤。

△　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开紧急会议，议决即日函催北京政府财政部，将所有积欠经费于最短期发清。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正式成立。会长林伟民，副会长钟筱朋。该会简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研究工业、维持生计、增进知识为宗旨。

△　辛亥革命时日本调驻汉口的陆军数百人是日运载回国。

7月3日　　张作霖召开东北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对北京政府守中立态度，不接受任何方面之命令及调解，并认真训练三省军队。会后张作霖向北京政府提出东三省政治十大原则，其要旨为：东三省暂时实行地方自治；东三省地方收入，全数划充地方政费；张作霖有暂行任免东三省文武官吏之权；东三省军权完全归保安总司令节制等。

△　国民裁兵促进会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由宣传部长林长民报

告该会成立经过。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分别为青岛公有财产和海关问题设一分委员会，由中日各派委员三人。

△ 日本外务省公布6月28日吉林头道沟日领事分馆被马某部下武装袭击之经过。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并为此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同日，北京政府国务院电吉省当局，嘱即查明陈报，又电令孙烈臣省长赶速查明办理。7月5日，日使又提出第二次警告，谓：“日本政府鉴于从来之经验，认为保护日侨一事，不能完全委诸中国方面，故特令若干警官驻扎必要之地点”，并声明“将来遇紧急必要之时实行出兵”。7日，孙烈臣向北京政府报告头道沟案经过及处理情形。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日使称，已电令吉督迅速回吉，办理善后事宜。10日，张作霖派奉天第十一混成旅与吉林第十九旅、第五旅及吉林独立团前往讨伐。14日，黎元洪下令将孙烈臣交付惩戒，并责成吉、奉两省军警迅将肇事“匪徒”严缉重惩，妥慎保护外人。

△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省议会开会，来自全国各省百余人参加，蔡元培致开幕词。

7月4日 黎元洪特任齐燮元为宁武将军，萧耀南为炳武将军，冯玉祥为扬武将军，熊炳琦为昌威将军，哈汉章为廉威将军。

△ 广州政府海军司令汤廷光、副司令温树德宣言赞成统一，请孙中山下野。

△ 十四省以上国会议员凌钺等280人致电孙中山，略谓“应责成我大总统严令海陆军限期剿灭叛贼，恢复秩序，并将陈炯明褫夺军职，拿获到案，押往军前，处以极刑”。

△ 广东国民大会通电讨伐陈炯明，略谓：“陈逆者，乃广东之祸首，亦西南之罪魁也。”“惟有联恳我省各县公民出而主持正义，组织

义军，一致声讨。”

△　广西自治军第十三路司令钟明雨通电，宣布由省议会及各界推举岑春煊为广西省长。6日，广西自治军第四路司令余明健通电，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加以任命”。

△　北京政府组织之清理财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由顾维钧主席，共通过16条议案。

△　全国农业讨论会在济南开幕。会员到者百余人。田中玉、许德一、黄炎培、梁启超均出席，并分别演说中国农业问题，介绍美国农业状况。

△　川督刘湘通电，声明自本年4月1日开始，将全川解省之肉税划作教育经费，独立专支，由各县教育机关直接征收。

△　秦皇岛直军司令部撤去，所有人员均返洛阳。

7月5日　　陈炯明再次派陈惺可登“永丰”舰谒见孙中山求和。孙中山以陈无诚意，严词拒绝。同日，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派人登舰，商议调停，提出：一、陈军退出广州省城，二、恢复政府，三、北伐军停止南下。孙中山允之。7日，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亦派陈家鼎持函往谒孙中山，请孙中山重新组织政府。孙中山表示叛军如真有悔过诚意，可予以自新之路，但须陈炯明先撤出广州百里以外，将省城交还政府。

△　滇军张开儒所属范石生旅占领广西梧州。6日，该部队在广东封川击退叶举部粤军。9日，张开儒部1.3万人抵梧州，孙中山派廖湘芸往迎。张部自梧又东下入广宁，经四会攻三水。

△　四川第二军杨森部向忠州第一军但懋辛部进攻。7日，但军由忠州退梁山。10日退守绥定。11日，成都第一、第三两军开军事会议，推刘成勋为临时总司令，并由但懋辛通电组联合军，刘分派邓锡

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各军往攻杨森第二军大本营重庆等地。

△　徐元诰应旅京赣人之电请抵京，请求黎元洪下令自赣撤直兵，尊重孙中山意旨。

△　北京政府接蔡成勋电，称北伐军至今尚未停止攻击，南昌已陷于包围状态。参陆处电请曹锟加派援军。6日，曹一面复电答应增派援军，一面连续电催董康拨款百万元，发放欠饷。

△　旅沪赣籍同乡会、赣民自治促进会等公团致电孙中山，请明令前方各军暂行停战。

△　桂林自治军总司令梁华堂致电黎元洪，请命沈鸿英返桂主持军事。同日，广西财政厅长杨愿公由驻梧州军队推为广西代理省长。

△　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董康提出财政计划：一、固定预算为每月政费150万元，军费150万元，清室优待费10万元，预备费20万元，共330万元；二、由中国及各国银行共同设一垫款期限，定此期限为一年，一面将盐余之一部、烟酒税、崇文门税、印花税、所得税等款，贮蓄以备偿还之用；三、为监督收支起见，当组织一特别审计委员会。

7月6日　　孙中山以手书致北伐军前线各将领，命北伐各军从速回粤定乱。

△　黎元洪令派项骧、严璩为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沈瑞麟、孙丹林等14人为委员。

△　黎元洪令免湖北省长刘承恩职，以汤芗铭继任。

△　吴佩孚致电北京政府，就裁兵问题具体提出：大省置二师，中省置一师一旅，小省置一师，全国共置40师，余悉裁撤。

△　北京政府外交、财政、农商三部合组商约研究会，电各省商会派员参加。

△　蔡元培、梁启超等致电北京政府，请求将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拨作教育经费。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一、裁撤日本邮局问题；二、关于海关之分科会，决定中日委员名单，中国方面有陈銮、安格联、梁上栋。

△　远东银行在上海开办，资金5000万元，天津、南京各设分行。

△　驻保定之直系二十三师下级军官因要求曹锟停派该师往赣及请发欠饷等事，是晚9时发动哗变。旋由曹锟发饷三个月，事始息。同日，热河亦发生兵变。

7月7日　　吴佩孚电复唐继尧，反对召开联省会议，主张统一问题应由国会解决。9日，吴电蔡元培等，反对联省自治。12日，再电唐继尧，反对召开联省会议。18日，曹锟、吴佩孚又电复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

△　赣公团派代表赴京向黎元洪、曹锟、吴佩孚请愿，反对蔡成勋军就地筹饷。次日，赣商会、银行公会电请北京政府速撤北兵，并推罗人骥、谭章为息兵赴京请愿代表。

△　河南教育会、农会、省工会、总商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等团体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军阀增兵索饷，吁请明令颁示额定豫军，此外驻豫各军，或令他调，或另筹饷。

△　颜惠庆、顾维钧、董康与外国使团面商延付庚子赔款事宜。

△　“鲁案”第二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日本代表允诺中国派人往胶

济铁路练习实务。

7月8日　黎元洪令孙传芳加陆军上将衔。

△　安徽周松圃、李次未等组织之废督裁兵会成立。同日，四川组成废督裁兵请愿团，并通电。上海工商界20余团体组织之裁兵促进会，发表宣言。次日，旅沪安徽废督裁兵协会成立。

△　是晚，“海圻”、“海琛”、“肇和”等三舰附逆驶离黄埔。孙中山下令其余各舰自黄埔上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通电反对北京政府秘密进行四路大借款，并电告外国银行团，“在中国未统一国会未完全行使职权以前，勿为借款，以长内乱”。同日，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痛斥王正廷“营私误国”，“赞成新辟八商埠”，“任用袁良及亲日派”。

7月9日　陈炯明部钟景棠亲率苏世安部，由鱼珠炮台向长洲炮台攻击。因海军陆战队孙祥夫所部降叛军，长洲炮台失守。孙中山命令各舰集中新造村，准备进攻车歪炮台。次日，双方炮战于车歪炮台，孙中山之坐舰“永丰号”受弹，舰尾被创。孙中山亲率“永翔”、“宝璧”等六舰冲越叛军炮火封锁，进泊省河白鹅潭。

△　吴佩孚派参谋长李济臣见黎元洪，声明不愿就任陆军总长；并表示在国会未成立以前，应维持内阁现状。

△　北京政府与法国公使签定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办）新约。条约规定，该行以庚子赔款充改组之用，银行业务只限于远东方面，管理董事会设于北京，公司资本总额为1500万法郎。

△　安徽阜阳县有大股溃兵约1500人，自中午放火烧至次日午后三时始止。幼童、妇女死伤100余名。17日，婺源县有形似军队之千余人占据县城，驱逐知事。

7月10日　粤海关英籍税务司登“永丰”舰会见孙中山，竟以白鹅潭为通商港口和毗邻沙面为借口，提出舰队驶离白鹅潭及孙中山离粤之无理要求。孙中山严词驳斥，指出：“此为我之领土，我可往来自由”，并表示“吾只知正义公道，决不受无理之干涉”。

△　广州政府海军司令汤廷光致函孙中山，请停止攻击陈炯明，愿负责调停，孙中山复函允之。同日，孙中山电谢海外各地华侨接济军饷，并请继续支持。

△　北京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宪兵司令车庆云等向北京政府财政部合呈催饷，代理财政次长项骧已不敢到部办公。

△　浙江旅京同乡会于7日曾致电卢永祥，促其先撤退客军（北洋军）。是日卢永祥复电谓，撤防须由北京政府指定地点，方可实行。该会又召集同乡开会，决定推代表与北京政府交涉，坚决要求撤客军。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开第四次会议，讨论公有财产事宜。日本代表介绍青岛市内外公有财产情况。13日，“鲁案”第一部委员会开第五次会议，日本代表提出青岛公有财产之详细价目。次日，“鲁案”第二部委员会开第五次会议，日本提出铁路增加财产总目共值2818.9212万金元，由中日派定代表组织铁路财产评价分委员会以审查之。17日，一部第六次会议，中日各指派人员，组织公产分科委员会。

7月11日　孙中山慰劳海军将士，表彰车歪海战功绩。

△　汤廷光、魏邦平为调和孙、陈战事，发起召开“海珠会议”。会上提出三大纲：一、由孙中山、陈炯明通电设和议机关，商讨全国统一问题；二、对陈不能用武力；北伐军不能向广州作战，叶举不能向军舰进逼；三、双方军队暂离广州市。议决函孙、叶请先答复。次日复开议，由洪兆麟之代表黄维藩传达叶举之答复：一、许军分三路

由曲江、仁化、翁源攻韶州，粤军不能不以武力对抗；二、如许军、滇军能退出南雄，再磋商。魏邦平代孙中山答复，谓先解决之问题为：一、恢复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原状，始向北议和；二、叶自请处分，由孙下令赦免。会议终无结果。同日，海军各舰长对“海珠调和会议”不满，纷纷发表宣言，要求广州叛军于两日内撤离省城百里外，并将广州市交还军政府管辖。

△　北伐军与陈炯明部叛军战于韶关。北伐军猛攻数日，未能击破陈军防线，转成相持之局。

△　广州电力、自来水和铁路工人为反对陈炯明霸占广州，举行联合罢工并发出宣言。

△　新任讨贼军湘军第一路司令陈嘉祐致电湘当局声明暂不与闻湘事，即日出发赴广东边境，与北伐军协同讨伐陈炯明，并声明取消以前北京政府任命之第六混成旅名义。

△　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开幕，委员长顾维钧演说，略谓：政府负债太重，入不敷出，已濒危境，本会以清理为入手，分四股办事，先行从事调查。

△　蔡成勋电告北京政府：沈鸿英、常德盛、周荫人等连日击退北伐军，并请吴佩孚亲临督战。曹锟又电请北京政府财政部，速筹援赣军费100万元。同日，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通电痛斥蔡成勋“作福作威，勒饷增兵，一心主战”，“实为统一之障碍”，“和平之公敌”，誓不与并立。江西省南昌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亦通电，拒绝直军入赣。

△　湖南长岳镇守使吴新田自陕南汉中驻地电告北京政府，陈树藩勾结川、陕土匪，进扰陕南，经派队痛击，陈军败散，陕南已告肃清。

7月12日　海军“永丰”、“永翔”、“楚豫”、“楚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长率全体官兵发表宣言：限广州陈炯明军退出百里之外，以广州完全归还吾政府自由处置。

△　吴佩孚电第二十三师师长张福来，岳州撤防延期履行，俟援赣军到，即加入编制。

△　北京政府派张孝若（张謇之子）前往欧美考察实业事宜。27日又令张赴日本一并考察。

△　北京成立女权同盟会。该会宗旨为要求宪法上明白规定女子与男子完全平等。北京警察厅援引《治安警察法》条例，禁止成立该会。

7月13日　甘肃省长潘龄皋因与议会冲突离职，是日，北京国务院电告甘肃督军陆洪涛，令教育厅长林锡光接印视事。

△　南路讨贼军司令黄明堂通电宣布出师讨伐陈炯明。

△　驻锦西奉军第二十七师兵变，溃散400余人。15日，江西丰城豫军杨营，亦突于夜间哗变，打毁电局，焚烧商铺百余家，刀伤多人。28日，江西丰城常德盛所部兵变。

△　湖北公民团三四百人集合于省议会请愿，随即游行，挥舞小旗，拒汤芗铭，“欢迎萧督军兼任省长”。至省长公署，前省长刘承恩被迫交出省长印信给萧辉南督军。29日，汤芗铭率卫队到汉口，往见萧耀南，遭拒。同日，拒汤派公民在督署开会，推萧耀南兼省长。萧即布告就省长职，并电告黎元洪。

7月14日　北伐军许崇智部以韶州难克，变更作战计划，一面仍攻韶关，一面分出军队由曲江抄袭翁源，以主力袭击英德，抄陈军之后路。18日，许军第一支队克复翁源。次日，由于陈炯明部分三路反攻，许崇智军失翁源，向始兴退却。20日，许军张民达部再收复翁

源，旋又复失。24日，黄大伟部又收复翁源。同日，许军另一部、黄旅一部，分兵攻惠州，占领五华、兴宁两县。27日，北伐军进克黎洞、大坪。28日，陈军对北伐军下总攻击令。

△　赣南北伐军赖世璜通电责蔡成勋违令反攻，并宣布赞成自治。

△　滇军张开儒函梧州各界，对粤事守中立。

△　浙督卢永祥电唐继尧，赞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

△　吴佩孚派高等顾问余道南抵京谒黎元洪，表示绝不轻诺赴赣；陆军总长主持裁兵之大权，不便久悬，应请另派信任之大员接替。

7月15日　吴佩孚召开洛阳会议，决定援赣：一、以张福来部假道平江入赣抵御赣西；二、以胡景翼之陕军第一师沿长江南下，由九江直达南昌；三、电请齐燮元拨兵一旅，就近赴赣协助赣南兵力。同时电萧耀南，整备运输，更密电北京政府，索款50万元充军费。

△　广州公路处长陈达生（陈炯明族弟）被枪击，刺客逃逸。陈于16日殒命。

△　北京政府陆军、内务、财政、农商等部职员800余人，组成索薪团，至国务院向财政总长董康索八个月欠薪，遭董辱骂。职员愤而殴董致伤，当场有万文藻、万重成、刘逸仙等八人被捕。董提出辞职。次日黎元洪亲自慰留。17日，董带伤赴保定向曹锟诉苦，部务由项骧代理。27日，财政部员工因董康屡假不到部，项骧亦不负发薪责任，宣布全体停止办公。

△　鲁督田中玉致电黎元洪，坚持征丁漕税。电谓：“今奉大令，理合即时截止”，但“东省财政，困穷已达极点”，“除支无存，兹奉令伊始，欲还原款，前已支出，无可抵补”。

△　王孝英、石淑卿、周潘、万璞等在北京发起女子参政协进会，是日在北京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筹备大会，大会主席王孝英作报告，要求“政府解放两性之间一切限制，还女子以完全之自由，使政治社会各方面之活动与男子有同一之权力”。大会并议决：一、发表宣言；二、致电全国女界，促其一致行动。27日，召开新闻界大会，重申要求“宪法上男女之平等”。

7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宣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提出了最高纲领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会议于23日闭幕。

△　孙中山任命欧阳格为海军临时总指挥。

△　蔡成勋密电北京政府，请阻止欧阳武等赴赣调解。

△　张作霖将巡阅使署与督军署合并，正式组成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设立七处：参谋处、副官处、军务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秘书处。张作霖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任副司令，改驻长春。

△　美国海军总长登白抵京，颜惠庆、李鼎新与驻京美使前往欢迎。17日，黎元洪宴请登白及夫人。20日，登白专车南下，临行时对记者大讲愿华盛顿会议精神在中国永远保留。26日离沪赴马尼拉。

7月17日　　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发表裁兵计划书。提出：一、裁兵须先废督；二、废督裁兵以后不可改设军区。具体办法有三端：一、定军制及每省设训练处；二、定将校官俸职给银法；三、筹备被裁士兵之生计。

△　苏俄驻京代表巴伊开斯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苏俄政府“业经允准本代表回莫斯科，派越飞为全权，使与中国政府商议一切”。27日，越飞自莫斯科启程赴北京。

△　哈尔滨总商会、滨口商会、钱业公会等致电张作霖，反对日商在哈尔滨设立交易所。电谓日商设所，“势必垄断市场”。

7月18日　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封闭。不久，书记部即由上海迁至北京，设立总部，主任为邓中夏。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等地，亦设立分部。

△　中英商业联合会会长致书各报，表示经英国政府同意，拨庚子赔款，招引中国留学生。

7月19日　孙中山派陈策、李安邦率三舰及民军数船攻前山炮台，为陈永善部击散，战舰一艘被夺。

△　黎元洪特任刘镇华为阜威将军，孙传芳为恪威将军，张福来为景威将军。

△　陈炯明部叛军潜放水雷谋炸“永丰”舰，未逞。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电张作霖，饬其即日将扣留之机车50辆及货车1000辆全数交出。一面令山海关以北之京奉路英国服务人员，全数即日撤回。21日，英国服务人员全部回关内。

△　滇军张开儒率所部由黔入桂，拟赴粤与孙中山部会合，在柳州地方与桂自治军林俊廷冲突，即驱逐林军，占领柳州。23日，张电请孙中山助款。

△　四川议会电责孙传芳“带队入蜀”，并揭发孙与杨森勾结。电谓：川省既宣言自治，川事川人决之，刘、杨弄兵横池，业就荡平，勿劳远道垂念。倘其不明顺逆，助彼穷寇，摇荡我边疆，我7000万父

老子弟誓与同命。

△ “鲁案”中日第一部委员会，在外交部开第七次会议，协议事项：一、由日本委员提出青岛日本居民团体应保有之财产目录；二、中国委员对于前记财产目录发表意见，自第一项至第十四项之财产，交分科委员会审议，第十五项之财产下次再议。

7月20日 护法议员旅京通讯处尹承福等通电，反对王家襄、吴景濂恢复民六旧国会。指出：“今日国会自当继续八年开宪法会议，方与维持法统之意义相符。”“王家襄初既不肯南下护法，七年七月，国会在广州续开常会，又不肯到院出席，自是绝于国会也。今以国会能在北京集会，遂与吴景濂出其把持手段，谓自今日始，国会继续六年六月十二开会……贻误国家，将酿出不可收拾之局。”

△ 黎元洪令：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着追赠海军上将，特给恤金一万元，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

△ 江苏公团联合会通电声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毁法弄兵十大罪状。

△ 北军援赣总司令蔡成勋在赣州向北伐军发总攻击令，命近畿第一师及第一混成旅，由正面追击，徐德生豫军及沈鸿英桂军由侧面进击。22日，蔡电告北京政府，先后占领太和、万安、遂川等地。24日，蔡又电请北京政府拨饷60万元。

△ 驻北京公使团领袖公使就裁兵问题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谓：“中国近日情形，不但与华府议案大相违背，即与贵国黎元洪总统鱼电主张，亦相径庭，对内对外不符之处甚多。”“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贵当局应如何应付补救，俾国际信用不至堕落？！”颜惠庆答称，各处添招新兵之事，无不严电阻止，“藉慰友邦之望”。

△　日本商人在哈尔滨所设之取引所（即交易所）开幕。哈尔滨总商会、钱业公会等团体于17日致电张作霖提出抗议。电谓："哈埠精华以钱粮业为中坚，倘钱粮业为其所夺，势必以金钱政策垄断市场，非徒哈埠商业为所操纵，即北满命脉，且永远断绝"，"恳请严重交涉，哈埠商民当为外交后盾。"

7月21日　黎元洪任命雷光宇为上海南洋大学校长，俞文鼎为唐山大学校长，全绍清为唐山大学分校校长。

△　江苏督军齐燮元因呈准回籍奔丧，给假一月，乃于是日电呈北京政府，以参谋长刘玉珂代行职务。

△　"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在外交部召开第二部第七次会议。会上，中国委员提议铁路评价须按交通部铁路会计规则办理，日本委员不允，另提出铁路增加财产查定标准五条，双方争议颇烈，遂决定先交分委员会，审查后再议。

△　黑龙江省议会发表通告，云："本省依据张总司令三省自主之宣言，实行联省自治，于七月二十一日特开紧急会议，议决在省宪未制定以前，推定本会议长梁声德代理省长职务。"

7月22日　孙中山致电慰劳北伐军将领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等。

△　北京报界开会议决：一、向国会请愿取消出版法，另订报纸法律；二、请国会建议对新闻界规定邮电减费办法。

△　章太炎、曹亚伯等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除四川、云南、湖南均有代表与会外，又有旧议员多人参加。

△　驻京比利时公使艾维滋赴北京外交部表示，已接到本国电令，同意中国缓付庚子赔款一年。法国指定以庚子赔款大部为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之用，其中小部分用于教育方面。英国议院正就此项赔款

进行讨论，亦有充作教育经费之意，不赞成全数充作政费。日本则惟欧西各国之马首是瞻。

7月23日　旅沪国会议员彭养光、杭辛斋等180余人发起组织“法统维持会”，开成立会于上海法租界尚贤堂，发表宣言，反对王家襄、吴景濂在京恢复（民六）旧国会，私戴黎元洪，诡称恢复法统之举。

△　湘督赵恒惕派唐文彬、李正常到鄂，与张福来商订湘、鄂联防办法。25日，赵恒惕派武装警察500余名，实行接管岳州以北地方，并接收各机关。张福来率所部由岳州回驻郑州，从事训练。岳防事宜完全终结。

△　汉阳铁厂800多工人，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反对当局解散工人俱乐部、无理开除7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经过四天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厂主答应工人如下要求：一、承认工人组织工会。二、照发停工期间之工资。三、恢复俱乐部；所开除工人一律复职。

△　留日学生总会为头道沟事件通电国内，抗议日本派警进驻吉林头道沟，呼吁“国人一致奋起，共同反对，挽主权而保国疆”。

7月24日　北伐军黄大伟部协同黄国华旅复占翁源，与陈炯明援军对峙。

△　奉军李景林奉张作霖命，率三支队进驻山海关附近。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开第八次会议。中国代表建议，将日人占据胶州时经营之事业及各项工程设施，提交华委审查。日本代表请中国给予保护市场、赛马、击球、教育、医院等各种事业订合同、租地权力，中国代表表示凡此诸事，均在青岛市政范围，须续加讨论。

△　北京外交团以东三省、江西各省截留盐税，向北京政府提出责问；并声称“如政府无法解决，将与各省直接交涉”。

△　北京政府陆军部直辖八机关职员派代表开会，要求财政部发欠薪。

△　鄂督萧耀南派代表李作栋向中央索还鄂省官钱局自民国元年以来为中央所垫款项1900余万元。

7月25日　黎元洪以高恩洪交通部务殷繁，令准辞兼代教育总长职，着派次长汤尔和暂行代理部务。

△　张作霖以保安总司令名义致书盐务稽核处，声言从本月13日起，东三省之收入全部充东三省政费，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亦不受现北京政府之命令。

7月26日　黎元洪任命李嘉品为将军府将军。

△　陈炯明军与由江西回粤之北伐军在韶关、始兴、翁源一带激战，洪兆麟派遣四个营抵御北伐军，并亲往北江督战。

△　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开会议决：一、以后关税收入，除为赔款及善后借款支出者外，剩余之款全由总税务司保管，充作公债基金；二、以前之公债基金，政府不得动用；三、关税增加之一部分，作为“九六公债”基金。

△　河南教育界联名致电曹锟、吴佩孚，要求“克期指定专款，永作教育基金，不为军政各费所挪用，不使教育有破产之虞，青年有失学之苦”。

△　曹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每月将京汉路收入中拨80万元解送保定，作为军费。

△　浙江教育行政研究会在教育会开会，会长叶谦，教育厅长马叙伦致词。大会决议：一、以增加关税拨充教育实业支配案，公决付审查；二、请预定“庚子赔款”退还后，充教育基金案，亦付审查；

三、指定学校试行新学制；四、改校长委任制为聘任制。

△ “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召开国宪草议委员会，到者章太炎、张君劢、温少鹤、蔡俊卿等十余人。会议决议，改原定一院制为上、下两院制。

△ 众议员蔡达生列举黎元洪罪状，提出弹劾案：一、毁弃约法；二、屈于威武，淫于富贵，任人傀儡；三、今日之国会不能行使质问权，查办权，选举权，立法权，建议权。

△ 四川第一军因省军攻击杨森第二军大本营之重庆，亦转取攻势占领泸州。次日，杨森通电刘湘请息兵。28日，吴佩孚命卢金山入川，助刘湘作战。

△ 直隶、京兆突发大水，波及40余县，永定河两岸田地均被冲毁，南北铁路交通被阻。

7月27日 黎元洪令准兼署外交总长颜惠庆呈外交部务拟请派次长代理，着派沈瑞麟代理部务。同日又令考察欧美实业专使张孝若赴日一并考察。

△ 温树德致函孙中山劝其“早期离粤，并饬永丰四舰早期归队”。同日，“海圻”、“海琛”、“肇和”三舰驶出虎门。

△ 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在中国大学开招待新闻界大会，到会北京各通信社、各报馆记者约20余人。30日发表宣言，提出：一、推翻专为男子而设之宪法，以求女权之保障；二、打破专以男嗣为限之袭产权，以求经济之独立；三、打破专治家政之教育制度，以求知识之平等。该会决定8月1日开成立大会。

△ 吉林市各界人士2000余人举行大会，抗议日本修筑天图铁路及在哈埠设立交易所、办滨江电车。次日，省议会又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向日政府抗议。

△　北京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日本撤兵西伯利亚后保护日侨办法。

7月28日　东三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谓日本要求筑天图路，办滨江电车，设取引所（交易所），有碍主权，请向驻京日使严重抗议。

△　八校教职员联席开紧急会议，讨论教育经费问题，由尹炎武主持，要求北京政府同意：八校经费于关税实行值百抽五后，按月由关税收入项下拨付32万元。

△　上海美国邮局自是日起不收邮件，所有寄往美国信件，概由中国邮局寄递。

7月29日　北伐军在韶关失利，全线退却。自22日起，双方在韶关附近激战。北伐军迭获战绩，但因久战疲劳，缺乏械弹，加以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陈修爵部突投叛军，牵动全线，而造成总退却。30日，各军退至始兴江口，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亦退却。

△　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颜惠庆向黎元洪递交辞呈。黎谓在国会未实行开会以前，现状有维持之必要，派饶汉祥劝留。新任教育部次长汤尔和因主张由关税实行值百抽五中拨付教育经费29万元一案未获国务会议通过，乃拂袖去职，是日赴西山，表示无复职之意。同日，北京国务会议再将此案提出通过。

△　众议员李庆芳提出撤销清室帝号及优待费商榷书。

△　曹锟函催吴佩孚，派人速向意大利商人交涉订购价值564万元之军火。

△　安徽废督裁兵会开会，决议："废督裁兵之事，必本省人自为之，不借外力。"

7月30日　孙中山任命徐天琛为讨贼军别动队司令。

△　张作霖取消东三省盐务所，限洋员交卸，北京政府盐务署无法制裁。

△　吴佩孚致电北京政府财政部代蔡成勋催饷60万元。

△　颜惠庆于晨10时赴西山，声言养病，托饶汉祥告黎元洪，如阁事有办法即回，黎商王宠惠暂代，王允，颜于次日得讯即回京。

△　王承斌就任直隶省长。与曹锟约，暂任两月，期满仍回任师长。

△　陕军师长胡景翼因所部团长王占标擅收土匪不服解散，命令派队勒令缴械，双方开战，王占标战死，事即平息。

△　驻京美使请中国派有学识之人才，前往参加于檀香山召开之“太平洋商业经济会议”。

△　山东各公团电请北京政府撤王正廷，以吕海寰、赵尔巽、柯凤孙监视“鲁案”会议。

7月31日　黎元洪特任王宠惠为代理国务总理。

△　曹锟、吴佩孚联名电复参众两院江西议员，声称自停战令颁以后，对赣“未增一援兵”。

△　江西省议会、教育会等各团体代表40余人，是日为赣事往见黎元洪，提出三项要求：一、撤销援赣总司令，惩办蔡成勋；二、撤退所有援赣各军；三、严令阻止其他军队南下援赣。黎答称：“余于赣事极望和平解决，所请三项，余均赞成。”

△　汉口各团联合会为省长问题，召集特别会议，到者26个团体代表。议决三项办法：一、通电全国声明对萧耀南兼省长并未与闻；

二、将唐克明、石星川等少数退伍军人收买无赖于29日当街行凶情形，通电全国，俾明真相；三、汉口各团体一致吁请北京政府速令萧移交省长职，俾汤芗铭正式履任，以维鄂局。同日，汤芗铭在商场督办处大宴绅商各界。绅商议决，一面电京否认萧兼省长，一面组织各法团联席会议，限三日内筹备完竣，召集大会研究省长问题，如不得解决，将采取罢市停税行动。

△ 湖北高等检察厅奉北京总检察厅令，票传前省长刘承恩到案质讯，刘避入日本医院，旋逃他埠。

△ 京奉路自是日起开行直达车。

是月　　大中华兴业公司上海分行开幕。该公司为旅美华侨所组织。1919年设总公司于芝加哥，资本为美金20万元，现扩充为美金50万元（约合华币100万元），上海分行主要为国内办理进口货及推销出口货。

△ 申新纺织无限公司在上海设立，股东代表荣宗锦，资本300万元。

△ 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自请将所部裁撤，北京国务院复电不允，谓事关全局，应俟规定办法，再行着手裁减。

8月

8月1日　　第一届旧国会在北京集会，参众两院由王家襄、吴景濂两人分任主席，宣布此次开会，“系继续六年二期常会”。会上议员姚桐豫等数十人提议，此次国会应先行从事制定宪法，暂停行使其他一切职权。

△ 王宠惠拒绝就任代理国务总理，并辞司法总长职。

△　汤芗铭致电北京政府，叙述抵武汉接任湖北省长职遭萧耀南抗拒之经过，并云萧已宣告摄省长职务。黎元洪接电后，除派哈汉章赴鄂外，令汤仍留鄂勿去，并电庄蕴宽令其查办此事。

△　孙中山电复海外国民党支部，勉以续助军饷。

△　唐继尧因贯彻废督主张，改组云南政府，于是日就省长职，撤销靖国军司令名义。

△　赣督蔡成勋电称：成立督理军务公署，一切如督军署旧制。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所创办之《少年》月刊出版。陈延年、陈乔年等负责出版工作，周恩来曾于第二期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该刊约一年后改名《赤光》。

8月2日　旅沪国会议员时功玖、茅祖权等100余人发表宣言，否认北京国会，略称："王家襄等自六年国会非法解散以后，或为伪廷官吏，或为非法议员，或于七年国会正式开会延不到院，经参众两院依法宣告解职，或自行辞职，经院议许可，议员资格，久经丧失，不得组织国会。"并郑重声明："依法解职之人所凑合之伪参众两院，根本不能成立，所有一切行为，当然无效。"

△　夜，九江常德盛部及陈光远旧部十二师一团步兵共700余人，因索饷不遂哗变，烧抢商店200余家，损失约300万元。

△　自是夜至3日晨，潮汕平原台风过境，平地水深丈余或数尺，路轨多毁，电线不通。汕头死者数万，澄海、饶平、潮阳三县死者达7000人，伤者不计其数，不少堤围溃决，田园被淹。

8月3日　北伐军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北伐军曾于英德县属黎洞下游与陈炯明军连日激战，一度击溃陈军；1日，于马坝击败陈军钟景泰部，此后形势急转。2日，江西蔡成勋军三面包围北伐军所据之赣州；广东方面，3日晨陈军杨坤如部攻下江口。北伐

军首尾受敌，饷弹不继，不能再战，决定分东西两路撤退。许崇智之第二军、李福林之福军及黄大伟部入赣东，再图入闽；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入湘边，再图入桂。李烈钧本人则赴沪养病。

△　山西阎锡山偕调查团400余人，乘专车赴平定，作实行自治计划之调查。

△　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在中国大学开成立大会，到会女会员200余人，并有各界来宾10余人参加，美国纽约《新共和报》记者毕斯烈及江亢虎、林长民、王世杰等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北京警察厅援引《治安警察法》条例“女子不得加入政治结社及政治集会”规定，禁止成立该会，该会临时改为讲演会。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借口“延边中国军警防卫不力”，拒绝撤除该地日警。

△　“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会在外交部开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如下：派公产委员即赴青岛调查，惟关于日本既得权利问题，双方于是否合法一层发生争执，日本委员主张凡日本所已取得之权利皆属合法，无讨论之必要。

8月4日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会见来访之何成濬，令赴闽联络延平镇守使王永泉，请接济许崇智军子弹，与之合作驱走督军李厚基。

△　陈炯明部占广东南雄。同日，蔡成勋军占江西赣州。

△　江苏省长韩国钧，召集全省代表开财政会议，议决核减军费，并发行公债700万元。14日旅京江苏同乡致电韩国钧，反对发行公债，并电上海银行公会嘱勿承受。苏同乡并推代表赴北京政府财政部，阻止核准该项公债。财政次长张英华接见代表，允准查账并提交

国会。

8月5日　黎元洪致众议院咨文，补行民国六年7月向国会正式辞职手续；并咨文众议院，宣布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经过。

△　黎元洪令署国务总理兼署外交总长颜惠庆、兼代内务总长署农商总长张国淦、署财政总长董康、陆军总长吴佩孚、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兼代教育总长署交通总长高恩洪均准免本兼各职；特任唐绍仪署国务总理。特任各部总长：外交顾维钧、内务田文烈、财政高凌霨、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张耀曾、教育王宠惠、农商卢信、交通高恩洪，唐绍仪未到任前由王宠惠兼代国务总理。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福建理事黄东鹗通电，列举事实否认北京之国会。电谓：一、民国七年所解职之议员，均已丧失议员之资格；二、第一届大总统任职期早满，黎元洪无职可复。

△　长江海员为华商轮船局拒不执行增加工资之条件，在“中国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参加罢工者有宁绍、同裕、三北、裕丰等大小20多家轮船公司，轮船60多艘，海员3000人以上。此次罢工坚持21天，停驶轮船达40艘。最后资方被迫增加工资三成，罢工取得胜利。

△　上海闸北各丝厂女工约一万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待遇，参加女子工业进德会。在警察和资本家压迫下，罢工三天后归于失败。

△　曹锟、吴佩孚致电黎元洪，反对撤回蔡成勋军。

△　湖北旅京各界联合会在湖广会馆开临时大会，讨论湖北省长问题，对萧耀南提出三条罪状：一、公然反对中央命官；二、以鄂人而反对鄂人长鄂；三、伪造民意，自兼省长。

△　吉林省城四周，自入月以来，连日大雨，4日傍晚雨势更剧，至5日午刻始止。房屋坍塌者约百家左右。吉长铁路被水冲坏五六十里，火车停止通行。松花江水位高二丈有奇。满江木材漂流东下，总数约达20余万根，损失约500万元。

8月6日　　陈炯明军在乐昌击败湘军，占领仁化、乐昌。陈嘉祐部已退回湘省。

△　旅沪粤人召开公民大会，反对陈炯明。大会致电孙中山，要求孙速赴公府，行使职权，维持秩序；致电粤总商会，要求该会“速行欢迎孙大总统上陆，维持秩序而保治安”；并致陈炯明电，指责陈“甘心卖友、背党通敌”，令其“速解散叛军，恢复公府，欢迎孙大总统行使职权”。

△　英人擅划云南边界之片马为缅甸之县治。北京政府外交部电唐继尧查复核办。

△　曹锐“因病”辞直隶省长职，王承斌接省长印。

8月7日　　6日至是日，吴佩孚曾通电反对唐绍仪组阁，并指名反对张耀曾、卢信入阁，谓张入阁“有碍川、滇、粤统一”，斥卢为“交易所诈财流氓”。8日，复致电议员金永炎，表示反对唐、张、卢组阁。

△　王宠惠致唐绍仪电邀其北上，电云：“国会重开，内阁亟待正式成立”，“授命宠惠暂时承乏，勉维现状，敬候高轩”，“唯望我公早日莅职”。

△　川军第三军邓锡侯部入重庆。驻渝领事团以德领事为代表，曾于4日出面调停川军纠纷。省军以第二军退出重庆，杨森下野，第二军不再反攻，北军不入川为条件，第二军不允。6日，第二军派员向省军议和，同意让出重庆。是日邓锡侯部入重庆，邓锡侯、赖心辉代行川军总司令行营职务。杨森退向夔、万。同日，刘成勋接任川军

卫戍司令职。

△　赣省代表约同旅京及各省赣人赴北京国务院请愿，要求撤出赣省客军并罢免蔡成勋。

△　北京外交团同意发给北京政府关余50万元，于是日一次拨齐。并规定此款充留学经费与北京专校经费各半，不得充作行政经费及军费。

8月8日　王宠惠晨9时就教育部总长职，10时到院就代总理职，并发就职通电，出席国务会议。新阁员到会者还有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张耀曾，交通总长高恩洪。

△　黎元洪任命张金标为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

△　北京参议院开议黎元洪补行辞职案，以黎单向众议院提出咨文不合法律手续，议决将咨文退还。

△　吴佩孚致王宠惠贺电云："公任阁揆，苍生之幸，望勉任艰巨，以慰群情。佩孚仰望高贤，谨当以全力为公后援。"

△　程潜由沙面登"永丰"舰，劝请孙中山离粤，另谋进取。

△　陈炯明部粤军黄强、黄业兴等部由北江回省。以翁式亮守韶关，杨坤如守南雄，谢文炳守乐昌，李云复、罗绍雄守翁源，陈炯光守始兴。

△　贵州总司令袁祖铭通电宣布接受81县"公民大会"公举为贵州省长，并"拟于本月内择日正式就职"。

8月9日　孙中山于下午离"永丰"舰，乘英舰"摩轩号"离粤赴香港，蒋介石等同行。孙中山对随行人员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并通电前方将士，令李烈钧率"各省之义军集合粤境，同心戮

力，讨此逆贼”。

△　北京众议院议员姚桐豫发表意见书，主张速在上海开南北统一会议，南北两方对等选派同数代表，共同解决时局上一切重要问题，如废督、裁兵、理财等。

△　北京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长吴佩璜通电，历述电政已濒破产，所负外债已达极点，全国电政收入及营业权，将抵押尽净，急宜开源节流以图挽救。

△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住宅被法国捕房拘捕，经中法会审官协商后，判决罚洋400元，于18日下午交保释放。

△　张作霖委任袁金铠为中东路督办。

8月10日　　旧国会开第一次宪法审议会议，参议院议员出席139人，众议院议员出席325人。修改民国六年草案之“地方制度”一章。

△　黎元洪令准交通大学校长关赓麟、唐山大学分校长全绍清辞职，以邵恒濬任唐山大学分校长。

△　陕督刘镇华通电声明：“现将全省商税三十五处统作为学校用途，无论军政各费如何艰窘，丝毫不得挪移，而棉捐收入，仍旧拨充留学费用，以示竭力提倡之决心。”

8月11日　黎元洪再次向国会提出补行辞职咨文。

△　5日和7日，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先后曾为教育经费问题向教育部请愿。是日，八校校长及教员数百人，又赴教育部向总长王宠惠索薪，王未见，散去，宣布次日将去国务院索薪。次日晨，王接见代表，允下星期三前解决教育经费问题。

△　台州发生飓风，历30小时，毁坏甚大，城乡内外，一片汪

洋。

△　澳门交涉事件久未解决，葡人托商会调停，中方提出条件20则，未得结果。

8月12日　吴佩孚电促孙传芳入川，孙赶编五个混成旅赴川援助杨森，是日下动员令，并暂设援川司令部于云阳。

△　张作霖招待奉天英、美商行代表，发表演说，略谓于直奉之战，志在“统一”，并责英人不守中立，助吴抗奉。

△　改造湖北同志会张孑余、孙明哲、左国栋等通电，提出关于湖北问题之建议：一、废除省长制，改行民选合议委员制，执行省政；二、废除现有省议会及省议会法，实行普通选举；三、撤销驻防军队，组织民兵。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向导》创刊于上海。

△　苏俄政府代表越飞率随员24人抵京。越飞一行于9日抵哈尔滨时，曾对记者发表声明，强调中俄建立友睦关系之必要。是日抵京时，有21个民众团体集会表示欢迎。13日晚，越飞宴请记者。

△　下午3时，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请愿团在北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发起人提出该团之要求为：一、联省民主；二、女子参政；三、贯彻信教自由；四、教育独立；五、劳工保护等项。

△　袁祖铭通电全省公民大会就任贵州省长，所设定黔军司令部即行取消。

8月13日　汉阳兵工厂2600多名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军警开枪镇压，打死工人三名。工人愤而爆炸机器一部，斗争结果取得部分胜利。

△　《民国日报》载北京国务院下令严禁以下七种书籍：一、《平民宝鉴》；二、《官场揭隐》；三《政府秘密大观》；四、《新知识》；五、《民国正义》；六、《治世要诀》；七、《下士衣食》。

△　女权运动同志会在北京招待报界、学界，会议主席周敏报告开展运动之方法：一、发刊《女权运动号》；二、学理讲演；三、实地调查。北大校长蔡元培、教授曹敏、黄日葵、谭仲逵、李大钊先后发言，宣传女权运动。

△　讨贼军黄明堂率部在广东高州独立，向化州方面进展，叶举令黄强率部往“剿”，两军接战。陈炯明又调陈德春、钟景棠所部，赴高州攻黄明堂。19日，黄明堂部退向廉州，集中合浦。20日，黄强率部入北海。21日，黄明堂由高州攻阳江，陈军30营急援，22日，滇军张开儒部入钦、廉，助黄明堂。

8月14日　　孙中山抵上海，随同到达者有汪精卫、陈策、蒋介石、陈群、黄龙等。在上海新码头欢迎者有40余团体，千余人。下午，孙中山召集会议讨论时局问题。

△　黎元洪派黎澍、刘钟秀二次赴沪请孙中山北上。

△　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电萧耀南，嘱萧转告赵恒惕阻北伐军入湖南境。当日晚，萧耀南宴湖南代表朱懋辛、周明，出示蔡电，请转达，并派蒋姓参谋持函星夜随朱、周赴湘。

△　庄蕴宽谒见黎元洪，详述赴鄂查办刘承恩舞弊证据，共约3450余万元，内由萧耀南手付给直系2700余万元。

△　长沙各校校长因欠发经费七个月，召开校长会议，常德、衡阳、辰州、永州各公立学校校长，亦因经费问题联名呈请辞职。此后，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任凯南与其他14所公立学校校长，以

经费困难亦联名辞职。湖南省政府无法，出面慰留，并允解决经费问题。

△　北京外交团会议，决定立时照会北京政府，允加拨关税30万元，充紧急政费、海道测量费与接收威海卫公署经费。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议决组织邮电分委员会，中国派孔祥熙等六人，日本派矢野真等八人为委员。17日，第十五次会议，中日双方同意海关分委员会之报告。

8月15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宣布陈炯明叛乱始末及解决国是之主张：一、护法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目的；二、实施6月6日宣言所说之“兵工计划”；三、发展实业；四、尊重自治，惟不容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17日，又发表内容基本相同之对外宣言，宣布和平统一中国的计划。

△　黎元洪令农商次长江天铎暂行代理部务。

△　陈炯明回广州，在白云山召开军事会议，自任粤军总司令。陈一面规划粤省善后，一面着手于联省自治，分途联络赣、粤、湘、浙、黔、滇各省。

△　吴佩孚电请王宠惠任总理，谓：“超然内阁非公莫属，万请出任艰巨……必以全力为公后援。”

△　赵尔巽奉黎元洪密令调解直奉矛盾，致电张作霖，希望张“顾全大局，表示让步，变更联省自治”，“将前方军务，全部收束，各路军队，尽数调回”。

△　黎元洪特召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在延庆楼议警卫北京事项：一、将驻北京第九师移开北苑；二、派王怀庆所部十三师填驻于北苑；三、京师以内除游缉队、宪兵及警察外，不得驻守其他军队。

△　广西省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就桂省各军总司令职，调各军集邕州分三路出发，左路马晓军攻南乡，右路韦冠英由梧州攻浔州，中路刘自率部由郁林攻陆川，拟肃清全省。连日平南、南乡均有战事。广西自治军韩采凤由邕进攻柳州，同卢焘部在迁江剧战，19日逐走卢焘，占领柳州。

△　川籍参众两院议员为反对直军入川，特致电吴佩孚，“速止前令，撤退入川之兵”。

△　上海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发出通电，表示对于国宪之意见。其要点为：一、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国防军不超过20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省政府岁出20％；四、各省军队改为民团；五、限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六、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联省政府及省政府皆不得当选为首长；七、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

△　湖北旅京同乡300余人召开大会，议决派代表赴国务院请愿，要求解决省长问题。25日，再次赴国务院请愿，并要求萧耀南交出省长印信。

△　苏俄政府代表越飞会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是日递交国书。18日，对北京报界代表发表谈话，抨击英、法各国，并云：“武力与资本及侵略主义者终必失败，而被蹂躏之弱国宜团结以抗之。”同日，北京学界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10余人，设宴东方饭店招待越飞。席间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相继发言，越飞亦有恳切之答辞。

△　孙中山电复国民党古巴支部，告以“来沪谋中国统一计划”，并勉续助军饷，以竟全功。

8月16日　黎元洪令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严璩

准免本兼各职，以张英华接任，并暂代理部务。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制订之《劳动法案大纲》19条，在《工人周刊》及其他报纸、杂志发表，号召全国工会展开劳动立法运动，《大纲》中心要求为：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权利，对工资福利、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等问题，也提出具体要求。《大纲》发布后，各地工人纷起响应。唐山、郑州、长沙等地工人开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并通电全国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大纲》。

△　章太炎、谭延闿为四川内战问题联名通电，谓："吴佩孚拥众洛阳，自谓北方第二政府，特派孙传芳为援川总司令，以两师两混成旅入川，预定川事得手，设长江上游总司令部于重庆，现渝、万虽复，而吴氏侵略之志未衰，又复纠合秦、陇，规出川北，煽惑黔军，冀其响应。所以图川不遗余力者，非特报十年北伐之仇，实以铲西南自治之本。西南无川则湘孤，而滇、黔无屏蔽；粤、桂虽远，自在掌中矣。吴之兵略，只以远交近攻为主，诸公不欲自存则已，如欲自存；对手西南联省，不应徒以空言相结，其必同伸义愤，一致拒吴。"

△　张作霖致黎元洪电，痛斥吴佩孚，略谓："仆一介武人，何仇于吴，视吴氏亦不过区区后进小子而已，乃竟敢欺我太甚。近者吴氏对于中央用人行政，种种把持，挟元首而令督军，欺人民而图私利，各大官吏苟非同系，一律排斥，内阁问题，更受其支配，太阿倒持，大权旁落，实为中央抱恨。"

△　是晚农商总长卢信抵京，次日到部接任，并拟定罗家衡为次长，江天铎提出辞职。

△　吉林督军孙烈臣向北京政府报告，中国军队在头道沟一带已布置妥贴，当催日本自延边撤警。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驻京公使，已派刘符诚为撤废客邮会主任委员。

8月17日　孙中山宴请驻沪国会议员。黎元洪、曹锟派遣来沪之代表黎澍、李繁昌、刘成禺、孙岳等出席。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有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这次会议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　旅京赣籍团体代表200余人，赴北京国务院请愿，要求查办蔡成勋违抗北京政府命令，不肯停战，软禁省长谢远涵，纵容九江兵变，勒索军饷等罪行，要求罢免蔡成勋之职务。王宠惠面允下令查办。国务会议即将查办案通过。赣人散后，由于直系反对，国务会议又将该案取消。

△　吴佩孚电复参众两院川籍议员，否认派兵入川。

△　四川旅沪同乡倪克明等百余人致电川中各将领，反对直军入川。25日复集会通电再次反对直军入川。

△　北京国立八校校长蔡元培等及教职员代表，根据北京国务会议决议教育经费归交通部拨给为由，至交通部向总长高恩洪索取积欠经费，自朝至暮，毫无结果。蔡元培等八校校长因即呈请辞职，并通电全国各界。当日晚，高恩洪因避八校索薪，亦辞职赴天津。19日，八校教职员开全体会议，决定派代表向国务院要求即日下令罢斥并严惩高恩洪，责成交通部速发积欠经费。20日，八校教职员通电申述至交通部索薪情状。21日，八校代表往见黎元洪，黎未见。同日，高恩洪回京并派吴佩璜见黎，商讨取缔教职员索薪对策。22日，黎接见八校代表，声言今后经费按月拨发，所有积欠全部补发，劝各校代表“勿走极端”。代表不满。同日，蔡元培等八校校长上第二次辞呈，

25日上第三次辞呈。同日，各校分别召集全体会议，议决教职员全体总辞职。30日，八校校长上第四次辞呈。同日，黎元洪指令，教育经费由财、教二部会同交通部解决，推翻由交通部解决之原议案。

△　黎元洪令派汪大燮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　在日本之16名华工无故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此后，22日日邮船“八幡丸”抵沪时，又载有被迫回国之华工40余人；25日又有华工23人被迫回国。据报载，在日华工总计约2500余人，日本政府已强迫彼等贮蓄，一俟其贮足回国川资，即实行驱逐。

8月18日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指使该部职员以八校教职员代表逼索经费为由，提出总辞职书。

△　黎元洪令上海南洋大学校校长雷光宇准免本职，任命卢炳田为该校校长。

△　中日撤邮会议在交通部开第一次预备会议。

8月19日　在国会宪法审议会上，出席议员466人，有393人赞成省之权限采取概括主义，中央取列举主义。

△　王宠惠呈请辞职，由黎元洪退还，次日继续辞职，并前往西山。

△　黎元洪特任林锡光署理甘肃省长。

△　成都卫戍司令部以“造谣通敌，捏造谣言，摇惑军心”，“随声附和，颠倒是非”罪名，查封《川报》、《国民公报》两报馆，逮捕两报总编辑宋师度、李澄波。

8月20日　北伐湘军陈嘉祐部返湘，赵恒惕派叶开鑫、唐生智两旅往宜章、永兴、桂东一带防堵。26日吴佩孚电赵恒惕，促其速以重

兵解除陈嘉祐、李明扬等部武装。28日，叶开鑫、唐生智两旅御战均败，陈部抵衡州。长沙紧急戒严。赵恒惕决定取消自治，投靠直系。但各方讨赵声甚高，赵仍恐吴佩孚派援不及，已将眷属送沪。

△　越飞在北京发表宣言，愿交还库伦，并要求解决中俄边境驻兵及中俄通商问题。23日，继续同顾维钧谈判，商洽中俄会议之进行问题。

△　河南赵倜旧部3000人攻克商丘，全城被劫，并掳去法国工程师二人、希腊教士一人。

△　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发起之“民治促进大同盟”，19日于船山学校开会，决定于是日举行市民请愿大游行，请省议会“毋为势屈，毋为利诱，务选出非军阀之人为省长”。是日长沙市民近二万人，至省议会请愿，齐呼：“打倒武人政治”，“拥护民权”等口号，由议长林支宇收受请愿书，许完全容纳其意见，众方整队离开议会游行。

△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正式开会。社员到者40余人。由主席张謇致开幕词，梁启超、马相伯演说。22日下午举行第一次社务会，由杨杏佛主席。

△　川军第二军大败，杨森逃宜昌，残部窜鄂属施南一带。

△　北京政府高等军事顾问日本中将青木宣纯请假归国，于今日抵日本门司。日报各新闻记者特往询问对华意见。青木宣纯竟主张“国际共管中国”，且断言“本年中（国）必有大乱”。

△　香港《农报》编辑部出版《陈炯明叛国史》。

8月21日　孙中山为组织力量讨伐叛逆问题同徐树铮会谈，同意其共同攻闽要求。孙并电嘱胡汉民前往延平与王永泉商合作攻闽条件。

△　广州政府财政次长廖仲恺，曾被陈炯明诬陷逮捕，因无证可查释放，于是晚抵沪。

△　黎元洪特任王毓芝为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同日批准该事务署督办一职“仍复旧制”。

△　北京参议院召开第五十六次常会，议长王家襄主席，出席议员138人。拟议事项为：一、黎元洪辞职咨文；二、外交部来咨：万国议院商业委员会请派员赴会问题。结果二项均未讨论。

△　晨，王宠惠返京，又往协和医院“调治眼疾”。张英华迄未敢到部，仅在盐务署办事，北京政府财政部事务无人主持。

△　北京国务院秘书厅因欠薪五个月，今日午后停止办公。并议定：一、封锁国务院大小印信；二、停止收发公文及电报；三、封锁会议厅，停止办理会议各事项；四、各科处无论大小事项，一律停办。22日下午，发一月欠薪，始恢复办公。

△　吴佩孚电促高恩洪即日回京，毋庸辞职，并表示对于事实上之困难，当以全力为之后盾。是日高恩洪由北戴河回京，派吴佩璜见黎元洪商谈取缔教职员索薪办法。

△　越飞之秘书库治纳诺夫访外交部秘书朱鹤翔，再次要求订期会见黎元洪。同日，北京新潮社、晨报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少年中国学会等14团体联合宴请越飞，到会七八百人。苏俄代表团并发表声明书，说明来京之目的。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中日各通告派接收行政分委员会之委员。

△　华人207名，被荷兰政府遣令出境，是日乘“安本号”轮船赴香港。

8月22日　齐燮元、卢永祥、王宠惠均派代表到沪，孙中山将于下星期中与各代表谈话。

△　护理江西省长何刚德致电北京政府辞职。

△　北京外交团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项通告：一、中国政局纷乱已极，各国在此纷乱政局期间，决不能对中国政府为财政上援助；二、外交团善意劝告中国政府，宜极力速谋全国统一；三、张作霖之截留盐税及东三省之外交状态，外交团认为违反条约，要求中国政府确实答复；四、届期外债本息，要求中国政府速行支付；五、各省兵变频发，故要求中国政府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须切实保护，并要求损失之赔偿。

△　中国驻横滨领事为日本驱逐中国侨工事，向日警署提出质问，留日中国学生亦表示不平。

△　四川刘成勋发表通告，谓："查川省和平之局，实为杨森一人所破坏"，"前总司令刘湘，已由成勋电饬前方，派队护送回籍，并令各军查照陆军定制一体崇敬。"

8月23日　黎元洪就国务总理问题电复吴佩孚，谓：颜惠庆在职期间"虽无殊勋，亦无大过"，然为各党所不容；"独卜少川，佥无异议"，"酝酿两旬，卒成定案"。目前，"唐揆来否，尚未可知"。即使唐肯来亦不妨暂观，如其"违众孤行"，"彼将自蹶"，"预摈何为"？

△　上午黎元洪邀集顾维钧、孙丹林、张耀曾、张绍曾、卢信等开临时会议，讨论总理问题，决定：一、在国会未将唐阁同意案解决以前，仍挽留王宠惠代理，继续维持现状。二、催国会方面速将唐阁同意案提付众议。下午，顾维钧、张绍曾同赴医院，劝王宠惠维持现状，王不允。

△　北京政府组织之国民监督财政委员会，公布北京政府财政情

况。计政费月应支300万元，而积欠已达4000万元；军费月应支600余万元，而积欠不下一亿元。至于长短期内外债款，除大部分系担保确实者不计外，其本息全无着落者，约三亿元。加以各银行垫款5000余万元，及已到期之国库券3000余万元，合计近四亿元。

△　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及中外来宾约计五六百人。

△　京绥路职工因要求北京政府交通部取消太康洋行合同无效，宣告脱离交通部，遭高恩洪派军警弹压，勒令路员照常办公并令捕拿闹事者。

△　王怀庆以军饷、政费无所措为由，辞卫戍总司令职，黎元洪慰留，王已出京。

8月24日　　是晚，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宴请报界人士，致词谓："中国现已过武力解决时期，而入舆论导进时期也。笔之为用，何殊十万毛瑟。诸君皆任笔政……请与全体国民共同奋斗进取，发明公理，宣释共和，监督武人，实现统一，斯国家之幸也。"

△　长辛店3000多铁路工人在工人俱乐部领导下举行罢工，断绝南北交通，粉碎军阀武装镇压，坚持两日，取得胜利。罢工工人共提出九项条件，主要有：增加工资，开除最坏之工头，争取工会有推荐工人权利等。此次罢工成为北方铁路工人罢工之起点。

△　外交部密函内务部，请饬京师警察厅选派干员，侦查越飞行动。

△　广西省长马君武因南宁为蒙人潜、林俊廷所据，特于是日在梧州设省署。

△　偿还内外短债委员会会长董康赴欧美调查商务实业，由副会长接续办理结束事宜。

8月25日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孙感到与苏俄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必要，并要马林向越飞转达如能实现同苏俄的联盟，将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允苏俄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以军事行动收复广州，建议应开展工农群众的宣传运动及接纳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等。孙中山接受此建议，并表示加入国民党可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旧办法。几天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拜会孙中山，并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

△　孙中山对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鲍威尔谈论中国之国际地位。谓："中国之内部政潮，欲求解决，必须先从解决财政入手，尤以解决北京政府之对外借款义务为特要。""赞成外资继续参加于开发中国富源及建筑铁路。"并表示："未觅到若干解决中国财政问题之方法以前，余不准备加入北京政府。""希望将中国欠欧洲之债移渡于美国"，"美国经济情形较良，中国或可取得较宽之条件及调整。"声明："凡北京政府所合法缔结并经国会最后批准之任何借款，余绝无否认之意。"

△　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于17日曾派兵赴西岸榷运局，强将该局收存之盐税50万元截留。是日，外交团派驻京日使小幡酉吉至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蔡成勋及张作霖等此类违约行为，加以严重处置。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云，已令张作霖即日将截留盐税交还，嗣后不得再有此"轨外行动"，对于蔡成勋"亦当即日严加调查事实真相，一俟查清，自当执相当处置"。

△　越飞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正式提议召开中俄会议。

△　"鲁案"第二部委员会续开第八次会议，决定各种财产审查标准：铁路改良及增修者，须能提高效力具有永久性质、机械上或地理上有固定位置为原则。

△　江亢虎在《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六号发表《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说明书》一文，提出“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不同之处作了分析；文中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新社会主义的特征。

8月26日　广东省议会开会选举省长，议员议论纷纭。议长陆梦飞与议员关文渊言语冲突，陆拔手枪击之，未中，秩序大乱。次日，广东省议会开紧急会议，将陆梦飞除名。28日，通过陈席儒任临时省长，陈炯明仍为总司令。

△　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一、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二、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

△　南浔路向日本方面借款250万元，以160万元付东亚公司旧债本息，余存路局，作为购办材料修理桥梁之用。

8月27日　越飞设宴招待中国国会议员、赈济俄灾会委员及教育界人士，赴宴者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刘式南、王葆真、胡鄂公、李季赓、邓洁民等10余人。越飞发表演说，表示：中俄两民族以平等友爱及互相尊重之精神，创始中俄间新纪元之条约。

△　沈鸿英根据吴佩孚授意，于19日通电反对联省会议，谓“联省会议之说”乃“亡国之言”。是日，吴佩孚复电表示赞成其主张。冯玉祥、田中玉、孙传芳、萧耀南、陆洪涛相继通电响应，反对联省会议，拥护国会速定宪法，与陈炯明、唐继尧、刘成勋、赵恒惕等主张在上海开联省会议者成对抗之形势。

△　女子参政协进会发表向国会请愿书，要求女子有被选为议员之权。

8月28日　黎元洪指令免除查办前湖北省长刘承恩。令曰：“据称（刘承恩）被控各节尚无确据，惟刘承恩在任年余，并无善政，现

在业经免职，应无庸议。”

△　曹锟致电北京政府催速发表蔡成勋督办江西军务。同日，赣籍国会议员，质问黎元洪自悖前言任蔡成勋督理赣省军务。

△　黎元洪以广东潮汕飓风成灾，令财政部迅拨帑银五万元交由该省办赈机关发放。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中国委员依据华会条约，提出收回矿山，中国不应偿价之意见。日本委员提出盐田偿金总额为780余万元。

8月29日　孙中山复函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延，解释护法要旨，略谓：“来函备悉。所提拥护中华民国、拥护约法、拥护国会三事，文频年所尽瘁者，诚在于斯。”并谓：“对于护法问题，以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亦即如来书旨意，以主义为归。”并勉为正义奋斗。

△　曹锟、吴佩孚致电孙中山，谓：“捧诵宣言，敬领宏旨”，“倘承不弃，时惠教言，则谋国有老成，匪独一二人之幸也”云云。

△　黎元洪以河南前督军赵倜暨其弟赵杰勾匪图乱，令赵倜着即褫夺原官、勋位、勋章，并赵杰一体通缉归案讯办。

△　孙中山委邓泽如为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　广东省议会通电，宣布陈席儒就省长职。

△　周自齐、董康赴美、法、英、日。此行任务为：一、中法银行在巴黎开会，尚有许多条约待商榷；二、中国财政枯窘已极，欧洲战后，损失亦不小，考察其如何救济之法；三、前往英伦考察其司法状况。

△　鄂督萧耀南派蒋秉忠赴湘，警告赵恒惕：一、取消联省自治主张，免碍统一；二、加派湘南防军，驱逐粤、赣军出境；并谓若再圆滑，洛方将助谭（延闿）回湘。

8月30日　　张英华由保定致电黎元洪，谓曹锟对内阁主留王宠惠，对军费支配，嘱向吴佩孚商，对高凌霨就财政总长职无表示。

△　顾维钧、越飞第三次会谈，次日第四次会谈，对库伦撤兵、中俄通商及日俄长春会议事，进行了广泛讨论。顾表示将于下月2日介绍蒙藏院长与越飞谈话。至于长春会议，北京政府不派员参加，但如涉及中国事项，非得中国同意决不承认。同日，英公使艾斯敦访顾维钧，谓越飞宣传过激思想，请中国严加监视。

△　孙中山召蒋介石赴沪，商讨对苏俄问题。

△　护法议员（即民八议员）45人赴众议院会场，要求见吴景濂，出席会议，遭拒绝。当日致电孙中山，谓："本日赴众议院出席，初则闭门禁阻，嗣始入院，多数议员允为依法解决，乞转同人到京，一致力争。并祈通电主持。"随后发出宣言。

△　冯玉祥、萧耀南、张锡元分别致电黎元洪，对内阁问题，表示拒唐绍仪、拥王宠惠，如王难留，请择外交人才为继。

△　王瑚辞山东省长。

△　晚7时40分，甘肃固原发生强烈地震，损失甚重。

8月31日　　孙中山答"东方社"记者，云："北方武人与余之主张接近，确为事实，但余非知其诚意如何，决不与之联络。苟有诚意，不论为张作霖，为吴佩孚，均可引为同志，国会问题，余主张恢复民八国会，至对陈炯明，余必按宣言膺惩之。"

△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拟定联省保安规约共20条，内容主要

为：东三省联合为一自治区，自治区内拟定规约，军民共同遵守；自治权由三省“人民”共主之；“人民权利义务”遵照旧约法；实行军民分治；省长由省议会选举；共同立法由三省省议会联合会行之。

△ 中日撤邮委员会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

是月 大兴纺织有限公司于石家庄成立，资本210万元，锭数2.4768万枚。

9月

9月1日 黎元洪令将第一届国会议员因政治关系被通缉之原案一律撤销。

△ 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严格限制京奉全路运送军队案。

△ 北京政府组织之修改税则委员会开第一次大会。英、美、法、日、比、意、荷、丹、挪、葡等十余国代表到会。由蔡廷幹主席。会议讨论此届修改税则后之实行征收期与现行值百抽五税率。25日闭幕。

△ 孙烈臣电告北京政府，日本撤退西伯利亚驻军，吉省已派军队增防中东路线。

△ 喀拉沁王谒黎元洪，陈述外蒙王公希望政府速派兵入库（伦），收回主权，王公愿为内应。12日，北京陆军部特组织蒙疆善后委员会，由张绍曾兼任会长。

△ 云南东陆大学兴建校舍，并推董泽为校长，王九龄为名誉校长。

9月2日 黎元洪特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特派萨镇冰前赴福建、安徽，李开侁前赴陕西、湖北，孙道仁前赴甘肃、新

疆，程道光前赴热河、绥远，会同各该军民长官查勘烟禁；特派孙丹林暂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又令现行各项奖券、赈券无论已否届期，自奉令之日一概停止发行。

△　黎元洪电催李烈钧北上。是日李抵长沙，将部队交李明扬统率离湘境，本人则于14日抵沪。15日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声明“在沪养病期间，不出席会，不复函电”。

△　北京政府兼代国务总理王宠惠呈请筹设政治善后讨论会，黎元洪指令照准。

△　在京护法议员120人于中央公园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发表“保持资格，维持法统，促成统一”等主张，呼吁新闻界主持公道。次日，旅沪护法议员60余人亦召开会议，议决留沪护法议员作北上之后援，发表声明时概用“法统维持会”名义。

△　川军军长但懋辛、刘成勋等通电全国，宣言：一、此次川中纠纷纯为内部问题，各军将领皆本从前宣言，承命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执行任务；二、各将领责任，限于川省以内之善后经营，以安定地方为职责；三、从前二军所派在各省之代表，不足以代表全川将领；各省正式派遣驻川之代表，请以军民首长所在地机关负责；四、川省僻处边隅，对于全国大势，多所隔膜，尚望时赐教言，俾作南针，苟利于国，主张以公，川人决不自外于国家。同日，刘成勋致电孙中山征求川局善后意见。

△　越飞致函顾维钧，提议根据1917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对华宣言原则进行谈判。同日，越飞偕随员14人离京赴长春，参加“日俄会议”。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参事朱凤鸣、邓洁民等送行，另派郑延禧、王鸿年赴长春照料“日俄会议”，惟不正式参加。

△　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请与莫斯科及远东代表商订任何条约时，当注重满洲人民意见。

△　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会议议决：一、要求拨付三个月教育经费，唤起群众舆论；二、宣布高恩洪推翻阁议、摧残教育等罪状。同日，八校学生代表赴国务院请愿，要求拨发教育经费，并请将高恩洪免职惩办。5日，教职员代表向黎元洪请愿。6日，蔡元培等呈国务院声明，“在未经领得三个月经费以前，绝对不能负责”。同日，八校教职员第一百五十次联席会议议决，即日致函王宠惠质问。7日，教育部会计科仅由财政部领到10万元，其余仍无下落。8日，教职员代表临时会议商讨继续争取经费及宣传学生参加读书运动事。会后散发传单，号召学生“起来向政府算账，向军阀算账”。

△　阎锡山在太原召集山西全省村范大会。各县知事、村长、村副及人民50万人应召与会。

9月3日　　孙中山复曹锟、吴佩孚8月29日电，重申“化兵为工之策，自信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并告诫曹、吴，“至冀守正不阿，一切依法解决，不为少数政客私见伪行所蔽，法统成立，纠纷自解，而国乃真可为也”。

△　吴佩孚召集鄂、鲁、豫各省代表开郑州会议，讨论对奉关系、南北统一、内阁、反对联省自治、援川军事收束诸问题。决发电暗示孙传芳：一、对于援川鄂军应即从速收束；二、凡已入川境之鄂军次第撤退，彼此不得侵犯；三、溃散之川军一律禁止窜入鄂境。川、鄂边防事宜，在川讧未大定前，应依旧特别戒严，不能疏忽。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工会代表为劳动立法事在北大三院招待国会议员。主席邓中夏讲话，要求在此次制宪中“为劳工规定权利”，“希望中国的资产阶级觉悟起来与劳动阶级携手，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提出要求之要点：一、工人集会言论自由；二、同盟罢工权；三、团体之契约缔结权；四、国际联合权；五、八小时工作；六、增加工资；七、改良待遇；八、参加工厂管理事务之权；九、工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国会议员蒋羲明等发言支持工人要求。

△　旅京江西国会议员在江西会馆开会，反对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

△　上海青年讲演会为纪念“国际少年日”，特请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青年问题。听众约200人。沈雁冰、杨贤江、高尚德、张国焘、张占刚等接续演说。最后大会通过：一、致电“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响应劳动立法及争取各种自由运动；二、中日与会青年组织民权运动同盟。

9月4日　　孙中山在沪召集各省国民党负责人会议，到会53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6日，孙指定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为丁惟汾、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等九人，并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　吴佩孚电请北京政府任杨森为旅长，率兵攻川。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盐场问题交分委员会审议。日方要求公产分委员会在青岛开议，以便迅速进行，中方允俟大会休会后在青岛开会。定本月7日起暂停大会，俟分科委员会议复后再议。

△　中南、盐业、金城及大陆四行联合发行纸币，并成立四行准备库。

△　“日俄会议”在长春开幕。

9月5日　　孙中山以黎元洪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后，撤销民六解散国会令，是日复函旅京护法议员，支持旧国会复会。

△　孙中山分函朱培德、陈嘉祐，令其联合刘震寰、黄明堂攻取桂林。9日，朱培德、赖世璜退出湖南，占领广西全州，向桂林进军。广西自治军梁华堂谋与陆荣廷旧部韩采凤合力抵御。

△　北京国会宪法审议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县制度之如何规定”。护法议员焦易堂、邹鲁、谢持等相继发言，质问王家襄民国八年在广州宪法会议已经通过之条文及审议会已经通过之地方制度各条文，审议长根据何种理由何种法律以取消之；此次会议何以不许护法议员代表进议场。王答语不得要领。众谓法律不明，所订宪法何能使国人尊信，王家襄谩骂，众哄上，殴王家襄，拉王正廷下台，无结果而散。同日，众议院警告议员，准6日开常会，随带徽证，否则不许入门，预防民八议员“捣乱”，已实行戒严。

△　张英华允代理财政总长职，要求三项条件：一、各机关不准动众索薪；二、交通部亏欠不负责；三、开各省代表会议讨论财政办法。7日，国务会议讨论张之要求，决定召集各省委员及各部委员速开财政会议，并取缔聚众索薪。8日，张到财政部代理部务。

△　吉林省派往头道沟之防军哗变，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　江西南昌蔡成勋所部第一师某营，因向商店要求50万元充饷薪未遂，哗变。

9月6日　　国会众议院常会开会。到会357人，张伯烈以218票当选副议长。会上民八民六议员发生纠纷。

△　川鄂和议经刘成勋派代表陈敬循向孙传芳商谈，所商条件为：一、川、鄂军同时撤退、两不相犯；二、渝、宜交通立时恢复；三、川鄂联防条约继续有效，由孙传芳电吴佩孚接洽。8日双方在宜昌签字。

△　曹锟致电黎元洪，要求将蔡成勋江西善后督办之“善后”字样删除。8日，蔡电辞军务善后督办职，北京政府复电慰留。12日，江西马伯祯、张小宋等数人往谒黎，要求罢免蔡。14日，江西自治促进会发表宣言，声讨蔡成勋。

9月7日　黎元洪颁令整顿财政，召集财政会议。令曰：“实行财政公开，将中央收支各款一律认真清厘，详举确数公诸全国。一面规定统一国库办法，平均分配，以为切实整顿，共同遵守之标准。”并谓：“着即召集财政会议，由京内各部署暨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员一人在京集会，迅速拟订办法。”

△　黎元洪令各官署人员“一概不得再有聚众索薪举动”，否则由军警“严行取缔，依法严办”；同日令，京内外各机关长短免票、铁路优待票等概着交通部查核，定期取消；同日令，所有奉省扣留各路车辆着即责成该省长悉数交出，克日全路通车，嗣后各省均不得再有干涉路权、妨碍交通之举。

△　黎元洪特派那彦图为蒙古宣慰使。

△　黎元洪令：9月26日“为秋丁祀孔之期，本大总统亲诣行礼，着内务部敬谨预备”。又指令，甲午海军阵亡人员合祀马江昭忠祠，派萨镇冰前往致祭。

△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恢复民国五年祭服礼节。

△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别照会驻京日使及苏俄代表，再次声明长春“日俄会议”如涉及中国领土主权与中国利益，非先得中国政府同意概不承认。

△　北伐军许崇智部由瑞金开始移动，预定经宁化、建宁、泰宁、建阳、建瓯，与延平王永泉部合攻福州。行抵建瓯，适徐树铮由沪过浙到达延平，王永泉乃调集部队与之协定作战计划，自任右路。

△　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向国会正式提出请愿书，要求在宪法上规定男女平等，恢复女子一切权利。13日，上海王曾吾等响应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之成立，于香港路开筹备女权同盟会。24日，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分会成立，以“扩张女权取得法律上男女平等”为宗旨。

△　广西桂林旅京学会通电反对陆荣廷返桂。

△　赣省中等以上18校校长因经费未解决，全体辞职并发表宣言。

△　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反对旧国会非法召开会议，并选举张伯烈为副议长。

9月8日　　北京政府署外交总长顾维钧宴请中外人士王宠惠、王正廷、汪大燮、孙宝琦及芮恩施、福开森、辛博森等20余人。席间前驻京美使芮恩施陈述改造中国财政之意见，认为中国财政之完全独立，必须先得外国援助。建议开募一种宪法借款，每月借美金200万元，以10个月为限。

△　浙江各公团以卢永祥宣告自行废督后，时愈两月，未见效绩，乃向卢永祥提出五项要求。其要旨为：第四、第十两个师原驻苏境、淞沪一带，拟请仍回原防；浙军第一、第二两个师各先裁一半，改师为旅；地方治安划分为三区，驻省军协同警卫队，切实保护人民。

△　北京政府电苏督齐燮元、省长韩国钧，责成维持治安，特定办法六项：一、保护各国侨商；二、严剿土匪；三、审查党人；四、严禁谣言；五、严防阴谋；六、军营长官应谨慎供职服从命令。

9月9日　　黎元洪公布《市自治施行细则》，凡18条。其中规定施行“国有之城镇指京师、省会、商埠、县治、城厢及其他满一万以上人口之市镇而言”；施行事务为：“一、教育；二、交通、水利及其他土木、行政；三、劝业及公共营业；四、卫生及救济事业；五、其他依法令属于市自治事务。”

△　黎元洪请张伯烈、褚辅成出面调停民八、民六议员纠纷。调停大要为：一、应泯除民八、民六之称，以合法者为有效；二、前在

广州新补之议员为正式议员，报到后其新补议员作为无效；三、本席缺席者，以新补议员出席；四、未经核准出席之新补议员，聘充公府顾问，月俸400元。民八议员仍表示反对。30日，民八议员致函张伯烈等，谢绝调停。并声明拒绝参加政治讨论委员会。

△　北京政府财政、农商两部召集之全国关税研究会开会。各省总商会到者十余人，外交、财政、农商各部及税务处、财政讨论会均派员与会。

△　云南唐继尧前派航空处长刘沛泉赴粤，是日刘偕陈觉民、刘震寰见陈炯明，商滇、粤、桂联防及滇、粤航空联络事。21日，唐电粤军，请粤、桂军会剿张开儒。

△　刘成勋通电，宣布成立四川省宪筹备处，本人就筹备员职。

△　上海银行公会致电北京银行公会，以“九六库券”利息延不照发，责其不向北京政府积极交涉。

△　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3000多名工人因要求当局撤换虐待工人之工头、提高工资，未获圆满答复，是日举行大罢工。萧耀南派军警镇压，毙伤70余人，逮捕30余人。11日起，武汉各工界、工厂、京汉铁路工人，上海、河南、山东工人俱乐部、工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纷纷举行同情罢工并通电声援。14日，北京交通部次长劳之常为解决罢工事抵汉口。罢工坚持17天，于25日胜利结束。北京政府完全承认工人条件，增加工资并开除监工张恩荣及苗凤鸣。

△　日韩工人300余在吉林石门强行开筑天图路，延吉、和龙两县聚众数千往阻，为县知事劝散，另派警阻止兴工。日人持刀斧与警斗，被警解散。日人又集60余人割毁田稼，乡民愤怒，集合民团对抗。

△　中国旅日华工被迫归国者前有四批到沪，共计95人。是日，

上海民国路商联会致函总商会，请速筹商救济办法，以谋抵制。至28日，被迫害之旅日华侨已有13批抵沪。

9月10日　北京国务会议议决，从“九六公债”关余中抽出22万元作为教育经费。交通部声明无款。教育界于是日在北京美术学校招待报界，指责北京政府欺骗“无枪阶级”。自是日起，八校校长离校，声明不再负校事责任。14日，北京大学学生召开紧急会议挽留蔡元培，蔡表示与校长团取同一行动。

△　宋大章奉令在奉天活动，是日上书孙中山报告奉方不日派前北京政府陆军次长韩麟春（系段祺瑞嫡系）“赴沪专谒先生商具体之办法，并携有小款（其事甚密），报效吾党”。请“示以希望奉张出款，召集民八议员，执行国会职权”。是日，孙中山批示：主张“开发民智，以辅当局之设施，期达最后之效果”。

9月11日　黎元洪指令：京师教育经费每月29万元，自本年增加关税实行值百抽五，自是日起，由关税项下拨付。

△　黎元洪特派梁如浩为接收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召开会议，议决以停付俄国赔款为担保，将七五库券改为1000万元特别库券，该券利息八厘预扣，分三年还清，11月起还本，用途为过中秋节。次日，安格联由青岛来电同意。13日上海银行公会特电北京公会，反对七五库券，认为乃政府“诈欺取财”。

△　北京政府美籍顾问福开森以备忘录呈黎元洪，劝黎拒绝越飞返京，勿与莫斯科缔结商约。13日美公使舒尔曼访顾维钧，又提出注意越飞之活动。

△　国立八校学生读书运动代表联席会在女高师开第一次常会。议决：一、请愿国会罢免高恩洪；二、要求拨发八校经费：三、去函

挽留校长团；四、要求宪法上规定教育基金独立。17日，读书运动代表招待国会议员，王家襄到会，表示赞同读书运动，关于教育经费规定允向国会转达。次日，八校得发两个半月经费。19日，八校学生代表赴国务院提出三项要求：一、限期发清三个月经费；二、罢免高恩洪；三、关税未加征前，确定教育基金。

△　自是晚7时至夜半，浙江温州全境大风，所有对外交通全部断绝。一百多艘大船沉没，小船约千只丧失。学校、教堂等亦毁坏甚巨。

9月1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复苏俄代表越飞，允召开中俄会议。

△　北京政府组织之关税研究会议决民国十三年1月1日起实行裁厘，并免除出口税。

△　北京政府与参众两院议长商定，如民八议员扰乱，在院内以院法绳之，在院外以地方治安绳之，如举动文明，则和平待遇。

△　陆荣廷在龙州通电就广西边防督办职。

△　数百旅京山东人士集于北京国务院门前请愿，反对英使向北京政府所提关于收回威海卫之无理条件，要求英国无条件归还威海卫，要求“鲁人治鲁”，罢免王正廷，否认梁如浩。按：英使所提条件为：一、英国军舰得在威海卫、刘公岛避暑；二、英国继续在该地使用军舰或蓄积货物，中国不得加以限制；三、威海卫之市政，外人应有充分之代表；四、中国须设法使威海卫与内地沟通。

△　旅京鄂籍韩道之、贺永年等1500余人向国会请愿，要求罢免萧耀南，并列举萧拥兵跋扈，反对中央，抗拒中央命官，抢夺省长印信，与刘承恩通同舞弊，滥发纸币，滥增军费等十二大罪行。

9月13日　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接受记者

采访转述孙中山关于解决时局之主张。略谓：关于解救时局的方法，孙先生“以为应该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否认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并谓：孙先生认为“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归根到底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

△　北京众议院议决退还唐绍仪内阁咨文，代总理王宠惠、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卢信呈请辞职。

△　北京政府外交部咨请国会民七年以后，同各国所签定之条约，计：一、中智通好条约；二、中波通好条约；三、中瑞通好条约；四、中德通好条约；五、国际法庭规约；六、国际邮政公约；七、九国间关于中国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八、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九、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　张作霖向东三省军队颁布命令，自20日起实施新军制。废师团名目，以旅团为本位；一旅三团，一团三营，一营四连，一连150人；骑、炮兵各营改为相等之团；其余独立师及团概行废止；军医、军需官非专门学校出身者概不采用。结果每旅可达6000人以上。

△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

△　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为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俱乐部1.7万人举行罢工。经过五天斗争，终于使厂方承认工人所提13条要求。

9月14日　黎元洪任命吴佩璜兼署国务院秘书长。

△　署司法总长张耀曾谒黎元洪，亲递辞呈。

△　徐谦不愿就北京政府任命之司法总长职，并于是日致书吴佩

孚，建议吴与孙中山商订实行“工兵计划”。30日，吴电催徐就职。

△　唐山、京奉两铁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推举代表向路局交涉，提出五项条约。是日，两路工人召开大会，到3000人，主席邓培报告与路局交涉经过，与会全体工人同意如路局不批准所提五项条件，则实行大罢工。

9月15日　黎元洪令准免督办浦口商埠事宜孙多钰本职，特派齐燮元兼督办该商埠事宜。

△　旅沪护法议员亢因培、凌钺、张秋白等54人致函各国公使，于合法国会未行召集以前，万勿借款给北京政府。

△　直隶省议会选出吴得禄、胡国宾为正副议长。

9月16日　陈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

△　陈炯明将孙中山联合苏俄之函交香港英国机关报发表。同日，美、日、英、法等国驻京公使照会北京政府，谓越飞在华宣传“过激主义”，请严厉监视其行动。

△　湖南宋鹤庚指挥叶开鑫、唐生智、贺耀组三旅攻下武冈，19日收编陈嘉祐部事竣，通电班师回省。

△　旅沪江西自治同志会电全国各界，反对前美国驻京大使芮恩施提议之制宪借款，谓：此种借款“助军阀以行欺”。旅沪国会议员毕鼎琛等亦致电驻京各国公使，并通电全国公团，反对制宪借款。

△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在迎黛路职工教育馆开成立大会。到者1600余人，并发表宣言。

9月17日　护法议员在北京头发胡同六号开会，议决：一、设护法议员办事处，推邹鲁等五人为干事；二、应邀出席国会之护法议

员，在法律问题未解决之前，决不出席。

△　江西护理省长何刚德被迫离职，蔡成勋因一部分人之要求派兵一营拥李廷玉至省公署接印。李通电宣布奉蔡成勋令“暂以帮办善后名义维持现状”。18日起，南昌、九江等处各商店门前张贴“商家要求赣人治赣”标语，各工团为驱蔡、拒李，相继罢市、罢工。同日，蔡成勋电催黎元洪任命李廷玉为省长。

9月18日　国会二届常会因遭护法议员反对，宣告停开。次日，国会通告：三届常会定于10月11日举行开会式，依法先于10月1日集会。

△　孙中山发出《致本党同志述陈事变始末及今后方针书》。略谓：“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报告，于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总统府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于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至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末谓：“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此则文所期望者也。”

△　廖仲恺致函蒋介石，告以汪精卫同卢永祥联系经过，谓浙卢主张浙、奉与我三方，应各派军事家一人，在沪组织军事委员会，“以资联络进行”，“请兄无论如何即行来沪商略一切”。

△　福建李厚基对抗王永泉失利，向直系乞饷械，是日曹锟电请北京政府内务部筹拨。

△　叶举通电撤销粤军总指挥处，陈炯明任叶举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9月19日　黎元洪令准免唐绍仪国务总理职，王宠惠准免兼代国务总理署教育总长，顾维钧、田文烈、高凌霨、张绍曾、李鼎新、张耀曾、卢信、高恩洪准免本兼各职；特任王宠惠署国务总理；特任各部总长：外交顾维钧、内务孙丹林、财政罗文幹、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徐谦、教育汤尔和、农商高凌霨、交通高恩洪；特任董康为大理院院长，未到任前着余棨昌代理；派穆湘玥前往檀香山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同日又令，俄国部分庚子赔款俟展缓期满一律停付，交财政部暨税务处查照。

△　王宠惠通电全国，宣布就总理职。吴佩孚、冯玉祥、萧耀南、齐燮元、刘承恩、田中玉等各直系督军均电贺。

△　护法议员第三次通电，声明否认北京国会。电云："同人对于此种假借国会名义之弄法举动，认为系吴景濂及解职分子王家襄等私人行为，此四十余日之弄法，不过为其谋权利而已，于法律上国会会期任期，不生丝毫关系，应予绝对否认。"

△　讨贼闽军游击队第三支队长姚际飞致孙中山电称，闽南北伐军完全收复浦城，知事潜逃，秩序如常。

△　江西督理蔡成勋致电北京政府财政部，催索军饷及督理善后等款200万元。

△　越飞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停付俄国庚子赔款及召集中东路股东会议。

△　中美无线电借款之追加合同正式签定。

9月20日　黎元洪令准免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顾维钧兼职，特派张英华任该会委员长；任命严璩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同日又令，着司法次长石志泉暂行代理部务。

△　孙中山致函滇军张开儒，略谓：叛逆陈炯明"国之蟊贼，为国

为党，皆当声罪致讨，有以除之”，并谓“滇军既为久经战阵之师，吾贤所统，已自不鲜，更望与朱益之（朱培德）兄合力并进……最后胜利当属吾军”。

△　曹锟、吴佩孚电请黎元洪援助李廷玉摄护赣省长。23日，旅鄂赣人开会议决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速撤惩蔡成勋、李廷玉。

△　直隶省长王承斌通知交通部，以直隶省经费无着为由，截留天津之烟酒、印花税及电报、电话等一切收入款项。

△　王宠惠电促徐谦来京就司法总长任。次日，徐复电谢绝。

△　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黎元洪到会讲话。蔡元培为主席，会议讨论内容：一、学校系统改革案；二、山西教育局所提学制系统草案；三、省区教育行政机关设立参议会案。30日闭会，通过七项学制系统案。小学分初、高两级，定四二制；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中学分初、高两级，定四二制，但得通融为三三制；师范定六年；高专改为单科大学；高师改师范大学。

△　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域为改省问题分别组织省制促进会，发表宣言。

△　下午，八校教职员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八校校长到会传达北京政府已允在中秋节前发一个半月经费。29日，因北京政府失信，八校教职员代表又开会，议决派代表要求汤尔和实现9月30日前发经费之诺言，致函王宠惠约期面询究竟。散会后代表尹炎武赴教育部质问汤尔和，汤答称：一、担保10月3日发半月之经费；二、中秋节前所发之一个半月经费，由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项下拨发。

9月21日　黎元洪特任财政总长罗文幹兼盐务署督办、币制局督办。

△　黎元洪任命邓琢如为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李鸿程为江西陆

军第二旅旅长。

△　曹锟电请北京政府财政部发饷600万元。23日，曹又派直、鲁、豫巡阅使署军需处科长左继梧抵京，向罗文幹索款。同日，吴佩孚之军需处长亦来京索饷。萧耀南亦电财政部索饷。25日，曹锟并决定组织各省“索饷团”。为此事，王宠惠托吴毓麟前往保定说情。

△　苏俄代表越飞抗议俄国庚子赔款停付用做库券基金，谓：中俄新约订立以前，中国政府不得处分。

△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公推豫丰纱厂毕云程为出席美国檀香山太平洋商业会议代表。

9月22日　孙中山派汪精卫携致张作霖父子亲笔函赴奉天，与张作霖商讨共同对付直系曹、吴方略。孙谓：“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

△　北京政府陆军部组织蒙疆善后委员会，由陆军总长张绍曾兼会长。

9月23日　孙中山函谢黎元洪，谓：“前蒙遣使存问，至深感纫。息鞅海上，未能面致谢忱为歉。兹嘱郭复初兄代候起居，并承明教，希赐见幸甚！”

△　张作霖电邀孙烈臣、吴光新到省，与奉省军政界要人会议。会议内容为：一、划一军制；二、三省“军民分治”后，保安副司令与省长职权之划分；三、应付自治各省联络之问题；四、应付北京取消自治之问题；五、整饬吉（林）、黑（龙江）军纪问题；六、布置吉、黑边防，严剿俄党之活动；七、组织联防司令部三省高等军事教练所、三省保安各分会；八、划一三省财政，改定各项预算等项。会

议进行三天，25日结束。

△　广州财政厅向中、英、法等银行进行市政借款英金200万镑。七厘半息，87.5％实收，限25年偿还。该款供收回自来水、电话、电车之用。

9月24日　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驻日代办公使，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于10月以前将“沿海洲”军队全部撤去。至于保护侨民，当另筹措置。北满日军之撤退日期，当俟中国军队能担任保护侨民为断。北京政府参陆处已电三省军事当局筹复。

△　苏俄代表就俄人员通过满洲里车站，所携带之外交文件受到查验及北京驻莫斯科代表向苏俄声明，必须俄政府担保，该项文件中，不带有宣传共产主义之性质，否则中国政府不能免验俄国外交文件事，是日照会北京政府，提出抗议。

9月25日　黎元洪公布《民国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条例》，凡15条。规定发行1000万元以“筹付中央紧急政费”，利率为周年八厘，分五年还清，指定由庚子赔款展缓期满之停付俄国部分赔款为还本付息基金。

△　北京国务院电复江西督理蔡成勋，谓已促谢远涵赴任，不能再有变更。同日谢远涵到京，26日对记者表示：一、尊重中央命令；二、顺从本省民意。同日，李廷玉离赣赴沪。28日，蔡通电拒谢远函。

△　北京国务会议关于江苏发行700万元公债票事议决：一、发行手续由本省长官自行办理；二、实价发行；三、厘税划归政府后，不能与政府收入有冲突；四、各省不得援例等。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越飞，促苏俄撤退外蒙驻军及税卡。

9月26日　黎元洪特任李根源为航空署督办。

△　是日及27日，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东三省政治、财政、军事会议，吉、黑督军、省长暨奉天省长、高级军官50余人出席，会议通过“奉、吉、黑联省自治，为永久自治之方针”及“划一军制”、“划一三省财政”、“划一三省外交”等多项决议案。

△　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照会两件：一、指责越飞在华宣传过激主义，应注意侦查；二、希望中国即速实行华府决议案，即行裁兵。如中国再不实行裁兵，将来发生兵变，各国损失须由中国担负完全责任。

△　曹锟召集在京直系各代表，赴保定会议。

△　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经费问题，向比利时银行借款20万元，是日签字。

△　上海银行公会开紧急会议，致电黎元洪、国务院、总税务司及各银行公会，声明对短期公债绝不承认。29日，又发表内容相似之通告。

9月27日　黎元洪特派王宠惠兼充政治善后讨论会会长。

△　旅沪国会议员刘积学、王文郁、丁惟汾、凌钺等57人联合发表致各国驻京公使函，宣布否认8月1日在京复会之国会。

△　由各省市律师及法政学校所组织之全国司法会议，于是日在上海开幕。

△　闽驻军旅长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并电闽督李厚基交出军民两政，即日离闽。29日，许崇智、黄大伟等进兵闽边，占领崇安、浦城、建阳等县，通电声讨李厚基。李向陈炯明等求救。28日，洪兆麟乃率部赴闽边防守。30日，闽南自治军克同安。李厚基致电北京政府告急求援。

△　奉直再战风声日高，吴佩孚连日在鄂、豫调兵北运，王士珍、田文烈、鲍贵卿今日谒黎元洪，商调解方法。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海支部在百老汇路举行成立庆典，海员到者200余人。中国劳动同盟会、中国机器总会驻沪办事处、侨港华工总会等数团体到会庆祝。

△　汪精卫、程潜抵奉天，与张作霖会晤。

9月28日　黎元洪令准办理发行八厘短期公债。

△　桂省督办刘震寰召开军事会议，决先肃清广东大河、抚河两路，恢复桂梧、邕梧交通。滇、黔军均派代表谒刘，表示一致，自治军亦派代表接洽，广西桂平镇守使韦荣昌欲在戍墟运动军队起事，被刘拿获。

△　四川省宪筹备处开会，决定自10月20日起开始起草省宪法。

△　鄂代表徐炯、林炳炎等赴北京，为反对萧耀南掌鄂省印向国务院上书请愿。

△　上海浦东纺织业工会被警厅查封。该会办事人张益章提出抗议。29日，该会发通电，宣布工人将与工会“生死与共”，“万望各界人士主持公道，急起援助”。

9月29日　孙中山致函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告以委派杨庶堪前往商议时局。

△　孙中山委派管鹏为中国国民党安徽支部筹备处长。

△　北京政府内务部因经费支绌，向比利时银行借款25万元。

△　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发电否认短期公债，电云：“今既无合法政府，又无合法国会，径募公债，徒供私人挥霍，增时局纠纷，吾

人……均绝对不能认为有效，祸在眉睫，务希一致主张。”

△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吴佩孚协议撤销京汉路南段监收处，以后该路收入统归交通部，直军饷项由该部负责拨付。

9月30日　黎元洪令准免山东省长王瑚本职；特任熊炳琦为山东省长。

△　孙中山代表郭泰祺于29日晚抵京，是日谒黎元洪答聘。10月1日黎宴郭于东厂胡同一号官邸。

△　顾维钧主持召开之财政委员讨论会结束，顾致函北京政府办理交待并辞委员长职。

△　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宣布，下月起报、电各加价三分之一，新闻照加，各界多反对。

△　国际联盟三次会议结束，中国继续被选为行政会非常任委员。

是月　日本神户国民党支部恢复。该支部创自清末，而发达于民国元、二年。章宗祥使日后，极力压制，于是该部采取去名存实之计，另以商业研究会名义代之。数年来，党员暗中仍积极奋斗，本月该部中坚党员杨寿彭等召集大会选举职员，宣告正式恢复支部。

△　大生第三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海门县设立，董事张退庵、张啬庵等。资本银300万元。

△　据9月9日《民国日报》报道，现在外国在华之邮务支局有150处，其中美国一所，英国12所，法国13所，而日本邮局则不下124处。

10月

10月1日　北伐军朱培德部克桂林。自治军梁华堂部退出。

△　国会参众两院第三期常会在北京集会。众院到会200人，参院原拟选举正副议长，因只到97人，未足法定人数，展期举行。护法议员多人，连日来为反对第三期常会举行游行，散发传单、演讲。

△　王永泉通电即日就闽军总司令职，所部由九里滩直下，占领闽清，离省城仅230里。南平附近10余县，均为王永泉军占领。东路北伐军黄大伟、李福林部由建瓯出发，与右翼王永泉部相呼应，经东游向古田推进。浦城、建阳西至崇安、邵武，沿闽边至长汀，均为许崇智北伐军占领。建宁、政和、南屏一带之李厚基部，由徐镜清率3000人，投许崇智军；宋渊源率领民军在永春独立。

△　北京政府向外国银团要求提取9月份盐余。次日外国允节前（中秋节）拨给9月份盐余共277万元。

△　北京政府交通部向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借日金50万元，拨付烟潍路工用款及军政各费，年息9.5%，期限二年，以吉长铁路余利为担保。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80万英镑，拨付吴佩孚政费22万镑，挪拨陇海铁路购买材料14万镑，余作利息折扣及汇兑费用。年息八厘，折扣87%。以包宁、京绥、绥包铁路财产及收入以及京汉路余利为担保。是为“包宁展线库券”。

△　旅沪福建同乡会通电，拥护萨镇冰率舰入闽，“暂维大局”，同时电请李厚基离闽。

△　旅沪江西同乡会通电反对蔡成勋、李廷玉任江西省督理及省长职。3日，李廷玉通电自9月17日起视江西省长事。4日，李因赣人反对激烈离职，蔡成勋致电北京政府，宣布“自行兼职，以维现状”。

△　湖南省长选举总事务所通电宣布，赵恒惕依省宪法被选为湖

南省长。

△　江苏旅京同乡会致电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所，反对江苏省发行700万元公债，劝“勿承销抵押”，声明“将来苏人决无偿还责任”。3日，该会又致电省长韩国钧及省议会，望“深察民情，急谋补救，发表严正之主张”。

△　上海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在宁波同乡会开成立大会，到会者1000余人。

10月2日　黎元洪令董康兼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未到任以前着胡诒谷代理。

△　徐树铮在福建延平结合旅长王永泉并与北伐军许崇智联络，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克日移驻福州”。宣布尊奉段祺瑞、孙中山为领导国家根本人。次日，徐电李厚基，劝李辞职离闽。

△　张作霖宴汪精卫、程潜及段祺瑞代表吴光新。对孙、段、张三角联盟之事，张谓：“中山、芝泉（段祺瑞）与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余等当协力同心，第一步以驱逐吴佩孚、曹锟为目的，第二步再谋新中国之建设。”

△　是日，至财政部坐索经费及薪金者有百余起，60余单位。王家襄、吴景濂、张伯烈等亲自出马坐索，总长客厅及库藏司办公室人已挤满。财政部均应允三日内发给若干以资点缀。次日，仅吴景濂、王家襄、张伯烈索得国会费28万元。

△　接收威海卫中英会议在威海卫召开。

△　驻京日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日本兵营中所收容之安福系祸首王郅隆、曾毓隽、梁鸿志“又告失踪”。小幡并建议，日本兵营中安福分子朱深、李思浩、丁士源、姚国桢四人，形状

可怜，可予以特赦或“私自放走”。北京政府除提出严重抗议外，并要求引渡其余四犯，日本公使置之不理。

10月3日　黎元洪特派孙丹林为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派赵锡恩前往檀香山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同日令，本年6月、7月、8月，浙东西各县叠遭风雨山洪之灾，“着财政部转饬该省财厅迅拨帑银五万元”，核实散放。

△　王永泉、许崇智决定联合进攻福州，许部担任左路由建瓯进攻古田，王部担任右路由樟湖坂进攻水口。同日，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通电宣布讨伐李厚基。

△　闽督李厚基连电北京政府告急。蔡成勋亦电称，闽局关系甚重，赣兵单不能赴援，请速另派兵。国务院将各电转交曹锟。是日国务会议决定电催萨镇冰率部前往福建应付，并许其调遣海军。

△　汪精卫接见旅奉日本记者团，答记者问，谓：“余之来奉，因张氏数派使至孙氏处，故特来答礼。次则基于八月十五日之宣言，关于统一问题，废督裁兵问题又求张氏对斯意见。”

△　全国司法会议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续开大会，到会代表21人，施洋提出11条建议。

△　越飞自长春抵京，称病谢客，并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6日后将到部访问总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驻京各国公使，新修税则定本年12月1日起施行。总税务司亦布告，12月1日起照新税则征收。16日，北京外交团恐关税增收之结果，为一党一派所垄断，通过葡公使代表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

△　四川军事善后会议开预备会。议决：一、缩减军队；二、废除军长制。25日四川军事善后会议正式开议。

△　绥远都统马福祥派人赴京坐索积欠军饷。

△　广州所有七所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为要求省财政厅支拨9月薪俸未遂，宣布罢课，并要求教育经费独立。高师学生会开紧急会议，议决援助罢课，并召集学生开全校大会。

10月4日　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厂工人1500余人为反对厂方破坏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并以山海关工友俱乐部名义发表宣言，向铁路当局提出开除工贼、增加工资等六项要求。铁路当局不仅不理，反而进行武装镇压。工人极为愤怒，于7日一面通告全国各工团及各界人士援助，一面向当局附加三条要求：一、必须正式承认本俱乐部为正当团体；二、罢工期间工资必须照发；三、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俱乐部职员，若犯大过开除时必须通过俱乐部。12日铁路当局被迫承认工人大部分要求，唯不承认俱乐部为合法组织。13日，全体工人宣布复工。

△　上海各工团执行委员会为浦东纺织工会被封事，是日召开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议决：一、援救浦东纺织工会；二、推陈国梁、童理璋二人为代表，赴交涉公署向韩国钧省长请愿，要求启封。

△　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要求宪法明白规定：一、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二、普遍选举；三、劳动立法；四、男女平等；五、教育独立。并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等口号，决定10月10日作国民示威之举。10日，各校学生万余人游行，手持小旗，上书“民权运动”，“打倒军阀”。

△　闽督李厚基拘禁福建银行行长刘友敏，勒令日缴万元。同日，李厚基派代表胡恩光赴保定乞援。

△　北京40余团体联合召开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林长民为主席，大会推定蔡元培、李石曾、林长民、马锦、马君武、张继、郭泰祺、王孝英、刘衡静、周垣、张耀曾、李大钊、胡适、陈炯瀛等15人为演

讲员。

△　威海卫中英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海军部之需要，并讨论刘公岛将来之行政。次日开第三次会议，英代表向中国代表宣读交还土地之临时建议，中国代表请提出书面文，并保留评议权。8日举行第四次会议，9日开第五次会议。

△　高凌霨奉黎元洪命，赴保定向曹锟疏通由王宠惠组阁问题。

△　北京政府财政部宣布为维持“中央”紧急政费，发行“八厘短债”，以停付俄国延期赔款为基金。

10月5日　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汤尔和辞职，未准。

△　吴佩孚致电北京政府谓：已电江西常（德盛）、周（兆瑞）两师，助李厚基攻许崇智，请速拨款。同日，吴佩孚电催海军司令杜锡珪率师赴闽。

10月6日　长沙4000多泥木手工业工人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罢工请愿，经过21天斗争，获得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

△　北伐军许崇智部占领古田，并决定进攻水口、福州。许崇智汇合延平王永泉从水口直逼福州；黄大伟与李福林出古田，从间道袭取福州；孙本戎部由大湖向白沙前进，断水口敌之后路与水口福州之交通。

△　英帝国主义为防皖系及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扩大，积极支持陈炯明，与陈订立700万镑借款，以使广九路延长与粤汉路衔接为条件。

△　沈鸿英在赣南发出通电，即日班师回桂。

△　北京政府外交部请盐务署设法阻止各省截留盐税。

△　陈炯明派洪兆麟为援闽总司令，率3000人向闽边戒备。

10月7日　黎元洪令准免安徽督办张文生本职，安徽督办一缺裁撤；特任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

△　黎元洪令褫夺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官职、勋章并通缉严惩。又令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辞职，以张祖廉署督办。

△　上海金银业工人1000余人（分属银楼30余家），因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遭各店主拒绝，并将工人俱乐部之代表三人开除，遂罢工。8日，工人俱乐部重提要求九条。9日，罢工人数增加，晚间南京路商联会出面调停。劳资双方僵持不下，罢工工人坚持所要求之条件，银楼公所则以开除全体罢工工人相威胁。

△　鲁督田中玉电曹锟、王承斌，要求将津浦路货捐截留给鲁省1.8万元。29日，曹、王复电，仅允月拨鲁省一万元。30日，田致电北京政府声称所有鲁境津浦路货捐，自9月1日起全部截留。

△　32名华工被日本当局驱逐归国，次日又有浙江温州17名伞商被逐，从长崎回国。

10月8日　福建旅京同乡在福建会馆开临时大会，议决：一、废除原督军，以萨镇冰督理福建军务；二、阻止客军（直军）入境；三、16日推代表赴北京政府请愿，并致电萨镇冰，责成其维持闽省治安。

△　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派代表晋见孙中山。

△　川、鄂和议除继续刘湘前约外，加入划界清匪诸条，即由刘成勋派员与孙传芳共同签字。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向苏俄代表越飞提出先开外蒙撤兵会议，然后召开中俄会议。14日，越飞反对在中俄会议开幕前，单独解决外蒙问题，并责北京政府袒护俄白党。

10月9日　黎元洪派陆徵祥为国际工会委员；派段书云督办徐州商埠事宜。

△　曹锟电复北京政府，对于闽事表示不肯负责。

△　闽督李厚基接王永泉、许崇智两部合攻水口之报，命史廷飏率福州防军，分乘民船30余艘，开赴水口增援。北伐军孙本戎部适抵白沙，遂拦江截击李军，击沉民船二艘。次日，李军用小火轮渡至白沙，与孙部鏖战半日，孙部退往大井，11日夜，李福林部猛攻福州，占领洪山桥（距福州10里）。

△　贵州省长袁祖铭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谓："现在国会制宪已成舆论，务望两院诸公扫不急之务，宏兹大法，确立国基。"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曹云祥署清华学校校长。

10月10日　黎元洪令吴佩孚、王怀庆、齐燮元均授陆军上将。

△　北京天安门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共77团体，七万余人，蔡元培主席。黎元洪到会演说，谓："兵额宜以强国为标准，军费勿过支出三分一。"当场演说者十余人。会后全体游行，举小旗，上书"减兵额救国救民"，"打倒军阀"。

△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群众开展"双十节""反对帝国主义大示威"运动，提出"驱除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拥护民权"等口号。

△　护法议员今日特扎庆祝牌楼，全体乘汽车散法统传单和孙中山肖像。传单有五种，上刻短文，题曰："力争合法国会"，"三民主

义”，“五权宪法”，“工兵政策”，“中华民国之由来”，各附以简单说明。护法议员在众院门前痛诋吴景濂等盗法欺民，听者甚众。

△　江西督理蔡成勋电北京政府，称赣军援闽，已由常德胜率一师两混成旅集合待命，请速筹开拔费，以便出发。北京政府已分别电饬汉阳兵工厂赶速制造枪弹，并由德县兵工厂赶造四生的口径大炮五尊，预备援闽之用。同日，萨镇冰抵福州。福州秩序纷乱。

△　武汉学生联合会所属中等以上40余校，28个工会，及各界人士，在汉口铁路外广场举行大会，成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到者约2.5万余人，联合会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全体一致议决：一、裁兵废督、打倒军阀；二、要求外交独立，促进中俄会议，正式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并订立两国通商条约，打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三、要求普通选举，男女平权，并制定劳动法；四、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

△　安徽省教育会学校联合会学生总会，通电指责马联甲为杀死姜高琦正凶，反对马督办皖军务。

△　《民国日报》发表孙中山为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于11月1日正式出版）所作序及该书全文。

△　《旭报》在上海出版，经理为庸商皓，编辑部长梁素夷。

10月11日　　黎元洪特任聂宪藩为宪威将军，李准为直威将军，金永炎为炎威将军，杨以德为将军府将军。

△　国会第三届议会开会，众院到340人，参院到150人。黎元洪及全体阁员到会。“护法议员”邹鲁、彭养光、王恒、凌毅等质问吴景濂“依何法开会？是欲统一国家，还是破坏国家”？质问黎元洪“乃一犯罪平民，以何格出席国会”？质问王宠惠“总理资格由何取得”？黎以祝词遮脸而读，吴则面色时红时白，乃草草嘱唱礼。许多议员声言不承

认其开会之合法性而散。“护法议员”尹承福等在众院议场前演说“法统真伪”，被便衣警卫强行挟持出院门。

△　孙中山致函中国国民党四川支部，略谓：“诸同志努力经营党务，至为欣慰。文素树以党治国之义，故视党极为重要。……欲救中国非实行本党主义不可。”并谓：“今所切生于诸同志者，即在竭力宣传主义，务使群众趋于一致，以举自治之责。川中旧同志实繁有徒，更当力为团结，以厚基础，至要至勉。”

△　孙中山复函《旭报》，谓：“贵报拥护法权，作民喉舌。……倘使群伦遵循有道，斯真远胜于三千毛瑟也。”

△　马联甲通电宣布就任皖省军务善后督理。张文生接黎元洪解职令后，致电北京政府，表示忙于裁兵，一俟事毕，再尊令北上。次日，张集兵蚌埠。17日，旅京安徽学生59人联名通电反对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

△　北京政府陆军部接济李厚基炮弹10万发、枪弹30万发，由海军输送赴闽。曹锟亦电请北京政府维持李厚基地位。

△　北京国务院会议，决定对闽下讨伐令，并电催江西常德盛一师出发。次日，曹锟致电北京财政部请速筹拨蔡成勋100万元，以便出师援闽。同日，曹与吴佩孚合电，请以蔡成勋为赣省长。同日，常德盛师得开拔费10万元，出发赴闽。海军司令杜锡珪遵命率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周兆瑞赴闽指挥。除派“楚观”、“应瑞”、“通济”等舰驶入省城外，又命驻沪海军第六、第七两连陆战队开拔赴闽。

10月12日　　北京国务会议决定内阁总辞职。王宠惠向阁议提出，京津保三处，对现内阁均无拥护之诚意，一切政策，亦实无实行之希望，最好即日定议，实行总辞。顾维钧、张绍曾、李鼎新、高凌霨均表示赞成，遂表决通过。

△　北伐军李福林、黄大伟等部占领福州。李厚基由日本领事保护离福州，入马尾船政局。13日，李厚基部下史廷飏部由白沙退至福州，亦被孙本戎部击溃。14日，李厚基所部在水口已全部被肃清。

△　吴佩孚电萧耀南，表示对皖事“决以武力解决”，已派冯玉祥为讨皖总司令。嘱萧“皖鄂接境，防务须特别加意”。17日，萧耀南在督署会议决定，由鄂军第二十五师四十九旅王启贵所部开往郑州，以为冯玉祥讨皖之助。19日，第二混成旅寇英杰部，奉吴佩孚令开赴皖省。

△　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开幕。各省共推代表45人，田中玉致开幕词，袁希涛、胡适、何日章等演说，会议讨论内容包括学制、编订课程。

△　日本泰兴会社与吉林省特派交涉员蔡运升在奉天日本总领事署签定修建天图铁路条约。

10月13日　黎元洪特派萨镇冰会办福建军务。

△　黎元洪令：晋授李烈钧以勋一位。

△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3500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承认工会、消灭包工制等举行罢工。罢工后，该局副处长孙鸿哲向美国兵营求救，美兵立刻出动，将工人解散。工人大愤，遂发出第二次宣言，要求开除张起祥、贾香圃二工贼，并对美国兵营提出质问。经过八天罢工斗争，路局同工人签定九条协议，工人最后取得部分胜利。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驻京日使抗议海参崴日军私售军械于张作霖。16日，第二次提出抗议。25日，日使在外交部口头答复，否认海参崴日军官有售械与张作霖之事。

△　江苏省议员为反对苏省700万元公债事召开会议，决定：一、

向北京政府要求将江苏省公债案迅行提交国会；二、电上海银行公会及钱业公所，勿收用债券。

10月14日　　黎元洪令前国务总理伍廷芳着特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交国务院从优议恤。

△　北京72团体代表蔡元培、林长民等请愿废止《警察条例》。请愿书云：一、《治安警察条例》实大有妨碍人民之自由，如女子参政及劳工集会结社之权，皆被剥夺；二、该《条例》未经国会通过，系袁世凯时代以教令公布者；三、国庆日各团体举行国民裁兵大会时，各界人士要求取消该《条例》。

△　孙中山委任彭伯勋为古巴湾京中国国民党《民声日报》馆总编辑，李月华为总理。

△　汪精卫、程潜等自奉天返沪，汪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此次孙总理令余赴奉，实抱一为民意求援之目的，以探问张意旨。"

△　陈炯明召集军事会议讨论闽事，决议由洪兆麟主持闽、粤边防。

△　北京政府接吴佩孚电，宣布援闽军队之进行：一由萨镇冰调遣各舰自海路应援；一由蔡成勋向赣东、闽北增兵；再电陈炯明由粤夹攻。

△　皖废督裁兵会致电北京参众两院，反对北京政府任命马联甲为"变相督军"。关于废督裁兵问题，主张"新旧两军"，"平均留汰"。

△　越飞答复北京政府外交部谓，不能即行将驻库伦俄兵撤去，并拒绝单独解决外蒙问题，责北京政府袒护白党。

10月15日　　黎元洪传见李鼎新、沈瑞麟、凌文渊、龙济光、黄培松等，就闽事进行商讨，决定：一、责成海军陆战队负责保护外人

之生命财产；二、催促萨镇冰克日赴闽，维持军务；三、废督问题已次第实行，福建可乘此时机，将督军一缺裁撤；四、对于闽中战事，以和平手段解决，暂不令任何军队入闽，但张绍曾坚主令常德盛进兵。

△　黎元洪特任萨镇冰为福建省长。

△　曹锟、吴佩孚曾电萧耀南询问对闽意见，萧是日复电，主张援闽海陆军暂武装劝告许崇智、王永泉等停止军事动作，解决闽事酌量容纳其意见，如王、许不听，即武力讨伐。

△　北京政府接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电，要求北京政府在此次中俄会议期间，“将所有在外蒙之劳农、赤塔两方军队限期撤退”；要求保证俄人不得在外蒙地方作战及派兵入蒙；要求“劳农、赤塔在蒙先后发行之军用债票卢布400余万”设法收回。

△　驻扎江西南城县之常德盛军，于夜10时哗变，抢劫商店50余户，伤10余人，死五人，损失约20余万元。

10月16日　吴佩孚在天津购买意大利军械，总额470万元，日内付齐取械。

△　安徽督理马联甲通电，宣告对皖省“强力更新”。略谓：“联甲自矢宣告以后，即举军民权限，切实划分，军队遵令量裁，以期省库收入之适合。”又谓：“自今日宣言涤刷志虑，强力更新，外征诸全省公议，内本诸清夜天良，以求我全皖之多福。”

10月17日　孙中山致函《觉民日报》之董事、记者暨执事，感佩其对讨伐陈炯明之尽力宣传，仍希奋力猛进。略谓：“夙仰贵报为吾党之喉舌，作侨界导师，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久已尽宣传之巨责，收文字之奇功，一纸风行，万流景仰。而对于陈逆叛乱，尤能主持正义，力辟奸邪，激发人心，咸知急难，大张士气，共励同仇。

……拿氏谓：‘报纸功力胜于三千毛瑟’，斯言殆可为贵报道矣，感甚，佩甚。国事多艰，仍希奋力猛进。”

△　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率部入福州。孙中山任命林森为福建省长。

△　萧耀南在督署召集特别军事会议，讨论援闽方略，吴佩孚派人列席。鄂省援闽军队，决以胡念先所部北洋第二旅及寇英杰所部鄂军第二旅共同担任。

△　护法议员凌毅、杭辛斋对黎元洪任总统问题依院法四十条提出质问书，并要求于三日内答复。

△　张作霖派朱庆澜任中东铁路护路司令，统辖吉、黑两省护路军队。

10月18日　　黎元洪再次传见李鼎新、龙济光等人讨论闽事，决定：一、闽省领事馆及各国商民生命财产，由中国军队负责保护，所有各国军舰及军队不得增派入闽；二、各国领事及洋行，对于各军不得售与军火及借给军饷；三、所有在闽之海陆军队之饷，由北京政府迅汇20万元，其余续拨；四、龙济光即日赴粤招集旧部，将来或将由粤出兵赴闽；五、黄培松克日赴闽，帮同萨镇冰主持闽省军务；六、李鼎新须随时入府，俾对闽省军务条述一切意见。同日，黎元洪特派常德盛为援闽总司令，节制赣、鄂各军。

△　黎元洪派凌文渊为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温飞雄为政治善后讨论会秘书长。

△　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

△　徐树铮以“建国军政制置府总领”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

抚”；委以管理军民两政，并任命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黄大伟为建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19日，福建各公团联名电请孙中山主持闽事。

△　陈炯明与吴佩孚勾结，下令攻闽，洪兆麟、李云复、尹骥等部入漳州，旋退潮汕。

△　护法议员宣言，要求先组织护法会议，解决法律争点，再制宪。

△　皖省城各界代表召开讨马（联甲）大会，到者200余人，决议：一、反对马联甲为变相督军；二、拒绝外兵入皖境；并发通电责北京政府之政令为“奖凶助虐”，要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立将马联甲拿交法庭归案讯办”。

△　川鄂边界川军但懋辛部与鄂军冲突。

△　汉口英美烟草公司3000多女工为抗议虐待女工，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罢工13天，取得胜利。后因厂方爽约，于次年1月2日再次举行罢工，又得到胜利。

10月19日　　孙中山指示香港国民党支部组织“驻港办事处”，并分函海外侨胞及国民党员筹款讨伐陈炯明。

△　黎元洪任命潘矩盈为矩威将军，李根源为云威将军。

△　驻沪美国商务参赞公署发出通告，华货运美实行新税率，熟丝（包括纺绸）增税45％—55％，花边增60％—90％，刺绣增60％—75％。

△　越飞要求中国派一调查委员团，彻查中东铁路弊端。

△　北京大学学生抗纳讲义费，校长蔡元培、总务长蒋梦麟等向

北京政府教育部辞职。北京大学全体职员宣言暂行停止校务，教育部汤尔和、马叙伦当晚赴蔡宅表示挽留。

△ 晚，广州晨钟报社被炸，伤毙六人。

10月20日 曹锟电告北京政府，常德盛师不肯开拔，要求先筹发两个月军饷及服装费20万元、步枪两千枝、子弹60万发。29日，蔡成勋又电告北京政府陆军部云，常师一旅已出动，周兆瑞师已下动员令，款到即开拔。

△ 广东省政府与联华公司（即英法支那有限公司）订立《七厘半货币借款契约》，债额200万镑，用途为供给省银行铸银毫之用，偿还期定为10年，是日由广东省议会通过。

△ 由山东绅士王朝俊等联合直豫人士发起组成全国垦殖协进会，是日开正式成立会。川、湘、鄂、黔、皖、甘、晋等省人士俱有加入者，到会46人。决定取西北农垦之原料，作东南工商之发展。

△ 顾维钧致函越飞，同意11月10日起，开中俄会议。

△ 哈尔滨无线电台全部归中国接管。

10月21日 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抵武汉，随行者有旅长王缵绪、秘书熊扬芝，中午渡江谒萧耀南。杨部在鄂西尚有郭汝栋、王缵绪、许绍宗、王正钧等四旅，共有七八千人。杨森在汉厂购步枪2000枝，弹50万发，由“复楚”轮运往宜昌。次日，杨赴洛阳。

△ 厦门海后滩悬案交涉善后办法四条，由厦门交涉员与英国领事在厦签字。

10月22日 孙中山致函邓锡侯、田颂尧等人，特派戴季陶赴四川，抚慰各北伐军并与吕超等讨论实业救川计划。戴于30日启程赴川。

△　孙中山函促石青阳，出兵助谭延闿图湘。略谓：“曩时计划图湘，组庵（谭延闿）、沧白（杨庶堪）皆望兄出兵助之，以鼓湘军之气；闻兄亦尝有斯志，函允组、沧。今已于实行期间，至盼兄速为筹备。如已决行，文亦当筹开拔款费，汇寄来川。”又谓：“此时湘中人士已视兄之能否助力，以为进止，组庵尤日夜企盼复音。……吾兄爱国若渴，当必不漠视斯言，而乘此良机，有以一展其平生抱负也。”

10月23日　　孙中山致函广西滇军总司令张开儒，指示讨陈逆机宜，并言特派邹鲁赴港与各省联络策应。

△　国会众议院开会选委员长，马骧以239票当选。

△　开滦煤矿工人联合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矿工人举行总罢工。16日，3700多名工人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抚恤伤亡，遭英国矿局拒绝，工人继续提出条件：一、承认开滦所属五矿矿工统一组织之俱乐部；二、非经俱乐部赞同，矿局不得开除工人。20日，矿局宣布每月工资在30元以下者增加10%，工人不满，是日举行罢工。26日，马家沟矿亦罢工。秦皇岛码头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唐山铁路工人、纱厂工人、洋灰厂工人，均起声援，罢工人数达三万余人；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支持罢工。矿局如临大敌，调集英舰之印度兵及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之保安队，镇压工人。25日，工人在矿务局门前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免除帝制余毒”、“要求经济解放”等口号，军警开枪，工人死五人、伤50余人、被捕10余人。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亦被捕，后牺牲。反动当局封闭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严禁工人开会。工人英勇不屈，坚持罢工25天，后经“调停”，增加少许工资，工人于11月16日忍痛复工。

△　井陉矿务局由直隶省公署与德人订立改办合同，其中规定：矿局主权完全归直省监督；财产估定450万两；股本原有50万两，中占37.5万两，德占12.5万两；原有财产股本发还半数，四分之一让归

直隶省有，四分之一由德政府作为战事赔偿。

10月24日　黎元洪任命高全忠为福建第二师师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声明日本与奉天所订天图路契约未经中央认可，不能有效。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澳门葡兵惨杀华商一事，向驻京葡使提出交涉。要求：一、严办肇事葡兵及警察；二、更换广州领事；三、惩罚澳门总督（即予撤任），并处分肇事警察长官；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种行动；五、澳门警察，一律更换华人充当，以免误会；六、葡萄牙政府应向北京政府道歉；七、驻广州之葡领，应向广州省政府道歉，并吊唁被害者之家属；八、对于被害者家属，应优予抚恤。

△　驻京美使单独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奉政府训令，二五附加税，须俟关税大会后，方能由中国政府支配”。英代办照会，新税则英政府业经同意，惟声明本年11月30日后能有他国允行，本国方能照办。

10月25日　黎元洪以徐树铮“在闽省妄称建国军政制置府，并煽惑军队土匪糜烂地方，亟应从严剿办”，着即派李厚基为讨逆总司令、萨镇冰为副司令，高全忠为总指挥，“务宜迅速进剿，克期肃清”。

△　孙中山与即将赴洛阳、保定与吴佩孚、曹锟会晤之张继谈时局，指出使国会合法，为今日之急务；总统须由合法国会选出；县民自治，县知事民选；兵工政策，变兵为工；防止国内战争，奉直调和，为目下之急务；国家建设，应有法国革命及明治维新之气魄与努力。

△　广东省长陈席儒布告，广州市政向联华公司借款200万镑。31日，32校学生乘汽车散发拒债救亡传单，公安局饬警察查禁，人心

益愤。

△ 由黄勖志、华志清、华彩苓组织之天津女权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女子有选举、参政一切之权利，是日在达仁女校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

△ 四川省议会通过临时省政府组织大纲。

△ 太平洋商务会议在檀香山开幕。我国代表穆藕初在会上演说我国商务与太平洋各国之关系及发展计划。谓从1880年至1920年，40年间，我国商务出口总额由157兆增加为1304兆，增加八倍以上；1880年至1920年，进口货以棉货为第一大宗，由4兆增为62兆，约增11倍；五金材料进口居次位，1880年至1920年，增加15.5倍。再次分别为煤油、机器、煤、鱼介海味、袋包等。1880年至1920年，出口以丝为第一大宗，由13兆增为77兆，约增六倍；其次为豆类，1900年至1920年，20年间，由5兆增为70兆，增加14倍。此外，出口在500万两以上者，计有：五谷、绸缎、锡块及生铁、生皮、芝麻、茶、牲畜及肉、猪鬃、羊毛及骆驼毛。进口最大国为美国，1880年至1920年，从美国进口价值由100万两增为1.43亿两，40年间，增加143倍。吾国对美出口，1880年为900万两，至1920年则为6700万两，40年间，增加七倍。进口居第二位的是日本，1880年，从日本进口为300万两，出口为200万两，1920年，进口日货，较40年前，增加76倍，而输出华货，则较40年前，增加70倍。进出口商务，除美日外，依次为暹罗、新加坡等处，爪哇等处，朝鲜、菲律宾、加拿大、南美、澳洲纽丝纶等处，安南、俄国、太平洋各国，墨西哥及中美。在谈及吾国商务进步时，认为尚有若干障碍，必须除去，计有：第一，年来政治多故，实为发展商务之第一大障碍；第二，关税不合科学的经济的原则；第三，货币制度不良；第四，无对外银行；第五，缺乏对外航路；第六，国内交通不便利；第七，国际间政治上之侵略，亦足以妨碍吾国之商务。最后表示：“我国人深愿与我各友邦为最诚挚之携手，以增进彼此商务上之利益，并以增进人类文化。”

△　日军全部退出海参崴，苏俄军队占领。次日，日本又撤退西伯利亚及中东路沿线驻军，哈尔滨日军亦撤去。

10月26日　　孙中山特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并特派邓泽如为驻港理财员，并嘱邹、邓二人相助为理，调和各人意见，以期速达歼灭陈（炯明）目的。

△　孙中山之代表林森、汪精卫、居正、蒋介石等至福州犒宴三军。

△　北京国会宪法审议会继续开会，议决对于县制在国宪内规定大纲。

△　北京政府外交部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因原定之中俄会议不能如期举行，提出辞职。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牒驻京各国公使磋商改革上海会审公堂办法。

△　北京外交团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云：中国于二五附加税加增前，公布财政计划。

△　浙江省教育会、杭州总商会、浙江省农会、杭府银行公会、杭县律师公会，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反对邮电加价。

△　四川教育协会、农工商联合会、议员恳亲会、律师联合会、各县参议会，通讯社暨公民张正谊等5.2万人通电，否认旧国会。略谓："查现在集合制宪之旧国会，其中分子有兼任官吏者，有业已解职者，有附和帝制者，有躬行卖国者，并有曾充非法议员者。人品既极卑污，法律又相违背，此等分子所集合之国会，只可谓伪国会，将来制定之宪法亦为一种伪宪法，吾人绝对不能承认。诸公尊崇法统，热心国宪，尚希一致否认。"

10月27日　　孙中山任命伍汝康为两广盐运使，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特派廖仲恺兼大本营筹饷总局总办，邹鲁为会办。同日，孙中山致函湘军将领鲁涤平、蔡巨猷，勉以救湘讨陈。

△　河南赵杰旧部纠集万余人向京汉路线攻击，经张福来、靳云鹗派队击散。

△　津浦路向英国中兴公司订借60万元，在天津签字。

△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千余人，因要求增加工资，罢工两天，获得胜利，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两元。

10月28日　　北京政府所组织之“政治善后讨论会”开幕，由国务总理兼会长王宠惠主持，会员多系“民八议员”。

△　黎元洪令浙江省长沈金鉴着来京另候任用，特任张戴阳为浙江省长。

△　蔡成勋因拒谢远涵到任，以暴力钳制赣人。是日，省议会开谈话会，宪兵营派来宪兵多名，并宣布：“奉司令命令，戒严时期不准开会。”

△　武昌女教员胡敬义、李哲旺、李学蕙、谢崇端、罗颖华，共同发起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

△　远东委员团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关于取缔白俄问题提出四项要求；一、窜入中国边境之武装党众应立即卸其武装；二、凡由该党众取得之枪炮子弹及国家财产需设法保管，以便将来移交我共和国；三、所有避入中国之白党由中国官吏管理监视；四、所有窜入华境之白党一律遣送出境，并交与远东共和国官吏。

10月29日　　黄大伟、许崇智、李福林通电，宣布奉孙中山令，就任东路讨贼军一、二、三路司令。

△　萨镇冰致电北京政府辞讨逆副司令职，又电称，王永泉以“不进攻”为“取消制置府”之交换条件。

△　旅沪福建同乡致电王永泉、许崇智，要求取消制置府，并劝徐树铮离闽。王于是日辞去总抚，主张民政公开（制置府已无形取消）。

△　北京50余团体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撤销治安警察法大同盟”。会上决定：一、即日再向政府呈请实行废止《治安警察法》，并限期答复；二、组织永久机关，专办废止治安警察法事宜；三、各省组织分部。当场推定费觉天、谭平山起草呈文，由蔡元培、林长民、毛一鸣、刘仲介到府面递。次日，民权大同盟等发起60余团体，再次于北京大学第二院举行大会，议决向北京政府递请愿书，扩大运动规模等项事宜。

△　上海女权同盟会经过八次筹备讨论，是日在省教育会开成立大会，到会400余人。

10月30日　　黎元洪令：派杨晟、罗昌赴暹罗，参加万国红十字会议。

△　徐树铮以在福建设置之建国军政制置府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因各方反对，是日通电，于军政制置府改设军民两署，任命王永泉为总司令，林森为省长，分理军民事宜。

△　中央观象台全体职员发起创立天文学会，选举高鲁、秦汾为正副会长。

△　安庆各界人士一万余人，在体育场举行声讨马联甲游行示威活动。

10月31日　　黎元洪特派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河南督军裁撤。特派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向驻京法公使傅乐猷交涉早日交还广州湾问题。

△　李厚基抵宁后，连日向齐燮元、杜锡珪乞援。并致北京政府电，称已与齐、杜商妥，请速拨饷，罗文幹立筹20万汇宁。

△　福建各界大会，到会千余人，选举林森为福建省长。

△　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债局及银行团议决，准以“九六公债”债票交胶济路股款。

是月　　吉林财政厅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日金100万元，期限半年，用于购买枪炮及整理官帖费用。

△　美国急欲在上海、北京、广州、哈尔滨四处设立无线电台，已由美国联邦电报公司发起，组织公司，总经理为阿尔亚谷，协理为休优里，定资本950万美元，优先股计360万元，余皆为普通股。

△　交通总长高恩洪宣布，截至今年底所负外债之总额已达七亿元以上。为偿还十二年（1923）到期铁路外债本息用，拟发行“救路公债”6000万元，利息周年八厘，四年偿本，以邮电加价及铁路脚夫加价所征收之税额充担保品。

11月

11月1日　　北京众议院以民国四年5月中日协约“二十一条”换文，未经国会议决，无效，请政府向中外宣布，即日移送参议院。

△　黎元洪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凡29条。规定初等教育：小学初级四年，高级二年；中等教育：中学一般初高级各三年，师范六年，甲、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年限各地酌定，得用选科制；高等教育：大学四至六年，专门学校三年以上，用选科制；大学院年

限不定。其改革之“标准”为：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7日，教育部咨各省区遵照施行。

△　北京政府交通部实行邮电加价后因各方反对，是日再发通告详加解释。

△　湘议会以湘为自治省，通电反对邮电加价。11日，赵恒惕据议会咨文，饬令邮、电各局不得加价。

△　全国商会联合会第四届大会于汉口开幕。出席者鄂、湘、川、陕、豫、鲁、晋、赣、苏、皖、浙、闽、粤、滇14省75人。推鄂商联会长吕超伯主席。萧耀南等到会致贺。在北京参加关税会议之各省商会代表以全国商联会副会长张维镛为首，主大会移京举行，与汉会大起争执，后妥协，仍赴汉加入大会。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中方提出总领事馆等保留财产对案。2日，第二十三次会议。双方意见大体一致。

△　福建建国军制置府总领徐树铮在闽通电，略谓：“与北京伪政府断绝往来，通告外国勿与交涉，公推浙江卢嘉帅（永祥）、奉天张雨帅（作霖）为领袖，联合有力各省区选派廉正忠勇代表各二人或三人，集议沪上，迎奉合肥段（祺瑞）上将移驻龙华，与中山先生朝夕晤聚，主持议局。”7日离闽抵沪。

△　江西督理蔡成勋在赣设“清赋督征总局”，以财政厅长为总办，委定清赋委员33人，分赴各县逼索历年地丁积欠，并由局拟定清赋章程，责令各县催办。

△　沈鸿英率部假道湘边进逼桂林。该处滇军朱培德部赶赴浔州与张开儒部联合。

△　湘工团联合会成立，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该会有基层工会14个，会员四万余人。同日，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该会包括徐家棚、株萍、新汉、岳州四处工会，为全国铁路工会最早之统一组织。

△　上海金业交易所成立，资本150万元，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934年9月，与沪证券物品交易所金银部（1920年2月成立）合并，形成我国惟一之金业市场。

△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3000余工人罢工，反对军阀查封浦东纺织工会。因军警镇压及工贼破坏，至25日失败。

11月2日　徐树铮因各方反对，离闽赴沪。次日闽绅商学各界大会通电，告徐已离闽，建国军政制置府取消，宣布“闽事闽人自决”，请各方军队停止入闽。

△　北京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各省区公私各界以路矿抵押外债，非经呈部立案者无效。

△　山东外交协会议决，呈请北京政府对“鲁案”提出取消永租权、胶澳商埠长官署内设参议会、准鲁代表参与该案等六项要求。4日熊炳琦代为转电北京。

△　上海浦东英美烟厂3000余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援助日华纱厂工人。3日罢工人数增至9500余人。遭警方镇压及工贼破坏，至24日失败。

11月3日　越飞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次声明除苏俄外，各国均无权与闻中东铁路。要求：一、取消该路管理处，将总工程师奥斯特罗莫夫逮捕法办；二、派员彻查账目；三、与苏协商组织临时管理机关。8日，复送照会重申以上三项要求，并声明道胜银行对中东路已失去资格，其举动侵犯苏权利，有碍中苏关系。

△　张载阳接任浙江省长。浙各界均谋抵制。军界陈乐山等通电，称卢永祥任善后督办六个月，期满之前应贯彻当初宗旨。各法团联合会主设省参议会以监督政局。旅沪浙江各团体亦致电卢及省议会等，反对北京政府任命省长，请从速宣布自治。

△　张作霖于奉天省署宴请东三省文武官吏及各团体代表，称其政治主张“不过‘保境安民’四字”。又称“不问何人，苟能促成统一，即为吾旧敌，吾亦赞助之”，“中央之事，吾不过问”。

△　吴佩孚致电王怀庆，以苏俄在外蒙组织公司，开办铁路矿山电气事业，无异“举蒙古版图归并于俄国”，请责令邮电机关检阅越飞往来函电，以了解究竟。

△　中英谈判接收威海卫会议，因中方反对以刘公岛为英海军避暑地，英方电伦敦请示，暂休会。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公产补偿额付款方法。4日，第二十五次会议，中方提议该款以无利息之银元国库券拨付，日方允考虑以国库券偿付半数，反对无利息及银单位。

△　河南赵杰、宝德全等旧部流窜成匪，是日洗劫颍州（阜阳）。该部先曾请吴佩孚收编，吴仅允资遣回籍，乃叛变。10月间先后攻陷新蔡、上蔡、项城、沈丘等县，声势大增。又抓去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多人，冀引起外交交涉。后大部窜入皖北。1日颍州守军闻风出逃，匪首“老洋人”率众数百入城，2日匪首李鸣盛率众近千入城，均大肆焚掠。城内死伤近700人，被掳千余人，财产房屋损失5000余万元，难民10余万人衣食住无着。该城倪嗣冲家藏之枪炮及大批弹药亦被掠去。

△　中华全国商约研究会成立。该会为张维镛等所发起，附属于全国商联会。同日，北京关税研究会闭会。

△　北京各团体代表蔡元培等再请撤销《治安警察条例》。

11月4日　冯玉祥由河南抵保定，会晤曹锟。10日抵京。14日就陆军检阅使职，所属军队驻京郊南苑。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就天图路约答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借口张志潭长交通部时已口头允许开工，拒绝将外交部之否认该约照会转达东京。

△　杜锡珪电请闽各界大会“速向中央表示服从诚意，”并称不宜阻止援军。7日，该会致电旅沪闽同乡会，请开会公决，反对杜电。

11月5日　黎元洪指令：江苏徐州辟为商埠。

△　日陆军第五师团假定日本四岛为中国，实行“敌前”登陆演习。

△　中国各省区民治运动总联合会第一次职员会议，通过修订之章程大纲及宣言，该会为各省区暨蒙、藏、华侨等各团体所组织，“以发展民治，保障国权”为宗旨。总部设于北京，各省区设支部。

11月6日　孙中山致函刘成勋、陈洪范，略谓：“执事握重兵，居要地，而四川豪俊，又不后人，务望互相策勉，力规其远且大者，以图利国家，洵诸君子不朽之业也。”

△　越飞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谓：中国政府未履行1919年及1920年宣言所载条件，倘继续藐视苏利益，苏将不再履行宣言义务。声明两国间各项问题解决之前，所有苏在华权益并不失效。强调中东路系西伯利亚铁路之一部分，即使让与中国人民，苏对该路之利益仍不消灭。9日又致外交部节略，重申该内容。

△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越飞10月24日照会，声明对苏“赤、白两

党”，向无偏袒；中国在黑龙江亦具固有航权，该等问题与外蒙问题不必并为一谈，盼速开中俄会议，商讨撤退外蒙苏军办法。

△　中日邮政会议之日本事务长天羽宣称，日不裁撤南满日邮，系执行华盛顿会议决议。8日，日政府分电各有关机关，谓对南满邮局问题绝不退让。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中方提出公产对案。7日第二十七次会议。日方除商科大学外，对该案均表同意。

△　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6000余人罢工，提出承认烟草公会，增加工资等17条要求，公司全部应诺（惟将公会改为职工同志会），次日复工。

△　北京政府陆军部因王永泉来电表示服从，电饬该旅呈报饷械，准予补充。

11月7日　北京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未设省宪之地方，在未适用本章规定之前，其制度以法律定之。

△　李厚基偕齐燮元派给之随员数十人，携现款10万元及大批枪弹于5日抵厦门，与高全忠协谋反攻福州。臧致平先已抵厦，是晚纵兵至李处索饷，旋借端围攻，李逃至鼓浪屿日租界，高亦受伤潜逃。次日，臧以总司令名义宣布维持地方秩序。

△　孙中山为国民党员金华衮、韩恢被杀事，电责萧耀南、齐燮元“破坏和平”。

△　尹之鑫等78人发起之各省区民治运动联合会在京开成立会，通过章程，凡14条，其宗旨规定：“本会采互助精神，以发展民治、保障国权为宗旨，其共同进行事件列举如下：（甲）废督及类似督军之军阀；（乙）裁兵并撤退驻防式之军队；（丙）各省区实行自治制宪；（丁）纠弹贪官污吏；（戊）整理地方财政，（己）振兴地方实

业；（庚）改良地方习惯；（辛）监督外交保全领土。”

△　武昌首义纪念筹备会于武昌成立，400余人到会，推吴兆麟为主任，并通过筹备事宜。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远东委员团节略，声明中国取缔白军溃兵系维护主权之内政行为，对俄内争不愿有所偏袒，拒绝该团10月28日节略所提四项要求。13日，远东委员团驳复外交部，云：俄白军自中国领土攻击远东共和国已屡见不鲜，中国政府之政策于中俄关系不能有所裨益。

△　北京外交团以各省截留盐税，危及借款担保，是日议决再向北京政府抗议，以派员赴各省交涉并由海关代收盐税相威胁，旋由领袖公使向外交部提出。北京政府答复，谓已设法解决，保证不影响借款担保及偿还本息。

△　各地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北京大学数百人举行庆祝大会，李大钊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发表宣言及通电，敦促北京政府承认苏俄。长沙各界举行庆祝大会，高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标帜，旋被赵恒惕强行解散。武汉亦有同样集会。

△　苏俄驻京代表越飞为庆祝十月革命五周年举行招待会。越飞因病请伊凤阁代为主持并宣读演讲稿，谓：苏俄自外蒙撤兵不合中苏共同利益，苏在中东路利益亦需保障。王家襄、吴景濂请苏遵照昔日宣言，以公平解决中东路等问题。蔡元培等演说，赞扬俄国革命。

11月8日　孙中山函促驻桂滇军杨希闵等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　北京众议院将政府咨请追认之九种条约付审查。计有：《中智商约》、《中瑞商约》、《中波商约》、《中德协约》、《国际法庭公约》、《国际邮政公约》、《九国间对华适用各原则及政策条

约》、《九国间对华关税条约》、《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　四川军事善后会议闭会。会期中议决：一、川省暂取自治态度；二、推刘成勋为总司令；暂兼摄民政；三、废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仍分期实行裁兵，积极结束；四、破除防区，统一财政，限定12月1日开始实行；五、取消护商、清乡、公益等捐；六、官商合办钢铁厂；七、举办官银行，整顿交通，划一军事教育等。

△　中日合办天图铁路契约在奉天签字。资本400万元，中日各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借垫200万日元作为华方资本，年息六厘，期限13年，以天图路财产及华方股票作抵。张作霖令延吉道尹布告地方，禁止人民反对。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中方提出青岛警备接收事项及方法案。9日，第二十九次会议。双方意见大体一致，其实行细目委托在青之警备委员会协定。

△　林森通告就福建省长职。次日王永泉通告就总司令职。11日，林布告施政方针：一、筹设自治机关；二、公开财政；三、蠲免苛捐；四、整顿金融机关；五、维持教育事业。

11月9日　黎元洪特派张绍曾兼蒙疆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

△　四川民政善后会议开幕。刘成勋演说，谓该会要旨为“维持现状”。11日起正式议事，28日闭幕。

△　鄂督萧耀南任命23人组成财政会议。次日议决将隶属中央之各局税款暂行挪移，再由官钱局借垫铜元两成，以凑足主客军一月薪饷。

11月10日　孙中山复函福建总司令王永泉，指示方略。略

谓："我兄与汝为（许崇智）诸君，同历艰危，死生相共，情志固结，必能和衷共济，措置裕如。文在此间一切自当留意，如有所见，必随时奉白，以资进行也。"并谓："日来北京及闽中对文表示，于闽事已渐化敌意，此后相机应付，当可使助范……闽事若得浙助，则唇齿势成，东南形势于此可求发展矣。"

△　北京言论自由期成会成立，中外记者及著作家140余人到会。推林天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等60人为评议员。其简章称："本会以向国会请愿，废止妨害言论自由一切法规，并另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为宗旨。"

△　粤讨贼军总司令部通告，自是日起，对陈炯明拍卖公产，包办盐务及一切公私借款概不承认，应承者以通敌论罪。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中方提出青岛土地问题大纲。13日，第三十一次会议。日方提出回答书。

△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杨小川、王培元离沪赴暹罗，出席万国红十字大会。

11月1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越飞，谓已派员调查中东路之管理，请苏"再行专案声明"将该路之权益无条件归还中国，另请对红军预备侵占中东路之传闻，"迅行切实更正"。同日照会远东委员团，亦请更正该项传闻。

△　安福系罪犯朱深"逃出"日本兵营。16日，最后三名罪犯丁士源、姚震、姚国桢亦"逃出"。

△　河南赵杰旧部"老洋人"等悍匪由皖回窜，连破息县、正阳、遂平，先后围攻固始、商城、光山、潢川、西平、舞阳等县。是日，在郾城南部与靳云鹗所部激战，京汉交通中断，次日始通车。

11月12日　孙中山任命周之贞为广东西江讨贼军司令。

△　滇各公团召开万余人之国民大会，抗议英国强占片马。公决组织片马协会以为政府后盾，组织示威大游行以示民气。

△　北京成立“国民监督议会团”。该团受吴佩孚支持，其宣言称：国会应先制宪法后举总统，否则必起而反对。

△　旅沪闽同乡会致电刘冠雄，谓“闽人仇公，无异仇李（厚基）”，反对刘回闽。后闽各界大会亦电刘，声言：“闽人为自卫计，惟有誓死相拒。”

△　山东各界联合会等通电，反对王正廷利用外资承办胶济铁路。又分电吴佩孚、曹锟及北京政府，以王办理“鲁案”“丧权侮国”，反对吴保王督办胶澳商埠。

11月13日　孙中山复函蔡钜猷、陈渠珍，指出“解决湖南，则惟湘西是赖”。望在湘西速起兵讨伐赵恒惕。

△　黎元洪特派李玉麟监督安徽裁兵事宜。特任胡景翼为延威将军。

△　浙督卢永祥寿辰，各省代表赴杭祝寿。孙中山派汪精卫前往。齐燮元之代表向卢竭诚修好。

△　湘议会开始选举省政府。至24日，选出七司司长各两名（交省长圈定一名）。至27日，选出高审、高检厅长与审计院长。长沙女界联合会通电，对女界无一人当选深表愤慨。

△　美新银团代表司蒂芬·阿卜脱会见黎元洪，谓中国债票在外跌价，请自动整理财政以维持国际信用。

△　英文《京津泰晤士报》陆续发表北京政府外交部泄露之外交文书，内容为北京政府上年春派员赴美、英、加等国运动破坏英日同盟之经过。

△　赣议会电请北京政府催促谢远涵及财政厅长文群、教育厅长朱念祖等履任视事。17日，旅京赣同乡议决组织省、厅长驻京办事处，函请谢、文主事，并派代表要求政府罢斥蔡成勋。

△　烟台、吴淞海底电缆竣工。此为日本古河电气株式会社承修，全长520海里。

11月14日　　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合并。18日越飞与远东委员团分别通知北京政府，远东委员团撤销，俟后一切事宜均向越飞接洽。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越飞，抗议苏蒙订约，声明外蒙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无与他国擅行订约之权。17日越飞复称，苏蒙条约并非秘密，亦无侵犯中国主权之处。

△　越飞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谓1919年及1920年宣言中并未载有将中东路权利无偿交还中国之词句，对俄白军问题望中国政府勿再持中立，并谓红军欲占中东路之传言毫无根据。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罗文幹与华义银行经理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该项债券自世界大战以来早已贬值，德奥奸商在欧洲以低价收购该债券，并以债权人资格要求偿还或换发新券，屡被财政部拒绝。此次通过华义银行办理，王宠惠等为应付吴佩孚催索军饷并迫于各国政府压力，同意续约。王等乃将补款八万镑（合华币60余万元）悉数交吴，惟未通过国务会议，仅由王批准。次日，该行协理徐世一向吴景濂等告密。

△　黎元洪据高恩洪呈，沪中国银行监理官傅宗耀“勾结逃犯，图谋不轨，煽惑路工罢业，触犯刑章”，请免职拿办，指令傅着即免职交法庭讯办。16日，宁波旅沪同乡会通电反对交通部滥用职权，罗织人罪。何丰林、卢永祥、张载阳等先后致电该会表示同情。沪总商会及银行公会等亦分电北京政府抗议。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日方同意青岛电话局六个月内并用日语。15日第三十三次会议。日方提出海底电缆新案。

△ 北京女子参政总会派定委员分赴豫、湘、赣及鄂、川、浙、粤组织分会。定下年1月在京召开全国大会。

11月15日 孙中山在沪召集会议，审查国民党改进案。推定汪精卫、胡汉民为宣言起草人。

△ 汉口英、法、美、日、荷、丹、墨、比、瑞、挪、意、葡等国侨商及传教士在英租界召开“万国公民大会”，以豫匪掠取教士，焚毁教堂，危及外人生命财产，电请各国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救出被掳外人。又选出执行委员，组成常设监督机构。

△ 北京众议院以逾期不到会为由，将徐清和等七名护法议员除名。护法议员乃连开紧急会议，除发宣言及提质问外，决提起诉讼。

△ 北京“万国报界学会”茶会欢迎美联合通讯社社长诺伊斯。诺倡言北京报界组织不受政府及派系束缚之通讯社。后诺赴沪，亦鼓吹参照美联社不党不偏之独立精神发展中国新闻事业。

△ 北京政府教育部职员因索欠薪无结果，停止办公。次日议决如不能达到目的，三日后封存印信，六日后锁闭机关。

11月16日 黎元洪据高恩洪呈沪招商局董事会傅宗耀等“草菅人命，败坏航政，舞弊营私，侵占公产，罪情重大”，着派邵恒浚、张福运、殷泰初前往查办。18日该局股东自组股东维持会，并连发通告通电，抗议官方侵犯并谋吞商办航业。20日北京政府交通部通电，以“官督商办”为根据解释对该局之查办。股东会复电驳斥，否认“官督”。工商各界纷纷声援。23日黎复电招商局股东维持会，谓该会拒绝查办之通电“已交院查照”。

△ 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举行家宴，招待段祺瑞所派使者何全勋。

△　曹锟等要求维持惩治盗匪法。前此北京国务会议议决该法至是月26日期满后即行废止，曹锟、田中玉、齐燮元、韩国钧、冯玉祥、张福来、张凤台、马联甲、许世英、王承斌、熊炳琦等是日联衔致电北京政府，列述“匪风滋盛”、“纲纪扰乱”、“牵及邦交”、新法“颁布无期”、该法“无关永制”五大理由，请延长施政时期，并以各省将施行单行条例相要挟。

△　英、法、美、意、瑞典五国公使赴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抗议照会，要求从速救出被豫匪掳去之外人，并保证外侨今后之安全。外交部急电吴佩孚尽速设法。吴次日复电陈述剿匪及营救办法，23日电令张福来、张凤台通饬各县调查外侨情况并派兵保护。

△　“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中方提出处分土地之答案。17日第三十五次会议。日方提出土地新对案。18日第三十六次会议。中方提出土地案之驳书。日方催定胶济沿线商埠，中方请与外交部直接交涉。

△　法国众议院通过组织公司恢复中法实业银行案。

△　广州第八甫街失火，烧毁《国华时报》、《南越报》等七家报馆。商号店铺损失30万元以上。

11月17日　　黎元洪据司法部呈《惩治盗匪法》施行期限瞬将届满，拟订强盗案件特别办法及过渡办法，是日指令由该部通行遵照。

△　黎元洪公布《胶澳商埠暂行章程》，凡12条。

△　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联合宴请全体省议员，报告治苏方针。齐燮元指出保境安民、肃清匪患等四项方针，韩国钧提举行八厘公债及地方自治等三项方针。

△　日首相加藤于贵族院称，日政府已断然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之交涉；又谓满洲租界地日邮不在裁撤之列。

△　苏俄远东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中东铁路地区包括在苏领土内。

△　东三省省议会电各省属机关声明直奉政见误会已由鲍贵卿从中调和。但张作霖对归还京奉车辆及盐税等问题仍无明确表示，并以“保境安民”为职志，拒受北京政府之命令。鲍于8日抵奉，23日由奉抵京复命。

△　张作霖拟定中东路护路计划，电令朱庆澜查照。该计划略为：一、加派军队；二、于各重站添设司令；三、修筑炮台；四、接济军火；五、请俄方约束部队勿侵入路线。

11月18日　　孙中山委田铭璋为中国国民党黑龙江支部筹备处长。

△　北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偕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三深夜入黎元洪宅，以盖印之议院公函指控罗文幹私订奥款展期合同，丧失国权，违背约法等罪，并控罗有受贿嫌疑。黎在挟迫下以手谕饬令聂宪藩、薛之珩捕罗，送地方检察厅拘押。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亦同时被捕。次日，聂、薛为自脱干系，致电曹锟、吴佩孚报告捕罗经过。

△　黎元洪公布《青岛市施行市自治制令》，凡九条；《胶澳各乡施行自治制令》，凡六条。

△　北京政府交通部解散唐山路矿大学。唐大全体学生300余名13日停课一天游行募捐，援助唐山五矿罢工。16日，校长俞文鼎据交通部旨意开除五名学生代表，学生罢课反对，发表驱俞宣言。驻军旅长董政国调停未成。是日，俞奉部令解散学校，将全体学生武装押解出唐。学生分赴津、京、沪、汉等地申述经过，并再三通电，恳各界声援。

△ “鲁案”第二部第十次会议，决组织交还铁路准备委员会。

△ 戴季陶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赴渝就职。是日，重庆军政各界设宴欢迎。会上戴解释孙中山对川局主张：消极的，避免战争；积极的，整顿教育、实业，以谋建国之基。

△ 上海三北公司“宁兴”轮载有闽军事当局招募之游民千余名，旅沪闽同乡会阻止开船，并向何丰林交涉。次日，何令游民离船。该会电请闽军事当局停召新兵入闽；28日，沪国民党人熊公烈等1200余人函该会质问，劝读李斯《谏逐客令》一文。

△ 华文《醒华日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出版，该报系由民国四年春创刊之《醒华周报》改组。

11月19日 北京国务院联席会议。阁员诘问黎捕罗之理由及不经司法部而拘捕罗之不合法。黎元洪自认捕罗文幹违法，答愿下令自责，并嘱警厅释罗。议决：罗案应由检厅依法办理，“实则严惩，虚则反坐”。吴景濂、张伯烈偕议员多人入府阻止黎下令。同日，全体阁员（除张绍曾、高凌霨）通电宣布吴、张坐迫下令捕罗经过，并声明奥款合同曾咨院经总理批准在案（后张、高通电否认该合同曾经过阁议）。同日京师地检厅票传吴景濂、张伯烈出庭对质。吴、张借词公府非诉讼机关，罗案系总统交办，拒绝到厅。次日，王宠惠等再赴公府请黎下令，复被吴等冲散。

△ 孙中山复电蒋介石，嘱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回粤讨贼任务，“万勿轻去，以致偾事”。

△ 四国新银行团代表在京会议。对北京政府提议之一亿元外债整理借款，日坚执不允。次日，议决以中国政局不稳，时机尚早为由正式拒绝，并劝北京政府速行废督裁兵，以实现和平统一。

△ 蒙疆善后委员会在北京张绍曾私宅开成立会。28日，援救蒙

疆筹备会成立，张出席。推那彦图为会长，对蒙事主张武力解决。

11月20日　　黎元洪令准免田中玉“鲁案”会办兼职，特派熊炳琦会办“鲁案”善后事宜。特派沈瑞麟兼外交官领事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长。

△　吴佩孚致电黎元洪，谓未能解职先行捕罗（文幹）“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后又电请黎通电说明罗案经过，“昭示群疑”。

△　北京众议院通过查办罗文幹丧权祸国、纳贿渎职案及奥款合同无效案。护法议员动议，吴景濂擅用院印，应付惩戒，被哄散。同日，北京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及干事处通电指斥吴“专权乱法”，“干预行政”。

△　张绍曾通电辞陆军总长职。自是日起，张未参与国务会议，亦未到部视事。

△　奥款债权代表罗森达、柯索利自到检厅，声明发生疑问之支票系酬劳费，与罗文幹无干。次日交通部函复检厅：财政部拨交该部之八万镑支票已于17日如数收到。22日，英、意公使致函外交部，证明奥款签字于手续上并无情弊。

△　梁启超致电黎元洪，谓捕罗为“蹂躏人权”，国会“以毁法为事”。25日，吴景濂、张伯烈电梁，斥其“左袒卖国者”。27日，部分众议员通电痛骂罗之“妻兄梁启超”，并电请齐燮元、韩国钧逐梁出境。又，康有为亦发表公电，谓罗于奥款“有大功而当赏”，并因吴景濂、张伯烈违法，进而攻击“代议制”。

△　上午，“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日方提出码头财产与公产一并处置等五案。下午第三十八次会议。日方再提土地新案，中方提出海电及码头财产答案。双方任定起草委员：中方稽镜、孔祥熙等六人，日方木村锐市等四人。

△　福建邵武徐镜清致电王永泉、许崇智，报告光泽、邵武、建宁、泰宁诸县相继为常德盛军攻占。时徐与延平许济部已集中大干固守。

△　川军但懋辛所部与田颂尧所部为争遂宁防地，于该县交火冲突。两部结怨已深，刘成勋调停无明确结果。

△　鲁省长熊炳琦与美商上海亚洲建业公司签订山东宫家坝堵口工程合同。该公司借垫银元120万元作为承包费用。

△　道胜银行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反对苏俄代表否认该行在中东路权利及指该路总工程司违法之声明，请保护该行股东权利。

11月21日　　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通电，说明19日准备所下命令之内容；指责吴景濂等屡次包围黎元洪不令盖印，声明责任内阁已被破坏，惟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待罪”静候解决。次日，吴、张通电驳斥王等“淆乱听闻，借资抵制”。

△　罗文幹在狱呈请黎元洪速令法庭依法办理该案，并于地检厅优待室接见记者，声称不俟该案水落石出绝不出狱。黎迭次派员请罗暂出检厅，罗均未允。

△　上午，“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日方对胶澳商埠章程中外国人代表权问题提出抗议。下午第四十次会议。日方大体同意电报局接收日文电报等中方对案。22日，第四十一次会议。双方议决青岛病院等归属问题，并同意电报、电话及埠头附属船舶解决案。23日，第四十二次会议。中方提出公产评价妥协等案，并同意青岛大连无线电报问题由两国主管官厅另行协议。

△　湘劳工会纪念成立二周年。电气、机械、印刷、纺织等十余工会1000余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200余人到会。是为该会被封

后第一次重大活动。

11月22日　　黎元洪派汪大燮、孙宝琦、黄开文、荫昌至地检厅，用总统专用之红牌一号汽车迎罗文幹（及黄体濂）出狱入公府。黎亲表歉忱。罗允暂住礼官处。是晚汪等四人向地检厅具送保单。

△　王正廷出席北京众议院报告“鲁案”两部情况。

△　“鲁案”第二部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中方提出铁路偿价之国库券利息作银单位。23日，第十二次会议。中方提出德国遗留财产估价问题。27日，第十三次会议，中方提出铁路估价为2700万元，日方反对以该额为讨论基础，对德遗留财产亦不允变动。28日，第十四次会议。中方提铁路估价3250万，日方要求4500万。双方任定接收铁路准备委员，中国颜德庆、日本秋山雅之介等各九名。29日，第十五次会议。国库券决依票面十足计算。30日，第十六次会议。双方对铁路偿价支付方法意见已接近。

△　安徽督理马联甲通电抨击省长许世英不筹裁兵款项，请立予罢黜，并提出新旧军共需饷款740万元。24日，许通电驳斥，谓皖省军费原为450万，尚须减去180万，马所定军饷不但未裁，反而增加。25日，李玉麟电请马、许“始终维持”，“宽筹经费”，以尽量裁军。

△　中国赴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商业会议代表穆藕初、赵晋卿、毕云程、赵桂芬结束会议，是日返抵上海。

△　广州大沙头飞机厂西厂被炸，全厂及新飞机二架、旧飞机五架均被焚毁。

11月23日　黎元洪特派顾维钧兼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处长。

△　曹锟通电，攻击罗文幹签订奥款合同丧权卖国，列举五罪：一、“追加八厘利息”；二、“滥算复利”；三、“抛弃定银”；四、“发行

九折新票”；五、“滥加所得税”。请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

△　黎元洪电复吴佩孚，责其“遥断朝政、轻折元首”，讥其亦曾请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并声明“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主贤能”。

△　北京国务院退回众议院查办罗文幹咨文。谓根据约法，国会对国务员只能弹劾，不能查办，该咨文“政府碍难收受”。

△　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奥款展期合同要点：一、奥对我国无债务，该款不能不还；二、利息等条件较前为优；三、附带之购货合同价值低廉；四、继续归案办理，又经总理批准，手续完备。

△　全国商联会举行特别会议。推黄炎培、聂云台、蒋梦麟、余日章为裁兵劝告员，劝北京政府及各省督军裁兵。议决请愿国会速制宪法；联络全国银行团体合组财政监督机关；要求各国政府、商人于裁兵实行前停止输送军械，于财政监督确立前停止借款。次日发出通电。

△　南浔铁路因欠日东亚会社1000万元不能偿还，照约由日人监督营业，日顾问兼经济监督高比良是日由沪赴赣就任。赣议会国路权断送，以该路合同未送省议会审议为由，电请北京政府交涉取消。

△　伍朝枢在沪为其父伍廷芳开吊。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诸人及黎元洪代表何丰林、北京国会代表卢宗岳、北京国务院代表刘左霖、驻沪日领事等中外人士数百人前往吊唁。

11月24日　　王承斌等直系督军通电响应曹锟23日通电，斥罗文幹误国违法，并请移转管辖。25日齐燮元、马联甲、直隶议会，26日蔡成勋、杜锡珪、马福祥、田中玉、熊炳琦、张锡元，27日卢永祥、刘镇华、何丰林，以及陆洪涛等，亦纷电响应。其中卢电痛斥“坐收

卖国之利者”，矛头直指吴佩孚。萧耀南于27日，张福来（及张凤台）于12月1日，亦通电附和曹电。

△　北京地检厅原拟宣告罗文幹无受贿证据，见曹锟23日电措词强硬，乃于下午召开司法界全体大会，决定“再加研究”。

△　东路讨贼军将领黄大伟与许崇智不和，黄应孙中山电召是日离闽，蒋介石同行。27日抵沪。孙令许崇智暂兼第一军军长，所部四个旅均归直辖。

△　上午，“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日方提出食盐出口案及矿山问题妥协案。下午，第四十四次会议。中方提出矿山、海电及土地答案。25日上午，第四十五次会议。中方提出无线电报等使用日文对案，日方提出海电修正案。下午，第四十六次会议。双方议决青盐出口及无线电报等使用日文协定案。

△　英使照会外交部，决于下年1月1日撤销在华邮局。

11月25日　　黎元洪通电述捕财长罗文幹案经过，称阁员未解职先送法庭尽多先例。次日复曹锟电谓罗案既交法庭，应依法解决，“似不必组特别法庭”。

△　吴佩孚致电黎元洪，声明拥护总统，称前电仅恐“程序未合，致碍中枢威信”，复致电曹锟，赞成对罗文幹案依法办理，“毋稍宽纵”。同日，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因吴佩孚态度软化，通电辞职，称罗案结果倘有牵涉，“仍当束身司败”。罗文幹、黄体濂仍回地检厅看守所，该厅将保结退回。

△　众院议长吴景濂通电详述罗案始末，称内阁更迭为政治问题，阁员渎职为法律问题，“两事截然，不容牵混”。复答记者问，指王宠惠、顾维钧、高恩洪有共犯嫌疑，谓王、罗非正式阁员，故不用弹劾而用查办。同日，吴等操纵发起之“国民大会”按吴口径向国会请

愿，该会曾大事张扬，但到会者实寥寥无几。

△　蔡元培、胡适发表谈话。对罗文幹均谅解，认总统与国会所为，失法律前提。

△　国会宪法审议会休会。该会自8月10日第四十五次会议起，共开会30次。12月30日，张伯烈向宪法会议报告审议情况。

11月26日　　曹锟电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谓“京中近有谣言，谓锟不日入都，并造出许多妄语”，请“严饬查究”。自称“对于元首，始终竭诚拥护，决无私见”。

△　皖裁兵协会江朝宗、徐谦、陈独秀、冯玉祥、段祺瑞、段芝贵、聂宪藩、臧致平、张敬尧、张克瑶等致电北京政府，以马联甲独揽军民两政大权，毫无裁兵诚意，请予罢斥，另简皖籍知兵大员，实行裁兵，实行分治。皖各团体及旅外皖人亦集会、通电，声讨马联甲。

△　国民党四川支部筹备处开筹备大会，数百党人到会。议决于军、政、学等各界要人中扩充筹备员之方法。刘成勋演说，推崇孙中山以党治国之主张。

△　杨森得吴佩孚支持，将残部编成一混成旅，驻鄂西。

11月27日　　北京众议院通过查办王宠惠、顾维钧“渎职祸国”案。又提出吴佩孚侮辱总统，应依《陆军刑事条例》判处徒刑等质问书。

△　沈鸿英占据柳州。沈军6日占雒容县，原驻自治军韩彩凤退柳州。8日沈部何才杰旅攻入柳州。韩先后得陆福祥、陆云高援助，与沈于柳州相持，屡进展出。沈以何、李（易标）两旅合攻，是日再入该城。韩被俘，沈即予释放。后双方以柳河为界各守地盘。

△　援闽鄂军胡念先旅是日向武昌调动，该旅已拨归孙传芳指挥。孙所部第二师奉吴佩孚命已向下游运送，前队驻武穴，图由赣入闽。原驻武穴之鲁军张克瑶混成旅已赴九江。

△　上午“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下午第四十八次会议。议决将青岛土地所有权问题留作悬案，对租界地及合组矿山公司意见大体一致。公产、邮电、埠头、盐业等补偿额，日方主日金1700万元，中方允1400万元。28日第四十九次会议。中方提出赔偿问题由双方政府派员解决等三案。29日第五十次会议。海电问题解决。公产等赔偿费定为1600万元。第一委员会范围内各问题完全结束，定于30日签字。

11月28日　北京政府总税务司通令各海关，原定12月1日实行之新税则因关系各国尚未一律承认，展期实行。

△　护法议员通告，吴景濂在广州众议院时经手之账目不清，决定清查旧账，并至法院控告。

11月29日　黎元洪特任汪大燮署国务总理。各部总长为：外交王正廷，内务高凌霨，财政汪大燮兼，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许世英，教育彭允彝，农商李根源，交通高恩洪。王宠惠暨原阁员准免本职。罗文幹着即免职。

△　日政府电令小幡酉吉通告中国政府，承认新税则。

△　北京众议院请愿委员会议决，将下列各案提交大会：一、女权运动同盟会请于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二、延吉等县代表请取消天图铁路合同；三、盐政讨论会长张謇等请对同一区域盐税不得引前清税率不同而设立越界为私例案；四、旅京江苏同乡会请停止苏省发行公债及彻查财政；五、旅京顺直代表以省议员俱系舞弊当选，请取消资格重行复选等。

△　鲁议会电请北京政府将“鲁案”提交国会详加讨论，反对“率行照签”。

△　豫官军与匪徒激战。先是，曹锟令靳云鹗为豫剿匪总司令。中旬，匪多次攻击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马店。下旬匪势渐衰，退避豫西之郏县、鲁山一带。靳分饬各军会剿，其总司令部亦随军移驻许昌，是日起于豫西山地围攻匪军。

11月30日　　孙中山复张作霖17日商时局函，主坚持一定之宗旨，始终贯彻。“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

△　汪大燮通电就国务总理职，当日国务会议议决派黄郛为财政总长，黎元洪以黄资望太浅，未允发令。傍晚汪愤而辞职，即出京。

△　黎元洪以“鲁案”协定同意案咨付众议院。众院紧急会议，先由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王正廷出席说明经过，旋开秘密会议，佥以政府未将草案提出，国会碍难决定赞否，当由政府负责，乃如是咨复。

△　黎元洪特派熊炳琦兼胶澳商埠督办，会同王正廷接收胶澳事务。

△　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以汪大燮曾迎罗文幹出狱并补具保结，许世英系代办奥款合同之华义银行总裁为由，通电反对汪阁。次日复随吴景濂通电反对汪阁，并对王、罗免职之令文未根据查办理由深表不满。

△　吴佩孚通电，声言与王宠惠、罗文幹“夙昧平生”，谓“案关受贿渎职，辱国丧权，非独罗个人应受刑事裁制，即内阁亦有联带关系，理应依法负责，非仅辞职所能了结”。

△　青岛土匪肇事。因日人纵容，青接收之际匪警日急、市面萧条，田中玉、熊炳琦派员招抚土匪，是晚匪首孙百万将参加谈判之总

商会长隋石卿及监收专员茅少甫掳去。次日，王正廷以行政尚未移交、治安当由日方负责，向小幡酉吉提出质问。

是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改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为农业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筹备改组。

△　辽宁纺织厂成立。资本奉洋450万元，锭数2.048万只。

12月

12月1日　“鲁案”细目协定（即第一部）在京签字。计正文九章28条，附件十项，了解事项四项。正文大要：一、胶澳于12月10日交还，手续一个月内完竣；二、日军20日内撤尽；三、条约批准前租地，期满后续租30年，批准后租地取消；四、日保留公产领事馆计八所，居留民团计11所；五、青佐海线无偿交回一半，青济无线电台，青岛沿线电报、电话交还后自行分开；六、青盐输出，15年内年额一亿至3.5亿斤；七、公产及盐业偿价合日金1600万元，先付现金200万元，余以国库券照票面交付，六厘息，期15年，以盐、关余担保；八、矿山由中日合资公司承办，付日偿金500万日元，利息超过八厘时以半数付日；九、海关维持保税区域制度继续办理。

△　旅京鲁人、鲁各团体代表及鲁学生数百人包围北京政府外交部力阻签字。鲁籍国会议员刘敬三等向王正廷交涉，提出撤销续租、拒开商埠、国库券取消利息、无偿收回矿山、解决土地悬案等挽救国家权利之要求，未得要领。4日，鲁各界联合会开外交大会，决向英、美两政府声明不承认该协定，并电请国会否认。

△　“鲁案”第二部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双方对铁路国库券之财政条件中存储银行等节，意见一致。2日，第十八次会议，对华盛顿条约附件各问题互换意见。4日，第十九及第二十次会议。决定铁路引渡财产范围等事项。任命一切已决问题之起草委员，中国稽镜、日

本木村锐市等各三名。日方就未了问题提出最后提案。

△　广东琼州各界数千人开“琼崖全属公民大会”，以日占据西沙群岛，复谋侵占琼州，决定成立挽救西沙群岛各界联合会，电请全国合力援助，并请粤当局从速取消西沙之日人实业公司。次日，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示威游行，总计不下万人。

△　直省自是日起将铁路、货捐、印花、烟酒暨各局处收款，一律扣留。

△　广东省各项税收开始实行加五征收。

△　溥仪以皇室礼仪行大婚礼。黎元洪派大礼官黄开文代表致贺，又饬拨10万元送交清室。

12月2日　曹锟通电，以汪大燮、许世英、高恩洪与罗文幹案迹有嫌疑，谓对新阁“决难承认”。4日，蔡成勋、王承斌亦分别通电反对汪阁。

△　川议会举刘成勋为临时省长。次日，国民党四川支部筹备处开会庆祝。熊克武主席，刘与石青阳等演说，刘表示服从三民主义。

△　浙各法团以卢永祥任善后军务督办六个月将满，通电吁请卢延长善后期。浙军政界要员亦请卢无限期留任。

△　彭允彝到北京政府教育部接任总长职。部员索欠薪不得，决继续停止办公，仅允彭用印于就职通告，即封锁。彭商请财政部先拨发一个半月欠薪，部员乃于12日办公。

△　俄军百数十人乘夜袭击黑省边境之札兰诺乐车站。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越飞查明禁止。11日，越飞答复：彼系白党乔装红军所为，白党得在边界活动乃北京政府纵容所致。

12月3日　黎元洪令邵章暂行代理平政院院长。

△　汪大燮通电请辞署国务总理职。

△　全国商联会第四届大会闭幕。2日，选举吕超伯为会长，穆藕初、张维镛为副会长（穆坚辞未就）。定第五届大会于山东举行。会议期间，设审查会审查裁厘加税等案，并通过撤废常关、否认所得与营业税、取缔各省铸造铜元、反对铁路货运加价、取缔五省通用纸币、撤废货物附加税等议案127起。对罗文幹案曾致电北京政府，请公平措置。

△　林虎、刘志陆抵广州。陈炯明与林约定：一、以林为援桂司令，统辖在桂各军；二、拨粤军两旅归林指挥；三、桂局定后由林主持一切。10日，林等赴梧州。

△　美长江游弋舰队司令官菲尔普以美人施利芬用驳船押运飞机四架至汉口，有违背美总统禁运军用品之规定，率舰扣留该飞机，并将施送交美领事署讯办。该飞机系北京航空署以供福州民用为名订购，因福州形势变迁，乃辗转运汉。7日，汉口当局以美国扣我海关已验放并装入我国驳船之物品，侵犯主权，有损海关信用，向美领事提出抗议。21日，美领署谕令非经许可，不准将飞机交中国政府。美政府特派法官来华审理该案。

△　吴佩孚向鄂榨取饷款之洛阳财政会议开会，6日闭会。鄂应允下年起印花税由30余万元加至60余万元，烟酒税由80万元加至100万元。

△　华洋义赈总会发起之浙灾征募大会在沪开幕，中外人士800余人参加。该会于上月22日成立，举黎元洪为会长。

12月4日　黎元洪令准免汪大燮财政总长兼职，着次长凌文渊暂行代理部务。

△　曹锟电请黎元洪饬法庭速开审罗文幹案。吴佩孚亦于日前发表声明，请慎重处置罗案，勿使“刑事案”牵入政治，宣称对该案各方均无左右袒，对组织新阁不愿干预，对曹锟依然融洽。

△　秘鲁通惠总局华侨自卫会以秘众议院通过废止中秘商约，禁绝华侨入境，侨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通电全国请急起援救。11日，国民党驻利马总分部电请孙中山立即拯救。孙转电北京政府办理。21日，秘华侨代表500余人通电，以秘排华日紧，危及三万侨民生命财产，吁请援助。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越飞，已转令沿海各关及各舰队，禁止旧俄海军将领斯达尔克率领之舰队进入中国口岸。

△　全国商会联合会致电北京国会，谓：“忠告贵院同人，速本良心专制宪法，并将裁减军队、整理财政诸办法，从速议定，限期实行。”

12月5日　“鲁案”铁路细目协定（即第二部）签字。计正文二章18条，附了解事项七项。其大要：一、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于下年1月1日移交，尽一个月办毕；二、铁路偿价为日金4000万元（约合华币3600万元），以国库券照票面交付，息六厘，以铁路及其进款为担保。另有现行契约合同及债权债务之处理与职员去留等规定。

△　黎元洪特派顾维钧为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处长。顾辞不就。8日，改派王正廷兼任。15日，派严鹤龄为该处主任。

△　众议院通过查办高恩洪、罗文幹案。众院以高、罗擅与比利时公司订立铁路购料合司，决咨政府声明无效，并列述舞弊卖国之四大罪状，请将高、罗褫职查办。同日，吴景濂、张伯烈通电全国。后曹锟电京汉、津浦、京绥、京奉四路局长，谓高正在查办中，凡关于四路款项出入，均须禀承巡署办理，高之部令无效。

△　北京政府派代表周予觉赴滇，解决统一办法。是日，周予觉电告唐继尧所提召集南北联合会议条件六项：一、尊重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从速完成国宪；二、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主张联省自治；三、实行废督裁兵；四、宣布民国五年以后中央所借内外债数目及用途；五、宣布民国以来中央与各国缔结各项密约；六、筹商各省善后重要事项。

△　湘水口山铅锌矿3000余工人罢工。由蒋先云、谢怀德领导，历时21天。25日，劳资双方签字，工人获得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人俱乐部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27日举行庆祝大会和示威游行，工人、农民共万余人参加，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工人农民万岁”、“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

△　日本抗议美国在华设无线电报局。日三井物产会社与海军部订有经办无线电报事业之特约，北京政府交通部又许美仅代拉尔公司开设电报局，日以优先权被侵害，曾三次抗议。是日，小幡酉吉再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给予最后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措施。

△　全国律师协会第二届大会开会，京、沪、浙、苏等20省市分会代表到会。推汪有龄等18人为代表，出席下年1月国际律师协会于马尼拉举行之大会。

12月6日　孙中山致函列宁，告以不远的将来将派全权代表去莫斯科同苏俄领导人磋商合作事宜。函中并谓：“你们以前对中国的宣言在我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中国人民将俄国看作中国的朋友，并使中国有从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获得民族解放的可能性。”末谓：苏俄同北京政府交往，将“使您置于同中国人民对立的不利地位”。

△　黎元洪特派劳之常会同王正廷接收胶济铁路。派马叙伦等五

人为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派张其密等90余人为政治善后讨论委员会委员。

△　黎元洪以浙江水灾募集赈款大会会长资格，招待中外人士，共同筹款赈助浙省灾民。与会者北京外交团法国公使、武官、使馆员及各夫人167人，外国记者48人，外国银行家24人，外国绅商29人，外国顾问及其他洋员48人，各教会会员317人；中国方面有国务院及各部机关、参众两院、各校、各商会、银行、记者及在野名流等。黎元洪讲话，并自捐一万元以为之倡。孙宝琦代表浙省乡亲致谢。

△　王正廷通告就外交总长职，即日赴济南，8日抵青岛办理接收事宜。熊炳琦9日抵青。

△　许世英因受各方攻击，通电请辞司法总长，惟声明对奥款合同毫无闻见。

△　滇、桂军联盟。驻桂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等，与桂军沈鸿英之代表黄应山、自治军刘玉山、陈升平等，于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军事会议，会商讨陈（炯明）战略及合作条件。是为“白马会盟”。后刘震寰亦加入。孙中山据邹鲁呈报，任命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即在白马宣誓就职，并委任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

△　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东北有朝鲜独立军联合红军入境胁迫日侨情事，中国政府如不能随时严防，日政府当采取适当措施。

12月7日　孙中山批复天津赵从宾关于联合直系之意见，认为宜集中力量讨伐陈炯明，“此后对北方已取和缓态度，故一切急烈之举，皆当停止”。

△　北京汪大燮内阁否认奥款展期合同，责成外交、财政两部办理。

△　驻桂滇军通电，张开儒解职就医，推金汉鼎为总司令，未到任前由杨希闵代。同日，桂议会请滇、粤军退出桂境。

△　沪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抨击王正廷及黎元洪、汪大燮等卖国媚日之罪行，请国民共起否认“鲁案”协定。山东公民“鲁案”后援会等亦发表宣言，列述王丧权辱国六大罪状，呼吁争取最后之补救。

△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向德保肥洋行订购之毛瑟枪3000支，无烟火药二万磅，炮弹3000发交货完毕。

△　越飞因4日北京政府抗议苏对黑龙江之华轮征收捐税，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谓在中俄会议未解决该问题前，只能照现行章程办理。

12月8日　张作霖因边防紧张，召集特别军事会议。决定由三省抽调四旅组成临时边防军，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一带。中俄边境实行戒严，驱逐中东铁路地区无业俄人，取缔经军张贴布告，禁止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同日，奉天官报公布划中东路沿线为特别区，以朱庆澜任长官，所有区内军警、外交、行政、司法各机关统归管辖。

△　济南总商会等四团体以青岛土匪与日浪人勾结，乘接收期肆意焚掠，并公然于市内设立总部，日方警宪熟视无睹，电请北京政府向日使严重交涉。同日，日政府迫于中外舆论及各国侨民谴责，训令驻青司令官由比光卫对通匪、纵匪者严行惩办。

△　署陕督刘镇华赴三原、郿县等处，开始裁汰第七、第八两路镇嵩军，并电请北京政府补助饷款。

△　云南东陆大学成立。次年4月20日正式开学。

12月9日　中日邮政会议签订四项协定：一、互换邮件；二、互换保险函件；三、互换包裹；四、互换汇票。均于次年1月1日起实行，在华日邮同时撤废。南满铁路附属地日邮问题由两国政府另行解

决。

△　曹锟做寿。冯玉祥、萧耀南、孙传芳、马福祥、高凌霨、张英华、吴景濂、张伯烈、边守靖等赴保祝寿。黎元洪派金永炎，张作霖派张学良，卢永祥派卢小川前往。直系要员均派有代表，另有国会议员及各界名流共数百人。吴佩孚未到，委萧耀南代为疏解。高恩洪受冷遇。寿期未正式讨论政局，曹仅表示对张绍曾组阁取观望态度。

△　沈鸿英致电陆荣廷，请撤惩陆福祥、林俊廷，或于十日内退出南宁，否则以武力进攻。

△　苏盐商朱乃庚等360人及部分省议员以盐政讨论会提请取消食盐越界为私条例，分另通电反对。12日，赵恒惕电请北京政府维持盐引成案。苏社事务所黄炎培等电北京政府，反对借改革盐政而增加盐税。苏籍国会议员亦通电反对淮盐加价。

△　道胜银行监事格南抵奉，与张作霖接洽中东路问题。原定同期赴奉之英、美、法、日各银行团代表决定展期一月赴奉。

△　京师高等与地方审检四厅职员因欠薪五月，一致停止办公。司法部允发一月薪水，13日恢复办公。

12月10日　　青岛行政事宜由王正廷、熊炳琦向日民政长秋山接收。熊就任胶澳商埠督办职。同日，黎元洪宴请小幡酉吉，庆祝“鲁案”结束，并邀汪大燮陪席。

△　安徽旅沪公民团、安徽驻沪劳工总会等各团体开联席会议，反对马联甲出任安徽督理，通电全国宣布马联甲之罪状。

△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该总工会由汉阳钢铁厂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冶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会五个工团组成，会员三万余人，为当时全国最大之产业工会。

12月上旬　　北京银行公会致函财政部及“鲁案”公署，以盐、关余为国内公债之第一、第二两种基金，清还内债尚嫌不足，反对用为“鲁案”国库券之担保。“鲁案”公署因请北京政府向日交涉将两余抽回，易他项确实担保。

△　张一鹏集资50万元，于武进设立利民纺织公司，经北京政府财政部注册。

12月11日　黎元洪特任王正廷兼代国务总理。

△　福建镇抚使刘冠雄离津赴宁，与齐燮元、杜锡珪等会晤。旋发《通告闽人书》，提出四项主张：一、使闽立于政争之外；二、实行军民分治；三、闽省自治；四、速立省宪。15日就镇抚使职。16日，电请臧致平、李厚基停战息争。17日，发入闽通电。随后乘“通济”舰离宁。23日，抵马江，设临时镇抚使署并与各方联络，未得积极反应。27日，经臧电催，改乘“靖安”舰抵厦。

△　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复越飞11月14日节略，谓苏1919年宣言中愿将中东铁路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等语，出自伊尔库斯克转来之法文电，为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杨松签署，并经苏代外长卡拉罕证明无误。

△　驻张家口美领事索克斌，与美商元和洋行经理柯尔曼驾汽车四辆私运现洋出口，不服检查，强行开车并鸣枪示威，驻卡岗兵还枪误伤柯。15日柯毙命。美使连赴北京外交部抗议。

△　原远东外交团代表、新任苏驻东三省特别代表巴谷勤抵哈尔滨。

△　湘工团联合会11工团之代表由毛泽东率领，同赵恒惕进行三天面对面说理斗争，利用“省宪”条文迫使赵承认工人集会、结社、罢工及工会向政府交涉之权利。

△　李玉麟通电报告皖已裁兵27营两哨，所余新安武军12营应候中央办理。次日回京复命。

△　赣督理蔡成勋致电陆军部，以赣省兵灾荒欠，食粮艰难，请转告各省停止采用赣米。

△　孙丹林原称罗文幹案结束前绝不他往，是日忽称母病返籍。罗文幹日前亦呈黎元洪，请援陈锦涛案改交平政院审理，并取保出所，随传随到，黎未准。顾维钧19日呈黎，陈明外交部对于奥款经过情形，以示清白。

12月12日　　黎元洪由张绍曾、冯玉祥等陪同，至南苑检阅冯军。

△　吴佩孚电告北京政府，豫匪劫去之外人仅余三人，正设法援救，请阻北京外交团派员赴豫。次日，北京外交团照会外交部，中止赴豫。

△　白俄将领斯达尔克偕谢米诺夫、麦克罗夫等率海参崴出逃之舰队（计15艘），载大批难民先后抵沪，泊吴淞口外，何丰林未允登岸。海军部电杜锡珪速令该舰等出境，并不得再入中国口岸。

△　浙各法团联合会通过筹备省自治大纲。

△　越飞撰文论述苏俄对华政策。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一纯正的党，它组织完整，团结巩固，在中国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可藉以联络民族主义与革命。"

12月13日　　王正廷通电报告就职三条件：一、新阁同意案即日提出；二、无论形势如何，兼代只以十日为期；三、除例行公事及万不能已各项外，其他重要人员之迁调及政令之设施均暂从缓，期维现状。次日通告就兼代国务总理职。

△　孙中山于上海私宅宴请施肇基。

△　全国财政讨论会开会。财政讨论会委员60余人出席。会议主席张英华会长说明中国财政穷困之状况，与整理财政之入手方法。

12月14日　　中国国民党国会议员王用宾、焦易堂、彭养光、冯自由、周震鳞等在北京约集众参两院议员宴会，决定：凡隶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之两院议员，而无显背三民主义之事实者，皆为民党议员；国民党议员有于一定组织团结之必要，在新组织未成立以前，暂假北巷五号为通讯处。

△　刘成勋通电就四川省长职，宣布促成省宪、尊重民意、财政公开等十项政见。

12月15日　　众议院提出张绍曾组阁同意案。反对派议员要求张先到院宣布政见，吴景濂派反驳。双方互骂，互掷墨盒并相互殴打，秩序大乱，遂流会。

△　青岛日军司令部撤销，日军撤离。同日，黎元洪授予由比光卫一等大绶嘉禾章，17日，由比离青返日。

△　沪总商会在“万国公民大会”马尔克等推动下发起裁兵运动。该会4日致电各省商会，提出检查裁兵、公开财政、速制国宪三项措施，请一致努力。12日会同15团体盛宴欢迎施肇基，联名发表裁兵宣言，请施转陈政府。是日分电国会两院及各省军事当局，力促实行。旋又组织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以推进全国大规模运动。

△　安徽省长许世英通电，赞马联甲于裁兵“精勤擘画、劳怨不辞”，请“商承中央，将第二期继续进行”，自言当负筹措经费之责。

△　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2000余工人，在中共北京党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先后两次发表宣言，提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会等14项要求。历时12日，取得胜利。27日，石家庄全

体工人游行，手执“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旗帜庆祝胜利。其间，京汉铁路总工会两次通电声援。

△　胶济铁路全体日职员因日本当局未践退职津贴诺言，愤而罢工，铁路中断。次日，要求获允，复工通车。淄州炭矿2300余日职员因同样情况于同日罢工，亦于次日复工。

△　驻京法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华法邮局12月31日撤销。

12月16日　　孙中山在沪召集各省同志65人审议国民党改进宣言。该宣言由胡汉民、汪精卫起草，审议略有修正。次日，总务部长居正、党务部长谢持等，以党纲、党章及宣言业已草讫，呈请孙中山作最后之酌定。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越飞提出抗议：一、远东革命委员会宣告中东铁路地区在其领土权范围之内，实属蔑视中国主权，要求详加更正；二、中东铁路系中俄合办，其财产在海参崴等处者纯系商业性质，苏无权片面收回，请取消成命。

△　黎元洪特任汪大燮为平政院院长。

△　闽南保安会通电组织保安军，以黄培松为总司令。黄声言与福建镇抚使刘冠雄取一致行动。

△　青岛市民为监视接收召开市民大会，发布宣言，并推出监收代表。

12月17日　　张绍曾为组阁事连日邀熟识议员到宅，讨论吴景濂、张伯烈包办说。张伯烈是日宴请反对派各团体，为张组阁疏通。吴亦多方运动，不遗余力。

△　伍廷芳追悼大会在沪举行，到会8000余人。谭延闿主席，居正代表孙中山主祭。

△　王永泉、林森通电，闽省邮电“克日取消加价”。

12月18日　　北京众议院通过张绍曾组阁案。上午，张邀两院议员数百人于外交大楼茶会，散发油印品并口头宣布政见，主对各省和平统一，并召集南北军事会议。下午，黎元洪派饶汉祥出席众院，说明提张组阁理由及其略历，随后以多数通过并移送参议院。

△　交通总长高恩洪以就医为名请假十日，21日黎元洪指令照准，并令劳之常暂行代理部务。

△　赵恒惕通电就湖南省长职，并依省宪取消总司令名义。21日，李剑农当选省务院长。

△　吉省长魁升辞职，张作霖以吉督署秘书长王树翰暂代。后孙烈臣仍自兼省长。

△　越飞答复北京政府外交部16日之抗议，谓远东革命委员会宣言中所称政权施及于中东铁路一语，绝未含有破坏中国主权及中东铁路一带之意。仅注意于该路技术管理及俄国人员。

12月19日　　闽省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及自治军张贞等部从四面合力围攻泉州张清汝。17日，张电许、王等求和。18日，臧部刘长胜旅与张贞从青元山攻入泉州，张逃逸。是日，许、王所部从洛阳桥方面攻入该城。张部被各军收编。

△　王家襄、吴景濂至国务院坐索国会积欠经费150万元。

12月20日　　孙中山派汪精卫赴奉天同张作霖接洽，望促成南北统一，并共同反对“用金钱武力进行总统选举”。

△　越飞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拒绝16日之抗议。谓中国政府五年来完全片面处置中东铁路，且听任该路为白党练兵场及出攻苏之根据地。苏收回境内该路财产与中国政府对该路在中国之部分办法相

同。声明关于俄境内所有东路财产之决议，于中俄会议双方对中东路问题完全解决之前，暂不能取消。

△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通告上海，自24日起取消邮电加价，仍照旧章收费。

△　王怀庆通电反对废止惩治盗匪法。司法部咨复云：业经国务会议议决废止，不再展期。14日王曾函请曹锟领衔再电北京政府，重申前请。马联甲、许世英、齐燮元、韩国钧、张福来、张凤台、蔡成勋等亦曾先后电请曹锟领衔联电北京政府，以明令宣布展期。

△　鲁省各界联合会通电反对驻青岛日领事于市内外私设警所九处，并抗议王正廷擅让主权。后熊炳琦在鲁人敦促下亦照会日领事，请速予撤销。

12月中旬　　粤、湘、赣订立三省联防及剿匪章程九条。直、鲁、豫新订联防条约六条。鄂、豫、陕议定联防及清匪事宜九条。

12月21日　　那彦图通电谓苏俄“决计吞噬满蒙”，“得陇望蜀，虎视狼贪”，劝国人勿“同室操戈”，应“一心御侮”。萧耀南23日，蔡成勋26日，通电响应。许世英29日通电，对外蒙事主由北京政府先行交涉，不成则由国会提出对苏宣战案。

△　越飞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谓1919年宣言中并无将中东路无条件归还毫不索偿之语，已转请苏政府推究误会原因。谓白党之在华实于中俄关系有无穷之危害。促速推代表，俾早开中俄会议。

△　齐燮元、韩国钧致电北京政府，宣布江苏下年1月1日起取消邮电加价。

△　许世英以马联甲擅令封锁金库，皖省政日趋纷扰，借词返津探亲，致电北京政府请假。黎元洪于23日，国务院于24日复电劝留。

△　皖废督裁兵会电责马联甲等袒庇新军殷恭先、旧军李传业“虚耗巨饷”、“贻害地方”，要求北京政府立予撤惩。次日，皖籍国会议员向黎元洪提出新军完全裁撤，旧军年饷减至140万元，保留许世英等三项要求。后马电请北京政府将裁余之新军十二营改编成师，委殷恭先为师长，未获允。

12月22日　王正廷请辞兼代国务总理职，黎元洪指令照准。

△　北京政府财政部币制局呈请设立蒙古实业银行，并拟定银行章程32条，是日，黎元洪指令照准。

△　越飞致外交部照会，请禁止白俄海军将领斯达尔克变卖俄舰，要求将俄舰引渡苏联，并拘留不愿归国之职员乘客。

△　闽各界各团体连日召开数千人大会，拒绝“福建镇抚使”刘冠雄入闽。19日省议会，20日自治军黄展云、张贞等，22日各界大会，均电刘阻拒。学生军亦电刘警告。

12月23日　张绍曾、高凌霨分别通告就陆军、内务总长职，与李鼎新等首次到院参加国务会议。张、高同劝王正廷继续维持。王终以参议院速提张组阁同意案为条件，允暂留。

△　宪法起草会三读通过国权章及地方制度两章，即提交宪法会议。

△　驻京日、英、美、法四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北京政府不清偿到期债务，声称关余及烟酒、交通等收入不能单还内债，外债亦须顾及。

△　粤省财政厅布告，自是日起各项税收照加五征收之数收银毫八成，省币七成，省币全解省库交商会焚毁。粤军饷自是日起亦改发银毫，兵士月饷减为六元，军官薪饷亦减发。

12月24日　　孙中山派孔庚与四川各将领接洽，在重庆设立川、陕、湘、鄂、滇、黔六省联军办公处，谋军事上之联络，推刘成勋为筹备处长，孔庚为理事。

△　黎元洪令加马联甲陆军上将。

△　北京成立救国联合会。该会为徐谦发起，旨在召集救国会议，协议解决统一问题。推冯玉祥、徐谦等为董事。全国商联会亦派代表任董事，又推徐为总干事。该会得到孙中山等人赞同。26日，冯玉祥宴请国会各派议员领袖，赞同徐等救国主张。

△　日关东长官伊集院抵奉天，次日会见张作霖。26日返日。

△　国会蒙藏议员组成蒙藏经济协进会。举那彦图为名誉会长，贡桑诺尔布为会长，是为国会中之蒙藏独立团体。

△　川、鄂盐商反对杨森加抽盐税。杨在宜昌抽收川盐军饷，每包加一元五角，旅汉宜昌六属同乡会500人分电北京政府及吴佩孚、萧耀南，请速令停征。川盐商亦纷纷集会请愿并通电反对。

12月25日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率所部在濛江誓师，讨伐陈炯明。

△　东蒙王公于长春会议，决定依那彦图计划，请北京政府速迫苏红军退出蒙境，并电请蒙藏院协力进行。次日，蒙藏院议决赞助该计划。

12月26日　孙中山任命李钺森为讨贼川军第一军军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金法郎案函复法、比等公使，决定以纸法郎偿付庚款。

△　孙传芳抵南昌，蔡成勋亲率全城文武至滕王阁欢迎。孙部先

已由浔入赣。

△　湖广铁路借款第二期利息15万英镑（约合华币130余万元）因英、法、美等国严厉催索，已由11月份盐、关余分拨偿还。

△　法权讨论会会长张耀曾赴晋、豫、湘、鄂、赣、皖、苏、浙等省考察司法状况，事毕由沪北上。

12月27日　讨贼军徐镜清击败江西援闽部队周荫人部，克复福建邵武。

△　众议院通过取消邮电加价案。次日，北京国务会议议决暂行取消加价，由交通部另提新案。

△　闽各界大会通电反对孙传芳、张克瑶、周荫人等部入闽。

12月28日　滇桂联军占领梧州，粤军第四师军官吕春荣、莫雄等在梧宣布与滇桂军一致行动。杨、刘随即分就孙中山委任之滇军、桂军总司令职。30日，沈鸿英部抵梧，吕、莫等以第四师名义通电讨陈炯明。31日滇粤桂联军誓师东下讨陈炯明。

△　孙中山函促驻闽讨贼军迅速回粤讨陈，“不可半刻迟疑”。

△　黎元洪以外债总算账之说日盛一日，与凌文渊等商定组织外债委员会，清查民国以来各项外债。该会隶属于财政部。

△　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奉吴佩孚命，向汉阳兵工厂领山炮六尊、炮弹20箱、枪弹50箱，并携饷款20万元，启程赴南昌。

△　日铁道省以告示发表《中日国际联运规则》，凡120条，定下年3月1日施行。

12月29日　北京参议院通过张绍曾组阁案。同日，护法议员第七次宣言，以国会自身未经合法，反对滥用同意权。

△　黎元洪令皖省长许世英仍留原任。

△　黎元洪批准胶济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并归该路理事会管理。

△　北京政府交通部通电，邮电自下年1月1日起“取消新价，仍按旧价核收”。

△　北京政府交通部请王正廷调停唐山大学风潮，与学生达成妥协，是日派佥事刘式训等护送学生回校上课，校长允俟后撤换。

12月30日　　王正廷内阁呈请辞职。黎元洪请王再代理几日，俾张绍曾选配阁员，辞呈暂置未批。

△　黎元洪公布《教育基金委员会条例》，凡13条。

△　黎元洪批准王正廷呈请派稽镜为代表接收胶济铁路。

△　北京政府外交部是日及次年1月6日，连收法使照会，法坚持以金法郎偿付庚款，并以撤销改组中法实业银行之协议相要挟。

△　陈炯明以形势危急、军心离散，在广州召开军官会议，胁迫军官歃血誓愿，并于次日通电拥陈。

△　岑春煊通电，赞同桂议会7日电，请粤、滇各军退出桂境。

△　王正廷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借银元30万元作为接收胶济路费用，期限七个月，年息一分一，以该路收入作抵。

12月31日　　黎元洪特派熊希龄、蔡元培等九人，派张伯苓等18人为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

△　意大利政府通知北京政府，同意实行关税新税则。

△　许济、徐镜清部肃清闽北。许、徐所部得福州增援，于中旬进攻常德盛军，连克将乐、建宁、邵武等县，是日收复光泽。常师被俘千余人，被缴枪弹无算，残部逃往杉关一带。

是月　孙中山派张继赴京晤越飞。

△　志信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本16万元。该公司承领官山、伐木制材、收买木材并经营森林各种副业。董事宁紫垣、解铭臣等四人。本店设吉林汪清县。

是年　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表《美治政策》一文，主张节制生育。提出“实施全国避孕”，“把中国人口维持在四亿，最好减少到三亿”。

△　北京政府与德国签订互寄包裹及互换汇票协定。

△　北京政府与荷兰签订互寄包裹协定。

△　青岛日商富士纱厂成立，资本4550万元。

△　大同同宝煤矿公司成立，资本300万元。

△　南京中国水泥公司成立，资本200万元。

△　东三省烟公司成立，资本100万元。

△　大连三华商事油坊成立，资本50万元。

△　天津民生天记面粉厂成立，资本61.8万元。

△　上海信大面粉公司成立，资本50万元。

△　汉口胜新面粉公司成立，资本50万元。

1923年（民国十二年）

1月

1月1日　　孙中山在沪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对时局的主张与民族、民权、民生政策。内称该党“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宣言回溯自兴中会成立以来的斗争情形，并提出国家建设之计划及现时所采用之政策，其主要者为：一、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二、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三、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四、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价税法等。同日，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规定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

△　滇桂讨贼联军攻占广西梧州后，是日向广东进发，讨伐陈炯明。以滇军任东路，杨希闵为总指挥；刘震寰部桂军与粤军第三、四两师任西路，刘震寰任总指挥。桂军沈鸿英部担任向北江出动。

△　黎元洪以“废督”无成效，咨国会辞大总统职，并通电各省，略称：“复职之初，即首以废督为请”，“乃荏苒半年，竟无寸效”，“迩者辞职之书已咨国会，替人朝得，轻骑晚归”。

△　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劳之常代表中国方面，按照“鲁案”交涉第二部协定细目将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从日本方面予

以收回。

△　聂云台、余日章、蒋梦麟、黄炎培受全国商会联合会之推举为裁兵劝告主任，是日，四人联名发出劝告裁兵通电。4日，孙中山复函聂云台等，指出该通电理由“深切著明”，而“国民之表示主张，自以劝告当局为第一步，然而与虎谋皮，久垂明戒。故第二步之办法，不可不为积极之准备，以免徒蹈空言”。嗣后，黎元洪、张绍曾、岑春煊、齐燮元、段祺瑞等亦先后通电，对裁兵通电佯为附和。

△　广东海丰县农民在彭湃的组织领导下，正式成立海丰总农会，选举彭湃为正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加入会员二万户，农会管辖下之人口约有10万人。农会为农民办学校、医院、合作社，领导农民进行反勒索斗争。

1月2日　　孙中山在沪召集中国国民党党务改进会议，宣布党纲及总章并推定改进后之中央干部组织人员。其余本部干事、书记及国内总分支部职员，一体重新委任。改本部通讯为公报。还制定了干部会议规则、入党金常年捐规则、入党规则、上海分部组织纲要、本部各支部组织规则及海外总支部通则等。

1月3日　孙中山致电张绍曾，望真正促成和平统一。

△　陈炯明军自广东肇庆向广西梧州反扑，因桂军取道怀集、广宁攻其侧面，陈军败退三水。

△　北军暂编河南陆军第一师常德盛部在闽境迭为王永泉、许崇智各军所败，退至赣、闽交界之越山关。

△　总税务司安格联复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三团体，对上年12月30日来电表示内国公债彼经管一日，对于其后发生各款，必竭力维持其已成立之优先权。

△　台湾文化协会派人去台湾各地作巡回演讲，以启蒙台湾同胞

民族意识，日本警察横加干涉，并命令解散。

△　美国驻京公使舒尔曼就侨商克门被张家口中国士兵枪伤毙命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提五项要求：一、杀人凶手抵命；二、惩办当事长官；三、在肇事地点为死者立纪念碑；四、优给死者家族恤金；五、中国政府道歉。

1月4日　　孙中山在沪通电讨伐陈炯明，宣布陈之叛国罪恶，痛辟陈军散布“客军入境，亡省可虞”的谰言；指出讨贼军的任务是“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勉诸军将士奋勇杀贼，为民除害；并勉粤省奋起直前，以民心为士气之后盾，俾肤功早奏。

△　北京政府改组。黎元洪批准兼代国务总理王正廷及各部总长免职。特任张绍曾为国务总理兼署陆军总长，施肇基署外交总长，高凌霨署内务总长，刘恩源署财政总长，李鼎新署海军总长，王正廷署司法总长，彭允彝署教育总长，李根源署农商总长，吴毓麟署交通总长。以吕均为国务院秘书长。

△　北京政府教育部因《教育基金委员会条例》公布，废止《教育部国有教育财产处规程》。并将原设办理华俄道胜银行中国本息委员会归并办理。

△　汉口英美烟厂工人，因资方不履行上次罢工所允许之条件，全体罢工。嗣后烟厂资方以停工解雇相威胁无效，乃于17日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经交涉，资方认赔工人损失9000元，双方达成调停和约13条，21日经双方签字，次日烟厂工人胜利复工。

1月5日　　孙中山复函北京政府新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嘱为护法助力。

△　孙中山复函林森，嘱在闽组织革命力量，促成大举。

△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通告北京外交团，本月17日起实施切实

值百抽五新税则。

△　北京政府蒙藏院职员因迭次索薪无结果，开会又被军警无理干涉，全体宣布停止办公。嗣后职员领得薪俸一个月，始于21日复工。

△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召集孙烈臣、吴俊陞、朱庆澜等人在奉开对俄军事会议，决定组织边防军五个旅。一旅驻扎奉天，以张作相为边防司令；两旅驻扎吉林，任张宗昌为边防司令；两旅驻扎黑龙江，以蔡平本为边防司令。

△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修改上次会议所拟总工会章程草案。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召开全路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1月6日　　山东各界联合会因日本于交还青岛后，仍于市内外设立警察分所九处，是日召集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分电北京府院和外交部，请速向日本公使严厉抗议，令即将所设警所撤销。

△　浙江丝商60余人赴法，谋发展华丝在法国市场上之销路。

△　驻京法公使因北京政府拒绝用金法郎赔付庚款，是日照会北京政府，告以中法实业银行之债权者将受重大影响。22日，法公使为庚款事再次照会北京政府。

1月7日　　北军孙传芳奉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之命图闽，将所部开抵江西临川，准备开入福建。

△　直系首领曹锟谋任总统，使高凌霨出面收买国会议员约400余人，每人月给“津贴”200元，本日第一次致送。给予高凌霨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名义。

△　江苏省立各学校校长因反对省议会削减教育经费，与议员刘

文辂发生冲突，刘向法庭控告各校长。9日，南京各校学生因反对削减教育经费，愤而罢课，并赴省议会责问；江苏29校校长王舜臣等，亦因反对削减教育经费，愤而辞职。

△　旅宁粤人电孙中山，敦请回粤主持大计，“使我国早日统一告成，免列强野心，借口共管”。

△　中英关于英国交还威海卫谈判，因英代表所提之交还条件15条对北京政府多方要挟，会议因之停顿，是日中方谈判代表梁如浩奉召回京，准备将此项交涉移京开议。

1月8日　　教育基金委员会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开成立大会，推熊希龄为委员长，蔡元培、孙宝琦为副委员长。教育部设立该会之目的，在使教育经费之筹划扩展及保管等事务，得一专管机关，以热心教育之人担任其事，以免政潮起伏、人事去留而影响及于教育事业。16日又增派张謇、王克敏、李石曾、谈荔孙为该会委员。

△　山东省议会选举议长事争执年余，是日始由省长熊炳琦监督，选出宋传典为议长，杜尚、陈鸾书为副议长。

△　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联合致电北京国务院、总税务司安格联、外交总长施肇基及英、法、美、日四国公使，反对增加关税作为整理外债之用，要求内债基金应照1921年10月整理原案及《九六公债条例》切实履行，无担保之内外债亦应统筹。

△　滇军总指挥杨希闵电孙中山，报告联军进攻陈炯明方略和占领梧州经过，恳请孙中山及护法诸名流，“联袂返粤，遂组合法机关，对内对外，均无滞碍，护法事业得竟全功”。

1月9日　　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通电宣称，该部奉孙中山大总统令，即日由闽返旆讨贼。

△　滇桂讨贼军攻克广东肇庆，陈炯明军败退三水、河口一带。

△　北京国务总理张绍曾电主张联省自治之西南各省军事长官，主张和平统一。谓促成宪法，选举大典，宜听之国会；与其争联省之名，毋宁图省治之实。

△　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400多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斗争结果取得部分胜利。

1月10日　中国国民党通告即日起实施新颁宣言、党纲及总章，民国九年11月公布之总章及规约即行废止。

△　孙中山在沪设午宴欢迎张作霖之特使冷遹。

△　滇桂讨贼军占领广东西江三水、河口。

△　直系军阀萧耀南、孙传芳、王汝勤、杨森、王怀庆、王承斌、张福来等在吴佩孚授意下联名电劝曹锟暂缓总统选举运动，勿急于任大总统。

△　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成都成立。

△　汉口英租界隆茂花行之英国资本家及工头反对工人组织工会，挑起冲突，指使印度巡捕拘捕工人三名。平和、利华等洋行之花厂工人齐到捕房交涉，捕头竟开枪击伤李玉成头部，其他重伤者九人，轻伤者10余人，并拘工人30余人。当晚，工人在湖北省工联开会，决定11日起隆茂、平和、利华之工人3000余人全体同盟罢工，并向厂主提出七项要求。13日，由汉口商会会董赵典出面调停，经多次谈判，厂主承认工人提出之大部分条件，19日晚条约正式签字，次日工人复工。

△　上海总商会通电各省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转各金融机关，及北京新银行团，上海英、法、美、日、意商会，要求勿再承担募借政治借款，切实履行以前各国政府在中国未统一前不作政治借款之决议。

△　日本关东厅之咨询机关“满洲经济调查委员会”在旅顺开会，制订操纵东三省金融的计划，谋新设“满洲中央银行”，资本一亿日元，并以发行金券为条件，或对朝鲜银行增加资本，以加强对东三省的金融控制。

1月11日　广州各公团会议善后，一致电请孙中山返粤主政。

△　孙中山派廖仲恺在沪与国民党各省支部干部商讨改组事宜。

△　北京京师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文幹案证据不足，免予起诉，罗文幹、黄体濂获释。

1月12日　驻广州之粤军谭启秀部晚间反正，围攻农林试验场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驻观音山之炮队亦响应。

△　黎元洪令准署司法总长王正廷辞职，以程克继任。

△　北京政府为处理蒙疆善后问题，并研究对俄方针，设立“蒙疆善后委员会”，是日派任唐在礼、哈汉章、王廷桢、吴廷燮、朱泮藻、程克、钮永建、洪尧、李芬九人为该委员会委员。13日，任命武向晨为秘书；23日，又以姚以价为专任委员。

△　湖南旅京同乡会致电湖南省议会，反对湘省当局加征田赋，大借外债。16日，湘省议会通电称：“倘湘政府果有借债之举，自应依法交会议决，不能单独缔结契约，凡未经本会通过者，概不能认为有效。”

△　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1月13日　　黎元洪令“嗣后各省各军，在防区接近之内，不得擅自用兵，互相残杀”，意在反对滇桂讨贼军讨伐陈炯明。同日，发布整顿学风令。

△　黎元洪令准政治善后讨论会委员长王宠惠辞职，派张绍曾兼任。

△　浙江各团体因省议会选举参议员有贿买选票情事，特开公民大会议决请愿撤销选举并提起诉讼。21日，杭州再次举行浙江公民大会，反对贿选。

△　《民国日报》揭露驻湖北公安、松滋之王汝勤第八师之扰民状况：如以罚为敛，借细故或无故处罚人民，罚款每人3000串、5000串不等；又如借做寿敛财，老太太忌辰八周年，小姐四周岁，各方都要送礼，有勒送100串者；其他如强征军米，包庇烟赌，干涉行政，强迫妇女离婚，纵兵奸占妇女，冒匪行劫等等，不一而足。

△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伯力、驿马河等处华侨商会被封闭，会长会员被捕，向苏联代表团提出抗议，要求速将被押华侨释放，各处商会即日启封，在事俄员应予惩处。18日，外交部再次提出抗议。

1月14日　　粤军将领梁鸿楷、陈章甫、陈德春等以粤局“群龙无首”，通电公推魏邦平出面维持，并恳请孙中山推诚倚畀。

1月15日　　由于驻广州周围之各军纷纷响应滇桂讨贼联军，洪兆麟亦因局势无望，在潮汕宣告脱离陈炯明。本日陈炯明于广州通电宣告下野，次日挈心腹将领遁返惠州，负隅固守。

△　粤军第三师开入广州，由魏邦平统率，联合军警维持省城治安。

△　罗文幹案免予起诉后，因直系军阀和一部分议员反对，是日经内阁议决交司法部令京师地方检察厅再次将罗文幹、黄体濂拘捕入

狱。次日，彭允彝在阁议中提出罗案交法庭再议。

△　江西督理蔡成勋拒绝黎元洪任命的省长谢远涵到任，将义宁、奉新的军队调至省城并宣布戒严，教育厅长朱念祖、省绅萧大鸣等数十人因迎谢被捕。20日，江西省议会、省城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为此电北京政府呼吁。29日，蔡嗾使军警打伤九江各团体迎谢代表20余人。

△　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报告民国十一年度（1922）海关总收入比十年度（1921）增收410余万两。

△　汉口万国商会谋干涉中国工人运动开特别会议，由马克尔主席，讨论联合华洋各商会促中国官厅速定“消弭工潮”之办法及联合租界内各义勇队问题。

1月16日　各部讨贼军纷纷开入广州城，各军不相统属，多自设司令部，张贴布告，并竞占机关，委派员吏，多达数十处。

△　开入广州之各军将领，电请孙中山回粤主持大政。

△　孙中山在沪接见国闻通信社记者，重申和平统一之主张，并谓战事之所以限于广东局部者，在于给北方军阀觉悟之机会，至设立政府与否，则当以北方有无真正觉悟为断。

△　北京政府发布命令称：现行法令有妨于农工商之发展者，应先修改；未备者应即编订，由农商部悉心厘订，以利推行。又令：军警机关除属于军事范围及违警案件外，一切民刑诉讼，均不得违法受理。

△　苏联代表越飞率随员离京赴沪，次日抵达，寓汇中旅馆。

1月17日　桂军沈鸿英所属李易标部4000人开抵广州（自称广东第一军），随即分占衙署，改委官吏，并会同滇军收缴各讨贼军枪

械。沈部桂军分踞韶关、石龙、兵工厂、观音山一带，为包围广州之态势。沈鸿英自设大本营于石龙。其后，虎门各要隘炮台均为沈军分别攻占，于是粤省要塞多入沈军之手。

△　孙中山任命邓泽如为广东省长，任命刘震寰为广州卫戍司令。

△　孙中山在沪对上海各团体代表60余人发表谈话，指出："国民不特要从民权、民生上作工夫，同时并应该发展民族自决的能力，团结起来奋斗，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一独立国家。至于国内军阀，只要人民万众一心，与他们奋斗，是不患不推倒的。"

△　邹鲁抵广州，同日以广东讨贼军总司令名义，通告粤军将领，"请明揭义旗，通电宣告，共释干戈，一致行动"。

△　孙中山函复廉泉，拒绝为良弼祠题楹。函称："在昔帝王颠倒英雄，常以表一姓之忠，为便私之计。今则所争者为人权，所战者为公理。人权既贵，则人权之敌应排；公理既明，则公理之仇难恕。……况今帝毒未清，人心待正，未收聂政之骨，先表武庚之顽，则亦虑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

△　北京众议院通过收回旅大案。

△　浙江督办卢永祥派郝国玺率军开驻衢州，监视孙传芳入闽军队。

△　湖南长沙各业工人800人集会，纪念黄爱、庞人铨遇害一周年。同日，上海、济南等地工人团体亦开会纪念。

1月18日　　粤军第一、三两师由江门调回省城后，是日粤军第一、三、四师暨警备队、海军、江防舰队各长官在海珠开会，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军总司令。同日，广州各军设立"海陆军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以魏邦平为主任。

△　粤军师长杨坤如通电表示服从孙中山，促姚雨平赴惠州收容各军。24日，姚雨平前往惠州。

△　孙中山电杨希闵等，嘱穷追陈逆残部，勿令稍息残喘以除后患。

△　孙中山派王约瑟、毕少珊去西北开展革命活动，并携去致西北地区政教领袖信函。孙中山在致马麒函中指出："惟际此国家多故，狐鼠纵横，西北寥天，置诸化外，遂使贪污坐据为雄，挑拨自固，此真国家之厄而西北之殃也。文持三民主义以治国，首图民族之融化，更谋西北之发展，故亟欲扫除恶障，改良政治，用得达我目的。……西北一隅，实劳筹划。"

△　黎元洪任命曹世英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鉴于教育总长彭允彝为罗文幹案逢迎军阀，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表示羞与为伍，是日辞职出京。

△　上海惠工银行宣告停业清理。

1月19日　　北京参议院通过宣布中日"二十一条"无效案，并咨政府照办。

△　北京众议院通过张绍曾内阁阁员同意案（外交施肇基、内务高凌霨、财政刘恩源、司法程克、陆军张绍曾兼、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教育彭允彝）。

△　北京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因罗文幹案再议，破坏司法独立，愤而辞职。

△　湖南省长赵恒惕电请鄂督萧耀南拨军舰两艘赴岳州停泊，并派员分赴赣、鄂，提倡赣、湘、鄂联防，隐示附北。

△　孙中山电委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以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

△　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致电孙中山，表示“绝对服从”，并尽力维持潮、梅治安。

△　北京各校学生4000人到国会请愿，反对通过彭允彝任教育总长案，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唆指院警横施殴击，学生受伤者40余人。翌日，各校代表开会，决驱逐彭允彝，控诉吴景濂并表示不信任国会。学潮扩大。

1月20日　孙中山电委魏邦平为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期统辖讨贼各军，指挥如意。望勉为难，底定粤局”。

△　护法议员电孙中山，祝讨贼成功，请俯顺人心，正位广州，竟护法之业，奏统一之功。同时电林森，请速在广州召集合法国会。

△　广东省长邓泽如电孙中山辞职，并荐胡汉民出任。

△　为反对彭允彝任教育总长，北京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该会在通告中指出：“本会自民国八年为争外交问题应运而生，年来学生运动渐趋衰竭，本会亦遂无形消灭，今因利害切身之教育问题不容袖手，经北京公私各学校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北京学生联合会自本日起正式宣告成立。”同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要求驱逐彭允彝，挽留蔡元培。

△　苏联代表越飞在沪赴莫利爱路29号造访孙中山，倾谈甚久。

1月21日　孙中山委任中国国民党本部各部长如下：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祖涵；党务部部长陈树人，副部长孙镜；财务部部长林业明；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副部长茅祖权；交际部部长张秋白，副部长周颂西。26日，中国国民党本部发出上述新任职员就职通知；同日，又委任周佩箴为财务部副部长。

△　粤滇桂讨贼各军将领举行会议，再电请孙中山来粤，主持大计。

△　福建总司令王永泉派代表曹勉庵携函晋见孙中山，报告闽局。27日，孙中山复王永泉函，告以闽、粤大计俟抵粤后再告。

△　黎元洪下令撤销福建讨逆军总副司令名义，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通缉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会同处理。

△　陕西癸亥旱灾救济会电各报馆转陕西同乡称，陕西亢旱成灾，哀鸿遍野，区广灾重，为数十年所未有，呼吁急为救济。

1月22日　　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林森为福建省长。

△　日本正金银行北京分行向北京政府财政部交涉，要求在盐余中扣除该行所得俄发债券本息。财政部因此项债券已宣告无效，予以拒绝。

△　苏联代表越飞在沪公开发表谈话，否认盛传“中俄防御同盟”合力对日之说。对中东铁路则云：“中东路之协议内容，将由中俄会议解决之。”同日，越飞再次往晤孙中山。

1月23日　　孙中山委任居正、孙洪伊、杨庶堪、杭辛斋、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吕志伊、周震鳞、廖仲恺、田桐、戴季陶、陈独秀、刘积学、张继、谢持、王用宾、詹大悲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参议。30日，又委任丁惟汾、黄复生、朱之洪为该党本部参议。

△　广州讨贼军各领袖在大沙头李烈钧处开治安及军事会议，桂军沈鸿英乘机派兵袭击粤军谭启秀与梅萼所部于观音山。沈更利用陈炯明所散布的“客军入境、广东亡省”之流言以煽惑滇军，谓魏邦平将

联合广东军队，解决滇、桂军。

△　苏联代表越飞在沪东方大旅馆宴请孙中山等人，席间孙表示愿派一军事使团去苏俄学习，考察党和政府的组织和功能，并就帮助中国革命进行谈判。经过几次会见，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规定苏俄将给予孙中山精神上、财政上的支持；孙在中国国民党取得中国政府的控制权，就担保承认俄国并与俄国结成联盟。

△　川军旅长何金鳌宣布与第七师师长陈国栋脱离关系，并露布陈之罪状，令所部向安岳移动，在大足与陈部发生冲突，战机遂启。四川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免去陈国栋师长职务，委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钲查办何金鳌。

△　东三省旅京学界同乡集会，力争收回旅大，当即组织收回旅大外交后援会为政府后盾。该会于27日发表宣言，呼吁国人“急此外患，同力合作，共策进行，以争青岛之精神来争旅大，庶乎公理昭彰，强权摧灭，还我疆土，雪我积羞”。

△　上海中国无线电社在广东路大赉洋行屋顶开始播音，是为国内有商业无线电之始。

1月24日　北京参议院投张绍曾内阁阁员同意票，除署外交总长施肇基外，均通过。

1月25日　黎元洪特任高凌霨为内务总长，刘恩源为财政总长，张绍曾兼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程克为司法总长，彭允彝为教育总长，李根源为农商总长，吴毓麟为交通总长。

△　孙中山致函张绍曾，重申实行裁兵为实现和平统一之办法。

△　胡汉民于21日偕李烈钧抵广州，是日就广东省长职。邹鲁于17日抵广州，设特派员办事公署于省长公署，未几被滇军范石生部据为司令部，至是收回省长公署，广州秩序略定。

1月26日　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宣言》共分四点，其中第一点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爱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　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建议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统一未完成前划境自守，互不侵犯。《宣言》提出裁兵计划三项纲要：一、本化兵为工的原则，裁去全国现有兵额之一半；二、由各系各省领袖赞成后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及全国工农商学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同日，孙中山招待上海报界人士，呼吁各报开辟专栏，鼓吹裁兵。

△　孙中山委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二军军长，卢师谛为第三军军长，张国桢为第四军军长，魏邦平为讨贼联军总司令。

△　孙中山派于右任持函往晤段祺瑞，商榷要事，函称"至文对于时局意见，已于今日电达，想邀英览矣"。

△　黎元洪任命潘守蒸为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寇英杰为第二混成旅旅长，刘佐龙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张允明为第五混成旅旅长。

△　广州发生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桂军首领沈鸿英与吴佩孚相勾结，谋消灭国民党在粤势力，是日下午以协商地方善后及追击敌军为名，在广州江防司令部（滇军杨如轩旅部）邀胡汉民、邹鲁、魏邦平、陈策等开会，企图乘机发动事变，将与会各要员除尽。事变发生，胡汉民、邹鲁等在杨如轩、夏声的护卫下脱险，仅魏邦平一人被

拘。

1月27日　孙中山因桂军首领沈鸿英在广州作乱，延期回粤。

△　驻广州河南之粤军第三师魏邦平部被滇、桂军缴械。次日，粤军及刘震寰部桂军均开离广州。

△　惠州警备军司令姚雨平暨各师旅团长致电孙中山，请“早日莅粤，主持大计”。

△　苏联代表越飞自上海搭轮赴日本。孙中山派廖仲恺同行，借便商讨实施《孙文越飞宣言》中约定事项之具体步骤。廖在日本热海与越飞多次商谈，逗留月余，于3月21日乘轮离横滨回上海。

1月28日　孙中山电潮梅善后处长洪兆麟、第六独立旅长翁式亮等准予立功自赎，并责成洪、翁等切实联络东、北两江广东原有各部军队，进讨沈鸿英所部桂军，“毋任祸粤，破坏大局”。

△　孙中山以沈鸿英广州之变，致函张作霖，告以“特派路孝忱晋谒麾下，申请援助”。如能照前所拟数，速与汇寄，则士饱马腾，荡平逆氛，可操胜券。

△　北京国务总理张绍曾宴请西南护法代表，表示愿以和平统一为方针，并“赞成挽留中山不赴粤，希望公开办统一”。

△　东三省特别法院通电北京政府司法部、大理院、法律馆、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和律师公会，抗议罗文幹案再议。继起响应的有湖北、安徽、奉天、河南、山东、直隶、江西及察哈尔等地方司法界。北京高等检察厅也诘责地方检察厅再行拘罗的非法。司法总长程克则采取以下手段对罗案施加压力：一、将大理院院长董康降为法权讨论会副会长以示威；二、撤去北京政府司法机关重要人物，易以亲信，以便对罗加罪；三、补送申请罗案再议理由书于法庭，以入罗于罪；四、电斥首先发难的东三省特别法院，加以恐吓，并将院长李家

鏊撤职。

1月29日　孙中山所著《中国革命史》完稿，全文共分七节，概述了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的基本内容，以及兴中会成立到护法运动的斗争史，指出："辛亥之结果，清帝退位而止。丙辰之结果，袁世凯取消帝制而止"，而护法之役"惟留法不可毁之一念于国人脑中而已，较辛亥、丙辰所得结果，不能有加也"。

△　孙中山电齐燮元、冯玉祥，谓"粤事变化，绝非民党与政学战争，本人暂待数日，仍将返粤"。

△　马伯援往晤孙中山于上海寓所，报告赴陕工作及其结果，并请示将来工作进行方针。孙中山告以"胡景翼既是浩然楼的同志，请你报告他，我们彼此心印。不过冯焕章的事，须当更进一步，劝其革命"。

△　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令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鹗严禁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

1月30日　北京政府以陈炯明下野并请求收编其所部为北军，是日黎元洪明令特予嘉许，并冀"在粤主客各军将领互谋谅解，勿再私争"。又派丁槐为两广宣慰使；林俊廷督理广西军务善后；任命高凤桂为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刘恩源通电各省督军、省长，谓"旧历年关将届，库储并无分文"，"目下中央情形竟将破产，舍乞援各省更无办法"，要求各省筹款，于旧历年前"汇京应急"。

△　京汉路总工会筹备处以吴佩孚来电要求工会代表赴洛计议在郑州开会事，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即日赴洛与吴交涉。次日，吴对代表声称"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表示拒不收回成命。谈判持续三小时，代表们不得要领而返。

△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联席会议代表往见黎元洪，要求下令罢斥教育总长彭允彝。

1月31日　北京众议院议决延长会期六个月。

△　北京政府财政部部务会议，对法国政府要求以金法郎付庚子赔款，因出入太大，议决根据法律及事实，请外交部驳复。

△　孙中山以沈鸿英谋变，复函桂军将领刘震寰，勖从速戡乱。函称“在鸿英向隶盗阀，久降北虏，其仇贼吾党，破坏西南，无足深怪”，粤中诸军屡请电讨，业经复电允可，“幸速图之”。

△　到达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来宾60余人；京汉路各分会代表65人；各地工会团体代表130余人；北京、武汉及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30余人。

△　京汉路总工会筹备处赴洛代表返郑州后，立即在会所召集全路代表会议，报告吴佩孚的态度，代表们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大愤，认为“无注意的必要”，经议决次日成立会仍照开。

△　华商纱厂联合会致电北京税务处，要求实行禁止棉花出口，以维护本国纺织业用棉。

2月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吴佩孚指使军警当局用武力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京汉路工人代表和来宾不顾压迫，冲破军警封锁，拥入钱塘里普乐戏院会场召开大会，当即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下午，靳云鹗派出大队军警前往镇压，占领京汉路总工会会场，将会内文件什物抄查

捣毁，工人代表住所旅馆遭军警监视，并禁止旅馆饭店供应食宿，限代表即日离郑。当晚，大会党团会议和京汉全路各分会代表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本月4日12时举行京汉路总同盟罢工，反对军阀压迫；并决定将京汉路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设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领导罢工。

△　孙中山分函各路将领何成濬等，促彼等迅速讨伐沈鸿英。

△　孙中山派陈友仁、伍朝枢往见赴北京途中抵沪之英驻京公使麻克类。英使表示：假如孙中山“要在南方建立共和国，那就很难得英国的同情和支持”。

△　张作霖否认奉直和议传说，表示坚持东三省“自治”。

△　吉林天图（铁路）公司在延吉龙井村成立。吉省当局委派赵延桐为董事，以开办自天宝山至图们江岸与朝鲜相衔接之铁道。该路合同原订于1918年，资本400万，中日各半，因吉林人民反对而延搁，至1922年日人运动张作霖另订合同，始能成立公司。

△　日本正金银行二次来函要求扣拨俄发债券款项，后经北京政府财政部再次拒绝。10日，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工会分电北京政府财政部、外交部及日本驻京公使，抗议日本正金银行借端扣留盐余，要求悉数发还，保全内债。

2月2日　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由福州开赴泉州，取道回粤。

△　广东潮、梅等地原陈炯明部各军，经李烈钧改编为中央直辖陆军第一、二、三、四师，以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分任师长。是日尹骥等通电就任。

△　沈鸿英部桂军袭击东莞、石龙，被刘震寰击败，陈天太部两营被缴械。

△　胡汉民自香港上书孙中山，报告粤省情况，并谓滇军杨希闵及其部将皆能服从命令，请孙回粤主持大计。杨希闵复派其副官长叶夏声赴沪面陈一切，并迎迓孙中山回粤。

△　中国国民党本部在沪举行第一次中央干部会议，拟成立军事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并决议《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凡12条。

△　因郑州军警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到汉口江岸办公。当晚该会工人代表在江岸俱乐部开紧急会议，决定要求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沄，惩罚干涉总工会成立活动之军警；并发出通电，吁请各方声援。

△　北京国务院秘书长吕均擅自用国务院秘书厅公函，饬警察厅拘捕亚洲通讯社记者林超然。6日，50余家报馆、通讯社的代表赴国务院质问总理张绍曾，要求立即将吕均免职交付法庭；并要求国务院明白宣布，以后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函令警察厅逮捕新闻记者。

△　北京国立五校学生代表在女高师开会，议决如下：一、各校一致宣告与彭允彝脱离关系，由评议会维持校务，无论何校，若有新校长到任，共同驱逐；二、由五校发表宣言，使国人咸知此项风潮已非从教育入手所能解决，惟有彻底澄清政治一法。

2月3日　　因北京参议院未通过施肇基外交总长之任命，是日黎元洪令准署理外交总长施肇基辞职，以黄郛继署。又令调董康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所遗大理院长缺，以余棨昌继任。

△　孙中山委任柏文蔚、吕超、黄大伟、蒋作宾、蒋介石、顾忠琛、朱霁青、路孝忱、叶荃、吴介璋、朱一鸣等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8日，又委任熊秉坤、吴忠信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津浦铁路浦镇工会决定以同盟罢工援助京汉路工的斗争，除

要求恢复京汉路总工会外，并向当局提出七项要求，限三日内答复，如不答复即实行同盟罢工。

△　安徽督理马联甲不满省长许世英坚决尽裁新安武军，勾结江苏督军齐燮元竭力排斥之，并通过北京政府阁议去许。是日黎元洪令准许世英辞皖省长职，调任航空署督办，以阮忠植护理省长。9日，皖省各厅、道、处联电北京政府以总辞职相争，拒绝阮忠植长皖。10日，北京政府又徇马、齐之意，改任吕调元为省长，虽经皖省及省外各公团、各法团与同乡会之纷纷反对，仍无效果。23日，吕调元接任省长职。

△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平民阶级大同盟、北大职员校务协进会、直隶教育改进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治主义同志会、民潮周刊社、京兆自治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监督会团、北大学生干事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唯真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劳动组合书记部、赣事报等40余团体，在北京北河沿开会，继续讨论应付时局之方法。结果决定以推翻军阀，建设真民主政治为宗旨。为达到此项宗旨，决议：一、推翻现国会；二、废督裁兵；三、教育独立；四、联络团体至相当时期开一国民大会。

2月4日　　在京汉路总工会的领导下，京汉路爆发争人权、争自由的政治性大罢工，全线客货车全部停开。京汉路总工会发出罢工宣言，要求：一、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沄、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二、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损失费6000元；三、所有被军警扣留之匾额礼物，以军乐队送还总工会，并将监视军警撤退，郑州分会损失由郑州地方长官赔偿及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　道清铁路（河南道口至清化）工会为声援京汉路罢工斗争，举行同情罢工。工人占领路局办公楼，向路局提出九项要求，迫使路局发给工人年终双薪。

△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20多个工会的代表参加，坚决为京汉路总工会的后援。决定采取三项办法：一、由该会向全国发表宣言，敦促有关当局接受京汉路工提出的条件；二、举行慰问大会和游行示威，以壮大声势；三、必要时采取总同盟罢工。

△　正太铁路总工会召开紧急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援助京汉路罢工的方法和手段，议决：一、立即发出通电以作声援；二、准备实力援助，如京汉路三日内无解决，即实行同盟罢工；三、派纠察队员到京汉路正定分会一起战斗。

△　吴佩孚电京汉路局长赵继贤，指使采取“刚柔相济”的策略，“婉言开导”工人“先行开车”，再议罢工要求；否则即“严厉处置”。是日，赵继贤发出通电，命令全路车务总分段段长、站长将已开在中途各列车，“速设法务令继续开行”。

△　湖北督军萧耀南命汉黄镇守使杜锡钧派武装军警巡缉二营及二十五师一部分，前往汉口江岸镇压京汉路罢工。

△　张绍曾致函孙中山，商议设立国事协商会，请孙中山及海外有力诸公迅派代表来京，一俟准备就绪，当即正式开会，即以议决之件，作为大政方案，交由政府分别进行。

2月5日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开会，决定组织工人后援会，发表宣言，进行募捐，声援京汉路罢工工人。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告全国各工团书》，号召各工团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京汉路工人反对军阀的罢工斗争。

△　吴佩孚电令湖北督军萧耀南用武力镇压京汉路工人罢工。电称：“日来各路工人，受人煽惑，动以罢工要挟，此等嚣风，若不严

加取缔，势将贻患无穷。除电沿线各军外，务希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应即武力制止。”萧耀南即命令汉口警察厅通知各警察所执行。次日，萧耀南任命汉黄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为汉口刘家庙铁路的警备司令，在江岸扶轮小学设立指挥部，准备武力镇压罢工。

△　吴佩孚电京汉路局长赵继贤，说有500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京汉路交通，对该路“原有工人，先用好语开导，奉公循法者仍照常办事，由军警特别保护，甘心捣乱者一律开除，劫去机车者迫令交还，倘有拗违，以军法从事”，责令赵放手办事，同日，赵继贤发出布告，要挟工人“限于十二小时内立即照旧上工，恢复交通”，否则认为工人“跟本路脱离关系”，路局“另行找人做事”。

△　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鹗派兵拘捕京汉路郑州分会罢工负责人高彬、姜海世，胁令复工无效，即将二人上铐镣予以拘押。次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派警将铁路工人王宗培、钱能贵捕去。

△　郑州军警当局指使一小撮人在普乐戏院开所谓“国民大会”，攻击京汉路罢工。又以“郑州军警绅商学各界全体同人”的名义发出通电威胁工人，宣称如“三日以内，仍不上工开车”，“凡该工人等起居饮食日用必需，概不供给，如有暴动行为，即以武力为后盾”。

△　北京政府向众议院提出十二年（1923）公债案，众议院以未开用途，决先付审查。

△　北京学生联合会要求罢斥彭允彝，切实挽留蔡元培等。同日，北京国立八校联席会议开会，反对彭允彝移用留学生经费买好教育部部员。

2月6日　　桂军首领沈鸿英江防之变阴谋败露后，遭到粤军、滇军及粤海军各方面之反对。沈以一时计不得逞，不得不暂戢凶锋，将所部由省垣移驻广州郊外。是日沈鸿英通电称，此后地方政务由胡（汉民）省长主持，临时委派各员，进退悉惟所命，请孙（中山）、

岑（春煊）回粤主持善后；省垣军队太多，已将所部移驻郊外。

△　琼崖讨贼军副司令黄胜朱通电讨伐陈系邓本殷，电称：“奉令讨贼，先后克复陵水、万宁、崖县、儋县、昌江和感恩等县。而邓本殷、吴伯仍据琼崖，爰率部誓歼此贼。”

△　经孙中山及粤省议会等方面的催促，魏邦平被滇、桂军释出。翌日，魏赴香港。

△　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偕局内各处长赴保定，与直系军阀首领谋划镇压罢工办法。

△　京汉路南段处长冯沄向萧耀南报告京汉路罢工三日，已造成损失100多万元，工潮正火速蔓延，要求迅速以武力解决。

△　直军第十四混成旅长时全盛于是日下午又从涿州调军队两营到长辛店，至此长辛店已集中军队八营，准备镇压京汉路罢工。当晚，时全盛派兵捕去京汉路长辛店分会干部和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史文彬、陈励茂、吴雨铭等11人。

△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办事处发表《告全国铁路工友书》，呼吁各铁路工人作“经济的援助”和“实力的援助”，举行同情罢工，支援京汉路的斗争。

△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援助京汉路工人罢工斗争宣言，号召“全体同胞，同申义愤，崛起援应，摧灭强敌，还我自由，在此一举”。

△　武汉各工团派代表1200余人到江岸慰问京汉铁路罢工工人并举行慰问大会，到会者万余人。会后举行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两小时许，沿途加入者3000余人，所过处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与此同时，湖北督军代表与英帝国主义分子在租界开会，谋划进行血腥镇压。

△　北京众议员胡鄂公等126人，为京汉路工人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竟遭军警干涉事，要求惩办京汉路局长，限政府三日内答复。

2月7日　　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下令对京汉铁路罢工事件进行武力镇压。清晨，在京汉路长辛店方面，直军第十四混成旅长时全盛指挥大批士兵，向集中于火神庙警察局门前要求释放昨晚被捕工会干部的2000余名铁路工人开枪，工人当场牺牲者三人，重伤后不准医治而牺牲者三人，轻伤者30多人，被捕30多人。下午汉口方面，湖北汉黄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指挥两营多兵力，分三路包抄刘家庙京汉路江岸分会，向坚持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工人当场牺牲者37人，受伤者27人，被捕者70多人。另外，工人家属被杀害者四人，非工人被枪杀者三人（其中小贩二名，拾粪夫一名）。士兵将被捕工人捆在车站电杆上进行毒打，张厚生持刀胁迫京汉路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下令复工，在遭到严词拒绝后遂将林祥谦当场杀害。与此同时，曹、吴对京汉路其余各站罢工工人也进行了武力镇压与摧残，是为“二七惨案”。二七惨案中，总计工人和工会干部被杀害者50人，重伤者近百人，被捕投入保定监狱者27人，被京汉路局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多人。

△　晚6时，汉口军政当局宣布全埠戒严，汉口租界之“义勇队”武装出发，并置大炮于扬子街各街口，放出步哨。晚9时，省交涉署交涉员陈介电话通知驻汉口各国领事，“江岸军工冲突，恐扰各国租界，请各派兵防护”。于是租界汽笛齐鸣，各国“义勇队”扎守汉口各要冲。停泊扬子江中的外国兵舰上之海军，奉有命令预备随时登陆。

△　鄂督萧耀南派兵封闭汉口湖北工团联合会，并拘捕各工会代表数十人。同日，该会法律顾问施洋律师被督署陆军稽查处便衣逮捕，拘押于陆军审判处监狱。

△　为支援京汉路工人罢工斗争，正太铁路工人、粤汉铁路武

（昌）长（沙）段机车处工人、津浦路南段浦镇工会工人举行同情罢工。

△　武汉总商会因京汉、粤汉武长段两路罢工，商业上受大打击，特开会议决通电曹锟、吴佩孚、张福来、萧耀南、赵恒惕，请容纳工人条件，并一面致电各省商会，请出为调停。

△　川军师长邓锡侯借调解川军第三军因改编何金鳌部冲突为名，率军离重庆，向永川方面进发。邓策动川军第二十一师、二十二师、第一混成旅，并联络吴佩孚支持下之川北刘存厚及鄂西杨森，共助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对抗四川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刘成勋。

△　北京政府外交部根据国内棉纺业暂停生棉出口之要求，致函北京外交团领衔公使葡国公使符礼德，称已饬关定期截止报运生棉出口。26日，葡国公使照会外交部，称外交团对于此事“碍难同意”。驻京日使小幡酉吉亦以日人预定棉花甚多，禁止出口损失甚巨，到外交部“抗议”。

2月8日　　萧耀南派出军警继续封闭武汉的工会团体，计有：扬子机器工会、汉口特别区香烟工会、武汉轮驳工会、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汉冶萍总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武汉调剂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西式缝衣工会、武汉蛋厂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和牛皮工会等。各工团既遭查封，其自办之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亦被一律勒令停办。是日晨，萧耀南借口汉口《真报》“鼓动工潮”，令军警将该报封闭，报馆重要财物被掠一空。

△　直系军阀在使用血腥手段镇压京汉路罢工同时，采用欺骗手法，妄图诱骗工人上工。是日，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鹗致电赵继贤称：“拟于明日再由各界邀集工人首领续开会议，准其提出合理办法，共同研究，以期根本解决，免致贻人口实。”同日，京汉铁路局发出《劝告工人书》（传单），内称“南北往来，首重交通，各项工

役，赶紧上工，不咎既往，照常收用，外间谣言，切勿听从”。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美专、医专、法专、男女高师及其他中等以上各国立及公私立学校学生纷纷开会，声讨直系军阀惨杀京汉路工的罪行，呼吁国人奋起支援。

△　孙中山函复桂军师长刘玉山，勉协同各友军戡定沈（鸿英）变。函称：“近来地域之谬见，浸淫全国，往往置国事党谊于不顾。兄桂人也，独能于桂军将领不法如沈鸿英者，持义不苟，痛加诛斥，高瞻远瞩，询足为吾党矜式，可与共天下事矣。粤局关系全局，幸协同诸友军努力戡定，文必竭其绵薄为兄等助，或来粤与兄等共苦乐也。”

△　闽省政局因许崇智部返粤，王永泉与孙传芳联系加深，拥萨（镇冰）派受北廷的指使，是日借福建善后公民大会的名义，要求省长林森退职，举萨镇冰为福建自治省长。

△　四川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开抵重庆。第一军军长但懋辛改称四川东防督办，并于13日移驻重庆。

△　北京政府取消王揖唐通缉令，并准开复原官暨勋位、勋章。

2月9日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严重的牺牲，以图再战，京汉铁路总工会根据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指示，决定暂时退却，宣布忍痛复工。翌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紧急通告，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明工人们今后应有的态度，劝说工人忍痛复工。

△　黎元洪颁布整顿学风令。指责学校师生“聚众干政，倡言脱离政府，解散国会”，“借口研究学说，组织秘密团体，希图扰乱公安”，并“责成内政、教育两部及京外地方长官，依法严加取缔”。

△　黎元洪特任贡桑诺尔布为蒙藏院总裁。

△　张绍曾召开特别内阁会议，讨论财政问题和工潮问题。为防止工潮与学潮合成一气，“主张应由政府设法消弭，决定由内务、教育、农商、交通四部各就所管部分，设法防范，勿使蔓延”；并请大总统黎元洪颁布明令制止。

△　北京西南城各学校和东北城各学校学生4000人，分别在女高师和北大三院开联合大会，一致声讨军阀镇压京汉路罢工，要求政府严惩赵继贤、冯沄、黄殿辰及肇事军警，释放被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工会职员及工人，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通电声讨军阀镇压京汉路工，组成湖南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发动全省各工团及各界同胞起来援助京汉路工友，并募捐救济。

△　上海36个工团组织联合发出援助京汉路工通电，“誓为列位工友经济实力之后盾，望奋斗前进，一息尚存，勿为屈服”。

△　关于庚子赔款法国部分改付金法郎问题，在东方汇理银行以扣留盐余和法国公使以限定2月10日12时以前答复，否则取消中法银行复业协定相威胁的情况下，是日北京国务院特别会议决定允诺法方要求，次日由北京外交部照会法国公使。

△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通电，吁请孙中山早日南旋主政。

2月10日　胡汉民自广州急电上海，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部在潮汕军事情况，孙中山批复转电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严备击贼”。

△　沈鸿英令粤军第四师吕春荣及梁若谷部出驻高雷，吕、梁行至罗定后决定反攻，与驻肇庆桂军张希栻部争防地，发生冲突，交火至14日，吕部不敌，向龟山方面退却。

△　萨镇冰致电北京参众两院闽籍议员、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福建同乡会，声称：“二月八日，福建公民在省议会开会，公举镇冰

为福建自治省长，坚辞不获，俟筹备就绪，即日就职。”

△　鄂军阀指使军警拘捕川路公司管款委员高钺后，是日由夏口县当局逼令高钺将路款300余万移交张泰阶、向藩接管，以作驻军宜昌之四川军阀杨森攻川军饷。各地川人闻讯，强烈反对。

△　湖北汉口警察厅命令所属警署查禁工人集会，“如该管区内，遇有多数工人于庙宇、茶肆，未经官厅许可，集众会议，即行一律禁止”。

△　全国各界联合会发出通电，谴责军阀惨杀京汉路工，提出“国人一致推翻曹、吴傀儡机关，屏逐曹、吴豢养之政客，打破曹、吴卵翼之势力，徐图建设，然后可以安居乐业”。

△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紧急通知，动员该会所属各工会坚持隐蔽斗争，暂时忍痛复工。

△　在京汉路复工后，正太路总工会决定该路工人是日复工。同日，当地军警将正太路总工会无理封闭。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公使小幡酉吉，对日本正金银行借故扣留盐余，提出抗议。

△　北京政府允准以金法郎支付法国庚子赔款后，全国舆论大哗。是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北京国务院、财政部及外交总长黄郛，务请明白宣布金法郎全案交涉经过，以释群疑，一面根据前案慎重对付。

△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特邀基督教会牧师刘芳到京郊军队中“布道”五日。冯部三万余人中，有基督教徒约7000余人。

2月11日　　北京众参两院议员100余人在众议院议场讨论工潮问题，议决建议案一件，内有：一、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二、释

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三、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撤退临时增调弹压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

△　北京审计院特派办理财政清理事宜傅增湘，是日向黎元洪呈报财政部发行国库券暨支出浮滥弊端八点：一、发行期限违法；二、发行毫无预算；三、不应支付军饷；四、支付用途不明；五、数起巨款不明着落；六、支付转移暧昧；七、不应支付慈善机关；八、偿还无期，坠失信用。

△　收回威海卫之交涉，经由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京英公使商定由威海卫移至北京举行。

2月12日　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为实现其武力统一西南各省计划，令驻宜昌之杨森军队向川东进发，并派孙传芳所部卢金山师助杨，川、鄂战衅重开。

△　孙中山函促谢文炳速剿沈鸿英，函称“沈鸿英逆迹已著，今虽退北江，实欲与赣南北军联络，在我非速图剿灭不可。望即查明前电，邀击勿失，迟则彼与驻赣北军合，君等腹背受敌，危矣”。

△　沈鸿英致书孙中山，佯称愿服从命令，促请还粤。是日，孙中山函复沈鸿英，劝其悔过自新，函称：“国家之事，须正当办法，乃能得正当解决，绝非挟私任术，好逞阴谋，与民治之道背驰者所能得胜；中间或能侥幸得一二胜利，结果亦终归于败，可以断言。此古今中外之成事俱在，可资考证者也。”

△　津浦、京奉、正太、京汉、道清、粤汉六路在北京的代表，秘密举行六路联合会议，讨论和研究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是日发出通电，略称：“惟自由未得，虽万死不足以馁其志……现我们已决定仍遵前议进行。昔人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愿我同胞，其共勉之。”

△　道清铁路工人进行同情罢工，共坚持九日，由于粮尽援绝，是日被迫复工。

2月13日　北京众议院召集紧急会议，议员褚辅成等提案反对北京政府允诺法国要求以金法郎交付庚子赔款，其损失当在5000万两以上（折银元7000万元左右），决咨请政府速将该案提交国会议决。同日，国会议员王廷弼等33人联名通电全国，以此案国家损失过大，且在中法银行有债权之中国人，颇多权要，内阁通过金法郎案颇有损削国家以附益个人之嫌，要求取消此案，以资挽救。

△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举行临时会议，孙中山除发表国是意见外，宣布日内赴粤，“本部党务交各同志办理”。

△　孙中山批准《中国国民党入党规则》，凡10条，自即日起实施。

△　胡汉民在广州与杨希闵商讨广东军事布置事宜后，于是日电告孙中山对粤主张：一、使某部（指沈鸿英部）让出北江，而令滇军驻之，以断其与北方及陈逆之勾通；二、盼钧座速来主持大计，拟以农林试验场为驻节地；三、于未有具体计划以前，江门等处不宜轻于启衅。

△　浦镇工会领导的津浦路南段工人的同情罢工，根据津浦路总工会命令于是日复工。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京代理全权代表，表示愿在北京举行中俄会议。其后苏联代表复照外交部，同意在越飞回到北京后举行会议。

2月14日　川军将领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文辉等在吴佩孚指使下，从宜昌发出通电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等。

△　直系首领曹锟为谋任总统笼络议员，令边守靖、袁乃宽经手

发给议员“津贴”每人200元以度岁。

△　吴佩孚通电呼吁国人群起力争，保卫片马领土。

2月15日　孙中山偕同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赴粤。17日下午6时到达香港。

△　孙中山任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

△　萧耀南根据吴佩孚的电令，以“迭次煽惑罢工”的罪名，是日凌晨将律师施洋枪杀于武昌洪山山麓。

△　豫匪潘占魁纠集股匪大小90余杆（匪徒2000余人，有快枪1000余支），在鲁山、宝丰一带起事，窜扰舞阳、西平、遂平各具，烧杀抢掠，势甚猖獗。靳云鹗派兵往剿。

2月16日　北军援川军副总司令卢金山部向川东巫山进攻，21日占领巫山。

△　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回粤军队，在粤东大埔与洪兆麟部发生冲突。

△　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学术研究会总会、中华留日学生救国会、中华女界联合会五团体通电警告国民，自起收回旅大。按：日本租借旅大原约，订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三，以25年为期，至是年阴历三月初三，即公历4月17日期满。

2月17日　曹锟、吴佩孚及直系鲁、豫、苏、皖、赣、鄂六省督军联名催请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为广东督理，孙传芳为福建督理。

2月18日　孙中山出席香港各工团宴会，赞扬港工界能辨顺逆，在讨陈（炯明）斗争中实与有力，希望今后益团结救国。

△　中华学生联合会总会就直系军阀惨杀路工之事，致电黎元

洪、张绍曾，斥彼等“既自命居政府之地位，应负管辖吴佩孚及军警之责任，乃事前不能加以制止，事后不能加以惩办，抚躬自问，果何颜以对国人”。

2月19日　福州举行二次闽局善后会议，王永泉列席，决定请林森退省长职，任全省公路督办，促萨镇冰接任省长。

△　上海各行业职工为支援京汉路工人斗争，特派代表开会协议，决定成立全国各职工之团结机关——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募集救济金救济罢工职工之家属。

△　英国人辛博森所办之《东方时报》在京发刊。

2月20日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忆述自己革命思想产生的经过。同日，孙中山在香港杨西岩宅对工商界领袖演讲，希望各商家协助革命，“与余一致行动”，实现先裁兵后统一的主张，“若各商家赞成此事，和平统一之希望目的当可立见也”。

△　孙中山电委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

△　川军第七师陈国栋部之朱宗悫、段荣琮两旅包围成都，23日晨省军第一军赖心辉、但懋辛部援军赶到，成都解围。陈国栋部退往新都、金堂、淮州镇等处。

△　正太铁路工会被直隶、山西两省当局强迫解散。

2月中旬　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福建总司令公署、福建省长公署联衔布告，发行福建省军需公债。发行额300万元，自民国十三年（1924）起，分五年偿还，以该省田赋为担保。

△　中共北方区委继续讨论京汉路复工后的善后方略。会议决定：一、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京汉路总工会江岸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

齐集天津开会；二、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三、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四、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路沿线各站和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

2月21日　孙中山返抵广州，在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大本营，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孙中山因与北方谋和平统一，虽回粤而仍不任总统，但陆海各军不能不有名义以统率，故设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之。

△　孙中山在广州滇、桂军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此次回粤，主张“第一和平统一，第二扫除叛乱军队，第三化兵为工，第四精练一部分军队”。化兵为工的主张，获得奉、皖两系的赞成，唯直系不赞成。

△　陈炯明旧部熊略向东路讨贼军输诚后，经许崇智总司令任命为东路讨贼军第一、二旅总指挥，是日熊略就职。

△　英国新任驻京公使麻克类向黎元洪呈递国书。

2月22日　孙中山在广州粤军政各界要人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广东为中国之广东，待遇各军，决不以省界分主客，只论护法与叛国；旧隶陈炯明部队，一概许其自新，惟仍敢抗命之余孽，必先以全力肃清；实践和平统一宣言。裁兵一半为工；用全力发展广东之市政、教育、实业，树革新之模范，立全国之信用。

△　孙中山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为了促进统一，除“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外，同时“余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现正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

△　黎元洪下令申明：“约法为立国之本，今国会已复，政府依法

成立，在宪法未公布以前，凡属国民应共遵守约法，以维法治。”28日，国民党籍在京议员对此发出宣言，指出黎总统之复位，国会之复会，内阁之成立，均属权宜，本身合法与否，尚属疑问，怎可遽然发布要求国人共遵约法之令。

△　黎元洪着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办京汉路工人罢工情由，并着主管部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

△　黎元洪特派高凌霨兼任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任命范源濂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　曹锐、王承斌、吴景濂及吴佩孚代表李倬章、江苏齐燮元代表孙发绪等齐集保定，再次共商倒阁。会议认为西南局势骤变，统一渐趋无望，张绍曾所标榜之和平统一，可谓完全失败，既然如此，张绍曾即不应恋栈。直系倒张在谋去黎，而为曹锟任总统铺路。

2月23日　　胶济路民有公司认股人在上海总商会开会，到黄炎培、颜德清、张兰坪、方椒伯、余日章、沈信卿、穆藕初、陆达权、史量才、贾季英等，讨论决定股本总数为4000万元，除以3600万赎路外，尚余400万作为修理扩充之费。

2月24日　　孙中山鉴于沈鸿英暗通直系军阀，为防沈引导北军攻粤，决定重定各军防地。是日，令桂军总司令沈鸿英所部移驻肇庆并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择要防守；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龙、东莞、虎门各处；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所部，着移驻罗定各地方。此外各部军队，着就现驻地点驻扎。嗣后各部军队，非奉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　孙中山在广州通电宣言实行裁兵，指斥曹、吴的武力统一政策，重申裁兵主张，并表示“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

△　孙中山特任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

△　中央直辖北路讨贼军谢文炳部袭击广东乐昌桂军沈荣光部失利，沈军26日占坪石，谢部退入湘境。

△　黎元洪特派谷钟秀筹办胶济铁路赎路事宜。

△　北京燕京大学主办之《燕大周刊》创刊，其宗旨“系以科学之精神，谋学术之发展”。

2月25日　孙中山宴请杨希闵、刘震寰、朱培德、程潜等各军将领，指出“主义与武力二者，终须相辅而行，希望以实力为后盾，实现救国主张”。

△　南洋英属华侨学生联合会、南洋华侨女权运动同盟会、雪兰莪锡矿工会、南洋树胶联合会、南洋华侨各界联合会致函国闻通信社，对京汉路工人被惨杀事件表示愤慨，要求国内各界速起奋斗，驱逐惨杀工人之元凶。

2月26日　孙中山任命高雷讨贼军总司令林树巍兼广东高雷绥靖处长；派姚雨平、罗翼群、周之贞、朱卓文、吴铁城、黄芸苏为兵工局筹备委员。

△　孙中山委任张继为中国国民党北京支部长。

△　中华各口华人领港会议在上海举行，讨论华人领港权利问题。到会有40余口领港公会代表80余人。会议对各口华人领港事业多被外人侵夺，提出补救办法，要求修改清同治七年（1868）引水暂行章程；以后对于中外商轮，凡雇华人为领港者，概行承保，以保国权而利民福。

△　中法实业银行经理公司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处开幕。该公司系法国各银行联络组织，专为中法实业银行代理营业、清偿债项，

一俟债票设法兑清，即由中法实业银行正式复业。

2月27日　黎元洪令准督办宫家坝黄河决口堵合事宜田中玉、会办劳之常辞兼职；特派熊炳琦兼任督办宫家坝黄河决口堵合事宜，张庆濡兼任会办。

△　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于24日上书黎元洪，索取驻京军警饷银，并以解散军警相要挟。黎接书后立即批交张绍曾转饬财政部迅速筹款发饷。时张绍曾正全力应付天津倒阁，将此事积压。王怀庆等候三日，不见答复，乃于是日辞职赴天津。

△　暂行禁止棉花出口案，经8日北京阁议议决仍照前议自3月1日实行，但遭到外交团的无理拒绝。是日，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致电国务院、税务处等机关，力争实行禁棉出口，以保国本。

△　驻日代办廖恩焘奉命照会日本政府，对日本在青岛擅自设警提出抗议，要求将青岛日警撤去。3月2日，日本外务省复照廖代办，借口青岛秩序未能认为安定，时机未到。

2月28日　孙中山特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等为驻沪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

△　孙中山任命傅秉常为粤海关监督，仍兼特派广东交涉员。

△　四川省军赖心辉等部攻占新都。

△　云南督军唐继尧以内有南北分裂之虞，外有列强共管之忧为由，致电国会促请两院议员迅速完成宪法，“以范围人心，而共维国是”。

是月　直系军阀吴佩孚为实现其武力统一西南各省之计划，派定各路攻川之军队：一、湖北方面以王汝勤为鄂西援川总司令，卢金山为总指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率三师二旅军队，分路由湖北恩施、

宜昌入夔、万；二、陕西方面以刘镇华为陕边援川总司令，吴新田为总指挥，王鸿恩为前敌指挥，率陕军及第七师军队约一师一旅由宁强、广元入川；三、甘肃方面以甘南镇守使孔繁锦为甘边援川总司令，率一旅由甘南摩天岭入川；四、贵州方面以袁祖铭为黔边援川总司令，率一师由毕节入四川叙州。以上四路人马合川中刘存厚、陈遐龄及邓锡侯、陈国栋各军，兵力约有12师11旅之众。

3月

3月1日　　孙中山特任朱培德为广州政府大本营参军长兼大本营巩卫军司令。

△　孙中山鉴于北方绝无谋和诚意，特致电北京护法议员办事处，邀请议员速回广州，不必再与北方政府周旋。

△　广东财政厅长杨西岩呈请孙中山明令划分军费由大本营军需处发给，并要求从各军手中收回征收机关。呈文称：广东财政“困难情形达于极点”，原因“财权未统一，各征收机关全被军队占据，解库之款绝无分毫”，而“军费现无定额，各处催支急如星火，极力筹借，苦难应付”。

△　四川省军刘成勋、赖心辉部占领广汉、金堂；3日，占领罗江。

△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以七年来欠饷800万，电川军总司令刘成勋索饷。陈本人赴雅安，更派一大纵队开抵邛崃境内，并称“师行在速，特电奉闻，如有不谅，阻挡本军者，亦惟力是谋而已”。

△　萨镇冰由海军公所入福州城，在孙公祠就福建自治省长职。

△　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在派人继任北大校长遭到拒绝后，报请黎元洪发出指令准北大教职员组织评议会代行校长职务，希图间

接行使权力，当即遭到北大评议会的拒绝。该会并重新声明：一、一致挽留蔡元培校长，驱逐彭允彝；二、拒绝任何人来长本校；三、本校事务仍由原有之评议会主持。

△　黎元洪公布《县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区域令，规定自本年9月1日于甘肃所属之皋兰（今兰州市）、狄道（今临洮）、导河（今临夏）、天水、陇西、武都、平凉、庆阳、泾川、固原（今属宁夏）、西宁（今属青海）、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宁朔（今属宁夏）、中卫（今属宁夏）、张掖、酒泉、武威、平罗（今属宁夏）、镇番（今民勤）、山丹20个县施行。

△　众议员黄攻素以近来盛传曹锟为竞选总统，以每票5000元贿赂国会议员，拥曹议员每月支车马费200元，多由内务总长高凌霨接洽其事，是日，为此特向北京政府提出质询。

△　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署在哈尔滨成立，朱庆澜任该署长官。

△　华商金清轮船公司之“金清”轮船，是晚6时驶至浙江三山头洋面时，因超载沉没，淹毙500余人，仅救起40余人。

△　驻京日本代理公使吉田参事官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中美间之无线电合同，侵害三井洋行之无线电合同权利，“决难承认”。美国方面则表明对日本之意见亦绝对不能通融，中美无线电台应照合同开筑。

3月2日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特任程潜为大本营军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杨庶堪为秘书长；又任命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纪文为审计局长，林云陔为金库长。

△　两广盐运使伍学晃向孙中山呈报整理盐务及筹措税款情形，

略称：“近因军兴，所有署辖各场均为各路军官派员接管，缉舰十余艘及盐警各队亦同时或被扣留或因缴械逃散，省内运销缉私各机关几乎完全停顿，日前虎门炮台等处并有扣留程船起盐变卖情事。至西北两江区域，此时非军队密布即盗匪披猖，运道益形梗塞。”

△　北京学界与各团体联合会为促进废督裁兵，联合举行农历元宵节提灯游行大会，遭到军警镇压。是日晚游行队伍分三路出发，从沙滩北大一院出发的东北路提灯群众行至前门大栅栏和南路从高师出发的群众行至西河沿东口时，突遭预伏该处武装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和市民受重伤者约30余人，受轻伤者90余人，被捕20多人。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否认国会，反对北京政府。

3月3日　黎元洪任命余棨昌兼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3月4日　孙中山令准福建省长林森辞职，调大本营任用，任命萨镇冰为福建省长。

3月5日　孙中山训令广东省长徐绍贞，“司法独立，宜不受地方行政干涉。现在广东司法官吏，应一律由大元帅委用”。同日任命陈融为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陆嗣曾为广州地方审判厅厅长。

△　广东东路讨贼军第八师师长徐汉臣、第十五旅旅长黄定中纵兵抢掠鹤山沙坪，擅捕县长李一谔，大本营将徐、黄撤职查办，所部军队改为大本营直辖陆军第四旅。是日，孙中山任命陆军少将张振武接充该旅旅长。

△　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以武力助刘显世回黔。是日，黔军总司令袁祖铭通电称：唐继尧以滇、黔各将领推唐为滇黔联军总司令、刘显世为副司令之名义，率重兵压黔境，护送刘显世回黔主政。滇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唐继虞率领约3000人入兴义；一由吴学显率领2000多人入盘县。10日，滇黔联军占领镇宁、安顺。

△　北京政府拖欠内外债，本息无着，又酝酿发行十二年公债，并计划将原定之债额1200万元扩充为8000万元，而未恤金融界之困难，是日，北京银行公会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以救济棉业衰敝及维持纱厂金融起见，推举聂云台、穆藕初于是日赴京，向当局陈述拟组织中华棉业银公司，发行债券3000万两，请政府担保，以资救济。8日，由农商部提出阁议，经议定暂交外交、财政、农商等部及税务处会核。19日，众议院开会，部分议员疑农商部有弊，提议反对，时财政部亦反对，此案竟遭搁置。

△　旅鄂川人弭兵会通电反对吴佩孚提取川人在汉口所存之川路股款300万元，充杨森及鄂军援川之用。

△　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开学。该校设有农艺、森林、畜牧、园艺、生物、病害虫和农业化学七系，章士钊任校长。

3月6日　　孙中山为贯彻裁兵主张，是日在广东开始着手裁兵。办法是限各军于半个月内将该军营数驻地、官兵姓名造册呈报，再由大元帅派员点验，倘有虚额，不准再招，其老弱及无枪支者，均一律裁汰。

△　孙中山令准魏邦平辞去粤讨贼军总司令职。

△　孙中山委任杨仙逸为大本营航空局长。

△　黎元洪特派黄郛兼充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　黎元洪颁发明令称：自此以后，“所有统兵各将领，务期袍泽一体，永远脱离政争；至奔走政治者，尤应各循正轨，以尽其爱国之忱，切勿假借武力，希图自重”。

△　陈炯明派人携款至广州，图运动士兵叛乱，并发电诋毁孙中

山。广州各地出现招兵告示，以抵制孙中山之裁兵计划。

△　驻闽、赣边境之直军孙传芳、周荫人部5000余众，开入福建延平。

3月7日　孙中山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兼广州卫戍总司令。

△　驻重庆之川军第一军但懋辛所部发生内讧，战斗剧烈，晚大火。重庆下半城被焚。

△　北京张绍曾内阁以金法郎案文件咨众议院，推诿责任于前任内阁。29日，前任国务总理颜惠庆函张绍曾，指出中法协定无一字涉及金法郎，彼任内并未决定，张阁致国会咨文所称“维持颜阁原案”实为撒谎。

3月8日　曹锟、吴佩孚以南方又组织大本营，派代表项致中、李倬章入京，迫国务院明令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以抵制孙中山。是日，张绍曾内阁因部分阁员反对发布闽、粤两令，全体辞职，以获取全国同情。

△　张作霖召集东北三省文武官员120余人在奉天（今沈阳）开重要会议，对下列各项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一、东三省军制之划一；二、三省各新旅分别调防；三、各旅添设随营工厂，寓兵于工；四、三省各添一镇守使；五、加派步兵两旅、马队一旅驻锦县、绥中以维安宁；六、划定三省边防防区；七、各边防区增加驻军；八、三省政治应力求划一，边区各设治局及各要镇酌量改为县治；九、三省地方官不称职者，须严行淘汰，补充人才，而澄清仕路；十、撙节三省财政开支，减低军政各费；十一、精简军政机构；十二、划一三省外交，在奉设外交署，添委督办；十三、收回旅大交涉，应依原约以和平办法据理力争；十四、整理三省金融，商办私立各银行不准发行纸币。会议于10日结束。

△　连日来川军杨森及直军卢金山、宋大霈部与省军但懋辛、石青阳部在川东发生激战，因忠县杨春芳、范绍曾两部倒戈，攻击但军后路，是日，杨森军占领万县，但军退往重庆、成都。

△　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程克，因罗文幹案指责东三省特别区高等审判厅厅长李家鏊于职务外干预政事，呈准将李免职，调陈克正继署。

△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以广东省银行所发纸币低折，商民交困，于6日向大本营请示如何设法维持。是日，孙中山指示："纸币低折，重苦吾民，皆由陈逆（炯明）等滥发于先，复不能维持于后，致滋纷扰，言之殊堪痛恨。查恶币之害，由无固定基金，以致信用全失。应俟财政统一，别筹根本整理之方。枝节补救，殊未有良策以善其后也。"

3月9日　孙中山任命黄镇磐为广东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区玉书为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在广州创刊，大本营秘书处发行。

△　广东省长徐绍桢为恢复粤省交通，保护商旅，提出规复以前之"保商卫旅营办法"，于7日呈报孙中山，是日经批准暂行试办，并饬令各军一体保护。

△　黎元洪批令：慰留张绍曾内阁总辞，"尚望勉为其难，毋萌退志"。同日并发通电称："元洪受国民之托，万不能使中枢瓦解"，"已敦促阁员即日视事"。

3月1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致照会于日本外务省和驻京日使馆，声明取消民国四年5月25日关于中日条约及换文（即"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顺、大连两租借地。

△　张绍曾内阁再上辞呈，黎元洪再度退还，张因此决定在其私宅召开非正式阁议，以图曹锟、吴佩孚转圜复职。

△　孙中山嘉勉中央直辖桂军第三师师长陈天太讨贼有功。

△　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200余人晚膳中毒，死学生22人、校役二人，全城学界、官厅及沪、杭医界派人赶往救治。

3月11日　　吴佩孚致电张绍曾，声称“此间计划，拟先改编陈炯明所部，与沈鸿英、孙传芳联合驱逐元帅府出粤，计不出两星期，即可奏功，布置妥协，并非大言而夸。一俟成为事实，再由中央下一命令，以一事权”。

3月12日　　孙中山发表“裁兵谈话”，指出“革命的成功与否，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起来，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此次回粤“主张第一和平统一；第二扫清叛乱军队；第三化兵为工；第四精练一部分军队”。只有“先裁兵后统一，那才算是真统一；如果先统一后裁兵，便是假统一”，而裁兵“是在化兵为工”。

△　孙中山任命陈树人为广东政务厅厅长，免去谢良牧厅长职务；任命盛延祺为“肇和”军舰舰长，欧阳琳为“永丰”军舰舰长，潘文治为“楚豫”军舰舰长，宋复九为“肇平”军舰舰长，周之武为海军总轮机长。

△　桂军将领李易标通电要求准予率部肃清陈炯明逆党，意在插足广东东江地区。14日，孙中山指令李易标“整饬戎行，静听后命”，未允所请。

△　川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杨春芳、第六师师长周西成在万县发出通电归附杨森，决分兵取道长寿、涪陵会攻重庆。

△　政学会之李根源、杨永泰、谷钟秀、张耀曾、杨肇甫等在北京太平湖宴同党，宣布宪政会组织法，该会经费由黎元洪承担。

△　依据解决山东悬案条约，青岛盐田自日本方面接收完竣，由“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之盐田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大业与日方委员订约签字。

3月13日　黎元洪令准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改铸川省土司印信。

△　国会护法议员发表宣言，指出张绍曾内阁辞职庚（8日）电，有“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一语，措辞失当。

△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因棉花出口增加，市价渐涨，棉纱滞销，市价大跌，特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一致赞成部分停工。自本月19日起，各厂纱锭实行停工二分之一，或者夜工完全停止。该会并分电本外埠一致实行。17日，天津各纱厂开会，一致赞成停机半数。

3月14日　孙中山任命陈策为广东海防司令，杨廷培为广东江防司令，苏从山为长洲要塞司令，谢铁良为鱼雷局局长，陈天太代理中央直辖桂军第一军军长。

△　福建总司令王永泉致电张绍曾称，萨镇冰就任福建省长，闽局完全倾向中央，本无镇抚之必要，要求北京政府裁撤闽镇抚使，将刘冠雄调回北京。

△　康有为致电张绍曾内阁，力劝张应与曹、吴通力合作，以武力对付广东，主张以孙传芳督粤，以沈鸿英帮办军务。

△　日本外务省分致复文与东京中国公使馆和北京中国外交部，拒绝取消民国四年“二十一条”换文与收回旅顺、大连之接洽。

3月15日　张作霖的代表成济安谒孙中山，转达奉张关于收拾政局办法及表示倾慕之诚意。18日，孙中山派路孝忱赴奉报聘。

△　黎元洪令改河南泚源县名为唐河县。

△　北京政府农商部设立“修正法规委员会”，商会代表加入者七人。农商总长李根源称该会以“除兴业障碍，保人民权利”为宗旨。

△　北京政府交通部重申限制各商路公司“不得招募外股，擅借外债，倘有私行募借或竟发生纠葛，本部概不承认，一经查实，并予该公司以相当之处分”。

△　北京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通电全国，呼吁速息内争，注意边患。

△　刘冠雄以萨镇冰及其本人名义在福州张贴布告，宣布就办理福建善后事宜职。次日，萨镇冰另出一布告，声明彼系就自治省长职，福建非脱离南北关系，必陷入政争之漩涡。此次就职，系为桑梓负责，南强北胜之议，均非所与闻。

△　张作霖为加强东三省军事联络，在奉天、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建成无线电台，其中哈尔滨电台于本日与欧洲通电讯。

△　驻河南宝丰、郏县之张国信部2000余人（即吴佩孚收编之土匪“老洋人”）在郏哗变，由舞阳窜扰西平、遂平两县，攻陷富庶村镇70余处，焚掠奸淫，无恶不作，各县当局惧匪来攻，竟闭城不问。24日张匪攻项城、沈丘，城几失守。

3月16日　滇黔联军占领贵阳，袁祖铭率部出走。

△　上海总商会致书吴佩孚，谓目下裁兵为全国一致主张，劝吴停止川战，不再干涉政治。

△　中英威海卫交涉移京办理后，是日由梁如浩与英代表进行第一次接洽。

3月17日　孙中山特任李烈钧为闽赣边防督办；特任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蒋以眼疾辞未就。

△　孙中山在广州举行招待会，粤垣各界主要人物参加，孙在会上就化兵为工、禁赌与澄清吏治发表演说。

△　广东大本营金库裁撤，所有事务归大本营财政部办理；金库长林云陔免职，另有任用。

△　四川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等部被赖心辉所率之省军第一、三军及边防军围困于三台、阆中一带，后邓等经过苦战于是日占领梓潼，20日占绵阳，22日占领罗江。

△　刘显世电吴佩孚，告袁祖铭败退，望承认刘治黔。19日，吴电复刘，“甚佩黔人治黔，慎望勿为大云南主义之伥”。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国公使麻克类，请派员会勘片马界线。

3月18日　　原粤军第四军军长及八属总司令陈德春“勾通逆党，希图扰乱大局”，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及各将领奉孙中山令，于是日拂晓将陈德春部全部缴械。

△　中国国民党福建支部在福州成立，黄展云任支部长。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甘石桥会所开评议会，对下列各案进行讨论，并有所议决，其要旨为：一、日本政府拒绝废弃“二十一条”及协商接收旅大，应警告国人一致对付案；二、黑河、伯力、驿马河、赤塔、上乌金斯克等处华商商会被苏联政府封闭并逮捕会长，应通电一致援助案；三、速组修改农商法规预备会案。

△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将官股划出。以杭州、海门、兰溪三行划归官股，改名为浙江地方银行。商股部分另行招股补足200万元，就上海、汉口原有两行继续营业，并即日推设分行于杭州等处，改名为浙江实业银行。

△　北京政府外交部曾电滇省当局，谓片马案已向英国公使提议勘界，请担任办理中英界务，并希预筹一切。是日，唐继尧复电外交部，同意担任办理勘定片马界务，并主张宜照清光绪二十年（1894）薛福成所订约签字成案图及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一日清外务部照会英公使嘉成案办理划界。

△　哈尔滨市民在道外公园举行群众大会，议决："（一）对日本拒不交还旅大，通电各国政府国会及各报馆宣布委曲情形，请主持公道，予以援助；（二）'二十一条'未取消、旅大未交还以前，全国人民请求当局或自动与日人解除商约，绝对不与往来；（三）东路问题，本俄农政府1919年之宣言，东路无条件交还我国，今则一致要求其履行。"大会当即发出通电，会后举行游行。

3月19日　孙中山令李烈钧率部移驻闽南，以所遗潮、汕防地归许崇智回粤军队驻扎。李部系收编陈炯明部之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苏世安等五师而成。

△　孙中山任命李易标为中央直辖第五军军长，沈荣光为中央直辖第六军军长。

△　张绍曾决定徇曹锟、吴佩孚之意，下达闽、粤督理令，实行内阁总复职。

3月20日　黎元洪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帮办广东军务善后事宜；任命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光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二师师长，黄业兴为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王定华为广东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又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帮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任命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

△　黎元洪特派李根源为全国国货展览会总裁，张英华为印制局总裁，徐佛苏为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

△　黎元洪公布“国币型式”，前为龙凤及十二年造字样，后为嘉禾及壹圆字样。

△　北京国务总理张绍曾派王宠惠、杨天骥赍函赴粤，敦劝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名义，离粤北上，徐商善后。王、杨抵沪后，先访浙督卢永祥，托其疏通。卢请先取消闽、粤两督命令，王、杨遂留于沪上者久之。

△　我国留日学生为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青年会召开大会，到会400余人，当即议决：一、打破军国主义；二、取消“二十一条”；三、收回旅顺、大连；四、巩固中日国交等。会后全体出发赴麹町区永田町中国公使馆及霞关日本外务省面递上项决议时，遭到日本警察马队残酷镇压，留日学生受伤者60余名，被捕20余名，但学生们不为军国主义者所屈，冲过警戒线前往中国使馆递交了决议书。

3月21日　　北京众议院通过决议，促请政府拒绝接受关于取消“二十一条”要求之日本复文，并请政府通告日本，对彼复文甚不满意。

△　黎元洪特任林俊廷暂行兼代广西省长。

△　黎元洪宣布迪化南关一带辟为商埠。

△　孙中山任命罗翼群为大本营军法处长，旋罗呈请辞职。28日，孙中山令准免罗本职；次日将军法处裁撤，所有军法事宜归军政部兼理。

△　孙中山令广东交涉员傅秉常即与驻广州英总领事交涉，请香港政府放逐陈炯明等逆首离港。

△　王文典等发起“继续恳让庚子赔款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略谓：1914年5月，伍廷芳、王文典等在上海发起“恳让庚

子赔款会”，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减免此项非人道之赔款，或免利息。后因欧战关系，该会未能进行，赔款也因故缓付五年。至上年底止，缓付期已满，故再为继续之运动。

3月22日　孙中山任命赵士北为大理院长，30日又令赵暂行兼管大本营司法行政事务。

△　北京政府署外交总长黄郛呈请辞职。25日，黎元洪予以慰留，给假十日，以外交部次长沈瑞麟暂代部务。

△　驻欧十国公使因使馆经费被欠多月，由驻法公使陈箓领衔联合电呈北京外交部总辞职。电称：“馆费积欠迄今十月，挪借已穷，维持无术，税款指拨使费之议，是否实行？如无的款，请准箓等退避贤路，或每馆酌留馆员一人看管，以资结束，免贻国家之羞。”

△　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法租界三益里开评议会，通过对于现时政治的态度案，要求全国学生联络国内外被压迫之民众，打倒北洋军阀和抵抗国际帝国主义者。24日，法租界当局徇官厅之请，禁止该会在沪开会并将三益里会所封闭。评议会被迫易地进行，在选出理事成立临时理事会后，于27日闭会。

3月23日　广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因黎元洪下督闽督粤令，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筹商对付方策。

△　孙中山任命王均为大本营巩卫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　黎元洪以闽局已定，令刘冠雄、朱泮藻即日回京，“所有善后事宜均应责成该省军民长官妥筹办理”。

△　黎元洪令江西省长谢远涵开缺，特任徐元诰为江西省长，徐未到任前由陶家瑶署理。又特派谢远涵为江西全省官矿督办。

3月24日　桂军总司令沈鸿英向孙中山表示愿遵照2月24日移防

命令，将应行移驻各队陆续开拔集中高唐、新街一带，准备领出号衣及开拔费后，即行移驻西江。

3月25日　沈鸿英、杨希闵通电辞绝北京政府任命，以释群疑。同日，滇、桂军会衔布告辟谣，谓勿为浮言所动。

△　上海各团体五万余人举行国民对日外交游行大会，主张根本否认“二十一条”，如约收回旅大，并以团结一致及经济绝交为抵制日本手段。全国各省各埠先后响应。

3月26日　孙中山训令中央直辖第五军军长李易标，将该部驻扎广州市内观音山之军队，克日另择市外适当地点移驻；嗣后观音山开放为公园，不得再行驻扎军队。次日，李易标将所部驻观音山之邹团移驻市外小坪，并将第五军司令部移驻石井。

△　孙中山委任谢持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本部党务事宜；令邓泽如速行恢复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

△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改组东京支部及进行北方宣传工作。

△　黎元洪特派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次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政府转饬越飞回京开议。

△　黎元洪令准绥远固阳设治局改为固阳县。

△　黎元洪令撤销李思浩通缉原案，并令回籍办赈。

△　许崇智之东路讨贼军由闽开抵广东大埔，前队抵达五华。

△　川军杨森所部攻占四川梁山，省军但懋辛部退重庆。

△　是日为我国应按照中俄条约收回旅大之日，全国各省各埠之各界公民纷纷集会，要求撤废“二十一条”和收回旅大。同日北京各界

公民5000人冒雨在天安门开大会，并决议：一、国民自动否认换文，收回旅大；二、整理内政；三、开全国国民代表会解决；四、抵制日货；五、援助工会复活；六、相当时期宣布与日本政府间断国交。会后各界冒雨参加游行，并派代表往见外交团。大会并通电全国一致力争收回旅大取消换文。

3月27日　孙中山派谭延闿往晤沈鸿英商开拔事，饬广东财政厅筹10万元为沈部桂军之开拔费。次日，沈电孙中山称，已分饬所部陆续开赴西江一带，并于肇庆设立桂军总司令部。

△　黎元洪派张维镛为全国国货展览会会长，王文典为副会长。

△　全国商业联合会、商约研究会、京师总商会等三团体在北京开会，成立内外债审查会。

3月28日　川军邓锡侯、刘斌所部联合陈遐龄的边军再次包围成都。次日，刘成勋在成都召开重要军官会议，30日发出通电辞川军总司令及省长职。刘成勋并电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第九师师长刘文辉速入省城维持一切，并任调停。

△　黎元洪令准江苏警察所所长一职另委警佐充任，不再由县知事兼充，但县知事仍处于监督地位。

△　各省军阀及驻外使领纷纷向北京财政部索款，是日财政总长刘恩源避债不到部，库藏司人员不敢到司办公，在他司借坐。

3月29日　孙中山特任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次日任命杨池生为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师师长，杨如轩为第二师师长，范石生为第三师师长，蒋光亮为第四师师长。

△　程潜、刘震寰、朱培德、卢师谛、刘玉山、梁鸿楷、周之贞、李济深、郑润琦、吕春荣等联名通电，反对北廷督粤伪令，并声明“倘彼曹吴等不谅此志，徒恃暴力以相侵凌，则潜等不得已为主义

而战，固所愿也”。

△　黎元洪任命张福运为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刘式训为唐山大学校长。

△　北京政府农商部以近来“罢工风潮日趋激烈”和“调解劳资冲突，预防工业流弊”为由，于是日公布《暂行工厂通则》，凡28条。

△　交收“鲁案”未了各事之中日最后协定，是日在青岛签字。按“鲁案”胶济铁路之移交，虽自本年1月1日开始进行，然实际自2月1日起始由中方人员接管，而各项附属财产及中日细目协定所未明白规定之各项问题，迟至上述最后协定签字之时，方获全部解决。

△　江西督理蔡成勋电告北京政府，报告九江绅商以该埠扼沪、汉咽喉，又有南浔铁路，诚为水陆交通中心，各种货物转运趸积之所，呈请重开九江商埠，以推展商业，并杜绝外人觊觎。并称现已按《自辟商埠开办章程》第三条之规定，就九江龙开河滨、兴洲一带公地及附近民地自辟商埠，委前赣南道尹陈富元为局长，蔡成勋自兼督办。

△　河南匪势猖獗，北京政府参陆处电靳云鹗“当筹根本肃清之法，毋使死灰复燃”。

3月31日　孙中山特任刘震寰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总司令；任命韦冠英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一师师长，严兆丰为第二师师长，黎鼎鉴为第三师师长，伍毓瑞为第四师师长。

△　安徽督理马联甲将存放安庆军械局旧军火变卖给上海协记洋行，搬运时发生爆炸，计炸毙役夫50余人，炸伤30余人。

是月　袁祖铭部黔军3000余人由湘西入鄂省宜都，由鄂当局拨给枪械，准备开拔援川。

△　湖南自修大学发表创立宣言，其创设宗旨在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该校暂设文、法两科。

△　河南教育厅召集施行新学制会议，议决国民小学、高等小学改为完全小学，自本年8月起，旧有中学一律改为初中（省立15所，县立14所），师范学校（男五、女一）一律改为六年毕业，高中先于省城设一校。旧有省县立甲种实业学校10处，改为六年毕业（前三年普通科，后三年职业科）。乙种实业学校共50余处，经核准者改为职业学校，否则改为小学。旧有法专、农专及留学预备学校，8月改建中州大学，先招文理两科。平民教育，先于省垣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再事推广。

4月

4月1日　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正式恢复。

△　黎元洪特派丁槐与孙中山之代表汪精卫、徐谦、张继等在上海洽谈南北对等会议事。

△　江西督理蔡成勋下令戒严司令部、警务处，封闭省垣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并将负责人刘子池、袁玉冰拘捕。

△　安徽芜湖各公团开对日外交后援会，讨论对日外交方针，议决抵制日货并通电全国一致力争，务达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目的。

4月2日　孙中山特派古应芬为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全权主任，所有留驻江门水陆各军队，概归节制调遣。

△　黎元洪公布《县自治法》，自本年10月1日起，于直隶省（今河北）所属天津、临榆、玉田、昌黎、高阳、滦县、蠡县、安国、交

河、束鹿、赵县、定县、磁县、永年、冀县、徐水、清苑、大名、宣化、怀安、蔚县、静海、大城、抚宁、定兴、深县、沧县、文安、获鹿、邯郸、河间、易县、正定、柏乡、深泽、赤城、卢龙、邢台、吴桥、枣强、丰润、遵化42县施行。

△　北京政府推翻所拟整理内债基金原办法，计划停付内债基金本息一年2400万元，而以1400万元付外债，1000万元充作政费。消息传出，内国公债持有人均感不安，是日联名致函上海银行公会建议组织债权团，向北京政府争取付息还本。

△　北京政府财政部印花税处总办李景铭以财政部印刷局长薛大可、库藏司长胡仁镜违章串同滥印印花票破坏税则，向京师地检厅提出控告。5日，财政部被迫下令停印；18日下令免去薛大可、胡仁镜职务同付惩戒，以为搪塞，薛已先期避往天津。

△　北京参议院开议不信任张绍曾内阁案，经审查后改为弹劾案。同日，众议院议决政府现拟之“整理公债案”，非经议会通过，不能认为有效。

△　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擅加鄂省田赋、丁漕三分之一，凡百杂税增加一倍有奇。旅沪鄂人组织拒税团，是日派人赴鄂西施鹤、鄂北襄郧以及武汉、鄂东一带运动市民拒税，并组织拒税请愿团分赴北京、保（定）、洛（阳）、广州等地请愿。26日，鄂省商联会及武阳夏三商会代表18人赴省财政厅，请取消赋税改征及教育附加税两案。

△　广州学界40余校学生万余人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举行大游行，并推派代表至大元帅府谒孙中山呈请愿书。孙亲自接见，略谓：“吾人拒绝廿一条及收回旅大问题，已于五年前进行运动，且数年来南方历次革命军兴，都系为斯而战，盖直接与北方战，间接与欺凌我者战也”，“诸君此后之责任，时时向人民作宣传工夫，唤醒国人精神，从根本上作工夫，一致把害国殃民者打倒，实现一真正民意

之良好政府，然后可以外交不致失败。”

△　河南西华地区140余村之农民二万余人在杨村开各界联合大会，以农民名义发出宣言，电达外交当局及驻京各国公使，一致力争收回旅大并警告日本政府反省。

△　苏联代表团在接获北京政府外交部上月28日关于特派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节略后，于是日将驻京苏联全权代表越飞自日本复电照转北京外交部，对王正廷任命表示欣然同意。

△　美国驻京公使舒尔曼访张绍曾，不满日本方面“三井洋行有三十年无线电专利权”之主张，要求即日承认美商费德礼公司开始无线电台建筑工程，否则“或再难援助中国”。

4月3日　　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由农林试验场滇军司令部迁往广州河南士敏土厂。

△　桂军将领李易标借口所部系中央直辖军，与沈鸿英军移防无关，调北路所部二团回驻广州白云山。

△　川军邓锡侯反攻至成都，“中立派”各将领以成都为首善之地，万不能作战场，遂推由此次未与战事之（新）第九师师长刘文辉等调停，刘成勋方面之但军、赖军和平开出，由刘文辉入城卫戍。4日午，但、赖军退后，刘文辉部入成都。川北战局暂时结束。

△　黎元洪特派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任命洪兆麟为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

△　上海银行公会以“公债为国家命脉，人民身家所寄托”，电北京政府请求取消推翻内债基金案之计划，以维护国家信用，安定金融。

△　山东各界为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事，在济南公园开国

民大会，二万多人参加。大会通过组织对日外交后援会；通电全国，宣布日本破坏东亚和平罪状；严行监督北京政府强硬交涉；与日本断绝经济关系；共起民众运动，全力对付外交等五项办法。会后整队赴省署请省长熊炳琦代电中央，据理力争。熊炳琦出见，竟以“如有轨外举动，余必以武力对待”相威胁。

4月4日　　孙中山任命梁鸿楷为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为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一师师长，郑润琦为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三师师长。又任命马伯麟为虎门要塞司令。

△　台湾人民在日本东京神田中华青年会举行反对日本统治台湾大会，到会者500余名。

4月5日　　黎元洪令准蒙藏院副总裁易次乾辞职，以潘毓桂继任。

△　北京政府总税务司安格联致函财政部，主张将关余拨入整理内债基金项下，以维持信用。

△　沈鸿英电岑春煊，俟中央接济确有把握及陈炯明确能合作，与桂省联络布置妥当，方能正式拜督理命。

△　上海面粉业公会在市内倚虹楼开同业大会，因麦价高昂，粉价低贱，亏耗堪虞，公决暂以阴历三月初一（4月16日）起，一律停机一月，以便节省开支，维持营业。

△　赣省教育会发起之江西实施新学制讨论会开幕，14日结束。决议：一、关于省会各小学、各县小学校决议案；二、农专、法专、医专改办为江西大学；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改为工业专门学校；第二甲种工业学校改办窑业专门学校，迁往景德镇；体专仍照原案。

4月6日　　北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率一混成旅入福州，王永泉让予驻地。

△　北军第十八混成旅赵荣华部于学忠支队、杨森部李钺生旅占领重庆，但懋辛军退往泸州。

△　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之前锋，回粤途中在大埔、潮州交界之高碑，与尹骥部发生激战。

△　孙中山发出清理庶狱训令，要求广东地区在三个月内办理完竣。

△　东三省收回旅大后援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开成立会，到会者甚众。为避免吉省当局的干涉，吉林各团体则组织国货维持会进行收回旅大之活动。

4月7日　　孙中山令闽赣边防督办李烈钧率所收编陈炯明部各军（第一、二、四、五师）移驻闽边，让潮、汕与许崇智军屯扎。10日，李烈钧电孙中山报告彼已率部抵达饶平附近，即向南靖前进，“数载相随，惟知尽忠”。

△　黎元洪代表丁槐自上海电告北京，迭与孙中山之代表孙洪伊、徐谦等会谈，商讨和平统一中国之办法。

△　总税务司安格联离京请假回英国，在西报登广告，表示对公债基金仍负责保管，所有假期内事务由总务科税务司包罗暂行代理。

△　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执行委员会邀本埠各团体、各商帮公所及各公司之代表开会，讨论对日经济绝交计划，通过《对日经济绝交大纲》等议决案。

△　哈尔滨傅家甸附近松花江之新堤决口，淹毙3000余人，无家可归者数千人，冲毁村庄20余处。

4月8日　黎元洪令准外交总长黄郛辞职，特任顾维钧继署。

△　驻防青岛之“海筹”、“永绩”、“建康”等舰及“列字”艇，由舰长许建廷率领驶至上海高昌庙，会同驻沪各舰于是日通电宣布赞助联省自治主张，拒孙传芳入闽，公推林建章为海军领袖。浙江卢永祥（11日）、奉天张作霖（13日）、厦门臧致平（14日）先后致电林建章，赞成联省自治主张。

4月9日　粤警备军军长姚雨平奉孙中山密令，将驻惠阳县城之翁辉腾所部缴械，是日并派队向海丰、汕尾等处进发，以肃清盘踞该地的陈修爵等部逆军。

△　桂军首领在新街行营召开军事会议，随后赴韶关在沈荣光司令部再开军事会议。北军代表沈锡荣亦出席，催促沈鸿英就广东军务督理职。

△　桂军将领李易标等致电孙中山，指责广东财政厅长杨西岩擅卖农场、佛寺、旧军署等公产以筹措军政费用，要求即日罢杨职。

△　上海舰队领袖林建章电孙中山，宣布海军同人“本联省自治主旨，以闽人治闽为联治之先河”，矢志卫国保民，实现和平统一。

△　孙中山明令褒扬前云南总司令顾品珍、靖国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均追赠为陆军上将。

4月10日　孙中山令准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辞职，特任张开儒为大本营参谋长；派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宣传委员会委员，6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陈独秀任委员长。

△　侵粤直军6000人，由南雄直趋韶关。

△　直军于学忠、张允明两支队经两日激战，是日攻占四川江北县。次日，张允明支队攻占璧山县。

△　直军运大批军队赴榆关、热河增防，奉、直形势趋紧。

△　张作霖致电孙中山谓：报载奉省有图谋复辟之说，深恐引起一般误会，请代为宣布，转饬各报更正。12日，孙中山复电允为剖白复辟谣诼，冀本爱护共和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

△　上海徐家汇东亚同文书院学生40余人，为争废“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发表宣言后，竟被该院日人院长谬认为不正当行为，将学生代表四人斥退。是日该校全体中国学生为反对此种无理压迫，决离该校。

△　江苏徐州各界开对日外交国民大会，到会三万余人，公决电北京政府并分电全国，一致力争收回旅大并取消“二十一条”。会后全体游行。

△　驻秘鲁使馆代办罗忠诒再电北京政府，谓秘鲁工党煽惑群众并要求秘鲁政府驱逐华侨，没收华侨财产，废止中秘商约，请速谋挽救。

4月上旬　　孙中山召集各要员到元帅府开财政会议，讨论筹款办法，杨西岩、邓泽如、孙科等列席。财政厅长杨西岩在会上发言称：省库收入，除省内所辖各机关及香山、顺德、南海、番禺各县略有解缴外，其余各属俱为军队截留，虽三令五申，仍不照向章将税收缴库，而各方追饷又急如星火，几至无法应付。应严令各军司令立将征收机关交回地方长官，勿令盘据。

△　陕督刘镇华根据吴佩孚电令实行“援川”，由第七师师长吴新田担任总指挥。援川军共三支队：一、由第七师第十四旅长兼陕南镇守使刘宝善率所部经镇巴，直入川属之太平一带；二、由驻广元之陕西第五混成旅王鸿恩，率全部由川北直入成都；三、由驻宝鸡之陕西第四混成旅长罗玉山率全部先集中汉中，亦由广元入川。

△　天津特派交涉员祝惺元调查存津意大利枪械私运赴奉情形，向外交部报告称：此项意械，于本年1月间由意商达利洋行出面售与

日本枪炮商池野。彼时适有奉天派来购械之吴子坚等来津，与池野缔结购械合同，计步枪1.3万支（附枪刺），炸弹800颗，大炮12尊，在津交货。嗣为津领事团所闻，派警拘吴等，吴等闻风先逃，未成事实。池野2月赴奉，与奉张磋商，遂改由日人代运赴奉，由奉方给予保险费2.5万余元。已运奉者，系储津之一部，由渔船运往葫芦岛。

4月11日　粤讨贼军将领刘震寰、周之贞、陈策、朱卓文等电孙中山，北军侵南雄，请速下令讨伐。

△　胡汉民、孙洪伊、徐谦代表孙中山接见北京政府代表王宠惠、杨天骥，表示北京政府真欲言和，须：一、自行取消闽、粤各令；二、调回孙传芳入闽军队；三、立停川战。如此三项不能办到，说明黎元洪、张绍曾殊无代表北方能力，无可言和。

△　黎元洪令准将谋杀前海军总长程璧光之凶犯张柏青（张梓樵）判处死刑。

△　北京参议院开会，讨论不信任张绍曾内阁案，以94票对21票通过。

△　邓锡侯经田颂尧、刘文辉、唐廷牧、陈国栋、刘眷藩、彭耀远和陈遐龄等推举为“四川联军总指挥”，是日通电就职。

△　湖南各工团为收回旅大、废止“二十一条”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联合而起，共谋抵抗。如日人不从，则誓与断绝邦交，抵制劣货，务必做到废止“二十一条”，以保障国权而维持东亚和平。

△　山西太原各界人士三万余人，为力争收回旅大及不承认“二十一条”，在文瀛湖公园举行对日国民外交大会，会后全体游行。

4月12日　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劳军使；任命刘玉山为中央直辖第七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　黎元洪任命陈蓉光为厦门商埠督办。

△　北京政府海军部派军学司长李景曦、军法司长郑宝菁南下调查沪海军独立事，于是日抵南京，当即与齐燮元、杜锡珪会商借拨省款发放各舰欠饷，并疏通长江上下游各舰艇勿遽加入沪舰队行动办法。14日，北京阁议通过自5月份起，每月在两淮盐余下，由扬州稽核所划拨40万，专顾舰饷。15日李、郑由宁抵沪调查。

△　孙传芳率北军抵福州。

△　武汉召开国民大会，各界五万余人参加，大会议决四项：一、通电全国，组织国民外交委员会；二、对日绝交，其办法为不买日货，不用日币，不供给日本原料，华人不为日本做工，组织对日外交委员会，督促对日绝交之进行；三、用英文通电世界各国政府与国民，请其主张公道；四、用国民大会名义，直接警告日本政府。会后分三大队出发，举行示威大游行。

4月13日　孙中山发布军事调度与编组命令：广东讨贼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中央直辖第四独立旅旅长张振武及现驻新兴第一独立旅旅长余六吉等所部，均归广东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梁鸿楷指挥，并由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全权主任古应芬节制调遣。又令将中央直辖第二、第三两师，改编为中央直辖第七军。

△　冯玉祥为协饷事赴保定后返京，已得曹锟允许该部不调往热河，是日冯宣布愿专保卫京师治安，不加入任何内争。

△　北京国立八校继续向教育部索薪（已积欠五个半月薪水），教育部职员亦开会讨论向彭允彝索薪。

4月14日　黎元洪特派刘恩源兼充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赵椿年、文群为副委员长。

△　章太炎在上海联络孙中山、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

惕、谭延闿、刘显世等人之驻沪代表，发表以孙中山等人署名通电，谴责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政策。旋赵恒惕声称此电未经本人同意；唐继尧亦称并未与孙会衔通电。

△　驻汕头之“肇和”舰舰长盛延祺命令该舰驶往厦门，因水兵要求发清欠饷不服从命令，致起冲突，盛及副舰长、总炮长等人被水兵枪杀。

△　孙传芳在福州督署邀请王永泉、萨镇冰等开善后会议，划分驻兵区。次日，孙传芳、王永泉宣布就福建军务督理和军务帮办职。

△　山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于赣边与赣督蔡成勋发生冲突后，是日发出辞职通电，反对北廷之武力统一政策。电称“若谓武力可以致统一，即无异强权可以代公理，藉非至愚，其谁信之”。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刘恩源呈准收回青岛盐业偿价，已商由四国银行垫付。

△　美日在华矛盾加深，是日两国互换文件，宣布取消1917年11月2日所订之《蓝辛——石井协定》。

4月15日　桂军沈鸿英在新街就北京政府所任命之督理广东军务职，公然称叛，并通电迫孙中山离粤。

△　黎元洪通电呼吁“早销兵气，以仁义为感召，以法律为依归”，实现和平统一。

△　张绍曾赴保定参加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与曹锟商讨时局，并为倒阁风潮向曹求援。

△　孙中山函复北京学生联合会，告以即将北伐，并勉励学生“极力从事宣传，使北方民众皆晓然于吴佩孚之恶而亟思去之”。

△　全国银行公会第四届联合会议在汉口华商总会开会，讨论议案10项，其中关于维持公债基金案，议决在内外债未整理实行以前，各在会银行不得单独或联合承募或购买政府发行之新公债，并由各地公会登报公告之。19日，会议结束。

△　山东鲁大矿业公司在天津开成立会，推选靳云鹏、潘复、王占元、赵兴基（赵尔巽之侄）、柯劭忞五人为董事，吕海寰为监察，并由董事互选靳云鹏为总理，潘复为协理。该公司将接收经营淄川煤矿、场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

△　《新江苏日报》在南京创刊。

4月16日　沈鸿英称叛兴兵。拂晓，沈军李易标部六七营分三路直扑广州市：一路由白云山向农林试验场滇军总司令部及观音山猛扑，杨希闵率滇军迎战，孙中山并亲赴农林试验场偕杨督队将敌击退。二路扑攻造币厂，为卢师谛击退。三路进攻流花桥为刘震寰部所阻。沈鸿英本人则自任中路，沿粤汉路南犯。沈荣光出英德、四会，直攻三水。西江一带之沈军，亦先后叛变。

△　孙中山下令褫夺沈鸿英桂军总司令职，并着各将领督饬所部分途兜剿。

△　孙中山电许崇智，告以沈鸿英叛乱进攻省城，命东路讨贼各军向翁源、英德出击，以断逆贼与江西之联络。

△　孙中山电驻沪代表胡汉民等嘱严质北廷嗾沈（鸿英）乱粤破坏和平之责任。

△　黎元洪令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咨请，追赠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为陆军上将，并由陆军部各从追赠本官，按照阵亡例从优议恤。

△　上海各华商纱厂发表联合宣言，三个月内各该厂棉纱不解交

易所，以实销为主，谋维持市价，免受任意操纵之弊害。

△　全国商联会因华侨遭到秘鲁、巴西、厄瓜多尔、荷兰和海滨俄政府当局的排斥虐待，特派出代表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恳请迅速分别严重交涉，以资挽救。

△　驻河南胡景翼陕军一营，在长葛与当地红枪会开仗，陕军伤亡甚多。

4月17日　刘震寰军攻克广州市郊沈鸿英军据点瘦狗岭。

△　孙中山任命廖湘芸为虎门要塞司令，派陈兴汉管理粤汉铁路事务。

△　张绍曾之代表王宠惠在沪电北京政府，报告与孙中山驻沪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接洽情形，谓“中山先生委派和平代表驻沪，原以谋时局之解决，而履行其历次之宣言。唯北方一面标榜和平，一面进行军事，全国舆论，皆难谅解”。要求仿辛亥、民八上海和会为先例，先停止军事行动及敌视之行为。

△　中国国民党党员李希莲上书孙中山，报告在奉天活动情形。李于3月19日赴奉，本月15日返沪。是日报告到奉之结果大概，谓“长江柏烈武（文蔚）方面，黄河刘荣棠方面，山西阎（锡山）方面，陈伯生方面，各方面联络已承允诺而赞许之”。

△　吴佩孚命北军张克瑶一旅，由赣赴粤，助沈鸿英。

△　浙督卢永祥调所部第四师第七旅第十四团全部步兵三营及机关枪二连，炮兵二连，增防衢州。

△　厦门皖军臧致平反对孙传芳督闽，宣告独立。

4月18日　孙中山派军政部长程潜前往三水，指挥左路军队进剿

沈鸿英桂军，以朱培德暂行兼代大本营军政部长。

△　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追击沈鸿英部桂军至广州郊区龙眼洞，刘震寰军收复小坪。沈军攻势顿挫。

△　臧致平电李烈钧，欢迎李率部驻闽南，协御孙传芳。

△　福州市民因王永泉部军队出发拉夫，全城罢市。

△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五旅长往谒黎元洪，请任薛笃弼为崇文门关税监督，黎因崇文门税收关系总统府经费，拒允所请。次日，薛笃弼辞司法部次长，以为要挟。

△　驻皖之新安武军40营裁竣。是日，黎元洪颁令嘉奖马联甲、吕调元、李玉麟、殷恭先等人。按：新安武军原为张勋定武军之一部，复辟失败后改为新安武军，归属倪嗣冲，至是全裁。

4月19日　滇桂粤讨贼联军击败广州之沈鸿英军，占领白云山、石井兵工厂等要隘，沈军败退广东新街。

△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军事会议，杨希闵、刘震寰、朱培德、李福林、卢师谛等将领参加，议定进剿沈鸿英叛军计划。

△　孙中山电上海议和代表，指示北方如犹言和，必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议立可停止，免堕术中。

△　广州大本营中央直辖军陈天太部与沈军张希栻部在肇庆冲突，陈部得滇军助力于22日占领肇庆。23日，陈部一个团叛变，与沈军勾结逐陈，肇庆再为沈军所占。25日，孙中山派陈策、周之贞率部以全力争该地，复占肇庆。旋以梧州东下之沈军后援开到，肇庆再陷沈军之手。

△　孙中山任命陈同贽为钦防司令；朱和中为广东兵工厂厂长。

△　黎元洪派陈绍唐帮办接收威海卫事宜。

△　张作霖在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俟孙中山在粤得手后再定方略，暂先固防。

△　刘显世在贵阳自任贵州省长，通电宣布18日由滇抵黔，21日就职视事。被逐之袁祖铭亦于23日通电宣称“决于铜仁设立省长行署，遥领大权，指挥一切”。

△　杭州各界公决对日经济绝交，停进日货。因闻商号中有私运日货情事，是日发出第二次传单，重申警告，请一致坚持。

△　江西南昌各校学生及各界人士三万多人，为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举行对日外交后援游行警告大会，以期唤醒同胞，与全国国民一致共图经济绝交，以为政府后盾。

4月20日　　孙中山下令褫夺附逆军官李易标、沈荣光本职，令曰：“沈逆鸿英称兵作乱，业经明令讨伐。……所有附逆军官李易标、沈荣光等甘心从乱，扰害地方，均属罪无可逭。中央直辖第五军军长李易标、第六军军长沈荣光，着即褫夺本职，并着各军长官饬令前敌将士将沈鸿英、李易标、沈荣光悬赏购拿，务获惩办，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　讨贼滇军克复广东新街。同日，胡思舜部攻占三水县北境之芦苞。

△　孙中山特任罗翼群为大本营兵站总监。

△　蒋介石抵广州，随孙中山参佐军务。

△　黎元洪明令任命陈炯明旧部：特派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任命钟鼎基为将军府将军，尹骥为广东陆军第五师师长，李云复为广东陆军第六师师长，赖世璜为广东陆军第七师师

长，苏世安为广东陆军第八师师长，杨坤如为广东陆军第九师师长，翁式亮为广东陆军第十师师长。次日，又任命陆宗宇为广东陆军第四师师长。

△　北京学界为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举行游行，演讲排货。次日开始检查日货，见有陈列日货之商店，则劝其即日停止出售，陈述旅大问题之原委及对日经济绝交之必要。学生态度恳挚，商人多为所动。

4月21日　陈炯明军林虎所部向广东五华、紫金猛进，次日抵五华，为许崇智部讨贼军所阻。

△　陕西对日外交国民大会为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在西安莲花池大体育场开会，法专等50余处学生七八千人与会。大会决定：一、通电政府合全国一致力争；二、电达日本政府与国民；三、电达各协约国。会后由各法团、各学校外交后援会分途演讲，听众约10万人。

4月22日　孙中山在广州接见报界记者，介绍进剿沈鸿英叛军情况。谓连日战斗白云山一役最烈，我军伤亡1000人，沈军伤亡2000余，被俘千余。我军已占肇庆、英德，当乘胜攻韶（关）。

△　黎元洪任命胡翊儒为山东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

4月23日　北京众议院开议参议院咨送之不信任张绍曾内阁案，决交全院委员会审查。25日，众议院全院委员会以222票对95票将此案否决。

△　孙中山任命陈可钰为广东宪兵司令。

△　张绍曾代表王宠惠、杨天骥由沪抵粤，往谒孙中山，并致送张绍曾敦请孙中山北上之书信。

△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发出通电，痛斥军阀武力统一之迷梦，倡议弭兵息争。

△　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中等学校学生在学时期限制结婚案。

△　锦州本关外双岔山军械库焚毁，损失子弹5.5万发，步枪2300支，毛瑟枪11支，炮弹400发，军服及其他军用品若干。

4月24日　孙中山派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

4月25日　沈鸿英桂军得南雄调来北军数千之助，利用地势使用火车头数辆配备机枪向北路联军冲锋，联军退至新街附近。次日，联军改变战法，击退北军，仍追击沈军至银盏坳。连日来两军在银盏坳、军田之间相持。

△　粤讨贼联军攻克广东清远，旋失。30日，联军再克清远，桂军沈荣光部败退。

△　驻汕头之“肇和”、“永丰”、“楚豫”、“肇平”四舰长官田士捷等通电响应沪海军。同日，温树德派“海圻”、“海琛”两舰驶往汕头，监视驻汕四舰，防其他往。

△　上海邮差400人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废除储金制度。后邮政司与罢工邮差代表商讨，答允所提条件，罢工结束。

4月26日　孙中山亲赴广东北路前线督师。

△　杨森电告鄂省当局称，刘成勋、但懋辛联合滇、黔力图反攻，滇军唐继虞率胡汝骥、吴学显1.5万人，由赤水进驻纳溪；刘显潜、吴心传各军亦向秀山进发，请迅拨子弹30万发，以资防堵。

△　冯玉祥、王怀庆、薛之珩、聂宪藩、车庆云、马龙标等北京军警将领，会同旅团长、处长、科长等百余人前往国务院索薪，向张

绍曾、刘恩源面陈军警界窘迫状况，要求立即筹拨一个月经费143万元，当场勒令财长刘恩源出立笔据，限下月3日、5日、7日分三期分发。同日，北京政府陆军部、教育部、总统府等机关代表，亦纷纷到财政部索薪。

△　北京国务院会议，承认日本正金银行所持有之俄发债券。

△　陕西省议会开紧急会议，向省政府严重质问，反对直军第二十师阎治堂部借开拔之名强向商会派索开拔费20万，并拉民车转运麦米出关。

4月27日　据《申报》报道：自我国对日经济绝交后，侨日华工被驱逐回国者，总计不下500余名，日昨“长崎丸”抵沪，又有21名华工被驱回国。

4月28日　孙中山复函李烈钧，望所部早日图赣，以断沈鸿英逆军之去路。

△　黎元洪派邓萃英、秦汾、李建勋、谢冰为出席万国教育会代表。

△　四川省军但懋辛部由合川、永川、铜梁根据地向重庆之杨森军反攻，川战重开。杨军、北军除分路防御外，并约成都之联军右翼向但军后方夹击。

△　岑春煊复电沈鸿英，为沈叛攻广州出谋划策，并向沈自荐其子岑德广任粤造币厂长。

4月29日　曹锟通电否认对奉备战。次日，张作霖通电响应，解释奉直并未备战。榆关、热河一带形势骤然和缓。

4月30日　粤桂滇讨贼联军攻克源潭，沈鸿英败退。吴佩孚令北军方本仁部从赣南增援沈鸿英。

△　黎元洪特派杨坤如兼惠州清乡督办。

△　吴佩孚因张克瑶旅援粤停滞赣边不进，现又加派岳兆麟为援粤军后路总指挥。

4月下旬　甘军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所部援川军进占四川平武。

是月　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报告本年度（1922—1923）全国小学生数为660.1802万人，中等学生数为18.2804万人，专门以上学生数为3.4880万人，共计681.9486万人。

5月

5月**1**日　广东讨贼联军占领军田、银盏坳。

△　广东省长徐绍桢电北京众议院议员陈家鼎，说明西南局势，并告以沈鸿英称兵谋叛，已被完全击退。

△　福建王永泉部与粤军孙本戎等部在莆田交战，王军败退，次日粤军入莆田。

△　唐继尧所部滇军分由泸州、纳溪出动，助熊克武、但懋辛。

△　黎元洪公布《修正国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其修正条文如下：“前项会合时以参议院议长为议长，众议院议长为副议长，正副议长均有事故时，以两院副议长临时代理。非两院有总议员五分三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但关于议宪程序，以两院议员总数过半数之出席开议，出席议员过半数之同意议决。”

△　北京政府代理外交部长沈瑞麟因使、领馆经费久无着落，提出辞呈，以去就力争使领馆经费。

△　济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召集各职业工人500余人开会纪念五一节，并发出传单号召工人、学生“快快起来，振刷精神，联合被压迫人民”，“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自由而战，为解放被压迫人民而战”。

△　上海各工团在北四川路青年会操场开纪念“五一”大会，陈炳生主席报告五一节历史及纪念宗旨；陈国栋报告上海工团现状；杨德甫报告吴佩孚、萧耀南惨杀京汉路工人情形；朱耀臣报告上年沪地罢工历史。

△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在天安门召开国际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到40余团体，30余学校，约五六千人。会议议决六事：一、农工集会结社自由；二、打倒军阀吴、曹、萧；三、释放京汉路罢工被捕人员；四、恢复铁路及各业工会；五、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　湖南安源工人二万多人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及庆祝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湖北、株洲、醴陵等地工团代表及学生参加。首由俱乐部主任刘少奇报告开会宗旨，次由大会总指挥陆沉整队出发游行。

△　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为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发挥海外国民党精神起见，发行《三五》季刊，是日创刊。

△　上海百老汇路商界联合会以北京政府拟借外债四亿元，供政客军阀之挥霍，助长内乱，残杀同胞，特通电反对。12日，国会议员刘荣棠、王用宾等数十人致函外交团，反对北京政府向外国秘密借款。

△　浙江教育厅拟订施行新学制标准及规定事项，经呈报教育部准予试办。其大概为：各县自十二年度起，至少筹设一所幼稚园，原设蒙养园改办幼稚园。原设国民学校一律改为初级小学，高等小学国

民高小之学校改办完全小学或初级小学。凡省立之普通中学、初级师范、甲种实业，将其全部或一部分别改组。

△　华侨创办之中国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以行驶太平洋旧金山至中国班营业不佳，亏本300万元，是日停业。

△　北京政府将驻苏联赤塔、黑河、伯力、海参崴、双城子、庙街等领事一律改称代表。

△　越飞在日本致电孙中山，转告苏联政府对越飞、孙文在上海讨论长期计划之答复，苏联准备援助200万金卢布及帮助建立内部军校。

△　驻京日本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日政府提取庚子赔款一部分，充中国留学生费。19日，北京政府议决将日退庚子赔款部分，定为部派及特约官费生留学费，有余再量助他校官费生。

5月2日　粤北路讨贼滇军进占源潭。

△　孙中山令刘震寰、刘玉山、陈天太等部讨贼桂军集中石龙，巩固东江下游，以防陈炯明部之蠢动。

△　孙中山任命陈天太为中央直辖第七军第三师师长。

△　四川杨森部及北军攻占但懋辛军根据地合川、铜梁。

5月3日　粤北路讨贼联军攻占琶江口，是日孙中山亲赴前线劳军。

△　孙中山以此次对沈鸿英桂军作战，北江一带民团亦能乘胜出奇，协同兜剿，特令省长徐绍桢详查，所有得力民团立功较著者，一律传令慰劳，并呈报战绩，以凭核办。

△　孙中山派汪精卫赴奉报聘，是日致函张作霖盼助饷需，共讨

曹吴。函称：“尊见以协和（李烈钧）回赣，组安（谭延闿）回湘，乃与鄙意不谋而同。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绌，不能因应咸宜。……如公处此时能助此额，协、组皆可立发。”

△　张绍曾、李根源在北京国务会议上主张下令讨伐孙中山并备就令文送总统府，黎元洪拒绝盖印。

△　黎元洪公布《商标法》，凡44条。

△　依附曹锟之参议员张端主张咨请众议院迅速共同组织大总统选举会，选举大总统、副总统，以撑持时局，挽救国家。

△　陇社在兰州开成立大会，举杨思、张维为正副社长，水梓为评议长。

△　阿富汗代表帕拉他扑到北京，与外交部商议中阿恢复历史上关系。

5月4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女高师开会纪念“五四”，各校学生2000余人到会，会上强调应继承“五四”精神，作政治运动。提出：对内打倒军阀，裁兵，否认现政府，否认现国会，拥护人权和教育独立；对外则应起来作国民的自动外交。会后，分为两队，一队去教育部，一队去彭允彝宅示威，“驱逐彭允彝”。

△　湖北省议会开会，将省财政厅所颁赋税折价加征办法予以否决。咨文指出：此办法“实属贻害商民，应请贵署严令克日取销，照旧征收，免滋苛扰”。

△　驻京英国公使麻克类、法国公使傅乐猷、美国公使舒尔曼、日本代办吉田伊三郎访张绍曾，对直奉再战提出警告，并催结到期外债。

5月5日　　孙中山命令裁撤广东之四邑两阳香顺八属绥靖处，是

日将处长周之贞免职，改任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二师师长。

△　粤东线陈军杨坤如部开向石龙附近，刘震寰令所部第二师严兆丰回防石龙。

△　粤北路讨贼滇军第二混成旅胡思舜部克复黎洞、连江口，沈鸿英与北军向英德溃退。

△　黎元洪令免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杨敬修本职，任命杨树庄继署。

△　黎元洪公布《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章程》，凡12条。

△　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矿业保安规则》，凡13章58条。该规则自公布后三个月施行。

△　青岛市面辅币充斥，价格日落，商民受亏，影响甚大，是日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电请北京财政部转饬造币厂勿滥发辅币，以维持青岛金融。

△　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省教育会举行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大会，王尽美等400多人参加。会议指出“欲改造社会为人类谋幸福，非马克思主义莫属”。

△　新南社发表《发起宣言》和《组织大纲》，内称：“南社在民元以前惟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因为要提倡民族气节，不知不觉形成了中国文字的交换机关。新南社是脱化文字交换而蕲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的。”该社的宗旨为：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该社定于10月10日成立。

△　张家口美侨克门案，照美公使舒尔曼所提条件办理，察哈尔都统张锡元亲到美使馆道歉，大体了结。

△　驻山西五台晋军第三混成旅第六团官兵，因不满阎锡山的残酷统治起事，杀死警佐县吏10余人，并将数千无辜囚民释出后将狱舍焚毁，起事官兵与龙泉关驻军会合后逸出。

5月6日　晨2时50分，津浦路北上特别快车在距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临城站（今枣庄西）十公里离沙沟四公里之处，被巨匪孙美瑶部千余人毁轨劫车，乘客二百数十人被掳往匪巢抱犊崮，其中有外国乘客男女26人，英国人罗斯门被击毙。是为“临城劫车案”。

△　粤北线杨希闵率讨贼联军攻占英德，沈鸿英军向北溃退。

△　程潜下令粤西江讨贼军总攻肇庆。同日，孙中山赴三水县慰问伤兵。

△　省宪同志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到会员230余人，汤漪主席并报告宗旨，顾维钧等发表演说，大会通过宣言及简章，推定丁佛言、林长民、李肇甫、骆继汉、汤漪、吕复、吴宗慈、褚辅成、马骧、雷殷等为书记及会计员。

△　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北京法政大学。该校分政治、经济、法律、商业四科，并设有预科和研究院。

△　据《申报》披露：云南全省种植鸦片之地，约占全省农田之20%，其烟土之产值约占农产总值40%。省官厅对种植者以缴纳罚金为名，实则与征收烟税无异，烟农恃为护符，产额年盛一年。

5月7日　孙中山改组大本营及广东省政府，免去内政部长谭延闿、建设部长兼财政部长邓泽如、广东省长徐绍桢本职；特任徐绍桢为大本营内政部长，叶恭绰为财政部长，谭延闿为建设部长，廖仲恺为广东省长，邓泽如为两广盐运使。

△　陈炯明系林虎部，趁讨贼军正全力与沈鸿英桂军作战之际，是日向梅县讨贼军许崇智部进攻。

△　黎元洪令免吕均国务院秘书长职，任命薛笃弼暂行兼代；又令派胡惟德、刘式训、刘镜人为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

△　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修正公司注册规则施行细则》，凡37条。

△　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集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大会，三万余人参加。大会通过之决议案有：一、根本否认“二十一条”；二、据理收回旅大；三、通电全国自本日起与日本经济绝交；四、警告日本国民，促日政府还我旅大，以维两国邦交；五、请各国公使主张正义等。会后分四队游行，冯玉祥所部军队1.5万人亦参加。

△　南昌各界五万人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会后举行游行。同日，常德商民全行业罢市，宣言不卖日本货；安庆全城商店一律闭市，加入游行者达万余人，并开始检查日货。

△　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纪念国耻日，主张即时抵制日货，旋全体整队赴驻日使馆，强迫廖恩焘代办即日辞职，并宣称：“三月二十日我国学生举行收回旅大运动，当时日警逮捕学生，并有受伤者数人，使署何故不严重抗议，实属有忝厥职，此种无用之外交官，即应逐回本国以减国家之耻辱。”廖氏被迫当日缮就辞职电稿，即晚拍发，北京政府外交部于9日电廖先行归国，再筹办法。

△　上海工商新闻社发行之《工商新闻》创刊。该刊以研究广告学术及鼓吹工商业为宗旨。

5月8日　　孙中山任命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同日派吕超为代表赴四川，调解川军内讧，劝一致对付北洋军阀。

△　袁祖铭奉吴佩孚命，率黔军由綦江入黔牵制援川滇军；杨森部与北军于是日占隆昌，次日占泸州，滇军退富顺。

△　黎元洪以临城劫车案发生，下令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

炳琦着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文武官吏，均即先行撤任听候查办，并责成该督军省长迅将被掳人等先行设法救回，务令安全出险”。

△　张绍曾总理因倒阁风潮辞职，经黎元洪慰留。10日，张绍曾在私宅开非正式国务会议，讨论临城劫车案、军警饷项案及财政总长刘恩源辞职案。

△　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商标法施行细则》，凡37条。

△　苏州城内各肉铺以县署不允免去屠宰税带征教育经费，举行罢市。

5月9日　粤北线讨贼滇军占领韶关，沈鸿英率残部退始兴。

△　陈炯明旧部在粤东江复叛，陈修爵进占龙门，图袭增城；杨坤如攻石龙。叶举、洪兆麟于次日到惠州，成立陈系粤军总指挥部，通电攻击孙中山借政府名义“卖产骗财”，并率部进扰增城、石龙。

△　唐绍仪由香山抵广州，谒孙中山后赴港。唐主张孙中山与黎元洪会晤。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刘恩源因无法筹得军政各费，辞职避往天津。

△　北京政府以比、意、美、日、西、法、英、荷八国要求以金币付还庚子赔款，咨众议院请求公决。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禁止日本人与华人在西沙岛合办垦务。

△　北京、天津、武汉、广州、上海、南京、长沙、南昌、济南、杭州、福州、兰州、安庆、芜湖、南通、镇江、扬州、松江、苏

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温州、金华等地举行集会游行，纪念“五九”国耻，一致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　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于是日发表声明，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全数救出临城被掳外侨，逾限依时要求赔偿。北京政府派沈瑞麟分访各国驻京公使，说明政府处理此案方针。

5月10日　孙中山因陈炯明旧部在粤东江复叛，派蒋介石赴东江视察，调北路滇军增防东江，命李福林率部赴仙村、横朗布防。

△　孙中山以前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受北廷嗾使与陈炯明勾结，运动军队，希图扰乱治安，破坏大局，下令予以通缉。

△　新疆省长杨增新为“造就吏材，以裨治理”，呈报设立“缠文缠语研究所”。是日黎元洪指令内务、陆军、教育三部查核办理。

△　上海茶商团体接获祁门茶商来函，反对江西当局征收过境茶税（每引六元），并请上海茶商一致反对。

5月11日　粤东路讨贼军占领增城之联和（墟）、福田（墟），次日占领龙华（墟）、龙溪（墟）。

△　与沈鸿英桂军相勾结之李耀汉部由广东阳江进占开平、恩平、新兴各属，并遣徐东海部进窥江门，以牵制攻肇庆之讨贼联军。

△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讨论对临城劫车案应取之态度，决定对内重责北京政府与军阀，对外表示歉忱。

△　全国商会联合会推派代表江经沅等四人前往临城劫车匪巢，商释放中外被掳之人。

△　黎元洪令裁撤蒙疆善后委员会；特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

办。

5月12日　粤东线陈炯明军攻占大埔三河坝，许崇智部讨贼军退往高陂。同日，叶举率熊略、杨坤如、练演雄各部分三路犯石龙，图由此进窥广州。

△　四川熊克武、但懋辛所统之第三军攻占成都，邓锡侯退新繁，陈遐龄退雅安。

△　黎元洪令免刘恩源财政总长职，特任张英华继署。

△　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矿工待遇规则》及《农作物病虫害防除规则》。

△　山东督军田中玉自枣庄电北京政府，报告临城劫车案同匪方接洽情形。略谓匪方昨提条件，“非先解豹子谷之围，不开谈判，并不愿与官厅人员接洽，须由外人或地方绅士居间，方足以资保证”。

△　招商局“泰顺”轮在由香港驶沪途中，经汕头附近花灯柱海域，被匪扮乘客伙劫。

5月13日　粤东线讨贼军刘震寰所部攻占博罗，旋陈军翁式亮部赴援反扑，博罗复陷。

△　北京政府代表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督军田中玉偕美国人安特生（曹锟私人代表）、交涉员温世珍（齐燮元代表）在枣庄和临城劫车案匪方孙美瑶、郭其才正式见面，进行官匪谈判赎放外侨及改编匪军为官军问题。议决官兵后撤30里，解除抱犊崮之围后，匪方即释放被劫外侨。政府方面并应允收编匪兵为官军。

△　山东省长熊炳琦为临城劫车案电北京政府，据吴旅长（长植）报告，彼奉郑士琦帮办谕，准匪方所求，于覃（13）日午前10时，吴旅王团及峄县保卫团，撤至马厂峨山口待命。

△　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报告：据确实调查，现时中国实欠国内及各国外债总额为26.6亿元，其中清政府覆灭前实欠为10.218亿，余则为民国以来所借。

△　山东武城东司庙庙会，突来土匪五六百人包围会场，绑架“肉票”二百六七十人而去。

5月14日　孙中山特派魏邦平为西江讨贼军总指挥；特派周震鳞为大本营劳军使兼督率中央直辖第一第二两师事宜，任命尹骥为中央直辖第一、第二两师指挥。

△　吴佩孚所遣“援粤”豫军，因鄂商会拒绝筹款哗变，抢劫汉口刘家庙，商民损失颇重。

5月15日　粤东线陈炯明军黄大伟、钟景棠部占揭阳；林虎部攻占梅县。

△　周震鳞奉孙中山之命赴厦门，与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及驻闽各军代表会议。

△　四川熊克武、但懋辛所部省军攻克德阳；16日克复中江，17日再克三台。

△　山东宫家口黄河坝工完竣，放水入引河。

5月16日　粤西江讨贼军总指挥魏邦平抵广利，召集军官会议，下令撤肇庆西门之围，致书沈军旅长张希栻，限两日内退出。

△　讨贼桂军刘震寰部黎明鉴师为陈军练演雄所败，由粤宝安退深圳广九路一带。

△　黎元洪任命李根沄为广东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关澄芳为广东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

△　北京政府农商部商标局成立。

△　北京众议院全院委员会通过对张绍曾内阁不信任案。

△　绥远都统马福祥电京称：察绥陕联防办法，兹已商订条件，在绥远签字。

5月17日　北路讨贼军攻克粤西北连县，桂军沈荣光残部退往广西边境。

△　北京政府撤退临城剿匪军队，解除抱犊崮之围，而匪方因内部意见不一幡然变卦，拒不交出被掳外侨，并向田中玉提出五项条件：一、第二十旅撤回济宁，第六旅回原防；二、滕、峄两县绅耆担保事后不背盟杀降；三、指定东凫岛为双方会议地点；四、匪众编成两旅；五、邹县上村等五处，改编后许其自由行动。

5月18日　粤讨贼联军经12天围攻，于是日攻入肇庆，沈军旅长张希栻率残部退梧州。

△　近期以来北京政府财政部滥发印花税票抵塞军政各费，据是日之调查，总计印花拨作抵押品，前后约达3200万元之巨。

5月19日　孙中山电调邓演达部到广州担任大本营卫队。

△　沈鸿英电曹锟、吴佩孚报告军情，准备即行反攻，并乞加拨饷械。

△　上海总商会接获棉兰中华总商会、爪哇梭罗中华总商会及黑河商会来电，要求收回旅大、撤废“二十一条”，“务乞力争，愿为后盾”。

△　日本驻京代办饬驻沪日总领事设法向各国领事及中国官厅，要求严厉取缔排日运动及抵制日货等，并要求将宣传排日运动之公私

团体一律发封。

5月20日　孙中山将广东西江、北江两路军队调集石龙，并任命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是日，东线讨贼联军再克博罗。同日，西江讨贼军克悦城、禄步。

△　孙中山令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严行禁止各师旅部自行处决人犯，所获奸细务令解至总司令部办理；各处之无兵而犹称某某司令等名目以招摇舞弊者，着该总司令严行拿办。

△　川省军第一军之喻培棣、张冲、余际唐等部攻占绵阳。邓锡侯、陈国栋及刘存厚部向保宁、昭化、广元退却；杨森部及北军则由东路推进，占安岳、遂宁、资中。

5月21日　孙中山令大理院兼司法行政事务赵士北呈报减刑办法，称“此次申令清理庶狱，重在平反冤狱，省释无辜。凡在疑狱，从宽免刑，轻罪可原，迅予开释。至于减刑一节，除真正命、盗要案外，宜详加审查，视其情罪之轻重，与在监执行刑罚之久暂，分别等差，呈请减免”。

△　附曹（锟）议员连日来谋划去黎拥曹，先后提案者20余起。黎元洪自知不可久留，遂于是日致函国会两院，谓两度咨请辞职，未承开议，补任期间亦未解释，深望转告同人，查明总统选举法，准备选举。

△　黎元洪令裁撤建安护军使和泉永镇守使，任命王永泉兼兴泉永护军使，周荫人为闽北护军使。

△　北京参议院通过《国际邮政公约》。

△　汉口商界举行对日大游行，130余帮五万余人参加，要求收回旅大，否认“二十一条”，对日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31日，武汉航业界举行水面对日大游行；同日，武昌商界80余帮四万余人举行对日大

游行。

△　安徽全省学生联合总会通电揭露皖省私种鸦片，流毒民生。皖省以阜阳、涡阳、蒙城、合肥、霍邱、亳县种植最多。马联甲、刘朝望、吕调元等朋营奸利，借查勘烟苗为名，派员按亩收税，每亩四至六元不等，总额约近200万元。

△　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行，26日结束。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运动员参加，中国运动员余怀安跳高破远东纪录，足球比赛中国获第一名。

△　驻江西临川李家渡镇之河南陆军第一师辎重营营部及第四连士兵哗变，径赴各街大肆抢劫，复纵火。被抢被焚毁商店计34家，损失甚大。

5月22日　　粤西江讨贼军吕春荣部获陈策江防舰队之助，克德庆，沈鸿英桂军逃往都城（今郁南）。

△　粤北路讨贼滇军在曲江大桥一带与北军接战，北军败退周田。

△　孙中山下令褫夺代理警备军军长及第一师师长杨坤如本兼各职，悬赏购拿，务获惩办。

△　山东督军田中玉至北京列席国务院会议，报告临城官匪交涉情形，并力主剿办。

△　直隶召集中学会议，议决省教育厅所提施行新学制标准案，所属中小学均自本年起施行。

5月23日　　粤西路讨贼军进占封川江口，沈鸿英桂军退往梧州。25日，孙中山电魏邦平等指示战略：西江余孽即可肃清，为顾念广西百姓疾苦，避免两粤兴兵，应于粤边暂取守势，以待从逆者之觉悟。

△　孙中山密电许崇智，令其固守潮汕，并转电海军将士与许协同一致，毋使洪兆麟得逞。

△　蒋介石抵广东博罗，会同刘震寰等，议决作战计划。

△　四川省军各将领连日在成都凤公祠会议，决定一面逼刘文辉离省，一面出师东征。是日各将领联名通电，声讨吴佩孚嗾使杨森祸川。同日，刘文辉通电解除所任成都卫戍司令职务，回叙府（今宜宾）防次。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复外交团，棉花出口禁令7月1日解除。

△　京沪航空线京津一段通航。

5月24日　粤东线讨贼军攻克深圳，乘胜追至淡水（墟），陈炯明部退惠州。

△　国民党为临城劫车事件电北京外交团，谓此案全在不裁兵不统一之故，希望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并予中国人民以另行建设全国公认政府之机会。

△　黎元洪任命张廷谔为国务院秘书长。

△　香港国民银行沪行开幕。该行是先施、永安等大公司合资组织，向香港当局注册，资本200万元，专营银行一切业务。

5月25日　骚扰广东新会、开平一带之陈炯明军李耀汉部，经讨贼军水陆各军兜剿，于24日纷向宅梧退却。是日，孙中山电江门大本营办事处刘纪文传令嘉奖有功将士，以策有功。

△　李烈钧所收编的陈炯明军尹骥等四个师由闽南倒戈回粤；是日，林虎率队攻占潮州，次日占领汕头，许崇智率部退向揭阳。东江战事逆转。

5月26日　福建闽清、永泰民军首领黄炳武与北军孙传芳、王永泉军交火，起初黄部颇占优势，后北军以炮火压制，黄部被迫退却。

△　北京政府署财政总长张英华于是日通电申述当前财政之窘困情况，并说明其财政方针为“以舆论为方针，以公开为主旨，以酌剂平均为定则，以维持国信为本图”。

△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上海开第六次年会，同时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举行第二次年会，议决建议以各国退还庚子赔款酌拨为职业教育经费等案。

5月27日　黎元洪商税务处会办蔡廷幹，向代理税务司包罗指借沪海关建筑费120万两，分四个月拨交，每月以17万元充制宪经费，以13万元充使领经费。

△　安徽督理马联甲、省长吕调元电北京国务院，截留凤阳、芜湖两关及烟酒印花等税，以弥补皖省代中央垫饷400余万之需。

△　山东临城劫匪本月17日未按协议，于官兵撤除抱犊崮之围后交出被掳外侨，官匪交涉因之宣告决裂。21日，官军再度包围抱犊崮山区，严密封锁。劫匪见事态严重，乃于25日央请被掳之美侨鲍威尔下山向郑士琦要求重开和议，但双方条件不洽作罢。是日，官方派侦察机两架飞往抱犊崮侦察，劫匪们震惊之余，再度央请鲍威尔下山，磋商和议。

5月28日　粤东线讨贼军分三路攻惠州，陈炯明军退入城内，讨贼军占飞鹅岭。陈炯明命熊略、练演雄分兵抄出后方，袭陷博罗，进窥石龙，广州震动。

△　北京政府航空署所属之航空教练所改为航空学校。

△　上海吴淞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改称同济大学。

△　厦门集美大学学生反对校长叶渊，全体离校。

5月29日　孙中山任命林云陔为中央银行行长。

△　孙中山电麦造舟、赵泮生，嘱向加拿大政府抗争所公布之新移民条例；委任刘芦隐为中国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总干事。

△　黎元洪令准山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辞职，任命雷长禄继署。

△　直方代表王承斌、陆锦，奉方代表孙烈臣、于冲汉及张绍曾派出之调人李际春，在榆关举行初步会晤。是日会议，双方仅谈及防守问题、恢复奉张地位及担任军饷各事。

△　北京政府年来财政艰窘至甚，军政各费均无法支应，署财政总长张英华为救眉急，提出发行民国十二年公债案于国务院会议，经阁议议决，是日咨众议院请求同意。同日，该部通过发行“法统恢复纪念”印花700万元，以应付端午节前应发之薪饷。

5月30日　孙中山抵东莞石龙，在车站设行营，当晚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亲率部队进攻博罗。

△　黎元洪特派李济臣帮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

△　东方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开幕，该行系华侨所创办。

5月31日　广州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谋叛，孙中山将温免职，并改委各舰长，舰队暂由孙中山直接管辖。

△　北京国务院会议，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共和国。

△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经教育部呈报批准改组为大学，以严智钟为校长，在大学组织未完备前，即以严智钟为医学专门学校校长。6月3日，北医教职员以彭允彝此举实系借以摧残医校，向府院呈请收

回成命，并推代表八人向严智钟提出忠告，劝勿为彭允彝所愚。

5月下旬　张作霖拒绝康有为赴奉讲学，斥康系“复辟罪犯，久稽刑戮，来此何为”。康于2月中旬赴洛阳，向吴佩孚游说。5月抵津，与靳云鹏、严修、潘复等酬酢。康“主统一，斥联治”，认为和平统一诚好，如不能，武力统一亦可，否则强藩割据，财源耗竭，共管之说将现目前。

△　驻防陕西华县赤水镇之陆军第二十师阎治堂部第四十团焦营士兵两连，突于夜间哗变，将赤水镇大小商店百余家，抢掠殆遍，并绑架“商票”10余人。

6月

6月1日　孙中山赴东江前敌督师，出巡期间派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同日，孙急调朱培德部主力前往东江增援。

△　许崇智军在广东揭阳为陈炯明军所败，退往梅县。次日，陈军叶举部攻占兴宁、五华，许军退老隆（今龙川县）。

△　陈炯明系邓本殷部在海南岛海口五公祠“誓师”称兵，计有军队六营。

△　长沙市民和学生在市内小西门外河街，为收回旅大及废除“二十一条”游行演讲，适日轮“金陵丸”由湘潭到埠，日兵与学生发生口角，日舰“伏见号”即派水兵登陆向人丛开枪，惨毙市民王绍元、学生黄汉卿，重伤市民九人，轻伤30余人，造成“六一惨案”。当晚长沙外交后援会开紧急大会，议决罢市、罢工、罢课三天，对被难者表示哀悼，并决定“对日九条”，请省政府向日领事交涉：一、废除中日所订条约；二、撤销日领；三、限日领交出凶手，由湘政府惩办；四、解除日舰武装；五、永禁日海军入境；六、收回码头；七、日政府向我

道歉；八、抚恤死者；九、赔偿伤者保险费与医药费。

△　北京银行公会举行临时会议，王克敏主持，请财政当局维持公债整理原案及“九六公债”优先权，反对发行民国十二年公债。

△　四行储蓄会（盐业、中南、金城、大陆）之津、沪、汉三处开市。

△　吉林延吉县教育会电北京政府报告日本人在延吉非法强设警察，私自管理垦民，并任意干涉当地教育，请政府严重交涉，并请国人共起援助。

6月2日　　沈鸿英、邓如琢得方本仁所率新到北军之助，并联络乐昌陈炯明系谢文炳旅，在北线分三路进攻，占广东韶关城北20里之长坝，讨贼滇军杨池生部退守韶关。

△　粤西江沈鸿英军邓瑞征部得冯葆初及梧州方面援助，以江口为第一线向肇庆方面发动进攻，孙中山令魏邦平前往抵御。

△　孙中山任命滇军第二军军长胡思舜为东江右岸指挥官，并授予作战方略。

△　长沙全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界13万人举行游行，抗议日海军“六一”暴行。同日，湖南省议会开紧急会议，决定咨请政府派兵解除日舰“伏见号”武装，扣留该舰，再行交涉。省长赵恒惕下令各属设法“防止排货暴动”，傍晚布告“倘再有假名检查骚扰，即以军法从事”。同日晚，汉口日本领事增派日舰赴长沙。

△　日本驻京代办吉田伊三郎照会北京外交部，日本政府已任命芳泽谦吉为驻京全权公使。

△　北京外交团由英、美、法、意等七国组成武官团赴枣庄调查临城劫车案，北京政府陆军部派梁上栋同往。

6月3日　　粤讨贼军朱培德部顾德恒旅抵达苏村，与讨贼桂军会合，进攻博罗。

△　驻闽海军陆战队改编为混成旅，杨砥中任旅长。该旅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去岁派杨砥中入闽招募，适李厚基兵败溃逃，经杨呈准将李部收编，又经陆续招募并由保、洛助以枪械，共编成12营。

△　关于英国交还威海卫事宜，自2月11日中英双方商定由威海卫移京进行后，至此中英谈判大体完结。

△　湖南省交涉司杨宣诚为“六一惨案”向长沙日领事抗议，除要求“伏见号”日舰立即离去，并提示：一、撤换日领与舰长；二、开枪日兵以军法治罪；三、水兵上岸侵我主权，须日政府道歉；四、抚恤死者伤者；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次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答复，措词含混，除表示歉忱外，丝毫不得要领。

6月4日　　粤东路讨贼联军朱培德、胡思舜部夺回博罗。同日，北路沈鸿英部及北军攻陷韶关。

△　孙中山特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四川省长兼川军总司令；任命赖心辉为川军讨贼军总指挥。

△　长沙市民、学生开会追悼被难同胞王绍元、黄汉卿。因闻日舰“安宅号”开来长沙，众情愤慨，数万人整队到省署请愿，要求照省议会解除日舰武装决议案执行。

△　湖南常德学生在码头检查日货，日清公司及“湘江”轮日人竟寻衅殴伤学生13人，并开枪示威。

△　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议订小学、初中各科纲要及高中课程总纲，并刊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一册。

6月5日　　孙中山以广东西江讨贼军左翼于四会、清远作战及围

攻肇庆追击沈鸿英军通过广宁大湾等处之际，各该地民团均能出奇应敌，协同兜剿，收效颇多，明令广东省长廖仲恺一律传令慰劳。

△　孙中山任命余和鸿为墨西哥中国国民党支部正部长。

△　粤北路沈鸿英军进至马坝，次日占河头。

△　福建民军黄炳武部被孙传芳军击溃，闽清失陷，黄退守永泰。

△　长沙“三罢”结束。省长赵恒惕为控制民众反日斗争，宣布省城戒严，委叶开鑫为戒严司令，并派军队保护日侨。长沙总商会组织临时保安队，“协助军警维持秩序”。北京政府决照会于驻京公使。

△　全国学生会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沙所犯暴行，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同团结，敦促当道使之严重交涉，严办凶手。一面消极与日人经济绝交，努力进行，坚持不懈；一面积极的作澄清政治运动，内除本国军阀政客，外攘国际资本主义，以为根本解决”。

△　京师中小学教职员因校费无着，曾到教育部坐索，而教育部无人负责，迫不获已，经议决是日起全体罢教。

6月6日　　张绍曾内阁召集会议，以黎元洪拒绝批准任命官员（指拒绝盖印任命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破坏内阁权限，提出总辞职以倒黎元洪。当晚张绍曾离京赴津。

△　黎元洪令免马龙标京师军警督察长职，以张拱辰继任。

△　粤西江桂军邓瑞征、冯葆初率三旅之众，在都城与讨贼军战甚剧。10日，桂军攻陷都城。讨贼军退守德庆。

△　孙中山赴粤东江博罗视察阵地，商肃清东江右岸敌军，定三日内向惠州施行总攻击。

△　长沙日侨借口地方秩序不宁，将妇孺尽行移入军舰，日领使署文卷亦移置舰上。

△　据《民国日报》报道：豫北内黄、安阳两属交界之神伯顶山，近日出现股匪3000人，匪首朱迪华自称皇帝，并自认是崇祯八世孙，在该县附近张贴“大明文治元年示谕”，骚扰地方。后经安阳县知事杜鸿宾约同水冶镇守望社勇并驻彰德陕军一营前往掩捕，匪首逃匿，余众被击散。

6月7日　　黎元洪为内阁辞职事通电辩白，声称彼与内阁在制宪经费、崇文门关税监督的任免等问题上的分歧，“纵复责为失检，亦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同日，黎派金永炎、刘治洲赴津向张绍曾“谢过”挽留，但无效果。

△　北京军警官佐200余人，借口内阁已经辞职，饷项无人负责，到总统府向黎元洪索欠饷。经黎应允于端午节前解决，始散去。

△　四川省军赖心辉、熊克武击退杨森部和北军西上先头部队，攻占资中，次日攻占内江。

6月8日　　直系津派政客积极进行倒黎活动，边守靖抵京与吴毓麟密议，决定三策：一、令王怀庆撤退军队；二、雇游民数千人围黎宅；三、冯玉祥率兵入城，以维持治安为名，逼黎元洪去位。是日，有自称“公民团”者，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数百人，举行所谓“国民大会”，发表演说，认为此次政潮，当由黎元洪负责，要求黎“克日退位，以让贤路”。

△　北京参议院常会通过延长会期至本年10月10日案。13日，众议院常会亦复通过延长会期案。

△　粤北路沈鸿英部桂军伙同北军攻陷英德，旋被讨贼滇军击退。

△　湖南省当局借口长沙外交后援会中有激烈分子，恐生枝节，下令将该会改组，并通缉郭亮。

△　安徽涡阳义门集驻防之安武军第三旅一团二营士兵两连哗变，击毙连长一名，市区被掠，损失约20万元。

6月9日　　粤东江讨贼联军第二次向惠州城施行总攻击，守惠陈炯明军得知潮汕方面援军即到，于11日改守为攻，联军总攻失败。

△　北京警察全体罢岗，以索饷迫黎元洪去职。因北京外交团干涉，警察于当晚6时复岗。

△　北京政府驻外各使节联合电告，使费积欠一年，多次电催外交部，竟置不理，“与其沦落异城，玷辱国体，不如早日回国”。

6月10日　　粤北路讨贼滇军与沈鸿英部桂军及北军在沙口激战，晚滇军占大坑口，敌退乌石、马坝。

△　孙中山致函广东财政厅长叶恭绰，嘱解决东江讨陈军费之困难。函称：“东江军事，日前石龙之溃，几误大事，今则危机已过矣，西江、北江皆不足虑。此后胜负所关者，仍在东江一着，东江一解决，则西北江必可同时解决。现敌人正集中数路之力，来救惠州；然我兵之集中此地者尚不薄，所虑者则财政之困乏耳。对于此事，深望兄与诸同人之尽力。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

△　连日来黎元洪为挽救危局，邀顾维钧、颜惠庆组阁均失败，是日黎宅召集“名流会议”，讨论解决时局办法，亦无结果。

△　北京军警官佐三四百人，到东厂胡同黎元洪私邸索饷，由侍卫武官长荫昌接见。略谓：总统现正从事组阁，在内阁未产生以前，军警饷项自无从发放。索饷军警坚持不去，邸内电话即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传接，自来水管亦被堵塞。后经荫昌再三劝慰，至傍晚始允

暂行退回。同日，“公民团”千人在天安门前示威，要求黎元洪退位，随后到东厂胡同围宅。黎元洪派员往召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厅薛之珩等前来弹压，保护住宅，聂等坐视不理，“公民团”至夜始自行散去。

△　黎元洪以北京军警暨“公民团”联合包围宅邸滋闹，急电曹锟、吴佩孚解围。电称：“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

△　四川省军赖心辉部占领隆昌，杨森败退荣昌。

6月11日　北京军警千余人又闯入黎宅索饷，王怀庆要求黎即日给饷，否则须有相当处置。同日，众议员彭占元等162人通电劝黎速走。黎元洪致函参众两院，报告数日来军警及公民团滋闹情形。

△　孙中山委任阮炎为檀香山中国国民党支部长。

△　粤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由汕头前来增援，加入进攻惠州作战。

△　日本政府因长沙案派“楛　”、“桧”、“柳”、“枞”四艘驱逐舰来华，是日由上海港向长江进发，以张声势。19日，“楛 字”驱逐舰由汉口抵湘“保护日侨”。该舰较“安宅”更大，市民得悉，众情忿激。

6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20日结束。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　粤北江讨贼滇军张武旅叛变，牵动全线，杨希闵率部退至英德之河头站。

△　粤西江讨贼军再攻都城，沈鸿英部桂军退守长冈。14日，桂军向都城反扑，联军退守德庆。

△　四川省军占领荣昌，杨森部及北军退守永川。

△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向黎元洪辞职，不再负责维持治安，以迫黎去位。“公民团”亦续围黎宅滋闹。

△　山东临城劫车案，官匪双方经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日签订条约，被掳“外票”全部获释，被掳“华票”于24日方获释。至本月下旬，这批土匪被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以孙美瑶为旅长，郭其才、周天松为团长，指定峄县郭里集为其驻防地。

△　英、美、法、日四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质问山东督军田中玉扣留盐税事。27日，北京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令田中玉归还所扣盐款。

6月13日　黎元洪因不堪北京军警当局的压迫避往天津。临行前下七道命令：一、准张绍曾辞国务总理职；二、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三、免署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高凌霨、署财政总长张英华、海军总长李鼎新、兼陆军总长张绍曾、司法总长程克、教育总长彭允彝、交通总长吴毓麟八人职务；四、特任金永炎署陆军总长；五、裁撤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辖；六、声讨北京政变中发纵指使之人；七、自民国十四年1月1日起裁废全国厘金，进口税改为值百抽12.5%。同日，黎所乘专车抵津，因总统印信未交出，直隶省长王承斌将黎扣留于津站，逼黎在代拟之三份电稿上签字：一、向国会辞职文；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文；三、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黎元洪被迫签字并电京交出总统印信后，始得于14日凌晨4时由车站回宅。

△　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于黎元洪被迫赴津后通电复职。同日，曹锟致电王、冯等，令协力维持北京治

安。

△　福建督理孙传芳离闽北上，先后到洛阳、保定求援，吴佩孚、曹锟允助孙武力统一福建。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对北京政变迫走黎元洪发表重要宣言，并提出国民自决办法三项，即一、全国各界发起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务委员会处理国事；二、通告中外，誓不承认曹锟继任总统；三、在政局未定以前，国民不得将应缴之捐税缴解北方当局。

6月14日　　北京政府内务总长高凌霨等宣告“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同日，黎元洪则在天津租界通电，声明所发辞职由国务院摄政之通电，系由王承斌胁迫而成，非出己意，应属无效。

△　北京国会议员190余人，因反对曹锟纷纷避往天津，准备迁地集会。

△　孙中山闻黎元洪被曹锟逼离北京，北方政局剧变，即回省，在大元帅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　湖北应城土匪大掠县属市镇，架掳男女百余人及意大利籍传教士梅神甫，土匪释出梅之仆人，令向汉口官吏索赎金百万元。22日，该股土匪之一部在鄂边被鄂军潘守蒸所部包围，余股窜入河南。

6月15日　　国会议员童杭时、吕志伊、丁超五、李文治等475人因黎元洪被逼离京，张绍曾内阁解体，电请孙中山大元帅“速正名位，复总统职”。同日，孙中山派刘成禺去京并致函护法各议员，劝他们持正爱国，“各尽所能，力持正义，其有以兵力金钱图窃国权者，当以去就相抵抗，文必为诸公后盾”。

△　曹锟发表通电，对黎元洪离京事表示置身事外，并称已电在京军警当局“保卫国会，维持治安”；“现大总统既已向国会辞职，自应

听从国会依法解决”，暗示国会从速大选。随后，孙传芳、王永泉、萨镇冰（19日）、吴佩孚（22日）、阎治堂（24日）等通电响应，表示拥戴曹锟，并赞成国务院摄政。

△　孙中山特任胡汉民为大本营总参议，伍朝枢为大本营外交部长。

△　《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出版。

△　晚9时，四川打箭炉（今康定）发生强烈地震，此次人民死亡之数约在1300人。

6月16日　北京参众两院开合会，通过自13日以后黎元洪所发命令无效案，及赞成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案。因拥曹驱黎有功之各议员，收到曹锟所赠“节敬”500元。次日，议员丁佛言、郭同等纠正16日两院合会之人数不足三分之二，指出以过半数表决系属非法。

△　黎元洪自天津咨参众两院，特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依法征求同意；唐未到任前暂任李根源兼署。咨文日期倒填为13日。

△　孙中山巡视北江战线，至英德之巫村，杨希闵等来谒，即会商战事。孙于夜半回到广州。

6月17日　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准林云陔辞中央银行行长职，由副行长宋子文代理。

6月18日　粤北江沈鸿英军右翼谢文炳部攻陷英德，战事益趋不利。大本营开军事紧急会议，决定：抽调东江滇军赴北江助战；限各机关速筹军饷；派员分赴北江各乡劝民团协助。

6月19日　黎元洪致函国会指出16日两院决议非法，并声明其职权未经国会正确之解免，无论以何种途径举选继任，概为非法。22日，政学系及民党籍、东三省籍及褚辅成派等200余名赴津议员发表

声明，斥16日北京两院合会为非法，所作决议无效。

△　川军师长颜德基通电宣布北廷十大罪，并声明就孙中山任命之四川讨贼军第二路司令职，与杨森脱离。23日，颜德基与张威在忠县截取北军运送之军械，并于26日进袭万县，旋为宜昌来援之北军击败，颜、张等部退回忠县。

△　北京劝业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因给北京政府财政部垫款太多，发生挤兑风潮。张英华急由天津赶回北京，极力设法解决。

6月20日　孙中山赴博罗巡视。次日，往白沙堆晤刘震寰及东江各将领，决以许崇智三旅专任攻惠州，悉调滇军赴北江增援。

△　上海总商会开临时会员大会，讨论应付时局案。23日议决：一、宣布否认现在北京高凌霨等之非法摄政及不承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二、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加意保护外人，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三、现在国会议员不能代表民意，所有一切行动不能认为有效；四、关于以外种种建设问题，组织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

△　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对曹锟等图谋窃国，导致北京事变极为骇愤，致电孙中山指陈造谋附逆诸奸罪状，并乞爱国同胞速即奋起声讨。

△　熊朱其慧、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推举袁希涛、蒋维乔为正副会长，办理平民教育（至年底计办有126校，学生5000余人）。

△　台湾嘉义人李思祯在厦门组织“台湾尚志社”，发行杂志《厦门尚志号》，开展抗日运动。

△　黑龙江黑河县商会及市民等因海兰泡俄员勒收过江票费，激起公愤，组织黑河道区沿江市民经济联合会，并于是日实行对俄经济

绝交。

△　驻防开封南关火药局张福来之第二十四师九十五团三营十二连士兵哗变，在南关大街挨户抢劫后逸去。

6月21日　　北京摄政内阁通过高徐、顺济铁路改订正约案。次日，与日本兴业银行签订高徐、顺济两路垫款合同。

△　直隶省长王承斌致电吴毓麟、高凌霨、王毓芝等，要求三事：一、军警严密监视议员，不得令议员出京；二、妥速进行大选，以法定正统名义，号召中外；三、不许制宪。

6月22日　陈炯明自香港抵汕头，与林虎、黄大伟、洪兆麟及叶举代表开军事会议。

△　前广州军政府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广东省长伍廷芳逝世一周年，孙中山明令褒扬伍廷芳“非惟民国之元勋，实乃人伦之楷模”。

△　长沙日本士兵无故拘捕在江岸散步之小学生钟振翮，诬以投石及断日船缆索，勒写笔据，并强迫交涉司前往保学生之邓承玮科长签字证实，次日晨始将钟、邓释放，群众闻讯情绪益忿。24日，长沙外交后援会、学生会向省议会请愿，要求弹劾交涉司杨宣诚撤免邓承玮。

6月23日　孙中山由博罗抵达石龙，商议时局，并讨论党事。

△　北京摄政内阁发布第一道命令，“任命高培枢为江西浔阳道道尹”，上署“大总统令”，下注“国务院摄行”，由内务总长高凌霨、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程克、交通总长吴毓麟四人署名。

△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迭次接到驻防甘孜旅长朱宪文、驻巴安（今巴塘）司令王政和驰报，藏兵进扰玉隆、巴安，川边紧急。是日，陈遐龄电请北京政府迅予接济。

6月24日　孙中山任命胡思舜为中央直辖滇军第五师师长。

△　粤西江沈鸿英部桂军由都城反攻，进占德庆，讨贼联军退守禄步。广州大本营即调李师杨旅兼程往援。

△　黔军袁祖铭部攻陷四川荣昌，次日杨森部再占永川。

6月25日　北京摄政内阁因临城劫车案命令免去兖州镇守使兼山东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本职，调张培荣继任；调任徐鸿宾为曹州镇守使兼山东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又任命张培勋为第五师第九旅旅长。

△　据《民国日报》报道：中国劳工同盟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旅沪粤侨工界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中华劳动联合会上海支部、上海机器工会等团体，对北京政变通电提出以下主张：一、颠覆北京伪政府，铲除北洋军阀；二、由国民储金悬赏缉捕曹、吴、萧、冯及其余党；三、致电驻华外使，请其截留关余、盐余，不供北京伪政府使用；四、对于在北京伪政府威胁或豢养下之所谓国会议员者，给以严重警告，命其从速离京；五、全国各界依罢工罢市罢租抗税等手段，以减少北洋军阀之势力，并到处组织平民军队，请孙大元帅指挥讨贼。

6月26日　孙中山特派姚雨平为惠州安抚使。

△　午夜，北京故宫大火，计焚毁建福宫、德日新斋、中正殿、延春阁、广胜楼、静宜轩、香云阁等处，计130余间，所藏古物尽毁，损失在千万元以上。

6月27日　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举行第四次会议，讨论应付时局问题，决议电促在京国民党议员南下。同日，孙中山亦请议员联袂出京南下，并派汪精卫驻沪招待，刘成禺等北上欢迎。

△　孙中山赴北江前线督师，抵连江口。

△　孙中山以训令颁布临时军律六条，规定将抢劫财物者，冒充军队及不知会警察擅自拉夫者，未奉长官命令、不知会警察擅自逮捕商民或入铺屋搜索者，不经由兵站擅自封用船渡者，强占商民铺屋者，掳人勒索及打单吓诈者，一律枪决。

△　广州江防司令部所属之陆战队、督察队因与陈炯明暗中勾结被解散，为首分子被处决。

△　孙中山发出训令，要求各军长官，凡有截留各属厘税饷捐等项迅即交回财政厅办理；应领军饷，由该长官造具清册，呈报大本营核发。

△　留京议员张益芳赴津，促褚辅成等驻津议员参加制宪。褚等以惩办主持政变之军警长官为条件，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不能接受。同日，奉天籍参议员王秉谦致函参众两院，诉说拥曹议员之罪恶，并希望两院议员本救国精神，彻底觉悟。

△　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致电北京宪法会议，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制宪。

△　苏联政府代表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越飞奉调回国，派加拉罕代理外交人民委员为驻华全权代表。8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电同意。

6月28日　曹锟贿选筹备处成立，由筹备员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边守靖、刘梦庚具名，是日在京宴请东三省议员，为曹锟疏通。7月1、2两日，高凌霨于北京袁家花园分宴议员，发出请帖800份。

△　援川北军卢金山部攻占泸州。

△　广州大本营为截断沈鸿英桂军赖以运输物资的西江交通线，决定设立西江船舶检查所，派琼海关监督兼交涉员黄建勋为所长，并令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各国领事查照。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中国实业银行借款10万元；外交部向北京银行界借款60万元。

△　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兆事务所为免陷入政治漩涡，是日发出通电，声称："只求地方聿安，奚问政归谁属。况全国鼎沸，政客纵横，同此一邱，夫复何择？"

△　美国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之万国教育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7月6日结束。中华教育改进社派蔡元培、范源濂等八人出席会议。会议议决成立"世界教育联合会"、"改良乡村教育"等案。

6月29日　广州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外交部长伍朝枢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列强勿承认北廷军阀政府，"宜保留承认，待有能代表全国又为各省拥戴之政府产出，然后再予承认"。

△　孙中山任命魏邦平兼广东西江戒严司令。

△　孙中山电嘱汪精卫，如与段祺瑞接洽之事遇有障碍，"则对国会、对黎、曹皆主不问，并请速回"。

△　四川省议会电孙中山，反对吴佩孚武力统一之迷梦，主张实行孙中山和平统一宣言。

△　京师地方审判厅以罗文幹案"伪造文书罪不能成立，受贿等情弊均无实据"，第二次宣布罗文幹、黄体濂无罪，罗、黄被释出狱。

△　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因海军欠饷迭电北京催索罔应，是日通电各方宣告离职，藉为最后之要求。7月6日，北京政府财政部拨给海军欠饷17.5万元，杜遂打消辞意。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使馆代办，要求速撤换长沙日本领事，并惩处拘学生逼供之责任者。

6月30日　孙中山发出指令称，湘粤联军总司令张开儒所部之新编军队，“此等名称并未经任命，应立即取消”。

△　孙中山训令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等将领，以黎元洪亡走，北变突起，令该总司令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

△　粤北江讨贼滇军击溃附沈粤军谢文炳部，是日复占英德。

△　湖南省长赵恒惕以沅陵镇守使蔡钜猷在辖区增兵截税并与反赵势力通声气，下令将蔡调任湖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所遗镇守使缺裁撤；蔡部军队第九旅归第二师鲁涤平改编，第十旅归第一师宋鹤庚改编，游击队归宝庆镇守使吴剑学改编。随后，蔡部军官开会，电省留蔡。7月3日，蔡钜猷电湘省当局，声言曾受孙中山任命，已电孙请示去就。

△　中国科学社发出说帖和计划书，请政府于退还庚款及加抽关税款项中拨出100万元，作为补助学术团体，开办研究所、博物馆之用；并另拨300万元作为基金，以便本国科学事业得所依藉，以图发达。

是月　根据中国邮务局所发表之《民国十一年之邮务报告》所附各省当局所调查之户口表，我国总人口当在4.4亿以上。又据内务、外交两部所作外侨在华人数调查，计日侨为7537人，英侨6762人，俄侨6721人，德侨2971人，美侨3911人，法侨2155人，意侨1125人，澳侨764人，比侨264人，荷兰侨民76人，其他国籍389人，平均以侨居上海者为最多。

7月

7月1日　　粤东江讨贼联军攻克永湖、淡水，陈炯明军退平山（今惠东）。

△　胡汉民代表孙中山赴粤东江督师。

△　北路沈鸿英桂军暨北军由河头分两路向北溃退，讨贼联军是日占领粤北之河头。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交涉日舰从长沙撤走事，派参事施履本去长沙调查，专办“六一”交涉。

△　非直派议员因制宪无望纷纷出京，大选派加紧活动，是日王毓芝、吴毓麟、屈映光等赴天津，对去津议员诱以甘言重币，冀能就范。

△　吉林延吉县教育会学董张斌被驻延吉天宝山之日本警察无理拘押，经延吉道尹陶彬向日本领事多次交涉，日本领事乃于是日将在事之驻天宝山日警巡查部长久保田撤换。

△　上海各工团发起之“全国工界救亡大会”在闸北全皖会馆开会。会议认为：国会南迁为解决现局之枢纽，并组织“工界监视国会团”，以应付今后之时局。

△　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杂志《前锋》月刊在广州创刊。

7月2日　　粤西江沈鸿英部李根沄、李耀汉、沈荣光等分三路向讨贼联军进攻，次日占领禄步。4日，联军得梁鸿楷部及江门援兵助战，始将桂军击退，夺回禄步。5日，沈部桂军以主力3000来援，又占禄步，并向肇庆进迫。

△　全国各界联合会发出对时局宣言，其要点为：一、拥护约法，承认合法国会议员南下制宪；二、责成护法总统团结西南、东南，组成正式政府，戡乱讨贼；三、委员制决不适用于中国，督责民

八合法国会监督护法总统实力戡乱，以扫除政治障碍，消灭军阀。

7月3日　　粤北江讨贼联军占领大坑口、韶关，沈鸿英桂军及北军向南雄、始兴退却。

△　日前川军赖心辉、石青阳、吕超等14名将领发表宣言推戴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后，是日杨森率同二军将领发出通电，公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并立请就职。

△　四川省军与杨森军、北军在内江激战，省军败退资中、资阳。

△　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转各国使节，请各国撤销对北京政府之承诺，并勿为任何方式之借款与现政府及省当局。北京摄政内阁遽令警厅将该会查封。13日，全国学生总会通电反对摄阁指使警厅查封北京学生联合会，要求全国人民及早觉悟，起而自主自决，打倒国际资本主义，铲除封建余孽之恶军阀，方可完成真正独立国家。

△　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500人，为反对利通车行老板增加车租而罢工。次日，车行主被迫让步，罢工结束。

△　英国政府提出所谓“补救中国乱局办法”，妄图干涉中国内政，内有：一、以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二、以外员编练中国警队，归中国政府管辖，但若中国政府不负责任，则归列强管辖；三、在中国口岸外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行动；四、征收附税，以应付国际共管下之军民行政经费等。

7月4日　　孙中山宣布广东之西江为戒严区域，并公布《西江沿岸警备区域临时戒严条例》、《西江船舶检查所组织条例》及《西江船舶检查所执行规则》。

△　孙中山复函徐谦，表示不愿受议员选为总统并反对委员制。

指出：“中国现局堕落，一至于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从今以后，我行我素，再从事于彻底之革命，此外之事，一概不理。此志能达，不怕他来什么内患外忧，倘兄不信，请一观今日之俄国。惜乎今日中国之志士不从根本上去做工夫，而只识反对曹锟做总统，吾不知曹与黎有何择焉？至兄所倡之委员制，更比曹、黎又下矣。”

△　闽粤联军（许崇智留闽之何成濬、孙本戎、张贞等部、闽南臧致平之刘长胜部及闽南自治军）分三路图潮汕；李烈钧亦令所统率之赖世璜、苏世安两部入粤，合力进击陈系粤军。5日，孙本戎占饶平，7日张贞占浮山，至10日前后闽粤联军已迫近潮汕。

△　陈炯明由广东梅县率林虎部8000人取道兴华援救惠州，讨贼联军刘震寰、许崇智等部纷向博罗以西溃退。孙中山急调北江讨贼滇军蒋光亮、胡思舜两部赴东江增防。

△　曹锟属下之要员分赴各省为“大选”筹款和疏通意见，直鲁豫巡阅使署仅留陆锦应付。是日，张怀芝赴天津代曹锟向各系疏通意见。8日，温世霖南下向民八议员疏通，但无效果，旋匆匆回津。

△　梁启超致书曹锟，反对以武力、金钱及其他卑劣手段争取总统职位，力劝曹锟悬崖勒马，并以袁世凯下场相戒。

△　陕军胡景翼师奉吴佩孚命援川，是日胡率部一团抵汉口。

△　上海南市木行主以营业疲滞，决扣发运木船水手三个月工资，引起水手同盟罢工。是日，全体水手在南市竹码头里街庆安公所开紧急会议，公决须木行主照全年工资算足，方允开工。随后，木行主挽人调停，将三个月工资如数付给并照发五厘五花红。8日，水手复工。

△　上月驻宜昌日本领事借口有人向日舰“嵯峨号”投掷石块，向宜昌当局交涉，宜昌县知事除发布“取缔排日十条”，并于是日亲至日

舰“道歉”。

△　北京外交团为北京政府农商部在上海设立商标局一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商标法未经列强认可以前，不得设立商标局。

△　日本僧人水野晓梅为调查发还庚子赔款事到达长沙，表示愿调停6月1日日舰肇事案。次日，水野往晤省长赵恒惕，声言愿以个人资格，先疏通此次误会，以便两方开始谈判。7日，水野再谒赵，劝长沙解严，日侨复业，日舰必撤。

7月5日　孙中山任命石青阳为中国国民党四川总支部长。

△　杨度电曹锟，提出解决时局主张，要求“暂请孙公（中山）北来，主持国是”。国民党人士对杨度是否为孙中山之代表颇有疑问。是日，孙中山电上海干部会议，说明“杨度本奉有密命与直系接洽，特无代表名义耳”。

△　吕超就任四川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刘成勋将川军第十师刘眷蕃部及川北清乡军吕镇华部，拨归吕超节制。

△　由香港开往广州之广九路慢车，在南岗站北十里许之红岗炮台山坳被土匪截劫，讨贼军官佐卢任华等三人与匪交火时牺牲，乘客数十人被匪掳去。

△　据《申报》报道：豫南匪祸猖獗，鲁山境内大杆皆为数百人，小杆各有数十人，统共有匪数千。近日鲁山驻军调走，土匪更肆无忌惮，道路截断，烧杀奸掳，日有数十起，农不敢耘田，商不敢运货。南阳县境内，被匪攻破镇砦，死伤被拉，抢掠财物，焚烧房屋，尤不胜记载。

7月6日　孙中山抵韶关犒师，与滇军将领杨希闵等商议追击叛逆方略及统一财政办法。

△　川军杨森部许绍宗旅在川南陈石场烧酒房地方与省军赖心辉、张冲部接战，杨春芳、潘文华两师复由左右翼夹攻，双方激战两昼夜，互有胜负。是日晨，直军张允明旅从隆昌驰援，赖军战败，向富顺、泸州退却。

△　张作霖在奉天开会研讨时局，次日结束。对于时局，奉张决定待时机成熟，再图发展。黎元洪代表韩玉辰、浙江代表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湘省代表周新谷、四川代表钟宏材、广东代表汪精卫等与会。

△　中国工程学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年会。该会七年前成立于美洲，此次为成立以来在国内举行的第一次年会。

7月7日　　孙中山发出训令，严饬参谋长张开儒迅将湘粤联军等所有私立名目、滥发号令一律取消。8月8日，军政部长程潜将奉令查办情形呈复称，关于湘粤联军名义业经遵令取消，护沙队名目系他人假借。8月10日，孙中山批准此案“从宽免议”。

△　粤北路讨贼滇军王均部攻占乐昌，谢文炳残部向九峰、坪石溃退。次日，谢部退入湘边，被湘省收编，谢离军。

△　离京议员褚辅成等发表声明，以在京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如召开宪法会议或组织总统选举会，显属非法，绝不予以承认。

△　直系政客于化龙由天津携款10万赴沪，专为运动各团体反对国会南迁。

7月8日　　拥直派30余政团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联席会议，决定：一、请国会议员维持国会，完成宪法；二、促政府召集全国和平统一会议；三、由本联席会议向全国各团体征求和平会议组织之办法；四、希望国会于制宪后选举总统。会后并发表通电。

△　沈鸿英部桂军得广西林俊廷部之援助，攻陷粤西江肇庆，讨

贼联军退至河口。

△　山东招抚之孙美瑶旅由省长郑士琦派员点验成军，全旅共2700余人，归郑士琦管辖。孙美瑶通电宣布所有未释旧票悉数交郑释放。

△　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改名）在沪开第一次社员会。该社有社员600多人，均系东西洋留学专门学生及国内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生。该社刊物有《学艺杂志》。

7月9日　　孙中山为“孙（洪伊）曹（锟）联合说”复电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略谓“沈鸿英未叛以前，本有与曹接洽和平统一之举，后得鸿英电底，证实犯粤之事，曹实主谋，遂电伯兰（孙洪伊）及杨度，与曹决绝久矣”。指出今日“尚未与其人有若何之接洽，彼方制造空气，勿遽信之”。

△　南洋砂劳越咪厘埠（今马来西亚沙捞越米厘）一华工与当地人发生口角被英国殖民地警察逮入警署，华工同业前往陈情，以及未明肇事原因前往围观者有百余人，而警官竟令警士开枪，当场惨毙华侨12名，重伤40余名，赴医院不治者二名。孙中山于接到砂劳越国民党分部刘友珊等来函后，于9月19日令饬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英国驻广州领事提出抗议，要求抚恤伤亡并惩办凶手。

7月10日　　孙中山之和平代表孙洪伊向孙转达曹锟齐（8日）电，表示愿意响应孙中山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工兵政策，实现和平统一。

△　孙中山致函四川石青阳，对近日沪上之联省政府、委员制等说，认为“断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之大局”。今日所患者“吾人之心志不坚，患得患失，不肯牺牲耳。深望蜀中同志勿忘素抱，务要恢复昔年手枪炸弹时代之革命精神，从今日起，再去开始奋斗”。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令准署财政总长张英华辞职，任命王克敏署财政总长。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任命孟昭月为陆军第十混成旅旅长。

△　高凌霨、王毓芝包办大选，拟备空头银号存折多份，一面交在京各议员，一面令各议员纳质图章一颗，俟总统选出，取还图章，再行发给现款，公然交易，骇人听闻。是日，离京议员褚辅成、刘恩格等295人致电留京议员，吁其慎保晚节，迅速离京，共策国计。

△　陈炯明军林虎、洪兆麟以臧致平军三犯粤境，占饶平袭黄冈为由，电限臧48小时内撤兵，“否则唯有用兵”。因臧答复未得要领，次日林、洪即率队反扑。李烈钧所率赖世璜、苏世安两部复叛投林虎。

△　北京国会之国民党籍议员，因直系与变节之议员狼狈相结，控制国会，是日发表告别北京之宣言，即日赴沪。宣言声明：“在法律下得不到救国之路，只有超越法律之上而求之，即不得护法，只好革命。”

△　湖南省议会要求省政府收回发行省库券30万元之成命，赵恒惕咨复议会允撤回。

7月上旬　　新疆省长杨增新与阿富汗国王签订临时局部通商条约，咨请北京政府外交部查明，以凭核办。

△　天津、汉口、上海等地日商民先后开会，谋对付“抵制日货”办法，决定一面向中国当地官吏提出“禁止排日”的要求，一面派代表回日本报告情形，请日政府对中国作“断然的处置”。

7月**11**日　　粤西江沈鸿英桂军弃守悦城，向德庆溃退，讨贼联军之舰队进抵悦城。

△　山东省议会就交涉接收威海卫事宜，电请北京政府拒绝英方所提“土地永租，操纵财权”等严酷条件。

7月12日　孙中山电复孙洪伊，答复曹锟（齐）电请求合作事。指出“前此我揭出和平统一之主旨，仲珊（曹锟）亦尝赞和，乃其见诸事实者，则乱闽祸川扰粤，以及种种行动，无一而不与和平为敌”。“徒务空言，天下其孰能信之”。

△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以师长杨池生、杨如轩有暗通沈鸿英及北军嫌疑，将两杨扣留，即日解广州大本营惩处。孙中山以两杨第一次在北江剿敌功绩不无可纪，故宥未深究，两杨遂得以离穗赴港。

△　蒋介石辞去行营参谋长离粤赴港。14日，孙中山以杨蓁代理行营参谋长。

△　粤西江讨贼军占领德庆，沈鸿英桂军退都城。

△　川军杨森部攻陷泸州。同日，省军颜德基部则攻占垫江。

△　湘西沅陵镇守使蔡钜猷发出通电，宣布与湖南省长赵恒惕脱离关系，就任孙中山所委湖南讨贼军湘西第一军军长职。

△　段祺瑞拒绝援助曹锟，是日语刘成禺：“他们要钱要官我都不管，如根本危害国家，吾决不忍坐视。”

△　东三省籍议员联合蒙古籍议员60余人，通电北京及各省，表示为完成制宪，将联袂赴沪。

△　济南理发工人反对官厅拟定的《理发营业取缔规则》19条，进行罢工。15日，济南东南乡、三元宫两区区长接受理发工人所提条件后，次日始恢复营业。

7月13日　湖南省长赵恒惕接获蔡钜猷通电后，于是日开军政会

议，颁讨伐令，决以武力解决湘西问题，并要求省议会通过戒严案。

△　驻江津之川军第二军第六师周西成部（原系黔军），反戈袭击重庆。周令所部毛光翔旅率王团协同新招之杨寅亮部，直攻重庆南岸铜元局而占领之；另派一团直趋重庆上游铜罐驿渡河，潜袭重庆要隘浮图关；周本人率兵一团赴上游以拒泸州下援之兵，旋川军第三师邓锡侯、第七师陈国栋等部由北道兼程赶至，与周部隔江对战，周部不支，于20日退出浮图关、铜元局。杨森为解重庆之围，令郭汝栋之十七旅和黄骥之四十四旅急攻江津，并于20日占领之。21日，周西成军被迫向綦江、南川退去。

△　前滇军师长杨池生被解职赴香港后，是日电孙中山辩诬，并对孙偏听暗通北军之说表示不满。电称“个人去留无关大计，惟诬人以不义之名，是不可不辩。……偏听生奸，独任成乱，公之大业，误于此矣”。26日，杨池生、杨如轩通电数杨希闵罪，谓杨希闵与沈鸿英等商谋害魏邦平，事定一任省长，一任督理，故有江防之变，“经池生等庇护，魏得不死”；并谓杨希闵托李根源转陈北廷，编滇军为北军，“经池生等反对而未果”。

7月14日　　孙中山特派杨希闵、叶恭绰、程潜、杨庶堪、廖仲恺、邹鲁为统一广东财政委员。

△　川省军将领赖心辉、石青阳、吕超、余际唐、喻培棣、何光烈、彭远耀、蓝世钲、张冲、郑英、陈万仞、张成孝、王丽中、刘国孝等联名通电揭露吴佩孚以援川为名，利用川人亡川；表示对于川军，无论其为友军与否，皆视为一体，均不与敌对，如此后尚有川军加入敌军方面攻击省军者，是甘心卖川亡省；凡北军、黔军及时觉悟，立刻出境，仍不失亲善，如再利用川人祸川，则我前敌将士，亦惟有拼命作战。

△　湖南省议会根据省长赵恒惕的要求通过在讨蔡（钜猷）期间

省城戒严案，并于翌日实行。赵恒惕任命湖南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为省城戒严司令。

△　离京国会议员在沪集会，发表对内、对外两宣言。对内宣言指出：“首都已陷于无政府状况，国会在此危乱之区，不能自由行使职权，爰自六月十三日起相率陆续南下，开会于沪上，别谋建树，完成宪法。”对外宣言称：自六月十四日起，“北京免职各国务员，对于贵公使所发文书，所订契约，断然不能发生效力，全国国民誓不承认”，并请“扣留每月应拨之关余盐余，俟正式政府成立，再行交出”。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核准《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凡11条。26日，新疆省议会致电参众两院，反对该暂行条例，请将新疆一省划除西北边防督办管辖范围之外，以维边局。9月下旬，高凌霨等函新疆议员，准将新疆划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管辖范围之外。

△　驻古巴公使刁作谦因使馆经费无着，电外交部请裁撤驻古巴公使，归并驻美使馆兼办，本人请解职回国。

△　长沙群治法政专门学校经北京政府教育部、司法部认可改为大学，并推广添设北京及上海两地群治大学。是日，上海群治大学校董会开会，讨论校董会章程，并拟先办文法两科。

△　上海闸北丝厂反对厂主无理延长工时一小时，停工一日，闸北四区警署二分所将女工六名拘去。次日，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函请警厅释放，16日被拘女工获释。29日闸北各丝厂停工者占十之三，丝厂女工进德会要求厂主增加工资，减少工时。

△　留日学生总会在东京开评、干两部联席会议，议决各案：一、请外交团撤销承认北京政府案；二、电促国会议员南下择地集会速制宪法案；三、对此次祸国罪魁曹锟、吴佩孚等主张彻底惩办案；四、儆告对于取缔排日运动之各省长官案；五、向各国宣告排日运动

之真相，免遭友邦误解案；六、向日本国民说明排日理由案；七、对长沙“六一”事件，促湘省政府须持强硬态度案。

7月15日　粤北路桂军沈鸿英部及北军退出南雄，讨贼滇军进占南雄、始兴。同日，西江讨贼联军第一、三两师协同舰队进占都城。

△　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电大元帅孙中山，以滇军改组，请加任命。电称：“第一军军长，拟由希闵兼领。第二军军长，请以第三师师长范石生升任。第三军军长，请以第四师师长蒋光亮升任。至第一师师长请以赵成梁升任。第二师师长，请以第四旅旅长廖行超升任。第三师师长，请以第五旅旅长杨廷培升任。第四师师长，请以第八旅旅长王秉钧升任。即请钧座加以委任，并颁给军长关防，以专职守。”同日，杨希闵在通电中称：“黄毓成、金汉鼎暗与北方曹吴私订密约，而杨如轩、杨池生两师长受彼蛊惑，经召集全体军官会议决定，已于九日将二杨免职。”

△　湖南省长赵恒惕为谋安抚附粤之政客与缓和助蔡钜猷之各部军队之态度电孙中山表示拥护，请孙主持大计组织联省政府，实行和平统一，并同时电知西南各省竭诚推崇。18日，湘军师旅长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田应诏、李佑文、陈渠珍、叶开鑫、贺耀组、唐生智、刘铦、唐荣阳等亦联名致电孙中山，恳请“组织联省政府，内以巩固西南，外以奠定大局”。

△　浙江自北京政变发生后，省议会及各团体谋再次宣布自治，推举起草员拟出《自治大纲》。是日，浙江各法团代表通过省《自治大纲》七条：一、浙江省应时势需要，宣布自治，特制定本大纲，在本省宪法未实施以前实用之；二、浙江省设临时议会，为临时立法机关，临时议会法另定之；三、浙江省军务善后督办、浙江省长以下各机关，均仍其旧；四、浙省宣布自治后，应设执行省宪筹备处，筹备省宪进行事宜，筹备程序及实行日期由临时议会定之；五、已在本省施行之各法令，除与本大纲抵触及由临时议会修正或废止者外，悉属

有效；六、本大纲自宣布之日起发生效力；七、本大纲需修正时，由临时议会修正之。

△　清宫大火后，废帝溥仪决定将众多太监资遣出宫，计被遣散者1734人，仅留年老者15名分守宫内各紧要处大门。

7月16日　孙中山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同日，任命蔡钜猷为湖南讨贼军湘西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为湘西第二军军长，谢国光为湘南第一军军长，吴剑学为湘南第二军军长，宋鹤庚为湘中第一军军长，鲁涤平为湘中第二军军长。同日，孙中山特任李烈钧为江西总司令兼江西省长。

△　孙中山命令取消大本营巩卫军，任命朱培德为中央直辖第一军军长，王均为中央直辖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　粤东江讨贼联军总攻惠州，激战竟日，未下。

△　粤西江讨贼军在封川江口与沈鸿英桂军剧战，歼敌一部，余众退往梧州。

△　滇军内讧后，孙中山下令改编驻粤滇军：一、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师师长杨池生、第二师师长杨如轩，均着免本职；二、任命杨希闵兼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军军长，范石生为第二军军长，蒋光亮为第三军军长；三、任命赵成梁为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师师长，廖行超为第二师师长，杨廷培为第三师师长，王秉均为第四师师长；四、金汉鼎串通黄毓成暗降吴佩孚，妄冀作乱，着即免去大本营高级参谋本职，与黄毓成一并通缉。

△　日本新任驻京公使芳泽谦吉抵京就任，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未变。芳泽以中国无总统，仅以本人署名公函致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已到京，暂缓呈递国书。随后芳泽与北京外交部为此事发生交涉，双方各发文件以明真相。后经外交界之调解，8月2日芳泽先将本人到任

并抄录国书副本咨照外交部，倒填7月19日日期。顾维钧即于当日以外交部名义复照，提明国书正本另行接洽。顾又倒填日期为7月24日之就职通告，于上项公文往来后送日使馆，并于8月2日过访芳泽，芳泽于次日回访。呈递国书交涉了结。

7月17日　粤东江讨贼军收复浮山、东陇、澄海等处。同日，陈炯明军洪兆麟部反扑，经激战又陷浮山。

△　曹锟派鲍贵卿赴奉，以上台后恢复奉张东三省巡阅使职务为饵，请张援曹。是日，鲍贵卿、李际春再次往见张作霖乞请。张拒绝援曹，要曹解甲归田或杀高凌霨、吴景濂等五人以谢天下。

△　天津怀远银行正式开幕。该行系陈光远、李盛铎等创办，资本500万元，杨庆鋆任总理。

7月18日　粤西江讨贼军占领梧州。17日，美国军舰“潘邦加号”护送美孚油轮抵梧，梧州镇守使冯葆初及各公团请美舰长出任调人，经与魏邦平接洽，允沈鸿英桂军于24小时内退出。讨贼军遂于是日占领两岸炮台，梧州城内则由桂军之输诚部队黄绍竑、冯葆初驻扎。

△　陈炯明粤军3000余众直趋博罗，包围惠城之许崇智及刘震寰军一部调往博罗增援；其时困守惠城之陈军开北门冲出，被刘震寰部敢死队数百乘机扑入，经剧战敢死队被逐出。是晚陈军夜袭刘部，刘部退十余里。

△　湘军将领谢国光、吴剑学、宋鹤庚、鲁涤平于16、17两日在湘乡开会后，于是日会衔通电要求调和湘局，声称已联电蔡钜猷，劝告“严饬军队，谨守原防，不得自由行动”；要求长沙方面“本息事宁人之旨，勿遽用兵，另图解决”。

7月19日　孙中山特派李济深兼西江善后督办。28日，将大本营

驻江门办事处及西江筹饷督办一并裁撤，所有西江流域由梧州至江门以及四邑各处地方之一切善后事宜，责成西江善后督办切实办理。8月11日，又特派程潜、廖仲恺、古应芬、邹鲁为西江善后委员，负责协助督办处理善后事宜。

△　孙中山指示讨贼滇军将领速增兵平定东江，“西北江已肃清，东江尚危，宜速增兵定之，如轻敌，恐稍有挫失，则西北又有事矣。潮汕初有进步，现颇滞。我能于十日内下惠、潮、梅，则北方亦无从捣乱。若持久，则即不败于兵，亦必败于财政。滇军年来辛苦，不可失之。于十日内战事平，则财政即可整理”。

7月20日　　孙中山公布《中国国民党总支部通则》，凡15条，《中国国民党支部通则》，凡10条，《中国国民党分部通则》，凡10条，《中国国民党通讯处通则》，凡七条，《中国国民党海外总支部通则》，凡七条，《中国国民党海外支部通则》，凡39条。

△　陈炯明军林虎部攻陷广东饶平之黄冈及闽南之平和，俘臧致平军500余，分路包抄诏安、云霄。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任命王汝勤为长江上游总司令。

△　北京政府谋向英商克利斯浦财团借款300万镑。是日，国会议员褚辅成等致函英公使，请阻止克利斯浦财团向北京政府贷款。

△　北大校长蔡元培携眷由沪乘法国邮船赴欧去比利时，拟在比专攻美育。

7月中旬　　长沙之日本商人先后复业。肇事日舰“伏见号”、“安宅号”亦于本月底借换防为名驶离长沙。

7月21日　　袁带、陈永安率众数百偷袭广东石岐附近之小榄，缴防军之枪械，响应陈炯明。孙中山调李福林所部三营往剿。

△　上海之沪、宁、苏三帮鲜肉业，因反对官办屠宰税罢市，屠夫停宰，除租界外尽皆停售。鲜肉业要求上海县知事取消官办成命。31日，县当局允准屠宰税捐款仍归三帮包认，年缴税额三万元，另加教育费3000元。8月2日，鲜肉庄复业。

7月22日　　曹锟因王克敏及外交系诸人之劝告，发促国会制宪电，声称“宪法为国家大本，宪法一日不定，国家一日不宁”，国人望成宪法“更逾畴昔”；又称彼“服勤国家，垂四十年，民国肇造，未尝一日自逸，私人权利，夙不敢争，耿耿寸衷，惟知有国”。随后，吴佩孚、张福来、张凤台、熊炳琦、田中玉、齐燮元、韩国钧、冯玉祥等先后通电，对曹电表示响应。

△　上海吴淞大中华纱厂因亏损宣布停工50天，该厂工人为事关众人生计，致函上海工人自救会，呼吁予以实力援助并向厂主要求妥筹善后。

7月23日　　陈炯明以两路援军俱已开到，在东江进行反扑。从河源开抵之黄凤纶、陈炯光两部，由泰尾进逼博罗；从三多祝、平山开抵之邓本殷、胡汉卿各一部，由淡水、龙冈进逼平湖；惠州城内陈军则反攻飞鹅、馒头各岭；驻龙华之熊略、练演雄两部，亦由永清进逼正果，战事剧烈。

△　顾维钧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职，同日通电为就职辩解，电称“行使约法赋予之职权，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惟吾力之是视，不敢告劳，求其心之所安，不能有二”。25日，旅沪国会议员田桐通电驳斥顾之通电，认为中国外交家不应为外人作宣传家，“数年以来，国人认熟解洋语、善着洋服、惯食洋餐之人为外交系……夫外交家者主观的也，非客观的也，外交家之所由来，即爱国男儿精神之所勃露者也。以上三者为构成洋奴之要素，不能谓为构成外交家之要素，摹仿外人之声音笑貌，仰其鼻息，体贴入微者，未有能知国家大事者，洋奴之技，西崽之才，正与外交家相悖谬”。

7月24日　孙中山令免谭延闿大本营建设部长职，特任林森为建设部长；林森未到任前着财政部长叶恭绰暂代。

△　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命高义、杨昭化等部于中旬由涵江向闽南讨贼军何成濬所部驻地莆田、仙游进窥，是日将何部龚师曾旅逐出占领之。

△　川军邓锡侯与北军于学忠支队分左右两路攻占合川，省军张冲部退往安居镇潼南一带。

7月25日　谭延闿受命离粤去湘西，与蔡钜猷、陈嘉祐等接洽联合倒赵恒惕。

△　湘军第一、二两师及一混旅所属团长17人通电拥赵恒惕讨伐蔡钜猷，声称：湘为西南一部分，决不附北，始终拥护省宪，同心对外，服从长官命令，维护政府威信。

△　福州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奉杜锡珪令，率领“海容”、“应瑞”、“楚同”、“楚观”、“江元”五舰及“定安”、“华乙”两运船，载陆战队杨砥中旅2000人于是日出发攻厦门。臧致平在漳州闻警，亲率队回援。30日，海军占领金门，8月1日舰队入嵩屿，陆战队在浮宫登陆。臧致平一面令厦门海军人员饶子和、曾省三赴舰与杨树庄议和；一面乘各舰无备，命胡里山炮台向各舰轰击，“海容”、“应瑞”等舰负伤。杨部陆战队亦因寡不敌众，退回运船，海军舰船遂于8月2日撤往金门。

△　熊克武在成都通电就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并与刘成勋、但懋辛、赖心辉、吕超、石青阳、喻培棣等将领联名发出讨贼通电。

7月26日　孙中山再次赴东江督师。次日，在博罗许崇智总司令部召集各部高级军官开联席军事会议，筹谋夺取惠州计划。

△　安徽督理马联甲到南京，与齐燮元商苏皖联防及对浙军事。

△　《京津晚报》因刊载揭露“直系”的消息，编辑曾青云、发行吴凤鸣被京师警察厅拘去，该报被勒令停刊。同日，警厅又查封民治通讯社并传去社长刘鸢如。30日，曾、吴、刘经报界同人营救，获准保释。

7月27日　粤东江讨贼军向白芒花、平山一带进攻，以截阻惠城与海陆丰之交通，是日占领白芒花，直达平山。陈炯明由河源率部猛攻淡水以救平山。8月1日占淡水。驻守白芒花之讨贼军以后方危险，退守永湖之东山。

△　孙中山任命路孝忱为中央直辖山陕讨贼军司令。

△　杜锡珪派“靖安”舰装载军火由南京驶往闽省，接济攻厦门之北军。是日该舰官兵反对祸闽，在吴淞口起义加入沪海军，并通电声明此次起义之原委。该舰共有官兵、学员300人，所运赴闽军火有新式快枪80支，子弹25万发，军用品200余件，过山炮一尊，舰用炮弹700发。

△　冯玉祥在北京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召集阁员、名流、军警头目、津保系要人开会，谋改组内阁。

△　山东各界联合会电北京国务院、外交部，反对梁如浩所订中英威海卫条约，谓该条约“丧权辱国，不啻断送，鲁人誓不承认，请勿签字”，并推邵次明等十人赴京请愿。

7月28日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特派刘湘为四川清乡督办。

△　川军杨森部郭汝栋、黄骥两旅，攻占省军周西成所在之綦江，周部退向南川。

7月29日　孙中山在博罗轮船上召开军事会议，同各高级将领会商攻惠（州）方略。

7月30日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派陈调元为苏皖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

△　福建王永泉所部攻占泉州，闽南讨贼军总指挥何成濬退安溪。

△　湖南省长赵恒惕代表首斌、邹礼赴鄂求援无结果，是日晚同赴洛阳向吴佩孚乞援。

7月31日　湖南省长赵恒惕通电全省军官，决维护省宪，“敢有称兵抗命、违宪乱法，以及招引外兵、嗾使土匪蹂躏湘境者，即为湘民之公敌，誓必竭全力以歼除之”。

△　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同赴国务院催饷。目前仅冯玉祥军每月从崇文门税款得饷10万元，其余军饷皆无着。

△　鲁南郯城八里港村遭大股土匪围攻，次日土匪将围寨攻破，村民惨遭匪祸，被焚数百家，杀戮千余人。8月12日，山东各界联合会电省长熊炳琦责问：“军政长官不保民于前，而又漠视于后，其职责何在？”

是月　四川省军总指挥赖心辉以各将领战功卓著，经呈报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核准予以分别升转如下：现任第二混成旅长张冲升任第三师师长，遗缺以第八混成旅旅长郑英转任，递遗第八混成旅旅长缺，以现任第一独立旅旅长郑世斌升任，又递遗独立旅旅长缺，以川南清乡军第三旅旅长蓝文彬转任。现任川东边防军总指挥汤子模升任第四师师长，现任川南清乡军总司令蓝世钲调任第七师师长，遗缺即行裁撤。现任川西清乡军总司令张成孝，调任第十一师师长，遗缺即行裁撤。周西成升任川东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归石青阳节制。

△　广州飞机制造厂研制的第一架双翼双座侦察教练机试飞成功。孙中山亲为该机命名为“乐士文号”。

8月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出《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军阀势力与列强相勾结是中国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反对当前的所谓拥黎、拥段、国会南迁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及借助列强等错误主张与态度。主张“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如果国民党不能肩此重任，“如此我们主人翁的国民断不能更袖手旁观，例如上海总商会所发起的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

△　沈鸿英桂军、直军3000余人开抵南雄边界，连营数十里。是日杨希闵令滇军第一师赵成梁部开赴韶州大桥、周田、大塘等处布防；次日，复饬滇军第五师胡思舜部前赴韶防。

△　陈炯明系洪兆麟部占领福建云霄，次日到达漳浦。

△　重庆江北之熊克武省军被北军击退，是日直军攻占忠县。

△　张作霖、朱庆澜委派滨江镇守使张焕相兼任中东路地亩局长，向路局收回沿路地亩管理权，但旧处长俄人关达基抗不交卸，驻哈尔滨之英、法、日、美领事亦干涉中国接收，将该局文卷封锁，并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

8月2日　　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电北京政府索海军欠饷六个月，以否则再有“靖安”舰等事件发生，彼不负责任。

△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集合校内外学者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全国风俗。其方法为：书籍之调查、实地调查及征集器物。该会印制调查表格三种，通函各省区教育厅，请转发所属各校着手调查，以资研究。

△　苏联新任中东路长官白尔罗夫到达哈尔滨。

△　北京双桥无线电台开始与世界各地通电讯。该电台系由北京政府海军部与日本三井洋行缔约建成，于上月底竣工。北京当局拟由日、美合办中国无线电事业，以了结中日、中美无线电交涉。

8月3日　　孙中山以梧州克复，粤西江军事已结束，命令撤销西江沿岸警备区域临时戒严条例，宣布解严，并裁撤西江船舶检查所，以利商务。

△　四川讨贼军第二路颜德基部攻克邻水。

△　四川省议会为反对直系军阀目无法纪，嗾使军警逼走黎元洪，少数辞职阁员寡廉鲜耻，摄行总统职权，部分议员趋炎附势，主张改选总统借拥曹锟登台等恶劣行状，是日致电孙中山，主张一致声讨曹锟、吴佩孚，并“希从速组织政府，以奠国本，而系人心”。

△　北京政府之教育、司法等八机关召开机关官吏联欢会，讨论索薪办法，决议：一、因索薪而发生该管长官之非法处分，当依文官保障法一致联合极力抵抗；二、达到各机关苦乐平均目的，“要饿大家饿，要吃大家吃”，不达目的不止。

△　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在省城将前在庆城收抚之胡匪800余名尽数击毙。4日，吴在致东北当局的密电中声称：该匪等归诚后复掳留人票200余名勒赎不放，且有俟官枪发放后密图逃逸消息，“始拟将该匪首等严加惩办，从者分别安置”；3日下午“令传该匪首等到署，立予逮捕，随督队伍，驰往该营，拟分别讯明，酌量留遣。正站队时，不意该匪竟用手枪连向王营长玉射击，致受透子伤四处，穷凶恶极，实所罕见。……遂一面督队严剿，一面将所逮首领悉予处决，乃该匪复负隅死力抵抗，直至夜十余钟，始将该匪悉数歼毙”。

△　据《申报》报道：北京万国拒土会书记阿士匹兰日前致函

《泰晤士报》称：目下闽、粤、滇、黔、湘、皖诸省，烟土已成省政府专卖之品。现中国除山西及沿海数省外，类皆种植罂粟，鸦片产额已达1907年之三成，每年约为7000至一万吨。

8月4日　孙中山复函胡汉民、程潜、廖仲恺、杨庶堪，谓："文在外专注军事，无暇分神于其他，一切政事，统由展兄代行；至其例外发生之事，请四兄会议定之。"

△　孙中山特派闽南民军领袖宋渊源为闽南宣慰使；派焦易堂为陕西、河南军事特派员。

△　曹锟在保定光园开军事会议，其军事计划为：先平福建的臧致平，以断浙卢之右臂。对奉取守势，由冯玉祥、王怀庆担任。守势既固，即以全力对浙，分四路包围，一路由皖攻湖州，二路由苏攻嘉兴，三路用海军攻宁波进绍兴，四路由闽赣攻金衢。攻浙兵力，除闽皖苏赣各出一师外，另于汴洛津保调四个师，凑成八师，志在必胜。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令裁撤财政会议筹备处、财政清理处、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另设财政整理会，特派颜惠庆为会长。10日公布《财政整理会章程》，全文16条。

△　沈鸿英部桂军及北军3000余人犯粤，是日占南雄，次日占始兴，进迫韶关。

8月5日　川军杨森部由富顺之何家场、三多寨等处向白马庙、龙会镇之讨贼军但懋辛军进攻，8日杨部攻占白马庙铁门坎等处。

△　林支宇、鲁涤平、陈强、刘铦等开"湘乡会议"，作出三项决定，谋调和湘局：一、各将领联电劝蔡钜猷去职；二、拥护省长；三、谭延闿回湘只准以劳军使名义暂驻衡州，遇相当时期率部赴粤。11日，林支宇以调停无效，避往汉口，通电表示反对战争。鲁涤平则宣布中立，将所部移往安化。

△　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在沪约会苏联代表马林及张继、汪精卫、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并洽商有关苏联援助问题。

8月6日　　桂军将领李易标抵广东龙川见陈炯明，加入陈系粤军，归叶举节制。

△　段祺瑞在津向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赞成各方合作，反对武力统一，并指责北京（驱黎）事变为临城第二。嗣后，直系津派议决对付段派办法，警告段勿再活动，并密布侦探严查段党门首出入之人。

8月7日　　中央直辖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黄绍竑、驻梧州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及驻梧州西江海军部队，奉孙中山密令将桂军冯葆初部缴械。冯降附大本营后仍驻梧州，阳奉阴违，暗通沈鸿英桂军，意图复叛，故收缴其枪械以除隐患。梧地治安改由黄绍竑维持。

△　陈炯明系粤军陈修爵等部由龙华（属广东龙门）进攻增城，讨贼军卢师谛部溃退，县长挟印逃，增城为陈军攻占。

△　广东财政厅长邹鲁以广东土地税收入不多，且民间争夺土地，豪强胥吏因缘为奸，而纠纷甚多，为平息纷争，增加土地收入，报请成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以厘正经界，确定民业，并随附《广东全省经界总局规程草案》。是日经孙中山核准，并令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转饬该厅遵照办理。

△　谭延闿在湖南衡阳宣告就孙中山所委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职，并组织公署，委任军长、师长多人。

△　驻京法使傅乐猷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核准金法郎案。10日，赴沪之国会众参两院议员致电法国国会及驻京法使，要求对于金

法郎案及其他有关中华民国国库负责之条约，概行停止谈判，避免“助虐军阀，贾怨国民，贪一时之利益，而贻永远之祸灾”。

△　浙江海门、温岭沿海一带发生大风潮灾害。温岭东乡淹毙人口有姓名可查者2018人，无家可归之灾民有4735户，计1.656万人。南乡淹毙人口有姓名可稽者1102人，无家可归之灾民有3582户，计1.3153万人。其残缺无可辨认的尸骸及随潮卷入大海者尚不在内。海门所有轮埠码头五个及靠近沿江一带的市街房屋，均被大浪卷入海中，城内外未被海潮冲去者，屋瓦墙垣亦皆被风吹倒。海门江面被毁船只数以千计。生命财产损失严重。

8月8日　孙中山任命陈嘉祐为湖南讨贼军湘东第一军军长。

△　陈炯明系林虎部刘志陆攻占闽南漳州，臧致平军刘长胜部不战而溃。同日，讨贼军许崇智部刘志达旅在漳州哗变。

△　中央直辖滇军所属游击司令董鸿勋觊觎广东香山、顺德两县烟赌捐税收入丰富，以剿袁带为名派队侵占，遭到该两县县长朱卓文、周之贞及陈策部抵抗。11日，孙中山以董鸿勋无故称兵，扰害地方，训令杨希闵着即勒令解职听候查办，同时并免去董的大本营参军职务。17日，周之贞等率队反攻顺德城，滇军溃退。24日，董部开回广州，旋奉滇军师长廖行超令，调赴翁源。

△　驻陕西之直军第二十师师长阎治堂因谋争夺陕西督军，反对陕督刘镇华；又因克扣所部军饷，引起部下鼓噪。是日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令阎解职，以杨清臣（第三师第五旅旅长）暂代师长。阎治堂心有不甘，当向保定曹锟请示，随后阎得曹锐电，嘱暂缓交卸。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陕西军务帮办第七师师长吴新田、陕南镇守使刘宝善、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均先后为阎向吴缓颊。吴见情形如此，乃令阎暂留军中自效。

8月9日　粤西江讨贼军总指挥魏邦平以广东西江各地已收复，

于4日提出辞职。是日，孙中山特派魏邦平为琼崖实业督办，准其辞去西江讨贼军总指挥及西江戒严司令等本兼各职。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任命王鸿恩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

8月10日　粤北路讨贼滇军第一师韦杵旅攻克始兴，沈鸿英桂军退南雄。

△　广州大本营财政部所拟《广东省银行纸币整理办法》经孙中山批准施行。该办法规定：省银行纸币自令行日起，限两个月内一律送交整理纸币委员会检验盖戳。凡经盖戳之纸币，一律十足兑现。检验办法为：凡送来纸币一百元由委员会将其中五十元公开销毁，其余五十元俟盖戳后分别交回本人及政府。其交回本人办法为：凡票面一元、五元、十元者按十成发回二成，其票面五十元、一百元及二毫、五毫者，按十成发回一成，余即交回政府。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将十六国为临城劫车案所提通牒交北京外交部，要求赔偿被害人之损失，保障外人安全及惩办山东军事当局和路警有关人员。外长顾维钧收到上述通牒之后，即通知内务总长高凌霨，并于当日下午召开特别阁议，议决应付此案之方针为：对于赔偿，当无异议；对于田中玉、何锋钰之免职，及其他一切处分，以事关中国政府用人行政之权，未便即准；关于该路警长张某及当日车上警官赵某等之处分，可以照办；至组织特别路警，由外人训练及指挥，关系中国主权甚巨，颇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万难承认等。

8月上旬　月初，直军卢金山部攻占四川忠县，熊克武讨贼军颜德基部退涪陵与周西成及泸州退出之汤子模会合，势力又趋雄厚。川军重庆方面以邓锡侯率两师与此路相持于南川、涪陵、垫江一带。

△　援川直军赵荣华、卢金山及袁祖铭、杨森、邓锡侯、陈国栋等会衔电北京摄阁，请拨印花税200万元充饷。

△　陈炯明代表李钟岳在津分别谒保（定）洛（阳）要人，请饷领械，并劝出兵“平粤”。

△　英、日、美、法四国借口保护在华外侨，在长江上下游共泊有舰只达37艘之多。

8月11日　　杨森率领杨春芳部川军攻入内江，次日拂晓省军张冲、余蕴兰奋力反攻，夺回内江，进踞椑木镇。适直军在椑木镇渡河援杨，张冲等猛烈反攻，用大炮将浮桥轰断，直军损失甚重。

△　川军第三师罗泽洲团向邻水之省军颜德基部进攻，次日颜部退往大竹、渠县。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特任林锡光为甘肃省长。

△　美、英、法、日四国驻京公使因近日盛传江苏、浙江两省有将开战之说，是日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保护在苏、浙二省外国人之生命财产；将上海划出战争区域之外，否则外交团当取适当手段以自保。14日，北京摄政内阁会议决定致电苏齐、浙卢，望维持两省和平，勿用兵，免外人干涉。

△　美、英、法、日四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要求“遵守华盛顿会议决议，保障中东路有关各国之利益”为由，阻挠中东路地亩局收回地亩主张之实施。随后，奉省当局对中东路地亩问题，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中国主张收回之中东路地亩并非条约规定之附属地，而是帝俄时代非法霸占者，并违法委任中东路地亩课管辖，故中国不能不速行收回。3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四国公使，声明俄国违反1920年条约，以土地公产运用于政治，中国不得不收回。

8月12日　　陈炯明系粤军自漳州迫厦门，王永泉军亦由同安攻厦，臧致平对厦门商界宣言决死守。

△　云南宁洱（今普洱）发生地震，损坏城垣20余丈，公私房屋

震塌420余间，压毙一人，伤数十人。后又连震五次，过此仍逐日震动，半月始息。

8月13日　孙中山以曹锟贿选有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参与其事，从事不法活动，是日委任李执中、邵力子等五人为惩戒委员，组织惩戒委员会，负责审查事宜。

△　河南省自治筹备处长刘积学被省长张凤台召至公署予以拘捕，随后吴佩孚电张，令将自治进行各事中止进行。

△　汉口银行公会议决在制宪未成，正式政府未产出前，各银行不得投资于任何军阀。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抵哈尔滨，随后即与东三省当局接洽中俄会议事宜，北京筹办中俄会议公署代表包世杰奉王正廷之命，于21日赴奉迎加拉罕入京。

8月14日　驻四川酆都原隶川军四师杨春芳所部贺龙独立旅，反戈归附省军石青阳。贺龙经石青阳委为川东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　四川省军赖心辉部克复隆昌，继占富顺。

△　吴佩孚利用北军、黔军在川境支持杨森图川，是日省军将领赖心辉、石青阳、吕超等联名通电，促北军、黔军立刻出境，仍不失为亲善，如再利用川人祸川，惟有与之拼命作战到底。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令准王克敏辞去财政总长职，以张弧署财政总长兼盐务署及币制局督办。

△　鲍贵卿为直奉作斡旋，向张作霖转致直系曹锟疏解条件五项：一、京奉火车营口盐款，仅将名义归奉中央，实际收入仍为奉有；二、恢复奉张官职，仍由中央任为满蒙巡阅使兼管辖察热绥三特别区行政事务；三、返还掳获之奉军械十分之四；四、恢复奉张原官

后，并允奉张出而同意组阁；五、遇必要时，奉军进关，驻屯京畿一带。次日，张作霖将条件交文武两派首领提出意见，文治派认为应抱定“保境安民”四字，拒绝联好；武人派则认为是饵惑手段，应严行拒绝。

8月15日　孙中山特任古应芬为大元帅府行营秘书长。

△　孙中山电臧致平及闽南同志，告以即亲督许崇智、蒋光亮两军赴援，“公等稍能坚持，则敌必全灭于闽粤之间”。

△　孙中山令四川所有讨贼各军，着统归川省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节制调遣。

△　杨森等部川军分三路进攻成都，是日夺得安岳，17日攻占乐至，占领入省垣大道之广元寺。

△　四川熊克武、刘成勋在省城军费统筹处筵请省中各界，宣布发行纸币200万元，以充作战费用，每月发行50万元，以造币厂余利及自流井盐税作为日后兑换基金。29日，四川省署发出布告，核准川军总司令部、讨贼军总司令部发行纸币的咨请，此项纸币由四川官银号发行。

△　北京政府财政部增印铜元票向银行抵押借款，到期因财政部无款备赎，此项无准备金的铜元票遂暗中流向市面。是日，北京市面发生铜元票挤兑风潮，铜元票跌价，至月底始暂告平息。

△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第五次评议会在广州举行。该会理事长杨文炤报告会议筹备情形及此次会议之目的。随后评议会主席韩觉民致词指出：该会主张打破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式军阀，创建真正民治的政府，望国民共起图之。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学生在革命中的“先知先觉”作用，应研究中国乱象之原因，及用何种方法以解决将来之危局。中国今日之先决问题在扫除军阀，整理内政，继续

革命。

8月16日　　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自上海乘日轮“神田丸”赴苏联考察。该团成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19日，蒋介石等一行抵大连，换乘火车于次日抵长春。21日抵哈尔滨。24日搭车赴莫斯科。

△　粤北路讨贼滇军第一师韦杵旅攻克南雄，沈鸿英桂军向大庾岭溃退。

△　因谭（延闿）、赵（恒惕）冲突，长（沙）衡（阳）交通阻断，赵恒惕派兵在湘潭以上沿江设防，长沙紧急戒严。是日，鄂督萧耀南电赵，询问有无实力保障全湘，可否由鄂接防湘阴、岳阳。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改派陈箓为国际联合会代表。

△　苏、浙士绅鉴于时局紧张，传闻两省将有军事行动，是日在沪成立苏浙和平协会并选出干事会。当选干事者：沈信卿、张仲仁、袁观澜、张一鹏、黄炎培、黄伯雨、史量才、钱强斋、穆抒斋、穆藕初、姚紫若、华蘅卿、袁履登、邬志豪、毛酉峰、章一山、方椒伯、盛竹书、徐建侯、陶拙存、徐申如、虞洽卿、李徵五、王晓籁。该会以主持和平，发抒民意，力图保全两省治安为宗旨。

△　苏联代表加拉罕在哈尔滨会见中日俄三国新闻记者，发表声明称：一、此次来华之目的，系为观察远东事情。俄国与中日两国壤地相连，互相会议通商，殊为必要。苏联政府放弃帝政时代的侵略政策，务求亲善态度，愿中国自古文明大开，国民爱和平，吾人尊重中国主权；二、中国人系最亲爱之同盟者，中俄两国宜协力一致，共登世界之大舞台。中东路问题，当由中俄两国解决，不许他国置喙；三、日俄会议须以对等资格相见，毫无降格以求通商之必要。

△　湖北天门县皂市镇被匪焚劫，全镇房屋被毁三分之二，被掳

居民200余人，英法教堂、医院亦毁。

8月17日　孙中山特派中央直辖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梁鸿楷兼广东两阳、三罗等处安抚使。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原任驻日公使汪荣宝不愿赴日，是日派施履本为驻日代办。

△　全浙女界联合会在杭州成立。该会以贯彻废止一切不平等法律之主张藉谋女界幸福，并服务社会为宗旨。

8月18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开会，讨论对于国会态度，根据孙中山来电所示精神，主张开宪法会议，以团结议员。

△　北京各政团借甘石桥俱乐部讨论组织总统选举会问题，当场推定12名代表，持各政团公函，向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商定日期，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便举行选举总统。

△　吴佩孚派咨议蒋某偕湘赵代表首斌赴鄂，是日往谒萧耀南陈述吴决至必要时助赵驱谭出境，目前暂听湘人自决。

△　孙中山致函在德留学之邓家彦，嘱游说德国人士促成中德提携。函称：此间须与德国资本实业家及其政府订一大建设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合作发展中国之富源，改良中国之行政，整顿中国之武备。总而言之，即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此步达到，则以中国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华塞条约之束缚”。“倘德国志士有此见地，促成中德两国之提携，其功业必比于俾斯麦者尤大也，而兄又为成此事业之中介，则功业亦当在四万万人之上矣”。

△　香港、澳门大风为灾。香港康乐道水深数尺，大树倾覆，电线多断，房屋损坏不少，船舶被损毁多艘。

8月19日　赵恒惕成立护宪军总指挥部，自兼总指挥，以抗谭延闿、蔡钜猷。委任陈渠珍为护宪军第一路指挥，攻蔡（钜猷）后路；唐荣阳为第二路指挥，攻蔡北路；唐生智为第三路指挥，攻蔡正面；贺耀组为第四路指挥，攻蔡东路，是为赵军右翼。刘铡为第五路指挥，防守湘乡；叶开鑫为第六路指挥，攻击湘南正面，是为赵军中路。杨源浚为第七路指挥攻湘南侧面，是为赵军左翼。

△　四川省军张冲所部攻占大足，直军宋大霈部向铜梁、永川溃退。

△　《江浙和平公约》经江苏、浙江当局齐燮元、韩国钧与卢永祥、张载阳及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签字后正式告成。月初，苏浙和平协会发起人张一麐等为消弭战祸，杜绝谣传，吁请苏、浙当局签订和平公约，经张奔走宁、杭、沪，面商当局，至此终取得一纸书面公约。

△　安徽各团体在省城教育会开省宪筹备会成立大会讨论制定省宪，省长吕调元竟派出军警数百人强行制止。

8月20日　孙中山令惠州安抚使姚雨平仍兼中央直辖警备军司令。同日向姚发出训令称："我军此次出征东江，在伐罪救民，歼厥逆魁，余无所问。所有胁从官兵应予招抚收编，以安反侧而示宽仁。"

△　四川省军周西成乘杨森派军队在前线三路失利，贺龙在酆都宣布独立袭攻长寿之机，联合汤子模、颜德基等部二次围攻重庆。直军、川军纷纷调兵援救，后袁祖铭调回黔军，始于27日将周军击退，重庆解围。

△　北京外交团路警委员会讨论临城劫车案善后之铁路警备问题，英国公使提案为：一、以外国军官设护路行政局于交通部，握全国路警权；二、各路设护路办事处，用外国军官管辖；三、组织护路常备队，分配各路直接由护路行政局指挥；四、此项经费为宽筹起

见，各路会计及路务总管以外人充任。提案遭到法、美公使的反对；日使以未奉政府训令，不参加表决。此项提案遂为多数通过。

△　在奉领事团会见张作霖，指责哈尔滨中国当局奉命将中东路地亩课移管，违反华府会议主旨。张答以中东路于必要土地之外占据广大土地，随意管理，是明明侵害中国主权，中国加以整理，自属至当，列国干涉，殊觉无谓。又称：因铁路管理之关系上，望再向孙烈臣督军接洽。22日，领事团前往会见孙烈臣，经协商同意将中东路地亩问题提交哈尔滨董事会处置。

8月21日　福州马尾海军舰队二次图攻厦门臧致平，海军陆战队再占金门，以作根据地。

△　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委任石青阳为讨贼军第三军总司令，汤子模为第一师师长、周西成为第二师师长，均归石青阳节制。

8月22日　张作霖在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商定对俄交涉方针。与会者有孙烈臣、吴俊陞、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王永江、张寿增等。议定六项方针为：一、承认劳农政府问题，决定与列国取同一步骤；二、中东路地亩问题，原应由中央政府交涉，然于东省治安亦有绝大关系，但决不变更既定方针；三、经济绝交问题，此乃地方人民所执之自卫手段，惟静待对方改变态度，此问题自可停息；四、修好及条约问题，为东省最所希望，如有必要，则于设置领事馆之事，不予反对；五、黑龙江航权问题，盖若不出本流以外，不必另加协议；六、国境问题乃中俄交涉上之烦琐事项，如俄国变更其从前侵华态度，认为真有商议国境问题之诚意，自当另与商议。以上各项，认为须与中央政府共商办法。

△　陈炯明党羽陈永安率部攻占香山县属之前山，滇军败退香山城。旋经陈策率舰队收复前山，陈永安逃往香州（今珠海）。

△　广州大本营兵站总监罗翼群以兵站各项支出至少日需2.6万

元，而每日领款仅1.2万元，不足支出之半数，办理为难，吁请大本营按日如数拨足经费，否则“惟有随同全部一律请予解职待罪，免误全局”。

△　山东旅京同乡会为山东开辟八埠问题特具呈国务院指出：“五六年来，日人占领青岛，豢养无数土匪，输入巨额军火，致沿铁路一带，伏莽遍地，路绝行人，佥以土匪未肃清前，万不能轻言开埠。”

8月23日　孙中山为便利指挥东江军事，迁大本营于石龙，开始第三次东征。

△　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政大会，讨论军队之编制、剿匪、防边及充实军械、扩充航空等，政界之政治教育、保甲及整理财政、澄清吏治等问题。关于直奉和议问题，决定拒绝，对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角同盟仍固守前约。

△　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因列名中立派之调停川战通电，被熊克武运动其部下旅长李伯阶软禁。是日，何光烈在顺庆发出通电，宣布卸职，师长职务暂交第九旅旅长李伯阶代理。

△　湘省长赵恒惕向各路“护宪军”下总攻击令，谭、赵两军在衡山附近激战。次日，护宪军中路蒋锄欧团击退吴剑学部第十七、十八两团，占领护湘关，25日占衡山。谭部湘中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宋鹤庚对所部军队（贺耀组、唐生智两师）失指挥能力，弃职赴汉转沪。

△　据《民国日报》报道：湖南学生会发表对于湘事宣言，指出：“中国人民要想不受外国与军阀的宰制，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独立国家，除用民众的势力，继续不断的革命，别无途径。”“联省自治实际就是联督割据，其结果只是保存军阀的势力，延长人民的痛苦。”“湖南自治的结果，只是赵恒惕专政，金钱选举，贿赂公行，非法抵借，杀死黄、庞，解散外交后援会，捕杀学生，以媚日人，投降

吴佩孚。”“我们的口号是反对联省自治！打倒封建军阀！继续民主革命！人民团结起来！”

8月24日　陈炯明系林虎、洪兆麟部从闽南开到东江，又得李易标、谢文炳两部从北路加入，是日陈军分三路向讨贼联军扑犯。左翼淡水方面陈军猛冲至广九路附近，联军被迫退却；中路李易标及惠城守军分路从泰尾进攻博罗，占飞鹅岭、笔架山等要隘，又分兵一路绕出苏村，将联军前后方水陆通路隔断；由龙门攻正果的陈军则进向石滩。孙中山急调驻广州之滇军蒋光亮部应援，蒋索饷不应命，乃改调李福林、吴铁城两部增援。

△　留京国会议员开两院谈话会，在吴景濂等人的操纵下通过“临时支给预备费方法案”，使议员在常会亦得出席费，以招徕议员进行“大选”。25日，离京国会议员联合通电，指责该项决议案非法。27日，国会议员彭养光等向检察厅控告吴景濂行贿害国。

△　山东省财政厅巧立名目设局征收产销税，遭到各地商人一致反对。长山税局被焚，分所长周锡禄被殴毙；胶县县署、税局被捣毁，伤数人；博山停装火车，潍县、高密均罢市，税局长逃。是日财政厅电各税局长返济南，产销税被迫停办。

△　北京江苏会馆开临时会议，决议电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对江、浙签布和平公约表示钦佩，但近三月内两省调动之军队仍未回防，不免怀疑，请速恢复原状，以昭信守。

△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京举行第二次年会，计到会500余人，决议案130件。是日与会全体人员一致反对外交团护路委员会借临城案干涉中国铁路警察及会计权，一面发表宣言并推熊希龄、黄炎培、张伯苓到外交部、交通部分头接洽，另向外交团表示上述反对态度。

8月25日　鲍贵卿奉曹锐之命，携条件赴奉与张作霖接洽奉直和议，鲍返津后是日派专人将携回之张作霖函送赴保定。

△　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交通部铁路警备处规则》，任命该部次长孙多钰兼铁路警备处处长，王赓、梁上栋为副处长，聘瑞典籍曼德中将为总教官，以抵制英公使在外交团所主张之外人护路案。

△　全国商联会对“临案”通牒发表声明：一、电请北京政府除赔偿外，概行拒绝；二、公布救护经过；三、全国组织国民后援会，以为政府后盾；四、国民督促政府剿匪。

△　在河南新郑县城内东南隅住户李锐宅旁园圃中，因凿井至三丈时发现东周铜器，先后掘得70多件。

8月26日　孙中山至粤东平湖，同杨希闵商议作战计划。同日，电李福林速来博罗督战，又命廖行超率部赴博罗解围。

△　孙中山函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告以闽方讨贼战况及东征形势，令筹紧急军费30万解应急需，俾早日结束东江军事。

△　粤讨贼滇军胡思舜部进抵东江淡水，陈军向白芒花退却。

△　中华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到20省代表600余人，会议举出董事40人（每省二人）。选出熊朱其慧、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等九人为执行董事，熊朱其慧被推举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

△　北京学生联合会因外交等问题开会决议：一、对外交团议定之变相共管铁路案，绝对反对；二、对中俄外交问题，欢迎俄代表加拉罕来京，采用国民外交方式，由国民自动承认苏联，希望中俄会议后，履行1920年之对华宣言，抛弃帝俄时代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与权利；三、坚持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四、国会期满后，请各省撤回所选之代表，反对贿选总统。

8月27日　湖南鲁涤平率中立军五团在湘乡不许“护宪军”叶开鑫部通过。次日，鲁率二师全体军官再发中立通电，宣布“划出本师原

属各防区为缓冲地点，凡区域以内所有保持秩序、清查盗匪之务，仍由涤平等担负完全责任”。

△　黔军袁祖铭击退围攻重庆之讨贼军周西成部。援川直军支队长于学忠任重庆沿江司令兼城防司令。

△　博罗告急，孙中山命古应芬回广州催蒋光亮部增援。

△　留京国会议员赵正印等通电反对英公使所提护路要求，以该项主张“不独干预我内政，攘夺我路权，而且破坏华会条约，破坏东亚和平，关系重大”，应同心同力，拒绝交涉。

8月28日　孙中山复函谭延闿，勉以“猛力毅进，解决湘局”。

△　北京摄政内阁开会，公推高凌霨临时主持院务。

△　湘省长赵恒惕虑后方不稳，派鄂军夏斗寅部于是日夜间围攻长沙陆军讲武堂，缴取学员枪械，激战至天明始平息。

△　致中银行之京、津两行亏款倒闭，京行经理张毓文先期逃匿，津行总经理杨惠廉、协理胡景诚、经理管凤冈等潜逃。致中津行系本年6月成立。

8月29日　粤东江连日大风雨，陈炯明军攻博罗不得进，讨贼军刘震寰部困守城下。孙中山复调滇军范石生全部来援，并饬杨希闵击退左翼淡水陈军。

△　袁祖铭部黔军攻占四川璧山，向大足、铜梁进攻。

△　湖南省长赵恒惕以“附逆毁宪”罪名免去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宝庆镇守使吴剑学本兼各职。

△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第五次评议会在广州闭会。会议通过请孙中山组织政府行使总统职权决议案及该会今后运动目标和进行计划案

等多项议案。

8月30日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下令责成有匪省份之军民长官合筹剿匪事宜，督同地方长官大举清乡，期于最短期内肃清辖境，务绝匪源；令派徐海镇守使陈调元为苏皖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王为蔚、张培荣、李传业为副司令。

△　广西督理林俊廷派兵东下图梧州，西江讨贼军第五师黄绍竑决先发制人，在海军浅水炮舰舰队配合下攻占广西藤县。

△　湖南“护宪军”叶开鑫所部蒋锄欧、刘重威两团攻占衡州（今衡阳市），谭延闿退耒阳，谢国光退祁阳，吴剑学退宝庆。

8月31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举行临时会，反对黎元洪南下及在沪以政府名义发号施令。

△　讨贼湘军将领张辉瓒率朱耀华、黄辉祖两团由易家湾猛扑长沙。赵恒惕仅有兵两营，不能御敌，又因湘潭及刘家台兵变，遂于9月1日晚率同鄂军司令夏斗寅及省署各司长出走醴陵。朱耀华团占领长沙后，当由张辉瓒、方鼎英出示安民，并电迎谭延闿及宋鹤庚、鲁涤平、刘铦、林支宇回省。

是月　河南近一月来，霪雨为灾，山洪暴发，受灾最著者为豫东之西华、汜水，豫南之商城，豫西之巩县、宝丰、洛阳。京汉、陇海两路被洪水冲断数处。

△　陈炯明系邓本殷指使所部在海南岛澄迈、临高、儋县对讨贼军的家属和乡里居民进行报复，计屠杀乡民600余口，焚掠5000余家。

△　罗文幹案经京师高检厅审核，以上诉理由不充驳回，且七天抗告期限已过去，该案确定无罪。

△　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聘请傅铜为国立西北大学筹备处处长，并指定地址及筹就30万元为开办费。

9月

9月1日　　孙中山命令到达东江石龙各军及抵苏村之福军、滇军攻击前进。孙所乘座船由苏村向博罗开驶，夜泊第七碉。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派朱兆莘为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准驻奥地利公使黄荣良辞去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兼职。

△　袁祖铭通电就吴佩孚所任援川各军前敌总指挥职。

△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以金钱“奖励”议员出席，议员趋之若鹜。是日晚，23政团在北京甘石桥俱乐部会议，到70多人，一致要出席费，并推钱崇恺、万钧、葛庄分赴各政团劝不领者，并设宴款待，务使之往领出席费。

△　广西陆荣廷将边防督办交谭浩明接理，本人回武鸣原籍。

△　北京政府交通部向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在京签字，借款总额为170万元，月息一分三厘五，本息以正太铁路全部余利之三分之一为抵。

△　北京政府交通部规定，火车运邮件自是日起，一律实行收费。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徐善庆代办驻墨西哥使事。

△　日本发生大地震，被灾地域，东从千叶县起，经东京、横滨、横须贺、镰仓、箱根、伊豆直到静冈止，计一府六县，面积二万方里。震后大火，日本精华除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外，几乎尽付一炬。人民死亡约2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浪人借口“韩人纵

火”惨杀韩人，旅日华侨及共济会领袖王希天等数百人亦遭惨杀。

9月2日　　蒋介石所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随后在苏参观、访问，历时两月余，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归国。

△　川军邓锡侯、陈国栋两部攻占合川，熊克武、但懋辛部省军退往顺庆、遂宁。

△　苏联代表加拉罕到达北京，各团体及外交界人员前往车站欢迎。次日，加拉罕在京发表对华宣言，重申前两次宣言之原则与精神依然为苏联对华关系之原则，并指出中苏两国亲善之必要。

△　晚21点15分，甘肃固原（今属宁夏）发生地震颇剧，历时10分钟之久。

9月3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黎元洪南下问题，决定反对黎元洪以总统名义组织类似政府之一切机关；重申孙中山前电，劝国民党籍民八议员在沪勿争出席。

△　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察哈尔都统张锡元、绥远都统马福祥、热河都统米振标、口北镇守使谭庆林等通电索饷，并催促国会速办大选。

△　河南陆军第三混成团团长郭振才率部在河南桐柏县柳树庄将杆匪刘排长包围，将意籍梅神甫救出，同时救出肉票500余人，多系湖北枣阳、京山、天门等地被匪掳去者。梅神甫因受枪伤甚重，于救出后次日死亡。

△　日本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离任回国，由内田嘉吉继任。

9月4日　　孙中山特派大本营出勤委员赵西山前赴陕西传谕同志各军将领，迅速协同一致讨贼救国。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令免教育总长彭允彝、农商总长李根源本职，以黄郛署教育总长，袁乃宽署农商总长，又以陆军次长金绍曾代理陆军部部务。5日，李根源、彭允彝抗议摄政内阁非法以阁员任免阁员。

△　湘中立军将领鲁涤平在湘潭致电谭、赵两军长官提出和平办法：一、由各战区两方指挥，互相约定先行局部停战；二、停战后再商定地点，由各处派员会商办法。

△　四川讨贼黔军周西成部再攻重庆南岸，与黔军袁祖铭激战数日，后袁部援军开到，10日周部主动撤往綦江，重庆第三次围解。

△　中俄交涉署督办王正廷在北京北海静心斋欢迎苏联代表加拉罕。王在欢迎词中希望苏联追随美国之后尘。加拉罕在答词中对王说表示拒绝，并声明苏联与中国将建设绝对平等之关系。

△　北京政府派驻日代办前往日本外务省慰问震灾，令财政部迅筹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为中国政府捐助之款；并由各地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尽数拨汇。又令外交部转饬驻日长崎、神户领事就近调查侨日商民被难情形；由内务部、财政部商拨款项，派遣专员会同红十字会携带衣服食物药品，迅即驰赴东京一带设法援救。

△　孙中山致电日本摄政皇太子，对日本遭受震灾表示“十分真挚的同情与吊慰”。

△　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地震，连续六七次，官署民房震倒颇多，城墙亦被震裂。

9月5日　　孙中山复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电，指示应付政局变化之意见：“一、黎（元洪）南下，据浙卢意，只承认其私人资格，似未能遽组政府。闻此次乃由段系利用，亦未便置词，以拆台为取得吾党同意故也。由党宣布反对非宜，似以不理为是。二、川湘为吾党支

配，搭台当不能得多数赞同，团结西南，必联其当道，力唱党义，方为正办，余均苟且，不能共肩救国之任。”

△　陈炯明系邓本殷部乘讨贼军集中东江苦战之际，攻陷北海。广州大本营令“永丰”舰前往增援。

△　黔军袁祖铭部攻占四川璧山。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摊分关余，并拨还民国九年3月以后西南应得之积存关余。7日，由广州英领事杰弥逊将照会转往北京。28日，外交团答复广州大本营称，对关余问题正在考虑。

△　港绅英籍华人何东爵士曾分致函电与南北各方要人，提议召集各省领袖南北名流联席平等和平会议，共谋息争恤民，解决时局纠纷。是日，孙中山复电赞同，表示“届时当躬亲列席”。在此之前，唐继尧、张作霖、卢永祥、黎元洪曾先后有函电答复，表示赞成。

9月6日　湖南讨贼军收复衡州，赵军退往攸县、醴陵。

△　绥远混成旅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三混成旅，北京摄政内阁任命王麟庆为旅长。

△　北京政府派新任驻日代办施履本赴日慰问地震巨灾，并办理被灾华侨善后事宜。汤尔和、江庸亦代表红十字会及救济会赴日。

△　苏联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介绍苏联成立情形；苏联的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之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派驻华全权代表团”。同日，顾维钧外长会见加拉罕。

9月7日　粤陈炯明军李易标、谢文炳、陈修爵等部万余人围困博罗。是日，陈军进犯淡水，被讨贼滇军第五师胡思舜等部击退。

△　袁祖铭部黔军攻占四川铜梁、大足。

△　北京众议院常会通过“国会延期案”，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对此，京中各界反响甚烈，谓“国利民福之件，无一桩决定，独于自身任期，两点钟通过三读，窜改定法，堕丧人格”。京中各报亦一致抨击，《京报》记者王懿年因此被京师检察厅传讯。

△　日清公司之“宜阳丸”、“云阳丸”两轮由宜昌开往重庆，载有北军“援川”之大批军火，是日驶经涪陵四川讨贼军第一师汤子模防区时不服驻军检查并开枪击毙官兵六名。汤部官兵当即将“宜阳丸”截住，检获手枪数十支、枪弹百余万发、炮弹三百多发。“云阳丸”则乘间鼓轮逃逸。“宜阳丸”及日人驾驶员二名被扣留，押运军火之军械处长张运玑被捕。随后汤子模令成渝交涉员向驻川日领事严重抗议，并要求赔偿此次所受损害。

9月8日　　孙中山亲率援军杨廷培一部，由石龙开赴东江前线增援，是日下午到达苏村。同日，东路讨贼军胡思舜、许崇智等部攻克白芒花。

△　广东省长廖仲恺函滇军师长廖行超，为广东教育机关呼吁经费。函称：教育机关职员欠薪半年有奇，而粤征收机关尽归握师干者掌管。再三筹思，求于军队给养无碍之中，谋学界一息命脉，决于花筵捐附征四毫。惟贵师以有碍饷源，欲行阻止，但舍此更无可为教育费，请兄令花捐局不得干涉省署批准之加捐。

△　离京国会议员褚辅成、汤漪等483人在上海联名通电，指责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利用国会包办大选，其条件为选举曹锟为总统者每票8000元，其对议员人格，极尽侮辱。重申留京议员自6月13日以后一切决议无效，所有常会开会或总统选举会根本不生效力。

9月9日　四川省军第五师第九旅李伯阶部攻占合川。

△　吴佩孚分致孙传芳、王永泉、王献臣一电，谓“臧（致平）果诚意休兵，应令将武装全数解除，否则仍合力会攻，免留后患”。

△　北京学生联合会在中央公园开会欢迎加拉罕。学联代表致词希望中俄两国之真实亲善出现，以抗拒其他帝国主义者对我国所施之压迫与侵略。加拉罕致答词称，以全世界情形而论，两国实有不能不亲善之理由，为保持两国之生存计，及促进世界和平计，皆觉有亲善之必要。

△　招商局“新昌”轮由粤驶沪，当航行至莲花山附近时，有头等舱“搭客”40余人持枪将乘客、船员财物劫掠一空，并掳乘客九人，换乘驶来接应之贼船逸去。

9月10日　粤东江博罗守军杨廷培部冲围而出，攻占铜鼓岭，陈炯明军向派尾、响水退却，博罗解围。孙中山进城抚慰，并订定追击计划。

△　孙中山任命孙祥夫为海军陆战队司令。

△　留京议员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恐人数不足，再度流会，遂虚报出席人数为436人，宣称已达法定人数，决定12日开会选举总统。但此次实到会者仅431人，不足成会人数。12日，众议院议事科科员秘书孙曜通电全国，揭露此次预选会议虚报人数实况。

△　哈尔滨《松江日报》创刊。

9月上旬　广东石龙大水成灾，水退后又遭大火，总计各街店户被水冲塌或被火毁者约六七百家，损失逾百万，失所难民数万。

9月11日　黎元洪偕陈宦等雇乘日轮“长府丸”由津抵沪，谋组织政府。

△　黎元洪自沪致电孙中山，谓：“元洪忝受国民付托……责任不可以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随国人之后，力图靖献。……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　粤东江讨贼滇军杨希闵部克复平山；朱培德、吴铁城部夺回增城。陈炯明军由河源退往海丰。

△　讨贼湘西第一军蔡钜猷之刘叙彝部占益阳，护宪军唐荣阳归附蔡钜猷，攻入常德。护宪军贺耀组、唐生智部败退湘阴、岳州。

△　南京总商会电请上海总商会就近忠告黎元洪，切勿从事破坏和平之政治运动；并劝告江苏军事当局，不得借口有所行动。次日又为此致电杭州总商会，请就近劝告浙江当局。随后杭州总商会复电称：浙省军事当局对于黎莅沪视为个人行动，对地方则抱定保境安民宗旨。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派张竞仁为财政整理委员会专门委员长，周诒春为秘书长。该会以整理外债名义，拟向新银团或其他外资之集合体借一大款，除还去各债外，尚余若干为度日之费。

△　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因揭载军阀阴谋，被直隶省长王承斌禁止在天津华界发售并不准寄递。是日京津各报驻沪记者李士林在“一江春”宴请各团体，到会之30余团体代表通电呼吁为该报争回自由。

9月12日　黎元洪在沪杜美路26号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费行简、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举行会议。黎说明目前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希望各省予以帮助。汪精卫对黎此说不予支持，各省代表表示须请示本省长官才能回答。

△　粤北路讨贼滇军赵成梁部进占南雄。14日，沈鸿英部及北军复陷南雄，滇军退守始兴。

△　湖南谭、赵两军在易家湾激战，赵军获胜。谭军黄、朱两团当晚退往宁乡、浏阳。次日赵军占长沙。

△　《申报》揭露曹锐、王承斌为曹锟筹措贿选经费，手段恶劣。一为借惩办贩卖金丹（毒品）为名，勒罚巨款；一为向各县勒借军饷。前者自谓至少可得500万元，后者派定共借200万元。

△　复辟祸首张勋在天津英租界松寿里寓所病死。

9月13日　孙中山在博罗召集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会议，讨论总攻惠州城计划。会后接黎元洪自沪来电，遂决定返广州。

△　广东西江陈炯明系之黄志桓等部攻廉州（今合浦），企图阻挠孙中山调遣西路讨贼军增援攻惠州。

△　原东路讨贼军第二师师长吕春荣叛投陈炯明，吕部下旅长莫雄及梁若谷通电与吕脱离关系，仍一致拥护孙中山。次日，吕春荣在遂溪宣布就任陈系粤军第二师师长兼高州善后处长职。

△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以黎元洪抵沪，人心惶恐，发出布告保境安民，严禁破坏秩序；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　京绥线鸡鸣山煤矿发生火灾，七百尺及八百尺矿洞全焚，工人千余名尽熏毙或遭活埋。

9月14日　湖南谭延闿部讨贼军克醴陵，向攸县、茶陵、株洲活动。是日，驻军湘中暂持观望态度之鲁涤平本日发表通电，主张谭、赵两方在长沙开和平会议。

△　广西林俊廷、张其锽、刘日福、陆云高、蒙仁潜、李宗仁、陆福祥、韩彩凤等通电声称“军民长官集议，推陆荣廷督办广西全省统一事宜”。随后陆复电，谓年老请另举贤能，惟有事见商，亦可助

力。

9月15日　根据曹锟、吴佩孚保荐，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任命沈鸿英为陆军第十七师师长，邓锡侯为陆军第三十师师长，陈国栋为三十一师师长，唐式遵为三十二师师长，潘文华为三十三师师长，袁祖铭为三十四师师长。又任命彭汉章为黔军第一师师长，王天培为黔军第二师师长。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派陆徵祥为国际保护劳工会委员，萧继宗为第二委员。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以各县旧监狱专以禁锢为事，殊不合今日之用，下令改良旧监狱，筹设新监狱，于后凡有犯罪者务于在监授以相当工艺，使之出狱以后得以复为良民。

△　湖南省长赵恒惕两电鄂督萧耀南，谓已饬湘鄂路局恢复武长路车，以利运输，请速拨大批弹药运湘接济，并请转电洛阳速派援军。

△　东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该校由奉天省长王永江兼任校长，暂设文法理工四科，计划日后添设财政、商业等科。

9月16日　厦门臧致平派兵分五路攻泉州，次日围攻惠安，旋经王永泉派队击退。

△　上海对日市民大会在总商会大厅举行第二次提倡国货大会。干事长冯少山在开会词中称：该会对反对“二十一条”、收回旅大而为经济绝交之进行，仍抱初衷。迩来时开提倡国货大会，并非放弃以前主张，实是从消极方面而为积极进行，要求切实提倡国货，不买劣货，为律己之标准。

9月17日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集特别会议，讨论黎元洪来电，以黎此次南下，绝无切实解决时局之方法，徒供政学系等政客之

玩弄，“吾人惟有努力贯彻救国主张”。

△　苏联代表加拉罕于本月8日致函孙中山，希望在实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最紧密关系的伟大任务中，得到帮助。是日，孙中山复函加拉罕，指出：“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我们生活在和其他大国平等的条件下，并可以使我们摆脱凭借强力和以经济上的帝国主义方法而行动的国际体系所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奴役。”次日，孙中山又致书加拉罕，说明蒋介石赴苏使命，并盼加拉罕前来广州。

△　北军、川军攻占四川涪陵，讨贼军周西成、汤子模部向南川、綦江退却。江路复通。

△　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调集大军向泸州杨森部发动猛攻。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以漳厦护军使臧致平“破坏统一，负隅抗命”，李崇寅、田德润、邢蓝田、曾少乾、艾庆镛、张保之等“朋比附乱，扰害地方，均属内乱重犯罪”，命令将臧等“一并褫夺官职、勋章，通缉惩办”。

△　福建督理孙传芳受吴佩孚之怂恿，由汉口回福州任事。

△　张作霖所派参与中俄会议之代表吕维东（奉天省议会副议长）、沈成章（警务处长）、祁彦术、杨倬（外交顾问）等抵京。

△　华威银行上海分行开幕。该行为中国、挪威两国商人合组，资本额1000万元，总裁刘焕，副总裁曼德，董事长江天铎，行长谭海秋，副行长哈斯伦。

9月18日　孙中山再赴东江前线，抵石龙。

△　李根沄率所部4000人脱离桂军沈鸿英投孙中山，被编入讨贼滇军第三军蒋光亮部。

△　湖南赵恒惕军蒋锄欧团攻占株洲，谭军谢国光部向渌口、醴陵溃退。

△　陕西讨贼军第一路司令张藩致电孙中山，以曹、吴窃权祸国，决率秦中将士组织陕西讨贼军，为国除贼。

△　北京摄政内阁会议通过张弧以“九六公债”加入内国公债整理案内及农商部提请裁撤边藏及青海劝业专员、川边矿务督办等案。

△　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否认北京之非法摄政内阁及非法国会，敦请孙中山重组政府，行使大总统职权。

△　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与苏联代表加拉罕商谈中俄会议事，加拉罕要求中俄先行复交，王未应允。

9月19日　广东陈炯明系粤军第二师吕春荣进犯阳江，孙中山调陈策部前往抵御。

△　讨贼滇军朱世贵部由广东英德开赴韶关转始兴，抵拒北军。

△　闽王永泉、王献臣、黄大伟、林虎、洪兆麟等围攻厦门各军，伙同海军计划对厦门发动总攻击，因内部有矛盾中变，臧致平得以暂时维持地盘。是日，林虎、洪兆麟所部开回粤省，援救惠州。

△　孙中山批准大理院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赵士北关于清理庶狱的报告，将广州及茂名等30厅庭所系罪名均非重大、情节皆有可原的人犯639名，依照减刑办法，明令宣布减刑，立予释放。

△　财政整理委员会在京开幕，会长颜惠庆演说，谓依缓急轻重之序，巩固财政信用，先整理债款，将既往无切实担保之债务，为通盘整理计划，报告政府，早日定案。

△　直系封锁贿选消息，钳制舆论，是日封闭北京《社会日

报》，并捕去记者林万里等三人。同日，中一通讯社亦被封，编辑李国华被捕。

△　甘肃银行在兰州开幕，委任牛载坤为经理。开幕后将官银号旧票一律按市价收回。

△　汉口实行抽收卷烟特捐，是日纸烟业大同行五家、小同行80余家因反对无效停市。22日，经县署调停后开市，卷烟值100元抽印花税20元。

9月20日　孙中山赴东江飞鹅岭筹攻惠州。大本营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局长杨仙逸、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等为攻惠作准备，在博罗前方梅湖炮台附近船上安放水雷时发生爆炸，谢、杨、苏及军官佐随从员役30余人当场牺牲，攻惠计划受挫。27日，孙中山令追赠谢铁良、杨仙逸、苏从山均为陆军中将。

△　北京政府外交部拨付美商克门因伤毙命之恤金2.5万美元，该案全部了结。

△　北京平市官钱局因借款难成，铜元票无款兑现，加之抵押之铜元票到期不赎，多流入市面，挤兑风潮再起。与此同时，中南、边业、劝业、保商、华成、察哈尔兴业六家银行，亦发生挤兑。同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以平市官钱局内容复杂，黑幕重重，呈请北京当局将贪墨官吏一一逮捕，依法惩办，并查封彼等财产抵作铜元券基金。

△　张作霖电令朱庆澜先切实调查中东路铁道用地情况，再清权限。

△　浙江“全浙教育会联合会”在鄞县举行会议，于25日结束，通过“促进平民教育”、“组织全浙教育参观团”、“普设阅报社”等13项决议案。

9月中旬　湘赵恒惕军唐生智部入长沙后，除捕杀谭系多人外，并杀鲁涤平师副官岳某、唐荣阳部参谋长钟某、副官长向振祺等200余人。宋鹤庚、鲁涤平住宅亦被抄。长沙知事及商会会长均逃往汉口。

9月21日　直系鄂军第二十五师四十九旅两个团进驻岳州南、汨罗北桃林寺黄沙街一带，旅长陈德麟移驻岳州。又鄂军第五十旅陆续开往岳州以北城陵矶。该师骑兵团一营于28日开赴岳州。

△　前广东省银行行长兼广东财政厅长程天斗因侵吞军饷案，由大本营组织特别军法会审，经查明侵吞公款达380余万元。本月8日，程天斗被判处死刑，财产充公抵补亏空。承审官又以程往昔奔走国事，不无前劳可念，报请“予以减免，俾其自新”。是日，经孙中山批示准予特赦。程于缴纳罚款40万元后，获释去港。

9月22日　孙中山派汪精卫赴奉天接洽军国要事。

△　赴沪国会议员在上海继续举行常会，众议员签到131人，列席者85人，请假者63人；参议院到场议员51人，请假者41人，共计两院实到议员136人。仅议工人监督议员团等五团体请愿一案。24日，国民党籍议员凌钺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反对政学系、安福系政客的活动。

△　湖南谭、赵两军在长沙附近及易家湾相持激烈，中立派鲁涤平电商双方停战一星期，并在中立军驻地湘潭姜畲地方交换意见。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任命史俊玉为苏皖鲁豫四省剿匪副司令，前经派之副司令李传业准其无庸充任。

△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在北京南苑召开军官会议，所部旅、团、营长与会，决议保境安民，不干预政治，不参预内争。

9月23日　粤东江陈炯明军由三多祝向平山反扑，讨贼军许崇智

部退回白芒花，陈军复占平山。同日，马鞍、横沥一带陈军改守为攻，滇军胡思舜部退回三栋，前此被讨贼军切断的惠州与汕尾间的交通恢复。

△　四川熊克武部讨贼军前敌总司令赖心辉率一、三两军合组之同盟军，取道璧山进入巴县西里，直抵浮图关，日夜猛攻，周西成部亦分兵渡江来会。

△　直军援助湘省赵恒惕之枪支150箱，枪弹400箱，炮弹200箱，是日由汉阳兵工厂拨往。

△　北京政府财政部决定此次京中各机关发薪三成，军警发六成五。据《申根》报道，京中“灾官”平均本年仅领过薪金两个月又四次三成。警察有白日站岗，夜间拉车度日者。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俄国侨民居留我国各地者往来无定，难免不有“过激派”混杂其间，于华人治安问题关系甚巨为由，通电各省按所规定之《取缔俄民留居规则》办理。

△　山东巨匪范明新率匪众2000余攻陷河南西华县城，掳去东城福音堂外国女传教士二人，绑走“肉票”200余人，内有高小学生90余人。

9月24日　广东滇桂讨贼各军拂晓向惠州城发动第三次总攻击，仍不克。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将关于临城劫车一案复文交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德礼，同时致送署名于前次照会之各国公使。复文分三大部分，关于赔偿问题，对受害人允酌予抚恤，但累进计偿理由欠明晰，予以驳斥；关于保障问题，声明护路为目前中国内政要举，现中国已自动整顿；关于惩罚失职官吏问题，认为此属中国内政权限，负责人已按法惩处。

△　金融界对北京政府的中秋节关垫款164.4万元，是日签字，由中南、盐业、金城、汇业等行共同垫出。此款由华比银行出面担保，日后由汇丰从盐余中拨还。

△　北京政府海军部全体部员，同赴海军总长李鼎新住宅索薪。众人诘问每月盐余用途，李默不能答，反电告军警机关拘捕科长林鉴殷等五人。众人回署开会，一致议决全体辞职，并于25日发出通电表示“誓不与此惨无人道之总长共事”。李则以公然侮辱长官，无力维持为词提出辞职。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明令予以慰留，并着部员限期到部办公，否则一概开革。随后，经杜锡珪来京调停，全体部员于10月2日恢复办公。

9月25日　孙中山自白沙堆回博罗。

△　前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22日由叙州抵重庆，意在调和息战。熊克武不许，于是日调叙、泸右翼军进攻重庆。刘湘遂助杨森军协谋防御重庆。

△　山东临朐县城突被大股土匪攻入，围县署，攻警所，闯入监狱将押犯放出，并在城中肆行劫掠，天明始饱载而去。

9月26日　粤东江讨贼军占领龙华（镇）及龙门（城）。同日，许崇智从横沥赴博罗谒孙中山，孙命许为东江作战中央军总指挥，杨希闵任右翼，朱培德任左翼，分途击敌。

△　孙中山任命马伯麟为长洲要塞司令；又命令撤销鱼雷局，所有鱼雷事宜暂归长洲要塞司令管理。

△　广州市内各打饷馆（系广州当地代货主向海关交纳关税，从中获取佣金的报税行业），对粤海关以该行瞒税处以罚金10万元不服，进行罢业。其后经调处，该行允“报效”军费四万，另借款二万了事，10月1日复业。

△　北京政府署财政总长张弧呈请辞职，摄政内阁予以慰留。

△　北京参议院开会，到142人，以102票通过众议院移交的延长众院任期案。次日，北京摄政内阁议决国会延长案，准作开会选举总统的交换条件，依两院议决公布。

△　曹锟偕同参谋长陆锦等在保定公园剧场观剧，刺客向曹所在包厢投炸弹两枚，均未击中，炸伤楼下观众三人。

9月27日　孙中山自博罗返回广州。

△　浙督卢永祥通电反对北京当局贿买大选，声称“不但永祥愚戇，未敢承认，凡有血气，谅亦同深愤慨”。

△　北京地方检察厅为铜元票风潮，正式票传平市官钱局前任监督魏联珉、李士炯到厅候讯。

△　北京外交团会议，对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临城案复牒，决定先各向本国政府请示；又以川、湘发生战事，策划由外舰组织“长江警备舰队”。

△　宜昌杨森新编团哗变，直军王汝勤派队镇压，变兵向小溪、当阳窜走。

9月28日　吴佩孚致电北京摄政内阁，反对众议院延长任期。30日，吴再电北京摄政内阁，反对发表众议院延长任期令。

△　上海丝茧女工总工团开紧急会议，再发哀告书揭露女工受资本家压迫情形：一、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近更强迫加工三小时；二、每日工价四角，借口押金扣留二角，动辄处罚将押金充公；三、做工稍不如意，惨加酷刑。呼吁各界同胞合力援救。

9月29日　广东讨贼军黄明堂部张旅，在廉州（合浦）被粤桂军

申葆藩、冯铭楷部围困一月余，是日开城投降。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江华赴四川，调查周西成部扣留日轮“宜阳丸”案。

9月30日　孙中山以财政机关弊窦易生，特派古应芬秉公查办。自运署、财厅、市厅、公安局、官产处各机关公款出纳各件，一律查核。又以兵站部设立数月，人言啧啧，特派许崇智查办。

△　孙中山任命陈友仁为大本营航空局局长。

△　高凌霨、吴毓麟、熊炳琦、王承斌联名函北京参众两院，要求先选曹锟为总统，然后再制定宪法。

△　驻沪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电否认曹锟贿选总统，指出离京议员列名讨曹者，已达480人，议会开会已不合法定人数，曹锟如果非法窃取总统，全体国民应一致讨贼。

△　武昌师范大学成立，教育部派张继煦为校长，开始授课。

△　山东德平西北乡王家寨子，突被土匪五六百人攻入，大肆抢掠，焚烧房屋，屠杀人民，被害300余家，死亡600余人，临行又择富户乡民架去，小刘家庄等处被匪害死者亦有三四百人，统计此次匪祸废命者1000余人，被绑架150余人。

10月

10月1日　广东省长廖仲恺、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联名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指责“曹锟以金钱勾结非法议员，准备大选，希图盗窃名位”。表示“讨贼救国，义无反顾，去此奸宄，惟力是视”。

△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通电反对曹锟贿选，表示赞成浙江

军务督办卢永祥反对贿选之通电，若少数不肖议员不顾国家尊严和个人人格，违法图财，所选之总统，“根本上谓为无效”。

△　江苏省公团联合会通电，主张根本“否认北京非法国会”，略谓：“私开非法伪选会，无论选举何人，概为私生之非法伪总统，与安福会之选徐世昌者同论。”

△　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暨全川将领通电反对曹锟贿选，吁请全国共起声讨，并表示“出师戡乱，愿效前驱”。

△　北京甘石桥俱乐部为曹锟贿选发支票，每名5000元，规定总统选出后三日即行付现。大选派议员纷往领取，共发出支票573张。同日，众议院电催居津、沪议员即日回京，并声言大选“果有非法干涉，则会内无论解决何项问题，概归无效”。

△　北京政府内务部通告，本年10月7日即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节，所有文武机关团体，均放假庆祝，并准各项人员前往孔庙自由行礼。

△　粤许崇智所部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张国桢部收复河源，陈炯明部向老隆（龙川）、回龙溃退。

△　驻京日使芳泽谦吉向外交部提交抗议照会，要求中国政府训令速释“宜阳丸事件”被扣之日人。外长顾维钧表示该案不至稽延。4日，海军总长李鼎新向顾维钧建议，由外交、海军两部会衔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请各国将派往长江之军舰从速撤退，各国在华侨民统由中央会同地方军队保护。

10月2日　孙中山以军用浩繁，大本营急需款用，令广东省长廖仲恺于所属各县设立筹饷局，速办正杂税捐，切实计划，严重监督。

△　徐绍桢奉孙中山之命在洛阳会晤吴佩孚，再次试探合作之可

能性，吴以与孙中山“在根本观念已距离甚远”为由而加以拒绝。

△　为保护曹锟贿选，京师军警各长官联席会决议保护办法五条：一、派侦探赴上海、天津、保定等处探究各方反直情况；二、在进京火车上安置侦察；三、各车站添派军警；四、清查各旅馆；五、注意旧官僚或军士有无与反直派方面暗通声气之行为。

△　旅沪川民自决会、上海工商友谊会、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等群众组织分别发表通电，严厉谴责曹锟贿选总统。

10月3日　众议院议员邵瑞彭以贿选支票5000元一张为证，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控告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10月1日晚在甘石桥俱乐部为运动曹锟为大总统向议员行贿之罪行。同日，邵并通电自述5000元支票之来由，同时将行贿支票制版，向各报发布。

△　北京众议院决议，咨请摄政内阁否认金法郎案。同日，参议院决议：将长久缺席之参议员杨庶堪、张继、曾继梧、胡汉民除名；通过《中国智利通好条约》。

△　松沪护军使何丰林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指责受贿议员丧失人格，称颂卢永祥、张作霖之反曹通电“辞严义正，实获我心”，表示对总统选举大事“难安缄默”。

△　中华民国参众两院国民后援会、中华全国民主协济会、浙江公民大会、大华文化社等团体分别通电，强烈反对曹锟贿选总统。

△　北京甘石桥俱乐部决议，5日上午10时开选举总统会议，对入场之议员及参观人员严格检查。

△　孙中山训令广东省长廖仲恺预办米粮100万斤，以备攻克惠州后救济灾民。

△　吴佩孚派葛云龙在岳州（岳阳）设立警备司令部，由萧耀南

部第二十五师编两混成旅进驻。吴自兼司令，萧任副司令，葛任参谋长。

△　山东省议会议员李长德等68人联名电北京摄政内阁，谓省长熊炳琦久离职守，“日夜驰驱于京保洛间”，“不知其在京任何职作何事”，并称熊在鲁省民怨沸腾，请将熊调离鲁省。

10月4日　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秘书长杨庶堪、外交部长伍朝枢、内政部长徐绍桢、财政部长叶恭绰、建设部长林森联名电孙中山，历数曹锟祸国殃民之累累罪行，吁请全国军民同志奋起诛彼元恶，请孙中山、段祺瑞共谋建设。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公布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改选令：民国十二年10月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改选年限；第二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另以教令定之。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任命张之江为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李鸣钟为第八混成旅旅长，宋哲元为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

△　北京众议院召开宪法会议，出席议员551人，足法定人数。黄赞元报告修正宪法情形后，吴景濂以地方制度章各条分付表决，二读通过。

△　北京甘石桥俱乐部为曹锟贿选总统活动通宵，发给贿选议员之支票增至600余张，支票有“秋记”、“孝记”、“兰记”、“洁记”四种。

△　旅沪各省同乡会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反对曹锟贿选，议定若北京议员不顾民意，竟行选出曹锟，则一、通告全国反对；二、一致罢税；三、为曹锟、吴景濂铸铁像。

△　贵州省长刘显世通电称病去职，遗缺命督办唐继虞暂代。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代表十六国驻京公使到外交部向

外长顾维钧递交“临案”第二次通牒，要求维持8月10日第一次致中国牒文中所提及的旨趣及结论。顾接牒文阅毕，答称“中国政府及人民委曲求全之苦心，竟不为外交团所谅，深为惋惜”。

10月5日　北京国会开会选举总统，场内外军警、侦缉队、保安队密布。军警要人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亲自出马。因不足法定人数，三次延长时间，始到590人，曹锟以480票当选总统，是为“曹锟贿选”。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通电全国，宣布曹锟当选总统。

△　孙中山为开展东北各省党务，特派孙天孙为国民党大连支部长，张晋为哈尔滨支部长。

△　吴景濂、张伯烈电保定祝贺曹锟当选总统。同日，高凌霨在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筹备曹锟就职典礼，并议定各机关推举两人赴保定祝贺，由袁乃宽带领前往。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称，10月5日，国会依法选举曹锟为大总统。

△　中央直辖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电孙中山，反对曹锟非法窃取大总统，表示“当率滇南子弟，敬从海内群贤之后，声罪致讨，歼厥渠魁”。

△　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中国工会等组织分别发通电，声讨贿选产生的总统曹锟。

△　湘省和平会议在湘潭姜畲附近野鸭塘召开，督军谭延闿、省长赵恒惕双方之代表出席，鲁涤平为主席。美国领事阿其森、舰长克福尔亦出席。谭方提出：一、服从大元帅（孙中山）之主义及命令；二、省宪废除；三、湘军团结一致对外。赵方提出：一、谭延闿离湘；二、蔡钜猷去职；三、惩办朱耀华；四、各军回原防；五、修改

省宪。双方意见不合，议无结果。

10月6日　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邀请，派鲍罗廷到中国帮助改组国民党，是日鲍抵广州，鲍、孙就改组党和建设军队问题作长谈。

△　旅沪国会议员158人在湖北会馆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宣言称："此次毁法乱纪之祸首曹锟，伪称当选总统"，"使神圣议会变为交易市场"，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声讨。

△　旅沪各省区同乡会及上海各团体召开市民大会，到会60余团体，3000余人，一致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国会非法延期。大会决议：通电中外否认曹锟为总统；组织永久机关，执行议决案；联合全国各机关，实行国民罢税；与北京政府断绝经济联系；一致通电各省声讨曹锟，敬告西南、东南各省准备讨贼；没收受贿议员之财产。

△　吴佩孚电贺曹锟当选总统，谀称"我大总统，名高海宇，功在国家，法统重光，遂作华盛顿之第二，共和有庆"。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派李家鳌为驻俄外交代表；令准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辞职，任命金还为中国银行总裁；直隶天津市定为特别市。

10月7日　曹锟自保定电北京参众两院、国务院各部及巡阅使王承斌、检阅使冯玉祥等，略谓"值此国家多故，民力困穷，宪法未成，统一未就"，"承国会选为总统，不敢推辞"。

△　国民党为曹锟贿选窃位发表宣言，宣布该党"誓奋一贯之精神，伸大义于天下，为国家存正气，为国民作先锋，务使积年混秽恶浊之稗政，悉推陷而廓清之"。

△　上海劳工同盟会、学生联合会、商业维持会、各旅沪同乡会等数十团体分别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否认贿选总统曹锟，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讨贼。

△　全国商会联合会致电警告高凌霨并转经办贿选诸人，促令速将发出之贿选支票一律停止支付，以减轻罪名，藉求国民谅解。

△　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黄绍竑部协同海防舰队攻克江口，陆云高部向鹏化溃退。黄部夺获大炮八门，步枪数百支，击沉“大鹏”兵舰。同日，李宗仁部攻克桂平。

10月8日　孙中山明令讨伐曹锟，略谓曹锟诱迫议员非法窃取总统，罪迹昭著，“我同胞将士护国护法已历年所，岂能容庇国贼妄干大位，兹特宣布罪状，申命讨伐。我全国爱国将士无问南北，凡能一致讨贼者，悉以友军相视，共赴国难，以挽垂危之局”。同日，孙中山又令护法各省区长官将此次附逆议员一律查明，通缉惩办，以昭炯戒，而立国纪。

△　孙中山电告上海汪精卫：“本日下令讨曹，通缉附逆国会议员，并电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张总司令、浙江卢督办，约共讨贼。”

△　北京宪法会议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该法分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修正解释及效力，凡13章140条。

△　吴景濂乘专车赴保定，向曹锟呈送当选总统证书。吴毓麟、熊炳琦、王承斌、边守靖等贿选要人由天津赴长辛店与吴同行。

△　吴佩孚电贺北京参众两院，谓“总统既经选出，大法又复完成，此诚国家否去泰来之大转机”，称颂两院有“继往开来之功”。

△　浙江各团体纷纷集会，通电反对曹锟当选总统，主张严惩受贿议员。杭州大街小巷遍贴“内乱犯曹锟贿选总统，浙人誓不承认”之标语。

△　皖督马联甲、皖省长吕调元、浙督卢永祥、浙省长张载阳联

名签订《皖浙和平公约》。该公约系仿照《苏浙和平公约》签订，凡四条，主要规定两省所属军队各仍驻原防，两军民长官负责不令客军侵入或驻扎两省区域。

△　议员邵瑞彭于天津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本人告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为运动曹锟当选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起诉一案，“决不申请撤销”。

△　章太炎发表声讨曹锟之意见，认为曹锟贿选，已构成内乱之罪，无论如何，曹锟不能为总统。“曹既当选，此后惟有回复戡乱原状，足以褫其名义，或于西南再设军政府，或各省攻守同盟”。

△　冯玉祥电贺曹锟当选总统，谀称曹为总统，“群情鼓舞，各界欢腾，天日增辉，风云绚采”，从此四海永清。

10月9日　北京众议院常会决议：一、咨请政府依华会决议，向法国政府收回广州湾；二、请政府对北京私立各校经费优重补助。同日，参议院常会决议，本届三期常会已满，改为临时行政委员会。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令：何成濬、范熙绩附逆臧致平破坏统一，扰乱地方，着一并剥夺官职勋章，通缉严办；特任杜锡珪为瀛威将军，袁祖铭为闳威将军；任命杨树庄为将军府将军。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令甘肃兰州定为特别市。

△　高凌霨摄行大总统令上海南洋大学校长卢炳田免职，任命陈杜衡为南洋大学校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法公使傅乐猷，声明金法郎案被众议院否决，中国政府刻正筹划善后办法。

△　北京政府内务部电饬各省区军警长官督率所属严防地方：一、严饬地方军警，竭力巡防；二、取缔一切谣言，以安人心；三、

维持市面金融，免滋纷扰；四、重视商学各界之团体行动，以重秩序；五、整顿各属部务；六、赈济失业游民。

△　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举行临时会议，遵照孙中山8日之讨伐令，组织惩戒委员会，推定李执中、彭介石、邵力子、黄元白、于恩波、董耕云、丁超五为委员。

△　旅沪国会议员江浩等171人联名发表宣言，否认北京议会通过的宪法，谓“此项宪法，乃贿选之副产物”，“愿与父老昆弟共弃之”。

△　前陆军总长鲍贵卿、天津镇守使赵玉珂奉曹锟之命由津赴奉天，向张作霖游说，劝张与曹蠲除旧怨，拥曹为总统，曹以恢复张之东三省巡阅使，并援助张当选副总统为条件。张窥破曹谋和系缓兵之计，毅然拒绝。13日，鲍、赵无获返回。

△　全国商会联合会致书各省市商会，谓众议院延长任期一案，违反约法，殊为国民立法史上之污点，应一致否认。

10月10日　　曹锟由保定入京，在怀仁堂正式就任总统，发表就职宣言，宣布其政纲在振兴教育与实业，财政节流，减军费，节军饷，人才统一，谋全国统一，保护外侨。

△　北京摄政内阁全体阁员联名通电，谓“大选告成，元首正位，群情望治，气象一新。谨于十月十日大总统就职以前，宣告摄政终止”。晚，高凌霨等将国玺、总统印信及总辞呈送总统府交给曹锟。

△　吴景濂等贿选派国会议员在北京众议员宪法议场举行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典礼，并通电全国依法公布。此即中国宪法史上所称的“曹锟贿选宪法”。

△　国民党在广州开恳亲会，讨论党务改革事宜。孙中山特派林森、谢英伯、胡汉民、廖仲恺、杨庶堪、林云陔、谢良牧、陈树人、苏无涯、徐苏中、孙科11人为党务讨论会委员。

△　上海百余团体组织国民讨曹游行大会，参加者8000余人，沿途广散传单，上书“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否认延期国会”，并用各省区旅沪公民大会名义通电，请各国尊重我国“人民之公意”，对曹锟所有一切外交交往概行拒绝。

△　南京学生联合会发起召开讨曹市民大会，到会40余校，市民数千人。大会通电全国一致否认10月5日选出之总统，申讨辱国之曹锟及廉耻丧尽之猪仔议员。

△　杭州各民众团体召开大会，愤怒声讨贿选总统曹锟及受贿议员，到会6000余人。大会决议：一、电举孙中山为讨贼军总司令；二、要求张载阳省长通电全国否认曹锟为总统，如不赞同，停止纳税；三、铸曹锟铁像于西子湖滨：四、拆毁受贿议员之房屋。会后整队游行，并捣毁受贿议员张复元住宅。

△　安徽芜湖学生高举“不承认曹锟做大总统”的横幅游行示威，怒将受贿议员吕祖翼、彭昌福住宅捣毁，并在其门上大书“人民的公敌，猪仔议员的窠窟”。19日，北京政府电饬督军马联甲严办该案。22日，马电告国务院称，已将防护不力之警察署长署员一律撤惩，厅长袁乃奎亦予撤换。

△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在京招待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顾孟馀、李大钊等20余人。11日，加拉罕招待北京学联，谈称“此次来华唯一之使命，即在解决中俄外交悬案”，“建设两国在国际上之新纪元，目前种种进行，似未得贵国谅解”，“请贵会加以相当援助，俾促成中俄之亲善”。学生代表发言表示愿与苏联友好，共谋对付“两国共同之敌人帝国资本主义”。

10月11日　　孙中山发表致列强宣言，略谓：曹锟用种种非法与贿赂手段获选总统，“举国反对”，“中国人民全体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之行为，必予以抗拒而惩伐之”，请列强与其驻北京之代表，避

免足使僭窃者可作为国际承认或赞助之任何行动。同日，孙中山对东方通讯社记者谈称，对曹锟贿选除通电声讨外，将从速组织北伐军，从事讨曹。

△　孙中山电上海国民党本部，“令各部即行裁员，废除正副部长，各部各设主任一人，干事书记各二人，准备改组，所余职员，听候遴用。原设于上海之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公处，亦一并裁撤”。

△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上讲述“过去党务失败之原因”：一、党中缺乏组织，党人误以为党员绝对自由；二、党人受“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愚，革命精神因此消失；三、本党基础未固，因为党之基础在于军队，而本党无庞大之党军。

△　浙江省长张载阳及督办卢永祥接曹锟就职通电及摄政内阁宣告终止电后，当即商定：本省反对贿选，对于伪政府命令当然不受，除饬浙江公报处停止转载命令外，并与北京政府各院部即日停止公文来往。

△　杭州学生救国团电各总司令、督军、督理、护军使、镇守使及各师、旅长声讨曹锟，请共举义旅，誓师讨贼。

△　张作霖在奉天对联合社记者谈：“北京如不对奉天取攻势，余亦不愿有攻势之活动。”“曹锟之当选，显然违法，曹秉国政，决无成功之望，惟余固切望曹能成功”，以实现“何东爵士之和平会议办法”。

10月12日　　曹锟特任高凌霨兼代理国务总理。同日，曹锟发布《告诫官吏令》及《剿匪保侨令》。

△　孙中山派邓演达为惠州安抚委员，预筹安抚事宜，以便联军攻克惠州后，使人民“不至以饥乏之身，复感兵燹之苦”。

△　吴佩孚派巡阅使署参谋长、河南军务帮办李倬章入京贺曹锟当选总统。是日，李向曹转陈吴意，新内阁对收拾人心十分重要，务

要慎选，以外交人才组阁为宜。

△　京师地方检察厅驳回议员邵瑞彭告发吴景濂、边守靖等贿选总统之诉状，谓原告人已出京，无从传询，原告不到，“支票不能证明为边守靖所发，且议员王烈亦否认有过付支票事，依法不能起诉”。

△　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电孙中山，报告已遵照讨伐曹锟令，“通饬各军将领誓师讨贼，并通缉附逆各议员，以赴国难，而张挞伐”。

△　英、美、日、法四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抗议中国政府将关余拨充整理内债基金，要求将来此种关余不得再专供抵偿内债，当兼充清理中国政府所担保之外债及义务之用；占用关余，“外债实有其超乎内债之上的一种自动优先权”。

10月13日　　旅沪国会议员致函北京外交团，略谓曹锟毫无治理地方能力，致使临城、河南等处事变发生，“此次非法当选，除北京受武力压迫外，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将来酿出事变，可以想见”，请各公使“以公正眼光”，“鉴及全国多数人民意见，不予承认”。

△　广州各界集会通电声讨曹锟，要求孙中山出师北伐。

△　吴佩孚电曹锟，请任命颜惠庆为国务院总理。

△　北京众议院咨曹锟，谓金法郎案已被审查否决，应行作废，请查照办理。

△　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临城劫案被迫辞职后，是日在京赴府院表示，个人去留无问题，惟用人行政，受外人干涉，有损国家主权。

△　湘军中立派第二师师长鲁涤平召团长袁植赴湘潭姜畲开军事会议，因袁反赵恒惕态度不明，途中被师部卫兵刺死。谭延闿部朱耀华团即入湘潭解散袁部，袁部二营及中立军叶琪团加入护宪军。17

日，赵恒惕通电称袁植以身殉宪，追赠袁为陆军少将。湘省和平会议破裂，战事又起。

△　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谓为消灭破坏约法的不呈之徒，以修内政，特派重兵肃清余孽，并联洽川、黔友军一致行动。

10月14日　　曹锟令准山东督军田中玉辞职，山东督军遗缺着即裁撤；特派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特任荫昌为庄威上将军，张怀芝为丰威上将军，刘冠雄为熙威上将军，田中玉为益威上将军，马联甲为联威将军。

△　北京财政部为应付急需用款，发行国库券150万元。该券由懋业银行独家承受销售，按八扣交款。由道胜银行经收之盐余项下每月拨出7.5万元偿还。分20个月还清。

△　湘省谭、赵两派停战期满，长沙备战繁忙。赵恒惕非正式通告外国人，请暂离长沙。同日，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赴湘东指挥护宪军何键、邹鹏振、刘重威、蒋锄欧、李品仙、刘兴等六旅准备攻株洲。

△　新南社在上海成立，柳亚子当选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当选为编辑主任，吴孟芙、叶楚伧、陈布雷任干事。并出版《南社社刊》，其《成立布告》称："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

10月15日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恳亲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的讲演，重述"以党治国"的主张。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功告成。"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北京外交团送交"临案"第二次复文，其要点为：一、本政府赞同赔偿，但其性质及公平数目，留待讨论；二、被指与该案有关的四员官吏，业已免职在案；三、关于改良护路办

法，为目前内政应负之责，对使团提交之种种计划，虽难承认，但对外交团关怀路警问题，深为感纫。

△　驻京13国公使及三国代办入总统府觐见曹锟，祝贺曹当选总统，罗马主教刚恒毅亦同往。日使芳泽虽还未呈国书，亦随同觐贺。领袖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公使致贺词，申明各国一致愿助中国完成统一，恢复国内治安秩序。

△　湖南讨贼军湘东第一军军长陈嘉祐电孙中山，表示愿遵大元帅令，整勒队伍，讨伐曹锟。

△　广东省长廖仲恺因滇桂军及各军驻防地均设护商机关勒抽保护费，小船经过亦抽二三百元，是日电请孙中山撤销各军私设护商机关。

△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以设于法租界内的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办事处“近以收回威海卫事散发传单”，“并劝告国民抵制英货”，妨碍租界治安，令法租界捕房将该办事处查封。

△　天津《大公报》报道，曹锟贿选经费经王承斌、吴景濂、高凌霨等结帐后，其报销帐大纲共分九类：一、各政团党费324.2万元；二、特别票价141万元；三、普通票价304.5万元；四、特别酬劳费32.4万元；五、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六、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七、各议员费190余万元；八、招待处临时费120余万元；九、秘密费70余万元，及其他费用共计1356.7万余元。

10月16日　　孙中山复函黎元洪邀其赴粤。黎元洪托郭泰祺持致孙中山函赴粤，函谓：“非通力合作，不足以扶持正义，刬除强权，谨追随左右，力图靖献。”是日，孙中山复函，称：“来示所谓非通力合作，不足以扶持正谊，刬除强权，洵今日之笃论也。追随之说，岂所克当！公我天职，斯时固未遑遐逸也。海上清豫，能否命驾来游是邦，拥簪清尘，伫候教益，匪特私幸，民国实利赖之。延望维劳，至

深企祷！”

△　孙中山召开政务会议讨论筹款充北伐经费问题。

△　四川讨贼军熊克武、赖心辉部攻占重庆。袁祖铭退长寿，刘湘退垫江，杨森、赵荣华退万县。自9月23日浮图关激战开始至是日重庆克复，刘、杨部死伤4000左右，熊、赖部死伤3000左右。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至外交部质问顾维钧，为何任意变更对田中玉处理之议定事项，要求48小时内撤销田中玉益威上将军之命令，并威胁称，若中国政府如无满意答复，使团将另定对华态度。

△　直隶省议会电曹锟，请将当选总统后所遗直鲁豫巡阅使暨直隶督军两职乘时裁撤。

△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咨财政部，谓该师自豫入京，“三旅之众，饷项全然无着”，请发10万元固定军饷，以安军心。20日，内阁决议，在崇文门关税下及盐余款下各拨10万元给冯部充饷。

10月17日　孙中山批准《大本营筹饷总局组织办法》及《总局及各属分局简章》等条例。总局由省长主其事，凡各县筹饷局缴解款项统由总局核收，并听候命令指拨，以支援军需。

△　北京政府税务处会办蔡廷幹奉曹锟之命访各国公使，说明授田中玉上将系虚衔敷衍。美使称：“美国开国以来，只有五个上将，欧战后只授白尔兴上将一人，中国名器虽滥，亦何至此？”使团对曹均表愤怒。

△　曹锟调任王天培为黔军第一师师长，彭汉章为黔军第二师师长。

△　江苏督军齐燮元电曹锟，请特赦安福党人张敬尧、张树元、

吴光新、刘询、魏宗瀚、曲同丰、陈文运等。略谓“该员戎行久寄，悉属可用之才”，请恩施特沛，予以自新。

△　青年会全国第九次大会在广州岭南大学开幕。到各地青年代表135人。本届大会主题在于讨论“人格救国”。

△　吴佩孚派马济赴岳州任两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代葛应龙管理入湘之北军。

10月18日　　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

△　孙中山令护法各省区长官将贿选议员一律查明通缉惩办。

△　孙中山公布《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该条例规定每年征地价税为：有建筑宅地征千分之十，无建筑宅地征千分之十五，农地征千分之八，旷地征千分之四。教育、慈善机关、寺庙、庵观、福音堂、公共墓地、公立劝业场、公立免费公园免征土地税。

△　曹锟公布裁员令，命令国务院会商各部长官妥速筹议，将骈散机关、闲冗员缺认真删并、甄汰，量财力之盈亏，定政费之多寡，限一个月办妥。

△　曹锟派蔡廷幹再访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陈述任命田中玉为上将之令在先，免田之督军令在后，系铸印局在刊发时将次序颠倒，请外交团消除误解。同日，高凌霨受曹锟令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关于田中玉任免“命令次序倒置”之声明。同日，高凌霨电田中玉，请田自辞益威上将军，以解外交难题。田以此事关系国家体面，严加拒绝。

△　旅沪国会议员电全国反直各省军民长官，谓曹锟“贿选造成，大盗窃国”，“请齐树义旗，大张挞伐”，“民国存亡，胥在于此”。

△　代总理高凌霨召开国务会议，决议：一、恢复民国三年预算原案；二、由曹锟电各服从中央之省区，按照成案解款接济中央财政；三、各机关经费超过民三预算者一律核减；四、恢复民国元年各机关官制，冗员一律停职；五、不在民国元年官制之内的新设机关，一律裁撤；六、发行民国十二年欠薪公债。

△　陈炯明向粤军下达总攻击令，粤军总指挥林虎率刘志陆、陈炯光等猛攻回龙、河源，是日粤军攻占河源，孙中山之联军退往龙门、博罗。

△　北京政府承认日正金银行擅付俄国发行债票利息，此举将使国库现即增加已付两重利息12.7585万镑，而此后37年（俄债票为善后借款之一，至1960年还清）尚须无故多支付两重本利500多万镑，合华币1000余万元。按：民国二年袁世凯向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镑，因正式票未印就，先以预约证交五国银行。正式票印成寄往俄国，俄国未将预约票及时收回，后俄国革命发生，革命政府将该预约票贱价卖给了日本正金银行。

△　苏联驻北京代表加拉罕向外交部提出书面抗议，谓本月15日满洲里地方当局拦阻俄国邮车，警察肆意殴捕车中差役，中国关员强行搜索空车，并开枪威吓机师，要求立即查办此案，从速答复。27日，满洲里地方当局向驻该地苏方代表致函道歉，承认税关人员及警兵行动失常，允予切实调查。

△　湘赵恒惕通电指责谭延闿所提和平条件不惜牺牲大法，更滥委司令，将中立区变为叛薮，议和之地竟成杀场，本人惟有督率将士，再整戎行。

△　豫省收编的土匪“老洋人”和张得胜在鹿邑、夏邑等县同时叛变，掠劫奸淫，地方惨遭蹂躏。25日，河南督理张福来除调派所部各军追歼外，并通电请邻近各省派兵防堵，以求全歼。

10月19日　　孙中山正式委任廖仲恺、汪精卫、戴季陶、张继、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工作，并请孙洪伊密电北京，促李大钊即刻赴沪会商。

△　驻京法公使傅乐猷照会北京外交部速承认金法郎案，否则法国将采用其他办法办理。

△　江苏督军齐燮元电曹锟并内务部，谓江苏省民国十年所选众议院议员，与法统并无抵触，请准勿庸再选。

△　闽督孙传芳电北京政府陆军部，谓“闽省各师旅病亡假革，缺额甚多，拟向直隶河间一带招募新兵四千名”，请迅转交通部饬津浦、京奉、京汉各路局备车，将新兵运闽。

△　张作霖之代表张九卿抵京，向曹锟面交张作霖之亲笔信，函称奉方希望和平，不愿作战。并要求对直鲁豫巡阅使人选须慎重安排。同日，曹锟派曹锐赴奉与张作霖谋和。

10月20日　　曹锟颁布《实施宪法令》，饬国务院迅与各省切实筹商，贯彻实施宪法。又令：派王嵩儒暂行兼充筹备国会选举事务局局长。

△　孙中山在广州青年会全国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以人格救国》之演说，谓：“青年会宗旨为道德，而国民党之奋斗为人格，故代表国民党表示欢迎。”希望青年会改变“以不问政治为标帜”的主旨，要关心政治，“勿忘余之三民主义”，使“青年会成为造成人格之唯一学校”，俾“四万万人全得此学校之陶冶”。

△　云南省长唐继尧电章太炎，反对曹锟贿选，声明“对此次大选，认为无效”。主张“此时唯有实行联省自治，组织联省政府，一面戡定祸乱，一面整理内政，庶地方不失安谧，国家不致分崩。救国要图，似无逾此”。

△　自曹锟下裁减冗员令后，一般谘议、顾问大起恐慌。是日，陆军部谘议邀同内务部之谘议、顾问开会，商议对付办法，若政府不付清欠薪而裁汰，则不惜一切从事抗争。

△　江苏省商会电北京外交团，略谓民国成立至今，军阀争雄，内乱不已，内外债共达25亿元，大半用于兵费，现兵额已达130余万人，居世界各国常备兵之首，而土匪如麻。若政府再借外债，请外交团告知银行团，在中国未完全统一前，不得再给中国借款，否则各国侨民在中国之安全，中国人民不负责任。

△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恽代英任主编。

10月21日　　孙中山以胡汉民告病假，令在出巡期间由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代行大元帅职权。

△　孙中山偕苏联顾问鲍罗廷及诸幕僚巡视虎门要塞，悉调海防诸舰会于虎门。22日，廖仲恺电告高州失陷，孙中山率各舰回广州。

△　孙中山令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创办中央陆军教导团。

△　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联名再电曹锟，坚持民国十年所选出的新议员有效，无庸再选。并请中央令各省速选议员，如期召开下届国会。

△　唐生智部在湖南株洲与谭延闿部激战，赵恒惕率刘秉璋旅赴株洲督战援唐。

△　鲁涤平通电，略谓曹锟窃位，赵恒惕引入吴佩孚之北军祸湘，和平绝望，本人正式就任湖南讨贼军湘中第二军军长兼陆军第二师师长本兼各职，即日誓师讨伐。

△　旅沪各省区公民代表召开大会，议定该会宗旨为彻底救国，

讨伐国贼，并决定该会为各省区公民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　前署国务总理、财政总长周自齐在北京病故。26日，曹锟令给治丧费1000元，“平生事迹，宣付国史立传”。

10月22日　　孙中山任命广东海防司令陈策兼理盐务缉私各舰主任，“务将进口私盐严密截缉，如有军人胆敢包庇，应由该司令严加惩办”，以保盐税充军饷。

△　曹锟令直隶督军一缺裁撤，特派王承斌兼督理直隶军务善后事宜。

△　广东工会联合会等工商学界82个团体联名致书孙中山，略谓曹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敬恳大元帅早定北伐大计，组织革命政府，以革命统一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国家”。

△　旅沪国会之参众两院行政委员联席会决议：为共讨贿选总统曹锟，分派代表赴各省联络，冯自由赴粤，潘大道赴川，刘重赴湘，吕志伊、张光辉赴滇、黔，吴昆赴奉。

△　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共到15省区代表22人，推由云龙为大会主席。11月5日闭会，期间开大会10次，通过议案31件。

△　安庆各校学生全体集会游行，声讨贿选总统曹锟及受贿议员，并抄毁受贿议员张伯衍、何雯两家住宅。省长吕调元令警察厅长潘怡然出动军警镇压，拘捕学生四人，打伤80余人。同日，省教育会、学校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通电吁请皖省旅外同乡会援助。23日，北京政府电饬皖省府赔偿议员损失，撤教育厅长，惩办鼓动学潮之人。同日，被捕学生由陶行知保释。

△　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电北京财政整理会，反对美、英、日、法四国公使要求将关余全部作外债担保基金，请该会向政府建

议，全力维持内债基金原案。

△　驻京法使傅乐猷到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尽早了结金法郎案，并谓法总理普嘉莱来电，催办前黄郛照会所允议案，否则，11月法国召集国会，恐发生重大问题。

△　驻日代办施履本就日本地震后日本青年团、自卫团残杀中国留日学生事件向日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日政府从速调查实情，严加处置。

10月23日　　孙中山电令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省军总司令刘成勋，嘉奖克复重庆有功将士，并饬督率各军，迅速扫荡，肃清川境，并力中原。

△　曹锟特任杨森为森威将军，刘湘为嘉威将军；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免职，特派程克暂兼。

△　粤军陈炯明部右翼林虎部攻陷河源，左翼叶举部攻陷平山，滇军蒋光亮部溃退。是日，联军大本营行营撤回石龙，陈炯明部乘机再逼近广州。

△　谭延闿军吴剑学、朱耀华两部攻克长沙，赵恒惕退岳州。同日，谭军张辉瓒部攻克株洲。

△　北京《晨报》载，曹锟下裁员令后，政府又添设六个机关：一、全国军需监署；二、最高咨询机关（其名或顾问院或元老院未定）；三、垦务牧政渔业公署；四、扩充统一会；五、剿匪机关，分辖各省警备队；六、善后处。

△　豫匪“老洋人”股匪500余人劫掠郑州南官亭车站，欲截京汉列车未遂，车站站长及眷属被掠走。

10月24日　　孙中山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国民

党改组问题。

△　孙中山特派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梁鸿楷兼高雷钦廉各军总指挥。

△　代总理高凌霨呈准取消安福系魏宗瀚、陈文运、刘询、吴炳湘等之处罚；张敬尧、张树元、曲同丰等人须请示段祺瑞后再定。

△　北京政府法律馆馆员一致反对程克兼任总裁，是日晚全体辞职，郑天锡亦辞总纂职。

△　北京教育部自彭允彝去职后，部务无人负责，员工薪水积欠多月，各种公文积压数月未办。是日，部员将公文封送国务院，高凌霨允积极筹款，始各退回。

△　湖北全省外交协会因极力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大招日人之忌，是日被湖北督军萧耀南下令查封。

10月25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在广州举行改组特别会议，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并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廖仲恺宣读孙中山指派的中央委员名单：临时执行委员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候补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聘鲍罗廷为顾问。

△　旅沪参众两院议员通告宣布参加北京贿选总统之全部议员名单，共556人，此数距法定选举人数尚差25人，故此次总统选举根本不能成立。

△　王承斌通电就任直隶军务善后督理。曹锟令王仍驻天津，以监视榆关，保定另设一留守司令，归王节制。同日，曹锟裁撤帮办山东军务事宜一缺。

△　驻京日本公使芳泽赴外交部向顾维钧递交国书。

△　粤讨贼联军分三路袭击龙华陈炯明粤军，激战竟夜，攻占龙华镇及龙门镇，粤军溃退平陵。

△　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电孙中山，谓曹锟贿选，罪恶昭彰，请孙以大元帅权宜监国，速正大号，俾中外晓然于正统所在。

△　杨森、刘湘自重庆败退万县后，奉吴佩孚指示，约集保宁刘存厚、黔边袁祖铭及邓锡侯、陈国栋等，在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共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袁祖铭为前敌总司令，主持反攻重庆。

△　川军田颂尧、张邦本、王鸿恩及直军等部围攻绵阳，省城震动。省军总司令刘成勋急令所部驰援，是日激战，将田、王等部击退，刘军复克梓潼。28日，刘成勋令一周内收复剑门关，田、王奉吴佩孚严令退川北死守。

△　皖省贿选议员张伯衍等12人见曹锟，诉说彼等因选举总统，原籍房屋财产被学生抄毁，请迅令地方长官拿获首犯，立即枪毙，否则皖籍议员全体出京。曹温谕慰藉，除允严惩肇事人外，议员所受损失，允由政府从事偿恤。

△　豫督张福来通电张国信（“老洋人”）受招抚复又叛变蹂躏豫省之罪行，并告以正派部队赴鹿邑、柘城一带进剿。

10月26日　　北京参众两院开会，曹锟委派海军总长李鼎新为代表出席会议。王枢、陈纯修等反吴景濂派议员认为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吴已失去议长资格，应另推临时主席。但吴景濂强据主席台，拥吴派议员反对讨论议长问题，与会者一哄而散。

△　驻京日使芳泽赴外交部质问中国政府财政、交通两部以无线电权转让美国，毁弃信约，妨害日商权利，日方无论如何，坚持日三井物产会社在华无线电之专利权。

10月27日　　曹锟任命唐在礼为交通部铁路警备事务督办；免钱方轼署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本兼各职，任命项骧继任。

△　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廖仲恺为大本营筹饷局总办，邹鲁为会办。

△　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谒见曹锟，面呈吴数电，请速发表颜惠庆组阁令。同日，齐燮元亦电曹请令颜惠庆组阁。

△　吴佩孚收编之河南樊钟秀部，被吴派往援粤，自6月南下，分驻赣州及粤之南雄，不愿加入战斗，深受赣南镇守使援粤总指挥方本仁之压迫，欲将樊部缴械。是日，樊率部反戈，投向孙中山。

△　北京教育部全体部员通电全国，谓自6月政变摄政内阁以来，教部无人负责，政务悉归停滞，部员欠薪已逾八个月，曹锟任总统后仍无解决办法，若政府再不发欠薪，将自决办法。

△　粤陈炯明军向联军反攻，攻占广九路平湖站，蒋光亮部溃败。林虎率部攻占博罗，直逼石龙，惠州城解围。孙中山急电范石生由增城驰援樟木头，营救蒋部。

△　驻京法使傅乐猷访北京政府兼代国务总理高凌霨，要求立即承认金法郎案。

△　驻京日公使芳泽赴外交部访顾维钧，声明日本在华无线电之专利权断不能放弃，中国政府如擅让与美商，应即取消。

△　四（平街）洮（南）铁路竣工。

10月28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首次会议决定，开始着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分部登记，设立广州市党部；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及设立讲习所等工作。并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每省派代表六名（选举三人，孙中山指派三人），海外支部代表12人。推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戴季陶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派廖仲恺前往组织。推廖仲恺、孙科、邓泽如为财政委员。

△　孙中山令大本营参军长朱培德，现在出发东江，所有参军长职务势难兼顾，应免去本职，俾专任中央直辖第一军军长，督战前线。同日，孙中山委任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张开儒为大本营参军长。

△　孙宝琦挈眷离京赴沪，料理汉冶萍事务，曹锟派蔡廷幹赴天津将孙追回，面请孙组阁，经力劝，孙允诺。

△　“永翔”、“同安”、“楚豫”、“楚同”四炮舰宣布中立，当即离开广州开往汕头。海珠炮台之陆战队随“永翔”舰长赵梯昆逃走，海珠之海军司令部各员，亦逃散一空。停泊广州效命孙中山之炮舰仅剩“永丰”一艘。

△　安徽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安庆各界代表、各校学生、各机关人员召开万人大会，晏阳初讲演普及平民教育的意义。会后举行大游行。

△　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在沪病故。

10月29日　　粤讨贼联军败退石龙，刘震寰奉孙中山令率李烈钧、范石生军一旅到达石龙，布告各军不得擅退，违即枪决。30日，孙中山赴石龙督战。

△　孙中山为解决经费问题，在广州大本营召集绅、商、学、报各界会议，决议成立广东善后委员会，筹款300万元至500万元。

△　北京政府财政次长贺德霖向驻京法使傅乐猷交涉汇理银行扣放盐余案，贺力争不能因金法郎案扣及善后借款，此系截然两事。法

使仍要求财部用金法郎付款，否则，法国只得收回赔款，中法实业银行一案，别无办法。贺答以该案众议院已否决，碍难办理。

△　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部占领涪陵、长寿，进攻万县。

10月30日　　曹锟向众议院提出，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请依法予以同意。

△　北京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发表声明，依法解除副议长职。

△　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在汕头通电宣布服从北京中央政府，将留粤之“永翔”、“楚豫”、“同安”、“豫章”各舰本日驶往汕头归队。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照会外交部称，近来通商各埠，俄国难民来数日多，于租界治安有关，请中国政府将俄难民案提交国联讨论安置办法，或与俄国政府接洽，设法遣送回国。

10月31日　　孙中山自东江石龙返广州，并向前线将领颁布训勉电令，促奋力作战。

△　曹锟免饶汉祥侨务局总裁职，任命毕维垣继任。

△　驻京法公使傅乐猷就金法郎案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法国国会将于11月13日开会，金法郎案将在国会讨论。中国政府对该案应履行黄郛照会内承认之条件，否则，法政府将另取相当手段。11月2日，外交部复照法使，谓金法郎案本部愿早日解决，来照所称各节，已咨国务院财政部，俟复到即开议。

△　驻京美国公使舒尔曼访外长顾维钧，询问无线电案中日交涉情形，谓中国既将无线电设置权予以美国，日本不应异议。

△　天津电车公司以亏本过巨为理由，加价20%，全市商民学生群起反对，并组织学生在东南马路一带劝阻同胞勿坐电车。警察厅出

动大批警察和保安队弹压，将学生和群众驱散。

是月　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开会，决议反对教会教育。此为收回教育运动之始。

△　冯玉祥上书曹锟请设言官，略谓欲整顿吏治，及时使民情上达，赏罚严明，不致有蒙蔽之虞，非设此制度不可。

11月

11月1日　曹锟特任周荫人为荫威将军，孟昭月、张俊峰、梁克发为将军府将军。

△　高凌霨将齐燮元等关于民十（1921）国会议员选举之新议员有效电交国会事务局核办。同日，众议院多数议员认为此举违法，拟提最高弹劾案与军人干政之惩戒案。

△　上海《新闻报》载中国军队及军费状况：全国军队有名称可指者共52师又102旅又220营，兵额为128.5万人。每月军饷（不含军事费）1540余万元（其混成旅、游缉队、卫队、巡防营、独立旅、混成团、独立军等名目繁多，额数亦多寡不同，均未列入）。

△　北京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致函财政部，略谓该院经费仅领数成，现在非但员司差役薪水无着，即区区办公所需之纸张笔墨，亦无着落，务请在盐余发放时，拨给该院经费一月。

△　北京新任铁路警备督办唐在礼往葡使馆晤领袖公使符礼德，说明嗣后中国政府对于外侨交通之安全，自当极力保护，以符各国之期望，请以此意转知各国公使。

△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出版《国民党周刊》办法。

△　北京国立八校因经费积欠已逾九个月，教职员生活陷入绝境，无法维持生计。是日，八校教职员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各校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讨论索薪办法。各校校长表示竭力向政府交涉，请再维持10天，“届期如仍无头绪，亦只好任其关闭”。

△　日本国民对华谢赈团臼井一行等五人，由日本驻京公使芳泽谦吉领赴外交部，拜访外交总长顾维钧，对中国各界人士团体捐款赈济日本地震灾，表示感谢。3日，该团由芳泽带领晋见曹锟表示感谢。

11月2日　孙中山任命黄绍竑为广东讨贼军第一军军长。

△　总税务司安格联休假期满由英回华，受到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欢迎，并与之商议维持内债基金办法。安格联表示对“维持关余担保内债之优先权”问题，“凡系本人所经管之内债以及外债，自当始终维持”。

△　驻京英、法、日三国公使以孙中山发行广东省公债用盐余款作抵押，违背善后借款合同之规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　湖南省长赵恒惕得岳州马济指挥之直军及海军“永安”、“拱辰”两舰援助，在长沙渡河向谭延闿军蔡钜猷部进攻，蔡部纷向宁乡、湘潭等地溃退。

△　河南督理张福来由开封到许昌设剿匪司令部，督剿“老洋人”、范明新、张得胜等巨匪。旅长苏世荣为汝宝总指挥，镇守使马志敏为南阳总指挥，旅长田维勤为汝属总指挥，张本人及师长靳云鹗居中调度。

11月3日　孙中山亲赴石龙督战，参谋长李烈钧随行，抵石龙后当即召集范石生、胡思舜、卢师谛三军长开会，令诸军坚守博罗。4日，滇军及许崇智、刘震寰部纷纷后退，孙中山严令制止无效。后孙

中山赏范石生部二万元，令其猛攻惠城，牵制粤军后方。

△　孙中山任命杨虎办理海军事务。

△　吴佩孚电告曹锟、冯玉祥及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谓前被豫匪范明新掳去的两女英教士，经各剿匪军营救出险，是日抵洛阳。

△　江苏督军齐燮元电各省督军、省长，谓民国十年各省依中央通令选举之众议员，应为有效，“无庸另选”，并请各疆吏一致赞同此议。4日，山东督理郑士琦、省长熊炳琦亦电北京政府，主张民国十年所选议员有效。

△　安徽省立各校教职员代表28人往省府见省长吕调元，请拨教育经费，与吕发生争执。吕乃指挥军警将代表殴伤10余人，省教育厅长江暐在场劝解，亦被打伤。同日，省教育会通电历数吕之罪行，请各方声援。教育厅长江暐愤而辞职。学生罢课，要求惩吕。同日，吕调元电北京政府，诬称教职员为乱党，蓄有野心，要求立即将学校解散，务请电饬督理马联甲协助镇压，并请通缉陈独秀。

△　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表示中国人民愿与各国友好，但外交团依据“临案”所提出未经解决之护路问题，断不能承认友邦之要求，请切勿再据“临案”而提出共管中国路警之要求。

△　湘赵恒惕分兵向谭延闿部反击，邹鹏振、蒋锄欧两旅攻湘潭，贺耀组旅攻易家湾，叶开鑫旅攻湘乡，唐生智部攻朱亭。是日，谭军蔡钜猷部退往常德。

△　据《新闻报》载，财政整理会清查财政、交通两部无担保之外债总数约七亿元，其中财部四亿元，交部三亿元。全国新旧外债约17亿元，每年利息均以六厘计，需付利息一亿元以上。

△　广州财政厅长邹鲁偕夫人许剑魂赴香港筹款，登岸时遭凶手枪击，邹幸免，许当场身亡。

11月4日　陈炯明粤军与讨贼联军在樟木头激战，孙中山亲临前线督阵，树黄色大旗一面，上书“帅驾亲自督阵，各宜奋勇向前”。联军士气大振，将粤军击退20余里。

△　曹锟令免修订法律馆总纂郑天锡、署纂潘元敉本职；任命高种、吴炳枞署修订法律馆总纂。

△　北京国会反吴景濂派议员在北京江西会馆开会，由议员胡源汇提出否认吴景濂之议长资格案，与会议员均表同意。

△　章太炎、于右任、方声涛等复唐继尧否认贿选之上月号（20日）电，表示响应。

△　山东省议会电各省议会，请力争收回威海卫之交涉，略谓英人强租之威海卫，期满收回，绝无条件可言。本年组织的中英委员会，华方代表梁如浩甘心媚外，抛弃接收本题，擅订苛酷条件24款，丧失领土，损害主权，务请各省协电中央，严拒英人要求，惩办梁如浩。

△　松坡图书馆在北京成立。创办主任梁启超为该馆募捐达七年之久，藏书三万余卷，中西图书分为两馆，中文书藏快雪堂，西文书藏石虎胡同七号。

△　扰乱直、鲁、豫、皖10余年之巨匪范明新，被陕军田维勤旅击毙于汝南团山城。

11月5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会议，由廖仲恺主持讨论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及经费预算。

△　北京众议院开会，讨论孙宝琦内阁案，多数议员以吴景濂任

议长期满，主张另推临时主席。吴景濂率数十警卫入场强占议长席，反吴派议员王枢等欲将吴推开，议场顿生混乱。吴之警卫乘乱行凶，打伤反吴派议员数人，议员一哄而散。

△　曹锟特任王用中为毓威将军，殷本浩为恺威将军；免天津镇守使赵玉珂本职，命王维城继任。

△　杨度等70余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全国和平统一协会，通过会章，并发表长篇宣言，声称该会旨在鼓吹和平，号召国民促成国家之统一，拟具和平统一方案，解决一切政治、法律、军事诸问题。18日，该会推李经羲、王士珍、张謇、杨度、何东、唐绍仪、王芝祥、汪大燮、朱启钤、钱能训、赵尔巽20余人为理事，拟定何海鸣等30余人为干事。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通牒北京外交团，要求收管粤海关关余税款。略谓：我国关税，除拨偿外债外，所余尚多，其中一部分为粤省税款，北京政府以取自西南者为祸西南，实非公允，粤省关余应归本政府使用。

△　北京国立八校呈国务院，请饬财部速发积欠薪饷，否则不负保管校产责任。

△　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通电控诉省长吕调元同督理马联甲沟通一气，摧残安徽教育，令警兵横施殴捕学生之罪行，并决定全体罢课，誓与吕、马斗争到底，请皖旅外同乡会及全省人民援助。

△　北京政府电饬驻美公使施肇基向国务卿休士接洽美国在华设无线电台问题。日、美两国在华设无线电台专利权之争，拟在华盛顿由日、美直接商洽，然后中国再加入协议。

△　荷兰、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八国驻京公使联名照会外交部，坚持依《辛丑条约》之规定，必须以

金币付庚子赔款。

△　美、英、法、日四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中国东北当局设置特别地亩管理局，接管中东路地亩。外交部即饬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查复。12月17日，中东路护路司令朱庆澜咨复，谓我国收回铁路地亩，实为保护中国行政主权，该路地亩处违背续订合同第六条，“勿庸第三国鳃鳃过虑”。

△　日本驻京公使芳泽谒见前清逊帝溥仪，申谢清室助赈日地震灾。

△　绥芬镇守使张宗昌部第三旅第四十四团在绥芬哗变。张作霖急令张宗昌及滨江镇守使张焕相、东路司令朱庆澜、洮辽镇守使阚朝玺等率兵一体严剿。

11月6日　曹锟在总统府召见全体阁员，告以从汇理银行收回之盐余，不准作他用，全交公府，俟筹足300万元之后，统作分配。

△　北京政府复电吕调元、马联甲，对吕在皖摧残教育、镇压学生大加赞许，并令督理马联甲“相机协助，如教、警两长不能得力，即予撤换”。

△　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川军总司令刘成勋通电缉拿勾引北军蹂躏川省残害川民之叛逆刘湘、杨森、邓锡侯、陈国栋、袁祖铭。

△　陈炯明粤军全力向讨贼联军反扑，联军败退。孙中山凌晨3时于帅府召集高级官员会议商议对策，杨庶堪、李烈钧、程潜等出席。同日，右翼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部击退粤军，追击至樟木头、鸭子步、深圳等地。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咨各省军民长官，请迅令所属军队严行剿办土匪，限期肃清，勿徒停止外人游历，转滋口实。

△　北京众议院议员蒲伯英等90余人发表请定期开会推举临时主席意见书，指出前议长吴景濂于10月10日任期已满，仍不解职，直接违背宪法。

△　湘军唐生智率刘兴、李品仙两旅攻占衡山。7日，占领衡州，谭延闿部退守宝庆。

11月7日　孙中山由石龙返广州，行营仍设石龙。同日，改组上海国民党本部为驻沪执行部。

△　孙中山以军费支绌，令廖仲恺、孙科于广州市内再向各房东、业主借用租金一个月份，此项借用租金准予满一年后加二归还。同日，孙中山任命石青阳兼理中央银行四川分行行长。

△　曹锟公布《县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区域令》，规定自治法自民国十三年（1924）4月1日于直隶省所属东光等47县实施。

△　曹锟下手谕三道：一、着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财政总长张弧速会同法、比两国公使商筹解决金法郎案；二、着国务院彻查铜元票案；三、着财长张弧速筹发放军饷一月。

△　北京甘石桥俱乐部完成曹锟贿选后，反对吴景濂之保定系议员是日召开大会，高凌霨、王毓芝、程克等内阁成员亦出席，议定将俱乐部改为“宪政党”，并以“实行宪政、谋南北统一之实现”为党纲。

△　吴景濂电话催询天津直隶督理兼省长王承斌，谋另组新党以对抗宪政党，王表示消极。

△　总税务司安格联在京向顾维钧、张弧报告对华态度，谓各国对华空气极坏，中国债票在外国市场均跌，关税会议难即召开。

△　英国前任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在伦敦中国协会上谈中国乱事说：“可保全中国者，仅有两端：非各党派有合力之同意，即中国有

如墨索里尼其人者出现。”

△　豫匪“老洋人”从汝州突围后，是日攻陷洛阳附近之宜阳县城，掳去肉票数百名。吴佩孚急调陕西镇嵩军出关助剿。

△　广州市中小学因经费积欠已达三个月之久，是日一致停课。

△　哈尔滨俄人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六周年大会并游行，地方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打伤俄人四名。

11月8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第四次会议，由廖仲恺主持讨论党纲、宣言及召开广州市党员大会等项事宜。

△　北京内阁会议否认金法郎案，由外交、财政两部会核。同日，财政部函外交部，金法郎案仍照10月3日众议院通过办法，按1905年换文办理。

△　孙中山令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将四川省每年应解中央之税款，全数拨充作讨贼军费，统由该总司令委员经收，随时册报大元帅核销。

△　陈炯明粤军占领博罗，滇桂军相继退却。9日，孙中山再赴石龙，饬各军不得后退，并组织反攻。11日，孙中山移行营于石滩车站，组织对粤军反攻。

△　国会反对吴景濂派议员王枢等80余人在京开会，认为吴之议长资格已消除，决议令吴将民国八年之后的帐目完全交出，由议员组织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在议长未选出之前，设置临时行政委员会。

△　吴景濂求见曹锟，诉说其帮助大选之苦及始终拥护总统之诚，请曹设法清弭院内推翻议长之风潮。曹以院内事“无权干涉”答之，吴悻悻退出。

△　瑞典新任驻京公使艾维娄福向曹锟呈递国书。

△　黎元洪离沪往日本养病。

11月9日　孙中山令兼理中央银行四川分行行长石青阳，迅将分行事宜积极照章筹备就绪，开始营业，并将办理情形报查。

△　曹锟晋封侯连珠为镇国公；派胡祖舜赴欧美考察政治事宜。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入总统府见曹锟，对护路、剿匪交换意见。并劝曹对金法郎案勿再坚持，否则将失去国际同情。

△　北京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因政府积欠薪饷九个月，实已无法维持，是日再开大会。英文《导报》主笔、北大教授柯乐文提议组织特别委员会，要求日、英两国公使以庚子赔款月拨20万元为八校及中小学经费。最后议决：若本月12日前政府尚无解决办法，八校一律关闭。

11月10日　孙中山赏朱培德、杨希闵部各5000元，令向陈军反攻，再退者枪决。

△　曹锟派薛笃弼前往京师平市官钱局彻查该局滥发铜元票舞弊情况；免许世英航空署督办职，派赵玉珂继任。

△　吴佩孚代表佟有方谒见曹锟，面呈对西南各省武力统一之军事计划一册，曹即将吴之军事计划交各部主管妥慎核议。

△　北京内阁会议决议：以庚子俄赔款停付一部分为担保，向银行商垫使领馆经费；苏、皖、鲁、豫剿匪经费，由津浦路局先垫支三个月。

△　旅沪国会议员成立“国会议员同志会”，通过会章。该会以澄清政治力图建设为宗旨。

△　赵恒惕部湘军刘重威旅9日攻占宝庆，讨贼军吴剑学部退祁阳。是日，唐生智部攻占常德，周朝武部退往沅江南岸。

△　意大利驻京公使翟录第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河南南阳土匪猖獗，意国教堂教士势极危险，请电饬豫督张福来派兵前往保护。

△　广州当押店全行业罢市，反对公安局长吴铁城强令向该行业借款五万元。

△　北京教育部全体职员因经费积欠已久，决定定期拍卖书籍物品，并发布告称“本部现经政府遗弃，公家事物，私人生计，均陷绝境，乃谋自决”，所有房屋器具、书籍陈设，一概定期拍卖。

△　北京财政部训令各省区财政厅，将各银行状况及详情调查明晰，造册送部，同时电告各省区调查各该省积欠岁款，并商询将来汇款办法。

△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开会，北大校长蒋梦麟报告奔走30万元教育借款经过，该款由中华汇业银行承借，由正金银行每月拨盐余五万元，并决定自12日起，各校照常上课。

△　赣省平民教育会组织南昌各校学生大游行，参加学生约7000人。沿途高呼“平民教育万岁”，并散发传单，上书：“你认得字么，快去教人，你不认得字，赶快去读书。”

△　安徽省长吕调元以《民治报》发表吕镇压学生的报道，将该报编辑人员管曙东、王兰田、陈紫枫逮捕。

△　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樑在英租界云南路遇刺重伤，刺客李达生自称系国民党人，因徐曾杀害党人多名，故为复仇。13日，徐死亡。

11月11日　　曹锟特任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为直鲁豫巡阅副使；派彭寿莘

帮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

△　曹锟召集高凌蔚、顾维钧、张弧入总统府，商速承认金法郎案。顾、张均主张暂缓，高以法使限期13日解决，不能再延。张弧始终未认可，曹锟大怒，准张辞职。

△　粤陈炯明军分四路向讨贼联军进攻，林虎部攻石滩，洪兆麟部攻石龙，熊略部攻樟木头，翁式亮、练演雄、叶举、钟景棠部攻平湖。

△　鲍罗廷在广州与中共在粤干部、陈独秀之代表谭平山会晤，鲍详述关于改组国民党之计划。17日，鲍再与谭会谈，希望中共注意激励群众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改组。

11月12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应付时局问题”：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及组织委员在广东支部开特别会议，讨论组织义勇军，以高师为训练地点，请党中军人同志训练。

△　粤陈炯明军攻入石龙，逼近石滩，孙中山、许崇智、刘震寰退守石滩，苏联军事顾问巴夫罗夫阵亡，广州震动。省中官眷纷纷往香港运送行李，彻夜不绝。同日，孙中山电湘谭延闿克日来援。

△　曹锟令免张弧署财政总长职，特任王克敏暂署财政总长。

△　北京国务院通电饬各省军民长官，注意防护各国侨民，以免外人有所借口。

△　据《新闻报》载，外蒙库伦政府设财政、司法、外交、陆军、内务五部，并有平政院、制度院。预定国防军20万，现有12万，俄兵一团司警政。俄政府将喀山游牧之成吉思汗遗族10余万遣送南部，我北疆日益严重。冯玉祥迭请运兵赴蒙，但军费难筹。

11月13日　　曹锟特任署财政总长王克敏兼盐务署督办和币制局督办；任命周荫人为陆军第十二师师长，靳云鹗为陆军第十四师师长，曹士杰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　旅京江苏同乡会干事与苏籍国会议员开会，反对曹锟任命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认为此命令违背约法及新宪法，苏人决不承认。

△　港绅何东爵士由齐燮元介绍，赴武汉、洛阳运动和平，是日由沪抵汉。鄂督萧耀南对何东所倡和平主张颇表赞成。14日，何东由汉赴洛阳，与吴佩孚会晤三次，吴对和平运动无赞助之意，认为“深信必经过此番武力，始能收和平之效”。21日，何东回汉口。

△　山东昌邑土匪于双龙在距县城南80里之张家堡教堂掳劫法人主教罗光汉及神甫一人，中国助教师五人，作为人质要求官府收抚。

△　吴景濂恋栈众议院议长席，但与反对派无法疏通，遂下令将众议院大小议场一并封锁。

△　谭延闿接孙中山援粤电率部向广东省境进发，唐生智部进占郴州。同日，邹鹏振部攻占常宁，继而向桂阳推进。除蔡钜猷在湘西尚有一隅之地外，湘境皆为赵恒惕所控制。

△　北京国立八校代表蒋梦麟、俞同奎、郑锦、许绳祖致函苏联代表加拉罕称，八校“经费困难，势将停顿，请贵代表团在中俄会议未开之前，将庚子赔款全部放弃，尽数发展中国教育，拨其中一部作八校经费及基金之用”。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为反对金法郎案致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谓“此案为王克敏卖国政策，早经国会否决，万无改以阁议承认之理”，务请据理力争。

11月14日　　孙中山在广九路石滩车站召集杨希闵、范石生、许

崇智、刘震寰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对付粤军之全权授于滇军，当即特任杨希闵兼滇粤桂联军前敌总司令。

△　曹锟特任王怀庆为靖武上将军，冯玉祥为扬武上将军，王承斌为匡武上将军，齐燮元为宁武上将军，萧耀南为炳武上将军，阎锡山为同武上将军；特任杨增新为阗武将军，白宝山为郁武将军，马玉仁为衡威将军，朱熙为缉威将军，杨春普为煦威将军，宫邦铎为振威将军，张仁奎为杰威将军，方本仁为粹威将军，岳兆麟为淑威将军，萧安国为良威将军；陆洪涛、郑士琦、张锡元、沈鸿英、彭寿莘均授陆军上将衔。

△　吴佩孚派代表孙发绪谒曹锟，请曹勿顾虑，提早发表孙宝琦组阁令，以维政局。

△　陆荣廷通电就任广西善后督办职。

△　湘赵恒惕部蒋锄欧旅攻克永州（今零陵），湘省战争暂告平息。谭延闿率部退至粤边，得孙中山令其援粤之电，星夜向广州进发。

△　法国驻京公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速承认金法郎案。同日，法使至外交部催办。

△　驻哈尔滨苏联政府代表拉基金致函东省当局，谓流亡东省特区内白党之残余军队及其所组织之团体，迭次图谋用暴力颠覆苏联政府，要求对其严加取缔，巩固两国亲善之谊。

11月15日　　孙中山以战事紧迫，财源益艰，是日令各军将领及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财政部长叶恭绰、两广盐运使伍汝康、广东财政厅长邹鲁、广州市长孙科等竭力筹措饷项，以供军需，毋得稍涉稽延。

△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组织义勇军，由

廖仲恺起草义勇军组织法，并议定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登报招请教练员，其条件为："一、国民党员或志愿入党者；二、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三、曾在本国或外国陆军大学、军官学校毕业者；四、能当义务，不受薪金。"

△　北京政府财政部就美、英、法、日四国公使抗议关余案咨复外交部：一、关余担保偿还各种债务之优先权，应以各债务指定以关余担保之先后为序；二、各项外债，因原定抵押品失效，不能如期付款者，须待将来财政好转再付本息。

△　苏联代表加拉罕就北京国立八校函请苏联政府将庚款全部拨作教育经费事照会北京外交部称："本代表特代表苏联政府将庚子赔款俄国部分之全部尽行拨为贵国教育经费，首先拨于国立各大学，并速拨交一部分给北京国立八校，希望中国政府亦承认该款不得作他用。"

△　湖南省长赵恒惕以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破坏省宪，刺杀护宪派团长袁植，实行叛乱，是日下令免鲁本兼各职，责地方军民长官严缉务获，依法惩办。

△　《新闻报》就军费发表评论，谓中国军费占岁出80%，为各国所无，非裁兵不能立国。而军费开支非用于练兵，多为统兵者中饱，彼等资财大者数千万，小者数百万，至于士兵，则欠饷累累。士兵不免哗变抢掠，故养兵如养匪。

△　徐州白枪会图谋攻城劫狱，营救会首张传孝等，被守城军警击散，县府遂将张传孝等四人于南门外枭首示众。

11月16日　　孙中山令滇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杨希闵速派遣主力分途增援第一线，寻粤军主力以歼之，以"肃清东江，进图大局"。

△　孙中山致函犬养毅，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劝告日本政府

帮助中国革命并首先承认苏俄。

△　北京内阁特别会议议决裁员办法：各机关凡非实缺人员，除考试及格分部任用者外，一律裁汰，其积欠薪水，另议办法。如被裁人员有法外举动，即依法惩办，断不姑容。

11月17日　　曹锟特任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任命杨以德为卫威将军；调李景曦署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　北京内阁再次讨论裁员办法，决定由财政部首先实行，其他各部各机关依照财政部办法办理。财政总长王克敏已确定裁汰标准，凡民国元年官制所未规定之员缺，一概裁撤。

△　浙督卢永祥电唐继尧，表示赞成唐提出的曹锟贿选为无效，以联省自治为前提之主张。

△　旅沪参众两院议员在湖北会馆开会，反对承认金法郎案。

△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开会再讨论经费问题，因本月10日北大校长蒋梦麟奔走议筹维持校务之30万元借款，财政部仅拨发12.6万余元，尚包括公立中小学经费在内，校务已无法维持，一致决议，自18日起，含悲忍痛将八校同时关闭。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组织外侨委员会，纪念上海开港八十周年。按：1843年11月1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根据《南京条约》在上海正式开港，设立租界。

11月18日　　由保定派操纵国会议员组成的宪政党在北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350余人，王毓芝为临时主席，通过党章。推选王毓芝为总理事长，高凌霨为首席理事，程克、刘梦庚、常耀奎为理事。并决定在直、鲁、豫、苏、鄂、皖、闽、赣、陕等省分设宪政党支部，由党中之各该省议员回籍担任组织，为国会改选作预备。

△　粤陈炯明军分四路猛攻广州，其编组为：一、右路：第一军林虎、第二军刘志陆、第四军李易标，共1.4万余人，归刘志陆指挥，由联和市、龙眼洞前进，攻击徐洞、白云山、瘦狗岭一带；二、第三军尹骥、第六军杨坤如，共一万人，归洪兆麟指挥，沿广九路南岗、乌涌一带前进，攻击车陂、石牌一带；三、钟景棠、练演雄等部攻击虎门；四、谢文炳、陈修爵、谢毅等部攻增城。陈军并占领瘦狗岭、石牌等地，距广州仅10余里，其前锋已迫近广九车站。

△　滇桂粤讨贼联军向陈炯明粤军猛烈反击，朱培德指挥中央军与林虎部激战龙眼洞，从江西归粤之樊钟秀率豫军2000人适由韶关乘火车抵达广州黄沙车站，即向广九车站增援，随后湘军谭延闿等部增援，协同联军作战，将粤军击退，广州转危为安。

△　驻京法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催办金法郎案，并提出以承认金法郎案为批准关税会议协约之交换条件。

△　全国商联会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反对承认金法郎案。谓此案关系国家一亿至数亿元之损失，中法买办王克敏若承认该案，“是我四万万国民之公敌”，望决勿苟同王之主张。

△　中共广东干部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在广州开会，鲍罗廷亦出席，讨论国民党改组工作，决议中共应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

△　北京《京津晚报》与民治通讯社因16日转发天津《大公报》文章《金法郎案内幕之大披露》，言及内有受贿情事，是日被高凌霨令警察厅查封，并逮捕两社经理及编辑。

△　湖南省长赵恒惕令各县知事一律兼任本县剿匪指挥部法官，拿获真正匪盗，着先行处决，随后呈报。各地散枪，着各知事妥为收集，以为团练之用。嗣后知事考成，即以治匪列为第一项。

△　北京召开追悼美故总统哈定纪念大会，外长顾维钧致词，称

赞哈定“为中国之平等机会、中国主权不可侵犯及中国在各列强认为自主国之一切特殊限制之解放”作出了贡献。并在中央公园立“美故总统哈定纪念碑”。

△　康有为在陕西万国道德会分会讲演，略谓现在世界有势力的宗教，不过孔、佛、耶、回而已，“至以中国此时情形而言之，尤宜实施孔教”。

11月19日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组织训练义勇军办法及开办国民党讲习所诸问题。并决议在党纲中规定：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之内容及解释，当以孙中山学说为断。

△　北京国立师范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美术专门学校、女子高等师范五校因政府积欠经费过巨，教职员薪饷无着，被迫同时停闭。

△　安徽省《民岩报》、《新建设报》、《劝业日报》、《民声报》、《商报》、《安庆新报》、《皖钟报》、《通俗教育报》、《皖铎报》等联名电督理马联甲并函省长吕调元称，以“教潮首犯”罪名被捕的《民治报》经理管曙东、编辑陈紫枫仅因直言无隐，报道此次教潮，并非有罪，请予释放，以重人权，而维舆论。

△　浙江省议员陈邦达等电斥王克敏甘冒不韪，谋求财长，“首先承办金法郎案，媚兹一曹而自绝全浙，忍弃祖宗庐墓而徇身中法银行，丧心病狂”，“望速自图，毋贻后悔”。

△　驻京美公使舒尔曼访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辞行，已定由沪转西贡再往云南调查西南政局，预计明年1月回京。

11月20日　　孙中山令讨贼联军各将领乘胜追击陈炯明、林虎残军，“务扫庭穴”，“奠安大局”。

△　国民党本部公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总纲明确指出："吾党之目的，在于中国领域之内构成一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使全体国民得于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遂其有价值之生存。揭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主张，以奋斗之精神，图其实现。"

△　北京政府派王正廷、刘彦、沈其昌赴日本调查前次日本地震后日人虐杀华侨及留学生案。

△　北京国务院参陆处以湘、鄂、川三省军事吃紧，电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该三省所有前方军务仍由吴指挥节制。

△　张作霖令奉天军警当局饬所属严禁现洋出境，如经捉获，除将所贩之现洋充公外，对犯者加重惩处。

△　援川黔军总指挥袁祖铭电萧耀南称，对四川熊克武军反攻的总攻击命令已下，梅山一带正激战，请速拨弹百万发。萧即令拨枪弹千箱、机枪弹30万发运川。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访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王毓芝交涉护路案，谓自外交使团提出护路案后，中国政府一再延宕，殊不能令使团满意，应请中国政府速行决断。

△　驻京日公使芳泽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强硬坚持日本在华享有建无线电台30年独占权。

11月21日　　孙中山特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鲁涤平为湘军总指挥，任命宋鹤庚为湘军第一军军长，鲁涤平为湘军第二军军长，谢国光为湘军第三军军长，吴剑学为湘军第四军军长，蔡钜猷为湘军第五军军长，陈嘉祐为湘军第六军军长。

△　曹锟令准署航空署署长潘矩楹辞职，任命航空署督办赵玉珂兼署长职。

△　安徽省长吕调元派怀宁县知事关婴棣为代表向各校校长道歉，并完全承认教育界拟定的八条办法，令教育厅送还各校校长之辞呈，令财政厅发一个月经费，通电更正本月3日不实通电。皖省教潮遂告平息。

△　河南督理张福来再赴许昌指挥剿匪。23日，豫匪“老洋人”向鄂边逃窜，攻破鄂、陕、豫三省交界之经商要地淅川李官桥，杀死200余人，架去肉票300余口，损失50余万元。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公使芳泽，谓中国政府尚未接收双桥无线电台，故该电台合同中之日本在华无线电独占权之效力尚未发生，中国对合同中关于日本30年独占权不能承认。

△　中国文艺协会在上海成立，推选袁寒云、包天笑、周瘦鹃等九人为审查员，余大雄、周南陔、江红蕉、严独鹤等20人为干事。该会宗旨在于“研究文艺，砥砺道德，本互助之精神，谋文化之发展”。

11月22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推谭平山、陈树人、谢英伯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组织秘书处。

△　曹锟指令顾维钧加委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为驻俄全权公使。

△　北京高凌霨内阁决议，路警督办直隶国务院，设护路督办处，不另设公署，每月经费1.5万元，由吴佩孚、王承斌各拨军队一旅归督办处指挥，两旅长兼督办处会办。

△　湘省长赵恒惕电令湖南各县知事，限在阳历年内将1924年之田赋及军用特捐扫数解省。

11月23日　　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所有东路讨贼军所属全部及广东讨贼军第四军，广东讨贼军第一、二、三师，高雷、钦廉、连阳三绥靖处，虎门、长洲两要塞，海防司令部等各部队，以及姚雨平、朱卓文、李天德、徐树荣、李安邦等部“编练整顿，节制调

遣，期成劲旅”。同日，孙中山令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所有属于桂军范围各部队，着统归该总司令编练整顿，节制调遣”。

△　孙中山为解决军饷问题，命令大元帅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政府，否则将自行提取。

△　孙中山电令嘉奖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克复重庆，并“着该总司令等督率各军，迅速扫荡，肃清川境，并力中原，以副本大元帅伐罪吊民之意”。

△　孙中山任命蒋尊簋为大本营参谋处主任。

△　北京高凌霨内阁续开裁员会议，议定裁员方针：一、实缺人员或见过命令、部令署派者不裁；二、曾经总统命令或指令交部酌量任用者不裁；三、凡经高等文官考试及普通文官考试及格，分发各部者不裁；四、积资提升者不裁。各机关取缔兼职。关于经费问题，由财政部统筹解决。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各国一再催逼庚子赔款须交现金事答复北京外交团，申明不能以现金付款。

△　中华国民教育促进会会长熊朱其慧及该会执行董事陶行知、四川董事晏阳初分赴武汉各校各团体演讲平民教育。

△　英、法、日三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湖南省军事长官强行将拟向盐商抵押借款之大宗盐斤擅行取去事提出抗议，请中国政府保护湘省盐号，防军人强索，以符善后借款条约。

11月24日　　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等文件。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通知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孙中山特派许崇智兼滇粤桂联军前敌副指挥，井上谦吉、朱润德为大本营参谋处军事顾问。

△　孙宝琦在北京就组阁问题发表谈话，略谓："余之组阁一事，众议院尚未投同意票，倘成事实，则余惟有遵守宪法，开诚布公，与天下英才共谋建设"，"照此做法，即是余之所谓执政方针。"

△　北京国立八校校长联名呈请国务院、教育部指定俄退庚款为教育基金。

11月25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说明该党改组主旨在加强组织与训练，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案，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之渴望；而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同日，公布《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凡61条。

△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敬告军人》宣言，期望各地各派系军人合作奋起，在孙中山亲自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旗帜下，打倒卖国军阀，与国民党协同并进，共为建设统一、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努力。

△　孙中山任命吕超为四川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石青阳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军总司令，汤子模、郑启和、周西成分别为四川讨贼军第一、二、三师师长，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　孙中山派叶恭绰持亲笔信赴奉天，联络张作霖讨伐曹锟，函称"屡蒙我公资助"，"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

△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讲演《过去党务失败之原因与今后努力之途径》，说明国民党改组的用意"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革命成功的因素是"革命精神"，"人民心力"，并强调指出

国民党员只有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整顿地方政治：一、土匪溃兵尽先剿抚，务早肃清；二、整顿财政，所有冗员一律裁撤；三、对于商民认真保护；四、扩充民团，改良警察；五、普及教育；六、提倡实业。

△　北京《晨报》载，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函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一、私越边界之官员人民，两国政府应令从速禁止；二、中东铁路之俄人利益，在租期未满之前，仍请保护俄国应有之正当权利；三、阿穆尔江（黑龙江）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俄政府仍愿遵守，务请派员与驻满洲代表商议航行办法。

△　英国皇家北兰夏联队第一大队抵天津。自欧战后，英国白种人联队屯驻华北者此为第一批。

11月26日　　粤讨贼联军分兵三路向陈炯明军反攻，陈军从石滩、石龙败退惠州，增城之围解除。至此，陈军进攻广州之战事遂全告失败。

△　孙中山电令嘉奖防卫增城有功人员，尤对增城命令传达所长胡谦及增城县长黄国民率疲困之兵，居无险之地，守援绝之城，当方张之敌，团结军心，守土安民，终能扭转战局，深表嘉许。

△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义勇军学校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并由廖仲恺筹备；推定执行委员林森、邓泽如、吴铁城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事宜。代表名数每省六名，其中由孙中山指派三人，各省党员互选三人，海外支部12人，合计代表144人。大会费用总预算五万元。

△　曹锟令免闽粤海疆防御使刘冠雄本职；任命卢香亭为陆军第二师步兵第三旅旅长。

△　曹锟宴请16国驻京公使及代办。宴后某重要外宾向曹建议，速组一裁兵预备会，由曹自兼会长，以吴佩孚、齐燮元等辅之，裁兵100师，留50师常备兵，以裁减之军费导淮及修理国道。曹表示将研究办理。

△　山东督理郑士琦电曹锟及国务院，谓昌邑土匪于双龙劫教士案发生后，营救教士正亟谋进行。但该土匪多为教徒，教士有与土匪勾结要挟招安之嫌，请向外交团交涉时说明。

11月27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制定全国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纲要及国民军军官学校筹备事项。

△　北京内阁决议裁员办法：一、宪法上无明文设置之独立各机关，除平政院应依法办理外，其余视其职务轻重繁简，或裁撤或减少经费；二、附属各院部之骈枝机关，悉行裁撤或归并；三、各机关经费以民八预算为标准；四、各机关人员除实缺外，酌减额外人员，以考试分发甄用合格等项人员派充；五、被裁人员之欠薪，由各机关开具体清单咨送财政部妥筹办法。

△　孙中山下令剥夺刘湘、杨森、邓锡侯、陈国栋、袁祖铭所有官职荣典，并着各省军民长官饬属一体协缉，务获惩办。

△　孙中山令省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命邹鲁兼校长，并委以改进广东教育之责。

△　曹锟令那彦图、陆洪涛、曹锳、蔡成勋、聂宪藩均晋授陆军上将，赵玉珂、熊炳琦、薛之珩均授上将衔；特任李厚基为全威将军，井岳秀为岳威将军，李鸣钟为刚威将军，张之江为洸威将军，刘富有为勇威将军，褚恩荣为荣威将军。

△　北京政府财政部裁减冗员，凡在实缺考取积资等官职以外之人员，均裁汰，所有顾问、咨议、参事上行走、佥事上行走、办事等

名目概撤销，各司会办、秘书厅办事及各科副科长、办事员种种职缺，亦一律取消。被裁汰人数达900余，每月省经费约10万元。

△　湘军谭延闿部第一、二两军联合滇军围攻粤北始兴，血战三昼夜，高凤桂、方本仁两部溃败。12月2日，谭军攻克南雄，继之分兵向江西南康、信丰、虔南、梅岭等地进攻。

△　湘军第五军军长蔡钜猷电孙中山，谓该部已退往湘西，子弹久罄，无法补充，恳拨大批子弹迅由湘南运给，并请促谭延闿即日督师反攻。

△　山东各界联合会代表及山东旅京同乡会代表赴国务院请愿，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撤惩与英国交涉的督办接收威海卫筹办善后事宜梁如浩。高凌霨表示服从民意，梁与英人商谈之条件，政府不予承认。

△　湖南水口山矿局工人俱乐部被军队占用，全矿3000余名工人罢工，并包围俱乐部。军队开枪镇压，打死一人，伤二人。工人向矿局严重交涉，要求军队立即撤出俱乐部，惩办凶手，抚恤死伤工人，罢工期间照发工资。30日，赵恒惕派兵封闭俱乐部，严办工潮首领，强迫工人复工。

11月28日　　孙中山加派林云陔、冯自由、徐苏中、林勉直、谢良牧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候补委员。

△　北京众议院开会再投孙宝琦内阁同意案票，反吴景濂议员以吴之议长资格已消除，提议开谈话会，推年长者张玉庚为主席。正议之间，吴率亲信议员及院警荷枪拥入会场，强占主席台。会场顿时大乱，两派互殴，双方打伤多人，各自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提起诉讼。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芳泽，抗议日本地震期间留日华侨被杀案，要求日政府赔偿、惩凶。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下令裁员：一、全体裁减津贴，自总长始，每月2000元；二、顾问及咨议改名誉职；三、兼差人员限10天内自行呈明，兼职不兼薪；四、雇员、录事等裁减一半。

△　张作霖在奉天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讨论奉直议和方针及军事计划，决定：一、议和前，直奉各军从山海关、喜峰口等地各退20里；二、热察绥三区都统由奉保荐，中央任命；三、恢复奉方巡阅使以下各职权，旧官吏不得更动；四、推孙烈臣为奉方代表，议和地在天津；五、自民国十三年起，增加军饷；六、改定奉军驻防地点，务期调动迅速；七、奉天设陆军大学；八、边防军分六区，每区驻二旅，省防军各省分二区，每区驻一旅。

△　安徽《通俗教育报》因关于学潮之记载，“秉笔直书，未稍隐讳”，被省长吕调元下令停办。29日，吕又以皖省学潮捣毁议员家宅为由，令警察厅将全省学生会解散。学生会代表迫于被镇压之危，纷纷逃往外地。

△　武昌、汉口、汉阳举行平民教育集会大游行，参加者达四万余人，陶行知、晏阳初到会演说。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开会，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

11月29日　　国民党广东支部长邓泽如及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在信上批示，谓改组国民党是本人的主张，“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并指出“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

△　曹锟下裁员令：中央机关除平政院应依法办理外，统一善后委员会、政治善后讨论会、京兆河道管理处、运河工程局、水路测量所等机关均着一并裁撤。外交委员会、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航空署、全国水利局、侨务局、蒙古宣慰使公署、关税特别会筹备处、赈务处，政务现尚无多，规制亟宜缩小，均应就原定经费，酌量裁减，另行核定。农商部所辖试验制造各场所，成绩甚鲜，即责成该部考核裁并。各部院现有官吏，除实职人员外，应按照事务繁简，酌定额外人数薪等，就考试、分发、甄用等项人员遴选派充，另定简章办理，总以经常政费不超出民国八年度预算为度。此后各部院用人行政，务须恪守此令。

△　廖仲恺、鲍罗廷奉孙中山之命由广州赴上海，向上海国民党本部人员解释关于国民党改组的诸问题。

△　北京参议院函国务院催发院费，谓政府积欠该院议员岁旅费已达100多万元，议员纷纷催发欠薪，请政府特别提议予以解决。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请假回国，自是日起由荷兰公使欧登科继任领袖公使。

11月30日　　反吴景濂派议员在北京西安饭店开会，以吴在议院强据议长席位，指使院警殴打议员，决议请司法总长程克撤换袒吴之北京地方检察厅长龙灵，并函国务院，“饬主管饥关将吴景濂及一般正凶，严拿惩办，以维法纪”。

△　整顿路电会议在北京召开，到各省区代表40余人，交通总长吴毓麟主持会议，吴称这次会议意在改变“入不敷出，行将无法维持”的困境。

△　吴佩孚电曹锟及国务院，催促速发何佩瑢长鄂令。高凌霨持吴电见曹锟，曹谓旅京鄂人及武汉各法团反对何氏长鄂甚烈，余当另物色无劣迹之鄂人长鄂。

△　日公使芳泽谦吉与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再交涉中日无线电问题。日使仍坚持拒绝移交北京通州双桥无线电台，同时亦坚持日在中国无线电30年独占权不变。交涉无结果。

12月

12月1日　孙中山令杨希闵、谭延闿转饬所属，将广东北江各军队所封用各盐船，一律即行交回盐商收管应用，庶便运销而裕饷源。

△　孙中山任命冯自由为广东宣传局局长，原局长邓慕韩免职；任命马超俊为广东兵工厂厂长，原厂长朱和中准予辞职。

△　曹锟特派汤芗铭兼任督办武阳夏三镇（今武汉市）商埠事宜；派杨敬修为闽粤海疆防御使。

△　北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再发议程召集众议院会议，谋通过孙宝琦内阁案。反吴派议员探知吴派议员在会场武力布置严密，恐在会场内不敌，遂雇用车夫、乞丐、杠夫等千余人号称“公民团”，手执反对吴景濂之小白旗到众议院请愿，阻止议员入场。中立派议员见势不妙，多不入场。“公民团”虽被军警驱散，但拥吴派议员终因不及法定人数而流会。

△　北京外交团开会讨论伍朝枢函请将广东关余划归粤政府问题，结果一致否认，即电知粤领事团警告孙中山：“一、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本外交团均不予以容纳；二、如有上述情事发生，本外交团即当采取相当强迫手段，藉凭办理。”

△　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联名电孙中山，请勿将广州开放为自由贸易港，谓此举影响公债基金太大，况整理内债案中之八厘军需公债，系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如令此亦动摇，实有反创共和国者之意，望能保全关税，使商民免遭受损失。

△　吴佩孚援川军分三路合攻重庆，左路由合川，右路由忠州，中路由长寿。杨森通电宣告两星期可克重庆。

△　北京国立八校“读书运动会”发表宣言，宣布该会改名为“国立八校学生教育基金运动会”，并声明此后“凡关于庚子赔款之退还，华府会议增加关税之拨充，皆在运动之列”。

△　北京国立师范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美术专门学校、女子高等师范五校得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极力奔走，筹得部分经费，宣布复课。

△　漳厦护军使臧致平部旅长李崇寅在厦门禾山勒索款20万元，将乡长100余人扣留。后被扣者认缴八万元，始得释放。

△　梁启超在北京松坡图书馆为江苏铜山县年仅22岁的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作序。

12月2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庆祝广州防卫战胜利，并欢宴湘、豫、滇、桂、粤各将领。席间孙发表演说，勉励各军将领实行三民主义，要“能够替主义去牺牲，然后才扩充到兵士”。同日，孙中山任命孔庚为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刘鸿逵为湖北讨贼军第一路司令。

△　高凌霨代总理电嘱各省，推荐在野名流来京，共组“国事商榷会”。该会附属于国务院，专门讨论国事疑难问题。凡该会议决之件，作为施政方针，交由政府顺序执行。

△　曾琦、李不韪、张子柱、李璜、胡国伟、何鲁之、梁志尹、周燮元、郑振文、王建陌等在法国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党。推选曾琦为党务主任，张子柱为宣传主任，并通过党纲，发表宣言，宣称该党以国家主义，全民政治，社会政策，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跻国家于独立自由为宗旨。

△　湘军第六军蔡钜猷部猛攻湘南，谋打通赴粤之道路，是日在

武冈与蒋锄欧旅激战，蔡部不支，退回洪江。

12月3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决议：一、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除由孙中山每省指派三人外，由上海本部介绍六人，由本委员会介绍若干人，以备孙中山指派；二、大本营党务处、宣传委员会及广东宣传局均裁撤，归并本委员会办理；三、委员会经费由广州市政厅垫支，由党归还；四、未经委员会核准以前，党员不能自由发表关于党务意见于报纸。

△　孙中山在广州兵工厂宴各机关长官，谈及许崇智离粤事，略谓："外间谓许崇智去粤由我负责，其实不然。潮梅丧师，石龙溃退，败军之将，责备何足奇？许之去实因他为粤军总司令，他见所部屡败，无法收拾，故命令一下即去，我已着人找他。"

△　拥吴景濂派议员陈子斌等数十人联名质问政府，谓本月1日众议院门前千余名鸠形鹄面之乞丐"公民团"，盈街塞途，散布传单，破坏议员开会，"政府闻之而不立予查究，是否步袁、段之后尘，为解散国会之准备"，要求政府三日答复。

△　北京外交团电广州政府，声言如广州政府径行收管广州关余，当以强硬手段对付。同时，外国军舰近20艘集中黄埔，准备驶入省河进行威胁。

△　北京国立八校学生教育基金运动会派代表分别谒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财长王克敏、教长黄郛、财政整理会长颜惠庆，请其一致援助将俄退庚款全部拨充为教育基金，同时致函北京银行公会，请勿允政府将俄退庚款抵押他用。

12月4日　　曹锟指令准黄郛辞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兼职，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由外交总长兼任；特任杨清臣为骧威将军，葛树屏为斐威将军。

△　北京政府财政、外交两部以俄退庚款为基金，发行国库券500万元，给驻外使领馆为欠薪经费。5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一致反对财政部挪用俄退庚子赔款，分别致函王克敏及北京银行公会，力争该款只能作教育基金专用。6日，财政、外交两部与教育界协商，教育界被迫妥协，议决再加发100万元国库券作教育经费，分16个月发给。

△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于石滩电孙中山，谓刘玉山、刘震寰、许崇智、卢师谛等部每遇战事，辄令滇军出马，致使云南子弟损失极多。

△　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奉派赴日调查地震中华侨被惨杀案，是日途经奉天，对张作霖谈：中俄交涉诸问题，与日本的利益关系密切，“东京政府之意向，认为有倾听之必要，故余有此东京之行”。

△　许崇智、叶恭绰、廖仲恺与汪精卫由沪同往杭州会晤浙督卢永祥。

△　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电呈广州孙中山，报告日轮“宜阳丸”、“云阳丸”装运军火，驶经戒严区内，不服检查，击毙官兵六名，于9月7日被反杨森之周西成部截击之真相，请孙中山据实向日本交涉，并要求日方赔偿损失费100万元。

12月5日　孙中山令大本营外交部就截留广州关余事复照北京外交团，谓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

△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电催蒋介石速赴粤就任军官学校校长。

△　曹锟特任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后，曹将巡阅使印信交保定

派军事处处长陆锦掌握，陆竟以代巡阅使自居，用此印信向各方追索使署旧欠经费。吴得悉，甚愤。是日，吴自洛阳电曹锟，请速将印信送往洛阳。6日上午，吴又电曹请裁汰一部分使署人员；下午再电曹请将保定使署撤销，使署即设洛阳。保洛分裂自此开始。

△　孙中山令熊克武、刘成勋将川省解中央税款扣充军费，随时册报大元帅府报销。

△　全国路电会议决议：假冒军用包运货物、藉口军务勒迫挂车、军人无票乘车，此三者严加取缔。嗣后各路每次另挂三等车一辆，以供军人乘用。

12月6日　孙中山电旅沪参众两院议员，略谓今法律效力，悉被蹂躏于暴力之下，“继此而谋救国之策，舍革命之外，必无真能成功之望。至盼患难与共之国会同人，舍国会之奋斗，助革命之进行”，并告以粤中军事颇称得手，“全粤肃清，即当提兵北伐。实力之助，宣传之功，惟诸君之力是视”。

△　曹锟特任赵荣华为彝威将军，免陆军第十八混成旅旅长兼施宜镇守使赵荣华本兼各职；裁撤施宜镇守使、荆州镇守使二缺，改设荆宜镇守使，任卢金山兼荆宜镇守使；于学忠为第十八混成旅旅长；杨树庄为海军练习舰队司令。

△　吴景濂再发议程召开北京众议院会议，谋通过孙宝琦组阁案。吴由卫兵多人拥入会场，反吴派议员均不出席，结果因人数不足流会。同日，前往甘石桥俱乐部领取津贴之宪政党议员300余人均签名同意组织“临时行政委员会”，与民治社协力推倒吴景濂。

△　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公署照会驻京俄代表团，要求讨论恢复中俄邦交诸问题。7日，俄代表团将该照会退还，并附函称，对中国外交部以外机关之文书，该代表团不能收受，俄代表团与该署不能发生关系，中方此举表明中国政府不准备恢复中俄正式邦交。

△　武汉总商会欢迎何东爵士。何讲述为中国实现和平奔走各方联络之经过，谓和平会议发起后，得到孙中山、唐继尧、刘显世、段祺瑞、张作霖、齐燮元、萧耀南等赞同；所提实现和平宗旨为：一、息兵；二、统一；三、裁兵；四、理财。15日，何东返沪。16日，何之秘书谈称，川粤军事失利，武力统一计划殆已失败，和平运动表面已一致。

12月7日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在粤成立，取消沪本部与中央干部会议，另组驻沪执行部。12日，沪本部复电孙中山，告以该部定15日起办结束，月底取消。

△　孙中山接见《字林西报》记者，谓“两广关税收入年约千万元，此本两广人民之钱，故当为两广所有”，并表示广州政府决不畏列强炮舰而改变截留关余之主张。

△　吴佩孚派驻岳州之两湖警备司令部军务处长葛应龙在驻地召集湘省绅商会议，运动湖南取消省宪，投归曹锟政府，并当场宣布赵恒惕附北电文，内称宪法已公布，湘省宪与国宪有相抵触之处，俟各省遵国宪修改后即行修改。

12月8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请孙中山自兼军官学校校长，孙不允，仍决以蒋介石为校长。

△　北京政府致电孙中山，略谓：内政上虽然不无意见不同之处，而对外必须一致，粤海关事关重大，务望慎重处置，勿启各国干涉之端。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与中国、交通、盐业、金城四银行签订借款100万元合同。该款专为兑换铜元票用，利息一分，自1924年3月起，每月以盐余10万元摊还。

△　北京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各国政府因有爱于中国

促进和平统一之诚意，信誓立约，禁售军用品于中国，以免延长内乱。倘有第三者违犯此项公约，准由该犯事地方之官厅提付使团，按照国际公法从严判处”。

△　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驻京代表加拉罕，谓俄退还之庚款，不能按俄方要求全部拨充作教育基金，应俟将来中俄会议解决。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就日人惨杀华侨案照会日使芳泽谦吉，提出三项最低要求：一、日政府迅速调查事件真相，依法严惩杀人凶犯；二、按次发表调查结果及处罚情况；三、对被害华侨之家眷给相当之抚恤或安慰费。

12月9日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谓国民党“此次改组，乃以苏联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过去经验表明“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俄国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各党人个个能为实行主义奋斗，不汲汲于握兵权，但监督之使为己用而已”。

△　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沪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改组问题。由廖仲恺报告改组意义及措施，并成立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汪精卫、居正、张继、叶楚伧、戴季陶、胡汉民、谢持为委员。

△　鲍罗廷在沪与中共干部会晤，鲍建议由瞿秋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

12月10日　　孙中山就广州政府截留关余事发表对外宣言，谓直系以北京政府作傀儡，扰乱地方治安及经济，列强不应要求粤税汇京。本政府行使其固有之权，管辖此税。中国海关所担负之债，向无不足偿还之处，若中国各处关税不足偿还外债，本政府愿任补偿。

△　曹锟特任邓锡侯为骠威将军，陈国栋为骞威将军，田颂尧为章威将军，唐廷牧为烜威将军。

△　北京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王克敏报告称：财政紊乱枯竭，积欠内外债已达20亿元，收入关盐税已无余，可为中央用者仅烟酒印花岁入二三百万元。除山西省外，各省亦欠债累累，中央亟欲与各省协同统筹计划，谋正本清源之良策。中央政费每月定300万元。定明年二三月再开第二次会议。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查询五国军舰是否占据黄埔粤海关，因何事故，请查实情。11日，使团照复外交部，谓“保护海关收入，为使团义务”，但现军舰仅集中广州湾，并未登陆。

△　宪政党宣布到该党部领津贴之参议员135人，众议员316人。该党决议：吴景濂如再发开会议程，党员出席与否，须一致行动；吴若不发开会议程，用全体名议以过半数议员通过即发通知，自行开会。

△　陕西督理刘镇华电北京政府，谓“陕西年来水旱频仍，土匪肆虐，师旅饥馑，人民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请拨巨款，设法拯救。

△　督办接收威海卫筹办善后事宜梁如浩，因与英国缔结威海草约，丧权误国，举国反对，是日向外交部自请辞职。

12月11日　　孙中山令湘军总指挥鲁涤平、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传令嘉奖北江大捷之前敌作战将领及官佐士兵，并勉其“再接再厉，共襄大业”。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奉孙中山之令复电上海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解释扣留关余之原因，说明“西南虽提取关余，于公债基金仍无影响”，并称：或不得已，辟南方港口自由贸易，虽牺牲税收，亦于商务有裨益。

△　鲍罗廷向孙中山面陈国民党改组之详细计划：一、将改组之计划广向人民宣传；二、精细制定国民党总章；三、以广州为党的核心，上海为第二中心；四、尽早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五、大会以后，建设地方党部。

△　曹锟令安徽省长吕调元着开缺，特派吕调元督办安徽全省铁路事宜，特任马联甲暂行兼署安徽省长；江西省长徐元浩、署江西省长陶家瑶均着开缺，特任蔡成勋暂行兼任江西省长，特派陶家瑶督办江西九江商埠事宜；京师军警督察长张拱辰免本职，任命宋锡金为京师军警督察长。

△　北京国务院就英、法、美、意、日诸国因广州当局议定取消海关，改广州为自由贸易口岸，各派军舰集泊海面，并拟派陆战队登岸之事，电令援粤前敌各将领：海关税早充赔款及借款担保，不容任何变更，若外兵登陆，有关领土权，除向公使团质问外，希慎重将事。

△　北京众议院开临时会议，两派议员为吴景濂任议长问题吵成一片，吴见势不佳，急摇铃散会。

△　吴佩孚电告湘省军事当局及各将领，声明已就任直鲁豫巡阅使，湘省军事已告结束，今后不再遥控湘省军政。

△　北京外交团决议再次照会北京政府，声明孙中山坚欲占据海关，今为中外利益计，有维持海关安全之必要。

12月12日　　曹锟令河南省长张凤台免职，特任李济臣署河南省长；特任刘宝善为耀威将军，时全胜为将军府将军。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电广州领事团领袖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声明依条约规定，列强对于关余之用途并无议决之权，公使团亦无分配关余之权，至于以海关税收入偿还国内公债事，公使

团与之毫无干系，故不能再有表示。

△　吴佩孚援川军向重庆发动总攻，中路杨森亲率所部从涪陵溯江西上，北路袁祖铭、邓锡侯所部从江北强渡长江进攻，南路唐式遵、杨春芳部从江津分道进击。

△　上海红十字会分别电广东大本营大元帅孙中山及江西督理蔡成勋，谓“粤边战事，伤亡相继，亟应组设医院，从事救护”，请即电令前敌各军，照约保护救护队。

△　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谓近来华军屡有攻击俄尼布楚县各村落之事，并私将婆尔维斯卡村交界碑迁移一里半之地，请中国政府对此活动严加取缔。

△　南京东南大学失火，烧毁校舍精华，理、化实验室及图书、标本均被焚。

12月13日　　曹锟令蒙藏院副总裁潘毓桂免职，以沈学范继任；任命曹士杰为将军府将军。

△　北京国务院通电饬各省长官，嘱令对“公民团”严加制止，切望饬警厅设法防范，以维治安。

△　拥吴景濂派议员开会，决议：一、公函质问高凌霨不发岁费之原因；二、请吴景濂向银行团借款，先行发岁费。

△　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谓中国政府擅将俄国退还之庚款作维持驻外使领经费，违背俄代表关于将该款拨作教育基金之声明，俄代表团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12月14日　　曹锟令刘镇华晋授陆军上将；特派驻瑞士全权公使陆徵祥就近签字于第四届国际劳工大会修改欧战和约关于劳动部分条文。

△　英、美、日等列强派军舰17艘驰入广州白鹅潭示威，对广州大本营扣留关余事进行武力恐吓。

△　北京公使团申明对粤截留关余之态度：一、公使团不干涉中国内政，但需保护庚子赔款担保品之安全；二、使团决不允许孙中山截留关余，以保护中国关税行政之完整。

△　川军杨森、刘湘、袁祖铭、邓锡侯等部再克重庆；讨贼军熊克武、但懋辛部从重庆败退璧山、綦江。胡若愚之滇军、周西成之黔军亦南退。

△　北京参议院开会反对金法郎案，要求高凌霨、王克敏、顾维钧到会质询，高等三人均托辞不到。同日，参议员王家襄等120余人联名函国务院质问金法郎案，谓该案已被众议院否决，政府只有依法办理，绝无游移余地，报载王克敏有变相承认说，请五天内明确答复。

△　北京铜元票舞弊案主犯、前币制局督办张英华家宅被查封，张闻讯逃往天津。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提出整理铜元票收回押品三项办法：一、押款尚未全交或借词不交者，应即全数追回，如违罚办；二、押款已交清者，少数应清算本息，立予偿还，将押品收回，大数则分期偿还若干，将押品取回若干；三、拨付军警之押品，应商定付款收回日期。

△　唐在礼就任路警督办职，同时声明：命令上为交通部路警督办，条例上隶属国务院，范围不清。交通部又设路警总局，权限更不明。护路军队，各有本职，调遣不灵，责重权不属。因总统及各方督促，勉先就职。

△　北京政府教育部电告各省省长，本年度选派留外学生，因多

数省份学费无着，应暂停办理。

12月15日　　孙中山任命由赣来归之北军高凤桂部为中央直辖第一师，高任师长，着归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节制指挥。

△　曹锟以近年各机关时有聚众滋扰罢公要挟情事，是日下严肃官纪令，饬各该长官随时告诫，严行制止，如有违抗情事，即会同地方军警长官严重惩办。

△　曹锟令国务院根据薛笃弼查办铜元票舞弊案报告，将所有舞弊案当事人按名严缉依法惩办；币制局即行裁撤，由财政部接收办理。

△　以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完毕，是日回到上海。

△　北京航空公署督办赵玉珂向王克敏索经费10万元，王答无款。赵拉王入总统府，曹锟不见，二人遂在怀仁堂发生冲突，王被赵殴打，经陆锦等劝止。同日，王克敏以“财政困难，各方需要，无以应付，自陈才力不及”，向曹锟辞职。16日，曹将原呈送还，加以慰留。

△　北京参议院开会，继续要求高凌霨、王克敏、顾维钧到会质问金法郎案，高等又以开国务会议为辞拒不出席。参议院行政委员会委员赴总统府见曹锟，亦被拒之门外。大会决议通电反对金法郎案。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电各省，谓各省留外官费学生因官费积欠年余，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请速汇款救济。

△　台湾日本当局出动军警，将“台湾独立团”成员69人逮捕。该团拟仿英国与印度之制度，建立台湾自治政府，以摆脱日本统治。

12月16日　　广州各界人民2.4万余人召开全省公民大会，决定收

回关税主权和抵制英美货物，会后前往沙基游行，并向大元帅府请愿。孙中山接见代表，表示“三日后用正式手续提取关余”。同日，大会电驻北京各国公使，说明将广州关余收回以建设广东，全属内政范围，请诸公使主持公谊，切勿逾轨干涉。

△　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并划上海为七个区，成立七个分部。

△　宪政党开会讨论推倒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办法，决议：一、以后众议院开会，本党党员一致出席，如吴景濂退席，宣布散会，本党同人即在议场开会；二、派代表向参议院借议场开会；三、以后自由开会以本党众议院议员300名以上署名。

△　参议院议员谷嘉荫等160人联名通电痛斥中法实业银行总裁王克敏以自身利益计，不惜滥用财政总长职权，秘密计划承认金法郎案之卖国罪行，表示彼等职责所在，不能对此坐视，并敬告国人，一致主张，誓死反对。

△　《赣浙和平公约》由两省绅商代表极力运动，11日浙督卢永祥、省长张载阳在和约上签字，是日赣督兼省长蔡成勋亦在和约上签字。该和约规定：一、两省军民长官，以保境安民为职志；二、两省军队各驻原防，不相侵越；三、若客军侵入两省区域，应由两省军民长官各自负责，设法防止；四、该公约两省军民长官签字后，由两省商民公证宣布。

△　山东“临案”首犯孙美瑶自被收编后，与鲁督派往枣庄监视孙部的稽查新军执法营务处处长吴可章发生冲突，吴急密电请郑士琦派兵。是日，郑派大队人马赶赴滕县，并急电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相机应付。17日，孙电郑表示认过，郑复电抚慰，风波暂平。

12月17日　　孙中山电美国国民，谓关余问题为中国内政，而美国政府以“多于他国之军舰，合力为毁中华民国之谋”，是“摧残自由，

蹂躏人权”，“吾人为自由而战，深愿美国有一如法将拉义脱之人，以予一臂之助”。

△　孙中山令廖仲恺、孙科转饬公安局：前令（11月7日）向广州市内房主借用一个月租金，声明不满五元者免借，现因军费亏缺过巨，不满五元者仍应一律照借。同日，又令廖仲恺、孙科再向广州沿岸各码头借捐租一月，以供军饷。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特派员傅秉常致函驻粤英领事，质问外舰麇集广州水面之理由。

△　广东总工会电孙中山，谓“关余为我粤应有，以粤款整理粤政，外人实无干涉之权”，务乞坚持收回粤关余之目的，勿为强权所屈。

△　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出席参议院大会，说明金法郎案情况，谓该案前外交总长黄郛确曾承认，该案焦点在于对条约之解释，此约关系八国，现政府尚在“慎重考虑”中，但最后仍须与国会一致商酌，并已电告各国公法学家，征其意见以作参考。

△　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电北京参议院谷嘉荫等参议员，表示赞成参议院16日反对金法郎之通电，并主张该案应由政府公开解决。

△　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电告吴佩孚，粤舰全部离汕头开往青岛。

12月18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吴景濂仍占据议长席位，拥吴派议员欲以“金法郎案”攻击高凌霨代内阁，从而通过孙宝琦为内阁总理。反吴派议员激烈反对吴占议长席，议员黄翼以墨盒掷出击伤吴头部，两派议员遂在会场武斗。吴景濂誓死不退席，令武装警卫拥入会场，打伤多人，将黄翼捆绑禁于密室。同时封闭会场门道，强迫议员投孙内阁赞成票，但投票者甚少，吴见此况，将票锁入柜内，不予开

箱。

△ 北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通电痛诋高凌霨煽动国会议员反对其任议长，阴谋破坏国会开会，并自称为“反对金法郎案最力之一人”，决不能“违法去职”，“在职一日，决当从两院同人之后监视政府，使卖国举动无从实行”，“虽以身殉法律，殉国会，殉国家，皆所不惜”。

△ 吴景濂以众议院议长名义领衔发表反对金法郎案通电，谓“若以金法郎折算，则我国损失当在一亿二千万元左右，倘八国同时援例，则损失之数更属不赀”。该案既经本院否决，通知政府在案，高凌霨代揆以来，有变相承认金法郎之说，故通告中外，务请共相援助，使违约坏法卖国营私之徒阴谋不能得逞。

△ 北京众议院议员牟琳等323人联名通电，指控吴景濂任议长期已满，为强霸议长席位，指挥武装院警在议场殴打议员之罪行，并揭露吴以议长名义领衔发反对金法郎案之通电的阴谋，谓金法郎案同人已于10月初旬全体一致否决，政府如有违法承认情形，自当依法弹劾，并科以应得之罪。吴假借该案，以议长名义领衔，使同人不便开口，以图夺取议长之目的。

△ 北京国务院为金法郎案通电申辩。略谓：参议院16日通电，借金法郎案痛诋政府，与事实全不相符。金法郎案为全国所注目，如果承认，当必立时宣露，何能秘密？此系外交要案，政府更无所用秘密承认，亦不必变相承认。对此事造谣鼓煽之人，政府定饬军警严密查拿，根究严办。

△ 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率全体官佐士兵通电宣布北归，略谓：“海军原为护法南来，现在法统重光，任务将告结束，率队北上，微特为护法始终之表示，且为南北统一之先声”，愿南方同志，早息纷争，速促国家统一。

△ 北京国务会议决议，赵玉珂之航空署经费照军警每月所领成

数一体支配，王克敏之辞呈由曹锟指令慰留，王、赵冲突案和平了结。

△　南昌学生联合会以传闻各国舰队有共管长江上游之说，特通电各地外交后援会、学生联合会，请一致反对，并电北京外交部，如公使团正式提出，请誓死抗议。

12月19日　　孙中山特派赵杰（前亲奉河南督军赵倜之弟）为豫鲁招抚使，同日任林云陔为广东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叶恭绰致函总税务司安格联称："奉大元帅令，本政府管辖地方内，本年各海关一切税收，除对于以关税作为抵外债及赔款应按比例押扣清还外，所余之款须妥为保管，候本政府命令支付。"

△　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奉山东督理郑士琦密令，在枣庄中兴公司以调解招安旅旅长孙美瑶与稽查新军执法处处长吴可章之冲突为名，将孙诱入宴会，当即捕拿就地处决。同时被诛者11人，孙之兄孙美松逃走。23日，郑士琦印"免死证"2500张送枣庄分发孙部，将该旅2000余人缴械资遣回籍。

△　北京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高凌霨令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将众议院警长及警卫一体撤换，薛当即令张汝霖为警长，率新警百余名到众议院接职，被原警卫长汤步瀛拒绝。20日，高凌霨再次严令薛之珩强行执行，新警始得入院。

△　吴佩孚电告河南军民长官，谓新任河南省长李济臣因身任参谋长职，亟须出巡清乡，故在洛阳接省长印，所有省府各机关暂留开封。

△　众议员黄翼被吴景濂送检察厅后，是日由议员王枢等保释。同日，黄翼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控诉吴景濂霸占议长席位，指挥院警行

凶，私擅捕禁议员，要求检察厅立即“严捕正凶吴景濂”，“以戢凶焰而重人权”。

△　王正廷在日发表声明，谓华人在日被杀惨案，“事实上不能由本人亲自调查，且明知亲自调查，亦无所得”，故决定委托日本民间律师代为调查。

△　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日商木多洋行副班诬称厨师田仲香偷窃金表链一挂（金表链实系被该行大班携往上海），私用毒刑拷打。次日，田身亡，该行诡称田畏罪自杀。

12月20日　　孙中山致函广州海关监督，要求自即日起将粤关税收入陆续缴纳于广州政府。

△　曹锟任命憨玉琨为陆军第三十五师师长，张治公为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

△　高凌霨代内阁向曹锟总辞职，谓众议院16日通电和吴景濂18日通电虚构丑诋政府承认金法郎案，谣诼繁兴，无法解释，不得不避退贤路。曹锟阅后即将原呈交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退还高凌霨，予以慰留。

△　高凌霨代内阁全体成员联名通电，指责吴景濂18日通电以金法郎案“悬揣虚构，集矢政府”，特郑重声明，政府从未承认金法郎案。

△　北京政府内务部声明撤换众议院院警真相。略谓：众议院院警已失去保护议员及议会之职能，屡有武装闯入议场殴打议员情事，围困司法官吏，拘禁黄议员多至七八小时之久，据谷芝瑞等358名议员之请，本部职责所在，将原院警全部撤换。

△　吴景濂通电斥责内务总长高凌霨突派武装警察数百名占据众议院，违背院法第八十六、八十七条关于院警由议长委充指挥监督之

规定，越权干涉议院，破坏国会，其居心在于阻止孙宝琦内阁案通过，而达其承认金法郎案之卖国目的。

△　北京政府驻法国公使陈箓电告外交部称，法外交部派员到使馆申明，法国交还广州湾与金法郎案须连同解决。外交部即电饬陈箓对法国无理要求严加驳复，此两案各为一事，绝不相涉。

△　廖仲恺电蒋介石，谓鲍罗廷有要事相商，军官学校亟待开办，盼到沪结伴返粤。

12月21日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大学发表演说，勉励学生为重建中华民国努力，并告诫学生们应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　曹锟特任马麒为锐威将军，任命马麟、马廷勷、刘郁芬、鹿钟麟、宋哲元为将军府将军。

△　北京众议院院警被高凌霨强行撤换后，是日吴景濂携带众议院案卷及帐簿仓皇潜逃天津，并以众议院议长名义通电声言此后众议院任何举动，皆属非法无效；孙宝琦内阁案不能通过，应由政府负责。

△　前财政次长贺德霖函陈国务院，声明张弧财长任内洽商金法郎案之经过。略谓本人在与法使谈及金法郎案时，始终坚持依照众议院决议，按1905年换文办法办理，均咨商外交部在案。

△　驻京法使派参赞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接胡祖舜等四议员来函拒绝承认金法郎案，本使无权与国会交涉，恕不答复；并声明法政府仍主用金法郎付款，不因议员反对而变更态度。

△　谭延闿在广州召集湘军将领开军事会议，决议湘军回湘，蔡钜猷得孙中山军援湘，即全军赴乐昌拒沈鸿英、赵恒惕，如得胜即乘胜回湘。

△　日警残害华工田仲香案，激起汉口日租界帮日华工公愤，是日数百华工包围日警所，要求再验尸，日警武力驱逐，打伤华工六人。

12月22日　　曹锟特任施从滨为恂威将军，张怀斌为丕威将军，张培荣为迅威将军，潘鸿钧为廓威将军，吴长植为卓威将军；任命徐鸿宾、孙宗先、胡翊儒为将军府将军。

△　北京参议院决议查办黄郛、王克敏关于金法郎案之罪，并咨请政府派员彻查，如罪状确实，即交法庭讯办。23日，府院协商，以宪法规定，对国务员只有弹劾权，无查办权，饬秘书厅将咨文退回。

△　吴佩孚援川军分兵三路向永川、綦江、璧山进攻，杨森部逼近綦江城下。

△　湖南赵恒惕军向溃退湘西的蔡钜猷部发动总攻，蔡部全体军官声明蔡已下野，请赵勿再追逼。23日，蔡部旅长刘叙彝、田镇藩及全体团营长通电，表示拥护赵恒惕。

12月23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党员大会，到3000余人，汪精卫报告孙中山关于改良党务宗旨，胡汉民、廖仲恺均发表演说，并选出张拱辰等三人为出席1924年1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

△　张伯烈函北京众议院，谓宪法初颁，内务部竟违法逐警，占领议院，蹂躏国会，“造意于议员，实施于内长，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特辞众议院副议长并议员职。同日，吴景濂致函众议院，声明其议长资格并未消灭，为反对高凌霨等卖国当局，不能违法解除议长职务。

△　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开紧急会议，讨论日警残害田仲香案。决议通电全国，请一致声援；并向政府所派交涉员陈介提出六项要

求：一、取消日本在我国领事裁判权，并解除日本在汉军警武装；二、撤换日本驻汉领事；三、惩办日本驻汉警察所长；四、日本木多洋行副班依法抵死；五、由日政府派员向汉口各团体谢罪；六、抚恤田仲香家属。

12月24日　　孙中山发表关于粤海关关余问题宣言，谓关余之处分，为中国内政问题，“而列强借保护其尚未确定权利之名，集军舰于省河，实无异帮助北京政府，以压制本政府”。宣言并重申：“北京政府系属非法，且为全国所弃，当然无权处分本政府辖境内之关税余款。”

△　孙中山任命黄明堂为中央直辖第二军军长。

△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复使俄之命，并商讨对时局之主张。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

△　广州工会联合会、新学生社等70余团体举行示威，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坚决要求收回关税主权，抗议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

△　北京众议院开会，拥吴景濂派议员马骧提议解决内政部撤换院警违法事件，反吴派议员主张组织行政委员会，两派大闹，秩序混乱。中立派议员调停无效，即散会。

△　驻京意大利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南阳、老河口等地土匪猖獗，均系“老洋人”部下，该地有意国教会教堂、医院、孤儿院，恐遭土匪烧掠，请万急设法保护。

12月25日　　孙中山以鲁涤平辞湘军总指挥职，令改任湘军第一军军长宋鹤庚兼任湘军总指挥。

△　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就日警残杀华工田仲香案召开群众大

会，各团体、各学校及市民二万余人参加大会。大会一致通过督促交涉员陈介依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所提六条件向日领事严重交涉。

△ 曹锟任命李彦青为平市官钱局督办。

12月26日 孙中山接见李福林。李转告在香港遇陈觉民、金章代表陈炯明来求和。孙中山表示："陈炯明如果有悔过之诚，应即来省见我请罪。"又谓："然陈若今日有悔悟，立即今日通电表明其悔过之诚意，斯犹有商量余地，若徒以他人辗转传达，为口头之求和，则余不能停兵以待也。"

△ 武昌各工厂工人及劳动界召开大会，决议就汉口日人残杀田仲香案组织工界外交委员会，实行对日绝交。同日，武汉商界田案外交后援会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对日严重交涉。

△ 河南省长李济臣通电称，豫省行政公署迁往洛阳办公。

△ 孙传芳电浙江省议会，声明闽军决无攻浙之意，闽军调动，纯为冬防，保境安民。

△ 北京政府驻苏联全权代表李家鳌离京赴任。

△ "老洋人"股匪由河南新野沿白河南下，窜至湖北襄阳东北乡，大肆焚抢。

12月27日 孙中山以李鸿祥受曹锟、吴佩孚密令潜来香港，阴遣党羽，希图煽惑军人，实属甘心附乱，罪不容诛，着地方文武严缉，以儆愚顽而肃国纪。

△ 曹锟指令：朱深、梁鸿志、方枢免予通缉，曲同丰撤销察看，张敬尧免予查办。

△ 北京内阁会议决议：根据国会否决金法郎案原案，驳复美、

英、法等八国关于用金法郎付庚子赔款之要求，国会选举仍依旧法办理。

△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宴请皖系要人曲同丰、陈文运。

12月28日　孙中山致电上海许崇智、廖仲恺，谓："东江敌势渐蹙，北伐及建设大计，诸待筹商，盼速回粤。"

△　曹锟饬军事处分电各省，谓"老洋人"股匪由豫窜鄂陕，为害地方，鄂、豫、陕三省军民长官即转饬各军勿分畛域，协力兜剿，凡有将此贼歼尽者，赏洋一万元。

△　北京政府外交部依据《辛丑条约》照会法、意、比、日、英、美、荷兰、西班牙八国公使，驳复各国关于用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之要求，声明中国政府主张以1901年和约第六款暨1905年协定付款。

△　广州税务司奉总税务司之令，答复孙中山本月20日截留关余命令，声明总税务司除中央政府外，不受任何方面之训令。

△　吴佩孚电令直隶省长、直鲁豫巡阅副使王承斌，今后无论何项团体，若有集会索薪或罢工情事，须严重取缔或惩办。

△　孙宝琦、钱能训、汪大燮等分别电齐燮元、卢永祥，请保江浙和平，而杜争端。

12月29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反吴景濂派推选张映兰为临时主席，拥吴派推选陈世录为临时主席。陈抢占议长席，张则占据总统席，双方为议长问题、院警问题大吵大闹，互相谩骂，一片混乱。中立派议员调解，劝双方各推代表在院外开协商会，谋解决诸问题。

△　张作霖派张景惠到北京接洽直奉议和事宜。

△　吴佩孚电曹锟，谓政府纵不能解散宪政党，亦当谕令政府人员退出政党而由议员为之。

12月30日　　孙中山在广州对党员讲演“国民党今后奋斗方针”。略谓：“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宣传奋斗之效力大，军事奋斗之效力小。吾人要再图进步，希望革命主义完全成功，便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之革命方法，即注重宣传。

12月31日　　孙中山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上演说，表示：“我不再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我的脸转向了俄国。”

△　孙中山任命叶恭绰、郑洪年、廖仲恺、杨西岩、伍学熀、赵士觐、孙科、梅光培、吴铁城为财政委员会委员。

△　湖南赵恒惕军叶开鑫部攻占湘西洪江，蔡钜猷率部逃往贵州境内，后辗转入粤，编为湘军第五军。

是月 月底，戴季陶在沪闻悉国民党改组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消息，即电辞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自粤赴沪劝说，戴表示绝不任中央委员，亦不出席代表大会，意甚坚决。

是年　　北京政府贸易进口总额9.23402887亿（银）两，出口总额7.52917416亿（银）两，入超1.70485471亿（银）两。

△　北京政府全年共发售确有担保之内债共600万元，外债共2199.7081万元。本年还偿1970.8461万元，年末负债滚存2.61828171亿元。

△　中国银行发行纸币增至8900万元。

△　北京政府修正国家地方两税划分原则，以关税、盐税、印花税、烟酒税及其他消费税带有全国划一性之租税者，为国家税；以田

赋、契税及其他省地方税为地方税。

△ 全国华商共有纱厂55家，布机8581台，有纱锭149.3672万枚。

1924年（民国十三年）

1月

1月1日　　北京政府总统曹锟发布众议院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初选于4月14日举行，复选于5月14日举行；蒙古、西藏、青海选举于5月20日举行。同日发布减刑、免刑令。

△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接受军政官员及各界的祝贺，并主持授勋典礼，授予民国十一年（1922）6月陈炯明叛乱时防守观音山粤秀楼卫士姚观顺、黄惠龙、马湘等62人“十一年讨贼有功卫士奖章”及“阵伤奖章”。孙中山致训词，重申年内“扫除军阀，统一民国”之决心。

△　上海《民国日报》出版元旦增刊《中国国民党改组号》，发表去年制定之中国国民党改组重要文献：《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孙总理演说改组原因》。

△　前广东香山县中央游击总司令兼县长朱卓文，于前山接防时与海防司令陈策部开衅弃职后，又于是日晨率大队潜入香山袭击陈军，抢掠百姓数百家。晚，陈策率部驰往西鸦搜索，亦焚毁数百家，死伤百姓甚众。6日，孙中山特令许崇智派参谋处长冯轶裴率军前往，严厉制止双方再斗，并委派李仙根署理香山县长。

△　浙江省公布自治程序及自治会议组织法。

△　湖南教育界在长沙召开平民教育运动游行大会，号召有钱者快办学，识字者快教人，不识字者快读书，并往省署及省议会请愿，请求支持经费。15日，湘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李剑农代表省长演说，各界代表要求政府负责筹办经费。李剑农、罗先闾被选为该会董事。

△　汉口工界外交委员会成立，到50余工厂代表百余人，对日警勒毙田仲香一案要求惩凶、赔偿，并决定对日实行经济绝交。7日，汉口交涉署致函日总领交涉。12日，日领复文，全盘否认。

1月2日　　北京多数议员以曹锟发布众议院议员改选令，又因高凌霨久未发给国会岁费，共谋倒高阁运动。

△　孙中山令谭延闿、樊钟秀各以所部防守白云山，以捍卫广州之安全。

1月3日　　孙中山对收回粤海关关余问题一再表示严正态度，各国知武力恫吓无效，是日乃由驻京美使舒尔曼出面调停。

△　孙中山任命钟明阶为桂军第四军军长，王汝为为中央直辖滇军第四师师长。

△　孙中山以中央直辖滇军第四师师长王秉钧、参谋长吴震东、第三军总参谋长禄国藩有私通北敌情事，明令免去三人本兼各职，听候查办。5日，又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及第三军军长蒋光亮严拿究办。6日，蒋光亮通电宣布王秉钧等与曹锟、吴佩孚密使李鸿祥暗通款曲，得贿八万，以通电不加入战斗并辅助曹、吴统一为条件等项劣迹。

△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决答复美国三藩市总支部陈耀垣之来函，说明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政策。略谓：“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

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习俄国，实俄国学习吾党。”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俄代表加拉罕，要求交还库伦、恰克图。

1月4日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重要会议，到各省代表、大本营各部总次长、各军总司令等60余人，议决最短时日在粤成立中华建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

△　曹锟特派各省省长为各该省众议院议员选举总监督。

△　孙中山以广东全省田土业佃保证照费收入，前经明令专拨为国立高等师范经费在案，是日训令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广东省长廖仲恺应即通饬各军、各行政长官，无论何项机关不得任意提借，并着各县军警认真协助，以维教育。

△　湘西蔡钜猷被赵恒惕战败后，所属田镇藩、刘叙彝旅溃散及半，移居会同、黔阳一带，是日通电投赵。22日，赵任田镇藩为暂编第十七旅旅长，归贺耀组节制；刘叙彝为暂编第十六旅旅长，归叶开鑫节制。

1月5日　　北京众议院议员叶夏声等提出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高凌霨、署财政总长王克敏等辱国丧权，渎职滥权弹劾案，称金法郎案构成外患罪；内务部滥用职权，违法撤换院警，擅行扣留岁费，封闭报馆等，均系犯罪行为。后复提出补充弹劾案，称高嗜吸鸦片，挑拨国会内部纷扰；近复突下改选众议员之令，图使国会消灭，统一无期，以便其卖国丧权。要求治高以失职之罪，立予免职，交付惩戒。

△　孙中山接见驻京美公使舒尔曼，同意以粤海关关余用于广东治河工程。同日，孙中山令派姚雨平为广东治河督办，原任汤廷光免职。

△　广州大本营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以统筹整理财政为宗旨，廖仲恺、叶恭绰等为委员。8日，孙中山指令《财政委员会章程》核准施行。

△　山东旅京同乡外交后援会反对日人欲在张店、淄州、坊子、青州、博山、潍县、胶县、高密开埠之无理要求，讨论反对办法，推定国会议员于均生等为代表，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请求阻止。

1月6日　　江、浙、皖、赣、闽旅鄂同乡会在汉口举行恳亲会，到万余人，中国银行行长洪岑西主席。五省同乡代表演说，希望组织恳亲社，主持五省永久和平，并盼推及全国。

1月7日　　北京众议院代表万钧、景耀月、李载赓等五人赴财政部向王克敏交涉岁费，无结果。

△　北京政府教育部告诫各校整饬学风。9日，教育总长黄郛在京招待新闻界，声称国立各校“学风败坏”，其原因为：一、“五四”以来，学生干政，习染成风，积重难返；二、教育经费支绌，教具设备难以满足学生要求；三、受政局变迁及世界潮流影响。

△　沪国民对日外交大会总部致书全国各界，为无故被汉口日警勒毙之厨工田仲香一案吁请声援，要求依法解决。

1月8日　　孙中山特任曲同丰为北洋招讨使，陈光逵为中央北伐讨贼军军长，柏文蔚为北伐讨贼军第二军军长。

△　孙中山派范石生、朱培德、李福林、张国桢为禁烟会办，廖行超、夏声、王南微、周鳌山、罗桂芳为禁烟帮办，协办禁烟事宜。

△　曹锟令准免湖北省省长汤芗铭职，特任督军萧耀南兼署。

△　陈炯明部在横沥（位于广东东江沿岸）附近与联军小有接触，是日，孙中山召军官讨论东江战事。

△　众议院议员万钧等270人致函高凌霨，请即饬京师警察厅将去年违法新派来众院之警卫长及巡官、长警等务于9日上午撤回，所有院内秩序暂由旧日长警负责。

1月9日　　北京众议院讨论曹锟上年10月30日所提孙宝琦组阁案，以250票通过。又决定组织行政委员会，人选抽签决定，包括各派人物。

△　中俄会议督办王正廷致函驻京苏联代表加拉罕，不同意苏联代表欲以中俄恢复邦交为中俄开议先决条件，主张恢复邦交在会议中同时解决。

△　曹锟令准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辞职，改任河东盐运使。

△　驻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依据黄郛任内所许，仍请用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

△　去岁12月因淞沪警察厅厅长继任问题未能解决，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闽、皖、赣，欲以武力对浙。太湖附近苏、浙军队陆续增防，闽军北移浙边温、处两州，东南局势颇有一触即发之势。苏、浙两省绅商代表张一麐、黄以霖、黄炎培、金润泉、盛竹书、陈其采等分别于8日集沪。是日赴宁晤齐燮元商谈和平。12日又赴杭晤卢永祥商谈。2月1日，盛竹书、沈田莘、张一麐、黄炎培、史量才、余诚格等在上海集议，请闽、浙、苏、皖各省同时撤防。

1月10日　　晚，高凌霨召集国务会议，决定提出内阁总辞职。会后即向曹锟总辞，并发出通电。

△　曹锟任命洪式闾为国立医科大学校长；特派马德润署修订法律馆总裁。

△　以张孝若为首的中国实业团出席伦敦总商会宴请。席上该会会长演说，希望中国工商各界左右政治。张表示，英为制造国，华为

原料国，通商前途未可限量。2月19日，实业团抵达美国波士顿考察，由州长兼哈佛大学校长接待。张在宴会上演说，谓美国先进，中美应谅解互助。

1月11日　湖南岳州商会、县议会等法团因岳州警备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葛应龙从中疏通，通电要求取消自治。14日，马济由汉口专车赴湘，代表吴佩孚促湘取消自治。

△　孙中山训令财政部长叶恭绰通缉挟款逃港之中国银行行长凌骥，并令中国银行监理官陈其瑗将该行地址、物业查封变卖，以偿公款。

△　滇军王秉钧旧部王汝为之第七旅旅长杨青圃率部1600余人围攻石围塘蒋光亮第三军军部，与第六师胡思清部激战，相持一夜，胡部不支逃广州，杨旅于12日占领石围塘。

1月12日　曹锟令准免张绍曾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准免高凌霨代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职；准免署外交总长顾维钧、署财政总长王克敏、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程克、署教育总长黄郛、署农商总长袁乃宽、交通总长吴毓麟本职；特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顾维钧为外交总长，程克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陆锦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颜惠庆为农商总长，吴毓麟为交通总长；特派高凌霨为税务处督办；特任张绍曾为树威上将军；任命王继曾为国务院秘书长。

△　大元帅孙中山令准财政部为救济财政，调剂金融，发行有利支付券，总额定为毫银300万元，劝令殷富商民认购，以广东全省沙田登记费、民产保证费及印花税等项为还本付息基金，月息一分，25个月内本息还清。

△　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议，讨论筹划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为草拟国民党政纲。该项政纲草案曾在上

海执行部第一次会议中提出研究，参与研究的有胡汉民、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等。随后，广州四人委员会（廖仲恺、鲍罗廷、胡汉民、汪精卫）外加瞿秋白，又对政纲问题讨论15小时。

△　曹锟特派曹锳督办热河林垦事宜。

△　美国丝业协会在纽约安司得旅馆举行的五十二周年年会上，提出筹款改良中国育蚕事业计划。会长郭司密谓：已资助广东岭南大学、南京金陵大学设育蚕所，上海已设生丝检查所，现准备在厦门大学设一养蚕科。中国用土法缫丝，不合美国丝厂之用。美国希望中国增产丝额与日人竞争取利。

△　湘省沅陵镇守使蔡巨猷为赵恒惕所逐后，唐继尧欢迎其入黔，指定铜仁、镇远各属为暂驻之地。是日，蔡率周朝武、邓黑七、蔡泽南、卢鑫所部由芷江首途，取道晃县至黔。抵铜仁后，唐任蔡为靖国联军第七路总司令，令肃清铜仁、镇远等地土匪。蔡又接孙中山令调入粤，决定留大部军队驻黔，本人亲率卫队若干及秘书、参谋等人入粤。

△　豫首巨匪“老洋人”（张国信）部在鄂边苦战多日，粮弹用尽，分股回窜郾城、确山，越京汉路，声言回豫度岁，是日在郏县城外被其部属丁保成击毙，余部东窜。

1月13日　北京政府新任国务总理孙宝琦对寰球通讯社记者发表政见称：一、以宪法统一中国，着手内政之清明；二、增加二五关税，以从事内外债之整理；三、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增进国际地位。

△　范石生、刘炎等奉孙中山命武力调停石围塘滇军内讧，令蒋光亮去职，王汝为第四师开往东江，胡思舜继任军长，所部驻守石围塘，是夜风潮完全平息。

△　孙宝琦内阁除外交顾维钧、交通吴毓麟、教育范源濂、海军

李鼎新四部系属孙12日所列原名单，其他五部悉由曹锟定名。孙谓：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长财政舆论不洽。曹谓：王能筹款，非王莫属。最后曹径填命令，促孙副署，立即发表。孙以形同傀儡，实受保派王毓芝等迫逼，且税务督办孙原拟自兼，又被高凌霨所夺，是日突赴海淀承泽园休养。后经颜惠庆力劝，孙始决定就职。

1月14日　孙中山出席广州商团和警察举行的联欢会，并发表演说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目的在于“筹备一个新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勉励大家和政府始终合作，共同促成革命事业。

△　议员李载赓、叶夏声、万钧等21人对王克敏复长财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书。略谓：“查王前以金法郎案利诱当局，迭长财政，为私人营牟利益，不惜丧权卖国，违法渎职，掀动政潮，蔑视民意，经本院议员依法提出弹劾查办在案……政府究竟有何不得已之苦衷，非留用王复长财政？”

△　王克敏以孙宝琦原拟阁员名单无其名，遂和王毓芝、李彦青等商量后，为刁难孙宝琦，提出辞财政总长职。15日，阁员（除范源濂）七人及冯玉祥联名致函敦劝。

△　闽农民反抗杨增福勒种烟苗，征收烟苗捐。是日，军务帮办王永彝抽调安海、南安驻兵一团，会同杨部分路进攻惠北各乡，枪杀农民千余人。

1月15日　孙宝琦内阁正式成立。阁员除教育总长范源濂、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余七人均就职。下午举行第一次国务会议，议决特派吴佩孚兼任督办直鲁豫汽车道路事宜等案。同日，曹锟明令公布。

△　桂军沈鸿英部受吴佩孚嗾使，由连县分两路进攻粤省北江。沈鸿英亲率黄汉功旅直扑阳山，次日占领；沈荣光部3000人由砰石进攻乐昌。湘滇联军朱培德、赵成梁、宋鹤庚各部迎击，击败沈军，17

日克复砰石，沈荣光部退湘边宜章，联军何克夫、吴剑学部亦于同日克阳山。沈鸿英部败退至小江后，即调何才杰等部赶至连县反攻，又派收抚之土匪出没于英德车站。19日，联军调滇军第一师赵成梁部两营由翁源驰往助战。

△　四川省军熊克武为渝军刘湘、杨森战败，13日退出铜梁、璧山，是日在内江南津驿召开军事会议，商请刘成勋、赖心辉等赴潼川作战。席间石青阳不发一言，刘、赖虽不愿再战，又不能不听命。

1月16日　　孙中山令免广东海防司令陈策职，遗缺由冯肇铭代理。

△　北京众议院开会，凌鸿寿主席，请孙宝琦内阁全体出席宣布政见，孙复本日忙，下次出席。又通过查办王克敏案。王潜行出京，表示不入孙阁。

△　曹锟任命郑金声为绥远陆军混成旅旅长，唐福山为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　曹锟据陆军总长陆锦呈报，第七混成旅旅长高凤桂等临敌畏缩，抗命潜逃，是日指令褫夺高等之官勋。

△　广州各界在总商会会议，决定成立广东财政统一促进会，促各将领于一个月内将一切代管财政之机关交回政府。

△　蒋介石由沪抵粤复述使俄之命。蒋谓："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孙中山阐述了联俄容共的决策。

△　吉林穆林煤矿公司正式成立，由吉林当局与白俄资本家谢吉斯合办，资本600万元，俄方出资300万元，中方以矿区作资。

△　广州米行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等条件不遂罢工，拒阻各米店

取货。21日善后会召集米行劳资双方调停无效。27日，广州商团开会，决定以实力保护起卸米粮。

1月17日　苏联代表加拉罕致函王正廷，指责北京政府按列强意旨干涉苏联、庇护白党等活动，重申中俄会议必须在承认苏联、恢复中苏邦交后始能开会，并表示在中俄会议中一切问题皆按1919年及1920年宣言精神解决。18日，王正廷宴加拉罕，商开中俄会议。20日，中国代表李家鏊赴苏。

△　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巴黎区分部）成立。筹备员周恩来报告筹备经过，临时通讯处主任李富春报告党务发展情况，聂荣臻被选为通讯处处长。

△　胶济路火车驶至金岭镇，突然发生火灾，焚车四辆，死百余人。24日，车行至潍县西朱刘店忽又起火。济南总商会等各团体电北京政府国务院，请严惩该路局长严堃。

△　厦门银行派黄世金与筹饷局会办来玉林合股，要求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准其包办鸦片公卖，每月可获利48万元。事为商会会长洪晓春等所悉，要求平分鸦片公卖之利。银行派拒绝，洪晓春当即由商会副会长蔡雨春撰“铁血团”传单散发，借名反对苛捐杂税，鼓动市民于是日罢市。银行派见事态扩大，始允两派合作，成立公卖局，承包公卖。洪以目的已达，动员市民开市。

△　北京政府财政部天津造币厂向日本三菱洋行借款行平银23.5041万两，银元三万，年息一分二厘。

1月18日　广州大益、太和、广东、文明、吉祥、中国、东山七家火柴厂工人代表1400余人，赴省署及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滇军军长范石生等处请愿取消苛捐。次日，范石生以滇军警卫团长苛抽火柴捐摧残工业，致函杨希闵请明令撤销。

△　孙中山任命朱世贵为中央直辖滇军第四师师长。

△　中日盐务会议在北京开幕，讨论“鲁案”细目协定中有关青岛盐输出办法，日本委员提出输出数量、税率等意见，中国委员允提对案后再讨论解决。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邀宴冯玉祥、王毓芝、李彦青及孙宝琦、王克敏、颜惠庆等阁员，席间冯力劝王克敏就任财政总长，王谓：“国会弹劾审查之际，不便就职。”次晨，曹锟召王，谓：“弹劾案嘱人疏通，由我来负责。”

1月19日　孙中山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廖仲恺报告国民党改组要点在于修改党纲，订立党章。自上年10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着手筹备改组事宜，至是日止共开会28次，议决案件共400余件，至此，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

△　孙中山任命陈兴汉兼理广三铁路管理局局长。

△　晨，停泊上海之美国花旗公司轮船“腊斯登号”船主、机师枪击所雇中国伙夫，贺永庆当场死亡，贺福允、叶阿元、贺阿友三人重伤。华工13人被捕交捕房关押。事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发出呼吁书，要求各界同伸正义，保障民权、国体。

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各省及海外代表165人。孙中山任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为主席团成员。孙中山致开会词称：十三年以来，革命主义还没有成功。我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受了满清官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的欺骗。宣告“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要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下午孙中山在大会上作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案》。称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决议交付宣言审查委员会审查。宣言审查委员会以胡汉民、戴季陶、茅祖权、李大钊、恩克巴图、叶楚伧、王恒、黄季陆、于树德九人为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孙中山在说明中指出：此次大会目的之一，就是立即将大元帅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会通过该项提案。

△　晚，孙中山举行宴会，招待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席间称革命“既要有主义，更要讲究方法”。孙盛赞俄国革命成功是“因为俄国人立志稳健，眼光远大”，“经验多而成功快”，强调应学习“俄国的好榜样”。

△　彭湃致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长刘仁静，建议党中央和团中央多派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1月21日　上午，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谭平山、廖仲恺、谢持、孙科、张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邓泽如、刘芦隐为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谭平山作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下午，沈定一、韩麟符分别作浙、直两省政治及党务状况报告。继由戴季陶、胡汉民报告宣言审查结果，并解释修正及增加各要点。针对右派反对改组及部分党员对民生主义缺乏了解，孙中山即席作《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称“近来俄国内政进步之神速，与前大不相同”，“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并称：“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就是非而言，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

△　曹锟令准教育总长范源濂辞职；特任张国淦为教育总长。

1月22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临时中央执委会提出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孙科在说明中称：一、“旧党章之中心

在上级党部，新党章之中心则在下级党部。”二、“新党章对于纪律视为一最重要之事，特别专章规定，必全体党员大家遵守。”主席林森指定谢持、何世桢、谭平山、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李大钊、朱霁青、萧佛成、汪精卫、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瑛、邓泽如、谢英伯19人组成党章审查委员会。继由陈觉梦等作海外支部党务状况报告。通过《纪律问题》及《收回海关权益问题》两项议案。关于纪律问题，胡汉民在说明中强调指出：“纪律实为革命胜利之第一必要条件”，“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汪精卫在《海关问题》说明中主张先收回关余，进一步收回海关。柏文蔚在会上作军事报告，决定通电慰问前敌将士。

△　吉林省公署代表、财政厅厅长孙其昌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代表深泽暹、中东海林实业公司代表吉植庄三签订《合办中东海林采木公司合同》，资金为日金350万元，双方各出半数，地区以北满林场和大海林林场为限。

△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议决索薪。次日派正、副主席往见教育总长张国淦表明要求。2月1日，该会继续讨论催发年关欠费。

△　孙宝琦在阁议提出为曹汝霖、陆宗舆消除参战借款案之处分，阁员无表示，未获通过。

1月23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第一部分为“中国之现状”，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及商人政府派的错误，指出“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宣言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

国”。民权主义主张国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规定于宪法，以五权（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分立原则是已。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主张“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并指出：国民党“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政纲”，包括对外和对内政策22条，主要内容为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外债，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等。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对宣言旨趣作了说明，重申对内要打倒军阀，“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将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3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发表。

△　上午，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由孙中山指定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伧、李大钊、冯自由、黄咏台、黄右公、刘成禺、白云梯为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

△　北京参议院开会，谷嘉荫主席，孙宝琦出席报告行政方针称：一、奉行宪法；二、尊重国会；三、促成和平统一。又答复郑江灏等质问，说明金法郎案经过，表示对该案之处理当尊重国会意见；王克敏虽有嫌疑，但无凭证。

△　沪华界卷烟业为反对卷烟特税一致停业。24日，集同业1600余人赴龙华何丰林护军使署请愿。25日，又集同业800余人，推派总代表往上海县公署及商会请愿，要求撤销捐局。

△　去冬以来江浙局势紧张，继赣浙和平公约成立后，杭州公团及浙省代表迭次联衔致电闽督孙传芳请签订“闽浙和平公约”。是日，

孙口头表示：和平公约为疆吏私订盟约，不便擅行，当候呈中央核准。

1月24日　上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读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致大会贺电及孙中山复电。复电称：“本会目的，在继续辛亥革命事业，以底于完成，使中国脱除军阀与夫帝国主义之压迫，以遂其再造。”并谓：“本会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将予以同情，而俄国人民来此先声，尤为吾人所感激。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携，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继通过孙中山所提“厘定各种考试制度，以为宣言补遗案”，并通过孙科提议以大会名义电贺英国新内阁首相劳工党首领麦克唐纳。汪精卫就党章已审查完毕各条先行报告；黄馥生作缅甸仰光支部党务报告。下午，大会通过刘伯伦提议“制定党歌”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定。

△　孙中山决定设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1日，又任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筹备委员，在省城南堤二号设立筹备处，6日正式成立。校址设在广州黄埔岛，以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旧址加以修整。

△　曹锟特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兼盐务署督办。

△　孙宝琦内阁举行政务会议，讨论维持年关财政等问题，谓年关至少需400余万元，不敷尚巨。财政总长王克敏、教育总长张国淦均出席。

△　苏、浙接洽和平代表集议，要求苏、浙两方及皖省定期同时撤防。代表黄以霖、盛竹书、张一麐、金百顺、史量才、黄炎培、陈其采、沈泽春发表报告书，说明本月9日、12日先后分赴宁、杭访晤齐燮元与卢永祥，齐、卢双方均遵守去秋所订江浙和平公约，双方均表示并未添兵；卢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当经黄以霖等提议，决由

两省军民长官会衔布告，始终遵守和平公约。

△　孙中山派刘毅为粤闽湘军招抚使。

1月25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传审查委员会叶楚伧报告《出版及宣传问题案》审查结果。汪精卫代表章程审查委员会续作党章审查报告。孙中山获悉列宁于21日逝世，提出紧急动议中止会议议程，建议致电莫斯科，对列宁逝世表示哀悼。并发表讲话称："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称赞列宁是"革命中之最好的模范"，重申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精神，"应该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大会决定电唁苏联党及政府致哀，休会三日以志哀悼，广泛宣传列宁生平及事业，并通令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

△　熊克武集中主力于潼川，准备暗袭渝军。刘湘得悉，调少数军队佯攻成都，而以全力猛攻潼川。28日，杨森、袁祖铭部占潼川，熊军大败，精锐丧失殆尽，半夜逃往成都。

△　张作霖召集的东北三省军政国民会议开幕，孙烈臣、吴俊陞、朱庆澜、王永江等出席，讨论整顿防务等事项。会议认为，直系欲与奉系议和，往返磋商数日无确信，为防备计，饬驻防各隘军队严重防守，并于京奉线增兵一旅，以资"保境安民"。

1月26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四团体，借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遥祭列宁大会，到会5000人。马叙伦任主席，高尚德报告列宁生平事略。大会通过顾孟馀提议，要求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并电苏联政府及列宁家属表示悼慰等。加拉罕致书感谢大会，并申列宁遗志。

△　孙中山令饬广东各县严禁地方士绅团防阻抗驻军。

1月27日　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开始系统讲述三民主义。此后每周演说一次：民族主义六讲，于3月2日讲毕；民权主义六讲，起迄于3月29日至4月27日；民生主义于8月3日开始讲述，同月24日讲完四讲后，因准备北伐而停顿。

△　滇军第四师师长王汝为在石围塘与军长蒋光亮开战，经调停后王率部回防，路经石龙，蒋光亮命其第七师攻击。是日王率残部入惠州，投附陈炯明。

△　上（海）、宝（山）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大会在上海举行，到80余人。主席沈信卿致开会词，谓“该会由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发起。上海交通便利，教育发达，然普及仍不易。闸北毗连宝山，上海、宝山联合进行平民教育，俾两地平民尽能识字”。熊朱其慧等相继演说，王伯秋报告南京初试平民教育之经过，黄炎培报告施行平民教育先以《千字文》为课本。最后通过该会简章。3月12日，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

1月28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报告，方瑞麟提出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有10余人附议。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发言，阐明国共合作的必要，指出“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人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担负的”。“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损失”。“有我们在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了联络，使革命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本党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江伟藩和黄季陆等发言，反对李大钊的跨党主张。廖仲恺发言指出：“此次彼等（指共产党员）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汪精卫称：“党员跨党一层，可不必过虑，如党员违纪一律绳以党纪。”胡汉民亦称：“不必再

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最后表决，否定方瑞麟的提议，通过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孙中山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

△　下午，邓鸿业、李次宋、宋聘三、丁超五、陈飚生、李国瑞、梁如久、刘士木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作山西、安徽、河南、福建、西贡、荷属八打威、荷兰棉兰、神户暨横滨党务报告。

△　孙中山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望其改变对华态度。

△　留沪议员在湖北会馆开会，通过林长民、汤漪等所拟之《反对宪法宣言》，否认曹锟宣布的新宪法。30日，林长民、章士钊、张我华等八人联名发表《关于改正宪法草案由国民公决之宣言》，同时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亦发表题为《完成中华民国宪法案，以俟国民公决宣言书》。

△　孙宝琦抵洛阳，与吴佩孚商讨应付时局之对策，并洽谈南北统一计划。

△　曹锟通令各省区军民长官，认真查禁烟毒。

1月29日　上午，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谢持所作党务审查委员会报告及于树德所提用“一大”名义建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款项由各代表负担案。黄季陆所提“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毛泽东、宣中华等表示反对，决议“将本案保留，等明年大会时作为必须之提案”。下午，通过孙中山所提“感化及收养游民土匪，使能获得从事于社会有益工作之机会及努力宣传军队，使其了然自身地位，变反动为革命”案，谭熙鸿所提“对于广东人民自革命以来因革命而受经济上之牺牲为数甚大，应有一种诚恳表示”案，石瑛所提“对于海外各同志为国为党奋斗应有一种诚恳表示”案等。

△　孙中山任命杨庶堪继廖仲恺任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改任大本营秘书长，廖未到任前，由谭延闿兼代。

△　广州海陆理货员工会及米业工会总理严月胜夫妇被暗杀。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请政府严缉杀严月胜夫妇之凶手并抚恤案。

△　驻京英使麻克类请北京政府外交部令各省取消纸烟特捐。

△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上海各公团之请，照会外交团再次提出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管理权的要求。

1月30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廖仲恺临时提出的国民党之政纲对外政策部分增加：一、收回租界；二、在中国领土内之外人，应服从中国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完全拨作教育经费。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4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五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五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下午，代表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会词，指出此次大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此后大家要分途奋斗，“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宣布到全国民众”。

△　曹锟特派陆荣廷暂署督理广西军务善后事宜，林俊廷为钦廉边防督办。

△　北京外交团反对商标法，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承认商标法

的四项条件：一、商标公报用英文；二、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三、反对更换代理人；四、反对六个月期限。5月27日，北京政府农商部允诺商标局雇用洋员，惟主自行选聘，不受使团推荐。

△　台湾在厦门之爱国同胞组成的尚志社，在厦门召开台湾人学生大会，通过决议反对台湾总督府之压迫政策和对议会请愿者之无理拘禁。尚志社将决议分寄台湾、东京及国内各地。

1月31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是日起至2月6日在广州举行，到会32人，孙中山主席，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常务委员。议决中央党部之组织，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调查部、军事部。2月4日决定各部人选：组织谭平山，宣传戴季陶，工人廖仲恺，农民林祖涵，青年邹鲁，妇女曾醒，军事许崇智。按照决议规定，广州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其余特别区如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则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去各该地组织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中央执行委员及各地执行部之执监委姓名与其管辖区域如下：一、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委廖仲恺、李烈钧、戴季陶、谭延闿、杨希闵、邹鲁、柏文蔚、林森、谭平山，候补执委邓家彦、李宗黄、林祖涵、彭素民，中央监委邓泽如，候补监委刘震寰、许崇智、樊钟秀、杨庶堪；直辖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二、北京执行部：中央执委李大钊、石瑛、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于方舟、张苇村、韩麟符、张国焘、傅汝霖、白云梯，中央监委李石曾，候补监委蔡元培；直辖直隶、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甘肃、新疆、青海、内蒙。三、四川执行部：中央执委熊克武、石青阳；直辖四川、贵州、西藏。四、上海执行部：中央执委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张静江，候补执委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毛泽东、瞿秋白，中央监委：张继、吴稚晖、谢持；直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五、汉口执行部：中央执委覃振，候补执委张知本，直辖湖北、湖南、陕西。六、哈尔滨执行部：中央执委居

正，候补执委张秋白，直辖东三省、外蒙古、北方、国外。另，设莫斯科通讯处。

△　曹锟特派张景惠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

△　沪纸烟业因反对特税罢业多日，经总商会、县商会等调解，是日江苏省署复电两商会，略称：年关逼近，不难勉徇商情，但恐一经松动，以后益难就范，且税款有关教育，事在必行；如贵会果有其他办法，当令展至年外启征。2月3日，沪烟业复业。

是月　　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发表《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一文，声明："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决不是因为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主义运动而加入的；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动机，都截然和国民党不同，是断然利用不来的。"

△　亨丰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在汉口硚口成立，资金银20万元，郭恕、刘济民等为董事。

△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组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到校任职，并成立董事会，以梁启超、李石曾、熊希龄、张伯苓、邓萃英、陈宝泉、范源濂等九人为董事。

△　江庸就北京法政大学校长职。

2月

2月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组织对外委员会，以邹鲁、廖仲恺、于树德为委员，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立场对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庚子赔款四项展开宣传工作。

△　孙中山令饬各军政长官将督办经管之财政机关，于本月6日以前一律交还广东省财政厅等政府主管机关接管。

△　北京国务院预备实施新宪法，特设宪政实施筹备处，是日公布该处办事规则八条，并令各部亦增设宪政实施委员会。此后，各部宪政实施筹备委员会相继成立。

△　广州总商会举行各界代表大会讨论供应军饷问题，议决由广东善后委员会、广州总商会等联合发行善后短期手票50万元贷与政府，以应旧历年关军政所需各费。3日，孙中山令准责成广州市长督饬进行。4日，财政局将手票32万元发给各军供伙食饷项。

△　粤琼崖各界召开全琼公民大会，抗议日人侵占西沙群岛，要求北京政府令广东省长取缔何瑞年等勾结日人在该岛开设之实业公司，并向日本公使严重交涉，限日本人、台湾人于短期内悉离该岛。

△　贵州省长刘显世复职，并聘唐继虞为省署参赞。

2月2日　　曹锟特派戴陈霖为参加瑞典京城万国邮政大会全权代表。

△　曹锟令准免陇秦豫海铁路督办张祖廉职，由赵德三继任。

△　陕西省长刘镇华呈请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将法政专校并入西北大学。

2月3日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　吴佩孚派议员何雯由北京到杭州访卢永祥，拟以副总统授卢，以取得合作。嗣后卢派人去洛阳向吴表示谢意，但称：不能出卖人格拥护总统曹锟，并劝吴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如公开讨论时局，愿意相助。

2月4日　　孙中山令国立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派邹鲁为该校筹备主任。

△　北京外交团在荷兰使馆集议中国不承认以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问题。荷使欧登科主张提交国际法庭公断，法使傅乐猷反对。法使拟就驳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公文，于10日经使团会议通过，坚主用金法郎偿付。11日，荷使将该照会送达北京政府外交部。

△　广州军人持手票购物，商民因未见商会公告，大为惊疑。有滇军二人持手票至某店购物，该店拒用，发生口角，店主即鸣笛召商团团丁，击毙军人及行人各二名。商店自是日起罢市。8日，财政部、军政部另订劝销手票办法，由叶恭绰、廖仲恺、杨希闵等会衔布告，劝商民复业。10日，全市复业。

2月5日　　基督教联合大会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举行。各地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代表225人到会，分宗教教育、暑期学校等20组讨论，决定扩充联合会会员范围等案，于7日结束。

△　驻厦门旅长臧致平闻在厦台湾籍人有联络民军王献臣袭厦消息，令军警搜查台人枪械，台民开枪抗拒，被击毙七人。是日，日正副领事偕日警长即向臧致平面提通牒，要求撤换警察厅长，优恤死者，缉捕凶犯。8日，日舰两艘到厦示威。10日，臧致平复文日领署，日人认为不满意。17日，台游民同时在六处放火，军警往救，被击毙五人，后由美领出面“调停”解决，内容秘不宣布。

2月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孙中山主持，出席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25人，通过《各省党务进行计划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上海、北京、哈尔滨等执行部组织及预算案》、《海外党务分案》等议案。其中《海外党务分案》决定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增设海外部，统辖海外加拿大、三藩市、古巴、檀香山、墨西哥、澳洲、菲律宾、安南、暹罗、缅甸、日本、香港、南

洋、英国、印度、美国、法国、南非18个总支部的工作。推举林森担任海外部部长。

△　孙中山令：滇军第四师师长王汝为率部降敌，着即严缉惩办。

△　孙中山致函莫斯科通讯处赵世炎等，告以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事。

△　全国总工会在北京成立。

△　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务局局长出渊胜次在东京订立《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议》。主要内容为：庚子赔款资金主要用于为中国人所办之文化事业；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日本在山东已设之学校、病院及其他日本各团体在华经营之文化事业，其补助费在有关山东项目下之资金支出。

2月7日　　王正廷因办理“鲁案”善后，曾于民国十一年10月向青岛商民借款15万元，迄未归还本利。商民迭催无效，拟罢市。是日，鲁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电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催还“鲁案”善后借款。

△　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九条铁路代表20余人参加，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以孙云鹏为委员长。成立宣言中提出四项宗旨。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努力促进国民革命，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及外人之侵略。大会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运动联合会。

2月8日　　蒋介石、廖仲恺奉孙中山命积极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由筹备委员长蒋介石主席，讨论招生事宜。

2月9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再次召开统一财政会议，决定：调查

全省收入总数、类目、各军截留税收情况及各军实有人数和饷项。会后，孙中山忿然曰："吾下命令将各军征收机关交回，竟置命令于不顾，成何体统！彼辈（按：指滇军）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而余则成为众怨之府，吾当有以处之。"

△　孙中山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转饬第一师：勿得违令擅提粤汉路附加军费。

△　渝军刘湘、袁祖铭、杨森部由中江进驻金堂，围攻成都，与省军熊克武、但懋辛、周西成、汤子模、刘成勋部激战七昼夜，渝军获胜。是日，杨森部首先攻入成都。刘成勋西退新津，熊、但南退仁寿，旋赴自流井出泸州，周、汤东退资阳、资中、内江。

△　吴佩孚邀请张敬尧到洛阳，以缓和与皖系之关系。13日，张至洛阳。

2月10日　　陕督刘镇华令所部镇嵩军麻振武侵夺郃阳（今作合阳）县高峻部防地，发生战争。刘即电免高峻旅长职。17日，刘又令第一师柴云陞、第三十五师憨玉琨部分路向澄城、白水两县进发。高峻为保存实力，21、24两日相继退出澄城、白水，后至西乡一带，暗与陕北井岳秀、杨虎城联络。镇嵩军进入澄、白大肆奸淫抢掠，诬栽勒索，居民损失约800万元。

△　齐燮元、冯玉祥等因直系各派倾轧内阁，拟发起召集巡阅使、督军会议进行解决。吴佩孚以"此举有军人干政嫌疑"，竭力反对，致会议未举行。是日，孙宝琦在阁议上对于齐、冯发起会议之主张认为可扩充范围，提出召集吴佩孚、齐燮元、卢永祥、萧耀南、冯玉祥、孙传芳、杜锡珪等共商和平统一会议。

△　吴佩孚电曹锟，举高恩洪为胶澳督办。

△　黄埔军校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拟定招学生324名：东三

省、热河、察哈尔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12名，共168名；湘、粤、滇、豫、桂五军各15名，共75名；国民党先烈家属20名，尚余11名。另招备取生30名至50名。因各省多在军阀统治下，不易公开招生，故预先委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

2月11日　孙中山因财政不能统一，决定停止北伐。原定滇粤桂联军入东江平陈炯明，湘豫联军入赣北伐，滇军因据有省会及北江征收机关，税收极丰，又有大量烟赌各税，一旦尽赴东江，财源将为湘军所夺，因此必欲湘军共同参加东江之战。湘军洞悉其情，坚持滇军将所占各征收机关交还政府，方能入东江作战。是日，滇军蒋光亮被迫通电宣布已于本月9日将该军在广三路附近经营财政之总机关财政处撤销。同日，湘军由北江返广州转东江。

△　孙中山任命何应钦为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

△　孙中山令饬各军不得借词截留禁烟收入款项。

△　孙宝琦在私宅邀集阁员讨论“和平统一”运动等问题，主张赴各省游说，但为阁员反对。

△　北京众议员林树椿等182人联名向众议院提出速组总统选举会选举副总统案。

△　驻京荷兰等八国公使至北京政府外交部，将坚持用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照会面交顾维钧，其大意为：一、根据辛丑和约第六款，赔款乃金货债务，不能用银货或纸币交付；二、不能改变原来之数额与品位；三、即使按照1905年协定采用电汇方法，亦仍不失其用金之意义。故中国政府应依照金法郎价格，购买电汇票以为偿付。

2月12日　北京国会议员叶夏声函汤漪、林长民反对毁宪，主张

行宪。

△　鄂督萧耀南委托英国陆军中佐麦德格代表武昌市政筹备处向英商借款5000万元，建筑武昌商埠，25年还清，以市政收入担保。28日，武昌各善堂开会反对，认为借款用途含混，建筑商埠应自汉口起，决定：一、谒萧阻止签字；二、联合商会等一致反对；三、发传单并游行等。

2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并定办法：一、通过党报及党人所办之报刊努力宣传；二、通告各级党部转告所属党员一致为本党宣言而奋斗，以获得人民之同情。

△　广州大本营财政委员会通电各军，请派员会同组织筹饷局，从速交出财政机关，以统一财政。

△　孙中山令饬各军对法庭处理诉讼事件毋得干涉，以维司法而肃军纪。

△　驻京英使馆因丰台车站英稽查员白赛尔被军人陈国贤殴打负伤，派员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惩凶。

△　谭延闿在湘军总部誓师，出发东江。

△　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电北京政府报告温树德部海军侵占烟台杜部练营，请予制止。18日，再电政府抨击温树德，称温部意在谋乱，要求严办。

△　驻京英使馆参赞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抗议各省征收卷烟特税，要求饬令阻止。25日，英使麻克类至南京访齐燮元，商议卷烟税事，坚主值百抽五。江苏省议员龚廷鹗等为此通电反对外人干涉省政。4月14日，驻京英使麻克类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取消苏省卷烟税。25日、26日又分别向外交部抗议江西、绥远举办卷烟税。

△　北京众议院召开特别委员会审查弹劾王克敏案，以王未经议会讨论，违法发行使领库券500万元为弹劾案之主体，金法郎案为附体，应予成立。当推廖伯劲起草审查报告，以便提交全体会议通过，并声明此案系在现阁以前构成，应按普通官吏违法治罪。

2月14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决定：一、金法郎案，慎重处理，对于驻京八公使11日所提照会，拟待征集各方意见后，再行驳复；二、同意发还上海德荷水线公司财产。

△　孙宝琦发起和平大会，是日分电孙中山等反直各派领袖派员参加。孙中山未予置复。孙宝琦除迭电张作霖，并派代表赴奉游说。张征求孙中山意见，孙认为北京政府以和平为招牌，谋离间反直同盟，盼张警惕。孙并电汪精卫，嘱其回粤后赴奉说明上述主旨。

2月15日　北京众议院开会，投票表决弹劾王克敏案，因宪政党袒王，表决无结果。16日，王携辞呈见曹锟，以众议院即将通过弹劾案。请准辞职。曹即派王毓芝疏解，弹劾案终未通过。

2月16日　孙中山特任蒋尊簋为中央军需总监。

△　北京大学教授丁西林、蒋梦麟、陈大齐、马叙伦、陶孟和、李大钊、胡适、郁达夫、沈尹默、江绍原、顾孟馀、汤尔和、张竞生、李石曾、周作人等47人，联名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请速恢复中苏邦交。参议员雷殷等多人及北京各团体，先后继起促顾、王先承认苏联，再行会谈。

△　金百顺、张一麐、陈其采、黄以霖、史量才等苏浙和平代表，联名致函卢永祥，谓卢允将夹浦浙军先退数十里一事已转达各方，现齐督燮元已允将宜兴警备队撤退，皖督理马联甲亦允将广德驻兵撤退，均将于月内同时实行，深愿各方践约。

△　曹锟任命张林为热河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2月17日　孙宝琦特派代表劳之常抵沪，决定即赴浙与卢永祥协商和平统一。27日，劳邀集苏浙和平代表张一麐、黄以霖、史量才、盛竹书等协商和平。

2月18日　吴佩孚电令赵恒惕取消自治，并称：如不取消，湘省军、民两长当分别正式任命。赵于是日复电谓：废弃省宪一事，拟于本年4月内召集大会，届时改议自治法，以求解决。

△　孙中山致函外蒙库伦国民党党部，介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前往商办党务。

△　孙中山令统一财政委员会即日办理广三路附近财政统一事宜。

△　湘军一部由广州开赴增城。22日，广州大本营军务会议议决，先肃清东江，后北伐，限期一月，湘军全部参加作战。同日，湘军一、二两军继续出发，前锋集中横沥、增城、石龙等处。高凤桂、赵成樑、韦杵、何克夫等部担任肃清北江敌军。

△　北京众议院开会，何畏等以王克敏查办案被搁置，提出“阁员审查案”交付讨论，欲作法理上之依据，以查办王克敏。

2月19日　孙中山令广东省长廖仲恺、广州卫戍司令杨希闵等即饬粤省商团团长陈廉伯、副团长李颂韶、区克明等，将所有枪支、子弹造册呈报广州市公安局，随时受该局检查。

△　上海全国工人自救会等13工团因闻苏联代表团加拉罕等不日离京南下，特联合筹备欢迎会。

△　孙中山令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孔庚称：现在川战方急，务即淬励部属，会合川军，早定川局，进规武汉。

△　四川省军熊克武、但懋辛部攻泸州，与渝军第四师杨春芳部

作战。27日克泸州。

△　渝军刘湘、袁祖铭、杨森等因熊克武部向成都东南部活动，图截断成都、重庆联络，以攻取重庆，在成都举行军事会议，决推杨森留守成都主持省务；刘湘、袁祖铭负责南路，由自流井向泸州追击熊克武、但懋辛；邓锡侯、陈国栋仍负责东路，追击周西成、汤子模。同日，邓、陈部克资阳，23日，进攻资中。周、汤退驻永川、荣昌，图扰重庆。刘湘、袁祖铭电重庆北军于学忠、宋大霈、张允明三旅夺回永川、荣昌，周、汤乃改道至泸州，与熊克武、但懋辛联合。

2月20日　孙中山令设广东筹饷总局，抽收全省防督经费，裁撤大本营筹饷总局，并特派范石生为广东筹饷总局督办。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委员会通过《办事关系条例》，中央党部乃在广州正式成立。

△　孙中山为统一粤省财政在大元帅府再次召集各军总司令、各军军需主任开财政会议，决定：一、各军一律限期将占领之征收机关交出；二、各军军饷照军额之多寡分别支配，嗣后各军对于税饷一概不准占收。广东全省防务经费责成广东筹饷总局督办范石生切实筹办。

△　北京政府派吴毓麟赴洛阳，旋转南京，调解海军杜锡珪、温树德间之纠纷，并疏解齐燮元、吴佩孚之间对浙江问题之歧见。

△　吴稚晖、黎锦熙等发起组织之上海国语师范学校开课，校长为吴稚晖。

△　广州手票由商团、警察挨户劝销，窒碍难行，公安局与总商会议定派销办法，是日起一律实行。办法规定以商店有无铺底为标准，按其租额派销，定为无铺底者租额一元，派销手票二元；有铺底者租额一元，派销手票四元；自业铺户则照目前征收租捐办法，按每

月缴纳警捐额数派销加五倍，作为应缴一个月之租捐额数。

2月中旬　吴佩孚与日人勾结，冀得青岛盐输出权，连电北京政府要求另设盐业专卖局，取消已立案之永裕公司。盐务署长项骧据此主张取消该公司，改由官办。盐务署职员认为政府已收受永裕保证金20万元，批准承办青岛盐输出业务，法律上绝无取消之理，反对官办。至此，中日盐务会议停顿。

2月21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对粤办法，决定：一、派员入粤检查军队；二、责成财政部拨援粤用费；三、决以武力解决孙中山；四、宣慰粤省商民。

△　王正廷因中苏交涉发生变化，由上海返回北京，访加拉罕进行磋商，表示可先承认苏联，再开正式会议，解决悬案，意欲以此阻止加拉罕南下访孙中山。加拉罕赞成先议交涉协定大纲，以示互让。

△　蒋介石两次向孙中山请辞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并不顾孙中山劝阻于是日离粤去沪。23日，孙中山派廖仲恺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　曹锟令福建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毅兼任厦门镇守使，同时明令撤销臧致平所任漳厦护军使一职。

△　哈尔滨市民因中东路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对局务长期专制，并演出侮辱华人戏剧，是日三万余人集会，要求驱逐该局长。但署理督办东省铁路事宜之王景春认为加拉罕正在商订中俄条约之际，若立即逐沃，恐与订约有碍，不宜即行驱逐。

2月22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东江作战方案。出席计有：谭延闿、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陈嘉祐、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刘玉山、陈天太等30余人。经讨论议决：一、湘、滇、桂、粤各军集中石龙、增城，一俟布置妥帖，即下总攻

击令，中、左、右三路同时进击，从3月1日起至30日止，限一个月肃清东江；二、限令高凤桂、赵成栋、韦杵、何克夫等，担任肃清北江边界逆军，限二星期竣事；三、严定赏罚。又严定军律八条。

△　北京政府财政整理委员会开会，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张嘉璈、黄郛等出席，外人安格联、韦尔敦、宝道亦参加。颜惠庆报告称：整理财政基金，惟恃海关二五附加税，而二五附加税被阻于关税会议；关税会议又被阻于金法郎案。目前自应从促进关税会议入手。颜并谓，目前政府负债数目极巨，财政部到期无抵押之外债约5.8亿余元，以关税、盐税担保者每年应付9700万元，交通部尚欠债二亿余元，加以中央政费及其他支出1.9亿余元，而目前全年收入不足二亿元。由此可知，二五附加税即能实现，差额仍极巨大。

2月23日　孙中山偕谭延闿、宋鹤庚、鲁涤平至黄沙检阅湘军，作《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演讲，希望湘军变成革命军，将中国改造成俄国式的新国家。并发湘军军饷10万元。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凡20条，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长聘任，设董事会，由例任董事（校长）、部派董事及聘任董事组成，董事会议决议事项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核准施行；附则三条，规定私立大学应参照本条例办理。北京大学、女高师等校纷纷反对，指出设董事会之举乃是教育总长张国淦旨在让政客控制大学，进而使学校牵连入政治漩涡，弊端丛生。

△　吴毓麟在洛晤吴佩孚及温树德。温称：当其率舰北归时，北京政府曾允月拨海军军饷15万元，由胶澳关拨放，并拨还欠饷60万元，又允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嗣屡经请求，现仅拨欠饷50万元、月饷五万元。吴毓麟即电曹锟转述吴佩孚意，催促从速任命温树德为渤海防御使，高恩洪为胶澳商埠督办。

△　中国留英学生在伦敦成立退款兴学研究会，以促进英国政府

退还庚子赔款兼讨论用途为宗旨。25日蔡元培由巴黎赶至伦敦，与该会人士商讨展开争取庚款兴学事宜。

2月24日　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廖仲恺主持，军、政、工、商、学、警各界人士五六万人参加。祭坛正中，高悬孙中山手书“国友人师”祭幛一幅。孙中山主祭，鲍罗廷致谢词。

△　吴毓麟到南京访齐燮元，转述北京政府意见，劝齐与吴佩孚达成谅解。晚吴又邀杜锡珪交换对海军之意见，商定：一、温树德名义上归杜锡珪节制；二、温为渤海防御使，由胶济路按月拨饷五万元。

△　日本东亚兴业会社集资40万元，在上海组织大兴信用会社，收买虹口区吴淞路一带土地、房屋，开辟商业市场，是日举行创立会，选大东银行分行行长市村等五人为理事。

△　沪闸北商界联合会等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一致主张力争废止北京政府于民国七年（1918）与日本政府所订电话借款密约，决定致电江苏省长韩国钧吁请力阻密约实行。

2月25日　王正廷与加拉罕会商，加允诺中东铁路用中国资本赎回，并允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王提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13条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1条。加拉罕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与道胜银行所议变更中东路权事，一概无效。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首次会议，于右任、叶楚伧、瞿秋白、茅祖权、谢持、何世桢、邵力子、孙镜到会。胡汉民任主席。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为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毛泽东为秘书；汪精卫为宣传部长，恽代英为秘书；于右任为工人、农民部长，邵力子为秘书；叶楚伧为青年、妇女部长，何世桢为秘书；茅祖权为调查部长，孙镜为秘书。以后历次各部联席会议，均

由胡汉民任主席，毛泽东任记录。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芳泽，对于去年9月1日日本地震时杀害我侨居日本之华侨356人之事，虽前已照会要求惩凶、抚恤和赔偿，但拖延至今仍未有见复，特催结此案。

△　孙中山派邓演达赴浙江奉化挽蒋介石回粤。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蒋：立即归粤。廖仲恺亦电蒋应即回粤。

△　湘军斥候队在苏村附近与陈炯明军中路步哨发生接触。陈部已在苏村及苏村下游增防，湘军宋鹤庚部6000人调往中路凤屯冈一带。滇军第五、第六两旅出发协防。左翼陈炯明部在深圳已开始活动。湘军吴剑学部任前锋，驻横沥，滇军胡思舜协防。27日，左路湘军陈嘉祐分布增城、正果各要隘。

2月26日　曹锟特派曹锐督办直隶全省官矿事宜。

△　吴佩孚委任脱离孙中山之前驻粤滇军团长杨池生为援粤总参谋。

△　吴佩孚乘广州湘军东调、粤西北防务空虚之际，派马济联络陆荣廷进兵梧州。陆派韩彩凤为攻梧总司令，率队数千人，由桂省平乐东攻梧州。孙中山令桂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派兵防堵。是日，韩部与黄部在白马一带激战。

△　桂军申葆藩部奉林俊廷命退出阳江、阳春，集中廉州。林经宋以梅接洽，向孙中山输诚，获得饷械，准备向桂省发展。

△　北京政府教育部令准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工业大学。

2月27日　福建督理孙传芳借校阅军队之名，率部由福州出驻延

平，由军务帮办王永泉代理闽省督理职务。孙向王索饷40万元，并借调王部劲旅一团。孙部李生春、卢香亭两旅仍留驻福州助王。实系孙故布疑阵，欲驱逐王永泉，统一福建。此举引起浙、赣二省恐慌。

△　吴毓麟由南京到济南，与督办郑士琦、省长兼胶澳督办熊炳琦商谈。吴谓：此次调停杜（锡珪）、温（树德）海军风潮，吴佩孚、齐燮元均有相当谅解，风潮可望平息。又谈及胶澳督办问题，熊谓："余之兼任督办与否，不成问题，最感痛苦者，为吴使（佩孚）对于鲁省军民各政每加干涉。"郑士琦对吴佩孚之欲以潘鸿钧为第五师师长深表不满。

△　国立自治学院在上海筹建完成，院长张君劢主持开学典礼。董事会代表沈恩孚致词，称该院宗旨为养成有道德之政治人才。章太炎出席演说，谓：就国宪立论，省治乃现今中国政治之惟一途径。

2月28日　曹锟令准免两湖巡阅使萧耀南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兼职，以陈嘉谟继任；准免督理直隶军务善后事宜王承斌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兼职，以王维城继任。

△　北京国务院会议决定，依吴佩孚之请，任刘存厚为四川督理军务善后事宜，田颂尧为帮办，邓锡侯署四川省长，刘湘署川藏边防督办，袁祖铭署川黔边防督办，杨森为川东护军使。后因四川二军驻京代表反对，此项命令搁置未发。

△　北京外交团由荷兰公使欧登科领衔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商标局聘用外国顾问为条件，承认北京政府所订之商标法。

△　驻粤滇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洪汝钧在南雄宣布脱离孙中山，是日率部到达大庾，归附吴佩孚所委前敌总指挥、前滇军第二师师长杨如轩。

2月29日　沈鸿英因迫于吴佩孚派陆荣廷联合马济统一全桂，乃

多次派代表向孙中山输诚。孙中山见其有悔过之意，予以收容，是日任命沈为桂军总司令，并拨款二万元、子弹数十万发，助沈返桂。

△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与刘成勋发生冲突，是日陈通电称："刘成勋通电解职，所辖三军各部，已由刘湘督办改委在案。今刘成勋自称督办副使，于本日拂晓竟派兵侵我原防，犹复在邛蒲本道增兵，向各邑移动，不得已立派大军进攻新邛，歼此凶顽。"

△　曹锟任沙克都尔札布为伊克昭盟盟长。

△　赣省直军方本仁部袭南雄边防军高凤桂部，高部电请广州政府派樊钟秀部赴援。

△　山东周村兵变焚掠，发生大火，死300余人，伤400余人，居民无家可归者数千人，毁商店及住宅200所，财产损失值百万。

2月下旬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分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咨询各地党务进行计划，遂草成各省党务进行计划草案，内规定：各特别区之范围和组织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自行决定和直接办理之；各省设临时省执行委员会，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派员筹备，派出之筹备员应于一星期内启程前往筹备，并派定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如下：山东王乐平，直隶李永声、于方舟，察哈尔恩克巴图，山西苗培成、韩书麟，绥远乌勒吉，内蒙白云梯、克兴额，湖南夏曦，热河陈镜远、韩麟符，福建许卓然，江苏刘云昭、张曙时，湖北刘伯垂，安徽李次宋、曹似冰，浙江沈定一，江西赵幹、邓鹤鸣。其余未派各地由所在地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决定。

是月　　吴佩孚函电诘责湘军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取消自治之无诚意，又派岳州军务处处长葛应龙及军法处处长谭道南等驻长沙，包围赵恒惕；同时秘密组织人员反对省宪活动。赵迫不得已，通电各军官务于3月1日前齐集长沙开军事会议，讨论善后。嗣后，吴又提出"湘省北归条件"30条，命葛应龙交赵恒惕，期在此会议中讨论附北

问题。其主要条件为：一、取消省宪；二、直军驻防湘西（按：湘西为出产烟土及云、贵烟土之出口要道，月有税银200余万元，为湘军惟一财源）。赵认为绝对不能服从，自治不能取消。

△　原陕军第一混成旅第一团赵树勋部驻守豫省卢氏县，每月勒索巨额钱饷达三万元左右，县民缴款稍迟即拘押严刑追缴，激起卢氏各民团之反抗。继去年8月全县保卫团、守望社、红枪会、硬肚队等10万人围城后，是月初，四乡民团又集聚围城驱赵，并发出宣言，声明驱逐陕军理由。时赵团已编入镇嵩军张治公之第二师，即由张治公前往调解，至是月中旬民团始解围而归。嗣后赵团之军饷因乡民不纳而仰城中商民，城中富户早已远迁，所遗贫民万难供给，而赵团反增添军额，并占据广地，大兴土木，每天索钱拉夫。4月初卢氏城内人民暗向四乡民团求救，集合数万人，第三次围住县城，要求赵团离卢。卢氏县民围城一月，誓死必达驱赵目的。

△　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经营信托业务，附设储蓄部，资金300万元。田时霖、田祈原、王晓籁等为董事。

△　广西林俊廷因马济、陆荣廷得吴佩孚支持，不能立足，派温雄飞去粤磋商。孙中山表示欢迎，助其回桂统一。

3月

3月1日　　北京政府全权代表王正廷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在北京会商修正《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中苏交涉第一阶段结束，王缮成公文，报告曹锟、孙宝琦、顾维钧。

△　驻京法公使傅乐猷赴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解决金法郎案，并威胁称："此乃最后之催促。"

△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金法郎案，孙宝琦主张据约再驳，顾维

钧以再驳亦无济于事，不如交国际公断。王克敏声称避嫌，不发表意见。

△　北京国务院会议决定：一、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二、温树德所属各级军官名单交杜锡珪呈中央任命；三、任命温树德为海军少将；四、温部舰队糈饷商由鲁省督长妥筹拨付；五、吴佩孚保高恩洪为胶澳督办一职，须等熊炳琦辞职呈文到京后再行办理。

△　孙中山就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四人秘密集会谋议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之事通知国民党各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如有疑问，当来直问总理为是”。

△　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提名邵元冲在伦敦筹设党部，以逐渐发展欧洲各国党务。会议通过孙之提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即行函邵办理。

△　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汪精卫、瞿秋白、邵力子为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并以叶楚伧为委员长。

△　马君武、冯自由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以对抗国民党之改组。

△　吴佩孚急电湘省当局，改派谭道南为两湖警备司令兼督办川鄂湘善后事务全权代表，掌管有关南北问题及湘省附北问题等。

△　齐燮元、韩国钧在军署召集江苏政务会议，讨论卷烟特税等问题。多数认为不平等条约只限于进口税及内地子口税两种，今苏省所推行者乃营业特税，系省内单行条例，外商不应有所借口。倘本省径与外人另提办法，是自损主权。决议不受外人干涉，积极推行。

△　熊炳琦通电辞胶澳督办职，并向吴佩孚声明此后海军用款须尽由青岛筹措，山东省府不能供给。

△　闽海军警备司令杨树庄召集驻闽各舰长会议，反对温树德任渤海舰队司令，并推“海容”舰长陈世英赴宁见杜锡珪。

△　中国银行对钱庄开始举办领用纸币办法。其后，浙江兴业、中国实业、四明等银行亦相继仿行。

3月2日　　孙中山通告党员，阐释中国国民党改组容共意义。略谓：“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之破坏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俱在，覆按可知。”“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在党言党，惟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

△　蒋介石自宁波函告孙中山遵命回粤，并建议任命许崇智督粤、胡汉民长省。

△　北京政府财政窘迫，自春节后未发第二次政费，军警界索欠饷三次。孙宝琦要求王克敏助国务院费用10万元，王拒不通融，欲以财政困难倒孙。是日，孙赴天津筹款。

△　北京政府财政部答复议员质询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中国赔款及德华银行复业两问题，正在考虑中，尚未作最后决定。

△　山东省议员国进修等10余人奉吴佩孚令分赴北京、洛阳，进行倒熊（山东省长熊炳琦）活动。

△　杜锡珪密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及海军部，不同意任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谓：“北归舰队既有名义，何以亟亟予以渤海舰队司令。”4日又电重申。

△　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开东京大地震期间留日被难侨胞、侨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等341人追悼大会，到会者数万人。

△　湖南省外交司长杨宣诚赴北京会同外交部向日使交涉去岁6月1日长沙日本“伏见”舰水兵枪杀中国人民案。

3月3日　　湖南省议会通过议长林支宇辞职案。10日选欧阳振声为议长，次日续选王上仁为副议长。

△　陈炯明军袭东江中路苏村，被宋鹤庚部击退。

△　江西驻军将领杨以来、岳兆麟、吴金彪、方本仁等联名电请北京政府设法阻止孙传芳自闽侵入江西。

△　赣南直军方本仁部突袭南雄高凤桂部，被高部击溃，退赣南。

△　四川第三军刘成勋部与陈遐龄军在藏边激战，陈军入雅州。吴佩孚令杨森援陈。

△　英美烟草公司在南京召开各埠分公司经理会议，坚持反对卷烟特税，声称如有擅行认税者，即取消其经理职务。

3月4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声明，驳斥上海《新闻报》上月29日载文《粤政党提倡共产中之政潮》所称“国民党已加入共产党”、“总理又提倡共产主义”云云“悉属传言错误”。声明：“国民党之惟一职任，在领导全国国民作反抗军阀及帝国主义之运动”，“国民党之主义，依然是三民主义。”

△　驻京法使傅乐猷见顾维钧，要求参预中东路会议。5日，法使向顾维钧提出“警告”，要求中东路问题之决定，应慎重考虑法国意见。

△　日本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面告驻日公使汪荣宝，金法郎案宜与法妥协；并训令在京公使斡旋。嗣因中国反对金法郎案极烈，无法进行斡旋。

△　熊克武部四万余人自泸州退江津，沿途遭刘湘、袁祖铭、邓锡侯袭击，逃亡十分之三，军心涣散。是日，熊率部由江津退綦江，准备入黔。

△　闽海军警备司令杨树庄命林永谟为驻东海陆战队总指挥，率舰四艘占领投北之温树德驻地东山县。

△　北京国立北大、师大、法大、医大、美专、工大、农大、女高师八校依中日文化事业协定规定，派遣学生46名赴日考察，为期一月，每人旅费500元，由日本就庚子赔款支给。

3月5日　　孙中山令饬各军不得擅征捐税，如有敢犯者，军官免职治罪；奸商承办者，除没收产业外，应一体严行治罪。

△　曹锟令准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潘守蒸免职，以孙建业继任。

△　张作霖所派代表袁金铠、张寿增晤孙宝琦，说明张作霖赞同《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希望从速承认苏联。11日，张电袁敦促政府从速签订该项协定，并举行中俄正式会议。

3月6日　　孙传芳回师福州，驱逐王永泉。5日，孙令闽北护军使周荫人在水口（位于闽江左岸）截留王永泉所运之军械，毙王部耿团300余人，孙并暗将所借王部一团缴械。同时又令李生春、卢香亭两旅开出福州，佯赴延平（今南平），暗扼附近要隘，就近歼灭王部。李、卢所部即以后队任先锋，反攻王部所驻洪山桥兵工厂，将王部缴械，入驻福州。王永泉与其弟王永彝率部走福清。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政府探询中国召集

关税会议之意见。

△ “中日电报协约”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委员长为交通部电政司司长祝书元，日本委员为日使馆参赞太田及递信省事务官牛泽等，商议南满铁路沿线“租借地”和“附属地”日本电报局与中国电报联络问题、电话通讯联络问题等。

3月7日 孔祥熙奉孙中山之派自粤抵沪，即日北上赴奉天访张作霖。郭泰祺亦将赴天津访段祺瑞。

△ 孙中山特任曲同丰为北洋招讨使，是日离粤北上，将赴津、奉与段祺瑞、张作霖有所商谈。

3月8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王正廷报告交涉经过，决定将草案交各部签注意见。自8日起国务院连开特别会议多次，将各部对于外蒙撤兵、废除旧约、中东路赎价、取缔白党等问题的意见，迭令王正廷访加拉罕要求修正。

△ 何香凝在广州主持召开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妇女解放口号，参加者2000余人，会后游行。同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表文告，呼吁妇女们团结起来，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促进中华民族之独立与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全国妇女同胞的平等与福祉。

△ 曹锟任命张毅为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

△ 全国各地集会悼念革命导师列宁。是日，上海各工团假上海工团联合会开追悼列宁大会，到全国工界救亡大会、上海纺织工会、海员工会、丝纱女工协会、中华劳工会等20余工团。9日，湖南省民众千人假省教育会开追悼会。23日，香港各工团及天津各校学生及天津青年会等分别举行追悼会。30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集会追悼列宁，大会由李大钊主持，散发《纪念列宁》小册子，首篇为李大钊所

撰《列宁不死》一文。

△　闽北护军使周荫人进入福州后，派兵南下追击王永泉，并分电厦门镇守使张毅、王献臣协同袭击。

△　章太炎电湖南省议会及赵恒惕并各军官，反对取消省宪，指出“若欲修改省宪以阿附洛阳而求瞬息之安，则终为自杀矣”。责洛阳吴佩孚借口“省宪抵触国宪，以未施行之宪法，而责人以抵触，是于国宪阴为规避，阳作奉行，其罪不容于诛矣”。并指吴抵触国宪数端：不废跨省之巡阅使；常驻国防军于非国防地带之岳州、常德、湖北、洛阳。20日、21日章又两次电湘议会。

△　留日学生因闻日本以庚子赔款30万元拨作留日补充经费之说，官费生与自费生相争不休。驻日使馆无法处理，呈请教育部核定分配办法。是日，北京教育部公布留日学生补助办法：一、学生额数为320名，以各省众议员名额及担负赔款金额之比例为分配标准；二、每名每月得支学费日币70元；三、各省应得名额，在留日官、自费生中各补半数，若系单数则自费生得多补一名。

3月9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共上海执行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等30余团体代表300余人在沪举行追悼列宁大会，胡汉民主席，瞿秋白报告列宁史略，叶楚伧、邵力子、福朗（德人）等演说。大会结束时全体高呼：“列宁主义万岁！”

△　张作霖派毛钟才至广州晋谒孙中山，孙以晚宴款待。

△　湘省议员刘思范、唐国珍、伍岳等18人为反对取消省宪，向省府提出质问书。略谓：外间纷传北方密使频来，希图撤销吾湘省宪，当局态度不甚明了。如果属实，则吾省3000万人民，势必冒险以索偿此不惜头颅代价所得之省宪。湘省自治又为联省自治命脉所关，特提出质问书，即请于三日内答复。

△　王永泉率部逃至峡兜渡乌龙江时，遭李生春约集之海军截阻，3000余人被俘。11日，王与其弟逃入泉州，集所部各旅开军事会议，谋联络臧致平再图反攻闽北。但因周荫人军已南下追逼，民军又急谋报复，王不得已将所部交旅长杨化昭，准备归附臧致平。

△　日本政府因温树德提取胶济路盈余充舰饷事，急令佐世保第一舰队炮舰21艘驶往青岛。

△　国会议员张伯烈等在京发起全国法团行宪会议，是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叶夏声主席，到会者120余人，推叶夏声、张树枏等为常任筹备委员，并通电全国法团于4月8日在上海会商实行既成之宪法，纠正一切违宪行动。

△　豫军在韶关肇事，强借用具，伤毙人命，抢掠财物，激起公愤。附近商团千余人入城，豫军亦架炮示威。是日，全市罢市。11日，豫军总司令樊钟秀亲往处理，允惩凶恤伤，迁出占住之商店。13日，各商店复业。

3月10日　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进攻惠州：湘军宋鹤庚第一军任中路，湘军陈嘉祐第六军任左路，桂军刘震寰任右路。

△　曹锟令准陆锦辞陆军第九师师长兼职，任命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继任第九师师长，冯玉荣为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召集关税预备会议事照会北京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公使，略谓："华会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件，原定俟该约施行后三个月内，应由中国政府择定地点，定期召集特别会议，议定撤除厘金，增收二五附加税"；该约"旨在救济中国财政，但至今已届两载，各签约国尚未完全批准，以致特别会议不能如期召集，中国财政上种种计划无法进行，内外各债亦无从整理"。为此，中国政府提议，先行召集预备会议，为将来特别会议作准备。

△　孙中山任命杨虎为北伐讨贼第二军第一师师长。18日令准杨虎辞办理海军事务职。

△　北京政府交通部津浦路局向英商祥泰木行借款40.9958万元，年息八厘，用作购买枕木、桥梁、道岔木。

△　北京政府院部会议讨论华洋义赈会导淮及设导淮督办案，因苏、皖、鲁三省人士反对甚力，决定不设导淮督办，由全国水利局主办导淮事务，辅以导淮委员会。

△　上海闸北祥经丝厂失火，烧死女工200余人，伤84人。

3月上旬　孙中山因防陆荣廷东窥，调桂军第七军刘玉山部开往西江地区之三罗。西江为粤军第一师李济深、第三师郑润琦防地，李、郑认为西防陆荣廷，南御陈炯明，足有实力可与周旋，不必另派军队，遂由郑润琦到省谒孙中山，请收回成命。孙以命令既下，碍难收回。郑返回西江后，即与李济深、梧州之黄绍竑会商，议定如有他军过境，当即以武力阻止。

△　孙中山应谭延闿请求，令滇军将广州飞来寺制弹厂转交湘军，以资全力进攻东江。滇军迫于形势，即将该厂交出。杨希闵为此颇不满，辞东江总指挥职。

△　江西督理蔡成勋及军务帮办赣北镇守使吴金彪等因闽督孙传芳屯兵延平，有侵犯该省之势，迭电请北京当局设法制止，并饬令孙督将闽边新增队伍即日撤回。

3月12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中苏交涉问题，审议《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王正廷出席报告11日晚与加拉罕磋商经过。各阁员对中东路估价问题讨论最久，多数认为此事太复杂，留待将来组织专家委员会办理；关于俄蒙协约及外蒙撤兵两大问题，王云曾与加一再磋商，加氏认为既有第五条“苏联视外蒙为中国之领土”，并有“尊

重中国主权”之规定，俄蒙协约当然失效，各阁员则认为应有明文规定，决令王与加再行磋商作文字修改。

△　北京外交团讨论中国财政问题，决定：一、照会北京政府速行整理无担保及担保不确实之外债；二、要求迅速偿还逾期外债本息，并追索利息；三、委托安格联查明增加关税实额，以便充作外债担保；四、在中国未整理外债以前，不给予财政援助。

△　道胜银行管理公司代表贝蒂海函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中苏两国商议赎回中东路一事，谓此乃违背1896年所订合同。

△　伍朝枢奉孙中山派离沪赴奉，将向张作霖说明北伐迟缓之原因及国民党改组之意义，并请张资助。

△　驻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干涉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之谈判，略谓：“1920年10月2日贵国政府与道胜银行缔结管理中东路合同，如不取得道胜银行之许可，不得有所变更。”“对于中东路之任何变更，若不经合法股东之考虑者，法国公使馆或其他代表中东路各股东或债权人之其他公使馆必行提出抗议。同时各项债权之要求及其他关于利息上损失之请求，亦必相继而至，则贵国政府财政状况将愈趋于纷乱。”

3月13日　　王正廷与拉加罕续议《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加拉罕同意第四条改为“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1919与1920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中国政府同时声明，中国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苏联政府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两缔约国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他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关于外蒙撤兵问题，将3月1日所定的第五条改为“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一俟蒙古撤兵之条件（即期限及彼此边界利益与安全）

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后，即将苏联军队由蒙古尽数撤退”。

△　驻京法使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催请解决金法郎案，声称奉本国政府训令，金法郎案不解决，则关税协定不能批准。

△　英国公使麻克类奉政府训令，要求重审在丰台殴伤京奉路洋稽查毕尔塞尔之军官陈国贤，并允由英使馆派员观审。陈原经陆军军法处判决监禁10个月，后改判监禁28天。27日，英使麻克类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对陈国贤殴伤英员事，处理失当，有意庇护。

△　孙中山任命林若时为广东海防司令。

△　湘省重要军官叶开鑫、唐生智、贺耀组等抵长沙，应赵恒惕之请参加军事会议，讨论吴佩孚要求取消省宪等问题。陈炯明代表亦到长沙，鼓吹联治。

△　王永泉被民军高义、杨汉烈、陈国辉等逼迫离泉州逃往上海，余部第二、四两旅交杨化昭。

△　全国商联会致电新疆总商会，请调查开采该省石油矿，内称：“顷准大阪中华总商会函称，兹见《朝日新闻》记载，新疆有极大之石油矿发现，现美、英、日等国均思染指，设吾国不自开采，恐偌大利权，又被外人攘夺。”

3月14日　王正廷与加拉罕拟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1条及中俄协定附件七种，各以两国全权代表名义签字，待双方政府批准后签定正约。

△　广州大本营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缔调第六路罗伟疆部沿宝安一带袭击陈炯明军练演雄部，练部由深圳率队抗拒，不支。是日卢部占据宝安附近之大鹏。

△ 臧致平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孙传芳、周荫人与王永泉冲突，联合各属民军及王永彝残部大举反攻，围攻漳州，恢复闽南。是日下午，下令封船。15日下午，集合出发部队5200余人于南普陀前磐石炮台，次晨炮轰屿仔尾投陈炯明之赣军赖世璜部，渡海进攻，赖部败逃，臧部登陆，20日攻占石码。

△ 蒋介石致函廖仲恺反对联俄政策，认为“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并认为孙中山“回粤已阅十五月，为时不可谓不多，而对于民政、财政、军政，未闻有一确定方针发表”，表示不满。

△ 上海闸北市民因争水电商办，迭向江苏省署呼吁无效，罢市二日。省长韩国钧被迫允许4月底移交商办。

3月15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中俄协定草案，顾维钧、陆锦、王克敏力持反对意见。顾、王声称：俄蒙协约仍未废除，外蒙撤兵仍附有条件，归还俄国教堂财产恐他国效尤，均不能允可；庚款充教育基金、中东路赎价两事亦难承认。其他阁员亦主慎重，决定令王正廷再商加拉罕修改。中苏交涉顿起变化。

△ 孙中山致电胡汉民请就任大本营秘书长，并偕蒋介石同来。

△ 驻京英使麻克类赴北京政府外交部催签威海卫条约。

△ 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因代理校长冯熙运拒绝学生改良学制和组织董事会的要求，又开除请愿代表四人，是日全体罢课。直隶省长王承斌派军警包围学校，搜捕学生代表。17日，225名学生赴京请愿，提出三项要求：一、去冯熙运；二、被开除之四代表回校；三、从速组织董事会。21日，北京警察侦缉队押送请愿学生回津。京、津学界群起声援，组织驱冯后援会。北京军警侦悉学生将游行，于29日上午包围北大、师大，游行未成。

3月16日　苏联代表加拉罕致紧急照会于王正廷，限三日内正式签定《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并声明三日期满所议协定即失效，一切随此而产生之后果，由北京政府负之。

△　孙中山通告担任公职之国民党员：一要严守三民主义；二要实行国民党之策略；三要刻苦自励与民同甘苦。

△　何成濬以孙中山命令回粤，乃率部由厦门突围，渡海挺向漳州。

△　孔祥熙、伍朝枢在奉天会见张作霖。19日、20日张与伍商讨双方合作反直事，表示愿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粤之诚意。

△　山东日人经营之坊子煤矿发水，淹死工人75名，被难家属要求日人如约抚恤。潍县驻军派兵一营前往弹压。

△　山西省太原步兵第五团密图推翻阎锡山，其中营长二人因隙向阎告发，阎密令立往捕获，当晚9时将所获叛军尽数枪毙。

3月17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仍坚持废除俄蒙协约，撤除驻蒙苏军，拒绝交还教堂产业，令王正廷向加拉罕商议修改协定。

△　曹锟令免帮办福建军务、兴泉永护军使兼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本兼各职，听候查办。7月10日，又据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呈准撤销王之查办案。

△　湘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副议长王上仁就职，发表演说表示全力拥护省宪，不为一党一派之议长。湘省议会旋讨论章太炎电，议决电复章，表示议会与3000万人民坚决护宪；并将章电抄送各军官查照。

△　孙中山令：“禁烟督办杨西岩办理不善，流弊滋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派邓泽如继任；并严令禁烟督办收入及一切公款，

军人一概不得干预，政府自有权衡，倘敢违犯，定必严办。31日孙中山又令，据财政委员会查明，杨被控“办理不善”，尚无实据，免职查办令应予撤销。

3月18日　　王正廷依据国务院会议方针，驳复加拉罕照会，以“草案商议未毕”为由，声明交涉破裂，责任应由苏俄负责。晚，王与加会见，希望续行磋商，加态度强硬，谓对于业经签字之草约，不能再有变更。

△　岳州警备司令部警备处长葛应龙及军法处长谭道南嗾使岳州各团体反对省宪，是日又以湖南总商会名义在岳州发出“反对省宪”通电。

△　吴佩孚电曹锟主张速签中俄协定。

△　曹锟令准免山东省长熊炳琦之胶澳督办兼职；特派高恩洪为督办胶澳商埠事宜。

△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上海总商会请求，派员晤外交团领袖荷使欧登科，接洽收回上海会审公廨。

△　桂军刘玉山第七军第三师陈天太部由河口出发至羚羊峡，守峡李济深第一师开枪阻止，陈军还击。

3月19日　　加拉罕函复王正廷，指责北京政府在其答复中置既成局面于不顾；指出中俄协定体现1919年、1920年向中国表示友好之原则，苏联废弃一切帝俄时代在华之特权，北京政府反而拒绝此协定，此实由列强干涉之所致。声明中苏交涉已终结，《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不能修改，16日所提出之三日限期后，所订协定之约束即无效，此后非无条件承认，不能恢复邦交。警告北京政府勿自陷于不可挽救之错误，影响中苏关系。晚，顾维钧访加拉罕，直接磋商修改协定，亦无结果。

△　曹锟任命杨池生为滇军第一师师长，杨如轩为滇军第二师师长。

△　驻南雄之高凤桂部入赣投北，赣南镇守使方本仁调高部驻赣州。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商标法事件复照外交团，允将注册期限展至明年6月，英文商标法可在政府公报发表；惟拒绝聘用外人为顾问。

△　孙中山电许崇智、蒋介石，谓：东路尽调回省，湘军集中东江，日内开始向潮梅进攻，乃高凤桂忽又投北，北江告急，省中东路部队无人主持，望速回维持大局。

△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因湘军扣留禁烟署总务厅长黄士强，并饬该署尽将收入交湘军，乃令驻东江中路马嘶等处滇军廖行超全部返省，与湘军对抗。21日，滇军收缴部分湘军兵械，在广州城内巷战数小时。29日，又在增城县西南之仙村镇冲突，湘军宋鹤庚抽调增城部队集中石滩。

△　淞沪警察厅长、上海县知事等向闸北水电公司筹备处宣布江苏省长批示，准闸北水电厂于5月1日商办，并有护军使何丰林保证。

3月20日　曹锟令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办中苏交涉，迅与苏俄代表继续商议进行。王正廷奉令即于是日停止中苏交涉。24日，外交部接收中俄交涉公署。

△　北京国务院通电公布中苏交涉之争议诸点及磋商经过。翌日，王正廷通电申述交涉经过。

△　曹锟令准免张福来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职，以杨清臣继任。

△　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长，蒋未回粤前暂由李济深代理；派王柏龄、胡树森、张家瑞、邓演达、钱大钧、彭素民、宋荣昌、简作桢、严重九人为入学试验委员。

3月中旬　吴佩孚密电赵恒惕，略谓：关于军事会议一切，责成葛应龙、马济及谭道南负责；国宪已公布，湘宪与国宪多所抵触，应将其取消，毋庸借词修改，免生枝节。

3月21日　孙中山派范石生为财政委员会委员。

△　孙中山委臧致平节制闽南民军。

△　何香凝主持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召开的妇女党员大会，决定组织贫民妇女生产保护医院和创办三所妇女劳工学校。28日，妇女部通告全国妇女界，号召参加国民党，共同为国家努力奋斗。

3月2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复加拉罕19日照会，为北京政府拒绝14日已签订之协定辩护，并表示准备继续谈判，早日缔结中俄协约。

△　曹锟指令陆军总长陆锦将陕西第一独立旅改编为陆军第二十六混成旅，并任命田维勤为该旅旅长。

△　臧致平约集各属民军并联络王永泉残部经数日战斗，于是日攻占漳州，赖世璜率余部向永定撤退，逃往汕头。23日何成濬亦随臧入漳州，自称民军总司令。

△　周荫人率部入莆田，急速解散莆田、仙游王永泉部降军。

△　湘省议会开会欢迎来省之各军官，赵恒惕亦参加。欧阳振声致欢迎词，谓："去年本会议决，以实力制止毁宪行动，各军官根据议案作守法之战。大难初平，军官必能服从省长，本会当作政府后盾。"赵答："尊重贵会主张，力图善后，务使成为真正自治。"

3月23日　孙中山就闽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任方声涛为福建民军总司令兼福建省长，乘时建设革命营地；并助已攻入漳州之臧致平军饷15万元。

△　广州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奉孙中山令前往西江，制止陈天太和李济深冲突，并派陆兰培第二独立旅前往三水，以武力调停。

△　王正廷通电对于国务院会议所坚持之废弃俄蒙条约、外蒙撤兵、归还旧俄之教堂财产三点加以辩白，以释不明真相者之责难。

△　吴佩孚电国务院、外交部，请及早签定中俄协定。

△　九江平民教育促进会开成立大会，到千余人，主席吴金彪。25日，3000余人游行，手持“教育普及，快来识字”纸旗。

△　广东大学经费运动会邀请各界代表在高师集会，请求赞助争回关余及庚款，以利大学之兴办。议决：一、由各团体联名发表宣言；二、由各团体联名通电中外各界及各国政府；三、宣言、电文发表后，到沙面举行示威，要求各国领事赞成。

3月24日　孙中山在广州对滇军讲演《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略谓：北伐是救国救民的当务之急，革命成功，便可享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那样的福。中国地广人多，人民聪明，中国改造好了可以超过他们。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好国家，才是大志气。

△　孙中山任命吴铁城为广东省警卫军司令。

△　上海等各埠举行对日外交周年大会，纷电日本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交还旅顺、大连。上海市民举行之周年大会决议致电日本国民，谓日本“不肯交还旅大，丧失中日亲善之诚心，永植世界和平之障碍”，上海市民“誓不承认”。26日，东京华侨留学生冒雨举行收回旅大示威大会；福州学生2000余人游行，要求收回旅大。27日，济

南各界万余人集会游行，坚持对日经济绝交，力争收回旅大，并电北京政府，要求速与日交涉收回旅大。

△　孙中山令准禁烟督办邓泽如辞职。26日派鲁涤平继任。

△　日使芳泽就中国违背《山东协定》移用胶济路款项供给海军温树德部月饷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第四次抗议。

△　湖北樊城驻军鄂军补充旅第一团一营，去岁由长沙调往协同张联陞部第十七混成旅剿匪，因欠饷达九个月之久，于是日在樊城哗变，大肆劫掠，地方损失18万元，商民被戕害者74人。张联陞得讯，追获90余名严办。

△　湘省议会因叶德辉发表论省宪书及两致章太炎书反对护宪，是日咨请省政府拿办。31日，省议会决定再催拿办。

△　北京大学发表宣言反对北京政府教育部所颁《国立大学条例》；该校评议会并具呈教育部，指出大学内部行政，自有校长总负其责，无须有董事会。

3月25日　　孙中山与张作霖来使杨大实晤谈，指出："粤中并未施行共产，对奉对直政策并未变更。""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请电雨亭（张作霖）弗可信。"按：张作霖以外间"传闻粤中实行共产及对奉与反直各政策略有变更"，特派杨大实来粤调查，并与孙中山磋商反直计划。

△　加拉罕复顾维钧22日照会，就签字问题、责任问题、列强干涉问题、期限问题等进行驳斥，并声明中国非先承认苏联，两国交涉不能继续。

△　广州各界召开大会，主张立即承认苏联。

△　曹锟授杜锡珪为海军上将，赵玉珂为陆军上将。

△　孙中山致电墨西哥总统，要求取消苛待华侨条例。4月28日，墨西哥政府允将该项条例取消。

△　留英学生退款兴学研究会自伦敦分函国内教育界，主张国内宜速组织一委员会讨论英国退还庚款之用途，并称该会已于3月8日在伦敦成立，一面请朱兆莘代使探询英政府意向，一面致书英国学者、教育家，并公请蔡元培由法到英接洽。

△　江苏财政厅就卷烟特税问题电复上海总商会，谓南市、闸北烟商销售凭证准照五折缴款，已属体恤周至，未便再持异议。

△　唐山煤矿塌顶，压死工人53名。

3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以香港报纸散布广东将于4月1日实行共产谣言，是日发布辟共产、赤化等谣诼文告。指出："吾人希望国人祛除对于'赤俄'、'共产'所怀之恐怖。当知世间一切新发现之思想或主义，苟能在日光底下，与世人共相研究者，决无危险，决非可怖。"并申明国民党此次改组，以苏俄革命党为师法，旨在救济中国，非必实行共产。

△　孙中山分令广东首长杨庶堪、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广东省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将东路第一路司令所部改编为广东省警卫军，归广东省长节制调遣。

△　广州大本营大元帅府决定各县设立民团，并可备价向兵工厂购领枪械。

△　北京政府驻苏代表李家鏊收到苏联政府节略，内容为：协定大纲应速批准，交涉停顿责在中国政府；苏联对外蒙、中东路等问题迭次退让，放弃权利；如中国不察实情，将协定大纲推翻，则中国将迫使苏联在外蒙之地位及在中东路权利之扩张。

△　赵恒惕电告萧耀南，谓该省多数军官不赞成废弃省宪、取消

自治，请暂缓附北。萧复电仍令劝告军民，实行附北；并致电曹锟、吴佩孚，谓赵既背约，请改定收湘计划。

3月27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中苏交涉案，决定对加拉罕25日照会暂不置复，暂将交涉停顿，并令驻苏代表李家鏊访莫斯科当局接洽。顾维钧、孙宝琦称病未出席会议。

△　孙宝琦因吴佩孚、萧耀南等迭电催签中俄协定大纲，并责当局误国，而加拉罕态度强硬，顾维钧无法与之续商，特宴请议员何雯、饶孟任、陈铭鉴、张益芳，希望何等出为调人，继续进行中苏交涉。28日，何雯等四人与加拉罕会见，加谓：此协定为他人从中破坏，但本人仍当遵守苏联历次宣言及政府训条。

△　陈炯明军洪兆麟部声言“入闽援漳”，令李云复、尹骥二部自汕头开拔。30日抵闽边。

△　周荫人军姚建屏部攻入泉州，民军高义出城迎降。29日，周军前锋300人进泉州城。

3月28日　顾维钧通知加拉罕举行会谈，加以病为辞，派秘书访顾。顾竭力声明北京政府并无推翻协定草案之意，但要求废弃俄蒙协定。加声明：“《解决中俄悬案协定大纲》内容，绝难再事讨论。”

△　曹锟令免甘肃省长林锡光职，特任陆洪涛兼署甘肃省长。

△　北京学生联合会因中苏交涉停顿，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北大、师大、女高师、中大等40余校代表参加。议定29日下午1时游行请愿，要求承认苏联。军警侦知，包围北大、师大，阻止游行。

△　沈鸿英军邓右文部由砰石取道湘边临武、江华回桂。邓临行时通电称：因陆荣廷断其饷源，决先回师平陆，后定粤。

△　上海《泰晤士报》馆昨晚大火，至是日下午始息，延烧三洋

行及所贮之酒类、茶叶、生丝等，损失350余万元。

3月29日　曹锟特派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任命李树勋为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刘文辉为四川陆军第九师师长。

△　驻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中苏两国关于汉口俄国租界交涉，须得法国同意。

△　广东省财政厅布告，将银市买卖捐暂时撤销。30日，广东银业行店对财厅布告之“暂时”二字仍表不满，一律罢市。同日，财厅再次布告，将买卖捐永远撤销。31日，银业行店一律复业，并要求严惩承办此捐之陈伟业。按：陈向财政厅承包此捐，年纳银五万，凡银业行店买卖金钱、外国纸币等，每万元抽五角。

△　日本政府派赤羽偕同工程师筹建齐洮铁路（齐齐哈尔至洮南）。

△　杨树庄率舰赴金门，迫臧致平照前约交出厦门与海军。

△　北京八校推举教员八人，赴教育部索欠薪。教育总长罗鸿年表示中央财政拮据，筹措困难，当竭个人绵薄。4月1日，八校又有教员300余人赴教育部索薪，教部允于3日发数成。

3月30日　孙中山致电何成濬，告由臧致平统辖指挥闽南联军。又促粤省东江前敌各军克日下总攻击令。

△　北京外交团开特别会议，讨论北京政府外交部所提收回上海会审公廨问题，决定以扩展公共租界为中国收回会审公廨之条件，要求将自靶子路以北，河南路、黄浦江及虹口公园北界以内之一段，划入租界范围。

△　旅京江西同乡会因该省督理兼省长蔡成勋专卖及勒种鸦片，议定四项办法倒蔡：一、向参众两院提质问案；二、向法庭控告；

三、向府、院请愿；四、组织委员会专办反对蔡勒种鸦片。

△　胶澳督办高恩洪以青岛电话局向日商押借日款100万元，25年为期；除以50万元直接拨充驻青岛海军费外，余额汇吴佩孚。高此举引起舆论攻击。

△　全国地方自治协进会联合会在南京成立，程克为会长，孙丹林、黄以霖为副会长。

3月31日　西江联军黄绍竑、李济深、郑润琦合围都城桂军刘玉山部陈天太第三师，陈部被缴械。残部数百人由都城西南方突围，逃至粤桂交界之大阪山附近。

△　杨树庄率海军陆战队抵金门，扬言将攻厦门，臧致平一面派方声涛等向杨疏通，一面布防。

△　北京政府内务、司法、外交三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对外国在华教堂不动产，可承认其永租权。

△　上海大学决定组织平民学校，是日召开筹办平民教育大会，邓中夏阐明提倡平民教育的必要性。公举卜世畸、刘华、王秋心等八人为委员。参加平民学校工作的师生有41人，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

3月下旬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制定农民运动计划，规定分别组织自耕农协会、佃农协会、雇农协会、农民自卫团等农民团体，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农民联合会，举办农民夜校、农民短期学校、农民讲演团，积极开展农民运动。

△　苏联代表鲍罗廷电孙中山，说明与北京政府交涉破裂之经过，请国民党注意。孙复电谓，北廷不能代表中国，须待合于民意之政府成立后，中苏方能提挈进行。

4月

4月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复苏联代表3月25日照会，略谓：一、王正廷系奉大总统令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并无可使贵代表臆定中国代表有签字之权。王与贵代表原系协商性质，非正式谈判；二、中国政府认为贵代表限期签订之举，实有未当；三、贵代表所称有他国出而阻挠中俄恢复邦交一节，与本案毫不相涉；中国政府对中俄协商方针，不容任何外力干涉；四、关于所签之件，贵代表曾认为协定草案之预稿，倘贵代表不允商议修正，而回复王督办谈判以前之原状，则可证明延宕之责者为苏俄而非中国政府；五、草约预稿内关于各项修正之三点予以贯彻，中国政府即可准备核准签定；六、承认可以王、加协定为基础，将中国所争三点参照修正，或附加换文声明，则自可恢复中俄邦交。

△　驻京英、法两使分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不同意召开关税预备会议。法使并声明金法郎案如不履行协定，法国决不批准华盛顿会议条约。

△　孙中山召集军事会议，解决西江联军黄绍竑、李济深等与桂军刘玉山部陈天太师冲突之处理办法。翌日令西江联军黄绍竑、李济深驻守原防，所有收缴刘玉山部之枪支悉数发还，所拘刘部游击司令叶式其等即释放。

△　孙中山因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赵士北主张“司法无党”，违反“以党治国”主张，令免赵本兼各职，特派吕志伊继任。

△　上海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青年学社、全国各界联合会等10余团体通电主张速签中俄协定，承认苏联。

△　国会议员叶夏声以苏联代表加拉罕于中苏交涉停顿后，迭与日使芳泽谈判，违反国际惯例，当局竟不予以阻止，特向北京政府提

出质问，唐宝锷等20余人连署。

△　国际联盟第四届大会开幕，北京政府派遣驻意公使唐在复、驻法公使陈箓、驻英代办朱兆莘为中国全权代表出席。

△　孙传芳电委高义为福建陆军第二师师长。

△　广州市政厅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并定6月1日开始抽收铺底捐。商民以此案困商贫民，乃联合商店数百家请善后委员会转请市政厅收回成命。广东总商会亦以此事影响商场，呈请省长取消。市政厅一面布告解释，一面派人向市内绅商婉劝勿反对政府。

△　孙中山重申禁令，严禁奸商承办杂捐，略谓：查军队擅抽杂捐，早经明令禁止，并声明奸商承办者应一体从重治罪在案。至原有各项税捐，自应由各主管机关主持，有奸商敢向别机关瞒承者，事与向军队承办杂捐无异，自应一律严惩，以免紊乱财政。

△　国民党创办中央通讯社，在广州正式成立。

△　山东地方自治促进会在济南开成立大会，到80余人，通过简章，规定加入者暂以议员为限，推宋传典为委员长。

△　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局参赞朝冈健到上海，拟以庚子赔款182万元与中国合办研究所、图书馆等。5日，朝冈健及教育参观团30余人到北京。

△　顺直省议会通电改组为直隶省议会，与原兼领之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四特区分别独立。

△　京兆区议会正式成立。

△　武汉贵州学生会印发宣言，分发黔省旅鄂各界人士，呼吁驱逐滇军，实行黔省自治。并电云南省长唐继尧，请率师回滇，听任黔

省自治。

4月2日　　驻京法使傅乐猷致牒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汉口租界如有变更，须先得法国同意；若中俄自行解决，法国决不承认。

△　北京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速偿临城劫车案损失35.4万元。

△　曹锟令准免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马联甲之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职，以倪朝荣继任。

4月3日　　戴季陶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第七次执行会议上提议搜集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及社会思想等各种文献，上海、广州各备一份总目。孙中山同意，并允拨5000元作为开办费。

△　唐努乌梁海副盟长达克丹通电主张唐努列入中苏交涉事项，略谓：外蒙地方范围之解释，中、俄观念向不相同。中国所谓之外蒙系包括唐努而言，俄人则反是，竟将唐努归为俄国领土。外蒙曾提出唐努归蒙之要求，俄人予以拒绝。此次对俄交涉，务必将唐努特别提出。

△　曹锟特派齐燮元兼任督办导淮事宜。同日，苏、皖、鲁、豫四省议员丁铭永等见孙宝琦，要求取消该项命令。

△　章太炎复叶德辉书，斥叶反对湘省自治为“甘作谯周”。叶曾寄书章氏，有“湖南费百万金钱，糜百万尸骸者，皆为省宪为之厉阶”等语。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宣布16日召集纳税外人会议，讨论：一、加征码头捐案；二、证券及物品交易所注册案；三、取缔印刷附律案。华人强烈反对，尤反对钳制言论自由之取缔印刷附律案。该案规定，凡印刷报纸、小册、传单、招贴、新闻消息、评论意见等等，须于事前向工部局注册，否则处以300以下之罚金，或三个月以

下之监禁。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就工部局增收码头捐案指令交涉员许沅向工部局提出抗议。

△ 张孝若抵横滨，考察日本纺织业。张于19日回国后，在南通发表《关于日本纺织业之报告》。

4月4日 曹锟令准内务总长程克呈请续行《修正义赈奖励章程》。章程第二条规定“凡捐助义赈银一万以上，或经募五万以上者，应由内务部呈请特奖”。随后，北京政府根据该项规定发表大量简、荐任职衔之官员，无异变相捐官。

△ 曹锟任命刘眷藩为四川暂编陆军第十师师长。

△ 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创办十七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题为《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的演说，指出民权主义包括“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 孙中山令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通令各军，一律禁止设卡抽费。

△ 臧致平在同安召集杨化昭等开军事会议，讨论对付周荫人进攻方略，决定在同城附近掘壕筑垒，以杨化昭旅守中路，张贞部叶旅及闽军五、六两团为左、右翼。6日，周荫人、高义、张毅进驻水头，向马巷、同安进发。9日，周部前锋抵达苏厝山下，力攻同安不下，战争亘六昼夜。

△ 北京外交团议决，对关税会议问题采取推延手段予以拒绝。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又照会使团促开关税会议。

4月5日 孙中山任命湘军六将领：方鼎英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张辉瓒为第一军第九师师长，戴岳为第二军第二师师长，谭道源为第三军第三师师长，王得庆为第三军第六师师长，吴家铨为第四军第四师师长。

△　湖北随县土匪刘心惠在应山平林抢劫，全镇被焚145家，占全镇三分之二，损失近30万元。

4月6日　　孙洪伊抵洛阳晤吴佩孚，谋议由孙组阁事，吴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　沈鸿英军邓右文部由道县进攻陆荣廷部，进占灌阳，翌日克文市，陆部由全州、兴安退向桂林。

△　上海卷烟同业公会决定先行复业，特税问题经总商会调停，官厅许以四折半计算解决。

4月7日　　孙中山趁洪兆麟部赴闽南，下令东江各军总攻陈炯明。各军遵令分三路长驱直进：中路湘军宋鹤庚第一军及滇军攻博罗，右路刘震寰桂军攻樟木头，左路湘军陈嘉祐第六军攻响水、龙门。

△　曹锟任命周荫人为帮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

△　蔡元培为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用途问题，在伦敦访晤英工商大臣韦伯夫妇、内务大臣亨特生夫妇及中国驻英代理公使朱兆莘，并与留英学生退款兴学研究讨论会讨论退款用途意见七条，主要为：设科学博物院；补助著名大学及专门学校，作建设扩充生物、纺织、机械、化学、医学、农林学等特种学术之用；各大学设立研究英国文化机关，派遣大学及专门学校教员与毕业生留英研究；交换教授。

△　湖南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吁请一致督促北京政府迅予承认苏联，并要求对英、美、法、日等国按苏联先例收回领事裁判权，撤销协定税制及一切不平等条约。

△　洪兆麟抵汕头，次日赴闽边督师。

△　议员唐宝锷、叶夏声赴洛阳为孙宝琦内阁向吴佩孚求救，力

言内阁不宜动摇。吴表示迭次对中俄交涉案等所发各电，系对一二阁员而言，不但无关孙宝琦，且不涉及其他人，请速促孙销假。是日，孙宝琦销假视事。

△　苏、皖旅沪同乡集会，反对北京政府任齐燮元为导淮督办。谓："赞成导淮民办或官督绅办，不赞成带兵者办，因带兵者必就饷于导淮费。就饷犹小，万一移导淮费于内争事大。"

4月8日　　赵恒惕在吴佩孚催促下决定附北，但又恐各方攻击，遂商定避去取消自治之名而行附北之实。是日与吴佩孚代表马济等秘密签定《湘军北归草约》，双方各作如下让步：取消省宪问题，赵允修改省宪与国宪抵触部分；直军驻防湘西，洪江改设禁烟督办，不影响湘军税收。

△　齐燮元电曹锟，主张王正廷协助顾维钧办理中俄交涉。

△　四川熊克武省军龙尚文部由綦江北上，余际唐部攻至江津，谋进窥重庆，是日，黔军袁祖铭下令反攻，夺回江津、南川。熊克武部万余人退入贵州仁怀县。唐继尧为防袁祖铭回黔，即令滇军在坡斗河、綦江等地布防。

△　臧致平部杨化昭旅缩短防线对付周荫人等之进攻，下令放弃小营岭、马巷一带，谋诱周军入同安与之苦战，而令民军乘虚进军泉城、安海，断其后路。同日，周荫人部不战入马巷。

4月9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陆军总长陆锦提议分兵三路接收外蒙，并报告吴佩孚之庞大用兵计划。众人意见不一，未决议。财政总长王克敏在会上以"政令扞格"及财政困难提出辞职。次日，曹锟亲批"勉为其难，勿庸固辞"，退回辞呈。12日王仍以"财政定有方针"为复职条件。

△　曹锟接见内蒙阿拉善旗旗长、郡王塔旺布里甲拉，嘱即回旗

慎选蒙兵，以备接收外蒙。

△　东江陈炯明部因抽调部队援漳，兵力单薄，乃自动退出博罗、樟木头、龙门等处。留杨坤如部守惠州，黄任寰、黄业兴等守老隆、紫金，作潮梅屏障。10日，中路滇军范石生部入博罗，右路桂军刘震寰部占樟木头，左路湘军占龙门。11日右路桂军攻占惠州城外飞鹅岭。

△　上海装订工人2000余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四成。19日，厂方被迫允加工资二成，工人复工。

△　留日私费生联合总会在驻日公使馆学务处开全体大会，到200余人，讨论庚款分配问题，并到驻日使馆质问公使汪荣宝，要求公私费生一律待遇。汪拒绝，发生争吵，以至动武。

4月10日　苏联代表伊凡诺夫致电孙中山，告以拟将中苏交涉案卷携粤进行协商，与广州革命政府先行相互承认。

△　曹锟任命孙震为陆军第二十七混成旅旅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驻京法使傅乐猷，拒绝上月12日关于中东铁路道胜银行法人权利要求之牒文。略谓：道胜银行虽属俄籍，但开办时中国曾出资银500万两，中东铁路之组织与管理委托该银行而受中国总理之节制。俄行纯系俄国之事业，他国无权干涉。如因俄国政局紊乱，该银行已置于法国政府保护之下，对此，外交部曾于1920年向法使署声明不能承认。总之，中东铁路乃中俄两国事业，历来合同均作规定。中国政府依合同行事，不容置辩。

△　吴佩孚在洛阳庆五十寿辰，各方往贺者数以千计。吴趁此举行军事会议，与苏、皖、赣、鄂、豫、陕、鲁七省代表及长江舰队人员密议长江联防事宜，拟以南京、洛阳两处为南北总防区，各设联防总司令一员，由吴佩孚、齐燮元分别担任；另在汉口设置联防总交际

处，萧耀南兼处长，办理各防区联络事宜；并由杜锡珪派出两舰往来宁、汉，以备差遣。会议又讨论川、湘、粤军事及接收外蒙等问题，主张以武力统一全国。

△　萧耀南在督署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湘办法，决定派参谋林其勋赴湘，劝赵恒惕解散省议会，宣布附北；密电长沙、岳阳北军，严防湘军异举，并监视赵之行动；电促赴洛祝寿之陈嘉谟师长迅速回岳布置防务。

△　赵恒惕召集政、学、商、绅各界人士在省公署讨论取消省宪问题。会上意见不一，争吵而散。11日，赵恒惕提出辞职，省议会议决慰留。

△　日本舰队在长江示威，在黄石港撞破民船，溺毙10余人，扬长而去。

△　山东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济南成立。

4月11日　孙中山明令设置法制委员会，派戴季陶、古应芬、曹受坤、杨宗炯、陈国榘、何启丰、陆巨恩为委员，戴季陶为委员长。21日加派廖忡恺、吕志伊、陈融、林云陔为委员。

△　北京外交团因北京政府交通部拟增收各铁路外人运送货物之运费，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　北京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谓：中国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管理权事，须与扩大上海租界、外人增加对市政厅之参预权等问题同时开议。

△　北京国务院裁员，凡非官制人员，一律停发薪水。22日，再下裁员令多道，裁撤参事、秘书、办事及分发甄用人员等230余人。

△　新疆督军兼省长杨增新电请北京国务院核准该省与苏联所订

局部通商条约，废止1920年5月27日在伊犁所订通商条约。17日，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新疆与苏俄局部通商条约》，决交各部会核。30日，司法部函复国务院认为该约可行。北京政府决定待中俄交涉解决后一并办理。

△　孙中山令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查明各省留寓广州之招抚使招募之军队，派出军队前往分别解散，并令嗣后不得在省城招兵。同日，孙中山令豫鲁招抚使赵杰、粤闽湘军招抚使刘毅、抚河招抚使马晓军即行解散在省城所招之兵员。

△　孙中山以中央直辖滇军第一独立旅何克夫部在连江口车站设出入口货捐厂，勒抽军费，激起商民罢市，指令滇军第三军军长蒋光亮转饬所部立即撤销。

△　陈炯明部洪兆麟、尹骥、李云复通电服从北京政府。

△　武汉学生联合会通电警告北京当局，倘犹不速承认苏俄，而充当列强之傀儡，视国权为弁髦，则惟有联合各民意团体，以“五四”对付曹、章、陆之手段作斗争。

△　各地日本领事30余名在北京日使馆会议，日使芳泽、参事官太田参加，讨论：一、保护日人在华工商业及侨民；二、“不正当课税”之对抗办法；三、对“满洲方面之意见与要求”。17日会议结束。

4月12日　孙中山公布手书《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凡25条，要旨为：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建设之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

△　孙中山任命叶恭绰兼盐务督办；郑洪年兼盐务署署长。

△　张作霖召东三省各要员开中俄交涉会议，决定：一、收回中东路管理局；二、松花江航权收回后之对外办法；三、驱逐苏俄共产

党及白党出境；四、封锁俄人共产党机关；五、禁止俄人在东三省秘密结社；六、俄党所占华产，勒令偿还；七、收回中东路附属地之处置法：八、东三省卢布一律收回；九、准俄恢复东三省领事；十、准俄向东三省通商。

△　江西旅京同乡会以江西省长蔡成勋假借筹饷名义开设拒毒局，公卖鸦片、勒种罂粟，派出代表百余人分赴总统府、国务院请愿，要求撤蔡。15日，北京国务院电江西省长蔡成勋将设局贩卖毒品事即日撤销，以顺舆情而重烟禁。

△　印度诗人泰戈尔应北京大学之聘来华讲学，一行六人是日抵沪，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往迎。次日在蒋方震沪寓与欢迎者会见。14日转住杭州。16日仍返沪上。

△　广州举行平民教育运动大会，万余人整队游行。

4月13日　沈鸿英军包围桂林。陆荣廷在城内独秀峰架设巨炮，沈部以东郊斗鸡岗为炮兵阵地，双方炮战激烈。

△　上海闸北各团体为反对以扩展闸北租界为收回会审公廨之条件，在沪组织“国土维护会”。

△　蒋光亮在佛山抽出入口货税，船渡费加二成，印花税加二成，爆竹印花加四成。是日佛山罢市抵抗，派代表至省谒孙中山，请饬蒋取消苛捐。

4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孙中山主持，决议准谭平山辞去常务委员一职，专任组织部工作，由彭素民接任常务委员；准林祖涵辞农民部长职，调办汉口党务。

△　苏联驻华副代表德夫金携中苏交涉全案离京回莫斯科报告。15日，途经哈尔滨晤哈特区长官朱庆澜，希朱促成中苏会议。

△　湘军谭延闿部克复河源，陈炯明部陈修爵、李易标及黄业兴军纷纷向古坳及石公神墟退走，据险固守。

△　瞿秋白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会议上提出组织委员会编辑《列宁文集》。戴季陶修正为先全力编苏俄法制全集，然后编《列宁文集》。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等以单独编译上述两种，范围过狭，乃于5月10日以上海执行部常委名义，呈请中央批准设置国民党图书室和编辑丛书办法，编辑政治、经济著作及俄、德、法、美等国革命及各弱小民族反抗运动之历史等。

△　直隶省议会讨论北洋大学学生要求撤校长冯熙运案，结果一致赞同撤冯。

△　平民教育四川分会于成都成立，选杨伯钦等12人为董事。

4月15日　孙中山复电东江前敌右翼代总指挥、滇军第七师师长李根沄，勉其鼓励将士先攻下惠州城。

△　北京政府陆军部卫兵李义元前于10日至使馆界欲登城墙游览，遭巡捕驱逐，发生互殴，事后被陆军部笞责。是日又登城堞与英人康培尔斗殴，被英兵捆交使馆界巡捕房。英使麻克类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严重交涉。翌日，北京政府陆军部派员向英使道歉。同日，驻京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李义元案提出抗议；英使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观审与赔偿；意使亦致函要求观审。17日，美使要求告知审讯办法。

△　长沙举行军事会议，主席赵恒惕，唐义彬、贺耀组、刘铡、叶开鑫、唐生智等出席，讨论：一、修改省宪，使不与国宪冲突；二、改编军队，将非正式编制之军队一律裁撤；三、民政以省务院为枢纽；四、组织资政院。

△　福建帮办周荫人军配合张毅部突破臧致平军防线，进至同安

城西南截断同美汽车道。是日，杨化昭部在血战数日后终因弹械不济被迫退出同安。同日，民军杨汉烈由溪尾攻泉州，陈国辉由官桥攻安海。周荫人不等其逼近即调大部队反击，杨、陈与周军激战二日，因其他民军不及应援，遂即败退。

△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五届年会，张公权主席，各省代表30人参加。会议连日讨论币制、公债、银行共同利益等各案。

4月16日　征讨陈炯明之滇、粤、桂军15日合围惠州城后，是日分兵攻淡水。陈炯明部钟景棠、练演雄等部由淡水败退平山。

△　驻京法使傅乐猷致牒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法国尚未承认苏俄，凡中国与苏俄缔结关于华俄银行及中东路之条约，应商诸第三方面。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印刷附律后，上海商界及出版、印刷、报业、书业各界激烈反对，一面函请纳税西人协同力争取消该案，一面由工部局华籍顾问四人向工部局总办磋商。是日，纳税外人特别会议开会，讨论印刷附律等。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根据各公团函电饬交涉员许沅征集材料，以便向外交团交涉印刷律案。

△　杨树庄部两舰驶入厦门港，臧致平军退往漳州。

4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彭素民为农民部长，通过组织部所提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工作分配案，工人部所提《工人党团组织通则》和组织广州市青年工人俱乐部案。青年工人俱乐部设电影部、音乐部、书报部、工人产品陈列所、演说室；附设青年劳工夜校由宣传部派员负责教授及管理。

△　臧致平部第三旅旅长李崇寅自称奉孙传芳命任保安司令，镇慑厦门，收编闽军。杨树庄以未接命令为名拒绝，当即下令开炮轰

击。当晚李请降。18日，李部千余人全被缴械。

△　孙中山令“江顺”等四舰轰击惠州城陈炯明军。

△　王克敏再次请辞财政总长职，曹锟慰留。

△　北京外交团密议：一、列强在华联合组织三大舰队，分区驻防，第一舰队任辽东、直、鲁沿海警备；第二舰队任长江一带警备；第三舰队任浙、闽、粤三省警备；二、各地领事征集精壮外侨组织商团。

△　奉天教育会通电倡议向日本收回教育权，略谓：“日本在旅大所设之公立学校，提倡中国女生裹足，不准中国教员讲爱中国。故学生毕业，但知有满清、有日本帝国，而不知有中华民国。”

4月18日　北京国务院为众议员李燮阳质问陈宝琛、郑孝胥串同清室盗卖历代古物事咨复众议院，略谓：内务部已决定阻止清室盗卖古物，已咨行清室内务府，非经核准均不得随意售卖移运，并令有关当局查明陈宝琛变卖古物事。

△　孙中山令免赵士觐两广盐运使职，以邓泽如继任。

△　与臧致平联合之杨化昭部3800余人由灌口退至漳州，洪兆麟由云霄进迫，至距漳州15里处与臧军发生战事。臧军向南靖撤退，以杨化昭部断后。次日，洪部入占漳州。

△　直隶省议会推派代表六人会见省长王承斌，要求：一、撤去监视北洋大学之武装警察；二、撤教育厅长张谨职；三、撤换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以平息北洋大学学潮。

△　上海20余团体假商务印书馆集会欢迎泰戈尔，由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持，中、西、印约1200人参加。泰戈尔在欢迎会上发表《东方文明的危机》之演说，呼吁勿再迷信西方之物质文明，而忽视东方

之精神文明。

△　顾维钧与驻京英使麻克类在外交部会晤，顾允将丰台殴白赛尔案之军人陈国贤重审，并许英方派员旁听。6月23日，北京军法裁判处以被殴洋人不能指认陈国贤，故认陈无殴打洋人实据，判决陈无罪释放，即由外交部转告英使。

4月19日　豫军樊钟秀部奉孙中山令，自北江、南雄开往江门，参加两阳之战。由于西江南路陈炯明部图占罗定以扑都城，而沿西江直下，威胁广州；而西江联军形同割据，去年授第四军军长梁鸿楷以南路总指挥，令其进攻两阳，梁按兵不动，而五邑财政不容当局过问，孙遂派豫军前往。次日，豫军抵江门。西江联军力挡，以防豫军强进，并要求孙中山收回调樊南征命令。时东江杨希闵又请孙中山檄调豫军参加右翼，联同西路军进攻海陆丰。孙中山乃于23日令樊调先头部队回省。

△　孙中山电惠州陈炯明部招降，表示陈部苟能悔罪输诚，本大元帅必予容纳。

△　曹锟特派直隶省长兼督理直隶军务善后事宜王承斌、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郑士琦、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张福来、山东省长熊炳琦、署河南省长李济臣会办各该省汽车道路事宜。

△　曹锟任命张俊峰为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

△　北京国务院清理欠薪事务处成立，各部均派员列席成立会。

△　北京政府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召集内蒙六盟王公开蒙事会议，决定分旗添练劲旅，以便将来接收外蒙。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令警察厅将李义元自使馆界巡捕房领回，并允许英使观审。但又恐招致外人干涉司法之责难，决定将该案交付大兴县办理，以便符合清末中英、中美等条约中“地方官与领

事会同办理”之规定。

4月20日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组织部长李大钊，秘书蔡和森；宣传部长马叙伦，秘书邹德高；青年部长于树德，秘书邓飞黄；工人部长丁惟汾，秘书张昆弟；农民部长谭仲逵，秘书张伯根；调查部长王法勤，秘书潘云超；妇女部长褚松雪，秘书缪伯英。即在北京织染局二十九号租房一处办公。

△　班禅喇嘛受英人和达赖之夹迫，率亲信及卫兵百人离藏赴京。

△　废帝溥仪召集近支王公内府各大臣会议，应付国会提案取消帝号及优待条件办法。

4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广西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成员：施正甫、李丹山、苏无涯、蒙卓凡、李济深、马晓军、吴兴、许绍奎、陈季川为执行委员，黎工佽、陆涉川、雷在汉、徐启祥、李天和为候补执行委员。

△　孙中山任命郑洪年兼广东财政厅厅长，邓泽如为财政委员会委员。

△　许崇智偕蒋介石由沪抵广州。孙中山以江门问题交许解决，并令许统率粤籍各军进攻南路之两阳、高雷。

△　奉天《东报》对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问题态度激烈；又因支持奉人收回南满沿线教育权甚力，与日人《盛京时报》针锋相对。是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船津谒张作霖，要求惩戒《东报》，又至交涉署抗议。东北当局于24日勒令《东报》停刊数天，报界大愤。30日，该报复刊。

△　中国青年党在巴黎召开首次全体大会，李璜等52人到会，选举曾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子柱、何鲁之、李荫侬为委员，

何鲁之为内务部长，李璜为外务部长。

△　参议院议员籍忠寅、胡源汇等组织之宪治社在北京成立。该社以研究系为基础。

△　北京政府司法部对上海会审公廨主无条件收回，咨外交部向外交团严重交涉。

4月22日　　在京国会议员胡鄂公等248人集会议决：通电抗议英国公使非法拘捕李义元，电请英政府召回英使，并要求英使道歉。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临城劫车案赔偿损失问题复北京外交团领袖荷使欧登科，请转关系各国：共组委员会调查损失。

△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中国科学社等教育学术团体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开会，讨论日本外务省拟以庚子赔款合办中日文化事业问题。27日，发表联合宣言，主张中日设文化事业理事会主持一切，理事人数中日各半，理事长一人由中方担任，否则决不参加合办。

△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发表闭幕宣言，希望速开关税会议，整理财政。

△　上海对日本外交市民大会通告各省团体：定于5月7日至5月9日联合各界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并建议全国一起举行。

△　奉天省教育会召开临时会议，抵制日本历年在“满铁”沿线设立学校，招收学生，实施殖民教育，决定组织收回教育权委员会。28日该委员会成立，定名为研究外人对华文化委员会，冯子安、张镜玄为正副委员长，分设总务、调查、研究、宣传四部进行工作。

4月23日　　孙宝琦在参议院宣称：维护宪法，进行和平统一。并表示处理中法金法郎案交涉，当尊重国会意见办理。

△　齐燮元派代表谒顾维钧，主张允许美商在苏州设无线电台，以导淮借款作为交换。

△　吴佩孚第八次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速筹中俄交涉办法。

△　沈鸿英军邓瑞澂部在桂林城外象鼻山架设重炮，向城中射击，居民中弹者甚多。30日，旅粤桂人通电呼吁沈军勿用开花弹轰击桂林城，并请网开一面，使敌人勿作困兽之斗。5月3日，邓电复旅粤桂人称："昨已让出利泽门、西门两路，促其（陆荣廷军）速退，然彼方仍欲死守待援，毫无退意。"

△　东江左路湘军第五军陈嘉祐率十五旅进占回龙，陈炯明军分两路退义合、南湖等处。24日，陈嘉祐部在回龙被黄业兴、李易标部包围，损失千人、枪700杆，后得宋鹤庚部由河源移师赴援，始将黄、李部击退。

△　英商韦德培违章冒挂汽车牌号向邮局取件，因漏税而殴伤警察刘奎元。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使：审办韦德培时，我国将派员观审。6月25日，驻京英使审判，仅处韦以25元之罚金。

△　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行在蒋方震、徐志摩等陪同下由上海至北京，梁启超等在车站欢迎。泰戈尔在北京讲学、访问计28天。5月8日胡适、梁启超等为其64岁诞辰祝寿。

4月24日　孙中山函吴忠信称，俟粤境肃清东江陈炯明叛军后，一面整饬广东内政，一面出师北伐。函谓："皖、奉两系……如能……与吾党合作，则尤为大局之幸。"9月12日，孙中山复派吴忠信为代表，携函往晤段祺瑞。

△　章太炎函复赵恒惕反对修改省宪，略谓：省宪果有不善，则平日自应讨论修改，如处武力压迫之下，以省宪不良为借口，隐示屈服，是不啻城下之盟。

4月25日　决定复职之王克敏，晋谒曹锟，曹谕王先办德国之债票事（按：中国欠德国的债票，欧战起后，按战时通例应宣告无效）；倘关连金法郎案，由其疏通，促王放胆到部。王称正在预备端节费用，俟有成数，即到部。

△　北京众议院通过查办蔡成勋公卖烟土勒种罂粟案及审查议员兼任官吏案。后者规定如有议员兼任文武官吏者，应尊重宪典，一律解职。

△　湖南省政府交涉司长杨宣诚偕外交部秘书熊垓至日使馆，与日参事太田交换解决长沙“六一”案意见。太田态度强硬，并谓“六一”事件系中国排外所致，中国不将此种原因除去，日本不能开议。杨答若日本取消“二十一条”，则排日原因自即消除。太田语塞，始允将“六一”案与其他中日间各悬案同时解决，俟向日政府请训后，再行开议。5月19日，杨宣诚因日政府久延无结果而回省。

△　吉林督军孙烈臣病卒。27日，张作霖委张作相继任。

△　孙中山令滇军军长蒋光亮停止抽收芳村、花地等处筵席捐，略谓：省河水陆筵席捐，既经指定全数拨充省市教育经费，而芳村、花地等处均在原定承抽区域之内，自不能另由滇军招商揽收，致妨教育。

4月26日　孙中山令饬各军不得加抽盐斤附捐，即日撤销所设之抽收机关，以恤商艰而维正税。

△　蒋介石到黄埔军校视事。

△　北京国务院会议通过试办京师警捐案，规定根据北京14万户居民之房价多寡，每户每月征收警捐一角至15元不等。北京各界闻讯纷纷反对，众议院亦认为此举违反宪法。

△　臧致平自溪口出发至连城，并令何成濬赴连城合攻汀州。28

日，臧、何于连城会合。

4月27日　吕烛庆等发起之藏事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临时主席徐曾在成立大会上报告称：现川事已渐底定，而班禅已由藏北来，发起此会拟催促利用此机迅速解决藏事，并促民众注意，借为外交后援。

△　北京外交团会议提出川、湘战事外侨“损失案”，计220余万元，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请速“赔偿”。

△　讨伐陈炯明之湘军扫清锡场北岸之敌，总指挥宋鹤庚率第二、三、五军渡新丰河。陈炯明部6000人分扼各险要，湘军屡攻不克。5月2日，湘军组敢死队冒枪林弹雨进攻，午后占领新丰河北岸陈军阵地。

△　江苏松江各团体500余人举行追悼列宁大会，恽代英等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致电加拉罕，请其南下与广州革命政府缔结邦交。

△　北京市民具呈北京政府内务总长程克反对警捐，要求提前成立自治会。

4月28日　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柏文蔚被控案。柏文蔚谓自己对政治无多研究，向未主张联省自治，以后当然亦不主张。孙云：“只要以后服从本党的主张，柏案就算了结。”

△　曹锟任命赖心辉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四川边防军司令，杨春芳为四川陆军第四师师长。

△　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布执监委员选举结果，吴铁城、孙科、潘歌雅、马超俊、陈其瑗、黄季陆、罗迈、陈兴汉、方瑞麟当选为执行委员，赵锦雯、阮啸仙、伍智梅、曾西盛、邝达生为候补执行委员；黄隆生、刘芦隐、陈树人为监察委员，张民达、林云陔、邓演达为候补监察委员。

△　刘震寰桂军及滇军二、四、五、六、七各师总攻惠州。杨希闵亲往督战，中午占馒头岭，猛攻西门，战事甚烈。29日，联军用地雷炸惠州西、北二门。30日续攻，陈炯明军杨坤如部坚守。

4月29日　曹锟派颜惠庆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蔡廷幹、杨晟为副会长。

△　张学良代张作相为第二十七师师长。

△　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王承斌电曹锟辞职。

△　中日青盐会议双方因盐价主张不一，又因日方要求中方提出永裕公司之组织内容及一切关系文件，中方认为此系农商部所管事务，非盐务署可以干预。日方认为无诚意，会议遂决裂。

△　齐燮元通电声明并无将借美款，以允许美国费德拉公司在江苏设立电台作为条件之事。

△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纸烟特税问题。顾维钧以此事因英、美公使迭提抗议，询问财政部能否废止。财政部次长苏锡第认为，各省征收该项特税，系由吸者负担，与英、美烟商无关。讨论无结果。

4月30日　驻美公使施肇基电告北京政府，称美政府抗议中国各省征收纸烟特税，并称“如无法制止，恐影响二五附加税”。

△　北洋大学学生200余人到北京教育部请愿，要求：一、撤换校长冯熙运；二、被开除之同学全部回校。教育部司长范鸿泰接见，劝先回校，教部当尽力调停。学生以教育部无具体办法，拒绝回校，夜宿教部礼堂。

△　上海闸北水电厂官商争办多年，是日双方订立合同，划归商办。

是月　　北京政府交通部京绥路局与日本三井物产会社成立“京绥路三井扬子借款”4.474948万元，年息一分二厘。

△　同益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兆宛平县成立，资金30万元，先招股10万元。董事王治记、夏郁峰等。

△　同润钱庄总庄在天津设立，董事长王伯元，总经理裴云卿。

△　泉元记股份有限公司在厦门开设，从事营造或转运中外物品，资金银90万元。董事蒋报察、蒋以守等。

△　国会议员王迪成对英、日、美设无线电台交涉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略谓：一、我国海外电报交通原与英国大东、大北两公司订立合同，专用水线通报，并明文规定于1930年以前，不准陆上电局与日本及欧美各国通报。何以1914年及1918年先后与英国马可尼公司订立在西北一带建筑内地交通无线电台三处，又许以将来设置无线电台之优先权；1918年又与日本三井物产会社订立合同，在北京附近建筑无线电台，并许以30年专利权；1921年又与美国费特拉公司订立正、附合同，于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处建筑无线电台，引起国际纠纷；二、中、美无线电合同及英国马可尼公司两次借款约国币3400余万元，除实用建筑费外，其盈余之数约一千数百万元，究拨作何用。连署者有廖宗伯、胡鄂公等30人。

△　商务印书馆向北京政府请准筹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400部，已装箱准备启运上海影印。因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索贿未遂，由国务院电令内务部阻运。

5月

5月1日　　广东各界举行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同时开幕，与会代表及旁听工人一万余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廖

仲恺主持。孙中山在会上演讲《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指出：中国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所以中国工人要对外国资本家去宣战，打破外国经济的压迫，解除条约上的束缚。中国工人要学习英国、俄国工人的好榜样，奉行三民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全国的指导，做国民的先锋。会后万人游行，沿途高呼“参加国民革命”等口号。

△　上海工人八万余集会庆祝国际劳动节，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等莅会演讲。

△　南越华侨总工会成立，以谋互助团结及增进华侨工友福利为宗旨。

△　安源工人二万多人示威游行，纪念“五一”。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马队一排，印捕、西探37人，荷枪实弹随同泰利洋行大班白兰特越界拆毁宜乐里房屋，驱逐房客并击伤二人。3日，又越界拘捕宜乐里房客联合会代表冯明权。

△　征讨东江陈炯明之联军右路黎鼎鉴、廖湘芸等部由深圳、平湖进攻淡水，陈炯明部练演雄率兵2000余人取道淡水左侧，偷渡沙头角、横岗，直趋深圳，陈部钟景棠亦由淡水向深圳反攻。2日，陈炯明部攻下平湖。3日晚，黎鼎鉴部、滇军第三军一部、豫军樊钟秀部克平湖。4日，联军在深圳与陈军激战，陈军纷向横岗、沙头角等处退却。5日，联军克平湖、深圳一带及广九路车站。

△　北京参议院院会决议：凡兼任政府官吏之议员，视为非法，概予取缔之。

△　陇海铁路观音堂至陕州段48公里竣工，通行客车。

5月2日　　广州各界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参军长张开儒代表孙中山致祭。晚，孙中山、廖仲恺在岭南大学为史坚如烈士像揭幕并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发表演说。廖称：史坚如与七十二烈士均为我民国先驱，史烈士“实在是一个大智，我们应在大智之下，低首下心，以他为模范”。孙中山称：“纪念烈士们以死唤醒国民，为国服务的志气”，“希望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

△ 曹锟任命王秉钧为滇军第三师师长。

△ 冯玉祥因既无地盘，又欠饷17个月之久，继王承斌后又向曹锟辞陆军检阅使职，曹慰留。

△ 因受英国勾结达赖夹迫离藏之西藏班禅喇嘛经新疆到甘肃，表示决赴北京请援。曹锟令派李迺棻为迎护班禅专员前往迎护；又派达寿会同蒙藏院准备招待。

5月3日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 北京国务院会议，顾维钧报告驻京英使麻克类迭次照会外交部，催问李义元、陈国贤案办理情形，议决催促主管机关迅速办理；程克提出增设专管户籍、国籍机关案，决交内、外两部先拟办法再议；孙宝琦报告直隶各团体挽留王承斌文电，议决由秘书厅分别函慰直隶各团体。

△ 驻京美使舒尔曼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美国维护各国在中东铁路之利益，警告中国勿缔结取消外人利益之片面条约。法使傅乐猷亦于7日以同一内容致牒外交部。

△ 王承斌再次电曹锟辞职。6日，曹慰留，允王改请病假10天。

△ 中美通讯社披露，英、美、法、日四国驻京公使秘密组织四国委员会，凡有重大之共同事务，均由该委员会处理，然后提交外交团全体大会。该委员会已就中国外债整理及旅华外人保护等问题会商两次。

△　上海《新闻报》载文揭露日本自上年9月1日东京、横滨大地震后，正发动“移民中国大陆”论，志在侵我满蒙，惊呼：“中国大难，已在目前”，“愿国人深戒慎之。”

△　北京政府航空署规定英国国际航行飞机过境临时办法，并电令各处交涉员分别保护，协助招待。法、美国际航行过境，亦将照该项办法招待。

△　山东省长熊炳琦奉吴佩孚令咨郑士琦派两团前往青岛，将驻青岛附近招安之孙百万匪军包围缴械遣散。

5月4日　　广州大本营令樊钟秀部受第一路军杨希闵指挥，开往平山进攻陈炯明部，肃清海陆丰沿海地区。

△　南京学生会举行纪念“五四”大会，杨杏佛演讲《学生运动之过去与未来》，呼吁学人展开救国运动。

5月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农民部所提《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案》。提案略称：农民运动实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亦为吾党当前重要的问题，应有充分的研究及神速的进行，故提出组织斯会。该会辅助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进行农民运动，委员除由农民部全体加入外，必须经农民部之介绍，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任命。农民部并提出聘请法兰克为该部顾问及介绍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法兰克参加农民运动委员会案，亦经会议通过。

△　曹锟因清室图谋售卖古物，派冯玉祥、颜惠庆、程克、蔡廷幹、薛笃弼、薛之珩、聂宪藩等10人为保存国有古物委员，会同清室所派人员共筹保管办法，规定除金银珠宝属于溥氏外，其他作为国宝，不许出售。

△　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350人入校，编为第一、二、三队；7日，备取生120名入校，编为第四队。军校对学生施以革命训练，军

事与政治教育并重，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奠定基础。

△　众议院议员廖劲伯以张志潭前在交通总长任内，于1921年7月利用国会中断期间秘密签订中美无线电借款续约，债额增多几近两倍，折合国币2600余万元，不惜将交通部全部财源作为抵押，丧权误国，借以自肥，特向众议院提出查办案。

△　众议院议员林绳武、林树椿等以财政总长王克敏违反院议，阴谋承认金法郎案，营私卖国，向众议院提出不信任案，要求将王免职。

△　德华银行总理斐格至京，商办德债案。

△　广州船商拒绝航运保卫处征收省河加二军费，轮渡一律停驶，省城与各乡交通断绝，百货停滞。

△　驻京日公使芳泽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长江各地正在筹划5月7日举动，请电地方官禁止。北京政府即通令全国，严禁人民召开“五七”、“五九”国耻纪念会。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准夏鸣复请辞代理加拿大总干事及《晨报》总编辑职，由何葆仁继任；补助北京《民生周刊》、汉口《大汉报》、太原《晓报》；接收《香港晨报》为党报，黄应公为总经理。

5月6日　曹锟令准杨树庄兼摄闽口厦门警备司令。

△　曹锟任命郭汝栋为四川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何金鳌为第二混成旅旅长，白驹为第三混成旅旅长。

△　曹锟任命孙润宇继易宗夔为国务院法制局局长。

△　北京政府教育、交通二部委任朱炎为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

校长。

△　北京农业大学自去冬起，因校长问题发生暗潮，后教育部派沈步洲为校长，学生分赞成、反对两派，4月4日曾争执动武。是日，沈步洲偕多名武装到校，学生与之辩论，沈即授意左右动武，伤多人，激起学生公愤，遂即开大会，议决起诉，并发表宣言，宣布沈之罪状。拥沈教员同被驱逐。

△　北洋大学学生为撤换校长事在北京教育部礼堂坚持斗争，是晚开会决定，非如愿以偿，不出部门。京中各校学生相继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警告当局勿任意摧残学生。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在中央公园招待北京新闻记者，一致声援。

△　臧致平军杨化昭部及何成濬部占领汀州，直军王献臣部700余人被缴械，蔡成勋部千余人亦几全被缴械。王部向赣边瑞金溃退。臧、杨及何所部获弹极丰，即趋上杭。22日，何部经武平入赣之寻邬、虔南抵粤东和平县，与湘军联合。

△　张毅被曹锟委为厦门镇守使，是日电海军杨树庄要求移交厦门。8日，杨树庄下令厦门特别戒严。13日，厦门商会及各团体发表宣言拒绝张毅去厦，略谓：张毅在漳，苛派义捐多至10余万，漳人痛苦难言，一旦抵厦，恐其行诸漳州者施于厦，故坚决拒绝。

△　沈鸿英以陆荣廷之援军陆福祥、谭浩明等师距桂林仅数十里，乃于是日在将军桥开军事会议，变更作战计划，以全军十分之三兵力围桂林，十分之二兵力防御马济由湘入桂，十分之五兵力向柳州方面进攻，截断敌援兵后路。

△　广州大本营财政部布告撤销广东航运附加军费，航运保卫处同时撤销。布告发表后，船商即照常营业。

5月7日　　北京各校学生上街纪念“五七”国耻，政府密派军警分

赴天安门及北大、法大、中大、医大、工大、师大、朝大各校戒备，阻止学生出校。下午1时半，东、西长安街聚集学生达8000人，手执“勿忘国耻”等小旗。军警用武力驱散，受伤、被捕多人。各校学生旋赴师大集会，议决以北京市民“五七”国耻纪念善后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历述军警打伤、逮捕参加国耻纪念集会群众惨状，表示抗议。

△　天津各界民众二万余人在南开大学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一致通过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反对外人观审李义元案、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项要求。会后游行。同日，南昌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会后1.3万余人游行。

△　留日学生数百人在东京集会并游行，慷慨悲歌，要求日本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　上海南洋、中国、同济、复旦、东南等大学学生决议从经济上、舆论上支持北洋大学学生。南洋学生会、东南学生自治会各汇款百元支援。8日，中国公学学生每人捐款一元，并电慰北洋同学。

△　驻美公使施肇基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美国会已通过第二次退还中国庚子赔款本利合计1254.5437万元。

△　黎元洪偕其夫人在日本游历各地后自门司乘船回国，10日到天津。

5月8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讨论北洋大学学潮，决请王正廷从速代为调解。旋张国淦与王正廷商议，派代表赴津见王承斌，磋商解决办法。

△　曹锟任命孙宗先继郑士琦为陆军第五师师长。

△　曹锟任命傅铜为西北大学校长。西北大学已于1月间成立。

△　众议院议员李有忱继林绳武等之后，又对财政总长王克敏提

出不信任案，谓王虽屡上辞呈，但仍进行金法郎案与德发债票两事。金法郎案绝不能承认，而德发债票一经办理失当，贻害国家非浅。

△　孙中山严令各军长官约束所部，不得包庇设赌，以清祸害。

△　张作霖接受奉天地方爱国工商界自办铁路的要求，宣布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任命王永江为委员长，下令筹备修筑开丰（开原至西丰）轻便铁路和奉海（奉天至海龙）、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

△　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决议设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部长担任会长；并提出："商团不得干涉工会事情及有侵犯工人自由之事"；"凡属工人不得充当商团军，一经查出即行驱逐出境"；"如商团压迫工人时，凡加入工代会之工会及工人须一致对付并援助"；"工人得组织工团军自卫"。11日闭会。

△　北京国务院会议议决：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大学合办之湘雅医校及医院合办十年之约已满，准予续办十年。

△　奉天省立各校校长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收回日人在南满铁路沿线所办之公学堂，改为各该地方之中国国民小学校，所用教科书及教授法、训练法，均应按奉天小学校施行规则办理，校长及教职员应由奉天教育厅遴选任用。日本南满铁路公司表示反对。

5月9日　　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代表。同日，南堤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

△　孙中山任命何克夫为中央直辖第一混成旅旅长。

△　孙中山以虎门威远、沙角两炮台借口伙食不足，擅向往来货船勒抽费用，贻害商旅，令军政部查明，饬将所收款项退还，并严令以后不得再行滥征。

△　广州铺底维持会在商团第九分团开会，议决通禀各衙署，请取消统一马路两旁业权办法，如无效，即实行全城罢市。

△　上海对日市民外交大会继续举行提倡国货会，到一万多人。下午举行国耻纪念会。

△　济南商界反对熊炳琦滥发纸币，吸收现金筹办地方银行，扰乱金融市场，是日开会议决，由济南总商会、商埠商会、银行公会三团体具呈熊炳琦请取消筹办地方银行成议，以维护商业；否则所发纸币，商号将一律拒绝使用。

△　洪兆麟为进攻恩平、四邑粤联军，委徐汉臣为陈炯明部第二师师长，并派徐乘江门联军内部倾轧，四邑空虚之际，赴阳江收编粤梁鸿楷部七、八两团（按：该两团原为徐之旧部）。是日，徐抵那龙，次日至合山，梁部七、八两团经徐利诱，决意归徐，于11日晚开赴阳江城，经徐改编为两旅，并招募新兵补充。

△　王正廷邀北洋大学学生谈话，说明王承斌已允被开除学生回校上课，校长冯熙运可以撤换，但此属于用人行政范围，学生不能强求，嘱学生回校。学生要求书面保证，王只允以个人信用担保。

5月10日　　江西省议会议长戴秉清等自沪电北京政府请撤蔡成勋，略谓蔡业经国会两次提案查办，旅外同乡迭电呼吁，中外报纸先后宣腾，其是非曲直尽人皆知，政府自当早予罢撤，请当机立断，拯垂危之赣局。

△　陈炯明在汕头召开军官会议，除林虎、洪兆麟、尹骥外，北京政府代表唐宝锷、关澄芳等亦与会。陈认为滇、湘军不睦，孙中山卧病，正是反攻时机。林虎提议拍发赞助统一之通电，请陈炯明领衔，陈婉词拒绝，因陈不愿公开投北，放下联省自治招牌。11日，陈返潮安。

△　湘军左翼一纵队协同赣军李明扬部2000余人向河源西北之新丰县城等地追击陈炯明部。陈军开城伪降，俟湘、赣军入城后，即以3000余人内外夹政。直至14日，湘、赣军始突围而出。湘军总指挥宋鹤庚据报，即调集第一军增援反攻，17日克新丰城。

△　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次照会北京外交团，商洽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事，并驳复外交团前此复牒之要求。

△　驻京法使对中、苏两国自行解决中东路事，再次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

△　全国银行公会第五届联合会议为维持国币币制事致函上海总商会，略谓：年来各省滥铸不合国币条例之银元，上年复滥铸银铺币，打破十进法价；近且发现安徽造币厂之银元，其成色分量均不及法定原额，必至扰乱金融市面，物价腾贵。为保全市面起见，共同议决维持国币办法五条，其主要内容有：请各埠商会、银行公会及中外银行遇有违反币制条例之造币厂，不得代购生银及代售银元；随时调查其铸造数目及检验其银元之成色，登报公告。

5月上旬　广州商人因财政局布告开抽特种药品等捐与发起统一马路旁铺业权，酝酿总罢市，七十二行商会领袖、英商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趁机操纵商界领导权。

△　北京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派馆员裘善元、顾问董光忠在信阳游河镇发掘到大批古物，计王坟洼地方掘得东汉墓一座，获有殉葬陶器及镍币等物；擂鼓台（距镇半里）掘得宋墓一座，获得宋代瓷瓶、瓷碗等物；在该台东部获得刀斧及陶鼎等残片，悉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内多考古家前所未见之珍品。

5月11日　孙中山令许崇智迅即改编各路粤军，统一组织，整顿饷务。

△　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次长罗洪年因无法应付京津各地迭起之学潮，提出辞职。

5月12日　曹锟任命张孝若为驻智利特命全权公使，岳昭燏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

△　广东省教育会等八团体为协助创设广东大学，发布《请争广东关余及欧美各国退回庚子赔款为广东大学经费宣言书》。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曹云祥为清华学校校长。

△　湖南省议会选举李剑农为省务院长。

△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到厦门，召集海军军官会议讨论防守事宜，并调解舰队司令杨树庄与陆战队旅长杨砥中间之矛盾。14日，厦门各界欢迎杜锡珪、杨树庄、杨砥中及各舰长，杜谓：海军决不轻让厦门，厦门由海军担负捍卫全责，不准张毅以一卒至厦。

△　胶澳督办高恩洪组织之青岛地方银行开幕，高自兼总理，隋石卿任经理。高利用东莱银行资财，号召巨商投资，东莱银行商股刘子山不愿被利用，潜行赴京。其他商号亦取观望态度。

5月13日　加拉罕通过华俄通讯社发表关于中苏谈判停顿敬告中国国民之宣言，并严斥美、法等国干涉中苏谈判。

△　曹锟特派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周荫人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

△　曹锟任命常耀奎为全国水利局总裁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委员长。

△　黄居素发起调和孙中山、陈炯明运动，并邀汪精卫、吴稚晖共同进行。黄持吴稚晖函偕陈秋霖至汕头见陈炯明，请重与孙中山合

作，陈以吴函出示潮梅粤军总指挥林虎，林未表示同意。是日，陈复吴函，称“但求对于双方行得通的办法，自无不唯命是听”。

△　湖南沅江县议会电长沙县议会，请求修改省宪。16日，湘省益阳、常德等22县县议会电县议会联合会，促各县一致赞助修改省宪，俟县议会署名足数，即邀省议会署名提案。

△　北京市民组织之“五七”国耻纪念善后委员会派代表高周等12人，持函至国务院质问孙宝琦：“五七”军警暴行，不但剥夺人民爱国自由，且残民媚外，何不加以惩办？被捕者虽已释出，但受伤者究将如何安置？

△　苏淮水利研究会与皖淮水利协会开联席会议，决议：一、赞成费礼门治淮计划，惟必须勘测后进行；二、苏、皖入淮支河宜修浚，工费列入导淮预算中；三、力争美国退回之庚款作为导淮之用，并于14日分电美政府及国会请求。

△　拥戴孙洪伊之“民治社”在北京开会，商讨组织孙洪伊内阁，到王湘、牟琳、王乃昌、李燮阳等40余人。15日，孙洪伊派牟琳等大宴各派议员，助其组阁。

△　捷克斯洛伐克请与中国互派驻使，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中捷尚未订约，复暂缓行。

5月14日　　孙中山派邵元冲、刘芦隐、黄季陆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邵元冲为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

△　北洋大学学生213人回津。王承斌因冯熙运反对，突改变态度，不准第一次被开除之四学生代表回校，并令后开除之学生186人具写悔过书。学生以当局无诚意，决定不回校。

5月15日　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梧州善后处处长。

△　众议院议员胡鄂公、黄功素等40余人为英人进兵西藏事向国务院提出质问：据本月13日报载，英兵已由不丹经猓獩　出波密而达白马岗，欲窥四川。又据川西人民电告，谓英兵已进驻西藏，迫令藏人用英语。查英人谋藏图川之心固非一日，政府对此，事前是否闻知，事后何以应付，限五日内答复。

△　顾维钧宅有人送去木箱一只，诈称箱内皆顾私用物品。25日，顾命仆启视，箱内炸弹爆炸，重伤三仆。

△　“民治社”牟琳、“民宪社”廖劲伯等联合27名议员，柬请各政团重要分子讨论政局。牟琳谓：“近日政府不要国会之存心渐次表现，同人等当觉悟，不为所利用而解体。”

5月16日　北京众议院通过请曹锟令内阁将德发债票案，依法先交由国会核议，政府不得擅与德国缔结关于本案之任何协约。

△　华北运动会在开封举行，直、鲁、豫、晋、陕、奉、吉、黑八省600余人参加。

△　安徽凤阳第五师范学校校长何汇东利用私党，虐待学生，激成众怒，月初全体学生出校。是日，何商请该县知事派卫队三四十人搜挟学生回校，又派卫队捕拿学生三人送监收押。18日后继续搜捕学生共达70人。县教育会及绅、商、学各团体致电泗县等10县各界，指斥何汇东压迫学生，请各团体速派代表来凤会商解决。

5月17日　苏联代表团致牒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取缔白党，略谓：苏联代表团对于满洲当局庇护白党，助其成军，劫掠边境，曾迭致牒外交部请予取缔。中国当局不独未设法取缔，反援助白党愈力，任其欺侮满洲境内苏联侨民。苏联政府已决定改与地方当局直接交涉，但希外交部对前此各次通牒详细答复。

△　北京政府内务部因京师警饷无着，经曹锟批准，拟试办警

捐。是日，北京市二十区市民代表开会反对。

△　江西旅京同乡赴国务院请愿罢免蔡成勋，孙宝琦表示已令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查办。

5月18日　曹锟特派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林虎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叶举为广东省长；任命洪兆麟为潮梅护军使。

△　北京国民对英外交协会电英国工党内阁，要求放弃中英不平等条约，并撤回保守党所派公使麻克类。

△　赖心辉就任北京政府所任师长兼边防司令职，令所部遵袁祖铭所划防区移驻资州、内江。原驻各军即让出驻地，四川各军移防问题解决。

△　山东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济南开成立大会，到会者50余团体二万余人。会后大游行。

5月19日　顾维钧趁苏联代表要求答复取缔白党牒文之机，派外交部参事朱鹤翔与加拉罕商谈恢复中俄邦交问题。加允诺，但提出不得以4月1日中国之通牒为约束，谈判内容要求严守秘密。

△　曹锟令准九江地方自辟商埠。

5月20日　孙中山派罗镇湘为大本营军事委员，准免蒋尊簋中央军需总监职。

△　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行由徐志摩陪同，由北京转赴太原访问，受到阎锡山接见。

5月21日　美国总统柯立芝批准交还中国庚子赔款余额议案，并说明此款作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之用。6月14日，美国国务卿休斯照会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施肇基，悉数退还庚子赔款余额。

△　孙中山身感不适，移居广州白云山养病，大本营事务交由胡汉民代理。

△　京师警察厅饬侦察队于凌晨4时在北京腊库十六号逮捕张国焘及法政大学预科女生杨子烈、彭子均等五人。

△　驻京英、法、意、瑞四使到外交部与顾维钧谈关税会议事，英、法、意三使托辞“华会条约尚未完成”，表示不欲先开关税预备会议。

△　正太铁路工人在工会领导下，怠工24小时，要求路局发10天特别工薪，作为每年红利，结果取得胜利。

△　旅欧华人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法国史太师埠开幕，由蔡元培主持典礼。

5月22日　湖南省议会以驻省县议会联合会派往桃源之谭铁耕、常德之杨云鹤等强求同意修改省宪，且向各县议会勒索旅费，议决请省府查办。是晚12时，驻长沙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郭向阳赴各报馆，禁止登载此项省议会议事录，遭拒绝。23日拂晓，郭又带兵四名赴各报馆印刷厂毁版。24日，省议会通电各县议会，如有胁迫修改省宪之人，就地拿办。

△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参加者13省运动员及马尼拉华侨篮球队，共400余人。总成绩以华北第一，华东第二，华中第三；江苏为各省之冠。24日闭幕。

5月23日　孙中山令准广东革命纪念会主持人林森呈请重振会务。按：该会系民国二年孙德彰、邓泽如等为表彰先烈发起，对革命史料之搜集及保存，颇有贡献。嗣以政变纷繁，会务停止。

△　上海各界推司法改良促进会代表董康、总商会代表赵锡恩等三人赴京分见外交、司法两总长，吁请无条件收回上海会审公廨。

5月24日　长沙各报馆联席会议讨论郭向阳带兵到各报馆印刷厂毁版，禁刊新闻报道问题，议决：一、立即致函省长赵恒惕质问郭之行为是否出诸政府意旨，如无此意旨，应即予制止，否则一致停刊；二、仍将22日省议会之议事录及24日之通电，登载于25日日报。

△　赵恒惕函复长沙各报馆质问，谓郭向阳冒充命令，钳制舆论，殊属不合，已电郭予以斥责。

△　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逝世。

5月25日　北京政府前以英兵侵藏窥川，令驻英代使朱兆莘向英政府交涉。是日朱复电称：英政府不承认英兵有意外行动，谓拉萨所驻英兵，实系护侨，对我要求撤兵一项，仍无明白答复。英称西藏谈判问题，须将威海卫问题解决后方能开始接洽。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日本中华汇业银行借款日金70万元，以盐税余款作担保，月息一分二，用作发放参众两院、教育部、国立八校之经费及陆军检阅使、步军统领衙门、京畿卫戍司令部饷项。

△　长沙美领致函赵恒惕，要求取缔长沙外交后援会。各界甚愤，函请该会据理力争。

△　赵恒惕据叶开鑫电称，湘西土匪猖獗，各路招安军明索暗抢，恳从速改编调离湘西，并令各军不再招安。是日，赵电令各军严切办理。

△　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武昌举行第七届年会，到280人，开会三天。同日，汉口举行第三届全国各省职业教育出品展览会，展品共1.2万余件，为鄂、湘、陕、豫、川、直、奉、晋、皖、苏等11省110所学校之出品。参观人数达11.5万余人。

△　晚，广州市财政局长陈其瑗赴沙面商请七十二行商会会长陈廉伯制止商界罢市，同时发出紧急布告，将统一马路铺业权案缓办，

并派人与商民会商，商民坚持非将该案永远取消不可。

5月26日　广州全市七十二行商界代表议决28日总罢市，以对抗市政厅统一马路业权及抽取铺底捐，并调商团、乡团陆续集中广州。同日，广东省长杨庶堪布告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

△　广州中、西药商借口市财政局所订特种药品捐苛细，一律罢业。

△　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26人离粤赴日，指导员为广东师范学院教授柳金田。除私费生10余人外，每人由日本从退回庚款项下拨给日金500元。

△　孙传芳在福州赴宴归途中遇炸，司机、卫士、副官炸死，卢香亭受伤，孙无恙。27日，省防司令李生春、警务处长张藻宸布告悬赏缉凶。

△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通知该校注册主任傅式说、商科主任王毓祥、教育科主任欧元怀、英文科主任林天兰等，于本年8月20日解职。学生要求宣布解职原因，并请撤回解职成命。林悍然拒绝。29日，全校学生罢课。

5月27日　广州大本营派徐绍桢、伍朝枢、郑洪年、陈树人等与各行商集议，调停罢市风潮，决定：一、永远取消统一铺底捐；二、约在座药商同往市财政局磋商取消药品捐办法；三、取消28日罢市。

△　孙中山令任顾忠琛为北伐讨贼联军第四军军长。

△　曹锟裁撤四川督军一缺；特派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任命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邓锡侯为四川省长。

△　曹锟特派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　曹锟令准督办接收威海卫事宜梁如浩辞职，所有交涉事宜即由外交部接收办理。6月7日，山东外交协会、省议会先后致电北京政府，以外交部部务殷繁，责任难专，请收回成命，另行简派专员办理此项交涉。

△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参议员雷殷所提地方制度何日实行，并主张实行宪法应从恢复县议会始的质问案。内务总长程克说明县议会停办已久，是否可以恢复，须责成内务部致电各省询问后，再斟酌办理。

△　北京政府教育部委任陈延龄暂充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

△　莫荣新前曾向美商罗拔洋行订购大批制造军械机器，已交款百万，机器久存白蚬壳安兴货仓，粤军回粤后续缴款百余万。孙中山欲将机器提取，为扩充兵工厂用，因议价不成，该商于是日雇日轮“高知丸”来粤，欲运该机他往。孙中山据报后，令郭泰祺赴沙面向美领交涉。29日，海陆理货员工会函日领，请下令制止“高知丸”搬运，否则不代日本船起卸货物。

△　桂林城内陆荣廷军由邓定邦率千余人冲出利泽门，与沈鸿英军剧战数小时，陆荣廷亲率卫队在鹿念门策应。战事激烈，沈军仍保持原防。

5月28日　　廖仲恺召集彭素民、马超俊、罗绮园、杨匏安、施卜、彭湃、西人法兰克等多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创设广东合作发展社，以谋广东乡村市镇合作事业之发展，当即议决草拟社章。

△　广州及其附近县镇龙江、桂州、河村、水藤、东莞、佛山等地之98个商团代表196人集中广州，在西瓜园开“团务会议”，决定成立联防总部，举陈廉伯为联防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副总长，李颂

诏为参事长。并议决扩充实力，筹备款项，购买军械，推陈廉伯主办。会后阅操。各团总计有常备、后备军8000人，枪械精良。

△　顾维钧等在宅讨论德发债票案。孙宝琦坚决主张提交国会通过，与阁员冲突，次日提出辞职。

△　曹锟传见王怀庆，赞扬其取缔共产宣传，并即令内务部制订单行条例。同日，内务部召集治安会议，军警长官均到，商议取缔“赤化”办法。

△　长沙美领事会晤湖南省交涉司长杨宣诚，对外交后援会“干涉”外交深致不满，口头要求“从严取缔”。同日，长沙各公团开会，认为美领事侮辱中国团体，议决要求交涉司提出抗议并以公团名义通电全国。

△　粤军东路总指挥何成濬率部离闽后，绕赣南返粤，是日抵翁源。

△　广东财政厅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毫银26万元，年息一分二厘，期限半年，以财厅收入及造币厂余利作为担保。

5月29日　　广东佛山农民组成佛山南浦农团军，共300人，团长吴劲、副团长李江。是日行开幕礼，商团及各界均往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彭素民揭幕，彭素民、廖仲恺、冯菊坡、施卜、杨匏安、罗绮园、杨殷、钟地等演说。

△　孙中山任命卢兴邦为东路讨贼军留闽第一师师长，孙本戎为东路讨贼军留闽第二师师长兼一、二师总指挥。

△　广州大本营政务会议复会，胡汉民任主席。谭延闿、程潜、徐绍桢、林森、陈树人、古应劳等出席。

△　曹锟派刘焕臣继王为蔚兼任苏皖鲁豫四省剿匪副司令。

△　曹锟授刘湘为陆军上将。

△　北京国务会议决议，派驻瑞士公使陆徵祥为出席国际保工大会第六次大会第一委员，驻瑞士使馆秘书萧继荣为第二委员，就近与会。

△　臧致平、杨化昭所部1.17万余人在闽被孙传芳、周荫人部战败后由上杭入赣，是日抵贵溪。该县第二十三混成旅王麟庆不敌，挽绅商调停，请由县北门经过，赠米300石。6月1日，臧、杨部到弋阳，与王部孙团接触，孙团不敌，败退北门王家碓，臧部于是晚开赴横峰。

△　湖南攸县赵恒惕湘军唐生智部第四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哗变，击毙营长、连长、连附，抢劫县公署，破坏电局电机，县知事逃逸。30日，该团团长率军队至攸县镇慑。

△　江苏县议会联合会致电省长韩国钧，以厦门海军在苏省购米10万石，违背民国八年（1919）禁采军米成案，攘夺民食，请政府维持成案。次日，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等各团体亦电韩请重申米禁。

△　印度诗人泰戈尔结束在华访问，在徐志摩陪同下由沪乘“上海丸”赴日本。

5月30日　孙中山应《上海晚报》记者沈卓如之请，作《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义》之留声机录音讲演计四片，谓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勉励大家研究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立志救国，使中国跻于富强；指出“革命党要学从前真革命先烈这个样，要肯牺牲性命，要舍身来救国”。

△　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电顾维钧，反对以扩大租界为收回会审公廨之条件，略谓：收回会审公廨之交涉，乃基于华府会议议决案，本无所谓交涉，更无所谓推广租界。如收回公廨而推广租界，则将来

收回领事裁判权又将以何者为条件？请依法力争，达到无条件收回之目的。

△　厦门大学学生致电陈嘉庚，请从速撤换校长，以挽危局；并电北京政府教育部、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及江苏教育会，谓林文庆不学无术，无故斥退学术经验俱富之三主任及一教员，逼得教员纷纷辞职，学生全体罢课。

△　浙江省议会选举高尔登等37人为省自治会议代表。

△　九江日商日清公司码头工人五六百人，抗议日人走狗袁阿发将工人刘财明推入江中淹死，举行罢工，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斗争未获结果。

△　顾维钧在宅开特别阁议，报告中俄交涉经过。同日，曹锟特派顾维钧为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全权代表。

△　日本清浦内阁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协定《对华政策纲领》，主要内容为："维护中国独立，杜绝各国在华势力的渗透增长，确保日本在华地位"；"开发其无尽资源，以谋日本经济实力之发展"；"对东三省张作霖继续按既定方针，给予好意的援助，以维护其地位"。

△　英外交部照会北京政府驻英代办朱兆莘，指责中国卷烟特税尚未停征，实属扰乱外商营业，违背国际条约。是日，朱电告外交部。

5月31日　顾维钧与加拉罕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及与上述协定有关之《声明书》七种。主要内容为：帝俄与中国所订一切旧约、协定、议定书等概行废止；帝俄与第三者所订有碍中国主权及利益之一切条约、协定概为无效；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允诺

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一切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平等协商关税等。同日，中苏两国互换建立邦交照会，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 中国国民党为北京、汉口逮捕党人事发表《敬告国民书》，略谓：旬日以来，汉口、北京相继发生党狱，捕去刘芬、杨德甫、张国焘等人。“本党宣言及章程，性质公开，与所谓过激主义绝非同物”；“本党党员为主义而活动，亦绝无轨外之行为可以供人罗织”；“军阀此举非仅向中国国民党而挑战，乃向中国国民而挑战”；“本党党员以国民之前驱自任……无时无地不为主义与政纲之宣传，即亦无时无地不与军阀为敌，经一次之挫折，得一次之进步，必期于成功而后已”。

△ 孙中山任命潘文治为海军练习舰队司令。

△ 曹锟特派刘湘兼筹办川边防务事宜。

△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金法郎及德发债票两案，主张同时解决。孙宝琦未出席。

△ 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职员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应先声明庚子赔款全数作为教育经费，不得挪用，并应脱离政治、外交、宗教等关系，由学者共同处理。

△ 洪兆麟自福建漳州回师东江。

5月下旬　　湖北省教育厅奉督署密令，严防工农革命活动，略谓：“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组织农民夜校，以期农民反抗业主，与路工一致演成农工过激主义。”

△ 赵恒惕派马济、叶琪旅援助陆荣廷返桂，吴佩孚尚感不足，必欲湘军大队应援。赵乃派省议员陈焕南赴全州见沈鸿英，劝其与陆

言和，以免出兵之苦。

是月　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纱厂地区开办补习学校。不久在小沙渡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在杨树浦成立“工人进德会”。

△　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南京路成立，董事长姚慕莲，总经理严叔和。

△　大成油漆颜料股份有限公司于天津成立，资金30万元，董事倪幼丹等。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立。

6月

6月1日　广州大本营财政部发行军需库券24万元，专备拨付军费之用，月息一分二厘，7月1日抽签还本，以印花税、造币余利充本息基金。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民国十三年八厘特种库券，定额现银100万元，年息八厘，至民国二十—年（1932）11月30日还清，指定以庚子赔款俄国部分之缓付款项，为还本付息基金。

△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黄季陆向中央党部提案，请制止共产党活动。

△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因学生质问三主任解职理由，唆使建筑部主任陈延庭、教师林幽率400余人围打学生，经海军制止。学生会主席罗士清等均受重伤。林即布告提前放暑假，并限学生五日内离校。

△　湖南各界在长沙纪念“六一”惨案，约10万人参加游行，全市

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同日，北京之“六一”纪念游行被军警阻止。

△　美国来华海军先锋两舰入青岛。18日，续有美舰14艘开到，停泊10日即驶往天津大沽。同日，美亚细亚舰队司令华盛顿偕驻京美使馆参赞裴克施美德等见曹锟。

6月2日　　华俄道胜银行及驻京法使为中苏协定允诺中国赎回中东路事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保留中东路既得权利。驻京美使亦提出警告。6日，日使芳泽提出同样照会，要求保留日本在中东路权利。

△　北京众议院开紧急会，到会317人，杜树勋主席，胡祖舜质问德债何不交国会。孙宝琦答称：此事由财政、交通两部负责办理，应由该两部答复，本人并未签字，但担保将此案交国会，决不保密。

△　北京国会议员胡鄂公、王文璞等181人致电苏联政府及人民，庆祝中苏恢复邦交，并认为此举乃反帝国主义的胜利。

△　曹锟传见鲍贵卿，请鲍赴奉征求张作霖对中俄正式会议意见。7月20日，曹又派周孟贤至奉谒张，疏通中俄协定事。

△　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将张国焘口供咨送北京政府内务部，并请拿办李大钊等，略称：张供出“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按：应为谭平山）等，北方有张昆弟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一体严查拿办。9日，内务部咨各地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拿办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君宇、刘仁静、方洪杰、陈佩兰（女）、缪佩英（女）等。下午6时，《新国民》杂志范体仁在北京被捕。

△　上海总商会为金法郎案及德发债票案通电全国，略谓：金法郎案碍难承认，全国舆论可谓一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近且以法国将拒开关税会议为词，作得不偿失之承认，不惜牺牲庚子条约上之正当主张以为交换，甘自负担数千万元之损失，以博此不可必得之关税会议，则外交悬案何止金法郎一案，应请全国国民否认。又我国对德要求赔款，当局为一时便利，商提德华银行管有部分之债票基金，不惜将以前议案尽数推翻，而将商人希望补偿之损失暗中断送。希望全国国民群起抗争。

△　爪哇华侨巨富糖业大王黄仲涵于新加坡逝世，黄之遗产共值荷币二亿盾。

△　留日华侨代表郝兆先受驻日华侨联合会会长林文昭之托，到沪报告日政府排斥华侨详情。

△　法国驻安南总督梅尔林由日本抵北京，3日见曹锟，4日出席顾维钧宴，9日赴宁转沪。

6月3日　　北京政府各总长因孙宝琦两次呈辞后，仍出席国会允将德债案交议，全体向孙辞职，以示反抗。曹锟密示各总长勿逼孙过急，宜与孙周旋，俟德债票办妥再作处理，并于孙辞呈上亲批“恳切慰留”字样。

△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成立，第一次会议推定黄季陆、方瑞麟、陈其瑗为党务委员，孙科为组织部长，吴铁城为宣传部长，马超俊为工人部长，陈兴汉为实业部长，陈其瑗为青年部长，伍智梅为妇女部长。

△　湘西辰州警备司令田义卿率部哗变，诱杀乾州巡防军统带兼代湘西镇守使张云龙。张之参谋长马名骧率部包围田义卿司令部，激战一日两夜，田不支，将监狱署囚粮、银元及西门商店洗劫一空后，退往辰州下游柳林汊一带。

△ 臧致平、杨化昭部抵玉山。4日，王麟庆率队4000人抵玉山，与臧、杨军开火。6日，王军大败，向广信退走。9日，臧、杨率部约五六千到常山，旋即赴杭州谒卢永祥。19日，臧、杨通电愿归浙收编。

△ 济南各界联合会电北京政府海军部，要求禁止日船在龙口越海捕鱼。19日、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两次照会日使馆，要求禁止日渔船侵入鲁境捕鱼。29日，日代理公使太田复牒竟谓日船系在公海捕鱼。

△ 孙中山派刘侯武赴越南协办党务。

△ 张作霖、朱庆澜、吴俊陞等在奉天商议《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问题，主张苏联代表未与奉天接洽以前不予承认该协定，中东铁路也不能变动。12日，张作霖在奉天召集官民集议此案，说明此次不承认该项协定，系因顾维钧、加拉罕秘密订约，事前不令奉代表知悉。众议东三省属自治，应守原定主旨，不予承认。14日，东三省各团体电北京政府，竭力反对《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声称生命财产皆可牺牲，此协定断难承认。

6月4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华比银行签订借银元70万元合同，月息一分三厘五毫，以盐余及正太铁路余利作担保，用作财政部拨借款项。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农民部秘书彭湃前往广宁调查农运情况。18日，彭湃向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阮啸仙等报告，略谓：广宁农会现已成立八个区农会，加入者六万余人，竟招劣绅之忌，本月10日利用地痞民团围攻农会，焚毁会所，逮捕农会职员。花县农会虽未成立，但加入者亦有600余户，近日劣绅也利用流氓向农会办事处肆行谩骂，侮辱备至。

△ 苏联代表加拉罕致牒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移交在上海由白

俄操纵之俄舰四艘。

△　孙中山令饬各机关裁减预算，民国十年（1921）已成立之机关，应参照该年度预算切实减除，不得超过；其成立于十年以后者，亦应力加节省。令限10日前将所拟减省之数呈报核夺。

△　曹锟授孙传芳为陆军上将。

△　北京国会参议院通过恢复县议会案，其未成立或议员不足数者，限两月内补选成立。未经议定县自治法之各省，迅由该省议会自定县自治法或县议会暂行法以及议员选举法，克期公布，限三月内选举完成。

△　北京政府内务部通令，依据新宪法，7月1日起实行裁撤各省道尹。

△　北京政府各总长在孙宝琦宅商量德债案提交国会问题，决定5日由国会开一紧急会议，由阁员出席报告而不讨论议决，以免国会反对，并决由财、交两部共同呈交总统，再由总统指令准如所呈办理，即行签约。众议妥后，将本次会议改为国务院正式会议。

△　曹锟以北京政府财、交两部所拟解决中德战争赔偿及债务办法，饬外交部与驻京德使换文。

△　吴毓麟、王毓芝等举行宴会，疏通各派议员赞助德发债票案，并许事成后补发800元，为二月欠费之一部分。议员经疏通后，已不反对。

△　美国“世界飞行队”飞机三架，由斯密斯中尉带领飞抵上海，中外官绅及领事80余人前往迎迓。北京航空署特派厉汝燕代表政府欢迎。7日，由上海飞往厦门，转香港飞印度、安南等处。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讨论：一、召开关税会议事，认为未到时

机；二、交还俄使馆，原则上同意，但手续与时间尚须研究，九国保管之俄使馆文件与财产，不能即依中国请求交付加拉罕；三、对交还上海租界公廨案，中国法律尚未见信于外人，似宜先交还公廨民事。次日，外交团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两件：一、临城劫车案赔偿问题拒绝重行调查；二、上海会审公廨收回问题允交还民事部分。

6月5日　北京国会众议院开会，到323人。孙宝琦、颜惠庆、顾维钧、吴毓麟、苏锡第等均出席。孙报告德发债票案由政府签字后再交众院。李载赓、彭汉遗等反对甚力。

△　孙中山令无论何项军队均不得擅行在广九铁路加收各费，以利商旅而维路政。

△　北京前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北京病逝。12日，曹锟令国务院从优议恤，给予丧银2000元，并派程克致祭。

△　孙中山令饬各军不准在南雄各属招募新兵，以重防务。

△　东江右路豫军樊钟秀部与桂军刘震寰部由平湖进至龙岗，与陈炯明之练演雄、马永平、钟景棠部激战。

△　英国文学博士兰顿抵洛阳面见吴佩孚，要求官方协助其考察在河南淮阳之伏羲庙及伏羲墓地，吴慨然应允；惟对其西藏筑路事，则请英国尊重主权而加以拒绝。

△　汉口交涉署函日本领事馆，就日商前田一二洋行于2日杀伤华工三人事提出抗议，要求迅予办理见复。8日，日领函复交涉署，反谓系华人闯进该行殴击日人、毁坏器具，要求惩犯与赔偿。

6月6日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开中苏邦交恢复庆祝大会，王家襄主席，加拉罕、沈瑞麟等演说。大会致苏贺电，谓：“中俄两国国交，从此益加敦厚，实两国国家及人民前途之幸。”

△　北京学生联合会干事会在北大三院开中俄邦交恢复庆祝大会，到各校学生5000人。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词，略谓：中俄邦交恢复为外交上开一新纪元，今后中俄两国当维持正义，与世界帝国主义奋斗。苏联代表加拉罕及北大教职员代表马叙伦及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周达文等相继演说。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驻京德使博邺签定《解决德华银行事务换文》，其中规定：中国政府交还德华银行在北京、汉口之不动产，连同建造之房屋，并同意以津浦、湖广铁路债票195万元付与银行；德华银行付清中国政府之各种索偿；中国政府拟将德华银行恢复至战前地位，连同其各种借款合同内发行银行之职务，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内各项职务现仍中止。

△　英、法、美、日、意、荷、比、葡八国驻京公使是日及翌日先后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应待法国批准华会条约后再开议为辞，拒开关税预备会议。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会见苏联代表加拉罕，谓两国交涉在精神不在形式，仍拟互派公使而非大使。

△　驻英代表朱兆莘报告中智商约已在伦敦签字。

△　东江豫军樊钟秀部占领龙岗，并续向淡水进攻。叶举、钟景棠、练演雄各部集中淡水向龙岗反攻。洪兆麟、李云复等在平山一带集合。

6月7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驻京德使博邺，同意将扣留之德侨私人财产约7000万元全部放还，德国将其半数作为赔偿费付给中国，用下列方法行之：一、三种德债计津浦铁路借款、津浦铁路续借款、湖广铁路借款共1500.0065万元；二、三种铁路借款之到期息票及中签债票共1583.9909万元；三、1921年所付现款400万元。同日，又签订《结束放发中国扣留之德侨私人财产换文》。9日

中德双方正式换文。北京政府财政部人员与德华银行总理斐格等，往复磋商四五月，至是将德发债票及德国赔偿问题在秘密中解决，共收回约1100余万元。

△　孙宝琦出席国务院会议，拟商妥德发债票之善后办法，王克敏、苏锡第等未出席。孙乃邀全体阁员会议于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痛斥王克敏相欺，并要求曹锟免王财政总长职。曹未准，孙消极。

△　日、法、美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对于中东铁路之发言权，不受中苏协定之拘束。

△　曹锟授周荫人为陆军上将，姚建屏加陆军上将衔。

△　曹锟派蒯寿枢为驻日留学事务总裁。

△　南京造币厂向三菱洋行借款银23.6万两，月息一分二厘，作购铜之用。

6月8日　　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司法会议，决在东三省行政委员会内组织最高法院，统辖东三省司法机关。嗣后三省案件即归该院，不再送北京大理院。

△　厦门大学全体学生因校长林文庆措施失当，唆使纵容教工殴打同学，演出流血惨剧，复停膳、停电、停茶水，以逼学生离校，是日举行离校宣誓典礼，誓言“林文庆一日不去，我等决不再来厦大”。被解职之王毓祥、傅式说各发宣言，驳林所举解职理由。后厦大离校学生团专函离校教员，请求另行筹办大学。

6月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驻京九国公使，声明中苏邦交业经恢复，所有前俄使馆及其附属财产，应照中苏协定交还苏联政府代表。10日，北京外交团再次开会反对交还。

△　孙中山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

△　孙中山令准林森所请，改革民间葬埋习俗，以天葬（火葬）代替土葬，并饬军政部长程潜、省长杨庶堪将永济药库废址拨为天葬场所。

△　孙中山函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请其在苏联退还庚款中，分拨一部分作为广东大学经费。加拉罕复函表示愿意助成此事。

△　中国科学社胡适、天文学会高鲁、远东生物学会李石曾、考古学会沈兼士、史地学会陈垣、地质学会翁文灏、气象学会蒋丙然等代表各学术团体，是日及10日两度在北京集会，讨论美国退还庚款事，议决如下：一、退款中酌提相当成数发展科学研究；二、退款应作为固定基金，以维久远，基金之保管及其利息用途之具体支配，成立基金委员会负其全责；三、基金委员会组织中之中国委员，应由有经验、有声望之人充任。

△　沈鸿英电孙中山谓：8日何才杰部抵柳州东门，邓右文部抵柳州喇塔三隍，断敌人桂、柳交通，柳州指日可下。桂城入软困之境，各路敌援已绝，可不战自溃。

6月10日　　孙中山任命范石生为中路总指挥，督率各军围攻惠州。

△　曹锟特派刘存厚兼四川陆军检察使；任命孟昭月为闽北镇守使，闽北护军使缺裁撤。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与中英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解决政府应分沪宁铁路余利办法合同》。按：沪宁铁路系1903年向中英银公司借款修筑，1908年通车后按合同分配铁路余利，该项合同系解决在余利分配实施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　孙中山因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横行无忌，对党之决议咸置不理，乃下令广州各军移驻郊外，借收安定地方、避免摩擦之

效。12日，孙又严令驻广州各军限10天移郊外，否则缴械遣散。

△　新疆督办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喀什噶尔提督马福兴叛国殃民，已将马及其子马继武一并击毙，请明令宣布其罪状。

△　浙江省财政调查会函督办卢永祥及省长张载扬，请截留全部盐余年400万两，以救济浙省财政。

△　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电日本新首相加藤高明，敦促取消“二十一条”，改变侵略政策。并通电全国，略谓：旅大租借逾期年余，日人犹假“二十一条”抗不交还。近更勒死田（仲香）、贾（邦敏），刺伤贫民，驱逐华工。更闻当年一手造成“二十一条”之加藤高明出而组阁，大敌当前，国人当注意及之。本会重申一面厉行经济绝交，一面提倡国货。苟能坚持到底，何虑日人。志士仁人，愿速图之。

△　平山陈炯明军7000余人袭击龙岗樊钟秀军。樊因不谙地势，且滇桂两军又坐视不救，受挫退集平湖。至此东江战事又呈相持态度。

△　陆荣廷调柳州之谭浩明解桂林之围。谭向雒容、鹿寨方面移动，沈鸿英命何才杰部攻鹿寨，邓瑞澂部攻雒容。6日，沈、谭两部在雒容、鹿寨间交战，是日谭军大败，退柳州。

6月上旬　　张作霖在哲里木盟召开蒙王会议，讨论经营蒙古政策。张派总司令顾问王家桢、张寿增参加。内蒙各旗王公、各重要官长、各团体首领均到。外蒙数旗及库伦亦派遣代表出席会议。

6月**11**日　　北京外交团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拒绝中国所提交还俄使馆之要求，声称：“当中国停止俄国使领待遇时（民国九年9月23日），关系辛丑和约各国公使曾议决：该俄国使署迄各关系国均经承认之俄国代表未驻北京之前，应由各关系国公使共负保管责任。故关于移交前俄使署一节，应由俄国正式派遣中国之外交代表前来请求移

交时，始能予以考虑。”

△　曹锟召顾维钧、颜惠庆、吴毓麟、陆锦、张国淦、王毓芝调停孙宝琦、王克敏间矛盾。

△　黄绍竑奉孙中山命出师援助沈鸿英，2000余人由梧州出发至贵县，联合李宗仁部会攻南宁。南宁陆荣廷急电柳州谭浩明求援，谭前后受敌，决意退兵。沈鸿英军何才杰、邓瑞澂部乘虚占柳州。

△　东方文化学社在北京成立，王正廷演说谓将东方文化宣传普及于欧美，为东方民族之责任。

6月12日　北京国务会议，顾维钧报告外交团11日照会拒交俄国使馆各情，决定由外交部再向使团交涉。

△　曹锟传见冯玉祥，研究“收蒙”准备。

△　孙中山令准杨庶堪辞广东省长职，以廖仲恺继任。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准廖仲恺辞去中央常务委员职，以邵元冲补常务委员。

△　东江陈炯明军林虎部到回龙，邀宴湘军总指挥宋鹤庚商谈和议条件。24日，林又往湘军总指挥部行营晤宋，以示诚意。

△　上海国民对日外交会为反对德发债票签字事，通电呼吁国民速起否认此丧权辱国债案。

6月13日　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苏联在各国均派大使，与中国自应互派大使以示平等。北京政府以此事牵涉外交团，不敢遽允。驻苏代表李家鏊因苏联外交部之催促，迭电促顾维钧从速解决。北京政府乃非正式向使团提出将各国公使一同升为大使。

△　北京外交团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允交还沪租界公廨民事部分，但望速扩充租界与开辟码头。外交部派参事张煜全与外交团洽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办法。

△　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陆军军官学校教练部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　孙中山派大本营建设部长林森继姚雨平兼理广东治河督办事宜。

△　吴佩孚电曹锟，请以俄退之庚款筑路，略谓："虽中俄协定有举办教育之说，然赔款筑路，更以路款兴学，功用益大，宗旨无殊。"

△　周荫人部与民军高义部在马巷、安海间开战。厦门至安海交通断绝。

6月14日　孙中山任命梁鸿楷为粤军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粤军第三军军长，李济深为粤军第一师师长，张民达为粤军第二师师长，郑润琦为粤军第三师师长。邵元冲为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　上海各丝厂工人罢工，抗议厂商借口丝价跌落，减低每日工资三分和延长工时。参加者14个厂工人1.5万余名。工人两名被捕。经市政当局仲裁，每工加给工资一分；关押之两女工交保释放；允许正式组织工会。27日，各丝厂女工复工。

△　闽督周荫人由漳州回福州视事。

△　美国务卿照会北京政府驻华盛顿公使施肇基，悉数退还庚子赔款余额。

6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广州特别市党部联合公宴黄埔军校师生。主宴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孙科等出席，蒋介石

率将士600余人入席。汪精卫代表中执委会致词，强调相依为命之精神；蒋介石代表师生致谢词，宣誓为党作牺牲，不负厚望。

△　张作霖召开东三省金融会议，决定：一、合并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二、取消各处货币交易所。

△　中国社会党在沪通电，声称以江亢虎主张之“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重建中国社会党，“使政治活动走上轨道，预防社会革命之‘危险’”，“用和平方法促进政治和经济制度之改造”。

6月16日　　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到学生499人。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莅会。孙中山致开会词，指出中国革命有了13年，只有民国之年号，无民国之事实，就是由于只有革命党之奋斗，没有革命军之奋斗。创办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强调要学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建立革命军队。胡汉民代孙中山训词，词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下午举行阅兵礼。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议决增设实业、联络两部，汪精卫任实业部长，胡汉民任联络部长。

△　驻京日本公使芳泽奉日政府电召回国。

△　广州举行大总统蒙难二周年纪念，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随孙中山蒙难诸人均参加，孙中山颁给会费300元。午后至大本营摄影纪念，并假两广盐运使署宴叙，旧话重提，并出示当时实录，备革命史之参考。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驻京日、美、法各使通牒干涉关于中东路问题致各使照会，声明：中俄协定成立后，中东路既系中俄两国之所有，自应由中俄处置，不受第三国干涉；至于各国所投资本，未有拒

不承认之意。

△　吉林省城成立平民学校14所共17班，是日开学。

6月17日　北京国务会议，由顾维钧代理主席。王克敏、苏锡第未出席。议决：一、通过外交部所拟中俄会议办事处组织大纲，并简派刘镜人为中俄会议办事处秘书长；二、加拉罕交来孙中山电，派邹鲁为俄国退还赔款委员会委员长，未到任前派李石曾代理，议决置之不理；三、陆锦提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辞职案，议决去电慰留。

△　王克敏辞财政总长职，辞呈内附任内收支表。

△　北京国会议员胡鄂公等135人发表《维持中俄协定宣言》，略谓：此次协定之成立，即中俄两国人民反抗列强帝国主义奋斗之结果。协定规定中东路由中国赎回，自不容第三国无理要挟。深望中俄两国政府及人民，应视此协定为中俄永久关系之要纲，中国外交之砥柱。

△　孙中山任命林振雄为陆军军官学校管理部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宋荣昌为军医部主任，俞飞鹏为军需部副主任，张崧年为政治部副主任，邓演达为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梁广谦、钱大钧、胡树森、陈继承、顾祝同、文素松、沈应时、陆福廷、严重、王俊、刘峙为教官。

△　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声明。

△　北京外交团会议，九国以外公使亦被邀参加，加拉罕发言，表示“本代表依法律向中国政府要求交还使馆，无与使团直接交涉之必要”。

△　广州各界讨论筹款向美商罗拔洋行购买兵工厂制械机案。决定由善、商、工、政各界组织广东兵工厂机器还款委员会，发行有价

证券港币150万元，由本省商会、慈善团体签字担保分八个月偿还，签字之日先交15万元。此项证券可以由商会代商团、民团、工团向兵工厂购买步枪子弹。

△　援陆荣廷之马济部会同湘军叶琪旅进占全州，沈鸿英部向桂林方向撤退。旋赵恒惕出面武装调停，一面阻马济穷追，一面负责全州治安。

△　北京国立八校发表宣言，略谓：八校经费积欠已阅十月，无法维持，要求政府在德国赔款项下先拨经费五个月，使学校不至停办。

△　湘省湘、资、沅诸水自是日起至下旬更迭涨退，全省46县遭灾，为30年来最大之水灾，灾情以宁乡县为最重。长沙各商店损失巨万，衡阳全城皆水，浮尸满河。至7月4日水势稍平。

△　上海台湾青年会集会反对台湾举行始政纪念日典礼，并发布讨日檄文。上海台湾自治协会亦参加上海青年会，反对台湾始政纪念日之活动。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具呈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并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声称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　曹锟任命陈洪范为四川陆军第八师师长。

△　山东省议会讨论青岛督办高恩洪拟拍卖青岛全部公产以充吴佩孚军费问题，决议通电全省反对，并通电各省协同力争。

△　江苏特派交涉员许沅以中智条约并无领事裁判权之规定，而驻沪领事团妄称智利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主张智利领事派员到会审公廨陪审，是日致函领袖领事抗议，并致函智利领事，迅将派员到廨

陪审一事取消，以重约章。

6月19日　法国驻安南总督梅尔林在广州沙面英租界宴会时，有安南人范鸿泰向之抛掷炸弹，梅尔林受伤，旁座死五人，伤七人。范被追捕至法界跃入海中溺毙。次日，驻广州英领事函广东省政府称，此案粤政府应负重责，应严定规章，限制华人进入沙面。广东省府复函英领，谓：沙面治安权向操之英、法两领，不容华官参预，此案不能归咎粤官吏。本省长特此提议，如遇必要时，大本营政府得派警入沙面协同维持。至于严订限制华人入沙面规章，有损华人利益，本政府难以首肯。

△　美籍英商郝莱由重庆运桐油至万县，17日抵埠时，因招揽脚夫搬运，不慎落水毙命。是日，英舰鸣炮示威，威迫万县知事及该地军警将船夫向国源等二人斩首，并勒令当地官绅厚恤郝莱，郝出殡时官绅须从江面起至万县墓地执绋送葬，以示道歉。万县知事一一照办。7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使麻克类，抗议19日万县英舰发炮胁迫知事枪毙船户。

△　沈鸿英在谭延闿处得子弹10万发运桂，甫经梧州，即被黄绍竑截留；又见黄绍竑、李宗仁将袭取南宁，故与陆荣廷停战。是日，沈电赵恒惕，略谓：吴佩孚已允负责该部军饷，已饬前方将士先解桂围，余事听候解决，请转告陆荣廷、马济饬部暂就原地驻扎，以免冲突。22日，赵复电沈请饬部回驻平乐，将灌阳、阳朔两县划为中立地点，以免两军冲突。

△　由闽至浙之臧致平、杨化昭部，被浙督卢永祥收编为边防军，驻开化、淳安一带。卢以臧为边防训练处处长，杨为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

6月20日　孙中山命谭延闿赴前敌督师，以胡汉民兼任大本营参谋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中俄会议办事处，以刘镜人为秘书长。

△　粤省南路阳江陈炯明军进迫恩平，杨锦隆奉许崇智命调陈慎荣团谭茹汉、陈才林两连赴恩平防御。是日，该两连甫离白沙圩20里即叛投陈炯明。

△　驻京日代使太田闻北京政府有令驻美公使施肇基签字于中美电台债券之说，即提出抗议。7月中旬，顾维钧命交通部向美国费德理公司驻华代表商办中美电台债票。日本政府训令太田再向华抗议，阻止发行电台新债券。

6月中旬　段祺瑞、卢永祥促张继、谢持等赴粤磋商孙中山与陈炯明和议事。谭延闿、杨希闵相继赴东江前敌主持和议，并向各军长征求同意。

6月21日　赵成樑电告广州大本营：方本仁以援粤总司令名义在赣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7月1日开始攻粤，以高凤桂部为前锋，邓如琢等四旅由信丰、南安、新城分三路进行，兵力约二万。次日赵又电告：方本仁部向南安进兵，前锋已有一旅之多到达南安，数日后即犯粤。

△　“江大”舰水兵愤欠饷过多，上官克扣，串同香山匪首林才骑劫持该舰，将正、副舰长绑缚，勒令驶往香山河面，遇船必劫，共劫丝艇十余艘，货船五六艘，得赃七八十万。最后遇英舰，恐不敌，林才骑将“江大”舰所有武器及子弹携走，并掳去舰长陈杰，转乘所掳小轮逃走，该舰即驶回黄埔。

△　台湾议会请愿委员蔡培火、蒋渭水、洪元湟、李岐　四人抵达日本东京，请愿台湾应行自治，东京台湾青年会会员200余人欢迎。当晚同记者见面，次日在拓殖大学演讲。

6月22日　孙中山电令梧州李济深、黄绍竑、迅将扣留之沈鸿英

代表解运桂子弹10万发验放，以利沈部围攻桂林。

△　晚，福州大水，为25年来所未见，全城淹没四分之三。灾区波及闽江沿岸28县，仅尤溪一县死伤即达8000人，损失1000万元以上。盖因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江水猛涨，复有台风海啸，泛滥成患。

6月23日　　广西讨贼军第七军总指挥黄绍竑通电声讨陆荣廷。谓："绍竑仰承帅令，用伸挞伐之威，环顾乡邦，意切澄清之愿，谨于六月东日（1日）誓师梧郡，直指邕龙。左右两军，业经先后克复横州、永淳、宾阳、迁江等处，南宁即在包围，龙州亦指日可下。"

6月24日　　孙中山批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拟定的《农民协会章程》，凡15章83条。

△　曹锟令皖北镇守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李传业到京供职，马联甲暂行兼署第二混成旅旅长。

△　东三省陆军步兵第一旅旅长阚朝玺接通辽县知事李新榜电话报告：盘踞河套纵横北方之匪首卢占魁，窜至通辽县九家子、车子花等处。阚当夜赶至通辽，将卢及匪众120人诱至，捕匪首卢占魁，匪众120人被缴械，内有日人六名。除将日人送交县署寄押外，余均枪毙。

6月25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等在广州就"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作党团活动"一事向鲍罗廷提出质问。

△　孙宝琦谒见曹锟。曹力言王克敏无劣迹可指，为今日难得之财长，即德发债票事亦办得不错，断不能以有功无罪之人而行罢免。孙见曹袒王，乃请准其出洋，曹力劝不必。

△　黄绍竑、李宗仁在贵县会师后，分水陆两路进攻南宁。23日，右翼占宾阳，左翼由水路直扑南宁。南宁陆荣廷部北上援桂林，

林俊廷移兵钦廉，守军不满1000人。是日，黄、李两部下南宁。次日，李入驻南宁城，黄回梧州。

△　北京八校教职员、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教育基金委员会联席会议发表宣言，声明："俄庚款清偿债务之后，悉用于教育，惟管理并分配该项赔款之中国委员二名，必须以教育界有资望、经验，而为一般人所信仰者充任。倘以不明教育事业或无资望，不为一般人信仰者滥竽斯席，同人等为国家教育计，惟有反对到底。"

△　淞沪警厅在上海横浜路破获所谓中国三K党七名，其中有两名为美国人。自称该党顾问之美国人凯南事后投函《字林西报》，妄称目下部分华人及外人宣传排外实为错误，于中国有害，三K党为辟其谬，负有阻止排外宣传之义务。

6月26日　广州大本营会议决定：陈炯明倘愿媾和，则须全部开赴北伐。陈如照办，可由联军担任后方供应；声明悔过一事，亦可让步。后陈炯明代表金章、马育航、陈觉民在香港向汪精卫、李福林表示，陈必欲回占广州握军政大权。和议未成。

△　出席蒙王会议之王家桢、张寿增回奉向张作霖报告会议经过，称重要决议有：一、由东省选拔两混成旅，分遣蒙境要隘驻扎，兵力与直方在蒙兵力相当，以保均势；二、就地招募蒙人入伍，编成后协同奉军驻扎；三、蒙军给以新式训练，易以奉天兵工厂制造之新械，由蒙出相当代价；四、设立航空处；五、设立银行；六、设立实业公司举办屯垦、开矿、畜牧、毛织等业；七、建筑铁路，可自洮南直达兴安岭；八、设立邮电；九、振兴教育；十、设立讲演所，启发蒙民知识。

△　日本船"海鲁布丸"船员在天津塘沽击毙驳船公司工人郑连仲，击伤陈德奎、张顺、张德。28日，日领署派马野弓男等到塘沽会同警局调查。7月9日，驻津日领致函天津交涉署表示歉意，并告已电

请上海日领馆设法将已开往上海之该船及凶犯扣留拘提讯办。

6月2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驳复11日照会，谓旧俄使馆及文件等，应照中国要求全部移交，并声明："使馆界虽由使团管辖，但仍系中国领土，故俄使馆不受他国管束……。中国请交还俄使馆给苏俄代表，乃对友邦尽国际应有之礼遇。"

△　沈鸿英军总指挥邓瑞澂派旅长邓右文与援桂湘军叶琪接洽，和议告成。是日沈军撤围桂林，退至六塘、良丰；驻兴安、全州之沈军退至大墟。

6月28日　北京国务会议，顾维钧主席。苏锡第报告德债手续完竣，陆续提取现款。顾报告中俄会议本应一个月内开幕，因故须稍缓数日。又请秘书长王继曾劝孙宝琦出席阁议，讨论英、美、日、法、俄改升大使案。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在广州举行妇女党员大会，百余人出席。

△　天津各界为提倡平民教育，有256团体约四万人举行游行。

△　粤省东、西江久雨成灾，西江之水灾受湘省大水之影响，因湘、桂之水实以粤之西江为尾闾之泄，桂之梧州，东江之肇庆、佛山，西江之石龙、增城各属悉被淹没，是日水势稍定。

△　湖南大雨成灾，遍及全省，长沙、宁乡、湘潭、衡山等县之灾情尤为惨重，损失达数千万元。

6月29日　国民党讲习所在广州开学，学员360余人。孙中山勉励学员以语言文字去宣传民众，为本党之主义作和平奋斗。

△　汉口法国领事照会交涉署，俄界毗连法界江岸马路，未得法国同意，不能遽行收回。

△　晚，天津日兵大久广次等在南门新华里殴打人力车夫姚庆顺，并毁其车。岗警干涉，日兵出利刃行凶，岗警将日兵带赴东六区。未及讯问，忽有日兵四五十人，在南市集益里一带捆绑华人数名，押送日军兵营。警厅派司法科长与日武官交涉。

△　盛竹书、吕静斋、赵南公、周伯尧、项松茂、史量才等九人当选为上海纳税华人会新理事。

6月3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汪精卫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实业部部长，谭平山兼常务委员，刘芦隐暂代宣传部长，戴季陶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又通过《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规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期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员。"

△　北京政府商标局布告：现据中外各商呈请注册种类甚多。其在外国者，现时正在函电商量一切办法。现规定住居外国及边远地区者，将商标法第四条规定之期限，展至本年12月31日止。商标法案乃结束。

△　晚，英驻广州领署召集会议，借口安南总督梅尔林被炸事件乃华人仇外行为，特制订限制华人出入之沙面新警律和交通新律例，规定华人出入沙面须持有执照，晚9时后即使持有执照亦不得出入。

△　前广州大本营司法总长徐谦到沪，专事办理上海法政大学校务。

△　北京国务院总理孙宝琦因曹锟偏袒王克敏而避往京郊逾半月，是日被劝回京。同日，"民治社"首领孙洪伊抵京活动组阁，曹锟代表徐文采、军警当局聂宪藩及国会议员等约200余人到车站迎接。

△　山东匪首高二虎率领悍匪百余人闯入安丘东北之戴家埠，抢掠烧杀，焚房屋200余间，击毙村民10余名，伤20余名，援军受伤者

10余名。

△　安徽大刀会约3000人攻占六安县城，自称“民生救济自治军”，以谢筱陆仔为总司令，架走中国银行行长傅麟、商会会长董复初，软禁法国教士三人，挟使商民要求官军勿攻城。

是月　　晋华纺织公司第一厂在山西省榆次县北关设立，资金200余万元。

△　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倡办私立青岛大学，聘蔡元培、黄炎培、张伯苓等为董事，李贻燕为筹备主任，招收文、商、工三科学生。

△　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在广州举行，到会有中国、印度、日本、菲律宾、爪哇、新加坡等地铁路和海员代表及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会议决定充分发展、巩固各国运输工人组织，使之成为东方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　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再次通电全国，请各省长一致赞成以庚款筑路，余利兴学。马福祥、孙传芳等人表示赞成，吴佩孚亦复电表示支持。

△　商务印书馆刊行瞿秋白所著《赤都心史》一书。该书于1921年11月完稿，为最早记述苏俄之著作。

△　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力争以日本退还庚款在鄂设文化事务所。

△　京师学务局归并男女小学35处，裁减校长及教员十分之三。

△　日本排斥华工，3月来已有500余人被拒登岸，上海、广州及旅日华侨向日人力争。

7月

7月1日　　孙宝琦主持北京国务会议，决定全体总辞职，并于翌日向总统府递送辞呈。

△　曹锟令准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辞去热河都统兼职；任命米振标署热河都统；帮办热河军务一缺即行裁撤。

△　孙中山令广九铁路护路司令周自得兼广九铁路局局长。

△　驻阳江之陈炯明军开始向联军防地恩平县攻击。联军郑润琦急调所部迎击，一面电请驻梧州之李济深增援。3日，陈军占领恩平。11日，广州大本营命梁振楷、林树巍、杨锦隆部向恩平反攻，陈炯明军陈章甫等部不支，退向阳江。

△　汉口交涉署派移交委员李子英将前俄领馆移交苏联代表季赛耶夫。同日，汉口俄租界收回，将“大俄工部局大俄护卫衙门”（即巡捕房）之名义取消，另在旧工部局内成立收回俄租界临时管理处，捕警均改换中国之肩章、帽徽。

△　北京政府外交部裁撤各埠俄侨事务局，并通知外交团。

△　英、美、法、日、意、比、西、荷八国使团为交还前俄使馆问题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称使团虽愿将前俄使馆交还俄国代表，但必须在俄国派出正式代表向使团接洽，并须俄国代表切实表示愿服从使馆界一切规章之后，方能交还。

△　日本外相币原向日本第四十九届国会作外交演说时，述及对华政策为：一、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二、中国国民之合理要求，以诚意与同情接受之；三、日本在中国之权益，以合理方法保护之；四、日中两国经济提携，共存共荣。

△　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次照会法使傅乐猷，驳复法国所提保留中东路权利的要求。

△　李义元案由大兴县判处四个月零三日徒刑。北京政府外交部将此项判决通知英、美、意三国驻京公使。

△　上海宝山青年谭翼鹏独资创办之半月刊《翼报》出版。《翼报》宣称以“发扬民意，改革社会”为主旨，请何世桢、邵力子为顾问，李剑虹、陈冰伯、朱大可、刘孤鹤等在第一期撰文。

△　“外蒙古人民政府”宣言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公布“宪法”。

7月2日　　曹锟令准免国务总理孙宝琦本职，特任顾维钧暂行兼代国务总理；各总长则均挽留。

△　北京国务院电杨增新，告以阁议已通过新俄商约。旋外交部电杨称，我国现已与苏俄恢复国交，订立条约宜用中央名义，应由本部特派新省交涉员署名。

△　北京参议院通过张我华所提《政府当局交涉德国赔款及德发债票，丧失权利，损害国库，急图补救决议案》，主要内容为：一、政府对德国赔款应根据前政府所提清单交涉，不得减少。其赔款延期之息金，亦应由德政府负之；二、我国前此所负德国债款，除其债票曾依前政府所布期限在驻英使署注册，证明为非德人所持有者外，其余一切德国所有之债权，无论为德政府所持有，或为德国人民所持有，应尽数抵充赔款；三、政府应根据所提各条向德政府交涉，未经依法同意前不得签约。

△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十周年纪念大会，到军民长官来宾百余人。范源濂主席，任鸿隽报告建社经过，马君武演说，主张利用西方科学，改良生产事业，救济人民生计。

△　四川官钱总局开市，发200、500、1000三种钱票，以铜圆局

所出铜圆为兑换基金，纳税通用，票面加盖商会章。

7月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邓泽如、张继、谢持所提“弹劾共产党案”，决议：一、须有表示态度之宣言，二、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讨论办法；三、呈请孙中山决定。推定汪精卫、邵元冲担任起草宣言。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所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彭湃为主任。

△　国民党为反对北京政府德发债票案发表宣言，略谓：北京政府办理德发债票，其行为之诡秘，方法之糊混，用途之叵测，皆足以构成其卖国殃民之罪状，对此实不宜漠视。全国国民团体，宜组织合议机关直接公开处理一切，庶几国民利益不致为少数军阀垄断。类似之金法郎案、各国退还庚子赔款案，国民亦当以同一态度处理之。

△　广州大本营开政务会议，讨论北江防务，决筹设北江前敌兵站，责成财政部副部长郑洪年负责。郑即先办军米5000石，令各县摊解。

△　孙中山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驻校党代表廖仲恺呈，称学生队第一队长吕梦雄私开会议，要求加薪，并欲联名要胁，引起同盟罢职之举动，拟即免除职务，永除党籍，驱逐出境，以儆效尤，而肃军纪等情，指令照准。

△　安徽督理马联甲电令驻蚌埠第一旅长倪朝栋率队往舒城、霍山剿大刀会，并令皖北镇守使史俊玉速往合肥指挥。8日，马联甲召驻省第三旅团长吴大鹤、军署参谋长田锦长及各厅道讨论进剿办法。因六安商民要求保全城池，安庆天主教士因六安教士被掳，亦要求勿操之过急，吴大鹤主张招抚，给资遣散。马乃电史俊玉相机办理。

△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到会20余省区之会

员1040人。董事长熊希龄致开会辞谓，今年希望于本会者：一、开展科学之调查与研究；二、推广平民教育；三、提倡华侨教育。主任干事陶行知作报告，希望创造合乎国情之中国式教育。该会学术会议议决研究蒙古教育之方针，反对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及收回教育权等重要议案。7日，该会议决请政府迅与日本交涉，取消“对支”文化事务之协定。9日，年会闭幕。

△　赣南山洪暴发，南昌城大半被水淹没，南昌以下沿赣江各县及鄱阳湖附近各县遭水灾，九江灾情亦重，为赣省20年来最大之水灾。

7月4日　　驻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中德协定关于德发债票之协定违反国际赔偿委员会之各项规定。7日，法使再次照会外文部，声称处置德产事违背《凡尔赛和约》。9日，法使第三次照会外交部，声明德华银行房产已由中国抵押于中法实业银行，在末赎回前，不能复业。

7月5日　曹锟向国会提出颜惠庆组阁，咨请同意。

△　众议院开会，廖劲伯、叶夏声动议变更议事日程，先议咨请大总统速提继任国务总理，交本院同意，并否认违法派代国务总理案。政府派代表李燮阳则请先议决议员兼任官吏案，众反对，致发生争吵。

△　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向北京政府提出西北边防计划。

△　滇军范石生、蒋光亮将广州士敏土厂交大本营财政委员会接收。

△　奉系代表杨大实偕奉天留粤议员徐清和谒孙中山，询对于中俄协定之态度。孙中山表示：苏俄此次与北廷缔约，不过表面上之敷衍手段，吾辈与苏俄既然为精神上知交，不必拘于形迹，否则不免时

生误会。

△　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在南京成立，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沈嗣良等九人当选为董事。

7月6日　　内蒙因张作霖反对中俄协定，奉俄局部会议即将举行，特派代表包景南到奉晤张作霖，要求将蒙俄问题附带于奉俄问题中进行谈判，所提要求主要为：一、要求撤退在蒙俄军；二、要求苏联将俄蒙私订条约一律废止；三、数年来俄人毁坏界标，任意侵占蒙土，要求将侵土让出；四、商订奉俄通商条约时，酌量蒙古与内地行省不同之情势，加以特别规定等。张作霖表示当与苏俄代表力争。

△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开成立大会，孙中山派林森出席，并代致训词。

△　国民党东京支部开成立大会，提出党员纪律案、宣传事务案等，选举雷昺、李人一、费哲民、郭汉鸣、马念一等七人为执行委员。

△　国民党旅法党员180多人在巴黎举行大会，决议设立总支部，并筹设华工义务学校及募集基金等。

△　旅日华侨代表郝兆先谒广州大本营外长伍朝枢，报告日本取缔华侨苛例经过。伍允即提出抗议。7日，郝与日总领事天羽协商侨工问题。天羽接受郝所提三条件：一、即日取消现定之苛例；二、另定厨师、理发师、裁缝师等入国保证办法，但须得华侨联合会同意；三、劳工上陆条例须以自由平等精神订之。天羽允即日致电日政府，陈述解决意见，候复示到粤再行谈判。

7月7日　　国民党发表党务宣言，申明容共原则。略称：三民主义之革命，为中国革命运动中惟一之途径。革命之基础，自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故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

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惟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是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中央执行委员会郑重声明：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

△　中华民国大学联合会在南京成立。选出会长范源濂、副会长郭秉文，并通过组织大纲六条，规定该会以联合各大学共谋学术上之合作及课程上之联络，促成全国高等教育之进步为宗旨。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

△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兼长洲要塞司令，原任马伯麟辞职。

△　厦门大学去职教授欧元怀、傅式说等九人和学生团总代表罗士清、孙亢曾等14人，在上海设立大夏大学筹备处，租定宜昌路前南方大学校舍为秋季开学之用。30日，在上海召开大夏大学筹备会议，决开办文、理、教、商、预五科。8月2日，招考新生。8日，吴稚晖、汪精卫、张君劢、王伯群、叶楚伧、邓萃英、邵力子、林支宇、陈树霖9人允任大夏大学董事，成立董事会。

△　留日中国同学会发表宣言，谴责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倒行逆施，任意分配庚款，并谴责驻日公使汪荣宝等处理不当。宣言并称军阀专横，祸国殃民，以致庚款未得公平处理。

7月8日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吴佩孚请以俄庚款筑路、以路款兴学案，决定由外交、财政、教育、内政、交通五部开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实行办法。

△　苏联代表因北京政府外交部对6月4日所提移交俄舰要求未作答复，是日再次提请中国政府移交此项俄产。外交部于16日答称：各船中白党长官水手600名甚难制服，故移交事宜迟延未办。22日，加拉罕复向外交部抗议吴淞口俄轮迟不移交，要求北京政府下令解除600匪军武装，移交船舰。

△　英、日、法三国公使因广州大本营另组盐税局征收盐税，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联合提出抗议，并令广州领事团向大本营外交部抗议。

△　陆荣廷与沈鸿英议和息战，约定抚河以上属陆，抚河以下属沈。

7月9日　　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许绳祖等14人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谒顾维钧，继访颜惠庆，由外交部参事朱鹤翔及颜之秘书吴炳南分别接见。许等申述三点：一、反对张国淦为俄款特别委员；二、各校经费积欠10月之多，学校与个人均不能维持，请设法补救；三、反对张国淦、罗文幹蝉联教育总、次长。

△　六安大刀会一部攻占霍山，宣称驱逐马联甲。马联甲电调第一旅等往剿，总计各路援兵有七八营之多。10日，江苏督理齐燮元令陈调元率一团至蚌埠及宿县协剿。马联甲严令皖省各军速克六安，以拒外省军队入援。

7月10日　　中国国民党就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事发表宣言，反对以庚款筑路导淮、再以筑路导淮之收入兴学之说，主张应由教育团体组织委员会保管庚款，审定其用途，务合振兴文化之旨。

△　冯玉祥宴孙洪伊及民治社议员，疏通颜惠庆组阁案，劝与当局合作。其他反颜派亦多数被邀。

△　顾维钧就庚款用途事函复吴佩孚，略谓：“美庚款已指定专

用，英款亦以文化事业为主，日款自行支配，俄款已切实规定，如变更原议，另指用途，转恐易生枝节。惟教育基金既需生利，可投资我国铁路事业，不妨设一总公司，发行债票，保障较固利率，届时不难劝委员动用基金，购买股票。”吴佩孚乃致电曹锟，主张俄款委员须以赞成筑路者担任。吴之驻京代表劳之常向顾维钧、吴毓麟等建议，请以王正廷为委员。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略谓：为实施商标法，中国已向瑞士万国商标联合会延聘专门人员，以备咨询。

△　江苏特派交涉员许沅就智利领事要求领事裁判权事函复智利领事，略谓：前奉外交部训令，中智条约并无领事裁判权之规定，至于函开《中瑞条约》签字在中智缔约之后，而彼享有治外法权。殊不知《中瑞条约》五款外，另有附件专条，声明瑞士享有领事裁判权。中智条约无此项附件声明，当不得强为比拟。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令驻美公使施肇基与智利驻美公使交涉，将中国意见转达智利政府。

7月11日　　孙中山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以辅助总理，应付时局，策划政治之方针”，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孙中山自任主席，聘俄人鲍罗廷任该会高级顾问。是日举行首次会议，议决：一、指定伍朝枢为秘书；二、决定关于摒除排外宣言之大旨；三、派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樊钟秀、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伍朝枢九人为军事委员，俄人高和罗夫为顾问；四、派古应芬、甘乃光、彭湃为农务调查委员，鲍罗廷为顾问；五、派廖仲恺、汪精卫、伍朝枢为商务调查委员。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胡汉民所提“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权限”一案，规定：一、关于党事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由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二、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决定办理。

△　孙中山明令重申兼差不兼薪之规定：凡在大本营及大本营直

辖各部、处、署、局、司、会兼职人员，除原职仍照现支额数支薪外，其所兼职之薪水，应即以二成发给，以节公帑。

△　曹锟特派叶举兼任督办广东治河事宜。

△　曹锟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荷公使王广圻、驻英代办朱兆莘为出席于日内瓦召开之国际禁烟会议全权代表。

△　北京国务会议，王正廷提出5月份军政费支配修正清单，决定军警费照原经费八成、国会七成、教育七成、普通机关五成发放。顾维钧报告，吴佩孚及各方面一再来电，要求公布德债内容，决于12日公布中德协定全案及换文等件。据马联甲报告大刀会攻陷六安，决令马督饬前方军队限期扑灭。

△　顾维钧宴外交委员会部分议员，代颜惠庆疏通同意案。12日，程克邀宴议员疏通颜阁同意案，并为本人疏通留任。

△　经营胶澳盐业之永裕公司在青岛成立。

△　日商明治制糖会社以资本日金3715万元，在上海杨树浦设立明华制糖厂，要求中国免税，以与香港糖竞争（按：当时中国所用糖只香港与日本二种）。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就该厂要求免税事，于是日及8月10日二次分电北京政府农、财、外三部，认为此例一开，关税主权丧失殆尽，要求政府严行驳复日商。

△　鄂省教育会教职员联合会及小学教职员联合会等五团体合组湖北教育基金委员会，决定向中央催索财政、交通两部积欠鄂省原充教育经费之米厘股本，并争回盐斤附捐，进而争摊庚款一部拨作鄂省教育基金，并由每团体各推代表二人，组织请愿代表团北上。

7月12日　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中苏两国互派大使。

△　北京政府外交、财政、交通三部根据国务会议11日决定公布

部分中德交涉文件11种。

△ 驻京荷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签字国答复北京政府外交部6月27日关于交还俄使署之照会，略谓：《辛丑条约》规定，在使馆界内之各种资产，皆隶属于国际的地役权之束缚下，中国政府及《辛丑条约》签字国皆受此束缚。且1920年起各国代表负保管俄国使团及各项财产之责。故请外交总长居间转邀苏联代表与外交团领袖直接交涉，以便维持外交团内各种规则。24日，顾维钧请美使舒尔曼以签字于《辛丑条约》中最老之外交团资格，与苏联代表加拉罕直接会谈交还俄使馆问题。

△ 驻京法使傅乐猷离京转沪回国述职，临行前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解决金法郎案。

△ 前皖督倪嗣冲于天津英租界本寓病卒。8月9日，曹锟令褒恤之，追赠倪为安武上将军，派员致祭。众议员李燮阳闻悉提案质问，列举倪之祸国罪状。

△ 天津“中华坚决救国团”等对塘沽日船“海鲁布丸”殴毙华人案进行实况调查后，召集30余团体代表40余人开会，组织“天津塘沽外交后援会”，并决议：一、请交涉署向日领严重交涉，引渡凶犯；二、通电全国请予一致援助；三、致电日本各机关、各报馆促醒日人，嗣后对华不得再有藐视行动。13日，沪日领派人将殴毙华人之吉本、濑户口、宫本三犯自大连解押至天津，交天津日领署司法科预审。22日，天津日本副领事田岛暨司法官宇佐美称，“根据日司法程序，领事馆预审重伤罪，须将案犯送交长崎复审”。又称，“此案现未查阅，予审期未能宣布”。

7月13日 湘军宋鹤庚部第六师长王德庆率部由横芙头驻地经锦场渡河，投附林虎。宋电请谭延闿将王德庆免职通缉。21日，谭在广州召开湘军将领会议，决发联衔通电拥护孙中山，停止与林虎议和。

22日，孙中山令各军长官饬属严办王德庆。

△　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等京内外50余团体及在京国会议员等各界人士230余人，在中央公园举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成立大会，选雷殷、王文璞、胡鄂公、周道文、谢复初等15人为执行委员，通过大联盟成立通告书，宣言向列强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50余团体为英舰逼万县知事枪毙船户华人案，联名致函外交使团领袖公使欧登科转英、美、日、法公使，要求凡扬子江一带不得再舶外国兵轮，至于万县寻衅，责在英、美，英、美公使应向我国政府道歉，对被害者家属负责抚恤赔偿。

△　闽省各县旅京联合会开紧急会议，议决：一、反对军阀兼省长；二、请中止军事善后借款；三、请禁止厦门海军公卖烟土；四、赞助闽省水灾赈济事务。并将决议通电闽、厦当局。

△　广东省教育会通电反对齐燮元、吴佩孚所倡以庚款导淮筑路，以其赢利为教育经费之说。

△　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到会者计有日、英、德、法、芬等国，太虚法师主持。议决下次大会以“东亚佛教大会”名义，于明年在日本举行。

7月14日　广州沙面租界华工为要求取消华人出入须备执照之苛例，除选派代表与沙面当局交涉外，于13日及是日集会，决定如15日下午6时前不撤销苛例，一概离去沙面；并组织沙面苛例大会事务处，举委员21人部署一切。同日，以“洋务联合工团”名义发出传单，声称：“本日由各界联合取消沙面苛例大会公决，准15日下午前一律离职，静候解决。”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加拉罕，并电驻苏代表李家鳌转告苏俄政府：决定中苏互派大使。上海俄领事署定7月24日交与苏俄代表，烟台领事署业已移交。

△　国民党为“中俄协定”发表宣言，指出：“中俄协定之成立，其中俄国对于中国放弃其从来获得之特权，及废止从来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皆俄国根据其革命主义所自愿抛弃，绝非北京政府所交涉而获得。”

△　北京政府外交、财政、交通、教育四部联席会议，讨论吴佩孚主张以俄庚款筑路问题，因顾虑使团及教育界反对，未有结果。

△　英、美、日、法四国新银行团在伦敦开会，决定对华借款合同再续五年；19日讨论对华铁路投资，英主张不受合同拘束，可就固有路线收入投资展线部分。美与英默契，法则反对。又英主张四国投资中东路使成国际性质，美则表示资力不等国家不能合作。

△　“蒙古政府首领会议”在库伦举行，与会者主张对中国宣言独立，“陆军总长”丹反对，并谓实力亦不足以自立。丹被疑为北京政府潜伏之内奸，即遭捕杀。库伦戒严。

7月15日　下午2时，沙面华工800余人相继离开沙面，赴西瓜园住宿。英国水兵登陆维持自来水工作，但洗扫煮食及照料幼儿等事无人侍役，粮食无人运输，餐食无人供给。各银行、洋行完全停业。英、法两领事急函广州大本营，请向华人疏通。大本营派兵工厂厂长马超俊前往调解，工人正在西堤茶居工会开会，当即向马表示，苛例不撤销，无磋商余地。下午，孙中山派陈友仁赴沙面，向英领等要求取消苛例。

△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直隶、福建、江西、湖南赈灾案，议决由政府发急赈，并明令劝捐。会议并通过王正廷所提自民国十四年（1925）1月1日起改换新印花税票案。闽省长萨镇冰辞职，议决慰留。

△　苏联代表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本人业经苏联政府特任为驻华全权大使，请定期递呈国书。”

△　孙中山派蒋介石为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为各军政治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许崇智为筹划广州防务委员会委员长。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孙镜亚为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是日孙接事。

△　冯自由离粤，临行前致函要求孙中山："一请公毅然向党员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二应将共产党员一律除名，并将引狼入室之汉民、仲恺、精卫等严重惩办，以为徇私害公者戒。"

△　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合并，改为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

△　北京八校教职员于是日、18日、25日在法大三次集会，议决庚款应专充教育基金，反对用以筑路，请全国教育界一致力争；催促政府迅速发表俄款特别委员；教育经费及积欠问题再向顾维钧、王正廷交涉；反对张国淦长教育；定期召集教育基金委员会；对于召开四部会议讨论庚款筑路的办法根本反对。

△　会商青岛盐输日问题之中日委员会议决裂已近三个月。是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永裕公司注册问题已解决为理由，照会驻京日本使署，请其转达日本盐专卖局速令前此列席委员到京续开会议。但日方认为中日盐务会议决裂之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盐输出税率等问题，不能轻表同意。

△　京津附近数百里间，自3日起久雨不止，永定河水大涨，决口溃堤300余丈，沿岸尽成泽国，京津市街漫水，交通一时阻断。永定河下游及子牙河、运河等先后水涨，沿京汉、京绥、津浦各路皆遭水灾，保定遭灾尤重；张家口平地水没丈余，5000余人无家可归。京兆、直隶灾区50余县。

7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政治委员谭平山辞职照准，派瞿秋白递补；决定命令因抗议贿选南下之国民党籍议员回北京奋斗。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释近时党内外各种误会，宣言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惟一途径。

△　李宗仁在南宁旧督办公署就定桂联军总指挥职。以张一气为广西临时省长。同日并在南宁通电，请陆荣廷辞广西边防督办职，即日宣告下野。

△　孙中山令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将士敏土厂拨归省署管理，以所得余利连同前拨北江石矿收入，悉数拨充广东大学经费。9月24日，又令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在省河盐税项下，以盐每包附收大洋四角，拨充该校经费。

△　北京政府就中德协定事驳复法使馆，略谓：中德协定之实施，因我国既未加入国际赔偿委员会，自不受该委员会之约束，也不受德国对协约国担任义务之影响。

△　北京参议院讨论金法郎案，决定由今日到会人全体署名，致电法国国会拒绝赔款用金。

7月17日　广州沙面华工联合会通电全国，略谓：沙面英领以炸弹案向我国政府交涉，无理要索，藐视我国体如无物，又迁怒华工，颁布苛例12条，视我华工如俘虏，故忍痛牺牲，全体罢工。倘英领仍不取消苛例，则誓不回沙面复业，以争国体而全人格。

△　晚，广州沙面方面派于仁燕梳公司大班罗鲁士，偕英国领事私人代表谭礼廷谒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声明新例有磋商余地。伍召工会代表11人会商，工人提出四条件：一、永久取消沙面12条新例；二、恢复华人原职，不得借故开除；三、因新例而离工时，工薪

不得扣除；四、东西二桥须晚12时方得关闸。18日，谭礼廷到工会答复工人所提条件，表示英领对一、二、三条可照办，第四条所提关闸时间太晚，只允照向日办法。工人认为须有英领签字方能复工，拒绝以私人名义调停。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日本苛待华侨订有苛例，决交政治委员会办理，予侨胞以援手。

△　湖北教育界要求加薪改发现洋，教厅召集各校校长及教联代表，议决三项办法分途进行：一、积极进行加薪改现；二、派代表晋京，力争盐斤加价及米厘公股；三、由校长团、教育厅各团体组织基金委员会。

△　皖军史俊玉对六安县大刀会下总攻击令，各路援军齐向六安城进攻。大刀会在码头集及木厂埠进行抵抗，又陷距舒城县50里之梅河镇，官军后防危险，进军迟缓。城内的商会会长集现款2.5万元送给大刀会，要求退出县城。晚，大刀会首领夏云峰等携款出城，一股西向霍丘，一股南向霍山及豫境。18日皖军入城。

7月18日　曹锟任命何光烈为四川陆军第五师师长。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汇丰银行借款三万元，拨充永定河抢险费。

△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发表废约宣言，表示愿以和平友谊的手段，联合我国民并世界同志，要求帝国主义国家速将国际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撤销，并声明我国国民之言论自由，绝对不受无理的干涉。

7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在京招待外国记者，答复各项外交问题：一、中东路外国债权在中俄协定签字之前为正当合法，现时依然；二、俄国使馆问题正在考虑外交团最近送来之照会，将尽

力使此项问题圆满解决；三、关于奉俄交涉，迄未接有正式报告，一切外交事件应由外交部与各国办理，各地方政府虽有奉中央政府之训令而与外人订立地方协定者，但如不经北京政府之认可，亦决不能发生效力；四、中暹派领考虑已有十余年之久，目前尚未切实决定进行方法；五、西藏问题政府迄未接驻藏委员之正式报告，中、英间尚未开始西藏问题之交涉；六、威海卫接收交涉无进展，中国正筹从速了结之办法。

△　法国驻广州领事出面调停沙面事件，与沙面工部局长高路士、马超俊、谭礼廷会商办法。马谓华人只有要求将12条例取消而已。下午法领事访马，云领事团开会，各领事允许取消12条例。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廖仲恺、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刘芦隐，请在两星期之内提出工会条例草案。

△　孙中山令准廖湘芸辞虎门要塞司令职，任命陈肇英继任。

△　陇秦豫铁路督办赵德三为修筑陕州至西安一段铁路，与比国铁路公司代表柯鸿年签订《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续订附件》。

△　香港陈炯明之机关报《新闻报》社长陈秋霖及报社同人黄居素、陈孚木、古爱公发表宣言，表示非与国民党合作不可，悔为陈军效力多年，“决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21日以红字易名为《中国新闻报》。

△　美国旧金山华侨电上海《民国日报》并转工、商、学、报各团体，谓美国苛禁侨民入境，昨“林肯”船新来华人男女学生、商人均被批驳回籍，望设法援助。

△　国民党墨西哥支部踊跃筹饷援粤和北伐，是日署理支部长麦兴华汇粤港银954元，计自4月份以来共汇4872元。

△　北京政府通知各地邮局，禁止寄递以下书刊：《自治旬

刊》、《陈独秀讲演录》、《上海工会报告》、《劳动旬刊》、《工人周刊》、《青年工人月刊》、《劳动周刊》、《中国青年》、《新建设》。

7月20日　沙面华人代表马超俊、邝达生、施卜、邓汉兴、黄汉泉偕英领私人代表谭礼廷等，赴英领事署会商取消新例。马等提出五条：一、永远取消沙面12条新例及其他不平等之待遇；二、恢复华人离职前之原有职守，不得借故开除；三、因新例离职华人薪金于离工期内得继续支付，毋得扣除；四、夜间须11时关闸，如过11时须由东家负责工人得自由出入；五、凡在沙面作工时间最迟不得过下午9时。如遇宴会不在此例，不得过10点半钟收工。英领事允将新例12条取消，惟坚持华人应领照；对其余各条均持异议。华方代表认为未得完全解决，匆匆辞出。21日续议，英领提五条件。华方代表认为此五条件与12条苛例相比，换汤不换药，当即声明决不承认。

△　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通电声明联盟之宗旨及任务：一、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政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凡愿加入本联盟反帝国主义者，本联盟即认为同志；三、本联盟若发现帝国主义走狗，充作帝国主义之汉奸者，本联盟亦必用扑灭帝国主义之手段以扑灭之；四、除反帝国主义之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同日发表致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声讨列强书，号召全世界被压迫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　北京国会议员95人联名电法国总理，请废除中法之间之不平等条约，并请召回现驻华公使，另派适当人员使华，以改善中法关系。又电法国左翼联盟党，请抛弃金法郎要求，善意退还庚子赔款。

7月中旬　加拉罕所派代表自奉回京，将《奉俄协定草案》面呈加拉罕。奉方亦派史俊民等三人至京协商。加拉罕表示须将草案电呈苏联政府复核后，再与奉方进行正式会谈。

△　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山东临时省党部分别成立。

7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农民部所提组织广州市四郊农民协会案及青年部所提组织学生军案，并通过对上海党员训令，禁止排外举动。

△　加拉罕为退还庚款事照会顾维钧，略谓按照5月31日订定之声明书规定，中、苏须选派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管理及分配俄国部分庚子赔款，请从速选派该会中国委员。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员访北京外交团，商请各国公使一同升格为大使。各使表示请示本国政府。

△　东三省陆军整理会议开会，张学良主席，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等副之，各师旅团长等60余人出席，讨论划一军制、野外战斗、举行检阅、严守军纪、整顿骑兵炮兵等问题。

7月22日　李宗仁、白崇禧分别率部进攻柳州沈鸿英部。适驻柳州之沈部师长何才杰由柳返阳朔为母祝寿，途中被陆荣廷溃军击毙，李、白乘机全力进攻，8月6日攻占柳州。

△　英、法驻粤领事谒见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要求解决沙面罢工事件。25日，伍朝枢函促英、法两国领事让步，以期早日解决沙面罢工事件。

△　广州反对沙面苛例大会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与英领接洽之经过，决定沙面当局如不无条件撤销苛例，决不复工。又决定：一、经济绝交，联络华人资本家请其援助；二、联络香港工人一致进行。23日，广州各工团决定演戏筹款，救济沙面离职华工。

△　颜惠庆组阁一案自提出以来已及五旬，国会因意见分歧，尚未予以同意。是日，北京国务会议决定报告曹锟，并再备咨文催请国会早日议决。

△　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中央政法专门学校、通才商业专门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平民大学、华北大学等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均经先后核准立案。

△　直、鲁、豫等省议会在天津成立省议会联合会，发表宣言反对国会代制省议员选举法。

△　武汉97个团体以日本驻汉总领事林久治郎徇日侨之意，至汉不及一年，日人逞凶杀人屡见，有恃无恐，虽经国人抗议警告，均无解决之途，是日通电要求将该日领撤除。

△　吴佩孚派遣“援粤”之胡景翼陕军指挥官马献章率千余人为先锋队，开至大庚岭，27日袭击南雄。广州大本营分路迎战，诱至九渡水触地雷，马始率部退去。

△　陈炯明南路军在高州开军事会议，邓本殷主席，吕春荣、申葆藩、苏廷有列席，八属联军军务督办林俊廷亦派代表与会，决定维持八属地盘，高、雷、钦、廉、琼崖各军一致合作互救，脱离陈炯明范围，固守八属，待机发展。

△　驻粤东河源、连平迤北之林虎各部拟由河源取道连平，冲出北江，以与吴佩孚所派由赣入南雄之“援粤军”夹攻大本营联军。许崇智命张民达师由北江河头站取道翁源，攻击连平。是日张民达部抵达连平之坡头，分三路进击林虎之李易标路。24日，张部占连平城外20里之密溪山峰，林虎即由回龙抽调王定华、黄任寰、黄业兴等部6000余人反攻，何成濬部增援张民达部，两军在密溪山血战二昼夜，张、何始突围退至坡头。是役张部损失300人，连平战事暂停。

△　驻粤南海属九江镇之滇军蒋光亮部保荣光旅，屡向商民勒抽苛捐，洗劫百姓，商民乃召北江吴三镜民团与该镇商团共抗滇军。是日，吴三镜部向滇军猛攻，滇军退沙口，死伤500人。23日，旅广州南海属九江公会议决请孙中山饬滇军克日离防；筹款请商团总部派商

团军到九江镇压。25日，蒋光亮由广州调大队往援。29日，九江滇军分11路向民团攻击，纵火焚烧六约、太平民房，30日战犹未息，九江商民因大火损失甚巨。8月3日，旅沪九江人士电孙中山请立撤滇军，并电请商团总部陈廉伯派队入境。7日，滇军离九江开回佛山。11日，旅穗九江人推举代表谒孙中山请示善后，孙中山准九江自卫，永不驻防。

△ 皖大刀会围攻合肥县城，自次晨5时起至24日上午9时，与马联甲部徐涟营血战一昼夜，后向西、北两路溃退。

7月23日 北京参议院开会，盛时要求先议“咨请政府明令撤销颐维钧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之违法命令，以保宪典而符法治决议案”，并说明提案理由。因会场引起纷扰，无结果散会。

△ 广州大本营为18日在广州落水遇难之苏联顾问高和罗夫将军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鲍罗廷、廖仲恺等和各界群众万人到会志哀。

△ 汇丰、汇理、道胜、正金四行联名致函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称：“民国七年李思浩财长任内曾有函声明，将来不许德华银行恢复战前状态。中、德所订德华银行复业换文，违反民国七年中政府声明，四行应将应交回中政府款全部留置，以促中政府之反省。”

△ 吴佩孚派方本仁为“援粤军”总司令，以支持陈炯明。

△ 杭州《新浙江报》因登载外籍传教士梅藤更汽车横冲直撞新闻，于是日深夜被警厅封闭，主笔朱采真被捕。次日，该报代电各团体要求声援。

7月24日 广州沙面华工继续罢工。租界当局经日本领事调解，英领允即取消新例，惟仍坚持晚10时后华人必须持用贴有照片之通行证。罢工工人坚不承认。是日，香港太古、渣甸、亚细亚三洋行华工

数千人声援沙面华工，均离职。26日，各工团电英国工党，声明沙面苛例违背国际平等与公道，并向英首相抗议。27日，湖南工、农、商、学各团体呼吁一致反抗沙面事件，并致电沙面罢工团表示声援。28日，海员工会通告，渣甸、太古各轮之海员一律罢工声援。29日，上海总工会筹备处、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上海店员联合会分别通电声援沙面罢工案，并电请广州当局力予援助。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准张静江辞中央执行委员职。

△　沪俄领署由交涉员陈世光移交苏联代表依勒德及帮办司克罗夫。烟台及天津俄领事馆亦先后移交苏联领事馆代表接管。

△　厦门交涉署咨领事团，以国民党人方声涛、张贞等七人潜匿鼓浪屿，集党人50余，希图煽惑泉州高义部队，扰乱闽局，奉督理周荫人令要求引渡。领事团长美领拒绝引渡，但允饬工部局监视。是日，鼓浪屿会审公堂据交涉署再次咨请，会同工部局至林知渊家搜捕方声涛，方避厦门五洲旅社。

△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款委员会通电主张庚款悉数作扩充教育及文化事业之用，吁请国民一致主张，以为后盾。8月17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第六届代表大会通电声明主张庚款兴学，倘有野心家垂涎攫取，即以国贼视之，誓死反对。19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合会、广东大学等发表宣言，指出以庚款筑路不啻奖励军阀穷兵黩武，表示坚决反对，强调庚款应直接用于全国教育事业。

△　江苏交涉署函告上海总商会及国货维持会，称日本通告奢侈品进口税值百抽百。上海总商会、苏州总商会等各团体认为该项税则与日货进口税值百抽五者相去悬殊，乃迭电当局及驻日公使汪荣宝反对该项税则，请日磋商修改。日本无视中国方面之反对，于31日起实

行奢侈品值百抽百之税则。

△ 华洋义赈会以公共捐款不敷赈灾，是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海关赈灾附税议案送达北京政府及北京外交团，提议：一、海关征收附税以充赈款；二、附税收入拨交本会经营；三、此款由政府、外交团及本会以同数代表所组织之联合委员会支配之；四、赈务由本会办理之，以证明赈款之国际监督；五、本会前已采行之以工代赈原则仍当照办。

7月25日 北京众议院讨论颜阁同意案，反颜之孙洪伊派民治社、吴景濂派民宪同志会议员吕复、陆昌烺等事先商定先发制人，开会后即临时动议，变更议事日程，提出先议全体国务员弹劾案，颜阁同意案未获结果。

△ 北京国务会议，顾维钧表示，对于国务总理一席，原已声明作极短时间之兼代，正式内阁必能依法产生，已嘱瞿代秘书长赶速预备交代。旋议赈灾附捐案，议决为救济长江各省区水灾，先办路、邮、电三项附捐，以六个月为期，航政附捐应由税务处决定。关于加拉罕催派庚款委员事，因吴佩孚有移庚款筑路计划，决缓选派。

△ 熊炳琦所设山东省银行、高恩洪所设青岛地方银行均请发行钞票，北京国务会议准分别发行500万、300万。8月8日曹锟批准。

△ 孙中山以军饷浩繁，度支奇绌，令自8月1日起，大本营各直辖机关以及各民政、财政机关所有职员薪俸，除已经减成发给者仍照旧支给外，职员薪俸凡在500元以上者概以七成发给，在300元以上者以八成发给，在200元以上者以九成发给。

△ 法国驻京公使就中德协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又提通牒，谓德国违反德、法成约，中国不得以未加入国际赔偿委员会为词而擅与德国处理德发债票之问题。

△　日本驻奉领事船津告张作霖：日使芳泽即将由日返任，届时将与张商洽下述诸事：一、芳泽即将与加拉罕开始交涉，有与东省问题关连者，拟预先交换意见；二、日本拟扩大驻京公使及“满铁”社长之权限；三、东省及日本与俄将同时举行会议，于日、奉间政治“提携”事件，必多涉及，拟详加讨论，分别存废。

△　江苏省议会通过省自治法案、省议员延长任期案及县议会延长任期案。

△　曹锟授王汝勤为陆军上将。

△　湘省第二师师长叶开鑫电促省议会从速成立修宪会议，修改省宪。

7月26日　北京政府为筹措赈救灾款，由交通部训令路、电、邮于8月1日开征附加赈捐，至明年2月止。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改订《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凡16条。其中规定自费留学生资格须具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者或办理教育事务二年以上者；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28日又公布发给留学证书规程11条。

△　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教育经费等问题访顾维钧，顾对教育经费及积欠问题允与王正廷商量设法接济；对俄款特别委员人选问题催促教育、财政二部从速办理；对反对张国淦长教育问题无确实办法。28日，又访王正廷，王对教育经费问题除诉穷外，则谓拟筹较大款项，以资根本上整顿。

7月27日　广州大本营召开政务会议，讨论8月1日起各机关减薪案、维持省纸币案、造币厂暂停铸案，均照原提案通过。

△　北京反帝大联盟在中央公园开欢迎新闻记者大会，到120余人，胡鄂公主持，雷殷委员致欢迎词，略谓：今为救国计，拟联合被

压迫、被宰割之各邦互为声援，以解放、平等、自由为目的，以稳健和平手段进行，希望新闻界予以援助。周达文委员代表该盟表示欢迎新闻界加入。全体到会记者，一致加入反帝大联盟为宣传委员，并成立宣传部，推举方梦超、龚德柏等12人为宣传部书记委员。

△　外蒙青年党领袖罕喀贝子到奉见张作霖，要求：一、协助青年党建设自治政府，废除王公制；二、苏联速撤驻蒙军队，派奉军赴蒙接防；三、在奉设立蒙政府办事处，以利蒙事接洽，并由奉派专使驻库伦，以便对蒙政府随时支持。张作霖表示满蒙原属一家，应互相援助，并聘罕喀贝子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蒙事咨议。

△　厦门商店为抗纳公安济用捐，一律罢市。商会召集会董开会，海军警备司令部派副官及支应局长到会，表示减轻公安济用捐率。30日商店复业。

7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举行农民党员联欢会及市郊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到广州近郊农民2000人，由彭湃主席。孙中山、廖仲恺演说，详述中国农民之地位及国民党与农民之关系，希望农民觉悟团结。

△　联省自治会在沪召开第三次筹备会，章太炎主席，汤漪、潘大道、黄云鹏等10余人出席，决定致函各省长及致电各省议会。致各省议会电略谓："欲谋民国之统一，首在打破蹂躏省权之势力，而以各省为同流共进之单位。欲谋国宪之成立，首在消灭谬托法统之国会，而以联省会议为根本解决之枢纽。欲得联省自治之实际，首在却还伪宪赋予之自治，而以人民自决为特立独行之主张。由是集合同志，共筹联治社之发起，以贯彻上述政策为职志。"并提出"打破旧有一切团体，以联治主义为结合之中心，或就当地筹备支部之发起，或推代表参加本部筹备之进行，庶几保持国民正谊，造成有力政党"。

△　胡景翼抵赣州开军事会议，决定8月5日攻粤，以陕军6000人

任前锋。蔡成勋及高凤桂部为后方警备。

△　上海市民对外协会、上海市民协会、机器工人俱乐部、店员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工团联合会、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等30余团体发表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8月13日，又成立上海废约运动大联盟。

7月29日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10余人，因往访顾维钧与王正廷未得良好结果，是日在法大开联席会议，议决：30日同往教部，要求教育总长或次长偕赴财部索款；即日电英政府及国会，建议将英庚款用于教育事业；并电蔡元培赴英伦力争实现此主张。8月2日，北京教育界在北大开会欢迎加拉罕，加致答辞，谓主张俄庚款用于教育事业及对农民问题的研究。

△　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向三井物产会社借款日金23.5348万元，年息一分，期限二年，用以垫付1918年1月5日借款利息。

△　粤省署财政会议通过禁用港币案，规定港币不能直接行使，交易不得以港币为本位，以抗议英领事坚持沙面苛律。

7月30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偕同苏俄大使加拉罕往访北京外交团代理领袖公使美使舒尔曼，会商收回前俄使馆房产事。当日顾并正式照会舒尔曼。

△　广州沙面租界各洋行大班出面调停罢工事件，推代表到反苛例会询问意见。答称：如英领取消第五条，允华捕复职，则其他四条有磋商余地。8月4日，英领召各大班会议，坚持不能全数用原华捕。

△　旅德中国国民党通讯处改组支部完竣，执行委员廖焕星、李育九、夏秀峰、高语罕，候补执行委员朱德、郑太朴、连瑞琦。

△　湖北襄河上游于上旬告灾，武昌汉阳门江岸已没，汉口市街多成泽国。17日，夏口长丰堤决门两丈，淹没万余家，嘉鱼、圻水、

黄梅、黄冈等均报灾。24日，沔阳平坊决堤，冲没抢险工人百余名，武昌西北湖堤决口两丈余，淹没田庐甚多，损失极重。是日，汉口水势有涨无退，沿江街道多淹没于惊涛骇浪之中。31日，汉口成立邻省水灾赈济筹办协会，推萧耀南为会长，定湘、赣、直、闽、鄂五省为赈济地区。

7月31日　苏联首任驻华全权大使加拉罕在北京怀仁堂向曹锟呈递国书。

△　国民党发表反对金法郎案宣言，略谓：本党主张从根本上反对金法郎案，勿使北京伪政府得所凭借，以纵其祸国殃民之欲。以全体国民之力，锄北京伪政府而去之，庶内政外交得以昌顺。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派常务委员邵元冲、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马超俊慰问沙面罢工工人。

△　中华学生废约同盟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开会，议决与反帝大联盟通力合作，并函北京外交团警告不能在我国境内继续侵凌同胞，并迅速取消不平等条约。

△　北京银行公会开会，认为财政部以用新废旧办法整顿印花税票，使各银行遭受损失，决请财部撤销，并通电全国商会拒用新票。

△　广州大本营政务会议审查通过《中央银行条例》草案，规定资本第一次定为毫银1000万元，由募集国外债款充之，俟将来业务推行，再呈请政府继续增加。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孟禄博士为美国退还庚款事离美来华。

△　江苏省教育会、省立学校联合会、省教育经费委员会三团体就全国烟酒署增加二五税，停止卷烟特税事电北京政府表示反对，并通电江苏各县教育会一致力争，谓将我省征收营业税之主权，听受外人干涉，误国丧权，将伊胡底。

是月　北京政府财政部允将交通部所借日本电信借款展期二年，年息八厘改为九厘。

△　萃蚨昌银号总号在山西太原设立，董事长郭进臣，总经理曹铭。

△　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改称上海艺术师范大学。

△　我国瓷器运往日本，被指为奢侈品，值百抽百，征收苛税。上海瓷业公所函请县商会转呈江苏省公署速向日本抗议，取消苛税章程。

8月

8月1日　北京众议院第二次讨论颜内阁同意案，反颜派以弹劾全体阁员案抵制，会议争吵不已，一哄而散。

△　皖大刀会占英山。萧耀南因英山与鄂省罗田接壤（英山当时属皖），宣布戒严，并于3日晨派鄂军刘佐龙部第四旅第七团团长陈尧鉴直逼英山县城，缒城而入。大刀会不支，向太湖方面逃去。

△　上海、天津等地商民自是日起纷纷集会，通电反对日本政府对我实行奢侈品入口税律，认为其结果无异于经济侵略，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　日使芳泽由日回任，道经奉天，晤张作霖商量重要事务。

△　上海总商会、上海机器面粉公会、上海华商粮食公会、苏州总商会、杭州总商会等团体纷纷通电，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征收路、电、邮、航关税附捐。

△　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开幕，代表百余人出席。2日，选出褚辅成为主席，叶焕华、莫永贞为副主席。11日，选举起草委员沈钧儒等49

名，成立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以殷汝骊为委员长。

8月2日　　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黄隆生、林丽生为副行长；派胡汉民、叶恭绰、廖仲恺、邓泽如、林云陔、孙科、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董事。7日孙中山核准公布《中央银行条例》，凡15条。

△　北京国立八校代表集会欢迎加拉罕，会后发表宣言，要求庚款用于教育事业，反对移充筑路。

△　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上海市市民对外协会、武汉国民对外同志会、松江国民外交会等，自是日至23日，先后通电声援沙面反苛例大会。

△　江苏省教育经费委员会、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立学校联合会、上海总商会、无锡纸烟公会、南京各团体、杭州总商会等团体自本日至21日纷纷发电，反对北京政府烟酒署与英美烟草公司密议停止卷烟特税，增加卷烟地方营业税。

△　天津红桥被水冲断塌陷，堤岸塌崩。3日，子牙河千里堤决口70余丈，文安等县灾情甚重。4日，海河浮桥冲塌，抢护工人溺毙20余名。6日，涿州山洪暴发，直冲永定河，丰台左近之浑河东岸堤溃决300英尺。涿州四乡水深逾丈。

8月3日　　北京反帝大联盟开第四次执行委员会，通过以9月3日至9日为中国反帝运动周，并致电上海市民对外协会等30余团体，请组织上海反帝大联盟。8月23日，上海反帝大联盟成立。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彭素民病逝。广州市各党部下半旗志哀。彭家贫无担石储，医药费及治丧费悉由廖仲恺所赠。

△　赵恒惕通电赞成用庚款筑路，并主张先从粤汉、川汉两路兴

筑，然后以两路逐年收入余利拨作教育基金。

△　滇军第三军军长蒋光亮自与第四师王秉钧启衅后，自知众叛亲离，且年来截收广三路款百万余元，乃退居香港，嘱军部总参谋长李根沄代军长职。7日，该军第五师师长胡思舜奉杨希闵命接任该军军长职，随即带兵前往石围塘武装接事。10日，李根沄率部退至石围塘对岸之芳村、花地一带。11日，孙中山以蒋光亮通敌，将其撤职，任命胡思舜为滇军第三军军长。

△　山东省外交协会电北京政府，反对日本在鲁省土地悬案解决前开设胶济路沿线商埠。

△　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以报道时事、分析政治为主旨。

8月4日　　北京国会议员谷嘉荫等致电法国国会及内阁反对金法郎案，略谓："前承贵国总理在华盛顿时向我国代表面许退还庚子赔款未经付清之年金，作为振兴教育事业之用。不料所分配者不满总数十五分之一，其大多数乃抵偿中法实业银行欠款及恢复该行之用。且又欲变更辛丑换文，并违反向来汇兑用纸币计算之惯例，要求用金付给而增加国库负担7000万以上之巨。群情愤激，国会遂一致议决，咨达政府绝对拒绝改纸用金之办法。即有一二当局因与中法实业银业关系密切，不惜违反公意，亦决无实现之可能。希从速抛弃赔金之主张。"

△　曹锟任命费东明为四川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

△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六届年会在上海复旦中学举行开幕式。恽代英演说谓："学生会之重大责任，即在唤起全国农、工、商三界之注意，共起为监督政府之行为，以图根本上杜绝卖国之行动，使当局者欲卖而不能。"吴稚晖、于右任、施存统、邵力子亦演说。

△　熊克武部川军汤子模、贺龙由黔边援助蔡巨猷，占领芷江。叶开鑫派蒋锄欧旅、贺耀组派郑鸿海旅向蔡总攻击。9日，蒋锄欧旅收复芷江县城，并向晃县进击。蔡、贺两部向玉屏退去。

△　上海商办闸北水电公司举行创立会，到股东193人，沈联芳主席致开会词，说明该公司收足股本131.194万元，已超过四分之一以上。陆伯鸿、朱孔嘉、沈联芳等11人被选为董事。

△　永定河决口600丈，危及京津一带。

△　辽河决口，水势浩大，通辽县城全被水浸，淹死200人。8日，辽河又泛滥，水没四平街。

8月5日　　中华国民拒毒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通过简章，宗旨为联合全国各团体设法肃清国内鸦片之种植、国外鸦片及一切复制毒品之输入。

△　曹锟令北京政府内务、财政两部电商鄂、川、察、绥省长、都统查勘各种水灾，拨款赶办急赈，并特派高凌霨充赈务督办。

△　北京政府军事处与洛、宁、闽、皖代表商定攻浙办法，以孙传芳、齐燮元为中坚，由中央拨款150万元，接济子弹百万发，为攻浙之用。

△　中国童子军代表团14人，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三次万国童子军大会。9日入营，参加急救、视察、手工、制面包、觅径等比赛。救护比赛中国名列第六。

8月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孙中山、胡汉民、邵元冲、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廷六人出席。决议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归训练处训练管理。训练处由孙中山任主席，委员为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

程潜及鲍罗廷。

△　北京政府为外蒙古在乌金斯克组织政府选举总统事，训令驻苏全权公使李家鏊向苏联政府交涉制止。

△　天津交涉署交涉员祝惺元奉省长王承斌令宣布接收俄租界，改称特别三区，委丁宏荃为该区主任，接管界内事宜。

△　驻广州各国领事由伍朝枢陪同谒孙中山，表示愿调停沙面事件，劝英、法让步，但望孙中山先谕令华工复职。孙答以复职乃工人自由，政府不能强迫。9日，反对沙面苛例大会通电全国，表示苛例不完全取消，誓不复业，呼吁全国同胞共赐援助。

△　孙中山令饬各军不得截留新增商捐加二专款，以供拨支要需。

△　北洋大学学生以校长冯熙运被迫辞职，由刘振华继任，决一致回校。历时半年之北洋学潮至此结束。

8月7日　　李宗仁挥兵北进，占领柳州，即联合沈鸿英部进攻桂林。陆荣廷退驻全州。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议决，准妇女部长曾醒辞职，以廖冰筠继任；通过汪精卫、廖仲恺等提出的工会法草案，并以大元帅名义公布。

△　国民党发表忠告日本国民宣言，劝喻日本国民制止虐杀华工和取缔华工入境，致力于亚洲人民团结。

△　广东陈炯明部徐焕臣旅投归梁鸿楷，编为第一旅。

△　南京下关日轮“千早丸”水手将卖水果人杨家寿殴伤，推入江心淹毙。11日，下关人民组织杨案后援会，要求军、民两长饬令交涉

员向日领严重交涉。18日，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为下关杨案特电江苏省当局催促严重抗议。

8月8日　　众议院会议第三次讨论颜惠庆内阁同意案，反颜之诸议员又借攻击金法郎案阻止投票。

△　北京国务会议通过王克敏所提关税附加赈捐办法：全国海关进出口税征收附加税一成，全国常关各路货捐局及其他税局亦加征一成，征收期为半年或一年。惟海关附加税须经驻京使团承认再实行。

△　日本加征奢侈品关税值百抽百案公布实施后，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全国商民抗议文电日有数十起，乃于是日向驻京日使芳泽提出照会，略谓：此项税率至不平等，违反华会九国关税协定，我国商业所受影响很大，商民愤慨异常，要求分别品目予我国以豁免或减轻。

8月9日　　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受英帝国主义分子教唆，托言商民自卫，由香港德商顺全隆洋行从欧洲购定枪械9000余支（其中滇军范石生搭购1000支）、子弹300万发，4日向大本营军政部朦领购枪护照一张，越四日以“哈辅”轮装运入口。孙中山据报，令许崇智密查，是日并令蒋介石查办此事。是晚，蒋率同大本营副官邓彦华乘“江固”舰赴沙角弋缉。次日晨，发现“哈辅号”已进泊广州市区白鹅潭。孙中山即令蒋介石饬“永丰”、“江固”两舰监押“哈辅号”驶至黄埔，并将查获全部械弹封存于军官学校。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将所拟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办法送致北京外交团代理领袖公使美使舒尔曼，内容要点为：定名为上海特别法厅；民刑诉讼纯属中国人者，完全归法厅审理；如牵涉外人，照条约有领事裁判权者，适用陪审制度，无条约国及放弃领事裁判权者，亦归法厅审理；犯罪处罚10年以上及命、盗等案，应报法部批准。

△　汕头商店为反对税契登记新章全体罢市。10日晚，洪兆麟由潮州至汕头，宴请文武长官及商民代表，即席议决商会担任筹饷36

万，分六个月摊缴，税契登记新章取消。11日，汕头商店复业。

8月10日　湖南反帝大联盟开成立大会，通过《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略谓：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应该认清谁是敌谁是友，而毫不犹豫地集合到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与帝国主义者决最后胜负。12日，天津学生联合会等26团体组成反帝大联盟分会，并发表宣言，谓天津当帝国主义侵略者之冲，受害更烈，故成立分会，誓与全国取一致行动。24日，山东反帝大联盟在济南成立。9月1日，杭州反帝大联盟成立。3日，武汉反帝大联盟在武昌成立、以陈时、董必武、陈潭秋等15人为执行委员。

8月上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反帝大联盟，略谓："幸诸君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压迫环境中，有此决心抵抗之大同盟，不独令为虎作伥之徒丧其魂魄，亦足令磨牙吮血者知我国尚有人在"，"所望努力不懈，以求奋斗之成功"。

△　张作霖因曹锟来电征询对中俄会议意见，特派中东路监察、总司令部参谋杨卓晋京，了解北京政府对奉俄协定及遏止苏联操纵外蒙问题之意见，并与加拉罕商讨奉俄协定等问题。

△　上海部分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一周刊，以指导和联络此项运动。不久，湘、鄂、川、赣、鲁、晋、粤、浙、直隶等省先后成立同样组织，协力进行。

8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议决：中央农民部部长彭素民病逝，由李章达继任中央农民部部长。

△　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与副团长邓介石、李仲韶面见吴铁城，要求发还枪械，未获结果。

△　驻京各关系国公使开会讨论关税附加赈款一案。不久，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可办。

△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举行第九次年会，发表宣言力主庚款用于科学研究，反对用于筑路、导淮。

8月12日　广州商团举行紧急会议，陈廉伯、陈恭受等向众提出辞职。会上推派代表八人偕商团军2000人到大本营请愿，索取被扣枪支，并以罢市相威胁。孙中山接见，表示枪械待查明后发还，并指出商团不待政府查清便欲罢市，“那便是居心要反对政府”。蒋介石宣布长洲要塞区域内戒严。

△　驻广州英、法领事与伍朝枢、陈友仁商定，命沙面工部局布告取消苛例12条，重颁双方同意之解决办法七条：一、取消苛例，修改旧通行证章程，外人、华人一律平等；二、通行证一年有效者附相片；三、临时通行证不附相片；四、每晚10时以前通行无阻；五、私家雇役一律复工，罢工期内薪金照发；六、公役一律复职，补发薪金，巡捕许其自动辞职；七、双方不得有报复诸事。旋即举行反对苛例大会，由伍朝枢报告交涉经过。大会认为满意，议决于16日开始复工。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为展开各地救灾，决定由路、电、邮、航、关税征收赈灾附捐，要求同意。

△　吴佩孚电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力陈庚款筑路兴学之主张。13日，吴佩孚坚主用庚款建筑粤汉、川汉两路，与美技师加乐尔估价1900万镑，并要求北京政府与美政府交涉以美庚款做筑路之用。如美庚款不敷，将英庚款1100万镑并充该两路之用。

8月13日　孙中山令广州中央银行自8月15日起发行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券四种货币；并饬财政机关与商民一律收用。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决设立联络部，由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国际各推代表一人组成，以解决国共联合战线内部纠纷。

△　广州工界万人欢送沙面英、法捕房华捕复工。下午4时，华捕返沙面复职时，英、法领事忽推翻原议，拒绝华捕复工。次日又发出布告，谓各罢工员役如不于15日下午4时前返工者，作为弃职，补用新人；所有遗下之行李等概不负责。工人愤激异常。工商联合会议决对付办法：一、劳工绝交；二、经济绝交；三、海员总罢工；四、断绝沙面水陆交通。

△　广东商团定于是日成立“联防总部”，一面具呈省政府立案，一面在各街搭造牌楼，准备庆祝。省长廖仲恺洞悉联防总部为各种反动势力的堡垒，未予核准。但花县、三水、佛山等十四埠商团均于是日携械麇集广州，在西瓜园举行成立典礼，副团长李颂韶任主席，全市商店休业一天以示庆祝，晚间举行提灯大会。

△　廖仲恺令文素松率黄埔学生军第三、四队至广州市区维持治安。19日，广州戒严，廖仲恺调北路湘军进驻沙基一带。20日，又调部分滇、桂、豫军分驻西关一带，以防商团叛乱。

△　孙中山公布《大学条例》，凡八条，规定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研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

△　孙中山公布《中央督察军组织条例》，凡九条，由滇、湘、粤、桂、豫五军各派一团编成，以巩固中央威信为主旨。

△　广东省政府训令教育厅：教育机关人员须加入国民党。

△　驻京美使舒尔曼离京回国。临行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中国不履行中美无线电合同，对于中美邦交颇有影响。

△　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交通附收赈捐规则》，规定以六个月为期，由路政、电政、邮政分别办理；电政、邮政均援照民国九年成案办理。

△　湘省叶开鑫部刘旅及邹旅向蔡巨猷部猛攻。14日，占领湘西蜈蚣关、便水司、波州等要隘。

8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议决，汪精卫任宣传部长，甘乃光代实业部长；准妇女部部长廖冰筠辞职，推何香凝代理。

△　孙中山任命梁龙为大理院院长。

△　黄埔军校继续招收第二期学生450人，编为第五、六、七队，合称第二总队，以及炮兵队、工兵队、辎重兵队、宪兵队，概属第二期。

△　广东省政府布告扣留商团所运枪械，理由为事先未将购运枪械理由、数目呈奉核准，以及护照上日期与枪支到岸日期不符。省属各地商团代表再次赴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枪械。

△　陆荣廷派韩彩凤攻柳州，与李宗仁部战于古化（今并入永福县）、中渡，被李击败。

△　我国学生赴美国留学，受美国新定移民律影响被拒。是日，美政府训令驻上海美领事，指定该国14大学准我国学生就学，赴其余各校留学之学生，概遭拒绝。16日，美政府续发表哈佛等22大学准中国学生入学。

8月15日　广州中央银行正式开幕。孙中山亲临致开幕词，勉励各界共同维持中央银行信用，促成中央银行发展，“使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

△　广州油业工会、农会函孙中山痛斥商团阴谋推翻政府罪行。油业工会并在通电中要求大元帅即将所扣商团枪械全数没收，发给工人组织工团军，以利国民革命之进行。同日，广州农会发表宣言，号召“快些解散商团，惩办商团，工人们快武装起来，我们农民已准备

和你们大联合，作政府的后盾”。

△　曹锟特派江苏省长韩国钧、安徽省长马联甲、河南省长李济臣兼会办导淮事宜。

△　北京国务会议决定特派唐在礼为外蒙宣慰使，谢国梁为西藏宣抚使。为免蒙、藏误会，均不发明令。

△　王正廷以道路协会会长名义访苏俄大使加拉罕，要求以庚款为筑路之用，加拒绝。20日，王派代表往见八校代表许绳祖等，声言如教育界赞成筑路，加拉罕可考虑改变协定。许等一笑置之。

△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8日在法大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庚款用途问题。许绳祖报告连续两日往访法、荷代使之经过情形，法代使称法国亦愿将庚款退还中国，惟因金法郎案及预备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之关系，一时未能决定。会议决定即日致函驻京英使馆，询问英国议会对于中国庚款之议决案及庚款委员会如何组织等。

8月16日　齐燮元召各师、旅长、镇守使及其他重要军官在南京秘密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浙江卢永祥用兵。苏军四万余人编为八个支队，以宫邦铎、卢凤书、李殿臣、黄振魁、朱熙、杨春普、白宝山、马玉仁为各支队司令；齐自任总司令，驻节苏州，刘玉珂为总参谋长；陈调元留南京，备作各路接应；王桂林为南京卫戍司令，维持省城治安；吴鸿昌为徐州守备司令兼代徐海镇守使；设总兵站于下关，刘同春为总兵站司令；镇江、无锡、常州、苏州、昆山分设五兵站。

△　张作霖代表杨卓由北京返奉天复命，加拉罕亦派代表同往，接洽奉俄协定事。

△　班禅喇嘛之两名代表抵京，接洽藏事。

△　驻京英、美、法、日四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谓：有约国在江、浙、上海及附近外人之生命财产，北京政府应负保护责任；

倘不能保护，惟有自卫。

8月17日　驻粤英、法领事慑于沙面工潮转剧，工界团结甚坚，亲访孙中山，为拒绝华捕复工和14日布告事道歉，并请离工华人早日践约返工；旋又函孙中山，为迅速解决此次风潮，建议全体罢工工人最好于18日依12日所订七条办法，切实履行。孙即将原函交马超俊转沙面苛例会与各罢工代表磋商，决定19日复工。

△　曹锟派陆锦赴天津，与王承斌商洽防奉南下援浙事。18日，曹召见第九师师长董政国，嘱速往洛阳听吴佩孚调遣。20日又召见冯玉祥，拟以防卫东北重任委冯，冯答称："力不胜任，愿卫京师。"

△　江苏县议会联合会电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呼吁江、浙和平，略谓："报载江、浙时事紧张，谣言滋炽，人心浮动，谈虎色变，若大祸之将临。故再行吁请，务乞重申《江浙和平公约》（按：该公约于1923年8月20日订立），宣示和平，勿再有萁豆相煎之事，而安人心。"

8月18日　齐燮元续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分四路对浙作战：第一路向上海取攻势，由宫邦铎、马玉仁等担任，其战略又分三路：中路沿沪宁线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左路由浏河、太仓以拊吴淞之背，而以海军攻其腹；右路由安亭分兵攻朱家角、青浦，横趋松江，以断浙、沪连络。第二路驻宜兴取守势，由陈调元等担任，亦分张渚、蜀山、乌溪三路防守。第三路向广德取攻势，由皖省旅长王普等担任，从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归路，南断杭州。以上三路总司令由齐燮元担任。第四路向仙霞关取攻势，由闽省孙传芳军及赣军之一部担任，以攻浙江之后，司令由孙担任。

△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密令厦门杨树庄率领"应瑞"、"海容"、"永健"、"楚同"、"楚观"各舰由闽驶沪，以助苏省攻浙。杨于是日晚入福州，集合各舰驶向浙海，31日抵浙东镇海附近。

△　曹锟任命王陵基为陆军第二十八混成旅旅长。

△　熊克武部川军由遵义移铜仁，委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余际唐为第二军军长。

△　广州商团煽动罢市，是日银钱业拒收中央银行发行之纸币。商团声称如19日无还械答复，20日罢市。

△　胡汉民同商团代表谈判，主张每支枪交纳60元捐税后发还。

△　驻京日使芳泽代表美使照会加拉罕，承认交还俄使馆，但声明并非美国政府承认苏联行为。19日，加拉罕将芳泽所交美国不承认苏联之附件退还，并指斥美使对苏仇视，有失国际礼貌。

△　北京外交团代理领袖公使、日使芳泽照会加拉罕，声明《辛丑条约》各国决定将前保管之俄使馆交还；将来苏联放弃《辛丑条约》利益，不得影响其他国利益。

8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对国民党内之共产分子提出弹劾书。候补中央执委瞿秋白作重要发言云：从主义、性质上，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有合作之可能；从组织上，国民党有与共产派合作之必要；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团作用，则自是客观存在，关键是看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分子，其行动有否违反国民党之宣言及章程，概以党之纪律为准。翌日，全体会议继续讨论。

△　孙中山派林直勉、连声海、邓彦华携亲笔函到商团总所答复扣械解决办法，凡前经缴款领取收条者（依商团总所存根为据），步枪每支向政府缴60元领取；未缴款者，则照民团领枪办法，每杆缴160元。孙函略谓：陈廉伯所私运之军火，其一部分为商人集资而购者，政府可承认，当令省长按照民团条例交还。近日发现陈廉伯欲借商团之力以倾覆政府，定于8月14日起事，政府宽大为怀，除陈一人

外，不谋株连。要求：一、知情而悔悟者，能自行检举，不事深究；二、倘有执迷不悟，仍欲图谋不轨者，则责成各代表自行指出，送交政府惩办。

△　张作霖召开东三省军民长官会议，议决：一、对江、浙问题非时局大起变化，决不轻易有所表示；二、对奉直和议，似不必多此一举；三、加拉罕要求修改奉俄协定，断难承认；四、对蒙协助问题，先了解蒙古对奉之信从程度再定；五、东三省军队现有40余万，不再扩充，惟各军空额须一律补足；六、巩固葫芦岛与营口海防；七、整顿交通事业与扩充航空事业；八、开发实业，维持金融等。

△　苏省军事会议结束，各师、旅长、各镇守使均回防次，调动所部开往前线：齐燮元部第六师驻防昆山、平望、苏州一带，由旅长宫邦铎、卢凤书指挥；第四混成旅吴恒瓒部驻防江阴一带；第三混成旅李殿臣部驻防吴江太湖一带；暂编第三师马玉仁之第五团协防第六师，第六团协防第三混成旅；第十九师杨春普部驻宜兴一带；第二混成旅黄振魁部驻防常州一带；第一师白宝山部及马玉仁各抽一混成团协防十九师及二师；第五混成旅陈调元部调徐州集中。此外募有输送队3000余名随军赴前线。

△　江、浙士绅张一麐、黄以霖、沈恩孚、黄炎培、史量才等电齐燮元称，近日报章披露，人心惶惶，似确有征调运兵之事实，请明白示复，以息谣言。20日，齐复电称队伍均驻原防，并无军事动作。

△　姚公鹤等发起的东南五省弭兵会在上海成立，通电苏、浙、闽、赣、皖五省省议会、省农会、省教育会、各总商会及各法团，请一致加入，以期实现弭兵。22日，该会发表宣言，要求弭战，建议卢永祥将收容臧致平、杨化昭之经过事实交五省人民公判，以息群疑。

△　瑷珲公民代表王纯乐等三人到奉谒交涉署长钟世铭，探询奉俄协约情形，并请主持向苏索还瑷珲江东六十四屯。20日，该代表又

向张作霖呈请愿书，略谓：六十四屯者，向隶我国版图而为瑷珲管辖之区，有清开国即置黑龙江城于其地。康熙二十八年曾驻兵于此以防俄。咸丰八年订立瑷珲条约，帝俄谬指黑龙江为界，据其地为己有，从此海兰泡改称布拉果维什臣斯科，瑷珲城遂迁移于黑龙江之西岸，而六十四屯之领土竟为俄罗斯阿穆尔省所属矣，庚子之年帝俄尽驱该地华人，死子江中无数。迨民国成立，江省议会及瑷珲之民，曾作呼吁而无效。今者苏俄政府已成立，自应悉数交还所有侵略我国之疆土，以符苏俄国际平等之方针及中俄协定之精神。

△　曹锟令准出席国际联盟全权代表陈箓辞职，遗职派驻瑞典公使戴陈霖兼任。

△　陈炯明军撤出惠州开向潮汕，因潮汕洪兆麟部入闽，图再攻漳州。

△　北京政府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四部又召集会议讨论庚款筑路问题。财、交两部不敢主张筑路或办教育，外交部云有外交上之困难，教育部仍持慎重，讨论无结果。

8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草案，前案之主旨，在以国民党之纪律约束共产分子，后案则主张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与第三国际及各国革命组织联络。两草案作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向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

△　广东省政府以陈廉伯阴谋内乱，查有确据，下令通缉。所举谋乱事实为：一、派刘焕与吴佩孚密谈，勾结为患；二、在香港攻击大元帅府，并定于8月14日起而推翻政府，投降北方；三、私运军械被发觉后潜逃香港；四、煽动罢市，诋毁政府。同日，陆军军官学校300余人在长堤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声讨陈廉伯。

△　未经广州大本营批准擅自成立的商团联防总部移至佛山，由陈恭受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总罢市。21日，决定渐次集中全省商团军，并运动股匪袁带之党羽千余人，改扮民团至佛山，同时准备各属罢市。此外，并大肆诬蔑广州政府“赤化”，实行“公夫公妻主义”，竭力蒙蔽商民。

△　广东省政府布告，劝商店勿罢市。

△　广东工农群众积极支持孙中山组织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以防商团叛乱。是日，广州工代会决议组织工团军。26日，工团军300人开始组编训练，施卜为正团长，刘公素、苏菲真为副团长。27日，省署准工团军立案，即日工团军出巡博罗。广州附近各属农民纷纷组织军民自卫军，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也建立农民自卫军，警卫省长公署。

△　孙中山令饬财政、建设、盐务、省政各机关收入，应解由中央银行存储，随时提用。

△　张謇为江、浙和平通电呼吁两省军政长官止战释争。

△　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上海总商会于是日及次日先后电苏、浙当局呼吁和平，谓上海钱庄已有三家停业，公债一落千丈，恐战事牵动金融，大局不堪设想。25日，卢永祥复电声称“始终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旨”。

8月中旬　　华洋义赈会报告全国水灾情况，略谓：各省淹毙者约计1.4万余人，被灾人数共达2000万左右，其中湖南476万，京兆80万，直隶510万，江西24万，福建13万，广东259万，山东310万，河南310万。

8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胡汉民主席。会议决定按照政治委员会所拟《国民

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草案解决。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两决议对全体党员发表关于容共之训令。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第一届学员毕业暨第二届学员入学典礼大会，中央农民部长李章达主持。孙中山出席并作演讲，勉励学员到乡村去，“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

△　苏州丝业木机职工万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被警察捕去数人。工人坚持斗争，结果工资增加，于24日复工。铁机工人千余，也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坚持至9月25日，工资有所增加。

△　浙江余姚盐户万人，因反对盐运使设立公仓，举行罢工，遭军队镇压。经盐商调停，公仓取消，25日复工。

△　北京金融因江浙战谣发生恐慌，公债暴跌，投机家均将破产，即组金融维持会，要求政府设法维持。

△　冯玉祥与黄郛在北京南苑谈时局，冯认为直、奉军再战，直系势力稍差，如第十五师、二十三师、二十五师皆不足撄锋；江浙风云，谣传甚大，将来战起，东三省及地方恐有响应，本军要准备待命。

△　旅沪皖绅余诚格、李经方等电马联甲，请勿加入江浙战争，力践和平，以靖人心。30日，全皖旅沪公民弭兵会亦电马联甲，请依照皖民公意，脱离江浙战潮而维皖局，所有调动之军队，须速遣归原防。

8月22日　在陈恭受及商团军胁迫下，商团总部所在地佛山镇罢市。陈恭受以佛山无险可守，率商团、乡团数千集合石湾及佛山对岸

之墩头乡，并纠集土匪冒称商团、乡团，陈自称攻城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陈又以商团副总长名义发表宣言，要挟广州大本营作出全面妥协，取消陈廉伯通缉令。23日，陈以广东省商团名义函孙中山提出三条件：一、成立商团联防总部；二、商团总、副团长安全就职；三、无条件发还枪械。同日，东莞县响应佛山宣告罢市。

△　孙中山派代表邓彦华答复商界和绅士代表：商团必须对19日亲笔函所提解决办法作出答复，推派代表同政府接洽；对佛山等地罢市，商团应负责任。

△　北京众议院讨论四届省议会选举办法，决定：一、由国会就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中抵触宪法之条文加以修正；二、第三届省议会议员如未选出，或选举无效时，第二届省议员得适用之；如第二届未选出，第一届得适用之。

△　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发表宣言书，以签定《辛丑条约》之9月7日为国耻日，呼吁全国同胞届时降半旗吊国耻、全国大示威、不买帝国主义各国之货物。

△　总税务司发表公债现状文告，略谓：近今整理公债市价大落，致市情恐慌，实因准备金由总税务司保管，已足付息而有余，但尚不足按照预定办法实行还本，于是投机家乘机操纵。整理公债现甚稳固，无暴落暴涨之理由，持债券者无庸恐慌。

8月23日　曹锟召开紧急会议，筹防东北，阁员及军事处厅长牛向辰、穆文善等武官参加。随后，连日密议，26日、27日会议决定曹锛第二十六师开驻九门口，彭寿莘第十五师驻守山海关，董政国第九师一部及王怀庆第十三师一部驻守喜峰口及古北口一带，王维城第二十三师及毅军全部驻守朝阳，张锡元之两混成旅驻守林西，冯玉祥拱卫京师，吴佩孚主持东北，齐燮元主持东南，陆锦为京畿戒严总司令。28日，王承斌到京，偕同王毓芝谒见曹锟，陈述此次主战之非

计，曹未予采纳，嘱王承斌速筹军饷百万元。

△　孙中山派湘、豫、桂、滇军千余人赴佛山，在市区及铁路沿线驻防，同时劝告商店复业，但被商团阻止。同日，江门商团长赵秀石因在会上陈述罢业损失，散会后在门首被杀。24日，滇军通知佛山各商店，限24小时内一律复业，否则立派军队入店驻扎。多数商店勉强开门营业。

△　广东省政府下令通缉陈恭受。大本营派豫军两营约600余人，向佛山对岸之墩头乡进发，抵该乡时即与商团、乡团步哨接触半小时，商团、乡团退却。豫军入乡，搜索陈恭受不获。

△　孙中山令蒋介石将所扣商团枪械内检交驳壳枪175支、手提机关枪18支及上述两项足用之子弹交李麇，为铁甲车队之用。

△　曹锟令航空署从速组织飞机队，连同机具由铁路运往南京。是日，由队长蒋逵率带飞机10架，自北京出发。

△　江苏军队续开前线，陈调元部第四旅由徐州开赴浦口，所遗防地由鲁军、豫军及省警备队填驻。淮扬镇守使马玉仁部向南通集中，准备开向江南。驻扬州之黄振魁混成旅过镇江开向昆山，其原驻地调清江浦之第三师接防。

△　原驻常山、开化、江山之浙江边防军臧致平、杨化昭所部奉卢永祥令西调，是日到杭，所遗防地决定由浙军第一师和第二师接防。同日，衢防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自杭赴防。张载阳留杭任省长。

8月24日　广州二万余工人集会，声讨陈廉伯、陈恭受，反对罢市，表示誓作政府后盾。同日，广州戒严。

△　卢永祥召开会议，部署军事，分为两路：一为北路，卢自为总司令，该路又分三路：上海，松江方面为右路，取守势，司令为何

丰林，杨化昭、朱广声、臧致平等部属之，负责黄渡、浏河、青浦、嘉定一线；中路向宜兴取攻势，司令陈乐山；左路泗安方面由王宾担任，以拒广德方面之皖军。二为南路，防备赣、闽，以张载阳为总司令，潘国纲为副。其军队除原有四个师外，加上边防及沪方各军，共七万之众。

△　张一麐、黄以霖、史量才、黄炎培、宋汉章、朱绍文等分别电齐燮元、卢永祥，请划边境为缓冲地带。25日，齐复电谓：上年《江浙和平公约》，议定两省同时撤防，苏即遵行，浙则至今失信，臧致平、杨化昭西调，浙省征调频仍，人心惶惶，诸公拟定缓冲地线，即希转商浙方迅予规定，俾资遵守。27日，卢永祥复电极表赞同，惟谓两省防地，增兵兴众，肇自何方，务请注意，以为根本解决。

△　上海市民协会举行成立大会，通电反对江、浙开战。

△　各国驻沪领事团讨论江、浙问题，决定：一、请北京外交团照会外交部设法保障苏、浙及上海一带外人之生命财产；二、如决裂后未能保障，各国将自行派舰保护；三、设法阻止沪宁路运兵；四、临时维持上海治安，并召集商团、外舰人员为万一准备。

△　北京政府农商总长颜惠庆因北京金融风潮紧急，公债暴跌，在国务会议上主张发布“交易所暂缓交割令”。王克敏因自己投机公债，借口此令将使北京金融益陷于危险境地，竭力阻止。

△　北京反帝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开第六次执行委员会议，议决：发行反帝运动周特刊；9月7日各界放假一日，并下旗志耻；举行游行示威，揭布反帝国主义旗帜；在北京及各地散发传单，讲演帝国主义之罪恶；主张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不买帝国主义各国货物等。

8月25日　广州商团强迫广州商店罢市，大商店全罢，小商店半

闭门。大新、先施等大公司罢市，并悬出英、法旗帜。全省已有138个城镇陆续罢市。广州商团发出一种“共产在即……应即起而自卫”内容的传单。

△　孙中山以管理粤汉铁路事务许崇灏有牵涉陈廉伯私运军械案嫌疑，下令停职听候查办；另派陈兴汉管理粤汉铁路事务。

△　孙传芳编组闽赣联军，自为总司令，离福州赴延平，26日抵水口。所部分三路入浙，共计兵力六混成旅另五个团，以卢香亭为前敌总指挥，陆续向浙边开拔。

△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令司令李景曦率同“楚有”、“楚泰”等六舰由南京开往镇江，会集闽队各舰合力助攻上海。

△　卢永祥第十师自杭州开赴松江驻防，29日自松江开抵浏河。

△　陈调元部自南京开往常州等地。30日，陈令搜罗船只，运送该部开向宜兴。

△　三合会成立上海临时组织，并发表宣言，通告南洋及美洲各埠。略称：“爰复旧日精神，约为统一活动，公定‘反抗列强侵略，打倒武人政治，铲除贪官污吏，拥护穷苦农工’为信条。并与革命团体提携并进。”“望治情殷，或有过量之行为。适应潮流，非若义和团之盲动。所幸四海兄弟，共喻斯言。”

8月26日　广州大本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对付罢市问题。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强制开市；伍朝枢、许崇智、孙科等力主“和平审慎”。范石生反对强制商团复市，主张调停。

△　孙中山接见广州商界代表冯星垣等，揭露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阴谋组织“商人政府”，并表示：“目下枪械一支亦难先发还，须明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仍恃顽弗恤，我当遣派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

△　孙中山明令公布考试院法规三项：《考试院组织条例》，凡26条；《考试条例》，凡16章64条；《考试条例试行细则》，凡18条。

△　北京国务会议，内务总长程克报告警察饷项积欠过久，生活困难情形。陆军总长陆锦报告近畿军饷需索甚急。海军总长李鼎新报告杜锡珪迭电催发海军军饷。财政总长王克敏表示：近畿军警饷七成可于明日先发，海军协饷略为减发，其余各项政费至迟29日开发支票。后因吴佩孚来电索饷，王克敏以筹得之款280万元移付之，致军警饷改发支票，分四期付款。

△　浙省战机已迫，浙军潘国纲第一师陆葆群营由杭州赴温州转龙泉，加强防务。与闽省福鼎接壤之平阳亦已布防就绪。陈乐山第四师大部开赴长兴、吴兴。27日，臧致平、杨化昭军一部自杭开赴长兴、吴兴，次日有小部开赴嘉兴。

△　江苏下全省动员令，齐燮元第六师自南京陆续运往苏州、昆山、青阳港等地。28日，在昆山、青阳港间安雷布网。29日，又令运大炮约30尊赴昆山。飞机两架已抵达昆山，该地驻军约二万余人。

△　南京城厢内外自24日起均有拉夫现象，不论男女，甚至敲门搜索，连及孕妇、学生，是日南京罢市。扬州、苏州亦因拉夫相继罢市。

△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议决五项：一、催促全国教育、学术团体成立大联合会；二、派代表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挪威等国公使，表示教育界对于庚款之主张；三、即日召集八校教育基金委员会；四、请八校校长出席本会议，共同讨论教育经费问题；五、27日齐集法大赴财部交涉教育经费。

△　重庆大火，延烧四日，焚毁商店、居民2000家，损失千万元以上。

8月27日　孙中山分饬滇、桂、粤、湘、豫五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转伤所属，严密保护复业商民。同日，广东省长廖仲恺布告：罢市商店如仍执迷不悟，则将以军法处置。吴铁城以炮置装甲车巡视市区，威迫商民开市。

△　齐燮元就江浙战争事答《字林西报》记者问，指责卢永祥破坏《江浙和平公约》，使“叛徒（指臧致平、杨化昭）于浙军中享有优崇地位”，利用来侵犯江苏。又称：江浙战争为政府及邻省之同僚所赞成，允共合作。“余非意在攫取土地，仅在使上海再入江苏版图后，可绝内争破坏中国之行动”。

△　孙中山任命黄建勋为盐务署署长。

8月28日　英舰九艘集结广州白鹅潭，并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当晚领事团向廖仲恺提出质问和警告，声称如政府开炮轰击市民，当以实力加以制止。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广州大本营发出最后通牒，干涉广州政府镇压商团，声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　曹锟传见王怀庆，议热河防奉问题；又传见口北镇守使谭庆林，谕口北戒备防务。

△　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杨树庄继27日“应瑞”等六舰抵三都澳后，又于是日续派“普安”等三舰赴沪助苏攻浙。联浙之驻沪独立舰队“海筹”等舰均升火。

△　上海总商会召集上海律师公会、粮业公会、省教育会等30余法团开会，讨论时局和粮食问题。决定即日通电江、浙两省当局划两省为永远中立区域，撤退军队，各不相犯，如有违反公意者，两省人民均视为戎首，所有地方直接间接之损失，均应以其私产负赔偿之责任。粮食问题，决定由商会会同银行、钱业两公会采办大宗粮食，接济民食。

△　吴佩孚电曹锟，主张增兵广德及宜兴方面，一举破浙，然后举全力对奉。

8月29日　国民党对广州罢市事件发表宣言，略谓：陈廉伯、陈恭受及其党羽，乘隙破坏政府，对商民借端渔利。商民迩年战争负担加重，对于现状倍感苦痛，陈廉伯等企图利用。须知广州最近政治上、军事上不良现状，决非主义所招致，乃不能实行主义之故。须知本党为代表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对于工人、农民两阶级素与其他阶级平等而视。至于实行共产主义云云，则本党主义政纲俱在，无须误会。

△　滇军军长范石生、师长廖行超出面调解广东罢市风潮，与商团代表订定六项调停条件：一、全部发还扣械；二、商团联防总部“改组”后，批准立案；三、政府撤出新驻广州市内驻军；四、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五、省政府撤销通缉令；六、商团报效政府军费50万元。范、廖并以“宣布独立”和调兵入省为要挟，胁迫孙中山接受。广州市郊各商店乃于是日相继复市，等候政府发还所扣枪械。

△　廖仲恺因严办商团的主张受到阻挠，向孙中山面辞广东省长职。

△　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800余人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明令讨伐商团。

△　张作霖召开时局会议，奉军司令、师长等20余人参加，决定：一、对江浙问题先函曹锟作善意劝告，希曹制止侵浙之军，曹如一意孤行，则率兵长驱入关，作武装调停；二、派梁秀芳于翌日赴天津与段祺瑞商量，江浙开火后与段同张义声；三、江浙未开战前，不作表示；四、檄文露布后分三路进兵；五、31日起密作军事筹划。

△　曹锟以吴佩孚来电要求冯玉祥军分一部南下援苏，大部开拔

东北，并予冯东北前敌总司令空衔，乃派王毓芝征冯同意。冯表示欠饷未清，碍难调动。曹又命王承斌向冯说服，王因吴佩孚解除其二十三师师长职，有夙怨，同情冯。是日，王告曹称：冯不愿分调辖军，亦不敢任前敌总司令。同日，曹召集全体阁员暨王毓芝、王承斌、冯玉祥、王怀庆等会议，商冯玉祥统率所部驻山海关、王承斌移驻洛阳，冯、王均不同意。

△　北京众议院议决：请曹锟制止江浙战事。

△　驻京英、美、法、日四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请注意去年8月11日使团警告：各国人民如因江浙战争而受损害，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赔偿责任。晚，驻京英使麻克类照会外交部称：沪宁路系向英国抵押借款，请即严令江、浙两方之军事长官勿干涉沪宁铁路，以免损害英国之债权。

8月30日　曹锟令航空署督办兼署长赵玉珂装配全部飞机，准备作战。

△　苏军第一师白宝山部自徐州开抵常州、苏州、昆山前线。

△　上海市民自卫大会通电，反对列强供给军阀饷械，并致电齐燮元、卢永祥，要求迅将各军撤回原地，以维和平。

△　驻京英、日、美、法四公使见顾维钧，催问北京政府保护江、浙各省外侨办法，提出以下要求：一、请划上海为中立地点，附近30里以内双方不准作战；二、吴淞口为中外轮出入之地，亦应划出战线之外，有必要时，各国军舰得自由至长江巡弋，保护侨民。

△　孙中山令准鲁涤平辞禁烟督办兼职，另派湘军第三军军长谢国光兼任。

8月31日　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谴责范石生等“阳拥政府，阴护商团”，坚决否认六项条件，并表示应“存一点

天地间的正气”。

△　孙传芳抵福鼎，令第三支队司令卢香亭为前敌指挥，进攻浙江平阳，直趋温、台；令第四支队司令谢鸿勋率所部二师四混成旅及骑、炮兵各一团，由政和入浙江庆元，集中永嘉；浦城及后方防务则令第十混成旅孟昭月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张俊峰负责。

△　英、美等驻京公使因江、浙局势紧急，电饬泊驻青岛、威海卫、北戴河、九江等处各该国军舰至沪，黄浦江已泊外舰七艘。

△　广东省东莞县自22日起罢市以来迄未复业。是日，桂军第二师师长严兆丰自石龙率部至东莞城劝告复业。下午，原驻城内之严部团长罗星枢因严入城，遣所部百余人出驻城外，强借居民铺板炊具，与当地商团冲突，双方遂开火。次日，近处乡团8000余人赴援，将桂军围困城内。9月3日，桂军司令刘震寰赴东莞调停，商团、乡团坚持桂军必须离防。

是月　　江苏、浙江因军事关系经费无出，苏省署19日通令各校展缓开学，浙省署令教育厅径行停办教育。

△　私立青岛大学推高恩洪为校长，在旧德兵营开课。

△　直隶发行省公债，金额480万元，九三实收，年息一分，六年还本，用以整理省债及还短期外债，咨北京政府财政部备案。

9月

9月1日　　孙中山为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指出：“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开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后，我即怀疑他的叛国行动是得到英国帝国主义支持的”；英国工党“曾屡次表示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故我仍希望工党政府至少应抛弃对中国之炮舰政策；不意英总领事8月29日对我政府之通牒，末段数语则无异

宣战，予觉此项挑战实欲企图破坏我革命之国民党政府。《宣言》并指出：“曾有一时期，其时要办的是推翻满洲征服者；而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

△　孙中山决定乘江浙战争爆发进行北伐，令湘军、豫军、赣军全部、张民达师、中央直辖一军朱培德部等，于半个月内集中韶关，以备入赣。

△　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会议筹备军饷，定战费为5000万。同日，又下令陆军整理处从速举行秋操，务于本月15日完毕。2日，张作霖据卢永祥电告齐燮元举兵侵浙，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一、假秋操之名，陆续向山海关进发；二、第二、第六两旅先行开拔，分据锦州、绥中，观察形势。3日，奉军开始出动。

△　吴佩孚在洛阳集议御奉援苏，参加者有张福来、杨清臣、靳云鹗、王汝勤、田维勤、胡景翼，曹锟、冯玉祥、王承斌、马联甲、刘镇华等亦派代表列席。会上吴主张：一、先调靳云鹗部东下，暂驻浦口为苏声援，续派杨清臣一部驻防徐海道属，巩固后方；二、电令常德盛等赣军牵制粤军助浙；三、援苏御奉并重，除分电驻滦州之彭寿莘第十五师特别戒备，檄调第二十六师一旅布防外，并集合第二十六师、第十三师、第四混成旅及第三师同时御奉。

△　英文《京津时报》载文论北京政府之战费，谓：“直派于其管辖境内所有之财源既已榨取殆尽，而此次所需之战费就可以征收者，无论现洋公债，皆无实在把握，由是北京政府与法国交涉欲从速解决金法郎问题，可得一千万以上之收入。”望列国对北京政府直接或间接供给财源之处置必须慎重考虑，“希望法国政府拒绝中国之提议，因金法郎问题之解决，使其增长内乱故也”。

△　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至奉天谒张作霖，请接济款械，借给飞

机。张均首肯。

△　昆山苏军对浙取攻势，第二师混成一团前进至陆家浜。浙军第十师第四十团出发至安亭，两军相距10华里。苏军安亭前敌司令朱熙、宜兴前敌司令陈调元、太仓前敌司令宫邦铎均亲往前线督战。

△　皖军第三混成旅调往广德、宣城一带援苏，旅长王普任前敌总司令。

△　李宗仁通电声讨陆荣廷。10日，李又与赵恒惕等电促陆荣廷下野，以利广西自治。

△　虞洽卿继宋汉章就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　张作霖任鲍贵卿为中东铁路督办；原督办王景春因与张意见分歧，已称病出洋。

9月2日　　曹锟总统府密议军事，并电吴佩孚“通盘布置”。同日，阁议讨论江浙问题，顾维钧谓和平之局面业已绝望，善后问题殊可注意。决定京畿治安由内务部函军警机关加以防范；四使要求划上海30华里以内为中立区域一节，暂按住不提，可由外部照复；对于外侨生命财产，当负责保护等。

△　苏军第二师前敌司令部移驻陆家浜车站，浙军之第四十团、第三十九团开至黄渡车站。沪宁路交通断绝，昆山至安亭间铁轨被苏军拆去，安亭至黄渡间铁轨亦被浙军拆毁。当夜，臧致平、杨化昭率部自杭抵沪，次日上午至高昌庙、龙华，下午即开往黄渡、浏河。4日，臧致平补充旅全部开往南翔。5日，杨化昭部又有3000由杭州开至南翔。浙军扼守南翔，以拒昆山之敌。

△　驻沪领事团因江、浙局势紧张，由代理领袖美领事克银汉邀请英、法、日三国领事商议租界治安办法，决定：一、通告江、浙当局，不得将军队开入租界；二、严防败兵窜入租界；三、请万国义勇

队下令准备随时出防；四、请各国驻沪军舰编练海军陆战队严重警戒，必要时登陆防护。

△　日内瓦国际联合会第五届议会选出副议长六人，中国代表唐在常被选为副议长。

△　驻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取消前次拒交汇理银行所存盐余之抗议，德债案内之汇理经手款项即可交付。

9月3日　　齐燮元命宫邦铎进兵昆山，以窥上海。上午10时余，苏军以一旅多之兵力向黄渡浙军林兰亭团一营发炮进攻，浙军司令朱声广下令发炮还击，江浙战争爆发。下午3时余，臧致平率兵二营至前线作战，毙苏军400余人，毁炮九尊；浙军亦死40人，毁炮一尊。浙军防线自黄渡西展至14里外之安亭，前哨至昆山附近之陆家浜。

△　卢永祥通电江、浙两省人民，略谓：四省攻浙，重兵压境。9月2日5时，苏军强占安亭车站。是日苏军已由安亭向黄渡方面进攻，势甚猛烈，当即电饬我军尽力防御。彼方已明白挑战，和平希望业经断绝，自当整我军旅，为国锄奸。推厥祸始，实由齐燮元为赞助曹锟贿选最力之人，故不惜残民以逞，助桀为虐。大憝不除，国难奚宁。

△　卢永祥通电成立浙沪联军，并在上海龙华设立联军司令部，以驻沪第六混成旅、第二十旅、补充旅为第一军，何丰林为司令，臧致平为副司令，约三万余人；以第四师及第二十四混成旅为第二军，陈乐山为司令，杨化昭为副司令，约二万人；以第一师及第二师为第三军，张载阳为司令，潘国纲为副司令。4日，卢永祥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孙中山、瞿秋白、伍朝枢、苏联顾问鲍罗廷四人出席，议决：一、发表北伐宣言及大本营移驻韶关宣言；二、裁汰闲散机关，裁撤苛细杂捐；三、韶关大本营特设政治训练团；四、本月7日国民运动大会宣传之宗旨为“反对帝

国主义”、“反对北方军阀”、“助浙救粤”，是日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周之开始。

△　卢永祥通电号召江、浙一致讨伐曹锟。略谓：苏、浙人民反对曹锟贿选，志趣吻合，向义最早；苏、浙唇齿相依，安危与共。此次奋力讨贼，基于正义防卫。苏民如能赞助义军，共驱曹党，浙军对苏决不以一矢相加。

△　蒋介石派黄埔军官学校总教官何应钦等筹备组织教导团，组织及训练采用苏联新制；是日并派总队长邓演达代理教练部主任。

△　八国驻京公使会议讨论移交旧俄使馆问题，要求加拉罕承允遵守《辛丑条约》及使馆界内一切章程，不得自由宣言废弃。加拉罕不允。10日，八使会议决定将俄使馆交与加拉罕接收。

△　北京政府交通部向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借款日金1292万元，年息九厘，用作包工建造洮昂铁路用费，内省署提用200万元，以洮昂铁路收入为担保。

△　湖北教育界代表赴北京请交通部拨还米厘公债本息以充教育基金，交通部不仅拒不接受，且对代表进行侮辱。是日，湖北省教育会等六团体集议应付方法，群情激愤，全体赴省署请愿。

9月4日　　江浙战争展开。苏军马玉仁部分路进攻浏河；同时由太仓之陆渡桥往击嘉定，与浙军前哨交火，战于朱家桥。浙军寡不敌众，退守离嘉定县城三里之竹篠弄待援。未几，南翔、罗店、澄桥、唐行之浙军均遣援兵至，分途应敌，战火激烈。

△　孙传芳军孟昭月旅进攻仙霞岭。浙军第二师四旅炮队团团长张国威暗与孙通款，并将仙霞关险要炮台上之机器卸下。8日，孙部卢香亭派先锋队随张国威入关侦察如实，乃遣大队由张引导自间道入仙霞关。守军仓猝应敌，全军覆没。孟昭月旅韩团占仙霞岭。

△　张作霖通电讨伐曹锟、吴佩孚。斥责曹、吴“稔恶山积”，贿买议员，以窃大位；豢养爪牙，以祸邻疆；破坏自治，蹂躏和平；卖国丧权，穷兵黩武，流毒颇多，舆情共愤。宣布“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已绝之生机”。

△　齐燮元抵昆山指挥，并通电声讨卢永祥，称卢“反抗中央，招聚乱党”，“自应悉力捍御，以期达保安之宗旨”。

△　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一、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粤军抽调一部随行；二、迁大本营于韶关，亲督各军，驻节于此，命各军分路入江西、湖南；三、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代广东省长，以巩固后方；四、委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军需总监；五、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督率各军前进。

△　卢永祥电孙中山、许崇智、廖仲恺等，略谓：“曹锟既为国民之公敌，则诸公宁忍作壁上之旁观？尚希诸公分道出师，兼程并进，庶几正谊有获伸之日，大局有复安之望。”

△　但懋辛、石青阳受唐继尧等派遣，以川滇黔三省总司令部代表名义到达广州谒孙中山，表示愿一致行动，讨伐曹、吴；并建议孙中山与陈炯明议和，令陈出兵攻闽。孙中山表示赞许。

△　豫、鲁、鄂援苏军队陆续开往江苏前线助战。豫军郭振才一团到达徐州东部，京汉路保安队调津浦路南段护路。5日，豫军第三混成旅陆续开赴宜兴、常州等地。6日，鲁军张培荣部张烈一团抵徐州西部驻防。9日，鄂军第七十四混成旅抵达南京，转赴常州、宜兴。

△　英、法、日三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江、浙两省扣留盐税，请设法制止。12日，曹锟令告各省军民长官暨各师、旅长等严饬所属保护盐务，毋任有干涉税款、侵越权限情事。

△　日使芳泽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中国如在国际联盟提出“鲁案”，须先征日本同意。

△　曾琦、李璜、罗世嶷（元叔）等一行结束留欧，返国抵沪。

9月5日　孙中山发布《讨伐曹吴告军民文》，宣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务使曹、吴诸贼次第伏法，尽摧军阀，实现民治”。同日，又发表《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指出“假使曹吴得逞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鼓励全粤人民“蹈厉奋发，为民前驱，扫除军阀，实现民治”。

△　孙中山电卢永祥，允派飞机师往助，谓：“此间日内有精练而熟于战斗之飞机师四人由欧洲到粤，如尊处需此项人才，可先派来应用，信其必能收大效果。”

△　苏、浙两军前锋对峙于嘉定城郊。杨化昭奉何丰林令以精锐3000自南翔驰援，与苏军激战于高升桥，屡进肉搏，苏军不敌而退。另一支苏军第十九师杨春普之一部进攻青浦，由泗港向离安亭12里之白鹤港总攻，浙军不支，退守重固镇，苏军以大炮轰击，浙军掘壕固守。同日，沪宁线上之浙军占安亭车站，至傍晚，苏军增援进攻，浙军仍退守黄渡。

△　张作霖召杨宇霆、沈鸿烈、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等开海路防务会议，决定责成第二十七师之一旅由连山湾迄葫芦岛扼要驻守，并派炮兵一至二团驻岛附近，以厚势力；在紧要处设置大炮、机关枪、探照灯、高射炮、无线电台、水上飞机等，紧急时日夜巡察。

△　张作霖向军事顾问本庄繁探询日本政府对直奉战争的态度：一、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是否予张帮助；二、张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日对此有何想法；三、张腹背受直军和俄国的压迫，日本有何想法。15日，奉军参谋长杨宇霆设宴招待驻奉日总领事船津和驻天津日总领事吉田茂等，请求在直奉战争中援奉。

△　浙江省长公署布告发行金库券兑换券50万元，委托浙江地方银行收付，并饬将基本金筹备足数，以昭信用。此项兑换券准抵缴赋税，发放军政各费及一切公项出入之用。发行后无论何人，均各一律收用。

△　日本加藤内阁讨论干涉中国内战问题。外务相币原作关于“中国动乱之经过”报告。决定采取措施“保护满洲方面日侨之生命与财产”，“上海、南京方面须有相当准备，以防万一”。

△　中国兴业银行在汉口开创立会，举孙丹林等九人为董事，蔡葵雨等七人为监察。9日正式成立，孙丹林兼任总理。

9月6日　　孙中山手谕蒋介石：扣留商团之枪械如何发落，俟汪精卫交涉后而定。函谓：“商人有愿筹北伐费而讨回枪械者，此事现交精卫交涉。如得完满结果，当要给回一大部与服从政府之商团。故欲沽其一部分为练兵费一节，不可施行。”

△　孙中山令饬广东省长、财政委员会核议蠲免苛细捐税。略谓：“着财政委员会将从前所有征收各项税捐及附加军费，逐案核议，其涉于苛细者，均一律蠲免，由广东省长转饬各主管征收机关竭力举行。”

△　粤省东莞十二坊商团暨附城各乡乡团复向驻东莞城之桂军严兆丰等部攻击，城破，桂军被缴步枪600杆，军官数名被擒。其他友军即会衔电总司令刘震寰，要求以武力围剿商团。刘复电所部制止妄进，听候调停。7日，旅广州东莞同人推举容万里、何梦生回城，邀德国牧师茂理作调人，双方签约和解。规定原驻之罗星枢军队除省渡头外，照旧驻扎；十二坊内照旧不得驻兵，自归商团保卫；新来之兵即拔队回防，不得以别师名目，复增兵驻莞；商团、乡团报效军费4.5万元。

△　集结在嘉定之浙军分三路进攻：北出皇庆以规娄塘；西北出

朱家桥以攻陆渡桥；西至外冈，与沪宁线浙军相呼应。杨化昭在前线督战，何丰林派飞机两架助战，追击苏军马玉仁部。同日，臧致平率队进攻安亭站，苏军不支退却；旋苏军又得援兵反扑，双方各有精兵逾万在安亭、黄渡间激战。

△　北京外交团因江浙战事影响，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请缓办海关附加赈捐。7日，驻京英使麻克类见顾维钧，声明江浙战争未了前海关附加赈捐暂停办。

△　北京政府以江浙战争爆发后时局趋紧，钳制新闻言论，不准登载不利直系之新闻，世界新闻社被查封；北京《民德报》社长何海鸣、总编辑萧一鸣亦因发表宜兴不守之谣被捕，报纸被勒令停刊。

9月7日　　曹锟据齐燮元、吴佩孚等电呈，对卢永祥下讨伐令。令称：卢永祥“公然首先破坏治安，违背全国人民爱护和平宗旨。本大总统为戢暴安民起见，实万难听其诡幻，徒苦吾民，卢永祥、何丰林均着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

△　在安亭、黄渡间与浙军激战竟日之苏军，死伤千人后于中午退至陆家浜及青阳港一带。同日，进攻浏河之苏军马玉仁部，在浙军阻击下损失400人，退至河北二里，与浙军隔河对峙。

△　浙军第二路陈乐山令所部自长兴向宜兴进攻，第四师十三团越过宜兴怀脚岭，十四团占父子山、青石山诸要隘，苏军退守蜀山。

△　张作霖宴请驻奉英、美、日、德各国总领事，声明对直出兵之原因，谓直系已命四师六混成旅向山海关、喜峰口、热河方面三路出发侵奉，故决举三省精锐，尽力防卫，事出万不得已，请予谅解：对于在东三省之外侨可负完全保护责任。

△　驻京英、法、日、美、意五国公使联名两次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请将上海及吴淞划为中立区，否则将来各项损失，悉由中国政

府担负。

△　国民党为“九七”国耻发表宣言，略谓：《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是中国人民之奇耻大辱。我们要昭雪国耻，就要认清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团结一致，与国民党合作，负荷起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

△　广州各界在第一公园举行纪念“九七”国耻反对帝国主义大会，到工、农、学、军百余团体计七万余人，谭平山主持，甘乃光、瞿秋白等演讲，并推学生联合会、工人代表会、海员工会、女界联合会、民族解放协会、新学生会、黄埔军校、市郊农民协会等12团体筹备组织反帝大联盟。

△　山东各界在济南召开大规模国耻纪念会，通过山东反帝大联盟“九七”纪念宣言，会后游行示威。同日，武昌各界集合阅马场举行示威；天津、杭州、太原、常德等地亦举行纪念活动。北京纪念活动被警厅武力制止，仅半数报馆停工纪念。

△　赵恒惕迫于美领事压力，6日晚令军警以武力制止长沙“九七”国耻纪念游行大会。是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开紧急会议，议决改游行为露天演讲大会。

△　滇军军长范石生等仍促广州大本营与商团妥协，并由商人持陈廉伯、陈恭受通电稿谒见孙中山，内容为拥护孙中山及服从政府。孙基本上接受范之调停，但要求两陈增加“勾结英国，图危政府”彻底表示悔过等句，方能发还扣械。商人不允，转向范等责难。

9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执委于树德提出《重申本党纪律决议案》，主要内容为：一、凡本党机关日报、杂志及受本党津贴之日报，不得发表违反本党章程、宣言及政纲之言论；二、不得无故拒绝发表同情于本党章程、宣言及政纲之文电；三、不得发表本党内部尚未解决之议案或问题；四、凡服务于本党政

府之党员实施其职权时，不可违反章程、宣言及政纲。会议议决由宣传部及工人部分别训令各关系人。

△　进攻青浦重固（离安亭24里）之苏军第十九师一部，在离安亭八里之杜村与浙军杨化昭援军接战后不支，败走陆家浜。

△　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工人7000人因反对资方苛例，无理开除女工两名和阴谋解散职工同志会，一致罢工。上海各界于11日、19日相继开大会声援，并在11月间组织失业救济会，募捐救济被开除的1700多名工人。后罢工失败，2000余工人仍坚持斗争，积极恢复工人组织，并派代表到广州、香港等地请求各兄弟工会援助。

△　大本营驻广东之湘、豫、赣各军纷集南雄，准备北伐。湘军自是日起陆续由东江开回广州转赴韶关。豫、赣各军亦于同日先后开拔赴韶关。至13日，集中于韶关者有滇军赵成梁部约2000人、中央直辖第一军朱培德部约3000人、何成濬部约2000人、湘军约2000人、赣军约1500人、桂军约1000人。19日，路孝忱部亦由东江调回广州转赴韶关。25日，东江中路刘玉山部由菉兰、广和圩回韶关。

9月9日　　孙中山函复蒋介石，指出在粤有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及滇、桂客军之贪横造孽，广州不能一刻再居，宜速舍去一切，以北伐谋生路；并谓："况现在奉军入关，浙可支持，人心悉欲倒曹、吴，武汉附近我有响应之师，乘此决心奋斗，长驱直进，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

△　广州商团乘孙中山率师北伐之际，是日复发表宣言，要挟政府克日发还扣械，否则将举行第二次罢市，以断政府之税收。

△　驻沪各国舰队之陆战队千余人登陆，与万国商团合作分驻租界各要隘，各国海军联军总司令英人安特生为领袖总司令。同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贴出布告，严禁江、浙两军进入租界。

△　钦廉八属联军军务督办林俊廷通电拥护孙中山。表示今后钦廉八属以内军民两政仍以钦城八属联治会议决案为依归，八属以外军事行动则服从孙中山之命令。林俊廷脱离邓本殷，广东南路形势为之一变。中旬，归附陈炯明之吕春荣亦输诚孙中山，退驻高州。

△　苏军马玉仁、吴恒瓒督率所部由陆渡桥进攻娄塘，浙军陈熙春、杨化昭部竭力防御，战斗甚烈。

△　浙军第四师十三团猛攻宜兴城，苏军杨春普在城外督战，指挥所部抵御。浙军第四师钟士秀团围攻兰山，与陈调元部激战二日后攻克兰山、乌溪关。

△　段祺瑞通电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唐绍仪、赵恒惕、张敬尧等，表示声援卢永祥、张作霖，谴责曹锟“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贪一己之尊荣，造弥天之罪孽，倒行至此，岂能幸存”。

△　曹锟加李济臣、胡景翼陆军上将衔。

△　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至洛阳访吴佩孚，谈中国交通及副总统问题。吴告野村：日本舰艇在内河调动，务必与地方官协调，免生事端。

9月10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指出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是直系与反直系军阀间大战之开始；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斗争之开始。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的统治；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呼吁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孙中山及胡汉民、

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云梯10人出席，讨论北伐问题。

△　孙中山发表《告广东民众书》，宣布将实行三事：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并谓：“惟我广东人民，对于革命之主义，当以热诚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实现……十三年来革命未就之绪，于以告成。”

△　孙中山复卢永祥4日电，同意合作讨伐曹、吴，略谓：“曹、吴祸国，稔恶贯盈，除暴锄奸，咸同斯愿。文已宣布国人，一致声讨，躬率师旅，以为前驱。”

△　广东省长廖仲恺布告辟谣。略谓：“近日有人散布谣言，谓政府将实行共产。……为此特行布告各界人等一体知悉。对于此等谣言，切勿轻信；如有造谣生事者，定行严惩不贷。”

△　孙中山致电英国政府，指出英总领事就商团事所提之最后通牒乃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重抗议。

△　晚，曹锟以百万火急电召吴佩孚赴京，主持对奉战事。吴声称能于48小时内檄调各师旅集中，并即电令靳云鹗十四师、杨清臣二十四师停止南下，听候调遣。

△　曹锟召见冯玉祥，仍请负责山海关军事，冯表示不能胜任，并谓去年不应解除王承斌、张福来兵柄。

△　冯玉祥与孙岳在北京南苑秘密约定联络胡景翼共倒曹、吴。

△　皖军派王普、史俊玉两旅由广德进击浙江泗安，并分史俊玉部步兵一团赴宜兴助苏军防守。

△　赣东镇守使杨以来部奉北京政府令协同攻浙，6日移驻广信，是日至玉山。

9月上旬　　张作霖在奉天召集军事紧急会议，决定分兵六路对直作战，兵力约15万人，并组镇威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锦州。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齐恩铭，进攻喜峰口；第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进攻朝阳、建平、承德，到达凌源以西地区，协同一、三军攻击山海关，并拟进入冷口，向滦州挺进；第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进攻山海关转趋京、津一带；第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驻兴城、绥中及锦县一带为预备队；第五军司令吴俊陞、副司令汤玉麟；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五、六两军以大半之骑兵队在彰武一带集合后分攻开鲁、赤峰，与李景林等部协作。又分飞机为三队，第一队驻山海关，队长张学良；第二队赵玉中，驻喜峰口；第三队哀烈坡，驻葫芦岛。其整个战略，对山海关暂取守势，对热河将急进。

△　汪精卫、吴稚晖等致电孙中山劝与陈炯明和解，以争取陈参加北伐。孙中山在批示中指出："陈逆阴险，非至势穷力竭，岂肯宣布攻曹？"

△　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成立，其组织要点如下：一、全省区内之民团、乡团、商团及各县各乡联团皆归该处指挥；二、全省民团统率处设督办一员，由省长兼任；三、各县民团、商团之编制法及联团组织章程概归该处制定颁布之；四、各民团局长、商团团长、联团局长概由该处加委。李福林为民团统率处督办。

△　江浙战争爆发后，吴佩孚在洛阳召开直系部队参谋长会议，决定对奉作战方略为："诱致奉军主力部队于山海关方面而抑留之，另以有力部队由海军掩护自海面迂回，在绥中、葫芦岛一带登陆夹击奉军而歼灭之。""奉直间将来如有军事行动时，山海关险要由十五师负责占有而巩固之，以掩护大军向山海关方面集中。"

9月11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大本营政务军事联合会议，推唐继尧为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同日，再电唐请兼任川滇黔军总司令。

△　孙中山在广州欢宴熊克武代表但懋辛、石青阳席上演讲称："如果西南能够联成一气，共同出兵北伐，很快就可以得武汉，得了武汉之后，便可以恢复民国元年的力量。"

△　直军陆续向山海关出动，布防地点分配已定，第十五师及第十三混成旅分防山海关至秦皇岛附近，葛树屏之第十二混成旅及时全胜之第十四混成旅驻扎昌黎附近。13日，第二十三师从廊坊、马厂开往芦台。14日，第十四混成旅由保定、长辛店等处运天津。

△　进攻宜兴之浙军第二路进逼蜀山镇，常州隐闻炮声。

△　曹锟与冯玉祥、王承斌商议出兵开鲁。

△　日本外相币原发表声明称，对中国之内争持旁观态度，并无采取对华干涉一类的措置之意思。

△　苏联大使加拉罕派员接收旧俄使馆。25日开始在旧俄使馆办公。

9月12日　孙中山特任胡汉民兼广东省长，廖仲恺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及广东财政厅长。原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免职。

△　孙中山令将所扣枪械分给军官学校长枪600杆，教导团长枪1000杆，干部学校、讲武学校长枪各200杆，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长短枪各500杆，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豫军总司令樊钟秀长枪各500杆。同日，谕蒋介石取消分械之前令，称："据汝为（许崇智）兄言，如果将长短枪交回商团，当能得百万，以为出发费。果尔，当可取消今日各令，除益之（范石生）之枪外，可悉数还之，如何？请与汝为酌夺可也。"

△　吴敬恒应邹鲁、汪精卫之请调停孙中山、陈炯明和议事，自港到广州偕汪跪谒孙中山，请恕陈既往，许以北伐自新。旋即偕港商莫纪彭由港赴海丰劝陈炯明协讨曹、吴，并言孙中山决意对东江退兵，陈军如能同时入闽北伐，孙即放弃广东，尽率客军北伐。陈炯明表示如孙中山能率各客军北伐，以粤还粤民，他事尽可商量。

△　北京众议院开会，延搁两月有余之颜阁同意案第六次列入议事日程，终于以291票对100票通过颜惠庆组阁案。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中华汇业银行借款日金30万元，月息一分二厘，用以发放参众两院经费。

△　山海关之中立地带全由直军占领，北京开赴奉天之火车被扣留，山海关车站之奉军宪兵稽查等被驱回（按：山海关车站依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停战条款定为联合车站）。张作霖即派交涉署科长高鸿文赴各领署，告以直方业已扣车，奉方车辆亦惟有不再开往北京，并声明此次开战之责任在直方。

△　江浙战争爆发后，外舰借口护侨，源源驶进黄浦江，至是日止，已有27艘之多；其中美舰几占一半。13日后，美舰有六艘陆续由上海驶至南京，日舰亦有二艘驶至镇江。

9月13日　孙中山亲率警卫队、军官学校学生第一队、吴铁城警卫军、赣军、滇军各一部，移大本营于韶关，指挥北伐。随行者有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第二军军长杨虎、行营秘书长古应芬、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卫士队长邓彦华、秘书朱和中等。临行曾于车中语东方通讯社记者称："苟有反对直隶派者，现今不起，更无再起之机会。现下形势，是重大且绝好之机会。予为顺应大局之趋势计，赴中原逐鹿，纵一方放弃广东，亦在所不辞。"

△　孙中山发布东江撤兵命令，略谓："东江叛军抗命经年，此时若能深思顺逆之辨，幡然悔悟，相率来归，本大元帅当许其自新；否

则，径率所部驰赴福建，以为浙江声援，亦必许其以功自赎。兹特命东江征讨诸军，撤惠州之围，并停止各路进攻，以示网开三面之意。”此令下后，驻东江联军分三路撤退，中路范石生自飞鹅岭、博罗等地调回省城，防守白云山一带；龙门左翼湘军退守增城，右路退守石龙。15日，三路联军先后集中石龙者，计有滇、桂、湘、豫、粤各军，数达二万以上。

△　孙中山特派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东，代行大元帅职权。

△　冯玉祥与胡景翼之代表李仲三密议共倒曹、吴。19日，冯与李约定，胡、冯取一致行动。

△　京奉路交通全断，奉方一、三两军向榆关出发，前锋至万家屯，张学良部第二十七师、李振声第五混成旅、高维岳第十九混成旅担任守备。第二军李景林部自北镇分三路向朝阳进军：张宗昌率第三旅由通裕铁路经大窑沟北上，李景林率第二十三旅李爽垲部由锦朝支路向北票，第二十四旅邢士廉部由北镇攻阜新。

△　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率部到达奉天，任榆关第二线防务。同日，张作霖召张作相至奉天面商机宜。镇威军第四军已成立，由张作相任司令，丁超为副司令。

△　苏军进占嘉定。先是苏军朱熙率队向石冈进攻，浙军第四师及杨化昭部力战，不支，退入嘉定城内。入夜，朱熙以敢死队在重炮轰击之际梯城而入，自内与主力夹攻，浙军自东门退出。

△　鲁、豫、鄂援苏军队二万余自南京入宜兴。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日金528.682051万元，年息九厘五，用以拨付满蒙、山东、吉会各铁路利息。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中华汇业银行借款日金760.822654万元，

月息一分二，以关税余款担保，用以拨付电信、林矿借款利息。

△　孙传芳电闽督理周荫人，略谓：自佳（9）日全队进攻，谢（鸿勋）旅长攻克庆元、龙泉；卢（香亭）旅长攻克保安桥、洪口（均在仙霞关北）。敌向衢州方面溃退。现正分令各路纵队猛力攻击。

9月14日　曹锟令准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顾维钧、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辞职。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顾维钧为外交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陆锦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高凌霨为农商总长，吴毓麟为交通总长。任命孙润宇为国务院秘书长。

△　王承斌奉曹锟召至北京密商军事，王允任讨逆军副司令，即日回津。

△　吴佩孚在洛阳宣示对东北用兵，准备离洛北上，并决定带胡景翼师余部、靳云鹗师一旅及驻龙门之张治公师同赴廊坊。15日，曹锟又催吴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事务。下午，吴专车北上，参谋长张方严及政务处长白坚武等同行，随带卫队及第三师一部共2000余人。

△　防守宜兴之苏军陈调元、杨春普等部，得昆山、南京之增援，并有鲁、豫、鄂军来到宜兴，势益振，遂与浙军第二路陈乐山部激战。浙军不敌，是日退守乌溪关。

△　广州党政军及农工各界集会追悼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彭素民。孙中山为追悼大会送挽联：“吾党惜斯人，应有注海倾江泪；廿年共患难，未遂乘风破浪心。”

△　卢永祥致电孙中山，请粤师早日进攻赣南。

9月15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李景林第二军第二十三旅李爽垲部在义州九官台门与直系毅军米振标部四营接战，战至午刻，直军不支，奉军改守为攻，占朝阳寺及大凌河左岸。

△　张作霖致曹锟最后通牒，略称："余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沈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哉！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武力讨伐之不可能，征诸苏军之连战连败而可明。余本拟再行遣使来前，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余今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

△　唐继尧在滇通电就任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职，表示与孙中山取一致行动。

△　苏军大举进攻浏河，分路包围浙军。傍晚浙援军至，猛力反攻。

△　苏、浙两军在安亭、黄渡间激战，互用大炮猛轰。

△　孙传芳军孟昭月旅抵广丰，15日与卢香亭旅会攻江山，浙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伍文渊令余团迎敌。潘国纲得讯，即命第二师四旅汪镐基部胡团增援，汪因与孙传芳通款，不应。孟、卢以三倍兵力分路进攻江山，伍部寡不敌众，弹尽力竭，16日江山遂失。不二日衢州亦失，潘国纲率部退桐庐。

△　陈廉伯、陈恭受通电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否认利用商团图危政府。20日，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通缉令，并发还其被封财产。关于枪械问题，胡汉民承孙中山意，商团必须依照政府条例进行改组，并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回。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定丁惟汾、王法勤返北京后，组织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之党团，公推一秘书直接与中央

联系，接受中央之一切训令。

△　大本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任命李文范继陈树人为广东政务厅厅长，李福林为警务处处长及广州市政厅长，商团军干事李朗如为公安局局长。

△　驻广德直系皖军第五旅一部进攻泗安，浙沪联军湖嘉镇守使王宾命李廷美团迎战于半边塘，皖军退。16日，皖军团长张洪德带队至，王普率炮兵一营为后援，浙军败退大环桥。

△　上海独立舰队领袖林建章等通电，声称与段祺瑞、孙中山、卢永祥、张作霖共讨曹、吴。

△　江浙战争发生后，上海日人借口保护侨民，派兵约一营在闸北五区地段华界蜀商公所一带驻扎，荷枪实弹出巡并游行示威。是日闸北五区商业联合会致函商界联合总会请设法制止。19日，商总会致函交涉员许沅，请抗议日兵越界侵驻华界。

9月16日　吴敬恒与陈炯明晤谈后，于是日至韶关谒孙中山。孙表示：一、陈如悔过，许其自新；即不为悔过之表示，而能出兵福建为浙江声援，也许其以功自赎；二、已令诸军撤惠州之围，并停止各军进攻，以待陈之自决。翌日，吴即赴港拟再往海丰劝陈。林虎之代表极力煽动在港陈军要员否认此议，不使调解人莫纪彭见吴。吴知调停有阻，即日离港返沪。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美、法、日、意五国驻京公使，表示容纳淞沪中立之要求，并附有四项条件：一、何丰林军退出中立区；二、炮台及沪海军卸除武装；三、上海制造局须停止工作；四、浙军不得在中立区域有任何军事行动。五使集议后，于19日复北京政府外交部称，所附四项条件应由苏、浙两方自行商定，并另提出：一、上海附近作战危害外侨生命财产时，各国实行武力对付；二、黄浦发生海战时亦同；三、吴淞口出入之各国船舶有危害时亦当谋自卫

之策。

△　苏军全力进攻浏河，并由迫近浏河之闽舰放炮助攻。惟因瞄准不确，反有两炮击中苏军。

9月17日　　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略称：张作霖“野心未戢，复乘东南多事之秋，为扰乱中原之计”，“破坏大局，蓄谋已久，实难再事容忍，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除明令总副司令并分派各司令外，即责成各该将领督率所部相机剿办，克日肃清”。

△　曹锟特派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省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王维城为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二路司令，董政国为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米振标为副司令，刘富有为前敌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之江为第一路司令，李鸣钟为第二路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曹锳、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路援军司令；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

△　曹锟特派李济臣为豫省后方筹备总司令，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熊炳琦为鲁省后方筹备总司令，刘梦庚为京兆后方筹备总司令，李炳之为豫省后方筹备副司令，迟云鹏为直鲁海疆防御总指挥，刘富有帮办热河军务。

△　晨，吴佩孚抵北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即在总统府四照堂召开军事联席会议，部署对奉作战，前线分三路，后援为十路，兵力约20万。第一路以彭寿莘为总司令，担任山海关方面，以彭寿莘之第十五师、王维城之第二十三师、董政国之第九师对奉军之张学良、齐恩铭等部作战，拟由山海关向绥中攻击，绝奉入关之路，司令部设滦州；第二路以王怀庆为总司令，担任朝阳方面，以王怀庆之第十三

师、米振标之毅军等与奉方之李景林、郭松龄等部相对抗，据朝阳进攻义州及北镇，设司令部于朝阳；第三路以冯玉祥为总司令，担任赤峰方面，以冯玉祥、张之江、李鸣钟等部与奉方之阚朝玺、穆春等部相对抗，据热河窥锦西，以断在绥中及山海关一带之奉军后路。

△ 张作霖出发锦州指挥榆关、朝阳、赤峰三路战事，省城治安由副司令吴俊陞、省长王永江、警备司令陈兴亚、警务处长于珍担任。张临行时声称：此次直奉交兵决不至如前次之失败，因奉军飞机、重炮之战斗力强，军士有20余万，粮饷充足，决可取胜。“要求曹锟退位，以谋南北统一，至于继任人选，应请段祺瑞出任”。

△ 吴佩孚延请之日人顾问冈野随吴抵京，由冈野在京引进小谷，吴请小谷赴日联络日本各界，以表善意。21日，吴又聘请日人坂西又八为顾问。

△ 卢永祥闻江山失守，又闻潘国纲退出衢州，疑潘国纲等浙军全变，乃在省署召开会议，宣布将浙省交还浙人治理，本人移沪督师。张载阳声明卸职，委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所兼第二师师长委警备队总参议周凤歧代理，浙江督办关防交王锡等接收，浙江地区战争遂告结束。

△ 浙军进攻宜兴之第二路陈乐山部在陈调元及鲁、豫、鄂援军反击下连战不利，撤出乌溪关退至兰山；次日放弃宜兴阵地，率部退驻嘉兴，调往淞沪战场。

△ 东江方面联军分三路撤退后，陈炯明部洪兆麟即分三路推进，右路进至龙门、永清之间，中路进至博罗，左路进至樟木头。19日，洪发表讨伐卢永祥通电，陈派主张联治将领皆不签名。至是陈附北已证实，联军责成滇军全力对付之。

△ 石青阳赴汕头劝陈炯明部将林虎、洪兆麟一致北伐。

△　曹锟据外交总长顾维钧、教育总长黄郛呈请，指令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及美籍人士孟禄（万国教育协会理事长）、杜威（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贝克尔（北京政府交通部顾问）、噶理恒（协和医学院董事）、白纳脱（花旗银行经理）为董事。18日，该会在北京外交大楼开成立大会，推范源濂为会长，孟禄为副会长。

△　廖仲恺因各军长不肯交还财权，更借北伐巧立名目，加抽各种捐税，是日向孙中山电请辞职。23日，孙中山准财政部长廖仲恺辞本兼各职，任命古应芬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及军需总监。

△　英舰通知江、浙两方海军称：吴淞之海道航线至高昌庙一带不得作战，由英、美、日、法、意、葡驻沪各舰分段担任防区。

9月18日　　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指出“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此次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曹、吴，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宣言最后列举政纲六条，作为推倒北洋军阀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

△　卢永祥、张载阳等抵沪，在龙华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浙江，发表移沪督师通电。淞沪方面仍由臧致平、杨化昭及何丰林负责作战，总司令部自杭州移驻松江。

△　苏军又攻浏河，闽海军发炮助攻，浙军扼守。

△　李福林赴海丰见陈炯明，提议：一、潮梅由陈炯明军留驻；二、任陈炯明为援闽总司令，全军向闽发展；三、东江划为不驻兵地区。19日，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范石生、宋鹤庚、李

福林等联电陈炯明，促其“凛遵帅令，长驱入闽”；“若仍意存观望，甚则包藏祸心，欲乘间窃发，惟有先清余孽，再事远征”。

△　冯玉祥之先头部队张之江旅出发去热河，宋哲元、刘郁芬、李鸣钟、鹿钟麟各旅陆续开拔。23日，开拔完竣，冯亦离京，另派步兵一营留守，以蒋鸿遇为留守司令。由河南招募来的新兵万人留后方训练，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又分派刘治洲、刘之龙、张树声等秘密联络各方，侦察军政情形。

△　直军彭寿莘部与奉军张学良部在山海关外万家屯之西接触，奉军仅放一排枪后即退，直军急迫，中地雷。奉军飞机是日起，连日在愉关、昌黎、滦州投弹。

△　孙中山派大本营参谋部长李烈钧赴日，以争取日本各界支持北伐事业。

9月19日　　孙中山为讨伐曹、吴电卢永祥，略谓：“曹、吴祸国穷兵，残民以逞，甘为戎首，举国痛心。文已移驻韶关，宣告邦人，出师入赣，期与浙、奉义军，一致讨贼。”

△　晨3时，齐燮元乘孙传芳进入杭州下总攻击令，限24小时内占龙华。援苏之皖军、豫军攻黄渡、袭南翔，浙军臧致平派兵抵抗，激战经日，皖、豫军退出马陆。黄渡、嘉定、南翔、浏河均有剧战。宁、闽舰六艘分三队连续猛攻浏河，均未得逞。苏军遂集中兵力自白鹤港进攻青浦，直扑松江。

△　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总部因苏军进逼南翔，下紧急出防令。法租界义勇队出防，法舰陆战队千余人登陆。虹口北四川路一带日本海军登陆巡逻。杨树浦一带均由美舰兵士担防。静安寺大西路直至华界法华镇一带由英海军士兵担防。后因苏军失利，23日，万国商团等撤防。

△　湖北省议会通电声明对各方战事严守中立，不承认鄂省接济各方战事所耗之公帑。山东省议会亦发起同样运动。

△　温树德令“海圻”舰开赴山海关。

9月20日　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驻韶各军旋分二路出发：第一路军由朱培德、何成濬、赵成梁、李明扬、樊钟秀等军组成，樊为攻赣先锋总指挥，率所部4000余人先入江西。第二路军又名援鄂军，由湘军谭延闿部、皖军柏文蔚部、赣军胡谦部及李国柱部等组成，程潜为总司令，进军湖南。

△　唐继尧召集川、滇、黔三省联军将领成立川滇黔建国联军，以胡若愚为滇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刘显世为黔军总司令，准备经川省参加北伐。22日，建国联军总司令部在昆明五华山开始办公。旋分任唐继虞、胡若愚、石青阳、吴醒汉、龙云、何海清、刘显潜、周西成为第一至八军军长。

△　奉军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至通辽，令穆春、阚朝玺两旅向开鲁出发。22日，穆旅等占开鲁。

△　张作霖邀见英、美等国驻奉领事，请将停泊山海关及秦皇岛之外舰撤离，声称将轰炸秦皇岛站及北京，但必保护在东北之外侨生命财产。

△　曹锟裁撤闽粤边防督办及浙江督军两缺，特任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

△　曹锟据吴佩孚呈请，将陆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褫职查办，任命夏兆麟暂代第四师师长职。

△　曹锟特任王克敏兼盐务署督办。

△　曹锟任命朱声广暂代陆军第十师师长；派杨树庄为海军副司

令，李景曦为淞沪海军司令。

△　卢永祥派王宾为第三军总司令，主持松江方面防务。

△　孙中山令广东“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赴韶关训练，以备维护后方。22日，“工团军”及“农民自卫军”由谭平山带领自广州至韶关谒见孙中山，表示极愿参加北伐。孙中山即命在大本营设立政治训练部，以谭平山专任政治宣传与训练任务。

△　广东全省工团军发表《北伐宣言》，称定于今日出发韶关，参加国民革命，本着为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而组织工团军的初旨，“宣传于数万少壮穷苦兵士之中”，使皆能为国民革命而战，为打倒全体民众惟一大仇敌之军阀与帝国主义而战，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冒死杀贼，“进而号召全国农友、工友、穷苦兵士齐起赞助北伐，以期革命彻底实现”。

△　农民自卫军发表《北伐宣言》，略谓：此次大元帅移师韶关，实行北伐，“在此时刻，我们变更在城市中的固定训练，跑到前锋，散之各地，作我们响应革命的武装训练，武装宣传”；“要使每个军队经过的乡村农民都懂得起来自卫，起来赞助革命政府，起来反抗军阀之压迫。更要使革命军士明白共同的敌人乃是反革命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宣传各地农民要参加国民革命，谋工农兵的大联合，这便是农民自卫军同着工团军出发的要义”。

△　由厦门大学离校师生筹设于上海之大夏大学举行开学典礼。22日正式上课，文、理、商、教、预五科并举，新旧学生240余人。

9月21日　吴佩孚在京宴请各银行经理商筹军费，各行皆婉言拒绝。

△　吴佩孚之第三师自廊坊、丰台开赴滦州。

△　陆荣廷宣布下野，所部入湘由马济改编。赵恒惕应桂军李宗

仁等之请，将湘军叶琪旅撤回湘境，让出全州。沈鸿英部旋入全州一带，愿候命出发北伐。

△　北伐军攻赣先锋总指挥樊钟秀令第一混成旅旅长阎凤岗、第七团团长赵天清由仁化出动。

△　旅法华人在巴黎地理学会集会，到200余人，一致主张：一、打倒军阀；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三、实行国民革命；四、拥护国民革命首领孙中山。并通过通电和宣言，支持国民革命。

△　浙军自重固退至青浦城内，陈乐山率援军两团至，力战竟日，收复重固。苏军退驻白鹤港。

△　援苏之皖军王普部乘浙军陈乐山部转赴淞沪前线之机，进占泗安；次日占吴兴，并向嘉兴进攻。

△　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以卢永祥疑其通敌，报端亦有所风传，于是日及次日两次电卢自白，表示服从。

△　蒙古达尔罕王、宾图王等组织旗兵助奉作战，每旗出兵5000，共二万余人，是日由司令官包吉达鲁率领到达通辽，加入奉军第五军吴俊陞部之右翼助战。

△　北京政府逮捕已辞职之参议员丁佛言后，是日又捕众议员彭养光。次日，多数议员认为宪法规定现任议员除现行犯外不得逮捕，现行犯被逮，政府亦应向参众两院报告理由。当经众院行政委员会决定24日开紧急会议，请颜惠庆出席答复。

9月22日　　苏联全权代表库兹聂佐夫与东三省代表郑谦、吕荣寰、钟世铭签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即《奉俄协定》），凡七条，规定：中东铁路60年后由中国无条件收回；中东铁路理事会由奉、俄会商解决，使中东铁路之权安然由旧俄董事移交苏联董事之手。该协定于1925年3月12日经段祺

瑞核准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附件。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 孙传芳军孟昭月、卢香亭两旅入杭州。

△ 曹锟令免浙江省长张载阳职，特任夏超为浙江省长。

△ 张作霖在奉召集高级军事人员30余人会议，决定：一、积极扩充前线兵力，并整备后援队；二、印刷劝降书500万张散发直军各营。其降服奉军者，军官则破格升用，携大炮一尊赏1000元，步枪一支赏100元至150元，兵士除赐银元，并量才升为下级军官；三、军事紧急时即由张作相任代理总司令，张作霖至前线督战。

△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发表声明称：日本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但日本国内舆论对币原的不干涉政策提出种种责难，要求采取“积极的强硬政策”；驻奉天总领事船津也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并主张如战争中张作霖胜利，则尽量促使段祺瑞出山，引导张援段。

△ 上海独立海军“海筹”等四舰受杜锡珪运动，归附江苏。杜原允发七个月饷项，后只发三个月，因此除“海筹”仍泊原处外，其他三舰于25日开赴浏河归队。后“海筹”开往通州，上海独立海军领袖林建章、舰队司令周兆瑞被士兵围在舰中。

9月23日 孙中山电许崇智查办商团勾结陈炯明谋乱，电称：“宜速将陈贼电沪全文发表各报，并为严重质问商团，限即日有完满答复。并限陈廉伯三日内回省辩明。否则，取消令无效。款要即日交足，然后陆续还枪于改组之商团。如不能办，则六日内当尽缴商团已有之枪，并分别查办通陈之人。”

△ 曹锟下令褫夺张作霖官勋，并称：“东三省各军官长有自拔来

归者，一律录用，其有率队来归者，考查确实编为国军，所有率队各级官长即予从优奖叙，以昭激劝。”

△　奉军李景林部攻朝阳，与直军谭庆林部战于尖山子，败之，是日李部占朝阳。奉军旋即分两路筹攻建平、凌源。

△　援直军第六路司令阎治堂率第二十师离丰台前往芦台，旋赴山海关。

△　浙沪联军虑孙传芳军接踵追至，将沪杭路嘉兴车站东之七十八号桥及嘉善、嘉兴间之七十一号铁桥炸毁。25日，孙军卢香亭旅占嘉兴。

△　齐燮元令陈调元部、杨春普部至昆山以厚主力，并令白宝山、史俊玉等部经吴兴、嘉兴向淞沪迅速跟追。

△　北京京畿卫戍司令部改为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以赵玉珂为总司令，孙岳、聂宪藩、刘梦庚、薛之珩、车庆云为副。

△　曹锟特派张怀芝为讨逆军军政执法总长。

△　直系各军枪弹不足，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是日又向阎锡山索得子弹60万发，吴佩孚即电阎奖励并请调兵一万。

9月24日　　孙中山发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谓：“夫元年以后，所恃以维持民国者，惟有《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之无效如此，则纲纪荡然，祸乱相寻，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鉴于此，以为今后之革命，当赓续辛亥未完之绪，而力矫其失。即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25条，以为今后革命之典型。”并谓：“革命为非常之破坏，故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积十三年痛苦之经验，当知所谓人民权利与人民幸福，当务其实，不当徒袭其名。”“本政府郑重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秉承本政府之号

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

△　冯玉祥奉命出发讨奉，是日到怀柔县暂设第三军司令部。28日到密云县。29日，冯电召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蒋鸿遇到密云密商准备班师回京事。10月1日到古北口，以筹措给养为名停止前进，一面督饬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预作回京准备，一面令鹿钟麟旅朝北京方面练习行军。

△　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自衢州退回五夫，将司令部及所部移居宁波。孙传芳因潘态度未明，并盛传其独立，乃呈请北京政府惩办。26日，曹锟据孙传芳呈请，下令将潘国纲免职，褫夺官勋，通缉严办。

△　孙中山电告卢永祥拟即出师北伐，谓：“此间先遣队已出发数日，拟以二旬突袭敌人要害，以为沪军之声援。现在有志北伐而向赣边集中之军队约二万人枪，10日可以到达。刻正一面赶筹一月之粮食费，倘能如意，则旬日后便可进攻赣南。此外尚有滇、粤、桂各军，本拟陆续出发，忽闻陈炯明有反攻羊城之举，遂被牵制，暂留后方。”

△　孙中山函国际联盟议长莫达，揭露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仍欲以帝国主义之干涉行为以行在华政策。

△　吴佩孚聘前财政总长张英华为高等财政顾问，告以预算军费约5000万元，决先筹1000万元。

△　众议院行政委员孙钟等见吴佩孚，谓国会对于中央军事均表同意，今因逮捕议员彭养光使国会与政府分歧，为计非得，应请主持释放。吴即令警察总监薛之珩将彭交保释放。众议院原定是日举行之紧急会议因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改开谈话会，由胡思舜报告彭被捕保释经过。

9月25日　北京外交团因奉天声言飞机将袭北京，乃由荷兰公使欧登科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及张作霖，抗议掷弹于毫无设防之城市，谓北京或任何通商口岸外人生命财产如因轰炸而受到损害，两军则应负完全之责任。

△　曹锟特派齐燮元暂行兼领松沪护军使，萧耀南为鄂豫湘防务总司令，刘镇华为陕西后方筹备总司令；派方本仁督办赣粤边防事宜，李英殿、杨以德为直隶后方筹备副司令，张殿如为独立骑兵总司令，谭庆林为独立骑兵前敌总指挥，丁长发、马鸿逵为独立骑兵前敌副指挥。

△　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在国务院宴日使芳泽，吴佩孚及其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等出席，商谈东北战事。吴要求日方予以“十分之同情及各种便宜”，勿以“不遵中央政府命令之张作霖为谋及东北事宜之交涉对象”。芳泽则谓：北京政府威令不及东北，“我日本对于东北事宜之交涉，自以张作霖为对手”。

△　卢永祥、何丰林、陈乐山、臧致平由沪抵南翔，谋攻苏军。苏军吴恒瓒以南翔不可急下，改攻方泰，激战一日，无进展。

△　陈调元率苏、皖军自宜兴入占嘉兴；孙传芳率闽军一旅亦至嘉兴，布置进攻松江。

△　顾维钧为《奉俄协定》事照会加拉罕，声明此项局部协定签字倘系事实，当提严重提议。10月1日，加拉罕复北京政府外交部谓，为防止列强侵略中东路之野心，不得不如此，且与《中苏协定大纲》毫无抵触。

△　北伐军攻赣之樊钟秀豫军3000多人攻占仙霞岭风（封）门坳要境。第二路入湘之柏文蔚、胡谦、李国柱部8000人抵湘边砰石。26日，朱培德部王均师由连州开抵乐昌、砰石，其前锋向宜章警戒。

△　直方毅军3000人由建平潜行东进，图反攻朝阳，为李景林部所察，即截击于中途，直军退青山。翌日直军援至，复战不敌，退大青山。

△　广州兵工厂工人致函《向导》周报，揭发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部长、兵工厂厂长马超俊破坏工人俱乐部、包庇工头、无故开除工人70名、纵容兵士殴打工人、虐待徒工、破坏消费合作社等十大罪状，要求将马撤职，开除党籍。10月20日，孙中山令免马超俊兵工厂厂长职，听候查办，任命黄骚代理广东兵工厂厂长。

△　杭州西湖胜景雷峰塔，于下午1时半轰然巨响中自行倾圮。

9月26日　闽军卢香亭旅在嘉兴与苏、皖军会合进占枫泾。浙沪联军退驻离枫泾18里之石湖荡，将枫泾与松江间之沪杭线三十一、三十四号桥炸毁，以阻苏、闽二军之进攻。27日，孙传芳任总指挥，以苏军白宝山部为中路，皖军史俊玉部为右翼，闽军孟昭月部为左翼，迫向石湖荡。

△　吴佩孚与曹锟等讨论军事，决定：一、分三路轮流攻击山海关奉军之最精锐部队，敌败则追击，勿留后患；二、喜峰口奉军李景林、吴俊陞部尽属骑兵，不时挑战，直军宜按剿匪方法设防；三、朝阳敌军出没无常，宜增加后路，取大包围。

△　曹锟派张锡元为察区防务总司令，马福祥为绥区防务总司令。

9月27日　曹锟特派曹锳兼讨逆军第四军总司令，殷本浩、曹士杰为副司令。

△　曹锟下令将对海军将领林建章、许建廷、蒋斌、曾以鼎、朱天森、张日章、陈时珍七人褫职通缉。

9月28日　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李少川调解孙中山、陈炯明和

议，携有段致陈函，劝陈出师援闽及联络孙中山共讨曹、吴。是日，李少川赴海丰见陈，许世英抵广州。29日，廖仲恺宴许世英，但懋辛、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等作陪。许表示此次来粤，一为表段愿与粤、奉、皖共讨曹、吴；二为促出师；三为劝与陈炯明合作。10月2日，陈炯明将驻海丰粤军总司令行营取消，表示已无军职，借以阻止许、李之调停。

△　东江方面联军由石龙退至石滩，以石滩为第一门户，与左翼之增城、右翼之虎门成一平行线，以备有事时易于进退联络。中路石滩由范石生部布防，左路增城由滇军胡思舜部布防，右路虎门一带由桂军刘震寰部扼守，三路军事由范石生负责指挥。

△　苏军自赵屯桥及白鹤港进攻青浦，与浙军在重固、章堰激战。

△　曹锟特派陆洪涛为甘肃后方筹备总司令。

△　孙中山电许崇智、蒋介石：范石生所购之驳壳枪1000支并子弹，可即发还。

△　中华国民拒毒会各地20余分会举行拒毒大会。上海拒毒大会对日内瓦禁烟大会提出请愿书，请贯彻主张，邀请各国订立公约，互相遵守；并向北京政府提出请愿书，略谓：我国去岁鸦片产额增至1.5万吨，烟禁废弛，不惟大损国际信用，且危及邦本，请下令各省军民长官实行禁烟法令，并训令全权代表在日内瓦大会与各国代表通力合作，设法限制鸦片及一切毒物之出产。

△　直军以长城前之旧俄国炮台为中心，右至海岸，左抵觉山，设防御阵地。29日晚，奉军以大炮猛击该阵地之右翼，进入战斗，拟冲向铁路线。30日，直军第九师、第二十三师、第二十六师开入榆关增防。

9月29日　广东各界在韶关举行赞助北伐大会，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军官学校、广东警卫军、第三师范、开明中学等各团体数千人参加。孙中山演讲《北伐之原因》，指出此次提师北伐，便是要将西南军队联络奉、浙军队，扫除北洋军阀官僚，以建设新国家，希望全国国民共起努力。会毕游行。

△　深夜，北伐豫军前锋总指挥樊钟秀率豫军第二、第三混成旅由封门坳出发，取道粤之仁化，绕道大庾岭之西，避去南安大庾岭之险要，进至崇义县境，防军方本仁部团长马龙标毫无戒备，遭豫军左右夹攻，纷纷退却，豫军乘胜追击，马团降者过半，马及官兵600余人被俘，余部向赣州方面退却。

△　孙中山电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称：东江防务专责滇、粤、桂三军担任，滇军除赵成梁、朱世贵部已在北江外，其他滇、粤、桂之部队，暂时概不调动，务期引敌就近一鼓而扑灭之，乘胜收复潮梅，以固根本。次日，又电令杨、许、刘，称东莞、宝安既撤防，虎门必当固守，不可疏虞。

△　孙中山特任张开儒为大本营高等顾问。

△　段祺瑞派贾德耀持亲笔信到密云晤冯玉祥，希望冯对贿选政府加以自处。

△　曹锟派冯玉荣为第一军第一路副司令，葛树屏为第二路副司令，时全胜为第三路副司令。

△　国民党人张镇乘江南战事，江北防守空虚之际，率众300余人在苏北阜宁起事，攻据八滩，驻阜宁荣管带率领警队暨盐城、阜宁游击队等抵御。10月2日，齐燮元令代淮扬镇守使兼淮泗守备司令刘汉民派大队进剿，限七日肃清。

9月30日　奉军第六军副军长吴光新、梯队长李爽垲率部克建

平，直军死伤2000余人，被夺军械无数。张宗昌率第三旅攻凌源，与直军董政国部战于叶柏寿，董败退，复增援兵，遭奉军第二旅邢士廉部猛攻，董部几全覆没，邢遂与张宗昌会师攻凌源，占领之，董败退喜峰口。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安利洋行借行平银167.908121万两，用以偿付瑞记德奥借款利息。

△　何丰林在沪发行淞沪公债200万元，指定以松江、上海、青浦、南汇四县丁漕作抵，上海市则以一月房租募作公债之用。同日，又征收军需善后米捐，规定甲地产米运销乙地者，每石须纳军需善后捐大洋一元。

9月下旬　　侨港工团总会代表18万余工人会员致电孙中山，拥护出师北伐。

是月　　张作霖之驻京办事人员马炳南会见冯王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张密告马：冯部一师三旅已奉命日内移防，分驻高丽营、怀柔、密云、石匣镇、古北口，冯因吴在第一次直奉战后行赏不公，不拟与奉军作战，并转达冯意，请奉军万勿入关，嘱马立即回沈阳报告。10月初，马由沈回京，与张树声等同去古北口见冯，并携张作霖函，大意谓：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阅后即写一大“成”字作复。马返回时途遇毅军，被截回南苑，所携冯之复信托人带往沈阳。

△　北京政府交通部招商轮船局向花旗银行借规平银100万两，年息八厘，以招商总局地产作担保。

△　溥益纺织公司第二厂在上海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设立，资本银150万两。

10月

10月1日　广州商团自恃有备，并有范石生、廖行超等为后盾，拒不依政府颁布条例实行改组，也未筹北伐战费50万元。是日，全省商、乡团代表在佛山开会，商议索还枪械事，决定于“双十节”在广州及各属一致大罢市，停止纳税，宣称“与械同存亡”。

△　孙中山公布《工会条例》，凡21条。

△　唐继尧电孙中山告以川滇黔建国联军已于上月20日在滇成立，并称“惟副元帅一职，名分较崇，愧无以应”，表示不就。又电驻粤滇军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请捐前嫌，共同对敌”。

△　浙军自重固向白鹤港进攻。次晨因松江战事启，改取守势。

△　苏、闽军袭取距松江南12里之佘来庙。2日，驻石湖荡孙传芳之闽军孟昭月部向卢永祥、何丰林之浙沪联军进攻，双方互开大炮轰击，联军退守石湖荡第三十一号桥。3日，闽、苏军由佘来庙猛攻三十一号桥，未果，于4日改变战略，移军转战浦南之松隐、米市渡、叶榭一带。

△　吴佩孚宴请北京外交团，争取各国对其讨奉战事之谅解。

△　奉军飞机轰炸山海关、昌黎间之直军营房及运兵火车，直军伤亡甚大。3日，又在万家屯一带掷弹40余枚。

△　日本各政党成员结伙到外务省谴责币原外相“优柔误国”，提出必须保障满蒙既得利益，否则日对朝鲜统治也将受到影响。10日，日本军人、政党组织所谓“对支国民大会”，督促日本政府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西方国家协调），以实力援助张作霖。13日，日本政府对直、奉双方提出护侨要求。

△　直军独立骑兵前敌副指挥马鸿逵筹饷30万元，抽调骑兵四个团3000人，陆续分批搭京绥路车经张家口、围场开往赤峰。

△　湖南省长赵恒惕颁布修正省宪法令，并公布经省议会议决之《省宪法会议组织法》13条和赞同修正首宪提案之议员130人名单。

△　上海对日市民外交大会议决，电告中外银行团不得私借款项助长内战。中旬，南洋华侨工会、美国芝加哥中华会馆等通电反对北京政府大借外债。

10月2日　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与各部总长，政府秘书长公宴吴佩孚，席间讨论发行“四二库券”400万元。同日，吴佩孚为此宴请总税务司安格联，安同意发行，并主张库券用于行政及治安费，偿还北京警察及步军统领衙门欠饷。该款用途由安监督。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法国售与张作霖飞机20架事向驻京法使馆提出抗议。同日，又致函日使馆，请于此项飞机运抵大连时予以扣留。7日，法机20架由香港运抵大连。晚，法使馆复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法国无禁止商用飞机出口之法律，惟军用飞机则可加以取缔。

△　山海关奉军骤增，战线至万家屯、黄家场、龙王庙、孟姜女庙等处，战况更烈。同日，援直军第五路司令靳云鹗率第十四师离郑州北开山海关。

10月3日　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长兼职，宣示贯彻讨贼与自治之目的。时广州商团正酝酿第二次大罢市，故派李福林向商团再次商议发还所扣枪械办法。

△　中东铁路于《奉俄协定》签字后改组，华方新董事为鲍贵卿、袁金铠、刘哲、范其光、吕荣寰，苏方新董事为伊万诺夫、拉基金、塞列卜利亚可夫、库尼列夫斯基、克莱士可夫。鲍贵卿为中东路总董兼督办，伊万诺夫为新局长。是日接收全路事务，即开董事会议，决免旧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及地亩局长关达基、经济调查局长米哈依洛夫职，并因吞款嫌疑将三人逮捕。

△　吴佩孚以冯玉祥借口交通不便停顿不前，派王承斌至承德前线，以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第二、三军，后援军张殿如、胡景翼归其调遣，借以监视冯之行动。吴又派车庆云、陈德修等为前敌执法官赴热河督师。

△　第二路入湘援鄂北伐军宋鹤庚、鲁涤平部各一旅及陈嘉祐一部由韶关向湘边出发。4日，援鄂军总司令程潜偕第三军军长胡谦由广州出发赴湘边指挥。5日，宋鹤庚率第一师方鼎英、第二师戴岳、第三师谭道源集合湘边待命，准备入湘。

10月4日　吴佩孚因朝阳、凌源等地先后失守，免去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刘富有、副指挥龚汉治本兼各职；以第二十五旅旅长陶经武、热河第一混成旅旅长张林分别继任总、副指挥。

△　曹锟以孙传芳督师进兵全浙，渐已底定，夏超翊戴中央，力维大局，其余浙省文武官吏或躬冒锋镝，或保境安民，特下令奖励，并责成孙传芳、夏超办理军事收束、地方绥抚事宜。

△　吴佩孚召见海军总司令杜锡珪，酌派苏、闽舰队协攻东北。杜决定派“海筹”、“海容”、“应瑞”、“华乙”四舰驶往秦皇岛以北。

△　许世英抵韶关谒孙中山，劝孙与陈炯明和解，共讨曹、吴，并转告段祺瑞对奉、粤、浙、皖、滇联合讨直计划。事毕即返穗经港北上复命。

△　孙中山特任方声涛代理大本营参谋长。

△　冯玉祥与王承斌密议时局。冯知王被吴佩孚解除二十三师师长职心怀怨恨，即将倒曹、吴秘密计划告王，王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声明愿守中立，不向吴告密，但亦不肯背吴助冯。同日，冯又与胡景翼之代表李仲三密谈，主张队伍开拔宜拖慢，以待战局变化。

△　驻京法使傅乐猷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奉俄协定》若有

损法国在中东铁路之权利，法国不能承认。

△ 《申报》载文云，近一个月之南北战事，损失国力在五亿元以上，非10年不能回复。

10月5日 齐燮元又下最后总攻击令，命所部对浙沪联军总攻击。

△ 曹锟特派王占元为讨逆军检察使。

△ 苏联大使加拉罕移居旧俄使馆，并举行升旗礼。上海、天津、广州苏联领事馆亦升旗。

10月6日 孙中山特任谭延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程潜为建国军攻鄂总司令；任命孔绍尧为赣南善后委员会委员长。

△ 广州饭馆、轮渡、茶居等数业罢市，反对滇、湘、桂军需筹备处借口筹划北伐军费，加抽杂捐。

10月7日 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韩麟春部与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共三万人合力向山海关直军彭寿莘第十五师阵地总攻。奉军分左右二翼，旅团长皆身先士卒，以山野炮、迫击炮掩护步兵冲锋，右翼于上午占领山海关外旧俄兵营、小林、姚家山；左翼攻下黄土岭、无名口，继攻山海关侧面要隘九门口。直军第十三混成旅冯玉荣部在九门口设防严密，奉军第二、第六旅冲锋数次，死伤甚众，终因直军兵力单薄，奉军奋勇登城夺取战壕，冯部军心动摇，临阵脱逃，至傍晚奉军孙旭昌第十混成旅攻入九门口，冯于次日晨服毒自杀，残部退石门寨，所剩不及半数。同日，奉军吴光新、李景林、许兰洲三部分路进逼赤峰。直军王承斌乘奉军远来疲惫之际先行突击，双方死伤甚众。后奉军炸弹队加入攻击，终于攻占赤峰。奉军俘获毅军统领一名、营长二名，士兵千余名。

△ 曹锟核准发行“四二库券”，总额银元420万元，自10月1日起

生效，按九四折发行，年利八厘，每年分3月31日及9月30日两次付息。但民国十三年10月1日以后所募款项按照日数加扣利息，10月1日起还本付息，用德国庚子赔款拨付四年特种公债及五年公债利息后之余剩款项为担保。

△　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裁撤战时军需筹备处机关，并将该处创立之各种捐款名目一律撤销。

△　凌晨，孙传芳军四营以木筏先后从叶榭暗渡黄浦江，伏于明星桥，图袭松江后路，对石湖荡则仍取攻势；又以主力由浦南之佘来庙等地趋松江车站，以分浙沪联军之力。上午10时，明星桥伏兵尽发，直捣浙沪联军后方，同时复由金山卫、叶榭、张泽等处猛击松江，联军四面受敌，据城力抗。

△　曹锟令派杨桑为锡林郭勒盟联防警备总司令。

△　福建因教育经费无着，中等以上各学校—律停课；因财厅无人负责，各校教职员捣毁财厅。

10月8日　曹锟特任马鸿宾为璞威将军，裴建准为揄威将军，谭道南为将军府将军。

△　曹锟任命蓝世钲为四川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张成孝为第十二师师长，李凤翔为福建陆军第三师师长，刘国孝为四川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蓝文彬为第七混成旅旅长，郑世斌为四川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陈兰亭为第十混成旅旅长。

△　防守松江之浙沪联军第三军司令王宾，以松江石湖荡为天险，无严密防御工事，闽军少数偷渡之敌得以乘隙而入。孙传芳军猛轰松江城垣，并攀墙而入。王宾携眷逃上海，孙传芳军进占松江。

△　宁波士绅李徵五、一师旅长郝国玺、伍文渊等在宁台镇守使署会议，一致主张浙江实行自治，草定浙江临时自治政府组织大纲，

决定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推蒋尊簋为委员长，吕公望为自治军总司令，屈映光为自治民政长。

△　苏联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运炮、机枪、长短枪（约8000支）及各种弹药400万发抵达黄埔，即时起卸。广州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孙中山在韶关撰词赞扬苏联“以推翻强暴帝国主义，解除弱小民族压迫为使命”。9日，苏舰海军将校团赴韶关谒孙中山。10日，苏联海军官兵在韶关参加“双十节”阅兵典礼。

10月9日　　广州商团用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名义发出总罢市通牒，内称：“自卫团械已亡，苛虐敲剥无阻，全省商人罢市，冀促政府觉悟，双十国庆举行，表示国民痛悼，千祈齐心协力，免犯全省众怒。”10日晨，部分商店次第罢市，以西关一带为最多，约十分之四。

△　胡汉民向孙中山转呈民团督办李福林所拟发还商团枪械办法三条：一、由李福林担任召集殷实商人筹借20万元，由租捐项下拨还；二、枪械交民团统率处发还，其数在5000支以上，发还之数须商团负责人签字；三、枪械发还之日，由商团通电解释以前误会，表明自卫心迹。孙中山据呈后，于下午5时半令蒋介石将商团枪械交李福林发还商团。

△　广州未加入罢市的商民拟组织“广州营业维持会”，派代表往见李福林，请李见孙中山商议发械手续，务于日内解决。李完全允诺，并即召集各商于中午散发劝勿罢市之传单，谓政府发还枪械已有办法，各项苛杂亦已完全取消。下午李福林等商诸孙中山后，当晚即至黄埔运枪4000杆，子弹2.5万发，次晨3时运到西濠口码头。商团军于中午分队至码头起运。

△　孙中山命令迅即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予商团以断然之处置。鲍罗廷到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商量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鲍不欲使

胡汉民、汪精卫参加，蒋即函请孙中山应准胡、汪加入革命委员会。孙复函谓：“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两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两人，当易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两有裨益。”

△　孙中山免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本职，特任许崇智兼任；免郑洪年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职，任林云陔兼代；免叶恭绰兼盐务督办，特任古应芬兼任。

△　广州商团利用部分行业反抗滇、桂军等加收捐税而罢业的机会扩大事态，要求发还被扣枪械，蒋介石两次函韶关告急。孙中山电复蒋介石，略谓：“以我推测，或不至如此危急，然我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函孙表示“决死守孤岛”。

△　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从山海关阵地转道秦皇岛赴石门寨督战，将山海关第十五师阵地交第二十九旅旅长郭敬臣指挥，将司令部移向滦州，命张治公陕军第二师反攻九门口。奉军居高临下，陕军不能取胜。

△　卢永祥改任何丰林为第三军总司令，第十师十九旅旅长郑俊彦任前敌总指挥，责以恢复松江。10日，何丰林亲自督战于明星桥，与孙传芳激战，孙军挫败。11日，两军相战于明星桥之正南方，浙沪联军进展数里。

△　冯玉祥电曹锟直系各将领及段祺瑞暨段系各要员，惟不及吴

佩孚，略谓：曹锟、李彦青、王毓芝、王克敏诸人朋比为奸，致兵革遍于全国，人民沦于水火，欲靖国事，非将此辈小人一律驱逐不可。

△　吴佩孚和驻天津日总领事吉田茂会谈，表示直军进入东北后，将尊重条约中规定之日本在满权益。

△　著名小说翻译家林纾（琴南）在北京病故。

10月10日　　广东工农各界群众及军校学生在广州第一公园集会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揭露商团的反革命面目。周恩来代表民族解放协会讲话，指出："团结全中国的革命群众向反革命派进攻"，就能够实现"真正独立，真正共和"。会后，数千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行至西濠口，遭预伏的商团军突然袭击，当场死亡20多人，落水淹毙工团军13人，被俘多人，造成"双十惨案"。孙中山获悉后，即电胡汉民、许崇智、李福林严行查办。

△　广州"双十惨案"发生后，参加游行的16团体成立"工农兵学革命同盟"，发表宣言，指出这次屠杀事件是英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商团军、陈炯明以及在广州的反动军阀联合制造的，号召大家"速起与反革命派决此最后死战"。同日，中共广州地方委员会发表告广州市民书，号召工农群众通过商团叛乱事件进一步肃清反革命派的阴谋，坚决打击反革命派以保卫革命，并要求国民党"扫除向日妥协的空气"，领导群众奋斗，"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

△　孙中山为处理商团问题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次日，孙特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为全权委员。13日，又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规定鲍"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

△　孙中山严电胡汉民、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古应芬、蒋介石、李福林、李朗如等应付商团，称："商人罢市与敌（按：指陈炯明）反攻同时并举，是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

当机立断。如果确有其事，则用干部及其他学生协同福军忠勇之士临门劝告。如有不从，即日将货铺充公。”

△　孙中山电示范石生、廖行超处理谋叛商团办法，谓：“商人不肯就政府所定条例领枪，且供给陈逆（按：指陈炯明）以150万，约定罢市、反攻同时并举，此非叛逆，尚何为叛逆？我当当机立断，为严正之解决，先将著名最反对政府之团店警告。如再不从，则先将逆商货屋悉行充公，以警效尤。若犹不能制止，则仰两兄出示令西关居民限三日内迁移出西关，免遭意外。”

△　孙中山在韶关各军庆祝武昌起义十三周年集会上发表演说，勉励各军将领立即出发，指出这次北伐是从新筹备革命，以竟过去斗争未了之功；并称：商团与陈炯明勾结，广州已陷于危险中，因此必须出发北伐，能攻下赣州、南昌，便开拓一个新局面。

△　吴佩孚命军事参议处财政组主任参议谢宗陶在总统府与中、交两行总经理张公权、钱新之谈判，筹索军饷120万元，并由财政、交通两部凑足300万，充作一月之军费。晚9时，吴即携款赶往榆关前线督战。

△　吴佩孚以王正廷筹款不力，命令警备司令部以泄露机密罪名将王之亲信秘书程锡庚拘押，以示警告。

△　北京警备司令部实行新闻检查。18日，英人辛博森所办之英汉合璧《东方时报》因记载东北战事未能尽道直军胜利，有时且直揭其败况，被北京政府警察厅查封，华人经理史俊明被捕。20日，《世界晚报》因载路透社电东京所传奉军消息，被查封。

△　胡景翼部岳维峻旅抵喜峰口，胡率所部抵遵化，饬李乾三开拔前线待命。

△　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在上海创办《醒

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喉舌。该刊宣传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全民合作”，反对阶级斗争；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实行反共反苏。

△　上海各界假总商会召开纪念国庆国民大会。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璋在会上提出帮助卢永祥、打倒齐燮元，遭到与会进步学生的反对。上海大学林钧等发表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演讲，竟被诬为齐的“奸细”，遭到毒打。该校学生黄仁上台质问，竟被童、喻收买的数名暴徒殴打，并从台上推下而致死。当天，瞿秋白奉中共中央命令，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的行动委员会，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抗议此种法西斯流氓行为。

△　湖南修改省宪之宪法会议开幕。23日讨论修改司法制度部分。24日讨论修正行政部分。30日讨论修正立法部分。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去年在四川被熊克武川军汤子模部所掳日船“宜阳丸”船员，现已由汤释放，该案完全了结。

10月上旬　　中共主办的《中国工人》创刊，每隔一两个月出版一期，后改为周刊。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后，该刊成为总工会的机关刊物。

10月11日　　孙中山令革命委员会用会长名义便宜行事，用种种方法打消商团罢市，并立即设法收回关余。12日，孙电令胡汉民宣布广州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应非常之变；各军既觉悟纵容商团之非，着令一致服从于革命委员会命令，不得再加犹豫。

△　商团收到4000枪械后，立翻前约，拒绝签名领收枪械字据，且提出无条件全部发还枪械要求，是日继续煽动、胁迫商民罢市。李朗如以商团反复，辞公安局长职。李福林亦于次日电孙中山自请处分。12日，商团在西关等处布防，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并张贴“驱逐

孙文”、“打倒孙政府”等标语。13日起西关商团即大加戒严，以铁栅门分锁各街区，构筑炮垒等工事，准备作战。

△　吴佩孚令驻长辛店、丰台之第三师悉开赴山海关前线。

△　曹锟特派阎锡山为山西后方筹备总司令；派李厚基、王廷桢、张敬尧为援军副司令。

△　孙中山函蒋介石迅将俄械运至韶关，“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设在韶关。”蒋介石以广州局势危急，电请孙调驻韶关兵力南下平乱。

△　孙中山令派陈友仁、宋子文、罗桂芳为收取关余全权委员；免傅秉常海关监督兼职。

△　北伐豫军樊钟秀部占万安、泰和。各属民军纷起响应，永新、莲花、宁冈相继攻克，前锋进至离吉安40里之大庙地方。当晚，赣督蔡成勋闻豫军进至大庙，特开军事紧急会议，决令冯绍闵率所部全旅及骑兵团乘夜赴吉安应援，并令原驻赣东之暂编第三旅及第二十三混成旅各抽调一部，增防宁都、广昌、抚州等处。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电北京外交团，不承认外国资本团或国民对北京政府之贷款。

△　广州卫戍司令部布告，劝商店开市，未还团械14日点交；又以民团统率处督办名义布告，劝工团“捐嫌”，“勿听人挑拨”。

△　冯玉祥与参谋长刘骥、熊斌及段祺瑞代表贾德耀等至滦平，与奉军协议停战。攻热之奉军李景林、张宗昌部乃于13日自赤峰等地秘密转移到榆关及秦皇岛西之平山营作战。

△　胡景翼应米振标之请，令岳维峻部开抵平泉，岳即率领邓、

康等四团前往。是日，胡部李乾三旅开抵喜峰口，胡又令后方田玉洁、冯敏东、李云龙三旅次第前进。

△　苏军齐燮元部大举进攻青浦，浙沪联军以子弹不敷，退北簳山及陈坊桥，次日苏军入青浦。联军向莘庄、南翔、上海撤退。

△　英、美、日、法公使集议扬州盐税被齐燮元挪用事。同日，英、法、日三使致牒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各督任意截留盐税。

10月12日　　孙中山以广州情势紧急，急电胡汉民“即宣布戒严”。

△　孙中山手谕蒋介石，令与许崇智磋商，坚决镇压商团叛乱，“立即起义杀贼，绝无反顾”；“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如许崇智“不能决断，则无论如何艰难危险，仍将械运来韶关，以练我之卫队”。

△　孙中山函廖行超、范石生务必拥护革命委员会。范、廖知孙决心镇压商团叛乱，估量商团不能敌，且商团罢市，范、廖每日损失赌税万元，故允协同合作。傍晚，范致书广州商团、商会，劝告于13日复业。

△　胡汉民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限商团13日一律开市，并作下列准备：一、布置各军分区防务；二、调湘军保卫粤汉铁路；三、保卫水电；四、调吴铁城警卫军回省。

△　深夜，陈廉伯指使其弟陈廉仲在沙面租界召集关楚璞、李颂韶、邓介石、何盈光等开会，策划扩大商团叛乱，决定新老城团友一律于14日下午5时集中西关待命，以便15日拂晓开始行动，占领省署、公安局及各财政机关。

△　陈炯明驱石龙土匪袭攻石滩。刘震寰率队驰往堵剿。

△　吴佩孚抵榆关亲自指挥战事，并调集大批援军，吴佩孚第三师、杨清臣第二十四师、曹锳第十六师、靳云鹗第十四师、张治公陕军第二师均加入战线。奉方亦由热河方面调兵增援，李景林部之第二军抽调一部由张宗昌率领参加石门寨之战，吴光新部骑兵自赤峰开抵秦皇岛西北30里之平山营附近。吴佩孚决定自石门寨经沙河寨反攻九门口。13日，吴佩孚乘“海圻”舰率“楚豫”、“永翔”两舰开往葫芦岛、营口，筹划由海道袭击奉军后路。

△　奉军得九门口、王冈子后乘胜进迫沙河寨，以重炮轰击直军第三师一部之炮弹阵地，第三师步队被迫退却。是日，奉军攻占沙河寨。

△　上午，冯玉祥在滦平与王承斌所派之直隶督署参谋长李竟容密谈。下午，冯对段祺瑞之亲信、前陆军部军学司司长贾德耀、田雄飞谈称：大局糜烂，拟请段祺瑞、张绍曾诸位重出维持大局，并特请贾往天津疏通段，派田回京探询各方情形。

△　苏军朱熙部向嘉定石岗门进攻，被浙沪联军夏兆麟部击退。夜，朱熙率队猛烈反攻，联军夏兆麟、杨化昭两部力战不敌，败退入嘉定城中。苏军敢死队架梯登城，联军知不可守，即自东门退出。13日晨，苏军入嘉定。

△　浙沪联军何丰林部在明星桥南与孙传芳军对峙，孙军一部突由颛桥至，联军竭力抗御，弹尽后继以肉搏，终因寡不敌众，退守莘庄西五里余之曹家庄。13日，孙传芳军入龙华。

△　曹锟派宋锡金为京畿警备副司令，曹景桐为第四军第一路司令，敖景文为讨逆军航空司令。

10月13日　浙沪联军总司令部晨1时在上海高昌庙开军事会议，杨化昭、陈乐山等表示不愿再战。卢知大势已去，即电召何丰林自莘庄前线回沪，草拟下野电稿。当日，卢永祥通电下野，偕何丰林、臧

致平登日本“上海丸”舰东渡。卢临行将龙华防务交由二十旅旅氏朱声广担任，第六混成旅及松沪扩军使之关防交上海防守总司令刘永胜；并令各师、旅长自行收束各路军队。

△　下午，安亭苏军向黄渡猛攻，浙沪联军闻卢永祥等出走，悬白旗停战，次日退真如及上海。防守浏河之联军闻卢、何出走，不敢再战，退出浏河。苏军追击数十里，联军死伤甚众。15日，苏军占领南翔。

△　浙军第一师各军官与宁台镇守使王桂林等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组织浙江自治军，谋宁、绍、台三属自治。15日，浙江自治军通电，推吕公望为自治军总司令。同日，被原师长潘国纲任命为代师长的旅长伍文渊通电称养病沪上，凡事概不与闻。自治军前敌总指挥郝国玺亦于17日通电辞职。

△　孙中山电革命委员会，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令李福林宣布商团叛乱罪状；令警卫军吴铁城全部、湘军一部、粤军张民达师全部星夜回师广州戡乱。14日，电令胡汉民及驻广州各军，迅速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

△　孙中山令改北伐“讨贼靖国军”为“建国联军”；任命宋鹤庚为建国军北伐中央总指挥，朱培德为建国军北伐左翼总指挥，卢师谛为建国军北伐右翼总指挥，樊钟秀为建国军北伐先遣队总指挥，何成濬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张翼鹏为建国军北伐中央总指挥部参谋长。孙并正式任命唐继尧为副元帅兼滇川黔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

△　孙中山电嘱李烈钧仍留日本为发起亚洲大同盟进行宣传。略谓：“兄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

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

10月14日　　广州商团下紧急戒严令，所有老城各分团一律集中西关，准备作战。下午，粤军总司令部紧急会议，拟定平定商团叛乱进军计划，决由吴铁城、张民达、李福林等部包围西关。是夜，蒋介石率黄埔军校第二、三队协同由韶关调回之湘军3000人及吴铁城、张民达、李福林各部分向西关、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迎击，长堤，沙基、黄沙等地以滇军扼御之。吴铁城所部经高第街前进时，遇商团军，经三小时战斗后占领商团公所。深夜，商团军将西关一带理发店焚烧，并杀害理发工人二三十人。

△　孙中山令警备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及滇军干部学校学生统归蒋介石指挥。

△　胡汉民准李朗如辞广州公安局长职，以吴铁城继任。

△　奉军第四、十六旅及十二旅经猪熊峪在沙河寨以东地区向陕军第二师张治公部猛攻，陕军不敌。奉军直攻石门寨。午间，彭寿莘部从石门寨退到柳江，随即沿轻便铁路南行抵小不老附近建立据点，奉军旋即占领石门寨。彭向吴佩孚报告石门寨之严重情况，吴即改变海道袭奉敌后登陆计划，将控制在手中的精锐部队第三师第六旅于次日晨增援小不老；派十四师靳云鹗部占领安民寨；又派第三师第十团援助十五师左翼防守三道关、山海关之北等高山地带。

△　直军第三路张连同、张殿如部得谭庆林、丁长发等部自察哈尔驰援，全力反攻赤峰，奉军大部已暗调山海关作战，第六军许兰洲部势孤不能敌，战斗数小时后直军即占领赤峰。

△　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熊克武电湘当局，声明假道北伐之主旨。其出兵计划分数路，大队由芷江出麻阳；蔡巨猷部折入洪江，以汤子模部为接应；各军在辰州集合，直趋桃源、常德，经澧州入鄂西。16日，汤子模部贺龙旅自铜仁一带移入麻阳，30日到达辰

州。

△　孙中山请叶恭绰、郑洪年转电张作霖，称：“到韶已一月，军队集中亦毕。惟自樊部出发之后，财政竟陷于绝地，其他部队因此不能继出。而樊部独力奋斗，已致敌人疲于奔命，若我大军一出，江西直唾手可得也，其奈十日行粮亦不可得，坐失时机，深为抱愧。倘能即接济30万，则江西不足平，而长江可牵动，子嘉（卢永祥）虽败，不足虑也。”

△　顾维钧第二次照会加拉罕，声明地方长官非中央特别授权不能与他国签订任何协定，奉俄局部交涉曾经外交部一再切实警告，今值中央声讨奉张之时，苏联代表与张作霖乘机签定《奉俄协定》，殊与5月31日协定宗旨背驰。加拉罕对此未作正式答复。

△　鄂军援苏总指挥张允明率部抵上海，声言为齐燮元先锋，占领龙华及兵工厂。

10月15日　广州商团叛乱弭平。晨4时，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军与滇、桂、湘、豫、粤各军分五路进攻西关商团，先由张民达部攻西门，迭次冲锋均为商团军击退，乃从观音山开炮向西门射击，一弹击中来安押当楼，商团失据，纷纷溃退，各路军分头追击。下午，商团军全部溃散。是役，各军伤亡达400余人，商团军据险扼守，死伤不及百人。陈廉伯，陈恭受等逃沙面。滇军在浆栏门缴截商团枪械。

△　广州各军总司令通电平定商团，略谓：商团公然反叛作乱，14日晚竟向各军袭击。15日晨遂即下令还击，该团不支，始逃窜。查该团原有枪械约3000杆，此次领回枪械4000杆，共7000，全数没收，以防滋事。陈廉伯、陈恭受等事前主使教唆，临事远逸，应分别通缉。

△　吴佩孚率部强行登陆秦皇岛，设大本营指挥对奉作战。奉军

派飞机空袭。

△　徐树铮、陈乐山、杨化昭等20余人在上海闸北会议，主对齐燮元再战。上海附近卢部约四万人无人统率，众推徐树铮为总司令。会后，徐乘汽车至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至英国驻沪总领事署软禁。

△　孙中山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23日，罗偕同武装人员接任，英、美、葡等国派舰八艘进泊白鹅潭，进行恫吓。孙中山即命广东交涉员传语："如果外舰胆敢开炮，我即命陆军占领沙面，收回主权，使逞强者无立足之地。"后由北京外交团出面调停，将关余如数交付，事始寝息，罗亦未接任海关。

△　曹锟下令嘉奖齐燮元、孙传芳底定浙、沪，着查明出力各员呈候奖叙，并派李厚基、王瑚南下宣慰，妥筹善后。

10月16日　　孙中山函促蒋介石鼓励各军即速出兵北伐，略谓："北伐志在必行"，"江西敌甚无斗志，亦无斗力，大军一出，必得江西全省"，"望兄鼓励各人速出，一由东江击破陈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则川、湘各军必争先而出武汉，而中原可为我有"。

△　北京政府设财政委员会总揽全国财政，委高凌霨、王克敏、吴毓麟、王毓芝、曹锐、蔡廷幹、项骧、薛笃弼、苏锡第、林步随等15人为委员，推曹锐为委员长。

△　北京临时参政院参政丁搏霄赴古北口与冯玉祥晤谈，称此次直奉作战，除涂炭生民，争权夺利外，别无他意，建议冯先回北京，以拥曹为名，发号施令，征求各要人及各省意见，借以倒吴。冯谓："此事我已筹之熟矣。"

△　奉军集结重兵连日猛攻山海关，直军据势构筑阵地固守，调集援军增防，顽强反击。是日郭松龄指挥三个团分三线猛攻直军第十五师五眼城附近阵地，直军以机关枪密集扫射。奉军连日攻击山海

关，死伤逾万，终未能下，遂转移兵力，攻击长城内各据点。

△　孙传芳委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办理地方善后及收抚事宜。

△　唐继尧通电讨曹，略谓："曹锟称兵黩武，沪杭之兵祸既开，东北之战端复启。为今日计，非有摧陷廓清之功，仍无彻底解决之望。继尧义难坐视，谨即简派部伍，克期出发，并亲出督师，期与各友军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剪灭凶残，奠安国本，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　胡汉民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受、关楚璞、邓介石、何盈光、李颂韶等九人。晚，陈恭受至黄埔军校求赎罪。西关外商店咸开市。

10月17日　　曹锟令各省区严缉惩治卢永祥、何丰林、陈乐山、臧致平、杨化昭，并着褫夺杨化昭官勋。

△　孙传芳、白宝山由梅家弄（位于沪西南）到沪主持收束卢、何军队，即邀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商谈。孙、白并与齐燮元之代表商洽收编与遣散浙沪联军之条件。

△　奉、直两军在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等处大战，姜登选第一军、张学良第三军猛烈进攻，占九门口。吴佩孚令斩守将冯玉英，自往督师，击破奉军第六旅。奉军以重炮轰城，倾其一角，石屑四散若雾弥空，直军大乱，坠城死者甚众。双方搏战死伤逾万。

△　奉军猛烈攻击小不老，吴佩孚所派之援军赶到，小不老据点始巩固。19日，彭寿莘将小不老阵地交第三师旅长张席珍负责，经秦皇岛回山海关司令部。

△　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抵秦皇岛与吴佩孚商议海陆军会同作战计划，旋即率"海圻"等舰驶向葫芦岛等处，以威胁奉军后路，中途被

奉军飞机袭击，又乏炮弹，乃于19日返回秦皇岛。21日，再驶葫芦岛炮击奉军。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请派中国军队保护使馆事复加拉罕称，派兵保护苏联大使馆与使馆界禁例冲突，须得各使同意。

10月18日　　冯玉祥闻悉吴佩孚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三师悉调前方，认为时机已成熟，但为慎重计，密派刘子云商于黄郛。黄以亲笔复书交刘携归，以坚冯之心而速其决计。是日，黄又电冯，谓："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复电称："来电遍示同人，众意佥同，准十九晚起程。"

△　段祺瑞派宋子扬至滦平语冯玉祥："检阅使同段督办三造共和，现在乃最须改造之时。若能办到，即当一共和国民于愿已足。"冯答："若团结力量，可以为之。"

△　奉军郭松龄部约一个团通过高山山麓袭击山海关背后，与附属直军第十五师之骑兵营在二郎庙接战，营长张春雨战死。第十五师二十九旅、三十旅各由前线抽出步兵一营反击，奉军退入深山。

△　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歧率队进攻宁波，浙江自治军总司令吕公望等离宁波逃往上海，取消独立。19日，周抵宁波，将自治军撤销。

△　孙中山函胡汉民、许崇智嘱筹北伐军费10万元。

△　菲律宾发生排华暴动，击毙华侨数人，侨商被抢百余家。20日晨，排华暴动又起，华侨死伤385人，大量钱财被抢劫。

10月19日　　冯玉祥在滦平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邓宝珊及胡景翼之代表等会议，确定班师回京计划。会后，冯即发布命令：一、命鹿钟麟率部自密云县秘密兼程回京，会同

孙良城、张维玺两旅驰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分任警戒；二、命李鸣钟旅自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交通；三、电停兵于喜峰口之胡景翼部南旋，占领滦州、军粮城一带，截断直军之联络，并防吴佩孚率兵西向；四、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五、命承德之张之江、宋哲元等旅克期返京。冯并派员联络热河都统米振标取一致行动。

△　冯玉祥率利郁芬旅自滦平直趋北京。

△　张福来率第二十四师及靳云鹗之第十四师共三个旅约1.5万人突攻沙河寨，鏖战终夜，奉军防线几被突破，石门寨奉军一旅开到应援，遂转危为安。20日晨，奉军佯作退却，直军右翼追击，中奉军地雷，受创甚巨，遂放弃攻势，向后溃退。

△　蔡成勋军冯绍闵部抵吉安，即逐樊钟秀军出莲花，岳兆麟、方本仁等部又对樊取包围形势。是日，樊部主力突围，向湘边退却。26日，樊部退至湘境桂东待援。

10月20日　　冯玉祥命张之江第二十一旅当晚退回北京。又命所部严加警戒，为防止泄漏班师回京消息，所有往来京、热者，均行扣留。

△　齐燮元、孙传芳之全权代表白宝山至上海北站，会见浙沪联军代表朱声广及各将校，旋即同赴北浙江路联军总司令部商定将所有军队悉数收编：联军第十师及臧、杨军队归齐燮元收编为苏军，暂驻吴淞附近，听候改编；第四师及第六混成旅残部由孙传芳收编为浙军，驻松江、枫泾，青浦一带，夏兆麟仍任第四师师长，刘永胜仍任旅长。不愿接受改编者，则发给川资遣送回籍。

△　吴佩孚调集援军增援前线各军：杨清臣第二十四师增步兵一旅、炮兵两营及河南李治云部第一旅；林起鹏部第二旅布防在第十四师（安民寨）及第三师第六旅（小不老）中间地带；田维勤部第二十

六混成旅布防于第三师第十团与第十四师之间的高地区域；曹锟部第二十六师及程希圣部新一旅等布在左翼山羊寨附近。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定：农民部长李章达辞职照准，以黄居素代；实业部改为商民部，以伍朝枢为部长；邵元冲代理海外部长。廖仲恺复任常务委员。

△　苏联大使馆向华俄通信社记者声明谓：《奉俄协定》纯为地方性质，不独未抵触中国主权，且对中国完全尊重。中东路因改组理事会，苏联人员得与旧俄人员更换，以避免帝国主义对该路之干涉。

10月中旬　　北京政府交通部密电津浦路局长孙凤藻，据称奉方以重金勾结孙美瑶之弟孙美松等，啸聚悍匪，复占抱犊山，希图大举，扰害治安，以冀牵动直军，仰督饬警队严防。孙接电后立派该路武装保安队及护路警数百人驰往抱犊山，协同兖州镇守使张培荣部围剿。

10月21日　　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监车庆云由热河回北京，冯玉祥命张之江派张瑞堂营长将其扣留。9时半，冯亲率刘郁芬旅由滦平秘密开至密云，布置入京措施。晚，同贾德耀、刘骥、熊斌、李鸣钟、张玉衡、王乃模商议到京后对各方之处置及断绝各路线事。

△　奉、直两军在长城内各据点展开最猛烈之攻击，安民寨炮火密集，双方死伤极大，直军旅长王乔被击毙，但十四师阵地仍未动。吴佩孚亲自督战，并出重赏，谋夺回石门寨、沙河寨，终不果。

△　孙中山令免古应芬军需总监兼职。

△　曹锟特派马德润为修订法律馆总裁；调任赵翰纶为行政研究会会长。

△　徐树铮被上海租界当局迫令乘轮出洋去伦敦，陈乐山离上海赴日本。次日，孙中山为徐被捕事，向广州领事团提出抗议。24日徐

至香港居留。

△　段祺瑞在津语《顺天时报》记者称：“东北战争大势已决，四五日后当可结束。自战争发生以来，我与吴佩孚之间，绝无信使往还，故对于调停奉直战争亦未予以考虑。至若予之出山，果出海内一致之希望，则余第一应令各方一律停战，战争结束后之办法，首先召集国内军民长官讨论善后办法，次应召集代表国内舆论之各省民间代表开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事。”

10月22日　　冯玉祥、胡景翼、王承斌抵密云县高丽营。同日9时，冯军第二十二旅全部抵北苑，旅长鹿钟麟与蒋鸿遇、孙良诚、张维玺等旅长会商，即于是晚8时率所部由北苑出发，12时鹿率所部抵安定门，孙岳即令守兵开城门，次日1时余即占车站、电报、电话等交通通讯机构。

△　驻京日使馆武官林弥三吉电召在山海关前线观察军事之松室孝良少佐回京，称冯军将班师倒直，命即赴古北口以军事观察员身份与冯军一道回京，借以掌握冯军动态。

△　黄郛以外出访友为名，深夜到达高丽营会晤冯玉祥，与冯共商政府过渡办法，决定由黄负责组织摄政内阁，并对迎请孙中山北上问题进行筹划。冯出示预拟之主和通电，请黄加以修改，黄以措辞不妥，乃重行草拟。当晚，黄赶回北京。

△　奉军张宗昌率骑步军二万人进攻滦州，李景林派骑步军1.5万人由界岭口进攻昌黎。是晚，冷口及界岭口驻军胡景翼部助奉军入关。24日，李部占据界岭口附近之抬头营，张部占据冷口附近之建昌营。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十次会议，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伍朝枢、鲍罗廷等出席，决定廖仲恺兼任黄埔新组军队之党代表，另以孙中山名义公布《工会法草案》。

△　上海工部局派千余工人到法华镇越界筑马路四条，将法华镇悉行圈入租界区域之内。

10月23日　　北京政变。晨1时，冯玉祥抵北苑召集会议，胡景翼、王承斌等出席，一致主张和平停战，并议及维持现政府或另筹过渡办法、停战后收拾大局、宪法及国会有否修正改组之必要等问题。又邀京畿警备副司令兼陆军第十五混成旅长孙岳前往，面商北京治安等问题。晨2时余，冯军遍布北京内城各城门及东、西四牌楼交通要道，景山上有大炮瞄准中南海，新华门前有重兵驻守。入城士兵均袖缠白布臂章，上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字。城内秩序，安堵如恒。鹿钟麟部重兵包围延庆楼总统府，曹锟被幽禁。蒋鸿遇部在前门外，孙良臣、张维玺在南城，分任警戒，禁止行人通行各大道。总统府卫队及曹士杰旅均被解除武装，给饷遣散。军需兵站副监李彦青被冯军捕押至北苑。王克敏避东交民巷。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等联名发出主和通电，略谓：“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玉祥等受良心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我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是为冯玉祥“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

△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以先遣军司令官名义发出通告，谓直军总退却不得使用秦皇岛码头。吴佩孚闻悉愤然。

△　段祺瑞在天津获悉冯玉祥班师回京成功，即晚举行会议，商讨处置北京政治办法。段并电上海曾毓隽、李思浩、马良暨浙沪联军各师旅团长，告以冯玉祥等班师举义，尤当保护上海闸北数万久经战阵之皖系浙沪联军士兵，勿任零星散去。

△　孙中山电令胡汉民称："前日占领之商团总所、分所各机关房屋，当悉行充公，纵将来商团改换名目，亦永不发还。"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讨论商团在叛乱中杀戮理发工人数十名事，决函省长饬公安局严缉行凶之商团，并函理发工会抚恤。

△　孙中山令沈鸿英将所部编为广西建国军。

△　李宗仁、黄绍竑、沈鸿英在浔州（今桂平）开全省善后会议，决推李宗仁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邓瑞澂为会办。会议29日结束。

△　京奉铁路局长周梦贤下令尽裁唐山京奉路机器工厂全体工人4000余名。26日，经工人一再交涉，仍被裁3000余人。后经工人继续斗争，于12月底全数复工。

10月24日　　颜惠庆往北苑征求冯玉祥意见，决定由冯派薛笃弼谒曹锟，请下令停战，并免吴佩孚各职。颜亦入府见曹，详陈利害，谓惟有依冯之要求。后孙岳至，谓曹之安全可以担保，对吴佩孚个人，业商之冯，给予一名义下台。曹乃谓颜："责任内阁一切可负责办去。"颜乃召各阁员在私宅会议，决下停战令，以青海垦务督办名义予吴。

△　曹锟据北京政府国务院会议决议发布四令：一、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二、撤销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所有山海关一带军队，着督理直隶军务王承斌、帮办直隶军务彭寿莘妥为维持，遵照前令办理；三、直鲁豫巡阅使兼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着免去本兼各职；四、特派吴佩孚督办青海屯垦事宜。

△　晨2时，张作霖得京、津关于冯、王回京之加急电，立转各军

长向各所部宣传，谓：冯玉祥、王承斌已率兵返京，京、津已被冯、王军队占据，胡景翼率军东来截断吴佩孚后路，我军正宜乘胜猛攻，一鼓可破。

△　上午，吴佩孚在山海关视察督战，直军尚未知北京政变消息。下午1时，直军得知政变消息，战斗力锐减，惧后路为冯军截断。晚6时，奉军战线遽行展开，将龙王庙方面之直军第二十三师包围，并散发劝降传单，谓冯玉祥、王承斌助奉反曹，已率兵占据京、津。直军知大势已去，又被重围，遂有部分缴械投降，计长枪5000余支，炮36门，枪炮弹800余箱，大车300辆，皆满载行李粮食。

△　冯玉祥等通电陈述建国大纲五条：一、建设清廉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四、对外讲信修睦；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

△　绥远都统马福祥通电响应冯玉祥推翻曹、吴行动。

△　北京外交团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三项要求：一、恢复京、津间铁路交通；二、东交民巷西口外之冯军减少至15名以内；三、通讯机关恢复原状。对国民军停战主张表示好感。

△　孙中山令胡汉民曰：各商团除通缉陈廉伯等11名外，一经遵照商团名册每名缴足毫银100元，即均免深究；其各属商团尚无附乱行为，并免予处罚。各县商团与广州、佛山商团并无关涉，既未附乱，应予一体保护，如有未奉命令擅缴团械者定以违令扰民论罪。次日孙又令保护各处乡团。

10月25日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者有王承斌、鹿钟麟、王芝祥、张之江、孙连仲、贾德耀、刘骥、何遂及黄郛、薛笃弼等，决定组织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兼第二、第三军军长。对于政局，冯主张立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岳则以为应同

时请段祺瑞出山以对吴佩孚作战。决定由冯派马伯援赴粤迎孙，并电请段入京；在孙、段未到京以前，曹锟贿选政府不容继续存在，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

△　吴佩孚在滦县通电否认曹锟之停战令及撤销其讨逆军总司令之命令，声称该令“显系伪造”，现奉密谕，贯彻戡乱。

△　吴佩孚率直军第三师及第二十六师余部共万余人自秦皇岛经滦县去天津，声称率师回京戡伐冯玉祥。临行前令张福来、彭寿莘、靳云鹗坚守秦皇岛、昌黎、滦县，山海关前线之军队陆续撤回。

△　吴佩孚在秦皇岛通电讨伐冯玉祥，自称奉曹锟密令，剪除凶逆，不使法统和政府任一二人颠覆。27日，章士钊、林长民、彭养光等未参加贿选议员279人通电严斥吴电“意在假借法纪，肆意寻仇”。

△　直系将领王怀庆、胡景翼、彭寿莘、张福来等36人通电服从吴佩孚调度，共讨冯玉祥，略渭：“冯玉祥擅率所部，闯入京师，围逼总统，妄发通电，希图阻挠讨逆大计，遂启阴图。”“吴总司令已奉宣密渝，承制讨贼，一切征讨事宜，均听吴总司令调度，职责所在，不敢中弃，惟各竭谋力，继续奋进，用竟全功。”

△　冯玉祥电卢永祥从速离日赴沪。29日，卢永祥由日本到达沈阳，张作霖请卢恢复浙沪联军总司令头衔。

△　前司法总长徐谦通电，主张解散非法国会，废总统制，行委员制，召集和平会议（由现在维持北京之领袖、各省农工商学团体代表及全国负重望而有功于民国之人组织之），由此会议产生委员，并主张扫除前清帝制之余孽。

10月26日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即日就职来京主持。30日，张作霖、卢永祥以及镇威军各将领联名通电，推段祺瑞为联军统帅，就近主持；并谓凡吾友军“倘荷赞

同，即祈径电津门，一致敦劝”。

△　夜，冯玉祥自北苑移居北京城内，设国民军司令部于旃檀寺，指挥对吴军残部作战事宜，并令国民军分京奉、京汉两路布防。冯军张之江、刘郁芬各一旅及胡景翼军李虎臣一旅开至廊坊布防，胡部亦有三个混成旅在京奉路驻防，统由胡指挥，攻击杨村方面之吴军。孙岳军一旅及冯军李鸣钟旅于27日向保定前进，以阻京汉路鄂、豫、苏、浙军北上应援。冯派重兵把守通县至丰台一线。

△　胡景翼、孙岳通电，略谓：“如冯（玉祥）、王（承斌）两公者，密谋挽救，共举义旗，冀停盲目之内争，期竟革命之全功，将邀请召集元老大会、国民大会解决一切政法问题。不论地位，不分党派，统以创造新国家，改进新社会为唯一目标”，“则景翼、岳首先解甲归田，长为农夫”。

△　吴佩孚自秦皇岛至天津，设临时司令部于新车站。所率第二十六师及暂编第一旅之一小部共800人抵津，除留驻军粮城外，皆开往杨村。吴命曹士杰部第十六混成旅由保定进驻高碑店，以便会攻丰台。吴拟自任东路杨村方面之指挥，派李济臣任西路保定方面之指挥。

△　吴佩孚通告驻天津领事团，斥冯玉祥为叛逆，伪称奉曹锟命集大军10万，扫除冯军，挽回时局。27日，驻天津领事团警告吴佩孚，按《辛丑条约》不得在天津市附近20里内驻兵作战。

△　奉军张宗昌与胡景翼部合力击破董政国指挥之第九、二十师，攻占迁安县。

△　直军财政组主任参议谢宗陶随吴佩孚到天津，向直隶省银行行长王子杰强提直隶省钞50万元。王交出二万元，即逃入租界避而不见。吴佩孚随即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以曹五为会长，白坚武、张月笙、潘馨航、杨敬林、卞月庭、刘子青为副会长，谢宗陶为总务主

任，负责筹划施行。规定筹集军费办法数项：一、由长芦盐运使张直卿于原在北京派定盐商报效150万元项下就地催缴，当交到23万元；二、由天津造币厂提用铜元一万元；三、由津浦路每月协饷20万元；四、由张月笙设法提用河东盐款40万元等。

△　陈调元奉齐燮元令将第五混成旅扩充为第四师，指挥所部自常州、昆山等地至徐州，准备北上援吴。31日，陈令毕化东旅第一营于11月1日开拔赴津，后因山东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阻止援吴军通过鲁境而未成行。

△　孙中山函饬蒋介石将3000支枪械运韶关，以便促使赵成梁出师北伐，交回韶关防地，为大本营练兵之用。

△　陈炯明致冯玉祥电，略谓：回师首都，除共和之障碍，为国欢迎，无间南北。务请秉持宏愿，廓清凶残，并联合明达同胞，力促合肥出山，维持局面。同日又电段祺瑞，务请毅然出山，谋统一之坦途。

△　直系在鄂将领萧耀南、王汝勤等通电讨伐冯玉祥。同日，赣督蔡成勋亦通电讨冯，称冯之举动“通敌忘仇，国法所不容”。

△　唐绍仪、徐谦、钮永建、褚辅成在上海开会，决请段祺瑞入京解决时局，废总统制改行委员制。

△　但懋辛在香港致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函，略称：陈炯明不赞成收受陈廉伯运动东江陈军反攻广州政府经费150万元，此款早在9月初陈廉伯已交金章手收50万元。当时陈尚犹豫，后鉴于广州商团军械已为政府收缴，态度遂变，拟将50万元退回。但洪兆麟竭力反对，并与林虎合作商定反攻计划，如陈炯明不赞成，即请陈下野。

△　留日工人、学生在东京召开对日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赴使馆请愿，要求日本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排斥华工条例，并警告

日政府不得援助任何军阀。队伍在中途遭到日警无理阻挠，复遭日警非法干涉，捕去何炳坤、李德钊等九人。

10月27日　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段祺瑞，允即北上。复冯电谓："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复段电谓："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矣，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

△　孙中山特任胡谦为中央军需总监。

△　熊克武、石青阳、但懋辛联名分别致电冯玉祥、段祺瑞，响应冯之义举，拥段出山，赞成南北贤豪共商建国之方，并请电约孙中山莅北共筹国计。

△　奉军下总攻击令，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吴光新各路直指秦皇岛；彭寿莘等直军在四面炮火包围中。

△　移沪国会议员通电全国国民暨讨曹、吴各军，要求明正贿选之罪，略谓："贿选罪名不予揭明，贿选罪人不予惩创，即此次战争未能彻底"，"深恐扰乱循环，建设国家终多阻碍，务望坚持正义，根本廓清"。

△　直系将领齐燮元、孙传芳、蔡成勋、周荫人、马联甲、杨树庄、李景曦联名通电讨伐冯玉祥。

△　吴佩孚急电山东督军郑士琦，征调孙宗先第五师及潘鸿钧中央第一混成旅赴援。郑仅遣潘旅应之。

△　各国驻京使馆以北京政变需保护使馆为辞，调各国联合军队直至北京。

10月28日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致电南北要人，主张召集和

平会议。略谓：“祥等以为此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国家建设计划，非一二人所能集中，亦非一二党派所能把持，必须一国贤豪同集京师，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将一切未决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以多数人之主张为指归，以最公平之办法为究竟，期得最良结果。”“惟此和平会议究应如何组织为妥善，如何产生为适宜，海内贤豪、南北硕彦，匡时共切，宏划应多，务祈不吝谠言，迅予指导。”

△　冯玉祥派鹿钟麟为京畿警卫总司令，张璧为警察厅总监，以维持北京一带治安。

△　直军彭寿莘部不敌奉军之围攻，退昌黎。奈因奉军张宗昌部攻占滦州，直军被截成两段，与天津之交通亦断。退至唐山之董政国第二十师溃部亦遭奉军追击。

△　河南省长李济臣任陕豫鄂援吴军总司令，在郑州集合部队，准备北上助吴作战。

△　阎锡山派兵二旅占领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援吴军北上。29日，袭击北上鄂军，并解除其武装。

△　四川将领刘湘、刘成勋、赖心辉、陈洪范、刘文辉联名通电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略谓：“吾民苦兵祸久矣！得诸公返辔止戈，义昭日月”。“尚祈于祸国者勿稍予姑容；于运置之方，务征诸公论”。又电段祺瑞请早日入京，俾一指挥；并请电约孙中山、民党领袖及东北、东南、西南诸同志，开诚协商国是。

△　萧耀南通电，略谓：冯玉祥既主张停战议和，则冯军亦应迅速退出北京，力避与吴佩孚军冲突。

△　龙华援苏鄂军张允明通电讨伐冯玉祥。次日，张接吴佩孚自天津转来密电，催促其北上。30日，张旅一部北上。

△　前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徐谦迭接冯玉祥电请北上商议善后，于

是日离沪乘轮启程。临行致电天津段祺瑞报告行程，并请派员来沪与各代表磋商善后意见及收束浙沪联军旧部。

10月29日　　段祺瑞电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略谓："诵漾（23日）电，所称请全国贤达速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数语，所见远大，洞中机宜。溯自纪元十三年来兵衅迭起，民不堪命，推原其故，盖政府未能守法，大法亦未尽当，始于束缚，终于横决，循环起伏，以迄于今，非有彻底改革之决心，焉得民国本来之面目。窃谓庶政公诸舆论，舆论务返本以求；安危须仗群才，群才务推诚相与。法善人得，何政不平，所有乱源，根株可尽。"

△　北京未参加贿选议员汤漪分别电段祺瑞、冯玉祥，请明正曹锟及贿选议员之罪，必使曹锟受公开之审判，贿选议员除自己引咎辞职外，宜以其名籍宣示国人，以昭炯戒。

△　吴佩孚派王荫棠到杭州与孙传芳商议出师计划，先由东南七省会商共出十混成旅，浙省担任一混成旅。孙即令闽军第十混成旅旅长孟昭月为浙江援军总司令，先率第二团附炮兵一营、机关枪16挺共2000余人援吴。30日，孟旅北上援吴，途中为鲁督郑士琦所阻，于11月4日开回上海。

△　张绍曾调停冯、吴和平无效，是日发表和平救国大纲五条：双方即日停战；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解决兵额、国军配备、军制、裁兵等问题；修改宪法，开国民会议，改善政治；贿选案法律解决；和平救国大纲，由双方及国民共决。

△　萧耀南任陈嘉谟为鄂军援吴总司令，并设法由正金等外国银行陆续汇津20万元。鄂省议会于同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申严守中立，保境安民，并通电各军，无论何方战争，概不参加。30日，萧又成立临时军事总办公处，专办讨冯事宜。

△　河南省长李济臣任陕豫鄂援吴军总司令，宣言亲率豫军第三

混成旅马灿林部、鄂军第二混成旅寇英杰部、第二十七旅王为蔚部、陕军田玉洁旅、豫军第四混成团李有才部、补充团吴文铠部与国民军作战。是日，由郑州乘车北上，但阎锡山已派兵二旅占领石家庄。11月1日，北上之援吴军一部被阎解除武装。

10月30日　　奉军第三军副司令郭松龄部由石门寨至海阳镇，炮击秦皇岛，张学良率部由长城低处冲入，张宗昌又由滦州直下，直军被包围。山海关直军第三、第九、第十四、第十五、第二十四、第二十六各师纷退秦皇岛栈桥附近，秦皇岛、山海关遂被奉军完全占领。直军一部约2000人运回塘沽，其余不及撤退者二万余人，于次日在秦皇岛附近悉被奉军缴械。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伍朝枢、鲍罗廷及卜士畸出席，通过拟向北方会议所提出之条件，如北方会议不能通过该条件，国民党代表团则脱离会议。

△　孙中山决定北上，由韶关返广州。

△　吴佩孚在津备战，冯、吴战事开始。是日东路吴军曹锓部由张庄发动进攻，即被冯、胡军击退，冯、胡军遂由廊坊反攻，进占落垡，并向杨村追击。同日，西路孙岳军进攻保定，吴军曹士杰部不战自退，后全部投降孙岳。

△　吴佩孚通电，声称："对敌军当次第削平，政治问题愿放弃成见，听海内贤豪各省代表为公平之解决。"

△　日本驻津总领事吉田茂与王揖唐面商，佥认由段祺瑞出山可挽危局。次日王士珍与直隶道尹吴履观访吉田茂，请日方向奉天交涉停战。

△　驻京日本公使芳泽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王克敏之房屋

财产早经抵押日人，应请中国政府顾全日人借款之约，对于王氏产业，勿得没收。

10月31日　　曹锟下令改组内阁，准颜惠庆辞国务总理职，特任黄郛兼代国务总理。准免外交总长顾维钧、兼内务总长颜惠庆、财政总长王克敏、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本兼各职。特任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迺斌为农商总长，黄郛兼交通总长。准孙润宇辞国务院秘书长兼职，以袁良继任。

△　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大本营军政联席会议，讨论北方局势之应付方策，议决：一、认曹、吴为今最狠毒最无耻之军阀，其勾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最甚。故无论何人何系，能有反直举动，以倒曹逐吴为职志者，革命政府当认为同情之友军，加以援助；二、鉴于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迭次来电请大元帅入都主持国是，先生俟后方部署略定，即行北上，与段、张共商统一建国方略；三、主张分电段、张、冯，勖其乘势铲除曹、吴根本势力；四、同时着力北伐，攻下赣、湘，并肃清东江陈炯明叛军。

△　段祺瑞复电孙中山，谓："公元勋照耀，政想宏深；命驾北来，登高发响，此天下之所想望，尤南北合力统一之先声。"

△　京奉路奉军三路进攻直军：中路张宗昌沿京奉路进攻芦台，左翼吴光新循陵河攻古塘，右翼胡景翼由唐山进攻宁河。吴佩孚以奉军迫近芦台，将司令部迁于军粮城，并召集彭寿莘、张福来等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作战，惟取守势，俟长江各省援军到后再取攻势。

△　张作霖电冯玉祥谓：如曹锟不走，则奉不停战。同日，冯警告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

△　英军强行进入丰台冯玉祥部队警戒线，殴打哨兵，并拘留冯

军团长冯治安，几经交涉始放回。

是月　张作霖批准日商与吉林地方合办修筑的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江岸）轻便铁路全部修通。

△　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分厂在南通江家桥设立，有1.672万枚纱锭。

11月

11月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孙中山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邵元冲、鲍罗廷、谭延闿出席，议决孙中山“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先往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

△　鲁督郑士琦宣布“中立”，派兵至沧州、马厂一带扼守津浦路，阻止败退吴军假道鲁境，并毁利国驿、韩庄间铁路，阻止齐燮元等援师由徐州北上。6日，逐走熊炳琦，委任龚积炳代理山东省长，熊被监视。

△　冯玉祥、王承斌、孙岳、胡景翼等再电请孙中山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

△　安徽督理马联甲通电讨冯，谓刻已委任本署参谋长兼补充旅旅长田锦章率兵一旅，准于3日由蚌埠北上应援。

△　湘省长赵恒惕以省议员何绍元作蔡巨猷企图会合川、黔各军图谋湘西之内应，加以逮捕。

△　鄂省议会咨文鄂督萧耀南，略谓：本会于上月29日全体紧急会议，认为目前仍应确守保境安民之旨，妥筹具体办法；凡各军队原驻防地不可轻动，凡以前欠发饷项不可再缓，汉阳兵工厂所制器械，

精制之品应储为自用，不宜远输示人以弱。至于他省军队，尤宜严定界限，不许擅自入境。

△　鄂省议会通电全国宣言中立，保境安民。并通电本省各军严守中立。同日，致函商会、银行团，告以已咨请当局无论何方战事均不参加，嗣后若有向贵行会接洽借款而增加人民负担者，本会决不承认。

△　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通电主张严边守御，保境安民，静待大局之解决，任何方面不予接济，吁请各省军民长官休战言和，并请各省省议会等一致主张“民治救国”，以作鄂省保境安民之援助。

△　冯玉祥创办之西北银行成立，在张家口、丰镇、归绥、汕头、北京、天津、郑州等地设立分行。

11月2日　　北京国务院令：“本日曹大总统宣告辞职，令由国务院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警卫司令会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

△　曹锟通电全国，宣布辞大总统职。谓：“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兢兢，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请避贤路以谢国人。除咨参众两院辞职，并将大总统印玺移送国务院，自即日起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外，特此通告。”

△　国民军占领杨村，俘鲁军旅长潘鸿钧，又占领北仓。航空司令何遂派飞机四架由京飞津、沽散发传单，宣布国民军和平主张，劝告吴军投顺，市民安业。

△　日驻津总领事吉田茂赴天津总站访晤吴佩孚，主张拥段祺瑞出山收拾政局，吴表示决不背弃曹锟。晚，吴之日籍顾问冈野奉吉田

茂之命请吴入日租界，吴拒，而于夜半离津转往塘沽候船。

△　在津国会议员40余名协议今后之方针，焦易堂主张淘汰贿选议员，维持国会；林长民提出旧约法、旧国会与民心趋向不一致，当谋民国根本改造。焦之主张得多数赞成。

△　建国第四军军长顾忠琛及杨化昭会同汪精卫面请孙中山北上。

11月3日　　国民军追击吴军至天津郊外，将其缴械，并占领天津。奉军攻下芦台，占领军粮城。直军前后受敌，吴佩孚率第三师残部在塘沽登轮南下。

△　黄郛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特任财政总长王正廷兼盐务署督办；派鹿钟麟为京畿警卫司令。

△　孙中山令准大本营内政部长徐绍桢辞职，派内政部次长杨西岩代理部务。

△　孙中山莅临黄埔军校作告别讲话，述及北京政变经过及北上目的，并指出："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的工夫，联络各省同志，成立一个国民党部，从党部之内成立革命基础。"

△　冯玉祥召集军政要人在北京旃檀寺开会，决恢复王承斌第二十三师师长职，驻津收束军队，办理善后。

△　皖督马联甲电请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蔡成勋、赵恒惕、周荫人、刘湘、杜锡珪等长江各督实行联盟，保守长江各省局势，以抗冯玉祥、张作霖。

△　陈炯明致电方本仁，询及合作攻粤事宜。4日，方复电将与林虎、洪兆麟、叶举等合作。

△　日内瓦国际禁烟第一次会议讨论禁止远东各国鸦片吸食问题，中、日、暹罗、荷、葡、法、英、印八国参加。5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发言，略谓：鸦片本非中国土产，乃自外输入，虽欲取缔私运，但未获经营鸦片业者诸国之合作，尤因治外法权之故，不能监督。施建议宣布吸食烟膏为有害及非法，除医学与科学用途外应禁止鸦片进出口。各国对施发言纷起诘难，尤以印度和英国为烈，称世界鸦片多数产于中国，中国之出产鸦片乃远东时局之主因。7日，施又发言称：中国种烟盖因军人需款购械，中央不易制裁，现中国明达之士正在北京讨论改革事宜。

11月4日　黄郛于深夜主持国务会议，通过由冯玉祥提出之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共五条：一、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溥仪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特支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宫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次日由摄政内阁通电公布。

△　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张作霖等，谓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等派马伯援为代表赴粤迎孙。

△　孙中山为启程北上，是日明令："除仍由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外，所有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着由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全权办理，北伐各军概归节制调遣。"同日，通令军民长官肃清余孽，绥靖地方。

△　黄郛令免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维城职，由王承斌兼任。又令撤销京畿警备总司令一职及裁撤京畿卫戍总司令部。

△　段祺瑞通电全国称：希望各界诸公痛抒谠见，共挽时艰，俾

集群言，彻底改造国家。11日，岑春煊复电称：彻底改造之根本，固在治人治法，尤重在各方悲痛忏悔之精神，图公道诚心之协作。统兵将帅，急宜除嫌怨，从今携手，庶几公开会议，可期建设之有成。移军殖边，可复政治之轨道，其他自可迎刃而解。

△　四川刘湘、刘存厚、邓锡侯、杨森通电援吴讨冯，声称："除恭承大总统传谕整军待命，并恪遵吴巡帅电令，先派川中第一师师长赖心辉率领全师克日北上，会师讨伐外，更乞袍泽诸公，同申义愤，分兵驰援。"

△　冯玉祥派员将驻故宫及景山之守卫士兵1200余人缴械，调驻北苑听候改编，以统一军权，维持治安。

△　夜，奉军张宗昌、吴光新占塘沽。段祺瑞及天津各公团为避免奉军与国民军冲突，请奉军停止前进。奉军不理，前锋3000人5日由塘沽抵津。

△　在沪之鄂、赣、闽、皖、苏、浙六省要员章太炎、褚辅成、汤漪、史家麟、张静江等30余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时局，通过：一、反对六省军阀投诚冯玉祥、段祺瑞，借以保全其原有势力而祸人民；二、无论北方暨西南出兵讨伐，解除曹、吴在长江势力后，不许何方军队仍在六省驻防；三、六省人民筹谋自治并废除巡阅使、督军、镇守使种种名目。7日，章太炎、张静江等17人联名发表上述内容之六省人民宣言。

11月5日　清废帝溥仪移出故宫。上午，北京国民军当局撤换驻清宫与景山一带之守卫兵士及驻神武门护城河营房之警察；并由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直隶士绅李石曾前往清宫，与清室内务大臣绍英交涉，告以摄政内阁已修正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即日废去尊号，交出宫殿及印玺，并商改优待费为每年50万元。绍英当即报告溥仪，溥仪对修改优待条件全部接受，并允移出宫禁，将国玺及宫

殿全座交还民国政府。下午3时，溥仪及其妻妾并少数太监宫女，在鹿钟麟、张璧陪同下分乘汽车五辆出宫，移居后海德胜桥载沣之醇王府，由鹿派兵保护。旋鹿即将所接收之国玺送国务院，由黄郛及陆军总长李书城点收，交第—科妥存。黄郛以溥仪愿意取消帝号，与国民一体享受民国政府之法律待遇，特传谕警察厅通知市民于次日一律悬挂国旗一日，以志庆祝。

△　驻京外交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及英使麻克类、日使芳泽，就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移出故宫事，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抗议。王答：政府保证溥仪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　黄郛令准参谋总长张怀芝辞职，特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任命何遂继赵玉珂为航空署长，王芝祥为京兆尹，张璧为京师警察总监；步军统领衙门、军警督察处、京师一带稽查处着即一律裁撤；特任王正廷继王毓芝暂兼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

△　甘肃督军陆洪涛等电请段祺瑞早日入京主政。同日，陕军刘镇华等电段出任艰巨。次日，张謇亦电促段入京主政。

△　上海女子参政会、上海工商友谊会分电孙中山、段祺瑞、冯玉祥等，要求率师穷追，肃清长江以南诸省之直系爪牙。

△　代理皖北镇守使、安徽陆军第四混成旅长高世读、第一混成旅旅长倪朝荣等为反对马联甲附和齐燮元，在蚌埠通电宣告独立，拥护段祺瑞复出。高等拆毁津浦路东葛站附近铁轨，阻苏军北上援吴，并划区实行防务：东葛、乌衣等处归倪朝荣防御；南宿州等处归被马联甲撤职之原第二旅旅长、皖北镇守使李传业防御。同日，马联甲部第五旅旅长史俊玉被迫通电辞职。6日，李传业在沪通电“召集旧部，宣誓追随冯检阅使”。7日，高世读通电在蚌埠就安徽国民军总司令。15日，李传业旧部在寿州通电推李为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

△　孙中山特任刘震寰为广西省长。24日，孙中山特任李宗仁为

广西省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为会办。

△ 国民军孙岳部第十五混成旅攻占保定。

11月6日 黄郛令民国九年7月29日至十三年11月2日间，所有因政治行为而褫夺官勋通缉各员之命令，一律撤销。

△ 段祺瑞电冯玉祥责问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事。7日，冯复电略称："清室为帝制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保旧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余孽，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和平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为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谓尊重民国，正所以保全清室也。"

△ 天津前清遗老闻溥仪出宫消息颇为震骇，当推定铁良、升充、袁大化、罗振玉等入京抗议。同日，段祺瑞接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竹本大佐转去郑孝胥的求援电报，即致电摄阁，谓："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

△ 黄郛准免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阎治堂职，以孙积孚继任。

△ 孙中山指令准广东警务处处长李福林辞职，以吴铁城接充。

△ 冯玉祥再次电促孙中山早日北上。

11月7日 黄郛命令国务院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

△ 鹿钟麟、张璧、李石曾与清室代表绍英、耆龄、载润、宝

熙、罗振玉会商接收宫中古物及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决设清室善后委员会，由委员会聘考古家审查宫中各物，辨别公私。同日，交收历代国玺23颗、皇后印五颗封存于原处，遣散太监、宫嫔千余名，每名发遣散费10元。

△　黄郛令着内务次长薛笃弼于内务总长王永江未到任前暂行代理部务；农商总长王迺斌未到任前，着次长刘治洲暂行代理部务。

△　黄郛令免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职，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免河南省长李济臣职，特任孙岳为河南省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呈请在俄属恰克图设立领事馆，并将伯力升为总领事馆，赤塔改为领事馆。8日，黄郛指令准如所请。

△　黄郛任张允明为松沪护军使。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访苏联大使加拉罕，商中俄正式会议事，并取消中俄会议办事处，由部直接办理。

△　孙中山任命刘成勋为建国川军总司令。

△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载文，主张阻止孙中山在上海登岸进入租界。略谓："因孙毕生精力皆专注于引起中国骚乱之目的，若准其在此进行彼之目的，殊为不当，且不免破坏上海之中立。"

△　阎锡山电转刘镇华、吴新田、憨玉昆之5日电，请段祺瑞出山，以维大局。同日，山东郑士琦电请段入京主持大计。9日，孙传芳通电请段出山维持大局；赵恒惕亦通电请段入京，主张组织临时联省政府，收拾时局。

△　吴佩孚乘华甲舰率"永翔"、"楚豫"、"肇和"三舰及运送船四艘，到达山东海域。郑士琦派第五师旅长王翰章率部赴青岛，拒吴在

鲁境登陆，并将胶澳督办高恩洪拘捕至济南。8日，吴率舰抵烟台，欲假道入豫，郑士琦不许，乃续南下。

△　川、鄂间驻军师，旅长王汝勤、卢金山、宋大霈等通电宣布中立，保境安民，阻川军东下援吴。

△　鄂省议会以连日报载川军熊克武部行将假道鄂西，粤军亦欲进入湖北，是日通电声明，外省军队或南北各军事要人擅入鄂境而为军事之运动者，即为妨害鄂省安宁，鄂民誓必认为公敌，吁请本省军事长官合力防御。

△　江浙战事之善后事宜办理完毕，齐燮元回南京，发表升迁军官命令：代理松沪护军使白宝山回海州原防，任江苏海疆防御总司令，节制第一、第十师；江宁镇守使兼第六师师长宫邦铎改任第十九师师长兼淞沪镇守使，所遗第六师师长职由齐自兼；朱熙升任江宁镇守使兼军务帮办；原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继任苏常镇守使；原江苏第四混成旅等改编为两师，吴恒瓒任第二师师长，陈调元任第四师师长。

11月8日　　张作霖入关，共开车五列：一为前卫队；二为步兵队；三为总司令部；四为张之官车暨外宾席；五为军需车。鲍贵卿、卢永祥、钟世铭、汤玉麟及驻奉日、英、德三国领事等随行，声势煊赫。

△　黄郛通电全国，说明溥仪移出故宫之原委以释误会。略谓："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列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优待条件之修正。""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怀荩虑，定荷赞同。"

△　章太炎致电黄郛、王正廷等，主张收回清室畿辅庄田。略谓：“畿辅庄田，豪夺已久，虽似私产，其实非以金钱买取，即仍袭明代勋戚庄田者，其始孰非吾民之有？事实既为强占，土田应还人民。苟利百姓，岂宜屯泽？愿诸君勿恤遗臣嚣言，而亏国家大义。”

△　胡适致函黄郛、王正廷，声称清室优待条件有关国际信义，不宜任意变更。

△　孙中山电北京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徐谦，指出旧国会须解散，宪法须改订，革除弊政宜严，“北京政治污浊，应充分洗涤，勿以苟且瞻徇，转遗后累”。

△　孙中山令北伐军总司令谭延闿及会计司司长林直勉，前方大本营经费着定为每月限支一万元为度，所有前方参军处着即裁撤，参谋各员酌予裁减。

△　湘省议会通电发起召开各省省议会联合会，并提出以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和促成统一之方案。

△　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张君劢在该院演说《此次北京政变中之见闻》，略谓：此次战争内幕中实有日本与英、美之暗争，日本早有握东亚霸权之野心，欲使中国陷入混乱状态，直军之后方布置，日人常以无线电报知奉方；英舰愤日人所为，则乱发无线电以乱电浪，使日人不能发电。冯玉祥入京，日本市民开会庆祝；而吴之返津，先为之传布消息者，则为美人所办之《华北明星报》。

11月9日　广州大本营代大元帅胡汉民谋为其弟胡毅生作广州市长，是日突然宣布实行市选，并通告本月17日为提选举人名之截止日期。伍朝枢、谢英伯、林云陔等立即掀起争选市长风波。

△　北伐军谭延闿部于占领新城后乘胜北进，一举攻克赣州，并向吉安前进。

△　未参加贿选之在沪议员高振霄、康汝耜、张凤九等20余人开会，议决即日北上，向各方接洽解决时局办法。并于次日致章士钊并京、津同志电，谓：同人公决：一、贿选分子及伪国会应即驱除；二、在津设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三、同人当陆续北行。

△　上海日文《日日新闻》载文《论段、张、冯的外交战》，略称：段祺瑞知在东南诸省形势未定之前遽行轻动，将自陷于不利。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拥兵数万，仅限近畿地方而无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早日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于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段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功。而段则乘张、冯之拥戴，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竞取权势。

△　浙省自治军办事处致电段祺瑞，谓："长江流域余孽犹存，务恳先派劲旅星夜南下，扫清妖氛，敝军誓为后盾。兹推敝军总裁吕公望总司令等代浙人就近迎驾入都，主持一切大计。"

△　陈宝琛将由日本兵营转来之段祺瑞密电交与溥仪，内称"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

△　旅沪皖人田为霖、毛凤悟、李寿亭等64人集议皖省重要问题，决定：一、致电李传业、高世读等速予开释上年因反对贿选及主持正义被马联甲监禁之王振武、王金林、管曙东、陈紫枫等；二、马联甲搜括民脂民膏达3000余万，决电请段祺瑞令李传业等将马扣留，彻查其所搜括之民财以发军饷，并电皖南王普严加看管，倘马潜逃则惟王普是问；三、被马联甲非法封闭的反对贿选之安庆各法团主张自由恢复。

△　江苏省地方自治协进会及省议会议长徐果人各致电齐燮元，

切望顺从舆情，保境安民。

11月10日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由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之各军；九、政党。

△　张作霖偕卢永祥等抵达天津。冯玉祥于前一日晚至天津。下午，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段宅晤商时局，段谓非俟孙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推戴不受任何名义；张、冯主张对长江各省用兵。

△　晚，奉军李景林突然解除北仓冯玉祥以所缴直军武器装备之国民军第三、第四两混成旅之武装，谓此系奉军在滦州以西与直军战斗之结果，直军败兵之武器应为奉军之掳获品。

△　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李济臣、李炳之自南京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出山以维大局。12日，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浙、皖、赣、鄂、豫、陕、闽、川、湘十省大同盟会议（按：川、湘并未正式加入，实际为八省及海军联防会议）。议决：一、保境安民；二、不承认摄阁；三、一致拥段。次日又联名通电，声称：“中央政府中断，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北京所发伪令，概不承认。”同日，松沪护军使张允明、安徽国民军总司令高世读、江西蔡成勋、方本仁等分别通电请段出山，以维时艰。

△　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查封故宫。13日，查封完竣，估计宝物价值10亿元以上。

△　黄郛特任易培基署教育总长；准全国烟酒署署长钱锦孙辞职，任命张我华继任。

△　北伐军右翼朱培德部继7日克崇义后向东北方向进攻，本日攻占上犹。

△　福建建国军总司令方声涛奉孙中山命出师北伐，即委张贞为该军总指挥，统率所部克日动员。是日，第二师师长陈国辉、第五师师长叶定国、第六师师长杨学良自永春出师讨伐周荫人。

11月11日　　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欢送会，演讲《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称：这次到北京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我想极快只要半年，便可达到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极慢也不过是要两年的工夫，便可以成功”。要求“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当晚各界联合举行提灯游行大会，二万余人参加。

△　孙中山令新军改为党军，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并兼农民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蒋介石为军事部秘书；任命谢适群代理大本营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着黄居素代理海外部长。

△　孙中山致电冯玉祥，嘉许逐溥仪出宫行动，并谓“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

△　段祺瑞、冯玉祥、张学良、卢永祥、袁良等在天津日租界非正式会商善后，确定议题为：一、对南方针；二、国会问题；三、疆吏人选；四、将来各军驻地及改编，等等。

△　晚，奉军李景林将王承斌新编二十三师缴械，王避入天津英

租界。同日李又将冯玉祥收编之孙积孚第二十师缴械。至此，奉军李景林、吴光新共补军队四个混成旅，较抵津之初增加一倍半，达七万人，分布天津及津浦、京奉两线。

△　李济臣通电拥护段祺瑞、吴佩孚合作，声称段、吴合作，“国难悉平”。同日，浙江省长夏超、代理甘州镇守使马绍先分别通电拥段入京主政。

△　张作霖到天津后，以六个混成旅约三万人分驻津浦路北段，前锋部队进抵泊头镇。鲁督郑士琦大为震动，一面令驻德州胡翊儒第七旅、张建功第四旅等严加戒备，一面致电段祺瑞询奉军南下目的，力陈鲁省维持中立之苦衷。

△　黄郛令免热察绥巡阅使兼陆军第十三师师长王怀庆本兼各职，所部由热河都统米振标收束，热察绥巡阅使一职裁撤；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免职，由刘文翰继任。

△　四川安县红灯教千余人分三路攻城，官军退却，红灯教于翌晨始退回山中。

11月12日　　上午，张作霖、冯玉祥分别访段祺瑞，表示愿听指挥。下午段宅设宴款待奉军各将领，张作霖未参加，议及京奉、津浦两线完全归奉军驻守，企图以李景林代替鹿钟麟之京畿警卫司令职。

△　南京地方公会、下关商会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制止奉军南下，并请信守宣言停战宗旨，分饬各省军队各归原防。

△　直隶省议会及各公团在李景林授意下，以直人治直为标榜，推举李景林为直隶保安司令并继王承斌任省长职。18日，李就直隶保安司令职，以省长让杨以德，杨称病辞谢。

△　吴佩孚率五舰南下抵吴淞口，以驶入长江。

11月13日　　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北上，邵元冲、黄昌谷、陈友仁、朱和中等人随行。汪精卫先一日赴港，在港会同下船。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邹鲁等乘“江固”等舰送至黄埔。

△　孙中山电湘军将领，谓长江余孽犹存，非摧陷肃清无根本解决之望，盼急以最短期间先定赣，会师武汉。

△　黄郛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凡八条，善后委员15人，为李石曾、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范源濂、俞同奎、沈兼士、鹿钟麟、张璧、载润、绍英、宝熙、耆龄、罗振玉、陈垣、葛文濬，李石曾为委员长。

△　黄郛派蔡元培、徐谦为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中国委员，蔡未就职前，着李石曾暂行代理。

11月14日　　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齐燮元领衔通电长江各省独立之形势，决定划京奉路廊坊至奉天及津浦路归奉军布防，拟由奉军沿津浦路入鲁、皖攻苏；廊坊至北京及京绥、京汉两路归国民军，由国民军沿京汉路入豫扫荡吴之残部。冯主张电催黄郛通缉吴佩孚；段则主派员南下疏通，如能服从和平即停止用兵，缓下缉吴令。

△　前湘省议长林支宇从沪回省，运动其旧部常澧镇守使唐荣阳对赵恒惕独立。是日，唐拥林为建国军湘西援鄂总司令，唐为总指挥，集中军队于澧州，设司令部于常德，由唐委其部下第一旅旅长吴汉镍为卫戍司令。

△　黄郛令准免熊炳琦山东省长职，以龚积炳暂兼。

△　黄郛商准安格联以“四二库券”二次款发北京治安费及行政费。安格联亲临监放，为外人直接监督中国财政之始。

△　黄郛摄政内阁设宴柬邀北京外交团。除苏联外，各国使节因对冯玉祥的所谓“赤化”深怀戒心，对摄阁地位尚难承认，故表示拒绝，黄临时自动取消宴会。

△　章太炎发表政治改革意见书，仍主行委员制，略谓：“反对者有谓试验学者说，有谓一国三公莫适为主者，不知事有必然”。“今者人情所向，亦不过为扑灭曹、吴，曹、吴既败，而合法政府无自产生。又观曹、吴所以能为乱者，则北洋派之武力统一主义为根本，今不去其根本，而徒以解决曹、吴为快，后有北洋派继之，则仍一曹、吴也。是故归之行政委员制，以合议易独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

11月15日　　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谓：“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　吴佩孚抵南京，齐燮元率领参加十省大同盟会议的各省代表登舰迎接，吴对各省组织同盟表示赞成，但反对齐等拥段，主张维持法统，出兵讨伐；并谓冯玉祥假借摄阁名义发号施令，难免不受宰割，应从速组织政府，采取对抗行为。吴出示所拟之《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齐虽签名，但主张须先布置军事，待军事上有把握时再予发表。

△　吴佩孚电驻沪鄂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张允明，称皖军一部中立谋变，事关重大，请统率全部，克日开赴浦口，会同防堵。

11月16日　郑士琦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　黄郛闻张作霖、冯玉祥于天津集议改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遂于是日派袁良赴津晤段祺瑞，听取意见。

△　皖南镇守使王普迭电马联甲，谓李传业在寿州组织国民军第四军，已率二旅分两路进迫省城，省署警备营索饷哗变。马联甲知大势已去，遂通电宣布退职离皖去沪，将军、民两印咨交王普。17日，王普就任皖督理兼省长。

△　奉军张宗昌率所部由津浦线南下，占德州兵工厂。鲁督郑士琦调第五师等部力守德州，并毁铁路以阻。经段祺瑞调解，张作霖令所部退驻沧州。

11月17日　　吴佩孚抵汉口，发出“组织护宪军政府”通电，苏、浙、鄂、陕、皖、赣、闽、豫、川、粤10省代表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刘镇华、吴佩孚、萨镇冰、黄毓成、金汉鼎、林虎、洪兆麟等21人列名，声称“冯玉祥反戈称叛，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亟应联合建立护宪军政府，当讨贼戡乱之大任”。并附组织大纲10条，宣称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的一切政务。

△　齐燮元通电10省：组织“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推吴佩孚为总司令。

△　孙中山抵上海，万余人热烈欢迎。中午在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寓所接见各界人士，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并指出：“《字林西报》日前著论拒绝余入租界，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我在租界之居住，则我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

△　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复电段祺瑞，对时局提出六点主张：一、应正曹锟贿选之罪，永垂大戒；二、贿选之罪，与受同科，稔恶议员，急宜惩治，庶几挽救全国各级议会贿赂公行之恶习；三、今之国会久为民意所不属，非根本改造不可；四、吴佩孚所拥非人，

然其人格未尝堕落，为国家爱惜人才，宜有以善处之；五、今后全国统一问题，宁以政治解决，万勿再凭武力；六、凡居全国重心者，不宜身当政治之冲，如其人非重要，不过变易政局而已，否则国家元气，斲 丧随之。鉴此前车，愿公善以自处。

△　国际禁烟大会在日内瓦开幕，古巴代表阿察罗为会长，中国代表施肇基当选为副会长。

△　《语丝》周刊创刊于北京，刊载鲁迅之杂文、周作人之小品等。

11月18日　　武汉各法团会议善后办法，阻止吴佩孚、齐燮元、萧耀南等在鄂组织护宪军政府。21日，鄂省议会通电反对组织护宪军政府。次日，湖北各法团亦发通电反对。

△　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卢永祥在天津会议，对吴佩孚及长江各省组织“护宪军政府”一致主张讨伐，并决定：一、俟有全国过半数之省区赞成，即请段入京执政，组织临时政府；二、军队指挥，由冯玉祥率国民军担任京汉路方面，卢永祥率奉军一部及鲁、皖、沪、浙各军，担任津浦路方面；三、为贯彻和平起见，静待南下代表疏通，望吴、齐悔悟，否则将褫吴、齐各职并下讨伐令；四、军费由奉方筹集，交由段祺瑞分配。

△　段祺瑞于天津致电黄郛，略谓：“执事苦心孤诣，力任其难，殊深欣慰。当此国事未定之时，务望坚持镇定，勉维现状为盼。”

△　湘西川军熊克武部占常德，解散林支宇司令部，并与唐荣阳开战，俘唐部旅长吴汉鍒　。林、唐退保澧州。20日，川军总指挥汤子模抵常德，发表谈话称：本军由川经黔入湘，系假道通过，地方用人行政均请湘政府主持。俟熊克武抵常德，即会师荆沙。目前地方治安，暂负全责。

△　驻墨西哥华侨团体总会致电段祺瑞，略谓：读孙中山11月10日宣言，“由农、工、商、学、教育、实业、大学、政党及反对曹、吴各军九团体派代表组织预备会议，以产生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语，法良意美，为救国惟一之方针，请速执行，以解纠纷。

△　吴佩孚17日组织“护宪军政府”的通电与10日长江各省拥段电截然相反，引起直系内部慌乱，孙传芳电询齐燮元。齐即于是晚召开同盟紧急会议，决定先授意韩国钧发出通电表示反对吴之17日通电，又电段请阻奉军南下，并再通电拥段，以扫除段之怀疑。

11月19日　　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区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早日出山，解决国是。

△　江苏省长韩国钧发出反对吴佩孚设立“护宪军政府”之通电。略谓：“前诵齐抚帅暨各帅蒸（10）日通电，吁恳段公出山，维持大局，极表赞同。顷阅武昌筱（17日）电，复有护宪军政府之组织，天下人民不免惊疑。若仅组织各省联合机关，仍按抚帅蒸电，辅助段公，收拾时局，实为大局之幸。如仍藉以战争，则国事分裂，民不堪命。国钧在苏言苏，恐地方既不愿受此牺牲，经济尤不能供此担负，尚祈各帅审慎执行。”22日，吴佩孚复电赞成拥段，谓组织护宪政府亦系促段出山之意。

△　浙江驻沪劳工总会致电段祺瑞，吁请速令孙传芳离浙，还政于浙人。该会又发表敬告浙民书，要求“浙民治浙”，实现民治主义。

△　段祺瑞电请唐绍仪即日北上主持外交。同日，许世英致电接近唐之欧阳荣，请其就近劝驾。22日，唐复电婉辞不就。23日，段又派齐俊民及许世英赴沪敦请，唐亦未允。24日唐复电段，仍表示不就。

△　吴佩孚离汉口抵郑州，旋赴洛阳，在郑、洛两地布置军事，在郑设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并将留豫各军加以整顿，偕同回豫部队共三万余人，赶赴新乡一带布防，扼守彰河，抵抗胡景翼军入豫。

△　中共中央在是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上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希望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其任务不仅是筹备国民会议，且应是“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这个政府应执行如下的政策：一、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的势力；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即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经济的计划）的阴谋；二、至少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以取得工农兵等民众的同情。

△　孙中山在沪莫利爱路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谓此次北上，“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要召开国民会议，使全国人民能够“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并谓：“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

△　孙中山任命任应岐为建国军豫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二旅旅长、兼建国豫军总指挥；陈青云为建国军豫军第二师师长兼第三旅旅长。

△　孙中山任命卢兴邦为福建上游指挥官。

11月20日　　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在天津举行会议，磋商直系长江各省问题，决定：一、请段祺瑞先行入京，主持一切；二、对于长江各省，为贯彻和平起见，决定先取防卫状态，静候各南下代表接洽结果报告到津，再于必要时施以进一步骤，以符和平本旨；三、关于以后长江应付方针，悉听段指挥。

△　段祺瑞通电定于24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谓不愿称总统，不设国务总理。并称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善后会议，

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

△　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于上旬向广东输诚，谭延闿委方为赣南督办，约定驱逐赣督兼省长蔡成勋之后，北伐军假道赣境。是日，方本仁通电讨蔡。

△　黄郛指令将京畿警卫司令改为京畿警卫总司令，仍以鹿钟麟充任。

△　四川第三军刘成勋部蓝文彬旅与川边镇守使陈遐龄部孙涵旅发生战斗，陈部先由天全、洪雅两路进攻雅州，败蓝旅。刘成勋急下令第四师师长蓝世钲为援川边总指挥，蓝文彬为右翼司令，洪璧为左翼司令，直取川边。16日，蓝文彬攻克马鞍山，17日克泸定桥，是日占领泸定城。第三军乃控制川边。28日，刘成勋通电委蓝世钲兼任川南屯殖军总司令，蓝文彬兼任泸边安抚司令，筹办善后事宜。

△　湖南省宪法会议闭幕。省宪修正案全部在昨日会议上通过，对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与国宪相抵触之处有所修改。改宪问题待公民投票表决。

11月21日　　岑春煊电段祺瑞并转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等，望各方当事者，务宜恩仇两忘，实行建国主义，裁兵废督，或移军殖边，或兵工筑路，与民更始，俾乱源永绝。25日，岑又电段谓："欲结一乱局，根本革新，必须胜者首示谦退，力持让德。雨亭（作霖）、焕章（玉祥）分任东、北两方，开拓富源，为全国倡；子玉（佩孚）复煊箇（21日）电中亦已明言移兵殖边，为其素志，开拓西北，岂不可能。兵气既消，恩仇悉泯，然后集各省区代表而议改定军制，裁兵理财，势可迎刃，其他新治，亦得应运而开。"

△　齐燮元按段祺瑞入京执政消息，在督署召开长江10省代表暨海军联防紧急会议，应付时局，议决：一、由齐燮元领衔联电贺段就执政职；二、段就职后联防各省一致服从执政政府；三、对"护宪军

政府”暂取搁置态度；四、电段阻止任何方面军队南下，如有侵犯十省境界者，一致同盟对付。

△　北京外交团领袖欧登科照会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阻止对长江各省用兵，并请注意外侨损失。

△　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商会，请一致要求以职业团体加入孙中山之国民会议。谓政治隆污为国民休戚所系，商人握经济中枢，所受恶政治之摧残较其余各界影响犹巨，如仍处旁观地位，不以国民资格要求，恐重蹈甲兴乙仆之故辙。南京、汉口、九江、长沙、烟台等各地商会先后复电赞同。

△　孙中山离沪，乘“上海丸”轮船取道日本转赴天津。

11月22日　　段祺瑞由天津入京，冯玉祥与段同行，张学良、吴光新、许世英、陈宦、马良等十余人随行。

△　《中国青年》第五十四期发行，刊有该刊记者15日所写《最近的政局》一文，谓：冯玉祥原想拥段祺瑞为傀儡以号令天下，但段、张嫉忌他的地位，都想迫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自开一个巡阅使的地盘，摄政内阁的命令也不能生效，这使冯不得不与国民党及北京大学之一部分人通气，冀增声势。张作霖主张扑灭直系势力，他想以南方巡阅使冯玉祥、卢永祥去打南方，他便可拥段独握中枢政权，他不愿冯、段有主和之议，故他的军队已沿津浦路南下。段祺瑞是不愿做傀儡的，他只责吴佩孚拥戴非人，暗予长江直系各督自新之路，这就唤起了八省联防拥段，为自己造成一种可与张、冯抗衡之力。

△　孙中山在“上海丸”船上接见日本记者，指出：“中国频年内乱，多半为外人直接或间接造成，过去如广州商团事件，现在如吴佩孚南下事件，暗中均有外人从中指使，无非欲达其侵略政策耳！”又谓：“中日两国，就目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

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　反贿选议员279人通电宣告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王家襄、童杭时、范熙壬、彭养光、韩玉宸等代表于23日往谒段祺瑞，由许世英代见。王家襄谓：当此政变之际、应有一民意机关，将来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组织法希望有国会非常会议之制定。许谓允段考虑后再答复。23日，该会继续开会，由童杭时等提出《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凡11条。25日通过该大纲及议事细则。

11月23日　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略谓：“临时执政莅京就职，大政已有所归……职责已尽，即于24日宣告辞职。”次日，黄郛又以个人名义发表长电，表示“即日归田，遂我初服”。

△　北京反帝大联盟在中央公园开会，议决对时局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制止未来的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相勾结。

△　孙中山抵日本长崎，在船上分别接见长崎新闻记者和中国留学生代表。在与记者谈话中强调中国国民已有能力解决全国一切大事。对留学生谈话中，指出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和打破列强的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希望大家赞成力争要开国民会议。

△　广州市郊农民因胡汉民公布的市选条例中只有士、工、商三界有选举权，农民被排斥在外，是日4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

△　冯玉祥在旃檀寺总司令部召集参谋长刘骥及熊斌、蒋鸿遇、鹿钟麟、张之江、刘郁芬、孙良臣等师、旅长九人开军事会议，讨论张作霖违约派大批奉军入关，威胁日急，如何动员舆论迫奉出关，主张采取以退为进策略。冯谓：此次回兵京师，主张和平，完全达到目的。国事主持有人，余早有俟达到目的后即行解除兵柄之宣言，现正求去之良机，所有军队请各主管之师、旅长妥为统属，直接属陆军

部，成完全之国军，以打破军阀私蓄军队、培植势力之恶习。

△　黄绍竑因商讨刘震寰回广西任职事抵广州。建国桂军第三师师长陈天太率领便服兵士20人至东亚酒店袭击黄绍竑，黄避入许崇智司令部得脱。26日，胡汉民下令将陈天太革职。27日，孙中山令第七军军长刘玉山严惩陈天太。

△　胡汉民以吴佩孚拟在武昌组织扩宪军政府，经迭电孙中山请示后，于是日在留守府集议：一、决以大本营名义宣言讨伐武昌护宪军政府；二、对陈炯明军主守；三、对北伐主速攻赣，捣武汉，破长江联盟局面。

△　建国军攻鄂总司令程潜部2000人攻克宜章，守军唐生智部团长张元达战死。25日，唐生智率队反攻。26日，程潜部向坪石后退。27日，唐部进占宜章，29日抵坪石附近，程部退向乐昌。

△　援助周荫人之民军高义联合吴威、杨汉烈分三路进攻永春之北伐军陈国辉等部。25日占领永春、德化。30日，陈国辉、杨学良部反攻，占领安溪。

△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日本大仓组借款日金50万元，月息九厘，以盐税余款担保，用作拨交中国实业银行兑换纸币。

△　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江浙丝绸厂联合会电段祺瑞，略谓："近闻中山先生在沪宣言，北上后拟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旨哉言乎！我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痛苦已历数十年之久。伏恳我公俟中山北上后协力合作，期底于成，藉臻国家于强盛之域。"

11月24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就职宣言声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同日，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

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

△　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三项命令：一、京外文武官吏仍旧供职，共济时艰；二、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三、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凡六条：第一条，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第二条，临时执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第三条，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第四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第五条，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第六条，本制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　张作霖偕卢永祥、鲍贵卿等入京，由李景林先到京布置，奉军第一军驻丰台，第二军驻马厂。在津浦线自天津至德州驻军约有六万人。

△　冯玉祥因张作霖不践约，大批军队开入关内，且皖、奉相结，奉军源源开入京城，乃通电宣布解除兵柄，决心下野，所有部下军队如何编制之处，完全听命于国家。同日，又电吴佩孚请将所统部队完全交付国家，“与弟共游欧美，为异日效忠民国之备，牺牲一人之政见，服从多数之民愿，解除兵柄，为废督裁兵之倡”。翌日，冯亲将辞呈递交段祺瑞，并即赴北京西郊天台山僧寺静养。

△　王揖唐通电取消安福俱乐部。略谓：“过去之国会与政团，情势既已推移，自当除旧布新，别筹途辙。”

△　李景林辞直隶保安总司令兼省长职，声言专治军旅，不视省政。

△　河南绅民张钫等发起组织之弭兵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开封各团体、全省法团及军、政、绅、商、学各界均派代表参加。

△　孙中山抵神户，对新闻记者谈日本应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

约。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中国革命以来，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外国人在中国捣乱。外国人在中国不只是利用不平等条约，并且滥用不平等条约为所欲为。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可以得中国的人心，日本完全得到了中国的人心，以后的大权利，便无可限量。

△　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开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中方徐谦、李石曾，苏方伊法尔（裴盖满代），推举蔡元培为委员长。

11月25日　　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在韶关开军事大会，宣布北伐军费有着，中央军需总局成立。各将领皆主张乘赣省内乱，刻日出发攻赣。乃议决由北伐联军总司令下令各军，限文到五日内一律开至南雄及赣边集中，听候命令出发。

△　孙中山在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的演说，略谓：中国历次内乱，皆由帝国主义援助军阀与军阀依附帝国主义所致。吴佩孚即获得帝国主义之援助；广州商团事变，亦为英国所唆使者。故阻遏乱源，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海关与领事裁判权，使外人无力在中国活动，方克有济。“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

△　段祺瑞令：外、财、海、教、农五部总长未到任前，着各该部次长沈瑞麟、张训钦、徐振鹏、马叙伦、刘治洲暂行代理部务；刘汝贤代参谋总长。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向中华汇业银行借银元八万元，以盐税余款担保，作拨放行政经费及垫款借款利息之用，月息一分三厘。

△　驻丰台之冯玉祥军第十一师由京汉路南下，孙岳部由石家庄南下，国民军约四万人分布于京汉路石家庄与磁县之间。

△　萧耀南、齐燮元联名电请段祺瑞释放曹锟，任命吴佩孚为陆军训练总监，并责成奉、冯两军退回原防。

△　齐燮元致电段祺瑞改革军制。略谓：解决国是之根本方略，应采用农、工、商、军事政策。陆军则编练常备军40师，以两师编成之军团为战略单位，按国防计划，划分军团管区，军区与政区分开，本此收束逾额之军队，渐次为新式国军之转移。愚见于善后会议之先，须将各省区各军驻地调查明确，宣告此时期内维持现状，一面由善后会议产生一军事委员会，由各省区各军派出全权代表组织之，专办改革军制及收束军队事宜，限期实行，以弭乱源。否则燮元在苏决按本省财力，自行办理改革及收束事宜，以维地方秩序之度为限。

△　江西教育经费无着，省会南昌各校教职员实行全体罢教，赴财厅请愿。

△　鄂军王汝勤、卢金山电熊克武，略谓：段祺瑞已经就职，国是解决即在目前，请停止军事行动。

△　全国地方自治协进会联合会通电，请一致电京力争加入国民代表会议。

11月26日　　滇川黔建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集合第四军总司令龙云、一、二路指挥官卢汉等在滇誓师，并作演说，重申联省自治主张。

△　杜锡珪电段祺瑞辞海军总司令职。29日，阁议挽留。

△　上海筹备欢迎孙中山之27公团代表53人集会通过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以维护孙中山之主张，并推定筹备委员七人，成立筹备会。

△　上海总商会电促吴佩孚接受冯玉祥劝告，与冯同时下野。

△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通电号召全国学生拥护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表示将在国民会议中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废督裁兵及确定教育基金不得挪作军政费用等要求。

11月27日　　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省军事紧急会议，宣布即日下野，并指出收束军队办法：一、在未奉执政令以前，督军一职暂委陈调元署理，苏皖赣巡阅使着即裁撤；二、江苏原驻各军队听候陈调元节制，其收束改编应服从中央；三、自24日起苏省取消独立，通饬各属知照；四、电饬淞沪镇守使宫邦铎照旧供职，听候中央处置。

△　段祺瑞下令慰留冯玉祥。令曰："据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呈请开去本兼各职，游学欧美俾遂素愿等语。此次该使维持京畿秩序，军民翕服，功在国家，现在大局粗安，岂容高蹈，尚期勉尽职责，共济时艰，所请开去本兼各职之处，应毋庸议。"同日，段派宋壬东会同鹿钟麟等赴西山劝冯回京。28日，冯上第二次辞呈，段仍慰留。

△　段祺瑞特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兼盐务署督办；派丁士源继张志潭任财政整理会副会长。

△　胡景翼与吴佩孚军在彰德接触，胡军大捷，是日占新乡。吴军向黄河以南退却。

△　留日学生致电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略谓：冯玉祥入都以来，仅驱逐三数阁员、黜陟一二胥吏而已，对于贿选祸国之曹酋不予依法惩办，反挟之以为发号施令之工具，藏污纳垢之国会不速予解散，虽削除溥仪帝号，改正优待条件一举尚属差强人意，而道路传闻，段、张犹不忘故主，从中𪓐 齕，致令复辟余孽野心不死。张乘战胜之余威，叱咤入关，不问国家根本大计，而且惟争编军队，分占地盘是谋，嗾使部曲，取直图鲁，力争经营，不可一世。诸公近日之所为，贿选虽殊，黩武则一。吾民诚不愿诸公之覆辙相寻，诸公应本和平统一之旨，作真正救国之谋，速召集国民会议，筹商救国方策。

11月28日　　驻京各国公使经日本公使芳泽斡旋，分别谒段祺瑞祝贺出任临时执政，对临时政府表示非正式之承认。

△　孙中山应神户商业会所等五团体邀请，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细亚主义》，强调亚洲民族如果不能团结，就无法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尤其希望日本以世界强国的资格，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而不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并指出：“我希望在将来，地处亚洲的中日两国将为确保东洋而充分携手合作。我希望得到日本全体国民各位的援助。”同日晚，孙中山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上讲演《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谓日本若能真心与中国亲善，务先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之地位，复中国人之自由，两国于是方可以言亲善。宋庆龄亦应神户兵库县立高等女校的邀请，发表男女平权的讲话，表示希望中日两国妇女提携，共为文明平和之努力。

△　溥仪之“内务府”致函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并否认清室善后委员会。同日，溥仪函各国公使求援，并对《顺天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

△　担任守卫载沣宅前看顾溥仪之国民军卫队奉令撤离。

△　上海大学代理校长邵力子召全体教职员学生会议，一致赞成孙中山所提出召集九团体之预备会议产生国民会议之建议，议决发表宣言，并推邵力子、彭述之、施存统、张太雷等七人为代表，与国内各大学联络，促进预备会议之产生。

△　段祺瑞令免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兼省长马联甲本兼各职，安徽督理一职着即裁撤；特任王揖唐为安徽省长暂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吴炳湘为京师警察总监。

△　驻京法代办祁毕业访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沈瑞麟，催促履行金法郎案。

△　蒋作宾衔段祺瑞命南下劝熊克武、汤子模等罢兵，是日到汉口。30日离汉赴长沙，与赵恒惕接洽后再赴常德。

△　郑士琦与张宗昌妥协，张部一旅二营由天津到达济南。陈调元是夜抵徐州。

△　上海总商会电赞冯玉祥勇退，略谓："方今乱源全在拥兵者以爵禄为私产，视封疆为汤沐，遂致人民水深火热，堕入泥犁。此举公倡其先，群帅踵其后，纠纷立解，政治可渐入于正轨，开民国十余年来拨乱反正之局面，垂之史册，公实功首。"

△　段祺瑞令准南洋大学校长陈杜衡辞职，以凌鸿勋继任。

11月29日　　北京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议决：一、组织参政院案，先成立法制院，以姚震为院长，由院议订参政院组织法；二、改革官制案，取消总统府、国务院，余暂仍旧；三、下令整理内外债；四、对杜锡珪辞职慰留。

△　段祺瑞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

△　段祺瑞电前国务总理孙宝琦北上复任税务督办，并征询对时局之意见。

△　清废帝溥仪经清室遗老郑孝胥等与天津日驻军司令部及北京日本兵营大佐竹本多吉、日使芳泽之策划，于是日下午5时逃入北京东交民巷日使馆。芳泽一面电告各国使馆，一面派书记官池部赴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说明溥仪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祺瑞，以免有所误会。段答复"极为谅解"。

△　孙中山因匆遽离沪，请谢持、居正、周佩箴、叶楚伧、邵力

子为代表，于是日招待上海实业团体、商会、教会重要人物，详述发起国民会议之旨趣，谓国民会议为今日解决国是之惟一方法。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商界叶惠钧等发言表示赞同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之主张。

△ 张作霖会见美国驻京代办梅尔、英国公使麻克类、荷兰公使欧登科，要求各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并攻击共产党及苏俄在华之活动。

△ 方本仁军攻占万安、泰和后又占吉安。

△ 皖北镇守使兼第四旅旅长高世读、宪兵司令程文沅、旅长倪朝荣等通电取消国民军总副司令名称。12月2日，国民军第四军司令李传业通电称："高世读等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未及通知，遽列贱名，且第四军早经郑重声明与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一致，第五、六两军方在组织，未敢擅自取消。"

△ 山东曹州第三旅参谋长吕秀文得胡景翼、孙岳支持，率部逼该旅旅长曹州镇守使徐鸿宾去职，自称国民军第五路司令，据曹州。该省督理郑士琦调解无效，12月7日乃请准段祺瑞任命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为曹州镇守使，自济宁率师赴曹，并于8日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第五旅李森等助之。

△ 汉冶萍公司假上海宁波同乡会开股东大会，到会329人，董事会长孙宝琦主席。大会决定发八厘股息，并通过续借日债850万元。湘公股代表张秉文反对无效，复于30日通电段祺瑞等反对，谓公司主持非人，坐令日益腐败，积欠日债达3000万元之多，近三年内损失又增800万元。此次股东大会议决续借日债850万元，外债愈多，公司愈危，国权损失愈大。同日，又电湘省政府，请将萍乡煤斤全数截留，以促公司觉悟。

△ 班禅额尔德尼通电呼吁和平，谓："自维自受国封，与同休

戚，年来受外界之刺激，沿途感闾里之萧条，知战祸不可再延，元气亟宜休养，所望彻底觉悟，共保和平，免阋墙之纷争，谋根本之建设。”

11月30日　　广州投票选举市长，初选结果，胡毅生因事前暗中勾结几个工会首领，又得邹鲁暗助，票数最多。广东民族解放协会投票前曾发表宣言，指出“市选条例完全失掉普通选举意义”，农民被列为“化外之民”，工界市选完全为只包括少数工会的广东总工会所把持，士界由极少数学生组织的民权社强各学校一致选伍朝枢。宣言提出市选要加入农民，反对包办，市民要直接选举，反对收买，主张自由投票。

△　全国各界均主惩办贿选议员。贿选议员犹发宣言，借口维持法统，与临时政府对抗。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于29日阁议中提出检举国会贿选事件。是日，北京地方检察厅奉司法部令，分各检察官为11班，遵照所开90余人之名单向各宅及有关各银行搜查贿选帐簿等证据。贿选议员纷纷逃避。

△　陈炯明军进占宝安、东莞、石龙等地。

△　梧州大火，自午刻至翌日，全城繁华悉付一炬，损失约3000万元。电线被焚，全城黑暗无光。

△　上海全浙公会开干事会议，要求段祺瑞明令撤孙传芳。次日，上海全浙公会通电促孙下野。

11月下旬　　退守桂东之豫军樊钟秀部，自方本仁投诚后，即与方部联络反攻赣省，樊军赵杰（前亲奉豫督赵倜之弟）部连克营前、左安、藻林，遂川，常德盛部大败，向赵杰示意输诚。同时樊部在宁冈附近与蔡成勋部激战五昼夜，不得手，乃绕道砻头圩夹攻宁冈。蔡军措手不备，樊部遂占宁冈城。时方军向吉安进迫，蔡部冯绍闵旅无力他顾，樊部乃克莲花，进迫萍乡。

是月　　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举行会议，讨论东江战事情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建议立刻东征，与会人员原则上同意，但因东征军费无着，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态度游移，东征计划因此延搁。

△　德诚银号总号在山东济南设立，董事长张吉庵，总经理刘瑞符。

△　交通部广九路局向中英公司借银元21.6293万元，年息九厘，以沪宁路余利作为担保，用作垫付借款本息之用。

△　私立青岛大学举宋传曲为校长。

12月

12月1日　　孙中山自神户乘日轮“北岭丸”赴天津，是日途经门司，在船上与新闻记者谈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指出：北上目的在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也包括日本同中国所订的“二十一条”。关于南北统一问题，关键“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够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不听外国人的话，来残害南方的人民”。并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单纯是对外问题，“因为中国近来的兵和督，都是外国条约造成的”。

△　段祺瑞电吴佩孚，望“只身引退，勿碍统一”。4日，吴复电谓：“自津南下，遄返洛阳，未问外事。……数月来忧劳成疾，现拟遵命赴鸡公山暂息，调养病体，当世之事，不敢复问。”

△　张作霖、张宗昌、卢永祥等在北京开会，主张从速对长江各省用兵。但段祺瑞主张从缓。

△　陕西督军刘镇华趁吴佩孚与胡景翼两军在彰德对垒，派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昆出兵潼关。是日憨师向东进军，限吴24小时

内让出洛阳。吴遂于2日离洛阳赴郑州。

△　北京贿选议员通告国会已不能行使职权，于本日移津。次日，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国会移津事，认为政府并未妨碍两院职权，检举贿选事属法庭，国会应否存在，待善后会议解决。

△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彭湃前往广宁领导农民减租运动。是日地主武装进攻潭垴，次日又从潭垴进攻社岗，被农民自卫军击退。自卫军并打退螺岗区地主武力收租，多数中小地主开始按照农会决定的数额收租。5日，彭湃向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会报告称：从广宁、花县等地的事件中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

△　湖南省39校教职员600余人集会，以教育经费积欠累年，一致决议2日罢课。省财政司允发一个月经费，请复课。

△　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致电段祺瑞，谓上海弹丸之地，既有北京简任之护军使，又有南京委任之镇守使，分兵列戍，为前所未有，请顺从民意，裁撤驻沪之护军使及镇守使两职。

△　旅沪闽同乡会、泉漳会馆等闽驻沪六团体电请段祺瑞下令裁撤闽督，并调驻防军队及海军陆战队离闽，一面简派闽人中声誉卓著众望共孚者收束民军，以杜军阀争夺地盘之源，而树闽人实行自治之基。

12月2日　段祺瑞主持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拟以善后会议替代参众两议院。许世英提议待征求孙中山同意后再公布，众同意。

△　张作霖接受段祺瑞之调停，率奉军5000人离京赴津，一部返奉，另部经山东向南进展。

△　汪精卫、邵元冲、孙科、徐谦、吴敬恒等往北京西山旃檀寺

访冯玉祥，未晤。

△　段祺瑞据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转陈蒙古王公联合会等呈询，指令该院宣示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暨蒙古待遇条例昭然有效无疑。

△　段祺瑞令免蔡成勋兼署赣省长职，由胡思义署理。

△　吴佩孚由洛阳至信阳后，是日自鸡公山电湖北督军萧耀南欲率部去鄂。萧恐吴入鄂引起鄂省战祸，当即致电婉谢，并即召鄂各军磋商阻吴来鄂对策。当夜，萧电吴请通电宣言下野，所部军队听候中央改编。3日，吴乘车赴汉，因中途路轨为河南民军袁英所毁，遂返鸡公山，并复电萧称养病数日再行去鄂，无宣言下野必要。

△　彰德前方援直鄂军寇英杰部后退50里，对胡景翼表示退让。4日，胡部占领彰德。

△　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致电段祺瑞请注意五事：一、抛弃武力政策，召集会议，熟商善后；二、实行废督裁兵，务使武人不得再行割据地盘；三、审察用人行政，以天下之贤才治天下之政治；四、慎重对外交涉；五、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致电段祺瑞请急办四事：一、废督裁兵；二、财政应严定量入为出，破各省把持截留之积习，再与各国商加二五关税，然后举全国之收入，先以整理债务，次以支配政军费；三、振兴实业，移民屯垦，裁兵实边；四、许职业团体加入选举。

△　皖驻沪劳工总会因段祺瑞起用倪道烺为凤阳关监督，陈策为浦信路督办，特电段祺瑞，谓：倪系姜案（按：指1921年6月2日安庆学生代表姜高琦因请愿增加教育经费被倪杀害案，该案后移江西法院审理）要犯，通缉有令；陈策之贿选罪行，劣迹昭彰。请速将倪、陈解职，依法惩处。3日，京、津两地皖籍同乡亦具呈段，请收回成

命。

12月3日　段祺瑞特任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以杨以德暂代直隶省长。

△　河南督理张福来宣布下野，所部交寇英杰。寇奉萧耀南命退回武胜关北，阻豫军溃兵入鄂。李济臣率鄂、豫军退守许昌。

△　方本仁占吉安后继续前进，又攻克峡江。

△　章太炎接段祺瑞函聘为高等顾问，不就，是日将原聘书退还。

△　孙中山特派范石生为广东全省筹饷总局监督，罗翼群、梅光培分别为筹饷总局总办、会办。

△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致电段祺瑞，请放弃善后会议，采行国民会议预备会，还政于民。

△　上海妇女运动会等10团体发起组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力争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早日召开。5日，湖南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

12月4日　孙中山自日本抵天津，下榻张园行馆。二万余人赴码头热烈欢迎。市民悬国旗三日。下午，孙赴曹园访张作霖，与张作简单谈话。张问："现在时局之收拾，合肥（段祺瑞）能当此任否？"孙答："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诸合肥办理。"旋黎元洪来张园访。晚，肝病骤发。

△　许世英受段祺瑞命至天津访孙中山于病榻旁，出示改名为《善后会议条例》之《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征求意见，孙不同意。

△　北京外交团以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在荷使馆会议，

讨论采取干涉孙中山入北京措施。同日，天津法租界捕房武力禁止京汉路总工会散发欢迎孙之传单，拘捕总工会代表、工人、学生、国民党人多名。次日，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突然搜去迎孙之传单及旗帜，并传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直隶省党部委员于方舟等。

△　湖北省议会、汉口总商会、省教育会等14团体在省议会开联席会议，决阻吴佩孚来鄂；并赴军署请愿拒吴，声言如吴来鄂，将实行罢市、罢工、罢税。同日14团体联电吴佩孚，表示吴如率部来鄂，决率全省人民誓死抵制。

△　段祺瑞公布临时法制院官制，并以姚震为法制院院长。

△　赵恒惕致电各省省议会，盼速定省宪。9日，湘议会又电请各省制宪自治。12日，萧耀南电赵恒惕赞成联省制宪。25日，鲁省议会复湘省议会赞同联省自治。

△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自治会通电力争早日召开国民会议。5日，芜湖学生联合会通电赞助孙中山之国民会议。6日，广州工人代表会等百余团体通电赞同孙中山召开预备会议及国民会议之主张。8日，安徽旅沪同乡会发表宣言，号召促成国民会议。

12月5日　张作霖电段祺瑞称，巡阅使之职为军阀之祸本，应请裁撤，并愿从自身做起，首先解除东三省巡阅使。6日又通电宣布将镇威军名义暨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线驻军准备分期撤回防地，嗣后东三省军事进止悉听中央命令。

△　镇嵩军憨玉琨师占开封、郑州，阻拒胡景翼军渡黄河南下。9日，孙岳派何遂率军取道柳园渡河攻入开封城。10日，胡军进抵郑州，憨部退洛阳，宣言服从段执政命令。同日，刘镇华电段祺瑞，谓已令憨师退至京汉路以西，静候命令回陕。11日，胡景翼至开封，次日通电就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职。

△　法国政府外交部照会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催速解决金法郎案，并以断绝邦交相要挟。11日，法外长普恩加赉请各国驻法公使电本国催段祺瑞速承认庚款用金币计算。12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陈篆，赔款用金币或纸币，主交国际法庭“公决”。

△　北京外交团会议，以上海宫邦铎、张允明两军预备开战，决向北京临时政府切实声明请担保上海和平，饬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并请迅速正式任命上海镇守使，使宫、张两人无所借口。

12月6日　汪精卫、丁惟汾、邵元冲、张继、戴季陶、李石曾、孙科、马伯援、焦易堂、王用宾、王法勤共11人在天津张园举行会议，讨论北京政局诸问题，主张：实现全国统一应付之国民会议；一切善后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无另行召集善后会议之必要；临时执政无法律根据，只能认为系临时发生之事实政府；必须惩办此次主战祸首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五人；应依法惩办贿选议员；清室问题应依照摄政府所定修正优待条件由清室善后委员会继续办理。

△　段祺瑞令：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部、陆军部严行监视，静候公判。

△　段祺瑞特任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同日，李济臣在信阳另组河南省政府，自称省长。8日，刘镇华以憨玉昆驱吴与胡同样居功，电段请授憨相当名义。

△　段祺瑞派曲同丰赴日使馆慰问溥仪，允予自由行动，加以特别保护。

△　冯玉祥三上辞呈请免本兼各职。10日，段祺瑞令准病假一月，假满速即视事。

△　广州大本营为前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广东省长伍廷芳举行

国葬，胡汉民代表孙中山主祭，各界送葬者数千人，炮舰鸣炮致敬。

△　谭延闿下令北伐军三路向赣南进攻，以樊钟秀为前敌总指挥。中央军总指挥宋鹤庚率建国湘军第一、二、三军由韶关、梅岭、大庾、青龙圩、南康之线攻击前进，图速占赣州；左翼军总指挥陈嘉祐率建国湘军第四、五军、建国豫军之一部由石化、城口、聂群镇向崇义、上犹、遂川之线攻击前进；右翼军总指挥朱培德率中央直辖一军、赣军、鄂军全部由乐昌、仁化经南雄以东之地区向小江口、信丰、古陂圩之线会攻赣州。

△　晚，北伐中央军宋鹤庚部占领大梅关、马鞍山、仙人岭、广头坟、大庾城，北伐军右翼朱培德部占领新城。次日，宋部克青龙圩，鲁涤平军会同湘军第三军占领南安县城。8日，各路军占领南康，宋鹤庚之先遣部队进至赣州附近。

△　方本仁部邓如琢旅进占樟树镇。南昌大震。

△　蔡成勋宣告退职，走九江去上海，将督理印交赣西镇守使岳兆麟；省长胡思义尚未到任，省长一职咨交豫章道尹曹本章暂行护理；所兼暂编第一师长职令第一旅长杨以来代理。

12月7日　段祺瑞对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略称：一、列国正式承认临时政府不过时间问题；二、孙文所说之废除不平等条约殊不能赞同；三、对清废帝驱之出宫，殊难同意，其避难于日使馆似出于自动，无法如何之；四、财政虽非常困难，“现无担保借款虽有六亿，然若将归还之年限延长，实不足忧”，以输入之外国资本作开垦、交通、畜牧等事业，自可发展而增财富；五、吴佩孚已电告决意下野；六、金法郎案因国民一致反对，难以解决。

△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在北京宴新闻界说明检查国会贿选情形，并谓此举目的在防止贿选议员对抗临时政府，至于起诉与否，无关紧要。

△　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及奉军将领会议，段祺瑞派吴光新参加，讨论解决齐燮元问题，决请段先下令免齐职，齐如反抗，即令奉军六万人南下，并推张宗昌以津浦路警备总司令名义先行率部由津南下。10日，张宗昌赴马厂检阅军队，准备开拔。

△　段祺瑞分电上海宫邦铎、张允明制止军事行动。

△　黎元洪在天津午宴李烈钧、许世英等，表示不参加善后会议。

△　杜锡珪赴沪养病，海军总司令职交杨树庄代理。同日，海军将领电段祺瑞反对林建章任海军总长。

△　熊克武派川军第四师师长余际唐至湘，与赵恒惕商谈贯彻联治建国主张。

△　上海商帮公会再电段祺瑞请准将上海护、镇两使一并裁撤，上海20里内永不驻兵。

△　段祺瑞令内务总长兼赈务督办龚心湛妥商地方长官，迅筹直、赣、闽、湘、浙、鄂、川、察、绥等省区水、旱灾黎赈抚。

12月8日　　冯玉祥致电段祺瑞称，即日取消国民军及总司令名义，俾队伍直隶中央以资统辖。

△　旅汉江西同乡会召集紧急会议，决即电请段祺瑞照安徽办法，特任李烈钧为赣省长兼理军务善后事宜，并电请北京江西同乡会一致主张，就近向段请愿，俾得赣人治赣。

△　陈炯明赴兴宁，劝林虎与洪兆麟、叶举修复旧好。11日，林通电拥陈。

12月9日　　驻京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至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面递

美、比、日、英、意、法、荷七国公使署名之联合照会，声明承认北京临时政府；各国政府愿在最短期内设法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惟要求尊重条约，不得任意变更。24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正式复照；声明中国政府尊重一切既成条约，并望各国早日实现华会有关中国的决议。

△ 方本仁率部进入南昌，通电维持治安。同日，岳兆麟通电取消保安总司令，督理印信交方本仁。

△ 北伐军朱培德部首先攻占赣州，湘军宋鹤庚部旋亦入赣，赣军蔡成勋部退万安、雩都。10日，赣南善后委员会会长孔绍尧抵赣州支配民事。

△ 段祺瑞令免张景惠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由黄郛继任。

△ 上海总商会电请张作霖以身作则，实行废督。

△ 孙中山派余和鸿为财政委员会委员。17日，又派范石生、谢国光、韦冠英、梅光培为该会委员。

△ 孙中山电促齐燮元自新，并截拿南下之吴佩孚，以造福国家。

△ 旅沪浙人30余人为驱逐孙传芳事在全浙公会举行临时会议，褚辅成主席，决定：一、即日组织驱孙大会；二、推定徐建侯等五人北上联合旅居京、津浙人一致行动；三、全浙公会即日发出五电：一电段祺瑞、张作霖赞成废督裁兵；二电段祺瑞，告以旅沪各团体公决驱孙，并推代表来京面呈；三电孙传芳，请自动下野；四电北京全浙公会，告以请一致进行驱孙；五电浙省各县各团体，告以孙祸浙不已，惟有鼎力鼓吹驱孙，将所有已缴未解各款设法扣留，俟浙局底定后再行解缴。

△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著文攻击冯玉祥“赤化”，声称冯拥护

布尔什维克，企图设立赤化委员制政府。

12月10日　　段祺瑞令裁撤各省巡阅使；并令张作霖仍节制指挥东三省军政。同日又任命张作霖督办奉天军务善后事宜，张作相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吴俊陞督办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

△　山东督理郑士琦经段祺瑞之侍从武官冉捷三说项，通电声明取消中立，服从临时执政命令，允奉军过境。

△　南京传闻奉军将南下，齐燮元调兵遣将布置防务，居民逃难离城者甚多。是日驻沪日总领事矢田商准海军武官急电驻泊镇江、九江等处各日舰驶南京护侨。

△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邀议员林长民、汤漪、范熙壬等10余人晚餐时谓：检察厅侦查贿选，查出确有受贿证据之议员共480余人，鄙见不如请政府下令解散国会，以减少纠纷。11日，范熙壬在国会非常会议谈话会上报告章之谈话，咸认为不当，决定推沈钧儒、王用宾、吕复等六代表谒见段祺瑞。13日，沈等见段问：国会问题是否留待国民会议解决？段答："此次纯粹革命，约法、国会一同消灭。"又谓："曹锟贿选告成，宣布宪法，约法即已失效。故此次革命成功，约法当然取消。至于拒贿选议员，曾合作讨贼，国会解散，政府当然负责安置。"

△　方本仁电请段祺瑞与孙中山磋商，制止谭延闿入赣北伐。14日，段径电谭，略称："贵军进攻江西，原为驱蔡，今蔡出走，方早已率队入省，赣省秩序，亟待维持，请即制止进攻，徐商解决。"

△　赣南原赵倜毅军常德盛部，经豫军招抚使赵杰、赣南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孔绍尧先后疏洽，是日通电输诚北伐军，谓："蒙我大元帅委以建国奉军总司令，遵于即日就职，努力杀贼。"当日，移驻雩都。驻大庾一带之鲁军雷长禄师亦随常响应北伐军，归常指挥。

△　上海工团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等14团体联席会议分电北京、广州、汉口各公团，请推派代表来沪，商量组织工界国民会议促成会。12日，安徽救国会、省教育会等通电，声明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奋斗。

12月上旬　　湘西蔡巨猷部随熊克武假道湘西入鄂北伐至辰州，其部第三师师长刘承烈率部进占溆浦。该地驻军第一师贺耀组部第七、十两旅退驻东坪、新化一带。刘部邓赫绩支队由溆浦直趋东坪，并向益阳进逼，占领马迹塘。贺耀组闻讯，率军开至益阳，邓部被击败退桃源，蔡率余众自辰州开向常德。

△　沪南青年协进会宣言，主张：一、速行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期真正之国民会议早日实现；二、反对军阀官僚之善后会议，以绝假国民会议产生之路；三、国民会议成立之日，应促临时政府立即还政于民。

△　浙江旅沪工会、上海青年工人互助社、金银工人互助会、中国青年救国团少年俱乐部四团体联名致函孙中山，表示准备牺牲一切以实现孙中山为民造福之主张。

△　上海南市市民对外协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一、民国十四年（1925）1月内召集人民团体组织之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二、预备会议成立后临时政府应将政权立刻交出；三、国民会议组织法由预备会议产生；四、半年内召集国民会议。

△　广州商民协会、江苏吴江县新盛泽报社、上海履业工会、上海工界救国同志会等团体各通电赞成召集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提出的善后会议。

12月11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江苏问题，咸以齐燮元不肯遵命，决定明令罢免齐本兼各职；如齐不遵命交卸，即由卢永祥率兵南下，从事讨伐，吴光新率一军为卢作后应；并决定善后会议日

期至迟不出明年1月。

△　段祺瑞令免江苏督军齐燮元职，江苏督军一缺着即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以李景林暂行署理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

△　段祺瑞明令参加榆关热河战事之直系第三、九、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等师及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二十五、二十六等混成旅，屡经败阵逃散，溃不成军，所有各该师旅番号一律取消。

△　段祺瑞令热河都统米振标到京供职，所辖军队交阚朝玺妥为收束，热河都统由阚朝玺署理。

△　驻京法代办祁毕业照会北京临时政府称：段执政就职时曾宣言“外崇国信”，金法郎案前经中国政府承认，静待解决已两年，亦使华会各决议长此延宕无从批准，应速即承认原案，俾早结束。次日又照会催促。驻京日使芳泽出任调停，以华会条约亟待批准为由，劝中国让步。段祺瑞因民意反对，一时不敢承认。

△　广东省广宁、花县、香山、顺德、南海、番禺、新会等市郊14县47区农民协会18万会员发表宣言，拥护孙中山所主张之预备会议产生国民会议。

△　胡适致函章士钊请将倪道烺依法逮捕，略谓：倪为杀死皖学生姜高琦、周肇基案之要犯，江西高等检察厅呈请京师总检厅下令通缉在案，倪犯逃匿无踪。今见执政任命倪犯为凤阳关监督，可见倪犯尚在人间，请将倪犯捕送江西高等检察厅，并呈请执政府取消此任命。

△　山东曹州吕秀文以郑士琦宣布取消中立，允奉军过境南下，电郑表示服从。20日，吴长植赴曹州接镇守使任，并与段祺瑞代表冉

捷三、吕秀文等共同办理改编国民军事宜，并决定任吕为第三混成旅旅长。

12月12日　　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吴光新、梁鸿志、叶恭绰、李烈钧、马良等在天津曹园会商对江苏用兵计划，决定由卢永祥率兵南下，张宗昌担任前锋，会同张允明和皖军攻苏，联合江西断苏、鄂联合，胡景翼出兵砀山、铜山响应。

△　齐燮元电段祺瑞，本日将巡署印信及一切军务事宜交由韩国钧接收办理。同日，齐又自行发表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督署参谋长刘玉珂继任第十九师师长，由刘朝彦先行代理，依然霸占宁、沪，作拒卢准备。

△　江苏议员朱绍文等40余人、东南大学苏籍教员68人、苏省31校校长、上海留日学生会等是日至17日纷电段祺瑞和卢永祥，反对卢南下“宣抚”，并拒奉军南下，以免引起第二次战祸。

△　李烈钧在天津代表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谓孙中山患胆囊炎症，横腹时痛，目下正在静养中，暂时难以入京。又谓孙绝不主张共产。

△　孙中山特派谢国光为粤赣边防善后督办；由陈青云代理建国豫军总指挥；任命林支宇为建国军湘西援鄂第一路总司令。

△　京师地方检察厅托天津地方检察厅票传避居天津租界之曹锟贿选涉嫌行贿人王承斌、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并搜查吴景濂住宅。

△　参议院议员谷嘉荫等48人集会，否认国会非常会议。

△　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与学生发表宣言，拥护孙中山主张召集九团体之预备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并指出段祺瑞虽亦有召集国民会议之表示，惟孙中山主张由九团体产生之国民会议比较能代表民意，希

能辨别真假，不受军阀利用，并真能代表民意以解决国是。

△　长沙人力车工人2600余人反对车业加租改洋，实行罢工。18日，湘省议会议决咨行政府，维持车租原案，不得改洋。罢工取得胜利，23日复工。

12月13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决定方本仁督赣，李烈钧长赣，原省长胡思义免职。拟就三令，14日段祺瑞又主暂搁。

△　北伐军由赣州分三路北上：中路宋鹤庚、鲁涤平，由赣州、丰塘向吉安前进；左翼朱培德、李明扬掩护；右翼常德盛督率建国鲁军第一师雷长禄、建国奉军第一师常锡荣、第二师李象山等部自雩都经赣东前进。

△　胡景翼军占信阳，李倬章所率之吴佩孚第三师被击败，仅剩3000人；豫军王为蔚统率之第二十四师溃散至砀山等处，被陈调元收编。胡即电吴限14日离鸡公山。15日，胡军李纪才部自信阳分两路南逼，包围李倬章第三师残部，李败退新店，被缴械2000人，胡部占领双河、柳林，豫省长李济臣潜逃，部下被胡收编一部，余溃散。萧耀南因接段祺瑞密令，派员劝吴只身到汉，并电胡暂缓前进。

△　驻京美使舒尔曼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要求速即执行费德尔公司与交通部所订之无线电合同，一面电令驻华盛顿中国公使将无线电债券签字发行，一面将上海电台之地基拨定。16日，日使芳泽赴交通部访叶恭绰，声明日本三井物产会社与海军部之无线电合同应完全有效，持有30年独占权，交通部与美国费德尔公司之合同应废止。交通部认为按照华会原则，日本取得之专利均应取消，三井无线电专利应请日本抛弃。

△　陈调元致电卢永祥，表示愿为前驱，惟请谢绝客军入苏，以定人心。14日卢复电谓：“南下系奉命宣示德意，除带少数卫兵外，并无率大队入苏之意，希广为宣布，以释群疑而定人心。”

△　湖北各法团电促吴佩孚下野，略谓：吾鄂之精华被将军频年之私争搜刮殆尽，以致商敝民困，怨声载道。今为将军将来计，应早决意表示下野，将军纵不摹时流之宣言，亦应在报纸登启事，光明磊落，矢勿来鄂，泯众惶惑。

12月14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三令：一、解散国会；二、取消宪法；三、取消约法。15日，议员杨永泰等87人开紧急会议，谋阻止发表上述三令，请王印川等奔走，一面派代表向国民党求援。16日，临时政府召集临时法律会议，决定三令因国民党坚决反对而暂搁，并主张派人向国会非常会议表示，希望与政府合作，改易非常会议名称，不再坚持约法有效之论，将组织国宪起草委员会。18日，国民党国会议员彭养光致函段祺瑞，指出取消《临时约法》之举谬极，略谓："有约法而后有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而后有国会，有国会而后有将来之宪法，系统相承，不容或间，一有所议，动摇国本。"

△　方本仁得段祺瑞任为暂行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电后，乃践其参谋长贺守中（陈炯明代表）关于湘、粤、赣三省同盟武力驱谭延闿之议，约定林虎从东江右翼直趋赣之三南（龙南、定南、虔南），与方军前后夹攻北伐军，请赵恒惕出兵支援，并相商萧耀南运子弹500箱来赣。

△　齐燮元召集南京各界茶话会，声明15日卸职后离宁。嗣见苏省军民反对奉军南下，又变卦拟用武力抵抗卢永祥南下，并联络萧耀南、孙传芳等准备作战。

△　齐燮元部下朱熙等师、旅长20余人通电拥韩（国钧）拒卢（永祥），略谓："顷奉齐督12日电开，将一切军务事宜交韩省长接办，嘱即服从指挥。熙等对韩省长夙所钦崇，特此宣言服从我齐帅电示，共负江苏全省治安责任，倘有危害苏境或另有军事大员来苏，希图总揽军政破坏现状者，定当剑及履及，惟力是视。"16日，段祺瑞

复电谓：“奉军南下不过假道，诸公位置，决予维持，请勿骇疑，转滋纷扰。”

△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选举向警予、邵力子、刘清扬等21人为委员，向临时政府要求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会议，立即恢复被曹、吴等解散之工会、农会、学生会，立即取消钳制人民之《治安警察条例》。同日，湖北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

△　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促成国民会议、整顿学生团体之紧急通告，略谓：全国同学须竭力赞助中山先生提倡之国民大会，使底于成，各地学生联合会于接到通告后一星期内应即召开当地各校代表会议，筹划如何促成国民会议，并切实整顿各校之学生会，使学生会与学生有密切之联系，成为强有力的团体。

12月15日　　驻京日使芳泽访晤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劝早日解决金法郎案。次日，驻京意使翟录第闻讯，向芳泽表示谢意，并请斡旋。驻京比使艾维兹亦作如是之表示。芳泽更积极进行，往返于法公使傅乐猷、李思浩之间。19日，中法实业银行管理公司贝代表提出解决方案。30日，李思浩亦命财政部库藏司长提出个人试案。

△　国民党负责宣传国民会议主张之十三省区宣传人员30余人在北京集训，吴敬恒讲述宣传性质及方法。17日集训结束。19日孙中山委派受训人员为北方十三省促进国民会议宣传委员。

△　晚，张锡元部第四混成旅三个营在张家口哗变，劫掠全市。北京临时政府即饬张锡元赴张家口办理善后事宜；并任原冯玉祥部暂编第一师师长张之江署察哈尔都统，率兵前往弹压，旋即敉平。

△　北京警备司令部将原任曹锟总统府收支处长之直军军需兵站副监李彦青枪毙，宣布其罪状为：窃权纳贿，克扣军饷。

△　西贡华侨电段祺瑞，请实现孙中山所主张之国民会议。下旬，留日学生总会、侨港工团总会及菲律宾、加拿大、墨西哥、美国费城等地华侨团体亦先后通电赞成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

△　苏绅张一麐通电段祺瑞、卢永祥，反对卢永祥南下“宣抚”。略谓：“今政府免职之令与齐燮元辞职之电同时见告，目标既达，则师出无名”，“苏人闻卢公宣抚之命，滋生疑惧，若以师来，是示人以不信也。”17日卢复电谓：“此次奉命南下，职责所在，原系不得已而有此行，况齐督构难，罪在一人，对于一切将士并无疑间，惟不能不带卫队以供驱遣，请代为宣示，勿惑闲言，致自疑惧。”

12月16日　　北伐军占领万安，中路湘军张辉瓒师与朱培德、李明扬会师城内。时林虎之先遣队王得庆一部已至赣东之寻邬，谭延闿即令赣西之陈嘉祐全部、朱培德之一部开赴三南（龙南、定南、虔南），并令右翼卢师谛部赶至龙南，又令在粤桂军伍毓瑞师加入北伐军右翼。

△　孙中山任命韦冠英为建国桂军第一军军长，伍毓瑞为第二军军长，刘震寰为第三军军长。

△　吴佩孚派员向胡景翼、孙岳表示决心下野，请准其在鸡公山养病，胡饬部对吴优遇。

△　广州反对市选大会开会，推代表携市选黑幕呈词赴津谒孙中山陈述。孙中山闻知市选黑幕及工界、市民等反对风声后，电命廖仲恺等查办。31日，孙科由天津回粤，制止广州市长复选。

△　北京外交团以上海无驻兵之必要，且江南制造局及龙华火药厂为内争时攘夺之原因，特推荷公使欧登科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建议裁撤护军使、镇守使及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

△　苏州人力车工人4000余人为反对加征车租举行罢工。次日，

警厅令先放车复工，增加车租缓议，18日全部复工。

12月17日　段祺瑞电孙中山，称："方本仁已抵南昌，当可收拾一切。南军师出无名，务请设法制止，俾赣事得以早日奠定。"18日，孙复电略谓：方本仁奉吴佩孚之命前后攻粤四次，今年夏秋间，复与陈炯明约期夹攻，进窥南雄。自吴败后，方始变计，要求与建国北伐军共逐蔡成勋。当蔡未走，对北伐军招之惟恐不来，及蔡既走，则挥之惟恐不去。北伐军将士积愤于前，复被卖于后，愤慨自在意中。且观方之所为，何尝体念国事，拥戴段公，不过因利乘便而已。孙在复电中主张派李烈钧回赣斡旋。

△　驻京德使博邺派参赞师谋至北京临时政府，表示德国政府正式承认执政府。

△　《中国玻利维亚通好条约》由中国驻智利代办欧阳庚在智利与玻利维亚政府代表互换。

△　奉天省长王永江派姚庆祝协同直隶省委员将直属之临榆、昌黎、滦县、卢龙、乐亭、迁安、抚宁七县划归奉省管辖，并通令各该县嗣后概改用奉币。

△　北京电车在天安门举行通车典礼，中外来宾200余人参观。市民对车票定价太高表示不满。

12月18日　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怒斥段祺瑞所谓之"外崇国信"，厉声曰："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甚么还来欢迎我呢？"是日，孙肝病加剧。

△　方本仁将所部第三混成旅改编为第二师，第九混成旅改编为第一师，是日率部开往赣南，与北伐军作战。同日，林虎令驻东江右

翼之黄业英部调回河源、老隆趋赣边援方本仁，拟由连平、翁源袭北伐军后路，然后入三南。

△　段祺瑞据陆军总长吴光新呈请，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所部军队改编为两个师，任命鹿钟麟为暂编第一师师长，刘郁芬为暂编第二师师长。

△　段祺瑞令准察哈尔都统张锡元辞职，以张之江继任。

△　齐燮元召开紧急会议，准备脱离北京临时政府，自任江苏保安司令。

△　张作霖以齐燮元恋宁不走，决派奉军南下。南下奉军分三军，集中马厂，一军张宗昌，二军姜登选，三军吴光新，均归卢永祥节制。张并调汲金纯部入关，布防京奉沿路，以免后顾之忧。

△　卢永祥代表刘世杰、张亚盛、艾庆镛等抵徐州与陈调元接洽，请陈劝齐燮元离宁。20日，陈调元专车到南京，劝齐离宁，免启战祸，齐遂宣布暂不就任保安司令职。

12月19日　　汪精卫、邵元冲、孙科代表国民党发表重要声明，称：一、民国十一年中山先生晤俄使越飞于上海，主张中俄亲善，同时声明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十三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阐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并宣布政纲对内保护农工商，对外解除帝国主义压迫，实已无可发生疑议；二、国民党对共产党之服从党纲、党纪者，一律同等待遇。但市侩劣绅不得志于广州政府者，乃以香港为根据地，兴讹造讪，宣传广州政府将于4月1日、后又改称将于5月1日实行共产。今中山先生移节京、津，谣言接踵而至，以极平常之废约运动，引起“赤化”、“过激”之风说。一切反动余孽、猪仔议员，更趁此行其挑拨离间之能事，望识者勿为所惑。

△　热河都统米振标所部毅军万余人集中古北口，要求回豫，或

派员收编，反对由奉军接收。是日，胡景翼电段祺瑞，保举米为帮办河南军务。

△　孙中山致电豫督胡景翼，请容纳经湘、鄂转入豫境之建国豫军樊钟秀部。

△　廖仲恺先后派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第三师一个营赴广宁地区支援彭湃对抗地主武装进攻，开展减租运动。是日，广宁举行农兵联欢会，彭湃在大会上演说称："农兵必定要联合，才能得到最后之胜利。"

△　孙中山命北京国民党执行部派周至、于树德、延瑞祺等分赴各省开展宣传，促成国民会议。

△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搜查上海大学，搜去各种书籍300余册。是日，会审公堂传讯代理校长邵力子到案，指控他出售《向导》周报，内含仇洋词句，犯刑律第一百二十七条，又不将主笔姓名刊明报端，犯刑律第八条。上海大学委托克威律师出庭辩护，指出会审公堂的控告"主体错误"，不能成立。但会审公堂仍蛮横判决"将抄获各书一并销毁，被告交1000元保，担保嗣后上海大学不得有共产计划及宣传共产学说"。

12月20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秘书长梁鸿志报告赴津与张作霖、卢永祥晤商经过，谓卢尚未确定南下日期，须俟苏省各将领明白表态后再酌带护卫队南下，一两日内分出部分护卫队先行开拔，对齐燮元讨伐令须待相当时期再发表。会议讨论最近所接文电：一、胡景翼来电保荐米振标帮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段谓俟米部开入关内后再定；二、孙传芳来电遵令裁撤闽浙巡阅使，段嘱复电嘉慰；三、张锡元来电请速饬新任察区都统张之江赴任，并谢本人治军不严之罪，段嘱照例电慰；四、海军司令杜锡珪因病电请辞职，议决照准。

△　齐燮元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孙传芳、宫邦铎、陈调元、白

宝山、吴恒瓒、朱熙、马玉仁均派代表列席，决定：一、徐州归陈调元部防守；二、海州归白宝山部防守；三、吴恒瓒部调驻南京，听候指挥；四、宫邦铎部抽调12营移驻苏、常；五、由孙传芳监督张允明之行动；六、朱熙部驻守省城各要塞并巡游各处；七、马玉仁部充后备队。但宫邦铎、白宝山、马玉仁等均不愿为齐作战，请病假推避，除驻沪第二师之一部约千余人调宁外，其余均未动。

△　清室善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点查清宫物件规则18条，决定23日起点查清宫物件。22日，清室向段祺瑞呈诉，谓摄政内阁欺侮清室，欲将宫中所藏古物归作民国所有，请设法援助；并请日使芳泽向段说项。段遂令内务部、警卫司令部查止。李石曾召集会议，反对段祺瑞违反民意之命令。24日起开封点查。

△　广州举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及预备会，反对段祺瑞之善后会议。会后大游行，参加者达10万人。21日，上海、天津、杭州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分别成立，向警予、邓颖超被推为上海、天津促成会主席。

12月21日　　卢永祥代表杜纯南下与韩国钧接洽，希冀和平收拾苏局。是晚，杜等自蚌埠抵南京，代卢转达决不挟私忿重祸苏人之意旨。22日，卢接杜报告，称南京态度强硬，决暂中止南下。

△　熊克武川军与林支宇、唐荣阳部冲突。经孙中山代表覃振等调解，决定将唐部缩编为两个混成旅，归林支宇统辖，以唐振铎、汤直衷为旅长，免唐荣阳军长职。是日，熊克武在常德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北伐；林支宇部改组，林改任赣鄂宣抚使，与川军一致北伐。

△　徐世昌因其亲信前总统府秘书长吴汲孙在津被奉军逮捕，是日潜离天津。

△　上海总商会发三电：一电韩国钧请制止苏省军官勿再听齐燮元命令；二电第十九师师长宫邦铎请专保障上海治安，其他行动一概

谢绝参加；三电齐燮元即日离宁，以消弭战祸。

△　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发三通电：一致齐燮元，请即日离宁，以纾兵祸；二致段祺瑞，谓齐宜速去，卢勿再来，庶两方消释前嫌；三致卢永祥，请移宣抚地点，庶东南问题较易解决。

12月22日　　北伐军宋鹤庚占领吉安，继占峡江。谭延闿下令将韶关北伐总司令部移设南雄。次日谭率豫军千余赴赣州。

△　胡汉民在大本营召集军事扩大会议，商讨对付陈炯明蠢动之策，决定推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以展开东征行动。24日又与廖仲恺、加伦将军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杨希闵为委员，加伦将军为顾问，策划指导东征事宜。

△　湖北驻京代表胡龙骧电萧耀南，谓：胡景翼、孙岳军队集中郑州，米振标亦率两旅入豫，将借搜吴佩孚为名侵鄂，段祺瑞表示无力干涉，应请鄂省自行解决。同日，萧耀南宴请孙中山代表郭泰祺、刘成禺，请分向胡、孙斡旋，鄂、豫各以保境为重，制止入鄂。

△　段祺瑞令准陆军总长吴光新呈请将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金标免职，任命宋玉珍继任。

△　旅沪浙人驱孙（传芳）运动会开代表会议，到30余人，决定以驱孙同盟会名义再电段祺瑞，请罢免孙。次日，又致电赴京代表顾子才、徐建侯等，望努力进行，无论如何困难，总宜达到驱孙目的而后已。

12月23日　　唐继尧、袁祖铭达成滇、黔和议，议定在滇黔军悉数回滇，在川之黔军由第二师师长彭汉章以清乡司令名义统率回黔。

△　吴光新、张宗昌至济南与郑士琦接洽奉军假道南下，晚开济南会议，江苏第四师师长、徐海镇守使陈调元亦至。陈谓：齐燮元集

重兵于南京，购得大批枪弹，决意阻奉军南下；齐与鄂萧、浙孙间有联络。陈与吴、张商议奉军驻兵地点，微有异议。次日，陈与吴、张同至天津，取决于张作霖。

△　孙中山电樊钟秀，慰勉其由粤转战抵豫，谓已电胡景翼量力接济；嘱其率部赴鸡公山歼吴佩孚。

△　鄂省议会以报载川、粤各军有会师武汉之说，豫军樊钟秀部有南下图鄂之意，是日电段祺瑞请求制止。同日，鄂省商联会、武汉两商会电段祺瑞，请制止胡景翼军入鄂，否则鄂人罢市罢税，誓死抗拒。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复照七国公使，声明继续尊重前政府与各国所订之一切条约。

12月24日　　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条例》规定善后会议以下列各员组织之：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

△　驻苏州第二师各军官议决不服从齐燮元之调遣，决不开拔赴宁，推炮兵营长秦洸为驻苏州军队临时总指挥，对该师进行改组，由全体军官彭启鹏等署名通电服从北京中央，维持苏州地方治安。同日，孙传芳、萧耀南通电劝齐下野。

△　晚，南京军署接驻苏州第二师第三旅全体军官来电，拒绝旅长陈孝思回任。齐燮元当即开军事会议，到朱熙、吴恒瓒、刘玉珂、陈孝思、王飞、王桂林等20余人，咸以此时兵士既不用命，乃大难事，拟请朱熙去苏疏解。齐以苏州驻军独立，后路断绝，且知陈调元与张作霖暗通声气，乃表示退离。25日，齐电韩国钧请维持城中治安，筹发本月军饷，并告今夜即走，以免外间惊疑。

△　陈乐山通电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第四师军官皆陈旧部，不愿为孙传芳所委之夏兆麟所用，一致拥陈就职。

△　冯玉祥四上辞呈，请开去西北边防督办及第十一师师长各职，并请明令废除陆军检阅使，第十一师师长暂委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暂行代理。

△　四川刘成勋部第三军与川边镇守使又起冲突，是日段祺瑞令任刘为川边督办。

△　建国闽军总司令方声涛、总指挥张贞拟由闽入赣助北伐。是日夜，所部第二师师长陈国辉会同杨学良、叶定国部攻浦南（漳州北），周荫人军第一师张毅部不支，于26日败退天宝（浦南之西南）。27日，陈国辉部过天宝猛攻漳州，被张毅击退。30日，张贞令叶定国、杨学良、陈国辉分左中右三路再攻漳州。时赣南北伐军处于被林虎、方本仁前后夹攻之势，建国闽军由闽入赣计未能实现。

12月25日　　方本仁通电向北伐军下总攻击令，即日以邓如琢部从正面进攻，置精锐于峡江、新淦、临江三县。北伐军左中右三路与邓部在吉水附近激战数小时，邓佯败退至峡江，左右两路连夺10余山头；中路前队张辉瓒师不知敌计，贸然深入，邓复退新淦；迨其进薄临江时，忽受方军四面包围，遂向峡江、吉安方面突围。次日，方本仁军进入吉安，蒋镇臣、邓如琢两部兼程追袭，北伐军退守泰和苍岭一带。时林虎部已分向寻邬、翁源出动至塘江；赵恒惕令夏斗寅部自修水附近进至万载；萧耀南又助方军子弹。北伐军腹背受敌，饷弹缺乏，陷入困境。

△　孙传芳召开军事会议，以陈乐山复职为卢永祥进逼浙江之先声，决定以卢香亭为司令，集中军队于嘉兴，谋攻陈部。26日，陈乐山部自嘉善退至枫泾一带，让出浙境以示不争。27日，孙传芳等一面通电严行拿办陈乐山，一面即令卢香亭部进攻枫泾。陈军由枫泾退至

石湖荡，严守三十八号桥。松嘉战事乃起。

△　广州掀起非基督教运动，在广东大学开会，请周恩来、廖仲恺等讲演，听众约3000人。同日，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召开反基督教大会，到300余人，主席唐公宪报告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之工具，本同盟自8月成立后，各处响应者甚多，已有杭州、温州、宁波、河南、安徽、湖南、苏州、山东、广东及本埠法政大学、南方大学等十多个支部成立，有会员5000余人，东京亦有中华侨日非基督同盟。

△　段祺瑞特派许世英筹备善后会议事宜。

△　唐继尧派代表黄天石去湘，与赵恒惕商讨联省自治之具体办法。

△　驻京日使馆转交日外务省致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希望中日两国交换大使；并拟现任驻华公使芳泽升为大使，征求同意。

12月26日　中国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

△　国会非常会议在参议院举行，反对段祺瑞废止约法，通过《约法护宪宣言书》。

△　李景林以直隶督办名义要求孙岳之国民军退出保定。孙岳调河南所部回保定以事抵制；同时国民军要求段祺瑞任孙岳为直隶省长。

△　齐燮元通电离宁。次晨3时登轮离宁赴沪，刘玉珂、吴恒瓒等随行。

△　奉军假道山东南下。先锋队第十九梯队第二营长俄人卜克司率炮兵60名先经济南南下；中午奉军第三旅旅长褚玉璞率部过济南南下，徐州镇守使陈调元随行。27日，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率兵10列

车过济赴徐，28日又有10列车南下，到徐兵力约在二万以上。驻徐陈调元部让防。

△　察哈尔都统张之江诱杀张家口变兵300余名，内有团、营长军官多人。

△　广州军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建议联军总司令杨希闵向各军索取东征战斗准备的报告和制定东征计划。会议规定广州总预备队为5000至6000的兵力，并建立一支特舰队，以备迎击陈炯明叛军来犯。

12月27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同意明年中日两国互派大使，即日由段祺瑞命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京公使芳泽转知日本政府。

△　段祺瑞致电孙中山，促驾入京。谓："现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

△　吴佩孚、李济臣率卫队500人由鸡公山南下，将双河及柳林站铁轨拆卸两段，以阻胡景翼军追击。吴原拟乘车至汉，因广水至杨家寨间的路轨被萧耀南下令拆毁，被阻于广水，遂下车住寇英杰师司令部。赶至广水接待吴之西南代表刘泗英转赶武昌与萧商洽，萧提出三条件：一、请吴勿驻岳州，改赴黄州（黄冈）；二、吴之卫队以两营为限；三、所乘"决川号"和"浚蜀号"两舰上之武装，以交通和自卫为限。吴接受三条件，继续入鄂，于翌年元旦抵汉口。

△　陈炯明在汕头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命令各部分赴前方。

△　全皖18公团在安庆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28日，山西、宜兴、宁波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29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提议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31日，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

12月28日　　段祺瑞在官邸会议松嘉战事，决由秘书厅电孙传

芳。29日，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电孙即停止军事行动。略谓：第四师易长本系出于曹锟任内之伪命，此次政局粗定，仍令陈乐山前往接充，并非假借名义，不得以镇抚为词，轻开战衅。

△　孙中山自天津复电段祺瑞，告早拟入京，只因肝病缠身，“尤虞冒寒，是以不果。国事未定，固惓惓于心，而病状如此，只能暂屏万虑，从事疗养。容俟告痊，再图承教。”

△　奉军先遣部队褚玉璞第三旅进抵浦口。

△　杨希闵召开军事会议，许崇智、刘震寰、范石生等20余人出席，杨谓陈炯明就职犯粤，军事急变，应商办法。决定：一、东江、北江、南路一律戒备；二、赶制子弹；三、请胡汉民等即筹巨款。

△　孙传芳、夏超、陈仪、卢香亭通电，略称：陈乐山假借命令，威逼第四师师长夏兆麟攻浙，自称师长，传芳等即酌派队伍前往镇抚，藉遏乱萌。同日，孙又通电称：“据卢香亭二十七日电告，已于该日下午一时在枫泾西方遇敌，激战三小时，我军第一路谢总指挥鸿勋率队猛力进攻，敌军退往松江方面，敌被毙数十名，伤百余名，渡桥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获械弹无数，于六时占领枫泾。”

△　卢永祥致电韩国钧及苏省各师、旅、团长，称：“今岁淞沪战役，发纵指使负责者自有其人，即抚帅（齐燮元）亦在被动之列，诸君守服从之天责，更无连带关系可言”；“永祥奉令南下，专为宣布中央德意，既无畛域之见，尤不存恩怨之心”，尚望祛此疑虑，推诚相与，共济时艰。

12月29日　孙中山电告段祺瑞，“定于31日入京。惟养病期内仍当暂屏一切，以期速愈。”

△　孙中山免陈兴汉管理粤汉铁路事务职，派林直勉继任。

△　萧耀南闻熊克武所率川军，谭延闿所率北伐军、樊钟秀之豫

军及胡景翼之陕军谋会师武汉，形势紧急，于是日通电保境安民，声称如有人犯及鄂疆，决率师周旋。

△　孙传芳军分兵沿黄浦江由佘来庙攻浦南，袭松江后路，是晚至次日，金山、洙泾、佘来庙、叶榭等处战事甚烈，陈乐山军力御，孙军未逞。30日，张允明以战事迫近松江，派其暂编第一师一混成团开赴莘庄、新桥，防守淞沪门户。陈军西路阵线未动，仍扼守石湖荡三十八号桥。

12月30日　段祺瑞通电宣布于明年2月1日前在北京召集善后会议。

△　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以齐燮元业经免职，电令宫邦铎接充第六师师长职，所遗第十九师师长以何丰林继任。

△　广州军事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东征之三路进兵计划：一、左翼军（北路）经过河源沿东江方向攻击，由粤军许崇智部一万人组成；二、右翼军（南路）沿海岸进击，由滇军杨希闵部1.5万至1.8万人组成；三、中路经惠州向河婆攻击，由桂军刘震寰部约6000人组成。

△　北京临时政府军务厅两电湖北军务署，先谓：吴佩孚、李济臣入鄂境，应令只身他去，不得再拥有兵权，退至武胜关之卫队应一律解除武装；又谓：“奉执政谕，以吴既入鄂，勿任其入湘，致生他虑。”段祺瑞并另派张学颜至鄂传面谕，严阻吴佩孚前往岳阳，劝其克日来京，当另有任命。

12月31日　孙中山自天津扶病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数万人热烈欢迎。孙在北京车站发表书面谈话，下榻北京饭店后又发表《入京宣言》，略谓：“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

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

△ 唐继尧通电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

△ 段祺瑞令免侨务局总裁毕维垣职，由王芝祥继任；又任薛笃弼为京兆尹。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专门学校暂设预科办法。

△ 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京汉路局向华比银行借款1.2万镑，年息一分二，以正太及道清两路联运余款作担保，用以开支员工薪金及其他费用。

△ 广东省议会通电，反对广州当局以粤汉铁路向外商押借巨债。

12月下旬　　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电段祺瑞，要求释放在汉被逮捕、关押在洛阳、汉口监狱之工人刘芬、许伯豪、陈式模、杨德甫、罗海月、周天光、黄子章等人。

是月　冯玉祥设航空司令部于北京，委王乃模为司令、邓建中为副司令，共有飞机六架。

是年　　年初，日本政府批准《加速修筑满蒙铁路方案》，并指派“满铁”理事松冈赴奉天与张作霖举行会谈。松冈提出由日本借款修筑吉林至敦化、洮南至昂昂溪、长春至大赉、开原至朝阳镇四条铁路。张为获得日本军费军械援助，答应日方要求，并指定王永江为代表与日本谈判。后因日本阻挠奉天自办铁路计划，交涉遂停。

△ 张作霖自国外购到各种类型新式飞机120余架，成立飞虎、飞鹰、飞豹、飞龙四个大队，任张学良兼东北空军总司令。

△ 北新书局在北京开办，光华书局在上海开办。

△ 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建立东方图书馆，又开办国语师范学校，并开始出版《中国年鉴》。

△ 瑞隆新记钱庄总庄在汉口设立，董事长周维之，总经理周纯之。

△ 信通钱庄总庄在重庆设立，董事长马绍周，总经理卢仲良。

△ 劝业公司（碾米业）在奉天开设，资金2000万元。

△ 裕庆毛织厂在哈尔滨设立，资金200万元。

△ 民丰面粉公司在天津开设，资金100万元。

△ 满洲纺绩株式会社在辽阳设立，资金250万元。

△ 泰安纺绩株式会社在汉口硚口设立，资金500万元。

△ 东济三榨油厂在哈尔滨八站开设，资金50万元。

△ 华成烟公司在上海狄司威路（今溧阳路）开设，资金120万元。

△ 晋省电灯公司在太原分设面粉厂，资金65万元。

△ 安裕火磨公司在哈尔滨设立，资金70万元。

△ 金华兄弟火柴工厂在吉林开设，资金20万元。

△ 中国酿酒公司在上海开设，制造烧酒，资金20万元。

△ 华北第一毛织公司在大同设立，资金10万元。

△ 英国托拉斯利华兄弟肥皂公司在上海杨树浦建立，年产肥皂百万箱左右，垄断中国肥皂市场。

△　冬，李大钊从苏联经哈尔滨回到北京。年底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北京翠花胡同成立，李大钊负总责，嗣后和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等领导整个北方党的工作，包括东北三省、陕西北部、直隶、山西、内蒙等地区，以《政治生活》为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由赵世炎任主编。北京大学红楼设有中共北方区委接头机关和《政治生活》发行处。

△　据驻外领事报告，截至本年底止，海外华侨总数为763.4万人。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四卷
(1925—1927)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

第四卷
(1925—1927)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25年（民国十四年）
1926年（民国十五年）
1927年（民国十六年）
返回总目录

1925年（民国十四年）

1月

1月1日　　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大赦令”，规定除曹锟与贿选议员两案，以及强盗、匪徒、强奸、放火、决水等案情节较重者外，其余不论轻罪重罪，已判决未判决，悉予赦免。

△　段祺瑞令废除将军府；派米振标帮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

△　段祺瑞电邀孙中山、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并电邀唐绍仪、章太炎、岑春煊、王士珍、汪精卫、黄郛、熊希龄、赵尔巽、胡适、李根源、汤漪、林长民、梁启超、虞洽卿、梁士诒等30人，列席善后会议。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乃实行本党政策之第一步，与以党建国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国民会议，任何污蔑、威胁，皆不暇顾，愿同志及国民矢诚拥护。”

△　段祺瑞派其子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为代表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表示慰问并恭贺新年。孙中山与段、梁作简单交谈，谓自己身体未愈，俟再过些时间才能与段晤谈，解决时局问题。段、梁辞出后，孙中山即派汪精卫往谢段祺瑞问候之意，并恭贺新年。段派侍从武官接待。

△　安徽各群众团体开会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宁波（2日）、北京（4日）、济南（5日）、南京（6日）、山东（7日）、福建（11日）、青岛（17日）等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亦相继宣告成立。

△　广州学界三万人举行提灯大会预祝国民会议成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大会制定旗帜、标语，其中有“解放中华民族！”“全民自觉打倒帝国主义！”“全民自觉打倒军阀！”“拥护国民党主张之国民会议！”“反对分赃式的善后会议！”“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实现和平统一！”等十余种。同日，上海、济南、梧州等地亦分别举行集会游行和讲演，宣传国民会议。

△　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率奉军南下，抵济南，郑士琦、龚积柄等率军政人员赴车站欢迎。

△　驻宁军队官兵通电反对奉军南下。次日，江苏省长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韩国钧召集驻宁军警长官开军事会议，议决省垣内外军队一律调开，让奉军入城。6日，驻宁第二、六两师及补充旅奉令分别开拔离省，分驻镇江、常州、江阴等地。

△　孙传芳所部第二师与驻松江陆军第四师陈乐山军队在石湖荡、李塔江等地激战。

△　吴佩孚率残部自鸡公山到汉口。鄂督萧耀南派军解除吴之武装，并派员护送吴赴鄂城西山“休养”。吴到汉后，驻汉法领事曾往晤。段祺瑞电萧耀南，令吴安心休养，俟政局大定，即予重要位置。武汉商会、教育会等开紧急会议，吁请萧耀南三日之内送吴出境，否则罢工、罢市。5日，吴乘军舰抵西山。萧于是日将吴来鄂情形电告段祺瑞。

△　驻鄂西之北军王汝勤所部第八师第十六旅第三十二团在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策动下，该团长与前第十六旅旅长密谋倒王，是日在秭归宣布独立，改所部为鄂军，旋即被王派兵镇压平息。驻宜都黔军

张膺方旅因参与倒王，被王派兵勒令缴械，给资遣散。

△　非基督教同盟杭州支部致电长沙雅礼大学罢课退学同学表示声援，指出："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不发达，任意在中国广设学校，强迫信教，禁止爱国，种种压迫已达极点。诸同志奋起反抗，为民族争自由，为青年求解放，希奋斗到底，敝会愿为后盾。"

△　四川数十法团于成都集会，成立四川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1月2日　　孙传芳所部第二师占领松江，陈乐山败逃上海，第四师分路退却。松江战事结束。

△　卢永祥派参谋长陈启祥先行到宁晤韩国钧，声明奉军决不驻苏。3日，卢又派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抵宁接洽。

△　驻京各国公使访晤段祺瑞，询问善后会议及国民会议召集日期，希望正式政府早日成立，以便"从旁援助"。

△　萧耀南撤回驻岳州之第二十五师军队，以岳还湘。是日，赵恒惕派南华镇守使邹序彬为岳阳镇守使，率队前往接防。湘北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　豫、晋、秦、陇四省协会在西安开成立大会。该会简章规定："以促进四省文化、实业、交通及其他各种公益事业为宗旨。"按：该会曾于清末由四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后因故中辍。今以国内多故，决定恢复。

1月3日　　广西建国军总司令沈鸿英抵平乐，决以四师兵力分三路东下攻梧州。广西绥靖督办李宗仁、会办黄绍竑，联合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第三师郑润琦部组成粤桂联军，调兵赴梧，堵截沈军东下。

1月4日　　段祺瑞为冯玉祥请裁陆军检阅使及开去本兼各职事，

令准裁检阅使，仍着督办西北边防事宜，即日销假任事。是日，并指令准陆军第十一师师长由宋哲元暂行代理。

△　段祺瑞派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李鸣钟署绥远都统。

△　段祺瑞特派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

△　奉军第一军军长张宗昌率队抵蚌埠。奉军原编定三军随卢永祥南下苏、皖，现齐燮元既去，故南下者仅张之第一军，有步兵五旅两梯团，骑兵一团，工兵二团，辎重一团。4日，张作霖以奉军南下情形电告段祺瑞，并称："苏局底定，指日可待。"6日，奉军抵宁。

△　汪精卫电告广州大本营，孙中山虽入京，但决不出席善后会议。

△　上海总商会致电孙传芳，谓陈乐山第四师已由第五混成旅收容，"无再派兵来沪之必要"，"请俯顺舆情，停止进行"。越二日，孙复电称，"决不派遣军队向前再进"。同日，孙派所部第二师自松江进驻闵行。

△　暂署江西督办方本仁所部赣军占赣州。北伐湘军向湘、粤边境撤退。

△　广西龙州镇守使韩采凤收集滇、黔溃军3000人投沈鸿英，由古宣攻庆远。是日庆远宣抚使通电告急。

1月5日　　孙传芳致电段祺瑞质问奉军因何南下，并电冯玉祥等，请向张作霖呼吁："先止南下之兵，一切留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解决。"

△　旅京苏人庄蕴宽等20余人具书向段祺瑞请愿，力阻奉军到宁，要求苏人治苏；并致电苏省各公团请一致主张，务将苏省军民两政完全交诸苏人。

△　是日章太炎，8日黎元洪，9日唐绍仪，分别电复段祺瑞，表示不参加善后会议。

△　唐继尧电令驻黔滇军克日开拔，直趋武汉，“所有黔省内政，概由黔人自理”。2月8日，鄂督萧耀南为此发出通电，声明：“果有野心家侵及鄂疆，吾鄂为自卫计，为大局计，不得不执鞭弭以与周旋。”

△　依附陈炯明之广东省议会议长钟声与议员78人在汕头通电粤军将领，促助陈攻省。

△　班禅额尔德尼晋京，是日抵太原。

1月6日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外交次长沈瑞麟报告，北京外交团以浙、沪迭次发生战事，影响外人商业，希望中国政府速将兵工厂及护军使衙门移往他处。议决由沈瑞麟向使团口头答复，政府对此一“善意”建议表示容纳，一俟时局平定，决当办理。

△　苏皖宣抚使卢永祥致电江苏军界各长官，宣称“奉令南下，专为宣布中央德意”，要求各长官“推诚相与，共济时艰”。

△孙岳所部军队占据直隶保定、大名两属，要求长直，为在直之奉军李景林所拒。段祺瑞拟任孙为直鲁豫浚河督办，是日，孙赴京见段，以部下四万余难安顿为由，不受浚河督办。

△　唐继尧所部军长龙云率部万余人由阿迷（今开远）出发，向南宁进发。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通电指责唐“命将远出，陈师桂边，名曰北伐，实行兼并”。

△　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在广州可园召沈鸿英代表钱秀斋、杨贞、邓士瞻、陈墨西及所部高级将领韦冠英、严兆丰等商讨桂省局势。

△　湘军四师长贺耀组、刘铡　、叶开鑫、唐生智及岳阳镇守使邹

序彬等联电北京临时政府，表示拥护湘省宪法。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免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职，以胡敦复继任。

1月7日　段祺瑞特任张作霖督办东北边防屯垦事宜。

△　段祺瑞令准免皖北镇守使兼安徽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苏皖鲁豫四省剿匪副司令史俊玉本兼各职，任高世读为皖北镇守使，李传业为安徽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兼苏皖鲁豫四省剿匪副司令，华鑄 章为安徽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　段祺瑞电复孙传芳，说明齐燮元在沪“尚有密谋”，卢永祥出于自卫，不得不酌带奉军南下，并无攻浙之意。

△　上海商界联合会以齐燮元下野来沪，又有暗中运动军队再图夺地盘之谋，特致函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要求设法劝齐离沪，以维治安，而安商业。

△　泗泾、七宝、虹桥各镇士绅杨心正等致函卢永祥、韩国钧沥陈四师溃兵糜烂地方情形。略谓“此次孙陈之战，陈失守松江，退至泗泾、七宝、虹桥各镇，将领失踪，士卒溃散，自本月二日起，沿途焚掠，挨户搜抄，人民雪夜逃亡，哭声震野，至今已历一星期，集中市镇，散布乡村，约有万余之多，其被灾区域跨松江、上海、青浦三县，辖境达五千方里，所过成墟，较前次战线内之南翔、安定、黄渡等处受害尤烈”，要求速派员收编溃兵，抚辑难民。

△　“救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分兵三路会同林虎、洪兆麟及江西方本仁部进兵广州，是日下达总动员令，着驻潮汕之洪兆麟军队克日出发，集惠州待命。

△　江西省81县代表赴京，要求段祺瑞任李烈钧为省长，收束军务，又至陆军部请阻止方本仁军事行动。

1月8日　全浙公会致电段祺瑞，揭露孙传芳联合齐燮元“占松窥沪”，请明令罢免，饬其率队离浙。

△　段祺瑞令准免筹办胶济铁路赎路事宜谷钟秀本职。

△　方梦超为金法郎案向京师地方检审厅告发颜惠庆、董康、王克敏，略谓：1921年政府派外交总长颜惠庆等三人为专员签订中法协定，颜等勾通法国，串通舞弊，要求中国政府将1905年换文规定用电汇票交付之庚子赔款余款5000余万元，改用金法郎支付，致损国库达8000余万银元之巨，酿成金法郎交涉案，要求即日拘捕颜、董、王等到案，依法治罪。

△　东南大学全体学生发表宣言，反对国务会议罢免校长郭秉文。2月9日，校董会议决请郭出洋考察教育，校务由临时委员会维持。

1月9日　“中华民国国民会议湖南后援会”致电段祺瑞，反对《善后会议条例》，要求立即“撤废该条例，任人民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而以政权交还人民，由国民会议预备会暂行掌握政治大权”。

△　孙传芳、齐燮元分别于是日及次日在杭、沪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组织江浙联军总司令部，以齐为第一路总司令，孙为第二路总司令，联合出兵驱逐张允明，拒奉军南下。

1月10日　段祺瑞令湖北督军一缺着即裁撤，特任萧耀南督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暂行兼署湖北省长。

△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电卢永祥克日到宁，措置善后，并分电陈调元、张允明、何丰林、宫邦铎各将领，请其助卢“促沪和平”。

△　卢永祥抵南京。是日，卢之随员答记者问奉军南下原因，

谓："此事在京时，几经磋商，在段执政方面，主张和平，在张氏（作霖）方面，主张用兵。令韩省长兼督办，与段执政之宗旨相符，令卢使带兵，与张氏之主张适合，双方兼顾，乃系折衷办法。"

△　驻上海宫邦铎所部军官受齐燮元运动，拒受宫命，并逼令宫去职。是日，宫致电段祺瑞、卢永祥等，辞去松沪镇守使、陆军第六师师长及江苏陆军第十九师师长职。

△　段祺瑞接见前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表示对西南意见"愿善意容纳"；长江方面，萧耀南对中央"极力表示服从"，并对吴佩孚亦"措置得当"。又谓对北方党派，"取调停办法，无论他方如何挑剔，决不为所惑"。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在国务会议上报告，阴历年关各项开支至少需1200万元，财政部张罗借款无着。段祺瑞通电关系省份，务于年内酌解款项，后仅山西汇来30万元。

△　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致电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响应上海倡议，主速由各省区国民会议促成会选派代表在北京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总会。九江、保定、徐州、南京、北京等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均通电表示赞同。

△　沈鸿英部前锋已抵马江，是日沈鸿英致电李宗仁、李济深，谓："东下讨伐目标在黄绍竑，余皆袍泽，断不侵犯，前线请撤二十里，免致误会。"

△　驻赣东之蔡成勋旧部江西暂编第三旅旅长张庆昶，自称"西南北伐军总司令"，由乐平进占进贤，向南昌进攻。是日，在武阳渡（距南昌40里）与方本仁部接战，旋即退走。方闻报率部自樟树回省镇压，11日抵南昌。

1月11日　凌晨，齐燮元联合孙传芳军队对上海张允明部驻军发

起攻击，双方在徐家汇、龙华、闵行等地激战至正午，张军不支退却，张允明逃入租界。孙、齐组成浙沪联军，联衔宣布占领上海，拒奉军南下。

△　孙传芳、齐燮元派联军水陆两路进攻苏州。13日，苏常镇守使秦洸由地方士绅出面以筹饷五万元为条件，允让出苏城。至此，上海苏军与集中镇江之齐氏旧部联成一气。

△　韩国钧致电段祺瑞，以“卢永祥已抵省垣，军政主持有人”，请辞本兼各职。

△　卢永祥由浦口致电段祺瑞，谓齐燮元与孙传芳联合，由某某二强国资本家援助，宣言攻南京，请与张作霖协议调奉军第八旅向沪出动。同日，上海交涉员陈世光致电外交部，报告某国警察署对齐援助，而齐之幕中有某国人数名，段旋着外交部调查外人资助联军军费真相，俾向使团提出抗议。

△　上海总商会致电段祺瑞，要求弭战。并声明：“无论何方，凡有军事饷糈等项，无为再为代筹。”

△　张作霖离津回奉。行前，请梁鸿志转达段祺瑞“对国事放胆进行，遇有为难，奉当随时协助”。

△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出通电，揭露善后会议对于中国前途之危害。指出：“段欲扩张己派之势力，遂假借善后会议之名，联络各派小军阀，以谋组成一己派势力之新结合”，“必将酿成与他派军阀攘夺势力之战争，而又予帝国主义者以侵略中国之机会”。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反抗。

△　川军第十师师长刘脊藩（斌）移兵驻梓潼，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杨森即令所部从三台驰梓潼填防，为刘所拒。杨又调刘任西川道尹，亦为刘所拒。

△　是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党员950人。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为了加强领导，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以及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决议案。

1月12日　段祺瑞接曾毓隽自上海电告上海事变后，于是晚召开紧急会议商平定沪事方案，除电卢永祥速平沪乱外，又电安徽省长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王揖唐，嘱助卢处理东南大局，并令何丰林收编溃散之第四师军队。

△　陈乐山通电陈述松嘉战事经过，宣布辞第四师师长职，并委所部第七旅旅长方先聪以代。同日，第二师第三旅旅长、浙军前敌总司令谢鸿勋亦发出布告，称奉孙传芳委任代理第四师师长，收抚该师残部。

△　驻沪英、美、德、日、意各国领事以奉军南下，沪局骤变，分电本国政府，要求速调军舰来沪及长江各要口。是日至31日，计有外舰27艘驶抵上海及长江一带。

△　“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为配合北伐军攻赣，进图湘南，为湘南督办唐生智部击败，退出汝城。

1月13日　段祺瑞召集特别紧急会议，讨论苏、沪问题，发表四令：一、奖励孙传芳撤兵回浙；二、派陈调元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三、任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四、任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

△　孙传芳、齐燮元以张宗昌率兵抵浦口，联衔通电反对。

△　上海五马路商界联合会致电段祺瑞，呼吁和平。略谓：“上海一隅，有苏、浙、闽、鄂四省大军压境，沪宁、沪杭两路断绝交通，

华界居民，流离迁徙，城内市面，寂若荒村，兵士公然抢劫，视人命如儿戏……事危时迫，务乞迅予设法制止，责孙、齐从速罢兵，令各军离开淞沪，并即调回奉军，免延战祸。”

△　冯玉祥离京赴张家口巡视。

△　福建省议会公布省制宪法。执政府秘书厅旋即去电，告以国宪问题尚未解决，省宪应暂缓办。20日，湖南省议会以“缓办”之说，实与段祺瑞入都之马（21日）电大相刺谬，致电各省议会促速制省宪。

△　湖南学生会致电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请明令取消教会学校。略谓：教会学校以“办学”、“传教”等方式，“实行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实为洋奴养成所”，“毕业学生除充当洋奴买办外，别无他种技能”，“为教育前途、国家存亡计，望明令取缔一切教会学校”。次日，该会又电请各方一致进行。

1月14日　卢永祥为应付上海事变，连日召集张宗昌、臧致平、郑俊彦等开紧急军事会议，决以奉军第一军及郑部第十师组织“宣抚军”，任张宗昌为总司令，臧致平为参谋长。

△　北京外交团以北京临时政府要求各国驻沪领事驱逐齐燮元及其党徒在租界活动，并屏绝勿与往来一事，复照外交部，略谓：领事团“为保安宁计”，对于在租界附近握有实力之军事长官，不能不有往有来或接洽。

1月15日　段祺瑞发布处置上海事变三项决定：一、裁撤松沪护军使；二、停办兵工厂，移交上海总商会，改名商业制造厂，着陆军部派员到沪会同总商会办理接收事宜；三、上海永远不得驻扎军队及设置军事机关。

△　孙传芳、齐燮元迫于形势，联名通电宣布撤退上海地域内所

有两省之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等名目，且反对以后再设置此类军职，兵工厂亦即日择地迁徙。

△　段祺瑞特派孙岳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

△　广州大本营决定将所辖许崇智之建国粤军、杨希闵之建国滇军、刘震寰之建国桂军及谭延闿之建国湘军等部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是日，杨以联军总司令名义颁布动员东征命令。

△　湖南省长赵恒惕电复陈炯明所部第三军军长尹骥，谓："承示攻广州计划，同仇敌忾"，谭延闿、程潜所部入湘军队业已击败，"自当乘机进攻，与贵军遥相策应，以收夹攻之效"。

△　北京绅商联合会等53团体通电拥护善后会议，宣称"非先开善后会议，国民代表会议决无由实现"，并谓段记"国民代表会议"，与孙中山所主张之国民会议，"根本完全相同"，要求各省长官"速派代表莅会"。

△　广东省议会议长钟声及议员78人自汕头致电段祺瑞及各省议会，要求各省议会加入善后会议，并希各省"一致主张"。

△　山东曹县公民孔宪杰等16人为供给浩繁，不堪负担，上书段祺瑞，略谓："国民军成立，骤行增兵万余，所有新旧军饷，均供自民间，即曹县一处，两月之间，已摊至四万余元"，且随加随征，层层递剥，"壮士之腹未饱，而小民之膏已竭，茕茕下邑，何堪负此？"请速发明令，迅行解决曹县军事，"以释负担，而苏民命"。

1月16日　　段祺瑞令："此次苏、浙军队发生冲突，闻齐燮元有从中煽惑情事"，"除应派员查办外，嗣后各该省军事长官务各严饬所部恪守疆界，不得轻信谣诼，致启衅端，如再有前项情事，定惟各该长官是问。"

△　段祺瑞令准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韩国钧请辞兼职，特

任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任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兼任帮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

△　段祺瑞令裁撤山东、浙江、福建督理员缺；特任郑士琦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派卢金山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1月17日　　段祺瑞特任李景林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裁撤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督军各缺，特任阎锡山督办山西军务善后事宜，刘镇华督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陆洪涛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杨增新兼督办新疆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

△　孙中山复段祺瑞东（1日）电，反对包办善后会议。指出："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会议之外，当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要求善后会议作以下的改变：第一，"容纳人民团体代表，如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第二，"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声明：如段氏"改弦更张"，"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则"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

△　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奉段命南下查办齐燮元，并与卢永祥协同处置上海事变。

△　晨5时，卢永祥下进攻令，卢、齐两军在镇江一带正式开火。正午奉军攻克镇江车站，3时克复镇江，齐军节节败退。18日，奉军占领丹阳。19日凌晨抵横林。齐亲率各部赴无锡布防。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日苏协定即将签字，分别照会该两国驻京公使，声明："如该约所订各款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及权利利益之处，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　法国新任驻华公使玛太尔到京。

1月18日　　段祺瑞据外交部呈请，公布《中国玻利维亚通好条约》。

△　段祺瑞派憨玉琨为豫陕甘剿匪副司令。

△　上海租界当局所收容之张允明、陈乐山溃兵1.23万余人，由总商会筹款雇外轮运往青岛遣散。是日，首批5000余人离沪，租界当局派英、印军队60人随轮监护。

1月19日　段祺瑞任李爽垲为天津镇守使；裁撤“行政研究会”。

1月20日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讨论江苏问题，决定容纳上海各法团电陈之善后办法，以上海作为商埠，派员督办其事，责成孙传芳与上海总商会妥商办理龙华兵工厂改建工厂事宜。

△　段祺瑞令褫夺齐燮元官勋，缉拿解京讯办，所有私产概行抄没。

△　孙传芳撤回开赴无锡、苏州助齐之军队，孙部师长卢香亭发出布告，班师回防。按：此次孙、齐合作，本为开拓地盘，孙原拟驱张后掌握沪埠，另以兵为助齐进展，不意齐先行下手，尽委其部属分据各机关，孙大为不满，乃借口免“中央之挞伐”，停止出兵助齐，故有此举。

1月21日　段祺瑞任冯绍闵为江西陆军第三师师长。

△　天津外商所设之“总商业会议所”开临时总会，英、日、美、法各国商业会所代表均出席，议决请领事团警告中国政府，严重抗议军人扣车，并谓“于必要时，得用外兵为助”。23日，该项决议经天津首席领事交由外交团牒送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

1月22日　段祺瑞任命邓如琢为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鸿程为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　段祺瑞任命郑金声为暂编陆军第三师师长，何遂为暂编陆军第四师师长，徐永昌为暂编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庞炳勋为暂编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刘廷森为暂编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王允恭为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同日，并令：暂编陆军第四师、暂编陆军第一、二、三混成旅及第十五混成旅交陆军部直辖。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渐澎涨起来。全国各城市里面的群众现正努力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差不多都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揭露“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

△　卢永祥对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谓：“前日有美国牧师某斡旋与齐氏停战讲和……因是于二十一日派人赴沪，与齐氏会见，对于上海之将来，已决定照政府所发表，不驻军队。”

1月23日　胡景翼、憨玉琨两部军队在禹县开火。憨玉琨唆使禹县地方土匪、民团收缴胡景翼所部曹世英旅枪械，双方在县城开战数小时，曹军驻禹部队王祥生团败退许昌，旋由驻许之胡军前来应援，击溃土匪、民团，夺回禹城。胡之援军到后，在禹城纵兵烧杀，死者千数，损失达千万元以上。事后，胡景翼以曹、王纵兵扰民，将王祥生枪毙，并布告缉拿在逃之曹世英。

△　段祺瑞任命唐福山为江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蒋镇臣为江西陆军第二师师长。

△　川黔边防督办兼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所部抵贵阳，接收贵州政权，由卢焘任贵州省行政委员长，彭汉章为清乡总司令。滇军全部撤

退完毕。

△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代表四人至临时政府教育部陈述校长杨荫榆罪状，要求即日撤换。旋该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历数杨荫榆罪状九条，表示“誓将此摧残教育之徒，驱逐出校”。

1月24日　孙岳致电憨玉琨，请“严令前方停止作战行动，稍示退让，以留调解余地”。次日，憨玉琨电陕西军务督办刘镇华，报称禹县事件系胡景翼所部陕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曹世英与地方民团为收缴枪械所致。26日，刘镇华电执政府否认憨部参与禹县事变。

△　晨5时，奉军先锋队由横林方面进攻，齐军节节败退。26日，奉军攻克无锡，27日抵苏州。

1月25日　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该会由周恩来等人发起，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组成。2月1日于广州举行成立大会，到万余人。会后游行示威，并发表宣言。2月20日，该会所编《中国军人》创刊号出版。

△　“上海反共产主义同盟会”成立，到会员200余人，总干事为邝宣扬。该会发表宣言，谓今日救国“惟有坚持三民主义之信仰”；“共产之在中国，犹疠疫之在身，防其蔓延，惟有扑灭殆尽而后快”。

1月26日　陈炯明部入侵联军驻地虎门、石滩，东江战事开始。上午10时，陈军练演雄部5000人由东莞、宝安二路向虎门进袭，与驻下岗桂军谭启秀旅接战数小时，陈军败退。同日，陈军向石滩滇军范石生部防线进攻，被击退。

△　孙中山病情恶化，午后3时移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确诊为肝癌后期。

△　蒋介石致函谭延闿促湘军加入东征行列。

1月27日　段祺瑞令设新疆沿边俄属伊尔库茨克、庙街等处总领事及领事。

△　胡汉民任林俊廷为粤桂边防督办。

△　段祺瑞令参谋次长刘汝贤暂行代理部务。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以上海附近战事“危及”外侨生命财产，“破坏”对于租界中立之保证为由，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发出通牒，要求务使交战各方，不得侵入外国租界及租界之外人居住处。

1月28日　孙中山谕汪精卫、陈友仁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由广州迁至北京，并派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

△　齐燮元自上海逃往日本。按：此次对卢作战，三日之内，齐部连战皆败，被俘三四千人，毙伤千余人，其残部纷向沪上溃散。27日，齐由苏州前线败逃上海。是日，乘日轮东遁。

△　韩国钧以齐燮元所部第六、第十九两师溃兵退沪，急应办理收抚事宜，令前松沪镇守使宫邦铎复职；孙传芳则令浙军第二师第三混成旅第五团团长李俊义为上海防守司令。是日，宫、李分别赴任。同日，韩国钧并令闸北保卫团总王栋、副团总尹鹏与松沪保安团总、副司令，会同宫邦铎设法收抚溃兵。

△　奉军先锋部队白俄兵500余人，乘装甲炮车于午后5时抵上海车站。

△　上海总商会以齐燮元所部溃兵纷集上海闸北达数千人，主持无人，给养无着，于是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并电请段祺瑞速派大员携款来沪收拾散兵，以保治安。

△　中国社会党更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京设总部，省设本

部，县设支部，江亢虎为总理。是日，该党发表宣言，并发表组织大纲13条。

△　旅英互助工团通电，要求将海外同胞加入国民会议。

1月29日　段祺瑞电复孙中山，拒绝孙筱（17日）电所提两项要求，仅允省议会、教育、商、农四会及京、津、沪、汉总商会代表加入善后会议为专门委员。同日，段并电邀上述团体各会长速赴京与会。

△　段祺瑞令准免督办京都市政事宜龚心湛兼职，以吴炳湘继任；任李寿金会办京都市政事宜；任朱深为京师警察总监。

△　段祺瑞特派鲍贵卿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原任王迺斌及署理之王景春免职。

△　奉军第一军军长张宗昌率所部1.5万人抵沪，即分派军队收缴齐部溃军枪械。孙传芳部驻龙华军队退守松江、莘庄，以防奉军再进。

△　沈鸿英部左中右三路向粤桂联军防地发起攻击，广西战事爆发。沈军中路陆志高部由蒙山进攻藤县之太平黄绍竑部防地，次日被击退。右翼邓右文部进攻武宣，与黄部激战竟日，邓不支，退石龙。联军乘胜追击，于2月3日占石龙，又占象州。左翼与李济深部战于沙头墟附近。沈军三路均败退。

△　韩国钧任上海市公所总董李平书等11人为上海特别市筹备委员。

△　上海各公团以奉军大队调沪，孙军加防，恐双方再战，是日开会议决致电北京临时政府，请令两方撤兵。

△　湖南省议会开会欢迎四川省议会议长熊晓岩。湘议长欧阳振

声致词，宣扬联省自治，谓："今正其时，愿由两省结合，进谋二十二省区大结合。"

△　吉林著名女匪驼龙伏诛。驼龙（原名张素贞）随其夫大龙（"仁义军"匪首）、九龙及"一枝花"（双城女匪首）在宾江道属五常、榆树、双城等县，前后为匪六年，手下有匪众2000人，展转攻入长春县内小合隆、万宝山等处，声势甚大。本月8日，其部为长春警备队击溃，驼龙只身潜逃，在公主岭被捕，是日解至长春枪毙。

1月30日　段祺瑞令善后会议于2月1日开会。

△　段祺瑞特派汪大燮为全国防灾委员会会长。

△　北京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由外交次长沈瑞麟派员分访驻京英、美、日、荷、葡、比、意各使，请履行华会条约，召集关税会议。

△　张宗昌派代表童好古赴杭州与孙传芳谈判上海问题。孙提出两项退兵条件：一、奉、浙两军同时撤出上海；二、奉军不攻浙，否则浙军将准备再战。旋协定双方军队同时撤防。奉军退至昆山，浙军退回松江，并将上海兵工厂封存，即日停止工作。

△　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三路进兵，先发制敌。杨希闵之滇军为左路，由河源、老隆（今龙川县）以趋兴宁、五华，当林虎防地；许崇智之粤军为右路，由淡水、平山、海陆丰直趋潮汕，当洪兆麟防地；刘震寰之桂军为中路，围攻惠州城。

△　上海总商会公请张宗昌面商治安办法。适吴光新抵沪，亦与会。张、吴演说，宣布将移苏军于昆山，洽请浙军退离松江，改兵工厂为工厂，实现上海永不驻兵、以符民意之旨。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生反对该部所委新任校长到校，是日派军警将该校强行解散。

△　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通函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声明加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总会；越二日，派代表二人赴京参加总会筹备会，并吁请各地亦派代表赴京，一致进行。

1月31日　段祺瑞特派许世英为善后会议秘书长。

△　段祺瑞宴请善后会议会员，到120余人。段演说承认处境艰危，声称："惟当奉公道以周旋，非徒受群情之推挽。"熊希龄致答辞，声称段"为现时和平统一之适当人物"，表示"当同心赞助，达到统一"。

△　国民党向全党发出抵制善后会议通告，略谓："因临时政府于善后会议不容纳人民团体代表正式参加，故本党决议亦不参与该会议。"

△　黄埔军校学生队两教导团官兵及入伍生队，在军校操场举行东征誓师典礼。

△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主席，讨论对善后会议之主张。咸以为善后会议之召集已成事实，所争之点不在名称，而在构成分子，故主力争人民代表参加该会。议决如下：一、拥护孙中山筱电主张，力争人民代表参加；二、人民代表人数应占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三、人民代表须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四、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亦应选派代表参加。会议并推定恽代英等三人为代表，赴京筹办全国促成总会。

△　甘肃省议会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国务院、陆军部，反对任孙岳、憨玉琨为豫陕甘剿匪总、副司令，要求将甘、陕"划出该总、副司令剿匪范围"，并指出："今者督军虽已易为督办，而军事繁要之官，如边防督办，如宣抚使，如剿匪司令，迭见命令，拔茅连茹，大者拥据数省区，小者控绾数万人，此其流弊所及，岂复稍异于前？多日谋戢兵，其效殊寡。今易其名而存其实，谓可长治，谁则信之？尤

愿我执政毅然决然废此厉阶，使我国家前途日入于宁静安谧。”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令驻英、美、法、葡、意、比、日、荷各使向各驻在国政府正式提出召集关税会议之要求。

△　上海领事团由领袖领事出面，通知张宗昌，请其根据执政府命令，早日退出沪埠，以符明令。

是月　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委员会经段祺瑞批准，宣告成立。

2月

2月1日　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应出席会员166人，实到96人，不足法定人数。中外宾到200余人，使团除美使亲到外，余派参赞。赵尔巽主席，段祺瑞致词。同日，段祺瑞发表《建设宣言》。《宣言》列举政纲六项，以补充其在津就任临时执政时马（11月21日）电内容之不足。政纲六项为：一、辛亥革命之意义；二、革命延长之危机；三、制定国宪速成省宪；四、善后会议与统一；五、国民代表会议与制宪；六、建设前途之责任。

△　东征联军右路许崇智部张明达师（第二师）许济旅（第七旅）由广九路向石龙前进，3日抵石滩。黄埔军校教导第一、第二两团加入右路作战，是日从黄埔军校出发，集中虎门，3日抵太平圩。

△　吉林国民会议促成会致电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赞成在京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总会。

△　孙传芳以奉军仍纷赴上海，致电段祺瑞、卢永祥及全国各省区军民长官表示反对，并称：“若云讨齐燮元，则齐已自退”，“若云与传芳对敌，则为正当防卫计，势不得不饬部严防，相与周旋。”

△　上海特别市筹备委员李平书等开会，议决以上海、宝山两县

有关系之22乡为区域，定名为“淞沪特别市”。是日，并电韩国钧请添委虞洽卿等四人为筹备委员。

△　青岛、佐世保间海底电线，由日本移交中国接收，即日起按新订协定实行。

2月2日　段祺瑞令导准督办、会办各职一并裁撤。

△　段祺瑞令张宗昌加陆军上将衔。

△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训令京外各机关，凡查获宣传共产，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如有以政党为护符者，亦一律依法办理”。

△　杨森以“移兵潜踞，闭门抗命，犯上作乱”罪名，解散驻绵属新都之川军第十师武装，免该师刘眷藩（斌）师长职。是日杨部对驻梓潼第十师实行攻击，刘师退绵阳，杨部遂占梓潼。越二日，又占绵阳，刘师向江油、安县退去。

△　驻京苏使加拉罕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俄国政府现极尊重中俄协定，凡有碍中国在蒙古主权之处，俄国尤愿加以注意，务贯彻不侵犯之本旨。俄蒙联防一事，俄国政府实未与闻，当望中国政府勿轻信谣传。”

△　张作霖电复上海总商会，告以：“现在军事已告结束，一俟布置就绪，所有奉军，均即一律退出”，“至兵工厂改办商厂一事，应候中央与苏省决定，敝处悉不与闻。”

△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电段祺瑞，声明善后会议须有人民团体代表占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方有讨论国事之权，如擅自议决国家大事，人民誓不承认。

△　是日，福建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江西九江（6日）、吉安（7日）、山东陵县（8日）、陕西三原（9日）、南京（15日）、长

沙（19日）、浙江象山（28日）等地，亦先后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略谓："本党总理一月十七日复电，为本党总理对善后会议相当让步之精神，然犹未得临时政府之容纳，故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

2月3日　　孙传芳由杭州到上海与张宗昌会晤，经吴光新主持，双方签订合约，规定：孙将兵工厂交出，于三日之内撤退上海附近之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即日孙、张会衔电令前敌一律停止军事行动，所有宜兴、长兴一带驻军，着克日向后方适中地点撤退。至此，第二次江浙战争宣告结束。

△　善后会议开谈话会。浙江省长夏超代表邵章提出停止全国军事行动之议案，结果议决由出席之74名会员以赵尔巽领衔签名，改为意见书，请段祺瑞明令全国，"所有各方一切军事行动，及其他敌对行动，均须完全停止"。次日，段祺瑞电令各省军民长官及将领，停止军事行动。

△　东征联军中路桂军林树巍师进袭宝安，是日占云霖后继续追击前进。右路粤军张明达师许济旅、王若周旅进攻石龙、东莞。4日，王旅克东莞，许旅占石龙。陈炯明军沿广九线退却。5日，蒋介石率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抵东莞。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致函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沈瑞麟，以近来上海情势日益险恶，危及外人生命财产，并有中国兵士"窜入租界"、"破坏中立"情事，要求严令在苏各军事当局，无论何方军队，"断不准其侵入租界或外人居住地"。

△　北京《京报》刊载"侨港工团总会"代表香港20余万工人所发通电，对于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主张，表示竭力拥护。

2月4日　上海总商会接收上海兵工厂，并电告段祺瑞。

△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广东东莞第二区农民协会通电，指出帝国主义所主张之“和平会议”与段祺瑞召开之“善后会议”，纯为分赃式之会议；声明拥护孙中山主张之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提出特赦政治犯，人民选举自由等五项先决条件，以及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七项对国民会议之最低要求。

△　袁祖铭致电段祺瑞，报告滇、黔和平解决，贵州军民两政官吏业已委派，并接收完竣。

△　粤桂联军黄绍竑部占蒙山，次日又占荔浦，7日三路围攻柳州。沈鸿英部见大势已去，弃柳州率队向桂林退去，黄部遂占柳州。

△　法国新任驻京公使玛太尔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庚子赔款按照中法协定，请暂照纸法郎折算，拨付东方汇理银行，但声明并无以此解决金法郎问题之意。

△　“国语统一筹备会”以近年来初级小学（旧制为国民学校）出现“倒行逆施，复其故辙”现象，函请北京政府教育部，重行申明民国九年（1920）国民学校改国文为国语之法令，并禁用初级小学国文教科书。23日，教育部准其所请，明令规定：“凡初级小学一律用国语教科书。”

2月5日　孙传芳军队即日起开始向松江一带撤退，至8日撤尽。

△　孙中山电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廖仲恺等，略谓：“大病方苏，闻东江将战，望努力破敌以安内而威外。”

△　加拉罕致函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声明：“一俟中国与外蒙关系恢复后，当即将驻蒙军队撤退”，并谓：“苏俄政府当即饬外蒙代表离去莫斯科，并切实禁止俄国人民之援助外蒙，反对中国。”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接阿富汗外交部来函，要求派代表来中国谈判议约，互派大使，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呈请段祺瑞同意，令饬京师总检察厅将安徽省凤阳关监督倪道烺被控教唆杀人案移京办理。28日，北京大学皖籍教授高一涵等联名具呈章士钊，反对倪案移京，并举发倪“辇金入都，与司法各界上下其手，希图敷衍了事”。3月5日，章士钊在执政府会议上要求法庭予以追究，并传讯高一涵。

△　段祺瑞派代表周渤抵长沙访晤赵恒惕。12日，周对报界声称此次来湘，“纯系报聘”，并谓：段对赵省长甚倚重，对湘宪甚尊崇。后赵恒惕以周来湘事致函段祺瑞，再倡联治主义，谓：“欲图永久统一，联治以外，实无他径。”

△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根据执行委员向警予提议，致电段祺瑞，要求人民团体和妇女团体参加善后会议，并通电全国各地促成会一致主张，同时选派代表三人赴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

2月6日　　段祺瑞令准免张謇督办江苏运河工程事宜兼督办吴淞商埠事宜、督办江北沿海五县新运河事宜本兼备职。

△　段祺瑞特派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派虞洽卿为会办。

△　段祺瑞令免海军总司令杜锡珪本职，特派杨树庄继任。

△　张宗昌以“宣抚第一军军长”名义发布《紧要启事》，声称将参加此次江浙战争之苏属各军一律资遣回籍，不留一兵一卒遗害苏民。

△　张作霖召集军政大会，吉、黑两省军务督办等出席，决定：一、派张学良赴宁详细调查，与卢永祥、张宗昌商议奉军之去留；二、东省共移民10万人，各省设屯垦会办一人专司屯垦；三、东省官

吏任命需经东省长官推荐或事先征求同意方可发表，并即电赴京之东省善后会议代表与段祺瑞接洽。

△　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因英、法反对于15年内禁绝吸烟及鸦片产额应以医药与科学上需用为限之两项提议，会议未有禁止远东境内吸食鸦片之担保，是日我国代表施肇基为此声明退出会议。11日，鸦片第一次会议闭幕，通过禁烟草约十五节，中国未参加签字。北京临时政府密令施肇基，“如与主权体面无碍，仍参与禁烟会”。

△　上海《申报》等各报载文报道江浙战争之损失情况：上年9月至本月份止，东南数次战争，各地被害损失总额，至少当在20亿元以上；其中沪宁、沪杭及淞沪等各铁路损失最巨，轮船局、招商局等，亦不下数十万元，至于人民田地、物产、财产、生命之损失，则更难以确定数字。

△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筹备处通电，劝阻各省之省议会、农会、教育会、商会等四法团出席善后会议之专门委员会，并请力争于善后会议内加入19种人民代表。

2月7日　　段祺瑞特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派刘文辉为帮办；邓锡侯着免四川省长本职，特任赖心辉继任；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所有该省区军队均归节制。

△　段祺瑞令：四川川边道所属地方暂行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域；特派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事宜。

△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开幕，到十二路代表共45人。上午，首先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郑州工人、市民二万余人到会。下午大会正式开幕。大会通过恢复所有工会组织、力谋工会之统一、救济失业、要求实行罢工所争得之条件、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赞助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等10项决议。越三日，大会闭幕并发表宣言。

△　京汉铁路在长辛店开劳工纪念大会，到1.5万人，各省均有代表出席。

△　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亲赴东江前线督战，是日抵横沥。次日，蒋介石会同许崇智商议进攻计划。许令张明达师、王若周旅、张我东团铁甲车队统归蒋指挥。

△　福建国民会议促成会自厦门致电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以段祺瑞违反公意，召集善后会议，声明绝不承认。

△　张作霖接见日本新闻记者团，发表对时局谈话，表示东三省“仍拟对日亲交，俾期益求治理”；并谓：“合肥（指段祺瑞）出而执政，纯系予之提线，合肥成功，直是予之成功；合肥失败，亦不啻予之失败。”

△　段祺瑞令：发行新债票，赎回秦豫陇海铁路2000万法郎短期债票。

2月8日　段祺瑞令四川督理一缺着即裁撤。

△　黎元洪电复段祺瑞，表示不出席善后会议。

△　奉军将领张学良、韩麟春抵沪视察军队。

△　胶济铁路商民、职工为请驱逐该路正副局长阚铎、朱庭祺，爆发罢运、罢工运动。次日，暂行兼护山东省长龚积柄召集济南胶济路各团体代表开会，龚以督办郑士琦派李钟岳为代理局长以为解决条件，征询众意。各团体代表提出三项条件：一、驱逐阚、朱；二、收回阚、朱以前之任免令；三、惩办阚、朱以下之罪魁。

△　上海市民举行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会，苏联驻沪领事出席，恽代英等在会上发表演说。最后唱国际歌，并高呼：“列宁主义万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2月9日　善后会议开预备会，讨论“善后会议议事细则”。

△　冯玉祥致电段祺瑞，称病六辞西北督办职，实则要求将内外蒙及三特区划归西北边防督办范围，方允就职。越三日，段电冯，务请其正式就任。

△　冯玉祥自张家口致电刘镇华、胡景翼、憨玉琨、岳维峻，劝解陕、豫两军互换渭北、豫西地盘，主张“以政权论，渭北应归陕，豫西应归豫；以驻军论，渭北之师应归豫，豫西之师应归陕”；并谓宜由刘镇华、胡景翼各派全权代表，“彻底规划，先清军匪之限，再定去留之额”。越二日，冯将该电转呈执政府。

△　刘湘、赖心辉、邓锡侯联名致电杨森，请停止进攻刘眷藩师，并允刘师移驻南江、通江。

△　上海日商内外棉八厂等11个纱厂二万余人，因抗议日厂主无故开除工人，举行同盟罢工。16日，日华、丰田等纱厂加入罢工，罢工人数已逾三万人。

2月10日　段祺瑞令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节制贵州全省军队，仍兼管驻川黔军。

△　段祺瑞令川滇边防督办、川边督办、川边镇守使等缺均着裁撤。又令：田颂尧着开去帮办四川军务，专任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　段祺瑞任吕秀文为山东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孔昭同为陆军第二十九混成旅旅长，苏珽 为陆军第三十混成旅旅长。

△　段祺瑞令准免陆军大学校长贾宾卿本职，以师景云继任。

△　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发出通电，反对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会议组织法，“盖唯人民团体所制定之组织法，乃能产生真正之国民会议也”。

△　陈炯明军驻守广九线者多为收编之土匪，无战斗力，闻东征军进逼，沿广九线节节败退，张明达师许济旅及黄埔军校教导团，是日进占平湖。次日占领深圳。陈军向淡水逃遁。至是广九路线完全由联军控制。

△　胡景翼前曾致电段祺瑞，以憨玉琨纵匪殃民，请免憨职，为段所拒。是日，胡因驱憨未成，愤而电请辞河南军务督办职。

△　山东督办、省长派济南镇守使施从滨及胶济路前局长李钟岳偕各界代表抵青岛，青岛站职工千人开会，向施、李提出四项条件：一、撤换阚、朱；二、李维持现状，须有期限，不得蝉联；三、推翻阚、朱所委人员；四、惩办阚、朱私党。施、李完全承认。次日，工人复工。

2月11日　段祺瑞特任龚积柄为山东省长。

△　段祺瑞派唐启尧为安徽抚慰使，是日，唐到安庆在宣慰驻省皖军大会上宣读段祺瑞“训词”，并演说要求皖省军政统一。

△　段祺瑞令陆军第六师、第十九师及江苏陆军第二师队号均着即行撤销。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日俄协定中有苏联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之条文，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分别向驻京苏、日两使提出抗议。

△　张作霖令准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辞职，任吉林军务督办张作相兼代总司令，吉林省长王树翰兼特别区行政长官。

△　北京外交团接沪领事团电，要求以步枪所及之地，扩充租界。27日，上海各团体组织“国民保土会”，奋起反对。

△　《民国日报》报道西藏人民驱逐亲英内奸斗争情况，略谓：

拉萨最近发生排英运动，反对英人侵藏，声势日益壮大。西藏内阁总理兼藏军总司令索龙格郎向与英人勾结，近复谋阻碍潘辛喇嘛出奔，尤使各喇嘛及藏人忿恨，藏人在达赖喇嘛宫前集会，举代表要求达赖逮捕索龙格郎，予以惩戒。此事拉萨军队及索卫队亦有参与者，现内阁已重行组织。

2月12日　胡汉民令裁撤驻韶州北伐军大本营。

△　胡汉民任命余际唐为建国川军第一军军长；汤子模为建国川军第二军军长。

△　胡汉民任命林支宇为建国联军湘军第一军总司令。

△　张作霖为订立《奉俄协定》事呈报段祺瑞，略称：《中俄协定》对中东路及松、黑航线权各部分，尚有遗漏，当由东省另订《奉俄协定》，并将换文抄呈执政府备查。段批交外交、交通两部会同考虑。是日，外交、交通两部呈请将《奉俄协定》核准追认，作为《中俄协定》附件，并由外交部照会加拉罕，请其转报苏联政府。

△　萧耀南电令全省军警长官，缉拿在汉口谋乱之吴佩孚部下、前第二十四师师长杨清臣及前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胜。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军阀把持铁路为借口，干涉中国路政。略谓："外人利益与铁路有密切关系，各铁路不特于外商所供给及实用之装备负债数千万元，而对于各国所持中国铁路债券数万万元，亦负有责任。"照会"警告中国中央政府，迅将中国之铁路全部恢复通常状态"，"凡铁路收入经营等事，概移交合法管理机关"。

△　哈尔滨青年学校、平民周报社、平民学社致电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及全国各法团，声明善后会议无人民代表参加，擅行开会，与贿选无异，故不承认其存在及其一切决议。

2月13日　善后会议开第一次大会，到132人。通过《善后会议议事细则》，选举赵尔巽、汤漪为正副议长。

△　张作霖在盛京（今沈阳）成立镇威上将军公署，是日，段祺瑞指令照准。

△　孙岳自保定致电刘镇华、胡景翼、憨玉琨、岳维峻，劝解胡、刘互换地盘，主张留陕余军调至河南，驻豫陕军全数开回关内。

△　桂林守军沈鸿英部邓瑞澂通电解除师长职务，将部下交邓右文指挥。次日，邓右文发出通电，与沈鸿英脱离关系。李宗仁、黄绍竑，委邓右文为第一师师长。

△　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伯来沪，将在中国逗留数月，管理开设假期圣经学校事宜。据教会估计，将于今夏在15省内设暑假圣经学校3000所，其中上海一埠将设100所，招收华童12.5万人，授以耶稣教之《圣经》。

2月14日　东征联军右路分兵三路围攻淡水，张明达师攻城之西北，许济旅攻城之东北，教导团攻城之东南。是日，三路直逼淡水城下，陈军闭城困守待援，相持至夜。此时洪兆麟部由潮汕开来已达惠州，闻淡水被围，急移兵来援，形势急迫。黄埔教导团遂组织奋勇队百余人，于次晨在炮火掩护下猛攻城池，克之。旋张师许旅对洪部援兵苦战，入夜陈军向平山退去。

△　段祺瑞令免江苏省长韩国钧本职，以郑谦继任。

△　段祺瑞任命张凤岐为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就孙传芳来电所提请饬驻淞沪奉军完全撤退；请卢永祥离宁北上；请以张宗昌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吴光新为江苏省长三事进行讨论，议决卢永祥仍为宣抚使；奉军撤退办法，责成卢办理；苏督一席，此时决不更动；韩国钧辞职应予

照准。

△　上海奉军将领张学良、韩麟春、张宗昌北回磋商军事，奉军亦撤退至昆山一带。

△　刘镇华致电执政府军务厅，要求制止胡景翼开衅。

△　北京临时政府军务厅、陆军部致电刘镇华、胡景翼，转达冯玉祥、孙岳关于陕、豫两军调整地盘办法。旋因憨玉琨、刘镇华反对，调停失败。

△　萧耀南召集长江上游副总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于学忠及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襄郧镇守使张联陞、汉黄镇守使杜锡钧、第一混成旅旅长孙建业、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等开军事会议，部署鄂西防务，以防川、滇、黔图鄂。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为英人包办西藏邮务事致函驻京英使，请查明前次照会，严行查禁。

2月15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总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等12团体联名致电段祺瑞，要求容纳人民公意，准许各省教、农、商、工、学各会及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之代表参加善后会议为正式会员，指出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竟以军阀官僚为组织分子，置人民于不顾……此人民之所以共起反对也”。

△　中华妇女协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通过宣言及简章。宣言提出女子应参加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民族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等八条纲领。简章规定该会“以团结妇女，力争经济上、政治上及社会上之平等地位为宗旨”。

△　吴佩孚在黄州派人四出联络，以冀卷土重来。其部下在汉擅发委任状，招纳流亡。鄂人恐吴谋乱影响鄂局，故日来驱吴之声甚炽。是日，湖北公民联合会开驱吴大会，推代表晤萧耀南，并电段祺

瑞，请驱吴出鄂境。

2月16日　陆军总长吴光新抵京，次日面见段祺瑞，陈述沪兵工厂接收经过及江、浙最近形势。

△　蒋介石驰电北京，向孙中山告捷。18日，由汪精卫代表孙中山复电嘉勉。

△　豫省议会电段祺瑞，谓胡景翼、憨玉琨两军移防，日益紧逼，一触即发，请速制止。

2月17日　段祺瑞特任王天培督办贵州军务善后事宜，派周西成为会办；特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

△　段祺瑞通令慎选县知事，严禁军人干预。

△　北京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通知孙中山家属及国民党党员，告以孙中山所患为肝癌末期，为不治之症。

△　唐山新华纱厂工人千余名，为抗议资本家罚打工人，举行罢工。该厂经理令厂警武装镇压，并声言将全体开除，另募新工。越二日，罢工工人发表宣言，痛斥资本家之罪行，要求国人支援，并向厂方提出取缔工头员司打骂工人、急速放回被捕工友，并赔偿损失及加薪等六条要求。

2月18日　孙中山因在北京协和医院医治无效，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

△　粤桂联军李宗仁、黄绍竑部进占广西全州。沈鸿英残部向湘粤边境退走。

△　北京临时政府驻法公使陈箓，在巴黎与驻法比使签订陇海路新借款条约，债额2300万法郎，赎回1919年2000万法郎旧债票。

2月19日　善后会议开第二次大会，讨论段祺瑞提出之整理军事大纲草案及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段到会致词，承认："环顾宇内，乱于兵，困于财。"林长民等就第一项提案提出质问，指出政府未提出具体方案，无从讨论。陆军总长吴光新出席解答，声明：政府提出此案，"时间甚为匆忙"，军队编制详细办法当提交下次大会讨论，请对此案"暂行保留"。

△　上海奉军大部已撤，其补充旅改为清乡军留沪。是日，闸北公团联合会等各团体致电卢永祥、张宗昌等，指出"该补充旅查系前苏军第六师、第十九师溃兵所改编，纪律之坏，人所共悉"，表示反对。

△　唐继尧通电主张贯彻联治主义。声称："进则共谋共和联邦之统一，退则保留联邦之省治，为国家为西南，无有切于此者。"

△　广西梧州团务会议通电请唐继尧撤回桂境滇军。越二日，梧州县各团体代表会议开会，议决组织统一机关，拒滇军入桂。

△　刘镇华致电北京临时政府，略谓：豫人治豫，理所当然，胡景翼所部，尽系陕军，而竟占领全豫，应请速饬胡部开驻关西，让出陇海铁路全线，交憨玉琨接防，以解纠纷，而符民意。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外交两部，宴请法新使玛太尔，双方交换对于金法郎案相互让步办法之意见。

△　驻京日使派员访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沈瑞麟，要求电令沪官厅从速解决上海日纱厂工潮，并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2月20日　晨，东征联军右路各军向平山合击。洪兆麟、叶举等陈军是时出平山，占白芒花，分三路反攻淡水，两军在淡水北羊塘围遭遇，战二小时，陈军向平山退却，联军乘胜追击至白芒花，21日进占平山。

△　粤桂联军第二军指挥白崇禧进占桂林，嗣因邓右文通电解除李宗仁、黄绍竑所委第一师师长职，白部于3月5日退出桂林警戒。

△　李景林为争夺保定、大名两道地盘，曾与孙岳发生火并，经段祺瑞及各方调解，是日双方签订妥协条件十余条，要点为：一、孙将保、大两属交还直隶管辖；二、保、大两属之道尹、县知事，悉由直隶委人充任；三、孙军饷项按月由直省财政厅协济24万元。

△　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横滨支部及华侨联合会、留日学生废除不平等条约同盟会、留日安徽学生醒民社等十余团体，在东京成立“中华留日国民会议促成会”。次日，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首倡国民会议之救国主张，揭露段祺瑞拂逆民意召集之善后会议“实不啻军阀官僚会议”，表示誓死反对。

2月21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补充内阁问题。外长唐绍仪一时不能来京，决定由沈瑞麟次长暂时署理。教、农二长由段分别函电敦促即日就职。

△　段祺瑞令准免外交总长唐绍仪本职，特任沈瑞麟继任。

△　段祺瑞特派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孙岳赴河南检查驻豫军队。

△　豫省旅沪商界联合会电北京临时政府，请迅予制止胡景翼、憨玉琨战争，以重民命，而顺舆情。

△　香港英国汇丰银行开年会，主席毕登顿演说，认为段祺瑞召开之善后会议，“为统一国家之初步，吾人当认为满意”，表示对该会给予“恳切及同情的注意”，并“盼其成功”。

2月22日　联军右路粤军在白芒花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二路进攻海陆丰，直捣潮汕。许崇智率张明达师、许济旅由三多祝进攻海丰，蒋介石率教导二团由梅陇进攻海丰，24日上午二路开始出发。

△　胡、憨两军又在禹县开战。是日；憨部张治公之一师率同镇嵩军第一路柴云陞之一部，收编王老五之匪军，向白沙镇胡景翼部猛攻。胡调李虎臣、蒋朗亭两旅前往助战，双方军队均在二万上下。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反对北京临时政府与法使拟互相让步解决金法郎案，并声明凡国家重大问题之足以增加人民负担者，非经国民会议与正式政府决定，国民概不承认。

△　北京临时政府派王彭年为赣鄂宣慰使。是日王抵汉口，并晤萧耀南。

2月23日　段祺瑞致电各省区军民长官，侈谈建设大计，主张移民垦拓边僻荒地，“以行屯田、卫民、拓地、建省之实”。

△　孙岳离京赴豫，调停胡、憨战争。26日，孙电告抵豫，并谓：“已电请两军遵照中央命令，停止军事动作，严守防线，组织和平会议，各派代表来京。”乃孙行抵新乡，忽称病不进。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申令各省教育厅，为推广国语统一运动，凡初级小学应一律用国语教科书。

2月24日　孙中山病危，是日口授遗嘱及家事遗嘱，由汪精卫当场笔录成稿。致苏联遗书则以英语口授，鲍罗廷等人笔记。遗嘱全文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在《致苏联遗书》中，表示“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意表示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　善后会议举行第三次大会。议案共五项：一、续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二、移民计划消纳裁兵案；三、提议收束及安插军队案；四、提议编制警备队案；五、禁烟案。第一案议决交由法制专门委员会审查。第二至第四案自行撤回，保留第五案。

△　段祺瑞令：河南胡景翼、憨玉琨两军按现驻地点各退50里，脱离接触，停止军事行动。

△　段祺瑞任命赖世璜为江西陆军第四师师长。

△　憨玉琨所部军队由吴赵河方面出动向苇渠（距郏县70里）包围并袭击胡景翼部左翼。胡军迎战。此部憨军因多系新收编土匪，战斗力弱，当即被胡军击散。次日，憨军由白沙、童池镇、银河镇派大队来援，胡军由苇渠进至吴赵河，旋占禹店、白沙西镇。

△　上海县商会、上海市议会等法团，就苏皖宣慰使、第一军司令部征募淞沪公债200万元一事，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略谓："今值军事收束，淞沪已奉令永不驻兵，宣抚使率领奉军南来时，声明不支苏饷，况值善后会议开议，决无任令军事机关发行一隅公债之理"，要求张作霖等电令阻止。

△　王揖唐奉段祺瑞命往鄂，谋与萧耀南联络长江各省拥段及劝吴佩孚离鄂，于是日抵汉口。

△　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致函直隶各县促成会，请自动组织人民团体，加入或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促成总会，以便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实行国民自动解决国是。

△　江浙皖丝茧总公所致电奉、皖、苏、浙四省军民长官，略谓现值时届春节，正农民从事蚕桑，而"常、锡、嘉、湖等处，谣言蜂起，草木皆兵"，若再有军事发生，则人民流徙，丝蚕一业将受极大打击，"七千万大宗土产，无以出口，数百万捐税，从何征取？"恳请

收束军事，俾农民得从事蚕桑。

△　溥仪在日使策划下，由日使馆潜逃至天津日租界。是晚，日使馆发表声明。谓已将此事通知段祺瑞及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并声称："政府亦熟知之，且无何等干涉之意。"

△　江西九江东门内美基督教会所设圣约翰大学代校长美国人葛若然，对学生有意寻衅，学生群起反抗。葛竟动武，美国教员更以尖刀刺伤学生八人。全校学生遂全体退学，以示抗议，并一面通电全国各教会学校学生，请一致退学，一面电请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明令收回教育权。

2月25日　段祺瑞特派林长民充国际联合会事宜讨论会会长。特派熊希龄督办永定河决口堵筑工程事宜，薛笃弼、鹿钟麟为会办。

△　班禅额尔德尼抵北京，由临时政府迎至中南海瀛台居住。

△　段祺瑞接见善后会议各省专门委员，声称："解决时局，惟善后会议是赖"；"国民会议，国民程度尚谈不到"；"国民会议议决，能否强制军阀遵从，尚属疑问。"

△　晨，胡景翼下令向憨军总攻击。岳维峻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自郑州向铁炉、荥阳前进。27日夜，驻沁阳之陕军一团，又奉命暗渡黄河，夺取孟津，与由登封绕道攻偃师之邓宝珊旅合击汜水憨军后路。胡又亲率所部，由荥阳正面猛攻。憨军三面受敌，力不能支。28日，胡军占荥阳、汜水、巩县等地。

△　唐继尧部龙云乘虚入南宁。省长张一气偕机关人员撤离南宁。卫戍司令蔡振云率部退横州。

△　刘镇华率镇嵩军离陕赴豫，27日抵洛阳。陕省军民两政交帮办吴新田暂代。26日，刘抵潼关后，即在各处张贴告示，声称：此次率师出关，完全在统一中原，解决时局。

△　王揖唐抵湖北黄州“慰问”吴佩孚。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民国十四年八厘公债，债额1500万元，以德国发行之津浦债票息券90万镑为基金，民国十八年（1929）起还本。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与汇丰银行签订借款银元34万元合同，作行政费用，年息8%，期限一年，以总税务司所存金法郎25万两利息作担保。

2月26日　胡景翼、憨玉琨两军在登封县激战。胡军约四旅，由李虎臣统率，包围憨军，憨部不支而退，死伤千余人。是日，胡景翼由开封专车来郑州督战。次晨，胡军进占登封县。

△　段祺瑞派施从滨帮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

△　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致电段祺瑞，要求临时政府向日使馆交涉引渡溥仪，依法惩办，明令废除清室条件，通缉严惩殷顽遗老；次日，向日使馆提出质问。

△　加拉罕就日俄协定中承认《朴资茅斯条约》问题，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认为中国在1905年及1915年两次与日本订约已承认《朴资茅斯条约》有效，并声明苏联承认《朴资茅斯条约》有效“绝不抵触中国权利”。

△　陈炯明由汕尾败逃香港。

2月27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讨论段祺瑞所提整理财政案。周作民等发言，谓此案与军费标准及整理军事案“甚有关系”，议决延会，俟下次开会时与军事大纲案一并列入议事日程。熊希龄临时动议，请执政府代表出席，质问关于河南军事问题。段祺瑞代表、政府军务厅厅长张树元答称：政府已派员前往检查，设法消弭战事，使双方不致有重大战事发生。

△　卢永祥致电段祺瑞，重倡废督，并主张“定军制”、“划军区”。其办法则暂以徐州一带为江苏国防军区域，大江以南不再驻国军，凡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国军区域，悉听中央指挥，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苏之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江苏军务善后督办一职，即请迅颁明令永远废除。同时提议浙省亦将国军调赴国防规定区域，不得仍驻江、浙毗连境址，并将军务善后悉听中央主持。

△　东征联军右路张明达师破敌于三多祝，在海丰农民协会配合下，是日占领海丰。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亦于是日会师海丰。旋分兵三路直趋潮汕。

△　中国沿海渔业协会、沿海七省渔民保卫团等团体，以“渔业人民有40万户之众，每年海产物价额达2.1亿之多”，合乎国民会议代表组织条例关于选举国民代表之规定，要求善后会议于提议国民会议组织条例时，将沿海渔民之选举权、被选举权及选举名额明白订定。是日，保卫渔业监督刘昌言函请善后会议对于上述要求“查照议办”。

△　天津农民协会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要求减轻田赋。

2月28日　　刘镇华致电北京临时政府，称胡景翼所部“乘我退避，猛烈进攻”，违背政府撤兵之令。3月4日，胡景翼亦电京指刘电所称各节“均系淆乱是非”，已电请善后会议派员赴豫西彻查，辨明是非。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宴请驻粤各国领事，解释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真意，略谓：“中国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排除帝国主义，并不是排除外国人；要自拔于半殖民地之中，并不是要驱逐外国人。”并谓：“中国人今天只求脱奴隶而为朋友，不取消不平等条约，是无法做朋友的。一切猜忌废约运动者，你们敢说中国人只配

做奴隶不配做朋友吗？”

△　孙岳抵郑州。

2月下旬　　驻京苏联大使加拉罕就中国政府雇用俄兵一事，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据确实报告，中国军队中有第一俄兵混成旅之军队组织，由前俄帝国军官尼查伊夫氏带领，内有白党千名驻扎沪宁一带，并招揽留居上海白党组织成军，直接受张宗昌指挥，由卢永祥管辖”。照会指出：此项反苏联之白党军队，影响中苏两国人民之友谊，助长中国内乱，应即停止招募白党，从速解除白俄军队武装，立予遣散，以符中俄协定。

是月　日商日华纱织喜和工厂在上海创立，资金1100万元。

△　日本在东三省铁路沿线中等学校实行军事教育。

3月

3月**1**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典礼，到各省区代表80余人，来宾数百人。大会宣布三项宗旨：一、人民之自由与权力，应由人民力争；二、人民应有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之坚强信念；三、国民会议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战斗与夺取权力之机关。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唐继尧勾结杨希闵、刘震寰觊觎粤政，特调建国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率部赴广西，协同桂军李宗仁、黄绍竑阻唐军由南宁东下。是日，范军总指挥杨榛率部出发，4日抵肇庆，7日抵梧州。

△　驻黔滇军唐继虞自称建国联军第一路总指挥，是日通电宣称奉唐继尧命令，“克日出师率兵东下……合湘川之贤豪……扫除联治障碍”。

△　段祺瑞特派王正廷督办中俄会议事宜，郑谦为会办；任吴金彪为赣东镇守使仍兼军务帮办，邓如琢为赣北镇守使仍兼陆军第一师师长。

△　蒋介石令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陈铭枢部及吴铁城之警卫军集中淡水，即日向海陆丰前进。

△　杨森令第一混成旅郭汝栋部、第三混成旅白驹部及吴行光三部由成都经仁寿、威远前往自流井屯驻。次日，杨通电称出兵仁威，定实行北京统提统拨盐款命令，并保井灶各商及运道交通。

△　北京新闻界百余人在中央公园集会，要求取消《出版法》。9日，青岛报界致电北京报界及临时政府司法部，提出同样要求。

△　蒙古旅京同乡会集会，讨论国民会议组织法关于蒙古国民代表名额等规定，作出三项议决案。其要者为：请将蒙古代表名额修订为：内蒙每盟五人，外蒙每部五人，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太新旧土尔扈特、呼伦贝尔、察哈尔各五人，阿拉善、额尔额西土默特、伊克明安、明安特场、商都牧场、两翼牧场各二人，青海七人。会议发出宣言，反对少数王公贩卖蒙、藏议员，主张就地选举代表，并一致议决于次日赴临时政府及善后会议请愿。

3月2日　　胡汉民颁令嘉奖东征联军将士，并饬乘胜前进，“务于最短期内，肃清残寇”。

△　北京临时政府农商部在京召集全国实业行政会议，各省实业厅长出席。至本日止，会议历时20余日，开议16次，议决案160余件，未议案数十件。22日，段祺瑞传见各会员，发表“实业救国”意见。

△　吴佩孚带卫队千余人乘“决川”、“浚蜀”两舰，启程赴岳阳。当日，吴之随员对《自由西报》记者谈话，声称“果时局非吴某出即

不能收拾，吴亦未始不可出山”。

△　桂粤联军为抵御唐继尧军东下，连日布防，以横州（今横县）为第一防线，贵县为第二防线，浔州（今桂平）为第三防线。是日，李济深、黄绍竑在梧州联衔发布讨唐布告。

3月3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五次大会。广西代表动议，要求临时政府依卢永祥请废督电，实行废督。旋开议，第一案为《整理财政案》，议决请政府将原案撤回修正，并先征求各省代表同意，然后续向善后会议提出修正案。次议《收束军事大纲案》，以本案修正之案甚多，且散会时间已届，议决下次开会时合并讨论。

△　孙中山致电联军总司令杨希闵：“卧病兼旬，得闻捷音，胜于良药。右翼深入，击破洪兆麟、叶举，须中左两路并进，乘胜击林虎，潮梅可定。”

△　联军右路许济旅及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追击前进，至鲤湖附近与洪兆麟部李云复师遭遇，激战甚烈。当地农民持土枪土炮助战，遂大败洪军。次日，许旅入普宁城，5日占揭阳。

△　海丰召开全县农民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到会三万余人。革命军宣布没收逆产，半数归农会，十分之三归工会，十分之二归学生会，并主张取消苛捐杂税。

△　段祺瑞令改呼伦善后督办为道尹。

△　孙岳自郑州通电，主张胡景翼、憨玉琨双方派遣全权代表至偃师开会，协商解决办法，定于5日各自撤兵，第一步憨军退新安、渑池，胡军退汜水。

△　安徽省长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王揖唐抵京，当日对记者发表谈话，略谓：本人赴任之际，本带有接洽长江各省之任务……此次赴京述职，经行赣、鄂、豫、晋等省，于各当局感情固极融洽，闻见亦

极翔实，各省拥护中央之诚意及诸种实况，亦应为之通达。

△　汉口英租界人力车夫为徐典案派代表赴交涉署请愿，被英巡捕捕去六人，激成罢工。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及汉口学生联合会等工会、团体纷起援助。车夫工会代表提出释放被捕者；严办凶首；抚恤徐典家属等要求。英租界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所提条件。越二日，斗争胜利结束，车夫一律复业。

3月4日　　滇军将领杨希闵、范石生、胡思舜、廖行超等在广州谢庐开会，研究对唐继尧作战计划。

△　四川军务帮办刘文辉亲率九师全部由叙永赴自流井布防。6日，刘通电指责杨森独占兵币两厂，睥睨一切，日事挤防锄异，添兵自流井，更图一逞，破坏和平。

△　驻京日使芳泽答复北京临时政府上月11日关于日俄协定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之抗议，声称日在满洲所得之权利，业经中国于1905年中日条约承认，“不受中俄两国间任何协定或争议而蒙受影响”。

3月5日　段祺瑞令蒙藏院副总裁沈学范辞职，以莫德惠继任。

△　胡汉民特派大本营参议廖仲恺驰赴东江前线劳军，并勉饬东征联军“务各努力前进，扫清余孽”。

△　胡景翼致电北京临时政府称，此次河南战事，憨玉琨首先开衅，请处刘镇华以擅离职守罪，治憨以拥兵犯顺罪。同日，憨玉琨亦电京指责胡景翼进占其撤退地区，要求下令讨伐。

△　刘镇华电告北京临时政府，孙岳所部两团业已加入战线，祈迅电制止。

△　唐继尧通电称，已令黔境滇军全部开拔，克日直趋武汉。

△　上海总商会致电善后会议，以全国现时兵多财匮，四民失业，请该会一致督促卢永祥废督裁兵通电，立予施行。

△　湖南省议会开会，议员查询吴佩孚抵岳阳真相。次日，议长欧阳振声向大会转达省长赵恒惕答复：一、吴若个人来湘，似宜不加干涉；二、吴若带有武装兵舰，须一律解除。7日，长沙学生联合会通函各处，请解除吴之武装，共同驱吴。

△　北京《民国日报》创刊。该报系国民党主办，邵元冲主编。18日京师警察总监朱深突派警察多人到社，以该报对当局举措有指摘处，勒令停版。次日，该报被封禁，编辑三人并被羁押警厅。

3月6日　　段祺瑞任命石敬亭为暂编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蒋鸿遇为暂编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　孙岳致电段祺瑞，指责刘镇华弁髦中央命令，助憨攻胡，妨碍偃师和平会议，有意破坏大局。刘亦电政府，攻讦孙以所部助胡作战，要求制止。

△　苏联大使加拉罕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苏俄曾于1921年派兵入蒙，以平白匪，现“业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开始由外蒙撤兵，目前业已撤尽”，并望中国乘此时机，解决中蒙关系问题。

3月7日　　段祺瑞令安徽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兼苏皖鲁豫四省剿匪副司令李传业调京另候任用，该旅部着即裁撤，所属两团派新任淮泗道尹唐启垚切实编练。又令安徽陆军五旅减额二成，着即择地屯垦，实行兵工，派新任淮泗道尹唐启垚总办其事。

△　建国军潮梅第一路司令周潜在潮阳附近举义，截击陈炯明、洪兆麟败军，配合东征右路军进攻汕头。是日，张明达师占领汕头，许济旅占潮安。10日，汕商会开会欢迎东征军，许崇智莅会演说，声称：此次东江战事有俄人参加，非行共产，共产实不适于中国；吾人

所为系民族革命，非社会革命。

△　胡景翼军攻占黑石关及偃师。

△　张作霖宴请中央暨各省赴奉为其祝寿之代表，并发表演说，略谓：段公（祺瑞）为予拥护出山，此后当负完全保护责任，使中央政府威信日重，一切政治，日即整饬；其有破坏大局，扰乱治安，为南北统一前途之梗者，誓必以全力铲除之。此予区区之态，夙夜耿耿在心，堪为诸公告者也。

3月8日　　冯自由、张继、乔义生、于右任、张知竞、卢师谛、邓家彦、徐谦、褚辅成、刘成禺、梅光培、黄大伟、朱卓文、彭养光、于洪起、李书城、吕复、贺之才、郭泰祺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是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成立大会，通过简章七章29条。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冯自由出党。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各省，否认北京俱乐部，宣布“与本党毫无关系”。

△　胡景翼所部岳维峻军樊钟秀、邓宝珊两旅攻入洛阳，刘镇华、憨玉琨军弃城溃逃，岳维峻到洛阳维持秩序。

△　陈炯明副官邓达材在沪对记者发表谈话，略谓：此次东江之战失败原因，在于内部不协，行动迟缓，军心涣散，且有蒋介石之教导团军纪极佳，作战勇敢，对敌作战先演说共产主义如何好，克服的地方即宣传共产，设立农民协会等。

△　驻粤滇军将领杨希闵、范石生、胡思舜联名通电声讨唐继尧“压迫邕宁，阴图两粤”。

△　刘湘电令杨森、刘文辉饬各部谨守原防，不得驻兵自流井，关于盐款分配即拟适当办法。杨、刘双方遵令撤兵。

△　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华妇女协会等20余团体开会纪

念国际妇女劳动节，到1300余人。会议提出“争回人格”、“同等教育”等口号，指出妇女同胞最迫切的奋斗工作为力争妇女参加国民会议。同日，广州工人万余人，女学生千余人亦集会庆祝，并发表通电。

△ 甘肃“陇南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天水开成立大会，陇南镇守使代表及各校师生共1500人到会。

3月9日 新任东南大学校长胡敦复到校就职，遭该校学生、教授拒绝，胡及其弟刚复均被殴。14日，东大学生维持学校委员会成立，声明拒绝胡任校长。24日，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派王家驹、洪逵前往查办，27日到达南京。

△ 重庆木工二万余人罢工示威，反对联合办事处抽木工注册及手续等费，至18日，市公所被迫撤销联合办事处和征费。

3月10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六次大会，出席会员不足法定人数，改开预备会，亦未按原议程开议。任可澄以开会将近一月，河南战事仍未制止，动议休会。旋由陆军次长贾德耀到会报告河南战事可望和平解决，任案遂自请取消。江亢虎等提出善后会议职权问题。赵恒惕代表钟才宏发言，阐述联治案之五项纲要。

△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开第一次正式大会，通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

△ 广州大本营发表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略谓：“本党目的在实现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现在有群众力量以拥护之，故本党主义实建在群众基础之上。”并表示“本政府为实行历史上之使命，谋最大多数人民之最大幸福起见，对于农民利益自当竭力拥护”。

△ 是日，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从广州乘广九路车出发，12日

抵达梧州。临行致电孙中山、胡汉民称，此行旨在固粤援桂除奸。

△　湘省议会开会，议员周荫棠等就熊克武部川军进驻湘西事提出质问。

△　倪道烺教唆杀人案，经司法总长章士钊呈请将倪免职，是日段祺瑞指令着倪道烺暂行停职，凤阳关监督职务由安徽省长遴员代理。

3月11日　孙中山午后召见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宋子文、孙科、邹鲁、吴稚晖、何香凝、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嘱咐后事，并在遗嘱上亲笔签字。

△　班禅额尔德尼赴执政府晤段祺瑞谈蒙事，略谓：外蒙为中国领土，现在驻蒙俄军自动撤退，此正我国收复外蒙之机会，请速与驻京俄使加拉罕交涉一切，俾我国对于外蒙得完全行使其统治权。对于藏事，亦有所商议。

3月12日　孙中山于是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在未安葬前，先将灵榇暂行安置中央公园社稷坛。北京临时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三日，派柏文蔚、王耒为治丧代表，“所有饰终典礼，并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意”。

△　孙中山北京治丧处成立，由于右任、吴敬恒、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汪精卫、邹鲁、孙科、林森九人组成。同日，胡汉民发出通电，宣布广州组织孙中山哀典筹备委员会，推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古应芬、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邓泽如、吴铁城11人为委员。

△　善后会议发出通告，以孙中山逝世，13日例会停开，用志哀悼。

△　廖仲恺奉命赴东征前线劳军，是日抵汕头。

△　段芝贵在天津病死。22日段祺瑞令陆军部给予治丧费5000元，并派员前往致祭。

△　龙济光病死。14日段祺瑞令以上将例优恤，给银5000元治丧，并派卫兴武前往致祭。

3月13日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唁电，哀悼孙中山逝世。略谓："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孙中山的遗训永垂不朽！"

△　各国驻京公使前往行馆吊唁孙中山逝世。驻上海、广州各国领事亦往灵堂吊唁。

△　驻河源、老隆（属龙川县）之林虎部刘志陆、黄任寰、王定华等股约8000人，由五华、河婆分鲤湖、棉湖二路进击联军右路之背。蒋介石令张明达师守潮汕，许济旅及教导一、二团回师揭阳迎敌。是日晨9时半，教导一团遇敌于棉湖一带，激战至正午，渐不支，许济旅、教导二团赶至，战局始转稳定。此时陈铭枢旅及警卫军已达河田，蒋令速攻林军之背。林部前后受敌，不敢再进，战至午后3时遂向五华、兴宁退去。此役东征军死伤千人以上，教导一团伤亡尤重。

△　河南省108县公民代表张干臣等向北京临时政府呈控前省长李济臣及督理张福来在豫祸国殃民，私吞肥己，"去年直奉作战共勒款三千余万元，征收十四年钱粮七百余万"，直系失败后，携款潜逃，隐匿汉口租界，逍遥法外，要求政府派员赴汉将李济臣、张福来在豫勒捐各款及家产查抄或作公款或还民间。

△　桂林48个法团通电声讨唐继尧率兵犯省，呼吁李宗仁"厚集兵

力，实行驱逐”。

3月1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悼孙中山先生》，号召“全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　驻沪苏联领事馆召集旅沪侨民及家属200余人追悼孙中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派代表出席。

△　段祺瑞召见四川刘湘、刘成勋、邓锡侯所派参加善后会议代表，嘱转告川省当局停止军事行动。

△　胡汉民电告东江前线各军，勉以“墨从戎，乘胜长驱，力翦凶仇，以报孙大元帅”。

△　唐继尧以联帅名义委林俊廷为粤桂边防督办，是日林在南宁通电就职。

△　张作霖为胡、憨战争致电段祺瑞，责段袒胡。次日，段特派王揖唐赴奉向张解说。

△　刘镇华电告北京临时政府，已遵令退至陕州，请制止胡景翼军追踪。同日，刘在陕州召集军事会议，决编残部为六个联队，分三路再图夺取洛阳。孙岳遵政府令派代表赴陕州与刘再商量和解办法。

3月15日　　孙中山遗体由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以便永远保存。是日，手术完毕，上午10时在医院大殓。

△　中国共产党电唁国民党哀悼孙中山逝世。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加倍努力，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　江苏省长韩国钧致电段祺瑞，以上海高昌庙、龙华两兵工厂

原由苏省拨款创办，现既已奉命停止军事工作，听候改组工厂，请将两厂准由苏省处分。

3月16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七次大会，因会期已满，决定延会20日并休会两星期，以便将重要各案开诚协商。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长江庸报告审查《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因人数不足，时常流会，未有成绩，议决改由各专门委员联合审查，限两星期报告大会。最后讨论政府所提出之《拟依法团委员请求修改条例案》时，奉天代表与西南代表发生冲突，由会员调停结果，请政府酌量自决。

△　全国省议会联合会在京正式成立，暂设事务所于京兆区省议会。该会由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发起，有17省议会参加，通过简章八条。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王九龄赴部就职。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及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代表百余人，至教部阻王到任。段祺瑞闻讯大怒，面谕教部次长马叙伦查明严办，并由警察总监朱深率武装警察护王到任。

△　香港全体华工工团总会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参加团体工会100余个，15万人，是日工人停工一天，商店停业一天志哀。

△　闽督办周荫人派员与陈炯明、洪兆麟接洽，指定云霄、诏安为粤军驻地，并电告段祺瑞。

△　云南大理一带大地震。15至17日，大理、下关、凤仪、宾川、祥云、弥度等地房屋倒塌无数，灾民露宿，土匪乘机抢劫，损失惨重。4月11日发生第二次强烈地震。

△　北京临时政府公布十四年八厘公债条例，总额为1500万元，以停付德国赔款之余款为担保，期限十年，每百元实收90元，周息八厘，第四年起开始偿还。4月1日起发行，作为支付中央紧急政费及领

使经费之用。

△　胡汉民令：建国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呈称奉令率部赴桂讨贼，派该部总参谋长李宗黄留守后方代行军长职权。

△　北京公民通信社于13日所发《刘镇华助憨之原原本本》通信稿中，揭露某大公子受刘贿30万元。段祺瑞之子宏业以“影射本人”、“妨害名誉”之罪名，向警察总监指控该社。是日，该社社长陈爱尘被捕。

3月17日　广州各界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是日至19日，各界分别前往致祭，前后共有20余万人参加。

△　善后会议开休会后第一次谈话会，商订分组办法，结果分法制、军事、财政三组。18日至26日，又开五次谈话会，就军事、财政等案分别交换意见。

3月18日　唐继尧乘孙中山逝世之机，图谋进据广东，是日在滇就副元帅职。次日并通电宣布就职理由，略谓：“……尔时军国大事，夙赖大元帅主持，未便遽膺崇秩；今不幸大元帅在京逝世，一切未竟之主张，皆吾辈应负之责任，用遵咨电，于三月十八日在滇就副元帅职……”

△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致函许崇智驻省司令部，声称：“现值军事时期，本部有卫戍之责，所有各军后方留守部队，均应由本部检查，贵军亦应援案检查。”次日，又令饬前线各军不许回广州，否则缴械，并令赵成梁师在白云山架大炮控制，近郊要隘均驻滇军。

3月19日　11时，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移殡中央公园社稷坛，送丧者达10万人。

△　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议定孙中山饰终典礼，并拟举行国葬。是日，段祺瑞指令准如所拟办理。

△　越南河内华侨午后1时在粤东会馆举行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各界停业一天并下半旗志哀。

△　东征联军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击败五华城守军林虎部王得庆师，于是日上午9时占五华城。教导二团及陈铭枢旅冒雨进攻兴宁，次晚8时攻克。林虎部受重创，向东退走。联军乘胜向梅县追击。23日，梅县林军弃城而逃，遂占领之。

△　刘镇华、憨玉琨、张治公等分三路在新安、洛阳间向国民军发动反攻，张治公部一度占领龙门和洛阳车站。国民军第三军加入战斗，孙岳、岳维峻、樊钟秀等在前线指挥，张治公等不支败走。

△　岳维峻师攻占渑池、观音堂。21日，胡军李虎臣部抵陕州。

△　冯玉祥代胡景翼致电北京临时政府，请任命孙岳、岳维峻分任陕西军务善后督办、帮办。旋由府复电拒绝。

△　唐绍仪对远东通信社记者发表谈话，鼓吹联省自治。略谓："余以为中国区域之大，省分又多……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并认为五权宪法之作用不及联省自治。

3月20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据密报称，北京大学共产党密议在京师中学以上各校发展学生入党，是日训令各大学及京师学务局严行防范。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以唐继尧入侵广西，通告国民党军人一致声讨。

△　唐继尧、赵恒惕以西南代表所提联治各案善后会议未予重视，是日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善后会议代表，略谓："为拨乱反正，救亡立国，以求真正和平，永久统一，舍联省自治外，实无第二途径"，要求会议"一致主张，促成大计"。

3月21日　胡汉民、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伍朝枢、古应芬发表宣言，哀悼孙中山逝世，并声明在国民会议未实现，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一切制度设施，“仍敬谨赓续孙大元帅成规，戮力同心，并期有以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

△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农商部报告：浙江省长夏超电称长兴煤矿公司前因江浙战事，损失500万，要求政府完全赔偿，并请从速拨给，以便恢复营业。议决以中央财政万分竭蹶，电复夏省长请其自行解决。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六十九次会议，廖仲恺主席，通过《本党对联治派决议案》，声明联治主义与本党根本不相容，应予防范，并揭露联治派军阀受帝国主义者利用，“阳假联治之名，阴行割据之实”。

△　段祺瑞派陆徵祥为国际保工大会第一委员，严庄为第二委员。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与驻京法使玛太尔面商拟定解决金法郎案办法草约。

3月22日　刘镇华反攻失败，陕西吴新田、井岳秀等在潼关断刘后路，刘退入山西运城。是日，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引咎辞职，次日通电下野，并电府保吴新田督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孔繁锦为省长，柴云陞为帮办。

△　美国纽约中国留学生及华商在万国学生会组织孙中山国际大追悼会，各国人士前来致祭者1000余人。4月12日，美国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华侨亦分别举行追悼活动。

△　上海女界各团体、学校代表百余人开女国民大会，向警予主

席。会议宗旨为争取女权，反对现时公布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不赋予女子选举权之规定。

△　哈尔滨戊通公司开股东会议，以历年赔累，万难支持，宣告破产，但因国家航权关系，议决三种结束办法：一、招商接收；二、政府接收；三、省政府接收，由总经理王渭生等全权办理。

3月23日　　上午11时，国民党北京市全体党员1500余人，齐集中央公园社稷坛致祭孙中山。

△　广州各团体开孙中山追悼会筹备会，廖仲恺出席，报告中央党部议决三项：一、改香山县为中山县；二、通告海外各党部购飞机20架；三、在西瓜园建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募集建筑费50万。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定下月12日在第一公园举行追悼大会。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永定河工督办熊希龄与外商汇理、汇丰、正金、花旗四银行签订借银元28万元合同作永定河修浚借款用款。年息10％，期限半年，以汇理银行所存盐税担保（合同借款额为70万元，其中有五家华商银行参加，以上数额为外国银行承借之款额）。

△　陈炯明率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援助之“海筹”、“永绩”、“楚安”三舰由东山岛出发，是日抵汕头港外，配合林虎部反攻。25日晨，“海筹”舰截获东征军之“永福”舰，舰上所载人员连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均被俘往东山。26日，许崇智致电杨树庄严词诘问，请饬“海筹”舰立即交回“永福”舰，并派代表赴厦与海军当局交涉。4月10日厦门海军将“永福”舰及舰载人员释回。

△　张作霖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东三省国防军共编18个师，李景林、张宗昌、阚朝玺、张学良、赵恩臻、郭松龄、高维岳、蔡平本、汲金纯、齐恩铭、汤玉麟、裴春生、张九卿、张作相、于深澄、万福麟、吴俊陞、穆春分任第一至第十八各师师长。

△　北京印刷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27家报纸停刊。

3月24日　北京临时政府全体阁员及政府文武官员百余人齐集中央公园往祭孙中山，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段祺瑞主祭。

△　台湾各界在台北开会追悼孙中山。大会由台北有志社发起，台北青年读书会等团体共5000人到会。大会冲破了日本当局施加的种种压迫，情绪悲壮感人。

△　段祺瑞令：胡思义因公来京，江西省长着李定魁暂行兼护。

△　胡汉民任命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刘棱为建国川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周朝武为建国川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周燮卿为建国川军第六混成旅旅长，田义卿为建国川军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义卿为建国川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　胡汉民致电杨希闵，促进兵河源、老隆，肃清残敌，并令韦寇英军速攻惠州。

△　孙岳以陕、豫两军冲突可告结束，电北京临时政府陈述河南善后办法，主张将溃兵散匪运送边地屯垦畜牧。

3月25日　段祺瑞据外交部报告，法、比两国公使要求设法恢复陇海铁路原状，是日，电令河南督军胡景翼制止军人阻碍路政，一面派陇秦豫海铁路会办章祜赴河南会同办理。

△　北京外交团及政府各机关、学校前往中央公园致祭孙中山者达两万余人。

3月26日　福州惨案。福州学生界为抵制美国进口鱼倾销市场，与鱼商发生纠纷，省长萨镇冰下令惩办为首者。31日，警方捕闽江中学学生两人。4月2日，男女生900余人往警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6日，警方又拘捕学生四人。7日学生往省署请愿，遭军警驱散。8日，

各校学生数千人，往省署，萨镇冰下令开枪，打死七人，伤数十人，造成“福州惨案”。同日，福州学生联合会发出急电求援。

△　汉口英国烟厂硚口新厂工人因反对工头虐待并无故开除工人，举行罢工，发表罢工宣言，要求开除为首之监工，以后不得打骂工人和重罚工人，在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复照驻京苏联大使加拉罕，略谓：张宗昌部下有俄兵一队，数约三四百人，皆已加入中国籍，但无在沪补充白党入伍情事；并谓：中国陆军有此一队，查与中俄条约无甚抵触，一俟大局平定，立即遣散。

△　云南省昆明市各界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全市下半旗志哀。

△　北京临时政府总税务司安格联请假启程回国。

3月27日　北京各界市民前往中央公园致祭孙中山，各方人士前往瞻仰孙中山遗容者络绎不绝。自24日至本月31日止，签名来宾达746823人。

△　段祺瑞派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对于卢电请定军制、划军区及先废苏督一节，许以容后“再当参酌办法厘定推行”。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七十次会议，议决反对唐继尧就副元帅职。

△　是日，沈鸿英军沈荣光部又占桂林，粤桂联军分二路进攻桂林，沈军不支，向义宁（今五通）、龙胜溃退，遂将桂林收复。15日又占龙胜。

△　段祺瑞派韩建铎赴豫与胡景翼、孙岳交换解决豫、陕善后问题意见。是日，韩电告执政府军务厅，报告达成五项办法：一、请准

刘镇华辞职；二、由胡景翼禁止豫军西进；三、胡景翼通电全国停止军事行动，服从中央；四、请以吴新田督陕，孙岳为省长；五、大军过后，河南土匪由胡、孙负责剿抚。

△　胡景翼部收复灵宝。

△　湖南省议会通过主张宣布武力驱逐川军出湘西议案。28日，又议决致电唐继尧劝阻滇军唐继虞部假道北伐。

3月28日　全国省议会联合会宣言，宣布成立理由四端：一、督促各省制定省宪；二、代国会纠正中央行政之流弊；三、调处各省争执；四、辅助政府从事和平运动，力劝各区实行自治。

3月29日　胡景翼下令班师，潼关、陕州各留驻一旅，余均撤回洛阳。胡憨战事结束。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以阳历3月29日为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是日，广州各界10万人往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　淮阴西坝盐工一万余人，为要求增加搬运盐斤工资举行罢工。4月3日，罢工取得相当胜利复工。

3月30日　东征联军在兴宁县北门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各军将士及地方各工农学商团体5000余人参加。

△　段祺瑞派王景春代表政府暨京汉路出席万国铁路协会第十次会议，并参与英国铁路百年纪念典礼；另派黄赞熙代表陇海路出席。

△　段祺瑞令督办浦口商埠事宜吴鸿昌免职，以李国筠继任。

△　段祺瑞令准免江南造船所所长刘寇南本职，以王齐辰继任。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七十一次会议，决定将香山县翠亨乡孙中山故居，永久保存。

3月31日　胡汉民派蒋介石兼理陆丰、海丰事宜，任命许济为建国粤军第四师师长。

△　善后会议开第八次会议，讨论军事案。议决将政府《收束军事大纲案》承认其大体，以原案与修正各案共17起并交军事专门委员会审查，限五日提出审查报告。

△　浙江督理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通电发表废督裁兵意见，并提出将各省军务督办及师、旅长同调邻省，三年任满，必再更调；军队由陆军部订定检阅兵械条例，由各省派军官会同法团代表检阅，核定各省军额，分别遣留。

是月　东征联军占汕头后，广州大本营即接管当地盐政，另委盐务稽核员。有关各国领事提出“抗议”，并派兵一队登陆。嗣胡汉民所派稽核所长唐三省前往接事，为原任外籍所长卢列所拒。汕头领事团函许崇智，声称原任所长系奉京都命令而来，如无京令，除以兵力外，该所长不能交卸，汕政府应派兵保护，否则领事等将替汕政府执行此项任务。

4月

4月1日　河南省议会在开封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胡景翼主持大会，军、政、学、商、工、农各界五万余人参加。

△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第八次大会，出席50余地区代表。

△　安徽陆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以督办王揖唐将第二旅旅长李传业免职，并惩办凤阳关监督倪道烺，拒绝王氏回任，是日电请北京临时政府将安徽督办一职明令废除，皖省军队暂归苏皖宣抚使卢永祥节制。后卢永祥致电段祺瑞，谓已电皖军人安其本分，至废督之事，应

听政府计划，彼等未便干预。

△　王揖唐离京赴皖，3日自徐州南下，得皖军拒返通电，复回徐商准奉军派两连随行，一面派人向皖军疏通，谓彼来不问军政。4日，王始抵蚌埠。

△　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奉令兼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是日在宁接印视事。

△　段祺瑞派唐在复为意大利万国农会大会全权代表。11日，复派为国防保工大会第一委员，陆徵祥因病开去国际保工大会第一委员职。

△　段祺瑞任命张克瑶为山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　驻京英、美、日、意、葡、比、西七国公使照会法使，对金法郎案提出质问，略谓：庚子赔款用纸用金，各国均有关系，向来交涉由八国联衔，反对法国单独与中国政府解决金法郎案。

△　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在参院开会，通过反对金法郎案。宣言声明：在此民意机关不能行使监督职权期间，无论何人当国，对法政府无理之要求，苟不断然拒绝，甚或悍然承认，其所决定之契约，绝对无效。

△　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制定《管理新闻营业规则》，凡12条。其中规定：凡开办报馆须具两家铺保；学校学生不得充报纸、通讯社经理人、编辑人、发行人、印局人；凡核准之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载新闻、言论，须遵照出版法。

4月2日　　午前11时，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社稷坛移厝西山碧云寺。市民30万人步送至西直门，万人送至西山。午后4时25分，灵柩到达碧云寺，5时30分举行公祭。是日，北京各机关一律下半旗志哀。

△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以金法郎案卷宗交司法部审查有无损害国库、触犯刑章之处，以便进行。6日，司法总长章士钊呈段祺瑞称，修正条文审查完竣，“均于我国有利，视原协定确有进步”，新协定全文“稳妥无疵”。

△　憨玉琨因战败仰药自杀。

△　胡汉民令裁撤梧州善后处。

△　安徽陆军第五旅全体军官通电声明支持倪朝荣废督主张。同日，宪兵司令程文源亦通电声明：“自今日起，谨率全体官兵随倪旅长归卢宣抚使节制。”

△　沈鸿英残部因李宗仁、黄绍竑部东下与唐继尧接战，乘虚入桂林。12日，李宗仁部克复桂林，沈军向义宁退去。

△　唐继虞以滇军北伐有协助邻省自治之作用为由，致电湘省议会为其假道湘境行为辩解。7日，湘省议会驳复唐电，催其出境。

△　北京全国省议会联合会通电要求各省区速制省宪，实行自治。

△　驻京法使玛太尔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告以法国政府对中国施行海关附加税以赈水灾之事，予以赞同。

4月3日　　善后会议开第九次大会，讨论财政案，议决：一、段祺瑞所提整理财政大纲案、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及会员修正案共九案，一并交付财政专门委员会审查，限五日内报告大会；二、咨达执政府请电各省区军民长官及各军将领限期报告最近财政军政情形。及至开议《宣布历年所欠内外债确数及其用途为整理财政之先决问题案》时，以在场会员多退席，人数不足，宣告延会。

△　北京临时政府秘书厅致电王揖唐，申斥皖省陆军第一混成旅

旅长倪朝荣等通电“越级妄言”，令其“传谕申诫”，“查询真相”。

△　段祺瑞指派驻西班牙公使刘崇杰为与委内瑞拉国签订通好条约全权代表。

△　冯玉祥致电驻京日使芳泽，指出：本月2日《顺天时报》“所载张冯不协”，“奉军增驻廊房，敝军移驻丰台”，显系“挑拨各方意见，致中国于危亡”，要求转饬该报馆，关于军国大事“不宜捉风捕影，致淆视听”。

△　熊克武致电湖南省议会、各工团，请顾念大局，解释疑虑，协助联军取道湘西移防。

4月4日　　日政府派外务省事务官朝冈来华签订中日文化协定，是日，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王九龄宴请朝冈，协商支配庚款办法。7日，阁议中日文化协定问题由教育部与朝冈协议，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交外交部核议。

△　“皖事改革促成会”、“安徽青年自治会”通电历数王揖唐五大罪状，要求皖省3000万父老兄弟共驱“此洪宪帝孽，安福罪魁，民国蟊贼”。

△　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陈柏年等发表致世界国民革命同志书，说明促成会之目的在于督促国民会议之早日实现，希作援助之鼓吹，相资提携。

△　湖南外交后援会为金法郎案召集各公团联席大会，通过致段祺瑞电，敦促向法政府严重交涉，拒绝签字，否则湘民“誓死与祸国殃民者作最后周旋”。

△　胡汉民任命蔡巨猷为建国联军湘军第六军军长。

△　许崇智部第二师师长张明达自松口（属梅县）搭民船赴汕。

次日，抵潮安城，船行至湘子桥下，因江水湍急，船覆，张遇难。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聘马君武为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张明伦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　赵恒惕通电主张裁兵，以联治建国。

△　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为据全国商会联合评议会主席安迪先呈，以湖北蒲圻羊楼洞采办茶砖销行蒙、俄、回、藏，运输停滞，茶砖壅积沿途已半年之久，请设法疏运一事，训令京汉、京绥两铁路管理局局长，务于最短期内陆续运竣。

△　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为响应北京新闻界废止出版法运动，特开联席会议，议决分电执政府、法制、司法、内务各院部，请即废止出版法。9日江苏教育会，14日南昌新闻界及汉口新闻界，亦先后响应。

4月5日　　黄埔军校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到会官兵及农民协会会员共4000余人。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主持会议。蒋介石发表演说。

△　皖省反王揖唐军人秘密开会，决定：一、派代表向卢永祥请愿，皖军始终拥护卢宣抚；二、派员向京、沪同乡要求，请一致主张废督。

4月6日　　善后会议开第十一次大会。续议《请宣布内外债确数及用途案》，经修正为《咨达政府请宣布历年所欠内外债及其用途并偿付各国庚子赔款之年限及方法问题案》。提案要求“务使历年举债之内幕，和盘托出”，“以为将来承认与否之标准”；否则“今侈言整理财政，而不注重财政之先决问题，无论如何提案，决不能引起人民之信仰”。《规复外蒙案》、《整理江苏财政案》，均可决。末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由提案人褚辅成作长时间之说明，会员多

退席，人数不足散会。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七十三次会议，根据廖仲恺提议，通过建立党军案：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成立党军，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编为党军第一旅，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兼任旅长，第二团团长为沈应时。全旅仍归蒋介石节制调遣。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此议决案。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长廖仲恺，以潮、梅各县已克复，是日致电汕头许崇智、蒋介石，指示：应乘此时机，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以拥护农民之利益，而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

△　前广西督军谭浩明在上海寓所为其仆人枪击身死。

△　湖南省议会开会，经议员临时动议，议决致电段祺瑞反对金法郎案签字。

4月7日　　善后会议开第十二次大会，讨论《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由审查会代表报告审议经过，议决即以审查报告交付二读。

△　湖北全省各团体在武昌首义公园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大会进行三天，参加者达10余万人。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设立临时参政院，以辅佐执政。又以据香港电传，杨希闵与胡汉民交哄，胡有避居沙面之说，决定分电沪、港随时查报实情，一面并与各方协商应付方针，以便相机处理。

△　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全国反对金法郎案，略谓北京政府当局，“不顾国家重大损失，竟欲变相承认，此案关系全国民众利益……必须留待国民会议，依人民公意以为解决”，吁请共同主张，监督政府；同日并致电段祺瑞要求执政府停止进行此案。

△　梁士诒由京抵奉，与张作霖密商组阁事宜。

△　全国私立大学联合会假北京民国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文化大学等10余校代表30余人，决议：一、通函京外各大学，请速加入；二、通知在京各私立大学速推代表一人组织委员会。

△　驻京英代办白拉瑞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云南、缅甸边界土匪迭次扰乱，英人所受损失约数十万，驻滇英领曾向唐继尧要求赔偿，迄无回复，现奉伦敦训令，须请中央政府赔偿，附抄英领所开损失清单，希查照见复。

4月8日　　北京因金法郎案解决已有头绪，是日由外交部照会驻京法使玛太尔，要求法国政府早日批准华盛顿协定，以便克期召集关税特别会议。次日，法使复照称：法国政府允即将该协定速交议会通过，并设法使关税会议速行召集。

△　唐继尧委桂军刘震寰部第三师师长黎鼎鉴为援桂联军前敌指挥官，是日黎在桂林布告就职。

△　刘震寰与唐继尧结合，准备回桂，所部发表宣言，指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讨唐之不当。

△　“皖民自觉会筹备处”通电，指出皖军人倪朝荣等通电，“显系本省失意无耻政客欲扇万恶倪氏死灰而扬其焰，以自绝于皖人”，要求皖人一致声请执政府将皖系余孽倪朝荣等免职严惩，并将其所辖军队全体裁汰。

△　山西人景定成通电全国，宣布已受同志委托任国民军第六军军长，建军宗旨，“意在扫除障碍，扶持平民自治”。并已于本月3日刊布关防就职，设办公处于洛阳。

4月9日　　善后会议开第十三次大会。续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众以此案非本会应行议决事项，议决搁置。次议会员顾鳌

所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修正案》，未有结果。

△　杨森委所部第十六师王缵绪、郭汝栋、何金鳌、白驹、王正鋆、朱宗悫等六旅长为师长，并提吴行光等四人为混成旅长，黄毓成、李树勋为前敌总、副司令。11日，下令分路出发，对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三军防地采取攻势。

4月10日　善后会议第十四次大会，二读讨论《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主席以“第一章总纲”标题五字付表决，多数可决。又以第一条全文付讨论，无结果，即宣告散会。褚辅成等代表因所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被搁置，是日愤而退席。

△　河南督军胡景翼在开封病故，临终前致电段祺瑞，请明令河南军民两政职务由岳维峻继任。

△　东征联军右路粤军入诏安。吴铁城之警卫军克老隆。林虎残部全退赣境。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出通电，反对唐继尧就任副元帅，并历数其罪状，吁请全国各地同志一致声讨。

△　湘省议会开会质问赵恒惕对湘西川军办法，赵答称：“现政府已定办法，如熊（克武）部一周内出境，即不用武力；否则，政府为保全湘境治安起见，决不能再事容忍。”

△　赵恒惕委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为湘西前敌总指挥，是日叶在马迹塘行营通电就职。

△　段祺瑞电令杨森将兵工、制币两厂及盐款交川康督办刘湘平均分配。12日，杨森电复遵办。

△　段祺瑞特派王瑚为包宁铁路督办。

△　胡汉民任命罗翼群为东江剿匪督办。次日，又令罗翼群统率原有潮梅军各部队，克日开赴老隆、河源、龙川、和平等处肃清匪患，仍听粤军总司令节制调遣。

△　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日人冈本理治发起在大连成立“满洲币制研究会”。

△　王揖唐通电赞同滇、湘两省联省自治主张。

△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贵州分会以全省三分之二县份受灾，“灾区广袤三千余里，饥民多至二百余万，草根树皮掘食殆尽”，通电乞赈。

4月11日　　善后会议开第十五次大会，奉代表未出席，人数不足，改开预备会。开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修正案》及《确立联治政策为改革财军各政之标本，以解纠纷而谋统一案》，提案人顾鳌、钟才宏分别说明理由，会员发表意见，主席宣布已届散会时间，尚有会员报号未发言，不能为预备会之结果，不能据以报告下次大会。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通过金法郎案。段祺瑞据财政部呈请，指令外交部办理签字及换文事宜。同日，阁议散后，沈瑞麟、李思浩邀法使玛太尔面商换文事宜。双方约定，俟法政府复电后，中、法同时发表。

△　国民会议促成会开第十五次大会，赵士炎主席，讨论增加促成会组织大纲条文案及议决总会章程等项事宜。

△　段祺瑞令驻闽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旅长杨砥中免职，并褫夺官勋交海军部依法讯办。杨已先于9日在上海因拒捕被击毙命。

△　驻湘省常德、桃源之川军蔡巨猷、林支宇部向省军防地发起攻击，叶开鑫下令还击。

△　前陆军第十三师王怀庆旧部下级军官女眷约300余人，扶老携幼，手执白旗，群集执政府求见段祺瑞，请发欠饷，与守卫军警发生冲突，彼此混打，哭喊之声，不绝于耳。阁员见此情形，纷纷从后门溜走，执政府派员面见请愿代表，允于日内商议救济办法，请愿者始各散去。

△　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联电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载称，4月15日纳税外人年会特别会议将再次提出印刷物附律，此事关系主权，一经通过，必起纠纷，要求外交部主持。次日，又致函交涉署请劝告领事团勿表决印刷附律案。

△　驻京美国公使代表使团为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事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称，已通知各使饬令驻沪领事团按照实地情形，逐条详密研究，各陈意见，俟复电到京，再由使团根据讨论为此案采取适当之措置。

△　加拉罕为张宗昌部下白俄军队迄未解散一事，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严重抗议中国3月26日之照会，要求将遣散期限在中俄会议开幕前答复。

4月12日　中法金法郎案协定在北京签字，并正式换文。其要点为：一、法国政府承认将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自1924年12月1日起算。其1922年12月1日后24个月作为展缓期内所存过期未付之款，悉数交与中国政府。二、上项应付而已退还之赔款余额，按1905年所采用之中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一并折合美金，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债之担保。中法实业银行将收回远东债权人应得之债券，全数一次交与中国政府，作为偿还前次垫款之担保。三、中法实业银行发行五厘美金债票用途分配如下：1．发给远东借债人以票面换回此次债权人所存之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

代付中国应交中法实业银行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之各款。四、作为担保品之债券，应以银行自身之所得等项收入拨还。五、远东债权人所存之债券交与中国政府后，应与其他债权人享有同等利益。六、美金债票上所载文字及发行数目、票面金额，应照中国政府核定格式办理。七、中国政府以中法实业银行股东资格，派员检查该行帐目。八、关于1923年2月8日法国法律施行条件之规定，仍以1922年6月24日、7月5日、9日及27日两国政府之各项换文为有效。

△　广州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共到30万人。廖仲恺主席，胡汉民主祭。苏联加伦将军及廖仲恺均发表演说，激励群众继承遗志。正午全市停止工作，默哀五分钟。

△　上海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到400余团体，共10万人左右。唐绍仪主祭。宋庆龄、孙科等到会。何香凝演说，会后游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散发传单，发起以每年3月12日所属一周为“纪念周”，各学校设“纪念课”，各地发起“中山主义研究社”。

△　浙江杭州各界追悼孙中山，到会六万人，孙传芳、夏超等参加，会后游行。

△　福建各界追悼孙中山，到会约500团体，20万人。学生宣传反帝及三民主义，并散发反对周荫人传单。

△　旅英华侨各界在伦敦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到中外人士400余人，其中有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康氏在会上讲述当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情形。

△　国民党驻法支部在巴黎组织东方民族追悼孙中山大会，到800余人。15日，旅法华侨在巴黎工人戏院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会上通过致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鼓励国人速起革命，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中山事业。

△　日本东京华侨团体及国民党东京支部在青山会馆组织孙中山追悼会，日本政府犬养毅大臣、保守党头山满、海军中将森山庆三郎、陆军少将嘉悦敏等出席，驻日各国公使馆、华侨联合会、朝鲜人协会等团体送花圈。同日，日本横滨等地亦举行追悼会。

△　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执行部，以唐继尧勾结陈炯明等，企图破坏广东革命政府，请声罪致讨。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与中法工商银行签订借款美金4389.39万元合同，作换发中法实业银行所发无利息证券，及办理中法间教育慈善事业，代缴中国未缴清之该行股本及中国政府所欠该行各债款，月息5%，期限为23年，以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为担保。

△　杨森部何金鳌、白驹、范绍增等师分路向刘成勋军驻地进攻。14日，杨军占双流、温江、彭山等县。

△　全国女界各团体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到者250余人，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一致决议改本日各团体联席会议为“中国女界联合会筹备会”，推石道潘、夏之栩等30人为筹备员，分总务、文书等五股，以女师大为办事处。

△　成都商会总会、农会、教育会、国民协进会、警务协进会等团体发通电谴责川省军阀混战，川省迄无宁日。

△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恢复，并发表宣言。

△　孙岳派兵包围景定成在洛阳所设建立国民军第六军办事处，逮捕景定成以下60余人，解送郑州。章太炎、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等人闻讯，均电孙请速释景。次日，岳维峻在开封会见孙岳，请其将景送汴，旋又随孙赴郑，偕景到汴。

△　北京尚贤堂中外各教联合会约同各教代表及中外名流约五六百人在瀛台参谒班禅，并由李佳白、赵尔巽致词欢迎。班禅向基督教

徒演说因果报应。

△　广东水灾。粤省东、北两江大雨阅月，遂成水灾。东江惠州一带灾情更重，龙川、五华等地，因山潦骤发，平地水深三四尺，惠阳、平山等处附近数百乡村，尽成泽国。北江韶州城外村落悉被水患，庐舍田畴，淹没将尽。

△　段祺瑞派杨穆生慰劳林虎部队，是日杨抵港。

4月13日　善后会议开第十六次大会，续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通过第一条修正案后，奉、苏代表因反对该条例中规定宪法起草员由临时执政选聘退席，人数不足散会。西南代表因《改组临时政府》及《联省自治》两案失败，本日起不出席，并声言即将全体离京。次日，第十七次大会，续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除组织、审查、选举三项保留待会外协商外，其余各条均二读通过。

△　国民党驻京中央执行委员不顾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擅自在帅府园开会讨论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地点问题，丁惟汾主席。于树德发言力排众议，说明北京处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之下，无集会自由，应在粤开会，遭受阻止。丁为居正等威势所迫，唱付表决。石瑛、居正、石青阳、李烈钧、覃振、邓家彦六人赞成在京开会及否决广州中央委员会之议决案，王法勤、于树德、戴季陶、邹鲁四人反对。结果，在京开会案竟获通过。复次讨论不许共产党跨党问题，于树德愤而退席，众主下次续议。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永丰”舰改为“中山”舰，是日举行改名开幕礼。

△　国民党上海市全体党员追悼孙中山，到会6000人。叶楚伧领读宣誓，何香凝、恽代英等发表演说。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致电广州各军总司令，请讨伐唐继尧。

△　湘军第三师蒋锄欧旅击退蔡巨猷部，是日占据桃源。15日，一师贺耀组部郑鸿海旅占领常德县城。蔡（巨猷）、林（支宇）残部向慈利、辰州（今沅陵）退却。

△　杨森发出通电，称刘文辉、刘成勋“犯上作乱”，宣布“出师讨伐”，并请中央褫夺刘等官勋。

△　杨森部王缵绪、朱宗悫、王正鋆、郭汝栋等师分别向赖心辉部驻地资阳、资中等地攻击，赖部沿东道撤退，16日退内江，18日又撤至椑木镇。

△　杨树庄、卢永祥等电政府称，金法郎案已解决，请拨款发饷，偿还旧债。

△　上海书业商会、日报公会、书业公所、书报联合会发表抗议工部局印刷物附律宣言，指出附律超出工部局洋泾浜章程权分之外，中国人民言论自由权载在约法，不容限制。

△　旅京江西同乡会开全体同乡大会，到1000余人，发出快邮代电，指责省长文群自请增加军费1176万元，因年入税收不及千万元，乃擅发流通券160万，银行借款钞票500万，公债1200万，及南浔铁路、牛行商埠之抵押，盐斤加价，统税附税之带征横征，置3000万同胞于永劫不回之地，请政府明令罢免文群，任徐元诰长省。

△　段祺瑞公布《临时参政院条例》，凡九条。

4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

△　段祺瑞以王九龄因事请假，着章士钊暂行兼署教育总长。

△　段祺瑞令寿明阿晋封辅国公。

△　段祺瑞令给陆军上将河南督办胡景翼治丧费一万元，并派员

前往致祭。

△　岳维峻与孙岳在郑州开军事会议，议决：一、各军防区照议定办法分别驻守，财权、政权俟省长就职日一律收归省署；二、团结二、三军团体；三、豫西二军全部移驻京汉铁路沿线，开封三军一律移驻陇海路沿线；四、二、三军协同出兵三万，肃清刘、憨残部。

△　韩建铎衔段祺瑞命到鄂，与萧耀南晤谈。韩此行目的在请鄂省维持政府之现有地位，以谋对付联治派。

△　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组织演讲队，于公共租界、法租界、闸北、南市、西门等处向市民宣传反对工部局印刷附律及增加码头捐，听众达五万人之多，散发传单六万余份。

4月15日　善后会议开第十八次大会。开议：一、《收束军事大纲》；二、《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议决将第一案并于第二案内讨论，并将本案标题修改为《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全文共16条，连续二、三读通过。

△　四川省重庆市工农商学各界四万余人举行哀悼孙中山大游行，并组织57个讲演队到各街道宣传讲说。

△　陕西省西安市由国民会议促进会等17个团体发起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到三万余人，会后游行。陕西省其他地方亦举行悼念活动。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会议在南京路市政厅举行大会，唐纳爵士主席。通过工部局上年度报告帐略等，议毕后，继续开特别会议，讨论增加码头捐、印刷附律、童工条律诸案，以不足法定人数，未能开议。

△　段祺瑞令呢玛扎布封为辅国公，毕勒格图加辅国公衔。

△　段祺瑞令严禁兵匪滋扰商业，并着各省区军民长官切实整顿，从严查处。

△　胡汉民派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为财政委员会委员。

△　胡汉民任命欧阳琳为“中山”舰舰长。

△　李景林致电段祺瑞，要求任命刘岳为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

△　北京全国教联会、庚款委员会一致反对日本利用庚款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议决发起组织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大同盟。

△　滇东自昭通至马龙一带，突降大霜，田中豆麦伤残大半，宣威、昭通、鲁甸等属尤重。灾区之广较震灾10倍，以致豆麦一升售四元余。树叶尽脱，民无物可食。每日饿死者不下三五百人。四乡食人肉者，亦时有所闻。

4月16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到200余人。会议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声中闭幕。执委会即开始办公。

△　湘省常澧镇守使唐荣阳（林支宇之建国军副司令）通电宣布解职，所部交第十三旅旅长唐生明接收。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举行临时董事会，议决致电段祺瑞，以金法郎案损失国家财产，促成武人内乱，请即毅然撤废。

△　许崇智致电质问周荫人，对于分窜平和、永定、龙岩等地之洪兆麟残部，是否派兵缴械，抑系收容，请明白答复。

△　胡汉民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以

广东省长名义正式公告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

△　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令各警察官署，取缔秘密结社与私行集会。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265.993208万日元借款合同，作拨付电信、林矿借款利息之用，月息为1.2%，期限二年，以关税余款担保。

4月17日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顾孟馀、苏兆征、刘清扬、王乐平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议决出版会刊《国民会议》周刊，推刘鹤鸣起草办事细则，整理大会各种决议案等。

△　广东粤汉铁路工程、机车、车务三处工人为反对无故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提出起用去年12月以后开除之工人，裁撤不熟悉路务之私人冗员，机器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工人加薪等11项条件。次日，政府派员解决，工人要求得全部承认，于19日全体复工。

△　汉口教职员要求加薪未准，是日一律停课，教职员千余人举行游行示威。次日，汉口各校教职员宣布不负教管责任，并发表宣言，指出省财政厅长杨令康紊乱金融、摧残教育罪状。同日，萧耀南接见教职员代表，会商解决办法，并令财政厅按原拟拨发增加经费条件办理，欠薪分六个月支给，加薪由4月起拨付，教职员工取得斗争胜利。

△　段祺瑞以迭据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电控杨森独占兵工、造币两厂，派兵袭踞自流井，独提盐款，三路出兵等情，令刘湘秉公查办，严行制止。

4月18日　善后会议经16日第十九次、17日第二十次大会续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后，是日开第二十一次大会，《国民代表

会议草案》全文凡六章39条，均二、三读通过，宣告全文成立，咨达政府。

△　杨森军三面包围新津，刘成勋部困守无援，于次日向邛州退却，杨军何畴部进入新津。

△　滇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栋宴请广州报界，声明反对唐继尧就任副元帅，宣布三事：一、对革命政府誓死拥护；二、对广州治安，完全负责；三、请勿轻信谣言。

△　段祺瑞指令批准《督办中俄会议公署组织大纲》。

△　驻福建泉州孔昭同所部军队借筹军饷，增设苛税达40余种。是日，因勒迫捐款与乡团之乡民发生冲突。该军洗劫数十乡，屠戮百余人。22日，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各县2578乡乡团会及公民代表陈乃元等致电闽省旅沪同乡会，揭露兵燹惨状，吁请援救。

4月19日　青岛日商太康纱厂工人罢工。25日，日商内外纱厂、隆兴纱厂万余工人，亦罢工响应。经政府调解，日人让步，同意工人提出条件14项，于5月7日复工。

△　杨森部郭汝栋、白驹两旅进攻荣县第八师陈洪范部，双方激战半日，陈部不支，向铁场铺、文昌宫方向退却，郭、白两旅遂占荣县。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给银元一万元，赈济贵州兵灾。

4月20日　陈炯明部困守惠州之杨坤如与滇军胡思舜妥协，是日让滇军进驻惠城。杨之部下改编为滇军八、九两师，任命骆凤翔、钟子廷为该两师师长。第一次东征之役胜利结束。

△　善后会议开第二十二次大会，开议：一、《整理财政大纲案》，二、《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议决将第一案并入第二案

讨论。并将本案标题修改为《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条例全文凡16条，均二、三读通过。顾鳌自请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修正案》改为建议案，咨达政府。

△　段祺瑞派代表涂凤书、黄之鹏由渝电杨森，谓："川战循环不定，原因虽多，饷械分配实为一大问题，除盐款已明令刘督主持外，其竞争焦点之兵工厂，拟请仿照淞沪办法交商会接收，改为普通铁工厂或交刘督办管理，另设一军事委员会，平均分配，以示大公。善后问题，由刘督办召集会议实行。"杨复电愿将兵工厂交刘湘接收，以息纷争。

△　广州大本营议决，通电反对北京临时政府解决金法郎案。

△　段祺瑞令驻闽海军陆战队旅、团长各职，着即一律裁撤，规复旧制，暂归海军部总务厅直接管辖，其派驻京、外海军各机关局所者，即由该机关局所长官管辖，并着该部迅拟善后办法，呈准施行。

4月21日　善后会议举行闭会式，段祺瑞出席致颂词。

△　段祺瑞通电全国，解释金法郎案。宣称此次解决本案，"首在保全华会精神"，与法使磋商尽速批准华会条约，促开关税会议，一面另行考虑金法郎问题，商妥新协定，交财政、司法两部所派专门委员，悉心计议，认为"妥慎无疵"。新协定较之原协定"改善良多"。末谓，本案之解决，关税会议之召开，中国财政借此措之于稳固之基础，"理财本策，由是而施"。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布金法郎案文件：中法换文四件（内中法协定八条两件；中法实业银行两件），财政、司法两部呈文三件，指令一件，府秘书厅函一件，共计九件。

△　江苏省南京市各界人士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卢永祥、韩国钧、陈调元、冷遹、郑俊彦等均到会。何香凝在会上报告孙中山历史

及革命事迹。第二天继续进行，参加致祭者达10万人。

△　湖南省长沙市各界军民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军政机关致祭人数达12万。次日，各学校及240个公团举行游行，人数逾16万。悼念活动共进行三天，总人数达50万。

△　刘湘通令川康将领，务就原地停止静候查办，毋得擅开衅端。

△　北京外交团议决苏联大使加拉罕为使团领袖。28日，加拉罕正式接任。

4月22日　金法郎案收回款项，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汇丰银行商定分三期交款，5月10日交400万，20日交300万，30日交304万。

△　广州市珠宝、玉石、首饰各行业工人数万人，向省署及财政厅请愿取消奢侈捐，次日，胡汉民指示财政部暂缓执行。

△　李景林以直隶大名各属人民呈控前直系要人王毓芝、高凌霨、陆锦、王承斌、吴毓麟、张志潭、刘梦庚、赵玉珂等假借大选，搜刮民财，经电请张作霖核准，是日派人查抄该八人财产，赔偿去年奉天战费，并电执政府报告查抄情形。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新青年》改为不定期刊，本日出版第一号列宁专号。

4月23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公布金法郎案说明书，将中法协定与新协定比较，共列13项要点。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各级党部开展征求党员运动，期限为4月13日至5月31日，预定一万人。

△　唐继尧电复湘省议会称，已令绕道湘西之黔、滇军即日离

湘。

△　上海《民国日报》揭露段祺瑞勾结唐继尧内幕，略谓王九龄此次请假回滇，“确挟有段唐合作之条件，以征求唐之同意”。“其最要条件有四：（一）段接济滇军饷械；（二）唐以武力助段；（三）援杨希闵督粤；（四）援熊克武攻鄂”。

4月24日　段祺瑞特任岳维峻署理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郑士琦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张宗昌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姜登选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准免安徽省长王揖唐军务督办兼职；并令河南省长孙岳着速就职。

△　段祺瑞令公布善后会议议决之《国民代表会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

△　段祺瑞下令取消法统，略谓：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业经善后会议一致议决，咨由本执政公布在案。国是既定，众纷可理，主权还诸国民，法统已成陈迹。所望制宪大业，早日观成，民国议会，依法产生，长治久安，实多利赖。至未参加贿选之前国会议员，首倡正义，志切匡时，仍当与本执政共济艰难，力图建设，应如何特设机关，俾抒抱负之处，着临时法制院妥订条例，呈准施行。

△　西班牙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嘎利德向段祺瑞递交国书。

△　意、比两国以金法郎案解决，援例提出用金法郎偿付庚款。北京临时政府外、财两部各司长开联席会议，商讨对付方法，议决以意、比并未退还赔款，不得与法国同样待遇，仍按1905年电汇办法，用纸法郎拨付。

△　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成立。该会由陈诚、贺衷寒等人发起，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该会于12月29日始行成立典礼，其组织亦由黄埔扩展至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

4月25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财政、教育三部拟定《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中国方面外、财、教三部及国立北京、东南、广东、中法四大学各派代表一人为委员，与法国委员一人，根据中法协定管理中法教育事业基金并决定其用途。该委员会设于北京。同日，段祺瑞指令照办。

△　非常国会议员原定下午2时在参议院开会讨论反对金法郎案，因警厅派警察阻止入内，未能成会。5月1日，非常国会自天津通电反对金法郎案。

△　蒋介石赴汕头就潮汕善后督办职。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就对外、财、教三部所提日本退还庚子赔款办理中日文化事业一事，议决由中日两国合组总务委员会，与朝冈事务官协商办理。

△　刘成勋致电段祺瑞，指责杨森“无故兴兵，攻我部属，节节进逼，忍无可忍，乃督饬各部向前方痛惩”。又谓：“杨森月来分兵四出，川中各军靡不被其攻击，请执政褫职声讨。”

△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各省代表推举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14人为协会董事，推戴志骞为执行部部长。该会创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20余年。1926年又创刊《图书馆学季刊》，1937年停刊。

4月26日　北京“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大同盟会”开会，到工大、师大、东大、民大等高校，以及教育改进社各团体。会议指出，日本在中国境内办理文化事业，其实质乃使中国为其附庸，议决推代表赴交、教两部表示反对。

△　建国滇军杨希闵部数百人包围广州石井兵工厂，是晚攻占该厂。

△　杨森军攻占邛崃县。

4月27日　山东省各界在济南追悼孙中山，大会进行三天，参加致祭者达10余万人。全省下半旗三天，停止娱乐三天，以志哀悼。

△　段祺瑞特任邓本殷督办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善后事宜，申葆藩、黄志垣为会办。

△　旅京广东高雷八属同乡会赴京请愿团赴执政府请愿，反对分割粤境。呈文略谓“高雷八属隶广东省治，并非特区，邓本殷败走琼崖，割裂版图，誓不承认，请收回成命”。

△　刘湘电告段祺瑞，杨森违令不交出盐税，继续进攻各军，请段将杨调京，另拣贤员接任川督。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关税筹备处开会，决由外部通知华会各国派员参列中国关税会议。

△　班禅喇嘛离京赴杭州，30日抵沪，5月1日到杭，孙传芳、夏超前往车站欢迎。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到25省区代表，举奉天商会长张志良、吉林代表王文典、安迪生为正副会长。上海总商会因争副会长不得，对选举表示反对。

△　京师警察厅训令城郊警署，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五团体。

4月28日　是日至30日，江西省南昌市各界追悼孙中山，三天内共到三万余人。5月4日，又在顺外大校场露天举行追悼大会，五万群众冒雨参加，散会沿途高呼“打倒军阀！”“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意使翟禄第，请使团转饬沪领事团撤销上海印刷附律及增加码头捐两案，并声明如果将来沪领事团仍旧实行，中国政府断不承认。

△　唐继虞部陈泽旅进抵溆浦属之大江口，省军第五旅刘重威部前往防堵，与滇军冲突，双方激战数小时，滇军不支，刘旅于5月1日占大江口。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给银元一万元，赈云南省大理、凤仪等属震灾及大理一属火灾。

△　胡汉民令准免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罗翼群、会办梅光培本职，派韦一新为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

△　驻京日使芳泽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青岛日商纱厂华工罢工风潮愈炽，请中国政府设法阻止，并使之不再扩大。

4月29日　　叶开鑫命令各路向辰州（即沅陵）进发，5月1日进攻，蔡巨猷残部向乌宿方面退走。

△　杨森军队攻占雅安、名山、丹棱、夹江等县，刘成勋部向犍为、叙府退却。

△　驻奉天日本总领事向奉天当局提出八项无理要求，其大要为：满洲胡匪未肃清前，日军不能完全撤退；日本附属地学校招收华生，东省官宪不得干涉；日本在奉天、大连及其他各处设无线电台与日、朝通电，在奉天、安东间设长途电话；东省官宪应准日本资本家发展实业等。后因东三省学生提出抗议，日领始诡称“谣言”，撤回要求。

△　段祺瑞据李思浩呈，中国农工银行援案发行纸币，酌定限制办法，并取消发行债票特权，指令照办。

△　孙科、张静江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对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概未与闻”。

4月30日　段祺瑞派石瑛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孔祥熙为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坐办。

△　长江上游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以所部内讧，是日宣布去职，并电段祺瑞自请下野。5月6日，王即离宜昌乘轮到汉口。

△　胡汉民在广州颐养园召集各总司令密议，杨希闵、刘震寰、程潜、方声涛均列席。一致劝刘震寰暂缓回桂，先扫灭唐军，并决调北伐军入桂。次议大本营问题，有谓为免被唐继尧利用，以改委员制为宜，因有人提出异议，未有结果。

△　京师警察厅查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及附设之全国联合会等五团体。

△　广东琼崖500余万公民通电，以邓本殷私向美国银行团借款3000万，出卖矿产资源，殃民祸国，琼民誓死反对，并望全国共同奋起，电请执政府制止。

是月　江苏常州通成纱织公司创立，资金23万两，有纱锭5740枚。

5月

5月1日　北京临时政府公布《修正临时参政院条例》；派赵尔巽、汤漪、王家襄、徐绍桢、周学熙、江朝宗、屈映光、王印川、张广建、陆宗舆、吕公望、言敦源、彭养光、黄书霖、王伯群、杨士聪、治格、刘骥、刘传绶、凌毅、陈汉茅、邵瑞彭、乌泽声、邓汉祥、刘振生、金鼎勋、金兆棪、何葆华、李国凤、周肇祥为临时参政院参政；特派赵尔巽为议长，汤漪为副议长。

△　段祺瑞令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郑士琦未到任以前，责成省长王揖唐妥为办理；督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兼省长刘镇华准免本兼各职；特任吴新田督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刘治洲为陕西省长；孔繁锦为陕甘边防督办；顾琢塘为陆军第七师师长；调任莫德惠为农商次长，代理部务；任刘锡宝为蒙藏院副总裁。

△　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工人代表280余人，代表166个工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大会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其主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中国工人运动的策略和目前进行的具体方针及谋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祝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召开。贺信强调工农联合，谓："在国民运动中，能够加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并指出："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的奋斗，不但中国革命的胜利终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然属于你们。"

△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在广州开幕，到农民代表120余人，代表有组织农民20余万人，全省农会即日成立。

△　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全体代表在广东大学举行联欢会，广州工界代表、革命军人代表、学生代表约1000余人到会。苏兆征、廖仲恺等到会发表演说。联欢会通过《工农兵联合决议案》，指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工农阶级及平民书，号召扩大"五一"的意义，提出两种口号，实现两个事实：一、工农联合的"五一"运动；二、一切平民同情于工农的"五一"运动。

△　北京各界在民国大学大礼堂举行"五一"纪念大会，到千余

人。大会议决庆祝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功，要求各界援助各地纱厂罢工，及争取罢工、言论、出版、组织工会等自由权利等五项议案。

△　唐山京奉铁路制造厂3000工人冒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提出“八小时工作”、“取消大包工制度”及“言论出版自由”等口号。厂中英人出动全体军警武装勒令解散，工人毫不为动。

△　香港工人俱乐部发表“五一”宣言，提出“与国内工人大联合，参加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及“与各国工人联合战线，向资本帝国主义下总攻击”等10项主张。

△　武汉学生联合会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通电全国，要求：“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向帝国主义进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实行中国民众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及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

△　京绥铁路工人代表数百人在张家口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宣布恢复工会，高呼“全世界工人联合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

△　段祺瑞下令严禁军人入党，略谓：“军人入党，流弊滋多。……兹特重申严令，嗣后在军人员，务各恪遵迭令，不得再行列名党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在职者立予罢免，授官者开去军籍。”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电反对驻京少数中央执行委员主张在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决主张在粤召开。

△　胡汉民令：代理广东兵工厂厂长黄骚应即免职，派夏声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　西北航空线郑（州）洛（阳）段正式开始通航。

5月2日　　段祺瑞令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着即免职，以朱庆澜继

任；安徽省长王揖唐呈请辞职，下令慰留。

△　胡汉民亲赴沙面晤陈廉仲，解释去年对待商团之错误，请转告其兄廉伯释前怨，协助政府。陈答：彼兄弟无问题，唯团友不易解释。胡见商人助己无望，势成孤立，将大本营迁返士敏土厂，免生危险，并令谭延闿部回省镇慑。

△　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通电全国，揭露邓本殷将会同段祺瑞、陈炯明代表，同美国银行团于海口签订借款3000万美元合同；指出此一借款“以发展实业之名，实欲以之作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之军费”，吁请全国同胞“抵死力争，毋使琼崖十三县为爪哇、台湾之续，毋使琼崖三百万同胞沦为美利坚帝国主义之奴隶”。

△　杨森以刘成勋与刘文辉、赖心辉等袭攻成都，进取康定，经制止无效，是日致电段祺瑞，要求“明令通缉，尽法惩办”。

5月3日　　段祺瑞公布《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国宪起草委员会规则》；特派许世英筹备国民代表会议。

△　郑州工学各界2000余人举行追悼孙中山、胡景翼大会。

△　谭延闿、杨希闵、程潜、许崇智四总司令联名通电，反对唐继尧就副元帅职。

△　广州因杨希闵、刘震寰军队移防，引起恐慌，胡汉民允任命夏声为兵工厂委员长，而以杨列名谭延闿、许崇智、程潜讨唐通电为交换条件。

△　全国劳动大会听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关于国际劳动运动报告，议决代表54万有组织工人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　广东22县农民协会代表117人于广州致电美国农民，要求合众国农民兄弟援助琼崖农民反对邓本殷向美国银行团借款。

△　蔡和森在《向导》第一百十三期上发表《何谓国民党左派？》一文。文章分析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党员群众“左”倾的革命形势及其重大意义，指出左派必须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裂。文章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责难，申明：共产主义者即无赤化国民党的奢望，更无赤化国民党的妄想，假使不如此，我们便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派了。所以我说，我还应再说：共产派不愿居国民党左派的美名，但愿一切革命的中山主义者成为国民党本身的左派；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并且希望全体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成功无派别的整个的国民党，以完成中山主义和国民革命的伟大使命！

△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宣言，主张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杨森军王兆奎部攻占自流井。杨派重兵前往驻扎，并令白驹、吴行光两部分军队向富顺进发，于7日抵富顺城下，赖军即退至对江。

5月4日　　上海中华民国学生会总会及上海学生会两团体举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到会者千余人。恽代英等发表演说。全体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

△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大会，遭段祺瑞制止。同日，执政府犹恐学生攻击近日外交内政各案件，指使警厅训令城郊警察署制止人民集会。

△　武汉各校学生在武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到万余人，议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反对解决金法郎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第三次会议，各地工会代表报告该地工作情况。次日，劳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政治问题、经济斗争等

案。同日下午，劳动大会开第五次会议，主席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七周年纪念静默五分钟。会议听取并一致通过《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及《经济斗争问题》两个报告。

△　罗翼群电告广州大本营，于本日在汕头就东江剿匪督办兼职，即日统率所部潮梅军出发东江上游一带，拟设剿匪督办公署于老隆，实行肃清匪患。

△　方本仁致电北京临时政府，谓接洽杨希闵，杨已表示“内向”。

△　杨希闵在广州谢庐遍宴军政长官，商“巩固粤局团结西南方法”。

△　段祺瑞公布《建设会议条例》，凡10条。规定：“本会讨论建设大计，拟订方案，备临时政府之抉择。”

△　《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协定》规定日本退还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设中日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名额为中国10人，日本10人，委员会每年可支用经费200万元。总委员会之职权规定为：“不违反日本法令范围，有对于事业之计划、规定及管理三项权限，但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商后始能发生效力。日本外务省之文化事业部，仍然有最后决定之实权。”

△　江苏省议员吴鸿璧等向全省60县各法团、北京同乡会等发出通函，揭露行将去职之省长韩国钧“附齐（燮元）主战”、“擅发公债”、“开放米禁”、“贿卖差缺”、“紊乱省政”、“组合私党”等罪行。

△　日本关东厅长官儿玉抵北京。

5月5日　　“东北陆军校阅监”姜登选在徐州就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职。

△　胡汉民任命胡思舜兼惠州善后督办。

△　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会议议决加入赤色农民国际。

△　袁祖铭通电宣布，从刘湘之请，派四旅开赴前线，武装调停川战。

5月6日　　杨希闵乘夜轮潜赴香港，寓英皇后酒店60号，与段祺瑞密使共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5月7日　　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纪念“五七”国耻，教育部曾有令劝阻，届时警察总监朱深令警队实行阻止。是晚，约3000人赴教育总长章士钊宅质问，章拒见。学生愤而捣毁门窗及用具。章宅急电话召大队武装警察驰至，打伤学生七人，捕去18人。

△　北京女师大学生举行“五七”演讲会，拒绝校长杨荫榆为主席，杨乃开除学生六人。11日，学生自治会一致议决逐杨出校，并封锁校长办公室，派人看守校门，禁其入校。

△　“北京各界‘五七’被害学生后援会”通电全国，抗议北京临时政府摧残爱国学生运动。

△　天津学生联合会等60团体召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天津市工商学各界50万人参加。大会议决：一、否认“二十一条”；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三、收回租界及外人在我国一切特权；四、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五、收回政权归全国民众。

△　广州军学工农各界10万人联合大巡行，纪念“五七”国耻。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誓雪国耻！”等口号。青年军人联合会散发传单，请各军与工农群众亲密携手，加入巡行。

△　长沙市各工团学校10万人冒雨举行游街会，纪念“五七”国

耻，散发传单70余种。当日，美、日领署工人退工，美教会所办湘雅、福湘两校学生退学，报刊亦停止出刊。

△　汕头工商学各界数万人集会纪念“五七”国耻。全体议决：用全力反抗各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否认“二十一条”，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为帝国主义走狗之军阀，促成国民会议。

△　“留日学生总会非常评议会”等团体在东京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到会数百人，议决救国方案多件，旋即持国旗游行。日警察撕毁国旗一面，捕去学生19人。游行队伍至中国使馆要求严重交涉。经使馆与日警署交涉，日方表示歉意，交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选举林伟民、苏兆征等25人为执行委员，成立全国总工会，通过大会宣言，即举行闭会式。大会宣言指出，“现在全国总工会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同日，全国总工会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选举林伟民为执行委员长。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七十九次会议，议决任命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

△　赣南镇守使兼滇军第一师师长杨池生、第二师师长杨如轩通电声讨唐继尧种祸川黔、觊觎粤桂、出兵赣鄂及僭称副元帅等罪行。

△　安徽芜湖织布厂工人4000余人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9日，织布厂工人700余人参加芜湖学生“五九”国耻游行。

△　杨森部何金鳌、向树荣等四旅兵力围攻眉山陈洪范部。次日，攻克青神。陈洪范部撤出眉山，向犍为退走。杨军又紧迫嘉定、犍为，陈师向沐川、屏山败退。

5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工农群众，祝贺第二

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号召“全国工农加紧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并表示当训令党员，“扶助工人农民团体之发展，以付全国工农之望”。

△　汪精卫抵潮安面晤蒋介石谈党事，并谋个人行止，征询意见。次日，汪离潮抵汕。10日，蒋介石抵汕头，在桂园与汪长谈，汪劝蒋行使参谋长职权。

△　张宗昌就山东督办军务善后事宜职。

△　赵恒惕派黄钺为代表，与滇军唐继虞交涉出境事宜。黄于是日动身赴洪江。15日，黄电告赵，谓：“唐继虞部确已于13日率队完全离洪。”

△　报载黔省灾荒遍及60余县，一月以来，乡民食粮断绝，仅恃青草树叶为生，且有食人惨剧，老弱者死亡路畔，通地皆是。

5月9日　　北京各大学学生赴天安门拟集会抗议执政府禁止纪念国耻及逮捕学生，被警察阻禁，未成。旋分队游行，不期而集者万人，沿途高呼：“推翻执政府！”“速免章士钊及朱深职！”抵执政府，推代表入内请愿，提出免章职、恢复言论集会自由、释放被捕学生、抚恤死伤学生等四项要求，并向群众演讲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之罪恶。

△　福州学生集队游行，并沿途演说，纪念“五九”。各商店亦罢市。

△　广东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政治问题提案、经济问题提案、合作运动提案、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加入赤色农民国际、全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等项提案和文件。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上海执行部，对北

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借名招摇、淆乱听闻等破坏党纪之行为，表示严重抗议。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五七”学生捣毁章士钊住宅一事，决明令告诫学生，潜心学业，勿问外事，并责成各校长严行约束，倘仍有越轨行动，惟有依法惩治。

△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杨榛联名通电声讨唐继尧。

△　李宗仁率队由桂林赴南宁前线，与范石生、黄绍竑部合围南宁，15日发起总攻击。南宁唐军资粮断绝，闭城待援。

△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庚款事宜委员会通电各省区教育会反对《中日文化协定》，要求“迅起抗争，予本会以充分之援助”。

△　东京日人开会追悼孙中山。由日本递信大臣犬养毅、子爵涩泽荣一、头山满等发起，内阁总理大臣加藤、司法大臣少川、陆军大臣宇垣及各界人士约800余人出席，中国各团体代表亦参加。会后举行茶话会招待中、日、朝人士。出席招待会之中国代表谓：“日本如果欲谋中日亲善，惟有自动归还旅大，取消‘二十一条’，不援助军阀武人，尊重民意，庶几亲善有望，否则徒托空言，决不能实现。”

5月10日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胜利，是日举行纪念大会，到会万人左右。工人手持小旗，上书“罢工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演说者甚多，每人演说毕即大呼“工人团结万岁！”等口号。散会后结队游行并举行工会悬牌额典礼。工人高唱胜利纪念歌，爆声震天，欢声雷动。工会宣布是晚复工。

△　上海全国学生总会为北京“五七”流血事件特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并发出致段祺瑞及各地学生会等电，要求查办章士钊，释放被捕学生。

△　天津学生联合会议决援助北京学生办法四条：一、通电全国各界一致抵抗恶政府；二、要求惩办刑事犯章士钊、朱深，并释放被捕同学；三、派代表赴北京慰问；四、联络各界一致援助。同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亦致函声援北京学生。

5月11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开会通过三项决议：一、修正中法基金委员会；二、考试学生办法：中学生之初试均由各校执行，其复试由教育厅专设之考试处执行；大学生之初试由各本校执行，其复试由教育部所设之考试处执行；三、美专9月恢复。

△　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北京屠杀学生事件发表宣言，揭露段祺瑞自去岁上台以来，葬送金法郎案，招集军阀分赃之善后会议，暗助唐继尧、陈炯明颠覆革命政府，唆使刘镇华、憨玉琨屠杀陕、豫人民，颁布取缔共产党条例及暗派安福党人分据各省包办国民会议选举等十大罪状，提出罢免章士钊、朱深，释放被捕学生，废止出版及新闻事业条例等五项要求，吁请各界同胞发起声援，共同奋斗。

△　北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调停“五七”北京学潮，被捕学生准予取保释放。

△　段祺瑞令驻瑞典国兼驻挪威、丹麦国特命全权公使戴陈霖聘为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处顾问。

△　湖南省议会开会议决，由各省一致反对金法郎案，并电各国公使表示否认，并议决反对《中日文化协定》。

△　广州兵工厂工人反对滇军派夏声为该厂委员长，宣布罢工。16日，夏声因工厂工潮无法收拾，辞委员长职。

5月12日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兼代教育总长章士钊请辞本兼各职，并于18日携眷出京。

△　唐继尧以副元帅名义任刘震寰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兼省长，

刘部拟由北江回桂。各方恐影响对唐战事，竭力劝阻，均无效果。胡汉民令朱培德以实力截阻。

△　杨森部郭汝栋师与刘文辉部激战于双十堡。刘军向叙府退走。次日，杨军乘胜占富顺，截断刘与赖之联系。

△　驻沪各国领事团召集临时会议，英、美、意、日各国领事均到会。英领事巴力德报告本月6日、9日两晚中国海军炮击海关巡轮及英商游船经过，议决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于即日召集驻沪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同日，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亲赴驻沪英领署道歉。16日，英领要求赔偿损失2000两，中国当局许诺，此事了结。

△　上海县议事会为本市鸦片公卖事致电段祺瑞，略谓："近日沪南发现土行二十余家公然贩卖，官厅非但不加查禁，且有军警从中包庇"，"请饬淞沪陆海驻军一律退出沪境，以除禁烟之梗。"

5月13日　段祺瑞通电宣布临时参政院定6月5日在北京开会，催促各省法团速将互选选出之一人电告。

△　廖仲恺到汕头，是晚在粤军总司令行营召开会议。许崇智、蒋介石、朱培德及顾问加伦将军参加，研究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策略，推蒋介石为总指挥。

△　北京临时政府驻滇专员黄云鹏电执政府报告，唐继尧因滇军在桂失败，被迫出走，滇事交大理镇守使李廷选代行。又谓：袁祖铭现任金汉鼎为援黔滇军前敌总司令，率队返滇，并令彭汉章、周西成分路会攻昆明。

△　湖南举行公布新宪法典礼。赵恒惕讲演，谓："此后湘人有此良法，誓当极力遵守，及进而促成各省制宪，俾联治早日成功。"

△　上海书报联合会、书业商会、日报公会、书业公所四团体致

电段祺瑞及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司法部，要求废止出版法。

5月14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章士钊辞职事，段祺瑞谓：不能因学潮而影响教育方针，决派员退还辞呈，挽章复本兼各职。29日，段祺瑞明令再挽章士钊。

△　奉军为争北京政权及京畿旗产，开入关内，进驻近畿。是日，由张学良统率两旅奉军到滦州。

△　段祺瑞令准外交部呈请加入《斯壁嵫浦条约》。

△　许崇智与蒋介石筹商回省兵力之调遣事宜，决以粤军一部留驻潮梅，大部参加讨逆。

△　黄埔军校政治部通电揭露邓本殷以全琼产业划归美国，借款3000万美元，并有段祺瑞代表杨志澄等与闻其谋，以发展实业为名，实欲以之作为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之军费，吁请全国同声共讨。

△　张宗昌派奉军武力解决曹州吕秀文部国民军。本月13日，奉军吴长植所部第二十旅、褚玉璞所部第三旅及毕庶澄部第三十二旅，分别自济宁攻郓城、巨野，由兖州攻城武、单县，及绕道徐州西攻考城、商丘一带。曹州吕秀文部国民军被奉军三面包围，知势不敌，旅长马士贵、团长张辅堂逃走。是日，吕随毕、褚两旅长赴济宁，协商遣散办法，决定每名士兵发两月饷糈，令其回家，军官入讲武堂习军事学识。旋张宗昌电告张作霖，吕部全体解散。

△　驻京英代办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中国迭次内争，各地土匪骚扰，英商损害甚巨，中国政府理应负责；并开具损害清单，要求予以赔偿。

△　新疆省议会议长李溶等晤苏使加拉罕，质问俄党援助外蒙入侵阿山事。加拉罕答称：此犯法事，俄决勿为，或旧党为之，俟电查再复。

5月15日　　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发表宣言，誓守大元帅遗嘱，与万恶势力奋斗，实现地方自治，一致反抗帝国主义之压迫侵略。

△　段祺瑞派卢耀前往欧美各国及日本考察财政事宜。

△　杨希闵致电北京临时政府请示处理粤事办法，次日，又以传闻所谓粤政府将移潮汕决计用兵一事，告以已函刘震寰派兵防阻，表示“万一他方（按：指广州革命政府）别有计划，最后必用武力，闵惟严饬部曲，即以武力贯彻主张”。

△　国民党广州市第十区一分部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训令党员孔庚通电服从本党主张，脱离唐继尧关系，并函请政府驱逐唐逆代表孔庚出境。旋经中央复函该分部，谓：“所请各节业经本会函致孔庚同志，令其即日通电服从本党主张，辞去唐氏职务，并声明与唐氏脱离一切关系。”

△　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第七厂借口闭厂，不许工人上工。是晚，夜班工人数百人进厂与日人交涉，发生冲突，日人元木、川村二人开枪射击，工人代表顾正红身中四弹，受重伤，同时中弹受伤者十余人，捕房捕走11人。同日，淞沪警察厅恐事态扩大，通令所属各区署队，对于各该管辖区内工人聚众罢工及煽惑等事，务须特别注意，严行遏止。

5月16日　　段祺瑞特派林长民办理国宪起草委员会事宜；派王士珍、陈宦、田中玉、魏宗瀚、曲同丰、吴纫礼、林绍斐、黄慕松为军事善后委员；派梁士诒、黄郛、杨永泰、卢学溥、汪士元、张嘉璈、金兆蕃、杨德森、王章祜、叶景华、黄元蔚、陈同纪、梁敬錞、王其渊、万兆芝、费保彦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特派王士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陈宦、田中玉为副委员长；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泰为副委员长。

△　段祺瑞令杨森为参谋总长，刘湘为四川军务善后督办，邓锡侯为四川清乡督办。

△　上海日商内外棉五东、西二厂及七、八、十二等五厂罢工工人约二万余人，为厂方惨杀工人事，在潭子口三德里工会开会，决定组织委员会，并提出开除并依法惩办肇祸之元木和川村、赔偿受伤工人损失、恢复开除工友之工作、承认工会有代表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八项条件，由工会代表刘贯之等赴捕房，要求将此八项条件向纱厂代为转达。

△　胡汉民发表宣言，反对北京临时政府划琼崖八属为特区。

△　安徽倪道烺杀害学生姜高琦案，经京师地方审判厅裁决“应不予起诉”，倪氏恢复自由。19日，姜案代表胡宣旭（霁澄）于夜半在开封车站被刺身死。21日，倪道烺晤段祺瑞。

△　孙岳以剿匪总司令名义饬所部入陕。

5月17日　　顾正红医治无效，于晨7时身死。20日，公祭顾正红烈士筹备处发出通知：定于24日下午1时在浜北潭子口三德里空场举行公祭，请各团体派代表参加。

△　广州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召开大会声讨段、唐。次日通电全国，略谓：“日本东京政府既利用其驯服工具张作霖、段祺瑞，攫取中国北部之政权，今更使其侦探山县氏教唆唐继尧称兵入桂，图谋两广，危害为全国民众利益奋斗之革命政府，以图均分整个之中国”，宣布“一致议决，声讨唐继尧、段祺瑞，以斩断日本帝国主义敲剥之双臂，愿我全国同胞其速奋起，以救危机”。

△　冯玉祥派张树声赴奉，与张作霖接洽冯军移防，决让出西、北两苑，由奉军填防，留南苑为冯军教练地点。是日，张树声回京，即赴张家口报告。21日，驻北苑之国民军移驻丰镇；31日，驻西苑之

国民军开赴张家口。

△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论认为冯、张两方之冲突势将不免，并虑奉张可能失败。22日，《朝日新闻》社论劝奉张将中央诸事悉任段氏主持，而己则专注全力于东三省之发展。并谓：徒然从事于扩张权力而不知足，其结果无非重起扰乱，循环不绝，望张氏反省与自重。

5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开幕，会期七天，于25日闭幕。会议议决：一、接受总理遗嘱，以总理遗教为最高指导原则；二、重申民国十三年（1924）8月二中全会关于容纳共产党员之决议。

△　段祺瑞为安置第二届安福国会议员，设国政商榷会，会长定李盛铎。是日段公布《国政商榷会条例》。

△　段祺瑞派汪守珍充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秘书长。

△　山西太原学生万余人，为反对阎锡山扩张军备，征收房税，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省督署，学生代表向阎提出取消房税、流通券及保卫团三项要求。学生并在督署门前抛掷砖瓦，拆毁墙垣，迫使阎当即签署命令，取消房税等三项苛政。

△　北京学生联合会开各校代表联席会议，议决：今后运动之根本主张分为二：一、争自由；二、保国权；要求执政府废除警察法，罢免朱（深）、章（士钊）。嗣各校学生拟在天安门开会罢章，被军警阻止未成。

△　杨森军攻占叙府（即宜宾），刘文辉、刘成勋军向永川、合江退去。

△　加拉罕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抗议，东三省中国官宪容留胡匪及旧党，侵扰苏联人民生命财产，声明所有损失应由中国政府负

责。

△　衡阳饥民因奸商藏米不售，群情激昂，晚集众捣毁米坊93家。唐生智竟逮捕市民代表何少青，诬指为地痞鼓动风潮，枭首示众。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芳泽，日本渔轮在长江口及烟台等处捕鱼，侵犯中国主权，特提抗议，并速禁阻。

5月19日　广州因驻粤、滇、桂军调驻大军，杨希闵、刘震寰又逗留香港，久不返省，形势骤然紧张，谣言复炽。是日，胡汉民将革命政府迁驻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办公。连日特由朱培德、李福林集中军队4000余人，屯驻士敏土厂左右各要隘，施行特别戒严，水面一带则以“中山”舰率同海防缉私等舰沿河日夜梭巡。23日，帅府通令，谓现时谣言繁兴，人心未定，河南为政府暂时驻地，不论何项军队，非奉本帅府命令者，概不准渡河。

△　唐继尧所派之代表马为麟、杨耀光抵香港宴香港要人，请协助其颠覆广州政府阴谋。杨希闵亦在座。

△　段祺瑞派曾毓隽赴上海调查鸦片风潮，并下令从严查禁。次日，又特派苏皖宣抚使卢永祥、江苏省长郑谦彻查上海设行私售鸦片情事。

△　段祺瑞令准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辞职，以卢金山继任。

△　驻京各国公使在意使馆开使团会议，讨论答复北京临时政府提议之收回沪公廨案。决先由意领使电驻沪领团从速查明情况，呈具说帖，再行答复。

△　上海交涉署接日本总领事馆函称：“近日有人假工友会及其他团体向日本人所办工厂征求会员，殊欠正当，应彻底取缔，以保障商业。”交涉署即据函分咨各机关查照办理。

△　中东铁路董事长鲍贵卿通告，宣布该路总理伊凡诺夫前所下自6月1日起，凡非注册为中国公民或苏俄公民之铁路雇员均予开除之命令，应作无效。次日，加拉罕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鲍氏此举实属违背《中俄协定》、《奉天条约》、《中东铁路临时管理合同》。又谓：中国政府一再袒护白党及帝制派，苏俄不能容忍。照会要求取消鲍氏通告，立即开除非中国或苏俄公民之职员，禁止中东路华员袒护帝制派，并要求以新董事代鲍。

5月20日　上午11时，张学良以代父为段祺瑞夫人“祝寿”为名到京；当即晤段，陈述奉军移驻京畿等事。下午偕鹿钟麟赴西、北苑视察营房，并拟赴张家口与冯玉祥商驻兵问题。晚，张忽中止赴张家口，即出京返奉。

△　张作霖致段祺瑞号（20日）电，略谓：“迭与冯督协商，将奉军一部移驻京畿，业蒙同意。外间谣言此次奉军入关，对付某方，显系奸人挑拨者传布，作霖拟即日入关，面陈下悃，对于任何事项，不加干涉。”并谓：“如我公不以奉军入关为然，则将苏、皖、鲁奉军悉数出关，不再与闻时事。”

△　曹汝霖离京赴奉，携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帐籍送张作霖查阅。

△　胡汉民任命加伦、基美拉为大本营高等军事顾问。

△　胡汉民任命林树巍为大本营参谋团主任。

△　桂军韦冠英部抵新街驻防，占驻福军防地，发生冲突。福军向湘军、朱培德部滇军及北伐军求援。次晨开战，桂军约3000余，北伐军约五六千，桂军不敌，退军田。广州闻此讯，颇震动。

△　吴铁城到香港，连夕与魏邦平等宴港商，谋驱客军并反对共产党。

△　唐继尧逃抵香港。段祺瑞派代表张星浦至港与唐之随员联系，谋求拥唐回滇。

△　旅沪滇籍国民党员致电滇军将士，声讨唐继尧“僭窃副元帅名义，拥兵入桂，响应陈逆（炯明）图谋颠覆革命政府”等罪行。并谓：“唐氏既逃，倒悬已解，政权应还诸人民，无论我军回滇或留粤，当一本党政纲，保证人民利益，为云南人民废除唐氏治下之种种苛政，拯救故乡父老子弟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即吾人所厚望者。”

△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新云南社第一次宣言草案》。《宣言草案》说明处于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唐继尧暴力的双重压迫下云南人民所受痛苦，宣布“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封建军阀及其工具——贪吏劣绅的一切暴力”及“谋求云南民众与全民族的解放”等四条社纲，并提出“进行收回片马与滇越铁路的运动”、“反对大云南主义、联治主义及任何军阀专政”等项工作任务。

5月中旬　　联唐（继尧）派在香港皇后酒店60号开会，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均出席，唐继尧、段祺瑞、林虎、陈炯明、邓本殷、香港当局均派有代表参加。议决马素担任外交，与香港政府接洽一切，军火由香港政府负责，谋攻广州。

△　胡汉民派邹鲁赴香港迎杨希闵、刘震寰回省。

5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广东大学召集广州市党员大会，到7000人。何香凝主持大会。大会通过《反对段祺瑞、唐继尧及一切反革命派》、《拥护革命政府为人民谋普遍的利益奋斗，肃清一切破坏和平之民敌，实现最低限度之党纲政纲》等四项议案。

△　党军司令官蒋介石率党军第一旅何应钦部、粤军第一师第一旅陈铭枢部、粤军第四师（原第七旅扩充）许济部、警卫军吴铁城部，由潮梅回师广州靖乱。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中法教育基金1000万元分两年支付，另给150万元分配京外国立各校。在京国立各校对分配问题意见不一致，教育部因财部提案手续不合，提出抗议。26日，国务会议决定中法基金现款150万元暂停分配。

△　段祺瑞复张作霖号电，略谓："入关奉军另谋驻地，让出民房，殊堪嘉尚"，"谣言岂可尽听，负气亦属不必"，"我弟如有事来京，正可借慰积愫"。

△　上海文治大学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被巡捕捕去施文定、谢玉树二人。次日，又捕去上海大学学生韩步先、赵震寰、朱义权、江锦淮四人。25日，施文定、韩步先等六人被解往分廨，定于30日以所谓"扰乱治安"罪开审。

△　段祺瑞令财政部拨给银元一万元赈济四川旱灾，并由省库酌拨巨款，由该省长遴委要员核实散放。

△　蔡巨猷所部旅长毛炳文，率其亲信部队及师部卫队营，一并投归湘军第一师贺耀组。贺委毛为第十旅旅长。毛于是日率队自辰州赴桃源听编。

5月22日　胡汉民以广州形势紧迫，迭电许崇智、蒋介石、谭延闿、程潜等急速率师返省。截至本日止，由潮汕调回者，计有蒋介石之教导团800余人，吴铁城之警卫军600余人，从海道抵省，拟驻扎市内，为滇军所拒，驻于东校场一带。北路方面，谭延闿之湘军，程潜之攻鄂军，共2000余人，由韶关返省，至新街附近又为桂军所拒，被迫折回。

△　杨希闵、刘震寰返广州布置军事。

△　国民党广州市党员大会发表决议案：一、遵受总理遗训，继续革命；二、尊重中央执行委员会惩办违背党纲之党员的议决案；

三、反对段（祺瑞）、唐（继尧）侵略粤、桂及反革命之活动，一致拥戴革命政府；四、为人民利益奋斗。

△　杨森部下黄毓成、王缵绪、何光烈、郭汝栋等将领联名电段祺瑞，责段5月16日政令为乱令。谓：刘湘不能制变，反优予事权；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乃川战戎首，反曲予优容。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潮梅党治条例》，凡12条。又以许崇智、蒋介石、邵元冲等五人为委员，组织政治局及民政局。

△　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声讨唐继尧。

△　汉口英美烟草公司工人2000余人，因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一致罢工，当日发表罢工宣言，提出要求11项。

5月24日　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发表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略谓：吾人今日惟一之责任，在完全接受我总理之遗嘱，自今而后，同德同心，尽吾人之全力，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力，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竟总理未竟之志。……凡接受总理之主义、政纲，从事于国民革命工作，皆为吾人所敬爱之同志；凡持反革命之行动，受帝国主义之嗾使，以阻碍国民革命之进行者，皆为吾人之敌。

△　下午11时“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在上海潭子湾广场举行，到会有工人、学生及各团体一万多人，会上各代表先后讲话，并散发传单。

△　胡汉民任命招桂章为大本营暂编舰队正指挥，士米诺夫为暂编舰队顾问。

△　湘西川军熊克武部分两路向乾州、凤凰攻击。边防守军陈渠珍部固守待援。

5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上海纱厂惨案通电全国，谓：本党对日人在中国境内无理由枪杀中国人民之暴举，表示严重抗议，对困苦之工人设法予以援助，外人枪杀华人之暴举须根本取缔，尤须人民一致奋起，废除外人以作恶之一切不平等条约。

△　国民党中央执行部通告党员，有列名北京俱乐部者，速声明否认；与唐继尧有政治关系者，速行脱党；否则作破坏党律论，应即严惩。

△　胡汉民任命邵元冲为潮、梅、陆丰行政长。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宣言，反对安福系制造国民会议，要求实现“本党所主张之职业的真正国民会议”。

5月26日　　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通电声讨唐继尧，指出唐“外受帝国主义之指挥，阴与陈炯明、陈廉伯相勾结，乘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窃副元帅之名，倚恃暴力，进兵侵桂，希图吞并两粤，推翻革命政府，此种反革命军阀，实我国民众之敌人”，决心“誓率全体工人为革命政府之后盾”，以除唐继尧。

5月27日　　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中法五厘美金公债，发行额为4389.39万美元。用途：一、收还倒闭之中法实业银行债权者所持之无利息证券；二、补缴中国政府之该行股本；三、偿还中国政府之该行借款；四、中法两国合作之教育慈善事业。以法国退还之庚子赔款作担保，年利五厘，以23年为期限，偿还期自1926年1月15日起至1948年1月15日止，每年还本一次，分23次还清。

△　广州大本营召集商民会议，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发表辟谣（所谓“共产”谣言）讨唐（唐继尧侵粤罪恶）谈话。越二日，广州市总商会等商会开联席会议，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反抗唐继尧，并提出八条要求，请革命政府协助商民。

△　杭州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揭露安福系包办国民会议，妄图弄出一个“由军阀所支配、为军阀而组织”的“国民代表会议”，“军阀政府不把国民当国民，更不把女国民当人”，“在国民代表会议条例里边明目张胆地不把女子当国民，连假意的片断的选举权都不规定”。通电要求全国同胞反抗军阀的假国民会议，自己起来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打倒军阀以建设国民政府，才是自救的正路”。

△　驻京日使芳泽因青岛日商纱厂罢工，是日访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速取适当处置，并声称：“如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实属势所当然。”次日，日本政府电令旅顺派遣驱逐舰二艘驶赴青岛。

△　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违禁药品管理局被沪公团控告发给鸦片印花，有保护售土嫌疑。是日，段祺瑞下令苏皖宣抚使、江苏省长饬淞沪警察厅将该局长施凤翔暂行监视，听候查办。

5月28日　张作霖通电入关，告以本日启程，亲往津、沽巡视奉军。

△　广州各军政要人在颐养园开会决定大本营采用委员制，以胡汉民、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伍朝枢、古应芬、林森为委员。委员长人选未决。

△　广州市土木建设工会通电，拥护革命政府，并请讨伐唐继尧，惩办通唐诸人。

5月29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以政府财政困窘，呈请辞职，并于次日出席国务会议宣布辞职原因。段祺瑞表示慰留。

△　张作霖致电段祺瑞，告以入关检阅京奉沿线驻军，并谓：倘承电召，便当入京一行。段复电表示欢迎，并请张早日来京，面谈一切。有人询段，张作霖来京，如何应付？段答：“国事由国民会议解

决；地盘问题，取协商，不尚侵略，苟违此旨，余即不干。”

△　滇唐军吴学显部会合沈鸿英、韩采凤残部，对柳州发起攻击，与联军黄绍竑部接战后，吴部大败，退沙铺待援。6月5日，黄部伍廷飏等分兵包围前来增援之唐继虞部王浩修等旅。王旅被迫缴械投降。唐率残部向黔边逃窜。是役毙唐军数百，俘2000余，缴枪炮数千。

△　日人贿买中国官厅，用武力压迫青岛日商内外、大康、隆兴三厂罢工工人。是日晨3时许，张宗昌派陆军、保安队等3000余人包围工厂，驱逐工人，并与日本人一齐开火，击毙二人，重伤10余人，拘捕数十人。

△　上海各团体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强烈反对加征码头捐、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三项提案。

△　杨希闵晤胡汉民，否认联唐（继尧）投段（祺瑞），并就许（崇智）、蒋（介石）大队水陆返省事，请胡表明用意。胡答称系援范（石生）讨唐（继尧）。

△　段祺瑞重申奖券禁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各项有奖债券证券，无论何种名称及已否核准，一律停止发行。

△　广州大本营召集省港各记者谈话，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发表讲话，宣布最近政况，请各报在诚信的责任上，辟除谣言，巩固政局。

5月30日　“五卅惨案”。上海各校学生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揭露日人枪杀顾正红、拘捕学生真相，并宣传反对工部局提案，又被捕房拘捕数十人。午后3时许，学生及市民近万人聚集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捕为驱散学生，举棍殴打，无效，遂下令向群众开排枪射击，当场中弹死亡11

人，重伤八人，轻伤10余人，造成震撼中外之五卅惨案。

△　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会通电全国，报告五卅惨案经过，吁请援助。同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开执行委员会，公决办法五项：一、致电外交部向驻京英使提出严重抗议；二、通电全国一致援助力争；三、通电世界请主张正义；四、通告工商界各团体速起援助；五、派员赴医院慰问受伤学生。

△　晚，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级，形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反抗帝国主义暴行。党组织行动委员会领导反帝的“三罢”运动。

△　上海各校学生代表20余人为英捕屠杀学生案赴江苏交涉署，要求交涉员陈世光速向驻沪领事团严重交涉，提出释放被捕学生、惩凶、赔偿、道歉、罢工自由等项要求。

△　段祺瑞公布《淞沪市区督办署官制》、《淞沪市自治制》，又修正《海道测量局条例》。

△　张作霖抵天津。

△　张作霖与南满铁道公司签订100万日元借款合同作军政费用，年息9%，期限一年，以吉长铁路余利担保。

△　胡汉民任命林树巍为建国军第一师师长。

5月31日　上海工人、学生千余人冒大雨到南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南京路贴满“援助被捕学生”、“援助工人”、“反对码头捐”等标语，又有多人被租界当局逮捕。同日，上海男女各校推举代表集会，决定奋斗到底。上海闸北各纱厂工人一律停工，集会声援。

△　上海各团体在总商会开联席会议，到者达万人。提出一、释放被捕学生；二、抚恤伤亡；三、外人道歉；四、取消印刷附律；

五、取消码头捐；六、收回会审公廨等项要求，并推代表向警予等向商会要求罢市。各团体均表示支持并签字。

是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滇唐祸粤告粤人书》，指出唐继尧与陈炯明勾结，意在东西并进，会师广州，号召粤人“与革命政府同心戮力，共驱除广东和平之敌人唐继尧”。

△　方本仁在江西省署财政会议上就陈炯明、林虎残部退入赣南事答复省议会副议长欧阳莘质问，略谓：陈、林此次在东江失败，被迫进入赣南，北京政府对陈、林等尚抱提携主义，允予以饷械上之接济，本省亦属北京政府统治下，自亦未便独异，现已决定让出赣南数县，准其驻兵休养，一面电请北京政府拨款协济。

△　旅京西藏同胞以英人侵藏、蔑我主权，特组织藏事促进会，并发表《敬告国人宣言》。

△　日商裕大纱厂第二厂在上海创立，资金1000万两，拥有纱锭8.5万枚。

△　上海久太缫丝厂创立，资金三万两，工人540人。

6月

6月1日　上海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宣告成立，李立三、刘华分任正副委员长。即日发表罢工宣言，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力；禁止殴打工人；改良工厂卫生，禁止虐待童工及妇女；不许雇用外国巡捕；反对印刷附律等七项要求，宣布于6月2日起总同盟罢工，不达目的，决不上工。

△　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商店一律罢市。南京路工人、学生及市民聚集演讲，散发传单，上午10时西捕协同万国商团用排枪向罢市群众射击，打死行人三人，伤18人。

△　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为上海西捕连日枪杀华人一事致电段祺瑞，要求速开交涉，并派专员来沪。同日，上海工商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职工俱乐部、华侨团体联席会议等数十团体开紧急会议，一致要求北京临时政府进行交涉，提出严重抗议。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沪案”发表宣言，略谓：国民党愿助全中国之爱国爱平等自由之民众，对此惨无人道之行为及其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奋斗，伸张主义，恢复国威。

△　午后6时，广东大学学生会开“六一”纪念大会，汪精卫等出席演说。全体学生议决多种援助五卅惨案办法。次日下午1时，广州各校学生数千人及军队、工人、农民等万余人，集齐广大操场，联合举行示威大巡行。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援助上海工人、学生！”“工学携手打倒军阀！”

△　苏州各校学生分组出发演讲，唤起民众对于“沪案”之注意，并予沪学生以相当之援助。次日，各校停课游行，分组演讲，到2000余人。南通（3日）、扬州、嘉兴（4日）、无锡（7日）、清江浦（8日）等地，亦先后集会、游行、演说，声援“沪案”。

△　章太炎、褚辅成、周震鳞、曾彦等13人为五卅惨案联名通电，要求政府收回租界市政，指出：“租界之名，在所必废；英人所设市政廨宇，在所必收。”

△　胡汉民为对付滇、桂军，发表整饬军队宣言。略谓：“军人身隶统一旗帜之下而迹类分封，名受革命政府指挥而形同割据，长此宽纵，是无政府，倘复姑息，是无革命。明知忍痛，而人命之疾苦不可不除；不下决心，则蟊贼之滋蔓将不可杀”；并谓：“本政府自后于最短时间，力求军民财政之统一，对抗令者予以严厉制裁，对阳奉阴违者予以严厉惩罚，凡力所能至，决心以行。”

△　长沙市六万余人举行游街大会，纪念日本“伏见舰”水兵制造

长沙惨案二周年。当即致电驻京日使芳泽，要求日政府承认中国对该案所提之条件，并撤销一切不平等条约。

△　日本劳工联合会代表至外务省，呈递公民大会赞助中国青岛罢工工人议决案，要求：一、停止武力干涉；二、力戒胁迫中国政府；三、惩罚妄图自利之日本资本家。政府答称：中国方面今无力应付工潮，故有日舰赴青岛之举。

6月2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沪案”，段祺瑞主席。沈瑞麟报告上海学生被杀经过。阁员相继发言，咸谓英、日等国驻沪当局对于无辜学生，竟采用武力摧残手段，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实属有侮我国国体，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当即通过先向北京外交团领袖意使严重抗议，并派曾宗鉴、蔡廷幹等赴沪查办，并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抚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等四项议决案。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领袖意公使翟禄第，对上海公共租界捕房枪杀学生、工人事件，向公共租界各关系国提出正式抗议。略谓：“此不幸之事，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声明“保留俟查得详情后，再提相当要求”，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上海五卅惨案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议，要求惩罚暴行巡捕，抚恤死伤，表示谢罪，保证此后永无此等至无人道之行为。凡我党员应一致努力援助国民，以与英国帝国主义相搏”。

△　上海总工会致电全国总工会，谓：“本会已于六月二日宣布上海各业工会一致罢工，商学界亦已一律罢市、罢课，抵抗外人屠杀同胞，誓死坚持，不达目的不止。望全国工界一致奋起，并予以援助。”

△　上海公共租界各路口要道由万国义勇队及各国海军陆战队分

兵把守。上午9时，日本巡捕又向小沙渡渡河工人开枪射击，打死三名，伤十几人。午后6时，义勇队开枪向南京路西段射击，打死行人一名，伤二名。是晚，新世界游艺场为义勇队占据。

△　上海领事团分电香港、小吕宋、渤海、威海卫等地，调大队兵舰来沪“镇慑”。是日，意舰“兰乔治号”、法舰“亚尔古号”先后至沪。4日，港督派英海防舰“卡律斯尔号”亦到。5日，港督再派“大爱米特号”炮舰，载1000名陆海士兵驶抵上海。同日，日海防舰“安全号”载海军300名抵沪。3、4两日，英、美、日等国加派来沪之海陆士兵，已达4000名之多。

△　浙江全省各界为上海英捕惨杀学生事，在省教育会开国民大会，组织杭州“上海惨案后援会”。次日，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开露天大会，工商学界到五万余人。会后游行。群众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实现国民革命”、“惩凶抚恤”、“收回租界”、“反对印刷附律”、“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　长沙市工人、学生为援助上海五卅惨案举行大示威运动，到二万余人，并组织湖南后援会。决定4日实行全市“三罢”。赵恒惕宣布全市戒严，派兵搜捕工人、学生领袖，并发表布告宣称：“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

△　江苏省长郑谦就五卅惨案复电上海南洋大学及各大学校长，“务望劝告各学生，在校静候解决，免滋别生意外”。

△　孙传芳为五卅惨案致电段祺瑞，要求特派专员赴沪视察，相机交涉，并饬主管外交官吏，严重抗议，“庶免酝酿因循，激成意外之变”。

△　杨希闵、胡思舜、赵成栋、廖行超、朱世贵等滇军将领联名通电“拥护”革命政府，并谓：“去年先帅亲政时，希闵曾以统一财政、移军郊外为请，不图军典之后，帅议未行，兹值东江肃清，正宜重申

前议，究竟饷源如何筹划，部队如何整顿，应急起直追，从长计议，早图向外发展。”

△　刘震寰通电，诡称“始终服从三民主义”，“竭诚拥护吾党政府”。

△　广州革命政府令中央银行停止营业，市内各银行亦相继停市。

△　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工人响应革命政府命令，一致罢工，拒绝运送滇、桂军队，省城东西北三江之交通，完全断绝。

△　下午1时，滇、桂军在大沙头缴朱培德部枪数十，战事随息。河北已入滇、桂军掌中。福军在河南架炮指向河北。李福林布告保护河南，如别军无理进入，必率同乡团迎头痛击。

△　何应钦率所部党军第一旅、陈铭枢之粤军第一旅、吴铁城之警卫军、粤军第四师许济部，是日抵平山，继续向广州进发。

△　滇军第三军长胡思舜由佛山调滇军千人入驻广州市，向河南方向架设大炮及机关枪，对准广州革命政府，并调所部滇军赴东江阻许崇智部队回省。

△　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暂编陆军第二师撤出南苑。

△　张作霖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4日结束，议决令梁士诒组阁及京畿驻军、奉军军费等四项决定。

6月3日　　北京百余校学生共五万余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声援五卅惨案。游行队伍先赴执政府递交九项意见，请向阁议席上提出，以作外交部向英使抗议之条件。嗣赴外交部，沈瑞麟亲自出见，学生代表要求向英使严重抗议，不达目的不止。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受阻，使馆界口预备水龙向群众喷射，使馆卫兵举枪威胁群众。学生愤极，

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后游行队伍齐赴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议决条件：一、游行队伍即赴总商会，请即日罢市下半旗；二、请工界罢工；三、发起组织北京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四、实行经济绝交，以及向北京外交团提出严重抗议等。

△　胡汉民发表《辟共产谣诼宣言》，略称：“依附本国军阀之走狗，奔走帝国主义之好汉，妄肆谣言，造作蜚语，不曰本政府已经赤化，即曰共产即将实行，浸且勾托外报，四出宣传，阴设机关，淆乱观听，揣其作用，无非欲破坏政府，遂其蝇苟捣乱之私。”《宣言》郑重声明：“本政府为造产之政府，而非共产之政府”，“本政府所知者三民主义，所行者民党党纲。言此以外，不知其他。”

△　胡汉民向杨希闵提出：一、服从政府；二、所占防地一律交出，由政府指驻；三、交还所占财政各机关。是晚，谢庐滇、桂军将领联席会议，对二、三两项拒绝接受。

△　杨希闵、胡思舜、赵成栋、廖行超等再次通电，谓：“粤政混乱，咎岂在滇军？欲谋整理，滇军罔不乐从。政府方面应将军事行动停止，倘我滇军于此度宣言而后，政府犹不停止军事行动，则是别有用意，我滇军虽弱，岂能甘受？彼时衅端一开，咎将谁属？”

△　上海杨树浦界内瑞熔造船厂、同兴纱厂、怡和纱厂、日商上海纱厂、裕丰纱厂、恒丰纱厂等中外各大工厂1.5万余工人罢工。当日，浦东、西轮船码头小工，顺记、公和祥及招商北栈等码头小工，浦东各码头小工，共约万人，相继罢工，上海码头起卸完全停顿，中外商船19艘停开。

△　北京临时政府复电上海总商会，称：“沪案”“已由外交部向使团提出严重抗议，即日派税务督办蔡廷幹、外交次长曾宗鉴驰沪查办，并饬交涉员许沅即赴沪妥为交涉。”

△　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向“五卅”死难烈士致哀，在该校图书馆

前升半旗，遭校方阻扰，并宣布提前放假，学生一律离校。次日，该校中国教师宣布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教育界。

△　南京各界开市民外交大会，反对上海西捕惨杀同胞，到三万余人。各校一致罢课，游行示威，继以罢工罢市，并通电全国，吁请国人“努力奋起，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　杭州工农商学各界三万余人开国民大会。会上，演讲人指出：“五卅惨案，不仅是学生与工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大局问题，应一致要求政府严重交涉。”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撤废领事裁判权”等口号。

△　湖北省议会讨论“沪案”，议决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请向各关系国严重交涉，并电各省议会一致援助。

△　湖南总商会通电各省，一致援助沪学生，并电段祺瑞饬外交部向英使抗议。

△　虞洽卿由京抵沪，向总商会副会长询问巡捕枪杀华人情状。虞主依段祺瑞令，向英领严重交涉，未交妥之前，劝各界“切勿暴动，致碍进行”。

△　赵恒惕为“沪案”致电段祺瑞及北京临时政府各院部，请主持正义，严重交涉，“否则国民积忿，屈莫能伸，一经触发，恐难遏制”。

△　加拉罕致牒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对于上海工人、学生被枪杀，向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同情与悲哀之情感”。

△　重庆各法团响应巴县议事会发起之全川和平大会，是日在渝总商会开会，发出和平弭兵通启，宣布发起全川和平弭兵大会，“以多数之民意，为团结之表示，期在从事弭兵运动”。

△　赵恒惕布告宣称："湘西渐告肃清，设有匪徒潜省，勾结痞党，扰乱治安，一经拿获，即予正法。"

6月4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本月1日上海西捕又杀华人，向北京外交团领袖意使翟禄第提出第二次强烈抗议，声明公共租界横暴态度，已激起民情之愤懑，租界当局实负全责，要求使团速饬驻沪领事团，立即停止开火。

△　胡汉民任命李海云为建国军第四师师长。

△　蒋介石率部经白芒花抵淡水城。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五卅惨案发出第二次宣言，吁请国民根据公理要求赔偿、惩凶及取消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未达目的之前，举国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以示我国民主张之坚决。

△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成立。该会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的对于五卅运动的公开的领导机构。是日，由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四团体（上海总商会未参加）共同发起开成立会，议决每团体推举正式代表六人主持会务，办理五卅惨案交涉事宜。

△　南京市民二万余人，为声援五卅惨案，是日午后继续游行，并沿途分组演讲，听者多为之泣下。士兵则表示："我们对内战争无非自相残杀，很不愿意，若因同胞冤死，用我们对外，就是三五个月不发饷，亦所甘心。"全城各通衢僻巷遍贴传单及惨案图说，观者莫不悲愤。

△　汉口50余校学生2.2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上海西捕枪杀我国同胞。

△　中国共产党为在五卅运动中加强宣传工作，是日在上海创办《热血日报》，瞿秋白主编。此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日报。

△　北京外交团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为西捕枪杀华人开脱罪责，竟声称五卅事件，“责在示威者，而不在租界当道”。

△　孙传芳、夏超为“沪案”会衔颁发布告，要求各界各安其业，“以严静之态度，作挽救之筹议”，“切勿叫嚣跳荡，徒逞意气……为越轨之行”，并宣称：“倘有不法暴民，假借名义，乘机思逞，即着军警严行究办。”

△　上午9时，上海租界中西巡捕与武装英国兵士六七十人，包围上海大学，闯入校内搜查，殴辱学生，逮捕职员一人，并驱逐寄宿员生百余人，强行占据该校。次日，复强占南方大学、文治大学。6日，同德医校亦被数十名英军占据。

6月5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五卅惨案“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号召全国各被压迫群众起来反抗野蛮的大屠杀，把斗争坚持到底，并在斗争中组成反帝联合战线，“万不可依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

△　天津各学校教职员、学生暨各团体数万人，对“沪案”举行唤起国人一致援助大游行，沿途演说并散发传单。

△　镇江外交后援会举行游行大会，学商工各界到80余团体共约三万余人。各工厂及人力车夫全体罢工，加入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英租界巡捕卸武装罢岗，表示同情。游行群众捣毁旧工部局，并焚毁其物件。

△　宁波开市民大会，声援上海被害同胞，到10万人。游行时，第四中学一演讲者咬破手指，血书“良心”二字，激励国民。大会致电虞洽卿，谓“先生主持是案，为国为乡，务须坚持到底，切勿让步，特此警告”。

△　芜湖各界开联席会议，讨论援助“沪案”办法，列席40余团体，议决组织外交后援会及分电京、沪当局严重交涉。各校并实行罢课。次日，各界约万余人游行演讲，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惩办凶手”等口号。10日，芜湖各界作第二次联合大游行，加入100余团体，约四万余人。全埠工商业均休业一日志哀。

△　湖北省议会致电段祺瑞、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请严重交涉“沪案”，以保国权；另电沪学生会表示援助，并电各省议会、各法团，要求一致声援。

△　虞洽卿应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之召，会商调解此次风潮办法。虞当允向工商学各团体磋商提出条件办法，以便迅速开市。

△　胡汉民令免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建国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特任朱培德为建国滇军总司令。

△　胡汉民令免建国桂军第一军军长韦冠英本职，听候查办。

△　滇、桂军以政府下易帅令，向政府取敌视行为。上午11时，滇军入占省长公署及粤军总司令部。下午1时，夏派兵占财政厅；5时，占公安局。市内电报局、电话局亦为滇军占据。其余铁路、征收、行政各机关，均被滇、桂军分别占驻。同日，杨希闵出示担任市内治安。

△　杨希闵、胡思舜等通电诬指广州革命政府勾结俄人，实行共产，声称：“今蒋中正、廖仲恺、谭平山等利用俄人，私相勾结，代彼宣传，冀以少数党人专制国命，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

△　杨森派政务厅长徐孝刚、前敌总参谋长曾述孔赴渝参加全川和平弭兵会，13日抵渝。

△　胡汉民任命饶勋为革命滇军第一路司令官；着免广三铁路管理局局长潘鸿图本职。

6月6日　段祺瑞令："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徒手奋呼，迭遭枪击，杀伤累累"，"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事实经过，期作交涉之根据。"并谓：政府"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爱国国民，率循正轨，用济时艰。"

△　段祺瑞特任孙宝琦为淞沪市区督办，虞和德（洽卿）、李钟珏为会办。

△　晚，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议定五卅惨案交涉条件17条，计：工部局应即履行以下四事：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校原状。正式条件13项：一、惩凶；二、赔款；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七、捕房应添设华捕头，各级巡捕华人占半；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期满收回；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制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次日，工商学联合会将交涉条件由邬志豪等在总商会面交执政府特派员蔡廷幹、曾宗鉴及交涉员许沅，凭此向公共租界当局严重交涉。

△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五卅惨案代表全国商人发表通电，正告各友邦及世界各民族，声明："我国人只知有公理，不知有强权；只知有公法，不知有暴力；只知有人道友爱，不知有欺凌压迫"，"若英人仍倚恃武力，不知悔悟，则世界各国咸晓然于此次惨事责任之所在，及此后爱和平之民族应求善后救济之自觉。我内外商人，为国家

地位计，为国民人格计，为生命自卫计，对于加我危害之国家，不得已而出最后之经济绝交，纵牺牲至若何程度，在所弗恤。”

△　北京外交团答复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第二次照会，否认英捕滥杀华人之责，并认为中国政府所得报告“不甚完全”，决由各关系国派代表赴沪就地调查。同日，领袖公使意使致函外交部，告以“代表团赴沪查报实情，定本月8日启程”。

△　冯玉祥致电张作霖，请其共援“沪案”，略谓：“弟以为急则治标，为今之计，交涉尚次，止杀当先；恤死固宜，救生更急。尊处如有胸算，尚祈指示周行，俾便一致主张。”

△　浙江绍兴学生会发起在大善寺内举行民众讲演，各界到会万余人。会后出发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同日，温州各校万余人游行讲演，全城罢市。7日，镇海开全城市民大会，游行示威，商店一律罢市。严州学生联合会亦举行游行大会。10日，平湖各界万人游行演讲，全城罢市，声援五卅惨案。30日，奉化、余姚分别举行游行示威，奉化到会者达三四万人之多。

△　下午4时30分，广州发生战事，首由河南政府军炮击东堤滇军总部及河西口一带之滇、桂军。滇、桂军在堤上开枪抵御。次日晨，双方以机关枪作战，其火线逐渐移向市区东南。晚12时，滇军由东郊外之猎德乡渡河袭攻河南，但未得手。

△　滇军占领广州市各机关。自晨至午，滇军乘汽车分派传单七八次，反对广州革命政府。杨希闵复用建国滇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反对“共产”。

△　杨森部杨春芳、兰文彬两师向合江黔军穆银洲（永康）旅防地攻击，黔军不支，退走马街。次日，杨、兰两师占合江。

△　段祺瑞派梁鸿志、曾毓隽、莫德惠赴津面晤张作霖，敦促入

京共商国是，并言政府应付丛脞，希望疆吏原谅，勉维暂局，若督责太严，惟有遂初。张言对段尊敬不渝，希望阁员以段心为心，希望与奉财政援助，且谓不日回奉。

6月7日　　胡汉民对上海五卅惨案发表宣言，郑重宣布：上海租界当局此等暴行，实为人道之蟊贼，及中国国家暨国际之非常损失与侮辱。救治之道，不当仅注意道歉、惩办、抚恤等枝节问题，尤当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着手，以谋根本解决。

△　北京临时政府调查“沪案”专员蔡廷幹、外交次长曾宗鉴抵沪。

△　郑州举行市民大会，到三百余团体，军界官佐及学生、士兵均一律参加。李立三报告开会宗旨，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讲述五卅惨案详情。全国总工会代表王若飞等相继演说。大会通过致电执政府、岳维峻，并通告上海及全国各报馆，提出：一、惩办祸首；二、赔偿损失；三、收回租界；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五、抵制英日货；六、打倒帝国主义。

△　党军第一旅到达樟木头，次日进占石龙，9日又占石滩，11日向龙眼洞滇、桂军进袭，旋即占之。敌退白云山高地。

△　胡汉民通电揭露杨希闵、刘震寰通敌，与唐（继尧）、段（祺瑞）密谋颠覆革命政府，发动叛乱罪状。并谓政府对此等叛军已有严重处分及周密之布置，预料旬日以内必可荡平。同日发表告滇、桂军人书，劝勉滇、桂军兵士勿为刘震寰、杨希闵个人送死，“打走你们的长官，服从国民党政府”。

△　谭延闿、许崇智、朱培德、程潜等联衔通电声讨杨、刘叛乱，揭露杨、刘称兵于首府，造谣惑众，阳奉阴违，“外应寇兵，以自相残杀”之罪行。

△　桂军第五师师长林树巍宣布脱离刘震寰，改编为建国桂军第一师。11日，滇军第四师朱世贵率所部脱离杨希闵，改编为建国滇军第二师。

△　孙科在粤调停无效，是日抵香港。发表对粤事意见，主张歼灭滇、桂军，改组现政府。并谓，国民党无行共产意，共产只可作一种学理研究，断不适于中国，最适者只有三民主义。

△　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令蒋锄欧旅、邹振鹏旅、郑鸿海旅向攻乾、凤川军实行包围反击，川军汤子模部向麻阳溃退。

6月8日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海支部发出通知："凡洋商各航轮公司所有轮船之海员一律罢工。"是日，怡和、太古等各外轮公司海员5000余人一律登岸加入罢工。

△　汕头各界万余人开会援沪学生，议决不为英、日国人佣役，不供食品，捐款助沪工人，抵制英、日商货，不搭英、日轮船，不用英、日钞票，组织义勇军等八项。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　冯玉祥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讲述五卅惨案，并令各官长集合部队，将详情讲与各兵士，以励军心。

△　广州滇军用木筏在海珠河面载兵渡河，图袭士敏土厂，被革命政府兵舰击退，死伤颇重。

△　陕西省议会致电段祺瑞，报告刘镇华残部窜扰陕南情况。略谓："刘之残部柴云陞等，由豫窜扰我省镇安、兴汉一带，沿途烧杀奸掠，无所不至，乡镇村落，十室九逃，游匪乘机蜂起，损伤生命，焚烧居民房屋"，要求"即饬省督各将领一致进剿，以清乱源"。

△　武汉米荒，米商复居奇涨价，居民大愤，武汉米店各被抢一空。萧耀南请绅商借款百万，赴皖、赣及西贡购米办平粜。

6月9日　　段祺瑞令再派江苏省长郑谦驰赴上海，妥筹救济“沪案”办法，以期早日恢复秩序，一面将市民被害情形，详细查明，呈报中央，以为交涉根据。越二日，郑谦抵沪。

△　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张作相、吴俊陞、姜登选、阚朝玺联合致电段祺瑞，略谓：“沪案”英领“不顾是非，一味强硬，是直蔑视公理，不顾邦交”，“应请睿谋立断，严厉主持，作霖等捍卫国防，义无旁贷。”

△　“五卅事件”拘捕之工人、学生共17人，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审。11日下午7时宣布判词：本公堂讯得被告人等，大多数原属青年学生，因日人工厂内工人被杀，在租界内结队演讲，散发传单，本公堂认为无欲暴动之意，且其拘入捕房时间，均在发生开枪事件之前，尚有少数被告讯系马路驻看闲人，被告等着一律具结开释。

△　武汉学界为声援五卅惨案举行游行，二万余人参加。游行队伍抵督办署，萧耀南出见学生代表，表示将请愿书所提“沪案”条件，即电转中央察核。

△　凌晨，广州滇军又派队集中西濠口，渡河攻河南。河南政府军亦凭据南岸向敌人猛击。互战约两小时，滇军卒不能过河，被击退。

△　广州商会及九善堂等团体发出通电，略谓：本市河南、河北发生战事，查其战线实在东西堤岸一带，是以本市商业中心为军事战争焦点，若循此以往，则阖市商场不毁于兵，亦必空于抢劫，全市商民呼吁，划出战线范围，以保公安，而免糜烂。

6月10日　　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到157团体，20万人，李石曾主席。上海工界代表孙宗昉报告英、日巡捕惨杀同胞经过，声泪俱下。台下群呼：“为工界同胞报仇！报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陈潜夫登台演说，当场断指血书“誓

死救国”四字，并大呼“救国”。主席宣读提案21项，交付表决，一致通过。会后游行，时值风雷大作，继之暴雨如骤，间以冰雹，数万群众步行泥淖中，气不稍馁，呼声动天地，如是者行约十数里。队伍行至外交部，向外长沈瑞麟递交国民大会决议案并附加三项，即：一、要求召回英、日公使；二、派军队至沪租界；三、政府速汇百万元至沪，援助罢业工人。旋赴执政府，段祺瑞接见群众代表，允将决议案交主管机关办理，并应群众要求，当面表示“保证提交明日阁议，尽量容纳诸位意见”。群众遂在口号声中散队。

△　济南开市民大会，援助五卅惨案，到百余团体，八万余人。议决：一、分队游行；二、推代表赴军民两署请愿；三、组织市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四、通电呼吁，一致力争。开会时，旅沪山东学生会代表报告五卅惨案经过，全场愤慨。

△　奉天各校学生为援助五卅惨案，千数百人齐集省长公署请愿。教长齐树彦到场呵斥学生爱国行动为“暴动”，迫各归本校。警厅长令警察将游行群众所持旗帜夺去焚毁，不准学生游行。学生代表提出：一、请电促外交部与英、日政府严重交涉；二、准学生代表民众演讲“沪案”；三、准学生举行哀掉大会；四、请省署筹款救济沪罢工工人；五、饬岗警保护学生讲演游行及集会之秩序；六、实行对英、日两国经济绝交。省长准前三项条件，后三项容缓商。

△　安庆各团体各学校二万人为援助“沪案”，齐集公共体育场，举行演讲及示威大游行。

△　太原三万市民为“沪案”游行示威，议决：一、与英、日经济绝交；二、募捐援助上海罢业工人。游行队伍至督署请愿，阎锡山出见，允即电执政府。

△　英、日、美、法、比、意六国公使所派调查“沪案”委员抵沪。

△　上海总商会由会长虞洽卿主持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特设“五卅事件”委员会，推举委员21人组成。

△　胡汉民任命魏邦平为建国军渡河攻城军总指挥。

△　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收编陈炯明旧部杨坤如、熊略，并任命杨坤如为粤军第五军军长，熊略为第六军军长，令熊略入梅县接防。熊入梅县后，在县城布告仍用第二军军长名义，并称“我军凯旋”。商民惊疑。汕头国民党当局是日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付办法，并致电许崇智，质问究竟。

△　全川和平弭兵大会成立。选邵从恩、黄美涵等11人为执行委员，并通电各军提出六项弭兵主张，即：核实枪支；取消防区制；组织全川财政委员会；军队由人民供应军饷；兵工厂改为普通机械厂；军政归省署办理。

△　汉口泥作工人1.3万名要求加薪，举行罢工。同日，武昌泥木作工人宣布不为英、日工作，不用英、日材料。

6月11日　　汉口惨案。10日晚8时，英商太古公司过磅人殴伤码头工人余金山，各工人愤愤不平。晚9时，工人齐集口岸，拥至公司质问，与前来镇压武装警队冲突，当场捕去八名，工人愤而罢工。是日晨，数千名码头罢工工人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表示抗议，并要求各界支援。萧耀南闻报，当派宪兵稽查到汉，协助武装军警弹压。群众被迫向租界转移，驻汉英领竟调义勇队及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当场毙30余人，重伤20余人，造成汉口惨案。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致北京外交团第三次照会，指出：使团4日、6日两次来照将“沪案”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要求租界当局“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

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以便进行交涉。

△　上海市民10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游行，工商学联合会林钧任主席。议决：一、限蔡、曾、许三特派交涉员于24小时内将本会所提之条件，向领事团提出，如不提出，即请求政府撤销其特派员资格；二、明日起与英、日二国经济绝交；三、限政府于本月14日前，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之条件完全提出，否则于14日通电全国罢市、罢工、罢课。

△　英舰助匪炮击中山县横档乡，焚民房700家，杀毙300余人，财物损失达20余万元。

6月12日　粤各路联军击败杨、刘叛乱，收复广州城。11日夜12时，大本营令西、南、北各路联军向广州总攻。渡河攻城总指挥魏邦平率部由猎德渡河，与东江联军总指挥蒋介石夹攻石牌滇军，双方激战数小时，联军始占石牌。是日拂晓，东江联军向退至白云山、观音山、瘦狗岭一带之滇军总攻，激战三小时，克瘦狗岭，击毙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晨，联军与滇军鏖战于白云山、观音山，联军两路包围，滇军分头抵抗。战至12时，滇军退入广州市区，同进入市内之魏邦平、吴铁城所部联军交火，东江联军亦相随进入市区内。旋联军击败观音山之滇军。下午2时半，粤联军收复广州市。北江方面，连日以来刘震寰所部桂军节节失利，是日亦被西江、北江联军击溃，刘震寰遁逃。至是，盘据广州四年之滇、桂军遂告覆灭。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蒋介石兼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为副司令。

△　北京外交团答复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沪案”第三次照会，声明已训令赴沪委员与中国代表讨论“沪案”，提出解决最良之方案。

△　湖北省议会、武汉两商会等九团体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汉口惨案，议决组织湖北各法团外交后援会，并决定对“汉案”临时办法三

条：一、租界已失维持治安之力，应由我政府驻扎军队代为保护；二、省政府派员调查肇事情形，严重交涉；三、募捐维持华工生活。上述三条即日电段祺瑞及执政府外交部，请速向驻京英使交涉。

△　驻汉英领柏达对11日夜英海军陆战队开枪扫射华人一案，照会湖北督办萧耀南，声称：贵督办及中国当局如果迅速预防，不以无力量之和解办法敷衍，绝无此事发生。务请禁止罢工、抵制外货、散发传单，拘拿煽惑及造乱之徒，调查排外阴谋，其为首者务须一并拿办。

6月13日　午，段祺瑞宴驻京日使芳泽等，讨论“沪案”。芳泽拟单独解决，不与英并案讨论。

△　上海总商会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沪案交涉17项条件修改为13条，请交涉员许沅向领事团正式提出：一、撤销非常戒备；二、被捕华人一律释放；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四、道歉；五、赔偿；六、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七、罢业工人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投票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十、制止越界筑路；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十三、撤换工部局书记鲁和。是日，许沅将此13条提交领事团。按：此13条与17条比较，修改最重要处有三：一、删去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条；二、删去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一条，而轻轻代之以“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三、关于收回会审公廨，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反而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而根本不想收回。其他各条，亦均减轻要求。

△　九江工人、学生援助“沪案”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经英租界时，英巡捕阻止，发生冲突。中国当局派军警前往镇压。适值台湾银行忽自行起火，经九江当局派队扑灭。

△　张学良抵沪，随行人员有参谋长喻建章及卫队共1000余人。次日，张对记者言：“此次来沪有二任务，一为调查五卅惨案真相及保护国土与华界居民之生命财产，二为顺道视察沪宁线驻军。”

△　上海总工会开临时紧急会，讨论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委员会17条件问题。议决由总工会起草，各工会署名，致函上海总商会，并另发一函致北京特派员，质问其不提出该会所提交涉条件之理由。

△　上海总商会通电，称五卅惨案交涉条件业已提出，“愿我国民勉抑感情，力持镇定，……勿分歧以召讥笑，勿越轨以资口实，勿笼统对待以减世界之同情，勿招致纠纷以增当事之苦痛”。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议决：汉口惨案向英使抗议；“沪案”令许沅在沪先与领事交涉前提四条，办不下，再移京。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英代使白拉瑞，谓“沪案”未了，汉口又发生英陆战队枪击华民，似此残酷行为，租界当局应负其责，不得不再为严重抗议。

△　湖北交涉公署交涉员胡钧，就汉口惨案向驻汉英总领事柏达提出抗议，指出：英兵开枪毙伤华人多名，“贵总领事及发令放枪者应负全责”，要求英水兵“应即令其回船，其义勇队亦应请即行转谕，嗣后不得再有开枪情事”。

△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致电段祺瑞及执政府外交部，请就汉口惨案向英使提出严重抗议，并“力争取消英、日不平等条约及收回英、日租界”。同日并电汉口工商学会及各团体，对于英帝国主义屠杀汉口同胞，表示同深悲愤。

△　徐州各界开国民外交大会，声援“沪案”，到三万余人，议决分募捐款，援助各处罢工同胞，先与英、日绝交，并将要求10项急电执政府严重交涉。是日，商罢市、学罢课、工罢业，各界结队游行。

△　冯玉祥令全军官佐目兵，一律臂缠黑纱，为“沪案”志哀，并谓非至解决时则黑纱不取消。同日，冯玉祥派顾问彭程万携款二万元（冯个人捐一万，冯军官佐合捐一万）赴沪，慰吊“沪案”之死伤者。

△　驻沪英领以汉口惨案发生，徇汉英领请，派巡洋舰“狄斯巴希号”载海军陆战队兵士350余名，由沪急驶汉口。前此，驻沪日领亦派旗舰“对马号”载陆战队200名驶汉。

△　据上海总工会调查，自5月15日至6月13日止，上海工人罢工统计数字如下：日人厂39个，6.3万余人；英人厂26个，3.6万余人；工部局八处，3600余人；华人厂11个，2.6万人；其他工人罢工34处，二万人。共计：118处，15.6万人。

6月14日　驻京意使翟禄第访晤段祺瑞，谓：本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接到上海委员团调查报告，议决扩充委员团之权限，已训令该委员团，并授予就地与中国委员讨论解决之权，俾“沪案”从速了结。

△　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暨练习舰队、第一、第二舰队各司令致电段祺瑞，以驻防海上，对于“沪案”，见闻较确，感愤尤深，要求饬令外交当局，严重交涉。

△　北京银行公会、北京总商会、北京教育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数十团体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筹款救济“沪案”办法。议决6月25日全国政商工学各界一律停工、停市、停课半天，停止娱乐及宴会，并下半旗志哀，举行大示威运动，表示全国人心一致，由本日到会团体通电全国一致举行。

△ 天津10余万人开市民大会，追悼“五卅”惨死同胞。议决：一、收回英、日租界；二、撤回肇事英、日领事；三、取消英、日不平等条约；四、取消英、日领事裁判权；五、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吉林开“沪案”死者追悼会暨市民大会，到万余人。通过以大会名义电京，请提惩凶、撤领、赔偿，抚恤、收回租界、撤退沪海陆军、取消领事权、取消不平等条约、道歉等10项要求。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张家口工商学绅商开国民大会，到1.2万人。张砺生主席。大会宣布英捕惨杀同胞情形，群众愤慨万状，大呼口号。会后示威游行，先赴都统署，由参谋长代见，表示与国民一致。又赴边防督办公署，由宋式颜代见，言冯督办愿为国民前驱，望万众一心，坚持到底。

△ 长辛店工人5000名在天安门开会，洪永福主席。会后游行至执政府及外交部请愿：一、惩办“沪案”戎首；二、收回租界；三、收回领判权；四、取消印刷附律；五、取消码头捐；六、抚恤伤亡同胞；七、颁保护劳工条例。

△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声明，本会所主张之交涉条件，与总商会所提13条并不相同。次日，派代表质问交涉员许沅，请将该会之条件从速提出。16日，又派代表走访蔡、曾两委员，指出摈弃该会所提之最低条件，实违反全体市民之意旨。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就汉口事件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声称：“不能承认此事之责任系由英国当道负担”，并要求沈瑞麟“竭力设法取缔”所谓“仇英举动”，及发表宣言“铲除谣传所发生之偏见与误会”。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十一号训令，略谓：杨、刘叛乱

业经迅速荡平，“本党日前整顿军队议决案，认为当及此实行，所有各军应将向来所分割之财政机关、民政机关、交通机关，一切交回政府，以资统筹整理”。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讨平杨、刘叛军发表致海内外同志电，指出“杨、刘身任革命政府重要军职，同时兼任中央党部重要党职，乃竟始则阴蓄异谋，继则公然叛乱，本党不得不执行纪律，加以严厉之裁判”。“此次用兵，不仅在驱除叛乱，尤在于驱除叛乱之后刷新庶政，解除人民之痛苦，而增益其幸福，俾本党政策得自由发展”。

△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电广州胡汉民及各官佐士兵，谓：杨、刘等盘据广州，冒名革命，肆行搜刮，地方人民被其荼毒数年于兹矣。近日公然勾结段、唐，希图颠覆革命政府，幸赖各军官佐士兵与地方同志合力声讨，一战而击溃之，数年巨毒，一朝斩削，快何如之。此后更望根据本党主义及政纲，努力奋斗，扫除一切障碍，巩固革命政府基础，是所至盼。

△　滇军第三军军长胡思舜部由惠州回援杨、刘，因铁路工人罢工，交通阻塞，于是日方始到达广州近郊，当即被联军包围缴械。

△　湘军第一师杨永清旅向岩门攻击，川军汤子模部退守麻阳，杨旅是日占岩门。越二日，又猛攻麻阳，占之。

△　段祺瑞令达穆林楚克晋封镇国公，喇济木多尔济加辅国公衔。

6月15日　北京外交团授予赴沪调查委员以就地与中国委员讨论解决五卅惨案之权。北京临时政府令蔡廷幹、郑谦、曾宗鉴、虞洽卿与使团所派委员根据事实克日开议，并派交涉员许沅随同办理。虞洽卿接电后即电请辞职。

△　广州大本营在河南士敏土厂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统一军民两政问题。胡汉民主席，并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号训令。汪精卫、廖仲恺、谭延闿、程潜、蒋介石、朱培德等相继发言，赞成将民财两政落入军队手者，一律交还政府。会议议决：一、将民政、财政、交通等机关交还政府；二、改建国军为国民军，所有湘、滇、粤、豫等名义，一律废除，统称国民军某某军。

△　胡汉民下令通缉杨希闵、刘震寰、韦冠英、胡思舜、廖行超、周自得等人。

△　陕西省议会致电段祺瑞，以执政府设立参政院“代行国会职权，参用专制手段，冀饰天下耳目，置国体于濒危之地”，声明誓不承认。

△　段祺瑞令沙克都尔札布晋封为郡王。

6月16日　　中外委员在上海举行首次解决“沪案”谈判，到会有法、美、意、英、日、比六国委员及中国方面蔡廷幹、郑谦、曾宗鉴、许沅共10人。中国方面提出：完全达到13条，视为本案解决。六国委员认为一至五条可以磋商；其余各条，“本委员无权解决，须电京请示使团后再议”。

△　段祺瑞令准免淞沪市区督办孙宝琦本职，以江苏省长郑谦兼署。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据沈瑞麟提议，为共商应付“沪案”谈判方略，决组织外交委员会。

△　青岛市民开雪耻大会，援助“沪案”，到三万余人，民气激昂，会后游行赴省署请愿，请电执政府先对英严重交涉，并请求先释“四方工厂”被捕工人。

△　甘肃省议会为五卅惨案通电全国，主张与英、日经济绝交，

请政府严重交涉，惩办祸魁，并表示："甘虽僻远，誓以千万人民公意，为政府后盾，为同胞援助。"

△　驻汉英总领事柏达复照湖北交涉署胡钧，对汉口惨案希图诿卸责任，声称；"办理此次治安之事，而非为一国之事，其责任则由所有旅汉各国担负，本署总领事与本国舰长于个人方面或英国官方均不负责。"

△　萧耀南逮捕汉口人道医院院长肖英，并加以鼓动工潮罪名，是日枪杀。汉口民众运动亦遭压制。

△　许崇智与陈炯明妥协，让潮梅给陈部。是日，许接蒋介石来电促其速将潮梅交与陈军，回省主持。许即与陈方代表谢文炳办交回手续，并于离汕时布告声称："本总司令为巩固粤局起见，决以潮梅收入交与林（虎）、洪（兆麟）、叶（举）各部粤军，公开分配，而以彼此合作为条件，自本月十六日起实行"。次日，许乘"绥阳"轮自汕返省。

△　熊希龄、鹿钟麟、薛笃弼等通电称：永定河决口工程自3月19日开工，已于6月1日将四处决口新堤堵筑，所余卢沟桥南岸右堤之新开泄水河决口，亦于本月15日完全堵筑合拢，全河大溜均入正流，得以完全告竣。

6月17日　　中外各委员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解决"沪案"谈判，续议首次会议各议案。六国委员允将第六条收回公廨一项并案讨论，惟须附带条件，中国方面以第六条既并案讨论，则第11条之三附律案，第12条之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案，尤须先行解决。六国方面允俟京电到后，再行方面答复。

△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复任，派次长王文豹赴沪会同蔡廷幹、曾宗鉴等办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事。王携带此案文件，偕国际联合会事宜讨论会秘书长梁敬錞于21日抵沪。

△　上海总工会、闸北各校学生“五卅”后援会、上海各路商店联合会共同大会在闸北天通庵止园路对面大荒场举行，到各商联会、各工团团体200余，三万多人。会后以闸北全体市民大会名义发布宣言，支持工商学联合会17条件，“绝对无退让之余地”；指出总商会修改之条件，“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与帝国主义妥协，本大会万难承认”。

△　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工友书，号召工人支持工商学联合会所提17条要求，不能丝毫退让。

△　广东省工农商学兵各界120余团体召开援助“沪案”代表会，林森主席，汪精卫、廖仲恺等到会。议决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由25团体各出代表一人为执行委员，并议决援助“沪案”办法15条。

△　湖南常宁县水口山矿全体工人罢工游行，援助“沪案”，并发表宣言，主张收回英国在水口山工厂。在游行中矿警突开枪，击伤10余人，捕去38人。

△　驻京意使翟禄第代表各关系国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称：“上海事件后，其他地方屡有酿成排外思想及破坏风潮，对现下之时局，再促中国政府慎重之注意。”

△　英国外长张伯伦在下议院答复工党议员质问上海事件称，“今兹乱莫能竭，各国民命，危若累卵”，“倘吾国侨民之生命财产，受乱党之害，不能不施弹压”。声称：“以枪击散乱党，乃是杀一儆百。”

△　武汉镇守使杜锡钧、交涉员胡均向驻汉领团表示，在汉之外侨生命、财产完全负保护责任。请将各租界之种种戒备一律撤除，免为交涉之障碍。次日，驻汉领团访萧耀南，萧声明汉口治安负完全责任，各领满意而归。

△　湖北学界外交后援会通电全国，报告汉口惨案发生经过，要

求政府当局根据下列各款，并入“沪案”严重交涉：一、惩凶；二、赔偿死伤损害；三、英国军舰以后永不许驶泊汉口江面；四、撤销汉口英国领事；五、英国政府向中国谢罪；六、收回汉口英国租界。

△　胡汉民令：一、各军移住郊外，禁止占据民房；二、令财政厅蠲免一切苛捐杂税；三、严禁烟赌。

△　广州中央银行及省银业界复业。

6月18日　段祺瑞令准免安徽省长王揖唐本职，特任吴炳湘为安徽省长；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郑士琦未到任前，着吴炳湘暂行兼署。

△　中外委员在上海举行第三次“沪案”谈判。六国委员态度强硬，拒绝谈判，并发表公报声称：“中国方面要求之条件，已出本委员职权之外，难有就地早日解决之希望，故委员团议决于今晚启程返京。”

△　湖北交涉公署照会驻汉英领署，提出第二次抗议，谓：“酿此重案，贵领事前失于防范，临事失于审慎，肇事在英界，发令为贵舰长，自应由贵领及舰长负责。”

△　胡汉民在省署召集总商会代表开会，请商人协助政府扫除反革命者，并谓：香港、沙面工人，为“沪案”酝酿罢工将成熟，我粤商人对罢工回省者，应予经济、粮食援助。

△　全川和平弭兵会邀请各军将领莅会表明“和”、“战”态度。到会有袁祖铭、邓锡侯、杨森代表曾述孔、徐孝刚，刘湘代表钟体乾，刘成勋代表刘莲舫，赖心辉代表沈宗元。会上杨森代表声称：“盖四川之内争纯由于不统一，杨督对此次战争以统一为号召，望大家促四川之统一，而谋达国家之统一。”

△　奉天兴城奉军第十二师第四旅朱继先所部第八十二团，因淘

汰中下级军官（大部属于收降之直系军官）发生哗变，共溃去七连，带步枪600余支。师长裴某闻警，急调第八十三团官兵追击，兜获300余名，悉数枪毙，尚有600余名窜入深山，不知所往。

6月19日　　蔡廷幹、郑谦、曾宗鉴公布“沪案”交涉经过通告，谓：本月16日与六国驻京公使代表委员团开始谈判，以迄本月18日止，凡会议三次，先之以和平协商，继之以郑重讨论。委员团始终坚持限定与本案直接关系各案，此外如公堂、市政、筑路等事，无论如何要求，均以无权研究相拒。复以此案发生之原因，谓我华界官吏亦应同负其责，更无承认之理。是与我所抱之方针，完全抵触，因此谈判宣告停顿。

△　驻京“沪案”各关系团发表公报，略谓：赴沪委员团奉命调查，中国委员提出逾越本委员团权限之要求，委员团遂回京报告，双方应根据公道与平等原则解决“沪案”本身问题，如中国政府愿意，经请示本国政府，可以友好之精神，讨论公共租界之组织及公共租界司法制之建议。

△　蔡廷幹电告执政府，谓六国委员18日晚离沪；“沪案”争持无结果，只有移京交涉，并告本日与曾宗鉴启程北上。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议决“沪案”移京办理，推举意使翟禄第、法使玛太尔、美代使迈尔为交涉专员。当日由意使亲往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访晤沈瑞麟，报告六国议决结果，并请中国方面亦为同样之准备。

△　英商太古、渣甸轮船公司奉令解雇华籍船员，并拘捕船员百余人。是日该公司行驶省港之佛山。龙山、金山等轮抵港后，船上海员遂宣布一致罢工离船，打响省港工人罢工第一炮。在港各工团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即日起一致罢工回省。次日，回广州之工人已逾2000名。

△　上海总工会开代表大会，一致议决：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会决不上工，如有破坏大局，私自上工者，一致对付之。25日，总工会致各工会通告，指出："明日商界要开市了，我们工界不要受商界开市之影响，要表示我们工界的热忱毅力，反对外国屠杀。我们工人是最勇敢的奋斗者，为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忠实保卫者……要下定决心，不得总工会的命令，不得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上。工友们坚持！坚持！"

△　上海70余商帮、团体代表在上海总商会开会，议决合组"上海提倡国货会。"

△　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发出通电，要求惩办萧耀南。通电历数萧于"汉案"发生后令交涉员向租界领事道歉、禁止工商学界募捐集会、逮捕多数市民、枪毙人道医院院长萧英等罪状，要求将萧耀南立予褫职，并依律处以私擅杀人之罪。

6月20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为"沪案"交涉停顿一事，照会驻京意公使翟禄第，略谓：原冀双方所派委员具同一和平精神，详加审核讨论，俾得早日解决。乃甫经开议，贵方所派委员忽宣告交涉停顿，离沪回京，与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提议就地商议之本旨不相符合，当此群情忿激之时，万一因交涉停顿，迁延时日，其责任当有所归，此不得不予为声明者也。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驳复意使翟禄第17日之照会，声明"沪、汉、浔等处事故之发生"，"绝无所谓排外或破坏之倾向"。"深冀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对于上海之惨案，迅依公理人道原则早日解决，则不平之民气，自可归于静止"。

△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五卅惨案交涉破裂发表宣言，指出："政府特派员删弃撤退英、日驻华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承认公会等条件，不与提出，先自示弱让步。政府庸弱，外人强暴，失败可以预

见”；呼吁国人“一致团结，对英日宣布国民绝交，务使屈服，还吾自由而后止。”

△　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大会，到男女学生及工人3000余人，刘一清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上海总商会此次将工商学联合会议决提出交涉条件，擅自修改径送交涉员提出交涉，现在我工商学各界全体否认，一致反对。”大会通过三项议决案后，即出发游行。

△　江苏省长行署布告，略谓：“六国公使代表团与我方所抱方针完全抵触，因此谈判宣告停顿，该团已于18日夜离沪。此案关系重大，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业电呈中央请予严重主持。……惟各业罢市已愈半月，牺牲綦重，亟应先行开市，以期各安本业，务各少安毋躁，勿作轨外行动，贻人口实。”

△　保定工商学各界为被英、日惨杀之诸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到500余团体，三万余人。各界代表发表演说，通过致段祺瑞及上海总商会电。是日全城各商店悬挂白旗志哀。

△　湖南省议会为青、沪惨案发表通电，呼吁“全国起而为大团结之运动，伸正义于世界，冀促彼方之反省”，“我国军人同捐私愤，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6月21日　香港工商各界数万人为援助“沪案”一致罢工，罢工工人陆续回广州。是日“全港工团委员会”发表罢工宣言，谓：“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则中国人民生命之安全绝无保障。……香港50万华工痛念沪、汉等地同胞横遭惨杀，决议与上海等地取同一态度，一致行动。非俟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之要求条约完全达到，决不中止对帝国主义之反抗运动。”对港政府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项条件。

△　广州沙面租界华工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是日一致罢

工，退出沙面租界。

△　西安开市民大会，到10万人，声援“沪案”。会后游行，全城罢市。

△　成都开国民大会声援“沪案”，到三万人，会后游行示威，全城罢市停业。本月上旬，重庆绅商学工各界对“沪案”一致愤慨，主经济绝交，并组织演讲团演讲。

△　倪道烺奉段祺瑞令，复安徽凤阳关监督职，是日接印视事。

6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主张全体国民应一致督责北京临时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依照前年《中俄协定》之例，另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　驻广州英总领事杰弥逊照会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声称：“凡穿行沙面英租界之任何举动，定遭武力之抵抗，所有后果由广州政府个人及全体政府负其责。”

△　上海总商会决定于本月26日实行开市。24日，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纳税华人会三团体各派代表开联席会议，议决26日一律开市，一面实行经济绝交，由三团体代表签名。

△　江苏省长郑谦派邢士廉为淞沪戒严总司令，是日就职视事。并致函各单位重伸民国元年12月15日颁发戒严法五条，宣布淞沪临时戒严。次日，发出戒严布告称：“倘有散布流言，妄生是非，意存破坏大局者从严惩办。”

△　张学良奉张作霖电召，促其率属迅即返津，是日离沪北上。

△　北京临时政府特派邓汉祥、邓宗瀛赴鄂调查汉口事件，越二日抵汉。25日，萧耀南宴京代表，并介绍武汉援“沪案”及“汉案”发生经过。邓汉祥谓：外交时期，官厅与人民，务须精神一致，中央此次

外交方针，决以民意为依归。关于“汉案”，不宜有所拘押、杀戮或通缉，以免外交棘手，对于最近期内拘押或通缉者，应一律开释或免缉。

△　上海总工会致电段祺瑞及各省军民长官，声讨萧耀南倒行逆施，压迫爱国人士之罪行，谓：鄂督萧耀南于市民之和平游行惨遭英人屠杀之后，始则宣称格杀勿论，继则枪毙爱国人士肖英等，封闭外交后援会及学生会，对于英人屠杀案反不严重交涉，显系卖国媚外……伏乞声罪致讨，以平民愤，而利国家，全国人民愿为后盾。

△　宁波海关日本职员是日晚8时雇车回寓所，车夫魏阿来要求增加车资，遭受毒打，受伤倒地，周围群众五人亦被打伤。日人无理行为激起公愤，群众咸入该日人寓所，将数件器物移出焚毁。中国军警出动弹压，始平息。

△　段祺瑞任命郑俊彦为陆军第十师师长。

△　中华民国全国省议会联合会通电各省议会，提议“各省田赋、货税或各项杂捐，除被灾区域应予蠲免外，量衡民力，酌征附捐”，用以“维持各本省失业工人之生计”，“协助沪、汉、京、津及海外各埠失业工人之救济”。

6月23日　沙基惨案。广州工农商学兵10万人集会援助“沪案”，胡汉民主席，廖仲恺、汪精卫等均发表演说。大会通过“沪案”要求条件16项。会后列队游行。当队伍途经沙基时，对岸沙面英、法等国外兵，突向稠密人群开枪射击，继以机关枪扫射。白鹅潭之英、法等国军舰亦发炮助击，当场击毙、击伤游行群众及围观群众百余人。后据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此案死52人，伤117人。

△　晚，广州大本营交涉署为沙基惨案照会驻广州英、法、葡三国领署，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此次巡行纯系因沪案迫于义愤，作最文明之表示，乃英、法、葡兵警军舰，竟为此灭绝人道之横蛮举

动，且此种惨杀亦系事先之蓄意阴谋”；声明此次事件，“应由英、法、葡兵警军舰及有关系之文武长官，负完全责任”。

△　广东交涉公署照会驻广州日、美、德、俄、智利、挪威、瑞士、丹麦、意大利、荷兰等国领事，告以此次沙基惨杀情形。

△　驻广州法国领事吕尔赓照会广东省长胡汉民，歪曲沙基惨案真相，诬称：“中国群众武装游行，无故向法界开枪，击毙一法商及击伤一外国居留人，旋因枪弹密下，始有还枪之举”；并扬言“对此命案，请求赔偿”。次日，驻京法使马太尔致牒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同样抗议。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沙基惨杀案较之上海、汉口租界事件，尤为暴戾”；“本党已组织调查委员会，对此次事件作严重之调查，并已决定对此事件，不依恃武力及狭隘的复仇手段，而惟以和平正当之方法，进行原有之目的，即取消不平等条约，所望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以期贯彻。”

△　北京外交团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声明不负“沪案”迟延解决之责任。

△　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召开会议，议决对英、日经济绝交。次日又召开第一次常会，决定自25日起，实行全部经济绝交，各途商不得订购英、日货品，其存入英、日银行之存款，应即日提回，并提议服务于洋行之人员与本会一致行动。

△　范石生部第三师师长徐德率部由宾州攻取武鸣，与武鸣守军胡若愚部接战于上林之间，胡部被四面包围，粮绝弹尽，向右江退走。是日，范军徐师攻占武鸣。

6月24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分别照会英、美、日、法、比、荷、葡、意八国驻京使署，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

约“是在特种情形下，未曾有充分自由之机会，以讨论规定中外间应守普通永久之原则”，故“不能继续有效”。今日，“环境业已大变，而外人所享政治经济之非常特权，依然永久存在，实与现法不合”。又谓：中国政府曾屡以“修正条约义务问题商诸关系各国……深盼各友邦对于近年中政府在各种国际会议，本全国人民所提事件，予以友谊之考量，借以增进邦交。”末谓：“中政府深信非常权利一经消除，不特各国权利利益更得良好保障，且中外友谊亦必能日益进步。为彼此利益计，甚望贵国政府重视中国人民正当之愿望，对于中政府依照公平主义修正条约之提议，以满意之答复。”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意公使翟禄第，正式提出上海总商会修正之13条为解决“沪案”之交涉根据。并称：“该案既定移京办理，以上十三条仅为解决沪案局部问题。为根本改良中外之友谊及维持永久之和平，必须将从前所订各项不平等条约加以修正。”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晤段祺瑞，递交英政府一训电，内云：“执政入京时，英国极为同情，且表示诚意，速开关税会议。今沪案实为赤化，闻政府尚汇款济沪，显系援助罢工。”段答称：“政府以罢工者食粮不给，恐其铤而走险，故接济之，全为平息风潮。贵政府见解错误，尚望转复。”

△　驻汉英国领事柏达复照省交涉公署18日对汉口惨案之第二次抗议。称：“由于华官不能切实保护租界，使领团不能不出于自卫，除开枪外，实无他法”，并声明“设防、开枪均有领团公意，以后请向领团抗议”。越二日，交涉公署致照驳复英领，指出：“肇事在英界，调兵及发令放枪为贵领及贵舰长，来照请径向领团抗议，碍难承认。”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就九江事件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诬称：“中国军警当此暴徒群众故意破坏器物，又行纵火之时，不加遏止……本国政府对此暴举提出抗议”，并称保留要求赔偿损失之权

利。

△　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致电北京外交团领袖大使加拉罕，对沙基惨杀事件提出最严重之抗议，并请转各国公使。

△　广东省署召开工农商学军各界及各国领事会议，胡汉民主席，推举代表成立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选出金曾澄等15人为常务委员。

△　驻广州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复照广东省长胡汉民，称："本领据目中所睹，此次因华人方面先行开火，我方为自卫起见始行放枪"，并"绝对否认事先有何准备"，且竟宣称："此重大责任由华人负担。"同日，驻广州葡领署总领事柯达复照广东交涉署，声明："葡舰于昨日不幸事故发生，并未发放一弹。"

△　广东岭南大学美籍教职员17人就沙基惨案发表宣言，略谓："特以自由及自动之意志表示恻怛之同情心。如此横暴之遭逢，实为不仁不公之袭击，沙面之主持此事者，当负其罪咎及责任。"并表示："我等决心与中国人合作，将中国方面所持之理由及合作之希望和目标，贡献于世界。并将予所持之宗旨直接的令美国政府与人民知之。"

△　胡汉民发布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组政府议决案，宣布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政务，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军事、外交、财政各部等六项改组办法。

△　段祺瑞公布直隶省属各地施行市自治制及区域令。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华北银行签订银元240万元借款合同，作行政费用，月息1.3%，期限二年，以汇丰银行经收盐税余款担保。

6月25日　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追悼沪、汉被难同胞大会，参

加团体达400余个，30余万人，总指挥马良。上午8时开始游行，人各手执小旗，臂缠黑纱，沿途高呼口号，市民和之，极为悲壮。午后2时，游行队伍回返天安门，举行追悼会，于右任主席，议决反对政府与使团或使团所派代表直接交涉、要求政府外交公开等五条。

△　南京各界人士30万人举行援助“沪案”大游行，主席陆志韦宣布游行宗旨为“消极为沪、汉案死难烈士作纪念，积极促进国人自救，抵抗强权”。

△　开封举行沪、汉惨案全国志哀日活动，各界160余团体，六万余人参加。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并下半旗志哀，会后游行。同日，洛阳工、农、商、学各界万余人开国民大会，声援“沪案”。

△　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开会，各界调查委员出席，驻广州美、日、德、俄各国领事及美舰长列席。胡汉民主席。会上市立职业学校黄祖培、警察第九区署署长沈崧、岭南大学学生兰骅堂、军官学校营长朱棠等以亲身目睹，报告当日沙面外兵首先开枪射击之实情。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沙基惨案发表通电，谴责帝国主义“野蛮横暴”，“肆行蹂躏”，“背弃德义，绝灭人道”，“欲一举覆灭我中华民国”之罪行，吁请“我全国国民更进一步，以努力援助广州革命政府，谋对英抵抗之胜利”。

△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外交委员会，是日公布《外交委员会条例》，凡11项。该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外交咨询机关，孙宝琦为委员长，汪大燮、颜惠庆、王正廷等18人为委员。7月1日，孙宝琦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　孙岳以政府发饷不足半数，有匪不许进剿，通电愤辞豫陕甘剿匪总司令职。

6月26日　广东政府交涉署照会驻广州英、法领事，对沙基惨案

提出第二次严重抗议。照会列举调查委员会报告之要点，确实证明沙面外兵首先开枪射击。提出要求条件：一、各关系国派大员谢罪；二、惩办关系长官；三、撤退各关系国驻粤兵舰；四、将沙面租界交回广东政府；五、赔偿毙伤华人。

△　上海公共租界各商店陆续开市。沪海道尹张寿镛、淞沪警厅长常之英、交涉员许沅等手执“政府负责交涉，商店请先开市”之旗帜，乘劝导开市运动之汽车向各商店“劝导”开市。南京路上悬挂“卧薪尝胆，永矢勿忘”白旗，万国义勇队之武装汽车来往穿梭巡视。

△　上海总工会致电段祺瑞、沈瑞麟，谓：政府对外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人民非常欣慰，咸愿为政府后盾。至“沪案”交涉，切望此间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提出，其中第六条尤为全体工人所热望，万勿让步，并请政府即以明令准允全国工人有组织工会之自由，以免外人借口中国法律，破坏爱国工人之团结。

△　段祺瑞特派王景春代表政府参与巴黎国际电政会议。

6月27日　段祺瑞特派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办理“沪案”及其善后交涉事宜；特任李景林兼署直隶省长。

△　胡汉民发表为沙基惨案烈士举行国葬令。略谓：此次民众为五卅惨案举行有秩序之大巡行，“乃帝国主义者竟施行极凶残手段，用机关枪大炮扫射，遂致死伤及溺毙多人，是真能本民族主义而为救国之热烈牺牲者，着广东省长查明此次死难之人，悉予国葬，迅即择地举行，以悼国殇，而示纪念”。

△　胡汉民通电宣布组织国民政府。略谓：“此次改组本旨，务使政府为人民意思所从出……自改组之后，政府务在与民休息，次第整理军民财政，实现本党政纲，一方积极造产，以应人民贫乏要求，一方调节经济，以符本党之民生主义。对于贪官污吏尽法严惩，对于不肖军人痛行裁兵，必使下无病民之事，上无旷职之官。本党主义得以

一一实行，国民革命得于短促时期告竣。”

△　驻京意使翟禄第代表“沪案”各关系国访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6月24日外交部照会所提13条，不能作为“沪案”谈判根据，可就“沪案”之直接问题先行商决。

△　邓汉祥致电段祺瑞，报告“汉案”真相。略谓：“汉案”远因起于援助“沪案”，近因起于英人调兵船越界示威及水兵戳伤工人，民众互爱求援非暴徒举动，英人对于群众未履行警告而突开机关枪，实属不合。此次酿成惨杀，实属故意，请饬外部提严重抗议。

△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24日致公使团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本会极为同情。年来帝国主义进攻日急，国权日丧，深为痛心，望执政竭力进行，并即提出本会13条件（按：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17项交涉条件，除四项前提条件外，其正式条件为13条）与使团交涉。

△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致电英国国会及全世界人民，谓：英外相张伯伦答国会质问，语多故作危词，乱人观念。至谓华人拟夺捕枪弹，大呼杀死外国人及英国人已丧失数命，均绝非事实。不平等条约为国际友谊之最大障碍，望各国主持公道，协助修改，俾中华民族解放于数十年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而公理人道亦于此更见伸张。

6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第二次宣言，郑重声明：对于不平等条约，应宣布废除，不应以请求修改为搪塞之具。凡我国民鉴于目前境遇，灼然于帝国主义之穷凶极恶，痛深创巨，宜一致拥护本党主张，务使即时实现。

△　上海提倡国货会在上海总商会开成立大会。虞洽卿、方椒伯及各业代表90余人到会，广肇公所霍守华主席，通过章程26条，选出临时执行会务15人。

6月29日　北京国民党要人在李石曾宅会议，对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24日修改不平等条约照会表赞同，决电广州革命政府一致进行。

△　驻汉英国海军司令戴芳卜通告称："遵照领团会议意见，即日起将汉口租界陆战队及障碍物一律撤退，7月1日晨解严。"

△　卢永祥为疏通段祺瑞、张作霖意见，是日抵京。

6月30日　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追悼"五卅"死难烈士大会，到团体300余个，20余万人，邬志豪主席，虞洽卿派代表叶震钧主祭。大会高呼"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国民绝交"、"烈士不死"等口号，是日全市商店均下半旗志哀。

△　下午1时，"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发起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到会500团体，五万余人。国际民族团体代表到会者，计有日、朝、印、土等国工党代表，及德国国际工人后援会代表等。大会通过致电广州政府，慰问广东人民，督促北京临时政府与广州政府取一致态度，以惩凶、赔偿、收回香港与收回英、法租界地为沙面惨案之主要条件，以及迅起团结，武装自卫等九项决议案。

△　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追悼沪、汉、湘、粤各界惨死同胞大会，到10万人。主席邓颖超致开会词。会后列队出发，在军警林立之下，游行示威，高呼对英日经济绝交等口号。

△　武汉各法团在武昌阅马厂举行追悼沪、汉、粤死难同胞大会，到各团体六万余人。主席屈佩兰。大会决议：一、英陆战队及义勇军为本案重犯，英政府应分别撤惩；二、英国军舰一律退出汉口，解散义勇队；三、收回汉口租界；四、英政府赔偿伤亡抚恤及一切损失；五、英政府向我道歉；六、废止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游行，并分往各街演讲。

△　济南各界举行追悼被英、日惨杀诸烈士大会，到200余团体，

八万余人。议决电广州政府对英交涉，请坚持到底，并主张收回沙面。同日，青岛各界万余人集会追悼青、沪、汉、粤死难烈士，并游行示威，商界罢市悬半旗。

△　郑州工商界为追悼沪、汉殉难烈士，全市罢工、罢市，挂半旗志哀，京汉、陇海铁路工人，豫丰纱厂工人及学、商、军、警界共数万人参加游行。

△　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举行追悼“五卅”死难诸先烈大会，是日全市休业，设祭坛于浮屿　陈氏宗祠，黄蕴山主祭。会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会后游行。

△　比利时新任驻北京全权公使华洛思向段祺瑞递交国书。

△　段祺瑞令准免帮办湖北军务兼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兼职，任刘建章为陆军第八师师长。

△　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凡127条。

△　胡汉民令准免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吕志伊本兼各职，派林翔暂行代理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

△　章士钊因地检厅检察官杨士毅、杨绳藻倡言金法郎案解决，司法部得赃10余万，呈请彻查。

△　上海《申报》载四川本年灾荒奇重。略谓：“川省本年灾荒达八十余县……据全川筹赈会派员所调查报告到会者，综计全川饿死者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疠者约二十万人，至于转徙流离，委填沟壑者，在六七十万人以上。灾情极重者，亦达三十七县。有争掘草根杀伤人命者，有攫食黄泥、观音粉，腹塞而死者，有逼自缢或投河者；有先杀儿女，再行自尽者；有全家服毒同死者；有聚众向官索食，求予枪毙者；有相率逃亡，估吃大户，死亡载道者……”又谓：“此次川省灾象，并不尽由天祸，强半出自人为，其所以使全川七千万人民胥受此

饥饿流离之痛苦者，川当局固不能不免几分相当之责任也。”据该报分析，荒旱原因在于：一、防区各军勒令民间种烟，致使民间秋种杂粮益少；二、川省连年内乱，几于各属皆成打仗区域，两军交绥，多妨害民农耕作；三、军队抽收丁粮，苛敛无厌；四、军队抢夺民食，致民间一无储蓄；五、川中土匪之多，甲于天下。

是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出版。7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出版。戴氏这两本书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渊源于孔子的“仁爱”学说；认为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全民革命，而不是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提出国民党生存所必须之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共产党应退出国民党。时称“戴季陶主义”。

△　绥远官商合办面粉公司创立，资本150万。

7月

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16人为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是日上午在广州市第三公园举行成立典礼。胡汉民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分授各政府委员印信，委员宣誓就职。广州市10万人齐集会场，高呼“拥护国民政府”、“实现孙先生遗嘱”、“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同日，大本营及省公署宣告结束，停止办公。

△　国民政府发布第一号通告，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

△　国民政府特任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徐谦为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未到任前着林翔代理。又任古应芬为广东民政厅厅长，廖仲恺为广东财政厅厅长，许崇智为广东军事厅厅长，许崇清为广东教育厅厅长，孙科为广东建设厅厅长，陈公博为广东农工厅厅长，宋子文为广东商务厅厅长，李文范为国民政府秘书长，邓泽如为两广盐运使，傅秉常为广东交涉员，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聘任鲍罗廷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凡17条。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设常务委员五人，处理日常政务。同日公布《广东省政府组织法》。

△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唯一职责，即在履行先大元帅遗嘱”；当前国民革命之任务，即着手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会议；表示国民若能自动集会行使国民会议职权，则国民政府“必尽其力所能至，以为种种之保障”。

△　法国新任驻京特命全权公使玛太尔向段祺瑞递交国书。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分电驻英、美、法、日、意、比、荷、葡八国使馆，令速向驻在国政府催复修改不平等条约照会。

△　英、美、法、日、意、丹麦、瑞典、荷兰、挪威等10国在巴黎签订《斯壁嵫浦条约》，确认挪威属斯壁嵫浦群岛为中立领土。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在条约上签字。是为中国参与世界领土中立公约之始。

△　川、黔军组织联军，推袁祖铭为川黔联军总司令，是日下达总动员令，决分三路对杨（森）军进攻，赖心辉为东路总指挥，周西成为南路总指挥，田颂尧为北路总指挥。

△　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日期，规定民国十四年8月16日至31日为初选选举期，9月1日至20日为复选选举期。

7月2日　　重庆惨案。是日，工人、学生集龙门浩外附近向市民宣讲各地惨杀案，英舰水兵持枪登岸，用武力驱散群众，发生冲突，市民被刺伤多人。次日，各界万余人举行集会对英水兵暴行表示抗议。当地军警借口维持治安，严禁集会，又刺伤市民十数人，并拘捕工人、学生数十人。

△　办理“沪案”交涉员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呈段祺瑞，声明交涉权限，举“沪案”为治标治本之分。治标者为以13条办理“沪案”交涉，治本者为修正条约；允担任修正条约，治标办法仍请由外交部办理。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通过海军部所提修筑东沙、西沙两群岛观象无线电台案，议决经费由财政部分10个月拨发。

△　段祺瑞任命朱深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

7月3日　　胡汉民以国民政府成立，是日通电解除代行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职，宣布“所有大本营暨广东省长一切政务，同时移交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广东省政府接收办理”。

△　广东省政府发表宣言，提出省政方针：一、靖匪保民；二、废除一切苛旧杂税；三、禁绝烟赌；四、整顿吏治，实行国民党考试、监察之制；五、扶植地方自治；六、整理交通；七、发展工业；八、保护农工；九、实现教育经费独立。

△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海支部，武装巡捕搜查各办事处，并将工作人员一律驱逐。

7月4日　　美国水兵无故开枪击毙上海杨树浦怡和纱厂工人蔡继贤。8日，上海交涉公署致函驻沪美国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杀

人凶手及赔偿损失。16日，再次致函美国总领事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按中美条约之规定，将火器伤人致毙之水兵克里斯特从速依法严办。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借口电力工人罢工，通知界内各大工厂，“定于本月6日正午停止供给电力”。

△　张作霖在天津召开会议，韩麟春、姜登选、李景林等参加，卢永祥列席。会议内容：一、对皖、苏问题；二、对沪防御布置问题；三、对中央应建议之项目；四、对长江直系之预防办法；五、对外交应取之态度等。

△　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组派兵解散该师第十三旅唐生明部。按：唐原系建国军唐荣阳部下，唐荣阳失败，由唐生明收束投赵恒惕，委为第一师第十三旅旅长。

7月5日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致电段祺瑞，要求按17条迅速开议“沪案”：并谓：“许交涉使接受总商会甘丧国权之十三条，希即撤任，并退还总商会条件。”

△　上海“五卅”国民外交会张梅庵等致电北京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略谓：“连日报载，诸公以权限为辞，与外长争持意见，迟不就职，二日又呈文以治本治标之说，不愿办理沪案交涉。如此一再迁延，交涉之开议无期，国民之愤慨日甚……尚祈以国事为重，消除私见，即日开议。”

△　南京学生联合会发起召开追悼沪、汉、粤死难烈士大会，学界及地方团体五万人到会。杨允中主席，卢永祥、郑谦等送挽联。

△　上海市民提倡国货大会在第一商场开幕。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等80余团体共2000余人到会，虞洽卿、霍守华、林钧、李立三等在会上发表演说。次日，第一商场开始营业。

7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主席汪精卫。是日，许、蒋、谭、朱各率所部军队到东校场宣誓就职，并行阅兵式，发出告诸将士文。

△　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并发出通电，宣称：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统一战线扩大能力起见，特行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以主持其事。由香港罢工工人选代表七人，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四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代表二人，共同组织之。

△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停供电力，经交涉无效，致使六万余人失业一事，电北京临时政府外交、农商总长及江苏省省长郑谦请向使团交涉。

△　北京外交团通过决议三项：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巡应即免职；二、下令开枪之捕头应依法惩办；三、公共租界工部局参事会（即董事会）应严加谴责。即日训令驻沪领事团通告工部局执行，为工部局所拒绝。

△　湖北督办公署外交委员会开成立会，萧耀南主席，宣布该委员会职权以研究“汉案”为范围，辅助省当局对于“汉案”之进行。会上推时樾阶为委员长。

△　驻广州英、法领事联名函复国民政府，拒绝对沙基惨案第二次严重抗议，称：“奉电令转告贵交涉员，对于此种性质之要求条件，不能加以考虑。”

△　驻汉英总领事柏达复照湖北交涉公署拒绝第三次抗议照会，声称：“本案实无磋商之余地”，并以“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吾等亦惟有取同一方法自卫”等语相威胁。

△　北京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两地之无线电通

讯试验成功。

7月7日　　国民政府为政府改组事发出通令，略谓（此次改组本旨，务使政府为人民意思所从出，而非为单纯发施政令之机关，尤使政府为人民产业建设之要枢，而非官僚政府之豢养地。自改组之后，政府务在与民休息，次第整理军民财政，实现本党政纲，以符本党之民生主义。）

△　唐继尧部龙云率队退出南宁回滇。次日，李宗仁部入城。滇桂战争告一段落。

△　截至是日止，香港罢工工团回省者已有50余个，罢工工人达20余万。

7月8日　段祺瑞令准免山东省长龚积柄本职，以张宗昌兼署。

△　段祺瑞公布陕西省属长安施行市自治制及区域令，规定长安市为特别市，以长安县城厢为其区域。

△　国民军第三军入陕。其前队为第一混成旅徐永昌全部，第一混成支队胡德甫全部，其后路援军为第一师师长叶荃、第二师师长何遂全部，共计四万人，是日开入潼关，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师长李云龙（虎臣）亦派所部协助第三军西进。

7月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于国民会议宣言，要点为：一、国民自动地开国民会议预备会于北京，开会日期为今年8月1日。二、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构成分子，完全依照本党总理孙先生去岁11月13日宣言所开列者。三、在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中，接收上海、青岛、九江、汉口、广州各处人民之要求，及全国人民之要求，使人民意思得充分表现，并共同讨论计划一切进行方针。四、在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中，决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审议其实行方法。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国民党员为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奋

斗。指出：善后会议与国民预备会议“绝非同物，凡我国民，应于此留意，勿令指鹿为马”。并谓：“当开始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运动之际，本党党员应遵本党总理去岁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今年一月十七日复段祺瑞电，暨依据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六月二十二日及二十八日之宣言，从事奋斗，务期贯彻。”

△　国民政府颁布统一税收令。令曰：自7月15日起，所有财政收入应一切由法定征收机关征收管理，无论何项文武官吏人等，概不得巧立名目，擅自征收或截留。违者认为违反法令，按照军法严重治罪。

△　广州各界于广东大学公祭沙基死难烈士。到者各界团体370余个，20余万人。次日，政府机关公祭。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谭延闿、孙科、伍朝枢、廖仲恺等均到会，并演说。第三天为省港罢工团体公祭。

△　驻重庆英国领事阿尔彻致函省署，竟称：“龙门浩属于本国领土……在此范围内，依陆军条例，应有正当之防卫。若中国国民未经本领事允可，而擅自入此范围，当开枪射击。”旋由四川省署予以驳复，声明：“龙门浩等地属我国领土，自有主权，现已派兵保护，贵领亦应严束英舰水兵勿滥用武力。”

△　驻京法使玛太尔不满于英使极力袒护工部局之抗命行动，于是晚借沪工部局不遵命问题声明辞退“沪案”交涉代表。次日公布声明书谓：“外交团与上海工部局，关于工部局董事会之权限问题及其对于使团之地位问题，解释上似已发生冲突……故认为在这种争执未解决之际，进行交涉，亦属无用。”

△　段祺瑞特派卢信为浦信铁路督办。

7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团结一致，为实现废除一切不

平等条约，解除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武装。召集真正人民之国民会议等10项要求而奋斗。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通过：一、汪精卫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二、周恩来为党军第一师党代表。

△　皖北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高世读、皖南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普等自蚌埠通电拥倪道烺为安徽陆军司令，拒吴炳湘到任。次日，倪通电宣布视事。

△　段祺瑞特派屈映光为国民代表会议华侨议员选举监督。

△　四川国民大会主任李景福等自上海发出通电，声讨杨森罪行。略谓：川督杨森重违民意，不服中央，敢于荒旱之年肆其淫威，攻伐异己，每克一城，则奸掳屠杀，勒派巨款，人民流离，田野辍耕，顿使通都大邑夷成赤地千里。今则战祸重开，糜烂当复更甚。伏望我全国同胞主张公道，一致以杨森为公敌。

7月11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胡汉民发表《告世界各国人民书》，请求主持正义，赞助废除不平等条约。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停止供应各厂电力一事，提出抗议，声明“倘因停电罢工发生骚动事情，该工部局应负完全责任”，要求转饬工部局照常供给各华厂电力。

△　省港罢工委员会派水陆纠察队封锁省港交通，旋发出通电，宣布本月10日起，所有轮船航渡，一律禁止往港及新界，并要求国民政府予以同情与援助。

△　广州工界二万余人赴国民政府请愿，递促进外交意见书，提出对外要求条件四项：一、帝国主义官吏向国民政府请罪；二、惨杀案之关系国凶徒一律惩办；三、限令现泊白鹅潭之帝国主义者战舰即

日出口；四、收回沙面租界。

△　武汉各界人士在武昌举行“汉案”周月纪念。到五万余人，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独立万岁”等口号。大会议决：一、通电全国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二、组织国民军；三、拥护人民三大自由；四、收回租界。是日各团体下半旗致哀，商店悬对英经济绝交白旗。

△　杨森部郭汝栋、白驹、何金鳌、兰文彬等师二万人，由黄毓成指挥，围攻荣昌刘文辉部，鏖战四昼夜，双方死伤数千人，刘部向永川、大足败退。14日晚，杨军占荣昌。

△　段祺瑞任命张联陞为暂编陆军第五师师长。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军事部组织法》。

△　国民政府任命卢兴原为总检察厅检察长；陈融为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林云陔为广东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7月12日　国民政府招待广州报界记者，胡汉民报告外交方针，表示：“政府对付帝国主义，办理外交，决定遵守先大元帅遗嘱，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谭延闿宣布统一军民财政计划。汪精卫说明改组政府理由与原因，略谓：此次改组，废除首长制，实行委员制，“此实国民党同志所最宜注意之事也”。

△　湖南“青沪惨案雪耻会”在省教育会召开追悼青、沪、汉、粤惨案死难烈士大会，到各团体100余个，共万余人。赵恒惕遣秘书长李鸣九到会致祭。

7月13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意使翟禄第，要求迅速通知各关系国公使，择定日期正式开始“沪案”交涉。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就沙基惨案照会北京临时政府。照会歪曲事实真相，否认英兵首先开枪，并将事件归咎于报纸之鼓吹。越二日，又致照外交部，且附有所谓《外人四人亲自目睹攻击沙面之证明书》，请北京临时政府将此两照登载华文诸报。外交部拒绝英使要求，并电广州国民政府请蠲弃成见，将调查报告电京。

△　孙岳派徐永昌旅进入华阴，将袭西安。吴新田调兵堵截，豫陕战事发生。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段祺瑞，就段对外交使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事忠告其对于国民运动勿加以阻碍，促其“完全履行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本党总理孙先生所宣言，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议决废除不平等条约”。

△　国民政府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议决《注重特别新兴工业并不许现任买办为行政官吏及各社团董事》一案，是日训令广东省政府查照办理。

△　苏联飞机4架自6月10日从莫斯科起飞，经蒙古来华，是日上午飞抵北京。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及各军队、各团体代表，到南苑机场欢迎。

7月14日　国民政府交涉署照会英、法领事，对沙基事件提出第三次严重抗议，指出：“……如认为沙面之继续战事设备为可恫吓无知之人，则广东三千万人民，更加有全国之援助，决不至因此种恐吓而屈服。”要求英、法“莫如将本政府之公平要求，迅速加以考虑，以期至于实行。则原状可以短期恢复，邦交日益巩固，请贵总领事烦为再将本政府所要求五项条件，转呈贵国驻华公使，商榷办理”。

△　段祺瑞致电孙岳，略谓：“据陕督十日、十一日电称，国民三军徐永昌由潼关佳（9）日整队入关，该军借故兴师，显系自由行动，速令国民各军严加制止等语。……关中之匪，有人负责，未经请

示，故中央谓不宜往。内情如何，明白告我。”孙接电后，即通电辞职，声称：“今陕西发生匪患，而中央谓不可以剿，匪既不能剿，剿匪总司令名义尚有何用？”

△　孙岳部师长何遂、旅长徐永昌等通电宣称：“豫匪纠股西窜，于九日提兵西进，驱除群丑，……使三省剿匪之军，名实相符。”

△　卢永祥请辞苏皖宣抚使职。卢奉张作霖电召北上后，方知张意在讽己辞职，遂于是日以“病体难支，不胜艰巨”为由，向执政府呈辞。

△　北京学界代表400余人赴执政府请愿，提出从速开议“沪案”、坚持修改不平等条约、惩办压迫爱国运动之军阀及援助工人等六项要求。

△　段祺瑞令准免署江西省长胡思义署职，特任李定魁继署。

7月15日　　段祺瑞令：“沪案发生，中外瞩目，政府迭经严重抗争，期伸正义。现在交涉正在进行，凡我国民，自应静气平心，共图挽济。各省区军民长官，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务各晓喻民众，听候解决，毋得有越轨行为，致贻口实。商埠辐辏之区，内地僻远之域，倘有奸徒搆煽，或易滋生事端，尤望剀切劝导，妥密防维，内遏乱源，外崇国信。”

△　美国新任驻京特命全权公使马瑞慕向段祺瑞递交国书。

△　汉口交涉员胡钧照会驻汉英领柏达，驳复其本月6日第三次复照。英领拒绝接受。将照会退还。

△　国民军二军李云龙部与吴新田军在距西安20里之灞桥激战。入夜，吴军不支，退回省垣。次晨，吴新田率部退出西安。

△　北京临时政府致电诘责徐永昌“无端提兵入秦，擅越边疆，殊

属藐玩法纪……”次日，国务会议决定严电孙岳约束所部，不得自由行动，一面遴派熟悉大员，驰往豫西实地查办。

△　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

△　国民政府公布《广东省政府民政厅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建设厅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军事厅组织法》。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日本兴业银行签订530万日元借款合同，作偿付满蒙、山东、吉会铁路借款利息之用，年息9.5%，期限二年。

7月16日　张作霖派杨宇霆由津入京。当日杨往晤段祺瑞转达张作霖关于内阁问题之主张及挽留卢永祥等四事。

△　国民军二军李云龙部及三军徐永昌部相继进占西安。豫陕战事告一段落。

△　刘湘、袁祖铭、赖心辉致电段祺瑞，报告“渝案”交涉情形，请饬外交部据理力争，严重抗议，并照会英代使先将驻渝英领阿尔彻撤换，以平众怒，而张国权。

7月17日　段祺瑞令国宪起草委员会于8月3日在北京召开。

△　南京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经南京总商会等团体调解，该洋行承认工人提出条件12项，并由洋行代表签字后，是日复工。按：和记洋行工人于6月5日起罢工。

△　吴炳湘到蚌埠，次日就安徽军民两职。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商务厅组织法》。

7月18日　　北京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到500余团体，四万余人。推李石曾、易培基、徐谦、马叙伦、王世杰、顾孟馀、周鲠生等为执行委员。决议四条提交北京临时政府：一、沪、汉、粤案归作一案，由北京临时政府与广州国民政府各派代表会合组织机关办理；二、对英政府单独交涉；三、废除中英不平等条约为沪、汉、粤案解决之一条件；四、与其他各国之一般不平等条约之取消，分别向各国交涉。

△　重庆交涉署为本月2日英海军杀伤我国人民一案，向驻渝英领署提出第二次抗议，并提出要求条件：一、英舰负责长官应予相当惩戒；二、擅行上岸执刀伤人之水兵，应严加惩办，递解离渝；三、向我国正式道歉；四、赔偿受伤者医药费及一切损失；五、保证今后不得再有此类暴烈行为；六、保证在英国各机关服务之华人，有愿辞退者，不得虐待扣薪。

△　驻沪美总领事复照江苏交涉公署，竟宣布本月4日枪杀工人蔡继贤之美水兵“无罪”，声称：“当时险象环生，该水兵行为应认为救济危机之唯一可行办法，实不宜惩办。”

△　旅沪中日名人学者唐绍仪、野平道男等百数十人，为联络中日人士感情，发起成立“中日联谊会”。

△　卢永祥奉张作霖急电召赴津。临行前往晤段祺瑞，段坚劝返苏任，卢仍辞。

7月19日　　袁祖铭所部黔军分路向龙水镇、邮亭铺、三溪镇发起攻势，是日午前与杨森军先后接战。次日，黔军占领上述各地，向荣昌追击前进。

7月2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宣言，声明：“中国工人绝不承认北京政府那样的工会条例。北京政府的背后站着外围的和中国的资本阶级，他们拟出那样的

工会条例，是想用来束缚工人，使工人不能自由结合。中国工人要求极自由的工会，要求保障工人权利的工会条例！”按：北京临时政府曾于6月间拟定《工会条例草案》25条。

△　汉口交涉员胡钧访晤驻汉英领柏达，交涉“汉案”，声明“政府当局服从民意，不得不取严重交涉”，并表示愿以和平途径解决，一经相谅，即提出条件正式谈判。英领答称：俟电京请示后再告。

△　国民政府训令裁撤前大本营内政部、军政部，所有该二部一切事务，移交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

7月21日　段祺瑞令临时参政院定于7月30日开会。

△　国民政府公布《禁烟条例》，凡12条。其第一条规定：限四年内将鸦片烟完全禁绝；第二条规定：特设禁烟督办管理一切禁烟事宜。同时公布《禁烟督办署组织章程》、《禁烟领牌章程》。

7月22日　川黔联军收复荣昌、隆昌两县，向椑木镇追击。黔军周西成部击败杨军杨春芳部，是日占领纳溪，进攻泸州。

△　广东省政府省务会议为整顿吏治，决定实行考试制度，是日通过《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县长甄别试规程》、《广东民政厅课吏馆规程草案》两条例。

△　国民政府特任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为国民政府惩吏院委员；派林翔、卢兴原、陈融、林云陔、曹受坤为法典编纂委员会委员。

△　赵恒惕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统一军费及整顿厘金问题。各师长、参谋长及财政司长等列席会议，决议办法六项。

7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宣言，于8月1日在北京由国民自动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实行办法，

胪列20条，其中指明段祺瑞修改不平等条约之企图与党所采之态度，及党员之责任。

△　汉口惨案举行第二次谈判。交涉员胡钧提出先决条件五项：一、撤退英舰，并解除英租界义勇队及巡捕武装；二、英租界完全由中国军警驻扎保护；三、赔偿伤亡及因本案所受之一切损失；四、撤销太古公司在租界外之行栈、码头及一切建筑物；五、英领事声明担保不再有伤害、侮辱华人之行为。驻汉英领表示：对一、二项需中英军警当局开会议定办法再定；第三项愿意接受赔偿单；第四项以两个月为限；第五项接受。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胡汉民将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之调查结果及现场见证，照会北京外交团，请加拉罕转各国公使。

△　广州工农商学各界30余万人举行沙基惨案周月纪念大游行。全市休业，停止宴会，缠黑纱，下半旗志哀，并至广东大学操场行追奠礼。

△　淞沪戒严司令部下令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海支部办事处及上海洋务工会三团体。

△　北京临时政府派李照松赴粤调查沙基惨案情况，是日抵粤。

△　国民政府发布第六十二号训令：为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起见，所有各军队及各军事机关，嗣后概不得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执行刑罚，其已因事逮捕者，着即日送交地方法庭裁判。如有违犯，无论何项军官，概行严惩。

△　张作霖由天津回到奉天。

△　段祺瑞令准免侨务局总裁王芝祥本职，以吴仲贤暂代。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给银一万元赈济湘西旱灾。

△　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外蒙古议员名额分配令。

7月24日　国民政府派孙科、傅秉常与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接洽沙基惨案交涉事宜，是日启程，8月4日抵京。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组织法》。

7月25日　国民政府任命范其务为禁烟督办；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经理。

△　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启封，越二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启封。

7月2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军事计划、方针及军政统一等问题。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出席会议，讲述以国民革命军统一军队名称，及扫除帝国主义利用军阀阻碍革命之进展。

7月27日　鄂、湘、川、黔、豫、赣、陕、甘、皖九省联防规约在汉口签字。

△　冯玉祥复电胡汉民等，赞成废除不平等条约。岳维峻、孙岳亦复电支持国民政府废约主张。

△　段祺瑞令：巴黎大学前经我国与法国学者商促中国文化讲座，现在中国学院次第观成，所有应拨款项，即由各部处按照议决办法陆续筹拨，并派专员充任监督，所冀切磋提挈，共策进行。又令韩汝甲充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监督兼办巴黎大学在华分校事宜。

△　段祺瑞令胶澳商埠督办朱庆澜未到任以前，着赵琪代理。

△　国民政府令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宋子文、陈公博为实业投资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令政府机关人员，凡有吸食鸦片者，限一个月戒

断，逾限即予撤换。

7月28日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驻京代表团、北京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北大教职员后援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六团体赴执政府，向段祺瑞提出三项要求：一、取消上海戒严；二、启封上海、济南等地封闭之团体；三、下令保护全国各界爱国运动。段答称：“第一、二两项已去电查问，第三项不能下令。”

△　段祺瑞令调章士钊署教育总长，杨庶堪署司法总长。

7月29日　　汉口惨案第三次谈判在湖北交涉署举行。英领以撤退英舰一项非领事职权所及，决移京办理。对英租界驻中国军警保护及解决义勇军武装两项，决于8月6日由双方军警各派三人商讨办法。

△　杨庶堪因不满政府之处置，仍以农商总长名义呈请病假10日。31日，段祺瑞指令：农商总长杨庶堪已有令调署司法总长，未到任以前部务暂由章士钊兼理，所请给假10日照准。

7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五卅”二周月纪念发表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书，指出：我们应当有全中国统一的指挥机关，赶紧召集全国工、商、学、农等各界人民的联合大会，举出中央执行机关，立即筹备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会议，组织真正统一的中国国民政府。应当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召集全国劳动大会，由全国总工会指导全国罢工的进行。民众应当要求武装，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我们17条的要求，才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解放。

△　北京临时参政院开幕，到114人，正、副议长赵尔巽、汤漪分别宣读就职词。段祺瑞到会并致颂词。

△　孙岳自华阴抵西安。国民军第二军开还豫境。陕西交由第三

军驻防。

△　段祺瑞令兼署航空署长何遂辞职，以曲同丰继任。

7月31日　南京英商和记洋行借口于8月1日起停工，驱逐工人出厂，并背信弃约，不按规定发放工资。工人大愤，派代表交涉。英人调海军陆战队进厂围殴工人，并开枪射击，工人死伤甚多。中国军警亦出动镇压。

△　杨森部师长王缵绪在安岳发出止戈停战通电，表示反对杨森武力统一，愿服从中央命令，率部听刘湘指挥。

△　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以川省旱灾严重，提议旅沪各团体申请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将现尚存有数逾千万之川汉铁路股款提归川民，以作救亡恤殇之用。

8月

8月1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催速开议“沪案”，并声明：“倘因此案延不能决，致生无论何种枝节，其责任当由延缓者负之。”

△　段祺瑞令班禅额尔德尼着加给“宣诚济世”封号，加封仪节着内务部蒙藏院会同速议。

△　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通告粤军将领，宣布“遵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军政计划，即日解除建国粤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4日，许崇智又与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联衔发出同样之通电。

△　南京学生联合会、南京学界沪案后援会等单位召开紧急会

议，讨论和记洋行事件，决定通电全国宣布此次惨案真相，并派代表见省长及江宁交涉署，提三项要求：一、派兵保护华人生命，禁止逮捕工人；二、速将被拘及死伤在洋行内之工人救出；三、提出严重交涉。

△　冯玉祥对记者发表时局问题谈话：开发西北，实行兵工主义；需以忠仆保卫中国国民，反对关税会议，主关税绝对自由。关于开发西北，冯谓："目下正在河套开渠，修汽车道。""汽车路拟从包头修至宁夏，现已达五原。此路修成后，该处皮毛药材等物，可以往外运出。"

△　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廖仲恺、伍朝枢、邹鲁致电北京沪案救济会熊希龄等，提出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解决对外问题等三项主张。

△　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等电许世英，指出：内政统一，外交一致，取决于赞同国民自动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

△　国民政府监察院成立。是日，监察委员林祖涵、黄昌谷、陈秋霖、甘乃光四人宣誓就职。

△　杨森军队与川黔联军在内江、椑木镇一带相峙，3日联军占内江，4日克资中。

8月2日　　国民政府招待报、学界，汪精卫发表演说，要求教育界支持政府财政统一计划，取消教育经费独立，则政府拨一巨款，以充教育经费。

△　范石生率部抵剥隘，7日抵郿县，前锋向广南进发。

8月3日　　段祺瑞特任孙宝琦为驻苏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按：是为中国驻外大使之第一人。

△　段祺瑞令准苏皖宣抚使兼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卢永祥辞职，着江苏省长郑谦暂兼办军务善后事宜。

△　国宪起草委员会行开会式，段祺瑞出席致颂词。开幕后即由梁士诒主席开谈话会。

△　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姚震呈准颁布《京师警察厅保管清室内务府及奉宸苑各产条例》，图向清室善后委员会收回清室财产之管理权。5日，清室善后委员会致函段祺瑞对此项议决表示反对，略谓："内务府者，清室丛恶之爪牙也。近年京师公产……或毁或卖，殆已净尽；今又转而谋之清室各产，此种计划，是否与内务府复辟密谋之财产有关，实一疑问。"又谓："当此革命时期，政府处于临时地位，实无变更及推翻革命之权……故此项阁议，本会万难承认。"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修改湖北省署提出之"汉案"交涉基本条件，并于次日将修改意见致电征询萧耀南，谓："第一条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可包括在不平等条约之中，自可并案办理。第二条与第六条均为本条责任上应有之事项。第六条改为英公使向中国政府及英驻汉总领事向湖北地方长官道歉。第三条改停泊汉口之英国军舰应即撤退，嗣后非得中国政府许可，不得在内江内海自由行驶及停泊。第四条国内用人行政权操自我，应由主管部门核办，无庸向英人交涉。第五条当在修改条约案中交涉，修改为英人在汉口及其他地方设立之工厂，关于待遇工人事项，应遵守中国法律。"

△　上海总工会就南京英商和记洋行事件发出通电，主张"速行组织民众准备武装之实力；以与彼人作最后之一战"。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一万元，赈济湖北旱灾。

8月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海外党部筹备不及，宣布展期至11月15日开会。

△　杨森决放弃成都，电令戒严司令向成杰炸毁成都兵工、造币两厂。是日向派兵将兵工厂重要机械概行拆毁、炸毁。次日，又令将造币厂重要机械炸毁。

8月5日　驻京英使馆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对7月31日南京和记洋行英方开枪击伤工人之事加以讳饰，称："舰上海军饬令登岸，将工人驱开，并未发生若何之意外。""双方冲突之故似因工人憎恨警察所致。"工人受伤系"华警开枪结果"。

△　驻京意使访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告以"沪案"开议一事，须各国复电到后，方能举行。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晤沈瑞麟，称"汉案"已请示英政府，准将该案直接关系事项，就地了结，其余以后再商。双方遂训令各自在汉外交官员，速行办理。

△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派代表刘钟鸣赴宁调查和记洋行案，是日返沪报告，已查明肇事之责任在英方。此案受重伤者32人，失踪者三人，中国军警当局有帮同行凶之嫌疑。

△　北京外交委员会讨论沪、汉及沙基等案，议决四项：一、对外交部修改之"汉案"交涉基本条件认为妥当；二、使团以"沪案"所提修正不平等条约，须候各国司法委员调查后方能开议，系有意延宕，外部应速向使团敦促开议日期；三、推许世英、江庸速访孙科、傅秉常，询问沙基案真相；四、南京和记风潮，速电郑谦就地解决。

△　段祺瑞任命倪道烺为长芦盐运使。

△　京兆大水成灾。入夏以来，淫雨连绵，最近更半月之久天雨不止，京兆所属大兴、宛平、昌平、密云、顺义、通县、永清、香河、三河、武清、东安、霸县、文安、平谷、蓟县、涿县、房山、良乡、固安、宝坻20县顿成泽国，损失达2000万元以上。

8月6日　　国民政府令：广西总司令、广西省长均着裁撤，于筹备改组以前，所有广西全省军政、民政、财政，着李宗仁、黄绍竑暂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负责办理。

△　蒋介石呈军事委员会请辞军事委员会委员等本兼各职。12日，军事委员会复函慰留。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次日，章士钊派视学张邦华等接收女师大。

△　段祺瑞令四川重庆市政公所改组为商埠，派聂正瑞为重庆商埠督办，魏国平为会办。

△　赖心辉、刘成勋部攻占自流井，刘文辉部占威远。越二日，邓锡侯部又占仁寿，杨森残部向眉山、青神、嘉定败退。

△　驻京英使馆华工及在英兵营服役之华工为抗议英国在各地之暴行，是日开始罢工。次日，罢工工人组织英使馆华人公会。8日，发表宣言，截至9日止，罢工人数已达300余人。

8月7日　　湖北交涉员胡钧与驻汉英领就汉口惨案举行第四次谈判，中、英军警长官参加，讨论中国方面派警察保护英租界具体办法。11日，举行第五次谈判，中国提出英租界除派警察保护外，还应加派军队防护。双方决定，由中国派军队，多数驻防界外，少数驻防界内。

△　湖北省外交委员会讨论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关于汉口惨案交涉之基本条件修改意见。关于修改条件第一条：“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会议认为：“沪、汉案之发生，皆由一切不平等条约所造成。此条为全案条件之要点，彰然甚明，且既为汉案而提出，纯系对英交涉之案，殊无向使团提出之必要，且此次各处英人惨杀案件所负责任异常重大，更未可笼统而言。”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称：7月2日重庆事件，“为应付当时情势正当必要之举”，为其刺伤华人之罪行开脱责任。

△　国际问题讨论社上海总社致电段祺瑞及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反对借口“沪案”二次调查，延宕开议；要求政府力争达到工商学联合会所提17条，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

△　省港罢工委员会致函国民政府声讨邓本殷，略谓：邓贼本殷不顾全国公愤，受香港政府80万元之运动，不惜与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接济香港粮食，助长敌国凶焰，更欲出兵扰乱广东，以消灭吾人反抗帝国主义之运动。……请国民政府迅颁明令，出师剿灭。

△　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学联会、救国团等83团体派代表至政府递交请愿书，提出取消停办女师大之议案，并即日罢免章士钊、杨荫榆等四项要求。

8月8日　　湖北省各法团外交后援会，讨论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之“汉案”交涉修改意见，认为：“沪案责任在工部局，汉案责任则全在英人。原提第一条主旨系专以汉案为根据，请政府单独对英提出。今外部将此条并入修改不平等条约一案，混向使团提出，实属错误。原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外部将‘废除’二字改为‘修改’，显有出入，绝对否认。”对其余各条准照外部来电修改，会后致函萧耀南查照。

△　北京使团会议对“沪案”用司法手续重查，意见未能一致。英、日公使已受本国训令，对司法调查保持协调。但法使反对，略谓：倘使团赞成此种办法，本公使惟有郑重宣告退出使团之途。

△　天津美商宝成纱厂工人因厂主殴辱工人，全体罢工。美厂主竟开枪镇压，打伤十几人。经工会出面交涉，提出条件八项，厂主承认，遂于11日复工。

△　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在辰州（沅陵）召开辰、沅、永、靖等21个县代表参加之善后会议，由叶提出救荒、办团、整顿财务、振兴实业四项议案。

8月9日　　杨森部向成杰离成都，袁祖铭令邓锡侯部、刘文辉部入城维持秩序。

8月10日　　驻京美使马瑞慕正式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本使已接本国训令，关于中国关税之九国条约批准书，于本年8月5日换文，即发生效力。请中国政府择定日期、地点，召集关税特别会议。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访晤段祺瑞，面陈使馆华人罢工情事，要求从严取缔。段表示："华人不与贵使馆工作，有自由主权，政府将不予干涉。"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奉军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镇压罢工运动，发表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指出工人"必须有长期斗争预备"，要求工人"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也要有组织的上工"；号召学生对于工人精神及物质上的援助，"此时更须努力"；号召兵士"不听任何人的命令压迫工界同胞"。

△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成立。选朱季恂、柳亚子、董亦湘、侯绍裘、刘重民、张应春、戴盆天、黄竞西、宛西俨9人为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通告，通知江苏省各县党部，自江苏正式党部成立后，以前临时省党部名义应即取消。23日，江苏省党部发表宣言10条。

△　段祺瑞任命梁敬錞署修订法律馆总纂。次日，特派王宠惠为修订法律馆总裁。

△　章士钊据国务会议议决，训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该校校长杨荫榆另候任用。

8月11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沈瑞麟所提“沪案”各关系国主张派遣司法调查员重查及政府应持之态度问题，认为：“沪案”经六国委员调查，无重查之必要，更不待于司法调查，可由外交部与外交委员会共同决定对待办法。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表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书，指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虽然用尽种种延宕的或屠杀的方法，镇压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然而，我们确信今后的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决非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种种方法所能镇压下去”，“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文告号召：“团结自己的力量，联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者，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

△　天津日商裕大纱厂工人为支援“沪案”，要求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及李景林之军警开枪打死工人八人，打伤多人。军警将被打死工人之尸体游街示众，向群众示威。次日，天津宝成、裕大、裕元、北洋等厂3000余工人开会，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屠杀工人。李景林派5000军队包围会场，大肆屠杀，死工人60余名，捕400余名，并封闭海员工会，逮捕各界会员多人。

△　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为督促国民政府克日肃清东江南路，统一广东，举行广东全省示威运动大会，到万余人。议决：一、反对人民公敌及帝国主义之工具；二、拥护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实行国民党对内对外的一切政策。会后大巡行，队伍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交请愿统一广东全省各议决案。邹鲁、谭平山两部长出见，表示接受大会主张，并于当日召开党务会议，将议案饬交国民政府执行。

△　国民军徐永昌旅与孔繁锦部激战于凤翔、岐山一带，孔军不

支，向西北方向退却。越二日，孔军败走汧、陇一带，陇南、陇东已无甘军踪迹。

△　上海南方大学校务会议以7、8日上海《新申报》、《民国日报》等各报皆载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清室密谋复辟文件，内有该校校长江亢虎请觐见溥仪函二件，金梁为江亢虎请觐见函一件，是江亢虎犯有复辟嫌疑，开会讨论，议决用全体教职员名义启事，否认江亢虎为校长。在此以前，该校留校学生群情激愤，曾电斥江亢虎，请其自动退职。

8月12日　段祺瑞指令：改派王曾恩充当代表，会同唐在复、朱兆莘前往参加即将召开之国际联合会第六届大会。

△　驻津日总领有田为裕大纱厂工潮向天津交涉员熊少豪提出抗议，要求赔偿裕大纱厂损失。17日，熊少豪复照日领，拒绝赔偿要求，谓："天津裕大纱厂为华人经营之事业，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与裕大的贷借关系，纯为私人契约，政府不能代私人负责。"

△　上海日商纱厂罢工案，经中日官方协商，达成协议。是日，上海特派交涉员许沅及日本总领事矢田签订共同遵守条约六项：一、厂方将来承认依中国政府颁布之工会条例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二、罢工期内对困难之工人予以相当之帮助；三、工人之工资依技术程度予以增加，并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四、工资以大洋计算；五、工厂日人进厂不得携带武器；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　省港罢工工人筹建之中山公路举行筑路开幕典礼，廖仲恺主席，罢工委员会代表林伟民致答词。会后举行筑路巡行。此次工程队分15个大队，共3750人。

△　邓锡侯部攻入眉山，杨森军队败走青神，刘文辉部占荣县，嘉定处于包围中。

8月13日　段祺瑞公布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之条约两件，即《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及《九国间关于关税税则之条约》。

△　段祺瑞令曲同丰兼航空总司令。

△　刘汝贤衔段祺瑞命赴张家口，为裁撤豫陕甘剿匪司令，另设军职事，与冯玉祥协商。

△　驻京日使芳泽就天津裕大纱厂罢工事件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歪曲事实，诬指工人为“暴徒”，要求段政府采取措施，使今后不致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8月14日　上海总商会分别致电段祺瑞及北京外交团，反对“沪案”司法调查。谓：“五卅案由六国委员莅沪调查，手续已属异常郑重，所得资料即为确证。现闻英忽倡议推翻前案，另付司法调查，是以代表各该国公使派员办理之事件，为不能取信。……求之国际通例，从未闻以外交官而受司法官之拘束。祈向各国严重声明，对于沪案重复调查一事，断不承认。”

△　段祺瑞为甘、陕局势令军务厅致新疆杨增新与川边刘存厚各一电，嘱杨速将甘省边状详复，嘱刘查复吴新田退驻汉中后有无反攻准备等情。

△　泸州杨森军师长杨春芳、何金鳌、向树荣、兰文彬，旅长张光典联电刘湘，表示静候指挥，请刘莅泸。是日，刘湘抵泸收编各部，并与各界商谈停战办法。

8月15日　湖北交涉员胡钧与驻汉英领柏达就汉口惨案举行第六次谈判。英领以中国军警驻扎英租界、英董事反对甚烈为由（按：指8月7日及11日中英军警当局在英工部局商英租界驻扎中国军队一事），要求19日中英军警当局再度会同谈判。19日，开第七次谈判，

英方租界驻军问题保持原状。胡钧将先决条件第三条内赔偿单（赔偿总额为109万元）一份面交英领。

△　北京外交委员会议决对于“沪案”重查，拟至相当时机即正式表示反对；请外部即向使团交涉二事：一、于最短时间内开始“沪案”全部交涉；二、正式公布前次六国委员调查“沪案”之全部报告书。

8月16日　广州“革命纪念会”董事邓泽如、邓慕韩、林森等11人发出重要启事，宣布该会成立经过及为表彰先烈之志所办、宜办之事项，切望同志于搜求诸先烈之德行文章功业予以赞助。

△　天津纱厂风潮被军警当局拘捕之420余人，是日起由警察厅逐一审讯。

△　北京《民报》主笔陈友仁以该报误登张作霖逝世消息一则，被奉军拘捕，解往天津奉军执法处。

8月17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召集部务会议，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女子大学，由章士钊自任筹备处长，以刘伯昭为筹备员。19日，刘伯昭到校接收女师大，学生自治会长刘和珍等与之力争，一致驱刘出校。警察动武，打伤学生数人，前来援助之各团体代表有14人被捕。

△　太原总商会（为银行买办操纵）为阻挠学联检查仇货，强令各商店即日罢市。太原总工会、山西各界雪耻会均与学联采取一致行动，国货商店等18行商人联名散发传单反对总商会，要求赔偿损失。百数十号商店亦发起另组新商会。总商会迫于形势，且阎锡山亦谕令开市，遂于22日通告各商店一律开市。

△　上海邮局及所属23个分局职工2200余人全体罢工，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薪、解雇译员等七项要求，经总商会、交涉公署出面调解，签定条件，于19日复工。

△　河南信阳500余人力车工人，成立人力车夫工会。次日，信阳柳林镇600余农民成立柳林农民协会。

△　绥远都统李鸣钟到张家口晤冯玉祥，报告该区屯垦情形。

△　清室善后委员会致函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英人庄士敦与康有为勾结，参与去年春、夏间清室复辟阴谋，扰乱中国治安，请向英国公使交涉，将庄士敦驱逐出境。

8月18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将邀请英、美、日、意、法、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之通牒分别送致各该使馆，首先声明："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开第十七次会议，中国委员对于关税税则条约虽予承认，但曾宣言无放弃关税自主之意，将来一遇适当时机，仍欲将此问题重行讨论，提出于行将开幕之会议，并希能有一种之决定，以祛除税则上之束缚"，并通告拟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开会。

△　清室善后委员会于7月31日点查故宫养心殿，发现去年春、夏间金梁等密谋复辟文件，以溥仪、康有为、金梁、庄士敦图谋倾覆民国，罪在不赦，江亢虎有重大嫌疑，亦难任其逍遥法网，是日特依《刑事诉讼条例》第18条规定，致函京师高等检察厅请速提起公诉，并列举六项证据及庄士敦在报馆所公布之文件，以备该厅参考。

△　北京大学评议会为反对章士钊摧残女师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旋胡适等五教授反对卷入政潮与学潮，向评议会提出抗议。31日，校长蒋梦麟在评议会上宣告："此案既经议决，宜继续执行脱离教育部，一切由本人负责。"此案遂决定。

△　西北国民大会在张家口开成立大会。该会由张家口本地绅士阎学沂等50余人发起，以发展国民教育为主旨，马邻翼为会长。冯玉祥出席并讲话。

8月19日　　张学良由奉抵秦皇岛检阅温树德所部来归之渤海舰队，计巡洋舰三艘、炮舰四艘、驱逐舰三艘、运送舰一艘。23日，张偕温抵天津，检阅津浦路奉军。

8月20日　　上午9时50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廖仲恺在广州偕夫人何香凝乘车抵中央党部门首，遭凶徒狙击，中弹受伤，于11时在医院逝世。同车之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同时受伤。是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讣告。各级党部下半旗三天致哀。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议决，特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应付时局。25日，特别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

△　国民政府令古应芬暂行兼署财政部长及广东省财政厅长。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给银元一万元，赈济江西水旱灾害。

△　上海纱厂总工会开成立会，到会代表124人，代表纱厂工人12万余人。次日，通过工会章程及宣言，选举执行委员25人。

△　“西北妇女讲习所”在张家口开幕，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为讲习所监督。

8月21日　　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财政部长廖仲恺，8月20日被贼徒狙击致殒，特颁治丧费一万元，准予国葬。又令：所有政府文武职员及兵士，由8月22日起至28日止，一律臂缠黑纱，以志哀悼。

△　是日上午8时廖仲恺遗体在医院小殓，11时移中央党部大殓。党政职员及农工各界均来送殓行礼，全体缠黑纱志哀，众达万余人。

△　段祺瑞通电，略谓：据直隶兼省长李景林电称，本月11日，

复有裕大纱厂工人受人煽惑，要求增薪，发生风潮。查裕大纱厂系华商集资而成，不与“沪案”有关。嗣后各省如有窃名召集，煽惑罢工者，应由各省军民长官即行制止，以遏乱源。

△　上海总商会等致电段祺瑞，反对上海设防护使。

△　日商航轮公司经上海总商会调解，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海支部达成谅解，决定罢工之华工于是日午后1时全体复工。

8月22日　汉口惨案交涉破裂。是日驻汉英领柏达至交涉署，略谓：“接英使电谕，对赔偿单不许开议；其他各项亦难有相当结果，无继续谈判必要”，随即离去。是晚，胡钧电告外交部陈述经过。谓：“英领未俟谈判之终，即拂衣而去，此外交上之失态，不独侮辱个人，且侮辱我国家机关。因停顿而生之损失，均应由英领负其全责。”次日，湖北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应付办法。

△　驻京意使翟禄第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答复去年8月9日提议收回会审公廨之照会。内称：“各国对中国所提收回公廨办法虽未同意，但中国如愿讨论，各国可以该照会为根据，开始谈判。”

△　上海总工会被流氓打手百余人持凶器捣毁，并打伤工作人员九名。上海各爱国团体派代表持函慰问。次日，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发出通电，指出：“查此等事变之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绝非偶然；其为故意破坏总工会之阴谋诡计，显然无疑”，呈请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将此事真相宣布各地，唤起民众注意，对上海总工会一致拥护，对阴谋破坏者一致声讨。”

△　北京高检厅竟以复辟案发生于本年元旦大赦令之前为理由，宣告免诉。

△　章士钊派刘伯昭强制接收女师大，并密令：“女生若有抵抗，可以格杀勿论。”当日刘带雇佣之女仆队30余人并由京师地检厅侦缉

队检验吏多人配合，将留校女生全部挟出校门，随后即将校门锁闭。

△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临时政府，抗议女师大暴行，要求将章士钊革职严惩。次日，全国学生总会及京学联合会各团体代表往警厅请愿，要求撤退军警，惩办行凶警察，保护被拘代表。

△　南方大学教职员为反对江亢虎占据学校，联合章太炎发起国民大学，是日通告正式成立。

△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3000余人举行罢工，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良待遇等12项要求。旋经劳资双方签订复工条件，于28日复工。

8月23日　　国民政府令：监察院监察委员陈秋霖于8月20日与廖仲恺同在中央党部遇刺，救治无效，溘然长逝，特发给治丧费5000元。

8月24日　　段祺瑞公布《京畿警卫总司令部暂行条例》，并特派鹿钟麟为京畿警卫总司令。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加拉罕，订于26日举行中俄会议开幕礼。

△　汪精卫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一文，略谓："我们同志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之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么共产与反共产的口号。"又谓："我们决不应该借共产二字为口实，以排斥左派分子。这是国民党当前生死关头所在。"

△　蒋介石布告就广州卫戍司令职。

△　刺杀廖仲恺的凶手之一陈顺死于医院。

△　四川将领刘湘、袁祖铭、赖心辉、邓锡侯、刘文辉、刘成勋等在自流井开军事善后会议，讨论分配防区及财政问题。

8月25日　北京国宪起草委员会议决国会采两院制，越二日，通过宪法纲目。

△　驻京美使马瑞慕访晤段祺瑞，赞同关税特别会议。美国政府决定接受北京政府邀请，派公使马瑞慕充任关会代表。

△　许世英、王正廷访晤加拉罕，商议中俄会议开议事。加拉罕表示：尚未准备完竣，恐赶不及。

△　国民政府令：设审理廖案特别法庭，任命朱培德、李福林、岳森、吴铁城、甘乃光、陈树人、陈公博、周恩来、陈孚木九人为检察委员，朱培德为委员长。

△　国民政府密令广州卫戍司令逮捕廖案嫌疑人犯。略谓："查得胡毅生、林树巍、赵士觐、魏邦平、林直勉、朱卓文等与狙击案有主谋指使重大嫌疑，且煽惑军队，拟乘机危害政府……令广州卫戍司令派兵逮捕，并组织特别法庭先由检察委员从事审问，然后由审判委员定罪。除林直勉已逮案候讯外，朱卓文、胡毅生、林树巍、赵士觐、魏邦平已闻风逃匿，着全省军警即严密缉拿。"

△　胡汉民因廖案嫌疑，是日被蒋介石拘捕。

△　许崇智召开军事会议，当场扣留廖案重要嫌疑人犯粤军军官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招桂章（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梁士铎（第一警备司令）、杨锦龙（旅长）、谭启秀（建国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是晚，国民政府派卫戍区巡查队及党军将梁鸿楷、梁士铎等附逆部队全部包围缴械。

△　审理廖案特别法庭以广州右派机关报《国民新闻》与廖案有关联，派党军搜查该报社，将营业部发行人扣留候讯。按：《国民新

闻》报于月前创办，主持笔政者为前盐运使赵士觐，该报出版之日，即首揭“反共产”之旗帜，与《民国日报》针锋相对，对于左派人物时有攻讦，而对左派之廖仲恺攻击尤力。

△　汪精卫对访者谈广东时局，谓：“此次廖氏被刺，纯然为反动分子所为，此种分子，大概合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失意之政客、及无聊之军人而成。其暗杀廖仲恺，不过为第一步计划，即加政府以意图共产之恶名，煽动军队，以推翻国民革命根据之国民政府。”并谓：“政府为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不能不下决心，以肃清反革命分子。”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代溥益实业公司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16.934363万（银元）借款合同，用于偿付溥益公司山东糖厂欠款，以保息库券作担保。

△　英国资本家在香港开会，主张对广州国民政府下哀的美敦书。是日，英资本家在香港开公民大会，通过议决案，拟电致英首相要求英政府以哀的美敦书致广州当局，令其：一、开广州为通商口岸，完全依照条约规定，许各订约国经营商业；二、驱逐广州及广东之布尔什维克党；三、解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之武装而遣散之；四、停止抵制英货；五、停止排英宣传。如不照允，则英海军完全封锁广州及附近海面，并施行英政府所视为必要之其他行动。哀的美敦书中应声明广州必须施行中国行政制度，并完全遵守中国与外国所订之各条约。与会者一致意见，以为今惟英政府干涉，始能恢复香港、广州与华南间之交通商业，并免香港与华南英人利益受经济之摧毁。会上，麦克哥文代表汕头英商会、华尔夫代表沙面英商会向众演说，赞助此决议案。

8月2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军政，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党军改为第一军（统辖第一、二两师），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

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

△　中俄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正廷演说，希望加拉罕“返国公毕早日来华，俾中俄间久悬未决之正式条约，得以从速观成”。加拉罕答称：苏联“处处愿为中国尽力，谋两国相互间之幸福”。开幕礼成后，即由王正廷与加拉罕议决在会议中分设六个专门委员会。即晚由王通电，报告中俄会议已正式开幕。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表示英国参加关税特别会议。9月18日又致照外交部，告以英政府已决定以麻大臣、皮乐上校及史图德为全权代表，牛敦、付夏礼、台克满为专门委员。

△　国民政府发出查究“廖案”通电，略谓：数日以来，已经查得此事是帝国主义走狗及反革命分子所为，已第次拿获重大嫌疑人犯，交付特别法庭审判，其少数被煽惑之部队，亦经分别处理完毕，乱萌已息，人情宁静。

△　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发出安民辟谣布告，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打着“反共产”口号，“以挑拨各阶级间之恶意，欲使互相猜忌，以分散革命势力，阴谋毒计，罪不容诛”。指出：“中国目前惟在扫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恶势，以求中国自由平等。”因此，“中国今日关于革命工作，在理论上无从发生共产反共产之问题……在事实上亦无从发生共产反共产之问题”。末谓：“自此布告之后，如再有造作谣言希图离间者，实为国民革命之公敌，当与国民共弃之！”

△　段祺瑞令教育次长吕复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事宜。

△　段祺瑞发布整饬学风令，宣称：“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并责成教育部拟具条规，认真整饬。”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召集之全国印花税会议在京闭幕。会议表决于9月1日起实行推销新式印花税等议决案20余起。

8月27日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咨行各省长、都统，略谓：外国领事有裁判权，使“外国人杀伤中国人者，不特不予处罚，且从多方袒护之，是无异奖励杀人也。若不及时收回，其危险何堪设想？”要求各地改良司法，以达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目的。10月9日驻京荷使欧登科代表驻京使团以司法部此项咨文“诬蔑误解友邦领事”，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

△　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处理沪、汉、浔、粤等处惨案致电段祺瑞，呼吁全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提出整个的具体条件”；并告以：“此间根据上述理由，议决发起组织全国外交代表团前来北京共谋进行”。

△　苏联驻京大使加拉罕离京返国。

△　北京临时政府参政院开第一次大会，审查议事细则。

8月28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照会驻京日使芳泽，提出中国向日、美两国借款收回无线电台自办等七点方案，以解决中、日、美三国间久悬之无线电问题。10月9日，芳泽照会外交部，答称：日本政府决定“原则上加以容纳”，但又怀疑中国财政能力，要求“精密考虑”，将其结果告知日方。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布告解除戒严令。次日，万国义勇团司令部将非常警备令撤销，各国海军陆战队亦收队回舰。

△　驻津日总领有田为裕大纱厂罢工事件向天津交涉署提第二次照会，认为熊少豪8月17日复函“所开各节，殊属谬见”，“东洋拓殖会社为保障债权起见，故对裕大之财产，作为抵押品；而近年该公司经营困难，故为之暂行代替经营”，“东拓”所有抵押权，即是一种财产

权，与外国人之财产同样保护，要求中国政府“应负完全保护之义务”。

△　上海中华书局职工罢工，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12项条件。后由劳资双方签订条件。罢工胜利结束，9月2日复工。

△　段祺瑞特派陆兴祺为国民代表会议西藏议员临时选举监督。

8月29日　段祺瑞特任冯玉祥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仍兼西北边防督办；特任陆洪涛为甘肃省长。

△　段祺瑞特任杨宇霆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

△　段祺瑞令准免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郑士琦本职，以姜登选继任。

△　段祺瑞特任孙岳督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派李云龙帮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任吴新田为陕南护军使。

△　段祺瑞令河南省长着岳维峻暂行兼署。

△　段祺瑞令苏鲁皖剿匪总司令、豫陕甘剿匪总司令、陕甘边防督办员缺，均着即裁撤。

△　段祺瑞令任命李家鏊为驻芬兰国特命全权公使。

△　段祺瑞令沁布多尔济晋封辅国公。

△　段祺瑞令各省区军民长官体会时艰，勤恤民隐，正当捐税之外，所有一切非法杂捐，悉予蠲除，着内务、财政、陆军部通行遵照。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议案多起，其要者计有：陆军

部提议请明令禁止购置外械，议决照办；吴光新提出福建第一师师长卢兴邦自改编后，肆意扰民，蹂躏地方，拟请明令准将其褫去现职，严行通缉，务获归案惩办，议决明令褫职查办。

△　吴光新面见段祺瑞，请辞陆军总长职，并荐卢永祥自代。次日，段祺瑞派吴赴津征卢同意。

△　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开广东人民代表大会，备界代表300余人出席。谭植棠报告开会理由。汪精卫说明组织代表团赴京原因，略谓：这次外交代表团计划就是一方联合全国各地民众，促成国民会议预备会，一方联合全国民众力量，将各地惨杀案在京总解决，并督促段祺瑞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

△　日本浪人平泉幸四郎、仓泽繁治、吉泽青、下川升等携带伪造中国10元纸币10万张前来奉天，奉省长已转饬各省知事、各警察厅一体协缉，务获送究，以免市面金融受其扰害。

△　熊克武部川军第二军奉国民政府令向桂省富川开拔，越二日，军长汤子模启程前往。

△　清室善后委员会就复辟案函复京师高等检察厅，指出："阴谋复辟，非普通犯罪可比，害及国家，不得谓情节较轻；推翻国体，罪更浮于贿选"，大赦令"实无赦及屡犯不悛进行不已之复辟犯之意"，仍要求高检厅依法检举。同时又在养心殿发现徐良于前年夏间致庄士敦代奏康有为行踪一件，一并送厅。

8月30日　梁士诒奉段祺瑞命，赴奉天催办国民会议选举等事。

8月3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吊唁廖仲恺遇刺。指出：廖仲恺被刺逝世，"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并谓：帝国主义勾结反革命军阀，刺死廖仲恺的目的，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

利益而奋斗的政府”。末谓：“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追悼党代表廖仲恺大会。廖夫人何香凝携子女莅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委员林森等出席，蒋介石主祭并发表演说，略谓：“党代表的死，是一般反革命派用反共产的口号打死的。”又谓：“帝国主义用反共产的口号来离间我们的同志，中伤我们同志，所欲谋杀的不止廖先生一人，汪先生和本校长都在内的。……如果党代表死后，我们还不彻底觉悟，便中了敌人的奸计了。”

△　驻京日使芳泽派参赞有野至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送交日本政府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复照，并谓：日本代表衔名，俟任命再行通知。

△　段祺瑞电促卢永祥来京面商入阁事。

△　段祺瑞令改编福建警备第一师师长卢兴邦褫去现职，交陆军部严行通缉，务获归案惩办。

△　国民政府公布《陆军测量局编制大纲》。

9月

9月1日　　廖仲恺安葬，送殡团体逾千，人数达20万，林森主祭。各机关全日停止办公，下半旗志哀。

△　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开会，议决三事：一、统一财政，设监督委员会，强迫各处解部；二、出兵东江；三、胡汉民出洋。

△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奉英外相张伯伦训令，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坚持“沪案”应进行司法调查。

△　天津交涉员熊少豪驳复驻津日领8月28日照会，略谓：来函声明以裕大之财产作为抵押品，则因罢工所受损失，仅应由债权者向债务者自行商酌处理，至于函称暂时代为经营等因，则足见该厂仍系纯粹华商营业，绝不因与外人有借贷关系而变更。照会声明：省代表对于保护该厂，实已充分尽责。前函所复各节，并无谬误之处。

△　张学良由天津返奉天。

△　吴光新由津回京，向段祺瑞报告卢永祥不允就陆长职，请段再电敦劝。

△　段祺瑞公布《国立编译馆条例》及《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官制》。

△　旅港各邑商会联合会致函省港罢工委员会，请求磋商调停办法。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复函，欢迎该会派代表来省。

9月2日　　段祺瑞令禁止购外械，略谓年来国内不靖，军器所需，每由外商包运来华，价值甚巨，为数繁多，且所购之器，类皆旧式，附带子弹，亦复有限，口径各异，补充亦难，殊非统一兵器教育之道。……除由科学所发明之器械，可供军队智育学术上之研究者，得随时审查需要程度，临时特许采购外，其余应一律禁止购置，并即停发此项护照；一面由外交部分行各国驻使及税务司严为查禁，以重军实，而杜漏卮。

△　段祺瑞特派邓本殷为广东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国民代表会议议员临时复选监督。

△　段祺瑞指令公布《斯壁嵫浦条约》。

△　段祺瑞指令将驻日本神户领事馆改为总领事馆。

△　北京临时政府派江庸、孔祥熙为代表赴广州磋商南北外交统

一事宜，是日离京南下。10日，江、孔接北京来电称“粤局不靖，缓去为宜”，逐中止赴粤。

△　国宪起草委员会议决各省得自行制定省宪法，特别区得自行制定区宪法。

△　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姜登选为苏皖鲁剿匪司令部明令裁撤，致电段祺瑞严索积欠之军饷23万余元。并谓：“公既裁撤，自应清偿债务，务请财、陆两部赶速如数汇拨，俾清手续。”

△　孙岳在西安就督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同日，河南兼署省长岳维峻电告段祺瑞，已遵命在省署任事。

△　驻京比使华洛思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比政府欣然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决定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并特派华洛思为代表，驻沪总领事汪侯特及银行总代表狄西业二人副之。

9月3日　　卢永祥致电北京临时政府，称苏皖宣抚行署从9月1日起先行收束，并请政府先须明令取消宣抚名义，本人俟调摄得痊，再效驰驱。

△　国民政府令兼署财政部长及财政厅长古应芬呈请辞去兼职，特任邓泽如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仍兼两广盐运使；任命李基鸿为广东财政厅长。

△　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宴请商界人士，总商会、市商会等200余人出席。汪精卫发表演说，阐述国民政府政策与商民之利害关系，指出：财政统一等四项决议案，是“保护商民利益，发展商民利益的”。

△　川黔联军攻入嘉定，杨军黄毓成部被迫缴械投降。

9月4日　　华盛顿会议条约各国（英、美、法、日、意、比、荷、葡）驻京使馆分别答复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6月24日促请修改不

平等条约照会，复文措辞大体相同，大意为：修约须视中国能否保护外人权利与利益为准；关税自主，俟财政改革后予以特别注意；领事裁判权问题，俟派员来华调查后决定。

△　驻京法使玛太尔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同意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团长为驻京法使玛太尔，委员为驻京法公使参议祁毕生、法国总领事商务随员克乃德。

△　段祺瑞指令外交、交通两总长，批准《万国邮政公约》。

△　北京临时政府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抵南京，筹商海军统一事宜。

△　杨森通电宣布率部由犍为向滇进发，所有留川各部概归刘湘节制指挥。

9月5日　　段祺瑞特派沈瑞麟、梁士诒、颜惠庆、李思浩、王正廷、叶恭绰、施肇基、黄郛、王宠惠、莫德惠、蔡廷幹、姚国桢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派严鹤龄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秘书长。

△　段祺瑞特派李盛铎为国政商榷会会长，彭养光、周渤为副会长。

△　中比金法郎案在京正式换文。该协定凡四条，其大要为：比国允将1922年12月1日所应开始偿付之赔款，改自1925年9月1日起清偿；以前33个月之付款，归中国支用，其余未付之款，须照电汇折为美金，一次付清，由华比银行垫出；俟付清垫款后，余款悉交中比委员会，作为教育、慈善、实业、公益工程之用，惟所需材料须向比国购买。

△　国民政府授予许崇智监督广东境内财政全权令：特授政府委员、军事部长许崇智以监督广东境内中央及地方财政全权，着即认真监督，切实整顿，如有不肖军人，贪墨官吏，或从中阻挠，或阳奉阴

违，务须按法惩治，庶几财政统一早日实现，并将从前紊乱分裂苞苴贿赂种种积习，悉数扫除，以成新治。

△　广西省政府改组，李宗仁任省军务督办，黄绍竑任省军务会办兼民政长。是日，李、黄宣誓就职。

△　国民政府公布《兼职条例》，凡五条，规定凡服务于政府机关人员，均以专任为原则，其有不得已而兼任者，须呈请主管机关核准，且兼职者不得兼薪。

△　粤商界为支持国民政府统一财政，表示商民与政府合作之决心，是日在广州总商会成立“改除杂捐研究会”，并通过宣言。

△　山东省银行在济南正式开幕。张宗昌出席并致训词。该行督办蒋邦彦，资本1000万元，已收足500万，发行钞票300万，为鲁省各银行之冠。

9月6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令驻英、美、日、法、比、意各国公使、代办，向驻在国政府声述：对于“沪案”司法调查，我国在原则上誓不承认，亦不派员参加。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开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发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

△　四川省议会召集被灾各县县议会代表议兵灾善后办法，到叙永、内江、资阳、仁寿等39县代表，一致主张立筹巨款，赶放急赈400万元，并请调回主客军队，免骚扰地方。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行第二期毕业礼。此届毕业生计五队：步兵二队、炮兵一队、工兵一队、辎重一队，共393人。校长蒋介石训勉各毕业生同心同德，继承总理遗志，努力革命事业。

9月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九七”国耻纪念大

会，到工农商学各团体二万余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谭平山、省农会代表阮啸仙等发表演说。旋列队示威巡行。

△　上海总工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纪念“九七”国耻及追悼“五卅”与各地死难烈士，举行大会，并示威游行，到12万余人。大会通过致段祺瑞及全国各界电，吁请圆满解决五卅惨案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下午6时，游行完毕。各工人散队回家，经过英租界爱多亚路时，英捕强行阻拦，不许通过，并开枪向工人射击，重伤六人，轻伤多人。同日，上海总工会就英捕任意枪杀游行工人通电各方，望南北政府即向英使提出严重抗议，务期达到赔款道歉目的，并望全国各界同胞速起援助，一致奋斗到底。

△　武汉工学商各界10余万人纪念“九七”国耻日，举行水陆大游行。是日，华英交界路口军警林立，戒备严密。游行队伍手执旗帜，高呼口号，通过各主要街道，秩序井然。水面游行由航业公会组织大小轮20余只，帆船40余只，约万余人。当日，各团体召开国民外交大会，到10余万人，通过议决案多起。

△　驻京葡代使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同意参加关税特别会议。17日，又来照称：已派定驻京公使毕安琪、国会议员罗夏、海军少将勃郎谷为会议代表。

△　新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杨宇霆与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梁士诒、农商次长莫德惠同车抵京。杨此次来京，系奉张作霖使命，与政府商洽改组内阁问题，为段所拒。越二日，杨离京回奉。

△　湖北国民外交协进会发表宣言，誓不承认北京外交委员会关于维持外交部所提“汉案”修正案的主张，声明：“本月七日湖北全省国民外交大会十余万人，当场通过坚持汉案原提条件，不达圆满目的不止。”

△　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

△　国民政府令：上海大学代理校长邵力子，呈请政府准予援助上海大学建筑经费大洋二万元，经十五次委员会议决，决补二万元，由财政部筹拨。

△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致函该校董事会，倡议“教授治校”，本人决辞。

9月8日　　驻京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荷兰政府同意参加关税特别会议。30日又来照称：欧登科为全权委员，荷属东印度副总税务司夏培克及荷兰东印度汉务哥喀特恩格立诺为专门顾问。

9月9日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7日英捕开枪伤人事致电段祺瑞，要求迅即提出严重抗议，“并速决谋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主权”。

△　驻京法使玛太尔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抗议，上海“九七”运动游行队携旗冲入法租界，不及派捕阻止，致在英界发生惨剧，此事应完全由中国官吏负责。驻京英使亦照会外交部声明“九七”流血惨剧之责任全由中国官吏负之。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讨论重查“沪案”问题。决议由英、美、日三国先行派遣司法官组织委员团，从速实地调查；“沪案”开议，俟司法调查后始能举行；通知中国政府亦派司法官会同调查；致电本国政府，促其派法官从速起程赴沪；并决定无论中国政府赞同与否，三国司法委员团决计实地调查。

△　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致电段祺瑞，请修正《工会条例》。指出：“该条例修正后，仍有种种限制，此不但不能纳工人行动于正轨，且将为工潮泛滥之根源”；要求“将该条例再加修正，使合于保障

工人利益及自由之原则；否则，该条例照旧发布，敝会所属八十万工人，誓不承认”。

△　旅京苏绅庄思缄等公饯杨宇霆。席间，杨表示：决不带一兵赴苏，到苏后亦不添募一卒。

9月10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议决，上海“九七”案作地方事件，由上海交涉员许沅与驻沪英领谈判解决。

△　陈启天在上海《醒狮周报》发表宣言及简约，宣布“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　甘肃省议会致电冯玉祥，对其督甘表示欢迎。次日，班禅额尔德尼亦电冯表示祝贺。

△　上海华商纱厂经上海总商会调停，承认工人所提六条件。是日，上海总工会通告工人即日复工。

9月11日　国民政府批准公布《修正发行广东短期金库券条例》。《条例》规定省金库券定额为200万元，月息六厘，三个月期满本息偿还。

△　国民政府公布《兵工厂组织法》，规定兵工厂直接属于国民政府，受军事委员会之直接监督。

△　林虎、洪兆麟、叶举三部由刘志陆指挥，分兵三路向普宁、惠来、揭阳、潮阳四县进攻，许崇智部纷纷退却。次日，林虎入汕头。

△　驻京美使马瑞慕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同意参加关税特别会议。29日，又来照称，全权代表兼委员长为马瑞慕，全权代表注恩，专门委员情金式、韩倍克、艾文思。

△　段祺瑞特派章士钊兼国立编译馆总裁，张奚若为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局长。

△　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期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指出其《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错误见解非常之多”，对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并对其“所持排除共党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作了简单的答复。

9月12日　　国民政府令：每年3月12日为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各机关均应于是日放假，并列入学校日历。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商标条例》及《修正商标条例施行细则》。

△　国民政府令：决定在虎门附近组织领港机关，着令饬领港人员应驻在该处。

△　段祺瑞任命杨如轩为暂编陆军第六师师长；陈兆锵为江南造船所所长。

△　江苏旅京同乡举旧国会议员陈则民访农商次长莫德惠，请向杨宇霆转达三事：一、军民分治；二、不带军队；三、实行新预算案。

9月13日　　上海各公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请向使团正式声明反对司法调查及否认其调查结果等项议决案。

△　陈炯明自上海乘轮赴香港，联络魏邦平，接洽商界。

9月14日　　李宗仁、黄绍竑致电国民政府，报告广西新政府成立。

△　川北旱灾急赈会以川北旱灾，灾区延袤70余县，饿死20余万人，是日开会公决：于京、沪两地设立办事处，宣传劝募，以资救急。

9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〇八次会议议决，任命汪精卫为各军及各党立军校党代表；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林祖涵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决派胡汉民为代表赴俄考察；改国立广东大学为国立中山大学。

△　驻京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各关系国议决对五月三十日上海事件，由美、英、日各派法官一人组成司法调查委员会重查，请中国亦派法官一人参与该会调查。"照会并附上述三国委员指定书副本一份。

△　国宪起草委员会议决，总统由全国选民组织选举委员会选举之。

△　卢永祥到京，当晚晤段祺瑞，坚请准辞宣抚使，并表示不肯就陆长职。24日，国务会议议决，由府聘为高等军事顾问。

△　刘志陆部分三路向东江移动。左路指挥谢文炳率部出发海陆丰，右路指挥林烈率部出发老隆、河源，中路指挥黎生、前敌总指挥李易标由五华、紫金击三多祝。是日，刘下达各路动员令，18日，下达总攻击令。

△黄河下游山东寿张县黄花寺决口，冲汲村庄80余处，淹毙2000余人。

9月16日　湖北交涉员胡钧与驻汉英领柏达就汉口惨案举行第九次谈判。英领提出除赔偿一条外，其余各项无再议之必要。

9月17日　驻京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请订"沪案"开议日期；并声明对于司法调查，仍坚持9月15日照会所持之态

度。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决定，授予吴光新陆军上将衔，特派赴日观操；又内务部提出包头改设县治案，议决准予照办。

△　段祺瑞任命王都庆为暂编陆军第七师师长。

△　山东省东昌驻军张建功部第四旅，奉命往大名一带剿匪，是晚全体哗变，抢劫城内钱庄、当店，黎明即鸣枪南去，沿途经过莘县、朝城、观城等县，均大肆抢劫，旋向豫境窜去。

△　苏军长官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在南京秘密会议，议决一致拒绝奉军，并将陈调元所率第十师（卢永祥旧部）陆续向宜兴移动，以防浙为名，待机而动。

9月18日　淞沪戒严总司令部派出大批军队解散上海总工会，封闭会所，拘留职员二人，并出布告以“宣传共产，鼓动风潮”为由，通缉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同时限令各工会即日一律自行取消。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电，说明事实真相，吁请全国各界“主持公道，予以实力之援助”。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令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戍司令蒋中正全权处置粤局。

△　国民政府代表林森、邹鲁率国民外交代表团赴北京，广州市各界八万余人欢送。

△　刘志陆、李易标、熊略等通电声讨蒋介石，并派人赴港请陈炯明回汕主持一切。

△　刘志陆部右路林烈部占紫金，左路谢文炳部占惠来。23日，占河婆。24日，又占海陆丰。许崇智部退淡水。

△　段祺瑞令财政部各发给帑银一万元，分别赈济直隶、福建水灾。

9月19日　国民政府以秘书长李文范随胡汉民赴俄访问，任命陈树人署理国民政府秘书长。

△　蒋介石密令黄埔学生军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第八旅并补充旅及铁甲车队、“江固”舰，解决叛军。次日，第二大队在虎门、太平，第四、五团在东莞，包围粤军第三师师长、前魏邦平部旅长郑润琦部，将其全部缴械；粤军陆海泉、谭曙卿、魏丽黄三旅迫石龙，粤军第三旅旅长莫雄部遂亦缴械。

△　段祺瑞指令批准在苏联列宁格勒特设总领事馆。

△　蒋介石致函许崇智，劝其暂离粤境。

9月20日　国民政府在广州开追悼廖仲恺大会。到数万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伍朝枢等均在会上演讲。

△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准予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并财政监督许崇智卸职。午后3时派陈铭枢护送许乘轮赴沪。

△　国民政府令：许崇智请假赴沪养疴，着谭延闿署理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部收束事宜，由该军参谋长蒋介石办理。任命谭曙卿代理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暂归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指挥。关于东莞、增城、宝安一带之军队，统为蒋介石分别处理。又令：免去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本职，由宋子文继任。

△　潮梅旅省各团体通电全国，宣布陈炯明军罪状。略谓：“……杨、刘叛乱，省军回戈，洪兆麟、林虎、叶举等趁虚复入，分驻梅、埔、顺、揭、潮、澄各属，驱万余叛军，散布村市，占驻民房，强占粮饷，掳掠货财，奸淫妇女，横行无忌。”并谓：“林、洪、叶等近且不惜勾结帝国主义，接济香港粮食，以冀获得枪械，重祸广东，卖国

殃民”，要求国民政府实行讨伐。

△　范石生部向文山进发，龙云、胡若愚两军分两路夹击。范军大败，残部向百色溃退。

△　中华学生联合会致电段祺瑞，要求立即电令上海当局启封上海总工会，并释放被捕职员。越二日，上海纱厂总工会等100多工会联合致电段祺瑞，提出同样要求。

△　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上海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　驻京西班牙公使嘎利拉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同意加入关税特别会议，出席代表委员为嘎利拉及本馆参赞阿嘎拉。

△　中国济难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以救济因爱国运动而被难者为其宗旨，恽代英、郭沫若、陈望道等为正式委员。

9月21日　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

△　新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杨宇霆抵南京，次日在督署接印视事。

△　段祺瑞令：军事善后委员会、财政善后委员会，均着于10月5日开会。

△　段祺瑞任命王天培兼暂编陆军第九师师长；彭德铨为暂编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杨振东为暂编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颜景宗为暂编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　段祺瑞令准免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鲍贵卿本职，特派刘尚清继任。

△　汉冶萍矿经理盛恩颐勾结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军队一团包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逮捕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等40余人。工人大愤，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军警当场开枪镇压，打死七人，伤30余人。当即封闭俱乐部，捕去工人多名，遣散工人千余名，并使煤矿停工，一万多工人失业。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因上海总工会被封，议决自行解散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9月22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驳复驻京英代使白拉瑞本月1日照会，反对英政府用司法调查手续重查“沪案”。

△　国民政府令财政部长邓泽如辞职，以宋子文继任。

△　段祺瑞令准免京师宪兵司令费国祥本职，任柴兰芬署京师宪兵司令。

△　孙岳致电北京临时政府，以奉命督陕，豫陕甘剿匪总司令一职，请任第三师师长叶荃继任。

△　陕西督办孙岳致电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以该军欠饷数月，官兵困苦，转瞬秋凉，冬衣尤为吃紧，请拨付比利时退还之金法郎款维持。

△　淞沪市政促成会以江浙再战之谣诼日盛，致使沪上米价飞涨，致电杨宇霆、孙传芳，要求通饬所属防军保护米船通行。

△　北京临时政府驻日本公使汪荣宝抵东京任所。是日上午往访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币原就北京临时政府8月28日关于无线电问题提出提议，表示：中国应先许可三井物产会社经营双桥无线电台为其前提条件。

9月23日　　国民政府布告处置“廖案”各犯经过。略谓：“廖案”发

生，政府“业于二十五日将嫌疑犯人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通缉归案讯办，并将谋危政府、叛迹已露之军官梁鸿楷等逮捕，暨将其所属部队，分别解散收编”。又谓：“郑润琦等包藏祸心，与梁鸿楷等串通一致，政府令其驻屯东莞、增城、宝安等处，责任重大，乃甘为反革命之鹰犬，以谋害国民革命政府，实为军队之败类，民国之罪人，故于九月十九日：令广州卫戍司令相机处置，以破凶谋，而息乱源。”

△　国民政府给予胡汉民以俄使名义出国，由黄埔乘俄舰放洋。所遗外交部长职务，由黄昌谷代拆代行。

△　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林森等一行22人抵沪，29日抵宁，10月6日到达汉口。

△　段祺瑞以陆军总长吴光新赴日本观操，令次长贾德耀暂行代理部务。又令：将陆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第三十一师师长陈国栋免职，以赖心辉兼第二十二师师长，刘文辉兼第三十一师师长；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

△　吴光新奉段祺瑞命，偕同宪兵司令柴兰芬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冯对吴表示：仍本去岁主张，与东北合力拥护现政府。并谓：本人现正致力于开发西北，日内即赴包、宁视察，筹划屯垦事宜。越二日，吴离张返京，并于次日向段面陈经过。

△　段祺瑞着财政部发给帑银一万元，赈济河南水灾。

△　汉口惨案举行第十次谈判，中英双方讨论租界防务及商团撤防等问题，无结果。

△　驻京意使翟禄第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同意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为驻京公使翟禄第，专门委员为陆尚达及意大利远东商会会长富麦加利。

△　上海工人组成上海工人临时代表会议，是日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范成馨等九人执行职务，负责对外接洽及办理事务。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日本太平公司签订1647.011393万日元借款合同，作偿付购械借款利息用，年息8%，期限二年，以国库券担保。

△　上海商场开幕。该商场由中华国货维持会发起，联络全国各工厂组织而成。出售商品50余种。商场委员长为杨小川、庞竹卿、王介安。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虞洽卿、方椒伯出席开幕式。

9月24日　国民党为促进各界与国民政府合作统一广东，是日召集广东“军、政、学、农、工、商各界大会”，到千余团体，10余万人。林祖涵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大会。国民政府代表汪精卫、省政府代表陈公博、总商会代表冯芝荪、广东对外协会代表谭植棠等在会上发表讲话。大会通过宣言，谓：“广东的统一，就是广东民政财政及军政的统一。”指出：“要使人民与军队结合起来，以全力做国民政府及国民之后盾，方能扫除一切障碍，方能达到广东的统一。”

△　库伦外蒙政府致电北京临时政府蒙藏院，请明令宣布民族自决，俾“蒙古政府当派全权代表驰赴中央，共议中蒙多数人民永享平安之计”。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给帑银一万元，赈济安徽水旱灾。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议决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

△　国民政府召集省港罢工委员会讨论解决罢工条件，提出《香港罢工工人复工条件草案》12条及《沙面罢工工人复工条件草案》八条。

△　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到达广州。

9月25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各国准备于12月18日召集调查中国司法制度委员会开会一事，照会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表示中国同意开会，届时当派专员参加。

△　葡萄牙新任驻京特命全权公使毕安琪抵京。

9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邵元冲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免去管理粤汉铁路事务许崇灏本职，以徐苏中继任。

△　汉口惨案举行第十一次谈判，双方就先决条件第二条声述各自意见。

△　驻京挪威公使米赛勒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同意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并由该公使为代表。

△　全国14省区电报局员生在上海组成中国电报工会联合会，并致电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要求承认该会组织，请愿加薪，及整顿电政，并限期36小时内答复。交通部置之不理。越二日，沪局及国内部分邮局同时罢工，发表宣言，向交通部提出总辞。

△　上海英商各纱厂由上海总商会调停，定于30日一律复工。

9月27日　国民政府军事部举行会议，讨论对付东江陈炯明部办法，决定出师东江，为第二次之东征。

△　吴光新赴奉天向张作霖转达冯玉祥意旨，劝张对冯谅解。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签订日金1026.765537万元借款合同，作偿付参战借款利息用，年息8%，期限二年，以国库券担保。

9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一〇次会议，议决任命李

福林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邵力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

△　关税特别会议专门委员在外交部开会。议决将全部事务分三股办理：梁士诒为第一股长，王正廷、王宠惠为委员，专管国际条约、国定税率、关税保护政策方针；颜惠庆为第二股长，李思浩、姚国桢、蔡廷幹为委员，专管二五加税、整理内外债、修改税则、评定货价、裁厘加税、烟酒税则；黄郛为第三股长，叶恭绰、施肇基、莫德惠为委员，专管关款保管、陆路关税、内河外海吨税、海内外贸易统计、海关制度。外交总长沈瑞麟总其成。

△　宪法起草委员会议决《议会组织法》，采两院制，参院议员任期四年，众院议员三年。

△　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咨各省，以无约国人民来华日益增多，要求地方按月调查送部登记，以便稽考。

△　冯玉祥致函张作霖表示和平旨趣。略谓："弟承乏西北，致力垦殖……其渴望和平，殆与我哥同其旨趣。此后左提右携，共以和平标帜，昭示国人，而以实力盾其后，庶几多年变乱相寻之局，由我辈而奠定，其为欣幸，实无以逾之。"

△　李宗仁、黄绍竑电告广西全省各军事机关决将全省军队分别改编为国防军及省防军，统一名称，按制编配，以便整顿使用，确定预算。国防军定名为广西陆军，最高单位为旅，旅辖两团。省防军定名为广西陆军游击队，其部队之大小，俟国防军编完后，再行规定。

9月29日　国民政府东征军组成。中路为第一纵队，纵队长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右翼为第二纵队，纵队长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左翼为第三纵队，纵队长为攻鄂军军长程潜；总预备队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总指挥蒋介石在中路督战。

△　国民政府公布《法制委员会组织法》，凡八条。

△　冯玉祥派遣军事代表团抵莫斯科，团长熊斌。该代表团赴苏，意在研究苏联政府已成就之事业、实业恢复工作、军事组织及教育事业等项。

△　上海各团体外交后援会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反对“沪案”司法调查，要求对于行将来沪之三国委员勿予以正式接待。

△　旅港各邑商会联合会派代表与省港罢工委员会接洽调停事宜，是日抵广州。越二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欢迎会，苏兆征主席、港商代表团团长谢树棠在会上讲话。

9月30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答复驻京荷使17日照会，声明：已准备开议“沪案”，惟所提保留态度一节，应行除外。

△　驻京丹使考夫曼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由该使充任关税会议全权代表。

△　姚震奉段祺瑞命赴豫后，于是日回京，即晤段报告与岳维峻接洽情形。据岳表示：决无对奉军开衅之意，军事问题悉听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今冯既已向中央表示和平，则河南更无自作主张，违背冯总司令意旨之余地。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由奥国代表罗森塔、财政部李思浩分别签字。

△　段祺瑞发布禁种鸦片令。

△　冯玉祥所委之甘肃督署参谋长蒋鸿遇率军抵宁夏，代冯发电宣告就职，甘肃省长陆洪涛潜逃，省务交蓝山道尹杨思代理。

△　国民政府令林祖涵、甘乃光、孙科、陈公博、徐苏中及粤汉

铁路总工会所推出之代表一人组织查办粤汉铁路委员会，彻查该路积弊，并授该委员会以监督及整顿之权。

△　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刑事审判所条例》、《特别刑事诉讼条例》、《统一广东军民财政及惩办盗匪奸宄特别刑事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

是月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时和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还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与右派的斗争。”

△　段祺瑞派卫兴武赴库伦会晤车林多尔济，说明中央取和平政策，对蒙不使用军队，并请参加国民会议及未来国会。

△　张家口交涉署为办理市政工程等需用浩繁，曾致函美、日、苏三国领事，请外商一律纳捐，以增进市政收入。乃美领事竟提出无理抗议，是日，交涉署据理驳复。

△　山东郓城县南坝黄河决口，河水溢出，淹没区长200里，宽40里，村落被水包围者900处。

10月

10月1日　中意金法郎案在北京正式换文。此案照法、比成例解决；退还三年缓付款480余万，由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抵借现款，充中秋应发之军政费，前罗文幹所订奥款合同，连带解决，改定新约。

△　驻京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表达各关系国对

我国所提“沪案”交涉条件的具体意见。大意为：13条中之取消武装设备，海军士兵回舰，义勇队遣归，解除戒严令，释放被拘人员，恢复占领之学校等项，都已实施。有待解决的有：一、“五卅”案之责任及结果，需详细研究，拟先将总巡停止职务，听候解决；二、改善工人状况，由各关系国训令驻沪领事设法改善雇主与被雇者之关系；三、交还会审公廨问题，准备交换意见；四、华人参加租界董事会，亦准备交换意见；五、越界筑路、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等问题，训令领团与当地官厅商决。

△　冯玉祥电告段祺瑞就任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

△　冯玉祥会见美国联合通信社董事长哈瓦德，指出：列国应宣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并取消不平等条约”。又谓：“鄙人绝无意于总统之职，惟甚愿以军人职责统一中国，使中国不受外侮之侵略与内争之扰攘。”并断言：中国“六个月内，绝无内战之忧”。

△　国民政府令：“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七号训令，此次中华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商民协会所议决之工商联合及共同决定废除苛捐杂税，减少军额，肃清土匪，扫除障碍，振兴工商业，完成粤路，速建黄埔商埠及其他公路，设法增加广东出入口货，使广州成为最富庶繁华之城市等项……业经宣言，谨以至诚完全接受，务于最短期限以实力行之。”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华比银行签订银元150万元借款合同。

10月2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致驻京荷使欧登科两照会：一、对1日来照，表示赞同，并愿继续讨论其余各问题，即：责任暨由此而生之结果问题，上海会审公廨交还问题，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内加入华董问题，务使最短期内，得一良好之结果。二、对上月15日来照主由美、英、日三国各派一法律专家为“五卅”案司法调查委员一事，

仍行驳复。

△　北京临时政府总检察厅检察官翁敬棠将查办金法郎案结果呈报司法部，指出：与法国订此协定，使国库损失8000万元，如意、比、西三国援例要求，则国库损失共1.3亿元，已构成刑律第108条外患罪。外交总长沈瑞麟为本案之正犯，财政总长李思浩为本案之共犯。请立饬侦查起诉，以彰法纪，并请饬令主办人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翁递呈后，为避免危险，即请假离京赴津。

△　吴铁城所统之警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是日，吴就师长职。

△　省港罢工委员会与旅港各邑商会联合会代表，就解决罢工条件草案进行会谈。港商代表谢树棠谓：凡关于政治或与港政府有关及涉及法律之各问题，代表团地位有限，无权讨论。会谈无结果而散。

△　陈炯明在香港宴港商何世光等数十人，要求与会者继续接济东江战事饷银20万元，未遂。

△　“沪案”司法调查委员会日本委员须贺喜三郎抵沪。

10月3日　蒋介石扣留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次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布告：熊克武与陈炯明密使往来……谋危国民政府，罪状昭然，人证俱获，实难再事姑容。已饬广州卫戍司令立将熊克武扣留，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判。

△　驻京瑞典国代办雷克武德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驻中国、日本特命全权公使艾维娄福及本代办为出席关税特别会议代表。

△　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为各电报局员生总辞职风潮案，致电上海电政监督，略谓：“本部为根本革新章程，改善员生待遇起见，业经开诚布公通电各局召集会议，所有修改章程、改良电政诸大纲，均

需集思广益，于会议中决定之。希将本部意旨广为晓谕，俾各局代表早日来京，迅予决定。”次日，各省电报局驻沪代表，即分电各省电报局，均于正午一律复职。

△　广东军、政、工、农、商、警各界举行沙基死难烈士国葬礼，五万余人参加，国民政府代表邓泽如主祭，陈树人宣读祭文。

△　汉口惨案举行第十二次谈判，就“汉案”先决条件达成妥协。谈判遂告结束。

△　“沪案”司法调查之英国委员、法官亨利·葛兰及美国委员、法官约翰森抵沪。同日，三国司法调查委员会发表开会通知书，谓：驻京美、英、日外交公使，受美、比、英、丹、法、意、日、荷、挪威、西班牙、瑞典等国外交公使之委托，委任本员等调查下列事项：一、“五卅”风潮之起源及性质；二、是否有扰乱之预兆及其理由；三、已取及可取之预防方法；四、弹压之方法；五、死伤者所处之环境。兹本委员等敬请各国人士亲自或派律师到会呈述关于以上各项之证据，俾使进行。第一次会议定于10月7日上午10时半在上海市政厅举行。

△　国宪起草委员会议决：总统选举法以县为基本选区，由省选举会选举总统。

△　驻京日使芳泽晤段祺瑞，接洽中、日、美无线电问题。

10月4日　胶济铁路民业公司正式成立。山东督办省长公署为尊重黎元洪由人民筹款赎回胶济铁路之前令，是日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民业公司，任省议会议长宋传典为筹备主任。

△　广州市各校代表齐集广东大学，议决禀请国民政府将全省教会学校从速收回国有。

10月5日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发表东征军出兵

布告。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一〇次会议，听取汪精卫报告熊克武通敌情况，议决解除熊克武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听候本会审判。

△　北京临时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段祺瑞到会致颂词，略谓：近来内讧日棘，军额多至数倍，而军与军哄，省与省哄，每一念及，戚焉如捣。兹届军事委员会开会，凡军额制度，军区划分，军费撙节，军械整一等各要点，谅各委员皆筹策有素，必能周密规定，以竟此功。11时，财政委员会开会，梁士诒报告筹备经过，段与国务员亦出席致颂词。

△　唐绍仪以关税特别会议将加重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是日发出通电反对召开关税会议。

△　段祺瑞任命张贻惠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0月6日　东征军各纵队连日开赴前线。是日，蒋介石率司令部抵石滩巡视。

△　上海百余团体之代表集上海总商会开会，反对“沪案”重查，并发表声明：英、美、日三国所派司法调查委员业已莅沪，本星期三（7日）将开始传集人证，加以讯问，敝会等郑重宣言，绝对否认之。

△　段祺瑞令：张英华等在汉口等处“设立机关，密谋煽动”，意在“扰乱治安，潜图不轨”，着褫夺张英华、吴景濂、张志潭、刘永谦官勋，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通饬所属，严缉务获，交由法庭依法讯办”。

△　国民政府特派谭延闿、古应芬、伍朝枢、谭平山、甘乃光为预算委员会委员，以谭延闿为主席；又派龙光为川军慰抚使。

10月7日　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在杭州开会，议决五省联盟。举孙传芳为总司令，树“拥段反奉”之帜，其战略由长兴出宜兴，兵分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五路司令周凤歧，定名“浙闽苏皖赣联军”。

△　段祺瑞任命颜惠庆为驻英吉利国特命全权公使，加全权大使衔。

△　“沪案”司法调查委员会在南京路市政厅举行开幕式，定于12日正式传集人证开审。

△　段祺瑞指令批准加入国际《禁止贩卖妇孺》公约三种及《禁止淫刊公约》。按：禁止贩卖妇孺公约三种，即：1904年5月18日及1910年5月4日各国先后两次在巴黎签订之《禁止贩卖白奴公约》；1921年9月30日订于日内瓦之《禁止贩卖妇孺公约》。《禁止淫刊公约》于1923年9月12日至1924年3月31日在日内瓦签字。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鲍罗廷宣布苏联创立“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通称“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并建议国民党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中山大学”在莫斯科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拉狄克。

△　下午，冯玉祥离张家口赴包头。张垣署事由刘骥代拆代行。

10月8日　广东石龙各界人士召开欢迎东征军大会。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略谓：“我们此次东征，都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一家兄弟一样，互相提携，帮忙去打敌人。”

△　葡萄牙国新任驻京特命全权公使毕安琪向段祺瑞递交国书。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苏联大使，借口俄轮“迭次私运

军火至粤，接济蒋介石军队”，助长中国内乱，提出严重抗议。

△　驻京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接本国政府训令，为促进中荷两国政府及国民亲善起见，业决定将庚子赔款荷兰部分全数还中国。至于该款之用途，望用于中荷间之文化事业。”

△　段祺瑞公布《星云勋章条例》及《金狮勋章条例》。

△　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告：本年10月14日（即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圣诞节，各机关、各团体照章放假庆祝，准各项人员前往孔子庙自由行礼。

△　陆宗舆奉段祺瑞命南下赴苏、浙，劝孙传芳、杨宇霆各自谅解，并促进苏、浙、皖三省重订和平公约。

10月9日　　段祺瑞于国庆前夕发布令文，略谓：执政一年，“阎闾雕敝，灾祲重沓，宿师满野，供亿烦多，乐利无闻，流亡莫复，度支匮绌，待举百端，中夜彷徨，戚焉如捣”。要求中央及各省区长官，“舟楫同持，休戚与共”，“镇定震撼，支拄艰危，勿诿卸以误国家，勿迁就以贻祸患……”

△　国民政府就熊克武被扣一事，发表《告川军将士书》，号召全体将士“服从革命政府，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实现中国国民党党纲，为人民谋幸福”。

△　驻京日使芳泽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原则上同意中国方面8月28日关于无线电台之建议照会。又谓：“中国以巨额经费与日、美合办大规模之电台，是否可以进行无阻，盼中政府能以精密考虑之结果告之。”

△　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在北京开成立会，推柯劭忞为委员长。12日闭幕。

△　翁敬棠由天津呈总检察厅，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对金法郎案有共犯嫌疑。

△　段祺瑞令章士钊、张训钦会商湖南省长筹备赈务。又令准免甘肃省长陆洪涛本职，特任薛笃弼继之，未到任以前，着杨思暂行护理。

△　国民政府特派林翔为特别刑事审判所所长。

△　国民政府公布《陆军刑律》，凡83条，分叛乱罪、擅权罪、辱职罪、抗命罪、暴行胁迫罪、侮辱罪、强奸罪、掠夺罪、诈伪罪、军用物资损坏罪、违背职守罪等。

10月10日　　国民政府及军、政、党、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10万人分别举行庆祝典礼大会及巡行，纪念“双十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号召全体同志“努力鼓励前敌军人，使东江残敌早日就擒”，并努力于国民革命，以脱离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双重压迫。

△　东征军中路抵博罗，向惠州进发。越二日，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博罗电告：“我军明日进攻惠州，炮火人力均十足，定下惠城。”

△　孙传芳以准备秋操为由，下动员令，调动军队准备向苏、皖奉军进攻。旋又在杭、松间封锁民船百余只，长兴、吴兴、泗泾等处均有军事行动。

△　故宫博物院行开幕典礼，古物、图书等馆完全开放，观众达数万人之多。

△　国货提倡会在京成立。王文典当选为会长，郭仙洲、陆平、周丙祥为副会长，关中敷当选为评议长。

10月11日　　广东省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历数陈炯明勾结帝国主义、图谋颠覆国民政府、摧残工农运动之罪行，声明此次出兵东征，为统一广东，扫除陈炯明，“以推倒帝国主义，完成孙大元帅为求国家独立平等之遗言”。

△　蒋介石令第一纵队长何应钦编组攻城先锋队。令曰：照得杨逆坤如，负隅惠州，祸国殃民，久稽天讨，本军前进，俯顺舆情，准备直捣巢穴。……除攻城计划（凡11项）另文饬遵外，为此令该纵队长迅而遵照，转饬第三师各团，各选士兵150名，第二师第四团挑选士兵200名，共650名，编为攻城先锋队。

10月12日　　上海市民举行反对“沪案”重查大会。会上高呼“反对沪案重查”、“反对沪案秘密会议”、“反对关税会议”等口号。大会通过致全国国民电及致世界各民族电。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荷使欧登科，就“沪案”开议提出交涉标准。分三部分：一、“五卅”案责任之结果，损害赔偿意见；二、收回会审公廨之手续，不附条件；三、工部局增加华人董事，以公共租界纳税人纳税多寡为标准比例。

△　孙传芳在杭州向在省各军官兵发表出征前训话，指责奉军暴行，并称：“我不攻彼，明春彼必攻我”；“如不先发制人，我浙亦难保无虞”。又谓：“刻下我国混乱已极，一旦成功，共和再造，吾等当推为首义。”

△　吴光新赴日本观操，是日抵东京。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因涉及金法郎案及五卅惨案受国人指责，向段祺瑞口头辞职，段予慰留。

△　“沪案”司法调查开庭，传讯证人、英教士惠司尼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各负责人，中国人无出席者。

△　四川省民会议在巴县开成立会。由全川和平弭兵会发起，到六七十县。次日，通过简章15条。

10月13日　　东征军两路包围惠州城，第一纵队第三师谭曙卿之第八团及第二师王懋功之第四团攻惠州之北门。左翼程潜部对南门警戒。守军杨坤如部奋力抗拒，血战入夜。次日晨，飞鹅岭炮兵掩护步兵登城，战至午后，杨军腹背受敌，渐不支，遂出东门向紫金方向退去。东征军第三师第八团由北门攻占惠州。越二日，蒋介石率部入城。

△　上海“江苏各团体联席会执行委员会”等48团体，以浙省调遣军队，谣言四起，开会讨论时局问题。议决电请孙传芳从速撤退松属驻军，停止军事行动，免致引起误会，酿成再战。

10月14日　　江苏督办杨宇霆、省长郑谦电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及总商会，宣布取消戒严令，撤退邢部驻沪军队。邢接电后，于当日下午即令第二十师奉军撤退至苏、常等处。

△　以林森为总代表之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到达北京。次日，北京国民外交代表团召开欢迎大会。会上，林森演说代表团两大任务：第一、宣传沙基惨案事实；第二、秉承孙中山国民外交，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中国解放之政策。

△　吴佩孚之代表、前直军第二十师师长杨清臣由沪到杭，面晤孙传芳，互商时局问题。

△　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赴石滩前线慰问东征作战部队。随行人员有吴铁城、陈公博、古应芬、苏兆征等。抵石龙时，蒋介石亲至车站欢迎。

△　第十一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在长沙开幕。出席代表20省区38人，历时13天，讨论庚款、平民教育等问题，27日闭幕。

10月15日　　孙传芳通电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职。同日，浙军在长兴、宜兴、湖州一带防地业已布置妥帖，前锋部队兵力达二万以上，并下总攻击令。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江、浙时局，国务员全体出席。议决分电阻止孙传芳、杨宇霆用兵，并电陆宗舆就地劝阻。

△　上海奉军因开拔运兵，将沪杭火车扣留。孙传芳即令杭州火车不得驶近上海。沪杭交通中断。

△　段祺瑞派陆军次长张厚琬赴奉面见张作霖。说明政府和平诚意，希望奉张共谅共守此旨。

10月16日　　五省联军之浙军第二军谢鸿勋部，从松江进占上海。奉军已先退苏州。奉军淞沪警备厅长常之英所部宪兵一营未及撤退，被全部缴械，常亦被扣留。第四军卢香亭部占领宜兴。同日，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衔通电，指责奉军违背上海永不驻兵协议，宣布“唯张作霖一人是讨”。

△　孙传芳委严春阳为淞沪临时戒严司令。

△　靳云鹗自鸡公山致电孙传芳，响应浙军，一致反奉，并告以：“今日赴汉会商，一面请吴帅出山，一面约同各将领按以前计划积极进行，以为声援，即日出发，互相策应。”

△　国民政府公布《文官官等条例》。《条例》规定：凡国民政府所属之文官及司法官，均依本条例附表所定等级，照文官俸给表内所定月俸数目支俸。最高月俸为800元，最低为15元。本条例自十四年11月1日施行。从前各机关自行拟定职员食俸等级，均属无效。

△　东征军第一纵队官兵在惠州召开攻城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何应钦主持，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读祭文，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讲话。

△　湖北省外交委员会通过汉口惨案谈判之结果。其重点为：一、撤退英舰：双方同意移京办理；解除义勇队武装，如中国当局兵力足以保护租界时，则英方不召集义勇队；英租界巡捕将警棍取消。二、中国军警保护租界办法为：在英租界沿边马路设岗位八处，紧急情况下可派遣军队径入租界，维护秩序。三、赔偿问题：暂保留将来再议。四、太古公司问题：仍由中英当局继续讨论。五、英当局切实通知巡捕，不得无理侮辱华人；中国官厅亦诫告华人，注意勿违警章。

△　湖北国民外交协进会就“汉案”含糊结束一事，致电诘问胡钧，指出：“所谓结束，实非结束，直放弃耳。吾人誓死实难承认”；要求胡钧“将所以承认如此结束之理由明白示复，并请暂拒签字，以重民意而保团体”。

△　赣南镇守使李鸿程将被捕之安源路矿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处死。19日，湖南各界组成之迎柩团抵醴陵，将灵柩运回长沙。沿途群众鸣鞭致哀，长沙各学校、工会团体二万余人在车站迎候，高呼“黄静源精神不死”等口号，并杠柩入城游行。26日，举行各界追悼黄静源烈士大会。

10月17日　　段祺瑞令孙传芳所部自沪撤回原防，略谓：近来谣诼繁兴，浙省复有调动军队之举。查淞沪永不驻兵，早有明令宣布。自“沪案”发生后，苏省为维持地方计，曾调邢士廉部前往：暂资镇慑。今人心已定，据杨宇霆电称，业照商民所请，于本月15日将邢部完全撤退，与孙传芳铣（16日）电用意不谋而合。……孙传芳所部应即各回原防，以符本执政爱护永久和平之心，而慰东南人士之望。

△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抵上海。当日并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军事后即回嘉兴。奉军邢部已退至常州、丹阳、镇江一带。联军采取水陆并进，攻击奉军。

△　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略谓：张作霖派兵入关，“内则软困北京政府，外则先占直隶，次占鲁、占皖、占苏，蚕食鲸吞，贪心不已”，“奉军所到之处，搜括民间财产，奸淫良家妇女……种种罪恶，擢发难数”，宣布联合各省义师，声罪致讨。

△　江苏第一、三、四、十各师师长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郑俊彦，江宁镇守使朱熙，通海镇守使张仁奎，第一旅旅长杨赓和，第二旅旅长李启佑等致电段祺瑞及全国各省军民，宣布“响应浙军，会师宁镇，驱逐奉军”，并电请吴佩孚、孙传芳主持大计，听其指挥。

△　张作霖特派郭瀛洲携函谒冯玉祥。是日，郭抵包头。原函略谓：“今者孙氏（按：指孙传芳）发难，意在为曹（曹锟），子胥逃吴，志在报楚，非独不穀之忧，亦将军之辱也。将军若愿始终其事，则不穀将随将军之后，同心定乱，惟力是视；若将军无意过问，坐视宿仇日肆，不加禁止，则不穀亦惟有引率所部退出关外，隐居长白之山，不复再询关内之事矣。”冯阅张函后，答郭曰：“既戮力同心于前，决不遽食前言于后”，并表示：“务以维持大局和平为归宿。”

△　杨宇霆以奉军自沪撤退，通电呼吁“和平”。并谓：“毋我负人，宁人负我，是非所在，听之公评。”

△　方本仁密电第一师师长邓如琢速出兵九江，乘姜登选在苏防务空虚，抄袭安庆。该师第一旅刘宝题部业已开拔。

△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以检察官翁敬棠检举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办理金法郎一案构成犯罪，及前司法总长章士钊对于金法郎有共犯情形，训令京师高等检察厅吴家驹依法办理。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给帑银一万元，赈济陕西水灾。

△　国民政府委陈章甫为东征军南路新编第二师师长，是日陈通

电就职。

△　蒋介石电呈国民政府辞第一军军长职。同日通电表示惟奉命东征，职责未了，于此期间仍愿权任总指挥，不敢遽尔卸责，以全始终。

10月18日　　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第四军司令卢香亭由陵口向丹阳前进，晚9时占丹阳，奉军退至镇江。次日，联军第二军前线总指挥杨震东部占镇江，晚又占龙潭。

△　五省联军第二军谢鸿勋通电报告奉军溃退情形，谓：敌军于筱（17日）午为我军在苏州击溃，纷纷退往无锡，旋于筱夜在无锡为我军击败，退至常州。巧（18日）晨又为我军击溃，向镇江退却。敌将常（州）、丹（阳）间铁道破坏，刻正修理追击中。是役俘敌千余，获子弹枪械无数。

△　东征军右翼李济深之十一师陈济棠部占领平山。

△　段祺瑞派薛笃弼赴张家口询冯玉祥对时局意见。是日，薛来电称冯部态度镇定，冯曾令各军暂持和平，看中央如何处事，再定国民军举止。

△　长沙各界举行收回大金码头游行示威大运动，到会各公团与学校工人千余人，郭亮主席。通过督促政府于3日内将码头收回、交由该码头工人组织接管等三项决议。

10月19日　　江苏陆军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在南京联名通电，宣布起义。杨宇霆、郑谦业已逃离南京。杨之参谋长臧式毅及奉军第八师师长丁喜春，均被苏军拘捕。丁部未及撤退之官兵，被苏军迫令缴械。省垣秩序由陈调元暂时维持。

△　孙传芳自常州电浙江驻沪办事处处长宋雪琴，告以冯玉祥及苏、皖、豫、鄂、湘各省友军群起响应讨奉。

△　吴佩孚通电宣布应孙传芳、周荫人、萧耀南电邀，定于21日到汉口共同讨奉。

△　邢士廉率队一旅一团分乘三列火车自浦口沿津浦路北上，在乌衣遭陈调元部苏军伏击，邢车疾驰脱险，其后一列火车奉军士兵被缴械，辎重悉为苏军所得。另一列车奉军与苏军激战，奉军溃散，死伤甚重。邢于当日抵蚌埠。

△　驻日英使黑里欧往访日外相币原，以中国浙奉战事关系日、英两国在长江一带之工商业利益，彼此协商应付办法。

△　北京临时政府与奥地利签订通商条约。中国全权代表、驻奥公使黄荣良，奥国全权代表、奥外交总长麻达雅，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　中、日、苏铁路联运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代表余序参加会议，并当选为副会长。

△　蒋介石之长子蒋经国启程赴莫斯科，留学中山大学。

10月20日　　浙军占领南京。19日，孙传芳在常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会攻南京计划。午后即下总攻击令，孙在常指挥一切。卢香亭攻紫金山，周凤歧攻雨花台，杨惠东、谢鸿勋夺幕府山，陈仪取道六合沿江攻宁。当日，苏军第四、第十两师独立，奉军不战而退。是日上午，各路联军分别进占南京城。

△　下午，孙传芳到达南京。当即在宁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进兵方略。孙令各军克日向江北进兵，务于三星期内解决战事。

△　孙传芳在宁发出“谨告苏省父老兄弟”通电，以“禁暴救乱”相标榜，声明除将畏罪潜逃之各职酌委人员外，“所有苏省各政，悉循原状”；并谓：“一俟全省底定，出师任务告终，当再访贤能，勤图治理。”

△　联军第二军司令谢鸿勋率部抵南京后，下午偕同陈调元渡江占领浦口，奉军退往蚌埠。

△　孙传芳、萧耀南、周荫人、岳维峻、孙岳、方本仁、杨森、邓锡侯、袁祖铭、刘存厚、王天培、周西城、彭汉章、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郑俊彦、朱熙、张仁奎、王普、靳云鹗21人致电吴佩孚，请其出山，组织联军，共讨奉张，并推吴就讨贼联军总司令职。

△　吴佩孚由岳州乘“决川”舰赴汉，是日抵金口。赵恒惕亲往岳州送行，劝吴主张联治。吴在舰上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谓：此次讨贼，志在统一救国，予既受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14省推戴，当然担当主持军事之责任。俟抵汉后，即组织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并通电就任总司令之职，有必要时，或亲赴前敌一行。并谓：决计恢复法统，依照法律解决国内一切纠纷。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反奉战争宣言。指出：“此次反奉战争虽搀和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号召爱国民众“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参加战争”。

△　江西九江镇守使兼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邓如琢致电孙传芳，响应浙军讨奉。

△　章太炎在汉口致电岳维峻，要求从速宣布讨奉，略谓：贵省北近畿南，南连徐、皖，易为敌所乘，亦易致敌之死命。想同仇敌忾，必不后人。前锋既启，即当从速宣布，以振义声，而壮邻援。

△　段祺瑞特派王宠惠为调查法权委员会全权代表，曾宗鉴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将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请帖送达驻京各使

馆。

△　国民政府以军费浩繁，入不敷出，决定征收房捐，并制定征收广东全省房屋租捐办法。

10月21日　吴佩孚抵汉口，并发出通电，宣布在汉就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　孙传芳、夏超、陈调元、郑俊彦、朱熙、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等通电，敦请吴佩孚出山。

△　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行辕组设“讨贼联军总司令”办公处，委蒋方震为参谋处长，张其锽为秘书处长，白坚武为政务处长，张福来为营务处长，刘梦庚为机要处长，张志潭为外交处长，高恩洪为交通处长，虞际唐为副官处长，刘绍曾为军需处长；并于总司令下设各参赞，以章太炎为总参议。

△　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出兵计划。萧耀南及鄂军各师旅长及吴部重要人员均出席，决议：一、军队以鄂军寇英杰师孙建业旅为先遣队，于学忠、宋大沛各一混成旅为续发队，一俟饷械补充，即赴豫集中郑州；二、军械由汉阳兵工厂于21日晚起加工赶造；三、军费暂由汉商会代借70万元，武昌商会代借30万元。

△　周荫人通电反奉，并敦请吴佩孚“即日出山，吊民伐罪”。

△　江西方本仁通电讨奉。

△　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自泗县移扎临淮一带，并电姜登选表示与孙传芳一致行动，请速将驻蚌奉军解除武装，即日出境。驻寿县皖军第四旅旅长高世读、驻颍上第五旅旅长华毓庵，均联合与倪一致。

△　苏军将领陈调元、郑俊彦、白宝山、马玉仁等20人联名电请

齐燮元迅速回国，主持大计。次日，齐由日本返沪。

△　五省联军淞沪戒严司令严春阳对中国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浙军仅“驱奉军于徐州以北”，“余由国民军担任”；又谓：冯玉祥与孙传芳“久有结合，助浙决无问题”。

△　五省联军谢鸿勋部进抵滁州，奉军退守张八岭。是晚，卢香亭、陈调元等部队相继到达，会攻张八岭，激战数小时，奉军再退蚌埠，联军又占张八岭。

△　张宗昌抵徐州，将所部编为五个军约10万人，进行备战。张为总司令。张所招募之白俄兵4000人，亦于当日抵徐州。

△　冯玉祥分电张作霖、孙传芳，请双方互让，和平解决战事，并自愿斡旋。

△　金陵道尹徐鼎康就护理江苏省长职。

△　国民政府派甘乃光、马洪焕、陈公博为调查广东大学委员会委员，以甘乃光为主席。

△　国民政府委员古应芬、陈公博，偕南征军总指挥陈铭枢赴江门布防。

△　国民政府据中华国货促进会呈请，通令提倡国货。令曰：“提倡国货实为今日之急务，该会所请令行军政警学各机关嗣后购置用物以国货为主，自应照行。”

△　广东平山农会及工商学各界开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到3000人。蒋介石莅会并致谢词，略谓：“陈逆残民以逞，惨无人道，革命军为人民除害，得力于人民相助。”

△　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关税定率条例》及《烟酒进口税条

例》。

△　全国商会联合会召开大会，讨论关税问题。到22省区代表。议决：一、对关税问题务达自主目的；二、达到自主之进行计划，交付审查会审查；三、发表宣言表示全国商界意见；四、通告全国各商会，于本月26日关会开幕之日，悬国旗欢迎各国代表。

10月22日　　吴佩孚发表外交宣言，声明对于有约各邦，前已订之条约，必加以尊重；对侨居外人生命财产，必切实保护；惟望各国不售武器并与对方以经济及借款之援助。至于关税会议，声明俟合法政府成立之后开会。

△　邓如琢在九江通电就“皖赣联军总指挥”职。赣军第三师师长冯绍闵为赣军副指挥，皖南镇守使王普为皖军副指挥，邓部先锋已开拔。

△　安徽乌衣溃散奉军七八百人，携械逃往全椒，向县署、商会立索川资五万元，未果；即四出抢劫，富商巨室无一幸免，弹伤市民数人，杀死士绅一人。横行达一昼夜，经驻乌衣浙军第二军派部前往剿办，始四散奔去。

△　东征军三路获胜。第一纵队何应钦部进攻梅陇，敌溃逃，是日占海丰，26日又占陆丰。第二纵队先锋张发奎旅与陈炯明军主力万余人，激战于热汤附近，张旅与敌相持，损失颇重。十一师陈济棠援兵开至，始将陈军击退，于次日占兰塘。陈师追击前进，26日又克紫金。此后，陈军精锐大创。第三纵队程潜部23日克河源，26日又占老隆。

△　徐树铮自华盛顿电责杨宇霆，谓此次战事，由杨督苏而起，“兄今日当为雨帅（张作霖）策万全，不可私逞意气，妄动干戈。江南之地，固不必争；江北之地，亦不必守。宜劝雨帅力持三省全力，修德行义，以待天下之归心”。

△　段祺瑞特派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幹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

10月23日　　黎元洪在天津与电通社记者谈话，要求段祺瑞下台，谓：此次内争，所谓一则愤于奉军之横暴，再则由于段祺瑞之失败。故为今之计，予甚盼奉军立退关外，段氏迅即下野，如是或可弭内乱于无形。

△　北京临时政府参政院开谈话会，讨论战事，决发通电，倡导和平。

△　安徽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倪朝荣通电响应浙军讨奉，宣布所部已陆续抵达蚌埠，共张挞伐，并联合皖军将领，一致拥戴吴佩孚、孙传芳。

△　姜登选以皖军倪朝荣旅进逼，是日通电辞职，撤退驻蚌埠奉军，赴徐州集中。姜亦离蚌北上。

△　湖北公民尹鸣珂等390余人致电吴佩孚，求其“俯念鄂民疾苦，减少鄂民负担”，“不以循环报复为政争之目的，不以攘夺政权为一党之宗旨”。

△　段祺瑞令准免临时参政院参政王家襄职，派杜光俊为临时参政院参政。

△　段祺瑞特派邓如琢驰赴安徽查办事件。

△　段祺瑞派章祜署陇秦豫海铁路督办。次日，又派张炽章署陇秦豫海铁路会办。

△　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通过《关税自主办法大纲》及《关税自主办法大纲草案说明书》咨达北京临时政府核定施行。

10月24日　　浙军卢香亭、周凤歧、谢鸿勋三部及苏、皖两大队进攻南宿州（即安徽宿县），与奉军小有接触，奉军退守夹沟，联军追击，连占南宿州及符离集两车站。傍晚，联军分三路进攻夹沟，在夹沟站南与奉军发生剧战。

△　赣皖联军总指挥邓如琢发表通电声讨张作霖，表示拥护“五省联军”孙传芳“举义旗”。

△　吴新田、孔繁锦、柴云陞、张治公等通电反奉。

△　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郑俊彦、张仁奎、杨赓和、李启佑、朱熙等通电公推齐燮元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　齐燮元由沪抵宁，晤孙传芳。同日，齐燮元致电吴佩孚，告以准备由宁赴汉，“亲承教益”。

△　吴佩孚召集汉口商界领袖商筹军费200万元，是日，商会通过筹借军费百万元，月息一分二厘，三月之后每月摊还14万，六个月还清。

△　段祺瑞公布临时参政院议决《关税定率条例》、《烟酒进口税条例》。按：《关税定率条例》，凡17条。其中规定：“进口税除烟酒及国家专卖品同类者另行规定外，其税率最高为值百抽四十，最低为值百抽七·五。”又规定：“民国六年12月25日公布之《国定税率条例》，自本条例施行之日，即行作废。”《烟酒进口税条例》，凡4条，规定：“进口税率为值百抽五十至八十。”

△　段祺瑞令准免驻瑞典国兼驻挪威、丹麦国特命全权公使戴陈霖本职。

△　张作霖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签订日金1800万元借款合同，由“满铁”承包吉林至敦化铁道筑路工程，经交通总长叶恭绰办理手续，年息9%，以本路财产及收入担保。

10月25日　　北京各团体一万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关税运动自主大会，因警厅禁止开会，改为游行。

△　杜锡珪致电吴佩孚、孙传芳暨浙、闽、皖、苏、赣、鄂、豫、陕各省督办、省长，宣布讨奉。同日，海军第二舰队驻宁各舰长代表各舰全体谒孙传芳，表示欢迎一致讨奉。

△　赣督署召开军政绅商各界联席大会，到180余人。方本仁宣布：赣省与浙、鄂联络一致讨奉。省财政厅长文群发言要求各界帮忙筹饷。

△　上海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发表时局宣言赞成反奉，但声明不是为曹、吴反奉，并指出此次反奉战争，“是两派军阀互抢地盘的争斗”，主张“组织人民自卫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使人民得最后胜利”。

△　江苏各公团联席会致电孙传芳请归还苏政，并告以议决顾忠琛出维暂局。

△　邓本殷所委八属联军总指挥魏邦平，运动驻恩平、阳江等地之梁鸿楷归部。梁鸿林、徐汉臣等会合苏廷有部，是日在阳江发动。次日集万余人进攻单水口。陈铭枢率三个团奋起抵抗，激战三昼夜。国民政府急调朱培德部增援，28日大举反攻，将敌击退。

△　陈炯明收编之部队林警魂、袁带、王作标等，在“永绩”舰掩护下，分三路侵占中山县城。

10月26日　　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居仁堂开幕。英、美、日、法、意、比、葡、荷、丹、瑞典、挪威、西班牙12国派代表出席。段祺瑞致欢迎词。沈瑞麟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王正廷宣读关税自主提案，办法为：一、列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权，解除现行协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国定税率条例，与

裁废厘金同时实行，至迟不过1929年1月1日。三、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三十，乙级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四、前项临时附加税，于本条例签字三个月后开始征收。五、前四项决议于本条例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各国代表相继致词。推举严鹤龄为大会秘书长后，宣告散会。

△　北京大学教员、学生及各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关税自主游行示威。因警察阻止前进，发生冲突。警察用棍棒刺刀殴打学生，学生奋起自卫，双方受伤多人，警厅拘捕学生10余人。

△　国宪起草委员会一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案》。

△　汉口吴佩孚总司令部任寇英杰为讨贼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又派马济为讨贼桂军第一路总司令。

△　杨森在万县通电就吴佩孚委“四川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职。

△　陈调元通电宣布：奉孙传芳委任，是日就代理江苏总司令职。

△　奉军邢士廉部由新安镇，毕庶澄所部海军由青岛，两路进攻海州，次晨，白宝山退守清江浦，奉军遂占海州。奉军军舰并到苏、浙一带海口活动。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张继、谢持、石瑛、邹鲁、茅祖权、傅汝霖七人，要求京部通知在京中央委员开会，未达目的，是日致电上海执行部并转中央及海内外各党部，请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即集张家口开全体委员会议。

△　东征军一纵队何应钦部占河婆。次日，陈炯明军集主力图反

攻，与第三师谭曙卿部接战于华阳地区，第三师受挫，陈军遂分两路向河婆夹攻。29日，与第一师激战于横江之间，战半日，陈军两路均败。30日，洪兆麟部又图反攻，为第一师与二纵第十一师所击败。此后，陈军主力即一蹶不振，东征军乘胜前进。

△　东征军右翼第二纵队李济深部，奉命由紫金回援南路作战。李率部于29日抵观音阁。11月4日，李部张发奎旅返省。

10月27日　　段祺瑞召集许世英、汤漪等密议对付时局办法，汤主请段见机行事，勿为曹锟第二。段谓："国事既不能为，决不恋栈"，暗露下野之意。

△　关税会议会务委员会议决设立三个委员会，分别讨论各案，即：关税自主事宜委员会，实行裁厘办法事宜委员会，关税会议有关事宜委员会。三委员会即日开始组织。

△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式委任各军司令官：第一军陈仪，第二军谢鸿勋，第三军孙传芳（兼），第四军卢香亭，第五军周凤歧，第六军白宝山，第七军马玉仁，第八军陈调元，第九军郑俊彦，第十军张仁奎，第十一军倪朝荣，第十二军王普，第十三军邓如琢，第十四军马祥斌，第十五军高世读，第十六军华锜章。

△　吴佩孚总司令部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讨贼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兼四川讨贼联军第二路总司令，赖心辉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三路总司令，刘湘为川黔讨贼联军后方筹备总司令，刘存厚为四川讨贼联军后援总司令，王天培为贵州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彭汉章为贵州讨贼联军第二路总司令，周西成为贵州讨贼联军第三路总司令。

△　岳维峻自开封赴郑州，是日在郑州开军事会议，与各重要军官协商应付时局办法，决定：河南加入战争与否，当以冯玉祥之动静为断；豫东方面，以陇海路线形势吃紧，派第五师师长王为蔚赴归德以东之虞城县查防。

△　冯玉祥通电主张和平，对军事当局提出相当办法，早息兵祸。

△　顾忠琛应吴佩孚请，由汉口致电冯（玉祥）、岳（维峻）、孙（岳），要求国民军即日出师，由陇海、津浦路分道并进，配合联军，共讨奉军。

△　段祺瑞派俞人凤为包宁铁路会办。

10月28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善后委员会向段祺瑞条陈关于关税特别会议之交涉大纲三项："第一，宣言因民意、国情、正义、人道，不能不实行关税自主……第二，宣言于实行关税自主之前，我国先自行裁撤厘金……第三，宣言于裁撤厘金之前，我国应增加入口普通品税率至值百抽十，奢侈品税率至值百抽十五至二十……"并谓："若各国代表不赞成吾国之宣言……惟有振露风稜，当机立断，宣告闭会。"

△　东征军第三纵队程潜部占五华城，31日又收复兴宁，追击至梅县、大埔、永定一线，陈炯明军向闽省退去。

△　吴炳湘去职离皖。自浙奉战起，姜登选离蚌赴徐，全皖均为皖军势力，吴内受皖宪兵司令程文源反对，外为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奉命率部来省查办所迫，遂将省长印信交由政务厅长保管，是日晨乘轮离省。邓如琢之先锋队步兵一团已抵皖。

10月29日　段祺瑞令国民代表会议议员于明年1月15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

△　段祺瑞以临时参政院参政德穆楚克栋鲁普辞职，令补英达赖多尔济帕拉穆为临时参政院参政。

△　孙传芳复电赵尔巽、王士珍、吕海寰，指责张作霖祸国殃民，操纵政府，倘张作霖率队出关，痛改前非，即可和平。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发表反奉战争宣言，声讨奉军，并指出："其间虽有报复分子，乘机利用，然既合乎民意，亦无不可联合。但无论何派军阀，如蹈奉系之故辙，我国民亦必以对付奉系之方法对付之。"

10月30日　关税自主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王正廷、蔡廷幹及12国代表参加。王正廷主席，将中国关税自主提案之一二项提交大会讨论。各国代表发言宣称：对关税自主并不反对，惟对中国过渡时期所拟各项计划，颇有质询。

△　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发表致国民党党员公开信，提出当前的策略是：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防止直系军阀恢复其武力专制。为达此目的，必须发动群众，促成反奉之大联合。公开信最后号召组织反奉势力联合的临时机关，"达到消灭奉系军力的最后胜利，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人民的政府"。

△　萧耀南、孙传芳等通电公推齐燮元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　北京临时政府赵尔巽、王士珍、梁士诒、许世英、林长民、汤漪、陈宦、黄郛、田中玉、杨永泰等，邀请各省代表调停时局。是日，先请鄂省代表周斌等人来京开会，议决：一、推王士珍晋谒段祺瑞，请电张作霖先制止军事行动；二、请浙江代表转电孙传芳停止战争；三、由各代表电致本省，征询军事当局意见。

△　吴佩孚致电北京外交团，宣布截留苏、皖、湘、鄂八省盐税。略谓："奉天张作霖扣留东三省盐税达四年之久，中外已默认许可。其他各省所收盐税，徒供北京非法政府任意挥霍。本军为杜绝乱源起见，苏、皖、赣、闽、浙、湘、鄂、川等省所有盐税，克日实行截留，归本总司令储存。"

10月31日　孙传芳进驻临淮关，向各军下令总攻徐州。

△　北京赵尔巽、王士珍、汤漪、梁士诒等召集闽、浙、苏各省代表协商和平办法。赵尔巽主席，议决由王士珍致电各军事省份当道，请主持公道，维持和平。

△　段祺瑞令准免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公使唐在复职，以朱兆莘继任。

11月

11月1日　镇威军、国民军两方代表会同段祺瑞所派之姚震、曾毓隽、邓汉祥在北海静心斋开会。决定由镇、国双方代表及政府派员共同实地调查双方之军事行动及防务布置，是否有足以引起误会之处，然后谋一调解办法。

△　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为南路总指挥，陈铭枢所部为第一路，王钧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陈章甫为右侧支队，会攻南路陈炯明余党邓本殷部。

△　东征军占领鲤湖，次日占普宁，3日占揭阳。陈炯明军残部退走潮安。

△　孙岳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声明保境安民之旨，并谓："当约束所部，以随冯、岳两军之后，共维国是，而尽职责。"

△　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通告：从本日开始，寄往国内各处（蒙古、新疆除外），及日本、朝鲜关东租地，以及台湾之信函、明信片之邮费，更改为：信函每重20公分，收费四分；明信片单片二分，双片（附回片者）四分。

△　香港英总督史搭士任职期满离港。是日，新任港督金文太抵港，宣誓就职。

11月2日　　孙传芳、张宗昌两军在安徽固镇激战。孙军拆毁铁道，断奉军后路，四面包围攻击。奉军溃退，孙军截获俄兵多人及铁甲车队，张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亦被拿获，当日解往蚌埠枪决。

△　齐燮元在汉口通电就任“讨贼联军副司令”。

△　国民政府公布《宣誓令》。文官誓词为：“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武官誓词为：“余誓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

11月3日　　关税会议第一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主席王正廷发表裁厘宣言，谓：“中国政府于熟加考量之后，须定裁撤厘金制，俾国民之幸福与外国之贸易，同受其益，国家财政巩固基础，与各国之关系亦愈加敦睦。中国于是宣言裁厘一事，将于民国十八年1月1日以前完全实行。”英代表声明：此会中筹议和商定各种办法，须呈请本国政府批准。日本代表及美国代表均提出具体提案。结果各国均赞成关税自主，惟具体办法交付第二委员会讨论。

△　陈炯明、洪兆麟残部纷纷逃离汕头，商店闭门歇业。是日，建国潮梅军罗翼群部及东征军第一纵队先后入城。

△　国民政府任命刘通为大理院庭长兼代司法行政主任；任命潘应荣为大理院庭长；任命湛桂芬为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

△　萧耀南受吴佩孚之托，向武汉商会借洋100万元，为吴军开拔费，是日签订借款合同，月息一分五厘，以汉口生成里房产作抵押，以电报、电话、铁路三局收入担保。于一年内分十期，本息还清。越二日，曹锟之弟曹锳来汉晤吴商要事，并携有银60万给吴作军饷。

△　张宗昌军需处长高厂奉命来青岛，向胶济路总管理局提取现

金140万。因提款时未经该局日本会计许可，故日会计佐伯彪向日领声诉，以此举实属“藐视国际条约”，“侵害日本权利”，请立即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将所提之款立即发还。

11月4日　王士珍、赵尔巽分电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萧耀南、姜登选，请双方即刻停止战斗，划缓冲地带，各派全权代表商善后。次日，又分电冯玉祥、岳维峻、方本仁等，请进一步主张“和平”。

△　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队抵汕头，市民万余人夹道欢迎。次晚，第一纵队长何应钦到汕。

△　东征军第三纵队程潜部进驻梅县。

△　南征军第一路陈铭枢部收复恩平。次日，第三路戴岳部克新兴。

△　北京外交团开会讨论应付中国时局方针，英、美、法、日、意各公使出席。荷使欧登科主席。讨论结果，于7日面询沈瑞麟外长，提出如不能保证京津通车，则将由使团组织联军维持。

△　段祺瑞令范源濂、周诒春、任鸿隽、陈任中、高步瀛、徐鸿宝、胡适、翁文灏、马君武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

11月5日　国民政府分电奉直两军将领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及吴佩孚、萧耀南、孙传芳，促请维护国家及民众利益，避免此次无谓战争，并提出四项解决时局办法，其要旨为：一、建设统一全国之真正的国民政府；二、于最短期间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三、发起国际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四、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

11月6日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王正廷、颜惠庆、蔡廷幹及12国代表参加。推王正廷为主席。颜惠庆提出

《过渡时期内附加税税率案》。蔡廷幹说明中国提议征收普通品及奢侈品附加税之理由。日代表芳泽声言，过渡税须受华会2.56％限制。意代表翟禄第宣言，过渡税须在华会条约第三款规定以上，惟指定增收之税款应用于：一、付还债款；二、抵补厘金；三、行政费。美代表史陶恩详细解释3日公布之美国提案。英代表皮乐赞同美国方案。

△　蒋介石偕邵力子、罗翼群及加伦将军抵汕头。次日，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工会联合会、国民党市党部召开欢迎国民革命军市民大会，到团体40余个，万余人。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宣布治理潮汕方针。

△　孙传芳电复赵尔巽、王士珍等，谓："张作霖如敛军出关，将祷祝不暇。若犹盘据腹地以劫掠代征榷，则有战而已。"

△　孙传芳致电联军总司令部驻沪办公处，告以：皖军已编成四个支队，第一、二支队先锋已达萧县，第三支队在固镇下车跟进中。赣军先锋支队已由浦口北上，即日在皖军之左，向萧、砀间进攻。苏军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张仁奎各部队，连日在宿迁、沭阳、小伊山将奉军击溃。豫军陈文钊、王为蔚各部到达萧、砀，正向徐州急进。

11月7日　晨，孙传芳下二次总攻击令。联军向奉军猛攻，双方激战于夹沟附近。联军陈仪部对奉军右翼进行包抄，奉军急后退，联军追至夹沟。

△　豫军分三路出师：右翼为靳云鹗督率王为蔚、陈文钊等部，沿陇海路东下，会师徐州；左翼及中路由李虎臣、李纪才指挥，分向曹州、大名一带进逼。三日间陇海路兵车络绎，客货车完全停驶。

△　张宗昌战败，奉张作霖急令退出徐州北上。海州、清江浦奉军亦同时退走。联军卢香亭一部自曹村向徐州进发。

△　冯玉祥致电黄郛等称，本军以和平为宗旨，以退让为办法，不为无名之战争；况械弹均不足，京畿不堪蹂躏，如彼方相煎过急，惟有出于避战一途。

△　东征军第十一师陈济棠部占饶平。

△　南征军第一路陈铭枢部攻占阳江。次日，第四路桂军俞作柏部克化州。

△　武汉学生联合会、工学联合会等单位在武昌召开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到五万余人。会上一致通过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通电。会后游行。

△　段祺瑞指令准将国立自治学院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同日并任张嘉森（君劢）为政治大学校长。

11月8日　蒋介石召各师将领在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讨论对陈军残部约二万余人窜入闽境之处置办法。议决分三路攻闽：何应钦率第一纵队从饶平出分水关；谭曙卿率第二纵队出大埔入平和，程潜率第三纵队出梅县攻永定。后方任务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一切。总指挥部即移至隘　隍就近指挥。次日，电告国民政府，谓："现我军全部集饶平、大埔，预备攻闽。"

△　浙、闽、苏、皖、赣联军占徐州。7日拂晓，五路联军三面攻徐：一、五两军从右路进攻；二军在左，由符离集进攻；四军及三军一部正面进攻。奉军担任防守之兵力在四混成旅以上（10万人以上），异种兵千名。张宗昌亲出督师。旋于6日起，因岳维峻所部国民军二军准备进攻津浦路之奉军，又近畿国民军日见增加，形势甚紧，张作霖采杨宇霆建议，将津浦路南段奉军撤退德州以上，集中京奉路及天津附近，以保全原有之军力，并对付国民军。故奉军于7日放弃徐州。是日，联军进驻徐州。

△　白宝山回驻海州，沭阳亦于同日为联军收复。奉军向青口方面退走。

△　岳维峻由开封抵徐州会晤孙传芳，面商作战计划。

△　萧耀南就“鄂军讨贼军总司令”职及“讨贼联军后方警备总司令”职。

△　热河都统阚朝玺部奉军一骑兵团，深入京兆域内三河县国民军防地，与鹿钟麟部守备队发生冲突，国民军旋即退出，奉军占据三河。

△　上海总工会电请冯玉祥讨奉，略称：“此时奉系之胜败存亡，实决于钧座之趋向”，“敝会谨代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请命于钧座之前，祈即表明态度，宣布讨奉，为民治害，为国杀贼。”

11月9日　段祺瑞令派颜惠庆为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

△　国民军在京要人开会，议决四项：一、始终拥护中央政府；二、不作因拥护地盘权利而破坏和平之行为；三、关税会议期间努力维持京师治安；四、由鹿钟麟负维持京师治安全责。

△　何应钦在汕头就潮梅善后督办职。

△　孙传芳由南宿州进驻徐州，联军总司令部亦移设徐州。下午，孙在徐州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进攻计划。集中徐州之联军已达10万左右，俟豫军抵徐后，即向鲁进攻。

△　王士珍、赵尔巽急电孙传芳勿再进攻，另图解决。

△　吴佩孚派蒋雁行携大批犒赏品，由京汉路转陇海路赴徐州劳军。

△　旧国会议员30余人宴请吴景濂。席间吴将旅沪议员对组织政

府六项意见提出讨论：一、组织合法政府；二、组织政府人物，须由讨贼分子参与；三、卖国党须付国法；四、各部组织依民元官制；五、国会自由集会，选举总统后依法改选；六、宪法上组织须逐渐推行。协商良久，无异议。

△ 杨森偕宋大沛乘“决川”舰抵汉口。

△ 皖赣联军总指挥邓如琢率两师兵力入皖。

11月10日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会同“江大”、“龙镶”、“江平”三舰分水陆进攻中山县城，战一小时，敌林警魂部向西南逃窜，遂收复中山县城。

△ 南征军三路进攻阳春，邓本殷军不支，弃城而逃，是日进占阳春。

△ 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就任“讨贼军海军副指挥”。

△ 段祺瑞令准免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傅铜本职，以李协继之。

11月11日 冯玉祥致书张作霖，表示：“如我兄认弟有合作之必要，有帮忙之必要，弟即来帮忙合作；否则惟有静待缴械而已。惟盼兄平心静气，思之又思。”

△ 皖赣联军总指挥邓如琢率部由安庆抵蚌。次日接孙传芳电邀赴徐州会商军事。邓到徐后即与孙接洽一切，越二日乘原车返蚌。

△ 国民政府特派伍朝枢、林翔、卢兴原、甘乃光、钱树芬为司法调查委员，以伍朝枢为主席。该委员等务须将现在广东司法状况详细调查，并拟具改良方法，以备采择施行。又公布《特别刑事诉讼补充条例》。

△ 国民政府令在罢工期内特别刑事审判所由罢工委员会派三人

陪审，其职权以关于罢工条件为限。

△　张家口开十户长大会，到500余人，西北平民教育处处长刘馨庭在会上讲话，大会议定平民教育实施办法六条。

11月12日　　冯玉祥致电段祺瑞，略谓："所部在京绝无轨外行动，惟京畿东西南三面奉军增兵十万。祥于关会期当竭力维持京师治安，当对奉军相谅，不与相争，彼虽持武力以炫耀，我仍以和平为依归。"

△　张学良携张作霖之进攻命令入关，抵天津后即开军事会议，各重要将领与会。因李景林主张和平，力主撤兵，而握有实力之郭松龄对于此次战争亦不主张进行，故奉方有撤兵之意。

△　徐州窑湾镇遭过境奉兵万余名惨劫。进镇奉兵高架大炮，向典铺轰击，溃兵入街市，杀人放火，到处抢掠。商店被劫30余家，居民被劫千余户，杀伤居民百余人，被掠去者50余人。商界损失20万元以上。

△　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广州商民协会派代表刘东平赴港，与港中外商会接洽，调解罢工案，越二日返省。

11月13日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自主过渡时期办法问题。英国代表麻克类提出中、美、日三方提案之折衷办法13条，要点为："本会议不应超过华盛顿条约以上，即输出港口运来之进口货，课以二·五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增至值百抽五。由此所得关税增收，交由海关保管。"欲使此次会议仅限附加税之讨论，而使自主案根本推翻。荷、美等代表赞同。辩论无结果，定明日再议。

△　段祺瑞下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令曰：前以淞沪驻兵问题

引起兵争，曾经明令制止。不意衅端一发，苏、皖骚然。吴佩孚复潜赴汉口，假借名义，希图一逞。若听其肆行无忌，扰及中原，何以奠民生而维国纪？所有京汉铁路沿线，应责成冯玉祥、岳维峻极力维持，相机制止，以遏乱萌。至孙传芳前次通电，本以淞沪驻兵为言，今仍前进不已，武力是图，殊违本执政倡导和平之意。着即通饬所部停止军事行动，听候解决。其在津浦铁路前线，仍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毋任蔓延。近畿驻兵，均着即日恢复此次军兴以前原状。自奉令后，均应将办理情形随时分别具报。

△　张作霖致电段祺瑞，表示服从中央命令。称：已电商直、鲁二省，停止战争，待中央命令，一切听钧坐主持；所属各部，均严令撤退。

△　北京市民治安维持会开成立会，推赵尔巽为会长，派代表见段祺瑞，请制止京城军事行动。

△　李景林致电鹿钟麟，告以：拟即将三河一带驻兵陆续后退，并保大防军，均向后方撤退。

△　段祺瑞公布《崇祀条例》，凡14条，规定崇祀分国祀、乡祀两种，“国祀由临时执政及各地方长官行之，乡祀由各地方官行之。奉祀社节另以命令定之。”

△　“沪案”司法调查之日本委员回国。英、美委员亦准备离沪。

11月14日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继续开会。王正廷提出三项：一、关税自主，应明白规定于条约内；二、裁厘是中国自动提出，非自主之交换条件；三、自主问题解决后，方能讨论附加税问题。英代表极力反对，坚持裁厘有详细办法后，方能自主。美、日代表支持英代表之主张。会议形势险恶，最后由荷兰、瑞典等国调解，在第二委员会中另设一小委员会，重新拟定具体条文，再开第二委员会复议。当即决定推王正廷、麻克类（英）、史陶恩（美）、日置益（日）、

欧登科（荷）五人为小委员会委员。

△　东征军第三纵队程潜部由松口向永定前进，与陈炯明所属之刘志陆等部稍有接触，即于是日进占永定。刘部向上杭、龙岩逃窜。

△　蒋介石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程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　曲同丰来京面见段祺瑞，报告京津线奉军全撤，饬分驻天津、昌黎。

11月15日　　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陈调元电五省军政、议会、法团，推孙传芳为五省领袖，开府南京，凡联军范围内军国大计，均由孙处理。

△　孙传芳抽调徐州前敌浙军第三军南下，转赴沪、浙驻扎。第二师第三旅旅长李俊义抵沪后，乘车赴松江布置一切。

△　南征军右侧支队陈章甫部占罗定。陈炯明所属之徐汉臣旅投诚。第二路指挥戴岳委徐为第一独立旅旅长。

△　金汉鼎在黔阳就定滇军总司令职，通电声讨唐继尧。

△　国民党南京市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南京市党部。选宋镇仑、高岳生等七人为执行委员，王守义等为监察委员。29日，国民党江苏省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合发表启事，宣布："所谓南京市党部，未经许可，擅自集合反动分子所组织，本部不能承认，本日起该党部一律解散，其反动分子宋镇仑、高岳生等10人永远开除党籍。"

11月16日　　奉方代表李景林、郭瀛洲，冯方代表张树声、王乃模在天津直督署签订和平条约八项：一、奉军让出保、大，京汉路全线予国民军；二、山西地盘由国民军支配；三、国民军由海道输入之

军用品，奉军不得阻碍；四、京畿一带，双方均不驻兵；五、津浦路全线归奉军；六、长江下游为奉军发展地，上游为国民军发展地；七、中央政权奉、国各半；八、财政收入，奉、国平均分配。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稚晖、傅汝霖等人在北京集议，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分别致电广州汪精卫、林祖涵等及上海执行部，决定于本月23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正式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

△　国民政府令：凡在国家或地方机关服务之文武官吏及在学校服务之教职员等，均不得借故联同罢职及罢课；倘敢故违，当施以严重之处分。

△　孙传芳通电：豫军北路已占邯郸，中路已过大名向德州前进，东路已过曹州、济宁，李纪才部已收编山东第五师改为国民军第十二师。

△　汕头市各界举行“祝捷国民革命军胜利大会”。工农学商等数十团体四万余人参加。会后各队手持书写标语小旗游行。晚8时举祝捷提灯会，珠光十里，宛若游龙。

△　下午3时，蒋介石莅汕头市总商会欢迎会，演说国共界线。揭露敌人散布“国民党是共产党，国民革命军是共产军”之谣言，“其目的在使人民不与革命政府合作”。并谓：“不过你们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是三民主义，是现在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最需要的主义。质言之，能够拯救中国得到独立自由的，只有这个主义。”“共产是实行于大资本国家，如像英美等国，因为大资本家渐渐发生起来，不只是工农受资本家的压迫，就是小资本家，也要被压迫不能生活，大资本为害如此，不共产如何能行。”“中国现在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并无大富与小富之家，这样情形怎么能够说共产呢，所以要请各位明白，中

国决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　山东兖州镇守使、第一师师长兼鲁军总司令张培荣等通电声讨奉军。

△　港商代表黄季熙、雷荫荪等六人抵省，与省商界代表交换调解罢工案意见。25日，港代表周寿臣等又来省接洽解决罢工事项。

△　联军第一军苏军第一支队司令部副官朱恒，报告调查夹沟集至乌衣镇被灾状况，略谓：“自夹沟至新桥，凡奉军所至，市镇乡村无不掳掠一空。入其宅第，则箱笼倒翻，器具杂乱，米粮满地，猫犬皆无。而固镇一地，被抢者竟至百万元之多。”“奉军由西寺坡退却时……纵火焚烧，全村遂成灰烬。”又谓：“其最堪痛恨者，俄籍士兵一见妇女，即上前拥抱而去，从而淫之，拒则杀之。其固镇、任桥、西寺坡、符离集、夹沟等处受其污辱者，不可胜计。”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凡六条。此次规定之后，所有民国六年、九年、十年4月间通行之教会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均即废止。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911.876877万日元借款合同，作拨付电信、林矿借款利息用，月息1.2%，期限25年，以关税余款担保。

11月17日　段祺瑞特派王宠惠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

△　段祺瑞公布修改学校系统改革案说明第八款为：“中学校修业年限六年，分为高初两级；初级四年，高级二年，但依设科性质得定为初级三年，高级三年。”

△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中之五国小委员会开会拟定自主条文，经讨论议决，仍以中国所提之原案加上日本代表团之提议，交第二委员会讨论。

11月18日　　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与奉军李景林部在保定发生冲突，经双方驻京代表调停休战。执政府开会议决，令“奉军速遵照和平协定，于十九日前撤退京汉铁路沿线之军队；国民军在奉军未撤退完前，不得移防”。越二日，邓率部入保定。

△　南征军第一路陈铭枢部进占电白、水东，向高州迫近。

△　章太炎发表时局通电，主张奉迎黎元洪“南来正位，建置合法政府”。

△　郑州开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四郊农民到者2000余人。会场满悬红旗，上书“农民解放万岁”，“工农联合万岁”等口号。张比南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李震瀛等发表演说。发起人提议拟照广州农民自卫办法成立农民军，大众以欢声雷动表示支持。

11月19日　　关税会议第一、第二委员会开联合会议。通过17日五国小委员会议决案。决定：一、各缔约国同意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二、撤废中国与列国所结现存条约中关于关税之限制；三、从民国十八年1月1日起实行中国国定税率；四、中国政府声明实行国定税率时即行裁厘，并声明民国十八年1月1日前实施裁厘。会议并组织附加税用途及税率两分委员会。附加税用途分委员会又分厘金专门委员会及其他用途专门委员会。

△　南征军四路进袭高州。第一路陈铭枢部由电白前进击高州之东，第二路王均部由阳春直攻高州之背，第三路戴岳部偕徐汉臣旅由罗定出信宜击高州之西，桂军俞作柏由化州击高州之南。是日，四路逼进高州城下。次日，邓本殷率其所部陈凤起等旅突围而逃。越二日，俞作柏部、陈铭枢部先后入城占领高州。

△　山东驻济宁鲁军之吴长植部与驻兖州之鲁军张培荣部联合豫军，攻击奉军张宗昌部，迫张退泰安。

△　国民政府以惩吏院委员邹鲁另有任用，应免本职；任邓泽如、李章达为国民政府惩吏院委员。

1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本年12月14日在广州开第四届全体委员会议，明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北京于右任、李大钊、王法勤、丁惟汾、于树德，指出：一、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全体会议，只能在广州开会，已经决议在前，何得违反前议？二、此举显然未得北京执行部之同意。三、熊克武因通敌被捕，听候审判，何得通电请其来京，公然违反中央决议及政府令？以上三点，以中央委员而举动若此，实为可耻。

△　汉口惨案交涉之先决条件五项，由湖北交涉员胡钧与驻汉英领分别在中、英两种文字议定书上签字。“汉案”交涉含糊了结。

△　国民政府电告北上外交代表团总代表林森：“本日决议取消邹鲁代表职权及名义，着北京执行部查办。”

△　冯玉祥与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签定密约，共七条。其中规定：国民军随意驻扎保大、京汉线，自由出入天津海河口；郭军经营东北和内蒙古，改造东三省政府，国民军以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治理，国民军对热河决不攻取；郭军诚意赞助国民军开发西北，必要时以实力赞助之。是日，冯在密约上签字，越二日，郭签字。

△　叶楚伧主编之上海《民国日报》，是日起连篇累牍刊载西山右派会议通电及议决案。旋于27日至12月22日，发表《告国民党全体同志》等12篇文字，公然支持西山会议，反对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背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诬蔑、诽谤共产党为“叛徒”、“反革命”。至是，该报充当了国民党右派的喉舌。

△　中日青岛盐输出问题，正式签定协定。计分两种：一为《青岛盐输出大纲暂行协定》，二为《工业盐向日本、朝鲜临时输出办法》。其中两国争执焦点之输出税率问题，执政府竟抛弃每担二角之主张，容纳日本每担三分之要求。旋青盐输出由日商三井、三菱两行承办，税率定每百斤三分，运朝鲜征九分。25日，北京临时政府通过青盐输出口办法。

△　广州四商会代表胡颂棠、林丽生、简琴石、黄旭升等20人抵港，与港各商团磋商调停罢工案，25日返省。

11月21日　　关税会议附加税用途分委员会之厘金专门委员会开会。中国及英、美、日、法、意、比、荷各国全权代表参加。曾宗鉴主席。会上中国代表提出裁厘具体计划为：应裁之厘金标准；应裁之厘金范围；厘金之抵补范围；裁厘之顺序。下午，召开用途专门委员会。中国提出用途之具体计划为：一、裁厘抵补3000万元；二、国家建设3000万元；三、内外债清理3000万元；四、中央行政费1000万元。共每年附加税增收一亿元，如不足此数，则减三、四两项。英、日代表提出应以清理内外债为第一项，辩论无结果。

△　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甘乃光为广东南路各属行政委员。

△　段祺瑞令：一、着财政部会同财政整理会妥筹整理国债方法；二、着岳维峻迅饬赴鲁军队开回原防，免滋纷扰；三、褒奖山西省长阎锡山政绩。

△　孙传芳通电由徐过宁回杭，将前敌作战事宜委前敌总指挥卢香亭、白宝山，徐州防务委第一军军长陈仪，分别担任。

△　孙传芳自徐州电复国民政府，对广州国民政府歌（5日）电“承示建国四义，洵为对症之药石，救时之正轨。……深愿群力于此，当亦诸公所乐闻”。

△　邓如琢通电，声言进行查办事宜，由蚌埠率所部回师当涂、安庆、芜湖等处。皖南军事当局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并宣布戒严。皖军总指挥王普亦急电芜湖戒严司令，阻止邓军过芜，并调各路驻军集中芜湖，进行军事布置。

△　济南商会开会讨论退兵遣送办法，及请张宗昌为鲁省留一线垂毙之民生；并组痛哭团，冒死赴奉天喊冤。

11月22日　　郭松龄倒戈。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主和拒战，张作霖电召郭回奉。郭即在天津与李景林商议取一致态度，是日通电倒戈反奉，请张作霖即日下野，将东三省军、民两政交张学良接管。

△　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等30余团体发起召开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北京警厅派大批军警将各集合点严密包围，禁止群众集会游行。群众大愤，与军警展开搏斗。二万余人奋勇冲出包围，分头集向天安门广场，受伤群众达百余人。大会推陈启修主席，议决案如下：一、绝对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二、本月19日关会议决系以裁厘列入条约，与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之主张相违，全国国民应一致反对；三、警告政府绝对尊重人民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会后游行示威。

△　奉军与国民军在北京正式成立镇国军联合办事处，推镇军马翰荣、国军史之照为常任委员，是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　孙传芳由徐州抵南京，并接见江苏官绅，筹商苏省善后诸问题。

11月23日　　西山会议。林森、居正、邹鲁、覃振、石青阳、石瑛、戴季陶、叶楚伧（以上八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谢持、张继（此二人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此四人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中国国

民党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通电，竟通告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日停止职权。

△　郭松龄在滦州召集军事会议，决就驱除张作霖侧近奸人杨宇霆等，采取军事行动，并将奉军将领姜登选、裴春生、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等监禁。

△　关税会议附加税税率分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蔡廷幹提出附加税具体方案。大要为：普通品值百抽五，年约3000万元；甲种奢侈品值百抽三十，年约3200万元；乙种奢侈品值百抽二十，年约5000万元。关于普通品，美、日、英代表坚持以华令二·五为限；关于奢侈品，各国代表亦反对。最后决定候审查用途再议。

△　段祺瑞令安徽省长着江绍杰暂行护理。

11月24日　　郭松龄在滦州发出第二次通电，数杨宇霆祸奉罪状，略谓：“杨之为人，残忍性成，险阴万状，排除异己，妒忌老成。”“杨督苏后，遍树私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餍”，“返奉后，罔知忏悟，仍积极主战，以冀雪其苏沪之耻。”末谓：“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率部屯垦边境，以巩国防。”

△　国民党西山会议又发通电，公然声言：集会“不受广州中央执行部拘束”；广州中央“限制本会议开会地点等议决”为“无效”。竟提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日期，“应由本会决定”。

△　段祺瑞任命黄郛为驻德意志国特命全权公使，加全权大使衔；特派魏宸组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派陈毅会同湖北省长筹办赈抚事宜。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部抵江门设第四军军部。28日，偕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抵阳江，与朱培德商攻琼崖计划。

△　南征军第一路陈铭枢部攻占廉江、安铺、遂溪，邓本殷军申

保藩、苏廷有部向钦廉溃退，陈凤起残部窜琼崖。

△　国民政府特派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陈公博为国立广东大学管理委员会委员。

△　是晚，杨宇霆携眷乘车由奉天避往大连。

11月25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外交、内政、陆军、海军、教育诸部总长李思浩、沈瑞麟、龚心湛、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等全体总辞，内阁陷于瘫痪状态。

△　段祺瑞令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杨宇霆免职，以孙传芳继任；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姜登选免职，以邓如琢继任。

△　冯玉祥致电敦促张作霖下野。略谓："现举国救亡，矢集一身，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劝其亟当顺应世界潮流，"及早引退"，"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　李景林致电张作霖劝其下野，即令张学良接管军民两政。谓："苏省之变……应听中央解决，不宜遂以兵戎相见。请我帅毅然决心，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

△　奉天因郭松龄倒戈，宣布戒严令。宪兵司令陈兴亚被任为戒严司令，公布取缔令17条。

△　察哈尔都统张之江以时局不靖，宣布张家口戒严，委第七混成旅旅长葛金章为戒严总司令。

△　孙传芳通电委派张俊峰为联军第三军军长，协同豫军进攻兖（州）、济（宁）。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告各级党部暨全体党员，否认西山非法会议。声明："本党部除电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速即召集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重要问题外，对于此北京非法会议，无论其所议结果如何，决不认为其有效。”

△　国民政府规定广东东江、南路各行政委员职权，即：一、督率所属各县县长处理地方行政事宜；二、对于所属各县县长，得先行任免，再行报告于省政府。

△　国民政府令杨西岩为港澳调查专员；任命黄一欧、詹大悲为国民政府参事。

11月26日　　郭松龄军因汲金纯所部第九师归降，是日占领秦皇岛。张作相所部奉军第十一师退绥中。

△　郭松龄将押禁在滦州之奉军将领姜登选枪决，其余师、旅长裴春生、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等10余人押送天津。29日，郭通电宣布枪决姜之理由。

△　张学良抵秦皇岛，遣飞机数架在关内外散发传单，责郭松龄忘恩负义，檄众军“讨叛”。郭军散去降奉者，约有三旅。

△　热河都统阚朝玺致电郭松龄、李景林，谓：“已迭向奉张劝告和平，请暂持镇静，万勿轻动，东省内部改革诸事，断无不可商量之处。”

△　李济深之第十一师陈济棠部由饶平班师回省。饶平由独立第一师欧阳驹填驻。

△　段祺瑞亲信曾毓隽被京师警卫司令部拘捕。当日，段祺瑞在吉兆胡同私宅召集紧急会议，梁鸿志、莫德惠、贾德耀、林建章、姚震、朱深、章士钊、林长民、汤漪、许世英等出席，密商营救办法。

△　五省联军第三军军长张俊峰通电报告，是日进占临城，向兖、济前进。

△　国民政府令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督饬所部于一个月内，将东莞、增城、宝安、博罗、河源等处散兵土匪，悉予扫灭，免为民害。

△　段祺瑞令财政部会同财政善后委员会裁撤各省区厘金。

11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致电各级党部，严驳西山右派会议。谓："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阴谋。"宣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已电嘱林森诸同志尊重决议，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

△　国民党发出时局宣言，主张"以国民会议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先行召集预备会议"。同日，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提出之《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　郭松龄军占领山海关。

△　张学良派日顾问宇田，郭松龄派日顾问仪我在滦州会谈。张请郭先停战，再谈善后。郭提出要求条件：一、鲁归岳（维峻）；二、直归冯（玉祥）；三、热归李（景林）；四、郭本人回奉统辖东三省，否则不应停战。谈判不洽，是夜，张离秦皇岛。越二日，张学良偕杨宇霆回奉天。奉方至此，决与郭军一战。

△　冯玉祥由包头抵张家口致电段祺瑞，表示始终拥护。

△　段祺瑞令准免京师警察总监朱深本职，以卫兴武兼署。

△　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以迭请辞职不准，是日在天津通电声明“以后对于部务不再负责”。同日，交通次长郑洪年亦通电辞职。

△　徐树铮访晤日币原外务大臣，说明中国时局，乞求对于段祺瑞加以特别之援助。币原表示当“不吝尽力援助”。

11月28日　　北京五万民众集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北京总工会率领工人臂缠红布前来参加。示威群众高呼“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广州国民政府”、“驱逐段祺瑞”等口号，并赴吉兆胡同段宅，高呼：“段祺瑞下野！”当即开会通过《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决议案面交鹿钟麟。段宅因国民军驻守，不能入内，群众旋分赴章士钊、朱深、叶恭绰、李思浩、曾毓隽、梁鸿志等住宅将什物捣毁，并有纵火情事。当日，段祺瑞责成鹿钟麟全权维持京师“治安”，鹿即下令禁止开会，并逮捕88人。

△　段祺瑞令准免交通总长叶恭绰本职，以龚心湛兼署。

△　北京国民党西山会议闭会，通过反对联共政策的决议：一、驱逐鲍罗廷；二、取消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党籍；三、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主持教育行政；四、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作官吏；五、不准共产党参加群众运动，如青年运动、农工运动等。

△　国民政府令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孙科、李作荣为广三铁路查办委员会委员，以陈公博为主席。

△　国民政府公布《审计法》、《审计法施行规则》、《监察院单据证明规则》及公布修正法院编制法第121条。

△　国民党江苏临时省党部及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分别刊载《启事》和《紧急启事》，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声明反对西山会议，宣布该省党部为“非法组织”。

△　孙传芳通电宣布联军第十三军司令邓如琢另有任用，兹委冯绍闵师长为浙闽苏皖赣联军第十七军司令官，率所部援助各友军北上。

11月29日　　北京各界五万人在天安门继续开国民大会，通过解除段祺瑞一切职权，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惩办卖国贼；查办金法郎等项提案。会后游行，有一部分群众赴《晨报》馆，纵火焚烧。

△　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段祺瑞亲信姚震为国民军第二军代表李仲三所捕，押北京警卫总司令部。旋李仲三发表捕姚宣言，宣布“代表国人擒贼”。12月28日，鹿钟麟奉冯玉祥令，将姚释放。

△　被章士钊迫令解散之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经师生坚持奋斗，是日师生返回原校，并隆重集会庆祝复校之胜利。

△　孙传芳发表统一江苏省财政电令，禁止各军政机关自由提款，所有苏省政费各用途，统由财厅按照应发数目，分别解交联军总司令部总收分发，由各领款机关盖章具领。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致电拥护西山会议，并声称：“先除内奸，后攘外敌。”

△　上海赣民社等三团体致电孙传芳，历数方本仁搜刮民脂民膏，暗与奉张信使往返等罪，请罢免赣省督办职。

11月30日　　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说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又胁迫张学良军，图进兵奉天。

△　郭松龄通电将所部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下辖五军：第一军军长刘振东，第二军军长刘伟，第三军军长范浦江，第四军军长霁云，第五军军长魏益三。

△　孙传芳委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12月9日，陈在蚌埠通电就职。

△　热河都统阚朝玺发通电，宣布将热河都统职权让归全区保民总办张鹏飞，即带所部归奉屯田。省议会等团体致电冯玉祥速派员前来镇慑。冯即令宋哲元开往热河。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念廖仲恺殉难百日。到汪精卫、陈公博、谭平山、林祖涵、邓泽如、古应芬及各级党代表、学生等千余人。汪精卫、何香凝等在会上发表演说。

△　国民政府令准如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呈请，对于伪冒罢工名义或真属罢工分子，如有违抗法令，骚扰地方者，应即按法拘拿，加等处罪。

△　南征军第一路陈铭枢部会同第四路俞作柏部收复廉州城。

△　陕西关中工农商学兵联合会致电岳维峻、邓宝珊等，誓以全力支持国民军声讨帝国主义之工具奉系军阀。

△　关会附加税税率分委员会第二次开会，蔡廷幹提出：一、增加税率计划书；二、过渡时期进口洋货附加税估计收入表及乙种奢侈品加以说明。议无结果。

是月　　张宗昌令山东107县商民借垫临时军费400万元，统限于11月25日以前一律交纳。

12月

12月1日　　郭松龄致电驻京日使芳泽声明对日外交态度，略谓："凡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一律尊重。一切贵国私人对于省政府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合法事业，一律照前继续有效。至贵国人士受政府及各机关雇佣者，亦均继续任用。"指出："惟在本军举事以后抵奉以前军事期间东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新契约，均不能承认为有效。"要求"通饬所部官吏，严守中立，不得有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

△　国民政府令免邹鲁国立广东大学校长本职，以顾孟馀继任，并着陈公博暂行兼代；任命宋子文兼广东广州各属行政委员；古应芬兼广东西江各属行政委员；彭泽民为国民政府参事。

△　吴佩孚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军需汇兑总局，委李葆元为局长，强行发行军需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总额2000万元，并发布告称："倘敢拒绝行使及有意破坏本券信用者，定按军法从严惩治。"

△　段祺瑞令准免陆军总长吴光新本兼各职，特任贾德耀为陆军总长。

△　苏联大使加拉罕由莫斯科抵北京返任。

△　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主办之《新女性》月刊出版。

12月2日　　西山会议发出通电，宣布取消共产派中央委员的党籍，称："查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皆属共产党人，应依议决开除。"

△　广东中华全国孙文主义青年会广东分会通电拥护西山会议，反对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电文并攻击共产党，声言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永不合作"。

△　李景林释放郭松龄解津拘禁之奉军师、旅长，并与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李任总司令，张任副司令。是日，通电声明："职在守土，倘有扰害直隶和平者，惟率健儿保卫疆土。"

△　宋哲元率部向热河进发，越三日抵隆化，7日就热河都统职。

△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通电，主张由国民军及革命军领袖组织临时国民革命政府，对内肃清一切反动之军阀势力，解除其武装，给予国民以一切自由，各职业团体派代表组织国民会议产生正式国民政府；对外宣布解散关税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脱离帝国主义之羁绊。

△　郭松龄致电北京外交团，声明："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尊重中外条约，希各国取中立态度"，"毋以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资助任何方面。"

△　段祺瑞特派龚心湛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　美国以中国时局紧张，自马尼拉派军舰三艘载美兵300名赴上海。

12月3日　郭松龄军占领兴城，张作相军向锦州退却。

△　段祺瑞令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本职，以陈锦涛继任；特派莫德惠考察欧美日本实业事宜。

△　邓如琢以孙传芳特任王普为安徽省长，陈调元为皖军总司令，是日自安庆通电宣布率师回赣。

12月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广州宣言："查冯自由、邹鲁攻本党政府曰共产，曰联俄，此帝国主义军阀用以离间一种策略，望同志勿为异说所惑。"

△　西山会议通电宣布下列议决案：一、取消政治委员会；二、解除鲍罗廷顾问职；三、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定于明年3月29日在上海或北京、广州举行。

△　李宗仁派龙州镇南善后处长胡宗铎及第一纵队黄旭初部进攻钦州。是日，在洞利（钦州属）与申保藩部接战数小时，申部不支，向钦州溃退。越二日，胡部进驻钦州，申保藩部改编为广西陆军第十三旅及十四旅，宋庆积、崔经贤为该二旅旅长。

△　李景林决定对国民军作战，是日通电声讨冯玉祥，次日又通电声明："在北京冯逆恶党未肃清以前，所有北京发布命令绝不承认。"

△　郑州各界市民举行声讨奉张大会，议决四项：一、要求国民军领袖速在北京组织临时革命政府，并继续努力扫清一切万恶势力；二、在最近期内，依照孙中山之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正式国民政府；三、对外宣布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停止现正进行之关税会议；四、对内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信仰之自由。

△　段祺瑞令准免兼署京师警察总监卫兴武兼职，特任鹿钟麟兼署；热河都统阚朝玺免职，以宋哲元继任；又令：苏省江北各属灾祸迭乘，着财政部发给帑银一万元，交该省长遴委妥员散放。

△　段祺瑞批准公布《简化税关则例国际公约》。按：该约系国际联盟于1923年10月在日内瓦召集税关章程会议由35国议订，我国派驻瑞士使馆秘书肖继荣及税务司卢立基参与。

△　段祺瑞于吉兆胡同本宅内约许世英、汤漪、邓汉祥、陈宦、龚心湛等会商改组事，段首先欲龚心湛出任组阁，龚以才力不胜，坚辞。段继又命许世英组阁，并谓：此次组阁为环境之要求，请许勿固执己见。在席诸人亦请许勉任其职，许要求组织联合内阁，俾各方对

于中央有共同负责之机会，段及在席诸人表示同意，许允担任。

12月5日　　西山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并不得在本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

△　《政治周刊》在广州创刊。该刊系在国共合作情况下出版的刊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至1926年6月5日，该刊共出了14期。

△　段祺瑞致电冯玉祥、岳维峻、孙岳、萧耀南、孙传芳、方本仁、邓如琢、郭松龄等，请派遣代表来京参与解决时局会议，讨论法统、内阁、东三省及直鲁等问题。

△　山东省议会、省教育会、济南总商会等五团体以北京临时政府已不能行使职权为由，通电宣布保境安民，实行自治，不承认中央政令，拒绝任何客军入境，并推张宗昌为山东保安总司令。

△　郭松龄军攻占锦州，张作相部放弃大凌河战线，郭军前锋到达沟帮子。张作霖于6日召集军事会议，宣布下野意见。

△　南京市万名民众举行市民大会，并游行示威，高呼“武装民众”、“关税自立”、“打倒军阀”、“推翻段政府”、“建立国民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旋分电郭松龄、冯玉祥，主张推倒卖国段政府，速组国民政府。

△　湖北全省商会联合会、汉口总商会、武昌商务总会、汉阳商会等五团体在汉口开联席会议，讨论应付军需券办法，到110余人。一致议决反对军需券在鄂发行，并约定如汉口方面起而反对军需券，武昌首先罢市以为后盾。次日，省各界代表300余人赴省署请愿，萧耀南接见，表示：“此项军需券，系在军前使用，如军事不急，决不轻易发行。”8日，萧以布告宣布：“现承联军吴总司令函示，该券不

在汉市行使。”

12月6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为调解罢工发表宣言，指出：“这次罢工系为求国家独立及民族生存之光明热烈运动。这次罢工之解决，当视港政府能否觉悟为定，我们始终严阵而待。”

△　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率部由张家口抵京，当即赴杨村前线督师。其察哈尔都统职委察东镇守使高振龙代理。

△　冯玉祥派张之江为第一军正司令，郑金声为副司令，担任天津北路作战；邓宝珊为第二军正司令，徐永昌为副司令，担任天津南路作战。次日，邓宝珊部进攻马厂李景林军，激战竟日，未能得手。

△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600余人，孙科等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大会通过宣言，声称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合国情”。越二日，该会发出紧急声明，宣称：“对信仰马克思主义、意在篡党之共产派，均不得不拒绝其参加。”

△　段祺瑞令准免兼署督办京都市政事宜朱深兼职，以鹿钟麟兼署。

△　包头数千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10项提案，要旨为：组织一在民众指挥下的革命政府，速与南方政府联合，召集真正国民会议；无条件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责成国民军与革命民众联合；服从民众议决案等。

△　上海总工会、学生会等发起召开市民反段大会，到工、学、妇女各界万余人。大会分别通过致国民政府、北京民众、冯玉祥、孙传芳电及大会宣言。宣言提出“打倒段政府和一切卖国军阀的势力”、“由民主组织临时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关税自主”、“废除厘金等苛捐杂税”、“颁布劳动法”等主张。吁请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团结自己，武装自己，使倒段运动成为民众夺取政

权的运动，使反奉战争成为人民夺自由的战争；使中断的五卅运动成为更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

△　安庆数万人开皖民大会，以孙传芳擅委皖军总司令、省长，实行征服政策，宰割安徽，蹂躏皖人，讨论对付办法。议决：一、致电忠告孙传芳；二、电请旅外皖人一致援助；三、电告陈调元、王普请勿轻率从事等五项议案。

△　上海总工会应上海市民之请，是日自动启封。13日，上海总工会招待各界团体讨论“五卅”案失业工人救济款项募捐办法。议决由与会单位组织“五卅”爱国失业工人募捐团。17日，总工会派代表向孙传芳请愿工会公开，遭拒。

△　刘湘召集四川军民代表在成都开善后会议，到代表131人，袁祖铭、赖心辉、刘文辉、邓锡侯等均到会。

12月7日　张作霖取消辞职下野之意，决定集兵辽河左岸与郭松龄作最后决战。吉（吉林）、黑（黑龙江）等省部队亦奉命援奉。

△　孙传芳在南京召集江苏政务会议，并发表宣言：一、请省长历行考绩，肃清吏治；二、统一财政，三、警务、司法、教育、实业关系民生，应从扫除旧弊入手；四、保卫团必须寓兵于农；五、道尹职司监察，至为重要，防止省侵道权。次日，孙传芳回抵杭州。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载“开除江苏省党部共产派党籍”启事。该启事要求西山会议明令将苏省党部“共产分子”朱季恂等10人“永远开除其党籍，余则分别处办”，并解散省党部，另组“合法”机关。

△　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按照西山会议决议，以党部执行委员俞秀松、宣中华、安体诚，候补委员倪忧天、唐公宪等皆属共产党员，议决取消其党籍。

△　长沙五六万市民举行时局大示威，通过对于时局之七条意见，要旨为：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三、反对“沪案”重查；四、打倒一切军阀，建设人民的委员制政府；五、要求省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曾三等，启封铅印活版工会，严惩平江县庇护英商、枪杀市民之驻军团长，收回大金码头等。旋结队往省署请愿，赵恒惕被迫出见，群众高呼“打倒赵恒惕”而去。

△　国民政府令：设国营实业管理委员会，隶于财政部，所有士敏土厂、皮革厂等皆归管理；任命李录超为国营实业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又令准免林翔特别刑事审判所长兼职，特派卢兴原继任。

△　广东陈炯明部副总指挥洪兆麟于乘外轮由港赴沪途中，被该轮中国船员韦德开枪击伤，经抢救无效，于9日上午毙命；韦德亦开枪自杀。

12月8日　蒋介石召集黄埔军校政治部人员与党代表开会，讨论对付共产党之办法。蒋在会上公然勒令：“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公开”，并声称：凡军校国民党员“愿加入共产党者，须向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准”。

孙殿英部攻占皖北亳县，大肆抢掠，26日，省军三面围攻，孙军窜逃，县城克复。孙军据城19天，全县损失达数千万元之巨。

△　吴佩孚委靳云鹗为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是日，靳在浦口发表就职通电，称“即日驰赴山东前敌督战”。越二日，靳抵徐州。

12月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广州致电上海执行部恽代英，略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广州开会，请转苏、浙、皖、赣、川、湘各省二届会议代表早日启程来粤。”

△　北路张之江部国民军对杨村李景林部奉军阵地发动攻击，李军负险防守运河南岸，张部迭次冲锋未能得手。次日晨，用猛烈炮火

掩护步兵涉水登岸，李军不支，向汉沟、北仓退却，张军遂占杨村。

△　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天津战事违反1905年条约。按《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里内不得驻兵。现津埠风云紧急，应请中政府注意，并饬双方军队切实遵守。"同日，天津领事团组织各国联军分布华、租交界地方。

△　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向张作霖、郭松龄两军提出警告，宣称："日本对中国动乱严守不干涉态度。但帝国在满洲之权利和利益不能损害，对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者，帝国不能默视。"是日，由菊池上校送达张作霖，并于次日派专使赴锦州面交郭松龄。

△　辽宁日本驻屯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移至奉天，驻公主岭骑兵一部开赴奉天担任警备任务。

△　司法总长杨庶堪因整顿司法，经费无着，提出辞职，段祺瑞指令慰留，并着财政部对其所需经费迅为筹拨。

△　冯玉祥致电段祺瑞，陈述兴革事宜及政治主张。要旨为：一、应改革者，实行平民政治，撤销王公制度，削除苛政，肃清积弊；二、应整理者：举贤才，明是非；三、应提倡者：崇节俭，重道德，注重人道，政治公开；四、应促进者：强迫教育，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自主；五、提倡实业，恤养无告贫民；六、统一之道宜以良心感化，不可恃武力解决。

12月10日　　广东大学离校教授周佛海、曾济宽、萧鸣籁、杨宙康、程璟、冯友兰、刘光华、任中敏、郭冠杰、费鸿年、黄季陆等38人抵沪后，是日发表反共宣言，诬指："鲍罗廷阴谋破坏广大"，"共产派占据广大"，宣称辞职原因在于"反对赤化教育"。

△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执行委员会致电汪精卫，指责其将"一切政

权、军权拱手交与俄人”，“为策之失，无以过此”；并指责汪被共产党包围，“甘为该党张目”，“欲驱我党，尽入彼党”。

△　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部占领唐山。次日占芦台，由东路直逼天津。

△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开第五次会议。蔡廷幹提出《预定修改税则章程》及《编订货价引言》。王正廷发表两项宣言：一、中国政府向旅华外侨推行各项税捐；二、中国政府关于不出洋之土货，抛弃出口税及复进口半税。各国代表均以“税率过高，中国现状不安”为借口，主暂缓讨论。

△　徐树铮考察欧美日本各国后，是日返抵上海。次日徐即奉段祺瑞命，赴杭会晤孙传芳，接洽关于整理政治及收束军事两项问题。

12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暨各部部长在广州举行第一二六次联席会议，通过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申孙中山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之根本方针；回顾党内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种种分子，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派之间摇撼与坚持根本方针之斗争经过，要求全党同志识破谢持、邹鲁企图破坏孙中山根本方针之反动计划。

△　国民军天津南路邓宝珊部攻克马厂。14日，占流河。北路国民军三面包围北仓。李景林军依仗坚固战壕对峙，国民军虽投重大兵力，激战数日，未有进展。

△　驻京日使芳泽发表对中国时局宣言，称：“内政不干涉主义，为日本之根本主义。此项主义，不因南满地方此次之时局而受何等之影响。”又称：“日本为保护在满洲之重大权利利益起见，日本官宪除在职责上不得已而谋适当之处置外，不复越出范围一步。”

12月12日　　维持京津交通之国际专车，因车后随有冯军铁甲炮

车，受李军炮击，不能前进，京津交通完全断绝。使团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及两军提出严重警告。

△　北京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到2000余人。沈定一、邹鲁等在会上发表演说。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广州发出通电，以邹鲁在京召集违法会议，议决给予查办；并谓其余列名北京会议诸人，“俟调查清楚，即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处”。

△　绥远都统李鸣钟率部进驻丰台。同日，以李景林“北拒郭军义师，南联张匪余孽，包藏祸心，近窥京畿”，通电声罪致讨。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欧登科之照会，决定电令战区内各军事长官尊重《辛丑条约》，勿在距天津20里内驻兵，并切实保护国际列车之通行及沿途外侨之安全。

△　郭松龄军主力渡大凌河进占沟帮子。越二日，郭军抵打虎山（今大虎山）。15日，右侧郭军先锋队占牛庄。

△　段祺瑞指令准予加入国际交换出版品公约两种，并予公布。按：国际交换出版品公约两种，系指《国际交换公牍科学文艺出版品公约》及《国际快捷交换官报与议院记录及文牍公约》，均为美、比等国1886年3月15日订于北京。

12月13日　　西山会议决议，是日通告接管上海执行部，并将中央执行部移至上海。次日上海执行部通告宣布“遵照办理”。

△　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率部二万余人，乘虚进占山西辽州（今左权县）。阎锡山委第一师师长商震为前敌总指挥率军反攻。18日，樊军被晋军击退。

△　国民军第一军将领邓宝珊、史宗法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

众之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统一，对外谋国际和平”。

△　孙传芳任命周凤歧为南京卫戍总司令。是日，周到职视事。

△　郭松龄右侧马恭诚旅占领营口河北车站，日本驻营口守备队阻止郭军进入市区，并提出警告谓：郭军不得侵入距南满铁路附属地20里。郭松龄为此向驻京日使芳泽提出抗议。

△　邢台各界3000余人开市民大会，通过议决案及通电，要求解除奉系军阀余孽之武装，召集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组织委员制的国民政府，以解决一切国是，并要求无条件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萧耀南通电全国，以鄂省旱荒，地遍57县，人口达1200余万，为60年所未有之奇灾，现已成立湖北急赈会、华洋义赈会联合办事处，自任名誉会长，吁请各省协助。

12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广州通电全国各省党部及海外各地党部，略谓：“上海《民国日报》近为反动分子所盘据，议论荒谬，大悖党义”，宣布已派员查办。

△　国民党南京市第三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拥护西山会议决议案。声称：西山会议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本党最高权力机关”，其一切决议“惟有绝对服从”；如有违反者，“即系本党孙文主义之叛徒”，“本党唯有本‘先除内奸，后攘外敌’之精神，以横扫‘反革命’之挞伐对付之”。

△　驻京荷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声明本月18日在京召集之法权调查会，因交通阻塞，各国代表不能及时来京，请予展期。

△　直隶省议会致电冯玉祥，力劝其迅即调回围攻天津之国民

军，以息战祸，以维和平。17日，冯玉祥电复天津直隶省议会，说明出兵缘由，并表示："贵会既以人民痛苦为由，当饬令本军前方暂缓攻击，藉以报命。"

△　唐之道部进占塘沽。19日，又克新河。23日，进占军粮城。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统一广东军民财政及惩办匪盗奸宄特别刑事条例》。

△　国民政府任命潘震亚、卢文澜为国民政府惩吏院委员；派朱赤霓、邓召荫、陈中孚、唐海安为国营实业管理委员会委员。

12月15日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发表公告，宣布：本党之上海执行部本年12月13日为反动之西山会议派所占据，并自称为本党中央。本党各党部已有宣言誓不承认。为此本省部特郑重公告：所有该处自称为中央之言论，本省党部均不承认。

△　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发表宣言，声明："此后凡汪精卫在广州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所发布之文字，皆不足以代表本党。"

△　驻京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晤段祺瑞，就本月10日杨村直军炮击国际列车一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请饬各方军事长官保护国际列车通行及履行任何军队不得接近天津租界附近20里之规定。段当面应允照办。

△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第二次向张、郭两军提出警告，称："离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该铁路终止点约20华里以内，不得为直接战斗动作，自不待言，且恐扰乱我附属地之治安，一概禁止军事行动，嗣后对本警告若有交涉，由贵国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

△　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中国东北，陆军省从驻朝鲜龙山二十师团及久留米之十二师团派步兵六个大队及炮兵、骑兵等部队约4000人充

实满洲独立守备队。次日，龙山日本部队出发赴奉。18日，久留米部队开拔。

△　孙传芳由杭州乘专车抵沪。越二日，偕徐树铮由沪乘轮赴南通晤张謇。

△　国民政府令：现政府厉行廉洁，整饬官常，如司法官吏有违法舞弊情事，准人民控告，严予查办。

△　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整顿军政建议书，其大要为：一、军长职衔应即撤废；二、全省军制应速确定；三、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四、军事教育应谋统一；五、兵工厂应积极整顿；六、改编军队应加限制。24日，由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通过。27日，军事委员会对于该建议书除第一项之外，余皆通过。

12月16日　段祺瑞令财政总长陈锦涛未到任以前，着张训钦暂行代理部务。

△　段祺瑞令财政部发给帑银一万元，赈济安徽旱、涝、兵灾。

△　国民政府令：省港罢工工人3456名，编作运输队随同大军出发东江服务宣劳，良堪嘉许，应由本府制定奖章，各给一枚，以示奖励。

△　张作霖发表东三省今后施政方针通电，声称承认偏靠武力之非，应视民治为重，保境安民为主，缩减军备，紧缩财政，开发地方，维持金融，防止赤化，加强文化设施。

12月17日　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被上海驻军秘密处死，上海学生总会、上海总工会等团体电孙传芳要求宣布罪状。2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工人声讨军阀孙传芳及上海总商会杀死刘华的罪行。

△ 热河都统宋哲元部奉命率部来京。越二日抵京，当即转天津前线参战。

12月18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党员大会自广州通电要求对在京开会之违法党员，予以相当之惩戒。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宣传部干事刘钟鸣、妇女部干事陈比难联名在上海《申报》上刊载启事，反对西山会议擅将“中央委员会”移设上海之非法决议，宣布不承认“一班从未在本部登记报到之人马超俊、刘芦隐等自称奉所谓中央委员会之命令接收本部党务”。并谓：“鄙人等已将一切情形报告广州中央委员会，听候解决。”

△ 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通电反对西山会议。

12月19日 绕阳河附近之郭松龄军主力通过白旗堡（今大红旗），次日向新民府奉军前哨阵地展开攻击。

△ 孙传芳委王普为安徽省长。31日，王通电就职。

△ 张宗昌委毕庶澄为胶东护军使。是日，毕在青岛宣誓就职。

△ 中华民国制糖有限公司在上海吴淞蕴藻浜泗塘河制造厂举行开幕典礼。唐绍仪、方椒伯等来宾数百人参加。该厂占地200亩，工人200余人，每日出糖300吨，经理为马玉山。

△ 日本增派满洲之部队全部到达。总司令斋藤少将是日抵奉。

12月20日 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在《民国日报》刊载启事，声明开除“共产派分子”恽代英、张廷灏、刘重民、陈比难党籍。

△ 段祺瑞特任财政总长陈锦涛兼盐务署督办。

△　湖南省财政司胡燮元与日本摄津信托公司、松记公司签订280万元（银行）借款合同，作开办湖南兴业银行资金，月息1.2%，期限25个月。

△　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北方反段运动，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日上午12时半，召集工、农、兵、学、商各界10万群众举行反段大会。大会通过五项决议案，主张联合全国民众，“打倒段政府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并建立一保障人民自由，与帝国主义奋斗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会后举行示威大巡行。

△　孙传芳在南京召开苏省善后会议，原拟讨论整理全省财政及协商年内财政过渡办法，惟因县士绅及公团反对增赋，要求军费公开，遂改开谈话会。

△　郭松龄发出通电，历数奉系摧残教育，摧残自治，害农扰民，祸省殃民，增兵害民共五大罪状；并声述事定后即着手实行省自治，保护劳工，免除苛税，淘汰匪兵，整理金融，实行强迫教育，振兴实业，整顿交通，整顿警察等10项治奉方针。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指出：“日本出兵奉天，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而是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了。”又指出：“是中国人民反奉运动胜利呢？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援奉运动胜利，这是中国全民族目前的一个生死问题。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而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的领土与民族自由。”

12月21日　　郭松龄军主力击退新民奉军，是日占领新民府。奉

军向巨流河一线退却。郭军指挥部移日旗堡。

△　段祺瑞令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钟世铭辞本兼各职，以过之翰继任。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致函驻沪领团，告以工部局议决总巡麦高云及老闸捕房主管人员捕头爱活生辞职照准。函中并附上支票7.5万元一纸，作为“五卅”案受伤者及死难者家属之抚恤费，要求转达江苏特派交涉员。

△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发行所二部职工因反对公司无故开除工人，宣布二次罢工。经淞沪戒严司令部出面调解，劳资双方达成协议，于26日复工。

12月22日　上海总商会致电段祺瑞反对日本出兵东北，要求“迅与日使交涉，并电我驻日使向日本外部迅提抗议，限令撤回，恢复原状，以保国体，而平民愤”。

△　国民政府特派何应钦为惠、潮、梅绥靖委员。

△　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擅委定陶同杰、陈白、孙镜、蒋子英、吴公干、周树棠、陈葆元、黄燕、葛建时等九人为上海特别区市党部筹备委员，筹备组织上海特别区市党部。

△　国民军四路包围天津，北路张之江部占领北仓。李景林部奉军全线瓦解，向天津市区溃退。

12月23日　郭松龄军与奉军决战于巨流河，奉军右翼张作相部占高台子，张学良部由正面猛攻，左翼吴俊陞率黑龙江骑兵迂回袭击郭松龄背后，又有日籍顾问林大儿和荒木等帮助部署军队和指挥日本炮手轰击郭军，郭军顿时失利，全线溃退，不能成军。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乔装匿逃。

△　关税会议附加税分委员会开会。蔡廷幹提出《乙种奢侈品摘要修订表》，由各国委员携回研究。

△　驻京领袖荷使欧登科为宣布英、美、日三国司法调查“沪案”报告，发表宣言。称：“该三国法官未能搜集完全与充足之证据，且不能拟有一致之决议案，各法官只得分别报告北京各外交代表而已。因无一致之报告，致各关系国未便以司法调查之结果为解决沪案之根据。”宣言末谓：对上海工部局理事会解决“五卅”沪案所采取之手续（即本月21日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致驻沪领团函），表示赞同。

△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对于广州国民政府之“训令”，以西山会议业已通过取消党籍及开除党籍诸人不得在本政府所属各机关服务之议决案，令其执行。

12月24日　　段祺瑞特派陈锦涛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27日，复又任命为全权代表。

△　段祺瑞特派李纪才前往山东查办事件。

△　段祺瑞令国立女子大学及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均着继续兴办，并着财政、教育两部迅即妥筹办法，呈候核办。

△　赵恒惕通电全国，声称国势险危，“补救之术，莫如省自制宪，历行自治，联省自治……苟能切实实行，自可成效立著”。

△　郭松龄夫妇在新民屯附近为张作霖之骑兵所俘，张作霖电令将郭解回奉天审讯，旋由杨宇霆矫命改为就地枪决，28日，郭松龄尸体解奉天示众。

△　郭松龄之幕僚殷汝耕等八人投新民屯日本领事馆分馆避难，张学良向日本领事馆要求引渡，遭拒。越二日，又提出交涉，日本总领事吉田断然拒之。

△　国民政府通令设立财政处，统一广东财政。令曰：“军事现已平靖，财政亟须统一，所有广东省内各属征收事宜，已由财政部分别派员前往接管，设立财政处，统收统支。嗣后凡政府所辖军队及一切军事机关所有应取军费均归财政部按照预算数目核发，不得再有截留，各属征收机关非有财政部特别命令亦不得擅行支拨。……各军再有擅自截留情事，即作违抗政府论。”

△　国民政府任命陈芝昌署理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　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在《民国日报》上刊载启事，声明：上海国民党第一区党部执行委员朱义权、沈雁冰、于晓光、杨贤理，第二区党部执行委员李士林、蔡鸿干、沈资田、余昌时，第六区党部执行委员何镜海、杨幼炯，第九区党部执行委员张永和、徐恒耀，第三区第四分部执行委员刘绍先，第十分部洪鼎，第二十一分部魏邦杰，第二十二分部文翮健等，“均属共产派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　国民军完全占领天津，李景林匿避英租界。其军队除被冯军缴械遣散外，大部退向直南，转赴山东与张宗昌军联合。是日，国民军布告安民，并通知各租界当局决以整严之纪律，维持全埠治安。

△　冯玉祥致电段祺瑞，告以国民军已占领天津，请速任命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

12月25日　　蒋介石发表《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指责西山会议派“自布议案，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偏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

△　段祺瑞令准免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兼署省长李景林本兼各职，特任孙岳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兼署省长；任命邓瑜帮办直隶军务。

△　南征军陈铭枢部由安铺进攻雷州（今海康），桂军俞作柏部由化州会攻，雷州守军黄大伟率队乘舰向琼州逃走。次日，陈部占雷州。

△　浙江杭州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并电段祺瑞，要求“速饬外部严重抗议，限令日本军队、兵舰克日退出中国国境”。

12月26日　　段祺瑞公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凡七条。其中规定：临时政府设国务院及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第六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为国务员（第四条）；“国务会议由国务员组织之，以国务总理为主席”（第五条）。

△　李景林乘日轮逃出天津。越二日，经烟台抵济南。

△　段祺瑞令设国务院。略谓：“嗣后凡百设施，以及改革建设诸大政，均由国务会议审量全国之趋向，博稽人民之公意，迅速筹议，共策进行。”同日，并特任许世英为国务总理。

△　徐树铮到京。越二日，向段祺瑞正式复命。

△　港侨恳亲团一行262人，于下午4时抵广州。次日，汪精卫接见恳亲团代表，解释“共产”嫌疑，略谓：“省港隔离，港多疑政府行共产，各位将政府设施详加考察，即可明了本党政府之主义。”

△　国民政府宣布阴历九月十九日为广东省光复纪念日，所属机关学校准放假一天，以表庆祝。惟应照武昌起义纪念日之例，查明是年阴历九月十九日系阳历何月何日，即定每年阳历是日举行。按：经查辛亥年之阴历九月十九日为阳历11月9日，故每年11月9日为广东省光复纪念日。

△　南京市民召开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示威运动大会，到40余团体，人数达数万名。宋镇仑主席。会后游行，游行群众手执“反对日

本强占满洲”、“打倒东方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等小旗，高呼“驱逐张作霖”、“组织国民政府”等口号。

12月27日　冯玉祥致电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熊斌表示辞职下野，略谓：“兹值竞争风尚未转变之时，我以至诚无私之心，若大权独揽，何以服人？……故先行下野，以示诚意牺牲。国事整理，千头万绪，非可计较近功。祥下野之后，当从事学问，涵养性情，将来报效国家，为日方长，不可专顾目前，以免贻误。”

△　上海市民召开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大会。到200余团体，六万余人，推费哲民为总主席，杨剑虹为总指挥。大会通过致日本国民电，致全世界人民书，致广州国民政府电，致国民军冯玉祥电。会后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张作霖、段祺瑞”、“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　段祺瑞令准免京师宪兵司令柴兰芬署职，以刘文翰继任。

△　孙岳到京。越二日，在天津通电就直隶军务督办职。

12月28日　段祺瑞任命汪守珍为国务院秘书长。

△　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发表成立宣言。该校以行政委员治校，陈望道为行政委员会主席。

12月29日　徐树铮在廊坊被枪杀。徐由京赴津，车抵廊坊站国民军一军防地，师长张之江派参谋长张钺率卫队至车站迎徐，徐甫下车，即被卫兵枪击身死。次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发出通电，供认“行凶”，“借报杀父之仇”。

△　日本派往满洲增防之部队一部分撤回原防。同日，驻屯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奉天移沈阳。

△　上海邮差拒绝投递日本驻沪使馆传单——《日本出兵满洲之

理由》。是日，邮务公会致函各报馆，揭露该传单“希图蒙蔽国人，以遂其蚕食之野心”，请勿予登载。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7.5万元作为“五卅”案死难抚恤金，纯系单方面之意见，未经我国承认，电令上海交涉员许沅予以退还，以便依正式外交方式解决。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结束办法。内长龚心湛主席，内、外、财、陆四总长到，余均次长到。许世英以私人资格列席。议决全体阁员总辞。

△　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发表声明，公然否认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案。

12月30日　　北京特别国务会议开会，财政总长陈锦涛出席报告年关政费筹措情形，说明已筹款103万，大约各机关可发月薪三四成。次日，银行通知陈氏，告以即日仅能凑付40万，余60万须以一个月后期款充数。各机关闻讯大起恐慌，各派主管会计往财部坐索。财部负责官员避不到部。

△　香港华商代表李石泉、李星衢、罗文锦、马叙朝、江贻荪、李耀堂、蔡少垣、谢树堂八人抵广州，磋商解决罢工条件。

△　日本增防满洲军队，因张、郭战事了结，已将其一部分陆续撤回原防，前移入奉天省城之辽阳师团司令部亦同时撤去。是日，驻京日使芳泽发表撤兵声明书，解释出兵理由，并声明未撤部分亦将于明年归国。

△　国民党东京支部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载启事，追随西山会议，宣布将王树声、黄光潜、宗贤俭、陈日新、李人一（国琛）、马念一、李兆龙、何恐等九名“共产分子”开除党籍。

12月31日　　段祺瑞明令改组国务院，外交总长沈瑞麟、内务总长兼署交通总长龚心湛、财政总长陈锦涛、陆军总长贾德耀、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杨庶堪、教育总长章士钊辞职，均予照准；特任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

△　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召开“反日国民大会”，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及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大学、全国妇联、北京总工会等200余团体，五万余人。由徐谦宣布开会宗旨，于右任、陈启修、雷殷等相继发表演说。议决联合全国民众，实现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会后游行示威。

△　蒋介石由汕返抵黄埔。是晚黄埔军校党员召开欢迎会，蒋发表演说，声称：左派、右派都是“我们的同志”，反对党内有左派、右派之分。

△　吴佩孚在汉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各党派领袖，息兵尊法。称：“定乱以武，安民以政，尊法虽我素志，用法听诸国人。”宣布结束“讨贼”事宜。按：此电系用以探各方之趋向，意在易讨贼标帜为尊法标帜，而取得政治上之地位。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公债司统计，截至本日，共负内外债计银元16.1525亿余元。

△　北京《政府公报》发表10月1日解决之中意金法郎案文件。

△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蒙古全体公民宣言》，揭露蒙古王公制度使蒙古公民“一无民权，二无法律，三无人格”之罪恶，要求取消王公制度，并吁请全国一致援助，使蒙民“脱出专制，恢复人权”。同日，又刊载内蒙各盟旗代表忠告北京临时政府勿再宠用蒙古王公，贻害蒙众宣言书。

是年　日商在大连创办昌光硝子株式会社，资金300万元。

△　日商满洲福纱株式会社在大连创立，资金300万元。

△　吉林省办哈尔滨电厂成立，投资250万元，发电容量5000千瓦。

△　倪克在天津创办倪克纱毛厂，资金100万元。

△　夏柏士在天津创办美古绅纱毛厂，资金40万元。

△　上海天章造纸东厂创立，资金40万元。

△　吉林中国人民毛织公司创立，资金40万元。

△　广信公司在哈尔滨创立广信昌榨油厂，投资30万元。

△　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金州支店第一厂、第二厂在辽宁金州创立，拥有纱锭1.32万个。

1926年（民国十五年）

1月

1月1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内地和海外代表共256名。汪精卫在开幕式上演说，谓本届代表的任务是要继承总理所决定之政策，接受总理遗嘱，继续总理的革命精神去努力奋斗，向着总理用40年心血和经验给我们找出的光明大路前进，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求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开幕典礼后，全体代表观看阅兵式。

△　冯玉祥通电下野。电谓："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俾人民得资休息。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

△　广州各界举行盛大活动庆祝元旦。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五军在东校场举行阅兵式，朱培德任总指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各军长蒋介石、谭延闿、李福林，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港侨恳亲团等莅临阅兵，市民30余万人到场参观。兵、工、学、农、商、政、警各界30万人联合游行，高呼"拥护总理农工政策"、"拥护总理联俄政策"、"拥护总理与共产党合作政策"、"国民革命万岁"、"工农商学兵大联合万岁"等口号。

△　国民政府宴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汪精卫致欢迎词，大会代表吴玉章致答词，鲍罗廷演说，邓演达报告游历英、德、法、苏各国经过及与胡汉民、戴季陶晤见情形。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举行成立会，到代表81人，主席恽代英报告筹备经过。大会选举恽代英、沈雁冰等九人为执行委员，通过决议案八项，主要有：要求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西山会议首领林森、邹鲁、谢持，并分别惩戒其他参与之党员，警告孙文主义学会，遵照总理政策解决党内纠纷等。

△　西山会议派中央发出第五号训令，指责江苏省党部“违律叛党”，自应全部解散，停止职权，听候派员改组。同日又发出第九号训令，指责湖南省党部为共产党把持，应停止职权，全部解散，听候改组。

△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发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略谓：大会的责任“应在如何能使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深入群众，如何使民众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一正确的观念，及指示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如何”；“应使中国国民运动与革命先进的苏俄之关系更形巩固，并规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与阶级联合的方法”；“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以严厉的处罚”；“应决定如何能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的党，使其组织能如网一样的布满全国，使有指导全国运动的能力”。《宣言》指出：“本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发展国民党与国民运动起见，是因为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政策的实行与左派势力的发展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与革命政策的实行。”宣言希望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　直鲁联军组成，总司令张宗昌，前敌司令李景林，总指挥褚玉璞，总参谋毕庶澄。

△　浙江省自治会议公布所议决之《浙江省自治法》、《浙江省自治法施行法》。

△　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

△　唐山市20余团体万余人举行市民大会，欢迎国民军，反对日本出兵南满，欢迎开滦煤矿工会代表出狱。会后游行。

△　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在上海、北京同时开幕。国语研究会联合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在广州、长沙、南京等百余城市陆续召开国语运动大会，以演讲、展览、文艺演出等推行国语，促进统一方言，普及教育。上海各报是日和3日先后出版国语特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半价发售国语图书一个月。

△　上海《时报》出版元旦增刊，刊载前一年新闻索引。是为我国报刊对时事有索引之始。

1月2日　督办湖北军务兼省长萧耀南复电吴佩孚，响应吴“息兵尊法”通电；4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亦复电响应。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令上海特派交涉员许沅，退还上海工部局所交与之五卅惨案恤金7.5万元。4日，许沅将该款退还。

1月3日　郭松龄余部刘伟之十九旅，范浦江之十二旅部，霁云之四、五旅，魏益三之炮兵三旅一部等共二万余人，共推魏益三为国民四军总司令。是日，魏在山海关通电表示继郭遗志，助冯反奉。5日，魏部与李烈钧部、唐之道部换防，由榆关开往滦县和秦皇岛。

△　苏皖公团联合会为五卅惨案事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电请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迅饬交涉员许沅严词驳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并退还7.5万元支票；认为五卅惨案之完满解决，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收回会审公廨。会议并决定发起建立“五卅”诸烈士纪念碑。

1月4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10时开会，汪精卫临时主席。林祖涵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谭平山报告代表资格审查经过，

吴玉章报告大会秘书处组织经过。通过会议规则，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巴图、经亨颐七人为主席团。下午继续开会，丁惟汾主席，汪精卫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议决：一、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二、致电苏俄表示诚意合作；三、致电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表示一致奋斗；四、致电日本反对出兵满洲；五、致电冯玉祥等劝勉其为国民利益奋斗；六、致电胡汉民勉励其为党为国宣劳。决定在广州粤秀山（即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次日，全体代表赴粤秀山行奠基礼，并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廖仲恺。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苏联政府："今日本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一致决议谨以至诚之意与贵国携手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贵国为世界革命先锋，向以扶助被压迫民族为职志，深望继续与以助力。本会更当率领全体同志努力奋勉，完成中国之国民革命，而促全世界革命之成功。谨祝中俄大连［联］合万岁！"

△　西山会议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事告同志书》，委任王太蕤等15人为委员。大会宣告西山会议闭幕。

△　西山会议派中执委和各部部长举行第五次联席会议，决定派人重组日本东京支部。

△　冯玉祥将军权交张之江，离张家口赴集宁，拟经乌兰巴托赴苏、德游历。国民军所占地域经议决划分五区：京兆附近、口北及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以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总司令，由冯电北京临时政府保荐。

△　李景林部由天津退向山东时，沿途被国民军堵截，残部由师长张宪率领入鲁北惠民，是日李景林到德州整顿残部，并派员在天津收容旧部，每人发30元川资赴德州整编。

△　日轮“乾坤丸”海员二名在汕头雇小艇回轮，不付艇资，反将船工郑阿丁打成重伤，郑阿灶打入海中，激起民愤。6日，海上驳艇对到汕头之日轮停止工作。同日，汕头交涉员马文车致书驻汕头日领事内田五郎提出条件：一、日本当局应将凶犯捉拿严惩；二、就地审惩凶犯，中国官员前往观审；三、日本政府应向国民政府及汕头市民道歉；四、赔偿损失；五、保证以后不得再有野蛮行动。7日，汕头驳艇工会通电控诉，200余船工列队到交涉署请愿。

△　东京东三省旅日同乡会、留日学生总会分别召开郭松龄夫妇追悼大会，声讨奉张。东三省旅日同乡会电请冯玉祥“迅策义师，指日北上”。

1月5日　段祺瑞前曾表示，如若国民会议到1月仍不能召开，本人即下野。是日，许世英谒段请示组阁办法，段谓本人下野绝无问题，嘱许拟电。当晚，许世英宴贾德耀等10余人，商议段下野电文。许主张应有“政权交内阁负责执行，自十六日起即不视事”之词。6日，两次在段宅商议电文，当晚许持稿请段签发，汤漪、屈映光、龚心湛、陈宦等劝阻，段犹豫未签。

△　《民国日报》载：日本政府借口“保护侨民”，在调遣军队侵入南满之同时，海军省亦纷调军舰至天津、秦皇岛一带，并派陆战队在天津登岸。总计已派入中国之军舰达27艘，海军官兵及陆战队等超过7000名。

△　北京临时政府各部机关员工因薪饷无着，纷起索薪。是日，教育部部员开索薪会，决定派员将北京图书馆《四库全书》及《唐人写经》等一律查封，作欠薪抵押。13日，内务部设立薪俸代用券维持会，按先农坛地亩售价，发券代付薪金。17日，司法界五厅一院员工向财政部索薪，要求半个月内发薪两个月，否则即罢工。

△　香港大罢工继续坚持。据统计，罢工后香港每日损失250万

元。是日，香港华商代表李石泉等返港汇报赴粤磋商经过，谓广州方面因香港代表只负经济责任，其余条件不能负责，要求港方改派全权代表赴粤再商。

△　厦门召开反对日本出兵南满市民大会，46个团体约5000人参加，冲破警方阻挠，坚持开会，10余人演说，高呼口号，会后列队游行。是日全市罢工、罢市、罢课，海面亦罢渡。

△　张作霖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并通电主张恢复约法解决国是。同日，湖南省长赵恒惕通电赞成吴佩孚“息兵尊法”主张。

△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新计划，内称本年收入可由2000万元增至7000万元。

△　西山会议派另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任林森、邹鲁、覃振三人为常委，傅汝霖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主任，张继为直隶省党部筹备主任。

1月6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汪精卫报告《两年来政治经过状况》。汪并报告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工作的情况，大会决定向鲍罗廷赠一银鼎以志感谢。下午，蒋介石报告军事状况，于树德报告北方政治状况，议决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汪精卫、邵力子、高语罕三人为起草员。

△　国民军将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刘骥以冯玉祥引退联名通电，以三事告全国同胞：一、拥护中央，此志不渝；二、服膺爱民主旨；三、力避内争，开发西北，注重民生。

△　孙传芳通电主张在沪开联省会议，解决护宪护法问题。

△　北京临时政府接新疆督办杨增新电称：唐努乌梁海擅自成立共和国，宣布法令，拟加入苏联联邦，请速向在京苏使提出抗议。

△　丹麦、挪威、德国驻京使馆分别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称，各该国已加入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

△　西山会议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启事，声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列举之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多系为本党已开除之共产分子，所有该党部一切行动概与本党无涉”。

1月7日　　许世英内阁勉强组成，是日举行首次国务会议，财政总长陈锦涛、陆军总长贾德耀、教育总长易培基、司法总长马君武、农商总长寇遐、交通总长龚心湛到会；外交总长王正廷、内务总长于右任和海军总长杜锡珪未出席。

△　许世英约汤漪等人在宅继续商议段祺瑞下野电稿，汤将“十六日起即不视事”句删去，许一怒而去，避入德国医院，至夜12时被挽回宅。是晚，汤漪等在段宅开会修改电文，删去“十六日起即不视事”一句，改为“所望各建谠言，迅定国是，即释重负，俾践前言”。段于修正之稿易数字后加批“即发”两字，临发时又追回不发。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谭平山作《党务总报告》，丁惟汾报告北方党务，刘尔崧报告《工人运动状况》。大会议决：主席团成员经亨颐未到，以宋庆龄替任；包惠僧、侯绍裘、陈其瑗、董用威（必武）、罗介夫、邓颖超、陈公博、吴玉章、张国焘、丁惟汾、黄平、郭春涛、许苏魂、黄学曾、杨匏安、路友于、熊式辉（次日又补定张伯荫）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

△　宋庆龄抵广州，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万余人在天字码头隆重欢迎。同日，宋庆龄接受《广州民国日报》记者采访，发表对于时局看法。指出：“国民政府在短短的这几个月中取得的这些成绩使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将在孙中山创立的这个党的领导下重新统一起来，并在国家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上得到迅速

的发展。”

△　孙岳在天津召集邓宝珊、史可轩、李仲三、史之照等开会，决定国民二、三军分三路联合攻鲁，邓宝珊任总司令，为北路，徐永昌为西路，田维勤、李纪才、王为蔚为南路。

△　张绍曾为国民军联合直系说项，是日电吴佩孚、孙传芳称：“昨晤焕帅（冯玉祥）谈法统，焕帅极赞同。至法统如何回复，佥以国会自由集会，依法成立政府为得策，非如此无以弭纷争而入正轨。但焕帅以尊重公议为怀，对恢复办法无成见。”

△　旅汉旧国会议员集会商讨时局，提出解决时局四项主张：一、恢复民国十三年合法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二、国会自由集会，选举继任大总统，同时摄政国务院下令改选众议员；三、新众议员召集之日，旧众议员依法解职；四、宪法应行增修之处，由宪法会议依法修正。翌日，致电吴佩孚表示拥赞尊崇宪法，并发表宣言指斥段祺瑞“凭藉暴力，诡言革命，将根本大法破坏无余”。

△　汕头日人殴伤艇工案，日领事内田五郎函复交涉署：一、本案凶犯业已拿获，将依国法严处；二、公判时贵国官民可依法观审，并不阻防；三、本领事已访贵交涉员，表述抱歉之意；四、“乾坤丸”船长承诺赔偿受伤人医药费及相当损失额，倘有郑阿灶致死之确证，应抚恤其遗族；五、饬令入口日轮船员，防止再发生此种事故。

△　日本名古屋华侨学工商联合会发起召开郭松龄追悼会，被日警强行解散，并当场逮捕工人、学生六名。经迭次交涉，11日被捕者获释。

△　武汉30余团体代表在琴园开会，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出兵满洲，要求对日经济绝交。

1月8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宋庆龄

莅会演说，希望大家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实现总理的主义。陈公博报告农民运动经过，何香凝报告廖仲恺死事经过；下午，陈公博报告青年运动经过，甘乃光报告商民运动经过，邓颖超代何香凝报告妇女运动经过，毛泽东报告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

△　孙传芳电段祺瑞，指责北京临时政府财政开支挥霍无度。略谓：年来收入共一万三千余万，用于奉张者约二三千万，用于国民军者不过数百万，其余全部，均已挥霍罄尽。“今收支相悬若是之巨，其中必有宵小舞弊之事”。要求段祺瑞“转饬所司彻底算清，明白公布于世，以释群疑”。12日，段祺瑞电复孙传芳称：“现新阁成立，庶政公开，前任帐目，钩稽更易。顷已交院严行彻查，档案俱存，职责攸在，自可与国人共见也。”

△　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邀关税会议与会各国专门委员开茶话会，表示关税用途按税率统计每年增收9000余万，以3000万还债，3000万裁厘，2000万建设，1000余万为紧要政费。各国专门委员表示已提有意见书，与中国主张相距甚远，望中国“勿持成见”，俾会务得以进行。

△　16省区驻京代表刘汝贤等谒段祺瑞，询问下野真相。10日，刘汝贤领衔通电陈述谒段颠末，略谓：“比经执政答称，‘余自入京以来，瞬经一载，事与愿违，心力交瘁。此次原拟根据迭电宣言，于本月十六日起即不视事。嗣因各方殷殷责勉，余亦因国家重器肩余一身，付托之方当听各省公决，若遽轻率脱摆，万一引起事变，咎无可辞。至政治如何解决，政权交付何人，本人并无成见，惟盼各省区军民长官速筹办法，俾卸仔肩’。”并表示诸帅“拟应速筹大计，以定国是”。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驻京日使芳泽谦吉去年12月30日《撤兵声明书》所称增防满洲军队之未撤部分将于今年归国事照会芳泽称：地方已渐平静，所有增派军队应请迅速撤回。

△　驻京日使芳泽谦吉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称："南京、长沙群众误会日本出兵满洲之用意，公然围困领事馆，威迫领事，图毁国旗，此等非常举动，本政府特提严重之抗议，望即警告该地方长官。"

△　旧国会议员叶兰彬、牟汉英、邓芷灵等由京抵津，请张绍曾组摄阁。是夜，在日租界新明大食堂秘密茶会，讨论法统问题，议定要求曹锟向国会辞职，另举正式总统。会至翌日凌晨始散。

△　北京临时政府秘书厅全体人员开索薪会，并赴吉兆胡同要求段祺瑞发给三个月欠薪。

1月9日　　段祺瑞恋栈不肯下野，是日下午6时将7日晚修改之电稿发出，略谓："际兹时变，善后维艰。前者修改现制，增置中枢，谋庶政之公开，补阙失于既往，但期利国，宁有成心。所望各建谠言，迅定国是，即释重负，俾践前言。"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鉴于居正等人用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擅行宣布解散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决定通电宣布："在大会期内，新中央执行委员会未选出以前，一切重大问题全由代表大会解决，上海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仍发出命令，当然无效。"上午，刘重民报告《上海政治及党务状况》，詹菊似报告《海外党务状况》；下午，邓青阳代表邓泽如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张晋报告东三省党务，范予遂报告《山东党务经过》。大会通过工运、农运、妇运、宣传、青运、商运六报告各审查委员会名单。

△　孙科、吴铁城由沪返穗。汪精卫、蒋介石同意孙、吴之三条要求：一、孙科垫付之西山会议各项经费，由广州国民政府拨还；二、孙科得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一席；三、取消监察院查办吴铁城案，吴仍任广州市公安局长。

△　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再改广东省政府及县市政府现行体制：省务会议为省政府最高行政会议，下设财政、民政、农工、建设、教育、交通、土地七厅；县务会议即旧制之县公署，下设公路、财政、土地、教育、民政五局，县长又曰民政局长，职权与各局长平，直接隶属于县务会议，为其主席；市政会议设工务、财政、教育三局，市政委员长直接隶属于市政会议，职权与各局长平。

△　段祺瑞特任刘汝贤署参谋总长，免去杨森署职；任命吴纫礼为海军次长，海军总长杜锡珪未到任以前，由吴纫礼暂行代理部务，免去徐振鹏海军次长职；特派冯玉祥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实业事宜，准予免去西北边防督办兼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职；特任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仍兼察哈尔都统；特任李鸣钟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李云龙督办陕西军务善后事宜；任命刘郁芬为绥远都统，井岳秀帮办陕西军务仍兼陕北镇守使。

△　段祺瑞以山东高等审判厅长张志为督办张宗昌枪毙，令派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岳维峻“就近严行查办，以肃纪纲”。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通知北京外交团，法权调查会议定于12日开会。

△　驻京各省区代表、各法团会长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先召集各省区议会及各法团之领袖开一预备会议，修改《国民代表会议条例》。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改编为教导师，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广东高要县土豪劣绅卢沂川等为破坏农民协会，集合民团500余人，于3日、4日、5日接连袭击岭村等乡农民协会和农军，恣意杀戮，焚烧民房，掠夺财物，农民死伤百余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是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要求国民政府

从严查办，严惩奸凶，维护农会，解散对农民树敌之民团，杜绝反革命根株。

1月10日　直鲁联军分十路进攻国民军：李景林自任第一路，二路李爽垲，三路马瑞云，四路张宪，张宗昌自任第五路，六路褚玉璞，七路毕庶澄，八路方振武，九路许琨，十路程国瑞。是日，李景林部在安陵、桑园间攻击五小时，占安陵。翌日拂晓，国民军增援，夺回安陵。

1月上旬　美、英、法、比、荷驻京公使先后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催还湖广、广九、陇海等线铁路借款本息。

1月11日　张作霖通电全国，声明段祺瑞既已丧失行政上之实权，今后“东三省与北京政府各部，停止行政交通关系，废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之职名，专用镇威上将军之名称”。

△　张作霖通电讨伐魏益三，出兵关内。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郭春涛、于树德报告北京党务；下午，汪精卫报告宣言大纲，冯品毅、张晋、董用威（必武）分别报告河南、东三省、湖北党务。

△　出席法权调查会议之中国代表与外国代表争持会长职甚烈，经日代表日置益调停，商定设名誉会长，由中国司法总长充任，实际会长为美代表史陶恩。

△　东京中国留日学生400余人，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开会议决陆续归国，以示抗议。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五卅惨案赔偿金7.5万元与原照会要求之100万元相差甚远，再次照会荷使欧登科促其转致各国公使依原要求解决。

1月12日　法权调查会议上午11时在北京居仁堂开幕。中、比、美、丹、法、英、意、日、荷、挪、葡、西12国代表出席，瑞典、秘鲁代表缺席。会议推王宠惠为临时主席，马君武为名誉会长，美代表史陶恩为会长，徐维震为秘书长。马君武致词，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收回领事裁判权。次日第二次会议，史陶恩主席，推法代表杜珊为副会长，讨论会议议程。15日，第三次会议，推英代表亚历山大为外国秘书长，讨论调查法典入手办法。王宠惠将已译成英、法文之中国法律提交各国代表阅看。

△　段祺瑞指令交通总长龚心湛彻查吉敦铁路合同事，略谓：前交通总长叶恭绰任内，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订立吉敦铁路合同，并未提经国务会议，应由交通部声明不能成立，并将蒙蔽擅订情形彻查呈明办理。26日，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呈复称：吉敦铁路系垫款包工性质，与借款筑路情形不同；并云合同成立时手续容或未周，但绝无蒙蔽事实。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孙科报告《总理葬事筹备经过》，吴玉章、刘伯垂、周启刚分别报告四川、汉口、古巴和墨西哥党务；下午，王健海、许苏魂、邓范生报告澳洲、缅甸、南洋荷属党务。议决：一、从速处决廖案要犯：二、纪念廖仲恺：三、设立机关保护海外华侨：四、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名额及选举方法。

1月13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袁同畴、许鸿、夏曦、宣中华、陈季博分别报告黄埔军官学校、江西、湖南、浙江、日本党务；下午，讨论通过：一、宣言：二、处分西山会议者：三、增加党务经费；四、对外政策；五、全国代表大会海外党部选举法应与国内同：六、惩办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等案。关于第二项，大会讨论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书》后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

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决定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12人由大会用书面“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若有不接受大会警告者，中央即应开除其党籍；戴季陶“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

△　在京旧国会“非贿选”议员30余人，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开会，通电主张恢复法统，继续制定宪法，否认许世英内阁。

△　国民一军在朝阳、阜新、凌源一带布防，大部集中京绥路，以防奉军向热河发展。

△　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讨论内蒙如何革新问题，并发表宣言主张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实行自治。

△　北京各大学、团体举办反日大讲演，李石曾、吴敬恒、周鲠生等六人在北大三院礼堂讲演，王世杰、陈翰笙等五人在师大风雨操场讲演，于右任、徐谦等四人在民大礼堂讲演。

1月14日　许世英主持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会后宣布新内阁组成后之四点方针：一、巩固国信，挽回国权；二、注重民生，不尚武力；三、庶政公开，无偏无党；四、洁己奉公，不图权利。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越南王达人演说越南民族被压迫状况及对国民党之希望，朝鲜吕光先演说朝鲜革命状况，印度哥巴清希望中国革命成功并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共同奋斗；刘侯武报告越南党务；陈公博报告“廖案”检察经过。大会决定加派林祖涵、王懋功、卢兴原、沈应时为“廖案”审判委员。下午，凌棠、彭泽民、郑受炳、张伯荫、关素人、林昌炽分别报告印度、南洋英属、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香港党务，通过政治报告决议。15日，大会讨论党章修改案。

△　国民政府通令各地驻军应负尊重、保护财政机关之责，不得干涉财政收入事项。

△　国民政府加派林祖涵、王懋功、卢兴原、沈应时为“廖案”审判委员，令迅速将案内人犯审讯判决，限本月内完毕；并责成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于一个月内将“廖案”主谋要犯朱卓文拿获归案讯办。

△　广东省、广州市两政府宴请国民党“二大”代表。孙科演说，希望增加团结，使本党及国民政府得发扬光大。伍朝枢演说，说明广州市推行三民主义情况：民族方面谋开设黄埔口岸，免为他方困逼；民权方面市政府委员会由人民各阶级各选三人充任；民生方面已通过都市土地登记及征税案。

△　国民军一军将领协商决定，请段祺瑞暂留，谋以段制吴。同日，国民军二军将领邓宝珊、李纪才等联名通电反对恢复法统，主张依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痛斥段祺瑞为祸国殃民的人民公敌，不应加以挽留。

△　北京各团体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反日示威运动大会，徐谦等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兵援奉，阴助李景林攻国民军，是我国民之公敌。大会通过“准备对日宣战”、“与日本断绝经济关系”、“召集国民代表会议”、“组织国民政府”等议案12条。会后徐谦等率队至警备司令部，要求鹿钟麟逮捕政府当局要员及其左右，并示威游行。是日，东三省留日学生300余人离日回国，以反对日本出兵援奉。

1月15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大会通过之宣言，阐述“世界之现状”、“中国之现状”和“本党努力之经过”，宣称：孙中山“所提出于第一次大会之宣言，对于三民主义之解释，及最小限度之政纲，实为中国之唯一生路”。“故第二次大会，对于主义固当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即对政纲，亦无所修改，惟期其得见诸施行”。宣

言表示：“吾人愿献此身以为一切民众之前驱，为一切民众而效死。”

△　晚，段祺瑞在私邸与陈宦、汤漪、龚心湛等商议下野问题，经左右怂恿，决定先不下野，维持现状，等候各省提出办法。

△　奉军与国民军在山海关附近交战。国民军增调兵力防御，第一防线设距山海关50里之高岭站，第二线设前所，第三线设边外，大本营设山海关，唐之道任前敌总司令。奉军主力由绥中西进。17日、18日两军激战，奉军攻占九门口，进逼山海关。20日晨，张学良率卫队进驻山海关城内之泰安栈。海军司令沈鸿烈率两舰载兵一旅在洋河海口登陆。穆春统率奉军大队入关，至21日晚，入关步兵达3.5万人，分驻山海关东北，后又逼近昌黎。国民军撤出山海关，退守滦县、卢龙一带。孙岳派第七混成旅赴滦县增防。21日，鹿钟麟、刘之龙等在北京商议，决派重兵增援，鹿为前敌总司令，郑金声为副，准备13个师兵力抵御奉军。

△　国民政府南征军12日克雷州后，是日，李济深部渡海攻琼州。

△　王文典代表全国商联会致函银行团，请取消安格联把持操纵管理公债基金权，由各界推人自管。

△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宣言》，略谓：日本帝国主义公然派兵入奉天，干涉中国内政，扶助最反动之军阀张作霖，枪杀郭松龄，蹂躏中国人民，同时国内新起之军阀，亦复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等处残杀我同胞。“处斯严酷情形之下，我国内同胞应即重加团结，一致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死战，达到最后之解放”。

△　日本关西自由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国印刷工联合会、芝浦劳动组合等团体发表声明书，反对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无理出兵，要求解除在中国领土的日本武装，支持中华民族自主独立，反对资本主义列

强干涉。

1月16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馀、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何香凝、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白云梯、毛泽东、许苏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韩麟符、路友于、黄实、董用威（必武）、屈武、邓颖超、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陈其瑗、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缪斌、吴铁城、詹大悲、陈肇英；中央监察委员12人：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邵力子、高语罕、柳亚子、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八人：黄绍竑、李宗仁、江浩、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选举前，韩麟符、李裕志、许卓然分别报告三特别区（绥远、察哈尔、热河）、蒙古、福建党务。大会通过工人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宣传决议案、关于党报决议案，通过《慰勉罢工工友电》和《慰勉海外华侨电》。

△　奉军调中东路护路军60人剿匪，苏方局长伊万诺夫不允免费运送，发生争执。伊万诺夫令南段长春、哈尔滨间停止通车，护路军亦制止东段车辆开驶，并拘捕哈尔滨苏方副站长。护路军司令张焕相向路局抗议。翌日，中东路全部停驶。苏联驻京大使加拉罕为此于19日、21日两次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抗议。

△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交通部提案：京奉、京绥、京汉、津浦四铁路客运票及京、津、汉、南京、苏州五市电话费酌加附捐，作为教育特别协款。会议讨论发行春节库券事，财政总长陈锦涛主张发行8000万元，利息八厘，以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之金融公债基金之一部为担保，除用以发给“九六公债”两年息金外，

其余充作政费。寇遐等反对。次日，陈锦涛递交辞呈，离京去津。

△　天津各界召开反对日本国民大会，徐谦、李石曾等演说。

△　汕头各界一万余人集会，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抗议日人凶殴艇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演说，号召一致对外打倒帝国主义。会后游行。

△　北京国立九校代表58人赴国务院索薪，要求年关发四个月。教育总长易培基允阴历12月10日发一个月，20日再发一个月。

1月17日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商讨春节库券事，王正廷报告昨晚与安格联接洽担保库券遭拒。18日、19日连续举行国务会议，许世英称已与安格联洽妥发行春节库券。19日晚，许在宅宴银行界，摊销库券。

△　江苏江阴顾山乡人周水平因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被地主劣绅控告而逮捕入狱。是日晨被枭首示众。县署宣布周之罪名为“意图扰乱治安，阴谋不轨”。

1月18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案、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商民运动决议案、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并决定由大会给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鲍罗廷发聘任书。翌日上午，大会通过《北方目下时局之宣传大纲》、财政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海外党务决议案、特别市党部变更组织法案、嘉勉国民政府电、军事工作案及纪律提案，议决：居正在湖北捣乱、怙恶不悛，石青阳勾结军阀、陷害同志，永远开除党籍；覃振、石瑛、茅祖权列名“同志俱乐部”，警告限两个月内声明脱离；邵元冲在上海主持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加以警告，并令其停止反动行为；叶楚伧除警告外并责令其交出《民国日报》；沈定一应令其停止主持反动之浙江省党部，否则除名；对上海伪中央党部所有人员桂崇基、袁世斌、刘芦隐、周佛海、马超俊、郎醒石、刘哲明、沈仪

彬、黄季陆，加以警告，限两个月内声明脱离，否则除名；参加善后会议之马君武、彭养光，擅自任职北京政府之杨庶堪，永远开除党籍；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分子限两个月内声明脱离，否则开除党籍。

△　鲁军第二十师师长方振武于肥城通电与国民军合作，是日，孙岳电方请参加北路战事，并予以国民军第五军名义。张宗昌急令娄明清率部追击，在濮阳一带激战三昼夜，娄败，方振武部北上，与国民军各军联成一气。

△　段祺瑞特任许世英暂行兼署财政总长；指令慰留财政总长陈锦涛，给假10日。

△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谓：“此间各团体已恢复国民会议促成会，望诸公北上与人民代表、国民军代表共组织中央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

△　广州各界举行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示威大会，200余团体、50余学校共20余万人参加，各团体旗帜书有“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收回旅顺大连”、“打倒日本走狗张作霖”、“取消不平等条约”、“请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等标语。大会通过致世界民众电、致日本民众电、致本国民众电。会后大游行。

△　北京国立各学校因经费无着，是日起一律停课。

1月19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下午闭幕。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主要内容分为：第一，世界之现状；第二，中国之现状；第三，本党努力之经过；第四，结论。《宣言》指出：“总理所提出于第一次大会之宣言，对于三民主义之解释，及最小限度之政纲，实为中国之唯一生路。”“故第二次大会，对于主义固当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对于政纲，亦无所修改，惟期其得见诸施行。”《宣言》重申党的纪律，谓：“凡为革命党人者，

不可不忠实诚笃，勇于改过。”“若过而不改，则不能不以铁的纪律，加诸其身，盖对于党员姑息，即对于党为不忠也。”汪精卫致闭幕词。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东沙岛归海军管辖，并通过京奉、津浦、京汉、京绥四路运送垦民减价规则。

△　卢香亭奉孙传芳令任浙军总司令，率部赴杭州就职。

△　美洲厄瓜多尔华侨急电上海国民党党部，略谓：“厄瓜多尔排华风潮剧烈，现拘华人一百三十七名监禁，并继续搜捕，驱逐出境。全体华侨停业，生命财产危在眉睫，乞速设法挽救危亡，并告中国政府及全国同胞援助。”26日，上海群社致电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请迅电驻美公使严重抗议，并要求赔偿一切损失，以维国体而慰侨胞”。

1月20日　国民政府令准蒋介石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以何应钦继任；特任程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国民会议促成会宣传标准八条，主要内容为：国民会议之目的，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建设统一的国民政府；要由人民团体自己筹备组织，不为一阶级一党派所独占包办；国民管理政权，实现民权主义；推倒为国民会议障碍的段祺瑞。

△　国民政府惩吏院成立，邓泽如、林翔、李章达、潘震亚、卢文澜五委员就职。

△　驻京日使芳泽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缔结中日关税互惠条约提出意见，要求对日本货品不受征加附加税之影响，对中国向

日输出原料亦须减税。27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复照表示同意开议。

△　吴佩孚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部署进攻国民军二军岳维峻部，即令寇英杰率贺国光、贾万兴等五个混成旅入豫。

△　李景林指挥直鲁联军在津浦线直、鲁边境德州一带向国民军发动进攻。22日晨，直鲁联军由桑园攻取安陵，进驻古城。国民军守连镇、东光，大队集中泊头。

△　孙岳电国民军一、二、三军诸将领，征询请冯玉祥出山意见，略谓："事局阽危，尚非焕帅高蹈之时，应请打消隐退之意，东山再起，卫国救民。"翌日，国民军将领由孙岳领衔电请冯玉祥再出平乱。

△　孙传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对豫省战事，因与各方均有友谊，决取中立态度。

1月21日　　段祺瑞以各军阀间战事加剧，下令"各军事长官应一律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各守疆圉，互戒侵陵。如再称兵构衅，则罪有攸归"。

△　段祺瑞致电张作霖，请蠲除积忿，各释前嫌，将西上师旅即日撤退出关。

△　许世英主持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说明发行春节库券案因各方反对，银行界与安格联以九六息金相要挟而搁浅，年关财政只得另觅他法。翌日，许世英、严璩等人宴银行界洽商发行库券办法。

△　段祺瑞特任许世英暂行兼署盐务署督办。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公推贾德耀赴包头请冯玉祥出山。25日，汪精卫、蒋介石电冯玉祥谓："时事多艰，请消退隐。"

△　国民政府为将行政、司法两权划分，各设机关以明权责，决定成立司法行政委员会，特派徐谦、伍朝枢、林翔、卢兴原为委员，以徐谦为主席，未到任前以伍朝枢代理；大理院前设之司法行政事务处着即裁撤。是日并公布《司法行政委员会组织法》。

△　广州各界举行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到10余万人，汪精卫、蒋介石演说。

△　英香港当局发表公报称，为解决省港罢工事件，愿随时续开谈判；惟就已往情形观之，目下续派代表团赴广州无济于事，故听广州政府表明诚意，再定办法。

1月22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九人为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中央党部八部长：宣传部长汪精卫，组织部长谭平山，工人部长胡汉民，农民部长林祖涵，商民部长宋子文，青年部长甘乃光，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宋庆龄。

△　中东路事态扩大，是日，奉军张焕相拘留苏方局长伊万诺夫。当日，驻京苏联大使加拉罕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抗议，要求立行释放。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翟趣林是日致牒北京临时政府，略谓："中国军事当局在事实上阻碍铁路管理当局履行职责，次第破坏中俄对中东路协定者凡五日，哈尔滨当局旋又有此种事前未闻之行为，鼓励兵士夺取车辆及破坏铁路秩序。苏联希望中国政府勿避免调查甲方或乙方破坏中东路协定之事件，采取必要办法以和平解决此问题。苏联要求在三日内完全恢复中东路秩序，履行协定，并释放伊万诺夫。如中国政府不能保证在上述日期内用和平方法解决上列各问题，则苏联政府请中国政府允许苏联自行设法保护中东路中苏两国之互相利益，并保证协定之履行。"

△　段祺瑞明令裁撤航空总司令一职，特派马福祥为航空署督

办。

△　驻京日使馆通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日本满洲派遣队业于20日全部回国。

△　国民政府南征军张发奎部占领琼山城。邓本殷部于21日撤退至海口一带，邓本人化装避入日本兵舰驶离海南岛。

△　重庆举行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大会，到70余团体万余人，通过告日本政府及国民书、电粤政府、电国民军、告国内军阀、告世界被压迫民族等文电。会后游行示威，沿街讲演并散发传单。

1月23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25日，会议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规程》，规定特派员之职权是：“一、于所指定之区域内，有指导及执行党务之权；二、有出席所指定之区域内各级会议之权；三、得召集所指定之区域内各最高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四、在指定之区域及特定任务之范围内，如各最高党部遇有临时紧急事宜，不及呈请中央时，得直接取决之，但事后应呈报中央党部得其核准。”会议并通过《各省区党务报告决议案》。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发行春节库券800万元事，因时迫年关，各方需款孔亟，故通过该库券发行条例。

△　加拉罕就中东路事件致电张作霖，要求“一、释放局长伊万诺夫及铁路职员；二、立刻制止军事当局干预铁路寻常交通状况；三、规定运兵时必须纳费，此项运费由将来中东路中国赢利项下核算”；并将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翟趣林致北京临时政府电文转达张作霖。

△　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经营国有实业；并决定全粤厘税饷捐本日起加征三成。

△　孙传芳、陈陶遗电北京临时政府，反对发行春节库券，略谓："承认九六为条件，将六千万关款完全牺牲，为少数操纵九六者发财，国人决不承认。"

1月24日　王正廷为中东路事件晤加拉罕，谓奉张与中央政府现无往来，其行动不足以代表中国朝野意思；中国政府遵守协约精神，谋最短期内有妥善解决办法。

△　张作霖派高清和与苏联驻奉总领事加拉柯维斯基于夜10时签定中东路问题先行解决办法五条，决定释放伊万诺夫及职工，恢复通车，此次风潮损失及责任问题日后再议。夜10时半，张下令释放伊万诺夫。26日，中东路恢复通车。

△　张作霖电复段祺瑞，声明奉军入关是为讨伐魏益三，现已令所部不再前进。

△　张宗昌与靳云鹗在泰安铁路宾馆签订和议协约，以尊崇吴佩孚、一致行动为宗旨，内容有两部今后分驻地区、职权分配、联防、合击国民军计划及互助办法等16条；并议定：靳、张合驻兖州，设直鲁联军驻兖办公处；靳援豫之军饷由鲁供给；即日恢复兖（州）济（宁）支路及津浦路南段交通；共同攻豫。

△　出席关税会议之英国代表向中国代表提出小债28笔，要求征收附加税时整理归还。美国代表亦开出中国欠美债务表，要求列入关税整理案。

△　日本驻京使馆致节略于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设法抑止反日游行风潮。

△　天津各团体及东三省留日学生归国讨张排日团在南开中学新操场举行国民大会，到万余人，通过议案12项，其中有：请政府免张作霖职，并下讨伐令；反对对抗国民军的一切军阀；反对吴佩孚联张

祸国；致电警告日本政府等。会后游行。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到400余团体代表千余人，议决14条，其中有：反对奉直反国民军之联合；反对护法与恢复法统；取消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取消法权调查会议及领事裁判权；恢复湖南国民会议促成会等。

△　湖北全省学生联合会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派代表包泽英赴襄樊宣传，被襄阳县知事逮捕下狱。该县学生会请求释放，又遭卫队枪击，伤数十人，被拘29人。是日，全国学生总会电鄂督萧耀南及襄阳镇守使、县知事严重质问。

1月25日　张作霖召集文武重要官吏开会，决议四项：一、东三省宣布独立，与北京临时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实行“保境安民”；二、以山海关、秦皇岛为界，布置防线，期永久维持；三、热河方面亦取守势，驻兵七八万于热边，以防国民军侵入；四、积极改编军队，编成14个师，暂时休整。

△　张作霖通令宣布与北京临时政府脱离关系，自就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并谓：“今后定当万机俟诸公论，实行我三省之自治，保全外交，使财政压全国，势威凌驾他省。”

△　法权调查会开会讨论调查方针，各国代表以秩序不宁，主张简单调查，先在北京及附近各县进行。审查法典因各国专门委员未签注，故延会。对不平等条约决定不提出修改，按华会规定范围办理。

△　段祺瑞批准上年10月19日签订之《中奥通商条约》。

△　段祺瑞任命方振武为直鲁豫边防剿匪司令。

△　国民政府汕头海关收回50里内常关税权，并实行华洋一律之营业税。驻汕领事团及税务司提出抗议，被驳复。

△　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等联名通电驳斥以“赤化”诬国民军之说，略谓：“比来敌方竟以赤化二字，诋诬本军，此乃假名挑衅，借题发挥，等诸乡曲讼棍之所为，岂是欺人！”又谓：“本军素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所揭橥之‘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字，自信尚能力行，此是与国人共鉴者。”

△　日本“东亚同志会”在东京神田会馆召开“满蒙拥护外交责问大演讲会”，主张援助张作霖，迎溥仪至满洲建立满蒙王国，以支配中国全境。

1月26日　　广州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湖南叶琪，贵州安健，云南范石生在梧州开重要军事会议，议决：一、到会各省服从国民政府指挥；二、实行党治；三、预备北伐；四、与冯玉祥、岳维峻、孙岳国民军合作。翌日，梧州各界六万余人在东学寺开欢迎会，李宗仁主席，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黄绍竑演说。

△　张作霖电山海关奉军将领，谓与国民军作战，本意在“保境安民”，现在“路潮虽暂解决，以后难免纠纷”，着所有入关部队即日撤退，守卫奉境。

△　鄂豫战争开始。吴佩孚派鄂军第一师寇英杰部由鄂北向豫南国民军二军进攻，是日自双河开往信阳，攻占信阳车站，遇国民军二军第十一师蒋世杰部伏击，又退出信阳车站，包围信阳城。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美国政府邀请德国、瑞典、秘鲁、巴西四国加入华盛顿《九国公约》，事前未征得中国同意，电令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政府声明不能承认。

△　吴佩孚电安格联称，正式政府尚未成立，所有伪政府举行内外债，全国不能承认，望拒绝以关余担保发行2000万公债。

1月27日　张学良抵榆关召开会议，穆春、万福麟、韩麟春、沈鸿烈等均到会，决定滦、热两方兼顾，不攻滦州，将部队集中到抚宁、昌黎一带。

△　北京临时政府决扩充法权调查会议范围，修改不平等条约，是日由王正廷与美代表接洽，请美代表商请各国加派全权代表。越三日，各国代表均表示反对。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向关税会议提议，海关以银两为本位，国库受损，请改以金为本位。

△　岳维峻在开封召集国民军二军将领商讨时局及对策，驻豫师长田玉洁、李虎臣，警备司令李纪才，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驻京代表李仲三等与会。李虎臣、李纪才主张抗御吴佩孚入豫。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团，催议五卅惨案事，俾及早解决该案，并分电驻外各使，饬向各驻在国政府接洽。

△　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开会追悼郭松龄，徐谦主席并演讲，说明此次追悼会之本旨在鼓吹革命，打倒帝国主义。

1月28日　北京外交团开会讨论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27日照会催议“沪案”事，决定由英、法、日、美、意五国公使各派参赞，与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代表交换关于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之意见，商定简单适用之办法，并由荷使欧登科代表外交使团通知北京临时政府查照办理。

△　贾德耀向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报告赴包头经过，谓冯玉祥表示坚决不再出山。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更动北京国立各大学校长人选：聘王宠惠为法政大学校长，李石曾为农业大学校长，孙柳溪为医科大学校长，林风眠为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徐谦为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1月29日　吴佩孚部寇英杰师第五旅围攻信阳，进入东门，遇守军国民军二军蒋世杰部阻击，寇部退出城外。

△　段祺瑞明令筹划教育特税，以充教育经费，并特派马叙伦督办教育特税事宜。督办教育特税公署于3月11日成立。3月28日，段祺瑞准马叙伦辞职，并裁彻督办教育特税事宜一职。

△　中日议定“中日关税互惠条约”缔结原则如下：一、限于特殊货物数种；二、务期从速缔结；三、双方须含互惠之性质；四、互惠条约与国定税率同时实行；五、最惠国约款不适用于互惠条约。

△　广州交涉署就省港罢工问题谈判事致函港英当局辅政司，略谓：省港罢工起于沪、粤两惨案，主要方面为港英当局与罢工工人，磋商应由双方代表互相协议。本政府非主持罢工及抵制之当事人，无庸越俎，倘有参加会议之可能，亦只居间调停而已。今港英当局只愿与本政府接洽，不愿与工人磋商，实所不解。本政府已竭力调停，以后仍本此诚意，力谋解决。

1月30日　两广宣言合作，集中革命势力，设统一委员会。汪精卫等人自梧州回广州，白崇禧随行。

△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议决：一、海军舰队司令杨树庄电请速拨舰队费，决交财政部尽先设法，并先电慰；二、以蔡元培、李石曾等16人为中华教育基金会委员；三、依民国五年制，国务院设参事厅；四、俄专学校归教育部管辖。

△　张作霖令免中东路护路军司令张焕相职，改任特区长官，遗缺由丁超继任。

△　出席关税会议之英、美、日方代表，连日向中国代表非正式质问，谓实行纸烟吸户捐，违反自动宣言裁厘和中国提出之税率表。中方代表与北京临时政府磋商结果，决定即行停办，另筹捐款抵补收

入。

1月31日　　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讨张反日国民大会，200余团体及东三省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团代表参加。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讨张反日，对日经济绝交；反对吴佩孚联张攻豫；请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讨张反日等10项。会后整队游行，散发传单五万份。

△　奉军舰在大沽海面游弋，国民军在大沽口南炮台安设重炮四尊，并装探照灯，入夜不准中外各轮进口。是日，驻津领事团以此举违背《辛丑条约》为理由，向孙岳提出抗议。

△　省立湖南大学正式成立。不设校长，由委员十人管理之；分设理、工、法、商四科。

是月　　驻沪美国总领事署发表1925年全年中国对美输出共值美金1.59502913亿元，其中以纺织品及其原料为额最巨，值美金8066.9586万元，逾总值之半。

△　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美国顾问贝克统计：1924年9月至1925年的16个月间，华北地区人民因战事所受之损失，计达7900万元；商务上之损失，则两倍于国立铁路之债款，并足以筑成拟议中之粤汉路。

△　据日本邮船公司报告，1925年因五卅惨案等关系，上海对日输出贸易影响颇巨，统计全年出口船只290次，装货28.5万吨，与1924年比，船只出口减少十分之五，出口货物减少十分之二。

△　中国科学社设置奖励基金，每年奖励科学研究有成绩与贡献者，奖励之学科，甲类包括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及其应用科学，乙类包括地学（气象、地质等）、生物学（动物、植物、生理、医学等）、人文科学（心理、人种、语言、考古、社会经济）及各类之应用科学等。

△　川省军阀私相约定，按照军额及地盘，瓜分省税。预算全年省正税及附加税两项共240万元，除四分之一拨充行政教育费外，其余概由各军阀分占。其他如鸦片税及一切杂税、军务税等亦然。

△　湖北大旱成灾，全省71县据正式呈报并经全省赈务处派员查实者有58县，饥民达3000万人。有因争食观音土致土山崩塌，死伤数十人者；有夫妻先后自尽，子女亦饿毙者；有八十老妪以败絮充饥，卒亦自缢者。

△　湖南岳阳、临湘、湘阴等地旱灾严重，岳阳灾民达四五十万。草根树皮掘食殆尽，卖妻鬻子时有所闻。灾民到长沙求食者以万计，警察驱逐回籍，遣去复来。

△　四川垫江饥民聚集劫谷。酆都、长寿、垫江、涪陵等四县饥民大会张贴文告，情词哀痛。

2月

2月1日　　国民军分三路东进攻击奉军：唐之道第九师及三军之顾占鳌旅，由昌黎正面攻北戴河；门致中第十一师由昌黎南抄奉军左翼；郑金声部由丰润西北进攻石门寨。

△　岳维峻率领国民二军全体军官通电讨伐吴佩孚。国民一军张之江等、国民三军孙岳等亦相继于6日、9日通电讨吴。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汪精卫为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为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为候补委员；会议并决定推李宗仁、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派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副党代表。

△　周恩来在汕头就东江行政委员职。东征总指挥部撤销。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电复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翟趣林，略谓：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已释，此案不难和平解决。“希望此后在事人员能持公平之态度与互助之精神，遇事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勿挟暂利一方一时之偏见，自可相安而免纠葛”。

2月2日　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联名通电称：冯玉祥“狡称下野，伏处平地泉（今集宁），密集饷械，特集师讨伐”。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嘱驻英代使朱兆莘向英国政府声明，否认“沪案”司法调查报告；并电令驻各关系国使节向各该国政府声明我国仍主照最初提案办理。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就美国邀请德国加入华会九国条约事，向美、德两国公使提出抗议。指出：九国条约所谓未签字各国，只指有不平等旧约各国而言，中德订有平等条约，显背原规，事前亦未相商。

△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负责干部联席会议，协调两组织之关系，议定办法四项：一、两会干部准互相加入；二、两会在军校及党军，须承本军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三、团长以上高级军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四、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校党代表解决。

△　上海全国学生总会、中国济难会、上海总工会、各界妇女联合会、非基督教大同盟等百余团体共同组织上海反日出兵行动委员会，并议决联合全国各地反日团体一致行动，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等。

2月3日　驻京英使麻克类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违反《辛丑条约》为理由，抗议国民军禁止外轮夜间通过大沽口。同日，北京外交团秘密会议，并约天津各国驻屯军司令与会，讨论“维持交

通办法”。

△ 冯玉祥函复鹿钟麟，表示不愿回任边防督办，并以“真爱民”、“严纪律”、“淡权利”三事相勉，谓“能行此三事，虽失败亦存在；不能行此三事，虽存在亦失败也”。

△ 直鲁联军沿津浦线继续向国民军邓宝珊、胡德辅等部进攻，是日占东光、泊头。

2月4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代表张煜全等与英、日、法、美、意五国使馆参赞开会，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及改组工部局董事会交换意见。五国参赞主张按1924年8月9日顾维钧致美使舒曼照会五项办法为根据；中国代表声明自五卅惨案发生后情形变迁，应根据1925年11月25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致荷使照会办理。

△ 英驻港总督金文泰发表演说，略谓港英当局认定广州政府为此次工潮之当事人，除广州政府外不能与别方磋商；声明原则上不承认赔偿工人在罢工期内工资及失业之损失；并谓近有人煽动再次罢工，港英当局当严厉制止。

△ 段祺瑞任命王廷璋为驻葡萄牙全权公使，罗忠诒为驻丹麦全权公使。

△ 段祺瑞令准免国立武昌大学校长石瑛本职，遗缺以张准继任。

2月5日 法权调查会议开会，继续讨论中国已颁布之各种法律，王宠惠逐点解释英、法代表所提疑问。

△ 驻守在直南之国民二、三军在李景林直鲁联军猛烈攻击下节节后撤，国民一军调第一师韩复榘部、警卫一旅刘汝明、二旅门致中等部开赴津南增援，共推鹿钟麟为总司令。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广东省各界共32团体联合发起援助省港罢工周，是日发表宣言。略谓：省港10万工人罢工回省已有8个月，坚持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严行封锁各海口，使广州商务日臻繁盛，并出力帮助肃清东江南路叛军。“援助罢工周，第一，要安慰我们的前敌战士，兴奋作战；第二，表示我们全省与全国人士的力量，已与罢工工友团结在一起，对付帝国主义”。

2月6日　段祺瑞指令兼财政总长许世英，准办春节特种库券，规定：一、定额800万元；二、利率周息八厘，八二折发行；三、前两年只付息，民国十七年（1928）起偿还本息，六年付清；四、自十七年起，以向由关余项下业经指定拨充之整理内债基金年约2400万元，除定案拨付各债本息外，所余之款为还本付息基金；五、由中国、交通两银行经理。

△　段祺瑞准免曲同丰航空署署长职。

△　围攻信阳之寇英杰部攻入信阳南门，遇守军蒋世杰部狙击，被迫退回原阵。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曾宗鉴会见驻京美使马慕瑞，希望法权调查会扩充范围，讨论不平等条约。美使表示：法权调查会乃根据华会精神办理，不能扩充。对上海会审公廨问题，美允缩小领事裁判权；工部局问题则须俟英、日两国表示后再议。

2月7日　北京外交团以北京临时政府以关余为春节特种库券之担保，事前未经同意，向外交部提出抗议。

△　魏益三率领之国民四军，由滦县移驻保定。滦县方面由国民一军唐之道师负责防御奉军。

△　西山会议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委派陈白等人筹备组织“上海特别市党部”，以对抗恽代英、沈雁冰等人领导之国民党上海

特别市党部。是日，在谢持等人主持下，在“中央党部”“复选选出”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

△　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天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致电祝贺，并表示：“望贵会记取‘二七’流血之教训，努力扩大与严密自己组织，继续先烈精神，为民族与阶级解放而奋斗。”

△　汉口、广州、北京、上海、杭州、长沙及长辛店等地民众举行“二七”纪念大会。广州纪念会有10万人参加，林祖涵主席，讲述纪念“二七”之意义；汪精卫演讲，号召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　上海商界要求以赔偿罢市20余日之损失作为五卅惨案解决条件之一，推代表赴京请愿。

2月8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代表张煜全等与驻京英、美、法、日、意五国参赞继续会议，洽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办法。司法部拟定改设特别法院之条例。

△　驻京法使玛太尔谒段祺瑞，抗议中国各地之反对基督教运动，要求以适当手段遏止。

2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孙科、宋子文、陈公博、伍朝枢为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委员；特派陈公博、甘乃光、许崇清、金曾澄、钟荣光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19日，又加派褚民谊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

2月10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800万元春节特种库券，节前先销500万，由各银行分摊凑认，扣净后政府实得330万元；其余300万元库券作为抵押用，经往返磋商，决照票面四折押借，实得120万元。

△　吴佩孚从汉口调刘玉春、宋大霈两旅开到信阳助战，是日攻入信阳城。国民二军增援之田生春、杨瑞轩两旅绕道冲进信阳城，协

同蒋世杰部抵抗，击退鄂军。吴佩孚因攻信阳半月不克，决定除由刘玉春率两旅继续围攻信阳守军外，令寇英杰部绕攻确山，以断信阳后路。

2月上旬　年关将近，各方纷纷向北京临时政府索薪索饷。国民一军索饷300万，二军索100万，三军索100万，邓宝珊索20万。1日，各机关人员在海军联欢社集会索薪。4日，法制院百余人、18机关代表120人、女校代表、临时政府人员等，纷纷到国务院向许世英索薪。许调卫队随身保护。9日，各机关官吏1000人包围国务院索薪。

2月11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裁撤，另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团务委员会，管理民团、农团一切事务，派李福林、林祖涵、古应芬、陈公博为团务委员。

2月12日　北京外交团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抗议国民军在大沽架炮。

△　中日盐案交涉，前因税率问题双方争持，延宕未决。北京临时政府盐务署长过之翰与日方代表重开谈判，议定向日本输出之工业盐每担税加为五分，输朝鲜盐税加为一角二，是日正式签字。

△　靳云鹗向孙传芳要求假道徐州，由山东向河南进攻岳维峻，孙以“五省中立”拒之，嗣经疏通，孙允靳在徐州设一司令部。

△　广州各界为援助罢工工友，组织200个宣传队，向各界宣传拥护罢工之必要，并组织募捐队，分向市内各界募捐。

2月13日　日本出席关税会议代表佐分利，回国磋商日本政府对关税会议之方案后返抵北京。其方案要旨为：一、关税会议完竣时，即行承认加税；二、加税货物分七种，由附加二五至二十五；三、日本运华之棉纱、棉布、砂糖等类重要商品，只允征二五附税；四、加

工制造之棉布可酌增若干；五、日本撤回延期支付案；六、关税增加后，中国年约增收7000万元，以4000万元还内外债，2000万元至2500万元作裁厘基金，500万元为政费；七、中国要求以增收税金修筑铁路事，日本不予承认。

2月14日　督办湖北军务兼省长、鄂军总司令萧耀南突患心脏病去世。21日，段祺瑞令给予治丧费一万元，派刘佐龙前往致祭。

△　吴佩孚以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派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继萧耀南为督理湖北军务兼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汉黄镇守使杜锡钧为湖北省长。

△　段祺瑞准免驻古巴国兼驻巴拿马国特命全权公使刁作谦本兼各职，任命廖恩焘为驻古巴国特命全权公使，施绍常为驻秘鲁国特命全权公使。

2月15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兼署财政总长许世英向段祺瑞辞本兼各职。段慰留，给假六日，并令陆军总长贾德耀暂行兼代国务总理，财政次长严璩暂行兼代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

△　湖北省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对吴佩孚擅委鄂省督办、省长事甚表不满，议决通电全国：一、将萧耀南急病逝世之事电告各方；二、请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以武汉警备总司令名义暂时维持湖北治安；三、湖北省长须由省议会选举，在选举之前由政务厅长代理；四、此后各项公文非用政务厅长代理省长之名义不生效力。

△　张宗昌就任吴佩孚所委之讨贼联军鲁军总司令，李景林就任讨贼联军直军总司令。张、李联名通电讨冯，并推吴佩孚为各省讨冯领袖。

2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训令称：国民军陷于奉直两系军阀夹击围攻之中，吴佩孚与奉通款，助奉攻豫。本党同志应造

成全国反吴空气，同时应促成国民会议。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暨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合发表宣言，对省政提出14项主张，倡议召集全省人民团体代表大会解决全省政治问题，反对吴佩孚把持政权，要求停止豫鄂战争。

△　中国共产党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在龙溪畔菜圩埔召开农民祝捷大会，到会农民数万人。彭湃致开幕词，赞扬农民勇敢战斗得到伟大胜利；指出当前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全国人民要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真正民主政权。彭湃强调农民占全国人口85%，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农民革命。

2月17日　靳云鹗军向豫东进攻，是日驻商丘之郭振才部迎靳军王为蔚部入城；翌晨，靳云鹗进驻商丘车站。19日、20日，王部与守柳河之国民二军田玉洁部激战，21日占柳河。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是日起至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国民党——其基本核心是与中国共产党员联合起来行动的——自身，乃是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等阶层底各阶级利益之共同性底基础上，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在生活中的一切军事封建制度，为争取国家底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革命联盟。""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与工人、农民及城市民主派底最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击败了受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而且实行着使广东省底全部政治生活急剧地民主化的工作）。"决议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的斗争中在军队、工农运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的任务和策略。

2月18日　关税会议过渡办法委员会开第六次会议，颜惠庆代表中国提出两议案：一、临时附加税预计增加之数，应在9000万至一亿之间，用于抵补裁厘、整理无确实担保之内外各债、建设事业经费和

紧要政费；二、征收各项附加税，自4月1日起征收二五附加税；奢侈品再加二五，不超过6月1日起征收，以便编制奢侈品表。外国代表对预计增加数、征收日期等提出异议。会议决定由英、美、日、法、荷、中六国代表组成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协商审核议案。

△　驻京英使麻克类谒见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声称广州政府煽动香港罢工，北京政府如无制止能力，英国决定自由行动，以武力干涉；并谓已预备每日以150万元充作军饷，将来由关余扣偿。

2月19日　国民政府召开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议，讨论两广军政民政财政统一事宜，并核定桂省军队改编训练之方案。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六人组成。

△　法权调查会议开会，讨论民事之各种法律及民事诉讼条例、大理院判例等，王宠惠解答各国代表所提疑问。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于是日至21日召集各直辖党部举行联席会议，议决：接受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案；为为农民运动奋斗而死的周水平举行党葬；通电反对吴佩孚，促国民政府北伐；促全省民众参加革命运动等。

2月20日　关税会议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在北京居仁堂举行第一次会议，中、英、美、日、法、荷六国代表出席，推中国代表颜惠庆为主席，讨论关于征收附加税之议案。对于预计增收税款数9000万元，其他各国代表反对中国提出之草案，认为不必载入议案。对于征收附加税之施行期，中国代表主张自5月1日起征收二五，奢侈品待列表，也应自二五税征收日起两个月内开始征收；外国代表借口货物运输费时，开始施行期应在二三个月之后。

△　直鲁联军因津浦线之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回救河南，乘隙大举北上，是日由泊头攻下沧州，又占青县。22日，李景林移驻沧州，令

所部向马厂进攻。

△　许世英于15日呈请辞职后，又于是日、23日、24日、27日四次请辞，坚请段祺瑞立予罢免其本兼各职。

△　国民政府议决拨100万元在广州建筑中山纪念堂。

△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告民众》书，谓：全国政局现在又转到一个最危急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利用奉直联合进攻国民军，进行消灭人民的势力。人民应赶速起来反攻，反对奉直联合，反对吴佩孚进攻河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混入奉军攻打国民军；要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人民掌握政权！”

2月21日　段祺瑞下令讨伐吴佩孚。略谓：“吴佩孚盘踞鄂疆，勾结土匪，侵扰陕、豫，所发伪军官委状关防迭经破获有据，是其好乱性成，不惜残民以逞，鄂、陕、豫诸省人民，何负于吴佩孚，竟倒行逆施一至于此。……着卢金山、刘佐龙等力为消弭，以安地方；并责成岳维峻、李云龙督饬部队会同进剿，勿少宽纵，以期早戢凶残，出民水火，免致勾煽无已，为害地方。”

△　段祺瑞特任卢金山督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刘佐龙为湖北省长。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案，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2月22日　靳云鹗军占商丘后继续西进，是日占考城，25日占兰封，27日，河南军务帮办、毅军统领米振标迎接靳军王维城部入开封

城。岳维峻军向郑州退却。

△　粤海关被封锁。20日，粤海关税务司英人贝尔面告海关监督傅秉常谓，省港罢工纠察队擅自扣留未经海关查验完税之货物八艇，妨碍其职务之履行，决于22日起停止海关验货，不发起卸货物之单据。傅当即表示反对，报告政府后又奉命制止。21日，贝尔函告傅称：已发通告停止起卸。傅再函制止。贝尔仍顽恃，遂封锁广州港口。

△　驻京英使麻克类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声称“广东江口罢工团体将英籍人民严刑炮烙，地方官有意怂恿”，提出抗议。

△　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大会在汕头开幕，潮、梅、海陆丰各属行政长官及人民团体代表124人出席，选何应钦、周恩来等七人组成主席团，周恩来致开幕词。次日继续开会，何应钦报告军事，周恩来报告政治，各地代表报告工、农、商、教育及妇女情况。大会通过议案93件及宣言，于3月3日闭幕。

2月23日　段祺瑞再给许世英续假10天，仍请贾德耀暂兼代国务总理。国务会议因各部总长步调不齐，至今未开。严璩坚辞代财长职。

△　段祺瑞任命曾宗鉴为驻瑞典国兼驻挪威国特命全权公使。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统计，全国有大中小学3.9872万所，学生92.1854万人。教育部通令各省区教育厅，本年内各地须广筹教育经费，全国增设中等学校400所，小学1200所。

2月24日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举行政治会议，讨论粤海关案，决定：海关检验入口各船，应负责不许货物走漏，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在此时取严格监视态度而无庸检查；如欲检查，须在海关验货之后。

△　关税会议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就中国代表团提交之征收附加税议案修正草案交换意见，日、美、荷代表在讨论中分别提出修正案。外国代表仍坚持预计增收税款9000万元之数不载入议案。

△　驻京各国公使开会，就我国时局问题商议对策：一、要求中国政府保护在华外人生命财产，如有不能保护之事件发生，彼时即采自卫手段；二、各国将其军队派往枢要地点时，应即声明系正当防卫；三、交通恢复问题，应先对中国发出警告，若仍不能恢复通行，即应采取“积极”手段。

△　直鲁联军继续沿津浦线北进，是日攻占马厂、唐官屯。

△　广州举行全省工商大会，抗议英人贝尔封锁粤海关，要求撤换贝尔，并收回海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等团体联合发表宣言，痛斥贝尔，并称：“如再利用封关以绝我人民生命，则吾辈工商各界必有最严重之方法以对付之。倘有意外发生，则负此次肇祸之责者不只贝尔一人，北京总税务司及英帝国主义者均应同负责任。”

△　上海总商会抗议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主使粤海关封锁广州港口，指出安格联“号称吾国雇用官吏，乃以此等手段施之无辜商民，无论挟何理由，终难自圆其说”。同日，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致电广州国民政府云：“务恳统率全粤民众，坚持奋斗，并积极进行收回广州海关，以彰国家威信，而戢侵略野心。”

△　国民政府公布《缉私卫商暂行条例》和《缉私卫商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特派宋子文兼缉私卫商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李济深、李福林、斯美诺夫、王懋功兼委员。

△　鄂省议员郭璜等草拟湖北省自治暂行条例，提交省议会讨论通过，其要旨为：设省自治政府，由省议会组选举会，票选临时省长

为最高行政长官，临时省长任期六个月，俟正式省长选出时解职。翌日，各法团及报界百余人集会，抨击省议会包办省长选举为非法，主张由省议会召集各法团修改省自治暂行条例，以选举临时省长权公诸各法团。

△ 张国淦、彭养光等旧议员在津谒黎元洪请黎出山，黎表示不敢再作冯妇。

2月25日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斥责军阀祸国殃民，揭露张作霖“保境安民”、吴佩孚“护宪护法”之花招，宣称“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当前急务”，领导民众及统率与民众合作之军队，实现国民革命之目的；主张以速开国民会议及预备会议“为解决时局之唯一方针”。

△ 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将前扣留之八艇千余件货物送回粤海关检验完税，然后加以检查，扣留一部分货物充公。同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布告：以后凡出入口货物，未经海关检验，无论何人不得干预。26日，粤海关启关验货。

△ 关税会议编订附加税奢侈品表专门分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各国委员推蔡廷幹为主席。会议讨论奢侈品表之编制事宜，对于载入奢侈品类目表之甲、乙、丙三类各项物品逐项交换意见。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据驻外各使报告：扩充法权调查会议议程事，列国只允依华盛顿会议精神，渐次推行撤销领事裁判权，无谈判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余地。

△ 鹿钟麟封闭《北京晚报》及《大同晚报》，并捕两报馆经理、主笔。北京报界共起声援。

2月26日 西山会议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在上海《申报》发布通告称：定于3月29日在北京西山总理灵前召开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取消本党党籍之共产党人不能与于选举之列”；并公布70名代表名单，排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广东谢英伯补廖仲恺，安徽管鹏代陈独秀，广东林云陔代谭平山，北京马叙伦代李大钊。此后，吴铁城、苏无涯、李元著、周仲良、刘崛、王度、谢晋、孙科、乌勒吉、王恒、覃超、刘通、马超俊、萧炳章、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17人先后通电、登报声明事先并未与闻，显系窃名冒签，绝对不能承认。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为西山会议派诬蔑市党部为“共产党人所组织”、省党部为“共产党分子所把持”，是日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指出西山会议派企图借此“以自掩其叛党形迹”。

△　蒋介石借口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为俄人季山嘉利用，图谋不轨”，将王撤职扣留。翌日夜，王被押送离粤赴沪。蒋介石以刘峙为第二师师长。

△　法权调查会开会，中国委员说明民法之法规、戒严法、战时捕获法、国籍法、森林矿业条例等，并答复各国委员之疑问。

△　困守信阳之国民二军蒋世杰，派参谋马骥偕信阳商会长杨光裕、红十字会长朱浩然、王楚芗等到汉口，向吴佩孚、李倬章洽商和平接收信阳，条件为蒋部两旅由吴佩孚收编，余缴械遣散。吴允给蒋等官职，惟蒋部须全部缴械，不允收编。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开会，各方面请拨基金书共105件，总数为2200余万元。经三天会议决：设置科学教席，并补助设备和其他项关于促进科学教学之费用；补助北京图书馆开办费100万元，在武昌华中大学设图书馆学教席及助学金。会议通过分配款项之补充原则六条及补助20个团体经费之数目与年限。会议决定在本会设立社会调查部，在美国设立华美协进社。

2月27日　段祺瑞面告鹿钟麟、刘骥：国务总理职已决定贾德耀

署，望鹿、刘再劝驾。鹿、刘谒贾，贾云：贺得霖允任财长后本人可视事。

△　李景林率直鲁联军沿津浦线大举北进，天津告急。国民一军决定鹿钟麟出京赴前线督师，李鸣钟到北京代鹿坐镇。

△　张作霖为策应直鲁联军夹击国民军，令前线奉军准备总攻击。驻锦州之奉军总司令部及第二十七师是日起开始进入关内，在山海关秦皇岛、石门寨之奉军第十、十七师及第十一、十二、十九混成旅络绎开往昌黎、抚宁。

△　段祺瑞特派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方本仁为湖北查办使，令方酌派军队驰往湖北。

△　北京举行国民大会，四万余人参加，高喊“打倒吴佩孚！”“拥护国民政府！”“要求北伐！”等口号。

2月28日　鹿钟麟自京抵津，即赴陈官屯晤国民一军第一师师长韩复榘，决反守为攻，在静海设总司令部，节制前敌各军。当晚，鹿下总攻击令，分三面与直鲁军作战：正面子牙河北岸，东路陈官屯，西路姚马渡。

△　段祺瑞下令制止反基督教运动，略谓：“天主、基督两教，历订条约，于传习保护，严切申明。共和成立，尤重信教自由。近闻各处颇有宣传反对宗教之印刷品及结社集会等事，若不急为禁遏，内则违戾国俗，外则摇动邦交，关碍殊巨。着责成各省军民长官力为制止，以杜淆惑而弭乱源。”

是月　上海商界有反对总税务司安格联保管关税和内债基金、另立关税公库之表示，安格联特从北京赶至上海观察形势，与金融、商界人士洽谈达旬日。上海银行界表示：原有整理公债基金仍归保管，关税公库须妥筹办法，与政府接洽。安格联表示满意，即回北京。

△　北京总邮务司发表中国各邮区内户口，共4.36094953亿人，蒙古、青海、西藏三地未计入。

△　李大钊在《政治生活》杂志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论述“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自耕农与佃农”，“耕地农有”，“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指出：“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李文认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3月

3月1日　段祺瑞召贾德耀磋商组阁事，贾请准辞代国务总理并陆军总长职。

△　靳云鹗军王维城、王为蔚、田维勤等部占开封后，继续沿陇海路西进，是日占中牟。国民二军岳维峻部西退郑州。同日，寇英杰军绕出信阳后方之部队，在明港、驻马店两战获胜后，乘势占领郾城和许昌。

△　奉军加紧部署攻击国民军，张学良移司令部于山海关，下令攻滦县。韩麟春部由抚宁攻卢龙。

△　国民军在唐官屯击退直鲁联军，李景林部退守减河南岸。两军夹减河作战。李移司令部于沧州。

△　毕庶澄率部自青岛开拔进攻大沽，所部军舰除“海琛号”外均于是日开出。

△　奉天省长王永江反对奉军入关，告假在金县“养病”，是日派

子携辞呈致张作霖。5日，王又函张谓，辞职“非惧时局之混乱，乃因金融紊乱，财政不能整理也”。“若将军翻然觉悟，则宜减少军队至足敷东三省自卫用之程度”。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上午举行成立典礼，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及各部、处主任就职。

△　厦门鼓浪屿华民公会对于前清由厦门地方官吏与驻厦领事团所订之《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认为极不平等，有丧国权，主张修改，是日组成修改鼓浪屿章程起草委员会，着手草拟修改意见。

△　北京图书馆成立。

3月2日　　靳云鹗军田维勤部自中牟西进，占领郑州，继续追击前进。靳云鹗于是日晚抵郑。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大部退往安阳、汲县、邢台一带，小部退往郑西荥阳、洛阳一带。

△　关税会议编订附加税奢侈品表专门分股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逐一讨论各国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保留之甲乙丙三项各项货品。各国代表对于中国代表将此三项编入奢侈品表，纷纷提出异议，要求规定奢侈品范围仅以少数珍品为限。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团尽早编订成修正表，分送各国代表校核，以期报告六国代表组织之分股委员会。

△　国民党中央决定取消各军政治部主任，加设一副党代表。

3月3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正式条约，侵犯中国主权，向苏联驻京大使加拉罕提出抗议；并令驻苏代办郑延禧请苏联政府从速取消。

△　全国非基督教大同盟通电各省非基督教同盟及各团体，指斥段祺瑞政府明令取缔非教运动，甘心作帝国主义之走狗，请一致声讨。

3月4日　　北京临时政府改组。段祺瑞令免国务总理许世英、外交总长王正廷、财政总长陈锦涛、陆军总长贾德耀、海军总长杜锡珪、农商总长寇遐、司法总长马君武、教育总长易培基、交通总长龚心湛职；特任贾德耀为国务总理，颜惠庆为外交总长，贺得霖为财政总长，贾德耀兼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卢信为司法总长，马君武为教育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

3月5日　　靳云鹗军克郑州后，前锋展至汜水，向巩县进攻。王维城率部西进，4日攻占黑石关后又占巩县，是日复由偃师进占洛阳。岳维峻、李虎臣率国民二军残部向陕县退走，沿途遭豫西红枪会截击，死伤积野，溃乱逃散无数，大炮300余尊、枪万余支均被夺去，轻重数列车悉被焚毁。冯子明、胡景铨、杜荫廷等将领亦被击毙。

△　阎锡山勾结直、奉，令师长商震出娘子关取石家庄，阻击国民二军由京汉路北撤。国民军反击，阎部9日起陆续撤回。

△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决由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直接统辖国民政府域内之童子军。7日，通过青年部所拟《童子军办理方案》及《组织大纲》。

△　卢金山、刘佐龙通电宣布不接受段祺瑞2月21日任命之湖北督办、省长职。7日，卢金山乘“靖江”轮返宜昌。

△　北京大中小学经费窘迫，无法开课。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对于九校只能发出行政费三成，教职员欠薪则无款发放。是日，九校教职员向贾德耀索薪。

3月6日　　鹿钟麟指挥国民一军韩复榘、刘汝明等部及国民三军从青县退回之部队展开于唐官屯、大城之线，与直鲁联军激战，突破其防线南下，是日收回马厂，进逼沧州。

△　孙传芳、杨文恺通电声明：北京临时政府任命杨文恺为农商总长，事先未征求同意，不能承认。

△　北京总商会及各商业团体通电要求关税自主，反对关款存放外国保管银行。

3月7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枯窘，贺得霖宴北京银行界人士，提出筹款三策：一、就300万抵押之春节库券，商增找押款数十万；二、将退回之德国赔款，按金马克算回增收数，再酌抵旧债；三、承认九六优先权，用腾出金融基金余额发新公债。席间，贺请银行界即日垫款三四十万应急，以中法储蓄会300万库券余款作抵。翌日，银行公会讨论决定酌予援助，每行分任二三万不等，计20万左右。

△　奉方代表郭瀛洲在北京会见国民军李鸣钟等人，提出议和条件：一、停战；二、热河让与奉方；三、直、鲁两省归奉。国民军方面表示，愿与奉停战，但不能停止讨吴；允让热河，但须以奉军退出山海关外为条件；直、鲁问题再议。

△　靳云鹗军王为蔚部自郑州渡河北进，追击国民二军，5日晚进占新乡，6日过汲县，是日晨占安阳。

△　冯玉祥派马伯援、蔡增基由集宁赴粤，向国民党方面解释冯下野意图及国民军形势和策略。

△　段祺瑞指令改派王景岐为参加国际联合会特别大会代表。

△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将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改为中俄大学，以徐谦为校长；其反对徐谦之部分学生，由外交部另设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学。

△　汕头各界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大会，到数万人，议决电促全国民众速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并表示热烈拥护国民政府。

3月8日　　毕庶澄所率舰队及奉军海军向大沽开炮轰击，守备大沽之国民军还炮抵御。由军舰载来之毕庶澄部海陆军6000人，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谋袭军粮城。经国民军门致中、庞炳勋等部截击，及驻芦台之唐之道部夹击，俘获2900余人，余众登舰逃走；毕舰队11艘也被击退。

△　关税会议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逐条讨论修改中国代表团提出之关于征收附加税之议案草案。对于征收临时附加税之施行日期，中国代表要求自6月1日起，英、美、法国代表均持异议，欧登科主张自6月15日起，亦未有结果，决定下次续议；对于附加税增收之关税保管存放问题，外国代表力主应分存于外国开设在中国之保管银行。

△　唐生智为取代赵恒惕治湘，调所部第十五团自宜章、郴县至衡山，向长沙逼进，并自衡阳急电赵恒惕，谓略："现因郴、宜米贵，给养困难已极，特调第十五团驻衡山，以便就食，且资整理。敬恳钧座移节衡山，检阅该团，并面授生智以整军防边机宜。"翌日，唐又电赵恒惕责问省政府三事："一、小人在位，若不立予斥退，后患何堪设想！二、熊克武残部窜湘，概予收编，不知是何用意？三、统一军政，整理财政，诚为治湘要著，但皆粉饰太平，各有用意。"要赵立即答复。

△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开学式，学生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及各军军官学校合并，总计2650余人；除步兵两团外，有政治、经理、炮、工等科。蒋介石在开学式讲演，谓三民主义是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与共产主义实现的方法不同，不过革命的精神完全一致。

△　颜惠庆函段祺瑞辞外交总长职，略谓：战事相循，影响邦交，外交一职，无论何人，折冲无术；况关税会议正与各国商定税率及整理外债，争议多端，不易就绪，幸身非外长，尚有回旋余地，如或兼充，恐多阻难，请准辞职。

△　马君武因北京九校无款开学，教育经费无着，表示不愿就教育总长职。

△　湘省女界联合会、青年妇女学艺社等团体发动10余女校学生1000余人游行示威，要求男女教育平等：一、设省立女子中学及职业学校；二、湖南大学招女生；三、设农工妇女义务学校等。

3月9日　　国民军为防奉鲁军舰驶入，敷设水雷10枚封锁大沽港口。同日，天津领事团向鹿钟麟抗议，并劝张作霖撤退舰队。

△　国民一军韩复榘等部自马厂南下进击沧州，驻保定之石友三部星夜东发，骑兵三旅王镇淮部绕河间袭击沧州后路，直鲁联军在兴济设防抵抗。是日，国民军夺回泊头，并进攻东光。

△　鹿钟麟前往津南指挥军事，段祺瑞令准京畿警卫总司令暨京师警察总监各职务由李鸣钟暂为照料。

△　段祺瑞特任财政总长贺得霖兼署盐务署督办；特派贺得霖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海军总长杜锡珪未到任以前，仍着吴纫礼暂行代理部务。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苏、德新约规定德侨在蒙古得享最惠国待遇，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令驻苏、德两国公使向两国政府提出抗议。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络长沙各民众团体在教育会坪召开市民大会，到三万余人，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提出之“对付此后湘局主张二十四条”，主要有：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取消省议会，反对联省自治，请国民政府北伐，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等。并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选举工、商、教育各界王基永等九人为委员，组织全省人民起来驱赵。街头贴满“打倒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等标语。翌日，赵恒惕及戒严司令部布告，严拿“当众倡言推翻省宪及散

贴传单之人”，倘敢抵抗，“准军警当场格杀勿论”。

3月10日　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驻京外交代表，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最急切之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拆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否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讨论权”。驻天津、奉天、济南领事团同时将此照会分致国民军及奉、鲁军总部。

△　苏联驻京大使加拉罕发表谈话，指责外交团抗议中国封锁大沽口为干涉中国内政，谓中国之海口港湾中国有权处理；至于《辛丑条约》，法权会议应从速修改。

△　国民军石敬亭等致电阎锡山等，劝其仍抱保境安民之旨，勿入直奉联盟。

3月11日　驻津英、日总领事就国民军封锁大沽海口事向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交涉，经协商，鹿钟麟允对外国轮船按下述办法进出大沽海口：必须悬挂本国国旗和特种旗号，须有引水船为之前驱，外轮中之华人必须接受当地驻军的检查。鹿钟麟电请北京国务院向北京外交团切实交涉，要求使团确实担保两条件：一、外轮入口不得再为敌军运送兵械；二、外轮入口不得使敌船尾随混入。是日，日轮“河南”、“天潮”两艘按协定入港，法轮一艘、日轮四艘、开滦公司轮一艘相继出港。

△　日本第一遣外舰队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四艘，上午9时由旅顺出发，下午4时半抵塘沽。驻津日本总领事馆派员至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称，日驱逐舰一艘定12日上午10时入口，请予免验放行。当即约定入港时刻、旗号、停泊地点、进港后须缓行等。

△　北京隆重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是日在天坛、先农坛举行

纪念演讲，听众10余万。晚上提灯游行。翌日，在天安门举行铜像奠基礼；在中央公园开纪念大会，10余万人参加，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15日，举行纪念碑奠基礼。连日来参加纪念活动者合计约百万人。

△　中苏债务会议之赔偿委员会开会，讨论我国商民货物损失案，我方代表提出共损失34亿卢布，要求按《中俄协定》及苏方历次宣言照案赔偿。苏方代表谓卢布失效是出于不可抵抗之原因，不能负责赔偿。

△　北京临时政府鉴于各机关冗员日增，政费愈形竭蹶，决定整理各机关人员，凡违背《文官保障法》者，一律裁汰。并宣称：民国十五年前之欠薪另定办法，今年1月份起按月筹款发给。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呈报五卅惨案损失，总计银367.01459万两，国币775.483115万元。

△　鄂省官票暴跌，市价仅值500，市面一律拒收。吴佩孚是日下令照旧收用，倘敢故违，即按军法从事。16日实行官票兑现，但有限制，市价更跌。为维持官票，25日官钱局将所有房地契据交银钱两公会保管，并组织维持会将房地契发售，收回官票焚毁。

3月12日　　大沽口事件。下午3时，日驱逐舰两艘不按协定驶入大沽港口，奉舰四艘尾随冲入。大沽炮台国民军守兵以时间、舰数皆与原约定不符，入口时又不暂停，即以旗语阻止。日舰不理，反以机关枪射击，国民军用步枪还击，日舰被迫退往塘沽。双方互击中，国民军死排长一人、司务长一人、士兵二人，伤士兵八人；日方称伤官兵三人。是为大沽口事件。

△　国民军就日本兵舰两艘强行驶入大沽口发生枪击事件，向驻津日总领事有田严重抗议，指出日方不遵照双方协定办法强行入口，

且以机关枪射击，所有损失俟查明后日方应负完全责任。当晚，日领亦至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抗议，狡称国民军向其兵舰开炮，彼始还击，且有人受伤。国民军方面称并未先行开炮，且已查明国民军被日机枪射击受伤者有14名之多。日领云：从前种种暂不问，应就目前现状妥筹完善办法，以免再生误会。国民军允派军官一名并译员一人，偕同日领明日驰往大沽口，就地商筹将来船只通行办法。谈判至深夜2时始散。13日凌晨，鹿钟麟将以上经过电告北京国务院。

△　鹿钟麟电北京国务院，表示将开放大沽港口，“惟须外交团方面确实担保两条件：一、外轮入口不得再为敌军运兵运械；二、外轮入口不得使敌舰尾随混入。”并恳速向外交团交涉。

△　关税会议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开第四次会议，继续讨论征收附加税之议案。英、法等国代表竭力主张“自本议案签字日后三个月起”即约7月1日起施行，与中国代表主张明文“自6月1日起”相去更远，争执无结果。对于税款保管问题，中国提案为“由海关暂行保管，不受一切干涉”，外国代表则坚持应“存放各保管银行”。日本代表日置益又提出“但书”，谓：如果“支配各该附加税项下增加税款之用途与条件犹未能在本会议议决，则各该项附加税之征收，惟自通过用途与条件之议案后15日起方能实行”。中国代表指责此项提案将会使征收附加税延搁不办，而使关会会务前功尽弃。英、美、法代表则支持日案。

△　围攻信阳之鄂军刘玉春、宋大霈部从汉阳运来重炮六尊准备轰城，是日午函蒋世杰、杨瑞轩、田生春限时缴械投降。次日，信阳城内之外籍教士及商会会长等出面调停。

△　湖南省长赵恒惕发表去职通电，略谓：“根据省宪，原拟至第二届选举时即行辞职，恐不见谅，提前辞职。”“根据省宪，委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以内务司长代理省长职务。”当晚，赵即乘轮取道岳阳去汉口。

△　南京隆重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上午，2000余团体20余万人冒雨举行纪念大会。下午，举行中山陵墓奠基礼，宋庆龄、孙科及广州国民政府代表邓泽如等参加。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指出：当年反动的军阀及反动的知识阶级掀起的反赤运动，“实际上乃是用反赤的旗帜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对抗，为帝国主义者来破坏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国民党的右派与左派分裂，以反动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苏俄所造的谣言与非难为据，要对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政策加以怀疑与修正，也参加这种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文中劝告国民党右派“应该完全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而不加以怀疑与修正”，“应该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眼前民族革命之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打倒反赤运动”。

3月13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接鹿钟麟电告日舰炮击大沽口炮台事，即派员向驻京日使芳泽提出口头抗议。日使反称中国军队突然开炮，致伤日舰官兵四人。日使随即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严命前方官宪，为严防此种不祥事件之再发，即时讲求的确最有效之手段”。

△　段祺瑞特派内务总长屈映光兼赈务督办。

△　阎锡山电国民军孙岳，表示决不与吴佩孚合作。

3月14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据鹿钟麟之报告，照会驻京日使芳泽13日抗议，声明日舰进入大沽口，不遵守事先约定之办法，责不在我。日使17日复照诿称鹿之报告“殊与事实不符”，否认事前有何约定。

△　国民军宣布大沽口事件真相，略谓：一、事前商定，“滕字十五号”兵舰一艘，按照商明办法进口，乃该日舰驶进之际又有一艘随

行，海防官兵见与所报舰数不符，恐系敌舰诈冒进袭，不得不令其停止；二、商定进口时间为上午10时，而该舰迟至下午3时始行进口，致海防官兵无从辨明是否即系日舰；三、日舰未遵照前约驶往应停地点停泊接受检查，强行闯入海口，国民军为防止敌舰之袭击，自不得不设法制止；四、国民军设法令其停止，但并未实弹放枪，而日舰即用机关枪射击，致我官兵猝不及防，受伤者有十数人之多。

△　困守信阳48天之国民二军蒋世杰，下令停止抵抗，向鄂军投降。守军9000人被遣散，缴出步枪7000余支、大炮22尊、机关枪500余挺。次日，蒋世杰、田生春、杨瑞轩随宋大霈到汉口见吴佩孚，吴聘蒋为总部参赞，委田、杨为参议。信阳遭此次战祸，城内大半房屋毁于炮火，市民被打死万余，饿死千余，妇女被轮奸毙命者600余，全城逃出者仅数千人。

△　鹿钟麟电冯玉祥反对与奉议和。略谓："一、让热可，让直不可。我两次大牺牲为直，让直何以对人民及阵亡将士？二、退兵之法由奉先实践。且其狡诈，更番欺我，我当固守原防。三、奉天中坚郭松龄败亡，张宗昌、李景林近又覆败，奈何以数十万敢死之士割地乞和？"

△　《民国日报》载，张宗昌在山东以种种苛捐杂税，大刮民财。为期不及一载，只丁漕一项即征收三次，数达3600万元之巨；胶济货捐旧日岁收50万元，今加三倍至150万元；各种杂税岁收40万元，均令加倍征收；并派捐各县，如营房捐、靴鞋捐、军事抚恤券、房捐、百货捐、鸡狗捐、锅饭捐、富户捐等，以及县知事保证金，名目繁多。同时发纸币3000余万元充斥市面；发军用票800余万元，例不兑现。至于散驻各县之10余万军队，一切给养均令就地征收，更使民不聊生。

3月15日　英、日、美、法、意等国驻天津之海军司令官，在英舰"福克斯号"开会，讨论大沽口事件之处置及此后大沽航行安全办

法，决定向国、奉双方提出警告，限于24小时内，国民军撤除大沽炮台之防备，奉军将军舰撤出大沽海面，并议定各国军舰分担区域，在16日晨9时前完成防范之部署。以上议定即请北京外交团批准。

△　北京外交团上午开会，次日上午续议，决定批准驻天津各国海军司令官之议案，根据《辛丑条约》抗议封锁大沽海口，由《辛丑条约》关系国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国公使联名向中国方面发最后通牒。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决定：一、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导监督。

△　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唐绍仪、张謇受段祺瑞命，发起全国和平会议，联名通电请前敌各军退驻原防，择定地点，派代表开停战分权会议。同日，王士珍等联名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等，提出和平办法五条：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仅设民政长官，所有驻军均须退出，地方治安由中央会同各省区改编武装警察维持；二、国民军悉数退回西北，专力开发西北；三、奉军悉数退回东三省原防；四、岳维峻部退入陕境，李景林部退入山东；五、豫、鲁及其他各省暂维现状。至于政治问题，共同和平商决。18日，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惟德、王芝祥、熊希龄等再次通电建议各军先行停战，召开和平会议，解决上述问题。

△　吴佩孚任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豫省长，所有在豫境鄂军悉听指挥。吴、靳商定出动十师向华北用兵。

△　天津各界四万余人开紧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事件，议决：一、请政府严重抗议；二、请外交部严重交涉，天津市民愿作后盾；三、通电全国一致兴起，督促当局严重交涉；四、抵制日货英货。北京、上海、南京、张家口、绥远等地各群众团体连日纷纷

集会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要求当局向日政府严重交涉。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代表朱兆莘力争国联理事席位，并令朱向国联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

3月16日 下午4时，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英、美、法、日、意、荷、比、西八国公使，为大沽口事件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最后通牒。略谓：鉴于3月10日通告之“要求并未获任何效果，遂认必要再由在津握有海军力之代表各国公使及海军指挥官以本日（3月16日星期二下午4时）对指挥大沽炮台之军事官宪暨指挥青岛舰队之海军将校”发出通告，要求：“（甲）由大沽砂洲至天津之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乙）应除却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碍物；（丙）恢复所有航行标识，且须保护将来不再发生任何妨碍行为；（丁）一切兵船须停泊于大沽砂洲之外，且须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戊）除海关官吏外，应停对于外国船舶之一切检查。对上述各项，若于三月十八日（星期四）正午止不得满足的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驻天津法、意海军司令官和英国“嘉来尔号”舰长将此项通牒同时送交驻大沽炮台之国民军和大沽海面之奉军青岛舰队司令。

△ 日本外务省训令驻京公使芳泽谦吉，就大沽口事件致最后通牒于中国政府：“一、严重处罚加害者；二、中国政府之责任者须向日本政府谢罪；三、对日本帝国军人之负伤者，须与五万元之损害赔偿；四、须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以上四项要求如不容纳，日本帝国不得不采实力之自卫手段。”

△ 各国就大沽口事件增兵调舰，实行武力威胁。大沽口内有各国军舰12艘，日本又增“利根”、“平户”两艘，美国增“马艾辛三号”驱逐舰；法、意亦各增一艘，由秦皇岛开大沽。

△　直鲁联军分三路北上进攻国民一军，李景林任东路，张宗昌任中路，褚玉璞任西路。20日夜进逼马厂，翌晨5时攻占。

△　张作霖向北京方面之国民军提出奉军停止进攻的先决条件：一、惩办赤化首领；二、交还直、热，仍由镇威军主持；三、京兆地区双方不驻兵；四、双方不干预中央政务。

△　唐生智抵长沙，声明以湘南督办兼第四师师长名义维持秩序。

△　国民政府据周恩来呈称，第一军副党代表事繁责重，请辞所兼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一职，是日令准免去兼职，由徐桴继任。

△　国民政府令准甘乃光辞广东南路各属行政委员职，南路各属行政事宜仍由广东省民政厅办理。

3月17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16日八国最后通牒答复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谓尊重《辛丑条约》，“正在竭力设法消弭此项障碍，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指出八国通牒“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该通牒所开条款，除饬由地方军事长官妥酌办理外，相应函请贵公使查照转达有海军在天津之各国公使，迅即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勿取激切之措置”。

△　国民军被迫承认八国公使最后通牒之五项要求，鹿钟麟令大沽驻军张团长于下午4时正式答复英舰长：一、国民军遵守最终议定书；二、大沽炮台之设防，纯属对渤海舰队之攻击而出于不得已；三、如列国对渤海舰队为中立之保证，则国民军方面欣然撤去有妨碍船舶航行之一切设施；四、临检船舶另设办法。同日晚，毕庶澄将复照送英舰，完全接受八国公使所要求之五项条件。驻津领事团向鹿钟麟声称，奉、鲁军舰已表示不再进攻大沽，请国民军开放海口。鹿允照办。

△　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代表100多人赴铁狮子胡同向北京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驳复八国最后通牒。各团体代表在接待室被执政府卫队蛮横驱出，并遭枪柄枪刺殴击，重伤六人，轻伤多人。

△　驻湘鄂军夏斗寅旅，由平江入赣，绕道修水抵铜鼓。22日，赣西之前粤军谢文炳部4000余人经湘东开抵鄂南通山边境。赣、鄂形势渐呈紧张。吴佩孚命军舰11艘上驶增防，调第二十五师余荫森旅回防鄂东，陈德霖旅回防鄂南。

△　寇英杰、靳云鹗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一、出兵北取保定；二、派兵疏清巩、洛；三、豫省军民两政遵吴佩孚意旨解决。

3月18日　　三一八惨案。是日上午10时，北京各界群众2000余人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徐谦主席，顾孟馀演说，通过决议六项：一、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二、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一致反对八国政府进攻中国；三、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四、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八国公使出境；五、宣布《辛丑条约》无效；六、驳复八国通牒最后的要求。大会并通过一议决案，要求：一、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二、立即撤退驻在京、津及各地之外国兵舰；三、惩办大沽战事祸首；四、抚恤大沽国民军死亡将士及家属；五、为死亡将士立纪念碑；六、在被害将士出殡日，八国驻京各机关均下半旗志哀；由各国政府向中国道歉；七、严惩执政府卫队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八、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会后群众整队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八国通牒”、“巩固大沽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驱逐八国兵舰出境”、“废除辛丑条约”、“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下午1时许，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并推派代表要求面见国务总理。执政府卫队紧闭栅门拒绝代表入内。群众不散，愤怒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执政府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死47人，伤132人。是为三一八惨案。

△　下午5时，段祺瑞和贾德耀等人在吉兆胡同段宅开会商议三一八惨案处理办法。次日正式发表，略谓：“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加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

△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禁止西山会议派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谓：“凡有敢在上海、北京等处假冒本党最高机关名义以遂其叛党营私目的者，不问首从，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论罪”；“凡列名伪会者，务于3月29日以前声明背签，否则届时定按名通缉”。国民政府并电北京孙灵卫士黄惠龙等，谓少数叛徒又欲在灵前开会，仰卫士制止，“否则与贼同科”。

△　关税会议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开第五次会议，讨论征收附加税议案关于所获税款之用途与条件问题。中国代表团提出《对于日本代表团提出但书之修正案》，提议“如本会议对于支配各该附加税所获之新税款犹未能议决办法，则此项税款中三分之一应作裁厘之用，又三分之一作整理内外无确实担保债务之用，其余三分之一作紧要政费之用”。日、英、美、法代表坚持“但书”，争执不下，决定将两案同时报告第二委员会。中国代表对议案不载入增加税款数9000万元及三个月后开始征收两点亦表示保留。

△　靳云鹗指挥“讨贼联军”三个师11个旅约12万人“北伐”，自河南分三路北上。是日，田维勤率自部及马吉第部先抵石家庄，与抵石之晋军联络。21日，靳云鹗由郑州赴石家庄。

3月19日　国民军下令前线总退却。在津浦路、京奉路前线之国民军诸部开始向北京方向撤退。翌日，驻天津之国民军各部陆续撤回

到京郊及通县、固安等地。

△　京畿警备司令部发布布告，禁止群众集会游行。略谓："青年人血气方刚，酿成惨剧。值此军事未定，人心惶乱，群众动作，恐引起各方误会，特郑重布告，毋得再行集会，致生事端。"

△　国民政府令知军政各机关"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议决事项"：广西省政府于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之指导监督。

△　国民政府公布《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军法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

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黎明，蒋借口"中山"舰擅入黄埔系有异动，宣布广州戒严，并令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派人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继又于上午10时扣留各舰舰长及党代表，间有加锁铐者。蒋同时密令刘峙部600余人由黄埔乘舰抵东堤于拂晓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纠察队枪械，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处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扣留广九、广三、粤汉三路车辆。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质问蒋时被软禁一天。

△　国民军将领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通电，表示愿遵王士珍等人15日电，将所部队伍完全撤回原防地点。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众的又一次反攻，是他们"借大沽事件以最后通牒威吓中国，且指示段祺瑞屠杀反对此项最后通牒的学生与市民"；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肃清一切卖国军

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

△　北京临时政府贾德耀内阁以各方电诘三一八惨案，决议全体引咎总辞职。24日，段祺瑞令贾德耀等妥筹善后，不允辞职。

△　北京各学校、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商讨三一八惨案善后事宜，议定：一、觅定公共地点，停放遗柩；二、定期集合各团体抬出各柩在北京全市游行；三、定期在天安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21日、22日复有各团体代表在北大开会，提出种种善后办法。

△　奉军占领滦县，张学良入滦县城，派部追击退往唐山方面之国民军。

△　冯玉祥离平地泉，取道外蒙古赴苏。22日抵库伦，与徐谦、顾孟馀及鲍罗廷会晤。

3月21日　国民军将领孙岳、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骥致电张绍曾赞同退兵言和。略谓：“若各方承认聘老（即王士珍）画直、热为缓冲之议，敝军当再将全部退往西北，以副弭兵之雅意。现政府既为国人所厌弃，敝军自今日始专任维持地方治安之责。至政府如何组织，法统如何接续，完全听之法律解决。”同日，孙岳并声明因八国通牒加辱，政府惨杀学生，决自卸直隶军务督办及兼职，借促政府觉悟。

△　张之江电吴佩孚，谓国民军愿撤回西北，请派使议和。23日、29日又电吴请和。

△　吴佩孚因湖北民众反对湖北省长杜锡钧甚烈，被迫令杜辞兼职，由陈嘉谟暂兼。

△　吴佩孚利用红枪会截击岳维峻西退残部后，下令红枪会将所得陕军枪械呈缴领价，一律归农，嗣后永远不得沿用红枪会之称号。

3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举行临时特别会议，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等出席，讨论中山舰事件处置办法，决议：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精卫翌日借口就医迁居隐匿不出。

△　国民政府就中山舰事件发布布告，称中山舰事件系“海军代理局长欧阳格无故离舰，舰队骤无统率，致中山舰发生不守纪律举动。政府为防患未然起见，特先将各嫌疑人拿办。现已处置妥当，一切如常”。

△　鹿钟麟、刘骥撤去京奉、津浦两线战备，放弃天津，退守京畿，总指挥部、参谋处及驻津各机关皆移北京。韩复榘部退高碑店，郑金声部退密云、怀柔、顺义，唐之道部回通县。

△　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刘郁芬等联衔发出退兵通电，略谓：“今承聘老诸调人示以周行，自当遵将所部队伍，完全撤回原防，专力开发西北，不与内争。”孙岳亦通电谓：“奉咸电（按：指王士珍等15日电）后，敝处已饬前方各部向后撤退。但希彼方同遵公意，勿因媾和致出意外。”

△　下午，王士珍等会议，决定：一、将张之江等退兵通电转电吴佩孚、张作霖等，请各军速撤回原防，务勿追击，静待和平解决；二、通知鹿钟麟、李鸣钟，请切实维持京师治安。

△　王士珍等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略谓：国民一军赞成和议，决定撤回原防开发西北，于19日起实行撤退，和平前途已有端倪。望容纳前电，饬前敌各军停止前进，择定地点，派遣代表商榷善后事宜，静洗甲兵，重修礼让。同日，王士珍等并电孙传芳、阎锡山，请劝告吴、张停止军事，促成和平会议，以安大局。

△　国民一军将领鹿钟麟、李鸣钟等举行会议，决以12万兵力固守北京，部署第十师驻杨村为第一防线，廊房为第二防线；第九师留通县，三师驻通县北面山地；第一师留南苑，十一师驻北京城内；第五、六师及四、五、七混成旅集中于南口。

△　张作霖致电张之江，略谓："直、热皆我军辖境，我兄既欲重修旧好，自应以恢复旧有状况为前提。""谋和宜恢复未战以前之感情，不宜据失和以后之权利。……如以恢复我军辖境即指为威力迫胁，未免不恕矣。和战两途皆惟我兄自决之。"

△　北京外交团在东交民巷六处出入口设置机关枪，并派步哨，由法、日、意、英、美分别警卫东交民巷四周地域。

3月23日　李景林部截击国民军后撤部队，占领天津。毕庶澄部占大沽。翌日下午，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同抵津。

△　国民军被迫缩短防线：东路由京奉线撤至顺义，南路由津浦线及天津撤至杨村，西路由京汉线撤至高碑店，热河方面退至承德。

△　张绍曾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呼吁息争，略谓："国民军各将领现已退兵言和；且关于政治法统问题，更能尊从法律解决。如必再以兵戈相见，似背祥和之理。""敢乞垂念军民痛苦，谋大局正当之解决。"

△　蒋介石具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诡称"中山"舰18日驶抵黄埔，停泊军校前露械升火亘一昼夜，19日晚又开回广州"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有变乱政局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此次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

△　国民政府公布《统一军民财政及惩办盗匪奸宄特别刑事补充

条例》，规定凡未经政府命令允准而组织或扩充军队者，对政府有公然诬蔑之行为者，均处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或五万元以下500元以上罚金。27日又公布《修正统一军民财政及惩办盗匪奸宄特别刑事条例》，凡24条，对各种罪犯均有判刑处罚之规定。

△　北京各学校、团体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各界赠送挽联、花圈，隆重吊祭。有死难学生的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各校，连日分别举行追悼大会。

△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就三一八惨案通告各地学生联合会：一、各地同学即日组织演讲队，出发向民众讲演此次惨案真相及其关系之重大；二、联合各界一致发表宣言或通电，宣布帝国主义之阴谋，段祺瑞媚外残民之罪恶及其借口“赤化”，嫁罪少数民众领袖，离间民众运动之阴谋；三、联合各界即日组织“京案”后援会；四、联络各界举行大规模之示威运动或追悼大会。

3月24日　在国民政府工作之苏联顾问季山嘉、苏共使团团长伊万诺夫斯基等10余人，乘“列宁号”轮船离穗返国。行前，谭延闿、林祖涵、何香凝等在国民政府设宴欢送。

△　吴佩孚、孙传芳会委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方本仁被迫下野。

△　上海各校学生为声援三一八惨案，纷纷上街讲演，散发传单，并一律罢课下半旗，以志哀悼。25日，工商学各界164团体组织“上海各界京案后援会”。27日，举行上海市民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到三万余人，会后游行。

3月25日　段祺瑞令准免颜惠庆外交总长职，特任胡惟德为外交总长；特派屈映光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29日，特派胡惟德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

△　段祺瑞召王士珍等商议和平运动，决定先电天津询问直鲁联军意旨；并定由临时政府通电请一致停止军事行动。

△　唐生智正式就任代行湖南省长职。唐并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第二师师长刘铦、秘书长萧汝霖、旅长唐希忭及第三师旅长刘重威、蒋锄欧、参谋长张雄舆等。同日，唐下令所部第四师向驻在湘阴、新市、桃林及岳阳一带之叶开鑫师进攻。

△　魏益三脱离国民军，通电“赞成和平”，所部改称“正义军”，退守高碑店。

△　直鲁联军在天津开会，决以褚玉璞任前敌总司令，荣臻任总指挥，第一路司令胡毓坤，第二路司令徐源泉。各部队于26日向津北开动待命。

△　阎锡山电令正定驻军协同靳云鹗军向保定急进。27日，晋军与靳军占保定。

△　北京各学校、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讨论筹备29日在中央公园举行死难国民追悼大会及在中央公园建立纪念碑等事宜。

△　北京大学学生为三一八惨案殉难同学李家珍、黄克仁、张仲超下葬，千余人送殡，并抬棺游行，抗议段祺瑞暴行。

△　长沙市民为声援北京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各界罢业一日，省议会停开，报纸停刊。26日，安庆万人开市民大会并游行示威。30日，广州各校停课追悼遇害学生。

3月26日　　鹿钟麟向和平调解人士表示：国民军决固守京畿，倘无和平办法及正式交代，决不放弃京畿。李景林等在天津部署进攻北京。京津交通断绝。

△　国民军宋哲元部自承德退往察哈尔多伦一带，热河为奉军占

领。

△　法权调查会开会，审议各国领事裁判权问题。各国代表提出领事裁判处构成及领事裁判官任用方法之详细说明书报告委员会。京会至此告一段落。

△　北京外交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告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称：如京津不能通车，即组织国际列车，从30日起每日开一次。

△　直鲁联军入津后，滥发军用票100万元，强制使用，商界罢市。警察亦因不能制止军队之横暴而罢岗。是日，直鲁联军与商会商妥以直库收入为担保，由商会凑足10万元后向财厅兑现一次。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3月27日　　奉军骑兵向北京方向进军，占玉田、三河，袭击通县，翌日，占通县。

△　国民军张之江等电王士珍谓，“奉军节节进逼，当严阵以待。破坏和平，责不我负”。次日又电王等请速制止奉军进兵，并称：“彼方执迷不悟，乘敝军撤防骤加攻击，不顾大义，不惜民生，致敝军全体将士同深愤慨。万一不可制止，诸公和平苦心均付流水，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望毅然主持，之江等愿率二十万健儿愿为和平后盾。”

△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讨段祺瑞承认金法郎案，摧残五卅运动，滥借外债供给军阀助长内乱，阴结吴佩孚、张作霖苟求固位，以及制造三一八惨案等罪行，宣称“誓当领导民众，以为国家除此残贼，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号召“全国人民及与人民合作之军队主张正谊，一致奋起，以驱除段祺瑞及一切卖国军阀，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　中苏会议之赔偿专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方委员长王文典指责苏方不认赔偿卢布为无理，要求赔偿卢布贬值损失、人民生

命损失、贷款损失和公家损失四项。

△　何键旅进驻岳阳，蒋锄欧旅退往湘鄂边境羊楼司。29日，两军在岳阳东北、羊楼司南接火。吴佩孚迅即调兵遣将陈兵鄂南，派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

3月28日　王士珍等人开会商议和平运动步骤，决定派金绍曾等赴汉访吴佩孚，派李钟岳、蒋濬川赴豫访靳云鹗、寇英杰，派李玉麟赴宁访孙传芳并访陈调元请出任调停。

△　王士珍等派师景云、三多、倪文瀚乘摩托车赴津，携王士珍函劝张宗昌、李景林罢兵。

3月29日　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77人。大会推举张继、居正、谢持、林森、沈定一、覃振、傅汝霖为主席团。张继、沈定一、覃振等相继演说。大会听取各地党务报告后，进行以“对付共产派”为主要议题之讨论，并反复讨论大会移粤继续举行事，并于4月1日通过决议案，推定张星辀、黄英、黄复生、管鹏、李敬斋、钟汝中、黎东方、宋镇仑、谢持、沈定一为大会移粤先遣特派员。大会通过《改进农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原则案》、《制定农业政策大纲案》、《肃清共产分子案》等。大会费时两日，分三次选出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覃振、张继、谢持、胡汉民、李烈钧、邵元冲、沈定一、居正、许崇智、傅汝霖、黄复生、张知本、石瑛、田桐、桂崇基、何世桢、张星辀、刘积学、茅祖权、管鹏、黄季陆、焦易堂、孙镜亚25名，中央监察委员石青阳、李敬斋、马叙伦、陈去病、于洪起、谢英伯、樊钟秀七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个民、张平江、宋镇仑、孙镜亚、黄英、张近芬、李次宋、高岳生、李宗邺、李翊东、李东园、蒋希哲、胡文灿、宋垣忠、袁世斌、沈肃文、张善与、刘恺钟、王鸿一、龚材榕、习文德、刘绛英、刘景新、毛仲衡、翁吉云、刘求南、胡人庆、陈兆彬、邓宝珊、王光辉、萧异、朱霁青、郑献征、陈敬修、梁楚三、李征植、马彬、姜次烈、

黄振家39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张秋白、郑毓秀、黄斗寅、沈素生、丁骞五名。4月10日，大会闭会，发表宣言。

△　张作霖抵秦皇岛，召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等前往会议，讨论：一、直省地盘；二、“讨赤”；三、中央政权。吴佩孚代表杨清臣亦列席。对于中央政权，张作霖主张推王士珍为总统，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在形式上仍由吴佩孚负责主持改造政局，以符合吴奉同盟之协定。31日，张回沈阳。

△　张作霖任命褚玉璞代理直隶督军，李爽垲代理直隶省长。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召集全体党员大会，到1000人。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训，联合世界革命先进之苏俄，及集合国内一切革命分子，始终拥护在广州举行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产生之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非法之西山会议及其在上海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与所召集之伪代表大会。

△　北京各界追悼三一八惨案死难国民大会原定在中央公园举行，因京师警察厅阻止，是日改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大操场举行，蒋梦麟主席，群情悲愤。

3月30日　段祺瑞公布《修正临时参政院条例》，凡10条。

△　哈尔滨市政局奉特区长官张焕相令，向俄人收回市政权，宣布解散俄人所占之市议会，另设自治会受理一切事务、公文、财产。各国驻哈领事团提出抗议。

3月31日　蒋介石、谭延闿、孙科、朱培德、伍朝枢、李济深、李福林、古应芬、黄绍竑等人会议，对张继等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拟采取警告手段。

△　蒋介石在广州东山私邸对新闻界谈话，谓：“联俄政策不啻为国民党之生命。此政策为先总理生前所定，著之遗嘱，代表大会敬谨

接受施行，其隆重如此，岂有轻于变更动摇之理。”

△　张之江电北京临时政府，再次恳求辞去察哈尔都统兼职，请调鹿钟麟担任。4月2日，贾德耀复张电谓：京师治安关系重要，鹿钟麟警卫有方，正资倚赖，仍盼张兼筹并顾，勉为其难。

△　段祺瑞令准马君武辞教育总长职，特任胡仁源为教育总长。

是月　　各地工人纷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计有：上海日商第九纱厂500余人、东亚麻袋厂1600余人，苏州苏纶纱厂100余人、木机织缎工人2000余名，无锡全城木工1000余人、申新布厂1000余人，杭州机织各厂工人，奉天纺纱厂2500人、制麻厂500余人、英美烟公司1300人、中俄烟公司女工200余人、利记猪毛公司200人、翻绱工人300名等。

4月

4月1日　　直鲁军及奉军将领在天津张宗昌寓所举行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北京国民军事，决定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赴前线督战，李景林留守天津。

△　国民军将领鹿钟麟、韩复榘、郑金声、门致中、弓富魁、胡德甫、方振武等，在北京警备司令部开紧急会议，决定：一、继续进行和平活动，一、三、五军听鹿指挥；二、向王士珍等表明：对方进逼，国民军将不得已而应战；三、筹办饷给，先二、三、五军，再一军；四、国民军各军组织联合办公处协商军事。次日又开会，决定暂仍尊重和平，不得已时当一致奋斗。

△　吴佩孚电唐生智，限24小时内将岳阳驻军完全撤出，以为湘、鄂缓冲地。唐部陆续撤回汨罗江南岸。3日，吴佩孚命前岳阳镇守使邹序彬回驻岳阳。

△　魏益三派赫乃苏赴汉谒吴佩孚，表示竭诚拥护。吴派魏为“讨贼联军”第三路总司令。

△　法权调查会开会，美国代表史陶恩主席，讨论出发去外地调查路程，议决：如交通恢复即取道津浦路南下；如交通梗阻，改于11日、12日由津搭轮。

△　冯玉祥代表马伯援抵粤，国民政府举行宴会欢迎，商谈时局和合作事宜。4日，蒋介石邀马赴黄埔商谈。

△　国民政府改广东省商务厅为实业厅，裁撤国营实业管理委员会，该会应办事项统归实业厅办理，任命李禄超为厅长。

△　邓如琢在九江就赣军总司令职。18日，邓入南昌城。

△　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到会代表2500余人。大会共举行六天，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宣传教育、青工女工、工农联合、制裁工人斗殴、要求国民政府制定劳动法等十多项决议案。大会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

△　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发出告全国同学书，提出“统一学生运动”的口号，号召全国学生在“反对外国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军阀压迫以争得民权”这两点共同要求上一致努力，捐弃一切成见，集中组织，统一实力，以抵抗一切压迫而争取学生的利益，根据第七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决议，造成学生群众中的统一联合战线。

4月2日　　国民军增防北京。三军刘廷森部调往房山，方振武军驻扎卢沟桥，驻南口的第二师开赴前线。孙岳任命徐永昌、庞炳勋、梁寿恺、刘廷森为三军第一、二、三、四师师长，补充缺额，分扎京城，与国民一军一致行动。

△　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对湘方针：一、以湘省为实施党治区域，一切办法仿照两广，三个月内使全湘党部完全

成立；二、暂先承认唐生智为湖南省长或军务督办等名义以维持湘局，将来照两广办法筹设湖南省政府。

△　唐生智派欧阳任赴汉口谒吴佩孚，解释湘、鄂误会。

△　吴佩孚委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刘即通电就职。刘占陕县后所部扩为八师，麻振武、柴春廷、梅发魁、贾巨卿、王振、憨玉珍等均归节制，分驻渭南、潼关、陕县、灵宝一带。

△　国民军代表王乃模、何遂在保定向田维勤、商震接洽和议，提出国民军谋和之条件：一、释放曹锟；二、恢复法统；三、将京汉全线交归吴佩孚；四、国民军驻屯京兆；五、协同吴军要求奉军退回关外。翌日，王、何到郑州见靳云鹗。

△　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三一八惨案完竣，致函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列举实地调查详情及军警官兵和目睹人供词，证实游行学生群众在国务院门前请愿，“查无犯罪情事，而其行为亦未达不正当侵害程度之情形”，国务院“卫队方面查无必要开枪防卫之情形”。以此，“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请陆军部“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　广州各界10余万人为北京三一八惨案在广东大学操场召开反段大会，宣讲者指出：此案乃北方反动派惨杀爱国民众之开始，俟将集中其目标于广东国民政府；一切不平等条约均系帝国主义束缚我国之工具，《辛丑条约》尤甚；直、奉军阀均系帝国主义走狗，直、奉势力优胜即帝国主义之胜利。号召各界团结一致以抵抗反动势力之进攻，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以早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北京群众运动，打倒直、奉反动势力。会后游行示威。

△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工人和各界同胞一致团结，反对军阀，并督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4月3日　　奉军及直鲁联军围攻北京不能取胜，乃以飞机向城内抛掷炸弹，毁民房多所。北京公益联合会等37团体联名急电李景林等诸将领，要求不再掷弹。北京悟善社江朝宗电张作霖吁请饬令停止轰炸。

△　张绍曾派刘恩源访直鲁联军各将领请罢兵。各将领答称："国民军极盛时公不言和，国民军败北公来言和，请俟联军到北京后再说。"

△　蒋介石通电指责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假借拥赞蒋镇压中山舰案之名通电制造谣言，"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并谓："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

△　香港当局派税务司、辅政司、华民司各一员来粤洽谈罢工问题解决办法。8日，又派律政司刚巴抵广州，偕驻粤英总领事普理宁谒伍朝枢交换意见。

4月4日　　王士珍等电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吁请暂停派飞机来北京投掷炸弹，并"明示大旨所在，俾得稍效奔走传达之役，以释众惑"。

△　张作霖为北京悟善社江朝宗吁请停止飞机到京掷弹事复电谓："诸君倘本慈惕之怀，应商同彼军速即退出京畿，俾免生灵涂炭。"同日，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复电北京公益联合会等37团体称："彼方既出以敌人行动，我自应以敌人对彼"，表示拒不停炸。

△　国民三军原驻防大名、保定之部队，由吴佩孚改编为讨贼联军第三军，杨清臣为总司令。

△　田维勤派王文正等二人到北京与国民军洽谈和议。

4月5日　　吴佩孚电复张之江，以先将国民军交阎锡山暂行接收，张亲赴汉口接洽为谋和条件。吴并将该电转张作霖，以释奉、直间对国民军谋和之误会。

△　张宗昌委林宪祖代理山东省长。

△　三一八惨案死难者家属委潘大道律师依法起诉。6日，潘并代北京国立各校呈京师地方检察厅，控告段祺瑞及其政府官员教唆卫队枪杀请愿人。

4月6日　　奉、直、鲁、晋各军联合对北京国民军下总攻击令。东路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司令，西路阎锡山、靳云鹗分任正副总司令，王为蔚、王维城、田维勤、魏益三分任指挥。杨清臣召集旧部编组成师，加入通县方面进攻。

△　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代表驻京各国公使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略谓："近日来发生之飞机投掷炸弹暨飞机一再翱翔于使馆界之上，尤望中国政府予以特别之注意。至以有关于此项违反条约之举，及中国政府于使馆界内及城内各处侨民之生命财产若因此而受损害，请查照1924年奉天飞机声言将攻北京时9月25日所递之照会，负其全责。"

△　荣臻不愿受直隶护理省长职，将印信交还省署，由政务厅长陈昌泽代拆代行。翌日，褚玉璞在省署就直隶保安总司令职，执行督办及省长职权。

△　王士珍在北京各报遍登广告，说明不接受和平维持治安等名义。

4月7日　　奉军及直鲁军分四路进攻北京：荣臻攻马驹桥，张学

良攻安定庄，韩麟春攻通县，穆春用骑兵经顺义抄袭南口以断国民军归路，褚玉璞赴杨村督战。

△　段祺瑞下令“抚恤”三一八惨案遭难者，但诬指青年学生是被人利用，略谓：“查徐谦等人假爱国之名，行破坏之实，青年学生卫国情切，堕其陷阱，殊深悯惜。除令内务部仍妥拟办法切实查明分别优恤抚慰外，并责成教育部督同各校校长妥筹善后之方，以维学风而培元气。”

△　张作霖准免王永江奉天省长职，命莫德惠接任奉天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职。

△　蒋作宾抵粤谒谭延闿，代表方本仁表示输诚。次日晚，蒋在国民政府报告谓：方有五万兵力愿合作，倘国民政府早日出师北伐，赣可不战而下。

△　旧参政院通电谓：“本院条例明令公布后，现经谈话会公决，在正副议长未选出前，暂推汤漪为临时主席总持一切。”

△　章太炎、徐绍桢、邓家彦等人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是日开成立大会，并通电全国各报馆，称“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14日，召开第一次干事会，讨论“宣言草案”，谓“居今之世，反对赤化，实为救国之要图”。

4月8日　　奉军与直鲁军在黄村方面与国民军四次交战。次日，左翼击退大红门之国民军驻部，占领南苑三间房；右翼占领长辛店、富古庄。

△　吴佩孚派蒋百里赴奉，磋商国民军求和问题。吴提出媾和条件征求张作霖意见：一、恢复法统；二、释放曹锟；三、国民军全体改编，将领由吴任命；四、以王士珍为临时海陆军元帅；五、限五个月内召开新国会，七个月内组织大选会。张作霖表示大致同意，请吴

勿让步。

△　吴佩孚部署河南军事，令张治公部移驻豫南，李振亚驻洛阳，任应岐驻陕县，各军准备即日移防。吴并委袁家骥为豫南剿匪总司令。11日，袁就职。

△　湖南常德市国民党右派分子殴打省立第二师范学生和常德学联代表滕代远等，制造惨案，死五人，伤30余人，被诬下狱10余人。

4月9日　　北京发生政变。是日夜，鹿钟麟派兵包围国务院，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避入东交民巷。国务院卫队受鹿改编，由门致中接收。10日，鹿钟麟发布警卫司令部布告，谓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迫不得已采用严正办法严行制止。一面恢复曹公（锟）自由，并电请吴玉帅（佩孚）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京师地方秩序，仍由军警负责维持”。

△　关税会议编订附加税奢侈品表专门分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审议附加税奢侈品表修正稿。英、日代表就奢侈品表列之税则号数问题提出异议，指出目录号数与列入之货品不符合，其中有上次会议所未同意者，要求依照税则号数编订新表。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团重新编订二表，详列一切货品之税则号数，每号载明货品应纳之附加税率，送交各国代表团俾便删整。

△　山东南部红枪会势力蔓延，连占重要城邑，兖州、济宁均告急。张宗昌电令第七军军长许琨率兵前往镇压，并派员招抚会众。前省长王鸿一、镇守使张培荣等有勾结红枪会嫌疑，被通缉。

△　湖南省议会选举雷铸寰为议长。

4月10日　　段祺瑞允辞职，并允解除宋玉珍部卫队武装。段要求出京，鹿钟麟不允。

△　北京国务院以鹿钟麟率兵围困，“一切政务无由执行”，向各

省区军民长官发出通电两则：一、“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各省区地方治安，均盼军民长官妥为维持。”二、“本院暂行停止办公。”

△　吴佩孚电津，请王怀庆入京维持治安，并派郭玉龙赴津与王商议。张作霖亦电王请帮忙。张宗昌在津宴王。

△　国民党中央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议，就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派人来粤捣乱事，决议着国民政府严令军警缉拿惩办。是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着广东省内各军警一体严缉，遇有伪代表大会派人来粤煽乱，即予拿解法庭，照叛逆治罪”。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在《申报》刊登通告，揭发西山会议派召开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黑幕，“所谓各省区代表，实并非由各省区党员选出，而由邹、谢、沈等私人指派，即以各人之原籍何省即为何省代表。……该大会到代表九十余人，均为上海、南京两地人，而东南大学学生竟占三分之一。故此次该伪大会不特在纪律上为背叛本党，即在集会手续上亦甚欺骗党员，亵渎总理，蒙蔽国人”。

△　国民政府派陈铭枢、白崇禧赴湘洽谈，是日陈电粤，略谓：唐生智对国民政府意思完全采纳，长沙民众连日开会欢迎，革命空气满布全湘。21日，陈、白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接洽情况。

△　国民政府与马伯援等人洽谈后是日函冯玉祥，略谓：“期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共定国难，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　国民政府指令外交部、司法行政委员会宣布：不接待法权调查会外国委员来粤调查；严正指出：“领事裁判权当然收回，无须由外人调查。”

△　唐生智在衡阳秘密处决湘军师长、旅长刘铡、萧汝霖等，引

起湖南反唐运动。

4月上旬　　北京成立法权自主协进会，并在沪、宁等地创设分会。宣言称：法权调查会分赴各地调查，倘有妨碍撤废领事裁判权之行为，当拒之。政府应于两个月内召集国际会议，或分向在华有领事裁判权之各国提议，即时无条件撤废领事裁判权。政府办理此事倘不开诚布公尊重民意，置国权于不顾者，国人当一致声讨。

4月**11**日　鹿钟麟等国民军将领致电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略谓：此次促段下野，“原冀实行监视，听候解决。不意敝军改编卫队之消息传出，段已事前风闻避入使馆界内。现在京师治安业由军警负责维持，秩序如常。至于建国大计，诸公素抱伟略，当能主持一切，敬祈随时见教，俾有遵循”。

△　曹锟10日恢复自由，是日致电吴佩孚为鹿钟麟说项，略谓：“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榘赴汉报告。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与成全。望即电达奉方，停止军事，以后大计尽可协商。”曹并派张廷锷偕鹿之代表宋良仲赴保定迎田维勤来京洽和。13日，田抵京晤鹿后电奉请先行停战，俾国民军退出北京。

△　晚，吴佩孚在汉口召集会议商讨时局，确定：一、即电靳云鹗、田维勤询京真相；二、致电奉军将领，征询对京事之态度；三、湘、赣事平后决从众请入京；四、复电鹿钟麟等，勿令段祺瑞走脱。

△　吴佩孚宴王士珍之代表金绍曾、吴春康，表示国民军全部退出北京，方有议和余地。

△　吴佩孚电张学良、张宗昌：“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照原定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

△　段祺瑞在东交民巷拟就辞职通电，左右劝阻不发，谓时局变

化，仍有复任希望。

△　李云龙（虎臣）逃归陕西，辞去督办职，与井岳秀、杨虎城结合共御刘镇华。省长刘治洲亦辞职。

△　奉、直双方争夺京绥路管理权。奉方委交通总司令唐德萱为京绥路局长，沈家桢为副局长。但直方劳之常以交通副司令名义于10日已委孙凤藻为局长。双方僵持。

△　奉省发公债现大洋5000万元，以清宫地价作保，年息六厘，六年内抽签偿还，限三个月募竣，以此款收回奉币一亿元。

△　上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宣称以“反对赤化，保障主权”为宗旨，徐绍桢、章太炎、黄子荫任名誉会长，马相伯为正会长，杨春绿、沈田莘为副会长。13日，该协会开会，通过“消灭世界赤化”等决议。

4月12日　　北京临时政府特别国务会议，胡惟德、卢信、贺得霖、吴纫礼等出席，通电宣布“在政局未定以前，暂维现状”。

△　贾德耀致函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并请转致各国公使：一、段执政“暂时不能行使其职权，然未尝因此而为辞职之表示”，“严重声明在此纷扰期内，所有一切捏造事实及假借民意之文电，概属无效”；二、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　段祺瑞在天津之部属向张宗昌、李景林陈述鹿钟麟驱段事，请速攻占北京。段祺瑞躲在东交民巷使馆区桂乐第大楼，诵经礼佛。

△　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江瀚、熊希龄联名电请靳云鹗饬所部移驻，以作两军缓冲之地，略谓：“西北军一再表示，只须京师治安付托有人，当即全师而出。惟现当枪林弹雨之中，实无疏通周旋之余地。……务恳鼎力调停，并请将贵部军队迅速移驻，以为两军缓冲之地，京师地方，亦赖以保全。”

4月13日　西山会议派选出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推举谢持、邹鲁、沈定一为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居正，宣传部长桂崇基，工人部长黄季陆，青年部长张星辅，妇女部长黄复生，海外部长林森，商人部长陈个民。会议决定创刊《江南晚报》为机关报。

△　北京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商议推王士珍、颜惠庆等人组织京师临时治安会，征得北京外交团同意，鹿钟麟亦允该会接京畿治安责任。

△　张作霖电吴佩孚，请勿受鹿钟麟之挑拨，并盼即日移节入都。

△　张作霖电复王士珍等六人，谓国民军“如能退出北京，敝军即不进攻”。

△　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联名通电斥鹿钟麟“前日拥段（祺瑞），今日驱段，前日捉曹（锟），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

△　靳云鹗通电河南全省军政长官，从速妥筹解散红枪会及豫卫军，如不服，准剿办。同日，河南省署电令登封县解散红枪会，并通缉首令梅仁义。

△　李宗仁聘苏联人马迈耶夫·吉罗莫夫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顾问。

4月14日　王士珍等六人致电张作霖，谓西北军一再声明只须京师治安付托有人即行退出，吁请张“迅予转劝奉军，请饬前方统兵将领停止进攻，并将部队酌量移退，另由第三者酌拨军队移驻其间以为缓冲之地，俾一方得以从容他徙，而地方亦赖以保全”。王士珍等同时电吴佩孚请“极力主持，相机劝导”。

△　张作霖通知驻奉苏联总领事加拉柯维斯基：如奉军一旦占领北京，绝不负苏联驻京大使加拉罕保护之责，请即电达大使速出北京。

△　蒋介石为掩饰中山舰事件真相，将事件中为其效力之海军舰队临时总指挥、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免职并予扣留，委潘文治为代理海军局长，章臣桐为海军学校副校长，吴嵎为“中山”舰长；是日，经蒋介石亲自审讯，又将李之龙释放。

△　国民政府派鲁涤平率军赴琶江剿沈鸿英残部，为民除匪患。除加派一团外，并派飞机往剿。湘军张辉瓒部配合向琵琶山匪总攻。

△　周荫人在福建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新兵训练计划、统一全省财政以及消灭境内民军等问题，历时10天。会议决定对吴佩孚取尊重态度，对孙传芳取绝对合作态度，对张作霖以吴、孙之态度为态度。

△　上海纳税西人会举行年会，通过增加华董三人案。同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谓，工部局须按照华人之纳税比例，增加适当额数之华董，反对外人以恩施方式增加三华董。沪西商界联合会亦发表宣言反对，谓应充分考虑华人之纳税额，以选定中国议员，如不达目的，即三名华董亦放弃之，各纳税人当暂停纳税，以示无权利即无尽义务之必要。

△　唐生智收编夏斗寅部，仍沿用鄂军混成旅名义，团、营长由唐考核另委。

4月15日　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南口。晨，奉军、直军与直鲁联军向北京猛烈攻击，奉军占通县，吴军进抵西苑。鹿钟麟急调援军在八里桥附近堵御奉军，迨援军至朝阳门外万国靶子场附近，南苑防线亦被突破。鹿遂下令总退却。

△　北京商会、银行公会等组织京师临时治安会，聘王士珍、赵

尔巽、熊希龄、颜惠庆、王宠惠、江朝宗、吴炳湘等17人主持一切。是日发表宣言称："即日假京都市政公所办事，举凡和平之呼吁、民食之维持、闾阎之乂安、外侨之保护，力之所及，勉效匡襄。至若根本大计解决，全听诸国人，本会概不拟议。"该会公推吴炳湘为京师警察总监，以治安会员名义维持治安之责；并聘外国人安格联、福开森、铎尔孟、板西为顾问。

△　国民军唐之道与段祺瑞秘密勾结谋变，是日率第九师由通县进入北京城内，自称"京师警备总司令"，出面维持治安。

△　美国纽约900名学生公举代表六人谒见总统柯立芝和国务卿基洛格，抗议美国对华政策，要求美国政府对治外法权勿与其他各国联合行动，并促美国退出正在举行之法权调查会议。

△　豫省议会及地方团体因年来军费自六七十万骤增至300万，均由滥招队伍所致，现民益不堪命，致函督办、省长并电吴佩孚请限制军旅，节省财源。

4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　国民军退往南口、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顺义西汤山一带之国民军继续抵抗，以阻奉军追击。

△　段祺瑞于国民军撤出北京后，由东交民巷桂乐第大楼回吉兆胡同私邸。

△　张作霖电请吴佩孚迅速北上主持大计，并声明自己不干政，"一切听候公决"。

△　吴佩孚遣密使劝曹锟四事：一、自身危险须加注意；二、国民军撤退后，即宣言从前年10月23日失去自由以后之一切命令概归无效；三、取消前年10月25日所发让政权于吴佩孚之命令；四、因已对

国会提出辞表，故决勿复大总统职。

△　青年军人联合会经蒋介石之“调和”，是日声明解散。20日，孙文主义学会亦宣布“自行解散”。

△　香港各工会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400余人出席，历时九天，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经济斗争等决议案，正式成立香港总工会。

4月17日　　段祺瑞通电宣告复职，略谓本执政“内审时艰，外崇国信，且目睹赤化之祸流于首都，不敢遽为无责任之放弃”。并谓：“曩者临时政府开始之日，曾规定应办者若干事，一年之中事势扞格，今后是否按程继进，听诸公意……当此乱极思治之秋，不无贞下起元之会，其速妥议善后，俾国政不至中斩，佥谋朝同，初服夕具。”

△　段祺瑞令免鹿钟麟京畿警卫总司令兼署京师警察总监、市政督办本兼各职。贾德耀呈手折于段为鹿说项，略谓：“一年以来，京师治安，鹿钟麟始终维持，不无功劳足录……拟恳宽其既往，免予深咎。”

△　段祺瑞致电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解释复职之意，并谓“纪纲应如何整饬，大局应如何奠定，公忠体国，不乏嘉猷，询谋佥同，必能善后”。“兄决计引退，请诸弟共推一人组阁，俾便摄政”。

△　贾德耀呈段祺瑞请辞国务总理职，略谓：“弭变无方，引咎自劾，请予罢斥。”

△　贾德耀致电冯玉祥，略谓：“四月九日变起非常，事前既无所闻，临时又无法补救。……我公平日主张，所以拥护执政者为甚。德耀之敢于任事，亦即在此。喋血都门，倒戈内向，此等举动，明知决非尊意，是以不敢随声附和，更背初衷，此中委曲，当荷鉴谅。”

△　段祺瑞令免司法总长卢信、次长余绍宋职，任命王文豹兼署司法次长。19日又令着王文豹代理部务。

△　吴佩孚通电主张维持法统，由颜惠庆组阁，准曹锟辞职，并称坚决“讨赤”。

△　驻澳门之葡萄牙士兵百余人在中山县属三厂地方，越境抢夺广州纠察队拘获之奸商及财物，并枪击纠察队。广东省政府令交涉员提出严重抗议。

4月18日　奉军及直鲁联军开入北京，张宗昌等以镇威军军团长名义委李寿金为京师警察总监。京师临时治安会推举之警察总监吴炳湘交出警权。徐源泉访王士珍，谓京中治安既由警察维持，无须唐之道部参预。

△　京师临时治安会王士珍等通电各方：“敝会再四筹维，谨以五日为期，过此不能再任。”

△　吴佩孚电唐之道，略谓：段祺瑞毁法，包庇“赤化”，无可维持，已委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令唐任副司令，听王节制，并着拘留安福系人士，监视段祺瑞。

△　入京之奉军布告使用军用券，商民多反对，总商会勉强议决通行，惟数额不得过10万，以一元、五元小票为限，请军事当局负责兑现，并要求先定数额，行使前由商会盖章。奉军派王琦、徐源泉、王翰鸣出席总商会会议，表示愿存军用券100万于商会，押现款若干。20日，王士珍请以崇文门税为担保基金。

△　张宗昌勒筹军饷，下令征收津浦客车兵灾附捐，头等车每票二角，二等一角，三等五分。23日，电济南当局令各财政机关筹军饷50万：盐运使署20万，烟酒局10万，卷烟税局13万，货捐及硝磺局七万。26日，又发出铜元票20万。

4月19日　　张作霖电复段祺瑞云：“法律政治问题，自有海内名流公同讨论，霖本军人，早经宣言不问政局。”

△　张作霖以“教唆学生，供武器弹药于国民军”为词，拒绝承认加拉罕为苏联驻京大使。

△　张宗昌在天津设立“直鲁联军密探处”，明、密稽查各100人，洪锡华为处长，专事查拿“赤党”及“捣乱分子”。

4月20日　　北京临时政府改组。段祺瑞决定下野离京，临行前明令准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特任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权；准免财政总长贺得霖、交通总长龚心湛、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外交次长曾宗鉴、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姚国桢本职。

△　段祺瑞发令称：“本执政兹已决定引退，自即日起，着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权。”下午，乘专车离京赴津，同行者有吴光新、许世英、章士钊及子段宏业等11人。

△　段祺瑞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阎锡山宣布下野，略谓：“兹兄先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已于本日下令。弟等有何建设，俱乐观成。”

△　京师临时治安会王士珍、赵尔巽等以段祺瑞下野，通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暨各省区军民长官，略谓：“合肥下野，贾阁辞职，中枢停顿，险象环生。……第政局一日不定，诸事无人主持，局势所迫，务请诸公迅赐伟略，早定大计。”

△　胡惟德以段祺瑞下野，贾内阁辞职，通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暨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总司令，“务请顾念时艰，速定大计”。26日，胡再通电，谓“勉任外交，已虞竭蹶，代阁事大，非一手一足之烈，岂老朽所能胜，是以未敢奉命，决无游移”；“事关全

局，亟应速定至计，俾免贻误”。

△　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指出：“现卖国残民之段祺瑞罪恶贯盈，已为国民军迫走。张、吴两军阀虽由帝国主义之撮合，暂时联合战线，而根本上彼此利害仍相冲突，关于倒段拥段各异，尤易促其分裂。目下北方政局事实上已陷于无政府地位，军阀崩溃之期亦将不远，所望全国各地方被压迫之人民乘时奋起，组织坚固之团体，积极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抗争，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以取得政权。”

△　晚，蒋介石在宴退出第一军之党代表及共产党员军官席中即席演说，略谓：中山舰事件前，高语罕等一派人制造各种谣言，如诬本人“不革命”、“是段祺瑞”，不编桂军为第七军是暗示二师和二十师倒蒋后可编称第七军，还有主张北伐问题。蒋指责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两个主义、两个领袖、两个中心，破裂军队破裂党；谓中山舰事件是“要纠正矛盾，整顿纪律，巩固本党革命基础，不得不如此”。蒋还诡言中山舰事件经过情形太离奇太复杂，有许多不忍说之话，只有他个人知道，“处境之苦真是有口莫辩”。

△　张宗昌所部王翰鸣之警备军入京。唐之道部被逐，退集南苑，两旅改归褚玉璞收编，留一旅归王怀庆指挥。唐向京师临时治安会辞警备副司令职，避入使馆区。

△　张作霖电阎锡山速出兵大同取丰镇。

△　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谓：“本党是代表中国工人及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之职责是领导中国工人、农民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斗争；同时，在民族革命中，代表中国工人、农民利益而斗争。”“本党和工人同志们携着手奋斗已经四五年了，现在方开始和农民携手走上战线，因此，在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

4月21日　　吴佩孚电张作霖称：“关于摄阁事，望雨帅主持，使早成立。”

△　张作霖通电声明对一切法律、政治未曾发表任何主张，略谓：“现在京师收复，军事虽未告终，政治问题行将开始。敝军此次义举仍复抱定前言，始终如一，决不为一党一系之争，亦不为任何方面所动。对于法律、政治仍无何等主张，亦未发表意见。”

△　张宗昌以镇威军军团长名义派王翰鸣为京畿临时警备总司令。24日，张向京师临时治安会表示：派王翰鸣为警备总司令系临时性质，如王怀庆就卫戍总司令，警备司令部名义即可撤销。

△　王士珍电吴佩孚谓，为避免主政嫌疑，治安会决计改为救济会，请吴即日北上，俾卸责任。

△　国民军将领张之江、鹿钟麟等在张家口举行会议，决定全力自保，并推出东、西、北三路总指挥：东路鹿钟麟，担任南口、居庸关一带之防务；西路李鸣钟，担任绥远、察西一带之防务；北路宋哲元，担任热河、多伦、察东一带之防务。张之江仍坐镇张垣，总揽一切。

△　叶开鑫通电就任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在吴佩孚指使下回岳阳起兵，率部向长沙进攻。蒋锄欧旅开抵汨罗。邹鹏振率领湘西的三个旅进攻新化、宝庆。吴佩孚电令邓如琢出兵三旅，配合陈炯明旧部谢文炳进兵湘东；又令桂军沈鸿英、韩彩凤等残部在零陵扰乱唐生智后方。唐四面被攻，长沙吃紧。

△　奉军及直鲁联军驻北京城外者10余万，奸淫杀掠，时有所闻，民房被占用者不可胜数。无家可归之难民纷纷逃避城内，数在10万以上。是日，治安会在神武门、天安门设两难民收容所。城内人心恐慌，商铺开市者甚少。

△　上海章太炎等人组织之“辛亥同志俱乐部”通电拥戴黎元洪，称“非黎公复出，国将焉赖”。

△　天津军警当局以《益世报》“记载失实”为词，禁止其发行。25日，天津保安司令部令警厅取缔“宣传赤化，造谣滋事”之报纸。

4月22日　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靳云鹗诸军代表开会，商定维持北京秩序办法七项：一、组织奉直鲁联军总执法处、总稽查处，总理京城内外军纪；二、各军给养各军自给，不许向治安会及机关索取；三、将纪律不整之新兵、降兵及改编的队伍和白俄兵调往廊房；四、山东军用票事，令山东省银行行长与北京商界、银行界会商切实办法；五、电山东银行汇20万元来京兑换军用票，并电山东即运大批帐篷来京，使军队不住民房；六、派员迎吴佩孚北上；七、拨车运粮煤来京。会后即将诸点通知王士珍等，请治安会继续主持北京行政。

△　京师临时治安会应张宗昌之请，允维持现状。王士珍称，如果军用票、省库券今明两天仍无办法，本会仍即取消。

△　吴佩孚电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靳云鹗等，迅饬各部并力向南口进攻。奉军及直鲁联军主力在昌平一带集中，公推李景林为攻击南口总司令。

△　奉、直、鲁各军进入北京后胡作非为，骚扰治安，市面紊乱，物价暴涨，民心惶恐，舆论哗然。是日，吴佩孚通令所部不准扰民。张作霖、张宗昌等亦令所属遵守军纪。

△　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声明：“在国民会议未召集、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任何军阀盘据北京，各国政府不应予以承认，免干涉我国内政，延长我国内争。”

4月23日　吴佩孚电促曹锟速发宣告下野之通电，略谓：“请将

宣言稿即日发布，安一时之人心，固百年之邦本，胥于是赖。”

△　吴佩孚电复胡惟德谓：一切办法已交王怀庆执行，请促王入京。已入京之奉、鲁军将领亦向京师临时治安会表示推重王。王怀庆得治安会电，即率毅军三旅到京。

△　国民军在南口、居庸关、岔道新设三道防线，鹿钟麟设司令部于居庸关，韩复榘为前敌总指挥。

△　山东各地红枪会蜂起反对张宗昌横征暴敛。汶上县为红枪会占领，滋阳县知事被红枪会杀死，济宁城被红枪会包围，许琨之第七军某团被红枪会缴械，团长被烧死。兖州以西、以南为红枪会势力范围，大炮、机关枪俱全，自带给养，专事仇杀军队。张宗昌除“劝谕”、“招抚”外，大肆调兵剿歼追击，屠灭村庄50余处，惨杀会众无数。是日，省署又令各县严加取缔。

4月24日　国民军张之江派张树声与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接洽和平，其条件为：一、国民军肃清内部激烈分子及赤化分子；二、改编国民军，受中央节制；三、放弃热河特别区；四、保留察哈尔、绥远、甘肃地盘；五、保留京绥全线之管理权；六、不出兵攻晋、陕。

△　叶开鑫电唐生智：限24小时退出长沙，否则实行进攻。27日，叶下总攻击令。

△　国民政府令免第十七师师长吴铁城所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职，任命李章达继任。

△　京师警察厅奉直鲁联军首领之命令，封闭《京报》馆，逮捕社长邵飘萍。邵于26日晨4时被绑赴天桥枪杀，罪名为“勾结赤俄，宣传赤化”。

△　张作霖以“行动诡秘，不尊敬我主权”为词，令驻奉苏联副领

事列夫离华。

4月25日　齐燮元、王怀庆与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在北京举行会议。齐提出吴佩孚处置政治、军事之方案：一、护宪；二、曹锟下野，以颜惠庆组摄政内阁；三、由王怀庆任卫戍总司令维持京师治安；四、张之江等输诚，须以先驱除冯军赤化分子为前提。张宗昌等反对护宪及颜惠庆摄政。次日，张学良回奉天，与张作霖面商应付办法。

△　吴佩孚命杨森为讨贼联军四川总司令。杨在长寿与刘湘军交火，派唐式遵、潘文华、郭汝栋、王兆奎四路攻刘。

△　奉军及直鲁联军强令使用军用票，商民与士兵屡起冲突，京内外小商铺十之六七倒闭。张宗昌27日犹令运军用票300万来京应用。总商会偕同治安会诸人与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商讨解决办法，议定：一、鲁、直票券由两省筹拨现款解京备兑；二、咨崇关、烟酒署、各铁路、电灯、电话准搭五成；三、咨财政部以官产作该票券在京行使担保；四、典当不得使用票券；五、不得以票券兑换现金；六、买物以票券找票券，不找现；七、由警备司令布告各军，违者军法从事。

4月26日　吴佩孚电京师临时治安会，谓：由颜惠庆摄政组阁，届时财政即有办法。

△　晚，王怀庆访颜惠庆，劝组摄行临时执政权之国务院，并谓须颜允出任后方就北京卫戍总司令职。

△　叶开鑫军与唐生智军隔汨罗江激战。叶军右翼谢文炳部占湘阴。28日，平江地区发生激战，唐军向浏阳撤退。29日，叶军南进，晚抵桃林寺。30日，叶向汨罗下总攻击令。

△　国民军在京绥路之八达岭、青龙桥、居庸关设三道防线，以

御奉军向南口进攻。

△　鹿钟麟在张家口就察哈尔都统职。

△　徐绍桢、王绍鏊在天津谒黎元洪，讨论法统。同日，徐通电主黎复位。

△　直省财源枯竭，褚玉璞在督署召集财政会议，财政厅、盐运使、津海道及各税局长均列席。褚谓：现驻直境军队约有40万，每日给养约需10万，请大家赶速筹款。

4月27日　曹锟左右草拟下野宣言稿，涉及复法与复宪问题，一再斟酌措词屡屡修改。旧国会议员及前年帮忙贿选者，力请在宣言中嵌有国会可复之意。曹锟电请吴佩孚、张作霖定夺。28日，齐燮元谒曹商议措词。29日，吴佩孚拟来一稿，谓宪法、约法均无辞职规定，只有因故缺位明文，故宣言用电不用令，用名不用职。

△　吴佩孚委蒋锄欧、刘重威、刘雪轩、姚继虞为“讨贼联军”湘军第一、二、四、五路司令。29日，又委夏斗寅部团长王殿甲代旅长并第六路司令。

△　湘军第一师贺耀组部及第二师刘铦残部组织“护湘军”，通电讨伐唐生智，贺部由澧县一带向长沙出动。

△　奉军与直鲁联军以“扑灭赤化”为名，派军队四出搜查国立九校。北京大学师生大批请假离校，校长蒋梦麟昨夜离京。

△　大连日商福岛纺织厂全体工人开始大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的虐待，要求增加工资、每日劳作由12至15小时降为11小时、允许有孩子的女工到厂门口喂奶、日人不得杀害工人等。日本帝国主义者极力镇压，捕工人领袖20余人，并利用工贼破坏。工人坚持斗争。全国总工会分别致电各有关方面要求声援、资助。铁路工厂、水泥厂、玻璃厂工人尽力支援；农民、渔民也帮助供给粮食，传送消息，掩护

工人领袖。上海、青岛纱厂工人亦捐款相助。罢工坚持95天，获得完全胜利。

△　广东大学部分教员反对文科学长郭沫若从事革新，认为“有侮蔑教员人格意”，22日停课罢教，要求校长将郭革职。是日，校长褚民谊及各科举出代表五人出面调停，又经学生要求，结果文科教员被挽留11位，被辞退15位。翌日，文科学生又组成革新委员会，宣言拥护郭之改革主张，反对罢教教员。

4月28日　奉军及直鲁联军将领决定酌量撤退驻京军队：第一军移驻沧州，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师驻马厂，第九军司令部移驻秦皇岛，第二十七旅驻卢龙，第三十四旅驻榆关，第四十旅驻锦州兴城，留第十军于珍部驻京。

△　叶开鑫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取道洪罗庙直趋衡阳。第二师唐𡼏部由澧县向常德、桃源方向移动，围攻唐生智军。

△　唐生智在四面受攻的危境下发表电文称：“生智受事以来，规随炎公（赵恒惕），虽备经事齐事楚之难，极受颐指气使之辱，为大局计，亦皆容忍之，至于今日，湖南未尝树一主义，生智未尝引一外援。乃叛将叶开鑫由鄂窜回，乘虚入岳。万一省宪破坏，引起南北纠纷，谁为戎首，不得不诉诸舆论。”

△　刘镇华以柴云陞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王振为第二军司令，由九华西进。张治公留守洛阳，贾济川留守陕县为后援。柴云陞在灵宝击退国民二军残部，洛阳、潼关间交通恢复。

△　法权调查会原定11日、12日去外地调查，因各地交通未恢复，京城亦尚未完全开市，未成行，是日开会决定缓行。中国代表王宠惠在会上续提领事裁判权以外之治外法权案。

4月29日　张学良在沈阳与张作霖等面商后，是日电驻京代表胡

若愚令转告齐燮元及张宗昌、李景林：“此间对法律问题，仍主公开讨论，不愿双方独裁，以致引起各方反感。军事问题仍照前议协同进行，决与玉帅合作到底。”

△　田维勤奉吴佩孚之命深夜抵京，与张宗昌会商与奉军及直鲁联军协力进攻南口事宜。

△　廖仲恺事件后于去年9月赴苏之胡汉民回国，是日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由海参崴同抵广州。蒋介石即邀胡叙谈，翌日下午又谈。

4月30日　英、法、美、日、意五国代表与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代表在外交大楼开会，讨论交还上海会审公廨及改组上海租界内司法机关等问题。中国方面代表坚持以中国提案为讨论根据进行谈判。五国代表对中国所提交还监狱，租界特别法庭完全适用中国现行法律，处理华洋民刑诉讼并违禁事宜以及普通华洋诉讼，领事不得会审各点，声明须加修正；对外国律师出庭须经中国司法部核准，亦持异议。

△　护法参众两院议员尹承福等428人通电提出四项主张：“一、黎元洪依法复大总统职；二、国会自由集会，继续宪法会议；三、修正国会选举法，改选新国会；四、三个月内举行大总统选举会。”

△　袁祖铭在四川与刘湘、杨森迭有冲突，决率黔军离川，向川军各将领要求以后每月由四川接济军饷40万元，并先付120万元为开拔费。

是月　阎锡山命所部进兵阳原、蔚县，拆毁天镇以西至大同之铁路，断国民军后方联络。

△　各地民众追悼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1日，北京中小学通知暂行停课数日。汉口各校停课一日志哀。广西学联通知各地学联与各地民众游行示威反段。5日，武汉大学追悼杨德群。8日，武汉学生成

立“京案”后援会。11日，长沙千余妇女追悼死难女生。12日，重庆、湖南邵阳游行示威。14日，桂林各界市民反段大会，通电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17日，长沙万余人开追悼会，次日游行。24日，宜昌万余人大会。28日，成都学生集会示威，有人袭击日总领事署。

△　湖南省举行农民代表大会，到15县代表57人，开会三日，正式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据统计，全省已有四县、32区、200余村正式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7万，入农会自卫军者约10万。

△　奉天当局为挽救东北三省财政，密令吉林、黑龙江两省开禁栽种鸦片，设局专卖，征收烟税，悉归军用。

△　上海工人为增加工资，反抗厂主压迫举行罢工，计有：闸北南市600余水笔工人，四明、中西、国民等三印局工人，中华袜厂女工，内外棉纱厂第三厂夜班工人400余，南北市青蓝染业工人1000余人，日商东方纱厂全体童工等。

5月

5月1日　　曹锟依吴佩孚意旨，正式发表下野宣言，谓：“锟忝膺重托，德薄能鲜，致令部曲携贰，纪纲失坠。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冯玉祥倒戈，锟受闭锢，自是法毁乱滋，国无元首，迄今一载有半，良用疚心。今联军讨贼，巨憝已除，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锟自惭失驭，久已倦勤，非弃屣以鸣高，且闭门而思过。所冀各方袍泽，励翊协和，共循法规。”“锟优游林下，获睹承平，欣幸曷极，特电布达，愿共察之。”

△　张作霖通电声明对北京政府主政人选事无所主张，略谓：“国家大事，理应公开讨论，不宜专断独裁”，“作霖罹分崩离析之忧，懔军人干政之惧，识见所囿，实不敢轻作主张，妄参末议。”

△　唐生智军为叶开鑫、贺耀组等部击败，退出长沙至湘潭，继续向衡山退却。谢文炳部入长沙城。

△　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502人，代表全国699个总会和分会的124.1万多会员，并有英、俄、法、德、美、日诸国工会代表及广东各界代表参加。大会至12日闭幕，共开15次，有李立三报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经过情形，鲍罗廷报告世界革命状况，邓中夏报告职工运动总策略，刘少奇报告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等。大会决议为职工运动死难烈士及廖仲恺树立纪念碑，修改工会章程，并选举执行委员39人，候补委员17人。

△　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到214人，代表62万农会会员，桂、闽、赣、鄂、皖、浙、苏、鲁、晋、黔等11省均派代表列席。大会听取了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会务总报告、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世界革命状况报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报告等，并通过《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地位》等决议案。

△　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开幕，共到代表482人。4日，大会通过教育宗旨为“注重平民化革命化之教育，以完成国民革命”案。6日，大会致电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誓与农工同志永远携手前进。7日，通过党化教育案。12日，通过应注重农工教育案。

△　广州工、农、军、学各界800余团体20余万人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并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第六次全省教育大会开幕，苏兆征主席，何香凝、施华诺夫、陈公博等演说，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奋斗，共同解放。

5月2日　　曹锟下野宣言发表后，颜惠庆意欲观察各方反应，通电表示不愿复阁摄政，略谓：“感触时艰，殊难再出，兢兢之情，当蒙共谅。”

△　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谓：“关于恢复宪法、约法及组织政府问题，可召开元老及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之。”

△　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布维持市面办法10条、保卫治安办法17条，声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　叶开鑫部入长沙城。3日，继续南下占领湘潭，向衡阳方面追击唐生智军。

△　赖心辉驻成都之部队被邓锡侯、田颂尧改编，赖被迫卸边防军总司令职，并被监视。

△　广州华侨协会举行反抗帝国主义大会，到各地华侨团体代表及印度、越南、朝鲜三国代表，议决：一、请国民政府向压迫华侨之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严重抗议，如无圆满答复，即通告海内实行排斥彼等货物并实行经济绝交；二、唤起侨众诚意与各殖民地弱小民族联合作反帝运动；三、请国民政府通缉为帝国主义作走狗之汉奸等案。

△　上海东方图书馆开幕。

5月3日　吴佩孚电促颜惠庆组织内阁，略谓：“今京师收复，曹大总统又已宣言倦勤，贵国务院自应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以免国本陷于危境。务请即日复政，共策治安。”

△　吴佩孚电请张作霖支持颜惠庆复阁，略谓：“曹总统既以下野，则颜阁复政，实今日救国济时之惟一正规，自不宜听其谦退。”“除颜阁摄政外，在法律上实无第二种办法可以救济而无碍。……务恳即日电促颜阁早成，并商贵军各部一致主张敦促，俾骏人（颜惠庆）放手进行。”

△　孙传芳与陈陶遗、卢香亭、夏超、周荫人、萨镇冰、邓如琢、李定魁、陈调元、高世读联名通电主张颜惠庆摄政，略谓：“元首既已下野，政府庸可久悬。芳等以为即依曹公通电，恢复颜惠庆摄

政内阁，其余一切中央地方政务，均由内阁解决，俾正式政府早日底定，以收治平之效。”

△　张树声奉张之江命到北京与张学良、张宗昌会见，商议妥协条件。张学良、张宗昌表示无此权限，嘱张树声赴奉天直接磋商。4日，张树声赴奉与张作霖、杨宇霆商谈。8日，奉方派员赴张家口接洽。

△　驻京奉军发行军票300万元，下令一律通用。商民不愿使用，按七五扣计算，但奉军强行十足使用。18日，商会副会长谒王怀庆，谓军票已超过300万元定额，要求不再发行。19日，商民闭门罢市。

5月4日　　王士珍、赵尔巽等宴张宗昌、张学良、齐燮元，调停奉、直双方政见，提出折衷方案三点：一、中枢无主，百政停顿，双方应赞成颜惠庆组阁，但声明系依《大总统选举法》复职；二、颜复职后即召集阁议，通过新总理，替颜摄政：三、宪法、国会事应俟军事收束再公开讨论。

△　齐燮元代表吴佩孚访问驻京各国公使，声明段祺瑞执政时期所签对外条约均可承认；并称恢复宪法乃14省区汉口会议之决定，未便更改，张作霖对法律问题主张审慎办理，并未表示反对。

△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与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继续讨论收回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案，五国代表提出对案，与中国原案相距甚远，讨论无结果。11日复议，五国代表只允恢复民国元年以前状态。

△　驻京英、法、日公使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天津地方官有干涉盐务行政及收入之意，殊违条约。除一面已由驻津领事致节略于该长官，一面请贵政府阻止。”

△　吴佩孚通电全国各地铁路局，严行取缔各路工会，“以遏乱萌，而免赤祸”。

△　吴佩孚命汉阳兵工厂拨步枪1500支、机枪六架、钢炮五尊、弹40万发、炸弹17箱运送长沙接济叶开鑫。23日又拨给叶军子弹40万；孙传芳亦接济子弹100万。

△　湘省各界人士反对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湖南省长，谓湘有省宪法，应依法选举，不能受吴之任命。

△　国民政府决定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惩吏院，该院一切职掌归审政院办理；同日任命邓泽如、林翔、李章达、潘震亚、卢文澜为审政院委员。

△　广州三万多人集会纪念“五四”，甘乃光、黎樾庭、褚民谊等演说。大会通过援助岭南大学被革同学等案。

△　上海学生联合会举行“五四”纪念会，杨杏佛、陈布雷、杨贤江、李石岑等讲演，并有北京学联代表报告三一八惨案详情。

△　孙传芳在上海就淞沪商埠督办兼职，委丁文江为督办公署总办，委上海绅商李平书、虞洽卿、黄炎培等九人为参议会参议。翌日，孙宣布“淞沪市政方针”，略谓：“督办署之设置，在改良市政，为将来收回租界，拟造成一规范市，请市民与以试验机会，与外人尽量合作，以备解决多年悬案。”并谓：“以五省之范围保境安民，任何军队侵入我五省，即以迎头痛击驱逐出境。”6日，孙在宴外人会上称：“凡有条约上外人的权利，没有废除前，自然要尊重。”

△　北京军警奉命“严拿宣传赤化及主张赤化者”，是日起搜查中国大学、中俄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女师大等校。

5月5日　孙传芳电复颜惠庆请摄阁，略谓：“曹前总统既已通电引退，我公仍应摄行阁事。务请念国事之纠纷，慨民生之涂炭，勉任艰巨。”

△　叶开鑫部先头部队进驻株洲，蒋锄欧、谢文炳、邹尧仁各率部分途渡江，会同刘重威、邹鹏振、刘雪轩各部，分六路追击唐生智军，由湘潭、衡山进攻衡阳。

△　法权调查会议开会，确定地方视察班20人行程，预定一月，先赴汉口，再到上海、东北，最后到天津。

△　正在广州举行之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八年联合纪念大会，到2000余人，陈启修、郭沫若等演说，全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学界亦在广东大学举行马克思纪念会。

5月6日　　张作霖对颜惠庆复阁事不肯表示赞同意见，是日电复吴佩孚云：“弟近日屡有宣言，对于政治法律问题不便过问。一经表示意向，即与历次通电自相矛盾，转恐被人指摘，引起纠纷。此事悉请我兄放手进行，但于国计民生有益，弟毫无意见。”翌日，吴电张云：“既承嘱放手进行，即当勉副尊意，转达骏人（颜惠庆），请其即日摄政。”

△　颜惠庆电吴佩孚谓：财政无办法，法律有纠纷，未敢贸然摄政。同日，顾维钧抵京晤颜，称系奉吴之命来京协议组阁。

△　张作霖决定在奉发省公债大洋5000万元（合奉票1亿元）。

△　驻东北各地之日本领事在奉天会议，商议巩固金融、振兴商务、加强警备、整理交易所、统制韩人、土地商租等问题。

5月7日　　刘镇华率“镇嵩军”攻西安，与李虎臣、杨虎城之陕军激战旬日，未能取胜。是日，西安市民组“和平期成会”向双方运动和平。刘表示须陕军先行出城；陕军表示须刘承认收容全省陕军，以井岳秀、麻振武任联军正副司令。交涉未洽，复战。

△　国民政府命令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公安局饬所属严密查拿图来粤续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沈定一，“务获解办，以肃党纪”。29日，又令查拿上海派出之张平江、曾宪明、李敬业、刘钟恺四人。

△　广州农工商学各界团体代表千余人，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收回岭南大学，当被采纳。

△　武昌学生3000余人在阅马厂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同日，广州各界10余万人、汕头各界万余人亦集会纪念。长沙学生界集会，叶开鑫令军队开枪，击毙三人，伤300余人。

5月8日　　吴佩孚电齐燮元“请即促成颜阁”。齐接电后，即约颜惠庆、顾维钧、王怀庆、潘复等人与张宗昌、张学良晤商，决定推颜惠庆复职，并拟就阁员名单，征张作霖、吴佩孚同意。

△　国民军在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设军事委员会，张之江兼委员长；财政委员会，魏宗晋为委员长；政治委员会，张秋白为委员长。三委员会各设委员若干人，借资研讨各方面问题。

5月9日　　颜惠庆准备出组摄政内阁，通电各省区“暂置法律而言事实”：一、军事“亟须设法消弭，稍留垂尽生机”，战事结束后，各省公开召开会议审量地方财力民情，以决定留存兵额；二、中央财政枯竭，望各省“顾念政本，酌予岁供，第一要需厥为盐税”；三、望各军放还擅扣之车辆，以利交通。

△　汪精卫自中山舰事件受蒋介石排挤后称病匿居一月余，因不满蒋等擅权，于是日秘密离广州去香港，转往法国治病。

△　胡汉民离粤去港。

△　冯玉祥抵莫斯科。25日，冯对苏联报界谈话，主张消灭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　上海各界民众分别集会纪念“五九”国耻。各路商界联合会通告各商店一律停业一天，下半旗志哀，在门口贴“国耻纪念，闭门思痛”等标语。对日市民大会印发“五九”特刊数万份分送全国各地，并以刊印“五卅”、“六一”、“六二”、“六三”等被难烈士传略之折扇分赠各界。

△　鼓浪屿市民纪念“五九”国耻日，全体休业、罢课、罢乐，海面除小艇外亦停。工部局逮捕贴传单之学生13人。17日，厦门教育会函交涉署及驻厦门英领，抗议工部局无理逮捕学生。18日，厦门各界集会，向当局请愿，向各国驻厦领事团严重交涉，并通电全国请援。21日，厦门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代表二百人到交涉署请愿，结队游行，散发传单，要求撤换工部局捕头。

△　直隶省议会议员通电揭露军阀混战扰民罪行十事：一、强住民房，强占民财，役使、殴辱人民；二、强征车马；三、拉夫；四、奸污妇女；五、抢劫；六、勒索诈骗；七、搜刮军饷；八、干预地方行政、司法；九、扣留运输车辆；十、驻兵学校，学生废学。

5月10日　张作霖既不能违背政局由吴佩孚主持之盟誓，又不满吴一手包办之种种做法，是日致电吴佩孚仍主“政治公开”，略谓：“吾辈同属军人，与其高谈法理而为法律家所利用，毋宁使海内名流共同负责，期于折衷至当。我兄今日负天下之重，一言得失，关系安危，对于应付时局方针，自必筹之已熟，尽可放手办去，而其发动之初，仍宜博采众议，事事公开。”电末又谓：“近颇亟欲与我兄一见，如南方无甚要事，仍请北来一行，无任企盼。”

△　李景林与直鲁各军师、旅长联名通电，公推张宗昌为直鲁联防总司令，褚玉璞为副司令。

△　北京举行各军“反赤”联合办事处成立会，张学良、张宗昌、齐燮元、王怀庆等出席，阎锡山、靳云鹗、刘镇华、孔繁锦、张兆钾

亦派员参加，吴佩孚派张联棻为全权代表。决定由各方面各派全权代表一名驻办事处，谋军事上之统一。

△　法权调查会地方视察班20人启程离京，13日抵汉口，吴佩孚设宴欢迎。23日抵沪，参观华、租二界之法庭与监狱。上海商界不参加对各国代表之招待，以示反对。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反对调查，主张无条件取消领事裁判权。

△　山东代理省长林宪祖布告全省各界："遇有提倡过激邪说者，务须搜集证据，立向所在官厅告发，以凭依法重究。"

5月上旬　国民军部署对晋作战，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统率石敬亭、石友三、蒋鸿遇、韩复榘诸部，设总司令部于丰镇。战略第一步先下大同，恢复京绥线交通，第二步会师桑乾河左岸，以肃清雁门以北。中路韩复榘部、右翼石友三部等开赴晋北。

△　阎锡山为在晋北与国民军作战，以商震为总司令，谢濂为前敌总指挥，设第一线于右玉、左云、大同以北之孤山、阳高、天镇、阳原、蔚县等处；第二线为平鲁、岱岳、应县、浑源、灵丘等处。

5月1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重要会议，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及白崇禧、刘文岛等出席，议决：湘、赣同时出兵，对闽实力防御。部署：四军陈铭枢师由坪石入湘赴衡；七军六个团由全州入湘西；三军、二军之一部入湘向鄂发展；六军全部及一、二、三军各一部入赣；一军一师、五军防闽；一军两个师为预备队守粤。

△　颜惠庆与顾维钧、张志潭、张国淦在宅会议，决定先复职摄政，再改组国务院成员。

△　王士珍等以卫戍司令部业经成立，通电宣布解散京师临时治安会，京畿善后另组救济联合会办理。王等访问王怀庆，要求其维持

此后京畿之治安。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将前欧阳琳所编之海军警备队千人缴械遣散。蒋介石派兵往缴，共缴枪800余支。

△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北京银行分会临时治安债权团签订《临时治安借款合同》，发行债券200万元。

△　袁祖铭电川军诸将领，谓黔军拟出川回黔，请各方速定一人来渝接防；惟回黔路费须先筹，每月协款亦当有人负责。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电复袁请暂缓出川。

△　上海国民外交协会以古巴总统批准禁止华人续入国境议案，是日通电全国请一致抗争。

△　湖南总商会与粤汉路湘鄂办事处召集各公法团体代表开会，议决力争用英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半数修筑粤汉铁路，以期发展工商实业，所得余利则用于教育。19日，重庆商会通电主张用庚款先筑川汉铁路。

△　河南全省教员联合会发表宣言，谓：各校欠薪已逾七八个月之久，如省府再无办法维持，即全体停课。

5月12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奉命入湘援助唐生智，是日先头部队第十五团尹承纲部抵衡阳助战，在涟水北岸击退叶开鑫军，开赴攸县防御赣军唐福山部。

△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嗣后罢工纠察队无论在何地方不得擅行捕人；倘遇应捕之犯，应会同警察拘捕；以前拘获人犯，应即解特别刑事审判所审理。

△　奉直双方争夺京兆尹一职。奉方李垣以“京兆尹公署”名义发表就任启事，宣称“叠承镇威上将军（按：指张作霖）暨奉联诸帅并

地方人民推举担任京兆尹职务”。同日，恽宝惠以“督办京都市政公所”名义布告称，受京师临时治安会之请，“以评议员资格照料京都市政事宜”。15日，有数十人声言借署开会，否认李垣，另推王芝祥。李垣谒见王怀庆，王嘱李仍供职。

5月13日　北京政府由颜惠庆内阁实行复职，摄行总统职务。是日颜惠庆在北京怀仁堂复就国务总理职。旧阁员到者除颜外，仅顾维钧、李鼎新两人。颜惠庆就职通电略谓：“摄阁仅于绝续之交，暂事维持之计”，摄政期间之任务，政治方面“冀各方负有最高责任者命驾来京”，推怀相与，解除误会；外交方面，冀关税、法权两会有相当之解决；大总统之选举，期“于极短期间得有结果”。

△　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区宣布：“本年五月一日曹大总统通电辞职，本院依法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务。”

△　颜惠庆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发布如下各项任免令：准免兼内务总长颜惠庆、财政总长王克敏、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教育总长黄郛、农商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本兼各职；调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为财政总长；特任施肇基为外交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张志潭为交通总长；施肇基未到任以前，特任颜惠庆暂行兼代。

△　北京国务院发布第一号令：“本院依法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应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地方军警长官妥慎办理。”

△　叶开鑫向衡阳下总攻击令，由东路攸县、中路衡山附近、西路金兰寺夹攻衡阳。中、西两路17日起连战失利，退至湘潭属之云湖桥和易俗河。

△　湘军第一、二两师和湘西统领陈渠珍通电组织护湘军，推举

赵恒惕为总司令，叶开鑫为副司令，贺耀组为总指挥，陈渠珍为边防总指挥，讨伐唐生智。

△　国民政府任命粟威、黄绍竑、盘珠祁、甘浩泽为广西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

5月14日　颜惠庆内阁无人就职。顾维钧离京去津，声明不能担任财长，并两次电吴佩孚辞谢；张国淦谓法长难就，晨赴津；张志潭于次日赴汉；王宠惠表示视多数为进退；施肇基电辞外长职；郑谦、张景惠不肯出任，电颜力辞；杜锡珪电颜一时不能北上。

△　广州市谣言纷传，谓："政府将在十五日实行共产，商民将实行罢市"，中央银行发生挤兑现象。是日，蒋介石、谭延闿联衔布告，谓：近来谣言甚多，纯系虚构，政府对人民生命财产，必始终尽力保护，勿信谣惊扰。

△　奉系军政要员在奉天举行会议商讨当前政治、军事，张学良、张宗昌、吴俊陞、张作相、杨宇霆等均出席。翌日续议。决定对北京政府持不问不闻态度，奉系阁员均不就职；军事上仍与吴佩孚维持合作关系，共同"讨赤"。作战部署以京绥铁路为中心点，其右方地区归奉直鲁联军，左方地区归田维勤、靳云鹗等军。会议并决定：鲁军除褚玉璞部外，全部撤回山东；奉军除吴俊陞之黑龙军及于珍第十军外，全部撤至唐山以东。

△　唐生智通电讨伐吴佩孚，并派参谋长龚长鲤、副官胡迈抵粤组办事处。

△　奉、苏中东路会议在奉天苏联领事馆举行，奉方出席者为东三省总交涉署长高清和等，苏方代表为沙夫拉苏夫等四人。双方提案共24项，一连开会三日，决定要案有：一、中东路职员比例定为华五、苏五；二、苏方裁汰职员，为期三个月；三、中东路收入款项归理事会保管，分储中国银行、极东银行、美国国际银行。

△　山东省公署决发善后公债2000万元，107县共摊1360万元，济南、青岛、周村、烟台等市共摊640万元。

5月15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开始举行。中央执行委员18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九人、中央监察委员三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四人出席。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九人联名提出《整理党事案》，谓：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善合作，牵制时起，误会滋生，特提出党事案四条："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二、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三、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接着蒋介石又提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八条。议决交付审查。

△　颜惠庆以各部总长无人就职，又以国务院令派刘馥暂代内务部次长，袁永廉暂代财政部次长，陆梦熊暂代交通部次长。

△　杨森击败袁祖铭军，进驻重庆。袁部退守江北之张关铁山、界石镇一带。

△　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历时四日，议决到各地组织各界妇女联合会，援助受婚姻压迫的妇女等。

5月17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继续举行，议决通过《整理党事案》及《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件》两案，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两案规定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之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员在中央和省、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充任党中央之部长；共产党发给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一切训令，应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蒋介石为中山舰事件自请外分，谓事出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政府，专擅之罪应自请从严处分。会上有人要求公布此案真相，蒋答称不能全

部宣布，以免党务、政治、军事发生动摇与影响，且牵动甚大，故惟有自请处分。谭延闿、张静江、孙科发言庇蒋，称因部分人有政治阴谋，图谋不轨，应一致拥蒋。

△　国民军将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骥、宋哲元、刘郁芬向中外发表宣言：一、开发西北；二、保境安民；三、主持正义；四、尊重主权；五、希望国际投资。并称："在适合民意所组织之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如有假借名义发布命令者，本军惟有不承受而已。"

△　颜惠庆向北京外交团交涉，请饬安格联拨付关余50万元，充法院经费、警饷、囚粮三项。20日，奉鲁联军为争50万关税，派兵前往税务外搜查，税务督办蔡廷幹避入使馆区。27日，税务处以"治安费"名目分配给张宗昌五万，李景林五万，田、靳两军五万，卫戍五万，警厅20万，宪兵四万，还治安会四万，联军办事处二万。

△　张作霖成立奉北海军司令部，委沈鸿烈为奉北海军总司令，凌霄为海防舰队长，尹祖荫为江防舰队长。

△　奉军吴俊陞率骑兵两混成旅进取多伦西北之高原，袭击多伦。

5月18日　北京外交团在荷使馆开会，商讨如何应付新成立的颜惠庆内阁，决议颜惠庆之摄政照会为交际性质，各使单独答复；至于承认问题，应以取得段祺瑞时期所订一切条约、协定、契约、合同等完全继续有效之声明作为交换条件。

△　国民军与晋军战事开始，韩复榘部由丰镇进抵得胜口，与晋军接触，旋占得胜堡。

△　安东（今丹东）市民为日人强行拆毁我虹桥事，在元宝山前天后宫开市民大会，到数千人。大会议决要求日本当局从速停止拆

毁，归还侵占之土地，赔偿相当损失，日领西泽次向我国官署正式道歉，并保证将来永不发生此类事情。会后游行示威，赴道尹公署请愿，要求向日方严重交涉。30日，日方表示将从虹桥退出。

5月19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继续举行，通过蒋介石等人提出之《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案》，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规定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职权为：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为主席，保存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名册，督促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各部长工作之进行。会议选举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会上动议：全体党员重行登记，一律取消无中央命令之党部。

△　张作霖就政局问题复电吴佩孚，略谓：两人迄未会晤，遂使时论纷陈，不得已于1日发表声明。护宪扩法，绝对不具成见，传已护法之说，纯属子虚。对于颜惠庆复职未曾反对，惟民国十三年九月颜副署讨伐之事，人格攸关，势所不能赞成。曹锟已于民国十三年通电去职，1日通电为蛇足。颜惠庆之国务院早已辞去，又经过黄郛摄政，今日不应复职。军事未完全解决前，“中央政局只宜维持军事、外交，不必为积极之设施。将来正当办法，拟与兄到京晤谈，并邀集袍泽名流恳切协商”。

△　颜惠庆招待北京外交团，各使声明以私人名义道贺，与现政府为事实上之往还。

△　旧国会贿选议员380余人集北京。是日，张鲁泉等80余人在抄手胡同开众参两院协商会，向乃祺任主席，通过决议事项：一、推代表见颜惠庆，请拨经费；二、推代表见王怀庆，请收回两院；三、电请沪、汉同人北上集会；四、声明国会未复会前，颜阁所有措施概不负责。

△　北京各大学教授、全国教育会旅京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代

表等70余人集会，主张敦促英国正式声明退还庚款，由中国设一董事会保管及支配。

△　上海总商会电北京政府海军部、交通部、税务处及孙传芳，力争领港权自主。指出：近日忽有外人组织考试委员会，招考请领长江吴淞至汉口间600里领江执照之人员，此举非但妨及华人领航权利，亦与长江国防有关，应请严予阻止。

5月20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规定全部党员限三个月内重新登记，登记表册要特别声明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会议选定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之国民党代表为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吴敬恒、顾孟馀五人，李济深、何香凝、经亨颐三人为候补代表。

△　唐生智军与叶开鑫军战事激烈。是日，唐军进至湘乡、湘潭间，并占永丰、湘乡，翌日又克复湘潭。叶集援军反攻，由宁乡绕攻湘乡，23日，叶军复进驻湘乡，唐军刘兴、何键部分向衡山、宝庆退却。25日，叶军占永丰。28日，谢文炳部入新市，向攸县前进。29日，刘雪轩进驻宝庆褚塘市，蒋锄欧部深夜克衡山，并向衡阳前进。

△　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联合各绸业公所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反对《中日关税互惠协定》。国货维持会会长王介安指出，所谓《中日关税互惠协定》，对于日货输我国者，税率为值百抽七五，而我国织物运日、韩者，仍须征值百抽百之重税。“我国关税一日不能自主，则中国实业一日无发达之希望”。大会议决各团体电呈政府力陈利害，推代表三名赴京接洽，并向上海有关当局请愿。

△　上海总商会赴日参观团虞洽卿等58人，乘“上海丸”出发，次日抵日。虞在长崎宴会上称：“本团此行，一方面固为实业上之观摩，同时亦负有增进邦交之使命。”

5月21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继续举行，通过宣言起草委员会

案，决定发布对时局的宣言，接受海内外同胞的请愿出师北伐。

△　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兼理湘省民政，刘文岛为政治部主任。

△　国民政府以胡汉民现在请假，令陈友仁暂行代理外交部长。

△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粤省盗匪猖獗，为害地方，为迅速肃清匪患，各军负责所驻防之各绥靖区范围，认真清剿，两个月内一鼓荡平。

△　阎锡山到大同视察，并电告北京各方面，谓国民军六路对大同进攻，已被晋军击败，请奉直联军迅速进兵夹击。

△　关税会议专门委员开协议会，协议按华会协定二五及五厘的增税率，将所增收的税款3400万元存于各国银行。

△　奉、苏中东路会议开会，双方提出提案。奉方提案有：一、局长权限分出一半给理事会，路员中苏各半；二、军事运输优先，运费记账；三、增加护路军经费；四、中东路财政改用现大洋；五、偿清华方资本500万两之利息；六、偿还中国政府之垫款；七、由理事会保管收款，存储中国银行。苏方提案有：一、组织中苏公共机关管理中东路属地；二、由中苏理事会裁决一切大事，撤废督办公署；三、全数返还苏联内战时进入中东路之火车；四、改善护路军与路员关系；五、中东路附属学校教育改革问题；六、保障职工组合权；七、中苏铁路联运问题；八、苏人参与哈尔滨市政；九、规定松花江航权等。

△　收回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案移地方办理，是日，丁文江、许沅与英、美、日三国驻沪领事会谈，开始交换意见。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孙传芳、陈陶遗称，北京交涉未决各点，请令丁文江、许沅仍照外交部方案交涉，除刑事陪审外，其余收回监狱等条可酌量退让。

△　汕头罢工委员会纠察数人，赴角石英领事馆附近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标语，驻汕英领事以手杖扯撕标语并殴我纠察队员，发生冲突。该领事回署后用旗语传令英军舰，派出水手14人登陆追击纠察队。次日，汕头交涉员向英领正式提出抗议。英领反提出四条件：一、以后禁止纠察队赴角石；二、不得再在英领署前贴任何标语；三、惩“行凶”纠察；四、道歉。汕交涉员只允第二条，余拒绝，并要求撤退登陆海军。

△　日本渔船200余艘、军舰一艘侵入我国渤海之龙口捕鱼，山东当局向驻济南日领抗议，并派兵舰二艘前往阻止。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芳泽，“请饬该处领事禁阻，毋在中国领海捕鱼”。

△　吴佩孚以法统恢复，促旧国会贿选议员速赴京筹备自由集会。是日，在汉百余名贿选议员专车北上，吴佩孚为之饯行。

5月22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通过《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后结束。谭延闿读闭幕词，谓此次决议整理党务，实是确定两党合作办法，把年来一切纠纷定了个解决办法。蒋介石演说称，以后要取消一切怀疑及成见，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均须根本消灭。谭平山谓，此次决议“整理党务”案是为巩固革命基础，团结革命势力，发展革命事业，共产党并无屈服，乃事实上希求革命成功。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比利时公使向比国外交部声明：《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至本年10月27日期满后应即失效，重行另订新约。

5月23日　杨森指挥所部第三师自垫江进击占据重庆之袁祖铭黔军，是日唐式遵部攻入重庆。袁祖铭率军退南岸，下令所部由川南回黔。

△　贺龙率部与川、黔援军抵沅陵，电桂军参谋处谓，“决以奋斗精神求主义贯彻，俟湘西障物排除，即以所部从诸公后”。翌日，唐

生智电国民政府谓："贺龙、姚继虞两部现正设法收编。"

△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就国民党举行二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声称："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对于《整理党务案》，"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

5月24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奉命入湘援唐生智军，由韶关向郴县兼程前进。

5月25日　国民党中央发表《整理党务宣言》，略谓：总理毅然改组国民党，与一切革命势力合作，日益取得国内外广大群众之同情，今已成为中国最大之政治势力，将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反动者仇视、恐惶，出其暴力、诡计以攻国民革命运动，最毒之武器为散布谣诼，以引起吾人内部之纠纷，构成疑虑。为明示决不让帝国主义与军阀利用反共产之口号以摧残国民革命，乃一致接受整理党务案，以消灭对于合作原则之真正目的之怀疑。此决非对任何方面表示妥协，而实为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以与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

△　关税会议开会，列国代表借口中国各省混战，政局不定，即使规定新税率亦无法实行，现今只能依华会协定先办附加税，普通品加二五，奢侈品加五。

△　英国庚款委员团在天津发表宣言，略谓：建议在中国设立庚款董事会，管理英国庚款；董事会成立时，现有咨询委员会即解散；董事会有全权随时决定将庚款用于教育及其他方面，并办理永久基金之投资；每年年终董事会将本年度庚款收支作一报告送呈中、英两国政府。

△　奉天金融市场陷于混乱状态，交易所不能开市，奉票连日跌

落，物价继续高涨。是日，日本人之奉天商会为此向张作霖提出严重警告。27日，奉方在京、津收购现洋150万运奉救济奉票。

5月26日　吴佩孚离汉北上。途经郑州、开封、洛阳等地检阅军队。30日，在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密谈晋北军事形势与战略，以及对中央政局善后意见。

△　吴佩孚离汉北上前，委任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办，田颂尧为帮办兼四川西北屯垦使，杨森为四川省长；并委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

△　国民军韩复榘部在雁北连日向孤山进攻，是日占宏赐堡，大同动摇。晋军竭力抵抗，与国民军激战数昼夜。阎锡山急向奉张表示愿以晋东防地让奉，请奉军速攻多伦，以牵制国民军。

△　全国省议会联合会通电，对于国是问题，主张以公开之方式，纳政治于轨道。

5月27日　陈其采奉孙传芳之命赴粤与蒋介石洽谈后返沪，是日语记者云："孙总司令前以蒋介石处置中山舰事件极为钦佩，因派鄙人赴粤与蒋接洽，蒋氏对孙氏表示亦极好。"又云："孙氏曾有电致粤，认湘战事为湘省内部问题，绝对恪守中立。"

5月28日　吴佩孚致电汉口留守总司令部，命残留部队全部迅速开拔北上，同时命京汉铁路南局备车。

5月29日　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主席团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接纳该会七项议决案：一、取消火油专卖；二、省港罢工案，由省港商、工代表，广州政府代表与香港政府代表共同组成一委员会速谋解决；三、对除盗安民，望政府拟定全盘具体计划，积极进行；四、组织劳资仲裁机关，解决劳资间之一切冲突；五、惩办贪官污吏，慎选民政人员；六、严禁散布谣言；七、建筑道路，黄埔开埠，改良港

口，完成粤汉铁路，普及教育，整饬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国民政府代表表示完全接受，拟明令公布，并与人民合作。

△　上海各团体代表5000余人在闸北方家木桥举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礼毕游行。同日，上海学生联合会集会追悼五卅惨案死难之学生烈士，陆定一、杨志英分别报告烈士陈虞钦、何秉彝事迹。30日，各界民众五万人举行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通过告全国同胞宣言，誓言“继续奋斗，抵死反抗，不达我民族完全解放不止”。会毕游行，沿途高呼“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下午2时，工人、学生组织之讲演队在英租界南京路、九江路一带活动，游行群众亦冲入租界示威，各种车辆停驶。工部局派武装巡捕、摩托队、手枪队威胁，并用水龙冲击群众，群众用砖石木棍与之搏斗，并击毁电车69辆。是日有七万余人罢工，商人亦多罢市。

△　重庆城防部布告：宣传赤化、共产者枪毙；传单稿件先送部审查；男女不得混合讲演。

5月30日　蒋介石在广州逮捕新改编之第十七师师长吴铁城，十七师之一部被遣散。张静江、孙科、伍朝枢为吴缓颊无效，伍即请假离粤。

△　国民军韩复榘部继续猛攻孤山，晋军凭坚固工事据守，激战数昼夜。晋军派出挺进队，突破国民军阵地。宋哲元亲率卫队团乘钢甲车驰援，在大炮掩护下猛攻，击溃晋军挺进队，是日占领孤山。国民军继续向大同前进，同日占领大同车站及外城，京绥交通恢复。

△　在京及自汉口抵京之旧国会贿选议员174人发出通电，略谓：十三年11月段祺瑞窃据首都，毁法乱政，国会中断。现在讨赤成功，暴力既除，国家不可一日无国会，兹决在京继续开会。

△　各地群众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广州20万人举行纪念大会，会后游行。厦门鼓浪屿全市休业，学生游行示威，各界代表公祭“五

卅”烈士。九江30余团体万余人集会、游行。杭州各界3000余人集会游行。郑州各界万余人游行、讲演。武汉、南京分别举行纪念活动。

△　英、美、日三国驻京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切实禁止直隶褚玉璞扣留长芦盐税，声明倘中国不能照办，将向关税会议提出整理盐税担保之外债问题。

5月31日　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陈果夫等人在张静江寓所会商，议定设立总司令部统率北伐各军。

△　国民政府为成立一周年下令切实办到下列八条：一、取消煤油专卖，另定火油捐办法；二、解决省港罢工，着外交部速与有关方面接洽；三、除盗安民，督饬各军于两月内肃清；四、组织劳资仲裁机关，由劳资双方各派等数代表，以政府委员为主席；五、禁止人民团体擅用武器，违则以叛乱治罪；六、从严查办违法贪官污吏，人民可向监察院陈诉；七、查拿散布谣言扰乱治安及阴谋煽动之乱党，按军法惩治；八、整饬教育，建筑铁路，改良港口，由各主管机关规划进行。

△　吴佩孚在石家庄开军事会议，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等参加，阎锡山特由太原赶来列席。同日，吴佩孚因靳云鹗不进兵南口攻国民军，又屡梗与奉合作，发表命令称：“靳云鹗逗留保定不进，虚糜饷糈，贻误戎机，着免去本兼各职，所有讨贼联军第一军总司令职务，由本总司令兼领。”

△　吴佩孚在石家庄电约张作霖在京会晤，并告以对颜惠庆之国务院表示“只望其过渡承转，并不坚持长期”。

是月　各地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反抗压迫，举行罢工。上海青蓝染业工人千余名反对大行坊主干预小行公所、指派董事，实行罢工。大连周水子福纺纱厂1000多工人罢工，反对厂主严酷虐待、增收伙食费以及工头肆意毒打。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五纱厂工人为反对

厂方无理开除并砍伤工人实行罢工。汉口英美烟厂新旧两厂3000多工人罢工，反抗英国资本家裁减工人。无锡各丝厂8000多女工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罢工10天取得胜利。

6月

6月1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人选：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顾孟馀代宣传部长，甘乃光为农民部长，叶楚伧为秘书长。

△　广西依照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会议决议案改组省政府，举黄绍竑为省政府主席。

△　援湘之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于5月下旬到达衡阳，是日晨，于衡阳金蓝寺北端三合桥一带击退叶开鑫军之进犯，两军隔涟水对峙。

△　吴佩孚电张作霖：已免靳云鹗职，请速入关会攻国民军。

△　黔军袁祖铭部从四川败退，大部退回黔边，小部退湘西。是日袁退抵松坎。

△　各省区旅沪公民联合会致电斥责吴景濂、张鲁泉等人率集贿选议员入京图召集国会，充当军阀之傀儡，作祟政变。

△　全国省议会联合会开会，议决分电英国首相、驻京英使及庚款委员会代表，提出英国退还庚款之处理办法，要旨为：一、仿照美国退还办法，一切主权属中国人民，英政府得于不妨碍我主权范围以内，同负审查监督之责；二、庚款退还后之用途，应以补助全国较为重大之水利、交通事业及关于劳工界之教育、卫生事业为范围，以比较能使全国普遍受益为标准；三、凡受庚款补助而完成之生利事业，其将来之收入应划出一部分作全国教育事业之基金；四、关于分配预

算、审核用途及一切出纳事项，由中英两国各推代表组织董事会负责办理。

△　奉天当局为发行5000万元公债，命令各县知事从本日起，各商民每资本100元负担九元；从9月1日起，农民每田一亩负担一元。

6月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通过张静江、宋子文为本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原五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谭延闿，现除谭外四人均告假，无法开会，遂补张、宋二人。

△　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职。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5月31日抵永兴后，接唐生智急电，即以强行军挺进，是日到达安仁。翌日赴渌田、龙家湾前线，迎击谢文炳部。4日晨，谢部败退，一部窜入茶陵方面，主力退入攸县，毁桥而守。5日晨谢部弃攸县向黄土岭方面退却，下午2时，独立团入攸县城。

△　田维勤军一部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军，由京北沙河方面南下直迫万寿山，与直鲁联军激战。国民军由昌平南下策应。吴佩孚得悉后即下令向该部进攻。

6月3日　　吴佩孚派员致意颜惠庆：请于本人到京前组成国务院，免使本人有操纵之嫌。颜旋即派孙润宇赴津劝张国淦、张景惠、张志潭来京就职。

△　吴佩孚在保定与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等开军事会议，决定三路进攻南口国民军：东路田维勤，中路王为蔚、王维城，西路魏益三；另请奉军攻多伦。

△　驻京美使致节略于北京政府，表示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商标

法》，自9月1日起实行。英、葡、日、意、丹、荷、法等国驻京使节亦先后函告北京政府外交部承认《商标法》。

△　粤农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宣言声援北伐，略称："此次北伐关系中国生死存亡，人民更宜与国民政府合作到底，完成国民革命。"

△　河南省议会开茶话会，讨论靳云鹗解职后之省长人选，电请吴佩孚实践"豫贤治豫"之宿诺。同日，吴派熊炳琦继任省长，令其即日赴任。4日，省教育会、农民协会、工会、总商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等团体开会集议，推派代表访寇英杰征询意见，并发电请"遴选豫贤"，"或以吴寇督兼长"。12日，各团体又联名电吴反对熊长豫。吴不理。16日，熊抵开封就豫省长职。

△　广州出版的《农民运动》杂志据各省报告和调查所得之不完全统计，截至本日止，粤、桂、豫、川、湘、鄂、鲁、直、赣、热、察、陕12省中，粤、桂、豫、鄂四省已成立省农民协会，36个县成立县农协，294区成立区农协，5023个乡成立乡农协，共有农协会员98.1442万人。

6月4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重申两党合作之政策符合两党之主义及宗旨，"两党之共同职任，即在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其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指出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竭力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摧残中国之革命。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之"整理党务案"，应当是"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祛除一般无谓的疑忌，然后决然肃清内部，打击反动派，方能整齐革命之战线，以全力对待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统治与压迫"。关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决议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

△　陈独秀致函蒋介石，批驳蒋4月20日之《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讲演，指出中山舰事件绝非共产党之阴谋，而是孙文主义学会一伙人的反革命勾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高语罕更无有可指摘之谬言。至于对北伐，陈说：有几个同志“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这“只有缓进急进之分”，说不到“根本推翻”。陈在信中还阐述两党合作之政策，以及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后的信仰与言行问题，批驳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的谬论。陈函中还有“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谁反对蒋就是反革命，就请蒋枪毙他”等词。

△　吴佩孚电促留汉国会议员扫数北上，谋重开旧国会。是日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赴保定。

△　东北航空司令部自秦皇岛移奉天，飞虎队长皮士良任东北航空副司令。

6月5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陆海空各军悉归总司令统辖，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均直属总司令部。

△　张作霖入关抵津，召集奉系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与吴佩孚之军事合作，决定请吴主持进攻南口，直鲁联军为辅；奉军专任进攻多伦，晋军反攻晋北。

△　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香港英总督，谓：国民政府对香港罢工事，已准备委派全权代表宋子文、陈公博、陈友仁三人负责解决，盼港英当局亦委派同数而有同等权力之代表，共同协商解决办法。

△　奉、苏会议，苏方提出：一、取消奉方要求撤回加拉罕之提议；二、中东路沿线之警察、市政及其他行政机关，聘请苏联人作顾

问。市政参事人员中苏各半；三、承认在满洲之职业同盟；四、解除中国各机关任用之白党及募集之白党军队；五、撤废中东铁路督办署；六、通用苏联纸币；七、北满迄中苏边境，由中苏两国军队共同警备；八、苏联政府及中东路附属财产一律返还。奉方认为要求过苛，杨宇霆宣布停止会议。

△　湖南省议会电促赵恒惕回湘。叶开鑫联合各界电孙传芳、吴佩孚，请转促赵恒惕来湘主持一切。

6月6日　　吴佩孚决以武力解决西北国民军，将“讨贼联军”所部分编四军，自兼第一军总司令，直辖田维勤、王为蔚等部，任命彭寿莘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总司令，杨清臣为第三军总司令，齐燮元为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副。是日下全体动员令。

△　阎锡山为保卫大同，电商震饬防守武周川之部改取攻势，向孤山前进。是日午，晋军在栲栳山北东虎坟与国民军激战。次日，韩复榘调所部一师、迫击炮一团由白马城、圣水沟、古城三路奋力攻击，包围大同。晋军张培梅、傅汝钧两部退守城内。

△　刘湘将川康边防督办及四川军务督办两署由成都移驻重庆，省城交帮办刘文辉维持。临行通电称：川境已无黔军踪迹，川军亦不越境再追。

△　黔省军务会办彭汉章率领所属全部移驻黔东铜仁及湘西芷江，电请国民政府改编，听候调遣。14日，彭派安健与国民政府商妥，领取饷械，助唐攻叶。

6月7日　　吴佩孚派张其锽、张志潭抵天津，与张作霖代表郑谦、张景惠举行预备会议，协调双方关于军事合作、北京政局及法律之意见：一、合作进攻西北国民军，奉攻多伦，吴攻南口，直鲁联军任后方，各军饷糈自筹；约定决不单独与西北言和；二、在军事未收束前，暂由颜阁维持政局，奉方可承认为事实上内阁，俟军事结束后

再行磋议。惟颜阁如以复职方式到任，则因十三年曾免张职，奉方未便赞同；三、法律问题系全国事宜，应行公决。疆吏任免，不仅吴、张双方须一致，且元老、名流、人民意见亦须兼顾。翌日继续协议。

△　国民政府为筹集北伐军饷，决定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中央军政费用支出搭发公债两成；并决定粤汉路车费加五征收。

△　国民代表会议通电声明，旧国会因非根据民意，故无存在之理由。

△　张作霖扩充海军，将营口练军营及渔业保护局军队合编为三团，每团三大队，不足之数添募凑齐，统归并于奉北海军。

△　上海总商会、商联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通电反对颜惠庆以秘密解决五卅惨案及承认二五附加税作为向外国大借款之交换条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全浙公会等亦电颜警告。17日，颜复电否认。

6月9日　　吴佩孚、张作霖之代表张其锽、张志潭与郑谦、张景惠继续会议。除军事方面双方赞成合作讨伐国民军外，北京政局及法律问题各持己见。吴方主张护宪，奉方称宪法已无实行可能。吴方表示希望勿变更国会，听其自由召集；奉方谓此系全国事宜，应将来公决。对北京政局，奉方仍反对颜惠庆等人以复职方式到任，若改为推戴性质，亦可默认；吴方希望奉张听其一度成立，至久远之计，可以双方推诚确定人选。会议陷入困境。是日晚，张作霖电召杨宇霆来津，授以全权与吴方继续谈判。

△　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各军长均无拥蒋表示，是日何应钦在士敏土厂军委会召集各军长会议，将拟定之拥蒋电稿请各军长联名发表，促蒋早日就职。谭延闿、朱培德、李宗仁等对之冷淡，表示俟审查后始可署名。

6月10日　吴佩孚、张作霖之代表在天津继续谈判，未谐之点在于护宪问题：吴方谓护宪足以防止循环革命，宪法不良尽可修改。奉方谓宪法无实行可能，与其骛名忘实，不如根本推翻，并列举四点理由认为吴不可护宪：一、宪法不良，全国诟病，贿选曹锟，议员人格破产，故不能再集会改宪；二、宪法规定省长民选，吴则自行任命，名护宪而实毁宪；三、宪法规定军费不得超过全年收入四分之一，吴军饷已占四分之二；四、宪法应行征兵制，吴军仍系募兵制。

△　关税会议举行正式会议，英国代表麻克类提议：中国正式政府迟未成立，英国政府以为关会应即宣告停止，俟将来有继续开会必要时再议。美、日代表主张应遵守华约规定，议决二五附加税及五分奢侈品税，以完成此项会议，中国正式政府终当出现，姑再静待一时。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茶陵击败谢文炳部，即占茶陵县城；继又在蓝岭告捷。谢文炳部退湖迹港。

△　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以各国将大量毒物输入我国，分函各西报指出：今年1至3月，江海各关查获由日本及欧洲运来之毒物，即有8536两之多，约占去年全年查获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估计非法运入中国之吗啡，每年不下27吨。故欲解决中国及世界之毒物问题，务须各国一致合作，庶克有济。

6月上旬　国民军谷良友旅进攻右玉，乘晋军守城主将王振恩离右玉去左云，一举克之。骑兵赵守钰旅监视左云，旋亦克，俘王振恩。

6月11日　张作霖、吴佩孚之代表天津预备会议结束，协定：一、军事合作到底。主要战略为讨伐西北国民军：南口方面以直鲁联军及奉军一部为主力，吴军一部牵制；奉军主力集于多伦方面，晋军主力集于大同方面；同时积极攻击热北之国民军，奉军全力攻之，必

要时吴军出援。告一段落后，吴以全力图粤，必要时奉出兵援助。二、奉方否认护宪及颜惠庆内阁，决定不谈护宪，颜之内阁自动辞职，另组事实内阁。三、另选新国会。翌日，杨宇霆回奉天，张其锽赴保定。

△　中苏赔偿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苏方对货物损失赔偿案大体应允，惟被白党截夺去之损失及无确实证据者不允赔偿。

△　汉口万余人举行汉口惨案周年纪念大会，要求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抵制英货，并通电南北当局，严重交涉“汉案”。会后游行。武昌各界在黄鹤楼开追悼会，追悼惨案死难者。

△　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通电，略谓：关税会议只完成二五及五厘案，而抛弃关税自主权，殊失全国人民之望，吾人绝对反对之。希望当局为国家计，一致力争，务必获得关税自主权。

6月12日　颜惠庆邀集顾维钧、杜锡珪、杨文恺到国务院，就天津张作霖、吴佩孚代表预备会议之协议商讨应付办法。

6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教育行政委员会提案：采用法国大学院制度，组织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及教育行政机关，并议决任蔡元培为院长。

△　北京政府各部、院机关经费无着，颜惠庆终日避居西山，财长顾维钧迟不就职，财政部各科长亦均躲避。各部各自为计：海军部由杜锡珪于两淮盐款上挹注，先发一月薪给；交通部由邮余凑一月经费，先向内国银行借垫；农商部将矿区税款借抵数万元；内务部发薪俸代用券两成；教育部分得俄款三成；军警费由海关付使领费下拨33万元，卫戍司令部、警厅各得十余万。

△　颜惠庆以财政匮乏，无法维持，电孙传芳请拨还两淮盐款之半数解京。是日孙电北京政府，汇还110万元，指定50万充吴佩孚军

饷，60万给政府过端阳节用。北京政府接得该款，扣债35万，军费70万，余五万用作国务院招待吴佩孚、张作霖。顾维钧再商请孙速解6月份盐款。

6月14日　吴佩孚在保定设“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是日向所统各军下总攻击令，命立即攻击南口国民军。田维勤、魏益三各率军前进。

△　孙传芳在南京召开苏、浙、皖、闽、赣五省军事长官会议，决定继续保持东南五省现有局势，不加入任何战争之旋涡；以重兵增防徐海一带之边防，加意保护津浦线交通；与鲁军各在境内会剿土匪，互不越境，以免误会；制止关于五省军事之谣传等。

△　广州各界246个团体30万人在东校场集会，庆祝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会后大游行，高呼“赞助北伐”、“拥护国民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

6月15日　吴佩孚电请颜惠庆暂维持数日，并有“一切苦衷均谅解，本人为敷衍张作霖计，致令兄难堪”等语。吴并电顾维钧称：颜阁“必须完成，现正催乾若（接即张国淦）诸君到京，请公先到部”。次日，顾就财长职，到部接事。张志潭、张国淦亦由津入京。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部自广州出发北伐，广东各界妇女代表何香凝、邓颖超、孔若伟等到车站欢送，并赠绣有“铲除军阀”四字之纪念旗。

△　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组织随军红十字队，开赴北伐前线。广州红十字会亦组织随军北伐救护队。

△　国民军方振武、孙连仲两部攻克阳高。继以一部包围天镇，一部协助徐永昌、弓富魁攻灵丘、蔚县。

△　奉军吴俊陞部约二万抵达多伦，后路约三万到热河。

△　彭汉章、罗觐光率师定黔，彭任黔督，罗任会办。25日，彭又在铜仁就吴佩孚所委之湘黔边防督办职，声称愿追随吴。

6月16日　　驻广州英总领事普理宁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5日照会，略谓：罢工已成过去之事，香港政府准备派代表三人，与广州政府谈判排斥英货问题。

△　古巴政府颁布限制华人入境令，规定华商、华工于1899年4月14日已在古巴者，须离古巴后方准再入境；水果店、洗衣铺、种植园及小贩之华人，一经出境即不准再来。是日，北京华侨公会呈北京政府外交部，请向驻京古巴公使抗议，并电我驻古公使严重交涉。

6月17日　　四万余直鲁联军、四万奉军、五万吴军准备会攻南口国民军，布置防线由密云展至雁门：密云归于珍，昌平归于济川，沙河归褚玉璞，怀来归田维勤，蔚县归魏益三，怀柔归张培梅，雁门归商震指挥。田维勤部先锋已抵千军台，王为蔚前锋已抵大龙门，谭庆林部占领口北要隘四海城。

△　杨如轩、杨池生、赖世璜等派代表杨廷抵粤，谒朱培德、蒋介石等人，报告赣方保持中立等情。朱、蒋允暂不派兵入赣，专向湖南发展。

△　贿选议员“油房胡同俱乐部”集会，商议张作霖、吴佩孚代表“天津协议”另选新国会事，决定乘张、吴未晤以前赶快号召，先举行集会式。会上推出薛丹曦、叶夏声、周之翰等八人谒颜惠庆，要求收回议院旧址；并派叶夏声等次日赴保定晤吴，力说护宪。

6月18日　　张其锽到京，秉吴佩孚旨意，邀国务院诸阁员及江天铎、符定一、劳之常等协商，决定先举行第一次国务院会议，任命各部次长；第二次国务院会议后再发颜惠庆辞职通电。翌日奉系代表郑谦、杨毓珣抵京，与张其锽协商颜阁开一度会议即去职，并以国务院全体成员名义发电声明系“事实内阁”。

△　吴佩孚组织援湘军助叶开鑫攻打唐生智，委任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前敌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防守右翼常德、澧县一带；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率赣、粤军任左翼作战；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唐之道部两旅及阎曰仁师为总预备队。

△　韩复榘留一部会同张自忠旅监视大同晋军，余皆南调，会同石友三部攻雁门右翼。是日，国民军与晋军在雁门关激战。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议决改组政治训练部，由国民党中央特设军事部接管该部工作，军事部内设政治训练委员会决定一切计划，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执行。政治训练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同指派组成。

△　李宗仁仿黄埔军校办法，在广西成立军官学校，聘两名苏联人为顾问，招生500名。

6月19日　　贿选议员薛丹曦等人赴国务院见颜惠庆，强借怀仁堂开会，被拒；旋派人前往硬要接收，几致冲突，无结果而散。即至油房胡同集议，扬言若得不到会场，露天亦要开会。颜防贿选议员强占怀仁堂，密布军警特别戒严。吴佩孚电颜惠庆、王怀庆，谓现国会拟在怀仁堂先行集会，届时请派军警保护。

△　北京14机关代表300人赴财部索薪，陆军部全体出发，茶房夫役均随行。齐到财部门口，被警察拦阻，推代表14人见顾维钧，仍不得要领。京畿卫戍司令部函各部、院禁止索薪。

6月20日　　吴佩孚急电颜惠庆，谓："昨以两院议员有要求在怀仁堂开会之举，曾电请派军警保护，刻因情形不同，恐滋他方误会，恳通知议员诸君少待，俟两院地址收回后再开会，希婉为劝慰。"贿选议员闻吴电后大为惊讶，即电符定一等向吴说项，务达开会目的。

△　赵恒惕自南京到汉口，以调解人自居，分别电劝叶开鑫、唐

生智息兵止争，并电阻蒋介石派军入湘。

△　直鲁联军之军用票，市价跌至三折，京中一批大小商店陆续倒闭。是日，北京总商会开会议决要求张宗昌停止使用军用票，并向张作霖、吴佩孚、颜惠庆要求赞助。29日，张作霖召集银行界及商会代表往谈，责成张宗昌收回军用票。

6月中旬　　石友三率部由吴家窑进攻晋军，克怀仁、岱岳；复与韩复榘联络，攻击山阴、雁门晋军左翼。

△　国民军方振武率部攻克应县，继向浑源进攻。

6月21日　　国民军张之江等各将领联名发表对外宣言，并电驻京各国公使：一、否认吴佩孚、颜惠庆、顾维钧等人有代表中华民国国家之权；二、北京政府假借中央名义与任何国家签订之条约一律无效；三、愿各国勿予各军阀以任何援助。

△　上海米价狂涨，每石涨至十七八元，工商联合会是日开紧急会议，决请孙传芳“关怀民瘼，设法补救”，并推举调查员调查有无奸商囤积居奇。郊区贫民连日向富商借米。

6月22日　　下午5时，颜惠庆按张其锽、郑谦商定之方案举行国务院会议，除郑谦、张景惠、王宠惠外，颜惠庆、顾维钧、杜锡珪、张国淦、杨文恺、张志潭均到。会议通过即发颜辞职、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电，任免部长、次长令，欢迎吴佩孚、张作霖入京电等。

△　北京国务院通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及各省军民长官，略谓：“政枢中断，内政外交，动呈险象。京师根本重地，同人等经各方敦促，不得不勉为事实上之维持。越月以来，区区苦心，当能共谅。现军事正在积极进行，而关税会议复须继续谈判。自顾菲材，实难胜任，亟请另选贤俊，主持一切，庶目前外交、军事，可赖推行；将来完成法律问题，亦可蕲循序而达。”

△　北京政府改组。颜惠庆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令：特任田应璜署理内务总长，任可澄署理教育总长，顾维钧兼盐务署督办，李鼎新为曜威上将军；任命王荫泰为外交次长，江天铎为内务次长，张竞仁为财政次长，符定一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金绍曾、何恩溥为陆军次长，孔昭焱为司法次长，王湘为农商次长；派朱兆莘为国际保工大会全权代表第一委员，萧继荣为第二委员。

△　北京国务院摄行大总统令：准免颜惠庆国务总理兼代外交总长职，特任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

△　北京国务院发电欢迎吴佩孚、张作霖入京，谓："国事久悬，闻旌节莅临，遐迩向望，请早日命驾入都，共商大计。"

△　法权调查会议开会，讨论各国代表在各地调查之报告书，决定汇集各代表之报告，制成总报告。

△　北京民国大学校长雷殷及教授一名被奉军以"有与国民军及共产党有关系"之罪名，拘捕送往天津。

△　大连周水子福纺纱厂资本家雇用大批工贼、打手，携带武器，寻坚持罢工两月有余之工人殴斗，罢工工人数名受伤，四名被捕。工贼并用刺刀刺杀当地农村屯长，激起农民愤怒，与工人联合共3000余人，于24日午后在周水子结队游行，围绕福纺纱厂三周，并齐至警察派出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

6月23日　　杜锡珪到北京国务院就兼代国务总理职，发表演说云："颜总理苦心维护，月余来辛苦已极。我此来暂任过渡，新阁俟吴、张两帅入京后发表。"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北伐作战计划：分三路向北挺进：西路为主力，正面进攻，由第四、七、八军五万人组成，沿粤汉路进攻两湖；中路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两师，担任警戒，保障主

攻方向侧翼的安全，并准备进攻江西；东路由第一军第三师组成，防御福建。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各军、师及各军事机关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与会，其中有第二军副党代表兼第四师党代表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林祖涵、第六师党代表萧劲光。会议决定各师组织宣传队，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任队长，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党部训练班、农民运动讲习所挑选600至800名宣传人员。会议推定林祖涵、李富春、恽代英三人审查宣传队组织条例。

△　广州各界纪念沙基惨案，国民政府通令下半旗志哀，学校及机关均放假，工商多休息，30万人参加纪念大会。民众冒雨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21日，在沙基马路建立烈士纪念碑，碑镌“毋忘此日”四字。

△　旅沪豫省绅、学两界组织之反吴驱寇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反对吴佩孚利用红枪会入据中州，使寇英杰入长河南，劫取民财，增加杂捐。

6月24日　国民政府派卢兴原为法官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湛滩芬、潘应荣、涂垚、杜之秋为委员。

△　张宗昌派齐道荣赴哈尔滨购买军火，并招募白俄匪兵。

6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常务委员及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委员。

△　中苏会议之债务赔偿委员会开会，王文典以文件致苏方代表，请于最短时期内实行赔偿已经审查完竣且为苏方承认之货物损失。王并续提卢布损失案。

△　阎锡山得吴佩孚担保不作假途灭虢之举，允王维城等部由正

太路援晋。28日，阎电田应璜请张作霖命奉军速攻多伦，以解晋危。

△　河南各界群起反对熊炳琦任豫省长，各公团开公民大会，组织办事机构，发表驱熊宣言。

6月26日　张作霖由津到京，王怀庆及先一日到京之张宗昌、张学良到车站迎接。警察总监李寿金以迎接清皇帝礼仪，净道铺沙，结彩通衢，军宪警戒，以示恭迎。张电促吴佩孚迅速入京。

△　田维勤对国民军下总攻击令。张万信、陈鼎甲两旅进占青白口、雁翅，国民军沿河退却。

△　褚玉璞在天津设直隶善后公债局，发行短期公债400万元，长期公债600万元。

△　上海闸北32家丝厂女工万余人，为反对资方虐待及要求驱逐工贼穆志英，联合掀起全面大罢工，捣毁工厂机件，资本家会同警察当局镇压，逮捕罢工工人朱大英子。翌日，罢工工人发表宣言，向厂主提出五条件："一、增加工资五分；二、上午六时上工，下午六时下工；三、不准穆志英进厂收捐；四、不得滥罚工资；五、不得拖欠工资。"资方被迫允诺，警察厅长严青阳亦不得不撤销"丝厂女工研究处"。罢工获胜。30日复工。

6月27日　吴佩孚由保定抵长辛店，田维勤等赶来迎接。翌日晨6时，吴偕张其锽、田维勤等由长辛店乘车抵京，王怀庆、张宗昌、张学良等到车站欢迎。

△　李景林通电下野，除自述对国民军两次作战功绩外，并声明因咯血不能胜任吴佩孚所委之讨贼联军直军总司令职，派荣臻暂行代理，本人即卸任职务，不再与闻时事。

△　沪警厅以"调停工潮不力"为词，封闭上海总工会。次日，上海总工会发表紧要启事抗议，声明："敝会为上海三十万工人托命所

在，责任重大，绝不因此而稍有灰心丧失勇气。除呈请警厅速行启封外，此后仍本为工人阶级谋福利之初衷继续奋斗。”下午总工会所属海员、印刷、码头、纱厂、邮电、金银商务、店员等各产业工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各工会发表拥护总工会宣言，派代表要求警厅启封。商务印书馆、各纱厂、浦东码头工人等工会连日纷纷集会发表宣言、启事要求启封，表示“誓死拥护总工会，今后仍在总工会指导下继续奋斗”。

6月28日　吴佩孚与张作霖在京会晤。9时许，张访吴，晤谈不及半小时；正午，吴偕张宗昌回拜，亦半小时；旋同赴怀仁堂出席杜锡珪等公宴，并偕访班禅喇嘛。当晚，吴出京往长辛店。翌日，张亦离京赴津。

△　驻京英、美、法、意、日、荷等国公使在北京饭店宴吴佩孚，吴以“来不及”辞谢。

△　张作霖、吴佩孚联名发布“讨赤”总攻击令，并知照北京政府褫冯玉祥、鹿钟麟等本兼各职并官勋。

△　福建泉州金井乡乡民抗不交纳苛捐，周荫人部孔昭同旅诬抗捐乡民为“会匪”，捕去34人。乡民持械阻挠其解往泉城，军队开枪射击。

6月29日　张作霖令张宗昌派军将李景林所部包围缴械改编，以有枪者万余人编成镇威军第十二军，仍以荣臻任军长，归张学良节制。

△　吴佩孚、张作霖出京后，留郑谦、张其锽在京磋商未了问题。张学良、张宗昌留京主持军事。

△　吴佩孚在长辛店设立总部，亲自指挥南口之战。是日偕田维勤赴门头沟视察阵地，指挥张万信旅攻青白口，陈鼎甲旅攻秦峪口。

吴称旬日之内可以攻下南口。

△　国民军将领通电反对关税会议，谓：关税自主与否，关系国家存亡。今北京政府当局“窃据政权，竟公然主张放弃关税自主权为条件，以二五附加税为担保，募借外债八千万元，作为造乱之资，违反民意，甘心卖国”，请全国一致反对。

△　驻京英使麻克类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广州政府将广九路款作军费，破坏条约，请速设法阻止，并保留由关税中扣还之要求。”

6月30日　关税会议各国代表集会，英国代表谓中国政府至今尚未成立，似此形势，关会殆已无望；且夏令已届，各国代表均须出京避暑，不如乘此时机宣告停止。将来可否继续开会，届时再议。各国代表以事属重大，谓须请示本国政府。

△　吴佩孚赴易县检阅魏益三部，令速出马水口攻灵邱、蔚县，以牵制攻晋北之国民军。

△　国民军由沙河防线向南口撤退。

△　吴佩孚任命李倬章为湘鄂边防督办，是日李在保定就职。

△　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为赞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特组北伐运输委员会，先派500名工人随军出发。

△　袁祖铭、王天培派代表抵粤，与国民政府洽谈，愿加入北伐。

6月下旬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到达安仁附近；第七军第二、七、八旅集结于永兴、金兰寺附近地区。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于衡阳召集会议，部署分三路进取长沙：右路军指挥官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

牵制湘江东岸之敌，协助中、左路进攻，成功后再分路取醴陵、株洲，以牵制敌人；中央军指挥官为唐生智自兼，率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教导师周斓部、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佯攻湘江以西涟水下游正面之敌；左路军指挥官为第八军第二师师长何键，率第二师、第四师刘兴部、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为主攻部队，攻娄底、濊水，而后转师东向，与中央军歼敌于湘乡、湘潭，进取长沙、宁乡；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第七旅十四团杨腾辉部由胡宗铎指挥，为总预备队，控制永丰。

是月　各地工人生活艰难，为要求增加工资，纷纷罢工，计有：无锡堆栈工人1000余，丝厂工人3000余，奉天印刷等工人1000余，宁波药案伙友、机料房工人、印刷工人500余，常州通成纱厂300人，南通永丰纱厂200余人等。

△　据全国学生总会统计，截至6月底已有16省有省学联，所属市、县学联为数在320以上；直、鲁、苏三省无省学联，而有20个左右市学联。

7月

7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略谓："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第七军李宗仁部（辖第一旅夏威部、第二旅李明瑞部、第七旅胡宗铎部、第八旅钟祖培部）、第八军唐生智部（辖第二师何键部、第三师李品仙部、第四师刘兴部、教导师周斓部、第五师叶琪部、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等）、第四军陈可钰部（辖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集中于永丰、衡山、攸县，相机进占长沙；第二

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仁，以防江西；第一军何应钦部集中衡阳，为各方策应。

△　法权调查会议各国代表起草报告书，内容为：一、关于中国法典之报告；二、调查各省司法情况之报告；三、对领事裁判权之意见。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所提收回领事裁判权事，认为尚非其时。

△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广东召集中央教育行政大会，出席47人，历时10天，议决请颁定国歌、推广工业教育、凡学校及私塾员生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外人捐资及教会设立之学校须呈报立案并不得施行小学教育及师范教育、中学校长不得兼职、注意推广小学并严厉取缔私塾、农工教育实施等共23案。

△　山东当局对胶济铁路征收货车特捐，每车收75元，名曰“兵士犒赏费”。

7月2日　　张学良、张宗昌、褚玉璞等在张宗昌宅开军事会议，讨论南口之战的进兵方略，王栋、王琦、徐源泉等亦列席。翌晨，张等同赴沙河督战。张宗昌下令限一星期攻克南口。

△　奉、苏中东路会议复会，双方提出议案共21项。4日，奉方借口“在加拉罕外交政策之下难期充满”，拒绝续开。

7月3日　　驻京英、美、法、意、日、比、西、荷、葡九国公使发表关税会议停会宣言，声称“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议时，当立即继续会议”。驻京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并将上述宣言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

△　驻京英使麻克类就关税会议发表声明，表示英国政府“切欲履行华会条约。设中国政府意征收该条约所规定之附加税则，本国政府甚欲允许之”。又谓：“本国政府绝无暂停会务及因中国时局之变易，竟至中止缔结关税条约谈判之意。”

△　英舰四艘无故宣布沙面戒严，任意运转英货，偷越海关，阻止华人往港。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严词驳斥。

7月4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广州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在粤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36人出席。会议讨论出师北伐事，议决：一、推顾孟馀、邵力子、陈公博、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起草《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和《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二、蒋介石就职誓师典礼时，同时举行党的出师仪式；三、军人部长蒋介石有任所辖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之权。

△　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学术院”，以罗致、造就政治、建设人才。学术院分设法律、政治、交通、外交、财政、教育、工业、农业等16门专科，入学资格为在国内外大专院校毕业，学习二个月后即推荐各行政机关任用。

7月5日　　拂晓，国民革命军进攻长沙之左、中两路在湘江以西地区开始攻击。翌日，刘兴部、钟祖培部强渡涟水，击破叶开鑫军，进占娄底。7日，何键部攻占灉水。叶军向大乐坪、连山方向撤退。右路第四军诸部在湘江以西地区自攸县前进，7日独立团进抵泗汾，第十二师抵皇图岭，第十师抵新市。

△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继续举行。谭延闿报告政治，叶楚伧代表张静江报告党务。会议决定：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誓师和党的北伐出师仪式9日在东校场举行；二、调查湖南战场人民粮食案，交常务委员会会同总司令商拟办法。

△　奉军和直鲁军对南口下总攻击令，分三路进攻国民军：第一路徐源泉部，第二路荣臻部，第三路韩麟春部，总指挥褚玉璞，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张学良为后方总司令。

7月6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结束。是

日会议决议：一、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和《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交起草委员与常务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联席审查，修正发表；二、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辞职，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三、通过《改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间办事关系案》，其中规定“政治委员会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种委员会，故嗣后应于每星期与常务委员同开会议一次”；四、补选顾孟馀、李济深、何香凝、于树德、彭泽民、丁惟汾、王法勤七人为候补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缺席时依次递补；五、承认蒋介石任党之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之全权；六、聘鲍罗廷为党的高等顾问。

△　北京杜锡珪代内阁举行首次国务会议，杜锡珪、顾维钧、任可澄、杨文恺、张国淦、张志潭出席。同日，国务院摄行之大总统特任蔡廷幹署外交总长，准免田应璜署内务总长职，特任张国淦署内务总长，特任罗文幹署司法总长。

△　关税会议中国委员颜惠庆、杨永泰、蔡廷幹、王宠惠等开会，主张照常继续进行关税会议之事务。

7月7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均归其统辖”，“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各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

△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一百六十一期发表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指出：“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并谓：“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走真正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末谓：“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将陷于四面围攻的

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是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　新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蔡廷幹通告北京外交团谓：战事即将结束，政府初定，请各国遵照华府会约，续开关税特别会议。

7月8日　　国民革命军进攻长沙之中央军第八军教导师周斓部和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进抵山枣、朱津渡，强行渡过涟水。翌日，夏斗寅部进占湘乡。周斓部经湘乡向如意亭方向追击溃退之叶开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在湘江南岸下摄司附近渡过涓水，向易俗河之守军攻击。10日晨，第三师进占湘潭，叶军第二、三师大部向长沙退却。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任命金還为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

7月9日　　广州隆重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各界群众五万余人参加。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吴敬恒代表国民党中央授旗。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称：一、必与帝国主义不断决战；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俾三民主义得早实现；三、使我全军与国民结合，进而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责任。

△　国民革命军进攻长沙之左路军刘兴部和钟祖培部占娄底后乘胜向东追击，进攻潭市。叶开鑫军主力以炮兵抵抗，利用复杂地形居高临下固守，相持竟日。至8日晚，叶军阵地各要点及右翼大乐坪、连山等地先后失陷，阵势动摇。是日黎明，叶军大部向通宁乡、益阳大道之石坝、如意亭、道林等处退却，一部向湘乡方面退却。刘兴部和钟祖培部分向石坝、章公桥追击。何键部于是日晨6时进占潭市。

△　国民革命军逼近长沙，叶开鑫退走，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工人保安队1000多人维持秩序。

7月10日　　国民革命军进攻长沙之右路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拂晓开始攻击，十二师向沈潭、夏家桥前进，独立团向泗汾进击，十师位于黄土岭策应。敌向浏阳退却，醴陵不战而下。

△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饬令粤汉、广三、广九、株萍等五路联合组织北伐交通队，以利国民革命军之运输。

△　唐继尧利用国家主义派张劲、张介石等人组织“民治党”，是日在昆明市礼堂召开第一次组党大会；并拟设立“民治学院”，发行《民治日报》。

7月上旬　　江西赣、饶、抚三河水涨，造成巨灾。南昌、九江间电杆被水冲坏，电讯中断。长江中下游湖北、安徽亦大水成灾。皖南宣城、南陵、芜湖竟成一片汪洋。

7月11日　　国民革命军进占长沙。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自湘潭追击溃退之叶开鑫部主力第二、三师，于是日晨进入长沙城。叶军正由岳麓山渡江，已渡者降，未渡者转向靖港逃逸。旅长刘雪轩及官兵2000余人被俘。周斓部在如意亭会合刘兴、钟祖培部向宁乡追击，同日晨克宁乡。何键部主力续向益阳进击。

△　吴佩孚在长辛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再催奉军和直鲁军速攻南口，并由正太路进兵，出雁门关，截断国民军后路。

△　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议定今后工作方针十项，决向官厅请愿启封上海总工会，并提出上海工人最低总要求11条，包括：每月工资不得低于15元，每日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改良工厂设备等。大会选举李立三等31名执行委员，陈之一等15名候补执行委员。16日，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推李立三为委员长。

7月12日　中国共产党是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确定北伐战争中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民众运动的政策。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略谓："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另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结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目前紧迫的职任，尤其以实行反右派斗争为最重要。"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各阶级民众的共同政纲，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实行地方自治、平民自治、颁布工会法、承认农民有自卫武装权、男女平等等23条，号召全国各阶级民众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为实现共同政纲而奋斗，推翻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　吴佩孚下令舰队封锁湖南。

△　田维勤部第三十九旅陈鼎甲部开抵妙峰山，改投国民军。后陈鼎甲抵张家口，任国民军第十一军军长。

7月13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议改委丁惟汾为青年部长，陈果夫为代组织部长，吴敬恒暂代工人部长。蒋介石就常务委员会主席职。

△　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援北伐，愿以20万工友为后盾，并组织北伐运输队特别委员会，选3000精壮组织北伐运输队。

△　广州总商会开会，决由各商行分摊筹款50万元，以供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用。

△　廖仲恺被刺案经审判委员会判决：梅光培、郭敏卿移送总司令部军法审理，梁博处死刑，林星处三等有期徒刑三年。

7月14日　国民党中央发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之《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略谓："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希望全国民众"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

△　国民党中央发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之《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四项：一、严密防范反动分子侵入党内破坏党纪；二、极力反对勾结吴佩孚之军阀，诱劝中立者，援助反吴者。对一时蔽于私欲、困于环境者，苟肯一旦觉悟，翻然来归，当谅其既往；三、对甘心为吴之鹰犬而绝不觉悟之军阀，则应破坏其势力，消灭其阴谋；四、努力巩固革命军与人民之联合，宣传党之主义与政策，辅助革命军民众化。

△　国民政府特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任命纽永建为总参议。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特派蔡廷幹、顾维钧、杨文恺、张志潭、张英华、梁士诒、颜惠庆、王宠惠、王荫泰、潘复、马素、夏仁虎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特派蔡廷幹、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张英华、王荫泰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并指令外交、财政两总长准如所拟《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组织章程》办理。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照会美国驻粤总领事，反对重开关

税特别会议，请转达美国驻北京公使。

△　湖南醴陵农工商学各界千余人于县城文庙开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独立团团长叶挺等发表演说。

△　华北地区大风成灾，京、津至上海电讯交通中断。

7月15日　国民政府与港英当局在广州开始谈判解决省港罢工案及抵制英货问题。国民政府代表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馀，英方代表为港英当局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律政司金培元、英驻粤总领事普理宁。陈友仁致开会辞，略谓此次谈判，一方为使英人在两广销货及营业有友谊与利益之场合，一方为使中国人民无所牵制地进行革新工作，与世界各国建立联谊。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方发生变迁，中国人民有图自救之必要。英国应当重新观察中国局势，不要阻塞实际解决之途径。双方代表商定谈判程序等项。

△　孙传芳出巡江北各地，因湘局变动，赣边吃紧，是日由扬州赶回南京。

△　吴佩孚部王宗荃旅炮团进攻南阳，占领瓦店。21日，王旅由三十里屯到达十五里铺，张允明部至白河东岸，以犄角之势包围南阳建国豫军樊钟秀部。

△　厦门鼓浪屿各界人士开会，修改《鼓浪屿公界章程》，主张改称厦门鼓屿公共市，并审定被选市委员之条件。22日开第二次会，改市民会议为市议会，15名议员，华九洋六；改市委员会为市董事会，七名董事华四洋三。29日第三次会，改市议员为16人，华十洋六。

7月16日　国民政府代表在与英方代表谈判解决省港罢工案及抵制英货问题之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对英抵制原由之意见书，阐明排斥

英货之由来，沙基惨案是直接原因，而沙基惨案之背景为五卅惨案。广东是民族主义之中心，对于此案自应坚持以民族主义相对待。并谓：在未提出解决新条件以前，愿闻英方对于抵制之见解。

△　江苏当局与驻沪领事团在交涉公署开会，详细探讨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之协定条文，经双方商妥，主要内容为：江苏省政府设立上海临时法庭，以代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按中国法律审理公共租界内一切民刑案件；遇享有领事裁判权西人或工部局为原告人之民事案件，或享有领事裁判权为被害人之刑事案件，该管领事得照约派员陪审。丁文江即携带协定条文赴南京，请孙传芳、陈陶遗核准。

△　清室遗老函吴佩孚及北京政府，请求恢复民国十三年修改优待条件以前状态，将故宫交还溥仪。是日，北京政府内务部议定：溥仪已永废帝位，优待由政府以赈济方式拨款；拒绝发还皇室财产，唯赠与不含历史性之一小部分公产；允许溥仪岁时以平民礼仪祭扫其祖先陵寝。

△　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董事会派代表罗教铎等访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可澄，反对教育部和财政部拟以俄国庚款作抵，发行教育国库券1000万元。

△　粤工人代表会和总工会合组总预备队，派出工人二万人担任北伐前方运输事宜。

△　河南洛阳大水，全城被淹，淹死数千人。

7月17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蒋介石离广州赴北伐前线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职由张静江代，政治会议主席职由谭延闿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由李济深代。

△　唐生智在长沙厉行党治，废五色旗，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通令取消省宪法及省议会，以省党部主持一切。

7月18日　驻美公使施肇基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速宣布关税自主。略谓：关税自主乃独立国家之权限，公理昭然，无反对之余地，故无与列国协商之必要。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贺耀组加入国民革命军事电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驻衡阳特别委员会，略谓："贺耀组果能奉行本党主义，一致出师北伐，当然欢迎加入国民革命战线，共图进行。惟应由贺先发通电讨贼，以示决心，并须有事实表现。"

7月19日　国民政府代表与英方代表第三次会议，谈判解决省港罢工案及抵制英货问题。英方代表表示五卅惨案之责任不在英国；华人对英抵制非出人民自愿，系少数强有力者组织团体以武力维持之结果；香港禁止粮食出口，是为维持香港民食及对罢工所施之自卫计划，不能认为是对广州之攻击。又谓英方愿见中国之兴盛，俾与贸易；香港政府尤愿辅助与港为邻各省之发展，俾彼此得益。

△　北京政府筹谋重开关税特别会议，外交部通电驻外各使，将关税特别会议中国委员名单知照各该国政府，并表示希望早日重开关会之意。同日，外交部派员与驻京外交使团首领欧登科接洽，拟以蔡廷幹之关会全权代表名义，邀请各国代表出席茶话会。

△　张作霖抵旅顺，往访日本关东厅长官儿玉、白川，次日又赴大连访"满铁"社长安广等人，并声称此行系为答谢日本之援助及商洽协力防御苏俄势力之"内侵"。

7月20日　国民政府为开辟黄埔商港发布《财政部第二次有奖公债条例》，规定自8月1日起发行，债额1000万元。

△　田维勤部攻打南口之第四十旅贾自温、马宗融两团在清水涧改投国民军。吴佩孚即派张万信等部往剿。

△　奉军吴俊陞率汤玉麟、万福麟、穆春等部占领榆树沟、门沙

口。次日，穆春部攻占多伦。

7月21日　国民政府代表在谈判解决省港罢工案及抵制英货问题的第四次会上，驳复英方代表之意见，提议委托第三方面组织审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判决双方所争之点。并谓：如英方愿尽速恢复香港与两广平日之交谊，则有三项解决条件：一、英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沙基惨案之发生，并规定沙基之戍兵人数及英炮船之航行与停泊办法；二、沙基案死伤者之眷属，英应秉公厚予赔偿；三、罢工工人之损失，须筹巨款解决。英方表示反对组织审查法庭，并谓解决条件不能包含赔偿，只允以实业借款方式，仿广九路协约办法，用以开辟黄埔或粤汉、广九两路接轨，亦可建筑别司湾或汕头铁路。

△　广州农工商学各界10万余人举行示威大会，声援国民政府代表团向英方提出之解决沙基惨案及省港罢工诸条件。

△　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遽派兵占领深圳车站。

7月22日　杜锡珪以摄行大总统特任刘湘为参谋总长。

7月23日　国民政府代表与英方代表第五次谈判解决省港罢工案及抵制英货问题。国民政府代表说明审查委员会可由中英各出委员一人、中立国出一主席组织之，依法裁判沙基案之责任，并提出对英抵制完全解决之建议。英方要求委员中加入与沙基案有关之法国代表一人，并询问在审查期间是否继续抵制英货。国民政府代表答抵制英货是有组织之爱国运动，非武力可遏止，英方在谈判中如不承担应负之责任，继续抵制运动势所难免。英方宣读借款议案后停会。翌日，英方代表返港，允将国民政府之建议转达英国政府。

△　关税特别会议中外各国代表举行茶话会，商议续开关税会议事项。蔡廷幹等希望商定暑期后正式开会日期，英、美、日等国代表指出中国政局不定，难定时日。后经驻京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调

停，预定9月15日再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　蒋介石下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关出发开赴北伐前线。

△　袁祖铭致电国民政府称："亲率十八个混成旅，出发湘鄂，誓效力党国，讨伐吴贼。"

△　孙传芳通电各方"主和"：请奉军、直鲁军与国民军休战；开国民会议，京畿区内永不驻兵；南北罢兵，迫唐生智止攻岳州。28日，孙派杨文恺赴长辛店谒吴佩孚面述政见，吴谓：西北指日可平，湘战又非力制不可，和平而非其时，将永无和平希望。

△　全国学生总会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到湖南、北京等17省市代表40余人。丁惟汾、甘乃光等到会讲演。30日，大会闭幕，议决统一学生运动等案。

7月24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各军将领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在长沙开会，讨论今后之作战策略，一致主张乘吴佩孚牵制于南口不能南下之机，迅速进攻鄂、赣。唐生智、李宗仁等主张同时进攻鄂、赣，第七军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取监视态度。会议通过了唐生智、李宗仁的主张，并草拟意见，报告蒋介石。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划广东全省为七个警备区域，委何应钦为潮梅警备司令，钱大钧为广属警备司令，胡谦为惠属警备司令，陈嘉祐为韶属警备司令，徐景唐为肇属警备司令，陈济棠为钦廉警备司令，许志锐为琼崖警备司令。

△　美国驻粤总领事奉驻京美使马瑞慕训令，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抗议关税会议之照会，略谓美国政府极愿中国有可负责任之中央政府，而目下中国未有对内可为各党所拥护、对外可为友邦承认与共事之中央政府，中国人又无一致之意见；美国政府确信办理对

华条约关系上之经济或他种修正事宜，目的在有益于中国全部，而非有益于各个军阀或政党。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比使华洛思，《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本年10月27日满期，即宣告废止，另订新约。在新约未成立前，两国政府可另定临时办法。

△　奉军和直鲁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南口国民军阵地。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令财政部迅即各拨币银二万元，赈济江西、湖南、湖北水灾。

7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同时指出：“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赞助人民和各种的自由，并应帮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

△　上海一批外籍律师反对交还上海会审公廨，是日派斐斯（意）、罗杰（美）等五人为代表赴北京，向驻京外交使团递交请愿书，并至各使馆陈述反对交还之意见。

7月26日　全国学联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北伐。

7月27日　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嘉伦将军等赴北伐前线，是日自广州抵韶关。翌日，由韶关向衡阳前进，29日至乐昌，8月2日至郴州南之良田。

△　孙传芳电吴佩孚请迅扫西北之敌，回师南下，坐镇长江，并谓：“目前赣闽吃紧，对湘事不能统筹兼顾，只能为相当之援助，仍请我帅自行主持。”

△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苏联驻京大使加拉罕有煽动革命之嫌，是

日饬驻苏代办郑延禧转致苏联政府照会，要求召回加拉罕，并电郑谓“此事政府意在必行”，“务达目的为要”。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发表宣言：会审公廨应无条件交还中国，限令侮辱中国之外籍律师出境。

7月28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再次照会美驻粤总领事反对关税会议，略谓：驻京美使以为国民政府之反对关税会议是中国人民缺乏一致，实为美国等国政策观念既误、运用又复不当之明证。国民政府视关税会议之复开，为美国与有关系各国有意将中国海关变更为筹取战费及外人干涉中国革命战争机关之举动，将不得已采取某种防卫计划。

△　田维勤由前线三家店回长辛店，向吴佩孚报告军情。旋又赴北京，与张宗昌、张学良会商进攻南口、怀来之计划。

7月29日　北京国务院举行国务会议，决定临时参政院、国政商榷会、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国宪起草委员会四机关撤销，财政善后委员会着财政部接收，军事善后委员会着陆军部接收，外交委员会着外交部接收。

△　北京外交团调查长江一带水灾，认为至少有500万人受灾，陷于绝食境地。

△　全国各大学教授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到代表数十人。会上发表阮志明所制之物理仪器及窦维廉之《华北食物分析》、韦尔巽之《软水研究》、黎国昌之《鸟肾研究》等论文。讨论会于8月6日结束。

7月30日　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为主席兼军事厅长，冯天柱、刘岳峙、周鳌山、邓寿荃分别代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

△　赵恒惕会同李倬章在岳阳主持湘、鄂边境军事防务，以宋大霈部及海军守汨罗正面，董政国、陆沄部守平江为左翼，余荫森部守长乐街及王都庆、贺耀组部守澧县为右翼。吴佩孚令前敌各部坚守防地，非有命令不许进攻。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饬驻英代办通告英国政府外交部：香港与广州所订任何合同，除解决罢工及对英抵制者外，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祖涵率五十五团抵郴州，受到全城群众热烈欢迎。晚8时开各界代表大会，林发表演说，叙述北伐意义。翌日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到4000人。

7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宣称："我们可以说全国反赤潮流现已到一低落时期，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表示："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是赞成北伐，尤其在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

△　吴佩孚在长辛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俟攻下怀来后吴即南下。

△　占据南阳一带之建国豫军樊钟秀部，在郾城一带活动，并拆毁京汉路一段路轨。是日，吴佩孚电令寇英杰会同张联陞、张元明限期剿灭樊钟秀部。

7月下旬　"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连日在京开会，拟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拟订会章13条，并议定在北京设图书馆。

△　上海霍乱盛行，各时疫医院皆有人满之患。据两个医院统计，一星期间就诊病人中患时疫者有2000人，其中700人患霍乱。广西平乐、荔浦等地亦传染霍乱。

是月　　各地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计有：上海三业105

厂七万余人，苏州高丽纱厂300余人，镇江兴记缫丝厂400余人，镇江驳船帮工人700余人，无锡香业水工100余人，江苏冶坊工人4000余人，汉口织袜业2000余人，大连福纺纱厂等20余家三万余人，浙江嘉兴油车工人100余人，山西晋华纱厂1000余人，湘潭泥木工人800余人等。

△ 江西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已有六县、28区、128乡成立农民协会，会员人数为6172人。

△ 徐州水灾。邳境之沙河在徐塘决口，运河在马兰集决口，陇海路东段碾庄站至炮车站一片汪洋，平地水深四五尺、七八尺不等。微山湖水溢灌沛县，沛城周围水深五六尺。灾民盈千累万，风餐露宿。

8月

8月1日 凌晨3时半，吴军和奉军、直鲁军向国民军南口防线展开全线总攻击。张学良、张宗昌分赴沙河、羊坊督战，吴佩孚也到三家店督促田维勤部向青白口进攻。奉军用数十门重炮猛轰南口要塞。

△ 吴佩孚下令田维勤部“限三日内攻下怀来”。8日、10日又连电崔促。

△ 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实行总罢工，不为吴佩孚制造枪炮。

△ 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第二次有奖公债1000万元，作北伐军费。

△ 旅居法国里昂之华侨集会，组织“里昂华侨北伐后援会”，募捐资助国民政府北伐。

△ “亚洲民族大会”在日本长崎开会，中、日、印、菲等国代表54人参加。中国代表要求取消各种不平等条约，包括日本强迫中国政府订定之“二十一条”，与日方代表辩论。日本代表提议组织亚洲银行，敷设跨越亚洲各国之铁路，设商业大公司等，“以增进亚洲各国间之实业关系”。3日，会议结束，决定成立“新亚洲联盟会”，七名理事为中、日、印各二，菲一。下届大会定在北京举行。

8月2日 北京政府通电各省缉拿鲍罗廷，并令检查其往来邮电，以防向各地“煽惑”。

8月3日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反对重开关税会议，指出：“吴（佩孚）、张（作霖）迫于财政困难，亟与各方接洽，欲图重开关会，且欲迁就让步，承认只解决二五附加税案，冀以此项附税抵借巨款，以资其扩充武力压抑革命之用。……承认二五附税，则不啻将全国各阶级人民所迫切要求之关税自主永远断送。”“对于张、吴此种卖国之举，绝不能予以承认，尤望全国人民急起反对，而益加努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运动。”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蔡廷幹拒绝驻京法使玛太尔对即将期满之中法越南商约展期一年之要求，并通令各省交涉员声明该约无效。

△ 停泊在上海华栈码头之日轮“万里丸”水手，无端殴死小贩陈阿堂。14日，上海总工会致函交涉署及各团体请坚决抗争，要求日领事道歉并交出凶手。

△ 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致电中华留日学生会，反对在日本长崎举行之“亚洲民族大会”，指出该会实是日人“假民族会议之美名，施行经济侵略之诈计”。同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等亦发表文告反对该会。

8月4日 蒋介石在湖南郴州召开军事会议，研讨第二期北伐作战方策。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同日，蒋介石电令：一、第

三军迅速赴浏阳接防；二、航空处派飞机来衡；三、令胡谦迅剿马雄韬。

△　驻京比公使华洛思照会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蔡廷幹称：中比条约虽即期满，但不能由中国宣告废止，否则比国拟将该争议提交国际法庭。

8月5日　晚，奉军、直鲁军再下进攻南口之总攻击令。7日，昌平全线激战，张学良、褚玉璞、王栋、韩麟春均赴前线指挥。8日，胡毓坤部进攻居庸关。9日，奉军骑兵第八旅占营子城、偏坡峪等，九军占铁卢沟，十军占毛司台、落马坡各要隘，铁甲车队破国民军外壕。南口陷于奉军三面包围之中。

△　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驻粤英总领事普理宁，严重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借口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扣留港船，调重兵集结深圳并派飞机队轰炸。

△　北京女师大教职员50余人，为反对与女大合并，开会讨论对付办法，议决推派周作人等八代表赴教育部交涉。

△　京畿卫戍司令部以“宣传共产主义”之罪名逮捕北大学生明仲祺，是日宣布判刑四年。并令各校将凡列“北大学生总会”名册之学生一律开除。

8月6日　黔军彭汉章宣布就国民政府所委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职。同日贺龙在常德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职。

△　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万里（白水）因撰文抨击张宗昌、潘复，是日凌晨2时被京畿宪兵司令王琦以“通敌”罪逮捕，4时许即绑赴天桥枪毙。

△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海各妇女团体筹备会发表《告全体姐妹书》，谓：“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旧礼教，女子在政治、经济、法律、

社会上应和男子平等，改良女工待遇，保护母性，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反对奴婢、养妾、童养媳制度。”

8月7日　　吴佩孚军宋大霈部在汨罗两次渡汨罗江，均为国民革命军何键部击退。翌日，宋部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于汨罗铁桥右侧强行渡江，仍被击退。

△　樊钟秀建国豫军占领许昌。寇英杰奉吴佩孚电令，饬张治公、陈文钊、贺国光、张联陞、刘佐龙等五路进攻樊钟秀。12日，樊部退出方城、泌阳；20日，又退出南阳进入鄂境。

△　为筹备修改通商进口税则，北京政府外、财、农三总长及税务督办呈请国务院，决定在上海组织编订货价委员会，陈銮为委员长，赖发洛为副委员长。

△　京畿宪兵司令王琦派出宪兵、警察20余人，于凌晨2时许逮捕北京《民立晚报》经理成济安，未获，带去车夫、印字工，并将报馆查封；3时许又将其弟《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逮捕。经各方营救，成于10日晚获释。

8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致粤港罢工工人书》，赞扬罢工工人坚持奋斗一年零二个月，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为全国人民报仇雪耻；指出“罢工早已到了解决的时候”，在解决时“一、须使罢工工人不至为全国民众而感受经济上极大痛苦；二、中英谈判须得相当的胜利”。

△　广州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大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增加二五附税，拥护国民政府宣言，要求关税自主。

8月9日　　《民国日报》载北京通信：驻京日、美、英、法、意五国司令曾开会，主张加派驻华兵力以保“安全”，议定各国在华北驻兵额数及警备区域为日本800人，由山海关至滦州；英国980人，由

杨村至北京；美国1400人，由滦州至芦台；法国1600人，由大沽至杨村；意大利380人，由芦台至大沽。

8月10日　国民政府派蒋作宾为湖北宣慰使，方本仁为江西宣慰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

△　张作霖以商人提高日元兑换价值，难以维持奉票价格，拘捕四平吉顺百货商店店主及其他缙绅10人，城内各店歇业者甚多。东北巨商天合盛店主被枪毙，该店及其在东北之13处分店及在沪、津、大阪分店等财产均被没收。

△　褚玉璞在直隶征收船税、茶捐、蔬菜捐、旧契补税等各种新税以充饷源，民生益困。是日全省各团体代表谒见省当局，请免除恶税，整饬吏治，以苏民困。

8月11日　奉军、直鲁军猛攻南口，国民军竭力抵抗，终不能支。13日，国民军在居庸关岔道等处布防，将南口守兵撤走。奉军大炮轰击不止。

△　云南唐继尧图桂，派龙云、刘震寰、廖行超等部开赴桂边。是日，国民政府令黄绍竑及范石生部戒备迎击。

8月12日　蒋介石抵长沙。晚上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进攻湖北，主力直趋武汉；对赣暂取守势。其部署为：唐生智指挥第八军正面攻岳阳；李宗仁指挥第七军、第四军侧出平江，北取蒲圻、羊楼峒，合力歼敌，然后分别渡江，与沿武岳路北进之主力规复武汉；朱培德指挥第二、三军及独立第一师为右翼军，集结醴陵、攸县、茶陵防赣；袁祖铭指挥第九、十军为左翼军，出荆、沙取宜昌与襄阳。

△　川军将领刘湘、赖心辉、刘文辉等派代表张伯常抵长沙，与唐生智商谈合作，并致函蒋介石表示愿共同反对吴佩孚，出兵参加北

伐。翌日刘等通电宣言出兵北伐。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特任蒋雁行署陆军总长。

△　北京政府司法部传谕各省检察厅，令公布“取缔过激思想”之法规，规定：宣传无政府主义者处以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金钱及权势诱惑他人使有过激思想者，或以威力胁迫者，处以五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张作霖召集奉天省长、省议会议长、商务会长、华商会长、官银号会办及五大银行行长等，举行整顿金融善后会议，决定整顿金融条例18条，规定：禁止银行钱号存储现洋、金票，买空卖空；携带现洋出境以50元为限，严查贩运现洋、金票等等。

△　唐继尧电吴佩孚表示“讨赤”决心，略谓：“闻荩筹硕划，大举讨赤，本除恶务尽之义，为正本清源之图，逖听义声，曷胜赞佩，继尧当相与戮力神州。吾属遭际正同，此物此志，愿与吾兄共勉之。”

8月1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饬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本政府声明：《中日通行船条约》于本年10月第三次期满后不再继续有效，须改订新约。

△　国民军在甘肃征募民兵三万人，开垦察、绥荒地，每兵给地50亩，长官按级递增。

8月14日　　晨5时，张学良向奉军、直鲁军下攻取南口之总攻击令，右翼奉军于珍部第十军三十七旅7时占虎峪村，左翼直鲁军第五军王栋部由后桃洼占马家湾，正午占领南口车站。下午2时，南口完全被奉军、直鲁军占领。国民军由居庸关向延庆、青龙桥方面退却。次日，张作霖通电称：“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重峦叠嶂，自十四年九、十月间，西北军在此建筑洋灰石子工事。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苏代办郑延禧催促苏联政府派相当人员来华接替苏驻华大使加拉罕。

△　北京政府通过《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特设委员会，聘赵尔巽等21人为委员。21日，委员会选赵尔巽为会长，孙宝琦为副会长。

△　直隶献县等处狂风及溃堤成灾，被灾20余县。是日，杜锡珪令财政部迅拨二万元赈济。

△　黄河在直隶濮阳境之刘庄决口百余丈，水势直趋东南，鲁西菏泽、郓城、巨野、金乡等县被淹。

8月15日　国民军下令实行总退却：宋哲元率部自多伦、沽源经张北、隆盛庄、集宁向绥远撤退；鹿钟麟率部自南口、延庆经京绥路至张家口，大部经柴沟堡、隆盛庄以南道路，过集宁退向绥远；徐永昌率部自蔚县、广灵经阳高、丰镇、集宁退向绥远；石友三率雁门方面各部经左云、杀虎口退向绥远。韩复榘、魏得成等部为撤退各部掩护。

△　杜锡珪电吴佩孚要求辞职，略谓：南口已下，应遵约卸肩，请速与各方商定正式阁揆，俾卸仔肩。

△　张宗昌函吴佩孚，指责杜锡珪之政府无能，推荐孙宝琦继任内阁。略谓：现在中央政府用人不当，筹饷不力，“应负贻误军事之责。若非改弦更张，另组新阁，势必政治未良，影响及于军事，讨赤之事无法进行，不仅宗昌无以对我公，即我公亦无以慰天下”。张主张孙宝琦组阁，“以收中外人心；财、交等部，职权重要，亦当妙选人材，分担艰巨。设能如此布置，实于今日军事所裨非小，讨赤一役庶几能竟其功”。

△　吴佩孚筹拨现款八万元遣散护宪国会议员，由符定一主持发

款，每名150元，往领者300余人。余三万元归各省首领支配。

△　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联席会、北京私立大学联合会四团体为争取日本庚款自主，向北京政府提出三项主张：一、日本如不正式声明退还庚款，则应根本拒绝日本在我国内地举办一切由日本操纵的文化事业的办法；二、否认民国十二年关于日庚款之中日协议及十四年所换有关文件；三、在上述交涉未办妥以前，日本在我国内地举办文化事业，悉视为侵略行为，政府应即阻止。27日，四团体复开会，电江庸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退还庚款，再议一切办法。

8月16日　蒋介石在长沙发表讨伐吴佩孚宣言，略谓："现在国民革命军将与北洋正统决战于江汉。此战关系不仅决军阀命运之存亡，即中国国家与民族之能否恢复其自由独立，胥卜于此。质言之，国民与军阀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三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争，已至决战最后之时期。"宣言历数吴佩孚之罪恶，重申北伐惟在讨贼，并谓："国民革命军为国民全体所有之军队也，尊重民意，服从民命，以人民为基础，以主义为依归。但期全国军人联合一致，参加革命战线，共同御侮，达到本党总理救国救民之目的。"

△　国民政府公布《劳工仲裁会条例》和《国民政府解决雇主雇工争执仲裁会条例》，规定仲裁劳工组织之间及劳资之间争执之办法。

△　孙传芳电复上海总商会等团体呼吁和平之通电，略谓："粤军进驻衡岳，以窥武汉，北军遂南下以保岸，解铃系之粤方。粤军如循贵会之请而撤退，则岳州北军当可设法中止南下。至东南数省芳当竭其驽钝，抱定保境安民四字，以图保全，绝不令其同成灰劫也。"

8月17日　奉军沿京绥铁路向宣化、张家口追击国民军。翌日，吴佩孚军王为蔚部占宣化。

△　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在广州开始举行。会议议决目前农民最低限度之要求为：（甲）经济方面，田租至少减原额25%，杂捐苛税均须废除，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废除佃业一切不平等契约。（乙）政治方面，乡长由乡民大会公举，县长暂由政府指派，但人民有撤换权。凡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再有别种武装团体成立。（丙）教育方面，以地方公款十分之五充教育费。会议于24日结束。

△　国民政府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戴季陶为校长。

△　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拟订之13条章程经日本政府外务省复电“可即照行”，是日宣布在北京正式成立，租屋开张，江庸并去日本活动。28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董事会代表六人要求北京政府教育部加以阻止，并取消该会章程。

8月18日　苏、浙、皖、闽、赣五省在孙传芳控制下，以“保境安民行自卫”为辞，出兵赴赣，分三路出发。是日孙传芳通电：“为保持五省安宁起见，爰派兵入赣增防，以固边圉，但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翌日又通电谓：“一省告警，则五省共以全力捍卫，正当防御。不越雷池。”

8月19日　国民革命军拂晓开始向汨罗吴军前线发起攻击，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及独立团进攻平江。张发奎部绕平江之东，击溃鲁肃山、审恩岭东之守敌。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和独立团叶挺部负责中路攻平江县城，分东北和西南两路夹击。三十六团占城东北之古城岭，俯击城中；又绕到城西北一带高地冲杀。独立团扫荡县城外围之敌。平江农民组织敢死队帮助围攻白石岭，扰乱吴佩孚军阵地后方。农民向导队引导革命军由横槎渡过狮子岩到达平江县城北街，吴军陈嘉谟第二十五师陆沄部惊慌失措，缴械投降，旅长陆沄逃至下西街萧曹庙举枪自杀。三十六团和独立团进驻平江县城。

△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和第八军一部渡过汨罗江，击退余荫森旅，占长乐。夜，铁路两侧之叶开鑫部炸毁汨罗铁道桥，退往岳阳关王庙。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为奖叙攻下南口有功的将领，晋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为良威将军，褚玉璞为璞威将军；21日又授韩麟春为麟威将军，王栋为栋威将军，于珍为珍威将军，田维勤为勤威将军，王为蔚为蔚威将军；24日授商震为震威将军。

△　奉军、直鲁军分五路进攻张家口国民军：东路奉军和直鲁军从延庆袭龙关；北路吴俊陞军从沽源攻白河；西路王为蔚部从涿鹿进陶水铺；魏益三部由天镇逼万全；晋军由大同进丰镇。国民军鹿钟麟部于16日撤出张家口，向集宁退却。是日下午6时，王为蔚部进张垣；翌晨6时，奉军骑兵第八旅、步兵第二旅等亦赶到。

△　张作霖为“整顿金融”，是日下午在奉天捕杀钱商五人。翌日，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疑张对日商怀有他意，向奉提出严重抗议，并向日本政府报告。21日，奉天交涉署派员解释。24日，正在日本之张作霖法律顾问赵欣伯见日本外相，代张致歉，允不再拘办钱商。

△　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务会议决定故宫永为国产，防止移转、变卖、抵押、借口整理迁入宫内或借名借款等事，以断觊觎者非分之心。

△　孙传芳训令上海宪兵司令汪其昌、两路局长任筱珊，严加检查南北车站，防范“粤方唆使大批共产党人利用工人来沪宣传赤化”。

8月20日　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略谓：率师北伐讨吴佩孚，深望各国予以赞助。“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欲保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

△　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长沙训令全体将士，申述对外策略，略谓："吾党起而打倒帝国主义，绝非仇视外人。不但帝国主义国家中之多数痛苦民众，为吾国同胞吾党同志之好友，吾人应诚意待之；即侨居吾国之教徒、商贩，凡非妨害中国国民革命之行动者，吾人亦应加以爱护，一视同仁。""吾人应分别敌友，以奋战之精神杀敌，以诚恳之态度爱友。"

△　上海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十五等厂工人，为抗议日本"万里丸"水手殴杀陈阿堂以及日本资本家恣意剥削压迫工人，是日起举行全市日本纱厂工人同盟罢工，提出要求：一、解决陈阿堂案，引渡凶手交中国法庭办理，抚恤被难家属，日本领事向中国道歉；二、改良工人待遇，不得殴打工人、滥罚工资、蔑视人格等事；三、增加工资二成；四、释放被捕工人，恢复被革工友工作；五、赔偿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等。陆续参加罢工的达12个厂约2.2万余人，坚持28天。

8月中旬　　阎锡山在晋绥地区向国民军进袭，接连攻占岱岳（即山阴）、应县、怀仁、丰镇等地。

8月**21**日　　北京国务总理杜锡珪通电辞职，略谓："前以军事方殷，中枢乏主，各方强相督责，勉为搘持，再四固辞，不获闻命，曾经表示最短期间，暂维现状，以待替人。视事瞬将两月，深维负荷之重，敢辞劳怨之丛，既无补于涓埃，实有辜乎期许。今幸军事渐告结束，此后正政局徐循正轨之时，凡百设施，断非不谙治术如锡珪者所能胜任，自当奉身引退，以避贤路而践前言，望大政付托有人，群治日臻上理，得以缅追盛轨，早释仔肩。"

△　吴佩孚由长辛店启程回武汉。行前电北京政府和张作霖云："现蒋中正、唐生智协谋侵犯湘鄂，佩孚以责任所在，不得不迅赴戎机。今后北方未了各事，由齐副总司令燮元代表。"

△　吴佩孚命齐燮元驻长辛店，行使总司令职权，指挥北方军事；彭寿莘负责保定、大名防务；派王维城等六人分驻保定以北各军事据点；命田维勤、魏益三、王为蔚等部扫数南下。

△　湘北岳阳、平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引导北伐部队从平江北乡渡过微水黄芽山间道袭取岳阳。敌军惊为天降，纷向云溪、路口铺、五里牌、羊楼司一带溃退。叶开鑫部2000余人投诚，余荫森部被截，全部缴械。

△　河南、贵州两省春间大旱成灾，赤地千里；入夏又霪雨连绵，田庐淹没，流亡载道。是日，杜锡珪令北京政府财政部各拨银二万元赈济。

8月22日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拂晓击退破塘口及新墙之敌，第二十六、二十七两团向云溪前进，三十四团向岳阳前进，10时占岳阳城。第三师李品仙部在五里牌截击向蒲圻急进之宋大霈部。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向通城附近之九岭攻击前进，下午占领通城。停泊洞庭湖之吴佩孚军10余艘舰艇，仓皇退往白螺矶、新堤一带。

△　吴佩孚在保定召集会议，奉方代表郑谦、于国瀚亦列席。对北京政府内阁问题，吴主张维持现局，必要时再全部改组，奉方表示仍听吴主持。

△　张学良电北京国务院，拒绝接受“良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之奖叙令。23日，韩麟春、于珍等亦联名致电拒受，张宗昌、褚玉璞、王栋亦电辞勋。23日，国务院在居仁堂设“庆功宴”，张学良等均相约不赴宴。26日，杜锡珪派人分头疏通，复遭拒。

△　广州30余万人在东校场举行预祝北伐成功大会。全市悬灯结彩，热烈庆祝。

△　蒋介石复电上海总商会等团体关于罢兵之请求，表示只求闽、赣表明态度，撤赣、粤边境之兵，东南各省速与吴脱离关系。

8月23日　徐谦、李鸣钟昨抵广州，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冯玉祥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国民政府是日决定任冯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冯为国民军党代表。26日晚，国民政府宴李鸣钟等人；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开欢迎会，谭延闿演说。

△　唐生智、李宗仁等在羊楼司会议，决定四路合攻汀泗桥：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崇阳、通山抄攻；第七军迅取浦圻会攻；第八军之一部助第七军由蒲圻会攻；第八军何键、刘兴两师渡江下嘉鱼抄攻。各路分头向汀泗桥方向前进。

△　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占领岳阳、通城后继续进击，是日至26日继续克复崇阳、蒲圻等县，与吴佩孚、叶开鑫军相持于汀泗桥南北两端。

△　吴佩孚南返道经郑州，接见寇英杰、熊炳琦、陈文钊、王维城等，并在车站开会，部署剿歼樊钟秀军及援湘等事宜。

△　《申报》载孙传芳致蒋介石函，离间国共合作北伐，并为出兵赣、闽制造借口，略谓："公已为外国人所监视，已为过激党所包围，公之举动已不自由……我求结纳，尚何可得？……此役乃非过激派防制过激派，乃中国人抵制非中国人"；"如去外国人，铲除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

△　日本驻沪领事署将殴杀陈阿堂之两凶手"万里丸"水手城户库和藤间房太郎秘密送往长崎地方法庭审理。26日，上海总工会通告全市在各日本工厂、日轮、日本码头、日本企业的全体工友准备罢工。28日，各团体派出演讲队四出演讲，散发传单。

8月24日　　蒋介石电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略谓：“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此种言论，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值此严紧时期，发此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不敢缄默。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答复，免致误会。”

△　北京政府拟发行新公债2500万元，以海关拨来偿付行将期满之“民九内债”1100万元为担保。是日，驻京美使马慕瑞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民九内债”还清后之款，应用以偿还积欠已久之美债，中国政府无权用此款作新内债之担保。27日，驻京英、法、日使亦继美使对发行新公债一举表示抗议。

△　汉口警厅查封《楚光日报》，翌日又封《汉口晨报》。27、28两日，汉口军法处又以“煽动工党，勾结内应”、“破坏桥梁”、“阻滞运输”等罪名，接连斩杀工人和学生九名悬首示众。

△　张謇在南通原籍病故。

8月25日　　国民革命军向汀泗桥方向前进，是日，第四军占中伙铺及山峡冲，第七军与第八军一部在蒲圻会合，第八军第二、四师在嘉鱼渡江。夜10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下进攻令，第十师陈铭枢部攻击自古角塘至张兴国之敌阵地，第十二师张发奎部攻击自张兴国至汀泗桥之敌阵地。吴佩孚军以二万余兵力，凭汀泗桥三面环水、东面高山耸立之险据守：宋大霈、董政国部退集桥头，第二十五师陈嘉谟部之一百团、军官团十大队、豫军王献臣部等占据汀泗桥西侧高地经梅董至古角塘之线，遍筑防御工事。26日，两军继续激战18个小时，死伤惨重。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防御孙传芳进犯湘、粤，部署对赣作战计划：以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取赣县，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出莲花、吉安，第三军朱培德部出萍乡占宜春，第六军程潜部出修水声

援；赣南方面以第四十六团出上犹，第五师出大庚，赣军赖世璜部出雩都，会取赣州。

△　吴佩孚返抵汉口查家墩总司令部。晚8时召集军事会议，以“诱敌深入”掩饰不利形势，并夸口将亲自率兵舰进攻岳阳，与孙传芳会师长沙，要诸将领速回阵地部署。决定先守汀泗桥、咸宁、白墩之线，并计划退守金口及炸毁武泰闸决金口堤以淹国民革命军。同日，吴急电孙传芳速出兵赣西，催邓如琢部袭击浏、醴。

△　孙传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应付长江上游之军事计划，决定继续运兵10万至江西，分五路与国民革命军作战：第一路司令为卢香亭，所部出仙霞岭至赣河口，入鄱阳湖转至赣南；第二路司令为谢鸿勋，所部由九江转修水抵铜鼓，防湘、赣、鄂交界地区；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由南昌向赣西；第四路司令为周凤岐，所部先开吉安；第五路司令王普，集萍乡。

8月26日　阎锡山电告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总部，晋军已占领集宁；并声明西北军事晋军可独立了之，请奉、鲁军不必再行前进。

△　北京九校经费困难，驻京苏联大使加拉罕允借拨20万元为维持费。

8月27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第八军一部在汀泗桥与吴佩孚军刘玉春部、陈嘉谟部、宋大霈部等约二万余人激烈搏战。陈铭枢师、张发奎师、叶挺独立团等奋勇攻击，前仆后继，是日晨8时突破敌阵，攻占汀泗桥。当夜，吴佩孚亲率卫队督战，大刀队分路监视各军，各部在威迫下，刘玉春部猛攻夺回汀泗桥。28日，革命军重新发动进攻，激战四小时，再克汀泗桥。未几，吴佩孚调马济率武卫军赶至，凶猛反扑，众寡悬殊，革命军力尽撤守。两军拼死苦战，弹雨弥天，桥下积尸累累，几使河水断流。已得咸宁之第八军李品仙师会同第七军一部，赖当地农民之向导，取道簰洲司越岭袭击吴佩孚军之

背。革命军前后夹攻，吴军不支。战至29日晨，国民革命军获最后胜利占领汀泗桥。是役俘获吴军军官157名、士卒2296名。第四军英勇搏战，获“铁军”称誉。

△　吴佩孚偕同陈嘉谟、刘玉春赴咸宁前线督战，在火车上建立总部行营，到贺胜桥视察后即赴汀泗桥、金口两地视察水陆阵地。吴下令所部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退者一律在阵前处极刑，并派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监视各军，旅长余荫森及八名团、营长均因临阵退缩被斩首。

△　驻比公使王景岐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谓：比利时政府外交大臣樊特维尔今日声称，1865年中比条约为一方面的，仅能由比取消。比政府愿缔结非一方面的新约，惟须俟中国政局稳定，关税与法权会议闭幕之后始能从事于此。又称：比政府如竭力让步而不获成效，则将提交海牙国际法庭。29日，驻京比使华洛思在北京发表同一内容之谈话。

△　张作霖顾问赵伯欣23日在日本筹借500万元，名为整理奉票，实则购买武器。留日各界人士闻之甚为愤慨。25日，国民党东京支部派代表15名向赵质问；是日又有留日学生20余名前去赵宅驱赵。赵举手打人，激起公愤被殴。日警捕去萧国桢等八人。28日，留日学生总会电请全国声援。

△　奉军第九军军长高维岳在张家口通电就察哈尔都统职。

△　北京中美通讯社和《中美晚报》被京师宪兵司令部封闭，编辑黄伯昂、黄觉民被捕。

8月28日　国民革命军为防止吴佩孚利用海军扰乱后方，封锁长江、湘江长沙至武昌一段航线，规定外国军舰、商轮如须通过，必须在24小时前通知长沙交涉员，取得许可，派领江导入。

△　吴佩孚限令武汉商会于31日前筹款250万元以充“讨赤”军费。

△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驻苏代办郑延禧催办撤换加拉罕大使事，饬向苏联政府外交部声明，“如九月五日以前苏联政府不能与中国以满意之答复，中国政府不得已即将取消该大使一切待遇并给予回国护照”。30日，郑电告外部称，苏联政府已电加拉罕回国。

△　北京国务院举行会议讨论新公债案，决改名“秋季库券”继续进行，嘱蔡廷幹对各国驻京使节进行疏通。

△　吴佩孚电请杜锡珪组织正式内阁。

8月29日　　英商太古公司商轮“万流号”在四川云阳江面违章疾驶，掀起巨浪打沉我国木船三只，溺死商民船夫10余人及杨森部解饷官兵58名，损失饷银8.5万元及步枪56支、子弹5500发。“万流号”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上船调查，停泊于万县之英舰“柯克捷夫号”派水兵前来夺去杨部士兵的枪支，并开机关枪击伤兵士二名。该舰并卸下炮衣，炮口指向城内陈家坝、南津街两岸民房，掩护“万流号”驶离码头。杨森向驻渝英领交涉未果，遂扣留停泊于万县之太古公司“万县号”、“万通号”两艘商轮。

△　国民革命军与吴佩孚军在贺胜桥剧战。吴令刘玉春扼守贺胜桥以南至桃林铺、杨林垱、王本立一带地区，自汀泗桥败退之宋大霈等残部以及赴援不及的约二万人麇集于此。下午1时，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第七军自东攻王本立，第四军自西攻杨林垱。30日凌晨，战事激烈，张发奎、陈铭枢均至阵地督战，一再发起冲击，战士前仆后继。7时半吴军不支，且战且退。9时第四军占杨林垱，随攻克桃林铺，10时克贺胜桥。吴军猛扑叶挺部，犯第七军右翼。6时，胡宗铎部赶到，将敌击退，占王本立后续追。夏威部由团宣桥前进，11时克孟家山，午达余花坪，与各部并进。吴军溃退时，吴佩孚亲临贺胜桥督战，喝令赵荣华之执法队砍杀后退官兵百余人，但无法遏止前线之

溃退。入夜，吴军分向武昌、金牛遁退，吴本人亦仓皇逃返武昌。是役吴军军官200人、士卒3000余被俘。国民革命军亦死伤800余人。

8月30日　齐燮元由长辛店抵京，秉吴佩孚旨意与京各方接洽，以期维持杜锡珪内阁。齐请杜锡珪筹划援湘军费及田维勤、魏益三部开拔费。

△　孙传芳颁布援赣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刘凤图部为第五军，苏军为第二、三军，浙军周凤歧部为第四军，以卢香亭为援赣总司令，攻击目标为通山、岳阳、平江、浏阳；赣军攻醴陵、株洲、莲花。孙并令周荫人部攻粤之潮、梅。

△　京兆尹李垣电吴佩孚，请饬前敌筹饷督办将京西之涿县、良乡、房山、固安四县政权归还京兆尹。

8月31日　吴佩孚将司令部转移到武昌郊外鲇鱼滪车站，在武昌城上安置炮位，沿城挖掘战壕，筑炮兵阵地，重新部署武汉防务：起用靳云鹗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刘玉春兼武昌防守司令，刘佐龙为湖北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陈嘉谟专任湖北督办，会同刘玉春守武昌。吴令靳云鹗部第十四师高汝桐之铜帽军会同刘佐龙师守汉阳，刘玉春部、前线退回的残部及豫军一旅守武昌。

△　上海《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已得江苏省政府和北京外交团批准，各关系国驻沪领事除墨西哥、荷兰领事未在沪外均已先后签字，是日，淞沪商埠公署总办丁文江、江苏特派交涉员许沅代表中方签字。《章程》规定改设临时法庭审理租界内民刑案件。

△　山东、福建、浙江三省连日霪雨连绵，山洪暴发，冲决堤坝，淹没田庐。是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摄行大总统令财政部：各拨银二万元赈济三省。

8月下旬　阎锡山收编国民军韩复榘、石友三、郑金声三个师。

三师所提条件仅“宁死不打国民军”一项，余悉愿听阎令。韩等请赴太原行正式收编礼，阎复电免。各级士官一律照旧。阎云：我以宽济冯之严，以真祛冯之假。阎调韩复榘部往晋南，郑金声部由包头赴榆林。石友三、郑金声送眷为质。

是月　上海、武汉、奉天等地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薪、改良待遇举行罢工：上海美华书馆全体工人，中华书局全体职工，浦东日华纱厂工人，怡和纱厂3000余人，日商内外棉第九纱厂工人，花旗烟公司700多人，祥生铁厂工人，汉口申新纱厂4000余人，奉天澡堂业。700余工人、理发业1100余工人，以及广州邮务工人等。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80余人参加。大会讨论了宁乡县土豪劣绅杨致泽、刘昭等人破坏农民协会、杀害农协委员梅治成案和株洲团防、清乡队诬陷农民为匪及破坏农运案，要求政府及时严惩土豪劣绅和反动团防局长。大会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商民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并发表宣言称：“今后吾湘之重要工作，必须建立革命的民权，以辅助监督革命之政府，摧毁封建社会之基础，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吾湘全体同志均须下一决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均须拥护农民利益。凡摧残农民者，即以反革命论，吾党必敌之仇之消灭之。”大会选举唐生智、夏曦、王基永、李荣植、凌炳、谢觉哉、熊亨瀚、董维健、谢让樨、周以粟等为国民党湖南省第二届执监委员。

9月

9月1日　英驻渝领事义思德至万县，与杨森直接谈判英轮浪沉木船肇祸事。英领谓须先放还“万通”、“万县”两轮，方能开始谈判，并指责杨森扣押商轮之动作有类作战行为。杨森指出：“万流”轮在云阳肇祸，到万县后派员交涉又遭枪击而重伤二人；且英舰以大炮向南津街、陈家坝一带作轰击势，又告日侨从速迁徙，据此可见，英舰显

系有意轰击万城，试问谁有作战行动？翌日上午续谈，英领承认在云阳浪沉木船，称在万县以机枪射击是为防卫，但绝不承认杀伤二人。交涉无结果。

△　晋军商震追击队傅存怀部进占绥远。阎锡山委商震为绥远都统。

△　阎锡山编晋南垣曲、芮城及韩阳镇驻军7000人为两支队，由风陵渡开入陕境抵灞桥，会同刘镇华部攻西安。

△　田维勤、魏益三、王为蔚各部奉吴佩孚急电迅速南下。王为蔚将张家口让与奉军高维岳，田维勤将怀来防地交奉军戢翼翘。吴原委任谭庆林为口北镇守使，该职亦交张作霖委之戢翼翘充任。

△　卢香亭乘轮赴九江，代孙传芳指挥进入江西之二万增援部队。陈调元、王普调遣所部继续入赣。

△　靳云鹗就武阳夏警备总司令职，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就湖北省长职。

△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在长沙开成立大会。中国共产党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写信祝贺，指出：为争取革命胜利，必须和农民建立起坚固的联合。

△　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序，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

△　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自是日起实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

造枪械。7日，兵工厂工人以国民革命军克复汉阳，即日复工。

△　刺杀廖仲恺之罪犯郭敏卿，被押赴广州东郊处决。梅光培出巨款免死。

△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

9月2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第一军第二师抵达武昌城外：第十师在保安门、宾阳门、洪山一带，第十二师在南湖、新店镇一带，第二师在街头口、徐家棚、石眼井、董家湾一带，三面包围武昌城。第七军各部抵达纸坊、樊口、五里墩。吴佩孚下令关闭武昌各城门，每日只汉阳、平湖两门开放一小时以维持武汉交通。

△　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在武昌城外余家湾车站会议攻城事宜，决定：第四军第十、十二师、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之二路分段攻城，以李宗仁为攻城司令官，陈可钰为副司令，定3日上午3时开始。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比国公使华洛思，中比新约如不能于旧约届满之日订立，中国政府特提出《临时办法》五条，拟于10月26日起实行，其施行期为六个月。

△　湖南教、商、工、农及律师公会等团体，联合发起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议决组织国民会议湖南促成会，公推徐特立为委员长。同日，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招待各团体代表，决定组织农工商学联合会。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特派京东河道督办潘复兼督办黄河工程事宜；赈务督办朱庆澜辞职，以毕桂芳继任。

9月3日　　凌晨1至6时，国民革命军第七、四、一军各部攻武昌城，通湘门、小东门、大东门、平湖门、草湖门、保安门外均有激烈战事。吴佩孚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架重炮、机枪射击，停泊在江

面的军舰亦发炮。各军未克奏功，停于原阵地。

△　晚，蒋介石、唐生智等在武昌城外余家湾车站开会，商讨攻取武汉三镇之方案。蒋介石主张强攻武昌，多数人认为为免人民财产损失太大，应先攻汉口、汉阳。会议决定攻城部队退至武昌洪山背后，第八军分两支兵力由新堤、簰洲和黄岗渡江，向汉口、汉阳猛进。

△　吴佩孚决心死守武汉三镇，下令加派刘佐龙为汉黄防御总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并恢复靳云鹗之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名义，畀以节制陆海军全权。

△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开始进攻赣州投直之滇军杨如轩、杨池生两部。第一师由雩都径向赣州，第二师由会昌向安远、信丰推进。是日，二师之一部占安远，其主力于次日进占信丰，敌军向上犹方向溃退。一师潜渡赣水，占茅店、下湖墟之线。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自南雄入赣，亦于次日占梅岭关、大庾，守敌向新城镇退去。

△　蒋介石委何应钦为北伐东路军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第十四师冯轶裴及独立师张贞等部攻闽。

△　张宗昌颁发北京戒严令，派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为戒严司令，京畿宪兵司令王琦为副司令；并谓遇事请示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及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本人。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失却统治北京之权力。

△　张作霖派沈鸿烈强行接收附属中东路航行松花江、黑龙江之船舶。4日，张焕相又饬令巡警强行封闭中东路学务课。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瞿吉林向北京政府驻苏代办郑延禧提出抗议。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顾维钧宴银行界，谋新发“秋季库券”400万

元。众以税务司安格联不允担保，不肯承募。顾又商借款应付秋节军政费，众又表示困难。6日，顾派人疏通银行，将借垫之数由400万改为200万，要求务须办到。银行界聚议，谓欲凑100万尚有困难。8日，银行界最后拼凑，允代筹警饷60万元。

△　刘镇华镇嵩军第三师及四师七旅、第八旅攻下咸阳。刘召开军事会议，谋攻西安。

△　康有为为清理清室财产及运动溥仪返宫，经津偕褚玉璞抵京。翌日，谒张宗昌，密谈三小时。康语人谓："清宫应还溥氏，优待费应照约偿付，方合讨赤宗旨。"

△　上海总商会为中比商约事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驳斥比政府外交部借口关会结束后再行会商，意存延宕；指出：中比条约定有限期，期满失效，与关会渺不相涉，请电饬驻比公使向比政府声明期满失效，无商讨展期及付诸公断之余地。13日，再电请饬驻比公使坚持期满废约。20日又电指出：若不到期取消，不特商业无发展之望，而国权亦有凌夷之惧。

△　东京留日学生总会发起国民大会，到会同胞千余人，商议驱逐卖国代表赵欣伯及援助被捕10同学事。8日电国内各公团请援。

9月4日　　驻渝英领义思德致最后通牒于杨森，限令24小时内释放扣押之"万通"、"万县"两轮，否则实行轰击。

△　万县各界组织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并发表宣言。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任命李垣为京兆尹，李寿金为京师警察总监。

△　张学良、韩麟春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商定绥远地盘归晋，西北军事由晋军独力负责处置，必要时再请奉军帮助。

△　驻泊广州沙面之英舰两艘，4时许越界驶往并寄泊于西堤前工商检验货物处河面，炮口指向该处，下令驱逐大小船只，并占领省港码头罢工工人饭堂。下午3时许，又来一艘炮舰，围集省港码头河面，小汽船往来巡梭，50余名水兵携机关枪数挺登陆，占驻省港码头。6日，英舰派三艘小电船，包围因破坏罢工被扣留之“亚伯”轮，并派兵过船强夺而去。

△　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可澄为强行将女师大等三校合并，带领军警武力接管女师大，迫令教职员于一小时内一律离校。全校教职员、校警、茶役当即一律搬出。次日，教职员集会反对三校合并，学生会亦发宣言指责教育部。

△　北京女子大学全体教员、学生及家长纷开紧急会议，一致挽留校长胡敦复，以抗议北京政府教育部将女大并入女子学院之决定。20日，胡敦复呈请教育部暂缓并入。

△　上海华侨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谓：清廷与各国所订条约，皆系片面，海外华侨受条约束缚之痛苦，不堪言状。近来期满之条约不止一国，务恳迅速通知各该国政府概行废止，重订平等新约。

△　章太炎致电孙传芳，自称，“为国呼吁，为民请命”，请孙即出师攻国民革命军，并谓：“赤氛北犯，江汉阽危，执事缨冠赴救，非为疆场之事，乃为国家保障主权也。”

9月5日　英军酿成万县惨案。下午4时，英装甲舰“嘉禾号”由宜昌到万县，逼近被杨森部扣留之“万县”轮，乘守轮士兵不备，袭入该轮，猛用机枪扫射，毙杨森部士兵100余名。同时，英舰“柯克捷夫号”及“威警号”用大炮轰击万县城两岸杨家坝、南津街及省长行署等地，引起火灾，焚毁民房、商店1000余家，死伤人民4000余。杨森部开炮还击，据驻京英使麻克类称死英海军军官三、兵士四，伤军官

二、兵士13。

△　杨森为万县惨案发出通电，详举惨案事实后略谓：“英舰‘柯克捷夫’前同‘万流’轮已勒提我军枪支，并擅用机关枪扫射，我方概未还击；嗣在交涉中，仍以大炮对准万城作攻击状，并通知旅万外侨迁避，足证其早有轰城决心。乃本日竟同‘威警’舰、‘嘉禾’轮悍然向我擅开战端，实属破弃公法，绝灭人道，待我国家直殖民地之不若。除电请政府向英使严重抗议制止英舰继续作战，保留一切要求条件，并派员来万调查以作交涉根据外，谨请军民各界起维国权，主张公道，一致对英，雪此大辱。”

△　10时，国民革命军江右先遣队向汉阳发起攻击，汉口守军纷渡汉水增援，激战至下午4时，二十七团占汉阳城脚，二十六团占扁担山。倒戈之鄂军第二师炮兵及步兵第八团向龟山进攻，与高汝桐部展开争夺战，激战终夜。至6日拂晓得援，击退守兵，占领龟山。6日下午3时，第八军第二师占兵工厂，第四师得刘佐龙部内应，克复汉阳城。

△　凌晨，国民革命军各部复攻武昌城，武昌九门有六门受攻，奋勇队三面攀登，死伤累累。刘玉春部顽强抵抗，炮火猛烈。中午，蒋介石到洪山，决定暂停攻击，除一部警戒外，大部退至邓家湾附近整顿。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照会驻粤英总领普理宁，严词抗议英舰驶进西堤占驻省港码头，要求：一、立刻撤退码头上之武装英兵；二、英海军立即停止干涉江面小船；三、英舰应退至沙面外原停泊处。照会并保留要求赔偿之权。12日，英舰撤退。

△　吴佩孚迫令汉口商会迅速筹饷250万元；并发电谎称四天之中共击毙北伐军数万人，王都庆部已在4日攻占长沙。

9月6日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第一师克复赣州。杨池

生、杨如轩部向遂川方面退却。

△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十五团经大义口、高泄里威胁萍乡守军之右侧背，第八师主力驱逐上栗市守军向清溪前进，第二十六团向桐木前进，第七师进至白兔潭，是日晨各部开始攻击前进，10时占领萍乡。

△　孙传芳致电谭延闿及国民革命军诸将领，请攻赣粤军迅速撤退。翌日又电蒋介石，要求“粤军限二十四小时内全数退回粤境，不得藉词逗留”；并谓：“湘政还诸湘民，无论何方不得干涉。”

△　晚，张作霖召集重要会议商讨时局对策，自北京抵奉之张宗昌、褚玉璞以及吴俊陞、杨宇霆、陈兴亚等人与会，讨论出兵援吴佩孚、关内奉军分布驻防及西北军事等问题。

△　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中苏会议委员会，以次长王荫泰为委员长，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为副委员长，宣布在北京设商务、界务、法律三委员会，在奉天设中东路、松黑航权、债务赔偿三委员会。

△　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联会庚款董事会、国立九校教职员联席会、私立五大学联合会等四教育团体开会，议决根本推翻为日本从事文化侵略服务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一、呈请政府撤销该会中国委员；二、警告该会主要活动分子江庸等，令其停止活动，退出该会；三、请各教育团体一致力争，并揭发日人文化侵略之阴谋。

△　新成立之故宫保管委员会会长赵尔巽、副会长孙宝琦以接收困难，向北京政府辞职。9日，京畿宪兵司令部以清宫交接问题，传询前委员会事务长陈垣。

9月7日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渡汉水攻占汉口。吴佩孚军向黄陂、孝感退却。商店鸣鞭炮悬青天白日旗庆祝。士兵四出演讲革命，散发传单。刘佐龙以蒋介石所委之武阳夏公安总司令名义出示安

民。

△　孙传芳援赣之先遣部队江苏第四师谢鸿勋部及第七混成旅杨镇东部已于月初进抵修水、铜鼓。6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由通城推进至赣境，当即向修水进击，是日晨8时，第十七师前卫在马坳附近与谢鸿勋部接触，鏖战半日，击溃谢部之赵团，毙200余，俘300余。第十九师由全丰、杨溪、风鼓泉包围修水，继续攻击前进，在杭口及修水南门附近激战，死数百人。11日，击溃谢部第一、二团兵力，克复修水，跟踪向武宁方向追击。

△　吴佩孚以汉阳、汉口失守，武昌危在旦夕，是日偕靳云鹗、杜锡钧等自汉口乘火车北逃，渡江奔孝感。临行前吴电孙传芳，略谓："我弟总镇长江，威加南北，试一举手，即可戡定中原，奠安华夏。今赤贼既已得志于湘、鄂，势必窥赣边而通声气。应懔唇亡齿寒之戒，念辅车相依之切，虞虢前车，可资殷鉴。"

△　国民党中央第十六次政治会议通过对时局宣言，略谓："本党之目的，在求中国之统一与和平。吴佩孚为统一和平之最大障碍，故毅然以武力扫除之。""各地军队，其于本党主张表示同情者，一律引为友军，共赴国难；其于本党行动不加妨害者，亦当开诚相与，无所嫌猜。"宣言并谓国家根本之改造，在"召集真正代表人民之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奠定国本"。"凡夫建立统一政府，规定地方制度，改善国际关系，发展经济、便利交通诸大端，皆应由国民会议决定方策，次第实行"。关于对外政策，宣言谓："统一政府成立之后，首应与平等待我之任何国家，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订定新约，以修和睦，而维和平。"

△　国民政府发布《出师北伐告全国人民书》，宣称："秉总理之遗嘱出师北伐，以蒋校长为总司令，委以讨贼吊民完成革命之重任。盖用兵虽危，顾不如是，则中国难免亡于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手也。敌人拥兵甚众，据地甚广，铲除虽未易言，而革命主义之毕竟成功，

大足以坚吾人之信念也。革命成功唯一之要素，在得民众扶助。前此国民政府得以成功于南方者，实赖南方民众之力。此次北伐，深望全国民众亦与以同等之扶助焉。”文告并提出对农民、劳工、商业各界之兴革大计，勉共同合作，为达成建立自由独立国家之使命而奋斗。

△　国民政府发布《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指出：“自农民组织团体之后，对于政府、社会有绝大之援助，其重要者即反对一般反动及贪利之军阀是也。”“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于农民协会仇视甚深，有势不两立之慨。”“政府特于此第三次宣言中明白表示：政府自始至终实行已往之宣言，尽力保护农民之利益，协助其组织之发展。”

△　孙传芳通电抨击国民革命军进攻萍乡，声称：“为避免战祸计，已令边军退让，撤退赣境数十里，一面严重诘问，待其答复。倘执迷不悟，一再破坏和平，芳惟有励方怒之将士，保垂尽之边民，亲执櫜鞬，以请命于军前。”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任命王琦为京畿宪兵司令，杨绍寅为京师军警督察处长。

△　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公布戒严条例八条，有“禁止输出民有物品可供军需之用者”，“交战不得已时，得破坏、烧毁人民之不动产”等规定。

△　中午12时，英舰“顺利号”在广州河面车歪炮台附近武装夺取罢工委员会轮船“亚细亚号”，没收船上纠察队之枪械子弹。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驻粤总领事普理宁抗议，要求放还该轮并赔偿损失。14日，“亚细亚号”放回。

△　上海各界300余团体代表及市民二万余人，上午在西门民国路开会纪念“九七”国耻日。与会群众集队游行，沿途散发传单数十万份，高呼口号。工、学各界组织900余讲演队到租界分头讲演，21人

被捕。经抗议、交涉、营救，27日全部获释。

9月8日　　蒋介石抵武昌城外之南湖，警告陈嘉谟、刘玉春：如不于24小时内开城投降，将不得不发炮猛轰。9日，商会徐荣廷偕刘文岛赴南湖行营向蒋屈膝泣乞，请再延八小时待商办法，以免城内百姓同遭浩劫。蒋允令唐生智办，唐允由商会斡旋。

△　孙传芳电张作霖表示“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次日，张复电云：“玉帅（吴佩孚）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

△　全浙公会在上海召集常务董事紧急会议，商讨江西战局吃紧、奉军决定南下之应付办法，决推蒋尊簋、殷铸夫、沈田莘三人即赴宁与孙传芳接洽。陈其采、蒋尊簋、褚辅成、殷铸夫、沈田莘联合各方士绅开展“和平”运动，酝酿发起组织一大规模之民间团体以提倡自治。

△　范石生通电声讨唐继尧，即日由广西恩隆（今田东）平马出师。

9月9日　　朱培德率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军向宜春进攻，是日午后进抵芦溪，先头部队到达宣风、竹坪附近之线。翌日，在距宜春30里之孟子桥附近，与赣军唐福山、张凤岐部接火两小时，赣军退却。晚8时，第二军占宜春，赣军向分宜退去。万载守军向上高退走，第二十六团由桐木追击，占领万载。

△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刘兴部沿京汉铁路追至横店，与高汝桐部激战，四师由右翼包围，高部向祁家湾退却，小股向黄陂退却。四师跟踪追击，午后4时占祁家湾，8时克黄陂。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关系各国驻京公使：请转知驻沪商务代表，请参加编订货价委员会事务，随时接洽一切。法、英、美、意、

日使先后函复派定驻沪领事或参赞参加。

△　旅荷华侨电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中比条约满期，请明令宣布废约。

9月10日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除第十三团一部暂留黄陂外，大部由廖家铺、贾家铺、徐家桥向孝感侧击。第三师一部接守黄陂，大部在四师后跟进。下午1时，第四师占孝感，守敌向广水退却。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万县惨案事向英驻京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英惩办肇事军官，并保留赔偿之要求。14日，再次抗议，并请暂止英舰驶往长江上游。

△　苏驻京大使加拉罕奉调回国，取道海参崴返莫斯科，是日离京。1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上海特派员许沅，谓毋庸按章接待，应严密监视有无轨外行动。15日，加拉罕对《大陆报》记者谈话，表示同情广州国民政府之表现，谓只有民众之势力如国民党者乃能统一中国。26日，加拉罕等五人乘船离沪。

△　商震部占包头。

△　萍乡举行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会，并宣告成立萍乡煤矿总工会，2.3万余人参加，萍乡、醴陵、株洲、长沙各地27个工农团体代表亦到会。14日，萍矿总工会召集代表大会，并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

9月11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开进大冶，占官矿局。15日，由大冶向阳新推进。

△　刘志陆、马济、叶开鑫、方殿甲等联名电孙传芳，请允粤、桂、湘、鄂四军加入五省联军，并恳孙就“九省联军总司令”职。

△　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应届毕业生318人组成之考察团，由萧楚女等率领到海陆丰实习，考察一月后回广州，是日举行第六届毕业礼。

9月12日　张作霖派靳云鹏至南京，与孙传芳面商合作共援吴佩孚“讨赤”办法，许孙以完全合作，不必相猜；表示奉、鲁军决不进兵津浦路，如有南下“讨赤”必要，亦将取道京汉路。孙传芳允苏、鲁境界不驻重兵，马登瀛旅即日开拔援鄂。翌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直鲁联军及各军将领，讨论援助吴佩孚、孙传芳及攻击国民军诸问题。

△　武昌商会为武昌城内人民免遭战祸，连日与国民革命军和守城吴佩孚军双方商洽办法。是日，陈嘉谟、刘玉春向商会代表提出三项条件：一、吴军改编，应先通知调防地点；二、商会筹集军饷，尚有120万元未交，此款应发给吴军欠饷；三、商会担保各将领生命安全。协商无结果。商会代表邀中外教士调停，外人表示“严守中立”。翌日午后，国民革命军复开始炮轰武昌城。

△　唐绍仪、张一麐通电各方领袖：请以武汉为缓冲地，停战开会议和。

△　驻京英使麻克类驳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万县惨案之抗议，声称：“中国政府若无制止中国军队暴行之能力，英国只可取自由行动。”

9月13日　唐生智与刘玉春关于武昌城处置办法之谈判破裂，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攻城部队以巨炮及汉阳之排炮轰击武昌，并用飞机投掷炸弹。

△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自孝感沿京汉铁道前进，第三师由铁道以东地区前进，鄂军第二师由铁道以西地区前进。晚，第四师占领广水，第三师抵双桥镇，鄂二师占应山。

△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于7日由岳阳转浏阳，进攻江西铜鼓孙传芳军杨镇东部，是日3时在上萑界附近之横界峰田坳地方接触。第一师之二团在丰田何家坳附近被围；三团8时包抄到铜鼓城东南左翼，攻击温汤南五里之荷塘；一团拂晓派一营侧击下油铺，与二团联络。至午前，三团击破铜鼓守敌，下午进城。

△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在修水南之山口得悉第一师击破铜鼓，即令一部由金鸡桥向大埚截击，一部由石街向奉新大道截击，俘获300余人。杨镇东率残部1200人向宜丰退却，程派十九师开往潭山、奉新截击。

△　福建各路民军联合组成“福建国民军”，推宋渊源为参谋团临时主任，卢兴邦、高义、杨汉烈、吴威、叶定国、陈国辉分任六路司令，陈烈臣、罗伟、林志民、林鹤分任游击队司令，陈启芳、梁济川为独立第一、二支队长。是日联名发出快邮代电，略谓：“本服膺三民之训，矢团结一致之诚，为主义战，为人格战。总期共诛周贼（荫人），先澄左海之波，仍当协歼元凶，痛饮黄龙之酒。报国者唯为国而牺牲，救乡者宁以乡为畛域。”

△　蒋介石于武昌南湖通电驳斥孙传芳7日电，略谓：孙8月30日发作战命令以及对湘、粤作战计划，征调频繁，谋扰湘、粤，乃以保境安民为名，行侵略扰民之实。

△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颁布新闻条例八条，规定汉口市内各报所编新闻稿及各通讯社发交外部稿件，均须交检查新闻委员会检查。

△　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本政府拟购买东京中国使馆之房产一事警告日本驻粤领事，声明此乃国产，北京政府之代表无权出售。

△　国际联盟选举中国及比利时、瑞典、罗马尼亚、波兰、智利、古巴、哥伦比亚、乌拉圭为非常任理事。

△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政府未与列强开任何谈判以对华采取共同行动，并表示将决不采取此项行动。

△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徐谦提出司法改良意见，认为旧日司法独立说违反国民党党义，司法机关必须与政治方针相统一，司法人员应受党务、政治训练，培养成为新进的革命法官、革命人才。现行法规、法律，其中有的是抄袭外国，与革命精神相反，应加全部审查，作根本修改。徐提议须在国民党中央领导下，吸收地方党、政、司法机关及各群众团体代表，组织司法制度改造委员会，拟定方案，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

△　重庆各界为万县惨案举行四川国民雪耻水陆游行示威大会，工界罢工，商界罢市，学界罢课，各机关团体亦停止办公。18日，各界三万余人又举行水陆示威游行。

△　浙江省慈溪县山北地方农民2000余人，到县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发生冲突，焚毁警署，并将警察枪械缴去，后又转到乡绅地主家“吃大户”。

9月14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颁发封锁武昌计划：陆路由攻城部队任之，对武胜门、忠孝门、贵阳门、通湘门、起义门、保安门、望山门通城外之路及其他要道均备障碍物防敌冲出扰乱；水路由第八军、十五军驻防阳夏部队及攻城部队协同任之；通信封锁由飞机及第八军二师驻阳夏部队暨前敌总指挥部任之。

△　正午，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十三两团追至鄂、豫接壤之东篁店附近，吴佩孚军以五六千人反扑并以铁甲车冲锋。革命军抄袭吴军后路，吴军向平靖关、武胜关、大新店退却。傍晚，第四师占东篁店。

△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十六团克复江西上高，赣军向高安溃退。第二军亦克复分宜。

△　唐生智所部之第八军已扩充至4.5万余人，月需军费200余万元，湘省全部收入尚不敷此数。唐电湘按月解缴100万元。是日，湘省政府以全年省预算收支相抵不敷二千六七百万元，公推财政厅长刘岳峙、建设厅长邓寿荃赴武汉谒唐生智商解决办法。19日，唐在汉口开湘省临时省务会议，议决自10月起担负经常军费60万元。湘省政府将前已提征至民国二十年之田赋一律作为无效，下令自11月1日起重新开征今年田赋。

△　武汉总工会成立。

9月15日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刘兴部攻击武胜关，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攻平靖关，第三师李品仙部随第四师前进。翌日，第四师击退田维勤部占领武胜关及新店，鄂一师攻占平靖关，第三师占领鸡公山、九里关，残敌向信阳方面退却。

△　国民党中央在汉口组成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为处理全省军事、政治、财政之最高机关，俟省政府正式成立时取消；颁布《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条例》，任命唐生智、邓演达、陈公博、刘佐龙、李宗仁、陈可钰、詹大悲、董用威、刘文岛、喻毓西、陈铭枢、胡宗铎、夏斗寅13人为委员，唐生智代理主席。

△　蒋介石委刘佐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邓演达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兼江汉关监督兼交涉员，邓兼兵工厂厂长。

△　国民革命军通告驻汉领事团，即日起封锁武汉江面，上下游往来商船须在各指定地点检查，并禁止驶进武昌，否则即开炮射击。

△　冯玉祥8月离莫斯科返国，是日由库伦抵五原。

△　寇英杰派徐声钰赴济南谒张宗昌，商议直鲁豫陕晋五省联盟“讨赤”服从张作霖、吴佩孚指挥。张答称：鲁军决尽力助吴“讨

赤”，饷械队伍均已备妥，专候张、吴两帅命令。

9月16日　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军向江西省新喻县（今新余）方面进击，赣军邓如琢、张凤岐、唐福山诸部及七大队在新喻附近占据阵地顽强抵抗，激战三昼夜，赣军主力被击破，由清江溃往樟树，小部向高安退却。是日，国民革命军占新喻。

△　方本仁派贺守中到吉安，劝蒋镇臣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被蒋扣留。当晚方亲自化装到吉安劝降，亦被扣。

△　法权调查会议在居仁堂开末次会议，通过司法调查报告，计分四章：一、中华民国治外法权之现状；二、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之现状；三、中华民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四、各国对中华民国司法制度之劝告。英、法委员作最后修正后，13国委员全体签字，决定分送13国政府协议后再行公布。中国委员王宠惠提出撤销治外法权之意见书，各国委员口头表示赞同，称须待军阀干涉司法之越权行动消灭、法庭完全独立后，方可实行。历时八个月之法权会议至此结束。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十五年秋节库券”300万元，以应付秋节紧急政费。公布条例，规定利息八厘，民国二十年（1931）3月20日一次还清。该库券不依向例由总税务司保管基金，不经银行承销，而作为现款给各机关。

△　奉方派张景惠离京赴长辛店晤齐燮元，磋商接收保（定）大（名）问题。

△　潘复到宁谒孙传芳，面商苏、鲁协调，议定五条：苏、鲁交界地区各驻兵一旅为限；徐、皖一带盐税归鲁省；津浦路收入徐州以北者归鲁，以南者归苏；马登瀛南下，由鲁军填防兖州；鲁军援鄂，乘津浦路南下不得到徐州以南。

△　靳云鹏积极活动组阁，以“领土统一，人才集中，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16字“新政策”广为招摇。是日，靳由津赴奉。

△　驻京美使马瑞慕取道上海去菲律宾会晤菲总督，12日抵宁谒孙传芳，是日在沪接见《大晚报》记者，谓北京之中央政府等于赘旒，致吾人办理外交事务多需与地方官直接交涉。又谓：领事裁判权固为弊制，但在目前乃为必须之弊制。

9月17日　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国民党于右任等人帮助下，是日12时在五原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誓辞曰：“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死生与共，不达目的不止。”誓师入陕，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同日，国民军第一、二、三、五军将领张之江、邓宝珊、孙岳、方振武等20人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

△　国民军刘郁芬部在甘肃联合回军，击溃吴佩孚系甘军张兆钾、孔繁锦两部，分路由陇东、陕北援救被围西安之李云龙、杨虎城部。

△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与建国豫军樊钟秀部联合进驻武胜关。驻信阳附近之庞炳勋部倒戈，吴佩孚由信阳退往郑州。

△　张作霖派张景惠到郑州谒吴佩孚，接洽援鄂办法。翌日，张携吴函回奉复命，谓中央政治听奉主持，请竭力筹措饷械接济。吴函称：京汉线尚有大军十余万，足供反攻之用，请接济饷械；如派军队，请由渤海舰队载运由海道直捣广州。

△　褚玉璞由天津赴济南晤张宗昌，筹划出兵援助吴佩孚，并商议直鲁豫陕晋五省联盟“讨赤”事。同日，张宗昌派参谋长李藻麟专车赴京，调动京、津一带之鲁军援鄂。

△　归降吴佩孚之原豫籍土著部队第十师任应岐部、十一师李振

亚部、第一混成旅马文德部及袁家骥部在河南宣称独立。

△　国民革命军用飞机在武昌上空散发传单，劝告武昌军民迅速自决，次日又限守城军24小时内投降，否则将用大炮攻城。武昌文华大学主办人、美国人孟良佐、韦格非两人缒城而下，到汉口与商会接洽“调停”推迟攻城日期。

△　国民政府为统一币制，铸造一元、半元、双角三种新银币，流通于国民政府所辖各地，并将所有旧币收回改铸。

△　北京政府驻宜昌、重庆交涉员与英领事、司令官为万县惨案举行谈判，结果允释放“万县”、“万通”两英船；赔偿我军民损失问题未达成协议。

9月18日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杨源浚部在程潜率领下转由江西同安向高安攻击前进，在第三军二十六团协同下，是日攻克高安。赣军谢文炳、张凤岐、唐福山等部向南昌退却。

△　北京国务院举行会议，杜锡珪声言即日辞职，请军警长官维持治安。京畿宪兵司令王琦等到会谓，节关已届，京师军警需开饷80万。商议直至深夜，最后由顾维钧允诺80万，次日3时顾等方出院，军警机关各派代表三人同往顾宅，守候80万现款。20日，杜锡珪到顾宅解围，电张嘉璈、卢学溥来协商，决定由中、交两行开库兑现，当现签发支票70万元、库券25万元交军警代表。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函英驻粤总领事普理宁：近期将解决排货风潮，决定对平常入口货品征特别消费税百分之二点五，奢侈品百分之五，出口货亦征特税若干，照关单计算。

△　杜锡珪摄行大总统派朱兆莘署国际联盟行政院代表。

△　万县市民为抗议英兵烧杀，举行水陆城乡大示威；翌日，在西校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议决“请求政府对英交涉”。

9月19日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率第十九师杨源浚部自高安东进，是日下午在南昌工人、学生、省长所属警备队等响应下，突占南昌城。是时，第三军朱培德部在高安附近，第二军与赣军邓如琢部对峙于樟树镇，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一师尚在奉新、罗坊间。

△　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击破赣军邓如琢部，克清江。邓部向樟树退去，第十一团跟踪追击，翌日到樟树大河西岸。

△　蒋介石离鄂经长沙入赣，是日抵萍乡，设总司令部行营于高安。

9月20日　英驻京公使麻克类就万县惨案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诬称此案之直接原因，为杨森欲强占一该国轮船运输军队，“行动几等于海盗”。照会并谓：“将竭力设法将该案就地解决，但未开始讨论之先，所截留之英舰两艘应即交还。”

△　杜锡珪电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要求辞职，略谓：“今日政局益趋纠纷，财政困难已臻极点，无论如何努力，终难期各方满足，遗憾实多，纵勉维现状，迄此节关，过此以往，实无法再行支撑。”翌日，张作霖复电称：中枢政局向由吴佩孚主持，仍希与吴商。吴电杜谓“时事多艰，军兴未艾，请维持中枢”。

△　周荫人奉孙传芳命，督率第十二师自漳州出发攻粤东大埔。

△　浙、苏、闽、皖四省奔走“和平”之代表蒋尊簋、魏伯桢、赵厚生、史家麟、李次山、张一麐由上海到南京，晤见孙传芳。孙提出“和平”条件为：一、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事；二、由各方自由推戴人选组织内阁，取决多数；三、召集南北和平会议，选举总统，划分军区，匀配财政等项。

△　旅比华侨各界废约后援会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誓死反对政府允中比条约延期，决派代表赴瑞士，与旅日、英、法、德侨民代表共

同行动，迫使驻比公使王景岐采纳民意，否则“民愿偕亡，铁血随之”。

9月中旬　阎锡山接济吴佩孚饷30万元、枪弹50万发，派梁巨川押赴信阳。

9月21日　孙传芳因江西告急，率援军由南京赴九江。

△　郑俊彦率新到援赣苏军由南浔路攻南昌。邓如琢部经丰城由南路北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竭力抵御，苦守三日，终不能支，是日退出南昌。次日，又会合由奉新赶到之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师再度攻入南昌。卢香亭率援军赶至围攻，激战不已。23日，程潜率军突围冲出南昌西撤。

△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十六团及第十八团之一营在副师长朱耀华率领下，由萍乡向莲花东进，17日午后在安福附近与投赣之陈炯明粤军残部陈修爵部接触，次日退守城西。朱耀华集合部队反攻，是日占安福城，赣军向吉安方面退走。吉安南之泰和县亦同时为国民革命军所占。

△　蔡廷幹、顾维钧、张国淦向杜锡珪辞外交、财政、内务总长职。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10月1日起取消封锁港澳政策，即日恢复粤港交通，准人民自由来往。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照会英驻粤总领事普理宁，谓已与罢工委员会磋商停止杯葛办法。

△　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陈树人召集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各工会代表125人举行会议，略谓：北伐顺利进展，地域扩大，过去政策已不适用，且须筹措军费支持北伐，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取消封锁香港之政策。晚，国民党中央宴请各罢工团体领袖。

△　国民政府发布《党员背誓罪条例》，规定“党员违背誓言而为

不法行为者，分别情形按刑律加一等以上处罚之”。

△　国民党全欧代表团为废除中比条约发出告海内外同胞书，提出三项主张：一、海外同胞作种种示威，并监督中国公使到期申明废约，如比国不承认，则促中国公使、领事下旗归国；二、国内各团体及全国人民全力督促北京政府或径电驻比公使于10月27日正式宣告中比条约作废；三、国内各社团应分电比国政府，驳斥其狡赖之无理，以示我国人民废约之决心，即使断绝国交亦在所不惜。

△　直系之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去职，翌晨离京南行，所部毅军开赴西苑移驻保定。驻在天坛及南长街公府之卫戍军诸团，被奉军缴械。26日，原卫戍军之团长李永清、李清雅、王殿元等通电一律改隶“镇威军”，服从张学良、韩麟春节制。

△　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及教职员联席会议，决定函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顾维钧，略谓九校每月经费需20余万，拨款一万可作何用？请负筹划经费之责。24日，九校长校务讨论会决定十日内暂不开学，积极奔走经费。

9月23日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彭汉章部在鄂西黄金口、斗湖堤与卢金山、于学忠、王都庆等部激战，于、王等部向沙市、宜昌方面退去。

9月24日　蒋介石在宜春策定全赣作战计划：第三军及第一军第一师协攻南昌；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对南昌之攻击；第二军主力与第一军第二师攻樟树，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第七军主力攻九江，一部警戒长江南岸；第十四军及第二军第五师攻吉安等地。

△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由泰和向吉安进攻，第六师戴岳部亦向吉安进迫，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向吉水、永丰抄袭。赣军蒋镇臣部见势不敌，陆续向赣东方面撤退。23日下午，第五师在高塘墟与赣军接触。是日，赣军向吉水退走，晚8时，第五师进占吉安

城，第六师之十六团协同进攻，亦入城。

△　程潜率第六军第十九师杨源浚部自南昌突围，渡过万河，翌日抵万寿宫，与第三军第七师王均部会合。所部死伤离散甚多。

9月25日　孙传芳军马登瀛部乘“决川”、“浚蜀”二舰在黄石港登陆，占大冶，联合江苏第四师谢鸿勋部与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接火。退驻武穴之马济、叶开鑫残部至广济策应。

△　张宗昌、褚玉璞以援鄂为名，不待吴佩孚之同意，部署直鲁军分六路出兵：北方第一路褚玉璞率孙殿英师由任丘往保定，第二路徐源泉部由沧州赴石家庄，第三路王栋部由北京南下至保定，以上三路先巩固直省防务；南方第一路许琨部假道徐州往商丘，第二路程国瑞部经济宁、曹县往考城，第三路王翰鸣部自东昌穿大名赴彰德，以上三路限十日内先集中兖州，以声援郑州、开封。

△　齐燮元移驻保定，以保持保（定）、大（名）免为奉鲁军所占。27日，齐访张学良，谓现驻保、大军队缺乏车辆，一时尚难完全开拔，请暂缓派兵接收保、大防务。张谓此事系直鲁范围，须转商张宗昌、褚玉璞。

△　广州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召集安置罢工工人办法会议，并邀实业、财政、市政三厅长出席，商议在渔业、开垦、开辟黄埔商埠、展筑粤汉路等各方面安置工人，并由政府筹款酌补工人损失。

△　蒋介石任命郭沫若代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9月26日　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之13处分行，奉巴黎总行董事会电令停业清理。该行由中俄两国合股经营，中国政府有股本500万两，且有存放关税、盐款及发行钞票之关系。29日，北京政府任命王宠惠为正清理员，法人巴杜副之。30日，北京政府财政部发布清理章程，规定清理事宜依中国法律执行，一切现金、产业偿还债权人，未

得清理员许可不得移出中国国境。

△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占吉安后，乘胜追击赣军蒋镇臣部，是日晚占三曲滩。翌日，所属第十三团、十七团与蒋部激战，蒋部向永丰退却。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丁超五提案：将来政制应听候中央主持，各级党部不得自由向外发表意见，以免纷歧。并发出训令，饬所属党员遵照。

9月27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夏威、胡宗铎两部经由大冶、阳新南下，在洋港与孙传芳军谢鸿勋部千余人遭遇，是日拂晓发起攻击，午刻谢部向石里头方向退走。翌晨，第七军经石里头向瑞昌前进，谢部据险扼守，顽强抵抗。经五小时激战，谢部不支，向箬溪方向退却。

△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由汕头抵高陂，督饬所部分三路进击闽军：第一军谭曙卿第三师为左翼，由大埔攻永定；第一军冯轶裴第十四师任中路，由饶平攻永定；张贞独立第四师及钱大钧第二十一师一部为右翼，出松柏关攻平和。另调赖世璜第十四军向汀州袭闽军后路。

△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举行国民党全军代表大会，历时三天，29日结束，成立最高特别党部，选出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钰、王一飞、张兆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11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五人为监察委员，卢召亭、张树声、张金宣、何其巩、白龙亭、张海如、李宝铨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刘廷森、刘仁辅、李鸣钟三人为候补监察委员。

△　张学良、韩麟春委其第十军军长于珍为京畿卫戍总司令，接收京畿卫戍司令部。于派副官长率第二十七团赴帅府园司令部接收，王怀庆之参谋长马履恒于28日晨将文卷交出，卫戍旅改编为奉军第四

十六旅。

△　吴佩孚以直鲁军进驻保定、大名，电令驻保、大所部勿再南下，所委官吏不得擅行交代。吴命原属王怀庆部之毅军退驻京汉线北段，以阻奉鲁军入豫。

△　上海银行公会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财政部，要求政府派专员办理道胜银行清算事宜。翌日，又会同钱业公会电请将关税存放之权完全收回，不再为外人操纵。

9月28日　吴佩孚坐困郑州，内部离析，屡下令进攻武汉，部下皆不听。是日，吴改部属为军团制，以王为蔚为第一军长，王维城为第六军长，魏益三为第八军长。

△　褚玉璞在天津通电列举冯玉祥、蒋介石八项“赤化”罪名，表示决“追随效帅（按：指张宗昌），禀命镇威，南下讨赤”。

9月29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通告否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设立之伪中央党部。

△　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中国对外各商约，满期后即行撤废另订，不再展期，以免援例。并电复滇交涉员，谓中法越南商约决不延期。

△　比国驻京公使华洛思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谓比国政府对中国政府9月2日提出之《临时办法》不能承允；比中两国可及早商议修改原约之第四十六款，以便修成之约届时代替原约。

△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两个团向永丰、乐安、宜黄前进。先头追击部队与赣军激战数小时占永丰城。十四军在瑞金的一个团和特遣支队经宁都向北前进，翌日分别攻占广昌、南丰。

△　武昌城被围困已20余日，粮食殆尽，武汉商会及慈善团体救

济难民出城的工作，受让城收编交涉影响，进展艰难。是日，汉口商会代表入武昌城与刘玉春继续磋商，并带妇孺万余人回汉口。

△　香港罢工工人留省各工团在广州举行会议，议决：一、请国民政府明白宣布此次恢复交通之原因；二、质问政府如何安置罢工工人；三、恢复交通有无条件，亦请政府答复。

9月30日　国民革命第三军第七师王均部迎击自万寿宫等地出犯白仙岭一带之孙传芳军郑俊彦部。次日，郑部殊死搏战，冒炮火反扑。下午3时，右翼第八师朱世贵部自高部侧击，进攻大庙逼进敌后；第七、九两师以三团之众出击，5时陷敌阵而克万寿宫。10月2日下午，第八师大败王良田部于大庙。第三军大部向生米街、一部向南昌追击。

△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拂晓攻击箬溪附近之孙传芳军谢鸿勋部，激战至午；下午3时第七旅包抄右翼，正面又猛烈冲锋，乃将该部全歼，俘2000余。师长谢鸿勋重伤赴沪医治，10月15日毙命。

△　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各工会代表1900余人列席旁听。委员长苏兆征宣布改变罢工政策：一、为使革命势力之增进与巩固，变更旧式封锁，扩大为全国民众新的杯葛运动；二、赞成国民政府征收附加税，请政府实践诺言，将此款全部津贴罢工工友，不作他用；三、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各工会机关纠察队仍旧存在；四、各工友未有工作以前其待遇如旧，其找工作未得而返回者依然得享罢工工友同等待遇；五、请国民政府饬财部绝对负责所有关于罢工之经济补助；六、督促政府立即开辟黄埔商埠及延长粤汉铁路以安插罢工工友，并在新兴实业中先用罢工工友；七、联合各界扩大经济绝交运动，并督促政府扶助；八、实行新策略决不是妥协、屈服，乃为适合新的革命环境之最有效最急迫的方法。出席委员对上列八项一致通过。

△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举行阅兵、授旗礼，冯玉祥代表受旗并致词云："此后誓本孙中山先生之主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促成国民革命之完成。"

△　曹锟到郑州后与吴佩孚商议对策，是日召集会议，竭力调和内部，决定：一、限五日分五路反攻，务期恢复武汉；二、派人赴奉，望张作霖谅解一切，保（定）、大（名）接收亦望从容办理。各军推曹锟为大经略史，吴佩孚、孙传芳为副经略史。曹力辞，谓将久居沪上，不问政事。吴力述北洋团体有巩固之必要，务须同心同德，勘定大局，否则势将瓦解，不堪设想。

△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顾维钧令稽核总所：将各地汇出应存道胜银行之关税盐款，改存汇丰银行。上海、北京银行界人士纷起指责，谓应乘此机会提归内国银行自理，不能仍任外行把持。

△　吴佩孚派张国溶、符定一等到济南，与张宗昌、褚玉璞商议暂缓接收保、大以及停止鲁军南下援鄂事宜，决定：一、保、大接收事，待粤军退出湖北后再议，现在已驻保、大之直鲁军可不开回；二、已动员之援鄂军队，中止前进。

是月　安福系分子四出活动，谋恢复段祺瑞政府，将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联成一体，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张作霖为大总统，以对付北伐之国民革命军。具体方案为：一、临时政府照去冬办法，加内阁总理。尊重奉方意见，择梁士诒或靳云鹏充任；二、段复位后即召集南北和平会议，中止全国军事行动；三、于和平会议中，决定国民会议召集办法；四、召开以上两会至少要六个月，故段之任期暂为六个月；五、六个月后以形势所趋，请张作霖为正式总统；六、段政府恢复后，负责完成关税会议。

△　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

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10月

10月1日　北京政府改组。北京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准免蔡廷幹署外交总长职，特任顾维钧署外交总长。

△　驻京法使玛太尔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见次长王荫泰，声称道胜银行自俄国革命后，已在法国政府注册立案，归法国保护；中国政府因该行之停业而派员清理账目，应先征求法国同意，否则不能承认。王答：道胜银行系华俄合办，中国不能承认与法国有任何之关系；且事前未接通知，当然不能承认该行受法国政府保护；中国政府派员清理，系属当然之事，法国无干涉之权，更无事前征求同意之必要。

△　于珍就京畿卫戍总司令职。4日，于访北京外交团，表示担保京师治安。

△　北京外交使节开谈话会，商议租界“治安”问题，商定于必要时增武装巡捕。

△　拂晓，孤守武昌城之刘玉春部企图突围。驻望山门之部队先行冲出，放火焚毁民房；驻通湘门之部队6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冲出，向火车站攻击；驻中和门之部队亦冲出。各路均被国民革命军围城部队堵截击退回城内。3日夜，驻通湘门、保安门之部队再度冲出，仍被击回。

△　国民军刘郁芬部开入甘肃平凉、武都。孔繁锦部退至清水、两当及陕西邠（今彬县）、陇等县。

△　于珍派侦缉队到北京各书铺搜查，凡有“俄”、“社会”等字样的书籍尽被抄去；并在各学校搜捕男女学生81人。

10月2日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六师及第一军第二师由峡江渡河，沿赣江东岸向新淦（今新干）之赣军攻击，是日拂晓迫近新淦，第四师第十团、第二师第五团分由东西两面攻占新淦城。守敌陈修爵、唐福山、杨池生等部经桑村向芗溪方面退去。

△　汪荣宝等14名驻外公使联衔急电上海转各省军民长官、省议会、教育会、其他法团及全国父老，主张停止战争，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一切。略谓：“同人等往返电商，以为此时救国之策，惟有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最为合理。拟请两方军事当局捐弃成见，商订休战条件，即时实行。一面通电各省派遣代表，公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于适当地点召集，即日选举大总统；并仿照现在法兰西博安加勒内阁成例，联合各派巨子，组织一致之政府，确定宪法，全国信守。此后有志政权者止能组织政党，公开运动，决不得以武力为后援。至现任统兵大员，职在整军安民，不得加入政争，倘欲转入政界，必先解除兵柄，如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大将之例。”

△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张志潭因京汉铁路以外铁路皆被奉系人物所占有，环境困难，是日由天津电国务院请辞职。

△　直鲁军开入保定、大名等12县。是日，徐源泉由鲁乘铁甲车“泰山号”并率俄籍兵百名过津赴保定。谢玉田、王栋部进驻保定、石家庄城内外及涿县、定县、望都、博野一带。

10月3日　蒋介石在江西高安致电广州张静江、谭延闿转汪精卫，请汪复出，并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往劝驾。

△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胡宗铎等部进攻德安。9时，在德安附近与孙传芳之联军四个旅相遇，激战至下午5时，复肉搏一小时，孙军向九江方面退却，胡宗铎部进占德安。双方各伤亡千余，孙军被俘千

余。随后，孙军一部由涂家埠、杨家岭赶来增援，又激战两昼夜，第七军不支，于5日下午8时退回箬溪。七军稍事整顿后复发起攻击，又克德安。孙军再增援反扑，夺回德安。7日，第七军仍退回八里铺。

△　围攻武昌城之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攻城军司令部与守城之鄂军双方协商同意开放汉阳门，以放出被围困在武昌城内之居民。是日起至6日，共放出3.84万余人。居民争先恐后出城，有被践踏致死和落水淹死者。

△　张宗昌运枪弹30万、现款五万去郑州接济吴佩孚。21日又允张敬尧请，汇50万元至奉购弹械济吴。张电吴表示“合作推戴，至死弗渝”。

△　刘镇华之镇嵩军对西安进行第二次总攻击，四面逼临城下。城上国民军守军待刘军上梯扒城时发枪、掷砖，刘军伤亡甚众，无一能上。嗣后三日屡屡攻至城下，终未能攻入。

△　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大学同志会为万县惨案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抵制英货，举行纪念大会，组织万县惨案后援会。

△　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起之全国拒毒运动周是日开始，各界团体响应推行。9日，杭州举行市民拒毒大会，苏州举行拒毒讲演。

△　云南迤西人民主张联县自治，推龙云、胡若愚主持军民两政。范石生在广州发表救滇意见及讨伐唐继尧宣言，招募新兵四团准备回滇。龙、胡派代表赴穗与范接洽修好。

10月4日　顾维钧11时先就北京政府外长职，再赴国务院就兼代国务总理职。军警长官除于珍外均赴院致贺。顾演说云：“民国十五年至今战乱不止，杜代阁维持数月，煞费苦心，因病告倦。弟勉出承乏，自惭亦无建树，唯外交案不易决，国际地位日堕，不得不勉为支

撑一时。”顾并发就职通电，表示“暂支短局，以待贤能”。

△　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两个团沿赣江右岸前进，接近在桑村之第二军第四师左翼，向清江南之永泰进攻。第六师主力参战，一部由观音山出黄村协同进攻。激战至正午，赣军退却，第二师进占永泰。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部再克大冶。翌日，克复黄石港。皖军陈调元部向武穴、九江方面退却。

△　国民政府通过《征收出产运销物品暂时内地税条例》，规定自11日起：一、凡两广与各省或外国所贸易之物品，无论为出产品、运销品，一律征税；二、普通货物之征收税率，按照现在海关或常关所征税率加征半数，奢侈品加征一倍，烟、酒、煤油、汽油等已缴特别税者得免征收；三、在海关各常关口卡或其附近征收之；四、不依照本条例之规定缴纳税项者，除将货物充公外，应处以三年以下之监禁或该项货物所值之十倍罚金。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通知各国驻粤领事团：11日起照章征收。

△　邓如琢辞赣军总司令职，孙传芳委郑俊彦继任。孙改任邓为联军训练总监，邓不就。

△　上海各团体代表百余人开会，议决正式成立万县惨案后援会，举行追悼周。总工会发出通告：“五日至十一日为追悼周，着我全体工友举行悼死救亡之大运动，誓死抵制英货。”5日，全市各界召开大会，追悼万县死难同胞。

△　国民革命军第二师主力攻阳湖街，以一部沿河攻击樟树；第二军主力由溧江、乌溪桥方向向店下攻击前进；第五师由七琴北进。赣军唐福山部向丰城、抚州方面退走。是日，第二师进占樟树，并分路向东北追击。翌日晚，不战而占丰城。

△　吴佩孚夜在郑州开军事会议直至次日晨，决定集靳云鹗部5000人、田维勤部5000人、魏益三部、毅军两个旅增防信阳，冀数日内冲出武胜关。

△　张作霖委常荫槐为京汉、津浦、京奉、京绥四路运输总司令。

△　汉口各界万余人集会，追悼万县惨案死难同胞，会后董用威率众游行。

△　旅比各界华侨废约后援会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谓中比条约废旧订新，为全体侨民坚持主张，亦为我国解除束缚之惟一生路，请即明令废除。

△　张宗昌在山东派捐款1500万元，名为“讨赤特捐”，限各县年底解完。

△　吴佩孚军饷缺乏，在保（定）、大（名）各县征收明、后年粮赋，在豫省催征民国十八年（1929）钱粮。

10月6日　北京政府派秦汾为代表，参加在东京举行之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各学校、团体派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陈焕镛、薛德焴、李熙谋、邹秉文、胡先骕、任鸿隽、谭熙鸿、陈方之、魏寿昙、沈宗瀚等参加。

△　载涛偕法人德尔孟到济南见张宗昌，求张保护清室西陵地产。是日，张电褚玉璞严缉盗卖陵产之地痞。

10月7日　北京国务总理顾维钧摄行大总统令准免张国淦署内务总长职，特任汤尔和署内务总长；特任潘复署财政总长。潘复未到任前，着派财政次长夏仁虎暂行代理部务。

△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一部及第一军第一师一部，拂晓

强渡修水，先头部队进占永修城及洪山、兴山一带。赣军坚守阵地，增援部队四面赶至，炮击渡河部队。国民革命军放弃永修转移阵地，已过河之部队由虬津向白槎移动，余部由程潜率领自米家村至吴田、狭坪附近集结。

△　东南五省军民长官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郑俊彦、萨镇冰、陈陶遗、高世读、陈仪、李定魁、白宝山、周凤歧等12人由周荫人领衔复电汪荣宝等14名驻外公使，赞成停止战争，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略谓："国家连年丧乱，已为邻邦所厌忌。各使见闻较切，故言之尤为沉痛。所望国内贤豪，以沉舟破釜之心，定安内攘外之策。"

△　日本航空公司试飞大阪至上海间之水上飞机三架抵上海。

10月8日　困守武昌城之河南第三师吴俊卿部与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攻城军司令部商议开城事宜。翌日正午，团长贺对庭到南湖攻城军司令部洽商。

△　原闽军第二军李凤翔部之曹万顺、杜起云两旅，在粤东蕉岭通电加入国民革命军，所部编为第十七军，以曹万顺代理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杜起云为第二师师长。

△　冯玉祥由五原抵包头。连日与韩复榘等人谈话，图收回驻该地已降阎锡山之韩复榘、石友三等三师军队。阎锡山闻讯，决定调韩师等移驻晋南。

△　关税会议中国方面委员举行例会，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等商讨重开关会之策，决定与列国委员交换意见。

△　京绥铁路局长唐德萱电张作霖，报告与晋方交涉京绥路管理权之结果：北京至永嘉堡间归奉方，永嘉堡至绥远间归晋方，绥远至包头间归商震管理；阎锡山允撤销大同管理局。

10月9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冯轶裴部、第二十师五十八团、第三师谭曙卿部等向驻永定之闽军第三军刘俊部发起进攻。下午3时，谭曙卿部驱逐书院岗之守军，迫近城垣，与南门河北岸之守军激战至晚9时，闽军残部退守城垣。第八团攻击城东南高地，第七团在城西南与峰市方面前来之闽援军激战。10日，何应钦率预备队增援第七团，至下午5时闽军不支而退，城内守军亦竖降旗。周荫人于下午4时仓皇越城而走。第十四师在芦下坝附近经一夜激战，歼灭闽军第四军孙云峰部一个团。

△　顾维钧摄行大总统特任孙传芳为恪威上将军，程国瑞为瑞威将军，徐源泉为克威将军，许琨为拱威将军，李藻麟为智威将军，金寿良为咸威将军，毕庶澄为澄威将军，王翰鸣为翰威将军，黄国梁为锐威将军，张培梅为肃威将军。

△　褚玉璞电保、大知事，令迅将今年应缴赋税扫数解来。18日，直财厅又电保、大各县，将一切收入扫数星夜解往保定。

△　北京新设“禁烟所”征收印花税，规定每一两鸦片课印花税三角，每支烟枪月课印花税10元。400余户鸦片窟纷纷登记，公然招徕顾客。是日，中华国民拒毒会电北京政府顾维钧，请速取消此变相公卖鸦片之“禁烟所”。

△　上海万国运动会在中华运动场开幕，中、美、英、法、日、苏、荷、葡八国135名运动员参加，我国占三分之一。

10月10日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城。9日，国民革命军攻城部队得守城部队河南第三师吴俊卿部内应，下达第六次攻城令。是日凌晨2时半起，第八军第五、九旅、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和独立团，一部攀绳梯登城楼，大部由保安门、中和门、楚望台小便门及宾阳门进入武昌城，分攻督军署、省长公署、江西公馆、学兵营等，占领蛇山。8时，围城40日之武昌完全克复。俘万余人，生擒刘玉春、陈嘉谟。

△　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恢复港澳交通，停止罢工。13日，广州与港澳间交通完全恢复。

△　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停止封锁港澳布告，略谓："北伐迭告胜利，形势已有变迁，而吾人策略亦须改变。故本会议决将纠察封锁旧形式，改变为扩大经济绝交新形式。爰定于本年十月十日十二时将各属驻防纠察一律撤回，交通部落港通过证之发给、船只出入口之领照及请派骑船员手续一概取消，工商检验货物处亦行停止。"

△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北全省总工会。

△　万县案经北京政府派重庆交涉员季宗孟在重庆与英领事义思德交涉，商定三款：一、英方切实保证于杨森交出"万县"、"万通"两轮后，迅速调查处理浪沉木船事件；二、英轮以后如再上驶，由英司令与领事负责保证决无含敌意之行动；三、关于万县案应有一切赔偿要求事件，双方均声明保留，将来交涉。

△　北京庆祝国庆节，奉军一万余人于南苑举行阅兵式，张学良、韩麟春等到场，顾维钧以摄行大总统名义临场，各国驻京使节除英、法外亦到。各界民众则无任何庆祝活动。

△　段祺瑞执政时召集之"国民会议"议员通电全国，主张促成和平，速制定新宪法，完成关税会议。13日，"国民会议议员通信处"以全体议员名义复电汪荣宝等14名驻外公使，表示赞同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选出者二十省区二百八十六人，去法定人数无几。希诸公促成国民会议，制定宪法"。17日，又复电周荫人并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由国民会议解决。

10月上旬　　国民革命军再度围攻南昌，孙传芳军负隅顽抗，并在城内大批残杀民众，先后被杀者达1000余人。

△　吴佩孚军在郑州四出拉夫，农民、工人、小贩无论壮年老者无一幸免。市上苦力绝迹，军警乃赴各乡征发。郑州附近三四十里内，少壮者均躲逃不敢耕作。

△　河南省财政厅征收民国十八年地丁，限开封城三日内缴款60万，谓如有不愿者以军法从事。

△　奉省为筹措军费，由省长莫德惠主持召开全省税务会议，决定加征出产税、销场税、豆税、牲畜税、补征牲畜税、茧税、参税等。

10月11日　　广州各界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拥护取消罢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分别发表宣言书，向罢工工人解释新政策。国民党中央党部声称：现因国家大局有根本的变动，国民党之权势得扩及扬子江，故不得不变更特殊奋斗之方略，使全国人民加入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罢工委员会表示：今日停止罢工，并非仇英责任从此终结。英国炮船政策如不改变，“五卅”与“六二三”之惨杀如不纠正，则吾人之使命未完，反帝国主义之运动亦不终止。吾人之责任在：一、全力扶助北伐军，以获最后之胜利；二、对外抵制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反革命运动；三、襄助改组省政府，卫我民权，保我自由；四、赞助黄埔口岸之开辟，粤汉铁路之扩张及其他实业之发达，使广东脱离香港之控制；五、与全国各界合作，力抗帝国主义之野蛮政策，保障中国之自由与独立。

△　孙传芳复电汪荣宝等14名驻外公使，略谓：“目下非停战不足以言和平，非息争不足以谋国是。彼方何时休战，我即何时撤兵。至于国民会议，本属治民良箴，如何组织，如何召集，地点如何决定，政府如何产出，宪法如何完成，均请各公使发表意见，众谋乃臧，惟命是从。惟假借国民会议之名以操纵是非，则非所愿闻。倘不能如愿，仍将固五省疆圉，与民休养生息。”

△　褚玉璞夜抵保定，视察保定、大名防务，并于保定设直鲁联军援鄂总司令部。

10月12日　　拂晓，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及第一军第二师攻击南昌城，士兵奋勇攀登。赣军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部5000余人闭城固守，并于城外纵火焚烧。国民革命军连日攻而不克，蒋介石于13日晚下令暂撤南昌之围。第一军第二师转攻南浔线，第二军守丰城、三江口之线，牵制南昌之赣军。

△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进攻牛行车站，遇孙传芳军四个混成旅抵抗，激战二日，十九团、二十一团受创甚重。

△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党代表熊式辉率三个团击破永丰、乐安之守敌，占宜黄。该军特遣支队同日占广昌、南丰地区，14日向南丰、南城攻击，15日进占南城、崇仁，守军残部向临川退去。

△　青岛外商开国际市民大会，反对征收新货物税，并电顾维钧请制止。14日，外人代表团在济南谒见日、美、英驻济领事。日领事谒见山东省政务厅长林宪祖，谈判青岛日商停市事。

10月13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第十四师冯轶裴部等向粤东松口方面之闽第三军刘俊部进击，双方反复冲锋争夺。九团于拂晓在松口上游完全渡河，猛烈攻击，激战至下午2时。在三面围攻之下，刘俊部无力再抗，向隆文圩、松源退去。

△　援赣之陈调元皖军刘凤图、毕化东部数千人，自瑞昌南下，图围攻箬溪。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迎击于王家铺，激战一昼夜。是日午后2时四团冲出隘路，将皖军截为两段，第一军一师来援，复冲其侧。晚，皖军溃退，伤亡甚众。国民革命军亦死伤2000余人。

△　褚玉璞指挥直鲁联军约四师开抵保定。吴系军队除齐燮元少数卫队外多已离去，所委之道尹亦已去职。保、大行政权、税收权全

部转落入褚手，褚新委之八知事抵保。

△　张作霖在日驻奉领事馆与日使芳泽交换中日外交意见，并请求日方协助整理东三省金融，毋令奸商在南满铁路附属地操纵。

△　广东省政府议决解放女尼，拨寺产为农村教育经费，令公安局执行。

△　杭州“浙江自治同志会”沈钧儒等人通电呼吁和平，主张赣前敌双方均撤退，以赣省土地政权还诸赣民。

10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中央党部礼堂开预备会议，14省、四特别市、11总支部代表53名报到出席。谭延闿报告筹备经过，通过议事细则，选出谭延闿、张静江、徐谦、宋庆龄、吴玉章五人为主席团。

△　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筹备重开中苏会议，议定分设六个委员会，赔偿、路务、航务三委员会在奉天开，法律、界约、商约三委员会在北京开。苏联政府派新任驻京代使齐尔内赫为中苏会议代表。北京政府财政部派蹇先骢、外交部派佘序为中苏会议专门委员。

△　吴佩孚委寇英杰为郑州防守司令，派靳云鹗、田维勤等部进剿樊钟秀部建国豫军，令王维城驻石家庄、彭寿莘驻保定，维持后防运输。

△　英国新任驻京公使蓝普森在伦敦中国协会举行之饯别宴会上发表演说，略谓：“中国之事，惟中国人能自决之。英国政府对中国各党派之争严守中立。华人当知英国非侵略之国，在中国非有何等政治野心。英人所企望者，惟和平与安固以及合理之商业条件而已。”又谓：在中国未成立全国政府时，英国政府不得不予本国人民以完全之保障。凡中国权力所不存在之处，苟有损害英人利益之事实，英政府不得不要索赔偿。

△　安徽省立各校校长因当局积欠教育经费过久，难以维持，齐集省垣，开会五六次，最后决定全体辞职，是日递交辞呈。

10月15日　　浙江省长夏超在杭州召集紧急军事会议，浙江道尹、厅长、统带等均参加，决定即日宣布浙江自主，电陈仪、周凤歧请即率师回杭。16日，夏超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省民政长职，所部向沪开拔。夏派吕公望、萧其煊、李书城去汉口和国民革命军联络，并电广州拟组织省政府委员会，请加任命。1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复电嘉奖。

△　旅居上海之浙籍士绅褚辅成、虞洽卿、殷铸夫、王晓籁、邬志豪等分电蒋介石及孙传芳，请毅然停战，划地缓冲；并要求孙传芳准在赣之浙军全部返浙。

△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开会，谭延闿主席并致开会词；陈果夫报告审查代表资格状况，谭延闿报告中央政治状况，徐谦报告中央提案委员会组织之经过及各提案。

△　国民政府发表讨伐孙传芳宣言，略谓：孙传芳利用保境安民之名义，取东南五省为其私产。国民政府孚之以信义，而孙报之以仇雠，封闭江浙党部，禁锢东南党员，解散上海工会，禁止爱国运动，与三民主义为仇，为帝国主义作伥。8月30日下作战命令，欲乘我苦战力疲之余，以为倾覆我根据之谋，继承吴佩孚之绪余，苟延北洋正统之命脉，以残害我民。特声罪致讨，于挞伐吴佩孚以后移师东指。宣言并期东南五省同胞一致奋起，共同讨贼；五省军人如向义输诚，则优加容纳，如始终附逆，则挞伐无赦。

△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决定组建海陆军人俱乐部；并饬各军将前方所获敌械一部拨给已在掌握之各省农会，组农民自卫军。

△　吴佩孚通电驳汪荣宝等14公使主和电，声言要彻底“讨赤”，

继续战争。略谓：“酿乱连年，苦兵已久，休战之愿，人心所同。然一方正厉行赤俄化，以狠辣狼贪不顾一切之政策，务期破坏旧有之道德文化，而与言和平，此与盗劫事主而责以分财了事何异，况分财而盗尤未必从乎”；“今之战争，为讨赤俄之奴。”通电声称：“讨赤乃吾辈天职，决不为一切浮言所惑，决不纵贼以为国家留数世之患。”

△　驻京法使玛太尔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请将中法通商条约延长半年，新约未缔结前应承认旧约之效力。顾答希望修正不平等条约。

△　英驻香港总督金文泰在立法会提出预算案时演说，略谓：广州港之兴办，广州四周铁路之敷设，亦即助兴香港之商务。吾人现仍准备合作与粤港互有利益之任何计划，恢复前交，捐弃旧嫌。

△　日、美、英驻济南领事及青岛外商代表12人访晤山东省政务厅长林宪祖，反对鲁省征收新货物税。经谈判决定：自17日起展延10日收税，修改税率不超过六厘。27日，日商代表又来济要求减征，林允再展延10日。

△　清室遗老将抵押在盐业银行之故宫文物，售与日本大阪之山中商会，价140万元。其中金器一项重达1.35万两。

10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继续开会，讨论国民政府主要工作发展问题。议决：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不迁武昌；现在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扩充各省人员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各部除已有外交、财政外，添设军事、交通两部，司法行政委员会改为部，军事委员会仍存在。

△　新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之曹万顺、杜起云部，以主力进中都，并截击自松口退往松源方面之闽军，俘获官兵1800余名。刘俊率残部200余逃窜，在连城被歼。十七军之另部分向松源、上杭挺

进。

△　夏超派所部保安队、警备队沿沪杭铁路向松江进展。驻上海之孙传芳军第十三团拆毁铁路以阻浙军前进。孟昭月部及李宝章旅增防上海。

△　王宠惠等清理道胜银行，派定各地方清理委员，并公布《清理章程施行细则》，凡40条。

△　驻京日使芳泽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商谈《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期满改订之意见。

△　国民政府决定彻底改革中山大学，“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先行停课，切实建设，期以下学期为新规之始业”。明令改中山大学为委员制，特任戴季陶为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委员。

△　国民政府拨五万元赈济武昌灾民。

△　驻欧各国使领馆全体同人致电上海全国教育会、总商会等各团体及各报馆，谓中比条约期满作废，务望各界一致主张，坚持到底，以为后盾，俾达恢复主权之目的。

△　北京国立九校开校务讨论会，议决：为顾全学生学业起见，暂且勉力维持，不作辞职之举。所有各校行政费，均由所收学生学费维持，同时竭力向当局交涉经费。

10月17日　　齐燮元与张宗昌在济南洽商保、大及京兆四县交还直省问题：吴军驻直境一万；直省月助吴军饷40万，四月为期，不足再补；京汉路收入及货物税暂不交还。晚，齐返天津。

△　吴佩孚电国务院及关税会议委员会，请督促早日复开关会，俾各国容纳吾国提案。并谓：“如各国拒绝，唯有将过渡办法昭示中

外，自动宣告自主。”

△　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分别召开会议，发表宣言，主张实现市民自治自决，尽撤上海驻军于境外，以上海市政之管理权还归市民，由市民领袖组织上海市保安委员会临时治理之。18日、19日，邮务工会、码头工会、海员工会及各地区工会、纱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华商电车工会等均宣言赞同。

△　在山东之日本矿业纺绩团，得日本政府大藏、外务两省许可，向胶济铁路投资700万元，作机车、货车代价。

10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议案。会议决定电慰蒋介石，并以汪精卫病已痊愈，应请汪销假复职，即推何香凝等四人（次日又议决加派一人）为代表，克日起程劝汪回粤。31日，汪复电谓：“剖腹后可望痊，能行即就道。同志请勿来，恐相左。”

△　孙传芳委第八师师长兼南京卫戍司令孟昭月主持浙事，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并任混成旅旅长李宝章为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率部开驻龙华、松江，守江苏境界。20日，宋旅进攻嘉善。

△　北京外交团电驻沪领事团力维租界治安，并付以调动义勇队之权。

△　坚守西安城之国民军李云龙、杨虎城部，联合杜成镇、姜宏模部突围，冲出南门，被刘镇华之镇嵩军李长铭、憨玉珍两部堵击，交战19小时至翌晨，突围未成。

△　吴佩孚军卢金山部占领公安，次日又占石首，张福臣部占领监利。20日，卢金山率上游联军夺回松滋、枝江各县。杨森军占领洞

庭湖北岸之南县。

10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召集国民会议原则，以发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预备办法。联合会须包含农、工、商、教、学、妇、侨、自由职业者及军队之代表，分为全国、省、县市及海外各地华侨联合会，由党部发起组织。中央党部须派一委员会负责管理联合会工作，各地党部也应指导联合会之工作，努力使党之主张在各联合会通过。

△　蒋介石重新部署江西作战计划，决以主力击破南浔路之敌，电调第四军入赣，第二军以主力协同第十四军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孤立南昌。同日，蒋离高安到奉新。

△　国民军刘郁芬部攻占天水，将孔繁锦部逐出甘肃。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中日商约期满之废约照会，述明旧约对关税、领事裁判权、航权等未能互惠平等，应于期满失效，依两国邦交及公平待遇精神即日商订新约。翌日又一再修改照会文稿，措词竭力婉转。

△　北京外交团会议，决定照会中国政府，否认广东征收货物附税及鲁、直、闽、赣等省征收一切特捐。

10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省政府与县市政府及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决议案》，规定：一、省政府采用委员制，由七至11人组织省政府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数人，会同省执行委员会组织省政府；二、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司法、教育各厅，必要时增设农工、实业、土地、公益等厅；三、县、市政府亦采用委员制，由省政府任命委员若干人，分掌教育、公路、公安、财政各局，必要时增设农工、土地、实业各局，委员长一人由省政府指定；四、省、县、乡民会议用职业选举法选举代表，其性质及

组织法由省党部起草，呈中央党部决定。

△　孙传芳任命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浙江省长。29日，陈仪乘专车离徐州南下。

△　国民革命军进攻抚州：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由白士墟进逼至黄风渡，第四师张辉瓒部渡抚河，第十四军赖世璜部由东南方面合攻。是日拂晓开始总攻，激战整日，晚8时破抚州城。孙军杨如轩等部向东乡、金溪、进贤退走。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芳泽称：1896年所订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已届期满，根据该约第二十六条规定，提议根本改订，希望从速开议，于此六个月修约期间完成新约；如新约不能如期成立，中国政府保留对于旧约表示态度之应有权利。

△　广东省政府公布《检查队检查条例》，规定对于开抵广东之船舶、火车，无分中外，一概严格检查旅客及货物；并通知各国驻粤领事团，25日起施行。

△　武昌各界100余团体之代表在公共体育场开会，推董用威为指挥，议决：限三月内拆完武昌城垣，检查及审判陈嘉谟、刘玉春，救济难民，追悼死难人民及阵亡将士，会同政府清查逆党等。

△　吴佩孚令其总游击队张玉山部开赴灵宝、陕县一带，援助刘镇华继续围困西安。阎锡山亦动员两师由潼关渡河援刘。

△　中东铁路督办于冲汉要求将路局总务、会计、材料、商务、储金、机务、工程、车务等处主要职员收归我国支配，提交苏联方面副理事长征求同意。

10月中旬　　广州各界自动扩大反英运动，130余团体代表500余人在永平天台开代表大会，决定在农工商学联合会之下，成立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由13团体各出一代表组成，执行最严密之对英经

济绝交运动。

△　北京政府决向北京外交团疏通，请续开关会，先办二五附加税，解决过渡办法，以免各省自颁税率，转滋纠纷。

△　云南省政府外交司咨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修订中法商约时注意下列各点：一、规定驻越总领，借资保护华侨；二、修改边界通商税则，实现互惠；三、不准苛待华侨勒缴人头税及限制营业等；四、引渡边界人犯；五、禁阻违禁品运输。省议会要求省政府转达北京政府严拒法人对该约展期之要求，迅即组织修约委员会。

10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省政府对国民政府关系案”，议决：一省之事归省政府办理，全国或两省以上有关系之事，归国民政府办理。外交之事归国民政府办理。省军队与国家军队须划分界限，分别管理。省军队专门维持省法及秩序、治安，国民政府亦可调遣为国防之用。县政府不得用任何名义组织军队。

△　顾维钧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李寿金之京师警察总监职，任命陈兴亚继任，李改任将军府将军。

△　晚，张宗昌、褚玉璞在济南督署开军事会议，决定直鲁将领通电声明“讨赤”到底，积极援吴。

△　吴佩孚军一部逼近湖北麻城，在黄梅附近之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部向蕲水（今浠水）退却。叶开鑫部进抵广济，固守武穴。国民革命军向武穴进攻，唐生智前往督战，战事激烈。

△　夏超之保安队在嘉兴被孙传芳第八师第十五旅宋梅村部击败，向杭州溃逃。宋部占嘉兴、硖石、长兴，前锋进抵临平。周凤歧部驻杭之伍崇仁第十团阻击夏军溃兵，夏逃。杭绅商推张载扬维持秩序，并电催陈仪速来浙。

10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最近政纲案，要点为：关于政治：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统一，废除督军、督办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之完全自由，听任国内各小民族自决，严惩贪官污吏。关于外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缔尊重中国主权之新约，规定外人投资中国之普通条件。关于经济：关税自主，废除厘金及苛税杂税，统一全国财政、币制及度量衡，筑铁道公路，修河道，设国家银行，改良地税。关于教育：指定经费，令教会及外人私立学校立案，普及强迫义务教育，厉行平民识字运动。关于行政：实行户口调查，土地测量，设立特别市及普通市，进行乡村自治，剿匪，限期禁止鸦片。

△　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求国民政府留粤，中央党部移鄂，以利党务发展。

△　宋梅村抵杭州任警备司令，悬赏缉拿夏超。夏部溃军多在杭州被伍崇仁缴械遣散，残部分逃衢、甬。

△　孙传芳电张学良、韩麟春称："讨赤大业，事关国家存亡，绝不因浙事小节有所气沮。"24日，张、韩复电谓："此次讨赤，义正词严。惟赣中赤氛未清，武汉逆焰犹张，祈始终贯彻讨赤主张。"

△　奉天当局通告驻奉各国领事：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规定之中外货物免重征专照（即免除二重课税之护照），现因奉天商务发达，已不适用，自11月1日起，凡运往非商埠地方货物，概不得再用此项专照。

△　瑞典地质学家、北京政府矿务顾问安特生，在北京地质研究会、自然历史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举行的联席会上发表学术论文，谓曾于北京25英里地内（按：即1921年夏在京西周口店附近石灰矿穴），掘得人类之牙齿一枚，已变成化石。此乃世界最古之人类的化

石，足以证明北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

10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最近政纲：关于军事：军队实行党代表制，党员有服兵役义务，在他省设立军校，设军事委员会及军事部，普及军事教育等。关于妇女：在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上地位与男子同等。关于工业：力求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政府协助工业发展，设工业协会，召集工业大会，在广州或武汉开国货展览会。关于商人：政府保障交通安全，禁征不正当附税，力除低价纸币，重订商会法，禁止操纵金融、垄断粮食。关于教职员：提高薪给，不得拖欠，规定疾病、死亡保险及养老金。

△　蒋介石在江西奉新接见孙传芳求和代表葛敬恩。

△　蒋介石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　驻京比使华洛思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重申比国政府有单方面废约之权利，提出中比条约期满后订立临时办法之条件。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驻京比使，对订立临时办法之条件提出修正草案，主张六个月内订立新约。

△　孙传芳、陈陶遗电北京政府国务院，主张由外交部声明中比条约期满失效。吴佩孚、张学良、褚玉璞、张宗昌先后通电主张废止。

10月24日　凌晨4时，上海工人在南市、闸北、沪西三处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警察厅长严春阳率部镇压。是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　蒋介石与葛敬恩达成和约条件，是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核示对孙传芳之条件。其条件为：“一、孙部立即撤退，开始撤兵之前一日，即为双方停战之日。二、浙江之政治军事，完全听国民革命

军决定。三、停战之日，即将孙氏境内被封党部被拘党员开释；并许国民党在联军境内，自由公开进行其准备国民会议之工作。四、言和之后，互相提携，一致对外。”

10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以及从速成立湖北正式省政府案、中央派赴各军工作特派员条例、党代表任免条例。会议通过致电慰勉冯玉祥。

△　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在松口歼灭闽军第二十四旅及骑兵团，周荫人率部退至延平。张毅退守漳州。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驻京代使齐尔内赫要求公开中东铁路会计事项：一、华人职员参加中东铁路会计科；二、调查中苏两国委员之旧帐案；三、年终公布中苏两国理事的检查之收支帐目；四、中东路督办得随时检查会计事务。

△　苏联方面允依中国当局提议，将中东铁路沿线电报、电话事业交还中国，惟要求在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处设置专用无线电作为交换条件。

△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奉日本政府训令访张作霖，向张提出警告：一、务必中止军事，以文治为本，维持保境安民之旨；二、撤废官定之金票价格，听其自然趋势，不得再施人为压迫；三、承认中日商民自由交换金银票券，不得横加干涉。张要求日商中止扰乱东三省金融之行为。

△　苏联新任代理驻京大使齐尔内赫在奉晤见张作霖。

10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继续举行，讨论并通过成立湖北省政府案、党员服兵役案。翌日，通过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

之政纲案及《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

△　驻京比使华洛思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晤见顾维钧，以正式照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中比条约期满后订立临时办法之草案。顾维钧当即将该临时办法第二条之修正案面交比使，建议在六个月内缔结新约。翌日，比使以照会建议规定“倘在六个月期内新约不能订立或不能实行，缔约一方得于三个月之前通知要求将本协定再施行六个月，以后均照此限类推，至新约实行为止”。

△　孙宝琦、熊希龄、张绍曾、汪大燮、徐绍桢、庄蕴宽、董康、张一麐、汪瑞闿、李国筠、褚辅成、蒋尊簋、沈恩孚、黄炎培等联名通电呼吁和平，请各军人勿以外力酿内争，勿以内争召外侮，各捐成见，立止战争，召开国民会议，共定国是。

10月27日　　蒋介石在高安行营下达进攻江西全境之总攻击令：以李宗仁为左翼军指挥官，进攻德安、涂家埠；朱培德为右翼军指挥官，牵制牛行敌之主力，并由蛟桥攻其右后，迎向邓家埠、谢家埠一线进迫南昌；程潜为中央军指挥官，进攻乐化，并向涂家埠夹击；刘峙为总预备队指挥官，随中央军推进。

△　旅比华侨及留德、法、奥等国工、商、学代表百余名，在布鲁塞尔游行，要求废除中比条约，比警强力驱散，抢夺国旗，拳棒交加，重伤二人，轻伤七人，并拘捕17人。翌日下午虽全部被释，但有九人被逐出境。

△　孙传芳为浙省自主事件，续行通缉马叙伦、许宝驹、宣中华、黄人望、查人伟、黄强、韩宝华七人。

10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增加中央党部经费案，各省原有之省议会经费拨为省党部经费案，民团团防或保卫团须由乡民大会产生、以剿匪为惟一责任案。会议议决肃清西山会议及孙文主义学会毫无觉悟表

示之分子；决定联席会议之权仅亚于代表大会，而高于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王宠惠以党之监察委员受北京政府任命，应予除名。下午2时举行闭会礼。

△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驻京比使华洛思，略谓：比国政府拟无限期延长审核中之临时办法，借以迟缓中比新约之缔结，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中国政府提议如六个月期满，经双方之同意，临时办法得延长之，并经任何一方之三个月预先通知得废止之；比国以辛丑和约国及华盛顿条约签字国资格所处之地位，不妨发表单方之宣言，中国政府只予以阅悉。

△　驻京比公使华洛思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晤顾维钧，就改订中比条约事长谈四小时。

10月29日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二师东出瑞金入闽，占领长汀城西北一带高地；第十七军由上杭分沿汀江两岸北进，抵达长汀东南。在两部协同攻击下，城内闽军第二军李凤翔部、第四军孙云峰部向清流、宁化退却。是日，革命军进占长汀城，并向永安、清流方面追击。

△　驻京日使芳泽晚访顾维钧，就中日条约期满改订之照会提出种种质问，并商议发表照会事。

△　孙传芳电张宗昌表示决心合作“讨赤”，略谓：“同心救国岂佥壬所能间惑。今后国家责任，愿与效帅诸贤共负之。”是日张复电孙，谓“信义昭如日月，同心誓若山河”。

10月30日　蒋介石令勉各军将士一鼓荡平孙传芳，略谓：“迩来国内军阀，冀苟延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相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惟一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之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得捩转，革命乃

可成功。”蒋并对第一军官长训话，说明击灭孙传芳在江西之兵力的意义与方法。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原由道胜银行存汇部分之盐款，分交汇丰、汇理、正金三银行暂存，由财政部饬盐务稽核总所向三银行声明：对于道胜银行经理中国各种外债之权利，政府仍保留自由处分移转之特权。

△　北京政府就旅比华侨因废约游行而有九人被逐出境事，向比利时驻京公使提出抗议，指出中比改约尚在谈判，比国遽出此举，实有损两国睦谊。

△　顾维钧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张鸿绪为成威将军，张国仁为晋威将军。

△　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日本东京开始举行，17国代表600余人参加，历时13天，11月11日闭会。中国代表翁文灏、竺可桢、胡先骕、沈宗瀚、魏寿昙在分组会上宣读论文，翁并代读章鸿钊论文。会议通过章程，决定更名泛太平洋学术会议为太平洋科学会议，成立为永久机关，并指派各种常设委员会，分类研究各种太平洋上之科学问题。中国科学社作为代表机关，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行政委员会。

△　驻奉领事团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抗议撤销免重征专照事件，声明对于以一地方官之通告撤废20年来外商所有之特权，认为不合。

△　全国商会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谓：中比条约届满，旧约须完全作废，新约须积极进行，新约草案须彻底公开，以供国人研讨。同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主张：一、即宣布中比条约失效；二、新约未成立前断绝外交关系；三、撤回驻比公使。

△　国民军刘郁芬部在甘肃节节取胜：26日克静宁，27日克隆

德，28日占六盘山，29日下三关口，是日占平凉。计毙敌1300余，俘700余。张兆钾、韩有禄部向泾川方面退去。

10月下旬　　被国民军击溃之甘军张兆钾部，与孔繁锦、吴新田部结合，约1.5万人，称“陕甘讨赤联军”，反攻陇东。

△　各地工人罢工据不完全统计有29次，共1.4万人以上，包括上海、武汉、广州、奉天、开封、无锡、苏州、镇江等地之纺织、军火、木业加工、印刷等十几种行业工人。成都市在外国人单位谋生之勤杂工人，罢工延达一个半月。

△　湖南工会组织蓬勃发展，工会会员由六万人增加到15万人。

是月　　国民军决定出兵援陕，任孙良城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率兵七路，以方振武、弓富魁、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榘为第一至六路司令，陈希圣、刘汝明、孙连仲、韩占元、韩德元、郑大章、张万庆部共为第七路。各军由邠州大道向西安方向进发。

△　各地民众奋起响应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褚玉璞等制造白色恐怖，以“防止赤化”为名，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3日，南京拘捕学生王建三等10余名，罪名是“与党人有关”。褚玉璞指令北京警察在后门逮捕“共进社”成员20余人，均系北大、师大、法大、中大等校学生。上海邮电检查扣留“赤化”嫌疑印刷品，三批计50余麻袋。南京光夏中学6日被封，师生10余人被捕。吴佩孚在开封、郑州捕工人多名，将国民党命军敢死队两名小队长枭决示众。沪淞警察厅5日查封学生总会和国民通信社，6日查封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捕梅电龙等31人，9日又查封海员工会，捕10人。

11月

11月1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为中比改约交涉事件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三点：一、对解除不平等条约，自己赞同不后于人；二、对比交涉已按既定步骤着着进行，先由国际常轨尽力向和平途径做去，须到山穷水尽时再别谋办法；三、中比关系以商务为重，比不借武力立国，我亦非之武力立国者，取消不平等条约乃为对各国一般之目的，非仅对于比约为然。现今尚候比使答复，待不能就我范围时，始取不得已之办法。

△　陈仪带一营军队到杭州，正式接任浙江省长。

△　吉林省议会决议筑造吉（林）海（龙）铁路，全长160英里，是日设立筹备处。

△　北京全城中小学教员因七八个月未领到薪金实行罢教。翌日，300余人赴国务院索薪，提出三项要求：一、各校已欠薪七八个月，最少须先发三个月；二、各国退还庚款，应拨一部分为京师公立中小学校之基金；三、地方税捐应办地方教育。

△　张宗昌自是日至12月28日，在山东丁、漕两项中征收“讨赤特捐”1614.7万元。

11月2日　晨7时，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夏威、胡宗铎两部迫近德安，与孙军第六方面军颜景琮部3000余人激战至午，颜部弃城沿河东岸向东南退去，七军占领德安城。

△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与南浔线马回岭附近之孙传芳联军激战，自晨至午不息。下午6时进至马回岭车站，战况更为剧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击溃万家垅之敌后，派十二师张发奎部北上援助夹击，激战至夜。翌晨，第七军派兵一旅北上增援。再激战一昼夜，反复冲杀，孙军始纷向九江方面退去。4日晨，革命军完全占领马回岭。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英使麻克类，驳复英使9月20日关于英舰炮轰万县案之节略。略谓：9月5日之事，乃长江上游英国舰队司令不待谈判解决，陡然从事于武力，迭开排枪、机关炮，击毙官兵百余人，居民死伤约1000人，房屋被毁1000余所，万县繁盛之区悉为灰烬。英舰及太古公司应负责任，不能适用自卫之说。英舰根据特许之权航行内港，乃竟寻衅，与条约规定之文字精神实相违反。节略指杨森扣留两轮为水寇行为，轻出诬言，殊为可憾。特提出正式抗议，保留中国政府一切权利，以备将来另提充分赔偿万县生命财产损失之要求及其他公平解决条件。至于英舰各员炮轰万县是否奉有贵国政府训令，应请查明见复。

△　奉票贬值，每元仅值日本金票（日本在中国发行之纸币）0.75元。哈尔滨商民拒用，非日本金票不受。商会传知各商号拒用外币。驻奉日领吉田以其意在拒用金票，是日向哈尔滨交涉员提出抗议。吉田并向日外务省建议在满洲设中央银行对付奉票。

11月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增任李济深、李烈钧、唐生智、蒋作宾为国民政府委员。

△　比利时政府外交部向北京政府驻比公使王景岐表示：中比修约问题，比国本拟容纳中国请求，惟列国对比纷纷责难，比政府实无法完全容纳中国主张。若中国坚持，惟有付诸海牙公断。

△　北京外交团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代表12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声明书，对于广东、山东及其他地方官吏对外国货物征收附加税，谓“系直接违反条约之行为，该项附加税不能认为适法之课税”。外交团并训令驻广州、济南领事团分别向该地当局提出抗议。

△　北京政府与奉方商议中苏会议方针，决定由奉方与苏驻京代使先行试谈中东路及卢布赔偿问题，如苏方不允赔偿现款，则收回中东路，计算彼方所投资本，以卢布结算。

△　天津银行界反对原存于道胜银行之盐款改存汇丰、汇理、正金三银行。上海总商会通电主张分存国内各银行，不致权利外溢。

11月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比使华洛思，对比国政府延未答复10月28日之照会表示“殊觉失望”，并谓：中比条约已于10月27日届满，“急宜从速解决缔结新约期内施行之临时办法问题，时机急迫。中国政府深盼比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之提案，不再延迟”，否则中国政府“对于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所订条约之态度将不能不正式宣言，俾两国之各种关系不至常处于一种不定之情状”。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对中比条约及税则通商章程之最后办法，多数认为政府前次要求仅为修改，未便变更。议决：对土耳其订约，按对智利先例办理。24日，土驻日代办在京晤见顾维钧，请按相互平等原则早日拟订商约。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师及第七军之一旅占领马回岭后驱师南下，会合第七军在德安之主力，向驿南站及永修、涂家埠方面攻击前进。第七军第一旅驱逐九仙岭及驿南站附近之敌，翌日抵涂家埠北岸；第六军及第一军经过猛烈战斗，击溃芦坑、乐化、涂家埠之敌，进抵涂家埠。

△　顾维钧摄行大总统令财政部迅拨二万元赈济陕西灾民。

11月5日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第一旅自马回岭出发，在晒湖桥与敌激战一昼夜。是日得第三旅之增援，于午后进占九江。

△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二旅4日攻击瑞昌，皖军刘凤图部凭险顽抗。二旅夜袭敌阵，勇猛搏斗，并乘夜追击，是日晨主力攻入瑞昌城。

△　驻京比使华洛思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晤顾维钧，递交备忘录，

拒绝北京政府10月28日之建议，谓比已愿共同废止1865年条约，但中国欲限定修约期限，比不得不取消从前之谈判；对于解释条约第四十六条之法律问题，将提交海牙国际常设法庭审理。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就广州领事团递交否认征收内地税声明书一事发表谈话，指出新规定之内地税税率合理，比各国为轻。中国货物入列国口岸被抽重税，中国未表异议，列国亦应遵从新税率。

△　北京政府参加中苏会议之专门委员会成立，成员为：周传经（外交部）、蹇先聪（财政部）、吴源（司法部）、秦汾（教育部）、廖炎（农商部）、佘序（交通部）、李诜（蒙藏院）、王诩华（陆军部）、姚亚英（侨务局）。

11月6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中比条约及税则通商章程失效。会后发布摄行大总统给外交部的指令，略谓："前清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中比北京条约共四十七款及税则通商章程，业于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期满，应即宣布自期满日起失效。着该部从速商订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之新约，以重邦交。"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驻京比使华洛思，略谓："贵国政府对于本总长十月二十八日送达贵公使提案所予之让步修正，未见容纳，反声明恢复其谈判前之地位，提议将条约解释问题交付国际法庭，中国政府殊深抱憾。""中国政府以为除宣布一八六五年中比条约终止外，别无他途""中国政府愿重行声明者，为中国政府之欲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早日缔结新约。"外交部并发表《终止中比条约宣言》。

△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一旅沿修水北岸进抵吴城镇，全歼孙传芳联军卢香亭第三方面军第一军刘士林部，俘其军长刘士林及以下官兵千余人。

△　驻京法使玛太尔致节略于北京政府外交部，谓《中法陆路通商条约》期满，法政府准备两个月内开始谈判，三个月内完成新约。

11月7日　国民革命军于6日向南昌发起总攻击：第二军主力紧逼南昌城郊，第十四军在进贤向东乡方面警戒，第二军第六师、第三军第七、八师围攻牛行、瀛上一带之敌，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军第一旅及第六军两个团南下增援抵达芦坑。守敌蒋镇臣、唐福山、张凤岐、岳思寅等部于夜12时渡河，向余干方向溃退。是日晨，国民革命军占瀛上、牛行，即渡赣江进逼南昌城。唐福山等部3000余人闭城困守，未几即竖白旗投降，革命军占领南昌。

△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于6日分两路向湖口、武穴跟踪追击，是日，第一旅进占湖口，第二旅进占武穴，敌分向彭泽、黄梅退去。

△　孙传芳由湖口回南京，宣布浙、闽、苏、皖、赣五省一律戒严，并颁戒严法19条。

△　驻济南、青岛日本领事与山东省公署交涉征收货物税事，省当局让步，改为日商运青岛制造品出口免税，进口货在青岛纳落地税2%，入内地纳子口税2.5%。

△　广州工、学、军、政各界举行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晚开中苏联欢会。汉口开庆祝大会，三万余人参加。长沙举行纪念会、游行及提灯庆祝。

11月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短期内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

△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冯轶裴部由福建大坪向南靖，独立第四师张贞部由云霄向漳浦，合力追击闽第一军张毅部。闽军节节撤退，主力于10月24日撤往同安，小部扼守江东桥及浦南要点，冯轶裴部7日进占南靖，是日进入漳州。张贞部越漳州向同安进击。

△　驻京比使馆发表声明，声述数月来谈判经过，指责中国宣布中比条约失效乃片面行为，打击比之合法权利；否认比国虐待华侨及受法、日怂恿；声明比国政府允订临时办法，于六个月满期后继续延长六个月及几个六个月，已为让步；并援引条约第四十六条，声明唯有请国际法庭公断两国间之争执。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驳复驻粤领事团递交之北京外交团首席公使关于不能承认征收附加税来函，声明国民政府“对于驻在北京代表利益关系国之首席公使不能承认其存在”，北京政府已不能行使其国家权力与法权，“国民的中国之革命及改造势力，业将此项国民的权力及法权已转移于吾政府”。

△　孙传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组五个混成旅即日对赣反攻。11日，孙电吴佩孚、齐燮元，请迅饬增援部队南下会师反攻。

△　北京税务处拨俄国庚款30万元救济北京国立各校。旧女师大与女子学院等校为分配问题引起纠纷，法大俄文系因未得同一分配而停课。

11月9日　蒋介石抵南昌。11日上午出席南昌市民欢迎大会，发表演说，希望各位同胞“共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同革命军联合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一切的军阀，来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使得中国真正能够独立、自由、平等”。

△　顾维钧致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表示国务总理一席难以支撑，愿即引退，请各方“共发宏谟，早戡国是”。11日，张作霖电顾“仍望勉为其难，以安庶望”。13日，孙传芳复电称：“拥护之诚，息壤无改。”21日，张宗昌电顾挽留，并促潘复速就财长。

△　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条约研究会，顾维钧为会长，颜惠庆为副会长，会员有罗文幹、刁作谦、戴陈霖、王荫泰、刘崇杰、王继

曾。是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顾维钧说明该会以研究修改不平等条约为其职责。

11月10日　　国民政府特任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并令司法行政委员会俟司法部成立后即行裁撤。

△　国民政府任命陈树人、宋子文、孙科、许崇清、徐权伯、李济深、陈孚木、李禄超、周佩箴、何香凝、甘乃光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陈树人兼民政厅长，宋子文兼财政厅长，孙科兼建设厅长，许崇清兼教育厅长，徐权伯兼司法厅长，李济深兼军事厅长，陈孚木兼农工厅长，李禄超兼实业厅长，周佩箴兼土地厅长。广东各路行政委员裁撤。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省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管理全省政务"；"省政府职权由国民政府任命省政府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组织省政府委员会行使之。"

△　驻京日使芳泽致节略于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10月20日关于修改《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之照会，声明日本政府允诺开始商议改订税率及条约中之通商条款，但拒绝对条约作全部根本修正，不承认中国政府于六个月后新约不成时有保留应有权利之表示。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全文公布10月20日之照会及日使馆之节略。

△　驻京比使华洛思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反对宣布中比条约失效，认为未经国际法庭判决以前，比利时政府仍认旧约有效。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西班牙驻京使馆：中国与西班牙之条约，明年5月10日满期，希于届满以前修改，依据平等相互原则商订新约。

△　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兵南下援孙，待孙求援

电到即发动，令第三军程国瑞、第六军徐源泉、第七军许琨、第八军毕庶澄准备。

△　上海各路商联会代表30余人举行会议，发表宣言要求：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由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拒绝奉鲁军南下。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对时局宣言，表示同意上述主张。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订定之《国音罗马字拼音法式》。

△　苏驻京代使齐尔内赫在哈尔滨表示：中苏会谈除中东路权限外，还应商谈保障文化机关及劳工团体各问题。奉当局拒绝。18日，苏使离哈，20日抵京。

11月上旬　　奉当局收回中东路之工务、地亩、医务、电务、经济调查、电话、电报、教育八项权利。

11月11日　　蒋介石自南昌到九江，与唐生智、邓演达开重要会议，刘佐龙、刘骥、柏文蔚等派代表参加，决定赣事委朱培德主持，对浙、皖取急进方针。

△　国民政府改造司法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徐谦主席，通过改造司法制度案：一、改正法院名称，采二级二审制；二、废法官不党之禁，非有社会名誉之党员，兼有三年以上法律经验者，不得为法官；三、废法院内设行政长官制；四、废止检察厅；五、采参审制及陪审制；六、减收讼费及状纸费，征收执行费。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派遣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孙科、顾孟馀五人赴武汉，筹划整理党务，统一各省财政、外交、交通等事。16日徐谦等离广州。

△　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系军事长官一百余人会议，提出三议

案：一、整顿军队，严肃军纪，恢复课操；二、巩固防务，剿捕土匪，以安闾阎；三、整顿吏治，军不干政，加捐增税应审度民力。对于应付时局之方针，张电邀吴佩孚、阎锡山派负责代表来津面议。

△　孙传芳之代表杨文恺专车抵津，即赴蔡园谒张作霖，陈述长江军事变化经过及孙传芳“暂取守势”“即行反攻”之现状，表示孙对张合作之诚意。张谓合作当贯彻始终；又云自己对国事尚无成见，须俟各方代表到齐集议再定。

△　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组成，朱培德、白崇禧、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熊式辉、张国焘、李仲公、张定璠12人为委员，朱培德为代理主席委员。

△　广东省政府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党部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决议案改组成立。翌日第一次会议，各委员推孙科、陈树人、宋子文、李济深、甘乃光五人为常务委员，孙科为常务委员会主席。

△　上海招商局前被孙传芳征发九轮运兵赴赣，其中“江永轮”在九江焚毁，死伤船员近百人。上海海员工会向招商局提出六条要求：一、抚恤“江永轮”死难船员家属每人1000元；二、赔偿“江永轮”遇难而幸得逃还之船员损失费每人300元；三、招商局各轮船员一律加工资二成；四、今后招商局之轮船不得再作运兵之用；五、招商局雇佣船员，必须与海员工会签合同；六、启封海员工会。招商局董事会拒不承认上述六条，亦不接见工会代表。是日，海员工会下令罢工，并呼吁各界援助。

11月13日　　张宗昌由济南抵天津谒张作霖，商谈出兵南下援吴佩孚、孙传芳等问题。张作霖先后会见吴佩孚之代表迟云鹏、沈鸿昭、颜世清，孙传芳之代表杨文恺，阎锡山之代表田应璜，商震之代表张汉章，顾维钧之代表孔昭焱。

△　全国商会联合会就中比条约期满事致电海牙国际法庭，请拒绝比国无理提案，以维持正义；并代表全国商界声称：“若比当局仍固执其主张，惟有与该国经济绝交。”

△　奉天公债局饬各县每10亩地募公债现洋一元。

11月14日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许世英、沈钧儒、褚辅成、黄炎培等5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联合会章程，规定该会“以人民直接负责，速实现民治为目的”。发表通电宣称：一、苏、浙、皖三省为民治区域，一切军政民政应即由人民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处理；二、上海应为特别民治市；三、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应即日停止。

△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江苏省党部、浙江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为苏、浙、皖问题发表联合宣言，提出：“一、本主权在民之义，应将三省及上海军民政权交还当地人民，由人民组织省民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二、拒绝奉鲁军南下；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四、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　吴佩孚改“讨贼”联军为“讨赤”联军，推戴曹锟为总司令。

△　奉天当局借日款修筑之吉敦铁路建成三分之一，而原有经费1800万元将罄，奉天交通委员会核准续借日金500万元。

11月15日　　蒋介石在九江发出“促各省人民自决”通电，谓北伐革命节节胜利，但距全国统一尚远，“所望各省人士速起自决，驱逐残余军阀，组织各省省政府与国民会议预备会”。

△　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张宗昌、褚玉璞、奉系各将领以及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之代表均列席，计200余人。会议决定：张宗昌援孙，褚玉璞援吴，奉军担任后防及增援，但孙、

吴如不请兵，张、褚决不出动；请阎锡山出兵援刘镇华戡定陕省；请商震切实改编绥西国民军，力如不逮，奉军派骑兵师协助。对于中央政局，决定暂不过问。

△　上海会审公廨因我国已宣布中比条约失效，停止中比诉讼案件，与比驻沪领事为陪审问题发生纠纷。是日，驻京比使华洛思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恢复旧约状态。

11月16日　　国民政府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鲍罗廷到武汉，对迁都作进一步调查与部署。

△　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复比驻京公使华洛思6日、10日两照会，指出中比改约争执之点在于以平等原则适用于中比关系，纯为政治性质，不能受国际法庭审判。比若将第四十六条解释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不过重申比国维持在华不平等制度，有碍谈判。“中国政府深信此项条件应照该盟约（按：指《国联盟约》）第十一条提出于国际联合大会”。

△　上海招商局将“广利”轮船员尽行开除，另雇新员赴粤，致在金利源码头发生殴斗事件，伤七人。海员工会发表第二次宣言，坚持罢工。24日，手工业联合总会等23团体召开会议，发表援助海员罢工宣言。29日，广州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致电警告上海招商局：如再迁延不理，“本会惟有出最后手段严厉对付之，以雪此奇冤”。

△　淞沪苏常镇扬区戒严司令部枪杀在上海自治运动中被捕之工人陶静轩。19日，上海总工会通告各工会于20日下午1时全体静默三分钟哀悼。24日，手工业联合总会等23团体发表为陶静轩雪冤宣言。

11月17日　　蒋介石在南昌函复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吁请“和平救国”事，谓：“如欲救国，应请先一设想我国家与我民族之现状。果求和平统一，果求独立自由，舍革命军与三民主义外，宁有他途？”希望该会“毅然变计，加入革命，合作救国”。

△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函上海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指出必须三省农工商学各界人士起来团结一致行动，始有成功之一日。“若仅以责之少数领袖，则匪特名实难符，亦且力所不逮”。并主张“现三省之军事当局，必须将三省军民两政交出”。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出席国际联盟代表朱兆莘，令将中比条约交涉全案提交国际联盟大会，要求各友邦之公平解决。

11月18日　　顾维钧以摄行大总统指令批准署司法总长罗文幹所呈《民律案总则编》、《民律案续编》、《商律商行为法案》、《票据法案》、《海船法案》、《破产法案》，着该部刊印颁行，除已有现行法令判例及有显著不同之习惯外，均准暂行参酌采用，仍着修订法律馆迅将该项法案分别妥为厘订，呈候公布，以资遵守。

△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中比条约既宣告失效，内务部应准备收回天津比租界行政权。24日，褚玉璞令庄景珂着手筹备。

△　孙传芳微服由宁抵津，晤张作霖、张宗昌，商请出兵及接济械弹。

△　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通信图书馆、上海世界语学会、中华农学会、创造社、妇女问题研究会、学术研究会等团体联合发表《拥护人道宣言》，略谓：“对于本国无抵抗的人民，不经法律裁判，任意逮捕虐杀，如最近九江、南昌等地所演的暴行，实为人道上一大污点。”“现在军人反向清白无辜的学生发泄怨愤，任意拘捕监禁，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处青年学子以极刑，这更是文化世界中难以洗刷的奇耻大辱。”“民国约法所赋予人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被剥夺净尽”，“这更是民族文化前途的最大的险象。”宣言最后表示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勿以为正义是无实力的，民众是驯伏如绵羊的”。

△　直隶教育厅下令整顿女校：一、禁止社交公开；二、禁阅不

正当书籍；三、禁止袒胸露肘；四、禁止与男生跳舞。

11月19日　　蒋介石再电张静江、谭延闿，要求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提高党政威信。

△　蒋介石在南昌向外国记者表示：非至治外法权、外人租界及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革命决不终止；革命不仅以推倒中国境内帝国主义为限，且以获取其他国内同样结果为目的；中国京城当在武汉，政府实行委员制；对美表示友谊，列强愿取消旧有条约，归还租界，以友好精神承认中国者，中国定以友邦待之；将完成粤汉铁路，使火车可从广州直达北京。

△　孙传芳去津后，陈仪、陈调元、白宝山、冯绍闵等赶至南京，与卢香亭、刘宗纪、孟昭月会商时局问题。

△　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发旗产税契执照10万张，交奉系“镇威军”筹饷，所得部三军七。

11月20日　　张作霖、孙传芳、杜锡珪及奉、直、鲁重要将领在天津开会，议定：一、张宗昌率直鲁军15万南下，进兵江西挡国民革命军之主力；二、孙传芳保守苏、浙，兼抵御福建之国民革命军；三、张学良以第三、四方面军团维持京畿治安；四、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南下参加战斗；五、张作霖就北方军队统帅。以上各项，先派员征求吴佩孚、阎锡山同意，再发通电。

△　湖北政务会议决定将武昌大学、商科大学、法科大学、文科大学、医科大学合并改组为湖北中山大学，实行委员制。

△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日本东京上野帝国学士院会馆开第二次会议，日本政府外相币原、文相冈田以及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列席。会议决定将535万元建筑设备费，除提出35万元为准备金外，北京、上海各分其半。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之事业归总委员会，上海

自然科学研究所事业归上海委员会实施。

△　上海总工会等工人、学生团体发表声明拥护《人道宣言》，号召各界同胞“对于军阀政治更深一层认识，而努力于自治运动”。

11月21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达同安后，独立第四师即向文斗店前进；福建民军第五路叶定国部及第二路一个支队占小盈岭；第十七军第二师向东四桥、五峰前进。闽军第一军张毅部及第二十九混成旅孔昭同部不支，向莆田退去。是日，革命军占泉州城。

△　商震就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加入国民革命军。翌日，丁惟汾、戴季陶、朱霁青联电称：“闻兄加入革命军，不胜雀跃。当年关外同志属南者惟兄，此次力任扫穴犁庭之责，南方同志闻之，无不勇气百倍。”

△　吴佩孚在郑州召集会议，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及在汴、郑之高级将领出席，决定：一、服从主帅，拥吴到底；二、省长履行职权，军民分治；三、用人行政公开；四、财政由省长负责；五、前方军事由田维勤负责；六、分区剿匪；七、各军一律交还扣留车辆；八、各地不得就地筹饷或征发。

11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是日起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两次报告中国革命问题，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列席会议。30日，斯大林在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主要和最基本之点，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把农民卷入革命，满足他们的最迫切要求，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加紧工作，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全会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

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

△　杨宇霆应张作霖之召，晚由奉抵津，孙传芳即往拜访、道歉，表示愿将东南奉还。旋同赴蔡园谒张。杨对出兵南下力主谨慎从事，先问饷项，表示东三省无力协济关内军费。

△　张宗昌由天津归抵济南，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出兵援孙。会后，张下动员令：第三军程国瑞部、第七军许琨部向津浦路南下，渤海舰队及第八军由海道赴上海。

△　上海招商局因孙传芳征用江轮有七艘未放还，“广利”、“新华”、“新昌”三船又在广东被扣，是日分电南京“联军”司令部、广州国民政府并北京政府交通部，要求27日前各将所扣轮船放回，否则全部停航。

11月23日　　邓演达与张发奎自武昌飞抵广州，催促中央迅速迁都。

△　国民军孙良诚部进至兴平、醴泉一线，围攻咸阳，与刘镇华部激战，是日占领咸阳。

△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推蔡元培主席，议决组成军事、外交、事务等委员会，推王正廷等四人为外交委员，孟森等九人为事务委员。会议决定通电宣布：一、孙传芳既已他往，其所有行动与三省无涉；二、三省已声明划为民治区域，奉、直、鲁首领如对三省有军事行动，誓以民意抵抗；三、三省军队赞护民治者供其给养，否则视为公敌。会议又通电要求三省全体人民及团体速即奋起，为组织三省正式民治政府共作准备。30日下午4时，该会招待中外记者，蔡元培致欢迎词，申述三省民治之必要及促其实现之决心。

△　中华国民拒毒会函北京政府外交部，对英商太古公司“泸州”轮运鸦片100箱由香港往大连供日本当局转销内地一事，要求提诉国际联盟，并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

11月24日　　北京教联会庚款董事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联席会、私立四大学联合会等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讨论反对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东京开会及其议决事项，号召教育界群起反对日本利用庚款进行文化侵略活动，并决定联合组织“对日庚款问题委员会”从事经常工作。

11月25日　　潘复自津抵京，就北京政府财政总长职，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发行军用票、巨额新库券或公债，杜锡珪等人反对。

△　驻京英、美、法、日四公使联衔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中国政府拟用关余指借债款，惟关余已无余，且牵动外债基金，特提抗议。

△　天津英工部局拘捕在英租界活动之国民党人江镇寰等15人，并即引渡于市警察厅。翌日，警厅长丁振之进行审讯。张宗昌急电丁“尽法惩办”。

△　鲁军发行“南征”新军用票1000万元，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在江苏省内发行。

11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决定迁都武汉。

△　驻闽厦海军警备司令林知渊及其陆战队长林忠在厦门开会，决率部归附国民革命军。计有“海筹”、“海容”、“海瑞”三大舰，“永健”、“永绩”、“四江”、“五楚”等11炮艇，二驱逐艇，八水雷艇，“通济”、“建威”、“建安”三练习舰，六运输舰，以及浅水舰等。翌晨，陆战队入福州。杜锡珪急电厦门通缉林知渊。

△　蒋介石任命陈可钰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党代表，调升张发

奎为第四军副军长，仍兼第十二师师长。

△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进驻福建仙游，乘胜前进，连克莆田、永泰。闽军张毅及孔昭同、蒋启凤等残部纷向闽江下游一带溃退。

△　南下援孙之鲁军第七军许琨部、第一百零七旅常芝英部到达浦口，下午有两团渡江。

11月27日　国民军解西安围。援陕诸路集结直趋西安，与围城之刘镇华军展开激战：左路方振武一部向泾阳东南进展，攻西安城北附近之敌；右路马鸿逵部向鄠县（今户县）东北方面进展，攻西安城南附近之敌；中路孙良诚部由咸阳进攻西安。刘镇华军殊死抵抗，猛力向中路冲击。国民军又调刘汝明部由左翼向敌背后十里铺方面迂回攻击，孙连仲部由右翼向蓝田、临潼方面绕攻。26日拂晓，全线展开总攻击，与刘镇华军激战一昼夜。刘镇华军见后路被抄袭，全线动摇，分向潼关、大荔、武关一带溃退。城内守军李云龙、杨虎城等部奋力出击。是日中午12时，被围七个月之西安城解围，方振武等部入城。

△　蒋介石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范石生为第十六军军长，准方本仁辞第十一军军长及江西宣慰使职。

△　苏联新任驻京代理大使齐尔内赫向顾维钧递交国书。

11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自下月1日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停收文件，5日停止办公。

△　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联名通电总辞职。翌日，张作霖电顾维钧等人谓“值此险象环生，所望艰难共济，尚请同支危局，勉维其难”。吴佩孚亦复电“尚希坚忍撑持”。

△　吴佩孚通电宣布下野，电云：“素以主张恢复武汉，向之所以

失败遭挫者，皆因将领团结不固之故，今时势变异，愿各方赓续讨赤决心，佩孚决计退息林下，不复再问政事。”

△　法权调查会议报告书经美国与关系各国商定，于30日中外同时公布。北京政府外交部因王宠惠声明“署名于本报告书不能认为对于第一第二第三编所载各节悉表赞同”，先于本日公布报告书第四编《委员会之建议》及《中国委员宣言书》。《宣言书》对于调查法权委员会以为按中国现状未便即时建议撤销治外法权表示“殊形失望”，“惟对于条约以外所发生不良之惯例立即取消，及其他中外人民关系之改善办法均有所建议”，则深为谅解关系各国之善意。

△　驻京英使麻克类抵津访张作霖，表示希望中国有强有力之政府，以防“赤化”，列强当予以援助。

△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决定前方主任邓演达直辖鄂、湘、川、黔、赣、闽诸省有关事宜，后方主任孙炳文直辖粤、桂、滇三省有关事宜。

△　湖南省民会议筹备处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选举夏曦、张翼鹏、董维键、左学谦、雷铸寰五人为常务委员，朱剑凡为宣传部长，凌炳为组织部长，张唯一为编纂部长，熊亨瀚为秘书长，推选各委员会主席：民政刘岳峙、财政李希贤、教育熊梦飞、司法吴鸿骞、军事熊震、外交董维轮、农民易礼容、商民王学衡、工人郭亮、实业凌炳、妇女谭国辅、青年刘国富。

△　上海400余团体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军南下市民大会，五万余人冒雨参加，决议：一、反对奉鲁军南下，请奉鲁军当局服从人民公意，撤回军队；二、反对发行1000万元军用票，一致拒绝使用；三、督促苏、浙、皖军事当局服从人民公意，保护地方治安，维持和平；四、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商、工、学各界组织自治市政府；五、恢复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由上海总商会、各马路商号总联合

会、闸北商会、南市商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七大团体组织，求市民自治之实现。会后游行。

△　南京无线电台落成，电力一个千瓦，电机用真空管，天线杆高160尺，多属中国制造，费用二万余元。

11月29日　　蒋介石电准唐生智、陈铭枢之请，委冯绍闵为暂编第一军军长。

△　驻京比使华洛思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谓按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九条，中国不能以一己权力终止中比条约，惟有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解决；比国承认提交海牙解决之法律争点，与中国提议交国际联盟并不矛盾，可以考虑于提交国际法庭后再在国际联盟提出。

△　张宗昌到天津谒张作霖，随即电令已出发南下各军暂在津浦路南段驻扎，以浦口为终点，勿越过长江一步；并令第四、五、六各军集中徐州，以待后命。

△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发出三电：一、电三省海陆军将领，敦促表示赞助民治之态度，声明如有观望，即系反对民治；二、电张作霖，劝令鲁军撤回原防，留三省为缓冲地点；三、通电反对英日借款。

11月30日　　孙传芳、吴俊陞、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16人联名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发表通电略谓：“赤逆披猖，黔黎困蹙，纪纲失坠，邪说横行，凡有良知，莫不愤激。传芳等仗义讨贼，义不容辞，然成城有志，束箭弭坚，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挈领之效。……谨愿推戴我公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

△　蒋介石任命吕汉群为四川宣慰使。

△　上海总工会公开办公，并通告所属工会，于5日内一律公开会所办公。

11月下旬　　山东又发行盐税国库善后公债2000万元，向各县摊派。

是月　武汉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在湖北总工会领导下，先后成立各业工会60余个，租界外人所雇佣之华工亦设立工会。各业工人纷纷要求加薪，未遂者即罢工。14日起武昌至长沙之粤汉路员工罢工，火车停开数日。印刷业工人、邮务工人、烟厂工人等亦先后罢工。总工会组织经济斗争委员会，刘少奇主任，对各工会所提要求先研究后再负责交涉。29日，湖北省政治委员会组织之劳资仲裁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总工会、省市党部、武汉商会、政治委员会、卫戍司令部各代表为委员，会后通告各项劳资问题不能解决者可交本会仲裁。

12月

12月**1**日　　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安国军总司令职，并发表就职通电，略谓："比以国政不纲，暴民乱纪，宣传赤化，勾结外援，年余以来，夺地争城，残民以逞。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顷据孙馨帅（孙传芳）诸君以时局艰危，暴徒肆虐，联名电请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统率同志，保安国家。作霖自分驽骀，岂堪膺兹重任？屡经电辞，未承谅许。当兹危急存亡之秋，敢昧匹夫有责之义，爰于十二月一日在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张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

△　张作霖在天津蔡园续开军事会议，决定：一、长江方面仍由孙传芳军担任前线，张宗昌之直鲁军在江北岸作为后盾；二、派韩麟春率领第十七军由京汉线"援吴"；三、热河汤玉麟、察哈尔高维岳两部协助阎锡山军在包、绥方面防范国民军；四、张学良负责警备北京、天津，吴俊陞、张作相负责巩固后方，张作霖坐镇天津策应各

方。蔡园会议结束。

△　张作霖派张景惠等人赴郑州，与吴佩孚商洽京汉线军力与津浦线呼应以及改组北京政府等事，邀曹锟、吴佩孚去津面商一切。翌夜，张景惠等返津，谓吴对张就安国军总司令无异言，望多济饷械。

△　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管理粤、桂、闽政务，委员为李济深、陈树人、甘乃光、戴季陶、宋子文、孙科、何香凝七人。

△　阎锡山派代表赵戴文到南昌，是日面见蒋介石，陈述愿加入国民革命军。

△　英国新任驻京公使蓝普森抵上海。蓝普森拟先赴汉口视察，决定对华外交方针，然后再去北京。原任公使麻克类已由北京到上海，候船回英。

△　日本政府派外务省条约局长、出席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的代表佐分利自北京南行，赴国民政府所辖地区实地考察。是日，佐分利在上海邀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中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各青年团体代表征询政见。

△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开委员会议，蔡元培主席，决定：电孙传芳斥其勾引暴军来犯三省，勿再昧于进退而重新干涉三省政务；通电三省各公团，请对奉军南下表明态度；推袁观澜等五人起草上海特别市组织大纲。

△　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参加人除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52名外，尚有湘、鄂、赣、皖、川、豫六省之代表。

△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出席大会的农民代表计33县及二特区170人，代表农会会员130万；工人代表计各地

区工会及产业工会52处175人，代表工会会员32.6万余人。开幕式并到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400余人，以及各界群众20余万人。大会由郭亮主持，国民党代表熊亨瀚、共产党代表李维汉、苏联驻湘领事彭礼之代表饶漱石、共青团代表谭因等先后讲话。大会聘李维汉、李荣植、夏曦等八人为顾问。3日，大会致电毛泽东，“盼即回湘指导一切”。

12月2日　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与驻闽厦海军联合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推李任保安司令，维持省城秩序。

△　国民政府电英国政府外交部，抗议天津英租界当局11月25日拘捕国民党人15名，并引渡与奉军，要求赔偿损失，声明倘被捕诸人受害，将由英政府负责。

△　蒋介石在南昌设宴欢迎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鲍罗廷等，称预料三年之内可以完成国民革命，统一全国。

△　汉口英商允纳国民政府当局所征附税，办法和广州相同，普通货物征2.5%，奢侈品征5%。

△　上海学生联合会向上海教育界及各学校当局提出教育改革要求28条，主要内容有：给予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改善各项设备，便于学习、生活、体育活动；减免各项费用，以利贫苦学生就学；教会学校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等。

12月3日　闽军第一军张毅部节节败退，一部从陆路退往福州附近，被海军陆战队及省防司令军合击；一部在莆田东南之涵江装运军械辎重及其他物资出海，被海军陆战队林忠部截击，张毅船两艘被“海筹”等舰在闽口、涵江一带截获。张毅部3000余人渡往峡兜南岸，尚在北岸之部以炮击顽抗。国民革命军独立四师张贞部于扈屿、第十七军杜起云部于永春会同攻击，张毅部不支，派员诈降，突又围击前往点收枪械之林忠及其所率之一团。后经海军扼守新歧，张贞、

吴威、洪永春等部分布尚干扼其左，杜起云部据大樟扼其右，海军第二团出青蓝铺击流沙乡攻其背，终于是日歼灭张毅全部。

△　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三师之林寿国部入福州城。4日，该师党代表兼总指挥林寿昌电何应钦请速来省，并布告由保安司令李生春维持省垣秩序。

△　国民军援陕诸部解围西安后乘胜追击刘镇华军。方振武部进至大荔，马鸿逵部抵蓝田一带，孙连仲部进达商雒，孙良诚部进驻渭南。是日，刘汝明部越过潼关，进入豫西阌乡（今属灵宝）。刘镇华军节节东退。6日，刘赴山西乞援。

△　张宗昌由天津回济南后大举派兵南下，江南民心恐慌。是日，张通电声明，苏、皖各省一切用人行政事宜，仍由孙传芳主持，决不稍有干涉。

△　美国务院正式宣称：美国政府对粤军在长江各条约口岸收回海关事件，决不采用任何方略阻止。因为此纯系中国国内行政，与美国政府无关。至于在中国各港内之美海军，只为保护在华美侨生命财产之用。

△　上海工商学各界团体代表开会，议决恢复工商学联合会，改名为“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以实现上海自治为宗旨。6日，市民公会开成立会，沈钧儒主席，推定委员，主持进行事宜。

△　汉口总商会召开全市商民大会，到一万人，确定对付工潮的四项办法交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执行：一、加薪须逐渐酌加；二、工作时间沿旧习惯；三、保持店主辞去员工之自由权；四、待遇力求平允。声言以全市商民之最后手段——罢市为代表作后盾。

12月4日　蒋介石、宋子文、陈友仁、孙科、徐谦、宋庆龄及鲍罗廷等由南昌抵九江，万余人执旗欢迎。

△　湖北省政府交涉署及卫戍司令部对英水兵登陆汉口事，向驻汉英领提出抗议，要求即日撤退。7日，英水兵撤离。

△　孙传芳偕杨文恺自天津返回南京，就“安国军”副司令职，并电召陈仪、陈调元、白宝山等苏、浙将领至南京参加军事会议。

△　张宗昌向德国订购之军火运抵青岛，计：枪5000，弹400万，手枪300，弹15万，无烟药三万斤。另订作战飞机六架。

△　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代表朱兆莘遵北京政府训令，向日内瓦报界发表一文称：中国坚绝反对将中比条约解释问题提交海牙法庭，因争论点系政治性质，而非法律性质。中国愿依照国际联盟会章第十一款第十一段之规定，将此案提交国际联盟大会。中国决心将所有不平等条约于期满时一律废止，对违反平等原则之任何提议，概不接受。

△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继续举行。是日，李维汉报告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6日，谢觉哉报告国民革命与农工阶级。7日，苏联驻湘领事彭礼到会介绍苏联政治经济状况。8日，李维汉报告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9日至14日，报告全国及湖南职工运动、农民运动。12日，大会发表《为反对奉鲁南下并援助江浙皖豫自治示威宣言》。

12月5日　上海招商局举行董事会和股东维持会联席会议，因请各方放回被扣船只未获结果，决定即日起停业，各线全部停航，通电各方；并令将已泊上海及在途将归各轮一律调集浦江。

△　中国科学社发表宣言，要求日本政府将全部庚款无条件退还中国。宣言并指出：所谓中日学者合组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不过乃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局一附属机关而已。

12月6日　蒋介石电冯玉祥请率师出潼关东进。同日，冯玉祥对豫西下总攻击令。

△　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十五军向鄂西发动总攻击。各部进展迅速：第十军王天培部12日进驻公安，同日克沙市；第九军彭汉章部13日克松滋、枝江；第十五军袁祖铭部14日攻入荆州；第九军贺龙师17日占领宜昌；王天培部22日占领秭归、巴东。卢金山、阎得胜等部向川东退却。

△　张作霖发表宣言，声称中国无大地主大资本家，不适用共产学说，不应推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并谓冯玉祥、蒋介石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与石敬瑭何异”。“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

△　吴佩孚召集寇英杰、齐燮元、王为蔚、田维勤、马吉第、阎曰仁等人在郑州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奉反攻，并讨论援陕以御国民军方案。吴派田维勤为援陕全军总司令，张治公为前敌总指挥，王维城、张凯臣为第一、二路司令，阎治堂、王振、柴云陞为左、右翼及纵队司令。

△　吴佩孚电张景惠，谓：“奉军入豫增援，将领主张尚不一致，当再事疏通，借图圆满。前敌虽紧迫，尚堪支持，勿劳过虑。”

△　孙传芳迎张宗昌率直鲁军南下，向张表示愿将津浦路南段收入、浦徐货捐、凤阳关税、正阳芜湖盐厘、两淮盐款等悉交鲁军筹饷，是日令浙、皖、苏各筹款50万助直鲁军南下。同日，孙并颁军令13条，中有凡阻止奉鲁军南下者以“赤党”论罪。

△　国民党代表夏鼎（译音）抵日内瓦，致函国际联盟秘书长，声明国民政府真正处于代表中国国民发言之地位，凡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吾人认为各国与北京政府之谈判悉为无效。

△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上海分委员会开会，中国委员伍连德等九人和日本委员山崎直方等七人出席，推严智钟为委员长。会议讨论在上海筹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事宜，决定先派14人赴欧美从事三年研

究工作。日本委员与中国委员一度发生冲突，结果日本委员略示让步，酌采中国委员“先派员赴欧美研究”之意见。8日闭会。

△　奉天因滥发新票，票值一再跌落。是日奉天当局出示：凡以奉票进行投机交易者，即行枪毙。市场益趋混乱。

12月7日　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昌。略谓：“承先总理遗志奋斗，现前方军事成功。党政府为适应环境，实行迁鄂。决七日迁移，准半月内可到武昌办事。”第一批人员彭泽民、丁惟汾、顾孟馀等计千余人启程北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仍留广州，由李济深主持。

△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政会议，孙科、宋子文、蒋作宾、陈友仁、宋庆龄、鲍罗廷等出席，议决：一、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二、工运主缓和，农运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之张本；三、通过财政统一方案。

△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1日占邵武后即分兵数路进击：左翼4日占福建建阳，是日克建瓯；中路是日达顺昌；右翼是日克将乐，一部3日先克泰宁。周荫人部向政和、浦城退却。

△　于右任就任国民军二、三军联军总司令，在潼关指挥三路进攻豫西：刘郁芬等部沿铁路线自阌乡攻灵宝、陕县，邓宝珊等部自黄河南岸进迫观音堂，李云龙等陕军向南阳一带联络樊钟秀。

12月8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在闽、浙边境击溃陈炯明粤军残部谢文柄、陈修爵等，会合第二十二师向浙江衢县前进。

△　张作霖电促吴佩孚迅即反攻，略谓：“贵部反攻无期，敝军发动在即。敝军南下，决不计及地盘，务请我兄向贵部解释。贵部如能团结内部定期反攻，无须敝军为助，亦可中止南下。所虑徘徊观望，坐误戎机。”翌日，张又电吴，谓：“安国军曾与讨贼军共同合作，一

致讨赤，弟对我兄誓守盟约，合作到底，成败利钝，均所不计。所望早饬大部，一致猛进。”10日，又电吴再次表示决“通力合作，贯彻始终”。

△　张作霖任命于珍为援豫总司令，率部南下抵御国民军。以荣臻部为先锋，于珍部续进为主力，赵思臻部任预备队。

△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致电三省各县征收机关暨各团体，劝告对于孙传芳苛征军费或预征漕粮之类一概拒绝。该会并致电警告银行界，反对发行变相之兑换券扰乱金融；致电安格联：反对军阀借款、预借漕粮及发行新公债。

△　上海总工会第三次被警厅查封。10日，各产业总工会、商务工会、各地区工人代表会、各行业工会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反动当局的暴力摧残。11日，2000工人集合上海总工会会所自动启封，将所有器物迁往虬江路印刷总工会内。

△　北京四教育团体开会，反对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上海分委员会议，致函南方各省教育界一致反对。11日，出席上海分委员会议之中国委员秦汾、胡敦复声明辞职，对日方表示抗议。中华化学会、上海学联会、江苏省教育会等先后发表宣言反对该会议，认为所定办法含有“二十一条”要求中第五条第二款之意味。

12月9日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第十七军第二师杜起云部及福建民军第五路叶定国部、第二路洪永春部等在歼灭闽军张毅部后乘胜追击前进，是日进占福州，俘万余人。闽军第二十九混成旅孔昭同部、补充旅蒋启凤部、第二旅董胜标部之残部由原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旅长李生春收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归曹万顺代军长节制。

△　蒋介石电令何应钦率两师兵力兼程入浙。

△　浙江省议会、杭州总商会分电蒋介石、孙传芳勿进兵浙省。

△　杭州市学生联合会邀请各界领袖30余人讨论浙江时局之应付办法，决议组织杭州各界联合会，推举沈钧业等人为筹备委员，拟定组织大纲草案，以真正实行浙江人民自治为宗旨。

△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王均部入浙江常山后即进占衢县，令商会通知商民通用由广州携来之纸币。

△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李济深、陈孚木等五人接收广州市党部，新组市党部特别委员会。

△　北京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中苏会议及条约研究会之经费，由关款拨9000元，10个月为限；储才馆、法律馆之经费，由关款各拨一万元，一年为限。

△　张宗昌电苏、皖当局，请会衔布告苏、鲁、皖、赣一律通用鲁省军用票。上海新苏公会通电江苏全省一律抵抗不用。

△　张作霖命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发奉天军票1000万元。是日《民国日报》揭露：表面称1000万，暗中实有2000万元。

12月10日　　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鲍罗廷自九江抵武汉。同日下午2时，武汉各界在武昌阅马厂举行“欢迎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鲍顾问罗廷大会”，到10余万人。大会总主席邓演达致欢迎词，宋庆龄、孙科、徐谦等相继演说。

△　奉军完全接收保（定）、大（名），置重兵于磁县，俟吴佩孚需要时，即大批入豫。

△　张作霖之安国军总部发表总司令部组织和人事，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下设三厅八处：军务厅长于国翰，总务厅长郑谦，秘书厅长任毓麟，军事处长陈钦若，军需处长栾贵田，军法处长颜文海，副官

处长俞恩桂，电务处长周大文，总务处长王其康，外交处长吴晋，机要处长娄裕熊。

△　出席关税会议之中国委员顾维钧、颜惠庆等七人集议继续开会问题，决先照会各国委员催促开会，如无结果，即发表宣言声明中国方面对此不能负任何责任。

△　谭延闿、何香凝等在广州召集工界代表谈话，劝工人一致团结，勿生纠纷，免使前方同志有后顾之虑。

△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通电阻止北京发行新公债；并通电拒用鲁省军用票。

△　直省筹集“讨赤”军用费共2500万元，计：办善后公债1000万元，其中长期600万元由各县摊派，短期400万元由各银行、公司、盐商分担；办第六次公债600万元，各县摊销；预借明年钱粮及按亩抽“讨赤”特捐各400万元；令开滦公司代筹100万元。

12月11日　　国民军援陕部队出潼关入豫境，刘镇华残部绕越山地，退函谷关集中，吴佩孚调遣所部西向援刘。

△　新任驻华英使蓝普森在武汉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陈向蓝普森宣布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略谓：国民政府决意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反对协定关税；对外侨生命财产，当负保全之责。14日，陈向蓝普森指出，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已占中国之半，南部关税收入应归国民政府。

△　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第二批人员，由谭延闿率领离广州经韶关北上。张静江因病暂时留粤。

△　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歧在衢县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

△　孙传芳复电杭州总商会拒国民革命军入浙，电称：可允浙人自治要求，惟一条件为党军不入浙境。

△　武汉各界10余万人集会欢迎国民政府北迁，大会总主席唐生智。宋庆龄、徐谦、孙科、陈友仁、鲍罗廷、宋子文等均发表演说，激励民众努力革命，巩固根据地，以期北伐成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跻中华民国于国际平等地位。

△　驻防磁县之吴佩孚军张汝田部与南下至磁县之奉军发生冲突。

△　蒋介石复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函，谓“欲求和平统一、独立自由，舍加入革命合作无他途”。

△　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集李志熙等五名直隶省议员及工厂、学校代表30余人开谈话会，宣布天津已入戒严时期，禁止结社集会，要大家回去劝导工人、学生“切勿以身试法”。张并宣称，上月25日由租界引渡之15名国民党员，“念其年少无知，不欲深究”。

12月12日　　蒋介石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人部，不准擅派党代表。14日电宋子文，准撤财政部党代表。

△　蒋介石任命邓锡侯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八军军长。

△　吴佩孚在郑州召集魏益三、马吉第、齐燮元、田维勤、寇英杰等人，会商奉军援豫问题，各人意见不一，无结果。

△　北京政府农商部训令京、沪交易所停止买卖“九六公债”。略谓：近日“九六公债”市价暴落已出常轨之外，并有奸人从中操纵，影响市面，扰乱公安。按照《交易所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所有“九六公债”部分营业暂行停止，听候派员查办。

△　上海自治运动各团体举行代表大会，200余人出席，通过宣言及告市民书，要求实行市民自治，市民公会筹备组织上海特别市政府；拒绝奉鲁军南下，拒用军用票。

△　武汉总工会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工会干部，是日开学。全市已成立工会300余个，近30万工人入会。

12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以及鲍罗廷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联席会议成员为宋庆龄、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董用威、于树德、叶楚伧等。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

△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即政治局与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的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报告提出挽救联合战线破裂的七项策略，其要旨为：防止党外右倾，反对党内“左”倾；改善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与多数同志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激进政策，主张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此，会议通过了《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决议案》。

△　海牙国际法庭书记长通知北京政府驻荷兰公使王广圻出席答辩中比条约交涉案。北京政府外交部饬王广圻访晤法庭书记长，该书记长表示，中国既签字公断条约，如不到庭答辩，将受缺席裁判；不如到庭答辩申述，犹可以使人明了中国之理由。王广圻即将比国政府

之提案报告北京政府外交部，并请示应付办法。

△　浙江省议会议长沈钧业偕蒋尊簋等人抵杭州，邀各界人士会议，陈仪亦列席。佥主浙省即日宣布自治，与国民革命军合作。陈仪表示消极，愿下野以谢浙人。翌日，浙江各界联合会成立，举蒋尊簋等25人为委员，负责办理一切。

△　中国科学社发表宣言，反对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上海分委员会议所通过之议案，反对“以提倡研究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

12月14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善后会议分组会议，谓此后军需、军医须独立；各军不得截留税收；军饷不能再在粤增抽，须湘、赣鄂各负担一部。

△　蒋介石任命熊雄为中央军校代政治部主任。

△　蒋介石电催何应钦，径率第三、第十四师入浙。

△　国民革命军攻浙前锋部队一部抵桐庐、富阳，一部由衢县向建德前进。

△　国民军刘郁芬部占灵宝后又入陕县。吴佩孚令柴云陞坚守待援，令洛阳张治公驰援，又任田维勤为援陕总司令，协调豫南军队前往增援。

△　湖南各县人民响应国民革命军提出之“铲除土豪劣绅”口号，捕捉一贯鱼肉乡民之豪绅。华容劣绅张祚荫被当场打死，汉寿豪绅梅实被扭送县署，立时枪决。各县土豪劣绅纷纷逃亡。岳阳、南县民众强烈要求处决省议员周嘉淦、夏炎，唐生智初意彼“罪不至死”，后以未便强拂民意，准于是日枪决。

12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代主席张静江等由广州动身北上赴武汉。

△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筹组浙江省临时政府，设政治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设政务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为执行机关；提名张静江任政治会议主席，褚辅成任政务委员会主席，陈其采任财政委员会主席。

△　杭州局面改变后，孙传芳令驻沪杭铁路军队前进至长安镇。是日，孟昭月率第八师第十六旅赶赴松江，与原驻松江部队会合担任前线。白宝山第五师、冯绍闵第七师亦由徐海移宜兴，从侧面威胁杭州。浙军在临平附近拆毁铁路一段，阻孟师前进。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开会，议决：由中央工人部于明年1月在武昌召开全国邮务工会代表大会，在此以前各省邮务工人不得罢工；鄂、赣、闽、湘及国民政府其他统辖区域，应即征收产销新税；财政部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2000万元，整理湖北财政公债1500万元。

△　广东省政府奉政治会议令发布告称："现北伐胜利，粤各界当共维后方治安，即劳资间有纠纷，亦应静候解决，不容有轨外行动。"布告规定工会不得擅自拘人，工人不得持械游行，不得擅自封锁工厂商店，不得没收工厂商店一切器物。

△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是日起分别举行工代大会和农代大会，由各地代表分别报告职工运动及农民运动概况。农民代表提出减租废押、解散团防、铲除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要求。

△　上海市各团体联合会为黄阿大于9月19日被日人枪伤致残要求赔偿而未得事，通电全国要求声援，"对此不合人道公理之事应群起力争"。

△　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全体学生发表退学宣言，略谓：该校对吾国留学生差别待遇，稍关重要之学科皆秘不教授，且学校当局无端凌辱，伤及国家体面，忍无可忍，遂全体签名退学，襆被回国。

12月16日　　广东省政府决定：一、责成农工厅拟定减收田租四分之一的具体办法；二、设改良佃户会；三、限制最高借贷利率，不得超过20％。

△　南昌召开市民大会，七万余人冒雨参加。蒋介石到会演说，略谓：“我们要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就非打倒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不可。”大会通过六项提案：一、通电全国一致反抗英帝国主义之暴行；二、电苏、浙、皖三省民众，声援三省驱逐孙传芳、阻止奉鲁军南下的自治运动；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严重抗议天津英工部局引渡国民党人与奉军；四、通电否认任何国家借款给军阀，延长战祸；五、声援上海总工会被封，并勖勉继续奋斗；六、要求政府严惩反动分子。会后游行。

△　安庆各法团通电声明脱离军阀羁绊，实行划境自守。

12月17日　　国民政府正式通告各国政府：本政府迁武昌后，所有外交事宜概由政府负责，非本政府承认或接受之事件及文书，在中国地域概不生效。同时，本政府愿与世界各国为平等的友谊的缔交。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函各省政府：实行统一外交。如各国领事径向外交部以外各机关递公文，应即退还。各机关亦勿向外国领事送公文。

△　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

△　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军进据宜昌，杨森部退往四川，于学忠、张福臣部退往鄂北，卢金山、阎得胜两部归附国民革命军。20日第十五军刘佐龙部又克沙市、荆州。

△　孙传芳委孟昭月为第三方面军司令，令孟率所部第八师，并节制王淼第十一师、李俊义第十四师及第四师王雅之旅，应付浙江军事。

△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颁发解决民团与农军纠纷办法10条，规

定民团须在省主管厅立案，各县长不得批准成立民团；民团以乡为单位，不得抽捐；已有农军之乡而无民团者，不得再成立民团。

△　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向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发出第三次辞职电，表示决不恋栈，请各方赶速主持，迅组新阁。

12月18日　　北京外交团开会，讨论中国时局及对策。英国驻京代使欧迈尔提出《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略谓今日中国时局，政治上虽见分歧，惟对于强有力之国民运动，应予以同情而加以谅解。英国政府建议由各国政府发表宣言“声明拟将修改条约之事及其他悬案，俟华人自行组成有权力之政府时即与之交涉”，并施行一种建设政策，以求合于目下变迁之环境。《建议案》主张各国“声明俟中国国定新税则规定颁布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权”；“对于华会附加税，应以无条件准中国全国立行征收”；“所收附加税进款，不必由各税务司解交上海保管银行”，“如何支配储存各问题，应由中国主管官署自行决定”；“裁撤厘金”；反对“以整理外债为关税会议目的之一”；“法权调查会报告书内之建议与其他改良办法，在现时局势之下可以见诸实行”；对于不合时宜之条约，“莫如调节条约权利，以副中国平允之要求”；如华人不顾条约或有攻击外人应享之利益，各国当协同从事。26日，英驻京使馆公布《建议案》全文及5月28日因关税会议问题致美国政府之备忘录。

△　蒋介石电召吕超为河南招抚使，任命陈铭枢兼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任命袁家声为独立师师长。同日，电嘱军法处处长戴任赴浙江办党。

△　蒋介石电宋子文，商派孙科、蒋作宾为代表赴奉。

△　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进驻福州，与李生春等会晤。

△　张宗昌率大批随员自济南南下，孙传芳亲赴浦口迎接。下午，张、孙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张即宣布委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许琨为副总司令，程国瑞、徐源泉、王栋为第一、二、三路司令，许琨兼第四路司令。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发布保障民产布告，宣布："国民政府保障人民资产安全，非依法律不得查封及没收，其已经查封没收之逆产，概由财政部管理。嗣后无论何人，不得挟嫌诬报，无论何机关，除财政部外，不得执行查封。商民人等务各安心营生。"

△　蒋介石发表《告武汉工界同胞》和《告武汉商界同胞》两文。《告武汉工界同胞》中称：国民党是个代表全民利益的党，工友必须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的指挥，非但不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在《告武汉商界同胞》中称：商人们的利益，本党是当然尊重的。在国民革命战线中，商人、工人地位相等，生死相依。本党与国民政府断乎不会蔑视商人。

△　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举行会议，讨论中比条约交涉案，决定仍提交明年国际联盟大会，即电驻荷公使王广圻向国际法庭接洽；并电驻比公使王景岐通知比政府保留中国原案。

△　奉军万福麟部在河套五原与国民军宋哲元部接触受挫，溃退归绥。张作霖急调黑龙江省骑兵第三旅入绥应援。

12月19日　　浙江各界联合会开会，通过蒋尊簋所拟之《浙江省政府组织大纲》九条，并即依《大纲》第三条选出蒋尊簋、陈仪、张载扬、蔡元培、周承菼、褚辅成、黄郛、周凤歧、陈其采九人为省府委员，依《大纲》第四条选出蒋尊簋为军政长，陈仪为民政长。陈仪派周承菼赴南京与孙传芳商议，请撤去联军，让浙江实行自治。

△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在建宁遇周荫人残部，战三

昼夜，周部溃散。

△　江西政务会议下令取消“张天师”名号，并没收其财产。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自龙虎山逃九江赴上海。

△　美国新任驻汉口、广州、天津总领事巴烈特等接政府训令：对华仍持亲善人民的方针，对南北两方不作左右偏袒。

△　上海市民公会开会，对张宗昌抵宁、孙传芳将来沪一事，决定发表宣言，指明孙如来沪，战端必启。会议推定四人起草告各界民众书和罢市宣言。

12月20日　　蒋介石电复何应钦，福建暂设临时政治会议，请其为代理主席。

△　浙江各界联合会开会，通过《自治宣言》电文及《浙江省政府监察会条例》10条，举王孚川等29人为监察员，汪大燮等为候补监察员。《自治宣言》宣布：一、浙人治浙，组设人民自治政府；二、反对任何军人假自治名义割据；三、政治公开；四、现有军队服从省政府；五、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六、废除杂税苛捐。

△　张作霖在天津蔡园邀靳云鹏、潘复等人会商，请靳组阁，掌握北京政权，央潘与之合作。靳允诺，着手筹备。

△　潘复提议发行“奥国赔款担保二四库券”240万元渡过年关，在家宴请各银行行长，请分认承销。安格联以奥款每月还不能定有三万，仅允备案，不允担保。

△　北京政府电告国际联盟秘书长，拟以海关增征之洋货税1.5%，抵付中国所欠国际联盟会费百余万元。

△　孙传芳、张宗昌协议在宁成立五省联军及直鲁联军联合办事处，由杨文恺、唐在礼主持。

△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欢迎毛泽东和农民国际代表卜礼慈。毛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讲演，阐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帝国主义、军阀或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卜礼慈报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苏联现状。

△　唐山开平煤矿发生爆炸事件，死20人，重伤16人。北京政府农商部调查后议决：一、该矿玩忽人命，除抚恤外要求特别赔偿；二、该矿设备不周，屡次肇祸，应令从实保障人命设备；三、应令开滦局仿各国通例，出资为工人保险。

△　闽江南岸瓜山等96乡灾民9000余人进省请愿，要求国民革命军严惩张毅并赈恤。请愿群众手执白纸旗，上书“十室九空，妻离子散，纵兵殃民，请诛张贼”。

12月中旬　　新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之周凤歧部，由衢县向桐庐、富阳推进，并与陈仪部在萧山之西兴镇、闻家堰部队取得联系，以阻孟昭月部之进犯。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由建德向新登（今属富阳）方面推进。

△　刘镇华部自陕败退入豫，沿途大事抢掠。新安、渑池、洛阳之红枪会，聚众四五万人反抗刘部抢掠，抵制勒派给养支应支差，抵制各县预征民国十八年、十九年丁漕。

12月21日　蒋介石电任戴任、经亨颐为浙江政治会议委员。

△　驻京日使芳泽向日驻京记者表示，反对英国驻京代使所提之中国关税案，谓日本遵守华会条约，附加税必须由关税会议决定。

△　国民军三路攻击镇嵩军，柴云陞、张治公放弃渑池东走。国民军联合樊钟秀部乘胜再进，占领洛阳东南龙门山。

△　张宗昌、孙传芳、陈调元在南京议定合作办法，决定以陈调

元部在皖境沿江防御国民革命军东下，直鲁军由皖进攻九江，孙传芳部以全力对浙。张宗昌要求沪宁路及淞沪路归直鲁军，孙未允。会后，张宗昌返济。

12月22日　　孟昭月被孙传芳委为浙军督战司令，在嘉兴召开沪杭路驻军将领会议，即令所部第八师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补充团及第四师第十三团等约4000余人开进杭州。陈仪部驻杭州之第二团及骑兵营被缴械，余部退绍兴与主力会合。孟昭月通电斥浙江自治为“捏造民意，胁迫士绅，阳托自治之名，阴行抢夺之实”。奔走自治之人士均走避。24日，孟部前锋开抵富阳，周凤歧部退桐庐。

△　新任英驻京公使蓝普森抵天津与张作霖会晤，劝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是，并提出南北分疆治理之意见。张答称：中国历史上向重统一，且只有北方征服南方，决无南方来北方统一之事；华人之事应由华人自了，不应引外人主持。张指责国民政府“所引者复为赤化之俄人”，“外国对赤化遏抑不遗其力，奈何任其在中国横行。一息尚存，必当反对到底”。

△　宋子文在汉口华商总会设宴招待商界代表80余人，就整理金融事交换意见。宋谓：整理金融确有把握，公债担保亦确实，希望商界支持政府。宋并谓：工商利益相依，应互相谅解。劳资双方应放大眼光，只要工人不过分要求，商人自应谅解。工人生活得到保障，商业自然发达，商人仍一样有利。国民政府对于农工商学兵一样尊重，对于商人财产一律保护。

△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分电北京外交使团、银行公会及安格联，请阻止实行附加税及承办“二四库券”，免资北方军阀财源，延长内乱。

△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继续举行，是日起讨论并通过各提案。工代大会通过工人武装自卫案、统一工人运

动案、拥护国民党中央关于工人之政纲案、接受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政纲以为奋斗之标准案等。农代大会通过40项议案，包括农村自治自卫、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接受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对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之主张、加入农民国际、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等。

△　殴毙小贩陈阿堂之日轮“万里丸”两凶手，经日本长崎地方裁判所判定，一处四年徒刑，一处两年徒刑。是日，日驻沪领事署付慰藉金3000元，请上海交涉署交陈阿堂家属。

△　河南省财政厅发行公债200万元，名“金融有息正券”，定三月后分期还本，派员分赴各县摊销。

12月2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讨论中比条约交涉案，决定：比国政府虽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我国仍保持原提议，不向国际法庭应诉。

△　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及旅长以上军官64人通电称：三部组一联合办事处，求军民财政统一及川局安定。推刘为正处长，邓、田副之。

△　孙传芳饬淞沪戒严司令李宝章、警察厅长严春阳，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及全苏公会、全浙公会、全皖公会等团体集会，缉拿其领袖蔡元培、褚辅成、董康、许世英等70余人，声称提倡自治即是“赤化”。26日，孙在《申报》第一版刊登《启事》，谓“有人假借苏皖浙三省公团名义，希图破坏三省之安宁，离间芳与三省父老昆季之感情”，表示“军法所在，绝不宽贷”。

△　北京政府司法部函外交部称：比国在华之民刑案件，无论已审未审，均应移归中国法庭审理，不得由会审公堂办理，请通饬各地查照。

12月24日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五、六师全数移驻上饶、余干一带，准备入浙。鲁涤平之军司令部设进贤。

△　奉军万福麟部步骑共五旅两团进驻包头，国民军张万庆部退五原。

△　北京外交团开会，再讨论英国所提对华新政策案，英驻华新使蓝普森亦出席。各使未接本国政府复电，讨论未得结果。

△　江苏省长陈陶遗、安徽省长高世读辞职，孙传芳委任金陵道尹徐鼎康为江苏省长，安徽省财政厅长何炳麟为安徽省长。

12月25日　　蒋介石电唐生智、邓演达等人：不日将召开军务善后会议，讨论划一国民革命军之编制、军费问题，对奉之作战计划等，所有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特派员、参谋长、各总指挥、各军长、独立师长、总部各处长、苏联顾问均须列席；并令各军长和处长先期集中南昌分组开会。

△　周凤歧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名义通电宣称：本人已奉蒋介石电令，有指挥全浙军队及现奉派来浙国民革命军各师之权，誓当速了战祸，以慰全国之望。

△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一师熊式辉部由闽入浙，直趋温州；另有两团抵兰溪。

△　陈仪到南京向孙传芳辞浙江省长职，孙慰留。

△　重庆国民党左右两派连日殴斗，是日晚，刘湘饬卫戍司令解散右派之省党部，禁止《中山日报》、《长江日报》、《江州日报》发行。

△　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于23日至28日举行反基督教运动周。是日，上海大学、同文书院、复旦大学等20余校分别举行讲演会，并上

街宣传，散发传单。虹口非基督教大同盟分会会员高士林等八人在进入教堂宣传中被警察拘捕。原定是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之全市市民大会，亦为军警当局所阻而未能开成。

△　长沙各团体组成之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召开讲演大会，5000余人参加，徐特立、李维汉、朱剑凡、周以粟、夏曦等10余人相继演说。同日，各学校上午在校内开讲演会，下午组织200余宣传队分赴各街衢、庙宇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宗教侵略，张贴写有“革新教会教育”、“援助教会群众自由斗争”、“严禁教会学校强迫学生读圣经做礼拜”等字样的标语。

△　日皇大正病故。翌日，北京政府顾维钧等亲往驻京日使馆吊唁，并破例令下半旗七日志哀（惯例只下半旗三日）。

12月26日　　何应钦收编福建各路民军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以谭曙卿为军长兼东路军第三路指挥官，统辖：独立第一师，卢兴邦任师长，卢兴明、卢兴荣分任第一、二旅旅长；新编第一师，吴威任师长；新编第二师，郭凤鸣任师长；独立第一旅，高义任旅长；独立第一、二、三团，叶定国、陈国辉、杨汉烈分任团长。各部留闽训练。

△　福建成立政务、财政两委员会，张贞等人为政务委员，何玉书等人为财政委员。

△　孙传芳发表宣言，宣称：“今日中国之病，莫烈于赤祸。在赤祸未清以前，决不容有其他之主义，惟有唯一之讨赤主义。”并标榜其召集国民大会、省民联合大会以解决中国或各省“应采之主义及办法”之主张，表示将于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召集之日“解兵去职，而以国之军与民之政还之国人，省之军与民之政还之省人”。

△　孟昭月部自杭州江干分向萧山、富阳进迫已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之周凤歧部及浙江第一师陈仪部。开向萧山之一团在渡钱

塘江时，被对岸之浙一师守部炮击所阻，两军隔江对战。

△　武昌各界民众五万余人在阅马厂举行反英市民运动大会，推徐谦等九人为主席团，董用威为总主席。董略述帝国主义种种侵略情形，谓中国今欲谋一生路，非农工商学大联合不可。陈潭秋等10余人演说，严重抗议英国支持奉系军阀和干涉中国革命的暴行，并呼吁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会末通过议决案12条。同日，汉口市民反英运动大会有10余万人参加，推周星棠等人为主席团，李立三为总指挥，向忠发等九人演说，通过决议案六项。

12月27日　张作霖偕韩麟春、张学良等午后自津抵京。

△　张作霖免安国军总务厅长郑谦职，以谈国桓代。

△　广东省农工厅拟定解决罢工法草案，提出调解劳资纠纷办法，其中规定：商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禁止工人参加革命，在工人罢工时不得雇佣他人；工人不得擅拘或侵害他人，不得封锁商店工场，不得携武器游行，未经官厅许可不准成立工会等。

12月28日　英国新任驻京公使蓝普森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访晤顾维钧，面述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意见。

△　北京外交团开会，讨论交还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议决定：若上海交换公文已毕，、则预定明年1月1日起，中国临时法庭可以接理一切。

△　张作霖赴国务院访顾维钧等，劝勉继续维持中枢。同日，张又访王士珍、赵尔巽等，商议筹组靳云鹏新阁问题。

△　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访晤各国驻京公使，告知张作霖不日将亲往访晤。

△　吴佩孚通电再免靳云鹗职。吴责靳云鹗失守汉阳，不事反攻，以及散布诋毁文件，特罢免其讨贼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职，所有前敌军务交由田维勤、魏益三两副司令承商寇英杰副司令负责办理。

△　蒋介石任命暗中派员输诚之吴佩孚部将领魏益三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

△　汉口农工商学联合会向政府提出十项要求：一、半年内禁绝鸦片；二、取消盐斤加价，禁止奸商居奇；三、取消杂色军队，限期肃清土匪；四、严惩土豪劣绅；五、实行统一财政，禁止自由抽收捐税；六、速令官营、私立工厂开工；七、确定教育经费，取缔教会学校；八、推广中央钞票兑现；九、速颁工厂法；十、严禁妇女缠足，发展女子教育。

△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闭幕。是日，毛泽东向大会报告革命战线联合问题，略谓："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毛泽东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的反革命宣传，指出："现时湖南虽然是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的余孽——土豪劣绅共同的统治，他们的势力还很大。"勉励代表们加强斗争。

12月2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议决：武昌设最高法院，广东大理院改为分院；组织接收保管湖北官产委员会；在汉口旧新市场设立中央人民俱乐部，为政府人员与人民接近谈话之场所。

△　孟昭月在杭州就浙江总司令职。其所部与周荫人残部向富阳、绍兴发动攻势。

12月30日　　张作霖亲赴东交民巷一一访问荷、英、日、法、美

驻京公使，致意四事：一、拟组织强固之中央政府；二、安国军对外债虽不全认，亦不否认；三、希各国援助打倒“赤化”；四、修约问题，主张渐进。翌日，日使芳泽回访张作霖。荷、英、法、美等使派员持片回报张之访问。

△　浙军第一师在绍兴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仍列陈仪名，由石铎代。

△　靳云鹗部任应岐师对靳被解职不满，在许昌拆毁铁路从事抵抗，旋被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等部击溃。

△　海牙国际法庭对中国提出中比条约案不应诉诸法庭之申辩理由，认为有研究之余地，已收受。

12月31日　　张静江、谭延闿、顾孟馀、丁惟汾、何香凝自广州到南昌。晚，蒋介石欢宴谭延闿等，席间致词表示，第一期要肃清长江流域东南几省，第二期要用全力直捣北京，两年之内实现全国统一。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略谓：美国政府对于英国18日主张立即征收附加税及将所征税款交与征收口岸当局之提案表示同意，但英国提案将税五分之三归于国民政府之政敌，以供战费，有三弊害：一、北洋军阀不但将得新税之收入，且得一绝好抵押品，使其可借巨款，以救济其金融破产；二、将使各通商口岸为各军阀争夺之地，使割据制度永难消除；三、上海有附税十分之四，本无须大战即可归之国民政府，现恐变为血战之地，外国商业或将永远受害。“英国提案有危及国民主义之前途”，请美国政府勿予依允。

△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法使玛太尔改订《中法陆路通商条约》，原定两个月内开始谈判，至明年1月6日期满，请于6日以前开始谈判。

△　出席关税特别会议之中国委员举行常会，讨论英国政府新提案，主张倘若英案在使团会议不获通过，中国亦须自行定期开征附加税；惟所收款项仍应由税务司解送北京，不分拨与南方。

12月下旬　　范石生抵粤，与李济深等商议讨伐唐继尧事。讨唐军除范石生部外，还有新编为第二十五军的黔军周西成部，川军赖心辉一部，第七军三个旅，以及滇西镇守使罗树昌部，范为讨唐各军总指挥。

是月　上海工人开展反对压迫、要求增薪的罢工斗争：老怡和纱厂工人反对外国监工无故处罚工人，于1日罢工；公大纱厂3200名工人反对日人殴打工人，4日至15日罢工；三新纱厂工人为抗议职员无故殴打女工，罢工六天；估衣业职工要求增加工资不遂，14日起罢工；法商电车公司400余工人提出不得打骂工人、不得借故开除工人、增加工资等六项要求未获答理，罢工两日；3000押当伙友要求加薪未遂，于25日罢工；杨树浦纱厂1500余人因工头压迫女工罢工；南货业职工4700人要求加薪、改良待遇而于30日罢工。

是年　全国煤总产量2304.0119万吨，其中外国资本控制下的为1224.2069万吨，占53.1％。全国生铁总产量为22.8352万吨，其中属外国资本控制下的为21.6054万吨，占94.6％。

△　全国粮食等农产品输入数量为：米1870.0797万担，小麦415.6378万担，面粉428.5124万担，烟叶、烟丝75.9508万担，棉花274.5017万担，棉纱44.9282万担。

△　全年出口贸易总额为8.64294771亿两（海关两），其中67种手工业出口值占总出口值32.3％。

△　全年海关岁收7810万两，比去年增加823万两。

△　东三省发生20年来未有之大旱灾。安徽发生60年未有之大水

灾，冲毁田园10万亩。湖北有64县发生旱灾。山东水灾亦20年来所未有，黄河南岸堤坝冲塌，沉没800平方里，损失2000万以上。除上列各省外，水旱灾并遍及直隶、江苏、河南、江西、浙江等省。

1927年（民国十六年）

1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以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并指定财政、外交、交通三部长，武昌、汉口二市长及武汉卫戍司令等九人为京兆区委员会委员。

△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讨论军制、军政，并商订长江下游作战计划。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均参加。

△　蒋介石令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将衢、严、宁、绍各路军队即日调集富阳，迅速向杭州总攻。

△　北京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组为临时法院，由代理领袖领事挪威总领事奥尔、英总领事巴尔敦与廨长关炯之移交与江苏交涉员许沅、临时法院院长徐维震。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予以否认，仍贯彻无条件收回的主张。

△　靳云鹗被吴佩孚免去“讨贼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后，所部高汝桐、庞炳勋、梁寿椿等在罗山会议，决定集中部队，分布郾城、驻马店铁路沿线，向吴佩孚方面进攻。高汝桐部旅长刘培绪已通电讨吴，并将许昌至临颍间铁轨完全拆去。3日至6日，刘培绪部与寇

英杰部冲突五次。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在汉口开幕，各县、市代表188人，特别委员42人出席。11日，选出孔庚、徐谦、孙科、张国恩等15人为执行委员，刘季良等八人为监察委员。13日，通过宋子文所提财政原则，大会闭幕。

△　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00余人，代表全省30万会员。大会通过经济斗争、女工童工问题、工农联合、省民会议等20多个决议案。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等3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10日，大会闭幕。

△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到各县代表200余人，方志敏为临时主席。2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指使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提出《国民党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办法》。12日，大会仍一致选出方志敏、李松风、罗石冰、朱由铿为执、监委员，但蒋介石却根据上述《办法》，圈定了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王镇寰、程天放、王礼锡等为执行委员；熊育锡、姜伯彰等为监察委员，并以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等为常务委员。

△　南昌市政府成立，张定璠任市长。

△　南昌总工会成立，选出正副委员长各一人，执行委员七人，候补执委五人，并特聘全国总工会特派员陈毅和市党部工人部季恨秋为高级顾问。

△　川康绥抚委员会于重庆成立，国民政府委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为委员，刘湘为委员长。在四川省及西康特别区政府未正式成立前，所有该省区政务、军事由该委员会负责处理。

△　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通告，湖北省境内本日起实行征收暂时

内地税，税率与广东所行者同，普通品征二厘五，奢侈品五厘。

1月2日　　武汉国民政府改革司法，其办法为：一、改用二级二审制；二、中央法院设最高法院（设于国民政府所在地，各省得设分院）与控诉院（设于各省）二级，地方法院设县市法院（设于县或市，得由二三县并设一院）与人民法院（设于镇或乡村）二级；三、非有社会名誉之国民党员兼具三年以上法律经验者不得为法官；四、废止法院内行政长官制，组织院内行政委员会，处理全院行政；五、废止检察厅，于法院内酌设检察官；六、参用参审制及陪审制。

△　上月25日开幕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二次全省大会是日闭幕，并发表宣言，要旨为：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拥护农民利益，使全省工人职业得保障，改善士兵生活，保障工业家投资，发展工业，增加教育经费，支持女子解放，注意华侨利益。何香凝、李济深、陈树人、孙科、古应芬等45人被选为二届执行委员，宋子文、许崇清等15人为监察委员。

△　广东机器工会率数百人，用手枪炸弹围攻粤汉铁路总工会，相持一小时许，经警备部及公安局派军警制止。粤汉、广三、广九三大铁路工人向当局请愿，如无解决办法，即行罢工。3日，机器工会复围攻广三铁路总工会，击伤工人，炸毁车辆房屋。

1月3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联会第九次会议议决，以联席会议名义，通知在鄂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　武汉各界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鄂及北伐胜利大会。是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江汉关前演讲，英帝国主义故意寻衅，突派大批水兵武装登陆，驱逐听讲群众，并以刺刀冲戮，当场伤我群众五人，内重伤二人，全市震愤。在场群众不顾牺牲，无不愿以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经党政当局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愤怒民众至晚7时许方渐散去。是夜，汉口各团体纷纷

集合，决定以惨案真相电告各地，请求政府严重抗议，并定次日在汉口商会召集各界紧急联席会议，筹商对付办法。

△　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就汉口惨案向驻汉英领事葛福口头抗议，令其立刻撤退水兵及义勇队，由中国军警接防，否则不负责任，英领事答称须缓至24小时后，俟请示其驻京公使，始有答复。

△　蒋介石反对中央政治会议去年11月26日作出的迁都武汉决定，是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议决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同时决定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

△　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成立，以何应钦、戴任、江董琴、何玉书、陈季良、方声涛、黄展云、丁超五、王允恭等为委员，何应钦为代理主席（蒋介石兼任主席）。

△　芜湖驻军陈调元部约1000人左右，因欠饷哗变，抢劫店户千余家。繁华市街，无一幸免，各银行、钱庄、商店及住宅，甚至邮局，均被劫掠一空，损失在200万元以上。

△　北京政府内阁总理顾维钧召集临时关税委员会及阁员联席会议，通过梁士诒所提立即实行征收附税案，并决定由内阁命令公布。

△　武汉国民政府接管汉口税关，派员监督所有关税事务。

△　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电召苏联顾问阿骚尔赴汉，洽商完成粤汉铁路及建筑韶（韶州）赣（赣州）公路计划。交通部限本年内完成韶赣公路，由财政部自3月份起每月筹拨筑路费二万元。

△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由桐庐进至富阳，与孙传芳联军孟昭月、王淼部作战，不支退桐庐，旋奉命于9日至衢州附近集结。是役团长钱峻牺牲。周部攻缙云之周荫人部亦以众寡不敌，于12日退龙游与该军各部会合。

△　张作霖委褚玉璞为直鲁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是日，褚在徐州就职。

1月4日　　陈友仁照会驻汉英领事葛福，谓此次肇事英舰，在本案未解决前不得离开汉口，否则遇有事故，国民政府概不负责。

△　收回汉口英租界。昨夜，驻汉英领事葛福因见英租界形势更形严重，知非解除戒备，由中国军警接防，无法维持。晨，英领事将英水兵义勇队全撤，仅留巡捕岗位。群众进入租界，撤除沙袋电网，随即占领工部局、税关、银行，封闭英人商店。晚7时，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三连进驻英租界。总工会派纠察队协助。5日，又派军队一连，由营长一人、党代表一人率领进驻英巡捕房办公。所有治安由中国军队维持。至是，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收回了帝国主义霸占的租界地。

△　午后，汉口各界代表500人开各团体联席会议，对英水兵惨杀民众事件通过五项决议：一、要求政府八项：对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英政府赔偿死伤民众损失，惩办凶手，撤退驻汉英舰及撤除电网沙袋，向我道歉，英租界内华人集会、结社、游行、言论绝对自由，解除英捕及义勇队武装，英租界须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如三天内无圆满答复，要求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海关，取消英国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二、决定5日午后2时举行对英示威大会；三、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外交委员会；四、组织经济抵制委员会；五、通电世界宣布英人暴行。晚8时，国民政府委员徐谦代表政府向民众报告，谓中央对所提八项要求完全接受，并已派军队入驻英租界维持秩序，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

△　中法越南商约延期五个月，至本月6日又届期满。是日，驻京法使玛太尔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外交部开始谈判该约。

△　毛泽东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4日至9日，先后在湘

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9日至14日，到湘乡县考察。15日至23日，到衡山县考察。24日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报告。1月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县考察。4日回到长沙。5日，历时32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

△　湖南省政府会同省党部组成“湖南审理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推派谢觉哉、何叔衡、仇鳌等为审理委员。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拟定解决农民与地主纠纷办法，在各县设立改良佃户局，仲裁农村争议，并经广东省务会议议决，将租金减去25%。是日，广东省政府通令所属一体遵照。

△　上海法租界当局应上海防守司令部要求，将设于该租界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查封。8日，又将特别市民公会查封。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因被孙传芳通缉，亦疏散他处。

1月5日　　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英租界内一切公安市政事宜。该委员会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代表、卫戍司令部代表及党代表共五人组成。同日，外交部宣布：所有界内中外居民生命财产，概由国民政府完全保护，希望民众协助维持秩序。晚，外交部正式照会英领事知照。捕房招牌已撤下，改换中央联席会议特派党代表办公处招牌，并改悬党旗、国旗。

△　午后2时，武汉市民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农、工、商、学各界30万人参加。大会通过各界联席会议所提之八项议案，并通电全国。会后游行，沿途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

△　自汉口英水兵惨杀民众事件发生后，武汉各团体、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等纷纷发出通电、宣言，严重抗议英兵暴行。是日，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集执委会，议决通电各地学联立即群起声援，并提出撤退英国在华海陆军、收回汉口租界、惩办凶犯、

抚恤死伤及正式向我国政府道歉等项要求。

△　驻上海法总领事那齐雅将法租界会审公廨民事部分交还我国审理。

△　北京政府外交部训令驻苏联代办郑延禧向苏联政府抗议率先承认广东政府。

△　张宗昌与孙传芳商定，收编桂、粤马济、刘志陆各军。是日，陆荣廷由南京赴济南，与张宗昌会商收拾桂省军事。

1月6日　　徐谦领衔与宋庆龄等致电南昌，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遵照已定策略来鄂，提议组织中央政治分会于武昌。同时提出派一二同志赴南昌解释。

△　蒋介石在南昌拟订长江下游作战方略，以先攻略杭、沪，击破孙传芳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并将全军兵力重加区分为三支：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中央军，由蒋兼任总指挥，下分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

△　陈友仁访驻汉英领事葛福，谓我国民众运动为反对英水兵暴行而起，对英国侨民绝无仇视之意，对英侨的生命财产当尽力保护。同日，陈约法领事及重要英、美商人晤谈。法领事问陈，是否有意接收法租界。陈答称：此时无此意，但租界非可永远存在，终有接收的一日。又郑重向外商声明：政府决力保外侨安全，希各照常营业，不必自相惊扰。

△　收回九江租界。下午3时，九江英水兵与码头工人冲突，伤工人二人，民众激愤。英舰发炮示威，群情益愤，商民相率罢市，以谋应付。英领事及租界官吏无法维持租界秩序，逃避他去。7日下午4时半，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与工人纠察队进入九江英租界，

派第三团团长龚宪驻扎租界内维持治安。8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下，组成“九江英租界管理委员会”，宣布接管租界的公安和市政事宜。

△　驻华比利时公使华洛思正式向顾维钧表示愿意商洽改订中比商约。中比商约交涉，自我国宣布废止旧约，比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后，已成僵局。近因我国革命运动高涨，比使始有此举。13日，比使华洛思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为表示“始终未变之调和精神”，愿开始会商新约，“在会商时期以内，中止在海牙国际永久法庭之诉讼”。次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驻京比使，建议本月17日开始谈判新约。

△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北京举行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催直军前进，奉军大举入豫，止于郑州，为陇海、京汉两路策应；津浦路及长江下游鲁军适当集中，俟直军攻鄂，鲁军即攻浔，收夹击之效。

△　汉冶萍公司汉阳、大冶等厂已经停闭，仅存萍乡煤矿，近因无款接济，亦有破产之势。萍乡总工会等组织赣西人民维持萍矿委员会，派代表至湖南请求维持。是日，湖南总工会召集各公法团讨论维持办法，决定组织湖南人民维持萍矿委员会，电促汉冶萍公司早日开工，否则由湘、鄂、赣三省人民收回自办，并派代表赴武昌请愿。

△　上月29日在长春开幕的东蒙王公会议闭幕。出席各旗王公及代表44人，讨论防范“赤化”、整顿内政及与奉天联络等问题。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湖南分会自去年10月成立后，即开展改良待遇运动，上月13日正式向各轮船公司提出改良海员工人待遇条件12条，公司迁延多日，迄无结果。是日，全体工人议决限各公司于9日圆满答复，否则实行罢工。

△　据《申报》载：北京警厅设检查新闻特务委员会，检查沪、津来京各报。

1月7日　　武汉中央临时联席会议议决：一、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改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长组织，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委员；二、电九江贺耀组转工商各界，对英交涉由外交部长负责办理，民众运动应避免直接冲突；三、电统辖各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同日，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就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职。

△　武汉中央临时联席会议议决：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

△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讨论徐谦6日电报，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仍暂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同时决议在武汉组织政治分会，派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用威等13人为政治委员。

△　南昌军务善后会议闭幕。会议通过有关编制及作战计划，蒋介石主持闭幕式并致词，要求国民革命军有条理，有系统，有统计，研究主义，增进编制、纪律、精神。

△　武昌市民20余万在阅马厂举行对英示威大会，通过决议四项：一、拥护政府外交政策；二、拥护各团体所提八项要求；三、厉行对英经济绝交；四、拥护武汉市民反英大会决议案。

△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通电表示维持顾维钧内阁，并劝顾补充阁员，统筹政费。

△　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电令直鲁联军前敌总司令褚玉璞等，长江战事不久将有发展，务速准备。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决议解决铁路、机器两工会纠纷办法：一、双方不得寻仇残杀；二、双方所虏工人交政府办；三、不得强迫

对方工人加入己方工会；四、被对方强迫离工之工人应即复职；五、被殴伤工人由政府查明，着双方偿医药费；六、某方杀死工人，由某方交凶，否则政府依法裁判。次日，粤汉、广三、广九三大铁路工人要求政府暂缓实行并复议“解决机工、路工纠纷方法”。

1月8日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在贺耀组师师部召开九江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向英领事抗议并组织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等项决议。

△　吴佩孚电复张作霖，赞成维持顾维钧内阁，并通电各省，表示所有阁员补充及政费筹划，悉听张作霖主持。

△　哈尔滨当局决定是日起一切交易以大洋计算，取缔日本货币金票。

1月9日　　蒋介石偕加仑将军、海外部长彭泽民、宣传部长顾孟馀、妇女部长何香凝等自南昌赴武昌。

△　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成立，通电中宣布保护租界治安。

△　上海《民国日报》被迫停刊。

△　孙传芳军刘士林第十三师与段承泽旅渡钱塘江，连占萧山、绍兴等县，直迫宁波，浙军第一师退守曹娥江。

△　安国军司令部公布：奉军第八军万福麟部占领五原。

△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徐鼎康电令上海、苏州、镇江各海关即日增收二厘五及五厘附加税，并列举三项理由电告三地交涉员：一、华会条约订明附加税由关税特别会议决定，今该会停顿，实为自行放弃权利；二、南方各省早经征收，按海关统一征收制度，应予一律征收；三、敌方各省海关早经征收附税，辖境内各海关

亦应同等待遇。

1月10日　　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指出汉口事件“是革命势力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崩溃当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号召“加紧整顿我们的军容，预备把帝国主义的寿命登诸鬼录”。

△　九江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外交部委赵畸、周雍能为委员，管理租界，恢复交通秩序，并知照外侨照常居住，毋自惊扰。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讨论汉口、九江英租界问题，以此案关系各国对华政策，决分电各本国政府请示办法。英、美、日等国大增驻华海军。英派驱逐舰八艘赴汉口，又向威海卫调第二舰队兵舰，共24艘，过镇江赴汉口，向武汉人民示威。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孙传芳官厅合谋，取缔政治集会、游行及宣传，并搜捕马路行人。是晚大戒严后，搜查革命党人住宅，捕去百余人，当时引渡，次晨即枪杀许棪一名。

△　直鲁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在津浦路南段检阅军队后，至南京与孙传芳磋商作战计划。

△　武汉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委吴玉章为鄂西特派员，王法勤为河南特派员，分别办理鄂西、豫南善后事宜。

1月11日　　武昌总司令部欢宴蒋介石总司令，鲍罗廷发表演说，解释孙中山三大政策，谓“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

△　驻北京英公使蓝普森遣参赞欧玛利及书记官达曼乘津浦路车南下转道到汉，与国民政府交涉汉口事件。汉口民众满贴“打倒帝国主义”标语，以示坚决抗议。

△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升任第一军副军长，第

十四师师长冯轶斐任东路军第二路指挥官，是日就职。

△　孙传芳五省联军军官张凤岐、岳思寅、唐福山、白家骏、侯全本前在南昌焚杀劫掠，残害民众，江西人民恨入骨髓，革命军攻克南昌，该五逆悉数被擒，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各人民团体组织人民审判委员审讯后，判处死刑，是日在南昌贡院执行。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湖南分会以工人工资收入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向各轮船公司提出改善待遇条件十二条，经湖南省党部工人部等调解，本国商人于是日签字承认。但外商仍未接受，外轮海员乃开始罢工。

△　英军舰两艘在湖北武穴故意撞沉我盐船、货船数百只，淹没百余人，损失百余万元以上。21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济难会湖北总会特派周延墉、蒋宗文前往武穴调查惨案真相。

△　比利时政府答复上年12月18日英驻京代使欧迈尔在北京外交团会上所提《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声明赞成立即无条件准中国征收华会新定之附税；立即实行关于治外法权之条陈与改良，但反对各国联合宣布对华政策。

△　孙传芳派万鸿图携款30万元，子弹两车，并“讨赤”计划书一册，到郑州献吴佩孚。

△　据上海《新闻报》载：湖南省党部、省教职员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等120余团体，联合组织反文化侵略大同盟，专门进行反对教会学校，各县成立分会，依照总会所定办法，一致运动。

1月12日　北京政府内阁改组。顾维钧内阁会议决定：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命令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顾维钧兼署国务总理，内务胡惟德，财政汤尔和，陆军张景惠，海军杜锡珪，司法罗文幹，教育任可澄，农商杨文恺，交通潘复。

△　蒋介石一行到汉口。蒋出席群众欢迎大会，会上群众质问其何故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及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也对蒋压迫工农、反对共产党的行动提出批评。

△　中共中央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事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公开表明对国民政府的赞助；要求英国人承认汉口1月5日群众大会所提条件；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英租界，撤退各帝国主义驻华军队，并望国民政府坚持到底，勿对英帝国主义让步。

△　北京政府命令2月1日起实行征收二五附加税。是日顾维钧内阁发布三令：一、政府制定之关税定率条例，现距实行之期不远，所应行筹备各事宜，着外交部、财政部会同税务处详加拟议，并由财政部迅将裁撤厘金进行方法妥为筹议，分别呈候核夺施行；二、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税务条约第三条规定，裁厘之前，进口货按值百抽二五附税，奢侈品抽百分之五，自民国十六年2月1日起分别征收；三、着外交部迅催续开关税特别会议，将前次提议增抽之过渡税商洽进行。此项附加税及过渡税应分别指充筹备裁厘、整理内外债、建设事业、紧要政费等项之用，着财政部会同各主管部署妥筹分配。

△　北京国务院电孙传芳，谓中央政府已宣布征收附加税，事关国家财政根本计划，望与政府取一致措置。

△　江苏省决定实行借征田亩捐一次，以二五关税附加税作抵，作为不发行直鲁军军用券之条件。

△　吴佩孚委陈善同为河南省省长。陈于19日接任。26日，毅军司令米振标通电反对陈善同到任，派员进驻省署。

△　程潜率第六军抵九江，接任英租界警备。

△　驻京英公使代表欧玛利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要求退

还汉口英租界，为外交部拒绝。

△　陈友仁致电各省军民长官，报告办理汉、浔事件经过，并令切实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以利外交进行。

△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宴请日本条约局长佐分利。佐氏演说称："视察广州情势，已脱离阶级政治，各书报谓民党赤化，现知系谣传……本人返国……报告国人，俾定方针。"2月3日，佐分利启程返东京。

△　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在汉口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中国、印度、朝鲜、越南代表200余人。该会以团结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为宗旨。大会通过简章及成立宣言，选举执委15人，内中国籍四人，印度籍11人。

△　湖南洋务工会组织对英罢工委员会，昨日罢工，海员工会湖南分会响应不复工，划夫工会亦加入罢工。是晨，英水兵由长沙怡和码头武装登陆。午后1时，长沙召开市民紧急大会，到团体300余，约八九千人。议决对英条件五项：一、撤退英舰；二、惩办舰长；三、驱逐英领；四、释放被扣海员，赔偿洋务工人损失；五、圆满解决"汉案"。

△　上海先施公司职工因反对资方开除组织工会的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举行罢工。次日，先施工厂工人700余人加入罢工，结果取得胜利，于17日复工。永安、新新、丽华三大公司职工亦在先施罢工的影响下相继罢工（永安由15日至25日，新新由16日至18日，丽华由22日至25日），均取得胜利。

1月13日　顾维钧就2月1日起实行征收附加税决定，照会关系各国驻华使馆，内称：关税特别会议常处于停顿状态，关税自主延不宣布，附税不克实行，中国财政经济之发展无从促进，不得已自动宣布关会已议决之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日期及实行增抽进口附加税。

△　英亚洲舰队总司令泰伟德自上海赴长江上游侦察。同日，美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抵上海，奉美政府训令，有便宜行事之全权。

△　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公司机务部工人要求加薪举行罢工。16日，公司董事会对工人所提条件逐条批驳。17日，工人实行第二次罢工。

△　天津总工会为援助“汉案”，在法租界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被法工部局巡捕包围，捕去总工会委员长吴雨铭及代表50余人。

△　吴佩孚准张英华辞兼河南省长职，专任筹饷督办。

1月14日　　武汉政府为补助国库，调济金融，公布发行国库券900万元，分三个月发行，六个月后偿还本息。

△　广东省政府通令3月1日起执行解放奴婢案。

△　魏益三电吴佩孚请暂与北伐军议和。吴召集会议，决定解决该部。

△　五省联军段承泽部占领宁波。革命军第十九军（即浙军第一师）各部自新昌、台州突围，向温州集结。

△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答复驻汉口英领事葛福及英使馆赴汉委员所提交回英租界之要求，称：一、英兵戕杀华人，必须有满意的道歉和惩凶；二、为维护国家主权，虽牺牲在所不惜。

△　福州西班牙天主教“仁慈堂”因屡次掩埋大批死婴，为群众侦知，认为有毒害儿童嫌疑，报告省、市党部。当经军警搜查，又发现堂内存尸20余具，女教士已逃逸，群众强烈反对，拥入该堂，捣毁器物。至16日，波及外国教堂、学校、医院13处。何应钦派军警前往包围，搜查证据，并制止群众行动。

1月15日　武汉联席会议议决“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

△　广州民众声援汉、浔事件示威周第一日。民众5000余人集会，并有宣传队数十组，分赴市内各处演讲。沙面特别戒严。同日，广东省府主席李济深答日本森田总领事称：蒋总司令鉴于近日情形，严令勿使在后方发生事故，故决不使示威游行队伍通过沙面附近，如强行通过，则严予取缔。

△　武汉国民政府今起在九江征收二五附税，海关未为代征。

△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鼓铸中山像银币。

△　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团体对于选举华董三人加入工部局董事会，已多赞同，且从事于选举手续的讨论。法租界亦由法总领事委派华人五名、西人13名组织临时行政委员会，共同参与该租界行政。

△　北京国务院总理顾维钧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财政总长汤尔和兼盐务署督办；孙润宇辞国务院秘书长兼职，以许宝蘅继任。

△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命张学良由京汉路、张宗昌由陇海路大举入豫援助吴佩孚。是日，张学良视察京汉沿线驻军，为入豫援吴作准备。

1月16日　广州各界对英示威被当局阻止未举行。各界代表千余人改在省党部礼堂开援助汉口事件大会，通电全国表示支援，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希望坚决抗议，粤民誓为后盾。同日，全国学联会、粤工代会等均有通电声援。

△　驻成都英领事因该地民众反帝声势猛烈，是日自行关闭领事馆，率全体馆员赴重庆。

△　奉天省宣布自本日起实行撤废日商只纳输入品之正税，免纳其他各税的专照单制度，日本领事吉田提出抗议，并策划对抗办法。

24日，日使芳泽复就此事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

1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开临时会议，在武汉及南昌来汉之中央执行委员出席，蒋介石在会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之必要，及中央政治会议与各分会的关系。

△　中比改订新约会议在北京外交部正式举行。顾维钧致词，谓新约当以平等及互尊土地主权为基础。比使华洛思致答辞，谓尊重协调精神，在交涉期内，决不将条约破弃问题付诸国际法庭裁判，并准备将1902年条约规定之天津比租界交还中国。顾维钧告以日内即派专门委员接管租界。中方专门委员为钱泰、朱鹤翔，比方为杜佛、兰勃脱、克慈。

△　北京政府阁议通过中国、墨西哥商约，内容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与智利、波兰等国商约同。

△　北京教育界为“汉案”致函英国议会，声明汉口事态应由英方负责，收回租界为我国国民一致主张，英国应自动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立即停止一切违反国际平等精神的行动。

△　长沙市民两万余人举行黄爱、庞人铨烈士被害五周年纪念大会。群众强烈要求立即枪决凶手李佑文。湖南省府允于3日内交审判土豪劣绅法庭依法处决。

1月18日　蒋介石离鄂返南昌。

△　总税务司安格联由上海到汉口，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商洽关税问题，数次会商结果：一、二五附税决定不由海关附征，另设机关办理；二、安格联对联席会议决定征收海关河工附加税表示绝对服从，并通知中国银行先付附税垫款；三、陈友仁要求将关余分拨一部与国民政府，其成分以南方所辖各海关收入总数与全国总数平均支付，安格联未答应。

△　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通告：一、鄂、湘、赣三省通用之大洋券，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幕后，一律兑现；二、湘、赣、桂三省毫洋券，俟筹设三省分行后，再行收兑；三、总部发行之临时兑换券，另行收兑。

△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各工会书，宣告该会将于2月7日迁至武汉，在广州设办事处。广东工农团体昨开会欢送。

△　广州千余人开促进开辟黄埔商埠大会，议决请政府督促殷富按抽租捐办法认缴股款。19日，广州政治分会议决政府月拨黄埔商埠股款10万元，分期拨足1000万元。

△　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公司机务部工人自13日要求增加工资实行罢工以来，是日车务部开车、卖票等工人又相率罢工。

△　寇英杰日前电吴佩孚请将督理河南军务一缺裁撤，所有驻豫各军直接隶吴指挥。吴复电批准，另委寇英杰为“讨贼”联军第三军团长，统辖寇自兼的第十三军、陈德麟的第十四军、贺国光的第十五军，并通电各方废除督军制。寇英杰是日在郑州就职。

△　顾维钧以摄行大总统令：特派汤尔和、罗文幹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　北京政府外交部训令天津交涉员庄景珂筹备接收比租界事宜。

△　驻华美使马瑞慕奉召离北京赴奉，取道日本归国，参加美国对华方针的讨论。旋接美政府电称中国时局严重，尤以上海情况最须警戒，着即返北京。27日马瑞慕返回北京。

1月19日　　孙传芳重整部队，以图再举，将所部编为五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兼司令及第二师师长孙传芳；第二方面军司令兼第十

师师长郑俊彦；第三方面军司令兼第八师师长孟昭月；第四方面军司令兼第五师师长白宝山；第五方面军司令兼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

△　北京外交团决议全力防备沪租界，遇警即以武力制止。

△　武汉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援助内蒙古委员会”，以鲍罗廷、徐谦、孙科、刘骥为该会委员。

△　湖南省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　湖南省政府公布《湖南省银行派募股款章程》，规定省银行资本为1000万元，凡人民有资产5000元以上者，即派募50元，多者递加；其财团法人如祠、庙、寺等以及地方公产，凡值2000元以上者，亦派募50元，多者递加。

△　汉口市教育局颁布《取缔外国学校条例》，凡九条。

△　湖南2000余邮务工人罢工，要求改良待遇，收回湖南邮政管理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饶略把大宗邮余解交北京政府，拒交湖南和武汉革命政府。

1月20日　吴铁城代表蒋介石秘密赴日，交涉中日间政治问题。

△　驻京比国使馆参赞到汉口会见陈友仁，探询武汉政府对该国政府与北京政府交涉修改中比商约及交还天津租界宣言的反应。陈友仁答称：“北京政府无代表全国之能力与权威，不能缔结任何有关全国权利与义务之条约。假若比国政府与北京政府缔结任何条约，国民政府保留审察此项条约之权利。”

△　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到衢州，召开军事会议。

△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函知国务院：为“礼罗耆硕，集思广益”设外交、财政、政治三个讨论会，聘孙宝琦、陆宗舆为外交讨论

会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正副会长；梁士诒、曾毓隽为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

△　北京政府以伊犁镇守使牛时扑灭伊犁步兵团长刘连科等谋乱，是日阁议通过牛时升为陆军中将。

△　西班牙公使嘎利德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交换改约意见。顾拟定：一、开议地点在北京或马德里，请西班牙政府择定；二、开议时间，北京政府希望于本年5月10日废止旧约，即日商订新约。西班牙政府仅允修改旧约。

△　上海江海关今日起征收二五附税，奢侈品附税率在未公布前亦暂收二五，由中国银行代收暂存。

△　汉口银行行员工会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要求八条，武汉政府议决由仲裁委员解决。双方达成协议，中国银行共32家是日正式签字。

△　据上海《时事新报》载：广州岭南大学已由纽约董事局代表与广州同学会商定改组，决定交回我国办理。原有董事局改为协进会，另由华人13人、西人五人组织新董事会，执行该大学的最高管理权。此为中国收回教育权的首次纪录。

1月中旬　　武汉国民政府以北京政府之实施附加税不脱协定关税之范围，表示反对。陈友仁向汉口海关税务司指出：在上海所征收之关税必然移充某方之军费，故南方至必要时期将扣留、管理关税。

△　上海领事团应工部局要求，“为防杜国民政府步汉、浔之后，接管上海租界”，特商定办法，遇必要时以水兵登岸，由英国出兵1500人、美国1300人、日本1000人、法国1000人、意国500人组成陆战队。

1月**21**日　　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于是日及22日联名致电武

汉，谓：“前由中央议决设武汉政治分会，于中央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分会应即成立，联席会议毋庸继续。”旋武汉复谓：“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　武汉国民政府是日起实行征收下列新税：一、在上海关免除附税之输入品，汉口仍征附税；二、现行船舶吨税之外，再课吨税半额附税；三、新课关税五厘为堤防税；四、对一、二特别区（即旧德、俄租界）之房屋所有者特别征收房租一个月；五、对中国船客以船票价格为标准，课以通行税同样的税。

△　武昌市政厅成立，黄昌谷任市长。

△　蔡元培、马叙伦等因北伐军在宁波失利，由浙境退至福州。

△　何应钦在福州对“仁慈堂”事件采取严厉镇压手段，是日枪杀捣毁教会医院之群众七人。

△　中日修订商约会议在北京举行，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致辞，希望以相互平等原则为基础订立新约。日使芳泽谦吉致答辞，称此为非正式会议，暗示北京政府尚未经使团正式承认。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讨论中国自动征收二五附税事，除日使芳泽表示反对外，其余各国公使多依其本国政府政策，取默许态度。

△　孙传芳任蔡璞为浙江省长。次日，蔡由杭赴宁与孙商决处置浙事办法，23日晚回杭接事。

1月22日　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答复上年12月18日英国对华宣言。略谓：深望以谈判及协议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一切问题，并愿单独与任何外国开始谈判，讨论修改两国条约及其他附属问题。但此项谈判须根据经济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之原则。声明汉口事件处置办法，与“上述政策完全符合”。

△　北京政府国务院函告各机关附加税暂以2500万元为额，其分配为：一、整理内外债400万元；二、教育建设费150万元；三、司法改良费150万元；四、平民生计费150万元；五、国际联盟会费50万元；六、中央政费800万元；七、各省建设费600万元；八、使领经费200万元。

△　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组成筹备处，由湖南省党部推举周以栗、毛泽东、陈克文，湖北省党部推举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等为筹备员。筹备处暂设省农协。是日，周以栗召集第一次筹备会议，议决经费、学生名额、考试、开学日期等项，并举陈克文为筹备主任。

1月23日　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议决六项：一、组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二、组财政委员会；三、定下月4日在济生路开追悼汉口等处惨案死难同胞大会；四、定26日在新市场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请政府报告交涉经过；五、请政府令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复业，并禁止两行现金出口；六、请政府向安格联交涉，将最近关余及两行所存中国贪官污吏之逆款交出。

△　广州工代会为省政府批准恢复店东在旧历正月初二日有权自由撤换工人一事，向省政府请愿。省政府未作明确答复，致使5000左右工人被解雇。

△　驻长沙美领事范宣德通告停办湖南湘雅医院，院方以停发工人工资和护士津贴，并运走重要公物相威胁。是日，该院职工奋起对付，阻禁帝国主义分子劫运公物。

1月24日　汉口英商经华商警告及陈友仁与欧玛利交涉结果，于本日复业。

△　驻汉口英领事葛福因对“汉案”措置失当，被调回国。陈友仁通令各省政务会议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地方外交事件应报部交涉，不

得直接办理。

△　中、比修约二次会议，首由比使报告比政府自动撤销海牙国际法庭诉讼经过，次讨论会议进行程序，议定审议事项，分别交付专门委员协议。

△　日本海军省宣布巡洋舰四艘开往上海。次日，驻日英使访日外相币原，商共同“防守”上海事。币原答称此刻尚无使陆战队登陆或派遣陆军的必要。

△　江苏所征二五附税税款，经张作霖向孙传芳交涉，是日，孙电复顾维钧表示可解交中央。

△　据中美社伦敦电称：英国战舰12艘，英印军队约1.6万名，铁甲车一队、坦克炮一队及航空队两队，现已奉命分别由英国、印度、香港向上海方向开拔。

1月25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认为北伐军战线延长，应配备兵力55万人，每月军费1600万元。

△　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代主席何应钦委戴任为福建政务委员会主任，宋渊源、丁超五、黄展云、詹调元、黄炳林、卢兴邦、王孝缜、陈乃元、江新等为政务委员。戴任未到任前，由张贞暂代。是日，福建政务、财政两委员会同时成立，以何玉书为财务委员会主任。

△　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学术团体分别发表宣言，声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全国一致之热望，收回租界亦全国人民合理之要求。上海总工会主张：反对汉口“一三”事件，反对英国以二五附税帮助北方，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收回租界与抵制英货。上海学术团体揭露英帝国主义歪曲“一三”事件为“少数暴民所为”，阴谋制造各国共同对付我国之局面，并正告各国勿为英政府宣传所蒙蔽。

△　江苏省教育会、国民大学学生会、北京大学学生会、中华全国警钟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商务印书馆工会等团体分别发表宣言，反对英军来华。

△　英国陆军部发表公报，上海防军兵力三旅，总司令邓堪今日启程赴沪。

1月26日　武汉中央联席会议议决，由省、市党部通知总工会、商民协会等各约束会员，不得自由捕人及其他越轨行动，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及反革命事件，须报告政府办理。

△　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由平凉抵西安。

△　张学良、张宗昌、于珍等在北京开重要会议，决定四路出兵援助吴佩孚。

△　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奥国赔款担保二四库券规则》，该库券用作年关政费。

△　美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政策宣言，谓美国准备与中国谈判新条约，如属必要，当离他国而单独行事，但在新约未签字及未经参院批准前，美国不能废除现有条约。

△　中法越南商约会议在北京开二次会议，顾维钧偕朱鹤翔，法使玛太尔、参赞韩德卫等参加。先讨论陆路商约原则大纲，次就陆路边界税则问题交换意见。

1月27日　驻北京英公使蓝普森与英国公使代表欧玛利分别向顾维钧、陈友仁提出对华新政策，内容七项，其中第一、二、三、五项为有条件地准备承认中国新式法庭及法律，并放弃英代表听审权；第四项为准备使英侨照纳不歧视英人英货且为各处中国人民照缴之合法捐税；第六项为准备讨论并协定英租界市政管理法之修正，应使与旧有租界之特殊中国行政相似，或与旧有租界现归中国管辖者相似，或

将租界警权移交中国当道；第七项为准备接受“英教士不得复有在内地购置地基之权”之原则，教育与医药机关之教士及中国教徒服从中国法律条例，不得借条约以谋保护。

△　蒋介石委柏文蔚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是日在武穴就职。

△　奉军入豫，已得吴佩孚认可。吴是日致电张作霖，谓豫南叛军业已解决，全军即将反攻，望其“迅令直边部伍，急筹出援”。29日，张作霖电复吴佩孚：“弟本合作之旨，决倾全力以济，刻电直边军队，准备相继出发。”

△　据伦敦电称：英政府派赴中国之全部兵力在1.9万至2.1万人之间，已开1000，本星期内续开1.1万，均步兵。英海军部宣布泊在中国之英舰有巡洋舰八、驱逐舰八、炮舰15、潜艇12、灭鱼雷艇一，其他小舰不计，尚待添派20舰，大小不等。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讨论“旅居南部各省外人之治安问题”，英使极力主张“共同出兵至上海及其他各省”。会议无结果。

1月28日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由闽入浙，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留守福州。何应钦临行以张贞为福州卫戍司令。

△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指出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农力量壮大，帝国主义及其雇用的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中国革命处于胜负的决战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国民运动的进攻，不但用武装的方法，而且还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为此号召：“反对英国帝国主义领导的四国对华出兵协定！”“巩固工人农民革命的军队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联合战线！”“解除奉直军阀的武装！”“在乡村中城市中省会中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召集革命民众的国民会议统一全中国！”

△　中日修订商约二次会议，讨论关税自主案及税则问题。

△　湖南交涉署通知长沙领事团，将在长沙、岳州开征内地税。美领事范宣德、日领事糟谷提出抗议。省政府当即予以驳复。

△　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孙宝琦在上海向日本八幡制铁所及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签订借款200万元合同，充作整理费。规定年息六厘，由汉冶萍公司每年供给日本生铁三万吨，铁砂40万吨，抵偿债务。另由正金银行添派常任视察员一人，对汉冶萍公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

1月29日　　陈友仁答复27日英国备忘录及附件（即对华新政策），谓此种提议，仅能显示对于中国奴隶式条约之零星修改，国民政府不能认为满意；但在两种情形之下，国民政府可以讨论此种条件作为中英间各种问题圆满合理解决之基础：一、凡属于全国性质之各种问题，英国政府只能与国民政府谈判，不能与其他任何地方政府谈判；二、一切谈判，皆须脱离威吓之空气，如英国集中军队于上海所造成者。

△　孙传芳通电反对英兵来沪，并另电诬指“汉口事件为少数赤党所挑起”，叫嚣“全国一致歼除赤祸，然后与英国樽俎折冲”。

△　浙江衢县北伐军分三路出击，一向汤溪，一向游埠，一向永昌，与敌激战竟日，旋克洋埠、游埠及汤溪县城。是夜敌第三方面军司令孟昭月由兰溪仓皇逃走，所部向严州、桐庐、浦江、诸暨方面分途溃退。

1月30日　北伐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师长何璧辉、参谋长朱崧等因与吴佩孚勾结，屯兵观望，在常德被唐生智派师长周斓诱杀。

△　北京政府以安格联不执行由各海关征收附加税命令，且赴汉与国民政府有所接洽，免其总税务司职，另委总税务司秘书长易纨士

代理；又准免蔡廷幹税务处督办职，由罗文幹兼署。并宣布安格联免职后的内外债务，悉照旧办理。

1月3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英国借口保护英侨及上海租界派遣陆海军来华事，照会英使提出抗议，劝告该使转请英政府迅速撤回来华军队。

△　五省联军松沪苏常镇扬区戒严司令官李宝章布告禁止工人罢工。

是月　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苏联总领事向新疆省长杨增新提出，拟在伊犁设立银行，为杨拒绝。该行竟不经同意公然在伊宁正式开业。杨增新急电北京国务院报告，国务院着外交部向驻华苏联代办交涉禁阻。

△　天津中元实业银行开业，资本400万元。总经理王承桓。

△　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广东中央银行发行新票500万元，并预征捐税10日，以应急需。

2月

2月1日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对英国上月27日所提备忘录发表宣言，略谓英国借口护侨，集中武装军队于上海，且公然冠以“中国远征队”名称，国民政府视此为对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为，“汉案”所商协定，非至英国停止威吓行动时不能签字。倘英国欲与中国缔结和平协定，一方满足英国民众愿望，一方保持中国民族主义尊严，则中英国交上未见不可辟一新时代。

△　驻京英使蓝普森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抗议安格联免职事。同日，新税务督办罗文幹就职。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托病不就职，也不应罗文幹召请。

△　中法越南商约开第三次会议，北京政府要求在越南设领事馆（过去曾屡与法政府交涉，法方迄未同意），并要求取消越南入口华侨人头税苛例。双方争持甚久，无结果。9日，开第四次会议，继续讨论上次会议所提各议题。

△　奉天省署布告，自是日起实行征收二五附税。

2月2日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何键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周斓为副军长；刘兴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叶琪为副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副军长。同日，又明令废旅，师下设团。

△　北京外交团为中国实行征收附税及安格联免职事举行会议。日使反对附税最烈。英使侧重安格联之免职事。因意见不一，无结果。

2月3日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二十六路军于2日攻占金华，孙传芳部属向浦江退走。是日东路军占领浦江、严州。

△　日本政府派到国民政府活动的条约局长佐分利，是日离北京经东三省返国。

△　上午11时55分、中午12时58分，上海发生地震两次，沪西震势较剧，屋中台凳、玻璃门窗等物砰然作响，屋宇动荡如水面船只。苏州、南京、松江、杭州、无锡、宝应、扬州、嘉兴、平湖、芜湖等地，亦同有震动。据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报告，震中约在上海西北200英里处（南京西、霍山东）。

2月4日　　美国政府饬驻京公使马瑞慕向中国南北军事当局提议，将上海公共租界划出战争区域以外。是日，美国代表将此项提议说帖分别交蒋介石、张作霖，副本交陈友仁。陈对此表示坚决抗议，指出此为侮辱国民政府之举动，与国民政府统一外交行动相冲突，将上海划为中立区，无异宰割中国之重要肢体。6日，陈友仁正式答复

美政府，上海为中国领土，依主权完整原则，毋庸代谋中立；至上海租界侨民生命财产，于革命军到后，自有妥善安全办法。

△　因黔军总指挥袁祖铭在常德被杀，唐生智分电袁部王天培、彭汉章、周西成等，取消黔军名称，此后各以军长名义直隶国民政府。

△　新疆省长兼督办杨增新电北京外交部报告，土人夏米大麻拉到新疆宣传“过激”主义，业饬和阗县知事派警押送出境。

△　安格联由汉口与陈友仁接洽后，转上海到北京，即访易纨士磋商应付免职令办法，易纨士益坚不就职，不发征收附税令。

2月5日　　陈友仁在汉口中外人士集会上演说，谓英外相张伯伦等对于中国时局之宣言，均违背自由独立之大原则。英国的建议在武汉和北京分别提出，已区分中国为“武汉之国民中国”与“北京之封建中国”，但两者不能调和，英国欲其商业在独立的中国日臻发达，抑或在封建的中国继续堕落，今为其自决之日。

△　袁祖铭被杀后，所部一部向辰州、桃源、津市、澧县退走，一部为唐生智军缴械。蒋介石电准将袁部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免职，并交唐生智查办。是日，汉口前敌总指挥部在汉将彭捕获，旋解长沙。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名急电南昌、武汉，敦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立即迁鄂，内称：为对付外交紧迫，中央党部及政府主席留滞南昌，不能策应严重时局，务恳依照广州决议，刻日莅鄂主持大计。并通电全国各党部，呼吁一致电请中央迁鄂。

△　长沙市民会议筹备处开成立大会，由近效农协、商民协会、学联、总工会、教师会、卫戍军队公职员联合会等团体代表36人组成。主席朱剑凡报告筹备经过，宣布已于1月18日通过组织大纲，22

日选出执行委员会。

2月6日　　云南发生政变。昆明镇守使龙云突于是夜趁士兵索饷机会，急派所部堵截各城门要道，一面密电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秉阳（选廷）及驻省各军，全部开省，围逼唐继尧，一面派代表进省公署面见唐氏。提出驱逐其亲信唐继虞、陈维庚等人，公开财政，拒绝北方代表，与国民政府联合等12项条件。唐被迫表示愿酌量容纳。龙云乃告示安民，略称：本省军民两政素称不良，此次由各镇守使联名呈请省长从速整理，以期适应世界新潮，贯彻民治精神，已得省长允许。10日，唐继虞、陈维庚由龙云护送出境。

△　中日修订商约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以下事项：一、关税自主问题；二、中日特别互惠协定问题；三、自主条款细目。14日第四次会议，继续讨论关税自主及有关问题。19日第五次会议，续议互惠协定。

△　据《时报》讯：张作霖已命荣臻率第十七军赴彰德（今安阳），此为最初入豫之奉军。

△　唐生智通电宣布彭汉章、袁祖铭蹂躏湘西，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罪状，准将彭汉章交付湘西人民审判，并通缉湘西将领陈渠珍、廖湘芸、刘叙彝等。

2月7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议决：一、英舰在武穴撞沉华船案，交外交、交通两部调查，拟取缔航行方法，并由外交部提出抗议；二、加派邵力子为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三、由外交部长将最近帝国主义种种压迫国民革命之行为报告该反帝大同盟，要求该同盟宣传并设法防止帝国主义者用武力干涉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赞助中国民众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运动。

△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议决司法部所提《反

革命罪条例》交付审查，推于树德、林祖涵、徐谦为审查委员。

△　据《申报》广州7日电：国民政府财政部增设次长，以孔祥熙担任，驻广州办公。

△　武汉地区隆重召开“二七”纪念大会，江岸方面到50余万人，洪山方面到20余万人。一致表示继承烈士遗志，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达到国民革命成功。

△　汉口上游约60里之长堤决口，武汉政府聘美人华洋义赈会总工程师杜德为湖北堤工顾问，进行监修。

△　吴佩孚部寇英杰由郑州到徐州谒褚玉璞，洽商直鲁军援豫事。是晨褚决定由驻徐第六军第三十五师孙殿英部先发援豫，从陇海路西进。

△　奉军三、四方面军团部发行兵站库券320万元，宣称可纳赋税，购路船票及官款出纳，商民交易，如官民拒收或挑剔折扣，按军法惩办。北京政府财政部令京、津各关卡一律收用。

△　驻京荷使欧登科、英使蓝普森、美使马瑞慕、日使芳泽、法使玛太尔、意代办法勒斯，同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晤顾维钧，面交节略一件，抗议征收附税及安格联免职事。顾答称：安格联屡次违抗政府命令，不能再事宽假，惟各国既认为重要，亦可予考虑。

2月8日　　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中央全体会议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

△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发表宣言，宣布进兵河南，并称其起兵目的“专为剿灭过激主义”。同日发表通电，内称：“豫中吴佩孚驻节，自任反攻，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兹分饬直鲁联军及三、四方面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其豫中将士，但系宗旨相同，即无歧视。”并另分电吴佩孚及其将领，望协同动作，勿生误

会，倘有甘心抗阻义师者，愿将士一致讨除。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因英人已有交还租界提案，决定停止华董选举，另组临时委员会，与工部局协商一切进行事宜。

2月9日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答复驻汉美领事，拒绝划上海为中立区；同时北京政府对此亦作同样之声明。

△　武汉国民政府汉口交涉署函告各国领事，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华洋讼案，已命汉口市法院办理，以后会审公堂不得开审，夏口县也不得受理，领事官员陪审之资格同时取消。

△　奉军决定入豫，是日张学良特由济南赴徐州，与已集中徐州的鲁军主力作最后协议，以期彻底解决豫事。

△　北京政府派叶夏声出席太平洋联合会檀香山法学会议。

△　是日至16日，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在比京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147人，代表37个国家134个团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廖焕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各国代表一致表示援助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大会通过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五项决议案，并议决组织“反抗帝国主义赞助民族独立大联盟”。

2月10日　　北京政府准外交部呈请组织“接收天津比国租界委员会”，并派张煜全、徐谔、庄景珂为接收委员。

△　吴佩孚为奉军入豫事电复张作霖称：“请先示兵数，若暂缓由彰德前进，则佩孚当图各驻屯军与奉鲁军之疏通，俾避免因双方误会以致冲突。”入豫奉军先锋荣臻军，已先后占领彰德、卫辉（今汲县）、辉县，与吴佩孚部发生小冲突。

△　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在武昌开庭审判反动军阀湖北督理陈嘉谟、第八师师长刘玉春。由徐谦任主席，审判委员为刘芬、张国恩、

向忠发等13人。人民代表刘季良、国家代表梁元芳指控陈嘉谟、刘玉春反抗革命军，杀害党人及民众，守武昌时焚烧劫掠、勒筹粮饷等等罪行。审讯毕等候判决。

△　广州市商会等召集各行商家万余人赴省府请愿，要求保持商店年初二自由用人权。被开除之工人千余人亦到省府请愿，要求打破年初二除人恶习。至晚9时，省政府答复：由商会、工会、实业厅、工农厅、省商民部、工人部派代表12人组织仲裁会解决。

2月上旬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委任张肇元为湖北省交涉员，董维键为湖南省交涉员，周雍能为江西省交涉员兼九江关监督。

△　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布告，凡大小轮船不得沿用北京交通部执照，应具呈该部注册领照。下旬，交通部再发通令，限长江湘、鄂、汉、渝各线及内河往来大小轮船，从3月1日起三个月内到部注册领照，逾期从严处罚。

2月**11**日　　孙传芳联军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在安徽祁门向革命军接洽归诚。是日，蒋介石委刘宝题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军长。15日，刘在祁门就职。

△　孟昭月以第八、第十三、第十四等三师及孙传芳之卫队旅进攻浙江桐庐，第三旅、补充团及周荫人残部进攻诸暨。次日至14日，由新登向桐庐屡次猛攻，均为北伐军所阻。15日，北伐军击溃敌右翼，敌退新登、富阳，第二十一师乘胜占新登。16日，第一师进占富阳。同日，北伐军右翼军击破攻诸暨之敌，进占萧山。

△　安格联免职事件解决。由税务处以公函褒奖其在华服务劳绩，一年内仍给薪俸，以全其面子。安格联即办交代与易纨士。英使署亦表示妥协。同日，易纨士就任代理总税务司职。武汉国民政府否认北京政府有任免海关洋员资格，以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组织收回税关研究会，计划由国民政府收回海关。

△　直隶省是日起开征二五附税，由附税管理处办理。津海关亦于同日征收附税，欧美商人均完纳，日商不缴。日领事冈本提出抗议，谓在关税会议未解决及中日商约未修订前，绝对不纳附税。14日，日商因不缴附税不能进口，且存放栈房租金甚昂，故声明保留索价，暂时缴纳。

2月12日　田维勤、魏益三、王维城、贺国光等通电，公推靳云鹗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以抵御奉军南下。15日，靳云鹗复齐燮元等电称：已移驻信阳，并定日内北征。

△　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通告北京邮务总办：凡国民政府辖下各省邮务长均须呈交通部委任，如不经本部委任者，概不生效。14日，北京邮务局总代办斯兰德电复国民政府称："此事与北京政府无涉，尊处之通告，难以允诺。"

△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会议通过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由三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后施行。《章程》规定："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

△　奉军前锋荣臻第十七军两旅约千余人渡过黄河，在荥泽惠济桥一带集中，并扼守黄河铁桥、铁路。在河北之直军阎治堂部一团由奉军第二十三旅收编，其余王维城部2000人完全退往西子河。

2月13日　奉军完全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吴佩孚命第二十二军集中郑州，以备万一，又派毅军一部及王维城部、张治公部对付归德（今商丘）方面鲁军。15日，奉军前敌总指挥于珍赶回北京报告，张作霖即召集各将领开紧急会议。

△　奉军第十七军副军长胡毓坤通令前线各部，凡来投附者一律改编。奉军渡过黄河后驻荥泽，齐燮元部一混成团全部向奉军投降，即由旅长武汉卿收编。

△　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省党部召集临时联席会议，到执监委员徐谦、孙科、孔庚、李汉俊、董用威等40余人。议决党务宣传四大要点：一、解释民主集中制及国民党总章与中央党部之地位；二、要求从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欢迎汪精卫复职；四、恢复党的权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

△　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委员会机关刊物《红灯周刊》复活期出版。团省委书记袁玉冰主编，先后共出15期，对当时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及南昌人民反“AB团”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2月14日　　吴佩孚11日已将军事交齐燮元。齐知大势已去，是日，在郑州通电宣布下野，解除“讨贼联军副司令”职务。

△　广州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议决统一币制案：凡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之金融，一律以中央纸币为本位，各省十足通用，并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

△　欧玛利将英外相张伯伦10日在英下院之声明转达陈友仁，声明调遣来华军队之大部分将不集中于上海，而改向香港进发。是日，陈友仁向欧玛利发出书面声明：英国武力在上海集中之原定计划之改变，国民政府视为一种让步。此项让步使“汉案”交涉有签字之可能，但英国仍有少数军队已在上海登陆，实无法律根据，国民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原定今日签字之《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遂展期。

△　鲁军一部开至开封，旋向中牟出动。王栋第五军第十一师潘鸿钧部开往归德。是日，褚玉璞通令各军先在中牟集中，俟黄河北岸奉军大部过河，再向郑州出动。

△　新任巴西驻华公使福兰科向北京政府呈递国书。

2月15日　　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在汉口举行会议，到邓演达、顾孟馀、张太雷等30余人。宣传部长顾孟馀报告党务宣传问题：一、巩固

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付党内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七、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武装决斗。

△　刘郁芬就任国民联军驻甘总司令。

△　中山学院筹备处在西安发布启事，说明办院宗旨为“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材”。3月10日，学院成立。院长刘含初及李子洲等中共党员参加领导工作。7月冯玉祥反共后，该校被迫结束。

△　广州工商纠纷仲裁委员会开会，讨论仲裁范围等问题。各工会因所提要求未能解决，乃封锁商店，停止营业。公安局长邓彦华奉李济深令强加干涉，并拔去商店门前纠察队小旗。

△　戴季陶乘日本邮船“山城丸”赴日。17日抵门司，对日本记者团称：此行“乃以国民党同志资格求日本朝野谅解本党真意”。

2月16日　英国军队本哲白队、克洛西德队及窦汉队等共2680余名，已在沪登陆，分驻沪埠各营房内。是日，又有苏福克联队印兵旅1700名到沪。据《大晚报》报道：英要人宣称，驻沪英兵以4000名为限，其已由英出发来华的英兵，非大局急变，均不来沪，将在香港或远东其他英国属地登岸。

△　驻京比利时使署通知北京外交部，比国政府据中国政府要求，已商准海牙国际法庭，自本月15日起中比诉讼案完全撤销，并约期重开会议。

△　中华全国铁路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到代表42人，代表全国14万铁路工人。大会号召铁路工人在北伐革命战争中踏

着“二七”先烈血路向前奋斗。大会重要议案计有目前的政治形势与铁路工人的责任；组织问题；教育宣传问题；纠察队与交通队问题等。

2月17日　　吴佩孚电张作霖反对奉军入豫，谓“敝部屯驻京汉线者十余万，道路之腾挪甚难，战线之分配不易……各军分子复杂，非简单命令所能处理”，奉军南来，“自不能相安无争”，盼速令停止前进，以便从长计议对赤作战办法。次日，张作霖电复吴佩孚称：非入豫不能进兵，师已出发，万难中途停进，并指责吴包庇靳云鹗。

△　孙传芳命令在富阳、临安、余杭前线各军开往嘉兴一带布防。其司令部设松江。孟昭月于15日逃回杭州，勒款300余万元，是日率残部退出，因列车不足，万余人未及退出，夜大掠杭垣。

△　国民党武汉、南昌两中央政令两歧。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电四川省党部及各军长，撤销四川省议会及县议会，原有经费分别划归省、县党部作为经费。同日，南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电告川康绥抚委员会及四川省党部，谓常务会议议决四川省议会及各县参议会应即取消，省议会经费照数解中央，县参议会经费在中央未定各省统一办法以前，暂解省党部，由省党部酌量分配。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电请中央党部实现下列各项主张：一、巩固中央威权，统一本党指挥机关；二、集中民主势力；三、促开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欢迎汪精卫复职；四、反对张静江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国民党赴苏代表谭平山由莫斯科返抵广州。同行者有第三国际工人代表团秘书士多里提，及美人蒲鲁华、印人奈尔、英人汤姆等，旋赴汉口等处考察党务政治。

△　广东省政府议决“开化黎、瑶民族”案，内容为设琼崖化黎局、连阳化瑶局，分期举办宣传队、简易识字学校、辟路局、土产交易所、储蓄银行、警察保安队、人事评判所等。

△　广州工商促裁会开第二次会议，议决暂行办法六条。在未解决“年初二案”（即资方在年初二日有自由任免店员工伴权）以前工商暂允遵守。

△　广州工人向农工厅请愿，要求停止公安局干涉罢工。该厅称：经调处不服者仍得干涉，惟因“年初二案”罢工者，则停止干涉。

2月18日　上海总工会为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上海革命民众政权，是日召集工会代表大会，议决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

△　北伐军之中央军进驻杭州，右翼军占萧山，左翼军主力占临安、余杭。

△　北京邮务总办是日将国民政府辖下各省区邮务长姓名开列呈交通部加委。交通部部长孙科任命下列邮务长：江西阿林敦、广东阿杜林、广西张文令、湖南饶略署、福建科登署、湖北乍配林。交通部于各邮区特设邮政监理，凡各区事务，须监理副署方生效力。并已电令北京总局将邮余全数缴呈汉口交部保管。

△　据《时报》载称：广东农工厅调查，全省工会共385个，会员达51.185万人。

2月19日　下午7时，《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由陈友仁及欧玛利在汉口正式签字。协定规定：3月1日（后改至3月15日）英租界当局召集纳税人年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租界区域内之行政事宜，由华人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次日，《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亦在汉口签字。

△　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是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发表宣言与政治经济总要求17条。其要旨为：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军阀黑暗政治，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增加工资等。

参加罢工人数达15万以上。孙传芳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进行血腥镇压，上海防守司令部大刀队将工人蔡建勋、史阿荣两人杀害“示众”。次日，因散发传单又被杀害31人，被捕54人。

△　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靳云鹗、副司令米振标、田维勤、魏益三，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建国军总司令樊钟秀，军长王为蔚、庞炳勋、陈文钊、梁寿恺、王维城、于学忠、任应岐、贺国光、陈德麟、贾万兴、张治公、柴云陞、王振等联电张作霖，列举其破坏统一、蔑视中枢、谋复帝制、密约卖国、蹂躏民权、摧残同胞六大罪状。电末指出：“如其不以为然，则请翻然改图，退出关外，与民休息”，“如以为然，尤应力修德业，另建新猷，与人共见。”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以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攻击鄂西颇著战绩，特提升为独立第十五师师长。

△　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海关进口附加税征收章程》，凡11条。

△　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入绍兴，将孙传芳卫队旅及周荫人残部缴械。

2月20日　　中共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革命的上海市民更应和革命的国民政府军队结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的市政府，解放各界市民多年的苦痛，创造独立自由的新上海”，并提出共同政纲12条作为上海各界市民奋斗的最低要求。

△　中华全国总工会自广州迁武昌，是日召集扩大执行委员会，到委员及各省市代表52人，参加会议的各机关、各团体代表及各工会工友3000余人。会议通过《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26条，要求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迁鄂，汪精卫复职及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决定全国工人于2月28日罢工一小时以抗议英

兵来华。

△　蒋介石利用中央党部和总司令名义，改组江西临时政务委员会为江西省政府，派李烈钧为主席，姜伯彰为民政厅长，周雍能为财政厅长，熊育锡为建设厅长，程天放为教育厅长，徐元诰为司法厅长；段锡朋、洪轨、周利生、王震寰等为省府委员。李烈钧等是日宣誓就职。

△　武汉国民政府委任李烈钧为代理海外部长，是日，李通电就职。

△　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所部分别进至安徽东流、大通、祁门、石埭等处。

△　是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出席54县农民代表141人。大会制定《江西农民运动宣言》和《江西省农民协会章程》，通过扩大对英经济绝交、惩办土豪劣绅、减轻田租、统一农民协会组织、建立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促成省民会议等18项决议案，选出方志敏等13人为执行委员，正式成立江西省农民协会。

△　吴佩孚委任周鸣岐为“讨贼”联军直鲁豫皖临时别动第一路司令。是日周在郑州就职。

△　张宗昌在北京与张作霖商定：河南方面军事完全由奉方主持，专任京汉路；鲁军全力援助宁、沪，担任津浦路；援苏事交张宗昌、褚玉璞主持；由陇海路入豫鲁军将开浦口。

△　吴佩孚因奉军南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派王为蔚、王维城在黄河北岸布防；二、派靳云鹗向开封开动；三、调张治公警卫郑州。豫西战事改取守势。

△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开学。该校系由原武昌大学、商科大学、法科大学、文科大学、医科大学五校合并组成。学校负责委员有徐

谦、顾孟馀、李汉俊、周佛海、章伯钧，政治训练员为詹大悲。担任讲学的有李四光、周建人、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陈望道、沈雁冰等。该校办学原则为学习科学知识，建设革命新文化，造就革命人才，拥护农工利益，建设民主的新社会。大革命失败后，该校不少学生加入叶挺、贺龙部队；一部分学生则深入农村，进行武装斗争。

2月中旬　　武汉国民政府航空处发起粤汉航空营业会，发起人为李济深、邓演达、陈可钰、张发奎等。招股20万元，凡党员均可入股，设筹备处于武昌。

△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按照南昌军事善后会议决议，将该军编为三个师：第一师，师长夏威，副师长李明瑞、尹承纲；第二师，师长胡宗铎，副师长杨腾辉；第三师，师长钟祖培，副师长陶钧。

2月**21**日　　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委员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举行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如下重要决定：一、结束临时联席会议；二、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在武汉开始办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日前召集全体会议，并通告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结束，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汉正式开始办公。

△　武汉国民政府就租界及国际居留地问题发表声明：国民政府政策，非用武力实行更改任何或一切租界与国际居留地的地位。凡在华租界以及国际居留地地位的改变，除国民政府本身外，一切地方当局或其他中国当道都不能与外国谈判。

△　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派吴敬恒、蔡元培、钮永建、杨树庄、蒋尊簋、陈其采、何应钦、陈果夫、郭泰祺、叶楚伧、杨铨、林焕庭、杨贤江为委员，吴为代理主席。

△　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纪念周上演说，公开反对武

汉联席会议，反对为防止军事独裁而开展的提高党权运动，捏造共产党员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和“有排挤”的趋向，声称“要对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制裁”，要“取消”汉口联席会议。

△　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电中央党部提出六项建议：一、一切权力属于党；二、一切指导及行使权完全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行民主集中制，扫除封建独裁制；四、促汪销假视事；五、请中央执行委员速开全体会议解决一切；六、请中央全体委员会驱逐党内昏庸腐化分子及西山余孽。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汉口特别市党部致电中央党部要求：一、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在鄂开始办公；二、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促汪精卫克日销假；四、肃清党内昏庸老朽破坏党务分子。

△　贵州省政府通电：推选周西成、杨元桢、周恭寿、窦觉苍、傅启钧、马空凡、杨权等为黔省政务委员，即日成立委员会，改组省政府。23日，选周西成为省政府主席。

△　李楠青在郧阳就任暂编第七军军长。

△　湖南省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全省《行政大纲》，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司法、土地、一般与农工九类，共112项。

△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余宪文部第一、二两师分水、陆两路由台州到达宁波。第十七军曹万顺部余仲麒师亦抵达。浙东孙传芳联军段承泽部及周荫人军受北伐军及义军攻击，纷纷北逃，浙东诸县悉告收复。

△　中法越南商约第五次会议，讨论华侨在越南销货入口问题及法国放弃云、贵采矿优先权问题。

△　直隶省银行因滥发纸币发生挤兑。该省当局以“扰乱金

融”罪，杀害挤兑商民二人。事后为维持钞票流通，财政厅通令各县，于向省解缴粮赋等税收时准搭省钞五成，省钞多的县亦可全部解缴省钞。

△　大宛（大兴及旧宛平）农工银行改组为中国农工银行，是日开业，资本定为1000万元，北京政府特准给予发行钞票特权。总行设北京，天津、上海设分行。首任董事为吕调元、冯耿光、王大贞、周家彦等人。

2月22日　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三次会议议决，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

△　上海工人总罢工人数激增至36万以上。下午6时，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海军“建威”、“建康”两舰响应，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工人与军警发生巷战。因发动起义时间过迟，部分罢工工人已在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残酷镇压下复工。北伐军先头部队在沪郊莘庄停止前进，工人纠察队陷入孤军作战境地，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

△　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议决于3月1日召集二届三中全会，并决定“即日用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行委员如期到会”。

△　湖南国民党右派、地主“保产党”刘岳峙等暗组“左社”破坏农民运动，是日在《国民日报》发表所谓《湖南农运计划》，诬指农民协会会员为“流氓地痞”。

△　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发表《联省自治建设大纲》，凡四章14条。

2月23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增选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五名政治委员，在武汉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候补中央执监委员，3月1日前在武汉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　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大会制定《工人运动宣言》和《工会组织章程》，通过统一工会组织、工人的经济要求、工人的政治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工人纠察队、反对英国派兵来华等十项决议案，选举陈赞贤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推陈赞贤为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同日，江西省总工会正式成立。

△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抵杭州。北伐军占领嘉兴，前线集中松江附近之明星桥。松江孙传芳军全部溃退。是晚，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至嘉兴视察。北伐军因蒋介石不主张在上海用兵，故未再前进。孙军在沪杭路三十一号桥布防。

△　广州各界在中山大学召开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大会。

△　广东潮梅海陆丰十七属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代表381人，大会发出请省农会发起组织全国农会等项通电。次日，罗绮园在大会作《广东省农民运动报告》，彭湃作《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捐助上海罢工工友五万元。

△　张宗昌抵南京，所部接防南京各要塞。

2月24日　驻上海之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因22日发生两舰响应上海工人起义、炮击兵工厂事件，下令黄浦江中各舰一律开出吴淞口，集中三夹水。

△　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令，指出此次罢工斗争，“市民暴动迭起，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

△　武汉三镇国民党员15000余人于武昌集会，进行恢复党权运动。大会议决：一、巩固中央权威，统一本党的指挥机关；二、速在武昌开全体中央执委会，解决党内一切问题；三、欢迎汪精卫即日销假视事；四、肃清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五、拥护国民政府的统一外交，打倒党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谋妥协的反动分子；六、积极反对奉军进攻河南，并准备与奉系军阀作最后决斗。

△　北京政府公布《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条例》，凡15条，并派财政总长汤尔和、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税务处督办罗文幹兼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委员，王士珍、赵尔巽、梁士诒、王宠惠、王克敏、袁金铠、韩德铭、陈汉第为该会委员。

△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古巴，抗议该国政府虐待华侨及驱逐国民党党员事件。

△　直鲁联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奉张宗昌、孙传芳令率所部开入江苏分驻沪宁线。毕是日抵沪。26日，毕布告宣称其来沪目的系“恢复各界工作，保护中外商民”，“有违反此旨者，悉行认为公敌”。

△　鲁军入南京后，商店拒用军用票，是日开始罢市。

△　驻京法使玛太尔向北京外交部抗议22日上海海军炮击法租界事件（按海军炮击高昌庙兵工厂，炮弹误落法租界），要求保留赔偿损失权利。

△　驻京英、法、美、日、荷、意、德、葡、比、瑞士、巴西、智利、西班牙13国公使对上海海军开炮事件发表联合宣言，宣称对地方各党派间的政争，保持中立，盼中国当局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　靳云鹗在新郑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布防计划，分配如下：一、高汝桐、任应岐两部布防荥泽、郑州；二、李振亚、阎曰仁

两部驻新郑；三、陈德霖、马吉第、萧广传两部调驻汴洛线；四、秦德纯、王为蔚两部为黄河北岸总预备队；五、贺国光、张占鳌两部调驻通许、中牟一带。

2月25日　冯玉祥以各方军情通告各将领：一、山西方面，阎锡山先后派河东道尹崔廷献、警务处长南桂馨来接洽，表示诚意合作，现已拟定联合办事处及确实进行方法；二、河南方面，刘镇华已委为驻豫军总司令，并言确实合作到底。靳云鹗遣代表，本日可到长安接见。齐燮元等通电，拥靳云鹗为保境总司令；三、汉中方面，前吴新田代表王霈已接受第十六路总司令委任状；四、已派孙连仲为第十四路总司令，进出商南一带，打通陕、鄂交通。

△　上海租界内之外国军队越界布防，英军占据梵王渡车站南面之阵地，日军驻江湾区内，意军驻杨树浦一带。公共租界各处遍布铁丝网，堆置沙袋，并派重兵驻守。

△　英、美等国增调陆海军到沪。美海军陆战队1200名是日抵埠，合英、美、法、日海陆军，共达万余人。同日又到美舰六艘，总计泊沪外舰不下35艘。

2月26日　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抵抗入豫奉军，以靳云鹗任北路，守京汉线，巩固黄河；田维勤任东路，由陇海路进展；王为蔚任后方，策应两路；魏益三任南路，维持信、郑间交通；张治公任西路，严守陕、洛。

△　张宗昌电令陇海路徐源泉第六军，兰封孙殿英部三十五师及所有入豫直鲁军，一律撤回徐州，转津浦路开往浦口渡江，再由沪宁路前进，并令航空队全部南下助战。同日，张宗昌、孙传芳由南京赴上海布防。

△　蒋介石因违抗迁都武汉，在武汉群众欢迎大会上受到群众严厉质询及鲍罗廷的批评，恼羞成怒，是日指使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致电

第三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撤回代表鲍罗廷。

△　戴季陶访日外务省，与出渊次官、亚洲局长木村等会晤。戴称中国革命决不采过激手段，俄人援助只为精神的，说国民党赤化者全属误解，并力说中日必须提携，望日本朝野谅解与援助。

△　南京总商会以直鲁联军在江苏省强行十足使用军用票，金融动荡，商民恐慌，要求孙传芳与直鲁联军洽商，在江苏境内免予行使，在未商定以前，准按济南军用票市价，加扣汇费，公平行使。是日，张宗昌决定按济南市价使用，暂以六折为标准实行。

2月27日　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以安庆既定，即令主力进取芜湖，分兵由宣城攻溧水。

△　入豫奉军已与靳军在中牟一带接触。是日，朱仙镇、兰封亦起冲突。京汉线中路部分奉军已渡黄河。

△　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以豫局关系最重，一致主张速照原计划进行，由京汉、陇海两路同时进发，腾出直鲁军专力援助东南。后方防务由吉、黑两省各抽调一师兵力，驻扎京奉线，俾随时可以开拔应援。

△　上海英防军司令邓堪少将昨晚由伦敦抵沪，是日在礼查饭店设司令部。

△　据《申报》讯：2月19日至24日上海地区罢工人数如下：一、中、英、日纱厂共12.15万人；二、电气邮务业243人；三、印刷业6000人；四、手工业1091人；五、店员5210人；六、铁厂252人；七、码头194人；八、丝厂3.51万人；九、电力丝织1500人；十、其他杂业不下九万余人。

2月28日　胡若愚、龙云等通电主张改组滇省政府为会议制，先组划一军政机关，再改革民政、财政。唐继尧答允三条件：一、改组

省政府；二、查办宵小；三、维持省长职权不中断。胡等认为无诚意，率兵由蒙自进逼滇垣。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以云南已内变，拟以第十六军军长名义让胡，自任党代表，呈请国民党中央核办。

△　张宗昌与孙传芳在南京开军事会议，决定：一、孙传芳坐镇后方；二、苏省军事由张宗昌主持，皖省则由褚玉璞主持；三、援苏军队以许琨为前敌总指挥，毕庶澄副之；四、在最短时期内将直鲁军运送前方。

△　全国总工会通告各工会：本日全国举行总罢工一小时，反对英军来华，支援上海罢工。上海于上午10时至11时总罢工，并发表反对外兵越界宣言。武汉三镇各工厂、轮船、火车上午10时汽笛齐鸣，全市罢工，参加人数达50万人。湖南长沙一处，罢工人数即达15万人。其他如四川、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陕西、福建等省，亦有盛大反英示威运动。

△　夜，上海制造局炮弹工场突然失火，毁炮弹40余箱及工场全部。

△　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又名圈子内）包围县城，搜捕农民协会会员及工会干部，用煤油活活烧死省农民协会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人，复将县党部抢劫一空。是为“阳新惨案”。

△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发表对工商交涉宣言，指出“年初二”问题，原是不成文之习惯，如一旦变为成文的法律，则工人将永远受其束缚，工人绝对不能忍受。如商界终不觉悟，不本互让精神以谋解决，广州20余万工友必为生存权与劳动权而奋斗，任何牺牲亦所不惜。

2月下旬　　何应钦抵杭后，与白崇禧制定北伐军进攻宁、沪计划如下：以前敌总指挥所属之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沿沪杭路前进，攻略上海；以东路军直属之第四、第五、第六各纵队及中路军之

第二军，以宜兴、溧阳向常州、丹阳前进，进占该两地后，以一部右旋回向无锡、苏州，协同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围歼淞沪地区之敌，以主力左旋回向南京前进，与江右军协同攻略南京。

△　武汉国民政府鉴于北京政府断绝部分驻外使领馆经费，拟从广东、汉口、厦门海关收入中支付。北京外交部向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交涉阻止。

△　武汉国民政府设立军事政治学校四川分校，蒋介石任命刘湘为该分校校长。

是月　武汉国民政府明令委任广西省政府委员九人：李宗仁、白崇禧、粟威、朱朝森、雷沛鸿、黄蓟、伍廷飏、俞作柏、黄绍竑。除李宗仁、白崇禧在外领兵外，粟威兼民政厅长，朱朝森兼司法厅长，雷沛鸿兼教育厅长，黄蓟兼财政厅长，伍廷飏兼建设厅长，俞作柏兼农工厅长，黄绍竑兼军事厅长。

△　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小平为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将邓小平等遣送别处。7月间，史可轩带领千余人离开西安，该校宣告结束。

3月

3月1日　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前经蒋介石任命张静江、周凤歧、韩宝华、陈其采、经亨颐、宣中华、蒋梦麟、蔡元培、褚辅成、戴任、马叙伦等为委员，张静江为主席。张未到任前由蔡元培代理。该会于1月8日在宁波成立，是日在杭州执行职权。

△　邓锡侯、田颂尧联名通电，分别在成都、潼川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及二十九军军长职。至是四川省内所有军队皆隶国民

政府。

△　直鲁联军第七军军长许琨奉孙传芳、张宗昌命令，以陈调元与党军结合，将其驻蚌埠部队缴械。

△　靳云鹗改编吴佩孚部为16个军。决定以王为蔚、田维勤、张治公等十余人分任正副军长。

△　韩麟春下令，限河北省内奉军七日内全部渡河，十日内会师郑州。

△　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那号”自长江上驶，开赴汉口装运茶叶，在浦口被张宗昌部搜查。船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夫人，苏联外交递信员三人并船员六人一起被扣留。6日，被押至济南，商轮仍被扣于浦口。

△　中、比修约会议在北京重开。顾维钧提案未提出，先组专门委员会讨论细目。

△　利济公司“逍遥津”小轮装载旅客70余人及该轮拖曳装有兵士百名及家具之民船五只，由大通开往芜湖，在繁昌县荻港附近江面被英商怡和洋行轮船“吉和号”撞沉，乘客无可逃命，获救者不满20人。是日芜湖镇署得报，即将“吉和”轮扣留以备交涉。

△　北京政府特派王士珍为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王宠惠为副。

△　北京农立银行开业，总行设北京，各大商埠设代理处。该行通告称：为协助农民事业，集股200万元，实收股本100万元，专营定期存款，着重经营不动产抵押放款。

△　湖北省各界成立援助上海罢工委员会，并决定募捐办法多项。

3月2日　　孙传芳与张宗昌商定：前线军事交直鲁军负责，任毕庶澄为前敌总指挥；孙传芳部开通州（今南通）、扬州、清江、海州（今东海）等地整训。同日，南京城由直鲁军接防。

△　中牟附近靳云鹗所属高汝桐、任应岐、阎曰仁、马吉第等部在白沙布防，与奉军赵恩臻部及毅军米国贤部炮战一小时。

3月3日　　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议决："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本月六日全部迁鄂，全体委员于是日起程赴汉，于十二日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　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张景惠、吉林督办张作相、黑龙江督办吴俊陞联电吴佩孚，责靳云鹗阻止奉军南下，请勿袒护，俾奉军早日入豫。

△　上海交涉员许沅因英兵在沪西越界设防，向驻沪领袖领事挪威总领事亚尔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英当局此举侵犯中国主权，应即撤退。

△　关税会议第二股委员会讨论日本要求最惠国待遇问题，决定先议国税条例，再与日本磋商互惠条约。

△　汉口、九江英租界问题已解决，国民政府赔偿英人在九江事件中所受损失四万元。英使代表欧玛利是日赴沪绕道回北京。

△　总工会命令封锁英国人在杭州经营之广济医院及附属医学校，并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代表组织收回委员会，协议善后。在杭英侨除税关员及邮务长外，全部离杭。

△　以樊钟秀之盟弟飞天龙为首之红枪会二万人，奉靳云鹗之命，将黄河桥之螺钉拆去13公尺，与奉军战于亢村（在河南获嘉县南35里）东十里，死伤600余人，不支溃退。

3月4日　　五省联军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在芜湖就任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七军军长，军务帮办王普就任第二十七军军长，叶开鑫旋就任新编第五军军长。此三军即改编为北路军。次日留守安庆之第一混成旅旅长杨世荣亦宣布服从国民政府。至此，芜湖、安庆均归北伐军范围。

△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率部抵祁门，前锋达安庆。贺耀组部两团抵大通。是日，江右军第十九师亦进驻青阳。同日，江左军一部进抵潜山、英山一带。

△　孙传芳命联军总指挥卢香亭偕总部参谋长刘宗纪等赴上海，与李宝章接洽撤军事宜。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外交部所提《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章程》，并着外交部迅速交涉收回汉口法、日两租界及广州沙面英、法两租界。对英烟厂罢工事件，令外交部会同劳资仲裁委员会调处，并通知总工会勿再赴外交部请愿。

△　北京举行中日商约第七次会议，讨论互惠条款，日方坚持最惠国待遇，顾维钧主张须有范围与时间的限制。

△　湖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又作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至22日闭幕。到会代表184人，代表36个县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约81万余人。此外还有30个特别委员。毛泽东、邓演达等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大会通过重要决议案35件，内有铲除封建势力、建设农民协会自身的联合战线等八件。选举执行委员陆沉、邓演达等17人，候补执行委员陈耀寰等九人。在大会推动下，湖北省农运发展较快，至是月底，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由1926年的七万余人猛增到110多万人。

3月5日　　毛泽东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一文，在是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期合刊上发表。

△　中共上海特委会开会讨论上海暴动问题。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彭述之、赵世炎等出席。周恩来报告军事方面的准备情形。陈独秀提出发动时机，归结为："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跟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关于暴动的指挥人，陈独秀决定"党的方面，士炎（即赵世炎）代理书记"。罗亦农提出整个行动由特委指挥，紧急时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赵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陈独秀）。"即实际上由陈独秀为总指挥。会议最后拟定了市政府15个成员名单，共产党方面有：罗亦农代表C．P．，汪寿华代表工会，顾顺章代表店员，丁晓先任秘书长，侯绍裘代表国民党，刘荣简代表学生，王承伟代表手工业者等。

△　苏联大使馆就直鲁联军在浦口扣留苏联商轮及苏联外交人员事，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提出此事违背世界公法，要求将所扣船只及船员立即释放，并保留赔偿因延误航期等而发生之损失。

△　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远征队考察我国西北地质、古物，并拟将所窃得材料运往国外。是日，北京文、博、图书界12团体在北京大学开会，以我国保存古物法、古物出口法、古物采集等法，政府至今未曾规定，议决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作为永久机关，其任务为：一、严密监视外人，不准随意购买或假名窃取及发掘我国古物等；二、互相交流、采集保存学术材料，主动联合举办科学探险发掘。

△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第七军李宗仁部与第三十三军柏文蔚部共约七万人，向安庆、芜湖、大通、宣城集中。6日，程潜抵大通。

△　孙传芳、张宗昌令免安徽总司令陈调元本兼各职，遗缺以江西总司令郑俊彦兼署，在郑未到任前，以第七军军长许琨代理。

△　韩麟春奉张作霖命赴山西与阎锡山商合作出兵事，无结果。是日，致电张作霖谓：冯、蒋、靳、阎共同一气，请分兵驻守石家庄，以防晋军由娘子关冲出，并命高维岳军分扎察哈尔、绥远境内，以备万一。

△　上海沪宁铁路开始罢工，罢工运动日渐扩大。12日晚，北伐军便衣队和工人在真如附近拆毁沪宁路轨一段，直鲁军军事运输大受影响。

△　上海招商局海员前因孙传芳扣轮运兵，致“江永”轮被炸，罢工抗争已阅四月。招商局基本承认海员工会所提反抗运兵、抚恤死者等条件，是日海员复工，各轮重新开航。

△　重庆工、农、商、学、兵联合举行全市反英示威大会，参加群众十余万人。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外交政策，拥护汉口民众提出对英条件，以实力援助上海罢工工人，请四川当局拥护农工政策等15项议决案。

3月6日　　北伐军部署应付奉军军事计划：一、以唐生智为北路总司令，出武胜关，由京汉路北进，以唐部第八军为主力，王法勤、魏益三豫军均供调遣；二、以李宗仁为江左总司令，由黄梅、宿松、太湖图皖北，以李部第七军为主力，陈调元、王普、柏文蔚等皖军均听调遣；三、以程潜为江右总司令，由皖南宁国前进，以程部第六军为主力，贺耀组之第四十军供其调遣；四、以何应钦为东路总司令，白崇禧为东路前敌总指挥，由嘉、湖进窥苏、锡，以何应钦第一军为主力，周凤歧、曹万顺、赖世璜、余宪文等部均供调遣。

△　驻赣新编第一师国民党代表倪弼，在蒋介石指使下，伙同“AB团”分子贺其燊、土豪刘甲第诱骗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

副委员长陈赞贤到县公署，威逼解散工会，陈威武不屈，倪弼、郭巩、刘甲第等人即开枪射击，陈身中18弹殉难。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并派出二百多名代表到南昌、武汉请愿。全国人民纷起响应，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要求惩凶。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表面同意将首犯倪弼“撤职查办”，但又故意先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后发命令，使倪弼得以闻风脱逃。

3月7日　下午6时，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汉口开预备会。此会原定3月1日召开，因南昌方面要求推迟而延期。谭延闿、何香凝、李烈钧、丁惟汾、陈公博等由南昌到汉参加，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未到。

△　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办理。是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正式上课。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系农讲所最高领导机构），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李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恽代兵、彭湃、方志敏等担任讲课。第一期优先录取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农运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800名，其中以湘、鄂、赣籍学员最多。

△　张作霖命令入豫之于珍、荣臻、赵恩臻三军长是日对河南靳云鹗部开始总攻击。张学良已于5日晚赴卫辉帮同韩麟春指挥。

△　中法修约会议讨论越南华侨待遇问题，决定先组织一特别委员会研究细则，议定中方派钱泰，法方派宾氏为委员。

△　中华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开幕，至16日闭幕。出席代表54人，代表10省邮区。大会通电宣称：“从此领导我三万遍及全国之邮务工人，一致与侵略我主权之帝国主义者争斗，而为收回邮务管理权与国民革命之前锋。”大会通过工会与邮局之关系等问题决议案。

3月8日　　湖北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至19日闭幕。到会代表百余人，来宾有第三国际妇女部代表、中央党部代表等共五百余人。会议宗旨为：检阅妇女界的力量，确定以后革命方针，以谋本身的解放，进而谋全世界妇女的解放。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及一切欺人的旧礼教，并集中力量作政府的后盾。蔡畅向大会作《中国妇女运动状况》报告。大会通过要求中央妇女部速即召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湖北妇女总要求、放足运动、教育问题等决议案多件，选出执行委员蓝淑文、刘清扬、蔡畅等17人。

△　广州四万余妇女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日、苏、美妇女代表均参加。会后列队向省党部政治分会请愿，要求速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及妇女劳动法，女子享有财产继承权及受教育权，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禁童养媳制。同日，武汉各界20万人在汉口举行“三八”纪念会，会后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婚姻自由、提高女权等。湖北劳动妇女亦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工资平等，产假两个月，在工厂附近设儿童寄养所，给妇女哺乳时间，设立乡村妇女补习学校等项要求。

△　鲁军第五军王栋部占领当涂。

△　英公使蓝普森致北京政府外交部两照会：一、解释英国提议召开中英非正式会议“原因”，提出先议天津英租界及英国在华各地治外法权两项，关税问题较复杂，此次不加讨论；二、开列中英谈判委员詹姆生、康特、荣思等三人名单。同日，北京政府决定，除刁作谦已委派为中英谈判主任委员外，加派徐谔（内务部参事）、庄景珂（天津交涉员）为天津租界问题委员，郑天锡（司法部参事）、金问泗（外交部参事）为法权问题委员，着即准备与英方进行交涉。

△　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为英国增兵上海事，发出忠告英当局电与致全国民众电。

△　宁波邮局职工要求改良待遇，提出19项条件，未得满意答复，是日举行大罢工，并发表罢工宣言，声称“非达到目的，决不甘休”。

3月9日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设立条约委员会，担任关于条约改订之研究及规划事宜，并公布条约委员会规则六条。

△　云南省务委员会成立，总裁唐继尧及省务委员胡若愚（主席）、龙云等宣誓就职。

△　张宗昌、孙传芳令委鲁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总司令毕庶澄继李宝章为淞沪防守司令。所有五省联军一律让防，毕所辖区域由苏州起至松江止。

△　张作霖接韩麟春电称：奉军分三路渡河，中路为于珍部，总数约五万；东路荣臻部及万福麟之骑兵队已开入郑州以东防线；西路赵恩臻部由孟津方面向虎牢关进展。

3月10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首次会议，出席委员33人，谭延闿任主席。徐谦报告武汉党员大会请愿恢复党权11项决议，决议全部容纳。徐谦继续报告中央联席会议成立原因及经过，议决承认中央联席会议为必要的组织，所议决各案仍继续有效。旋又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　武汉国民党员在血花世界开恢复党权运动大会，孔庚任主席，通过巩固先总理联俄等三大政策、反对军事专制、纠正个人独裁的封建制度等11项决议案，由主席团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愿，经徐谦、谭延闿、顾孟馀、孙科代表答复，表示完全接受，并在最短期间切实执行。

△　武汉卫戍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已于6日离职。是日，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武汉卫戍事宜着唐生智暂行负责。唐复将武昌卫戍事着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负责，汉口卫戍事着第八军副军长李品仙负责。

△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由杭州出发经湖州赴泗安督师。

△　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电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查办和改组反动的江西省党部。

△　上海东方纺织公司工人3000余人因反对公司开除工人，是日起举行罢工，坚持40多天，后因发生四一二政变而失败。

△　广东反文化侵略会召集各界开收回教育权运动会议。

△　上海海员工会召集海员代表80余人开会。决议八项：一、恢复“五卅”罢工失业海员工作；二、增加工资；三、雇用海员须用中华海员工会会员，并由海员工会介绍及签订合同；四、八小时工作；五、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六、死伤给予抚恤金；七、疾病由公司负责治疗；八、不准外国船员打骂中国船员。并决定推派代表参加市民会议。

△　苏联大使馆为直鲁联军扣留苏联商轮及鲍罗廷夫人等事件，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第二次抗议，警告北京政府须负责被拘诸人之安全。

3月上旬　　国民革命军后方总司令部改为广东行营，李济深任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

△　靳云鹗以吴佩孚名义委米振标为“讨贼”联军第四军军长兼毅军总司令，张继武、米国贤分任毅军第一、第二军总司令。

△　张宗昌、孙传芳会委王栋、徐源泉、许琨为前敌副司令，许兼第二路副指挥。

3月11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28人，孙科任主席。根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议决下列各项：一、改选常务委员，汪精卫、谭廷闿、蒋介石、顾孟馀、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当选；二、改选中央党部各部部长，组织汪精卫（吴玉章代），宣传顾孟馀，农民邓演达，工人陈公博，商民陈其瑗（旋改王法勤，由经亨颐代），妇女何香凝，海外彭泽民，青年孙科；三、改选中央政治委员，除中央常务委员九人兼政治委员外，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六人当选；四、选蒋介石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介石、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五、选汪精卫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学生10日在血花世界与工人宣传队冲突，发生殴伤并捕去工人事件，特训令相互劝勉，勿中反动派分裂阴谋。

△　冯玉祥布告出师，内谓：“国民革命军肃清江表，正以五十万大兵，长驱北上。靳总司令云鹗，倡义豫中。……本总司令业与阎督办锡山约定，以晋军横截新乡、石家庄、大同各路，以刘总司令镇华为我东路总司令，进兵河北。本总司令亲率二十万兵力，东出潼关，会师许、郑。其在南路方面，已令第十六路吴总司令新田，孙总司令连仲，张总司令维玺，共率二十余万兵力，东出武关，与唐总指挥生智所部结合并进。我北路军则随商副司令震进攻察、热，直捣幽燕。”

△　北京政府顾维钧内阁以安国军总司令部下令用飞机袭击郑州，不啻对吴佩孚宣战，是日阁议讨论总辞职。

△　张宗昌在徐州召集军事会议，议决褚玉璞坐镇南京，许琨驻蚌埠，程国瑞驻徐州，巩固后方，张宗昌往来徐州、南京间，策应全

局。

3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通告：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一律志哀，党员、军队缠纱三天。是日，武汉各界分别在武昌、汉口和汉阳三地举行纪念大会，参加群众不下百万。武昌大会通过：拥护总理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提高党的权威，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独裁；实现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最近政纲；要求蒋介石明白表示对总理政策的态度。北京各界赴碧云寺致吊者，“素车白马，络绎于途”。

△　上海各团体举行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到200余团体代表200余人，选举钮永建、虞洽卿、罗亦农、汪寿华、丁晓先等31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大会宣言指出：“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公民之意志，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而对于军阀之走狗官僚、土豪劣绅之流，当依国民政府颁布之条例行之，为民除害，决不宽容。”

△　入豫奉军在韩庄被毅军击败，退至距开封十余里护城。次日，靳云鹗部刘培绪师，马吉第军进攻开封。

△　新加坡华侨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举行游行，与巡警发生冲突，巡警开枪打死华人六人，伤11人。中国学生示威抗议，又被枪伤多人。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新总领事详报真相，并向新加坡英当局严重抗议。

△　北京学生总会上年因三一八惨案被武力解散，近以革命潮流日趋扩大，各校学生代表乃起而重议恢复北京学生统一机关，议决根据全国学生联合总会统一全国学生组织案，重新起草章程，并改名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是日该会正式成立。

3月13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委员32人，徐谦任主席。根据“统一革命势力案”议决：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开会，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主要内容有：

1．统一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共同指导；2．国内少数民族问题；3．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和省政府。二、派代表团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此外并议决：一、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二、修正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三、通过内蒙古国民党问题案，内蒙古国民党接受中央指挥。四、通过外蒙古国民党关系案，决定派驻库伦代表一人，并要求外蒙古派驻中央代表一人。五、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报告外交事务，说明汉、浔两案交涉经过。

△　中共中央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斥责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上的言论，指出蒋此举已是奉行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以赤制赤”的反革命策略。

△　全国总工会就赣州驻军倪弼枪杀工人领袖陈赞贤事致电蒋介石，指出总司令部为革命最高指挥机关，与赣州近在咫尺，此种开明军阀所不忍为之摧残工人运动情事，竟至再至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革命前途利益计，请严行查办。同日，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力争，以救革命危机。

△　长沙市国民党党员二万人集会，通过致蒋介石电及致国民党中央和各省通电，主要内容为：反对军事独裁，巩固党的权威，拥护中央联席会议议决案，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鄂开会等。

△　太原总工会被国民党右派首领苗培成等率领流氓百余人捣毁，孙中山遗像及工会旗帜被撕得粉碎，重伤工友七人，轻伤20余人。

△　苏联大使馆为直鲁联军扣留苏联商轮事发表声明，略称：商轮“巴米亚列宁那号”赴汉确系装茶，外间所传船中发现军火及其他违禁品，全属捏造。乘客中有苏联外交信使三人，持有赴汉护照，竟被

拘留，此种举动不能不视为违背国际公法及国际礼貌，苏联政府要求即行释放该船及被拘诸人。

△　奉军占领中牟车站，前锋抵北河镇，距郑州数十里，黄河铁桥南岸豫军全部撤退。

△　前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在上海就任淞沪商埠督办。

△　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以二五附税作抵，发行1000万库券并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借款500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除已函中、交两行拒借外，是日发出宣言，忠告上海金融界拒绝。

△　中国棉业银行以国内战事频繁，是日经临时股东会议决解散。该行于民国十年开办，总行设上海，资本总额100万元，专营纱花押汇押款及汇兑业务。

3月14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出席委员27人，顾孟馀主席。议决：一、由常务委员会赶速筹备，从速决定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二、广东、江西省党部、广州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员之选举违背总章，应交常务委员会从速改选；三、通过《北伐军费支给案》。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谭平山为农民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顾孟馀为教育部长，刘瑞恒为卫生部长。

△　驻上海之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向北伐军投诚，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并派“楚同”、“楚有”、“楚谦”三舰越过江阴、镇江、南京诸防线，驶至九江，候令会同陆军攻打南京。

△　广东省政府财政部颁布《禁用外币条例》，凡八条，即日施行。

△　湖南各界举行救党示威运动大会，到十万余人。议决：一、反对军事独裁的蒋介石，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二、纯洁革命队伍；三、拥护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四、实行民主政治。

△　孙传芳将金陵军官学校移设清江浦。

3月15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出席委员27人，谭延闿主席。丁超五报告“阳新惨案”详情，议决组织委员会，指定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三人为委员，与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开联席会议处理。并议决要案如下：一、指定谭延闿、孙科、徐谦为党员服兵役法征集委员；二、以财政部长兼江、浙财政处长，以统一财政案；三、批准湖北省党部《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及《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条例》；四、通过总政治部组织大纲；五、裁撤中央军人部；六、任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等。

△　国民政府正式收回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汉口英租界纳税人年会据《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将英租界正式交还中国，改组为第三特别区，国民政府外交部委黄昌谷为第三特别区管理局长，办理接收事宜。九江英租界同时正式收回。

△　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是日至21日在武昌雄楚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县40万武装农民。推王法勤、于树德、陈克文、邓演达、刘莪菁、郭安宇等13人为主席团。陈克文、毛泽东、陆沉、郑振宇在大会上分别作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省农运状况报告。李立三作中国职工运动报告。大会通过拥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反对奉鲁军阀、发展河南农民协会组织等案。又规定河南全省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并选举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汪慕恺等五人。

△　国民党广西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提案如下：一、严定军官资格，改良军人生活；二、妥定农佃制度及保障农民利益；三、

取缔苛细杂捐；四、兴林筑路；五、积极宣传党义。

△　沪宁铁路工人自5日罢工后，沪杭路司机及伙夫亦有四五十人先后离职。上海港务处亦有工人参加罢工行列，至是日沪杭路及港务工人大罢工。港务处工人全体离职，沪杭路机务处空无一人。至下午6时半，上海南北两站数十部机车均无人驾驶。

△　北伐军东路军主力向宜兴、溧阳进攻，前敌各部亦开始向松江、青浦、吴江攻击。同日，第二军占溧水，鲁军王栋部退秣陵关。次日，何应钦部占领溧阳。

△　何键、叶琪在常德就任第三十五军正副军长。

△　靳云鹗部马吉第军第十五师击退奉军，占领中牟。

3月16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孙科主席。通过：一、大会对全体党员训令，对全国民众宣言及对全国农民宣言；二、修正农民问题案；三、令外交部严重抗议新加坡英警惨杀华侨案。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中校以上官佐通电拥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议决案。

△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广州工人代表会、香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广东省农民协会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革命军“对于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的妥协，无论以任何口实，丝毫都不容许”。

△　段锡朋、周利生奉蒋介石命，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员，封闭学生会，通缉学生会执监委员，并查封《贯彻日报》。

△　北京政府欠发驻外使领馆经费已20个月，驻比公使王景岐是日抵京索款。先后回国的尚有驻奥黄荣良、驻日汪荣宝等。

3月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徐谦主席。通过下列主要议案后即闭幕：一、以王法勤继陈其瑗任商民部长；二、三一八案要犯贺德霖交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照反革命罪条例审判；三、令外交部抗议英水兵在芜湖登陆事件；四、通过湖南省民会议大纲及其组织法，并决定5月1日召集；五、通过财政统一案、外交统一案；六、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及关于军事政治学校案等十余案。

△　蒋介石昨由南昌至九江，是日指使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健刚组织青红帮流氓百人，捣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在市党部打死三人，在总工会打死一人，伤六人。工人纠察队捉获流氓数十人。蒋介石又派卫队弹压工人，掩护流氓出市，并借保护为名占领市党部和总工会。工人愤极，决定次日举行总罢工。蒋介石连夜派第六军留守司令唐蟒为九江戒严司令官，严禁罢工，并密令九江警卫团：如有工人罢工，立即拘捕。18日，蒋介石乘“楚同”舰东下安庆。

△　冯玉祥通电称，所有前国民军第一、二、三、五军等名目一律取消，业经改为各路军，悉按新编制办理。

△　程潜、贺耀组部自15日起开始会攻皖南当涂，经过两日激烈战斗，将直鲁军第四军、第五军及孙殿英部击溃，直鲁军第四军军长孙宗先仅以身免。是日，北伐军进驻当涂，连克采石、慈湖。敌纷向南京及江北岸溃逃。

△　奉军第十七军完全占领郑州。吴佩孚逃往洛阳、巩县一带，靳云鹗部退新郑、许昌、郾城。

△　东路军赖世璜部克宜兴，敌白宝山、冯绍闵、郑俊彦三师退

常州。赖军跟踪追击，21日占常州。直鲁军在沪宁铁路联络已被截断。

△　新降奉之米振标部响应靳云鹗反攻奉军。是日，靳军马吉第部占领开封，遂决定以米振标全部为先锋队，火速前进，王为蔚为左翼，魏益三为右翼，靳自率高汝桐、马吉第等师为总预备队，指挥一切。同日，占领内黄、兰封。奉军及直鲁军退至归德以西之柳河小坝，掘壕固守。

△　苏联大使根据上海苏联领事调查报告，确认苏联商轮行驶合法，拘捕外交公差实属侮辱苏联，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日特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第四次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扣商轮及被拘人员。

△　安国军总司令部发表扣留苏联船只及鲍罗廷夫人声明书，谓“列宁号”因载违禁宣传品被拘，依1924年中俄协定互禁有碍他方面之宣传条文，其责任实在苏联政府。北京外交部已将此意电驻苏代使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并称所拘船员有查办必要，碍难释放。

△　云南日报公会通电声讨英政府派兵入寇滇边江心坡一带地方，内称：“现刻英国驻江心坡官兵计约四千有余，马匹不下千余匹，并在该地附近设营安寨”，以配合驻在我国沿海、沿江之炮舰实行侵略。

△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现前总税务司安格联串同现任总税务司易纨士，从内国公债基金项下擅拨40万镑与伦敦汇丰银行，是日特发表长篇宣言，叙述事情经过及与现任总税务司易纨士交涉情形，并指出“此种恶例断不可开”。

3月18日　　北伐军东路军第二十一师严重部克吴江，向苏州进展。

△　蒋介石委任云南航空处处长刘沛泉为东路军航空司令，归东

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节制。是日刘在杭州就职。

△　唐生智致电云南将领，劝其彻底改革，受国民政府节制，勿再拥戴唐继尧。同日，另电促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积极准备入滇。

△　江左军全部进入合肥、六安之线，皖军马祥斌部投降北伐军。

△　孙传芳因北伐军逼近南京，形势危急，是日秘密离南京赴扬州。

△　张宗昌委直鲁第三军副军长兼一百零七旅旅长常之英为苏州、吴江、常州、无锡四县总指挥。

△　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大校场举行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会后数千人到蒋介石总司令部请愿，要求惩办凶手。

△　驻长沙美领事范宣德致函湖南交涉员董维键，声明自动取消观审权。董复函表示欢迎，并望自动放弃领事裁判权。

3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南昌、九江事件处置办法：一、电令蒋介石报告真相；二、训令江西各驻军绝对保护江西各级党部及一切民众团体；三、对于非法选举之江西省执行委员会严加处办。

△　浙江省政治会议第六次会议据杭州郑宗衍等函控章太炎于上年8月间通电全国，违反民意，阿附孙传芳，不惜牺牲五省人民生命，请剥夺其公权，并将财产没收，议决宣布章太炎罪状，褫夺公权，没收其财产，但不牵及亲属，交政务委员会执行。

△　直鲁军第六军徐源泉部约三个混成旅，粤军谢文炳部一个混成旅及白俄兵一个团，是日正午分向贺耀组部阵地濮塘镇、朱门镇反

攻，势甚危急。次日，程潜总指挥因敌已先发动，乃将原订3月21日总攻日期提前一日开始。

△　张作霖任张宗昌为海军总司令，毕庶澄、沈鸿烈为副司令，节制东北、渤海两舰队。

△　晚，张作霖在北京召集张学良、杨宇霆、吴俊陞、张作相、于国翰开军事会议，决定今后军事方略，对豫西取守势，中路与东路取积极攻势。

3月20日　武汉国民政府新选任委员在武昌国府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28人，是日出席宣誓就职委员为：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谭平山、孙庚、宋庆龄、吴玉章、彭泽民、唐生智、顾孟馀、王法勤13人。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林伯渠恭读总理遗嘱后，举行国府委员就职宣誓。誓词曰："余敬谨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并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佣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参加典礼的各团体代表共500余人。

△　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公布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25人名单，计：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谦、冯玉祥、程潜、谭延闿、陈友仁、李宗仁、谭平山、钮永建、蒋介石、柏文蔚、王法勤、吴玉章、何应钦、孙庚、彭泽民、经亨颐、黄绍竑、杨树庄、陈调元、朱培德、唐生智、李济深、宋庆龄、顾孟馀。国府常务委员五人：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

△　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令进攻淞沪。以第一师薛岳部担任正面，以第二师刘峙部、第二十一师严重部为左翼，攻苏州，以第二十六军之第二师斯烈部为右翼，由金山卫、张堰、松隐，从得胜港氽来庙渡河，经闵行抄莘庄、明星桥。另派先遣队李明扬部

由青浦之朱家角进至安亭，截其归路。同日，右翼即由浦南抄出明星桥，断直鲁军与上海之联络，直逼上海；正面已达三十一号桥，逼攻松江。

△　何应钦部占领横林、奔牛、吕城、丹阳等地。

△　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抵武穴，第二十八师前队已入霍山。

△　驻镇江直鲁军奉令连夜撤退。张宗昌由南京返徐州。

△　北京政府派外交部参事刁作谦等抵天津，与英使馆代表詹姆生等开始商谈交还天津租界事。

△　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已旬日，参加人数达3000以上。是日，罢工委员会决定：提出两路全体工友总要求21条；组织纠察、宣传、交通队各一百余人；对纠察队施加军事训练。

△　宁波总工会被宁波市商民协会部分会员焚烧，店员公会被捣毁，是晚，市总工会发出紧急命令，决定次日起全体罢工。

△　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开成立大会，到会员82人。议决要案四件：一、拥护国民党恢复党权运动；二、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次全体会议一切议决案；三、欢迎汪精卫主席复职；四、电斥蒋介石摧残江西舆论及党务。

3月中旬　蒋介石命令取消第十九军。军长陈仪免职。

△　靳云鹗部于去秋入驻信阳洋河一带，一切给养皆仰赖地方，居民不堪其苦，此次庞炳勋奉靳令开拔北上，临行又向各村拉夫派米，当地红枪会起而聚众反抗。

3月21日　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晨，中共江浙区委书

记罗亦农代表区委宣布当天中午12时举行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立即分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七个区举行起义。12时，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直接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遵照总工会发布的总同盟罢工令，一齐罢工。工人纠察队向预定地点紧急集合。在一小时内，七个地区分别围攻警署，夺取枪械，展开激烈巷战。至晚，各路纠察队先后占领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六个区。闸北区因敌人兵力众多，军事据点达20多处，敌人又以铁甲车、大炮作掩护纵火反攻，英军亦越界助敌，战斗极为激烈，经过反复争夺，直到22日午后4时余，除北站外所有各据点敌人均投降。周恩来立即命令工人纠察队对北站据点发起总攻击。经一个多小时猛攻，直鲁联军纷纷溃逃。午后6时，战斗结束，上海工人阶级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歼3000直鲁联军和2000反动警察。联军前敌总指挥毕庶澄逃入租界。南市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到五万人。

△　程潜、贺耀组、鲁涤平部先后克复江宁镇、秣陵关、龙都镇。22日又克板桥、淳化镇。

△　北伐军东路军第二十六军昨日渡过黄浦江，进逼松江，第二师及先遣队沿铁路向松江城猛攻，是日占领松江城，毕庶澄所部四个混成旅被解决。鲁军凌晨1时起陆续退沪北站，本日龙华发现北伐军别动队，英租界震动，派装甲车出巡。同日，东路军第二十一师严重部占领苏州。

△　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常务会议，汪寿华主席，通过紧急命令，号召全市各界人民从本日正午12时起，一致行动，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国民政府指挥下之民选市政府。

△　上海总工会刊登启事，命令工人纠察队协助北伐军维持秩序，以绥地方。

△　何应钦至吕城，令赖世璜部东攻无锡、江阴；冯轶裴、曹万顺部分经镇江、汤水、白虎、新塘市攻南京。次日，何应钦入镇江。23日，冯轶裴部方至栖霞街东流镇时，南京已为江右军攻克。25日，何应钦率冯轶裴部进驻南京。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得悉北伐军克复上海消息后，当即作出三项决议：一、派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赴沪指导一切；二、派吴敬恒、侯绍裘、张曙时、汪寿华、杨杏佛、白崇禧、钮永建等组织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三、令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郭沫若为上海革命军政治工作指导员。

△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开始办公。委员会下分设总政治部、秘书、参谋、陆军、经理、航空五处及革命军事裁判所，并任命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为秘书处长，龚浩为参谋处长，刘骥为陆军处长，孙科为航空处长，谢晋代理经理处长，徐谦为革命军事裁判所长。

3月22日　　上午9时余，白崇禧偕薛岳抵龙华。因白已奉蒋介石按兵不动命令，是日下午，当工人攻打上海北火车站最紧急时刻，总工会代表汪寿华请白出兵援助，竟遭拒绝。后经力争，薛岳方率部开入麦根路。时直鲁军纷向虹口及沿租界溃退，缴械投降者颇多，其一部图攀外兵所设之铁丝网逃窜，外兵用机关枪扫射，伤亡达百余名。另一部千余名向外兵缴械，租界当局启栅收纳。再1500余名，至某日人花园被缴械。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上海。

△　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宣布，经上海政治分会及市党部指定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郑毓秀、陈光甫、王晓籁、林钧、谢福生、侯绍裘、王景云、王汉良、李泊之、何浩、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治委员。25日，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议决通过。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连声海为国民政府秘书长；特任顾孟馀为教育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任命孔祥熙代理广东财政厅长，陈耀祖代理广东建设厅长。

△　冯玉祥派刘骥为驻武汉全权代表，李鸣钟副之。

△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郭泰祺为芜湖交涉员，张国辉为福州交涉员，林实为厦门交涉员。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主办的《中央日报》在汉口出版。中央宣传部长顾孟馀兼社长，陈启修任主撰，孙伏园任副刊主撰。

△　上海《民国日报》复刊。

△　安徽省党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安庆开幕。会后，伪安徽省总工会组织暴徒在总司令行辕门前行凶殴打省党部执行委员光升。蒋介石对行凶暴徒竟不予惩办。

△　赣州各界举行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会后整队护送烈士遗体回南康原籍安葬。此后，吉安、雩都、抚州、上饶、都昌、永修、丰城、永新等十多个县接连发生屠杀工农惨案。

△　张学良、韩麟春由郑州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促进和平，一致对外。

△　张作霖任命褚玉璞为江苏保安总司令，荣臻为河南保安总司令。

△　唐生智电复蒋介石，谓西路除令第四、第十一两军照冬（2日）电迅向指定地点集中协同江左军向皖北进展外，并饬第八、第三十六两军集结柳林、武胜关、孝感县一带，乘机增援靳云鹗部。

△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由常州进驻无锡。

△　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是日该会成立，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等60余团体参加。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顾馨一、荣宗敬、王一亭等15人任常务委员，虞洽卿、吴蕴斋、王一亭任主席。该会宗旨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

△　北京政府为安格联于免职后，擅将关税余款挪充别用，影响公债基金，特令财政部会同税务处拟具惩处办法。

△　上海《申报》讯：驻华美使马瑞慕通知北京政府，谓奉美政府训令，撤销关会美代表团。

3月23日　北伐军占领南京。北伐军逼近南京城，直鲁联军恐被北伐军围困，决定退守徐、蚌，是日令南京城内外驻军急退浦口。北伐军第二军第四、第五、第六师、教导师，第六军，独立二师等兵临城下。第六军攻占雨花台后，第十九师由中华门冲入南京城。入晚，各军分路进入南京。敌三万余人被缴械，余溃散，一部由下关抢渡逃回浦口。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以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李隆建、侯绍裘、张曙时、江董琴、顾顺章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程潜为主席。26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又议决增加林祖涵、高尔柏、杨溥生、李世璋、戴盆天为江苏政务委员。

△　上海临时市政府常务委员会决定：一、由市民代表会议发布全市复工令：二、推举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常务委员；三、贴布告声明上海军事由白崇禧负责，治安除正式军队外，由总工会纠察队、警察保卫团维持。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对上海外交策略：一、由外交部长发表对外宣言，以上海战事已结束，要求撤退驻上海外兵；二、由党部指导民众作广大宣传，要求撤退驻上海外兵，并用谈判方法收回上海公共租界。

△　上海新疆路天保里等处便衣军拒绝缴械，与白崇禧部发生武装冲突。

△　驻沪各国领事前往龙华司令部，访谒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询问革命军到沪后一切方针。白对于劳资问题答称：在国民政府指导下，工人有所要求，必先与资本家开诚接洽，若使劳资双方相持不下，则政府将来自有劳资裁判所公平解决。

△　昆山毕庶澄部四千余人被北伐军缴械。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令江西省党部改选执监委员，停止职权，听候查办。

△　安徽省工会（鲁班阁）、安徽农民协会、安徽商民协会、安徽省学联、安徽省妇女协会等于上午组织市民大会，欢迎蒋介石。并用每名四元身价收买流氓打手，纠集百人敢死队，定出赏格（轻伤者100元，重伤者500元，丧命者1500元），令其在大会中杀害革命分子。会后，安徽临时省党部及各合法民众团体统被捣毁，革命同志六人被殴伤，酿成安庆“三二三事件”。

△　香港英政府因广州政府未与之合剿海盗，适又发生“合生”轮船被劫案件，即派英舰五艘、飞机四架、士兵200余人，在惠阳属稔山地方，焚毁华人村户2000余家，杀死10余人。26日，陈友仁向广州英领事提出抗议，谓：此系侵犯我领土主权，借口剿匪，惩罚良民以为报复，尤为近代法律观念所不容，要求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有此行为，并保留要求赔偿权利。

△　天津收回租界交涉，因英委员持观望态度而停顿，是日刁作谦离津返北京。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将制定出《解决工商纠纷办法》六条函送省政府，饬农工厅执行。办法中确定店东每年旧历年初二有自由去留店伙权。

△　广州各界在东校场举行促汪（精卫）销假复职运动大会，议决：一、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军阀作坚决斗争，消灭最反动之奉系军阀；二、拥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请汪克日销假复职，以及关于指导机关之统一、外交政策之统一、财政政策之统一、革命势力之统一四大政策。

△　数日来，北京军警当局捕去各大学学生39人，各校教职员、学生人人自危，纷纷出京避祸。是日，国立九校校长校务讨论会推定北大代理校长余文灿、工大校长马君武等访杨宇霆营救被捕学生。

3月24日　　北伐军大队进入南京城后，城内反动分子乘秩序混乱，煽动溃兵及流氓进行抢劫，袭击英、美、日领署及侨民，外国人死四至六人，伤六人。美、英帝国主义者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侵害，下令驻下关各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死30余人，伤数十人，毁坏房屋财产甚多。是为“南京事件”。

△　程潜、贺耀组、鲁涤平到南京。城厢内外，张贴总司令蒋介石、总指挥程潜、副党代表林祖涵之安民布告，宣示革命宗旨。程潜入城后，即派队镇压骚乱秩序者，并就地枪决抢犯多名。第六师师长戴岳、党代表萧劲光发出告示维持军纪，谓奉总指挥令，凡抢劫财物者斩，无故放枪者斩，借故滋事者斩，造谣生事者斩。

△　蒋介石由安庆抵芜湖，得宁讯后，即派参议林石民赴芜湖日本领事馆，恳请日领事转达英、美当局，谓党军无恶意，蒋本人决亲赴南京负责解决。

△　上海总工会通告，是日10时起，除武装纠察队外，一律复工。

△　张国威在扬州叛离孙传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师师长，所部被段承泽缴械。次日，孙传芳、卢香亭等率部由扬州退淮阴。

△　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率“海筹”、“应瑞”各舰开回高昌庙原防，其余各舰仍分布闽、浙、苏沿海各要隘驻防。同日，厦门海军及各机关举行易党旗礼，表示正式服从国民政府。

△　靳云鹗部高汝桐乘铁甲车反攻郑州，为奉军包围击毙。

△　张学良、韩麟春通电欢迎吴佩孚回郑州主持在豫联军。

△　毕庶澄、吴光新由沪逃抵青岛。次日，毕庶澄奉张宗昌命赴徐州报告军事。

△　革命军昨抵镇江。英领事怀雅特致函交涉署，声明拟于午12时将镇江租界内巡捕岗位全撤。是日，沈交涉员会同警察厅厅长、丹徒县县长、商会会长、商团团长率同警察、商团团员前往租界接岗。6月18日，镇江市公安局将租界内之第五区署改为特别区署，前英租界工部局遂无形取消。

3月25日　何应钦、程潜、鲁涤平、贺耀组会衔在宁出示布告，保护外侨生命财产，违者严惩。同日北伐军派队护送集合在金陵大学的外侨百余人至下关江岸，转登外舰。

△　蒋介石由芜湖抵南京下关，何应钦、程潜、鲁涤平等登舰与蒋商议军事。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徐谦、孙科、邓演达、宋子文、孔庚、詹大悲、董用威、张国恩、恽代英、邓希禹、

李汉俊等11人为湖北省府委员；徐、李、宋、孔、董、张分别兼任司法、教育、财政、建设、农工、民政各厅厅长。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李宗仁、光升、常恒芳、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高语罕、朱克靖九人为安徽省政务委员，李宗仁兼主席。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电复承认上海市民大会选出之市政府委员19人为上海市政府临时委员。

△　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汪寿华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声明“此次上海总罢工，纯系对内之政治运动，无与外人或厂方为难之处”；并抗议公共租界当局屡次非法逮捕工人，断绝华租交界处交通，破坏工人复工，要求限期切实圆满答复。

△　据《申报》载：与我国修约关系各国在北京交换修约意见，认为北京政府未能代表半个中国，所议结果，将来更不能得到全中国承认，故一致取消极态度，并有两国主张即此停议。

△　美舰二艘护送从南京下驶之商船，至江阴与当地驻军互相轰击。

3月26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第三次扩大会议议决：派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傅惠忠、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为改组江西省党部筹备员。

△　冯玉祥奉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在西安发布总动员令，分三路向河南出动，沿陇海路东进，以京汉线为目的。于右任为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陈希圣为第二路司令，李云龙为第三路司令。

△　北伐军派队严密保护各国驻宁领署及侨商，各军政治部合组临时外交委员会办理外交事项。军法处将捕获乘机抢劫人犯11名枪决

示众。南京是日一律开市。

△　蒋介石乘“楚同”军舰抵上海，即以新西区交涉公署为行辕。法租界当局当即派政治部主任程子卿率包探黄金荣等到署“照料”。法总领事以特别通行证送蒋介石，允许他带武装卫兵10名自由出入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亦特派西探罗斯送去特别通行证。蒋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

△　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致函英、法租界当局表明：已与军事当局及总工会商妥，维持治安，保证无轨外行动，请合作。

△　上海总工会因歹徒散布总工会将攻击租界捕房谣言，通告上海中外居民，指出“本会对于租界之收回，本所主张，但无须即用武力解决”，并声明“本会已通知所属各工会严究造谣之徒”。

△　贺耀组在江宁行营就第四十军军长职。

△　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宣布：收回苏、皖、湘三区邮政权，并任吴尚鹰为湖南、湖北两省邮务监督。

△　吴新田在南郑就国民军第十六路司令职。

△　驻北京英、美、日公使协商南京事件，英、美公使主取强烈对付中国办法，并力劝日使与英、美两国采一致行动。日使谓南京等处详细报告未到，且损害似非外传之甚，应持冷静态度。

△　日本外相币原就南京事件电令驻沪总领事矢田，设法警告蒋介石“应尽早赶赴南京处理事态纠纷”。30日，矢田会见蒋介石，要求“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加以特别深刻的考虑”。蒋表示“充分体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

3月27日　晚，蒋介石在上海交涉公署开重要会议，张静江、蔡

元培、白崇禧、周凤歧及参谋秘书等出席，讨论后方布置、肃清江北、上海治安等问题。

△　白崇禧令先遣司令李明扬办理接洽改编淞沪杂色军队事宜。

△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林祖涵、郭沫若、许甦魂为代表往宁、沪一带慰劳前敌将士；河南、四川及各省各军宣慰使等名义，决一律裁撤。

△　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三百余团体参加，因租界当局阻断交通要隘，以致沪东、浦东多数工会未能参加。大会由执行委员长汪寿华报告第三次暴动经过及工会今后责任，并议决抗议南京英、美军舰开炮惨案等七案。

△　蒋介石会见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声称绝无用武力收回沪租界的用意，要虞告商界放心。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委员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等29人往谒蒋介石，提出“希望原有经济制度不可破坏过甚”。蒋答称：“此次革命成功，商界助力亦匪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及维护商业问题，旦夕间即有具体办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后上海银行界提供一笔6000万银元的贷款支持蒋介石。

△　蒋介石任命陈调元、蒋作宾、程潜、朱培德、李宗仁等20人为安徽政务委员会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

△　武汉国民政府为统一财政，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至上海主持，是日电令上海各机关，所有江、浙财政均须经过宋子文办理，否则概不承认。

△　陈友仁在英文《汉口日报》发表声明，要求各国在沪驻军速行撤退，国民政府对公共租界不日将进行和平交涉。

△　南京交涉员李石民代表蒋介石访问日总领事森冈，对南京事

件表示遗憾。

△　渤海舰队“海圻”等舰，奉舰队司令张宗昌命令进攻吴淞口，扰乱北伐军后方，为驻沪舰队击退。

△　上海艺术协会成立，以黎锦晖、田汉、陈望道、欧阳予倩等九人为执行委员。

3月28日　蒋介石指使吴敬恒、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古应芬等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会议，通过吴敬恒所提“纠察共产党行为”案，当经决定发动“护党救国运动”。

△　蒋介石令白崇禧即日宣布上海水陆戒严。

△　上海总工会因闻纠察队将有被缴械消息，是日派代表质问蒋介石。蒋诡称：“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当代表陈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时，蒋保证“严行制止，尽可放心”。

△　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推举汪寿华、王梅卿为正副委员长，张昆弟为组织部长，李泊之为宣传部长，龙大道为经济斗争部长，赵子敬为交际部长，顾顺章为纠察部长；并议决由正副委员长联合各部长组织常务委员会。同时就夺回租界谣言发表宣言，严正指出：本会认为收回租界并不是本会的单独行动所能成功，收回租界特别是上海租界的伟大工作，须民众政府与军事势力，一致起而为政府作后盾。

△　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任林祖涵为该部驻宁办事处主任，林未到任前，由李富春代。

△　中央农民部在武昌召开各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周以栗、陆沉、方志敏、陈子林等出席，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领导全国农运。时全国有组织的农

民已达800万人。

△　南京市民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到会群众五万人，通过四案：一、拥护江右军程潜部改造南京；二、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三、敦请汪精卫销假；四、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决案。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南京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并派定吴敬恒、杨杏佛、侯绍裘、柳亚子、顾孟馀、郭沫若等七人为筹备员。

△　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科布多蒙兵攻入新疆，图在兴河驻兵，请政府向苏联提严重抗议，召回其驻蒙军事顾问。

△　绥远近以丈量余荒、夹荒，激起民愤。是晨市民五六千人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城南之孤魂滩聚集示威，并散发传单，略谓：辛亥革命成功不过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新招牌，所有专制时代的腐朽遗物与帝国主义的思想，完全保留。并历数各级长官罪状。旋整队赴新城都统署请愿。都统商震闻讯，紧闭城门，只由代表数人入见。代表提出反对丈量余荒、夹荒；反对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等要求。商震皆允照办。

3月29日　　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成立。蒋介石借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函令市政府暂缓办公。

△　驻京法使玛太尔就宁案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保留赔偿损害权利。

3月30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修正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张国焘、刘一峰、李松风、萧炳章、黄实、王均、刘芬、李尚庸为江西省政府委员，朱培德兼主席。杨、黄、刘、萧、姜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司

法、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原任委员李烈钧（兼主席）、徐元诰、周雍能、程天放、周利生、王镇寰等已于26日免职。

△　蒋介石任命陈其采、陈光甫、钱永铭、虞洽卿、钮永建、杨杏佛、王伯群、吴荣鬯、秦祖泽、汤钜、顾馨一、王晓籁、徐国安、柳亚子、汤济沧15人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熊式辉师占领江苏靖江，孙传芳率残部向泰兴方面溃退。

△　北伐军前锋便衣队突在津浦路出现，一部昨夜袭凤阳关，临淮、蚌埠形势紧急。是日，李宗仁部占领定远。陈调元部第六师由全椒到滁州。31日，北攻蚌埠。

△　湖南、广东、湖北、江西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省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昌召开联席会议，选出彭湃（粤）、易礼容（湘）、方志敏（赣）、陆沉（鄂）、萧寅谷（豫）及毛泽东、徐谦、孙科、谭延闿、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谭平山13人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陆沉五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兼任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工作。并决定在5月15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680人。

△　杭州总工会自成立以来已发展会员20万余人，金、衢、严、处四府近忽由右派另组职工会，号称10万。是日在钱塘门头小校场集会后，率众手持木棍，图捣毁总工会。总工会聚集纠察队二三千人对抗。次日，杭州总工会在西湖公众运动场开会，驻杭留守东路总指挥行营部派队弹压，公安局并捕押游行工人数人。总工会当晚发出罢工命令，并提出复工条件六项。4月2日，被拘工人获释，所提条件经杭州当局圆满答复，杭州各工会工人遂复工。

△　河南红枪会接受奉军委任，破坏信阳北部18里间铁道数段，阻止讨奉援军北进。是日又聚众包围信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

魏益三派员前往，晓以利害，悉置不听，遂开枪射击。

△　蒋介石声明解决宁案步骤：先组调查委员会调查，若骚扰者确系革命兵士或与革命军有关系者，愿负全责解决。

△　国际工人代表汤姆、白劳德、多理越、秘书施端理，偕广州总司令部招待员包惠僧由九江到汉口。

3月31日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美驻汉领事当面抗议英、美军舰炮轰南京事件，指出南京之骚扰事件系反动派所为，使外人受伤者六人、死亡者四至六人，而华人死伤于英、美炮舰者则为一与百余人之比。国民政府一方对于外人之被袭击表示甚深之歉意，一方对于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一举提出严重之抗议。

△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抗议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侵略暴行，声援南京人民反帝斗争，召集重庆工、农、商、学各界三四万人，在打枪坝举行“反对英美兵舰炮轰南京”市民大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重庆反帝爱国民众运动进行镇压，下令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调动军队包围大会会场，上午11时许，又令兰文彬部更换便装，携带武器冲入会场，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同胞任意砍杀，打死400余人，打伤1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大惨案。同时，又派人捣毁莲花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重庆市党部、中法大学。当晚，王陵基、兰文彬封锁杀人现场，又令军队搜捕逃亡者，捉住后均送交兰文彬枪决。是日，四川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重庆市党部常委、《新蜀报》主笔、大会主席漆南薰遇害。4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常务委员杨闇公被刘湘杀害。

△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为驻粤外侨准备离粤事致函驻粤各国总领事称：保护外侨之生命财产，已经国民政府屡次声明，外侨之恐怖或系惑于反革命派所布之谣言。国民政府已训令广东省政府及广东军留守总司令，命其益加意保护，俾无疏忽。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京，汉口总部行辕人员是日均离汉赴宁。

△　郭沫若在武汉《中央日报》（附刊）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而“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呼吁：“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要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　奉军占领许昌。4月3日进逼漯河。

△　康有为在青岛病逝。

3月下旬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电令冯玉祥在西安筹设政治分会，处理西北政治。指定冯玉祥、于右任、于树德、郭春涛、杨明轩、薛笃弼、刘伯坚七人为委员。

△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张发奎继任第十一军军长，陈洪代理第四军军长，并令程潜、唐蟒、王均分别兼管南京、九江、南昌卫戍事宜。

△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免蒋光鼐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准戴戟辞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另委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许志锐为副师长；叶挺为第二十四师师长，方伟为副师长。学兵团团长张治中辞职照准，委黄仲恂暂代。又准第十一军代理师长范汉杰辞职。

△　蒋介石委朱绍良继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

△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定邓演达、恽代英、顾孟馀、谭延闿、徐谦为该校委员。

△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选出黄绍竑、周炳南、李宗仁、黄华表、盘珠祁、伍廷飏、黄家直、梁六度、李岱年、黄旭初、裴邦焘、曾象质、黄同仇、雷沛涛为二届执行委员，白崇禧、甘乃光等31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俞作柏、粟威、黄琨山、李光华、蒙民伟、周瑞桓、伍廷飏、陈锡光、毛振先、刘扬廷、雷沛涛、盘珠祁、朱朝森、韦拔群、甘乃光为监察委员。

△ 美国使馆关闭长沙、重庆领事馆。

△ 武汉国民政府通令14省海关，无论正附税，均不得解北京。

4月

4月1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一、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须尊重二届三中全会议决之《总司令条例》，以及外交、财政、交通统一各案，违者以反革命论；二、关于上海纠察队问题，认为此种组织为必要而且合法，决定通电各军事长官，如有希图解散上海纠察队者，即以反革命论。

△ 汪精卫自欧洲回国，经莫斯科于是日抵沪。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以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于上月31日市民大会饬部开枪，造成血案，议决将王撤职，交刘湘查办。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戴修瓒、翁敬棠试署最高法院庭长，胡心耕为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开会议决，省、市党部各派代表三人，总指挥部、政治部及在宁各军、师政治部各一人，组织联席会议办理苏省一切事宜。江苏省党部是日由沪迁宁办公。

△ 湖南各界五六万人在长沙开会欢迎第三国际代表罗易及谭平

山、蔡和森等，郭亮主席。罗易发表演说，谓第三国际是为解放被压迫民众，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希望中国民众努力奋斗。蔡和森演说，指出："现在革命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建立革命武装，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

△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应各地学生联合会请求迁鄂。是日武汉各团体在省党部开会，庆祝该会在武昌开始办公，到各界代表二千余人。唐鉴委员演说，谓中国革命以农工为主力，学生运动须与农工及被压迫民众相结合，方有成效。他勉励学生为革命需要和本身的改造应"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

△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在银钱业中积极为蒋介石筹款，是日由银行公会垫借200万元，钱业公会垫借100万元，以二五附税作抵。

△　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发行短期金库券200万元，以全省各项税收为担保，明年4月还清。

△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张辉瓒率部渡江，沿津浦铁路进展。5日到达滁州。

△　阎锡山宣布废除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将所部山西、绥远各军队改编为晋绥军。

△　苏联职工会中央理事会汇寄10万卢布救济南京事件难民，并致电上海总工会表示慰问。

△　北京政府公布优待比侨办法，大略为：一、依照国际法保护比侨；二、比领事裁判权取消；三、通商税则照现行法。

△　中日长途电话通信是日开始，北京、天津、洮南、奉天、大连、旅顺等城市皆可与日本通话。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讨论对天津各租界警备问题，决定在现状下仍请中国官厅协助维持，至必要时取相当手段。同日，天津英领事布告，租界内居民均应受中国官厅管辖；有涉及仇视阶级、反对外人、阴谋暴动等事者，即拘案严办；中国当局如有要求，均可引渡。

△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训令驻沪总领事矢田，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信心”，应促其迅速采取反共行动。当日，矢田向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转达了币原的意旨，“促蒋深刻反省与注意”。

4月2日　　李济深、黄绍竑应蒋介石急电邀约由粤抵沪，参与蒋介石、白崇禧等清党密谋。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全体紧急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敬恒、李石曾、陈果夫八人出席。通过吴敬恒所提“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决定通知军警机关对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197人分别实行看管监视。对汉口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之决议，认为有疑问，应请中央执行委员按酌事实分别接受或搁置。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蒋介石“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对于外交，未得中央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切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以强迫帝国主义直接与国民政府交涉”。同日，严电申斥蒋介石擅委郭泰祺为上海交涉员，下令拿办郭泰祺并开除其党籍。

△　武汉国民政府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已依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公布，关于总司令之职权，限于该条例所定在前方得指挥军民财政各机关，但任免文武官吏，非经国民政府或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不生效力。

△　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成立，推徐谦、顾孟馀、谭平山、毛泽

东、邓演达为委员。原定订出一个实行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步骤，以“造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后经三次会议讨论，无具体结果。

△　南昌市各界千余人举行群众大会，控诉“AB团”反动罪行。方志敏、邹努等带领工人纠察队占领江西省党部，解散省党部纠察队，先后捕捉程天放、罗时实、关麟徵等30余人。“AB团”首领段锡朋、周利生、王镇寰潜逃，省主席李烈钧逃福建。各民众团体发表宣言，指出：“四月二日，是江西民众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四月二日，是江西民众用民众革命手段来裁判反革命分子的一日。”

△　黄郛向矢田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对日方的意见“表示谅解和衷心感谢”。并称“整顿国民党内部已下决心，现正召集将领仔细讨论中，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黄透露蒋的具体计划首先是解除工人武装，然后由在沪的国民党中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

△　据北京《晨报》讯：天津洋务华员公会为宁案发表宣言，提出七项要求：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撤退中国境内外国军队军舰；三、收回英国租界；四、赔偿宁案损失；五、英美当局向我国道歉；六、禁止外国通讯社传播不正确消息；七、惩戒命令开炮凶手。

4月3日　　汪精卫是日至5日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蒋介石提议：一、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二、分共。汪不赞成立即分共，经反复策划后决定：一、定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问题，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可以拒不接受；三、由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　蒋介石发表支持汪精卫复职通电，内称：“自汪归来，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皆在汪指挥下统一于中央，本人独司军令，俾专责成。”

△　蒋介石阻止上海临时市政府成立，激起市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公愤。后经呈准武汉国民政府，市民政府遂得宣告成立。是日市政府特将此消息通告各国领事。

△　南昌二百余团体群众三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朱（培德）主席改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大会”，会间，纠察队押送程天放到场，群众高呼“打倒反革命”，要求当场枪决，结果由民众团体组织裁判委员会处置。

△　湖北麻城县土豪劣绅利用红枪会策动武装暴乱，残杀革命干部和军民，包围麻城县城。毛泽东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组织学生军300名，于14日开赴麻城，平息暴乱。

△　福州举行所谓“拥蒋护党”运动大会，议决肃清跨党分子等16条。新编一军二师四团党代表范毅威表示反对，竟被挟以游街，旋在南台大桥头被枪杀。

△　湖北省各团体在汉口举行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及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大会，到会群众达50万人，通过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公电、致全国宣言及对各国海陆军宣言。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欢宴国际工人代表团。

△　汉口日水兵两名欲共乘一人力车，车夫以违背警章不允，遭日水兵刺倒于地。群众激愤，起而追捕，擒获水兵六名及嫌疑者四人，押解总工会。日舰水兵竟武装登陆，开枪击毙群众九人，伤八人。酿成汉口“四三惨案”。

△　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上海各团体关于南京惨案代表大会，到

工商学各界80余团体代表百余人，通过发起反英帝国主义大同盟等项决议。大会通电指出：英帝国主义制造之南京惨案比之万县事件，有过之无不及，此系英帝国主义一贯之炮舰政策，此次在宁故意开炮，更为严重，直接帮助直鲁反动军阀，延长中国内乱。一致议决即日起对英经济绝交，望全国同胞扩大对英经济绝交运动，非达收回英租界，撤退英国在华一切海陆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誓不终止。

4月4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代表百余人参加，国际工人代表团亦莅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行《开学纪念特刊》，载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等文件。《宣言》指出该所培养目标为“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6月18日举行毕业典礼。许多学员后来成为湘、鄂、赣等地区的农民优秀干部。

△　蒋介石任命原孙传芳部第九师师长李宝章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

△　福州革命派为抗议反动派举行“拥蒋护党”大会及枪杀党代表范毅威事件在店员总工会组织游行，为军长谭曙卿派兵解散，福州戒严，大捕革命派。

△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汉口“四三”惨案方针：一、避免冲突；二、调查事实真相；三、严重交涉。同日，汉口当局鉴于日兵登陆，形势严重，除派兵防守日租界周围外，由唐生智亲访日本总领事高尾表示歉意，并声明极力维持治安，请日本撤退登陆水兵。日总领事断然拒绝。

△　武汉各团体在市党部召开“四三”惨案紧急会议，全国总工会刘少奇报告惨案情形。一致决议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提出立即撤退日水兵、惩凶、赔偿、道歉等七项要求，并派代表向政府请愿，

与日领严重交涉。

△　国民党湖北省秭归县党部致电武汉政府外交部，报告本月2日英国军舰护送英商轮二艘通过新滩，不服检查，用机枪向岸上射击，死二人，伤26人，请外交部严重交涉。

△　驻北京各国使馆卫队长官在美国兵营开会，会商“防卫”使馆界问题，英、美、法、意、日、荷六国统军长官均到会。英国卫队长谓：北京使馆界内共有英、法、美、意、日五国驻兵1102名，骑、炮兵皆全，可保卫使馆界内各巷口，惟防区之分担及是否增兵华北两问题请公决。大致决定：如必要时，即推美国卫队长官詹贝荪为领袖指挥一切；防区之分配，看将来情形而定；界内各处根据《辛丑条约》，不得容许中国武装兵士闯入。

4月5日　　汪精卫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即《告两党同志书》）。宣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表示国共两党“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当晚，汪秘密乘船赴汉口。

△　武汉国民政府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又以何应钦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程潜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李宗仁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均归第一集团军统辖。同日下讨伐张作霖令，着蒋介石、冯玉祥两总司令各率第一、第二集团军，务于最短时期予以歼灭。

△　蒋介石以总政治部迁移上海后不向总司令部报到，下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派兵前往查封，并逮捕办事人员19名。

△　蒋介石下令将驻上海之第一军第一、二两师调往南京，以原

浙江周凤歧第二十六军接替“沪上防务”。同日，蒋宣布上海戒严。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工农部在各报刊登紧急启事，表示支持上海总工会，要求查究地痞流氓董福开、张伯岐等设立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陈启修、郭沫若、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刘伯承、邓锡侯、廖划平、杨闇公、李筱亭、刘公潜为四川临时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陈启修、郭沫若、刘湘、刘文辉、杨闇公、杨森、李筱亭为常务委员。

△　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方志敏、刘一锋、李尚庸、邓鹤鸣等八人到南昌代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职权。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接胡若愚、龙云等输诚电，即派蒋子孝、邓鸿渠、罗衡等赴滇筹备省党部。

△　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长沙枪决惨杀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主犯李佑文。

△　成都各界代表大会讨论援助“三三一”惨案办法，决定：一、电请国民党中央派专员到川，会同省党部召集民众团体组织委员会办理此案；二、警告刘湘及渝中各将领，不许再有此种惨剧发生，须负责将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监禁，听候查办；三、成立后援会。

△　湖南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并拟定收回长沙关办法五项。翌日，委员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称：请政府暂派员保管税款文件，并遵照中央党部议决案迅予派员接收。7日，省政府派员接收长沙关，洋税务司毕尚将关防文件交出，以后税款解省金库。

△　阎锡山电告赵丕廉：“本日已下动员令，并向省民宣布服从三

民主义。”

△　张学良、韩麟春致电北伐军各将领，颠倒是非，指责北伐军失纪，致引起外舰炮击南京，死伤数千无罪同胞，要求“整饬军纪，保全社会秩序，以回天下之观听”。

△　毕庶澄奉张宗昌电召，由青岛抵济南见褚玉璞。褚奉张令，以毕在沪曾暗通北伐军，贻误大局，即将毕枪决。

△　北京政府阁议停开，阁员只二人，顾维钧报告张作霖，谓政令无从发布，请速备继任人选。

4月6日　张作霖派武装军警300余人，串通北京外交团，包围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搜查苏联远东银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及其他官舍，逮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60余人，抢去大使馆大量档案。驻华苏联代理大使齐尔内赫于事件发生后，亲至外交部访顾维钧提出抗议，因是日适为假日，未晤；午后6时，又派人赴警厅要求立刻释放所捕大使馆人员，警厅未予承诺。

△　晚，张作霖等开紧急会议，商议处置东交民巷所捕全案，决定对刘之龙等非共产党人没收其财产，李大钊等待判决。

△　蒋介石决定四路北伐计划：第一路由津浦路进攻，以程潜、鲁涤平等四个军担任；第二路由陇海路进攻，以李宗仁、陈调元等三个军担任；第三路由京汉路前进，以唐生智所属三个军及刘佐龙部担任；第四路由江北前进，以何应钦、曹万顺等三个军担任。

△　上海总工会纠察队3000余人，在青云路大旷场举行授旗典礼，共产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执行委员会、特别市党部、中国济难会、商总会、学联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83团体出席参观，蒋介石假意赠送“共同奋斗”旗帜一面。

△　蒋介石命令，从本日起，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武汉

各报“妨碍革命”之记载及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有故意违抗者，在戒严期内，应按戒严条例惩办。

△　南昌市举行庆祝克复沪宁郑州及军民联欢大会。会上群众提出六项提案：一、通电国民政府从速收回上海租界及向各国提出从速撤退来华之海陆军；二、质问蒋介石最近摧残民众运动的反动行为；三、要求政府立即下令通缉反革命分子段锡朋、周利生等22人；四、要求政府对已捕之反革命分子按群众意见裁判，严格执行。

△　芜湖市20万民众集会反对陈调元大向商民索饷，纵兵抢劫。

△　午后1时，武昌、汉口人民同时举行追悼“四三”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两地到会群众70余万，一致表示严守革命纪律，督促并拥护政府严重交涉。大会通过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日本租界及惩凶、赔偿、道歉等多项决议案。次日，长沙20万民众为“四三”惨案举行反日大示威。

4月7日　　蒋介石到上海后即商由法租界青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另组“中华共进会”，专事反共。是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获得情报，称“共进会”正准备奇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并解除居住在内人员之武装。奇袭将由青帮分子负责，由便衣士兵协助。

△　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推陈友仁、孙科、徐谦、顾孟馀、邓演达组对日外交委员会，协同外交部办理对日交涉。

△　苏联代理大使齐尔内赫在各报发表昨日向北京外交部所提抗议书，内谓华方军警不应侵入使署进行搜查，军警对于被拘诸人举动极为野蛮，且苛待署中妇女。

△　上海苏联领署被公共租界巡捕、商团包围，出入行人亦被搜查。同日，天津警厅会同法巡捕搜查苏联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苏联使署商务办事处、蒙古贸易公司等机关。

△　顾维钧向苏联代理大使齐尔内赫提出“抗议”，谓俄大使馆区域内，收容中国共产党，“以谋紊乱治安”，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且违犯中俄协定。

△　英国军用飞机数架是晨及午后先后两次侵入上海高昌庙兵工厂、吴淞炮台一带上空侦察。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势力之新发展及应付目前革命之需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并由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8日，上述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

△　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党员为重庆“三三一”惨案，通电指斥蒋介石新任特派四川整理党务人员向传义、吕超、石青阳等嗾使刘湘部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下令枪击群众，死伤无数，同时捣毁省、市两党部及中法、中山、巴师、巴中四校，并高喊“杀共产党”口号，显系出自蒋介石之意旨。

△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军叶开鑫部与第三十三军柏文蔚部克复皖西正阳关。同日，克颍上。

△　奉军占领郾城，任应岐被俘，靳云鹗军退至漯河以南。

4月8日　　蒋介石由沪赴宁，临行前颁布《战时戒严条例》，以白崇禧、周凤歧为淞沪戒严司令。

△　“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以吴敬恒、蔡元培等15人为委员。该会掌握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有权指导当地党务。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三国际代表罗易。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英、美兵舰轰击南京事件，发

表《告美国民众书》，揭露美国步英国后尘，采取武力干涉中国政策，表明美国历次对华宣言毫无诚意。指出今日有人欲向已经奋起力争自由之中国民众作流血之战争，是不可能的，唤醒美国人民制止其政府勿再陷于流血之屠杀。

△　镇江北伐军与孙传芳军隔江炮战。突有英舰二艘，自南京驶往下游，被流弹击中，英舰乃向镇江北伐军开炮，先后发炮80余发，击毁镇江炮台。午刻又有英国军用飞机两架在江阴炮台及停泊江阴兵舰上空，往来飞行达半小时之久。

△　汉口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所有在汉日人工厂、银行、会社、商店一律停业，致使中国工人1.49万余人失业。是日汉口工人在血花世界集会，提出四项要求：一、对日本严重抗议，要求撤退水兵；二、救济失业工人；三、拍卖日本工厂及商店现存之货物；四、请政府接管日本工厂，继续生产。

△　日海军700余人在上海邮船码头登岸游行示威。

4月9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在沪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该电指责武汉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的种种措施和决议，认为有“不合者二”，“可痛心者十一”。电文称：“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望全体同志“共图匡济，扶危定倾”。

△　四川省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联名通电反共。

△　孙传芳委任第四师师长彭德铨兼任联军副司令；是日，彭在江苏淮阴就职。

△　北京警厅会同安国军及外交部开始检查苏联大使馆所捕全案。安国军对该案有交法庭与军事裁判两种主张。各将领复电多主从

严。因之军事裁判说占优势。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苏代使郑延禧提出通牒，指出张作霖搜捕苏联使馆一举，系破坏治外法权，违反国际公法，苏联政府对此严重抗议，并提出下列要求：一、立即撤退监视军警；二、立即释放俄员；三、交还在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并声明在北京政府履行此项要求之前，当召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仅留领事，以示抗议。通牒并声明苏联政府完全了解北京内阁系受帝国主义者之利用，但苏联政府决不受任何方面之挑拨，当尽力防卫两国国民之和平；苏联政府深信此志必受各国劳工连同中苏人民之友谊赞助。

△　北京国立大学九校校长开会议决分途营救李大钊等，推定北大代理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往见张学良，提出如下要求：一、在押各生盼速释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移交法庭办理；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审讯。

△　晨，蒋介石抵南京。午后，暴徒数百人在蒋的纵容下将江苏省和南京市党部捣毁、封闭。省、市党部常委及工作人员侯绍裘、张曙时、戴盆天、高尔柏、刘少猷等俱被殴伤，并被执送公安局。

△　福建全省戒严。厦门警备司令部奉福州政治分会令通缉兴泉政治监察陈文总、罗扬才等11人，罗等六人被捕。是日厦市召开“拥蒋护党大会”，陆战队及“永健”舰水兵数百人游行，高呼“拥蒋迎汪”及“肃清共产分子”等口号。总工会要求释放罗扬才等，取消“拥蒋护党”及恢复工会集会自由，并组织总罢工。下午，工人集会，军警前往制止，总工会被监视，市党部被接收。

△　成都《九五日报》及各工会被清党纠察队捣毁。

△　财政部长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到沪，设立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接理江、浙财政，宋兼任江浙财政处长。同日，蒋介石另委

陈光甫等组织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亦在沪正式成立，陈任主任委员。

△　河南刘镇华镇嵩军李万如率部从陕州（今陕县）向新安东进，在该地强征民国二十年（1931）及二十一年（1932）糟粮，衣服2500套，鞋子3000双，面粉1000袋，缝衣妇500名。红枪会群起反对，镇嵩军发兵镇压，自上月29日起至是日，新安铁门、辛庄等17个村庄被李万如部洗劫一空。

△　上海公共租界百余英兵越界包围大夏大学，侵入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及各寝室搜查并殴伤同学数十人。上海交涉员郭泰祺接受学校及学生陈请，于次日向驻沪英领事巴尔敦提严重抗议。

△　驻外使领由陈篆领衔电北京外交部催款，并要求尽月内筹汇，否则下月将下旗归国。是日，北京外交部电复各使，当即筹汇少数，望勉维现状。

4月10日　蒋介石任命冯轶裴为南京戒严司令，宣布自是日下午6时起，南京一带实行戒严，并公告《戒严施行条例》，凡12条。

△　南京市民举行“肃清反革命派大会”，25万人到会。通过请保护省市党部、总工会、查办公安局等案。随即游行至总司令部请愿，请愿代表数批被扣留，请愿队伍被打散。当晚，侯绍裘、谢文晋等开会商议应付办法，亦被捕送公安局看管。

△　蒋介石电令解散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蒋在电中指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少数投机少年所独占”，总政治部的宣传训练等工作，“破坏国民革命军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为防止其军队“受蛊惑而分离，因分离而崩溃”，特下令封禁。

△　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奉蒋介石密令，以特别戒严为由，先派

兵包围宁波市党部，次又派兵搜查总工会、农民协会及民国日报社，捕去市党部常委杨眉山、总工会委员长王鲲、《民国日报》经理庄禹梅。事件发生后，王俊派兵禁阻召开市民大会，与群众发生冲突，结果群众伤亡20人。次日，宁波全市罢工、罢市、罢课，通电抗议王俊暴行。

△　后方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应邓演达电召自广州赴鄂，准备出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12日，李济深令公安局逮捕孙炳文，不获。13日，李济深以总司令名义委任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曾养甫为总政治部留守主任。

△　阎锡山日前在军署召集会议，筹商改组省政府，已推定阎锡山、商震、南桂馨、徐永昌、王世卿、罗任一、郭载阳、台林一、李勉之为省府执行委员，赵戴文等六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并决定先布置军备，巩固省防，一面即改组内部。是日，阎锡山下令取消北京任命之督办名义，自翌日起以“晋绥总司令”名义统辖军民两政。

△　驻汉英国领事以英、美、日、意、法五国代表名义至国民政府外交部，约期面晤陈友仁部长。陈答须遵守三条件方允接见：一、非联合通牒；二、接见不能认为是接受通牒；三、此次接见不能成为后来的成例。

△　上海交涉员郭泰祺为英国军用飞机于7、8两日在我国作战戒严区及机要重地上空擅行侦察一事，致函驻沪英总领事巴尔敦提出严重抗议。英方置之不理，飞行如故。27日又提第二次抗议。

△　直鲁军配合孙传芳在津浦路反攻，是日进迫浦口。

△　张宗昌令山东勒征两个月军饷，除由各征收机关筹垫若干外，计划发行盐余公债400万元，以山东盐余作担保，分两年偿清。此外，省政府并令盐商垫交八厘税金100万元，限半月缴清。

△　据上海《时报》讯：沪总工会所组织之儿童团，全市已有1.2527万人参加，团员年龄约为七岁至16岁。

4月上旬　　阎锡山连发三道命令：一、令军队信服三民主义；二、宣布太原戒严，严禁暴乱之徒扰乱治安；三、取消亩捐，另定公允办法。

4月**11**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电蒋介石等停止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

△　苏联代使齐尔内赫向顾维钧提出抗议，要求撤退使署军警，释放被捕职员，发还文件，并声明撤回驻华大使，但仍维持和平。

△　陈友仁在汉口分别接见英、美、法、日、意五国代表并接受各该国同样内容的通牒。通牒内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向外交部及蒋介石分别提出立即解决南京事件的条件：一、统兵各司令负杀害侮辱损毁之责，予以惩办；二、总司令书面道歉，并负责制止各种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之暴动与鼓噪；三、完全赔偿个人之伤害与物质之损毁。并称：假令国民政府不能使有关系各国认为满意时，关系各国将不得已采行其认为适当之方法。同日，英、美、法、日、意五国驻沪总领事访交涉员郭泰祺递交同一通牒，并向新闻界发表一文，将其制造惨案之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　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通电反共，动员其党羽“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消灭共产党。

△　晚8时，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骗至法租界，旋被暗杀于枫林桥。

△　杭州职工联合会伙同士兵搜捕省党部之丁济美、戴学南等20余人，并押同游街，高呼“打倒把持政权的跨党分子”等口号。总工会及其纠察队被解散，党务养成所亦被封闭。同日，杭州军警当局以共

产党嫌疑捕去查人伟等19人。

△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电告各省党部农民部就地择期举行农运宣传周。

△　北京国立九校当局在北大三院开会讨论经费问题，决定如一星期内政府毫无办法，则九校立即提出总辞职，呈请教育部接收。

4月12日　　上海发生“四一二”清党。晨4时，白崇禧在上海亲自执行蒋介石清党大屠杀密令。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发出信号，公共租界出动大批“共进会”组织的武装流氓，袖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分头袭击闸北总工会会所，以及南市、沪西、浦东、吴淞、江湾等14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发生激战。事前在这一带布岗、巡逻的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武装官兵，借口工人“械斗”，以维持、援助为名，将“双方”枪械收缴。二十六军部分军队还直接参加屠杀。上海2700名武装工人纠察队全部被解除武装，总工会会所也被占据。上海工人死伤达300余人。反动派出动流氓及军队在1.5万以上。全沪工人和市民纷纷集会要求惩办祸首，发还枪械。数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开大会后游行，并一举夺回总工会会所。总工会立即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议决即日宣告全市总罢工，以示反抗。南市体育场群众大会有30万人参加，会后冒雨到龙华向白崇禧请愿。

△　蒋介石、李济深电粤省党部、省政府，对中央迁鄂后一切命令，不准执行。是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致电武汉中央党部，拥护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国民政府迁鄂决议案。

△　北伐军在津浦路失利，定远、寿县相继失陷，直鲁军自寿县进迫合肥，张宗昌军队亦迫近浦口，其飞机向浦口及南京投掷炸弹，两军夹江对峙。

△　江北孙传芳军在瓜洲、泰兴集中，准备渡江进攻沪宁线北伐军。是日，泰兴孙军一部向南岸出动，用民船载运过江，被南岸北伐

军机枪扫射，不逞折回。

△　武汉国民政府布告，蠲除河南人民一切苛税杂捐，并承认红枪会为河南人民自卫合法武力，准许购枪自卫及保存所俘奉军枪炮。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天柱、赵恩绶、邓寿荃、董维键、唐生智、李荣植、张翼鹏、夏曦、吴鸿骞、朱剑帆、凌炳为湖南省政府委员，以冯、赵、邓、董、唐、李、张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司法、土地各厅厅长。

△　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接收岳州关。岳州税务司阿客海出境。同日，湖南省政府因长、岳两关概行收回，为统一财权起见，特电国民政府速派两关税务司正式接办。次日，汉口税务司费格逊来电干涉，要求将长沙关税收汇交总税务司，非经总税务司许可不准支付。15日，长沙关代理税务司魏荔洲去电驳复称：非本国政府命令，概不接受。

△　安国军发表文告，声称苏联大使馆内搜获之文件，内有在中国各地的苏联军事专家及密使之报告，苏联军事专家与国民军、国民党领袖之函件等等。

△　北京警察厅释放上月所捕学生19人，尚有14人在押。是日，北京公、私立25所大学校长开会议决，要求将未释学生速送法庭。

4月13日　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各业工人不顾蒋介石高压，热烈响应号召，参加罢工人数约计在20万人以上。

△　上海总工会为纠察队被缴械事，通电全国揭露军事当局与帝国主义勾结，发动四一二政变真相，同时电南京质问蒋介石“曾表示承认此民众的武力，何以今日竟发生此类似军阀之行动”？要求：一、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械及所抢衣物银钱文件；二：保护上海总工会；三、惩办下令攻击纠察队的军事长官；四、惩办流氓，肃清一切

反动派；五、向帝国主义者抗议指使流氓由租界武装进攻纠察队。

△　上海总工会为纠察队被缴械事，上午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游行请愿，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即遭第二十六军开枪屠杀，立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反动派为掩盖其血腥罪行，立即下令戒严，禁绝行人，用大卡车把死者运往荒郊埋掉，重伤未死者，亦竟被装往郊外活埋。南市工人群众举行示威，也遭到反动军队开枪射击，被打死工人十余人，伤数十人。是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表第二次宣言，号召全沪工人坚持总同盟罢工，誓死奋斗。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上海驻军将工人纠察队包围缴械严重事件电蒋介石、白崇禧，指出：一、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应依法予以严重处分，并饬令退还纠察队枪械；二、令将肇事部队官长拘捕惩办。

△　上海总工会纠察队被缴械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即委派董福开、张伯岐等14人为专员，占领总工会会所，宣布取消上海总工会，并于是日成立“上海工联总会”（后又改名为“上海工会统一组织委员会”），委邓禹为主任，专事镇压、破坏工人运动。

△　蒋介石委黔军袁祖铭旧部李燊为第四十三军军长，胡刚为副军长。

△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市政收回直辖，另组市政委员会，是日任命陈友仁、苏兆征、陈公博等11人为委员。16日，由武昌市政厅、汉口市政委员会、汉阳市政委员会合并组成武汉市政府。

4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萧佛成、柏文蔚、陈果夫、甘乃光、黄绍竑等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胡汉民主席，决定全体委员会于4月

15日上午10时举行，并电催汪精卫等来宁。

△　郑振铎、胡愈之等以目击者身份就昨日宝山路发生的大惨杀，致函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等，抗议反动派血腥屠杀。抗议书指斥“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段祺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严正要求蒋介石：一、严惩此暴行中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二、保障军队不向徒手民众开枪射击，军队不干涉集会游行。

△　上海国民党临时政治委员会派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潘宜之、吴倚沧、罗家伦为上海市党部指导委员。在陈群等人的指使下，军警分头出动搜查和封闭上海临时市政府、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和中国济难会等机关，共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1000余人，全部解送龙华东路军总指挥部扣押讯办。市党部成员多数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　沪杭甬路及沪宁路沿线松江、嘉兴、湖州、宁波、苏州、无锡、镇江等县市国民党党部均被封。

△　上海学生联合会议决罢课三日，要求当局发还工人枪械。

△　陈友仁将武汉国民政府关于南京事件的复文，送交驻汉英、美、法、意、日五国总领事，略称：国民政府对于各国侨民所受损失准备给以适当与必要的赔偿；关于惩凶与道歉，应由政府派员或组织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后再行交涉。对英复文提出五卅、沙面、万县三案，对法复文提出参加沙面炮轰案等，要求一并加以调查。复文并指出，“切实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之最好保障，在除去中国与列强现仍保持不平等条约者间现有纷扰之根本原因”。

△　杨增新函北京政府，谓新疆与俄国所订局部临时协定已告成，请予核复。

△　上海英兵80余人搜查中华法政大学，学生多人受伤，物件亦遗失很多。学生全体大会决议，请交涉署对英严重抗议。

△　靳云鹗、魏益三率部连日反攻许昌，奉军损失甚重，几濒于危。韩麟春急调第八军万福麟部南下应援，是日万率3000人离郑赴许昌。

4月15日　广州发生“四一五”大逮捕。李济深自上海赶回广州积极布置清党，是晨2时起广州戒严，钱大钧首先派出军队控制电报、电话，随即包围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等地，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等地则由公安局派保安队搜索，总计被捕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共2100余人，黄埔军校是李济深的清查重点，逮捕500人。22日，刘尔崧、李森、萧楚女、何耀全、沈春雨、刘剑雄、邓培、容保辉、陈辅国、熊锐等11名共产党员遇害。

△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原订是日在南京召开，因武汉方面委员未到，改开谈话会，柏文蔚主席，依据萧佛成之提议，决议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及政府。

△　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电各中央常务委员，促刻日遄赴南京执行职务。

△　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昨日上海警察厅又发布查禁工人集会命令，于是各工会组织均被查抄封闭，工人集会与罢工概以“反革命”论罪。截至是日，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及革命群众被捕者500人，被杀害300人，逃亡失踪者5000余人。为避免无谓牺牲，总工会颁布命令，于是日召开追悼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大会后，一律忍痛复工。命令指出：“此后本会仍本初衷，领导全上海工友作政治与经济的奋斗。各工友仍当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死难烈士之精神不死，全上海工友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继续死

难烈士之精神以奋斗。”

△　汕头代理潮梅警备司令罗权奉蒋介石密令，于是晚10时许紧急戒严，断绝水陆交通，搜捕共产党员。首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枪支缴去，接着搜查各工会、农会，捕去市党部执行委员李春涛等三四十人。外交后援会、岭东《日日新闻》等亦同时被钉封。次日又钉封工会、农会、商民协会等80余所，捕去工会重要人员50余名。

△　湖北全省总工会通电讨蒋，痛斥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纠察队；破坏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省市党部、总工会及各人民团体，惨杀陈赞贤；破坏上海民主市政府等革命机关，惨杀汪寿华；破坏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并勾结帝国主义分裂革命运动种种罪行，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撤职查办。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叶挺兼管武昌卫戍事宜。

△　武汉国民政府特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苏兆征为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25日，公布《战时经济委员会条例》，凡八条。

△　蒋介石委刘纪文为南京市市长。

△　李景林在天津日租界招募别动队，密谋响应北伐军，事泄，乘轮逃日。天津当局奉张作霖令是日前往截阻出口日轮“长安丸”，军警登船搜捕，仅搜得李景林部属及前绥远都统马福祥数人。张作霖悬赏两万元捕捉李景林。日公使芳泽当晚赴北京外交部访顾维钧面递抗议，要求放行船只，所受损失要求保留交涉权利。18日，李景林部八人被直隶省会军警督察处捕获，在津枪决。

4月16日　汪精卫在武汉致电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中央命令，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反抗中央。

△　汪精卫在武汉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讨论应付时局方法。18日，决定先行北伐。

△　湖北省农民协会通电讨蒋，指责蒋介石反抗中央、压迫党部、摧残工农兵、背叛孙中山、背叛党等12条罪状，表示誓率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的同胞，“与此獠决一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

△　广东北江农会和海员工会等联合陈嘉祐部，在韶关宣布脱离广东省政府，同时收缴第五军驻韶部队枪械，扣留韶关中央银行50万元，组织广东农民总指挥部及南韶连政务处，动员各界组织党权运动大同盟。20日，李济深派队镇压，并调广西军队前往协助。

△　上海商业联合会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蒋介石清党主张，“愿为后盾”。

4月17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加派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九人为政治会议委员；复推选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于本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

△　陈友仁致驻汉日本领事高尾建议书一件，提出：一、国民政府与日本成立相当妥协，日本须恢复长江流域旧日之态度，国民政府并严厉取缔排日运动；二、日本脱出五国联合通牒，对于国民政府外交上问题，须根本采取独立性质；三、国民政府与日本在列国对复牒未有表示前，即组设宁案调查委员会，双方互派代表在发生地点谈判，解决一切问题。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令郑延禧复照苏联政府，诡称：苏联外交等机关人员图谋颠覆驻在国政府，破坏驻在国秩序，故不得不取断然之处置，且按国际法遇事实上必要时，检查使馆亦非绝对不许之事。

△　武汉国民政府为打破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者经济封锁，是日特下令禁止现金出口，并颁布《集中现金条例》，封存各银行之现金400多万元，规定凡完纳国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汉口通用钞票为限，凡持有现银或其他商业银行纸币者，准换成以上三行钞票使用，一律不兑现。次日，上海银行公会议决即日与汉口各行暂停往来。20日，北京银行公会电上海银行公会取一致态度。

△　上海银团续垫借300万元，以二五附税作抵，供蒋介石军需及苏省政费之用。

△　武汉国民政府议决发行直鲁豫陕国库券900万元，分三个月发行，每月发行300万元，流通市面，与现金一律行使。

△　梧州军警当局奉令逮捕共产党人，解散苍梧书社。

4月18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午9时，政府委员蒋介石、吴敬恒、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宾、蔡元培、邓泽如、李石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伧等举行就职典礼。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建都南京宣言》。同日，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建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蒋介石、吴敬恒、胡汉民等莅会并发表演说，通过“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严厉取缔跨党分子”、“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等案。会后举行游行和阅兵式。

△　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密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和国民党“附共分子”197人。通缉令称：“查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

△　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称：“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

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又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　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通令各区郊警署，检查界内书肆书摊，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书籍发行。又令此后凡到新书，务须先送警厅审查，始准售卖。

△　天津戒严司令部奉命将今春在英租界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捕获之革命者赵遵三等15人就地枪杀。

△　张作霖委徐寿椿为第二十二军军长，是日徐在河南赊旗镇就职。

△　晨，江北直鲁军炮击南京下关，北伐军散兵壕数处被毁。上午9时在浦口上游四英里处又发生激战，鲁军炮弹命中北伐军“永绩”舰尾。北伐军发炮还击。停泊江面英舰“满梯斯号”以机枪射击北伐军，炮声始息。

△　《中日通商条约》至本月19日届期，是日第十五次中日商约会议议决延长三个月。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及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委员全体出席阅兵。唐生智任总指挥（名义是第四方面军），统率三个纵队。以张发奎为第一纵队司令官，任右翼，指挥第四、第十一两军及贺龙独立第五师，经汝南、上蔡攻开封、归德；以刘兴为第二纵队司令官，指挥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两军向京汉路正面前进；以新收编的河南保卫军田维勤、靳云鹗部及暂编第三军梁寿恺、暂编第五军庞炳勋、新编第十四师安俊才、新编第十六师张万信等部为第三纵队任左翼，沿京汉路西侧地区前进，限4月29日前集中完毕。总计武汉政府攻击部队人数

共六万，步枪4.5万支，参加抗击郑州以南号称奉军精锐之14个旅七至八万人，步枪五万，大炮500门，坦克10余辆。

△　自是日至5月6日，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共举行五次扩大会议，正式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出席人数最多者为40人，代表15个省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致认为理论上土地须全数收归国有，但根据目前客观情况，只能做到政治的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尚未能完全消灭。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中央只能规定一个原则，详细办法应由各省酌情自行拟定。会议通过决议案多项：一、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二、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三、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问题；四、佃农保护法；五、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六、处分逆产条例；七、解决土地问题等。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提交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时，又决定暂时保留，不予公布。

△　南京举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两部：一、财政部，推定古应芬为部长；二、外交部，拟推伍朝枢为部长，伍未到任前，仍由代部长陈友仁负责，办理宁汉交涉。

△　贵州周西成突于是日自铜仁进驻湖南辰州（今沅陵），与袁祖铭旧部将领会议，决定向长沙进兵。驻辰州黔军刻向常德前进。常德黔军王天章、毛鸿绪两师，已向长沙进发。唐生智急令何键返湘，调集各军防御黔军。

△　苏联代理大使齐尔内赫率馆员30余人离北京返国。21日，北京英、美使馆接收苏联使馆管理权。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电贺南京政府建都南京。

△　上海拥蒋之各界召开“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通过拥护中央执监联席会议，驱逐鲍罗廷，通缉徐谦、邓演达等决议。江、浙各地亦开同样大会。

4月20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支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关于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

△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委员会主席陈光甫暨委员陈其采、钮永建、虞洽卿、汤筱斋、汤济沧、吴震修、王晓籁宣誓就职，即开首次会议，讨论整理江苏省财政事宜。

△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等为重庆“三三一”惨案致武汉国民政府呈文称：假革命刘湘，昔称臣于袁氏，乃帝制之余孽，屡构衅于川战，实四川之祸魁。自任革命军长之后，犹阳奉阴违，近复乘重庆各界反英大同盟开会之际，勾结右派，制造3月31日大屠杀，罪恶滔天。应请中央政府免其军职，明令讨伐。

△　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率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开赴河南驻马店。29日，第一纵队指挥官兼第四军、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率十一军到达驻马店。

4月中旬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武汉。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临时中央，连电催促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赴汉，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问题都应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汪陈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离开上海赴武汉。本月中旬，中共中央机构正式移驻武汉。

4月21日　武汉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努力完成北伐及肃清蒋介石等叛党分子。电称：“沪宁克复，长江肃清，已取得革命工作第一期之胜利，但张作霖、张宗昌恃帝国主义者之后援，盘据直鲁关外各省。而反革命派蒋介石等又复甘心叛党，在沪宁粤一带，屠

杀革命民众，使已得解放之东南人民，再入痛苦之境地。我国民革命军，承总理之遗训，受党国之重托，为解除全国人民痛苦，完成北伐起见，已在武昌南湖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尚望全国民众及我革命将士，一致努力，以竟全功。”

△　蒋介石通电宣布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于本日开始办公，否认武汉中央政府。

△　广州发现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香港总工会等五团体署名之布告，号召全市工友为反抗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摧残和恐怖，于22日举行政治总同盟罢工一天。当局当晚捕去80余人。22日又枪杀散发传单者五人，但仍有部分工人罢工。23日各报停刊，海员、轮渡、油业等工人一律罢工。

△　张宗昌令山东省财政厅向各县征收军事特捐1000万元。

4月22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斥责蒋介石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抵沪以后，与帝国主义妥协，借反共产为名，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派吴倚沧、靳鹤声、左景烈、洪轨、甘家馨为南京市党部改组委员，接管该党部。

△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陈光甫等由宁抵沪，下午即会同在沪委员开第二次会议，继续筹划财政事宜，并决定设沪宁分会。宋子文原设之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及附设之江苏财政处撤销。

△　九江工人举行反对蒋介石示威，部分军队亦加入。卫戍司令贺耀组部与反蒋军队发生冲突，两军在九江市内开枪互击，死亡10余名。贺耀组宣布全市戒严，禁止游行集会。

4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召集武汉各界在阅马厂举行讨蒋大会，除全体学生外，第四军、第八军、第十一军、第十五军及武汉各团体百余，共40万人参加。

△　驻汉日本副领事访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陈公博商议维持商业、交通问题。当经外交部、总工会及日商业会社代表等谈判，决定日商准于本月27日复业。

△　湖南省政府发行不兑现之省金库流通券50万元，以募集之省银行股款为准备金，俟省银行开幕发行票币时，即行收回。是日公布条例九条。

△　北伐军由南京幕府山用大炮向浦口猛轰，鲁军铁甲车及大炮均被击毁，死伤甚重，丧失战斗力。

4月24日　蒋系海陆军将领由何应钦、杨树庄领衔在南京发表陆海军会议宣言，公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反共、一致完成“北伐”等六项议决案。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严防帝国主义者挑衅，通告各党部、各军政治部、各工会、各农会宣传外交政策，略谓：中央为应付此严重局面，已制定战时外交策略宣传大纲，并组织武汉各界临时联合会指挥一切。惟尚须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一致动员，集中全部精力向民众作广大宣传，方能使中央外交政策得民众之拥护。

△　蒋介石改委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为南京戒严司令兼沪宁路要塞司令。

△　云南国民党省党部正式成立。胡惹愚、龙云等九人为执委。

4月25日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　蒋介石以吴敬恒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陈铭枢、刘文岛为副主任，是日三人于南京就职。

△　北京当局对李大钊案决定组织特别法庭，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组成，性质属军事范围。是日特别法庭在警察厅正式成立，安国军总司令部委何丰林为审判长，各方面所派人员共13人。

△　黄埔学生军到宁共1000余人，自第二十一师严重部队开往苏州、昆山一带，随去约300余人。余下在宁不过700人，已在成贤街组织黄埔同学会，会长蒋介石。该会之黄埔学生是日成立清党委员会，从事清党反共。

△　杨虎、陈群在各报发布命令，悬赏缉捕共产党人及工人运动领袖林钧、王守谦、余泽鸿、吴广吾、李泊之、朱义权、龙大道等20人。

△　上海商业联合会募集300万元，为蒋介石军队“筹饷慰劳”。

△　在彭湃、罗绮园领导下，古大存、宋魏公等集合武装农军5000余人，是日在广东五华县属安流渡地方游行示威，高呼“拥护汉口联席会议”、“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并声明组织苏维埃劳农政府，实行农工专政。5月8日，五华县省港澳工商联合会电请广东省政府“迅派得力军队围拿究办”。

△　接收天津英租界委员会在北京开会，北京政府外交、内务、财政、司法四部，每部二人，安国军委员六人，委员长吴晋、总参议杨宇霆均出席。会议由赴津各委员报告谈判经过，并讨论业经中英签字关于接收英租界之草案。

△　南京方面之李宗仁、王天培军对驻九江之武汉方面朱培德军从事防御。在津浦路作战之鲁涤平军全部与程潜军一部表示服从武汉

国民政府，潜行退至安徽，图袭取南京。

△　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外交部、湖北总工会等代表与日副领事商定非正式解决“四三”惨案条件六项：一、日本撤兵，并撤各种防御武器；二、日商复业，发给华人工资；三、国民政府撤退驻防华界军警及纠察队；四、工人绝对服从政府命令，决不仇视日人；五、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六、“四三”案保留，俟至适当时期，再开谈判。

4月26日　南京政府通电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反共议决案：一、对各地共产党首要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二、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产生之机关所发之命令，一律否认。

△　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等七人前在粤以勾结陈炯明嫌疑被捕，软禁于虎门炮台，是日南京政府议决释放，电粤执行。

△　南京政府任命钮永建、何应钦、叶楚伧、白崇禧、杨树庄、陈铭枢、郑毓秀、朱炎、高鲁、张乃燕、陈和铣、甘乃光、陈光甫、何玉书、贺耀组、张寿镛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钮永建兼民政厅长，何应钦兼军事厅长，叶楚伧兼建设厅长，陈光甫兼财政厅长，张乃燕兼教育厅长，陈和铣兼司法厅长，甘乃光兼农工厅长。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派张静江、蒋介石、蔡元培、何应钦、周凤歧、庄崧甫、陈其采、马叙伦、蒋梦麟、邵元冲、朱家骅为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该会即日成立。

△　政治会议上海分会议决限钱永铭、虞洽卿、冯少山、王震、潘宜之等克日前往接收上海总商会，并通令缉拿该会会长傅筱庵，押解戒严司令部讯办。

△　湖南各界在长沙举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讨伐蒋介石示威运

动大会。全城罢课、罢工、罢市，参加人数达20万之多。

4月27日　是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万余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出席大会。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闿亦应邀出席。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和《职工运动议决案》等。陈独秀仍被选为中央总书记。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关于指导江西、湖南党务案》，派陈其瑗为江西特派员，林祖涵为湖南特派员。

△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率全体官兵致电武汉国民政府，痛斥南京伪政府。

△　南京政府任命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为东南大学校长，褚民谊为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周凤歧兼任浙江军事厅厅长。

△　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改称浙江省务委员会，是日成立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暨各委员、厅长就职。

△　武汉国民政府为肃清反革命，特组织武汉保安委员会，并公布《武汉保安委员会暂行条例》。该委员会由国民政府委员代表、外交部长代表、武汉公安局代表、武汉卫戍司令及总工会纠察队代表等组织之。该会有审判及处决在武汉逮捕反革命犯之权，惟执行死刑须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

△　李济深在广州召开“清党及庆祝迁宁大会”，发表所谓《护党救国宣言》。各马路密布军警，搜查行人，公安局门前交通几断。

△　吉林省为安置30万直隶、山东出关难民，特订定安抚冀鲁难民办法。

4月28日　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是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以“扰乱治安”罪宣判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张挹兰等20人绞刑。同日下午在警察厅看守所执行。李大钊临刑时神色不变，首登绞台，从容就义。次日，特别法庭续判舒启昌等10人徒刑。

△　新编第五军军长叶开鑫在宁改就蒋介石所委第四十四军军长职。

△　蒋介石令杜起云将驻南京附近程潜第六军第十九师杨源浚部三个团解除武装。

△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任潘宜之、陈群、吴倚沧、汤济沧、黄惠平、冷欣、陈德征、冷隽、俞国珍、张晴川、周志逸为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并指定潘宜之、陈群、吴倚沧为常务委员。

△　国民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在鄂成立，该会宗旨为“执行国民党之政纲，发展农民组织，解除农民穷苦，并建立国民革命军与农民之亲切合作”。

△　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出布告，嗣后凡有汉口地名之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不得在他省兑现。次日，南京政府通电，令长江下游各地禁止现金运往武汉，并禁汉票在各地行使。

△　广州无线电台成立，此后沪、粤消息可用无线电直接通讯，不必再经香港水线传递。

4月29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凡12条。该会为南京政府军事最高机关，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交“国民政府”特任；互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中选一人为主席；在战时得设革命军总司令，由中央执行委

员于军事委员中遴选一人，由“国民政府”特任。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组广州政治分会，任古应芬、李济深、黄绍竑、戴季陶、陈孚木、甘乃光、陈可钰、朱家骅、李福林、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何香凝13人为委员。

△　南京政府任命周西成、何应钦、王天培、李燊、周恭寿、李仲公、熊逸滨、杨元桢、彭俊、窦觉苍、平刚、杨权、熊杰、傅启钧、马空凡15人为贵州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　蒋介石令白崇禧将驻镇江程潜第六军第十七师邓彦华部包围缴械。后该部改编归白节制。

△　唐生智由武汉出发赴河南前线指挥第二期北伐部队。

△　安徽太湖民众二万余人举行反蒋示威运动。全城罢市、罢工、罢课，乡间农民亦前来参加。通过决议案，一致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打倒叛徒蒋介石，取消南京伪政府。

△　上海交涉员郭泰祺正式照会各国领事，并转达各国政府，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已于18日成立。

△　英、美、日、法、意五国公使在北京日使馆会议宁案第二次通牒事。英使对华态度依然主张强硬，法使反对武力对华，日使支持法使主张。决定取消前次起草之通牒，另行起草，词句改采缓和。

4月30日　武汉国民政府电冯玉祥称，国民政府已下讨奉令，任冯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已令唐生智所部于本月15日以前集中汝宁、驻马店一带；第三方面军李宗仁部已达蚌埠，第一、第二方面军何应钦、程潜部正衔尾由津浦线北进，嘱冯军即日出关会师。

△　广东东江共产党人联络农军，集中海陆丰及潮阳、揭阳、普宁各地准备起义。其在海陆丰者系由彭湃领导，吴振民为总指挥。是

日农军在海丰成立农民政府，颁发拥护武汉中央政府口号，实行去年国民党联席会议决议案。5月9日，农民政府因力量孤单，被惠州警备司令胡谦派兵一团解决。

△　于珍坚辞奉军第十军军长及北京卫戍司令职，张作霖命王树常暂代第十军军长，王是日在开封接任。5月23日，邢士廉正式代理京畿卫戍司令。

△　北京警察厅布告禁止秘密结社，限令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革命青年社、新滇社、革新社、琼岛魂、琼崖协进会、中山学社、新中学社等团体即日解散。

△　收回天津英租界交涉，驻津英领事詹姆生提出二条件：一、工部局所发行之600万元公债，须中国承认偿还；二、以前所有英国人职务，租界交还后一律蝉联，不得更动或降黜。是日安国军外交处处长吴晋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应付办法。

△　吉林省临江农商教育会等为日人谋在临江设立安东领事馆分馆事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略称：临江向无日侨，本无设领之必要。彼之垂涎者以临江地居鸭江中枢，其用意无非扰我沿江政权，排我经济发展，请外交部予以拒绝。

是月　英、日等国为保持其在华特权，对武汉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实行经济封锁，如故意停闭工厂、银行；唆使奸商、买办向中央银行挤兑；将大批现金偷运上海；图谋从武汉运出燃料、食料等等。截至4月份，由于货运稀少、码头冷落等原因，武汉失业工人已不下30万人。武汉政府特设湖北失业工人救济局，每人每日发洋二角救济。

△　驻津美领事白格通知直隶交涉署称：奉美使训令，放弃1880年中美条约规定之观审权，凡美人控诉华人之案，由中国新式法庭审理。

5月

5月1日　　冯玉祥在西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任石敬亭为总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吴锡祺为参谋处长，张自忠为副官处长。冯并将该集团军之编制及部署通令各将领：一、中央军直辖六路又三师、骑兵四旅、炮兵一旅，由冯亲率，经灵宝、陕州、洛阳向郑州前进；二、东路军总司令刘镇华直辖四路，由孟津渡河，绕攻京汉路郑州之后方；三、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直辖两路又两师及五旅，集中雒南，经卢氏、洛阳前进；四、右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直辖本路及三旅，又汉中张耀枢师集中龙驹寨、荆紫关一带，经南阳向郑州前进；五、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直辖本路及第九路之一部，由陕北假道晋境，出娘子关，攻敌后路；六、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直辖第七路及三独立师，集中宁夏石嘴子，待命出发。

△　蒋介石决定三路“北伐”作战计划：第一路以何应钦任总指挥，统率第十四、第十七军及第一、第二十六两军之一部，由镇江、常熟渡江北上，肃清江北；第二路蒋介石自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前敌总指挥陈调元，统率第一军之一部及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军并第六军之一师，由浦口渡江北上，任津浦路正面作战；第三路以李宗仁任总指挥，统率第七、第十、第二十七、第四十四及第十五各军之一部，与原在皖北之第三十三军、马祥斌、王金韬之独立师，由芜湖渡江袭津浦路直鲁军侧背，北上解六安、合肥友军之围，联合进攻陇海路。限5月8日集中完毕，10日开始攻击。

△　唐生智抵驻马店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攻击奉军计划，并赴前线视察。同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部由广水至驻马店集中，会合靳云鹗部向郾城、漯河之奉军攻击前进。

△　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等致电质问汪精卫到武汉后与前在沪言行何以判若两人，

并分电促孙科及宋庆龄离汉赴宁。

△　广东省军事厅成立，徐景唐任厅长。总司令部后方办事处结束。

△　陕西全省总工会在西安开成立大会，到会30余团体工人1000余人。大会通过关于宣传教育、统一工会组织、接受全国总工会决议案、接受国民党对工人政纲等九项决议，及致全国总工会和赤色职工国际以及拥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蒋介石之决议等电，并通过章程，选举张含辉等13人为执行委员。

△　张学良、韩麟春电北京张作霖，报告收编豫军情形及改组后新名义：李振亚部为第十九军，于学忠部为第十二军，张治公部为第二十一军，徐寿椿部为第二十二军兼暂编第三师，阎曰仁部为第二十三军，郭振才部为暂编第一师，李鸿翥部为第二师，李光藻部为第四师，马文德部为第五师。

△　开封中州大学因外人告密暗通北伐军，被军队捕去教职员及学生20余人。10日，开封警备司令宣布，除校长曹理卿等五人外，余准开释。

△　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华比使商议接收天津比租界事，拟先在北京开一非正式会议，再在天津开正式会议，比界地亩决备价收回，码头、马路、工部局房屋亦拟给价。

5月2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其要点为：凡作战之陆、海、空三军，均归总司令指挥统辖，未加入作战各军由军事委员会直辖，必要时总司令得咨请调遣之。战时政务委员会由政府特派民政、财政、交通、外交等部人员组成，受总司令指挥，处理作战区域内政务，并任作战上各种要素之筹备调节分配。

△　江苏省政府在南京成立，省政务委员钮永建等10人就职。

△　南京政府任命方声涛、杨树庄、陈季良、郑宝菁、陈培锟、丁超五、宋渊源、谭曙卿、张贞、卢兴邦、殷汝骊、黄琬为福建省政府委员。方声涛兼军事厅长，陈培锟兼财政厅长，黄琬兼教育厅长，丁超五兼建设厅长，郑宝菁兼民政厅长。

△　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告工界书》，宣布新劳工政策16条，内称每日工作八小时，加增工资，但须以不得“破毁”工业为前提，并称反对共产党鼓动罢工，解散上海各共产党工会。

△　广东北路总指挥钱大钧率部进攻韶关陈嘉祐军。陈以英德已陷，3日率队退出韶关，7日由乐昌九峰退湖南郴州。钱大钧乃入据韶关。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段国璋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

△　长沙市民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主席朱剑凡报告指出：此次市民会议是全省之第一次，全国之第一次，不仅为省民会议之基础，且可为国民会议的基础。

△　山东省当局将鲍罗廷夫人及其他三名苏联人员由济南押解北京。

△　苏联政府向驻莫斯科中国代办郑延禧声明，闻由苏联大使馆附属机关内捕去之俄员有将受军法会审之消息，其结果或恐与李大钊等陷于同一命运，如有上述情形，苏联政府将认为重大之事情。同日，郑延禧将此项声明转达北京外交部。

△　北京中日商约第十八次会议，对最惠国待遇及互惠协定，芳泽强要广义的互惠，顾维钧主张互惠货税，最惠待遇须有限制及确定范围。

△　英、美军舰各一艘开至江阴拦门沙，向南岸驻军开炮猛击，死伤颇多，毁屋无算。国民党江阴县党部电蒋介石等要求扣留该舰，并请严重交涉。

△　奉天日商制麻会社职工约40名要求加薪。日警署以“煽惑罢工，宣传过激”为词捕去二人。3日，织布工300余名散发传单，同盟罢工。4日，棉布职工百数十名参加，日警署又捕去四人，拘禁拷问。5日，全体参加罢工，日警先后拘捕工人13人。

5月3日　　晚，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朱绍良议北伐作战计划，提出先向津浦路前进，再右旋以迫胁江北逆敌于海滨。

△　上海交涉员郭泰祺为上海外军非法搜查大夏大学，割断中国地之电话线，越界侦察、筑垒、屯兵、飞行及捕人等事，再次向驻沪外国领团提出书面抗议。

△　北京汇丰银行以该行华人经理邓君翔亏款匿迹为由，拒付各行4月30日存入之款。是日，北京银行公会集议对付办法，当推代表前往警告。7日，银行公会更采积极措施：一、通电全国金融界与汇丰断绝往来，或先将此意通知汇丰银行；二、派代表谒见政府当局，剥夺该行关盐余存放权；三、延聘律师向香港法院控诉，求公平之裁判，同时呈请北京政府外交部对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5月4日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陈嘉祐、罗绮园等为南韶连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派陈嘉祐为主席。

△　刘湘就任蒋介石所委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总指挥。

△　南京政府任命王伯群为代理交通部长，周佩箴为上海中央银行行长，钱永铭为上海中央银行副行长。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通过成立上海劳资仲裁委

员会（后称劳资调节委员会），并订定《上海劳资仲裁委员会暂行条例》及《解决工商纠纷条例》。13日，正式公布《上海解决劳资纠纷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工厂、商店每年有一日得自由解雇工人；工商业之雇主及劳动者发生纠纷，经劳资委员会裁决后，由政府强制执行。

△　上海各学校、团体在蒋介石控制下，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通过改组全国学生总会，讨伐武汉政府，杀徐谦、邓演达，驱逐鲍罗廷等决议案。

△　上海当局枪杀曾任工人纠察队指挥之共产党员何大可等五人。

△　中荷商约8日期满，是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该约废止事。荷京中华会代表林满志、荷属华侨代表林思温列席，请求废止陆徵祥所订中荷旧约，另订新约。议决：一、由外交部对荷提出旧约期满，重订新约之牒文；二、电荷属华侨，告以政府力争新约，望为后盾；三、电各省党部在一周内作废约运动，期间自定。

5月5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长联席会议议决组织清党委员会，并通过清党原则六条：一、清党时期停止入党；二、所有党员经三个月之审查再发党证；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混入本党者，一律清除；四、所有党员须每半个月向所属党部报告其工作，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党部加以警告，三月不报告工作者，取消党员资格；五、海军及海外清党办法另定；六、任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萧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

△　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议决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推定叶楚伧、曾养甫等为筹备员。后第九十二次中常会又议决任命蒋介石兼任校长。第九十三次中央党部执委会派戴季陶为教务

主任，罗家伦为副，丁惟汾为训育主任，曾养甫为副，陈果夫为总务主任。

△　刘湘奉蒋介石令出兵武汉，任命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约七个师兵力东下。是日，杨森通电拥蒋反共，并于当日占领鄂西秭归。7日入宜昌，将总工会、农民协会等团体解散，干部数名被枪决或监禁。

△　第四十三军军长兼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李燊率在湘、鄂的黔军四万人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15日，李自巴东电告其驻宁办事处，称已联合杨森、夏斗寅等进攻武汉，前锋已过宜、沙。6月8日李部占津（市）、澧（县）。

△　冯玉祥电告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令方振武之第一路、孙良诚之第三路、马鸿逵之第四路、石友三之第五路、韩复榘之第六路，共精兵十余万出关讨奉；又令张维玺之一路及刘汝明、佟麟阁、赵守钰各独立师，集中西安附近，陆续出关。岳维峻南路军五万余人，亦已出动。刘镇华已允就东路军总司令职，即日东进。于学忠、张联陞结合反对革命，已令孙连仲率部出老河口，务于最短期间扑灭。

△　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陈其瑗奉命到江西宣布中央政策，是日在南昌召集江西省、市党部同省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完全接受新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收回教育权暂缓实施，对教会财产及外人生命一律保护。

△　上海大学是日被国民党查封，学生被驱逐。

△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处等发起全沪商业团体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大会，议决组织国民革命军商民后援会，为蒋介石筹饷。

△　北京盐务稽核所英会办斐立克以各省自留盐税，认为引岸制度被破坏，向北京政府财政部建议，拟于8月1日起将各省分所一并就近归海关办理。

△　新疆省长杨增新致电北京政府称：在喀什噶尔地方有美国纽约某博物馆远征队一批。因未领得外交部护照，已将其采集之件扣留。

△　荷属东婆罗岛华侨举行“五五”纪念，遭当地殖民政府派警挨户搜查，拘捕华人领袖二人，并开枪击毙10人，伤30人。7日，中华侨商联益会致电南京政府，要求严重交涉，务达惩凶、道歉、恤偿，并担保以后不发生同样事件。

5月6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就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各地新旧军阀最近大肆屠杀革命人士一事发表宣言，指斥蒋介石、张作霖对革命民众的屠杀，系“以革命的民众之血，为献媚帝国主义之礼物”，表示将“继续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愿”。

△　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织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及北京分会，决议：指定陈嘉祐、蒋隆芬、邓中夏、彭湃为广东分会委员，暂在湖南成立组织；王法勤、顾孟馀、徐谦、江浩、于方舟、李希逸、李秀容、李北海为北京分会委员。北京分会因李大钊牺牲，改在武汉成立，由吴玉章、陈公博参加指导。10日，北京分会在武汉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有关配合北伐军事计划等事项。

△　武汉国民政府批准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辞职，以王均继任；特任朱培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批准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辞职，以鲁涤平继任。

△　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由宜昌驱军东下进攻武汉。13日，夏斗寅发出进兵武汉反共通电。14日至沙市，15日至嘉鱼，16日入咸宁之汀泗桥，拆毁武昌、长沙间铁轨八里余。杨

森军则在江北岸配合行动，17日到岳口。

△ 李宗仁部第三路第二十七军及第十军两个师分别由芜湖、大通渡江，向合肥前进。

△ 南京总司令部政治部以各书局发行之教科书，受共产主义影响颇多，决定下令各书局呈送审查，否则不准发行。

△ 越南华侨在言论、居住、迁移等方面，备受当地政府之压制和虐待，甚至于被施以鞭笞、课以重税，无法为生。近已起而组织“人权运动大会”。是日通电海内外呼吁支援。

△ 中日修约第十九次会议，继续讨论最惠国待遇问题之税则部分，因对关税最惠国待遇附条件与不附条件问题，意见不一致，故北京方面提议，将最惠国待遇问题暂行停议，另议其他问题。

5月7日 南京政府公布《中央法制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2条，规定该会受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之命草拟并审查一切法制。13日，南京政府任命胡汉民、丁惟汾、伍朝枢、戴季陶、钮永建、罗家伦等为法制委员会委员。

△ 陈仪旧部新编第十五师，奉蒋介石令改编为第六军第十九师。

△ 云南省龙云、胡若愚等通电反共拥蒋。

△ 中荷商约明日期满，北京外交部照会荷使馆提议改约。

5月8日 张学良日前由郑州至蚌埠晤张宗昌洽商豫境奉军与皖北直鲁军联络事。入豫奉军已由豫东向皖北移动。许昌方面奉军以冯玉祥军大举由陇海线进取洛阳，郑州动摇，正面又受北伐军严重压迫，是日全部向郑州撤退。

△　北京中央观象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北大考古学会等各学术团体与瑞典人斯文赫定组成之西北科学考察团，是日由北京起程。该团体系根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会章第七、第八两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调查采集时，以不伤害主权、不以物品报酬为原则组成。

5月9日　　武汉国民政府公布三项法令：一、《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二、《处分逆产条例》；三、《佃农保护法》。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教育行政委员会提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并派蔡元培等为筹备员。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上海江湾之模范、游民两工厂，改设国立劳动大学，并派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11人为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于5月13日成立。

△　据《晨报》载：自清党以来，一个月中，上海一埠共产党之被逮捕者已达二百余名，而奉蒋介石命令被杀害者近百人。蒋介石有电至沪：凡共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

△　西班牙公使嘎利德赴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顾维钧交换改订新约意见。28日，外交部电驻西班牙代办宋善良，饬迅即严催西班牙外交部令嘎利德公使与北京接洽订期开议，若仍延宕，将采适当办法。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耿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副军长；徐谦准辞兼革命军事裁判所长，由江浩继任。

△　阎锡山禁止纪念国耻集会。太原共产党员假国民师范学校举行追悼李大钊大会，被军队包围，捕去首领四人。

△　厦门鼓浪屿工部局制止群众纪念国耻集会，拘捕林幸福等数人，又开枪驱散群众，引起厦鼓各界公愤，组织厦鼓外交后援会进行

交涉。10日，向领团提出惩凶、道歉、保障集会自由等项要求。

5月10日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免去杨森第二十军军长职，遗缺以郭汝栋继任。另委王缵绪为第二十一军军长，李家钰为第二十二军军长。

△　武汉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长，杨树松为副师长。

△　南京政府令准上海中央银行副行长钱永铭辞职，遗缺由张寿镛兼任。又准中央政治会议咨开财政部次长钱永铭未到任以前，所有部务暂由江苏财政厅长张寿镛代拆代行。

△　张作霖在苏联大使馆所拘苏联人员，及由济南解京之鲍罗廷夫人等共19名，经北京当局决定移送普通法庭。警察厅遂于是日移交，先送高等检察厅略为预审，旋送看守所拘押。19日，高检厅将鲍罗廷夫人等，先行移送高审厅预审。

△　广东惠州警备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胡谦、汕头警备司令何辑五奉李济深令，分别由惠阳与揭阳、棉湖进攻彭湃等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是日，胡谦部攻入海丰，农军一部分退守村落，一部分乘帆船十余艘退往香港。23日，胡谦部继由海丰攻陆丰。

△　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呈准北京教育部立案。该协会以采集保存国境内所有学术材料为主旨。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

5月上旬　广州因前年省港罢工迄今失业尚有三万人，向由省府拨给生活费用，自“四一五”大逮捕后，李济深特向广东总商会筹拨100万元，拟每人发给90元予以遣散。

5月11日　南京政府任命古应芬代理财政部长；免去陈友仁代理

外交部长职，特任伍朝枢为外交部长。

△　蒋介石派杨虎继白崇禧任上海警备司令，令陈群主持上海政治工作。

△　第二路前敌总指挥陈调元率所部第三十七军由马鞍山分乘“决川”、“浚蜀”两舰渡江，占领西梁山。同日，克和县。鲁军第十军杜凤举、第七军许琨等部退全椒。

△　李宗仁由芜湖乘轮西上，次日至湖口，与朱培德晤谈，对宁、汉双方暂缓冲突，分途北进，取得一致意见。

△　鄂北于学忠、张联陞军联合向汉口出动。是日，于学忠部犯应山，前锋攻广水。12日，张联陞部3000人侵入孝感以北之陆家山，拆毁铁路一段。唐生智自广水调军一旅击退。

△　蒋介石司令部特务处以上海《青天白日报》为上海共产党发行印刷品之总机关，是日会同公共租界新闸捕房将该报主笔李仲苏、钱一飞枪杀。

△　东路军政治部会同上海法捕房查封法租界徐谦所办之法政大学。

△　汉口英水兵寻衅，枪伤怡和码头工人一人，工人闻讯云集，外交部派员到场调查，作为交涉根据，工人始散。次日，武汉码头总工会提出撤退英水陆军、道歉、赔偿等五项要求，呈请全省总工会转呈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英交涉。

5月12日　　武汉国民政府特任陈嘉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谭道源为副军长；张辉瓒为第二军副军长。

△　白崇禧第二路杨杰部由江宁镇、慈湖镇分别渡江。

△　国民党随县县党部电告湖北省党部称：“孙连仲部约五师出荆紫关进驻老河口。”14日，孙连仲抵襄阳，17日，孙部克内乡，为牵制于学忠、张联陞部，不使进犯汉口，复以全力进攻邓县。

△　何键派第三十五军陶广师部经理科长黄慧僧，专程至湖南约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张因对唐生智态度不甚了解，表示犹豫，并因与何有宿怨，不乐受何驱使，以主力已开岳阳为辞进行拖延。中旬，为何键在湖南策划军事叛乱的代理人余湘三，因见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兵力单薄，特商请湖南省代理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以增防长沙为名，将驻湘乡、湘潭整训的许克祥第三十三团调来长沙共谋叛乱。

△　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外交部令大裁驻外领事馆12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汉堡、苏联列宁格勒等领事馆皆在内。所有领事职务或归所在国公使馆办理，或归附近领事馆兼理。

5月13日　李宗仁第三路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协同第二路陈调元之一部攻克安徽含山。

△　吴佩孚率部万余人离巩县孝义镇绕道赴南阳依于学忠。该地附近有于学忠、田维勤、徐寿椿、郭振才、李振亚等部共五万人。15日抵登封。20日，吴率残部3000人经叶县、襄城抵南阳，张联陞、于学忠悬灯迎接。

△　南京政府任命马叙伦、蒋梦麟、陈其采、周佩箴、程振钧、阮性存、朱家骅、蒋介石、邵元冲、徐鼎年、张世杓、黄人望、孙鹤皋、蒋伯诚、周觉、陈希豪、陈屺怀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兼民政厅长，蒋梦麟兼教育厅长，朱家骅兼农工厅长，陈其采兼财政厅长，周佩箴兼土地厅长，程振钧兼建设厅长，阮性存兼司法厅长。

△　南京政府公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凡14条。此

项库券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奉命发行，定额3000万元，5月1日发行，充作国民政府临时军需及其他建设之用。应付本息以江海关二五附税全部作抵，到民国十八年（1929）12月本息偿清。

△　中日商约会议对最惠国待遇问题已讨论18次，毫无结果，是日第二十次会议暂时中止。

5月14日　武汉国民政府公布《取缔擅行逮捕令》，规定逮捕须依以下手续：一、司法机关依法执行；二、武汉公安局奉上级机关命令执行；三、当场拿获之现行犯，须交由政府之法定机关审讯。

△　武汉北伐军主力在汝南、上蔡、东西虹桥与奉军接触。

△　厦门各界会议决定积极进行收回鼓浪屿运动，并致电要求南京政府向各国公使提出收回办法。

△　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禁止擅行没收人民财产令》，规定：凡不依《处分逆产条例》而擅行没收人民财产者，政府当予以严厉之制裁；其为团体行动者，解散其团体，并对于负责之个人加以处罚。

5月15日　广西省政府成立，黄绍竑任主席。

△　武汉北伐军第三十六军第一师占领西平。同日，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完全击溃上蔡奉军，俘虏5000余人，夺获大炮30余门。

△　田维勤月初由运城至郑州会见张学良、韩麟春，是日又由郑州至北京谒张作霖，表示愿接受奉方改编，请接济饷械。18日，田赴前方遂平督师。

△　白崇禧第二路第四十军贺耀组部由下关、大胜关间渡江，未遇抵抗，即占领江浦。直鲁军败退滁州。

△　厦鼓外交后援会对工部局答复鼓浪屿“五九”案之条件不满

意，决定以洋务工人总罢工为对付。

5月16日　蒋介石委周凤歧兼任浙江省戒严司令。是日，周在杭州就职，即日宣布戒严令。

△　阎锡山应蒋介石电邀，派代表赵丕廉由沪到宁，商洽晋省军事、政治和党务。

5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邓泽如为主任委员。

△　夏斗寅叛军进抵武昌城外之纸坊，武汉震动。武汉国民政府急派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及中央独立第一师进剿，并急召在九江、武穴方面的第二军与第六军部队回援。时原与夏斗寅相约内外夹攻之何键部已开赴河南。第十五军刘佐龙等部亦未敢轻动。

△　余湘三、王东原（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陶柳（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李殿臣（第八军教导团团长）、许克祥、晏国涛和魏镇等在许克祥团部策划发动事变，决定由许克祥担任指挥官，其第三十三团为主力。第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部队及其他驻长沙部队配合行动。发动日期大致决定在5月21日晚。许克祥承担军事叛变首难之责后，即加紧叛变步伐，制造反革命舆论，挑拨军工关系，瓦解人心。是日，湖南方面谣言大起，有谓武汉已为夏斗寅袭取者；有谓湖南不日将包围者；有谓农民自卫军要夺取第三十六军同第三十五军的枪械者。军队以此为借口在驻扎地点布置沙包，各商店纷纷罢市，形势紧张。

△　陈嘉祐部协同农军反攻坪石、乐昌，钱大钧调兵一团由韶增援，陈部不支退郴州。

△　白崇禧第二路军杨杰部击溃鲁军许琨、杜凤举部，克全椒，鲁军残部退向滁县方面。次日，邓振铨师克滁州。张宗昌因直鲁军节

节失利，下令总退却，命在蚌埠、临淮集中。

△　英政府撤回其驻武汉代表牛敦。牛敦撤退时照会陈友仁，攻击武汉国民政府“完全缺乏实践文明国家责任之能力”。陈友仁驳复牛敦指出：“此种攻讦，本外交部不得不愤然加以摈斥”，并郑重声明：“中英间今日之危殆关系，英政府之政策及行为应负完全责任。”

△　《京津日日新闻夕刊》载：蒋介石特派赴日代表刘厚生在日积极活动，谋取得田中首相谅解，曾表示如次意见：一、南京政府决不企图赤化中国，及谋世界革命运动；二、南京政府为国民党之中心机关，不得与武汉共产党政府相提并论；三、关于南中国方面之外交关系，应以南京政府为正式之对手。

△　上海各界为反对日本旅大船坞修理奉鲁军舰是日举行大会，决定发表宣言警告日本政府，并电请南京政府提出严重交涉。20日，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此事向驻沪日领事抗议。

△　汕头罢工委员会及汕头总工会所属各工会，均被潮梅警备司令封闭。总工会执委李春涛、廖伯鸿等被捕。至是日共被捕去2000人。

5月18日　　武汉国民政府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称兵谋叛”，下令褫职拿办。

△　武汉各界纷发通电声讨夏斗寅。是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通电指斥夏勾结杨森、张联陞、于学忠称兵犯顺，进犯嘉鱼、蒲圻，并节节进逼，沿途解散党部，屠杀党员，摧残工会农会，勒索商民，要求褫职讨伐。

△　中共中央为夏斗寅叛变发表《告民众书》，指出：夏斗寅一类的反动派，以反共产为借口，实行反革命反国民政府的阴谋。他们想联合在城乡的各种中等阶级于反革命旗帜之下，以反对中国共产

党，他们又制造共产党将破坏中等阶级的谣言，以引起社会的恐慌。声明共产党竭诚与国民政府协同共进，维持与中等阶级的联盟，保持中等阶级的利益。号召工农群众随国民政府之后削平夏斗寅的反叛，中等阶级应急速与工农携手共同保障革命。

△　南京政府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　南京政府公布《中央财政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会依中央政治会议之议决指导全国财政；由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三人及财政部长、次长共五人组织之。

△　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移驻汉阳、分防兵工厂、铁厂、黑山分厂、龟山等处。同日，第二军第六师戴岳部亦抵武昌。

△　钱大钧部蔡熙盛团入赣州，缴去卫队连及一团枪械，扣留官佐十余人。蒋介石委钱大钧为新编第一师师长，蔡熙盛为副师长，代行师长职权。

△　张学良离北京赴郑州，专任豫西军事指挥。豫南方面指挥由韩麟春担任。

△　沈鸿烈指挥渤海舰队“海圻”、“肇和”、“威海”、镇海等舰袭击吴淞要塞，旋被击退。

△　上海外籍诈骗商人设立之东方储蓄银公司突然倒闭。各储户组织债权团，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起诉。按：该公司成立于1920年6月，未向中国有关部门注册，资金10万元，以办有奖长期储蓄吸收储户4800余号，一次可收储金5.8万余元。

5月19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各级党部，称：“长江流域之农工团体，以突飞进展之故，幼稚之病，潜然不自觉而发生……忽视共同作战之工商业者同盟者……更使国民革命之基础，日益摇动”，特令国民政府执行以下决议：一、制定劳资仲裁条例；

二、制定劳动法；三、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四、严禁工会或纠察队对店员或厂主恐吓罚款及擅自逮捕；五、外人在华经营工商业者应由外交当局根据上列四项原则办理。并强调指出：此为巩固国民革命同盟战线之政策，凡属党员如有违反及不执行者，各级党部应加严厉之制裁；各级党部不能领导民众服从上项决议，中央必予相当惩戒。

△　晚，第三十五军留守处部队在长沙公开寻衅。当工人纠察队巡经留守处时，留守处驻军诬称纠察队企图夺取枪支，公然鸣枪挑衅，缴去纠察队员枪支。同晚，许克祥等唆使伤兵与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闹事，打伤工人纠察队员数人。伤兵亦被纠察队逮捕数人。

△　武汉三镇分别举行讨夏（斗寅）大会。武昌方面同时举行欢迎第二军大会。议决五项：一、请中央明令讨伐夏斗寅；二、拥护中央外交政策及现金集中政策以巩固后方；三、拥护北伐将士肃清奉系残余军阀；四、肃清武汉一切反革命派，消弥谣言；五、要求中央武装革命民众，并通过讨夏通电三则。同日，发表大会告民众书，号召“联合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一律武装起来，与反动派作最后的战斗”。

△　湖北总工会为稳定由夏斗寅叛变而引起的社会震荡，是日特发出通告，希望各工会负责人不应轻举妄动，退出队籍，私自迁避；对于一般市民搬家应立即制止，以免扰乱市面秩序。如有违反中央决议的，各工友可自动依照议案执行，并即时报告总工会核办。同晚，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召集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公安局、卫戍司令部、学生总会代表商定组织“临时各界联合会”，进行宣传，镇定人心。

5月20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关于“纠正农运”的训令，略称：“剥削农民与压迫农民必须行迹显著，证据确凿者，始得交由法定机关依法惩办，至乡里公正及丰裕之户不反对国民革命者，

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其有藉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于反革命。”同日，又发出“制裁越轨行动”训令称：中央已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指导，切实执行中央决议。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赵佳白为京汉铁路监护司令。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与省政府为防止反革命采取应急措施，派熊亨瀚、石醉六等去岳州联合当地驻军防止夏斗寅部入湘，并发布《什么人是反革命》的文告，宣布：宣传蒋介石主义者、捏造或传播谣言者、暗盘操纵或捣乱金融者、阻绝交通者、侵犯军人家属者、阻碍军米者、扰乱市面治安者、受反动派利用，以离间挑拨手段破坏革命者，均是反革命。

△　是日至29日，江西省党部重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刘一峰、王枕心、王均、方志敏、李桂生、姜济寰、罗石冰、李小青、李松风、邓鹤鸣、朱克靖、黄实、黄道中为执行委员，萧炳章、李尚庸、涂振农、邵式平等为监察委员。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闽、浙、苏等省政治监察委员徒乱行政系统，实无设立之必要”，议决取消。

△　何应钦第一路军卫立煌率部第十四师由下关渡江，并协同第二路军贺耀组部自浦口。东进，次日占领瓜埠。孙传芳军向六合退却。21日，贺耀组第四十军克六合，孙军向扬州、天长、仪征方向溃退。

△　李宗仁第三路军夏威、胡宗铎部克定远。鲁军程国瑞、徐源泉、许琨、刘志陆等部向凤阳、临淮关溃退。此役第十五军军长马济中弹阵亡（一说马在合肥北被红枪会击伤不治而死）。次日，克凤阳。

△　陈嘉祐部退醴陵，驻韶桂军陆续入湘。

△　刘镇华任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后，仍盘据洛阳、新安，第二集团军不得不施以攻击。刘见实力消灭，是日乃通电下野，所部归各将领自辖。

△　是日至26日，太平洋劳动代表会议在汉口血花世界开会。日本、朝鲜、法国、苏联、中国、美国、英国、爪哇等国代表32人参加，共代表1450万劳动者。大会通过重要议案多项：一、赞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二、为消弭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大战而奋斗；三、赞助印度、朝鲜、爪哇、菲律宾、拉丁美洲等国的独立运动；四、采八小时工作制、施行工人保险等10项计划；五、特设秘书厅于上海，由上海总工会二人、苏联总工会二人、日、英、美、法各国工会代表各一人组织之，每六个月召集会议一次，由该厅发行《太平洋工人》及《太平洋劳动大会公报》。

△　驻镇江英领事署奉英公使训令暂行撤销。英领事怀雅特撤离时表示：镇江租界英政府愿意交还，惟界内电灯自来水价值约六万元，将来最好由华商备价收回。

5月21日　　许克祥在叶琪、何键指挥下发动“马日事变”。晚11时，由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统一指挥，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率部分途袭击湖南省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机关，解除农民自卫军与纠察队武装，搜捕革命分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共产党湖南省委对敌人袭击，事先未作充分准备，致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完全处在被动地位，但仍作坚决抵抗，绝大部分均英勇牺牲。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及工农革命群众一百余人遭到捕杀。革命机关概被摧毁，所有监狱人犯全数释放。此后反动派在长沙和各县日夜进行劫掠屠杀。

△　夏斗寅叛军被叶挺师击溃，武汉人心大定，宣布解严。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各省市党部，该会已开始办公，嗣后有关清党事宜，须向该会接洽。同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清党条例》，凡11条。该条例指出：共产分子及遇有阻挠清党进行者，当地清党委员会得直接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缉拿。25日，南京政府通令全国各行政机关遵行《清党条例》。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胡汉民、蒋介石、邓泽如、阎锡山、王伯群为国民政府委员。

△　广州八大领袖工会代表联席会议议决组织广东全省劳工团体总同盟，要求公安局长邓彦华尊重总理扶植农工政策及要求政府严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腐化分子。

△　刘兴第三十六军克郾城。

△　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因革命军北进，在北京集议增防华北。

5月22日　　蒋介石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宣称，“夏斗寅之起而宣言反对共产，与杨森、刘湘同受余之命令”。

△　驻粤桂边之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因滇军已有归附南京之表示，特电南京蒋介石，愿移师“北伐”，“先清湘赣、继捣燕京”。

△　何应钦第一路军第十七军曹万顺部五十八团克仪征。孙传芳军第八师崔锦桂部悉退扬州。孙令所部速经邵伯向高邮方面退却。

△　李宗仁第三路军叶开鑫部克临淮关，夏威、胡宗铎部克蚌埠。张宗昌、褚玉璞残部纷向徐州溃退。同日，张宗昌致电北京，谓已决定将大队撤至淮北符离集、南宿州，并商由孙传芳迅出宿迁、睢宁，袭国民党军之背。

5月23日　武汉国民政府对湖北省总工会发出三项训令：一、工人有违反纪律者，工会得加以制裁；二、违反纪律的工人，如情节重大时，交政府机关办理；三、总工会对工人以外之人，不得擅行逮捕、罚款及加以其他压迫之情事。

△　云南省务委员会总裁唐继尧在昆明病殁。

△　济南警厅查抄徐家花园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后，21日又接连在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处捕去革命分子40余人，是日，在南门外杀害八人。

△　本月上旬，邓锡侯与刘文辉、田颂尧商定出兵武汉办法两项：一、刘湘、杨森部各抽编八师即日出兵宜昌、沙市；二、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三部共抽编12个混成旅，由邓统一指挥与刘湘部衔接东下，会攻武汉。是日，邓函驻宁代表，谓已编就12个混成旅，下令动员出发。

△　何应钦第一路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熊式辉师克靖江。孙传芳部退黄桥。

△　第十七军曹万顺部杜起云师克扬州。孙传芳部分两路退却，一沿运河退淮阴；一自南通经如皋、东台、盐城、阜宁退守海州。

△　南京政府教育委员会派蔡无忌、胡刚复等接收东南大学。

△　湖南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长沙戒严司令部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办公处”，推定许克祥、周荣光、王东原、李殿臣、张敬兮五人为“救党”临时主席团。当即发出命令：以后非经“救党”临时办公处命令，各部队不得擅行拿办暴徒分子。29日，正式成立“救党”委员会，并发表反共就职通电。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等单位发起组织之上海房租协助北伐军饷委员会成立。该会勒令各房客缴纳房租三成，由江苏财政委员会

派员收取助饷。

△　晨6时32分47秒，甘肃省古浪发生八级强烈地震，波及兰州、武威、华亭、永昌、民勤、张掖等20余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官方统计仅武威一县即死亡2.5万余人，马、牛、羊22万余头，倒塌房屋41.8万余间。凉州原有户口六万，古浪原有户口4000，震后均罕见人烟。

△　武汉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有奖债券条例》。

5月24日　武汉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分饬所属各机关，一律严禁侵犯军人土地财产，凡已被侵害者，务须清查发还。

△　唐生智自河南以“敬电”致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对“马日事变”提出处置办法：一、长沙各部队非有命令，不许有何举动；二、以长沙军界全体会议名义贴出拥护中央党部、拥护三大政策、打倒蒋介石等标语；三、所缴枪支一律发还。

△　驻常德熊震部包围搜查国民党常德市、县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工农干训所、湘西民报馆以及各人民团体。枪杀工人纠察队队员、共产党员及群众80余人。衡阳、醴陵、武冈、益阳、湘阴等地均先后发生屠杀惨案。

△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总理纪念周条例》，凡八条，规定每周月曜日（周期一）上午为举行期，凡各级党部、各机关、各军队须一律举行。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加推冯玉祥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以李鸣钟代表出席。

△　蒋介石在南京对将士训话称：对武汉共产党即下讨伐令。

△　国民党广州特别委员会结束，广州政治分会成立，李济深任

主席。

△　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李馥荪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此后江海关逐日所收附税悉归入保管公库。

△　武汉北伐军第十二师协同贺龙独立第五师占领逍遥镇（位于临颍东南）。

△　唐生智电武汉国民政府，奉军第十一军军长富双英已投降，任富为第二十一师师长，归第四军朱晖日指挥。

5月25日　　豫东红枪会10万余人在农民自卫团联合办事处领导下，响应武汉北伐军，齐起暴动，包围杞县，激战约五小时，破城，捕获伪县长及土豪劣绅20余人。同时该办事处因恐奉军反攻，派代表至第四军军部报告，请求立派大军镇压及接济经费。

△　何应钦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克南通，午后克如皋。孙军李宝章部向海安撤退。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电告各报馆：经第九次会议议决委任陈德征、陈群、黄惠平、高方、冷隽、潘宜之、陈超、周致远、桂崇基、俞国珍、冷欣为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又第十次会议议决委任李济深、林云陔、曾养甫、李国端、詹菊似、谢治平、罗纬疆、谢瀛、陈策为广东省清党委员；李家英、邓彦华、李悦义、邓文仪、刘石心、何思源、陈森为广州特别市清党委员。

△　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杨森，第二军全部奉令出发。28日开始总攻。29日，戴岳师联合李云杰师进攻潜江。

△　鲍罗廷偕武汉政府特派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芬由武汉出发赴湘查办“马日事变”，当晚到达岳州，得许克祥等电称，将逮捕鲍等就地枪决，鲍等即折返武汉。

△　李宗仁第三路军柏文蔚部及王普部克六安。

△　何应钦第一路军第十四军第二师谢杰部克泰县，孙传芳第十五师宋福田部向宝应、兴化溃退。

△　蒋介石唆使其御用上海学生联合会举行援助“北伐军”大募捐，自是日起至30日止在上海华租两界实行挨户强捐，并勒逼各校全体学生一律出动。

5月26日　冯玉祥部攻入洛阳，俘获奉军二万人。万福麟东遁，张治公窜南山。

△　李宗仁第三路军第十军王天培部占固镇。28日克宿县。

△　上海英兵赫白脱劳于4月23日闯入居民家中强奸华妇案，在英按察使署开审，证据确凿，因被告否认，竟判无罪，当场开释。

5月27日　冯玉祥部石友三第五路军攻占孟津，续克偃师。

△　李宗仁第三路军新编第十一军马祥斌部占领寿州、凤台。

△　蒋介石赴津浦路沿线视察，6月3日返宁。

△　北京外交团举行会议，英、日、美、法、意各公使说明关于华北护侨方针，及本国政府对出兵计划之意见。

△　北京政府外交部接驻苏代办郑延禧电，称苏联政府要求将在东交民巷所捕苏人15名、鲍罗廷之妻等四名所犯罪名告知被告人。是日外交部电复称：“该俄人等现已移交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现正从事侦查预审，在此期间应严守秘密，不便向外宣布。”

5月28日　武汉北伐军占临颍。奉军自郾城溃败后，企图固守临颍，集中其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各旅会合第十七军及吴佩孚残部据守十里头、王庄之线。并调第三十四、第四十五旅为预备队，控

制临颍。主帅韩麟春亲赴许昌指挥。从26日午后6时开始至是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刘兴部在漯河、临颍一带与奉军展开决死战，唐生智檄调张发奎第一纵队加入，是日大败奉军，占领临颍城。第十一军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担任正面，英勇顽强，三次负伤不下火线，终于英勇牺牲。北伐军在战斗中损失也极大，仅第四军第十二师，伤亡即达8000人以上。第七十七团牺牲营长两人，连长六人。参谋长亦受伤。

△　日本政府发表出兵山东声明，借口济南形势紧张，不能依在长江沿岸各地之海军保护侨民，决派驻满洲部队2000名赴青岛。

△　第二十五军军长兼第六路军总指挥周西成统率黔军大举出兵武汉，是日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部犹国材师25日占洪江，复向辰、溆进攻，前锋已达安江一带。

△　何应钦第一路军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克东台。孙传芳退宿迁。其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五、第七各师，退盐城、海州附近。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议决：任命黄绍竑、伍廷飏、黄旭初、蒙民伟、黄华表、李天和、陈锡珖七人为广西省清党委员会委员；黄展云、林赤民、李大超、林寿昌、李文滨、秦望山、林寄华、罗兆修九人为福建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柏文蔚、葛晓东、李次宋、路锡祉、陈紫枫、汤志先、陈杰民七人为安徽省清党委员会委员。

△　南京组织清党审判委员会，是日由总政治部、黄埔同学会清党委员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留宁官生办事处、江苏第一监狱署各代表委员在第一监狱署开始审理案件。

△　南京政府训令：代理财政部长古应芬到任前所有部务由次长钱永铭暂行代理。钱是日到职。

△　香港当局以中华海员工会香港分会与中华海员慈善会领导罢工，抵制英货，宣布将其解散，并派警察包围，捕去八人，没收会内所有物品。

5月29日　山东省督办张宗昌、省长林宪祖接到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矢田部保吉出兵山东的通知后，特电北京国务院、外交部，要求速向驻京日使严重抗议，并声明对于侨商安全始终负全责。次日，张、林再电北京国务院、外交部，催请迅与日方交涉，内称："迭据地方法团全体推举代表来署请愿，群情愤激，纯系出于爱国思想，实有不可遏抑之象。"

△　南京政府训令军民各机关保护宗教团体，谓民众不可误解打倒帝国主义，而以排外排教之性质利用任何势力压迫或侵害中外人民信仰之自由。

△　朱培德电武汉国民政府，报告江西军事政治不稳情形，请派陈公博、何香凝、朱霁青三人赴赣指导党务。

△　朱培德在江西将第三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142名遣送出境。

△　自"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柳直荀到湘潭、湘乡等县发动和组织农军，并在湘潭建立农军总指挥部，准备进攻长沙。湖南省政府分兵三路进行抗拒：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向湘潭，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三团李仲任部沿株萍铁路向株、醴，省防军第二师范转帆团由宝庆、湘乡包围合攻。是日三路同时动员。

△　长沙河西第十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易子义等集众3000余人，在白著铺齐天庙开会，约期联合长沙18镇乡农民协会、纠察队向省城进攻，并推易子义为总指挥。易荣贵为副指挥。

5月30日　张作霖亲访驻华日使芳泽，询出兵事件。芳泽当即口头通知日本出兵山东理由，谓"全在保侨"。同日午后，芳泽至北京政

府外交部将同一内容通知顾维钧，“希望谅解”。顾表示“日本出兵，殊违常轨”，“自未可默认”。

△　山东各界开会，宣布日本派兵来华系帝国主义侵略，决请当局禁阻日军在青岛登岸。同日，当局向驻青岛日本总领事提抗议，请电日本政府中止出兵。

△　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各县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如再有自由逮捕惩罚人民情事，定将该县党部解散，并对负责人员惩治。县以下各级党部及各种团体均照此规定办理。

△　武汉国民党中央派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组织江西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主席，执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各种训令。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西安政治分会在潼关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冯玉祥、于右任、杨明轩、薛笃弼、刘伯坚、郭春涛等出席，通过组织大纲，议决调集20万将士，会合唐生智、阎锡山各部乘胜直捣北京。

△　全国农民协会对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发出重要训令，谓农民运动已有相当发展，必须采用新政策，首要的即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县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民主自治政府。此种民主政府以大多数农民参加，其他中等阶级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均得充分参加。此种乡村自治机关必须严厉对付一切反革命派；切实保护革命军官家属的利益；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间惟一的武装势力；改良贫农生计；保障佃农雇农生活。

△　湖南省政府接到各地战报如下：一、湘潭农军约三万人，枪三四百支，由刘昭植统率，分布于湘潭易俗河、窑湾、姜畲、云湖桥、炭塘子一带，昨今两日，许克祥团前往镇压，农军退湘乡；二、株、醴方面农军约一二万人，由柳直荀亲自指挥，前线在距长沙60里之易家湾，已将距省30里小托铺地方铁路轨道拆毁。29日，叛军李仲

任团占领易家湾，农军退向株洲，30日再退醴陵；三、宁乡县报告，29日有湘潭农军军长刘忠恺率自卫军枪兵数百，梭标队数千，集中县属道安一带；四、衡州地方农民于27日开会，议决在衡州成立湖南劳农政府，图谋大举，被驻衡州省军俞业裕商同陈嘉祐所部师长李蕴珩将其解散。

△　五卅惨案二周年纪念，武昌、汉口、硚口、汉阳四处同时举行，并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及开济难运动周宣传大会。武昌方面在阅马厂举行，到10万人以上。主席董必武报告指出：自从革命势力进展到长江一带，帝国主义结合新军阀蒋介石及旧军阀张作霖等，在各地屠杀我们的同志，希图破坏革命。全国济难会代表祝目音报告：今年1月到现在，我们的同胞及革命的同志，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上海、南京、浙江、安徽、江西、天津、北京等处，被新旧军阀与帝国主义及土豪劣绅所惨杀的，约有1.4万余人。大会通过革命民众团结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导下，继续五卅精神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等六项议决案，并电唐生智要求防止反革命派扰乱。

△　上海、南京等地举行五卅惨案二周年纪念日，通过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退驻沪外国海陆军等议案。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克孝义，骑兵向汜水、郑州方面追击。同日，第三十六军刘兴部下新郑。

5月31日　日本陆军第十四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步兵共2000余名在日司令官乡田兼吉率领下，昨日由大连分乘“长平丸”及“香港丸”出发，是晚抵青岛。次日上午8时全部登陆。

△　东京中国国民党支部及中国留学生总代表至日本外务省，递交反对日本对华出兵之抗议书。

△　日使芳泽原定今日离北京返国，昨午忽接日政府训令，以中国时局紧张，暂缓回国。

△　英、日、美、法、意五国公使会议，决定起草关于华北防务之列国协同声明书，俟本国政府指示后即宣布。

△　上午11时余，浏阳农民军三千余人分两路进攻长沙：一路攻小吴门，一路攻浏阳门，在距城三里之杨家山、陈家陇一带散开，分攻陆军医院、中央军事政治第三分校与第三十三团团部。张翼鹏令省城驻军分途抵抗，相持一小时左右，农军不支，由东屯渡向浏阳方面撤退。

△　湖南省政府公布：前省党部关于土地收归公有的决议案宣布无效。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先遣队骑兵于昨日抵郑州。是日，石友三第五路军全部抵郑。

△　张作霖因豫、皖战事失利，晋阎态度不明，决定放弃郑州、开封、徐州，退守山东、直隶，入豫奉军是晚全部退至黄河北岸，设司令部于新乡。直鲁军开始由徐州向韩庄集中。

△　晚，张作霖在北京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杨宇霆、吴俊陞、张作相参加，决定任张作相为前方指挥，担任京汉线防务；吴俊陞任后方指挥，以固津榆一带防务。张作霖并电东三省军事长官，谓前方军事，刻趋紧迫，所有派定援军应迅速出发，限电到后三日集中预定地点。

△　南京政府财政委员会成立。以古应芬、钱永铭、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为委员，成立会上讨论财政整理及建设事项，订于下月15日在宁召集各省财政厅长会议讨论一切。

是月　　冯玉祥在西安公布《临时劳动法》，凡41条，并宣称：“在国民政府未颁布劳动法以前，本军区域内皆适用此劳动法。”

△　郑州豫丰纱厂以百业凋零，产品出售困难为词，突然宣告停

工，致使4800余工人失业。工人代表向厂方要求：一、规定开工日期；二、停工期间发给维持费；三、否则发给路费，俾可各自回家，以免流落他乡。厂方对此一律拒绝，致多数女工沿门求乞。

6月

6月1日　共产国际给鲍罗廷、罗易的5月“紧急指示”传到中国，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五万名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5日，罗易将国际指示泄露给汪精卫，并要他“接受电报的要旨”，“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

△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就日本出兵山东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书，内称：日本政府之派兵，足认为对全体华人之重大挑战，是无异于“二十一条”政策之复活。日政府“此举适足激怒中国国民，致使国民政府终不能制止其出于经济的抵制之行为”。

△　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电日外务大臣田中抗议日本出兵山东。谓日本于“本政府军队征伐军阀将到山东境内之时”，突出此举，“于公法上既毫无根据，于本国领土主权复有妨害，本政府不得不提严重抗议”，要求即日撤军。

△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就日本出兵山东事件照会驻华日使提出正式抗议，要求迅予转达日政府中止派兵赴青，其已开到该埠者，应令勿遽登岸。

△　山东各法团通过反对日本出兵山东通电及致日本领事馆公函。通电称：“鲁人为国家权利计，为同胞人格计，一息尚存，誓与奋斗。”致日领函要求切实致电日本政府，将已登岸之陆军全数撤

回。

△　第三十六军刘兴部由临颍沿京汉线向郑州追击前进，是日与第二集团军会师郑州。

△　阎锡山代表李庆芳昨今两日与安国军接洽，表示晋方仍守保境安民之旨，对奉决无积极压迫之事。同日，据东方社北京电称：张作霖代表到山西，请阎锡山出兵陕西，截断冯玉祥军退路。阎答："本人始终以保境安民为旨，苟冯军不侵犯本省，决不动兵。"

△　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等通电主张从速解决长沙事变，略谓：湖南农工运动幼稚之病，非深加整顿，诚属危机，惟整顿权衡，应在中央。此次长沙事变，中央已决定方针，派员处理，武装同志应服从中央调处与唐生智总指挥电令，并请政府查明真相，从速解决，以免久延时日，别行枝节，如有不听调解，惟有从严惩办。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改称总政治训练部，吴敬恒为正主任，陈铭枢、刘文岛为副主任，王昆仑为秘书长，罗家伦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各军、师政治部改为军、师政治训练处。

△　南京政府任命戴季陶为国立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为副校长。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次会议议决：加推古应芬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县采县长制。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南京改特别市，市区包括下关。是日，南京市政厅改称市政府，各局正式成立。6日，南京政府公布《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

△　古应芬就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并发表整理财政计划。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议决，任命吴敬恒、叶楚伧、王柏龄、葛建时、叶秀峰、余心一、李一平、靳鹤声、刘季洪、周曙山、李寿雍为江苏省清党委员会委员。

△　无锡公安局在铁路饭店逮捕共产党员27名。20日，南京政府又以反蒋嫌疑下令无锡当局逮捕徐明英等五人。

△　是日至8日，陕西省召开全陕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4人，代表32个县农协组织。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及拥护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苛捐杂税、田赋租税、农民自卫军、红枪会等决议案26件。选出共产党员王授金、张含辉、李维平等为农协领导。在省农协领导下，各县农协组织蓬勃发展，迄6月止，遍及60余县，会员50余万人，武装农民10万以上。其中以长安、盩厔（今周至县）、鄠县（今户县）、渭南、华县、三原、绥德等县农运发展最快。

6月2日　　晨，宁方李宗仁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占领徐州，直鲁军退驻山东韩庄。

△　何应钦第一军第二十一师陈诚部克高邮。3日，克界首。4日，克宝应。孙传芳部向宿迁、海州溃退。5日，又克淮安。

△　阎锡山派兵开往东天门，并派军队若干至运城、大同。5日，阎电张作霖解释派兵原因，谓“贵军北退，诚虑临时布防不易，派少数队伍进驻东天门，即令停驻井陉，不再前进”。

△　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发出训令：一、对党员之选择，务须严格，决不可使投机分子乘间而入，已经厕名者务须淘汰；二、注意对党员进行主义之认识、政策之运用、服从纪律之习惯等方面的训练；三、对民众应先注全力于宣传党义；四、注意克服各种民众运动的幼稚举动。

△　湖北全省总工会、汉口市商民协会等团体发表《工商联席会议宣言》，内称：工商之间“对于过去的一切纠纷，已经双方考虑，议定很好的方法解决”。因为“我们双方所受的痛苦，是一切帝国主义和买办军阀所给予我们的。因此，我工人和一般中小商业者就应该互相联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共同敌人，救得双方解放”。

△　南京政府中央财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胡汉民、张静江、古应芬、钱永铭出席，讨论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确定国立银行基金、改革币制、整顿盐务等案，并定6月15日召开各省财政厅长会议。

△　原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在随县就任国民革命军西路军指挥。

△　湖南“救党”委员会通告各县市党部组织分会厉行清党，规定所有国民党员均须重新登记。

△　驻北京英、法、美、日、意五国公使在日使馆再次开会，讨论增兵华北数目、驻防区域与联络防守办法等。

△　著名国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投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杀。

6月3日　　阎锡山布告取消晋绥陆军原有编制，改称国民革命军。是日起山西省改悬青天白日旗。

△　全国农协通电声讨许克祥，并请武汉国民政府立予免职查办，内称：许克祥破坏党部，屠杀农工，称兵谋变，扰乱后方，已属罪不容诛，复拒绝中央特派专员赴湘查办，违抗唐总指挥敬电指示解决方法，倘若再予姑容，则彼或将误认为政府默许，其行动而日益凶横，愈难制止。

△　何应钦第一路军赖世璜部与刘峙部克盐城。

△　奉军在新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设三道防线：第一道在卫辉，由第十六军军长胡毓坤及第十七军军长荣臻负责，以副军长丁喜春为总指挥；第二道在彰德，由王树常、赵恩臻率所部第十、第十一两军负责；第三道在正定，由万福麟、汲金纯两部为主力，另以高维岳第九军补充之，以于芷山等部驻扎保定、大名方面以作后防。

△　南京政府批准贵州省政务委员会推选周西成为该省政府主席。

6月4日　　中共中央致函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主张六项：一、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二、另委合法的省政府；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生智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五、国民政府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暴乱之发生。

△　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农民群众书》，指出："湖南农民是整个农民运动的先锋，应当反对大地主豪绅及反动的军阀。你们应当在乡村中建设民权自治政府及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把大地主资本家公司与基督教会的土地收归公有。你们应当破坏豪绅的政权。你们应当将豪绅所霸占的所谓公有田地，以及庙宇祠堂的田地拿回来，交与乡村自治政府中的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武装起来与反动势力奋斗，而保持革命中所得之胜利。长沙的反动军阀应当推翻。"

△　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农村自治机关的决议案，其内容大致如下：因国民政府农政部所拟县区乡自治暂行条例草案尚未公布，为应付此过渡时期，应即设置县区乡自治筹备会，使在国民政府农政主管机关特派员指导下，担任县区乡民会议及县区乡政务委员会之筹备，并代行县区乡民会议及县区乡政务委员会之职权，以杜民众之幼稚及不合于中央训令之行动。

△　据东方社汉口电：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省市党部军事政治部发出电令，大要为：一、国民党对入党者须严加选择；二、工农运动使无职业工人参加，有害真正之民众运动，国民党期改善工人运动，以达成国民革命；三、地方行政与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等之关系，在中央方法未确定以前，谋与军队疏通意思，使过激派无跋扈之余地。

△　白崇禧第二路军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克宿迁。

△　冯玉祥电令孙连仲部进攻邓县，岳维峻部由内乡取南阳，方振武部由襄城会攻南阳。

△　美军陆战队1500名已在天津登陆。驻华美军陆战队旅长浦脱勒、驻津美军步队旅长卡斯提纳及统领美国驱逐舰第三队海军提督布力克莱，是日联袂入北京，与英使马慕瑞商洽对付华北时局，迄7日止，在津陆续登陆之美兵共达2000人。

6月5日　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　2日，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率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由临颍出发，向东急攻开封，是日克开封城。至此，黄河以南已无敌踪。7日，张率部离开封南下回汉。

△　山西各界二万余人在太原集会。大会一致公推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通过电请省党部厉行清党，及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等议案。

△　晋军前锋已至河北省获鹿县，骑兵队一部抵摄头镇。晋军李德懋第七师开驻枕头，孙长胜骑兵第三师驻获鹿，卢丰年第十师驻井陉，王嗣昌第六师驻娘子关，关福安第五师驻平定，张荫梧第十四师驻潞安，杨效欧第十一师由太原向石家庄输送。阎锡山决定以徐永昌

为各路总指挥，总制一切，司令部设井陉。

△　朱培德在江西“分共”。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将江西省党部、南昌市党部及革命群众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刘一峰、方志敏等22人遣送出境。同日，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团体亦被查封。

△　武汉50余团体为讨伐许克祥，特推举向忠发等为请愿主席团，向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并至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处表示拥护唐生智敬（24日）电。请即日出兵讨伐许克祥。

△　何应钦第一路军第十七军杜起云部占领涟水，孙传芳军彭德铨部第三团缴械投降。

△　日在野党一致反对田中内阁出兵来华，是日在东京举行反对出兵大会。日本各地亦有同样集会。日劳动农民党发表宣言，呼吁对日政府出兵反抗到底。

△　天津各国驻屯军司令官在日本司令官高田宅讨论京、津“防备”问题。上海英防军司令邓肯北上。南下视察之英使蓝普森亦自上海启程回任。

6月6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湖南省政府通知解决长沙事件办法五项：一、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由中央根据情况决定改组办法；二、湖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及省总工会均应改组；三、长、岳一切部队均归副军长周斓指挥，越轨军人由周查办；四、军队及农工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两方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五、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

△　武汉国民政府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抵湘处理“马日事件”。次日，周邀集全体军官开军事联席会议，周荣光、许克祥、李殿臣、李仲任、王东原等团长皆参加。决定：一、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一概停止活动；二、各地聚集的农工全部解散，各归原地；三、省

政府暂维现状；四、各军队停止军事行动。

△　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蒋介石代表彭凌霄、冯玉祥代表刘治洲参加。阎在就职宣言中称："今兹三民主义已深入北方民众心坎，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得以早日实现。"

△　武汉国民政府鉴于冯玉祥态度不定，派邓演达至潼关谒冯，请冯至郑州开会。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馀、孙科等由武汉赴郑州。

△　据上海《民国日报》讯：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标语，取消"严防右倾分子"、"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国家主义派"等口号。

△　北京政府前总理唐绍仪在上海通电主张各方息战，划地分治，各修内政。

△　杨森部自沔阳、潜江、天门分三路出动，拟切断京汉路，被第八军击败，溃至潜江。8日进攻仙桃镇之敌，亦被第八军所部击退。

△　南京东南大学学生为复校事向教育行政委员会请愿。该会常务委员褚民谊答称：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任张乃燕为校长，一月内开学。

△　安国军外交处长吴晋在北京对中外记者谈称：奉军此次撤退河北，系因红枪会、天门会等农民组织风起云涌，无法对付，以及阎锡山态度不明之故。吴对记者鼓吹蒋、奉、阎三角联盟，略谓蒋介石既已反对共产党，并镇压群众运动，与张作霖主张相同，阎锡山已出任调停。而蒋介石最近又表示愿与张作霖合作，张作霖自无不赞成。

△　英军一营乘“哈米那斯号”舰自上海开赴天津。同日另一营开赴威海卫。

6月7日　　驻华英使蓝普森及驻沪英军司令官邓肯等抵北京。是晚即召集在沪英军长官开重要会议，讨论华北英军布防、英使馆迁移海滨及上海英军北调等问题。8日晚，英柬约克州军团一队开抵北京。

△　广州总政治部为反对日本出兵山东事召集各校校长及新闻记者等开会，决定举行示威运动、令各界组织反对出兵宣传委员会、由教育厅令各校学生组织排日宣传队等多项对付办法。

△　上海妇女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通电抗议英兵兽行，提出四项要求：一、撤退一切驻华海陆军队；二、收回租借地；三、依法严惩罪犯并对中国国民道歉；四、负责赔偿被害人损失。

△　南京政府财政部电各省市商会等称：“前由政治会议议决停铸袁币，改铸先总理像币，又据中央财政委员会议决，先总理像币织像镌模需时……准暂用民国元年所铸先总理纪念币旧模先行铸用，成色分量，均暂照袁币办理。”11日，南京造币厂开铸孙中山纪念币。

△　全国农协训令各级农协，指示适应新环境的新政策五项：一、巩固组织，严肃纪律；二、保护革命同盟之利益；三、注意改良乡村旧日习惯之步骤；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五、加紧宣传工作。

6月8日　　南京政府依5月30日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训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暨各省政府，于惩办土豪劣绅之案，除当事人实系共产党，仍归清党机关办理外，事犯在4月15日以前者，概令具结保释，事犯在4月15日清党以后者，仍应依法办理。

△　阎锡山派政务处长兼警察厅长南桂馨赴北京，与张作霖商议晋奉宁三角同盟事。9日，杨宇霆、韩麟春向南桂馨转达奉方意见，

略谓：对三民主义东北不反对，但先决条件在共同讨赤。晋方既主张奉晋宁三角同盟，应先由三方面摊派队伍会剿赤化军。至国是问题，俟赤化敉平，听由国人从长计议。10日，南桂馨变更预定南京之行，遄返太原，向阎锡山报告与奉方接洽经过。

△　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湖北全省工会组织部调查：全省工人人数80万，有组织者共51.3408万人。工人俱乐部及工人学校共二三百处。

6月9日　　阎锡山下令取消省长，裁撤省公署、省议会、参事会、自治筹备处、道尹、镇守使署，决定自兼山西省政。并任命各厅长如下：民政南桂馨，财政李鸿文，建设王禄勋，司法冀贡泉，教育陈受中，农工赵丕廉，实业马骏，总司令部省政秘书厅杨兆泰。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议决，任命张静江、蔡元培、陈希豪、沈定一、姜绍谟、蒋伯诚、卢仲英、洪陆东、李超英为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

△　夏斗寅叛军由武长路东退，是日占领大冶，武装工人纠察队顽强抵抗。

△　白崇禧第二路军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克海州。孙传芳部冯绍闵师及郑俊彦师各一部被歼，周荫人残部由海道退青岛。白宝山部李奇峰等率部投降。13日，蒋介石令白宝山降部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委郑绍虔代理该军军长，李明扬为副军长。

△　高桂滋电武汉军事委员会称，所部克复归德，孙殿英仅以身免，陇海东段敌已肃清。13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高桂滋为暂编第十九军军长。

△　日本复照送达北京政府外交部，诡称日本出兵山东，除护侨外无其他目的。18日，北京外交部对日出兵提出第二次抗议，略谓：

日方答复对于中国政府要求各节毫未容纳，而所述派兵不得已之理由，中国政府亦不能认为充足。务希转达日政府迅予撤军，尤盼勿再向胶济沿线及济南等处移动。

6月10日　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历时两日，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馀、于右任、唐生智、王法勤、于树德、邓演达、张发奎、鹿钟麟等均出席。会议结果，河南和西北军政大权交冯独揽，武汉政府部队则按“原定计划”班师回武汉。主要决定如下：一、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以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二、组织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馀、王法勤、杨明轩等11人为委员，以冯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政务，北京及西北两政治分会裁撤，以乌桂曼诺夫为开封政治分会顾问；三、冯玉祥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此外，冯玉祥提出调和宁、汉之议，但未商得明确办法，由冯酌办。

△　据上海《民国日报》讯：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张静江提议，恢复西山会议派张继、谢持、林森、覃振、邹鲁、居正、石青阳、傅汝霖、何世桢等国民党党籍。

△　据《民国日报》讯：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议决任戴季陶为中央工人部部长。

△　蒋介石任命夏斗寅为新编第十军军长，是日夏在蕲水防次就职。

△　孙传芳由枣庄到济南，与张宗昌、褚玉璞、寇英杰协商应付时局办法。

△　天门会与红枪会聚众六七百人围攻邯郸县城。13日，又聚众五六千人再攻县城。

△　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致电英使蓝普森，抗议英国飞机迭在广东黄埔军校上空及上海警戒区域飞行。

△　伍朝枢致电南京政府，称中法商约将期满，乘时务尽能力将其废除，另订互惠新约。

△　日、英、法、比、荷、西六国公使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各国对华修约所取态度，均认为中国时局不靖，修约会议可不必举行，一俟南北问题解决后，再与负责当局交涉。

△　直隶交涉署以美国增兵天津，英、法、意、日等国亦有增兵情事，是日，特向驻津各国领事提出抗议，请即速转致该国军事当局，注意华府会议尊重中国主权议决案，务将所增军队一律撤退。

6月上旬　　宁方“北伐”第四期作战计划已制定，分三路进兵：第一路由徐州出发，沿津浦线进展，趋滕县、兖州、泰安而至济南；第二路由宿迁、邳县入山东境，经沂州、蒙阴、新泰、莱芜、博山、淄川以断胶济路；第三路由海州、赣榆进兵，趋日照、诸城、胶州而达青岛。

△　日军自青岛登陆一周来，肆无忌惮进行侵略活动：一、派员侦察青岛地形；二、3日晚日司令官乡田赴济勘定驻军地址后，第六十三联队约200余人奉令于7日晨开赴济南；三、由日本运到青岛大批子弹粮秣，足够该军一年之需。

6月**11**日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一、豫军樊钟秀、梁寿恺、任应岐、蒋世杰、王乃文及王耀珊所部，归第二集团军冯玉祥节制指挥；二、河南保卫军应予裁撤，归冯玉祥严行编组。

△　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分两路进攻方城、南阳。是日，占领镇平、南召。

△　宁方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占郏城、赣榆。孙传芳嫡系第二、

第四、第八、第十四等师共43个混成旅全溃，向临沂退却。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美国在天津增兵事向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要求立即撤退所增军队，内述理由四点：一、违反《辛丑条约》规定；二、华北外侨向无受害情形；三、未得中国政府同意，违背华会精神；四、侵犯中国主权。

△　南京各界民众20万人举行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示威大会，通电全国一致反对日本出兵，并致电日本社会民众党制止日政府出兵中国。会后游行。

△　湖南省、市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为“马日事变”向武汉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并提出七项要求：一、明令讨伐许克祥；二、恢复湖南省党部及各市县党部；三、请唐生智回湘恢复省政府职权；四、枪毙许克祥等；五、解散湖南“救党”委员会；六、恢复湖南总工会；七、救恤被难同志。代表团对于汪精卫迁延不下讨伐许克祥明令表示失望。16日，湖南代表团通电痛陈“马日事变”后许克祥之流屠杀和镇压革命民众和革命组织罪行。

6月12日　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馀、徐谦于郑州会议结束后，是日返武汉。于右任附车同行。

△　绥远都统商震奉阎锡山命在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并颁令改悬青天白日旗。

△　豫军樊钟秀部克枣阳。

△　法兵500名由沪抵津。

△　上海各界60万人分别在南市、闸北、江湾三处举行反对日本出兵来华大会。大会发出警告日本政府及忠告日本民众两电。南市大会通过反对日兵来华办法多项：一、国民经济绝交，其办法为人民不用日货，商店不售日货，交易所不拍卖日货，不用日钞，不存款入日

银行；二、国民停止合作，其办法为日人工厂职工、日船海员、日人商店住宅职工一律罢工；三、海关对日封锁；四、请国民政府对日断绝国交。

6月13日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孙岳、鹿钟麟、薛笃弼、靳云鹗、方振武、凌勉之、刘治洲、载修瓒、梁寿恺、刘镇华为河南省政府委员，指定冯玉祥为主席；于右任、邓宝珊、茹欲立、李元鼎、石敬亭、井岳秀、过之翰、惠有光、杨荃骏、段韶九、王授金、邓长耀、严庄为陕西省政府委员，于右任为主席；刘郁芬、宋哲元、杨慕时、胡毓威、马鹤天、赵元桢、韩骏杰、马麒、蒋鸿遇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刘郁芬为主席。又任命第二集团军一至七方面军总指挥为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

△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解决“马日事变”办法，会议根据汪精卫的综合报告，认为鄂西、鄂北等地均在用兵，对“马日事变”不用武力解决，以免引起纠纷。同意唐生智请求亲到长沙以和平方法改组农民协会及实行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同时，武汉政府批准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辞职，以周斓继任。

△　唐生智等返抵武汉。同日，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马日事变”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

△　武汉国民党中央江西特别委员会命令恢复农工活动，是日撤退驻守农会、工会的军队。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一、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任蔡元培为院长；二、设外交委员会，推胡汉民、蒋介石、吴敬恒、李石曾、伍朝枢为委员。

△　日本前任陆相山梨大将奉日首相田中之命来华访问，是晚抵北京。次晚晤张作霖。28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题为《请国人注意山梨》一文，称山梨来华，一为以调和为名，促成南北双方妥协，

使中国革命不能彻底；另一则准备将来奉军溃灭时，引诱张作霖独立于东三省，则日本可用并吞朝鲜之故技并吞满蒙。

6月14日　夏斗寅部再次向武昌进攻，由仓子埠进迫距武昌30里之青山，另一部由骆驼湖绕攻汉阳。武汉震动。

△　阎锡山发表北方“国民革命军”各军司令人选：第一军商震，第二军杨爱源，第三军徐永昌，第四军傅存怀，第五军傅汝钧，第六军丰玉玺，第七军张荫梧，第八军谭庆林，第九军郑泽生，第十军李维新。

△　云南省政府主席胡若愚通电宣布解决龙云经过，略谓：“本省前次改革政治，误于龙云作梗，毫不彻底，昨奉国民政府密令，已于六月十三日夜，将该员职务、武装一并解除。”同日，龙云通电辞去本兼各职，所属各部队概交政府管辖指挥。

△　冯玉祥就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发表施政方针六项：一、统一军政；二、刷新吏治；三、整理财政；四、党化教育；五、抚恤灾黎；六、肃清盗匪。

△　阎锡山电复北京当局，谓奉军请求晋军出兵黄河北岸分担防务，除非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及悬挂青天白日旗，未便照行。

△　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发出分路清乡电令15条，规定令到后10日内一律肃清。自此许克祥、周荣光等部即深入湖南各乡县镇压农民运动，无日不杀数十人。各县原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及各革命机关悉被摧毁。

△　湖北省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到代表二千余名，中央党部蓝辛田、湖南代表简传良、江西代表邹努等出席。主席向忠发作报告，代表一致要求政府：一、下令平定湖南叛乱；二、继续向东南进攻，打倒蒋介石。

△　张作霖为摆脱危境，安抚内部，是日设宴介绍张宗昌、孙传芳、吴俊陞、张作相、杨宇霆、韩麟春、汤玉麟等重换兰谱，表示合作到底。席散后，即召开重要会议，决定以下事项：一、军事两大干路（京汉、津浦）分工严防；二、致电阎锡山，劝其表明态度，以三方面出兵讨赤为妥协先决条件；三、推潘复组阁。

△　南京国民政府布告保护外侨，命令军人“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

△　杭州各界举行反对日本出兵大会。蒋介石出席作反共演说，对日本出兵事未置一辞。大会发电两通：一致日本内阁，反对日本出兵。一致日本国民，宣布中国民众将实行以下步骤：一、一致抵制日货；二、在日军撤退后，如日方工厂船只仍顽抗，则实行罢工；三、若日本仍坚持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则海关拒收日货，直至断交。

△　全国律师协会电英首相鲍尔温，请其训令沪上英员对英兵强奸案执行复审。

△　山东阳谷县五万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是日起围城10日。

6月15日　武汉国民政府将唐生智之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下辖两个方面军，以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为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以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贺龙为第二十军军长。又第一集团军（蒋介石部）之第一、二、三、五各方面军仍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　武汉三镇约百万人冒雨参加欢迎第二期北伐将领及武装同志凯旋大会。并举行罢工示威。大会议决：一、欢迎北伐将士凯旋；二、讨伐蒋介石；三、恳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坚决拿办许克祥；四、抗议江西驱逐工农领袖、停止工农运动；五、反对帝国主义派兵

来华；六、抚恤伤亡将士家属。会后，各团体向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

△　据汉口《民国日报》讯：武汉工会代表大会通过对目前政府情形决议案，谓大会认为要使革命继续发展，必先肃清一切反革命派。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行下列八条：一、接受湖南代表团的八项要求；二、明令拿办许克祥并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三、明令恢复原有之党部、工会、农会等一切民众团体组织；四、发给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的枪械要明令保护；五、明令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六、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七、讨伐蒋介石；八、明令制止驱逐工农领袖等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行为。

△　第八军第三师李云杰部克沙市，杨森部向宜昌方面溃退。

△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萧佛成、周启刚、吴公义、陈肇燊、邓丹魂组织海外清党委员会。

△　南京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电令全国学生总会筹备会从速迁宁，并指令宁特别市党部负责指导改组。30日，全国学生总会改组筹备处由沪迁宁办公。

△　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已由上海迁南京，另设“国民革命军警备司令部”驻上海。是日，杨虎就任上海警备司令。

△　孙传芳、张宗昌、杨宇霆、韩麟春、张作相等在北京开会，决定推潘复组阁。又讨论组织新国家党问题，声称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四民平等，劳资调协，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并决定立即成立组织。

△　《中央半月刊》出版。吴敬恒主撰。该刊为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定期刊物。

△　新任驻宁日领事浅户正美偕同武官随员等30余人抵宁。晚，

伍朝枢欢宴。席间伍希望日政府即日将山东日兵撤去，详述日无出兵华北理由。浅户氏允转电回国。

6月16日　　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陞、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通电拥戴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讨赤救国”。

△　张作霖通电表示始终讨赤，暗示“非赤者”可以媾和，“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

△　顾维钧通电辞职，由胡惟德代总理，王荫泰暂代外交总长。

△　张宗昌因济南危机迫在眉睫，通告日当局将不负日侨安全之责。

△　上海开始清党。以陈德征、潘宜之、陈群、杨虎等13人为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委员。清党对象为：共产党员、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动”分子、恶化分子、学阀之类。准人“报告”且可代其保密。次日，该会开三次会议，陈德征又将缉拿权限扩大，随时随地知有共产党等分子，立可调派军警镇压。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学阀之名通缉章太炎、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劢、张东荪、凌鸿勋等15人。

△　浙江省开始清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彻底改组。张静江、蔡元培等九人任省党部改组委员。

△　湖南赵恒惕、袁华选（士权）到宁谒蒋介石，商解决两湖办法。

△　中央通讯社正式发稿。南京设总社，国内外各大埠设分社。7月12日，南京政府通令称，该社既为中央通讯机关，于党国要政以及各方面消息，不但具有迅速宣传之能，且负有精密审查之责，为此通令军政各级机关，以后所有新闻消息，务赶先尽量供给该社，不得延

缓简略。

△ 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一月来多为反动派所摧残，农民牺牲者达一万数千人，是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呈请国民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一、明令保护农工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介石；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工之土豪劣绅及其他一切反动分子，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翼鲲，解散其“救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湖南省政府、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并令唐生智从速镇压湖南之反动派；四、恢复江西工农团体，并严惩江西各县屠杀民众之反动派。

△ 山东省银行因时局影响，加上奸商操纵，发生挤兑风潮。是日，为男子兑现期，六人被挤倒，一人毙命。次日，为女子兑现期，六人挤毙，其中三名为怀孕妇女。

6月17日 蒋介石偕冯玉祥驻宁代表李鸣钟、方本仁等由宁抵徐。

△ 北京高等审判厅对鲍罗廷夫人及苏联三信使进行第一次预审。鲍夫人等拟聘请侨津美国律师化克士出庭辩护。闭庭时中国律师等要求提出关于犯罪之证据及下次出庭之证人。

△ 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孔庚到太原，阎锡山发起驱孔，并以“保护”为名，令孔寓督署内，不得外出一步，不许自由谈论军政，并由省党部派人监视。19日，经孔庚抗议后，阎始送孔离开太原。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派中央党部视察员刘芙若及蒋介石代表何亚农、彭凌霄到晋，省党部开会欢迎。

△ 南京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王世杰为法制局局长，

李晓生为印铸局局长。

△　安国军总部外交处代表顾泰来对记者谈称：张作霖就任大元帅后，各军名称一律称安国军，以昭统一，断无再有鲁军或孙军之分。至军事方面，暂取守势，俟军队改编完成，再谋从新发展。

△　上海反对日本出兵运动委员会开紧急执委会，议决以下各项：一、通告各商埠组织劣货检查处；二、请各地团体组织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会；三、请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后援队，从事后援；四、请上海学生联合会通告码头工会不装卸日货；五、请各路商会总联合会通告各商店，不许贩卖日货，由警察厅通知各署，取缔奸商乘机渔利；六，通知各娱乐场、电影院映演日本侵华影片；七、通告各报馆不许登日本广告，违者处罚；八、通告警察厅、学生联合会撤去街上日本广告；九、通告中国妇女协会，日用装饰品不用日货。

6月18日　“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就职誓词为“拥护共和；发扬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孙传芳率文武官员贺张。张招待各国公使，谓照约保侨，但不欲各国干涉内政。修改不平等条约，当照外交手续，不欲强制取消。

△　张作霖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大要为：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二、大元帅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之权利；三、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四、国务员设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五、大元帅命令，总理副署，但任免国务员不在此限；六、国务院与各部官制另订；七、6月17日前法令，不抵触本令者适用之。同日，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组成安国军政府。

△　驻沪日代理总领事清水就上海反对日本出兵运动事，向郭泰祺交涉员提严重抗议，要求“取缔排日宣传，及其他一切排日行动”。

△　广州各团体五万人举行反日出兵大会，通过实行经济绝交、不准商民购运日货等议决案十余项。

△　宁方军队奉令以主力向日照、沂州、枣庄、临城线上之敌攻击，以一部向鲁南津浦路诸要点挺进。各路军任务如下：第一路军之第十四军、第十七军向日照攻击；第二路军向沂州攻击；第三路军以主力自津浦路正面向韩庄、台儿庄、枣庄、临城攻击，以一部分向济宁、兖州等要点挺进。

△　福建财政处牌照局税丁偕巡警两名赴伞店征收税捐，双方发生冲突，巡警开枪打死店伙，激起民愤，捣毁局长住宅。全市商店罢市。闽江船户亦定自21日起停航。各界向当局提出枪决局长及税丁等要求。

6月19日　冯玉祥由开封抵徐州。蒋介石率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到车站欢迎。冯在车站发表演说，声明唯蒋介石马首是瞻。

△　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政治训练部、外交部为谋统一国际宣传起见，发起合组国际宣传讨论会，是日在南京成立，公推刘霆为主席，谭葆慎为副主席。以中央通讯社及国民通讯社为发表机关。

△　南京国民党为统一上海宣传机关，设中央宣传部驻沪办事处，以陈群为主任，刘霆、潘宜之为副主任。并另组上海宣传委员会，推定陈群、潘宜之等13人为宣传委员。次日，中央宣传部驻沪办事处正式成立。

△　是日至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420人，代表290万有组织的工人。赤色职工委员长及英、俄、法、美、日本、印度、爪哇等国代表均参加。主席团为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等。大会总结北伐以来的工会工作，讨论如何对付蒋介石叛变问题，驳斥“工农运动过火”论，决定扶助农民运动，巩固工农联盟的方针，特别强调组织工人武装的重要性。大会通过会务

报告、关于工会组织、关于童工女工、关于失业问题等决议案多件。并决定7月1日全国各地各业工会同时举行追悼死难工农同志及革命领袖大会；在最严重压迫之下，亦必须在工作所在地举行飞行集会，以表示工人阶级艰苦卓绝、一致团结反抗到底的奋斗精神。

△　省港罢工两周年，广州二万多工人集会纪念，并示威游行，提出“保护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保持四月十五日以前工人和资本家所订的条约”等口号。

△　日清公司日轮“南阳丸”由汉过宁驶沪，在下关违例不靠码头，不接受检查。由于该轮不鸣汽笛突然开驶，以致撞沉四艘划子，溺死乘客150人以上，损失行李无数。江宁交涉员蔡公时照会驻宁日领事田岛，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保留要求赔偿权。27日，经蔡公时与日领事交涉结果，日领事承认以后日商轮抵埠须靠码头，接受船舶检查所检查。

6月20日　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胡汉民、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钮永建、黄郛等专程到徐参加。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鸣钟、何其巩等前敌将领亦均出席。吴敬恒主席。会议讨论事项为：一、党之问题；二、目前政治建设问题；三、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四、继续北伐问题；五、武汉政府问题；六、政治部改良问题；七、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八、军事问题。对于北伐军事问题，蒋欲使冯军以一部沿平汉路直下武汉；国军主力溯江西上，以最短时间，削平“叛部”。冯以为当面之奉鲁军乃真正敌人，宜先以全力击灭之，武汉方面乃一家人，不宜兵戎相见，予敌以反攻机会。蒋以冯氏意见虽左，对奉鲁军阀尚能同仇敌忾，遂决定先用兵鲁南，予敌人以重创，再行回师西征武汉。会期两日。

△　潘复通电就任安国军政府国务总理。张作霖任命潘复内阁成员如下：外交王荫泰，军事何丰林，内务沈瑞麟，财政阎泽溥，司法姚震，教育刘哲，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交通潘复兼任。以夏仁

虎为国务院秘书长。

△　蒋介石委樊钟秀为第四十五军军长，取消原有建国军名义；委李纪才为暂编第二军军长，石德纯为新编第六军军长，张德胜为新编第二十一军军长，沈明玉为新编第八军军长。

△　上海开展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是日起实行下列措施：一、各报纸禁登日商广告；二、学生团体分派至各街道将日货招牌广告摘下；三、抵制日货委员会通知各商店禁止向日本定货与发卖日货，有不遵行者须囚于特制之木笼内数日，以示惩戒。

△　南京商民协会各区分会联席会议决定对日经济绝交，并举杨仲麒等11人为委员，组织委员会。次日，在下关设检查所检查日货进口。

△　苏联与奉方签订《俄满长途电话协定》。经费150万元，奉方半数由东铁红利下支付。于哈尔滨与赤塔间架二线，哈尔滨与海参崴间架四线。

6月21日　徐州会议继续开会，至午散会。今日最后议决，冯表示由彼个人请武汉政府取消，与蒋介石联名北伐。同日，冯电武汉政府汪精卫、谭延闿诸人，促鲍罗廷解职归国；劝在武汉之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望唐生智调集所部于郑州，协力“北伐”。

△　蒋介石、冯玉祥联名通电北伐。谓：“兹当会师鲁豫，更益进行之际，谨拘诚悃，为海内外告：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谨偕全国民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

△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委任

陈铭枢、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可钰、曾扩情、陈立夫、马文车、潘佑强、吴醒亚、王昆仑11人为军队清党委员。

△　北京军政府潘复内阁首次会议，通过下列主要议案：一、根据组织令于国务院分设九部，变通组织大纲；二、明令国务院限期修正现行官制官规；三、对现有人员，应酌量调用，其余候考试分别录用。所有积欠薪俸，由财政部议定，呈候核夺施行；四、简任外交次长吴晋，军事部参谋次长于国翰，军事部陆军次长杨毓珣，军事部海军次长温树德，军事部航空次长刘光克，内务次长齐耀珊，财政次长朱有济、段永彬、董士恩，实业次长田步蟾，农工次长刘敬宜，交通次长常荫槐。

△　在我国人民舆论压力下，日本不敢公开遣兵，青岛日兵是日起改换便衣，每日搭乘胶济车赴济南，迄24日止已开济1000余名。

△　驻上海日代理总领事清水访问署理东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张定璠，要求“取缔”上海人民反日运动。会谈历二小时，张答应“取缔过激运动”。

6月22日　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开幕，广东、广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六省财政厅长、海关监督、烟酒印花税局长、两淮两浙广东盐运使等以及中央财政主管机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统一及补救预算问题。蒋介石每月军政费需1600万元，而收入不及半数。古应芬要求各省“协力担负”，并宣布其方针为量出为入。解决办法为所有中央收入一律解交财政部，各省不足之开支应由各省自行筹补。各省不得截留税款及擅行任免财政部直辖机关人员。27日，各案议毕，决定8月1日实行裁厘加税。

△　蒋介石派杨虎、陈群到宁波调查清党，杨等到宁波后，即大事拘捕革命分子，前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杨眉山、前市总工会会长王鲲被杀害。

△　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由汉口到南京谒蒋介石，共商“讨共”，并即日赴前线慰劳已出发之部队。

△　日轮“瑞阳丸”乘客宋伯华等七人乘该轮由沪赴宁，至镇江时因该轮多索酒资，致起冲突。日人竟令水手茶房数十人围打宋伯华等，其中一人被抛江溺毙，其余亦皆受伤。宋等到宁报告船舶检查所。次日，船舶检查所请当局严重交涉。

△　张宗昌在济南召集金融维持紧急会议，提出办法三项：一、丁漕每亩加洋四元，共可收入2000万元，以1000万维持省银行钞票；二、会同两商会查明省银行未发行钞票，一律封存，每日兑回之钞票不准再流通；三、酌设兑换所四处。23日兑现仍极拥挤，又挤伤二人。

6月23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电各省市速办清党，限派定之各省及特别市清党委员于7月5日以前成立委员会；已成立者限同日以前报告工作，违者以懈怠工作处理。

△　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自本年7月1日起实行值百抽五十之卷烟统税，废除卷烟旧有一切捐税。同日，财政部公布《全国卷烟统税暂行简章》，凡12条。

△　广州沙基惨案纪念日，武汉三镇分别举行群众大会，并纪念“六一一”惨案（1925年6月11日汉口惨案）烈士、阵亡将士与各地死难同胞。通过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请第二、第三集团军出师北伐，消灭张作霖；请政府讨伐蒋介石，肃清东南等项决议。同日，广州、南京、徐州等地亦举行大规模纪念会。

△　上海总商会、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及纳税华人会，以上海租界当局定7月1日增加巡捕捐2%，是日特召集上海租界市民反对增加巡捕捐代表大会，通过提案多件：一、如不增加，照付；二、如须加收，连原数亦不付；三、如用压迫手段，采用必要表示，以示坚决。

又议决扩大租界纳税华人会，凡租界纳税人均须参加，不得限于公共租界。定名为“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设临时执行委员会，人数定为21人，加倍选举，交上海特别市党部圈委。

△　上海交涉员郭泰祺答复驻沪日代理总领事清水对上海人民抗日运动之抗议，称“决极力设法阻止此种不稳运动”，但仍希日政府早日撤兵。

△　白崇禧指挥第二路军向鲁南临沂攻击；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之第七、第十两军向临城，第三十三军及暂编第十一军向鱼台、金乡前进。

△　冯玉祥部占领曹州。

6月24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王宠惠为司法部长；改组广东省政府，省政务委员全体免职，另任李济深、邓泽如、李文范、陈可钰、陈融、古应芬、冯祝万、张难先、曾养甫、李禄超、朱家骅11人为委员。

△　何应钦第一路军之第十七军自赣榆向日照前进。第十四军由东海经沙河镇向莒县前进。28日，两军分别攻克日照、莒县。

△　第二军张辉瓒部克宜昌，杨森部溃不成军，所部向成杰师投降，其余纷向川边溃窜。

△　李宗仁第三路军第四十军（5月29日起归第三路军指挥）贺耀组部克台儿庄，程国瑞第三军及王翰鸣第十一军等部向峄县溃退。次晚，进克峄县，敌又向枣庄溃退，贺部乘胜追击。26日晨，克枣庄，敌向滕县方向逃遁。

△　广东北路总指挥钱大钧由粤至宁面谒蒋介石报告军事。

△　北京英、美、法、日、意五国使团会议，讨论两事：一、对

于北京改制、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事应持何态度，决分电各该国政府请示；二、美、意、法三国以中国时局紧张，主张使馆应即移津。英、日两国主张不迁，必要时以武力保护，讨论无结果。

△　据上海《民国日报》讯：奉天洮安县农会会长李迎春、镇东县苏邦公与蒙旗辅国公、北京蒙古参议员寿明阿等发起组织内蒙垦务公司，以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后旗荒地四百余万亩为垦区，资本奉大洋十万元。

6月25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一、追认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二、在广州之监察院即日结束，全部迁宁；三、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清党委员会、司法部、总部军法处各派一人组织特别临时预审法庭，其组织法由中央法制委员会起草。

△　张作霖发表“和平革新令”，宣称“自今更始，一切外交内政均以民意为归”。同日，通电声称与孙中山多年交谊，宗旨本属相同，凡属中山同志一律友视，其有甘心赤化者，仍当贯彻初旨，问罪兴讨，意在与蒋介石、阎锡山反共势力谋求妥协。

△　浙江省政府训令各县自7月15日起减轻田租25％，所减系照原有额征数计算，若原纳实数已达于减轻25％定率或超过者不在此例。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昌市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发表训令九条：一、民众对外交上不得作无责任之主张及发言；二、农民运动应取慎重态度，避免增加小农小商之不安，而致使其与大资本家联合反抗；三、民众不得缚束他人之身体财产及行动之自由；四、力图刷新地方行政；五、统一各级党部之权限；六、禁止私刑；七、处分逆产须照政府所公布之规定施行；八、禁止民众自由拘捕个人；九、保护革命军人财产。

△　上海华人纳税会会员与市党部代表开联席会，议决拒绝交纳

新增之二成巡捕捐，并郑重宣言：“上海为中国领土，外军无权侵入……吾华人于不得市政权利占得工部局内相当地位之前，决无一人出资交纳增税。”

△　方振武部克南阳，吴佩孚率残部千余人窜邓县，余部悉降。吴抵邓县后，仅于学忠部听命，张联陞、秦建斌部均归附冯玉祥。时孙连仲部大举进攻，吴率残部走鄂境，准备渡汉入川往依杨森，张联陞奉命截击。7月2日，吴佩孚在樊城上游30里之竹筱铺与张联陞军遭遇，吴仅率其妻子及卫士数百人逃遁，其参谋长张其锽被击毙，于学忠易服逃走。吴佩孚势力至此完全消灭。21日，吴率残部抵四川巫山，杨森亲迎吴至万县。

△　夏斗寅军为叶挺师追击，一个团退至安徽太湖。

6月26日　唐生智抵长沙查办“马日事变”，是日致电武汉中央，称“马日事变”系“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中央明令保护军人家属，则视同具文”；“投机分子更从而推波助澜，寻仇报复”；“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决自卫之谋”。其处理办法则为：一、党部及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听候改组；二、政客仇鳌、张敬兮等开除党籍，许克祥从轻记过一次。

△　蒋介石通电各地军事当局，令选派参谋一员，到宁组织点验编练委员会，并派张治中为委员长。

△　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延年任书记。同日，因叛徒告密，陈延年被捕。7月4日，陈延年被杀害。

△　李宗仁第三路军王天培部第二十九师占领韩庄，敌顾震、张继善、刘金彪等部向临城方面溃退。王部经沙沟直达临城。

6月27日　武汉国民政府因冯玉祥有驱逐共产党的提议，决定让步：一、解散工人纠察队；二、逼农政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长苏兆征

辞职；三、停止宣传工作。至于党务问题及对鲍罗廷等苏联人之解雇问题，留待下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讨论。又决定如冯玉祥不满意而更诉诸武力压迫，则武汉国民政府以湖南、湖北为根据地，以唐生智、程潜、张发奎、李品仙等之力防御之。

△　中共中央致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指出当前反对革命的势力，不只是帝国主义、张作霖、蒋介石，“凡是被革命高潮所吓退而接受帝国主义教唆的，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走到反革命那边去”。所以中国革命，“不但要集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势力，而且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战”。

△　唐生智、周斓令湖南公安局密拿散发传单要求恢复各级党部与民众团体活动之工人、学生数十人。翌日，曹树生等四人在长沙被杀害。

△　南京政府任命陈铭枢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原浙江省教育厅长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原江苏省教育厅长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并决定大学区制先在江、浙试办。按：南京政府原定粤省为第一大学区，鄂为第二大学区，浙为第三大学区，江苏为第四大学区。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所辖各省盐务稽核分所一律停止职权。29日，英、法、日三国领事谒伍朝枢，要求照常办理，并请对原有办公人员勿遽调动。

△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议决，8月份起，所有粤、桂、苏、浙、闽、皖六省厘金及与厘金性质相同之通过税一律裁撤。入口关税除特定物品烟酒等依特定税征收，奢侈品值百抽不过三十，普通值百抽一二点五，由财部切实进行，俟各省统一陆续仿照办理。

△　李宗仁第三路军第十军第二十九师占领临城，许琨率残部向兖州溃退。鲁军第十二军马玉仁部投降，由第十军收编。孙百万、章斌各部亦均投降。张宗昌以直鲁军第三军作战不力，下令免第三军军长程国瑞职，调任直鲁联军训练副监，所部归第五军改编。

△　张宗昌因韩庄、临城已失，退至兖州南之界河设防，济宁战事在进行中。

△　蒋介石电白崇禧停止进攻临沂，调主力西上进攻武汉政府。后因白崇禧不愿放弃临沂，未实行。

△　日本政府召集东方会议讨论对华政策，主持人田中首相，参加者有陆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以及驻华的使领馆官员等数十人。会议议题有：对华投资、出兵山东、改订中日通商条约及“满蒙”利益等涉及对华侵略的各方面问题，尤以对中国东三省最为注重。

△　上海国民外交后援会代表张四维等与驻沪日领事清水谈判，要求日政府于最短期间撤退在华军队。日领事允转达政府。

6月28日　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对官兵发出反共训令，要求武汉中央与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宣称“此而不去，祸将不堪”。

△　湖北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械弹交武汉政府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李品仙复下令解散劳动童子团。同日下午，第三十五军官兵至全国总工会索要房子，汉阳、汉口各重要行业工会亦先后被三十五军官兵占领。

△　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公布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命令，实际编入张发奎部队；中央机关主移武昌，与国民党中央脱离接触，并准备军事斗争。

△　冯玉祥致电豫、陕、甘省政府，令其与南京一致行动：一、

不准跨党；二、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期间，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

△　张作霖派北京卫戍司令邢士廉赴太原与阎锡山再商妥协问题，驻京山西代表李庆芳偕行。

△　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公布《政治会议分会条例》。规定：政治分会依照政治会议之决定于其特定地域内指导并监督最高级地方政府。

△　蒋介石委马祥斌为暂编第十军军长。是日马在砀山就职。

△　李宗仁第三路军王天培第十军第三十师克滕县。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占领大名，冀南、鲁南已无敌踪。

△　张宗昌、孙传芳等在济南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以许琨为前敌总司令、王栋为副司令，分守兖州、滕县间铁路线；以徐源泉为第二路总司令，率部驻守大汶口、泰安府；杜凤举为西路总司令，扼守济宁及运河沿岸；胶济路方面以郑俊彦为总司令，指挥第五、第十两师防守胶州、潍县；并派彭德铨为前敌司令，率部分布诸城；另调孟昭月部两师，守莒、峄、泗水之线。

6月29日　晨，李品仙部机关枪连在汉口占据全国总工会、湖北总工会，并发生抓捕工会成员事情。经劳工部长苏兆征与李品仙交涉，是晚军队始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

△　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称病辞职。湖北省民政厅长张国威、农工厅长董用威均辞职。军事处长刘骥辞职赴郑州。

△　广州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以广州工人前在省港罢工纪念日及沙基惨案纪念日大游行中，高呼革命口号，散发拥护武汉政府，收复

广东等标语传单为借口，举行第二次清党，大肆搜捕革命工人，围搜工会50余个，被捕200余名，其中主要人员13名在黄埔被枪杀。

△　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在广西平马通电率师入湘“讨伐湖南共党”。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阎锡山为政治会议委员，先以赵丕廉代表出席。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财政部长古应芬提议，发行民国十六年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以江、浙两省盐税全部收入作抵，自7月1日起发行。

△　李品仙第八军第三师克澧州（今澧县），黔军李燊部向合口（在澧县西50里，与临澧县互界）溃退。熊震师在桃源重创陈渠珍部。

△　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在北京开会讨论警备华北及保护侨民问题。英使主张划出华北相当区域为各国保卫区，双方军队作战时不得侵入40华里以内。保卫区域由各国分段担任警备，均以天津为根据地。美使提议“护侨”办法，即在京、津增兵，并声称此系“根据辛丑条约”。结果决定由各使向本国政府请示。

△　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裁员减薪，激成中外海员总罢工，是日起全部停航。

6月30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表示“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纠纷，可以请假”。

△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武汉公

安局长江董琴，指出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将纠察队全部解散，系为“巩固联合战线”，“避免奸人藉口”，但两日以来，外间竟有“捣毁工会，抢劫财物”情事发生，令迅饬所属对各工会严加保卫，严密缉拿惩办造谣捣乱者。

△　武汉国民政府改组湖南省政府，任命唐生智、周斓、刘兴、赵墨龙、冯天柱、李荣植、黄士衡、谢晓钟、曹伯闻为省府委员。唐为主席兼军事厅厅长。冯、赵、曹、黄、李、周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司法、土地各厅厅长。

△　山西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首领胡遽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及卫戍司令部逮捕。

△　张宗昌以前方军事紧急，调孙传芳军大部加入津浦路作战。两日以来孙传芳部陆续由胶济路经过济南南下，以泰安、界首、万德、张夏四处为该军驻防地。

△　张作霖颁布统一税收令，由财政部会商各省区将现行一切赋税杂捐严加综核，分别厘正、酌量裁减，嗣后非经中央核准，各省区不得擅加捐税。

6月下旬　　冯玉祥派李鸣钟为驻宁总代表兼军事代表，韩竹坪为政治代表，毛以亨为财政代表。

△　南京金陵关关余二万余元，前被第六军军长程潜扣留。后驻宁各国领事纷纷返宁，旧案重提，要求将该款退还，以重外债。关督蔡公时痛加驳复，声明除以前关余无须交还外，即以后之税收亦须一律保留。各领事无法反驳，只得照办，并有照会致监督署表示承认。南京政府遂下令各关督即日起所有税收悉仿金陵关办法完全保留，以免外人把持。

是月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北京政府审讯三名苏联外

交人员事，向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内称：“该三外交员所持各项中苏护照及保证文书，于职务全无错误，并已由北京政府承认，决不应加以逮捕或审讯”，此举实为“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要求北京政府即时释放。

△ 美国圣本笃会在北京所办公教大学，改名为辅仁大学，推陈垣为校长。

7月

7月1日 武汉、南京、广州等地纪念国民政府成立二周年。湖北省党部发布《告民众书》，称：“我们纪念国民政府之成立，纪念以往一切胜利之牺牲，与未来光荣的期望，唯一就只有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在南京军、政、党各机关团体纪念会上演说，声称“武汉伪政府及共产党甘为俄共驱使，阴谋破坏国民党政策，若不将此革命大障碍消灭，则中国无统一希望”。广州各界纪念会电请南京下令讨伐武汉及反对日本出兵山东。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议决加派张志韩、胡遁、张裕光、许鸿图为福建省清党委员；邓祖禹为江苏省清党委员；姜善一为湖北省清党委员；沈毅、何觉甫为广东省清党委员。

△ 云南改悬青天白日旗。

△ 宁方赖世璜第十四军奉第二路代总指挥白崇禧令协攻临沂，是日到达汤头镇，以一部位置葛沟；陈调元第三十七军第一师同时到达青驼寺，第三师主力位置义堂集，包围临沂。白崇禧亲率叶开鑫第四十四军猛攻临沂城，鲁军方永昌部乘夜屡图突围，均被击退，回城固守。

△ 宁方第十军王天培部由界河向邹县进展，一部由右翼四基山

方面进袭曲阜。次日，王部傅觉民纵队追敌至曲阜，与鲁军徐源泉部激战两小时，俘官兵中有白俄军官二人，俄兵170名。

△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下令各军限15日全部渡黄河。4日，孙良诚率部自郑州正面及西路巩县孟津北渡，石友三率部自开封柳园口北渡。7日，孙良诚部吉鸿昌师克新乡，沁（阳）、孟、温、武（陟）各县奉军次第肃清。14日，占彰德，前锋抵直隶（今河北）省境。

△　全国印刷业总工会在汉口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湖南、湖北、广东、香港、江西、大连、天津、四川、杭州、上海、广西等地代表50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印刷业工人9.465万人，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各界来宾1800余人参加。国民党中委彭泽民讲话，号召工人“团结自己力量，去裁制反革命宣传”；“拥护国民政府，去图谋本身利益”。

△　南京市总工会成立。该会章程称：“全市各工会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罢工，必须有上级工会之命令”；“所属各工会，如有共产及‘反动’分子混入其间，凡会员应尽量举发呈报本会，转请当局严密拿办，倘有藏匿或庇护者，一经查明，治以同罪。”

△　南京政府自本日起实行出口附税，加征百分之二点五。5日，北京外交团开会讨论对付办法，意见未一致。

△　武汉金融因受下游封锁影响，陷于困境，国库券已发900万元，是日纸币价格跌至六折，普通物价概涨四成，粮价涨至一倍，殷实商界广帮、宁（波）帮避匿，土著商家亦多停业。

△　冯玉祥通知河南各县，西北军用流通券听商界自由折扣，不得再有高抬物价及售货不找零钱等情事发生。通告一出，郑州市上西北流通券一元折价五角，2日开封竟跌至二角八分。3日，河南财政厅长薛笃弼召集开封商会各董开会，要求最低价格每元维持在六角以

上。

△　晨，徐州各界民众一万余人开第二次反对日本出兵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出兵山东、驱逐日本在华海陆军、取消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九项决议。会后游行示威。同日，福州中学生召开反对日本出兵中国大会，呼吁对日经济制裁。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顾市民反对，悍然于是日起实行增加巡捕捐二成，其他捐税一二成不等。租界纳税华人集会，决以休业方式示威反抗。3日，公共租界商店罢市示威；法租界方面，因有取消增捐之望未休业。

7月2日　　南京政府训令军、政、司法各机关饬属解散各地共产党机关，并分别逮捕看管共产党员，“毋稍宽纵”。

△　湖北全省总工会为解散工人纠察队事发表《告军士及工友宣言》，称工人纠察队自动停止武装的意义是为了顾全革命利益，消灭反动派的借口，而使兵工更加巩固起来。

△　下午，湖北孝感土豪劣绅入城，抢去自卫军枪支，党部、农协被抄毁一空，各负责人被捉者即被惨杀，并高喊杀尽党员及农协、妇协会员等口号。驻军何键第三十六军教导营坐视土劣猖獗而不顾。

△　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在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住处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19日被杀害于枫林桥畔。

△　南昌市民数万人集会，要求恢复工农运动，发还工农武装，严惩反动派。全市罢工、罢课、罢市。

△　北京军政府发布大赦令。令称：“各种犯囚，除伤尊罪在不赦外，其余应照本令分别赦免减刑”，限令到七日内一律开释；“涉及共产主义之罪犯，业经判决确定处刑，或经该管法厅裁判认为嫌疑重大者，仍暂羁押，由司法部速拟管束条例，呈候核准施行。”5日，北京

释放囚犯97名。

△　孙传芳联军周荫人部师长陈以燊、陆殿臣率领三师两旅在胶州通电宣告独立。3日，陈受冯玉祥委为革命军援鲁总司令兼第三十九军军长，陆为第四十军军长；陈等并胁迫青岛鲁军祝祥本部取一致行动。7日，鲁军三个师集结潍县，以褚玉璞为总指挥，进攻陈以燊部，孙传芳亦派兵从胶济路攻陈。9日，胶州方面陈部受日军压迫，卸下青天白日旗。12日，鲁军占胶州，陈部退日照。14日，陆殿臣部为孙传芳收编，开济南集合，陈部向苏鲁边境退却。

△　鲁军第十二军马玉仁部三个团共3500人请降无诚意，在徐州被李宗仁全部缴械遣散。

△　南京下关装载火药之民船失慎爆炸，死伤百余人，房屋炸毁百余间。

△　上海民众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执行委员会通过《惩办奸民条例》及禁止日货进口等经济绝交要案多件，《条例》规定："在本年六月十二日市民大会议决对日经济绝交后，全国人民如再有向日商私定私买日货，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查明确实者，处拘禁木笼十日以下及游街五日以下惩戒，并将货物充会。"同日，上海各团体反对日本出兵来华运动委员会登报警告私进日货商人："若再不悟，一经调查确实，定当严厉处置。"

△　广东全省开始停办日货。

△　广州市公安局派队搜查织造工会及鲜鱼工会，捕去革命分子11人。

7月3日　　武汉学生在武昌举行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封锁武汉。恽代英代表中央到会演讲称：现在武汉金融之所以如此困难，完全系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所造成，中

央认为欲革命成功，必须打倒蒋介石。大会通过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讨伐蒋介石等决议案。

△　福建省政府改组。举杨树庄、方声涛、郑宝菁、陈培锟，殷汝骊为常委，杨树庄为主席。

△　奉方于上月底派代表邢士廉赴晋商谈合作，卑辞厚礼，仍未得与阎锡山见面。邢在晋勾留两日，不得要领，是日自晋返北京复命。

△　厦门是日起禁止日货入口，凡赴日商店购货者，罚戴纸帽游街。7日，汕头实行抵制日货，违者充公。

7月4日　　汉口国民党各级执监委联席会议发表《对时局宣言》，称："我们要下革命的决心，谋我们的出路，打倒捣乱武汉的主谋者蒋介石，并且要使蒋介石覆没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不仅要打倒蒋介石个人，尤其要打倒蒋介石所代表的一切恶劣势力及帝国主义。"

△　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主张上山。毛泽东、陈独秀也同意上山。会议在讨论对付湖南反共事件时，仍然坚持联唐（生智）反蒋的政策。

△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日出兵山东发表宣言，希望日本政府"以同洲同文之关系，敦睦两国之亲善，毅然变计，立即撤退山东日兵，以平众愤，而弭衅端"。

△　国际联盟原北京政府代表朱兆莘在日内瓦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发表声明，谓此次三国海军会议或其他会议，中国未出席及未平等参加讨论者，苟有何关于中国之决议，中国政府与人民决不承

认。12日，北京外交总长王荫泰着驻瑞士公使萧继荣查办朱氏。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李石曾提议，设立中央建设委员会，实现孙中山《建国方略》统一各省建设行政案，及广州中山大学定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案。

△　津浦线鲁军徐源泉等部自界河反攻，王天培第十军教导第三师、第二十九师不支，退运河南岸，滕县、临城先后为鲁军攻占。

△　鲁军第二十二师董鸿逵部及王冠军旅由泗水、蒙阴间道增援临沂，白崇禧急令第三十七军进攻蒙阴，以第六军第十七师接替费县防务。是日，第三十七军第一师进抵瓦子坪（青驼寺西北），第三师到达青驼寺，第二师由费县北进，第六军第十七师接替费县防务于员外庄、永康庄之线，对泗水方面警戒。

△　第四十军贺耀组部由曲阜绕至石门山，与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夹攻孙传芳军。次日午占新泰。孙部退莱芜，张宗昌部退徂徕山。

△　江西省清党委员会成立，委员李烈钧、蔡公时、杨耀唐、陆杰、范振亚、董开福就职。洪轨、甘家馨、王礼锡、周利生等未到，会后全体党员会认为洪等不莅会有消极帮助“反革命”行为，一致议决呈请中央撤惩。

△　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特别军法处长兼各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在沪搜捕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者数百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自上月26日被捕后化名陈友生，因被叛徒韩步先出卖，真实身份暴露，是日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杀害。

△　各国向华北增兵，截至是日，日兵2300名，美兵2850名，法兵2700名、炮兵一大队，意兵1200名，均以天津为大本营。

7月5日　　晚，蒋介石宴沪绅商报界人士，席间蒋称：工潮问题，望自谋解决；“政治方面请以军事告一段落，三个月后为期，如

仍无成绩，胥本人之罪”。黄郛称：当局已出期票，国民解除痛苦有望，惟欲期票有信用，须尽量维持“银行”，望商界一致为后盾。李馥荪代表金融界要求维持公债。穆藕初要求维持实业。蒋答称：维持实业为政府之重要政策；公债事望开诚商洽。

△　汉阳50余团体代表500余人举行讨蒋反帝大会，通过请武汉国民政府严重抗议帝国主义出兵华北，请立即下令讨伐叛党叛国的蒋介石等10项议决案。

△　上午8时，陈调元第三十七军第一师抵侍郎宅北，与敌王冠军部遭遇，激战至下午2时，王部不支退蒙阴，一师占北桃墟。次晨一、二两师会攻蒙阴，10时克之，王部向新泰溃退。

△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职工会、海员工会、中华书局职工会等400余团体联名电请南京政府、中央党部明令永除汪精卫国党两籍，严拿究办。

△　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发表宣言，抗议香港政府解散香港分会，号召海员工人团结一致，誓死奋斗，并彻底反抗国内反动派提取会款，封闭各地分会。

△　南京政府训令财政部转饬江海关监督查禁北洋军阀在沪购粮。

△　日本政府决定将驻青岛日军全部开赴济南，并由大连派兵2000维持青岛及胶济路治安。6日，经日皇裁可，日政府发布出动令。7日，日以护侨为名出兵济南，由乡田少将统率，共到2000余人。乡田布告声称：“本军抵境，实因保护日侨，确无干涉内争之意；若有不逞，加累日侨，或对日军表示敌意，定当立惩。”

7月6日　　南京政府特任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蒋介石、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李宗仁、温寿泉、李鸣钟、李福

林、朱培德、王天培、白崇禧、朱绍良、陈铭枢、赖世璜、曹万顺、周凤歧、陈调元、柏文蔚、王普、贺耀组、叶开鑫、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周西成、胡若愚、陈可钰、黄绍竑、钮永建、商震、鹿钟麟、向传义、张之江、陈绍宽、陈季良、李景曦、陈仪、樊钟秀46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汪精卫向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东征”案。

△　蒋介石在上海国民党员欢迎会上作《关于党务问题》演说，宣称：一定要取消武汉政府，赶走共产党，武汉军队重回河南前线作战。

△　驻沪日代理总领事清水在沪公共租界见蒋介石，要求对抵制日货问题适当取缔，对日出兵济南事予以谅解。

△　武汉国民政府发出关于农工运动布告，谓各界不得妨害农工团体之运动，农工团体亦不得擅行逮捕惩罚善良，对一切反动分子勾结土匪，捣毁农工团体，杀害农工群众，定必严惩。

△　谭平山组织“农政调查团”，率大批干部离汉，转往九江。

△　据汉口《民国日报》讯：近数月来湖北各属反动势力残杀民众，据省农协统计，自2月至6月，大冶、宜都等三十余县被屠杀而死者4700余人，伤者无数，屠杀方式用活埋、烧死、钉死、锤死、枪杀或挖眼、割舌等等，惨不忍闻。

△　浙省残杀省、县党部革命分子，五、六两日在杭州陆军监狱被秘密杀害者即达22人。

△　上海总商会奉令通告禁止现银出口，中外军民凡由上海携带现币出口，须有财部护照。每人所带银币不得过50元，毫银不得过100元，违者没收。

7月7日　　蒋介石在上海总商会等团体欢迎会上作《国民革命与经济的关系》的演说，向资本家宣传反共，宣称：上海是全国经济枢纽，“如落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不特经济破产，商人不能安居乐业，全国国民亦必受其祸”；“中国没有资本家，如果三民主义实行，那么个个人都可有四五十万的财产”；“不论何人的财产，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都在保护之列”；“经济关系国民革命的成败，必须求其安定发展”；“希望上海工商界与国民革命站在同一条战线，赞助政府，建设新上海”。

△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

△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吴敬恒提议，凡因反对共产党而被通缉之国民党员，一律取消通缉。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苗培成、李江、郭树棠、杨笑天、王振钧、梁永泰、南桂馨为山西省清党委员，是日，各委在太原就职。

△　冯玉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清党：“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收容之。至于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9日，全军政治人员一律被冯解职，加以甄别。武汉派往豫、陕政治人员一律被冯遣回。

△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典礼，蒋介石主持。设土地、工商、公益、工务、教育、卫生、港务、公安、公用、财政十局。市长黄郛就职。

△　北京军政府阁议，决裁撤京畿卫戍总司令一职，所有维持治安事宜，交由军事、内务两部负责办理，派高金山接收卫戍区域防务事宜。

△　自上月27日至是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外相官邸召开有政府代表、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首脑参加的“东方会议”，策划侵略中国，图谋独占东方。是日会议闭幕，田中在闭幕词中发表侵华根本政策，宣称“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原则；中国东三省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中国战乱一旦“波及满蒙”，日本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措施”。25日，田中上奏日皇裕仁，报告“东方会议”侵华决策，提出“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主张以“铁血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并声称：“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致函公董局，就增税等事提出三条件：一、尊重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凡关于法公董局一切设施，须经纳税华人会承认或否认定之；二、此次公董局所增房捐、地捐及车摊杂捐，要求一律免加，仍照旧额收取；三、公董局之华董须由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产生。

△　北京政府驻意公使、国际联盟代表朱兆莘宣布脱离北京军政府而任南方代表，国联下届开会时将代表南京政府出席。

7月8日　　南京政府公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由“国民政府”任命委员九人至15人组织省政府委员会行使其职权；省政府下分设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司法各厅，必要时得增设教育、农工、实业、土地等厅分管省行政事务。

△　南京政府公布《财政部民国十六年盐余国库券条例》，规定该项国库券用于整理实业，补助国库，定额银元6000万元，以江、浙两省全部盐税收入作抵，月息八厘，7月1日开始发行，六个月后分月偿还，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2月底偿清。

△　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屡攻临沂不下，白崇禧令陈调元第三十七军是日自青驼寺全部撤至义堂集，杨杰第六军第十七师主力撤至卞

庄、向城一带，赖世璜第十四军第二师移驻李家庄，同时集合各部炮兵向临沂射击，援助第四十四军攻城。

△　南昌工会代表大会决议恢复江西全省总工会和南昌市总工会。13日南昌市工人数万人分别到总工会祝贺，张贴“拥护总工会”、“讨伐蒋介石”等标语。

△　美舰15艘、英舰一艘，意大利舰二艘开抵青岛。

△　张作霖在北京大捕学生，一日内被捕67名。

7月9日　　南京政府任命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汝钧、丰玉玺、谭庆林、郑泽生、李维新分别为北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各军军长，张荫梧为北方第七军副军长。

△　南京政府令免广东省政府委员陈树人（兼民政厅长）、许崇清（兼教育厅长）、陈孚木（兼农工厅长）、何香凝、宋子文（兼财政厅长）、徐权伯（兼司法厅长）、李禄超（兼实业厅长）、孙科（兼建设厅长）、李济深（兼军事厅长）、周佩箴本兼各职；11日，任命李济深、邓泽如、李文范、古应芬、陈可钰、朱家骅、曾养甫、陈融、张难先、冯祝万、李禄超为该省政府委员，李（文范）、陈（可钰）、陈（融）、李（禄超）、古、朱、曾、张、冯分别兼民政、军事、司法、实业、财政、教育、建设、土地、农工各厅厅长。

△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贺锦斋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龙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师师长。

△　蒋介石以第四期“北伐”计划已实现，即进行第五期计划，决定从设立点验编练委员会，整理各军着手。18日，点验编练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白崇禧在成立会上代蒋声明此后每月拨西北军军饷200万元。

△　鲁军总司令张宗昌以累欠各军军饷，兵士滞留缓进，决定缩编裁军，是日下令裁撤孙魁元之第十四军、王毓秀之第十八军。

△　拂晓，贺耀组第四十军主力由万里闸（位于台儿庄西鲁运河）渡河攻击鲁军徐源泉部，激战至午，将徐部击退，即与王天培第十军第二十九师协同作战，下午3时克韩庄。

△　乐昌桂军胡凤璋部入湘境，击散农军，占领桂阳。

△　江西停止工农运动已一月余，是日九江码头总工会通电全国，略称：为应付革命环境暂停工农运动，在当局固属善意，孰知竟予反动派以可乘之机，四出造谣，捣毁工农团体，牺牲不少同志，顷已电请国民党中央江西特别委员会即日明令恢复工农运动。

7月10日　　贺耀组第四十军克复峄县。次日下午4时，王天培第十军再克临城。鲁军退守官桥附近之南沙河。

△　白崇禧下令弃蒙阴、费县，并撤临沂之围，抽兵南下，以作应付长江上游武汉军之准备。

△　各地民众纷纷成立反日团体。是日扬州各界民众三万人举行对日经济绝交大会，并游行示威。11日，杭州对日经济绝交同盟成立。12日，河南民众反日出兵运动大会筹委会推定省党部筹委会、教职员联合会等11团体即日组织反日运动执行委员会，负责开展反日运动。南宁反日会、徐州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委员会于同一日成立。

△　江苏交涉员郭泰祺，据上海市郊农协俞汉强电称，英兵驻扎虹桥路，侵害我国主权，特函驻沪英总领事巴尔敦抗议，略称：英兵在华界沪西虹桥路航空场附近扎营操练，实属侵害中国主权，违反国际惯例，请速撤回租界。

△　冯玉祥驻晋代表刘治洲离太原返河南，临行语人，称蒋、冯既已确实合作，冯业明白反共，阎锡山对军事将有所表示。

△　天津华人自营进出口货事业之协和贸易公司受时局影响倒闭，负债500余万元，金融界大震动。

7月11日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加推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

△　胡汉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作反共报告，声称“我们军事政治的力量，如果不严重的逼迫过去，所谓真的清党，是断难实现于两湖的”，要求动员全体党员力量去“完全消灭”共产党。

△　日本续派军队2000名自大连到达青岛。同日，北京外交部致牒驻京日使馆再提严重抗议，要求速撤济南、青岛两处日兵，并中止再由大连增兵青岛。19日，日使芳泽答复北京外交部，声称山东出兵为保侨需要，如山东今后无军事行动，方能议撤。

△　南京政府任命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长，郑洪年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朱家骅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　据汉口《民国日报》讯：鄂北农运有突飞猛进发展，计已成立13个区农协、132个乡农协，会员约3.4万余人。土豪劣绅等组织“厉山会议”和“安居宣传社”向农协反攻。

△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退出四川泸州，是日抵汉口。

7月12日　冯玉祥分电南京、武汉政府竭力调停，要求双方“化除意见，努力北伐”，并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

△　南京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　中共中央改组，成立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总书

记陈独秀停职。

△　北京高等审判厅主任推事何隽宣告鲍罗廷夫人案预审终结，鲍罗廷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三人无罪释放。何亦于当日呈请辞职，出京赴津，避不露面。14日，何隽因判释鲍罗廷夫人事，住宅被封，家属被监视。16日，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亦因此被张作霖免职。

△　林祖涵称疾向武汉国民政府请辞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职。

△　阎锡山厉行反共，是日颁发《各军事长官连带负责办法》，规定军队中如发现有共产分子，由各该管长官负连带责任，“如有隐徇情事，即唯负连带责任之该管长官及设有党部之执行委员等是问”。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声明中国共产党“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宣布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一切封建余孽，继续增进工人利益和解放农民的斗争。

△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因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形势逆转，无力挽回，于上月末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离汉北上郑州，转西安赴苏联。是日发表《辞职宣言》，声明：“此次革命势将重蹈民国元年失败之覆辙。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

△　南京政府发布军事时期巩固后方之重要通令，内举当前便利进行之急要政务五条：一、剿匪；二、整理交通；三、党不干政；四、抚恤战区人民；五、修整道路、桥梁、渡口。

△　白崇禧致书第六军军长程潜，力劝“以党国利益为前提，勿为共党所利用”，并请一致清党。

△　白崇禧令赖世璜第十四军重行围攻临沂，陈调元第三十七军主力集结大店崖、傅家庄、黄土堰之线，截敌外援。14日起扫除敌外围据点。18日夜间自东、南、西三面攻城，19日开始，昼夜炮击城内达三日之久。张宗昌部凭城固守，白为南下援徐，遂于21日再撤临沂之围。

△　晚，王天培第十军因右翼贺耀组部侧击成功，复克滕县，与鲁军在界河相持。

7月14日　　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陈友仁代宋庆龄发言极力反对，称：“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会议决定派重要人员赴莫斯科说明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并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对于“违反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的共产党员予以制裁。

△　宋庆龄因汪精卫集团排斥中共，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8日在汉口《人民政坛报》公开发表。《声明》指斥汪精卫集团企图改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严正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将不再参加。”

△　共产国际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出“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终结，它现在已成为反革

命力量”，号召中国共产党员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严惩镇压工农的一切罪犯，揭发武汉政府的路线政策；仍留国民党内，加强群众工作，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以对付镇压和杀害。

△ 冯玉祥、徐谦、孔祥熙自洛阳致电宁、汉政府，力陈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召开开封会议，专议党内问题，双方停止向皖、赣征调军队，共图和平；凡会议公认负咎之人，均当服从众议下野。18日，胡汉民、钮永建、吴敬恒自宁复电赞成携手反共，惟对汪精卫等上月复冯礻（22日）电中所称“南京决难宽恕”之言及武汉倒蒋之行动表示不满。22日，冯玉祥再电汉口汪精卫劝和，并提开封会议办法。24日，汪等复电赞同，声明反共，愿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如宁方赞同，可在开封开预备会议，不必拘会议形式。汪并另电致冯，称对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但“政府法统必以死争”。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周震鳞、覃振、刘岳峙、萧汉藩、袁同畴、潘佑强、仇鳌等16人为湖南省清党委员。同日，广西省清党委员会成立，以黄绍竑、黄华表、伍廷飏、黄旭初、蒙民伟、陈锡珖等为委员。

△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派张继、林森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二、特任陈训泳、蒋作宾、方声涛、何成濬、孙岳、方本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交由国民政府任命；三、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应即改组为省政府；四、任命张静江、蒋介石、马叙伦、颜大组、蒋梦麟、程振钧、阮性存、李伯勤、周凤歧、蒋伯诚、陈希豪、陈屺怀、邵元冲、马寅初为浙江省政府委员，马（叙伦）、颜、程、阮、周、李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司法、军事、土地各厅厅长。

△ 南京积极备战，李宗仁军及王普第二十七军过芜湖开赴安庆，夏斗寅回皖太湖防次，指挥反武汉军事。武汉军主力在武穴。

△　南京政府公布《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规定以上海、宝山两县所属原有之淞沪地区为上海特别市行政范围。

7月15日　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分共”，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共”。汪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悍然宣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对政局宣言》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共产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大捕共产党人，在育才学校、文化书社等处一日即捕20余人。中共中央从武汉开始转移和疏散人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解散。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邓演达辞职照准，以陈公博继邓演达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以陈克文继邓演达代理中央农民部长；并推陈公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武汉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张联陞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

△　武汉政府在工会组织中清党，特组特务委员会，改组各级工会，并通缉前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长向忠发。

△　孙科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革命与民众》一文，要求民众坚决拥护和实现下列两个主张：一、国民革命的领导，要统一于中国国民党；二、革命政权之行使，要统一于武汉政府。

△　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17日，第一次会议选胡汉民、何应钦、李鸣钟、阎锡山、杨树庄、李宗仁、李济深七人为常务委员。

△　南京纪念北伐出师，举行阅兵式。蒋介石演说，声称：“共产党不打倒，武汉政府不消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从今起一年中一

定要打倒共产党。”

△　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任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陞、褚玉璞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方面军团长。

△　阎锡山军占领石家庄。

△　长沙市公安局搜捕共产党人，是日共捕21人。当局并训令各学校、警署，严禁秘密集会，实行清查户口，五家联保，无保者不准在长沙市居住，分别予以监视、检查、驱逐、拿办。

△　日本民政党开对华特别调查会，讨论出兵山东问题，认为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均无明显理由，除予中国民心以反感外，无何效果，一致表决务请政府立即撤兵。

7月16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发表声明，诬指共产党破坏联合阵线，声称“六月初旬，政治委员会突然由某一共产党负责同志交付一项秘密决议案，而此项决议案之内容，实不啻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按指罗易交与汪精卫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之《紧急指示》）；“中共中央执委会复声明撤回其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本党容共政策，已被破坏无余”。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两项训令：一、《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诡称：共产党员受党内之纪律与国民党员无异，本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员而妨害其身体自由，或指诬他人为共产分子，妄图倾陷者，依法严办。二、《保护农工之训令》，诡称：并不因限制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　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宣布反共，所部占汉阳，次日又占汉口，反对鲍罗廷之传单满贴市中。共产党要人均避匿，鲍罗廷昨已赴牯岭。

△　上海苏联远东银行因被控有接济共产党经费情事被军事当局协同工部局捕房搜查，至晚又被加封。21日，南京派陈光甫到沪组织委员会对该行进行清查。8月15日，清查结果表明，该行犯罪行为不能成立，上海临时法院遂宣布准予启封。

△　上海清党委员会公告，宣称共产党自首者免予追究，复能检举者给奖，并准其加入国民党。

△　驻京英、法、日三国公使对中国扣留盐税事，向北京军政府总理潘复提严重抗议，要求北京军政府反省。

△　阎锡山到井陉，令商震沿滹沱河一带布防。

7月17日　南京政府令上海市长黄郛、警备司令杨虎审慎对外行动，防止罢工，如有不受约束，即严行惩办。19日，南京政府特派叶楚伧到沪，与学商界领袖商洽对日应取态度。21日，杨虎及驻沪特别军法处长陈群等会衔布告称："近来上海排外运动益见激烈，甚至强迫停业，擅封商店，此种不智行为，何异临敌自杀"，此后如再有自由拿人封店及其他一切扰乱秩序妨害金融等举动，惟有执行政府命令，严予惩处。

△　武汉军事委员会对付蒋介石之军事行动积极进行，由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贺龙各部合组之东征军集中江西，分由三路行动：一、由九江、湖口向安庆；二、由赣东攻浙江；三、由鄂东趋皖北。蒋系驻皖之王普、夏斗寅电南京告急。

7月18日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9月1日实行裁厘，同时宣布关税自主，将苏、皖、闽、浙、粤、桂六省境内一切通过税全裁撤，

进口货物改照国定税率征收，工厂制造货物照《出厂税条例》征收。23日，南京政府公布《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出厂税条例》。

△　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日声明，指出田中7月7日对华问题演说，意在力谋“二十一条”政策之复活；日对满蒙特殊地位之伸张，则较“二十一条”更扩大其范围，所谓“划出该地域为中外人安全地带”，其要求实有恢复列强从前在中国施行之势力范围政策之企图；对日本认为利权有危险时实行自卫手段之借口，表示绝不能承认。

△　甘肃省政府成立，以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马麒、胡毓威、杨慕时、马鹤天、赵元贞、韩骏杰为省府委员，刘郁芬为省府主席，胡、杨、马（鹤天）、赵、韩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司法各厅厅长。

△　陕西省政府改组，省府委员石敬亭、宋维窳、邝实桀、井岳秀、过之翰、邓长耀、杨荃骏、段韶九、严庄、惠文、倪卓京就职。以石为省府主席，邓、过、杨、段、严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建设各厅厅长。

△　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所有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佃农，自本年起一律照去年租额减租25％。

△　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董用威向武汉政府辞去本兼各职。同日并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经理。

△　武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杨绵仲接管汉口《民国日报》，23日派曾集熙继任该报经理。

△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迫停刊，是日出终刊号第二百零一期。

△　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分别被任命为“满铁”正、副社长。

△　京汉线奉军主力撤至保、石间之定县，24日复退至定县以北，晋军不战占正定。

7月19日　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各军取缔共产党，略称：共产党谋组织军队七万人，用以消灭国民革命军，此举所以绝国民革命军之生命，亦即所以绝国民党之生命，为此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查明所属军队中军事负责及政治工作各人员，其有共产党员已经知名者，切实劝导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停止职务；至于共产党之未知名者，应随时留心查察，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

△　李立三、邓中夏奉中共中央命令到达九江，与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吴玉章、林祖涵等一起会商南昌暴动事，认为“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第二十军实行南昌暴动，解决第三、第六、第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

△　杨树庄、李济深等于10日致电唐生智等申述对蒋态度，勖以一致团结，“继续北伐”。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等15人于是日联名复电，指出蒋假除共之名，行独裁之实，欲以一手囊括中央，成立南京政府，分裂国民党；并称“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蒋如不去，党必沦亡”。

△　南京政府通令自8月1日起禁止重利盘剥，规定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20％，如敢违反，从严治罪。

△　安国军第七军团长褚玉璞亲督徐源泉第六军、许琨第七军分三路围攻临城，王天培第十军弃临城，撤至韩庄以南。

△　张作霖任张宗昌为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第一舰队（东北舰队）司令，吴志馨为第二舰队（渤海舰队）司令。

7月20日　武汉政府任命王法勤为劳工部长；陈克文为农政部秘书长，暂代部务。

△　武汉政府任命孔庚、李书城、李品仙、朱霁青、叶琪、詹大悲、李汉俊、喻毓西、刘永闯、王祺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孔、李（书城）、詹、李（汉俊）、刘、王分别兼任民政、建设、财政、教育、司法、农工各厅厅长。原任省府委员孙科、邓演达、刘芬、董用威、张国恩、詹大悲、邓希禹、李汉俊、恽代英、宋子文、孔庚免职。

△　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仿照湘、赣成例，任命孙科、潘云超、孔庚三人为湖北特别委员会委员。

△　南京政府令广东省政府，凡在民国十四年8月20日以后至十五年3月20日以前因政变在广东被通缉之人，除朱卓文一人外概予取消通缉。

△　晚，驻北京日本武官本庄繁中将宴杨宇霆、南桂馨等，希望奉、晋合作，拒冯玉祥北来，谓冯与俄关系过密，北京若为其掌握，共党必活跃。

△　蒋介石之驻晋代表何澄到北京晤杨宇霆等，并已电宁请派代表到北京议和，惟迄无复电。是日，张作霖与张作相、吴俊陞、杨宇霆、韩麟春等在帅府商谈南北和议事，决俟宁方有无复电再议。22日，奉方代表葛光廷到宁商南北妥协。

△　青岛日兵肇事。下午5时，日本水兵在市场路殴伤人力车工人，并用刺刀刺伤前去排解之警察三名，华警一区第一分驻所被捣毁，枪支被收缴，日陆战队60名在山东路口架枪示威。次日青岛商会讨论应付办法，议决请当局严重交涉。24日，青岛商埠局照会驻青日领事馆表示抗议，并提要求五项：一、处分驻青日海军司令；二、惩凶；三、赔偿损失；四、道歉；五、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种行动。8月13日，日方同意惩凶、赔偿、道歉等项要求，此案正式解决。

7月中旬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颁发第九号通令，将郭沫若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

△　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郭沫若兼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　据外人蒲脱南调查，各国驻华军队共近10万人，计：英国4.4万，日本2.9万，美国1.4万，法国6000，意大利1200，其他各国2000。

7月21日　南京政府发表关于对日出兵山东交涉之宣言，声称政府依总理遗嘱直任对日外交全部责任，望民众为政府后援，切戒与政府政策相矛盾之举动，“日本出兵山东，为其传统的侵略政策之一部；中国而欲制止其政策者，决非枝枝节节之事，必遵依总理所遗留整个的对外政策，一致进行”。

△　中日修改商约展期三个月，昨已期满，是日北京阁议通过续延三个月。25日，北京外交部据此通知驻京日使馆。

△　北京军政府阁议议决，派张学良为陆军大学监督，韩麟春为校长。

7月22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8月15日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之《统一本党政策案》，凡未除名之执行委员均通知参加。

△　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在上海市党部独立区分部全体党员欢迎会上演说称：“目前最要紧的工作，一、继续北伐；二、讨伐共产党。”

△　张宗昌部寇英杰军第十师师长薛传峰在鲁西朝城宣布独立，改树国民革命军旗帜，驱逐朝城、范县、观城三县知事，收缴警备队枪械，复收容本地红枪会二万余人，合本部共约2.4万之众，设大本

营于朝城。

△　武汉与南京间战机益迫，蒋介石抽调津浦路“北伐”军队五万人西迫湖口、九江；以周凤歧、郑绍虔各军集中浙江衢州，威胁南昌。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制征收新增巡捕捐，30余家拒绝付款商店被勒令停业，并派捕严重监视。纳税华人会紧急会议议决坚持到底，并函交涉员严重交涉。30日，工部局允撤驻店监视之巡捕，各商店复业。

7月23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统一本党政策案》，称：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军将士书》，谓蒋介石自立中央，分裂党国，摧残第二方面军，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经济封锁，阻止第四方面军北伐，摧残农工，屠杀民众，是党国惟一敌人，号召革命军人“专心致志”打倒蒋介石。

△　晚，武汉政府招宴团长以上各将领，到唐生智、张发奎、魏益三、鲁涤平、何键、刘佐龙等90余人，席间唐生智演说称，“望努力打到南京去，方可得着出路”。

△　南京国民党中央密令江苏省政府，称：“对日政策应力避冲突，免日人有所借口，公然援助军阀，或与他帝国主义者结合。所有关于反对日本出兵事件，务依中央计划进行，在未议定对日排货以前，只宜以文字或演说宣传，不得径行有罢工及排货之举。”

△　南京政府公布，定于9月1日为裁厘之期，同日宣告关税自主，即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六省境内各种通过税完全裁撤，并将进口货物改照国定税率征收，工厂制造货物依照出厂税条例征收。

7月24日　直鲁军乘李宗仁、贺耀组部南调对付武汉之隙攻占徐州；王天培第十军争先撤退。蒋介石令贺耀组复回津浦线督师。次日，蒋亲率第一军之第二十一师抵蚌埠部署反攻，并电冯玉祥派队夹击。26日，蒋下达攻徐州作战令，各军限28日前集中兵力于八义集、任桥集、符离集、黄口附近，向徐州分进合击。

△　鲍罗廷在庐山居留多日，召集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等会议，对党务、军事均有秘密计划。是日因工作完毕，返回汉口。

7月25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派阎锡山、南桂馨、张继、童冠贤、马约、张砺生、丁惟汾、李石曾、赵戴文为中央政治会议太原临时政治分会委员。

△　南京政府任命蒋作宾、周雍能、张秋白、李宗仁、刘复、何世桢、李因、冯玉祥、柏文蔚、陈调元、王普、王天培、马祥斌、韩安、管鹏为安徽省政府委员。蒋、周、张、李（宗仁）、刘、何、李（因）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司法、教育、农工各厅厅长。

△　南京政府电令上海特别市长黄郛及警备司令杨虎劝止市民排外运动。

△　浙江省政府成立，张静江、蒋介石等14委员就职。下午第一次省务会议选张静江为省府主席。

△　陈布雷就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职。

△　南京政府聘任美国人那文为高等顾问。

△　冯玉祥在洛阳总部纪念周报告最近军政情形，略谓石家庄以南已无奉军，现奉方新旧派倾轧甚烈，张学良派代表携亲函到洛，极愿让出直隶，举青天白日旗，彼此停战。

△　李品仙奉唐生智令，就任武汉卫戍司令。

7月26日　汪精卫准备在庐山开反共会议，通知贺龙、叶挺到庐山参加，并令所部集中德安。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在鄱阳湖小船上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不去庐山，部队亦不去德安，而按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顺序速向南昌开进。是日，贺龙第二十军到达涂家埠。

△　南京政府任命贵州省政府各厅厅长：民政杨元桢，财政彭俊，军事周西成，司法窦觉苍，教育周恭寿，农工傅启钧。

△　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议决：一、委派刘纪文、邱鸿钧、靳鹤声、陈葆元、甘家馨、郎良、周曙山、萧锡祥、许锡勇、萧同兹、邓青阳11人为南京特别市清党委员；二、加派贺其燊、张抱之、李人祝、饶宝书四人为江西省清党委员；三、军队清党困难，停止进行。

△　武昌第二十军留守部失火。炮弹炸裂。驻防之张发奎第四军与新到之何键第三十五军因误会互相炮击终夜。

△　陕军麻振武部困守大荔，是日冯玉祥军张维玺、刘汝明等部掘地道攻击，克大荔城，麻负伤逃遁，死于途，余众散，多被活埋。

△　潮梅警备司令部奉蒋介石令，在汕头枪毙周荫人部第一师师长张毅。

△　日驻安东副领事田中作率日兵500余名，携机枪九挺、山炮两

尊，武装入侵临江县，强行设置安东领事馆临江分馆。是日，临江民众万余人聚集江边誓行抗拒，并组拒绝日领团，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次日拒绝日领团及临江县知事袁葆真等电北京外交部请示对付办法。

7月27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指责共产党不接受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要“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声称如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

△　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由周任书记。周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及江西省党组织负责人等均参加，讨论南昌起义部署，决定7月30日晚起义。随后成立军事参谋团，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贺锦斋、蔡廷锴等人参加，以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

△　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省党部、省政府、军部严防共产党活动，略谓第三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之训令中有“共产党员应在国民党内创设非法战斗机关”之称，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存在有直接之关系，除另电莫斯科询问该项训令是否确实外，希各级党部、机关“加以注意，严加防范”。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改组湖北省党部，以孔庚、郝绳祖、罗贡华、孙科、潘云超、朱霁青、张国恩、李汉俊、邓希禹九人为改组委员。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一、由军事委员会严令各军迅即退出各工会；二、湖北全省总工会及各种工会，应完全受中央工人部及湖北特务委员会指导监督，如有违反本党主义政策及革命纪律时，有纠正及改组之权；三、店员总工会改为店员总会，归当地党

部商民部指导监督。

△　鲍罗廷离汉口乘京汉路车北上郑州，转道陕、蒙回苏联，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到车站送行。

△　武汉反共后仍有倒蒋口号，张发奎且有率部回攻广东之谋。是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联名致电警告张发奎，谓张近标反共倒蒋口号，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促其勿再倒蒋，“觉悟来归”。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郑大章部夜攻东平，鲁军未战即退肥城。

△　冯玉祥代表熊斌到宁，表示西北军一致讨奉反共，服从中央命令。

△　冯玉祥、张之江、鹿钟麟电宁，就军事委员会委员职。

7月28日　夜，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等离汉口赴九江，次日到庐山，密商加紧“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均与会。会议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组织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审判关于“反革命”及土豪劣绅之案件，并通过《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8月20日南京政府以明令公布。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甘乃光前因附逆嫌疑被开除党籍，后据查实，并未参与，是日武汉中央党部通告所属，恢复甘之党籍。

△　冯玉祥自洛阳抵郑州布置攻鲁，即日起冯军向徐州方面移动。

△　上海浦东英美烟公司工厂反对征收烟草新税，是晚宣布停

工，7000工人被辞退。

7月29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时局之决议四条：一、提高党的威权；二、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三、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四、党员全体动员，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汉政府是日发表宣言，接受中央之决议，表示努力奉行，必于最短期间使其实现。宣言抨击蒋介石“挟持党军，遂进而挟持党部，个人独裁之结果，使国人知有蒋中正，不知有党，此实为党所不容”。提出要提高党的威权，“务使党的威权高于一切”。

△　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九江连发两封密电致南昌中共前委，称“暴动要慎重”，要等他到南昌再决定是否起义。次晨，张赶到南昌，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等，遭到前委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反对。争论数小时未决，原定起义计划推迟。

△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各地清党限8月底截止，军队除外。

△　南京政府派何成濬到北京，与杨宇霆、韩麟春等商谈南北妥协事。杨提出南北双方在国家政治上可以合作，内部之事则各自为政，双方不必过问；先军事后政治，第一步商停战办法，第二步定合作方案。何对此无负责表示，谈判无结果。8月1日，何离北京赴大同。

△　北京军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外交部称，日本政府屡催解决满洲土地商租权问题，究竟政府对此态度如何。是日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复电，谓该案属中日间重大问题，在政局安定以前，难以商议此事。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发表《告全市民众书》，要求审慎对日经济绝交，宣称：“稍一不慎，动误大局，经济绝交于是不能不

审慎，抵制日货之方式于是乃有细加考核之必要，若因抵制日货而引起排外举动，而引起外交纠纷，因外交纠纷而妨碍军事进行，因妨碍军事进行而危害国民革命……则攻败垂成。”

△　褚玉璞、孙传芳抵徐州督师，直鲁军第一、第五、第六、第七各军及孙传芳联军第四、第七、第八、第十各师已抵徐集中。

△　冯玉祥军孙良诚部先遣队抵石家庄。

△　英国下议院讨论政府对华政策，外交大臣张伯伦答复质问时声称：英国对华政策不变，须待有负责政府后再商订合宜新约。

△　傍晚，武汉1000余人力车工人与军警冲突，捣毁第七警署，军警开枪弹压，击毙工人二人，伤10余人。军警亦伤数人。30日，华洋两界全体人力车工人罢工，汉口全市戒严，人力车工人被捕去五人，全国总工会及湖北省总工会枪弹被李品仙派队收缴，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办事人员走避一空。武汉《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

7月30日　渤海舰队（第二舰队）司令吴志馨被东北舰队（第一舰队）司令沈鸿烈在青岛拘捕，“肇和”、“华甲”两舰舰长同时被扣。

△　李征五月前受蒋介石电请斡旋南北和平，是日李到济南与张宗昌密商南北妥协。

△　据《申报》讯：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宣布反共后，在汉口大捕共产党，市党部即捕去百余人，重要者均被枪杀。

7月31日　晨，南昌中共前委继续开会，经数小时辩论，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会议决定8月1日上午4时举行南昌起义。后因叛徒告密，前委决定从晚9时开始全城戒严，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

△　潘复奉张作霖命，是日往济南与张宗昌商洽军事，并征求对时局意见。8月2日，潘返北京报告，谓“徐州现有兵力达十万，布防

已妥，党军反攻，可以无虞，张且表示对军事进止，悉听政府命令”。

△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宣称：全国农民“欲图真正之解放，惟有信仰三民主义，及在本党指导之下组织团结，努力奋斗，始能达到目的”，要求国民党员尽其力之所能及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　胡汉民电粤邀唐绍仪去南京商外交。

△　武汉商家拒收国库券，有以修房为名停止营业者，有以无货应市为借口者。是晚，武汉当局在各交通要道，高悬“要革命先维持国库券”、“谁不用国库券，谁就是反革命”等标语。8月1日，市政府复布告，称国库券价格日落，显系奸人破坏，此后倘有故意折扣，及拒绝收用者，定当严惩。

7月下旬　　长沙自集中现金令实施后，当局滥发纸币，近日发生军人流氓向商店强迫兑现情事，激成全城罢市风潮，经周斓应商界之要求出而制止，风潮始息。

是月　　武汉国民党为严密控制工人运动，由中央工人部发出通告，声称：以后各级党部工人部、各产业工人特别党部对于工人团体应切实指挥监督，运用一切有效方法指挥其工作，使工人群众的一切行动，都根据本党的策略行动。并列举对工人团体实际指导方法四条：一、严密党与工会的关系；二、严密工会特别党部的组织；三、加紧工会里党团的组织；四、使有力的党员在工会活动。

△　谭平山、苏兆征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书，声明退出武汉政府，略谓：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已为中央自身所背弃，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共产党员既为革命的国民党党员及共产主义者，则在此种状况之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职。

△　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议决，工人部部长戴季陶辞职，以叶楚伧代理。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罗明纳兹及纽曼到华指导中共工作。罗易回苏。

△　台湾民众党领导之兰阳总工会、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台南木材工友会等29团体联合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以李友三为联盟书记长。

8月

8月1日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起义部队有朱德第九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公安局两个警察队，贺龙之第二十军，叶挺之第二十四师和蔡廷锴之第十师等。凌晨，1时开始，战斗主要在鼓楼、贡院街、天主堂等地发生，敌军六个团约6000余人，经过五个小时激战，至黎明，战斗胜利结束，歼敌朱培德部一个警卫团，王均第三军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两个团及一个宪兵营，金汉鼎第九军之第七十九团、第八十团之大部和程潜第六军之第五十七团。起义军占领南昌城。中午，聂荣臻率周士第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和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各一部在马回岭起义，向南昌进发，在德安将尾追之敌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所率卫队包围缴械，次日入南昌，与市内起义部队会师。

△　中共前委在南昌召开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彭湃、张曙时、李立三、经亨颐、徐特立25人为委员；并以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七人组成主席团。

会议通过《联席会议宣声》及《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

△ 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恩克巴图、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谢晋、白云梯、毛泽东、董必武、江浩、韩麟符、夏曦、许甦魂、邓颖超、屈武在南昌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汪精卫屈服于军阀武力，巧鼓簧舌，举止反常，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指出党中旧的领袖大半为敌人软化，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革命同志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拥护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与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 南昌“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提出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六条：一、确立革命的新根据地；二、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坚持总理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四、实行本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去年联席会议、今年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宣言、决议案；五、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六、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

△ 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题为《论中国》的演说，指出今日中国革命正处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上，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尽量利用党、无产阶级（工会）、农民（农会）和一般革命的公开组织，推动武汉的国民党人向左走，向土地革命的方面走，把武汉的国民党变为反对反革命斗争的中心，变为工农的未来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湖北省党部，由改组委员会即日接收该省党部，各种工作代理人员分配如下：组织部郝绳祖，宣

传部邓希禹，农民部张国恩，商民部罗贡华，工人部朱霁青，青年部李汉俊，常务委员孔庚、张国恩、潘云超。次日，湖北省党部由改组委员会接收。各级党部进行改组，共产党员被排斥。

△　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发动工人总罢工。4日，武汉中央工人部及湖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张铁君接收全省总工会。11日，省总工会发布《告工友书》，要求各工会严厉“清共”，实行工兵联合，拥护“东征”后方，打倒蒋介石。21日，张铁君在省总工会第四次会议上宣称已有机器、肠业、钟表、海员、车总、棉总、烟总等16个工会改组。

△　南京《革命军日报》记者访冯玉祥之代表熊斌、王彭年，王称冯已决定服从南京命令，与蒋介石一致“讨共北伐”。

△　广东省政府改组成立，新任省府委员陈可钰、古应芬、朱家骅等正式就职，李济深仍任省府主席。

△　南京政府公布《财政部特办爱国捐章程》，总额以募足3000万元为度，称此款用于“接济北伐饷糈”。

△　南京政府军事当局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妄登战报”，令上海邮局禁寄。

△　蒋介石督师反攻徐州。是日，李宗仁第三路左翼第十军王天培部于萧县东北之毛庄、姚楼一带与鲁军接触，逐次击退敌人，占领九里山、卧牛山及云龙山附近一带高地，其第三十师直薄徐州城下，第二十八师攻占津浦、陇海两车站，自西北面围攻徐城。第三路右翼第四十军贺耀组部拂晓攻占颜山高地，续向十里堡攻击，被高家营附近之敌所阻。

△　张宗昌以军需孔急，而山东省银行资金不足，各县之2400万元军事特捐又缓不济急，是日手谕山东各征收机关垫解军事借款400

万元，自8月1日起，到9月10日止，分四期解完，逾期不解者处罚。

△　北京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释放前因党案被捕之学生20余人。

△　浙江省务会议议决将前浙江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农业专门学校分别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另筹文理学院，合三院组织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大学区成立。

8月2日　　下午，南昌各界在贡院侧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八一”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宣誓就职，到数万人。委员誓词略称：“誓以至诚恪守总理遗训，根据本党主义及政策及各次大会决议，履行革命职责，为全国大多数民众利益奋斗到底，绝不妥协，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

△　武汉政府下令进攻南昌起义军，令称：贺龙、叶挺即褫军职，照“谋叛律”治罪；张发奎初抵九江，即逢事变，从宽免予置议，着即饬部赶紧“进剿”；朱培德即饬驻赣东南各处驻军严密兜截；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同日，张发奎军与起义军在南浔路沿线激战。

△　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革命同志，指斥武汉政府如今变成军阀政府，与革命公敌蒋介石等类毫无差异；汪精卫等类伪左派领袖已经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对革命主义和政策实行叛变，压迫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破裂，因此不能代表国民党群众的迫切希望和要求，不配称国民党的领袖，要求国民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

△　南京国民党中常会议决，以刘纪文、靳鹤声、甘家馨、洪轨、周曙山、陈焕东、刘季洪、罗家伦、罗芳炯九人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以陈铭枢、陈立夫、黄居素、叶楚伧、钮永建五人为监察委员。

△　武汉政府劳工部布告告诫工人，当此东征之会，不得听信谣

言随意罢工。同日，武汉政府下令大捕共产党，在泰康里九十五号等处捕去数十人。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吴玉章为该会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林祖涵为财务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为宣传委员会主席，郭未到任前，由恽代英代理；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张曙时、彭泽民、韩麟符、徐特立、王积衡、穆景周、林超伯、朱蕴山、孟湘鉴、陈日新、林钧、邓鹤鸣、张馀生、王一德、张开运为党务委员会委员，张曙时为主席。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任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叶挺代；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前章伯钧副主任代。下辖三个军：贺龙兼第二十军军长，党代表廖乾吾；叶挺兼第十一军军长，党代表聂荣臻，蔡廷锴兼代第十一军副军长；韦杵为第九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周逸群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总共16个团四个营，共三万余人。

△　胡汉民、钮永建、吴稚晖、李烈钧复冯玉祥转汉敬（24日）电，谓“汪精卫前存意气，故未能开诚相商，只须汉实践四月开执监大会之宿诺，则其重要分子来柄大权，亦所希望”。次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等联名电冯表白彻底反共，谓已通告于一个月内开执监会议，“俾进行讨共及对北战事”。8日，李宗仁、蒋介石、胡汉民等11人电谢冯玉祥。宁汉妥协成立。

△　日本在临江强设领事馆事，中国官民一致反对，日政府则坚持不肯退让，令驻奉总领事吉田与奉天省长谈判。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电安东道尹绝对否认，并劝人民勿对日暴动，静候解决。

8月3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加紧各军政治工作令，宣称“革命”濒于危险时期，一方须裁制共产党，一方须讨伐新军

阀，若不加紧政治训练，“则军队非离开革命战线，即易入于腐化之途”，要求自后对于党的政治训令诚意接受，对政工人员密切联合，共同奋斗。

△　汪精卫等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的进退，无关轻重。

△　中共中央发布《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于秋收期间，以农会为中心，团结一切接近农民的会门力量实行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归农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没收其财产，实行土地革命，对反动政府抗纳捐税。并指出这次暴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必然的可以使农村革命的势力得到新的集聚和训练，可以促进农民夺取武装和政权的决心，发达其根本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意识，同时党内对于土地革命的认识，亦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　南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武汉中央最近之行动，三大政策既被根本破坏，三民主义亦被曲解，党之纪律与权威既扫地无余，党之名义早成为一二私人之工具”；“武汉中央既已表现反革命行动之事实而与南京政府无异，本会决不能姑息盲从，亦必将以对待南京政府之手段对待之。”

△　南昌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征入粤。部队分两路南下，以朱德率领之第九军为第一纵队先遣队，以蔡廷锴第十师为第二纵队。4日，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向抚州出发。5日，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直属部队，贺龙第二十军全部离南昌。6日，警卫队南下。7日，周士第二十五师最后撤离，向抚州出发。

△　唐生智、朱培德、程潜自汉电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请“合力堵截”贺（龙）、叶（挺）军。

△　武汉政府在汉口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代表讨论维持国库

券，通过办法四项：一、即日通令各税收机关尽量收回国库券；二、限四个月内将国库券全部收回；三、各商店可存放国库券于中央银行，俟中央钞票印出，凭折兑换，并领取利息；四、由财部饬中央银行多发辅币券，以利流通。

△　宁方李宗仁第三路军攻徐州失利，左翼王天培第十军撤离津浦路，退萧县；右翼柏文蔚第三十三军退保淮河。

8月4日　　武汉、南京两政府迅速调集部队进攻南昌起义军。是日，张发奎部在德安附近与起义军开火，并将该地占领；张部军队数千人从武汉开抵九江；黄绍竑部韦云淞、黄旭初两旅奉命集中南雄；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派队将叶、贺两部在湘机关解散，并俘叶部新兵120余名。次日，朱培德由汉到浔，与张发奎、黄琪翔商攻南昌；张发奎先头部队抵涂家埠，向南昌进攻。钱大钧部自南雄至赣州驻扎，连营数百里，堵截起义军南下。

△　起义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进贤被第二十八团团长陈芝馨说动脱离起义队伍，是日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出进贤东门三里许停驻，将共产党在该师之主力范孟声（亦名范荩）第三十团解决，旋开赴闽浙边受陈铭枢收抚。

△　蒋介石在蚌埠电胡汉民转监察委员吴敬恒，谓："时局重要，除开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外，可否同时召开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解决一切重要问题，请于本月十二日以前召集如何？"

△　汪精卫致书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对容共表示认错，并对许颇多推崇，要其"出而负责，置党于最安全之地"。

△　武汉政府任命张肇元为财政部次长，并署理财政部长。

△　冯玉祥军奉蒋介石命令攻徐州，以鹿钟麟为东路军总司令，率杨虎城军及新编之李元藻、王鸿恩、王钰芬、常好仁各师约2.5万

人，日夜兼程自陕州、豫南驻地出发，是日抵达徐州城郊，与直鲁军徐源泉部相持于马牧集、杨集之间。但蒋介石因攻徐受挫，已于前一日决心撤兵。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为苏联抗议北京军政府检扣苏使馆留京人员密电事，致电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称："苏远东司长所称之驻京总领事馆，在法律上及事实上均无根据，中国政府碍难承认，且外交通信秘密权只能在相当范围内适用于领馆馆长，苏俄留京人员既无法律上之资格，复值我国军事时代，自不能任其享受该项特权。"

△　青岛渤海舰队反对张宗昌、沈鸿烈拘捕舰队司令吴志馨及舰长二人，是日大小舰六艘开出港外，列炮示威，提出释吴、发清欠饷、自举司令等要求。9日，经外国驻青各领及商埠督办调解，渤海舰队风潮解决。条件为：一、欠饷在10日正午以前发给；二、吴志馨与渤海舰队断绝关系，立即送还济南；三、保留渤海舰队之名，不归东北舰队司令官沈鸿烈指挥。

△　驻奉日总领事吉田茂与奉天省长莫德惠开谈满蒙交涉，吉田态度蛮横，对东北当局"着手进行的满铁并行线问题（按即关于吉海铁路和打通铁路之敷设）及用暴力阻止（日本）在帽儿山设领事分馆等事，要求中国方面反省"；否则停止京奉路军车通过"满铁"附属地。

△　北京军政府阁议通过教育部所拟改组北京国立九校计划。九校教职员忠告教育总长刘哲，勿使国校随政潮而转移。

8月5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十三次常务扩大会议决定改组汉口特别市党部，指定曾集熙、李午云、李叔模、赖特才、詹大悲、梁寒操、唐爱陆、李星亚、刘赓藻九人克日组织改组委员会，着手进行。

△　南京政府通令各机关，取消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名目，全国不得再送学生前往。

△　武汉政府诬指共产党为民众仇敌，决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活动。是日卫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产党“罪状”，借以大捕共产党，并枪杀多人。

△　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委员长陈群发布紧急通告，宣称：“本会为上海工人团体最高机关，所有上海工友应在本会指导下组织工会，始能认为真正工人之集团，凡未经本会指导组织之工会，本会认为自外于国民党，不准其设立”，如敢故违，当以“反革命”加以制裁。

△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及革命同志书》，主张彻底肃清奉鲁军阀，劝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

△　第二路军白崇禧部在陇海东段战斗失利，脱离战场南撤。7日，撤至睢宁、宿迁。

△　蒋介石于蚌埠策定淮河及江北防守计划，是日对淮河、运河地区下达防御令，各区分右左两地区，依据淮河之线及淮阴、阜宁两据点扼要固守。

△　驻华日公使芳泽到沪，接见日记者称，日本反对中国关税自主，“如南京政府准于九月一日断行关税自主，日本当有相当之应付办法”。

△　南京商民协会发起拥护关税自主运动，上海商民亦有同样举动。

8月6日　　张发奎传檄进攻南昌起义军。次晨最后一批起义军自南昌撤走，下午张之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部及第十二师缪培南部、第十一军二十六师许志锐部开入南昌城，8日，张率本部进城。

△　张发奎在九江大捕共产党人，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劳动组

合的主要领导人等70余人悉被捕。9日，共产党员26名在九江被杀害。

△　南昌起义军陆续到达抚州，杨如轩、杨池生部不战而逃。当地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四百余人参加起义军。12日前后，起义军离抚城。王均第三军会同张发奎部至宜黄堵截。

△　南京政府特任陈训泳、蒋作宾、方声涛、何成濬、孙岳、方本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郭泰祺为外交部次长，仍兼江苏交涉员。

△　南京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令各省区教育行政机关，所有学校采用校长制，废除委员制。

△　广州商民二万余人包围广东省政府，要求取消奢侈税。次晨3时，省府宣布戒严，借口请愿团内有共产党欲谋刺省府要人，派兵2000弹压，并派救火队以水龙射击，相持三小时，群众被驱散。

△　冯玉祥军郑大章部骑兵军自菏泽取道金乡、巨野进攻济宁，是日将济宁包围。经直鲁联军调集大军应援，内外夹击，郑部乃于8日撤退至菏泽附近，济宁围解。

△　鲁西范县、朝城一带，是日起被红枪会3000余人包围攻城，与鲁军第十师薛传峰部激战十昼夜，15日范县围解，朝城红枪会不战而退。

8月7日　　武汉政府军委总政治部发表《为讨蒋告九江民众书》，称讨伐蒋介石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决斗。为打倒新军阀，为提高党的威权，为解放东南民众，非打倒蒋介石不可。

△　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作反共演说，声称："我们今日已经到了决斗时期，要和共产党，和一切假革命派决一死战。"

△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三人，共青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陈独秀未能与会。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罗明纳兹代表共产国际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它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指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中共以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彭湃、任弼时九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七人为候补委员。

△　奉天商界厉行排日，商会令华商禁进日货，复令日人工厂华工总罢工，是日起与日商交易一律停止。

8月8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一、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国民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之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甦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之共产党分子，应由地方军

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介石、胡汉民、李烈钧等电武汉汪精卫、谭延闿等，谓“伏读江（3日）电，喜极而涕”，“前电明令，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然南京集会，汉上同志早有决议，翘请汉同志，及早莅临，以践夙诺”。

△　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湖北人民团体办法两项：一、湖北全省人民团体应即停止活动，听候改组；二、改组人民团体，由中央各部会同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负责办理。

△　南京政府令各省政府清查留学生，“如有共产党及跨党分子即停止公费”。

△　孙传芳、张宗昌军由徐州分两路南下：中路占固镇，向蚌埠推进；东路由宿迁向江北发展。贺耀组第四十军等撤至淮河南岸。

△　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王荫泰与西班牙公使嘎利德在外交部举行中西修约正式会议。

8月9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　武汉东征军总指挥唐生智通电讨蒋，谓：“长江各省之痛，皆中正所造成；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痛斥蒋介石操纵党权、军权、政权于一人之手，以反共为名，叛党抗命，自立政府，屠杀异己，要求海内共起平乱。

△　武汉汪精卫等通电全体国民党员，首述反共经过，继谓国民

党之危机，因反共已去其一，惟分裂不可不及时解决，决于一个月内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告各执行委员，预定本月15日召集之四中全会，延期至9月15日在南京举行。

△ 晚，胡汉民、蒋介石在南京总部宴日使芳泽，席间胡演说称："国民党在历史上与日本亲密，仍望携手。"芳泽答称："中日间时有不幸事件，由于壤地相接，望双方谋了解。"蒋称："希望赞助国民革命成功。"

△ 南京各市民团体致函芳泽，请将中国人民对于关税自主、实行裁厘加税之决心转达日政府。

△ 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到南昌，布告"讨共"。同日，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抵韶关，旋赴乐昌督师，出发湘边"讨共"。

△ 孙传芳部第二、第四、第八、第九各师迫近淮河北岸，主力向怀远附近之柏文蔚第三十三军第二师阵地猛攻，相持至10日午后，占怀远。第三十三军第二师退至淮河东岸冷水店附近。

△ 驻日公使汪荣宝以日本拟以强硬手段胁迫地方与之商议东三省问题，特电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迅定处置方策。内称：田中首相托出渊面告，"东方会议决定对东三省方针，拟将各种悬案与地方当局'诚意'商榷，以求得解决"，吉田总领事迭次通知莫省长协商，惟该省长始终不肯负责，再三警告，仍无效果，近更有排日之举，日方拟以强硬手段对付，要求政府严令该省长变更态度，否则日本将有不得已之举动。14日，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电汪荣宝称，"出渊所称各节意近恫吓，自应持以镇静，免为所乘"。

8月10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议决，列名革命委员会之共产党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一

律通缉拿办，“其跨有本党党籍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

△　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电李宗仁，谓：“弟等对于共贼，防制过迟，致酿成南昌之变，至深内疚；只以责任所在，应先谋补过，然后向第四次全体会议引咎，请求处分。”并谓：“诚使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能开，则不但个人负责问题，即机关改组问题，亦可于此解决。……由此会议，可能产生真能统一全国之政府，则一切分崩离析之现象，完全消灭之，顾诸同志深念之也。”

△　安徽省政府成立，管鹏为省政府主席。

△　湖北省农民协会改组委员会成立，以孔庚、亢振华、张国恩、郭树勋、邓良生、李汉俊、丁陶庵七人为委员。

△　安国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在北京对记者谈南北妥协称：“双方虽有此愿望，然商谈以来，皆系私人资格出面斡旋，以期接近之后再为正式谈判。”

△　蒋介石将前方作战部队撤至浦口、泰州、扬州等地整顿，另抽调第一、第七、第十五各军抵御南下之孙（传芳）军。

△　北京外交团集议反对南京政府加征吨税，主张各国船舶应纳吨税仍照旧率缴本国领署保管。

△　奉天总商会等团体因日召开“东方会议”举行反日运动，新组外交后援会，推总商会会长郑鸿文为执行委员长，计划以奉天为中心，推及全满，其目标为：一、“二十一条”之撤废；二、治外法权之撤废；三、反对“东方会议”议决事项及田中内阁之对满政策。

△　奉天全省商工组织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并通电各省军民，坚决反对临江设领。14日，该会在总商会招待日本记者，代理委员长杜重远称：“临江设领，即其‘东方会议’侵略政策之先锋，吾人对此侵略政策，如不极端反对，是直俯首贴耳任其宰割，故临江设领誓

死不能承认，假令不幸设领成为事实，则吾临江同胞与全国父老一致抗争。”17日，临江设领问题解决，奉天日领与该省当局议定，日领日兵撤回，设领问题待中日外交当局日后商定。

△　李济深、黄绍竑联名通电分别就第八路军总指挥及代理总指挥职，并宣布进兵湘、赣“讨共”。

△　北京军政府将北京国立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师范大学、女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教育总长刘哲自兼校长。是日教部派参事陈任中、司长刘风竹等分别将九校接收。

△　河南省政府令各县将红枪、黄枪等会一律取消，改编为民团，以作河南“革命成功刷新民治之后盾”，受各该管县长监督。

8月11日　冯玉祥电南京李宗仁等，建议在安庆召开中央执监会预备会或筹备会，进行“宁汉合作”。12日，李宗仁等复电同意在安庆开筹备会，“先聚一堂，融洽感情”。蒋介石亦署名。

△　第十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于反攻徐州作战时，擅自由前线退却，并残害同志、扣发军饷，引致军队哗变，蒋介石于8月9日将其拘捕，是日在南京枪决。

△　湖北省政府委员、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是日不经裁判擅杀其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耿丹。武汉政府为此免去刘职，并予逮捕，其部被改编为湖北省防军第一师、第二师。

△　张作霖特任褚玉璞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

△　久悬未决之中东铁路存款问题，由中（北京）苏两方理事成立协定，以半数1600万元拨交中方保管，是日先付500万元。

8月12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蒋介石以北伐受挫，宁

汉谋和之压力，提出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军事方面交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总指挥负责。晚11时30分偕白崇禧、黄郛暨随员、卫队离南京赴沪。

△　李宗仁、白崇禧自宁联名通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陈公博等创议宁汉联合，内称：诸公毅然清党“讨共”，“已与宁方一致，其他党内问题自可迎刃而解，而介公蒋介石以其所抱清党去鲍罗廷目的已达，对于总揽戎机之权，急须卸脱仔肩，离宁休养，所有总司令之职权，交军事委员会接收”；“党内政治问题，亟须推诚计议，迅谋解决，请速电示进行方针，以便合宁汉全力一致北伐”。

△　津浦路贺耀组第四十军等部因受孙传芳部自怀远及五河两翼侧背之威胁，是夜由淮河阵地撤退，第四十军及第二十一师经定远趋含山，第三十三军趋合肥。

△　孙传芳军先头部队到达西坝，白崇禧第二路军已全部撤离淮阴。第一路军何应钦令第一军之第二师、第六军之第十九师及第十七军在宝应湖以东地区作攻势防御；第一军之第二十二师驻守六合附近；第十一军于盐城附近作坚固防御。

△　武汉政府劳工部为严密监督工人，使一切工会成为“国民党化的工会”，特规定严密工人团体组织，严防共产党等六条办法，训令鄂省切实执行。

△　原黔军袁祖铭旧部、前第九军军长彭汉章以“在叙浦、泸溪一带杀人劫财”罪，经武汉军事裁判所判决死刑，是日在阅马厂执行。

△　河南新乡农、工、商、学、兵各界2.5万余人集会，决议打倒奉鲁军阀，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次日，举行示威大游行，要求武汉政府对日严重交涉，限期撤兵。开封、郑州亦分别于14日、19日举行10余万人参加之群众大会，反对日本出兵山东。

△　广州东沙角共产党机关被破坏，共产党员九人被捕。17日，广州警备司令部连日按所获名册捕人，截至本日，共捕共产党人59名。

8月13日　蒋介石在沪通电宣布下野。蒋氏辞职宣言，申述反共经过，并期望同志实行三事：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彻底清党。并谓："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日下午，乘轮赴宁波转奉化原籍。

△　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废除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不平等条约。略谓："凡经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再无存在之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予废除。至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更应即予终止，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改订新约。嗣后任何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

△　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反对宁汉合作，是日借赴日内瓦国际联盟为名离汉。

△　武汉政府令免魏益三第三十军军长职，调任军委会参赞，以该军副军长彭振国代理军长。魏知有变，旋即率部数团向皖境避去。横店、黄陂魏部被唐生智部第三十六军缴械，余部悉被彭振国收编。

△　沪商赞助武汉政府迁宁，是日各银行商号拨款200万元，作新政府经费。

△　孙传芳军占淮阴，先头部队到淮安，白崇禧第二路军纷退扬州。同日，孙军第二师李宝章部到蚌埠。

△　据上海《民国日报》讯：上海英侨法尔斯在租界发起组织"上海法西斯蒂团"，宣布十项主张：一、拥护租界之地位；二、协助当局维护法律及秩序；三、协助当局于租界内设立不受任何政党势力支

配之法庭；四、反对一切未经条约认可或未经关系各国同意之中国捐税；五、保持中国海关及盐务之管理权，至中国所负各国债务偿清后为止；六、反对一切政治团体在租界内活动；七、驱逐共产党人和工潮之发动者；八、反对中国军人以租界为庇护所，一切交战者不得入租界范围之内；九、随时保护租界内遵守章程之中外居民；十、协助当局保护守法居民，科罚恶徒。

8月14日　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商宁汉合作，内称蒋已离宁赴沪，总司令职权交军委会接收，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至因争持期间所发生之诸问题而必须先解决者，仍由代表赴浔面商。

△　南京国民党中委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敬恒、李石曾等到上海挽留蒋介石，蒋已返奉化。胡等亦继蒋而辞职。同日，胡等电冯玉祥谓，“夫议而必至于会，会且必赴各非所居之安庆，则双方尚有不可思议之小隔阂可知。……虽弟等自信能至议席让步，然何如介兄（蒋介石）早让之直捷”，“故现亦幡然改其安庆之行，一了即百了”，并谑冯“一柱擎天”。

△　冯玉祥接李烈钧报告蒋介石辞职电，即复电李烈钧转蒋挽留，“务请刻日还宁，主持大计”；并称：“如必欲退休，忍将垂成之业，付诸东流，则本人自揣智力，不及万一，亦惟有一同退隐。”

△　唐生智以许克祥“灰（10）日窜入祁阳，大肆劫掠，勾结湘粤边匪，蹂躏地方，行同枭獍”，下令严缉，并没收其财产，拘拿其家属。

△　孙传芳部第七师自淮阴南下，迫近宝应。宁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一面严令第十九师固守宝应附近之黄浦镇阵地，一面电令扬州第十四军确实占领天长、六合。

8月15日　日本外务省森次官、芳泽公使、儿玉关东长官、吉田

奉天总领事、武藤关东军司令官、三井财阀代表等在旅顺开第二次“东方会议”，密议满蒙政策，决定如下原则：将满蒙和中国本土分开；对满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不问何国欲向满蒙开发产业，发展经济，概不拒绝，但无论何种场合，日本必须占有地理的和历史的优越地位。并决定：一、对于满蒙秩序，日本必尽力之所及与以援助而维持，如有扰乱，日本将不辞以武力镇压，日本政府对以维持满蒙秩序自任之张作霖与以援助；二、废除在东三省的治外法权，获取商租权，容许日人内地杂居，赋以与中国人同等之权利；三、彻底取缔关于满洲的增税与排日运动；四、吉会、洮索等满蒙六大铁道建筑计划，依既定方针实行；五、山东撤兵暂观形势；六、南京增税决采强硬手段。张作霖之顾问松井、町野二人亦列席，代张提出1000万元借款要求，日方允借300万。

△　南京军政要员集议挽留蒋介石、胡汉民等，并决定由中央执监委员、中央党部各部长，政治会议委员，政府委员、部长，军委会常委等组织联席会议，推李烈钧为主席，决定大计。

△　武汉汪精卫、谭延闿迭接南京要求合作电报，是日复电请李宗仁等赴九江协议。

△　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作报告，宣称“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只有一个，谁亦不能任意把持……我们坚持我们主张，务必达到提高党权的威权”，武汉政府早已决定要迁往南京。

△　李济深、黄绍竑联名发出两电：一致冯玉祥，望支持宁汉合作；一劝武汉要员与南京双方以诚相见，共除共产党及奉鲁军阀。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核准财部整理国库券办法三项：一、人民手中之现金，准在政府辖境以内自由流通，车船输送千元以上须得财部许可；二、特税、盐税及内地税应付现金，此项税收所得拨归整理国库券之用；三、11月15日以抽签办法收回国库券300万

元；11月15日以后，每月收回100万元，至收完为止。

△　武汉政府为筹补饷糈，举办湘鄂赣三省绅富捐，是日公布之《绅富捐条例》规定：凡不动产价值满5000元者，自百分之一起累进计征。

△　直鲁联军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率部取道巨野，会合第二十四军潘鸿钧部及骑兵团等进攻菏泽冯玉祥军郑大章部；17日占新集，19日夜占菏泽。

△　津浦路孙传芳部迫近滁州。

8月16日　武汉政府任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第四集团军江左军前敌总指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前敌总指挥。

△　南京政府下令改革司法制度，自10月1日起一律裁撤检察厅（将原有检察官酌置各该级法院内仍行使检察职权），将各省高等审判厅改称高等法院，其分厅改称为分院，地方审判厅改称地方法院，其已设地方分厅分庭者亦照改。

△　武汉政府交通部长孙科电令上海各航业公司刻日恢复沪汉航行。

△　南京政府任命徐景棠、许崇清、梁漱溟为广东省政府委员。

△　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下令取缔排日。

△　陈铭枢电南京政府军委会请辞总政治部训练部主任职；次日又电辞第十一军军长职。

△　宁方杨杰第六军第十九师余宪文部在宝应以北之泾河镇为孙传芳部所败，向界首退却。

△　沪领事团集议南京政府实行新税问题，决拒绝缴纳，即日照

会南京政府。

△　上海英军用飞机一架落于江湾，当地驻军扣留机翼作为交涉依据，并由交涉员郭泰祺向英领事巴尔敦抗议。英领事及英军事当局反采逆袭手段，以哀的美敦书致交涉公署，限17日上午11时以前交还飞机，否则断绝沪杭路交通。17日下午4时半，果将梵王渡桥路轨拆毁，并派兵把守。18日，由日海军陆战队军官调停，一方归还机翼，一方修复铁路，至午刻始解决。

8月17日　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各军转战过久，疲困不堪，需有长时期休整，而敌追踪即至，宁汉合作又难实现，是日将江北前方所有部队撤至长江南岸，凭江扼守。孙传芳军旋即跟踪追至江北沿岸，占领和县、含山、六合、扬州、泰兴等县，征集船只，企图渡江。午刻，孙军前锋一个旅抵达浦口江边，晚后续部队开到，开始攻击南京，与狮子山守军隔江互相炮击。

△　南京政府通电各军长官，在蒋介石未回以前，所有总司令职权交军事委员会负责执行，至一切行政事务，概由南京政府负责办理。

△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挽留蒋（介石）、胡（汉民）及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委员回宁，推定刘霆、潘佑强分别赴沪、甬劝驾。次日，南京政府明令留蒋；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函胡等再出视事。

△　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奉南京外交部令，再向日总领事矢田致送觉书，促速撤山东日兵，并声明保护山东日侨。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以连声海署理中央海外部部长。

△　上海总商会电南京财政部，反对于内债登记时认购债额十分

之一之盐余国库券办法。

△　国民党江西特别委员会为防止共产党活动，暂令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停办。

△　北京军政府正式否认关税自主，谓政府之政策，不欲作反常之改革，此举非先商诸外交团，决不为之。

8月18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要求武汉继续清党，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照在广州未迁移前状态改组。

△　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北郊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决定以共产党的名义组织工农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农民；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并决定成立领导秋收起义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长沙为中心，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七处同时发动起义。

△　武汉政府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在南昌起义时就起义军参谋团参谋长职，着即免职拿办；任命黄慕颜署理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　张发奎派军长朱晖日到粤会商堵击贺（龙）、叶（挺）军事计划，是日朱抵广州，旋赴梧晤商李济深。

△　北京军政府阁议议决简任汤玉麟为热河都统，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

△　是日至28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举办的基督化经济关系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中西男女50余人，其中英、美、日人占三分之一，主要讨论我国工农业问题及基督教伦理。大会决议声称：“本会主张劳资合作，建议国内各种工业及商店设立雇佣调节委员会及仲裁机关，以弭纠纷”；“大田产制为造成农佃制中各种弊端之主要原因，故建议由政府公布法令，限制大田产制”；“基督徒须研究现行经济制

度，批评各种学说，灌输基督精神于经济生活，合即赞助之，不合即改革之。”

8月19日　武汉政府依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通电宣布迁都南京，并以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迁都南京宣言》，称：“今者蒋中正既解除兵权，以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环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由武汉迁都南京，以实行四月初旬之决议，而亟谋全党之统一”，经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克日迁都南京，并以党员应服从党纪，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肃清军阀，合力铲除共产党，以党治军等四端相勉励。

△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通过汪精卫提议，将中央前次对于胡汉民、蔡元培、吴敬恒、李济深、张静江、蒋介石、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撤销，俟四中全会解决。

△　汪精卫、谭延闿电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促宁方一意渡江作战，声明东下诸军“只有急难之谊，并无他图”。

△　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

8月20日　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于右任、顾孟馀等乘轮东下，次晨抵九江，下午至庐山举行军事会议，与前方军事领袖程潜等会商军事及政府迁宁等问题。

△　南京政府特任薛笃弼为民政部长。

△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准陈希豪、马叙伦辞浙江省政府委员职；任庄崧甫、陈其采、斯烈为浙江省政府委员，陈、斯分别兼任财政、民政各厅厅长；张静江未回任前，由周凤歧暂代省政府主席。

△　武汉东征部队陈嘉祐第十三军前锋抵湖口。

△　渤海舰队“海圻”、“肇和”、“海琛”等七舰奉张宗昌命秘密南下，是晨驶进吴淞口，向吴淞要塞炮台轰击，经炮台开炮还击，互战半小时后，相率逃出海口。

△　大连日本当局以共产嫌疑拘捕华人51名。

△　安南（今越南）海防发生排华暴动，自17日至本日，死华侨五人，伤约百人，被拘150人，商店被抢30家。22日，广州交涉员韦玉向法领事抗议，要求法政府切实保护华侨。

8月21日　　南京军事委员会决定裁并军队，裁撤不重要军事机关，归并杂色军队，缩小政治部范围或取消政治部，整顿兵站，以节省经费。

△　蒋介石在奉化溪口接见美国记者卡登堡等，当记者问及仍否继续国民革命时，蒋答：“今虽下野，党员资格仍旧存在，当然不能脱离革命关系”，并对记者微露出洋游历之意。

△　何键第三十五军抵安庆，原驻安庆之蒋系王普、夏斗寅两军让出驻地，开赴大通。安徽省政府、省党部迁往芜湖。25日，唐生智抵安庆指挥军事。

△　西山会议派张继就宁汉合作问题致电南京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等，略谓：“值此危疑震撼之际，团结内部，实为唯一要图，其办法似宜统一汉、宁、沪三党部合组，南京、武汉两政府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暂避要路，东南大局更有赖焉。”

△　北京军政府财政拮据，外交部限制驻外使领经费每月为10万元，是日将驻葡萄牙、墨西哥、瑞士、瑞典、挪威、秘鲁、古巴、巴西八国使馆裁撤。

△　英国海军陆战队百名，借口警卫和记工场，在南京登岸。

8月22日　南京代表李宗仁抵九江，旋赴庐山与汪精卫会谈宁汉合作，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等均参加。会议决定：谭、孙23日先偕李宗仁赴宁详商一切；武汉东征军暂行停止前进；武汉中央党部、政府、军委会一星期内迁宁；南京拱卫暂令第七军负责，前方军队限即日肃清津浦路南段。

△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决议，设立武汉政治分会，以指导党务、政治、军事，并特派唐生智、顾孟馀等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

△　白崇禧在沪宣布，依南京第一〇二次政治会议议决整顿上海，其中关于军事者九条：除专设防守长官外，总指挥部及其他军事机关分别裁并迁移；特务处调宁；东路军前敌政治部取消；各军政治部不得干政；义勇队及警备司令等名目均取消；除防守司令及公安局两机关外不得任意捕人等。杨虎、陈群畏罪逃避，杨部警备队被改编。

△　广州受南京政局变动影响，发生挤兑风潮，市内纸币交易几停，当局筹款救济，并枪毙拒用中央纸币者三人，拘捕40余人，下令禁携50元以上现银出口。

8月23日　杭州受南京政局变动影响发生政潮，周凤歧系在省渐占优势，杭州市长邵元冲乘南京政局变动之际，将公款七万余元汇沪保存，被公安局扣留，交省府查办，是日邵呈请辞职。9月5日，邵致书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驳浙江清党委员会报告书，谓该会王讷言等对于调查汇款之报告书所称，有“湮没事实、图入人罪之行为，本人在党中之言行历史，尤不能任人之诬陷而置之不问”，要求为公正之处置。

△　何应钦第一军开沪宁路，其第二师刘峙部在常州将刘宝题新编第三军军部包围缴械，刘亦被捕。

△　孙传芳军进攻南京，浦口、南京间炮战激烈。下午，孙传芳部用榴霰弹轰击，下关车站站长室及货栈被焚毁。

△　北京军政府阁议议决，特派王景岐充国联代表，并代理行政院代表。

△　渤海舰队又袭吴淞，是晚驶近吴淞口外40里许，知陆上有备即离去。

△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捐风潮解决，纳税华人会接受该会委员虞洽卿调解，于抗议之下照缴新增二厘捐税，以后工部局如再增捐，须与纳税华人代表磋商方可决定。

△　中日合办之奉天本溪湖煤矿公司工人1300人，因奉票贬值，要求按时价折合大洋补足，恢复原工资水平，实行总罢工。公司派日本守备队弹压，激起各矿华工6000人示威，日又派陆军二中队及警察守备队、宪兵队捕杀，是夜共捕矿工约300人，伤30余人，死四人。28日，本溪湖采煤工人在日本军警高压下复工，日本守备队撤退。

8月24日　武汉政府任命杨赓笙、陈礼江、熊育锡为江西省政府委员，杨、陈分别兼民政、教育厅长，李尚庸兼建设厅长。

△　孙传芳军两次偷渡长江。拂晓，孙军约一团于大胜关上游兔耳矶（属和县）方面偷渡，被胡宗铎第十九军第一师守兵开炮击退。午，江宁镇采石矶对岸乌江镇孙军乘民船数十艘自驻马河入江向南疾驶，又被守兵、军舰协同击退。

△　程潜第六军由九江开往湖口。

△　驻华日公使芳泽持田中手书及礼物在北京访晤张作霖，向张提交《满蒙觉书》，要求从速解决中日间一切“悬案”。张以“不知详情”为由，约定由杨宇霆出任交涉。26日，北京军政府以芳泽访张事引起北京外交团之注意，特发表声明，称日方对满蒙问题并未提何交

涉，仅向驻日汪荣宝公使送达一种声明书类之觉书。

△　驻京英、美、法、意、日五公使集议应付南京政府9月1日实行裁厘加税方法，无结果。

8月25日　下午，贺龙第二十军在瑞金以北30里之壬田市与敌左翼军钱大钧部第五十、第六十两个团遭遇，激战至次晨，敌向会昌方面溃退。26日，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全部到达瑞金城，教导团第一、第二总队追敌至距瑞金50里之谢坊为止。

△　江西省党部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托黄实、李尚庸、萧淑宇、刘来元、曾振五、许德珩、李筱青为该省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江西特别委员会即撤销。

△　叶楚伧电南京政府、中央党部辞党政本兼各职。

△　宁代表方声涛离郑赴晋，冯玉祥派刘治洲为代表与方偕行，敦促阎锡山出兵攻奉。同日，张宗昌派李凤山到晋商晋奉合作。奉方承认晋不易帜，希望晋方撤防石家庄，准德州、保定等地奉鲁军由该处通过进攻河南冯玉祥；晋方表示石家庄让防事可办到。

△　上海总商会及各省区商民协会代表会议等纷请南京政府展期实行裁厘加税，惟赞成关税自主。

△　晨，台湾台南附近有剧烈地震，死10人，伤百人。毁屋200余间。

8月26日　晨3时许，孙传芳军段承泽等三个师，乘雾夜由长江北岸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处向乌龙山、栖霞山及龙潭一带强渡，占领栖霞山、龙潭车站，沪宁交通断绝，情势危急。何应钦第一军会同李宗仁第七军由南京、镇江夹击，并由陈绍宽率海军在江面截击，激战一昼夜，27日将栖霞山孙军击溃缴械，夺回栖霞山及南北象山高地。龙潭孙军仍据江岸抗争，并有大部队陆续渡江增援。

△　南京政府任命张定璠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原任黄郛托病辞职。

△　湖北省政府议决镇压“反革命”派办法，由省政府、卫戍司令部等单位组织“镇反”委员会，并组挨户团清查户口，派兵驻守学校，对职员、学生和工人实行连保连坐。30日，“镇反”委员会成立。

△　北京军政府不满出席国联代表王景岐催索国联欠费，改派驻葡公使王廷璋为出席国际联盟代表及行政院代表。王景岐亦以北京外交部不允照向例筹汇代表用费14000元而电辞代表职务。

8月27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停止李稚、包惠僧、曾华等27名共产党员该会职务的通告，并饬所属“严密注意，不得录用”。

△　武汉政府劳工部对全国工人发布训令，要求工人必须“恪遵善用”武汉政府所下一切命令，“严密防范共产党”，在国民党领导下组织工会，工人活动不容离开武汉政府之监督。

△　自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湖北全省党部及人民团体停止活动后，各地土豪劣绅乘机活动，挟嫌报复，同日黄冈学员李蕴玉等向省报称，该县近日土劣流氓肆行暴动，惨杀党员数十人。

△　宋庆龄自上月离汉经沪，是日偕陈友仁抵海参崴，旋赴莫斯科。

△　广州官商会议讨论维持中央纸币，决组“商界临时存款中央银行经理委员会”，由该会封存纸币300万元，贷与政府，政府以二五附加税作担保。总部令禁军人挤兑，并在繁盛市街设市民兑现处，每人限兑一元。

△　是日至9月3日，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得足球、排球、网球三项锦标，日本得田径、全能运动、棒球三项锦标，

菲律宾得游泳、篮球两项锦标，日本得总锦标。

△　驻华日使芳泽与张作霖之代表杨宇霆在北京开谈满蒙问题。杨提出满蒙交涉仍应由地方办理，望芳泽转告驻奉总领事吉田改变傲慢态度。芳泽仍主张与北京直接交涉。31日，杨向记者宣布日本提案之具体要求为：一、反对中国资本家建筑与日本利益冲突之铁路；二、反对海关二五附加税；三、在满洲增设日领事署若干处。

8月28日　宁、汉将领杨树庄、陈季良、陈绍宽、陈训泳、唐生智、程潜、朱培德、鲁涤平、王均、李品仙、金汉鼎、何键、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周凤歧、赖世璜等29人联名通电，宣称会合各军继续“北伐”。

△　冯玉祥致电阎锡山，表示决无图晋之心，并称已派刘治洲入晋面商对奉方策。

△　沈鸿烈整顿鲁海军，改委渤海舰队各舰长，并将官兵分别裁汰编练，其与前次风潮有牵连者均被惩办。

△　广州各界举行拥护裁厘加税大会，各店悬拥护关税自主大旗。

8月29日　孙传芳五省联军10个师四个混成旅约五万余人，聚集龙潭一隅，向何应钦第一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南京军委会令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分别率第一、第七两军主力及第十九军第一师反攻，以第四十军等分兵应援。30日，第七军第一、第三两师和第十九军第一、第二两师在夏威、胡宗铎指挥下，自栖霞山向东进攻；何应钦指挥第一军第二、第二十二、第十四师之一部自东阳镇出发，会攻龙潭，与逆袭之孙军激战终日，至下午5时克龙潭。

△　何键暨程潜部向津浦线侧击，浦口孙传芳军开始退却。

△　南京政府任命张仲苏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

△　北京军政府财政困难，财部特设“关盐两税抵借外债委员会”，以资筹措，并令各地速将关款解京，以备拨付外债后用作军政费用。

△　著名记者戈公振在日内瓦国际新闻界会议上发表声明，谓会议对于取缔外国新闻记者之决议，不适用于世界全部国家，缘中国无权干预在国内之外国新闻记者，因彼等具有由中国发送不负责任之新闻之特权。

△　湖南共产党密定于30日大暴动，为当局发觉，指挥人员名单被搜去，国民党军警即在长沙大检查，捕去300余人。9月1日，省党部委员、省府厅长联席会议决定处置办法：由省党部、军事厅、民政厅、法院、卫戍司令部、公安局共组特别法庭会审，凡在马日事变以前有显著工作，在马日事变后继续工作，与在马日事变后始加入共产党者，一律处以死刑。其余分别情节轻重，予以禁锢或交其家属领回看管。

8月30日　　南京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通知英、美等12国驻沪领事，称因时局关系，暂缓裁厘加税，至关税自主政策则始终不变。

△　钱大钧部九个团集结会昌一带，构筑工事防守，桂军黄绍竑部约七个团集结白鹅墟附近，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企图堵击南昌起义军。是日，起义军向会昌发起总攻击，首由朱德指挥的教导团和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向城东北之敌发起进攻，后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赶到，向城西北敌之阵地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起义军占领会昌城。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率残部向筠门岭方向溃退。9月2日，叶挺部又击溃援敌黄绍竑部2000余人，敌退洛口墟。叶部伤亡200余人。

△　北京军政府交通部令派程崇为唐山交通大学校长。

△　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山东撤兵声明，定9月7、8两日由青岛全部

开拔完毕；并称日本政府“希望中国内乱从速终息”，“日侨众多地方再无因战乱祸及日侨之虞，而不至使帝国政府不得不讲机宜自卫之措置”。同日，驻北京日使馆一等书记官西田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山东撤兵节略。

△ 广州金融风潮益烈，中央银行纸币停止兑现，财政厅长古应芬为维持中央纸币发短期公债1000万元，召商会银行公会代表会议，迫令五日内每日缴200万元。商人纷纷以现银运藏沙面租界。9月1日，保安队会同警察查封银行、银号、商店多家，至各店认缴公债40余万后始启封。商会所属各商店被迫认借者已达九成以上。次日中行纸币十足通用，挤兑风潮结束。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函复旦大学，声称该校学生陈昺德、谢国慈、罗元英等12名确系共产党员，应即开除学籍。

8月31日 龙潭大捷。晨5时，孙传芳部猛攻龙潭水泥厂及龙潭车站。何应钦、白崇禧于龙潭下令第一、第七、第十九等军协同反击。孙军除一部由柴洲等地渡江北窜外，其余均被缴械俘虏。此役双方出动兵力15万之多，成为北伐以来一场大血战，宁方俘虏孙部官兵三万余人，高级军官数十名，缴械四万余支，孙部死亡及溺毙万余人，第一、第七两军伤亡亦达8000余人。

△ 南京军事当局以吴淞、镇江炮台附近均有外国军舰商轮停泊，有利孙军掩袭，令交涉员郭泰祺向领事团抗议。

△ 湖北农工厅布告实行减租，自本月秋收起，依照原订佃约租额减纳25％；原租额不及收获量40％者，得由当地地方政府会同农民协会按照当地情形规定之。

△ 南京政府以汕头、广州等地广帮拒用中山新币，影响金融安定，是日训令各省一律使用，以广流通。

9月

9月1日　　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上海外交交涉公署，以英舰连日无端炮击乌龙山、幕府山等炮台，令速向英总领事严重抗议。

△　上午，香港英舰五艘以捕盗为名开入大鹏湾，英兵数百人在张坝登岸，毁村屋40余间，继赴方洛港，又毁村屋五所，午后方离去。

△　南京政府传令嘉奖龙潭战役有功将士，称："总指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海军司令陈绍宽等调度有方，各军将士忠勇效命，得于最短期间，俘敌五万余人，缴械四万余支，孙逆仅以身免，党国转危为安，言念殊勋，洵堪嘉慰。"

△　午后，奉军渤海舰队"海圻"、"海琛"等四舰驶至吴淞口外鸭嘴沙，探得有备未进；夜经川沙海面，与防军开炮互击，旋即逃逸。3日下午，"海圻"等四舰又驶近吴淞轰击炮台，双方各发20余炮，为防军击退。

△　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致电南京政府称，9月2日扶病东渡就医，军长职务交由副军长蒋光鼐代理。

△　唐生智电汉报告已抵安庆，并称安徽省政府组织完竣，军旅布置就绪。同日，何键奉唐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　桂省大捕共产党，是日省清党委员会在南宁枪杀共产党员高孤雁、雷沛涛、邓哲、罗如川等13人。7日又在梧州逮捕一百数十人，在南宁杀害12人。

△　驻华日使芳泽在北京接见日记者，声称外交团接南京政府裁厘加税延期及保留关税自主之通告，甚为满意；满蒙诸悬案向来作为地方问题，在奉天就地折冲，以东三省实际之主要人物张作霖为对手

最为妥当，地点、日期未定；中日修约尚未商定续议日期；山东撤军全系自主行动，无向中方要求今后保障之必要。

△　孙传芳军渡江进攻南京时，曾有日轮两艘停泊乌龙、幕府两山间之江心洲江面，掩护孙军偷渡，经交涉员郭泰祺向日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交涉。是日，日总领事函复交涉署，称因避两岸炮火故停江心，否认有屏蔽孙军情事。

△　北京外交团讨论驻华外军等问题，决先撤退天津、青岛驻军，开往上海防区。至沪卫戍司令部通告军事期内禁止外轮入长江事，认为妨碍各国航行权利，决饬沪领事团提严重抗议，并饬外舰保护，决不因此停航。

△　汉口《中央日报》是日起停刊。

△　纸烟统税开征后，因外商拒缴，以无税之廉价纸烟行销，致华烟税高价昂，无人过问，势将停业，是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特致函沪总商会，请代向南京财政当局呼吁挽救。

9月2日　　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一、第三两路军一部渡江肃清江南残敌。同时命第十八军军长杨杰、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等分途渡江北追，并命海军派舰游弋于和州、采石、南京、镇江、江阴、南通一带江面，掩护陆军渡江。

△　孙传芳军在怀远与何键军激战。同日，鲁军前敌总司令许琨由济南赴蚌埠，与孙传芳协商军事。

△　日军舰、商船不遵吴淞炮台特别戒严令，直驶入警戒线，中国军队开枪射击，日舰还击。晚，日舰“桃号”驶过江阴，又对该地炮台发炮。3日，驻沪日总领事矢田反向交涉署提抗议，沪领事团亦决定与沪交涉员郭泰祺交涉。

△　香港英舰借口悬英旗之中国商轮在广东西江临阳峡被劫，纵

火焚烧石峡太平湖村，并发炮10余响，进行恫吓。

△　张作霖、张宗昌为实施攻豫计划，是日再派常运衡赴太原与阎锡山接洽。4日，常抵太原，阎称病不见。

△　沪银行、钱业两公会致电南京政府，抗议古应芬在广州勒借巨款，封闭银号，摧残金融事业，谓“此乃共党在武汉所不敢为，而古为之”；又谓古在宁时种种设施悖谬妄行，致使政府财政陷于绝境，社会经济濒于破产，除请救济外，并要求罢斥古之财政部长职务。

△　长沙人力车2400辆车工约3000余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罢工抗捐。市公安局等集议对付办法，决对罢工抗捐首领从严拿办，并议定办法数条，凡“煽惑车夫罢工，希图集会反抗者，以暴动论”；“车栈主因车夫积欠车租者，得以押租扣抵，不得指照不发，致生事端”。4日，市党部恐久延酿成重大事端，特商公安局将扣留之车释放，劝令车工先行复工，听候调解，并将月捐二元减为一元六角，工潮始平息。

△　贺龙第二十军南昌起义先头部队由瑞金向长汀开拔，5日大部到达长汀。

9月3日　　南京开祝捷及挽蒋大会，到各机关团体代表三万余人，通过提案多件：通电挽留中央五委员及蒋介石、电请全国严厉清共、请中央监委会清除中央执委会之共产分子、请中央于12月10日以前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

△　驻沪日总领事矢田致函上海交涉署通知山东撤兵，妄称：将来日侨居住地方，无论何处，“为维持治安并避免再受祸害起见”，彼时日本政府将“为不得已而施行机宜自卫之措置”。同日，济南日军开始撤退，至8日驻鲁日军全部撤尽，除炮兵二中队、工兵一小队赴大连外，余撤回日本。

△　上月下旬奉天本溪湖煤矿发生之工潮中，工人数十名遭日兵惨杀，是日奉天省长莫德惠令交涉员高清和向日总领事抗议，并电北京向日使交涉。

△　南京外交部以英舰不顾邦交，连日无端炮击乌龙山、幕府山等炮台，致电沪交涉公署速向英总领事严重抗议。同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为英舰停泊吴淞炮台附近，函饬交涉员郭泰祺向英总领事交涉，令该舰即刻离开，以免纠纷。

△　北京大元帅府军事会议讨论孙传芳军渡江失败后对付时局之方针，决定对豫暂取守势，将孙军主力撤至蚌埠，许琨、王栋两军由褚玉璞指挥，向徐州、蚌埠增援，以备由安庆入侵之敌，务固守长江以北之安徽、江苏。

△　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奉令改组，以陈公博、王法勤等11人为改组委员，是日第一次会议推选王法勤、薛修、梅哲之三人为常委，张铁君为秘书长，朱力一为组织部长，戚报捷为宣传部长，负责指导全国各工会改组事宜，在改组期间摄行全国总工会职权。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据罗重等函报告，公共租界之公园不准华人游览。是日特函公共租界工部局称："租界内之公园等公共场所，均由市政捐所建设，而所有市政捐，华人独占多数，华人岂反无享受此项场所之权利，且只限华人不得入内，尤属不平"，要求将公园等公共场所无条件开放。

△　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在北京病故。赵前清时曾任四川总督，民国成立后曾任奉天都督，曾负责编修《清史稿》。

9月4日　　日、张（作霖）满蒙交涉消息传出后，东北民众反日斗争复形高涨。是日，奉天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沈阳民众六万余人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每人手执白旗，上书"打倒田中内阁侵略政策"、"拒绝日本临江设领"、"取消二十一条"等标语。7日，吉林各团

体集会反对“满蒙交涉”，表示为此不惜一战。9日、10日夜间沈阳城内满贴“打倒军阀张作霖”标语。学生反日游行被禁止。14日，洮南民众一万余人集会反日。20日，齐齐哈尔数万人示威游行，齐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反对日本”等口号。

△ 广州各界十余万人举行挽蒋大会，通过四案：一、挽留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五委员；二、拥护李济深；三、巩固后方；四、援助海防华侨。旋游行示威。同日，李济深电奉化劝蒋复职。

△ 被俘孙传芳军前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等在南京处决。

△ 劳动大学筹委会推易培基为校长。

9月5日 宁汉合作大致商妥，是日汪精卫偕顾孟馀、徐谦、陈公博、何香凝、朱培德等自九江抵南京，惟南京遍贴反汪标语。同日，武汉代表谭延闿、孙科自京赴沪，与胡汉民等协商合作办法。

△ 拂晓，宁方右翼军左纵队杨杰第十八军由大港镇及镇江渡江，驱逐孙传芳军警戒部队，7日占泰州、扬州、仙女庙等地，8日克邵伯，9日克高邮，10日占宝应，11、12两日紧蹑敌军梁鸿恩、陆殿臣两部之后，破敌于淮安、淮阴一带，克淮阴，敌向宿迁方向溃退，14日先后克涟水、泗阳等地。按：蒋介石将程潜驻南京附近的第六军第十七、第十九两个师缴械后，另拨浙军第十九军余宪文师，重建第六军，委杨杰为军长，以后杨的第六军改番号为第十八军。程潜在江西收容残部仍建第六军，程为军长，后被李宗仁缴械。

△ 李济深通电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党内合作，蒋汪合作，称“拥汪倒蒋或拥蒋倒汪，均属失当”；主张暂时保留总司令制度，认蒋为“最适之军事领袖”；宁、汉一切重大问题应由不跨党之第二届中央执监会议解决，并宣称：“宜巩固党基，勿令共党重来。”

△ 武汉政府下令将监察院监察委员、共产党员李永声褫职拿

办。

△　叶挺第十一军南昌起义军大部由会昌回到瑞金，7日先头部队由瑞金向长汀开拔，9日到达长汀。

9月6日　　宋庆龄偕陈友仁抵莫斯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代表及莫斯科工人代表等到车站欢迎。宋发表声明，对苏联人民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声明，表示将同苏联工人“继续并肩作战，打垮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

△　拂晓，宁方新编第十军夏斗寅部由采石附近渡江，占和县；同时，贺耀组第四十军之先头部队由浦口渡江，占浦镇。10日，第十军杨胜治部占全椒，第四十军进至花旗营，两军协力向滁州之敌攻击，14日占滁州，孙传芳部退明光。

△　宁方右翼军中央纵队之赖世璜第十四军由江阴渡江至靖江，8日以主力经姜堰，以一部经泰兴向泰州前进，嗣向邵伯、高邮、宝应，于16日到达淮安。

△　唐生智部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部由大通入驻芜湖。

△　广东省金融风潮，省政府查出财部、财厅重要职员乘机操纵，有获利数十万者。是日广州政治分会查办此案，财部禁烟处长李海云等古应芬系人物数十名被逮捕监禁。古因此辞财政厅长职，由冯祝万继任。民政厅长李文范、司法厅长陈融等亦相继辞职走避香港。

△　上海英兵分批撤退，第一批1800名前已离沪；是日第二批1900名登轮，另有1800余名自香港到沪填防；10日第三批1700名离沪。

△　上海戈登路日商同兴纱厂工人1600余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不准打骂工人、撤换三日人监工、担保以后不得任意开除工人等

要求；后又提启封工人俱乐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失业工人优给川资、释放被捕之工人家属三人等要求。经市党部工农部调停，厂方答应解决，29日全体复工。

9月7日　　冯玉祥电责靳云鹗勾结孙传芳、张宗昌等蓄谋反动，免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以马吉第、秦德纯代总、副指挥。是日靳复电声称："此次驻军京汉，不即东进，系遵国民政府迭次密令，防止我公异图，巩固党国根本。"同日，冯军开始对靳军攻击，第一方面军孙良诚由北向南，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由南向北夹击。

△　江苏交涉员郭泰祺致牒驻沪日总领事矢田，指出日撤兵声明中所称日本政府将"为不得已而施行机宜自卫之措置"一节，有损中国主权，表示绝对不能承认。

△　唐生智部何键第三十五军由和县侧攻津浦线，断孙传芳军归路，孙军不战退蚌埠。

△　黄琪翔代张发奎率第四军及第十一军余部回粤，是日抵赣州，次日向南雄进发。

△　谭延闿、孙科等在沪力劝胡汉民、蔡元培、张静江等回京复职，胡等以"于大局无裨"为词表示拒绝。

△　阎锡山在太原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暂时维持石家庄防务，对冯、奉两方仍照常联络。

△　东三省反日运动扩大，是日，日使芳泽奉政府令向张作霖面提警告，要求严重取缔。同日，张作霖电奉天省长莫德惠设法阻止定于10日举行之对日示威运动。

△　广东陆丰农军攻克大安，次日直取陆丰县城。

9月8日　　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李宗仁等设宴欢迎武汉抵宁

中委，汪精卫演说，声称宁汉分裂是由于“工作上之注意点有所分歧”，“一方注意于清党，一方注意于提高党权”；并称今日必须团结，“要以十二分的诚意和十二分的勇气，来纠正既往，补救现在，开济将来”。

△ 国民党粤省市党部联席会议通电赞成宁汉合作，声称“前因反共联共而分裂，此日大可由清共绝共而合作”，并力主挽留蒋介石及五委员。

△ 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以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屡次作战，畏葸不前，对于该军饷糈尤多克扣，应即免职拿办，军长职务由该军参谋长刘士毅暂代。14日，赖在沪北站被第一军宪兵扣留，旋解龙华淞沪卫戍司令部禁押。12月31日，南京军委会下令将赖枪决。

△ 唐生智抵安庆，在各机关团体欢迎会上讲演，谓共产党南昌之变及成立政府，皆系蒋成立南京政府之恶例所引起；并否认宁汉合作之说，谓系武汉中央政府迁都南京，不能说是两个政府合作。同日，唐令安徽省党部听候改组。

△ 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联名致电唐生智，请赴宁列席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唐复电拒绝，称党国大计，悉由会议决定，军事意见，已向主席团陈述，无列席会议必要。

△ 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为防共产党于中秋节暴动，宣布是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次日，枪杀王谦吉等三名，斩杀苏毅一名。

△ 黄绍竑抵韶关，指挥各军入赣堵截南下叶、贺起义军。陈济棠率第十一师及第三十三师两团趋潮（安）梅（县）“围剿”起义军，并派“飞鹰”等舰由水路进攻。

△ 冯玉祥、靳云鹗两军在许昌开战。驻马店、确山方面之冯军

孙连仲部与靳军有小接触。靳在郾城，拥兵约四万。9日晚，郾城靳军北上至临颍，冯军被迫退许昌。10日，靳军马吉第师在临颍北大石桥与冯军交战。

△　海丰农民军克青坑，次日驱逐梅陇敌团队，公平驻军一连投降。至此，海陆丰除海丰城以外，皆为农军克复，敌千余人集中海丰县城固守待援。

△　北京军政府教育部通令各校禁用白话文。

9月9日　　湘赣边界爆发秋收起义，由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参加。起义部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下辖四个团。是日，起义铁路工人和农民按计划破坏粤汉线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敌交通运输。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10日克朱溪厂，旋越湘赣边界，续克湖南平江县龙门厂。时原收编之土匪武装邱国轩第四团在金坪圩叛变，一团背腹受敌，激战两小时，伤亡200多人，被迫向浏阳方向转移。

△　汪精卫、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孙科、朱培德、李烈钧、陈公博、甘乃光等为挽辞职五中委回任，并与在沪执监委交换团结意见，是日自京到沪。汪在北站接见记者，宣称汉宁两派在军事方面现已一致，政治方面亦非一致不可，两派合作已不成问题。

△　杨宇霆奉命答访日使芳泽，疏解奉天排日事件，称张作霖已迭电严加制止，此后当不至再发生类此事端。次对满蒙问题交换意见，杨称北京外交当局拟将日方所提觉书中五项，择其易于解决者由地方磋商，较难解决者实行搁置。

△　宁方右翼军右纵队（第三十一军之张中立第九十二师）于江阴南星镇一带渡江，循水道经南通、如皋，11日晚到达海安，13日拂

晓到达盐城，14日克阜宁，敌向东坎（今属滨海县）退走。

9月10日　蒋介石在奉化雪窦寺对《大陆报》记者谈称，拟作海外游五年，考察各国政治经济生活，并声称将来中国必循共和之道发展，此后即共产党之名称，亦必不令其再见于中国史乘；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循美国之途，俄国既不可恃，中国必视美国为惟一之良友。

△　汪精卫在沪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颂蒋反共“有先见之明”，并称自己“自从五月间奋斗起，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主张分共的”。又称彼此“反共之方法与政策不同，以致把党分裂”，“关于政治问题，在军事时期，不得不提高党权，实行以党治军，以党治国”。

△　汪精卫等电奉化蒋介石到沪“会商党国大计”。

△　上海海陆军要员杨树庄、周凤歧等欢宴汪精卫，会场揭“国民党大团结”之标语，蔡元培演说，主张宁汉合作，“烧去旧帐，从新做起”。

△　夜，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王新亚部在安源起义，次晨赶到萍乡外围，强攻县城，战斗一天多未下，敌从宜春增派援兵。中午，二团停攻萍乡，改攻老关，占领之。12日，在农军配合下攻占醴陵城。15日晨占浏阳县城。16日，陷入优势敌人（张国威部）重围，在突围中大部损失，浏阳复失。

△　宁方左翼军柏文蔚第三十三军得农军红枪会五六千人之助，围攻定远孙传芳军，血战至次晨，孙军溃散，第三十三军入定远城。

△　汉口店员代表30余人为店东借故裁退店员事，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称：店东利用中央排斥共产党之机裁退店员，不及月余，失业店员达2000以上，特提出店东不得借故关门或辞退店员、不得推翻工商以前合订之一切条件、即日恢复失业店员工作等项要求。

△　无锡广勤、申新、庆丰、豫康等纱厂因日商放价大购新花，

棉贵纱滞，无法维持，是日起停闭，两万余工人失业。12日，县分署、商民协会、总工会等电南京政府，请禁国棉出口。

9月11日　国民党汉、宁、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中央要员在沪戈登路开谈话会，商统一党务及宁、汉政府合并改组办法，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烈钧、褚民谊、李宗仁、程潜、张静江、蔡元培、杨树庄、李石曾、于右任、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居正21人出席，推谭延闿为主席。胡汉民、吴敬恒、蒋介石、陈公博、顾孟馀拒不出席。会议连开三日，辩论甚烈，宁派力主非汪下野无以平党员之愤，汪决暂退。会议决定：一、由宁、沪、汉三方面各推委员六人（另候补委员各三人）及共推委员14人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行使党务政治之最高机关；二、中央政治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暂撤销；三、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别委员会另选国民政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暨各部部长；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于三个月内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纠纷；五、推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统一宣言；六、推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五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因宁、沪两方否认三月间武汉召开之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合法，遂改四中全会为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

△　陇海路鲁军前锋张敬尧第二军在刘堤圈（属河南省虞城县）与冯玉祥军发生激战，冯军向野鸡岗撤退。

△　南满铁路总裁山本条太郎因中国有收回中东铁路之计划，赴哈尔滨视察。

△　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领导下，在铜鼓起义，占白沙镇。次日占浏阳东门市。14日被唐生智部新八军两个团及地主武装包围夹击，激战六小时后，向浏阳上坪撤退。

△　长沙乡村农民响应秋收起义，是日暴动，解散团防局七处，缴枪80多支，杀土豪劣绅七八人。同日，醴陵农民起义，镇压土豪劣绅，夺取反动军队枪支。

△　唐生智自安庆抵芜湖，获悉冯玉祥、靳云鹗发生冲突，是日即由芜折回汉口出任调停。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在虹桥路设立捕房，沪各团体请交涉员郭泰祺向领事团交涉撤回。

9月12日　　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与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制订“会剿”由安源入醴陵之工农革命军计划：一、令张（国威）师所部谭（崇鄧）团从姚家坝向阳三石前进；二、令独立团长罗定派队向醴陵包围，断其后路；三、派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率一大队由西乡神福港前进，夹攻革命军。13日晚，谭、罗两部到达姚家坝与老关，立即与工农革命军接触，相持至14日，谭、罗两部陷醴陵。

△　贺龙第二十军攻抵上杭，闽西南之连城、宁化、清流、永定、龙岩、长汀、武平一带均为起义军所占领。

△　程潜应南京军事委员会之邀抵沪，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会商进攻徐州计划。

△　鲁军总司令张宗昌电徐州前敌总指挥部委任攻豫各路指挥：第一路张敬尧；第二路徐源泉；第三路程国瑞。

9月13日　　汪精卫偕顾孟馀秘密离沪赴牯岭。行前顾致书南京中央党部称：“此次东下，系专为出席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而来，现闻在沪同志多主张暂时不开此次会议，此外其他会议，孟余已无参加之必要。”汪电中执委会并通电全党，自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自动下野，并听候处分。

△　武汉政府停止办公，结束一切。迁宁第一批人员已于昨日出

发。

△　李济深发表宣言，劝说汪蒋合作，汉宁提携，并提出如下主张：一、党之各派彻底统一；二、蒋介石复任总司令，汪精卫不可引退；三、党之军事首脑以蒋最为适任；四、速开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解决党内诸重要问题。

△　武汉各界代表大会提出要求18条，决议推代表即日携赴南京请愿，要求中包括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根据三民主义确定建设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纲领、继续北伐、实行关税自主、厉行军队党代表制、贯彻农工政策、严办向农工进攻的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等。

△　日本阁议讨论满蒙交涉及排日问题之应付方法。日兼外相田中发表声明，谓在排日运动镇静以前，满蒙交涉暂行中止；对华方针决不因排日运动而变更。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复日使撤兵节略，声明以后负责保护日侨。

9月14日　唐生智在汉口召集重要军官会议，协商省防问题，决调第八军二师进驻武胜关，防守鄂北一带；长江下游派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布防；宜昌派第二军防守；湘省防务归第三十七军担任；并决定暂缓北伐，以巩固湘、鄂、皖三省防务为目的，由唐任三省联军总司令，何键、刘兴、周斓任副司令。

△　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由韶关入赣，是日抵信丰，17日赴雩都指挥各军入闽，追击贺、叶起义军。蔡廷锴第十师由蒋光鼐接统，由雩都（今于都）、瑞金兼程入闽边夹击贺、叶起义军。

△　毛泽东在浏阳上坪以前委书记名义通知秋收起义各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19日，各路起义部队约1500人在文家市会师。次日离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25日，克莲花县城。29日，到达江

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部队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人数不足一千。

△　陈公博因第四次全体执监会议改为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致函唐生智转中央，声明及时引退，并即日离沪赴粤。

△　靳云鹗军秦德纯、马吉第两部被冯玉祥军韩复榘、石友三部压迫，是日自许昌大石桥退至郾城，继又向上蔡退却。

△　陈济棠在惠州就任代理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

9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20人出席。谭延闿主席，报告中央执委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候补执委白云梯、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及中央监委高语罕，候补监委江浩，因隶共产党籍予以除名。决定开除“附逆有据”之彭泽民、邓演达党籍；徐谦、陈公博、谢晋、詹大悲、邓懋修有无“附逆”嫌疑，交中监委审查；恢复王宠惠党籍；设“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委员32人：沪方（西山会议派）为林森、邹鲁、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六人，候补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宁方为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枢、李烈钧六人，候补叶楚伧、褚民谊、缪斌；汉方为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六人，候补为顾孟馀、甘乃光、陈公博；三方公推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敬恒、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14人。以张继、于右任等五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特别委员会之任务及职权为：一、受中央党部之委托，分别行使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职权，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为止；二、统一各地方国民党党部；三、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十七年（1928）1月1日为开会期。对汪精卫自请处分案，决定应无庸议。并决定劝汪、蒋及胡汉

民等速出任事。

△　唐生智自武汉通电劝冯（玉祥）、靳（云鹗）息争，称靳“去岁反吴，今年讨奉，艰苦卓绝，再接再厉，皆忠实同志，党国干城”。

△　唐生智调李品仙第八军第二师吴尚部及中央警备第一师戴斗垣部至武胜关。次日信阳冯玉祥军忽自动向明港、确山撤退。唐军入信阳。

△　安国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军事，议决：一、津浦路正面，令孙传芳军担任，军费由北京设法援助；二、陇海路之直鲁联军乘冯、靳两军冲突，开始积极行动；三、京汉路方面因与晋军之关系，暂维现状；若晋军退却，即令第三、第四方面军前进。

9月16日　宁、汉、沪三方合组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即开第一次大会，决议要案多件：一、发表修正后之国民党宣言；二、改组中央党部，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海外八部；三、改组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财政、司法、农工、实业、交通七部及大学院与军事委员会；四、设置监察院；五、推谭延闿、于右任、张静江、李烈钧、张继、谢持、李宗仁、白崇禧、朱培德、程潜、杨树庄等11人协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人选。

△　北京续开停顿日久之中日修约会议，交换通商、航海意见，无具体结果。日方代表重光葵，中方代表唐在章。

△　奉天省当局不顾日方阻挠，兴工修筑打通路（自锦州打虎山至通辽县），因该路有衔接京奉、四洮两路，使北满货物直达葫芦岛之功用。

9月17日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改组国民

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案。议决推丁惟汾、于右任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五人为常务委员；于右任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何应钦、汪精卫、李宗仁、自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程潜、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14人为主席团；通过大学院院长、各部部长名单。

△　南京政府致电慰留蒋介石，促其“克速回宁，完成北伐使命”。

△　徐谦为南京疑其“附共”交中监委审查事通电自辩，谓“谦在武汉分共政策未宣布前，主张分共甚力”，曾反对鲍罗廷，且对南京“主张调和，力阻东征”。

△　武汉军事委员会以第二十一师（按系奉军富双英旧部改编）“谋叛有据”，令江右军总指挥刘兴迅即给资遣散，该师师长郭广炎、副师长周堉调汉。21日，该师在芜湖被缴械遣散。

△　海丰、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以刘琴西为工农革命军总指挥，林道文为大队长，是日攻克海丰城，重建人民政权，并采取没收官僚、地主之工商企业，镇压反革命分子等措施。25日，在敌陈学顺补充团和戴可雄之保安队、民团反攻下撤出县城，转入中峒革命根据地。

△　南昌起义军主力已由闽入粤。粤第八路代总指挥黄绍竑急令右翼东路两军速向贝岭、兴宁进出，然后各军并进，向海边压迫包围，加以歼灭。

△　湖南特别法庭在长沙成立，以唐斌为庭长。是日下午，杀害共产党员三人，并在长沙县郊大捕农军多批，解送特别法庭讯办。

△　冯玉祥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称，靳云鹗“抗命通

敌，破坏革命，背叛党国”，请明令通缉，以儆反侧。10月6日，国民政府据冯电下令将靳褫职，并严缉究办。

△　驻扎顺德（今邢台）一带之晋军是夜开始撤退，声言“让防”，大部集中高邑，准备北退。

△　日轮“现德丸”因贪利载重逾量，违背行船规则，在青岛附近沉没，淹毙乘客数百人。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率30万会员致电忠告日本政府，称日本撤兵山东之同时，已实施满蒙侵略政策，筑铁路，设领馆，无所不用其极，并利诱张作霖缔结借款，私订条约，中国人民万不承认。

9月18日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前队黄琪翔部六七千人到达韶关，余数万人陆续回粤。张发奎赴香港休养，由黄琪翔暂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　南昌起义军贺龙部攻入大埔，旋沿韩江直下，19日占三河坝。叶挺部亦于次日到达。随后分兵，由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续向潮汕前进。在三河坝、隘　隍间击退潮梅警备司令王俊部四个团，23日克潮安。王俊率部分路向汤坑退却。农军千余人入据汕头市。24日，南昌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汕头。

△　云南唐继虞军一部攻击呈贡，21日黎明攻至省城昆明。龙云军据城鏖战一昼夜，次晨唐部向西退却。

△　于右任、谭延闿等屡电冯玉祥为靳云鹗说和，是日冯复谭电称：“逆军破坏党体，为害殊甚，若不趁时扫荡，豫局何堪收拾”；“目下交锋胜利，和复何益，未和于未战之先，而和于逆军溃退之际，再三筹思，似非得计。”

9月19日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三次大会，张继主席，决

定：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推定中央党部各部委员：组织汪精卫、陈树人、谢持等八人，宣传戴季陶、顾孟馀、胡汉民等八人，工人陈公博、居正等四人，农民甘乃光、陈果夫等五人，商民褚民谊等五人，青年傅汝霖、邹鲁等四人，妇女何香凝、陈璧君等六人，海外邓泽如、林森等四人；二、中央政治委员会（或称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权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限10月1日前取消；三、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立即合并于新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立即移交。

△　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同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沪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提出在革命斗争新高潮中成立苏维埃。

△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请假离省三月，经省政府委员会公推伍廷飏代理主席。是日伍在南宁就职。

△　冯玉祥下令通缉靳云鹗，并派东路郑金声军自陈留进攻周家口（即周口，在商水县北部），中路石友三及郑大章骑兵师由郾城进攻上蔡，截击靳军后路。20日，上蔡靳军一旅为冯军缴械，余部逃汝南。

△　据《晨报》讯：奉天省长莫德惠根据北京外交部电示，已与驻奉日总领事吉田等协订《取缔东三省韩人协定》六条，主旨在解散韩党，缴其枪械，并依日方所指，逮捕韩党首领引渡于日本。

9月20日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礼，张继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致训词后授印。蔡元培代表国民政府委员接印，并致答词。接着，蔡元培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向军委会致训词，伍朝枢代表国民政府向军事委员会

授印，程潜接印并致答词。至此，沪、汉、宁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产生，武汉政府正式结束。

△　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其要旨如下：一、继续北伐；二、力求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三、“肃清”共党；四、建设“革命”秩序，厉行“革命”纪律；五、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之建设程序。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建设国家资本；六、扫除文武官吏贪污腐败积习。

△　湖北省、汉口市两党部改组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提出疑问，略称：报载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指定数十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而所指定之特别委员中，有不少业经总理及全国代表大会除名之人，究竟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仍否存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仍否举行，本党党章及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否尚属有效。

△　何应钦奉军事委员会令，将驻无锡、松江、杭州三地之白宝山旧部：第三十一军之蒋毅、第九十三师李奇峰、第九十一师缴械，称其有勾通孙传芳情事。

△　湖北省党部、省政府公布《处置共党新条例》，内称凡在“马日”以前有显著工作，“马日”后继续工作或继续加入共党者均处死刑，非属以上三项者仅予监禁。

△　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改组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救济武汉金融办法，议定请军委会及省政府组织临时特别机关，全权处理中央及地方财政，并整顿金融。

△　浙江省政府下令严缉共产党人萧澄等84名。

△　杨宇霆赴奉天调查排日案。奉反日运动渐形沉静。

9月中旬　　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准李宗仁辞第七军军长兼职，以

夏威继任；第七军留广西后方之第三师改编为第十五军，任黄绍竑为军长。

9月21日　汪精卫、顾孟馀、唐生智等返汉，依据上月22日国民党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于是日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对峙。指定委员23人，以唐生智、顾孟馀、陈公博、孔庚、邓寿荃五人为常务委员。

△　汉口徒手士兵数十名拟搭日轮“沅江号”赴长沙，为日水手拒绝，发生冲突。武汉卫戍司令部应日海军要求派兵弹压，因语言不通，解释无效，日兵竟开枪射击，华军死军官一人、士兵二人，伤数人，日兵亦伤二人。日方要求道歉，并予日兵将来之保障。22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张翼鹏访日司令官荒城表示道歉，日方亦派员至卫戍司令部对死伤者表示同情。

△　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黄琪翔偕师长缪培南率前队2000人入广州。该军政治部所贴标语中有“拥护汪精卫、李济深、张发奎及军事委员会”、“反对个人代表党”、“建设革命的新广东”等。次日发表第二方面军返粤《凯旋宣言》，号召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肃清藉党营私的投机分子，打倒冒充三民主义的信徒，揭破腐化党员的假面具，打倒代表土豪劣绅的腐化分子，打倒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共产党，打倒叶挺、贺龙”。

9月22日　国民政府第二次会议议决，设财政监理委员会及外交委员会。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设立财政委员会，以孔庚、邓寿荃等为委员，管理该分会辖境内之财政事宜。

△　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呈请辞职，10月5日国民政府指令慰留。

△　广东海军“广金”舰自琼州运税银毫洋60万、纸币30万返广州，途中舰员勾匪劫纸币30万元逃亡，舰由伙夫驾驶抵广州。广东省当局派员赴香港查捕各犯。

△　阎锡山委前第六旅旅长高鸿文为第十六师师长；绥远都统商震为左路总指挥。

9月23日　蒋介石自宁波抵上海，与胡汉民、吴敬恒等会晤，表示小住数日即出洋。浙江省政府委员会议决拨蒋出洋旅费五万元。

△　石家庄民众两万余人举行拒毒示威运动，反对日人贩卖金丹、吗啡，驱逐贩毒日人出境，将华友洋行日人及两名贩金丹日人送太原总司令部转送天津日领署惩办。按：据拒毒会调查，石家庄每年行销西北之吗啡、金丹，价值在500万元以上。

△　南京短波无线电台落成，与广东、洛阳、上海、宁波、厦门、菲律宾、东沙岛可直接通报。

9月24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为对付唐生智军东下，决定向安徽三路进兵，将唐军逐出皖境：中路由李宗仁、贺耀组、叶开鑫三军担任，沿长江直趋芜湖；南路由陈调元、王普两军担任，自宣城出兵，经祁门、景德镇入赣，联络朱培德第三军攻九江；北路由柏文蔚、张克瑶、王天锡三军担任，自合肥、桐城进攻安庆。程潜、白崇禧两军担任后方应援。

△　第二路总指挥白崇禧由宁到沪挽留蒋介石，国民政府委员蔡元培、褚民谊等12人亦因挽蒋及胡汉民等到沪，蒋出洋意甚坚决，无法相强。

△　黄绍竑抵梅县，指挥所部向大埔前进。同日，薛岳、黄旭初部占大埔。

△　上海虹口日巡逻水兵在乍浦路殴伤华童陈启荣，华捕干涉，

亦被殴辱，大队华捕乃将肇事日兵两人拘押汇山捕房。日侨闻讯，麇集捕房门前滋扰。当晚捕房将滋事水兵交武官领回。日海军即向捕房要求恢复日海军名誉及保证不再发生类此事件，限时答复。

△　杨宇霆就时局问题在奉天发表谈话，称：一、满蒙交涉，在排日问题未镇静以前，无续开之望，交涉在北京决定大纲后，在奉天协议细目；二、外交后援会不能急于解散，亦不能加以弹压；三、莫省长提出辞呈，虽系事实，但不能使其负排日问题之一切责任。

△　奉天旅津同乡五百余人在南开中学集议满洲问题，议决：一、组旅津奉人对日外交后援会；二、公开日本侵略满蒙之真相；三、研究中日交涉悬案内容，直陈政府参考；四、通电全国，请组对日外交后援会，一致力争；五、通电各国民众，声述日本破坏东亚和平无异破坏世界和平，请主持正义；六、劝东省父老提倡工商，调查货物，以求经济独立。

△　石家庄晋军徐永昌部主力自是日至26日，撤至获鹿及井陉。

9月25日　浙江总工会在杭州举行“浙民救党运动大会”，参加者约5000人，国民党省、市党部代表均演说，通过“否认南京特别委员会之决议事项”之提案，理由为“南京会议使西山派归复，实属破坏革命精神之谬举”。

△　汪精卫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各报馆，声称“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表示仍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同日汪电黄琪翔，称当回粤候命，“为指臂之助”。

△　粤第八路各军于梅县附近集中完毕，代总指挥黄绍竑下令东路军以一部进占丰顺城，主力进占汤坑，与中央军联系后，向白坟铺、潮安进攻；中央军与东路军取得联系后，由黄金市进攻隘 隍，渡过韩江左岸，断南昌起义军退路；右翼军务于29日到达新渡墟，渡过韩江左岸，断起义军退路，潮梅军务于9月27日向揭阳进攻，阻断起

义军陆丰、海丰之通路。

△　北京军警大捕学生，包围搜查国立九校及私立各大学，以共产党嫌疑捕去学生百余人，并枪杀赵全霖、陈国华等10人。

9月26日　何应钦通电即日起解除第一军军长兼职，专任第一路总指挥；并称第一军部队有十师以上，已奉准编为三军，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休整三日，是日第二次分兵：第二十军第三师由师长周逸群率领警备潮汕；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第一师会合彭湃东江工农自卫军集中揭阳城。敌潮梅军退丰顺附近。

△　张宗昌在济南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邯郸、曹州、陇海三路大举攻豫，每路配兵三万。

△　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正式成立，开始授课，10月7日补行开学典礼。

9月27日　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决，废止中央财务委员会，改中央党部农民部为农人部，商民部为商人部。

△　江苏省、浙江省、南京特别市国民党党部联名通电，否认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谓特别委员会之组织破坏党的系统，破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特别委员会中分子有曾反对北伐者，有曾充贿选议员者，有曾反对收回法权者，有吸食鸦片、人格破产者，有军阀之走狗蜕化而来者。同日，山东、奉天、直隶、绥远、吉林各省及北京特别市等党部亦发宣言否认特别委员会。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由唐生智、顾孟馀、孔庚、邓寿荃、陈公博五人以常委名义，委任何键为安徽省政府代理主席；王大桢、汪钟祥、袁家普、胡升骐、许恒芳、王星拱分别代理该省民政、财政、司法、建设、农工、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财政委员会为整理财政，决定收回票券办法：中央、交通、中国三银行纸币折价兑现，每元兑洋二角，武汉各银行自10月12日起，停止支付两个月，在此期间，所有钞票悉行兑现；借征武汉三镇房捐两个月，专为收回国库券之用，缴纳房捐时，以国库券一元作现洋一角。10月12日，汉口中央、交通、中国三行钞票开始兑现，一元作二角。

△　粤第八路代总指挥黄绍竑令中央、东路两军同时向揭阳进攻，右翼军进攻三河坝，潮梅军于汤坑附近集结后，向揭阳进攻。

△　湖北省、汉口市两党部代表大会通过四项通电：一、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二、促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三、挽留汪精卫复职；四、拥护武汉政治分会。

△　张发奎由港返粤，晚李济深在宅邀宴，张主张先巩固广东，次补充部队，再行“北伐”。

△　晋、奉形势骤变，晋军商震部乘奉军不备，折毁京绥路轨，阻断张家口与京绥路西段交通。其前卫在柴沟堡西直隶、山西省界处，与奉军于珍部冲突。

9月28日　晨，蒋介石一行10人自上海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次日抵日本长崎，发表谈话称：“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相晋接。”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特别委员会与中央执委会有同等权力，指摘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违反党章，不能承认；声明在党的合法机关未经恢复职权以前，吾人仍可视特别委员会所产生之政府为事实的政府，而在对外、对军阀、对共产党数种事件上与之作条件的合作，但特别委员会关于党务、政治上一般之决议，则不能承认其有效。

△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通电称，张树声在苏、皖一带组织军队，委任军长至34人之多，极招摇之能事，特免除张所有职务。

△　中东铁路理事会开会，中国代表依原条约要求退还中国股本500万两，连30年利息共1500万两。俄代表认此为政治问题，应由两国政府解决。

△　南京全国学生联合会颁布各省市县学生联合会及各校学生会临时组织法，通告各地学生联合会、学生会按此法改组。

△　汉口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因宁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议决暂缓迁宁。

△　汉口《民国日报》经理曾集熙辞职，由范予遂接任。

△　周凤歧电南京国民政府辞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各职。29日又电军事委员会辞第二十六军军长职。

△　南昌起义军贺龙主力第二十军第一师及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汤坑攻击前进，第二十军第二师为后续部队。行至汤坑附近与王俊潮梅警备旅、陈济棠第十一师、薛岳新编第二师等接战。经过两日夜鏖战，至30日，起义军弹药将尽，损失过半，退揭阳。晚，揭阳复沦入敌手。

△　粤海军“飞鹰”、“民生”两舰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在汕头登陆袭击南昌起义军，被警卫团击退。

△　上海各报登载蒋介石答复对其家事来书质疑之启事，称：“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

9月29日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报告誓师讨奉。同日，晋、奉战事开始，晋军分两路向奉军进攻：右路军由阎亲自指挥，沿京汉路前

进，第二、第三联合军由获鹿、平山一带进至滹沱河南岸，次日第二军于滹沱河北就攻击准备位置，第三军在平山以北地区集结。左路军以商震为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九、第七联合军沿京绥路方面进攻，是日下午先后占领丰镇及平地泉；奉军检阅使于珍及特派员赵倜在丰镇为商震截获。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后，汪精卫由汉回牯岭。是日，孙科派曾仲鸣赴九江劝汪回宁。

△　北京学生因张贴打倒军阀字样标语，连日被当局逮捕50余人。

9月30日　　傍晚，黄绍竑部攻陷潮安。南昌起义军因潮汕联系被敌隔断，汕头失掉保护，为避免损失，于是晚主动撤出汕头，向流沙方面转移。

△　上海日水兵在虹口被拘事，经日驻沪总领事矢田及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调解，工部局复文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表示歉意，保障以后不干涉日武装海军，惩办负责巡查及华捕。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松本认为满意。

△　国民政府电饬四川将领刘湘、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通缉吴佩孚。

△　奉方以与阎锡山开战不利，是日由张学良电阎言和，提出释放于珍，停止军事行动，将晋军撤回原地，修复商震拆毁之路轨等和平条件。阎答称两军冲突系起于商震之误解，奉方要求决全部容纳。

9月下旬　　中央特别委员会电令10月1日撤销广州政治分会。李济深等电特委会请收回成命，或准另设与政治分会职权相同之机关。10月3日，广东省政府电南京国民政府，称当此西南多事之秋，万难将广州政治分会裁撤。

△　何香凝辞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离南京赴日本休养。

△　军事委员会改编第十八、第十九两军，委杨杰为第十八军军长，郝国玺为副，胡宗铎为第十九军军长。第十九军由第七军之一部及刘佐龙之第十五军第二师所编成，第十八军系第六军第十九师扩编。

△　湖北黄、麻地区爆发农民武装暴动，从26日起，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农民武装数百人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恢复农协，发展农民武装。不久因魏益三第三十军窜扰，武装暴动暂处停滞。

△　山东淄川华坞岭中日合办之煤矿，淹毙华工一百八九十名。

是月　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琼崖起义。在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及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下，在定安、琼山、万宁、陵水、乐会（今琼海市）、文昌、琼东、儋县、临高等地先后发动起义。起义后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1928年8月中旬，成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王文明为主席。

△　白崇禧任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10月

10月1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孙科、外交部长伍朝枢、交通部长王伯群、司法部长王宠惠、大学院长蔡元培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央党部代表李烈钧致训词，勉以“治心为本，治国为末”，一致努力排除“为世界障碍之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国家障碍之地方主义与地盘思想”。孙科发表就职通电，大旨为出纳公开，厘剔弊害，力求财政统一。

△　李济深之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广州正式成立，后方总司令部

同时结束。后方总司令部原属之军队及军事机关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概归第八路总指挥部统辖。

△　冯玉祥与阎锡山议定，以阎牵制奉军，由冯全力攻鲁，是日阎下令对奉军总攻击。京绥路奉军3日全线被晋军击破，放弃张家口，向宣化退却。

△　京汉路晋军第二军在滹沱河开始攻击，下午1时占正定城。5日下午，第二、第三联合军占新乐城，入夜第二军先头部队占定县，并在望都附近与奉军激战。第十军骑四旅于同日攻占安国县城。

△　北京大元帅府决定，京绥路以张作相为总指挥，汤玉麟副之；京汉路以张学良为总指挥，韩麟春副之。

△　南昌起义军在距揭阳约40里之炮台渡过榕江，次日至贵屿，3日到达普宁县流沙镇附近之乌石，遭陈济棠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第十三师伏击，起义军第一、第二师与革命委员会机关、第二十四师被切断。数小时后，第二十四师、革命委员会机关被打散，突围部队千余人由董朗和颜昌颐率领，于7日到达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后建立红二师。

△　梅县方面第三十二军钱大钧部沿韩江北岸向三河坝起义军朱德部第二十五师发动进攻，激战终日。次日占三河坝。起义军渡江占三河坝对面之高地，隔江对峙。

△　南京军事委员会裁并不足额之军队，第十四军（赖世璜旧部）被编为中央独立第一师，以熊式辉为师长；第二十七军（王普部）改编为独立第三师，以徐琏为师长。

△　杭州《民国日报》因登江浙暨南京市党部联衔否认中央特委会之通电，被勒令停版。

10月2日　孙科、伍朝枢由南京前往牯岭劝汪精卫复职。同日，

汪电南京谭延闿、蔡元培、李宗仁等称：“政府职务，虽已辞谢，党员责任，未敢放弃，拟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

△　李济深在广州邀宴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缪培南等各军将领，李声称要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冒充三民主义信徒之投机分子，以巩固革命策源地之广东。张致答辞，声明拥护李济深；又称只认从前武汉党部、政府为正统，应打倒昏庸老朽分子。

△　唐生智将截获之“决川”等舰编为长江第一舰队，以丁延龄任队长。

△　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率2000人入汕头。次日黄绍竑、王俊亦到，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由薛派两团向澄（海）、揭（阳）追击南昌起义军，王派一团入潮阳。王复任潮梅警备司令。

△　张作霖通电讨伐阎锡山，历数阎无端兴戎之罪，谓为维持大局，不得已饬军讨伐，倘阎能悔过息兵，仍当宽其既往。4日对阎下讨伐令。

△　张作霖任吴俊陞为东三省边防司令兼保安总司令。

△　全国拒毒运动周第一日，上海禁烟局举行拒毒演讲会，局方一科长宣称该局进行之方针，完全以禁烟为目的，非以筹饷为目的，当场焚去红丸9400余盒及白粉、吗啡、烟具等。

10月3日　　湖南省务会议议决，请驻湘苏联领事馆人员限期出境，由交涉员萧恩承照会苏领事。22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查封驻湘苏领事馆，领馆人员“监护出境”，苏、华人役一律被驱逐。

△　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党员统一登记条例》。

△　张作霖特任刘尚清为奉天省长，原任莫德惠调任农工总长。

△　朱德率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与敌钱大钧部10个团激战三昼夜，歼敌千余人，于是夜率2000人突围撤出战斗。

△　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经验，讨论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7日进抵茅坪。27日到达井冈山中心茨坪，和当地的农民革命武装王佐、袁文才部汇合，开始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　靳云鹗军残部于学忠、刘培绪两师退集凤阳，是日为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陈文钊收编，即以此成立第十五军。

△　蒋介石到神户，即与宋子文同赴有马温泉见宋母，请其允诺与宋美龄之婚事。宋母允其所请。

△　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浦东分厂工人8000名，华商恒丰纱厂工人2200名，招商局码头工人五百余名，因要求增加工资，开始罢工。

10月4日　　国民政府下令讨奉，令称："北京伪政府，倒行逆施，秽德彰闻，久为人民所痛恶。自张作霖窃踞幽燕，益复勾结残寇，扰害闾阎，恶焰弥天，怨声载道。其爪牙孙传芳、张宗昌，负隅海岱，图抗义军，日暮途穷，凶氛犹炽，致使大江以北，庐舍荡然，火热水深，民不堪命"，"凡我将士，咸应发扬蹈厉，戮力同心，直指朔方，殄灭巨憝。"7日，国民政府令军委会筹划克日出师"北伐"，策应晋军。

△　中央特别委员会委派沈定一等为浙江省党部特派员，王讷言、萧明新等九人为执行委员，于是日接收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同日，杭州《民国日报》由萧明新接收。

△　国民政府议决接济冯玉祥军饷100万元，交财政部拨付。

△　阎锡山通电向张作霖宣战，责张为华北和平之扰乱者，且妨

碍新中国之建设，号召奉军士兵协力讨张。

△　晋军李生达第十五师由蔚县进至宣化以南，奉军放弃宣化退守怀来。次日，晋军第十五师协同第五师及左翼队占领张家口、万全、宣化一带。

10月5日　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何应钦、朱家骅、陈其采、程振钧、蒋伯诚、蒋梦麟、马寅初、阮性存、陈屺怀为浙江省政府委员，以何应钦为主席，朱、陈、程、蒋（伯诚）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命郑洪年、张寿镛为财政部次长，张仍兼江苏财政厅长。

△　李济深请保留广州政治分会及增设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一案，是日经中央特委会议决，政治分会应予取消，军事委员会分会应否增设交国民政府核办。

△　前王普第二十七军改编之独立第三师约5000人，在南京下关附近被第七军李宗仁部包围缴械。军委会宣布该师暗通孙传芳军。

△　阎锡山致电张作霖称，兵戎相见，实违初心，苟有解决途径，仍当开诚相与。7日，张复电称，既相见以兵戎，成败利钝，惟力是视；背叛共和，拔五色帜而易赤帜，谓为顺应潮流，不敢奉命。

10月6日　南京军事委员会议决分别电勉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协力进攻张作霖。谓该会决定一律动员，大举北伐，务希督饬所部努力前驱，以成革命大业。

△　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致日公使芳泽照会，抗议日本对华政策，谓日本对华之满蒙新政策，拟系复活“二十一条”，甚或变本加厉，此种政策必至引起中国人民之公愤，恐将酿成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于远东，危及世界和平。

△　国民政府据特委会第四次会议议决，致函军事委员会转饬淞沪卫戍司令部，设立健全侦缉机关，严厉逮捕上海共党。

△　广西清党，梧州枪杀学生胡宝凤等13人，14日桂林县杀害共产党员赵世恪等18人，19日梧州又杀害19人。

△　前武汉政府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及其夫人并随员一名，已得日本政府准许，是日由上海启程经日本回国。

△　清晨，朱德率南昌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约2000人撤出三河坝，南下接应潮、汕方面起义军。在饶平与潮汕起义军约200人会合。

10月7日　国民政府议决任命刘峙、钱大钧、顾祝同、黄琪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准裁撤江苏军事厅，并免何应钦所兼厅长职。

△　朱德率领第二十五师、第九军教导团及从潮州撤出的第三师一部约2500人，从饶平出发，向平和方向转移，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17日，在武平击退尾追之钱大钧部两个团的进攻。朱部损失亦重，仅存兵力约1500人。

△　军事委员会令将第十八军改编为四个团，拨归程潜节制，仍在扬州原地担任警戒。该军军长杨杰已通电辞职。

△　张宗昌连日与孙传芳、褚玉璞、张敬尧、程国瑞等在济南开军事会议，集议陇海、津浦两路军事，是日决定孙传芳军扼守津浦路，所有津浦路及东路直鲁军尽调鲁西及陇海沿线，以备大举对豫。

△　苏州铁机工人3000余人以三星纺织厂无故停业，不允发放工人津贴，是日起全体罢工援助三星厂工人。15日，市公安局会同市党部召集各团体、机关代表讨论解决办法，决定：一、由商会负责我资方出面磋商办法；二、工方负责保障资方身体安全；三、限三日内（自15日下午1时至18日上午12时止）解决。

10月8日　国民政府公布《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发行总额2400万元，充作本年军需政费预算不足及归还短期借款之用，以二五附税全部收入作为本息基金，月息七厘，10月1日发行，至1931年12月底本息全部还清。

△　国民政府重申前令，严禁军人干涉省政，擅委官吏。

△　财政部长孙科发表《告全国商界书》，称国民政府对于“所借各种款项，必完全负责，依约履行；以前债务亦必次第整理，妥定办法，决不使人民有意外之损失”；要求全国商界与政府“同心协办，始终合作，以度过目前之难关”。

△　军事委员会议决军队编制案。以军为单位，军之上分路，各路负责者总指挥，以数目字表示之。军之编制，每军三师，一教导团，一骑兵队，一炮兵团，一工兵营，一通信队，一宪兵队，一军乐队；师分两种：甲种四团，乙种三团，一特务营，一炮兵营；一团三营，一迫击炮连，一机关枪连，一卫生队；每营四连。

△　日芳泽公使、本庄繁中将在北京晤杨宇霆，非正式要求续开满蒙交涉。

△　汉口英领函交涉署，拒绝汉口第三特区新局长张履鳌到任，声明如必欲令张履任，恐将演成严重局势，应由中国当局负责。交涉署于19日函英领事波特据理驳复，责英方违背尊重条约之国际义务，并声明：英国政府苟欲公然背弃其全权代表所签条约，而规避签字后发生之国际义务，将使英国负其全责。

△　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副军长斯烈相继辞职，南京军事委员会委陈焯继任该军副军长兼代军长。是日陈在沪就职。

△　第八路代总指挥黄绍竑由汕头抵广州谒李济深，报告潮汕解决起义军经过；并请解除第八路代总指挥职，在粤第七军亦请调桂补

充休养。24日黄自粤回桂。

△　张作霖颁发京汉、京绥、陇海三线总攻击令，以张学良、韩麟春率领三、四方面军团所辖各军，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张作相、汤玉麟率第五方面军团所辖各军，由下花园经宣化、张家口向大同进发；万福麟部仍照原定战线进攻；张宗昌、褚玉璞率二、七方面军团各军，由济南、徐州经东明、曹州、夏邑等地向开封、郑州、运城进发。同日，京汉线奉军左翼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占领安国。

10月9日　冯玉祥第二军团开始攻击直鲁军。第一路鹿钟麟等部自归德附近东进，10日上午与直鲁军在杨集以西遭遇。11日，直鲁军褚玉璞部及袁家骥部合力进迫，沿铁道附近之冯军阵地被突破，损失甚重。12日，冯军败退归德，袁家骥部自永城方面向冯军右翼包围。14日，冯令第一路军放弃归德，向太康、柘城附近南撤。该路军以攻击猛烈，不易脱离，且刘镇华部叛军已截断退路，致第十军及王金韬师被围于归德，王鸿恩师受困于虞城，其余各部几经转折方撤出。王金韬师至16日始突围南撤。

△　朱培德向各方周旋之结果，李烈钧在赣东之省政府，钱大钧在赣南之行政委员会均经撤销，江西政令至此统一。

△　晋军第四军第十师抵进定县西南二十里铺附近，与奉军遭遇。奉军迫近定县。

△　驻华日使芳泽向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致送节略，通知汕头日水兵为护侨登陆，请予谅解。

10月10日　汪精卫偕宁方代表孙科、伍朝枢等自九江抵汉口。次日宁方代表与汪精卫、唐生智及李济深之代表等在汉会谈，汉方代表唐生智、顾孟馀等提出解决“党的纠纷”主张如下：一、在宁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追认中央特别委员会；四、规定中央常务、特别两委员会之职权；五、恢

复中央监察委员会。13日，宁方代表孙科等携此提案返宁。

△　南京举行国庆祝典，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谢持等主持，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继续“北伐”、平定物价、“肃清”共产党等项提案。

△　广州各界庆祝国庆大会，通过迎汪通电及请当局整理省市县各级党务、迅释因清党被陷分子、促开第四次执监联席会议、保障农工利益、肃清贪官污吏等项提案。会后十余万人游行。

△　粤省新编第十三军在广州长堤成立，以方鼎英为军长。由湘入粤之许克祥部归其编配。

△　陈铭枢之第十一军由副军长蒋光鼐率领入福州。市中遍贴反谭（曙卿）标语。

△　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军2000余人由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撤退到陆丰，是日被陈济棠军缴械，士兵被改编，军官被押送至汕头遣散。贺率手枪队百余人向汕尾方向转移。

△　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抵北京，次日与张作霖秘密会谈，15日达成所谓《满蒙新五路协约》的谅解。《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线：一、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岸线；二、自长春至大赉线；三、自吉林至五常线；四、自洮南至索伦线；五、自延吉至海林线。并规定：中国不能将打虎山至通辽之线延长至通辽以北；不能修建开通（属通榆县）至扶余铁路。

△　山东省政府是日起征收奢侈品入口新税，税率自4％至20％，国货减半优待。外商方面由驻济南日本领事藤田荣介向该省提出抗议，要求取消。

△　奉军全线总攻击后，是日京汉路奉军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占领定县，晋军第二军右翼在清风店附近被包围。阎锡山令各部队撤退，12日，第二军撤至获鹿，第三军至平山，第十军至灵寿，第四军

至行唐，第六军协同第八军至曲阳。奉军占新乐、正定。

△　晋军谭庆林部约百名出没于北京门头沟西北，图袭北京，被奉军击退。

10月上旬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通告，以前误入三民社者，皆须自首及呈报该社一切印刷物，得予免究，否则一经查出，即行严办。按：湖北省党部委员罗贡华、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刘叔模等在鄂暗组三民社，图夺该省党、政诸权，因该社社员李培文等自首，罗、刘等被该省省防军公安局捕获。

10月11日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决定拒绝南京中央特委会取消该会之议决，并通过在该会下组织临时军事委员会，以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可钰、徐景唐、陈济棠、戴季陶为委员，如戴不就，以陈公博补充；如汪精卫回粤，则随时推举加入。该会受政治分会指导及监督，对政治分会辖内陆海空军及一切军事机关有指挥整理之权。

△　冯玉祥电南京报告协同讨奉计划，略称晋军任京绥、京汉两路，冯军进攻徐州、济宁、大名，请南京派大军向津浦路挺进，并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人中择一前往督师。

△　汉口英侨250余人集会，要求英国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强硬通牒：一、中国军队撤出特区；二、修改陈（友仁）阿（马利）协定，使市政不受政治干涉；三、保证界内警察官吏执行职权不受军令或其他干涉；四、管理局内增加英籍职员。

△　李福林第五军由东江回师广州，在市内东堤附近与张发奎军冲突，交战数小时，李军被缴械，退珠江南旧根据地，决与张军对抗。

△　晋军第四师傅作义部向涿州城进攻，奉军在南门据民宅及天

主教堂竭力抵抗。12日，晋军占涿州城。

10月12日　　国民政府特任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任命连声海为国民政府秘书长，黄惠龙为副官长。

△　国民政府再电李济深应照前令依限取消广州政治分会。

△　京绥路晋军商震部第一、第三、第五、第十五等师及骑兵第二、第六、第七等三师与奉军第九、第十二两军及增援之步兵四旅、骑兵两旅激战于下花园。同日，商震部奉令撤退。

10月13日　　南京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致电汪精卫，赞同在汉所议各项办法，并定11月1日在宁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请汪邀同武汉、粤、浔各中委赴宁集会。17日，汪电广州陈树人等，谓宁方已赞成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恢复中央执委会，武汉委员将东下，请陈等到沪会齐，或到汉同行。18日，汪致电各地中委，提出两项意见：一、如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得已延期，似宜再行通告；二、党务重要议案似宜留待全会公决。

△　唐生智通电各报馆请一致声援阎锡山讨奉。

△　方声涛自太原抵郑州，代表晋阎锡山谒冯玉祥，详商讨奉计划。

△　南京军事委员会令第一独立师改编为第十三军第一师，师长仍由熊式辉担任；原第十军部队合编为第十三军第二、第三两师；第十三军军长由白崇禧兼任。

△　闽局发生变化，蒋光鼐与海军联络，在招宴席上将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扣留。是午，新一军与第十一军在福州冲突，巷战三小时，新一军三个团被缴械。27日，闽南新编军高义、杨汉烈等组织闽南军事委员会，共拒海军收编。

10月14日　　广州海员及各业工人二万余人集会游行，高擎铁锤镰刀红旗，公开拥护赤色工会和共产党，并驱逐工会改组委员会，夺回海员工会会所，由海员25人组成维持委员会，进驻办公。晚，游行工人27名被警察捕去。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讨论修正临时军事委员会大纲，议决以李济深为主席，陈可钰为参谋长，黄绍竑、张发奎为副参谋长，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

△　安国军第五军团长张作相下令对宣化晋军实行全线攻击。汤玉麟、高维岳指挥第二十九军三师二旅同时猛攻。晋军第七军据城抵御，力不能支，向张家口退却。奉军入宣化。15日，晋军陆续撤至柴沟堡附近之永嘉堡以西及折儿岭、大高崖、西洋河一带，高维岳、汤玉麟部占领张家口。

△　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令驻沪宁路之第一军集中于镇江、扬州、邵伯一带，第九军向滁州附近，第十七军向阜宁附近，第二十六军向淮安、淮阴等处分别集中，均限10月20日集中完毕，准备讨奉。

△　江苏省政府政务会议通过加征本年冬漕，米每石加征正税二元，合原有正附各税每石共征七元。

10月15日　　军事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津浦路作战计划，为策应冯玉祥、阎锡山两集团军作战，决定大举北伐。

△　阎锡山为固守山西门户，以获鹿附近为第一线阵地，由第八师防守；井陉以西一带高地为第二线阵地，左翼地区由第三军担任，右翼地区由第二军担任；第十军在平山附近，第八师之一营在石家庄担任警戒。17日，石家庄第八师一营受奉军压迫，由正太路撤回。27日，第八师之一旅移守盂县，第六师、第六旅及第三十二团移守阳泉。

△　奉军集中兵力三万余人在第八军军长万福麟指挥下，连续两日向涿州城发动猛烈攻击，未果。19日起，张学良率第八军、卫队旅及炮兵团，对涿州城连续五次总攻，由坦克冲锋，以炸药炸城墙，在地下潜掘地道，空中派飞机投弹，架云梯强行爬城，遭晋军傅作义部守军反击，未能奏效。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财政委员会召集湘、鄂、皖三省财政会议，由三省财政厅长报告各该省财政情况及整理方法。17日，会议决议保障各省财政机关独立、设立安徽财政分会、整理两湖盐税等案。

△　粤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部到惠州接防，将蒋系赣军第十八师留守部队两连缴械，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胡谦被扣。师长一职由副师长苏世安升充。18日，胡谦于解省途中被杀。

△　中日合办之吉敦铁路全线通车。

△　汉口英国总领事波特致交涉员甘介侯通牒，谓英美烟公司罢工以来，英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损失，应由国民政府并地方官宪负责。

10月16日　　汕头姚雨平率海军袭击贺龙、叶挺军，曾越日兵防线，回舰时，恰遇日兵丢失一枪事件发生，日人疑为姚军取去。是日，日舰“癸菊号”封锁港口，派兵将“安平”舰缴械，除华旗，易日旗，硬指华兵抢去一枪，要求交回。“飞鹰”舰长据理力争，始交回“安平”舰械，交涉署向驻汕日领事内田严重抗议。19日，汕市工农商学兵五万余人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向驻汕日领提警告。

△　张宗昌命青岛军舰“江利号”扣留烟台盐税，英舰开赴烟台保护存放该款之汇丰银行。

△　中日合办之图们江铁桥（位于吉林省延吉县之开山屯）落成，是日行落成礼。

△　直鲁军三路会师归德，冯玉祥军退守兰封（今合并于兰考

县）。

10月17日　　武汉方面第三十六军受南京方面程潜第六军之压迫，是日起陆续由芜湖向繁昌、大通方向撤退。18日，第六军及第三十七军向驻芜刘兴第三十六军开始攻击。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令湘、鄂、皖三省党部一律限期改组。

△　广州工人代表会特委会议决24日总罢工，要求释放4月15日后被捕工人，恢复铁路工会，废工代会，白旗易赤帜等。19日，广州市公安局奉李济深令派警拿办，一路赴东园罢工纠察委员会，捕去70余人；一路将海员工会解散，捕去30余人，并枪杀海员领袖二人。

△　晨，奉军第十五军汲金纯部占领石家庄，晋军向娘子关方面退却。

△　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浦东一、二两分厂工人罢工后，该厂工会与厂方谈判复工条件迄无结果，是日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通令，依照劳资条例规定，在罢工未解决前，不得自由复工。18日，浦西三分厂工人1000余人决议罢工声援。

10月18日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取消李济深之第八路总指挥及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名义，并声明俟第四次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会议后，中央特别委员会取消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健全时，该委员会即行取消。

△　冀东张明远等率领农民万余人攻占玉田县城，次日杨春林又率遵化农民2000余人到玉田与张会合。旋因警察、民团数千人攻城，暴动农民被迫退至城北郭家屯，正式建立农民军，后又改编为“京东人民革命军”，以杨春林为总司令，刘自立为总参谋长，张明远为政治部主任，于方舟为党代表。11月7日，队伍在遵化鲁家峪遭民团、军警围攻，于方舟、杨春林、刘自立、解学海（中共玉田县委书记）

等突围，至丰润池家屯再次遇敌被捕。12月30日，于方舟等被杀害于玉田。至此，玉田农民武装暴动失败。

△　晋军骑兵4000，向京西门头沟妙峰山下袭击，被奉军王琦旅击溃，王旅占斋堂。

△　苏州铁机工人因总商会狡黠敷衍，逾限未见资方出面与工人谈判，激起公愤，工人2000余人拥入总商会，将商会会长庞天笙等13人捆缚游街，旋送市党部。经市党部调处，决定由总商会借给工人洋5000元，被监视之商会人员由庞天笙保释。19日，总商会开紧急会议，讨论商人自卫办法，议决电请军委会、中央党部饬究。同日，上海商界电请中央党部制止苏州铁机工潮。

△　张作霖在北京枪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仁山等九人。

10月19日　　国民政府特任于右任、白崇禧、朱培德、李烈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何键、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孙科、陈铭枢、张发奎、黄绍竑、程潜、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长江两岸武汉东征军总退却，是日南京军委会令李宗仁第三、程潜第四两路军分江北、江南两路向西追击。同日，陈绍宽率“楚有”、“楚同”、“永健”、“永绩”、“江贞”各舰西驶，占芜湖。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加派陈公博、甘乃光、陈孚木、何香凝为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

△　粤国民党中委李济深等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拟请先开执监预备会，决定党政军事纲领，然后正式开四次执监会议，人数不必限宁、汉、沪各六人。

△　冯玉祥令马鸿逵第四军即夜放弃兰封，西退30里，诱敌深入。20日，鲁军第六军占兰封城。

△　张宗昌扣留烟台盐款事，驻京英、法、日三使多次要求发还，是日又函北京军政府外交部抗议。

△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约2500人罢工，援助英美烟厂工人，浦东南洋烟厂、大英烟公司工人亦罢工声援。

△　招商局“爱仁”轮自香港开赴厦门途中遭匪劫，至大鹏湾被英舰窥见，开炮轰击，全船焚毁，伤四人，失踪24人，救出241人。

10月20日　　国民政府依军事委员会议决下令讨伐唐生智，免唐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依法治罪，并宣布其罪状为：勾结张作霖，阴谋破坏党和政府统一，把持财政，剥削人民，擅增军队，窃据湘、鄂、皖省政府，并于清党之后复用共产党员等。

△　国民政府任命李仲公为交通部次长；朱兆莘、郭泰祺为外交部次长；王征兼中央银行行长。

△　国民政府特任刘峙、钱大钧、顾祝同、黄琪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北京中日商约交涉展限之期已满，双方同意再展期三个月。

△　北京大元帅府参谋长于国翰以私人名义致电阎锡山请释放于珍，并称希望奉晋关系复旧。

△　贺耀组第四十军、叶开鑫第四十四军由南京下关渡江，沿津浦路北进。

△　京汉路右翼奉军第十军王树常部占阜平。

△　冯玉祥军孙连仲部克汤阴，解彰德梁寿恺部之围；直鲁军孙殿英第十四军退隆集一带。

10月中旬　　日商“宜阳”轮在秭归不服驻军检查，其护送舰开炮

四发，击毙第十六军兵士20余人，伤者甚多。

△　上海英兵因浦东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借故登陆入厂把守。江苏交涉员郭泰祺致函驻沪英总领事巴尔敦抗议，要求迅饬登陆水兵撤走。

10月21日　　唐生智以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绝关系，指责南京破坏赴汉委员团与武汉所商妥之约束。

△　国民政府决议改组安徽省政府，同日任命陈调元、柏文蔚、张秋白、何世桢、韩安、汤志先、雷啸岑、陈中孚、宁坤为安徽省政府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汤、陈（中孚）、何、张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以实业部暂缓设置，准实业部长孔祥熙辞本兼各职。

△　国民政府任命杨胜治为第十三军第二师师长；王天锡为该军第三师师长。

△　南京军事委员会发表《告唐（生智）部将领书》，盼与政府合作，劝唐下野。

△　北京当局以整理教育为名，与驻京比使商议提用比退庚款、发行500万元公债，是日比使复照北京外交部称，此案与原协定不符，不便擅专。27日，北京又令张弧为委员，会同外长王荫泰再向比使交涉，比使提出将中比旧约延长五年之对案，交涉遂停。

△　是日至23日，由芜湖溯长江上驶西征宁军约二万，陈调元、李宗仁、程潜等均抵芜指挥。江北胡宗铎第十九军及夏威第七军之一部过和县、含山。江南陈调元第三十七军过大通。

△　陇海路直鲁军三路前进，右翼第十三军刘志陆部占新旧考

城，中路第六军徐源泉部22日至兰封，左翼第二军张敬尧部向睢（县）、杞（县）前进。

△　海陆丰粤军李济深部陈学顺团进攻农军防地黄羌，被农军及起义军第二十四师之一排毙伤20余人。

10月22日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发表宣言，否认南京特别委员会，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成立前，政治分会辖下各省党务、政治、军事完全独立。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分电宁、汉汪精卫、谭延闿等，主张：一、速开四次执监大会，克日恢复中央党部；二、唐生智部即日退出皖境，不能因军事而阻党务，更不能因军事而致四次执监大会不能开会，皖政俟中央解决。25日，谭等复电赞同不因军事中止四次执监会议之主张，盼届时齐集开会。

△　南京财政部长孙科等在沪宴绅商，劝认二五国库券，沪商联会主席虞洽卿答称商民皆愿援助“北伐”。

△　孙连仲接冯玉祥攻鄂命令，于是日派一师兵力迫武胜关，与防守该地之鄂军开火，鄂军退守广水车站。23日，唐生智急调李云杰师自汉口北开增援。

△　第十六军范石生部两师奉令由乐昌、仁化向湘边开拔，以牵制唐生智军。

10月23日　　蒋介石在日本各地漫游20天，是日自伊东到达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称：“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决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之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

△　长沙卫戍司令部下令查封苏联领事馆，将领馆人员“监护”出

境。

△　广州临时军委会讨论出师讨唐及布防粤边计划，议决由李福林率第五军入湘。同日，李部第四十三团乘粤汉车北上。

△　皖战发生前，李烈钧电冯玉祥共同讨唐（生智），冯主慎重。是日李又电冯，谓时机成熟，不宜再缓，促冯即日对唐出兵。

△　北京借口冯、阎间谍嫌疑，大捕学生。是晨中国大学学生被军警捕去三四十人。次晨北京大学理科宿舍被包围检查，又带走七人。25日，军警联合办事处在天桥枪杀学生、工人10名，其中有京津工会会长赵铨林等。

10月24日　　中央特别委员会追认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命令，次又决议，唐“叛党通敌，破坏统一”，依国民党总章第七十五条，永远开除唐之党籍。

△　汪精卫自汉口秘密抵沪，知南京有反对特别委员会即为反革命之宣传，次日转赴广州。

△　财政部长孙科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指责汪精卫、顾孟馀等倒行逆施，组织武汉政治分会与财务委员会，破坏中央党、政、军事、财务统一，延长党内纠纷。

△　甘肃张兆钾残部和韩有禄、黄得贵等3000余人溃散于平凉、泾川间地区，据地扰民，后入陕投陕军田玉洁，据三原、泾阳。宋哲元部发起围攻。是日克三原，27日克徐家堡，田玉洁逃，29日又克泾阳，韩有禄中炮弹毙命，黄得贵易服逃亡，乱事遂平。

△　安庆唐生智部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两军向西退却，其在桐城之一部被宁西征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俘缴殆尽。第十九军、第七军已越桐城、孔城镇之线。

△　夜，唐生智将驻武昌鲁涤平部张辉瓒第二军之一团缴械。同日，鲁涤平电令驻宜昌第二军各师长率部东下讨唐。

△　打通线（打虎山至通辽）连接京奉、四洮两路之工程告竣，是日正午第一次京奉列车到达通辽车站。

10月25日　　下午，蒋介石在东京应日外务省招宴，与外务省事务次官出渊胜次就亚洲情势交换意见达三小时。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省政府组织法》，凡17条。

△　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特定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资本总额定为一万万元，由国库支给，其一部分经政府核准，可由国内银行分认。并规定该行特权如下：一、发行兑换券；二、经理国库；三、募集或经理公债事务；四、铸造及发行国币。

△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政府，嗣后无论公私事项，一律遵用阳历。

△　南京西征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舰将刘兴第三十六军之掩护部队击破，先后占枞阳、安庆。未及撤退之刘兴部2000人被缴械。该军第四师贺对庭部约5000人在南陵投宁，后被改编为独立第二师。

△　苏州铁机工潮相持日久，资方避沪，工人生计将绝，是晚苏州各业工会代表讨论援助办法，议决组织募捐救济铁机工友等办法四项。

△　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后援会成立，议决通电全国民众一致抵制英美烟厂香烟，实行不吸、不贩、不运三不主义；请政府设法救济罢工工人等。

△　上海市小学教员270人罢教，要求增薪，最低月薪以25元为

限度。

10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第九军副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蒋鼎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　京绥线奉军拂晓起开始攻击，以第九军一部并第十二军全部攻柴沟堡；第三十军主力攻怀安，一部攻蔚县。第九军军长高维岳赴万全督战。次日，奉军占柴沟堡，晋军李生达、张荫梧两师向永嘉堡、阳高退却。

△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商人部通告，嗣后各地店员工会应一律改称店员总会，概归中央党部商人部指挥监督。

△　广州警署解散沙面罢工总机关，28日复将广州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一队缴械。

10月27日　　李宗仁部入驻安庆。何键第三十五军退黄梅，刘兴第三十六军退武穴。讨唐军分三路入鄂，海军陈绍宽任中路，程潜、朱培德部为左路，李宗仁部为右路。

△　冯玉祥军进攻兰封、考城、杞县之线，与直鲁军血战五日，至31日将敌全线击溃。11月1日冯军孙良诚部占兰封，3日敌刘志陆、潘鸿钧等部自考城撤围。至是进攻陇海路之直鲁军全部崩溃。

△　驻北京英、法、日三国公使访张作霖，对张宗昌扣留烟台盐税事，口头再提严重抗议。

10月28日　　国民政府第十一次常务会议通过改组江苏省政府案，决议任命钮永建等11人为江苏省政府委员；任命朱培德等九人为江西省政府委员。

△　南京各级党部各机关团体约五万人开讨唐大会，通过议案数件：一、通电全国一致讨唐；二、彻底清共；三、请特委会严防投机

分子；四、请严办与唐联结之詹大悲等11人。

△　汪精卫偕甘乃光等10余人自沪抵香港。汪语记者主张三点：一、开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恢复中央执监两委员会；二、宁汉之战，可待党之决议解决，各自任意冲突，不能承认；三、广东各派应团结一致，整顿军民两政。

△　日前上海苏联领事馆被搜查，苏联共产党员数名被上海卫戍司令部逮捕，是夜解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处理。

△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北京开第三次大会，出席委员日方五人，中国11人，委员长柯劭忞主持，通过《研究所暂行章程》及《图书馆筹备章程》，选举研究所职员，柯劭忞为总裁，王树枏及日人服部为副总裁。

10月29日　　汪精卫抵广州，政治分会、省政府、省党部及各界均派代表到西堤欢迎。同日，汪与何香凝、甘乃光电邀南宁黄绍竑到粤商量政务。11月3日，黄复电称将桂省政务略为处置，即行下粤。

△　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裁撤司法厅。

△　据《申报》讯：国民政府决定网罗人才新方针，为求才得其用，将设一机关调查登记国内外专门学校毕业生，以使逐渐分配适当工作，并将逐渐推行考试制度。其理由为：目下用人之弊，在但凭亲故请托，一遇上级官长更动，即致全部易人，于事业甚多障碍；而大学毕业取得专门学术之人才，觅一位置而不可得，甚或学非所用。

△　何成濬、危道丰等奔走奉晋和议，是日何自沪电北京危称：晋方愿修旧好，请询明奉方条件。31日，危复何电称：如果晋方能先电此间，声明以前误会，愿修旧好，则奉方决不变更初衷。

△　第九军第二十一师步哨张明政在上海宝山路口巡逻，被越界英国巡查兵开枪击伤。沪卫戍司令部函交涉署向英领事严重交涉。

10月30日　　国民党在粤中执监委汪精卫、李济深、何香凝、李福林、陈树人、陈公博、甘乃光在广州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名通电主张克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会议，解决党务、政治、军事；并令中执委会之常务会议及秘书处恢复办公，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同日，汪等七人联名电促各中委齐集广州开四中全会。

△　国民政府任于右任、宋哲元、石敬亭、岳维峻、井岳秀、邓宝珊、张维玺、邓长耀、过之翰、严庄、段韶九、黄统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并委于右任为主席，于未到前，由宋哲元代理，邓（长耀）、过、严、段、黄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司法、教育各厅厅长。

△　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催汪精卫、陈公博等入京，并解释特委会之产生，系各方在沪所共同议定。

△　皖中军事发动后，武汉金融更形紧张，中央钞票跌至每元仅值现洋一角二分。是日，武汉财政委员会布告，略称近有渔利之徒收积大批中央钞票到行挤兑，操纵捣乱，兹定31日起中央票停止兑现，以武、阳、夏三镇两月房捐及营业牌照捐十分之五，委托汉口总商会及商民协会担任收兑钞票库券。

△　京绥路奉军骑兵占领永嘉堡。晋军退守天镇。

△　海陆丰工农武装在红二师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次日占海丰城，旋克陆丰，11月19日又下捷胜，获全胜。

10月31日　　国民政府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是日发出禁止自上海向汉口运银、制造军器之金属、纸、煤等之通告。日本领事高尾亨认为违反条约，且关系日商利益重大，于11月1日向交涉员甘介侯提出严重抗议。

△　谭延闿电促汪精卫、李济深刻日到宁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再电汪等劝驾。

△　南京军事委员会对第一路军下达进攻蚌埠命令，第一路军及第二、第三两路军之一部，由津浦路向明光、蚌埠之敌攻击，苏北方面第一路军之一部，由泗阳向蚌埠东方威胁敌之侧背。次日，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令第一军即向滁州、乌衣一带集中，而以第二十六军及第十七师于泗阳附近，第十七军及独立第一师于阜宁附近，依决战防御部署，监视宿迁、海州之敌。

△　奉军董怀清骑兵第一旅占领天镇；次日，第九军高维岳部。第十二军汤玉麟部占阳高，进迫大同。

10月下旬　　粤临时军委会通过，留粤第四军改为新编第四军，以李济深为军长；由汉回粤之第四军名称仍旧，以黄琪翔为军长。

△　何键之代表何宣往宁洽降回鄂，途经武穴被刘兴枪决。

△　朱德、陈毅率起义军约八九百人自信丰到达赣、粤边大庾，旋进行整编，编为一个团，对外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代号，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是月　　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成立，继教育行政委员会办理全国教育行政事宜，并负学术机关之管理、扩充等责。教育行政委员会同时结束。

11月

11月**1**日　　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宣言称该临时行动委员会之责任，在“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一面迅行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以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

员会的职权；一面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并重行选举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称该会职权，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即行取消。

△　唐生智第四集团军全体将领33人通电称，程潜等部乘芜湖驻军渡江“北伐”之际施以袭击，轻启衅端，甘为戎首，武汉政治分会忍无可忍，分遣各军，一致征讨，并声明“护党纲，除腐化，促开第四次执监大会，恢复中央，巩固党权”。

△　国民党四中全会因汉、粤各中委未到而延期召开。是日，谭延闿、孙科等电促汪精卫、李济深、顾孟馀等各方国民党中委赴宁开会。

△　广州铁路、火柴工人1000余名举行“援助三大铁路及火柴工人恢复工作”大示威，列队向葵园汪精卫住宅请愿，要求：一、实行联共政策；二、严办右派分子；三、停止讨唐；四、恢复广州工人代表会；五、释放清党时被捕工人。汪拒见，遣人告以事属政府权限，未便干预。工人大呼打倒汪精卫、李济深，军警弹压，捕去马璜等21名。

△　驻华日使芳泽在北京对日记者称，满蒙交涉杨宇霆已谅解，不久可继续开议。

△　上海交涉公署就英兵枪伤华兵张明政案向驻沪英总领署抗议，要求惩凶、道歉、给医药费，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同日，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发表《告民众书》，称此案应认为英帝国主义者蔑视中国主权，除惩凶、道歉、赔偿外，并应根本撤退英国在沪驻兵。3日，驻沪英总领事巴尔敦致函交涉公署表示歉意，允偿受伤中国兵士医药费等。

△　国民政府任命钮永建、叶楚伧、张寿镛、陈和铣、高鲁、张乃燕、刘云昭、茅祖权、陈世璋、何民魂、何玉书为江苏省政府委

员，茅、张（寿镛）、陈（世璋）、何（玉书）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农工各厅厅长，钮永建为省政府主席。

△　国民政府任命陈季良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绍宽为第二舰队司令，陈训泳为练习舰队司令。

△　司法部奉国民政府令准改革司法制度，是日起裁撤检察机关，各法院内原设之检察长及监督检察官一律改为首席检察官；各级审判厅分别改为高等法院、地方法院。

△　夜，鲁涤平第二军自宜昌开往荆州，杨森军第八师第十六旅进入宜昌城，两军合力讨伐唐生智。

△　宜兴农民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举行秋收暴动。是日，共产党人万镒率领农民武装2000余人，项缠红布，手执木棍、农具，占领宜兴县署，围攻公安局，解除警察武装，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搜捕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30余人。次日，第十三军两个营及第一独立师开宜，与县署卫队、水陆警察及商团合力弹压，起义农民被捕杀20余人，余撤离县城。8日，起义领袖万镒、蒋三大、陈世明因坏人告密，在长兴被地主武装张鸣皋部所捕，于23日被杀害于宜兴体育场。

11月2日　蒋介石在日访问曾任日文部大臣之犬养毅。同日，与在高田炮兵联队见习时代之长官长冈外史（第十三师团长）和飞松宽吾（野炮兵第十九联队长）欢叙。蒋书赠长冈“不负师教”条幅。次日，访问“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晚应头山满邀宴。

△　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议决：一、通过李烈钧、蔡元培等所提早日成立监察院及最高法院案，决定推谭延闿等先审查修改前广东所颁监察院组织法；二、请国民政府特任张继等五人为监察院委员，监察院委员不得兼行政官；三、为已故日本宫崎寅藏、犬塚信太郎、田政建碑纪念，宫崎碑拟建在总理陵墓侧，犬塚碑树在大连山，

田政碑树惠州；四、孙中山先生诞辰，令全国各级党部举行纪念大会。

△　国民政府公布《禁烟条例》，规定自民国十七年（1928）起，限三年内将鸦片烟禁绝。

△　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军委主席团程潜等提议，请派定军事进展区内政、财、党务机关负责人员随军进发，免启军人干预政治、党务。议决政治交各部筹划，党务由中央党部核办。

△　财政部长孙科等电沪三北轮埠公司总经理虞洽卿并转冯少山、顾馨一、林康侯、沈联芳、王晓籁等，称："劝募绅商二五库券，承先借垫二十五万元，现西征北伐，全赖后方接济，务请赶为凑集五十万元，于十日前解宁。"

△　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决定各部负责人：组织张发奎，宣传张难先，工人陈孚木，农民徐天深，妇女何香凝，青年朱家骅。

△　晋左路军商震下达缩短战线防御令，以第六军仍位于台怀镇一带，为防御之右地区；张荫梧指挥阳原各部队退守繁峙方面，为防御之中央地区；柴沟堡附近各部队退守雁门关以东，以第三师防守广武镇一带，为防御之左地区。

△　上海台湾学生会声明：亚洲民族大同盟为日人机关，台湾民众洞悉其奸，拒绝参加。

△　陈铭枢由日返国抵福州，复任第十一军军长。

△　北京中西（班牙）修约交涉，北京外交部长王荫泰称，该约10日到期，不再继续，在新约未成立前，另定过渡办法四条：一、使领关系仍旧；二、西货入华照其他外国同样纳税，华货入西享最低税率国权利；三、西承认放弃领事裁判权，过渡期内另订法律条款；四、六个月内成立新约；临时办法即以六个月为期，如展期须双方同

意。西使嘎利德允请示西政府后再答复。10日，西使见王荫泰，称接西政府复电，对北京所提临时过渡办法不能承认，仍请延长旧约。

11月3日　汪精卫在广州各界欢迎大会上演说，声称此次回粤惟一目的系“提高党权”，商量“以党治军，以党治国”，主张在粤恢复中央党部，速开四届执监联席会议，解决党内一切重大问题。何香凝演说，力主打倒南京非法特别委员会。

△　汪精卫在广州葵园召集在粤中委开谈话会，讨论如何答复谭、孙等1日电。决定照李济深所提折衷办法，在未正式开会前，先在广州或上海开一预备会议，确定正式开会地点。

△　财政部长孙科通电全国各团体、各银行，称北方军阀拟以比国退还庚款作为基金，发行美金公债500万元，并以延长旧约若干年为互利条件，实属增订不平等条约，应据理力争，不使实现，要求各界万勿承受该项公债，倘有私自押借购买情事，国民政府概不承认。8日，国民政府又发同样内容通电，并称北方军阀先借比国庚款积存110万元自由支配，除警告比使及中外银行否认外，望全国民众对此事奋起而攻之。

△　李济深致电孙科称，决与宁合作，一致讨唐，惟在战事时期，两广每月应解中央之款，须暂行停止，以济军需。

△　陈绍宽率“楚有”、“江贞”两舰逼攻龙坪，激战竟日，4、5两日“永键”、“永绩”两舰加入作战，唐（生智）军“楚振”等舰逃遁，遂下龙坪。

△　第三中山大学区通令各市县自民国十六年度第二学期（1928年2月）起，初高级小学一律不得再用古语文之教科书或教材。

△　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县七里坪召开黄（安）、麻（城）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

权和革命军队。14日，黄安农民自卫军及农民义勇队等二万余人在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下攻克黄安城，活捉县长贺守忠。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曹学楷为政府主席，制定了《施政纲领》。政府主张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保护商业贸易、建立工农政权、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等。同时，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以潘忠汝为总指挥。

11月4日　　汪精卫、李济深、宋子文、陈公博、李福林、甘乃光、何香凝、陈树人电宁、沪、汉各中委谭延闿、孙科、胡汉民、顾孟馀等，称若谭等坚持在宁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则中央特委会应即取消，最低限度亦应明白宣布停止其职权，并宜于正式会议以前，在广州或上海先开预备会议。

△　蒋介石在日与澁泽荣一子爵会晤，就中日经济提携问题交换意见，历三小时之久。张群、添田寿一、儿主谦次、白岩龙平等均在座。

△　国民政府议决特派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各路军总指挥，负“北伐”、西征责任；并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与临时党务委员会，处理西征军之政务及党务，以程潜、李仲公、王世杰、张肇元、甘介侯为政务委员会委员，程为主席。

△　国民政府第十三次常会决议，以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卢兴原背职越权，擅委推事及其他职员，干涉裁判，将其停职交监察院法办。

△　李济深电令前方各讨唐军同时前进。中央军方鼎英部奉令后立由坪石进攻宜章，右翼军范石生部由城口进攻汝城。唐军因缩短防线，已撤宜章、临武、郴州、资兴、永兴、汝城、桂东各处防军。5日，方鼎英部不费一弹占宜章，范石生部占汝城。8日，方鼎英部占

郴州。

△　直鲁军谢玉田、袁振青等部三万余人围攻彰德，7日占彰德、汤阴、淇县。

11月5日　　下午，蒋介石与日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青山私邸会谈，张群偕往。蒋为反共并建立其统一政权请求日本支持。田中答称："此时从全局观点看，首先解决长江以南问题为当务之急，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人能够实行。""倘若长江以南问题不解决，不久共产党成长起来，暂时摘掉了嫩芽的共产党会重新爆芽生叶。"日本"对贵国共产党的跋扈断难旁观"，"对于反共产主义的你的巩固南方的措施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为此，在国际许可的范围以及日本利权不作其他牺牲的范围内，对你的事业不惜充分的援助"。蒋称：中日"两国的利害是共通的"，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早日完成革命，排除国民的误解，而如果能这样做，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要求日本对中国进行干涉和"援助"。

△　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宣称："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犹之明知到上海后必然分路，不过从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说出来便了。"

△　国民政府公布《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委员会在战事时期秉承国民政府处理湘、鄂两省民政、外交、财政、交通等事务，处理政务则以时机紧迫须急切处理者为限，但仍随时呈报国民政府及该管部；俟两省政府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即行裁撤。

△　国民政府特任张继、邓泽如、黄复生、曾继梧、林翔为监察院委员。

△　浙省农民要求国民党兑现“解放工农”口号，实行减租。省党部曾核定佃六业四，较前减除二成，后农人部更规定照额（即四成）只可七成半收租，违则将田没收。是日，省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本年佃农缴租实施办法》，规定缴租原则为：以正产全收50％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25％缴纳。

11月6日　在宁中委谭延闿等坚持在宁开四中全会，是日复电汪精卫等称，在宁开四次中央执监会议系汪之主张，而宁所赞同，若复变更，转生枝节，“负有其他职务者，未必能远离赴会，设以不足法定人数，致会不能开，转非迅求解决纠纷之初意。弟等以为仍如原议，在宁开会为便”。8日，谭延闿、孙科等又电汪等称，“特委会乃根据沪议成立，同人等数人固不能宣布取消，即停止其职权亦觉非同人等权力所及”，此问题宜待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先开预备会一节，亦极赞成，地点在上海较为适中。

△　武穴刘兴军不战退黄梅，何键军略行抵抗后退广济。唐生智以前线不支，夜乘“永兴”轮到汉口，即向绅商勒索巨款200万元。

△　粤临时军委会决议委黄绍竑为北路总指挥，率部讨唐生智。

△　宁暂编第十一军军长马祥斌前在徐撤退时被直鲁军张敬尧部俘获，屡劝不降，是日在济南被张宗昌处决。

△　阎锡山因无力独当奉军全部势力之压迫，为保全实力计，乃于是日下三路总退却令，北路退雁门，中路退蔚县，南路退井陉。

△　甘肃教育厅决定，将中山学院及公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改办为兰州中山大学。

11月7日　中央特委会依李济深之调停办法，决在四中全会开会以前，特委会暂停职权。同日，南京外交委员会议决，派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张继、居正赴日。9日，特委会正式决定派许考察欧美、日

本党务，张、居为驻日代表。

△　国民政府任朱培德、熊式辉、胡曜、杨赓笙、陈礼江、熊育锡、李尚庸、黄实、王均为江西省政府委员，以杨、黄、陈、李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朱培德为省政府主席。19日，又加任彭程万、伍毓瑞为该省政府委员。

△　宋子文奔走蒋汪合作，汪已允诺，是日，宋自粤启程返沪，称粤宁提携已经成立，拟更为之斡旋，以谋切实之办法。

△　陈绍宽第二舰队进抵武穴，唐军向蕲水、蕲春退却。次日李宗仁第七军追至蕲水，何键第三十五军凭河抵抗。9日，李军猛攻，何军不支，弃蕲春城西溃。11日，陈绍宽率舰不战下蕲春。同日，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由蕲春渡江向鄂城追击。

△　军委会令将驻皖之暂编第十一军马祥斌旧部改编为独立第五师，以刘和鼎为师长。

△　冯玉祥部第五十三师师长王鸿恩以守虞城建奇功，升任第三十七军军长。

△　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中国各地苏联领事馆均举行庆祝，上海、天津发生大队白俄包围攻击苏领馆、掷石、扯旗情事。同日，广州工人在太平戏院举行庆祝会时，被军警围搜，十余人被扣；赴会苏领汽车亦被截搜。奉天白俄皆佩丧章，揭帝俄国旗，吊祭前俄皇。

11月8日　津浦线何应钦第一路各军开始向孙传芳军总攻击。上午，顾祝同第九军第十四师击破孙军第八师崔景桂部，占领红心铺。9日，第二师占明光。10日，第二师进至安子集附近，第二十一师进至王营子附近，第三师进至桥头子附近。孙军第八师及第十三混成旅退集临淮关、凤阳等处。

△　广州取消省港罢工工人权利。是日政治分会、省政府借联合邀宴省港罢工工友代表之名，突在席上宣布解散省港罢工工友会，并称由政府发给各工友津贴，每人百元，内现金六成，金库券四成，童工及家属每人现金10元。10日，广州公安局奉令将罢工工友会解散，开始发给现有罢工工友三万余人遣散津贴，限27日遣散完竣，停给伙食，由公安局接收各宿舍。

△　午后，第一路新编第十军夏斗寅部占领殷家涧、陈家桥（安徽定远北）之线。孙传芳军第十五师及第十六混成旅退据林桥子，隔河对峙。

△　柏文蔚第三十三军奉令攻击怀远，是日以第一师经洛河、新集前进，攻击怀远之正面，以第三师绕攻孙传芳军郑俊彦部之侧背。13日，第三师占怀远，敌向固镇退却。14日，敌由蚌埠增兵反攻，第三师被迫退出怀远。16日拂晓，柏文蔚军第一师到达，与第三师配合进攻，下午再克怀远。18日又占固镇。郑俊彦部向南宿州方向退却。

△　北京军政府阁议通过，中西商约期满后决照前次对中比商约办法宣布废约；中法商约6日期满，决延期两月。

△　华洋义赈会宣布调查山东旱、蝗、兵灾结果：灾区56县，面积24万余方里，占全省十分之六；灾民2100万，占全省人口一半以上。

11月9日　唐生智在汉口召集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弃鄂守湘。长江下游退汉唐军纷转武长路退湘。

△　国民党留沪中央执委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及临委潘云超应汪等电召是日上午到广州，下午汪并约在粤中委陈树人、何香凝、甘乃光、李济深、陈公博等同到葵园开谈话会，讨论在粤恢复中央党部及召集第四次中央会议事，各委以兹事体大，主张详细计议，会议直至深夜无结果而散。

△　中央特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中央各部组织大纲及处理军事区域党务条例；议决派许崇智赴日本、欧美视察党务；决定赣、川、鄂三省党部委员人选；加派潘云超、褚民谊为监察委员。

△　是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在策略上反对退却，要求继续发动工农武装暴动。

△　无锡农民3000余人在共产党人严朴、杭果人等领导下，在安镇等十余村镇起事，手持农具或古式刀枪，所举大旗上书“农民革命军”字样，并张贴“农民暴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田”等标语。无锡公安局为防农军攻城，派警察严密守卫，并由第十三军第一师下乡追捕，农军闻风向江阴、常熟方向撤退。

△　奉军攻涿州不克，拟商和平解决，是日，晋人周望英奉张作霖之命赴涿游说傅作义，被傅所拒。傅称两月后如果援断粮绝，彼当通电下野，或以身殉职。

△　奉军郭希鹏骑兵师占绥远城，次晨前锋至包头。

11月10日　　蒋介石自日乘“长崎丸”返抵上海，即电促汪精卫赴沪晤商党务，并谓欲使党从破裂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举行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不可。汪接蒋电，即在葵园会议席间传阅。各委以蒋对开四中全会既表赞同，此后一切纠纷不难解决，似可不必坚持在粤举行，遂表示同意，即席公推汪精卫、李济深二人为代表，赴沪与宁、沪各中委磋商。

△　汪精卫在广州黄埔军事政治学校演说联蒋，声称当时蒋介石“分共”，并非操之过急，自悔当日之过，以后当与蒋益加团结。

△　何键在兰溪登“九华”舰夜驶汉口，所部第三十五军溃散，自11日至12日陆续抵汉口集合，除沿途死伤逃散者外，全军只足两师之

谱。

△　驻鄂西北鲁涤平、方振武、杨森、李燊等军共组讨唐西路军，是日开始东下，以鲁军为右翼，向钟祥、京山进攻；方、李等军任中路，向德安（今随县、安陆一带）、云梦进攻；樊钟秀军为左翼，向孝感进攻。

△　唐生智令调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第二师吴尚部东下。晚，张师一部过汉下驶兰溪，即被围缴械，张乃退回汉口。

△　沪东华商纱厂罢工扩大，自厚生纱厂罢工后，是日，纬通纱厂与申新纱厂第五工场相继罢工。日陆战队指挥松本大佐以“保护”为名，派兵进驻沪东各日商纱厂。

△　天津海河淤塞，大轮船不能入口，是日北京军政府阁议决定举办海河治标工程，拟自北运河北仓迤北开挖引河一道，与金钟河相会合经北塘入海，并于分流处建操纵机关，俾于必要时得以分泄永定河一部或全部之淤沙水量。

11月上旬　　北京警厅调查内外城四郊户籍，共人口129.7万余人。

△　浙省实行减租，今年田粮收入，业主每亩约得三元，以较上年可收八九元者减去三分之二，各地业主组织产权联合会进行反抗。省党部恐酿成事故，特密令取缔，并发布《劝告全省业主书》，声称：农人生活窘迫，“容易被人煽动，甚至走到暴动那一条路上去”，“我们主张减租，实在为防止祸患”，“目前虽然少收了几斗谷，似乎有点损失，而无形中的收获是不可限量的”。

11月**11**日　　唐生智以蕲春战败，沙市失利，方振武部进逼孝感，省防军不稳，湘南粤军进逼，部将迫其解职，是日深夜召集高级军官紧急会议，决定下野，随发下野通电，乘日轮东渡，所部分向鄂

西、岳阳撤退，武汉秩序由省防军以卫戍副司令贺国光负责维持。

△　唐生智离鄂前，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因劝唐撤退，被唐在其私宅勒毙泄愤。唐离鄂后，张部搜得尸首，大愤，遂纵火焚总司令部。

△　国民政府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系统，决定增设内政部、实业部、农工部。14日，国民政府以明令公布国民政府直辖各机关系统表，除增设内政等三个部外，新增设监察院、最高法院。

△　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比使华洛思与北方军阀磋商，以比庚款发公债事令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向上海比领事抗议，请电北京比使立予拒绝，以重邦交。

△　顾祝同第九军第三师、第十四师与夏斗寅新编第十军与安徽凤阳附近反攻之孙传芳部激战三小时，克凤阳城。次日孙军反攻，陷马鞍山，新十军被迫撤至殷家涧附近，第九军之第三、第十四两师撤至红心铺、黄泥铺一带。

△　津浦线刘峙第一军第二师进攻安徽临淮关，激战一昼夜，次日上午11时占领之。敌第十师郑俊彦部退守淮河北岸。

△　闽南新编军高义、郭凤鸣等部负隅抗命，陈铭枢第十一军与闽海军决定共同讨伐，由海军陆战队进攻惠安，第十一军进攻永春，并由第十一军会同陆战队取泉州。是日起第十一军第十师蔡廷锴部及第二十四师黄质胜部自福州南下，高义闻讯急派安海驻军增防，自率在泉部队入南安。21日，第十一军占泉州。

△　苏联因国民党反共，勒令该党所派留苏研究军事之军官王懋功、贺衷寒等28人回国，是日，王等抵上海。

11月12日　　唐生智部李品仙、何键、刘兴、周斓、叶琪、彭振国等电请国民政府息兵言和，称唐“不忍自相残杀，一再饬属退让，

冀留合作余地，免深党军分裂之痕”，劝宁勿进逼不已，师出无名。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交通部长王伯群、财政部长孙科、司法部长王宠惠由宁到沪，与蒋介石筹商国是。蒋接见记者，宣称“唯党之命令是从”，但无再任总司令意。同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对国民社记者称，蒋汪合作已属可能，胡汉民可望其出山。

△　贺耀组第四十军第一师、第三师协攻蚌埠受挫，何应钦进驻明光指挥。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致西班牙驻京公使嘎利德照会，通知前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十日所订中西《天津条约》及附属专约期满，宣布自11月10日起失效，另与商订平等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新约。14日，嘎利德致外交部备忘录一件，否认北京政府有废止中西条约之权，谓仅得据该约第二十三条修改通商部分，并提抗议。王荫泰认为不能就旧约曲为解释，决置不理。

△　张作霖委投奉之晋军郑泽生为安国军第三十一军军长，宝振荣为该军第一师师长，石杰为第二师师长，满泰为第三十师师长，王英为第三十一师师长。

11月13日　　经程潜与何键、李品仙往来电商结果，是日宁、汉双方一律下停战令，长江下游战事遂告结束。

△　陈绍宽率舰进占鄂城、黄冈，何键第三十五军由水路退岳阳，刘兴第三十六军循武长路退长沙。

△　是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两县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各开会四天，彭湃代表中共中央在两会发表演说。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通过并颁布施政纲领，内容有“没收土地和分田”、“镇压反革命”、“改善工人生活”、“改善士兵生活”、“取消苛杂”等项。

△　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下达进攻蚌埠令。16日，第一路各军

同时向蚌埠实施攻击，下午4时克蚌埠，孙传芳部第十师向淮河北退却。刘峙、贺耀组、夏斗寅各军继续北进。

△　江苏海门县农民数千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抗租，被县署派往弹压之警察格杀三人，捕走九人。

△　香港总督克乃门抵北京，16日出席英、美、法、日、意五国驻京公使会议，讨论剿除华南海盗、保护外国在华商业问题。27日抵沪答记者称：驻北京各国公使已议定《惩治海盗条例》，第一步先用牒文警告南方政府，要求将防止海盗之详细规划答复，如答复不能满意，第二步即将《条例》付之实行。

11月14日　　陈绍宽率舰进占汉口，次日拂晓占武昌。同日，西征军第三路之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先后进抵汉口，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入武昌，程潜第六军占咸宁，陈嘉祐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魏益三第三十军由罗田进驻黄陂，第十一路军方振武部由襄樊进驻孝感。

△　汪精卫在广州武装团体养成所演说“清党”，声称：国民党“保护农工利益”，以“打倒军阀”为对象，与共产党阶级斗争之农工政策，目的既异，取径自歧，故决心“清党”。

△　讨唐西路军鲁涤平部占仙桃镇（属沔阳县）。

△　张发奎被李济深所迫，将第二方面军军权交黄琪翔，赴港准备出洋。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提议外交团，如中国警察查获有“破坏”嫌疑之外人，即予留询姓名、国籍，并通知其所属国使领馆派员认证是否属实，业经使团同意予以充分合作协助。是日，北京国务院密函内务部通知各省转饬各警察机关遵办。

11月15日　　汪精卫、李济深即将去上海出席国民党第四次中央

全体会议预备会，黄绍竑应李之召自南宁赶抵广州，李即将粤省政军要务面嘱其负责办理。同日下午，汪、李离粤赴港，次晨转轮赴沪。粤方向预备会议之提案，经广州政治分会讨论决定：一、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二、恢复中央执监委员会；三、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称唐“背叛党国，阻兵殃民”，已畏罪潜逃，应即饬令陆海各军及各省市政府通令严拿归案惩办。

△　南京各界举行反对日本侵略满蒙大会，到200余团体10万余人。大会通过“请中央党部通令各级党部领导民众共起反日”、“请外交部对日严重抗议，撤退东三省日本驻军、停建六大铁路”、“请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海关不准日货进口”、“请国民政府通令对日实行经济绝交”等提案多件；并决议自11月1日起南京市各商号不准购进日货，16日起南京以内不准再进日货，12月1日起南京市各商号不准再卖日货。会后游行民众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

△　北京外交团会议，讨论华北各省征收货捐及各路增加运费，认为违背条约，并反对组织利商局，推荷领袖公使欧登科向北京军政府外交部交涉取消。

△　国立音乐学院于上月在上海开始筹备，是日开课，27日补行成立礼。

△　北京军政府财政当局以筹措军费为由创办奢侈品税及特种物品税，金银、绸缎、杂货、玩物、木料、茶叶、煤油、布匹等均列入收税物品，是日各行商纷纷集议抵抗，要求豁免或缓办。

11月16日　　蒋介石在上海国民党员欢迎会上演说，声称因汪精卫力促，由日返沪，与汪合作不成问题，必须汪、胡等共同联合，始是真合作，但不赞成排斥西山会议派。

△　晚，黄琪翔召集李福林、朱晖日、薛岳、顾孟馀、陈公博、陈树人、何香凝、王法勤、甘乃光、潘云超、王乐平等及所部各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桂，派队分头将李济深、黄绍竑部队缴械。

△　是日及19日，冯玉祥连电上海孔祥熙，请代恳蒋介石复职。

△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孙科以戒烟药品专卖包商浙江中兴公司、江苏信远公司行贿有据，决定予以撤销，改归该部自行设局办理，并没收其保证金，严办公司代表。

△　陇海线直鲁军褚玉璞右路之刘志陆等部与冯玉祥军刘镇华部在考城以东激战三日后，于是日占考城，刘部退爪营、红庙之线。24日，冯军左路之第三军及第四军由孙良诚指挥，向考城北及定陶迂回攻击，敌退守考城。次日，第三军吉鸿昌、梁冠英两师将刘志陆、潘鸿钧等部五万余人包围，至26日，除一部逸去外，余部全溃散，毙敌军长潘鸿钧，并俘旅长以上军官四名。

△　奉军猛攻涿州，自是日至19日，用炮击及毒瓦斯弹攻城，均被守城傅作义部击退。人民因不明防护方法，死伤甚众。

11月17日　　张（发奎）、黄（琪翔）发动驱逐李济深势力之广州事变。晨，张发奎部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与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等以“护党救国”为号召，声言“打倒新桂系”，“打倒南京特委会”、“打倒西山会议派”，将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临时军委会警卫团、黄绍竑驻新编第四军军部之部队、第七军办事处、陈济棠第十一师及徐景唐第十三师之驻省部队、省防军、黄埔军校工兵团、石井兵工厂、虎门要塞之守卫队等悉予缴械，并包围李济深、陈济棠、黄绍竑之住宅，搜捕黄绍竑未获。双方激战至上午10时即结束，死伤数十人，失踪者百余人。桂系部队匆忙向广西边境撤退。

△　黄绍竑于广州政变前一日得讯潜赴香港，取道海防、河内转

赴梧州，是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要求以反革命之理由逮捕汪精卫。黄认为广州政变系汪离粤前与张（发奎）、黄（琪翔）等共同策划。

△　中共中央通过《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正式作出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要求广东省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贫民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私人战争”。

△　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派代表廖汉瀛到南京军委会洽降。廖称何始终未与唐合作，有数事足证：一、宁军西征，何率部节节撤退，未曾抵抗；二、唐严令死守团风，何未遵从；三、唐向不信任何，曾将其参谋长撤换，易以亲信。

△　国民政府宣布，是日起对武汉方面煤炭、纸、银类输入解禁。

△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成立，院长徐元诰在南京就职。

△　西班牙公使嗄利德访北京军政府外交部长王荫泰，对中国废止中西条约提出第二次抗议照会，内称西班牙政府认为此次中国政府之举动殊乏睦谊，对西必须与修约各国所享受之优待与利益同样待遇，方能允开谈判，并称西政府保留将来一切权利与自由行动。

△　上海重要工人团体因不满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之行动，得国民党市党部支持，于是日借市党部召开援助英美烟公司罢工大会之机，提出另结新团体之紧急动议，一致通过成立“上海工人总会”，脱离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

11月18日　　汪精卫、李济深乘“亚洲皇后号”轮抵沪。汪在船上对各报记者谈称：“对于党内纠纷之解决，务避去激烈手段，而采用和平补救之方法，实为余之根本主张。”并称此来任务为代表在粤中委与宁、沪中委讨论党务、政治、军事解决办法。

△　上午，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上海环龙路宋子文宅会见，交换党务、政务意见，蒋对开四中全会表示赞成。下午，汪在宅对记者谈称，主张恢复中央党部，并称："极愿与蒋先生同时出而为党国努力。"

△　广州政治分会议决，请张发奎加入该会为委员，加派黄琪翔、朱晖日、范石生、方鼎英、陈济棠、冯肇铭为临时军委会委员。以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为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在李济深回粤之前，由张发奎代理军委会主席职务。同时议决褫夺黄绍竑军职，开除党籍，通缉究办。

△　张发奎、黄琪翔联名分电汪精卫、李济深报告粤变经过，称汪、李（济深）删（15日）夜启程，而黄（绍竑）已密令北江所属部队移动向第五军包围缴械，"为形势所迫，已奋起驱除，黄本人先时免脱外，其余在广州市之部队已一律缴械，并拟于最短期内肃清北江"，请汪、李会议事毕即回粤坐镇。

△　国民党在粤中委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李福林、潘云超电沪汪精卫并转谭延闿及中央、各省，称黄绍竑企图延长非法特委会生命，阴阻第四次执监全体会议，擅调第七军集中西、北两江，复挑拨粤中部队自相猜忌，深恐黄等此举足以助长"特委"，危害中央，破坏革命，延长私斗，临时军委会诸委员以时机迫切，爰于筱日（17日）举行"护党运动"，分别解散反侧部队，中央在粤同志承认此举为当然处置，并候呈四次执监全体大会加黄以处分。28日，黄绍竑具呈上海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各中委，对何香凝等电报所指各点进行声辩，要求主持公道，"加以相当之纠正"，并严重处分发动广州政变之陈公博、李福林、黄琪翔、薛岳等。

△　黄琪翔派李汉魂、缪培南两师自广州赴英德袭击范石生军，范部驻英德乐村一师入湛江口，同日，李福林第五军前锋占三水，黄绍竑军翁师退守高要。

△　黄绍竑令北江第七军“剿平粤乱”。

△　国民政府公布《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凡12条。

△　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进驻蚌埠，令主力集结临淮关、蚌埠、怀远一带整理补充，准备进攻徐州。

△　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下旬，建立湘赣边第一个革命政权茶陵县苏维埃政府，谭震林被选为政府主席。

△　苏州铁机工潮解决，是日苏州铁机丝织公会与苏州铁机工人联合会订立协定，条件为取消入厂保证金，增加工资，厂方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滥罚工资等。

11月19日　　汪精卫、李济深与蒋介石、谭延闿在上海晤谈，汪提出粤方中委关于“宁汉沪合作”之提案。

△　国民政府财政部为适应军事进展，整理财政，特设财政设计委员会，是日该会在南京成立。

△　国民政府特任潘云超、褚民谊为监察院委员。

△　前广西黄埔军校分校校长兼农工厅长俞作柏应黄琪翔召，到广州商量对付黄绍竑西、北江军事及收编桂军计划。俞在临时军委会席上报告收拾桂局计划。

△　柏文蔚第三十三军第二、第三两师，会同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及王金韬独立第一师克蒙城、涡阳，孙传芳军北遁。

△　奉晋开战以来，北京学生、工人以共产党案被军警捕去约百名。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18名被张作霖之军警办事处秘密杀害。是日，北京军警办事处令将在押嫌疑者70余名分批具结开释。

△　上海市公安局奉淞沪卫戍司令部令，严禁《群众》旬刊发行，并究办其印刷机关。

△　北京军政府阁议议决，出口华茶豁免关税，并减收内地厘税五成案，再展期一年。

11月20日　　下午，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全市党员大会，蔡元培报告《特委会之经过及宁沪汉合作之始末》。当宣读《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提案时，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一跃上桌，大数特委会不应存在之理由。市党部立将黄杰及该校其他三名学生左元白、曹明化、逄化文逮捕，拘于市党部。

△　在粤国民党中委何香凝、顾孟馀、陈公博等联电汪精卫、李济深、蒋介石，请赞成设中央执监委员会办公处于广州。

△　粤变发生后，汪精卫颇受各方指责，是日，汪在沪往访胡汉民，胡称病拒见。

△　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筹备委员及专门委员谌湛溪、曾昭抡、吴涧东、蔡元培、李石曾、周鲠生、王世杰、彭学沛、张乃燕、张奚若、杨杏佛等30人参加。通过《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研究院院长，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并推定各所常务筹备员。

△　南京各界妇女2000余人开联欢大会，通过废除多妻制、扩大废娼运动、废除蓄婢制等案。

△　日、鲜人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荒地种植水稻，获利颇丰，是日张焕相等组惠民公司，雇直鲁难民仿行。

11月21日　　中央党务学校学生数百人捣毁南京市党部，将“中国国民党南京市执行委员会”长牌击毁，满贴“打倒中央特别委员

会”、“打倒国民政府”、“打倒军事委员会”等标语，并高呼“打倒南京特别市党部”口号。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电驻美公使施肇基，略称：19日美京路透电称华盛顿召集会议，讨论远东经济问题，倘美国果系贷款日本，即无异使日本假美国财力以侵我满蒙，希迅向美政府切实解释，设法消弭。次日，施复电称：南满铁路公司借款事美外部尚未决定办法，闻该借款系为偿还到期借款及推广路务之用。同日，北京外部电驻日公使汪荣宝设法密探并向驻日美使面询究竟。

△　黄琪翔在广州临时军委会报告军事，称新编第二师薛岳部已克韶关，范石生、方鼎英事先有联络，表示服从；西江方面，冯肇铭已与“护党军”联络，舰队均从军委会令；黄绍竑兵力有限，尽调桂军不过三师。

△　唐生智部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已退湖南，是日，军长李品仙、何键、刘兴及各师长并省主席周斓在长沙举行重要会议，决定：一、暂时保境休养，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二、在长沙设第四集团军办事处，推定李品仙等七人为委员；三、支配防地，第八军驻湘中，第三十五军驻湘东，第三十六军驻湘南；四、推张开琏代理财政厅长，月筹军费70万元，并设财务委员会，推周斓等21人为委员。

△　宁西征军第七军夏威部两个师及第四十四军叶开鑫一部迫近岳阳，与李品仙部一度小接触，李部向汉寿、常德、桃源退却。23日，西征军入岳阳。同日，宁舰队向城陵矶、岳阳进迫，与敌舰激战，至25日敌降，宁舰队奉命停止军事行动。

△　浙省当局以“谋危党部政府罪”，在杭州大捕学生。是日，省政府致函第三中山大学，请缉学生，计150余人。

△　郑毓秀继张知本任上海法政大学校长。

11月22日　南京各界举行讨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通过“打倒西山会议派”、“取消特别委员会”等议案。会上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训育主任）谷正纲演说，大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台下党务学校学生应声而和。会后游行，以党务学校学生居前列，行至复成桥，军警开枪，死二人，伤75人，酿成“一一二二”惨案。

△　张发奎决定进攻梧州，是日派黄琪翔、李福林指挥各军沿西江前进。27日，李福林入湘部队回师抵韶关，次日开赴西江。

△　苏（州）常（州）旅沪学商分会讨论日本以“满铁”名义向美国摩根公司借款一案，佥以南满铁道系在我国领土之内，应坚决反对其侵犯我国主权，决定电请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务卿凯洛格声明我国国民一致反对之意，请顾全两国友谊，勿使此项借款实现。

11月23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各国发表对外条约与协定宣言，略称：中国前政府与外国政府、公司及个人所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及协定，实无存在之理由，应于最短期间内废止。业经期满之条约及合同，当然无效。任何中国官吏拟与任何外国政府、公司或个人订立任何条约或协定，凡未经国民政府参与或承认者，完全无效。凡国民政府未参与之中外条约或协定，均不能认为对中国有约束力。

△　驻上海比领事范豪特函复交涉公署11日之抗议书，声明中比条约会议及庚款会议等并非事实，500万美金公债比政府并无允意，惟北京政府曾拟预提全部比庚款，照1925年约定，拨作购买铁路材料、教育用途及慈善事业等，并拟先提110万元备还外债、付通行税及中国驻比使馆费用者，比政府或拟允准之。

△　李济深在沪对各报记者谈称，粤变“纯系共产党支配一般骄将悍卒与失意政客，乘机作乱，夺取政权之表现”。次日，李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伐发动粤变之张发奎、黄琪翔。

△　白崇禧自南京抵汉口，与李宗仁商应付广州事变方法。

△　国民政府任命何民魂兼南京特别市市长；张定璠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　国民政府任命杜起云为第十七军副军长；邓振铨为第十七军第二师师长兼该军参谋长。

△　何应钦第一路军第二十六军陈焯部主力到达众兴，27日占宿迁。29日，沐阳、刘马庄、新店子之直鲁军反攻，左翼战斗亦失利，第二十六军退出宿迁。30日，直鲁军第七军许琨部复占宿迁。

△　国民政府核定大学院制定之《教科书审查条例》，规定中、小学教科书，非经大学院审定者，不得发行或采用。

△　华盛顿国际无线电会议，北京出席该会代表王景春等，反对日本根据现行无线电报公约，将旅大等作为该国属地，而增加设台投票权，坚持一国一票，将该公约第十二款依各国属地多寡而定票数之规定取消。

11月24日　　谭延闿、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联名在上海召集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谈话会，到中央执监委员23人。胡汉民、李烈钧未出席。决定下月3日至5日在上海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并邀未列席谈话会之中委如期莅会。上海市区各党部、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南京市区各党部等派代表向与会各委员请愿，其要点为：一、促开中央全体会议；二、拥护汪、蒋及中央各委团结；三、肃清腐化的西山会议派；四、请蒋调解粤事纠纷；五、惩办南京惨案主谋。会议议决，公推谭延闿、蔡元培即日查办南京惨案。蒋介石就此事发言，称此案如何处理，为革命生死问题，不能坐视，如无正当办法，虽诉之革命手段，亦所不惜。

△　南京各界组成“一一二二”惨案后援会，参加单位有南京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学联等。是日该会派代表五人到沪，向四中全会谈话会陈述惨案经过，要求缉凶，指西山会议派之特别委员邹鲁、

居正、谢持、覃振、傅汝霖、潘宜之、王昆仑等人为该案之主使者。27日，该会发行《救党特刊》，宣传打倒特别委员会，内列“潘宜之屠杀民众之铁证”一栏，称系潘下“市民暴动着武力解决”之手谕。

△　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西班牙驻法国公使德佩里蒂·德拉罗科，声明1864年10月10日所订中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条约期满作废。

△　国民政府交通部在上海设立监督招商局办公处，由部长王伯群兼任监督，赵铁桥充任总办。

△　程潜、李宗仁派袁家普、廖汉瀛赴湘接洽和平，是日抵长沙，与李品仙等晤谈，李表示服从。27日，李品仙、何键等派代表曹伯闻偕袁家普等到汉，与程、李等商和平解决办法。

△　李烈钧接见《新闻报》记者，称粤变不致影响大局，湘局大致底定，政府已决定抽调“西征军”七万以上，分两路加入“北伐”，并称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事实情理所不易办到，惟见解不同，应推诚谦和商洽。

△　据《新闻报》讯：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训令各地严密防范缉获共产党。嗣在绍兴破坏共产党机关，搜去浙江全省共产党员1300余人之总名册，其中大部分为青年学生，142名已被捕。

△　省港罢工工人百余在广州露天集会，反抗政府解散罢工工人组织，遍插红旗，并散发反抗政府传单，工人邱生等25人被公安局当场捕去。26日，广州当局派大队军警驱散省港罢工工人，将全市罢工工人之宿舍、饭堂取消；公安局并于28日将八名工人枪杀。

11月25日　　汪精卫在沪招待记者，声称广州事变之起因，并非由于对共产党问题，乃是由于对特委会之态度不同。黄绍竑遵照特委会决议主张率两广军队讨唐，张发奎、黄琪翔则认为西征纵有必要，

但不能奉特委会之命而西征，以增加特委会之声势，由意见之冲突而形成武力之冲突。并称渠对此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

△　国民政府会议，讨论谢持、邹鲁等对南京事件之提案，谭延闿主持，谢、邹力主拿办凶犯及煽乱之人。谭称：“若单纯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此事发动，由上海有人主持，实党内之争，为人所乘，拿捕愈加纠纷。”

△　何香凝由广州抵上海，晤记者表示，粤方各中委坚决反对特委会，称特委会之产生，无法律根据，特委会因名不正，故令不行。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凡11条。

△　国民政府任命黄质胜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徐庭瑶为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　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部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致驻华西班牙公使嘎利德节略，深以西所持态度为异，称以往西政府照会，曾承认中国可宣告废止税则商务条款，望西政府速议新约，使两国邦交立于公正平允之基础。

△　日本因南满铁路会社向美借款关系，对日美两国间悬案之中国无线电台交涉表示退让，是日由驻美日使松平与美国务卿凯洛格达成协定，日本对上海费德拉尔无线电台，美国对北京双桥无线电台，互认其优先权。

△　共产党人方志敏在江西弋阳窖头村主持召开弋阳、横峰等五县共产党员联席会议，通过“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的武装起义

纲领。12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阳）横（峰）暴动，暴动区域纵横遍及百余里，参加暴动农民五万余人。后建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1月26日　国民党上海市各区党部联席会议议决，援助南京“一一二二”惨案，决定电述特别委员会屡杀民众之错误，请谭延闿、蔡元培严惩主犯，并决定对最近时局之口号为：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打倒假革命的腐化派、肃清腐化分子、惩办“一一二二”惨案祸首、促开中央全体会议、杀尽中国共产党等。

△　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建立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担任总指挥。28日，总指挥部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动员广州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为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并把原来以行业为单位分散组织的“工人自救部”、“剑仔队”和“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工人秘密武装3000余人改编为统一的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周文雍为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　蒋介石往访上海法租界捕房顾问黄金荣，道谢派探目保护国民党中委，并请转向捕房当局致意。杜月笙、张啸林亦在黄宅与蒋会晤。

△　陇海路冯玉祥军右路鹿钟麟部击破张敬尧等军，占睢县，27日收复归德，12月1日入虞城；同时，中路韩复榘、石友三两军大破直鲁军褚玉璞等部，到达砀山之线。

△　梧州桂军誓师东下，禄步有小战，四会有剧战。

11月27日　湖北党务整理委员会在汉口成立，28日通电声明：省市党部改组委员在法理上无存在理由，本会以整理职权所在，当切实奉行中央意志。

△　程潜、李宗仁、陈嘉祐自湖北电汪精卫等，称湖北省市两党部对南京发表之湖北整理党务委员力持反对，请饬令该委员会停止活动；并称该委员等张贴“反特委会即是反革命”、“否认整理党务委员即是共产党”等标语。28日，汪复电极表赞同，称取消特委会恢复中央党部实全体中央执监委员之一致主张，特委会本身既无存在价值，则其产生之整理党务委员会实不能“听其佾张为幻，贻害地方”。

△　新编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在汕头就代理第八路总指挥职。29日，陈在汕誓师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即赴潮州阅兵，出发前方督师。

△　上海各报载南京惨案代表招待各界报告，称潘宜之为西山会议派首领，主使惨杀民众。是日潘电上海各报馆声明称：“为人诬陷，蒙此恶名，冤愤何极，所称下令惨杀民众一节，更属离奇怪诞。”12月3日，潘又在沪报刊登启事，要求“将伪造证据蓄意诬陷之徒宣布姓名”，俾诉诸法律。

△　私立金陵大学系由1888年美“美以美会”傅罗在南京创设之汇文书院改组而成，今春北伐军到达南京后，该校师生即进行收回教育权运动，西籍教职员陆续离校。是日成立新校董会，正式推举陈裕光为校长，从此该校行政由华人主持。

11月28日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蔡元培、谭延闿、李烈钧等就南京事件下令引咎，谓政府“因一时保护之疏，酿成从来所无之变”，除再严饬军事委员会、司法部依法究办，并抚恤疗伤外，军警及司法官吏以后对于保障人权，“务须特加注意，毋稍疏忽”。

△　中央党务学校学生200余人舁南京惨案伤亡民众血衣及该校学生袁大煦遗体游行，李烈钧亲出表示引咎，允严办主使。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并以“待罪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身份发表声明：“这惨案的负责者之罪”“自然是政府，尤其是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

员。”表示“决不愿有意的推诿”。

△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政府，为尊重司法独立，所有现职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及其他官吏。

△　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依广州市党部之请愿，决定逮捕并严惩李济深、黄绍竑。

△　张发奎通电否认有容共及联络陈炯明之事，自称其广州事变之行动为“护党”，表明反对特委会而服从中央。

△　驻广东江门陈章甫第十三师发出讨黄琪翔急电。粤临时军委会下令拿办陈章甫。

△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在四川万县将吴佩孚之卫队800余人解除武装，请吴夫妇至杨氏私邸居住，并派兵两连监视。是晚吴乘间逸去，逃至绥定，往依刘存厚。

△　上海英美电车公司机务工人600余人，因向公司提出改良待遇及增加薪水等条件不准，于是日下午1时起全体宣告罢工。后迭经交涉，公司方面允加年赏20%，罢工期内工资照给，大部工人遂于12月22日复工。

△　武昌震寰纱厂因开除剪发女工激起风潮，中山大学女生往该厂演说，被驻厂军警击毙一人，伤二人。男生赶往援救，亦被围捕多人。次日，市学生联合会议决援助被捕学生及开除女工，大中学生500余人列队往厂质问，并捕该厂工会改组委员五人。保安队驰至，捕学生数名，余众至晚始散去。

△　北京军政府交通部密派邮务司长顾宗林及秘书康诰前赴大连与南方邮务总局所派代表黄乃枢及钱春祺等，作成细目协定，由北京

交通部统一其事务上之联络，双方议定自明年1月1日起实行。

11月29日　　西山会议派谢持、张继、居正、许崇智、邹鲁、傅汝霖发表《告同志书》，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声称中央特别委员会之产生，系由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之正式决议，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外，断不能以一方之意思变动。一方之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欲凌驾三方成立之中央特别委员会，无一毫容许之理由。

△　李宗仁、程潜、陈嘉祐通电表示对四中全会意见：一、四中全会开会时，中央特委会可停止行使职权；二、特委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军委会及一切军事行政机关，均暂维现状，不随特委会而取消；三、限制个人及一个系统代表党的行动发表宣言。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据临时军委会呈称，截获李济深令陈济棠回师广州电，决定褫李军职。

△　湖北党务整理委员会将湖北省、汉口市党部解散，并代行其职权，所有该两党部职员由该会委员二人以上介绍，可仍到会办公。

△　白崇禧等通电对南京惨案表示悲愤，要求政府彻底查明真相，予以惩处。

△　杨宇霆在北京晤外报记者，声明美贷日款开发满蒙，奉方反对；日美两国所议解决无线电台协定，中国不能予以承认；葫芦岛开港及打通路建筑，并无英国投资，至满蒙交涉，上次停顿，迄未续议，外间所传，系日人故意宣传。

△　日外务省出渊次官与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在日外务省会谈三井公司及费德理公司在华设无线电台问题，成立原则协定：一、日美两国政府承认将在华无线电信归中国经营；二、日本将三井公司依据双桥无线电局借款合同取得之权利返还中国，美国亦将上海费德理公司依合同所得之权利返还中国；三、三井、费德理在华所设无线电台建

设费作为日美对华贷款，另换合同；四、两电台返还中国后，各配置日美两国技师及会计监督。

△　国民党中央商人部通令，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请求撤销全国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机关之议案，致杭、汉等地有提议撤销商会之举，是日，上海总商会分电国民政府、各省政府、省党部等请纠正民众此项错误行动。

11月30日　　上海市党部为南京惨案发表宣言，提出要求四项：一、由谭、蔡两委员秉公查明主从各犯，尽法惩治；二、从优抚恤被难家属；三、取消中央特别委员会，肃清腐化分子；四、由国民政府引咎自劾，以谢国人。

△　驻华日使芳泽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发表反驳杨宇霆之谈话，称杨向外报记者对满洲问题之谈话于中日间关系有害，且其内容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日本对于本国之商业交易，无论何处皆可自由进行，非第三者所能置喙，并责杨不顾国交。同日，芳泽口头要求杨宇霆将其谈话中不符事实之点，予以更正。

△　上海英美烟厂工友罢工后援会成立以来，一方筹款救济工友，一方劝告民众对该厂出产之卷烟实行不吸、不贩、不运，一致抵制。是日该会又议决自12月1日起实行检查，如再遇仇货，立即扣留，当场焚毁。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电驻美公使施肇基，称美国贷款南满铁路公司，有侵略中国满蒙主权嫌疑，不能承认，应向美政府抗议。同日，另电驻日公使汪荣宝，嘱探询条件内容，俾资应付。

11月下旬　　全国商会联合会致电驻美公使施肇基，请转告美国务卿，国人反对美国借款资助日本对我满蒙实行侵略。

12月

12月1日　程潜据汪精卫上月28日电，咨达鄂党务整委会停止活动，由原有各党部维持现状。是日整委会咨文驳复，谓附唐分子以不足法定人数所把持之省、市两党部，自应随唐而覆灭，“敝会奉特委会命令而来，亦当奉特委会命令而去”，纵环境如何险恶，亦不易其初衷，并指责程“以军治党”。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改委会、汉口特别市党部改委会联衔电汪精卫、谭延闿，称湖北党务整委会收买流氓地痞捣毁省党部，用暴力占据市党部、民国日报社、楚光日报社，任意拘捕党员，请明示办法，以解党危。4日，汪、谭电汉口程潜等查核办理。

△　广州开“护党”运动大会，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均出席，通过请中执监委到粤开四中全会等提案。

△　国民政府参事谢荫粹、陈扬镳奉派办理南京惨案，是日赴惨案后援会调查。后援会要求：一、逮捕并严惩凶手；二、抚恤死伤；三、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四、保障民众集会自由。

△　国民政府颁布《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规定特种刑事法庭分地方、中央两级，专司审判关于“反革命”之诉讼及上诉案件。

△　冯玉祥电沪劝蒋介石“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同日，又电汪精卫，盼“出山主持，团结内部”。

△　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电国民政府辞职。

△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沪结婚，蔡元培证婚。蒋撰文《我们的今日》，称“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

△　杨宇霆对记者发表谈话，声明山本条太郎来北京对满蒙修路等事，仅口头上略有陈述，张大元帅谓将来自有协商之日，现非其时。山本非日本政府外交特派员或外交当局，自无投递觉书义务。并

称渠前之谈片中，言日将以摩根借款充政治用途，仅感想或将如此耳，渠为日相田中之好友，无意抨击之。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电美国国务卿凯洛格阻止南满铁路在美借款，内称南满铁路并非仅一实业企业，乃外人统治中国之武器与象征。5日，伍就此事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南满铁路乃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及行政上管理满蒙之工具，美国政府贷款不啻积极赞助日本在满蒙之政治经济侵略，甚望阻止其成立。

△　驻汉口英领事波特函交涉员甘介侯，否认欲以军队恢复英租界之传说，称："迩来敝国以值此多事之秋，在汉口及其他口岸派有军舰，尽保护之责，一旦秩序恢复，敝国必撤退所派军舰。"

△　国民政府外交部令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函沪英、丹领事转北京该两国公使，对北京电政当局向英、丹两公司秘密商借巨款，延长电信合同事提出抗议，声明以后电信事宜只可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商榷，其他任何方面所订条约概不承认。

△　驻国际联盟代表陈箓致电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称，中国任行政院主席事，英国《泰晤士报》攻击甚烈，国联正副秘书长态度冷淡，表示不合作，鉴此拟援例推延下届，免生枝节。旋北京外交部电复陈箓，称波兰与立陶宛两国问题关系欧洲和平，此次行政院主席能推延至下届，可免负重责。5日，国联行政院主席仍归中国，由陈篆正式就职。

△　东省特区教育厅与苏联成立《学务协定》五条，规定路立教育苏联子弟各校之管理及教授，应照中国现行学制及地方法令办理，中东路局学务处裁撤，中国收回该路教育权。

△　鲁商民反对当局强征煤炭军事特别捐，煤矿煤炭业者及商民间已成立三角同盟，博山、淄川地方进而成立中日双方不载运煤炭同盟，煤矿主亦组不开采同盟，截至是日止，华矿十分之七停止开采，

日矿亦即日停工。

12月2日　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令称张、黄在粤谋变，罪应褫职拿办，即由军委会迅派军队分道进剿。

△　国民党粤方中委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潘云超到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是日对《时事新报》记者谈，坚决主张取消中央特别委员会，否则不出席四中全会，并辩明张发奎非共产党，此次粤变系因对南京特委会见解不同，致生冲突。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通过讨伐陈济棠令。

△　《新闻报》记者访问陈树人，询及粤变原因，陈称有二：一由于张发奎之反对特别委员会，一由于黄绍竑之压迫张发奎军队。

△　西江桂军黄旭初师在悦城（位于广东德庆县东）、禄步间与粤军缪培南师激战。粤军因有军舰掩护，前锋已入德庆，黄旭初师向封川、梧州急退。同日，四会方面范石生部经俞作柏师猛击，大部退广宁。

△　陇海路冯玉祥军第六军韩复榘部进占黄口，郑大章骑兵军进占徐州城西之卧牛山。3日，第六军直薄徐州城下，占领徐州北站，围攻城垣；鹿钟麟部克萧县，向徐州挺进。4日，直鲁军调集援军猛烈反攻，西北军第五、第六两军及鹿钟麟部撤退至李庄、黄口之线扼守。5日，冯玉祥又增大军围攻徐州，血战两昼夜，直鲁军得孙传芳军由皖回援，至7日将冯军击退，直鲁军、孙军师、旅、团、营长共伤亡50余名。

△　湘鄂临时政委会于汉口成立，以程潜、张知本、甘介侯、白志鲲、赵世瑄为委员，程潜为主席，自是鄂省政权移于湘鄂临时政委会之手。3日，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电宁，力保张知本为鄂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党务亦请责成张负责。

△　程潜据汪精卫俭（28日）电意旨，分令武汉卫戍司令部、公安局保护省、市党部改委会。同日，汉口市党部改委会接收市党部、总工会及《民国日报》、《楚光日报》。次日，两报照常出版，《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声明“在反动派占据本报数日中所发言论，自三六四号起至三六六号止，本报一概否认”。

△　冯玉祥致电阎锡山，约其联名通电拥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愿听其指挥以完成“北伐”。

12月3日　　宁、粤两方国民党中执监委在沪开谈话会，到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李济深、何香凝、李宗仁、张静江等29人，以已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蔡元培主席。会议对特别委员会之存废及处置粤变方针均有辩论。何香凝对南京对粤下讨伐令甚为不满，希望不用干戈，由四中全会解决。李济深对粤主战。汪精卫以张发奎、黄琪翔已有函表示服从四中全会，主张不用武力尽可解决。讨论良久，一致主张在四中全会解决。各委对取消中央特别委员会一节，皆无异议。会议议决南京惨案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对该案被指控之谢持、邹鲁、居正、傅汝霖、王昆仑、高方、葛建时、潘宜之、覃振、任西萍10人即行停职监视。

△　午后，有自称“民众”者多人拥入汉口市党部，驱逐改组委员会人员，并拘捕数人，欢迎整理党务委员进驻党部恢复工作，同时并接收总工会。惟《民国》、《楚光》两报截至是晚止，尚在改委会手中。

△　晚，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宣布全市戒严，禁止游行集会。5日，复奉南京军委会电令禁止党部及人民团体活动，并令《民国日报》暂行停刊，静候四次执监会议解决。

△　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直辖之武汉临时财政整理委员会成立，推白志鲲、甘介侯、黄肇基为常委，负责接管鄂境内中央及地方各项

财政事宜。

△　前唐生智之第三十军彭振国部驻花园、孝感第一、第三两师由方振武收编，驻刘家庙第二师由叶开鑫收编，军官给资遣散。

△　国民政府令照陆军上将阵亡例优恤新委第八军故军长张国威，宣称张“去逆效顺，尽瘁党国，此次西征之役，牵制逆军，因以被害”。

△　国民政府令任魏道明为司法部次长。

12月4日　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汪精卫主席，议决四项：一、特委会在中央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开预备会议时，军政重要事项应由国府军委随时先与预备会议协商；二、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应照党章组织，常委九人在全体会议中全部改选；三、中央党部各部组织案交审查，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四、湖北党务纠纷案电程潜等核办。

△　上海举行援助南京惨案市民大会，到各级党部等200余团体5000余人，由南京各界惨案后援会代表谷正纲报告惨案经过，大会通过拥护中央全体会议、根本取消特别委员会、粤事应由中央全体会议解决、严办惨案首从各犯、制止徐谦活动、请中央开除徐谦党籍等提案。

△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召集第四军教导团200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秘密开会，宣布广州武装起义的决定。

△　孙传芳以第十五师师长宋福田在蚌埠战役中，“作战不力，擅自退却，并煽惑全师逃亡”，是日在济南将宋枪决。

12月5日　四中全会三次预备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流会，宁派、桂派委员谭延闿、李济深、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何应钦、孙科、

张静江、伍朝枢、吴铁城相约不出席，在南园李济深寓会商对粤。6日，谭延闿等10中委续开谈话会，决对粤讨伐，并拟迫与粤变有关之何香凝等九委退出预备会，交监察委员会查办。三次预备会再延期一天。时隐寓在沪之徐谦，致函预备会议质问不使参加之理由，并攻讦汪历来袒共之事实。

△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蔡元培、谭延闿、李烈钧三人发表《一一二二惨案宣言》，自称为“待罪委员”，表示对惨案之牺牲者，比“五卅”与“三一八”两案的牺牲者加倍的悲痛，要负责办理此案，对将来保障人权的手续要严密规定。

△　谢持、邹鲁、居正等向国民政府会议提出对南京惨案之提案。略谓“一一二二”惨案，曾于23日、25日两次提请政府讨论究办，迄今未得主使与应负责任者，而别有用心者遂“诬指邹鲁、覃振、居正、谢持四人等为主使，其他同志某某等为实施，奔走呼号，传单标语应有尽有，大有造成积非成是之势，推彼辈用心，无非志在扩大范围，破坏党国大计”，要求即付讨论，令催办理此案各机关迅速办理。

△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与日斯巴尼亚国未订新约前临时办法》七条，要点为保护在华西侨，西侨须服从中国法律，讼事照无约国办理，西货按无约国税率纳税等。

△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有奖公债条例》，定额500万元，用作补助国库，指拨教育、储蓄银行基金及兴办实业。此项公债前两年定为月息一分，即以两年利息全数拨充奖金，两年以后每三个月抽签偿还本金一次，两年内分八次偿还，不另给息。

△　第十一军由闽回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李济深任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节制钱大钧、陈济棠两部，会同西路黄绍竑、南路徐景棠，合攻广州。

△　厦门国民党市党部暨民众团体联席会议电国民政府，请通缉参预粤变之顾孟馀、陈公博等。

△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奉令调第一师岳盛宣部、第三师谈经国部及第二师第五团往当涂、宣城、芜湖一带，堵截入皖之王天培旧部第十军；第二路总指挥白崇禧亦派大队在浙边防堵，以防该军自皖入赣去粤。次日，第十军被陈调元部包围于芜湖、当涂之间。11日，第十军表示服从，军委会令杨胜治所率一部归何应钦指挥，调津浦路前线。

△　第十二军任应岐部一个师袭击黄安县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牺牲，鄂东军撤出黄安城，29日转移至黄陂县木兰山地区，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

△　四川省立各校因经费无着，全体罢课。省署政务厅是日召集各校长、教职员会议，教育厅长万克明因拒绝学联会代表列席被殴。

△　上海中外纱厂，计华商25家，英商四家，日商32家，为统一对付工人罢工，于是日成立上海纱厂业联合委员会。

△　奉军将领张学良、韩麟春自保定急电北京国务院总理潘复请免奢侈品特捐，谓此捐众怨沸腾，“倘竟因此而酿成市变，非惟贻讥笑于友邦，抑亦留污点于史册”。

△　直隶省钞停止兑现，各征收机关一律征收现洋，省署政务厅决定市面流通可由总商会或银钱业自由规定行市，互相授受。6日，省署因总商会副会长王君直等与省署政务厅长交涉结果，准搭放省钞二成，完纳捐税，收回省钞即行销废，不再发行。

△　美商信济银行在哈尔滨成立，资本美金10万元，专营商业银行业务。

12月6日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致电四中全会预备会，谓政治分会已命张发奎、黄琪翔等停止军事行动，惟广西桂军纷纷东下，陈济棠、徐景唐两师据地截留税款；并谓第十一军由闽向东江移动，如为个人行动，政分会只有命临时军委会移师讨伐。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议决：胪列李济深罪状，呈四次执监会议处分，执监会未开前，先免李职；改组广东省政府，实业厅归并建设厅，裁撤土地厅；任何香凝、朱兆莘、李朗如、陈公博、李章达、许崇清、陈树人、谢婴白、邹敏初、朱晖日、余湛恺为广东省府委员，以李章达兼民政厅长；准张发奎辞政治分会委员职。

△　谢持、许崇智、居正、邹鲁、傅汝霖联名发表《再告同志书》，详述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之经过，尤注重汪精卫等与特别委员会之关系，声称："中央特别委员会之成立，虽由沪、宁、汉三方之合并，但南京及武汉清党，乃由汉沪合作之议进为宁汉合作之议，清党之后，最初只有宁沪合作之议，终至于逼宁汉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

△　王昆仑以宁案被控10人中列有其名，特致电吴敬恒、胡汉民、蒋介石、李济深等辩诬，略称："仑任职中央组织部委员，甚少与南京任何民众团体接触，当场军警，亦迄未知是何部属，仑更以何资格能指挥军警，不知指控者何所据而指仑为主使"，要求彻底查究。

△　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电汪精卫、蒋介石，反对南京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同日，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等电汪蒋，表示服从四次执监会及中央党部，反对特委会及该会所产生之机关。

△　李品仙、何键、刘兴、周斓等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一、第四集团军对外态度一致，分为两路，第一路属李品仙指挥，第二路归何键节制；二、联络程潜及鄂省改进会派（主要负责人为孔

庚、李书城、邓希禹等）实行湘鄂联防；三、结合粤军，拒绝桂军假道；四、长沙以南，常德以东，决不许他军侵入。

12月7日　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是日复延会。宁方委员谭延闿等邀非粤派委员21人在沪南园晚餐，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未到。席间吴敬恒发言，主张中央特别委员会自动宣布取消。次由谭延闿报告连日南园会议经过。孙科提出停止粤派委员出席案。李济深、李宗仁认为粤变与共党有关，主张竭全力解决，词甚激烈。于右任、柏文蔚意主调停，劝勿分裂。多数意见主张：一、粤方委员应自动退出中央执监会议议席；二、执监会议开会地点须在南京；三、粤事决以武力解决；四、粤方委员退出议席后，应请胡汉民、程潜、陈嘉祐、萧佛成迅速出席。

△　朝鲜亲日分子借口吉林取缔鲜人煽动排华，居住朝鲜南部华侨陆续撤退，经由仁川归国，其数达三四千人。14日，仁川突有十二三人一团之朝鲜人十余团，随处殴打卖菜之华人，受伤者数十人，日警并未制止。15日，暴徒啸聚数达千人，进击仁川外里华人住所，无一家不受其害，华侨受重伤者六七十名，轻伤者百数十名。16日，中国驻仁川领事分馆与商务总会商妥，将华侨集中收容避难。

△　广州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到代表80余人，选出工农兵代表执行委员会名单，决定12月13日举行武装起义。后因事泄，张发奎有解除教导团武装之说，乃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至11日。

△　国民政府明令组织“一一二二”惨案特别法庭，以党部代表二人、江宁法院院长、军委会军法处长、江苏省府代表一人、南京市府代表一人、工农商学妇五团体代表各一人，共11人组成。

△　湖北党务整理委员会通告，派柴晓泉等接收鄂省党部，郭英等接收武昌市党部，周济之等接收省农协会，李鹧升等接收省商协会，田逸生等接收省店员总会，毛道生等接收汉口市店员总会，王承

绪等接收汉口市学联会，各接收人员限是午到会接收。

△　何应钦离沪赴津浦路前线指挥攻徐军事。12日，何令津浦路各军向徐州总攻。

△　奉方派代表周望瑛等入涿州，与傅作义洽和。9日，傅作义正式提出开城条件，较重要者有三：一、围城奉军于谈判条件签字后六小时内退至距城十里以外；二、准许城内晋军携带武器退往山西境内，沿途奉军不得阻滞及袭击；三、奉军入城签字代表，须为师长以上军官，保证履行条件。万福麟以条件过苛，未予答复。11日，奉方决定武力解决。

△　奉天全省商工外交后援会通电反对日本以“满铁”名义向美国举债经营吉会各路，内称：日本侵略满蒙，“近者复由满铁会社以整理铁路为名，向美国举行六千万元借款，冀以日美经济之协作，促进满蒙政策之实现，斯种借款果得成立，非特华会之精神扫地，即满蒙之覆亡亦立至矣。”

△　北京外交团会议，以华北战事延长，决合力防卫天津租界。

12月8日　四中全会预备会开第三次会议，粤方各委员仍出席，蒋介石主席，议决：一、《改组国民政府案》，以戴季陶、陈果夫、周启刚、陈树人、甘乃光组织审查委员会讨论之；二、《政治委员会组织案》，以丁惟汾、戴季陶、谭延闿、于右任、经亨颐组织审查委员会讨论之；三、《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大会日期须由四次全体会议决定，特委会所定十七年元旦之召集期无效，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监察委员会吴敬恒、张静江等五委联名提出对陈公博、汪精卫、顾孟馀弹劾案，请停止其出席正式会议。汪表示监委会业经特委会取消，此举系宁方对认为敌人者之应付，彼无所惧。李济深提案，要求令汪以外之在粤中委退出议席，提交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何香凝等致书预备会称李提案“显欲藉此破坏会议”。蒋发表《致中央

执监委员诸同志书》，劝宁、粤各委息争，两方尽蠲前嫌，勿互相猜忌。

△　奉、直、鲁、豫、苏、皖、浙、闽、粤、桂、湘、鄂、赣13省国民党员朱济武等1381人具呈各中委提出13项要求，主要有：一、恢复党的正统，当以武汉之中央为中央，西山会议派已开除党籍，在党内无参预之资格，一律驱逐，蒋介石在南京私立中央，要以党的纪律制裁，四次会议之中央委员要负二次代表大会所交付之责任；二、履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维党纪；三、恢复二次代表大会后之正式的各省区党部，凡有以武力摧残各省区党部者，即处以叛党之制裁；四、严重处分屠杀民众的叛党新军阀蒋介石、李济深及现在南京之西山会议派；五、立即取消特委会所产生之党政军机关，并将列名供职于特委会之中委，一律停职一年，留党察看，西山派永远不准入党；六、收回本党势力所到地方之租界；七、对俄履行孙中山遗嘱及《致苏俄书》之友谊等。

△　返任之驻华美使马瑞慕晤北京军政府外交部长王荫泰，会谈中美无线电台案。马瑞慕称美国政府甚愿与中国再开交涉，外传美、日已协定办法，并非事实。至美银团贷款“满铁”事，美政府并未核准。美国政府对华亲善政策，毫不变更。

△　中比订立比退庚款用途第二次协定，规定以40％拨陇海路，35％拨其他国有铁路，作向比购买材料之用；25％交由中比庚款委员会作为中比教育慈善之用。

△　浙江省政府令绍兴等县解放浙江堕民，要求通过设立独立的完全小学，津贴贫寒子弟升学，与普通平民同受中等或高等教育，使之增进知识、学问、技能，自拔于“卑贱”职业（指从事鼓乐、唱戏、抬轿、剃头、制糖、买破布古董等）之中，改善其生活，提高其身份，而达到解放压迫、消除这一特殊阶级之目的。按：堕民亦称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分置江、浙。

12月9日　　汪精卫、陈树人、陈璧君、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王乐平、潘云超联名电广州陈公博、张发奎等实行“清共”。略称：“同人以反对特别委员会，主张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主张相同，一致努力。对于反共，既经中央决议于前，全体同志自应一致努力，无有异趋。……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恕，贻误无穷。并饬军警严拿匿迹苏俄领事署内之共党，如苏俄领事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并称贺、叶近在海丰、陆丰、五华、紫金、惠来等处建立苏维埃，请即派兵“合剿”。

△　汪精卫电张发奎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10日，广州宣布特别戒严，日夜搜查户口，张令离广州部队向市区移动。

△　汪精卫密电广州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称黄琪翔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

△　汪精卫密电陈公博、张发奎、李福林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请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此为目前要着。”

△　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因汪精卫要求而延会，汪派与李济深派各开小组会议，互谋对付之策。

△　国民政府第二十二次会议议决，特任赵戴文、张之江为国民政府委员。

△　冯玉祥、阎锡山先后电促蒋介石复任总司令，何应钦、贺耀组等亦联名通电拥蒋出山，主持军事。11日，冯、阎联名电请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起用蒋介石主持军政，并电促蒋复职。次日，冯又另致蒋电，谓此时军事非有统一枢纽，决难完成革命，非蒋出山，不能当此重任。

△　湖北党务整理委员会通电声讨黄琪翔；同日又电请南京特委会、军委等明令通缉汪精卫、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等，并请速出兵歼灭张发奎、黄琪翔。

△　石家庄奉军向正太线进攻，在获鹿附近北楼村李家庄与晋军接触。包头奉军被晋军击退，是日退回绥远以东。

△　驻南京第五军第十六师是日奉军委会令改编为独立第六师，以副师长王若周升任师长。

△　上午，驻九江英国军舰水兵乘码头工友上船运货，借口检查，肆行搜抢，发生冲突，水兵鸣枪向徒手工人射击，当场伤多人。

12月10日　　四中全会预备会开第四次会议，于右任主席，有力之反粤派李济深、李宗仁、吴敬恒等未出席。汪精卫等11名粤委突提议请蒋介石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案，即通过。汪并声明，如对其不能谅解，个人“尽可引退”。随即议决十七年（1928）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军事、党务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至是预备会议结束。

△　汪精卫密电广州陈公博、张发奎、李福林、朱晖日，略称：“今日预备会议议决，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职务，并议决密令兄等围捕苏俄领署内共产党员。弟因黄琪翔掩护共党，例如著名共党廖尚果竟为四军政治部主任，灯塔第三、四期容共有据，已决引退。”汪并嘱陈等坚决反共，“如见之事实，则各方谅解”。

△　张太雷、周文雍、杨殷、聂荣臻、黄锦辉等在广州分头召开有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革命官兵代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指挥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武装起义计划。工人赤卫队改编为七个联队和一个敢死队，分区集中待命。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按原建制和部署不变动。叶挺由香港赶回广州，担任起义的军事总指挥。

△　晚8时，湘省共产党领导工农及学生数千人在长沙暴动，突袭湖南电灯公司、光华电灯公司及火车站，旋被李品仙、何键、刘兴、周斓分令军警击退，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振楚等百余人被捕后牺牲。

△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电促胡汉民回宁主政，并通电江、浙、皖、赣、川等省各级党部，请一致敦促。

△　直鲁军第三军程国瑞部、第六军徐源泉部联合第二军张敬尧部向砀山冯玉祥军猛攻，上午8时，冯军向西退却，直鲁军占领砀山。

△　上海交涉员郭泰祺奉国民政府外交部令，就比将庚款120万借与北京当局事向比领事范豪特抗议，要求此后对北京借款之请求一概拒绝，以全邦交。

△　北京军政府财政部拟征之奢侈品税，因各方纷起反对，决暂缓办。是日，北京外交部通知外商，谓在奢移品目未经修改完竣以前，暂不征收。同日，北京日人商工会决议，凡属该会会员一体不纳此税，声称中国政府于输入之际，已按奢侈税加课五厘，近因筹措军费起见，复发布苛酷之奢侈品税条例，对外侨一律适用，诚属不法。

12月11日　　共产党人张太雷、黄平、叶挺、周文雍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二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凌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处决张发奎所派监视该团行动之代理团长朱逸芳和15名反动军官。3时30分起义爆发，以教导团为主力，联合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农团，向指定目标进攻，激战二小时，至拂晓，除第四军军部等少数据点外，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及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均被起义部队及工人赤卫队占领，并解除武装。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公安局旧址正式成立，选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如下：政府主席苏兆征（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政府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人民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人民肃反委

员杨殷、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土地委员彭湃（由赵自选暂代）、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并发布工农民主政府政纲，主要内容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打倒各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工人监督生产；银行、铁路、矿山、大工厂、大轮船均收归国有；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工会的惟一最高组织；解散一切反动工会组织；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镇压地主豪绅；各村各区立即成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工农革命军，改善兵士生活；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人民居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取消劳动者的一切捐税、债务和息金；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

△　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一译诺依曼）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15日，共产国际发表《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

△　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逃广州河南第五军军部，与李福林策划镇压广州起义，商定由李负责调驻韶关之陆满、周定宽两团，江门潘枝团，佛山林营、李营回省；黄琪翔负责调回西江前线军队，并利用英轮往接江门、黄埔、虎门驻军。英、日、法驻广州领事亦在沙面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帮助张发奎等运输军队，并直接对广州起义军作战。同日，国民党海军“江大”舰，以英、日军舰作掩护，炮击长堤。晚，日海军陆战队数百人在长堤登陆，向起义部队进攻，被起义军击退赶回军舰。河南李福林军两个团在炮舰掩护下渡河向广州市区进攻，起义部队在长堤阻击，激战至半夜，将李部击退。

△　国民政府外交部令交涉员郭泰祺向驻北京美、日两国公使声明，否认无线电案交涉中北京政府与美、日所订合同之效力，国民政府一概不受拘束。

12月12日　　拂晓，李福林第五军两个团，由“江大”、“宝璧”两

舰掩护分两路渡河，向广州起义部队进攻，教导团伤亡过半，赤卫队伤亡较重，李部多次冲锋未能登岸。黄埔黄慕松团，虎门许志锐团，江门潘枝团，韶关周定宽、陆满两团，佛山林营、李营先后迫近广州，进行反攻。沙面帝国主义调军助战，英兵增至2000名，法水兵400名，日水兵300余名，并派炮舰不断向市区轰击。起义部队内外受敌，入夜，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教导团大部和警卫团、赤卫队一部突围，连夜向花县转移，未及撤出之部分逐街逐巷逐屋与敌争夺。

△　中午，广州工农兵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举行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张太雷到会讲话，宣布1927年12月11日上午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敌从东、西、北三面合围。散会后，张在驱车返回指挥部途中，遭敌机器工会体育队袭击，中弹殉难。

△　蒋介石致电张发奎，称两次“粤变”，前则事后未能裁处，后则事先未能防范，应负其责，望张“戴罪立功”。

△　宁派中委在上海南园会议，讨论对付“粤变”办法，李宗仁、吴敬恒痛陈汪精卫危害两粤，主张速由政府下令逮捕何香凝、甘乃光等，宣布汪精卫罪状。

△　白崇禧因广州共产党起义，特于是晚赴宁商议“讨共”。

△　驻华日使芳泽在北京向日记者团谈，满蒙交涉已回复至杨字霆议论事件发生以前之状态，谬称“满铁向美募集公债属于满铁财政上之内部情形，若批评其可否，直与干涉满铁内政无异，自应力于趋避”。关于中、日、美无线电台问题，“颇冀由中、日、美三国间作圆满之解决，未闻由其中两国间予以解决之计划”。

△　英国陆军部代表向下院报告，宣称英军步兵12个团，业经准备常川驻扎中国；并称前此常川驻华英军只三个团，但自中国时局不靖后，已改以六个团常驻上海，六个团分驻香港及天津各地。

12月13日　　第四军新编第二师薛岳部自西江回师广州，与第五军李福林部会合，进击广州市区，反共最力之机器工会工人约千人亦组敢死队应援李军，在广州市内与起义部队短兵相接，巷战甚烈。起义军伤亡过重，势不能支，仅千余人于下午由东北方向突围，向花县转移，守卫苏维埃政府的起义部队全部牺牲。4时，广州被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张发奎入城大肆捕杀，一时市民及共产党人被屠戮者枕藉于道，不下数千人。这次起义中，朝鲜革命者100多人牺牲，越南革命者胡松茂等24人被捕，苏联驻粤副领事哈西斯以下馆员十余人，以及在馆工作的中国工人龙狄邦等十余人亦被杀害，正领事波吉伐林斯基被捕。

△　蒋介石在沪对记者发表对时局之重要谈话，说明时局主张：广东问题，决定责成张发奎务于最短期间消灭共产党；“汪蒋合作”，尊重前辈同志及监委会的意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蒋并主张暂时停止一切民众运动，等到政府确定办法和方针之后，重新再办；对复任总司令事，表示非到要消灭共产党、继续“北伐”时不出任事。

△　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致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拿办“粤变主谋”汪精卫、顾孟馀、何香凝、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陈树人、潘云超、王乐平，并请国民政府克日出兵，“戡平粤乱”。

△　汪精卫因广州起义陷入窘境，反汪派借以对汪及张发奎竭力攻击，指其为共产党。汪为剖白其确非共产党，特于是日在上海报纸公布其致陈公博等反共密电数件：一、请黄琪翔暂时退休认真清共之青（9日）电；二、致李福林请驱逐俄领之佳（9日）电；三、致陈公博等请派兵会剿海陆丰等处共产党之青（9日）电；四、致陈公博令围捕苏俄领署内之共产党员之蒸（10日）电。

△　李济深对东方社记者谈称：广州事变不可轻视，汪精卫等与此事有关。李宗仁亦称汪等与此次事件有关，故中央全体大会应拒绝

汪等出席。

△　粤方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何香凝、陈璧君、陈树人、王法勤、潘云超、王乐平联名发表宣言，略谓："就昨今两日关于广州事变之各种电报看来，张发奎正和共产党作殊死战，那些以勾结共产党诬张发奎等，并以诬我们的是绝对的不确"；"有些人似乎主张张发奎等如果是共产党固然要讨伐，不是也一样要讨伐，这无异帮共产党来打张发奎，希望不至于有此事实"，望蒋介石悉心筹划广东各军力量，合力消灭共产党。

△　军委会临时紧急会议，决令李济深统率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各部迅即"讨伐"广州共产党。

△　蒋介石电令张发奎戴罪立功自赎，听从李济深指挥，即率所部，会同陈铭枢等友军，于最短期间歼灭共产党。同日，蒋通电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等，声称："此番变乱，足征向华（张发奎）实非共党，望毅然捐弃小嫌，誓死共维大局，即与向华协同一致，迅平共产党。"

△　汪精卫电嘱粤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等服从蒋令，协力讨共，切勿再有其他顾虑，致分兵力。

△　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急电汪精卫、蒋介石等，报告广州事件经过，并宣称是日拂晓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仍望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此后我国只有惟一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次日，汪精卫复电张发奎等，嘱将共党"去之务尽"，"即浮薄少年好为偏激之论者，亦宜痛斥，不可录用，民众运动在中央未确定方针以前，宜停止进行；农工运动中尤易杂入莠民，不可不防"。

△　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及军事长官整饬纲纪，内称："完成统一，计日可期，根本之图，在端趋向，风声所树，咸应率从，断非旷

涣之心，能起衰颓之象，尤非补苴之术，可策长久之安。”

△　津浦路直鲁军、孙军反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勒兵进击，大破之。15日，何令各军继续向徐州之敌进攻，西北军韩复榘等部复自其侧背加以威胁，直鲁军、孙军不支向鲁境韩庄一带溃退，次日，何应钦军再克徐州，与沿陇海路东进攻徐之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会合。

△　奉军顾问町野武马在东京往访田中首相及白川陆相，陈述华方对于满蒙交涉之意见，借求谅解。日政府已谅其意，决于日内再度开始关于解决满蒙各种悬案交涉。

12月14日　　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宣称：本月11日广东事变，共产党占领省垣，“究厥原因，皆由共党藉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操纵指示之地”，其他各省地方，亦不无暴发之虑，为“维持治安，预防滋蔓”起见，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联领事馆一律撤销，所有各省之苏联国营商业机关，应一并勒令停止营业。

△　中央特别委员会开会，以出席委员不足法定人数，改开谈话会，议决党务继续维持，俟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开会，即停止职权。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下令，略谓广州事件在粤军事长官事后虽能“敉平暴乱”，惟事前不能“防患未然”，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张发奎、陈公博，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公安局长朱晖日，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所遗第四军军长一职，由副军长缪培南升任。公安局长一职，由李朗如充任。

△　浙江省党部致电蔡元培，历数汪精卫之罪状，称汪之逆迹已彰明昭著，请不准其参加四中全会。同日，旅宁粤人2000余开“讨共救粤”大会，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缉办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王乐平、陈树人、何香凝、潘云超等人。

△　东三省当局下令驱逐未入华籍之朝鲜侨民出境。令称部分在满鲜侨扰乱秩序，参加政治活动；其有职业者，多以垦荒耕作为生，有碍中国之土地主权，故对未入华籍之鲜民不得不予以取缔。是日，驻奉日总领事吉田茂向华方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12月15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及江苏交涉员郭泰祺赴驻沪苏联总领事馆，面交断绝国交通牒，并限苏领事一星期内出境。同日，外交部拟定中苏绝交办法四项：一、由交涉员向苏领事声明，自即日起，对于该领事撤销承认，并嘱该领事及领馆人员离境；二、所有苏联国营商业机关，如银行及轮船公司等，一律勒令即日停止营业，并派警严密监视；三、详查辖境内苏籍侨民总数，无正当职业而形迹可疑者，随时侦查拘禁，驱逐出境；四、凡苏籍侨民，均应领外侨执照。

△　广州连日屠杀共产党人，除被公安局枪杀者外，军队方面是日枪杀600余人，17日枪杀400余人，19日又在北校场枪杀100余人。又据香港路透社17日电讯，广州共产党被杀者约2000人，街市尸骸累累，景象凄惨。

△　共产党武装数百人夜袭长沙电灯厂，旋为警备军击散。

△　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古应芬通电全党，宣布武汉召开之中央执委第三次会议不能承认，该会开除蒋介石等党籍之决议案为非法。

△　李宗仁通电“护党”，声称：“宗仁护国护党，无役不从”，“对党之观念自信与金石同坚，有与党为敌者，死生以之。”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农部慑于广州暴动，是日通令所属各工会禁止罢工。略称：在此严重时期内，不得罢工，已经罢工者赶即结束，若抗不遵令，即以“反革命”论。

△　第十三军副军长熊式辉奉军长白崇禧命，在宁组织第十三军军部。军部乃由上海淞沪卫戍司令部所改组。该军共三个师，第三十七师师长熊式辉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定璠，第三十九师师长吕焕炎。第三十七师由十四军驻锡部队改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两师由第二路总指挥部五个补充团改编。

12月16日　　国民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之汪精卫、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何香凝，略称：汪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与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复。在查办时期，汪等居住所在，应责成当地军警注意监视。同日，江苏省党部、旅宁粤人等各界请愿团代表数百人向国民政府请愿，认为查办令过轻，力求改为通缉，经国民政府常委李烈钧解释，众始散去。

△　汪精卫因受南京制裁，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于是日深夜登轮离沪，出国去马赛。濒行前向中央执监各委员发出引退通电，称其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愿个人引去以息纠纷，并为张发奎等无共党嫌疑力辩。通电仍主张“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20日，汪过港未登陆，召黄琪翔随同赴法。

△　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复照国民政府，称该政府驱逐苏联领事、终止承认苏联领署令为非法，此举为南京僭权军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之行动。苏联从未承认该政府，苏联政府在中国所设之各领署，系1924年在北京所订中苏条约之结果，所派各领俱系北京政府所承认，苏联领署及商务机关，并无赤化宣传及指示广东工人农民等之革命运动。凡孰先与苏联政府取仇视政策者，其人必将首受其害。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在沪对记者发表对契切林复照之意见，声称：“苏俄设领显然得到国民政府承认，俄领署宣传赤化已得文据证明，此次取缔俄领纯出自卫。”

△　黄绍竑等在梧州誓师讨粤，誓师通电略称：真日（11日）广州事件，实肇端于筱日（17日）之变，而参预逆谋之中央委员陈公博等，实为主要负责之人，望一致讨伐。

△　鄂省政府及各厅由湘鄂临时政委会接收。

△　武汉卫戍司令部奉国民政府令大捕共产党人，是日在市内捕获60余名，法租界捕获约70名，特一区一元路截获48名，总共100余名，内有苏联人数十名。驻汉苏联领事馆被搜查，总领事普历澈夫妇、副领事美宁夫妇及馆员共十余人被拘押于交涉署，并于是晚“护送”出境，于21日由上海乘“长崎丸”取道日本回国。

△　何应钦所部陈焯第二十六军赵观涛师再克宿迁城，直鲁军皮华清、褚锦坤两旅弃城向皂河溃退。

△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花县正式成立，由广州撤至该县之起义军及新参加之农民武装共约一千四五百人所组成。全师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个团，以叶镛为师长，王侃予为党代表，袁裕（袁国平）为参谋长。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因越南华侨一再请求在越设领，而法政府迄未答允，是日电令陈箓向法外交部提议，于中法陆路商约未成立前，先在越南设一办理领事事务之委员，以便保护侨民。

12月17日　　陈铭枢在汕头与陈济棠、钱大钧、徐景唐等商议讨伐张发奎军，决联合闽、粤、桂各军进攻广州，由陈铭枢任总指挥，令黄绍竑、黄旭初军自西路，徐景唐、邓世增军自南路，范石生、方鼎英军自北路，与潮汕各军呼应，同向广州进发。

△　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命令所部搜查长沙共产党机关，捕获数百人。长沙城内苏联远东贸易公司被封闭，苏领事馆亦被包围。

△　上海是日起禁止苏联轮船进口。

△　张发奎被迫致电蒋介石表示服从，声称广州政治分会已将其免去本兼各职，“戴罪勉维善后”，愿以党员资格，随从补过于将来，并宣称与共产党“义不共存”，一息尚存，亦以歼灭共产党为职志。

△　下午7时，湖北省前财政厅长詹大悲、前教育厅长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被卫戍司令部协同日巡捕逮捕，当晚9时在济生二马路被枪杀。18日，武汉卫戍司令部布告宣布“罪状”，指詹、李为湖北共产党首领。夜，该省前民政厅长孔庚、前建设厅长李书城在法租界亚洲旅馆被捕。

△　曹万顺第十七军以独立第一师及该军第一师分由盐河两岸向灌云追击西撤之孙传芳军，是日午前占灌云，晚克海州，19日进克青口、赣榆，至此陇海路东段已无敌踪。

△　各省商会联合会在上海总商会开幕，主席冯少山致开会词称：“本会所负之任务，一在解除商人之苦痛，一在积极努力国民革命之工作，兼营并进，决无轩轾。”“本会今后之任务，一方当力谋商人苦痛之解除，一方又当力谋各阶级间利益之融和，期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党纲，而化除阶级斗争之惨剧。”蒋介石出席致训词，希望各省商会注意两点：一、商业不能脱离政治；二、商业之进展，须与农工各界联合。

12月18日　　宋庆龄就国民政府对苏联绝交事，自莫斯科致电蒋介石，内称：“对俄绝交，驱逐俄领，此举如果实行，非惟自杀，实使党国孤立无援，后世历史上将以君等为误党误国之罪人，望静心三思，翻然觉悟，缓行前议。”同日，蒋复电力言对苏联绝交出于不得已，请回国考察事实后，再发表主张。

△　李济深令东路军、北路军、西路军分由东江、北江、西江三路会攻广州，讨伐张发奎。张以地方指责严厉，补给困难，而第八路军又由东西两路渐次进迫，遂宣言下野，以所部交缪培南指挥。

△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致电上海各中央委员，略称东西两路进兵相迫，谓粤为共，请主持正义，消弭兵争，静候中央会议解决，勿自相煎迫，并称一俟共产党完全消灭，即当弃职归农。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表示尊重中央，“嗣后交通回复，所有豫、陕、甘一切行政事宜，自应禀命中枢，呵成一气”。

△　李石曾通启谢客养病，称从事反共之政治工作即告结束，自下月起当专事社会文化，不复参加实际政治。

△　汉口震寰纱厂案被捕学生马红、梅玉科、陈梦兰、纪李华、许白池、许蕴达、田常、李子芳以“受向忠发指使纠众暴乱罪”，被武汉卫戍司令部杀害。

△　上海茶商20余家，年售苏联茶叶达1400万两，以中苏绝交，营业大受影响，百余万恃茶为生之人将有失业之虞，是日特推代表陈兆焘向外交部请愿，请示维持营业办法。22日，处理苏俄在沪商业委员会决定，全俄中央合组协助会社、中东铁路经理处、俄商茶叶行、纺织公司、远东木材公司等得继续营业，称该协助会社等“乃个人商业公司，完全与政府无关”。

△　无锡鱼商300余人因稽征所非法征税，擅扣鲜鱼，于是日聚众持香至该所请愿，所长朱焕霞避匿不理，致引起全体罢市，捣毁稽征所。20日，又聚众持香至县府请愿，该县俞县长允布告暂停征鱼税，并将扣留鲜鱼发还，鱼商认为满意，于次日全体复业。

12月19日　　李福林就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临时主席，薛岳为广州戒备司令，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仍任公安局长。

△　上海汪宅是日接宋庆龄致汪精卫电，竭力反对与苏联绝交，内称：“闻尔有与苏俄断绝关系及撤销苏俄领事署之提议，此事果成，实属自杀，而使中国孤立，且迟其进步，则历史上尔当负其责

也。”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知本、熊斌、张难先、杨在春、石瑛、王世杰、胡宗铎、严重、李隆建、孙绳、张九维、王恒、李世光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张知本为主席，杨、张（难先）、王（世杰）、石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原任省府委员孔庚（兼民政厅长）、李书城（兼建设厅长）、李品仙、朱霁青、叶琪（兼军事厅长）、詹大悲（兼财政厅长）、李汉俊（兼教育厅长）、喻毓西、王祺（兼农工厅长）、袁家普、郝绳祖免职。

△　白崇禧奉令赴汉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兼第三路总指挥职务，必要时统兵解决湘、粤，因电辞所兼淞沪卫戍司令职。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决先出兵五万，由京汉路渡黄河北上援晋。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芳泽，内称：据仁川吴领事电，16日晚，鲜人聚众袭击领事馆及中国街，幸华侨力御，未被侵入，现华商避居领事馆及商会者共千余，尚未脱险，特提抗议，请负责保护中国领事馆及华侨生命财产之安全。24日，日使馆复照北京外交部，称仁川领事言之过甚，朝鲜总督府对于鲜人暴动，自始即严厉取缔，且归咎于东省官厅之压迫鲜农。晚，北京外交部又照会芳泽，再提抗议，并附华侨损失表，要求赔偿。

12月20日　　国民政府第二十五次常会议决，重新编定各路军总指挥名称，并任命各路军总指挥：第一路何应钦，第二路白崇禧，第三路李宗仁，第四路程潜，第五路朱培德，第六路刘湘，第七路邓锡侯，第八路李济深，第九路周西成，第十一路方振武，第十二路徐永昌。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调元，第七路军前敌总指挥田颂尧。

△　津浦路前敌将领31人由何应钦领衔通电条陈“救国大计”五

项：一、促开中央全体会议，树立党权；二、各省酌留少数军队维持省防，其余参加“北伐”；三、敦促蒋介石东山复起，总领师干，统一军事；四、各级政府注意整饬，造成廉洁，以孚民望；五、“肃清”共产党，以求彻底建设。

△　黄绍竑电复蒋介石元（13日）电，力主讨伐第四军，声称：“日言清党而党不清，日言讨共而共乱不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故今日若言讨共，则应先讨掩护共党之军政要人。”

△　黄绍竑亲赴西江前方督师，率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三部1.5万人，三路直攻肇庆，第四军向三水方面退却，黄部旋占肇庆。

12月21日　　国民政府议决，授予李济深返粤整顿粤局全权。李旋即回到广东，亲自指挥对张发奎部的攻击。

△　上海处理苏俄在沪商业临时委员会决定处理在沪苏联各商业机关，监视清理之机关计五处：远东银行、苏联义勇舰队公司、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处、乌苏里铁路运输处、苏维埃政府保险管理处。

△　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解散讨唐救鄂团及各业店员工会，声称各业店员工会“违反党义，为共派操纵”，成为一年来惹起武汉劳资纠纷之策源地，特将各该工会完全封闭；并将不服制止之店员工会会员加以拘捕，以共产党看待，予以最严厉之处分。

△　武汉卫戍司令部通告，声称为防止共产党活动，令湖北党务整理委员会及省市改组委员会一律停止活动。

△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电促蒋介石复职。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令所属各市县党部，严密检查邮件，防止共产党活动。

△　南京飞机队一、二队进驻徐州。

12月22日　　国民政府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通电严拿吴佩孚；令浙、皖两省政府对财政机关用人须尊重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决用四级三审制；实行教育经费独立等项议案。

△　广州政治分会免去张发奎、陈公博之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职，以方鼎英、缪培南继任。

△　国民政府任王若周为独立第六师师长，朱锡麒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贺国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办公厅高级参谋。

△　驻华德使博邺致函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称奉柏林训令，苏联政府请德国政府代理保护苏联在中国南方之人民及其利益，德政府按照国际公法规例保护，已电令驻沪、汉、粤德领就领事权限范围内，代理苏联利益，但决不干预中国内政及苏联人民在中国一切政治活动，请中国政府谅解。

12月23日　湘鄂政委会派张有桐、周星棠等接收武汉市政府。

△　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及新西伯利亚等城市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广州杀害苏联人事件。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表抗议声明书，谓鉴于中国南部因反苏而演出之流血罪恶，苏联政府保留采取认为必要的步骤之权利，此种野蛮行为，不能轻轻放过，必有以惩罚之。

△　上海苏联领署下旗。晚，领署职员自总领事柯兹罗夫斯基起共18人分两批登上苏轮“西山号”回国。苏联领署由驻沪德总领事蒂尔接管。

△　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之学生因广东事件被苏联政府限令出境，是日有17人由海参崴抵日本，转道归国。

△　日本以护侨为由，特派“长良号”巡洋舰载陆战队200名，于是日下午2时半驶抵青岛。同日，日白川陆相在阁议中声称，此后济南地方之日侨，若有陷于危险状态之形势时，得随时命令熊本第六师团

出动。

△　龙云军击败滇军胡若愚、张汝骥部，是日龙军右翼第一、第四两师攻入黔境普安一带。

△　前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于天津病逝。

12月24日　　蒋介石、何香凝自沪电粤促陈公博、甘乃光、陈树人赴南京出席四中全会，称“四次全体会议定可如期开成，一切党内问题，在会内公平解决”。

△　白崇禧奉命到汉口劳军，是晚在总指挥部欢宴海陆军将领席间演说称：目前最厉害的敌人是内部敌人，内部敌人这样猖獗，汪精卫应负最大责任；唐生智的叛变，大半是因汪代他撑腰，广州张、黄叛变，尤为汪所主使。

△　各省商会联合会通电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称日此举“阳为保护侨民，阴实阻挠义师”，如彼方始终不顾公理，全国商人为保卫国权起见，自当本其决心，亟起对付。

△　据北京《晨报》讯，今春以来，直鲁人民移往北满者，数达50万人。

△　天津美孚油公司是日失火，延烧数日，中、美、法、英、意各国消防队均出救护，焚毁蜡烛仓库一座，煤油仓库六座，损失约数百万元，为天津稀有之大火。

12月25日　　上海各报载称：外交部长伍朝枢最近在上海对国民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对外交、政务、党务表示悲观，称“数月之间，政局飘摇，大变四五次，小变六七次，影响外交”；又称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选举之执监委员已经满任，十七年（1928）元旦后开全体会议，“不过是一群前任之委员开会，以严格的法律论之，亦不合法”；并称特委会即使不合法律手续，但使三分之党合而为一，以巩

固革命势力起见，是否可以原谅。

△　国民党在沪中央执监委员多人发表谈话，指责伍朝枢谈话中有关中央全体会议之批评，“足以危害国民党之生命”，伍以非法相诘责，则“此后党权更何从行使”，岂欲以“一言亡党”；伍为特委会辩护，意欲破坏全体会议，“延长特委会之生命”。

△　甘肃省政府电国民政府，报告已严查苏联在甘经商机关，勒令停止营业。

△　桂军黄绍竑部向三水总攻击，防军李福林部向广州撤退。东江方面防备惠州之张发奎军约二师与钱大钧部发生冲突。27日，桂军先头部队占三水车站，28日，沿广三铁路搜索前进，便衣队抵广州市郊。

12月26日　　第四军新任军长缪培南、副军长薛岳通电率部离开广州，服从蒋介石，电称张发奎、陈公博等已引咎离粤，彼等不忍再起干戈，决定离开广州，东集潮梅，候令北发。是日起第四军全部出发东江，集中惠州、河源，缪培南、薛岳亦同时离省，广州治安由李福林之第五军维持。

△　国民政府据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财政部部长孙科提议，通令财政部、各省市政府切实施行整理学制，并保障教育经费独立。

△　国民政府常委李烈钧在南京接见记者称：“中央特委会准备结束；北伐兵力与敌接触者逾四十万，意再增二十万，陈调元、方振武均准备动员，白崇禧来电称，愿率师直捣燕京，政府已去电促之。”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各界代表500余人举行促蒋（介石）复职大会，通电全国一致敦促。各地纷电响应。

△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沪欢宴各省商联会代表，主席王正廷致欢迎词称：中国学校所学不切社会应用，人才普通者实多，专门者太

少，欲救中国，非从职业教育入手不为功。次由办事主任杨卫玉报告该社设立旨趣及所办事业，称该社主旨，在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十年来极力沟通职业界与教育界，以救中国之社会，如办试验学校、上海职业指导所、南京职业指导所，发刊《教育与职业》月刊、《生活周刊》，提倡农村事业、补习教育等。

12月27日　　国民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财政部部长孙科、次长郑洪年辞职案。伍朝枢主张，孙既感办事困难，不必强留；李烈钧、谭延闿表示所有困难均应共同负责。讨论结果，决定明令慰留。

△　程潜、白崇禧、鲁涤平等联名由汉致电南京，反对粤委员出席四中全会，电中列举汪精卫、顾孟馀、陈公博、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何香凝九人“破坏党国”罪行，要求中央开除汪等党籍，通缉拿办。

△　冯玉祥及所部将领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等20人通电，一致赞成何应钦等于20日发表之五项“救国主张”，盛赞“确系洞见症结，解决时局之不二法门”，应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　浙江省党部发布《共产党自首条例》，规定“共产分子如有确被诱惑而无破坏本党之事实者，准其自首，予以自新”；“自首应备下列手续：一、自首状；二、悔过书；三、最近四寸半身照片；四、声明此后行径；五、亲属保证；六、殷实商铺具保；七、详细住址；八、罚誓”。

△　东江陈济棠师因陈铭枢第十一军应援，于占领紫金后，联络钱大钧第二十师直迫惠州。是日陈部3000人在惠州北部与李汉魂第二十五师接触，陈亲督一师兵力猛攻，李师退守博罗，陈师占惠州。同日，第四军缪培南、薛岳统率所部二万人抵增城，联络许志锐师，向惠州反攻。

△　最近北京、天津发现出售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不少，且

多有为外人购去者，是日，北京军政府内阁总理潘复特电请鲁省长林宪祖设法保护，并主张给价归公保存，或订给一种优越权利，为其世掌，以免散失。

12月28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束，中央特别委员会亦于同日正式解散。南京各团体欢迎蒋介石前往筹备四中全会。

△　国民政府特任徐永昌、刘骥、傅作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令：司法部长王宠惠因赴海牙国际法庭，未返以前，部务由次长魏道明代理。

△　甘肃等15省区回民代表赖家铎等到南京，声明拥护国民政府。

△　汉口交涉员甘介侯与英领事波特对第三特区问题交涉告一段落，是日，英籍董事亦因英领事命令出席市政局董事会，此案圆满解决。

△　广州总商会与李福林军议妥，以商会名义通电陈铭枢、徐景唐、陈章甫、钱大钧、黄绍竑，欢迎各军回省，到时李军定先移防。同日，商会代表胡颂棠等赴三水，迎西江各军返省。次晨桂军黄旭初师开入广州市，李福林军退驻河南。

△　各省商会联合会闭幕。冯少山（上海总商会）、张棫泉（汉口总商会）、苏民生（南京总商会）当选为该会总事务所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大会宣言声称，该会“谋商人真正团结，谋各阶级利益调和，谋全国和平建设，望商人真切了解政治”。

△　皖省教育厅长雷啸岑通令各县教育局及各省立学校，提倡平民识字运动。令称：“据北京平民教育总会之统计，吾国不识字之民，几占全国百分之七十有余，聚无数群盲以为国家，民治精神，何能发达。”并定本年寒假起，举行全省平民识字运动，以简单之工

作，少数之经费，使全省未识字之人，得有识字机会。

△　据上海《新闻报》讯：赈济会所传鲁省有400万人将成饿殍之说，已由鲁省外人证实，鲁省107县，有35县收成不足10％，另有30县收成自10％—40％不等，人民多以树皮草根充饥。当局以灾荒诿诸亢旱蝗患，外人则称乃由内战及匪患苛捐所致，中国现无力筹此巨款以办赈济，急需外助。

12月29日　　李福林通电引咎辞职，第五军军长由第十六师师长邓彦华代理。邓就职后即电李济深、冯祝万、陈铭枢到广州主持。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因国民党内部纠纷，呈国民政府辞职。同日，孙科、郑洪年二次呈请辞职。孙并声明自十七年（1928）元旦起，所有财部事务不能负责。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陶钧为第十八军军长，张义纯为副军长，林逸圣为第十八军第一师师长，严敬为第二师师长，李石樵为第三师师长，是日在武汉分别就职。

△　江西省政府通令81县严捕共产党，“准就地枪决，事后呈报”。

△　南京戒严司令部查出国民政府参事陈海澄以军政秘密私通奉鲁，经国府常委批准，定30日枪决示众。旋因有人代陈申明冤屈，未即定谳。

△　汉口交涉署布告，饬居留武汉苏侨，自明年1月3日起至10日止，亲去该署注册，领取外侨执照，违则处刑。

△　广州苏联领事波吉伐林斯基夫妇及随员等七人为第四军退走时释放，经香港回国。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复照英、日、法三国驻华公使，通知鲁省

截留盐款事决停止进行。

12月30日　　国民政府第二十八次会议，对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孙科、财政次长郑洪年呈辞，议决慰留，并特派谭延闿赴沪，挽伍、孙回京。

△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议决，陈海澄通敌案，为慎重起见，移送法院审讯，严密搜查党羽。

△　黄绍竑令西路军出发东江，与陈铭枢之东路军夹击在惠州、河源之第四军。

△　张难先电南京，辞鄂省政务委员兼财政厅长职。

△　涿州围城事件和平解决，傅作义、万福麟各发通电停止军事行动。傅电略称：守涿两月余，因慈善团体等之请，于本日停止军事行动，所部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惟遇国际战争、地方剿匪，当听中央命令竭力应付。

12月31日　　伍朝枢在沪发表谈话，对“在沪中央执监委多人”对彼谈话之纠正有所辩护，称：“如果根据党章及正义来评论党务，即谓之亡党，那么如有重要党员提倡一说，大家随风而靡，作应声虫，方算作兴党吗？”并称：“我讲的话，可以当作代被屈的特委会作辩护词，亦可以当作代垂死的特委会作墓志铭。”

△　邓泽如、古应芬向国民政府呈复查办汪精卫等九人之结果，称汪及其党徒对于11月17日之乱，不独参预逆谋，实为发纵指示；对于12月11日广州事件，则为“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彼等身为中委，竟敢肆意作乱，危害民国，破坏革命，罪证确凿，请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发表宣言，宣布调停纳税华人拒付工部局增捐事，已与工部局协商顾全之办法：一、秋季巡捕捐，为顾

全工部局预算案起见，除原数一成四应照付外，其所加二厘在抗议之下交付之；二、华董席数，应照工部局备忘录所述捐税比例分配，其权限须中外一律；三、市政捐所举办之公共场所等，应中外一律享受。

△ 驻华日使芳泽照会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谓朝鲜各地排华风潮已平静，仁川等处华侨均回原处继续营业，仍请中国政府停止取缔鲜农，敦睦邻谊。

是月 湖南唐生智旧部仍用第四集团军名义从事扩充，经过整顿，决自十七年（1928）1月起实行新编制，下分第一、三、四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李品仙，第八军军长及第一师师长由李兼，第二师师长吴尚，第三师师长李云杰，教导团团长王戈，独立第一师师长熊震。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何键，第三十五军军长由何兼，第一师师长周磐，第二师师长刘建绪，第三师师长陶广，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第十八军军长叶琪，第一师师长门炳岳，第二师师长何宣，第三师师长危宿钟，独立第十师师长戴斗垣，独立团团长唐生明。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刘兴，第三十六军军长由刘兼，第一师师长廖磊，第二师师长唐明哲，第三师师长周维寅；第十七军军长周斓，第一师师长王锡焘，独立第五师师长陈汉章，步一旅旅长周荣光，步二旅旅长罗霖，警卫第一团团长周宗濂。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就广州事变发表对外宣言，略称此次广州事变，华南国民党将领以苏联为其敌人，苏联副领事惨遭屠戮，苏联人民伤亡枕藉，不仅张发奎、李福林等为此案之罪魁，即李济深、蒋介石、白崇禧等亦与有过焉。教唆之者，实尚有人，即欲施行在华殖民政策之英伦，立于背后而指之导之。特郑重声明，于必要时，苏联得采取任何步骤，以报此次华南排苏之仇，此等野蛮举动决不能无以惩之。

△ 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等到湘鄂西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

会，发动监利、华容、石首、南县等地的年关斗争，农民革命武装扩大至1000余人。

△　南昌起义军余部为暂时隐蔽目标，由朱德利用驻汝城第十六军范石生的过去同学关系，到韶关西北之犁步头休整，改番号为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朱化名王楷担任团长，由范石生补充装备和供给军饷。

△　据国际联盟卫生监督罗琪门医生之在华调查报告，称中国染疫死亡率，岁约530余万人。

是年　　我国对外贸易总额30.09357亿元，其中进口15.78148亿元，出口14.31209亿元，入超1.46939亿元。

△　我国本年关税收入共关平银6868.7万两，较上年减少943.5万两。增收之主要口岸有：天津92万两，大连43.1万两，哈尔滨28.8万两，汕头25.5万两，安东10.5万两。减收之主要口岸有：上海702.5万两，汉口226.3万两，广州153.8万两。

△　全国共有铁路总长1.304048万公里，其中自主铁路1043.94公里，占8%；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铁路为1.199654万公里，占92%，内由帝国主义直接经营者为4330.25公里，控制经营者为7666.29公里。

△　我国石油年产量共1.3401万桶（每桶24加伦）；铁矿矿石产量171.0135万吨；生铁产量25.7945万吨；钢产量三万吨。

△　我国民营工业，共纱厂73家，纱锭209.9058万枚；丝厂93家，丝车2.2168万部；卷烟厂182家。外厂纱锭149.7294万枚，布机1.1973万部，占全国布机总数的49.7%。

△　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估计：一、全国农户总数共5600万户（地主包括在内），平均每户以六人计算，共3.36亿人，其中：有土

地的（一亩起至大地主）1.2亿至1.5亿人；无地雇农3000万人；游民、土匪、兵士、无固定职业之乡村小商人共约2000万人；佃农1.36亿人。二、无地农民占55%，土地极少的贫农（一亩至十亩的）占20%，两者共占75%，均是要求土地的；有地10亩至30亩的中农占11%，他们不须为土地而斗争，亦不反对贫农取得土地，反倒帮助贫农；有地30亩以上的富农、中小地主及大地主占14%。

△　日本在我国东北的企业投资迅速增加，从1917年到本年十年间，纯日资企业的资本增加214%；而在中日合资的企业中，日资则增加655%。

△　在日人盛倡“韩民移满、日民移韩”之口号下，至是年朝鲜人移殖我国东北各省累计达9.7594万户，54.2869万人，种植水田面积4.3263万町步，收获量达70.5893万日石。

△　据内政部统计，全国出版报纸总计有628家。

△　春，暨南学校设商科大学部，定名为国立暨南商科大学。

△　夏，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议决，江苏省国立各大学及各专门学校（计河海工程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工业专门学校、江苏法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等九校）合并改设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五卷

(1928—1930)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五卷

(1928—1930)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28年（民国十七年）
1929年（民国十八年）
1930年（民国十九年）
返回总目录

1928年（民国十七年）

1　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集会庆祝民国开国第十七周年，国民政府常委谭延闿、李烈钧及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党政军官员约千人参加大会。按：此系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举行开国庆典以来，国民政府首次在南京举行开国纪念大会。

△　李烈钧、谭延闿、李宗仁由宁赴沪，请蒋介石回宁复职。

△　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十军贺耀组部由鲁南进攻，是日占领临城（今枣庄西）。

△　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自枣阳通电誓师北伐。

△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通电揭橥豫、陕、甘三省除害兴利七事：一、肃清匪患；二、恢复交通；三、改良农业；四、改善贫民生活；五、普及教育；六、振兴工商；七、筹集经费。并提出延揽专家，组织三省建设讨论会，从容筹议。11日，国民政府电冯赞同七项措施，并希“切实施行”。

△　蒋介石指定周佛海（总负责）、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五人在上海创办之《新生命月刊》杂志创刊。

△　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不顾国民政府通缉令，派“彝陵”、“长

安”、“福川”三轮驶往白帝城，迎吴佩孚及其眷属随员，连同卫队共2000余人，于3日到达四川万县，住杨森花园。8日，杨森电上海驻沪代表刘介藩，嘱其向国民政府报告，诡称拥吴移居万县纯属私谊，“免滋误会”。

△　全国注册局在南京成立，局长李宗侗。

△　奉天通化、临江一带农民，不堪苛政暴敛，组成大刀会举行起事。该会原系白莲教一支派，发源于山东农村，渐及于东三省，以自治自卫为宗旨，设督办、参谋长、总教师等，总会设于临江，分会设于通化、抚松、安东、桓仁、宽甸等县，入会者甚夥，最多达到2.4万人。

△　天津中原公司百货商店正式开幕。创办人为黄文谦、林寿田、林紫垣、陈军海、赵泽苓、何逸洲等，官僚资本有陈耀珊、陈光远、陈希晃、徐善伯等人，海外华侨有蓝赞襄、鲍翼君、黄启功、王重山等人。股东1000余户。蓝赞襄为总经理。资本总额为130万元，经营洋广杂货、布匹、呢绒、绸缎及食品用具，并附设游艺场、大戏院、酒楼。前大总统黎元洪剪彩揭幕，千万顾客拥进商场，竟日川流不息。

△　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于台北市港町（今环河北街）成立，台湾省机械工会代表78人出席成立大会。

1月2日　国民政府致电上海蒋介石总司令，“应即旋都复职，共竟革命全功”。

△　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敦促莅京复职；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拥护出山。

△　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通告，所有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为共产党把持之民众团体一律解散，听

候中央命令办理。

1月3日　　蒋介石通电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级党部，主张恢复最高党部，速开中央全体会议，以结束过去党内纠纷，树立国家大计之新基；并表示“即日驰赴首都，负责筹画一切，务使会议开成，党基重奠”。

△　国民政府明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四总司令督率所部，完成北伐。

△　国民政府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增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是日明令公布，着即就职。

△　国民政府增设建设部，调任孙科为部长，所遗财政部长缺，着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兼任。

△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伍朝枢任赴美改订条约特使，部务着次长郭泰祺代理。

△　国民政府派上海中法大学校长褚民谊赴法国调查卫生事宜。

△　第一集团军第九军军长顾祝同到京欢迎蒋介石，并赴军委会报告前线军情。

△　驻南京各省军、师代表暨办事处主任、留守处主任熊斌、刘朴忱、谭星阁、袁绩熙、史毓锟、陈戎生、黄朋等24人联衔电请蒋介石出山，“早日命驾入都，主持军事”。

△　孙传芳、张宗昌派便衣潜行到沪，勾结匪徒百余人，夜晚在南市暴动，抢劫三山会馆李明扬独立一师军械库枪械，被刘峙第一军余思聪第二十二师击毙九人，逮捕六人，独立一师炮兵营有通敌嫌疑，被缴械。

△　奉天通化、临江、辑安大刀会蜂起，是日袭击四道沟，5日袭击辑安县城及三道沟。张作霖派兵两营往剿。

△　驻京日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记者团谈话，谓满蒙交涉已达相当程度；无线电问题，中、日、美三国均表示妥协态度，若谋解决之途，则以在北京聚商为便。

1月4日　　下午蒋介石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濬、陈立夫等人乘火车由沪抵宁。当晚，国民政府公宴蒋介石。李烈钧致欢迎辞，蒋介石发表演说，希望四中全会早日召开，完成北伐。

△　蒋介石致电汉口程潜、白崇禧，告以本日抵京，望群策群力，早日完成北伐。

△　伍朝枢电国民政府辞赴美改约特使，谓派员与美国缔结新约，现在是否为适当时机尚须斟酌，请勿明令发表改订条约特使之令。

△　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应安国军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之邀入京，讨论前方军事。津浦正面防务仍由孙军担任，孙军饷项、军装及枪械则由北京军政府供给。5日下午，北京军政府总理潘复及全体阁员设宴为孙饯行。

△　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由香港返抵广州。

△　李济深第八路军东路军占领龙川。东路军总指挥陈铭枢获悉缪培南第四军退出广州向东江前进，将以主力趋五华、兴宁，图突破东路军防线后入赣，2日乃作龙川战斗部署，令第十师集中合路口，从西南攻龙川，第十一师集中鹤市墟，从东南攻龙川，第二十四师为总预备队，尾随第十师后跟进。是日，东路军黄质胜第二十四师在龙川对岸东山、南山与第四军许志锐第二十六师激战。旋东路军蔡廷锴第十师援军由老隆渡河增援第二十四师，第四军不支取道蓝口（龙川

西南）退向紫金，东路军第十师占领龙川。

△　李济深第八路军南路军占领惠州。南路总指挥徐景唐于1日离广州赴东江前线督战，指挥所部进攻惠州缪培南第四军。是日，徐部由博罗攻惠州，在飞鹅岭与第四军黄镇球、薛岳两师激战四小时，东路军陈铭枢部前来助战。第四军不支，退往河源，徐景唐部占领惠州城。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电日本外务省，警告勿冒国际之大不韪，再度出兵来华，阻挠北伐义师，并指出："万一复萌故态，吾中华人民必能摈贵国货物于商场以外，勿谓言之不预。"

△　山东省督办张宗昌、省长林宪祖以年关在即，需款孔急，用二五附税作抵，向青岛商会借款100万元。16日，青岛商会召集大会，公推审查委员，落实款项分配。

△　武汉卫戍司令部疯狂屠杀共产党员，自去年12月17日起至是日止，李汉俊等26人遇害，另有170余人在押。

△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第三营的一个连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萧家璧之靖卫团，县城之敌闻讯弃城逃跑，次日红军乘胜占领遂川城。

△　上午，江苏崇明县附近沙同村农民六七百人，头缠红布，手持镰刀、斧头、红旗等，冲入习艺所，释放犯人80余名，并在村镇发表演说，张贴标语，提出"建立苏维埃政府"。农民纷纷加入，队伍很快发展为3000余人。旋向镇东拥入地主家，焚毁田契。至下午6时，始各散去。

1月5日　蒋介石电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全体委员，报告已于4日驰抵首都，四中全会业已筹备完竣，请即日命驾前来，一俟到京委员满法定人数，立即正式开会。

△　蒋介石电复洛阳冯玉祥、太原阎锡山，告以4日抵宁，四中全会业已筹备就绪，一俟足数，即可开会，并表示："誓当简率军旅，会合雄师，完成北伐。"同日，并电胡汉民、孙科，"务请命驾，共支危局"。

△　国民政府电上海胡汉民，"望即遄返首都，共商大计"。

△　李烈钧对京、沪各报记者发表时局谈话，认为四中全会开会议决无问题，并谓将来蒋、冯、阎、杨四总司令同时北伐，成功乃指顾间事。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开全市党员大会，通过拥护中央全体会议、促蒋复职及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等10项议决案。

△　湘军将领李品仙、何键、刘兴、周斓电所部各官兵拥蒋反白，宣称"拥蒋即所以护党"，指责白崇禧此次侵湘，"冀割两湖两广，以为叛党犯上之根据地"。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开会议决取消军委会，派林云陔为广州市长，并议决维持金融、赈灾等五项办法。

△　杨森致电国民政府报告军队编制及军事实况，表示服从中央，请指示方略，畀以任务，并谎称吴佩孚已赴绥定。

△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〇团名义，离开犁铺头（韶关西北30里左右）前往海陆丰与叶剑英所率领之广州起义余部会合，是日在起义农民支持下，占领广东仁化县城。

△　奉天大刀会攻入通化县城。7日，奉天宪兵司令派步、骑兵各200名增援通化，与大刀会在城内激战。8日，大刀会向八道沟退去。

△　国民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兼北方前敌总指挥李景林任崔庭芳为

东北第一军军长。

△　褚玉璞所部白俄军官施罗维支凯少校，于上年12月下旬见所部铁甲车内机枪与炮队将被解散，且欠饷甚巨，乃径自赴北京拟见褚玉璞未遂，怏怏而返，于是晚抵济宁。当夜即有华兵将其从被中曳出，搜得拟上褚氏之呈文，遂不复审讯，押出营外枪毙。噩耗传出，白俄军心解体，纷纷逃往京、津、沪等处。

△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由叶镛、袁国平、徐向前率领的广州起义的部分队伍红四师到达海丰城。彭湃在会上发表演说。

△　驻津法兵司令官胡志格回国，由狄娄继任，次日，狄娄就职阅兵。

1月6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开第三十次会议，议决将查办汪精卫、陈公博等九人案移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检举，邓泽如、古应芬呈复通缉严办汪精卫案，亦一并移送该委员会。

△　国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据军事委员会呈请，议决改编西征部队为第十八军及独立第八师，任陶钧为第十八军军长，刘春荣为独立第八师师长。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国民政府以第六路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把持地盘，纵庇吴佩孚潜谋不轨，是日明令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所部交第六路总指挥刘湘、副总指挥刘文辉接收，第二十军军长职务准其遴员请简，并责成川中将领严拿吴佩孚解京惩办。

△　蒋介石派邵力子赴沪迎粤方委员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人到宁，参加四中全会。

△　晚，吴敬恒离宁悄然回沪。临行前，蒋介石闻讯曾晤吴面留。吴亦有致蒋一书留别，内有“先生之出，中外欣慰，前途光明，

将无可量”等语。

△　胡汉民致函蒋介石，表示不赴南京，并谓完成北伐及肃清共产党为今日最重要之任务。

△　孙科自沪电复蒋介石，暂不赴宁，并对时局有所指陈，略谓：“目下时局之艰危，仿佛去年之九月，而繁兴之异论，亦无异于彼时。先生究采何宗旨以解决国是，安危系于此矣。以科愚见，先生果欲拯党国于危难，则此次会议，当仍本忠实同志大团结之精神，集合党中全体领袖，以建造统一而有能力之中央干部，或幸种种葛藤能从此永断。若犹泥于法统之说，不顾事实，不言正谊……亦终陷僵局而已。”并提出不能以个人代表全党，“党事之能得良好解决，惟在征集众意，无所轩轾。苟任何人欲以党为工具，以成就其个人之功业，结果无不失败者，此尤冀我中央诸同志之自觉，而无再贻党与个人以不幸之收场也”。

△　第八路军南路徐景唐部由惠州进驻河源，缪培南第四军由河源退老隆。

△　涿州开城，北方革命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出城与安国军第三方面军第八军军长万福麟晤见，并乘车同赴保定见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面商改编涿州晋军事宜。至是，安国军倾全力围攻三月不拔之涿州城，已于是日下午开城让防，结束战事。

△　万福麟致电北京军政府军事部报告傅作义已出涿州城赴保晤张学良，涿州事件业已解决，并请将发放晋军之恩饷10万元及军装等件，交参谋长毛福成带至松林店。

△　杨森所部何金鳌、郭汝栋两师，在万县与刘湘军队开火，因杨军一部在万县内应刘军，截击何部第十九师，杨军不支，是日全部退出万县。

△　于右任著文批评李石曾“分治合作”论，认为三民主义为“现代世界最优良之主义”。略谓：“石曾先生以为世界只有马克思（或列宁）、蒲鲁东两派，而忘却除马、蒲外，尚有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可与马、蒲鼎足而三也。须知总理三民主义，富于革命性而不失其和平中正，富于实际性而不流于空阔玄虚，较之马克思、列宁、蒲鲁东等之主义，均远胜之，故现代世界最优良之主义，实非蒲鲁东主义而为孙文主义。”

1月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开临时会议，谭延闿主席，蒋介石出席，到委员13人。会议决定通电各省党部报告中央特别委员会业于去年12月28日结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本日在南京开会，中央党部即日开始办公，并电请各执监委员来京参与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函所提：一、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四人，应停止出席第四次全体会议，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分；二、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五人交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倘无处分必要，听其照常行使职权；三、第四次全体会议只能以28人计算。议决接受该项提案，留待审查，并电知广东军政长官。会议还决定于11日开政治会议第一二四次会议，政治分会问题俟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组织、宣传及海外部，由陈果夫、丁惟汾、周启刚三人维持部务。

△　蒋介石正式复职，并向国民政府呈报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日，蒋到军事委员会办公。

△　蒋介石电复冯玉祥，告以已抵京三日，部署略定，拟即日行使职权，率领部属，追随前进，以贯彻北伐初愿；同日又电复阎锡山，表示僇力追随，以竟北伐大业。

△　白崇禧、胡宗铎、夏威、陶钧联电欢迎蒋介石莅宁复职，并望“继续北伐，完成革命”。

△　湖北省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到主席张知本、委员张难先、胡宗铎、李建隆、严重及来宾300余人。国民政府派程潜监誓授印，白崇禧指导。

△　宋子文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当即对记者谈话谓：现在收入每月仅二三百万，支出须1100余万，相去甚远。

△　白崇禧所部第十三军离沪开赴武汉，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由宁开沪接防，8日下午抵沪。

△　国民党将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工统会。是日，上海工统会宣告正式成立，发表宣言，选出执委25人，陈彬、周先青、梁凤楼、周瑞昌、王瑞臣五人为常委，并聘请吴稚晖、张继、李石曾、居正、丁惟汾等20人为顾问。

△　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军队袭击山东郓城，直鲁军第二十三军杨清臣部三个旅的步炮兵猛烈抵抗，双方激战竟日，冯军始向曹州退去。

△　奉军第三十一军郑泽生部占领山西偏关，俘晋军旅长张诚德，晋军师长李德茂率部向河曲退却。

1月8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　南京各界千余人开“欢迎中央委员及蒋总司令大会”，中央委员丁惟汾等四人参加，褚民谊代表蒋介石出席。大会通过提案10项，其要者为：一、通电全国拥护中央全会，拥蒋复职；二、要求中央全会取消非法特别委员会所产生的各级党部各机关；三、永久开除西山会议派党籍；四、请中央全会立即拘捕“一一二二”惨案主从犯谢持、邹鲁等人；五、要求中央全会继续清除共产党。

△　宋子文在南京召开财政紧急会议，讨论年关筹款办法，决定苏、浙、皖各征收机关认解426.5万元，限本月15日以前分两批解

缴。

△　国民党湖北省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胡宗铎、陶钧、石瑛、张知本、萧萱、王世杰、林逸圣当选为省党部执委，范龙光、孙绳、白志鹃为监委。同日，武汉特别市党部代表大会开会，选举严重、李焕华等七人为执委，石幼平等三人为监委。

△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央特派员蒋伯诚、蒋梦麟致电中央党部，要求函请浙省政府及浙省党部一律暂停民众运动；严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聚众开会，结队游行，各地农工团体亦暂停活动，并取缔抗租、罢工，以防止共产党在浙省暴动。

△　马超俊接长广东农工厅主任，揭示六项施政准则，其要旨为解散附赤团体，严防共产党等。

△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占领河南内黄县，直鲁军第十八军袁振青部纷向大名、成安溃退。

△　傅作义到达北京，由安国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参谋长鲍文樾偕同访晤张作霖。嗣又与北京军政府军事部总长何丰林会见，商谈晋军改编及移防地点等事。

△　北京各法团、善团及总商会组织联合会，办理涿州善后事宜，拟定救济办法四项。12日，大批赈品开始由京运涿。

1月9日　　蒋介石致电国民党员及全国民众，宣布于4日驰抵首都，继续行使总司令职责，专司军令，“至于党务、政治，应由中央机关主持”；并表示“负责筹备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务使早日开会”。同日，向全军将士发出宣告复职电。

△　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报告复职，声称将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召集国民会议，早定国是。

△　蒋介石到宁后首次出席国民政府举行之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表示从今以后，不再放弃责任。同日又召集军委会各厅、部、处人员训话。

△　国民政府讨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国府委员谭延闿、李烈钧、何应钦、张之江、李宗仁等出席。此《组织大纲》原系去年5月2日由政治会议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经此次讨论，提出修改之点共有二条，第一条改为：国民政府为战时统一指挥起见，特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凡编入作战军战斗序列之陆海空军，均归统辖指挥；第七条改为：未加入作战军战斗序列之各军，仍由军事委员会直辖，但因作战上之要求，总司令得咨请军事委员会调遣之。

△　白崇禧在武汉召集第二、第三路军职员谈话，表示对蒋复职极为赞同，“北伐以来，介公遇我独厚，始终不忘其情”。并谓：“惟蒋对张（发奎）、黄（琪翔）及与粤有关诸委员，迄未表示明显态度，殊为遗憾。”

△　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甘乃光复电蒋介石，谓粤变系特别委员会所促成，今对主持特别委员会者不加弹劾，而对我等有所处置，岂能忍受？声明在此问题未解决前，暂难赴宁莅会。次日，蒋复电解释，并派宋子文、褚民谊赴沪促驾。

△　阎锡山代表赵丕廉在南京分晤程潜、白崇禧，商北伐军事。

△　广州商界开维持纸币大会，议决向各县募公债1000万元，由政府指拨相当税款为公债保证及组织募债委员会等四项办法。李济深亦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请求借款1000万元，以维持中央银行。

△　杨森电国民政府推卸庇吴责任，旋将吴佩孚等人送往大竹县笠竹寺隐居，并嘱驻大竹杨部第七师师长范绍增予以保护。

△　中共中央致函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决定以郭亮、贺龙、周逸

群、柳克明、徐特立五人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在湘、鄂边界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局面。

△　浙江特种刑事法庭在杭州枪毙共产党员八名。20日又枪毙共产党员七名。

△　日田中首相根据同蒋介石方面达成的默契，采取迫使张作霖承认满蒙悬案后令其返奉的方针，派町野（张作霖的顾问）、江藤（三井物产会社职员、张作霖的挚友）是日同张作霖开始就铁路问题进行谈判。

1月1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培德、监察委员李宗仁联名致电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陈述党务建议，强调认识主义与加强训练之重要。略谓："……明了主义以运用势力，党国乃有重心，若徒恃势力，不明主义，虽有深长之历史，而重心不定，则党员意志不统一，必易发生纠纷。"并谓：现在中央执监预备会议既决定反共绝俄，本党主义已如日月重光，凡我同志，亟宜彻底认识主义，痛自悔过。总司令既已就职，中央会议亦在筹备，所窃窃私虑者，将来之计划，非从训练入手，实无他道可循。末谓：军队与党有密切关系，则训练不难普及，军队主义化乃有可能，"总司令训练军队，请自隗始"。

△　冯玉祥于3日电请国民政府接济300万元充北伐军饷。是日，国务会议决先解百万元。

△　阎锡山电晋军驻沪代表，谓晋军已分五路反攻，妥协一节，纯系奉方宣传，请向沪、宁新闻界声明。12日，阎又以京、津报载晋派代表到京议和一事，电驻汉代表向报界辟谣。

△　戴季陶将赴欧洲考察教育，发表《告别国人书》，希望国民党诸老前辈，一致集于国都，一切行事，以总理遗教为依归，扶助蒋介石，完成北伐，领导各地当局，肃清吏治，从事建设。旋因南京中央电挽，戴未能成行。

△　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召集各级政训机关主任联席会议于南京正式开会，军委会政治训练部秘书长徐德培主席，各级政训主任40余人参加。议定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训练部，直隶于国民政府，各级政训处改名为政治训练部，海空军政治训练机关由总政训部约定办理，各独立师、旅、团增设政训机关，各军设宣传队，特种军事机关恢复政训部，恢复连指导员，改名为连政治训练员。上述各案，建议中央全体会议核议。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决议，张（发奎）、黄（琪翔）称兵广东期间之各种决议案无效；撤销各机关党代表；请广州市党部执行部复职。13日，又议决通令各党部一切民众之新组织，在中央未有办法以前，暂行停止。

△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发起召开“安庆各界庆祝中央全体执监会议开幕、蒋总司令继续行使职权大会”，到各机关团体暨全体市民共10万人。大会以“拥蒋、反共”为宗旨，会后举行游行。

△　第十九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率第一师李思炽部自武昌乘车开赴鄂南前线。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第十八军军长陶钧代拆代行。

△　涿州傅作义部改编为陆军第三十六师。是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自保定总部发出委任令，派白儒清为第三十六师师长，未到任以前，由团长袁庆增代理。

△　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对《晨报》记者发表谈话，略谓：“此次涿州被困已有三月，城内商民遭七万发炮弹之轰炸，统计此次全城所遭横死者，约有二百三十余名，涿城南北大街共有铺户二百七十四家，均受炮火袭击。调查全城损失，确在四百万以上。”并谓：“吾涿商业夙称繁盛之区，今遭此大劫，三十年内恐不能救回元气。”

△　奉天通化大刀会五六百人在于超海率领下，再围通化县城，

与奉军蔡均炳所率迫击炮队二团在城内外激战，大刀会以夺取各村落巡警、保卫团及各地总商会之武器应战，对迫击炮亦毫无所惧。各地警察受其威胁辞职者颇众。

1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开第一二四次会议，谭延闿主席，蒋介石等15名在京委员出席，议决政治会议业经开始办公，一切提案均查照向例办理，至各地政治分会应否恢复，留待第四次全会讨论；于右任、易培基加入政治会议为委员，叶楚伧被推为秘书长。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总额为4000万元（去年11月旧券2400万元，新增1600万元），月息六厘，1933年4月底还清。

△　蒋介石宴请李宗仁、何应钦、贺耀组、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蔡元培、张群、朱培德、丁惟汾等20余军政要人，详细讨论军政要务，商洽总司令部组织及进行等问题。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该部各处长等人选：总司令办公厅主任吴思豫；参谋处长葛敬恩；副官处代处长郭大荣；军法处长孙葆瑢；经理处长缪斌；兵站总监黄振兴。次日，任命张群为总参谋长，何成濬为总参议。

△　缪培南第四军于岐岭（五华与龙川之间）大败李济深第八路军东路军。龙川之战以后，第四军退紫金，以主力趋五华、兴宁，以拊东路之背，8日占五华。东路军决回师五华。9日，第四军军部及教导一师向岐岭陈济棠第十一师进攻，陆续投入兵力达四师以上，双方拉锯肉搏战凡三昼夜。至是日，东路军陈铭枢第十一军及陈济棠、钱大钧两师大败，损失奇重，分向铁场、老隆方面退却。

△　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辞职获准，北京军政府外交部派严鹤龄暂代该校校长。

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一四次会议，丁惟汾主席，到蒋介石等13委员。褚民谊报告粤方五委员来宁经过。议决令纠纷较多之皖、闽、滇、鄂等省党部停止活动，候四中全会解决；纠纷较少之浙江等省党部，承认其暂维现状；苏省党部由组织部派员接收；绥远特别区党部，由商震等九人办理；其余各省党部，由组织部分别办理。

△　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五粤方中央委员抵南京。

△　褚民谊在南京对记者谈去沪劝驾情形：一、甘乃光、李石曾因病不能来宁；二、何香凝、王乐平、王法勤、陈树人、潘云超已到宁；三、胡汉民、伍朝枢、吴铁城、孙科等人准备赴欧美考察；四、吴敬恒不来宁与会；五、邓泽如在沪谢绝会客；六、古应芬、萧佛成均不在沪。并谓："予以为四次会议能出席者，无论意见如何，大家都要出席，一切党的纠纷，应该在会中解决。"

△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名义，发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一带农民，在宜章举行暴动（亦称"年关暴动"），推翻国民党县政权。次日，宜章县城开群众大会，到五六千人，朱德宣布暴动成功。会后，起义军改编为中国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两个团，第一团为南昌起义部队，朱德兼团长；第二团为宜章起义农军，胡少海任团长。

△　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通电奉命北伐，已饬所部陆续北开，移至信阳、驻马店、确山、西平一带。方本人已于11日移驻信阳。

△　第二路总指挥白崇禧、第四路总指挥程潜以湘军将领李品仙、何键电请弭兵后，仍在平江、岳阳增兵备战，故决以西征军第七、十九、四十四、六各军为主力，直下长（沙）、岳（阳）。动员令下后，3日起第七军第一师李明瑞部自武昌南湖出发南开。是日，

第四十四军于乌口附近，第六军于新店镇附近，第十三军于羊楼司附近，第七、十九军于通城附近，均已集中完毕，准备对湘作战。

△　傅作义部自涿州开拔，是日首批1700余人开往通州。次日晨7时，傅军旅长白儒清带领三个团全部出城，乘车至丰台后，徒步开赴通州。

△　北京军政府开国务会议，军事总长何丰林报告各路军情及涿事解决情况。内务部以涿州灾情深重，提请讨论急赈办法，议决由内、财、农、实四部会同派员调查，并准免本年各项粮赋捐税。当即拟具令文，由张作霖即日明令发表。

△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通告全省各级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由局部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并将全省划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地区，以渭华地区为暴动的重点区。要求各区沟通情况，协同作战，灵活地指挥各区的游击战争。

△　上海百余家丝厂营业亏折甚巨，无力支持，向政府请求救济，是日，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电请国民政府指定二五附税项下余款部分为保证，并令财政部电中央、交通两银行会同银行团于阴历年内分任借款。

△　张作霖派宪兵司令齐恩铭率队讨伐通化大刀会。

△　奉天通化县大刀会七八百人同官军交战，大刀会死伤50余人，官军官兵死伤百余人。柳河方面，亦有大刀会与官军作战。

1月13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第一次谈话会。到执委17人，监委二人，谭延闿主席。会议以沪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推定之各组审查委员及宣言起草委员，均未进行工作，议决加推邵力子等四人为“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起草员，加推丁惟汾、柏文蔚、蒋介石、于右任等13人分任“中央党部各部组织

案”及“确定整理党务根本计划案”、“政治委员会组织案”、“改组国民政府案”各案审查委员。每案由一人负责召集（“改组军事委员会”、“改定军事系统”、“改良军队政治工作”三案审查委员会，由蒋介石召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日期问题，决定先开一次预备会议，待各案审查完毕，再开正式会议。开会日期，由蒋介石决定。

△　国民政府举行第三十二次会议，谭延闿主席，到李烈钧等15委员。议决嘉勉蒋介石复职，奖励北伐军指挥作战有功人员军师长顾祝同、徐庭瑶等八人。国民政府党委、军委会主席团报告《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议决专案讨论。

△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移驻新乡督师北伐。

△　涿州傅作义部第四师7000人，至是日止全部移驻通州完毕，涿州由万福麟之第十七师入城接防。

△　广州国民党军政各界举行欢迎李济深大会，到数万人。李济深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通过12项议决案，其要旨为：一、拥护李主席；二、从速肃清张（发奎）、黄（琪翔）叛军；三、请政府彻底严办汪精卫、陈公博等；四、请中央制止汪精卫、陈公博、何香凝、甘乃光、陈树人、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九人出席执监会议。会后游行。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高桂滋所部新编第十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

△　军委会各级政训主任联席会议闭幕，通过对于时局之宣言，主张：一、促开四中全会；二、继续贯彻清党；三、拥蒋复职；四、完成北伐。

△　奉天通化大刀会因官军进剿日急，自通化退走，随后又在临江、桓仁、辑安、柳河各县蜂起。

1月14日　何应钦、贺耀组因处置苏、沪桂军问题意见分歧，是日何不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谈话会，贺亦表示不问津浦线战事。蒋介石对此事极为愤懑，向谭延闿等谈称：倘各方互挟己见，不改畴昔态度，本人唯有再下野以谢党国。

△　国民党中央委员白云梯电各方人士，略谓此次入都，原为报告蒙古革命状况及促成四次中央执监大会起见，而入都之后，失望非常，险象环生，一触即发，吁请各方以主义为前提，捐弃个人意见，早开四中全会。

△　北京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复偕同外交总长王荫泰、军事总长何丰林、实业总长张景惠、教育总长刘哲等阁员联袂赴保定，与直督褚玉璞及军团长张学良磋商直省民政事宜。16日，由保定回京。

△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130人出席，吴超主席。选举正式省党部执监委员及出席全国第三次党代会代表。唐德安、黄圣祥等10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蒋特生等七人为监察委员，选举吴超等九人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月15日　李济深第八路军西、南两路军于潭下墟（五华县城西30里）大败缪培南第四军。10日，李济深第八路军西路黄绍竑及南路徐景唐两部桂军于紫金会师，决分左、右两纵队分向潭下、水寨（五华东南）前进。14日，双方在潭下墟发生遭遇战，兵力均各在四师以上，血战两昼夜。是日，桂军全线出击，粤军第四军以久战疲乏，大败而退，第四军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被击毙，教导第二师师长黄镇球受重伤，双方伤亡达二万人以上。第四军经五华、老隆向赣南退走，桂军亦无力追击，至是第一次新粤桂战争（1927年12月18日开始）宣告结束。

△　国民政府委员孙科致函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条陈粤省军事、经济、政治办法：一、吾粤军事，务当于最短期间迅速求

结束，裁汰不必要的军队，保留精良军队六师；二、关于经济，分政府财政及社会经济。“本党现为执政党，最多利用现有政权以提高农工之生活……此今日民生问题最扼要之点，尤愿先生注意及之”。三、政治方面，“鄙意以为今后之省政府与县政府，当设参事会为训政实验机关，使人民渐次养成民治之观念与习惯”。

△　西征军第四路军叶开鑫所部第四十四军先头部队，在海军第二舰队协同下，攻克城陵矶。

△　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十二师赵观涛部占领郯城，直鲁军方永昌部向蓝山溃退。

△　北京京师总商会召集各业董大会，王文典主席，议决呈请政府拨款赈济涿州，并恳明令取消奢侈捐。

△　津浦铁路第二十次南下之特别快车在德州附近与北来之军用列车相撞，引起军火爆炸，死伤军民达数百人，中有旅长一名。

△　杨森所部军队于夜间纵火焚掠宜昌，延烧数千户，次晨火犹未熄，人民生命财产惨遭损伤。

1月16日　蒋介石在中央党务学校演讲《一切政治制度要以〈建国大纲〉为基础》，要求学员时刻不忘却《建国大纲》，要口诵心维，反复研究，以为将来实行的准备；并谓“我们要以主义为生命，头可断，身可死，主义不可弃”。

△　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成立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组织”及“策定整理党务根本计划”两审查委员会开第一次审查会，丁惟汾主席，议决由四中全会选出常务委员九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中央党部组织照旧。

△　国民政府议决设立侨务局，简任钟荣光为局长，是日，钟于上海就职，局址设上海。

△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电请中央常务委员会速派各改组委员来浙接收省党部。26日，中央常务会议议决先着陈希豪、洪陆东两委员即日前往接收。2月4日，陈、洪正式接收浙江省党部。

△　上海英美烟厂罢工事件，经财政部长宋子文调解，劳资双方于是日晚在宋公馆正式签订劳资互助条约12款，规定职工依法组织工会，不得无故开除职工，厂方负担工人子弟学校经费，职工米贴由八元改为五元起算，女工产假定为六星期，厂方指定医院为职工治病，并负担医药费用，因公亡身者给予抚恤费1500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次日，烟厂男女9000余名工人复工。按：该厂工人自去年9月30日开始罢工，历时三月之久。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致电驻美公使施肇基，声明赞成改订《中美通商条约》，并令其为交涉代表。按：《中美通商条约》将满期，国民政府驻美代表李锦纶向美国政府提出改订条约，美政府表示，若南北两政府一致，始可进行。李遂与施商议，经施电北京请示，故有此举。

△　安国军第六方面军军团长吴俊陞衔张作霖命自京归奉，亲率黑军第二团、骑兵第一、二连约2000名，前往通化讨伐大刀会。是日晋京向张作霖报告派队围剿情形并请示办法。19日始督队出征。

△　驻廊坊安国军第五方面军骑兵第十三师一个旅开赴通化讨伐大刀会。18日，自黑龙江南下之黑军步兵一团过奉，亦开赴通化往剿。

△　驻哈尔滨日本总领事八木元八联合美、法、英、意、丹、葡各领及荷代领、比副领事，就东省特区地亩管理局为整理地亩执照并限制地亩主权转移所发之五十、五十一两布告，向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递交抗议照会，声称：该布告所列各款，“均与各本国侨民应享条约之利权殊有妨碍……自应视为对于各本国侨民绝难实用”。

1月17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军委会呈送《陆军编制草案》准予备案；财政部拟具《征收卷烟统税条例》即予公布；司法部呈复《审查最高法院修改民事、刑事诉讼律意见》照案通过。会议决议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南省政府；省府委员冯玉祥、孙岳、鹿钟麟、薛笃弼、靳云鹗、方振武、凌勉之、刘治洲、戴修瓒、梁寿恺、刘镇华均免本职；鹿钟麟、薛笃弼、凌勉之、刘治洲、戴修瓒均免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司法各厅厅长职务，任命冯玉祥、孙岳、刘镇华、方振武、梁寿恺、薛笃弼、魏宗晋、江恒源、庞炳勋为省府委员，指定冯玉祥为主席；任命薛笃弼、魏宗晋、刘镇华、江恒源分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命龙云、范石生、胡瑛、金汉鼎、陈钧、张维翰、马聪、丁兆冠、张邦翰为云南省政府委员，指定龙云为省府主席；任命丁兆冠、陈钧分兼云南省民政、财政厅厅长。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云南省政府后，特致电龙云、周西成两军长及滇、黔两省政府，以滇、黔两省唇齿相依，为西南边陲之安危所系，务望团结一致，共济时艰，“相亲相爱，各保安宁”。

△　西征军占领岳阳。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率大队于15日由聂家市向云溪（岳阳东面）湘军第三十六军第二师进攻，陈绍宽亦率海军第二舰队协攻，湘军于水陆夹攻下，向汨罗溃退，西征军于是日占领岳阳。

△　冯玉祥部连日来与直鲁军在河南汤阴、彰德激战，是晨冯部第一方面军孙连仲率部攻占彰德，郑大章骑兵部占领丰乐镇，河南境内之直鲁军完全肃清。

△　傅作义自保定发出下野通电，宣布“谨即束身引退，以谢国人。大局稍定，言还故乡”。

△　张作霖决定命张作相同日本签定“满蒙新五路”承包合同，并提出三项条件要求日本承认：一、日本方面在一定期间内要严守秘密；二、不要各线问题同时着手，要一条线或两条线地逐步着手；三、政治上取得联系。2月1日，张作相自长春到北京。

△　云南省议会设立“清共委员会”。

△　中日法权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中国委员郑天锡、日本委员掘义贵出席。

△　武汉卫戍司令部闻共产党员贺龙、董用威（必武）、向忠发、陆沉、陈潭秋等将在汉举行年关暴动，宣布自本日起特别戒严10天。武汉市公安局亦出示布告，强令市民“举发共产党”。

1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五次会议加推杨树庄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　第四路总指挥兼第六军军长程潜由武汉出发，次日到达岳阳，召集第六军、第四十四军各将领开会，旋饬令各部向汨罗追击。

△　熊式辉到上海就代理沪淞卫戍司令职。所部第十三军第一师亦自无锡调沪。

△　中日修约专门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中国委员唐在章、日本委员掘义贵出席，续议通商航行问题。

1月19日　西征军第七军占领平江。21日，海军第二舰队攻占湘阴。

△　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郭泰祺照会驻沪日总领事矢田抗议日本出兵山东，警告日政府“出兵如果实现，其结果若发生事端，其责任应由日本政府负之”。

△　张作霖任命梁国栋为热河道道尹。

△　奉天东方社电称，揭橥全省公民团军大旗之大刀会，在通化、临江及其他各县，以公立联村会长名义张贴布告，以不侵良民为标榜，商、工、农民中参加者颇众。

1月20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议决颁布《北伐全军战斗序列令》，其要旨为：（甲）北伐全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统辖指挥之；（乙）北伐军之兵力，以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北方革命军之作战军、海军之作战军及航空军全部任之。

△　阎锡山致电国民政府，拥护《北伐全军战斗序列令》，愿率所部北方革命军听候蒋介石指挥。冯玉祥、杨树庄亦分别电蒋表示拥护。

△　驻鄂西第二军鲁涤平部占领沙市，杨森军向宜昌撤退。

△　江西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贫农王次淳当选为政府主席。此系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　共产党员古大存等率农军攻占广东五华县塘湖、石溪两乡。

△　福州发现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执委会、共青团福州市执委会传单多起。24日，又发现中共福州执委会、共青团福州执委会《为列宁逝世四周年纪念告农工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书》，及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工兵政权等标语，邮局并查获自沪、宁寄来《红旗周刊》等宣传品。25日，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因传闻共产党元旦暴动，由上海回省坐镇。

△　自是日起至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卫戍区四出搜捕共产党，破获共产党机关两处，逮捕共产党员260余人，枪毙多人。

1月21日　国民政府特派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

任命陈焯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胡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孟坤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军长。

△　西征军向湘军发动全线总攻击，第七军强行渡过汨罗江，突破湘军第八军及独立第一师在南岸之防线，于天岳山一带将其击溃。第十九军于汨罗江中与湘军遭遇，经数小时之争夺，双方死伤甚重，湘军不支，退走永安市，第十九军跟踪追击，直逼长沙。当夜，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在岳阳黄沙街叛变，与湘军李品仙部结合，图袭西征军第六军侧面，第六军损失甚重。旋经程潜、白崇禧调三、四路军包围叶部，至23日始将叶部解决，俘虏6000余名，缴枪万余支，残部退向浏阳。

△　国民政府电勉刘湘、赖心辉，望维持川、滇、黔局势。

△　湖北应山县千余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暴动，于是日攻城，县长何浩率队抵抗，未克。

△　日本派兵舰至大冶，次日水兵上陆进大冶铁矿山示威，抗议国民政府接管该矿。

1月22日　晚，广州卫戍司令部派兵一营，会同公安局保安队侦缉队百余名，赴长堤八旗会馆，借口“受共产党运动”，将第十三师第三十九团特务队缴械，遇到激烈抵抗，双方接战半小时，军警卒攻入会馆，击毙特务队兵士50余人，捕获百余人，队长冯鹤亭已先期出逃。旋即向东郊出发，会同驻市第十三师第三十九团及守备队一、四、六各团共800余人，抵东川马路红花岗寺贝底东山一带，围攻共产党机关，共产党员起而抵抗，至次晨5时始撤退，计击毙共产党员数十人，又在东郊警区辖内拘获共产党员90余人，警区辖外捕获百余人，共搜缴枪械两百余支，及大批红旗、标语、传单。

1月23日　湘军退出长沙。自21日西征军过汨罗后，各路湘军节节败退，前线无兵补充，长沙不能再守，湘军临时军事委员会遂于22

日早下令总退却，计左路叶开鑫部退宁乡，中路刘兴部退衡州，右路李品仙部退醴陵，第十七军周斓部退宝庆，第十八军何宣师、第三十五军陶广师退湘西，省垣秩序由何键督率第八团暂行维持。是日，前线湘军纷纷过省，各向指定地点退却。同时，何键召集长沙各法团代表开会，讨论维持省垣治安事宜，当经议决设立长沙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由各法团组织；推派五名代表前往汨罗、苦竹坳等处欢迎鄂方军队入省。

1月24日　　蒋介石电告各地中央委员，四中全会定于2月1日开会，请于1月29日到京，以便召开执监联席会议解决四中全会之各项手续及各审查案。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镇华军为肃清漳河以南之直鲁军，是日第一军万选才部由濮阳进攻朝城、观城，第四军第三师刘茂恩部由清丰攻南乐，第二师徐鹏部由内黄攻元村镇之敌，26日拂晓乘机往攻南乐，鏖战竟日，将敌军迫入城内。30日，第三师、第二师分别占领南乐、元村。

△　北京军政府与日本南满铁路公司秘密签订吉会铁路500万元合同。

1月25日　　国民政府常委胡汉民、孙科及委员伍朝枢依照前外交委员会议决，派赴亚、非、欧各国考察政治、经济，是日由沪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船启程。

△　西征军占领长沙。21日，第三路第七、第十九、第十三各军渡过汨罗江后，在三眼桥、鲁肃山、张家碑一带与湘军激战两昼夜，将湘军第八、第十七、第十八、第三十六各军及第三十五军之一部击溃，俘虏湘军1.5万余人，缴枪1.2万支，机关枪50挺，大炮20余门，是日完全占领长沙。湘军残部分向株洲、衡阳逃遁。

△　安国军将领在北京开军事会议，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

褚玉璞等出席，会议决定全力对付冯玉祥，并以韩麟春卧病未愈，三、四方面军团悉由张学良主持。经张学良商承张作霖同意后，由杨宇霆兼代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驻保定指挥军事；万福麟各部悉数南调。磁州为最前线。次日，军事会议闭幕。26日，孙、张、褚分返津、济。

△　内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致函蒋介石，请于国民政府下添设蒙藏部，以代行处理北京政府蒙藏院各项事宜，是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交四中全会解决。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议决整理广东全省金融办法四项，规定自26日起，全省一切征收均以八成现金、二成纸币缴纳。

△　奉天省长刘尚清奉北京军政府命令，通令各县严厉取缔大刀会，防其蔓延。是日，齐恩铭奉吴俊陞命率队赴四道沟继续讨伐。

△　捷克轮“辟拉掰号”载运张宗昌向牛庄某德国洋商行订购之枪九万支、子弹数百万发、铁甲车一辆运往青岛，是日行至山东海面，为国民政府军舰“飞虎号”发现，立发停轮信号，捷轮不遵，“飞虎”轮开火轰击，双方互击三小时，后捷轮开抵青岛。

△　新任中国北部英军总司令怀德洛甫少将乘轮抵沪。

1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六次会议，蒋介石等九人出席，议决要项为：令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在云南厉行清党；浙江省党部呈送《共产分子自首条例》六条，议决交组织部审查决定办法；派陈希豪、洪陆东接收浙江省党部。

△　张作霖任杨宇霆暂代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31日，张学良偕杨宇霆由北京抵保定。

△　南京成立军官团，专收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及军官研究所各

期毕业生之无工作者，蒋介石自兼团长，是日开始办公。

△　西征军第十九军占领浏阳。

△　鄂西驻军魏益三部第三十军，于本月21日起自荆门团林铺一带向大小烟墩集等处进攻，与杨森军激战三昼夜，于是日晨占领当阳县城。

△　广州卫戍司令部在西关吉星里捕获共产党员七人，搜出重要文件一束，内有苏维埃政府传单及春节暴动布告。27日，又在贤藏街、大德路破获共产党机关两处，捕走男女六人。同日，广州公安局于东校场枪毙共产党员11人。

1月27日　　国民政府第三十五次会议议决案九项，其要项为：一、修正《大学院组织条例》、《各大学区组织条例》，简任杨铨（杏佛）为大学院副院长；二、《反革命治罪条例》，送中央党部核准；三、着财政部速拨二五库券250万元、现款50万元，接济第三集团军战费；四、任贺耀组为首都卫戍司令，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处长张静愚兼北伐航空司令，郭汝栋继杨森任川军第二十军军长，仍归第六路总指挥刘湘节制。

△　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国民政府对海关态度宣言，称：国民政府现统辖21省之16省，所收关税约占70%。北京政府又非前经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政之权，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

△　白崇禧抵长沙。次日，程潜由汨罗乘车到省。程、白两总指挥以李品仙、刘兴两部退走湘南，何键困守湘西，决定分兵追击，令第六、第十三两军留守长沙，以第七、第十九两军为主力，向株洲、衡山追击。

△　国华银行在上海开幕，资金200万元，后增至400万元，系商

业银行，多为南洋华侨投资。

1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整理党务根本计划审查会开会，丁惟汾主席，中执监委丁超五、白云梯、王乐平、郭春涛、朱霁青、何香凝等参加，通过整饬党纪方法提案13条、整理各地党务提案九条、训练党的人才方法提案五条等。

△　北京军政府新任土默特总管葛光庭返京，次日，访张学良报告绥远情形。

△　通化大刀会向官军无条件投降。30日，吴俊陞自通化赴临江，继续讨伐缉安、桓仁、临江一带之大刀会。

1月29日　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祺接见路透社代表，解释宋子文27日之宣言，谓：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在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又谓：易纨士南下，已得国民政府同意，惟国民政府不承认其为代理总税务司。关于海关之新任命，表示非由上海税务司梅滋荐举，国民政府碍难承认。

△　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安局布告：市政府设计委员会已决定将本市租界改为特别区，计分五区，即以公共租界原定之东、西、北、中四区为特别区之东、西、北、中区，以法租界为南区。

1月30日　28日胡汉民抵香港时，李济深、黄绍竑曾交由冯祝万转致一函，对于军事、政治、党国各事，有所征询。是日，胡于赴菲律宾途中复书李、黄，告以今日革命之需要，在恢复党的整个精神与主义之实现，应以互让精神，免除互争习气，并对李石曾所提“分治合作”口号有所辨正。

△　第四军将领缪培南、邓龙光、薛岳联名通电称，该部已安全集中江西雩都，听候中央复命。

△　第二集团军刘镇华部占领大名，俘虏直鲁军孙殿英第十四军7000人。

△　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商震部在偏关附近击溃奉军郑泽生部，俘虏4000名。

1月31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在南京开会，蒋介石主席，到执监委员20人。议决：一、前经中央监察委员会检举之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五委员应照常行使职权；二、定2月1日下午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

△　国民政府第三十六次会议议决任命蔡元培为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胡汉民及孙科等一行抵马尼拉，受到旅菲侨胞热烈欢迎。胡汉民于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呼吁侨胞拥护北伐，以统一国家。

△　湘鄂政委会开第七次例会，议决在湘设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驻湘办公处，派李隆建委员率同民、财、外交各处人员到湘，襄理一切政务。是日，李隆建偕同随员赴湘。

△　鄂西驻军李燊所部第四十三军、魏益三部第三十军、鲁涤平部第二军占领宜昌县城，杨森部退向秭归。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克复曹县。上年12月2日，吉鸿昌师及马鸿逵军围攻曹县刘镇华部叛军姜明玉部。曹县城势坚固，难以攻入。乃用坑道轰城法。历时近两月，是日坑道爆发，城垣崩陷八丈余，奋勇队争先登城，共俘姜部一军之余，姜明玉自戕。第二集团军鲁西战事暂告结束。

△　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占领观城。

△　朱培德致电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请负责堵截缪培南第四军，略谓：“张（发奎）、黄（琪翔）残部扰及赣边，已飞令第三军驰赴赣南截击，请饬贵军在闽粤赣边防堵，免使回窜。”

△　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赴北京军政府向国务总理潘复辞行，并对南下赴宁一事同潘复有所商榷。次日，潘复会见新闻记者，谓：“易纨士之南下，系奉政府之命，以总税务司资格，调查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之海关状况。”

△　驻华美公使马瑞慕访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谈中美修约事。

△　驻沪英军司令邓坎离沪乘轮船返国。

△　日本海相冈田命令前由佐世保派遣之特别陆战队200名由青岛归国。

△　挪威轮船“布拉戛号”装载捷克军火步枪四万支（每支附以500发子弹）在秦皇岛起卸。

是月　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向比利时驻沪领事转驻北京比使，请要求拒绝借现款110万元与北京军政府。

△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电令江海、镇江、苏州、金陵各关禁止铜元出口。

△　蒋介石以湘鄂、宁汉战事均已告一段落，致电白崇禧、程潜，略谓：“目下北伐时机正属适宜，务抽选五师，参加北伐。”旋白崇禧、程潜通电，拒绝蒋介石要求，主张停止北伐，俾克努力休养民生，召集正式国民大会，以解全国纠纷。

△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农民起义。起义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并先后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和横峰县委。5月，在弋阳县召开第一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弋阳苏维埃政府。嗣后又成立了横峰苏维埃政府。

2　月

2月1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在南京开会，出席中执委19人，列席中监委六人。蒋介石主席。决定2月2日上午10时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开会式，3日开议；推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为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主席团。

△　国民党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审查委员会”开会，决定：国民政府委员为35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常务委员五至七人，互推一人为主席；国府下设八部、三院、两局、两会，为：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教育八部，监察、审计、考试三院，蒙藏、侨务两局，建设、军事两委员会。同日，“中央政治会议审查委员会”开会，议决：政治委员会暂存，政治分会专理党务。“军事提案审查委员会”开会，商定：统一全国军政，规定全国各军及省防军数目、编制、任务，不恢复党代表制，提高各级政治训练部、处之职权，严定政治工作人员之资格。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第一二七次会议，蒋介石等17委员出席，蔡元培主席。根据孙科、张静江等11委员提议，议决设立建设委员会；通过修正建设委员会组织法；确定建设委员孙科、张静江、李石曾、孔祥熙、叶楚伧、宋子文、郑洪年、魏道明、陈立夫、曾养甫、王征等常委；建设委员会经费定为五万元，由委员会筹集。

△　杨宇霆、张学良在保定召集对冯军事会议，安国军将领出席者为第八军军长万福麟、第十军军长王树常、第十一军军长刘伟、第十五军军长汲金纯、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二十九军军长戢翼翘及军团部参谋长鲍文樾、总参议岳兆麟等。席间讨论军事计划，决定对冯

玉祥军队采取积极行动，以万福麟、戢翼翘及于学忠（第二十军）担任攻豫前锋队，东路方面由直军及团防军联合，与京汉线奉军取一致行动；奉军总副指挥，分别以万福麟、戢翼翘充任。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议决加派谢瀛洲等10人为省党部改组委员；派孙科为建设厅长，未到任前，由吴铁城代理。

△　桂军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抵汕头，当晚于汕头第八路总指挥部行营召集军事会议，讨论韩江上游军事及向闽、赣发展计划。据各军报告，第四军经寻邬、安远入赣者有五六千人，黄即席决定调一纵队伍廷飏部、二纵队黄旭初部、三纵队吕焕炎部克日向韩江上游开拔，一俟集中粤边后，一路以钱大钧、王文瀚为主力入闽，一路以黄旭初各部为前锋入赣。黄本人即率队驰赴韩江上游督师，追击第四军。

△　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部脱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由河南开抵江苏砀山加入第一集团军，并派参谋长杨可东赴徐州见蒋介石、何应钦接洽北伐。

△　原程潜第六军留守广东的第十八师苏世安部奉命自韶关北上，协同西征军夹击湘军，防堵李品仙、何键部队南下。是日，苏部向耒阳前进，在湘江附近，与李品仙部已有接触。

△　红军占领坪石。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共3000人，撤离宜章，1月31自圣公坛（宜章南40公里）向岩泉进发，是日同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五个团兵力相遇，激战两小时，许部不支，退向坪石。红军乘胜追击，占领坪石（广东韶关县属），歼敌1000余人。坪石大捷，为湘南暴动打开了胜利局面。

△　浙江省政府通令各属，凡民众运动，非经政府核准，不许举行。

△　驻华德公使卜尔熙向北京外交团声明，德国预备加入禁止军火运华协定。

△　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离北京南下，英使蓝普森同行。行前，易纨士曾致北京军政府财政部三税务节略，其大要为：列国承认中国自定税则，分步骤进行，第一步，二五附税改海关征收，进口货一律增至一二·五，将二五税取消；第二步，在上海开税率委员会。

△　国民政府财政部以芜湖税务司贾士（又译加斯特）不遵命令，滥用职权，封锁海关，下令免职，并训饬所属各税务司，此后如有违令者，一律惩处。

△　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共产党员23名，枪毙孝感县共产党员一名；8日枪毙共产党员六名；14日破获汉口共产党机关一处，逮捕共产党员13名，15日续捕四名。18日破获汉口共产党机关一处，逮捕共产党员13人。19日，在汉口逮捕共产党员四名，枪毙共产党员21名。

△　武汉公安局邀请各界商议官民协助“清共”办法，责成民团随时侦缉报告，知情不报，以“附共”论罪。

△　湖北省黄冈县共产党率数百人进攻团风镇，与团防激战数小时，团防不支，适省军赶到，共产党始退。次晨，省军追至回龙山，枪毙共产党员五人，捕嫌疑犯10余人。

△　长江华轮复航（去年8月起停航）。

△　日本在台湾实施《台湾土地改用总则》。

2月2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上午10时在南京举行开会式。白云梯、张静江、李烈钧、蔡元培、陈肇英、黄实、柏文蔚、朱培德、何应钦、丁超五、宋子文、潘云超、朱霁青、陈树人、经亨颐、于右任、邵力子、褚民谊、陈果夫、蒋介

石、何香凝、李石曾、丁惟汾、王乐平、王法勤、缪斌、谭延闿、郭春涛、李宗仁出席。于右任主席。蒋介石致开会词，称四中全会是在推翻了共产党之后，本党团结起来召开的，可说是“本党中兴的一个会”，今后的惟一工作是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国民会，欲达此目的，必须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铲除共党的理论与方法；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做军阀的后盾来破坏革命势力的，仍然是同反抗俄国一样来反对他。

△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第二次谈话会，中执委21人出席，中监委八人列席，蒋介石主席，决议组织外交方针讨论会，推定于右任、李烈钧、蒋介石、宋子文等七人组成，谭延闿召集。四中全会决发《对俄民众宣言》、《对日宣言》、《对弱小民族宣言》、《对国民宣言》、《对党员训令》。

△　下午，整理党务审查委员会开会，决定中央党部除宣传、组织两部及秘书处不予更改外，请增设训练委员会、民众运动委员会以代替农、工、商、青、妇五部。当晚，蒋介石召集外交方针讨论委员会开会，磋商清党后外交方针。

△　西征军在长沙开联席会议讨论军事、政治问题，决定分湘南、湘西两路追击湘军：由白崇禧、程潜分别指挥湘南方面；由白指挥第七军夏威、第十九军胡宗铎，一由湘潭沿朱亭进攻衡阳，一由醴陵取道茶（陵）、攸（县），抄攻衡（阳）、郴（州）；一由湘乡取道宝庆（邵阳），会攻衡（阳）、永（零陵），并以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向成杰部开往湘潭、湘乡，为衡（阳）、宝（庆）间总联络。湘西方面：由程指挥第十四军陈嘉祐及第六军之一部，一由宁乡攻益阳、沅江，一由汨罗、白马寺夹攻沅、益。是日上午4时，各队自长沙分途出发。

△　黄绍竑与陈铭枢在揭阳会晤，商妥入赣战略。会谈后，陈乘轮赴汕头，黄转梅县，率西南两路入赣。

△　第八路总指挥李济深所属之第三十二军钱大钧部于上月26日至五华追击缪培南第四军第十二师吴奇伟部，是日进驻蕉岭，吴部向定南败退。

△　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秦德纯率部进攻孙殿英部直军，是日占领卫辉县城，孙军全部被俘，同时并俘获军长任增祺、旅长张玉玺及团长以下军官300余名，机关枪百余挺，迫击炮200余门，炮弹5000余发。

△　驻防滑县之直鲁军徐鹤亭旅及赵殿元团，响应冯玉祥，退出内黄、濮阳、清丰、南乐等县，冯军随即占领。

△　冯玉祥电令各军严密查拿共产党，规定：于本年1月1日起，凡讯明有据者，押送前来，定实行枪决。

△　共产党员、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兼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被捕，6日在广州黄花岗就义。

△　河南省政府通电指斥张作霖将“肇和”、“海琛”二舰运至旅顺请日本修理，吁请分途进讨，“务于最短期内，直捣奉鲁巢穴”。

△　吴佩孚在大竹设“大帅行辕”，挂“讨贼联军总部”招牌。

2月3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举行首次会议，中执委员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李烈钧、戴季陶、褚民谊、何应钦、柏文蔚、丁惟汾、周启刚、宋子文、白云梯、朱霁青、经亨颐、丁超五、黄实、朱培德、缪斌、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陈肇英23人出席，中监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邵力子、陈果夫、郭春涛、潘云超八人列席。谭延闿主席。决议：一、开除隶属共产党之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六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屈武、邓颖超七人党籍；中央执行委员附逆有据而开除党籍者一

人，已故者二人，停止职权者一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附逆有据而开除党籍者一人，已故者一人，停止职权者一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补为中央执行委员者10人，为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二、开除隶属共产党之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江浩党籍；由候补中央监察委员黄绍竑递补。三、改组中央党部案照陈果夫、丁惟汾、蒋介石所提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并各项特种委员会之提案通过。

△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下午续开全体会议，中执委员21人出席，中监委员八人列席，于右任主席。决议：一、政治委员会改组案：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仍可存在，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各分会应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处设立分会，其政治指导区域，广东、广西属广州分会，湖南、湖北属武汉分会，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其余各省概由中央政治会议处理之；《政治会议组织条例》及《政治分会条例》，交中央党务委员会修订。二、国民政府改组案：改组国民政府审查委员会所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除第五条略有变动、第七条保留下次讨论外，其他十条均修正通过。

△　北京军政府国务院总理潘复邀外、财两界要人及以前参与关会各人物，在宅内会议关税事务。决议：一、关于实施过渡关税办法，以原定关税自主期迫，在关税自主期前之过渡税率，亟应图早日实施，决由税务处去电上海，训令到沪之易纨士，着其在沪接洽实施过渡税办法；二、决组“关税自主委员会”，以潘复、夏仁虎、王荫泰、颜惠庆、顾维钧、李思浩、沈瑞麟、梁士诒、阎泽溥为委员，钱泰、严鹤龄、袁永康、金焕章为专门委员。

△　湘鄂政委会讨论地主、佃农间之租课问题，议决暂废止二五减租条例，仍以地主与佃农间自由意志规定之租约为准。19日，政委会通令各县遵照。

△　第八路总指挥陈铭枢以粤境战事即将结束，自梅县班师，取道汕头回省。12日，广东省、市党部欢宴陈铭枢等，军政要人赴会者200余人，吴铁城致欢迎词，陈演说东江作战经过，对于党务力主服从中央，勿信流言。

△　湖北枣阳县共产党率四五百人，图扑县城，樊钟秀派兵一营，与战于县北五十里寨附近，县长余花楼亲往前线指挥，饮弹毙命，旋得樊加派景团长率队来援，始击退共产党。

△　朱德、陈毅率部队于2月2日离坪石北上，当晚到达白石渡，郴州守军何键部于折岭（郴州以南宜章以北）设防。红军翻山越岭，在折岭一带包围何军，是日下午，激战三小时，何军不支，向北溃退，红军直追至郴州良田，全歼何军，毙何军副师长一名，旋向郴州进发。

△　奉军剿平大刀会，袭击通化附近之二村大刀会根据地，凡12岁以上之男子，悉被屠杀。

△　意大利驻沪总领事答复江苏特派交涉员抗议意以步枪四万支售与张作霖事，称已电询本国政府，并无其事。

2月4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于上午9时开会，中执委员23人出席，中监委员八人列席，蒋介石主席。决议：一、南京“一一二二”惨案，由政府所组织之法庭依法审判，死伤各员另由政府参照党员抚恤条例从优抚恤。二、修正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

△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下午继续开会，谭延闿主席。决议：一、改组军事委员会、改定军事系统及改良军队政治工作三案，以“对总司令之权限及其与军委会之关系未有明确规定”，决定

重付审查后再提交大会讨论；加派戴季陶、何应钦共同审查国事三案。二、修正通过“整理党务根本计划”审查委员会提出之《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丁惟汾、陈果夫、蒋介石所提整理党务计划交中常会讨论，以本日通过之《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之各条为原则。《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党员重新登记及整理事宜。

△　下午2时，西征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向成杰部与湘军第三十六军在小田冲、石狮寨接战，湘军不支，向永丰、宝庆退去，向部遂占湘乡县城。

△　湘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程潜主席，议决：一、派陈嘉任、刘岳峙、刘召甫、张定分任湖南民政、财政、建设、教育事宜；二、取消军事、司法、土地三厅；三、民、财、建、教四厅，限各委员于5日前往接收，正式办公；四、对外文件一律用湘鄂临时政委会名义，由主席程潜与各该主管委员副署；五、临时政委会职权，以湖南省政府成立之日为止。

△　黄绍竑抵畲坑（属梅县），闻第四军向闽南移动，即分兵两路：一由兴宁入赣、一由蕉岭入闽，以西路军为主力，东、南两路为辅。

△　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由广东普宁县统兵入赣，追击第四军。

△　日本首相田中派三井物产会社职员、张作霖的挚友江藤同张作霖会见，谈“满蒙五铁路”签约问题。下午4时，江藤会见张学良，张学良表示赞同，愿尽力相助。当晚8时，江藤再见张作霖，刚自东京归来之张作霖日本顾问町野列席，并报告日本承认张作霖所提条件。张作霖谈称，已说服张作相使其勉强同意签字，在各项合同上当须本人自签“阅”字。

△　国民政府财政部特设湘、鄂、赣、皖四岸食盐济运总局，委松江盐运副使陈绍妫为局长，是日公布组织简章，设总局于南京，四岸各设分局；总、分局运销盐斤，由淮北各盐场配运，定额暂以200万担为限，从前临时官盐、商盐一律停止。

△　红军占领郴州。红军向郴州进发，何键部守军闻风逃窜，红军未经战斗，即进占郴州。5日，中央郴属特委会成立。6日，郴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李才佳为主席，旋即掀起“插标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没收了地主豪绅的粮食，烧毁田契，废除债务，并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允庭任师长，蔡协民为党代表。

2月5日　“首都各界拥护中央四次全会暨蒋介石复职市民大会”于南京公共体育场开会，到10万余人。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洪轨主席，于右任出席并发表演说，大会通过通电全国一致拥护四中全会及拥蒋复职，要求取消特别委员会所产生之各党部及各机关，拘捕“一一二二”惨案主从各犯，完成北伐，统一民财两政，彻底肃清共产党等10项提案。

△　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禁止重征赋税。同日，又通令恢复盐务稽核机关（根据民国二年善后借款而设），其前任财长孙科任内所设之上海稽核总所及江、浙、闽、粤、赣、鄂稽核人员一律停止工作；至于外债问题，俟通盘筹划，再定办法。

△　冯玉祥由新乡赴巩县。9日返郑，10日即赴汴。

△　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军北伐前敌将领开紧急会议，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及留省各师长出席，决定反攻奉军。是日，阎致电驻南京代表赵丕廉，嘱向蒋介石等转达一切。

△　驻杨柳青褚玉璞安国军第七方面军第六旅第二团全团士兵受冯玉祥方面运动，突然哗变，绑团长而行，杀连长二名，变兵分三

组，全副武装向天津出动。代理天津镇守使谢玉田等闻报急调督署镇署卫队、宪兵、保安警察前往堵截，在津南10余里地方与变兵交火，变兵不敌，分向安次、武清撤走。

△　黎元洪声明否认参加北方名流发起之全国和平运动。

△　东三省金融界因奉票连续跌价，大起恐慌，营口东亚烟草公司职工1300名，要求全行发给工资未遂，全体罢工。同日，营口警察以奉票低落，生计艰难，开始总罢工。

△　法驻华公使玛太尔由北京南游沪、汉各地，是日，由汉口抵南京，国民政府设午宴招待，蒋介石、于右任、蔡元培等50余人出席，李烈钧主席致欢迎词。法使致答词，称：法愿工商上通好，中法不适之规约，亦可取消重订。

2月6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中执委员21人出席，中监委员八人列席，于右任主席。决议：修正通过“整理党务根本计划”审查委员会提出之《整饬党纪之方法案》；通过蒋介石、戴季陶提出之《整理特别党部原则》。

△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大会下午继续开会，谭延闿主席，决议六项，其要项为：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十七年（1928）8月1日召集之。二、宁、汉两方决议案，交执监两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席会议审查：（一）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二）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均修正通过。四、《中华民国暂行刑法草案》，交中央常务会议迅予审议通过。五、于右任所提《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北伐全军总司令统筹全局，从速遵办。

△　驻益阳之湘军何宣师向西征军投诚，编为第九师，西征军第六军第十九师胡文斗部进驻益阳。

△　第四军从五华退入赣南，是日，沿闽赣边退集会昌。西路总指挥黄绍竑统率伍廷飏、黄旭初、吕焕炎三师，从兴宁追入江西寻邬县。10日，伍廷飏部叶丛华团追至澄江圩，与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王超遭遇，将王部击败，第四军尽向会昌撤退。

△　李济深第八路军第十五军伍廷飏部克雩都，第四军第十二师退长兴。

△　易纨士于4日抵上海，是日，晤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建议召集南北代表共同列席关税会议。

△　北京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复召集关税自主委员，正式会商关税自主与增收税率问题。专门委员钱泰等人提出二五附税改由海关征收一事，应商洽日使克期开征等四项意见，顾维钧、梁士诒赞同在沪开税率会议。

△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大藏省财务官公森太郎、正金银行副行长武内、东亚兴业银行董事小贯调查长江流域日本对华债权、汉冶萍公司、南浔铁路等实状，于是日抵上海。次日偕矢田总领事会见宋子文及郭泰祺，面谈汉冶萍整理问题，双方各陈意见，俟调查实情后，再正式交涉。

△　浙江省政府议决公安局即日封闭各级工会。同日，杭州公安局长章烈奉命发出布告，将所辖400余工会于下午5时以前一律封闭。

△　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改国立第三中山大学为浙江大学，蒋梦麟任校长。

△　中华民国拒毒会会长李登辉、总干事钟可托联名电四中全会，要求责成政府变更禁烟政策，改变“寓征于禁”政策为“寓禁于征”。

△　晚9时，厦门公安局四出搜捕共产党，至11时，共捕走10余

人。

△　湖南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毛科文任主席。

2月7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闭幕。四中全会于上午举行第四次会议，中执委员22人出席，中监委员五人列席，蒋介石主席，决议七项，其要项为：一、推举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二、推举丁惟汾、于右任、王伯群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三、推定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四、推选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五、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六、蔡元培等五人提议制止共产党阴谋，铲除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由全体会议交由执监两委员会与政治会议随时审查执行。下午，四中全会举行闭幕式，于右任主席，通过《中华民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即行闭幕。

△　江藤会见张作相，张作相谈称，承包铁路合同，事关重大，须待战争结束回吉林商议后才能签字。

△　江苏省政府指令核准虞洽卿为上海租界内纳税华人会主席。

△　胡宗铎部第十九军于3日自长沙出发，追击湘军第八、第十七、第三十六军，是晚占领衡山县，湘军分向宝庆、衡阳退却。

△　易纨士在上海访晤黄郛，略述关税问题意见：一、按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增加数目全国约6000万两，以1000万两留抵担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按三七或六四比例分配于南北（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在大连，以后各次在

上海。

△　上海总商会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请撤废一切苛捐杂税。

2月8日　　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团长孙传芳召集直鲁将领在济南开军事会议，张宗昌、褚玉璞、寇英杰、张敬尧、程国瑞、王栋、李藻麟、马敦源等出席，讨论军事问题，决任褚玉璞为西路总司令指挥大名、曹州军事，结果各方意见未获一致。

△　第一集团军第九军长顾祝同向徐州北上，经柳泉转贾汪，视察右翼前线防务，并检阅驻贾汪一带之第九军第三师涂思宗、第二十一师陈继承两部，当晚仍原车返徐。

△　安徽省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军委会及蒋介石，恳请限期北伐，消平奉鲁，上慰总理在天之灵，下慰群众延颈之望。

△　下午5时，西征军第十九军胡宗铎、第七军夏威部占衡阳。当日，白崇禧亦到衡，湘军李品仙部退郴州。

△　西征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向成杰部由湘乡向永丰进逼，是日拂晓，在铜铃铺（距永丰10里）与湘军第十七军激战三小时，于上午9时占领永丰，湘军退向宝庆。

△　上午8时，陈铭枢偕徐景唐抵广州，即赴第八路总指挥部晤李济深，即日午间，李设宴为陈、徐洗尘，冯祝万、吴铁城、陈章甫等10余人作陪，席间讨论粤善后及财政问题甚久。

△　李济深在第八路总指挥部开粤省军事及政治会议，到陈铭枢、徐景唐、邓彦华、冯祝万等人，讨论统一财政、肃清共产党及进兵援湘等问题。议决：一、严令各军将曾截留之款项，扫数解回财政主管机关核收，并将占收之机关即日交回主管机关接管；二、决定由惠、潮两方面抽调大军，分路向海陆丰合围搜捕共产党，务期于旬日内将其扑灭，其余北、西、南三路，亦令饬防军切实剿办；三、责成

范石生、胡凤璋、许克祥刻日进兵入湘，务将宜章湘军及共军击退，必要时拟增调第十一军开赴北路，以厚兵力；并电白崇禧饬部兼程追击，以收前后夹攻之效。是日，陈铭枢允就省政府主席职。

△　国民党广州政分会议决，新编第四军回复第四军名称，陈济棠任军长。

△　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通电称，奉蒋介石冬（2日）电，于本日集中潮梅各部，继续北伐。

△　国民政府特别党部依四中全会整理党务计划案，决定呈报中央党部停止筹办。

△　前国民政府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7日由港来穗，8日被捕就义。

△　湖北省政府以东北部各县共产党大肆活动，是日颁发《湖北各县清匪奖励条例》。

△　北京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梁士诒访日使芳泽，陈述中国方面现正组织关税自主委员会，将从明年2月起实行关税自主，希望日本为好意之援助。

△　伍朝枢在新加坡游历，突遭狙击，幸未受伤，凶手当场捕获。

△　驻青岛日本陆战队乘“长良”舰全部返国。

2月9日　　蒋介石偕总参议何成濬赴徐州视察军事，并谋与冯玉祥谋面，商榷北伐事宜。次日抵徐，总部参谋长林伯森及第一、第九、第二十七军各军长刘峙、顾祝同、夏斗寅到车站迎迓。

△　国民政府特任黄郛为外交部长。21日，黄郛自上海到南京就

外交部长职，发表对外宣言，提出屏除不平等条约等六项与各友邦周旋之标准。

△　国民政府电令各省、市政府严密防范共产党，称：共产党“自厉行清党以后，竟有怙恶不悛之徒，潜去各方，阴谋复煽，除恶务尽，防范宜周，仰各省、市政府转饬所属，严密查拿”。

△　晋军第六军丰玉玺部在长城岭附近与奉军接仗，激战七小时，奉军不支，向阳曲方面退去，晋军占领阜平。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兼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电李烈钧，拥护四中全会。

△　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以赣省进入训政时期，是日电令民政厅长杨咽冰对各县长及公安官吏“分期调考，以定去留”；“至于在军队服务之人员，如有政治经验，欲在行政方面图谋建白者，亦须经考试方能录用”。

△　吴俊陞以通化大刀会讨伐告一段落，是日归奉发表谈话，略谓：“以通化为中心之大刀会员，其数已达七千名，一般性质尚属善良。此次抵抗官兵之会员，虽有相当之数，而其大部分已被击毙，后事一任齐恩铭清乡督办处理。不日拟亲晋京谒见张大元帅，报告讨伐大刀会经过。”15日到京，向张作霖报告剿办经过。

△　英外相张伯伦致电易纨士，大意谓：中国关税自主，如以统一的国定税率为根据，不予英商以难堪为前提，英政府对此甚表同情，将来召集关税会议，英政府决不作梗。

△　驻华英、美、日、法四国公使，因北满中国当道于去年12月2日布告不承认由中东铁路土地局发给外国人之借地权一事，向张作霖提出严词抗议，指责此系违反各国侨民既得权之保护声明，请予撤回。

△　美轮“爱德摩号”于4日抵厦门，连日卸货，至是日该轮大副误伤华人林狗使，林被送入鼓浪屿日本医院抢救，因枪伤腹部，抢救无效而死。次日海关下令扣留该轮，交涉员刘光谦向美领提出正式抗议，美领当即道歉，并表示考虑赔偿、惩凶等要求。

△　驻华挪威公使密那成自沪乘轮返国。

2月10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讨论事项：（甲）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函送四次全会议决案：（一）修正国府组织法案，决议公布施行；（二）推举国府委员（49人）、国府常委（五人）、主席（谭延闿）案，推定军事委员会委员（73人）、军委常委（12人）、主席（蒋介石）案，决议录案通知；（三）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决议通过实行；（四）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案，决议公布施行；（五）限期完成北伐案，决议分令行知；（乙）中央政治会议咨送：（一）关于建设经费由建设委员会筹集案，决议交财政部拟办；（二）关于建设委员会经费开支案，决议令财部查照办理。

△　国民政府致电张静江，告以业经四中全会推为常务委员，促其“克日莅都，共谋建设”。12日，张由上海到南京。

△　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祺对日发表声明，关于张作霖向日方南满铁路会社借吉会路垫款500万元以及北方军阀对外任何借款，国民政府概不承认。

△　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致电李烈钧报告甘肃最近情形，要点为：一、省市党部正式成立，县党部成立10余县，余正积极筹备；二、拉卜楞之青海番民，多数入党，已改设县治；青海内部，已将总理遗嘱、党义等译成藏文，派员带往散发，唤醒番民；三、设立省道办事处，专任修路事宜；四、设立自治训练所，养成自治人才。

△　陈铭枢第十一军军部及第十师师部开抵惠州。次日下午，第

十一军副军长蒋光鼐及第二十四师师长黄质胜抵省。

△　夏斗寅所部新十军奉令改为第二十七军，是日，夏于徐州宣布改称，并宣誓就职。

△　大学院决定将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名称改为“中山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名称改为“国立江苏大学”。

△　汕头公安局破获共产党机关七处，共捕共产党员28名，枪毙11名。

△　驻华英公使蓝普森抵福州，访晤福建省府代理主席方声涛。国民政府电方声涛转告欢迎蓝返沪时到南京一行。

△　中日双方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非正式交换对于汉冶萍公司及南浔路之意见。由中方交通部次长李仲公、司长赵世暄、整理汉冶萍专任委员湛溪等，日方驻沪总领事矢田、正金银行副行长武内、东亚兴业银行董事小贯、大藏省财务官公森等14人参加。日方要求李仲公将口述意见作书面发表，李答称俟报告政府再办。正式谈判俟有负责外交部长后，于最短期间开始。

2月11日　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及北伐全军总司令限期完成北伐。

△　国民政府简派陈绍宽、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张定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

△　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以该路辖10余军之多，战线绵亘数百里，运输联络诸感不便，是日致电蒋介石请改订编制，并即请其就近指挥，己则专力于后方事务。

△　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由安庆启程开赴徐州前线。

△　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通电，定于12日由上杭率部北上，遵军事委员会前令加入北伐。17日，国民政府致电嘉许。

△　奉军郑泽生部向山西偏关进攻，商震所部晋军还击，郑军大溃，被俘4000余人，郑仅以身免。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乘轮离沪赴法，调查军医及卫生事务。

△　湖北新堤关监督喻毓西电湘鄂政委会，告以贺龙军队已至监利县，向新堤进逼，特飞电请剿。

△　日本新任济南总领事西田过津访张绍曾谈时局，为日方出兵山东辩护，略谓："日本出兵山东，不仅中国南北误会，即日本国人亦必攻击；惟不出兵，则一旦侨民危险时，当取何种自卫手段？"又谓："中国若再经两年内战，则南北工商业必完全破坏无遗……列国为救济自国商务，势将采取共管手段。望君以北方先觉资格出来唤醒国人，早息内战。"

△　驻苏州第一军教导团团长李仙洲，赴宁向何应钦报告破获共产党机关情形。13日返苏，奉令将所获之徐家六等16名共产党员一并解宁，交特别法庭讯办。

△　朱德派红军一连兵力，协同江西省永兴县农军，一举攻占永兴县城。次日，永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木为委员长，13日，组建红色警卫团，尹子韶为团长，黄克诚为党代表。

2月12日　　蒋介石连日在徐州对第一、第九两军长官训话。11日，对第一军讲《恢复革命精神和纪律》，说为什么北伐军连克十省，何以直鲁打不下来？"根本原因，是因各人到了南京，便发生争权夺利的错误思想。……若这种情形不变更，各人不彻底觉悟，不决心奋斗到底，本党的命运，必蹈洪、杨的覆辙，一到南京就倒台"。

12日，蒋又对第九军讲《恢复领导重心向革命道路继续前进》。

△　李济深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发表演说表示拥蒋（介石），称不可排蒋，致敌人乘隙离间本党。

△　张作霖接奉军和原直鲁联军在津浦线泊头镇附近内讧之报，是晨召集军事会议。张学良谓：最近右翼路军已发生兵变数次，杨柳青方面，逃亡之兵向京南三县百余村掠夺，与我后方安全及对冯作战影响重大；今欲谋对冯、阎作战之胜利，不得不计及后方之安全。经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汤玉麟等协议结果，张作霖决定：褚玉璞调任吉林督办，张作相为直隶督办兼三四方面军团司令，以孙传芳为山东督办，并协同在德州之于学忠部担任山东之防护。对晋问题，决用孙传芳之主张，表面上对晋下总攻击，实则谋依赖英、美两国要人与阎锡山议和，其条件仅请阎不予援冯，此外别无他项要求。

△　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由信阳出发归德，是日抵开封，冯玉祥召开大会欢迎，并发表演说，谓："希望十一路的武装同志，继续以前光荣的历史，奋斗的精神，努力杀贼，打到山东去，打到北京去，活捉张宗昌、张作霖，完成国民革命。"方表示愿随蒋、冯之后努力北伐，致力国民革命。

△　阎锡山军事代表、山西陆军第九师师长吴藻华取道郑、汉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晋省军事，据吴谈称：晋军加入北伐，原定六个月到达北京，军饷军械均以六个月为预算，现逾四个月，以后如何筹措，即为此次赴京及谒蒋之目的。去年全省税收及京绥、正太两路收入，月可得380万，现在仅月收百三十万，极力张罗，只能维持至3月底。

△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奉召由宁赴徐面晤蒋介石，商北伐军事。

△　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克瑶奉柏文蔚令，渡江北上督师，其直辖

第二师限三日内集中蚌埠。

△　湘军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致电蒋介石，要求将该部军队从湘西调回北伐。

△　程潜、白崇禧下总动员令，分兵四路，进攻湘西：以第十三军与第六军李师，由益阳、沅江、汉寿进攻常德，以第二军、第四十三军由荆、沙进攻津、澧，以新编陈渠珍师由辰、沅进攻桃源，以周朝武师由慈利、大庸进攻临澧。

△　白崇禧进驻衡阳，电粤请派兵夹击湘军。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电驻苏代理大使郑延禧，谓已签字之《日俄渔业协定》中，若有关于黑龙江之中俄管内渔场之各项，则系侵害中国之主权，令调查电复。

△　华北日军司令新井到北京检阅日军。

△　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电呈国民政府及军委会，保荐赖心辉为第九路军副总指挥。

△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杭州《民国日报》“任意诬蔑中央委任人员”（陈希豪、洪陆东），是日，咨请省府查办该报；又省府查封工会，并未预先征得党部同意，省党部以事关党权，特函省府质问。

2月13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席人选：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指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次日公布《修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　蒋介石于徐州前线电国民政府，报告本日下令改编第一路军为第一集团军，下设三个纵队：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纵队；第十七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二纵队；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三军、第四十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纵队。任刘峙为第一纵队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陈调元为第二纵队总指挥兼第三十七军军长，贺耀组为第三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3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自兼，调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　蒋介石在徐州召集第四十、第二十七两军官佐训话，到贺耀组、夏斗寅等及在徐官佐政训处人员共数百人，蒋致训词要求两军保持光荣历史，继续努力，完成北伐。

△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抵杭州解决浙省财政问题，即日与省府各委员磋商，达成浙省每月解部之款由原50万元增至70万元等五项有关国税、省税协议。

△　冯玉祥派石敬亭由豫抵徐，向蒋介石接洽联络北伐军务。

△　安国军褚玉璞第七方面军团（直军）徐源泉部第六军游击旅长梁振寰，近忽由巨野向济宁撤退。褚玉璞见其有异动，遂调梁部入津。是日，梁部北上专车开至泊头镇车站，被褚布置之军队包围，双方互战三小时，梁振寰被击毙，该旅官兵毙命者200余，伤百余，突围溃走者千余名，缴械者不足500名。

△　李景林所部东北第一军军长崔芳庭致电蒋介石，告以奉李景林令赴鲁西召集旧部，响应北伐，兹在金乡、鱼台、嘉祥、巨野等处召集郑春阳、梁宝斋两师，在蒙阴、新泰、莱芜等处召集周寿山、刘华民两师，在泗水、邹县等处召集王芳亭师、何宗文、孙法霖、李绪九三个旅，总计四万余人，均系李公旧部，现各在原驻地点枕戈待

命，请催令李即日莅止前方，指导进行。

△　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湘省各地之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民众团体，“向受共产党操纵利用”，是日颁发布告，宣布“一律取消，不许活动”。

△　中俄地方当局签订黑龙江、乌苏里江航行新约，未呈北京军政府批准。中方签字者黑河道张寿增、黑河税务司铎斯、东北航务局长陈文让；俄方签字者黑河领事米拉美得、俄水道局长吉阿诺夫、技术米拉依罗夫。

△　奉天临江县八道沟大刀会员200名与官军宪兵队激战，至14日始被击退。辉南县亦有大刀会员200余与马贼呼应，于16日占领大肚村，并向辉南县城进击，与官军发生激战。

2月14日　国民政府与谭延闿、李烈钧分别复电蒋介石，赞同一路军改定编制新令。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　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由归德到徐州晤蒋介石，次晚先蒋遄返归德候迎，并与蒋同赴汴，列席蒋、冯开封军事会议。

△　白崇禧令西征各军举行第三次总攻击，分三路进攻宝庆，五路进攻常、澧，另以一路侧击安化，以截断宝庆与湘西之联络，宝庆、安化战斗激烈进行。同日，白崇禧偕第七军军长夏威自衡阳赴红罗庙督师。

△　粤省东江军事开始收束。东江军事自张、黄部队入赣后，李济深初拟积极追击，嗣以缪培南、薛岳通电率队北伐，而第八路军兵士亟须休养，遂决定收束军事，是日致电梅县黄绍竑先将东江各部队分别留驻或开拔，除指定驻防之部队外，其余概行班师。黄绍竑奉令后，即将西路部队分别撤回，第五师伍廷飏部由平远回梅县，第六师

黄旭初部由平远回河源，第七师吕先逵部由兴宁回广州。南路部队，徐景唐之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八两团已先期陆续抵省，一部则径返江门原防。东路部队，陈铭枢之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六各师，亦次第来省。东、西、南三路总指挥部亦由前线迁回省垣。

△　京汉路郑州运输司令许骧云通电征收京汉路军事捐，宣布章程10条，其中规定大米、高粱、豆麦、食品征收为70％，食盐与消耗品（如烟叶、香烟等类）同征50％，自15日起开始实行。

△　张作霖任命沈鸿烈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凌霄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　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公森、正金银行副总裁武内等11人，自宁赴汉交涉汉冶萍问题，次日访湖北省府主席张知本、交涉员甘介侯。张、甘即日设宴欢迎，16日，公森设席答宴，席间对于汉冶萍问题均有所讨论。17日晚，公森等一行乘轮离汉，一部赴大冶视察矿地，一部赴南昌交涉南浔铁路借款问题。

△　驻沪之英国陆军寒泉大队官兵共900名奉调回国。

2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八次会议，张之江、钮永建提议实行信教自由，取消反对基督教及反对各教等口号，议决移送中央党部核议。

△　徐州各界五万人召开庆祝国民党中央四次会议及欢迎蒋介石大会，蒋演说谓：四次全会圆满，北伐已有全计，定于三个月内完成，此可以预告以慰徐州同胞。

△　蚌埠市各界三万余人集会庆祝国民党中央执监会议及蒋介石复职，全市休业半日，晚上举行游艺会。

△　各省商联会呈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筹开国民会议，并请选举党国名流组织国民会议起草委员会，决议各项法规，从

速成立筹备处，“庶国民之总意思得以表示，而国家亦得以长治久安”。

△　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在徐州第一军部就第一集团军一、二、三纵队总指挥职，蒋介石亲授印并致训词，谓：现在北伐继续开始，望三总指挥不负委托，努力奋斗，完成革命工作。

△　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克瑶由蚌埠抵徐州，晤蒋介石商议军务。19日，随蒋介石由徐抵蚌，奉命回寿州调遣军队，集中蚌埠，会师北伐。

△　阎锡山派山西陆军第九师师长吴藻华兼驻宁军事代表，是日到任，即偕刘璞忱晤李烈钧，报告晋战情况，商洽机宜。

△　第四军军长缪培南、副军长薛岳、第十二师师长吴奇伟、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第二十六师代师长陈芝馨、教导第一师师长邓龙光、教导第二师师长黄镇球等通电，表示一致拥护南京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会及决议案，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

△　西征军第十三军副军长谭道源由汉寿返省，陈述常德前线情形，以湘军常、澧后方极为空虚，主张速取常德，以破何（键）、叶（琪）根据，获程潜、陈嘉祐赞许。17日，西征军集中汉寿前线，陈嘉祐偕谭由省返汉寿督战，一面会知常、澧各军同时总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亦亲率浅水炮舰“江贞号”前往监利、石首、荆河一带助战。

△　何键致电程潜、白崇禧输诚，表示愿于善后勉效绵薄，不能再事内争，重苦地方，前电停止军事行动一节，可否同意实行，以便从长协商，完成合作之愿，并表示愿亲自赴长沙面商一切。

△　新疆乌什回王全权代表定希程，为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会议议决设立蒙藏委员会，而对新疆回族各事则未闻提及一事，具呈国民党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恳请速示办法，“冀能解除回族痛苦，同登平等之阶”，以慰7000万回民之渴望。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据呈后，即函约定希程于是日赴府谈话，磋商此事。

△　驻华英公使蓝普森抵厦门，交涉署茶会招待，英使即席演说，略谓：“此行观察国民政府治下状况，极为满意，英国政府极愿视力之所及，为国民政府助。”当日下午离厦赴汕头转广州。

△　苏联开设之上海远东银行复业。该行于上年7月16日因有接济共产党款项嫌疑被国民政府查封，后经上海茶商联合请愿（因中国茶叶大宗销俄，该行查封，引起上海茶商恐慌），国民政府于是日下令准予启封复业。

△　南昌卫戍司令部以铜鼓县农民协会委员、共产党员李建康召集农民2000余人勒缴保卫团枪械，是日拿解省垣枪决。

△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马骏就义。

2月16日　　蒋介石于下午2时由徐州抵开封与冯玉祥会商北伐大计及作战方略。结果冯同意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议决彰德、大名方面及山西方面先取守势，集中兵力以解决山东。其作战部队为：一、用于山东方面者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刘峙（担任津浦路正面）、第二军团陈调元（担任郯城、沂州迤东一带）、第三军团贺耀组（担任湖西经丰、沛、单各县攻鱼台）、第四军团方振武（由归德、曹县、定陶攻金乡），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孙良诚、第四军马鸿逵、第五军石友三、第二十一军吕秀文（由菏泽攻巨野、嘉祥及郓城）、骑兵第二军席液池（由郓城以北绕汶上、宁阳截击奉军后方联络线）；二、用于河北方面者为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第三方面军韩复榘、第八方面军刘骥、骑兵第一军郑大章；三、用于山西方面者为第三集团军全部。期于三个月内会师北京。阎锡山代表朱振声亦与会。

△　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第一一七次会议议决，遵照四中全会决议，各级党部暂停活动。次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告各省、市党部。

△　陈调元返皖，调所部第三十七军加入北伐。当晚，该军第三师师长谈经国率部自安庆开抵浦口，待车北上。

△　刘镇华部占山东堂邑县，直鲁军向东昌溃退。

△　西征军胡宗铎部第十九军、夏威第七军于15日拂晓向黑田铺、两市塘、仙槎桥一带湘军进攻，战一小时。湘军第八军李品仙部、刘兴、周斓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军力不能支，西征军于是日上午占领宝庆，李、刘、周仅率卫队数百人退至洪江。是役湘军3000余人被俘。

△　西征军鲁涤平所部第二军占领公安县，次日向湘西前进，追击湘军何键部，何部第一师师长周碞向刘铦投诚。

△　第八路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由汕头抵广州，旋晤李济深报告前方军事。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同行。

△　晚，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于上海私邸设席宴易纨士。宋于席散后，乘夜车回宁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予易氏以最后之答复。

△　北京商会挂牌，奉票每元值三分六，北京军政府派张焕相为哈尔滨各银行监理官，迅筹奉、哈两地东三省银号现款，救济奉票。

△　红军占领耒阳县。朱德率红军主力于10日沿郴（州）衡（阳）大道，从永兴马田圩正面进攻耒阳，是日清晨进攻耒阳县城，农民纷持大刀、梭标响应，直冲城内，占领县城。19日，耒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泰为主席。同时，耒阳起义工农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2月17日　国民政府特任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王钧、石青阳、白崇禧、田颂尧、朱培德、朱绍良、宋哲元、李宗仁、李烈钧、李福林、李景曦、李鸣钟、李济深、何成濬、何应钦、汪精卫、周西成、岳维峻、金汉鼎、胡宗铎、胡汉民、柏文蔚、徐永昌、马福祥、孙良诚、孙岳、孙科、陈可钰、陈季良、陈训泳、陈焯、陈绍宽、陈嘉祐、陈铭枢、陈调元、夏威、曹万顺、张之江、张群、商震、鹿钟麟、贺耀组、黄绍竑、程潜、汪寿良、冯玉祥、钮永建、杨杰、杨虎城、杨爱源、杨树庄、邓锡侯、邓宝珊、樊钟秀、熊斌、钱大钧、卢师谛、刘文辉、刘郁芬、刘峙、刘湘、刘骥、蒋介石、蒋作宾、鲁涤平、赖心辉、龙云、阎锡山、谭延闿、顾祝同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　蒋介石偕冯玉祥离开封赴郑州视察，次日车至归德及砀山，先后下车分别对第十一路方振武部第四十一军及第三十四军训话，下午2时专车返抵徐州。

△　第二集团军克林县，剿平天门会。豫北、直南天门会势力极盛，蔓延20余县，其巢穴在林县。第二集团军令庞炳勋军由彰德经水冶、科泉攻寺县，别以许长林师由辉县、鹤壁协攻，是日克林县，次日克油房、焚伪宫殿。自3月1日起至18日，先后凡八日，天门会患悉平，从此豫北肃清，北伐无后顾之忧。

△　李济深召集广东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北伐问题，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陈章甫、邓世增、邓彦华等出席，陈铭枢提出广东应于第八路总指挥下属各军每军抽调一至二师，组成北伐军，迅速出兵，追随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北伐。陈济棠、徐景唐亦表赞同，待黄绍竑返省后再定。

△　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以本人既兼任省党部改组委员兼组织部长，又任省府主席、第八路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党政军务集于一身，对于省府主席一职未遑兼

顾，特提议辞职，并请以陈铭枢继任主席。出席省委员均赞成通过。陈铭枢以专心办理第十一军军务，亦坚辞不就，决下次再议。

△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电令驻沪缉私处，责成该处专办禁烟缉私，此外如盐务、卷烟、煤油、烟酒、印花等项缉私事宜，仍由各主管机关收回办理。

2月18日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开成立会，到谭延闿、李石曾、黄郛、郑洪年、陈立夫、王征、叶楚伧、吴敬恒等委员及苏、浙、皖三省建设厅长，张静江主席，讨论职权问题，决定由秘书处草拟暂行条例，俾资依据。

△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通电拥护中央四次全体会议，表示“誓竭至诚，绝对服从”。并望各省各界同志同胞一致遵循，努力奋斗，俾中央议决各案早日实现。

△　西征军鲁涤平部第二军、李燊部第四十三军由公安攻津、澧，是日鲁军占津市，李军占澧县。湘军向临澧方面退走，鲁、李军向常德前进。

△　湘军放弃安化县城，向东坪、溆浦退走，次日西征军李韫珩师进驻安化县城。

△　福建省府代理主席方声涛电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告以英使蓝普森在闽期间关于宁案之谈话要点：一、惩凶：严缉凶手，依法惩办，所有案内带兵长官，如有在逃，不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之内者，须以明令公告，以后不再任用；二、道歉：此案在中国人方面，咸抱歉忱，两方意思，业经接近，只须正式履行道歉手续；三、赔偿：两方各派委员会同调查事实，如财产被掠、房屋被焚、被害负伤等，然后决定赔偿办法。

△　晚，上海大通协记航业公司“新大明”轮被日本小樽会社佐藤

商会之轮船“厚田第二丸”在目鱼沙附近长江东岸撞沉，溺毙450人，损失60万元。

2月19日　　蒋介石离徐州，次日凌晨抵南京会晤谭延闿、李烈钧，报告开封会议经过及前方军事编配布置情形，关于党政各要务亦有协商。

△　西征军夏威部第七军克新化县，湘军退走溆浦、龙潭。

△　第八路代总指挥黄绍竑由兴宁启程回省，是日，第八路总指挥部规定粤省东江军事结束办法六项：一、入赣追击部队限期开回粤境，由黄绍竑指定各军驻地担任“剿匪”；二、电令驻闽第十一军留守主任黄强严剿散兵，同时电赣朱（培德）将赣边散兵剿清；三、将东江战事状况及善后计划电告国府；四、补充各军缺额及军事；五、在广州、惠州、汕头设治疗所，医治伤兵及资遣敌兵回籍；六、在东江临时招募补充机关一律撤销，以后招兵须呈准总部核行。

△　阎锡山召集山西军政各界人员举行节俭会议，发表演说，略谓：厉行清廉政治，为表现爱国爱民之第一义，本党既先以此与国人相见，应有正确之办法。旋由各界推举代表草拟规定，公布实行。

△　阎锡山致电驻宁代表赵丕廉，谓山西省政府拟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属于省政职权者，自行拟一办法试办，请中央派员监察，倘荷赞成，即由山西将拟定办法送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照阎来电办理，并认为暂无派员监察之必要。

△　湖北省监利县长田立勋电省府，告以“昨午一时农工革命军第十五军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共三百余人，猛来扑城，勋等亲率团队出击，击毙连长等二十五人，生擒三名，将其击退，监城始得保全”；又谓：“惟东南股匪，尚有数起，恳准速派大军救援。”

△　开封共产党员李子明散发传单被捕，随又有六名共产党员被

捕，省政府派军警于郑州、洛阳两地捕获同案之共产党员共三名。

△　台湾民众党领导下之劳工团体29个单位（会员共有6367人），在台北设立台湾工友总联盟。联盟规约之宗旨，在谋工人及店员之利益与幸福及其生活之向上；其任务有“统一全岛之劳动运动”等10项。

2月20日　国民政府致电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请将党国大计及地方应兴应革事宜及时敷陈，借资采择；现在滇中情形，立盼切实见告。

△　国民政府为决定川省施政计划，推李烈钧征求该省各界意见。是日，李烈钧致电刘湘分转四川省、成都市党部及赖心辉、郭汝栋、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订于3月1、3、5日，约集各界请愿代表、京沪川籍军政要员戴季陶、卢锡卿、黄复生、张希骞等人在南京会商川局。

△　张作霖特派张宗昌兼节制直隶军务。

△　白崇禧自宝庆行营电告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将移师北伐，略谓：“一候湘局解决，即将移兵北上，敬随我公之后，长驱朔漠，直捣幽冀，借竟全功，完成革命。”

△　湘鄂临时政委会主席程潜公布《湖南各县清乡条例》，通令各县同时举办清乡，限备县清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以一个半月办竣。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反对与北方对等地位开对等关税会议。

△　美驻华公使马瑞慕离京取道济南、青岛南下，至长江“视察”，25日抵上海。

2月21日　国民政府大学院明令废止祀孔，令称：查我国旧制，

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着将祀孔旧礼，一律废止。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议决通缉俞作柏，并令桂省政府查封其家产；又通过省党部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派李晓生赴法、比考察农工行政。

△　南京特别市市长何民魂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关税自由，反对易纨士之主张，略谓："……近幸我国民政府底定东南，定期十八年一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并进而编订国定税则，凡属国人，同深庆贺。乃迩来迭见报载竟有北京伪政府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南下，主张在中国未实行关税自主以前，将海关税征至一二·五，并主张南北双方合组税率委员会议，解决一切等语，披览之余，实深发指。"吁请国人一致否认易之主张，并誓为国民政府关税自主之后盾。

△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致电上海总商会，略谓该会代表工商谆谆以关税自主为请，与本部所抱宗旨正复相同；至易纨士南下，接洽所提关税自主前之过渡办法，纯属一种私人建议，本部以事关全局，正在慎重考虑，报载各节，率多失实；至承受巨额借款之说，更属无稽。

△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两个团自遂川攻打宁冈新城，歼灭守军多人，击毙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县长张开阳，俘敌军400余人，并占领新城，是日在宁冈砻市开万人大会，成立宁冈县苏维埃政府。

△　驻厦门美领关于美轮"爱德摩号"大副枪杀华工林狗使案答复交涉署：一、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二、凶手按美律惩办；惟交涉署所提赔偿5500元赔款一项，当电华盛顿请示政府。次日，美领告以政府电复，允照赔5500元。

△　湖北蒲圻县县长张静修以该县东乡共产党集合500余人，有枪

数百支，响应群众千余人，准备扑攻县城，连电省府告急，请求派兵往剿。

2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九次会议，议决：一、设立国民政府内政、农矿、工商三部，特任薛笃弼、易培基、孔祥熙分别担任，咨国府任命；二、推黄郛为政治会议委员；三、推方振武、薛岳、岳维峻为国民政府委员；四、推李宗黄、吴忠信、刘纪文为建设委员会委员；五、推于右任为国府审计院院长；六、《立法程序法》修正通过，移送中央执委会交国府公布等10项议案。

△　蒋介石致电程潜，请其率军参加北伐。

△　北京安国军将领开会，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张宗昌为津浦路讨赤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讨赤总指挥；褚玉璞为大名方面讨赤总指挥兼津浦路讨赤副总指挥；张学良为京汉路讨赤总指挥，杨宇霆副之；张作相为京绥路讨赤总指挥，汤玉麟、高维岳副之。同时决定，所有直军系统归张宗昌指挥。

△　冯玉祥由汴赴洛。28日，检阅第三十军刘骥部。冯任命石敬亭兼第二十二军长。

△　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通电称，奉蒋介石电令独立第一师着改为第十七军第二师，委李明扬为第十七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　第三十三军师长岳相如、第十军军长杨胜治、师长张锡海、陈克逊暨各团长赴徐州开军事会议，准备北伐。

△　何键、叶琪通电表示愿让出常德，退往南县、华容、安乡各县听候改编，并派参谋长刘晴初分赴长沙、宝庆商议一切。

△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致电南京中央党部，报告奉命停止活动，已通令各县党部一律遵照，并恳请早日派员来赣，以免党务中断。

△　张作霖公布《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公署暂行条例》，凡17条，规定：各省军务善后事宜督办由大元帅特任；督办于军政事务承大元帅之命受军事部之监察指示；督办于军事之计划及命令承大元帅之命受军事部之监察指示；督办因维持该管区域内（在军区未定之前暂以省治为范围）各地方之治安可依省长之请求，需用兵时得酌量情形派兵协助，但遇紧急事变得径行处置。

△　张作霖公布《都统公署暂行条例》，凡28条，规定在热河、绥远、察哈尔设都统，都统统辖所部军队管理该管区域内军政、民政事务；都统于军政事务军事计划及命令承大元帅之命受军事部之监督；都统于管辖区域内有维持地方安宁之责，遇有特别事变或所辖道尹之呈请，认为必要时得使用兵力。

△　驻华英公使蓝普森抵澳门，英使秘书在澳发表文告，谓："英使此次游历南华之目的，乃欲续其初莅中国任公使时之志愿，即密切调查地方情形，及亲自会晤可与处理因中国现局发生诸问题之实际的当局。"

△　湖南"铲共"特别法院将共产党员盛贵士、谭汉镇、刘光太、邓荣华四人以19日在长沙扑城暴动罪，在长沙枪决。

2月23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一八次会议，通过10项议决案，其要项为：一、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分任组织、宣传、训练部长；二、民众训练委员会推定经亨颐、朱霁青、戴季陶、蒋介石、何香凝、王乐平、丁超五、陈果夫、李石曾九人组织之，李、经、朱、何、陈五人为常委；三、推丁超五为中央特别临时法庭庭长；四、推孙岳、岳维峻为国民政府委员；五、修订政治会议及分会条例案及丁、陈、蒋三委员所提整理党务案，由丁惟汾、陈果夫、蒋介石、谭延闿、蔡元培审查，丁负责召集。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四次全会

议决改组，推定委员及常务委员，是日开成立会，到常委蒋介石、于右任、谭延闿、李宗仁，委员李烈钧等20余人，蒋介石主席，议决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业。

△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政府，各地查获共产党文件，须先送交国民党中央党部审核处理，不宜流传各处，以免为共产党作反宣传。

△　程潜应何键、叶琪代表刘晴初等之请求，下令停战，并令何、叶两军即日退出常德，何部集中桃源候编，叶部集中南县、华容、安乡、汉寿候编，所有叶部给养由省府担任。

△　北京军政府实业部发给张学良矿照，准其开采热河阜新县煤矿。

△　岳维峻陕军第十九军廖仁辅师之一部于德安叛变，是日，军长李纪才通电，宣布业已派队驰剿击散。

△　驻华英公使蓝普森由澳门乘舰抵穗，广州市长林云陔、交涉员朱兆莘登舰欢迎。次日，李济深在省府宴请蓝使，席间李济深演说，表示中英通商策源地之广州与英国有悠久历史，要求依平等相互原则，改订不合时宜条约。蓝使答称英政府对华方针已改善，赞成取消不平等条约，希望中英商务发达。

△　驻华日公使芳泽访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王荫泰谈盐税事，询北京军政府对宋子文关于盐税声明之看法，并声明日本对于善后借款担保有动摇之事，碍难承认。

△　日舰“浦风”停泊大冶示威，经交涉员甘介侯抗议，是日驻汉日领署函复交涉署，该舰已离大冶。

△　驻津日军司令新井赴山海关、秦皇岛、塘沽检阅日军，26日晚返津。

2月2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解决浙省党政纠纷。自本月4日陈希豪、洪陆东奉中央命接收浙省党部后，浙省府与省党部纠纷多有发生。22日，省府电国民政府对陈、洪多所指责。是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浙省党政纠纷，特电令陈、洪回京，另由组织部派员前往，办理浙省党部将来工作。

△　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各地取消苛捐杂税。

△　阎锡山致电国民政府报捷，略谓：据左路总指挥部漾（23日）电称，哿（20日）夜在神池附近毙敌营长一员，排长二名，俘虏士兵300余名。商震部养（22日）日在楼口附近，将敌张作相部李桂林师完全击溃。

△　晋省驻宁各代表招待报界，到20余人，吴藻华报告军事情形，宣布奉方屡派代表求和，均被拒绝；表示现在晋军补充已完备，实力充足，亟盼蒋、冯两总司令迅速前驱，早定大局。赵丕廉希望舆论界对于晋军作战予以充分援助。

△　白崇禧自长沙致电蒋介石报告湘、鄂战事，略谓：自长、岳、衡、宝相继光复，敌纷遣代表投诚，俟下常德，再剿抚兼施，三湘奠定，当追随北伐，完成革命。是日，蒋电白令其对于湘战“期于适当而已”，称“惟共匪乘隙煽乱，务重创之，邪说之为害，固有甚于刀兵者也”。蒋又有致程潜类似之电令。

△　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自沪回北京。29日往访北京军政府税务督办梁士诒，关于与宋子文协商之内容，有所密谈，拟在下月召开关税自主委员会前提出正式报告书。

2月25日　　蒋介石召集军事委员会及总部各厅处长、重要官佐会议整军节饷办法，决定：自3月1日起，一、军人自总司令至士兵一律着布制军服；二、国府直辖军队，饷银一律减折支发，士兵八成，尉官七成，校官六成。

△　蒋介石、李石曾赴汤山，次晨谭延闿亦前往，三人共商两湖军事及党务问题。

△　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略谓：中正受命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望联合承销二五库券1000余万元。无论如何为难，务希办到，以应急需。

△　上午，第八路军西路军总指挥黄绍竑返抵广州，李济深于省政府设午宴招待。黄对省文武官员谈东江军事状况，略谓：张、黄所部薛岳驻赣南，缪培南、李汉魂驻浙西，将不再穷追；又谓：第十五军此次东下，原系奉中央之命而来，任务已尽，应班师回桂，休养整顿，本人俟部队返桂后，随亦回桂，专心整理桂省政务，决不干预粤政。

△　张作霖特任罗文幹为外交总长，王荫泰为司法总长，姚震为大理院院长。

△　北京军政府财政总长阎泽溥呈请辞税务督办兼职，是日张作霖指令照准。同日，特任梁士诒为税务督办。

△　湘军何键、叶琪两军让出常德，西征军第十三军副军长谭道源即率岳森、成光曜两师进驻常德县城。

△　江苏交涉公署就日轮撞沉“新大明”轮一案，向驻沪日总领事提出抗议，并请转饬该日轮公司立将肇事人看管，依法从严惩办，赔偿各项损失，抚恤死者家属，在此案解决以前，即将“厚田丸”扣留。

2月26日　冯玉祥致电熊斌，称蒋介石“实今第一流人才”，并告以蒋来汴晤面，对北军事已商定具体办法，蒋决定自提20万重兵循津浦线北进，与国、晋军同时动作。

△　白云梯对《申报》记者谈关于蒙藏院问题，告以正在拟定组

织大纲，一俟中央常会通过后，即可着手组织蒙藏院。并谓：应视蒙、藏同各省一样，不可认为殖民地，此事即易于办理。对于蒙、藏之方针，白谓：将先从整理西藏及内蒙西北地区之国民党党部入手，至外蒙问题，俟本党势力到北京，即可解决。主义与本党相同者即合作进行，其与本党不同者，则协同改进。末谓：对于蒙、藏之社会经济，将来须设立蒙藏银行。

△　第四军第十一师3000人取道揭阳向陆丰苏维埃政权进攻，29日，攻陷陆丰县城。

△　驻华美公使马瑞慕在上海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会谈宁案问题，驻沪美总领事克银汉、外交部司长何杰才参加。双方表示俱愿早日解决此案，美使并同意黄郛所提宁案谈判与修改中美旧约结合进行之主张。旋美使西行，黄郛急须回宁，遂各委克银汉与何杰才在沪继续谈判。

2月27日　蒋介石对南京公安局全体警察训话，告以现在市财政困难，不能按定薪饷如期发领，要求警察“忍耐辛苦”，注意保障首都治安、交通、卫生，“勿放弃天职”。

△　张作霖特派余棨昌为修订法律馆总裁。

△　北京军政府新任外交总长罗文幹在北京行就职礼，礼毕对东方社记者谈话，表示尽力完成废除及改善不平等条约，希望日本及列国以甚深之同情加以“援助”；关于实施固定税率及关税自主问题，政府正在研究，至关税会议则尚难明言。末谓对于中日外交关系，将“谋适当之措施，以竭力增进国交之亲密”。

△　《申报》记者访谭延闿、李烈钧，叩以关于第四集团军等问题。谭、李答称，不建立第四集团军，两湖各军及南方各省国民革命军均归第一集团军，谭暂不赴汉；又谓：“我们主张关税自主，决不能与奉方共同开会商议。”

△　刘镇华部占大名，俘直鲁军3000余，毙旅长刘鸿勋、邓九如及团长五名，直鲁军退广平、成安。

△　李济深特委第七军第六师师长黄旭初为河源、龙川、紫金、兴宁、五华五属绥靖处长，是日，黄于兴宁宣誓就职，当即移兵五华，赴海丰“剿共”。

△　旅沪川人熊克武、谢持、黄复生、黄季陆等七人，以国民政府电约赴宁开会，特于是日开会征求意见，到40余人，谢持主席，通过决议案六项，其要项为：一、赞成国府议设川省政府；二、现役军人不得兼任省府主席；三、康藏绥靖委员会暂缓设立。并提出最低限度之办法14条款。

2月28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议决12项，其要项为：一、公布政治会议修正通过之《立法程序法》；二、加推方振武、岳维峻、孙岳为国府委员，录案通知；三、任命丁超五为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庭长；四、建赵声铜像费用1.4万元照拨；五、特任蒋介石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29日明令公布）；六、派李宗仁前赴武汉劳军，并收束军事，准备北伐。

△　北伐军编组正式决定：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兼）（辖18个军，29万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辖25个军，31万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辖11个军，15万人）；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辖四个舰队）。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汪精卫、胡汉民、陈季良为委员。

△　国民政府特任薛笃弼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孔祥熙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易培基为国民政府农矿部长。同日，又特任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

△　国民政府以西征军出发以来，鄂、湘次第戡定，西征部队亟须抽调加入京汉线北伐，是日，特派李宗仁前赴湘、鄂慰劳西征军将士，筹备北伐，所有整理军队、抚绥地方各事宜，并会商程潜、白崇禧两总指挥妥为办理。

△　阎锡山致电驻宁办事处，报告奉方军情，略谓："据探报奉军将领议决对晋、冯两面积极备战，晋北由张作相指挥第五方面军及第九、第十二、第二十、第三十一各军，攻击雁门、繁峙；对京汉线龙泉正太线，由三四方面军担任；对京汉线取守，对冯决调孙传芳第三师开往濮阳，联合直鲁军进攻鲁南、豫北，以进至黄河北岸为止；对津浦线北岸取守势。"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第八十四次会议据第八路总指挥部军务会议关于剿匪"清共"之议决案，讨论具体办法，决定设立全省绥靖总处，由李济深兼任处长。总处之下，划分四大军区：以陈济棠负责东区，陈铭枢负责西区，徐景唐负责中区，吕光逵负责北区，办理绥靖事宜。又东江军事既经结束，所有东、西、南三路总指挥部亦须裁撤，决定令陈铭枢、黄绍竑、徐景唐查照，并限于3月1日办竣。

△　安徽省政府通电反对易纨士南下之关税主张，要求中央保持关税改革自由，勿惑外言，勿图小利，誓死一致否认，以求贯彻而固主权。

△　北京军政府决将奉海铁路发还商股，改归官办。

△　新疆回王代表定希程偕回部驻宁办事处秘书长蔡天祚由宁到汉，是晚赴汴与冯玉祥及杨增新到汴代表共商防范伊犁共产党办法。

△　西藏代表秦世昌到宁向国民政府陈述藏事意见。

△　英国运兵船"马赛城号"载英兵500名离沪返国。

△　日本商轮"锦江丸"于27日夜在福建平潭县附近大富港触礁沉

没，船员30余名经我国李一糅渔船救护出险，登日舰“葵号”返国。是日，平潭县长派员前往查勘时，突来日船“谷风”，不问情由，向该处渔船及岸上民众开枪射击，死12人，伤27人，造成“二二八”惨案。

2月2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第一三〇次会，议决12项，其要项为：一、内政、农矿、工商三部组织法草案付审查；二、中执委员会请加派孔繁霨等12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加推高桂滋等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又再加派刘汝明等六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均决议加派；三、新疆乌什回王全权代表定希程请愿解除民众痛苦书及17省回民旅京请愿团代表铁楚良等呈文，决议推张之江等审查后再办。

△　张作霖特任鲍贵卿为审计院院长。

△　张作霖公布《森林条例》，凡75条，此条例公布施行之日起，民国三年公布之《森林法》废止。

△　张作霖任姚国桢为北京交通大学校长，程崇为唐山交通大学校长，郑林皋为锦县交通大学校长。

△　北京军政府关税自主委员会于国务院开会，潘复、罗文幹、吴晋、顾维钧、王克敏、梁士诒、王荫泰、沈瑞麟、莫德惠、颜惠庆等13委员及专门委员出席，讨论未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前应采取之过渡办法。

△　2月下旬，第三集团军进攻朔县，初以大批步队侧攻朔城，奉军抽怀仁兵力来战，相持颇烈。是日午前11时，奉方前锋之骑兵师，一部分触地雷而溃，步兵接应不利，炮手被虏，急向东北撤退，下午4时，朔城遂为第三集团军占领，奉军退向怀仁。

△　阎锡山再电驻宁办事处，通报晋北奉军调动情形，略谓：第五方面军王桂林、宋日新各师，开到盘石沟、千叶树、铁角岭一带，

重炮第一旅由大同调至下射村，第十一军补充旅开到山阴，郑泽生两师骑兵由洪山沟开到平鲁，郑军司令部移朔县，王英、满泰两师在滑石口。

△　国民政府委员周震鳞离太原南下，临行语阎锡山，回宁后即促蒋介石积极北伐。3月4日，抵郑州晤冯玉祥。

2月下旬　日使馆副官士肥原到太原，为张作霖活动议和。

是月　中国、瑞士交换邮件，是月实行。

△　山东利津县黄河决口成灾，附近百余村落均成泽国，灾民两万余人，为民国来未有之惨状。

3　月

3月**1**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一九次会议议决：一、总理逝世纪念日，各地举行植树，以为各地造中山林之提倡；二、通过孔繁霨、丰玉玺、朱绶光、张荫梧、孙楚、赵守钰、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黄国梁、谭庆林、井秀岳、高桂滋、任应岐、方鼎英、伊德钦、刘汝明、卫定一、石友三、张维玺、韩复榘、李云龙、方本仁、夏斗寅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三、电令福建省党部停止召集各市县代表党务讨论会；四、《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交国民政府公布；五、通过政治会议及分会条例；六、派组织部长蒋介石赴杭勘查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发生之纠纷。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凡七条，规定：“政治会议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凡一切法律问题，经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之；凡重要政务，须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国民政府执行。同日公布《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凡10条，规定中

央执行委员会得于特定地域设立政治分会，其管辖区域由中央政治会议随时指定之；政治分会于其特定区域内指导并监督最高地方政府，但不兼管党务，政治分会之决议案，交该特定地域内之最高地方政府执行之。

△　国民政府通知中央各机关及各省市政府，3月12日总理逝世三周年举行纪念大会。6日，下达纪念大会注意事项，规定男缠黑纱，女佩黑花，全国停止娱乐活动，鸣礼炮33响。

△　国民政府批准甘肃省拉卜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

△　国民政府就整顿川省事宜召集川中各军代表、民众请愿代表、旅沪川人代表27人开会，李烈钧主席。通过整顿川省应废除一切害民苛捐杂税，田赋不得预征；严禁强派勒垫；严禁私造枪械扩充兵额，兵工厂须由中央派人管理；严禁各军私自设厂铸造杂币、伪币；已开除之共党分子仍逗留成都者应逮捕到案惩办等15项建议。

△　上午，蒋介石抵沪，检阅沪宁线、浙沪线沿路驻军。

△　冯玉祥由洛阳赴孝义，3日抵郑州，在飞机场检阅军官学校及第三师骑兵。

△　云南省政府致电国民政府，略谓：滇省客军驱逐出境，胡（若愚）、张（汝骥）残部完全解决，三迤已告肃清，刻正遵照钧府迭次命令，对于军民两政积极筹划，从事组织，一俟内政厘定，军队编成，即行出师北伐。

△　第四军军长缪培南、副军长薛岳、第十二师师长吴奇伟、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第二十六师代师长陈兰馨、教导第一师师长邓龙光、教导第二师师长黄镇球等联衔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报告奉命取道赣省转赴大通，集众候令北伐，现已全部到达景德镇，并表示竭诚拥护中央第四次全会之整理党

务案。

△　白崇禧电国民政府报告西征军战况，略称：第三路连克衡、宝，逆军缴械散亡为数极重，其第三十军、第十七军、第八军残部退至淑浦、沅江沿岸一带。吴尚、熊震、李云杰三师残部退至东坪，已于东（1）日通电表示服从。至湘西之敌，已退守桃源、常德一带，要求改编，并派员前来悔过输诚，当与程总指挥协商，分别诚伪，剿抚兼施，以期早奠湘局而便转旆北伐。并告衡南各县“剿共”情形，已于寝（上月26日）克复耒阳。

△　程潜派代表凌达如随同叶琪、何键代表陈希洛、田勉龙、周肇文、贾士杰赴常德磋商善后。

△　福建省政府发出废止台伏票四项办法之布告，其要点为：一、于3月1日登报公布。二、为责成钱商分期收回台伏票，并维持钱商兑现，调剂市面金融，特组织整理圜法委员会，设委员五人，省府三人，总商会二人（应呈由省政府委任之）。三、台伏票与大洋比价，每台票一元折合大洋九角五分。四、台伏票废止期，经商会之请求，准展至本年7月31日止。

△　湖北省各机关奉国民政府电令，自是日起实行减薪。

△　湖北石首共产党员易在田、李兆龙等率农军200余人，有步枪、盒子枪百余支，由监（利）、沔（阳）交界之大营洪湖出发，进攻监利、车湾、朱河等处，围缴文宣区团防枪30余支，进占石首县城，并在石首组织苏维埃政府。是日，国民党独立第五师刘和鼎之一部，由沙、石开赴下游，“剿办”石首共产党。

△　易纨士晤北京军政府总理潘复。潘述政府拟下月实行过渡税，不问南方是否同意，北方先办，至按一二·五抑按七级制，俟疏通使团后再定，易氏表示物价与税率须先对外公开。

△　驻华日公使芳泽对记者团谈话，表示日本对于关税自主，若能成立互惠税率协定，则不持异议，但施行国定税率及暂行税率之时，当以指定其收入之用途并裁撤厘金为条件，并认为不必召开关税会议解决暂行税率问题。

3月2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八项决议，其要项为：一、任命陈调元、柏文蔚、吴忠信等11人为安徽省政府委员，指定陈调元为主席；二、照准甘肃省政府呈请将狄道、导河、伏羌等10县改变名称；三、批准江宁区炮台司令改为江宁区要塞司令，镇江要塞司令改为镇江区要塞司令，澄路要塞司令改为江阴区要塞司令。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安徽省政府，省府委员陈调元、柏文蔚、张秋白、何世桢、韩安、汤志先、雷啸岑、宁坤、孙棨、刘复、陈家栋着免本职；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汤志先、兼财政厅长陈家栋、兼教育厅长何世桢、兼建设厅长张秋白着免本兼各职；任命陈调元、柏文蔚、吴忠信、刘复、余谊密、韩安、胡春霖、汤志先、孙棨、张鼎勋、李应生为安徽省政府委员，指定陈调元为主席；刘复、余谊密、韩安、胡春霖分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各省政府，提倡造中山林，略谓：本月文（12）日为先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当此海宇将清，国基大定，益切追念国父之诚。比经决议，每岁3月12日，全国各地一致举行植树典礼，以为全国造中山林之提倡，务期蔚成大观，昭布无极。

△　上午，蒋介石到杭州检阅军队及磋商浙省党政问题。下午，浙省府民众开大会欢迎，到数万人，何应钦主席并致词欢迎，蒋介石发表演说，深望杭州各界同志尽力帮助北伐，拥护省党部与省政府。5日，蒋介石由上海返抵南京。

△　程潜任命许克祥为湘南“剿匪”总司令，罗霖（原湘军周斓军

第二旅旅长）副之。

△　湖北旅沪同乡会致电武昌湘鄂临时政委会、湖北省政府，以近据鄂商来沪告称，市面捐税迭增，印花税尤属繁苛，商民受累不堪，要求转饬财政当局，“遵照中央通令，将一切新旧苛税杂捐概予罢免，并速取消货物征贴印花办法，以苏商困”。

△　福州市各钱庄为反对省府废止台伏票，举行全市罢业，停止兑现，并截止各商帮放款提款，一面赴省政府请收回成命。4日，福州市典铺亦同盟宣告止当。

△　潘复宴各关税委员，商定各员分别担任疏通外团，约下星期会集报告，如无阻梗，即由财部税处断然通知税务司实行过渡税。

△　厦门日警六人伪装华人，于深夜12时开枪擅捕韩籍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朝鲜革命党人李箕焕及韩籍李明斋、李刚、李润炳四人，押至日本警部。3日晨，日本警部将李箕焕等转押至鼓浪屿日领署。

3月3日　　国民政府批准甘肃省改定县名：狄道县改临洮县，导河县改临夏县，镇戎县改豫旺县，伏羌县改甘谷县，碾伯县改乐都县，巴戎县改巴燕县，平番县改永登县，镇番县改民勤县，抚彝县改临泽县，毛目县改鼎新县。

△　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发出《严防共党混迹》通电，颁行《清共办法》七条及《共党自首条例》八条。“办法”规定，各机关团体之员司、士兵、学生、工徒人等，均须取具五人连环保结，否则一律革退。

△　叶琪偕西征军第十四军军长陈嘉祐由常德赶赴长沙，同程面商改编办法及湘西善后等问题。程以叶琪首先输诚，将维持其原有名义，并令转赴湘南、湘东“清共剿匪”。

△　第三集团军商震部与奉军在平型关附近激战24小时，奉军不支，向灵邱溃退。

△　北伐航空司令张静愚率司令部部分人员飞抵徐州。次日，在徐州机场视察，并调后方飞机到徐参加北伐。

△　驻华美公使马瑞慕抵汉。4日，交涉员甘介侯拜会马使晤谈。5日，湖北省府主席张知本设宴欢迎。

△　厦门各民众团体就日方藐视我国国权，擅自开枪捕人事紧急集会，议决：请司令部及交涉署向日领严重交涉，务将所捕李箕焕等四人立即交还中国官厅，并应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派警来厦。同日，各民众团体致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饬严重交涉。

3月4日　　湘军李品仙、刘兴、周斓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及长沙程潜、宝庆白崇禧求和，表示不愿以民众之武力作无益之牺牲，谨率所部集结湘西，听候命令，移师北伐。

△　湘军李品仙第八军第二师师长吴尚抵长沙，向程潜输诚。程即委吴为第八军军长，拨给该军伙食费三万元，令移驻湘阴、平江一带“剿共”。同日，程潜以湘、鄂战事已定，又保举周斓为第十七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十二路总指挥，准备北伐。

△　湘军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到新化，约白崇禧前往会商，为白所拒。白于宝庆通过军用电话与李接谈，谓：“息兵之请，当然赞同。惟刘兴、周斓为唐生智嫡系，为消灭唐之残余势力计，对于处置方式，不能与吴尚、叶琪相同。先决条件须刘、周二人下野，交出兵柄，出洋游历，所余部队听候改编。”

3月5日　　国民政府召集川省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到黄季陆等20人，李烈钧主席。会议就组织川省政府、提高党权等问题进行磋

商，要求立即成立省政府，统一省政，省府未成立之前，先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以戴季陶为主席。

△　国民政府电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及省府各委员，勉以保境绥民、辑睦川滇。8日，周西成电复国民政府，表示拥护中央，服从命令。

△　北京军政府令设置关税自主委员会，任命顾维钧、梁士诒、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罗文幹、阎泽溥、沈瑞麟、莫德惠、夏仁虎、吴晋、朱有济、马素、潘复为委员，潘复以国务总理资格兼该会主席。7日，加派刘哲、张景惠、王荫泰、常荫槐为委员。

△　上海闸北维纶厂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并勾结巡警将工人姜阿兴击伤，7日毙命。9日，该厂舆情激愤，推代表300余人紧急集会，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从优抚恤受害者。同日，全市93家丝厂6000余人全体罢工，以示抗议。

△　厦门交涉署就日本领事馆擅自开枪捕人，侵越中国国权事向日领提出正式抗议。同日，厦门民众团体联合会向日领提出限24小时内交出所捕李箕焕等四人，正式向中国官厅道歉等四项条件。

△　哈尔滨各法团联合具呈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列举事实说明，汇丰、花旗、朝鲜等外国银行操纵金融，压迫哈券，至本年1、2月间，哈券一元仅值金券六角二三分，月余以来，商民损失达500万元以上，吁请长官公署向各该领事提出质问，严加取缔。

3月6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一、中常会加派孔繁霨、黄国梁、方本仁、夏斗寅等24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议照案任命；二、照准郭泰祺辞去外交部次长代理部务职务；三、王宠惠赴海牙出席国际法庭期间，特派蔡元培兼代司法部长职务；四、任命阎锡山、杨兆泰等九人为山西省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军官团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主席并致训词，何香凝、谭延闿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致训词。旋即举行阅兵式。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26年1月12日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11月5日，军事委员会令该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　日本新闻记者代表团添田嘉一、日森海雄、波多博等一行八人抵南京。是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并发表演说，略谓：“日本与我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故我敢相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

△　蒋介石下令将驻颍、亳之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归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指挥。

△　厦门港口于晨6时起抵制日轮生效。日轮“开城丸”自台湾经汕头驶抵厦门港，被巡察队监视，船工拒绝起卸。日领派员见交涉员，请勿抵制。交涉署坚持原提之条件。日领表示将李箕焕等四人移出日领署或另居鼓浪屿，暂不押解赴沪。各界未允，日“开城丸”遂折返汕头。

3月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一次会议，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任命李济深为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冯玉祥为政治会议开封分会主席，阎锡山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

△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由兰封移驻新乡，就近指挥彰德（今安阳）军事，并任第九方面总指挥鹿钟麟兼任北路军总司令，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率第十四军、第二十三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调赴彰德前线增防，拒止磁州之敌南下；庞炳勋军则驻林县，与彰德互成犄角之势。迨开战后，复调驻洛阳之刘骥军、驻属县之刘

汝明军、驻漯河之韩复榘军加入作战。

△　鲁军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偕新任第十七军军长谢文炳由城武抵济南，向张宗昌报告曹州军情，并与孙传芳、郑俊彦接洽防守计划。

△　湘民众请愿团代表何宪琦等，分呈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请收束西征，完成北伐，维持湘局，拯救湘民。

△　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闸北商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团体召集会议，到虞洽卿、林康侯、赵晋卿、冯少云、邬志豪等10人，讨论上海商界劝募二五库券进行办法，议决成立上海商界劝募二五库券协会，推林康侯为主任，并设相应机构，即日开始办公。

△　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蓝普森：中国实施关税自主之事，可予以承认，惟对于裁撤厘金，应与各国公使取一致之步调。关于过渡税之实施，“中国若能得各国之同意，英政府亦当承认其效力之发生”。

3月8日　　国民党中央党务会议据组织部长蒋介石函请，决定推陈果夫代中央组织部长。

△　冯玉祥至道口镇，下令三路进攻大名：中路鹿钟麟，由内黄出发；东路刘镇华，由南乐出发；西路孙连仲，由临漳出发。每路兵力约一万数千人。郑大章骑兵师为别动队。直军亦分三路应战：第十四军孙殿英部为中路，以赵金熙、于世铭两师守龙王庙、徐屯、双井集；第六军徐源泉为东路，在朝城、冠县防守胡气村、东馆集；第十六军袁振青与尹之鑫团防第二支队任西路，防守岸上村、黄道村。每路兵力亦在万人上下。是日中午，中路首先在双井集接触，旋西路亦在岸上村开火，东路刘镇华部亦冲至徐屯，郑大章之骑兵别动队，更出现于大名后方之单庄高儿村一带，大名入于包围状态。酣战三小

时，冯军占领直军第一道防线，大名城门紧闭。战至日暮，冯军已迫近直军第二道防线，距城仅10余里。是役直军死500余人，伤1000余人。

△　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郑俊彦、褚玉璞、刘志陆、寇英杰、师景云等出席，商讨对晋、豫、宁三方军事，决鲁西主攻，鲁南主守。

△　7日，白崇禧、陈嘉祐、叶琪抵长沙。是日，程潜设筵欢宴白、陈、叶，程潜及白、陈、叶诸人相继演说。席间并会商湘局善后事宜，其大要为：一、处置唐（生智）部问题，仍暂定编为三军，以吴尚为第八军军长，叶琪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何键、周斓均聘为高等军事顾问，刘、何各给两万元出洋考察军事。周斓如愿出洋，亦与刘、何同。李品仙任第十二路总指挥，将所编唐部抽调北伐之两军，归李统率北伐。第八军下属三个师，以熊震、吴尚、程泽润分任师长。第三十五军以何键、叶琪两部合并编成。第三十六军下属三个师，以廖磊、周维寅、唐哲明分任师长。二、北伐问题，李品仙率廖磊、叶琪两军先开赴信阳待命，白崇禧所部胡、夏两军，程潜所部第四路，共六个军担任。三、处置叶开鑫部问题，派魏云前往辰州上游收编叶部。四、“剿共”问题，决定除吴尚第八军外，再由第四路抽派一军担任，与赣、粤两省部队会同堵剿。五、政治、党务问题，俟李宗仁到汉后，另开两湖善后会议解决。

△　厦门日领对释放李箕焕等四人事迟不答复，是日，厦对日经济绝交生效。日轮“孟那多丸”抵港，工人拒不卸货，遂折返。当夜，日领要求交涉员勿抵制，否则将调轮来厦对付。9日，厦反日侵略委员会就外界所传李箕焕等四人被密解台湾一事，议决12日举行对日经济绝交示威游行，并电闽沿海各地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

3月9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议决：一、任命蒋

介石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何应钦为教育长；戴季陶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何思源、方觉慧为副主任。二、设立国民政府国定关税委员会。13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李、何之任命令。

△　国民政府公布《战地政务委员会条例》，凡九条，其中规定该会任务是“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指挥，处理战地民政、财政、外交、司法、交通各政务”。

△　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凡13条。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山西省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南桂馨为民政厅长，李鸿文为财政厅长，陈受中为教育厅长，王录勋为建设厅长，杨兆泰、马骏、孟元文、冀贡泉为省政府委员。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询广州政治分会，是否与香港英政府接洽粤汉、广九两路接轨事。14日，广州政治分会电复并无其事。按：近传广州方面向香港英方提议，以广九、粤汉两路接轨为条件，借款3000万元，故有此电。

△　国民政府财政部通电各地财厅关所，凡执有部照运行之盐，经过沿途关卡，应尽先查验，立即放行，毋得稍延。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广西省政府、第八路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代第五军军长邓彦华、副军长蒋光鼐、海军司令陈策等联名发表时局宣言，略谓张（发奎）、黄（琪翔）祸粤，应请中央明令缉办；广东大乱之后，民不聊生，故凡省会之诸被害区域之救恤，共产党及一切土匪之扫除，维持破坏之金融，恢复垂尽之工商业，须努力办理；统一之进行，在武力积极之进展，故应促北伐大计早日完成，而吾党统治之省区，则应扫除障碍，巩固后方，

从事建设。

△　北京开关税自主委员会成立大会。到关税委员顾维钧、梁士诒、王克敏、李思浩、王荫泰、刘哲、张景惠、沈瑞麟、莫德惠、吴晋、夏仁虎、马素、朱有济，专门委员钱泰、严鹤龄、袁永廉、金焕章、夏清贻、王章祐等，潘复主席。讨论通过章程及细则，决定设秘书、议案、事务三处。会后，潘复、梁士诒向张作霖报告，决定由潘复柬邀各国公使，于宴席间陈述北京办理过渡税之目的，公开向各公使疏通。

△　奉军王树常部在阜平被第三集团军击溃，伤兵1500余名，由石家庄赴保定，运往军粮城医治。

△　驻华法、英、美、荷等国公使，在荷使馆会议扩张禁止武器输入中国协定之范围，结果决会衔电禀本国政府，陈述1919年《禁止对华输入武器协定》之重要性及严禁一切军火输入中国之紧要，并维持其效力。

△　香港总督金文泰到广州，广东省府隆重欢迎。次日，金文泰与李济深会商省港亲善事宜，议毕回港。

3月10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凡387条。

△　蒋介石遣陈仪率军事考察团赴德国考察。

△　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在康定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任命贺守贤、韩沛、吴三降、陈启图、胡人纲为该会常务委员，指派贺守贤为主席。

△　挪威商轮“阿克号”从德国装载2482箱军火来华，是日晨5时抵青岛，下午即将军火卸下。当晚由胶济路局押运西上即交直鲁军孙传芳部提用。

△　日驱逐舰一艘借口保护侨民驶抵厦门，泊鼓浪屿，激起厦门各界民愤。13日，厦反日侵略委员会组织海上罢工，断绝交通。日领答应将捕去之二名韩人移交中国，以为取消抵制之交换条件。

△　《新月》杂志创刊，徐志摩主编。

3月11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总指挥程潜、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三路总指挥白崇禧、第十二路总指挥李品仙、鄂西各军代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鲁涤平、兼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夏威、第八军军长吴尚、兼第十三军军长白崇禧、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十四军军长陈嘉祐、第十八军军长陶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独立师师长刘和鼎、向成杰、李云杰联衔通电宣布西征任务已毕，业令各军克日由湘南、湘西次第移向京汉路线南段集中，随我豫、晋友军之后，直捣幽燕，以竟北伐全功。

△　白崇禧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已回长沙商办三湘善后，军事既经结束，即当北上驰驱，会师河朔，直捣幽燕。

△　第六路总指挥刘湘致电李烈钧，表示谨率所部，待命加入北伐。

△　李济深致电蒋介石，拟请派戴季陶、陈铭枢、李文范、冯祝万、黄绍竑、林云陔、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如须加派，则胡汉民、孙科、伍朝枢、邓泽如、古应芬、萧佛成诸同志亦可备推。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李济深即可到宁出席，俟提出下次会议讨论。

△　湘鄂临时政委会驻湘办事处公布《共产党自首条例》。

△　朱培德所部第五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派第二十五团与第七十九团由永新出发，第八十一团由遂川出发，分三路包围井冈山

红军。13日下午，第二十五团陷茅坪，毛泽东率红军千余退走湘边，红军袁文才部千数百人退向陇西。同日，第七十九团陷古城。

△　冯玉祥电令豫、陕、甘省政府创办要政五项：一、开河渠，掘水井，以兴水利；二、每县至少种树三百亩苗圃；三、工厂多设木工、铁工、烧砖、烧瓦。四、利用水利，设水磨电机；五、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许瞻徇情面，并改良监狱，不准久羁人犯，妄押无辜。

△　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分呈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报告业将第三十三军军长职交该军第二师师长张克瑶，仅任宣慰使。

△　西康全区特选代表格桑泽仁同记者谈康、藏近况，并谓此次来宁目的有三：一、请求中央直接领导训练康、藏民众；二、请求中央允许在首都设立康藏办事处；三、希望中央早日成立蒙藏委员会。

△　奉军第八军万福麟部与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受天门会挑拨，在邯郸互战四小时，万部损失甚大，经张学良电令调回石家庄补充。

3月12日　上午，南京国民党党政军各界10余万人举行纪念总理逝世三周年大会，谭延闿主席，蒋介石发表演说，称总理所遗政策未能实现，实因党内缺乏纪念训练，致使共产党操纵其间，北伐未能完成。下午，党政军及各界数万人至中山陵谒陵，并行植树典礼。

△　广州、汉口、福州、厦门、太原、郑州、杭州、香港等城市举行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是日各机关停止办公，悬半旗致哀，商界停止营业，会后游行、植树。

△　冯玉祥下令进攻磁州，韩占元第一军，梁寿恺第三军，马鸿逵、秦德纯两师，分别由丰乐镇、临漳、清流镇前进，郑大章骑兵师扰乱磁州后方。奉军在漳河北岸布置防御工程，以戢翼翘第二十九军黄师岳、何柱国两师、马占元骑兵师程志远、张殿九两旅迎战。同日

黎明，韩占元令铁甲车四列由丰镇开至河岸，发炮攻击，奉军在北岸应战。郑大章之骑兵及便衣队突然占领台城镇，同时秦、马两师亦渡河压迫讲武城及岳城镇奉军阵地，磁州岌岌可危。

△　独立第二师师长贺对廷部踞湖北武穴截留盐税，第二十一军向成杰部第二师师长罗启疆奉白崇禧电令由英山往剿，是日，将贺部全部缴械，贺亦就擒。

△　哈尔滨东亚无线电电报局开始与欧美各地通讯。23日，驻哈日总领事八木向蔡运声提出抗议，认为此举侵害日方根据双桥无线电合同所取得之三井独占权，要求即刻停止。

3月13日　国民政府特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次长。同日又特派何应钦代理参谋总长。本月30日，李通电就任。并称不能常驻南京执行职务。

△　国民政府特派蒋作宾为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同日又任命何成濬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

△　国民政府令免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办公厅主任马晓军、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陶冶公、军政厅厅长严重本职；任命杨杰兼办公厅主任，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主任，何思源、方觉惠为副主任，朱绍良为军政厅厅长。

△　“一一二二”惨案特别法庭各代表开联席会议，柏文蔚主席。决议：一、特别法庭于4月1日正式成立；二、通过特别法庭组织及审判程序法；三、推白云梯等三人负责筹备。

△　程潜电告湖北省府主席张知本，两湖善后会议定本月20日在长沙开幕，促邀同在鄂政委会各委员前往列席。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经李济深推荐，委徐景唐、陈铭枢、陈济棠、王应榆分任东、南、西、北各路善后委员。

△　范石生军攻陷安峒。广东独立第三师自2月26日起，开始围攻朱德所部驻地安峒，至本月初旬，中经大小血战数十次，双方死亡二三百人，终不能得手。是日拂晓，范军挑选敢死队500名，持长矛短刀及手榴弹拼死冲锋，遂将安峒攻下。

△　张学良、杨宇霆为防止反侧，将原冯德麟第二十八师扩编的第十五军军长汲金纯在保定新成立之补充旅，及别动队、便衣队一律缴械遣散。

△　李景林派军长崔芳亭抵徐州组设司令部，参加北伐，招降奉系各军。

3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二次会议通过：一、蒋介石提议在北伐期间，由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二、加推王伯群、孔祥熙、薛笃弼等24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三、决议各特任官、各省政府委员、各特别市长之任免权归政治会议；四、决议阎锡山、赵戴文、商震等九人为政治分会太原分会委员；五、加推孔繁霨、方本仁等24人为军委会委员；六、推蒋介石、黄郛、李石曾、吴敬恒等九人为外交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明令京内外各行政机关在北伐期间实行减俸，以充军费，规定：凡文职特任官俸给概照五成减支，简任六成，荐任七成，委任八成。

△　军事委员会委李品仙为第十二路军总指挥，统率第十七军、第三十六军。是日，李品仙通电宣布于新化行营就职，并请将所部移驻新化、宝庆、湘乡整理后北伐。

△　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为督率所部开赴徐州加入北伐，是日，离宁返省，16日抵南昌。该军之一部已于15日开抵合肥。

△　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电陇海路督办王正廷，令其负责由京汉、陇海两铁路抽拨机车十辆、车辆百辆，以供北伐军运。

△　冯玉祥电令第二集团军各部禁止军人兼营商业。

△　程潜、白崇禧派王允恭抵新乡晤冯玉祥商北伐，旋赴太原访阎锡山。

△　国民政府交通部据邮政总局局长刘书蕃呈称，北京邮政总局奉北庭命令，发行一种纪念邮票，计有一分、四分、一角、一元四种，专在直隶、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六省以内售卖，已通令各管理局查照，令行所属局所对于此项邮票不予承认通用。是日，交通部指令照准。

△　南北邮务统一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一、南北政府各设邮务总局，置总办、会办、局长各一人；二、法人台斯兰特兼任南北两总办；三、北方之会办由南方派来，南方之会办由北方派往，互相交换任命；四、邮款存银行，由总办保管，盈余之提用，须两总局同意。是日，北方派陈廷均任南局会办，由津南下。

△　厦门反日浪潮日烈，纠察队焚毁日轮一艘。15日，日领表示，李明斋、李润炳可在厦释放，李箕焕、李刚则须押解朝鲜。各界益愤，严词拒绝。日领访漳厦警备司令林国赓要求制止排日风潮。林召各界征询意见。各界坚持四李全部在厦释放，撤去在厦日警。

△　香港邮政局长及邮电局长抵广州，与广州政府当局商改善省港两地无线电通讯办法及开设商业航空事务。

△　彭湃率所部赤色教导团于海陆丰失陷后，于10日直扑惠来县。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六团颜鼎成部退守城中五日，旋因形势不利，于是晚突围出城，彭湃遂率部入城。

3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二二次会议，决议中央宣传部长戴

季陶未到任以前，指定叶楚伧为宣传部秘书并代理部务。会议通过《党员总登记条例》。

△　国民政府任命赖心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副总指挥。

△　宋子文由宁赴沪接洽劝认二五库券，经各商家踊跃认购，共缴付现款100余万元，是晚，宋携巨款回宁。

△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奉蒋介石电召赴宁，是日离穗，于19日到沪。同日，李在沪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此次赴宁任务："（一）筹商粤北伐事宜；（二）向中央报告共党乱后之广东一切善后事宜及军队之改编，经济之设施；（三）请示今后两广之一切办法。"

△　第四十六军军长方鼎英奉军委会命令，率所部第四、五、六师约二万余人，由韶关出发参加北伐，取道浙江，业已次第抵杭，是日，方鼎英抵沪。

△　孙岳、周震鳞致电程潜、白崇禧请速提师北伐，俾与晋军收夹攻之效。阎锡山亦电促程、白早日出兵。程、白复电称，正在准备动员中。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公博开始在上海《贡献》（旬刊）第二卷二期发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长篇文章，旋经该刊二卷三期（3月25日）、二卷四期（4月5日）及二卷五期（4月15日）四次载完。文末公开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号召，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　英、美、法、意、日五国代表在北京日使馆会议解决宁案方针，侧重赔偿问题。

△　北京军政府国务院总理潘复为北京商民反对奢侈税事，召见商会长孙学仕称，明年1月关税自主，届时一切杂捐均可相当减除，

奢侈税为现时济急办法，望商界在此数月内多帮政府一点忙，勿再坚持。

△　新疆回王代表定希程抵新乡晤冯玉祥，接洽新疆事宜。

△　成都省立第一中学发生学生反对军阀保荐校长杨廷铨风潮，杨带兵佐将学校接收。学生闻讯，有200余名入校将杨手足捆绑坠入井中淹毙。军警闻耗往捕，捕去学生10余名。17日，军警复派兵一团将省中各校包围，共捕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法政学院、工业学院学生百余人，当即枪毙15人。

3月16日　　蒋介石颁发国民革命军北伐总方略，分为“方针”、“前期作战任务及部署”、“后期作战任务及部署”三个部分。其中“方针”为：国民革命军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参战各部队，于4月×日（日期另电决定）开始攻击。本作战分前后两期，前期须进展至胶济路亘高唐—清河—南宫—石家庄之线，后期须进展至山海关—承德—多伦之线。“前期作战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规定，第一集团军左翼部队及黄河右岸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诸部队，首先攻占济宁，同时第一集团军之右翼及中央部队占领日照、临沂、兖州之线；第二集团军河北诸部队及第三集团军向当面之敌佯攻，并严防敌之反攻；第二阶段规定，以攻济宁诸部队之大部，迅速北渡黄河，向大名以北地区协攻京汉路方面之敌，时第二集团军主力，全力猛攻河北之敌，进取石家庄，第三集团军全力协攻石家庄，第一集团军主力肃清胶济路以南地区之敌，进占济南。“后期作战任务”规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三集团军进出东北一带及京绥路，会师京、津，同时各以主力部队向榆关、承德、多伦猛烈追击。

△　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招待京、沪各报记者，发表关于北伐及外交谈话：一、关于北伐：敌人的计划，以奉军力量集中京

汉线，孙传芳的主力由济宁前进，打归德、开封，打下河南，再打山西，再打津浦线。我军方面，希望敌军深入黄河以南，一战而克河北。兵力方面，奉鲁军总计最多20万，我方实有50万以上，革命军在枪械上兵力上确有制胜的把握。二、关于外交：此次英公使到沪要求解决宁案，我们本着以平等精神和不受拘束两个原则来解决，其余各案及今后的外交，都本此原则进行，并希望赶紧和各国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得我们革命完全达到目的。

△　国民政府为宁案一事，通缉前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

△　国民政府明令重申保护在华外侨，着各省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密查访，倘有对内外越轨行动，应即切实制止。

△　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幹宴驻京各使团作初任联欢，并疏通过渡税。

△　白崇禧电复武汉两商会，已令胡宗铎军长班师回汉，绥靖地方。

△　叶琪在长沙通电就任第十二军军长，即将所部集中武汉，待命北伐。次日，该部何宣第一师、门炳岳第三师由长沙乘车赴汉，旋危宿钟第二师亦乘车赴汉。

△　第四军军长缪培南抵南京。次日，李汉魂率第二十五师抵浦口。19日，副军长薛岳率教导第二师，吴奇伟率第十二师，陈兰馨（代师长）率第二十六师分别抵浦口。旋第二十五师开宿州，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及教导二师开赴蚌埠，加入北伐。

△　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抵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旋在土国考察两周，曾与代理凯末尔执政者伊斯美帕沙作深切谈话。

△　湖南平江发生“扑城”暴动，由中共平江县委领导，县农民协

会主席余本健任工农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游击队员500人为主力军，各乡20万农民暴动队伍，化装分三路“扑城”，同城内民团展开激战。旋因湖南反动当局从长沙调来两个团的兵力镇压农军，暴动总指挥部为避免过大的伤亡，当即下令全部撤离了县城。

△　日领再访漳厦警备司令林国赓，请先制止海上抵制航行，并谓纠察队向日汽船开枪。林以绝无其事驳复。旋林召各界询问可否先撤海上之抵制，众拒绝。

△　国民政府驻日外交特派员殷汝耕乘“上海丸”到长崎。

3月17日　　李宗仁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建议裁兵，略谓：“本党革命方略，首在打倒军阀，欲使军不成阀，必须根本解决。为长治久安之计，惟有由中央先行颁布兵工政策奖励条例及垦殖奖励条例，一面组织兵工委员会。召集军事停止区域代表会议，限制各省兵额，确定兵饷预算，应归裁汰之军队，或筑路，或开垦，或经营各种生产工业，均依照条例，优予待遇，使兵与民能相安，民与兵为一体，军政财政，绝对统一，事后强有力之政府可以成立，建设计划自不难一一实现。”李并分电粤、桂、滇、黔四省，请予赞同。

△　程潜、陈嘉祐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在长沙召集党务会议，决定设湖南党务临时指导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派刘召圃、刘岳峙、张定、陈嘉任、李隆建等九人为委员。次日，指委会开第一次委员会。

△　周震鳞、孔繁霨由并到宁，即入国民政府报告山西军事情形。周并语记者：阎锡山嘱达中央谭、蒋两主席，请速北伐。晋方军队准备完全，枕戈待命。晋人愿一致努力打倒残余军阀。

△　杨树庄、方声涛联衔向福建省府提出闽军、财、权三计划，经省府委员会通过：一、全省海军、省防独四师各军，概归海军总部闽行营指挥；二、全省土著军队卢兴邦、郭凤鸣、陈国辉、叶振凤

等，均调离本防，不遵以匪论剿；设福建“剿匪”司令，以张贞、林国赓为正副司令；三、设闽南闽北要港司令，以固海防；四、设整理财政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先查全省月饷及税收额，移审计委员会查核，各军军饷俟点验兵报审会审定，移财会，始照拨；五、统一民政，驻军不得干政及用人。

△　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该部开抵琼州海口，布告“剿共”。

△　黄郛偕金问泗由宁赴沪，与英使蓝普森谈宁案。

△　奉天省长刘尚清与北京军政府磋商奉票救济办法，决定以2500万元（由东三省本身筹备2000万元，向中、交两行借500万元）为基金，谋奉票之清理救济。是晚，刘尚清回奉办理。

△　南京特别市市立各校教职员以经费三月未发，生活困难，议决总辞职，并组织清理积欠委员会，推派代表赴教育局坐索欠薪。各校自19日起暂停开课。

3月18日　第一集团军第一纵队整理设计委员会在南京开会，蒋介石主席，并发表讲话，谓：我国民革命军有50军之多，但军风不振，若不积极整顿，革命前途殊为危险。指定邵力子、陈立夫、方觉慧、李范一、刘纪文等九人为整委会常务委员。

△　第四十六军军长方鼎英抵宁，当晚，晤蒋介石请示北伐军事。方语记者谓：所部第四、五、六师已全数开抵浙境，约五日内可转入沪宁线，部队预备分两路前进，一由津浦路线，一沿运河由扬州、清江浦、宿迁入徐州。

△　鹿钟麟派军清剿林县大刀会，是日已全部肃清，毙会众千余名，“皇帝”韩玉明自杀。

△　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在浑源附近与奉军李桂林、李振声等师激

战一昼夜，将其击溃，奉军向广灵方面逃遁。

△　冯玉祥致电程潜、白崇禧称，大战在即，请促叶琪部进驻信阳。次日再电程潜谓：湘军赴豫北伐，极表欢迎，请示开拔日期，俾先派员招待。

3月19日　国民政府明令皖、赣两省政府，每月筹解北伐军米七万石。据蒋介石呈称，此次国军北伐，计各部队现有人数及将来进展增加部队约在28万余人以上，以每日每人食米一斤四两计算，日需米2470余石，每月应需米74100余石，而北方均系产麦区域，采办米粮殊属困难，自非后方源源接济，实不足以资军食而利戎机。是日，国民政府明令皖、赣两省每月筹解北伐军米七万石，内计赣省每月四万石，皖省每月三万石。自4月1日起，以三个月为率，每10日解运一次，每次须解每月全额三分之一。

△　夏斗寅奉蒋介石命赴北伐前线，是日，卸徐州戒严司令兼职，由刘峙暂摄。

△　白崇禧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告以此间北伐军业经动员，叶琪军已于筱（17）日开始输送北上，其余各部亦在继续输送。

△　西征军第三十三军长魏益三奉程潜、白崇禧命，以驻鄂西远安县独立第十三师曾述孔师“勾结共党，私通杨森，扰害地方”为由，派队解决曾部，经五小时激战，是日，攻破远安县城，曾部向城东茅坪退走。

△　陈济棠在广州就第四军军长职。同日，陈委任余汉谋为第十一师师长，香翰屏为第十二师师长，陈章甫为第十三师师长。

△　李济深在上海向《申报》记者谈广东共产党近况，谓：“琼崖一带及海陆丰、北江等处，尚潜伏不少，共党首领彭湃、朱德等尚在

北江一带，并闻海陆丰尚有共党所设之中央政府，实力亦有万人。”妄称一月之内“肃清”共产党。

△　方鼎英在南京各界代表欢迎大会上演说，惊呼：现在广东的北江和湘南一带，“共产党都猖獗的了不得”，湘、粤、赣三省壤地相接，声气相通，倘不及早扑灭，将来贻患必不堪设想，“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件事是极值得中央注意的”。

△　福建省府委员会议决：一、实行禁烟，种者限本届收成止；二、整理财政，确定军政预算，军队不得截留税收；三、统一民政，军队不得干涉行政；四、统一军政，取消军事厅，由海军总部行营添设军务、经理两处。

△　粤军邓彦华部攻占海丰城。

△　晨，陇海路东段由徐州开海州之二次票车驶至徐塘车站，突有匪众千人开枪劫车，11节车厢倾倒，乘客百余名、第十七军押运兵一连多被匪掳，两三节车被焚，损失财产达二三十万元。

△　法国海军陆战队队员71名抵沪，驻防徐家汇法国兵营。

3月20日　阎锡山在太原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

△　战地政务委员会成立。是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蒋作宾、委员蔡公时、赵世暄、陈家栋、仇鳌、林者仁，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谭延闿、国民政府代表李烈钧出席并训词。蒋作宾致答词，谓：北方民众受军阀蹂躏，地方残破无遗，山东尤甚，弃田宅而逃者达300万人以上，本会责任重大，谨当遵依训示，群策群力，努力奋斗，期于战地薄有建树。

△　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呈报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以出发在即，后方一切事宜统由副军长毛炳文处理，并请辞首都卫戍兼职，准调驻宁部队全部北伐。蒋介石面谕慰留，卫戍暂归谷正伦负责。

△　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致电李烈钧，决率部北伐。22日，国民政府复电嘉许。

△　驻津澧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奉程潜、白崇禧电令，是日，派遣第三师第六旅全部及第五师一部，开赴桑植、石门“进剿”红军贺龙之部队。23日，第三师师长雷光云率部抵石门。

△　范石生在乐昌召集所部训话，俟款到即续开湘南，会同胡凤璋“剿共”。

△　福州钱商因废止台伏票事全体罢市。省防司令部、市公安局派军警前往弹压，捕去店员一人。21日晨，各钱商就捕人事推举代表晤总商会负责人，要求保释，并磋商办法五项。

△　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夏明翰在汉口就义。

△　厦门日领将李箕焕、李刚解赴台湾转轮去朝鲜。21日，交涉员访日领事提出质问。反对侵略国权委员会开紧急会议，决派代表赴交涉署强烈要求立即解回，并电请外交部通知日本政府将该领撤换；并定23日厦门、鼓浪屿各地实行海陆总罢工一天。

△　驻华德公使博邺奉召回国，是日，离北京南下，4月5日，由沪乘轮启程。

3月中旬　蒋介石密电刘湘、赖心辉等人，以除吴（佩孚）必先倒杨（森），希对杨“共张挞伐”。

3月21日　蒋介石将16日颁发之北伐总方略要旨，电达上海海军司令杨树庄，令其统率海军警戒江苏以南海面，努力防范外国军火济敌，并须相机制服敌舰，掌握直、鲁海权。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三次会议决议：一、由财政部迅速拨巨款10万元，赶修被冲崩之直南河堤；二、推李景林、马麟、蒋

鸿遇等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三、加派陈无秩为第二集团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

△　李济深、陈铭枢奉蒋介石命抵南京，会商北伐大计。当晚，蒋介石设宴欢迎，李、陈即席报告粤、闽最近军政党务情形，对于时局有所讨论。

△　南京各界数百人举行欢迎周震鳞、孙岳、孔繁霨、邓宝珊四委员大会，蒋作宾主席，周等四委员分别演说，声称此来目的，在要求国民政府及蒋总司令即速北伐，以解北方民众痛苦。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派张凌云师攻下为土匪占据之商水县城。

△　胡宗铎、陶钧派李国泰赴新乡晤冯玉祥协商北伐，是日冯电胡、陶表示欢迎。

△　驻粤北的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通电率部自坪石北上，赴耒阳“剿共”。

△　广东省政府照会各国驻穗领事，谓华盛顿会议所议之附税今增为10％，自是日起开征，以六个月为限；且已令海关自5月11日起征关税20％，亦以六个月为限，所征入之款，供救济粤灾之用。

△　浙江省政府通过委员马寅初所提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是日呈请国民政府主持办理。

△　东三省官银号由津运现洋40万元出关，维持奉票。4月2日，又运现洋50万元赴奉。

△　北京商界请改奢侈税为商界乐捐，取消奢侈捐局，由商界每月缴捐五万元。24日，北京军政府国务会议决议照办。

△　前北京国务总理张绍曾在天津日租界遇刺身死。4月5日，北京军政府颁令优恤张绍曾，14日，国民政府议决照陆军上将例议恤张绍曾。

△　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热心祖国慈善事业，是日呈请蒋介石在上海近郊拨公地30亩，出资建筑养老院，收留沪上失业老人。

△　邮政局发表全国人口总数，共4.85508838亿人。过去三年中共增4941.3885万人。

3月22日　国民政府任命阮玄武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鲍刚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马文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军长，何应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嗣后领款统由财政部转交该会经理处发给，切勿径电各征收机关支拨款项。各军领款统由军事委员会经理处统收分发，不得自行向各征收机关提款。

△　李济深同蒋介石、谭延闿会谈，除商北伐军事计划外，李并报告平定粤局经过，请示今后处理粤局政策与党务方针。

△　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宴请李济深，陈铭枢、谭延闿、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作陪，席间于军事之各项计划有所商议。

△　程潜致电李宗仁，促来湘参加湘、鄂善后会议。

△　白崇禧以北伐在即，致电军事委员会请辞淞沪卫戍司令职，并以第三十七师远戍沪滨，统驭不便，请改归军委会直辖。

△　钱大钧部第三十二军奉蒋介石命由浙江开拔到沪，是日第一批开抵北站。同日，该军政治部主任贾伯涛语记者，中央已内定钱军长期驻沪，决改卫戍司令部为淞沪警备司令部。

△　浙江省政府致电杭州总商会，劝续认购二五库券，要求此次各业认购额数应以30万元为最少限度，以促北伐之完成。

△　上海总商会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响应李宗仁提倡兵工政策之建议，请政府迅予主持办理。

△　上海商民协会致电国民政府财政、工商两部，请取消苛捐杂税。

△　福州市圜委会通知钱业工会：凡钱商愿发行大洋票者，本年3月31日以前呈报到会；逾期未报者，一概不准发行。又谓：由圜委会函请中国银行暂借大洋五万元、辅币50万角至各钱庄，以应币面兑换之用。台伏票风潮遂告解决，被捕店员获释。

△　厦门交涉署就日领署将李箕焕、李刚解往台湾事，向日领提出正式抗议。次日，厦门反日侵略会发起抗日侵权、驱逐日领示威运动，自晨6时起，举行海陆总罢工，海上交通断绝。24日，厦门各界赴福州招待新闻界，报告反日经过，并磋商办法，要求当局于48小时内解散日警部。

△　驻宁日领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保证赔偿被日方撞沉之“新大明”轮船“一切损失”，并送吊慰金一万元为条件，要求释放被中国扣留之“厚四丸”。是日，外交部谕令海关将“厚四丸”释放。

3月23日　　国民政府发布《卷烟税国库券条例》，定额1600万元，以财政部卷烟统税为担保，言明充军政费，月息八厘，定4月1日发行，至1930年11月30日本息如数还清。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团组成，张之江任主任，是日公布参谋团条例13条，其中规定该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国民革命军各高级干部幕僚人员之联合机关”。其业务为筹议各军联合作战事宜，协助各军之作战指导，维系各军之联络，协议各军军务之整

理、改良建设事宜。

△　国民政府据冯玉祥请，电程潜、白崇禧，请将叶琪部开赴彰德。

△　刘和鼎师开赴藕池，会同李燊军进攻红军贺龙、周逸群部。

△　各省商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冯少山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五事：一、从速修订商事法令；二、免征国货二五税；三、修订劳资仲裁条例；四、废除苛捐杂税；五、修改印花税新章。

3月24日　两湖善后会议在长沙开幕，程潜、白崇禧、鲁涤平、陈嘉祐、何键、叶琪、陈绍宽、刘铡、李品仙、夏威、张知本、李隆建、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张定等30人出席，程潜主席，演说此次善后会议目的，在解除民众痛苦及巩固北伐后方，对于整理党务、刷新政治、缩减军备诸端，均有阐述。旋推定李宗仁、程潜、白崇禧、张知本、陈绍宽五人为主席团。通过议事细则。大会收到提案共144件，计党务18件，政治89件，军事37件。

△　军事委员会任何思源兼代该会政治训练部主任。

△　第一集团军第九军军长顾祝同由南京返抵徐州指挥军事。

△　第一集团军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离南京赴徐州，贺部在宁之第二师杨永清部23日起陆续开徐。

△　冯玉祥派何其巩赴湘促两湖军队北伐，是日何自新乡启程，27日抵汉口。

3月25日　贺耀组奉蒋介石命，赴归德与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会商北伐军事计划。

△　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由安庆到南京，对大中社记者谈话，

略谓："今晚专晤蒋总司令，面商北伐机宜，约明后日可以出发，本人担任东路指挥，所部军队已集中江北一带，本人到达江北，即向山东开始攻击。"

△　江西第五路军参加北伐部队，业已指定第三军第八、九两师及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师，全由第三十一军军长金汉鼎指挥。是日，朱培德偕金汉鼎抵九江，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并检阅驻九江之第八师朱世贵北伐部队。

△　张学良、杨宇霆离北京抵保定。28日到东长寿检阅奉军。29日到石家庄指挥作战。

△　英公使蓝普森因宁案交涉停顿，离沪北上。自黄郛与蓝普森谈判宁案，经数度交换意见，大体已获蓝使完全同意，内容分为三项：一、中国惩凶、赔偿；二、英国兵舰炮击南京城应道歉、赔偿；三、修改现行中英条约，以平等互尊主权为原则。正在大纲拟就解决在即之时，英政府忽以蓝使所谈判为非，第二、三两项不能与第一项同列，训令蓝氏改变交涉方针，中英宁案交涉遂告停顿。

3月26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电成都四川省党部筹备处称，四川省1月14日全省党代会之议决各案"未经中央核准，其组织法、选举法以及执监委员人数，亦未经中央审核规定"，"应即宣布无效"。

△　两湖善后会议开第一次议事会，到30人，程潜主席，通过10项议案，除继续北伐案决由负责军事领袖准备进行，并推定张知本等人起草电文外，其余九项党务案提交下次会议续议。

△　第五路军第三军第八师朱世贵率部自九江乘轮东下，次日抵芜湖，31日抵浦口。

△　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由土耳其披里致电国民政府，报告土政府极愿与我结好，派使驻宁。

△　第三集团军商震部与奉军于芷山部在偏关激战一昼夜，将其击溃。

△　南京总商会、南京市商民协会致电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军委会，拥护李宗仁裁军提案，请迅予施行；在未实行以前，请通令各军此后不得再有收编及招募情事。

△　范石生部抵九峰，往郴（州）、宜（章）“剿共”。29日，吴尚所部第八军开平（江）、浏（阳）、醴（陵）“剿共”。

△　大学院准福建私立厦门大学立案。

△　北京军政府以奉海路沿线存货过多，决定拨用洮昂路机车两辆，货车14辆。日方借口以洮昂路有“满铁”借款关系，此事有违约定，由日驻奉代理总领事峰谷向北京当局提出抗议。次日，北京答复日方，谓此事未违背“满铁”、洮昂车辆通融合同，此乃中国铁路内部事项，不能受日本干涉。

△　美公使马瑞慕于25日由汉抵沪，是日，中美双方开始在沪正式谈判宁案。

3月27日　两湖善后会议第二次会议，张知本主席。党务案凡九项，全部议毕。内中重新登记党员案，议决根据中央条例设登记委员会，交两省党部执行。会议另议决组织议案审查委员会，推张知本为委员长，刘岳峙等六人为委员。

△　广东兴（宁）、（五）华、紫（金）绥靖处长黄旭初电广州黄绍竑报告共产党在潮汕之影响，略谓：“五华、紫金民众，尚多有以行共产为甚好者，因共党实行烧田契，烧租簿，掘田界，分田地，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目前利益甚多，故迷信甚深，对此点应请政府给民众以相当利益，党部给民众以针锋相对之宣传，方能善后。”

△　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师长颜德基抵汕头，与欧阳驹协商“剿共”。是日，颜赴潮阳、惠来指挥进攻。黄旭初奉总部令，将河源、紫金、兴宁、五华所部开拔赴潮，助“剿”潮、惠、普一带共产党。

△　沪新闻检查员通知各报馆称，奉蒋介石令，禁止登载军队调动、将领行动、蒋氏出发及总攻击日期等新闻。

△　南京卫戍司令部以《三民导报》社长胡大刚“屡有轻视高级军事长官之言论”，着令拘捕究办。

△　日军舰六艘先后抵厦，自行卸货。下午，日“大井”舰派出武装艇两艘，掳去纠察队汽船一艘，队员八人，舆情大震。市警备司令部急派陆战队一连、武警数十人前往防范，同时函告市党部撤销纠察队，以免民众发生过激举动，致使事态扩大。是晚，反日侵权委员会召各界代表开会磋商办法，并派代表往晤林国赓从严交涉，否则自28日起全市罢工。林以“此举将引起共产党扰乱，纠察队撤消可免日舰往来海上”作推诿。

△　北京税务督办梁士诒对日本记者谈关税问题，称：“余此次承乏税务督办，目的不外为实行关税自主。实行关税自主有与各国订立互惠条约之必要，即不问商条已满限之国或未满限之国，须一齐订立互惠条约，俾中国得以改正从来受不平等条约所束缚之经济条约的一部分。此不仅为余个人之主张，实为南北同所切望者也。”

△　北京军政府公布设立长春关。

3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四次会议通过任命李济深、戴季陶、陈铭枢、李文范、冯祝万、黄绍竑、林云陔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奉国民政府命令来汉慰劳西征军将士及布置北伐事宜，是日偕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乘舰自南京

抵汉口。

△　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自汉口通电称，西征军事已告结束，奉程、白两总指挥命令班师回汉，整旅北伐，先头部队业已到达武昌。

△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在磁州附近与奉军于学忠部激战一昼夜，将奉军击溃。

△　两湖善后会议第三次会议，到29人，张知本主席，议程列政治案34件，并为17件。建立湖南省政府案通过，未议及人选。财政、军事、建设、教育各案，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推定人选为：财政白志鹃等五人，建设张定等七人，军事程潜、白崇禧等11人。

△　中共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在岳阳被捕，是晚在长沙就义。

△　国民党军对驻惠来红四师、红二师决取三路合围势：一、第十一师余汉谋由海丰进攻；二、黄旭初部由紫金进攻；三、潮汕军由揭阳进攻。是日，颜德基指挥“中山”舰载守备军一团抵汕头，即登岸赴前方增援。4月5日，惠来失陷。

△　厦门、鼓浪屿工商界罢业一日，抗议日武装舰艇掳我纠察汽船之无理行径。宣传队冒雨讲演，张贴反日标语，日人住宅数处玻璃窗及一商店被毁。30日，厦市举行反日游行，高呼“收回鼓浪屿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工、商、学各界分别集会，成立“反日后援会”。

△　沪、宁间民用飞行首次通航。

△　驻华巴西公使佛兰科返国，是日到北京军政府外交部辞行。

3月29日　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举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500余人出席，蔡元培主席。于右任报告烈士

殉国事略，蔡元培、何香凝发表演说，同日，广州、上海、武昌、郑州、厦门、香港等城市相继举行七十二烈士追悼典礼，学校停课一天。

△　李宗仁、陈铭枢由汉口赴长沙。李语人此行为筹商军事，慰劳将士，至湘鄂政分会主席，俟接洽后再定。

△　沪各商家所购二五库券180万元，由第三十二军派兵押解到宁。

△　张宗昌、孙传芳在济南誓师，发出通电两通，一电专攻击冯玉祥，另一电则表示希望阎、蒋两方勿助冯氏，宣称“愿与重温旧好，各不相犯”。

△　兰州中山大学举行开学成立典礼，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演讲，代校长马鹤天报告筹办经过。

△　德国国会通过政府提案，决议禁止由德运输军火入中国。

3月30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驻华美使马瑞慕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之《中美协定》。黄郛在致马瑞慕照会中谓：“兹本部长以国民政府名义，对于本事件，虽经调查证实完全为共产党于国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动而发生，但国民政府仍负其责”，并谓国民政府向美国“深示歉意”，并“惩办肇事兵卒及其他人”，赔偿美领馆人员及美侨之损失。4月4日，《中美协定》全文在南京、北京、上海、华盛顿、纽约同时公布。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工商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农矿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审计院组织法》、《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

△　国民党中常委会第一二四次会议通过指派卢师谛、黄季陆、黄以镛、向传义、叶松石、熊晓岩、陈杰、李孟辉、杨全宇九人为四

川省党务指导委员。

△　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设东北特别委员会，以蒋作宾、熊斌、刘朴忱、张璧、孔繁霨、冷遹、卢曜、孙洪、张之江、南桂馨、李廷玉、张肇、何成濬等14人组成。是日在南京开第一次谈话会，推熊斌等三人起草组织条例。4月1日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急于进行各事项，并推定蒋作宾、熊斌、刘朴忱为常务委员。

△　李宗仁、陈铭枢抵长沙，程潜、白崇禧亲赴南洋旅社拜晤，当晚程、白欢宴李、陈，并商北伐。

△　黄郛为南京事件解决照会美政府，“希望中美两国在外交上开一新纪元”，提议修订中美现行条约，解决其他悬案。

△　国民政府财政部前为救济四岸盐荒，曾设立济运总局，嗣因盐务署派员调查，认为尚无设立必要；又据四岸运商呈请仍由商运，借以维持盐业，经财政部呈请国民政府于是日会议核准，将四岸食盐济运局撤销，仍由淮商照旧案办理。

△　武昌总商会等160余团体通电要求汉口中央、中交银行钞票兑现，并请财政部收回国库券。

△　日炮舰“矢矧号”开抵武汉，载海军陆战队300余人，泊日租界江面。次日，日本第二舰队22艘军舰、兵员930余人驶抵青岛。

3月31日　晚，蒋介石到徐州督师北伐。同日发表《北伐出发告后方同志书》，要求后方将士努力职守，使阎闾不惊，工商乐业，前敌将士，无后顾之忧。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任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名单通告：计广东省陈铭枢、李济深、朱家骅等九人；广州特别市范其务、马超俊、郑国材等九人；广西省黄绍竑、伍廷飏、黄华美等九人；湖南省刘岳峙、李毓尧、刘召圃等九人；湖北省张知本、张难

先、石瑛等八人；汉口特别市严重、孙绳、李翊东等七人；山西省赵丕廉、苗培成、姚大海等九人；福建省鲁纯仁、沈江、何孝纯等七人；江西省周利生、陈礼江、王礼锡等九人；浙江省何应钦、周炳琳、王漱芳等九人；安徽省金维洁、韩安、王星拱等七人；南京特别市陈剑修、段锡朋、洪陆东等九人；江苏省钱大钧、叶楚伧、滕固等九人；河南省黄少谷、邓飞黄、郭春涛等七人；四川省卢师谛、黄季陆、黄以镛等九人；上海特别市潘公展、陈希豪、刘蘅静等九人；陕西省于振瀛、延国符、黄统等九人；甘肃省马鹤天、田昆山、李世家等八人；云南省张禄、罗衡、张邦翰等九人。

△　两湖善后会议第五次会议政治案全部议完，其要项有：请中央按月发给两湖北伐军临时费200万元；要求中央取消洋稽核制度及食盐运济局；两湖盐税交两湖管理，两湖境内公矿官营业归省政府管理；要求中央偿还已抵债之鄂公产；汉冶萍公司所欠湖北债务，应归作湖北建设之用。

△　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召集财政会议，讨论北伐筹款问题，到江、浙、皖三省财政人员60余，宋子文主席，宣布各财政机关每月解款数。次日，续开会议，各财政机关分头与宋子文接洽认定解款数目，作最后之决定。

△　国民政府就江苏省府及宁、沪两特别市权限、区域划分问题，指令内政部准如所拟办法办理；关于划界事宜及职员铨叙等，应由该部会同法制局查照案内事项，分别办理，呈候核夺。

△　国民党海外部驻粤办事处、广东华侨团体及海外部驻粤代表，在广东省党部开会欢迎林森，林森演说请海外同志慎选第三次代表大会海外代表。

△　淞沪卫戍司令部奉命撤销。同日，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抵沪。次日，第三十二军军部移至龙华正式接防。

△　彭湃率领红四师占领普宁县。

△　广州卫戍区司令部为防共产党下月1日起事，宣布戒严，当晚12时各戏院、酒楼均停业，交通断绝，军警大索共产党，捕获嫌疑犯百余名，又派舰赴汕头载余汉谋、香翰屏两师返省。

△　漳厦警备司令林国赓招待新闻记者，就中日交涉事发表谈话，声称今后李箕焕案及中日交涉各案，应听由中央及厦门外交官办理，各方不得直接干涉。

△　厦（门）、鼓（浪屿）公布特别戒严令，称：地方不靖，为严防共产党活动，无论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妨及秩序。

△　厦门大学教职员反日后援会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两事：一、3月20日厦门日警越界捕人，侵略国权，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二、3月27日日舰“大井”捕去纠察队数人，事关国权，请严重抗议。

是月　蒋介石以大举北伐在即，命令增设首都警卫司令部，直隶总司令部，任命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陈诚兼任警卫司令。

△　第一集团军策定鲁南作战计划，其要旨为：一、集中优势兵力，以两翼包围攻击，压迫敌人于汶河以南地区而歼灭之。二、第二军团于赣榆、红花埠、涝沟、邳县之线展开，以一部经赣榆向日照、莒县，以全力与第一军团联系，经郯城、临沂以西地区，向泗水、曲阜之敌攻击，并相机以强有力之一部控制海州，以策主力军侧背之安全。三、第一集团军于宿羊山、贾汪、柳泉、后想山之线展开，以一部牵制当面之敌，以主力向峄县、临城、界河之敌攻击。四、第三军团于终兴集、芳桂集之线展开，与第一、四两军团联系，除以一部控制黄口附近保护铁路外，主力向鱼台、济宁之敌攻击。五、第四军团于龙巨集、泰楼、红纸屯之线展开，与第三军团及第二集团军之第一方面军联系，除以小部位置归德附近保护铁路外，主力向金乡、济宁

之敌攻击。六、第二集团军之第一方面军于龙堌集、红船口之线展开，向巨野、汶上、济宁、滋阳之敌攻击。七、各部务于4月7日由集中地开始运动，8日在所示之线展开，10日拂晓开始向敌进攻。八、航空队于4月8日晨开始侦察台儿庄、韩庄、临城、兖州、济宁、郓城、巨野、金乡、鱼台一带敌军之阵地及行动。九、战地政务委员会随同大军之进展逐步推进，展开工作，对于收复之乡村，尤须迅速建立政权，抚辑流亡。

△　周西成派车鸣翼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黔省军事、实业等方面近况，略谓：对滇已停止用兵，滇政府龙云亦派代表赴筑言和；惟滇省内容复杂，亟盼政府设法制止乱源，以免牵动大局。创办泉水冲之煤油矿，可敷黔省之用，并开凿赤水、脚角两处盐井，电力机器设备亦将完全，燃料、食盐可不仰给外省。

△　蒋介石委冯志洵为第四十一军军长。冯前任直鲁军毕庶澄军之参谋长，毕以倒戈未成遇害后，旧部多散处鲁东北，冯委盛觉民为独立第一旅旅长，偕团长鲍哲谋来徐组织司令部，招集毕之旧部参加北伐。

△　晋北前线奉军将领高维岳、汤玉麟、张作相等在大同开军事会议，大起冲突，会议无结果而散，兵士传为笑话。战地营幕流传俚歌一首，辞曰："领袖意志不相谅，苦教士兵抱悲伤。既无枪械又无粮，一年之久未关饷。凡我弟兄快团结，同心协力倒奉张。相率去投革命军，救国救民复争光。"

△　上海浦东商业储备银行成立，董事长杜月笙，总经理裴正庸。资本1500万元。

△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上海成立；又决议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员。

4　月

4月1日　　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要求前方将士“视民众之痛苦为己身之痛苦，视国家之危难如己身之危难，将存必死之心，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

△　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相与成不世之业。“诚能于革命军未到以前，在军阀后方自动举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与革命军无稍差异”。

△　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声讨张作霖罪行，要求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同日又发表《告北方同胞书》。

△　战地政务委员会发表《告北方父老书》，望投袂而起，共同动作。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军队《连坐法修正条例》。

△　奉、晋两军于获鹿附近发生战事。奉军第八军由石家庄分向海山、申后、大车行及同冶、汶邑之线展开，向晋军标高六五三五高地杜家庄西方高地及土门阵地猛攻，双方激战数小时，未获进展。次日拂晓，奉军继续攻击，激战至午，死伤甚众。2日，同冶方面奉军亦推进至岭底；北塞之线，晋军被迫撤退，转而守井陉阵地。

△　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司令方振武由归德赴徐州晤蒋介石，会商北伐。

△　贺国光、吴藻华持蒋介石亲笔函抵兰封晤冯玉祥。2日，贺、吴携冯复蒋信离兰返徐复命。函谓大战在即，一切悉听遵命。

△　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长沙开成立大会。李宗仁、程潜、白崇禧、张知本、陈嘉祐、何键、陈绍宽及各界代表200余人出席。刘岳峙主席，程潜、李宗仁等均发表讲话。该委员会由程潜、陈嘉祐以中央委员名义派定刘岳峙、刘召圃、张定、李隆建、罗介夫、赵缭、陈容、张炯、陈嘉任九人组成。

△　湘鄂临时政委会开军事案审查会，程潜主席。审查结果计有两湖北伐军速作各种准备，早日实行，克期完成北伐等23案。

△　国民政府财政会议议决由苏、浙、皖三省向中央按月解款924.3万元。

△　南京“一一二二”惨案特别法庭在中央党部举行成立典礼，法庭审判委员柏文蔚、白云梯等11人宣誓就职。丁惟汾主席，丁超五、徐元诰分别代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到会监誓。同日，南京各机关团体举行拥护特别法庭成立游行。

△　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以近来地痞流氓勾结散兵游勇，乘机劫掠，为维持治安，是日通令所属严行取缔。同日并制定检查逃兵办法九条。

△　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陷宜章，宜章农军胡鳌、杨子达率部退郴州。3日，第八路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及总预备队进驻宜章。4日，范军第四十六师及许克祥部夹击郴州农军，双方在郴州附近30里地方接战，相持三小时，农军4000人寡不敌众。5日，郴州失陷。

△　驻华美公使马瑞慕离沪北上，3日抵北京。

4月2日　　是日至4日蒋介石在徐州、柳泉、贾汪各地检阅当地驻军并训话，称两个月内打下北京。5日，蒋抵新安镇检阅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

△　蒋介石为渡江北伐发表《告海外同胞书》，指出此次北伐，

已操左券；北伐胜利，中国能跻于自由平等之地位，事后海外同胞能享真正之幸福。“深冀海外同胞，念北伐关系之重要，共同奋斗，继续努力，俾于最短期间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 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委员蔡公时自南京出发赴徐州。

△ 国民政府任命龙云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淞沪卫戍司令部着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该司令一职简任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兼充。

△ 李宗仁、陈铭枢、程潜、白崇禧在长沙开会磋商北伐，商定两湖军队组成五个纵队，由李率队北伐，白留守武汉，程坐镇长沙。7日，李、白率第七、第十九等五军兵力参加北伐，即日开拔。

△ 张学良、杨宇霆在邯郸与戢翼翘、于学忠等会议磁南军事事毕，是日由邯郸北返，经石家庄抵灵寿，往平山前线视察。同日，奉军占领平山。

△ 褚玉璞抵大名，召直军各将官开会磋商反冯（玉祥）军事。

△ 国民政府特派李石曾、张继、丁惟汾、许世英、王瑚、王一亭、庞青城、虞洽卿、陈嘉庚、林义顺、黄贻柱、蒋作宾为直鲁赈灾委员会委员。

△ 两湖善后会议开第六次会，程潜主席。建设、教育各案审查完毕，其要项有湘粤、湘桂汽车路克期筑成案，注重德性、实施党化教育案。

△ 驻厦门张贞独立第四师召集龙溪、漳浦、云霄、海澄、诏安、南靖、平和、长泰八县县长开会，决定在各县成立清乡委员会。

△　广州市公安局破获共产党机关一处，逮捕17人，枪决五人。当晚，陈铭枢第十一军在河南凤凰岗枪杀共产党员七人。

4月3日　　蒋介石在徐州行营举行第一集团军各军参谋长会议，面授作战命令，并指示方略，共七条。

△　李宗仁电告冯玉祥定支（4日）回汉，即率部集中武胜（关）、信阳一带，追随杀贼。5日，冯电复表示“谨率三军，竭诚欢迎”。

△　冯玉祥致电第三集团军各总指挥，勖勉将士有贼无我，有我无贼；规定六种口号，振奋杀贼精神。

△　两湖善后会议第七次会，开议军事案62件，除六件免议外，余均通过。其要项为：一、设两湖军队统御整理机关案；二、各军师于规定期内，点验枪支，核定饷项案；三、各军队、机关厉行清党案；四、两湖军队月饷需600万元，由两湖中央税项下拨付，不足之数请中央补给案。

△　国民政府外交部令免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职，遗缺以外交部第一司司长金问泗接任。

△　北京军政府国务院会议决定将军事部内陆、海、航空三署并为军政署，任杨毓珣为署长；另设参谋署，于国翰为署长。

△　梁士诒在北京召集各银行行长会议，拟筹借2000万元为整理奉票经费，遭中国银行行长冯耿光及各行行长一致反对。次日，梁赴津向银行界疏通借款事。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加入三华董、六委员案。

4月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五次会议决定任命冯玉

祥、郭春涛、邓哲熙、凌勉之、李兴中、张吉墉、何其巩为政治会议开封分会委员；张励生、祁志厚为太原分会委员；朱家骅、陈可钰为广州分会委员；吕志伊、孙光庭、周钟岳、卢锡荣为云南省政府委员。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民政府禁烟条例》，凡21条。规定自民国十七年（1928）起，限期三年，将鸦片烟完全禁绝，人民戒烟期限，至迟不得逾民国十九年12月31日。

△　湘鄂善后会议闭幕。6日，驻长沙程潜部队李明灏第六军开会拥护善后会议。

△　冯玉祥以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名义电令豫、陕、甘三省政府澄清吏治，用人须注重培养、选择、陶冶、督察。

△　冯玉祥代表何其巩在湘接洽事竣，次日离湘返豫复命。程潜、白崇禧并有手书托何交冯，谓即日整师北伐。

△　奉军郑泽生部向偏关进攻，遭商震部迎击，大溃，被俘3000余人。

△　奉天交涉员高清和、日代理总领事峰谷就奉海路向洮昂路借车事举行会谈，无结果。是日，日政府向北京军政府提出第二次严重抗议，限5日答复。

△　上午，广东北江共产党领导农军2000余人在清远龙江市暴动，攻占琶江车站，通向韶关火车停开。第八路总指挥部急调第四军前往“围剿”，又饬驻韶关桂军第七师吕焕炎调大队南下夹攻。下午农军放弃车站，退向距琶江口五里地方，粤汉路火车即恢复开行。

4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二五次会议，修正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伐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案。

△　奉军自彰德方面向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猛攻。奉方兵力雄厚，第二集团军尚未布置完竣，冯玉祥调洛阳刘骥军、禹县刘汝明军、漯河韩复榘军加入前线，仍寡不敌众。9日，濮阳、观城、南乐、内黄皆发生激战。按：奉军计划，第一步对晋猛攻，逼入山西境内，第二步对晋封锁，以全力击破第二集团军在豫北作战之部队，第三步再全力解决山西。第一步计划业已实现，此系实行第二步计划。

△　第二集团军鹿钟麟第九方面军第二十军庞炳勋将林县奉军与天门会混合各部队5000余人击溃，占领古城。至此，漳河以南已无奉军及天门会踪迹。

△　奉军韩师、安师占领井陉县城。

△　吴尚赴醴陵“剿共”。9日，程潜令长沙警备司令张轸率部开赴茶陵、攸县协同吴尚“剿共”。

△　驻华法公使玛太尔原订是日返国，因中、美宁案解决，突奉法政府训令暂缓回法，令仍留任。

4月6日　　冯玉祥下令第二集团军豫北各军向磁州、大名进攻，以分奉军优势，期解山西之危。其兵力部署为：以孙连仲率第十四军、第二十三军、郑大章骑兵第一军，由彰德向磁州进攻；庞炳勋驻林县与彰德为犄角；刘镇华部第八方面军由清丰、南乐向大名进攻，于观城、濮县对东昌方面取守势；韩占元军驻道口为刘镇华军策应；鹿钟麟为北路军总司令，凡豫北作战各军，悉听指挥。

△　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纵队改为军团，仍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总指挥。第十一路军改为第四军团，以方振武为总指挥。

△　奉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及第三十五、第二十八两师，自石家庄、井陉、凤山村之线向第三集团军一一一四高地猛攻，被击退；至

夜12时，第三集团军第二、第三军接合部之七八一高地，被奉军第二十八师突破，第三集团军退至梅庄附近另筑阵地扼守。

△　日首相田中、陆军大臣白川、参谋总长铃木开会，就“山东形势遽变”研讨对策，一致同意“迅行派兵保护济南及胶济沿线日侨”。

4月7日　　蒋介石下总攻击令，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同日，蒋发布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

△　蒋介石发表《告友邦人民书》，希望“友邦”不要接济旧军阀军火。宣布：我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时严密保护。

△　蒋介石赴海州阅第十七军，次日赴运河阅第四军，缪培南同行，当晚乘专车返回徐州。

△　蒋介石因率师北伐，所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未便兼顾，推李济深暂行代理，呈请国民政府备案，是日国民政府批复准予备案。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前方将士，谓：大战在即，各将士务须具牺牲决心，益励精忠，殄此残寇。同日，并训令后方将士密切与前方策应，飞刍挽粟以济饷源，除奸缉匪，以靖地方。

△　国民政府任命吕志伊、孙光庭、周钟岳、卢锡荣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吕兼建设厅厅长，卢兼教育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令：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式，所有植树节应即废止。清明节各机关照常办公。

△　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奉命发动进攻。是日，第四军自土山镇攻击前进，9日抵河南头，向枣庄、滕县攻击；同日，第九军主力由泇口圩以南渡河，一部于9日占领梁王城、薛家庄之线，围歼台儿庄

之鲁军。

△　国民政府任命杨杰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

△　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奉蒋介石命到开封会晤冯玉祥，磋商北伐要务。9日，冯偕蒋由兰封同赴柳河，讨论军事及战地政务事宜，10日蒋由柳河返汴，后回到徐州。

△　原驻淞沪之白崇禧部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师长熊式辉抵徐州。其所部三个团均于6日陆续到徐。

△　江西朱培德部第五路军第三十一军军长金汉鼎离南昌遄赴徐州前线指挥北伐赣军。

△　国民政府明令照上将例恤前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

△　第八路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率第十三师、第十一师各一部赴东江“剿共”，是日陷惠来。

△　白崇禧部第十三军第二师师长李朝芳部陷永兴。同日，湘南第一游击司令胡凤璋进攻汝城，8日陷汝城。

4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5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参加北伐。

△　蒋介石发布航空队作战命令：规定于战斗开始后，航空队任务为：一、破坏敌军后方铁路及重要交通；二、空投煽动敌军及招降传单；三、协助各军之进攻，并担任联络；四、每日两机分左右交互航行，侦察敌军情况用地图填报，重要位置须摄影报告。

△　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骑兵在龙堌集、东莱坊将孙传芳部唐庆

珊第十三混成旅包围缴械，俘虏500余名。

△　李宗仁在武汉召集军政会议，张知本、胡宗铎、夏威、叶琪、李纪才、石瑛、张难先出席，决定武汉政治分会即日成立，令叶琪所部先行北伐，夏威部继之，胡宗铎部担任“剿共”清乡。

△　张学良到北京，报告安国军两路军情，并领军饷百万元。10日，张离京回防，11日到石家庄与杨宇霆晤面。

△　张宗昌离济南下，次日到韩庄前线督师。

△　孙传芳部第四师第十五团由济宁开赴鱼台增防。同日，兖州直鲁联军第二师炮辎各团营、第十师郑俊彦全部抵济宁填防。

△　刘湘、周西成在重庆成立川黔军联合办事处。

△　新疆回王全权代表定希程电中央，请扩大蒙藏委员会组织，加入回族委员。次日，南京回民联合会与十七省回族代表李廷相等赴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同样要求。

△　日人经营之抚顺大山煤矿贮水坑裂缝，淹毙工人1200余名。

4月9日　　蒋介石下令第一集团军，今后占领区内所有民政、财政等事概归战地政务委员会处置，各军官不得干涉。

△　冯玉祥电告鹿钟麟、孙连仲等各将领，所有此次作战克复各地之一切政务及行政、司法、财政、外交、公安等项，概由战地政务委员会主持，不必由军人代筹，仰即遵照。

△　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部郑大章骑兵第一军由彭城抄袭邯郸，战胜奉军，占领邯郸城。

△　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六军陈焯部邢震南第六十三师，向郯城张宗昌所部方永昌第四军进攻，激战数小时，击败鲁军，占领郯城。同

日，第三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占领马头镇。11日，第二十七军于李家庄西渡沂河攻占大沙沟。

△　安国军第七方面军团褚玉璞部自东昌、大名猛攻濮阳、观城、南乐、内黄之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驻道口之韩占元军已陆续增加第一线，后方空虚，驻潼关之张维玺第十三军奉命急赴道口增援，因中道受阻，全军仅半数到达。至17日，安国军增兵攻破观城。复派白俄兵及直鲁军之一部有绕攻濮县企图，濮县陷于孤立，第二集团军乃放弃濮阳，退至濮阳以西及清丰、内黄以北地区，利用楚旺、北伐村、六塔集等村落碉堡，构筑坚固阵地固守，并令第十三军策应前线。

△　程潜、白崇禧拨洋10万元、枪弹20万粒与第四十三军，令其务速剿灭贺龙，再移师北伐。

△　黄旭初率部抵普宁“剿共”。

△　南京各界五万余人隆重集会，追悼“一一二二”惨案受害烈士，段锡朋主席。谷正纲报告惨案经过，白云梯、王文藻分别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发表演说。大会通电国民政府立即拘捕惨案主、从各犯交特别法庭从严判处。

△　南满铁路会社秘书田野兰藏抵兰封访晤冯玉祥，表明该社对华态度，称：日本绝非帝国主义者，南满铁社与日政府决不助奉张。少数政客为经济关系与张勾结，诚所难免，但大多数日人决非如此。张之顾问町野氏，此次普选失败，即系因助张之故。深望此后双方开诚布公，增进友谊。冯玉祥表示：日本如能在实际上公平待我国，则我亦当以同文同种之好友公平相待。

4月10日　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克台儿庄。是日，航空队侦炸台儿庄、韩庄、临城一带鲁军阵地，第一集团第九军顾祝同部第十四师攻克禹王山、王母山、车辐山，第三师向韩山、侯新闸进攻，第二十

一师由枣庄、石埠向燕子景攻击。张宗昌第三十军毛思义部据险顽守，激战终日，毛部不支，向峄县退走。是晚顾军攻克台儿庄。

△　国民党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在南京宣誓就职，于右任主席，蔡元培监誓。参加宣誓委员为：江苏狄膺、滕固等八人；南京张厉生、洪陆东等八人；上海潘公展、吴开先、刘蘅静等七人；安徽刘真如等七人；浙江何应钦等九人；广东李安定；湖北方子樵等四人；汉口贺楚强等四人；江西萧赣等八人；云南吕志伊等五人；福建罗兆修等六人；四川陈杰、杨全宇等六人；河南邓飞黄等二人；山西赵丕廉等三人；湖南王凤喈。

△　蒋介石任段祥麟为暂编第十八军军长，武衍周为东北军前敌总指挥，褚敬坤为新编独立十二师师长。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代表大会，选举工部局董事及委员，到代表54人，贝淞荪、袁履登、赵晋卿三人当选为董事，林康侯、李馥荪、秦润卿、黄明道、陈霆锐、钱龙章当选为委员。

△　江西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均致电长沙程潜、白崇禧报告毛泽东率部分两路由遂川进至湘东，请派湘军“协同兜剿”。11日，程潜电复，已饬吴、李两师部同该军围剿醴陵、茶陵、攸县、酃县红军。

△　杨森派师长白驹抵汉，是日见李宗仁表示悔过输诚，并请抽部北伐。

△　湖北政委会议决文武官吏俸给自本月份起一律减成支发，充北伐军费；派刘士熊赴日考察政治。

△　浙江省政府下令启封各级工会。

△　军事委员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在南京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李范一，分设有线电、无线电、机车、汽车、道路工程五系，教职员、

学生近千人。

△　《中国晚报》在上海复刊。按：该报创于1919年，为我国夕刊新闻之创始者。

4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六次会，议决：一、任命李宗仁、程潜、张知本、严重、张华辅、刘岳峙、陈绍宽、李隆建、白崇禧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二、推谭延闿、蔡元培、孔祥熙、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宋子文、薛笃弼、黄郛、王伯群为财政监理委员会委员；三、《审计法》及《大学院组织法》修正通过；四、2月3日四次会议关于政治会议改组决议案全文及中常会第一一九次会议修正通过之《政治会议条例》、《政治分会条例》，电令各政治分会及各省府及各特别市政府遵照。

△　蒋介石就“清共”一周年密令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特别戒严三日，“严防共党闹事”。12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布告，“有共党希图闹事者，决杀不贷”。

△　第一集团军第三十三军占领鱼台。10日拂晓，第三军团第三十三军张克瑶部主力沿丰（县）、鱼（台）大道前进，上午11时占领渠阁，旋跟踪追击，迫近鱼台。孙传芳部李宝章师及张宗昌部第七十一旅守军败退，第三十三军乘胜包围鱼台，是日入城，完全占领。12日，第二十七军独立第三师师长陈耀汉占领谷亭。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吕秀文第二十一军占领郓城，俘张宗昌第二十三军杨清臣部2000余名，即向汶上前进。

△　魏益三部自宜昌开拔，加入北伐，宜昌警备由第四十三军担任。13日，魏抵汉谒李宗仁，商北伐。

△　范石生率领第四十五师会同第十三军第二师李朝芳部，与红军朱德部在资兴激战数小时，陷安仁、资兴县城。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陶钧为会办。胡、陶通电是日于武昌就职。

△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举行本年度董事举选大会，选举结果：增选陈巨熙、钟蕙生、庄乐峰三人为华董，杨嘉立等五人为英董。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复函工部局，提出华董席数之确定应以捐税比例为原则，租界华人教育经费、组织设施等问题亦应尊重纳税华人代表意见，以示合作诚意。

4月12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二六次会议决议：一、组织战地临时党务指导委员会，以何思源、于恩波等五人为指导委员；二、香港、九龙、澳门、广州湾、台湾、琉球群岛各地党务划归广东、福建两省就近管辖；三、蔡元培、张静江、叶楚伧、陈果夫、于右任、谭延闿、丁惟汾为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四、训令党员严守纪律，不得有轨外举动。

△　国民政府派罗家伦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

△　冯玉祥致电第二集团军各将领，略谓：此次北伐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之最后生死关头，凡编入战斗序列各军，对蒋介石均应绝对服从，不可稍存不欲下人之心，自坏万里长城。

△　蒋介石电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第四军于是日占领枣庄。

△　井陉以西雪花山昼夜血战。奉军胡毓坤、荣臻两军以该山系入井陉、获鹿、平山等县要道，以第十四师数次冲锋夺取山头，第三集团军徐永昌等据险固守。是日至18日，激战不息，双方死伤枕藉。

△　北京军政府正式声明，停止道胜银行各项合同权利，第三国不得承继。

△　北京军政府设政费管理委员会，鲍贵卿兼会长。

△　张作霖令吉林军入关助战。但因奉方于本月9日将洮南、昂昂溪路线之车辆移往奉海路线，引起日方不满，日南满铁路会社拒绝运行，13日，吉军乃徒步南下。

4月13日　国民政府第五十四次会议，内政部长薛笃弼提议，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之旨，由政府颁发明令昭示国人，以端趋向。在教育方面，由大学院厘定普通人民应具有之德育编为公民常识课本，责成各学校实地训育。决议通过。

△　第一集团军第九军占领临城。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九军由小城子经杏峪、奶奶山开始攻临城。是日，鲁军第十一军张宗辅、第七军许琨、第五军王栋、第十军吴奠卿各部占领沙沟、临城以东一带高地，与第九军激战。张宗昌亲临前线，督部猛攻，激战数小时，鲁军不支，张宗昌偕许、王等分乘13辆列车，退向兖州，第九军占领临城。是役，鲁军死伤300余名，被俘百余名，第九军阵亡少将团长一员，伤亡亦甚众。

△　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一军占韩庄、沙沟。10日，第一军进占红庙、沟上、利国驿之线。11日总指挥刘峙决以优势兵力，向敌左翼包围攻击，第一军先后占领六十子、耿山子、晋庄、王庄等地。是日，第一军第一师占领小营、张庄、大小窝，第二师占领金马驹，续向韩庄进攻。张宗昌部守军不支，向赤山口溃退，二师遂占韩庄。旋向张阿、谢庄分途攻击，张部退向界河，二师又占沙沟。同日，蒋介石抵新安镇视察，旋即返徐。

△　北京军政府向中、交、边业三银行借紧要军费200万元，以崇关税收作抵，除预扣利息外，净交167万元。

△　驻华日公使芳泽与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幹会商结束，因

北京方面妥协，是日就中日奉海路交涉案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一、恢复奉海、满铁两路之联运协定；二、归还奉海线借用洮昂线之车辆。

△　夜，安国军德州兵工厂被焚，损失子弹300余万发。

4月14日　国民政府致电各省政府，告以北伐大战开始以来，京汉、津浦两路大军全线进攻，迭克名城，山西方面亦有进展，北伐优势已彰，扫荡幽燕可冀，要求各省整理地方，修明政治，协同作战，巩固后方。

△　孙传芳率部攻陷丰县。孙传芳以津浦正面鲁军吃紧，亲率主力五万向徐州猛攻，第三军团贺耀组部受挫。是日，孙军陷丰县，其先头部队已向黄口进发，徐州危急。同日，蒋介石在徐州获悉丰县失守，作出紧急处置：一、飞电冯玉祥调石友三部自兰封乘车至砀山下车，进攻丰县；二、自临城前线抽调第一军，令副军长蒋鼎文率领乘火车回援，在徐北茅村车站下车，徒步前进；三、令总预备队第三十七师及第三军之第八师占领徐州城西九里山阵地；四、严令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军、独立第三师死守待援。

△　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六军占领日照，张宗昌部张宗辅军向胶州退却。

△　首都各界北伐协助会开成立会，推举总司令部兵站总监部、市党部、下关商会、下关商民协会、市商民协会、南京总商会、市学生联合会、市妇女协会、市政府、市总工会、军事委员会、市农民协会、市公安局13团体为执委。

4月15日　蒋介石抵临城，询问第九军前线战况后，偕刘峙、顾祝同至官桥镇第四军视察前线防务。当晚返回徐州。

△　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占领羊山集。13日，方振武率第三十四

军及第四十七军各一部，自单县北之鸡黍集，进攻羊山集。羊山集地势险恶，为金乡北、济宁南之重镇，孙传芳军第十三混成旅、第三十旅、第十九旅顽守，郑俊彦指挥。14日晚，方军即占领附近各村庄。是日下午5时，第三十四军阮玄武部冲锋上山，仅半小时即完全占领羊集山。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占领巨野，俘敌万余，毙敌7000余名，孙部死伤千余。孙传芳主力李宝章全军覆灭，余部向嘉祥溃退。孙良诚部跟踪尾追，午后继克嘉祥，旋向济宁追击。

△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在上海龙华司令部举行就职典礼。是日，钱派兵员赴嘉定“剿共”。

△　湖北清乡督办胡宗铎、会办陶钧委李纪才任鄂北清乡司令，驻襄阳；严敬为鄂中清乡司令，驻沔阳；刘和鼎为鄂西清乡司令，驻宜昌；李宜煊为鄂南清乡司令，驻咸宁；廖辅仁为应、安、黄、孝等六属清乡主任，驻花园；吕冠为冈、安、麻清乡主任，驻黄冈；皮宗荣为蕲水等五属清乡主任，驻蕲水。同日，鄂清乡督办署令第十九军第三师第十七团开赴鄂东清乡“剿共”。

4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党务指导委员，略谓：“各同志此次受党使命，务须确实履践，力惩颓习，凡到达各省市地方所有欢迎酬酢，应即一概谢绝。”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电达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规定党员登记期限：一、上海、南京、广州、汉口特别市，以一个月为限；二、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以两个月为限；三、云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山西，以三个月为限；四、在未公开地方，登记期限定为四个月。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为派定党务指导委员事通令全体党员，略谓：此次中央所派党务指导委员，事前详立标准，慎重考察，参以各

地方情形，期于适合实际工作。此后各地方党务之整理，民众之训练，皆所资赖。凡我同志，自应深念中央分配任务之重，服从党命，共同努力，不得假借党部及民众团体之名义，擅布主义，妄施攻击，使党务更受影响。中央为此，已令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政府对各指导委员负责保护。兹特训令全体党员共体此意，务须严守纪律，不得有越轨之举动，是为至要。

△　李烈钧电复日本民党要人头山满，对其提出“国民党不要内讧”的好意警告表示感谢，并谓津浦、京汉两路敌军自蒋、冯、阎督师后均获大胜，山西之敌全线损失惨重，北伐完成，指日可待。

△　日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佐向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建议日本再次出兵山东。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暨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亦向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

△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任命邹鹏振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代理军长。

△　程潜电告李宗仁已将二五库券拨20万充军饷，国府汇北伐军费30万17日到汉。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骑兵第四师占领汶上。

△　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驻华葡公使毕安琪（由葡驻宁领事转），声明1887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葡《通商条约》，已不适用于现在中葡两国的政治、经济、商务情形，提议于本月28日（距1888年4月28日在天津换约已届第四个10年）该约期满后，由两国各派专员，重订新约。北京军政府亦于28日照会葡使，提议重订新约。

△　程潜令第四十三军独立第八师及第十四军新编第二师前往湘鄂边境会剿红军贺龙部。

△　范石生部抵郴州“剿共”。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令准严鹤龄辞清华学校校长，遗缺由温应星继任。

△　德国新任驻华公使卜尔熙抵北京。

△　美国中央探险队由北京出发，赴内蒙古探索生物遗迹，队长安德鲁斯。

4月17日　第二集团军第五军石友三部克复丰县。15日，石友三部奉令增援贺耀组军，即调该部及野炮兵一团，以火车输送一昼夜，运至砀山，是日进攻丰县。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两师亦自茅村西进，第四十军拂晓由栖山、孟楼、吴河、高楼两道，分向华山攻击，第二十七军一部由小张寨、王小楼攻击前进，威胁华山侧背直军。旋孙传芳闻济宁报警，率部仓皇北逃，石友三部首先克丰县，并于是役击毙鲁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袁家骥。

△　国民政府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修正大学院组织法》及《审计法》；准冯玉祥电请令拨库券200万元接济北伐军需。

△　日本内阁会议讨论山东形势，决定以鲁军撤退济宁及北伐军中断胶济铁路为由，断行出兵，由横须贺派陆战队250名乘“春日”舰赴青岛。同日，海军省公布：在该队开到前，令第二舰队所属军舰“古鹰号”泊于青岛，与第二遣外舰队之“球磨”及“对马”协力警备。20日，“春日”舰陆战队在青岛登陆。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以彰德方面战事吃紧，迭电李宗仁率部北上。旋李派叶琪率队至河南漯河接替韩复榘军防务。韩军星夜北调，16日集中彰德以南，是日拂晓向奉军右翼猛攻，占领崔家桥，连下30余堡。奉军复于后方增加大部兵力，占据村寨。激战至夜，韩军师长三人均受重伤，复伤旅长两员，韩复榘遂下令退回原阵地。

△　李宗仁、程潜、白崇禧派代表赴兰封谒冯玉祥商讨北伐事宜。

△　安国军第五方面军团长张作相电召第十六师李振声率部入关作战。

△　北京军政府任命王占元为陆军检阅使。

△　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议决推叶楚伧赴省政府，请切实负责防止嘉定、青浦、无锡、江阴共产党暴动。

△　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王均布告，以朱（培德）总指挥率师北伐，身负全赣治安之责，凡各县署公安官吏、地方团体，对“共党盗匪”须极力扫除，如有希图扰乱，则法所不容，必尽杀而后已。

△　战地政务委员会以临城业已克复，特设整理中兴煤矿公司委员会，订定整理委员会暂行条例，委俞飞鹏、陈家栋等五人为委员，俞兼整理委员会主任，陈为副主任。是日，俞等五委员赴临城开始工作。

△　东三省官银号派宋恩宽购现洋15万由津运奉。

4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七次会议通过《省政府组织法》；特任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任胡宗铎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刘郁芬、宋哲元为政治会议开封分会委员，缪培南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宋子文、易培基为外交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致电蒋介石，请于军事进行时，注意胶济沿线日侨权益，免生事端。电曰：“查胶济铁路沿线，除青岛、济南外，尚有章邱、张店、博山、周村、潍县、淄川、金岭镇、坊子八处，为中日约定自开之商埠，日侨极多。又有地名‘四方’者，日人亦伙，且为胶济工厂所在地，与青岛关系尤重。胶济铁路对于日本尚有债务关系。至淄川、金岭镇、坊子三处，更有中日合办之矿业。是

等处所，于军事进行时最易发生事件，除饬知战地政务委员会（蒋作宾主持）、外交处蔡（公时）主任特加注意外，应请通饬前方将领，藉备参考。”

△　日外务省发表出兵山东声明书，谬称：山东形势急转，内乱将波及日侨，出兵纯属自卫。

△　国民政府据密报获悉：张宗昌深恐不能固守济南，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与日本密约，即以青岛及胶济铁路权益作代价，要求日本派兵驱逐北伐军，所有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完全归日军负责防守，不许北伐军驻济南。

△　第一集团军占领滕县。15日，张宗昌部退滕县、界河一带防守。16日，第一集团军第一军第二师及第四、九两军展开于花石沟、南沙河、刘庄之线，施行包围，并以第九军向龙山、界河攻击。17日，第九军与张敬尧、许琨等部接战，经一昼夜战斗，卒将张、许等部迫向界河方面溃退。是日，第三十七军迂回至张庄（邹县以东），张、许遂总退却，第九军第三师占领滕县。是役，敌军伤亡约2000名，毙师长一名，第九军亦伤亡官兵800余名。第四军于休城一带击败吴奠卿部后，亦于19日拂晓进至滕县。19日晨，蒋介石赴滕县视察。

△　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占领界河。拂晓，第一军团第一军自滕县乘胜向界河攻击。界河为鲁军第二道防线，张宗昌曾于界河附近东自龙山，西迄大马山，费金50万，历时半载，聘德人造成据点或半永久筑城三处，工事坚固。敌据险顽守，激战至午，第一军团击破敌防线，占领界河。同日，乘胜占领两下店。

△　奉军增加大部队向第二集团军正面猛攻，直插韩陵山背后东涧山，炮火极烈，飞机、坦克同时并进。至是，韩陵山阵地为双方争夺之焦点，屡得屡失，白刃相接，伤亡甚大。孙连仲亲率手枪营赴前

线督战，所部高树勋、韩德元、魏凤楼各师亦艰苦应战，奉军猛攻数十次，均被击退。

△　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偕第三军军长王均、第三十一军军长金汉鼎抵徐州谒蒋介石，请示北伐机宜。

△　李济深召开广东军政会议，陈铭枢、黄绍竑、冯祝万、邓世增等及少将以上军官均列席，讨论各军实行划区分防及筹商军事、财政，协助北伐各问题。同日，李在本宅召各将领开谈话会，决调范石生、胡凤璋、许克祥三部加入北伐，于一月之内编第四、五、十一三个军，专任剿匪，驻粤第十五军调回桂省。

△　北京军政府因军事失利，各城门加派兵员守卫。19日，北京颁布全城戒严令。

4月19日　日本政府下令第二次出兵山东。是日，日首相田中、参谋总长铃木觐见天皇，奏请出兵山东获准。内阁召集临时阁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决议。旋铃木向熊本师团颁发出兵令：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中将统率所部5000人从门司出发，向山东进兵；另以驻津之三个中队由小永伍率领向济南进兵。所需经费230万元除责任内阁支出70万元外，余部160万元追加预算于特别议会。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据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告日本出兵山东，请严重抗议，略谓："日本出兵，本日已下动员令，派天津驻防军步兵三个中队四百名，约二十八号到济南，并派本国第六师团步兵两旅及铁路电信队五百余名，赴青岛胶济沿线。27日预定在青岛登陆，请严重抗议。"

△　上午4时，蒋介石赴邹县前线晤刘峙、顾祝同等，面授机宜。20日返徐。

△　国民政府公布《审计法》。

△　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九次部务会议，议决通告全国人民12条要点，令各省民政厅遵办，要点为：一、誓雪国耻；二、崇尚道德；三、破除迷信；四、购用国货；五、勤修道路；六、多种树木；七、戒除烟酒嫖赌；八、厉行勤苦俭朴；九、锻炼健全身体；十、要人人识字；十一、禁止女子缠足；十二、注重清洁卫生。

△　第一集团军第一、九两军占领邹县。18日下午，邹县张宗昌部第七军军长许琨、第三军军长程国瑞闻兖州及两下店均已失去，即仓皇向曲阜、泗水逃遁。程国瑞部于是日上午全部退出邹县，顾祝同第九军前锋第三师随即跟进，占领邹县车站，午入城。刘峙第一军于下午3时由界河进驻邹县，第三十七军副军长范熙绩率部于下午4时抵邹。蒋介石令即晚向曲阜追击。顾祝同于下午2时抵邹，当晚奉命指挥所部追击曲阜残敌。

△　第一集团军第九军会同孙良诚部围攻兖州，席液池骑兵军断兖州北面铁路，鲁军无退路。是午，完全占领兖州，张宗昌、王栋、程国瑞等弃车徒步潜逃。是役俘敌师长一名，中将支队长四名，少将支队长三名，毙伤士兵万余。旋跟踪追击，继克宁阳。孙良诚命所属各部进攻济宁。

△　第二集团军庞炳勋军一部，向水冶之奉军陈光斗军及窦联芳部骑兵攻击，激战竟日，庞军占领固县村、高平等地，奉军退大正集，旋又增加兵力来攻，仍被击退。

△　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开会讨论日本出兵山东事件，到黄郛、谭延闿、蔡元培、易培基、王正廷等人，决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

△　东京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通电誓死反对日本出兵山东，乞全国一致排日。

△　日军建川少将由大连抵北京访日使芳泽及北京军政府，接洽日本出兵山东事宜。

△　重庆大火，被灾者七八千户。

4月20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过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宋子文、易培基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张群继任上海兵工厂厂长；议决令各部院制订施政纲领。

△　第二次出兵山东之首批日军到达济南。日陆军省19日电令驻津日军司令新井即日出兵济南。是日新井派遣步兵三中队460人以小泉慕次为指挥官由天津开抵济南。新井佯称：本军对南北两军将“严守中立”。

△　第一集团军占领金乡。第四军团第三十四军阮玄武率部向金乡进攻，孙传芳军马葆珩部凭城据险顽守，阮军围攻经旬，迭次肉搏，是日下午6时占领金乡。

△　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第九军第三师于上午8时占领曲阜县城。

△　第三集团军反攻石家庄。次日，阎锡山电蒋介石报告东路晋军自20日起已改取攻势，本人已离太原亲赴东路前线，率领全军冲出娘子关，进取石家庄。

△　第二军团第三十七军由邹县向宫里集中，第三师以急行军于楼德镇、崔家楼包围鲁军董鸿逵师予以歼灭，生擒董鸿逵。22日集中宫里、谷里，24日经封邱、吐丝口、锦阳关向胶济铁路明水车站挺进。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就日本出兵山东事电汪荣宝转知日本政府，略谓：据驻日公使汪荣宝报告谓日本阁议，已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如果系事实，务望从速取消，以敦邦交。

△　山东督办张宗昌、省长林宪祖联名电北京国务院、外交部，报告日本借口保侨，派兵到山东，请就近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

4月21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事向日外交部严重抗议，要求“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是晚该抗议书送达日驻宁领事署。

△　驻宁日领冈本一策偕海军少将中岛访何应钦、李烈钧，就国民政府外交部严重抗议日出兵事进行解释，诡释在青岛登陆之日海军，确系保侨，并无助逆情事。

△　上海市各工会、市民会等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同日，全国学生总会在南京开会，发起组织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

△　国民政府公布《卷烟税国库券条例》，定额1600万元，以卷烟统税为担保，用以抵充政府预算不敷之用。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克复济宁。16日，孙良诚部攻济宁，占其四门。孙传芳在鱼台闻警，乃率部分兵五路，奋力反攻，一留鱼台抵抗，一援济宁，一向安居镇，一向嘉祥，一出巨野、嘉祥间，各路同时并进，冀包围孙良诚部。旋解济宁之危，固守安居镇。于是城中直鲁军与兖州来援之军，及孙传芳自前线调回之两路，合攻孙良诚军于安居镇。旋石友三军将鱼台之孙军击破，与贺耀组部急向济宁前进，方振武军也将金乡攻克，旋与孙传芳两路军相遇于嘉祥、巨野间，大败孙军，19日围安居镇。孙军亦为孙良诚击溃。席液池骑兵军自宁阳进攻敌军后路，破坏曲阜、兖州间交通，先于18日乘虚占领兖州。滕县之直鲁军闻讯，亦于19日退走。旋孙良诚、马鸿逵军克济宁，孙军向肥城、东平退走。

△　第一集团军第十军占领峄县。18日，第一集团军第十军杨胜治部包围峄县，鲁军孙百万部曾多次突围，均被击回。旋孙军伪装投诚，仍密通土匪，图扰乱杨军后方，卒被截击，死伤甚众。是日，杨军乘胜占领峄县，孙军逃向官庄。同日下午，峄县各界3000人同第十

军举行军民联欢会，庆祝北伐军占领峄县。

△　冯玉祥以彰德被围，情势危急，电请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速行大规模反攻，以解彰德之围。

△　皖南大刀会聚众3000余人包围和县，与县长高寿恒所率部队80人激战，砍死县警备队长二人，官兵死伤数十人。驻芜湖第三十七军教导师闻讯，即派兵一营往剿，会众闻风散去。

△　日先遣舰“球磨”、“古鹰”、“对马”三舰驶抵青岛。旋该三舰陆战队员660名登陆。

△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罗亦农在上海就义。

4月22日　蒋介石、陈调元、刘峙抵兖州。总司令部徐州行营即日移兖州办公，何成濬、邵力子留守徐州。次日上午，蒋介石至曲阜瞻仰孔庙、孔林，召见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下午回兖。

△　白崇禧电冯玉祥告廖磊、魏益三、周斓各军刻已开拔北上，并谓：“此次各军出发，诸多困难，艰苦成行，致稽时日，殊以为愧。”冯当即复电称：“兄部大战之后，又事长征，给养困难，自属实况，弟处筹划接济，当惟力是视。”

△　石友三奉冯玉祥令增援孝义。是日，石率部经柳河，于19日占领巩县，解孝义之围。旋与宋哲元部分兵两路，克临汝、密县，解登封、禹县之围，樊钟秀率部向鲁山、襄城、方城一带逃奔。至是豫西粗告平定。

△　广东省党部通电反对日本出兵，指出日派兵抵济南，冀助其走狗奉张，借保其在鲁所得权利，阻挠我革命进行；宣布愿率百粤民众为政府后盾，务达日本撤兵目的。

△　张宗昌向开滦公司借款500万元。

4月23日　　蒋介石在兖州行营部署第一集团军进攻济南战略：一、第二军团一部攻临沂，一部由新泰向博山挺进，主力经莱芜、文祖镇、龙山镇截断胶济路，向济南袭击；二、第一军团向山口镇、泰安、界首攻击；三、第三军团向大小万德、青杨树攻击；四、第四军团于击破肥城后向石店、张夏镇、大冈山攻击；五、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进至陈家山、东阿之线，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经平阴、长清向济南袭击；六、第三军及第三十七师为总预备队，在宁阳附近待命。

△　蒋介石自兖州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常委李烈钧等人，请嘉奖有功将士，略谓："此次作战，全赖各将士用命，共同一致，克臻奇效，而第二集团军之骑兵第二军军长席液池之得力，尤为伟大；此外在鲁西各军，据冯总司令所报，为孙总指挥良诚、方总指挥振武、石军长友三、夏军长斗寅；在津浦正面各军，赖刘总指挥峙、顾军长祝同、缪军长培南，奋勇坚决，用克消灭强寇，速平鲁南，谨祈分别嘉奖。至其他有功各员，正在查明，另请叙奖。"24日，国民政府颁令嘉奖蒋介石及北伐有功将士。

△　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对付日本出兵山东问题，通过《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要求党员严行保持秩序，遵守纪律，使前敌将士一意向前，无内顾之忧，个人言论行动，务当遵照中央所指示之标准，不得稍有违背。

△　奉军三面围攻南乐，第二集团军寡不敌众，弃守南乐，退至吉村、马村集之线。

△　国民政府委战地政务委员蔡公时为战地外交处主任。是日，蔡分别函告驻沪各国领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护。

△　南京党、政、军各机关、各民众团体代表举行反日出兵山东大会，通过《警告日本民众书》、《告日田中内阁书》、《告世界民众书》，组织“首都各民众团体反日出兵山东委员会”，由各团体推举委员九人组成执行委员会。

△　全国学生总会通电全国，代表500万学生誓死反对日本出兵山东，阻我北伐，望全国同胞共褫奸丑，屏除腥膻，保障革命。

△　安徽全省商会联合会在芜湖开会，就日本再次出兵山东事一致通过电请外交部迅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　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

△　中比学术慈善事业委员会（庚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比驻京公使华洛思、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幹到会祝贺。

4月24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三〇次会议就日本出兵山东问题，通过《告世界民众书》及《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世界民众给予中国以正义之援助，要求日本国民力谋遏止田中内阁之侵略政策。

△　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

△　蒋介石命令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四各军团及第一、四、九、三十六、三十七各军政治部主任：“我军到达胶济路后，须切实保护外侨，并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

4月25日　日本熊本第六师团1600余名，由福田师团长率领，分乘三轮抵青岛。其中福田师团长及斋藤旅团长率官兵746名，乘“亚美利加丸”于上午7时到达；特别陆战队200名，乘“春日号”于上午10时到达；第六师团步、骑、通信、铁道各部队，乘“山城丸”于上午11时到达。下午1时，日步兵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十三联队本队及十三联队一个大队、机关枪队主力、工兵一个小队，总员约600名，由大港车站登车开赴济南。

△　日驻青岛司令福田布告，中国时局急变，战祸将及山东，本军警备济南、青岛以及胶济铁路，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若有累及日侨情事，立即严办，决不宽贷。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八次会议通过《劳资争议处理法》、《侨务委员会组织法》及裁撤华侨教育委员会，华侨教育事项归侨务委员会办理等七项议案。

△　国民政府明令各机关整饬纪纲，以建立庶政革新之根本。令曰：国家之败，由于官邪，现在训政伊始，端重政治上之建设，而建设良好政治，必先以祛除积习，整肃官常为嚆矢。用特申令整饬纪纲，以立庶政革新之根本：一曰明党义；二曰崇廉洁；三曰亲民众；四曰矢慎勤；五曰尚节俭；六曰绝嗜好；七曰严奖惩；八曰督功过。

△　第二军团占莱芜。21日，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进至平邑，23日到达蒙阴，24日向新泰推进，是日进驻莱芜。旋抄袭泰安后路，左路孙良诚部集中东阿，抄袭济南侧面。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占领东阿。24日，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吕秀文第二十一军进至东平附近，同时探知东阿有孙传芳军千余名，孙良诚遂令吕军速向东阿进展，并令第十九师进驻东平，相机援助吕军，是日第二十一军占领东阿，旋向平阴进击。

△　张作霖派员携现款20万元、枪1000支，抵济南慰问孙传芳。

△　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县砻市。

△　江苏句容、溧阳间之茅山、黄山等处大刀会六七百人攻占溧阳县城。该大刀会众曾于23日抵上兴埠，与句容、溧阳、溧水三县军警激战，24日抵南渡镇，是日入溧阳城，26日入宜兴。

4月26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第二次严重抗议日本出兵山东。是日下午，江苏、江宁两交涉员分别将抗议

照会送达驻沪、宁日领事。照会要求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动。

△　日军第六师团斋藤旅团长率领第二批日军600余人由青岛开抵济南。

△　河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通电全国各报馆，吁请全国同胞一致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并请外交部速行提出抗议，以再接再厉、百折不回之精神，不达日兵撤退之目的不止。

△　浙江各界“民众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委员会”在杭州成立。

△　国民政府以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奉命提师北伐，是日批准杨赓笙代行江西省府主席。

△　驻赣第五路军第九师杨池生部在南昌誓师北伐，第三军军长王均及杨池生先后训话。同日及27日，第九师第二十六、七两团开拔北上，第二十五团已于25日开浔转赴徐州应战。

△　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通电宣布调集大兵10万，进驻潼关，即日誓师，加入北伐。

△　阎锡山奉蒋介石所颁作战计划，以晋军倾全力出兵石家庄，以利北伐全局，是日抵井陉督师。

△　第三集团军东路右翼总指挥赵承绶先锋部队占领赞皇，暂编第六师进攻武安。

△　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各省民政厅提倡国货，规定：一、由大学院编审中小学校课本，注重提倡国货；二、由工商部速筹振兴工艺计划，并严禁商人以外货冒充国货；三、由财政部实行保护国货政策；四、由内政部、大学院分行内外各官署、各学校，嗣后购用物品，除图书、仪器及其他为中国所无而必须购用者外，应一律购用国

货；五、由各省政府及特别市政府布告民众一律提倡购用国货。

△　福建全省财政会议开幕。28日，第二次预备会上，省府报告国家、地方两税收入支出状况：一、国家税岁入：1279.9659万元；二、地方税岁入：883.4183万元；三、国家岁出：1553.3717万元；四、地方岁出：1511.5726万元；五、旧欠省债：1252.7603万元；六、新欠省债：476.3306万元。国家、地方收入支出，共不敷901.5601万元。

4月27日　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逼近泰安，张宗昌恃泰安天险顽守，山东即将决战，日本复又出兵济南，是日自徐州专程抵兰封野鸡岗车站会晤冯玉祥磋商办法。决定以陈调元部主力攻击济南以东，刘峙部主攻界首，贺耀组部经大舍、大石桥攻济南正面，方振武部向孙伯庄、阳庄之线展开攻击，孙良诚部由东阿、平阴向长清进攻。

△　国民政府委员会开第五十八次会议，谭延闿主席，通过《军需公债条例》；特派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同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朱培德任命令。

△　南京特别市市政府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省党部、省政府及全国党政军各机关、各团体、各报馆暨全国民众，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指出："现在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除向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尤其是日本的民众，请求予以赞助外，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力，来对付他们。我们相信在现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时代，只有用实力去制裁他们的暴行，我们更相信军阀与帝国主义在最近的将来，要同时宣告覆灭。"

△　开封山东革命同志救鲁期成会通电全国各团体，誓死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所望海外友邦主持正谊，伸张公道，国内同胞，急起反抗，坚持到底，一面督促政府与日本严重抗议，一面从促进和扩大民众的组织力上着手，造成一种规模更大的群众运动，向着山东目标

勇猛做去”。“日兵与舰一日不撤退，即反对工作一日不停止，希望于最短期间，达到最后目的”。

△　我国留日士官学校学生愤日本出兵山东，组织“中国国民党留日士官学校反日出兵归国团”，首批50余人，是日离东京返国。

△　冯玉祥自新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以叛国通敌罪褫夺樊钟秀本兼各职，谓樊军乘玉祥动员北伐，后方空虚之际，由赊旗镇一带北犯，陷叶县（本月1日）、宝丰、鲁山（均5日）、郏县（8日）、襄城（9日）、舞阳（16日）、临汝，围困禹城（19日）、登封（20日），陷偃师（20日），占领黑关车站，截断陇海交通，使北伐军事受阻，勾结奉鲁逆军，扰乱后方，罪大恶极，无可逭恕，除申令石友三、宋哲元两部夹击外，请国民政府明令讨伐。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占领平阴。

△　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贺耀组军同孙传芳军在刀山、谷山附近激战。孙传芳军在肥城以东刀山、谷山一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阻贺军前进。是日，第二十七军攻占孙家庄，旋占鱼池庄，第六十五师向黑山、甲子峪进攻，同孙军展开激烈争夺，旋占甲子峪，独立第三师集中炮火猛攻谷山，掩护步兵冲锋，孙军不支，退向大王庄，独立第三师遂占谷山。同日，第四十军亦自鱼池庄向蒋家庄附近猛攻，孙军据守穆英台高地附近阵地，瞰射贺军，贺军伤亡重大。旋贺军奋勇鏖战，占蒋家庄、穆英台阵地，并炮攻刀山阵地，掩护步兵攀登悬崖，仰攻刀山、黄巢寨之敌。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开会，李济深提议黄埔中央军事学校改称国民革命军官学校，广西军事分校改称国民革命军官学校分校，重新派定梁漱溟、彭一湖、陆兴祺为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均获通过。

△　湖北省府开会，就组织惩共特别法庭磋商办法。同日，省清乡督办署通令各县司令、各县长切实清乡。

△　中日合办吉林老沟煤矿合同签字。

△　中国公学校董会选举胡适为校长。

4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军需公债条例》，定额1000万元，以本年5月1日为发行期，利息为周率八厘。民国十八年起偿还，至第10年止全数偿清。

△　国民政府再电张学良，嗣后东三省外交移交中央办理。

△　日军1500余人开抵济南，旋自定防界，修筑工事，铺设电网，并以日领事馆、正金银行、济南医院三处称为警备区域，加设武装日警，禁止华人通行，市民惊慌。

△　日军第四十七联队等部400余人以“护矿”为名，开抵博山布防。

△　李济深致电国民政府反对日本出兵山东，请政府督促各军挺进北讨，一面团结各方，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宣告列邦，以彰公论。

△　江苏省政府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出兵山东，要求外交当局严重抗议，责令退兵。

△　中国留日侨胞在东京举行反对日本出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日政府下令逮捕游行示威之中国留学生宋希濂等70余人。5月4日，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通电全国，声援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并盼中央政府向日政府提出抗议，并进行交涉，务达圆满结果。

△　第一集团军陈调元第二军团第三十七军占领胶济铁路明水镇车站，旋在龙山附近展开激战。次日，炸毁权庄附近铁道，毙敌旅长任得福于龙山车站，克龙山镇。青岛、济南联络被割断，济南动摇。

△　晨，奉军以步兵坦克车五辆，向第二集团军高庄阵地攻击，被击退，并获坦克两辆。冯玉祥以敌势已衰，津浦路方面第一军团着着胜利，敌已呈全面动摇之象，乃重新部署部队，分右翼、中央及左翼三方面反攻奉军。

△　宋哲元部于27日抵洛阳，是日击败龙门樊钟秀部三万余人。

△　国民政府派陈立夫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

△　第四十六军军长方鼎英奉蒋介石命抵徐州，所部亦自明光一带陆续北开到徐，任第三预备队。

△　直鲁联军褚玉璞及孙殿英率部向清丰东大屯进攻，被第二集团军刘茂恩第八方面军击溃。

△　毛泽东率井冈山红军经酃县回到砻市，是日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

4月29日　　蒋介石以济南旦夕即下，是晚10时专车由徐州赴兖州，措置克济时之设施。

△　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以胶济路明水站被蒋介石收编的鲁南匪刘桂棠（刘黑七）炸毁受阻，令黑田大佐为指挥官率兵2000，于次日开抵张店“护路”。

△　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占领界首。28日，缪培南第四军向界首西南之凤凰庄鲁军进攻，敌军自车站起至凤凰台止，共有两军之众，第四军猛烈攻击，敌军不支，退守界首车站附近。及是日拂晓，第四军以一师兵力赶至车站西南面，向车站发起冲锋，血战三小时，敌军向山地退却，缪部攻下界首，是役缴获步枪两千余支，机关枪12挺，迫击炮20门，俘虏2000名，敌军死伤甚众，四军之一师亦死伤千余人。

△　第二集团军彰德战事开始反攻。右翼占领郭家庄、吴家村之线，中央方面占领东西涧山、马垒村、五关之线，左翼占领固县村、郭庄之线，先后共占20余村。奉军张学良亲率部队至前线督战，因闻济南败耗，乃破坏漳河铁桥及铁道、电线，向顺德方面溃退。

△　韩复榘率第十四师及第一师之一部、第七十师、骑兵、炮兵、坦克等部，向曲沟集奉部攻击，奉军猛烈抵抗，战至5月1日夜，濮阳、观城奉军不支，乃全线溃退。

△　石友三部奉第二集团军命自济宁回师河南驱除樊钟秀部，是日克复巩县，复解孝义之围。

△　湘鄂政委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及郑州民众援助北伐委员会分别通电反对日本出兵山东。郑州援助北伐委员会通电恳请政府严重抗议，限期撤兵，并吁请各省同胞“排货练兵，同作后盾”。

4月30日　蒋介石自徐州抵兖州，旋至行营主持总理纪念周，并作军事及外交之讲话。关于外交，蒋谓：据日人表示，出兵目的在于保护日侨，决不妨碍国民革命军之军事行动，不但山东如此，将来东三省方面亦须如此。如日兵不干涉我军行动最佳，万一干涉我军行动，引起我全国人民之愤恨，则我军亦不得不取相当之对付。

△　蒋介石令战地政务委员会：凡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一律蠲除，着各县及各机关不得收纳。

△　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占领泰安。第一集团军自26日起分路进攻泰安，第九军由右翼绕道泰安东面山地截击泰安北面，第一、第十、第三十七、第四十七军沿铁路用铁甲车进攻正面，第四军由左翼会同第四十七军进攻界首。28日，各路围攻泰安城，张宗昌军徐海春旅2000人不及退去，避入城内死守。是日，第一军第一师攻占泰安，城内守军全部投降。

△　第一集团军方振武第四军、第四十一军向肥城围攻，肥城附近直鲁军两师，于城之南北两面约五公里处设防，激战一昼夜，击毙张宗昌部第八军军长柴云陞并师、旅长三人，获枪万余，是日占领肥城。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于26日进至平阴，28日由平阴向长清挺进，是日进占长清。

△　蒋介石派张群赴东京就日本出兵山东问题进行谈判。是日张群自沪乘“上海丸”赴日。

△　黄郛自南京赴济南，行前电蒋介石告以对日情形，其要点为：“（1）最初与岳（张群）商电邀松井来，嗣得复电称，松拟下济后，径赴济晤总司令，并望岳随往。又言鲁与日关系甚深，下济后，何人当局？甚悬念。能密示预拟人选？若得岳当此任最佳，否则亦盼以总司令有密切关系者任之等语。……（3）与矢田谈，谓据彼所得训令及情形观之，在济日兵决不袒奉。”

△　济南日军司令斋藤布告称，本军负责保护胶济路及其沿线，南北两军任何一方闯入其界限内者，一律解除武装。

△　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在北京病故。

是月　　余日章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耶路撒冷召开的世界宣教会会议。

5　月

5月1日　　第一集团军克复济南。第一集团军自左、中、右三路包抄济南，是晨，第九军第三师、第一军第二十二师首先入城。下午1时，刘峙进驻旧督署，下令以第二十二师维持市内秩序。同日，陈调元部第二十六军及第三十七军第三师沿胶济路南北地区攻入济南。

第三十七军第一师经黄台山攻入黄河桥，敌卫队旅据新城兵工厂桥头堡顽抗，激战数小时，卒不支，借铁甲车掩护，由黄河桥北撤。方振武部击退大石桥之敌后，亦于同日进入济南。贺耀组部截击肥城之敌后进驻济南城郊。下午4时止，张宗昌直鲁军残部数万人经黄河桥逸去，济南全城被第一集团军完全占领。

△　上午，蒋介石由兖州抵泰安，旋赴蒿里山视察炮兵阵地；下午至界首视察。同日，蒋电国民政府，告以本日完全克复济南，并表示仍当督率各军，迅速追击残敌，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

△　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五十九次会议，主席谭延闿。议决公布《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修正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任命张邦翰为外交部特派云南交涉员；改宜昌沙市交涉员为宜昌交涉员，增设沙市交涉员一缺，分别专办宜、沙两处交涉事宜。

△　阎锡山策定平山出击计划，第一期消灭温汤、洪子店及其以西之敌而占领之；第二期占领获鹿、东天门，包抄右路当面之敌而歼灭之；第三期占领石家庄，断敌后路，并援助左路军之出击。决定自雁北及阳泉抽调五个师之兵力，分为三路，分别由关福安（第八师长）、赵承绶（第二师长）、徐永昌（第三军长）指挥。各出击部队于5月3日正午以前分别按指定地点集结。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谓彰德方面，我军连战皆捷，毙敌三四千人，获战利品无数，敌纷纷北退；大名徐源泉卫队团亦被缴械，徐逆潜逃无踪。次日又电谓：我军于艳（29）日开始向彰德攻击，昨（1）日下午4时已将其全线击溃，敌向顺德逃遁，正在追击中。

△　李宗仁在汉招宴冯玉祥代表李鸣钟、何其巩、马福祥，表示愿竭两湖全力，完成北伐，白崇禧总指挥并将亲赴前敌。李、何对两湖北伐极表欢迎，并表示冯可帮助给养。

△　宋哲元部驱除樊钟秀部，克复偃师。

△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召开反日大会，决定反日出兵大会与“五七”纪念会合并举行。同日，广州总商会通电反对日本出兵山东。

△　陕西省渭南县崇凝镇苏维埃政府成立。是日，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南东原农民千余人，在崇凝镇召开群众大会，痛斥军阀罪行及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宣布起义。在赤卫队配合下，农民奋起推翻区公所，成立苏维埃政权，揭开了渭华起义的序幕。

△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醴泉县农民起义。农民三万余人包围县城，要求县政府豁免粮款，县长撤职，惩办豪绅。次日，县长朱家骧勾结土匪武装镇压起义农民，起义失败。

△　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在汉口就义。

△　《现代中国》杂志在上海创刊，由郭昌锦、丁时政创办。

△　据广州市公安局调查，广州户数为17.6436万家，男47.4074万人，女33.7687万人，合计81.1761万人。

5月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九次会议修正通过《著作权法》；任命林森、萧佛成等九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指定林森、萧佛成、邓泽如为常务委员；特任傅存怀、郭宗汾、周玳、南桂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上午9时，蒋介石抵济南。下午，召集军长以上军官会议，指示地方绥靖事宜，委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马登瀛为济南公安局长。同日，方振武晤日军旅团长斋藤，声明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请日军即日撤除警戒。斋藤慨然允诺。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抵济南。

△　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由青岛率所部600名抵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司令部。

△　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阎锡山及各路总指挥，报告该军彰德前线各部已渡过漳河，占领磁州，正向顺德进攻。

△　第三集团军克复井陉。

5月3日　　上午8时，驻济南日代理总领事西田畊一带同宪兵司令到城内总司令部（设在旧山东督办公署）拜会蒋介石，佯称济南日军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特地前来辞行”。

△　日军恣意屠杀我国军民，制造济南惨案。上午，第四十军贺耀组部一名兵士因患病被送往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基督教医院（在城外商埠区）治疗，日本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争执。日兵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中国士兵及夫役各一人，余皆逃入医院。日兵又将医院包围，用机枪扫射。同时，日兵开枪打死在街上张贴标语的中国兵士。10时半，忽有一日人在隆昌洋行附近强行通过贺耀组第四十军防地，士兵予以制止，发生冲突。日武官酒井暗中指使特务在中日军队对峙中放枪，引起战斗。日兵听到枪声后，即沿街放枪，恣意屠杀市民和士兵，顷刻间市内血肉横飞，尸体满街。蒋介石闻讯，立即下令城外的军队于下午5时以前离开济南，并将此事通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一面请其约束部下。混乱之际，日军乘机将第四十军第七团千余人缴械，又窜至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室开枪射击。黄郛赴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迫令在文件上签字，承认冲突由中国士兵挑起，黄被扣达18小时。下午，邮政局、电报局被日军占领，交通断绝，全城辍业。在日军炮火轰击下，中国军用电台被炸毁，守台兵士全部阵亡。是夜11时，日兵20余人借口交涉署门前发现日兵尸

体，强行收缴交涉署的枪械，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起来，用刺刀逼迫他们跪下。蔡用日语抗议，日军竟将蔡的耳鼻割去，继又将蔡的舌头、眼睛挖去，然后用机枪射击，蔡公时、张麟书等17人惨遭杀害。

△　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当天即决定采取派遣援军的强硬方针，下令福田彦助："决由内地（日本本土）尽量增兵。此际须采取断然措施"；并决定由国内派遣一个师团及一个铁道队，中国东北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朝鲜派出一个航空中队，立即前往山东，候田中首相裁决。田中以政友会未能在议会中占多数，犹豫不决，迟至8日方作出正式决定。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三二次会议，议决加委张廷灏、贾伯涛为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委员；委李居平、吴道安、杨万选等九人为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政治会议议决特任傅存怀、郭宗汾、周玳、南桂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交国民政府任命，并通过"国民党组织系统图"等11项决议。

△　国民政府以梁士诒、王克敏"潜匿北京，托庇奉逆，把持财政，植党营私，复以巨款接济逆军，以冀延长祸乱，罪恶昭著，实国法所不容"，是日下令通缉梁、王。

△　第二集团军自大名方面全线反击，直鲁军总退却。是日刘镇华部克复大名，直鲁军向德州方面溃逃。

△　蒋介石派代表李仲公到重庆。据李谈称，此来任务：一、促各军觉悟，共谋解决川事；二、催各军实行加入北伐；三、考察川省形势，为中央解决川事张本。同日，李偕赖心辉由江津赴黔晤周西成。

5月4日　　国民政府以北伐军克复济南，明令奖恤将士，赈济灾黎。

△　晨，济南市枪炮声复起，弹落省长公署及总部，死伤军民19人，英、美两国驻济领事出面调停冲突。至晚，形势稍和缓。

△　凌晨，蒋介石在济南派高级参谋熊式辉至津浦铁路办事处（蒋与福田商定之交涉地点），同日军代表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日方提出停战条件迫熊签字：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与津浦铁路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里外。熊以事关重大，须请示总司令，遂于5时返回总司令部。

△　下午，蒋介石电国民政府报告日军在济暴行经过。5日，国民政府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应付策略，决定取容忍政策，并电复蒋介石谓：我方态度须特别“持重”。

△　夜，蒋介石在济南总司令部同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部署济案发生后之军事，决定退出济南，分五路大军渡黄河绕道继续北伐。当晚，蒋介石密令城外各路大军渡河北进。

△　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派高级参谋一名至北伐军总司令部见蒋介石，称：“昨日的事情，是部下冲突，发生了误会”，表示以后设法调解，使事态“不再扩大”。蒋当即表示赞同“勿使冲突扩大”，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投掷炸弹。当晚，日军仍在城外从西关至北关一带连续放枪打炮，投掷炸弹。

△　黄郛就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事，急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轰击之暴行，并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先决问题概用正当手续解决，并声明保留所应提出之要求。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为济南事件向日使馆提出抗议。

△　济南日军电退驻德州的张宗昌，告以济南业已发生战事，令

其派军队速来攻济。因张军已被击溃，一时不能集中兵力，故日军派飞机轰炸北伐军总司令部，轰死警卫数人，伤军官数人，蒋介石适在司令部，未被炸中。

△　日军第三十六旅团长岩仓率第二十三联队日军500余人、机枪一连，是日自青岛启程向济南进发。

△　张群抵东京。次日会见田中首相，提出济南事件勿任凭地方的军队直接折冲，应移付外交交涉，未被接受。旋田中派日军参谋部第三部部长松井石根前往济南同中国当局谈判。

△　济南各界组“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负责调查惨案真相。12日，“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更名“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并发表宣言，要求日兵退出山东，惩办日军高级军官，收回日租界，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　南京党、政、军及各民众团体代表千余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中央大学谢兆熊主席，中央党部代表缪斌、国民政府代表程天放等分别代表党政发表演说，强调“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的先声，学生除奸的壮举，救国的伟绩，建设新文化的导源”。

△　广西省政府通电全国，要求中央向日政府严重交涉从山东撤兵，并吁请全国一致主张，务达胜利。

△　驻汉日副领事田中访李宗仁，谓济南冲突，两国均以为憾，武汉人心动摇，恐有不测骚扰，商请防止越轨行为，及保护在汉日侨生命财产。李宗仁声明允予保护。

△　军事委员会讨论检阅军队问题，议决推何应钦为检阅军队委员会委员长，葛敬恩等20余人为委员，分三班检阅，先检阅第四十六军与第三十三军。

△　第三集团军右路军洪子店攻击战开始。是日，关福安第八师

沿滹沱河向洪子店攻击前进，赵承绶部协助攻击。6日，攻占洪子店。7日，徐永昌部攻占温汤，奉军向平山溃逃。

△ “一一二二”惨案特别法庭在南京举行第六次会议，议决7日开庭，推柏文蔚任审判长。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江西宁冈砻市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朱德与毛泽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毛泽东分别讲话。两军会合后，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军委书记。部队编为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三个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师师长毛泽东（兼）；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共九个团，全部兵力一万多人，大部为湘南农军。

△ 渭华农民起义迅速发展。2日，渭南与华县交界处的赤水镇召开群众大会，到千余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3日，渭南西原的阳郭镇举行群众大会，数千群众捣毁了劣绅的商号。是日，华县高塘镇举行群众大会，赤卫队员查抄了劣绅的商号及染房，烧毁了账目，将粮食及财物分给了农民。同日，渭南西原的三张镇群众大会处决了搜刮民财的厘金局长。9日，渭南400余农民和赤卫队员在白庙举行大会，与前来围攻的冯子明军展开英勇搏斗。旬日之间，农民开展“踏团”（即消灭地主民团）及“火化地契”斗争，建立农民协会及苏维埃政权。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了渭南和华县南靠秦岭、北临西（安）潼（关）公路，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南北30余里、东西60余里，人口约九万的地区。

5月5日 上午，蒋介石偕黄郛离济南退驻党家庄（距济南约30华里），令第一军李延年团及第四十一军苏宗辙旅之一部（计3000人）留守济南城内，维持秩序，并于同日函告福田彦助，盼其停止特

殊行动，俾维持两国睦谊。

△　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奉蒋介石命致函英、美两国驻济南总领事，通告北伐军退出济南，仅留极少数维持治安部队，使济南成为不设防城市，此后一切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如因战事受到损害，应由日本负完全责任，北伐军愿意给以一切应有的保护。

△　冯玉祥、蒋介石在党家庄会商军事。蒋决定将北伐军事交冯主持，自己回南京主持党政。6日，冯由党家庄返回郑州。

△　下午，日军得悉济南中国军队主力已渡过黄河，派飞机10余架轰炸，又用大炮轰击已经渡河的军队，阻止南军行动，死伤甚众。

△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知国民政府向日本严重交涉济案，略谓："沉冤不雪，民命何堪，国权堕落，至此已极。为特令仰迅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不屈不挠，务期达到公平解决之目的，以伸民愤，而保国权。"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一周内一切集会静默三分钟，为蔡公时等志哀。9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为济案死者志哀。

△　全国各地举行"五五"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暨光复济南庆祝大会。是日，南京、上海、徐州、汉口、南昌、福州、厦门等地同时集会。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大会，到千余人，谭延闿、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演说对日问题，强调民众与党部、政府持同一态度。上海党政军及民众团体联合大会上，对济南事件议决三案：一、通电全国誓雪此仇；二、明日开会讨论应付办法；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

△　南京50余团体、60余名代表开会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实行对日经济绝交，通电全国反对日本暴行及电请蒋

介石驱逐日兵出境，以及请求中央恢复民众运动、组织青年救国军等18项议案。

△ 浙江省政府通电全国，指责日兵在济南无端开衅，戕害我外交官吏，暴戾野蛮，为近世罕见，要求国民政府确定外交方针，以资应付，全国民众一致奋起，为外交后盾。

5月6日 蒋介石电饬北伐各军保护各友邦领事及外侨生命财产，“举凡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尤宜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

△ 南京各机关团体代表开会，通过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同日，南京各学校举行反日运动大会，反对日本侵略暴行。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日本出兵及济南惨案之办法。通过决议案10项，其要项为：一、通电全国军民各界一致起来御日；二、努力劝导二五库券，协助军饷，完成北伐；三、联合五商会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四、筹集对日战事准备。

△ 上海总商会以济案发生，国难已临，致电张作霖，请“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

△ 菲律宾华侨集会声讨日本制造济南惨案，议决向国民政府请愿对日宣战。次日，中国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中华国民协会、中华总商会暨全体侨民致电蒋介石，请主持大计，当机立断，表示“侨民等当捐弃一切，效命宗国”。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报告江（3）日总攻情形，谓：“骑兵第三师歌（5）日到高邑县北，其余部队明日可断京汉线；出攻平山各部本日连克洪子店、温塘镇、郭苏集等处，即可与第二集团军会师石家庄，直捣燕薊。”

△　湘军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由河南漯河到汉，向程潜、白崇禧请示北伐机宜。

5月7日　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提出五项无理要求，于下午4时送交暂代济南交涉员赵世暄转致蒋介石（时在泰安），限12小时内答复："一、严峻惩罚有关骚扰及其暴虐行为之高级武官。二、解除在日本军前抗争之军队武装。三、在南军治下严禁一切反日之宣传。四、南军应撤离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沿线20华里外。五、为监视右项执行起见，在12小时以内，开放张辛庄兵营。"

△　晚8时，蒋介石在泰安车站接得福田所提五项要求条件后，即拟定六项对案，命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星夜携赴济南与福田交涉。对案条件为："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但当时日本军队有同样行动者，亦应按律处分。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传，且已实行取缔。三、胶济路两侧20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路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国应派相当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

△　蒋介石为表示接受日军所提惩办肇事长官的条件，以"贺耀组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下令免其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委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毛炳文代第四十军军长。

△　蒋介石电令张群迅速晤见田中，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告友邦民众书》，将日军悍然出兵侵入中国领土、制造济南惨案的暴行公诸于众，吁请世界人民作公道的评判。

△　国民政府就济案电各省市政府，略谓中央已饬外交部严重交涉济案，当此北伐成功在迩之际，益应坚定精神，严整步调，努力工作，俟北伐早日完成，外交亦得次第解决，各地应“恪守中央旨令，以促成之”。

△　李石曾、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王宠惠自巴黎电黄郛，主张“对日外交无妨让步，俾速取北京，免蹈郭松龄故轨”，并决定推王宠惠9日赴英，伍朝枢真（11）日赴美，孙科文（12）日往荷、比、德，胡汉民暂驻法，分头行动。

△　日政府举行紧急临时阁议，首相田中及各大臣、陆军次官、军务局长河部、参谋本部长松井等列席，陆相白川报告山东情形，一致主张“毅然措置”。8日，日内阁正式决定“军事占领胶济路”案：一、动员第三师团出兵中国；二、武力监理胶济铁路，令名古屋第三师团照战时编制开赴青岛。9日，日皇批准第三次出兵中国，日内阁亦同时向第三师团下达动员令，命令组成1.5万人队伍，按战时编制开赴青岛。

△　日本南满铁道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奉日本首相田中命秘密抵北京晤张作霖，表示日本当局决定掩护他撤回关外，阻止北伐军出关。张当即允诺在日本《满蒙新五路密约》上签字。

△　张作霖密使庄景珂抵日本东京会晤田中，要求日本出兵山东。15日，庄景珂密电天津孙俶仁，叙述与日谈判内情，略谓：昨与田中晤谈，田中完全同意以保侨为名，拒赤为实，“以甲寅原案（‘二十一条’）作交换，以武力压制党方作标的”，动员十师兵力来华。

△　日人头山满、佃信夫、水野梅晓致电谭延闿、张静江、李烈

钧、于右任、蔡元培、黄郛、何应钦等人并转蒋介石、冯玉祥，对于济南惨案主张双方在各自认其曲、于理法之下以诚相见，方有转机。

△　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司令部第十五联队及炮兵中队自青岛开往济南。9日，日特别陆战队300名在青岛登岸。

△　驻津日军司令部新井扨太郎照会天津警察厅，声称奉日政府电令，即派工兵500名在四乡六区建筑飞机场。8日，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向日使提口头抗议，无效。11日，天津日军架设机枪，强筑机场，行人误入者皆被殴逐。安国军第七方面军团长褚玉璞赴北京请示办法。

△　广州各界于东校场举行反日出兵大会，到20余万人。议决七案，其要项为：组广东各界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电全国一致反日，并提议组织全国国民反日侵略大同盟；电请政府严重抗议济案，限鲁日兵即日退却，否则取断然之对付；致电警告日本政府，从速撤兵。大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愿团结粤数千万同胞，誓作政府后盾。

△　北京京师总商会代表京师全体商民电国务院外交部、军事部，反对日本再度出兵山东，并电上海总商会支持吁请弭兵通电。

△　《革命评论》杂志在上海创刊，陈公博主编。

△　中共陕西省委发动旬邑起义。是日，在许才升领导下，该县郝村及其附近各村农民400余人，手持梭标，打开县城，杀死县长李克选，开仓济贫，并于25日宣布成立旬邑工农民主政府及红军渭北支队。6月7日，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派代理旬邑县长李焕章督率民团“围剿”，旬邑起义失败。

5月8日　　上午，熊式辉、罗家伦至济南日军司令部与福田谈判。福田态度横蛮，谓南军推派代表已逾期限，并对蒋介石所拟对案各项，均云不必谈，并面致书面通牒，内称：“昨日午后4时，本司令

官对贵总司令所提之五项要求条件，亲交贵军代表，虽通告内声明限12小时以内回答，然至本日午前4时，仍未接获贵总司令之正式回答，因此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熊、罗交涉遂无结果。

△ 罗家伦向留守济南城的旅长苏宗辙和第一军第一团团长李延年转述蒋介石命令，内容为：令苏、李尽卫戍之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日军来攻时，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打击；未奉退却命令，不得撤出济南。

△ 蒋介石致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外交部长黄郛电二通：其一，报告福田所提五项要求条件内容，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同福田谈判；其二，日方不待我答复，占领辛庄、张庄，并于本日凌晨4时突用大炮猛攻济南，灭绝人道，应请钧府立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事实宣告全世界。

△ 张群往日首相官邸晤田中，转达蒋介石解决济案意见：如果日本出兵只在护侨，不影响国民革命军北伐，则我们必将尽力完成北伐，达成统一中国之使命。至于济案，如果经查明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总之，一切我们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来了结这次的不幸事件。

△ 张群自东京致电黄郛，报告与日首相田中谈判结果：“（一）不袒奉，至北伐将成时，彼当助南统一中国。（二）根据华府会议，说明胶济路之担保权及济南侨民关系，不得已出兵理由，求谅解，并不妨碍北伐进行。（三）关于目前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者，福田现负其责，当由其办理，此外交涉统由双方外交当局办理。济南择留优秀部队维持治安，注重在先求相安，后谈是非。（四）万勿因此扩大风潮，益增纠纷，致使彼此处境困难，无法挽救。”并告明晨离东返沪。

△　国民政府为“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希图煽动，利用停课、罢工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一事，通电晓谕全国各界遵照政府命令，恪守纪律，各安职业，对于外交事件，听候中央处理；如有违反命令者，依照戒严条例处置。

△　国民政府派林森、萧佛成、邓泽如、周启刚、丘莘畇、张南生、郑洪年、王志远、吴公义为侨务委员会委员，指定林森、萧佛成、邓泽如为常务委员。

△　国民政府任命崔士杰为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

△　晨6时20分，福田师团长接到东京之命令：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的行动。7时，日军以我方对最后通牒未作答复，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开炮轰击济南，并限我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各城门落弹起火，延烧千余家。内外城门守军刘峙、方振武部各一团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方部据城垣抵抗，拒不缴械。

△　日军占领新城兵工厂，炮毁黄河铁桥。同日上午，辛庄火药库落弹起火，日军岩仓旅团占领张庄、辛庄及白马山车站。旋向党家庄攻击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居民。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在该车站休整之第三军第八师遭日军袭击，伤亡几十人，350包军米及大批军械物资被日军击毁、掳去。9日，蒋介石下令撤出党家庄。

△　第三集团军占领河北高邑。2日，阎锡山电昔阳第十军军长李维新及东冶头第六师师长孙楚，告以彰德之敌已开始退却，希速派骑兵一部，绕出京汉路，破坏交通，并侦察其退却情形，相机扰乱奉军退路。第十军奉命派队于3日晚出发，向顺德以北前进，至是日会同谭旅占领高邑。

△　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自5月1日起，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北追击奉军张学良部，是日占领顺德，奉军向东北溃退。

△　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孙楚所部第六师占领河北获鹿。

△　第三集团军右路军自4日起，自洪子店向奉军接连发动进攻，是日其第一路由放口进占平山。

△　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军万选才部、第十三军张维玺部占领夏津，9日占武城，直鲁军退向德州、故城、枣强一带。

5月9日　　蒋介石就济南惨案发出避免冲突通令，饬全体军人务须仰体中央意志，忍耐处置，所有民众集会及游行，应绝对禁止参加。“如有故意玩视禁令者，一经察觉，定以军法从事”。

△　蒋介石电谭延闿、黄郛，告以改派总参议何成濬携下列六条交涉济案：一、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因不听命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二、胶济路沿线及济南周围20华里以内，我方暂不驻兵；三、本军治下地方，为维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切实取缔一切反日宣传；四、辛庄、张庄之部队开拔北伐，该两处暂不驻兵；五、本军前为贵军所缴之枪械，请即交还；六、请日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以维中日两国友谊及东亚和平。

△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日师团长福田所提五项条件及熊式辉、罗家伦与日军交涉情形。议决要案六项：一、令蒋、阎、冯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二、令李、程、白三总指挥率湘、鄂全军，赶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内会师北京；三、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四、由国府致电国联，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情形；五、电在欧洲之重要同志将日军暴行宣示于世界；六、依照国府8日通令，严密保持后方秩序。

△　南京各界200余团体3000余人集会，隆重追悼蔡公时及济案死难同胞。大会通过对付日本议案17件。同日，芜湖、徐州、浦口、厦门、天津、武汉等地举行反日大会，与会者臂缠黑纱，为死难者志

哀。

△　山东泰安各界开拥蒋完成北伐大会，到万余人，蒋介石出席演说，勖勉军民团结救国，忍辱负重。何思源、方觉慧及各界代表均有演说。晚，提灯庆祝胜利。

△　蒋介石在泰安调整北伐部署，下达第十七号命令：将主力嫡系第一军团撤至泰安、大汶河以南地区“待机行动”，以谋自卫。第一军留三个支队位于莱芜、山口、界首；第三军以两团位于肥城；第四军留一团位于长清、广里之间；第三十二军在兖州待命。令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率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及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迅速渡河，向德州进攻。

△　汪精卫自欧洲为日本在济南暴行事件致电国民党中央，略谓：国民革命为求中国之平等自由，故必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不容，望中央坚持，各同志一致结合，为国民前驱，务求达到自卫目的。并谓：“铭已纠合在欧同志，为有组织之援助与宣传，万希领导国民誓死奋争，铭当与国人及诸同志共生死也。”

△　日军旅团长斋藤率所部猛攻济南西城门，与李延年部激战。至10日，省公署被日军炮毁，死伤军民甚夥。济市红十字会、总商会派出代表向双方请求停战。是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行让步”，退出济南，不留一兵一卒，李延年、邓殷藩部由苏宗辙率领于11日凌晨2时由东门突围出城，行至城外三里路之时，被日军伏兵用机关枪扫射，死伤数百人。未及退出者悉被屠杀。

△　日外务省就第三次出兵发表声明，宣布增派第三师团赴山东，诡称：“济南事态恶化，以现有兵力而期保护侨民于万全，不但为不可得，且连络青岛与济南之胶济铁路，随所被毁，有难期确保交通之现状，因此以谋该方面居留民之保护无有遗憾，且期确保山东铁路之交通为目的，特增派第三师团前往山东。”同时另由内地派遣五

个中队至天津为应急措置。又决定向长江及华南方面增派巡洋舰、驱逐舰若干以防万一。

△　张作霖召张学良、杨宇霆到京，讨论停战息争事。张、杨均力主停战息争，谓所部士兵，均明大义，果因必要而息争，军心只有感奋。会毕张作霖拟就停战通电，随即发出。当日张、杨回防布置撤兵。

△　上午，孙传芳抵天津，即日致电北京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复，略谓："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兹已到津，前线军事，不能负责。"下午，潘向张作霖报告，并劝张顺应潮流，通电停战。

△　张作霖发出息战通电。略谓：正太、彰德两路已停止攻击，国内政治，听候国民公正裁决。是非曲直，付之舆论。

△　晚，张学良、杨宇霆抵保定，军团部由石家庄移回。京汉前线在顺德、元氏，正太线在井陉东。留戢翼翘、荣臻、万福麟军经京汉、正太线，于学忠、富双英及胡毓坤等部则开赴津浦线，各路均停止进攻。

△　第三集团军占领石家庄。第三集团军右路军第十二师杨效欧部于4日开始攻击，7日下午奉军开始退却。8日上午，第三集团军进占测鱼、杨庄、耿庄、南彰城之线，奉军向东北方向溃退，是日上午9时，该师占领石家庄。

△　第三集团军左纵队第八师占领河北灵寿、行唐。

△　第三集团军占领河北阜平。第三集团军丰玉玺第六军于洪子店之战开始后，即行反攻，6日占摩天岭、长城岭，7日占南天门。8日，奉军由龙泉关东撤，该军即向阜平反击，是日占阜平，奉军向唐

县、曲阳退却。

△　第三集团军右路军第六师孙楚部占领河北赞皇、元氏。

△　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凡示威运动、集会及对外人涉及暴行之事项，一律严行禁止，违者枪决。

△　日驻美大使松平就济案访美国务卿，诡称出兵中国纯系保护日侨，一俟秩序恢复即行撤军。

5月10日　蒋介石全权代表何成濬，几经跋涉，是日始抵济南，旋与日领吉田、师团长福田谈判。何向福田说明日军所提五个条件都已兑现，请求停止攻城。日方提出须于日军面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贺、陈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何以条件苛刻，谈判卒无结果，返兖州复命。

△　谭延闿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致电国际联盟秘书长德鲁蒙爵士，要求召开理事会议公断济案。12日，德鲁蒙复电南京，谓南京政府未经国际联盟承认，难以受理济案。13日，南京政府派王宠惠赴英，李石曾赴法，伍朝枢赴美，报告济案详情，请求国联公断。

△　谭延闿、张静江、吴敬恒于9日晚离京北上，是日抵兖州，与蒋介石晤商济南惨案，王正廷、蒋作宾等列席。商定以完成北伐为前提，济南事件仍用外交方法解决。

△　蒋介石据黄郛电告张群在日与田中会晤经过后，是日电复黄郛，略谓："彼言不妨碍我军北伐，如其能不妨碍我津浦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如此则向来关系依然继续，且益加厚。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嘱黄代向矢田总领事或电殷汝耕转达日方。旋又追发一电，嘱黄"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不必用弟名义"。

△　黄郛电蒋介石报告沪日总领事矢田来访，面示日外部训令，

内称：一、第三师团出动专为护路、护侨，决无膺惩之意；二、济案除军事由福田负责，其余当由外交办理；三、希望不扩大，仍继续北伐。

△　何成濬自济电告国民政府：福田坚持必须在日军撤退之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如不照条件承认，此后即不再接受我方代表。

△　日军继续围攻济南，重炮轰城，竟日不绝，留城伤员及无辜居民被残害者六七百人。逃出城市的难民抢食日军丢下的含毒面包，致死者数百人。

△　日大批驱逐舰抵沪，旋驶往大冶、汉口，“警戒”长江沿线。是日至17日，从佐世保调遣“柿号”、“梅号”等驱逐舰六艘留驻上海，轻巡洋舰三艘抵南京。

△　纽约《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安培德抵济，调查济案真相。

△　云南省府主席龙云电告李济深，以二万锐师北伐，一万留守滇防，请指示路线。

△　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第三十四军胡正卫团于9日袭击禹城，波罗屯附近之直鲁军一旅不支，溃向北窜，是日占领禹城。

△　第三集团军右路军第八师自石家庄进占曲阳，次日向唐县、完县、满城之线追击前进，并进占唐县。13日，再由唐县向方顺桥前进。

△　孙传芳、褚玉璞由德州到北京，与张作霖商时局问题，决将津浦线奉直各军撤退至沧州。

5月11日　　日军占领济南城。大批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升挂日旗，旋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屠杀，伤病员300余人惨遭牺牲。日军

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住户稍加抵抗，即遭枪杀。据事后调查，此次济南事变，死伤军民约1.1万人。同日，斋藤发布“安民布告”，规定监视邮政、电报、电话等五项措施。

△　日军500余人，由青岛开抵博山。张店、周村各驻日军一营，潍县及胶济路各站亦由日兵驻扎。

△　李济深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应付济案办法。决议两广政府及军、政、学各界于令到之日起，一个月内停止宴会，以志耻辱。同日，广州各商业代表议决一致对日经济绝交。

△　阎锡山委第四军军长傅存怀为察哈尔区挺进骑兵指挥官，骑兵第六师、骑兵第一旅、炮兵第一团归其指挥，骑兵第二、第七两师仍由李培基率领，改向绥远前进。

△　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第十七军以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向沂河东、西攻击，于是日攻占临沂，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团第四军军长方永昌及其参谋长受伤，副官长毙命。13日，第十七军攻占莒县，方永昌率残部向青岛方向溃逃。

△　刘湘授意所部师长王缵绪通电，劝杨森下野。

5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谭延闿主席，讨论应付张作霖息战通电，因奉张通电并无诚意，决定置之不理，惟对诚意来归之奉军将领，当允其自新；通过为济案致美总统柯立芝电文；任命谷正伦为首都卫戍司令，并决定明令优恤蔡公时。

△　蒋介石致电谭延闿，告以何成濬同福田谈判情形：福田坚持将方、贺、陈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严惩肇事军官，否则将不接受我方所派之代表，“似此横蛮态度，请即电示，以便遵循”，并望黄郛将福田条件及何、福谈判情形速交美领，请从中调停。

△　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先、廖泽等人通电讨杨（森），旋即

率部向万县进攻，倒杨战争爆发。

△　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陈述日军在山东之暴行，请其对日本出兵演成之严重局势表示态度。

△　国民党中执委员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联名致函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对于山东事件的意见：一、“我党应首先要求日本撤回山东驻兵，在日本未撤回驻兵以前，不应在此种侮辱与压迫之下，与之开任何之谈判”；二、此次对日“外交谈判，绝对公开，谈判经过，随时宣布，反对秘密谈判”；三、“恢复民众运动，责成各地党务指导员积极提倡并扩大人民组织，使人民努力于本党之主张，使本党完成革命之使命，不但外交容易着手，且必如此，共产党方能肃清”。

△　日军炸毁济南城郊无影山弹药库，20余间药库付之一炬。

△　吉林省督办张作相同吉林交涉署长钟毓在北京联名电吉林省议会，内称：大元帅为筹措军费，正拟以吉林省所有森林、矿山、铁路为抵押向外借款，并将命令我二人签字。此刻，望省议会能对我二人此举意图保守秘密，并电大元帅表示反对。

5月13日　张作霖在北京与日本满铁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签订延（吉）海（林）、洮（南）索（伦）线筑路承包合约。该两项合约规定，签字后三个月即着手开工。

△　王正廷奉蒋介石命专办济南外交，是日由京抵沪晤黄郛，接洽济南事件交涉事宜。

△　张群抵达上海。次日就福田向何成濬所提济案之要求条件，电日首相田中：“查福田师团长此等态度，与首相及诸公对群之表示，大相径庭，不知何故？群意拟请松井先生遵照首相意旨，克日首途，一面电达福田师团长静候和平解决。”

△　汪精卫为济南惨案自欧洲再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谓此次挫

辱，甚于“二十一条”，诉之外交，仅能使人知是非所在，若欲雪耻图存，惟持国民团结自救，切望中央督饬诸军，迅复京津，底定辽沈。

△　蒋介石电令阎锡山督饬所部努力前进，速占北京。阎接电后当即于17日电令商震设法突破当面之敌，以赢得有利之战局，旋即以小部队追击，以大部队集中火力，务使攻势地区绝对形成优势。18日，阎再电商震指示作战机宜。商即转饬左、右两路军遵照。

△　晨，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骑兵席液池军进占德州。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直鲁军分三路向沧州溃退。同日，褚玉璞残部一万余人在沧州设防，张宗昌率所部五万余人由沧州退至马厂。

△　第三集团军自4日起向奉军发动总攻击，激战七昼夜，将奉军全线击溃，是日东、中两路乘胜占领正定，北路追过怀仁，先锋行抵大同，共计俘虏奉军官兵1.4万余人。

△　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第三十四军驱逐平原附近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团第十军吴奠卿、第三十军毛思义部后，乘胜占领平原。

5月14日　蒋介石移节徐州。同日，据蒋介石电谭延闿之提议，国民政府特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　国民政府以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职务甚繁，不能常川驻省，明令批准蒋伯诚以省府委员代理省主席。同日任命谷正伦为首都卫戍司令。

△　国民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细则》。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三七次会议，通过11项决议案，其要项为：《民众训练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咨请国民政府从速规定划一度量衡制度；通令全国于6月3日一律下半旗一日，为“五三”惨案志哀；以王陆一暂代中央秘书处书记长。

△　吉林省议会在张作相授意下，电张作霖反对同日本签定修筑吉会铁路合同。同日，张作霖复电称：吉会等线系段政府时代所认可，此次由日本方面提出。政府正在为减轻一部分和取消几部分而努力，以挽回吉林省利权。要求省议会体会此意，慎重静观交涉进行。

△　日内阁正式通过陆、海、外三部联合提案，决定向中国提出蒋介石正式谢罪、严惩贺耀组、赔偿日本军民所受损失等五项条件。同日，日陆军参谋总长铃木电告福田，若南军承认五项要求，则可通过济南。

△　日驻博山防卫司令岩仓正雄在博山发布公告，谬称：南北两军不许侵入博山及其周围20华里以内地区，违者一律解除武装。

5月15日　北京军政府交通部次长、署理部务赵镇和日本山本条太郎在北京签订吉敦老线（敦化至老头沟）、老图线（老头沟至图们江）和长大线（长春至大赉）筑路合约。该两项合约规定，签字后三个月即着手开工。

△　北京军政府准于新疆省喀什噶尔道莎车县回城地方增设叶尔羌县。

△　美国众议院为中日在山东争端提出重要议案，循解决宁案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一法律的实体之理由，通过济案“应由合众国国务卿与驻华盛顿中国公使及驻华盛顿日本大使，并与中国国民政府接洽，提供合众国之调停，以期中、日两国之困难可得一种和平解决”。

△　第三集团军左路军第六军丰玉玺部克复完县。12日，奉军在完县至望都之线占领阵地，丰玉玺即令所部开始驱逐完县附近之敌。13日，丰玉玺亲至大郭村，指挥第五师对大王庄、亭乡村，第十师对吴庄等地之敌作战，是日该部第十师占领完县。

△　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开幕，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席并致词，

提出大会应当研究之问题为：第一，注重科学；第二，注意学生运动；第三，教育经费独立；第四，教育方案。16省代表及来宾百数十人出席，下午举行第一次大会，通过大会议事细则28条及审查会规则14条。

5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〇次会议，议决任鲁涤平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特任李品仙、叶琪、周斓、陶钧、魏益三、廖磊、李燊、刘兴、何键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命孙良诚、丁惟汾、蒋作宾、宋哲元、石敬亭、冷遹、陈雪南、魏宗晋、于恩波、阎容德、孔繁霨、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孙良诚为主席。

△　阎锡山、冯玉祥联名通电服从中央，追随蒋介石继续北伐，彻底消灭奉鲁余孽，永绝后患。25日，海军司令杨树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司令响应阎、冯通电。

△　蒋作宾向国民政府呈报蔡公时暨随员在济被难情形，并附呈名单一纸，计有：主任蔡公时；参议张鸿渐；第二科科长谭显章；科员周惠和、姚成仁、张麟书、袁家达、熊道存、姚成义；书记刘文鼎；勤务员王立泰、张德福、陈普远、黄继曾、陈端成、傅宝山；另有伙夫一人姓名待查。共殉难职员10员，勤务兵七名。

△　日本田中内阁秘密决定：若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时，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但若只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可不解除武装。

△　日政府阁议，以“华北动乱危及满蒙之特殊利益”，决定第四次出兵中国，命令陆军当局第三师团一个联队，野炮兵一个大队，飞行队一个中队由门司开往天津。17日，日皇正式批准。

△　日驻北京使馆武官建川少将抵保定访晤张学良、杨宇霆，声称若战争波及满洲，则日本由拥护特权利益出发，势不得不采断然之

处置。

△　张作霖特使赵欣伯秘密抵日，向日本帝国主义乞怜。是日，赵在门司发表谈话，谬称："济案系南军匪徒所为，贵国出兵山东，事出不得已……北军军心解体，张宗昌既不能战，孙传芳亦不可靠，中国若没有日本的帮助，是无事可为的。"

△　谭延闿电促李宗仁速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如因职务不能督师，可请白崇禧总指挥暂代。

△　刘志丹奉中共陕西省委命，率陕军李云龙（虎臣）部许权中旅600余人，撤出反冯（玉祥）战场，于11日夜在潼关南原宣布起义，向高唐镇挺进。16日，高塘举行国民联欢大会，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及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等出席，会上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为前敌总指挥，许权中为顾问。工农革命军编为四个大队，共计千余人。渭华起义全面爆发。

△　杨森放弃万县，移兵开江、开梁之间。郭汝栋命廖泽、范绍增、吴行光分别自涪陵、长寿、分水岭等地向开江进攻。

5月17日　深夜，驻华日公使芳泽往晤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声称中国战争将波及北京、天津，若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为维护在满洲治安起见，势不得不采断然之处置。芳泽并以"个人名义"劝张收兵退回满洲，以保京、津勿受战乱。张表示拒绝，谓："若非本人坐镇北京，恐北京亦沦为赤化，今南军尾随追击，本人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日本与南军唱同调，欲迫本人放弃己策，殊不合理。"

△　日军安满钦一中将率领第三师团第一批1.5万名，自名古屋开抵青岛。18日，骑兵5000，野炮兵一大队，一中队，工兵一大队抵青岛。22日，第二十九旅团通讯处，第三十四联队一部抵青岛。总额2.5万名，是为日本第三次出兵山东。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席液池骑兵军占领东光、南皮，直逼沧州。

△　张宗昌在天津山东督办临时公署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津、京；表示反对张作霖息争通电，决心拼命再打，把南军赶到黄河以南。

△　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到党务指导委员王镇寰、邹曾侯、王礼锡、刘抱一等六人，公推王镇寰、邹曾侯、王礼锡三人为常务委员，周利生任组织部长，陈礼江任宣传部长。

△　第六路军总指挥刘湘所部郭汝栋军攻占万县，杨森向奉节、开县败退。22日，国民政府以杨森“拥兵祸川，违抗命令”，电令刘湘及川中各将领协同“进剿杨森，奠定川局”。

5月18日　　蒋介石连致黄郛两电：其一，“请代复福田：济南交涉，已奉国民政府命令，移归外交部交涉。并请外交部照会日政府，此案准归政府办理，不在军前交涉”；其二，“松井（日军参谋本部长，中将）不启程，飞机及斥候骚扰不已，彼方竟无诚意，请注意，弟已认为绝望也”。

△　驻沪日领事矢田以致北京军政府同样之觉书面交黄郛，并将该国对此觉书之说明书出示黄郛，内容四点：“（一）南北和平谈判有可能否？（二）如不能则对奉取两种方法：①不战而退，准出关，但不许南（军）追；②战败而退，则须先缴械始出关，然仍不准南（军）追。（三）张（作霖）出，不准再进。总之，日欲保持其在东省特殊利益，无论张败或胜，南军不许出关，张如欲出关，则应立即保持其实力而出，不然留关内作死斗。”

△　党家庄、兴龙庄、八里霍等处日军撤防。是日，济南2000余日军开赴天津。

△　驻沪美总领事克银汉奉美公使马瑞慕电令，就保护天津美侨事照会黄郛，略谓：目下军事进展已有涉及天津之势，美政府曾派防卫队，负责保护侨民，防卫队将慎求避免有妨中国军事行动之事及不诉诸武力，希贵部长于天津附近作战时，能派可靠之军队与统将前往从事，并将美军之保卫措施通知贵国军队司令。

△　上午10时，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举行成立大会，中央党部留汉委员陈嘉祐到会监誓，主席李宗仁、委员程潜、白崇禧、陈绍宽、胡宗铎、张知本、严重、李隆建、刘岳峙、张华辅、鲁涤平等宣誓就职。会后，全体委员举行政务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组织秘书处及财政、外交、军事三委员会，并通过成立宣言，宣布施政大纲，分三期实施。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席液池骑兵军占阜城，刘镇华军占武邑、武强。19日，刘镇华军占献县。

△　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张荫梧军第十四师自平型关向浑源追击，第七师与第十五师协同进攻，是日，奉军第十三军及第九军一部自浑源向下花园、天丰镇方向退却，第三集团军占领浑源。

△　冯玉祥部宋哲元军主力于8日由豫西班师回陕，10日在潼关击败李云龙部陕军，是日又击溃李云龙围攻西安的部队。

△　吉林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总商会、律师公会联名发出三电反对日本谋攫吉（林）会（宁）、吉（东）（五）常、（延）吉海（林）、长（春）大（赉）等路建筑权：一致张作霖，“无论日人如何要挟，万不可稍或许可”；一致张作相，“务望鼎力主持，据理抗争，并转告钟交涉署长，万勿签字”；一致日内阁及日使芳泽，表示日本建筑吉会等路权，吉林人民决不承认。

△　福建省财政会议闭幕。省府代主席方声涛发表演说，提出福建财政之整理，第一步先求维持现状，第二步再图发展。

5月19日　　蒋介石由徐州抵郑州，与冯玉祥会商进兵京、津策略，决定一、二两集团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担任京汉线，分兵三路向京、津进兵。限京汉、津浦两路之第一、第二集团军，于本月25日前，在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将主力集结进攻，分别由朱培德、鹿钟麟主持。

△　白崇禧离汉赴新乡晤冯玉祥，接洽第四集团军北伐联络作战方略。22日，转赴石家庄晤阎锡山。经与冯、阎商定，第四集团军路线沿京汉线北上，集中石家庄，与二、三两集团军取联络战线前进，完成北伐。

△　美国务卿凯洛格在新闻会议上就日本对华觉书发表声明：美国认满洲为中国之领土，不承认日本于满洲有特殊势力范围之要求。

△　日军第七、第十二师团五个中队在塘沽登陆。24日，两个中队几百名日军抵天津。

△　“侨日各界反日大同盟”在东京召集华侨侨民大会，到数千人，议决全体归国，相与祖国同胞扩大反日运动，务期克复山东、满洲，驱逐日兵出境，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勾结帝国主义之军阀。28日，反日大同盟派郭任华等三人组成归国代表团抵沪，接洽全日各地华侨分批归国事宜。按：自济案发生后，全日各地发生排华事件，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迫害，我留日东京同学与广东同乡会发起，各省旅日22团体先后加入，成立“侨日各界反日大同盟”，曾奔走日本各地，多方进行活动。

△　第三集团军骑兵第七师于18日向绥远前进，于清水河探得汲金纯部已退，是日该师抵绥远，骑兵第二师亦同时到达，完全占领绥远。同日，傅存怀总指挥亦挥军进占大同。

△　南京反日救国运动大会开会，招待各国旅京外侨，王开基主席，报告日兵在济暴行经过。

5月20日　黄郛自沪回南京，召开外交委员会，讨论济案及应付日本觉书问题。同日与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联名将应付方针电告蒋介石："（一）前方临时协定，既经多次接洽，日方坚持不允免除，惟有由前方速派代表前往办理，以便结束；（二）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避免冲突引以为歉辞。至向何人及何种方式道歉，已电亦农（殷汝耕）非正式探询；（三）觉书，因含有确定日本在满特殊地位之关系，拟以简单答之，大意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以口头告以若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

△　陈立夫电蒋介石，报告日使芳泽与张作霖晤谈情形，略谓："昨得京电，芳泽访张谈八小时，无结果。谈判大意：（一）张下野；（二）京津交（杨）宇霆、（张）学良；（三）败卒不准退关外。"

△　黄郛以日军于宣言停止军事行动后，又派飞机向泰安（时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投掷炸弹，特向南京日领事提出抗议。

△　东京日参谋本部以张作霖拒绝芳泽5月17日之警告，为阻止奉军及北伐军进入东北，是日对关东军下秘密动员令：一、驻屯满洲各地部队，立向奉天移动；二、由济南撤至大连之外山旅团，改赴奉天；三、驻满日军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劲旅向锦州、义州、山海关、朝阳镇担任奉军警戒；五、维持新民屯与新家屯之治安。

△　济南日本派遣军发出布告称，于驻屯日军之济南周围20华里以内，不问南北两军，不准擅入，若有未得日军允许而侵入者，当立解除其武装。

△　中共湘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半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会议选举特委委员23

人，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

△　杨森部李钟鸣与范绍增旅在开江附近接战，李部不支向开县退却，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率部进占开江。23日，杨森部兵分三路向开江猛攻，双方激战。

△　中波《友好通商条约》在北京签字。

△　吉林总工会开会议决反对日本要求修筑五大铁路；要求停止南北内战；同心协力一致承当对外交涉，努力维护国权，并商讨了具体做法。

5月21日　　国民政府明令组织山东省政府，任命孙良诚、丁惟汾、蒋作宾、宋哲元、石敬亭、冷遹、魏宗晋、何思源、孔繁霨、陈雪南、丁恩波、阎德容为山东省政府委员，指定孙良诚为省主席；任命冷遹、魏宗晋、何思源、孔繁霨分别兼任山东省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据安徽省府电呈，省府主席陈调元奉命率师北伐，不能常川驻皖，请以省府委员孙桀代理主席，是日指令照准。

△　国民政府令财政部，凡北京伪政府所订条约税则，概不承认，由外交、财政、工商三部拟定宣言，提出政治会议核定，并令财政部转饬税务司，凡北京伪政府修正税则，不得实行。

△　蒋介石在郑州会晤白崇禧，决定中央对两湖军队饷糈，按各军一律支配，不加歧视。两湖军俟白与冯商定路线后，即实行渡河作战，仍由白指挥。

△　蒋作宾由泰安电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部院，报告日军福田师团已撤出，另换名古屋第三师团，暂以斋藤为警备司令，济南治安共推何宗莲维持。

△　程潜被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监视。同日，李宗仁致电国民党政府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议决将程潜暂行监视，请明令免其本兼各职。次日，国民政府电复李宗仁，命从宽办理，或交付中央政治会议核办。

△　外交部长黄郛以蒋介石来电请专任外交委员会会长，改以王正廷任外长，遂自南京赴沪，并电请国民政府恳辞本兼各职。29日，国民政府明令所有外交部部务着由次长唐悦良暂行代理。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举行首次会议，李宗仁主席，讨论湘省府人选，决定呈请中央任命鲁涤平、陈嘉祐、刘兴、何键、周斓、李隆建、张定、刘召圃、陈嘉任、曾继梧、刘岳峙11人为省府委员，以鲁涤平兼主席，财政、民政、教育、建设四厅，仍由李隆建、陈嘉任、张定、刘召圃兼任，又令李隆建于22日返湘筹备一切。

△　日军三宅旅团5000名到天津，第三师团司令部设天津。

△　第三集团军发动方顺桥会战。方顺桥位于保定西南40里之平汉线上，系保定门户。第三集团军自平山出击后，为夺取保定，会师天津，决分左、右两路军会攻方顺桥，左路军总指挥商震，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各路部队遵令于15日以前抵达方顺桥前线，是日开始攻击，激战八昼夜。28日，第三集团军发起总攻，次日奉军动摇，放弃方顺桥，退守琉璃河。第三集团军旋即向保定追击。

△　哈尔滨学生冲破官厅及学校禁阻，是日成立“哈埠学生济案后援会”，举工业大学、法政大学、扶轮学校及第一、第二中学等校学生11人为委员。该会以抵制日货为活动内容，并于本日起，各校学生一律臂缠黑纱，志悼济案先烈。

5月22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议决准以李品仙、叶琪、陶钧、周斓、魏益三、廖磊、李燊、刘兴、何键九人为军委会委员（23日明令公布）；公布修正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

矿、工商各部及大学院组织法八项决议。

△　白崇禧由汉口抵石家庄，次日谒阎锡山，允即日回汉调第四集团军三万人来石，加入保定方面助战。

△　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张荫梧军第十四师占领涞源。

△　蒋介石电赖心辉转告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各军，请协同刘湘堵击杨森。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一次会议，通过九项议决案，其要项为：一、程潜免职，听候查办；二、任命鲁涤平、陈嘉任、李隆建等11人为湖南省政府委员，鲁涤平为主席兼湖南全省清乡督办；三、两湖临时政务委员会应即裁撤；四、于右任、薛笃弼等七人为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为委员长；五、将阎锡山确立乡村自治制度、改善农工组织之建议，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研究。

△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6月3日一律下半旗为五三惨案死者志哀。

△　蒋介石电内政部长薛笃弼，指示在江、浙、皖三省兴保甲，办团练，略谓："弟以为今日各地警察腐败已极，欲求整顿，非经长时间之教练不可，故为今之计，莫若兴保甲，办团练。此法虽古，可行于今，且甚易兴办而能确实也，请兄勿以迂阔视之。江、浙、皖三省为畿辅之区，亟应首先兴办，然后推之于各省，切期兄切实审查省委员考试县长，勿稍徇情，弟必力助其成也。"同日，蒋介石并分电江、浙、皖三省府主席，指示办理清查户口、编练民团与订立保甲法等急务。

△　北京军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北京外交部，说明日本5月17日觉书目的，在确定满洲"为其保护领土"，请予根本否认，并应约束军队，严守纪律，勿予口实。

△　日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和华北驻军参谋浦江澄到奉军前线访晤张学良、杨宇霆，请张、杨二人出名劝告张作霖出关。

△　北京外交团以中国战事波及京、津，在荷兰使馆开会讨论“自卫”办法，日使芳泽提出“非常警备”案，援用庚子八国联军对付义和团之办法，主张各国陆军管理京津、京奉铁路之关内全段，沿线20里内，绝对不许中国南北军队作战，保持大沽、秦皇岛两口岸之绝对自由。各国公使认为此项办法超越自卫以外，一致表示反对。芳泽即将讨论详情电东京请示。当夜，田中内阁复电芳泽：纵令各国皆不与日本协作，日本亦准备以一个师团以上之兵力，警备京、津及津、榆（山海关）一带，彻底实行5月18日觉书。

△　马福祥奉冯玉祥命致书新疆督办杨增新，劝其顺应潮流，一致对外。

5月24日　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政府为避免北伐障碍，济案决用外交解决，各军队应切实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不遵约束者以反革命论罪。

△　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戴季陶呈报国民政府并通电各级党部，报告济南失陷后我方被执拘留人员受辱情形，希外交部迅予交涉释放，各界一致急起营救。

△　晋军骑兵第七师占领丰镇。

△　何键及湘省各界要人致电鲁涤平，欢迎主持湘政。26日晚，鲁涤平抵长沙。

△　赖心辉部范子英离垫江出兵增援倒杨军，驻防广安、邻水之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乘垫江空虚偷袭垫江、大竹、长寿，截断赖心辉部后路，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各部闻讯纷向涪陵撤退，以确保后方安全。杨森部占领梁山。是役双方伤亡8000余人。

5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法》，凡21条；《修正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法》，凡23条；《修正国民政府财政部组织法》，凡32条；《修正国民政府交通部组织法》，凡19条；《修正国民政府司法部组织法》，凡23条；《修正国民政府农矿部组织法》，凡20条；《修正国民政府工商部组织法》，凡20条；《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凡23条。

△　蒋介石策定平、津作战部署：津浦路方面之第一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之第一方面军，由朱培德负责，向沧州、河间之敌攻击；平汉路以东之第二集团军，由鹿钟麟负责，先驱逐博野、蠡县、肃宁之敌，尔后向高阳攻击；衡水、饶阳、肃宁、雄县之线，为第一、二两集团军作战地境；第三集团军沿平汉路两侧向保定攻击，并以一部出紫荆关，向易县攻击；各集团军统限于28日开始攻击。

△　奉军对晋军下总攻击令，调孙传芳部由河北任丘、高阳攻击第三集团军右侧背，调京津总预备队攻击左侧背，所增兵力在10师以上，图从京汉线击破第三集团军。

△　第三集团军挺进军总司令傅存怀部占领张家口；骑兵占宣化。28日，国民政府致电阎锡山嘉勉。

△　李燊第四十三军派第五旅于湘西桑植、大庸、冯家关一带进攻红军贺龙部，激战数日。

△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就日本17日觉书复照日使芳泽，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均中国领土，表示日“所称以动乱行动将及于京、津，影响东三省地方，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置一节，本政府断难承认”。同日，北京军政府发表对外宣言，重申上述照会立场。

△　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钦一在青岛发表宣言，妄称：中国南北两军不得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20里内交战；南北两军应退出青岛及胶济铁路两侧20华里以外之地区，前项地区内不

得有排日宣传及有关之一切举动。是日，宣言书送交直鲁军胶东防守总司令刘志陆及奉军渤海舰队代司令沈鸿烈。29日，刘志陆部自潍县向铁路北20里外退却，日第二十九旅团长中岛率步兵、炮兵进占潍县。

5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通过复日本觉书牒文，并推谭延闿、张静江、陈果夫赴徐州与蒋介石晤商，如无异议，再行发出。次日，谭延闿抵徐州晤蒋介石。

△　第四集团军总部正式成立。总部设汉口，参谋长张华辅，参谋处长林赐熙，秘书长谢远涵，于25日正式委任。三个军团总指挥分由鲁涤平、李品仙、白崇禧担任。二、三路总部、军委会长江上游办事处均奉令撤销。是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返汉就职。

△　第四集团军叶琪第十二军门炳岳师全部抵石家庄，加入京汉线正面作战。第十二军周维寅师亦抵石。28日，廖磊第三十六军扫数开正定。

△　冯玉祥通电全军，转录保护外侨布告，并重申对于外人生命财产，如医院、商家、教堂等类，一律妥为保护，不得疏忽。

△　冯玉祥令郑大章骑兵第一军迅由安国经肃宁、任丘、雄县向定兴挺进，相机截断京汉交通；席液池骑兵第二军速由献县、河间、任丘、文安向静海挺进，相机截断津浦路。

△　第二集团军北路总司令鹿钟麟由顺德抵石家庄，当晚谒阎锡山会商联合作战计划。

△　第三集团军傅存怀部骑兵第六师经宣化进占下花园，骑兵第一旅驱逐张北之奉军第三十一军郑泽生部，并占领该城。

△　中希《联好条约》在巴黎签字。

△ “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成立，何宗莲任会长，于耀西等三人任副会长。

5月27日 第三集团军占领河北满城。第三集团军为应付奉军25日开始之总攻击，急调攻紫荆关的部队向满城出动，攻击奉军之右后方，又调石家庄总预备部队攻击奉军左后方。26日，阎锡山赴清风店督战，经两昼夜激战，奉军不支后退，第三集团军东路占领保定以东50里以外各村庄，西路于是日占领满城。奉军第十军王树常部几全军覆没，保定奉军三面被围。

△ 第二集团军特别党部通电全国，揭露张作霖佳（9日）电谎言息争对外之阴谋，“尚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绝对维护中央讨伐张逆之明令，无丝毫妥协之余地。如有敢持异议者，愿与国人亟起攻之”。

△ 河南省政府委员、前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孙岳在上海病逝。

△ 名古屋华工六七百人，自济案发生后被日政府停止工作，百余人被拘捕，数十人被驱逐归国，是日沪交涉员金问泗致函日领，要求转致日政府迅速释放拘捕之华工，恢复被迫停工华人之工作。

5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劳资争议法》，交国府公布；“筹设全国国民储蓄银行”案，交建委会酌办；通过《目前整理民众团体办法》，规定对各地民众团体之整理，仿照整理党部办法，由中央指派专员整理。

△ 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周诒柯、李菱、翁敬棠、薛笃弼、王世杰、陈和铣为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以于右任为委员长。

△ 国民政府特派白崇禧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湘鄂政务委员会。

△　国民政府任命鲁涤平、陈嘉任、李隆建、张定、刘召圃、曾继梧、刘岳峙、周斓、何键、陈嘉祐、刘兴为湖南省政府委员，指定鲁涤平为主席。任命陈嘉任、李隆建、张定、刘召圃分别兼湖南省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以山东省府主席孙良诚督师前方，令该省府委员石敬亭暂行代理。

△　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

△　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开始全线总攻击。同日，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下达命令："本集团军与第二、第三集团军依会攻津、保之目的，于五月二十九日开始运动，向沧州东西之敌攻击前进。"

△　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进占安国，旋即与万福麟部在董庄一带激战，肉搏数次，万部旅长失踪，参谋长受重伤，士气大挫，纷向北溃退。29日，韩部占领博野。

△　全国教育会议闭幕。大会会期为两周。共开12次大会，通过议决案237件，其最要者为：一、确定三民主义为民国教育宗旨；二、注重民众教育机会均等；三、注重劳工神圣；四、提倡艺术教育及科学教育；五、注重体育；六、宽筹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七、筹设国立中央图书馆；八、注意中小学生之补充读物；九、注重社会娱乐之改良；十、注重私立学校之改进。大会发表宣言，宣布今后教育宗旨。

5月29日　　国民政府以节略答复日本觉书，指出觉书中所称"为维持东三省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等语，此等措置，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并希望日本政府为两国永久亲善计，避免一切妨碍友好关系发生之行动。此节略由上海交涉员交付

日领矢田，并作口头声明：“将来我国民革命军勿论进展至何处，自有妥善方法可以解决各国侨民之生命财产……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举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我国此次用兵，为谋统一，奉军苟能及时觉悟，则军事行动自可适可而止也。”

△　蒋介石为军事进展及避免外交纠纷，是日抵柳卫同冯玉祥会谈。旋即分别电令各集团军“于击破当面之敌，进抵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后，停止待命”。

△　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各团体代表谈话，希望体谅中央意思，慎重对日。谈话会由蔡元培主席，中宣部长叶楚伧、内政部长薛笃弼、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张厉生暨各团体代表20余人出席。薛笃弼根据中政会决议，提出日货检查暂不举行、停止张贴反日标语两项要求，并称：张作霖派庄景珂等要求日本出兵10万，冀延长其生命，民众此时应集中视线，对付家贼，所有进行口号标语等反日举动，立即停止。蔡元培报告中央不得已之苦衷，要求民众举动应依中央方针去做。

△　国民政府特派赖心辉为国民革命军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

△　日军第二十九旅团长中岛率所部侵占潍县。2000日军以保护胶济路为借口，由黑田大佐指挥自青岛开抵张店驻防。31日，胶州守军方永昌、顾震撤退，日军进驻胶州。

△　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军万选才部驱逐滹沱南岸之安国军后，乘胜占领饶阳，旋向肃宁县攻击。

△　美国务卿凯洛格接见中国赴美专使伍朝枢，重申美国愿与任何中国的统一政府谈修约问题。

5月30日　国民政府明令战地政务委员会迅免山东省一切苛细捐税。

△　张作霖于夜间在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于国瀚、潘复、何丰林等军政府最高官员出席。会上张作霖容纳各将领之劝告，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京汉线奉军全部先行退琉璃河、长辛店之线，主力部队撤离京、津，向滦河之线总退却。

△　阎锡山代表南桂馨与冯玉祥代表张之江在天津私宅讨论奉军退出关外后京、津治安维持办法，决在天津组治安维持委员会，极力避免与外国发生误会。

△　白崇禧在汉口对记者谈称，第四集团军出发京汉加入北伐之部队，系由第二、第三、第四路军及旧四集团军抽调，总数在六军以上，将于数日内启程北上督师。

△　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进占蠡县。同日，韩部进击高阳奉军戢翼翘部，血战一昼夜，于次日完全占领高阳。

△　日使芳泽召集使馆官员紧急会议，建川少将列席，讨论奉军战况急转直下之时局。佥谓目下南北妥协运动频行，蒋介石、阎锡山等非正式表示，若奉军和平让权，退出京、津地方，则不事追击。奉军张学良、杨宇霆等咸主顺应大势，预测政权当通过和平方式授受，决定注视战局之推移，临机决定，不必以奉张出京作为日侨被难之张本。

5月31日　蒋介石以奉军全线崩溃，是日在石家庄向各军发布追击令：第一集团军与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须举全力向静海、胜芳、信安镇之线，迅速开始追击；第二集团军向永清、固安之线，迅速开始攻击；第三集团军向长辛店及其以北地区，迅速开始攻击；第四集团军以预定计划迅速集中；各军追击部队到达永定河岸，务须待命前进。

△　第三集团军占领保定。28日，第三集团军下令总攻保定，20

个步兵师、七个骑兵师加入战斗。29日，阎锡山赴望都前线督战，当晚第三集团军炸毁漕河铁桥（保定以北京汉线上），以截断奉军归路，同时占方顺桥及大固庄（保定与满城间），与奉军在保定城郊短兵相接，旋以骑兵一营首先破西门入城，是日拂晓第三集团军完全占领保定。商震于正午进入保定城，奉军安锡嘏师投诚，被缴械之奉军在三师以上，第三集团军损失兵力亦不下三个师。同日，第三集团军占领易县。

△　日本顾问松井少将晤张作霖。张表示整旅回奉意，松井表示日方已允许取消解除返回东三省之奉军武装之前言。京中治安由鲍毓麟旅维持。

△　张作霖招王士珍入府，以出关办法征询意见。王赞成张收束军事，并主张组顾维钧内阁过渡。

△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本月20日下达之秘密动员令遭到美国反对，是日下令取消出兵锦州、榆关、新民屯之计划。

△　日本军部接获张作霖决意退出关外之报告，是日上午在陆军省及参谋本部讨论对策。决定京、津之警备，与各国共同担任，日侨保护若不发生意外之事，现有兵力足敷应付。满洲方面，已取应急之措施，关东军司令部及主力则集中于奉天，须观张作霖离京之状况如何，然后再将应付方策训令在华公使及军司令官。

△　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率部离汉北上，加入北伐。

△　郭汝栋部因杨森回驻万县，率部移驻长寿，并向刘湘请援。6月1日，郭汝栋在垫江召集所部，会议对付杨森办法。

是月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三原、澄城两县农民起义。三原起义参加农民达万余人，包围县城四日之久，县长被迫答应减免粮款。后马鸿宾等派兵镇压，起义失败。澄城起义后，曾和赵桂堂旅作战四五

次，参加战斗的农民达5000余人。

6　月

6月1日　　下午，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告别茶话会招待各国公使，即席声明撤离北京，表示“只是大元帅府由北京迁往奉天，不管怎么样，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并说明本人离京后，北京秩序请王士珍负责维持，奉军虽撤防，仍将尽力维持北京治安。各国公使要求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张表示同意。

△　蒋介石在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京、津善后事宜，除商定进攻北京之具体军事计划外，并决定外交尤应格外谨慎。

△　下午，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召集京内各耆老、地方绅商代表，到熊希龄、汪大燮、江庸、恽宝惠等20余人，商谈关于撤退关外后北京市秩序维持办法。各代表面请留鲍毓麟旅在京维持治安，张允照办。

△　张作霖命许兰洲将“安国军大元帅”印、旗，国务院印信及外交部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奉天。

△　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军万选才、第二十九军刘茂恩部进占河北肃宁，向霸县追击。同日，第一集团军占领泊头。

△　京汉路第三集团军徐永昌部攻占高碑店。同日，京绥路商震等部猛攻南口，张作相率部抵抗。

△　于学忠及孙传芳部进犯河北献县臧家桥，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一军吕秀文部及骑兵军激战两昼夜，于、孙部终未能得逞，吕部于31日晚全线猛攻，是晨占领河间，分向任丘、大城追击。

△　国民政府以湖北省府委员熊斌、李世光、杨农春、张九维久

未就职，明令均免本职，任命陶钧、但焘、时功玖为湖北省府委员。

△　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在临清电令该集团军各军团击破当面之敌后，向惠丰桥、静海、滕芳镇、信安镇追击前进，第四十军至沧州停止待命。

△　湖南省府委员宣誓就职，新政府成立，省府主席鲁涤平在典礼中表示，将本着“军受政治支配，政治受党指挥之原则，建设党化的湖南”。

△　山东省政府各委员在泰安宣誓就职，山东省新政府成立。同日，战地政务委员会电国民政府，说明已解除对山东省之政务关系，即移京、津前线办公。

△　《前进》半月刊在上海创刊，顾孟馀主编。

△　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函请美公使撤退美国驻津部队，中国自负保护美侨生命财产之责。该函由沪交涉员金问泗送美总领克银汉转驻华美使马瑞慕。

△　鲁涤平、何键急电广州李济深，谓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宁冈为根据地，分别在茶陵、酃县各地滋扰，刻正与南昌王钧部会剿，望驻粤边军队严密防堵，以免窜逃。

6月2日　　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政务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仍听国民裁决。“所冀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党赤化，不自我而兴”。

△　驻华日公使芳泽访晤张作霖，称：日本将以绝大之助力迫退南军，俾得划江而守，中分天下，并提出求偿的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葫芦岛筑港停止；三、大通路改线。张严词拒绝，并谓：“此我家事，于贵方何与？吾宁受南军之缴械，不愿借贵方之助，以保此小朝廷。”

△　蒋介石自石家庄乘专车抵柳卫再晤冯玉祥，征询冯对于光复京、津后军事善后及政治主持人物的意见。冯推阎锡山主持一切，并主由阎任北京卫戍总司令。蒋表赞同。

△　冯玉祥以直省军事收束在即，政务设施，亟待预筹，是日自道口电阎锡山，请主持北京政事。略谓："迩来蒋总司令暨中枢诸公，每以北方政治设施垂询鄙见，经一一答复，一听我公（指阎锡山）主持。此系夙怀，绝非客气，所有直隶省政府及京兆特别区政府主席人选，至希迅速推荐，以便早日决定，早日进行。……万恳以党国为重，幸勿稍事谦抑。"

△　国民政府代表孔繁霨在北京同张学良、杨宇霆接洽张作霖退出关外事，是日接谭延闿东（1日）电，谓国府议决，赞成张意，请将奉军移驻滦、榆间，由其将领自行整顿，并决公推阎锡山入京接收。孔即以此电转交张、杨。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骑兵第二军席液池部占领任丘。

△　国民政府据军事委员会呈称：驻沪日本第一舰队司令官宇川照会我方海军称，切望南北海军勿于青岛、烟台、龙口、大沽口、秦皇岛、营口各处20海里以内作战斗行为，以"保护日侨"。

△　李济深通电响应冯、阎铣（16日）电，对内对外服从中央，听从蒋介石指挥。

△　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电请李宗仁早日恢复程潜自由。同日，程潜所部第六军代军长李明灏、副军长胡文斗联名电李宗仁请准由湘入赣开赴北伐前线。

△　鲁涤平、何键急电李宗仁，谓定于6月15日发动清乡"剿共"，请电各边境省军政长官派兵堵剿。

△　国民政府电令邓锡侯、田颂尧严束所部，不得擅动。

△　北京军政府开末次国务会议，潘复表示退让贤能，即日出京，院中事务交许宝蘅暂时负责保管，阁员大多数亦与潘同退。嗣议决例案二件。

6月3日　张作霖出京归奉。凌晨1时15分，张乘专车离开北京，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莫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30余人，日本顾问仪我诚也、町野武马同行。至此，统治民国历16年的北洋军阀政府遂告覆灭。

△　蒋介石由石家庄返抵南京，马福祥、邵力子、何成濬等同行。

△　北京军政府国务院总理潘复电各部院，谓："本总理因公随大元帅赴沈阳，并奉谕应即暂在沈阳组织行署，一俟规（粗）定，再行电知。现下京中各院部公务，仍由负责长官妥为维持，其有应发命令事件，应随时呈明大元帅盖印电京发表。现在阁员多数随节赴沈，国务会议着即停止。"

△　孙传芳、杨宇霆与张作霖同车离京，经天津赴滦州，指挥安国军各部撤退。张作相第五方面军团汤玉麟部撤往热河，其余向山海关、锦州撤退。孙传芳第一方面军团除郑俊彦部经北伐军收编外，仅有两个师，随同张学良、杨宇霆之第三、第四方面军团，向滦河以东撤退。张宗昌、褚玉璞之第二、第七方面军团，集结天津附近，其动向犹豫未定。

△　孙传芳部主力弃守霸县退向天津。是日下午，天津各国军队在租界及华界之境界各道路布防，租界当局下令总动员，开始特别警戒。

△　孙传芳在天津通电辞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团长职，退出天津，军事由国民公决。孙部李宝章及于学忠等五军长亦通电休

战。

△　第一集团军克复沧州。第一集团军以第四军团、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及第三十七军分别担任左、中、右三路，向沧州攻击前进。张宗昌、褚玉璞亲率张敬尧、寇英杰、陆殿臣等直鲁军大举反扑。29日，双方分路接战，中路津浦沿线战斗最烈。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赵观涛、邢震南两师与敌激战三昼夜，卒将其击退，旋直扑沧州。是晨，第二十六军赵观涛师首先攻入沧州城，旋向马厂追击。

△　李品仙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报告，本日率所部第三十六军全体人员赴石家庄。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骑兵第二军席液池部向文安挺进，在严家务遭遇袁克文挺进队300余人，当即向前攻击，俘敌60余名，于12时抵文安城。

△　前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遗电劝各方息兵，并提出济案求外交正义之解决及从速召集国民议会，解决时局纠纷等10项时局主张。

△　中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中国银行公会、中国新闻记者联合会、中国报界联合会驻日内瓦代表夏奇峰向国联提出《关于济南日兵暴行抗议书》，驳斥日本于上月28日致国联声明书的谰言，并郑重声明："若国际联盟不能应付环境，并不能主持国际正义，对此次中日冲突谋一公正之解决，则以后因此事发生的不幸结果，联盟应负责任。"按：日本致国联的"声明书"诡称"日军决不无故杀戮毫无抵抗之华人"，并称"其中是否有蔡公时其人，则不得而知"。

6月4日　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遇炸。凌晨5时23分，张专车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南满与京奉路交叉处之铁桥下，被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指挥日工兵第二十二联队预埋的炸药（120公斤，分装30麻袋内），用电流控制引爆爆炸，张作霖受重伤，抬回沈阳大

元帅府后于上午10时身亡。吴俊陞（在山海关迎张随同返奉）当场毙命。此乃民国史上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　蒋介石据报张作霖已出京，电冯玉祥、阎锡山着编第二集团军为右翼军，第三、四集团军编为左翼军，分别率领速向滦河与热河前进。

△　张学良、杨宇霆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张、杨欲以和平方式请第三集团军入城，然后安国军退走，并保留津东永、遵10县为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屯兵区域。孔提出三条件：一、东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褚、孙、张须受改编；三、服从国民政府命令。谈判破裂，张学良决定不让出北京。

△　张学良在北京闻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是日晚化装离京归奉，并下令长辛店、卢沟桥、良乡等处三四方面军火速撤退滦河。至滦州因收束军车停留10余日，于17日化装成士兵，乘兵车潜归沈阳。

△　北京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转外交部，要求向北京进发之华军各司令注意北京外侨及人民之安宁，并使鲍毓麟旅安然退走。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电复欧登科，告以“国民政府对于在华外侨之安全向极关心，在京津一带已有适当之布置，故对鲍部军队和平退出，亦必有办法”。

△　胡汉民、孙科、王宠惠自巴黎电谭延闿，对外事问题提出三项建议：一、驻外使馆改隶国民政府；二、慎择驻外使节人选；三、不急求各国承认，应着眼于取消不平等条约。

△　北京“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成立，举王士珍为会长，汪大燮，熊希龄为副会长。同日，王士珍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略谓张作霖业已启节回奉，敝团体与奉方司令商留鲍毓麟旅暂住城内，暂维秩序，将来尊处军队开到之先，应请赐示敝团体，俾得以先知照

鲍旅安全开出，请通知前线各军查照办理，以便接洽。次日，谭延闿电复王士珍等称，鲍旅自当维护，已电前敌照办，乞就近接洽，并电国民政府已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京、津治安必能办理妥善。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郑大章骑兵第一军抵永清，与于学忠部激战，于部不支，向安次溃退，郑部占领永清，俘官兵千余名，枪支、马匹数百。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向大城攻击，与直鲁军第十六军袁振清部3000余人激战多时，袁部不支向静海退却，是日吉部占大城。

△ 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 胡汉民等自巴黎电国民党中央，请由外交部电令各驻外使馆通知所在国政府，先由各该使馆维持，听候国府命令，并同时以此意照会北京各国公使。

△ 清废帝溥仪在日军“保护”下离津，6日抵大连。

△ 杨森向郭汝栋进攻，两部在梁山激战，杨败退开江、云阳，郭部师长范绍增占领万县。刘存厚向邓锡侯、田颂尧请求援杨，邓派谢德勘率部驰赴顺庆助杨。

△ 吴俊陞嗣子、黑龙江第十八师师长吴泰来召集黑龙江省长于驷兴等数十人开紧急会议，成立军警联合会，筹划全省治安。6日，吴胁迫省议会通电拥其为黑龙江省督办兼省长，黑军将领多不服。

6月5日 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离汉口北上赴石家庄督师。第四集团军北伐部队分两批出发，截至上月底，第一批出发者，为第三十六军廖磊部、第十七军周斓部、第十二军叶琪部、第三十军魏益三部及独立第八师，向石家庄一带集中；第二批为前敌总指挥

部、第四十四军，随白同行；第七军、第十九军为总预备队，暂不开动。

△　冯玉祥发表“歌”电，提出六项建国主张：一、废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方面军、各军团总指挥名义，以军或师为军制最高单位，统一军政，由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二、组织裁兵委员会，厉行兵工政策；三、统一全国财权；四、废除不平等条约；五、统一意志，整顿党务；六、蠲除苛捐杂税，清乡剿匪，提供职业教育，振兴水利，兴办工业，为民谋利。

△　国民政府派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徵赴美接洽建设事宜。

△　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发行第二期军需公债简章》，债额为400万元，年息八厘，自民国十八年起，开始偿还本金二十分之一，至第十年止，如数偿清。

△　第三集团军向京绥线青龙桥之奉军进攻，奉军退昌平，第三集团军占领南口，俘奉军500余人。

△　孙传芳、张宗昌等在天津褚玉璞寿筵上会商和战问题。各将主张不一，张宗昌仍主战。

△　奉天以张作霖被炸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奉天省城戒严司令，陈奉璋副之。其《戒严条例》规定：管辖与军事有关系之地方行政、司法；严查私带军火及其他违禁品；禁止银元出境；检查邮政、电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　前清恭亲王赴奉，日报谓有复辟阴谋。按：近月以来，出入恭亲王府者，皆与复辟运动有关之人，白俄将军谢米诺夫与恭亲王亦时相过从，拟建立“满洲帝国”。

△　北京奉系机关报《东方时报》停刊。同日，《晨钟》报（梁启超、汤化龙办）、《晨报》停刊。《黄报》于次日起易名《民意

报》。

△　上海《申报》发表《历年外械输入之概况》报道，谓过去五年之内，北京政府向德、捷各国购买军火陆续运装来华，于沪、青、厦、闽及秦皇岛等埠起卸者，计70余批，枪炮炸弹均有，每批多则3000余箱，少亦有一千六七百箱。

6月6日　　第三集团军徐永昌部开抵长辛店，谭庆林部骑兵抵卢沟桥。

△　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于4、5两日在永定河一带与奉军激战，奉军不支，向东北溃退，是日韩部占领团河、南苑。北京绅商各界至南苑欢迎。

△　奉天省公署就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发表通电，为应付日人及稳定政局，佯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

△　阎锡山移节保定，在行营就京津卫戍总司令职。

△　是晨，鹿钟麟、孙良诚两军占丰台，旋占南苑、落垡，与孙传芳部接火，战至次日晨，孙部不支，退双沟、北仓。

△　国民政府财政部以北京业已收复，是晚电北京各征收机关，令各安心服务，听候本部派员接管，并电北京总商会等，在此期内不得有订约借款情事。

△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正式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为李吉辰、黄如今、李乐三、许超远、王季高、黄国桢、徐季吾、马洗繁、梅子青九人。议决：一、通电中央党部报告正式成立；二、通电前敌各司令请速来京；三、函治安会转京市一体挂青天白日旗。

△　上午，张宗昌在津访段祺瑞，谋拥段借以号召，为段谢绝。

下午又访日军司令官，告将以杨柳青、北仓、军粮城为直鲁军第一道防线，表示将作最后一战。

△　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陈独秀次子）被捕，于是日在上海龙华就义。

6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四次会议议决：一、撤销战地党务指导委员会，各军所组织之民众团体，一律由党部接收；二、组织北京临时政治分会，管辖旧京兆、热河、直隶区域；三、组织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由谭延闿、宋子文、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为委员，丁惟汾负责召集开会。

△　蒋介石致阎锡山两电；一、京、津及其他各地逆产之处置，应听由政府组织机关，依法办理，勿使有自由查封之事发生；二、奉、直、鲁各军溃退，其留居京、津各地之眷属应一视同仁，加以保护，如有故违，须从严惩办。

△　蒋介石以近日报载有人在津冒充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军长等名义，招摇撞骗，是日通电否认，并电前敌各将领就近拿办。

△　冯玉祥自道口电国民政府称，各部队今晚到团河、南苑一带，已饬韩总指挥复榘以骑兵追击，主力即在南苑集合，不准进入北京。

△　陈调元、贺耀组、方振武等部迫近天津城郊，冯玉祥部骑兵第一军郑大章占领杨柳青，其一部抵达军粮城对岸，韩复榘部进至韩家墅，天津被三面包围。

△　孙传芳抵芦台访张学良、杨宇霆，商直鲁联军到滦后布防事宜。

△　日本田中内阁就张作霖被炸事件，作出决定：若炸张案引起排日运动，应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军队若有排日行动，当增派日军；

确保日在满蒙之特殊利益。

△　李济深召开西南联办建设事业会议，桂、滇、黔代表均列席，决定拟组织西南贸易公司，开发四省实业，并设西南实业银行，定额资本洋2000万元。

△　“济案后援会”在南京报告济案死伤人数：死亡3625人，受伤1455人；财产损失约2600万元。

6月8日　第三集团军孙楚部进入北京。上午9时，鲍毓麟旅撤出北京城。10时，孙楚乘汽车首先入城，稍后该部第十三师第三十二团、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一团鱼贯而入，北京全市高悬青天白日旗，各界代表前往欢迎。下午2时，商震及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入城，阎锡山派参谋长朱绶光到京，与各界接洽。当晚，商震布告安民，声明代表阎锡山接收北京，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保护敌军眷属，禁止晋军擅入民间搜查。

△　国民政府准免外交部长黄郛本职，特任王正廷为外交部长。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次日，派白云梯筹备蒙藏委员会，并接收蒙藏院一切事宜。

△　国民政府明令优恤前大总统黎元洪，并着内政部详拟丧葬典礼，以彰崇报元勋之典。28日，又颁令国葬黎元洪，拨款一万元治丧，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鸣礼炮17响。

△　国民政府明令财政部蠲除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地方行政费之筹措，应照各省普通税收切实整理，以符除旧布新之旨。

△　国民政府明令追赠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教导师师长龚宪为陆军上将，由军事委员会以上将阵亡例从优给恤。按：龚宪于本年4月在攻克鱼台之战中阵亡。

△　蒋介石以据报孙传芳借日人为后援力图负隅，杨（宇霆）、张（学良）亦在津急谋复燃，是日电促冯玉祥北上指挥各军，以固军心，并表示“兄如不进，军队散漫，进退不一，危险万分，弟惟有告罪，以谢党国”。

△　胡汉民、孙科自巴黎电国民政府，请设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以中央委员任之。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呈请中央党部严惩北方反革命分子，并速行裁兵计划。略谓：“第三期北伐计划业告完成，而北方反动官僚及军阀政客与一切腐化分子，目睹本党革命成功，又复大肆活动，纷来归降，图谋窃据。设或处置一不得宜，即将重陷于辛亥之覆辙。”“为特具文呈请钧会转令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对于反动军队一律不予收编，而于原有国军亦宜酌量裁减，以节国库而资建设。”13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四次会议讨论，议决：一、电蒋、冯、阎、李、杨各总司令切实筹商办法；二、凡附逆有据及逆迹昭著现仍在四处活动之官僚政客，由国民政府查明严办。

△　内蒙古国民党员于泽兰、李凤岗抵南京谒谭延闿、白云梯，请参加蒙藏委员会。同日，新疆回部全权代表定希程谒谭延闿，陈述治理回疆事务。

△　关内奉军自张作霖卫队于芷山之第三十军起，所有第三、四方面军团及吉黑各军，是夜络绎归奉，抵省城者约达二万五六千人。

△　冯玉祥派兵围攻渭华起义。是日，宋哲元奉冯命调遣一个旅的兵力，在渭南县保安团配合下，进攻渭华地区塔山（渭南县东原南端）军事据点，图扑灭陕东赤卫队，是日在塔山脚下的龙尾坡南端被西北工农革命军与陕东赤卫队击退。10日左右，宋哲元再派田金凯骑兵师自华县向高塘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进攻，在骆驼渠（距高塘三里）被赤卫队与革命军两面夹攻，田部仓皇退走。

△　张群由济南党家庄回南京，报告与日参谋长松井接洽情形，略谓：济南事件因日本出兵而发生，故须日本迅速撤兵，济案方易解决。松井称侨民安全不得保障以前，难以撤兵。双方决用正式外交手续解决济案。

△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齐（8日）电报告，直军第十七军军长谢文柄矢志投诚，现已率所部万余人由潍县集中安邱，听候改编。

6月9日　　蒋介石因北伐告竣，呈请国民政府准予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职。1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以军事收束需人，决议挽留。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煤油特税短期公债条例》，债额4000万元，利息周年八厘，自发行之日起，第六个月抽签还本一次，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底全数偿清。

△　国民政府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法》，凡40条。

△　国民政府明令北京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华大学，任命蔡元培为校长；蔡未到任前，以李石曾署理。同日任命吴敬恒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　国民政府为统一整理全国教育学术机关起见，是日明令“所有从前分隶各部院及特殊团体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自应一律改归大学院主管”。

△　国民政府通令直属各机关应优先购用国货，以资提倡振兴实业；“如有适用之国货而仍购用洋货者，应以不经济支出论”。

△　国民政府为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筱（5月17日）代电呈请参加北伐一事，是日批复称，因现燕京收复，战事可告结束，所请已非必要，应暂维现状，徐待后命；至所陈整理政治、规划建设各端，除吸收外资一层应详呈中央核定外，其余均属妥善，希即切实进行。

△　国民政府令江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李尚庸、江西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彭程万均着免去本兼各职，来京听候查办。

△　奉军鲍毓麟旅退出北京回奉天，行抵通州被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冯治安师缴械，全旅千余人均收容于南苑，枪械交回总商会。

△　王士珍、汪大燮、熊希龄以第三集团军业已入京，治安秩序负责有人，联名通电宣告“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解散。

△　方振武进至独流，所部第三十四军军部驻马厂。该军于良王庄、独流镇、杨柳青、胡村一带休整待命。

△　奉天省长刘尚清在省署宴日本在奉要人，席间刘发表媚日之演说，略谓：东省与日本唇齿相依，谊如手足，不能不求亲善。愿我中日两国，仍以夙昔亲善之心，进行亲善之道，勿因无根之言，致生疑虑。按：所谓无根之言，暗指张作霖被炸后，举国上下，异口同声，咸指为日本人之阴谋。

6月10日　国民政府会议，决议组织敌产委员会，设委员五至七人，内、财两部长为当然委员，加入高等法官一人。各省市设分会，所没收敌产用于办理地方慈善、教育、工商事业，不得作军政费。

△　中央训练部委张忠仁为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令即日组织童子军。

△　驻华荷兰公使欧登科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请设法维持鲍毓麟旅之安全。是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电欧登科，允设法维持鲍旅之安全返奉。

△　冯玉祥以所部缴去鲍旅枪械，引起北京外交团交涉，电令京、津近郊第二集团军各军撤至固安、静海待命。

△　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请蒋介石打消辞意，并电请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总司令及朱培德总指挥一致慰留。

△　学生联合会军事训练委员会召集上海学生1.6万余人，举行检阅典礼，并通过誓死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及收回租界等要案。

△　天津改旗易帜。直鲁军第六军军长徐源泉辞直隶军务帮办职，受直隶省议会及天津总商会等法团之推戴，是日正式就“国民革命军天津临时保卫总司令”职，颁发布告，声明：悬挂青天白日旗，令前线各部队立即停战，听候国民政府解决；本总司令负责维持天津治安。次日，徐源泉会同所部各将领联衔通电全国，希望南北一致，早日实现和平。

△　邓锡侯以第七路总指挥名义通电，表示遵国府命令，拿办吴佩孚。

△　夜，奉天日人居留地发生炸弹案共六起，均向空无一人之日人住宅投掷，未伤一人。当晚，日驻奉天总领事林权助召集日警察署长等讨论应付办法，次日并向中国当局提出警告。

6月11日　蒋介石请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1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恳切慰留。

△　国民党中央常会第一四五次会议议决，7月15日召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

△　蒋介石以平津军事告一段落，北伐各军势无留驻北京之必要，下令各军，除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三军一部进驻北京，所部第十二军、第三十军、第三十六军仍在平汉路原驻地待命外，第一集团军由津浦回驻沧州、马厂一带；第二集团军由小站、武清、南苑之线，回驻静海、安次、霸县、固安、高阳之线；第三集团军除留傅作义部警备天津、商震所部拱卫京畿、徐永昌部驻防京汉路外，其余作战出力各部队，概令返晋休养。是日，各线兵车分向指定

地点进发。

△　阎锡山偕白崇禧由保定抵北京。当晚，阎发出两电，一呈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一通电各省，报告本日午刻到京，表示遵照中央旨意，辑睦邦交，安抚民众。

△　阎锡山自北京电蒋介石请取消辞意，以竟北伐全功。

△　内政部、外交部、司法部会拟《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凡七条，呈请国民政府鉴核施行，是日国民政府批准予以备案。

△　直隶军事特派员、暂编第一军军长卢和生，以天津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直鲁军解体，是日乘机占领大沽、塘沽、长芦、白河各港口要隘，并收复造船所、兵工厂，又截获敌舰数艘。敌海军司令沈鸿烈派舰攻击，激战数小时，终被卢军击退，即收降其他舰艇，并将散处天津附近之零星敌军收编5000余人，移送傅作义点收改编。

△　奉天省长刘尚清电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国民政府，悬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

6月12日　国民政府发表《对内施政方针》之通电，声称北伐完成后，政府将立即实行之事，约有五端：一、厉行法制；二、澄清吏治；三、肃清匪盗；四、蠲免苛税；五、裁减兵额。

△　国民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

△　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致电驻外各公使，令仍维持原职，并将使领馆国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　阎锡山派员与张宗昌、褚玉璞之代表商定直鲁军和平退出天

津之五项办法，第三集团军接收天津。张宗昌与褚玉璞所率之直鲁军退出天津，表示愿接受和平。阎锡山遵照国民政府和平接收天津之指示，派南桂馨为代表，与张、褚之代表贾济川、关麟书商定直鲁军退出天津之五项办法。是日，第三集团军接收天津，阎将五项办法电告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并请令第一、第二集团军切实执行。该项办法为："一、直鲁军为免蹈济南覆辙，不可在天津作战；二、自动退出天津，交晋军维持治安；三、自签字日起开始撤退，约定一星期完全撤完。但撤退时，无论何方，不许追击、抄袭及军事行动；四、如有违第三条者，晋负阻止之责；五、晋军未到时，由直鲁军留精炼一部维持，以地方民意团体主持之，此项军队撤退时，晋负保护之责。"并请令知第一、二集团军切勿追击、抄袭直鲁军。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悦良条陈奉军鲍毓麟旅被缴械之经过及理由七项，其要项为：韩总指挥接国府允许使团担保鲍旅安全之电令，已在该部缴械鲍旅武装之后，并非有意抗命；韩部既未奉到命令，自无坐视势穷力尽之敌人携械退却、遗患他日之理；此次鲍旅事件，纯系使团袒敌行为，北京政府向受使团卵翼，仰承鼻息，颐指气使，无所不用其极，弟昔居北京，身经目击，每为痛心疾首，此次革命军进至京、津，必须不亢不卑，力矫此弊。冯并望将所陈七条婉陈谭延闿及中枢诸公，斟酌答复使团。

△　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诬指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之便衣人员无疑"。

△　阎锡山委任徐源泉为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

△　李宗仁电谭延闿、蒋介石陈述对时局意见：一、对奉用政治手腕解决；二、军队收束，只重国防；三、政治力求建设；四、外交期达废旧约目的；五、党务整齐理论，统一意志；六、国民会议急事准备；七、党外不究既往，党内悉泯猜疑。最后主张俟各地建设粗具规模再集权中央。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请速饬各部院派员北来接收北京各机关印信、文卷、图书。13日，国民政府派国府委员周震鳞率同秘书杨熙绩等14人前往北京接收前总统府、国务院及各部院之各机关一切事务，并令杨熙绩为主任，禀承周震鳞妥为办理。

△　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抵北京，表示决在北京组直隶省政府、政务委员分会及市党部，原市党部指导员须经中央党部审定与任命。又谓战地政委会以彻底改革为惟一职志，至统一政权，则权待省政府成立即交代之。13日，战地政委会移至北京办公。

△　财政部为裁撤麦厘，征收麦粉特税，缮具由部颁之《征收麦粉特税条例》15条，呈请国民政府备案，是日国民政府批准备案。

△　张宗昌、褚玉璞率直鲁联军残部五万余人，自天津向芦台、宁河撤退。

△　直鲁残兵在天津骚扰，商民闭户，电车停驶。阎锡山据傅作义、南桂馨增兵要求，13日派孙传芳旧部陆殿臣、何绍南两旅开抵天津与直鲁残兵激战，至14日，直鲁残兵不支，退向西郊外。15日，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第十四师一团兵力由北京赴天津协同维持治安。16日，天津秩序恢复正常。

6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四次会议讨论蒋介石函辞中政会主席职务事，一致议决恳切慰留。

△　蒋介石请假一周回奉化原籍，是日偕宋美龄由下关乘“永丰”舰赴镇江。

△　国民政府据司法部呈请，下令军事委员会及各省政府，嗣后对于法院审判、检察及用人行政事务，概不得越权干涉，以维护司法独立。

△　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各省民政厅，切实查禁人口买卖。

△　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分别致电阎锡山，同意与直鲁军商订之五项和平办法，惟撤退宜缩短为三日，务使依限退出关外。

△　阎锡山以战地政务委员会已全部到达北京，是日电国民政府："此后所有北京及直隶地方一切政务，均交由该会主持办理。"

△　阎锡山访晤英、美、法、日、意、荷、德七公使，表示保护外侨，责无旁贷，至于政治，则由战地政委会主持，将来交北平政治分会。

△　冯玉祥电第二集团军各将领追悼南口阵亡将士，略谓：十五年（1926）之役，张作霖、吴佩孚两逆，倾巢合犯我军，我军拼命搏战，自4月15日至8月20日，固守南口凡四个月之久，阵亡官兵，凡万余众，迄未安葬，每念及此，无限痛心。兹着由各军派领袖一员，各军、师、旅、团、营各部派长官一员，每营派官长一员，目兵一员，即日前来郑州集合，统限于本月25日到齐，以便前往南口追悼。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恳请明令慰留蒋介石，并再电蒋介石请继续指挥各军肃清关内外残敌，以竟全功。14日，广州李济深、陈铭枢、徐景唐、陈济棠亦联名通电慰留蒋介石。

△　冯玉祥令所部退离北京100里。是日，刘镇华部离通州移防固安，韩复榘部由南苑移驻新城。

6月14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六次会议议决推蒋介石赴北平祭告总理之灵，兼视察一切。同日，中央党部将此决议电告蒋介石。16日，蒋电复表示遵命北上考察，提议于五次全会以前将总理灵柩迁至南京安葬。

△　蒋介石、宋美龄一行游览扬州名胜，16日由镇江赴常州。

△　国民政府发出指令三项：一、蒋介石呈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未便照准；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以病呈请开除本兼各职，碍

难照准；三、薛笃弼呈请开去内政部长，应无庸议。

△　国民政府以北京克复，全国政务业已统一，前由南北两邮政总局会订公同管理全国邮政事务条款，自应取消，是日令裁并北京邮局总局，所有全国邮务，均由南京邮政总局管理。

6月15日　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略谓：现在军事时期将告终结，国民政府正从事整顿与建设，谋求完成建设新国家之目的，国民政府对外之关系，自应另辟一新纪元。望各友邦充分谅解，表同情于中国新国家之建设，解除中国80余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遵正当之手续另订新约。

△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发出通电，宣布7月1日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要求中央和地方主管财政机关派出全权代表，参加会议，共商全国统一后之财政大计。会议应讨论事项为：地价税之推行；兵工政策之实现；各界对国家之负担；直接间接税收之取舍；内债外债之整理，国地税之划分；预算之确立；裁厘之实现；财政之统一。

△　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各省民政厅保护女权，以重人道，其大要为：一、取缔娼妓；二、禁蓄婢女；三、严办诱拐；四、严禁溺女。20日又通令各省政府取缔一切伤风败俗以及其他迷信神权之商标图画，改为爱国明耻、劝勤崇俭、有益社会人心之图画文字。

△　第三集团军李生达军第十四师抵天津，负责维持天津治安。

△　河北三河、宝坻方面孙传芳部派马宝珩为代表，至北京向阎锡山接洽投诚。是日达成协议，阎将该军编成四个军，任郑俊彦为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李宝章为副指挥。

6月16日　蒋介石为纪念孙中山广州蒙难六周年，通电全国同胞，宣扬“三民主义救国”论。声称：三民主义“为今日唯一救国之主

义，吾人欲求中国之不亡，惟有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统一国民之思想”。“自今纪念之日起，愿吾国人之思想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中，以完成国民革命”。

△　新疆督办杨增新通电易帜，宣布“新疆各界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旗，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禀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

△　驻华日使芳泽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报告张作霖生死不明，日本对其继任者和东三省的未来，应当作好周密考虑。关于张作霖的继任者，不论是张作相或张学良，“南方势力早晚必定到达东三省”，而南方的政策，“是和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其优越势力相冲突的”，“因此，我方必须事先研究好对付办法。而当前必须加以考虑的是，修筑满蒙新铁路问题”。建议先解决最急需的吉会、长大两铁路，探询合同签约人赵镇的意见，如不表同意，“就必须排除官民的反对，用实力把铁路修筑进行到底”。

△　奉天日军一万几千人在城南洋河沿岸举行大规模野外操演，归途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恣意挑衅。同日，青岛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在青岛举行大规模阅兵式，并游行“示威”。

6月17日　蒋介石由镇江抵南京。同日，蒋电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丁惟汾，恳请打消辞意，即日回京主持党务。

△　何成濬自天津致蒋介石两电，其一曰：“张作霖确已死，杨宇霆、张学良、孙传芳皆在滦州，职即往北京同于涛（济）川邀（商）办法”；其二曰：“徐源泉应天津各界之请，更易旗帜，维持地方治安，（张宗昌）率残部退芦台，着委徐（源泉）为第十一军团总指挥，徐已就职，现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徐颇相联，徐以（此）加入革命范围，于军事外交前途关系甚大，如有电到京，祈即复电嘉慰，并加以任命。”旋蒋介石批示：电奖徐源泉。

△　阎锡山偕北京国民党党、军、政代表前往西山碧云寺公祭总理灵寝。军务代表包括方本仁、朱绶光等，政务代表为蒋作宾、仇鳌等，党务代表由梁子清率部分党员参加。阎锡山、蒋作宾、梁子清联合主祭。同日，阎、蒋会衔电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报告奠祭经过。

△　阎锡山派于珍、邢士廉赴奉天劝导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三省问题。

6月1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七次会议议决，派蒋介石赴北京为祭告总理代表；移灵南京事，由蒋到北京后斟酌决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

△　国民政府特派接收北京市机关代表周震鳞抵北京，当即晤阎锡山，转达国府对京、津意见。次日，周对记者谈称，国民政府同奉方久有接洽，不自今日始。现张作霖已亡，障碍已除，此次于珍、邢士廉回奉以后，必有相当之结果，并表示政府此后对关外奉军当用政治解决，绝对不至用兵。

△　国民政府特派易培基前往北京接收故宫博物院。同日，任命张继、白云梯、刘朴忱、罗桑囊嘉、格桑泽仁、陈继淹、李凤岗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指定张继、白云梯、刘朴忱为常务委员。

△　国民政府特派工商部长孔祥熙驰赴北京祭告总理灵。

△　国民政府公布《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凡21条。

△　国民政府准免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蔡元培兼职，任命王伯群兼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布哈林报告《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瞿秋白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大会指出“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性

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十大纲领。

△　天津恒源纱厂职工2000名，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6月19日　国民政府准免国立中华大学校长蔡元培兼职，任命李石曾为国立中华大学校长。

△　阎锡山电蒋介石称，东三省情况复杂，务恳早日北上处置。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以天津直鲁残军数近十万，请中央迅派大员北来办理收束事宜。

△　宋哲元亲率孙连仲、魏凤楼、田金凯三师分三路进攻渭华起义之西北工农革命军。革命军与赤卫队分路御敌，中路战斗尤为激烈，刘志丹、唐澍指挥革命军两个大队和宋哲元一个师激战竟日。当晚，革命军自东西两线分别从涧峪、箭峪撤退到洛南西岔河集中。旋宋军占领高塘。

6月20日　周震鳞自北京电蒋介石、张静江，报告日本意在夺取满蒙，对奉宜用和平解决。略谓：“惟倭奴志在夺取满蒙，故在榆关阻奉后退，若我军再进，无异为日本作前驱，百公（百川，阎锡山字）深虑及此，故极主张怀柔，纯用和平解决，万望布告焕章（冯玉祥字）、剑生（即健生，白崇禧字）、德邻（李宗仁字）诸兄，务宜同此主张，隐消外侮，以保国疆。”

△　张学良通电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并发表《致奉省各县父老宣言》，宣布：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决不轻言战事；二、讲求外交亲睦，与友邦共存共荣；三、整饬戎政，厉行兵农政策；四、提倡实业，改革政治；五、一切制度规章，归于公决。

△　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开幕，到会委员61人，宋子文主席。讨论事项：一、整理财政，统一币制，巩固金融；二、巩固国内外公债信用；三、改革税收。会议分金融、国债、税务、贸易、国用五股进行讨论，为期10日。

△　阎锡山致电中央呈述时局意见："（一）首宜召集各方革命领袖，开军缩会议，限定兵额，分期裁减；其裁余之军队，务宜军权集中，统一训练，免蹈前此军阀之覆辙。（二）财政亟宜统一，应按各省需要，适当分配，以期财用适当。（三）交通亟宜统一，以利运输，而维路政。"

△　《奔流》月刊在上海创刊。由语丝社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合办，鲁迅主编。至次年8月，第二卷出至五期时（第一卷出十期）停刊。

6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决议：一、直隶省改名河北省；二、旧京兆区各县并入河北省；三、北京改名北平；四、北平、天津为特别市。28日，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知照。

△　奉天省长公署正式公布张作霖于是日下午逝世。按：张作霖死于本月4日，奉方为稳定政局，秘不发丧，直至张学良归奉就任奉天督办后，才于是日公布死耗。

△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别担任奉天、黑龙江两省司令。张作相坚辞。

△　国民政府据蒋介石呈称，中央银行发行小洋辅币，两月以来，军民称便，乃近闻各征收机关仍有拒用情事，致民众发生疑虑，奸人乘机造谣，辅币信用为之锐减，驯至南京兑换分所酿成挤兑风潮，是日训令交通、财政部及江苏省、南京特别市政府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使用小洋辅币。

△　商震抵天津，当即在警备司令部开会，讨论办理天津军事善后事宜，傅作义、徐源泉、温寿泉、南桂馨、李生达、陈长捷等出席，议决第一步点验白河以南各部驻军，第二步点验完竣，递遗防务即由第三集团军第十四师、第十五师、第九师担任；又决议请总商会银行工会借30万元作结束军事之费，各军给养暂请商会垫办。韩家墅、军粮城、小站、马厂为新编军队驻扎地点。

△　大连经奉天达朝鲜汉城之国际长途电话开始通话，系日人所架设。

6月22日　湘赣两省军队共10个团，由湘军吴尚、赣军杨如轩、杨池生率领向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分进合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率领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一营，直奔新七溪岭，多次打退国军进攻，全歼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粉碎湘赣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的第一次大“会剿”，取得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　直鲁军胶东防御总司令刘志陆与其部下顾震以方永昌违抗命令，通敌有据，是日在昌邑会议将方部旅长石驻华扣留，旋于次日将方部缴械，得步枪3000余支，方残部逃奔掖县。

6月23日　冯玉祥电军事委员会告病假10日，赴百泉静养。

△　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讨论恢复保安总司令及易帜等问题，张作相、于珍、邢士廉等均出席，27日会议结束。议决仍用保安总司令名义，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总司令。张作相辞不允就，且举张学良自代；东三省不改易旗帜，并令前线主力奉军坚守山海关一带阵地。

△　美国务卿凯洛格就中国关税自主问题训令驻华公使马瑞慕通知中国政府：“美国已准备同意将所有中美两国在此之前所签订及有效的各条约中，有关在华货物进出口的关税、退税、吨位税等的税

率，自1929年1月1日或新条约生效后的四个月之后，依何者在后为期之日作废无效；此款（约）同意在中美两国任何一方，将可在对方领土内，在上述事项及有关事项方面，享有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较，不被歧视的情形下，完全的本国关税自主的原则，即可适用。”

6月24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四次会议通过设立裁兵委员会及津关二五库券条例等项议案。

△　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设立裁兵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一面设置生产机关，分途接纳被裁士兵，从事筑路、治河、开矿、造林、垦荒等事；并拟请由财政部发行军务善后公债，解决裁兵所需经费问题。

△　蒋介石通令取消战时所委之“游击司令”、“迫进司令”等名义，并一律缴械遣散；待后如仍有假借此次名义，召集不逞之徒为害地方者，严惩不贷。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称天津饿军麇集，数逾10万，需款万分急迫，请先筹拨1月份供养120万元。

△　第三集团军傅存怀骑兵第七师进占多伦，察哈尔省军事结束。

6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九次会议通过《经济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国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区党部划分办法》；议决五次全体会议预备案（如依照建国大纲规定实施方案、决定国防计划案及结束军事整顿军队案、统一财政案）等12项议案，分别交军事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起草。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任命李石曾、阎锡山、冯玉祥、张继、刘守中、王法勤、鹿钟麟、赵戴文、蒋作宾、白崇禧、马福祥、陈调元、李宗侗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以李石曾为主

席，李未到任前由阎锡山代理；通过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市长及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员人选之决议案。

△　财政部、内政部会同拟定《勘报灾歉条例》，凡15条，其中规定："各地遇有水旱风雹虫伤诸灾及其他项灾伤，应行查勘蠲缓钱粮者，悉依本条例办理。"是日，国民政府指令以部令公布。

△　日首相田中于是日至次日两次电令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不得和南京国民政府妥协。

△　渭华起义失败。20日，宋哲元率部续攻渭华革命军。该部西路军向塔山附近的清明山、凤凰山进攻，中路和东路猛攻退至箭峪口、牛峪口、涧峪口一带的革命军，战斗十分激烈。许权中指挥西线革命军在箭峪口同宋部一个团激战数小时，开展肉搏战，多次打退宋军进攻。当晚许权中率队撤退，次日抵西岔河。东线革命军在刘志丹、唐澍率领下，分由东西涧峪进山，22日相继抵西岔河。西北工农革命军余部仅存三四百人，渭华起义失败。

6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

△　国民政府任命商震、韩复榘、徐永昌、段宗林、朱绶光、丁春膏、沈尹默、孙奂仑、李鸿文、温寿泉、严智怡为河北省府委员，并指定商震为省府主席，孙、李、温、严分兼民、财、建、教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会议通过蒋介石提议"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协调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案"。

△　蒋介石遵照国民政府命令，偕吴敬恒、张静江、邵力子、陈绍宽、周佛海、陈立夫、张群、刘纪文等人由南京启程北上，28日抵武汉。29日晚，蒋介石与李宗仁离汉北上，7月1日清晨抵郑州，冯玉

祥前往欢迎。7月3日抵长辛店，蒋与李偕阎锡山抵北平。

△　江西弋阳红军方志敏率部40余人击溃弋阳靖卫团，方部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9月，方部攻下横峰县城。

6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六次会议议决：一、撤销战地政务委员会；二、修正通过《土地收用法》；三、指定李济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津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规定库券发行总额为900万元，月息八厘，自十七年（1928）10月起每月月底还本三十分之一，至二十年（1931）3月底本息如数偿清。

△　国民政府派钱永铭、虞洽卿、陈行、宋子文、孔祥熙等13人为国货银行筹备委员。

△　国民政府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函开，分电阎锡山、战地政务委员会令会同北平特别市党部严密审查张作霖时代之被捕党员，确系本党忠实同志应即释放，其有共产嫌疑者仍押候审判。

△　内政部制定《禁止未成年者吸烟饮酒规则》，凡六条，其中规定：凡年龄未满20岁之男女一律禁吸纸烟并禁饮酒，违者处五元以下罚金。如知未成年即以烟或酒及烟具、酒具卖与者，处20元以下之罚金。是日，国民政府指令准以部令公布。

△　东三省军民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　孙传芳军郑俊彦部投诚第三集团军后，于19日开赴怀柔改编，是日郑抵北平谒阎锡山请饷。阎谓晋军尚未得中央分毫，晋省库战事中亏2300万，非俟蒋（介石）到，给养无办法。

△　张宗昌率残部万余人，拟经滦州冷口出关，奉军不允，致起冲突，张仍退回唐山。

△　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下令，凡未经承认之军事机关，限于10小时内撤销，如仍有存在者，当即查封逮捕。

△　蒋介石电令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继续讨杨（森），重申讨杨乃政府明令，无论何军，冀其服从。又电罗泽洲，停止军事行动，谓倘若附逆，法令所在，决不宽恕。

△　杨森在万县自行宣布恢复第二十军军长职，旋电蒋介石，要求“派公正人员来川明察是非”。

6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五〇次会议以北伐完成，军事结束，议决禁止招募新兵；修正通过《政治设计委员会组织法条例》。

△　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陈铭枢、徐景唐、冯祝万、刘栽甫、伍观淇、许崇清、吴铁城、李禄超、朱兆莘、马超俊、黄节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指定李济深为主席，刘、冯、马、黄分兼民、财、建、教各厅厅长。

△　国民党广东党务指导委员会电告中央执行委员会，谓华侨协会提议中央召胡汉民、孙科、李石曾、伍朝枢、许崇智、邹鲁、萧佛成等回国共负党国责任，并建议建都南京。

△　全国经济会议举行第三次大会，通过提请政府裁兵、统一财政、改革税收、保护关税、整理交通及公债等案。

△　徐州各界五万人举行庆祝克复北平大会，通过四案：一、请中央于最短时期完成统一中国；二、请军委会实行裁兵；三、请国府永定都南京；四、实行提倡国货，拒用仇货。

△　徐源泉第十一军团奉命全部离津，集中蓟县。徐电阎锡山、蒋作宾等辞职，并请发给养。阎复电慰留。

△　马衡等五人奉国民政府令接收清史馆。按：清史馆于1914年

3月9日经袁世凯明令设立。

6月29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公布《市及特别市组织法》；决定河北省政府设于保定；通过《津关库券保护条例》；《刑法》草案展期两月施行。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所有京内外各行政机关俸给自8月1日起概照原数支给。

△　国民政府训令财政部拨款50万元（除前据冯玉祥电请河工费已拨10万元外，应再拨40万元），抢修鲁、直、豫三省之黄河工程。

△　蒋介石以北伐已告一段落，电令李济深转饬所属停止招兵。

△　蒋介石自汉口致电整理中兴煤矿委员会主任俞飞鹏称，中兴之款如30日前不付清，是军阀奸商朋比抵抗，着即用总司令名义，公布将该矿完全充公，“并由兄组织委员会监理接办”。30日，俞飞鹏将蒋艳（29日）电内容转达中兴公司，并通知该公司将遵令着手筹备接收手续，定期交接。

△　全国经济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通过请求裁兵通电及停止招兵通电，并以经济会议名义组织全国裁兵协会。裁兵通电提出裁兵总案，其大要为：一、军额全国留50师，每师一万人；二、军费全年总额1.92亿元，占全国收入三分之二；三、裁兵机关，中央设全国兵工建设委员会，各省设分会。

6月30日　国民政府以平、津收复已久，军事告终，河北省政府及北平、天津特别市政府委员、市长亦已次第任命，是日明令取消战地政务委员会。

△　国民政府据内政部呈报议定江苏省政府与上海特别市政府划

分治权办法，是日指令该省、市政府依期实行。

△　新疆省政府成立。新疆督办署改新疆总司令部，杨增新就省长兼总司令职。7月5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杨增新嘉奖，至是西北“统一”。

△　国民政府据甘肃省呈请将白马关改设县治，定名为永康县，是日指令照办，并训令内政部知照。

△　全国经济会议闭幕，通过有关决议案，组织裁兵促成会筹备委员会，选举虞洽卿、杨杏佛、刘纪文、冯少山、张嘉璈、贝淞荪、徐新六等25人为常务委员，宋子文在闭幕式发表演说，声明代表国民政府接受大会通过之各项建设提案。

△　全国经济会议发出请从速统一全国财政之通电，略谓从前军阀拥兵割据，破坏财政统一。国民革命完成统一，凡百建设，首在财政。故统一财政，履行预算与实行裁兵，自应并重。现经本会议全体决定，认为财政统一、实行全国预算为当务之急，所望财政当局及各省长官共同进行。

△　第一集团军各军、师长以上军官在南京军委会开会，讨论缩编事宜。7月1日继续开会，通过《缩减第一集团军案》，要求全部缩减为15个师，每师不超过1.5万人。第一期从第一、第九、第三十三、第十七军开始，限7月底完成。最终缩编成10师。师长内定刘峙、顾祝同、熊式辉、朱培德、钱大钧、蒋鼎文、缪培南、陈焯、方振武、陈调元。

△　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参观团120人到达太原。

△　中日《洮昂材料煤价短期借款合同》由洮昂铁路工程局局长许文国、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在沈阳签字。借款日金82.877万元，自民十七年7月1日起三年为期。

7　月

7月1日　　全国财政会议在南京开幕。宋子文主席并致词，要点有统一财政，分配平均，确立预算，划分国地税。下午举行第一次大会，提案共有《整理财政大纲案》、《筹备关税自主案》等53件。

△　张学良致电北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南京谭延闿、李烈钧等，表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已令前方军队从事撤退，“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事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并“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

△　凌晨，蒋介石偕李宗仁乘火车抵郑州，冯玉祥扶病亲往迎接。省市团体在车站集会欢迎。蒋介石致词，称：“打倒军阀告一段落，此后国民须一致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次晨，蒋、李抵石家庄，阎锡山派方本仁等迎候。

△　国民政府于上月25日特派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刘通电宣布于是日就职。

△　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应北平新闻界请，下令停止检查新闻，恢复言论自由。

△　国民政府审计院正式成立。

△　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于是日起停止招兵。

△　外交部长王正廷照会意驻华公使华蕾，1866年10月26日中意商约已于本年6月30日期满，应即取消，并提议两国立即互派代表，根据平等及互相尊重主权订立新约。

△　天津举行“庆祝北伐胜利欢迎蒋总司令大会”，到300余团体10万人，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参加大会并演讲。大会通过要求国民政

府以武力彻底肃清关内外残余军阀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21项提案。

△　鲍毓麟旅300人携带武器过津，由北平宪兵护送至塘沽，乘船于6日返抵沈阳。

7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善后短期公债条例》，定额4000万元，为完成统一全国之用，利息八厘，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底全数偿清。同日并公布《津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保管基金条例》。

△　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报告缩减军备问题，说明全国有84个军，272个师，220万人以上，全年军费7.2亿元，全国收入仅四亿，相差三亿余元，军委会希望缩减为70至80个师，军费减至全国收入的60%。

△　国民政府委员宋渊源自南京电蒋介石报告祁暄到奉晤张学良谈易帜事。略谓："汉卿对三民主义不但无反对之意，且甚赞同，惟因对外则有某方（按：'某方'系指日本）窥伺，对内则新遭大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但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全国一致解决，无妨碍统一之意。"

△　张学良电北平何成濬报告派前省长王树翰、司令邢士廉、总监米春霖、参谋徐祖贻为正式代表，现正候船出发，请知会京、津军警加以保护。

7月3日　　蒋介石偕李宗仁抵北平。凌晨，阎锡山在长辛店迎接，与蒋同车赴平。下午1时，蒋介石往碧云寺谒总理灵柩，并在碧云寺对日本东方社记者谈话，谓中国目下第一重要问题，对内为裁兵与财政统一，对外为改订一切不平等条约。又谓东三省问题务希和平解决，深望日本国民予以公正之援助。

△　国民政府电奉军将领提出处理东三省三原则：一、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二、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三、以公正办法处理三省政务、军事。

△　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市组织法》。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严禁在职人员狎妓、赌博、酗酒及吸食鸦片。

△　汪精卫电国民党中央五次全体会议，声明道远时迫，不及列席全会，并提出三点意见：一、捐弃个人地位观念及区域观念，以求中央组织之巩固，政治始能稳定；二、指导民众应以整个的民族利益为前提，痛除阶级间嫌恨之习；三、训政时期，对于党外言论应许其自由发挥，以表现人民之要求，以养成民权之基础。

△　广东新任省府委员吴铁诚、许崇清、徐景棠、马超俊、李禄超、刘栽甫等就职，广东省府改组。省府主席李济深因乘轮赴沪，以李文范代政治分会主席，冯祝万代粤省主席，邓世增代第八路总指挥，梁漱溟代建设委员会主席。

△　上月底以来，山海关附近之奉系吉军主力开始撤退，依铁路运送者达一万名，是日全部撤退关外。

△　中国测地协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300余人，除川、陕、疆外，15个省皆派代表与会。

7月4日　　张学良在沈阳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东三省联合省议会初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辞不就，故改推张学良继任。

△　阎锡山电请蒋介石派员接收平、津收编之直鲁军和浙、苏、闽、赣、皖五省联军残部。6日，蒋介石电复阎锡山，指示所有平、津收编军队统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管理和调遣，望“随时襄

助，以竟全功”。

△　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省府主席商震及各委员徐永昌、段宗林、朱绶光、沈尹默、孙奂仑、温寿泉、严智怡宣誓就职。

△　清东陵发生盗掘案。奉军出关后，直鲁残军孙殿英第十四军谭温江师驻东陵。孙殿英亦至。当地土豪高寿光等告以康熙、乾隆、慈禧遗椋均在地宫，殡物甚多，概属宝贵之品，设法挖掘，可以致富。孙遂与谭等密议掘陵办法。是日，孙集所部工兵训话，谓昨夕梦见七世祖本端公，泣告生前为顺治帝惨杀，迅为掘陵雪仇。言下作种种惨状，大哭不止。各工兵皆大愤，请立掘坟。旋出布告，佯称试演迫击炮，军民人等，为安全起见，在陵周围一里以内，禁止通行。5日用炸药轰炸地宫，将裕陵（乾隆）、定东陵（慈禧）墓内殡葬珍宝翠玉，价值一万万以上，盗掘一空，历七昼夜。

7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五二次会议议决追认民国《刑法》展期两月，由原定之7月1日展至9月1日施行案；通过停止新闻检查案。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国民政府，查禁《灯塔》周刊。

△　蒋介石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主张裁兵救国，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要求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裁兵。

△　蒋介石电上海全国经济会议常务委员会，赞同该会议来电所提裁兵及统一财政之主张，表示“当与各同志一致努力，决不稍存私意以负人民责望之殷”，并望早日将裁兵公债办妥，以促进行。

△　蒋介石就安福系在天津、大连假托段祺瑞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致函警告段祺瑞“爰惜令名，善用勋望，以图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实”，“勿为奸邪宵小所误”。10日，段复函蒋称，津、连妨碍革命

之举，绝非所闻，亦非所乐闻。

△　蒋介石下令没收中兴煤矿公司。第一集团军克复枣庄后，战地政委会委俞飞鹏为整理该矿委员会主任，与该公司议定，由公司报效军饷百万，未能实现。蒋介石以该公司希图阻挠军饷为由，遂于是日下令将该公司所有财产一律充公，并责成俞飞鹏负责接收。

△　冯玉祥自保定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收拾时局六项意见：一、统一军政，取消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方面军、各军团总指挥名义，以军或师为军制最高单位。二、组织裁兵委员会，规定裁兵条例应为枪械不全者裁，老弱不堪者裁，纪律不佳者裁，而不按比例裁。裁兵前严禁招兵及收编敌军残部补充实力。三、打破地方割据恶习，统一财政、政权，政治方面以党治国，不可以党员治国，经济方面确定预算，公开用途，平均支配。四、对外方针应不亢不卑，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一味退缩。五、整理党务，统一意志。六、今后地方政治设施应蠲除苛捐杂税，清乡剿匪，振兴水利，提倡职业教育。

△　红军朱德部4日由宁冈、永新向遂川转移，是日湘军程泽润、熊震部攻陷宁冈，10日陷永新。

△　杭州之江大学美籍主办人坚持设宗教科，校董不同意，是日开特别会议议决停办。

7月6日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上午7时，蒋、阎、李及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政府委员周震鳞、各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以及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成濬、北平政治分会、工商学界代表数百人参加。冯玉祥自保定抵平赴碧云寺参加大祭，蒋介石主祭，冯、阎、李襄祭。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祭文及蒋介石祭文。蒋氏祭文回顾总理永诀三年间，党之基础濒于危亡者五次，革命势力几于倾覆者凡十五

次；继以八事告总理，其中攻击共产党“破坏革命，加害民生”，认为“清共绝俄”政策之变更，“无背于总理之遗教”；并谓“值此更始之际……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于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誓以全力赞促武装同志，务底于成”。

△　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群等开会讨论裁兵问题。蒋提出国防兵工意见书，冯表赞同，阎、李均主提交国民党五中全会。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宣言取消不平等条约。

△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议决外交部呈送重订条约宣言及旧约已到期新约未缔结前之临时办法案，送中央政治会议核议；内政部长提议特区应改省制，并拟以绥远改称绥远省，热河改称热河省，察哈尔改为集宁省，以旧直隶口北道10县划入集宁省范围，及热、绥、集三省省会设置案，交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杨增新来电请委金校江等八名新疆省府委员案，送中央政治会议核议。

△　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成立，委员阎锡山、陈调元、马福祥、蒋作宾、刘守中、鹿钟麟、白崇禧宣誓就职，冯玉祥不就委员职，未到。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到会并分别致训词。

△　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成都成立。

△　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及委员罗家伦等以北伐告成，军事大定，北平政治分会及河北、天津省、市政府均先后成立，是日联名通电宣布解职。

△　江苏省政府通电赞同全国经济会议上月30日之统一财政电，主张首先划分中央与地方之各项税款，然后确定预算，依照百分之

率，斟酌缓急，支配平均。

△　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待新闻界，提出整理交通事业政策，其要旨为：一、统一事权，凡路、电、邮、航四政，任何重要机关，不得任意支配；二、会计独立；三、减轻电费及路费负担；四、保护商旅；五、罗致人才；六、组织财务、购料、法规各委员会，制定法令，以资遵守。

7月7日　　外交部发表宣言，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略谓："国民政府为适合现代形势，增进国际友谊及幸福起见，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及双方平等互惠主权新约之重订，久已视为当务之急，此种意志，迭经宣言在案。现在统一告成，国民政府对于上述意旨，应即力求贯彻。除继续依法保护在华外侨生命财产外，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特作如下宣言：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已届期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期满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

△　张学良所派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到天津。9日，蒋介石派张品哲赴津邀奉方代表到平。10日晨，张品哲访王树翰等，表示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决不诉诸武力，旋即同赴北平。

△　新疆政变。省府主席杨增新出席迪化俄文专修学校毕业典礼，正颁发文凭时，为交涉员兼军事厅长樊耀南狙击毙命。旋樊占据省府自称省长兼总司令。是晚，民政厅长金树仁率部捕樊及同谋者21名，并将樊处决。9日，各界公举金就任新疆省府主席兼总司令。

△　何应钦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述裁兵方案，并谓："倘诸公一致主张，举国谁不服从。治乱之源，存亡之键，胥决于此。"该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将各集团军及广东军队共缩编为40师，每师1.5万人；乙案为60师，第一期每师1.5万人，第二期每

师减为一万人。

△　冯玉祥、阎锡山分别电令所部严禁招兵，并令各县通告民众“如发现招兵情事，准其告发，决拘留严究”。

△　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到200余团体，10余万人，阎锡山、李宗仁、何成濬、何其巩等出席，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参加。吴敬恒、鹿钟麟、商震等发表演说，通过取消苛捐恶税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17项决议。

△　长沙10万人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各县同时举行庆祝活动。同日，横滨华侨集会庆祝北伐胜利。

△　吉林省教育界张德懋等上书张学良，要求改旗易帜，以救危亡。

△　上海国货运动大会开幕，至13日闭幕。

7月8日　　下午，阎锡山在北平外交大楼宴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军政重要人员120余名出席。蒋、冯发表演说。蒋谓北伐告成，诸同志相聚一堂，无任欢慰。冯则表示“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旧军阀残余尚未完全消灭，各军裁兵未见实行，余不胜悲痛”。

△　滦州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向山海关总撤退，山海关、滦州之间七县由张宗昌部接防。15日，第三、四方面军全部退集锦州。

△　外交部照会丹麦驻华公使高福曼，1863年7月13日中丹《友好通商航行条约》已届期满，应即废止，提议两国各派全权代表，另缔新约。

△　北平蒙古代表团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蒙藏委员会，略谓：“革命成功，寰宇一新，内蒙、青海、呼伦贝尔各蒙族欢

幸之至，各推代表团来平，决遵三民主义，另随全蒙民意，凡关蒙古法案，务乞暂为保留，予蒙族以自决之机会。”13日，蒙藏委员会电复请即选派代表至京，共商一切。

7月9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五四次常务会议议决，第五次全体会议延期至8月1日，原定8月1日召开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因筹备不及，亦延期召集。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凡七条，其中规定：由外国输入中国之货物所应征之关税，在国家税则未实行以前，照现行章程办理；在华外人应照章纳税。

△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安福系余孽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12人。

△　李烈钧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谓现在训政开始，最要之举有三：即对内二事为裁兵、理财，对外问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希望各同志一致努力奋斗，以求实现。

△　追悼国民军1926年南口战役阵亡将士大会在南口举行，蒋介石、李宗仁、鹿钟麟、方振武及工、商、学、农、军、政各界5000人出席。冯玉祥主祭，何其巩代蒋读祭文，鹿钟麟报告南口战役详情，冯、蒋发表演说。

△　奉天代表王树翰、米春霖、邢士廉、徐祖贻抵天津对记者谈张学良与国府谋和之磋商条件共七项，计：一、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并改换旗帜；二、东三省改组委员制，成立政治分会；三、张学良为政治分会主席；四、杨宇霆为奉天省政府主席；五、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六、万福麟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七、所有兵权，暂由原人统率。

△　东三省议会审议《东三省约章》（即《东三省宪法》）草案，凡22条，规定：东三省主权在东三省民，三权分立，以联合省议会为立法并行政机关之监督机关，设三省临时保安会为行政机关。

△　国民党新疆省党部通电全国，报告新疆政变经过，并说明经全体党员紧急会议，公推金树仁为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已于是日就职，请中央政府俯顺舆情，速颁明令，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府主席兼总司令。

△　财政部接收北平各机关办事处为募集津海关二五附加税库券垫款事，致函北平总商会，告以北平各钱号应垫银元25万元，限5日内缴清。

7月10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议决：《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通过；民十六年以前旧欠田赋豁免；通缉安福系余孽王揖唐等12人。

△　下午奉天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由津到平，邢对记者谈此行系遵照张学良东（1日）电商洽统一办法，并谓：张学良早求统一。皇姑屯之变，益增爱国之热度，而赞成统一志愿，尤觉须急速实现。兹既举国一致易旗，东省自当不必坚持异议。不过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

△　蒋介石在北平碧云寺接见张学良代表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

△　全国财政会议闭幕。宋子文致闭幕词，略谓：中央及各省现有收入，皆感拮据，而两湖金融之困难，两广债务之积欠，亦为当务之急。现财部每月须筹军费160万元，政费百余万元，尤感财穷力尽。希望到会同人共商划一新税制度，协力实行，赞助中央，减少财政上之困难。会议通过三个月内实行裁厘、统一全国财政、明年1月

起实行关税自主等议案。

△　冯玉祥电蒋介石，已遵照上月24日关于取消各色杂牌军队之电令，将第二集团所委任之东路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鲁东别动军、北直别动军、鲁南别动军、奉别动师、第二、第三、第四旅之司令、副司令、师长、旅长16员一律取消，分别缴械遣散。

△　李宗仁电复冯玉祥5日电，表示对于裁兵“惟有遵照蒋总司令意旨，务竭力促其进行，不以空言相督责”。

△　戴季陶抵汉口，当晚在武汉各界欢迎大会上演说“救国之道”，略谓：“我们现在只有一条救国救自己的路，就是无论在那一桩事情，都要实事求是的去干。无论工业、农业、商业、教育、政治、军事，都要彻底的自己整顿自己的力量，务必要把人家赶上，这才是一条救国的根本正路。”

△　东三省旅平学、商两界发表宣言，发起成立“东三省政治改进会”，以“应顺潮流，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以谋统一”为宗旨。

△　驻日公使汪荣宝访日外务省次官出渊，就日军司令声言驱逐张店、傅山等县知事一事提出抗议。

△　日本阁议讨论中国事件，须张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之约，然后日本承认张学良之地位。

△　日本陆军省遵照内阁决议，公布撤兵命令，将山东派遣军第三师团预备兵、后备兵7500名撤回日本国。15日，第一批日兵1500人从青岛启程归国。18日，第二批千余人、马500匹，启程返日。

7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八次会议议决：省政府委员与特别市市长不得由一人兼任；何民魂免去南京特别市市长兼职，专任江苏省府委员，以刘纪文为南京特别市市长；加派戴季陶、郑毓

秀、陈辉德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通过《暂行特种刑事诬告治罪法》、《违警罚法》、《土地征收法》；修正《惩治土豪劣绅条例》。

△　蒋介石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敬恒、陈绍宽、朱培德、张群在北平汤山开会，商讨军事善后问题，经两天讨论，由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及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代）共同签署《军事整理案》，主要内容分两部分：一为整理军事方案，一为军事意见书。

△　军事委员会电复冯玉祥5日电，略谓“歌电所举六条，嘉谟谠论，非特救时之良策，亦属立国之大计……循诵之余，良深嘉慰”，并表示统一军政一节，现已由本会拟具方案，送请中央五次全会讨论，其裁兵事宜，亦经交裁兵委员会分别办理。

△　李宗仁对上海《时报》驻平记者谈军事、政治、裁兵等问题，其大要为：一、现在事实上全国业已统一，无再须用兵之必要。今后惟一要务就是裁兵。蒋、冯、阎总司令等与余会商结果，决举国一致裁兵。不过裁兵一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难。故各总司令于裁兵及善后研究最切，裁兵、善后，无非化兵为工，如振兴实业，设立工厂，垦荒筑路开河，现在各总司令俟李济深到平后，将裁兵与善后两问题作最后之讨论，有所决议，提交第五次大会或建议中央施行；二、各总司令来平完全为军事上问题，政治问题由中央主持，军事首脑不过问；三、各总司令对奉一视同仁，决以政治手腕解东省问题。

△　蒙藏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白云梯等六委员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丁超五致训词，白云梯致答词。

△　伍朝枢奉国民政府训令致函美国务卿凯洛格，告以国民政府决定指派全权代表与美国重订新约。

△　美国务卿凯洛格向柯立芝总统报告，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之未来演变，虽然难以预料，但美国应同意其关税自主权，“以鼓励其应

付内部的巨大困难，进而成为稳定的文治政府”。

△　外交部照会法国驻沪领事梅里蔼，声明中法《越南通商章程》及其附约中法《陆路通商章程》（1886年4月25日订于天津）、中法《续议商务专条》（1878年6月26日订于北京）、中法《续议商会专条附章》（1895年6月20日订于北京）于7月7日起概予作废，并提议中法两国政府各派全权代表，另订新约。

△　外交部照会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琪，1887年12月1日《中葡商约》业于本年4月28日到期，应完全废止，不生效力；在新约未订前应即适用《临时办法》七条，以维护两国关系。

△　驻华意公使华蕾答复外交部长王正廷1日照会，声称中国无权宣布中意商约无效，但不反对开始谈判修约，在新约未实行前，中意两国关系应恢复旧态。

△　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白崇禧条陈北平改革方案七项：一、停止民众运动；二、河北省政府移设北平；三、改革风俗；四、整顿学校教育；五、设河北省党校；六、实行县长考试；七、训练机关人员三民主义化。

△　内政部部长薛笃弼请将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改省，并以旧直隶口北道10县并入察哈尔，改称集宁省案，是日由中央政治会议交北平政治分会审议。17日，阎锡山电国民政府表示赞成。

△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项决议案。会后举行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等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周恩来、项英、张国焘、瞿秋白七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罗登贤等七人。向忠发为总书记，周恩来、蔡和森、项英、彭湃分任组织、宣传、劳动、农民部部长。

△　张学良电蒋介石提议恢复平津交通，全线通车如有不便，请暂先分段开行。如承应允，当即派员来平，面商一切办法。

△　鄂南清乡司令马文德率部赴大冶、咸宁、嘉鱼“清乡”。

7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请冯玉祥早日来京参加五中全会。

△　国民政府着内政、财政两部通行各省政府豁免民国十六年12月31日以前旧欠田赋。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及《修正国民政府审计院组织法》。

△　外交部照会日驻华公使芳泽，声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日所缔《通商行船条约》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缔《通商行船续约》，至民国十五年10月8日第三次满期，要求即刻改订。

△　外交部撤回驻法公使陈策，派齐致暂行代办。

△　国民党奉、吉、黑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及东三省特务委员会致函蒋作宾，请发恻隐之心，促各军事首领急速进兵，肃清余孽，“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东三省问题。

△　班禅派员入川求援。西藏班禅喇嘛额尔德尼派代表阿汪敬巴绕道入川，分别谒见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面递重要文件，陈述班禅四项主张：一、康、藏人民隶属中央政府；二、维护教务；三、进兵收复失地，解除康、藏人民痛苦；四、开发康、藏富源；并述达赖背华亲英，将后藏政权拱手献与外人，希望川政府及各军长念休戚相关，实行出兵援助，庶国权可保，领土不致丧失。邓、刘、田答复愿尽力赞助，出兵一层，推刘文辉就附近防军酌调，如须多兵助攻时，再由邓、田调队应援。

△　吴佩孚因邓锡侯部师长罗泽洲派兵进攻，是日由大竹移住达县。

7月13日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杨树庄（陈绍宽代）之裁兵方案，即《军事整理案》及《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在北平签字。该方案规定组织编遣委员会处理编遣事宜，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司令；选择最精锐而立战功者编成50或60师，另在全国组织宪兵20万，维持治安。

△　蒋介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招待中日新闻界，到中日记者32人。蒋就军事、财政及对奉问题回答记者，略谓：东三省问题并非难于解决，学良如能彻底信仰三民主义，知国家非统一不可，同隶于青天白日旗之下，实大体者。否则，政府亦不对其勉强。

△　李济深、戴季陶抵北平。

△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九次会议通过南京特别市市长任免案；修正通过划一权度标准案、处理逆产条例案；函请国民党中央党部拨捐款30万元救济陕西兵灾，并于华侨捐款中拨30万元充赈济山西、北平、热河、绥远、察哈尔战地灾民之用。

△　湖南省政府议决：自本月16日起，长沙市烟馆一律封闭，秘密卖烟者枪决。

△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占湖南酃县，湘军退守茶陵。

7月14日　蒋介石在香山双清别墅宴奉天代表邢士廉、米春霖、王树翰、徐祖贻。邢等陈述奉天现状及张学良期望统一之忱。蒋表示赞许，仍主以三民主义统一东北，以自家人办自家事，绝无其他主张。

△　国民政府代表刘光、张同礼抵沈阳与张学良会商东北易帜问题，刘提出：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

改悬青天白日旗。同日并电北平蒋介石，报告抵沈后同张学良会晤情形。略谓：张学良对易帜、撤兵及服从主义，均可办到，但须待解决四事：一、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问题，望明复一电，言明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四、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恳暂停止，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

△　张学良电国民政府代表祁暄，表示“弟对介公（指蒋介石）决心合作，至目下立即改帜一事，决非不愿，对内已有办法，唯对外确有为难……仍望切致介公迅速设法，使弟有可借口转圜之地，或他方设法疏通，无不乐从也”。

△　蒋介石以近来大军云集河北，争先恐后征发粮秣，人民不胜支应，电令冯玉祥、李宗仁等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此后购办给养，应于所驻区域内，不得越境征发，并严禁招兵集匪，骚扰勒索。

△　国民政府令准何民魂辞南京特别市市长兼职，任命刘纪文继任。

△　军事委员会讨论裁兵善后安置问题，何应钦主席，议决被裁军官概送入军官学校肄业，被裁兵士则分别安置各工厂练习。

△　冯玉祥离北平，17日抵新乡，旋电阎锡山对北平“克复未久，秩序大定”表示敬服。

7月15日　蒋介石下令肃清关内张宗昌、褚玉璞部直鲁残军，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任滦河方面右路军指挥；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策应左右两军作战，并限令左右两路主力于29日前在指定地点集中，总预备队在宝坻、杨村、三河、顺义集中。

△　冯玉祥电请国民政府拨发伤亡官兵恤金，略谓：自去年5月以

来，各大战役所部官兵伤亡不下五万之众，“迩来伤亡官兵之家属，向玉祥请发恤金者，扶老携幼，相属于途，汴、郑、洛三处，各聚万余人，每逢玉祥外出，辄遮道而来，环绕乞请，呻吟号哭之声，闻之痛心，辗转流离之状，见之泪下”，仰恳速拨大宗款项，俾便发放。

△　为贯彻全国财政会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是日裁厘委员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18日，该会讨论裁厘方案，决定裁厘后以整理田赋、营业税、特种消费税所得款抵补各种经费。24日，裁厘委员会闭会，选出贾士毅等五人为常委。

△　共青团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大会讨论贯彻执行中共六大决议，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关向应为团中央总书记，华少峰为宣传部长，李祖芬为组织部长，温裕成为工人经济斗争部长。

△　台湾民众党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通过《大会宣言》，号召“打倒公敌帝国主义”，指出“今后援助农工及各团体组织之政策，亦即本党之基础工作”。此宣言因被日本统治者认为内容不妥，禁止其散布。

7月16日　蒋介石邀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至西山饭店会谈对奉、裁兵及财政三大问题，决定派何成濬、孔繁霨为全权代表，随邢士廉赴奉报聘。

△　奉天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会见李宗仁，告以东三省改悬青白旗事，一星期内可实现。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惩治土豪劣绅条例》，17日，公布《处理逆产条例》。

△　张学良访日总领事林久治郎，告以奉方与关内商洽易帜经过及双方所提条件，并征询意见。林氏答称当请示政府，再行奉复。

△　张学良委孙传芳为东三省军务总指挥，统辖退奉军队。

△　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电国民政府称，广西业已遵照中央通令，停止招募新兵，并将原有部队陆续裁撤，希望各友军一致实行。

7月17日　　蒋介石在北大对北平学界发表演说，略谓："北大是最高学府，新文化策源地，自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民众运动，均以北大为中心……此次北伐成功，亦深受其赐。"现在革命尚未完全成功，希望秉承总理遗训，继续努力，以打倒帝国主义及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官僚政客，团结起来作革命后盾。并谓现在政府极力提倡教育，希望北平学生"安心念书，不要动辄游行示威，荒废学业"，"应当将共产学说及国家主义等，极力排除，将思想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然后革命才能成功"。

△　李宗仁电劝张学良一致拥护国民政府，从速服从三民主义，并称"舍三民主义不能救国"，非此无以争生存。

△　蒋介石代表郭同自北平赴奉，同张学良商东北易帜事宜。

△　宋子文抵北平与平、津银行界及商界讨论财政问题。

△　第三集团军总部开会讨论裁兵，朱绶光主席，决议：一、作战时所添官员约万余人，一律裁汰；二、各师、旅督战队及各团之步兵炮连、手机枪连约二万人以上，实行裁撤。

△　张学良在沈阳对外人谈时局问题，谓南北妥协问题，双方意见已相当接近；至于三民主义，前于中山首倡时早经表示谅解，及今不复成为屈服不屈服之问题，惟共产党誓必防止到底。

△　江苏省府委员会议决：丹徒县改名镇江县，江苏省府迁出南京，以镇江为江苏省会。

△　中共湖南省委命令取消湘赣边界军委，另设前敌委员会，以

陈毅为前委书记。

7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九次会议，议决：《共产党人自首条例》付审查；“严查官吏吸食鸦片，赌博狎妓，从重惩办案”交国府核办。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规定以万国公制（即米突制）为民国权度标准。

△　蒋介石将提交五中全会之《军事整理案》电达国民政府。该方案大要为：一、组织国防会议，为最高军事统率机关，隶属于国民政府；二、国军之编成，由总司令及一、二、三、四集团军及海军总司令、参谋总次长，另加中央委员三人或五人，合组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各军长皆听指挥。编遣委员会成立后，各总司令即取消，但未完成期间仍由各总司令负责；三、编余军队裁减方法，由编遣委员会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及警保、工兵、屯垦、设计部等部，编宪兵20万人，并由中央设立大规模警察学校及兵工讲习所、航空学校等。

△　蒋介石在北大对北平各团体发表演说，强调“要拿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中国的制度才能确定”。“思想统一，比什么事情都紧要。各位诸君要国家能够健全，能够独立自由，第一步工作要谋中国人思想统一，要确定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要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

△　于右任、丁惟汾等电在法国之汪精卫、胡汉民、褚民谊、孙科、陈璧君，在英国之王宠惠，在美国之伍朝枢、李石曾、甘乃光及其他海外中央委员，请早日回国参加8月1日举行之五中全会。

△　黎元洪灵柩出殡，天津市下半旗，送葬者数万人。商震偕河北省府委员八人往吊，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各派代表专程抵天津致吊。

△　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见张学良，要求实行张作霖同南满铁道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商订的《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的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表示“实行困难”。

△　上海日总领事矢田抵南京，访王正廷谈判济案，提出惩办济案中国方面肇事者、赔偿经费等五条无理要求作为谈判原则，遭王正廷拒绝。矢田当晚返沪，即电北平日公使芳泽，报告谈判无结果。

△　武汉卫戍司令部第七、第十八、第十九三军奉李宗仁密令，是日将驻武汉之邹鹏振第四十四军解除武装，改为工兵，厉行工兵政策，暂作修堤、拆城工作。

7月19日　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访张学良，为东北易帜事向张学良提出第三次警告。林久治郎向张学良转交日首相田中的信件，主要内容为：“一、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联系之必要；二、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三、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报告？”林氏无词以答。林久治郎转送书信之前，田中曾有电报指示林氏：“由于我方一向对张学良过于表示善意态度，已使其怀有日本不难对付之念；是故，此际有必要表示看对方的态度如何，日本也应表示其强硬的一面。……更须充分说明就东三省而论，最有必要的是‘保境安民，观望形势’。”

△　下午4时，张学良在奉天大元帅府召开时局紧急会议，到张作相、张景惠、袁金铠、张焕相、刘尚清、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协议易帜事，因日本态度强硬，未作决定。

△　汤玉麟在热河通电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25日，汤派代表金鼎臣面见蒋介石，声言服从三民主义。蒋谓如

若借此谋取地盘，决不姑容。

△　内政部呈奉国民政府令准公布通行全国各省市办理户口调查，限本年12月底一律办竣。

△　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南京领事冈本，转交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之通告，声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业已逾期，应予废止。冈本表示照会中事实可以电呈芳泽公使，但照会则不便收下。

△　驻日公使汪荣宝奉国民政府训令，赴日外务省访亚洲局长有田，通告中日通商条约于20日届满，望从速订立新约。

△　冯玉祥电复国民政府报告已停止招募新兵，谓："自平津克复后，玉祥已通饬所属各军不准招募一兵，所有原设之征募总区、分区早已一律撤消。兹奉钧电，除再行通令全军一体凛遵并派员切查外，谨电奉复。"

△　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由德国购买军火，计机关枪100挺，毛瑟枪300支及大批自动手枪，子弹300万发，共值100万元，于6月27日由德国利克茂轮船公司之"苏菲利克茂"轮船运抵上海。旋由四川旅沪同乡会刘宗权等56人投书《申报》，谓刘湘勾结帝国主义，秘密购械，助长川乱，要求转请中央彻查。是日，国民政府下令放行。

△　河北省政府会议议决取消"讨赤税"、"讨赤捐"、"军事捐"、"军事善后特捐"。

7月20日　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呈报第一集团军第一期缩小编制办法，计黄河以南第一、第九、第十七、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各军及警卫司令所属各步兵团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九、第十一共五个师，裁去36万人。

△　张学良就林久治郎第三次警告事偕日顾问土肥原往访关东军

司令官村冈。村冈劝张勿轻率妥协，致东三省卷起新波澜，应保境安民，致力于实现和平，愿予以援助。

△　已投降北伐军的直鲁军残部顾震部1500名开往高密迤南二华里地点集结，越过日方所定的胶济沿线南北20华里以内禁止中国开入之规定区域，被日军迫令缴械，顾军不服，日军遂以重炮轰击，顾部死五六百人，余被解除武装，高密尽成焦土。

△　菲律宾中国国民党总支部及中华民国协会、中华总商务会等团体以《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其续约已届期满，电请外交部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废除中日旧约，另订新约。

7月21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十三次会议议决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杨树庄五总司令所送《军事整理案》送五中全会讨论。

△　国民政府公布《违警罚法》，凡53条。

△　蒋介石在北平招待外交使团，到中外人士300余人，日使芳泽未到。

△　晚，张学良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等会晤蒋介石，告以“日本驻奉领事正式用书面劝告：（一）东三省应保境安民；（二）东三省不宜实行三民主义”。蒋指出：“此宜自己觉悟，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为所愚。将来正式与日本交涉时，本诸正义，外交决不失败。”“应催张学良不可为倭奴恫吓所屈服，当即决然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以救东北救中国。”

△　何成濬、刘光电张学良促其当机立断，毅然宣布易帜。略谓：“皓（19日）电奉悉，当即转陈。总座之意，以日人态度如此，尊处愈有当机立断毅然宣告之必要。盖日人此等举动，非仅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惧别生枝节而犹豫不决，以

后将永远受其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国领土，先生亦岂能更有立足之地？若不受其恫吓，毅然易帜通电而以独立之精神出之，则东省为全中国之东省，全国皆将深致崇敬，为先生后援。且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日人未必敢遽肆吞噬，即使真占据东省，吾人必以全力对日，援助先生，真爱国之英雄，决不患无用武之地也。东三省之存亡，即全中国之存亡，系乎先生今日之举措，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无论如何困难，必以毅力排除，勿稍瞻顾，致误事机。”

△　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外务省抗议沈阳日总领事阻挠张学良易帜。

△　全国反日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15省及香港反日会代表百余人出席，陈德征主席，24日正式开会，27日闭幕。大会通过议决案多起，其要项有：一、厉行全国经济绝交，限期肃清仇货案；二、定期举行全国总检查日货周案；三、通电各地迅速建立反日会案；四、反日工作要永久干下去，须全国一致动作案；五、通电各国及国联陈述日本暴行并请主持公论案；六、告日本在野党及日本民众，请其促政府觉悟案；七、呈请政府确定对外方针案；八、惩办奸民案。最后通过大会宣言，即告闭幕。

△　王正廷抵沪对记者发表谈话，宣布中日条约昨日满期，已发出废除之通告，希望日本应早日开始订立新约之交涉，中国绝难许任日本采取无限期延长之手段。又谓关于济案交涉，当视日方是否有解决诚意，否则亦惟有听之。

△　日首相田中在内阁会议说明中日条约废除问题，称政府已通告国民政府，中日通商条约不能依国民政府之单独的废除通告即行失效。依据该约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自前年10月20日起继续有效10年。若中国以真挚之诚意求改订条约，则日本表示同情。

△　李济深在北平访英公使蓝普森，商拨庚款完成粤汉铁路事。英使谓此款恐不敷，将来中英可再讨论。24日，李电广东省建设厅将完成粤汉路程序案克日妥拟具呈。按：粤汉路未成路轨920里，建筑费需4000万元，拟商诸英国拨还庚款300万元，不足部分拟发行公债。

7月22日　　蒋介石在北平太和殿对警察训话，略谓“北平警察向来甚善，希望以后求进步，并彻底的党化，为各地警察之模范”。

△　蒋介石会见邢士廉、王树翰，邢、王陈述奉方易帜尚有困难。蒋指出：张学良信仰主义，是中国内政问题，日本不得干涉。日本每借口中国不统一，而今不令三省统一，则不啻自供不愿中国统一。东省仍当以民意主张为依归，原定易帜即可实现。

△　张学良以日本阻挠，东北易帜不能如限实行事电告邢士廉，并谓：“国事至此，百念俱灰。一切仍盼就近积极商榷，俾得促成，以慰民望，弟无不赞同也。”

△　张学良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省长，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

△　宋子文在北平接见路透社记者谈财政政策，略谓：财部于近半月内向京、津各银行订成一种借款，纯属津关二五附税公债垫款之性质，以充北方善后费用，数额300万元，年息八厘，九五实收。

△　驻湖南平江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举行闹饷起义（即平江起义）。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遭到破坏后，独立第五师中共组织被暴露，中共湖南省委派特派员滕代远到平江策动该师暴动。18日，第五师第一团团长、中共党员彭德怀于当晚召开第一团党委紧急会议，滕代远到会并讲话，决定于22日以闹饷为手段举行起义，并分别派人通知第五师中共党员黄公略、贺国中各率所部参加起义。是日上午10时，彭德怀召集军官会议，扣留反动军官。11时半到第一营大操场召集全营官兵宣布起义。下午1时，起义队伍进

攻县城，经过一个半小时，全部占领平江县城，活捉县长刘作柱。下午5时，黄公略率第三团第三营起义士兵自嘉义镇到达平江县城。次日凌晨，贺国中带领师部随营学校学员自浯口镇（距县城60里）宣布起义，开进县城。三支队伍胜利会师，起义队伍总共3700人。

△　烟台事变。投降北伐军之张宗昌部钟震国（张宗昌义子，投降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刘志陆部教导师师长兼东海警备副司令，调驻烟台），奉张宗昌之密令，于是夜突然袭击烟台驻军刘志陆部施中诚团，解除施团3000余人武装，次日占领烟台。旋出布告，自称奉张宗昌委任为烟台警备司令，改悬五色旗。

△　康、藏驻京代表格桑泽仁、宫郭札西日前联电云南省政府，请对康、藏予以提携。是日，云南省政府电复表示极愿敦睦邻好，并请莅临面商一切。

7月23日　　蒋介石电张学良，请毅然断行易帜，略谓："精神结合，固属根本要图，但易帜问题，亦非可因外交恫吓，轻于放弃。请兄毅然断行，以救中国。""至相会一节，弟所深愿，但弟既以外交关系不便来奉，而兄于此时亦断难离奉，并望兄勿轻外出，为国珍重。大局底定，相见自有日也。"

△　军委会军政厅厅长朱绍良在国民政府第四十二次纪念周作政治报告，谈及东三省易帜问题时谓，虽有日本帝国主义从中无理干涉，但政府当以政治手腕促其实现。又谓东三省问题，政府已电请蒋总司令办理，前数日并派刘光前往，顷据刘光来信报告，东三省易帜不成问题。

△　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开成立大会，选举张学良为委员长，袁金铠为副委员长。《临时保安公约》规定东北各省区之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为最高立法机关；临时保安会督理各省区一切重要政务，对省议会联合会负责；东北各省区之军民政务，采分

治主义，军政归总司令并各司令处理，民政归各省民政长官处理；临时保安会非经省议会联合会之议决，不得对外缔结各种契约协定，不得施行军事上之作战行动，以及不得募集债券、通行单行法律；临时保安会有任免东北各省区之最高文武长官之权；本公约于政局统一时即行废除。

△ 张学良对记者谈话，略谓："余现感到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故自先父去世，即选派代表与国府要人接洽妥协，一两日来已急遽接近，成为事实，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余与国府精神上已趋一致，现不过形式上之易帜问题，尚须迟缓一二日实行而已。"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树人自香港启程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陈濒行时语人，汪（精卫）派决定列席大会，但汪本人不出席，提案委陈公博代提。

△ 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何应钦分别兼任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朱绍良为委员。

△ 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裁兵问题，谓如四川兵额多而无首先裁兵之人，但亦不能听其据地自雄，如不早觉悟，国府对之用兵，亦不得已。

△ 大学院训令各省区、各特别市教育行政机关，限十八年5月前制定推行义务教育计划，于计划完成之日起，两年内减少失学儿童20%。

△ 李烈钧致电欢迎日本民政党领袖床次竹二郎来华，谓："敝国情形贵国人士似尚有不明其真谛者，苟得两国负望之士往还游涉，调查实情，并告相互尊重诚意而努力以实行之，两国前途，实获大益。"

△　朱德部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5000余人占领资兴。24日向郴州进逼，郴城东守军范石生第十六军第四十六师第一三六团仓卒应战，卒不能支，团长王甲本重伤，伤亡官兵230人，朱德部进占郴州，范石生急调藩毓英团会合王团反攻。是晚，朱德部退出郴州。

△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发表宣言，谓意政府根据南京政府外交部最近之对外宣言，已训令驻华外交代表与国民政府开始磋商，讨论废除中意间旧有各种不平等条约，并成立新协定。

7月24日　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在北平会商关内军事。阎主张蒋缓行。蒋以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必须出席，所有关内军事及热河善后，请李济深负责主持，李、阎均赞同。

△　蒋介石访李济深、李宗仁，对日本公然阻挠我统一与怂恿直鲁军回据胶东等事表示悲观。

△　国民政府公布《暂行特种刑事诬告治罪法》。同日，令派施肇基、王景岐、齐致为本届国际联合会赴会代表。

△　国民政府据内政部呈请新疆省乾德城县佐改升县治是日指令照准。

△　东三省原定本日通电易帜，因日本横蛮阻止，张学良深恐发生“第二济南惨案”，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乃决定暂缓易帜。

△　张学良电蒋介石陈述不能立即易帜之苦衷，略谓：“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弟对兄方深愧疚，乃蒙曲垂爱护，益觉汗颜。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弟可誓诸天日，且弟之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请询实君、小岱即可尽知。如再怀疑，并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总之，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数日前探知田中意旨，如我方不听劝

告，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现奉垣形势，我公定悉。”“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

△　英驻华公使蓝普森宴请蒋介石。

△　军事委员会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规定所有编留之现役士兵，应择其年龄在18岁至28岁，身材在1.6米以上为合格，即希饬属一体遵照。

△　冯玉祥连日在开封召集裁兵会议，鹿钟麟、刘骥、冯治安、石友三等出席。决定所有各部归鹿钟麟、刘郁芬统辖整理。

△　戴季陶在北平电劝四川将领勿以个人权利之争，作自相残杀之战，呼吁立停私战，共谋救国。

△　美国务卿凯洛格致电外交部长王正廷，表示美国政府愿即刻派驻华公使与国民政府所派之全权代表，开始讨论中美条约中之关税款项，以订立一互尊关税自主为原则之新约。此电由美驻华公使马瑞慕于是日晚转宁，同时以一份送达在平之外交次长唐悦良，并约定26日午中美双方同时发表。

△　美政府电驻华亚细亚舰队司令白里斯脱上将，令驻华北（天津）美军1400人撤退回国。美驻华公使馆卫队500人同时撤退。

△　上午，平江起义部队士兵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五军，选举彭德怀为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会议通过从军到连实行共产党党代表制，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下午，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

△　山东安邱、临朐县暴雨成灾，汶河、弥河水位陡涨，淹没村庄20余，淹死1800人，无家可归者3.2万余人。

7月25日　中美签订关税条约。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驻华公使马

瑞慕在北京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消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此约由伍朝枢在美国同国务院直接商洽，其约文由华盛顿拍发到平，由宋子文与马瑞慕签字。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〇次会议，阎锡山提议通令实行村政，提议内分六大纲：（甲）整理村范；（乙）设村民会议；（丙）规定村禁约；（丁）设立息讼会；（戊）设立保卫团；（己）设立村监检委会。议决：交内政部法制局参考。

△　国民政府任命经亨颐、徐元浩、田桐、朱绍良、刘盥训为中央处理逆产委员会委员，薛笃弼、宋子文为当然委员，指定经亨颐为主席；特派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钟可托、李登辉、张之江、李烈钧、陈绍宽为禁烟委员会委员，薛笃弼、蔡元培、王正廷为当然委员，指定张之江为主席，薛笃弼、钟可托为常务委员。

△　国民政府任命第一集团军改编后之各师、旅长：刘峙为第一师师长，张克瑶为副师长，徐庭瑶为第一师步兵第一旅旅长，胡宗南为第二旅旅长，张承治为第三旅旅长；顾祝同为第二师师长，李明扬为副师长，黄国梁为第二师步兵第四旅旅长，涂思宗为第五旅旅长，李明扬兼第六旅旅长；钱大钧为第三师师长，陈继承为副师长，蔡忠笏为第三师步兵第七旅旅长，蔡熙盛为第八旅旅长，赵锦雯为第九旅旅长；蒋鼎文为第九师师长，岳相如为副师长，甘丽初为第九师步兵第二十五旅旅长，李延年为第二十六旅旅长，岳相如兼第二十七旅旅长；曹万顺为第十一师师长，陈诚为副师长，桂永清为第十一师步兵第三十一旅旅长，殷祖绳为第三十二旅旅长，余仲麟为第三十三旅旅长。

△　国民政府指令准江苏省政府之请，将丹徒县改为镇江县。

△　蒋介石在北京饭店召见王树翰、邢士廉，指出易帜为东三省自主权，不应受日本干预；三省既有诚意易帜，不必再通电公布保安制度。同日，并派方本仁为驻奉天代表伴王、邢赴奉。

△　蒋介石电复张学良24日电，略谓："敬电已悉，兄之为难，弟亦深悉。弟现请方耀庭（方本仁）君到奉，面达一切详情。"并谓："时局虽属艰难，我辈当忍耐奋斗，如一去了事，决非所宜，且于兄于弟仍无所益也。东三省关系重要，惟兄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

△　蒋介石离北平返南京，行前委李济深代理总司令留守北平。次日蒋抵郑州，旋出席郑州民众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

△　张学良电北平何成濬转阎锡山表白暂时不能易帜的苦衷，略谓："本期统一早日观成，借符厚望，讵料东省情形较异，不能不稍俟迟徊。……尚祈曲加鉴谅，于诸公之前代为剖明。天日在上，良终有自白之一日。"

△　张学良通知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暂缓悬挂青天白日旗。

△　国民政府特派员王大桢（王芃生）抵东京，代表王正廷向日本政府陈述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通告等问题，并要求日本国民谅解。

△　张学良特使陶尚铭抵达东京，同日，张在沈阳就陶之使命对日记者发表谈话，否认陶尚铭在日有借款事，声明陶之派往日本，系以私人名义答礼，毫无政治意义。

△　葡驻华公使毕安琪照复国民政府外交部，答复7月11日照会，声明"敝国政府不得不驳斥是项宣告，并不承认适用临时办法"，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敝国即派代表与中国缔结新约"。

△　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发表声明，宣称根据中日商约第26

条，该约应继续有效10年，不承认中国之片面废约具有任何意义，并以“当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以维护其利益”相威胁。

△　日本陆相白川在阁议报告山东形势，以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又有南北军冲突之虞，日军之撤退且勿论，即减兵亦暂无望。

△　四川旅沪各界联合会为反对刘湘私购械弹案电蒋、冯、阎、李各总司令，请饬令沿途各军严查扣留。27日，川籍军人熊克武等人联名电呈中央，请迅速处置刘湘私购械弹案。

△　福建省政府发出布告，宣布自7月31日起废除台伏票，改用大洋，大洋九角五分折合台伏一元。

7月26日　张学良电北平邢士廉等人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并愿为蒋介石效力。略谓：“即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但目前对外交方面情形，确实重要，谅介公早有成竹。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东三省一切不成问题也。”

△　钱大钧奉军事委员会令将刘湘私购械弹扣留。同日旅沪川人通知驻沪各领事，请其制止运卖外购事件，助成中国之和平。

△　是日至28日，第三批日军540名，自青岛撤回本国。

7月27日　奉方代表吕荣寰等四人到南京，29日向谭延闿、李烈钧、蒋介石等声明，陶尚铭系赴日考察，绝无勾结日本和借款等事。

△　湖南省政府公布“厘金新率”，规定裁撤厘金局八所，入口货只收入境厘、落地厘两道，出口货只收出产厘、出口厘两道，将奢侈品与洋货加税一至二，对于日需品及土货则依值百抽三原则。定8月1日起施行。

7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施行条

例》及《土地征收法》。

△　蒋介石返抵南京，谭延闿、李烈钧、何应钦等至浦口迎接。

△　阎锡山在平接见记者时称，第三集团军应裁八万，先裁三万，预定于40天之内分两期裁完。裁撤之后，第三集团军共留10个师。

△　王正廷照复美驻华公使马瑞慕，答复24日照会，声明国民政府特派伍朝枢为全权代表，希望与美国政府代表及早举行会议，期于最短期间完成新约。31日，国民政府特派伍朝枢为改订中美条约全权代表之任命令发表。

△　驻日公使汪荣宝访晤日本外相田中，就改订中日商约问题交换意见。

△　王大桢访晤田中，指出日本警告东三省为干涉中国内政，表示严重抗议。田中表示："日本忠告奉方，断非干涉内政"，并威胁称"若为保持特殊利权，今后亦仍须用一切手段，今先明言"。

△　各省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常务委员冯少山、苏民生、张棫泉联名电外交、工商两部，请严厉拒绝日本对于中日通商条约之展期要求，迅速改订新约，愿率领全国商民为政府后盾。

△　褚玉璞由山海关赴沈阳，次日向张学良索饷，并报告国军不日来攻，请示办法。

△　平汉路职工会成立。

7月29日　蒋介石以烟台事变发生，委第三军团总指挥方鼎英解决胶东军事。旋方率第四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军由沧州出发，开赴胶东。

△　张学良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离平返奉，方本仁偕行。邢临行前谈称，东北易帜一事，不过时间问题，此番回奉后定有圆满解决；东北既已声明服从国府，今后一切，决当惟中央之命是从。

△　河北省政府通电乞赈，略谓近年军阀压迫，横征暴敛，焚烧掳掠，所过为墟，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吁请代筹巨款，俾数十万流离，得庆更生。

7月30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〇次会议议决：8月1日上午8时开五次全会预备会，如不足法定人数，即改开谈话会。

△　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时局，略谓："此次赴平，系奉命祭奠总理，并解决奉天等问题，兼事结束军事，结果甚为圆满"，已与各将领商有切实办法；并谓关于党的问题，迩来党员多有意气用事，言论分歧，或更攻击老同志者，当此五中全会开幕在即，望各同志一致团结，则吾党国之光明定可实现。

△　国民政府准大学院呈，改订《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取消原有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任命胡适、贝克、贝诺德、孟禄、赵元任、司徒雷登、施肇基、翁文灏、蔡元培、汪精卫、伍朝枢、蒋梦麟、李石曾、孙科、顾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　英外相张伯伦在下院就英政府对华政策发表谈话，声称：英国仍遵守1926年12月与1927年1月宣言之精神，俟南京政府解决宁案后，方可另订新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7月31日　张学良电蒋介石陈述东省受日本压迫，目前易帜不能无所顾虑，略谓："日方近来手段对东省则施以压迫，对尊处则又极力掩饰，既以淆乱欧美之耳目，又以离间我辈之交情，用心之狡，兄倘身处其境，即知弟所感痛苦之深。弟前电谓作进一步表示者，即指通电易帜而言。盖英美对我已有表示，则日方态度亦必因而变更。彼既不能以暴力相加，我方自有应付之余地，惟在目前确不能一无顾虑

耳。”

△　日驻华公使馆照复外交部，声明日本政府对7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关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其续约“强行失效”及在新约未订前实施国民政府所订临时办法之“暴举”，“断难容忍”；要求国民政府“收回实施临时办法之主张，并认现行条约为有效”，否则，“帝国政府为维护条约上之权益计，将有不得以出于认为适当之处置”。此复照于8月7日由日驻宁日领冈本送达外交部，8月8日下午5时在东京、北平、上海三处同时发表。

△　鲁涤平、张辉瓒电告汉口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30日收复平江。

7月下旬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告阵亡将士追悼会筹备处，报告该集团军此次作战阵亡军官152名，士兵5007名。

8　月

8月**1**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预备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改开谈话会。谭延闿主席，决定预备会展期于4日召开。

△　冯玉祥、李宗仁由北平抵南京。阎锡山因胃病发作，于30日在顺德下车，谓折返太原治病，并电南京不出席五中全会。

△　孙科自纽约电南京五中全会，陈述四项主张：一、敦促胡汉民、汪精卫、陈友仁、宋庆龄克日回国，共负艰难；二、速定政制，试行五权；三、切实裁军，统一财政；四、请促外交部提前解决宁案，以便进行修约。

△　南京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数千人集会，追悼北伐阵亡将士，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致悼词，略谓党国之有今日，均由将士鲜血

换来，三年间阵亡将士约10万人，均死得其所，毫无遗憾。表示要继续遗志，抚恤遗族，以使先烈瞑目。同日，北平、天津、上海、长沙、厦门、武汉、徐州、福州等地分别举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

△　全国民用航空会议在南京开幕，议决改名为“中华航空协进会”，其组织机构分中央总会及特别区分会。总会设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五人，各特别区分会设执委九人，监委三人。

△　吉林省议会电国民政府及各地军民长官，表示吉省愿无条件地奉行三民主义，设置政治分会于吉林，援助国民政府废弃或修订不平等条约，务期举国一致撤废治外法权。

△　阎锡山令商震、张荫梧分别派相当兵力保护东陵、西陵，并饬速拿盗墓匪人，从重惩办。

△　北平文物临时维护会电国民政府，报告直鲁残部孙殿英军盗掘清乾隆及慈禧两陵，将及半月，事后该军师长谭松艇（温江）来平，寓六国饭店，将一部分之珠玉宝物卖与琉璃厂古玩铺尊古斋铺长黄百川，价值约10万元左右，正在查办中。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举行开播典礼，正式开始播音。

△　教皇庇护十一自梵蒂冈向中国天主教发布特别通谕，嘱中国天主教徒服从国民政府。略谓：“现在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　西康代表格桑泽仁、西藏代表宫敦札西，向五中全会提议改西康、前后藏为三个省：以西康原47州县为西康省，省会设于巴塘；以前藏原有范围为前藏省，省会设于拉萨；以后藏原有范围为后藏省，省会设于札布伦布，并设康藏政治分会于西康。

8月2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在报上发表《以党纪劝陈公博》一文，反对陈公博出席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　驻奉天日总领事林久治郎访晤张学良，取得张学良与林权助会晤之谅解。

△　台湾民众党电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及各党派等，认为“日本内阁对中国国民政府解决东三省问题及废弃不平等条约之态度，显示破坏民国统一与东洋和平之行为”。

△　驻广州英领毕礼敦抵梧州，谒广西省府主席黄绍竑，探询桂省改订中英新商约态度。黄答，本人绝对服从国府，将来新约成立，自当奉行，但须声明，奢侈品为不必要之品，对此除征税外，并在发销地附抽印花税。英领又询五中全会事，黄答称五中全会通过各案无不照行。

8月3日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案研究会开会，于右任主席，对中常会讨论起草之“依照建国大纲规定训政时期施行案”、“统一财政并确定预算案”、“建设程序案”、“澄清吏治案”、“促进党务进行案”、“确定民众运动方针案”等12项提案进行审查。

△　蒋介石代表方本仁、白崇禧代表何千里偕王树翰、邢士廉抵沈阳，参加张作霖丧礼。

△　第三集团军第四师孙楚部于2日夜由塘沽进攻北塘，是晨3时占领北塘，直鲁军退汉沽。

△　北平警备司令部将清东陵盗掘案要犯谭温江与琉璃厂之古物商黄百川捕获。黄对收购清陵珠宝事供认不讳。4日，警备司令部将谭、黄解送卫戍司令部查办。旋谭被何成濬、徐源泉索回“看管”。

△　冯玉祥在中华农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演说，批评国人只知趋重奢侈，不知农事重要，致使农业日渐退化，希望政府与人民合力提

倡，使农业逐渐发展。

△　全国民用航空会议通过决定，以沪汉、沪粤及汉平三线先行试航。6日通过定每年1月1日为航空节。8日闭幕。

8月4日　上午8时，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在南京中央党部开会，出席中央执委29人，候补七人，中央监委五人，候补三人，蒋介石主席。通过议案六项，其要项为：一、推谭延闿、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二、执委程潜业经停职，应予追认，以候补执委员缪斌递补；三、通知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三总司令列席五中全会；四、再电上海何香凝、王法勤、王乐平、陈树人、陈公博、顾孟馀、潘云超各委员从速来京开会。

△　张作霖丧仪在沈阳大元帅府举行。张学良行点主仪式，沈阳各级官吏及东三省军务及民政长官，均麇集奉垣，吊问者络绎不绝。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斋滕恒参谋长、秦特务机关长亦前来祭吊，自是日起，开吊三天。

△　日首相田中特使林权助携田中秘密训令赴奉为张作霖吊丧，是日抵沈阳。“训令”反对东三省与南方谋妥协，“万一敌军（指北伐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时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

△　张学良会见方本仁，提出东省统一须分三步骤：第一步，停止热河、关内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收编给饷；第二步，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第三步，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成立，然后易帜。

△　冯玉祥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讲，略谓今日谨以“互相原谅，互相补助，国家之利，个人蒙福，切勿猜疑，切戒挑剔，不慌不忙，合而为一”32字相贡献，希共勉之。

△　外交部照会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琪，国民政府派外交部次长唐悦良为全权代表，于9月3日在南京与葡政府代表开始磋商修改中葡现行之条约。

△　杨森电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辩明心迹，否认包庇吴佩孚，要求政府选派公正大员，来川查明真相。

△　郭坚残部党玉昆、耿庄、段懋功等据凤翔反冯（玉祥），经宋哲元、张维玺部包围月余后，是日完全缴械。

△　青岛警厅在由天津开至青岛之日轮“陈平丸”上查获东陵盗墓逃犯孙殿英部士兵张岐厚。张供称曾参预盗掘慈禧的坟墓，得珍珠48颗。

8月5日　蒋介石于4日到沪，是日发表文告，要求全体党员团结一心。略谓：“国家之大患，在于国内之战争，中正当竭其心力，务使今后国内决不用兵；社会之大患，在于共产党煽动各阶级之互仇而敌视，中正当竭其心力，誓必遏制阶级之争斗；我党之大患，在于同志间之猜疑而离散，中正当竭其心力，祛其猜疑，集其离散，务使归于团结一致，准是以进，生死不渝。”

△　杨宇霆率军团全体将校吊奠张作霖。日本特使林权助、沈阳日总领事林久治郎及美、英、法、德、意、苏各国领事均至大元帅府吊奠，各国领事馆均下半旗志哀。

△　石友三部克河南鲁山，俘樊部军长赵振才，毙、俘樊军各3000余人，樊钟秀逃宝丰。6日，石部再克宝丰、襄城，樊部大败。

△　日军在津逞凶，刺伤邮工李殿藻。是日下午6时，三名日兵欲通过老站邮件栏，邮工李殿藻不允。日兵咆哮凶殴后，又拔出刺刀将李刺伤。李脑、肘受重伤晕倒，旋有法兵10余名出而干涉，将该日兵扣留，一面命人将李送医院救治。旋来日警官向法兵索要凶犯，法兵

不允。7时，驰来武装日兵一队，包围车站，殴逐华人，事态扩大。

8月6日　　蒋介石电令白崇禧，东征军在北塘、沙流河停止军事行动。按：关内直鲁残军约五六万人，蒋介石原拟武力解决，后因张学良电请国民政府暂勿进攻，奉方愿承担改编直鲁残部，以和平方式解决，故蒋有此电令。

△　蒋介石自沪返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并发表讲话，强调党员必须遵守党纪，所著的书，所出的刊物，必须站在党和主义的地位上讲话，不可越出轨道之外。批评有许多刊物和小册子，骂党部，骂政府，骂老同志，尤其骂军人是军阀的更多，“像这样的乱骂，对于党是没有利益的”。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切实执行《政军警各机关工作人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

△　冯玉祥函复国民党五中全会，以本人非中央委员，不列席会议，但表示“钧会讨论某项问题，与玉祥职责有关，须加垂询时，一接临时通知，谨当遵命赴会，恭候垂问，以备采择”。

△　国民政府据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〇次会议决议，是日训令大学院通令各级学校切实施行《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

△　林权助向张学良递交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的信件。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

△　日本陆军部参谋次长南中将为视察山东驻屯日军，乘“榊丸”抵青岛，当即召集第六师团长福田、第三师团长安满开军事会议。同日，南中将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济案交涉无急于进行之必要，日侨生命未安定以前，决不撤兵。

△　曹万顺第十七军改编完竣，是日曹在兖州就第十一师师长。

△　天津邮务职工会、市指委会开紧急会议，讨论李殿藻被刺案，议决对日严重抗议，要求严惩肇事日兵，日领向邮局道歉，赔偿医药费。

△　大学院令准私立金陵大学立案。

8月7日　　国民党五中全会第二次预备会议开会，于右任主席。决定次日上午8时举行大会开幕式，推谭延闿、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为主席团，提案分党务及民众、党部与政府之关系及其权责、政治及军事三组，审查委员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分别担任三组主席。下午，谭、于、戴分别召集三组开审查会。

△　张作霖丧礼结束，是日举行出殡，执绋者达万人以上。

△　驻华日使芳泽复照外交部长王正廷，否认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与光绪二十九年（1903）之《通商行船续约》期满作废，提出只有中国政府撤回所谓实行《临时办法》之主张，并认为现行条约之有效，帝国政府方可接纳改订之商议；否则帝国政府为维护条约之权益，将不得不作出适当之处置。

△　驻华葡使毕安琪复照外交部长王正廷，否认1889年12月1日中葡条约期满作废，拒绝承认临时办法；惟表示愿开议修改现有条约，另缔结新约。

△　驻赣省新喻之程潜第六军军长胡文斗因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王均有逐客意，遂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去向。部下意见纷歧，胡拟挟部下离赣赴闽，激起官兵忿怒。是日凌晨2时许，第十九师第三团团长蔡雄、教导总队队长徐焕湘等官兵拥进胡卧室，将胡乱枪击毙。

△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召开大会，80余团体、300余人参加。各界代表沉痛演说日兵殴伤邮工案，一致要求对日经济绝交，议决组织全国反日大会。

△　津浦铁路职工会在天津开成立会，宣言拥护国民政府，实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废除不平等条约。

△　河南省政府任邓萃英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

△　彭德怀、黄公略率部三四千人撤出平江后，是日到达江西修水、铜鼓。15日，第三军军长王均令第二十一团、第二十团分别进攻彭、黄，并电鲁涤平速派湘军入赣，以收夹攻之效。

△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化名杨维策）在安源开中共湘鄂赣三省联席会议时被捕，是日在长沙遇难。

8月8日　上午8时，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南京中央会议厅举行开幕式，出席中央执委24人，候补执委一人，列席中央监委九人，候补监委一人，谭延闿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9时开第一次大会，议决：一、暂定十八年1月1日为总理安葬日期；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于全会闭会前，根据中央组织部之党务状况报告决定；三、关于整理党务办法，由审查会讨论后，再行决议，提交全会决定；四、程潜停止职务、以缪斌递补为中央正式执委案，应予追认；五、各种提案、建议、意见书，分三组审查：党务及民众组审查委员14人，由谭延闿召集开会；党务与政府之关系及权责组审查委员13人，由于右任召集开会；政治及军事组审查委员12人，由戴季陶召集开会；六、接受蒋介石对于阵亡将士及本党先烈遗族抚恤及建立公墓专祠并优恤残废士兵之提议，以全权委任蒋介石及中央常委处理。又通过奖励北伐将士令文。

△　下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各审查组分别开会。党务及民众组对“严密各级党部与中央关系案”、“党务进行案”等18案审查竣事。党部与政府关系及其权责组主张取消政治会议，政治及军事组一致赞成召集国防会议，将军委会改称军政部；裁撤所有各总司令部、总指挥部，编遣及军事悉归军政部办理。

△　国民党粤方中央委员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五人由沪抵南京，出席五中全会，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三人仍留沪不赴会。

△　蒋介石发表对时局意见：一、宣称退职：今大局已定，“中正自应退于党国同志之下，以听党国同志之驱策”；二、对于同志之间：“甚望日后诸同志互谅，以至恕之情，以党国为重，以主义为界，而不复互相诋毁”；三、对于用人一端：“如有玩法乱纪者，无论何人所用，皆当尽法以治，不必有所姑息而容情”；四、对于调治各部分之见解：政府行政人员与党，党部党员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各宜立一至严至明之标准，使之不生直接之冲突；五、对于言论之处置：“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摇乱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列。”

△　日本特使林权助同张学良开始正式洽谈，重申日首相田中关于东省不应和国民政府妥协之意旨，并威胁称，如不从日本忠告，田中已具决心，决取自由行动。

8月9日　　《中英宁案协定》在南京签字。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驻沪总领事巴尔敦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其内容为：国民政府对于去年3月24日南京事件，向英政府深示歉意，赔偿损失，深望英政府对英舰炮击南京城之举动，表示歉意；英政府将委派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13日，该项《协定》在南京、伦敦同时公布。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各提案审查组开会，讨论对各提案处理意见。党务与民众组建议案29件，意见书11件，其中“统一党政理论案”决定提交大会通过；“农工商学等民众运动案”，认为民众运动须完全受党的支配指导；民众集会结社准许自由，惟须向党部立案。党部与政府之关系及其权责组各审委对政治分会存废问题争论激烈；对设立五院制意见统一，提交大会通过。政治及军事组全体审委及冯玉祥、杨树庄、李烈钧出席，蒋介石报告军务整理方案，各委赞成贯彻

兵工政策，军费不得超过财政支出之50%，军委会改为军政部，提交大会通过。

△　张静江、李石曾因对政治分会存废问题持不同意见，退出五中全会，离京赴沪。

△　蒋介石电熊式辉师长等指示第一集团军第二次改编部队，应即着手办理，并颁发第五、第六、第八、第十各师师长、副师长之委任名单；第五师师长熊式辉、副师长刘士毅；第六师师长陈焯、副师长方策；第八师师长朱绍良、副师长毛炳文；第十师师长方鼎英、副师长杨胜治。以上各师师长之任命令，13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　蒋介石电上海总商会虞洽卿及各商董请援助被裁之退伍官兵免费搭轮回籍。

△　张学良赴日总领事馆回拜林权助，会谈东三省易帜问题，同日方展开激烈争辩。林氏重申反对中国南北妥协，并称若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犯日本之利益与特殊地位，若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声明：我是中国人，当以中国为本位。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以实现东三省人民所渴望的事。日佐藤少将谓："田中于东省具有决心，如保安会必主易帜，总司令（张学良）似可以辞职避开。"张学良异常愤慨，忠告日本政府不要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日总领事林久治郎则称"即谓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谈判不欢而散。

△　张学良自沈阳电蒋介石，报告与林权助谈话及田中阻止东北易帜情形，并谓："弟归后即召集保安委员会讨论，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共愤，惟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当邀同耀庭

（方本仁）代表共同讨论，耀庭兄亦以为然。”

△　方本仁自沈阳电蒋介石，报告是日张学良答拜林权助，东北易帜受阻情形；并谓：“汉兄（张学良）异常愤慨，谓对日办法暂取延宕，精神上仍服从政府等语。似此情形，日已悍然不顾，通电易帜，一时恐难实现。”

△　方本仁自沈阳电北平何成濬，报告日特使林权助干涉东北易帜及褚玉璞向张学良表示服从等事。略谓：“褚玉璞来奉，向汉卿兄（张学良）表示服从。汉兄已定将直鲁残部分别编遣，并取消各军名义，此事解决尚易。惟林权助顷向汉兄表示，态度极为强硬，悍然不顾，干涉易帜，汉兄愤慨异常。弟日内即偕邢（士廉）、王（树翰）两代表回宁。”

8月10日　　全国交通会议在南京开幕。各省市代表120人出席。交通部长王伯群主席并致开幕词，略谓今日交通事业千疮百孔，业已陷于破产境地，若不力图补救，训政及建设均无所依凭。对今后任务，王提出分为三步，其中第二步急需事业，要求提前筹备者，为完成粤汉铁路株洲到韶关段，修筑沪杭甬线钱塘江至曹娥江段，陇海线由灵宝进展至兰州段，建全全国无线电讯网，筹办机车车辆制造厂，筹办航空运输，准备接管海事行政等项，旋由各省代表报告交通情况。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各提案审查组继续开会，通过遵循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组织五院八部等提案。

△　蒋介石致电张静江，望速偕李石曾、吴敬恒即日返京参加五中全会，并派陈立夫赴沪敦促。

△　张学良电蒋介石，对林权助来奉阻挠东省对南妥协，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一事，要求国民政府电致驻日公使提出抗议。

△　张学良派代表刘哲通知日本特使林权助：“东三省易帜，延期三个月。”

△　北平卫戍部派哈汉仪赴东陵，会同刘人瑞接收东陵。

8月11日　　上午8时，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第二次大会，通过“统一革命理论案”、“民众运动案”、“革命青年之培植及救济案”、“厉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取缔军政机关人员干涉民众运动案”。

△　下午2时，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第三次大会，议决：一、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二、训政开始时期，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应随时实施，逐渐设立完全；三、各省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决议：凡各省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加以纠正；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亦得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

△　方本仁自沈阳电留平秘书何葆华，略谓：“此间军政等事，汉卿兄允依照政府意向次第施行，确已不成问题。惟日人对易帜一事，强硬干涉，汉卿焦虑异常。仁现定日内南旋。”

△　上海总商会等40余团体60余人之请愿团，于10日晨抵南京，是日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要求统一财政，关税自主，恢复交通，裁减军额，劳资合作，免除杂税，并向财政部、南京市分别递交请愿书。南京特别市长刘纪文、工商部长孔祥熙接见，并招待代表团冯少山、虞洽卿、胡凤翔等。

△　白崇禧电李宗仁辞第十一军军长兼职，并建议将所部缩编为一师，以张定璠为师长，编余官兵实行兵工政策或资遣回籍。14日，李宗仁复电嘉奖，准如所请。

△　国民政府据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呈称，此次奉令裁兵，已将冯治安所部第二十三军，韩多峰部第六十一师共1.6万余人，先行裁撤，给资遣散，须发给50万元，是日训令军事委员会、财政部查照办理。

△　王正廷特使王大桢至日外务省访晤外务大臣田中，讨论改订中日条约等问题。田中谓日本既已发出回文，日本之方针不变更，劝王氏从速归国报告。

△　商震奉阎锡山命令由天津抵北平，与张荫梧、徐源泉、何成濬、朱绶光共商查办东陵盗掘案。

8月12日　蒋介石由南京抵上海，劝张静江、李石曾返南京参加五中全会，张、李表示拒绝，蒋于次日返南京。

△　白崇禧、陈调元电阎锡山，谓北平工会受共产党领导，请予解散。13日、15日，阎锡山分别电令平津卫戍总司令部暂行解散平、津工会组织。

8月13日　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王均在江西省府纪念周报告，第五路军裁兵分两期，改编第七、第八及第二十八三个师，编竣开赣西“剿共”；将赣西之第九、第二十七、赣东第二十九师调回改编，遵令缩成两师。

△　南京各团体向五中全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恢复民众运动，安徽旅京、沪、汉、芜湖、苏州等同乡两千余人，向五中全会请愿，要求改组安徽省政府，均由于右任出见，分别予以答复，表示“对各同志请愿，当尽量容纳”。

△　林权助离奉回国。16日抵东京，对记者称，张学良允宁奉妥协展期三个月。

△　驻华美使马瑞慕赴朝鲜旅行，取道沈阳，杨宇霆即赴美总领

事馆相晤，要求美谅解东省与日本关系，并望美政府援助。

△　英国新闻记者辛博森赴奉参加张作霖葬礼后于是日返平，对外国访员谈称，他在张作霖遇害地作密切勘查后，深信张作霖确为日人炸死。并指出“自去年11月杨宇霆起抗膺根借款及东三省拒绝批准铁路计划协定书后，奉天与东京间裂痕颇大，故张作霖乃于元月5日提出和议，日本即起作梗，并告以从速离开北京；张作霖旋于6月4日遇害，并非事出偶然，盖为理所当然”。

△　鄂北樊城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电陶钧，本日下午2时占领谷城，围攻老河口。15日，陕军岳维峻残部退出老河口，向陕西方向溃退。22日，马部占老河口。

8月14日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第四次大会，通过下列各案：一、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推定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邵力子、伍朝枢、孙科、朱培德、张静江、丁惟汾、王法勤、吴敬恒、陈友仁、戴季陶、何香凝、顾孟馀、宋子文、李济深、陈果夫、李烈钧、柏文蔚、李宗仁、宋庆龄、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叶楚伧、冯玉祥、古应芬、阎锡山、于右任、杨树庄、黄郛、孔祥熙、王伯群、薛笃弼、王正廷、易培基46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二、各政治分会限本年年底一律裁撤。

△　下午2时，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第五次大会，议决：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定明年1月1日举行；二、决照建国大纲设立国民政府五院。行政院下分设外交、内政、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工商、农矿各部及建设、侨务、蒙藏三委员会、参谋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其他四院设立先后程序，由中常会决定；三、军事整理问题应确立下列根本原则：（1）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组织必须十分完备，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安内攘外之效。破除旧日一切

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习惯。（2）全国军队数目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束，军费不得超过全国预算50%。（3）军事教育应切实规划，归中央统一妥定办法。（4）切实施行裁兵。（5）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上述军事整理之要点，仍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切实规划，由国民政府施行；四、“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以植财政政策，而利民生建议案”，交国民政府查照规划施行。

△　外交部答复驻华日使芳泽之照会，声称：日本不应曲解条文，希图延长旧约10年，中国政府认为中日商约现已满期，当然失效，请日本方面速订新约，在新约未成立以前，决依照旧时办法办理。

△　白崇禧电第四集团军总部，谓关内直鲁残军由张学良负责收束，北平无驻重兵必要，特先令第七、第十九两军回汉休整。19、20日，第七、第十九两军抵武汉。

△　全国交通会议召开第二次大会，决议取消中美、中日无线电合同。是日至次日，各审查组分别开会讨论提案。17日，该会决定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官商合办。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报告拿获清东陵盗掘案犯经过，并请简派大员组织军法会审特别法庭，依法审判要犯谭温江。

△　第六军胡文斗部教导师师长彭子国派代表向鲁涤平要求收容，鲁准彭部返湘改编为湘南独立第一师，开赴茶陵、攸县待命。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向国民政府建议整理汉冶萍矿，并又函农商、交通两部，整理湘、鄂株萍路及增进萍冶煤矿运输。

△　天津警备司令部会同津海关监督公署将形迹可疑之出口珠宝

35箱暂行扣留。此系北平吉珍阁古玩商张月岩拟经天津运往法国之珠宝古物，自报价值2.2万元。

△ “满铁”经营之抚顺老虎台炭坑爆炸，中日工人伤亡约70名，采炭机器损坏，值日金五万元。

△ 田中谒见日皇，关于中国时局有所奏闻。

8月15日 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戴季陶等22人出席，冯玉祥列席。中央党政机关、各团体数百人列席。谭延闿致闭幕词，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其要点为：确定军事整理之原则；规定良好的行政系统与组织及党部、政府与人民之权责；根据《建国大纲》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并决定迅速起草约法，以植五权宪法之基础。旋即宣告闭幕。

△ 汤玉麟代表金鼎臣抵北平，旋与何成濬、白崇禧详商热河与中央合作事宜。同日，汤玉麟通电归顺中央，服从三民主义，政事悉禀中央处置。

△ 内蒙古青年党要求改革，请将呼伦副都统公署改委员制，推举代表七人与副都统贵福（胜福之子）交涉，悉遭囚禁。于是青年党集合1500人揭竿而起，谋攻都统署，高呼贵福下野，一面将中东铁路宜立克都与乌诺尔站中间之铁轨拆断，致满洲里至哈尔滨间交通中断，旋向海拉尔进迫。万福麟闻讯，率部前往镇压，并电张学良请奉、吉两省出兵接应。

△ 国民政府特派接收东陵委员刘人瑞、张宗海、俞奋、谭肖岩抵马兰峪，接收东陵一切事宜。27日，刘人瑞返平，对记者谈东陵被盗掘情形，并称，此行纯为调查，将具详细报告书，呈报中央。

△ 何成濬电蒋介石，解释保释谭温江事，谓谭氏经手之事未了，故索回第六军团指挥部看管，并称谭是否盗墓要犯，静候法律解

决，本人决不袒护。

△　阎锡山改任绥远警备司令李培基代理绥远都统，察区警备司令张会诏护理察哈尔都统。

△　川军第二十一军向成杰部奉李宗仁令调赴鄂边公安、石首待命，是日过长沙时被李密令鲁涤平、何键派队包围缴械遣散。

△　何键抵安源“视察”，旋与赣军师长杨池生、安源驻军萧希贤密商“剿共”办法，商定粤、湘、赣、桂四省联合“会剿”湘南红军。16日捕中共湘东特委、安源市委、萍乡县委曾干廷等九人，枪决三人，余六人押送长沙。

△　南满铁道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访三土藏相，陈述整理满铁附属地各种事业问题。

8月16日　王宠惠赴欧美考察司法事竣回国抵广州。当晚，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及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宴王宠惠。14日，王到香港曾对记者谈游欧印象，称济案发生时，欧洲舆论多为日本反宣传所蒙蔽，我国人民应从根本上应付，须举国一致，同心协力，抵制仇货；又谓多数国家认我国修约要求为正当，前途颇可乐观。

△　新军舰“咸宁号”在上海下水，舰长170尺，宽24尺，排水量480吨。蒋介石、张定璠、张群、杨树庄及各界来宾参加下水典礼。

△　奉天省长翟文选为维持奉票，于省长公署召集各银行团开金融维持会，结果命官银号、中国、交通三金融机关共同出资，购入银元送造币厂铸造现洋500万元，以维持奉票兑现之用。该项银元已向美国花旗银行驻奉分行托购。

△　第六军军长胡文斗7日被其部下击毙后，其副军长张轸由宁冈赶抵新喻，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决定中止入闽，静候中央处置，追缉凶手，为胡报仇。是日，营长以上军官任倜等联合通电，谓第六

军一致拥护由张轸统率。

△　驻日公使汪荣宝赴外务省向亚细亚局长有田面交国民政府关于要求改订中日商约之第二次照会，表示对于临时办法之实行，当加以考虑。希望日本政府从速开议修约。

8月17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十六次会议，议决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交国府之训政大纲提案、训政时期党与政府工作之规定案、彻底澄清贪官污吏案、确定整理侨务方针案、实施平民教育案、整理并统一全国财政案、统一币制案等18项提案，分别交各部、会办理；薛笃弼请允辞内政部长职，议决慰留。

△　中德《关税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和驻华德公使卜尔熙在南京签字。20日，该条约在南京、上海、柏林正式公布。该条约系补充民国十年5月21日《中德协约》之性质，规定两缔约国应于最短期内，开议商订通商及航海条约。

△　大学委员会举行会议，蔡元培主席，李石曾提议在北平实行大学区制，蔡元培反对无效，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案，其要旨为：一、北平大学区以北平政治分会所管辖者为限；二、设立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同日，蔡元培以国民党五中全会议决设立五院八部，其手创之大学院无法保留及大学委员会又通过设立北平大学区制，为此分呈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请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次日携眷出京赴沪。

△　蒙藏委员会委员张继函蒙藏委员会，陈述对蒙藏政见四项：一、民族平等；二、取消阶级；三、发展富源；四、实行民政。是日已向蒙藏委员会常会提出。

△　杨宇霆访驻奉日总领事林久治郎作长谈，希望日本援助。

△　张宗昌吊张作霖丧后回驻滦州，是日在山东龙口与旧部方永昌会商“再图大举”。

△　凌晨，内蒙青年军攻占海拉尔，占据都统府，驻军向小兴安岭退却，呼伦贝尔道尹、都统化装逃出。下午6时，万福麟由满洲里率部赶赴海拉尔，以所部黑军为正面，吴泰来统率之吴俊陞旧部担任右翼，吉军2000人担任左翼，奉军两旅集中于中东路各站，激战两小时，青年军向西北败逃，万部进驻海拉尔。

8月18日　全国交通会议闭幕。共开大会四次，通过修订各路借款合同整理长江航运、疏通内河航道、统一交通行政、确定交通计划等议案140余件，交通部长王伯群致闭幕词。通过《大会宣言》。

△　张学良就解决直鲁军残部电何成濬，谓张（宗昌）、褚（玉璞）所部复杂，收拾自需时日，顷已电该二人迅速办理，万一失信，届时惟有取断然处置。

△　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宴报界，报告山西建设计划，谓第一步浚河，第二步筑汽车路4000里，第三步植树造林，并谓：“本人赞成总理主张，借外债，用外人来建设，惟须不丧失主权。”

8月19日　蒋介石派往奉天接洽易帜之代表方本仁偕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离奉南返，是日抵沪，邢氏在沪答复记者询问时称：“东三省于事实上、精神上早已服从中央，表示一致，所差者不过悬旗之一形式问题。”

△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攻占湖南桂东县城。

8月20日　全国禁烟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委员李烈钧、何应钦、薛笃弼、钮永建、王正廷、钟可托、李登辉、陈绍宽、张之江九人在国府大礼堂宣誓就职。主席张之江。谭延闿代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致训词，张之江致答词。

△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就北平卫戍总司令部解散工会事发表宣言表示抗议，略谓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均受命中央，已组织之民众均系三民主义信仰者，以共党相诬，迹近军阀。“无论何人，概无解散本会所属之民众团体之权”。

△　白崇禧在北平召集军事会议，磋商解决直鲁残部问题，刘镇华、廖磊、叶琪、朱绶光列席。决定敦促奉方于短期之内改编，倘不得已时，惟有采取断然措置，并复电张学良准备力量，协同会剿。

△　刘湘电蒋介石请明令罢去第六路总指挥职，并愿将第二十一军全体官兵裁遣，在未奉中央明令以前，先实行兵工筑路。

△　广东省财政厅宣布，政府日间收回十三年（1924）毫币，约22日开始改铸新币，25日可出新币300万元，政府将增发盖印纸币260万，以为收兑十三年毫币之用。

△　比利时驻华代办计霞墨抵南京。当晚，外交部长王正廷设席欢宴计霞墨。

△　驻东三省各日领在沈阳总领事馆开会讨论对奉问题，议决：积极保护满蒙利权；力劝张学良采取“独立主义”，阻止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增加满蒙军警，防止“赤化”；设立满蒙中央银行，维持东省金融。

8月21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十七次会议，蔡元培请辞大学院院长及代理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议决慰留。冯玉祥、李烈钧、何应钦、孔祥熙、蒋作宾等提出筹措首都建设经费案审查报告，拟具建设标准四项，其前三项标准为：拟具整个的建都计划，从节省俭朴处核实规划；经费由国库支出。决议交建设委员会照办。

△　蒋介石下令武力解决盘据冀东之直鲁军残部。是日命令第二军团第三十七军及独立第三师务于9月8日以前占领宁河、丰台，并向

唐山进攻，至滦河西岸待命；右翼军徐永昌部第三军、第十四军务于9月7日以前占领芦台、杨家泊之线，由铁路以南进攻唐山、开平之侧背，并向乐亭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左翼军李品仙部第三十军、独立第八师务于9月8日以前占领丰润、大鹿河之线，并以主力进攻唐山、开平之右侧，至滦河西岸待命。

△　张学良电北平当局报告褚玉璞到奉，经会同白崇禧代表何千里商定，直鲁军余部分别遣散，克日实行。大致办法：军官每员给予遣散费50元，士兵每员10元，计滦河以西遣散者约1.8万左右，余部开到滦河以东，陆续裁编，留至三旅为止。

△　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　古巴外交部照会中国驻古巴公使馆，赞同中国政府于7月17日照会所提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主张，并告古巴总统昭度将军已派定河些哥米斯柯理格为驻华代办，将于最短期内特派全权公使常驻南京。

△　平汉铁路局协济第二集团军军饷月50万元，分三期汇，是日汇16万元。

8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第一五一次全会，议决：一、照准李石曾辞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职，任命张继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任商震、刘镇华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冯玉祥辞北平政治分会委员职，议决慰留；二、通过《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三、通过《县组织法》；四、通过福建省政府委员名单。

△　白崇禧电南京总司令部报告直鲁主力得某国暗助，与安福余孽勾结，向丰台、宁河增兵，拟由芦台、丰台沿平奉铁路乘虚袭击天津，已电前方徐总指挥永昌、李总指挥品仙、范军长熙绩、傅警备司令作义、刘总指挥镇华，转饬前线，严加戒备，并遵总部命令，限各军于26日前完成攻击准备，布置待令，向芦台、宁河、丰润之敌进

攻。

△　东三省保安会讨论呼伦贝尔事件，决令万福麟主持军事，并派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议王锡章前往呼伦调查。

△　天津反日大会正式开会成立。

△　张群奉蒋介石命自沪到宁谒冯玉祥，商中央政务及鲁省军事。当晚返沪向蒋报告。次日，张群语人，蒋对时局极抱乐观，一切议案均可实行。

△　济案代表团在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招待新闻界，报告济南惨案经过，军民死伤一万三四千人，损失在4500万元以上。

△　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秘书周圣工、组织部主任干事李楚藩、省党校教导员米世珍均系中共党员，是日在长沙被捕。24日，鲁涤平、何键亲自会讯。31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令各县、市党务指导委员会，限一周内揭发周等三人共党活动，“倘或故意隐匿，一经查觉，必以最严之纪律制裁”。

△　杭州省防军司令部军械库爆炸，焚烧两小时，毁子弹10余万。

△　天津美兵600名乘“亨得森号”返美，仍有900名驻津。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一次会议，蒋介石电称因病请准假两星期案，决议：病愈仍盼速回京，不必以两星期为限；戴季陶提议：五中全会各提案应由常会在大会闭幕后，派定专门负责人员，审查编制，在三个月内完成案，决议：照办；陈果夫请辞去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兼职案，决议：慰留。

8月23日　农矿部公布《特准探采煤油矿暂行条例》，凡10条。

△　国民政府派刘书蕃为中华民国邮政总办。

△　外交部长王正廷招待各国记者报告最近外交，其要点为：一、中葡订约谈判下月开始；二、中西、中意正在接洽修约；三、中法、中意宁案不日即解决；四、罗马天主教皇对中国统一希望甚殷，并望得到国际平等地位，外交部已复函致谢；五、我国拟即加入废战公约。

△　吴尚、范石生奉鲁涤平、何键急电，指挥所部分三路进攻桂东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激战三昼夜，朱、毛率部向宁冈退却。26日，吴尚陷桂东。

△　美远东海军总司令比尔斯托由重庆抵长沙，考察长江沿岸情形。24日，鲁涤平设宴欢迎。

8月24日　国民政府任缪培南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师师长，朱晖日为副师长；王均为陆军第七师师长；金汉鼎为陆军第十二师师长；夏斗寅为陆军第十三师师长。

△　国民政府以陇海铁路督办王正廷另有任用，令免本职，派刘骥为陇海铁路督办。

△　凌晨4时，冯玉祥离京回豫。临行前，蒋介石于23日自沪派张群晤冯，商洽一切。25日，冯抵开封。

△　张学良代表杨毓珣抵广州，当晚第八路总部设宴款杨。次日，杨回拜八路总部，语人谓："本人代表汉卿来粤目的，纯为晋谒军政诸公，面陈东三省真相及环境现状。现在汉卿绝对服从三民主义，与蒋总司令根本合作，预料易帜之举，当可日间实现。"又谓本人俟李（济深）主席回粤晤会后，方北上复命，连日并顺便考察北伐策源地之新政，以便回奉后，对于新建设得资借鉴。

△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举行拥护国民政府弃约运动大会，各团体

代表200余人参加，议决：通电全国一致贯彻弃约主张及对日经济绝交，请省、市党部组织弃约运动会。

△　长沙商民以洋货与奢侈品税率过高，是日一二千人游行示威，反对“厘金新率”。游行队伍至省政府，由总商会会长左学谦、王聘莘二人向鲁涤平递交请愿书。同日湖南省政府委员会开会，认定商民此举“显系共党暗中操纵”，决定函告长沙警备司令部，并令长沙市公安局严加制止。

△　外交部照会驻华荷使欧登科，抗议荷属南洋群岛殖民地禁止华侨爱国运动。

△　日军第三师团通讯处、第六联队第一大队、步兵第五旅团司令部人员、工兵第三大队第三小队，由青岛开抵济南。

8月25日　国民政府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咨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之《关于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案》，其中规定凡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亦得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是日国民政府训令各特别市政府、各省政府并转饬各属一体遵照。

△　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刑事法令刑等计算标准条例》，凡七条，自9月1日施行。

△　中苏《（中）东洮（昂）跨线协定》于哈尔滨签字。协定规定：洮昂、东铁须互相尊重权利与利益；对于跨线地点发生灾害时，两路共同负责；东铁、洮昂两路须常相保持协调，不得有侵害对方利益之行动，一切纠纷须以极和平之方法解决。东铁获得安（达）拜（泉）线之修筑权，为洮昂跨线之交换条件。至此，三年来东、洮跨线之纠葛遂获解决。

△　吉（林）敦（化）铁路竣工，并举行通车典礼。该路由日满铁会社垫款承修，二年工竣。

8月26日　国民政府电阎锡山速赴北平，协助白崇禧肃清直鲁军残敌。

△　张学良于沈阳召集东三省文武官吏会议，讨论对蒙之办法，议决：一、移索伦、鄂鲁特各旗游牧蒙民于黑省境内，实行坚壁清野；二、固守海拉尔及满洲里；三、将吉林军富双英两个旅拨归万福麟编练骑兵；四、请班禅喇嘛宣抚蒙众。30日闭幕。

8月27日　国民政府任杨树庄、陈乃元、徐桴、程时煃、许显时、林知渊、陈培锟、陈楚楠、林寄南为福建省政府委员，指定杨树庄为主席，陈乃元、徐桴、程时煃、许显时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白崇禧电告张学良，收编直鲁军军事再展期一周，逾期以武力解决。30日，张复电白，谓褚部于世铭、袁振青各军听候改编，唯张宗昌强硬不驯，听候中央解决。

△　刘湘电国民政府，呈报续裁兵一万余，裁兵全部为三师，所有第六路总指挥名义及附属机关分别裁撤。

△　张学良代表邢士廉在沪谒蒋介石，当晚向新闻界报告东三省决服从国民政府，惟待外交有办法，即实行易帜。

△　何键电吴尚集中茶、酃，范石生集中郴、资待命。30日，何启程赴衡阳“督剿”红军，王东原、陶广两师随行。行前，何键发出通电，谬称湖南衡、永、柳、桂一带共党暴动，“若不斩尽杀绝，何以策全省之安全”。

△　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自东蒙科尔沁旗右前旗葛根庙抵奉天。30日，张学良招宴班禅，讨论应付蒙乱方策，班禅自愿任专使，

奔走和平。9月10日，班禅赴通辽，转内蒙各地宣抚。

△　驻华美代办照会外交部，告以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洲、爱尔兰、印度、意大利、日本、波兰、捷克等15国于是日在巴黎签订《非战公约》，该条约规定各国应排斥以战争为国家政策之工具，决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美国政府特将条约全文抄送查照，并请中国政府加入。

△　自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鼓倡改组国民党以来，截至是日止，共收到各地赞同改组主张的信达3252封。9月2日，陈在该刊第十八期发表《党的改组方法和时期》一文，表示："若要的的确确的改组，最少还在一年以后。"

8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预算委员会组织条例》。次日特任谭延闿、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蔡元培、于右任、宋子文、王伯群、蒋作宾为预算委员会委员。

△　胡汉民偕许崇智由欧洲回国，是日抵香港。陈济棠、陈铭枢、王宠惠等抵港迎接。29日，胡汉民在香港对记者就时局问题发表讲话，谓为建设新中国，彻底实施五权宪法乃惟一之要务，而同志全体团结尤为必要，若徒然攻击左派，直等于实行共产党之策略，为真正国民党员所不取。又政治分会产生于军事时代，所谓过渡办法是也。现今已入训政时代，自然无存续之必要。

△　冯玉祥在开封下令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方面军名义一律取消；原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三十各军编制一律取消；原总部或各方面军直属之特种独立师及第三、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三十各独立师及骑兵第一师编制一律取消。以上各部共缩编成12个师，任韩复榘、梁冠英、吉鸿昌、冯治安、石友三、童玉振、程希贤、张维玺、宋哲元、刘汝明、佟麟

阁、孙连仲为第一至第十二师师长。

△　阎锡山委商震兼河北省剿匪司令，升丰玉玺为第四军团总指挥，王靖国为第二军军长，李服膺为第七军军长。

△　白崇禧据派驻奉代表何千里27日电告张学良处置直鲁军之经过及办法，望我军速进，是日电国民政府，谓左翼军各部已占领攻击准备位置，俟范（熙绩）、徐（永昌）两军到达，即行进逼，并拟日内亲赴天津就近指挥。

△　外交部就废除《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并附约事，第二次照会日本政府，重申该项条约系30年前所订，不适于现今两国政治、经济情况，须予废除，双方根据平等、相互尊重主权原则另订新约。按：1927年12月，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提出废约，另订新约，日方未予理睬。

△　工商部长孔祥熙提议保护山东孔林及各省孔庙，是日，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决由国府通电各省切实保护。

△　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沈定一在浙江萧山遇刺身死。

△　国货银行筹备委员宋渊源电冯玉祥，告以国货银行拟于一个月内招足股份金额1000万元，即照章开业，望转达豫、鲁、陕、甘等省各机关，从速劝募。31日冯复电宋，谓国货银行关系实业前途甚巨，豫、陕、甘各省虽地瘠民贫，亦当竭力劝募，以尽国民之职。

△　何键自长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泽东等部红军。湘省清乡督办处获悉，江西红军朱德、毛泽东部与湘南宁远、蓝山、新田、祁阳一带红军周文、陈光保等部联合，图夺取衡阳。鲁涤平特商何键，按李宗仁电令，由何亲赴湘南，指挥湘军协同粤、赣军队大举“会剿”。何遂令所部第三十五军教导师王东原部由长沙开赴衡阳，第三

师陶广部集中东安、祁阳之间，一面电令第八军吴尚将所部集中湘东茶陵、酃县，向桂东、赣边搜索，并电请驻粤滇军范石生部集中郴州、汝城，向桂东、资兴进逼，赣军刘士毅师、杨如轩师向宁冈、上犹、湘边“兜剿”。部署已定，何键于是日下午离长沙赴湘南，30日抵衡阳。

△　济南日军正式换防。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策一率司令部全体人员自青岛到济南。当夜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向安满交代防务，安委第五旅团长蜂须贺任济南警备司令。次日福田离济南赴青岛，第六师团亦撤离济南。

8月2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二次会议议决多项议案，其要案为：一、外交委员会暂缓改组；二、改西藏、青海及察、绥、热各特区为省；三、河北省府迁北平；四、推李烈钧、孔祥熙、陈嘉庚等六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并暂代常委；五、各特别法庭与“一一二二”法庭同时取消；六、梁漱溟拟具《试办乡治讲习所大纲计划》及《建议书》，交内政部审查。

△　张学良下令将奉方所捕之国民党员全部释放，以示真心服从国民政府。

△　凌晨1时，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以收编之直鲁军扰害闾阎，暗通张宗昌，密派第五军军长李生达部至韩家墅，将收编的第一、二、三、四师曾琦、任增祺、朱堃、雷长禄各部包围，当即遭到抵抗，双方激战多时，收编各师冲出包围溃逃者约五六千人，死伤2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余部1.4万人给资遣散。

△　樊钟秀逃抵汉口。盘踞豫西伏牛山区的樊钟秀建国豫军经冯玉祥派兵追剿，向鄂境枣阳、随州溃逃。

△　日本政府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

8月30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三次会议议决多项议案，其要案为：一、二届五中全会决议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设立次序由常务会决定案，俟组织法草案拟就请核时再议；二、工商部长孔祥熙拟具兴办基本工商业，实行民生主义，并拟定筹款办法案，交政治会议核办；三、所有各种特别法庭均应取消，其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取消办法，俟司法院成立时再议。至“一一二二”惨案特种庭，应即结束，所办案件移交有管辖权之法庭，按法审办，即交国民政府查照办理。

△　白崇禧召集军事会议，就部队进军津东肃清直鲁残部的给养问题研究办法，并决定北平事务在阎锡山未到前由朱绶光、刘镇华负责。

△　王正廷接见各报记者，谓济案悬而未决，系因日方缺乏平等协商的诚意，我国拟将济案提交第九届国际联盟大会公断。

8月31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通过多项议案，其要项为：一、关于蒙民生计、参政权及蒙旗组织案，交内政部、蒙藏委员会、法制局详细计划；二、冯玉祥建议本党对于民生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应有最低限度之紧急设施案，分交主管机关切实筹划进行；三、王法勤等提议彻底肃清贪官污吏案，由政府明令制定法规，严革弊端，并交内政、司法部商定检举及发觉贪污详切办法；四、修正通过蒋介石提送《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五、取消各种特别法庭，结束“一一二二”惨案特种法庭；六、河北省政府准移北平；七、由财政部尽先筹拨20万，交白崇禧制备前线军棉衣。

△　白崇禧召集朱绶光、何成濬、杨杰、刘镇华开会，磋商东征部署，决定方振武、李品仙部分别担任左翼之左右两路，范熙绩、徐永昌部分别担任右翼之左右两路，中路由白主力及第二、三集团各师、刘镇华部为预备队，总兵力近10万人。

△　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致电上海李宗仁报告将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各军改编为第二、第三、第四三个师，每师辖三旅，每师有步枪1.47万余支。

△　芜湖各界反对菜籽出口发生流血事件。是日下午，芜湖各机关、各民众团体代表200余人集会，要求厉行对日经济绝交，制止奸商向日本售卖菜籽（日方购定之菜籽二万数千包及奸商陶惜芬售卖日方之菜籽1800余包），决议电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全国反日会解决，旋结队游行，向安徽交涉署请愿。队伍行抵交署大门，与卫兵发生冲突，群众被殴伤10余人，重伤三人。

△　河北省政府电国民政府，顺直水利委员会自为建设委员会接收后，裁去技术人员，所有治本、治标计划悉被搁置，乞俯念河北省河患危急，从速划分权限，决定办法。9月7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议决划归河北省办理。

是月　　津浦铁路自北伐战争开始迄今，据津浦铁路局统计，路轨、桥沟涵洞、车辆等物质及材料上所受军事损失，总计金额1800余万元。

9　月

9月1日　　国民政府派李烈钧、宋渊源、钟荣光、陈嘉庚、陈季良、孔祥熙为侨务委员会委员，指定周启刚、丘莘昀为常务委员；侨务委员会常委林森、萧佛成、邓泽如未到任以前，由李烈钧、宋渊源、孔祥熙暂行代理。

△　国民政府训令“一一二二”惨案特别法庭、各省政府及司法、财政两部，经本会第一六三次常务会议讨论，所有各种特别法庭均应取消，其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取消办法，俟司法院成立再行交议，至“一一二二”惨案特别法庭应即结束，所办案件移送有管辖权之法庭

按法审办，即交国民政府查照办理。

△　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分访驻华英、美、法、日、意、荷各公使，说明进兵京奉线意旨，并电张学良即将直鲁军撤退，否则即行总攻击。

△　胶东方永昌部刘珍年师于掖县反正，悬青天白日旗，旋率部赴平度、黄县、蓬莱，3日抵烟台。烟台守军司令钟震国宣布下野，副司令李锡相悬青天白日旗。方率残部300余人自龙口逃秦皇岛。张宗昌在胶东之地盘尽失，原拟雇日轮“松浦丸”自秦皇岛运兵烟台计划，遂告中止。

△　张学良代表邢士廉偕方本仁抵南京。当晚，邢对记者谈话，谓东三省易帜，本可早日实现，嗣因外交关系，只得稍缓，如将来外交办理顺利，自可不成问题。

△　湘军独立第十九师师长陈渠珍与川军师长穆瀛洲签订《川湘联防清共剿匪条例》，凡11条，在湖南里耶（保靖县属）设联防办公处，陈、穆分任正、副处长，自是日起实行。

△　鲁涤平改编前第六军彭子国教导师，取消教导师名义，改名为清乡团，第一团归何键指挥，第二团归鲁涤平指挥，彭调充督署顾问，其余官兵遣散。

△　河北省府主席商震、委员徐永昌等以延庆县长马友麟因难于支应驻军，忧惧自杀，是日联衔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委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暨各总指挥，恳请早日下令撤退驻省各军。

△　芜湖罢市、罢工，声援上月31日为反对菜籽出口受伤群众。2日，芜湖国民党党、政、军出面调处，将凶手送法院法办，奸商陶惜芬由反日会处置，拨1000元予受伤者治伤。3日，芜市复工开市。

△　广东全省商会代表大会于广州开幕，讨论商会改制问题，10日闭幕。大会选出全省商联会执委49人，监委23人，通过请免柴税及取消食盐专卖等案，并发表宣言，希望商人与政府合作。

△　北平卫戍司令部据文物维持会关于阻止美探险队队长安竹斯运走内蒙古古物之请求，是日电令张家口各地予以扣留。按：安竹斯佯称去内蒙狩猎，盗掘古物，盗走驼龙骨64骨、驼龙蛋数十个，价值甚高。

9月2日　　蒋介石在上海对记者谈时局问题，略称：时局绝无任何不安之点，外间谣传，系反动派挑拨离间之惯技，避免党内纠纷，惟有少发议论，多做实事，小册子愈多，小团体亦愈多，促使青年思想不一，则党国危机愈甚；去年粤变之责任，陈公博应负责引咎；吴先生（敬恒）等为本党之瑰宝，必须绝对尊崇之，万不可蔑视老成，肆意诽谤。蒋令记者公布本日谈话，并出示其《最近对党国感想》一文，嘱为一并发表。该文对各界批评他“太软弱”、“太不彻底”、“外事不公”、“功罪是非不明”等等，进行了辩解。

△　白崇禧出发东征，由北平抵天津，并于津警备司令部对各记者谈话，谓因张（宗昌）、褚（玉璞）缺乏诚意，不得不以武力解决，第一步进至滦河一带，奉方亦将出兵夹击。

△　张宗昌派代表郑大伟见白崇禧，谓直鲁军即从芦台、宁河撤退，丰润稍缓让防，被白拒绝。3日，白崇禧部向宁河进攻，张宗昌又派李徵五见白，表示直鲁军即退滦河以东，要求稍缓进逼。

△　冯玉祥委任鹿钟麟为豫鲁剿匪总司令兼河南剿匪总指挥，孙良诚为山东剿匪总指挥，刘郁芬为陕甘剿匪总司令，孙连仲为甘肃剿匪总指挥，宋哲元为陕西剿匪总指挥。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请准天津特别市长南桂馨辞职，遗缺以崔廷献继任。同日电国民政府军委会，以第三集团军北伐各役阵亡、

伤残官兵共两万余人，请拨给抚恤金200万元。

△　阎锡山分别电令察绥剿匪司令傅存怀、平绥路局长班廷琪、绥远都统李培基、察区都统张会诏，严禁扣车行为，谓嗣后如再发生前项情事，自高级官员以下，统准就地枪决，倘循情故纵，一并治罪。

△　国民政府军委会通令各军驻京联合办事处，重申独立师以下不准设立驻京办事处，所有新编各师，只准派员驻京，不得悬挂办事处牌额。

△　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千余人，分乘“长城丸”、“大开丸”离青岛返国。同日，驻天津日军第十八联队赴青岛接防。

△　全国学生总会第十届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到晋、赣、皖、沪、平、浙、鲁、冀、奉、吉、豫等省市代表20余人，大会共开三天，通过该会总章，议决呈请中央严禁无政府党、西山会议派、共产党、第三党、国家主义派暗中活动煽惑青年案；驳斥戴季陶青年运动理论案；敦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国大计案；统一各级学生组织案；确定今后学生运动方针案等项提案。4日闭幕，发表闭幕宣言。

9月3日　　胡汉民由香港抵沪，蒋介石派张群前往码头迎接。当晚，胡汉民与蒋介石就改组政府事交换意见。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请胡汉民即日入京。

△　第四集团军通电声讨张宗昌，略谓张宗昌盘据关内以来，荼毒人民，不遗余力，近复勾结安福余孽，许以政权，交换巨款，冀图死灰复燃。“我白总指挥秉国民政府肃清国内军阀之本旨，奉命东征，拯民水火，业于冬（2）日率部抵津，克期东指，灭此朝食，务望各界一致声讨”。

△　白崇禧复电张学良，展期势不可能，7日前若不撤退，即按原计划进军。同日，张学良派何丰林赴滦河，向张、褚作最后警告，倘再执迷，即系自入死途。

△　张学良在奉天开军事会议，讨论改编直鲁军问题，杨宇霆、万福麟、张作相、汲金纯、胡毓坤等出席，议决：一、令张宗昌下野；二、奉方发给直鲁军遣散费；三、以四军集中山海关一带，先请白崇禧改编开平直鲁军，若遇反抗，则实行武力缴械。次日派臧式毅就治安问题赴村冈关东军司令官处，请求日方谅解。

△　据外人调查统计：近四年直、鲁两省因军事匪乱，壮丁减少180余万，将饿死者在50万人以上，财政损失两亿以上，牛、马、驴、骡损失20余万头。

△　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通电全国，宣布该军由七师、一旅、两司令缩编为三师，委唐式遵为第一师师长，蓝文彬为副师长；王缵绪为第二师师长，潘文华为副师长；刘湘暂兼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为副师长，并已于本月1日宣誓就职。

△　河南省政府颁布《农业畜产奖励条例》，规定养畜者分别授予奖章、奖金及免收子女学费。

△　建国豫军樊钟秀部攻占湖北应山县。上月31日，樊钟秀部突袭随县，经驻军击退，旋向东往攻应山，是日与驻应山第十七军第二师第六团杨营激战数小时，击败杨营，占领县城。4日，樊以杨营援军赶至，旋即向东北方肖山店等处退走。

9月4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起草《文官甄别及任用暂行条例》；议决关于保护东、西陵事宜由内政部负责办理。

△　国民政府公布《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

△　五院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开会，蒋介石、孙科、谭延闿、戴季

陶、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李济深、吴敬恒、褚民谊、李宗仁出席，王世杰列席。决定王宠惠负责起草司法，王世杰负责起草考试、监察。

△　全国预算委员会开会，确定全国军队不得超过60师，由财政部速筹裁兵费。宋子文提出9、10、11月预算额1500万元，除各省二五库券300万元，尚少1200万元，若各省将国税上缴中央则可相抵。谭延闿主张，俟冯玉祥、阎锡山到京后再从长计议。

△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李烈钧、周启刚、钟荣光等九人在南京宣誓就职，侨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　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于天津下达命令，其要旨为：一、右翼军徐永昌所部务于9月7日以前占领芦台、杨家泊之线后，以主力与中央军联系，由铁道以南进攻唐山、开平之侧背，破坏敌后方铁道；二、中央军范熙绩所部务于9月7日以前占领宁河、丰台之线后，与右翼军联系，进攻胥各庄与唐山正面之敌；三、左翼军李品仙所部务于9月8日前占领丰润至大鹿河之线后，以一部进击榛子镇，向沙河驿、迁安方面警戒，以主力进攻唐山、开平敌之右侧背，上述各路于奏功后，均至滦河西岸待命；四、郑大章骑兵军、孙长胜骑兵警戒左侧方，准备袭击向迁安、冷口逃窜热河之敌。

△　白崇禧在天津拜会日、英、法、美领事，重申东征在即，希望驻津外兵勿阻碍东征军前进，并表示军队所到之地，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各领事表示谅解。

△　宋哲元攻克陕西省凤翔县，党玉琨及部下军官200余人、兵千余人被俘。嗣后，党玉琨在西安枪决。按：党为郭坚旧部，曾响应李云龙反冯玉祥，李失败后，党退据凤翔。

△　驻奉天日总领林久治郎奉召回国，商东三省问题。

9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三次会议议决：一、准热、察、绥、西康、青海改省，每省设委员五至七人。旧直隶口北道10县划归察哈尔，察哈尔原划绥远之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仍归还绥远。热河省会设于承德，察哈尔省会设于万全，绥远省会设于归绥，西康省会设于康定，青海省会暂设甘肃西宁；二、崔廷献继任天津特别市长；三、任命卢兴邦、丁超五、方声涛、郑宝菁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四、中国加入《非战公约》。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第一六五次会议议决，以上各案均交国民政府办理。

△　白崇禧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报告宣抚胶东及刘珍年反正经过，请示胶东问题善后办法。略谓："方逆（永昌）虽去，秩序未定，绥靖地方，整顿部队，尤为刻不容缓之举，已电刘军长（珍年）切实办理，此后胶东应如何善后，请冯总司令、孙总指挥（良诚）策划为祷。"

△　张学良电南京邢士廉称，"直鲁军收束办法早经商定，张、褚一再迁延，近又派代表赴平，请求脱离东省关系，改隶中央管辖。健生（白崇禧）、雪竹（何成濬）均予拒绝，一面决定用武力解决。此间昨派茂如（何丰林）前往为最后之劝谕，并盼前方密为戒备，杜其来窜"，并告胡若愚明日回津，即由津南行。

△　褚玉璞应召抵奉见张学良，表示愿接受改编，并代张宗昌缓颊。张学良力劝其下野。

△　北塘、汉沽、芦台、宁河一带直鲁残军全部溃退。是日两地绅商代表赴塘沽，请东征军进驻。李生达部第十五师进入北塘、汉沽接防，悬青天白日旗。6日，东征军进入宁河，7日进入芦台。

△　白崇禧在天津总商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称津东残敌不足为患，所患者"共祸"、"赤祸"侵入，甚于洪水猛兽，望河北省父老注意，更望党的同志努力"清共"。

9月6日　　晚，蒋介石在宋子文寓所宴请留沪各中央委员，到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陈铭枢等人，讨论五院人选及中政会改组等问题。

△　国民党中常会开第一六五次会议，谭延闿主席，组织部提议规定各级党部监察委员人数案，议决如拟决定；宣传部呈请在北平设置党报案，议决交国民政府查酌办理；政治会议第一五三次会议议决之加入《非战公约》等案，均议决交国民政府办理。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派黄慕松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　张宗昌电白崇禧表示不愿受奉改编，“尊处如有意收纳，敝部本人极端服从”。

△　日驻沪总领事矢田在东京接受田中对华新方针，是日夜自东京出发返任。

△　驻津美领戴尔恩答拜白崇禧，希望中国百政革新，中美邦交益臻良好。7日，日驻津司令官新井访白崇禧，否认日军暗助张宗昌。

9月7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王宠惠请准免司法部长本兼各职，议决慰留；加派财政、交通两部长为禁烟委员会当然委员，贺国光、李铎、葛敬恩为建设委员会委员；任卢兴邦、方声涛、郑宝菁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天津特别市市长南桂馨照准辞职，遗缺以崔廷献继之；由内政部、蒙藏委员会拟设蒙藏学校；任陆军第五师师长熊式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第三师师长钱大钧兼任江南剿匪司令，第十师师长方鼎英兼任江北剿匪司令；指定孔祥熙、宋子文等六委员审查开办基本工商业，实现民生主义案。

△　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由宁抵沪，促胡汉民到南京主持党政。

△　蒋介石偕宋美龄从上海返奉化，8日抵宁波转赴溪口。11日，

蒋在奉化大摆结婚筵席，招待戚族。

△　国民政府以侨务委员会业经成立，令外务部侨务局应即裁撤。

△　张宗昌派参谋长李藻麟到津会晤白崇禧，接洽直鲁军改编事宜。白限张宗昌七日内退出滦东，否则三路军进攻。是日，李离津复命。

△　太原各界举行发起废约运动大会，到89团体，约四万余人。通过电请国民政府自动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肃清关内外残余军阀，通电全国对日经济绝交，呈请党部、省府一致提倡国货四项议案。会后游行，并沿街讲演。

△　日派遣驻朝军第四十旅团长仙波安艺率本部自沈阳撤回平壤原防。该旅团驻长春之第七十七联队已于本月4日先期返回平壤。
按：该旅团系皇姑屯事件前后借口保护侨民，奉命由平壤移驻沈阳、长春等满铁各埠。

9月8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王伯群为禁烟委员会委员；准天津特别市市长南桂馨辞职，遗缺以崔廷献继任。

△　东征军左路李品仙部叶琪、廖磊、魏益三等军进攻丰润城，直鲁军张敬尧、毛永恩等败退，李品仙部即分西、北、南三门入城，克复丰润。

△　白崇禧电告宋子文，已督率前敌各军开始进攻直鲁军，请派员随军出发，接收各地中央税收机关。

△　宋子文在上海宴请商界负责人，劝募善后公债。9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分别开会，讨论筹募150万元善后公债办法。

△　第三集团军总部召集军事会议，议决缩编为12个师，并组织第三集团军整理委员会，阎锡山自兼委员长，另任商震、徐永昌、杨爱源、丰玉玺、谢廉为委员，同时发表第二期裁兵宣言，略谓："本军前在北平，第一期已将每团裁减两连，计裁减三万余人，嗣定缩军为师分期裁兵办法，第二期裁并骑兵六师二旅。现又着手第三期裁并步兵为12师，其军费人数，均照总司令部之规定，计裁去军团部五，军部15，师部19，被裁士兵人数7.5万余人。"

△　北平地方法院判决李大钊案内俄人奥纽夫等15人无罪释放。

△　日本民党众议院议员大内畅之访华抵南京，晤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谈中日问题，告以日政府已派定议院方面政友会、民政党议员10人来华调查，俾早日解决中日一切外交问题。

9月9日　　东征军克复唐山。拂晓，东征军第十二军叶琪部击溃韩城镇之直鲁残部，正午追至马驹桥、曹江口之线。河头、胥各庄之敌，因东征军左翼之先头部队已进攻牛郎山，遂向乐亭撤退。同时，东征军第三十六军击溃老庄子镇之敌，正午追至小马各庄、韩庄子之线，敌向龙王庙、开平方向逃走。唐山之敌因无险可守，仍向开平、古冶撤退。下午4时，第十二军占领唐山。

△　晚8时，白崇禧率预备队由天津进抵芦台。

△　东征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进占喜峰口。

△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偕山东省政府代理主席石敬亭自开封赴南京。11日，孙、石二人分别对记者谈此行任务。石谓向中央报告鲁省政务，磋商解决张宗昌残部办法，及促孙良诚速就鲁省府主席。孙表示要与蒋介石讨论山东剿匪问题，就省府主席后，仍请石敬亭主持政务。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以改组在即，停止办公。是日钱大钧所部调

离苏州、常州、无锡、江阴、常熟、太仓、嘉定、南翔、松江、青浦，由第五师熊式辉部接防。至14日，熊、钱调防完竣。10日，国民政府任命熊式辉接替钱大钧任淞沪警备司令。

△　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告外交部，日首相田中已授驻沪总领事矢田以交涉济案全权，日方盼我国不提赔款、惩凶、道歉，只要求不再发生此类不幸之保障。

△　张学良以交通部长王伯群对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组织邮务处表示怀疑，是日电邢士廉，谓此举“仅有整顿扩充之计，绝无破坏统一之心”，请先行婉达此意。

9月10日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张宗昌。略谓张逆宗昌啸集残部，冀燃死灰，似此怙恶不悛，断难姑息贻患，着交军事委员会、内政部通行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

△　晚，白崇禧抵唐山，旋召集三军负责人李品仙、徐永昌、范熙绩开会，决定乘胜继续进军，派第三集团军关福安、段树华师，李品仙部陈耀汉师，及韦云淞、魏益三、叶琪等部向古冶进攻。

△　东征军第三十六军第一、二两师于9日晚各派一部向开平攻击前进，由唐山退来之直鲁军，人数甚众，经三十六军第一、二两师合力猛攻，将敌击退。是日上午8时完全占领开平。

△　张学良致电忠告张宗昌，略谓：“有承示各节，弟现时有所考虑，东省有貔貅之士达二十万，未尝不可与南军作一决战，但鉴于外患险恶，济案及皇姑屯之变，深为痛心，且因大势所趋，全国人民服膺三民主义，我兄弟倘使举措不检，不特为亡国之罪人，亦且为人民所唾弃，人格所关，在此一着，惟兄图之。”

△　张学良在奉天总部向奉天各界报告收编直鲁军经过。略谓：本人为顾全大局，曾与张宗昌之代表褚玉璞在奉天商定：第一期将七

万直鲁军遣散二万，余五万人限于四个月内遣散，存两万人，并发给遣散费现洋25万元，但张、褚存心欺诈，拒不改编，迫不得已，乃决心彻底铲除，为国除害。

△　张学良代表罗文幹抵天津，要求东征军攻至山海关即停止前进。

△　张学良以国民政府筹组国货银行，是日电邢士廉，表示与杨宇霆各认股款，并嘱勿列入发起人衔名，以免惹注意。

△　冯玉祥离开封，翌晨抵洛阳，入陕巡视。

△　呼海路支线绥海段竣工。

△　驻华英、法、日三公使抗议扣留盐税。9日，英、法、日三国代理公使并汇丰、汇理、正金三银行代表，在日使馆讨论盐税问题，是日向国民政府发出严重抗议之警告，谓各地军政官吏扣留盐税，致使担保之债款发生动摇，此种违约举动，若不能制止，三国将采取强制措置。

△　日船“登安丸”自旅顺装运私盐1260包（共120吨），在湖北黄石港起卸，被缉私队截获，江汉关盐督甘介侯即令扣留，并予没收，是日在汉口将船货一并充公。

9月11日　　第三集团军实行缩军为师，是日阎锡山特任李培基（李士元暂代）、孙楚、徐永昌、杨效欧、李生达、王靖国、李服膺、赵承绶、关福安、张会诏、张荫梧、傅作义分别为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一师至第十二师师长，并电商震、傅存怀、徐永昌、谢廉、孙楚、张荫梧、丰玉玺、杨效欧等，着将各军团总副指挥名义，限电到后一律取消。

△　国民政府以前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民国十四年在滦州举义兴师，至以身殉”，是日明令褒恤，并发给治丧费5000元。

△　白崇禧在开平召集徐永昌、李品仙、叶琪、范熙绩开会，决分三路进攻滦州：中路由洼里进，右翼由张格庄进，左翼由榛子镇进。当晚，白崇禧下令限三日内会师滦州。

△　日本南满铁道会社社长山本由神户乘轮回任，临行前于10日在私宅开“满铁”与外务省联席会议，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及驻奉总领、驻平参事官等均出席，“满铁”方面到山本、松冈正副社长。林久治郎总领事报告与张学良交涉经过，继由山本、松冈二人说明“满铁”与奉方交涉事项，计有：一、确立吉会线借款契约，与吉长线联络经营等问题；二、吉会线及今后拟定敷设之铁路问题；三、关于东三省经济开发等诸案件（整理奉票、设立东三省银行等）。会议取得一致认识。

△　驻奉日军第二十八炮联队、海城第十九联队撤离回国。

△　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及民众团体促胡汉民入都主持党国大计，又电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称，八闽党政重心停顿，请饬闽省党指委、省府委速来闽主持党政。

△　陈公博主编之《革命评论》发表启事，以“处此局面之下无再评论可能”，宣告暂时停版。

△　台北——基隆纵贯公路举行通车典礼。

9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议决：一、本年10月1日起实行关税等差税率；二、《法院编制法》、《法官惩戒法》、《法官委员会审查规则》等交付法制局审查；三、集宁县划归绥远省；四、加入《非战公约》事，推王正廷起草电文答复美政府。

△　国民政府任卢兴邦、丁超五、方声涛、郑宝菁为福建省政府委员。

△　东征军占领滦州。同日，东征军第三十七军范熙绩部占领古

冶。直鲁残军退滦河东岸。

△　白崇禧在唐山阅兵，当日乘“北平号”铁甲车赴古冶督战。

△　东征军进驻滦河西岸，将沿岸直鲁军完全肃清，张学良不欲东征军渡河，派代表向白崇禧请求，直鲁残部仍归奉军改编。白为表示合作诚意，已允如所请。

9月13日　外交部复照驻华美代办，表示中国政府极愿与诸国一致行动，正式加入非战条约，指出：“本国政府深信各国必将依据本约之精神，使数十年来中外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侵犯中国主权之事实，如驻扎外兵于中国领土等行动，皆能于最短期间，以正式之方式一一废除，庶克确保中国之自由独立，而促进世界之永久和平。”18日，全文正式公布。

△　徐永昌率四师兵力攻占乐亭。

△　东征军各路部队集中滦州，沿滦河西岸直鲁军业已完全肃清。14日，直鲁军炸毁滦河铁桥，以阻东征军过河。

△　唐山举行军民联欢会，到20余民众团体，计六七千人，白崇禧出席并发表演说，称打倒帝国主义侵略，取消不平等条约，肃清军阀，“铲除”共产党，革命方算成功。

△　张学良以直鲁军收束办法经两次会商决定，张昌宗延不实行，近复袭击滦河奉军守兵，遽行乘机偷渡，入踞奉军防地，是日下令解除直鲁军武装，听候处置。同日，派杨宇霆赴前方督饬处理。

△　张学良电白崇禧，谓所有直鲁军善后事宜，听候国军处置，决不过问。

△　直鲁残军方永昌、王琦部在昌黎至秦皇岛一带大肆抢劫民物。奉军于学忠部第二十军第二十五师向昌黎进发，截击方、王残

部，15日将方永昌部3000人缴械，16日在秦皇岛将王琦部缴械，王被俘，解往奉天。

△　第四集团军总部为实行第二期裁兵计划，是日令湘省各军缩编为师及独立旅，其要旨为：一、着第二军、第十四军缩编为第四集团军第五师，以鲁涤平为师长；二、着第三十五军、第十七独立师、第十九独立师及李云杰师，缩编为第四集团军第六师，以何键为师长；三、着第八军及刘铦师缩编为第四集团军第一独立旅，以吴尚为旅长；四、着独立第五师缩编为第四集团军第二独立旅，以刘和鼎为旅长；五、限10月10日以前编组完竣。

△　鲁涤平为“围剿”贺龙红军，是日电贵州省府主席周西成，请仿照湘、鄂联防办法，订立《湘黔清乡联防会剿暂行条例》。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报告拟将该集团军第五方面军岳维峻部缩编为一师，以邓宝珊为师长，岳赴中央或河南省政府供职，正在电商之际，该总指挥竟不听编制，突然擅离驻马店，东开皖境，请示处理办法。

9月14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通过集宁县划入绥远省；筹拨款项赈恤阵亡官兵家属；任张治忠为北平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由农矿部会同处理逆产委员会派员先行清查安徽宝城益华铁矿公司、定远普益林垦公司之倪嗣冲股份，再行呈请核办。

△　蒋介石自宁波抵杭州。同日，蒋电令刘峙为徐海剿匪总司令，所有徐海驻军均归调遣。

△　上午，白崇禧到滦州视察，旋即回唐山，发表战况：一、我骑兵12日午占滦州，获枪千支；二、我军13日抵滦河西岸，与敌夹河对峙，我军已准备渡河；三、滦河东岸至永平有奉军，张学良来电谓派杨宇霆赴前方督战，缴直鲁军械。

△　夜，白崇禧在唐山召集军事会议，刘镇华、徐永昌、叶琪、刘春荣等出席，决定分三路渡滦河进攻昌黎，由李品仙、刘镇华、徐永昌分别担任左、右、中各路总指挥。当夜10时，白下令攻击，并于15日晨赴滦督战。

△　奉军与直鲁军战事爆发。奉军以直鲁军不服归降劝解，是日向安山（昌黎以西20里）直鲁军发动攻击。奉军前线仅胡毓坤部一个师，寡不敌众，致颇失利，向安山以东退却，直鲁军占安山。同日，张学良派杨宇霆赴榆关督师；令驻榆于学忠部加入前线，又调戢翼翘、富双英等部防守冷口、喜峰口，免张、褚残部窜入热河。

△　张宗昌通电决与奉军兵戎相见。略谓："余从故大元帅兴兵讨赤，转战各地，兹已数年，备共艰苦。张作霖没后，张学良为其左右所误，视余等为敌寇，勾连赤贼，向南请和，竟敢出卖其昔日友军之举，此实背先人之遗训，悖旧友之情谊，罪不容恕。""余兹因剪除张学良左右之奸佞，不得不还师向奉，与奉军以兵戎相见，此实余至引为痛心者也。"张学良闻电，于同日发出告直鲁军将士通电，述力谋对直鲁军和平解决之苦衷，并谓直鲁军将领若服从舆论，听候改编，余当力谋优遇诸君之方法，不问已往之事，否则惟有采用武力解决手段而已。

△　张学良电白崇禧，表示奉军可完全负责解决滦河东岸直鲁军，请勿渡河，以免误会。

△　张学良电何成濬，表示愿负责解决直鲁残敌。略谓："张宗昌于协商已定之办法，延不履行，近复当国军进逼之际，借口送眷属为辞，统军进驻滦河，敝部堵截不力，咎无可辞。……弟为大局计，为人格计，实已忍无可忍，下令前方令派得力军队，将张、褚所部俱以解除武装，静候处置。"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报告是日抵西安，拟即点验驻陕各部

队，切实改编。

△　湖北全省清乡会办陶钧自鄂返汉，对记者谈话，谓：岳维峻部张万信、田春生，在鄂北数月，遍地抽税，挨户奸淫，绑票勒赎，无恶不作，综计襄阳、樊城、谷城、光化、随县、枣阳等处民众被杀者至7000之多，房屋被烧者在百里以外。民众因不堪其虐，遂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白带会、硬肚会、清乡社、一心社、万仙会等，以为抵抗。清乡军到达后，将襄樊各县之匪驱逐出境及缴械遣散，计缴匪枪1.3万支，岳部除大部解散外，余均窜至豫境。现鄂北防务，实力充足，匪辈当不易思逞。

△　徐源泉具呈阎锡山、蒋介石，为东陵盗墓主犯孙殿英、谭温江狡辩，谓：东陵盗案与该部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及所属第五师师长谭温江无关，乃张敬尧部柴云陞所为。谭所获金银珠宝系7月2日抵马兰峪时所掳战利品，共27包大小233件，已呈送平津卫戍总司令部。

△　日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来华抵沪，对往访友人称，此次来华，并无政治目的。

9月15日　　胡汉民发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略谓：“今北伐既以完成，军阀渐以告终，本党目前所致力者，厥为负荷实施训政之一大责任。”训政大纲“其中包含二部分：一为政治会议纲领，一为国民政府组织纲领。此提案须有原则上之说明者四，有须为制度上之说明者五。”并谓：“今为总合全部之铨义言，即本大纲之根本原则，完全本于总理建国之旨。在向于宪政时期进行的程途中，所有军政、训政，皆为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党员任褓母之责。”

△　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凡58条。

△　东征军中央军范熙绩一部渡过滦河，占领故上庄以上地区，与直鲁军接战，不分胜负。

△　奉军进攻直鲁军，因日本暗助张宗昌，致受挫折。是日，张学良电请白崇禧派兵夹击直鲁军。

△　西安各界举行欢迎冯玉祥大会，到三万余人，冯在会上发表演说，称“今后敌人，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共产党，目标须认清”。并谓“国民应打破迷信，努力革命，以主义救国，以科学救国”。

△　“一一二二”惨案法庭开结束会议，议决呈请中央迅即通缉本案之被告人等，依法惩办；并发表宣言，宣布该庭工作经过，略称惨案之凶犯屡传不到，工作无从进行，最近中央结束之令倏下，致使所负使命不克完成，未了的工作，应由中央负责完成。

△　阎锡山在北平电请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审理东陵盗案军事特别法庭审判长，杨杰（一集团）、刘镇华（二集团）、谢濂（三集团）、王泽民（四集团）为审判员，冷遹、周孝鲁为法官。

△　驻江西第五路军（第三军、第三十一军）改编为第七、第十二两师，是日该两师长王钧、金汉鼎发出通电，宣布在南昌宣誓就职，按照新制次第缩编完毕，第三军、第三十一军名义即日取消。

△　驻漳州之张贞独立第四师在鼓浪屿破获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逮捕陈源隆、李家郴、陈静峰、张振声、陈仁芬五人，搜出重要文件多宗。

△　驻日公使汪荣宝拜访日外相田中，就中日条约及济案问题征询日方意见。

△　捷克驻华代办倪慈都由平抵南京，与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会长徐东藩商订中捷修好及通商条约事宜。22日夜离京北返。

△　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在资中会晤，商讨妥协条件。25日结束会议，决定统一意志，裁编军队，组织省政府。

9月16日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定于10月26至28日，在北平北海公园开会追悼黎元洪。

△　蒋介石抵沪，与胡汉民在张静江私宅晤谈。

△　张学良电白崇禧，奉军正解决张、褚残部，请国军勿进。下午白下令东征各军无命令不准渡河进攻，一面电责张学良不在滦河东岸堵截张、褚残部，听任过河，致生枝节。

△　奉天教职员联合会电张学良，望“迅即旗扬青天白日，政遵三民五权，实行赞助统一，以表爱国邦乡之至意”。

△　冯玉祥以甘肃今年荒旱，灾情严重，月底报旱灾者，已有皋兰等50余县，7月间突降大冰雹，无衣无食者不下数十万人，是日电国民政府及各方恳请赈济。

△　驻山东坊子日军牛岛旅团长率第三十四联队第三大队本部、第九、十、十一、十二四个中队到达青岛。

△　驻华葡萄牙公使毕安琪由平抵沪，下午4时会晤外交部长王正廷，接洽修订中葡条约事。19日，同外报记者谈话，谓葡中双方关于重订新约，有许多根本要点，业经彼此同意。

9月17日　国民政府通电公布改热河等区为省办法：一、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均改省；二、旧直隶省之口北道10县划归察哈尔省，察哈尔原划归绥远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及后置之集宁县，仍划归绥远；三、五省政府之组织委员暂定五人至七人，设民政、财政两厅，并得酌设教育厅、建设厅，余照省组织法办理。

△　国民政府公布《禁烟法》及《禁烟法施行条例》。

△　奉军于学忠部两师从青门镇中间突击，将直鲁军截为两段，

东征军遥为声援，形势为之一变，直鲁军内部大为恐慌。同日，直鲁军许琨第七军（在铁道以南）及吴奠卿第十军（在静发镇）派代表杨威向东征军接洽投降办法。东征军允如所请，将警戒线移至兴隆庄、长凝镇一带，令许、吴各部渡河，在大王庙、马城镇等处集合，听候发落。

△　张宗昌派代表到唐山谒白崇禧，表示投诚，愿率直鲁军消灭奉军。白拒绝，谓时机已过。

△　胡汉民电谢冯玉祥派员存问，“连日与中央诸同志商定实施五权制度，树立训政规模，期建设事业得以循序发展”。

△　日军第二遣外舰队“旗舰”、“多摩”两舰，以秦皇岛方面形势吃紧，是日急驶秦皇岛。19日，日军新井司令派古田率一中队由大沽搭轮赴秦皇岛增防。

△　日政府派赴济南及沿线视察之冈本中将抵青岛。

9月18日　蒋介石离上海抵南京。是夜，胡汉民、蔡元培、李宗仁、李济深、李石曾、宋子文、戴季陶、吴铁城等中央委员亦离沪赴南京。

△　陈公博离沪赴香港。临行前于9月7日向太平洋社记者谈话，称此次出行，一不是疗养，二不是考察政治，不过转地换换空气而已。重申两年之内不愿参加实际政治，决心在野，实愿以己身为青年之教科书。并称去年广州共产党暴动，疏于防范，“余应单独完全负责”，与汪精卫、张发奎等无关。

△　白崇禧与杨宇霆所派代表、参谋长张廉春等偕何千里在滦州坨子头站会晤，商定滦河东岸直鲁残部悉归奉军收束。当晚，白回唐山，何等赴昌黎晤杨。

△　日总领事矢田在上海访问王正廷，双方就中日改订新约问题

商定，由外交部司长周龙光与日驻宁领事冈本先行谈判。

△　日内阁召集临时会议，决定派特使赴南京交涉济案。

9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五次会议议决：任命孙连仲、林竞、黎丹、马麟、郭立志为青海省政府委员，指定孙连仲兼省政府主席；顺直水利委员会照改组计划切实进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续呈坚辞大学院院长职，决议挽留；维持故宫博物院（经亨颐曾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之动议）。

△　国民政府以连声海另有任用，令免其国民政府秘书长本职，任吕苾筹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任王伯群兼交通大学校长。

△　国民党中委胡汉民、李济深、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宋子文、戴季陶、陈铭枢、王宠惠、吴铁城等由沪抵南京。当晚，蒋介石招宴胡汉民等各中委，谭延闿亦到。

△　蒋介石电促冯玉祥早日入都，共商大计。

△　张宗昌、褚玉璞以奉军包围日紧，是日抵安山会晤杨宇霆，请求停战，双方达成解决直鲁军办法：一、张宗昌下野；二、褚玉璞暂留现职，与奉方协商；三、自19日起直鲁军按奉方条件（即留纪律良好者1.5万人，由奉方改编为三个旅，余部每人发给10元至50元遣散）自动解除武装，从事改编；四、保证张、褚生命财产。旋因张、褚部下意见分歧，协议未能实行。

△　白崇禧电张学良，略谓国、奉两军夹击张、褚，敌蹈绝地，若不另开生路，必致死战，为避免地方糜烂及减少敌人兵力计，敌来降者准其缴械，请勿误会。

△　张学良电邢士廉告以滦东军事情形，略谓直鲁军本日正面向我军猛攻，经第十六军军长胡毓坤率部奋勇还击，激战一昼夜，卒将敌军击退，擒毙甚众。又谓张宗昌因部下死伤甚众，日有自杀情势；

褚玉璞率部约本日来归缴械。

△　四川教育厅奉大学院令饬筹设四川大学，特组织筹备国立四川大学讨论委员会连日召开会议，议决将国立成都大学等10个大专学校改组为国立四川大学，设文、理、法、农、工、医学科。

9月20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八次会议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出席，胡汉民等列席，谭延闿主席。议决：加推胡汉民、孙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凡中央执监委均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加推张继为中政会委员；推蔡元培、李石曾、戴季陶负责审查党治教育案。

△　白崇禧关于收编直鲁军事宜已悉委奉军处理，是日派参谋长王泽民赴滦州监视滦河东岸军事，并加派一团至河东钓鱼台协助奉军收束。

△　张宗昌、褚玉璞及许琨均派员于昨、今两日至东征军范熙绩部第三十七军接洽投诚，是午许琨已渡过滦河，刻在西岸督饬所部渡河。

△　直鲁军袁振青率三旅6000余人投归奉军富双英部，是日杨宇霆于安山附近将其完全缴械。

△　福建省新政府成立。省府主席杨树庄偕委员陈乃元、徐桴、程时煃、许显时、林知渊、陈培锟、陈楚楠、林寄南、卢兴邦、丁超五、方声涛、郑宝菁宣誓就职。

△　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郭树棠主席并致开会词，指导委员郭树棠、潘云超、南桂馨、刘天素、韩振声、杨亦周、莫子镇、王化初宣誓就职。会上通过成立宣言，称应继续完成清党工作，“与负隅的残余恶势力，作最后搏斗”。

△　日驻宁领事冈本同外交部第二司长周龙光就中日悬案进行会

谈。周提出日本从山东撤兵要求。冈本诡称：日本对鲁并无野心，只要中国方面停止排日，负责保护山东日侨，随时可以撤兵。

△　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李家钰、陈鼎勋、黄隐、罗泽洲等21位川军将领联名通电指责资中会议，声称“若中央为慎重川事起见，必须采纳民意，有会议之需要时，亦应请中央指定全川将领、党中负责同志、民众团体代表一体参加，公开讨论，将决议案报请中央核准，庶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并吁请各方制止渝方开衅。

△　南昌总商会以九江、吉安等地反对江西内地商捐，激成罢市风潮，全省各地商界函电纷驰，一致援助，致电国民政府，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10日财长宋子文及是日工商部先后电复，明令取消赣省内地商捐。

△　第二集团军在南京军械局承领土炸药2200余箱，运至汉西门码头，忽有两车炸药爆炸，炸死13人，重伤30余人，炸毁城内外房屋100间左右。

△　《大众文艺》月刊创刊，郁达夫主编。1930年6月出至2卷6期时，以提倡新兴文学，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禁刊。

9月21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议决任命孙连仲等四人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孙兼主席；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并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

△　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开会，推谭延闿、于右任、宋子文为该会常务委员，谭延闿为主席。宋子文报告，现在全国每月收入约500万，支出达900万，不敷数400万。讨论结果，决定实行节流，核减军政各费及裁减兵额，一面设法开源，使收支平衡。

△　蒋介石招宴孙良诚、石敬亭，席间对山东省军、政、外交有所讨论。

△　于右任电国民党中常会特请辞去本兼各职。23日又函，现已电请辞去本兼各职，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秘书，并请从速另推接替。24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九次会议议决慰留。

△　孙科乘加拿大“皇后号”轮回国抵沪。孙在轮上对各记者谈海外归来之感想。略谓：“中国之国家，实为世界最佳之国家，现在之所以不及各国者，因一切政治、实业均无科学之整理；除此外，中国之土地、人民、物产，无一不远在各国之上，倘吾人能明此而努力前进，则将来之中国，实有可观者。”

△　鲁涤平、何键电令湘省各区指挥官将清乡期限延长70天，至11月底止。按：湖南西征军事告竣，即设立全省清乡督办署，将全省划分为五区，从6月20日起，按清乡计划同时“清剿”，限三个月肃清。截至9月20日止，为期已满，而红军彭德怀部，贺龙部，朱德、毛泽东、袁文才部，以及陈光保、周文等部，仍在各地活动，故鲁、何有此电令。

9月22日　白崇禧向奉方提出三项要求：一、奉军应于短期内全部退出关外；二、关内军政事宜全部交国军管理；三、奉军所扣之平汉、平绥、津浦、陇海等线客货车2000辆、车头百余个，应一律归还。同日，张学良召集会议，讨论白崇禧三项要求，决定奉军暂缓退出关外。

△　白崇禧通电报告进剿张宗昌、褚玉璞残部情形。略谓：张、褚残部，盘踞关内，禧不得已，乃督师进剿，连日国奉两军，包围滦河东岸，奉军奋勇力攻，残敌不能抵抗，乃向奉方请求停战缴械。褚已赴奉，张则以违抗奉方命令，为国奉双方所不容，其所部溃散，零星来降者，不下6000余人，业已分别缴械遣散，溃散者尚不在内。据俘虏供称：张宗昌已微服由胥各庄于马（21）日向滦河下游潜逃，已电请奉方海军注意。

△　张学良电邢士廉告以张宗昌战败，闻投徐永昌，褚玉璞回奉转赴大连，张、褚所部完全缴械，但有一部逃至河西，刻下滦东方面一律肃清，夺获战利品甚多，我方得枪支共约两万，敌军伤亡约万余。同日并将上列情况电告何成濬。

△　财政部长宋子文抵上海，同日正式委任易纨士为总税务司，梅乐和为副总税务司。

9月23日　东征军事结束。是日，东征军将直鲁军全部分调胥各庄、开平、洼里、古冶、希家店、雷庄、坨子头、滦州一带，悉数解除武装。直鲁军初极顽强，每站抵抗，自下午3时起，与东征军激战六小时，直鲁军死伤2000余人，东征军亦伤亡500余人，俘直鲁军官兵约两万余人，共收缴枪械万余支，大炮、迫击炮两百余门。至是，东征军事自本月2日津沽誓师至是日止，历时21天，始告结束。

△　白崇禧下令改编直鲁降军为三个暂编师，并发表正副师长之任命：暂编第四师师长于世铭，副师长刘振邦；第五师师长姚钰，副师长祝祥本；第六师师长王恩贵，副师长张骏。该三个师暂归第四集团军前敌总部节制，听候国民政府命令处置。

△　孙科偕吴铁城、林森、王宠惠、傅秉常等由沪抵京。

△　驻华美使马瑞慕抵平归任。

△　暂编第四十四军寇英杰部（直鲁降军）由泰安南调合肥，刘峙奉蒋介石密令于是日在津浦路沿线泰安至蚌埠等处，协同顾祝同等部分别将寇部缴械。寇闻讯潜逃后，在蚌埠被捕，旋被解往南京。

9月24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九次会议，通过恩克巴图、缪斌、周启刚、黄实、王乐平、经亨颐、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刘守中、陈树人、褚民谊、白云梯、陈璧君、黄绍竑、王宠惠、柳亚子17人补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加推胡汉民负中执会秘书处责。

△　国民政府任孙连仲、林竞、黎丹、马麒、郭立志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并指定孙连仲为主席，林、郭、马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各厅厅长。

△　白崇禧电国民政府及各总司令报告俘虏直鲁军官兵约两万人，东征军伤兵约万人，请拨款资遣救伤。略谓："窃查前敌各军，近月以来，无米为炊，饥寒困苦，已达极点；迭经电陈，谅邀鉴察。今益以若此巨额之俘虏伤兵，倘无巨款接济，虽起管、乐，恐亦无法维持，务恳政府暨蒋总座体念前方将士之艰难，迅赐电饬立拨巨款，以济急需。"

△　唐山公安局、商会、交通大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平奉路制造厂等工商学政各界电请政府规定9月23日为北伐完成之永久纪念日。

△　冯玉祥在西安电总参谋长秦德纯、军政处长吴锡祺，指示缩军要点：一、各军一概不准招募添兵，有缺一概不补；二、不足一师所规定之三旅完全人数、枪数，可改为两旅，不足两旅的可改为一旅；三、各将领须知此次缩编，为裁兵节饷，非为增兵，应深体此旨；四、如有缩编不实，希图蒙混及私自招募者，一经告发查实，不论何级官长，一律枪决，决不姑宽。

△　王正廷对日驻京记者表示：中日济案谈判地点不宜在青岛、济南，南京、上海较为妥当适宜。按：日方坚持在日兵集结之青岛、济南举行。

△　驻日公使汪荣宝访日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就名古屋博览会上将满蒙列为日本殖民地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呼伦贝尔代表与奉方在海拉尔达成妥协：一、奉省承认蒙旗自主；二、奉军撤至满洲里；三、都统费增至20万（包括警察费六万，教育费五万）；四、此次独立运动蒙人，不予追究。是日，青年

军首领郭道甫在海拉尔通电下野，脱离青年军，归隐黑河故乡，对于呼伦善后问题，愿以私人资格助其进行。至是，呼伦事件初获解决。

9月25日　国民政府以训政开始，北伐告成，明令本年10月10日国庆节，应彰庆祝典礼，以垂统一纪念，着京内外军事、民政机关届期举行，并转饬所属一体查照办理。

△　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九十七次会议，议决：拨款10万元筹办北平冬赈；《县长考试暂行条例》及《县长奖惩条例》均修正通过；欢迎国联代表团来华观光。

△　蒋介石电赴日参加阅兵典礼之张群，指示到日本后，“先与田中首相约明勿干涉奉天易帜事，必使中国统一，乃可开始解决各案”。

△　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自大同抵北平。

△　直鲁军残部由东征军全部缴械。直鲁军残部约二万人，于23日晚在滦州分乘九列车西开，其余徒步向雷庄进行。是日下午2时，当徒步枪兵全数到达雷庄时，由驻雷庄附近之李品仙部第三十六军第三师缴械。其余车载之枪兵，计第一、二、三列车在唐山停止，由右翼军总指军部派队围缴，第四、五列车在开平由李品仙第十七军第三师围缴，第六、七、八列车在古冶，亦由李部第三十六军围缴。共俘虏两万余人，缴械士兵已一律遣散，送回原籍。直鲁残部至此完全消灭。

△　冯玉祥电国民政府及交通部，请速定计完成陇海铁路。略谓：豫、甘、陕三省，今年大旱，灾民载道，二集团军编余官兵待遣散者当前有10万人，陇海路若能开工，以工代赈，一举数便。

△　顾震在山东诸城通电就代理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职。所部二万余人，枪1.5万余支，改编为第十六、十七两师，顾自兼第

十六师师长，彭祖佑任第十七师师长。

△　岳维峻部由豫窜入皖境，是日岳抵京谒蒋介石，陈述该军撤离豫境经过。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古应芬返抵香港，广东各界代表设宴欢迎。古氏报告出洋经过，表示此次返国为党服务，所传留粤任要职，并非事实。

9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六次会议议决：组织“五院组织法”审查委员会，推蒋介石、胡汉民、孙科、王宠惠、蔡元培、何应钦、王世杰、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戴季陶、李济深、谭延闿、李烈钧为审查员，由蒋介石召集，限三日内审查结束，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　白崇禧以滦东军事完全结束，是晨下令第四集团军前敌总部分批班师回鄂。

△　建设委员会将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指定李仪祉为主席。

△　满海警备司令梁忠甲、道尹赵仲仁自海拉尔电奉天省长公署，报告呼伦贝尔事件解决经过。略谓：“呼伦蒙旗青年，标榜民族自决主义，为自治、民治之要求，煽惑蒙民揭竿起事，遂拟袭图海、满，为实行其大蒙古国计划之根据。……该党来自外蒙，气息沟通，益以第三国际之阴谋，迁流所届，险象环生，忠甲等秉承长官训示，用相机剿抚之策，两个月来，迭派专员前往剀切劝谕，兹幸该党觉悟利害，诚意就抚，首领郭道甫等，已于本日来海，蒙乱纠纷，此至完全结束。”

△　日第三师团长安满钦一巡视胶济路及青岛后，是日返抵济南。

△　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

9月27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〇次会议议决，加推林森、吴忠信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总理葬期改至十八年（1929）3月12日举行。

△　白崇禧、杨宇霆在滦州附近会晤，会商双方部队驻防地点、办法。决定奉军全部撤至山海关，划出滦东、昌黎、北戴河为两军缓冲地，过河国军调回滦西。

△　白崇禧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总司令，谓北伐告终，请辞代总司令职及右路军总指挥职，并请准所部班师返汉。

△　晚，白崇禧在唐山行辕招宴从军记者，演说东征情形。略谓：此次肃清直鲁残军，只能说是打土匪，不能说与军队作战，张宗昌、褚玉璞、刘振邦便是土匪头儿。此次战役，双方死伤约七万余人，虽云国、奉夹击，我方损失特重。许琨、王栋、刘振邦、于世铭等部，来降者两万余人，惟仅缴七八千支枪。平奉路外兵甚多，英兵不下千余，此为最堪痛心者，稍不小心，即赴纠纷，日本浪人阴助张、褚，尤堪痛心。想起东征之苦，令人泪下。当打古冶时，各军断食三日，欠饷两月，时当凉秋，士兵犹着单衣草履。唐山以西，十室九空，民生问题，实关重要。

△　张学良以电令告诫前方奉军将领。略谓目前正值农家收获之时，各军应本爱护人民之旨，力戒骚扰，务使各安生产，安心收割，如有不法军人，以拉夫抓车扰及地方者，即按军法严惩。

△　王正廷在南京对各报社记者宣布：古巴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承认国民政府。

△　驻奉日总领事林久治郎返任抵沈阳，奉首相田中训令，向张学良表示，东三省如必易帜，须先解决满蒙悬案。

△　日本内田康哉于26日抵纽约，是日会见柯立芝总统，就日中关系问题进行游说。

9月28日　国民政府代表、上海兵工厂厂长张群抵日本东京，参加日阅兵典礼。王右瑜、张治中、熊斌等随行。

△　孙连仲围攻甘肃凉州回军甘凉镇守使马廷骧部，于30日攻克凉州，马部除大部缴械外，余均溃散。冯玉祥派马鸿宾前往兰州宣抚。29日，刘郁芬返甘处理善后。

9月29日　白崇禧派何千里赴奉晤张学良，请定入关日期及晤谈地点，张称因病不能入关，请白赴奉会晤。

△　杨宇霆由滦州返抵沈阳，向张学良报告解决直鲁叛军经过及与白崇禧接洽之情形。

△　冯玉祥布告自是日起免除陕西地方一切杂税。

9月30日　国民政府电阎锡山，就任阎为内政部长事征求意见。

△　蒋介石电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四军长，谓资中会议，和衷共济，协谋川局，从此得有具体解决办法，非惟桑梓之幸，抑亦党国与民众之福；并对刘等请派外省兵入川一事，表示不予赞同。

△　北平市民数千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克复津东。谷正鼎、何其巩、方振武等七人为主席团，通过吁请中央定“九二三”为完成北伐纪念日；彻底裁兵，实行兵工政策；请速实行训政；取消不平等条约等七项议决案。

△　邢士廉赴杭州观钱塘江潮，在车站语人，谓奉方易帜因外交关系，双十节尚难实现，惟不久可成，绝无问题。

△　驻奉日军第二十七旅、第十五联队、独立守备司令部、第十四师团部分别撤回原防柳树屯、旅顺、公主岭、辽阳。

10　月

10月1日　李烈钧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国民政府组织与宪法》。

△　白崇禧抵滦州，检阅范熙绩、徐永昌所部东征军。

△　阎锡山以津东军事已告肃清，特令第三集团军东征军中路总指挥徐永昌、右路总指挥谭庆林各率所部，撤回后防，指定徐部沿平奉路驻扎军粮城及新河一带，谭部驻扎廊坊、落垡一带。

△　孙科电冯玉祥，略谓："科此次出国考察，益觉吾国之急需要安定时局与健全中央。此着办到，则废除不平等条约，吸收外资，以实现种种福利民生之建设，均可迎刃而解。我公谋国忠诚，切盼即日命驾来京，共商大计。"

△　邢士廉自南京电张学良，秉承国民政府意旨，向张转陈两项问题，促其慨然决定施行：一、关于奉方放还扣留车辆事，请在协议未臻妥协前，尽先放还一半，以供各干线运输之需；二、热河问题，请张即向汤玉麟提出劝告，令自动离职，以免激起风波，于奉方不利。

△　中央陆军大学为容纳缩编后各部高级军官，是日开设特别班，招收团长以上在各战役中建有殊功者，定额一百人，由一、二、三、四集团军各保送20人，军委会、总司令部共保送20人。

△　中华航空协进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选李济深、张静愚、邓建中、陈际熙、凌鄂荪为常务委员。

△　日本陆相白川在官邸召集会议，听取参谋本部总务部长冈本

中将关于山东方面之实情及第三师团整理方法之报告。

△　天津市海关开征出口二五附税，同时并征出口复入口各货之附税。

△　天津国货展览会开幕。与会商行119家，陈列物品万余种。

△　段祺瑞离天津赴大连隐居，王揖唐、姚震、姚国桢同行。

10月2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八次会议议决取消各集团军名义，现有各部编为第一至四十三师（缺第十四师），并通过各师师长之任命案；任伍朝枢、王世杰、李锦纶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任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为管理俄国部分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任易纨士为代理总税务司，梅乐和为副总税务司。

△　上海邮务工会会员2500余人，要求改革邮务工人薪金制度，改良待遇及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于是晨5时举行大罢工。

△　白崇禧在唐山召集东征军各军长会议，决定东征军主力部队留驻滦河西岸警戒，所有其他参战各军一律调回平、津，向后移防，其拟定调防计划，以叶琪、廖磊两部驻守滦河西岸，刘春荣第八独立师移防唐山，第二军团范熙绩第三十七军移防胥各庄，第三集团军徐永昌部队移防军粮城、塘沽、天津，第二集团军郑大章骑兵军撤回原驻防地。会后，白崇禧即令各总指挥、各军长照预定地点移防，第十三军及第十七军韦云淞师、魏镇藩师均开回南苑。

△　杨宇霆电邀白崇禧近期内赴奉一行，并谓关外民众，极欲一瞻颜色，如因事不克前往，彼将代表张氏（学良）再度至滦州附近一晤，俾将滦东善后诸问题彻底解决。

△　河北省政府以省境大军云集，行政不能统一，人民负担繁重，是日再电国民党中央及各军事领袖，请立撤客军，禁干政务。

10月3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二次会议，通过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及《训政纲领》；陈果夫辞代理组织部长照准。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公布《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全文如下："中国国民党实行总理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在训政时期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统治，制定左列纲领：（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实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七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推蒋介石、孙科、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李济深等10人为五院组织法起草委员，准大学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长蔡元培辞职，特任蒋梦麟为大学院院长。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交通部长王伯群呈报，讨论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事件，决议由中央发令上海特别市党部，就近劝导复工，至待遇上之要求，当有适当之解决，如工人不接受劝导，中央只有严厉取缔。

△　蒋介石宴刘峙、顾祝同等，对今后军队训练有所指示。

△　薛笃弼分别向国民党中政会及国民政府呈辞内政部长职，未准。15日，薛再次坚请辞本兼各职，出洋考察。27日，国民政府准免薛笃弼本兼各职。

△　内政部据南京特别市公安局长孙伯文呈称，以王汇百案内各犯供出在逃之共党不少，兹将所有未获人犯姓名、年龄、籍贯汇呈到部，是日该部通令各省民政厅，通缉王汇百案内在逃共党，并抄发名单一份，计李成云、王从照等111名，令转饬所属一体协缉。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电呈中央，请定“九二三”为完成北伐永久纪念日。旋李济深、方振武、何其巩、杨树庄、陈嘉祐、鲁涤平及湖北省政府均通电表示赞同。

△　邢士廉返南京，在沪时日总领事矢田约谈，首询南行目的及接洽结果。邢答结果良好，但未便奉告。矢田劝邢转告张学良对易帜事慎重。邢答今日系私人谈话，如有关外交事件，请由贵国驻奉领事向敝总司令接洽。

△　东三省法团联合会电请保安司令部于国庆日准津、奉通车，并悬挂青天白日旗。

△　热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子钊电阎锡山、方振武、商震等，报告汤玉麟联络溃窜热境之直鲁残军，在朝阳迄西沿长城一带布防备战。

△　张群在东京谒见日首相田中，就中日间各问题恳求日方“免除误会”。田中佯允，并谓：一切悬案之解决在于国民政府今后的态度，日方并无误会。

△　天津邮务工会电北平邮务工会，告以该会紧急会议决议，3日起罢工，与申会一致行动，事关全国邮工利益，请速照办勿延。

△　第一批撤退之美国军舰共10艘（驱逐舰六，炮舰、巡洋舰各二）自渤海湾抵上海后，是日奉令开菲律宾。

10月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令各级党部，重申“嗣后如有擅布主张，及挑拨离间等行动，应即从严惩处，以维纪律”。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郑州市代表大会于8月30日曾通电声讨阎锡山，9月19日又通电欢迎汪精卫，此为党纪国法所不恕，是日令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先将郑州市党部指导委员停职查办。

△　下午，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就邮务罢工案磋商对策。决定由市党部、市政府联名训令上海邮务工会即日复工，所有该工会关于改善待遇、统一工会组织及撤惩邮务总办等条件，静候中央解决。旋派代表前往邮务工会交涉，允12日夜8时前有圆满结果。

△　晚，上海邮务工会罢工委员会就市党部训令复工事召集紧急会议，议决要求市党部出示立即将邮务总办刘书蕃革职惩办等三项要求的书面保证作为暂时复工之先决条件，旋派代表赴市党部交涉。

△　北平邮务工会执监委联席会议，议决就改善邮务事向当局提出邮政归还中国人自办及拥护上海邮务工会合理要求等四项条件。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向记者宣布：我国明年1月1日实行关税自主，将以明文规定。

△　邢士廉谒蒋介石，谓奉方加入国民政府事，须回奉面商，并请以何成濬加入热河省府委员，蒋未允。5日，邢再谒蒋，报告张学良派胡若愚为代表将来京，本人即回奉，要求对热河勿进兵。

△　中华全国机器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600人出席，讨论“以机器工业化救中国”。

△　全国预算委员会议决整理财政办法六条，规定统一全国收入，地方税划归各省，国家税解中央，全国军政各费收支平衡，各省军费由中央支付，政费由地方支拨，全国军额不得超过60师等。

△　张群离东京返国。行前就中日关系向日本报界发表谈话，谓：两国政府若有诚意打破僵局，中日商约及各种悬案方能顺利开展

谈判。7日，张群抵上海。

△　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告外交部，土耳其将正式承认国民政府，并将在京设立使馆。

△　樊钟秀到南京，当即转赴上海就医，5日派驻京代表顾阳亮谒蒋介石，报告愿将所部三四万人枪完全交归政府接收。

△　胶县日军警备队无理命令该县驻军周昆山旅“即刻退出胶城20华里外”。为防周部反抗，并密电高密日警备队配合行动。是日，周部500余人悉被胶县、高密日军包围缴械后遣散。

10月5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通过《民国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条例》；任命中央银行理事及监事。

△　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8日，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

△　国民政府据审计院院长于右任呈请，训令直辖各机关不得以公款作私人认捐及私人酬应为正当开支，否则惟有按照审计法规处理。

△　蒋介石电嘱何成濬务请阎锡山于政府改组时来京，以便协商一切。

△　蒋介石召见刘珍年代表张星拱，询问胶东情形。

△　军事委员会下令通缉鲁军张宗昌部第二军军长张敬尧，其在皖省逆产一律充公。

△　交通部召开邮政会议，讨论邮务职工根本待遇办法，6日继续开会，决按现时生活程度酌量提高；职工休假，亦作出相应规定。

△　河北省府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及北平临时政

分会，谓嗣后官吏如有违法犯赃情事，一经审实，请按《党员背誓罪条例》一律判处死刑。

△　张学良在沈阳召集内蒙东三盟盟长王公会议，内蒙东三盟盟长、王公及郭道甫出席，会议达成协议，东三盟承认与奉方团结一致，合作共存，奉方保护王公、盟长的利益，卓索图盟长、蒙王贡桑诺尔布为高等顾问。23日会议结束。按：东三盟为哲里木盟（在黑奉间洮齐铁路一带）、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均在热河境内）。

△　天津邮政总工委员会成立，旋电南京邮政总局，限三日内无条件接受上海邮务工会12项条件，否则实行怠工。

10月6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条例》，凡12条，规定公债总额为3000万元，以为建设金融事业之用，周息八厘，自10月发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底还清。

△　国民政府准大学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长蔡元培辞本兼各职，特任蒋梦麟为大学院院长。

△　国民党中央党校校长蒋介石向第二期入校新生400余人训话，要求全体学生明了自身的责任是“继往开来”四个字。进入党校的目的，不是想升官，不是为名，不是想发财，不是为利，不是专为求学，而是学做人的方法，要做成功一个完善的人，要有自强自立自活的精神，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去求中国的自由与平等。

△　内政部通电各省，公布以孔子诞日为纪念日，并于是日举行纪念时演述孔子言行事迹，以志景仰。

△　下午3时上海邮工复工。次日，上海邮务工会通告，接受各方劝告，忍痛复工，静候中央解决。

10月7日　蒋介石宴国民党中委，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孙科、李宗仁、王宠惠、李济深、王世杰均到，宴会后复与各委商五院

组织法。

△　白崇禧、杨宇霆在滦州再次会晤，双方同意恢复津、奉交通，即日通车，关外车辆归还一小部分，易帜事因外交关系尚须从缓。是晚，白返回唐山。

△　杨宇霆在滦州对记者谈东北易帜问题，谓："此事不成问题，盖虽一时因外交关系而不得不慎重，但终必实现。"

△　邢士廉偕方本仁携蒋介石致张学良、杨宇霆亲笔函两件回奉。同日，张学良代表杨毓珣、白聘珍离沪乘轮返奉。

△　财政部长宋子文由宁抵沪会晤驻沪日总领事矢田，讨论中日关税问题。

10月8日　　上午，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三次会议议决选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自由、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任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院院长。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统一后国庆纪念发表告民众书，略谓：10月10日为辛亥创造中华民国之国庆，又为十五年复兴中华民国之国庆。现值训政开始，依总理大纲之规范，制定训政纲领，从事建设五院，施行五权之治，誓将领导国民，从刻苦奋斗中作实际建设工作。我国民亦当奋发不息，以从事实际之建设，而完成建国大业，俾全国共蒙乐业。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凡七章48条，规定"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织之"；"国民政府设主席委员一人，委员十二人至十六人"；"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

试院、监察院分别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机关。并训令各部院会、京内外直辖各机关、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　国民政府任命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缪培南、熊式辉、陈焯、王均、朱绍良、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金汉鼎、夏斗寅、夏威、胡宗铎、陶钧、鲁涤平、何键、韩复榘、梁冠英、吉鸿昌、冯治安、石友三、童玉振、程希贤、张维玺、宋哲元、刘汝明、佟麟阁、孙连仲、李培基、孙楚、徐永昌、杨效欧、李生达、王靖国、李服膺、赵承绶、关福安、张会诏、张荫梧、傅作义为陆军第一至第四十三师师长（按：缺第十四师）。

△　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易培基、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江瀚、薛笃弼、庄蕴宽、吴敬恒、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柯劭忞、何应钦、戴季陶、张继、马福祥、胡汉民、班禅额尔德尼、恩克巴图、赵戴文为故宫博物院理事。

△　国民政府特派宋子文、陈行、叶琢堂、姚泳白、王宝仑、钱永铭、陈光甫、荣宗敬、周宗良为中央银行理事，指定宋子文、陈行、叶琢堂、姚泳白、王宝仑为常务理事；特派李铭、贝祖诒、秦润卿、虞洽卿、林康侯、徐陈冕为中央银行监事。

△　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

△　蒋介石电告张学良已被本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　孙科、王宠惠电张学良，略谓：“本日议决选任台端为国民政府委员……希于是日易帜，除旧更新。”10日，张复电谓易帜事正积极准备，并请介公（蒋介石）指示办理。

△　白崇禧代表何千里电白，转告张学良电请蒋介石留白驻平。张电称：“方今异党潜伏平津，正在伺机而谋发动，万一羊城共祸复陷燕京，其危险何堪设想？拟请我兄仍令健生（白崇禧）兄暂驻北平，责成维持一切，不特北方大局可资奠定，东省亦托庇良多……。务祈熟权利害，毅然主持，是所企祷。”

△　下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通过行政、立法、司法三院组织法；建设大纲草案付审查。

△　中意宁案协定换文签字。11日，驻华意公使照会外交部，表示愿以平等、相互尊重主权为原则会商新约。

△　日外务省电令驻沪总领事矢田向南京交涉中日各悬案。

△　白崇禧代表王泽民出席驻华日使馆宴会，席间向日使芳泽表示，东北易帜望日本取中立态度，并请转电本国予以缓和。

10月9日　　蒋介石发表《国庆日敬告同胞书》，声称：“以今日而欲求中国之不亡，达到其独立自由之目的，惟有统一全国革命思想，以排除阶级斗争之邪说，团结国民之爱国精神，以杜绝国内武力之战争，必如是乃能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亦必如此乃能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并提出“发育国民强毅之体力”，“保持中国固有之德性”，“增进科学必须之常识”，“灌输世界最新之文化”四端，为“建设新中国”之要道，“以奠定民国自强之基础”。

△　蒋介石再电张学良，略谓：“委员（指国民政府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同日，张学良电复接受任命，并表示：“学良才识薄弱，重蒙提挈，得与诸贤共襄国事，感幸已深。而得我公为主席，俾获追随左右，尤惬私愿，届时即请加列贱名宣布就任。”

△　白崇禧以东征军虏获直鲁军许琨、王栋两军长，拘禁在津，

电国府请示办法。是日，军事委员会复电，谓查许琨、王栋两军犯，系为从前暗杀陈其美之要犯，请速派员押解南下归案讯办。

△　何成濬电贺张学良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希早践易帜之前约。

△　何成濬电胶东暂编第一军军长刘珍年，据报毕庶澄党羽潘士椿受张宗昌运动，潜踪烟台保安栈，召集旧部，希扰地方，祈严密查缉。10日，刘电复称，公安局检查户口极严密，敌党万难潜踪烟台，且驻有一师三独立团，治安无虑。

10月10日　　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委员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院长戴季陶、李济深、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何应钦、王宠惠、李宗仁、孙科、陈果夫，国民党中央委员吴敬恒、李烈钧、张静江等出席，各界莅场观礼代表共千余人。蒋介石主席，吴敬恒授印致训词，蒋介石受印致答词，委员宣誓受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李石曾、吴敬恒监誓。至是开始“训政时期”。

△　南京党、政、军及各界群众20万人集会，纪念国庆节，蒋介石偕国府委员出席，会后举行阅兵，晚上10万人参加提灯大会。同日，北平、天津、广州、徐州、杭州、福州、长沙、太原、南昌、安庆、上海、汉口、泰安、开封等地举行集会，纪念国庆节。

△　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在奉天省长公署举行招待会，庆祝国庆节。次日举行阅兵礼，万余人参加。

△　张学良电蒋介石，报告东三省积极筹备易帜情形，略谓：“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以三省同日实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日举行。”

△　张学良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询党、国旗尺度，以便制办。

△　南满铁道社长山本抵沈阳会见张学良，要求允许吉敦、吉会两铁路接成一线，张已许诺。其交换条件为日方贷给奉天资金5000万元，以为奉天整理奉票、开发蒙边之经费。哈尔滨自治会等团体联名电张，力持不可。14日，张学良电复，略谓："关于外交交涉事项，区区私见，当以开发实业，不损利权为前提，至其间条件如何，必定根据三省公约付之公决也。"

△　吉（林）敦（化）铁路通车，全长1300英里。该路于1926年6月1日开工，由北京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于1925年同"满铁"理事松冈洋右订立包工契约，金额1800万元，两年零四个月全部建成。

△　尊孔会在英国伦敦开会庆祝孔子诞辰，英人杨赫斯本爵士主席，到中国、波斯（今伊朗）两公使及安格联等90余人。中国孔教会会长陈焕章发表演说，谓西方渐了解孔道，可为欢忭。

10月11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四次会议推胡汉民、谭延闿、李石曾、王宠惠审查修正《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及《立法程序法》；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额数及人选标准。

△　上海惠源银行开幕，程霖杰、龚子渔等人创办，资本100万元。

△　驻华日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自北平启程赴山东及东北各地视察，蒋介石电山东省政府请予接待。31日，返北平使馆武官原任。

10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八次会议决议：《国民政府考试院组织法》、《监察院组织法》、《共产党自首法》修正通过；察、绥两省府委员名单正式发表，察省府委为赵戴文等七人，绥省府委为徐永昌等七人；特任蒋作宾、高鲁为驻德、法两国公使，推胡汉民、戴季陶、王宠惠为外交委员会委员，特派宋子文为中央银行

总裁。

△　蒋介石致张学良二电：其一为告知“已将兄名加入（国民政府）委员会发表就任”；其二为：“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邮务工友书》，宣称中央确认上海邮务工人不幸罢工事件，为工友行动之错误，实有深切之遗憾，倘一任私情愤张而不自遏抑，必将自绝于生计。

△　财政部长宋子文通令各省财政厅长，严禁苛征田赋，制订限制办法八条，规定田赋正副税总额至少不得超过地价1％，如敢故违，撤职惩戒。

△　河北省政府自天津迁移北平，同日省府主席商震偕省府职员、卫队等百余人抵平。

△　白崇禧派叶琪赴奉，接洽奉军关内让防及恢复交通问题。14日晚，张学良设宴招待叶琪。

△　杨宇霆由热河返沈阳，并约汤玉麟同行。汤表示，只要本人权威不减，何种旗帜、何种主义均可赞成。

△　东征军将领李品仙、范熙绩、魏益三、叶琪、廖磊、周斓、刘春荣电国民党中央及各总司令，请早日决定以9月23日为完成北伐纪念日。

△　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琪到南京，谭延闿接见，谈中葡国交及修约事宜。当晚，外交部长王正廷欢宴葡使。

10月13日　　冯玉祥奉国民政府电召，自开封抵南京。当晚对记

者发表谈话，告以对中央任命之行政院副院长及军政部长两职当表服从；并谓第二集团军第一期缩编完竣，已裁去11万余人，尚存25万余人。

△　阎锡山代表张天枢谒蒋介石报告晋方军政情形及阎将由平南来诸事。

△　全国商业临时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到16省、京、沪两府特别市以及日本、荷兰、朝鲜华侨代表共133人，冯少山、苏民生、何创夏主席。工商部长孔祥熙到会致辞。大会举出执监委，通过创办商业银行及《全国商联会日报》等议决案，27日通过呈国民政府文，要求令饬奉方全部放还直鲁军所扣之车辆，事毕即宣告闭幕。

△　张学良电蒋介石，致谢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并谓："承示亟速恢复交通与改悬国旗各事，莫不深表赞同。惜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总期实践前约，昭示国人。"

△　北京外交团讨论中国来年新税问题，称中国如不推翻华会协定，于关税自主前先宣布实施七级过渡税，则列国亦必赞同。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上海邮务罢工案，召开第一七七次常务会议，议决嗣后政府机关、公用事业职工绝对禁止罢工；邮工服务及待遇之厘定，应绝对服从交通部公平之处理。

△　福建省府召开军缩会议，省府委员及独立第十四师、独立第四师、省防军第一旅、第二旅代表出席。杨树庄主席，并以书面提出《结束闽省军事办法纲要》交会议讨论。结果决定：一、海军陆战队、独立第十四、第四师各缩编为四团，省防一、二旅，教导团各编为一团，各师部、旅部、炮兵营、特务连，暂行保留；二、各部依调防案，限年底移竣。26日闭幕。

△　国民党四川各县市指导委员会通电反对资中会议。指出川中少数将领私行召集资中会议，“揆其用心，无非分赃，分赃不平，促成混战……近日以来，全川民众对此，群情惶骇，纷纷反对”。敦促各军事领袖“速行各返原地，蠲免苛税，停止预征，一切川事，静听中央处理。苟犹充耳不闻，誓当与国人共弃之”。

10月14日　蒋介石宴冯玉祥，并邀古应芬、李济深、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张静江、谭延闿、何应钦等人作陪，席间冯报告陕、甘旱荒灾况与西北最近军政情形以及今后建设计划，各要人与冯对训政实施及五院副长人选，均有相当商洽。

△　白云梯谒蒋介石、胡汉民，商蒙、藏重要问题。

10月15日　蒋介石撰文指责上海邮务工人罢工，是意图掀起各地工潮，影响社会的“轻率举动”，“无论动机如何，至少不能不说是工友们手段的错误”。“所望邮务工友于宣告复工以后，安心工作，听候处理，所提关于经济各条件，政府自当审量社会的现实生活及邮局经济情况，于可能范围内尽量容纳。若复不谅，以不可能的条件相要挟，或行动越轨，终使大多数工人失业，她就不是中正日夕所期望于工友们的地方了”。

△　国民政府举行改组后第一次纪念周，蒋介石主席并报告，表示希望“在中央办事的同志，个个要奋发有为，个个勤慎廉洁，以中央为各省模范”。并称中正个人如有过失，或不勤不廉，亦请各位举发，俾得做一个模范。同日，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国民政府和五院的组织法》。

△　李宗仁抵汉口，湖北省府主席张知本率各机关、团体数千人前往码头迎接。18日，李召省政负责人张知本、陶钧、刘岳峙等开会，讨论汉口债权、债务纠纷、处理逆产、救济失业人口等问题。

△　军事委员会电慰白崇禧，令其暂镇津东，并称整理善后良

图，尤须倚重长才，如促进统一，恢复交通各问题，全恃就近协商解决，静待后命。

△　何应钦就热河问题复电阎锡山、方振武，谓介公（蒋介石）之意，国军应暂取监视态度，因正向张学良交涉热河问题，并称预料热河方面，必能与奉方一致服从中央也。究竟是否用兵，尚有所待。

△　北伐军总司令部因北伐已告完成，军政部等即将成立，奉谕准备结束。是晚，何应钦召集总部各处厅主任会议，决定三事：一、各处厅编造器具清册；二、各处厅编录北伐以来大事记；三、各处厅考核各员成绩，择优呈报。以上三项限五日内办妥。

△　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在南京开幕。交通部长王伯群到会致训词。与会人员提出整顿路政、清查车辆、厘定客货运价等提案45件。

△　交通部发表《改订邮务职工待遇章程》。16日，上海邮务工会开会，议决取消罢工委员会。

△　国民党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通电全国，略谓今年豫西、豫南兵燹之余，继以天灾，大旱遍于百零八县，绝食者数十万人，凄惨之状，亘古未有，希望各界予以救济。

△　张宗昌自滦东败后，在乐亭附近乘小船出大清河口，是日亡命大连。旋到旅顺，僭称“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与白俄谢米诺夫（“大俄国远东政府代表”）签订《中俄讨赤军事协定》七条，规定各自“扫除”本国之“赤党”，并互相援助饷项、军械、兵力，如有必要，“得设立联合军司令部”。

△　广东省政府发表湘、粤边境连（山）、乐（昌）、宜（章）、汝（城）等七县《联防协约》25条。

10月16日　　国民政府改组后举行首次国务会议，委员林森、孙科、冯玉祥、陈果夫、蒋介石、谭延闿、王宠惠、何应钦、李济深、

胡汉民、戴季陶出席，蒋介石主席。通过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织法；议决察、绥两省府委员任命案；通令全国政务官不准兼俸、事务官不准兼差，违者即以舞弊论处；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于参加首次国务会议散会后对访者表示："中国虽能统一，前途仍多困难，余决心扶助蒋介石等诸位忠诚同志，共谋建设。"

△　中法宁案在南京换文。17日，外交部公布中法两国关于解决宁案及修约照会四件。

△　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自北平启程南下，是日抵沪。18日在沪对记者发表谈话与宣言，宣布正式接受国民政府之任命，决定明日入京。

△　招商局"新康"轮船由塘沽开往上海，行驶至大沽外20余里海面，忽与由营口开来之"荣兴"商轮相撞，"荣兴"轮立即沉毁，乘客得救者仅五六十人，"新康"轮无大损伤。

10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九次会议，决议：一、准内政部长薛笃弼辞本兼各职，出洋考察；二、甘肃省旧西宁道属各县划入青海省，定西宁为青海省治；三、设宁夏省，以旧宁夏护军使所辖及旧宁夏道属各县为宁夏省管辖区域，以宁夏为省治；四、任李锦纶为驻墨西哥国全权公使；五、通过《中国国民党对于全国工会及工人之告诫书》。

△　国民政府电新疆省政府代理主席金树仁，饬令安边靖乱，绥缉军民，维持治安。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对于全国工会及工人之告诫书》，诬指"上海邮务工人罢工系受共党诱惑"，要求各工会

工人勿再“蹈怠工罢工之歧路……反抗政府，反叛国家”。

△　上海邮务工会发表《告全国各界同胞书》，说明忍痛暂时复工之真相，宣布不能接受交通部《邮政人员修正薪率章程》之苦衷，声称“要扑灭一切共党的阴谋，在青天白日旗下去寻找一条生路”，呼吁各界同胞予以实力援助。

△　山东省府主席孙良诚颁发布告，宣布治鲁方针六端：一、肃清土匪；二、审慎用人；三、铲除贪官污吏；四、整顿教育；五、扫除积弊；六、军民合作。并谓上述各端急求实现，其他建设次第施行。

△　刘珍年在烟台通电宣布奉蒋介石令委充胶东暂编第一军军长，是日就职，并将胶东革命军总指挥名义取消。

△　吉林省延吉农工商学各团体联席会议，讨论抗路（吉林铁路）问题，议决在延吉设反对运动本部，在和龙、汪清、珲春三县设支部，以指导反对依赖外资修筑铁路的运动，如果遭到失败，即在各城市联合罢工、罢课。

△　日驻华公使芳泽离北平取道天津返国，使馆事务由崛义贵参赞代办。芳泽到津与白崇禧会晤，希望白中止班师，留为防共，并盼与东三省联合，防俄赤祸。

10月1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七次会议通过：一、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分别为行政、立法、考试、监察院副院长；二、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参谋部长，何应钦为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部长；三、取消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

△　驻沪日总领事矢田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表示愿弃却往日之争执，披沥诚意，解决中日问题悬案。

△　蒋介石在总司令部召集上海工人代表团谈话，告诫工人罢工之手段不能轻易为之。

△　张学良代表胡若愚偕方本仁谒蒋介石，蒋就东三省易帜问题询问甚详，并表示希望奉方派员来京，以便接洽。

△　侨务委员会招待新闻界，常委周启刚报告整顿侨务方针，其要旨为：一、设法巩固华侨原有的一切地位；二、解除华侨痛苦，使在居留地享受自由平等；三、发展华侨国际贸易；四、介绍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五、设法消除一切苛待华侨条例；六、督促严重交涉华侨所遭之惨案；七、与华侨居留地政府改订华侨所属之国籍法。

10月19日　国民政府明令禁止以私人名义推荐官员。令曰："国家设官，所以任职，用人贤否，攸关政治隆污，若非拔取真才，何以企臻郅治。近顷以来，奔竞之风未息，请托之事盛行，亟应严加取缔，以资整顿。嗣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平行机关，均不得以私人名义有所推荐，借杜幸进，而肃官常，违者分别惩处。"

△　国民政府明令政务官不得兼薪，事务官不得兼差。令曰："政务官不得兼薪，事务官不得兼差职，迭经明令严禁在案。乃实行奉行者固居多数，间亦不免有阳奉阴违情事。为此重申诰令：嗣后政务官即因政务上之必要而兼差职，亦不得兼薪，并不得有支取夫马津贴类似兼薪之事项。事务官绝对不得兼差职。倘敢故违，以贪墨论，即予褫职惩办。"

△　国民政府第二次国务会议，蒋介石主席。议决任命阎锡山、王正廷、冯玉祥、宋子文、易培基、孔祥熙、蒋梦麟、王伯群、孙科、薛笃弼分别为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铁道、卫生各部部长。古应芬为政府文官长，提请中政会通过。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照案通过。

△　国民政府特任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

△　外交部长王正廷邀驻沪日总领事矢田在南京萨家湾私宅商洽中日悬案：一、中日修约案：日方表示日政府原则上赞同，并主双方于沪上开修约会议。二、中日宁案：中方表示负责赔偿日方所有损失，甚望日政府本善意与中国协商。三、汉口事件：中方表示，日方在汉口日租界枪杀中国军民多人，此事日方应负完全责任。日方答称，即请示田中，并建议此案与济案同时解决。四、济南惨案：中方提议日方先撤退济南驻军，再开谈判，并应对其惨杀中国外交官一事，须向中国政府郑重道歉，日方允转告本国政府。20日，谈判继续进行。

△　白崇禧派赴奉天代表王季文、何千里返津，向白报告与张学良接洽经过。

△　驻沈阳日总领事林久治郎访晤张学良，交涉土地商租问题。日方以撤废在东三省治外法权为条件，要求奉方谅解，奉方不允。

△　日本众议院中华参观团河上誓太郎等15人，自东京出发来华参观，是日抵沪。视察团立宪民政党所属众议员前田房之助等三人发表声明书，称“日本所望于中国者，除拥［维］护日本在满蒙之特殊权利利益及已存之条约外，丝毫不存帝国主义之野心”。

10月20日　　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组织法》，凡11条；《立法院组织法》，凡26条；《司法院组织法》，凡16条；《考试院组织法》，凡17条；《监察院组织法》，凡23条。

△　国民政府令：青海改建为省，前经明令公布。兹查甘肃省旧西宁道属各县与青海形势毗连，应即划入青海省，并定西宁为青海省治。又查旧宁夏护军使辖地及旧宁夏道属各县地方辽阔，应即设置宁夏省，以宁夏为省治。

△　国民政府任赵戴文、彭赞璜、兰均、张砺生、童效先、索狄木拉普坦、萨木端降魔普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指定赵戴文为主席。

△　国民政府任徐永昌、陈宾寅、梁汝舟、冯曦、祁志厚、蕴栋旺楚克、沙克都尔札布为绥远省政府委员，指定徐永昌为主席。

△　国民政府任蒋作宾为驻德意志国特命全权公使；任高鲁为驻法兰西国特命全权公使；任李锦纶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

△　国民政府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凡九条，并附录《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七条。

△　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奉蒋介石命慰劳东征军队，是日抵北平，谒阎锡山后，于22日赴津晤见白崇禧。

△　湖北省府举行县长考试。应试者1287人，23日录取初试合格者308人。25日复试。27日宣布录取合格者107人。

△　刘珍年部何益三旅在山东牟平县，会同知事郭佩五，带领2000余人，至南汉、北汉、但家三村强索现款，预征钱粮，三村不允，是夜包围三村炮轰，计毙男女老少四五百名，斩九名，所斩人头悬牟平四城门，烟台、大连商会调停无效。

△　晋西临县鼠疫成灾，全县死数百人。

10月21日　　蒋介石电北平何成濬，请即到南京就参军长职，杨杰亦请速来。

△　天津警备司令部以成分复杂为由，将驻防马厂暂编第九路军包围缴械，给资遣散。

△　冯玉祥电令山东省政府将全省民团改为人民自卫团，并任命陈以燊为山东人民自卫团总团长，是日，陈抵泰安与孙良诚接洽组织自卫团办法，决定分山东为10区，每区设区长一名，大县配备团员300人，中县200人，小县50人。

△　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指导委员会就传闻向美国借款500万美元修华北河道及向英国格利菲斯公司借款2.6亿元修粤汉铁路两事电中央党部，表示现在财政、军政、民政尚未完全统一，不平等条约仍然存在，遽募巨量外债，既未昭大信于国人，更加以重大之担负，是增加束缚，恐为建设前途之障碍。是日，中央党部复电，谓所称大举外债，建设实业一节，纯系关于吸收外资，开发实业，表示在整个计划未发表前，决不轻易举借。

△　江苏大刀会攻占溧阳。是日，大刀会首领潘瑶率部400余人袭击溧阳，该城军警猝不及防，县府被劫公款7000余元，县长、县公安局长狼狈逃匿，大刀会众焚烧商店，劫狱释放犯人，全城停业，损失20余万元。次晨，宜兴驻军开赴溧阳，潘率部退出。

△　日军第三师团从济南第二次撤退。是日至24日，侵鲁日军骑兵第三联队、第六联队第二大队及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中队，野炮第三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及第一中队将校级军官246人，士兵1896人离济南经青岛回国。

△　中美就安德思盗古案成立协议。是日，安德思在内蒙所盗掘古物86箱在协和医院开箱受检，各有关专家出席。马衡代表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张继与安德思在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历史学、考古学古物留华；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平分；有脊椎动物化石送美国，留一份在华；无脊椎动物化石留华，送一份与美，但嗣后得允许中国学者前往从事研究。

10月22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八次会议通过国民党海外总支部、支部、分部、区分部执行委员各条例。

△　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纪念周，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国府工作人员严守时间，准时上下班；服从官长，各尽其职。

△　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招待日本众议院参观团。蒋表示中日

悬案应本亲善原则，以外交方式迅谋解决，使双方得有圆满之结果。25日，参观团乘日本邮轮离沪返国。

△　河北省南部唐山县与津东唐山二字相重，河北省政府呈请改为尧山，是日国民政府准如所请，训令内政部知照。

△　第四集团军东征前敌各军成立点验委员会，李品仙为委员长，为缩军之先着。是日，李品仙抵津晤白崇禧，请示缩编问题。按：第四集团军除回后方缩编者外，津东前线仍有25万以上。

△　方本仁电北平报告奉天关于解决热河、关内撤防及东北易帜三事交涉情形。略谓："迭经国府来电催促，究拟何时实现，张汉卿对此亦颇注意，并经东省会议及叶琪到奉磋商之结果，除热河尚无彻底解决之方法外，其撤兵、易帜两项，决于最近期内践约实行。自号（20）日起，关内驻军即首先向关外陆续撤退，暂驻平奉线之锦西、绥中一带。易帜问题虽在积极准备中，卒以环境关系，尚须少缓时日，约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间，一律易帜。"

△　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

△　中日谈判举行第四次、第五次会议，日方要求以取消排日行为为济案谈判的先决条件，王正廷提出日方必须先从济南撤兵，对济案死伤人员道歉、惩凶，承认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行为，矢田不置可否。

△　白崇禧电国民政府转报英使蓝普森函告：在唐山、古冶一带护矿英军，一俟所需各项备妥，立即撤退。

△　沈阳商、工、教育界召开"东三省路权保持会"成立大会，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修筑吉会、长大铁路，劝告奉天省府拒绝签约。

10月23日　　国民政府第三次国务会议议决：国民党中央党部函开之军事参议院院长、参谋部参谋总长、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及行政

院内政、外交、军政、财政、交通、铁道、工商、农矿、教育、卫生部部长、国府文官长任命名单，照任命；国徽、国旗法草案重付审查；指定王宠惠整理行政院各部、会组织法。

△　国民政府明令设置铁道部，大学院改为教育部。

△　国民政府特任古应芬为国民政府文官长。

△　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曹万顺五师长联衔电蒋介石，要求军需独立，各师军需直辖于中央军需机关，师以下军需直辖于师军需处，使军需自成一贯之系统，俾领兵官得专心治军，不待期年，必有异效。

△　张学良在沈阳召集东三省军政会议，张作相、万福麟、杨宇霆、李振唐、高维岳、王树常、富双英、汲金纯、胡毓坤、于学忠、戢翼翘、于芷山等出席，至26日闭幕。决议：一、东三省军队裁减为10万人；二、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至不得已时以不设国民党党部为易帜条件；三、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　中日谈判继续进行，上午王正廷与矢田专谈济案，对赔偿款额、撤兵日期及惩办主凶诸点，争执甚剧。下午，矢田对于修约已允开议，惟税率条款，则要求保留。

10月24日　　国民政府任命行政院各部部长：特任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长；任赵戴文为内政部次长，阎锡山未到任以前，并兼代理部务。

△　国民政府特任李济深为参谋部参谋总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〇次会议，决议：一、任命门致

中等七人为宁夏省政府委员；二、任命班禅额尔德尼为青海省政府委员；三、任命何成濬为国府参军长；四、指定胡汉民、李济深、何应钦、谭延闿、古应芬、冯玉祥、戴季陶七委员讨论四川军政问题。

△　军事委员会开结束会议，蒋介石、冯玉祥、谭延闿、何应钦、李济深等出席，讨论该会总部及海军部结束后人员分配问题，推定冯、李、何等审查。31日正式结束，停止办公。

△　徐海剿匪总司令刘峙召集徐海剿匪会议，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出席。代表所提各案，多数通过。会议对于联防剿匪及惩治土匪办法，均有决定。24日闭幕。当夜，第九师师长蒋鼎文由京返徐晤刘峙，决定第一、九两师联合剿匪。

△　下午，吉林省议会召集省农、工、商、教等10团体开联席会议，决议三项：一、联衔致电张学良、张作相及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请保持路权，拒绝签字；二、各推代表一至二人会同延边代表赴奉协力抗争；三、组织“省路自主会”，专办抗路事宜，至达目的为止。推宋炎等五人为自主会组织章程起草人，将长大路照吉会路例，不借外债，由吉人自修。

10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九次会议，通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党员登记办法等项决议案：一、关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1）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依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例，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中央指定全额之半，选举法另定之；（2）未办完登记、未正式成立之省、特别市党部之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由中央指定之；（3）海外各总支部及国内各特别党部，亦合用以上第一、第二两项办法，其名额另定之。二、关于登记案，决议：（1）登记截止期为十七年12月底；（2）凡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及登记于中国国民党成立至民国十二年改组时之同志，得合用特种登记表，有真实之证明，即承认其党籍，特种登记表另定之。三、关于下层党部工作纲领，以地方自治为原则，实行识字运动、造

林运动、造路运动、合作运动、保甲运动、卫生运动。四、关于《防制共产党案》，决议采用各级连坐法。五、《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草案），决议通过。六、改派戴季陶、何应钦、胡汉民、李济深、缪斌为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凡13条，规定："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全责"；中央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为政治委员会当然委员；中执会得推定其他政治会议委员，其人数不得超过当然委员之半数；政治会议讨论及议决事项，计有建国大纲，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及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各省政府委员主席及厅长、各特别市市长、驻外大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之人选；政治会议之决议，直接交国民政府执行。

△　国民政府举行行政院成立典礼。下午，行政院院长及各部长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蒋介石主席，依次授印，行政院长谭延闿、财政部长宋子文、教育部长蒋梦麟、军政部长冯玉祥、农矿部长易培基、工商部长孔祥熙、交通部长王伯群、铁道部长孙科、卫生部长薛笃弼均亲自受印，并举手宣誓。中央党部代表蔡元培、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分致训词，行政院长谭延闿致答词。

△　国民政府发布整顿田赋令，令曰："吾国田赋之法，历朝屡变，舆图不确，册籍多讹。舛错支离，不可究诘。值兹训政开始，自应力加整顿，务期赋由田地生，粮随户转，富者无抗匿之弊，贫者无代纳之虞，以收田赋平均之效。除已谕内政、财政两部会函各省政府限期认真清理外，特此通令知之。"

△　张学良电蒋介石，谓中央对奉天、热河种种期待，已征各将领同意，本人因组省府及军队整顿问题，碍难南下领教，请随时示代表胡若愚电知。旋蒋电复，促将关内撤防、热河改组两事先行解决。

△　白崇禧由津抵平，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主张增兵河北，以备外患；张学良不遵守交还12辆列车诺言，奉方扣车辆占全国五分之三，如不交还，全国交通则遭破坏，迭次电催送回所扣车辆，亦未放回；东征军饥寒交迫，棉衣无着，究竟留津多久，饷项如何拨法等事，连日与阎（锡山）商量，尚未得具体办法。

△　中日谈判初步告竣。是日下午，王正廷与矢田于王宅举行第九次会议，6时半联名发表声明书，宣布中日间之协议，对于通商条约问题、济案、宁案、汉案，详细交换意见，对于各个问题之具体解决方法，意见一致，决定报告双方政府，以待训令。26日，矢田回沪。

△　江西省务会议通过《进口消费税则》，自11月1日启征。按：江西省原有收入，月共180余万，自将米捐、商捐、禁烟局及厘金局26所一并裁撤之后，每月收入减少100万元左右，致省库如洗，军政各费统无办法，故有此项决定。

10月26日　　国民政府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首述训政时期国民党本其历史上所负之使命，适应国家实际之需要，代行政权，而以治权授诸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设立五院，分负治理责任；其次除分别列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教育建设各要点外，并强调安定社会、裁兵节饷、整理财政为建设之先决条件。

△　国民政府第四次国务会议，通过任命吕苾筹为行政院秘书长；连声海、王澂、胡毓威、马叙伦、吴震春、张寿镛、李调生七人分别为铁道、卫生、教育、财政各部政务及常任次长；张群、鹿钟麟为军政部政务及常任次长等15项决议，通过《国民政府宣言》。

△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银行条例》，凡24条，规定资金为国币2500万元，25万股，政府认五万股，余由人民承购，总行设上海。

△　上午8时，北平各界在北海公园举行追悼黎元洪大会，阎锡山

主祭，英、美、德、比、法、瑞典、丹麦、挪威等国使馆均派代表致祭。下午，各民众10万人自由致祭。追悼会共开三天。

△　国民政府就易帜事电诘张学良，谓刻下三省外交既归国府负责办理，是三省外交障碍已除，奉方依然借助外交关系，屡次迁延，不果易帜，难免怀疑奉方无具诚意。

△　吉林省省城学生联合会召集市民大会，到10余学校及市民，约二万余人，会后游行，学生高举“收回吉会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旗帜，至省议会、省署、省交涉署请愿，要求拒绝日本修建吉会铁路之要求。

△　张学良电复白崇禧允拨车辆，并声明因调转延期极歉，并非食言，并谓奉电后又令交通委员会迅速办理。

△　奉天向捷克订购步枪万支，子弹1500万发，由挪威船“乌鸦号”运抵营口，31日卸竣。此系奉军于退出关外前所订购之军火。

△　上海《申报》及其他各报刊登路透社25日东京电讯称，日侵略满蒙之东方拓殖会社向美国纽约市国民银行借款1900万美元，作日人开发满洲及朝鲜之用。消息披露后，中国政界及民间极为关注。30日，驻华日使馆宣称，“东拓”所借美金1900万元，系用以赎旧债；实则以一半还旧债，一半用于满洲、朝鲜。

10月27日　　张学良、杨宇霆、罗文幹等与蒋介石代表张其宽、缪定保、白崇禧代表叶琪，连日来分别协议移防、交通、易帜、热河、外交各问题，决议：放还车辆、平奉通车，决先提前解决，双方暂行山海关为交界终点；奉军于本月底陆续撤退，所遗平东防地，由国民政府指定第四集团军接防；东三省整理军政与善后事宜，由张学良自行负责，惟易帜时期，须俟省政府组织成立时方能实现；对热河愿以和平处置，决调汤玉麟归奉，畀以省委或较崇职务，一俟派员赴热点编后，当可逐渐实行；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决由中央政府完全处

理，采取一致方针。

△　沈阳“东三省路权保持会”开会，延吉等四县代表及吉林省议会议长林鹤皋、吉林商务会长张松龄等出席，议决：一、对日本所提修筑吉会、长大铁路应严加拒绝；二、此案当事人赵镇，应请当局速予革职；三、日本如采取自由行动，市民大会即举行激烈的抗议示威。

10月28日　长春市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百余人，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反对秘密签订六大铁路协定！”等口号的小旗，在市内繁华大街游行示威，并发表演说，抨击签约人赵镇、常荫槐，被警察驱散。

△　中国回教公会在南京成立，马福祥、白崇禧、马良等19人当选为临时执行委员。

△　田中召集驻华日使芳泽等开紧急会议，研究对华谈判方略，决定训令矢田总领事，授以第二次交涉方针并决定派遣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赴华参与谈判。

10月29日　王正廷在上海接见中外记者，谈中日交涉等问题：一、条约问题与济、宁、汉各案，必将同时解决，务于最短期间订定新约；二、济案亦必与其他各案同时解决，而解决济案与撤退在鲁日军亦属连带关系；三、宁案有中美、中英、中法、中意各案之先例，故解决极易。

△　叶琪由沈阳返回北平，张学良派米春霖同来。当即谒见白崇禧，报告与奉方接洽经过。谓张学良因有杀父之仇，故立志服从国民政府，对关内野心确已放弃，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

△　蒋介石派吴忠信赴平，是日吴在北平中央饭店邀白崇禧、陈铭枢、王泽民、方振武、叶琪、魏益三等接洽平、津一带驻军缩编问

题。

△　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在成都设立办事处，处长阿汪敬呈请第二十四军司令部备案，已获批准。呈文略谓："吾藏地据中华民国之西南……以言形势，实为中国之屏藩，以言历史，则从来膺服中国之向化。是扶植藏民，即中国巩固国防之要略；而倾心宗邦，亦即藏民图谋自存之要道也。"

10月30日　　国民政府明令设置卫生部，着内政部即将关于卫生行政一切事宜，移交卫生部办理。

△　行政院第一次会议，谭延闿主席，通过军政部各署厅、司长及农矿、外交、交通、卫生等部次长任命案。内政部所呈北平特别市与河北省政府划分管辖区一案，议决照办。

△　中意宁案赔偿协定在上海签字，规定意国退还中国赔偿意方教士之抚恤金三万元，以助中国慈善事业及公益之用。

△　首都反日会召集各界50余团体代表数百人至国民政府请愿，推黄世杰等入府见蒋介石，由杨熙绩、王文藻接见。黄等当面呈交请愿书，提出中日交涉建议五项，其要旨为：完全撤退驻华日军；日本必须承认废除不平等条约；济案须日惩凶、道歉及赔偿损失。杨、王表示完全接受。

△　米春霖在北平接见记者，答复所提东北易帜等问题，略谓："易帜本属中国内部事，与外交截然为两事，似不能因外交而不办内政，然其实亦有许多关系。所以至今未实现者，即以事先必须将一切事办好，而后易帜，方觉妥当，国府方面亦深悉此种情形也。好在大家精神上既已一致，此等事必有实现之一日，且其期并不在远，此可敢告于国人者也。"

△　东三省路权保持会代表向张作相请愿，要求坚持拒绝日方要

求，并罢免吉敦路局局长赵镇职务，张均允诺。是日又见张学良，张表示尊重民意。

10月3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一次会议，任命江苏、浙江、新疆、四川省省府委员：苏省为钮永建等12人，浙省为张静江等10人，新疆省府委员为金树仁等九人，四川省府委员为刘文辉等13人；通过王用宾、王世杰、宋美龄等48人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决议杨森免予查办；决派刘湘、邓锡侯、刘存厚、杨森等八人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指定刘湘为委员长，邓锡侯、刘存厚为副委员长。

△　国民政府特任何成濬为国民政府参军长，何未到任以前，以参军吴思豫暂行代理。任命吕苾筹为行政院秘书长。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条例》，凡12条，规定公债总额为4500万元，周息2.5厘，25年还清。

△　蒋介石电告方振武，热河问题，刻与奉代表诚意接洽，谅可解决；指示方于北平就近主持其事。

△　驻华荷使欧登科、比利时代办纪佑穆、意使华蕾拜会蒋介石，蒋表示愿在平等互惠原则上，与各国益敦睦谊。

△　国民党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将热河全体公民代表赵胜等控告都统汤玉麟十大罪状、呈请撤职查办案，转电中央政治会议，请求迅予核办。

△　军政部长冯玉祥派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检阅第二集团军改编各部队，是日石携冯亲书交各官佐传阅之手札一件，离京北上。

△　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长有田抵沪，至驻沪日总领事馆同矢田商议，决入京进行第二次日中之交涉。

△　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发表户口统计，户数为31.1144万，人口为150.3921万，其中外侨2001户，计英、美、法、德、苏联、日等国侨民9449人。

10月下旬　　黑龙江省教育会会长王福维、副会长杨致焕电东北保安委员会，吁请“毅然决然，迅即改旗易制（帜）”。并谓“强邻横加干涉，不可理喻”。“因强邻之不利而我即不为，然必有利于强邻者而始为之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

是月　　北平市户口统计结果为：全市正式户口25.2521万户，126.75万人。

11　月

11月**1**日　　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资本总额2000万元（银元），总裁宋子文，副总裁陈行，总经理顾立仁。上午9时，举行开幕典礼，蒋介石主席并授宋子文总裁印。下午，正式开始营业。

△　国民政府任门致中、邵遇芝、李世军、魏鸿发、马福寿、白云梯、扈天魁为宁夏省政府委员，并指定门致中为主席。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〇次会议决定组织党务审查委员会，推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等11人为委员；通过《补行登记手续条例》；南京特别市党部有不尊重中央决议之言论行为，系该市指导委员会指导无力，应予警告；通过修正《海外各级党部代表大会选举法大纲》第三条及代表人数标准案；派李石曾、张继考核北平、河北、山东、山西党务。

△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到11个区党部、92个区分部代表，讨论中央最近延长党员登记时间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指定半数代表问题，佥谓中央延长登记时间及指定半

数代表实与训政时期发挥民主精神不符，议决提出反对意见，并派丘河清等九委员携联席会议议决案至中央常会陈述，为中常会所拒。当日下午，市指委会开会，指委丘河清、洪陆东、刘季洪、段锡朋、张厉生、靳鹤声、李敬斋、吴保丰、陈剑翛出席，议决全体总辞职，并将辞呈送中央党部。

△　全国禁烟会议在南京开幕，到谭延闿、褚民谊、王宠惠、王伯群、王正廷、吴思豫、薛笃弼、赵戴文、陈绍宽及各省市代表共200人。张之江主席并致开会词，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代表及行政院长分致训词，外长王正廷、内次赵戴文、东三省代表赵巽相继演说，大会收到提案300余件。下午，各省代表报告禁烟情形。

△　蒋介石电方振武、陈调元、吴忠信、杨杰，指示北平驻军缩编事宜：第四军团缩编为两师，称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第三十七军缩编为一师一旅，称第四十六师及新编步兵第一旅，第五军团缩编为一师，称第四十七师；第六军团缩编为一师一旅，称第四十八师及新编步兵第二旅，该部等应即就原驻地编并，统归改编主任吴忠信会同各该主管负责办理。同日，方、陈、吴、杨复电蒋介石称，遵即着手进行缩编，惟改编后之遣散费请从速汇平，并请整委会派员速来监督办理。

△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成立，是日政治分会全体委员宣誓就职，张知本授印，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监誓并致训词，胡宗铎及各委员致答词。

△　察哈尔省省政府成立，代理主席杨爱源偕委员彭赞璜、兰均宣誓就职。

△　第八路总指挥部在广州连日开裁兵会议，讨论两广裁兵问题，决定粤、桂各留三师，其余酌情编为省防军。

△　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开幕，市长张定璠主席并致开幕词，

蒋介石主持升旗礼。到中外来宾五万余人。

△　邢士廉、王树翰由沈阳抵津，邢发表谈话，谓上次与国府接洽系非正式的，此次奉东三省保安会正式派遣，与国府为正式之接洽。

△　驻唐山之英兵200余名撤至天津，其一部英兵于3日离津回国。

11月2日　国民政府第五次国务会议议决公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铁道部组织法》、《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改组浙江省政府，准何应钦辞省府主席，任命张静江等10人为省府委员；组织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文辉等13人为省府委员；杨森免予查办；设立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派刘湘等八人为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改组江苏省政府，任命钮永建等12人为省府委员；组织新疆省政府，任命金树仁等四人为省府委员。

△　国民党中央民训会新任常委胡汉民、戴季陶、缪斌就职，并召全体职员训话，对于今后民众运动方针有所说明。

△　蒋介石电苏、浙、赣、鲁、冀各省府主席，重申“各军队不准就地向各县及征收机关提款”；嗣后非经财政部核准有案，不能拨抵军费。

△　张继抵北平，9日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职。

△　张学良派程义明、米春霖、蔡钟麟携现款10余万元，助东征军给养，是日抵平交白崇禧。

△　张学良代表米春霖与白崇禧商奉方放还车辆问题，已有结果，是夜离平返奉。按：奉方扣关内机车400余辆、车皮5000余辆，占全国火车车辆五分之四，于全国交通影响甚大，白曾派员赴奉多次交涉。

△　热河省各团体代表数十人到北平卫戍司令部请愿，要求撤换汤玉麟。

△　江苏省政府第一五二次会议，通过钱大钧所提苏州设市案。

△　北平特别市政府就南京中央侨务委员会电嘱各省市政府不得允许外籍人在中国招募华工一事复电侨委，谓北平地区尚未发现外人招工事情。

△　侵鲁日军开始第二批撤退回国，是日，日步兵第十八联队之主力共770名，官佐27名，由指挥官村田少佐率领，乘日轮“大和丸”由青岛回国。

11月3日　是日至次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区党部及各区分部分别召开党员大会，拥护市指委以总辞职抗议中央的决定，并强调下级党部有权对中央违反党义的一切行为提出抗议。

△　建设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同美国无线电公司签订订购短波国际电台合同，价值60万元。6日，美国该公司驻华经理之电务公司总董杜莱在沪正式发表美中签订合同事。此一大规模无线电台设备，从美运到后，将于明春落成使用，届时中国与美欧各国可直接拍发电报。

△　陈铭枢偕叶琪离平南下，是日抵汉口，李宗仁设宴招待，席间对于东北军事善后问题有所讨论。陈于席散后对记者谈三事：一、前方军事已告结束，现中央派代表吴忠信驻平，与阎总司令、白总指挥商一切善后问题及裁缩军队，均拟有具体办法；二、热河省政府将由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张学良既为国府委员，自当遵从命令，听候解决；三、东省易帜，不久当可实行。7日，陈铭枢抵南京，当晚蒋介石招宴。

△　白崇禧在北平对复旦社记者谈前往新疆问题，略谓此事起因，系胡汉民游历土耳其时，土外长建议中国加强新疆防务，免入俄

人之手，胡回国后，写信希望余领兵前往新疆。设中央有令，派余率师入新，余自当前往。入新工作，最要紧为国防计划，应先谋铁路、航空事业之发达及联络，使新疆与甘、陕交通铁路计划完成，则国防自有相当利益。

△　日外务省亚细亚局长有田会晤蒋介石，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

△　首都反日会代表黄世杰谒蒋介石请愿，要求政府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对日交涉不能让步，侵华日军须完全撤退，方可开始谈判；济案最低限度，日本须惩凶、道歉及赔偿损失；并表示民众誓为政府后盾。蒋表示政府完全接受民众要求。

△　哈尔滨为反对日人修筑吉会铁路，是日召开市民抗路大会，到各界30余团体300余人，推教育会长王景仁、法大校长雷殷为正副主席，议决成立“哈尔滨市民抗路联合大会”，推选委员及常委后散会。当日，委员会开会议决电国民政府请抗议日人恃强筑路，否认局部外交，并电奉天总部力抗日人筑路，拒绝签字。

△　湘、赣部署第三次“会剿”江西红军，“会剿”部队为赣省四个旅，湘省六个团，人数达三万以上，任何键为“会剿”临时指挥；以刘士毅、杨池生两旅由遂川向大小五井进攻，韦杵、周泽源两旅由宁冈向井冈山进攻，何键部两团由桂东向江西大小五井进攻，吴尚部三团由茶（陵）、攸（县）向井冈山进攻；各路部队统限于本月10日以前集中完毕。

△　何键自衡州出发，巡视湘南，历18日，周巡永兴、资兴、桂东、郴州、宜章、桂阳、新田、嘉禾、蓝山、临武、宁远、常宁、祁阳、零陵、道县等16县，20日返衡。23日，何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李宗仁、鲁涤平，将湘南情形，分清乡、团务、军务、剿匪、“铲共”、讼案、灾情、党务、教育、交通10项，作有系统之报告。

△　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公布《惩办械斗办法》，凡12条，规定对械斗主犯处以极刑或无期徒刑，附从者处三年至10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

△　山西旱灾救济会电平津卫戍总司令部暨冀、察、绥各省政府，报告山西灾情。略谓：山西灾害频仍，兵燹饥馑，纷沓而至，雁北各县，被敌蹂躏者数月，人民之死亡，以数十万计，财物之损失，以数千万计。旱雹风霜，相继摧残，数月以来，饿毙者累累，全家服毒自尽者触目皆是。晋南今年自春至秋，无一雨泽，河流大减，井泉亦枯，夏田歉收，秋禾全无，民众家家缺食，粮价日日飞涨，以致盗贼滋起，路断人行，仰屋兴叹，无以为计。中部各县，大起鼠疫，计由临县而兴县，而岚县，而汾阳，每一村落，死者辄数十人，大有不可防御之势。恳请诸公捐资拯援，慷慨济施。

△　江苏溧阳县大刀会首领葛小妹妹（男）被捕获。该会有千余人，200余支枪。

△　驻华挪威代办奥尔门奉本国政府令由平南下，是日抵南京会晤外交部长王正廷商订新约事宜。

△　日军野炮第一联队一部士兵715人、官佐35人，工兵第三大队、步兵第十八联队一部及师团通讯队、野战电讯队士兵500余人，官佐17人，野炮第三联队一部，由青岛分乘日轮撤退回国。

11月4日　哈尔滨市民抗路大会电南京国民政府，略谓：日本乘危劫夺吉会、长大等路权，以遂其二线（南满、吉会）二港（大连、清津）主义，囊括东三省于南满铁道会社范围之下，使东三省沦为朝鲜第二。东三省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务恳钧府本保卫国家主权之责任，严词拒绝，痛予驳斥，毋使日人得遂奸谋。

△　哈尔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开会，讨论抗路反日事项，议决成立“哈尔滨学生保持路权联合会”，并定三日内外举行游行示威

及演讲，反对日人修筑吉会铁路。

△　奉方令关内吉军万余人即日撤回原防。

△　鲁涤平以湘省米价由每石四五元骤涨至八元以上，民众大起恐慌，是日发出布告实行禁运，凡华洋轮船、民船、火车，一概不准装运谷米输出省境。

△　山东全省日本侨民在济南开大会，议决济案交涉，须俟中国国情安定后，方可撤兵；撤兵之前，须先撤日侨。

△　日本山东派遣军野炮派成第九中队、第一野战医院，由指挥官水岛大尉带领，是日乘“美崎丸”离青岛撤退回国。

11月5日　美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令各省、市党部迅速办理登记，并将未组织健全之党部从速组织成立。

△　张继对北平报界发表谈话，主张保留政治分会。略谓：“个人意见，以为政治分会不必取消，政治分会可以助成中央统一，为有益于中央的。离京时亦曾与蒋（介石）胡（汉民）两位同志谈及，两人意见亦同。一部分人怀疑政治分会易构成割据形势，其实不然，本人主张应当存在。”并谓“本人最主张党内无派，不应有小组织”。

△　阎锡山电河北省政府，告以前次收复平、津时收编之士兵两万余人，现由平津卫戍总司令部派员按路分送回籍，定于8日由平出发，希冀政府通饬所属各县，务使士兵安然回籍，地方不受惊扰。

△　外交委员会开会，王正廷报告中日最近交涉情形，议决伍朝枢、戴恩赛分任驻美、古两国公使。

△　日满铁会社社长山本离奉归国，临行前往见张学良，力陈联日之利，同时要求承认日本增修吉会铁路及商租权利益。

△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人修筑吉会铁路。第六中学、三育中学、职业中学、华俄职业学校、女一中、工大、法大、许公等校学生亦出动游行，与一中会合，旋向长官公署街进行，高呼“收回路权”、“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行至长官公署门前，行政长官张焕相出见，表示支持学生爱国精神。下午过日领事馆，口号之声尤为激昂，日领馆大门紧闭，不敢出视。4时至买卖街道尹公署请愿，道尹蔡品三因有勾结日人之嫌，学生包围公署达一小时，高呼口号，旋因天色过晚，由代表宣布解散。

△　张作相传见吉林各校学生代表，宣布吉会铁路交涉经过，嘱静候正当解决。

△　李品仙自德州电蒋介石，请起用前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从优位置。蒋复电嘉许。

△　李宗仁电蒋介石告灾，略谓两湖雨泽衍期，秋收绝望，灾情重大，需款浩繁，决非地方财力所能赈济，而粤、桂、苏、陕、甘、鲁等省，同罹困境，应请中央速办大规模之赈济计划，倡借外资，以工代赈，拯救万民。

△　日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大队本部及第九十、九十一各中队，由指挥官河部少佐带领，搭乘“三云洋丸”，步兵第六十八联队临时编成之第一、二中队、临时派遣电信队，由指挥官平柳大尉带领，搭乘“立石丸”离青岛回国。至此，日本山东派遣军第三次撤兵输送完毕。

11月6日　国民政府令前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免予查办，着将所属部队分别裁编，听候中央任使。

△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洪陆东等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原则及登记问题，往谒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有所请示。蒋就所提问题说明中央意见，并表示负责将各下级党部意见转达中央。

△　蒋介石出席全国禁烟会议，发表演说，称："如果大家要救中国，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凡调查中央政府人员确有吃烟贩烟或有鸦片嫌疑的，呈请政府，政府自当负责一一处理。""深望本会能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

△　第二集团军点验委员长石敬亭电冯玉祥，报告赴开封、郑州各处点验情形，并沥陈财政困难，官兵衣食不周，伤兵治疗不善，遗族抚恤及遣散无资，请冯向中央提议，速拨大宗款项，设法救济。

△　张学良派莫德惠赴日参加日皇加冕典礼。莫在日期间，日首相田中邀宴，谈及东北易帜问题，莫告以明年元旦前即实行易帜。田中表示：日本在东北有许多既得权益，如东北易帜，苏俄凭恃中东铁路得寸进尺，东北不足以应付苏俄之侵略，日本愿以全力协助，此为交邻友好应尽之义务。莫又谓："东北决不容赤化，与贵国防共之意相同。但东北一隅，抵抗苏俄自有不逮，故有易帜之举。若中国全国统一，则苏俄野心自可戢止，因此必须易帜。"田中遂云："此为中国内政问题。"莫以田中此语是对易帜之默认，于大典后即返奉复命。

△　全国商会电张学良，请拒绝日人要求，自筑吉会铁路，略谓："吉会路权，关系东省存亡，亦即关系全国存亡，日人野心，欲依此而完成其满蒙路网化政策，应请拒绝要求，集资自筑……务恳秉承民意，明白表示，本会愿领导全国商会为后盾。"

△　哈尔滨市总商会致电东三省当局，要求严词驳斥日人索路要求。略谓："皇姑屯事变以来，我方喘息未定，哀痛犹存，日人竟乘丧压迫当局一一强索建筑吉会、吉长路权，若使得逞，我东三省之大好河山，将步台湾、朝鲜之后尘。"

△　云南省政府暨军民全体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查核前例，申令全国，于云南首义拥护共和纪念日（即护国首义纪念日）——12月25日，照旧一致举行纪念典礼。

△　全国商会以广东汕头内地税局擅订苛例五项，致商货停运两月之久，工商失业不下数万人，金融枯竭，华侨失望，是日呈行政院请求取消汕头税局五项苛例，仍以旧章施行。

△　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在上海病逝。

11月7日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军事委员会，所有该管一切事宜限11月10日以前结束，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办理。10日，军事委员会议决通电全国报告奉命结束。

△　国民政府任王用宾、王葆真、王世杰、方觉慧、田桐、史尚宽、米和中、吴铁城、吴尚鹰、吕志伊、宋美龄、邵元冲、周震鳞、周览、林彬、马寅初、恩克巴图、孙镜亚、庄嵩甫、陈肇英、陈长蘅、陶玄、黄昌谷、黄居素、郭泰祺、曹受坤、张凤九、张志韩、傅秉常、焦易堂、曾杰、赵士北、楼桐荪、邓召荫、刘盥训、刘克俊、刘景新、刘积学、郑毓秀、郑忭辰、蔡瑄、卫挺生、卢仲琳、卢奕农、缪斌、戴修骏、魏怀、罗鼎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浙江省政府：委员何应钦、朱家骅、陈其采、程振钧、蔡元培、蒋伯诚、蒋梦麟、马寅初、陈屺怀、双清、庄嵩甫着即免职，并免朱家骅、陈其采、程振钧所兼民政、财政、建设各厅厅长职；任张静江、朱家骅、钱永铭、程振钧、叶琢堂、蒋伯诚、黄郛、陈其采、何辑五、周骏彦为委员，并指定张静江为主席，朱、钱、程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苏省政府：委员钮永建、茅祖权、张寿镛、陈世璋、何玉书、叶楚伧、张乃燕、陈和铣、高鲁、刘云昭、何民魂、缪斌、钱大钧着即免职，并免茅祖权、张寿镛、陈世璋、何玉

书所兼民政、财政、建设、农矿各厅厅长职；任钮永建、叶楚伧、缪斌、钱大钧、陈辉德、张寿镛、顾祝同、张乃燕、陈和铣、王柏龄、何玉书、吴藻华为委员，并指定钮永建为主席，缪斌、张寿镛、王柏龄、何玉书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农矿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明令组织四川省政府，任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谢持、任鸿隽、刘湘、田颂尧、黄复生、杨森、吕超、卢师谛、熊骅、卢仲琳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并指定刘文辉为主席；邓、向、任、谢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派刘湘、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赖心辉、郭汝栋、杨森、胡若愚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指定刘湘为委员长，邓锡侯、刘存厚为副委员长。

△　国民政府任朱培德、鲁涤平为湘赣两省“剿匪”总副指挥。8日又训令朱、鲁“督饬部队会同进剿，限于本年十二月以前肃清，以靖地方”。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铁道部组织法》，凡21条。

△　国民政府颁布《察访贤才令》：各省政府就旧道区域内，选择公正廉明有学识经验者，每区、县一至三人，汇报政府，以备录用，并随时以地方情形咨问，并着由行政院迅即拟定人选资格及详细办法，呈候核定施行。

△　国民政府颁布《清除盗匪令》，并着行政院饬由军政部拟订各卫戍区军队查缉盗匪考绩条例，由内政部拟订各县长、公安局长查缉盗匪考绩条例及地方保卫团条例，呈候核定施行。

△　国民政府明令植树造林，限制采伐林木，并着农矿部速行编订森林法规及奖励种林条例，呈候核定施行。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二次会议，加推赵戴文、蒋梦麟

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司法行政署改为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处改为最高法院，行政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议决照改；指定蒋介石、谭延闿（召集人）、戴季陶、胡汉民、王宠惠审查国民政府各部组织法；改组全国注册局为商标局，所有公司商号注册事项，改由工商部主管，矿业注册事项，改由农矿部主管；任方振武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通过任命魏道明为司法行政部长，林翔为最高法院院长；派刘文辉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通过建设大纲草案原则。13日，国民政府发表魏、林任命令。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省县区各监委会组织条例》。

△　蒋介石召见赵戴文，指示再促阎锡山本月内来京供职；南京近郊剿匪计划，应由内政部责成江苏省府克日进行；积极举办地方自治，先从苏省入手，一面修筑京东及环湖公路，以绝茅山及太湖之匪源。

△　陈调元、范熙绩由津赴芦台、唐山一带，检阅第四集团军前敌各部缩编成绩。

△　济南惨案代表团孟民言、刘旭初、张天彪、武竹亭、孙文景等列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济案发生后鲁人受惨杀及日军勾结土匪屠村之惨状，希望中央抱大无畏精神，解决济案。同日，济案代表团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交请愿书，提出对日交涉八条，其要者为：一、所有驻华日军立即退出中国，然后开始正式谈判；二、惩办杀人凶手福田彦助及日领西田；三、日本政府应向中国政府谢罪；四、日本应赔偿损失，抚恤死难同胞及其家属；五、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六、收回旅顺、大连及各地日租界。

△　吉林省延边农工商联合会通电全国，吁请张学良“为维持中国之独立主权计，为尊重三省人民之公意计，为顺应国内政治之趋势计，均应立改其迟疑之态度，毅然决然，即日易帜，以表示不甘屈服

于帝国主义者之非理压迫而实现全国统一之精神”；主张由吉林民众采取自主政策，于11月15日一律改悬青天白日旗。

△　张作相通电全国，严禁吉林省学生活动，违背者格杀勿论。

△　哈尔滨市民在省议会集会，宣告成立黑龙江东三省路权自主会。

△　哈尔滨行政长官张焕相召集哈尔滨市中学以上学校代表到行政长官公署，谕令勿单独举行示威游行，应组成小团体，为下层宣传，使社会一般民众知道满蒙五路之利害。

△　何键在湖南资兴电蓝山、嘉禾、临武、新田、宁远五县县长，12日前集中桂阳商讨“会剿”共产党办法。

11月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一次会议议决，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丘河清等辞职不准；由中央召集南京、上海特别市及江、浙、皖省党务指导委员报告工作，说明中央党政方策之意旨；通过筹备总理奉安办法；设党歌曲谱审查会；推孙科、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负责整理中央财务，总理生辰放假一日。

△　国民政府颁布整理四川政令，略谓：政府关怀川局，业经任命委员，克日成立省政府，为初步之筹备。其关于军政者，川省养兵巨万，应即大加裁汰，尽量缩编，厘定军额军制，不得自由扩充，兵工厂一律停办；其关于民政者，地方官吏应统一任命权于省政府，切实筹备地方自治；关于财政者，多种苛捐杂税应即一律废除，各处造币机关一律撤除；其关于教育者，所有教育经费不得挪用，改良教育内容，实行三民主义国民教育；其关于民团者，各县民团应归县政府直接监督指挥，严禁军队收编；其关于司法者，法官任免，应听中央命令，地方政府及军队不得干涉，司法经费不应减少。并谓：“此为政府整理川政最小限度之计划，应责成该省政府于最短期间全部施行，然后再为第二步之设施。所有施行细目及办法，限该省政府于成

立后一个月内具报政府查考。”

△　晨，蒋介石自南京出发，校阅第一集团军各师，下午抵蚌埠。次日由蚌赴凤阳、临淮检阅顾祝同师第四旅，当日返回。10日在蚌检阅顾师第五旅，并集合官兵训话，谓江北匪风日炽，各驻地官兵应设法清剿，先期安内，然后方能攘外。

△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各区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讨论中常会第一七九次议决案，中常会派书记长王陆一到会说明中央意旨，未有结果，当即推派谷正纲、吴健、刘竹岩三人列席中常会，请中央撤销指派代表及特种登记两项议案。

△　李宗仁电蒋介石请办关税附捐，拨充两湖灾区工赈之用，如以全国办理为难，或单就两湖境内各税关酌加若干成提充，借资救济。

△　张学良代表王树翰、邢士廉抵沪。邢对记者宣布，奉张学良正式派遣，全权代表三省，来京陈述一切。

△　吉林500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散发敦促悬挂青天白日旗和南北统一的传单，并携有青天白日旗齐赴省议会，将副议长等四名议员绑起，挥舞“请看卖国贼”小旗，拥向省长公署，被武力所驱散，20余名学生被捕。

△　吉林省城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响应延边吁请易帜通电，召集各校学生及民众约万人，手持青天白日旗，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南北统一”等口号，结队赴省署请愿易帜。省长张作相召代表入见，谓易帜事关重大，三省既系一家，办法不可独异，况强邻虎视，万一举动稍涉激烈，发生意外，非爱国而反误国矣。各校代表以当局意志坚决，遂即解散队伍。

△　驻沪日总领事矢田奉本国政府训令二次赴南京，与王正廷作

宁、汉两案之具体交涉。双方对《中日宁案协定草案》、《中日汉案协定草案》逐条修正。宁案我先对日表示歉意，汉案日允向国府道歉，并由中日双方派代表组成宁汉案调查会，至协议草案须经两国政府核准后始能签字。王正廷坚持中日各悬案同时解决，矢田允对济案、修约俟向日政府请示后，再来京谈判。9日晨，矢田离京返沪。

△　驻沪日总领事矢田在南京访晤财政部长宋子文，关于关税自主及盐税问题，有所讨论。

△　芜湖市54家布商，因济案前所定购日货1980余件，货运到埠后被禁止起卸，宣告全体罢市。11日，芜市染布业罢市响应。

△　美国共和党胡佛7日当选为总统。是日，外交部长王正廷电胡佛表示祝贺。

△　朱德率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一营及特务营共五营兵力，攻占江西宁冈，熊式辉第五师之第十四旅周浑元部第二十七团第三营弃城退守七溪岭。

△　南通大学成立，由南通医、农、纺织三专门学校合并改组而成。

11月9日　　国民政府令：民国十八年3月12日为总理灵柩奉安于首都紫金山陵墓之期，着京内外各机关届时举行隆重典礼，特派林森、郑洪年、吴铁城赴北平恭迎总理灵柩。

△　国民政府公布《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凡11条。

△　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二次会议议决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等案，议决照案公布；任冯玉祥为豫陕甘赈灾委员会主席。

△　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第五十五次常会，为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向中央提出建议：一、各省、市、区及等于省之党部正式成立半数以上后，开三全大会；二、正式成立省、市、区党部之区域之代表，完全由选举产生；三、总登记已办理完毕之省、市、区地方，由中央从党员选出代表之倍数中圈定；四、总登记未完之省、市、区代表，应由中央指派；五、海外总支部及各特别党部代表产生办法，照二、三、四项办理。另对特种登记办法，认为确与十三年改组精神不符，应请中央勿予施行。

△　上午，哈尔滨各院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争路游行示威，抗议日人强索筑路权。学生手执小旗，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走狗”、“反对吉敦路延长”、“不承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收回路权”等口号。被滨江警厅警察开枪镇压，伤140余人。

△　哈尔滨学生保路联合会紧急通电全国，陈述学生为反对日军擅筑铁路之爱国举动横遭枪击一事的经过，称我等为唤醒民众，游行示威，虽首断腰折，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同日，哈尔滨教职员联合会发出争路通电，恳请南京国民政府与奉天当局毅然拒绝日本修筑吉会、长大两路，全国父老奋然崛起，救国保种。

△　下午，冈本代替矢田与外交部代表周龙光会谈中日未决问题。决定济案会谈地点设在南京。中国方面坚持日军必须从济南撤兵方可开议，修约一事，中方主张废止中日旧约，日方则坚持旧约延长10年。

△　湖南全省清乡督办鲁涤平、会办何键电蒋介石、谭延闿、李宗仁报告“清乡剿匪”经过，略谓：“自本年五月奉军委会令成立以来，‘清剿’计划未能实现，虽经收复共军所陷城池，‘追剿’朱、毛，克复宁冈、永新，一面击破宁远、阳明之周文、陈光保两股，并打散桑植、石门之贺龙，扫除衡、邵、武、绥、新化、湘乡及沿源河流域各属‘散匪’溃卒，兼捕共党首要彭公望、张嗣同、米世珍、彭搏黄、周圣工等数十人，共党千余人，破获共党湖南省委、湘赣特委等重要机

关数十余处，而潜伏共党铲除未尽，审核共党自首诸事，一时未能了结，为时数月，事变纷起，收效甚微，良深内疚。”并谓为尊重省政府委员会议决案，清乡督办署拟即于11月底结束，所有未了事件，交由省政府办理。

△　天津德文书店售性史书籍，是日公安局将经理赵梦九捕获罚办。

11月10日　　国民政府令京内外各机关，关于中央银行发行各项兑换券计一元、五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须与现金一律行使通用。

△　下午，蒋介石离蚌埠赴徐州，沿途在固镇、南宿州检阅第二师驻军涂思宗等部。晚7时40分抵徐州，驻徐州第一师师长刘峙偕张先瑶、徐庭瑶等并各界代表到车站迎候。是晚，徐州各界代表宴请蒋介石，要求澄清吏治，免除苛捐杂税。

△　建设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与美、德两国代表在沪签订中美、中德《无线电报务合同》。

△　全国禁烟会议闭幕，通过全部审查议案，发表宣言，立法院长胡汉民到会演讲禁烟。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责一七九次中常会关于指定三全大会半数代表之决定为“垄断选举”，“无异将本党民主制度完全摧毁”，要求立即取消中常会一七九次决议案。19日，国民党中央复函何香凝“解释”，谓指定代表及特种登记乃有不得已之“苦衷”，望“忍耐辛勤，护维全局”。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第一集团军在平各军团改编主任吴忠信接蒋介石电，关于河北各军改编事，中央整理委员会拟不派员北来，即令吴在平组织缩编委员会办理。是日，吴邀杨杰、陈调元、

方振武、徐源泉、高桂滋开会，商定由第二、第五、第六各军团各选派五人为委员，分两组，推米熙为点验组主任，冷遹为裁遣组主任。

△　下午，王树翰、邢士廉由上海抵南京，接洽东北易帜事宜。邢对记者表示，东北唯中央意旨是从，东北系中国领土，希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　晨，吉林省长春市内各商铺门前，遍插纸制之青天白日旗。警厅闻报大惊，全体武装出动，拔除纸旗，并沿街搜索插旗之人，捕获学生一人。当日，长春学生会发表宣言，宣称南北妥协，中国统一，从今日起，本城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旗。

△　戴季陶在南京向军校教官、学生训话，谓总理手定建设程序首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再次为民族，故民生问题若不解决，则民族、民权决难实现。

△　李宗仁在武汉召集商会、银行及财委会代表周小泉等五人商解决债务纠纷办法。

△　中美士兵共同修建平津公路纪念塔在杨村落成，傅作义主持开幕典礼，到美陆战队司令、驻华美使等中外来宾200余人。

△　徐州进化书店因有共产党嫌疑，奉省令查封。

11月11日　　蒋介石在徐州机场检阅第一师刘峙部并训话，要求士兵服从命令，精研技术，并从徐州中央银行提款一万元，奖第一师官兵，每人洋四角，又令驻徐州之第三十七军炮二团何邦杰部改归中央节制。

△　北平总部行营开会，到阎锡山、商震、白崇禧、陈调元、吴忠信、杨杰，讨论第一、三、四集团军缩编办法，因军委会已结束，各集团军名义取消，总部行营亦准备收束，电国府速拨编遣款项。

△　广东航空署长张惠长及飞机师杨光宇驾驶“广州号”飞机由广州飞汉口试航成功。15日自汉口飞抵南京。冯玉祥、李济深、孙科、何应钦、古应芬及各界代表千余人在机场举行欢迎大会，孙、冯、李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中华航空协进会致欢迎词。

△　哈尔滨18所学校学生反对敷设吉会铁路，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学生三人死亡，50人受重伤。驻哈日总领八木以事态重大，竟向中国提出抗议。

△　东三省旅平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反对日人侵占东三省路权，并成立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

△　南京反日会举行招待会，全国反日会、济案后援会代表及报界记者参加，黄世杰主席，济案代表刘旭初、留日学生外交后援会邵光烈等发表演说，要求集合全国反日力量，废除不平等条约。

△　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收编之张宗昌旧部军长吴杰因不服从缩编，是日在通县哗变。方振武闻讯即派兵追剿，吴逃至独流镇率手枪队一连冲出重围，旋匿迹天津日租界。

11月12日　　中挪《关税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挪威驻华代办欧勒在上海签字，其内容要旨为撤销中挪旧约内税款各条文，适用关税完全自主原则；关税问题上，彼此给予最惠国待遇。挪威同意以平等、互尊主权为原则，同意全部修订新约。26日中挪《关税条约》在两国首都同时全文发表。

△　全国各地举行大典，庆祝孙中山诞生六十二周年。是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分别举行总理诞辰纪念会，胡汉民、谭延闿分别在党部与国府会上讲述总理诞辰之意义。同日，北平、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杭州、徐州、南昌、太原、长沙、芜湖等市各界集会，庆祝孙中山诞辰。

△　江苏省政府改组，新任省府主席钮永建及委员张乃燕、何玉书、张寿镛、缪斌、陈和铣、叶楚伧、王柏龄、陈辉德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戴季陶、国民政府代表胡汉民监誓并致训词。

△　蒋介石离徐州赴海州新浦检阅第九师。第九师师长蒋鼎文及当地党政军民千余人冒大雨欢迎。次日上午，蒋对第九师官兵训话，要求“忠于党国，服从长官，明瞭主义”。

△　平奉铁路恢复通车，第一〇六次直达客车由沈阳开出，14日到平。

△　南社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在苏州虎丘举行，到社员110余人，陈去病主席，议决编辑南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推举柳亚子、陈去病、胡朴安、朱梁公等五人为编辑委员。

11月13日　　国民政府特派孙科、王正廷、王宠惠、冯玉祥、刘治洲、许世英、宋庆澜、王瑚、胡汉民、李元鼎、戴季陶、刘尔炘、王震、马福祥、奎印、薛笃弼、王芝祥、王人文、丘莘昀、虞洽卿、李云书为豫、陕、甘三省赈灾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冯玉祥、许世英、刘治洲为常务委员，冯玉祥为主席。

△　国民政府改组安徽省政府，令准免委员兼民政厅长刘复，委员兼建设厅长胡春霖本兼各职，免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兼职，任罗良鉴、袁励宸、李范一、吴醒亚为委员，罗、袁、李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各厅厅长，罗未到任前以吴暂代。

△　国民政府派刘文辉、李家钰、孙震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任周亚卫、贺耀组为训练总监部训练副监；任贺国光为训练总监部步兵监，汪镐基为骑兵监，张敬修为炮兵监；任刘汝贤、葛敬恩为参谋部参谋次长；任张治中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

主任，王右瑜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部主任，准王柏龄、王右瑜分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部主任、训练部主任职。

△　行政院第三次会议议决赈灾款项先筹拨100万元，另饬财政部计划发行公债，拨办赈务；王伯群请辞交通大学校长兼职照准，任孙科为交通大学校长，提请政府分别任免。19日，国民政府发表王、孙任免令。

△　全国商会联合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外交、财政、工商部，略谓七级差等税为军阀时代各国关税会议所议决，足致商人于死命，商民万难承认此自杀之税率，务恳毅然宣布，自十八年1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

△　李燊第四十三军由鄂西来凤、咸丰向四川酉（阳）、秀（山）进攻，与周西成部黔军侯旅激战六小时，李军不支，向来凤退却。17日，蒋介石电李仲公，嘱其转告李燊停止军事行动。

11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三次会议议决《惩办绑匪条例》；《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自11月18日起，再准展期六个月；通过《卫生部组织法》；任蒋作宾兼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邓锡侯请辞四川裁编军队委员会副委员长，应勿庸议；加派李家钰、孙震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沧石铁路敷设不用窄轨，交铁道部办理。19日，国民政府发表蒋作宾任命令。

△　国民政府任钮永建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蒋介石离新浦沿津浦线东行，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随行。沿途在新安镇、运河等站检阅第二十六旅李延年部。

△　张学良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免职，任张学惠继之。按：张焕相因对学生易帜要求措置失当，故被免职。

△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召集三省议会代表开常驻委员会，讨论

东省路权问题，对延边农工商联合会代表请愿之举动，认为正当，表示支持。17日，议会联合会咨请东北保安司令部、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尊重民意，“对于日人所要求之（吉敦、吉会）各该路权，严辞拒绝”。

11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二次会议议决委任阎锡山等89人为第三、四集团总部、第八路总指挥部、首都卫戍司令部、第五、第三十八军及第三、十、十五、十七、十九各师特别党部筹委及筹备员；任赵戴文、蒋梦麟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　下午，蒋介石离徐州北上，在临城校阅第十三师之第三十九旅。16日晨抵达兖州，在兖州机场校阅第四师缪培南部后于17日下午4时多返回徐州，刘峙等前往迎接。

△　铁道部长孙科电张学良，请放车运粟入关，赈济西北灾荒。略谓：“西北六省，灾民达两百万，枕藉沟壑已五十万，比闻三省仓有朽粟，榆关以东，存车数千，机车亦有六百，弟意即由尊处发起急赈，便以余车载运余粟，输送入关，分配灾区。”

△　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电国民政府，报告所部奉令缩编为两师，归中央直辖，现已编遣就绪，第五路总指挥职务应即解除，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已于本月10日撤销。

△　川军将领刘文辉、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电旅外川省府委员谢持、任鸿隽、黄复生、卢师谛等，盼速回川，商组四川省政府事宜。

△　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电中央党部抗议指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略谓特种登记办法，违反总理十三年改组精神，请鉴察舆情，提出复议，改订办法，以重党纪。

△　是日至次日，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学生数千人游行示威，声

援哈市路案，反对吉敦路延长，拒绝长大路由日人建筑。

△ “新大明”轮案公断员裁决撞沉事件应由日轮“第二厚田丸”负责，须赔偿“新大明”损失26.3159万元。

11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三次会议议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在十八年3月15日举行，代表选举法另定之；关于特种登记案，通过《修正补行登记手续条例》；训令各级党部以后不准攻击中央委员个人，其不接受此次警告而开会者，即移付监察委员会惩戒。

△ 国民党中央党部训令各省党部，谓近查各级党部每对于中委个人，妄事攻击，殊有未合，为此明令申诫，嗣后如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委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

△ 国民政府第七次国务会议议决公布《卫生部组织法》、《惩治绑匪组织法》、《商标局组织法》；《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自11月18日起，再延长六个月；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朱培德辞职照准，改任鲁涤平为总指挥，金汉鼎、何键为副总指挥；王伯群辞交通大学校长兼职照准，任孙科兼交通大学校长；任蒋作宾为驻奥地利国特命全权公使。

△ 浙江省新任省府主席张静江（人杰）偕府委宣誓就职。同日，张静江发表就职宣言，声称要努力于政治建设，“以与障碍实现三民主义者奋斗”。“今之障碍实现三民主义者，内固有土豪劣绅及似将形成之资本阶级，然大敌则在外国之新旧帝国主义。使旧帝国主义者之势扑灭，彼土豪劣绅固以无所依附而自亡，即似将形成之资本阶级，亦如日出而爝火无所容其光。今吾党于旧帝国主义者，固必誓百死以摧崩之，而新帝国主义，若所谓共产党者，尤为以政治的建设而实现三民主义之障碍。……人杰闻吾浙一年以来，亦颇蒙其害”。“人杰于浙亦惟知恪遵（总理）遗教，努力以扫除此障碍国民革命成功之新旧帝国主义，而促成三民主义之实现”。

△　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盐务稽核所对外宣言，宣布为使盐政纯由财政部完全管辖起见，须修改盐政旧章，按照新规章，中国政府按照1913年善后借款合同设置之盐务稽核所，嗣后除由财政部长拨付偿还借款应需之款外，不再负保管任何款项之责任。

△　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联名通电宣布东北裁兵情形：一、将现有步兵40余师旅缩成15个旅，骑兵六个师缩成两旅，炮三旅两团缩成八个团，工兵缩成六营，辎重取消，另设辎重教导队；二、裁减官兵数目约40余万，除留编约15万外，共裁官兵约20余万；三、新裁官兵按照志愿，分别遣送归屯垦公署服务或分别资遣等；四、已于10月27日撤销军团部，11月3日撤销军部、师部；五、每月支出可节省军费200万以上。

△　参谋部参谋总长李济深由沪返粤，临行前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返粤在于收缩军队及整理财政；参谋部已组织就绪，返粤后由次长刘汝贤代。陈铭枢同行。20日抵粤。

△　外交部特派员王大桢离日本返回。临行前致大阪《朝日新闻》一声明书，略谓："自本年七月东渡以来，向贵国朝野人士开陈意见，并聆其高教，凡讲说三十二次，开垦谈会十一次，访问各方面要人百余人，及其他除投稿与书面外，径与贵国人士接触之数，计达三万以上"，"对此谨衷心表示谢意"。

△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电中央党部，请援豫、陕、甘例，以工代赈，举筑同蒲铁路，修治汾河，筹设冶铁厂，开采煤矿等，赈济晋人。

11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命金树仁、王之何、徐谦、刘文龙、阎毓善、李溶为新疆省府委员，指定金树仁为主席，王、徐、刘分兼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令：《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自十七年11月18日起，

再延长六个月。着各省、特别市政府在六个月内，应会同各卫戍区军事长官，督饬所属务将境内盗匪认真缉办，一律肃清。

△　国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组织法》、《修正司法院组织法》。

△　国民政府以《疾风》周刊、《双十》月刊，均立言悖谬，训令江苏省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严密检查，务期禁绝。

△　国民政府以《暖流》半月刊“肆意攻击，意图煽惑民众，危害党国”，训令天津特别市政府切实查禁。

△　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苏、浙、皖三省及京、沪两市党指委谈话，到苏省指委滕固等五人，浙省指委许绍棣等三人，皖省指委金维系等六人，京市指委丘河清等六人，沪市指委王延松等四人，中央党部书记长王陆一主持。各指委报告党务情形，并提交呈请中央文件多种，王陆一允为转呈常务会议，再定日期正式谈话。

△　蒋介石离兖州南下，在邹县校阅第四师第十二旅及教导一团，下午返徐州。同日，蒋在徐州对记者谈党务，答复所提近来南京市指委与各处党部反对中央决议之问题，略谓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决议有不同时，在党内抗议无效，“亦应服从，断不能因此诋毁中委个人”。“望各级党部绝对服从中央决议，勿稍用意气”，“力戒内部倾轧与上下之隔阂，否则长此互相倾轧，恐亡吾党者非共党，乃本党同志自亡之；灭吾国者非外寇，乃吾党同志自灭之也”。

△　蒋介石通令各师、旅、营、连之佐属，非军士学校出身者，应即一律裁撤。

△　蒋介石令江苏省政府会同浙江省政府辟一南京至杭州之公路，限明年3月前竣工。

△　外交部电促驻华西班牙公使嘎利德南下，商修约及关税事

宜。

△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开常会，议决函省政府查封王占元在保定之乾义、乾丰两公司财产。

△　第三届国际运动会在上海举行，18日闭幕，中国队获团体总分第三名。

11月18日　　蒋介石离徐州南下，沿途校阅第十一师骑兵后，下午抵蚌埠。19日乘汽车经怀远抵寿州，校阅夏斗寅第十三师。又赴正阳关校阅第十三师第三十七、第三十八两旅。20日至蒙城、阜阳，校阅岳维峻、樊钟秀两部。

△　冯玉祥电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回国，谓“当此国家多事之秋，非名将高蹈之时，务祈大旆即日返国，共策至计”。按：杨于旬日之前东渡日本，冯以杨军尚有三师驻鲁南一带，为商该军改编事宜，故有此电。

△　第十二军叶琪部第一、二、三师全部开回湖北省境内，分别驻防于孝感、花园、广水。是日，该三师师长门炳岳、何宣、危宿钟同赴汉口，向叶琪报告驻防详情。

△　张学良指示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调查哈埠惨案。是晚，于珍偕省教育厅长等数人抵哈尔滨。次日，于珍慰问受伤学生，并代表张学良赠款1000元作医药费。

△　国际劳工局长多姆斯由奉抵北平，驻华法公使玛太尔随行。多姆斯称此行系考察中国劳工情形，及与国民政府接洽合作方法。次日会见阎锡山。

11月19日　　国民政府特派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王宠惠、蒋梦麟、魏道明为中意庚款委员会委员，并以蒋、李、魏为庚款委员会出席委员。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组织法》，凡20条。

△　国民政府电周西成、李燊制止黔、鄂战争，静待解决，并电李宗仁迅查实在情形，妥善处置，务期消弭战祸，巩固大局。

△　第四集团军前敌各军第十二路指挥李品仙自唐山抵北平，谒白崇禧协商裁编及军饷问题。

△　第四集团军总部正式发表第三期缩编命令：一、独立第八师归并第一师，以韦云淞、杨腾辉、刘春荣分任第一、二、三旅旅长；二、周斓第十七军魏镇藩师、廖磊第三十六军之凌兆尧师、罗启疆独立第二师，合编为第八师，以李品仙、唐哲明分任正副师长，凌兆尧、魏镇藩、罗启疆分任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旅长，周斓调充总部高等顾问；三、叶琪第十二军、第十七军直属部队及彭位仁师合编为第九师，以叶琪、周维寅任正副师长，门炳岳、何宣、危宿钟分任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旅旅长；四、第十七军周祖晃师、第三十六军颜仁毅师、张节师合编为第十师，以廖磊为师长，颜仁毅、周祖晃、张节分任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旅旅长。

△　张学良电复孙科，略谓："承示西北各省灾情奇重，极为恻念。弟于一月前业经发起西北筹赈会，筹集现金及粮食，期以百万为额，一俟募有成数，即行分批运往助赈，借尽救灾恤邻之谊。其各方有来东省运粮助赈者，无论公家或团体，均极力予以便利。"

△　英、法、日三国政府在巴黎、伦敦、东京、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宋子文关于盐务稽核所之对外宣言，声称"如国民政府以片面之行动，变更国际协定（1913年善后借款合同），则由此而产生之后果，应由该政府负责"。

△　晚，日驻沪总领事矢田抵南京，翌日上午10时，矢田赴萨家湾王正廷私寓与王举行第三次正式谈判。双方就宁案、汉案商妥草案，唯济案及中日修约两事，日方刁难，不同意从山东撤退日军。

△　东三省代表张大同等为哈尔滨护路运动惨案，到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请愿书，请令张学良严惩惨案祸首；制止张学良对外单独行动；令张学良不得干涉民众运动；严令张学良即日易帜。

1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苏、浙、皖、京、沪省市指委训话，中委到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九人，指委到苏省狄膺、滕固等六人，浙省到许绍棣等四人，皖省到金维系等六人，京市到丘河清等八人，沪市到刘蘅静等三人。各指委对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代表及特种登记办法仍表示不满。戴季陶、胡汉民相继致词，解释中常会第一七九次会议决议，希望党员对中央决议须牺牲、尊重与谅解，对指委要求各项允由中央于日内作书面答复。

△　国民政府准免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朱培德本职，任鲁涤平为总指挥，金汉鼎、何键为副总指挥。

△　谭延闿设晚宴招待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王树翰，非正式讨论东北易帜及吉会铁路押款事。邢表示张学良竭诚拥护中央，惟以牵涉外交，当听中央裁决。

△　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电告张学良允日本修筑吉会、长大两条铁路，并电中央请查办哈尔滨惨案责任者张焕相及张学良。

△　国民政府电令贵州省府主席周西成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解决。同日又电宜昌李燊，应克日停止军事行动，返回原防，如确有为难情形，可陈明中央，听候核办。

△　杨森、赖心辉、李家钰、陈鼎勋、黄隐、罗泽洲、郭汝栋联名通电抨击刘湘，列举六端，“伏恳中央洞察川局，分别泾渭，立将频年造乱之野心阴谋家，构成资中会议之祸首，明令惩办”。

△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共出126期，前23期是周

报，后103期是三日报。1930年8月2日停刊。

11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取消办法六条；二、废江宁县，江宁县境及浦口商埠全区划入南京特别市；三、准李济深辞广东省主席职，指定陈铭枢为广东省府主席；四、免去察哈尔省府委员兼主席赵戴文本兼各职，任命杨爱源继之。21日，国民政府发表李、陈任免令。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条例》及《惩治绑匪条例》。

△　蒋介石在蚌埠向记者发表谈话，谓皖北各地人民生活安定，又称皖北党务不发达，县长多阳奉阴违，蒙上欺下。旋去凤阳龙兴寺、洪武庙等地游玩。

△　财政部长宋子文至驻沪日总领事馆，与矢田正式商议关税问题。矢田表示：一、对中国1929年1月1日实行关税自主，碍难赞同；二、要求中国切实整理所借日本之无担保债款；三、以裁撤厘金为实行关税自主交换条件。

△　招商局轮船公司股东代表蒋尊簋招待新闻界，席上章太炎责骂孙中山，攻击三民主义。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以章“图谋危害政府”，议决呈请市党部并转呈中央通缉。24日，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议决呈请中央通缉。

△　云南临（安）个（旧）铁路举行通车典礼。

△　下午，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各区党部、区分部代表再开联席会议，对中央指派代表及特种登记两案，一致决议提请中央容纳补救，作出解决。

11月22日　　中比《通商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比利时驻华代办纪佑穆在南京签字。其内容要旨为，比方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放

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缔约双方征收进出口货物之关税，与其他各国享同等待遇。29日，中比《通商条约》在两国首都同时全文发表。

△　蒋介石由蚌埠改乘汽车赴合肥，检阅第八师朱绍良部，午游包公祠。下午，合肥各界民众二万余人集会，蒋介石演说，侈谈革新合肥政治。同日，蒋电皖省主席孙良诚，召各县县长至安庆训话，并电南京内政部长赵戴文赴安庆参加县长会议。

△　张继就东北民众护路运动电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略谓“乃闻哈埠民众，因护路运动而死伤二百余人，吉垣民众，因自动易帜备受军警蹂躏，况复外交私授，显背中央之旨，迭经留平东省青年请愿质问，情词迫切，应请一方严重抗议日本筑路，以保主权，一方电令东省当局保护民众运动，立释拘禁各人，并派员严查伤害民众主犯，依法惩办”。

△　张继电责张学良阻禁民众护路及易帜运动。24日，张学良复电称，吉会路约昔年政府已经签字，无庸再签，尊指外交私授，误信谣传；至哈埠学潮，军警干涉，仅放空枪，跌碰虽多，尚无身死。

△　中日第三次交涉在南京王正廷宅举行，王正廷提出：一、驻济日军全数撤退；二、宁案、汉案、济案及修约须同时解决。矢田未置可否。23日，矢田闻国民政府即将宣布关税自主，当晚即返沪晤宋子文，协商中日关税问题。

△　上海市商务印书馆工会、邮务工会等七工会就日本侵夺吉会路权及东北易帜问题，联名电请国民政府采取断然手段，挽回领土主权，并解东省人民倒悬之急。

△　上海“江安”轮私运烟土案发生。是日凌晨1时，上海大达码头巡警电话向市公安局报告，称发现由便衣武装士兵30余人押运之大批烟土船“江安”轮正在起岸。市局局长戴石浮急派警官李存正率员七人前往查拿时，却被该便衣武装队连烟带人掳走，向白云观警备司令部

方面驶去。戴石浮甚感惊诧，疑便衣武装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所为，即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市政府报告上述情形，又会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熊佯称不知。

11月23日　国民政府颁优恤北伐阵亡及伤残将士令，规定："其将士阵亡，应详录战功，优恤遗族；伤废者应量其情形，善为安置，着军政部厘定最次，妥议候核；其抚恤专款，着财政部迅速筹备；所有将士功绩，着该管高级将领具明事迹，详报军政部备核。"

△　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议决颁发通令，凡各省县政府得调动地方军队剿匪，各该驻军均不得延宕；通过粤、察两省府主席任免案；加推熊希龄等九人为豫陕甘赈灾委员会委员。

△　张学良电南京王树翰、邢士廉，报告东北路权与哈埠惨案情形，略谓日方所要求延长吉敦线，早经前政府两次商定，我方为维持主权计，只有力争。至哈埠学潮，现已派员调查，兹据复称，当时确无学生身死情事，受伤者均系磕跌所致，报载所传，实非真相。

△　戴季陶宴何应钦、何成濬、张群及刘湘代表张必果、刘文辉代表张儒善等，关于解决川事有所商洽。

△　旅沪川人吕超、谢持、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等九人联名电呈蒋介石，以旅沪川民团体查获刘湘所部购第二批外械600余箱，秘密抵沪一事，请明令处分刘湘。

11月24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卫生部组织法》，凡22条。

△　国民政府以南京近日迭次发生劫案，下令首都卫戍司令申诫，公安局长记过一次，并限三日之内将各该劫匪务获归案。

△　湖南省政府议决：12月1日实行统税，土货征15—30；国货日用品征3%—5%，奢侈品征6%—10%；洋货普通品征3%—8%，

奢侈品征10%—15%。

△　河北省府主席商震电张学良，略谓军事结束，河北行政应完全由省政府统一，税收亦应直接解省，请制止贵军在卢龙河东关越河征税。

△　刘湘函何成濬，称川军各军正谋推诚互助，所有裁兵、减税及一切地方建设事宜，正次第施行。

△　黑龙江省议会通电反对日本建筑吉会等五条铁路，希望全国同胞一致反抗，共策进行。

△　盘踞山东章邱县之土匪张明九率部出城，攻占宁家埠（城西12里），土匪蜂拥入庄，大肆抢劫，杀人放火，村民死亡百余人，被绑架千余人。

11月25日　　侨务委员会制定《奖励华侨回国兴办实业条例》，凡八条。

△　方振武第四军团收编之张宗昌旧部吴杰师，因不服缩编，在平东哗变窜鲁，方振武驻通县王占林第九十一师在三河、宝坻等处堵截。28日，王占林电方，报告追击吴部至任丘东北梁占镇，其两营投归，余逆云散，吴只身逃走。

△　侨居奉天犹太人开侨民大会，到150人，议决电日内瓦国际联盟，请愿二事：一、解放犹太民族；二、耶路撒冷建设犹太国。

11月26日　　上午蒋介石由巢县乘轮船抵芜湖，出席万人欢迎大会并演说。下午检阅第十一师曹顺万部。是晚，蒋由芜湖乘“楚有”舰上驶，经大通、贵池赴安庆，曹万顺、陈绍宽等随往。

△　国民政府接张学良电，除报告东三省近况外，并谓东省现在进行党务，拟于日内选派大批人员来京研究党义，俾其了解党义之

后，一律召回指导东省党务进行，庶免错误。

△　冯玉祥电令第二集团全军禁止军人纳妾。“嗣后各官长如有纳妾情事发生，即行撤差监禁，各该总指挥、师长均负有直接监督之责，亦应受连带之处分”。

△　邹鲁环游欧美29国，返国抵沪，对来访者谈最近政见。略谓今日中国问题，一则如何免亡国，二如何免为半开化国。至目前着手之方，则在裁兵，兴教育，事建设。并谓今日之裁兵，一切改变名目，如缩军为师，缩师为旅，皆非切实之图，若裁他人之兵而增自己之兵，则心尤不可问。民国以来，拥兵不自焚者，究何人哉？一部以兴教育，一部以办建设，敢信不出15年，全国皆兵，而同时民智已足，民族、民权、民生亦同时一致解决。

△　西班牙派遣代表来青岛招募华工赴非洲垦荒。自本月18日至25日止，陆续报名者达1500余人，检验合格者500余人，拟于12月2日开船。外交部以此事未经我国政府许可，实属有违国际公法，是日训令山东交涉署查明阻止。

△　“广州号”飞机于20日由京飞平。22日，张学良电复白崇禧，欢迎粤飞机到奉，是日抵沈阳，张学良派机往迎，并在机场迎接。

11月27日　　中意《友好通商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驻华意公使华蕾在南京签字。其内容要旨为：关税各以国内法规定之，缔约双方于关税问题上，与其他各国平等待遇。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

△　国民政府令准免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李济深兼职，任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察哈尔省府委员兼主席赵戴文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任杨爱源为省府委员，并指定为主席。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转饬军政、铁道两部遵行孙科所提铁道行政之管理统一、会计独立两大施政方针。

△　国民政府训令司法院、各省政府、中央特种刑事临时法庭，通令取消特种刑事临时法庭。

△　行政院第五次会议通过赵戴文所提于12月15日召集苏、浙、皖、赣、闽五省民政厅长会议案；文官处所呈设立国史馆案，并派员接收北平国史馆案，议决交教育部办理。

△　外交委员会在南京王正廷官邸开会，到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王宠惠、孔祥熙、王正廷，通过对国际宣传办法及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伍朝枢、施肇基分任驻美、英公使等议决案。

△　孙科电阎锡山，以平绥铁路局附征一成五裁兵费，影响货运及路款税收，请暂停止，所有挪垫遣散军费，已商财部另案筹拨。29日，阎电复已电饬停征，并接平绥路局电称，已布告各站，定1日起一律停征。

△　军政部长冯玉祥召集军政部全体职员训话，要求打消派别门户，一致拥护军事领袖蒋介石。

△　国民党广州市指导委员会电中央党部，表示拥护中央指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党员补行登记之规定，并“望各级党部一致主张”。

△　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分别致函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军政部，要求速派大员查办上海军人私运烟土案。

△　国际劳工局长多姆斯由汉抵京，29日南京市总工会整委会开欢迎大会，到各界代表千余人，多姆斯报告国际劳工状况，并希望中国派代表参加明年国际劳工大会。

△　河北省宁津县公民王玉振等，呈请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将前江苏督军李纯遗产3000万元没收，开办实业工厂。

11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五次会议通过《行政院各部会组织法》；议决程潜解除监视，免予查办；参谋部改称参谋本部；凡未经正当手续，在出版地之行政官厅注册，无确实负责人营业之出版品，由国民政府令饬主管部严加取缔。

△　晨，蒋介石抵安庆，省级机关、团体代表数千人在码头迎候。下午，蒋在安徽省各界民众欢迎会上训话，强调查清户口，剿匪反共，开发资源，兴筑道路。

△　内蒙古代表团抵南京，该团有卓索图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伊克昭盟、哲里木盟代表及随员20余人，29日，代表团主任吴鹤龄谒何成濬，报告内蒙情形。

△　周西成电驻京代表谭星阁，称李逆（李燊）图黔，现仍进犯不已，望就近促国府下令讨伐。

△　张之江以中央对沪市武装运烟案一事迟不表态，再电蒋介石，请迅速严究，“以肃禁政”。29日，蒋介石复电张之江，指示将沪烟案双方关系人员一并解京面审。

11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四次会议，以国家主义派近复在各处分发印刷品，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议决通令查禁。

△　商震、阮肇昌、邱效宁、周学海等在北平宣誓就东陵审判官职，即通电成立陆军高级军法会审，并电各方将破获东陵案要犯解平候审。

△　财政部长宋子文电令取消汕头土货入口税。汕头、潮、梅常关课收内地土货入口苛例，凡惠（阳）、潮（州）、梅（县）内地货物到汕，须领取候轮出口单，限期出口，逾期则课入口税，名为候轮出口报税办法。此种苛例，不仅有碍国货发展，且背赋税公平原则。宋子文据11月14日广东国税管理委员冯祝万电请，是日电冯明令取消

汕头入口土货税，并同时取消汕局新订候船出口办法。

△　武汉航空会订购英、美飞机。武汉民用航空协进会为开辟粤汉航线，由干事周星棠等与安利美洋行大班马克琼司签订购机合同，购买陆地式摩斯飞机四架，每架9500元，四个月内交清。复与美商美信洋行经理总理盖乐汤姆议购美机办法，订购美国革茵式飞机五架，每架1.3万美元，两月之内交货，7日与美正式签订购机合同。

△　广东省政府下令禁止蓄婢。

△　北京大学学生300余人，反对大学区制，要求恢复北京大学，举行游行示威，先至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高呼口号，军警出面干涉，学生遂打碎办公处门前两块木牌，随又往干面胡同校长李石曾住宅，为军警阻止，未能入门。下午5时，复折回北大，至附近副校长李书华宅破门而入，门窗损坏颇多。当晚，北京大学学生会紧急会议议决：派代表南下请国民政府明令恢复北京大学及通电全国说明护校经过。

△　凌晨4时，国民党奉天省指导委员会临时办公处启明学院，被军警包围搜查，携去文件多份，指委会宣传部秘书韦仲达被捕。12月25日，奉天指委会通电全国，说明真相，要求中央转电张学良，释放韦仲达。

11月30日　　蒋介石在安庆县长会议上讲话，侈谈人民自治，指示裁撤各县公安局，举办人民自卫团等。

△　国民政府第九次国务会议，议决照准张学良按指定调拨赈款数目30万元，购备粮食，救灾恤邻；公布行政院所属内政、外交、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卫生各部及建委会组织法；特派李济深等13人为两粤赈灾委员，指定古应芬召集。

△　南京国民政府以沪烟案情节严重，决定调查。是日，禁烟委

员会主席张之江偕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抵上海，召市公安局巡官等关系人员讯问。同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会议决定成立“江安”轮运土案调查委员会，指定何世桢、陈布雷等人为调查委员。

△　豫陕甘赈灾委员会常务会议开会，孙科报告张学良来电允助100万元，决议由常委派员前往东省领款；财政部拨20万元，由委员会支配。

△　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通电饬边防关卡，“无论何色人等，不由正当关卡经过，潜入新省内地，一经查获，当按共党治罪”。

△　湖南清乡督署结束，督办鲁涤平、会办何键通电报告经过，未了之事，由省政府军事科及“惩共法院”负责办理。

△　芜湖布业罢市风潮解决。是日，各界开联席会议，第十一师副师长陈诚主席，议决：罚布商三万规元，准予日货布匹进口；起岸后限价售卖；令布商公会具结，以后不得再进日货。

△　内蒙古代表团会见冯玉祥，报告此来任务，第一拥护三民主义的国家，促其在世界上早成一最健全、最光荣之国家；第二报告全蒙详情，请国府按照三民主义，予蒙古生存发达之机会。

△　晋、冀、察、绥四省政府联名电国民政府，报告该四省本年灾情重大，请设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拟定委员名单，请中央特派，并请指定阎锡山为主席。

△　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在南京设办事处，是日班禅派员谒谭延闿，请求每月由政府拨给办公费5000元，谭当即应允。

△　奉天营口与长春、哈尔滨、满洲里、海参崴长途无线电通话，12月1日，与北平、上海通话。

△　驻华法使玛太尔于29日抵京，是日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中法

修约会议。关税问题法国悉照中美关税条约办理，《越南陆路通商条约》废止后，法政府负责保护越南华侨；中国收回广西、云南路矿权问题，法使允向该国政府请示后，再行谈判。

是月　国民政府经内政部提议交教育部会核，正式决定以梅花为国花，并拟用三朵连枝象征三民主义，五瓣象征五权。

△　截至是月底，全国办理国民党党员总登记，已结束者计：一、六特别市：南京、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北平；二、六省：浙江、江苏、广东、广西、河南、山西；三、四铁路党部：沪宁、沪杭、津浦、平绥；四、九省未办完竣：河北、安徽、山东、甘肃、湖北、湖南、四川、绥远、察哈尔。已登记之国民党员24.46万人以上（尚有10省未呈报：云南、贵州、福建、江西、陕西、热河、东三省、内蒙）。

△　张学良致驻京代表赵志白亲笔信，其要旨为：一、东北内部日见坚固，惟外交仍棘手，请将特殊情形介绍于国人，以免误解；二、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事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三、决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

△　徐州北伐阵亡将士墓建成，占地三亩。刘峙亲撰墓表，略称：第一军本年5月1日会师济南，不幸饮弹而殁者近460余人，致残者五倍。

12　月

12月1日　蒋介石北上校阅津浦路第一集团军完竣，是晨自安庆返抵南京。

△　邢士廉、王树翰谒蒋介石，对东省易帜、热河、外交、交通

等问题，报告甚详。蒋谓此等问题，俟与党国诸要人协商后，再定办法。

△　国民政府宴请内蒙代表团，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何应钦、古应芬、何成濬出席，对内蒙政治问题，谈论甚洽。

△　国民政府训令直属各机关：嗣后如有文武官员贪赃枉法，或奉令不力，情虚蒙蔽，案情重大者，应由各该高级长官押送来京讯办，或由该管长官撤职审究；如于某省犯案未了，他处不许复用，并不得只撤差委，使其逍遥法外。

△　国民政府为上海“江安”轮船偷运烟土一案，训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特别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长傅肖先、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均着停职来京，听候审讯。

△　国民政府以近来各处时常发现匿名出版品（小报、小册子等），“非共产党之宣传，即捣乱分子之言论，其用心甚不可问，而为害尤属深广”，是日训令内政、交通两部赶速严加取缔。

△　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就中日谈判问题电国民政府，要求在日本未撤兵以前，先与停止谈判，断绝国交。10日甘肃省政府，11日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24日浙江省政府，29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均通电响应。甘省电谓“应请我政府毅然本陕省府之主张，各省同志作一致之联络，非达最后之胜利不止”。

△　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指出：“如再有野心国家，不识时务，甘冒不韪，违反公理，不肯废约，吾人自应本大无畏之精神，共同奋斗，力抗强权，务使国际间互订平等之条约，洗涤战争之余毒，造成升平之新世界，而保障人类之安宁。”

△　南京卫戍司令部奉命扣押偷运烟土之“江安”轮。是日上午，“江安”轮行驶江宁县境时被扣，船主及船员吴翰卿等23人被押送

江宁地方法院，因船主、轮机长均系英人，故交英领事署处理。

△　国际劳工局长汤姆斯由工商部长孔祥熙陪同，抵上海参观访问。

12月2日　蒋介石约见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王树翰，邢、王面呈张致蒋电，报告东省民众运动及组织党部情形。

12月3日　蒋介石晚宴德顾问威尔史，兼为驻德公使蒋作宾饯行，对德中关系有所讨论。

△　孙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中央财政收入，统计每月约为1900余万（除东三省及川、滇、黔等省尚未完全统一外），中央政费每月不过百余万，其余1800万，全属军费。国家岁入供养兵之用者，居十之八九，建设事业无从发展。

△　上午，全国反日会在南京举行首次宣传周，到南京各团体、机关、学校代表数百人，分乘50余部汽车，手持标语，赴国民政府请愿，沿途散发传单。请愿书要求中日谈判必须俟日方先撤兵后再行开议；日方须有废约之诚意，方可开议宁、汉、济三案；宁、汉、济三案和修约问题在谈判中同时解决。

△　上海水电工会工人1000余人要求加薪未果，是日宣布罢工，并推选46人成立罢工委员会。汽车全部停驶。至10日，杜月笙代表资方签字，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工人复工。16日，因资方未履行协议，且开除工人10余人，工人再次罢工。罢工委员会分别致函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商界联合会请主持正义。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已启程晋京，平津卫戍总司令职请准以商震代理。5日，国民政府复电照准。6日，商震在北平就平津代理卫戍总司令职。

△　呼海铁路绥（化）海（伦）段工竣，全长103公里。

12月4日　国民政府特派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孙科、古应芬、李济深、李宗仁、邓泽如、萧佛成、黄绍竑、陈铭枢、白崇禧、宋子文为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特派赵戴文为赈款委员会委员；赈款委员会常务委员薛笃弼、胡毓威业经辞职，以赵戴文、赵丕廉为常务委员。特派阎锡山、薛笃弼为禁烟委员会委员。

△　行政院第六次会议议决：江苏省苏州准予改市；上海市府准予发行市政公债200万元，于房捐款项内按月拨款2.4万元，偿还公债本息；北大学潮事先由教育部发电剀切晓谕，如不遵令，即依法律严行制裁。

△　蒋介石接见内蒙古代表团，代表吴鹤龄提出地方自治等项计划。蒋表示当呈请国府于下次国务会议讨论，并称蒙事当由蒙人自理，蒙人权利自应由蒙人享受。

△　全国编遣委员会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何应钦主席。决定《国军编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以陆海空军总司令为会长，各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政部长各派三至五人为委员，并推张群等四人为编制起草委员。

△　鹿钟麟、刘峙奉蒋介石命令，分别任剿办樊钟秀残军正副指挥，由豫东、皖北就地剿办。樊部分驻涡阳、蒙城等处，约两万余人，枪械万余支。鹿、刘议定鹿调豫东三师，刘调皖北五师，鹿任豫东军指挥官，刘为皖北军指挥官。是晚，各部向涡阳、蒙城形成包围圈，开始进击。

△　蒋介石电复阎锡山、张继、李石曾，指示北大由卫戍司令部、北平政治分会及大学院共商接收办法。

△　天津市政府奉中央命令，查封张宗昌、褚玉璞、顾维钧、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王印川、潘复、吴毓麟、王毓芝、边守靖、刘梦庚等13人逆产。

△　驻华荷公使欧登科抵京，下午至外交部晤王正廷，协商中荷《关税条约》草案。

12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六次会议，讨论中比、中意、中挪商约问题。蔡元培等指出条约对取消领事裁判权附有极苛待条件，实属不彻底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又规定侨民在华有居住、营商、购地权利，均属惠彼而不惠我，三约不妥之处太多，应加修正，结果议决交外交委员会讨论；民国十八年在南京开中华民国建国纪念博览会，交国民政府办理；任何其巩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

△　下午，外交委员会审查中比、中意、中挪商约，对条约中不妥之处，多数均主张加以修正，决定由王正廷拟具审查报告，提交中央政治会议讨论。

△　国民政府令：中央处理逆产委员会着即裁撤。

△　李济深在广州召集缩军会议，各军、师长陈济棠、徐景唐、黄绍竑、蒋光鼐等人出席。决议依中央编制将第四、第五、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各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第三独立师许克祥部缩编为旅。

△　张之江、魏道明等人向蒋介石报告沪烟土案情形。蒋令对“江安”轮被扣之关系人员严加审讯。下午，江宁法院提审“江安”轮被扣之侍者、厨司、生火等各关系人员。7日，张之江审讯江宁地方法院来沪土案关系人吴翰卿、戴丰泰等15人。吴等皆诿称不知。

△　教育部就北大学生反对大学区制，维护北京大学事，电令北平大学警告学生勿为“共产党利用”，应悉心为学，即期悛悔，否则即当依法制裁。

△　张学良代表胡若愚、朱光沐在天津发表谈话称，拟于三五日内赴平，与张继、李石曾接洽，然后朱即赴京，调查党的组织与工

作，并与中央党部接洽。并谓东三省拟派有志青年到津，请党部训练，然后回去分别成立省、市党部，所派人选奉14，吉、黑各四。

△　上海招商局董事会长李国杰电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将招商局交还商办，略谓：近自政府监督整理招商局以来，董事会对于局事不容置喙，胥由政府派员代为支配管理，在法理上究为一种超过程度之处置，殊未足以悦服众商。要求完全交还商办，以听商民之自行整理，自由贸易，以保持50余年商办之局面。并提出五项办法挽救招商局，俾我国最大之航业机关起死回生，同时并将江海航权迅图恢复，毋令外人轮船飞扬驰骤，出入于我国堂奥，若临无人之境。

12月6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五次会议议决修正通过《党员无故不出席区分部党员大会惩戒条例》，规定党员无故连续二次、或三个月内间断三次不出席所属区分部党员大会者，由该区分部执委会去函诘问，诘问无效后警告，警告无效后停止其党权，停止党权三星期仍无效后，开除党籍。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于民国十八年2月1日施行，以一年为有效期。

△　外交部分别照会比、意、日、美、葡萄牙、挪威、丹麦、西班牙八国驻华领事，宣布实行关税自主，并附《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新税则》各一份，由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分别递交各该国驻沪总领事馆。

△　上午，南京市各区国民党执监委员齐赴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撤销中常会第一七九次之第一、二两案及第一八二次之南京市圈定选举法案。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临时常务会议议决不准。

△　第四集团军总部发表第四次缩编方案，以第三、四两师各一部及第四十二军全部另编为第十二、十三两师，分别委任程汝怀（前第十九军副军长）、张义纯（前第十八军副军长）担任该两师师长

（第四集团军前后缩编四次，共编13个师，分别由白崇禧、夏威、胡宗铎、陶钧、鲁涤平、何键、谭道源、李品仙、叶琪、廖磊、王泽民、程汝怀、张义纯充任第一至十三师师长）。

△　皖北蒙城、涡阳樊钟秀部被刘峙、鹿钟麟部包围后，已乏抵抗能力，全部缴械，刘峙进驻蒙城。8日，刘峙返回徐州，向各界报告剿樊经过，缴获大炮12门，机关枪10挺，步枪700余支，毙代军长王崇林，俘旅长一人、士兵2000余人。豫东鹿钟麟部在涡阳缴获步枪300余支，大炮机10余尊，俘虏百余名，残部千余人向阜阳逃窜。

△　邢士廉、王树翰携蒋介石致张学良亲笔密函离沪返奉。蒋允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办理，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东省应即易帜，以贯彻统一精神。

△　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联名电劝北大学生，略谓护校举动，有违常轨，“大学区制培等实创其议，顷闻诸君容有未慊，自系误会所致，望长思远瞩，静候当局解决”。19日，北大学生会派李辛之、赵子懋为代表前往南京教育部呈请愿书，要求：一、取消北平大学区制；二、恢复北京大学校名与原有组织；三、由北大旧职教员主持校务。

12月7日　下午，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议决：一、关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原则：（一）凡省或等于省之党部，于十八年2月15日以前正式成立，经中央审查认为组织健全者，其代表得完全由党员选举产生；（二）于十八年2月15日以前，正式省（或等于省）党部尚未成立者，其代表由该省党员依照中央规定之选举法，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出加倍人数，由省或等于省之代表大会选定之；（三）县市以下之下级党部，组织尚未建全之省（或等于省），其代表由中央指定之。二、关于特种登记案：（一）电令各省、各特别市委指委会迅速遵照修正补行登记手续条例，办理特种登记；（二）南京特别市之特种登记，由中央组织部派

员办理。

△　国民政府第十次国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以阎锡山等26人为晋察绥赈灾委员会委员；加派唐绍仪等26人为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明令嘉奖张惠长等三飞行家；明令地方政府机关，如未经国民政府核准，不得与外人订立和约，借用外资，或准许外人有经营建设事业之特权；议决全国所用邮票，一律改印总理遗像，暨陈其美、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邓铿诸先烈遗像。

△　驻华英公使蓝普森抵京接洽关税自主问题，当晚外交部长王正廷设宴欢迎。8日，蓝普森谒蒋介石，述此次来京目的。

△　日驻沪总领事矢田派领事清水将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照会退回外交部，声称奉本国政府训令不予接受。

△　国民党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通电全国，吁请外交当局于中日谈判中，严词交涉，勿稍退让，以冀废除不平等条约；万一谈判破裂，我四万万民众誓作前驱，为国雪耻。

△　侨务委员会为暹罗驱逐大批反日华侨事致函外交部，略谓我旅暹侨胞，自济案发生，自动抵制日货，组织对日经济绝交会，历期数月，即将日人在暹经营之商业陷于无形倒闭之中，讵日使恐慌之余，竟嗾使暹政府肆行压迫反日华侨，因而被其非法逮捕驱逐出境者，已达201人之多。该暹政府欺我侨民，辱我国体，蹂躏人道主义，违背国际公法，请速向暹政府提出严重交涉。

12月8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法》，凡23条；《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法》，凡21条；《国民政府财政部组织法》，凡29条；《国民政府农矿部组织法》，凡21条；《国民政府工商部组织法》，凡21条；《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法》，凡21条；《国民政府交通部组织法》，凡21条；《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组织法》，凡11条。

△　立法院第一次会议，到立法委员37人，胡汉民主席，议决《监察商办航空事业条例》及《中华民国无线电工程师登记条例》等五法案，交法制委员会审查；于法制、经济、财政、外交四委员会之外，增置军事委员会；推焦易堂等16人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邓君荫等五人为财政委员会委员，傅秉常等五人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邵元冲等五人为经济委员会委员，钮永建等五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赈务委员会决定将张学良汇交国民政府之赈款30万元，分配如下：晋、冀、豫、陕、甘五省各4.5万，绥、鲁两省各三万，察哈尔1.5万。

△　张学良将国民党奉天党务指导员钱公来开释，并赠调养费500元，将令其办理党部事务。

△　蒙藏委员会常会决议严令蒙不得擅捕内蒙同志；添设内蒙康藏佛教整委会，派章嘉呼图克图、诺那呼图克图等分任筹备委员；筹设常委会，《管理内蒙康藏各整会之组织条例》推王尚曾等为起草委员。

△　西安市长萧振瀛通电力争济案，表示本人愿率全市民众作政府后盾。

12月9日　　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则》业经明令公布，定于民国十八年2月1日实行，附《海关进口税则表》送请查照。

△　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通电声援东北学生易帜运动，略谓：11月18日吉、黑各地学生易帜运动，爱国热忱，甚堪钦佩，乃张作相甘冒不韪，拒不接见，武力强迫卸帜，伤亡学生民众百余人，蹂躏民权，草菅人命，噩耗踵至，言之痛心。“本会誓竭全力以从，义无反顾，望全国同胞，一致声援，以救关外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　蒋介石宴请内蒙古代表团，席间蒋介石与蒙古代表吴鹤龄分别讲话。该代表团并送呈文一件，呈请国民政府改组蒙藏委员会，并在北平设置分会；请在热、察、绥、青等省各设一蒙旗自治委员会，增加蒙古省委名额。

△　驻秘鲁公使施肇基电外交部，报告于是日进谒南游到秘之美总统胡佛，胡对蒋介石邀其游华之意，表示感谢。

△　天津汇业银行（中日合资，股本700万元）因天津反日会拒绝使用该行钞票，各界纷纷提款，致使该行资金周转不灵，本月1、2、3日及8日电请日人铃木理事拨款维持，铃木拒绝，乃宣布停业。该行设于北平、上海、沈阳之分行亦随之停业。是日，该行召集华股股东开会，决定辞退日股，由中方经营，并宣布自10日起休业一个月。

△　河南省总工会整理委员会通电全国，吁请外交当局中日悬案合并解决，关税绝对自主，并拒绝床次来华。

12月10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讲演《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提出北伐后最紧要的工作是外交方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实现此一目标，必须具备国民的实力和军队的实力。并称国民要刻苦忍辱，养精蓄锐，自立自强，打破现在险恶的环境，接受现代化文化、法律、经济、政治的教育；军队要通过召开编遣会议实现军队有军额，军饷有饷额，军制有编制，军人领袖要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不搞四分五裂，割据地盘，拥兵自卫，贻害国民。

△　中英谈判在南京外交部开议。外交部长王正廷与驻华英使蓝普森会谈关税问题，无结果。12日下午，会谈继续举行，英方坚持“中国关税自主”无须写入中英关税条约内，仍无结果。

△　张继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暂不裁撤政治分会，留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　东北海防舰队成立，张学良、沈鸿烈在沈阳宣誓就任正副总司令。

△　驻华丹麦公使高福曼到京，11日晤王正廷，接洽修约等问题。

△　上海华侨联谊会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为保障侨胞事业、财产计，要求对中比、中意新约关于侨民相互有内地居住、经商、购地权之规定，勿加修改和取消。

△　全国商会联合会电国民政府、外、财、工商各部，请拒还西原借款，略谓："查西原借款，不但供军阀内乱之用，且数目不明，弊窦孔多，于法理于党纲均不应承认，属会代表全国商会，一致为国府后盾，务请概予拒绝。"

△　奉天研究国学之萃升书院举行开学典礼。院长为张学良。

12月11日　　国民政府特派训练总监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主任。

△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政府，嗣后不得各自为政，滥举外债，否则绝不承认。

△　国民政府以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与周西成部黔军发生冲突，迭经电令，不听制止，似此擅行扬兵，殊属有违军纪，是日明令李燊迅即退回原防，听候查办。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4条；《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凡七条。

△　国民政府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凡14条，规定"中央设卫生部，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各省设卫生处，隶属于行政厅，兼受卫生部之直接指挥监督"。

△　行政院第七次会议，议决山西设立临时防疫处；各省国税不得擅抵借款；各省市募集公债，须经财政部核准，方得发行。

△　日首相田中特使、日新党俱乐部总裁床次竹二郎偕议员一行10人访华“视察”，是日抵南京，下午会晤蒋介石。

△　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电中央党部，谓中比、中意新约及自本年7月以来与各国所订约中，关于关税及其关系事项之规定，“名为平等，实属不平；名为互惠，实为片惠”，要求所订各约，交中央政治会议详加审查。按：此电经鄂指委会第二十六次常会通过，21日发出。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讨论建筑武汉三镇铁桥，按例由海关征收附捐充经费案，议决交财委会核议。

12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七次会议议决设立导淮委员会；凡立法事项自应归立法院厘定，嗣后关于立法原则，应经由政治会议议决，而法规条文由立法院起草；通过《考试院铨叙部组织法》；河南省府主席冯玉祥辞职照准，任韩复榘为河南省府主席。

△　阎锡山由天津乘“新华”轮抵南京，随员90人，卫队120余人随行。训练总监何应钦，中央委员邵力子，国府文官长古应芬，参军长何成濬，南京特别市长刘纪文等千余人迎接。

△　蒋介石赴汤山，与床次长谈。13日，床次在南京安乐酒店招待日本新闻记者，宣称将以公平态度确立对华政策。同日晚，床次宴请蒋介石、冯玉祥等人。

△　中丹（麦）《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同驻华丹使高福曼在南京签字。

△　南京国民党各级党部、各民众团体代表霍志澂等为东北护路惨案事，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胡汉民出见，略谓中央对东省惨案，除

已电张学良询问外，并派专员前往调查真相。又谓关于外交方面，中央亦已训令各省嗣后不准私办外交，并注意保护国土、路权。

△　川省倒刘（湘）各军将领杨森、赖心辉、李家钰、黄隐、陈鼎勋、罗泽洲、郭汝栋，订立四川同盟各军公约10条，其中有同盟各军共同组织临时军事委员会，打破防区制度，实行裁编军队等项规定。16日，杨森在涪陵就讨刘（湘）同盟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职。

△　上午，汉口各界群众六万人举行大规模反日大游行，并议决两项：一、电请国民政府转饬外交部不得私自与日方妥协；二、电请国民政府令财政部不得承认西原借款。

△　洮（南）昂（昂溪）铁路通车，北满物产可由昂站直接输出口。

△　赣粤公路南（昌）莲（塘，即定南）段通车典礼在南昌举行，到省军政各机关及市民五六千人，省府主席朱培德乘车至莲塘站，对乡民演说。此系赣粤、赣浙、赣闽、赣皖四公路之总枢纽，且为江西内地第一条长途汽车路。

12月13日　　首都反日会对中比、中意条约及中日交涉问题，集矢于外交部长王正廷，于是日下午召开市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万余人参加。沿途高呼口号“反对妥协外交”、“打倒王正廷”。愤怒群众将王正廷官舍捣毁。蒋介石闻报，至现场视察，一面召群众代表到中央党部训话，指责此举“为不信任政府之表示”；并声称：“三年之后，若外兵不撤，不平等条约不废，请杀我以谢国人。”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七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凡14条；《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凡18条；《组织法》规定：“各省或特别市，在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县或市以下之各级党部尚未组织健全者，其代表由中央指定之。”

△　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张继、李石曾、白崇禧、唐绍仪、王士珍、熊希龄、王芝祥、朱庆澜、孔祥熙、宋子文、薛笃弼、许世英、严修、严庄、王震、冯少山、梁如浩、华世奎、张兴汉、邢士廉、张品题、杨兆泰、商震、杨爱源、徐永昌、何其巩、崔廷献、赵戴文为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委员，以阎锡山、熊希龄、王芝祥、朱庆澜、杨兆泰、商震、杨爱源、徐永昌为常务委员，指定阎锡山为主席。同日又特派程源铨为豫陕甘赈灾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特派唐绍仪、张静江、吴铁城、刘纪文、郑洪年、郑毓秀、孔祥熙、林焕廷、许崇灏、陈辉德、虞洽卿、郭标、王震、冯少山、劳敬修、马晓军、李文范、傅秉常、简玉阶、陈炳谦、陈翊洲、谭兆鳌、黄少岩、曾彦、郑铁如、潘静波为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以此次广东航空处处长张惠长等乘“广州号”飞机由粤抵京，中经汉、津、平、奉等处，长途飞行，为中国航空界首创之举，是日颁令给予张惠长、黄毓沛、杨官宇奖章。

△　张之江、魏道明向国民政府呈报上海烟土案调查结果，略谓此次烟土，是由汉口下驶之“江安”轮火舱装载运沪，由侦查队在火舱抄获（据侦查队报告，有土1273斤，计蒲包14个，小包97个，小件15件）。本案已由江宁地方法院实行侦查。至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及警备司令部因查拿烟土发生争权情形，察核各方陈述，事实已甚明显。侦查队员搜查烟土，既不查拿土贩，又不追究船中人员，处理已有未合，侦查处长傅肖先扣留巡官李存正，任队兵殴辱成伤，自不能不负违法责任。据李存正所述，并非掠劫，已无疑义。该公安局长戴石浮，未察细情，遽以武装运土及官警被劫，迭电呈请究办，一面登报，亦属轻率。

△　程潜抵上海，15日在《申报》刊登启事，声明蒙难汉皋六月余，现奉中央明令恢复自由，俟体气稍健，即当束装放洋，漫游欧

美，今后不再过问政治。

△　外交部致函驻华西班牙公使，请阻止该国招募人在华擅招华工，谓此等非法举动，无异贩卖人口，有碍两国睦谊。

12月14日　　国民政府令：昨日首都对外团体集合群众游行示威，发生捣毁外交部长住宅，殴伤宪兵、警察至25人之多，殊堪骇异。着南京特别市政府督饬公安局严密查办，呈候处分。嗣后凡有开会游行事件，必须呈报该管官厅批准。

△　上午，阎锡山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就国民政府委员职。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监誓。同日，蒋介石欢宴阎锡山。

△　国民政府以江西省政府编辑印行之《策进》第三卷第五十八期内载有署名兰畦撰著之《克复南昌二周年纪念的意义》一文，有“目前国民党几乎成了封建的集团”等语，“诋毁党国”，是日训令江西省政府立即撤换该刊编辑人。

△　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议决首都卫戍司令部归国民政府直辖；冯玉祥辞河南省政府主席兼职照准，调韩复榘为河南省府主席。

△　浙、闽、苏、皖、赣五省裁厘会议在南京开幕，该会系财政部为准备裁厘实行新税制召开。贾士毅主席。会议提出裁厘先决方针七项，规定裁厘时间应以六个月为期；各省特别税应设特派员管理。

△　侨务委员会、外交部、内政部联席会议，就西班牙人在青岛市擅自招募华工2000人一事，商讨对付办法。

△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会议决：通电全国，以张学良逮捕奉天指委，请一致声讨；请中央督促东三省限于十八年1月1日实行易帜，否则即须明令讨伐。

△　天津市长崔廷献电张学良，请发还大批车辆，以维持商务交

通。

△　驻华美公使马瑞慕照会外交部，称本月15日恢复美驻京领事馆业务，前美驻沪领事史沛果调任南京领事。15日，王正廷复照予以承认。

△　曹锟住宅被劫。天津大雪，是夜英租界前总统曹锟住宅被上月11日哗变后逃匿至天津的张宗昌旧部军长吴杰等六名匪徒劫掠，抢去衣物、金饰值洋五万余元。17日，吴杰被天津日警署捕获。

△　上海公安局以复旦书店出售《检阅》周刊，密令巡长李少云率警察搜查，抄去《新路》杂志一册、出版物21种，店员四人拘警署并解局核办。

12月15日　　国民政府颁发统一财权令：嗣后各省市政府以国税抵借国内款项，或募集省市公债，均应将需募债额及基金办法条例等，咨由财政部核明，呈候政府批准，方准发行；其于各项税款，如有指定抵借款项者，未于事前呈准核定，概不发生效力，各省管理国税机关长官如未奉有财政部命令，亦不得擅许抵押。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布《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题》，凡10条。其要旨为：编制过去党之法令、规章案；确定党、政、人民行使政权、治权案；确定各级党部职责、党部工作及党部组织案；确定人权民权案；确定施行政纲案；确定教育、国防、外交、经济建设案。

△　立法院第二次会议通过临时动议：请国民政府将最近外交部与比、意、挪国代表签订之中比、中意、中挪草约，送交本院议决。

△　王正廷奉蒋介石电邀由上海抵京，即赴总部谒蒋，因首都民众捣毁私宅事面请辞职。蒋予以慰留，并表示，外部官舍被毁事，业经国府下令告诫群众，以后不得再有此种举动，勉王继续与各国进行

交涉，勿抱消极。

△　上午，蒋介石、阎锡山夫妇游汤山。16日晚，宋美龄在励志社宴请阎锡山夫妇，冯玉祥、何应钦夫妇，胡汉民、古应芬等及上校以上军官作陪。

△　内政部召集苏、浙、皖、赣、闽五省民政会议，到200余人，赵戴文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在谋地方之安定与各省地方自治之实行。会议讨论事项为改组县政府、整顿警察、清乡剿匪，会期10天。蒋介石、吴敬恒、胡汉民等到会讲话，谈及刷新政治，开展识字运动，健全保甲制度等。

△　苏、浙、皖、闽、赣五省裁厘会议议决特种消费税设局原则，规定："凡性质相同及征收手续相近而为零星收数之货品，同在一地收税者，置归一局办理，但大宗货品在创办之初，亦得按类设局。"

△　蒙藏委员会第十一次常会，以美国新出版地图将西藏划入，又苏俄新地图将唐努乌梁海划入，议决均呈请行政院令外交部严重交涉。

△　内政部电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及青岛市商埠局总办赵琪，谓西班牙人未经我国政府允许，在青岛擅自招募华工指定赴非洲垦荒，迹近掠买猪仔，不啻送2000人于死地，并已电西班牙政府及该国驻华公使拒绝在案，务希严重交涉，扣留华工，并将该西班牙人驱逐出境。

12月16日　　国民政府训令各省、特别市政府：各省、特别市径隶行政院，嗣后各该政府如对于行政事务有所禀承，应先呈行政院。

△　南京上校以上军官300余人在励志社集会，庆祝徐州光复一周年，蒋介石到会致词，称徐州为南北重镇，国军三得三失，牺牲极大。冯玉祥、阎锡山先后发表演说。同日上午，南京市民一万余人亦

隆重集会纪念，并通过坚持要求日军撤兵、严究沪烟土案等决议。

△　内蒙代表团在南京招待京、沪各报记者，吴鹤龄报告，谓本团宗旨在于联合各盟旗，拥护国民政府，希望三民主义实现于蒙古民众；本团向政府条陈：一、请将蒙藏委员会分别改组，并在北平设置分会；二、请在热、察、绥、青等省各设一蒙旗自治委员会，并增设蒙古省委专额。

12月17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及《考试院铨叙部组织法》。

△　国民政府举行临时会议，讨论中英关税条约，以该约条文尚有数点应加修改，决定令王正廷与英使讨论，修正之后即可签字；关于《编遣会议组织条例》，决提中政会通过。

△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游行群众捣毁外部官舍事件，声称操纵运动的少数人，“不是与国家主义派有嫌疑，即是与共产党有嫌疑”，一定要惩办肇事人。

△　国民政府训令各省政府将该省通志及各府县志分别搜集齐全，于六个月内汇送本府。

△　下川东战事再起。川军李家钰、罗泽州及杨森、赖心辉，恐刘湘借编遣之机兼并，合力进攻重庆刘部。是日，罗师首先进袭江北之桃子垭，杨森率第九、第十两师到长寿，宣布与刘作战。旋李家钰、赖心辉亦分别出师，重庆三面受包围。18日，重庆宣布戒严，刘湘出城督战。

△　五省民政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蒋介石到会训话，要求各县长实施建设大纲，做全国模范；县长要廉洁勤慎，宝贵光阴，努力工作，则政治自可清明，训政目的亦可达到。

△　蒋介石电令厦门驻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限一月内将独四师、独十四师分别缩编为两旅一师制，改称暂编第一师、第二师，由张贞、卢兴邦分任师长。

△　汉口人力车夫水杏林被日军炮车撞伤，于次日伤重致死。20日，汉口反日会就“水案”议决，通电全国抗议日军无端惨杀华人，制造血案，要求撤退驻华日军，收回日租界；惩办肇事犯首领日陆战队司令官；给死者治丧费一万元，抚恤费五万元；日政府必须向中国政府道歉。

△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电王正廷，谓暹罗政府自明年起将增加华人入境税，请提出抗议并严重交涉。26日，外交部复电，谓已向该国驻华使馆切实交涉。

△　山西太原各界从本日起连续4日举行反日宣传活动。是日上午，66个团体4000余人集会，群情激昂，进行反日讲演，各校停课一日。18日社会团体，19日军队，20日工商界分别举行反日示威。

△　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呈国民政府，报告张鲁泉等在鲁谋乱有据：一、该逆等于日兵强占济南之际，乘机联合安福系及直鲁余孽，组织自治政府，并招纳土匪为自治军；二、指挥土匪张明九等，攻陷章邱、齐东等县；三、与日人订密约13条，盗卖山东权利；四、依仗日人霸占济南，横征暴敛；五、勾结直鲁余孽，招纳土匪，骚扰胶济路线一带；六、带领土匪驱逐平度、胶县、青州等10余党部暨县政府，并惨杀胶县公安局长柳子开；七、勾结贿选议员、土豪劣绅并杜尚一派之贪官，以图反动；八、嗾使日人搜捕历城县长等，要求严行缉办，绥靖地方。是日，国民政府训令内政、军政两部通令所属一体协缉张鲁泉、张明九等，务获归案究办。

12月18日　　白崇禧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等，陈述理由八项，请中央注意西北国防：一、“为扶持国内弱小民族，健全民国组织

计”；二、“为国家繁荣，民族生存久远计”；三、“为发展欧亚交通，实现总理计划计”；四、“为中国将来海军及工商业之根本计”；五、“为预防英俄隐患，绝未来共祸计”；六、“为保持社会治安计”；七、“为消除国内战争计”；八、“为殖边造产计”。并提出应先解决三事：一、请中央急速成立最高国防会议机关，早日决定国防计划；二、及早筹备国防交通；三、国防经费独立。

△　国民政府以军政费不敷，令饬两浙、两淮盐运使及松江盐运副使向沪银行界接洽借款，是日签字，金额500万元，以淮南、外江、内河各食岸及两浙、苏五属各食岸军用加价及善后军费全军收入750万元作抵押，利息一分一厘，自十九年1月起，10个月还清。

△　五省裁厘会议决定，裁厘改办特种消费税后，较旧厘短亏者，应由国家正税收入及原厘金下之附征税款内抵补，不得在特种消费税项下带征任何附税。

△　驻华法使玛太尔抵京谒蒋介石。下午，在外交部同王正廷开中法关税会议，逐条讨论中法《关税条约》草案。

△　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通过接管清室财产，由故宫博物院会同河北省兼热河官产总处等组织善后委员会商办。

△　据路透社北平电称，张学良派代表赴欧美宣传，携有统计地图、影片及东三省出产标本，以期解释东三省之现状。

△　厦门各行商人结队游行请愿，反对裁厘，苛征土货内地税。内地税局局长被迫同意暂缓征。

△　日特使床次自上海取道青岛到济南视察日军战迹及蔡公时殉难处。

12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八次会议通过《全国编遣会议组织条例》；议决任赵戴文为内政部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自

九人增至13人，加任阎锡山等五人为委员，并指定阎为主席。

△　中荷《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驻华荷兰公使欧登科在南京签字。同日，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同驻华葡萄牙公使毕安琪在南京签字。

△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编遣委员会之重要》，阎锡山演讲《裁兵实行建设》。同日，冯玉祥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台讲编遣军队问题。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自是日至22日举行整理军事宣传周，迎接全国编遣会议。同日，上海六区党部通电全国，希望各军将领一律参加编遣会议。

△　五省民政会议，以增加京、沪两特别市参加，改名为第一期民政会议。同日开第二次大会，讨论创制村里事项等案。

△　五省裁厘会议通过《特种消费税条例》。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特派东三省调查专员张宗海到奉接洽“防共”办法，是日谒张学良。23日携张学良亲笔函返平。

△　太原妇女反日运动日，参加者约2000人，通过由反日会提出电请中央，不撤退济南日军不开中日谈判，拒绝日在东省建筑铁路，讨伐张学良，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否认西原借款等七项提案。

12月20日　　英驻华公使蓝普森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国书。蓝普森致颂词，蒋介石致答词。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

△　中英《关税条约》由王正廷与英驻华公使蓝普森在南京签字。同日，王正廷与瑞典驻华代办雷尧德在南京签订中瑞《关税条

约》。

△　王正廷在南京外交部官舍宴请英、荷、葡、瑞典四国公使。当晚，英、荷、葡三公使离京北返。临行前，英使蓝普森谈称，中英《关税条约》成立，于中英邦交大有增进之望，并谓英日同盟复活之说，并不确实。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八次会议调整浙江等九省、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浙省何应钦辞职照准，遗缺以张静江补充；晋省杨笑天撤职，调河北刘瑶章补充；陕省梁俊章撤职，以孙维栋补充；滇省指委全体撤回，中央另派人前往专办登记；绥省冷刚锋调鲁充指委，以徐永昌补充；汪亮撤职，调河北指委卜哲民补充，商震调充北平指委；湘省张定撤回，以袁同畴补充；河北于国桢、刘绳武一并撤回，卜哲民、刘瑶章分调绥、晋，所有遗缺以王礼锡、李石曾、张继、张荫梧补充；北平黄如金、李乐三、李吉辰、徐季吾、梁子青一并撤回，以阎锡山、商震、杨永泰、萧子升、方振武补充；准赣省曾华美、邹曾侯辞职，撤回王镇寰、姜伯彰，调刘抱一回中央，以王廷瑞、陈泮藻、甘家馨、朱培德、俞百庆补充。

△　何应钦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国军编遣会之意义及其使命》，略谓："国家及人民，均认缩减军队为目前救国唯一要图，故编遣委员会遂应时代之要求而成立。""编遣委员会的使命，不仅消极的缩减军队而已，并积极的作改进军队之计划，如拟定国军兵额及其编制饷章，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兵费，厘定军官佐任免调补各项办法，筹办编余军兵之分遣安置事宜，其责任至为重大，其关系至为深切，我国军队前途之盛衰优劣，均于此会卜之。"

△　奉迎总理灵榇委员吴铁城、林森、郑洪年抵北平。23日，吴、林、郑等赴香山碧云寺谒灵。

△　国民革命军四川同盟各军主席并前敌总指挥杨森、总指挥刘

存厚、李家钰、陈鼎勋、黄隐、罗泽洲、郭汝栋、赖心辉联衔通电讨伐刘湘、刘文辉，要求国民政府将刘湘、刘文辉撤职治罪，并明令讨伐。

△　陕西各界反日运动大会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到数万人。与会者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等口号。大会通过提案13条，并通电全国，请一致主张。

△　奉天代表马锦章离平回奉，白崇禧以致张学良亲笔信交马携回，并派交通科长钱宗陶随同往奉接洽。

△　驻华葡公使毕安琪谒见蒋介石，谈中葡邦交。

12月中旬　　何键在北平谈称，湘、鄂两省近七个月内，已捕杀共产党员1.7万余人。

12月21日　　国民政府第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加派刘盥训、张文兰为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委员；准杨兆泰、商震、杨爱源辞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常务委员职，以孔祥熙、严庄、赵戴文继任；特任赵戴文为内政部长；任命阎锡山、恩克巴图、班禅额尔德尼、李培天、诺那呼图克图为蒙藏委员会委员，特任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通过公布；江宁县暂缓撤废；派张治中为民国十八年元旦阅兵总指挥，徐国镇为阅兵参谋长。

△　立法院长胡汉民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整理军队十大意义》，从“军队本身”、“地方治安”、“巩固国防”、“整理财政”、“国民生计”、“铲除军阀”、“打倒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完成真正的统一”、“促成建设”十层意思，证明整理军队“是目前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大家身体力行，“并且要去促成全国人民大家一致拥护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政府的政令，将这件关系全体国民万年大计的大事，完全实现起来”。

△　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在北平南苑对其第一师编遣官员训话，谓本集团军在北方部队，第一次裁减官长3000余员，士兵1.7万余名，给饷退伍回家，在队的仍应卧薪尝胆，“务期达到内除共匪，外固边防之目的”。

△　日田中特使床次抵沈阳，会晤张学良。次日离奉返国。

△　张学良委金梁办理影印《四库全书》事宜，提开办费20万元，由东方印刷所承印，东北文化社出版。26日，张学良为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致电世界各国预告影印此书之目的，旨在发扬东方文化，使世界学者便利研究。略谓：“论此书之伟大，则全部36275册……实460万页。论此书之完备……中间包括五千余年所有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舆、物产、文艺、哲理、美术、医、算、农、工、商、矿及百家杂学等，一无所遗，内容丰富，无可比拟。”并谓：今学良等“深认此书印行之必不可缓，现已筹集巨款，精心计划，纸墨形式，务求精美，出书期限，务求迅速，各样售价，务求廉平，想各国人士闻此消息，无不踊跃欢迎也。”

△　陈炯明应段祺瑞邀请，自香港取道日本长崎北上，29日抵大连，与北方军人订立共和大同盟。

△　汉口日警是夜擅自从同仁医院将水杏林尸体偷运至日租界。24日，鄂省交涉员就此事向日驻汉领事署提出严重抗议。

12月22日　　中法《关税条约》由王正廷与驻华法公使玛太尔在南京签字。

△　第一期民政会议开第三次大会，冯玉祥到会演讲，谓官员应是人民的公仆，要小心谨慎，刻刻自省，尤须具有勤俭耐苦之精神，生活平民化，如此风气自可改善。

△　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各区党务指导委员会联席会议通电反对中

央党部第一八八次常务会议关于撤回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黄如金、李乐三、梁子青、徐季吾，另行指派阎锡山、商震、萧瑜、方振武、梁永泰替充的决定，指出此系“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为达到其把持操纵全国党务，排挤忠实不阿附、不为其私人工具之革命同志计，而出此卑污恶劣的阴谋”，吁请“本党忠实革命同志一致奋起，声讨此篡窃党权之蟊贼”。

△　驻津日领事署向天津交涉署递交抗议书，略称反日会强制商民抵制日货，日界等于封锁，在中日未经济绝交前，不应有此种情形。

12月23日　　第一期民政会议开第四次大会，阎锡山到会演说，谓对县长“须严格考核政务，始不至荒怠”。“各人立身处世，须实行父母其心，公仆其身八字，作事时须实行以法治标，以情治本八字，此外再加上一勤字，然后自可收圆满效果”。

12月24日　　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预备会议，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出席，商定会议内一切规则，会期拟请政府改元旦举行。

△　第一期民政会议第五次会议讨论关于村里制及土地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案。蒋介石、胡汉民、吴敬恒到会发表演说。蒋称实行清理户口，调查公地，训练警卫，开辟道路，则三民主义定可实现。

△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四川战事，称战事发生系政客、官僚从中挑拨所致，“四川之事，不仅为本党之大不幸事，且贻外人口实，表示军人尚未觉悟，“中央对此，颇抱悲观”。

△　王正廷向上海新闻界报告外交，论述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略谓：不平等条约共有五点：一、关税不自主；二、侨民不受我国法律裁判，各国有领事裁判权；三、外国可以在我国驻军；四、租界及租界地；五、内河航行权。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步骤，因关税关系

国家命脉，故先从向各国争关税自主做起。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海关进口税则》业经公布，并定明年2月1日起实行，特定本日起举行关税自主宣传周，制定宣传大纲、宣传要点及标语，颁发各级党部，以便指导民众团体一体举行。

△　全国反日会、沪反日会、首都反日会、学联会、南京总工会等50余团体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速开编遣会议；废除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日本先撤兵，再谈判。蒋介石出见代表，对于民众请求，表示接受。

△　白崇禧在北平纪念周报告整军，并谓外间谣言本人联奉，其实均是信仰三民主义，何分彼此？“共党散布谣言，大家莫听”。

△　张学良电请何成濬将中枢最近政情据实见告，期作周行。25日，何成濬复电，告以关于外交方面，各国先后签订新约，呈递国书；内政方面，三全代表选举法及大会日期业已公布。

△　白崇禧总参议何千里及第四集团军赴奉军官访问团是日由北平启程。

△　北大学生代表赵子懋、李辛之等在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保持北京大学原名，取消北平大学区，罢免李石曾。

△　天津日警署将抢劫曹锟私宅之主犯吴杰等四人移交英国工部局。旋由英工部局引渡至天津公安局。25日吴杰被押解北平，26日吴在平被枪毙。

△　日本首相田中奏呈天皇，决定举行军法会议，严厉裁处与“皇姑屯事件”有关的军人。上奏之后，田中立即命令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遵办。旋因军部表示猛烈反对，以致军法会议未能开成。

12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凡11条，

其要旨为：该会为整理全国军事而设立，其职责在拟定兵额及编制饷章，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军费，规定各部队官兵裁留标准，厘定官佐任免办法，点验及校阅各军，筹办编遣事宜，委员长由陆海空军总司令兼任。

△　国民政府以《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则》业已公布，并定于民国十八年2月1日施行，是日训令直属各机关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　国民政府训令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转饬所属对于川北盐务稽核分所提解应摊债款，不得发生异议，以利进行，而维国信。

△　国民政府第二次临时国务会议，议决国军编遣会议改于民国十八年1月1日开会。

△　行政院第九次会议，据蒋介石函请，议决修筑六条干线国道：一、南京、杭州线；二、南京、芜湖线；三、杭州经衢州、上饶至南昌线；四、衢州经延平至福州线；五、浦口经合肥至安庆线；六、杭州经徽州至安庆线。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云南起义纪念会，到400余人，叶楚伧主席并致词，谓今日希望各同志注意两点：一、本党应打倒一切恶势力；二、统一本党力量，不许有第二种势力加入。

△　第一期民政会议闭幕。赵戴文主席致闭幕词，要求大家回去后，照议决方案切实办理。对于县政府组织，应顾及财政，不可增加行政费，减少事业费；整理土地须实行登记，按照价纳税办法办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丁超五致训词。

△　杨森电驻京代表罗冠英，谓此次川战发生，纯因资中会议邓部将领李家钰、罗泽洲、陈书农、黄隐等，均不自安，谣传蜂起，双方各自警戒，遂因误会而生冲突。“森以壤地相接，又恐乡邦糜烂，

故出而武装调停，现李、罗均已停战，盼兄迅请介公主席严令川中将领，不许再有军事行动”。

△　广东省政府议决派梁漱溟赴山西考察乡村自治；通过教育厅提议筹设乡村师范学校。

12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九次会议议决：一、草拟土地法原则案，指定胡汉民、戴季陶等10委员审查，胡召集开会；二、设立黄河水利委员会案，指定冯玉祥、孙科等七委员审查，冯召集开会；三、粤省政府委员李济深辞职照准，粤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刘栽甫请辞本兼各职，准辞兼职，任命李文范、陈济棠为粤省政府委员，李文范兼粤省民政厅长，李未到任前，由陈铭枢暂代；四、各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均着加入编遣会议为委员；五、任命赵戴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副委员长；六、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通过东三省及热河省府委名单，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吉、黑、热省府主席。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凡18条。

△　国民政府派张治中为民国十八年元旦阅兵指挥官，徐国镇为阅兵参谋长。

△　国军编遣会议筹备会开会讨论陆军兵额、陆军师编制及整理海军意见等问题。28日，通过会议规则。

△　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联名电请国民政府惩办杨森。略谓：“查此次川乱发生，显系有人煽惑，故损中央威信，破坏省府组织，除由锡侯、颂尧各拨所部，公推文辉指挥讨叛外，应请钧府免去罗泽洲、杨森、赖心辉本兼各职，明令讨伐。”

△　卫生部为整理卫生行政计划起见，借第一期民政会议机会，

于是日上午10时召开卫生行政会议，参加民政会议会员，全体出席，通过卫生部提出之《地方卫生行政初期实施方案》。下午4时闭幕，薛笃弼致词，提出“卫生救国”，改变“东方病夫”称号。

△　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外交部，报告日本首相田中特使床次对华表示好感。略谓：顷晤床次，盛称我政府诸公，协同一致，努力建设划策，甚可乐观。并谓此次游历，备蒙优待，嘱转谢忱，关于交涉各事，当尽心援助。

△　湖北交涉员甘介侯为“水案”事电外交部，报告肇事情形及交涉经过，请向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务将驻汉水兵团迅速撤回。

12月27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九次会议推蔡元培、吴敬恒、胡汉民、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戴季陶七委员出席编遣会议；政治分会展至3月15日撤销；限明年6月以前出版《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一卷及《国民政府年鉴》，并编辑《蒙藏全书》；新闻纸刊载会议消息，须由各该秘书处正式交出发表者，否则不许登载；由宣传部制定出版法草案；通过《处理留俄归国学生暂行办法》八条，规定凡留俄学生归国后应于一周内去中央或省市党部报到，由留俄学生归国收容所审查，否则以共党嫌疑犯论，由中央通令各地严密侦捕，押解中央核办。

△　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任阎锡山、恩克巴图、班禅额尔德尼、李培天、诺那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特任赵戴文为内政部部长。

△　国民政府公布《各省县举士条例》，凡15条，其要点为：为咨求民隐，厉行兴革起见，特饬各省县分别甄举人士，以备询用；凡年在30岁以上，历办地方事业成绩卓著，允孚众望者，大学毕业，有社会政治学识者，曾在地方自治机关服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学识

丰富曾有著述者，均可甄举；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行，证据确凿者，被告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经法庭判决有罪者，曾受刑事处分者，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或受停止党籍之处分尚未恢复者等，均不得甄举。

△　国民政府特派刘盥训、张杜兰为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委员；准免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兆泰、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常务委员兼职，以该会委员孔祥熙、刘盥训、严庄、赵戴文为常务委员。

△　中西《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西班牙驻华公使嘎利德在南京签字。

△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员选举，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中学三处进行，投票者3116人，选出执行委员黄仲翔、谷正纲、康泽、段锡朋、方觉慧等18人（由中央圈定九人），监察委员陈立夫等14人（由中央圈定七人）。

12月28日　　夜，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对中央社记者宣布，国府接到确电，奉天定29日易帜。

△　国民政府第十三次国务会议议决组织兵工研究委员会，任张群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唐绍仪为国府高等顾问；通过边防讨论会规则。

△　李宗仁乘“楚同”舰抵南京，出席全国编遣会议，并向中央报告第四集团军缩编情形。

△　江苏省政府电全国编遣会议，表示全力拥护召开编遣会议，“尚望诸公不避艰辛，详密计划，议决诸案，一致执行”。“现在集会在即，伏乞各省政府一致拥护，以促其成”。

△　刘湘代表张必果、刘文辉代表吴晋航越国民政府求见蒋介石，陈述川事，请严厉处置，以靖川乱。蒋适开国务会议，由何成濬

接见，允为转呈核办。

△　旅沪川人为反对下川东战事，是日召开“四川旅沪同乡川战同盟大会”成立大会，到120余人，通过简章，选举执委七人，发表宣言，指出此次反刘湘的战争，是军阀间“争权利、争地盘的混战”。“这种战争，不但是与民众毫无益处，反转是给我们以重大的祸害”。“所以我们不能不站在民众自己切身的立场，起来坚决反对”。希望各地旅外同乡及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少数人的权利战争。

△　张学良代表胡若愚偕任毓麟、夏仁虎抵平，与李石曾有所接洽。

12月29日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略谓：“现在国府诸公，反共清党，与此间宗旨相同，彼此使者往来，一切真相，更加明彻，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奉天省公署及各机关、学校、商店悬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旗。

△　奉天省府礼堂举行东北易帜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参加，惟日本领事未到。张学良于宣誓后发表演说，他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按：指日本）的做法。某方（按：指日本）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　蒋介石电复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

△　国民政府电复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

对易帜通电表示嘉慰，并谓“完成统一，捍卫边疆，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

△　白崇禧电贺张学良等易帜，称：“此后凡我国人，信仰三民主义，期诸实行，以创三民主义之新中国，必能永泯内争，合图对外，则帝国主义者与第三国际之阻谋，概无所施其伎矣。”

△　国民政府据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八次会议决定，通电庆祝元旦，规定全国各党政军及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休假一日，举行庆祝典礼，并普用国历。

△　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修正省代表大会选举法。经中常会第一八九次会议议决各县市党部党员在200以下者，选派代表二人，201人至400人者派三人，401至600者派四人，600以上者派五人，每县市以五人为限。

△　刘湘赴下游督师，杨森连战皆败，已电催请李家钰等向刘求和。中路刘文辉部到达永川后，赖心辉军即退回江津。同日，郭汝栋发出通电，表示仍服从刘湘。

△　张学良电外交部，报告西班牙人在青岛招募之2000华工，业已运往大连，由东北筹赈会交由兴安屯垦公署妥为安插。按：张学良以中央有令禁阻西班牙人在华招工，运往非洲垦荒，遂令青岛军舰将此批难民接往东北开垦，故有此电。

△　汉口各界代表及市民一万余人示威游行，声援水杏林惨死案。旋至省交涉署，交涉员甘介侯接见后表示，如5日内交涉无结果，即引咎辞职。

12月3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张继电贺张学良易帜，“从兹结束军事，开始训政，诸公责任，来日正多”。

△　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告某要人，谓日政府准备在我国实施新税

率以前，订成中日关税条约。

△　蒙藏民众联合会在南京招待记者，报告蒙藏近况，略谓：内蒙方面，民众亟欲脱离封建势力之压迫；西藏方面，英国以文化、经济、交通诸政策，侵略前后藏。要求中央规划办法，以保边土，并望国内舆论尽量援助。

12月31日　　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

△　国民政府任翟文选、陈文敦、张振麟、王毓桂、刘鹤龄、彭志云、高纪毅、王镜寰、王树常、高维岳、邢士廉为奉天省政府委员，并指定翟文选为主席；陈、张、刘、彭、王毓桂分别兼民政、财政、农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张作相、章启槐、荣厚、王莘林、马德恩、诚允、孙其昌、钟毓、王之佑、熙洽、刘钧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并指定张作相为主席；章、荣、马、王莘林分别兼民政、财政、农矿、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常荫槐、马景桂、庞作屏、潘景武、高家骥、陈耀先、孙润庠、李彭年、孙炳文、宋文郁、万国宾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并指定常荫槐为主席；马、庞、潘、高、陈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农矿、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汤玉麟、邴克庄、梁国栋、李元著、金鼎臣、佟兆元为热河省政府委员，并指定汤玉麟为主席；邴、佟、梁分兼民政、财政、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令准免山东省政府委员石敬亭本职，任吕秀文为山东省政府委员。

△　国民政府任赵戴文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该

委员会副委员长。

△　国民政府特派孙科为禁烟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颁发各省募金救灾令：据各省政府纷电报灾，北极燕云，西连关陇，中亘楚豫，南暨瓯粤，灾区之广，近古所无，仰各该省市县地方长官，召集富户殷商，添募巨金，以资接济；民食盈虚，务须妥为调剂。

△　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首相田中的指示，拜会张学良，会谈两小时。林久治郎捶着桌子责难："突然易帜，等于宣告断交；日本方面现在看你的态度，必要时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可能。"继而提出日本在满蒙的铁路权益，逼张让步，张学良以"外交问题是中央政权的权限"以示回绝。

是年　陈公博、顾孟馀、王乐平等国民党二届粤方委员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提出"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等口号，主张改组国民党，拥汪（精卫）反蒋（介石）。此系国民党内之一秘密派别，世称"改组派"。

△　海关收入约为关平银8233.2万两，较1927年税收增加关平银1359.7万两。

1929年（民国十八年）

1　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为庆祝“统一”后的第一个新年，在南京举行阅兵。同日，蒋介石发表告国民书，略谓：总理交与吾人统一全中国之第一步工作，幸已达到，“果能于今日以后之三年内，只以和平之方法实现总理所主张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达到中国国际地位之平等，乃吾人所大愿”。

△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是日举行开幕式，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胡汉民、宋子文、王宠惠、吴敬恒、孙科等均出席。同日，蒋发表《关于国军编遣会之希望》一文，宣称：“国军编遣委员会是根据五中全会决议案和北平汤山军事整理案而成立的。”“编遣委员会目的，固然是要整理全国的军事，但同时也要把整个全国财政这一个问题，谋根本的解决。”

△　第四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电蒋介石提出兵垦主张。略谓：“际此建设之初期，惟以实边为上策”，“拟请于国防计划确定之后，以全国多数之兵移屯于东北、西南各边地，巩固国防，并同时开发宝藏。”

△　蒋介石为发动对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第三次“会剿”，任何键为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何是日在长沙就职。

△　热河省政府成立，主席汤玉麟，委员邴克庄、金鼎臣等通电

就职。

△　国民政府明令原甘肃省宁夏道属各县划归宁夏省管辖；原甘肃省西宁道属各县划归青海省管辖。

△　由蒋介石发起之励志社在南京正式开幕，蒋自任社长。

△　上海浦东陆家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分厂突然关闭，全厂2700余名失业工人开紧急会议，组织停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与资方交涉，并向各机关呼吁。4月，工人代表百余人赴总公司请愿，5日被捕房驱散，多名代表受伤，张根宝等六人重伤入医院。上海各工会发表宣言声援失业工人。几经争持，至31日由上海劳资仲裁委员会裁决，决定准该厂停业，资方补发长工及短工一月工资，同时发给退职金，发还储蓄金及津贴受伤工人医药费100元，以后该公司扩充生产添设新厂时应尽先雇用此次退职工人。

1月2日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对编遣会议表示消极，是日至4日，先后至镇江、无锡等地参观游览。

△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派李凤冈查办赵化成勾结日人在大连组织“满蒙自决会”案，赵已逃，是日李由平赴奉与张学良接洽。

1月3日　　外交部公布《中法关税条约》、《中西友好通商条约》。

△　国民党中央委员周震鳞、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等七人，奉命至奉天祝贺东北易帜，接洽东北党务，并监誓张学良就职。

△　张宗昌旧部朱泮藻部约500人攻潍县城。4日，日军步兵二中队，炮兵、机关枪各一小队以护侨为名开赴潍县城内。8日，日军发出通告，谓在沿胶济路沿线20华里内，不许驻有华军，业经声明在案，而潍县当局玩视不遵，应即将保卫团、警备队一律解散，由绅商自行设法维持治安。

1月4日　　何键派李文彬、张与仁、王捷俊、吴尚、刘建绪分别为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1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

△　是日至6日，中共湘赣边区前委、特委、红四军军委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在宁冈柏露举行，由毛泽东主持，决定彭德怀红五军及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彻底粉碎敌人“围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　上年杨森联合李家钰、罗泽洲等组成同盟军，进攻刘湘之防区重庆，刘湘、刘文辉之省军全力抵抗，杨森失败。战事停顿数日，是日复起，由同盟军倒戈投入二刘方面之郭汝栋部占领忠县、酆都。5日，杨森被迫放弃万县，向梁山方面退却，刘湘乘胜追击，将杨森赶出下川东防地。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杭州开第三次常会，修改该会章程，并议决董事郭秉文、顾维钧、张伯苓、颜惠庆、周诒春、胡适辞职，由汪精卫、孙科、李石曾、伍朝枢、任鸿隽、赵元任继任，选蔡元培为董事长，蒋梦麟为副董事长，任鸿隽为秘书。

△　国民党热河省全体指委为反对汤玉麟任该省政府主席电南京辞职。

△　参谋本部训令首都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邮政检查所，派员分赴各邮局妥慎检查来往邮件。

△　国民政府训令交通部和各省、市政府查禁《无轨列车》及《东方》等书刊。7日，又训令查禁《血潮》，并饬上海临时法院封闭印刷该刊物之励群书社。

△　招商局“江安”轮私运烟土案，除有关行政、军事部分转交行政院和总司令部军法处外，其余司法部分是日由江宁地方法院移上海

地方法院办理，7日开审，16日判决，船员王建美等四人被判徒刑，烟土1360余斤没收。主犯未获。

△　上海新新公司职工会为反对资方无故开除工友俞德源、更换保单、克减膳费、禁止集会等事，曾提出修订劳资条约，以保障职工及工会权益，并改良待遇，经社会局三次调解，资方均抗不出席，工会方面遂于本日召开大会，议决自5日午起罢工，将工会一切职权完全移交罢工委员会，同时发表罢工宣言和罢工纪律。

1月5日　　编遣会议开第一次大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胡汉民、吴敬恒、张静江、孙科、李宗仁、李石曾、朱培德、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何应钦、赵戴文、宋子文、薛笃弼、王正廷、王伯群及张学良之代表王树常、杨树庄之代表陈季良等出席，俞飞鹏、曹浩森、古应芬、葛敬恩、张群、陈绍宽、周亚卫、朱绶光、刘汝贤、何成濬等列席。蒋介石主席并致词，编遣会议筹备主任何应钦报告筹备经过。大会决定将开会宣言交吴敬恒、胡汉民、戴季陶、古应芬修改后即日发表，其主要内容除说明该会议使命外，并标榜以“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四项原则为公认必守之信条。推定各审查委员会人选，分别以李宗仁（经理审查会）、阎锡山（编制审查会）、冯玉祥（遣置审查会）、何应钦（提案审查会和各种起草审查会）、李济深（国防审查会）为委员长。军事建设意见案内容暂不宣布。编遣会总务部已先成立，内定李济深为主任，葛敬恩为副。

△　国民政府令：陆军第三师师长钱大钧免职，任命该师副师长陈继承暂代师长职务。

△　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汪大燮在北平病故。

△　厦门《民国日报》因经费困难停刊。

1月6日　　张学良与中央特派代表及各机关首脑在沈阳开会，讨

论组织东北各省国民党省、县党部问题，决定由党务筹备处筹备，候中央任命指导委员后实行组织。

△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组织的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已成立。此前南京组成六团，苏、浙、沪、皖、鄂、湘、平、津等省市共组成16团，尚有新组织的40余团在审查登记中，在各省市军、师部未成立前暂以团部名义直辖于中央司令部，均受党部指导，施以初、中、高级教育。对年龄未及格之儿童另组幼童军，进行最浅近的训练。

1月7日　　李济深到达南京，谭延闿、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同车到京。晚，蒋介石宴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国民政府各院长，席间就编遣会议交换意见。

△　东北政务委员会在沈阳成立，委员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王树翰、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袁金铠、刘哲、莫德惠、刘尚清、沈鸿烈、何成濬、方本仁，以张学良为主任。

△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黄郛等14人为导淮委员会委员，指定蒋等七人为常委，并特任蒋为委员长，黄为副委员长。

△　国民政府训令各省政府妥筹安置遣散士兵，并转饬所属各县克日清查户口，实行连保连坐，以绝匪患而卫地方。

△　山东交涉员崔士杰抵南京，向外交部报告：驻济南日领西田已表示，如中国能保障山东日侨生命财产安全，日军必可撤退。

△　上海总商会等80余商业团体电呈中央，要求厘金、产销及二五附税等税同时一律裁撤。2月1日再电财政部要求停办特种消费税。

1月8日　　编遣会议开第二次大会，冯玉祥因病未出席。会上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及第八路军、东北边防军、海军代表分别报告编制、收支情形。加推谭延闿为经理审查委员会委员。讨论编遣委员会编制草案，决议增设常务委员及临时秘书处。

△　国民政府公布《发行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凡12条。规定为拯救各省灾黎，特发行公债1000万元，利率为周年八厘。自民国十八年六月起，十年本息全数还清。

△　行政院第十次会议决议：总税务司易纨士辞职照准，以梅乐和继任。9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任免令，梅于10日在上海江海关宣誓就职。

△　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讨论各省、市党部预算、增加经费等问题，规定省党部经费每月为1.3万元。

△　黑龙江省路权自主会代表于成泽（即于毅夫）偕东省旅京同志扩路会代表吴焕章等，向国民政府及铁道部请愿，誓死反对建筑长大路；要求从速开发葫芦岛商港；筹款修筑敦化、海林间铁路；收回旅、大及南满、安奉两路；警告日本不得在东北擅筑任何铁路；宣布东省与日本缔结之一切秘密条约无效；严令外交当局不得牺牲东北权利作中日交涉交换条件。次日又向中央政治会议和外交部请愿。

1月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〇次会议通过中德、中英、中法、中荷、中瑞（典）、中挪各关税条约；追认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案。

△　财政部为整理田亩赋税，通令各省重申严禁田亩加赋。

△　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向国民政府提出意见书，反对中比、中意两约关于外人在内地有居住自由与土地所有权之规定。

△　宁夏省政府成立，主席门致中，委员邵遇芝、扈天魁等宣誓就职。

△　汉口人力车夫水杏林被日本水兵炮车撞死案，因与日方交涉无效，本日汉口工人以日清公司三井物产会社为主实行对日总罢工。

水杏林之兄水裕林张贴罢工布告时被日方越界捕去，并被殴伤，日水兵陆战队亦实弹警备。

△　蒋介石令南京市长刘纪文会同财政部长宋子文查办皖北铲除烟苗特派员包世杰舞弊案，结果查出未奉命令并无收据支出军费60万元。

1月10日　夜，张学良诱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常荫槐。11日晨，召集张作相等开重要会议，并组织临时高等军事会审，以谋叛、内乱罪，宣判杨、常死刑。同日，张学良等通电宣布杨、常阻挠东北易帜及滦东撤兵、擅扣京奉路车辆、侵吞兵工厂公款二亿元等罪状。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〇次会议，修正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该《条例》规定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宣传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攻击或分化国民党者为“反动”宣传品；曲解或误解国民党主义、政纲、政策、决议及记载失实，足以影响观听者，为谬误宣传品。会议圈定黄仲翔、段锡朋、狄膺等九人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委，接受中央监委会决议，以贺衷寒、梅思平等五人为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派贺其燊、周杰人、裴存藩赴云南省专办党员登记事宜。

△　日军特务机关长佐藤由济南抵泰安，是日谒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同意孙之请求允津浦路通货车，又谓省府如取缔胶济路20里内经济封锁与排货即撤兵。

△　国民党改组派出版之《光明周刊》发表《胡党之训政观》一文，反对该党三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反对国民政府签订中比、中意新约和承认偿还日本西原借款等。

1月11日　编遣会议开第三次大会，何应钦报告修正《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条文案，提出增设常务委员五至七人（后改为七至九人），经讨论通过。宋子文说明财政部提案及财政情形，谓全国每年

收入约4.77亿元，支出军费1.92亿元，约占收入的41％，请以后所有军费概由中央筹发，各省应解中央款项不得截用，大会原则通过。经蒋介石提议，决定对《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草案》和《决定兵额及实施办法大纲草案》共组一审查委员会先行审查，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吴敬恒、谭延闿、何应钦等13人为委员，指定冯为委员长，负责召集。

△　长芦纲总积弊案移南京审理，被捕纲总李赞臣等五人是日押解抵南京，暂由盐署看管，听候审判。

△　全国赈灾委员会成立，原豫陕甘、两粤、晋冀察绥三赈灾会均改为处，各另立分处，并设保管、监察两委员会。

△　蒙古代表团前曾向中央请愿，提出热、察、绥、青四省省委蒙人居半、四省各设一蒙旗自治委员会、四省各旗设立旗政府三项要求。是日，该团二次派代表玛尼巴达拉等10人抵南京，促政府早日解决。

△　汕头大火，烧毁篷寮200余间、商店百余间，损失达100余万元。

1月12日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通电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职。

△　蒋介石召见奉方代表王树翰，听取有关杨（宇霆）、常（荫槐）案报告，并邀请胡汉民、戴季陶、何成濬、方本仁等交换对东北问题意见，决派方本仁赴奉。

△　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外交部，谓日内阁训令驻奉日领向东省要求解决满蒙各悬案，请外部电东省拒绝日方要求。驻奉日领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速决吉会、长大、洮昂等五路问题，张表示拒绝，并正式通知驻奉各领事馆，东三省已完全服从国府，所有对外已决及未决

各案均移交国府办理，东三省政府仅处理地方事件之小交涉。

△　日海军驻华司令官米内少将由南京乘舰抵武汉。13日，续有四日舰到汉。14日，米内与驻汉日领会议，决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工人罢工。

△　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湘、赣两省军队集中完毕，划湖南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桂东、汝城八县及江西上犹、万安、泰和、安福、万载、铜鼓、萍乡、莲花、永新、遂川十县为警备区，以江西七溪岭、古城、砻市以南，十都、大院、八字水以东，石门岭、大汾、禾源以北，藻林、五斗坑（江）、车坳以西为接战区。又赣军特派代表苏子泉抵长沙，将随何键出发萍乡。

△　福建省政府函卢兴邦师郭凤鸣旅防堵红军入闽。

△　国民政府任命毛炳文为陆军第三师师长。

△　河北省政府和党务指导委员会呈请撤销北平大学区，反对北平大学接收河北教育厅，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驳复。同日，教育部电北平大学、河北省政府及党务指导委员会，谓：中政会决议河北教育厅划归大学区管理，未便率予变更，应遵令接收。17日，河北省教育厅案卷正式移交大学办公处。

1月13日　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请任命万福麟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兵工厂督办，并谓对杨、常事件以断然处置者，实因彼等种种行动，不但令负责人无退让余地，抑且有危害国家之虞，“事前未及禀商主座，实万不得已，千恳俯视鉴察”。14日，蒋复电称：“既认杨、常有碍大局，临机应变，当无不合。”

△　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以张学良已通电宣布杨、常阻挠滦东撤兵、交还滦东五县、放回关内各路机车车辆等罪状，令河北省政府电询奉方撤兵及交还车辆日期，以便派员接收。

△　保定国民党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斗争激化。是日改组派由市指委赵霜峰、第六中学校长屈凌汉、第二师范校长梁子清等出面，假市党部召集护党大会，并游行示威，以反对西山会议派之育德中学校长郝仲青等，双方发生冲突。事后，郝具呈北平政治分会和河北省政府要求处理，政治分会主席张继批交大学区校长办公处查办。

1月14日　蒋介石在中央军校训话，声称国家前途安危全在这次编遣会议的成败，要求大家一致促进编遣会议决议案的实现。

△　国民政府特派唐绍仪为赈款委员会委员；任命刘之龙为禁烟委员会副委员长，罗忠诚为外交部特派福建交涉员，杨杰为宪兵学校校长。

△　国民政府令：邓荫南着照上将阵亡例给恤。同日，指令行政院抚恤故上将邓铿。

△　铁道部部长孙科电促张学良早日统一京奉路政，并速放还北方各路被扣车辆。4月13日，张电告孙科拨还机车四辆、客车等各种车辆共30辆，以恢复津浦路交通。

△　据《申报》讯：驻东三省日领事会议议决，对满蒙悬案依田中内阁政策进行，必要时取硬性手段，无论在当地解决或移至南京交涉，日本特殊利益绝不放弃。

△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约4000人离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并发表红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即“四言布告”）。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得此消息后，于16日飞电遂川第一路司令李文彬、桂东第五路司令刘建绪追堵，并电第二、三、四路司令按计划向井冈山进攻。

△　中国史学会在北平成立，朱希祖等任执委。

1月15日　国民政府下令制止川战，略谓：杨森自专征伐，目无

中央，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其善后事宜并着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共同负责，妥为处理。一面各束所部驻守原防，听候中央派员查明办理，以奠川局而肃军纪”。

△　国民政府任命北平市政府各局长：财政局舒双全，公用局李汉光，教育局李泰棻，卫生局黄子方，公安局赵以宽，社会局赵正平，土地局黄中汉，公务局华南圭。

△　劳动界贫民代表胡耀声呈北平政治分会转中央政治会议，请禁止粮行托词加价，谓“自民国三年至今粮价加上五倍”。是日国民政府训令各省、市政府取缔粮商不得任意提高粮价，并筹办消费合作社，以裕民食。

△　国民党改组派在北平出版之《青年出路》第二卷第三期发表《介绍西山会议派及无政府主义者》一文，列举西山会议派五罪、无政府主义者四罪，称“二者狼狈为奸，相依为命”。

△　交通部无线电管理处电台与奉天电台签订通报合同，是日起正式收发国际电报，可通欧洲各国及亚洲土耳其、西印度群岛等地。

1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一次会议，通过统一外交案，规定“所有各省对外交涉应归中央办理，由外部通告中外，无论何国凡与各省长官订立协定，中央不能承认，不能发生效力”。此外并通过土地法原则等案。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抄发国民党中执会第一八九次常会通过之《处理留俄归国学生暂行办法》，令饬一体遵照。该办法规定：凡留俄学生归国后应于一星期内赴中央或各省市党部报到，一星期内不报到者以共产嫌疑犯论，由中央通令各地党部、政府、驻军严密侦捕，押解中央核办；留俄归国学生报到后由中央所设立之留俄归国学生临时招待所收容之，非经中央详密考查认为确无共产嫌疑并给予证明书后不得擅自离去，取得证明书后得由党员五人以上之连坐保

证准其自由行动，但在一年以内仍须将住址、行动随时报告中央以备查讯；留俄归国学生确系共产党但在发觉前自首者，依照《共产党自首条例》办理。

△　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离日来华赴任，临行发表声明，略谓：解决中日重要悬案，增进两国间亲善关系之事，乃为中日两国国民所期望，然关于解决之条件两国间意见有所不合。“此行拟与国民政府当局会见，披沥日本之意见，同时倾听国民政府方面之言论，以求解决之端绪，务思竭其全力，谋圆满之解决”。19日抵沪，对记者谈此来目的有二：一、求华当局取缔反日；二、极望能解决各悬案。

△　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令反日会停收救国基金，已收者提20万元办国货公司，余款拨细纱厂作资本。

△　福建省政府宣布提前裁厘，是日起实行征收特种消费税。17日，厦门各行商联合会议决予以否认，并电上海总商会、福州及苏、皖、浙、赣各商会一致力争。2月1日，厦门商帮再请福建财政厅取消特种消费税。

△　招商局“新华”轮在香港附近触礁沉没，溺毙300余人。交通部长王伯群17日电招商总办赵铁桥申斥，并将赵及船务科长各记大过一次。

1月17日　　编遣会议开第四次大会，何应钦报告各提案审查结果，冯玉祥报告《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决定兵额及实施办法大纲》的审查意见，提出将《实施办法大纲》并入《进行程序大纲》之内，决议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进行程序大纲》主要内容为：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之后，即设编遣区；全国现有各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应分为六个编遣区，第一、二、三、四编遣区专管编遣原隶

第一、二、三、四集团之部队，第五编遣区负责编遣原东三省之部队，第六编遣区负责编遣原川、康、滇、黔之部队；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师，骑兵八旅，炮兵16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80万人，空军海军另定）；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师，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入总额之比例，务缩减军费至总收入40％为止。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92亿元。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一次会议，通过有关孙中山总理奉安纪念办法和宣传计划六种；推定蒋介石、胡汉民、李石曾、蔡元培、吴敬恒、陈果夫等12人审查北方党务，由蒋介石召集；决议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委会应即解散，由中央组织部派员前往办理该市执监委员选举，成立正式党部。

1月18日　　孙总理奉安委员会成立，是日开第一次会议，蒋介石、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20余人到会，推蒋为主席委员，孔祥熙为办公处总干事。

△　全国反日会第四次执委会在南京开幕，到南京、北平、山东、湖北、湖南、四川、黑龙江等地代表百余人。19日，通过如下各项决议：芳泽来华，应发宣言，并举行市民大会，予以警告；呈请国府饬外交部对日交涉绝对公开；呈请中央对日退还关税照会以无约国待遇之；呈请中央、国府从速收回旅大、南满、安奉路，积极交涉济案；发宣言并电全国援助“水案”，汇款救济罢工工友。20日闭幕。

△　汉水杏林案罢工委员会本日与19日两次电外交部称，“水案”移京谈判，请根据惩凶、道歉、撤退驻汉日水兵各前提条件与日方交涉，日方并须保证不得停止罢工工人职务或扣发工资，否则誓不复工。

1月19日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财政部取缔各省县属地方钱

庄商号不得再发行兑换纸币或类似纸币之票券，已发行者限一个月内呈查。

△　国民政府令：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擅自移师，构成战祸，经迭电制止，犹敢违抗，着即免职，听候查办。

△　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宣言，略谓：国民政府一向维持保护在华外侨生命财产之政策，为消除日本方面疑惧起见，一俟日本政府表示预备实际撤退山东日本军队后，将以特殊方法保护该地日人之生命与财产。

△　以床次为首的日本新党俱乐部发表对华声明，主张承认国民政府，实行山东撤兵，本国际平等精神改订通商条约，对满蒙方面须确保帝国利益，同时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对中国目下之不当行动宜促其反省，速复邦交于常轨。

△　云南省政府委员张维翰谒蒋介石，报告该省政情及对中法修约意见。旅沪滇人李根源、张耀曾电南京当局，力陈滇、桂受法人之苛待，希望收回钦渝路权，并修改未到期约章，纠正条约外之恶例。

△　刘湘电南京，略谓：已恪遵明令电达刘文辉就近协商田颂尧、邓锡侯各将领妥筹善后，惟杨森残部5000人已窜入田军驻兵境内，亦经请田就近解决。

△　湘、赣两省“剿共”第二路军占领宁冈。

△　西北学术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在北平大学报告考察经过，谓该团共有中外学者20余人，于1927年5月自北京出发，前不久从迪化归来。此次考察结果成绩极好，袁希渊所发现之恐龙最有价值，为亚洲第一次发现，时间在1600万年以前，远比西人发现者古老。

△　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病故。

1月20日　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成立，以罗桐坚赞为处长。

△　红四军与赣敌李文彬部战于江西大庾，失利向南雄转移。

1月21日　日本驻汉水兵劫虏罢委会汽船“海安号”并船员六人。22日，湖北交涉员甘介侯向驻汉日领提出抗议，略谓：日兵舰在中国领水内拘掳中国汽船，并捕船员，如非交战，即在公海亦属违犯国际公法，请日领明白答复。28日，外交部又电日公使抗议，至29日日始将汽船放还。

△　罗马教皇代表刚恒毅抵南京，22日谒蒋介石，表示此后该教教徒受中国法律支配。

△　福州商帮电南京当局反对特种消费税，略谓：“凭空勒税，无物不征，甚至无厘免税之物亦须征税，谓为聚敛则可，谓为抵补则不可。”

△　中国政治学会年会选颜惠庆为会长，马瑞慕、张煜全为副会长。

△　全国反日会代表向中央请愿，提出饬外部严重抗议日本扣留津浦路车辆，宣布东三省与日缔结密约一律无效，从速收回旅大及南满、安奉路，对济案坚持撤兵、惩凶、道歉、赔偿，取消不平等条约五项原则等七项要求。

△　中共江苏省奉贤县委会率众暴动，50余人夜袭庄行镇。22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得报后令第五师派队弹压，25日，由连长刘汉柱率一连人到奉驻防。

1月22日　编遣会议开第五次大会，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编制》、《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等。关于杨树庄所提有关海军提案，决议：海军总司令取消后，即设海军编遣区办事处，除原有第一、二舰队改为第一、二

舰队外，渤海舰队改为第三舰队，广东各舰队改为第四舰队，统归编遣委员会管辖，由海军编遣区分别编遣；至海军部应否设置，俟国防会议决定。推定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各部主任。

△　出席编遣会议之海军代表、代总司令陈季良及海军署长陈绍宽，因不满编遣会议对海军的决议离京返沪，提出辞职。24日，国民政府致电慰留。同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令在沪晤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挽留二陈。27日，蒋亲至上海面挽。二陈打消辞意，陈绍宽于29日随蒋回京到署视事。

△　第四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电蒋介石、李宗仁，以咯红旧疾复发请求辞职，准予回桂休养，所属各师已令各在原地听候中央编遣，在未实行编遣前暂托李品仙师长指挥。

△　国民政府任命伍朝枢为驻美国特命全权公使，施肇基为驻英国特命全权公使。

△　广东省政府会议通过民、财两厅所拟禁烟办法，其中规定40岁以下吸鸦片者处以死刑。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呈中执会称，北平发现护党运动刊物，对于中央肆行攻击。是日国民政府训令北平市政府切实查禁。

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二次会议通过中比、中意、中葡、中西、中丹商约；并通过《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编遣委员会常委及各部人选和孙科所提电饬广州政治分会执行铁道部施政方针，将广九、粤汉、广三各路局统归铁道部管理等决议。

△　东北政务委员会常会议决：日内将吉敦路交涉经过明白宣布，以祛群疑；设立蒙文师范学校，俾汉蒙文化得以相互贯通；委王树翰为东三省博物馆长；发行东北政务周刊。

△　湖北省政府议决，改武汉市委会为市政府，任命潘宜之为市长。

1月24日　国民政府特任张静江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曾养甫为副委员长，并聘吴敬恒等37人为委员。特派冯玉祥、马福祥、王瑚等17人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以冯玉祥为委员长，马福祥、王瑚为副委员长。

△　国民政府以喀尔喀车臣汗部落镇国公德钦诺布皆自请取消封号，特予明令褒扬。

△　修订中法越南陆路通商条约举行第一次会谈，中方外交部长王正廷、秘书胡世泽、欧美司长徐谟、云南交涉员张维翰，法方法使玛太尔及其秘书越南经济局长卜鲁思参加，双方均同意另订新约，并对中方所提草案进行讨论。

△　日使芳泽谒蒋介石表示中日亲善。此前晤王正廷说明来意，王表示但愿相见以诚，则彼此互有利益。

1月25日　编遣会议开第六次大会，李济深报告国防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决议交国防会议。何应钦报告提议：第三编遣区办事处之驻地应由太原改设北平，决议照改。何应钦报告草拟各省保安队编制草案和陆军军官学校组织要领案，决议：各省保安队编制草案交常委会特加注意，斟酌决定。通过陆军军官学校组织要领案，推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吴敬恒、李济深、李宗仁、何应钦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并推何为常委，蒋为委员长。阎锡山报告军官佐任免调补办法草案和陆军官佐服役任免规程大纲审查结果，宋子文报告经理审查委员会对编遣委员会经理办法和编遣区经理分处条例审查结果，决议均交常务委员会。同日，编遣会议闭幕。会后以编遣委员会名义发出通电，宣称今后必令全国军队真正党化，“凡集团防区之观念、历史与形迹悉当泯除净尽，勿俾留遗。至经议定之军制、军

额、军费各端，以及裁编、遣置、点验、检阅各种程序，尤当本总理知难行易之旨，谕之以勇毅，继之以忠贞，不偏私，不欺饰，不中辍，不假借，誓守开会宣言，力谋实施，以求贯彻”。

△　中日悬案交涉开始，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使芳泽在南京首次晤谈，中国方面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山东交涉员崔士杰，日本方面使馆秘书堀内、翻译有野、参赞驻沪日领上村列席。芳泽表示诚意解决各案，提出先自济案谈起。王表示同意，请日方早撤驻济日军，双方就撤兵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芳泽对汉水案希望以大化小。

△　中法修约谈判，《越南商约》议毕，有数点争议，对收回钦渝路权和滇、桂矿权等，法使表示须向本国政府请示后再解决。

△　北平政治分会因迭接河北各县来呈控告党部，是日函河北、热河、北平、天津各省、市政府和河北、热河高等法院，申明：“嗣后各地方党务人员如有凭借党部侵犯人民在法律上应享受之自由或直接干涉行政、司法者，各地方官吏应遵照五中全会议决案，严守职权，依法制止，一面报告省政府咨转省党部处理。如省党部处理不当，省政府应报告本会转请中央政治会议核办。如或行政、司法官依然放弃职权，任各级党部指委侵权越职不加制止，则各级政府、各级法院均不能辞其咎，本会当从严纠问，以肃纲纪。”

△　驻比公使、出席国际联盟鸦片委员会代表王景岐，在国联鸦片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日本及欧洲各殖民主义国家不肯放弃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不能杜绝鸦片私运。王又电国民政府，以本年6月3日为林则徐禁烟九十周年纪念，请明令褒扬并在虎门销烟旧址为林铸像立碑。

△　胶东刘珍年部师长刘开泰因与刘珍年发生矛盾被免职后，运动旧部并联络张宗昌等，于本日在龙口、黄县哗变，将刘珍年参谋长和黄县县长枪杀，肆意抢掠，随即窜向招远，日本兵舰两艘借口护侨

开到龙口。

1月26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谭延闿、李济深、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王正廷、宋子文为国防会议委员。任命冯玉祥、刘骥等16人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冯为委员长，刘为副委员长。

△　王正廷与芳泽第二次会晤，续商济案问题。王要求芳泽明确表示撤兵及撤兵日期。芳泽称：撤兵非不可能，但鉴于中国排日运动极为严重，须国府先加取缔，并保证日侨安全。王谓：今日所以全国排日，实由贵国不应出兵而出兵，应撤兵而不撤兵，只要日政府速撤兵，速与我订平等之约，则保侨、通商我政府自有办法。芳泽又提出要求中方道歉、赔偿损失、处罚责任者等项条件。王亦提出应由日方道歉、惩凶、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之要求。

△　行政院依中央政治会议咨，训令热河省政府应受北平政治分会指导监督。

△　孙连仲就青海省政府主席职。

△　东陵盗陵案在平津卫戍司令部开始预审，审判长商震，要犯谭温江及古董商张歧厚、戴明德等20余人被提讯，案犯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旅长孙殿英等未到。

△　烟台煤矿第一斜矿爆炸，103人遇难。

1月27日　行政院训令内政部，嗣后如有文武官吏贪赃枉法，或奉令不力、情虚蒙蔽、案情重大者，由各该高级长官押送到京讯办，或由该管长官撤职严办；如于某省犯案未了，他处不许复用，亦不得只撤差委，幸逃法外。

△　李济深以葬母为由离南京，经上海回广州。

△　张宗昌余党前直鲁军第五军军长王栋、前直鲁军游击司令于世铭分别在北平煤市街大旅社和西珠市口北京饭店设立机关，准备起事，是日被捕。29日提讯，据王供称：系奉张宗昌命前来北平，预备在平设立机关10余处，但现在成立者不过四五处，其余尚在接洽中，将来北平总指挥为王一人，其余如天津、保定、丰台、长辛店均派有专员担任，一俟布置妥当即同时起事。

△　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第二、三、四路军奉何键电令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总攻，除局部地区外红军防线均未被突破。

△　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指委会函该省清乡总署派兵进攻鹤峰县红军贺龙部。湖北省施鹤清乡司令马文德部奉调回防。

1月28日　国民政府特派王宠惠、蔡元培、陈果夫、谭延闿、冯玉祥、宋子文、赵戴文为审讯长芦盐案委员，以王宠惠为主席委员。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吴禄贞，着照上将阵亡例给恤。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三次会议议决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是否定为国花应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　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2月1日选陈济棠、陈铭枢等为执委候选人，李济深、古应芬等为监委候选人。

△　日本警察数十人包围奉天省本溪县政府和公安局，入内搜查，并拟将县长带走，经县政府卫队死力抵抗未逞，奉天当局向驻奉日总领事提出严重交涉。

1月29日　行政院第十三次会议依据宋子文提议，通过发行民国十八年裁兵公债5000万元案和请在新关税增加收入内年拨500万元专作整理国债之用案。

△　国民政府任命谭道源为陆军第五十师师长，李品仙为陆军第

五十一师师长，叶琪为陆军第五十二师师长，廖磊为陆军第五十三师师长，王泽民为陆军第五十四师师长，程汝怀为陆军第五十五师师长，张义纯为陆军第五十六师师长。任命熊谦吉为外交部特派湖南交涉员，原任李芳准免本职。

△　王正廷与芳泽在南京续谈济案撤兵问题，王请日方迅速宣布撤兵确期，芳泽表示接受，但撤兵日期须请示政府后再答复。30日，芳泽等离京回沪，中日交涉俟日本政府训令到后再继续进行。

△　热河旅平同乡会、热河农商协进会、热河民军委员会电北平政治分会，反对汤玉麟任热河省政府主席。

△　湘、赣军分三路总攻井冈山红军，第三路王捷俊部从侧面袭击得手，是日晚（一说28日）占领黄洋界。30日晨，第四路吴尚部攻破八面山哨口。

1月30日　国民党中政会第一七三次会议，推谭延闿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追认蒋介石等为国防会议委员；通过《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及《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规则》；决议奉天省改称辽宁省（2月5日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知照）。

△　赣军张与仁等旅完全占领井冈山，并进行残酷烧杀。红五军由彭德怀率领从荆竹山方面突围转向赣南，王佐部和地方游击队仍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袁文才已随主力撤走，井冈山只留下王佐部200余人）。

△　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外交部，报告《中日关税协定》本日经日本枢密院正式通过，由首相田中训令芳泽通告国民政府。31日，驻南京日领冈本访外交部长王正廷，口头声明承认该协定，2月1日实施海关新税则，在华日侨可遵照办理。

△　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因河北各县民众控告党部，而中央党

部不能断然处置，政治分会反受党部攻击，为此致电中央政治会议请求辞职。31日，中常会决议慰留，阎锡山等亦致电挽留。2月5日，张打消辞意，出席政治分会会议。21日，张以“政象迍邅，危机环伏，所属各地常呈恐怖状态”为由，再请辞职。25日，中常会决议再慰留。

△　交通部长王伯群因该部与建设委员会在无线电管辖权问题上发生纠纷未得解决，向行政院提出辞呈。2月4日，国民政府指令慰留。

△　甘肃省政府常会推王烜为临时主席，李象臣、何山亨、王烜为常务委员，并决定以李为执行处长，王为事务处长，骆力学为监察处长。

1月31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四次会议，讨论孙中山奉安典礼展期案，决议因迎榇大道工程未竣，应俟南京市长再行精密计算路工日期报告奉安委员会，再提会决定。决议全国农业行政与矿业行政以分别召集会议为便，应先召集全国农政会议。

△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吴敬恒、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张学良、杨树庄、何应钦、宋子文、胡汉民、林森、蔡元培、戴季陶、孙科、陈果夫、于右任为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　北平当局查获毒品海洛英10余大包，乃张宗昌旧部邵锡昆勾结日本浪人运来者，邵被捕。

是月　河北清党同志会两次具呈北平政治分会，指责河北、平、津指委王南复、王宣、童冠贤、张清源等，多系改组派王法勤等所保荐，或为新中学会主要分子，公然反抗中央命令，反对张继、李石曾等，请彻底改造河北及平、津党部，对党籍严加审查，并举行特别登记。

2　月

2月1日　　财政部所颁海关新税则开始实行，内地税局及煤油、卷烟征收总局裁撤。同日，蒋介石发表《对于关税自主之感想》一文，略谓："今日为新税则实行之日，亦即差等税率实施之日。吾国关税至于今日犹不能完全独立，而行此不得已之过渡税率……欲求关税之完全自主，全在吾人自强奋斗，猛进不已。"

△　国民政府特任谭延闿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　蒙藏委员会在南京成立。阎锡山、赵戴文、白云梯、恩克巴图、格桑泽仁等20余人出席成立大会。

△　吉林省政府成立。

△　教育部聘吴敬恒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并指派黎锦熙、钱玄同等七人为常委。

△　山东长山县周村村民、皈一道首领马士伟自立为"皇帝"，定周村为中京，并任命文武官员，纠集道徒1000余人，其势力已扩展到淄川、博山、临淄、邹平等地。

2月2日　　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正副主任、国防会议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监委王宠惠、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相继致词。

△　国民政府令：派外交部长王正廷为商订中法越南新约全权代表。同日，王正廷与法使玛太尔在沪继续会谈，法政府已原则同意前在南京所议各事，本日双方依草约逐条讨论。法方同意中国在西贡、海防、河内设领及修改滇越路章程，但关于护照问题不允废止原办法，只允减轻护照费。

△　王正廷与芳泽在上海继续谈济案，对责任问题略有争执，日方声明决撤济南驻军，但未宣布撤军日期。

△　全国电报同人公益会委员长何家成等到南京请愿，要求将有线电、无线电统归交通部管理。11、12两日，全国电局职工代表团分别至中央党部及行政院请愿，要求统一电政。

△　国际联盟鸦片委员会通过致联盟行政院之报告，国民政府代表王景岐因该报告未考虑中国志愿，对限制与管理毒药事无具体结果，未投赞成票，并声明保留在适当时机将中国方面志愿向国联提出之权。

△　红四军在吉谭与赣军刘士毅旅激战，互有伤亡，当晚转移至闽、赣、粤三省交界处之罗福嶂。4日，在罗塘与刘士毅旅再度接触，旋仍退回罗福嶂。

2月3日　　张学良命临榆、抚宁、昌黎、乐亭、东沟五县知事赶办交待，以备商震派员接收。

△　南京总商会以特种消费税病商甚深，议决呈请财政部暂缓施行。

△　闽军郭凤鸣旅在汀、漳全部动员，准备开往闽边堵截红四军。5日，红四军与郭部在东留激战后，转向长汀、会昌方面。7日，红四军由楼竹坝向瑞金之九堡进军，8日将尾袭之郭部击退。

2月4日　　蒋介石发表《本党最近之重要问题》演讲，指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是：一、保障本党历史的基础；二、巩固本党政治的地位。下届中执监委的选举标准，应注意之点：一、必须对于党义有真切的认识；二、必须在本党有相当的历史；三、必须有奋斗的成绩。在谈及汪精卫回国时，称汪“当然是下届中央委员选举时一个重要的候选人”，“我相信他自身有一个为党为国的主张，如果没有

到于党国有利的时候，无论如何要求，他是决不回来的，即使回来，也不肯作人家的傀儡的”。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五次会议，议决该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之人选标准：（甲）取得本党党籍，并为本党服务二年以上，经此次登记合格领有新党证或登记证者；（乙）从未有违反本党言论或行为者；（丙）从未违犯党纪者。

△　阎锡山以父病重为由呈国民政府准假四星期，于是日由南京乘轮北上返晋。

△　济案交涉经王正廷与芳泽长时间晤谈将大纲谈妥，细目亦略定原则。芳泽表示会后即将详情报告政府，请明示撤兵日期；对济案责任问题决组中日联合委员会赴济实地调查，赔偿以相等为原则；至蔡公时被杀事以日本道歉了之。

△　国民政府依据行政院及司法院呈请，训令各军长官严禁各军事机关受理诉讼，干涉司法。另据立法院呈请，为整理现行法规，训令各院、部、会、各省、市政府将各机关所颁行各种法规、条例，除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经国民政府公布者外，一律检送立法院审议，以昭划一而免纷歧。

△　江苏省政府及各厅自是日起陆续迁往镇江，定18日开始在镇江办公。

△　河北省政府会议决定遵北平政治分会函，令工商厅及各县局制止店员工会成立；决定制止庆云等县农民组织自卫军，已组织者令即解散，不服则拿办首要。

2月5日　　冯玉祥以豫、陕、甘灾重待赈及为办第二集团军编遣事离南京北返。

△　行政院第十四次会议通过财长宋子文提案，决定再颁通令，

凡已设有中央银行各地方，所有机关一切公款，如有不遵前令全数交存中央银行者，即以营私舞弊论，并将款项提还国库。

△　国民政府令：福建省政府主席以该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陈乃元暂行代理；任命蒋介石、胡汉民、吴敬恒、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李宗仁、何应钦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以何应钦为常务委员；特派伍朝枢为商订中土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国民政府公布《国籍法》、《国籍法施行条例》、《侨务委员会组织法》。

△　国民政府据编遣委员会呈请，训令军政部、海军总司令部等称：海军总司令部取消后，设海军编遣办事处，原有第一、二舰队编为第一、第二舰队，渤海舰队改为第三舰队，广东各舰队改为第四舰队，统归编遣委员会管辖，由海军编遣办事处分别编遣。

△　张宗昌所委之“民治军”总司令张敬尧在济南日人旅馆秘密集会，谋于日军撤退时乘机举事，与会者有号称代理山东督办袁忠权和刘开泰的代表等10余人，并日本顾问二人。

2月6日　　孙总理奉安委员会第三次大会决议改6月1日为奉安之期。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该项决议。

△　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四次会议决议：任命万福麟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并指定万任该省政府主席；特任杨树庄、赵戴文、阎锡山为国防会议委员。9日，国民政府任命令发表。

2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六次会议决议：通过各地党部出席及列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各省、市党部执监委员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均不以具有该省、市党籍为限；照修正案通过下层党部工作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准江苏、山西、浙江、上海定期举行代表大会，成立省、市党部，执监委员选举采用《省执监委员选

举法大纲》第二条丙项规定办理；汉口特别市执监委员选举改照《省执监委员选举法大纲》第二条丙项规定办理，并指定张知本等42人为执监委员候选人；决定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特别市补行登记，其办法可与组织部洽商；通过张静江等提议，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加入中央政治会议。

△　白崇禧辞职未准，但允暂假休养，本日遵命将所有驻河北部队暂交李品仙代理指挥，将总指挥部应行公事交参谋长王泽民代拆代行。

△　驻哈尔滨英、美、德、法、日、意、葡、丹等国领事开会，对海关征收中国土产出口二五附税问题，借口征收手续未完善，征收之先未通知各驻在国领事，使外商蒙受重大损失，决定由各领事分电驻平公使向国民政府交涉。

△　北平总工会开“二七”纪念会，到各工会代表200余人。同日，长辛店有500余人开会追悼京汉路被害工友。

2月8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使芳泽举行第六次晤谈，芳泽奉日政府令将济案交涉原案推翻，尤其对赔偿损失采相等原则表示异议，王对此提出抗议。此后芳泽托病不出，中日交涉暂停。

△　湘赣边红军转入外线作战，湘军的“会剿”计划完全打破。何键因支绌异常，已将所部人员分别裁减，伤兵野战各院概予取消，并于是日电蒋介石、李宗仁，拟2月底将“剿共”总部收束。19日，何再呈国民政府陈述请求收束理由。

△　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大会开幕，14日选汪宝瑄、李寿雍等为执监委候选人。15日决议电汪精卫等国内外中委来京主持党国大计。16日闭幕。

△　津浦路济南通车问题久经交涉，驻济日领西田等允先通货

车，本日达成协议，规定济南至晏城、崮山互通货车，而南北货车到济南时仍须经日军检查。自12日起，济南至崮山、济南至晏城货车每日各往返一次。

△　云南民众改订中法商约后援会通电，要求收回滇越铁路和废除钦渝路约，他如越南设领、取消旅越华侨及过境华人、国货种种苛征虐待，俱当彻底解决。

2月9日　国民政府训令各省政府：煤油税已拨归海关征收，自2月1日起照新税率实行，原有煤油税局一律撤销，以后煤气油运销各地，各省政府毋得另立名目再征任何税捐。

△　财政部电苏、浙等五省财政特派员和财政厅，谓常关裁撤时期应候大宗货品均已办消费税时，由部酌定日期。在常关保留期内，所有已征特种消费税货品应予免征常关税及附征之内地税。

△　交通部致函外交部称：内河航权关系于国防及经济至为重大，决不能任各国侵占，请与各国订通商条约时特加注意，并与交通部斟酌。

△　胶东乱事又起，刘开泰、李锡桐部攻入龙口，驻龙口之刘珍年军何益三部退往黄县。反刘珍年之刘开泰、李锡桐、黄凤起、施中诚等日趋联合，自称“中华国民军讨逆军”，以前直鲁军毕庶澄部旅长史书简为总指挥。13日，“讨逆军”复占黄县，何益三部退出城外，往东败逃。

△　铁道部次长王征由南京赴北平洽商接管平奉、平绥路事。11日，平奉路接铁道部训令，着与平绥路合组整理委员会，派王征为委员长，朱华、班廷献、刘景山、胡文有为委员。同日，王征由天津赴北平与当局磋商，将平奉、平绥两路改为委员制。

△　红四军进入瑞金，旋即退出。

2月10日　红四军在江西瑞金大柏地击溃赣军刘士毅旅，歼敌一团，俘团长萧致平以下800余人，获枪800余支，取得下山以来第一个胜利。

△　国民政府新聘财政顾问美人甘末尔等12人抵上海，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国民政府改革币制。

△　樊钟秀旧部李万林率4000余人图唐县，被冯玉祥军第二十四师石友三部歼灭。

2月11日　王正廷与玛太尔举行中法商约第七次会议，讨论人头税、营业税、通过税、过埠证等问题。中方要求与欧美、日本一律待遇，法方仅对通过税允向政府请示，人头税允改去人头二字，营业税各国侨民均有，过埠证则殊坚持，只同意凡持有护照之华人及居留该地之侨民可以废除打指模，但行迹可疑经当地法庭认可者仍应打指模。

2月12日　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表示服从编遣。

△　国民党中央委员蔡元培、吴敬恒等，在沪借世界学社及促进中法文化事业名义宴请中法要人，法使玛太尔和何应钦、王正廷等60余人参加。会上蔡首先致词，次李石曾报告世界学社所进行各事。王正廷讲演，称中法文化事业须合作，中法国交亦当亲睦。法使玛太尔亦发表演说。

△　红四军到宁都，14日抵黄坡。

2月13日　国民政府通令，以广东省中山县为模范县。16日并令特设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以唐绍仪、孙科、吴铁城、李禄超、钟荣光、李蟠、马应彪、蔡昌、郑道实为委员，指定唐为主席。

△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与菲律宾合组无线电公司，本日正式签

订中菲报务合同，以后所有自菲台拍来国际电报均归建委会电台接收。

△　江苏省宿迁县小刀会徒与极乐庵僧人5000余人暴动，大旗上书“党逼民反”四字，将国民党县党部捣毁，抓走县指委多人。14日，该县县长童回坤进行调停，会众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取消县党部、重修已拆毁之东岳庙等项要求，会众达五六万人。16日，第九师约一团人开到宿迁镇压。

2月14日　行政院训令内政部，准陕西省政府划朝邑、华阴两县所属滩地五千七百余顷，于该处适中之地大庆关新设平民县治。

△　国民政府接刘珍年电，谓刘开泰等部进逼甚紧，请速下令讨伐。

△　南京检查邮电委员会成立，委员暂定24人，由卫戍司令部派陈开怀为主任，即日开始工作。

△　全国电报局职工代表团第四次赴行政院请愿无线电讯归交通部办理，要求面见行政院长谭延闿，适谭在中央党部开会，用电话答复，允三日内定期约见，并表示完全接受各代表请愿，所有两次呈文及全国各电局来电当一并提出审查会讨论。18日，谭见请愿代表听取意见，允即日召集行政院会议讨论此案。

△　全国反日会常会以中日交涉破裂，决议通电全国一致武装起来为政府后盾；训令各省反日会加紧对日经济绝交工作。

2月15日　黑龙江省政府成立。

△　独立第四师改为暂编第一师，师长张贞在漳州宣誓就职。

△　国民政府任命周振声、邓庆澜、李培荣分别为天津市财政、教育、土地各局局长。

△　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拟具《严防首都各机关奸徒混迹办法》数条。是日，国民政府训令首都各机关遵照办理。

△　上海新新公司风潮又起，资方以冯自由为首，率暴徒200余人将公司包围，打伤工人数十，冯等声称不承认职工会签订之条件，并无故开除工友20余人。16日，职工再次罢工。21日，市社会局令职工先复工，静候核办。25日，500余工友整队赴社会局请愿，提出请政府制止公司不法行为、设法维持工友生活、严办资方三点要求。3月4日，职工会发表告各界书，呼吁各界人士督促公司资方迅速开门营业。10日，上海各工会发表宣言请政府惩处冯自由。26日，该公司职工200余人再次向市党部、社会局请愿。4月1日复业。

2月16日　国民政府派驻德公使蒋作宾为商订中匈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中法商约第八次会议讨论过境税问题，订定凡中国货物运赴越南，不论何种船只，有起运地点关单证明为中国货者，一律免税。

△　日使芳泽发表谈话称：已接到外务省训令，中日济案交涉将继续进行。18日，芳泽派有野、上村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希望重开谈判。

△　日侨反对胶海关实施出口附加税，本日由日领藤田与海关交涉，决定在中日交涉未解决前，仍照旧纳五分税，新附加税款暂存正金银行。

△　广州政治分会电铁道部称，粤汉、广九、广三三路局以后直接归部办理。

△　上海日商华丰纱厂因厂方无故开除工人200余，强迫工人增加工作，减低工资，是日全厂1000多工人罢工。17日，该厂职工会向厂方提出被开除工友复工、恢复原有工资、停工期内工资照给等五项

条件，并组织复工委员会办理罢工期内事务。18日，厂方宣布停厂，并遣日海军陆战队武装入厂示威，工会令全体工友出厂。3月1日，工人向厂方提出十条要求，包括：一、停雇工人11人复工；二、工头陆河香停雇；三、罢工期间工资照给三项先决条件。7日，厂方容纳工人要求，工人复工。

2月17日　外交部照会英、美、法等12国公使馆，通告新关税项下每年提出500万元整理内外债。

△　济南惨案后援会代表团通电全国，请政府停止对日一切交涉，芳泽自食其言，已失代表资格，不必再与周旋，望政府迅令全国武装军士积极备战，作彻底之对待，并望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一方对日经济绝交，一方准备武装宣战，以救危亡。

△　四川省政府及裁编委员会民众督促会代表唐重民抵南京请愿，携有致国民政府呈文一件，内陈川省善后办法多项，要求采纳：一、请中央转饬各委员限日返川，如逾期不到者即简员另补；二、请中央对于此次违抗命令擅开兵衅各部撤除番号，责成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四军长切实改编；三、请中央派兵入川；四、请中央明令免除一切苛捐杂税预征代垫等。

△　孙中山铜像在北平天安门奠基，张继、林森及各界代表1000余人参加典礼。

2月1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八次会议决议：确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费预算为29.9958万元；通过扩充中央广播电台计划案；推胡汉民、李石曾、戴季陶、陈果夫讨论河北及平、津两市党员补行登记事宜。

△　财政部公布《民国十八年裁兵公债发行简章》，凡20条，债额5000万元，定本年2月至4月为发行期。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法越南条约已有解决把握；中法宁案已完全解决，计赔偿总数约10万有零，其中有法国神父一人死于宁案，计赔偿三万元，但亦仿照意大利死难神父办法，将此款移作中国慈善事业之用；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爱文诺希望我国对国际间多加联络，本部已派吴凯声为一等秘书兼秘书长，常驻日内瓦办公。

△　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杨全宇、熊晓岩、卢师谛、黄季陆等草就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文，指控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枪杀邛崃县指委孙鸿图，武力解散省指委成立之“孙案”后援会，威逼省指委出走等，请转饬国民政府将刘撤职查办。

△　上海总商会坚决反对特种消费税，议决函请全国商联会通电全国各商会一致反对，并定本月20日续开各业团体会议，商决最后对付办法。

△　张继电教育部辞北平大学委员会委员及暂代主席职，电称：“数月以来，北方教育风波迭起，情势汹涌，动辄聚众包围，无可理喻，最近第一师范学院学生要求增加经费，包围十小时”，“学风如此，殊堪痛惜。”21日，教育部长蒋梦麟电张慰留。

2月19日　武汉政治分会第四十九次会议议决改组湖南省政府，免该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职，以何键继任，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谭（道源）所部军队。

△　行政院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提案，决定将两湖财政委员会撤销，派白志鲲为湖北财政特派员，粟显扬为湖南财政特派员。

△　张宗昌、吴光新率数百人由大连乘日轮抵龙口，加紧对胶东扰乱，同行者有日人城口等。

△　北平东交民巷使馆界华捕罢岗，反对无故开革巡捕，要求加薪并斥革管理巡捕之洋员狄尔等。英、美、法、日、意等使馆卫队在出入口站岗暂维秩序，并另行招募新捕。20日，罢岗华捕组织罢岗委员会。21日，国民党北平市指委会通电声援罢岗巡捕。24日，罢岗巡捕游行，而公安局派出40名武装人员于界外戒备，同界内卫队联络动作。25日，卫队撤岗，由新捕替换旧捕。26日，使馆界设宴招待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北平公安局长赵以宽等致谢。

△　北平第一师范学院学生数百人向北平大学办公处请愿，要求增加经费，恢复公费待遇，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李泰华等40人受伤。20日，师院学生游行并发通电，对当局以武力对付学生表示誓死周旋。北大全体学生电教育部，请蔡元培北上主持校务。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指委会电中央党部，指责李石曾、张继等镇压学生，请将其撤职查办，处以极刑。21日，教育部电北平大学当局，指责学生“目无法纪”，令将为首各生依法办理，并另电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卫戍司令及北平市长，请“设法制止学生暴行，防止煽动破坏”。同日，北平市总工会、农协会、商协会、学生联合会等各团体发表通电，请查究“二一九”惨案祸首张继、李书华等，并要求撤销北平政治分会及大学区制。

2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六次会议决议，任命驻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巴西、瑞典及挪威特命全权公使；决定组织解决北大学潮委员会，推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蒋梦麟等为委员，由蒋负责召集。

△　日本驻汉炮兵全部登陆，在各要口架设炮位，重筑沙堆，形势严重，并再次越界捕人，罢工指导员夏元被捕毒打后释放。21日，罢工委员会请交涉署对日抗议。

2月21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九次会议，决议各地党部出席及列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甲、普通党部：（一）选举

者：南京、上海、广州、广东；（二）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者：江苏、浙江、湖北、汉口、天津、山西、广西、甘肃；（三）由中央指派者：哈尔滨、察哈尔、绥远、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北平、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南、江西、云南、贵州、河北、四川；（四）由中央指派列席者：西康、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宁夏、内蒙古。乙、铁路及海员特别党部：（一）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者：沪宁、沪杭甬、津浦；（二）由中央指派出席者：平汉、粤汉北段、海员；（三）中央指派列席者：平绥、平奉。丙、军队特别党部另定。

△　武汉政治分会电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各委员报告解决湘事、改组湖南省政府情形，指斥湖南省府主席鲁涤平把持财政，“清共”不力，苛征厘盐，行政多乖，“对于属会指导监督尤复任情抗阻”，当经常会议决，免去鲁本兼各职，并指定该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原省府委员曾继梧、周斓、刘兴、刘铡留任，另加任张开琏、黄士衡、邹鹏、叶琪、吴尚、陈渠珍为委员，以曾、张、周、黄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请鉴核。同日，李宗仁借口治疗目疾离南京赴上海，行前电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编遣会委员报告免去鲁涤平、谭道源师长职，并将各该师部队分别解散。

△　第四集团军夏威、叶琪两部奉武汉政治分会令入湘，鲁涤平闻讯率部走平（江）、浏（阳），后续由水路退入江西。夏部李明瑞旅、叶部杨腾辉旅进驻长沙，杨并以旅长名义布告，略谓：“第十八师师长鲁涤平自兼任湖南主席以来，结合谭道源部拥兵恣肆，对于两湖政治分会与总司令命令视同弁髦，中央财政任意把持，共匪、土匪任其骚扰，破坏纪纲，莫此为甚，我总司令业经明令将该师长鲁涤平、谭道源本兼各职即予免除，听候查办。”

△　刘珍年部与黄凤岐部战于山东福山附近之商疃，刘军获胜，22、23两日在烟台以西续胜敌军。

△　顾震电中央请从速解决胶东乱事。孙殿英部由齐河东开，在章邱城南与民团开火，孙布告称奉中央令剿抚张鸣九部。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招待新闻记者，该部秘书张廷休宣称最近共产党中央全会决议集中力量宣传武装暴动，其宣传品有《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形似《中央半月刊》，请报界予以“揭露”。

2月22日　已入湖南之武汉李宗仁军叶琪率何宣、危宿钟两旅向常德谭道源部进攻，谭部往辰州上游退去。同日，李明瑞、杨腾辉两旅移株洲，向浏、醴追击鲁涤平部。

△　中法商约举行第十次会议，双方声明废止旧约，开始讨论新约草案。23日、25日继续会谈，草约均已审查一过，对关税和条文主文等问题仍有争论。

△　东北舰队奉国民政府令由“楚豫”舰长率两舰驶至烟台，协助刘珍年肃清胶东。

△　驻日公使汪荣宝赴日外务省访亚细亚局长有田，商谈张宗昌在山东起兵反抗国民政府事。

△　国民党南京各区党部联席会议决议请中央电促汪精卫等中委回国主政。

2月23日　何键由醴陵电武汉辞湖南省政府主席。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沪答大中社记者问，谓关于整理内外债设立整债委员会事，外部已照会英、美、日、法、意、比、丹、葡、荷九国，各国须派代表一人办理此事，或加入该委员会；济南现在日人势力范围下，阻止我国军队到达该处，今则放任盗匪设立办事处，已向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驻青岛日领藤田在领署招待日记者，声称：一、青岛及铁路

沿线20里内一概不许“反动的策动”；二、不许有“妨治安”军队通过铁路；三、中国正式军队如有通过铁路必要时，须得日军之谅解，并不妨其军事行动；四、与“反动派”有关之日人即时驱逐出境；五、青岛及沿线凡有军队色彩者，当与华警协力不许其上岸。

△ 张宗昌企图利用刘珍年，本日派副官刘铭勋持函赴牟平见刘。

△ 上海总商会再次通电反对特种消费税，内称：“五省裁厘会议议决举办特种消费税有十种之多，重重剥削，无异变相厘金，且裁厘仅限五省，运至五省以外货物又须节节抽厘，裁厘加税之谓何？国信不立，民命何堪？”“事关商民切肤利害，非有联合一致坚决之表示，不足以动当局之视听……务乞一致奋起，共同力争。”并决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2月24日 蒋介石、李宗仁、谭延闿在上海会商鲁涤平免职事，李表示当与中央一致。

△ 桂军夏威部李明瑞旅抵醴陵，截缴鲁涤平部陈祁初团。

△ 北平大学各院长董时进、徐炳昶等致函校长李石曾请解决经费和学潮问题，并电教育部长蒋梦麟转促处理学潮各委员到平实地查办学潮。

△ 北平工人、学生等3000余人集会，通过请中央收回东交民巷、援助罢岗华捕、废除《辛丑条约》、组织市民裁判委员会等议案20余件，会后游行，至前门被军警驱散。

△ 国民党江苏省宿迁县指委会通电，宣称该县13日僧人和刀会暴动，捣毁县党部暨各机关、学校住宅数十处，捕去党员、学生、教员30余人，“县政当局故意纵容，不加制止”。25日，该县县长童回坤通电解释，谓“投鼠忌器，武力又薄，未敢开火”，现“地方如常，正在

严拿首要，筹办善后”。

△　天津反日会为中日交涉汉口“水案”事召开市民代表大会，到会1000余人，通过向全国反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案多件，其中有电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公开中日外交、通电全国一致对日经济绝交、不以停止反日运动为中日交涉条件、5月3日以前肃清日货、即日禁止对日输出等项。

2月25日　李宗仁由上海电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陈述处理湘事，将鲁涤平免职详情，并谓：“武汉政治分会有此紧急处分，在事势上固出于万不得已，然不及候中央核准遽令各师执行，未免迹近操切”，“除请中央顾念湖南人民痛苦，迅赐追认武汉政治分会第四十九次之决议照准施行外，并请将宗仁加以处分，以明责任。”

△　鲁涤平自九江电国民党中央，报告武汉方面进攻湘省及所部脱险抵浔等情，并谓：“武汉此举究竟是否奉有命令”，“拟克日来京请训，并请处分。”

△　蒋介石电促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回南京任职。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比代办纪佑穆在上海会商接收天津比租界事，会后王语太平洋社记者，略谓关于收回津比租界问题，已派定五人共同办理，计外交部二人、内政部一人、河北省政府一人、天津市一人，预计下月中旬即可实行接收。

△　刘文辉电国民党中央，陈述川局善后办法，其要点为：组织省府、解决叛部、打破防区等。

△　全国商会联合会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工商部，谓《海关进口新税则》已实行，则毋庸抵补，无所谓过渡，请即撤销16种特种消费税，并召开第二次全国裁厘会议，将其余省市厘金依期裁尽。

△　杨虎城部在山东追剿土匪刘桂堂，是日攻占日照县。

2月26日　蒋介石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刘峙、顾祝同、缪培南、朱绍良、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夏斗寅各师长于3月3日以前完成出师准备。

△　李宗仁令恢复湖南清乡督办公署，以何键为督办，叶琪为会办。同日，武汉政治分会新任命之湖南省政府委员开会，议决电促何键入省主持省政。

△　鲁涤平抵南京，分谒蒋介石、谭延闿等报告湘事，表示如何处置悉听中央主持。

△　国民政府训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简派吴醒汉、魏崇元为视察西康专员，并会同该省政府筹备西康设省事宜。

△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齐燮元，称齐为“惨杀韩恢之主要凶犯”。

△　行政院第十六次会议议决由财政部发行海河公债400万元，工程交建设委员会及河北省政府统筹计划。

△　刘珍年电国民政府参军长何成濬欢迎任应岐赴胶东协剿逆军。同日，国民政府拨子弹20万粒、现款三万元接济刘珍年，由江海关运往烟台。

2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七次会议决议：一、武汉政治分会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案，本会认为与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及编遣会有关决议相违，应派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国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核办；至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二、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3月2日国民政府任命令发表）；三、通过《非战公约》；四、《工厂法》、《商会法》原则

修正通过，《工商同业公会条例》原则通过。

△　国民政府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总指挥部均着于3月15日一律撤销。各编遣区办事处均着于3月16日正式开始办公。编遣委员会呈报决议各兵工厂于4月1日一律停工照准，着军政部转饬遵照。

△　国民政府令：任命何应钦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刘汝明、尹扶一为委员；朱培德为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佟麟阁、孔繁霨、林拔萃为委员；鹿钟麟为第二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石敬亭为副主任委员，李兴中、李炘、吴中柱、台寿民为委员；周玳为第三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辜仁发为副主任委员，杨澄源、李竟容、王镇淮、雷寿荣为委员；白崇禧为第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胡宗铎为副主任委员，何键、夏威、王风清、田种玉为委员；张维清、杨劲支为第五编遣区办事处委员。任命杨树庄为海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未到差以前由陈季良代理，陈季良、陈绍宽、曾以鼎为委员。

△　国民政府令：任命郭泰祺为驻意大利国特命全权公使；诸昌年为驻瑞典国特命全权公使；戴恩赛为驻巴西国特命全权公使。特派施肇基、刘书蕃为万国邮政联合会代表。

△　国民政府任命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潘宜之为湖北武汉市市长。

△　国民政府电促李济深即日赴武汉彻查湘事。同日，李济深在粤发表谈话，谓：“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鲁涤平因反抗武汉政分会，故有此紧急处置，全为对鲁个人问题，中央自有正当处置。”

△　国民政府以司法系统不宜分歧，令所有曾经设立最高法院分院或类似该项机关之省份自奉令日起不得再行受理案件，其已经受理

尚未结束之案均限一年以内完全办结，俟办结后应即裁撤，各该分院结束以前所办民刑判决各案应准一律认为有效，着司法院转行遵照。

△　国民政府公布《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法》、《禁烟委员会组织法》；修正公布《教育部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

△　何键抵长沙，语记者称，“剿匪”事照常进行，主席职务拟暂请曾继梧兼代。

△　日本新任驻沪总领事重光葵抵上海，往访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对中日交涉约定先由彼二人秘密协商。同日，重光葵语记者，略谓：“中日交涉虽处于停顿状态，然将来定能完美解决，办理交涉事宜仍由芳泽负完全责任，余或将为其助理耳。”

2月28日　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设宴为鲁涤平洗尘，谭延闿、朱培德等在场，鲁于席间报告湘主席任内各事。同日，蔡元培函李宗仁，商查办湘事办法。

△　国民政府任命金问泗、傅秉常分别为驻荷兰、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

△　夏威抵长沙，夏部李明瑞旅到达铜鼓；叶琪部与谭道源部战于益阳，叶部占领县城，向常德、桃源追击，谭部向慈利退却。

△　日水兵全部在汉口登陆，并在一字街枪伤罢工指导员组长余金山。3月8日、17日、25日、4月7日又多次打伤或抓走罢工指导员段垣纪、李雅言、吴大德、冯秀庭等，罢工委员会迭请交涉署向日方交涉。

△　各省市妇协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三事：一、请组织全国妇女协会，并准由联席会产生筹备会；二、要求三全大会准许各省市妇协列席，至少各省市一人；三、要求三全大会各省市须有女代表一人出席，并列席常会陈述上项意见。

是月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发表。宣称：“本会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凡我忠实同志，三民主义信徒，其即集合于改组中国国民党旗帜之下，重新共同奋斗。”

3　月

3月1日　西康特区委员会成立。

△　国民政府依蒋介石提议决定发行建设公债300万元，建筑中央党部及政府各院部房屋。

△　全国反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到南京、山东、湖北及上海各团体代表100余人，7日闭幕。发表宣言，略谓：要中华民族得到解放，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为集中我们对外的力量和铲除革命的障碍，不得不澄清内讧，打倒一切军阀、政客、土豪劣绅和压迫、破坏我们反日运动的反动分子。

△　福州各界举行反日运动大会，数万人参加，会后游行。

△　因宿迁县长童回坤捕小刀会首领及极乐庵僧人10余人，刀会七八千人再围县城，要求放人。2至3日，刀会与驻军、公安队发生冲突，互有伤亡，军警将十余佛堂焚毁，殃及高坂村头一带民房百余家。5日，童县长逃离县城。6日，当地公团开紧急会议，组织治安维持会，推王仰周为临时县长，并由商会等出面调解，形势渐和缓。

3月2日　蒋介石制定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密令各军、师长遵照，准备出师：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何应钦；第一军军长刘峙，辖第一、二、九各师；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朱绍良，辖第八、第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前敌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辖第四、

七、十一、十二、十八各师；总部直辖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第六、十、四十八各师及炮兵团。

△　蔡元培、吴敬恒在沪晤李宗仁谈湘事，李谓一切服从中央。同日，李宗仁电令杨腾辉旅不得进驻赣境，以避免误会。

△　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奉阎锡山密令，将驻平旃檀寺第四十二师第一百二十五旅（前直鲁军张膺芳旧部）张英武、张逊廷两团缴械，并电国民政府报告，称该两团与张宗昌勾结谋叛。

△　国民政府以安福系余孽朱深在北平收买部分电车工人图谋不轨，训令直辖各机关并转饬所属一体严缉，务获归案究办。

△　山东益都窦宝璋部与城西各村民团红枪会冲突，焚烧20余村，淄河店车站电线具被击断。

△　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通电，反对中央指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略谓："乃查中央第一八七次常会通过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法，与第一九九次常会通过之各地代表产生法……不免有违党纪……属会为爱党护党起见，乃不能不出而抗议。"并谓："今河南代表，竟全为指派……用敢坚决抗议。"

3月3日　　蒋介石颁定第一集团军集中计划：一、第一军集中太湖、潜山附近；二、第二军集中霍山附近；三、第三军集中九江、建昌、南昌、高安一带；四、骑兵师经霍山向鄂东前进；五、总预备队：第十师经镇江、通州乘轮到安庆，炮兵团由徐州到安庆，第六师、第四十八师在原地待命，准备对武汉用兵。

△　新疆省政府委员阎毓善等再电中央，反对客军入境和移兵开垦。

△　国民党湖北省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代表、来宾700余人。4

日，选张知本、张难先等九人为省党部执委，程汝怀、萧萱等五人为监委。5日，闭幕。

△　刘珍年电南京当局，以日本“八幡”、“修农”二轮在鲁私运军火兵卒，请向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自称国民党“平津河北忠实同志请愿代表团”之马至远等呈北平政治分会，请转呈中央，以“勾结赤俄、藉党营私、谋叛中央、吞赃舞弊”等罪名，要求将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党务指委严加惩办，并肃清其党羽。

3月4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〇二次会议决议：分别指派安徽、北平、河南、辽宁、山东、四川、湖南、江西、法国、日本、檀香山、新疆、西藏、陇海铁路等地出席及列席三全大会代表；准广东省和广州市选出之代表备案；圈定江苏和第一、四、五十一、五十四师及第四军各党部出席三全大会代表；内蒙代表改为出席；又圈定李超英、许绍棣等九人为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宋藩周、苏蓬仙等九人为天津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

△　李宗仁在上海宏恩医院对国联社记者谈称，“余始终为拥护蒋主席完成统一之一人”，“此次处置鲁部，实出于拯救湘民、安辑地方之至诚，毫无个人权力杂于其间”。同日，白崇禧自北平电胡汉民、吴敬恒、张静江，“请设法稳定大局，两湘必能听命中央”。

△　李明瑞从平、浏班师回长沙。叶琪部抵益阳进击谭部，次日进驻清水潭，何键令陈汉章、陈渠珍部归叶指挥。

△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指委熊晓岩、杨全宇等及“孙案”后援会代表列席中央常会，由杨报告刘文辉杀害邛崃县指委孙鸿图、解散省指委会、成都市、成都县、华阳县及省警察厅独立区党部之联席会议等情。于右任代表中央答称中央必以全力求川省党务纠纷正当解决。

△　驻山东禹城之任应岐部文清林团哗变。

3月5日　　国民政府发布整顿学生令，略称：学校风潮迭起，甚至离常突轨，有妨治安。着教育部严令教育行政机关督率各校注意严格训练，必使尽纳轨范，如有侵轶轨范即行纠正。地方行政长官于学生举动妨及治安者，宜协同教育行政机关严予裁制，务使学风丕变，蔚成良模。至教育经费为教育生机所寄，着财政部及各省财政机关尽先拨付，毋得悬欠。

△　李宗仁电蒋介石，谓杨旅暂驻浏阳“剿匪”，李旅已回鄂训练，实无一兵一卒留滞赣边，奸人造谣，盼持镇静。同日，李对中华社记者谈称：此次湘事“完全是出于整理内部的苦衷，今后的处置亦决定服从中央”，外间传闻鄂东派重兵威胁邻省，完全是无根据的谣言。“中央要怎样处分武汉政治分会，兄弟及在湖北的诸将领绝无成见，即使解散分会亦无怨言”。

△　第一集团军第十一师到浦口，炮团开芜湖，江宁要塞司令部奉蒋令，在狮子山安置高射炮多尊。

△　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未到任前以该校理工学院院长王星拱代理。任命张群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原任张仲苏免职。派易培基兼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3月6日　　蒋介石、蔡元培、谭延闿、胡汉民、张静江、吴敬恒等会商湘事，由蔡报告与李宗仁会商结果，其余各委相继发表意见，咸以湘事处置不善，殊非党国之福。

△　白崇禧就湘事再电胡汉民，谓已嘱武汉不得妄动，并促李济深早日赴京调解，请将此意转告蒋介石，“无论如何总宜顾全中央威信，使政局稳定，不与奸人以挑拨之隙”。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八次会议决议，依海军总司令杨

树庄建议决设海军部，交国防会议核议。

△　国民党河北省指委全体请辞职，派王宣、吴铸人赴京报告。

△　红四军3000余人攻克江西石城。8日，闽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营及赣军第十二师金汉鼎部一团赶到，红军向屏山方面转移。

3月7日　　蒋介石致书李宗仁称："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为防范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于威信不失，则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

△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〇三次会议决议：圈定黄绍竑、白崇禧等九人为广西省党部执委；准湖北省代表大会选出之省党部执委备案；圈定汉口市党部和第二集团军、第五、十五军、第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四十六、四十九、五十、独四、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师、首都卫戍部各党部出席三全大会代表，并指派第六、七、十二师、第二十四军第二、二十二、十九、三十一、骑一师等未正式成立及未经中央派员筹备党部之党部出席或列席三全大会代表；据中宣部呈，以北平市指委会宣传部印行《国民周刊》言论失当，措词荒谬，决定将该市指委、该刊主办人许超远撤职，并改组宣传部。

△　葡使毕安琪电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葡政府已批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　红五军彭德怀部在赣南雩都、信丰间袭击并全歼敌刘士毅部一个营，获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

3月8日　　李宗仁电南京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略称："湘局改组，宗仁虽不在汉，但事属整顿内部，消除隐患，各集团军整饬所部有不

少先例，奉令查办，尚未执行，下游竟有军事行动。革命军队本为救国救民，岂可因局部细故，劳师动众。日来传闻，裁兵公债业移作战费，如果属实，良用痛心。宗仁自维才不足以济变，学不足以匡时，久应退避贤路，今政治分会及集团军总部行将裁撤，惟忝任国府委员一职，尚负重责，仰恳辞去委员之职，以谢国人。”蒋介石接电后即派古应芬赴沪慰留，并于11日电李，劝勿萌退志。

△　白崇禧通电，谓国内不堪再战，统一端赖和平，祈一致电请政府持以镇静，处以宽宏，武汉分会原在政府统治之下，中央如何处理，必能恪遵命令。

△　何键电蒋介石、李宗仁报告湘省情形，称：“迩来谣言四起，多谓下游扣船运兵上驶，或谓赣、鄂边境并有增兵之事，以致人心慌惑。湘省现状如恒，前次李旅到湘，早已返鄂，浏、平一带，现由职师继续担任清剿余匪外，毫无异状。”

△　胡宗铎、夏威电李石曾、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谓武汉政治分会依据紧急处分之条例，第四集团军本其整理军队之职权解决湘事，“意在限制共党暴动，俾第三次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希望“明察事实，止息浮言”。同日，李品仙、廖磊、王泽民、韦云淞、刘春荣五师长通电，表示“凡百举措，悉听中央”。

△　国民党河北省代表大会开幕，到200余人，决派朱玉清、韩纬生赴南京说明开会原因，15日选张清源、童冠贤等为执监委人选，16日闭幕。

△　平奉路工人要求发放去年花红四分之一，代理副局长孙鸿哲置之不理，引起不满，本日及次日各站和列车均贴有打倒孙之标语。9日，该路工会发表宣言，谓孙为杨、常爪牙，卖官鬻爵，虐待工人，电请铁道部撤惩。14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议决电中央党部与铁道部撤销孙本兼各职，以免工潮扩广。15日，天津、塘沽等地铁路工

人为反孙怠工三小时，16日全路工人怠工四小时，18日怠工六小时。19日，铁道部将孙免职。22日，该路副局长杨先芬接见工人代表，允充分保障怠工工人，决不借故开除，并拨给房屋作工会办事处，对煤条、制服、花红等项要求亦照办，工人开始复工。

3月9日　　蔡元培、李石曾至上海，偕吴敬恒再访李宗仁谈湘事。同日，蔡语记者，谓李宗仁昨晚已向中央辞职，今日所谈皆不着边际，明日李济深可来沪，湘事须待李来后方可着手彻查。

△　国民政府参军长何成濬抵北平，代表蒋介石祭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料理第一集团军行营事务，视察第三编遣区实况并慰问白崇禧等。10日，何先后访问商震、方振武、刘镇华等，活动频繁。

△　李品仙就任第四集团军总指挥。

△　中法越南商约会议通过正约草案及附件六件，关于取消通过税问题待法使请示政府后解决。

△　张宗昌旧部军长曲同丰在天津日租界本宅被刺身死。

3月10日　　何键通电辞职。略谓："此次武汉政治分会处理湘事，纵属过当，既经派员查办，应有和平解决之方，似不应于方告统一之时，使久同患难之革命团体，遽以局部问题而致分裂"；"现在湘、赣边境匪势复张，必须亲往前线指挥清剿，所有湘省政府主席一职，应恳迅简贤能来湘接替。"同日，胡宗铎电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解释湘事处理未抵触政分会条例。

△　国民党安徽省代表大会开幕。13日，由中央特派员陈石泉监选，选出邵华、曹立瀛等为执监委，16日闭幕。20日，该省国民党员请愿代表团在南京三全大会门外散发通告书，否认该省代表大会。

△　芜湖市商民因印花税局稽查苛扰结队游行请愿，要求省府撤换印花税局长余德民，次日大罢市。16日，财政部同意撤余职，电全

国商联会转电芜湖总商会晓谕商民即日开市。

3月11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〇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三全大会秘书处组织条例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规则；推戴季陶为三全大会秘书长，戴未销假前由叶楚伧代理；豫指委会抗议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藐视党纪，一律予以撤职处分，并交监委会查办；准南京、上海、加拿大、古巴、安南、三藩市、澳洲、河内各党部选出之三全大会代表备案；圈定湖北、浙江、山西、甘肃、广西各省、沪宁、沪杭、津浦路及第三、八、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师、第三集团军总部、中央军校、第十六、二十一、十一、五十六、二十四、二十七、五、十七师各党部出席三全大会代表；指定第二十八、二十九军、第五十五、四十三师、东北各师列席三全大会代表；同意河北省开全省党代表大会，但执监委员选举应候常会决定候选后举行；圈定苗培成、韩克温等九人为山西省党部执委。

△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柏文蔚、何香凝、王法勤、陈树人等14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宣言》指责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之产生，完全违反本党民主原则，“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祝祷本党巩固与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同日，国民党汉口市执委会亦通电根本反对中央指定三全大会代表，称：“代表总额三百余人，指定者一百六十余人，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指定之代表对于所代表之党部有从未涉足其境者，是代表与被代表毫无关系，尚何代表之足云。”

△　李济深自港到沪，蔡元培、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晤李谈湘事。李语记者称，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

△　驻北平之第四集团军第五十四师（魏益三旧部）发动反对师长王泽民，王被迫逃走。12日，李品仙令副师长刘凤池代理师长。21

日，该师参谋长郭光霭等电蒋介石，指控白崇禧、王泽民，请明令将王免职拿办，并令魏益三接任师长，重领该师，以脱离桂系，归还中央。

△　白崇禧托词旧病复发在北平入德国医院，12日偕廖磊、王泽民等赴唐山，因部下不稳折回。16日，白电蒋介石辞编遣区主任和三全大会代表职。17日，由天津秘密转道大连赴广西，称回桂林静养。在此前后商震、方振武、李品仙等往还频繁，以加强联络各军之感情。

△　杨虎城部在山东捣破刘桂堂北杏巢穴，12、13两日又战败援刘之顾震部，14日完全占领诸城。

3月12日　李济深、蔡元培、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在沪与李宗仁晤谈湘事，并劝李即日返京会商。李以目疾未愈须在沪医治为词未允，请蔡元培、李济深等先入京与何应钦商榷。

△　冯玉祥电蒋介石辞军政部长职务。

△　叶琪、谭道源两军在鄂西已停战，何键派李佳白偕谭之代表黄宜赴叶驻地商和平。13日，叶部继续攻占常德，谭部退桃源、大庸等地。

△　山东省滕县红枪会谋攻县城，被第三师、第四十八师镇压，死100余人，300多人被俘。

3月13日　李济深、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吴敬恒、古应芬由上海到南京，晤蒋介石谈湘事，李济深并语记者谓湘事归政治解决，一切听中央办理。同日，蔡元培、李济深等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九次会议，报告查办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一案之意见。会议决议：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着先行免去政治分会委员之职，请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　中央政治会议电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北平各分会，应遵中常会第一八九次会议决议，电告各地政治分会应于3月15日以前裁撤，本日起停止开会，并电各省、市政府查照。

△　国民政府任命何成濬、钱大钧、贺国光、陈焯、吴荫棠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陈肇英、张群、葛敬恩、钱宗泽、杨焕彩为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委员，陈嘉祐、贺耀组、舒石父、高荫周为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委员，丁超五、唐豸、陈仪、赵延绪为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委员，褚民谊、李铎、胡翊儒、韩云为第四编遣区办事处委员；任命万福麟为第五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荣臻为副主任委员，吴铁城、方本仁、刘维勇、陈钦若、段云峰、李兴中为委员；任命舒宗鎏为海军编遣区办事处委员。

△　何键电王均、金汉鼎，谓湘事无论如何解决，湘、赣两省“会剿”事宜决不可因而中辍，现仍饬吴（尚）、刘（建绪）两旅照常“清剿”。

△　全国商会联合会召集全国各省总商会代表会议，各代表均主积极反对特种消费税，决向三全会请愿，务达取消目的。同日，全国商联会通电，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对汉口“水案”迅予严重抗议，非有满意之惩凶、赔偿、道歉保证，万勿轻易了结，商会誓作外交后盾。16日，商联会及各省商会请愿团向三全大会请愿取消特种消费税。4月22日，商联会电财政部，再请先停止征收特种消费税，并尽快召集第二次裁厘会议。

△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南京开第二次执监委全会，16日移沪继续举行，并发表宣言，以在首都不能得到保障，决定暂在上海设临时办事处；通过派代表赴各地视察、组织学联等议案。

3月14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〇五次会议，推胡汉民为三全大会开幕式临时主席，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于右任、孙科、陈果

夫、古应芬、吴敬恒、张静江九人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圈定天津市、第三十一、二十三、三十七师出席代表，决定新疆省代表列席改为出席，指派第四十八师等列席代表及加派和补充有关党部代表。又依组织部提议，圈定骆力学、曾三省等九人为甘肃省党部执委。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应绝大多数区党部之请，召集党员代表大会，讨论三全大会代表问题。大会由改组派吴健主持，推中央党校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上台讲话。谷发言反对蒋介石圈定指派代表的办法，称“这样搞下去，国民党就要亡了”。改组派利用大会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而亲蒋派则大骂参加会议代表都是“共产党”，冲打会场，砸坏玻璃、椅凳，打落孙中山、廖仲恺遗像，谷正纲等多人受伤。蒋介石以维持秩序为名，派军校学生和宪兵冲进会场，捕去会议代表七人。晚，蒋召集代表训话，为其包办三全大会行为辩护。次日，蒋又召集中央党校全体学生训话，宣称：“须绝对服从本校长命令，不得有丝毫怀疑或反对之表示”，“谷正纲言行乖谬，已免本职，遗缺派张厉生代行，望诸生努力求学，勿为浮言所动。”

△　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电武汉政分会辞本兼各职，以何宣代师长，是日政分会电叶慰留。

△　张宗昌在北平众卫街机关被破获，林起云、姜绍武等被捕。

△　红四军在距长汀城10里之长岭寨大败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及营长王宝珍等，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乘胜进占长汀县城。

△　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津病逝。

3月15日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代表211人，湖北、广西代表未出席，临时主席胡汉民致开会词。蒋介石致开幕

词，指出“党内的根本弱点，是思想不统一”。自“清党”以后，许多同志离开三民主义，致使党内理论分歧，思想复杂。“在一方面，有许多人大倡农工小资产阶级为本党应代表的民众，而自命为革命的分子。在别一方面，有许多人竟否认三民主义为社会全义”。这些思想，我们只要研究总理的三民主义，就知道这些左偏右倾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并谓：“希望这一次的大会，对于政治也应该讨论出一个切实的办法，以消灭地方割据的形势，而巩固中央的地位。”末谓：“诚恳的希望一切同志，要以亲爱精诚的精神，共同团结。”

△　蒋介石通电并宣言，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撤销，成立中央与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原隶第一集团军各部队交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实行编遣。同日，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开封、武汉、广州等政治分会亦撤销。

△　财政部咨江苏省政府制止该省增加田赋，并令财政厅拟定革新田赋办法，在新办法未定以前，凡田赋已超过地价百分之一者，一概免予增加。

△　山东栖霞、莱阳、海阳等县施中诚部改悬青天白日旗，宣称与刘珍年合作共同对付张宗昌。

△　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在镇江开会，反对江苏继续施行大学区制，决议发表宣言，列举制度庞杂、权责不分、效率低减等八项弊端，并向三全大会建议取消大学区制。

△　中华国货维持会电国民政府，请实行服用国产丝棉品，以救农工商生计。

3月16日　　上午，国民党三全大会开第一次预备会议，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潘公展、于右任、孙科、古应芬、陈果夫、陈耀垣九人为大会主席团。下午，主席团首次会议，议决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及宣言起草委员会，其人选由主席团选定介绍大会通过。

△　胡宗铎、夏威等电胡汉民、李济深，指责下游缪（培南）、方（鼎英）、夏（斗寅）、刘（峙）各师进兵，并谓："侦察近日下游各师行动，显无和平诚意……如窜入湘、鄂境界，职部是否应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之处，祈迅即电示祗遵。"

△　中央、第一、二、三、五各编遣区宣告成立。广州第八路总部缩编各师长已定，第一师陈济棠，第二师徐景唐，第三师蒋光鼐、副师长蔡廷锴，第五师范石生。海军总司令部撤销。

3月17日　汉口总商会通电全国，反对宁、汉开战，呼吁维持和平。

△　刘珍年代表李子辉到德州，18日在前方谒任应岐，商会剿胶东匪事。

△　滇缅界务研究会代表谢焜等呈请国民政府对英人侵略江心坡事提出抗议，要求屯驻该地之英军一律撤出，释回英人掳去之山官11人，以后中国边圉或中缅未定界内英人不得任意进兵。4月7日，谢等至外交部见外长王正廷，再请严重抗议英人侵占江心坡；并发表该会告同胞书，略谓：江心坡为我旧里麻长官司地，其人民亦我民族之分支，敝会同人勉慰江心坡代表外出请愿制止英人进兵侵入该地，此愿一日不达，进行一日不懈，务盼全国民众一致奋起，据理力争，督促政府，从速抗议。17日，行政院训令外交部，对英人侵略云南江心坡进行严重抗议。

△　全国医药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到15省131团体代表262人，议决以"三一七"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同日，上海各中药铺罢业半天，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药之决议案。19日，大会闭幕，决议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推陆志东等为执行委员，并发表宣言，指责西医余岩等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摧残中医，使中医前不得继往，后不得开来，虽欲改进，其道无由，要求政府速撤销原案，并惩戒提案人

余岩。

△　上海国际法学会电请国民党三全大会决议，饬令外交当局于最短期间与各国交涉取消领事裁判权。

3月18日　　上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出席代表238人，列席代表25人。胡汉民主席，蒋介石作党务报告。陈果夫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合格者255人，手续未完备者三人。下午，开第二次会议，蒋介石主席，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决议：通过刘文岛等临时动议，令国民政府严令制止叶琪等军事行动；通过组织各种委员会案，由主席提出提案审查委员会九至11人、宣言起草委员会三至七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九至11人，人选俟散会后经主席团讨论后提交明日会议；准潘公展辞主席团职务，补推朱家骅加入；在三全大会期间，各级党部不得开联席会议、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

△　行政院通令，民众越级陈诉，概不受理。

△　蒋介石电令各军，20日以前，第一军推进到潜山、太湖之间，并派一部至宿松，第二军推进到英山及其以北地区；第三军之缪（培南）、曹（万顺）、王（均）、金（汉鼎）各师照原计划集中，鲁（涤平）师应推进至新喻，第三军之警戒部队须派遣至瑞昌、武宁、甘坊市、宜丰、宜春之线。

△　叶琪部撤出岳州原防，常（德）、桃（源）由何键部李觉团接防。

△　第四十九师副师长李肖庭、军事代表申鸿升见蒋介石，报告该师在胶东肃清残敌情形，并请速发饷弹。蒋准充分接济，并电师长任应岐速前进，与刘珍年会师肃清胶东。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电三全大会，请注意中日交涉，勿却

步退萎。

3月19日　上午，国民党三全大会开第三次会议，孙科主席。通过以王宠惠、李文范等15人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由王宠惠召集；以蔡元培等五人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由叶楚伧召集；以李济深、陈布雷等11人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由李济深召集。谭延闿报告中央政治，苏、浙及南京代表分别报告各该省、市党务。讨论中常会所提“根据训政纲领确定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决议交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下午，开第四次会议，由主席谭延闿报告李济深辞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主席意见，委员慰留，改由何应钦召集。广东省、广州市代表报告党务。中常会所提“确定施行政纲之方略及程序以定政治之实行标准案”及“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方针案”，决议交付审查。追认中执会所提五案：一、训政纲领案；二、中执监委因共产党关系开除党籍及停止职权案；三、停止程潜职权案；四、因反共开除党籍之林森、张继、谢持、邹鲁、居正、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恢复党籍案；五、变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案；均予通过追认。

△　国民政府依国民党三全大会决议，命令叶琪等“迅即遵令停止军事行动，克日退回原防，毋得故违，致干法纪”。

△　胡宗铎、夏威等16日电经李济深转交蒋介石后，是日蒋电复胡、夏等，略谓：“所有调集皖、赣境内各师，中央用意全为巩固中央，防止反动”，指责胡等“不知自责，反决心构衅”，“逆料兄等发电之日即密令动员之时，日内必实行向中央各师袭击，而冀以迎头痛击之词诬指中央为戎首，不知适以暴露兄等目无中央、蓄心作乱之阴谋”，警告胡等不应冒天下之大不韪。

△　李宗仁自上海密电黄绍竑，谓“醒南（雷飚）参谋长自京回沪，奉任公（李济深）面谕，时机紧急，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亟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希望急速动员。

△　李品仙等电蒋介石，列举白崇禧排斥异己、力主武汉逆谋、破坏中央威信、强令本军撤退开滦、扰乱北方等罪状，望蒋明令讨伐，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

△　蒋军总部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已派第三十六混成旅张永升部填防兖州，令驻徐州之毛炳文师不必派队前往，徐属与鲁毗连，应严密预防；并令谭曙卿旅长认真保护陇海路东段。

△第四十九师张德成团攻占高唐，击退张宗昌便衣队2000余人，张宗昌之师长傅干臣被击毙。

△　比公使华洛思到南京，与王正廷商洽履行《中比友好通商条约》及收回天津比租界事。

△　全国电局职工代表向三全大会请愿，要求将无线电管理权收归交通部。

3月20日　三全大会第五次会议，朱家骅主席，安徽、上海、福建代表报告党务；中央常委会提出确定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决议交付审查；临时讨论监委会十七年（1928）1月7日检举汪精卫等一案，决议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顾孟馀开除党籍三年，汪精卫由大会予以书面警告。

△　李济深晤蒋介石谈湘事，李表示“但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平解决”；“中央应格外宽恕，汉方各将应格外忍受，方能消弭无形。若中央再加压迫，压迫过甚势将不接受，届时中央为威信计益非用兵不可，和平之局愈将无望，颇非本人之愿”。同日，李语记者：“胡（宗铎）等十六日电系余交蒋，盖不欲个人复函，专听中央处置。”

△　唐生智由天津赴唐山收集湘军旧部，李品仙、廖磊等重归唐生智节制。同日，李、廖等通电声讨白崇禧，谓白“排斥异己，克扣

军饷，野心所炽，直欲抹煞本军历年为革命奋斗之历史，而供彼个人争权攘利之工具，近更明目张胆，强令本军扰乱北方，响应武汉，袭攻徐海，进逼首都，元恶大憝，人得而诛”。

△　改组派期刊《革命出路》第一期发表《从蒋胡对三全大会的分赃斗争说到蒋桂的火拼》一文，略谓：“蒋胡两人都认为三全大会可以做他们俩造成墨索里尼的机会的绝好武器”，“两派在表面上看虽是旗鼓相当，好像对三全大会的御用都有把握，其实正为棋逢敌手，双方都互相的生起猜忌”，“因此大家一方面既然积极的作那出席大会的预备，一方面又在暗中手忙脚乱的作那军事准备……尤其与胡系轧姘的桂系怀着鬼胎”；“任他如何装腔作势，这个火拼也不外是时间的问题。”

3月21日　上午，国民党三全大会第六次会议，古应芬主席，西藏代表格桑泽仁、蒙古代表包悦卿报告党务及帝国主义侵略情形。讨论中常会所提“整理本党组织以巩固党基案”，决议交付审查；通过以十五年（1926）7月9日为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日。下午，第七次会议，陈果夫主席，江西、山西省党部代表报告党务；关于国花案被打销；对训政纲领确定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照审查修正案通过；原则通过“根据总理主义编制过去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并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通过由大会奖慰蒋介石案。

△　李济深在南京力言湘事可和平解决，致被蒋介石召其来寓，“责其密通桂系，所为不义”软禁于汤山。蔡元培、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均未出席三全大会，湘事由蒋介石一人处理。蒋发表声明，此次湘变违背中央决议，破坏国家统一，决非局部问题，必取适当之处置。

△　编遣委员会第十次常会决议：推凌霄为海军编遣区办事处副主任；任命杨杰为第六编遣区特派专员；准白崇禧辞第四编遣区主

任，原属第四集团军各部队分别编遣，派胡宗铎、何键、陈济棠、黄绍竑分别为武汉、湖南、广东、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李品仙为北平原属第四集团军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叶琪免职听候查办，其部队归何键遣置；夏威免师长职，以李明瑞升任；至中央各部队应令于皖、赣境内严守原防，非奉中央命令不得移动。

△　是日至次日，黄绍竑在广州召集第八路军各师（旅）长及总部重要将领王应榆、吕焕炎、余汉谋、香翰屏、邓世增、张文等开军事会议，讨论应付时局及派兵布防问题，决下动员令，推黄绍竑代第八路总指挥，粤军全力入赣，广东治安由蒋光鼐师戴戟部负责。黄应各将领之请坐镇广州，暂中止返桂。同时，各军已着手调动。

△　湘变发生后，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之间往来频繁，是日冯之代表何其巩、张之代表鲍文樾抵太原，何22日赴五台谒阎。

△　长沙商会通电反对南京用兵西征，谓“鲁去何代，仍奉中央命令，出处光明，安用劳师远征，重苦吾民”。22日，湖北省商会亦通电呼吁和平。

△　上海总商会等团体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出售电气处，本日江苏交涉员金问泗奉外交部训令函驻沪领袖领事，称电气系属公营事业，且与租界内华市民权利有关，如售诸私人，必有垄断独点之弊，殊与市政府前途影响非浅，则本特派员万难承认，请烦查照转知工部局，迅将前项拟议撤销。

3月22日　国民党三全大会第八次会议，陈耀垣主席，秘书处临时报告蒋介石呈报昨日编遣委员会处置湘事各决议案；陈果夫报告中监委会过去工作；河南省党部代表报告该省党务。讨论本届中执监委员名额及选举方法案，决议：名额维持二届原数，即执委36人，候补执委24人，监委12人，候补监委8人；方法由主席团介绍加倍中执监委候选人，选举人就中圈选所规定之执监委人数，亦可自选名单以外

之人，但执委不得过七人，监委不得过三人，候补执监委由次多数充任，但所得票数需超过参加选举人数之半，如选出之执监委不足额时，则当场再选。人选标准未定，交提案审查委员会详细研究后提出下次会议。周炳琳、段锡朋等提出弹劾特别委员会案，未通过，周等退席，致会场小有混乱。

△　何键通电，谓湘事已奉中政会议依法解决，军民安堵，秩序如常，望诸公考察真相，勿惑流言。

△　蒋军总部令熊式辉为沪宁、沪杭铁路警备司令；陈调元为津浦路警备司令。

△　刘峙电蒋军总部，以鄂东人民自卫团有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总部复电：如确有助逆行动者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

△　福建省政府因地方军师长卢兴邦越权委任驻地各县县长，拒绝省府所委县长赴任，议决具文呈请中央解决。4月8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行军政部严饬该师长不得干涉行政，以明权限而重纪纲。

△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等电国民政府，报告该省政府成立。同日，刘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

3月23日　上午，国民党三全大会第九次会议，谭延闿主席，通过变更中执监委选举方法，由各代表每人投票介绍10人，以投票最多之48人及另由主席团介绍之48人为候选人。通过蒋介石所提执监委人选标准修正案，执委年龄须在30岁以上，监委须36岁以上。追认《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定为国民政府整军之纲领。决定将“整理本党组织以巩固党基案”并入修改本党总章内审查。组织惩戒委员会惩戒昨日第八次会议擅自退席扰乱会场秩序之代表。通过刘文岛、倪弼等临时动议：国民政府对湘事以往处置大会认为适当，叶琪等如再抗命，由国民政府从严处理案。下午，第十次会议，孙科主

席，依上次会议决定，由代表投票介绍中执监委候选人。决议按审查会报告修正通过施行政纲之方略及程序案、慰劳将士及抚恤遗族案。原则通过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

△ 蒋介石决心对桂系用兵。蒋军总部令朱培德、刘峙、朱绍良各军长务于有（25）日以前完毕战斗准备，预定宥（26）日向湘、鄂前进，静待后命；并令朱培德总指挥于九江、南昌、高安、武宁四处设置飞机场，限一星期内完毕，航空队长张静愚于宥日率队到九江；又令第十师方鼎英部，限28日到达九江，即向瑞昌城集中，第六师方策部27日乘船出发，29日到达九江待命。总部行营人员准28日出发。

△ 李宗仁由上海到达广州，发表谈话，谓鲁涤平“庇共殃民，事实俱在”，“私运大宗械弹，经王均在九江截获，其举动显系欲包围武汉，危害党国。武汉政分会为断然处分，事前本人并未预闻，事后得胡委员宗铎之报告始知”。“李主席济深未入京前，各同志多劝其勿往，惟李因既身许党国，急欲和平解决湘案，故不顾一切径行赴京，弗料竟被蒋扣留”。

△ 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偕全体将士自广州电蒋介石，要求释放李济深。同日，邓招待报界，谓致蒋电已发，限三日答复，否则实行武装和平之法。又谓在陈济棠返粤之前，广州治安由其负责。

△ 蒋介石派参军蒋锄欧携慰劳书及三万元款到江西慰劳自湘退赣之鲁涤平部第十八师，本日在南昌第十八师驻省办公处接洽，24日赴高安第十八师师部慰劳，并宣达中央意旨，嘱整顿军力待命。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发表声明，反对工部局出售电气处，请外交部制止。同日，又电外交部历述交涉增加华董经过，反对工部局总裁费信惇悔约，请迅予交涉本年工部局应增华董二席。

△　中医药代表团就卫生会议提议取消中医药事分别向国民党三全大会、国民政府和卫生部请愿，卫生部次长胡毓威表示："本部正在提倡，使中医药有进步"，对取消中医药之提议，认为不能行于现今之中国。

3月24日　国民政府发表处理湘变三道命令：一、特派李品仙为第四编遣区北平部队编遣特派员，胡宗铎为湖北部队编遣特派员，何键为湖南部队编遣特派员，暂行分别负责编遣，一切秉承编遣委员会办理，所有原属该区现驻河北之各师暂归李品仙全权节制指挥，现驻湖北各师暂归胡宗铎全权节制指挥，现驻湖南各师暂归何键全权节制指挥；二、此次湘变发生，前准查办员蔡元培等声复，李宗仁供职在京，事前并不知情，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第十五师师长夏威遽行处置湘事，激起衅端，迨中央明令制止双方各守原防，复悍然不顾，叶琪所部竟追击谭道源师，进占湘西，实属好乱称兵，抗命犯纪，罪无可逭，师长叶琪、夏威应即免职查办，叶琪所部第五十二师应交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就地编遣，第十五师师长应委李明瑞接充；三、所有中央前日调赴皖、赣边境之各师应在现地停止静待后命，以促武汉各部之猛省。

△　冯玉祥电复蒋介石，对中央用兵西征表示服从，出兵路线及作战方略请指授机宜。

△　冯玉祥、阎锡山联名电张学良征求对时局意见，张复电表示服从中央，东北军出动必须奉蒋命令。

△　李宗仁、黄绍竑在广州与第八路军将领邓世增、张文、余汉谋、香翰屏等会商应付时局。同日，陈铭枢自香港电黄绍竑、邓世增，劝粤"为促进和平计，只宜冷静斡旋，万无自为戎首而迫天下于不得不战之理"。

△　蒋军已完成战斗准备，第一军刘峙部拟于25日由集中地开始

运动，准备占领广济、武穴。朱绍良拟于26日由霍山向英山前进，俟第一军进占武穴后，第二军即占领罗田、齐家堡之线。第三军朱培德计划第十八师由清江进至袁州，进取醴陵、株洲；第七师由高安进至万载，取浏阳；第四师由奉新进至铜鼓，取平江；第十一师由德安进至义宁，以一部控制武宁，进出通城。同日，朱培德电总部报告桂军本晨向铜鼓、万载方面挺进；25日夏斗寅亦电南京，称桂军于是晨向英山进攻，请蒋介石迅示处置方针。

△　第四师师长缪培南等电促何键及湘军各旅长拥护中央，讨伐桂系。

△　李济深被扣汤山后，吴敬恒陪李寓汤山。本日，胡汉民、孙科、戴季陶至汤山与吴谈湘事，吴认为“自李济深事发生后，欲集中人才于中央将不可能，因无形中已见意志分歧”。同日，记者访吴，问湘事能否解决，吴答：“若照中央办法，将一二不守规则者解职，湘事可以解决。”

△　王正廷与芳泽在上海重开济案谈判并签订草约，决数日内在南京正式会议解决。

3月25日　上午，三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胡汉民主席，云南省党部代表报告党务，依审查报告通过确定教育方针及实施原则案。下午，第十二次会议，辽宁、吉林、黑龙江、三藩市党部代表报告党务。讨论修改党章案，决议：本党党员分预备党员及党员两种，将青年团归入预备党员内，不另设青年团；预备党员须年在16岁以上，党员须20岁以上；预备党员经一年以上训练，经审查合格始得为党员。

△　冯玉祥由百泉到郑州，转赴华山养病。蒋介石派邵力子访冯，商应付时局办法，邵于29日抵华山。

△　李宗仁偕黄绍竑由粤返桂规划军事，27日到达南宁。

△　白崇禧由上海乘“笠置丸”轮抵日本门司。

△　叶琪部在德山（湘北）附近与谭道源部战后退岳阳。

△　宋子文赴沪筹军费，与银行界接洽以裁兵公债抵借现金750万元事。

△　广东省政府代财政厅长沈载和召集各商会代表讨论中行挤兑风潮，决用封存中央银行纸币办法进行救济，自27日起三日封竣。

△　张宗昌之联合军在芝罘（烟台）南12英里处向刘珍年军进攻，顾震部在即墨与刘军激战，次日占领该城。张宗昌军在东昌（今聊城）被马鸿逵之第十七师战败，死七八百人，师长以下500余人被俘。

△　驻美公使伍朝枢向美国总统胡佛递交国书，胡表示对两国外交当以合作精神出之。

△　全国反日会议决坚持本会对中日交涉须日方先撤兵而后开始谈判，以革命手段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之主张，并警告王正廷办理中日交涉须尊重民意。

3月26日　国民党三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改总章草案全部通过，决议：中委二年一任，中常委名额五至九人，取消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下级党部须绝对服从上级党部。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何应钦、胡汉民、孙科、阎锡山、陈果夫、陈铭枢、叶楚伧、朱培德、冯玉祥、吴铁城、宋庆龄、于右任、宋子文、汪精卫、伍朝枢、何成濬、李文范、王柏龄、邵元冲、朱家骅、张群、刘峙25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吴敬恒、张静江、古应芬、林森、蔡元培、张继、王宠惠、邵力子、李石曾、邓泽如、萧佛成11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　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略谓：“此次武汉政治分会违法僭权，任免官吏，称兵构衅，袭击湖南，政府以和平为怀，力从宽大，

除迭令擅自调动之军队制止行动，撤回原防外，仅将地方军政负责人员免职查办，原冀以主义相感召，促首逆诸人之觉悟。乃据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有已电称逆军于本日拂晓向我英山前方部队进攻等语，是该逆军等蓄意谋叛，逆迹昭彰。……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　蒋介石改订战斗序列，以编遣会名义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刘峙为“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讨逆军”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讨逆军”总预备队总指挥。

△　国民政府任命陈济棠为中央区广东部队编遣特派员，黄绍竑为中央区广西部队编遣特派员，分别节制指挥现驻广东、广西各师旅，仰即各守范围，互重权责。

△　胡汉民电陈铭枢，谓“湖北已分两路犯皖、赣，是非功罪益明，府将下明令讨伐”。同日，陈在港称力主和平，所部不参预军事，并派代表携亲笔函赴南京表示意见。

△　粤军积极备战，邓世增在广州开军事会议，决中路以南雄梅关为防御线，左翼以仁化、城口、汝城、桂东为防御线，右翼以连平、和平、翁源、兴宁、五华为防御线。

△　国民政府特派伍朝枢为议订中美公断条约全权代表。

3月27日　　上午，国民党三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续选出杨树庄、方振武、赵戴文、周启刚、陈立夫、刘纪文、陈肇英、刘芦隐、丁惟汾、曾养甫、方觉慧11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恩克巴图为中央监察委员，王伯群等24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等八人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通过大会宣言。下午，第十五次会议，讨论总章附注，通过全文。蒋介石报告国民政府明令讨伐桂系经过。依胡汉民提议决定

永远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

△　蒋、桂正式开战，蒋军刘峙部蒋鼎文师与桂系武汉方面胡宗铎部在湖北、安徽交界之宿松一带激战终日，桂军不支，向双城驿（黄安县北）退却。蒋介石移总司令部于浦口，准备西上，并发表告将士文，列举桂系军阀罪恶最大者五项：第一，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第二，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第三，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第四，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第五，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

△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与桂系武汉方面军队在武胜关发生冲突，数小时后桂军南退。同日，海军通电拥护中央，各舰队先后西上参与对桂系作战。

△　蒋介石电阎锡山，请与张学良、何成濬共同维持北方秩序。本日，何成濬在北平约卫戍部各处商时局和维持治安办法。

△　张学良代表胡若愚在天津语记者，谓张极不愿国内再起兵戎，今湘、鄂开火实大局之不幸，张矢诚服从中央，除努力三省建设外，不干预三省外之事，奉军将入关之说绝对不确。

△　上海《响报》第一期发表《蒋介石是湘案的首犯》一文，谓湘事的导火线是“由于蒋介石施行故技，秘密运了两三百万子弹绕道江西之袁州接济鲁涤平，这批子弹由王均护送到湖南境界，经何键发觉……何键于是将这个消息报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这自然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无论蒋介石怎样自欺欺人，拿怎样好的题目，他的鬼蜮伎俩是再也不会骗人了的，所以我们应该认定蒋介石是湘案的首犯”。

△　国民政府令：军政部部长冯玉祥因病呈请辞职，准给假调理，毋庸辞职，未销假前军政部长以鹿钟麟代理；调鹿钟麟为军政部

政务次长。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原任张宗璠辞职照准。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辞职照准，指定何键为该省政府主席。任命周启刚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任命凌霄为海军编遣办事处副主任委员。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续发卷烟税国库卷条例》，规定发行总额2400万元，以充国民政府预算不敷之用。

3月28日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谭延闿致闭幕词，蒋介石发表演说，称本党应绝对禁止小组织，并要求各省党部必须与省政府共同前进，避免纠纷。同日，第三届中执委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为常委，决议取消民众训练委员会，主管事务归训练部办理。

△　国民政府特任何应钦兼署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蒋介石任命贺耀组为行营总参议，贺国光为代理行营总参谋长。

△　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电颁“讨逆军”战斗序列：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一路总指挥朱培德，属第三、第五两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兼，属第四、第十一、第十二各师，第十四、第十五两旅，第五军军长鲁涤平，属第七、第十八两师；第二路总指挥刘峙，属第一、第二两军，第一军军长刘峙兼，属第一、第二、第九各师及独立炮兵第三团，第二军军长朱绍良，属第八、第十三两师、独立第一旅及骑兵团；第三路总指挥韩复榘，属第六、第七两军；总预备队总指挥陈调元，属第六、第十、第四十八各师及岳盛宣、陈众孚两旅；第四军军长何键，属第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二各师及张其雄、陈渠珍、陈汉章诸部；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航空大队司令张静愚；兵站总监俞飞鹏。

△　蒋介石下达作战命令：一、“讨逆军”决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二、第二

路限3月29日前展开于武宁、宜丰、宜春之线，即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威胁其退路，命刘、周二旅位置吉安、赣州，掩护军之侧背；三、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占领麻城、团风、黄冈之线，其主力即经黄陂及沿江前进，以一部渡江相机策应第一路军之作战。第一军限4月5日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相呼应，协力攻取武汉；四、第三路集中南阳、信阳附近，于4月2日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限5日以前到达武汉附近，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五、二、三路间作战境地为东阳岗、太平镇、祝家湾车站之线，线上属第二路；六、总预备队先以第六、第十两师限3月29日前集结九江、瑞昌附近待命；七、海军游弋于九江、汉口间，极力妨害敌人之行动，并援助第一军之作战及渡江；八、航空大队应先在九江、南昌设置航空站，以后推进至义宁、袁州、鄂城，袭击武汉及湘南一带敌军，并侦察其行动。

△　蒋介石电冯玉祥，请酌派重要军官数员速来行营赞襄一切；又电何成濬成立国府驻平办事处，以便于各方接洽有关公务。

△　蒋军第九师蒋鼎文部与桂军胡宗铎部继续战于双城驿，蒋军占领武穴，桂军退向黄冈。同日，蒋军第一师刘峙部进抵游家桥、傅村一带，第二师顾祝同部已到广济。

△　张学良派代表秦华谒蒋介石表示服从中央，并请示战争进行方略。

△　蒋军第十八师特别党部通电反对桂系，提出打倒大广西主义。陈调元、方振武、李品仙、刘春荣、岳维峻、徐源泉等分别通电讨伐桂系。

△　上午，王正廷与芳泽在南京正式会谈，互换解决济案照会，签定议定书和声明书各一件，决定山东日兵至多两月内全部撤去，撤兵前后之措置由两国各派委员就地商办；议定关于济案损害问题，双

方各任命同数委员设共同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之；声明“济案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国交益臻敦厚”。下午，上述文件在南京和东京同时发表。同日，日本参谋总长铃木训令第三师团即行撤退驻鲁日军。

△　张宗昌、吴光新、孙殿英、刘开泰等到烟台，设司令部于商会内，改公安局为警厅，任锦涛为厅长。

3月29日　蒋介石乘“楚有”舰由南京赴上游督师，贺国光、俞飞鹏等随行，总部行营人员大部另船出发。30日抵九江，行营即设九江大东旅馆。出发前蒋手谕：28日后行动不准发表，否则径予逮捕。

△　第四集团军全体将士发表讨蒋宣言，指责蒋介石把持中央、藉党营私、宠用群小、排除异己、指派代表包办三全大会、钳制舆论、格杀无辜同志、滥发公债、搜括自肥、投降帝国主义、承认西原借款、滥增中枢军额、擅用裁兵经费等。“近且丧心病狂，变本加厉，藉局部之问题，奋独夫之骄固，妄发乱命，轻动天下之忧，逞凶残民，不恤举国之怨，奔走调停者横被拘囚，号呼请愿者均遭诛戮”。望全党同志、爱国同胞共起义师，一致击讨。

△　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粤军第一师师长陈济棠、海军司令陈策、第二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邓彦华、广东财政厅长冯祝万在上海得李济深被扣讯后南返，是日抵香港，即赴医院慰问陈铭枢病情，并会商粤事。

△　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何成濬为第九军军长，第五路以第八、九两军编成之。4月4日，唐、李、何联名通电拥蒋反桂。

△　阎锡山电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谓政府讨伐桂系，实具苦衷，“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同日，杨树庄亦电国民政府对讨伐桂系表示拥护。

△　王正廷与芳泽在南京会晤，交换宁案、汉案及修约意见。

3月30日　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联名通电，宣称：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同日，陈济棠在“海虎”舰就中央编遣区广东编遣特派员职，即下令停止出兵，并应邓世增要求，准桂军24小时内自由离境。

△　蒋介石在“楚有”舰召集方鼎英、方策两师长面授机宜，又与朱培德商作战计划，并改订战斗序列，令以第四师、第七师编成第三军，派朱培德兼任军长；以第十八师、第四十八师编成第五军，派鲁涤平兼任军长；以第十师、第十一师编成第十军，派方鼎英兼任军长。又令徐源泉率第四十八师主力六团于4月2日到达九江。

△　蒋系第一、第二军与桂系胡宗铎、陶钧部激战于罗田、蔡家河、蕲春、田家镇一线。31日，蒋军占领各要害，并向麻城、黄冈追击，桂军退向阳罗、黄陂。蒋系海军进攻阳罗，进逼刘家庙，桂军不支退去。

△　冯玉祥电蒋介石，谓已派定魏凤楼、石友三、张自忠、田金凯、张维玺、程希贤、万选才等七个师由韩复榘指挥，即日向武汉前进。

△　白崇禧由日本抵香港，即返粤。同日，邓世增等再开军事会议，因粤中多数将领反桂，准备出走。

3月31日　蒋介石自武穴回九江，即将行营移往湖口，并派第六师归刘峙指挥，倘武汉内变确实，即令该师乘船直驶汉口，担任武汉临时卫戍勤务。

△　蒋介石通过俞作柏运动李明瑞反桂，李之代表阮庆电告俞（时在上海），谓李决定到黄陂祁家湾即反攻回汉。是日阮至九江行

营报告汉方军事计划分五路：一路司令何键，防线在湖南边境；二路司令叶琪，防线在青山；三路司令夏威未就职，由副司令李明瑞代，防线在祁家湾至京汉路；四路司令胡宗铎，防线在阳罗；五路司令陶钧，防线在三、四路之间，拟以三、四、五路全力迎击蒋军刘、顾、夏诸部，以一、二路进攻江西。

△　陈济棠、陈策等回到广州，并开军事会议，决议一致主张和平，停止出兵，商定结束总部办法。同日，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李务滋由广州赴香港谒陈铭枢商粤事。陈主张服从中央，维持和平。

△　黄绍竑由桂赴粤，本日抵河口登陆，因闻粤变折回梧州。新到广州桂军两团及第十五军驻粤办事处同时离广州返桂。

△　李济深、吴敬恒在汤山俱乐部同晤记者。吴谓："桂系此次叛谋殊属不识大体……以今日而论，李济深虽以地域关系，蒙有极大之嫌疑，但其个人根性与见识，比较李宗仁等较好。曾询任潮（李济深），李宗仁军事会议席上发表之证据（指本月19日李宗仁假借李济深谕令黄绍竑调动大军讨蒋之密电）系何时寄出，彼谓并无其事，近且上一呈至国府，陈辩实未预闻逆谋。"随即李亲笔书字交记者带回发表："昔人云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余今日竟得尝此中好滋味矣。"

△　济南市民悬青天白日旗庆祝接收，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和济南维持会长柴勤唐均出告示安民，要市民"各安居乐业，勿得自相惊扰"，并谓"从前或作轨外行动，或有附逆嫌疑，苟能革命自新，均当曲予原宥，免究既往"。同日，驻济日领西田宴接收胶济委员会委员长崔士杰等，席间交换接收济南问题意见。

是月　国民党广西、湖北、汉口及第十五师、第十六师、第十七师、第五十五师、第五十六师代表团发表不出席三全大会宣言，指责

蒋介石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造成蒋家之天下”，“此次代表大会既完全为蒋所包办，于是全党最高权力机关满布其私人，至一变而为蒋家之御用机关，更可以利用大会之决议实行其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一贯政策，而巧避扰乱党国、破坏统一之罪名，凶焰所煽，顺余者生，逆余则死，代表言论、身体之自由在开会期间几乎完全失去”，代表大会完全在蒋威胁之下，绝不能行使职权，为国家和党的利益，为个人争人格，不能不拒绝出席会议。

△　2、3月间，李宗仁派其代表温乔生到河南，在百泉见冯玉祥，约冯一致反蒋，冯表示也要打蒋，但部署军队需要时间，望李、白（崇禧）先发动，撑持两个星期，到时一定响应。

4　月

4月1日　　蒋军第二路刘峙部攻占黄冈，罗霖旅降，夏威受重伤，其部归李明瑞指挥。同日，蒋军又占领麻城；海军“楚观”、“楚同”等舰已向刘家庙发起攻击。晚7时，蒋介石乘“楚有”舰抵黄冈，召集刘峙等面授机宜，手令第二路军于到达黄冈、团风、麻城之线后迅速整顿，派骑兵团向黄安以北严密搜索前进，并随时与第三路联络，防敌由黄陂以北地区出击。又令第一路军分左、右两翼，左翼司令朱培德兼，副司令王均，第七、第十二、第十八各师属之，对湖南境内之逆军取攻势防御，并相机进取长沙而占领之；右翼司令张发奎，副司令方鼎英，第四、第十、第十一各师属之，对湖北境内之逆军取积极攻势，攻截武长路北段，限5日前占领威宁、蒲圻等地，以断武汉敌人之退路。

△　粤军第二师师长徐景唐电陈济棠，谓“和平为今日切要之图，望总揽提挈”。同日，粤军旅长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云瀛桥、邓彦华、李务滋、蔡廷锴、戴戟等联合通电拥护陈济棠主和电，称实行和平为营救李济深之惟一方法。

△　桂系将领在梧州开军事会议，决定全力救武汉，将桂系军队改称“靖难军”，派18个团由粤、桂入湘，推白崇禧为总指挥，黄旭初为前敌总指挥，调伍廷飏部由桂林出发入湘与黄部会合。同日，黄旭初、吕焕炎两师由韶关北上，并电粤方，谓两粤今虽各行其事，仍属同志，勿自相煎迫。

△　广西梧州警备司令龚杰元因粤方拥蒋，下令水陆军警一体施行戒严，所有市区冲要地点每晚10时以后由军警派哨制止通过，水上派军舰数艘分扼冲要河道检查船只。

△　邓世增因出兵主张失败，辞广州公安局长和独立旅旅长职，离粤赴沪，准备出洋；第八路总部各处长张文等亦离粤赴梧。

△　蒋介石任命方振武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及津浦路北段警备司令，7日起所部陆续开往德州。

△　国民政府令：第四编遣区办事处着即撤销。

△　何成濬通电宣布成立国府驻平办事处，并依蒋介石令于是日组成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何为主任，统辖北方各部队。第四集团军在平军官团内有武汉送来300余人被资遣，其中数人因与守卫者冲突被刺伤。

△　何键通电声称，编遣会第十次常会决议和国民政府3月24日命令“足以弭患扶危，宁人息事”，表示拥护。

△　冯玉祥在华山通电各报馆，谓武汉军阀甘冒不韪，中央万不得已明令讨伐，“玉祥谨以至诚，静待后命，苟利党国，惟义是从”。同日，刘湘电蒋介石，谓四川频年混战皆由桂系横阻，武汉竭力挑唆，桂系祸川祸国，罪无可逃，刻已积极准备，受命即发。

△　红四军主动撤出长汀，回师赣南，在瑞金与红五军会合。次日，福建省防军第二旅两连占领长汀城。8日，红五军彭德怀部在雩

都受命回湘赣边界恢复割据游击区域。

4月2日　　蒋军第二路刘峙部与桂系胡宗铎、陶钧、夏威部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冈、黄陂之线，是晚，刘部已占领距离武汉数十里之青山。

△　李明瑞倒戈降蒋，将部队由团风撤至孝感，并贴出打倒胡宗铎、夏威、叶琪等标语。3日，李与杨腾辉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刻已率领所部离开战线，听候命令”。15日，国民政府下令奖励李、杨。

△　蒋介石电冯玉祥、鹿钟麟转韩复榘，奖勉韩等出兵讨逆。又令罗霖旅加入第二军，归朱绍良指挥。

△　白崇禧、黄旭初抵梧州。同日，黄令许宗武部开乐昌，王应榆部已开至良田，驻嘉禾之防军亦开永兴，准备直趋株萍线。

△　何键电何应钦，报告已派主力向武昌前进，另派两旅赴湘南迎击桂军，请转告各友军勿生误会，交饬赣南部队齐头并进。

△　陈济棠召集重要会议，讨论接收第八路军总部办法、遣置总部人员及粤军编遣事宜，并决定调兵增防西、南两路。同日，国民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党部联名电中央，称陈济棠等返粤，真相大白，武汉抗命称兵，中央不得已下令讨伐，誓当竭诚拥护。12日，广州市各级党部联席会议复发出三电：一指责李宗仁等，一慰劳蒋介石，一促陈铭枢早日返省主政。

△　东北将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联名通电拥护中央，声讨桂系。4日，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电蒋介石，表示拥护讨桂，“敬待后命”。

△　行政院第十八次会议决议，自本年4月10日至1930年4月10日，举办关税附加赈捐2.5%。

△　中日双方接交胶济委员在济南开会，日方已准备交待。3日，日方派松室赴泰安谒孙良诚，希望中国早日接收，孙决定派程心明、梁冠英等四师约六万人接收胶济。

△　驻平日代办崛义贵访商震，以济案签字，宁案商有眉目，望中止平、津反日会活动。商允尽力劝导，下令军警随时纠正。

△　“水案”交涉因湘事发生，日方推翻前议，本日驻汉日领通知交涉员甘介侯谓东京未准撤兵，甘表示拒绝。

△　皖南悍匪朱富润率部占领祁门县城，3日又占休宁县城。

4月3日　　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在黄陂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守为攻，即日下令于4日进行总攻击，但因夏部已不听命令，胡、陶遂分途退却。4日，胡部退往夏口、柏泉，陶部退往蔡甸，胡、陶本人通电下野，师长职交李石樵、郑重接代。张知本、潘宜之等亦同时离汉。

△　武汉方面发出戒严布告，4日开始实行。第四集团军总部订定封锁江面条例，本日晚12时起实行，每日上午6时前，下午7时后，无论中外商轮、兵舰一律禁止通行。

△　蒋介石令第二路军第八师向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索，第一师向罗家田经长堰西进，以攻敌之右侧背，并积极向黄陂前进，截断敌之归路，第九师尾随第一师之后，偏移右翼，相机策应。又令第一路军右翼改换行进目标，其第四师经通山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山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各师到目的地后即转攻武昌、汉阳，与江北第二路军相呼应。

△　陈绍宽率“楚同”、“江贞”等舰继续向刘家庙进攻，“楚有”、“楚观”等舰在团风一带掩护陆军登岸。

△　何键派代表张慕先携函见蒋介石，表示遵命暂维湘局，请

蒋“训示机宜，俾有遵循”。4日，何在长沙召集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拥蒋反桂，宣布就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第四军军长职。同日，何并电劝夏威、叶琪等下野。

△　编遣委员会常会决议：总务部主任由葛敬恩代理，编组部主任由何应钦兼，以周亚卫副之。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中央大学区所属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宣言，陈述大学区制各种弊害，要求取消。4月6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呈中执委会请取消大学区制，并弹劾中大校长张乃燕。

△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开夏季评议员会，讨论设立补习性质之职业专修学校等问题，并推王云五、邹秉文、廖茂如为常任评议员。

4月4日　　蒋介石乘“楚有”舰抵鄂城，并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称“第四集团军本为国家之公有军队，而李、白等劫持为一派一系所私有”，“湘变发生以来，李、白等逆行愈著，叛迹益彰”，政府不得已用兵，“中央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各将士须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同日，总司令行营亦发出布告谴责桂系。

△　蒋军第二路已占领团风，前锋到达距武昌30里附近地方。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楚观”、“楚同”、“江贞”、“咸宁”四舰在谌家矶江面遭到桂军野炮射击，激战终日，蒋军冲破桂军第一、二、三道防线，桂军被迫撤退。同日，蒋介石委李石樵代胡宗铎部师长，石毓灵代陶钧部师长；危宿钟、门炳岳两旅已有相当接洽，令朱培德转知前线注意，准其投诚，并令第一路军右翼各师兼程向武长路北段原定目标前进，以防桂军南逃。

△　桂军各师撤出武汉退鄂西，武汉治安由卫戍部参谋长聂洸负责维持。武汉商会、公安局及各界代表开会，决定组织临时治安委员

会，推孔庚为委员长，中央派郑介民等参加（郑为副委员长）。孔电请蒋介石入汉，并派黄文植、聂洸、甘介侯等乘轮往迎。5日，桂系溃兵千余在汉被公安队缴械。

△　武汉桂系机关报《中山日报》被封，其他各报均变换论调，无不讴歌中央政府，并载有打倒李宗仁、打倒桂系军阀等字样。7日，方觉慧奉总部行营命接收武汉《民国》、《中山》两报。8日，《民国日报》停刊，《中山日报》日出两张。

△　冯军韩复榘部前锋到达孝感，5日第二十九师攻占武胜关，6日抵广水。同日韩令所部由襄樊、老河口一带向荆、沙急进。

△　北平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发表蒋介石命令，宣布北方第一、四集团军今后均归阎锡山节制。

△　胡汉民、孙科、王宠惠、古应芬等电陈铭枢、陈济棠、粤军各师、旅长、各团体、各报馆等，历数桂系之罪状，称中央用兵为不得已，望乡人憬然有悟。

△　黄旭初、吕焕炎、王应榆在宜章通电赞同粤中将领之和平主张，“应请即将本师各旅速行退回原防”。

△　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二次大会，修正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草案》；决议国府侨务委员会改归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整饬党纪通令。

△　胶济接防委员会通电，谓：“现时接收济南、青岛及沿路一切事宜协商均顺利，不日即可实行，孙主席（良诚）已具决心派遣精军四个师计六万人，用以肃清胶东，现已动员，至对于反动分子，本取宽大主义，不追既往，许其自新，但在接收期间如尚蠢动或犹无悔悟者，即一律剿灭，决不宽贷。”

△　津浦路恢复通车，南北客车分段通达济南。

△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电清华教授会吴之椿等，因董事会减费，其志受阻，决心辞职。20日，国民政府指令慰留。

△　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议决：改组反日会为国民救国会，推陈德徵、王延松、郑通伟等为该会执行委员；又组织救国基金董事会，推陈德徵、吴开先、施公猛等为董事，上述两会均由陈负责召集。

△　上海警备司令部及市公安局破获英商“大通”轮私运鸦片五万两以上，价值可达数万元，请交署向英领提出严重抗议。

4月5日　　蒋军第二路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夏斗寅部及海军各舰艇进占武汉，蒋介石乘“楚有”舰抵汉，汉各界代表孔庚等登舰欢迎。蒋并派第六师方策部一旅先赴汉口准备接收、布防及设行营事宜。同日，总司令行营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鲁未到任前由刘峙代；刘文岛为武汉市市长。又令刘峙照原计划攻击前进，务期消灭逆军，以除后患；令宜昌刘和鼎旅长速侦察敌踪，扼要堵截；任命门炳岳为独立第六旅旅长兼鄂西追击队总指挥，任命焦文典、罗霖、危宿钟、胡天乐分别为独立第一、四、五、八各旅旅长，命门指挥独立第五、六、八各旅，由现地出发向汉川、蔡甸追击武汉溃军（后复令门等在汉川停止待命，进行整顿）；令鹿钟麟转知韩复榘在现地停止待命。

△　陈绍宽派“江鲲”舰向上游巡弋。6日，继续派“楚同”、“楚谦”、“咸宁”、“江犀”四舰追击桂军，先后占领金口、嘉鱼等地，8日已过新堤、城陵矶，到岳阳。陈又增派“楚观”、“勇胜”、“诚胜”各舰追击。10日，“咸宁”、“江犀”、“江鲲”等舰已抵沙市，一面压迫残敌，一面电促友军西发。

△　桂系叶琪部退岳州，何键令在云溪待命，派郭涛前往联系接收事宜，并派陶广旅开岳州，炮兵营开城陵矶。同日，谭道源接防桃源。

△　贵州周西成电国民政府，表示服从中央命令。6日，范石生、许克祥通电服从中央。

△　蒋介石电何成濬令速调方振武部集中德州，并警备津浦北段。6日，何电方奉行。

△　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派第二十二师程心明部接防胶济，本日该师第六十六旅到达党家庄，第六十五旅已进驻崮山。

4月6日　　蒋介石偕贺耀组、陈绍宽等在汉口江海关码头登岸。同日，蒋以总司令名义在汉布告安民。

△　“讨逆军”空军司令张静愚由南京乘轮西上指挥一切，航空署除已派两队飞机外，又派新自美国购买之民用飞机往前线。

△　徐景唐因主张武装和平，与陈铭枢、陈济棠意见不合，本日由香港返汕头表示消极。

△　桂系黄旭初、吕焕炎、王应榆、叶大森等部由湘南退回粤边，黄、叶两部取道小北江返桂，吕、王部则向安仁进发。

△　蒋介石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要求各将领遵中央前令，共同肃清杨森，以期川局统一。

△　全国巡回拒毒运动大会在上海开幕，拒毒会会长罗运炎主席，到各界代表约千人，已组成全国拒毒巡回运动团，即赴各地。

4月7日　　蒋介石部署军事：暂调第一师第二旅胡宗南部会同第六师方策部负武汉卫戍责任；着第十八师鲁涤平部开拔来汉担任卫戍勤务；着第十一师曹万顺部即日开武昌以待后命；令朱绍良率第八、第十三两师即日由现地向潜江、荆、沙方面追击胡、陶残部，不得迟延；令张发奎率第十、第四两师限9日同时在各该地乘船上驶向沙市追击；令海军第二舰队派浅水舰三艘同时溯江上驶协同追击；令朱培

德将熊式辉第五师驻赣各旅调集沪、宁归还建制，王（均）、金（汉鼎）两师即饬回原防从事“剿共”。

△　蒋介石电胡宗铎、陶钧，略称：“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对兄等不加追究，如将所部交所属统领，对兄等行动更不加束缚，居汉出洋皆可。”同日，总司令部行营重委桂系驻湘北各部队官长：程汝怀为新编第六师师长；李明瑞为第十五师师长；李石樵为第十六师师长；石毓灵为第十七师师长；罗霖为第四独立旅旅长；危宿钟为第五独立旅旅长；门炳岳为第六独立旅旅长；刘和鼎为第七独立旅旅长；胡乐天为第八独立旅旅长；前四集团炮兵团改为独立炮兵第四团，陆阴楫仍任团长；前四集团铁甲车队“北平号”、“云贵号”、“长城号”均着开至武汉听候点编。

△　蒋介石再令韩复榘部在原地停止整顿待命，并将各部所在地点具报。8日，韩复榘电称，张允荣师在广水，石友三师在柳林、李家寨一带停止待命。

△　陈铭枢电黄绍竑，略谓：“弟为私为公，不忍视粤人之涂炭，千回万折，终不得不呼吁和平”，“粤不加入战争……即在求和平，无论大局如何迁移，终不违背此旨。”同日，陈济棠派香翰屏赴梧州劝黄拥护中央，黄表示赞成广东将领之和平运动。

△　张宗昌攻牟平刘珍年，遭到失败。孙殿英受山东省政府委就独立第二旅长职。孙曾奉何成濬命与任应岐联合，9日，孙、任代表梅华德、李凤亭在济招待新闻界，宣布两军联合进军胶东计划。

△　川战再起，原退往广安、渠县一带之杨森、罗泽洲等部，由成都、重庆间向泸州、叙州进攻，以断刘湘与刘文辉的联络。

△　长岳护路副司令兼第二团团长陈光中部在平江哗变，经蒲塘、金井、湘阴、益阳向武冈方面逃去。9日，何键分电湘阴、益阳、安化、湘乡、武冈等县驻军与团防堵截，10日，又电第一警备司

令陈汉章及第十九师堵截。

△　全国反日会在南京开提倡国货委员会，议决召集全国提倡国货委员会代表大会；聘胡文虎、胡文豹、陈嘉庚等为该会委员。

4月8日　　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推蒋介石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叶楚伧为宣传部部长，刘芦隐为副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部长，何应钦为副部长，陈立夫为秘书长。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案，决定：一、政治会议委员就中央执监委员中推定之，其人数不得超过中央执监委员全数之半数；二、依据以上原则，交常会修改条例并决定其人选。依吴铁城临时动议，通过以全会名义致电奖励蒋介石讨桂“功绩”。

△　蒋介石在武汉通电自劾，略谓：此次鄂战“兵不血刃而逆首窜逃，武汉恢复，足见叛党背国之徒决不能苟存于青天白日之下”；表示“事先既有失察之处，事发复无阻止之方”，“一俟武汉粗定，大局敉平，当即遄返首都，引咎自劾，静待处分”。

△　蒋介石以桂军大部西退，尚有零星潜伏各村落间，除派朱绍良等部追击外，决定主力控制于武汉南北地区以备非常事变；着刘峙部第一军诸部队集结于黄陂、横店、祁家湾附近地区，骑兵团改由刘指挥；着张发奎所属第四、第十、第十一各师改变由水道追击原令，向武昌、金口、贺胜桥附近地区集结；着李明瑞第十五师集结安陆附近；罗霖第四旅集结黄安附近；并电军政部，以讨逆军事已告段落，请转饬各方原定派遣各部队停止待命。

△　冯玉祥自华山再次通电各报馆，数桂系北伐时停兵武汉，不发兵援助彰德之役，肆意挑拨冯与中央关系等罪状四端。

△　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古应芬等电陈铭枢、陈济棠，谓李济深功不补过，其安全有蒋介石亲署之函为保证，近日反动者复为种种谣诼，希图煽动，其用心可知，“弟等护之之心当始终不渝”。

△　中日接防胶济会议开第三次会，议决军政各机关入济办法，济南、张店、博山、坊子、青岛均派联络员，胶济沿线治安维持由双方负责，十日内军队将济南及胶济路沿线各要区接收。同日，日本山东派遣军安满师团长电日军总参谋长，请日政府鉴于中国目下之政情变更既定方针。9日，崔士杰赴泰安向山东省政府孙良诚报告接防会议情形；驻青、济日领藤田、西田同车到泰谒孙，商撤军保侨事宜。

△　张鸣九残部占领章丘城北旧军镇，大肆烧杀，难民数千人逃济。

△　安徽省政府在安庆实行大逮捕，分别在安大、第一中学、平心桥二十三号、康济里一号、西门外贺震昌锅铁店等处捕共产党员及嫌疑者30余人。

4月9日　　蒋介石致函嘉慰李明瑞、杨腾辉。同日，李、杨等电蒋，声讨李宗仁、白崇禧、胡宗铎、陶钧破坏统一，擅自称兵等罪状，表示该军“不供一人一系之利用，自冬（2）日起集中京汉南段，严守纪律，拥护中央，静待主席之后命”。

△　蒋介石电令何键剿办入湘桂军黄旭初、吕焕炎两部，并速转谭道源率所部至石首、公安、松滋一带截堵武汉方面溃军。

△　孔庚奉蒋介石命赴荆、沙晤胡宗铎、陶钧商收编。胡是日到潜江，所部集中荆门，陶10日至沙市。

△　邵力子奉蒋令往华山谒冯玉祥后，是日抵汉，携有冯致蒋函，内称鄂边境之军队以中央政府命令是从，拟即退回豫省。冯亦派曹浩森、刘骥赴汉，商增进冯、蒋关系。

△　蔡廷锴第七旅开抵广州，余汉谋率部赴韶关。

△　国民政府以接防准备尚未完备为由，要求日方缓撤山东日军，万不得已请先撤张店以西之日军，至张店以东之日军务须待中国

方面准备完成后再撤。11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再请日领冈本向日本当局正式要求暂缓撤退驻博山以东日军。

△　山东省当局接冯玉祥电，谓特派郑大章、席液池两师骑兵赴鲁接防，以厚兵力，该两师共三万人，前锋已由曹州抵兖州。

△　行政院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将平奉路改称北宁路。

△　宋子文离南京赴汉整理两湖财政及恢复汉口中行，11日到汉即谒蒋介石商两湖国税等问题，12日，汉银行团宴宋并讨论财部旧欠鄂债问题。汉商会要求清还中央欠汉商会款及免除苛捐杂税。4月20日，宋与银行界达成善后借款280万元之协议，以鄂岸盐税作抵，款项由上海各银行委汉口各分行代办。

△　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率“海容”、“应瑞”两舰自沪经厦赴粤，改编粤舰队，以统一海军及对付桂军。

△　新任汉口交涉员李芳访各国领事，各领表示亲善，并赞此次对桂之处置。同日，汉日租界障碍物完全撤除，日、法租界均允交署之请，准武装卫兵自由出入，但日巡捕仍将罢工指导员王洪林等四人捕押。

4月10日　蒋介石派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夏斗寅为副司令官，率第八、第十三两师，经天门、仙桃镇向荆门、沙市方面追击；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方鼎英为副司令官，率第十、第四两师于11日由武汉、嘉鱼乘船沿江向上游追击，其先头部队限13日到达荆门、沙市；令独立第一旅归朱绍良指挥，速向荆门赶进，勿再延缓。

△　冯玉祥在华山电饬豫、陕、甘、青、宁各省政府一致服从中央，所有用人、行政、财政等悉听中央统一指挥。

△　韩复榘应蒋介石电召抵汉，11日谒蒋报告军政情形，请示机

宜，备受蒋笼络。

△　孙总理奉安委员会通过参加奉安大典人员及代表名额，规定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党部职员、南京市党部及所属区分部执监委员、在京各机关荐任以上职员一律参加，对各省党、军、学校、民众团体、华侨等出席代表人数也有所规定。

△　周龙光、江华本、有野、崛内等在南京开解决中日悬案预备会议，商宁、汉两案，意见颇接近，宁案解决办法大体与其他各国相似。11日，续开第二次预备会议，汉案换文草案大体商定。12日，开第三次预备会议，讨论修约进行手续。

△　中日两国办理接交胶济事宜之委员在济讨论接防程序及日期，议定第一步接收济南至博山一段，第二步接收博山以东至青岛一段，接防军16日起入济南，日军18日至20日撤离济南。

4月11日　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决议：推谭延闿、胡汉民等审查政治会议组织条例之修正与人选案；戴季陶、孙科等审查三全大会交下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与未及讨论各案；常委会秘书处日常事务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秘书长陈立夫未就职前，推叶楚伧负责。同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之整饬通令，要求各级党部随时考察所属党员，如发现有通令所述之出轨言动，应立即纠正制止，不从则进行处分。

△　蒋军第八师朱绍良部进占仙桃，在黄家新场附近与桂军张义纯师激战数小时，迫使张师接受改编。同日，桂系胡宗铎、陶钧部由荆、沙退潜江，遭到蒋系海、陆、空军攻击，被俘甚多，失枪2000余支。蒋军蒋鼎文部由齐家湾开赴宜、沙追击桂军。

△　蒋介石电刘湘请促川军第一师速进荆、沙，勿停顿于宜昌；又令独立第六旅旅长门炳岳率所部会同谭道源堵截武汉溃军，务阻止该敌渡窜江南。12日，鄂西桂军与刘湘部战于宜昌。14日，蒋介石电

令朱绍良、张发奎等务于15日占领荆门，17日以前占领沙市。

△　何键抵武汉谒蒋介石报告湘事及收编叶琪部情形，并请鲁涤平回湘主政。

△　是日及13日，陈济棠在广州召集各军官开防务会议，14日派蒋光鼐赴香港与陈枢铭磋商，15日召集省、市党部委员会议讨论应付时局，16日再开军官会议，蒋光鼐、陈策等恐西、北江桂军无回桂意，请陈济棠派兵往攻，陈仍主对桂军取守势。

△　孙良诚通电指责桂系，表示服从党义，枕戈待命。

△　甘肃回军马仲英部攻占宁朔县。

△　禁烟会咨请外交部，根据清宣统三年（1911）外务部与各国所订严禁吗啡来华章程，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严禁外商贩运毒品。

△　江苏宿迁窑湾又有小刀会暴动，捣毁电报局，缴公安局、盐务局、商会枪支百余支，12日起挨户搜捕国民党员，13日贴出“大同革命仁义兴龙军”布告。14日，该县县长刘昌言及防军团长孙仲猷督队弹压，双方互有伤亡。19日，毛炳文部第三师第八旅第十六团赴徐东八义集堵击，21日在邳县西道口与刀会激战，该团第二营营长郑平被刀会击毙，刀会败退，死30余人，11人被俘，其中三人于23日在邳县城枪决。

4月12日　蒋介石在武汉召集两湖军政要员会议，商军事和两湖善后。

△　桂军旅长李石樵、石毓灵、江声、程汝怀等自沙市电贺国光、孔庚，谓此间各部队已在荆、宜停止待命，请即日到沙奉商一切，并转陈蒋介石令前方部队停止前进。

△　王应榆派参谋长谒陈济棠报告该部由湘南回桂经过。桂系梁

朝玑师退出永州，何键部进驻。

△　国民政府裁并海军署，设海军部，并特任杨树庄为海军部部长，任陈绍宽为政务次长，在杨未到任前由陈代理部务。

△　崔士杰在济南通电，称济案接防事进行顺利，经双方协定各派联络员十余名，连同胶济路沿线各县长赴沿线办公，续由鲁省派军队由济东下，现联络员及县长已出发，军队随后即到。

△　蒋介石为防冯玉祥取得胶东地盘和海港，由汉口分电军政部代部长鹿钟麟、参谋总长何应钦，称接收青、济关系重大，国府自应负责办理，不宜分段落，应整个接防，以树对外信用。同日，山东省政府亦接外交部电，谓接收须慎重，我军暂缓入城，静候详议。14日，程心明、杨虎城师遵令分别开回泰安、莱芜原防。

△　驻汉日总领事桑岛、领事田中等谒蒋介石，要求取缔排日运动，并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　武汉辛亥首义军人在民众乐园开会，要求蒋介石准许恢复党籍，并编辛亥革命史等。

4月13日　冯玉祥在华山通电辟谣，说明自湘事发生后所部拥护中央及出师情形，并谓“好事者流造作种种谣言，以淆惑视听，不曰蒋阎联合倒冯，则曰冯李联合倒蒋，不曰冯阎联合倒蒋，即曰蒋李联合倒冯……无形之中遂造成一恐怖现象”。“切望邦人君子，万勿轻听谣言，任其挑拨，贻国家之戚于无穷也”。“现在第二集团军总部及开封政治分会早已取消，军权政权均已奉归中央，而军政部长一职亦经呈请开去，只愿为一党员，其又何所争乎”？

△　蒋介石令方策部第六师自14日起陆续调回南京，限20日全部到达；第十八师即日接替武汉防务。16日，第六师全部离汉，18日，第十八师先头部队抵汉。

△　陈绍宽率舰赴荆、宜督战，“江鲲”、“江犀”等舰在鄂西马家寨与桂军激战。

△　刘兴遵蒋介石令在开平就任陆军第五十三师师长。

△　龙云就蒋系“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后，本日开始动员，拟先解决贵州，同时取道百色、龙州两路入桂。

△　国民政府任命姚琮为首都公安局局长；任命朱兆莘兼外交部广东特派交涉员；任命陈仪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原任张群免职。

4月14日　蒋介石部署“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以根本铲除桂系，本日令第四路总指挥何键选派所部20个团以于上月底集中桂边，5月1日由集中地出发，5月15日以前占领桂林，即向柳州前进；令第十路总指挥龙云选派所部12个团以上限5月20日以前集中广南、剥隘一带，5月30日以前占领百色，即向龙州、南宁前进。同日，蒋又委任何键兼湖南清乡司令及新编第七师师长，罗藩瀛为副师长；周斓为新编第八师师长，唐哲民为副师长；刘建绪为第十九师师长，陶广为副师长；叶开鑫为武株萍路警备司令（武株萍路警备队由陈汉章、陈渠珍部两团改编而成）。

△　冯玉祥电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及蒋介石，称有人故意捏造苏俄东方政治分会训令，指冯通苏，恳请迅派负责大员彻查究竟。22日，蒋复电谓此等伪造文字显系别有作用，请勿置怀。

△　韩复榘离汉回防，刘骥、马福祥等同行。贺耀组奉蒋介石令赴豫慰劳韩、石（友三）等部，17日，贺返汉复命。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使芳泽在上海举行解决中日悬案正式谈判，中方周龙光、李深，日方有野、堀内、上村等列席，先就预备会所商各案略加讨论，然后集中谈宁案，双方意见颇接近。

△　崔士杰至驻济日领馆，说明接防事由中央统筹办理，中国军

队16日不能入城，请日军缓撤。

△　甘肃马仲英、马廷骧等回军三四千人攻陷宁夏省城，省府主席门致中率队退守平罗，18日、24日门又先后从平罗、石嘴子败退。

△　婺源皖匪遭到浙江保安队攻击，死百余，匪首朱老二被擒。

4月15日　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修正中央政治会议条例和建都南京纪念办法；并决议中央党务学校党部改归中央党部直辖；解散湖北省党部及汉口市党部，所属党员重新登记，分别去取，分别派夏斗寅、邱鸿钧等为该两党部临时整理委员。

△　蒋介石以川军第一师唐式遵部已由巴东进至宜昌西北10余里之平善坝、下牢溪之线，与桂军刘和鼎部对峙，是日分别电令张发奎、朱绍良速向宜昌进击，以收夹击之效；令陈绍宽派浅水兵舰多艘即日驶至宜昌协同作战；令刘湘务派有力部队到巴东，防桂军由宜昌西逃；令何键转谭道源改变赴公安、石首计划，限22日以前赶至长阳、五峰堵截桂军。

△　孔庚、何竞武电贺耀组报告与鄂西桂军接洽情形。谓胡、陶、夏三师长已于本日电蒋介石表明心迹，此间正召集会议协商和平，胡等离开队伍不成问题，李（石樵）、石（毓灵）等就职因编制略有斟酌，待回汉请示后即可实行，请转陈蒋令前方停止军事行动。同日，胡、陶代表携输诚函抵汉。16日，贺复孔电，要求桂军即日将荆门、沙市和平交出，所有部队克日开至建阳驿、半月山、鸦雀岭等处，以便派员点验，并请孔等陪同胡、陶、夏到汉一谈。

△　蒋介石令龙云转李燊免去查办处分，着戴罪图功，率所部编入“讨逆军”第十路，归龙指挥。21日，李奉蒋命反攻贵阳。

△　蒋介石令萧萱暂代湖北省政府主席。

△　国民政府令：民国十八年以前所有以政府名义颁发之勋位、

勋章均着一律废止。

△　国民政府特派孙科为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

△　王正廷、芳泽继续会谈，宁案解决，大体仿照中英、中美宁案解决办法，由中方向日方略表歉意，双方合组调查委员会，调查事实并办理赔偿损失事宜。汉案日方坚持开炮为正当防卫，不能负责；修约问题决重订新约，但需候日政府训令。

△　新任命之青岛接收专员及市长陈中孚接收青岛，本日至商埠局行接收礼。原商埠局赵琪等重要官员已于昨日走大连。

△　国民党福建省指委会因有人请蒋介石以杜锡珪代杨树庄为闽省主席，特电中央反杜留杨。

△　浙江省黄岩县盐民聚众数千人反对新盐政。16日，宁波外海水警局派“永平”舰前往镇压。

4月16日　编遣委员会决议第四编遣区办事处奉令撤销，所有前由该区派往各区之林拔萃等委员，及由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各编遣区派出该区之委员褚民谊等应一律撤销。22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蒋介石任命刘湘为“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

△　李济深在汤山函李宗仁、白崇禧，绝对停止蠢抗，早日出洋留学，并望寄语黄绍竑“惟中央之命是听，为中央去西顾之忧，为吾省保能安之局”。

△　蒋军飞机多架，赴老河口、江陵、宜昌等地搜索桂军，在江陵掷弹轰炸，桂军西遁。

△　广州召开促进和平大会，蒲良柱主席，陈济棠、陈策、马超

俊等发表拥蒋演说。17日，广东省党部议决警告桂军当局，服从中央，勿再用兵。

△　济南接防因改换接防部队及手续，中国军队未按原计划入城。日军未如期撤退，山东省政府孙良诚布告说明暂缓接防缘由，济南公安局长下令特别紧急戒严。晚8时起，各商店完全闭门，9时后街市即断绝行人，各街口一律加派双岗，荷枪实弹，严重警备。

△　王正廷、芳泽继续会议，汉案完全解决，双方互有让步，日方承认道歉，至赔偿损失须先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　外交部以法国驻云南交涉员诋毁我特派云南交涉员，并干涉我国任免官吏，令驻法公使高鲁向法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将该驻云南交涉员撤换。

△　国民党浙江省执委会第二次常会，反对该省政府取消二五减租的决定，决议函请省府复议。

△　任应岐师包围昌邑黄凤岐军，并由昌邑、掖县、龙口向烟台进攻。

△　汉《中山日报》更名《武汉中山日报》，是日出第一号。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年会，通过出售电气事业等决议案。

4月17日　冯玉祥离华山东行。行前迭电南京，声明接收胶济及用人完全听从中央，本人绝无成见。19日，冯电告中央谓本日已抵潼关，数日内赴开封，又电各报馆否认曾向蒋推荐刘骥任湖北省主席。

△　据胶济接防委员会讯，蒋介石已电令接防仍由省政府办理，惟须呈准中央方可施行。同日，济南日领署及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分别接到外务省及铃木总参谋长延缓撤兵命令，但日军仍须在两个月内撤尽。

△　四川省政府委员会议推田颂尧代理省主席。

△　孙殿英电何成濬，谓已陆续增援昌邑，即下令总攻，决遵令直捣烟台。同日，方振武一部乘轮到龙口参与讨张宗昌战斗。

△　班禅代表罗桑泽仁等三人由北平到南京接洽西藏事务。19日至国民政府，由古应芬接见，该代表等详述藏情，要求中央接管藏务，古答对藏事俟国事稍定自当设法解决。

△　全国反日会通过提倡国货运动工作计划大纲及五三公学、建筑五三公墓、五三纪念碑进行计划大纲。18日，又订定封存仇货办法，规定在封存期间应进行仇货登记，设立封存仇货委员会负责办理；对奸商私自贩卖仇货者，除没收封存外，并按货价两倍处罚，对抗不封者照奸民条例办理，将经理游行示众；仇货封存后，如有任意撕毁及更换标封者，即封闭该商店；封存之仇货非经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不得启封发卖。

4月18日　陈绍宽率舰攻下马家寨，乘胜追击至距沙市五里之观音寺，孔庚、何竞武以胡（宗铎）、陶（钧）等乞降，请海军暂停炮击，陈电蒋介石请示进止。同日，蒋系空军飞机队飞机多架轰炸马家寨、沙市。

△　蒋介石令范石生、许克祥部归何键指挥，范、许两部同驻湘南待命讨桂。同日，范由汉赴长沙回防，临行语记者谓“本师与许师均唯蒋命是听”。

△　王正廷、芳泽谈判修约问题，拟妥中日间照会两件，决将旧约废止，重订新约。至此谈判暂告一段落，待日政府批复后再在南京正式签字。

△　鄂交涉署电外交部，请速谋“水案”解决办法；交涉员李芳21日开始与日领进行交涉。

△　中比庚款委员会委员人选经双方派定，中方委员六人，委员长褚民谊，委员有胡世泽、黎照寰等。

△　旅京桂人开会，到300余人，通过呈请政府下令免黄绍竑本兼各职，彻底肃清桂系军阀势力，彻底改组广西省党部，永远开除黄绍竑、黄华表、陈锡珖等党籍，通电宣布黄绍竑罪状等项决议，并选出代表四人，准备赴中央党部及政府请愿。

4月19日　胡宗铎、陶钧派代表谒蒋介石，商定准胡、陶等投降下野，并给10万元，所部军队悉予解散。但前方仍有战事，蒋军夏斗寅部占领荆门，桂军退当阳，蒋军飞机队继续轰炸沙市，炸毁桂军船只两艘，并散发传单促桂投降。

△　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告湖北文武官员书》，宣称对桂系时代人员只究首领，绝对禁止对胁从者挟嫌报复。同日，蒋又通令各级政府及各军整饬官常，标榜“兹值训政开始，必须涤荡秽恶，力持廉洁……所有苞苴贿赂亟应一体严禁”。

△　蒋介石再令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令陈济棠选派所部18个团以上步兵，与海军第四舰队全部、航空司令张惠长部编为第八路军，于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5月1日由集中地出发，限5月15日以前占领梧州后即向浔州（桂平）前进；并派朱绍良为总预备队总指挥，率第八、第十五、第五十七师于4月底集中武汉附近，相机推进。

△　邓彦华谒陈济棠，商议是否接任徐景唐所遗之粤军第二师师长。徐已调任蒋介石行营参议。23日，汕头市党部电蒋收回成命。26日，陈奉令通饬取消第二师番号，将第二师改为第五十八师，以邓为师长。

△　方振武奉令渡河接防胶济路，并会同孙良诚共负鲁省接防责任，所部即由禹城向黄河推进。

△　日军中尉主计伊藤佑教在济南商埠升平街被人击毙，当晚日军在商埠各街布岗检查行人。20日早，日军马炮兵一队并铁甲车两辆上街游行示威。同日，日领西田向孙良诚、崔士杰提出抗议，崔以尚未接防为理由，声明中国不能负责，并将抗议退回。

△　任应岐、孙殿英联军围攻昌邑黄凤岐部。21日，双方激战五小时，黄弃城东逃。孙旅向平度进军，22日占领该城。任师23日占领沙河镇，24日又占领掖县。

△　日清公司轮船“涪陵丸”在宜昌下游10余里处遭胡、陶军射击，该船日海军警戒队指挥官丰名中尉中弹毙命，鬼泽机关长受重伤，其余伤者67人。

△　四川杨森部袭击资中、内江，与刘文辉部开战。

△　南昌《新闻日报》刊行号外，标题为《无法无天之大同盟阴谋大暴露》，揭露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各负责人搞派系活动。5月1日，国民政府训令江西省政府查封该报。

△　上海救国会通电，谓日本乘中日悬案未决之际，逞进一步侵略满蒙之野心，召集驻满官宪会议，讨论吉会、长大路强行开工案、交涉建筑营口至瓦房店之新线案、商租权解决案、对于满蒙行政警备案，上述四项决议“任其实现，不仅东陲将非我有，恐华北之藩篱一撤，堂奥空虚，蚕食鲸吞之所极，将使神州国土从此无噍类矣”，要求外交部严重交涉，盼全国同胞厉行对日经济绝交，厚集实力为最后之准备。

4月20日　　国民政府下令保障人权、财权。略谓：“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

△　蒋介石为联络冯玉祥反桂，曾派邵力子等携函访冯，许以行

政院长之职。是日，冯由潼关电蒋，以“才力所限，不可相强”婉拒，并称“军政专责窃非玉祥之夙望，且恐将开干进者觊觎之心”。

△　国民政府通告驻南京日领事冈本，谓现已决定山东日军撤退后之接防问题，从济南至张店、博山以西配置孙良诚军，张店以东至青岛配置中央军从事接防，具体方案将于一二日内正式通知。

△　粤编遣处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粤方各军准备攻桂。21日余汉谋由韶关到广州商军事，驻连江口之余部一团奉令赴韶增防。

△　桂军积极对东、北两路布防，是日吕焕炎部开抵平乐。23日黄旭初、王应榆部分别抵达梧州、贺县。

△　龙云派师长卢汉赴汉，是日卢谒蒋表示拥护中央，铲除桂系，保障统一。蒋拟告十路将士书交卢携滇，内谓“李、白捣乱，此而不讨，国法何存”。

△　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签订之航空邮务合同发表，该合同规定由美公司代为开办上海经南京至汉口，南京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汉口经长沙至广州三条航空线，限六个月内办成。27日，邓建中、张静愚等出席中央航空协进会常会，议决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取消该合同、通电全国航空同人一致反对、函请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孙科注意领空权等七项决议。5月2日，蒋军出发武汉前方人员通电指出该合同有损领空主权，妨害国防，并违背国际公法，祈务必打消此议。后首都航空署、河北邮务工会、上海邮务工会亦分别呈文或发表宣言反对。

△　国民政府以东北民众自卫委员会印发之杨、常死后《敬告民众书》内容乖谬，特通令查禁。

4月21日　胡宗铎、陶钧、夏威通电下野，出洋留学，所部军队

交程汝怀等带领。

△　蒋介石自汉电工商、农矿两部，谓军事结束，编遣大计亟待实行，安插冗兵，事关重要，希派专人调查内蒙各处之屯垦、各地工厂、矿山之工人，介绍及一切救济失业官兵之方法。农矿部奉命后于25日派20余人组成农林事业调查设计委员会。

△　张宗昌军猛攻牟平刘珍年军。22日，张军刘开泰部被刘军包围击败，张宗昌等逃往大连。23日，刘珍年军乘胜攻占烟台，刘本人24日入城告示安民，劝谕开市，旧日官吏均回原职。是役刘军俘敌4000余人，获枪2000余支，炮六门。其他军用品甚多。

△　何键在长沙召集营长以上军官训话，宣布拥蒋讨桂，并颁讨桂令。

4月22日　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常务会议修正通过孙科、戴季陶、李文范所提关于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通过中央财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推胡汉民、谭延闿、孙科、陈果夫为财委；议定四川邛崃县指委孙洪图被杀案处置办法，决电令刘文辉将该部余仁撤职查办，以后从严管束部下，不得再有同样之事发生。

△　是日起陈济棠在广州连日召集各师、旅长会议，讨论西、北江防务及讨桂问题。对蒋介石之讨桂令有主张即受命出兵和主张保境安民两种意见，27日，议决对桂先警告后出兵，准备出兵10个团，必要时再加五个团。同日，蒋光鼐、邓彦华、陈策、余汉谋、香翰屏等10余人联名电黄绍竑、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王应榆、龚杰元，促服从中央。28日，粤将领纷纷回防部署军事。

△　程汝怀、张义纯、李石樵、石毓灵、李宜煊在沙市通电分别就第五十五、五十六、十六、十七和新编第十师师长职，程并兼鄂西编遣专员。同日，孔庚、何竞武就鄂西编遣委员职。

△　国民政府任命何键、贺耀组、叶开鑫、黄士衡、张开琏、曹伯闻、张辉瓒、曾继梧、陈嘉祐、陈渠珍、宋鹤庚、吴尚为湖南省政府委员，指定何键为主席，以曹、张（开琏）、黄、贺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原任免职。任命王金钰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派陈维城、朱懋澄为出席第十二次国际劳工大会政府方面代表，富纲侯为政府方面顾问，陈光甫为雇主方面代表，夏奇峰为雇主方面顾问。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外交部呈报派崔士杰、郭同、吕秀文、李庆施为山东接收委员准予备案。

△　国民政府驻法公使高鲁谒法总统呈递国书。同日，互换中法关税条约批准文件。

△　田颂尧通电武装制止川战，略称："资、内、安、乐之间，战耗忽起，尧与自（自乾，刘文辉字）、晋（晋康，邓锡侯字）两兄鉴此川局不堪再扰，爰特协商，力赞自、晋两兄偕赴资、内，尽力阻止。祈望诸兄捐弃小嫌，顾全大局，双方立令所部停止军事进行。倘再仍此纷争不已，则是有意破坏和平。尧当贯彻初衷，立率全军武装制止。"27日，田、邓电告南京，谓同盟军退出资、内，川战可望结束。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机关，声称共产党刊物到处寄递，"且有假托本党刊物名义与式样，或用小说名称印成封面而内容则纯系宣传共党谬论，企图掩饰，冀便流传各情事"，饬各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

△　南京市总工会及各级工会代表100余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取缔非法会员，规定劳动契约以无故不得开除工友、奖勤、恤死为原则，并请禁止开放茧行，以维机织业劳工生计。

4月23日　国民政府令：派何应钦为总理奉安迎榇总指挥，孔祥

熙、赵戴文、鹿钟麟、刘纪文、谷正伦、郑洪年、姚琮、席楚霖、夏光宇为总理奉安迎榇指挥。

△　陈绍宽率“楚谦”等舰进驻沙市，并分派舰艇赴宜昌一带。

△　何键在长沙就蒋军“讨逆”第四路总指挥兼湖南清乡司令及新编第七师师长各职，又周斓、刘建绪分别就新编第八师和第十九师师长职。

△　张学良召开军事会议整理东北军，决定改师为旅、淘汰老弱残疾、开除吸鸦片及嗜好者、招补空额、官兵一律识字、多添骑兵、兵饷改洋等项整理办法。

△　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议决：一、中日悬案应谋根本解决；二、各国对庚款用途支配固可贡献意见，但最后支配权应操诸中国；三、撤销领事裁判权应积极进行；四、上海临时法院收回后，其审判权、法警权应直辖中国。

△　国民党江苏省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议决：关于睢宁迭呈如何处理刀会案，呈报中央并推顾、段两委员面陈情形，并电蒋介石报告宿、睢、邳三县土匪暴动因果、民厅疏于防范、事后描置失当等情，请速派重兵痛剿。

△　教育部通令公布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规定各宗教团体设立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或各种补习学校、民众学校，应照私立学校规程或教部有关是项法令办理；为传播教义设立机关，不得沿用学制系统内学校名称；集合社会研究教义或学术，得遵行学术集会结社手续；设校或办学术团体均应呈教育行政机关立案或备案。

△　国民政府据中执委会函称，“上海《字林西报》言论记载诋毁本党，造谣惑众，并挑拨金融界及商人反抗本党，请严加取缔，通令扣留，并饬外部交涉”；又称“香港《工商日报》言论记载多属反动宣

传，请通令党部并函政府转饬查禁”，特训令行政院遵办。

△　蒋介石电上海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部劝止、取缔反日运动，要求将以前所扣日货予以发还，以后不得再有擅自扣货之举，违者以破坏大局论。

△　皖匪宋富润经皖、浙、赣各军围剿败逃，在四号洲受伤被俘，是日解安庆，25日就地枪决，洪照杨、曾小毛同时被处死。

4月24日　冯玉祥在开封召集所部师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时局与军事问题，会后即撤退鲁西、豫南部队，将主力集中于潼关一带。同日，韩复榘之第三路指挥部由信阳移至郑州。

△　蒋介石令何键、陈济棠、龙云、朱绍良等，将湘、粤、滇攻桂时间分别延后五至10天。

△　程天放就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职。

4月25日　蒋介石由武汉到达长沙，召集湖南省政府科长、军队少校以上官佐训话，并在省府宴会上致词，望湘人努力扫除桂系巢穴。26日，蒋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就职礼上致训，勉何等“积极清乡剿匪，讨桂安湘，完成自治，消灭土劣”。同日，在长沙10万人之欢迎大会上发表题为《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的演说，宣称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共产革命和全民革命在性质和方法上存在差别。共产革命不适用于中国。现在是训政时期，“希望大家毅然的加入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为民族努力，为民权奋斗，为民生牺牲的光明大道”。当晚专车返汉。

△　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因不满胶济接防办法，分别呈蒋介石及谭延闿称病辞职，省府主席由吕秀文代理。26日，孙率部离泰安赴开封，地方治安暂由人民自卫团维持。27日，复通电全国谓：“良诚

近见驻鲁部队日见增加，为接收填防已足分配，然大军云集，给养困难，不幸牵动外交，更将予人以口实”；“且念外交之不易知，应付之不可不慎重，更见内争之可耻，而处事不可不退让也……思维再四，莫展一筹，兹幸中央对接收济案统筹兼备，策划万全，良诚以久病之躯，正可乘时疗养。”

△　参谋本部据蒋介石电拟就分段、分期接防胶济办法，26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发表接防令：济南以东至潍县以西地区着程心明及杨虎城两部接防，潍县及潍县以东一带着刘珍年及第四十五师分别接防，青岛及胶济铁路沿路车站由政府派宪兵驻扎，办理行车之稽查侦防事宜。

△　何键之代表吴勉抵广州谒陈济棠，27日陈之代表汪子薪至长沙互商桂事。

△　驻黄沙河、全州桂军向桂林撤退。湘军已占东安。

△　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常务会议决定：在孙中山灵榇抵南京时迎至中央党部公祭三天；圈定河北省党部执委；规定党、国旗悬挂位置，国旗居党旗之左，党旗居国旗之右。

△　北平禁烟处焚烟，共焚烟与土1.036万两、烟具7540件。

4月26日　龙云在昆明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参加讨桂，委李燊为前敌总指挥，第九十九师师长朱旭为左翼指挥，第一百师师长张凤春为右翼指挥，张冲第一百零一师留守。

△　国民政府指令批准甘肃省政府将临夏县属之莲花城添设永靖县治。

△　张宗昌率残部乘“同源”等七舰离龙口逃往砣矶岛，东北舰队司令沈鸿烈率军舰三艘前往监视。龙口刘开泰、刘选来部万余人托龙口商会转请投诚。27日，任应岐部占领龙口，刘开泰、黄凤岐等逃

走，残部退黄县，复被任军包围。

△　北平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废除荷、比、丹、巴西、西、美、法、意、日、英、葡11国1919年5月5日对华禁运武器协定。

4月27日　外交部照会英、美、法、荷、挪威、巴西六国公使，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

△　中日互换修约照会，双方均肯定应派员重订新约。同日，“水案”双方在汉交换意见。28日，交涉员李芳向各界报告交涉经过，罢工委员会提出八项条件请李转达日领。

△　国民政府令，将武汉市改为特别市，任刘文岛为市长。6月11日，又令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特别市，以汉口、汉阳为管辖区域。21日，湖北省政府会议议决：划武昌为普通市，由省府组市政委员会，不另设市政府。

△　国民政府任命张贞兼福建“剿匪”司令。

△　四川万源、宣汉边界农民在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王维舟为书记）领导下于固军坝举行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

4月28日　梧州警备司令龚杰元奉桂系当局派遣抵广州商和平，29日谒陈济棠面交黄绍竑亲笔函。5月1日，龚再次谒陈，粤将领多在座，陈希望黄表示鲜明态度，龚答黄主服从中央。

△　教育部布告，规定现有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无庸呈报教育行政机关立案，其考核办法应候内政、卫生两部商定通令遵照。

△　北平卫戍部奉蒋介石及外交部电令，布告改反日会为救国运

动会，并规定取消反日会名称、取消反日标语、停检日货、已登记之日货不得封锁等四项办法。

△　长春全体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日人修筑吉会路。

△　大帮太湖土匪抢劫嘉兴中国银行，劫去钞票9.6万余元，同时驻当地兵轮和警察所枪支亦被劫，并有多人受伤。6月15日，抢劫犯陈必哥、曹志刚、曾柏林、潘才广四人被枪毙。

4月29日　何键由长沙赴衡阳督师攻桂，参谋长刘晴初、秘书长刘鹏年随行。第四路讨桂军队分为第一（新编第八师周斓部）、第二（第十九师刘建绪部）、第三（第五十二师吴尚部）、第四（范石生部）纵队及总预备队（新编第七师）向指定地点集中，5月7日前先后抵塘田寺、永州（陵零）、东安、道县、永明、江华等地。

△　蒋介石在武汉各界纪念周上作党务报告，宣称不平等条约已取消一半，二年后可完全取消，应以坚忍精神肃清腐恶势力。次日，蒋偕邵力子、周佛海等离武汉，5月1日抵南京。

△　薛笃弼受蒋介石委托离武汉北上，持蒋亲笔函劝孙良诚回鲁，并促冯玉祥赴南京。

△　北平市长何其巩入德国医院，30日在北京饭店宴林森、吴铁城，并语人略谓本人并无离开准备，余来系奉中央命令，同时应听命于阎总司令，纵时局发生变化，应候中央及阎公指挥，不应擅离职守。同日下午，何复入德国医院。

△　国民党中常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修正省县执监委员会组织条例，议决民训会结束手续、期限及其工作人员任用办法；准蒙人特别入党事交组织部办理；翻译三民主义各书蒙文事交宣传部办理。

△　国民政府令：广东省政府委员刘栽甫免职候用，任命范其务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原任冯祝万改为兼代民政厅长；四川

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谢持应免兼职，兼四川省财政厅长向传义改为兼建设厅长，任命邓锡侯兼四川省财政厅长。

△　蒙藏委员会常会讨论废止蒙藏王公喇嘛世袭爵位及册赠封号案，决议对王公喇嘛自动取消爵位封号者呈国府嘉奖。

△　驻湖北通山之鄂警备旅第二团第二营士兵哗变，杀营、连、排长，5月2日由汀泗桥走嘉鱼。

4月30日　冯玉祥电邵力子、薛笃弼，略谓拟俟所患稍轻先行到洛，孙良诚因病辞职一节确出至诚。同日，又电其代表刘治洲转呈蒋介石准孙辞职。

△　兵工署长陈仪奉国民政府派暂维军政部部务，军政部及冯玉祥在南京住宅原有卫队已撤去，改由国府警卫团派队驻守。5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陈仪为军政部常任次长，代理部长职务。11日，蒋介石指示邵力子电刘骥，转请冯玉祥于刘骥、刘郁芬二人中保荐一人为代部长人选。

△　国民政府训令四川省政府转行各军并通饬所属，嗣后对于党务人员均应切实保护，如有纠纷事项遵照中央决议案分别呈请上级党部与政府会同处理，不得私擅逮捕，以重系统。

△　浙江省政府因杭州《民国日报》登有反对省府取消二五减租文字，是日勒令该报停刊，并将其总编辑胡健中逮捕。同日，国民党浙江省执委会紧急会议议决弹劾浙江省政府，电请中央释放胡。杭记联会亦议决电请各地记联会援胡，并电胡慰问。

△　是日至5月1日“海圻”舰在长山、砣矶、大钦诸岛将张宗昌残部3000余人解除武装，并送日照等处遣散。张逃大连，于5月2日到达日本门司。

是月　蒋介石制定《国军对冯警备计划》及战斗序列。计划确定

为防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为此第二路第一军集中信阳、广水、花园间，第二军集中襄樊、邓县、新野间；第五路第八、九两军集中洛阳、郑州一带，第十军集中许昌、偃城间；第一路第三、四两军及第六师集中徐州、开封间；陈调元之总预备队暂在原地待命。

△　红四军在赣南兴国发布《兴国土地法》，较前《井冈山土地法》有原则改变，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

5　月

5月1日　　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电告各机关：该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自5月26日起，至6月1日止，全国一律下半旗，并臂缠黑纱，停止宴会、娱乐七日，以志哀悼。7日，国民政府复通电全国遵行。

△　国民政府电各院部会、各省市政府、各机关团体，补充“五三”、“五四”、“五九”三个国耻纪念日纪念办法，除业经公布之五条外，再补充五项，主要为照常工作不许放假，分别就地在内部举行一小时讲演，不许在外张贴标语等。

△　陈济棠召集蒋光鼐、陈章甫、陈策、李扬敬等讨论粤、桂军事，决定调蔡廷锴、陈维远部增防西江。

△　第四十六师范熙绩部一旅、第四十四师阮玄武部一旅同时开进泰安，次日阮部奉蒋介石命开回齐河。

△　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第十七次常会议决：呈请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并缉惩其负责人冯少山；议决统一上海学生团体，派张中枢、袁哲、陈贯吾、杨绍志、洪钧培、杨志豪、傅德培、田和卿、金

光楣九人为整理委员会委员。

△　广州总商会议决维持纸币办法：本月1日前纸银并用，1日后以纸币为本位。3日起粤中行限制兑现，凡商店需现款，须携商业牌照，按资本额兑1%，如无牌照每人限兑10元以下。

△　哈尔滨法亚银行开业。

5月2日　　中日宁、汉两案解决，外交部长王正廷、驻华日公使芳泽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　国民党中央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组织部组织条例；通过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组织案，决定令该市商人团体一律停止办公，派虞洽卿等34人为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委员；圈定邵华等为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邓哲熙等为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吴思豫等为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

△　蒋介石电冯玉祥询问病状，并仍希冯劝孙良诚回鲁。同日，邵力子亦电薛笃弼请劝鹿钟麟等回京。

△　贺耀组携蒋介石亲笔函抵潼关谒冯玉祥，促冯早日赴南京共商大计。3日，贺离潼回南京复命，薛笃弼、刘骥等同行。5日，贺谒蒋面交冯致蒋亲笔函，除陈述对党、政、军各方面意见外，主要为请蒋实践第一、二集团军一律待遇之诺言。6日，蒋接见薛、刘，令薛照常到部工作，令刘携其亲笔函赴沪劝鹿钟麟等回南京。

△　宋庆龄由苏启程回国，18日抵北平，即赴碧云寺祭孙中山灵。

△　第五路刘春荣部进驻曹县，前锋达河南考城。

5月3日　　国民政府令：派陈调元为接收胶济特派员，并代理山东省政府主席，关于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一切应行接收事宜均着负

责办理，凡驻在上项地区内各部队统归其指挥；派方振武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未到任前由吴醒亚代拆代行。

△　外交部长王正廷通告日使芳泽：接防山东由陈调元办理，15日以前完毕高密以西之接收，25日以前完毕青岛方面之接收；以吴思豫部宪兵负责维持济南、青岛及胶济路沿线治安，范熙绩部担任济南、张店、高密、潍县、青岛间防务，杨虎城部担任淄川、博山防务，刘珍年军警备烟台方面。

△　蒋介石代表邱文、廖武郎抵广州，携蒋令促陈济棠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职，并速出兵攻桂。

△　粤将领再电黄绍竑，限三日内切实表示服从中央，否则即对桂用兵；并电南京，请派“海容”、“应瑞”两舰赴粤加强海防。同日，蒋光鼐、陈章甫部纷纷西上。

△　滇军龙云部分三路入黔，助李燊攻周西成，并由黔攻桂。龙本人于8日由昆明启程赴前方督师。

△　桂系投降蒋军之第五十六师师长张义纯以克扣军饷被部下所逐，汉行营委任副师长刘和鼎为该师师长。

△　马文德部士兵一旅在湖北通山哗变，杀死团长一人，其他军官14人。

△　北平燕京通信社因登载三全大会反响之文章被勒令停刊，是日办理结束。

5月4日　　国民政府下令解除黄绍竑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职务，以伍廷飏兼任主席，吕焕炎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免湖北省政府委员张知本、张难先、胡宗铎、石瑛、陶钧等本兼各职；任命何成濬、方本仁、刘骥、方觉慧、李基鸿、黄昌谷、夏斗寅、孔庚、熊秉坤、贺国光、萧萱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并指

定何成濬为主席，何未到任前由方本仁代理，分别以方、李、刘、黄兼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任命夏斗寅为湖北省警备司令；撤销海军第四舰队编遣区主任委员名义，任命陈策为海军第四舰队司令。

△　蒋介石召见冯玉祥代表刘治洲，谓与冯始终合作，派陈调元代鲁主席系权宜之计，望孙良诚及二集团军离京人员回任，嘱刘电冯勿听外间谣言，并即来南京。

△　吴敬恒电黄绍竑，劝其早偕李宗仁、白崇禧释兵远游。

△　桂军连日东下，是日有船20余艘，由“驾江”、“静江”两舰率领，自梧州向肇庆进发。

△　崔士杰、吴思豫、吴希明与日方谷寿夫、西田、佐藤等商定接收济南办法。同日，停泊青岛日舰与中国军舰“肇和号”互致礼炮13响。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国军编遣委员会、各警备司令部、各卫戍司令部、内政部、军政部禁止死刑用斩。

△　孙总理迎榇奉安各指挥第一次会议议决，除何应钦任总指挥外，推谷正伦、刘纪文、姚琮担任行列指挥，孔祥熙担任事务指挥，赵戴文、席楚林担任典礼指挥，夏光宇担任陵墓事务指挥。

△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制定处置浙江省二五减租纠纷办法数项，训令该省党部遵行。6日，国民政府又令浙江省政府照中央委员会所提办法办理，即准该省暂停二五减租，而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已经实行又未发生纠纷的地方不得再将租额复旧；该省政府应在两年内做好各项准备，以便施行。

△　第一路总指挥刘峙奉蒋令解散鄂西独立第六旅，其部属资遣回籍，该旅旅长刘柏芳被迫登报声明取消旅长名义。

△　汉口行营讨论“水案”交涉问题，决定责成李芳通知日领先撤海军陆战队，中国方面亦暂停排日，以共谋正当解决。12日，驻汉日领允撤海军陆战队，但要求中国方面先停止反日运动。

△　任应岐部克复黄县后，又在广饶击溃张自诚部1000余人。同日，“海琛”舰在山东李口附近将张宗昌溃兵四百余人缴械。

△　张宗昌之伪司令张敬侯在北平被捕，供出党羽多名，次日北平当局又捕获袁继明、张德福、乔玉春、李芬、王端甸、庄质廷等数人。

5月5日　　李宗仁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自任南路总司令，斥蒋介石为党贼，窃据中央，非法私造三全大会，“毁党乱纪，植其帝制自为之基，解决济案私订秘密条件，居心卖国”，“任用外戚，贿赂公行，渎乱度支，饱盈欲壑，排除异己，残害同胞”，并称只驱除蒋氏一人，“现隶蒋部者倘自拔来归，亦当相与图功，引为同志”。

△　粤、桂军已在怀集开火，粤军有12列车由石围塘西开，陈济棠通令各军准备一切，并令肇庆之香翰屏先行戒严，限陈维远、蔡廷锴两部7日前赶到肇庆。6日，陈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职，宣布讨桂。

△　吴思豫率宪兵接防济南城，布告安民。城内军械库和新城兵工厂亦由接收军需委员厉尔康接收。同日，驻济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发表撤军日期，谓定于本月11、12、13三日先撤济南驻军，青岛沿线部队逐次撤至青岛，自本月14日起开始船舶运输，20日前后可以将山东派遣军全部撤完。

△　韩复榘电蒋介石，略谓：“迩者谣诼繁兴，市虎杯蛇，岌岌影响大局。究其由来，不过失意军人政客暗肆挑拨，并无丝毫事实。……冯公既绝对服从中央，钧座复极端信任冯公，即主张偶有不同，均系为国为民，绝无私意存乎其间，定能互相谅解，故复榘以为现在

时局全仗两方开诚布公，竭力维持。”

△　吉鸿昌师协助门致中部攻克宁夏城，门入城安民，并电告国民政府主张对回军进行收抚。

△　接防济南委员李庆施电国民政府与外交部，控交涉员崔士杰擅提税款四万多元，请求查办。

△　蒙藏委员会第十一次常会议决：一、关于西康贡噶喇嘛请求派兵防边案，准如所请，呈国府核办，并请对其加以奖励；二、章嘉呼图克图请设立南京、北平、太原、奉天、多伦、张家口、五台山、绥远八个办公处，准暂设南京、北平两处，余缓设。

△　杭州寿安路大火，三元路、新民路、崔家巷、铁线巷、里仁坊巷等八处俱付一炬，共焚商店188家，被灾住户113户，损失达600多万元。

5月6日　　国民党中央第八次常务会议决议：修正《中央政治会议条例》，在第三条后，增加“得设候补委员，但名额不得超过委员名额三分之一”；推定胡汉民、蒋介石等24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李文范、朱家骅等八人为候补委员；通过《侨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令南京市党部对不听该党部命令之下级党部进行整顿；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反对三全大会业经撤职查办，该省78县市联席会议又发诋毁三全大会通电，决定下令解散，严饬各报馆不得登载该会文电，在该省指委会未就职前由河南省政府执行。

△　陈调元抵泰安，与专程赴泰之崔士杰、西田等略商接防问题。7日，陈偕范熙绩、吕秀文并卫队两营由泰安抵济南。

△　吴敬恒等26人联衔电请中央释放李济深，是日吴谒蒋介石当面陈请，蒋意已动。

△　何键以湖南全省司令名义下令将慈庸桑清乡司令周朝武撤职

查办，另委张义卿继任，并着张收编周部。次日，蒋介石电令派谭道源师入湘解散周部，并令何派队会同办理，何即派张部和李韫珩、李云杰两旅分三路进行堵截。

5月7日　　蒋介石发表《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政策》一文，声称："现在中国国民党已形成为中国唯一之中心势力，而国民政府之组织即由此中心势力所构成"，要求所有国民一致拥护此中心势力，所有国民党员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尤应一致拥护和平统一之政策，政府当局以及军事领袖和衷共济，"应就现在之中心势力谋所以扩大之，巩固之，不宜自外此中心势力，尤不宜从中分化，自损团结，致取败亡"。

△　粤军徐景唐旧部李务滋、云瀛桥等附桂，扣留师长邓彦华，并派队向广州移动，8日与粤军战于广九路。

△　湘军总预备队罗藩瀛部由衡阳向祁阳前进。同日，刘建绪部由东安、永州出发，8日抵水澜村，9、10、11日先后占领黄沙河、全州、山枣。桂军退向兴安，双方在越城岭发生激战。

△　唐生智向何成濬表示有意入南京从事政治工作，愿将第五军交还中央直接统制，何即将唐意电蒋介石报告。

△　刘文辉电蒋介石辞四川省主席职务。

△　悍匪刘桂堂部占领山东高苑县城，并劫掠附近各村，7日，又围攻寿光县城，城内驻军与刘联合，共同进行劫掠。23日，该县难民至省政府请愿派军往剿。

△　上海学生请愿团代表多人高呼改组国民党、打倒市党部等口号，到学生团体整理委员会将整委洪钧培等殴伤，并夺去印信文件，复结队至市党部请愿，被公安局驱散。

5月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八〇次会议决议：推蒋介石

为中政会主席；以后各处保荐简任、荐任人员，必须先将其籍贯、年龄、履历详细报告，以凭中央核定；以后各省兼厅长之省委必须于就职前向国府报到接受任命；《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施行期再延长六个月。

△　蒋介石电令何键以一部对桂林之敌，以主力向平乐前进，务于18日以前到达平乐后直趋梧州，并令范石生师改向广宁、四会前进。何接电后请蒋准照原计划以一、二纵队取桂林，以三、四纵队取平乐，占领平乐后再令范师经贺县趋广宁。

△　何键令先遣司令覃寿乔部出连山桂岭直攻贺县。同日，吴尚部攻占灌阳；陈光中部右翼抵梅溪口，左翼到达白沙以南；范石生、阎仲儒部在龙虎关与桂军吕焕炎部发生激战，于10日将该关占领。

△　粤舰队副司令舒宗鎏等率舰附桂，令“飞鹰”、“中山”、“海虎”、“江大”、“江汉”、“自由”、“宝璧”等舰集中南石头。9日，粤军炮队、飞机队轰炸附桂各舰，各舰初在南石头树降旗，后驶入省河泊沙面，改树戒严旗。因周围有外舰，粤军不便攻击，陈策至沙面向领团交涉解除各舰武装办法，并与各舰商投降条件。10日，陈策与“叛舰”达成协议，各舰均已服从，舒领款10万由美领保护安全离粤。陈收复“中山”、“飞鹰”、“海虎”、“宝璧”、“自由”、“澄江”六舰，11、12两日又收复“江大”、“江汉”、“江巩”、“江固”四舰。

△　西江桂军由肇庆退德庆，10日退回梧州。

△　福建暂编第一师师长张贞部奉令援粤讨桂，分三支队向粤边进发，14日先遣队抵粤之大埔。

△　外交部国际司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照会，送达英、法、美、荷、挪、巴西六国公使。

△　国民政府下令免去湖北各部队编遣特派员胡宗铎职务，任命

刘峙为湖北各部队编遣特派员。

5月9日　　国民党中央第九次常务会议决议：北平特别市和山东省党务指委一律撤职，山东省代表大会所产生之执监委候选人宣布无效，另派商震、罗家伦等七人为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委，何思源、刘涟漪、张金鉴、冷刚锋、阎实甫等五人为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在汉口设一中央直辖之报纸，将以前《中央日报》机件收回，交曾集熙负责接收，筹备出版。

△　蒋介石委任贺国光为武汉行营主任。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蔡元培、王宠惠、古应芬、张静江、林森为常委。

△　何键令范石生师以主力会同吴尚师攻平乐，周斓、刘建绪两师按预定计划攻桂林，务于20日以前将上述两地占领。

△　崔士杰与日方将已接收济南武器、房产等有关文件签字。第四十六师开始接防胶县、高密、张店、青州（益都）、坊子、普集、周村、潍县。

△　褚玉璞与刘珍年达成协议，褚投降后赴朝鲜，其部下编入刘军。

△　月初，河南商城南部丁家埠、李家集民团和南溪群众在中共领导下相继举行起义，是日起义武装100余人集中南溪，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以周维炯为师长，徐其虚为党代表。

△　上海军警当局为防群众借“五九”国耻纪念进行暴动，实行特别戒严。同日，上海临时法院应市政府之请查封大陆、华南、建华等三所大学，宣称该校等有藉学校宣传共产之嫌疑。11日，市党部常会议决函请军警机关通缉大陆大学护校委员李鹏、韩华凯、吴铁锋等九人。

5月10日　蔡元培、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分电李宗仁，责李通电组织“护党救国军”，劝其释兵远游。

△　冯玉祥自潼关电蒋介石，谓“谣言纷起，何足为信，所幸彼此均不为所愚”，甚盼邵力子常川驻豫，藉免流言。

△　吴思豫部宪兵接防济南商埠。陈调元宴安满等日军军官送行，英、美、德、日各领亦在座。11日，驻济日军开始撤离，分三列车向青岛输送，12日安满及司令部人员均离济赴青。

△　程汝怀、李石樵、石毓灵、李宜煊通电方本仁、贺国光、孔庚、何竞武辟谣，谓与胡宗铎、陶钧未通音问，表示服从中央，拥护蒋介石。

△　蒋介石任命王金钰为第四十七师副师长，暂代师长职权，郭宗华为第一百三十九旅旅长，上官云相为第一百四十一旅旅长，原师长李宝璋、旅长马葆珩、段承泽调南京军事参议院。

△　刘珍年攻占福山，俘张宗昌残部4000余名，获枪3000余支，迫击炮数门。

△　浙江省农民代表傅云、周爽秋等由杭州抵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恢复二五减租，以维护农民利益。16日，南京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通电声援浙江省农民恢复二五减租的要求。

5月11日　徐景唐部李务滋、云瀛桥两旅进占石龙，威胁广州，李并令王道团向虎门前进，陈济棠急调蒋光鼐部蔡廷锴旅沿广九路抵御。12日，李旅进至石滩以下之南岗站，蔡旅亦抵新塘。13日，蔡旅在空军配合下攻石龙，李旅退樟木头。

△　由西江退走之桂军复入肇庆。12日，桂军黄旭初部3000人由广利（在肇庆、三水间）渡江东下，受到粤军香翰屏部阻击，仍退回广利。

△　湘军吴尚部抵黄田铺。13日，戴斗垣、许克祥两旅分别占领灵川、富川。

△　外交部为解决英人侵占江心坡案，特组滇缅界委员会先行调查，任徐东藩为该会委员。

△　何成濬在北平招待报界，宣称代表中央声明对任何方面不致变更和平，各集团军队非奉中央命令，不得自行调动，至讨伐桂系亦是万不得已办法，近纵有军队违反编遣会议决案，中央亦处以宽大，决不临之以兵，期以政治手段使之解决，望各记者勿信谣诼。

5月12日　孙科夫妇偕子女及戴恩赛夫妇、陈君朴、梁寒操、胡天浚等离南京北上迎榇。14日抵北平，并与吴铁城、郑洪年等同往碧云寺谒孙中山灵。

△　陈济棠赴北江督师。

△　蒋百里奉蒋介石令至北平接洽时局，第五路军官纷纷往访。

△　范熙绩布告令胶济路沿线杂牌军退50里外候编。范部军队有四列车到青州，杂军窦宝章部被迫让出青州城。同日，杨虎城部开进博山、淄川等地。14日，范将师部移设周村，吴思豫部宪兵一营开往潍县接防。

△　海拉尔当局宣布戒严，并在满洲里车站和蒙边交通要道检查行旅，以防阿明泰指挥之蒙古青年党暴动。

△　鼓浪屿华人议事会呈请外交部收回鼓浪屿公共租界，改为自治区，外交部令厦交涉员与驻厦法领交涉。

△　内蒙六盟王公在嵩祝寺开谈话会，表示赞成三民主义和民族自决，请政府保持内蒙习惯，不变更原有政教组织。

△　天津美商乾昌地毯厂工人罢工，要求恢复被开除之两名工友的工作，并补发“五一”、“五三”、“五四”等纪念日工资。塘沽永利碱厂工人为反对厂方开革工友而接收工厂，职员全体赴津。

△　安徽悍匪朱富润余众50余焚劫怀宁县属之高河埠镇，劫去现款五万元左右，掠走30余人。

5月13日　　蒋介石复冯玉祥10日电，略称：“前此一、二两集团军发饷未能一致，纯为环境关系，非有畛域存在”；“比来谣诼纷纭，影响大局，诚宜谋一根本止息之法”；“综合今日造谣致疑于兄者不外三点：（一）谓兄购买军械，积储粮秣，而谋割据西北，反抗中央；（二）谓兄缩短防地，图攻燕晋，而谋勾结苏俄，另设政府；（三）谓兄拒绝来京，联络桂系，而谋进攻武汉，别创新局”；“吾人对症发药，惟有望兄供职中央，而不逗留于西北一隅，则万谣尽息，人心亦定。”同日，蒋电韩复榘，称其部下在漳河、黄河两桥埋布炸药，驻兵武胜关，在该处敷设地雷，有拆卸武胜关以北、归德以西各桥梁之准备以及扣车等情，命即查复。

△　桂军黄旭初部乘兵舰并民船数十艘由肇庆东下攻三水，受到粤军香翰屏和陈策部截击，桂军后撤，兵舰一艘被击沉，“鸳江”、“靖江”两舰被掳，损失民船20多只、官兵2000余人。

△　何键总指挥部由衡阳移永州，并再电劝李宗仁、白崇禧下野止兵。

△　国民政府下令改组黑龙江省政府，任命刘廷选、高家骥、潘景武、马景桂、窦联芳、袁庆恩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刘、高、潘、马分别兼民政、教育、建设、农矿各厅厅长，原任省府委员孙润庠、李彭年及各厅厅长免职。任命徐谟兼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原任金问泗免职；任命陶履谦为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原任朱兆莘免职。

△　刘珍年电蒋介石，谓张、褚余孽窜伏胶东各县者尚不在少

数，招远一带已啸聚两千余人，奸淫掳掠，名为无极道会，实则逆军余孽，“除派队设法搜索并相机剿办外，所有胶东善后事宜究应如何办理之处，伏祈迅示机宜”。

△　国民政府据国民党三藩市总支部电称，海外国家主义派要犯赵鼎荣、陈魁梧已潜行回国，意图谋乱，本日训令直辖各机关饬所属一体严缉。

△　红四军二三千人入粤，本日至14日先后攻克蕉岭、平远等地。

5月14日　冯玉祥任命韩复榘为郑州及信阳警备司令，孙良诚为开封及兰封警备司令。又令驻武胜关、信阳之张允荣部开往泌阳、南阳；驻遂平、驻马店一带军队开往洛阳集中。17日，冯并密电平、津各代表及所派主要人员相机避往安全地带。

△　粤军陈维远旅占领博罗、三多祝。徐景唐部云瀛桥旅到达河源。

△　原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杨虎城部改为中央军新编陆军第十一师。

△　国民政府任命贺耀组代理国民政府参军长。

△　盘据山东黄县之张宗昌残部张升九部六七千人被任应岐师缴械，张被击毙。

△　天津市学联、妇协、商协和总工会等团体代表谒市长崔廷献，请从缓取缔对日运动。15日，各代表又赴北平请愿。

5月15日　豫南冯军韩复榘部纷纷后撤，张允荣第二十九师临行将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炸毁，此外东双河、漳河铁桥均被冯军破坏。同日，孙良诚部扣留陇海路客车准备运兵西行。

△　冯玉祥致电驳复蒋介石13日电，举不能赴京理由六端，指责蒋排斥异己，穷兵黩武，并表示如蒋于“奉安后拟通电谢职”，则“愿追随骥尾，携手同去”。同日，孙良诚、韩复榘等亦通电称：“自入春以来，谣言纷起，经时未久，战端竟开”；“良诚辞职去鲁，固因病体难支，而力避争端，亦其主因也。私幸自来豫省，庶可相安，不意大军压境，复又相逼”；“复榘待罪河南，居心惴惴……倘亦不见谅于人，则惟有引咎离豫，退避贤路，以示不争。”

△　韩复榘派代表唐佛哉至南京见蒋介石，报告豫省军队驻防情形，声明无军事行动，韩决惟中央之命是从。

△　刘建绪、范石生部占领桂林、平乐，桂军向柳州方面退却。同日，张其雄旅到达全州。

△　陈铭枢由香港回广州主持省政。

△　粤军蔡廷锴旅占领惠州。同日，陈济棠新委之第五十八师副师长文鸿恩乘“广庚”舰前往海丰收抚邓彦华部吴、何两团。

△　龙云部滇军与周西成部黔军开战，龙部17日攻普安，19日占领兴义（黄草坝），周部节节败退。

△　程汝怀、李石樵、尹承纲、石毓灵、李宜煊联名电胡宗铎、陶钧、夏威，望即放洋，勿久留香港，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　吴思豫偕崔士杰率宪兵第二团赴青岛接防。同日，驻山东日军开始归国，630余人乘“吉田丸”离青岛赴门司。

△　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组山东及安徽省政府，以陈调元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以方振武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在蒙藏行政制度未确定前，所有名称、官职暂准照旧；新疆各区行政长官暂准存留。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山东省政府、青岛市政府查禁青岛

市工会整委会印发之《工人之路》。

△　波兰代表魏登涛抵南京，谒王正廷商订约事。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常会议决：呈请中央饬立法院及司法院撤销大赦案；呈请中央宣布中日交涉真相，并将周龙光、崔士杰撤职查办。

△　东北政委会第三十五次常会据辽宁省政府呈，议决将兴京县改名为新宾县，又准将金川设治局改县。

△　红军彭德怀部2000余人攻克桂东。

5月16日　冯军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指责蒋介石外交上卖国、指派三全大会代表为不合法及用人不当等，促其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统50万大军与蒋周旋。

△　蒋介石电冯玉祥，质问原驻武胜关、信阳之冯军撤退及炸毁隧道、桥梁事，要冯迅速查明，饬令恢复原状。同日，蒋军刘峙部进驻武胜关、新店一带。

△　孙良诚部撤离商丘，炸毁杨集路桥及马牧集至刘堤圈间大小桥梁各二座，并拆毁枕木、电杆等。

△　国民党中央第十三次常务会议决议：前派辽宁、吉林、热河三省党务指委及黑龙江、哈尔滨两处党务特派员一律撤回。另派张学良、王君培、刘不同、彭志云、马亮、张铎、赵连丰为辽宁省党务指委；张心洁、王秉谦、张作相、王诚、张鼐任、顾耕野、单成仪为吉林省党务指委；李元箸、谭文彬、张启明、于明洲、梁中权为热河省党务指委；吕醒夫、王宪章、万福麟、杨致焕、田见龙、王秉钧、刘存忠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委；张冲、韩圣波、张大同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任周启刚、黄右公、陈耀垣、李绮庵、陈安仁、郑占南、吴公

义、萧吉珊、吕渭生为侨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商人团体整委会代行旧日上海商民协会、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南市商会等之职权。

△　胶济接防委员长崔士杰与日方移交委员谷寿夫在青岛签订济南、胶济路沿线及青岛日军驻区内兵器物件移交协定。同日，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在青岛设宴招待各界，并致词表示亲善。

△　湘军许克祥旅占领贺县、八步。

△　“讨逆”第二总队总指挥张贞率指挥部全体人员由漳州出发赴前线，所部第一支队张汝劻部是日与云瀛桥旅战于粤东高陂、大麻一带。

5月17日　国民政府令冯玉祥称，孙良诚、韩复榘15日通电辞意背离，其毁路、撤兵数端均需严切指正，仰就近查明办理，并分行各师、旅嗣后应遵照中央编遣委员会决议，非奉中央命令任何事故不得调动军旅。

△　蒋介石电韩复榘斥责所部破坏漳河铁桥、武胜关隧道，扣留陇海西行客车，称当此总理奉安期间，出此举动，殊出意外，希“速令所部迅即放还车辆，恢复陇海唯一交通路线，勿使公私断绝”。20日，韩电总部参军长贺耀组，谓接蒋17日电，“关于交通一节，实有难言之隐”，“嗣后力求和平，究应如何妥为进行，务请指示方略，俾获遵循”。27日，贺复电请韩“力劝焕公（冯玉祥）勒马悬崖，避位远行”，并“希速与汉章、金凯诸兄集结所部听候命令”。

△　冯军继续炸桥扣车，孙良诚部炸毁马牧集至商丘间陇海路桥28座；韩复榘部全部撤离信阳，炸毁信阳以北长台关铁桥，带走车头、车厢300多辆；庞炳勋部亦撤离安阳，炸毁洹水铁桥第三号，并将沿路机车车辆带走。

△　白崇禧率桂军吕焕炎、王应榆、黄旭初部进至清远、芦苞一

带；粤军第一、二旅在李扬敬、香翰屏指挥下步步扼守，是日起双方激战颇烈，粤海军开芦苞方面加入战斗。18日，陈济棠下令对桂军总攻击。19日，粤军香翰屏部沿广三路进攻，陈章甫、李扬敬部担任芦苞方面，海军“中山”、“江大”等舰由马口炮击敌军，戴戟旅及教导队郭思演团至军田增援。21日，粤军在西北江获全胜，先后收复芦苞、白泥、大塘、清远等地，桂军向四会溃退，损失数千人，王应榆被俘，黄旭初受伤，粤军伤亡也众。

△　何键令各纵队分途追击桂军，并以一部协同粤军夹击梧州，着周斓、刘建绪两师暂在桂林整理待命，周师向永宁、刘师向永福方面严密警戒；吴尚师暂在平乐整理待命，向修仁方面严密警戒，驻平乐范石生师推进至昭平后，以一部向蒙山警戒，其余协同在贺县之许克祥旅向梧州搜索前进。19日，复电令各纵队司令：为断敌归路，歼灭敌人，拟即占领梧州。第三、四两纵队应由现地出发进取梧州，许旅务由贺县取捷径向梧州前进；第二纵队应即进驻平乐待命，并以一部向修仁、蒙山方面警戒；第一纵队在桂林维持治安，并以一部向永宁、永福方面警戒，一部维持全州至桂林交通。

△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反小组”互贴标语进行攻击，被省政府各捕去二人，省府布告谓有关党务纠纷听中央解决，禁止贴标语、禁止各报登载此事。同日，省党部新办之《中山日报》印刷部被捣毁。

△　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分别令浙江省党部、省政府，谓关于取消二五减租及因此引起之杭州《民国日报》案，中央对该省政府与省党部过去之错误已一一加以妥慎之纠正，嗣后省政府与省党部应互相爱护，互相砥砺，互相尊重其职权。省政府如有对于全省兴废关涉本党政纲政策事宜，应先呈明中央，并不得直接干涉党报；省党部如遇与政府施政见解有不合时亦应呈明中央，静候解决，不得直接以文字攻击，转滋纠纷。

△　汉口交涉员李芳以“水案”觉书送至日领馆，内容大致为日本

撤驻汉水兵，中国同时劝阻反日运动。18日，驻汉日领至交署表示接受解决“水案”建议，待双方政府训示到后即行签字。

△　国民党江苏省执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议决：建议中央确定训政时期省、县党部职权；呈请中央撤惩侵吞公款、媚外辱国之崔士杰，并撤惩屡用非人之外长王正廷。

△　福州商帮为腹地税问题罢运，并向福建省政府及财署请愿。

5月18日　蒋介石约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叶楚伧、陈仪、杨杰等会商对冯玉祥处置办法。同日，蒋、胡、谭（延闿）、戴、叶、陈（果夫）等联衔电邀留沪中委于右任、吴敬恒、蔡元培、杨树庄、李石曾、丁惟汾、张群赴京商时局。

△　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山东、安徽省政府。任命陈调元、冷遹、袁家普、何思源、孔繁霨、朱熙、陈名豫、陈鸾书、于恩波、崔士杰、阮肇昌、阎容德、刘珍年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并指定陈调元为主席，冷、袁、何、孔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原山东省府委员孙良诚等免职。任命方振武、吴醒亚、袁励宸、程天放、李范一、吴忠信、郭子清、方培良、阮玄武、苏宗辙、李德膏、孙传瑗、江炜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并指定方振武为主席，吴、袁、程、李（范一）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任命李芳为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原任甘介侯准予辞职。

△　蒋介石电委贺国光为“讨逆”第一纵队司令，贺本日乘轮赴沙市就任。

△　文鸿恩率原邓彦华部由海丰进攻河源。20日，蔡廷锴旅攻占河源，获械2000，徐景唐军团长王道受伤，余部由李务滋率领走连平。

△　张贞抵永定，所部陈国辉、林寿国旅及卢兴邦师已到大埔。

同日，“楚泰”、“江元”两舰由厦开粤助战。张部19日占领梅县，徐景唐部退兴宁。

△　红四军进入闽西汀州地区，赣军李文彬旅尾追。福建省政府决定电令卢兴邦旅暂缓援粤，以对付红军。

5月19日　李石曾通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呼吁政治解决时局纠纷。

△　黄河以北冯军全部撤至南岸，集中荥泽（今属荥阳）、郑州等地，并拆毁黄河铁桥第五十四和第五十七孔。

△　蒋介石宴程汝怀、李石樵、李明瑞、杨腾辉等，并令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南下援粤。李部于21日由上海分乘四轮南下。

△　本日起北平各报开始对冯军称“逆贼”，军警当局检查新闻甚严，邮局信检室奉令扣报纸传单达23麻袋。

△　吴思豫部宪兵第二团与驻青日军第六旅团按预定程序交接青岛防务，市内警察队、保安队及胶济路护路队悉听吴指挥，共同维持地方治安。

△　任应岐师奉命回防德州，所遗龙口、掖县、昌邑等地防务仍由刘珍年接替，本日任、刘在蓬莱会商善后事宜。

5月20日　蒋介石复冯玉祥15日电，令其严厉处分刘郁芬等，即日恢复陇海、平汉两路交通，并指定地点约期晤谈。同日，蒋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西北将领通电与粤、桂军事之关系，称：初西北方面各将领以为桂军10日可下广州，故李宗仁为南路总司令，冯为北路总司令，及期未能占领。彼等又以为15日准可下，故约定双方发表宣言；惟李系护党讨贼军南路总司令，冯系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其名义不同，也许是各有心思与主张。并宣称中央仍以大度宽容、和平统一的宗旨进行，自信有力量可以平定一切叛逆。

△　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由谭延闿报告冯军毁路炸桥及刘郁芬等通电情形后，临时动议决定本星期内召集全体执监会议，会商应付时局方针；并决议令沪各工会概归沪特别市党部指挥训练，受市政府监督管理。

△　刘镇华奉蒋介石令任“讨逆”第十一路总指挥，受阎锡山节制。同日，刘密电冯玉祥劝其出洋。

△　刘峙部抵信阳。

△　铁道部令裁撤陇秦豫海铁路督办（该路督办为冯系刘骥），并函比公司代表郎柏尔与荷兰银公司，称5月20日起无论何人以该路督办名义向贵公司订立契约关系文件均属无效。同日，铁道部又电平汉路局停止支付第二集团军协饷及军事附加捐。

△　何键由永州赴桂林视察，行前电周斓、刘建绪、吴尚、罗藩瀛等齐集桂林。

△　中英在沪会谈各悬案，外交部长王正廷、欧美司长徐谟、英国公使蓝普森、参赞戴光明等列席，江心坡、滇缅划界、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临时法院诸问题均已提出并初步交换意见。

△　所有驻鲁日军一律撤离山东归国。陈调元、崔士杰分别通电报告接防完毕，地方安谧。

5月21日　　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陈果夫发出对时局之通电，略谓：“此次西北叛将之动乱，托词于山东接防。夫山东为中央所辖之省区，孙良诚为中央任命之守吏，不遵令接防之不足，复自由离职；自由离职之不足，复席卷款械粮秣以西。……而刘郁芬等又巧避叛变之名，集矢主席，通电张皇，等于狂呓，举刃相向”，表示誓当随蒋介石之后“削除党国之奸顽，力振纪纲，义无反顾”。

△　唐生智应蒋介石之邀离北平赴南京。同日，蒋电令驻宣化一带之王金钰之第四十七师暂归唐指挥。

△　阎军参谋长朱绶光前奉阎命赴南京，谒蒋介石等商议时局，本日回北平，旋即返晋复命。

△　国民政府电开封河南民众反对扣留赈粮运动大会，称："中央眷念民生，恻焉在抱，早经遣派大员专办灾区赈务……集款已多，移粟亦伙，方冀西北灾黎从此可免流亡，不图中央意旨反为地方阻隔，现金则截购军械，赈米则移作军粮，巨万赈款，用途不明。"

△　国民政府令改派朱培德为总理奉安总指挥，任命张治中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原任何应钦免职。

△　北平市军事当局搜查市政府，抓走冯派官员五人，并拆除无线电设备。市长何其巩电南京辞职。

△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第十四次会议议决：请中央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解决时局问题，给冯玉祥、孙良诚、韩复榘等以永远开除党籍处分，并明令讨伐。24日，江苏省党部、省政府分别议决呈请中央下令讨伐冯玉祥，并永远开除韩复榘、孙良诚等党籍。

△　前第二集团军官代表团通电列举冯玉祥五大罪状，请中央大张挞伐，并谓"同人等即与冯逆脱离关系，为国锄奸，义无反顾"。

△　张贞及其指挥部由大埔移驻三河镇，所部第三支队本日占领距潮安五里之竹篙山，第一、二支队23日占领兴宁，向五华推进。

△　汉口交涉员李芳电王正廷报告水杏林案解决情形，其要点为日本定31日撤兵，抚恤家属6300元，尸还交署并道歉，复工问题尚未解决。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上海特别市政府："查上海泰东书局印

行之《暴风雨的前夜》一书，纯系煽惑农工、宣传暴动之反动刊物”，饬严切检查，务期禁绝。

5月22日　　阎锡山电冯玉祥，劝冯“解除兵柄，还之中央，同适异国”，并称“陪兄远游，去则同去，来则同来”，表示“愿负疏解之责”，“如蒙赞许，弟当急电中央停发命令”。

△　何应钦乘飞机由武汉抵南京，谒蒋介石报告军事。同日，蒋宴吴敬恒、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王宠惠、陈果夫、叶楚伧、何应钦、邵力子、赵戴文、宋子文等，席间商时局，决定对冯方策，拟提出于次日之中央常务会议。何应钦23日返汉筹划对冯军事。

△　韩复榘、石友三受蒋介石策动叛冯，通电宣称“拥护中央，待罪洛阳，静候命令”。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八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监察院弹劾法》；特任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陈绍宽、钮永建、张之江、熊式辉等11人为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

△　孙中山遗体在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堂内移殓铜棺，参加奉移的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迎榇专员林森、郑洪年、吴铁城等。

△　粤军香翰屏、余汉谋旅向四会进发，桂军不战退广宁，粤军当晚进驻四会，继续向广宁追击。

△　哈尔滨民众集会反对日人修筑敦化会宁线。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令查禁《先声周刊》、《快乐之神》、《中国工人》、《民众呼声》、《创造月刊》等多种书刊。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决议：冯玉祥永远开除党籍，并革除中央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职；所有下

讨伐令以及关于军事与紧急之政治处置均由国民政府全权办理；对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惩戒问题决定由国府先行免职，待调查后再分别处理；派苗培成视察指导河北、天津、北平、山东各省市党务；以陈耀垣为侨务委员会主任，周启刚、萧吉珊为副主任；奉安公祭事宜由叶楚伧、陈果夫负责主持；通过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县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及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等。

△　蒋介石电韩复榘、石友三，声称冯玉祥叛变，“自陷反革命之罪恶”，“兄等仗义革命，当不再为个人之工具”，“本日已决议开除冯玉祥个人党籍，明令通缉，至其余诸将领为其威胁者概不与也。如有深明大义反正效顺者，中央必倚为长城，恃为心腹”。

△　韩复榘两次电蒋介石，声明“凡以捏造榘之名义破坏和平者，事前概未与闻”，并谓：“业于二十二日将马（鸿逵）、庞（炳勋）、石（友三）、田（金凯）各师约集十万余人，集中洛阳，敬候命令，除通电陈诉各项情节外，伏乞以仁慈俯念十万生灵无幸待毙，指示方略，俾获遵循。”

△　张学良通电指责刘郁芬等“对主席则肆意诋媒，对党国则形同背叛”，“学良等效忠党国，未敢后人，拥护中央，尤为素志，其有甘冒不韪自绝于人者，定当仗义执言，与众共弃”。

△　粤军蒋光鼐部蔡廷锴、陈维远两旅由东江撤回广州休整。粤海军“永绩”、“永健”、“海容”等舰抵汕头海面，限汕徐景唐军25日12时以前撤尽。

△　蒋介石任命李万林为“讨逆别动队”司令。

△　国民政府颁布《民法总则》，定自本年10月10日起开始施行。

△　国民政府令：任命程汝怀、孔庚、何竞武为湖北各部队编遣

特派员办事处委员。

△　北平本日起公祭孙中山，宋庆龄伴灵，商震、刘镇华、李品仙、张继等致祭。同日，举行社稷坛改中山堂落成典礼，商震、林森、孙科之代表梁寒操等500余人参加。

△　国民政府参军、护灵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由南京北上，25日抵平。又沪宁、沪杭两路总理奉安宣传列车是日由杭州开出。

△　日本民党前领袖犬养毅、头山满两人以孙中山友人之资格来华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是日到达上海，随行者有宫崎龙介等20余人，上海市长张群代表蒋介石、胡汉民等前往码头欢迎，并设宴招待。

△　红四军攻克龙岩城，击溃守敌陈国辉部两个营，当日撤出，向永定进军，25日占领永定城。26日，由永定向粤境大埔进军。

5月24日　　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冯玉祥，称："冯玉祥背叛党国，逆迹已著，无可再予宽容。冯玉祥应即褫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文武机关一体协缉拿办，以安党国而彰法纪。"

△　蒋介石发表告第二集团将士文，略称："今冯玉祥已甘为叛党之军阀……诸将士不甘以人格资冯氏去贩卖，幸速图之"，"不欲以性命供冯氏之孤注，更宜早图之"；"愿诸将士凛然于公私之界，顺逆之辨，反正效顺……中央必倚诸将士为干城。"同日，蒋又复韩复榘23日电，略谓："吾兄服从中央，拥护统一……无任感慰，除呈请政府特加嘉奖外，凡驻在陕、豫各部队概归兄指挥，并任命石友三为讨逆第十三路总指挥，希即转令遵行。"

△　冯玉祥复蒋介石20日电，略谓："大局崩坏至此，和平统一，徒成虚语，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明达如公，当知症结所在"；"玉祥腿病加剧，步履维艰……敢请由山西来陕州一谈，藉慰饥渴，并申下

情，不识可否？”

△　孙良诚部与韩复榘部是日起在郑州、洛阳间发生激战。25日，韩电何成濬，谓“势成骑虎，与叛逆决难并存”，请速派队援助。何当即电南京报告，并于28日电韩称，“已呈主席迅饬各部分头进援”。

△　何应钦、刘峙、朱绍良、张发奎、贺国光、顾祝同、鲁涤平、谭道源等60余将领自汉电请蒋介石等讨冯，声称：“冯逆玉祥勾结桂逆，托庇赤俄，蔑视国家法纪，违背中央命令，擅调军队，破坏交通，叛迹已彰……应请中央迅颁明令，用张挞伐。”

△　陈铭枢出席省务会议，并发表《告全粤父老书》，说明反桂经过，主张集权中央，建设廉洁法制政府。同日，陈济棠在粤军总部召集两广善后会议，陈铭枢、俞作柏及粤军将领共20余人出席，议决收拾桂系残敌计划，拟以俞统帅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合香翰屏旅追击桂敌，并由粤方协助俞回桂主持军政；为防止桂军与警卫队随白崇禧逃走，决用俞、李、杨三人名义印就告广西民众传单，速派飞机散发。

△　白崇禧率卫队回梧，海军陈策部占领肇庆、禄步，桂军退悦城。次日，粤军总部令香翰屏派队进驻肇庆等地。26日，粤军入悦城，桂军退封川。

△　何键在桂林召集湘军将领会商军事，决以一部驻桂林、平乐，肃清附近残敌，以主力进攻梧州。同日下令：着第四纵队司令范石生即率所部经贺县、官潭攻梧，并派先遣司令覃寿乔率所部由荔浦经蒙山、蒙江抄袭梧之后方；着第三纵队司令吴尚部暂时位置于二塘、贺县间，继第四纵队之后向梧前进；着第二纵队司令刘建绪进驻平乐，向修仁、马江方面严密警戒；着第一纵队司令周斓以一部肃清义宁等处后向广南方面警戒，并维持桂林秩序及至灵川之联络线；着

总预备队分驻兴安、大溶江、小溶江、全州、永州等地，担任后方联络与维护交通等任务。28日，再电各纵队限期向指定地点攻击前进，并注意由广东退怀集之桂军。

△　徐景唐军由汕头开始撤退。张贞部与徐部在潮安附近之意溪开战，26日，张部进占潮安。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陈济棠、陈铭枢等粤军将士；特任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朱培德为参谋本部代理参谋总长。

△　是日至28日，程汝怀、石毓灵、尹承纲、李石樵、李宜煊五师在湖北沙市、黄州、宜都等地，分别被朱绍良、张发奎、鲁涤平、谭道源部改编。

△　青岛四方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因厂方无故开除工人而罢工，经社会科调停始复工，厂方与工人订立协定：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已开除工人改为自动辞职，罢工时间照支薪水。

5月25日　　蒋介石电冯玉祥，指责冯“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不惜自堕其革命之历史与人格，并称“如愿涉历海外，增益新知，或优游休养，重辟新路”，当代陈于中央，成全其志愿。所部将士原为国家之军队，中央必能爱护备至，一视同仁。

△　冯玉祥复阎锡山22日电，略谓：“既承指示，极愿即日下野，或息影山中，或翔游海外，则介公之怒可以稍息，我弟之苦心亦可稍慰……然回首前尘，固不胜其枨触万端矣。此后办法，伫候明教。”26日，阎复电再次表示愿与冯同游海外，促冯“一面通电宣布即日下野，一面偕同嫂夫人命驾来晋，以便早日放洋”。

△　韩复榘在洛阳就中央新委西北军总指挥职，并电北平当局，谓：“冯此次不听忠言，破坏统一，殊深愤恨，已将洛阳工厂军械等件取出东运，决即到郑州收束军事，静候政府命令。”

△　石友三电蒋介石表示服从中央，“宣劳党国，以报殊恩”。同日，石之秘书刘电舟抵衡阳，携有致钱大钧电，谓“弟与韩总指挥复榘已联名通电，一致拥护中央，各在原防待命，听候蒋总司令指示”，请转禀蒋派员面商一切。

△　李明瑞率部抵粤，分谒陈铭枢、陈济棠。27日，二陈设宴招待李师校官以上军官百余人，并开会通过由俞作柏统帅李、杨（腾辉）两部，会同香翰屏旅追击桂军计划。

△　北平天安门举行孙中山送榇大会，由总工会张寅卿任总指挥，到党、政、军及各团体代表二万余人。

△　国民政府改组禁烟委员会，免冯玉祥等委员职务，任命阎锡山、何应钦、陈绍宽、钮永建、张之江、李登辉、钟可托、王维藩、罗运炎、田雄飞为禁烟委员会委员，指定张之江为委员长，钮永建为副委员长。

△　蒋介石、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电邀前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来京。6月7日，蒋聘樊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

△　蒋介石电刘湘、刘文辉制止张汝骥率部扰云南。

△　国民政府训令山东省政府查禁《民权导报》。

△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结束，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本日正式成立，虞洽卿、叶惠钧、王延松、王晓籁、徐寄廎、顾馨一、秦润卿七人当选为常委，陈布雷被推为秘书。

5月26日　孙中山灵榇由北平南移，商震任总指挥，宋庆龄、孙科、何成濬、林森、郑洪年、吴铁城等参加。凌晨1时由碧云寺起灵，沿途送殡群众达30万人。下午3时15分，商震等将灵榇扶入灵车，至下午5时开行，鸣炮108响。前引列车先于中午12时开出，护灵列车、警备列车也提前发车，灵车前后各有一列铁甲车，家属随乘

灵车，最后送客列车下午6时始发，灵车于晚8时至天津站，停车半小时，当局各要人和外宾在车站致祭。全国各大城市均下半旗志哀，南京举行奉安典礼演习。

△　韩复榘派人至武胜关与蒋军联络。同日，石友三电何应钦，称在原防待命，请转陈蒋介石派员往洛阳接洽。27日，石再电何，谓该部开赴许昌，“此后当追随诸公之后，服从中央，遵守党义，谨效驰驱”。

△　马鸿逵部入郑州，另部在黑石关为庞炳勋部所阻，韩复榘率队与庞部激战，并将该关占领。27日，韩部与庞部继续在偃师、登封一带激战。

△　“讨逆军”第五路将领唐生智、李品仙、何成濬等通电，数冯十罪。同时，第四十八师徐源泉等电蒋介石讨冯。

5月27日　　冯玉祥通电下野，略谓：“玉祥养疴华山，深居简出，尝惴惴焉以国危民困，万不可再有内战，以自取覆亡，不料区区苦衷，复不见谅于友，谣言纷起，岌岌若不可终日……谨洁身引退，以谢国人。自五月廿七日起，所有各处文电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

△　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谭延闿等通电冯玉祥部各将领，略谓：“冯玉祥背叛党国，中央已严重处置。”“观于最近冯氏无故张皇，撤兵毁路……进则胁部队以犯中原，陷诸将士以叛徒之恶名；败则退保西北，即以诸将士馈赠苏俄，为万劫不复之臣仆。”诸将领“与其为私人供刍狗，何如为民众作干城”。并谓中央处分此事，只及冯氏一人，“凡有效顺自拔，解除私人之系属而表服从中央之诚者，中央必保障其地位”。

△　冯玉祥复阎锡山26日电，谓：“下野宣言业经拟就，即日公告国人……拟俟谣诼稍息，体气略复，即束装就道，远是非之窝，作逍

遥之游。”“我弟为党国柱石，侪辈所钦，中央倚畀正殷，岂可遽言高蹈；远引何敢梗阻，携手同游，则亦兄之私幸。”28日，阎复电云：“承允携手同游，欣幸何极……务请我兄断然决然即日命驾莅晋，以便及早偕游”，并称：“弟前日返里已将家事料理就绪，亦即挈眷驰赴运城，恭候尊驾。”

△　石友三自偃城通电称：“遵将所部集中南阳，与韩总指挥行动一致，主张和平，拥护中央。”

△　新编第五师师长李纪才因拥冯（玉祥）嫌疑由武汉卫戍部押解到南京，交总部监狱暂押，经证明排除怀疑，于6月6日释出。

△　何键部各路湘军开始向梧州进攻。

△　滇军龙云部朱旭师占领贵阳，28日李燊入省。

△　哈尔滨当局借口第三国际执委会在苏联驻哈领事馆内集会，入内搜查，抄走文件、书籍及物件两车，并拘捕驻沈阳苏总领事库兹涅佐夫（旋被释放）、驻哈领事梅里尼可夫及馆员等39人。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当即向黑龙江省长官公署提出抗议。

△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宋太夫人由南京赴蚌埠迎接孙中山灵榇，唐生智等同行。同日，蔡元培、何香凝、张之江、唐绍仪等抵南京，17国公使及教皇代表由北平专车南下，日使芳泽、波、捷两国代表及犬养毅、头山满由上海到达南京参加孙中山奉安典礼。

△　国民政府令：定每年6月3日为禁烟纪念日。

5月28日　孙中山灵榇抵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委员、各特任官和各地、各机关团体代表前往浦口迎榇。上午10时40分，灵车到达浦口车站，海军鸣炮101响，各外国军舰亦鸣炮致敬。下午3时，灵榇运入中央党部祭堂，举行停灵礼，蒋介石主祭，各中央要员及家属与祭。迎榇队伍依次分为八列，共约六七万人，沿途参谒民众则达

10余万人，犬养毅、头山满和国民政府顾问宝道等外国友人一并参加迎榇活动。下午4时起，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特任官分班守灵，每班三人，每四小时一更易。

△　国民政府令：在孙中山总理奉安期间，禁止自由开会或聚众游行，倘敢故违，立即逮捕，照《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严行惩治。

△　何应钦电庞炳勋、席液池，劝其弃冯投蒋。

△　何成濬发表告“讨逆”第五路第九军将士书，历数冯玉祥罪状，请一致讨伐。同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王均第七师、金汉鼎第十二师通电讨冯。

△　李明瑞离广州率部西上。同日，杨腾辉部到达广东，杨至广州谒陈济棠。30日，杨部开肇庆，会合李部一起攻桂。

△　白崇禧在梧州召集各军官讨论战略问题，决定必要时放弃梧州。

△　范石生部占领乾河汛，右翼到达东安。刘建绪部集中平乐。30、31日攻梧。

5月29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中央及首都各机关、团体公祭孙中山，中央党部由胡汉民主祭，国民政府由蒋介石主祭，中央及第一编遣区亦由蒋主祭，各省、市党部由叶楚伧主祭，其他机关由本机关主管长官主祭。

△　蒋介石复阎锡山26日电，宣称冯玉祥如能允出洋，“无论其道出晋、沪，我二人皆可为其保障安全，即弟亦愿随其出国，以全吾三人之始终”。

△　国民政府公布《弹劾法》，凡11条。

△　马鸿逵通电，谓即率部至新郑与韩复榘部会合，表示一致拥护中央，拥护和平。同日，韩、马两部同入郑州，韩之第五十九旅开往汜水堵截孙良诚部。

△　蒋介石任命万选才为暂编第三师师长，刘茂恩为暂编第四师师长；又任命马廷勷为“讨逆”第十五路总指挥，马占逵副之。

△　哈密回部双亲王、库车亲王及回部全军总指挥马廷勷、回部全权总代表兼全军总司令李谦、甘军总司令马麒等西北回族领袖电国民政府声讨冯玉祥。

△　陈策率“中山”等五舰进驻封川。

5月30日　　阎锡山挈眷由五台原籍返太原，同日复蒋介石29日电，报告将赴运城迎冯，并谓“钧座对焕章始终包容，爱护到底……已转电焕章，俾领厚意”；又谓“党国肇造，整理建设，一切胥赖钧座主持，钧座不可言去”。次日，阎自太原赴运城，并派朱绶光、贾景德往华阴迎冯莅晋。

△　唐生智、方振武、徐源泉、贺耀组等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会议，决定唐、方两部由陇海北段，陈调元部沿陇海正面向豫进军，会师开封，最低限度封锁潼关。

△　冯军第二十六师田金凯部由荆紫关东开，本日抵南阳，继续向方城、舞阳一带集中，决定与石友三、韩复榘一致行动。

△　公祭孙中山第二日，国民党海外各总支部、各直辖支部、各地华侨代表、蒙藏代表、农工商学妇各团体代表及国民党中央党校、中央军校、童子军先后进行公祭。

△　国民政府令公布民国十八年关税库券条例，定额4000万元，定于本年6月发行。

5月31日　　公祭孙中山最后一日，18国参加奉安专使、教皇代表、日人犬养毅、头山满、各国驻华新闻界代表及葬事筹备处委员、奉安委员会委员、亲故、家属等分别致祭。祭毕即行封棺礼，孙之家属、亲友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特任官、宋庆龄、孙科、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叶楚伧等100多人参加。

△　苏联照会国民政府，抗议哈尔滨当局搜查驻哈苏领事馆，要求立即释放一切被捕人员，送还一切信札及其他财物，并称将取消莫斯科中国使馆与在苏各中国领馆所享之治外法权。

△　蒋介石、张学良电阎锡山表示挽留，请勿远引高蹈。

△　韩复榘、席液池先后抵郑州，韩召集商民训话，通告安民，并电告各方：孙连仲、庞炳勋部已由洛阳西退。

△　陈汉光奉陈济棠令赴从化收编李务滋部，并负责保护石井兵工厂。

△　国民政府派王正廷为互换《中比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全权代表。

△　天津警备司令部军械库地窖爆炸，所藏手榴弹、炮弹等全部炸尽。

△　江苏省当局在各县镇压共产党及革命群众，本日在江阴逮捕陈叔旋、在沭阳逮捕王安民等11人，6月1日，又在东海捕陈秀夫等12人、在灌云捕武心殿等20余人。

5月下旬　　刘郁芬电韩复榘、石友三，谓："本军非两兄固无以成今日之盛，抑两兄苟非凭借团体共同奋斗，则亦何以有今日？"指出蒋介石好用权术，"非可共事之人"，"本军朝被消灭，则两兄夕被解决"，蒋"自包办三全大会以来已成袁世凯第二"，并称"今日之事，团

体之存亡，国家之存亡，皆悬于两兄之手”，望“毅然决然迅速率部西开”，或“集合兵力，择险固守”，俟机驰骋长江上下游。韩复电称冯玉祥去留“关于国家存亡及数千万之生灵涂炭，能不能放下屠刀，皆悬于兄等之手，千载一时，万勿蹉跎”。

是月　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组织“护党革命大同盟”，并发表成立宣言。略谓：蒋介石“篡夺中枢以后，外交则以献媚帝国主义为能事，吏治则亲戚故旧、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尽据要津，财政则滥发公债，贩运烟土，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军事则假编遣会议名义扩充军备。凡此诸端，已比北洋军阀专政时代，其腐败黑暗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全大会以后的国民党几乎尽变成蒋中正个人御用的党，吾党同志誓死不能承认”。“同人等追随先总理革命有年，目睹党国危机，岌岌不可始日，故不揣绵薄，集合同志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领导护党运动，设总部于沪上，设分部于各行省”。宣言并提出欢迎汪精卫等归国护党；请二届中委“自动集合重组中央党部”及组织护党革命军、组织护党政府等项主张。

6　月

6月1日　孙中山灵榇安葬于南京紫金山陵墓，晨4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启灵，在京各中央委员、政府委员、孙之家属、亲故及各国专使参加送殡，沿途民众肃立瞻礼者达数十万人，正午12时奉安告成。同日，全国各地均举行公祭，并停止工作与交通三分钟，以志哀悼。海外国民党各支部与华侨亦有纪念活动。

△　冯玉祥电阎锡山，劝阎与蒋介石勿下野，并谓：“刻闻通缉等令确已发表，兄纵欲远游，亦何所逃罪。承吾弟与介公保障个人安全，感且不朽，顾中央威信、法律尊严恐非爱我者所能左右，临电神驰，万望明示。”阎于2日电蒋转达冯意，请示应付办法。

△　阎锡山到达运城，电冯玉祥称：“挈眷抵运，候迎兄及嫂夫

人，并派朱绶光、贾景德赴潼速驾，盼即日惠临。”同日，阎电何成濬止兵，谓：“西北苦旱，大兵进据，恐贻人民无穷之忧，弟拟邀焕兄出洋，意在避免战争，以保持中央视民如伤之德意，果能如约，则和平统一可以立见，否则弟拥护中央，不落人后，一切惟中央之命是从。”

△　石友三通电称已奉命集中许昌，并于本日在许昌防次就“讨逆”第十三路总指挥职。石并电何应钦称：“与向方（韩复榘）服从党国，主张和平，实受良心驱使，自当继续努力为党国奋斗，以副尊命。”

△　李明瑞部向广坪镇（距梧州70里）进发，陈策率“中山”、“江大”、“江固”、“江巩”等舰对界首、鸡笼洲、狮子山各炮台发起攻击。同日，驻梧桂军并各机关重要职员退藤县，所有辎重及制弹厂机器、枪炮弹等分装10余船运往柳州。

△　何键令周斓部即日由桂林进取永福，刘建绪部即日进占修仁后，同向柳州攻击，务于本月7日以前占领柳州。

△　红五军彭德怀部攻克粤北南雄城。

6月2日　　粤、湘军联合攻梧，与桂军战于封川，桂军退往桂平，陈策海军陆战队和范石生部相继进占梧州。

△　云瀛桥、李务滋部约四团由紫金抵揭阳。4日在揭阳会议，决定向闽南发展，会后李部即开往潮安，进攻韩江上游张贞部。

△　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驻哈尔滨副领事斯那米列斯基等由哈回国，本日在满洲里为护路警捕送回哈，6日库兹涅佐夫复化装潜行回国。

6月3日　　李明瑞率部抵梧州，布告安民，并通电称即向南宁进军，全省肃清为期不远，念祸首仅为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诸人，

其余非甘心附逆，翻然来归者自当一视同仁。

△　何键令范石生部及许克祥旅协同李明瑞之第十五师追击由梧州向藤县撤退之桂军；令吴尚部调贺县、平乐之线填防。同日，何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表示“务于最短期间歼灭桂逆，一面准备精锐三师待命北征”。

△　冯玉祥复电阎锡山，谓一周内偕朱绶光、贾景德、丁春膏、曹浩森至运城恭聆教益，请阎不必准备出洋，冯本人则另途出国。

△　孙良诚退出洛阳，向西开拔。同日，高在田派飞机三架赴潼关、洛阳等处散发传单，劝第二集团军将士拥蒋。

△　济南各界四万余人开讨冯大会，通过请国府明令讨冯、通电全国一致声讨、请省府肃清冯系余孽马良、李庆施等决议。

△　日本公使芳泽、意大利公使华蕾、德国公使卜尔熙分别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

△　国民政府公布《南京特别市市政公债条例》，债额300万元。

△　是日至7日，国民党中宣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宣传会议，通过规定训政时期宣传方法、统一宣传系统、充实中央党报内容、规定国际宣传方法、扩大农村宣传等10余项议案。

△　是日及9日，张学良分别电蒙藏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称，苏联煽惑外蒙，蒙兵已到哈拉哈。

△　禁烟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林则徐禁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到各机关代表400余人，该会委员长张之江主席。下午在公共体育场焚毁烟土。同日，拒毒会发表宣言，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加入拒毒会，使鸦片毒物从此肃清。北京、上海等地亦有纪念、焚土活动。

△　红四军再克龙岩，5日开往上杭。

6月4日　　冯玉祥见朱绶光、贾景德后，致电阎锡山拒赴运城，谓："出洋本兄素志……惟中央已下通缉令，深恐国境未出，刑网已触"，"故对同道赴津乘轮游日恐难从命。兄之出国拟取道西伯利亚，然后再赴德"，请勿烦迎候。

△　唐生智谒蒋介石，商讨冯军事部署后，离南京北返。同日，唐部第五十三师由济宁向归德开拔。

△　马鸿逵代表王文黻抵汉谒何应钦，陈述该师拥护中央诚意。

△　蒋介石电张学良，谓苏联及蒙古与冯关系已明，"东省与俄蒙毗连，关系极重，请注意防范"。5日，沈阳当局饬张作相、万福麟注意边防，并电令松黑江防第三舰队派舰赴三江口驻扎，另调丁超部第十八旅、邢士奎部第二十六旅各一团开赴吉边、绥远（今抚远县）驻防。

△　俞作柏、杨腾辉等在广州葵园开会，议决收拾全桂计划，并请粤助以巨款。

△　湘军刘建绪、周斓部分别占领修仁、永福、永宁，桂军向柳州退却。7日，周部先遣司令陈光中进占雒容，刘部戴斗垣旅到达鹿寨。

△　蒋光鼐部陈维远、戴戟旅昨今两日抵海丰，蒋等在海丰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潮汕下总攻击令。

△　桂系在香港出版之机关报《正报》发表《蒋中正与奉安》一文，指责蒋藉尸敲诈，屡次将先烈居为奇货，以成就其地位权势，同时将党中柱石如芭蕉般一层一层剥除，最后则存蒋氏一人："今者蒋氏又于奉安典礼假惺惺作孝子状……不知者以为蒋中正总理之信徒也，英士（陈英士）之化身也，仲恺（廖仲恺）之后起也，谬矣！堕

蒋氏之术中矣！”

△　行政院第二十六次会议，议决武汉特别市名称改为汉口特别市，以汉阳、汉口为其管辖区域，武昌划归鄂省府（11日国民政府以令公布）；筹备中之国立山东大学改称国立青岛大学，撤销原私立青岛大学，其校产归国立青岛大学接收。

△　南京水西门造币厂起火，烧毁房屋90余间，损失上百万元。同日，汉阳兵工厂制炸弹引线爆发，炮厂全毁，损失极巨。

6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八三次会议决议，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辞职照准，以张荫梧继任。

△　蒋介石积极部署讨冯，武汉方面各部队已集中豫南，向平汉线集结之宁方军队渐次向襄阳、樊城移动，驻浦口之罗霖部向汉口开拔。本日蒋令南路总指挥何应钦自平汉路进攻河南，令毛炳文、徐源泉、方振武向河南进击。

△　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刘芦隐对各报记者谈称：中央讨冯绝非内争，乃政府处理“叛将”，中央讨冯为既定政策，当然无变更之理；冯最近有下野通电，并非真诚，不过为缓兵之计。

△　国民党济南市党部会议议决呈省党部转请中央及省府拿办马良、师景云、白宝山等八人；并请省府取消人民自卫团，另订维持治安法。

△　李明瑞、范石生部向藤县桂军进攻，桂军向平南、桂平退却，李、范军队当即入城。同日，许克祥部抵梧州。

△　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

△　驻辽宁苏领事馆就哈尔滨当局无理搜查苏领馆事向辽交涉署提出抗议。同日，东铁苏理事长齐尔金访张景惠面致抗议，张借口齐

非外交官予以拒绝。

△　财政部长宋子文偕中央造币厂厂长郭标赴广东整理财政。12日起，宋在广州与陈铭枢、陈济棠及财界要员商财政整理问题，大体确定除盐税、烟、酒、印花、海关已划入国税外，更将禁烟、厘金、沙田、爆品等项税收一并划入，如国税仍有不敷则酌由省税借给国库支付；军费亦须切实核减，得陈济棠同意，除6月份在军事时期仍需450余万元外，以后每月当缩减至300万元。

6月6日　　国民党第十六次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三全大会未及讨论各项提案之审查报告；修正通过各级党部工作考核条例草案；蒋介石提请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并撤销其处分案，决议先恢复俞之党籍，候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议决《字林西报》已改变态度，取消禁止邮递。

△　李明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副总指挥及广西编遣特派员。同日，黄绍竑、白崇禧派人到梧见李明瑞请求收编，李要黄、白先通电下野，然后再商收编条件，并保存其生命财产。

△　陈策率舰由梧班师回粤，9日抵广州。

△　张贞部与徐景唐军激战于高陂，徐军退丰顺，张部乘胜攻潮安，7日开始总攻；又粤军陈维远部8日抵葵潭，9日抵普宁，12日占揭阳，13日占潮安，均无抵抗。

△　国民政府以冯、桂两派在上海活动皆以张定璠为中心，下令对张严缉究办。

△　阎锡山所派迎冯代表朱绶光、贾景德偕冯玉祥代表曹浩森由华阴返运城。冯未同行。

△　冯军庞炳勋部奉令撤出洛阳西开。

△　中日宁案调查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方余紫骧、陈开懋，日方清水、村上等到会，对调查手续及程序有详细讨论。又汉口“水案”谈判，日领承认赔偿等条件，但复工问题尚未议妥。

△　西湖博览会开幕，万余人参加典礼，开幕式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主持，国民政府代表孔祥熙、中央党部代表朱家骅、行政院代表蒋梦麟等到场致词。

△　中国垦业银行上海总行开业，该行董事长秦润卿，总理由秦兼，经理王伯元。

6月7日　　阎锡山接蒋介石电，称冯玉祥如决心出洋，必可保障其安全。阎即将蒋电出示曹浩森、邓哲熙，嘱曹、邓回潼复命。同日，阎又接何成濬电，谓蒋有致阎亲笔信由唐生智携平，命赴晋面交。阎即由运城回太原，临行电冯玉祥，略谓：“介公顷有复电，所陈各事均行认可，且慷慨其词，尤见与兄感情依然未稍改变，已请曹、邓两同志持原电回华复命，务请大驾早日来晋，以便偕行。介公派孟潇（唐生智）、雪竹（何成濬）两兄来晋见面，拟留敝眷在此相候，弟先回省一行，稍事周旋，仍来运迎驾。”

△　方振武抵豫，是晚及次晨韩复榘、石友三、贺耀组、方振武、马鸿逵、关树人等在郑州韩之司令部会晤，商河南善后和布防问题。8日下午，贺、方、马、关等离郑赴南京。

△　驻晋、陕交界大庆关之冯军已撤至潼关、朝邑、韩城一带。8日，河南冯军全退潼关以西，一部抵长安，一部抵汉中。

△　甘、宁、青三省联军“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马仲英、第二路司令兼军长马廷贤等回军将领通电声讨冯玉祥，并谓该军五万人，现“集中大滩水岸一带，枕戈待命，绝对服从中央命令，就近受阎总司令指挥”，但给养缺乏，无力购办，请求予以救济和实行编遣。

△　黔军军长李燊电南京，谓已遵令集中所部前进讨桂，黔省善后一切听中央处置。

△　蔡元培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呈辞监察院长及国府委员职。

△　蒋介石任命川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为“讨逆”第十四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讨逆”第十二路总指挥。

△　川军赖心辉与刘湘、刘文辉战于江津。

△　外交部电驻莫斯科总领事夏维松称，哈尔滨苏领馆有秘密开会宣传共产行为，令其向苏联提出口头抗议。同日，中国驻苏联代办朱绍阳抵南京，即向外交部报告哈尔滨苏领馆被搜查事。

△　广东省政府议决发行中央银行公债1000万元，限20个月清还。

△　厦门国民党当局追究《鹭江小报》和《飞泉周刊》，搜查其承办人住所，捕去嫌疑犯陈玉清等三人。

6月8日　　国民政府以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不私一人一系”，通电拥护中央，讨伐冯玉祥，特予明令嘉奖，尤冀韩等早日清除反侧。

△　陕军师长井岳秀电南京称，冯军假道陕境，业经电拒。同日，冯玉祥部骑兵第二师师长席液池电请所部由韩复榘节制。

△　“讨逆军”在梧州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南宁，李明瑞、杨腾辉各部已下动员令。同日，范石生偕师部人员抵梧。

△　清东陵盗墓案经多次审问，是日预审终结，主犯谭温江等七人被判死刑，余犯分别判无期徒刑和徒刑。审判长商震发表谈话，称

判死刑之现役军官均握有重兵，执行时明知有种种困难，但为维持军法精神起见，不得不如此判决。判决书于17日送军政部核办。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查禁《溺情记》，宣称该书内容“均系关于共产党秘密组织”。

△　中国佛教会代表数十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请愿，要求取消《寺庙管理条例》，另颁包括各宗教之适当条例。

△　北平邮务局工人与邮票处监视员英人戈裕德为放假问题发生冲突。12日，邮局工会要求将戈撤职，并发表宣言。14日，工人列举戈35条罪状呈报总局。17日，全体邮工议决限三日内撤换戈，否则取最后对付。20日戈辞职，遗缺由副监华人车瑞衡代理，工潮解决。

6月9日　　唐生智、何成濬在太原谒阎锡山，转交蒋介石促阎对冯用兵函。阎对时局仍主和平，并表示蒋决不能卸肩。对冯用兵问题，决定以冯去留为转移，去则罢兵，不去即讨伐。

△　程希贤带领冯部手枪队一营到郑州投韩复榘改编。

△　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电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伍廷飏等，请暂息肩远游，以军权交吕焕炎，政权交粟威，静候中央命令。

△　周斓、刘建绪同到鹿寨，何键令周部向柳州北城进攻；刘部向柳州东城进攻，并以一部出江口袭击柳州之背。周、刘两纵队10日开始动作，至13日分别到达指定地点。

△　由梧州撤退之桂军乘民船20余艘过象县北进增援柳州。同日，桂军与范石生部在五福墟接触。

△　张贞抵漳州，所部除张汝勖率一个团留饶平协同蒋光鼐部攻潮汕外，其余陆续回闽原防，以对付红军。

△　全国反日会改名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是日在南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决在东三省积极抵制日货、救国基金以发展实业为原则、定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全国提倡国货运动会等案。

6月10日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开幕，接开预备会，出席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43人，到各机关代表数百人。胡汉民主席，议决：冯玉祥业经开除党籍并革除其中央执行委员，应以王伯群递补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孙科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

△　阎锡山、何成濬、唐生智联名电蒋介石商处置冯玉祥事。蒋复电谓只要冯到运城出洋，中央不失威信，可不事苛求，其军队本系国家之军队，自无不可设法安插，否则为保持威信计，不能不按照原定计划积极讨伐。

△　阎锡山电冯玉祥谓："前奉介公微（5日）复电，系望公先实践出游之约，后以人格保障支（4日）电所请各项之实行。细绎尊电系望介公先行停止军事行动，酌发欠饷恤赏，俾便旦夕首途，所差只在一间。弟意我二人因决定携手出洋，敝处始有日前陈请各项之电，似须先践约出洋，始为不失顺序。介公信人，既以人格保障，必能如电实行。倘非然者，弟当负完全责任，必使对得起我兄而后已。兄意如何？切盼示复。弭战祸，全始终，端在我兄最后之一诺也。"同日，阎电北平行营，谓韩（复榘）、石（友三）服从中央确系诚意，"地方谣言不值一笑，敝处当随时辟之"。

△　贺耀组、方振武偕韩复榘代表马鸿逵、石友三代表关树人、石友信等自郑州抵南京谒蒋介石，晚蒋在私宅宴韩、石代表，贺、方及鲁涤平等作陪，席间对解决冯玉祥方法有所讨论。

△　韩复榘电刘镇华请赴郑主持豫政，刘派代表与韩接洽。

△　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川军将领电国民党中央及

国民政府，请颁明令讨伐冯玉祥。

△　陈济棠由颐养园回第一师部召集重要会议，团长以上均参加，议决第一师各旅分驻西北江及江门、四邑各地，以黄质文、陈汉光两团固省防，派林翼中赴南京报告讨桂事，并请示粤军编配。

△　李明瑞、杨腾辉部是日起分三路向桂平进军，一路由梧州攻平南，一路由藤县攻容县，一路绕道攻郁林（今玉林）。

△　何键遵蒋介石令组织广西战地政务委员会，由何任主任，负责处理一切政务，俟省政府成立后即撤销。

△　徐景唐军以廖鸣欧统帅由潮安总退却，11日汕头徐军已撤尽，赴大埔集中，准备向福建进发。同日，粤军蔡廷锴部占领梅县。

△　红四军与闽军卢兴邦、卢新铭、陈国辉部战于长汀，后转移永定。同日，红军贺龙部1000余人进入五峰县境，该县当局电湖北省民政厅告急。12日，贺部与谭道源部激战于五峰县。

6月11日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开第一次大会，蒋介石主席，通过预备会决议各案，推出党务、政治、军事、建设四组审查委员，决定自12日起开审查会三天，常委提案分交各组审查。

△　蒋介石召集朱培德、刘峙、方振武、陈仪、杨杰等开军事会议，商讨对冯玉祥进兵及安排西北“反正”各军问题。次日晚朱等赴蒋宴，续商上述问题，认为冯出洋毫无诚意，需要进一步部署兵力。

△　阎锡山派员赴运城与冯玉祥代表作最后商榷。同日，冯复阎10日电，谓：“兄之归田，早具决心，出洋同去，更为感念。前电所请，不过认为应行先决问题，并非条件的。介石以人格担保，请我弟又负完全责任，兄岂有不相信者，但数十万军队，若不急图所以解决之者，万一军心摇动，恐非国家之福”；“此时但求军队有切实具体办法，则其余皆可迎刃而解”；“仍派曹浩森、邓哲熙两同志前往请教，

至祈惠予接纳。”

△　吴敬恒电冯玉祥劝“尽释兵柄，翻然远游”，称阎邀冯去国之意在“冀先生另换一负担，望自任以大业之重，为伟大开山之人物”。

△　韩复榘部前锋进驻洛阳；方振武之第六路军已过周家口；唐生智之第五路军前部已抵开封，所属第八军李品仙师13日全部开商丘、兰封；第五十三师刘兴部14日由兖州开徐州，准备西进。

△　李明瑞、李腾辉部占蒙江，次日复占白马，13日占武林，均无抵抗。

△　国民政府令：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周西成阻挠讨逆师出黔边，贻误地方，着即免职查办。

△　国民政府撤销靳云鹗之通缉令。23日，蒋介石电靳，称“效忠党国，来日方长，前此受屈，望勿芥蒂”。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世界日报》及《公论日报》。

△　天津电车工人向比方公司提改善待遇10条件，是日公司洋总管卢发完全拒绝工人要求，工人开始罢工，12日罢工人数已达千人。14日，公司登广告招募工人300名代替罢工者，工会亦登广告，声明在工潮未解决前如应募作工，则以反革命对待。18日，卢发访市长崔廷献，对工人所提条件仍无容纳。19日，崔赴市党部商解决办法。21日，市政府与公司开始谈判，22日公司大体接受工人要求。23日，工人在总工会开罢工胜利大会，会后复工。

6月12日　阎锡山、唐生智、何成濬等在太原会议，初步议定对冯问题善后办法：一、冯服从中央，于十日以内外游；二、国民政府于冯出游时即取消通缉令；三、冯之军队归阎指挥，由中央改编；四、冯之部下一俟时局安定，改由中央重新任命。

△　蒋介石召见马鸿逵谈西北军事，并面示讨冯作战计划。

△　曹福林追随韩复榘、石友三之后率部集中漯河，听候中央调遣，奉令续任第二十九师师长，是日电谢国府奖励。

△　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就任第十八路“讨逆军”总指挥。

△　贵县吕焕炎率部向李明瑞输诚，被委为广西编遣部队第十五路总指挥。

△　国民政府令：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并指定为主席；任命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原任吕焕炎免职；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黄节准免本兼各职，任命许崇清兼代教育厅长，所遗民政厅长职务由陈铭枢暂行兼代；任命姚承业、张翼廷为热河省政府委员，分别兼任财政、教育厅长；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张群免职，遗职由胡庶华继任。

6月13日　国民政府为谋对冯玉祥军事便利起见，对韩复榘提出三事任其自择：一、韩内任军政部长，所部另由其部将领代为指挥讨逆；二、所部调赴山东，任讨逆后方事宜；三、率部积极西进，肃清冯军。同日，马鸿逵派人回郑州见韩报告在南京接洽情形；钱大钧携款至豫慰劳并检阅韩、石（友三）部队。

△　傅作义就任“讨逆军”第十六路总指挥。

△　李明瑞、李腾辉等在藤县会议，决定攻桂平方案，以李和范石生部任中路，杨任左翼，何键任右翼，分别由平南、大乌、柳州进兵。

△　湘军周斓部占领柳城，桂军退柳州、庆远（属宜山县），白崇禧亲率五个团援柳。

△　粤军戴戟旅进占汕头，未受抵抗。徐景唐军已抵平和，旋转

移永定，17日抵上杭。张贞部在南靖、山城、小溪设防，并电蒋光鼐沿韩江夹击徐军。

△　黔省在贵阳开市民大会，推举李燊、安健、龚为霖、彭述文、马明亮、周培艺、方策、王度、马培中、平刚、李居平、杨万选、吴道安为该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李为主席，安、龚、彭、马（明亮）、周分别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各厅厅长。

△　青海代表雅楞丕勒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救济难民、组织民团、任命蒙籍委员、设立办事处等六项要求。

△　长沙市公安局在距城20里之九峰镇赤冈冲弥陀庵地方破获一制造伪钞机关，逮捕人犯唐洪亮、晏寅生、谢和风、陈迪、吴桂林、刘杰生等六人，搜出上海中、交两行钞票伪版、山西省银行金库券伪版、国民政府新旧两种印花伪版、湖南电灯公司一、二、三角辅币券伪版等数十块及已制成伪钞5.6万多张，计28万余元。后又捕同犯吴志和一人，除唐犯另案办理，其余六人于16日枪毙。

6月14日　国民党二中全会第二次大会，讨论振刷政治案审查报告，通过于最短时间内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工作；厉行禁绝鸦片及一切代用品；统一币制整理金融；严厉革新财务行政制度；五院中未成立各院限三个月内完全成立等项决议。军队编遣案，议决全国各军统限于民国十九年（1930）6月编竣，编余官兵之遣置，如兵工、垦荒、修路、浚河、造林、筑堤、筑港、开矿等，由编遣委员会与农矿、工商、铁道、内政各部迅行筹备。

△　蒋介石答记者问，声称："桂逆残部正待肃清，而冯氏又以叛党闻……故现在非特非余所忍言去之时，且有振作精神激励国人共与周旋之必要。""对于冯氏始终以宽大处之，不加讨伐，亦无讨伐之必要。如其不自觉悟，必欲割据抗命，障碍统一，国人当有公判，决不容叛逆常为革命之障碍，政府亦必随国人之后以尽其职也。"

△　冯玉祥派曹浩森、丁春膏、邓哲熙到太原商出洋条件及确实保障办法，是日与阎锡山晤谈，并交冯亲笔函，内称对阎之劝告完全容纳，并称对中央绝无抵抗意，观于放弃全豫可知，现在仍取退让宗旨，稍事摒挡即出国，惟部下欠饷非空言所能济事，“望吾弟转陈介公得一切实办法”。阎即将冯意转告唐生智、何成濬，认为冯不无诚意，遂商定三项办法，分电南京及华阴：一、冯须于最短期内实行出洋，沿途保障安全；二、各路军队暂在原驻防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解决；三、冯部欠饷由中央尽先筹拨，惟冯部须听中央编遣。

△　刘建绪电湘军总部报告攻柳州部署：戴斗垣旅附周斓师一团由雨泉墟、洛垢墟攻柳正面，周师陈光中部由柳城攻柳右侧，罗树甲旅一部由三门江、一部由江口墟攻柳左侧。桂军伍廷飏部坚守柳州，两军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均重。16日，桂军突破湘军之联络线，并将陈光中部包围，湘军大败，后数日被迫退桂林，复分别撤至梅溪口、文村、灌阳、全州、黄沙河、贺县、龙虎关。

△　范石生部依俞作柏令由昭平出修仁攻象县、武宣，本日起与桂军张任民部发生激战。许克祥率部由梧西上参加讨桂，香翰屏部亦陆续到梧，于16日开往桂平助战。

△　范熙绩部将青州张宗昌旧部窦宝璋残部缴械。陈调元派王凯赴即墨点验顾震部。

△　据《申报》讯：内蒙各盟旗向中央提出六项要求：一、盟旗制度一律照旧，不得改设县治；二、各盟长、副盟长、兵备扎萨克由中央就本盟旗中择优任命；三、盟旗归省范围仅以外交及关于外侮之军事为限，所有地方行政权仍由王公处理；四、设在蒙地之省府须有半数蒙族委员，经盟旗公推，由中央任命；五、凡内蒙未垦之地不得藉任何名义再行开垦，其已开垦者，土地所有权仍由蒙人自主；六、以上各条请中央明令公布。

△　红军彭德怀部进抵上犹。贺龙部再克桑植，进逼大庸、慈利等县。

6月15日　国民党二中全会第三次大会，通过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分区“剿匪”案、继续执行编遣会议决议案、确立农业政策为发展工商业之基础案、规定训政时期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完成案、二十三年（1934）底完成县自治案、普及教育，限民国二十三年底实现案、二五减租案。蒋介石临时动议，提出满蒙回藏党务政治案，推蒋与赵戴文、谭延闿、戴季陶等拟定办法。

△　冯玉祥复电阎锡山，谓“前言既出，决不反汗，日内总可见信于吾弟”。又电曹浩森等，谓出洋之事业已决定，现正摒挡一切，稍缓即践阎公之约。同日，李书城自华阴电阎，称冯出国通电已起草，又称甘刘郁芬、陕宋哲元、宁夏吉鸿昌均商定于冯离西北时，通电一致拥护中央。

△　蒋介石在南京私宅宴韩复榘、石友三之代表马鸿逵、唐邦植等，详商豫事，并嘱张钫代表范琪秋回豫宣达中央意旨。

△　张学良、张作相、翟文选、万福麟、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等在沈阳开重要会议，商讨东三省军队改编、对苏态度、屯兵吉蒙边界及接收中东铁路等问题。

△　国民政府通缉黄灼棠、马镜池，声称黄等“劫持加拿大晨报，该报言论始终反叛中央”，现在“已经回国，居然奔走营谋”，训令直辖各机关转饬所属严缉究办。

6月16日　阎锡山电张荫梧，略称以促成统一为职志，第一步采取和平方法，如无效再秉承中央；对中央绝对服从，如冯不走，中央无论如何处置无不听命。

△　冯军田金凯部决与张维玺一致反冯，是日电何应钦，谓遵命

派人赴汉请示，望大军速进，免误时机。18日，田率两万人离潼关，再电何输诚，何接电后即电蒋请示。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徐景唐军已退入闽西，是日电令粤军蒋光鼐师由潮汕溯韩江而上，闽之张贞部向连城、龙岩进攻，江西之第十二师金汉鼎部及第七师王均部由瑞金向汀州进攻，三面夹击徐军。同日，外交部令广东交涉员向香港当局交涉引渡徐与邓世增等。

△　红四军攻克上杭，闽军卢新铭部分三路向上杭反攻。

6月17日　　国民党二中全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下列各项重要决议案：一、拨用庚款发展建设事业案：努力发展铁道事业，提前完成粤汉、陇海、新陇绥各线，粤汉限民国二十一年（1932）底竣工，陇海限二十三年（1934）底竣工，新陇绥限二十六年（1937）底竣工；就庚款全部中拨用三分之二为铁道建筑经费，三分之一为水利及电气事业等建设经费；用庚款完成之铁路及其他建设事业其母金所得之赢余全数用于文化教育经费。导淮治河工程应于民国二十三年底完成。二、改善工人生活改良工作制度案，由工商部负责于民国十八年制成入手办法。三、确定行政事项统属案：航空事业归军政部主管，建委会所管之无线电移转交通部，海政归海军部管理，全国铁道之敷设及经费归铁道部统一筹办，各市之公用事业归各市政府监督，各部公款及发行公债一律由中央银行存储，各部会不得自设银行。建委会毋庸并入各部。四、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案。此外，并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方法、关于司法制度之完成及其改良进步之规划、治权行使之规律、蒙藏问题、铁路统一行政等案。通过胡汉民等所提议恢复李济深自由案。

△　国民党中央监委会议决：开除张知本、张华辅、胡宗铎、邓世增、徐景唐、黄旭初、黄绍竑、王垣、王季文、张定璠、李务滋、云瀛桥、张国元、舒宗鎏14人党籍，交由中执会通过执行。

△　蒋介石令阎锡山、唐生智、方振武、刘峙着照讨逆作战第一期作战计划及附图表切实施行。该项计划规定以河北、山西（主要为原第三集团军）为北路军主力；以唐生智之第五路军及方振武之第六路军为东路军；在粤、鄂各军为南路军（旋改定战斗序列，取消东路并入南路，蒋自兼南路总司令，北路总司令为阎锡山）；为平定西北之目的，先以主力于豫省东、南两方面取包围态势，压迫逆敌至郑州以西地区，北路军主力乘机由晋南出清化、济源、陕州各道渡河与陇海线各军协取虎牢、洛阳等处，务在潼关以东地区将敌包围而歼灭之；各路军均于本月20日开始运动，限31日集中完毕。计划还确定：以第三集团军步兵两师、骑兵三师编为北路挺进军，由包头进取宁夏；以四川之邓锡侯、田颂尧两部编为南路挺进军，由汉中威胁西安，断敌归路；总预备队为第三、五、六、七、四十七、四十九、十八、五十各师。

△　蒋介石再次见韩、石之代表唐邦植等谈河南及西北事。中央正式令调韩部驻鲁西，石部驻皖北，韩、石所遗豫中防地由唐生智和方振武部填防。同日，前奉蒋命赴沪访西北要员之关树人回京复命，称在沪西北要员行踪秘密，无从探视，仅晤张之江，张对韩、石表示同情，并望冯早日出洋。

△　冯玉祥部下将领张维玺电何应钦，表示反冯，拥护中央，请呈蒋介石不咎既往。

△　俞作柏令李明瑞等限三日内攻克桂平。18日李等开始总攻，李与杨腾辉部由藤县攻江口，范石生、许克祥部由大湟江击桂平之侧，海空军亦加入战斗，桂军向贵县方面退却。

△　蒋光鼐令所部入闽追击徐景唐军，戴旅已抵大埔。18日，徐军向赣南“三南”（定南、龙南、虔南）转进。

△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及军事机关盐税统由中央核收。

△　中比庚款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款项用途原则：一、华人留比学费；二、中比学术交换；三、在华、在比中比间学术事业；四、比人在华经营之慈善事业；五、中比在华卫生建设事业。

△　甘肃灾民代表呼吁团在上海接甘肃电称，此次回乱屠杀汉人近万人，系为马廷勷作内应，说明冯（玉祥）部已不能统治甘肃，希望中央速救灾民之命。

△　北平师院学生游行示威，与军警发生冲突，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已容纳部分要求，学生不满，遂电教育部反对大学当局。同日，北平第一工学院亦罢课。

△　北大举行“三一八”烈士纪念碑落成礼。

6月18日　国民党二中全会第五次大会决议：接受中常会关于处置冯玉祥“叛党乱国”事件报告；关于整顿并发展全国教育案等。通过大会宣言后闭会，宣言强调必须保持全国之真正统一、争取国家之自由平等、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实现地方自治、完成训政需全党全民一致努力等四端。

△　冯玉祥电告阎锡山谓：“内人携小女日昨已由长安到华阴，预定今日再到运城，兄于明日或后日亦可到运，把晤在即，欣慰何似，特电奉闻。”同日，阎复电谓：“我兄及嫂夫人惠然莅止，得遂同游，欢欣何极，已派朱参谋长随同曹、邓、丁三同志先往负弩，晋垣行馆早已备齐，弟亦即前往欢迓。”19日，冯之妻李德全等11人抵运城，与前往迎候之阎之妻会晤。朱绶光等同日亦抵运城迎冯。

△　财政部电全国关税局，着以后所有收入按月缴解中央，各机关借款亦须呈财政部核准后才能拨付。

△　赈灾委员会常会决定：请国民政府速办海关附加以资分拨各灾区；拨云南、青海赈款各一万元；丰台存粮交陕北赈分会接收散

放。

△　中央大学区中校联会开会，议决分呈中央及教育部即日取消大学区制。下午，出席会议的全体校长赴教育部请愿，蒋梦麟表示浙江大学区立即取消，江苏半年以后取消，河北与李石曾商后定期取消。

6月19日　蒋介石之代表熊式辉抵太原，20日谒阎锡山面交蒋亲笔函，并代蒋恳切挽阎，打消去意。同日，阎锡山电何成濬，谓“焕章兄果来运城，大局可望和平解决，锡山仍拟随同出洋”。20日，何电蒋报告。

△　韩复榘因孙良诚派交际处长谒韩接洽投诚，并附手函有“破坏交通，百身莫赎，留此余身，图报党国”等语，本日电何应钦请示。

△　李明瑞、杨腾辉部于官江渡江进攻蒙圩，与桂军韦云淞部接触，桂平已被包围，桂军入城坚守。桂军许宗武部输诚改编，后许被委任为警备第二师师长。21日，韦云淞亦请降，李、杨准韦即日离境，所部交吕焕炎收编。23日，韦在桂平遍插白旗，李、杨部入城。同日，俞作柏亦抵桂平。

△　陈济棠得香翰屏报告赞成桂军将领吕焕炎投诚。本日香电俞作柏请催吕就桂警备司令职，将所部集中兴业、贵县以击黄绍竑、白崇禧之背。同日，黄绍竑由南宁至贵县指挥，白崇禧则在柳州督战。

△　陈章甫奉陈济棠命将三水刘玉山部缴械遣散，共缴步枪400支，刘事先赴梧州得免。

△　青岛四方日纱厂罢工工人向厂方提四项要求：一、每人每月加房资三元；二、星期休假照给工资；三、实行八小时工作；四、必要时工人得自由集会。厂方接受，是日工人复工。

△　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闽军陈国辉部三营全被缴械，陈逃

永福，集合余部于24日退同安。

6月20日　　蒋介石接阎锡山告冯玉祥将抵运城电后，即邀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等商应付方针，命军政部筹300万元作为冯出洋旅费及所欠冯部军费，并电阎请先垫付，面交给冯。

△　冯玉祥离华阴赴晋，行前曾召集部下说明为党国计、为保全西北计不得不毅然出洋之苦衷。总司令职交石敬亭代理，陕西、甘肃事仍交宋哲元、刘郁芬、门致中等负责，又令鹿钟麟与中央接洽一切。

△　阎锡山电冯玉祥谓："特派朱绶光代表欢迎吾兄，务请径临太原，所商各节容晤面后再行奉告。"又电何成濬请再赴太原会商冯出洋各事，何以在平事忙，熊式辉已抵太原，暂不前往。

△　黄绍竑由南宁走龙州，通电称因事离邕，省府事务着粟威代，军部事务着郑承典代。21日，白崇禧亦走龙州。24日，白、黄同赴越南，后转赴香港。

△　吕焕炎在鬱林通电就桂警备军副司令兼警备第一师师长职。同日电梧，谓"自二日率部回鬱，即本最初主张力倡和平，各部同袍亦同此旨，季宽兄亦于二十日宣言和平，善后收拾千端万绪，望时加指导"。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修正省执委会及县执委会组织条例；天津特别市党部宣传荒谬，掩护冯玉祥，决议将该党部宣传部长周仁齐、秘书周德伟撤职，并交中监委会惩处；驻法国总支部迭起纠纷，近更发函电诋毁中央，决议将该总支部指委一律免职，其所召集代表大会及选出之执监委不能存在，该地党务另行派员整理。

△　外交部奉国民政府令，本年8月底将各埠交涉员一律裁撤，年

终裁撤各特派交涉署，嗣后各省通商、游历事凡属内政者归地方政府办理，临时如遇重大交涉，呈报中央办理。是日，饬各地交涉署遵令如期结束。

△　教育部长蒋梦麟赴杭州结束浙江大学区，改设浙江省教育厅，管理中小学校。仍组织浙江大学，蒋兼任校长，由教育部直接管理。

△　广州南堤原第二师弹药库起火爆炸，所存弹药全部炸毁，伤亡颇重，损失达数十万元。

6月21日　　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任命石青阳为滇康垦殖特派员。

△　冯玉祥偕李书城等到达运城。同日，冯电阎锡山，略谓："我弟将莅运城相迎，当此溽暑天气，万不敢当。兄渡河即赴太原，当与我弟在省垣欢聚。"

△　第十三路军石友三部奉命移驻亳、颍，是日开始移动，24日开拔完毕。同日，唐生智部李品仙之第五十一师、刘兴之第五十三师由商丘、兰封乘车西上，刘春荣之独立第十四师，魏益三之第五十四师亦由曹县、济宁向河南开拔。

△　俞作柏赴藤县督师。香翰屏由广州赴都城率部讨桂。

△　蒋介石电令何键星夜率部回师桂林，恢复失地。何接电后决定先以主力进攻平乐，然后再攻桂林，遂于28日着刘建绪、范石生各率所部由现地出发向平乐进军，限7月2日以前占领之；着吴尚率所部由现地出发，经兴安、大溶江，限7月2日到达甘棠渡附近，3日开始向桂林进攻，5日以前占领之；着周斓率所部由现地出发，经梅溪、西延，限7月2日到达六峒附近，4日到达义宁，5日协助吴师进占桂林。各部得令即开始行动，刘师于7月1日攻入平乐，吴师先头部队亦

到桂林附近。

△　编遣会第十五次常会通过以张之江为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仍用委员制，增常委二人，以张学良、朱培德补为委员，以蒋介石、阎锡山为常委；追认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吕焕炎免职，遗缺以李明瑞接充；由本会明令禁止驻闽海陆各军不得截留地方税捐等案。

△　中英会商接收威海卫和修约等问题，中方王正廷、徐谟、刁敏谦，英方蓝普森、福克司、台克满参加，中国要求无条件收回设在刘公岛及威海卫全湾英人建筑及炮台，英国则主张保留，修约问题亦无结果。22日继续会商，英方提出刘公岛保留十年，以作英远东舰队基地，中方不同意。对庚款英使表示可以交出。修约问题已有相当结果。决定将谈判情形报本国政府请训。

△　沪宁路与英银公司成立购车借款15.6万镑合同，本日由蔡增基与英方代表柯士比在南京签字。

△　国民政府依中宣部呈训令各省、市政府查禁青天白日社邮寄之《促开国民会议挽救中国危亡宣言》，并严密查禁各种含有政治性之集会，防范、制止其活动。

6月22日　蒋介石电约阎锡山在北平会晤。另电告何成濬，谓23日晚或可由南京赴北平，请何在平相候。

△　唐生智率第五路军部人员由兖州抵商丘，所部刘兴、李品仙两师前锋已到郑州。第六路军方振武部阮玄武第四十四师抵许昌、鲍刚师抵长葛。

△　蒋光鼐由汕头赴大埔，率部入闽追击徐景唐军。24日，陈维远部抵永定。同日，蒋应陈济棠电召回广州，入闽粤军共八团，归蔡廷锴指挥。25日，徐军廖鸣欧、王道部退向龙岩。

△　国民政府令：贵州省军民各政暂由龙云以第十三路总指挥名

义援照战时办法从权处理；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着即开复原职并将从前查办处分撤销；派李仲公、何辑五驰赴贵州，会同龙云、李燊商办贵州善后事宜。

△　东北军政首领张学良等议决，派步、炮、骑兵共七旅赴满洲里一带，并拟于必要时收回中东路。

△　范熙绩和孙殿英部奉令将即墨顾震部包围缴械。同日，杨虎城参谋处电南京报告山东郯城一带剿匪情形，谓攻克刘家庙，击毙匪首朱贵信、王毓和等，救出肉票500余人。

△　西藏代表诺那呼图克图谒蒋介石，报告西藏情形及今后治藏意见。

△　吴雷川就任燕京大学校长。何思源至青岛接收青岛大学。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和江苏省、上海市政府照《关于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各书店之办法》、《关于取缔印刷共产刊物之印刷所及工人办法》，严密取缔共产党刊物。

6月23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吴敬恒、赵戴文、孔祥熙、陈布雷、周佛海离南京北上。行前蒋发通电称："顷据阎总司令报告，冯焕章已抵运城，大局可望和平解决。中央此次处置，于伸张纪纲之中，本寓指导和平之意，已明令阎总司令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中正并于本日驰赴北平，约同阎总司令面商种切。""中央对于阎总司令正资倚畀，前请偕同焕章出洋考察，已由中正恳切挽留。"另电何成濬就近派员谒阎，申述挽留之挚意。

△　冯玉祥代表曹浩森、丁春膏自运城抵太原。丁称冯因患头痛未克首途，派彼等先行。曹下车即访熊式辉，并偕丁谒阎锡山。24日，曹语记者，谓昨与熊式辉接洽，对冯善后问题，均照阎、蒋前电商各条办理。又谓冯仍劝阎勿偕行，惟阎意坚难挽。

△　韩复榘部向商丘移动，马鸿逵部由郑州开济宁。

△　河南渑池遭匪劫，数百户被焚，架走肉票不下300人。

6月24日　冯玉祥离运城赴太原，阎锡山到介休相迎，当晚冯、阎晤面作竟夜谈。

△　阎锡山电武汉何应钦、方本仁及北平商震等，仍表示将偕冯玉祥出洋。同日，阎派宋澈、岳开侁赴日本筹备行馆。

△　范石生致书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立即下野。

△　杨腾辉部由桂平开赴武宣以攻柳州之敌，杨于25日亦前往督师。

△　蒋军第十师方鼎英部遵令由武汉回防蚌埠，第一批于本日到浦口，第二、第三批亦于一二日后相继开到。

△　东北当局公布并开始施行整理奉票办法，规定：一、以奉票大洋50元作现洋一元，由官银号充分准备现洋兑现；二、凡属省库征收机关所有课赋捐税及一切收入税一律按照定价征收奉票；三、凡属商民交易、私人买卖一律按官价使用奉票，违者重办；四、为充实汇兑基金，特发行第一次卷烟统税公债2000万元。

6月25日　蒋介石偕吴敬恒等抵北平。吴称，蒋此次北来专为与阎见面，其目的有二：一、商冯玉祥出洋事；二、和平处理西北善后。同日，蒋电阎约冯到平晤谈，并通电西北各将领称："此后编遣办法当悉照编遣会议原案办理，中央待遇各军向无歧视，所有西北军事善后并已委任阎总司令主持……望诸同志效忠党国，一致服从命令，并请合电挽留阎总司令。"

△　冯玉祥在阎锡山陪同下由介休到太原，阎当即电蒋介石报告，并通电说明冯已到太原，稍事摒挡即行放洋。午后冯在晋祠行馆

接见来访者，表示请一致劝阎勿与彼同出洋，又谓军队已交石敬亭，秉承中央意志办理。

△　国民政府令：冯玉祥已解除兵柄，自愿出洋游历，行经内地各处应责成阎委员派员妥为照料。

△　阎锡山、冯玉祥联名发出洋通电。同日，阎呈国民政府请辞本兼各职，俾便偕冯出洋，并谓所部军队已饬听候中央按照编遣会议编遣，晋、冀、察、绥四省主席及各委员拟请一并由中央遴选妥员早日接替。

△　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谭延闿、胡汉民等电阎锡山劝勿出洋。同日，东北要员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上海市长张群，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湖北省政府代主席方本仁，江苏省政府，中央军校党部等，亦电阎挽留。

△　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离梧州赴广州，28日与陈济棠、陈铭枢商善后，已拟定桂军编遣办法，军饷问题由二陈即席拍电中央请示，广西省政府准于7月15日在南宁成立，编遣处亦移邕。

△　桂系要员粟威自南宁电梧州俞作柏，谓黄、白均已离龙州出关，盼早日莅邕，俾卸重任。同日，南宁、贵县各界亦电梧表示欢迎李明瑞、杨腾辉。

△　投降李明瑞、杨腾辉之许宗武部占领永淳（今并入横县等县），桂军退南宁。同日，吕焕炎部进占龙山。

△　东北当局首脑会议结束，对“哈案”处置决遵中央意旨，在中央未公布办法前，巩固国防，对苏取冷静态度，日内派哈尔滨特教厅长张国枕赴南京报告，张景惠、吕荣寰回哈办理善后。同日，国民政府电令在中央未决定办法前，对苏交涉勿为局部之缔结。

△　中英再次会商威海卫案，英方蓝普森主张以旧约为准，中方

王正廷则提出新约，分歧较大。28日继续会谈该案，中方提出刘公岛须无条件交还，英使表示不能做主，待请示政府。谈判暂停，蓝普森离南京赴沪转平。

△　行政院第二十七次会议，依蒋梦麟提议，准照教育部拟定办法停止试行大学区制，浙江大学区及北平大学区限本年暑假停止，中央大学区限本年底停止。同日，浙江大学电教育部，谓浙江大学区拟即日开始结束，7月底取消，请求核准。26日，国民党江苏省执委会议决，函教育部立即取消中央大学区；江苏职教员联会亦议决请教育部准中大校长张乃燕辞职，反对张长省教厅，并请政府维持省税办省校原案。

△　是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分析目前的政治形势，重申今后继续执行中共六大规定的“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和各种宣言，确定了争取群众的15项任务。全会“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一致起来，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

△　阎锡山训令查禁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印发的《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和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印发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的起源、组织、纲领及其工作》等文件。

△　天津电车公司稽查与该公司工人又发生冲突，伤工人数人。26日，比代理总领事骆丰泰要求重办“肇事”工人，崔廷献召集总工会、公安局、社会局代表讨论应付办法。

6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八四次会议决议：推蒋介石、古应芬、胡汉民等11委员审查二中全会交议各案；改组广西省政府，任命曾如柏等为委员；改组河南省政府，任命韩复榘等为委员，

以韩为主席；任命赵丕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任命陈中孚为江苏省政府委员；任命陈布雷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任命马福祥为青岛市长，未赴任前由吴思豫代理。同时，依国民政府函追认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周西成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　国民党中常委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陈果夫、叶楚伧、孙科等电阎锡山挽留，谓“值此训政开始，方案初定，诸待实施之时，务祈权衡轻重，停止远游，牺牲约言，共赴国是”。

△　阎锡山电蒋介石称：“锡山拟行出洋，致劳我公溽暑远行，深感不安，短期内决来平进见，已嘱启予（商震）先行返平，面陈一切。”同日，阎派朱绶光偕蒋之代表熊式辉赴平谒蒋，请代向蒋作出洋之请。

△　阎锡山偕贾景德等赴晋祠晤冯玉祥，谈出洋问题。同日，阎电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及交涉员苏体仁，请代定赴日船位50个备用。

△　唐生智自商丘抵郑州，其总部亦移郑。同日，石友三率指挥部人员抵商丘。

△　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关系党国安危甚巨”，训令军政各机关严密防范。

△　吉林交涉员钟辑五奉东北政务委员会令，将“哈案”查抄苏领事馆所获文件送抵南京，谒王正廷谈话数小时。27日，钟又晤外部司长周龙光及中国驻苏代办朱绍阳商应付办法。

△　外交部照会驻华瑞典代办雷尧武德，以《中瑞友好通商行船条约》至本月14日期满，请即各派专员重订平等新约。

△　川军混战又起，赖心辉部被刘文辉指挥的张致和部驱逐出川，退往康边。

△　青岛日人火柴公司宣布停业，全厂650余工人被逐，经调停于28日无条件复工。

6月27日　蒋介石在北平招待新闻界，声称中国已进入真正和平统一时代，此后再无军阀出现之可能，并称改组派（按：系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完全是一班叛党背国的狐群狗党，冯全系上了改组派的当，中央对冯力持宽大，劝阎勿出洋。同日，蒋在平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讲话，抨击改组派“无政治道德，专事取巧，不足成事，亦不足为敌”，并称汪（精卫）如不离开党，中央自极端敬仰，如站在改组派的基础上，中央必严重予以处置。

△　阎锡山电蒋介石，谓冯玉祥出洋“系受本人之约，若不偕行，恐失信义，冯部结束问题由刘郁芬、马福祥赴平面陈”，“冯在革命历史上不乏劳绩，此次自觉出洋，请与以相当名义”。

△　熊式辉偕朱绶光抵北平见蒋介石，报告冯玉祥到晋后情形，谓冯决心出洋，对中央赆款至感，至欠饷支配及西北善后须待刘（郁芬）、孙（良诚）等到后会商，阎一星期内可来平，熊等濒行时，阎坚请转达蒋准许其出洋。

△　吴敬恒、孔祥熙、赵戴文奉蒋命抵太原，随即谒阎锡山谈此来任务，吴等携有蒋介石亲笔函劝阎勿出洋，同赴北平商洽国是。经吴等恳切慰留，阎始与吴、孔拟电报告中央，请撤销对冯处分，恢复官职，以便同行赴京。

△　何应钦电何成濬，谓：“焕章（冯玉祥）出洋，举国欣慰，西北军事善后非百公（阎锡山）莫属，尚祈力劝打消去意。”同日，方本仁电阎劝勿同冯远游。

△　李明瑞部占领南宁，原桂系驻南宁之朱为珍部事先退龙州，本日朱在龙州就任第八路总指挥部所委广西新编第一师师长。

△　杨腾辉部由武宣向柳州进军，并请何键夹攻柳敌，范石生部亦由平乐向柳州前进。

△　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关于南京市执委会呈请规定中央委员不得兼任行政长官案，此时不能有此限制；又请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兼任省府委员，并修正省府组织法，裁撤不兼厅长之委员案，交政府照此原案斟酌情形采纳施行；原则通过禁止各省预征钱粮；中央党务学校改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推蒋介石为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任李文范、余井塘、赖特才为中央法规编审委员会专任委员，指定李为主任委员；加派陈调元、范熙绩为山东省党务整委会委员；河南省党务指委邓哲熙等五人一律撤回，另派陈泮岭等八人为河南省党务指委。

△　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在辽宁召开军事会议，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张景惠、高维岳、邹作华、荣臻、于学忠、王以哲等出席，讨论接收津平与支配防务办法、编师进行与师长人选、在滦县设立东北边防办事处及饬海军司令沈鸿烈调海军往秦皇岛、责成哈满护路司令梁忠甲及呼伦贝尔镇守使张殿九等派兵防边等问题。

△　北宁路北陵支线通过日侨神原农场，经路局交涉将地赎回，但日侨于交涉妥协后忽反悔，本日日方军警率韩人百余拆毁铁道数处，将车辆推于道下，并插日旗及木牌，上书“神原农场、禁止通行”字样。当晚辽宁交涉署向日领严重抗议，要求惩凶、道歉、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　教育部长蒋梦麟咨请外交部向日方提出废止前北京政府承认之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及换文。

6月28日　吴敬恒、孔祥熙、赵戴文持蒋介石函赴晋祠慰问冯玉祥，并报告昨日晤阎锡山结果，请冯偕阎至北平商善后及出洋问题，冯表示不愿阎此时出洋。

△　阎锡山电告蒋介石，定29日离太原，30日到平晋谒。

△　韩复榘部离郑州东开，其参谋长李树春赴北平谒蒋介石报告一切。同日，韩电何应钦，略谓田金凯部已遵令集中禹州，服从中央系出至诚。

△　国民政府令派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李石曾、蔡元培、于右任、林森、宋子文、孔祥熙、林焕庭、叶楚伧、杨铨、戴季陶、陈果夫、孙科、古应芬、刘纪文、吴铁城为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并指定林森、林焕庭、叶楚伧、孙科、刘纪文为常务委员。

△　江苏交涉员徐谟致函驻沪领袖领事，声明民国十六年（1927）1月1日开始施行之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不适用现在情形。

6月29日　蒋介石在北平招待美国记者团并发表演说，声称中国已届统一时期，今后建设工作，务必使之实践，希望“昔之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实行解除，尤盼亲爱的美邦予中国以较关切之同情”。

△　朱绶光自北平携300万元赴太原，交冯玉祥作为西北军善后费，另有冯出洋旅费20万元。

△　何键重整部队反攻桂林、平乐，本日湘军吴尚部过兴安抵大溶江，与桂军发生接触；另一路湘军占领恭城，30日过沙子街，到达平乐附近。7月1日，何接蒋介石电令停止入桂。后即电各部队停止待命。

△　中法越南陆路商约交涉续在南京谈判，中方王正廷、张维翰、徐谟、胡世泽，法方玛太尔、粤斯特鲁、阿拿大、茄乐参加，法使玛太尔报告法国政府研究前订草案情形，谓补充修改甚多，并提出书面意见，中方须详加研究，未能即议，遂散会。

△　驻安徽芜湖新编第七旅第一团陈国材部哗变，走宣城转赣闽边，该旅旅长李崎电皖南各县进行堵截。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会决议查禁反帝大同盟、取缔劳资争议结队请愿、7月9日北伐纪念不得结队游行等案。

△　上海药业工人罢工。30日，市党部令工人最迟7月2日前复工，并函警备司令部，到期如不复工即驱逐出店，对有越轨骚扰情事者拘拿法办。

△　红四军攻克福建适中（位于龙岩东南）。

6月30日　阎锡山偕吴敬恒、商震等抵北平，谒蒋介石，报告冯玉祥出洋确具决心，说明本人须同行之苦衷，请中央解除其本兼各职，并转交冯致蒋复函。蒋力劝阎勿出洋。下午，蒋复至阎宅再三挽留。同日，阎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略谓此来见蒋面述出洋诚意，并辞行，蒋虽挽劝，但决心已定，拟7月15日同冯夫妇在天津乘“南岭丸”出发，先至日本，渡过夏季再游欧美，家属及贾景德（秘书长）、南桂馨（前师长）等随行。晋、冀、察、绥四省党务及军事善后已完全交还中央，晋省主席以傅作义为宜，余当力保。至西北宣慰使当然未能就职，西北将领及军队处置权固操之中央，但依余私见以维持现状为宜，中央允诺之300万元善后费决定由余转交，行前拟将此款领到交冯支配。

△　阎锡山复国民政府26日电，略谓：“锡山身许党国，何忍言去，惟此次宁息西北，实具苦衷。伏冀俯念锡山出国确系积极的为国家筹和平统一，非消极的以鸣个人高蹈，特恳俯允，俾得遄行。”同日，阎电编遣委员会说明冯已到晋，“惟有力践前约，一同放洋，庶几和平统一可以彻底实现。至于锡山与冯总司令所部即照编遣议案一律进行，当然相安无事，此实党国安危，非仅个人出处”。

△　29日开幕之国民党长沙市党代大会，因派别纠纷是日被清乡

司令部职员何柱国等30余人捣毁，殴伤10余人。7月1日，湖南省政府临时会议议决，饬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并函清乡司令部对肇事者严拿究办，派兵驻会保护。

7　月

7月1日　　国民政府任命曾如柏、梁世昌、李明瑞、梁史、杨腾辉、卢奕农、李权亨、雷沛鸿、郑介民、范石生为广西省政府委员；梁（史）、梁（世昌）、雷、李（权亨）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原省府委员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粟威、伍廷飏、黄蓟、雷沛鸿、朱朝森免职。

△　国民政府任命陈布雷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奉蒋介石电召“整理北方党务”，是日离京赴平。

△　中英签订海军合同，国民政府得派海军学生赴英见习，并向英购买军舰数艘，英派专家来华襄助。

△　徐景唐部自福建上杭、武平退广东蕉岭；蔡廷锴师由松口向蕉岭包围。同日，湘军刘建绪师克平乐，吴尚师进驻兴安，准备进攻桂林。

△　红四军朱德、毛泽东部自适中返回龙岩。

△　豫南光山等地群众和革命红枪会万余人，配合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和黄安地区武装向盘踞白沙关一带地主武装发起进攻，是日攻占白沙关，并建立“豫南红军司令部”。

△　教育部通令查封《纪念广州惨案》、《中国工人》、《布尔塞维克》等18种进步刊物。

7月2日　　国民党中常会及国民政府发电挽留阎锡山。同日，阎晤蒋介石，仍表示决与冯一同出洋。下午，阎接见方本仁，以条件未洽，忽称吐泻入德国医院，谢客养病。

△　国民政府任命韩复榘、张钫、张鸿烈、马鸿逵、韩多峰、石友三、李树春、何其慎、王向荣、李敬斋、杨冏、袁华选、张静愚为河南省政府委员，韩复榘为省政府主席，李树春、杨冏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厅长。原省府委员冯玉祥、刘镇华、邓哲熙等免职。

△　黄绍竑抵香港，与李宗仁同住青山桃园。

△　徐景唐部退赣南，欲出赣西奔湖北归张发奎改编，粤省当局电韶关余汉谋派兵堵截。同日，徐军廖鸣欧部3000人在广东兴宁贝岭被蔡廷锴旅缴械。

△　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赴粤筹款，是日在广州发表谈话称：杨腾辉师已进驻南宁，伍廷飏出走安南，桂系驻柳州之徐启明、梁朝玑部4000余人输诚，听候改编。3日，粤方表示筹款事爱莫能助，俞空手而归。

△　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各中学校长赴教育部请愿，申述中央大学区延长之流弊，要求即时废止；指责张乃燕不照任免条例任免中学校长为毁法，要求纠正。

△　山东博兴县民众代表舒耀南等20余人到山东省政府请愿，谓任应岐部从该县撤退时屠焚全城，民众死亡十之四五，要求派兵剿除和救济。

7月3日　　蒋介石以河北省党务复杂，是日在平发表党务政治谈话，称党内不应有小组织，并声称“国民政府之基础已十分巩固”。同日，陈果夫抵平与蒋会商整理北方党务方针。

△　外交部长王正廷复照驻华使团领袖公使欧登科，谓收回临时

法院系外交问题，应由外交部与关系国公使直接交涉，不宜委诸地方代表审议。同日，王正廷赴沪，与法使玛太尔继续会商中法越南陆路通商条约。

△　徐景唐部于兴宁败后，退向赣边“三南”（虔南、龙南、定南），粤军总部电请赣军出师会剿，并调香翰屏部由西江集中英德、韶关，防徐部北逃。5日香部抵韶关，6日香率巫剑雄、陈枚新两团取道入赣向“三南”进发。

△　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电告国民党中央，谓桂系已告肃清，徐景唐、邓世增决计出国；吕焕炎、许宗武各部候命改编。

△　红五军彭德怀部与赣军在遂川激战后，转入井冈山。

△　南京中学学生400余人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一、取消大学区制，设立教育厅；二、罢免中大校长张乃燕；三、请令中央大学收回更换中学校长之乱命；四、挽留南京中学校长沈履。

7月4日　　蒋介石在北平陆军大学演讲《我们为什么要入党，我们为什么要以党治国》，宣称：“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绝不能够再有第二个党起来，也不能让第二个主义出来，我们只能用一个党、一个主义来号召，来领导。”

△　蒙藏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报告，英人在西藏大肆侵略，贱收原料，贵卖成品，不准抽税，并建筑印藏铁道，嗾使藏兵抢占西康20余县。

△　贵州周西成部毛光翔、黄丞谟、廖怀忠等部数万人攻下贵阳。

△　红五军彭德怀部克宁冈。6日，何键派门炳岳部赴茶陵防堵。

7月5日　　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对冯玉祥之通缉令，声称：“前因豫

鲁撤兵，行为越轨，政府为申纲纪，不得不加以制裁。近据调查情形，冯玉祥养病华山，深自怨艾，遵令解除兵柄，愿即出洋游历，政府追念前劳，允宜曲示宽大。”

△　阎锡山在医院对何成濬宣称：目前时局症结，仍在军权问题未得解决，主张先将第三集团军按照编遣会议决议案实行编遣，然后再编遣第二集团军，如此，西北根本问题可得解决。

△　邓哲熙、马福祥奉冯玉祥命，先后离晋赴平晤阎锡山，探询与蒋会谈真相及协商西北善后具体办法。

△　外交部决定对中东铁路采取强硬态度，是日蒋介石电张学良，谓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不得已时可绝交，并嘱东北边境戒严。

△　外交部对日军警无理拆毁北宁路案，二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一、处分参与此事之军警；二、恢复铁路原状；三、赔偿一切损失。

△　驻沪英军司令博来德就英兵泼赖斯无理殴毙上海市民张学亮一案宣称：科处泼赖斯监禁一年，遣回英国陆军监狱执行。6日，上海各民众团体异常愤慨。“张案”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各界同胞为争取恢复民族地位而奋斗。

△　中法越南商约会议继续举行，王正廷对法方新提案加以驳复，指出三点：一、华侨在越南有历史的固有权利，不能与其他国家并论；二、通过税废除，国际约法有明文规定；三、滇越路签订在数十年前，与现状不合，非修改不可。法代表允电政府请示。

△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下令班师回湘，所有军队限一星期内撤回。何即日返省。

7月6日　国民政府再次电挽阎锡山。

△　立法院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禁烟法》。胡汉民在会上谈时局时宣称：“这三个月中时局的转变非常剧烈，在政治上几乎又回复到去年那种混乱的状态。”

△　张学良抵天津，旋即发表声明，谓赴平目的乃奉蒋电召，特来报告东北易帜后军政情形，探望阎锡山病况，挽留其出洋之举，与王正廷会商解决东北外交问题，并表示以中央之意志为意志，协助中央实现统一。

△　国民政府任朱绍阳为驻芬兰特命全权公使。

△　汉口水杏林案是日由交涉员李芳与日领在汉正式签字解决，日方出抚恤金360元，并书面道歉。

△　陕西赈灾救济会具呈国民政府请速发赈款救济，内称：“西北各地赤地千里，田间颗粒无收，树皮草根掘食已尽。政府无施赈之粮，人民无可逃之路，仅长安一隅，每日饿毙者不下数百人。……更可伤者，饥民卖妻鬻子，易子而食，而全家服毒自杀，惨苦情况，摧痛无极。”

7月7日　　张学良抵平，随带卫队约千名，汽车20辆。傍晚，阎锡山往访。晚8时，蒋介石、张学良谈东北党务等问题。

△　马福祥、邓哲熙、张允荣抵平。下午，马赴北京饭店见蒋介石；张与邓到医院谒阎锡山。

△　辽宁日商劝业公司强占新民县农民土地200余亩，并枪伤村民，村民奋勇抵抗，夺下枪支与日方交涉。日领事竟不理。

△　北平商民千余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迁都北平及取消崇文门税关，无结果。

△　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记者招待会，

报告庚款来历，反对国民政府挪用庚款。

△　河南省赈务会派代表李环侬、周小范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向各界呼吁，略谓：河南旱魃为虐，加以兵匪，民不堪命。河南110余县，而省府所能管辖者仅七县而已，其余百余县之县长、厘税局长均为当地驻军所委派，军政不分，颇为混乱。现各县土匪峰起，已剿不胜剿。

7月8日　　晨，阎锡山出院回私宅，对记者表示：待蒋回京后，本人即将返并，督率办理“二集”、“三集”之编遣事宜，大抵三个月可办完，届时再偕冯玉祥出洋。并称“二集”编遣主任为鹿钟麟，石敬亭副之，本人为监督编遣，冯已表示同意，且电令马福祥列席北平会议。

△　蒋介石接见张学良、马福祥谈对付苏联问题和西北军编遣问题。上午9时半，蒋、阎、张举行会谈。

△　国民党天津市执委在蒋讨冯期间，未作讨冯宣传，此次整理北方党务，恐遭不测，是日总辞。

△　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邓泽如、范其务、许崇清、孙希文、林云陔、曾蹇、林翼中、金曾澄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陈铭枢为省政府主席。以陈、范、许、邓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原任徐景唐、冯祝万、伍观淇等均免职。

△　国民政府电令东北当局：“东铁电报、电话关系赤化宣传，应速收回。”同日，东北电政监督蒋斌抵哈尔滨。张景惠在哈召开会议，决定对中东路采取断然措施处置。

△　国际商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会，中国代表提出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英、美、法、日等国代表反对。

△　粤军香翰屏旅抵南雄向信丰推进。蔡廷锴旅克安远，徐景唐

部被俘600余，缴械500余。

7月9日　　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及何成濬等在平外交大楼宴会，并商议东北外交、西北善后、编遣等问题。下午，蒋、阎、张同赴西山举行会议，与会者有冯玉祥之代表马福祥及方本仁等。会议决定由阎锡山处理西北军善后，张学良回东北发动反苏的中东路事件。

△　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举行北伐三周年纪念会，胡汉民先后在两个大会上作报告，宣称：军事时期已告一段落，训政时期建设正在开始，要增加军事成功之价值，尤须致力于建设。

△　贵州周西成部下毛光翔等攻入贵阳后，组成临时政务委员会，是日，委员毛光翔、卢涛、王显芳、胡仁、周培艺、熊逸滨、彭文治、马空凡、谢勋陶、陈公亮、蒋亦莹、邱连昌、潘慎勤、杜运枢、赵蓄乘在省府就职，推毛光翔为政务委员会主席。

△　北平教育界代表往北京饭店见蒋介石，反对用庚款筑路，由周佛海、陈布雷接见，允代为转达。

7月10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及驻苏公使朱绍阳等抵平与蒋介石会晤。下午蒋、阎、张（学良）、王举行会议，讨论西北问题及东北外交。当晚，蒋、阎、张先后离平。蒋行前招待报界宣称：与阎、张晤谈结果，一致认为应服从中央，遵守命令；编遣军队，各区同时举行；返京后将立即召集编遣主任会议。

△　蒋介石发表《告北方青年书》，指责北方青年惯提出空洞口号，攻击中央，小团体观念重于党的观念。关于民主，蒋说："中国的人民和本党下层同志，事实上大都是幼稚的，而且情形与思想是复杂不纯的，无论党内或党外要实行民主，非经长期训练不行。"

△　东北电政监督蒋斌派哈埠电话局长沈家桢率员接收中东铁路电讯机关。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下令将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

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查封，并解散各职工会。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准该路华副局长郭宗熙辞职，遗职委派范其光代理。

△　徐景唐残部遭粤、赣军围攻，自“三南”退至信丰，前后受敌，遂向粤军第一旅叶肇团投降。

△　韩复榘电蒋介石请辞河南省政府主席。

△　红四军朱德、毛泽东部攻克上杭、永定，距广东大埔仅30里，大埔县长电汕告急，蒋光鼐调张世德团由松口赴大埔防堵。

△　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以大学区制被取消，庚款复改作他用，教育经费无着，提出辞职。是日国民政府复电慰留。

△　上海沪西劳勃生路日商东亚制麻株式会社纱厂工人1800余名，要求增加工资，厂方不理，全体罢工。

7月上旬　　红军在闽、粤、赣边区进行武装斗争，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红色区域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附近广大农村和龙岩、永定两座县城，成立了长汀、永定、龙岩三个县的革命委员会。

△　湖南第一警备军第三团团长向子云率部进犯桑植，红军贺龙部采取诱敌深入战略在南岔地区将其全歼。

7月**11**日　　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与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交涉规定局长权限，要求双方平均用人，并用中苏文字，及建立中苏局长会签制度，遭到苏局长叶穆善诺夫的拒绝。吕荣寰即将叶撤换监视，以范其光为代理局长。同日，张景惠要求在哈埠及中东路沿线之苏联人全部于12小时内退出国境。

△　日本当局对中东路事件表示中立，认为此次断然处置系蒋、张在北平会议之结果。同日，日本政府突然令关东军在长春建筑大兵

营，经费为100万日元。

△　北平外交团因上海领袖领事克银汉将南行，特召集非正式会议，交换撤废领事裁判权等案之意见，各公使认为组织中外预备委员会之时期已到，而交付领事裁判权之时期尚有相当之过程，均称须向本国请示后方能答复。

△　海军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自马江乘舰赴厦门指挥进攻红军。12日抵厦门后，即电漳州邀张贞会商军务。17日，杨、张等在厦门会商“剿共”计划，决定第一师出兵三团，省防军、陆战队出兵三团，共六团，四团在前线，两团任预备。

△　北平大学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要求北大直属中央，请任蔡元培为校长，恢复“北京大学”原称。

△　上海市民举行收回租界宣传周，是日开宣传大会，各界代表发表演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无条件收回上海租界”、“反对驻沪英国兵擅杀华人”等口号。

△　昆明火药库爆炸。13日，云南代主席胡瑛电驻沪滇省交涉员张维翰，谓火药库因搬运管理不慎，造成火药爆炸，毁屋无数，死千人，伤六七千人，请商中央拨款救济。

7月12日　　国民政府下令，宣称现在大局敉平，全国军队除“剿匪”区域外，均应复员。关于编遣事宜，“着国军编遣委员会依照议定原则，迅即分别编遣”。

△　阎锡山赴晋祠晤被软禁的冯玉祥，面述在平与蒋、张会议经过，解释因各方坚留，未克即行出洋苦衷，并协商编遣事宜。

△　驻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函告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谓苏联政府已派交通次长谢列布良阔夫来华谈判，希望和平解决。吕即向南京政府请示。

△　王正廷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宣称收回中东路已预先知道；并称："俄人宣传共产，常利用电信机关为普通宣传，故首先接收电讯机关。"

△　张汝骥、胡若愚趁龙云用兵贵州，由四川暗袭昆明，师次昭通，被滇军击溃。

△　红军四川第一路军邝继勋、恽代英部在四川西充、蓬溪一带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16日，川军刘文辉派邓锡侯、黄隐部进攻红军。

7月13日　苏联照会国民政府，声明愿意以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一、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二、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该路之专制行为；三、从速释放被拘捕之苏联人员，停止排苏行动。照会并警告中国须顾及拒绝此项提议后所产生之不良结果，限三日内给予答复。

△　驻哈尔滨日总领事八本代表各国领事访张景惠，对中东路问题提出抗议。略谓："从国际信谊，世界交通立场，希望问题迅速解决。"同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声称："中国当局若侵害日人在东三省利益，日本必以极端之方法抵抗之。"

△　闽西永定县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大暴动。是日，当地豪绅向国民党当局发电求救，略谓：永定自5月24日被红军占领后，本地共产党领袖张鼎丞、阮山等即成立红军赤卫队。6月4日红军返回龙岩，张等复组织永定革命委员会于湖雷。7月5日前举行第二次暴动，各乡村又成立苏维埃区分部。最近又在举行第三次暴动。并称："省防军卢新铭旅自红军到后，逃匿无踪，不知去向；陈国辉旅被朱、毛击溃，全师覆没。"

7月14日　蒋介石偕赵戴文、孔祥熙、周佛海、陈布雷等抵南京。据蒋之幕僚宣称，此行结果：一、阎、冯均暂缓出洋，全国同时

进行编遣，冯不任编遣职务，亦不离晋；二、北方及两广、云、贵均停止军事行动，军队各归原防；三、二集团军将领将发服从中央通电；四、张学良晤蒋、王后，东三省外交听命中央，对苏外交及收回中东路采取断然手段。

△ 苏联政府致国民政府之照会由驻苏代办夏维崧电达南京，蒋介石立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及外交部要员会商对策。

△ 上海青年学生1000余人在舢板厂、新桥等处作反帝宣传，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遭到中外探捕镇压，被捕27人。

7月15日 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赴平与阎、张会谈经过，宣称：赵、孔二委到太原见冯玉祥，冯称反抗中央通电是改组派借刀杀人，不能承认，要求政府彻底根究。故中央以宽大为怀，取消通缉令，西北问题完全可以和平解决。关于中东路问题，蒋称：“过去和现在苏俄是我们主义上最大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定须先把中东路收回。”

△ 中东路形势转趋严重，是日，哈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接收中东路地亩局及图书馆。

△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正式成立，俞作柏就省政府主席职。

△ 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东路事件对策，认为苏已派出谈判代表，此次照会不过表示不满之意而已，故无须在一定期间内答复，拟照已定方针进行，以期达到完全收回中东路之目的。

△ 日使芳泽由北平奉召回国。

△ 红五军彭德怀部自宁冈追敌至安福城边。敌门炳岳旅驰援。

△ 江西省政府决定裁撤厘金及统税，实行特种消费税制。

△　农矿部垦务会议开幕，制定垦务政策及全国垦务计划，20日会议闭幕。

7月16日　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宣称对于中东路之处置，“纯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权宜之处置”。声明苏联政府若能释还拘押之华侨，对于中国旅苏侨商及团体予以保障及便利，则中国对于东省被捕之苏联人员及查封之机关，亦可于适当时机予以相当之待遇。所有中俄关系各事及东路问题，均可由驻苏公使朱绍阳回任时与苏商洽，谋求合理解决。

△　中东路督办吕荣寰通电中外各报社，宣布执行“中俄协定”之经过。称按照协定，双方权利悉应平均，因俄方把持，以致协定精神未能实现。

△　苏联谈判代表突然中止来华，待南京复照如何再定行止。

△　行政院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外交部长王正廷提议，裁撤各地交涉署，分期增设驻外总领事馆五，领事馆13，副领事馆10。

△　何键在衡阳召开军整会，商讨整训军队，“围剿”湘西及鄂属石首、监利红军。

△　日本对北宁路交涉表示拒绝，是日驻上海日领事署将拘捕之华籍韩人吕运亨密解赴日，准备转解朝鲜处分。

△　孙科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代表佐治·施赖德，就100万美元之航空借款正式签字。30日，美国飞机五架由美轮“林肯号”装运到沪。

7月17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与中国绝交。略谓：中国政府否决苏联三条和平提议，用友善态度调解中东铁路争执问题之方法业经罄尽，苏联政府不得已采取下列方法：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

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

△　鹿钟麟允就二集团军编遣主任，即日离沪赴潼关。

△　中华国货维持会浙丝绸机织联合会电外交部，请抗议越南本月3日起实行新税制（值100抽50），要求仍照旧章最惠税（值100抽5）办理。

△　福建省防军旅长陈国辉自龙岩败逃同安，余部仅剩三营，是日省府令缩编为独立团，以营长陈荣亮任团长。30日，陈通电下野表示服从。

△　金汉鼎在吉安召集的闽、粤、赣三省“剿匪”会议结束。同日，粤军三团入闽协助“剿共”。19日，粤军总指挥陈济棠又令蒋光鼐师入闽助战。

△　永定河流域12县代表赵维新等到河北省政府请愿，因连日雨量过大，要求将金门闸加木板以资防堵，但无结果。18日，永定河决口成灾。

7月18日　下午，苏联二次照会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召集高级干部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决定对苏来照不予答复，准备发表宣言请各国主持公论，并公布前从哈尔滨苏领事馆所获之文件。

△　蒋介石电阎锡山、张学良告以中央对中东路事件方针，谓：“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改组四川、绥远、天津党务机关，派卢师谛、石青阳等八人为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徐永昌、王靖国等七人为绥远省党务指导委员，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鲁荡平等为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

△ 张学良离北戴河返东北，21日抵沈阳。

△ 济南商民协会、各工会、学联会、妇女协会等团体三万余人，赴山东省济南市党部及政府请愿，要求严办侵吞公款之商会会长于耀西，陈调元派白玉剖代见，谓于已被逮捕，应候法办。

△ 在沪白俄旧军官开会议定，凡无职业且在从军年龄者，将悉赴国军投效。

7月19日 国民政府为苏联对华绝交事发表对外宣言，声称："此次中东路事件之发生，乃由苏俄政府违反中东路协定精神之全部，及指使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与利用中东路机关及其人员之名义，为其宣传共产主义等事实而起。"同日，外交部正式公布从哈埠苏领事馆搜获之文件。

△ 苏联使领馆人员下旗回国，在华苏侨托德使馆保护。同日，苏联中央交通委员罗佐泰克宣布：中国军队若不侵入苏国境，苏联政府不向中国宣战。

△ 美国务卿史汀生与英、法、日三国大使会商，拟用"公断程度"解决中苏问题。

△ 第三编遣区主任周玳语记者称：三区编遣纯系自动，确无保持均势意味，为免观望，决从三区开始编遣，照规定应遣长官7000余、士兵八万余。第三编遣区已设总务、军务、遣置三局进行工作。总部被裁人员约700人，8月底一律停薪。

△ 济南市各民众团体三万余人又赴山东省政府请愿，要求严办市公安局长徐朝桐，因徐有包庇于耀西行为。省政府被迫将徐停职查办。

7月20日 蒋介石致全国将士电，宣称"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要求共同努力以保国权。同日，蒋又致电西北将士，宣称"中央

对于全国部队，一视同仁”，要求“振作精神，激励士卒，巩固西北边防”。

△　王正廷在沪语记者，谓对中东路事件仍当以外交手续和平解决。

△　苏联军舰在黑龙江、松花江合流处截住中国商轮二艘。同日，张学良电国民政府报告，称：“苏军在绥芬河用炮向我军射击，我军尚未还击”，“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俾中央与地方联贯一气，相机应付，事机迫危，不容再迟。”

△　国民党山东省整委会会同公安局将济南市党部、商会查封，并令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7月21日　驻苏代办夏维崧电告外交部，略谓：苏联政府对其边境之军事行动，严加制止，加拉罕已表示愿避免军事行动。

△　美国务卿史汀生电令驻平美武官速往中苏边界调查实况。次日，美海军武官波渥罗大佐、陆军武官马克律特少佐赴哈尔滨调查。

△　上海招商局“新康”轮由沪开津，是日下午1时许，行至山东成山角海面被日轮“龙野丸”撞沉，伤亡乘客60余人。烟台分局电日本邮船会社交涉。23日，招商局出面交涉，要求日方赔偿一切损失。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设科学研究补助金当选名单揭晓：甲种补助金获得者，丁文江、赖其芳、张春霖、严济慈、吴定良、饶毓泰六人；乙种补助金获得者，王竹泉、赵忠尧等14人；丙种补助金获得者，汪敬熙、戴芳兰等19人。

7月22日　国民政府文官处通电全国军民应沉着观变，内称：政府早定维持世界和平、保障本国主权独立之方针，中东路事件“苟非苏联以武力相凌，兵衅决不轻自我启，溯自十八日迄今，绝交已赓五日，东省长官来电，尚未有军队接触之正式报告”。同日，蒋介石在

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称："政府是采取和平方针与镇静态度，决不至与俄国开战。"孙科启程北上调查中东路事件。

△ 苏联政府发表宣言，谓恢复中东路原状为和平解决之第一要件。同日，驻哈苏总领事梅里尼可夫访交涉员蔡运升，表示将在哈多住数日，以便联系和平解决中苏问题。

△ 日本外务省举行会议，关于中苏问题，决定派驻沪总领事重光葵回任与国民政府接洽。重光葵即日由东京启程。

△ 国民党中央以天津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连日来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是日电令天津当局制止一切反日运动。

△ 国民政府任命李鸣钟为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

△ 教育部公布《蒙藏学生待遇章程》，凡12条，规定每年学校开学可以保送蒙、藏生，分别奖励或保送国内外相当学校升学，毕业后可由蒙藏委员会择优介绍工作。

7月23日 外交部宣称：中苏邦交虽然断绝，但不无和平之途径，故不能视为完全决裂。同日，朱绍阳语记者：俄事确已和缓，决不再兵戎相见，二次来照亦无答复必要；并宣布即将北上，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交涉。

△ 中东路苏职员300余人罢工被拘，是日解至哈尔滨监狱。

△ 阎锡山电辞西北边防长官之委任，对苏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

△ 编遣实施会议第一次预备会在南京召开，到会者朱培德、贺耀组、陈仪、杨杰等人，讨论编遣实施方法，并决定24日开第二次预备会。

△　闽、粤、赣三省合力追攻红军。粤军分两路入闽，以陈维远为总指挥，率两团由三河埧趋永定；张世德率三团由松口攻上杭。

△　北平大雨成灾，市内房屋倒塌7000余间。同日，永定河又决30丈，数十万灾民呼吁发粮救济。25日，大清河决口11处。

7月24日　　外交部遵国务会议决议，训令驻苏使领即日下旗回国，实行中苏绝交。

△　东北当局就第三国际决定8月1日在海参崴召开亚洲工人代表大会事，分电文武各官吏严加防范，如有请假半月以上之工人，有赴海参崴之形迹者，即行拿办。

△　驻日苏使访日外相币原，声称中东路问题不愿第三者调停。

△　满洲里苏领事为避免双方军队冲突，与中国方面约定，将入满洲里之苏军主动撤退。25日，哈尔滨苏总领事梅里尼可夫偕蔡运升抵吉林访张作相，旋即返长春。

△　北平美、英、法使馆专员抵哈尔滨调查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派秘书随行。

△　美国总统胡佛在华盛顿宣布《凯洛格非战公约》即日生效。

△　中波修约会议在南京外交部举行，双方决定废弃北京政府所定之商约草案，重订新约。

△　云南龙云电告国民政府，称19日抵省，值胡若愚、张汝骥等窜至近郊，当即饬部下将其击溃，败走迤西。

7月25日　　苏联政府发表文告，详述白俄在远东之活动，谓此种白俄得到中国当局之直接援助。

△　驻苏代办夏维崧及其随员离苏赴芬兰，使馆事务托德使照

料。

△　驻沪日总领事重光葵抵沪，即拜会外交部长王正廷。晚，重光葵语记者称：中苏问题希望能及早和平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日修约交涉待芳泽公使回华即可开议。

△　王正廷、玛太尔在沪续开中法越南通商条约修约会议，除通过税需各自向本国政府请示再议外，其余大致决定，并签声明书，以免再有异议。

△　编遣实施会第三次预备会讨论编遣分区、军额编制、编遣标准等案；决定邵力子为编遣实施会议秘书长，会期定五天。

△　蒋介石电湖北编遣处，饬令各部“进剿”洪湖红军。同日，湖北省编遣特派员刘峙致电黄安夏斗寅、光山李永安、蚌埠方振武“会剿”河南商城之红军。

△　湖北省立第三、第七、实验三小学教职员赴教育厅请愿，要求收回撤换三校长之成命，遭到门卫武力镇压，伤张实之等四人。29日，湖北教育界代表在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罢免该省教育厅长黄昌谷。

△　上海杨树浦英商自来水厂工人组织工会，厂方不加认可，并借故将积极活动之工人开除三名，为此全厂400余工人罢工。

7月26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特任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任命刘大白为教育部常任次长；公布《考试法》、《禁烟法》。

△　驻苏公使朱绍阳偕吉交涉员钟辑五等由南京乘专车赴哈尔滨，调查中东路事件。王正廷语记者称：朱绍阳启程赴哈，如苏赞成直接谈判，即可命其赴莫斯科会谈。

△　编遣实施会第四次预备会讨论兵额编制及裁留标准。全国兵额拟定80万。

△　阎锡山电国民政府，请拨士兵编遣费290万，官佐编遣费300余万，及欠饷400余万。

△　蒋介石召滇、黔驻南京代表李培天、谭星阁，询问两省军事实况；并任毛光翔为第二十五军军长，令龙云对胡若愚、张汝骥等须速剿办。

△　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凡26条，规定大学分国、省、市、私立四种，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方得称大学，否则只称为独立学院。同日，公布《专科学校组织法》，凡13条，规定专科学校分省、市、私立三种，修业年限为二年或三年。

7月27日　满洲里前线中苏军队各奉政府命令后撤10余里，听候和平解决。

△　蒋介石召胡汉民、戴季陶、古应芬、王正廷等会商中苏问题，至夜12时始散。

△　蒋介石电邀阎锡山出席编遣实施会议，阎以病后体弱，且正办编遣，电蒋辞谢。

△　日本向长春、珲春等处增兵将近4000名。31日，日本又在长春增兵2000名，委关东军司令长官田英太郎任总指挥。

△　何键决定派刘建绪、吴尚、周斓三个师共20团担任“清乡”，并限期三个月“剿灭”红军贺龙部。先期者赏一万元，如期者赏5000元，越期者严惩。

7月28日　张学良任命张作相为国防司令，万福麟为副司令，熙洽为参谋长。

7月29日　驻达普里亚之苏军司令部电满洲里东北军司令部，略谓：中东路问题希望和平解决，苏现已委梅里尼可夫为全权代表，请中国速派交涉员蔡运升前往接洽。同日下午6时许，蔡运升与东铁理事李绍庚及英、法领事前往满洲里。

△　编遣实施预备会开第六、第七次会议，决定设中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编遣区，第四区归编遣会直接办理。

△　鹿钟麟、薛笃弼、唐悦良等西北要员由沪到南京。鹿语记者称：编遣贵有标准，须先点后编，而点验全国军队谈何容易。目前彼此不无猜疑，如能开诚布公，编遣始克有济。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50万人参加之反苏市民大会。

7月30日　蔡运升晚抵满洲里后，即偕李绍庚专车到苏境第86号小站（距满站60里），与苏代表梅里尼可夫在火车上举行中苏会谈，内容为：一、中止两国军事行动；二、决定召开和平会议之时间及地点；三、和平会议，以1924年之协定为基础；四、从速恢复西伯利亚与中东铁路之联络。

△　蒋介石电派何成濬赴太原，促阎锡山就西北边防长官职。

△　湘军独立第九旅李韫珩与慈庸桑清乡司令张义卿部在桃源发生激战，焚烧民房800余栋，死伤军民1000余人。

△　浙江大学区结束，教育厅长陈布雷正式到职，着手组织教育厅。8月10日，浙江教育厅正式成立。

△　上海招商局“新康”轮交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报告交通部咨请外交部与日本交涉情况。31日，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向日本邮船会社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　河北省连日大雨，各河均泛滥，唐山倒屋1200间，宝坻、安

次两县城全被淹没，人畜皆有极大伤亡。

7月31日　　中苏边界会谈今晨散会，会议除同意提前恢复通车外，余无结果。苏联代表提出：中国借口取缔苏联宣传“赤化”，致以武力蹂躏协定，今后交涉能否圆满进行，当以中国方面态度为先决问题。会后，蔡回满洲里，梅领返赤塔，各电本国政府请示办法。

△　编遣实施会议开第九次预备会，讨论各编遣区遣置分局条例、官兵遣散费等案。全国兵额若定80万，将分为65师，军费每月需3300万元。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李济深准恢复自由。

△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奉命结束，组织案卷保管委员会，各部职员全体离职。同日，河北省党部全体执委电国民党中央，声明自8月4日起自动离职。

△　国民党军分三路进攻闽西红军：闽军张贞师任中路，林秉周、萧叔宣两团为左翼，金振中团为右翼，与长汀赣军金汉鼎部、永定粤军陈维远部为犄角，向龙岩、永定、上杭进行包围。

是月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举行，提出“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割据”的总路线和必须完成的18项任务。通过了《政治决议案》。会上，邓子恢对闽西党的工作做了总结。毛泽东就如何巩固和发展红色根据地方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8　月

8月1日　　编遣实施会议开幕，到曹浩森、何应钦、朱培德、张之江、张学良（王树常代）、杨树庄（陈季良代）、胡汉民、赵戴

文、李鸣钟、唐生智、朱绶光、周玳、刘峙、刘镇华、石友三、方振武、石敬亭、陈调元、杨永泰、马鸿逵、鲍文樾、宋子文、何键等300余人。蒋介石致开幕词，痛陈裁兵必要。下午第一次大会，何应钦报告中央、第一、第四各编遣区编遣经过；通过编遣部队裁留标准等案。

△　国民政府公布《考试法》。

△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白逾桓、张华炽等人，称："白逆逾桓在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即已背叛总理，近复与其党羽张华炽等匿身海外，主办反动刊物，企图煽惑民众，颠覆党国。"

△　闽军在漳州开"剿共"军事会议，当晚下令向龙岩总攻击。

△　是日为南昌起义纪念日，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宣布特别戒严。北平有大刀队乘车巡逻。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前群众呼喊口号、散发传单，被捕20余人。

△　吉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相兼校长，李锡恩任副校长。

△　交通部遵照二中全会决议，接收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台，并通函各洋商公司，承认继续履行与建设委员会所订合同。

△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因学校演出话剧《子见南子》案，被省教育厅撤职。

8月2日　　编遣实施会议第二次大会，周玳报告第三编遣区编遣经过情形，通过实施编遣奖惩条例等案。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第二编遣区代表报告编遣经过情形，通过军官佐退役俸率及给与规则。同日，陈济棠抵京参加会议。

△　苏领事梅里尼可夫与蔡运升在满洲里继续会商，中方提出先行恢复欧亚通车，无结果。苏方提出恢复中东路原状，中苏分任沿线

警备，中苏交涉在赤塔开会等要求。同日，中东路驻天津办事处由华人接收，新任经理王文秉即日就职。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京语记者称："我国对中苏谈判颇为赞同，但在未开正式谈判以前，绝对不承认任何条件。以现在情形论，虽在谈判，但仍十分严重。"同日，赴东北办理中东路交涉之驻苏公使朱绍阳抵沈阳。

△　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离平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西北边防。4日，何抵太原劝阎就任西北司令长官，阎表示坚辞。

△　闽军卢新铭旅进占长汀、上杭。3日，卢电蒋介石，要求"迅定三省会剿大计"。

△　青岛日本商办之铃木、和田、华祥、山东四厂为应付工潮限工人三日内退出。经青岛市社会局与厂方交涉结果，允每人发给回家路费两元。

8月3日　　编遣实施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刘峙报告湖北各部队编遣办事处成立经过及编遣情形；鲍文樾报告第五编遣区成立经过及编遣情形；通过陆军编制原则，分师为甲、乙、丙三种。

△　张学良训令蔡运升不能接受苏方要求，宣称："若照昨日梅里尼可夫所提出的要求条件，由中俄两国分担保护中东铁路之任，则从今以后，反因此残留祸根。"

△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在天安门组织二万余人之反苏大会，通过无条件收回中东路、限期"铲除"共产党、请积极对苏备战等案。

△　闽军陈国辉部在同安哗变，杨树庄派陆战队围剿。

△　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田英太郎抵沈阳就职。

8月4日　　孙科抵沈阳与张学良、朱绍阳及东北政务委员等举行会谈，对苏方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问题，决定依照《奉俄协定》进行交涉。朱于是晚赴哈尔滨。

△　湖北省教育界代表张实廷等10余人，是日在南京向教育部请愿，历陈教育厅长黄昌谷摧残教育，近来又逮捕省一中校长夏正声等情形，要求罢免黄。该部派科长钟灵秀赴鄂调查。

△　越南被逐华侨160人，自西贡乘“元利”轮抵汕头。

△　青岛日本大康、内外、隆兴三纱厂决定停工，2000余工人赴青岛市政府请愿。近来青岛日商工厂停工者已有10余家，失业工人约四五万人。

△　北平大学区结束，河北教育行政事务移交省教育厅办理。

8月5日　　编遣实施会议举行第五次大会，何键报告湖南各部队编遣办事处成立经过；陈济棠报告广东编遣办事处成立经过。下午，第六次大会通过：一、陆军给予草案，定全国兵额为65个师，军饷等费每月为1884万元；二、今后省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军职，师长不得兼任政务官；三、分别编遣，确定各区师额，于编遣时以团为单位。

△　张景惠命将前搜查哈尔滨苏领事馆时所捕苏共党员39人解送法院审讯。

△　蔡运升电外交部，报告苏联提出由其另委中东路正、副局长，为开始正式谈判之先决条件。王正廷在南京答记者称：此种提议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容许。同日，外交部致电《非战公约》各国，申述中苏谈判停顿原因。

△　司法院副院长张继抵沈阳，访张学良商谈外交事务。同日，孙科离沈阳返南京。朱绍阳抵哈尔滨后即赴满洲里。

△　第三师第四旅旅长谭曙卿枪杀东海县党部委员兼《民报》主笔陈嗣恒及县总工会常委张劲升，徐、海各县民众组织东海惨案后援会，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编遣会请愿，要求惩凶。

8月6日　　编遣实施会议第七次大会，补推朱培德、唐生智、鹿钟麟为常务委员，通过请政府明令严禁招兵等案，即举行闭幕式，并发表《编遣实施会议闭会宣言》，声称：能否实施编遣会议之议决案，是“革命与反革命之所攸分”，“革命与不革命之所攸分”，“革命与假革命之所攸分”。

△　财政部长宋子文由于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撙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自上海电国民政府辞职。同日，阎锡山电辞山西省政府主席职。

△　晚，朱绍阳抵满洲里后即与蔡运升、李绍庚及护路司令梁忠甲等密议。同日，国民政府宣称：蔡、梅交涉“呈完全停顿之状态”。

△　行政院通过教育部所提更改北平大学各学院名称，恢复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案。同日，教育部决定增设蒙藏教育司。

△　河北省永定河水暴涨，淹入北平南城。7日，永定河南岸续溃130余丈，北运堤决，水淹18里，估计被灾民众不下50万人。

8月7日　　中东路副局长李绍庚以电话邀苏领梅里尼可夫到满站接洽，被其秘书米海伊诺夫藉词拒绝。同日，外交部电嘱朱绍阳“除商议正式谈判日期及地点外，其余概可拒绝讨论”。

△　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宋允复职。9日，国民政府下令挽留宋。

△　王均第七师部分士兵在九江因欠饷哗变，戕杀该部参谋长，抢劫市民商店，民房被焚不计其数。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航政根本方针：确定航路国有政策，凡属港政归中央主管机关负责，凡属港务归地方管理；沿海及国境内之外船航行权，应即速收回。

△　鹿钟麟、熊斌联袂赴沪，不就所委之军政部长、航空署长职务。薛笃弼坚持出洋，已上第三次呈文。

△　第三编遣区主任周玳语记者称：第三集团军现存兵额130余团20余万人，按定额最大限度为九师计54团，遣散之数当在半数以上。

△　红军朱德、毛泽东部攻漳平新桥，与守军陈祖康部及地主武装激战后，转移至距城45里处。闽军师长张贞令张汝勖旅自浦南、永福向漳平“追击”。

8月8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就外传美将出面邀集四国调停中苏事答记者称：中俄形势近日无甚变化，倘形势万一恶化，美国为缔结《凯洛格非战公约》之盟主，当然可以根据条约出面谈话。

△　山西省召开村政会议，阎锡山训话宣称：“村本政治很重要，欲诊治穷病，应集资于村、县、省举办民生事业，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互相提携。”

△　国民政府国道设计委员会定全国国道干线12条：一、京桂线；二、京滇康线；三、京藏线；四、闽浙线；五、京蒙线；六、京黑线；七、张绥线；八、甘藏新线；九、绥新线；十、黑蒙新线；十一、迪疏线；十二、陕桂线。

△　山东长山县皈一道首领自称“皇帝”之马士伟部1000余人，被第四十六师范熙绩部剿俘。同日，徐州宿县小刀会首领王金桂、孙三奉省令就地枪决。

△　中法宁案经审定，法方所受损失8.6万余元，已由财部支付法领收转，此案结束。

△　英国嗾使藏军进攻打箭炉，已陷巴安（今巴塘），驻军向四川省府告急。

8月9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与朱绍阳通电话，对派代表会议表示同情，但谓必须以彼方之最后通牒为基础条件。

△　编遣委员会召开常委会，何应钦主持，通过《点验委员组编制草案》，追认李鸣钟任遣置部主任，决议厘定各直辖分区之番号。

△　湖南人民救湘驱何请愿代表团周梁等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湘省主席何键，并决定10日再赴国民党中央请愿，将其罪状通电全国。

△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崔廷献、傅作义、鲁涤平等六人在宪兵保护下在警备司令部就职，公推苗培成主席。同日，天津总工会、学联、商协、妇协等团体向整委会辞职。

△　闽西红军又攻漳平，守军陈祖康不支退华安，战事集中在浦南北溪方面。

△　1926年发生之汉口“神电”轮案是日由交涉员李芳与亚细亚公司龙天桢在汉签字解决，由英商亚细亚公司付恤金2.7万元。

8月10日　　国民政府令，山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阎锡山准免本兼各职，遗职以商震继任；徐永昌继商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蒋介石在上海召集银行界劝认编遣公债，晚宴鹿钟麟、李鸣钟、马福祥等西北军人。

△　闽军侵占龙岩，粤军第三师抵永定峰市，赣军进犯上杭。同日，蒋介石电令湘军进攻红军贺龙部。

△　广东梅县新塘、官塘等地群众600余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游行

示威，宣传《土地法》，遍贴苏维埃标语。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中东路事发表《告东北将士书》，勉励服从中央命令，“捍卫边陲”。

△　日侨神原毁北宁路案交涉步骤，辽宁当局决定先与神原个人交涉，收回农场。至于日本军警无故拆路，将来赔偿损失，当由日领负完全责任。

△　山东“新康”轮案，日邮船会社复函招商局，否认“龙野丸”错误。招商局汇集材料，准备再作进一步交涉。

8月11日　加拉罕在莫斯科对美记者发表谈话，谓苏联所提出之条件，中国须先加以承认，否则无谈判之可言；中国代表朱绍阳上星期“函约我方代表面洽一切，业已由本人予以拒绝，盖中国对于我方条件，毫无接受诚意，空言又何能了事”。

△　苏军与东北军在满洲里冲突，交战两小时，东北军伤60余名、死五名。张学良召开紧急会议，对前线军队发出避免冲突令。12日，蔡运升为两军冲突事向苏方提出抗议。

△　东三省讲武学堂与东北学生队100余人，乘安奉线车时，被日守备队以无日本护照加以扣留。

△　湖北编遣处电饬张发奎、谭道源等师，会同湘军吴尚师“兜剿”红军贺龙部。吴尚已抵常德。同日，湘军陈渠珍部分永顺、大庸、龙山三路进攻红军。

△　四川红军邝继勋部约7000人与川军刘湘部作战，已进入遂宁一带。

△　财政部曾电海外华侨酌量推销编遣公债，各地复电承销总数已达千万元以上。是日该部宣布前发编遣公债5000万已销售半数，近

拟再发5000万元以助编遣之实施。

8月12日　　蔡运升接到10日张学良对苏联加拉罕最后通牒之回训，是日答复苏方，请于三日内再开中苏交涉，否则将认苏方无诚意，应由苏方负交涉决裂之责。同日，胡汉民在南京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称："对俄问题，形势仍在混沌，结果尚难推测。"

△　苏联飞机两架、军舰二艘载陆战队300人驶抵黑龙江绥东县属兆兴镇，与东北军交战。傍午，东北军退守绥东；苏军占据兆兴镇及李家房子。

△　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致电外交部报告新疆对苏态度，谓："新省拟暂持以镇静，藉资羁縻，仍候明示机宜，再行积极防御。"

△　国民政府派参谋部厅长刘光视察东北国防，刘是晨由吉林赴哈尔滨。

△　财政部咨各省府，盐斤附捐应统归盐务机关办理，嗣后各地驻军不得派员收取。

△　湘西红军贺龙部进攻慈利。同日，湘军师长吴尚电令汽车路局，限9月20日前完成桃辰及常庸汽车路，以便"围剿"红军。

△　中国要求备价赎回北宁路神原农场，日方不允，宣称："此事须俟中日商租权完全决定后，方有解决办法。"并称："拆坏轨道，日方不负责，因在农场区域内，日侨有自由处分权。"

8月13日　　晨，东北军第九旅一团及海军陆战队一营在绥东兆兴镇与苏军发生冲突，战斗五小时后将苏军击退。同日，苏军在满洲里附近占领闹尔屯。东北军军长王树常派飞机多架，炮兵一大队前往绥芬河前线增援。东北海军舰队司令沈鸿烈抽调水兵300名，由营口开往前线。

△　蒋介石电北平何成濬，告以中东路事态严重，请往助张学良主持交涉，称“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

△　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1000万，余由上海银行界负责筹募。是晚，宋返京复职。

△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黄绍竑、温树德。

△　中共豫南罗山县委郑新民等领导当地红枪会和数千群众起义，消灭民团，组织革命委员会，改红枪会为赤卫队。

△　江苏东海惨案后援会由镇江移往南京，是日推代表十余人赴南京市党部申述惨案最近情形。14日，赴中央党部二次请愿。

△　外交部接到英、法、荷三国关于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之复文，内容大致与美国政府之复文相同，先言在主义上并不反对，而结论却婉拒中国方面之要求。

8月14日　中苏交涉决裂，苏领梅里尼可夫奉令返莫斯科，朱绍阳亦离满洲里赴哈尔滨。外交部宣称：苏俄虽无与我直接谈判诚意，但亦未完全拒绝谈判，故蔡运升仍暂留满洲里，相机进行。同日，蒋介石、胡汉民、王正廷等会商对苏问题，决不改变原定方针。

△　吉林军步兵一连、骑兵两连赴宽城子，被日警阻止。日警声称：南满路附属地不许华兵通过。

△　国民党天津市整委崔廷献、傅作义、刘不同等在市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因第六区党部反对整委会，议决将张信庵等16名撤职，并开除党籍；第六区党部执监委一律撤职，另派员整理。

△　北平银行公会致电中央党部及监察院、财政部，略谓：比年军费浩繁，用款则毫无限制，长此以往，非至财政破产不止，上海各团体主张监督编遣费用途，筹定全国预算，并缩减军费，望切实采

纳。要求政府及各军公开一切收支，使民众得以审核。

△　北平大学八校（法、工、农、艺、医、女大、女师大、俄专）自北大、北师大独立后，均要求独立。是日，招待新闻界报告八校希望独立复校之意义，并决议每校推代表二人至南京请愿。

△　中央研究院于南京成立天文、气象二研究所，上海成立化学、工程、物理、地质四研究所，北平成立历史语言、心理二研究所。

△　上海市闸北农纯丝厂女工200余人因厂方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无理压迫，相率罢工。沪北14厂女工为支援农纯厂斗争亦相继罢工。

8月15日　朱绍阳、蔡运升、李绍庚等抵哈尔滨。张学良奉令派兵六万赴西伯利亚边界，派王树常为西路总指挥，设司令部于满洲里；胡毓坤为东路总指挥，设司令部于绥芬河。

△　刘芦隐在招待记者席上报告中苏问题，声称："若我承认先恢复中东路原状，是无异于中国承认此次对该路处置为无意义，故必先由俄方承认，然后始有谈判可能，此种立场，我国决不变更。"同日，吕荣寰电告南京，谓东北对俄态度，完全与中央一致，中东路照常通车。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通过《征求预备党员实施办法》；二、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一律撤职，另派陈访先等七人为该省党务整理委员；三、停办河北《民国日报》，由中央派员接收。

△　粤军陈维远部攻永定城，与红军激战；红军向胡雷方面转移，粤军占永定。

△　是日至17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清华学校举行科学教育会议，讨论科学教育方法之改良及合作办法，与会者有韦悫、邝

嵩龄、吴永权、曾昭抡、赵元任、罗家伦、翁文灏等20余人。

△　美国卡尼奇国际和平基金委员会所派新闻记者访华代表团，游历东三省及上海等地后回国途中在日本发表污蔑中国之言论，谬称："所谓取消治外法权，使侨居中国之外人，遵从中国之法院之听断，真是妄谈而已"；"中国欲使国内安宁，颇需日本扶掖"等等。是日《申报》进行报道，斥之为谬论。

8月16日　外交部电《非战公约》签字国宣布对苏交涉经过及中国态度。同日，另电驻德公使蒋作宾，请德政府代向苏联询问此次苏军入境是否奉有政府之命令，若无即请加以制止。

△　苏军与东北军在札兰诺尔冲突，激战约两小时，苏军主动退去。同日，东线绥芬河附近也有小冲突。

△　王正廷对记者谈中东路事，谓苏军"万一真入我国境，我方为自卫计，决采用第二步外交方针，与之对抗"。同日，张学良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宣称苏不守《非战公约》遣兵入境，准备决一死战。

△　陆海空军总部以谭曙卿"擅杀党委，破坏党纪"，下令拘捕，押于军法处，听候审讯。

△　教育部聘王宠惠、王正廷、李石曾、陈立夫、王劭廉、赵天麟、茅以升七人为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　日兵在长春增兵并实弹演习。外部令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询问。

△　日本公使芳泽抵北平办理北平使馆结束事宜，20日离平返国，由驻沪日总领事重光葵代理公使。

8月17日　晨，苏军再攻札兰诺尔，双方相持至天明始退。张学

良电南京国民政府，称“俄军侵我边境，意图占领满洲里断我后方联络”。同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下令步兵四旅、骑兵一旅、航空兵一队，开赴边防。

△　国民政府委员张继抵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调查中东路情形。

△　国民政府公布《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工商同业公会法》。

△　国民政府任命鹿钟麟署理军政部部长。

△　外交部为越南违反中法关税新约，增加华绸进口税事，向驻华法公使玛太尔提出抗议，并电令驻法公使高鲁向法政府切实抗议。

△　红五军彭德怀部攻克江西万载。

△　英人嗾使藏兵进犯西康，是日西康旅京代表分向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组织西康省政府，以固边圉。

△　美国红十字会调查陕、甘、豫旱灾赈恤团，以别克纳尔为首，一行六人抵南京。

8月18日　　苏军占东宁县城，守军退大绥芬。晚，曹团、保卫团、商团反攻，鏖战一夜，19日拂晓苏军被击退。

△　日军连日在长春增兵并进行实弹演习。是日，日军4000人又在沈阳城郊演习作战，枪炮声不绝，意在示威，民众愤激，促交涉署向日方速提抗议。

△　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奉蒋介石命到沈阳与张学良策划对苏，晚召集东北各将领会议，讨论对苏问题。

△　韩复榘在南京与鹿钟麟、熊斌及西北在京要员协商第二编遣区编遣事宜，决照中央议决案进行。

8月19日　外交部再电驻美公使伍朝枢，令向各国宣布“苏俄破坏非战公约，向中国开衅情形”。

△　中东路局长吕荣寰等电国民政府称：“俄方密探在宽城子及满洲里等处出没无常，为慎重路务计，自十九日起已全线戒严。”

△　蒋介石派胡逸民、王震南赴汤山迎李济深入城，移住总司令部招待处。

△　北平国立八校代表团到南京教育部请愿，教育部长蒋梦麟接见，称独立不成问题，但须经相当时期；复大问题，限于国府颁布条例，须重加考虑后再定。

8月20日　晨，何成濬会晤张学良，报告中央军已集中津浦路及北宁路一带，归张指挥，必要时可开赴前线。同日，何电蒋介石报告与张学良谈话情形，并陈述对苏交涉意见，称“张态度颇镇静，惟其左右多怀疑，不愿有军事行动”。为今后计，似仍宜外示坚强，内则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以求相当解决。

△　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何成濬、蔡运升、翟文选、于学忠、高纪毅及在省各旅长均列席。讨论万一与俄决裂后，关于军队之备战及军火、军费等筹备事项，议决对苏取严守地位，调步兵二旅、骑兵三旅分赴北满驻防，令各镇守使注重边防。21日，张学良、何成濬、朱绍阳又在北陵会商对苏问题。

△　晨，苏军铁甲车一列、步兵200余名，在满洲里以西与东北军发生冲突，交战数小时后退出国境。

△　蒋介石发出通电，切望国人协助编遣，宣称“民国存亡，视此一举”。

△　长芦纲总案举行第三次审讯，由主席委员赵戴文、委员宋子文、李翔及司法院秘书吴昆吾将五纲总隔离审讯，至5时许退庭。所

有审讯详情未公布。

△　毛泽东之堂妹共产党员毛达湘（毛泽建）在湖南衡山县被该县县长蔡庆煊枪杀，壮烈牺牲。

8月21日　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见派赴各编遣区点验委员，勉励大家“任劳任怨，不偏不私”。到会者有何应钦、唐生智、周亚卫等百余人。同日，国民党中央划定第五编遣区之军队，为刘镇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等部；以马福祥为该区正主任，刘镇华为副主任。

△　国民政府特派伍朝枢、蒋作宾、高鲁为出席国际联盟会第十届大会代表。

△　外交部电驻日公使汪荣宝，嘱向日本政府转达国民政府同意日本政府以佐分利任驻华公使。

△　中国科学社在北平燕京大学开年会，到会社员任鸿隽、王琎、白敦庸及来宾李石曾、吴雷川、罗家伦等50余人。余泽兰、吴有训等15人在会上宣读科学论文，会议于24日闭幕。新增理事有胡刚复、竺可桢、杨铨、赵元任、翁文灏、胡先骕六人。

8月22日　中东路东线苏军主动从密山县撤退到兴凯湖岸。

△　外交委员会讨论对苏方针及步骤，王正廷、胡汉民、孙科等出席。会议决定援助张学良军费200万元，必要时再补充实力，派郭同赴东北传达中央意旨。23日，郭于沪启程北上。

△　蔡运升由沈阳回哈尔滨，表示中俄开议仍有可能，对来访者宣称：沈阳军事会议并未主张对俄严峻计划。目下边界冲突，殊不足重，两国实际未曾开战。

△　孙科在京记者招待会上报告考察东北路政，宣称：中东路管

理，俄方既违反协定，我即不遵守义务，“中央外交方针，最低限制必须收回该路管理权”。

△　广东梅县驻军三路包围松源、宝坑红军，红军奋勇抗击，旋即向安全地区转移。同日，赣军金汉鼎部全部抵闽，后方交谭道源填防。闽军张贞部向龙岩进攻，并分电粤军陈维远、卢新铭“会剿”红军。

8月23日　苏骑兵1700余，由第五卡架浮桥渡河猛袭札兰诺尔，经东北军第十八旅死力抵御，激战一昼夜，是晨将苏军击退。

△　国民政府召开国务会议，王正廷列席报告东北边境中苏冲突情况及外交委员会所定对苏方针步骤。决议简派王正廷为中波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公布《民国十八年编遣库券条例》，库券定额为7000万元，9月份开始发行。

△　沈阳军事会议结束，张学良任命张作相为“防俄军”总司令，万福麟为副司令，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西路总指挥。

△　朱愈云、袁恒升、潘焕清等14人在上海宝山路东方图书馆门前散发进步传单，被市公安局逮捕。

8月24日　晨，苏军与东北军在札兰屯北激战两小时，旋即退去，苏军被俘120余名，东北军团长陈志新伤重死亡。翌日，东北军为防止苏军装甲列车驶入，将满洲里前线铁轨拆卸数段。

△　驻德公使蒋作宾在柏林与苏驻德大使会晤，苏使否认对华有战意，称如苏境无华兵侵入，决不作战。

△　国民政府任命李培基继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李服膺为北平警备司令。

△　第三区编遣实施会议在太原开幕，周玳主席，到徐永昌、李培基、傅作义、辜仁发、李生达等32人。阎锡山致训词，略谓："晋、察、绥及河北等省，近以军费开支浩繁，本省财政均已不能维持，故本人极为焦虑。今日之会务须筹一通盘计划，照中央规定，实行编遣。"

△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因叛徒白鑫出卖在沪被捕，同时被捕者有杨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颜昌颐（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中共江苏省军委干部）。30日于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　北平40余所小学教员代表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改善待遇，结果无切实办法，决继续怠工一星期。

8月25日　　张学良电国民政府称："昨今两日前方甚沉寂，俄方虽时有骚扰行为，但我方仍在镇静防备……学良令关内滦西各军一律开往北满驻防；第十二旅张廷枢部队编入防俄第一军，即由锦州北开，而以于学忠二十七旅出关接防。"

△　苏联远东军司令白鲁谦（即加伦）抵赤塔，是日对苏军发表演说谓："此次调动之军队应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战。"

△　日本自动开筑吉会路已成七华里，同时催华方进行正式会议。

△　上午，第三区编遣实施会议继续开会，提案分四项：一、裁留标准；二、军额及编制；三、编余军官安插法；四、在编遣期内各地治安维持法。讨论结果，裁留标准以淘汰老弱为原则；军额及编制，以九师为准。下午，大会闭幕。

△　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奉命离芜湖开往福建"剿灭"红军，前部28日抵厦门。

8月26日　　德国政府将苏联政府对中国抗议之答复转达国民政府，略谓：苏军绝对不侵入中国领土，亦未尝取挑战的态度。但对于受中国军队指挥之白俄军侵入苏联领土，不得已而取当然应取之处置，希望中国负责方面将在华白俄军一律遣散；因此而发生之一切损害，苏方完全不能负责，当由中国方面负之。

△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郭同离京赴辽，临行前语记者称："此次北上任务，系奉蒋命前往宣达中央意旨：对俄问题系整个的，中央与地方意见均须一致。关于军事方面，悉由张学良指挥，必要时中央充分援助。"

△　外交部接驻德公使蒋作宾电告：加拉罕电驻德俄使，要求中国准俄方依照协定更换中东路正副局长，即可直接谈判。

△　司法院副院长张继25日抵长崎，是日赴横滨，语日记者称："余来日目的，在访问贵国朝野代表参加总理奉安者，以示答礼。故以私人资格来日，并非奉政府之命。协议中俄问题等事，国民政府始终希望和平解决。"

△　第十八师鲁涤平部离汉口开赴江西。南昌卫戍司令即由该师代师长张辉瓒出任。

△　闽军独一师第二旅杨逢年部自适中三面进攻龙岩，中午，杨部第三团陈林荣部入城，红军向东北转移。

△　北平市公安局公布秋季调查全市户口，总计为26.0961万户，男女共124.2728万名。

8月27日　　蒋作宾电外部，谓接苏俄政府正式答复：一、华军不攻俄军，俄军决不攻华军；二、须中国负责将在华白俄军一律遣散。

△　朱绍阳离沈阳返南京，是日抵北平答记者称："俄军犯我国境，纯为示威。现我对国防已有准备，不虞其骚扰，至外交进行，

京、辽完全一致。”

△　广东编遣会议在广州开幕，决议将全省军队编为五个师：余汉谋第五十九师、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李扬敬第六十三师。

△　国民政府下令禁运粮出口。令称：“西北灾情奇重，待赈孔殷，粮食一项，必赖他省源源接济，庶免缺乏，所有国内出产之米谷麦粉，亟应暂禁出口，以资转运。”

△　红军贺龙部进攻慈利；湖南“清乡”司令何键命令李韫珩旅前往防堵，同时调周斓部戴斗垣旅赴湘西进攻红军。

△　武昌地方法院侦查教潮案宣告终结，谓黄昌谷犯法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门卫伤害教员另案起诉。

8月28日　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天津，语记者称：“中央对俄方针，根据第一次复牒，始终一贯，决不变更。”“苏联当局迄今仍否认派兵攻我防地，似无对我宣战决心。”

△　红军贺龙部攻克慈利。

△　北平八校代表团为恢复大学事再赴教育部请愿，部长蒋梦麟答复：一、独立不成问题；二、经费可以增加；三、“复大”限于大学组织法，不能变通。

△　胡适曾在《新月》杂志先后发表《约法与人权》、《我们何时才能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三文，是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此作出决议，略谓：“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

8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蔡元培辞去监察院院长兼职，

所请辞去国民政府委员，应予慰留；选任赵戴文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

△　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就中东路问题语记者称，中国始终以无条件先开正式谈判为言，外传苏已新任中东路局长，完全不确。现在边境形势已渐和缓，如苏联愿与我直接谈判，则交涉前途数日内或有进展希望。

△　王正廷在上海先后接见德国驻京代表费休、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就两使所提中苏问题分别予以解答。同日，朱绍阳由京抵沪。

△　《南京条约》八十七周年纪念，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地均举行国耻纪念集会，南京国民废约会纪念会发表宣言，希望一致团结，恢复民族精神，与帝国主义奋斗，以求废约运动之成功。

8月30日　外交部负责人答记者称：苏联委派中东路局长事前并未通知我方，外部亦未接到吕荣寰电告，苏即独意执行，我方断难承认。

△　郭同昨日抵沈，是日往晤张学良，传达国民党中央意旨，并表示此次奉令代外交部接洽外交，军事由何成濬负责。张表示对苏交涉遵中央意旨办理。同日，张作相奉张学良命，即令蔡运升停止以私人资格与苏联之一切接洽，静候中央交涉。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前第四集团军驻各地部队编遣特派员李品仙、刘峙、何键、李明瑞均免职；另任晏勋甫、刘峙、何键、李明瑞、马福祥分别为编遣委员会直辖第一、二、三、四、五编遣分区办事处主任委员，广东各部队编遣特派员一并撤销，任命陈济棠为中央编遣区第一分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　铁道部次长王征因在北宁路营私舞弊，被人告发，国民政府

将其交参军处看管。

△　四川刘文辉致电南京蒙藏委员会，略谓：“报载英人嗾使藏兵侵略西康，已占甘孜、巴安等语，毫无事实……藏兵团无内犯之行动，西康仍为稳固之屏藩。”

8月31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通知苏驻德大使窦克森，谓：苏联政府准备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签署解决中苏争端联合宣言之提议，同时将苏联政府建议之联合宣言交与德使。其内容大致为：一、双方派代表开会，俾依据1924年中俄协定解决两国间各悬案；二、依照1924年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三、苏保举中东路正副局长各一人，应即由董事会任命之；四、双方严格遵守1924年协定之第六条规定；五、双方释放自1929年5月1日起或因此案被捕之人员。

△　唐生智因与张发奎暗中串连反蒋，是日起被蒋软禁在南京。后因西北军反蒋，蒋百里力保唐为前方统率，方获自由。

△　红军朱德部克漳平，张汝勖旅第一团退永福，张旅被隔于宁洋。

△　上海英军殴毙张学亮案解决，英人给恤金5000元。

△　《关于比国交还天津比国租界协定》由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凌冰与比利时驻华公使馆参赞纪佑穆在天津正式签字，俟比国及南京政府立法院通过后，即实行接收。比方对中国要求先移交租界后筹偿市债一节，亦已允诺。

是月　平汉路局长刘维炽在北平谈该路收支情况，谓本路每月负担湖北军费35万，冯玉祥军费50万、山西军费35万。目前共负债6000余万元，外债5000万元。平汉路被破坏状况，非1000万不济。

△　北平义赈会发表调查西北四省灾情结果：本年因灾死亡者600万人，病者1400万人，流亡转徙者400万人，比平时疾病死亡率超过

25倍。

9　月

9月1日　　外交部电令驻德公使蒋作宾向苏驻德大使窦克森提出答复苏联政府之照会，质问苏方对华军事行动，声明中方并未利用白俄，望互派代表，会议解决中东路发生后之纠纷，并解决中苏间已往之悬案。

△　粤军是日起实行编遣，新委师长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在广州正式就职。

△　铁道部长孙科以王征贪污案引咎辞职赴沪。是日，蒋介石亲赴孙宅慰留。2日，孙科返京复职。

△　湘军师长吴尚到常德，令各部是日起“围剿”红军贺龙部，以阎仲儒任指挥，向慈利前进；李韫珩由石门，陈渠珍由永顺同时前进。

△　闽西红四军克永定，粤军陈维远旅由胡雷驰援，红军当晚转移。

△　是日为国际青年运动纪念日，上海工人、学生上街发传单，捣毁时事新报社，即遭军警镇压，捕去学生二人。

9月2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语记者称：中苏直接谈判确有可能性，共同发表宣言事尚未决定；苏委中东路局长，未经正式手续，势难承认。

△　国府文官处秘书钱昌照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作政治报告，声称：“苏俄外交是很难推测的，缓和时候忽然紧张起来，紧张时忽然缓和下去。……我国与之交涉，首须镇定，当其缓和，不因之而大

意，当其紧张，不因之而恐慌，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　财政部次长张寿镛语记者，谓：编遣库券，上海方面大约可募一千五六百万元左右，余数财部已决定按省摊派，每省约一二百万元不等，再加海外侨胞认购7000万元之数，相差必不甚远。同日，北平银行界表示：编遣区共计向中央请领恤款、欠饷、维持费、编遣等费总数在一亿元以上，7000万编遣库券无济于事。

△　农矿部林政会议开幕，通过奖励私有林与整理国有林业等案。7日闭幕。

△　李培基称病辞绥远省政府主席，称该省地丁钱粮，年入仅10万余元，无“政”可办。3日，国民政府致电慰留，阎锡山亦电促其早往就职。

△　中央研究院向李盛铎购回前清大高殿之内阁档案数千麻袋，是日运到历史博物馆清理，月拨3500元为整理费。

△　长春日军军事演习，由关东军司令田英亲自指挥，踏坏民田1500余亩。

9月3日　桂军编遣已告完竣，共编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三个师及梁朝玑、蒙志两独立旅；此外警备军改编为警备队五个大队，归省府直辖。

△　红军彭德怀部由宜春进入萍乡桐木附近；驻醴陵地方武装驰往攻击。

△　杨树庄电南京总司令部，称：闽西红军已向龙岩以西发展，刘和鼎师全部入闽，正会同省防军分途“围剿”红军。同日，张贞因永春、德化之红军攻占漳平，电刘尚志旅往援。

△　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在豫南磨角楼歼敌第七十四团一个

排，后向麻城转移，在八字门楼与第三十二师会合。敌人妄图消灭红十一军主力的企图遂被打破。

9月4日　　蒋作宾自日内瓦电国民政府，谓中苏交涉连日无进展，因苏未加入国联，无代表在日内瓦，故无从接洽。同日，伍朝枢在国联发表演说，希望贯彻盟约第十九条之规定，将不适用之条约加以修改，并称“联盟成立十年，未能引用，深为可惜”。

△　编遣会电各地党政机关，于各部队驻在地组织裁兵协会，辅助编遣。同日，第二编遣区点验组主委贺耀组离京西上，点验二编遣区各部队。

△　何成濬离沈阳返平。何语记者称：“俄事不久即可告一段落，军事济外交之穷，一切已与张学良商妥，并极有把握。”

△　北平八校学生代表团再赴教育部请见部长，要求“复大”、增费。蒋梦麟未见，学生闯入部长室，致与工役冲突，学生坐守两昼一夜，至5日下午6时始离部，由一司长出面传言，宣称：“八校问题准10日提出行政会议讨论解决。”

9月5日　　何成濬抵平，来平之前对记者谈，称苏军在前线仅四师兵力，另有预备队四师，粮食缺乏。东北军在前线约八万人，近又开去六个混成旅。苏联态度并不强硬，而是某国故意挑拨离间，目前有和平谈判希望。

△　中央编遣区点验组主任及各委员，分八班出发武昌、延平（今南平）、芜湖、宿州等地开始点验。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新闻纸检查，除中央认为有特殊情形之地点及一定时期外，一律停止；通过日报登记办法。同日，中央宣传部招待新闻界，宣称此项登记办法，决非干涉舆论界，而为防止做广告之报纸及防止“反动”宣传言论。南京市社会局是日在中央书店查禁

《我的幼年》等刊物。16日，国民政府明令停止检查新闻纸。

△　刘和鼎抵厦门，宣称："在闽之本师，暂编一师、二师，省防陆队，均归杨树庄规划。赣第十二师及粤第三师归金汉鼎指挥规划。"并称："杨对闽各师旅合围命令已下，大约赣军自西，粤军自南，卢师自北，本师与张师自东，合围剿共。"

△　何键限令张其雄旅刻日恢复铜鼓、万载。

△　外交部发表英、美、法、荷、挪五国关于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复照，内容皆反对中国收回领判权。同日，外交部决定根据五国复照，分别发出第二次照会，重申撤销领判权之意旨。

9月6日　　苏军与东北军在满洲里和绥芬河前线激战。札兰诺尔地区战斗持续到7日苏军被击退为止，共战斗20小时，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万福麟、张作相并慰劳诸将士。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声明共同宣言不照苏方意思修改不能再开谈判；华方另委新理事长，苏方允换局长。

△　蒋介石派朱绍阳赴柏林同蒋作宾商筹对苏交涉。苏方已派克列斯敦斯基等二人为对华交涉代表。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任杨兆泰为内政部长，朱培德为参谋总长；改组江西省政府，指定鲁涤平为省政府主席，以张辉瓒继鲁任第十八师师长。

△　国民政府驻美旧金山副领事高英夫妇及旧金山领事馆主事孙垣，因在美犯偷运烟土案，奉召加国，是日抵沪，旋由军警押解南京，收押在江宁地方法院。

△　第五十二师阎仲儒旅占慈利，李韫珩旅占江垭东岳庙，红军贺龙部转移桑植。

△　闽军旅长卢新铭电蒋介石乞援，略称：“红军傅柏翠于5日围困武平，经职团汤营全营及梁营一连与之激战，以众寡不敌，至6日全城被陷，汤营长失踪。乞饬前线各支军会同职旅共同围剿。”

9月7日　　晨，苏军3000人左右向绥芬河、马桥河之间的东北军进攻，战至8日晨始退。同日，东北军坦克车队开往绥芬，沈鸿烈率舰抵黑河视察。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驻苏德大使，谓中苏断交以来，苏侨迭受中国当局虐待，要求德政府训令其驻华领事向南京政府交涉，即速制止中国当局不人道之行为，否则将施以报复之手段。9日，德国外交部答复苏联称：在华德领事已尽力保护苏侨之利益，如将所知之事立即呈报在华德领事，则保护更可周到。

△　国民政府文官处电四川省政府，询问西康近况及可否组织西康省政府等事。刘文辉复电认为西康省府能副其名，非四川省府已臻健全不可，否则徒有空名，实则崎岖僻野，荒旷一如其旧。并称报载英兵侵康，巴安陷落，则是无端造谣。

△　蒋介石决定派航空署长熊斌携带接济费30万元赴陕西办编遣，熊10日由平赴晋。

△　刘和鼎偕许卓然等入漳平，各军分途进攻红军；以皖军刘尚志旅及闽军独一师张旅包围漳、宁；粤军陈维远进攻杭、连；闽军卢新铭团夹击连城；永德由闽军陆战队担任。并宣称：“剿共完成后，赣军、粤军各回本省防次，张师移汀属。”

△　张继在东京访问日拓相松田，对中日问题交换意见。

9月8日　　晨2时，苏军与东北军在绥芬河激战，至晚7时始息。

东北军退守小绥芬站。

△　蒋介石电张发奎，命第四师由湖北宜昌移防陇海路，乘船东下，原防由新一师曹万顺接替。10日，张在师部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一致认为此乃蒋之阴谋，企图在转移中消灭异己。决定一面警告蒋氏，一面准备南下与桂军联合，共同反蒋。

△　阎锡山荐举被裁之高级军官佐出任军事参议，谓彼等在北伐期中勋劳卓著，一旦置诸闲散，殊非国家褒奖有功之旨，因特荐黄国梁等10人为军事参议院特任参议；张维清等23人为简任参议。

△　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由粤抵京。与陈偕行之范其务称：广东省现每月收入约300万，其中烟赌捐占三分之二，如将此项捐款取消，必将导致财政破产，此来特向中央请示补救办法。

△　湘军吴尚分兵四路，委李韫珩、阎仲儒、王霈、陈渠珍为纵队司令，门炳岳为总预备队，准备进攻红军。同日，粤军陈维远旅占漳平。

9月9日　　苏军猛攻守满洲里十八里小站之东北军梁忠甲旅，战斗至晚结束，苏军被击退。

△　国民政府再令军政机关保障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除刑事嫌疑犯应由法院依法办理外，不得任意逮捕伤害”。

△　王正廷由沪返宁语记者称：“中俄双方发表共同宣言问题，现因意见相距尚远，何日实现，殊未有把握。”关于近日边界军事冲突，王称：“俄当局迄未承认发过正式命令”，“此种流寇式行动，已令边境军队迎头痛击。”

△　徐永昌就河北省政府主席职，何成濬出席监誓并致训词，略谓：河北省阻碍建设原因：一、改组派捣乱；二、一部分人受帝国主义者煽动；三、封建势力的存在。希望徐就职后，努力肃清反动势

力。并称：军队本来要改编，反对改编是不对的，近来有谣言说阎、冯合作倒蒋云云，皆不可信。

△　国际联盟推选常任理事，中国二次落选。消息传到北平，舆论大哗，谓国际对有色人种向欠公平待遇，中国纳巨额会费甚冤。

△　天津市举行反苏市民大会，到1.5万人，国民党天津市整委会宣传部长鲁荡平主席并发表反苏演说。

△　红军贺龙部由桑植入慈利、石门。何键致电刘峙派兵截堵。

△　外交部公布比利时交还天津租界之中比协定。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捷克代表倪慈都在上海开订立《中捷友好通商条约》第一次正式会议。

9月10日　中东路两端战事已平静，绥芬河各机关职员是日下午返回办理善后。满洲里之战争已于9日晚停止。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致函驻苏德大使，要求转达沈阳、南京当局，内称：华军与白俄军近复攻击苏境19次，沈阳当局及南京政府须负完全责任。苏军为自卫计，不得不取坚决报复行动。13日，沈阳当局语路透社访员，否认上述事实。

△　张学良电王正廷报告苏军进攻情形，称："近日俄军于绥、满两处猛烈进攻，其意不止促进交涉，似有作战决心，业电前方将领，竭力撑持。"

△　国民政府任命鲁涤平、刘芦隐、陈家栋、张斐然、蒋笈、路孝忱、林支宇、熊育锡为江西省政府委员，以鲁为省政府主席，刘、陈、张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各厅厅长。

△　何成濬偕熊斌由平赴并与阎锡山协商"二集团"编遣。同日，

鹿钟麟由沪返京出席编遣常会，声称已得蒋介石允许准假回西北办理编遣。

△　李石曾、褚民谊等之北平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法国雪特隆汽车公司订立组织“一九学术考察团”合同，定民国十九年（1930）1月启程赴蒙古、新疆考察。

△　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黄俊昌赴青岛调查工潮情形，是日在青岛市党部召集各工厂工人代表讲话，决定11日赴四沧工厂视察。

△　日本成立“日蒙协会”，是日该会理事长石塚　忠乘轮由神户经大连入蒙考察。

9月11日　外交部电驻德公使蒋作宾向苏再提严重抗议，质问苏方对交涉有无谈判诚意，及此次对中国边境进攻究属何意，如无明确答复，则一切损害赔偿之责，当由苏方担负。同日，驻苏代办夏维崧电国民政府，谓旅苏华侨2000人业于今日到芬兰。

△　陈铭枢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广东省财政、政治状况，并要求中央制定国、省两税原则，及偿还前财政部在粤所发未还公债费2000万元。

△　蒋介石电张发奎限期开拔，略谓：“准备二次或三次运完可也。先由汉运新一师来荆接宜防，即以原船运第四师东下，先头部队务于哿（20）日前到达浦口为要。”

△　粤军旅长陈维远回汕头与蒋光鼐商洽增兵入闽事。蒋又调两团归陈指挥。

9月12日　国民党中宣部招待报界，刘芦隐声称：中东路问题“决不变更对俄宗旨，仍遵守非战公约，希望以和平方法解决”。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宣称：近日各地时有以党

员联合会或省党部联合会之名散发印刷品诋毁中央，破坏编遣，冀以淆乱人心，动摇政局，除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严密查禁，并缉惩破坏编遣之“反动分子”外，望国人协助政府防止“反动”。

△　李明瑞连日在广西扣留国民党改组派黄鸣一等30余人。

△　宋子文召集各省财政厅长、特派员会议，讨论分派编遣库券办法，13省代表出席，经逐名认派，共推销2055万元，限年底缴足。

△　何成濬谒阎锡山长谈。何语记者，称此来系奉阎召，报告中苏战事近况，并协商“二集团”编遣善后。

△　何键电刘峙，请令彭启彪等部“进剿”监利、通咸一带红军，由湘军王通厚部“协堵”。是日，刘峙电复何键，称已分电曹万顺、万倚吾“协击”贺龙。

△　张其雄旅由平江、浏阳向铜鼓、万载进攻红军彭德怀、黄公略部。

△　外交部答复美国关于撤销领判权之第二次照会在南京正式发表。照会称：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对此案作进一步研究，从大处着想，速与中国代表商定必要办法，废止在华领判权。

△　日本函辽宁当局促开解决吉会路会议。

9月13日　　王正廷招待新闻界，对苏联之抗议进行反驳，称：“苏俄谓中国向俄方攻击，俄方不得不出而抵抗云云，此点毫无根据，最明显者，即屡次发生冲突，皆在我国境内，故绝非我方去为难可知。”

△　莫斯科发表中国外交部托德使转交之复照，内容系拒绝苏联修改共同宣言之草稿，拒绝双方须尊重中俄条约，对于简放中东路苏

籍正、副局长尤加峻拒。

△　蒋介石电各省府主席，限期三个月至多半年办理保甲，清查户口。声称欲绝“匪”之根株不在用兵，宜由举办保甲、清查户口入手。“延不奉行者，应以纵匪治罪”。17日，国民政府颁布《清乡条例》，声称颁布此条例是“为肃清全国匪源，厉行训政”；“本条件施行期间，各地方以文到之日起，限三个月办理完竣”。

△　刘峙奉蒋介石令，电调第四师张发奎部移防陇海路，限日内开拔；五路靖区主任由新一师曹万顺接替。

△　闽军张贞部会同皖军、粤军包围龙岩红军。

△　于右任抵西安办理赈务。19日，于电南京为全陕灾民请命，由赈会代拍。

△　中丹条约正式换文。

9月14日　苏联政府二次复照，由苏联驻德大使窦克森电达蒋作宾。内容要点为：一、苏允更换中东路原任局长，须中国更换吕董事长；二、国境军事因白党侵袭而执行自卫行动，如中国能阻止白党来侵，自无抵抗之事；三、维持第一次照会所称之双方释放被捕人员及不得反对对方的立国主义；四、俄任命局长系中俄协定上赋予之权利，无否认余地。

△　阎锡山向何成濬表示决定下月初偕冯玉祥出洋，编遣费请何代向南京催发，免失信于部下。何电商南京，允先发300万，但不敷其巨。同日，熊斌由太原赴陕办“二区”编遣。

△　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会见津报载有蒋梦麟、宋子文拟以清华基金购买公债之报道，是日该校评议会开会讨论并发表宣言：一、反对以基金购买不可靠之公债；二、致函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请重视基金，勿买公债。

9月15日　朱绍阳晨抵北平，称此来系办理出国护照准备赴芬兰任所。关于中俄交涉，朱云：“中央已令蒋作宾自日内瓦遄返柏林，即在德与俄方接洽。报载俄已向我提出条件，外部未接到，因国际惯例，两国绝交时期任何条件均不能接受。交涉前途如何，此刻尚难预断。”

△　外交部接驻苏代办夏维崧自芬兰来之报告，称莫斯科政府拘禁华侨千余人。是日，王正廷电请德国政府代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请德政府对被拘华侨代为援救。

△　闽省府主席杨树庄率行营全部乘“普安”舰抵厦门，刘和鼎、林知渊自漳到厦会晤。行营参谋长沈珂语记者称：“剿匪”中央划定区域，由省主席指挥。闽省“剿匪”各军，归杨直接指挥。同日，粤军陈维远部两团由汕头开到闽西。

9月16日　蒋作宾由日内瓦电外交部，报告苏联对中东路局长人选问题，坚持在正式谈判以前解决。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发出对华第二次复照，交德大使馆转达，其内容系拒绝中国所提议之行政权共同分配案及管理局整理案，并力主中东路须恢复事件发生前之原状及苏联正、副局长之复任，为中苏交涉再开之必须条件。倘今后交涉仍迁延无进展，全部责任须由中国方面负之。

△　张学良电外交部称：被禁苏侨未受虐待，现在仅拘禁1100余人，谓被逮数千，实无其事。

△　张之江、唐悦良赴晋访阎事毕，是日同车抵京。唐语记者，谓冯玉祥出洋意仍甚坚决，俟阎编遣完竣即偕同赴日。第二区编遣事，已由熊斌召集各将领开始编遣，最近期内即可完竣。

△　国民政府下令查封前清故吏盛宣怀遗产，称盛“侵蚀公帑，证

据确凿”，所有遗产除拨充慈善基金外，一律查封没收。

△　国民政府令：任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未到任前以陈大齐代理。

△　张发奎电刘峙称：“曹师接防部队仍未到，职师第一批部队准十七日晨开船，余俟曹师船到即行。”

△　贵州临时政委会主席毛光翔电驻京代表谭星阁，谓李燊残部均被击溃，罗启疆已经收抚，裁兵指导所经费已经规定。

△　何键电鄂军驻监利部队堵击湘、鄂边境红军。同日，彭进之部在沔阳与红军激战。

△　闽、赣、湘三省“剿匪”总指挥金汉鼎在赣防次就职，并令三省军队准备出发。

△　日本外相币原在东京招宴张继及驻日公使汪荣宝，对中苏问题及通商航海条约交换意见。

9月17日　苏联政府答复南京政府有关委任中东铁路副局长之复文，是日已送驻苏之德大使，内称：“南京政府既否认其自己条件，则谈判地点问题直无意义，此后冲突责任须由南京政府负责。”

△　第四师师长张发奎解除蒋介石派往宜昌接防之曹万顺部武装，通电拥汪反蒋，提出三点主张：“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违法乱纪”，“应请立即解散，再行依法召集”；“二、侵蚀本党之腐化分子，及一切残余封建势力，应请根本铲除，并继续反帝反共的工作”；“三、汪精卫同志为本党最忠心最伟大的领袖”，“应敦请回国主持大计”。

△　阎锡山至建安村会晤冯玉祥，解释他始终与冯合作讨蒋，望勿误中蒋的离间计。阎建议先由西北军发动，晋军继起响应。

△　红军彭德怀部进攻铜鼓。

△　王正廷为比教士三人9日晚在湖北宜昌柳塘被杀案致电刚恒毅主教称："本部长对此异常焦灼，刻正饬令地方当局详细调查。以后对于教士，当妥为保护，不使再有意外事件发生。"

△　接收天津比租界委员长凌冰语记者称，此次接收比租界有两点足以自慰：一、比方公有财产一律无条件交还我国；二、比租界收回后，该处外人私产须一律向当地官厅更换契约，此实开我国收回租界之先河。

9月18日　张发奎率所部第四师21500余人于湖北枝江渡江，向湘西进发。

△　宋子文发表盐务借款宣言，谓现在盐税收入渐有起色，每年应还外债可以按年偿还，积欠之数亦可按计划清理，英、法借款于1931年可以还清；1912年克利斯浦借款，拟从1932年起分年偿还。19日，英、法、日盐税借款团对宋之宣言，认为时机尚早。

△　《中波通商友好航海条约》在南京由王正廷与波方代表魏登涛正式签字，该条约定明无领事裁判权及内河航行权。

9月19日　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谈对苏方针，谓："苏联抗议全文尚未接到，仅见外电，如果到达，当逐条驳复。俄方有无诚意尚待静观。总之，现时症结悉在局长问题，此问题未解决前纵互相抗议，亦无何等结果。"

△　晚，武汉当局因闻张发奎军变，有向湘西移动模样，采取临时戒严。曹万顺原定是日赴宜昌，因所部三个团开往宜昌，三四日尚无回信，暂留武汉。

△　张发奎部旅长黄镇球、邓龙光自宜都电南京蒋介石，表示服从，称该旅长等决不受威胁，誓死拥护中央，全部移驻宜都待命。

△　蒋介石拘押方振武于南京。

△　国民党中央因俞作柏治桂期间采取急进主义，将“清党”时革除或通缉分子起用，派往各县担任农运工作，故派吴铁城前往调查，并电促俞入京。

△　红军毛泽东部一纵队攻克中都，距上杭城30里。闽军卢新铭电驻汕代表向各方告急，谓上杭与峰市间交通断绝，援军不至恐难持久。

△　美国以春间上海流行脑膜炎症为借口，派员在沪检疫。卫生部请外交部向美抗议，要求将此种不合国际礼让之政令即日撤销。

9月20日　王正廷在南京对记者报告外交，称中苏交涉日来无甚发展，“现在我国方面，完全以逸待劳，故前方极为镇静”。

△　郭同抵哈尔滨调查中东路事件。郭语记者称，“中央对俄主张，始终一贯，并未变更”。

△　国民政府令：陆军第四师师长张发奎未奉命令，擅自调动，着即免职听候查办。任命黄镇球为陆军第四师师长。

△　蒋介石电令刘峙率第六师讨伐张发奎，并命刘文辉、李仲公开往湖南，阻止张部南下回粤。

△　蒋介石电张发奎，称：“改组派日以挑拨离间为事，汪先生决无回国与彼等合作之可能，若汪先生应彼等之请而回国，中正亦决无与汪先生合作之可能。”

△　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称病辞本兼各职。

△　红军朱德部约2000人，集中龙岩及坎市间。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受杨树庄委任为闽西“剿匪”指挥官，是日出发南靖进攻红军。

△　红军朱德部攻克上杭，闽军卢新铭旅被歼。

9月21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柯夫在莫斯科区第一大会演讲，谓中国之提议不能作为解决冲突之根据，因中国系欲以谈判维持其用武力攫得之地位，在此等情况下谈判，无由成功。并称："苏联政府自始即主张恢复原状，而同意最低限度以中国委任中东路新理事长为委任俄籍新正、副局长之交换条件。倘令中国拒绝此最低限度之条件，即中国无和平解决冲突之意。"

△　国民政府准第六路总指挥方振武辞职。22日，方部第四十五师师长鲍刚由芜湖发出通电，称第六路总指挥部奉令结束，第四十五师调动及编遣，悉听中央直接指挥。

△　刘郁芬偕贺耀组、于右任等自西安启程赴京。24日抵南京后，刘语记者，称此来系报告西北编遣情形，并请示一切，西北有兵30万，近已开始点验编遣；并称："过去误会，全系路远，交通阻隔，致为谣言所乘。今后常来常往，谣言自无从发生。"

△　古应芬以广西俞作柏及李明瑞、杨腾辉等呼应张发奎之独立，似有迫近广东之势，特电请陈铭枢、李扬敬、余汉谋回粤防范。陈等是日启程返粤。

△　何成濬、马廷勷离并返平。何语记者称，"二集团"编遣已经商定，由刘郁芬、石敬亭负责进行。编遣后西北军政各权概交中央，由中央月协款200万，与他军一视同仁。

△　宋庆龄离沪赴法。何香凝由沪抵香港。

△　国民党中训部致函国民政府，称：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误解党义，不审社会实情，放言空论，饬令教育部加以警告"。24日，国民政府准中训部函请，明令彻查中国公学校长胡适。

9月22日　　苏联16日之复照已由蒋作宾转递到南京。是日，王正

廷召周龙光等商议对苏复照，内容有两点：中苏宣言依照最初原稿，不涉及中俄、俄奉两协定；中东路局长之任命不明白规定，俟谈判时解决。

△　张发奎前头部队吴奇伟旅到达石门县之大望山、王家渡一带，余部在澧县之王家厂。23日晨向慈利、永顺方面推进。

△　红军彭德怀部又克铜鼓，该地县长逃浏阳。

△　刘和鼎师刘尚志旅抵华口，陈万泰旅抵适中。23日，刘旅到达漳平。25日，陈旅抵龙岩。龙岩红军朱德率第二、三纵队转移上杭与第一、四纵队会合。

△　湘军吴尚师阎仲儒旅占桑植，红军贺龙部向鄂境鹤峰转移。

9月23日　外交部否认拟就答复苏16日照会复文之说，谓外部拟暂不答复苏方来照，现在中苏双方时有接洽，万一交涉无望时，将向世界公布交涉经过详情。

△　陈调元在山东省政府纪念周会上，谈张发奎、方振武免职原因，谓张发奎系因与俞作柏联合发电，邀请汪兆铭回国主政而引起；方振武因有证据与上海行刺蒋介石案有关。方现在京尚可自由，但出京困难。

△　辽宁铁岭日宪兵六七人酗酒滋事，大闹戏院，警察干涉不服，当场打伤华警三人。下午3时，日驻军包围县公安局，逮捕保安队官兵30人，监押于日本宪兵营。

△　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外界谓其复任后发行债券已达四五亿元，专供军政费消耗之用，特公布任内所发债券详表进行解释。声称除已还本外，因军政费用而所负之债额总数仅13800余万元，裁兵公债用于军政费者仅五六百万元。

△　国民政府任命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石青阳为委员，赵戴文准免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职。

△　广西俞作柏部向广东方面移动。

9月24日　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到京看望方振武，方嘱阮转告蒋介石，称“本人始终服从中央，过去历史可证明”。阮即见蒋表明方之态度，蒋允任方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并令第四十四师阮玄武与第十师方鼎英、第四十五师鲍刚与第六师方策对调师长，易部统率。阮当晚离京回防。

△　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馀、陈树人、陈璧君、潘云超、郭春涛12人在香港联名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最近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之十大罪状，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行使职权，改组国民政府”等五项主张，“建设统一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所望革命民众一致兴起，为本党之革命纲领而奋斗”。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前广州孤儿院院长潘达微，并指定广州孤儿院为其纪念。令称潘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志洁行芳，任侠尚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躬冒危难，收瘗七十二烈士骸骨于黄花岗，义声震于海内，后为广州孤儿院院长，晚年积劳致疾以终。

△　湖北省政府会议通过方本仁提议：黄安、麻城、黄陂等县红军出没无常，宜先组成一中队便衣游击队进行潜伏活动，归警备部指挥，委皮宗荣为大队长。

9月2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宣言，请驻苏德大使转南京及辽宁政府，略谓：苏联政府已促南京及辽宁政府注意武装白俄卫军及中国军队在苏联领土挑衅，并指出必须立即解散一切白俄卫军，为防止新严重纠纷之惟一方法。

△　外交部向驻京日领事馆询问是否接到有关铁岭事件之报告，请即致电铁岭日守备队释放被捕之公安人员。同日，沈阳交涉署亦向日领提出交涉。

△　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设宴为刘郁芬洗尘，刘发表演说，谓上年因交通不便，故中央与西北略有隔膜，近来反动派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第二编遣区将士不为所动，“只知服从中央而不知其他”。

△　于右任语访者，谓陕西人民饿死者达50余万，潼关道上妇女、儿童之被卖出关者不计其数。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命毛光翔、李仲公、窦居仁、马空凡、李雁宾、马明亮、胡刚、叶纪元、杜忱为省府委员，指定毛为主席，李（仲公）、马、叶、杜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10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　福建省政府决议，自是日起实行全省戒严。陈维远旅全部回粤，第五十六师刘和鼎派队接防。

△　南京市店员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取消旧商会，维持商民协会名义；通令各级党部扩大民众组织，增加民运经费；颁布店员服务法。

9月26日　张发奎部第十二旅、第十旅过石门，何键遵蒋介石令派吴尚、周斓等师分途堵截。同日，湘军李韫珩旅在石门，与张发奎后续部队第十一旅、教导旅进行激战，张部不支，退走辰州。

△　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发表命令：免去李燊第四十三军军长职，调充军事参议院参议。

△　驻铁岭日军复向县署索取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未遂，即绑去队兵三名，商民四名。卢忿而自杀。

9月27日　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师长李明瑞等通电响应张发奎宣布独立。是日，俞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率兵与广东陈济棠部作战。

△　王正廷在京语记者称：中苏交涉截至今日，因蒋作宾在日内瓦开会，故未接具体解决办法，现蒋已返柏林，中苏交涉当由彼继续进行。双方所争执之点仍为局长问题。

△　第四十五师余亚农旅在安徽临淮关哗变，捕新任师长方策。

△　蒋介石派毛炳文、徐源泉、夏斗寅三师会剿皖境方振武部。

△　蒋介石派刘文岛飞抵长沙，与何键商堵张发奎部机宜。

△　美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决定对华赈务不再推广。据该会派赴中国调查西北灾情之委员团主席比克尼尔报称：中国之灾情系缺乏强有力之中央政府所造成，人民受军阀苛索、土匪蹂躏等，以至民穷财尽。灾民饿死300万人以上，“非天灾，不受人怜”。

△　蒙藏委员会常会决议将中东路详细经过情形通令蒙古各盟旗，劝勿受利诱；并致函班禅请其劝导蒙民“勿为赤化所惑”。

△　赈灾委员会主席许世英等电蒋介石，略谓：灾民数至5000万以上，前发赈灾公债1000万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请再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并请每年筹备灾荒基金500万元。

9月28日　国民政府电令皖省府：代理主席苏宗辙着即来京，主席职务以吴醒亚代理。

△　张学良电外交部报告称：铁岭案迭经交涉，现已将捕去的24名保安队员及枪弹等释还一部分，余者均定28日晚释放，风潮不致扩大。

△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克日水陆总动员，由陈策派八舰赴西江组成西江舰队，派香翰屏、李扬敬、蒋光鼐三师为前锋，集全力进捣南宁，向桂军发动攻击。同日，吴铁城、李扬敬、邓彦华、蔡廷锴、余汉谋等由香港抵广州。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驻苏德大使，谓齐齐哈尔苏籍路员三人被枪击事，请德政府向南京与辽宁省当局切实抗议，并谓苏联将采取适当方法，以保护在华之苏联人生命。

9月29日　张君劢对记者谈中苏边事，称此次赴满洲里、绥芬河一带视察，藉悉中苏两军，远者相隔三四里，近者不过一里。两军接触以8月16日及9月8日两天最为剧烈，目下苏军仍不时以飞机向华方阵地窥探及投掷炸弹。

△　辽宁省政府令交涉署向日提严重抗议，要求：一、严惩铁岭肇事日军；二、释放被捕人员，交还枪弹；三、驻铁岭肇事军队离开南满线驻防；四、道歉、赔偿损失。

△　张学良电张发奎称："值此中俄开衅之际，正危急存亡之秋，望切种族之谊，敌同仇之忾，毋为戎首，遗臭将来，请速息争端，一致团结，以御外侮。"

9月30日　蒋介石电劝广西师长李明瑞，勿为改组派利用。略谓："顷据杨（腾辉）师长电称：健侯（俞作柏）受反动派挑拨，将挟兄反抗中央。"指出："改组派买空卖空……为世人所不齿之徒。""今张发奎部受湘西各军之打击，早已处于进退维谷之势。"末谓："尚希兄迅速电复，以明真相，并促健侯离桂来京，以息谣诼。""是非顺逆，成败祸福，尚祈熟筹之。"

△　张发奎反蒋事件发生以来，阎锡山一面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积极办理所部编遣；一面主动表示愿与冯玉祥合作反蒋。是日，偕冯玉祥、邓哲熙等同游五台山，当晚同住紫金山。

△　铁岭事件，日本反提出条件，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0万元为日兵治伤，并要求将广裕大街（即肇事地区）划为铁路附属地。沈阳交涉署严加拒绝。

△　收回法权筹备会在南京开成立会。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答记者称：收回领判权在最短期间必当促其实现，未收回前，尤应先行收回上海临时法院，候各国现对我国收回原则无异议，所须详细会商者，仅收回后之善后办法。收回后之法院组织法限下月讨论完竣。

△　蒋作宾、伍朝枢电蒋介石，要求取消顾维钧通缉令，使彼协助中俄交涉。

是月　四川省綦江、涪陵民众抗缴粮税，与当地驻军发生冲突，驻军困守城内，粮尽援绝，派代表出城交涉，订立军民协定，规定除现有税卡外，不再增税，保障自卫团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冲突结束。

△　上海市教育局发表全市私立学校调查结果：高等以上学校35所，学生1.1351万人；中等学校160所，学生2.1945万人；小学759所，学生5.4461万人；私塾172所，学生3394人；其他特殊学校145所，学生420人。

△　《新民报》在南京市创刊。

△　红五军第四纵队进入湖北崇阳、通山，决定在黄沙镇落脚。

10　月

10月1日　下午6时，苏军炮兵在飞机掩护下猛攻东北军满洲里阵地，炮战甚烈，战斗两小时，双方均有重大伤亡。2日晨又有炮战，苏军数百人逼东北军战壕，发生肉搏战，东北军阵地一角被占领。3日，苏联骑兵三面向东北军围攻，另以步兵攻击正面，战斗至下午5时停止。

△　蒋介石之代表刘文岛在长沙召集军政人员训话，勉湘军讨伐张发奎，拥护中央。宣称：“全国军权非集中不可……谁反蒋，即谁反对中央集中军权。”何键为湘军按兵不动辩解称：“军队调动稍迟，刘代表所深知，且财政困难无法补助，希望刘代表转达中央协济。总之，以后湖南为中央之湖南。”

△　刘峙电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再请明令讨伐张发奎。张部已进入湖南桃源，正向溆浦方面前进。同日，何键令周斓师集中宝庆、桃花坪一带，刘建绪师集中永州、新宁一带，分途阻击张部。

△　孙良诚离太原返陕，行前答记者称：第二编遣区点验工作正进行中，但军饷甚为困难，极望中央接济。此来与冯玉祥面商此事，已有头绪。拟返陕与宋哲元报告此行结果后，仍回陕州原防。

△　河北省政府会议决定发行编遣欠饷库券220万元。该省担任前第三集团军军费，至7月底欠饷已达373.7万余元，阎锡山迭电催发，无法筹支，不得已发行库券，以备遣散时发给官佐。

△　北平郊区农民不堪菜商重利剥削，5000余人赴市政府请愿，要求取消惠民菜业专行，自行组织合作出售蔬菜。请愿队手持白布标语，上书“打倒万恶滔天贪官污吏”，“剁除剥削农民菜专行”等口号。北平市长张荫梧被迫答应农民要求。

10月2日　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领事馆案，19名苏联职员受审，被告聘有律师六人辩护。

△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奉命自京赴沈阳与张学良会商中苏交涉。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免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俞作柏职，指定吕焕炎继任。5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国民政府文官处以俞作柏“擅调军队，侵犯粤边，破坏编遣，

扰乱两粤”，电令“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副总指挥吕焕炎督率所部克期歼灭广西俞作柏部。

△　驻法公使高鲁电外交部报告《中希友好条约》已于9月30日在巴黎正式签字。

10月3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馀、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勾结军阀余孽，阴谋破坏编遣，颠覆党国。交国民政府明令缉拿，其有党籍者送中央监察委员会分别议处。11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陈等。

△　“讨逆”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在广州布告“讨伐”俞作柏，并发宣言数俞五大罪状：“一、勾引赤俄，甘心卖国；二、招引共党，组织农军；三、与改组派同谋叛乱；四、破坏统一，以便私图；五、反抗中央裁兵大计。”同日，吕焕炎宣布就任“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即引陈济棠部余汉谋第五十九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暨海军陈策率舰九艘入梧州。

△　桂军师长杨腾辉通电拥护中央，声称桂省自俞作柏主政以来，一切设施多有乖戾，违抗国军编遣会议决议，将编遣会所派委员逮捕，望中央明令讨伐。

△　张发奎部第四师副师长李汉魂自湖南辰州电南京古应芬，表示拥护中央，略称：“第四师全体官兵离防以来，历尽艰辛，昨始到达辰州，今张发奎业已引退，全师任务暂交汉魂代理，听候中央处分。请迅令在湘各军，准予安全通过，勿再冲突，本师暂以芷江、洪江为驻地，请速派黄镇球师长前来就职。”

△　外交部电驻德公使蒋作宾，就苏军进攻满洲里事向驻德苏大使提出质问，声称中方所受损失须由苏方完全负责。

△　参谋本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测量会议，决议：一、各省测量局经费独立；二、测量教育取三级制，分简易、本科及研究科；三、航空摄影测量招生标准，取人才主义，不归各省分派；四、拟订整理全国测量计划大纲。

10月4日　　晨3时，苏军出动飞机五架，配合陆军骑兵在满洲里前线与东北军激战。同日，辽宁飞机第一队10架运抵长春，准备开赴前线。

△　王正廷在南京招待记者报告外交，声称解决“济案”时，国民政府不但未承认西原借款，且双方亦从未曾提及此事。

△　安徽省政府主席杨杰令第十、第十六两师各派两团，于是日配合第六师在太湖一带追剿第四十五师余亚农旅。5日中午，第四十五师全部被缴械，余只身逃英山，被余旅劫持之第四十五师师长方策出险抵舒城。

△　蚌埠驻军第七师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奉蒋介石令收缴市公安局各署队枪械，局长廖梓英撤职查办，以该旅副旅长陈傅文代理。

△　国民政府令赈委会讨论灾区移民办法。令称：“救荒之策，不在一时而在永久，与其移粟以安旦夕，曷若移民以辟草莱”，边陲藏富于地，亟当藉民力增加生产，着赈委会会同各被灾省区妥议移民办法，呈候施行。

△　教育部以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近年来刊发《人权与约法》等三篇文章，是日奉国民政府令训令称：“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防止“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胡适致函教育部长蒋梦麟，称来文“含糊笼统”，“不得谓为‘警告’”，“只好依旧退还贵部”。

△　蒙藏委员会讨论苏联在外蒙之行动，决议：一、通咨沿边各

省府及各盟旗严防“赤化”；二、咨请外交部向苏提出交涉。

△　日本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抵上海，就铁岭事件答《申报》记者称：事件发生时，本人已由东京启程，故未知真相，发表意见，恐反滋误会。

△　日本警察当局以检举共产党为名，在东京拘捕中国留学生130余人。后经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提出抗议，日方仅放回20余人。

10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免俞作柏广西省政府主席职，以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第四编遣分区办事处主任委员，黄权为第十五师师长；原任李明瑞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　外交部据张学良4日电告绥远县（今属抚远县）城失守经过，即电蒋作宾就此事请德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

△　夜12时，苏联骑兵进攻满洲里站东北军。6日凌晨1时许，东北军第四十三团援军开到，于2时许击退苏军。

△　张发奎部在石门与慈利麻衣袱击败李韫珩旅后，先后渡过沣水与沅江，于13抵溆浦。

△　第六师师长鲍刚自安庆抵南京见蒋介石，报告解决余亚农旅经过。鲍语记者称：余已觉悟，所部听候编遣，余本人则准许出洋。6日，鲍返安庆。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以后对西藏民族，不得再沿用番、蛮等称谓，以符中华民族一律平等之旨。

△　国民政府令直辖各机关：“从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商家账目、民间契约，及一切文书簿据，一律须用国历上之日期，并不得附用阴历，方有法律上之效力。”

10月6日　夜11时许，满洲里前线战事极烈，苏军出动飞机三架助战，战斗至次晨6时结束，苏军撤退。

△　商震赴五台谒阎锡山，报告在北平办理编遣及结束各部之经过。同日，薛笃弼抵五台会见冯玉祥、阎锡山，报告中央最近情况。

△　司法院通令废除斩刑。

10月7日　陈济棠由肇庆抵梧州，吕焕炎、陈策、香翰屏前往迎接。陈谓："此次讨逆共分三纵队：第一纵队由朱绍良指挥，率中央军向韶州出发；第二纵队本人指挥；第三纵队吕焕炎指挥，分向抚、大两河前进。定八日向上游开拔。"

△　比利时驻华参赞纪佑穆在北平会见法国公使玛太尔，报告宜昌比教士被杀经过，请法使依中法教约催促南京政府查惩凶手。法使应允协助办理。

△　新任驻华日本公使佐分利贞男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国书。

10月8日　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偕师长毛炳文等抵广州，晚与粤军将领李扬敬、陈铭枢等会商军务，决定朱部以北江为防地。

10月9日　国民政府颁令：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启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同日，又令定自本年10月10日为《乡镇自治施行法》及《区自治施行法》施行日期。

△　陈济棠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下总攻击令，分三路向浔州（桂平）、贵县、南宁前进，攻击俞作柏部；吕焕炎由藤县攻浔州，香翰屏、蔡廷锴由戎墟迫贵县；杨腾辉由桂、柳东下会师浔、贵，并派海军协助。

△　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在南京与王正廷会谈两小时，佐分

利语记者称：“本日会见系一种普通谈话，对中日修约事未多提及，至正式会期约在一月以后。”

10月10日　第二编遣区将领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等27人，在阎锡山、冯玉祥策动下自西安发出反蒋通电，推戴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副司令。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哲元等服膺三民主义，矢志革命，誓不与独夫共存，谨率四十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通电并列举蒋之六大罪状：一、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二、自蒋氏主中枢，政以贿成；三、财政不公开，黑暗贪污；四、消灭革命武力，以恣行其帝王专政之淫威；五、假编遣为名，行武力吞并之实；六、利用外交问题（中东路问题），转移国人目标。

△　蒋介石发表《双十节告同胞书》，以所谓“立勇、近仁、致知”勉国人，宣称“吾人革命与立国之要道为仁、智、勇”云云。

△　军政部长鹿钟麟及编遣委员会遣置部副主任刘骥是晚逃离上海。

△　德国政府提议中苏两方先将在满洲疆界两面所拘留之俘囚，举行对换。13日，外交部电令驻德公使蒋作宾答复德政府不能赞同。

10月上旬　汪精卫由法国回香港指挥反蒋军事。各路“护党救国军”均发委任状，自第三路以下的总司令，有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胡宗铎、石友三诸人；第一、二路总司令留给冯玉祥、阎锡山，未曾发下。

△　红军第五军第四纵队在黄沙镇举行大冶中心县委和第五纵队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在鄂东任务为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

10月11日　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西北将领，声称：“宋哲元、石敬亭等破坏编遣，背叛中央，称兵作乱，逆迹昭著……着即免职，缉拿

惩办，各该部队或甘心附逆，或被胁盲从，着各路讨逆军指挥分别剿办绥抚，以遏乱萌。”

△　国民政府下令缉拿鹿钟麟、刘骥，令称：署理军政部长鹿钟麟、抚恤委员会委员长兼编遣委员会遣置部副主任刘骥，“图谋不轨，离职潜逃”，“均予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机关一体缉拿”。同日，任命该部政务次长朱绶光代理军政部长。

△　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联名电阎锡山，谓宋哲元、石敬亭等背叛中央，破坏编遣，国府已明令讨伐，请其就近负责解决。

△　晨，阎锡山离建安村急返太原。同日，何成濬、刘镇华奉蒋介石令由平赴晋晤阎锡山。

△　苏联军队与东北军在同江激战甚烈。

△　张学良在沈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决议拥护中央，并致电阎锡山取一致行动，拱卫北方。

△　国民政府令：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前因矜躁未除，志行不固，轻生战衅，贻误西陲，业经明令免职查办在案，兹据电陈图盖前愆，情词恳切，姑从宽宥，应即免予查办，许其自新”。

△　何键偕刘文岛、叶开鑫等10余人由长沙赴宝庆，策划“督剿”张发奎部。

△　北平外交团举行非正式会议，交换中国时局意见，对修约、法权等事决中止进行，静候时机到来。

△　浙江省西湖博览会自6月6日开幕以来，历时四月，是日闭幕，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致训词，希望民众一致起来，协助政府及工商界，以促进中国工商业之猛进。

10月12日　　苏联以陆海空军袭击三江口，占同江，东北军退守富锦。同江之役，“江平”、“江安”、“江泰”三艘军舰被击沉。苏联军舰亦被击沉三艘。

△　冯军分三路出动，孙良诚任西北军前部总指挥。是日午间，孙部前锋已达洛阳，原驻洛阳之第五路军唐生智部第五十一师退集孝义防守。

△　晨，蒋介石召见唐生智、朱培德、何应钦等商讨应付西北军事。同日，唐、朱、何三人联名致电阎锡山称：“焕章与宋、石、孙逆，关系至深，在晋居留，难保宋、石、孙诸逆不假借其名，以为号召，殊非所宜。我公如能劝其来京，使谋逆之徒，无复藉口，则乱事易平。”“至焕章个人安全，则生智等皆可以人格担保。”

△　晚，蒋介石召集杨兆泰、赵戴文、朱绶光谈话，询问阎锡山对西北态度。杨答称，阎素以服从中央努力和平为职志。蒋又询此次西北事阎知冯玉祥曾参加否？杨等皆答不知。

△　蒋介石派军政部次长陈仪赴东北劳军，是日离京北上。14日，抵沈阳，晚，会见张学良。

10月13日　　东北江防司令沈鸿烈偕依兰镇守使李杜由哈赴富锦督战。同日，辽宁航空第二、三队飞机九架，由长春飞哈尔滨支援前方。

△　蒋介石邀唐生智到南京城外汤山共度周末，戴季陶作陪，蒋以“真诚合作”相抚慰。唐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领袖有命，谁敢不从。”互相暂时让步，携手合作。

△　晨，何成濬在太原与阎锡山晤谈。据何随员谈：阎表示对“二集团”将领通电，事前确未知晓；对西北问题仍望依照中央意旨和平解决。

△　晨，宋哲元抵潼关，其总部也随之由西安移潼关。

△　陈济棠电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谓俞作柏、李明瑞已由南宁逃往龙州，杨腾辉委张贯之为南宁警备司令。

10月14日　下午7时许，苏联军队退出同江城，移驻三江口。同日，双方海军在三江口发生激战，炮兵总指挥张力声阵亡。

△　苏联政府就三江口、同江县之役发表声明，略谓：中国军队炮击阿穆尔松花江下游航行之苏联船舶，并敷设水雷，故苏陆海军在阿穆尔沿岸采取断然处置。此后中国方面若不反省，仍当取同样行动。

△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实施编遣，乃国家治乱之所关”，宋哲元、石敬亭处心积虑，阻碍编遣，“冯系逆军乃中国统一之最后障碍……汉贼不两立，革命与反革命不共存，我不消灭逆军，即将为逆军所消灭”。同日，蒋任命唐生智、何应钦为讨伐西北军之第一、二路总司令；并派方本仁赴晋与阎锡山磋商时局。

△　何成濬、刘镇华离晋返平，行前何发表谈话，称：西北军事与阎已议有办法，绝不至影响大局，中央与阎意旨均愿和平解决。俟与蒋晤面，即可决定进行程序。

△　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孙桐萱、曹福林、张德顺联名电国民党中央“讨逆”，谓：此次西北军变，其中不无明白大义之人，一马之害岂及于群，一发之牵动及全体，则石敬亭实为罪魁祸首，理当挞伐，群起相攻。

10月15日　哈尔滨搜查苏联领事馆案，经近五个月审讯，是日由哈埠特区法院正式宣判：处徒刑九年者四人，七年者19人，五年者七人，二年者四人。理由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共同集会，执行重要事务之所为”。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讨论对西北军作战部署及讨伐各军名义。16日，总部委派“讨逆”军五路总指挥：第一路方鼎英；第二路刘峙；第三路韩复榘；第四路何键；第五路唐生智。并以陈调元任后方总预备队总指挥，贺国光为第一路总参谋长。

△　阎锡山电南京赵戴文复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表示对宋哲元等举动，当尽力制止。

△　赵戴文在中央广播电台报告阎锡山对时局主张，谓宋哲元、石敬亭凭藉武力抗拒编遣，和平完全被其破坏。阎愿献身党国，惟政府之命令是从。并谓今晨接阎电，昨日起已派卫队旅杜春沂旅长监视冯玉祥行动。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正式成立。16日，刘峙就行营主任职。

△　刘镇华通电答复宋哲元、石敬亭，声称：“若执迷不悟，甘犯和平，惟有本尊电大义为重私交为轻之旨，疆场相见。”

△　红四军猛攻闽西峰市，与当地警士团激战四小时，占领峰市。峰市公安局长陈荣光率队向广东大埔败退。18日，红军攻克大埔。

△　红军袁文才、王佐部又克江西宁冈县；何键电许克祥部往援。赣军金汉鼎部攻占上杭城。

10月16日　　蒋介石电吕焕炎，谓：“俞（作柏）、李（明瑞）既逃，此后动作，更贵敏捷，各军应共入邕，歼灭妖氛。”

△　方本仁抵北平就任北平行营主任，是日在平语记者称：因何成濬出发赴郑州，西北问题不难解决。17日，方本仁离平赴太原。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调任石友三为安徽省政府主席。21

日，国民政府发表任命令。

△　阎锡山离太原复往五台县，旋即赴建安村与冯玉祥会商西北军务。

10月17日　外交部特派员郭同由沈抵津，对记者谈称：“中苏交涉最近在德国接洽，已有具体办法，使双方面子过得去，内容暂难宣布。”“中日交涉，成为悬案者五百余件，最近铁岭事件，亦将来悬案之一。”

△　“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赴郑州指挥军事，蒋介石夫妇亲自送行，下午4时唐与何应钦同车离京西上。同日，何成濬由北平抵郑州。

△　吕焕炎在梧州通电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

△　金汉鼎自会昌电漳州张贞出兵“会剿”红军，称“武平共党已完全肃清，本军十五日抵高梧（离上杭30里），十六日进上杭城，请各友军夹攻”。

10月18日　哈尔滨警察局派警察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哈埠分行，并逮捕苏联职员二人。据称该行自停业后，仍拟收回华商贷款，华方认为非法，故予封锁。

△　外交部长王正廷招待各报记者报告外交情况。称：外部前据德公使转来俄国照会，谓中东路有枪毙三俄员事，据张学良14日来电谓“绝无其事”，外部已将此意电告德公使。

△　西北军在陕州开军事会议，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等10余人参加，决定即日下令向郑州、许昌、信阳、襄阳等地之蒋军发动总攻击。

△　方本仁抵太原，语记者称：“中央军事布置已妥，徐、汴、汉

行营、兵站等均成立，军队正开始调动。蒋对西北事拟尊重阎意，持容忍态度，先礼后兵，予阎以斡旋余地。”

△　是日及20日，张发奎部在武岗江口、瓦屋塘，两江击退刘建绪部，以及李韫珩、周斓、陈汉章、吴尚各部（共六个团），于31日越过湘桂交界大山之甘溪苗寨乡，进入广西龙胜县。

△　援粤第六路军决定班师回京。当晚第八师乘“海平”、“裕通”、“济通”等七轮离粤。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定21日启程。

△　粤军师长蒋光鼐令陈维远第七旅入闽“剿共”，是日陈由汕头赴韩江上游“督师”。

10月19日　　西北军孙良诚部向豫西巩县之洛河桥附近，用大炮向唐生智第五路军猛攻；驻孝义之姚永安部炮兵团用大炮还击。洛阳以南临汝一带亦发生战斗。

△　晨，方本仁赴五台县建安村与阎锡山会谈，当晚返太原。方语记者称：阎对时局表示乐观；对西北军处境艰苦甚为同情；对西北军事仍望和平解决。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命张治中兼武汉行营主任，刘峙改任为前敌总指挥。

△　驻德公使蒋作宾自柏林电外交部，谓关于抗议苏联军队进攻三江口的照会，已请德政府提出，苏方未答复。

△　晨，红四军朱德、毛泽东部再克福建虎头沙（距大埔40里）。同日，第一纵队由闽西武平县出击广东梅县。

10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馀、陈树人、陈璧君、潘云超、郭春涛联名通电声讨蒋介石，号召武装同志，“露布到

日，应即迅提义师，扫除叛逆”。

△　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陈仪、周龙光及东北军政要员50余人出席，议决：一、饬令前方严防苏军进攻；二、东北出兵防苏，对西北军作战决不参加；三、诚意拥护中央；四、请阎锡山劝息西北战事。

△　唐生智乘铁甲车赴黑石关前线视察，对官兵训话，称：“此次声讨西北军，完全为党国而战。”当日返回郑州，召杨杰等开军事会议，决议致电蒋介石，请颁总攻击令。

△　中国出席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代表张伯苓、吴鼎昌、陶孟和等由天津启程赴日本。28日，会议在日本京都开幕，出席会议者有中、日、美、英、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等七国代表200余人。会期至11月9日共13天。是日，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宣言中陈述济案及皇姑屯事件的经过，要求废除治外法权，谓取消领判权时机已至。

△　粤军陈维远、戴戟两旅分别自松口、三河坝进攻入粤红军，是日侵占大埔。红军转移石下坝，旋退峰市。

10月21日　　中苏交涉无进展，王正廷电令蒋作宾中止与苏谈判，并电张学良加强边防；另方面整理交涉经过，准备公告国人及外邦。

△　刘镇华由杨村到北平，语记者称：“本人主张停止战争，以苏民困，曾电宋哲元等请其翻然悔悟，停止军事。昨津报竟谓所部有联冯之意，深为可笑，实无辩白价值。”

△　上午，陈调元奉蒋介石令由济南赴德州访石友三，商石部调皖事。下午返回济南。陈语记者称：此行结果圆满，石表示拥护中央，石部俟省军接防完毕后，即分批南开。

△　湘军旅长阎仲儒电告何键，谓：红军贺龙部在植树坪与鄂军

万倚吾团激战后，转移鹤峰。阎亲率全旅赴鹤峰“会剿”。

10月22日　“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方鼎英率指挥部人员由蚌埠过徐州西上，参谋长贺国光偕行。贺语记者称：“西北军事可于最短时期解决，因西北力量薄弱，我军一总攻，即可各个击破敌军。”

△　何应钦抵郑州，与何成濬、唐生智会商军事。

△　何键、刘文岛、叶开鑫由宝庆抵长沙。湖南堵击张发奎战事告一段落。何对欢迎者宣称：“我军堵剿张发奎部，以十八、十九、二十日为最烈。周斓师在龙潭，李觉旅在江口，陶广旅在金瓦屋塘，分段肉搏。”

△　陈济棠在广州谈“桂战”局势，谓：“本人中止赴梧，杨（腾辉）、黄（权）部已入邕，粤军仍驻梧、浔，暂不班师。”

△　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在上海日侨俱乐部谈日本之移民政策，宣称“中国为日人海外发展第一线”，“每年移民一万尚不为多，不幸近年来中国国内变乱时起，未能达到最初之期望”。上海舆论界对此言论极大反感。

△　北平市人力车工人因反对市党部改选总工会，借“电车影响人力车夫生计”之名，与电车工会发生大冲突，电车被毁17辆，司机、售票员伤10余名，电车工人全体离职逃避。市内警察全部出动镇压，逮捕人力车工人李政德等六名及群众数人。当晚市卫戍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戒严令，人力车工人1400余名被围拘光明殿，全市人力车工会一律被封闭。23日，北平市长张荫梧电南京行政院报告昨日工会冲突，系因市党部改组总工会，以致新旧两派互相争斗，大同盟鼓动人力车工会制造事端，因此形成大规模暴动。

△　广东省财政厅长范其务因原定军费月支250万元，本月骤增500万元，无法筹措，特电财政部辞职。

10月23日　　外交部电令驻外各公使向各国宣布同江战役事实真相，略称：“本日德参赞在京面称：苏联以我方军队于十一、十二两日向彼枪击，提起抗议。本部以同江之事确系彼方启衅，我方还击，出于自卫，事实俱在，应由彼方负完全责任。俄提抗议，不能接受。”

△　哈尔滨探访局自20日以来，捕获苏联敢死队18名。是日下午，又派警察赴苏领事馆搜查，捕去馆员三人。当局声称：“此次搜查，乃因有人告密，共产党图在哈尔滨起事，以苏俄领署为根据地所致。”

△　红军朱德、毛泽东部约5000人于晚12时自松源分兵两路转移，一向象洞，一向蕉岭。粤军分别向岩前、中都堵击。

10月24日　　张治中在武汉行营召集各处科长开会，讨论作战方略。略谓：作战地点当在豫南、陕南、陕东各处，鄂省决无战事。前敌作战计划须待刘峙返汉后再作决定。

△　马鸿逵奉命被任为陇海警备司令，是日由济宁率部南下徐州。

△　拂晓，赣军金汉鼎师周志群旅由武平，韦旅由汀属回龙会攻上杭；红军傅柏翠率农民赤卫队应战，因寡不敌众，退出上杭城。同日，粤军陈维远旅自松口及下坝进攻松源。

10月25日　　阎锡山在五台建安村晤冯玉祥，劝冯檄告西北将领停止军事行动，实行编遣，并将进入豫南各军退回潼、洛。冯以部下渐大，恐不听话，表示可姑发一信。

△　驻旧金山领事高瑛夫妇贩卖烟土案，在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公审。检察官提起公诉，高夫妇拒不承认，审讯无结果。26日，第二次审讯亦无结果，待调查后再审。

△　蒋作宾由柏林电外交部，报告在苏华侨情形。称：“接德国政府照会称，驻列宁堡德领事报告，被拘华侨虐待极惨，九十七人禁锢两小房，饥寒交迫，已由德领力争改良。”

△　红四军朱德、毛泽东部攻克广东梅县。翌日与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在城北门外激战，黄昏后退兴宁。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卫生部长薛笃弼免职，部务由次长刘瑞恒代理；外交部次长唐悦良准辞职，以李锦纶为外交部政务次长，张我华为外交部常任次长；广州市改为特别市。

10月26日　　拂晓，蒋军与西北军在豫西巩县至登封间全线开火。

△　第六路军总政训主任陈平裘由港抵沪，对记者谈“讨桂”经过。谓此次中央特派第五十师及第三、八两师，由朱绍良统率入粤，朱受命后，一面令第五十师由赣到韶关集合待命；一面自率第三、八两师，全数到广州，未及两旬，广西遂告底定。今奉令率部回京待命，第八师已全数离粤，第三师及总部正候船待发。

△　王正廷由南京飞抵上海，记者询以中苏问题，王称：“自宣言发出后，且看俄方如何表示再定办法。如果将来诉之武力，我方早有准备，足资防御。”

10月27日　　蒋介石为讨伐西北军发表《政府今日之责任与国民现在之地位》一文，声称：“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晚，蒋又发表讨冯誓师词。

△　北平人力车工人风潮案，经军警会审决定，将人力车工人900余人开释，驱逐出境；其执监委、组长等移交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理。28日，人力车工人有800余人，分三批由军、警、宪兵释放押解

出境。

△　驻华日使佐分利贞男抵北平，途经青岛时曾发表谈话，谓纱厂问题不久可望解决，并否认在沪发表每年移侨民万人来华之言论。

△　陈济棠接海丰县长告急电，称海陆丰共产党千余名占据海丰属新田、河田等20余村。陈电蒋光鼐由大埔率队攻红军，并电蔡廷锴调驻梧部队一部回粤，开海陆丰。

△　蒋介石急电川军将领整装待命，拟调邓锡侯、田颂尧分攻陕、甘，夹击西北军；刘湘部出击鄂西。同日，刘湘、龙云、毛光翔密电筹商时局，表示一致拥护中央巩固西北办法。

10月28日　　蒋介石由京乘轮赴汉督师，其国民政府主席职由行政院长谭延闿代，总司令由参谋长朱培德代。行前发出讨冯（玉祥）誓师通电。略谓："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

△　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并每月拨款680万元与阎作为"协饷"。

△　何应钦对记者谈军情，称："前方军事已布置妥善，预料一月内即可肃清西北叛逆。本日前方已下总攻击令，前线军队齐向洛阳方面猛攻。本人定即日赴郑州。"

△　晨，唐生智率随员专车赴孝义转前线督战。西北军孙良诚部自27日晨起猛攻登封第九军魏益三师。第八、十两军各遣一部增援，均已达到阵地。

10月29日　　蒋军分三路进攻西北军，唐生智、方鼎英、何成濬、杨杰均赴前方督师，在黑石关、登封、临汝、禹县、郏县以西激战终日，至晚6时，西北军程心明部向洛阳退却。

△　国民政府任命李燊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任命顾祝同、夏斗寅、方本仁为编遣委员会直辖第二编遣分区办事处委员。同日并公布《公务员任用条例》，凡13条；《审计部组织法》，凡17条。

△　行政院就人力车工潮事电北平市长张荫梧，声称："车夫啸聚骚扰，企图暴乱，与寻常滋事不同……尤应搜索余匪，以遏乱源。"

10月30日　　苏联政府就中苏交涉问题发出第十次宣言致各国政府，对国民政府25日宣言有所答辩，并主张与东北当局依照1924年俄奉协定进行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

△　晨，苏联飞机六架先后在富锦投弹，据称当地民众死伤九人。下午苏联飞机五架、步骑兵一师、炮舰10艘向富锦30里外之高家屯进攻。

△　晚，第九军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将西北军魏凤楼部四团击退，占领临汝。

10月31日　　上午，蒋介石由汉口赴许昌视察，布置讨逆军事。邵力子、周佛海、刘文岛等随行。

△　第五路军王金钰部拂晓以五团兵力攻占登封。

△　苏联军舰九艘，冲破东北海军防线，进入富锦江岸用炮猛攻县城，同时派步骑兵登陆与东北军激战。

△　何应钦、方本仁、刘志陆等抵太原，商震、辜仁发、周玳等到站迎接。

△　国民党中常委决定：解散广西省党部执委会，派吕焕炎等进行整顿。

△　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外交部，报告在东京被捕之中国留学生共

达百余人，经迭次交涉，已放30余人，其余未释者须由日当局详细研究再定。同日，据日警察厅报告称：“近来中国共产党在日甚为活跃，全境约百余人，其在押之七十余人中，均查获有与第三国际之通信及文件传单等。”

11　月

11月1日　　国民政府令：自本年11月1日为《工会法》施行日期。

△　《申报》刊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肃清改组派宣传要点。共分四部分：一、改组派之分析；二、改组派之最大罪愆；三、怎样肃清改组派；四、口号。

△　王正廷在上海对记者谈：“中俄交涉略有新发展，我方宗旨，无论直接谈，或任人调停，或国际仲裁，均无不可，即根据前订之中俄协定，以谋解决，亦所乐从。总之，我对中东路有一半权利，苟不越此范围，我即认为有解决之可能。”此后交涉方式，如形势必要，“亦可由中央责令地方当局，全权代表中央办理”。

△　晚，阎锡山由五台返太原，即赴傅公祠会晤何应钦、方本仁。2日晨又继续会谈，阎对时局仍主和平解决。方语记者，宣称“会商结果异常圆满”。

△　陈济棠偕陈章甫乘广三路车赴三水，转乘兵舰赴梧州督师。

△　华侨教育会议是日至9日在南京举行，到代表40余人，戴季陶主席，会议着重讨论发展华侨教育办法，通过广设海外华侨社会教育机关等案。

△　驻华英、美、法、荷四国公使照会外交部，拒绝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

11月2日　国民政府训令财政部迅拨50万元给广西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吕焕炎，“派部队分赴左右两江肃清余孽，并出发桂、全堵张（发奎）逆”。

△　太平洋会议继续讨论在华领判权问题。是日，外国代表数人谬称：“如即将上海租界交还中国，则必发生纷扰，盖除行政干涉司法问题外，因华人缺乏经验，必不能立即担负全部管理事宜。”

△　苏军迫桦川，东北军被迫退至松花江上游。

△　日本逮捕中国学生案，经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交涉，是日汪电外交部，谓连日赓续向日外务省交涉，昨今又释30余人。惟共产嫌疑浓厚者（约60人）不能通融。

△　粤军蒋光鼐师对进入粤东之红军发动围攻，红四军被迫从东江退出，经石正转入赣南寻邬游击。13日又回师闽西。

11月3日　蒋介石抵许昌，召集何成濬、杨杰、唐生智等高级军官开军事会议，商讨对西北军作战计划。4日会议结束，即下攻击令，前线各军统归唐生智指挥。

△　陈济棠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堵截张发奎军之办法，陈铭枢、吕焕炎、香翰屏、蔡廷锴等出席。同日，陈电何键，请增派军队追击张发奎部。

△　张学良就日军在长春殴毙市民事电告外交部，称：长春日警1日干涉市政，在东瓜与市民冲突，市民死七人，请外部向日提出严重抗议。

11月4日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拨款购买日本熊本市荒尾村宫崎民藏、宫崎寅藏两位先生之屋舍园圃，作为孙中山在日本之永久纪念。

△　国民政府令：卫生部长薛笃弼免职；任命刘瑞恒代理卫生部长；任命林云陔为广州特别市市长。

△　晨，石友三由徐州抵蚌埠，所部移防完竣。石出布告称：“誓肃清西北，拥护中央，以苏民困。”

△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正式开幕。此为中国人自办银行在英国设立直接经理处之开端。

△　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满洲问题，日本代表声称：“日本在满洲所处之地位，类乎英国之在印度，美国之在海地。”“日本在满洲，不但于经济上负重大责任，且于军事上负重大责任。”中国代表对此强烈反对。

11月5日　　阎锡山在太原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就职通电称：“锡山以衰弱之躯，早不堪再肩巨任，第身许党国，义不敢辞，遵于本日就职。”

△　张发奎电唐生智，劝其“因利乘便，义旗高张，一发而有武汉，再战而定金陵。”

△　汉口行营主任张治中对时局答客问：一、中央各路军正在追击前进，直趋洛阳；二、阎已出兵讨逆；三、鄂北未发生战事；四、鄂属共军正派兵肃清。

△　国民政府令：广东粤汉铁路应即收归国有，其原有商股，着由铁道部发行公债限期赎回，以利建设。又令特任张难先为铨叙部部长。

11月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组广西省政府，除吕焕炎业经任命为该省政府委员并指定为主席外，任命梁史、蒋继伊、雷沛鸿、杨腾辉、林伯桀、杨鼎中、吕沧隐、杨愿公、伍蕃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以梁、蒋、雷、吕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

长。8日，国民政府第五十次国务会议通过，11日，正式明令公布。

△　汉口行营主任张治中偕航空署长张惠长乘飞机由汉口赴许昌谒蒋介石。行前张语记者称：此行系与蒋商第二步进攻敌军计划。7日，蒋在许昌召集张治中、朱绍良等会议军事。

△　何应钦、方本仁在太原宴晋要员，宣称对付西北问题，已商有善后办法，准备“恩威并用”。

△　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奉国民政府电准，以“捣毁电车，扰害公安、破坏秩序”罪将人力车夫“暴动”之领导人、北平市工会执监委员陈子修、贾春山、马文禄、赵永昌四人判处死刑，是日在天桥执行。

△　哈尔滨特区军警司令部第五署，在偏脸子逮捕苏联敢死团团员105人。据哈尔滨军警当局宣称，该团谋于11月7日苏联革命纪念日举行“暴动”。

11月7日　王正廷在上海接见德使馆参赞费休，询问柏林方面中苏事件消息。旋接见记者称：“苏俄仍在看风驶舵，寇边未已；富锦未失，仅一度被包围。”又称：“我侨民在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处被捕者约二千人，德政府以隆冬将届，希望我政府接济。据其预算，有俄币五万即足。政府于四日已汇款五万，请德政府交各德领发给华侨。”

△　晨5时，中央军在豫西偃师一带向西北军展开全线总攻击，激战终日。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何成濬任中路指挥，杨杰任左翼，刘兴任右翼。

△　全国商会联合会具呈国民政府，要求裁撤厘金，实行“工商救国”。略称：“关税已加，厘金未裁，与党纲不符，请准通令全国裁厘，撤销新税，废除苛捐杂税”；并要求于十九年（1930）6月底止，全国厘金一律裁撤。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省政府各委员第三次联席谈话会讨论如皋、南通、海门、泰兴、常熟等县“防范共党活动”案，决定：一、由省党部令该县党部严密侦查具报；二、由省政府酌派省、县警察队，并令各该县县长切实“防剿”。

△　中英宁案损失调查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对久悬未决之英人史密斯·贺贝生命赔偿案作出决议，此案宣告结束。赔款总额须经政府核准后公布。

△　太平洋会议讨论中苏问题。中国代表提议，于国际联盟设调查机关调查中东路事件真相。各国代表主张以第三国之调停为最适策，同时有主张日本以第三国资格出面调停者。日本代表表示，“中俄两国如有表示，日本当执调停之劳”。

11月8日　　谭延闿在京召开全国民食问题会议，到戴季陶、孙科、赵戴文、叶楚伧、陈果夫、易培基、邵元冲等，决定组织粮食研究委员会，以五院院长及农矿、交通、铁道、财政、内政、工商各部长为当然委员；另聘专家为委员，讨论具体方案，呈请政府办理。

△　国民政府第五十次国务会议决议：教育部政务次长马叙伦辞职照准，遗缺调常任次长刘大白继任。11日，国民政府明令正式公布。

△　驻沈阳日总领事就中东路问题再次劝张学良与苏直接交涉。张表示“在未得中央容许前，不便直接谈判”。

△　张发奎部到达广西灵川，是日蔡廷锴由梧州赴蒙山督师迎击。

△　安徽省政府通电各报馆宣称：盘据英霍间之余（亚农）逆部4000余人，经方师长策收抚，微（5日）日到省，驻集贤关；皖南徽属鲍（刚）逆所部，亦经韩旅、胡旅完全击溃。

△　安徽六安县独山数千农民举行起义，包围六安三区“自卫团”，夺取枪支。经过激烈战斗，占领独山镇。12日，在独山镇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提出“打倒豪绅地主”等口号。

11月9日　蒋介石下令限中央军于10日向登封方面发动第二次总攻。

△　刘镇华部于下午3时攻克豫西密县，西北军向卢店方面退却。

△　阎锡山7日晚患霍乱症。8日起停止会客。是日午，何应钦在太原答记者，谓：“阎拥护中央，态度极坚决，宣誓系仪式，阎因病暂缓举行。方本仁将长驻晋接洽一切。”

△　太平洋会议闭幕，1931年在中国召开第四届太平洋会议。

11月10日　蒋介石赴禹县前线督战，中央军向登封孙良诚部开始第二次总攻，战事激烈。

△　晨，太原各界举行庆贺阎锡山就任副司令大会，阎锡山、何应钦、商震等均派代表莅会。会议代表发言，均以拥护阎出师、巩固中央为主旨。

△　凌晨1时，湘军吴尚第五十二师发生内讧，第一五六旅旅长王霈、团长唐钺在常德同时被部下戕杀。

△　国民政府特派海军上将杜锡珪赴日本、欧美考察海军，是日晨乘船离上海赴东京，秘书长董显光等偕行。

△　粤军驻汕头部队调兵进攻兴宁红军。

11月上旬　李宗仁、黄绍竑就上海国民党（改组派）二届中央所委任之“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副司令职，与张发奎军切实合作，共同讨蒋。

11月11日　　国民政府令：任命凌冰为中国驻古巴国特命全权公使。

△　外交部发表英国政府定于本月15日将镇江租界交还中国政府之往来照会。英政府照会要求“此后应仍继续享受从货栈搬运货物、商品、材料等件，经过江岸达江中浮船或轮船之权利”。

△　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高瑛及其妻高廖氏贩运烟土案，江宁地方法院正式宣判：高瑛帮助输运鸦片一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科罚金6666元；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期得贿赂一罪，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褫夺公权七年。高廖氏处有期徒刑四年，并科罚金5000元，鸦片烟膏2299罐没收焚毁。孙垣无罪。

△　北平外交团开特别会议，讨论上海临时法院问题，决定依国民政府之要求，派代表赴南京出席改组临时法院会议。各国皆拟从上海、南京两处之领事馆中选派代表。

11月12日　　墨西哥代理外交部长艾斯加大照会中国驻墨公使，正式声明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　川军刘文辉召集泸州会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杨森均派代表列席，决定一致拥护中央，通电讨冯。15日，会议闭幕，议定邓锡侯部攻甘肃，田颂尧部攻陕西，杨森赴鄂攻郧阳，刘湘负责全省治安，刘文辉留后方筹饷，郭汝栋部全部离川，赴荆、沙一带候命。

11月13日　　蒋介石由新郑赴郑州，转赴黑石关阵地视察。旋召唐生智等会议进攻洛阳方略。

△　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对苏问题。14日，继续会议，沈鸿烈作关于苏方军事状况的报告。

△　张学良致电外交部，报告苏军军情，略谓：“其用兵计划，俟封冻后，一部由萝北进攻阳原，然后直捣哈埠；一部用骑兵直攻黑

河，然后直攻江省省城。”又谓：“伯力附近铁路沿线，堆积粮秣如山，确有第三国由海参崴运输供给，如云俄方缺粮，实不足信。”

△　吴尚由益阳致电何键，正式声明解除第五十二师师长职务，服从命令，分编所部。

11月14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推孙科、吴铁城赴东北，戴季陶、刘纪文赴西北劳军；二、规定学生党员担任党务办法三项，以不妨碍学业为原则；三、规定1月3日为广东新军庚戌首义纪念日，该省于每年是日举行纪念。

△　葛光庭奉张学良命由北平赴太原慰问阎疾，并商时局。16日抵太原，旋即赴总部访阎，代表张学良慰问病况，请阎斡旋时局，早息内争，并报告东北边防近况。

△　刘峙率部抵枣阳，二路总指挥部暂设县城。刘定15日赴襄阳，率蒋鼎文、杨虎城、陈诚等部，向陕南总攻击。

△　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大学停止施行学分制，改行学年制，以杜流弊。略谓：各大学实施学分制，原为便利高才生之自由发展，期能缩短修学年限。但施行以来流弊甚多，例如欲早毕业者，每择其易获学分之科目而习之，常有三年或不足三年而毕业者，至是否已学得真实之智识皆不顾及。故规定除医科外，均须读满四年始准毕业。

11月15日　　拂晓，中央军在豫西向西北军发动第三次总攻击，唐生智等临阵督战，蒋介石赴白沙（位于登封之东南）视察。

△　晨，陈济棠偕区芳浦、程璧金等由梧州乘舰返粤，下午抵广州。区语记者谓：“行营仍设梧不迁省。桂无张发奎军踪迹。”张发奎部已放弃进兵桂林之举，另从全州直赴灌阳向粤边进军，陈匆遽返粤布置粤边防务。

△　何键发出整顿军务电令：一、第五十二师师部名义，着裁

撤；二、第一百五十六旅旅长王霈出缺，着湖南团防训练所教育长张敬兮暂代；三、第五十二师第六团团长唐钺出缺，着张代理旅长暂兼。

△　外交部正式接收镇江英租界，是日在该地旧英领署举行接收典礼，到王正廷、英总领事许立德等40余人。王正廷致词称："英政府及商人此次以平等态度待我中国，以前的中英邦交不必论。自去年英国表示中国关税自主，此即我先总理所谓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有共同奋斗之可能。"

△　外交部招待新闻界，到中外记者30余人，由外交次长张我华作报告，略谓：一、本部一年来比较满意之工作，为收回天津比租界与镇江英租界；二、改组上海临时法院会议，已决定19日在南京开议；三、关于收回领事裁判权，英、美、法、荷四国已有照会到部，内容大致相同；四、关于中俄交涉，外交一项系整个国家的行动，决不能单独由地方办理。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

11月16日　　何应钦离太原南下许昌谒蒋介石，报告与阎锡山接洽经过，并携有阎致蒋函。据何对记者称："此行结果圆满，阎就副司令职后，已予西北军莫大打击。"

△　蒋介石任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为攻洛阳前敌总指挥，将王均之第七师、毛炳文之第八师、方鼎英之第四十四师、马鸿逵部骑兵旅、孙殿英部独立旅交徐调度。

△　何香凝上月出洋，是日抵荷兰。

11月17日　　"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李宗仁、第三路总司令张发奎联合通电讨蒋（介石），宣布"以护党救国相勖勉"，"务将蒋贼所凭借之不正当势力，摧毁廓清，俾无余毒"。同日两路出发，桂军

由李指挥，向梧州进发；张部向广东北江前进，互相呼应，直取广州。

△　总司令许昌行营政训部通电告捷，谓：“登封之敌，锐日（16日）经我一、二两师及刘春荣师、万选才师围城猛攻，敌军不支，即于夜十二时弃城西遁，我万师已进城。”

△　晨1时半，苏军大举进攻满洲里及札兰诺尔，与东北军第十七旅进行激烈战斗。18日，苏军再度以步、骑、炮兵攻击满洲里。19日，张学良电南京外交部报告苏军进攻札兰诺尔情况，略谓：“十七日晨，敌飞机二十七架，联合步、骑、炮兵三万余人，坦克车二十余辆，向满洲里、札兰诺尔同时进攻……我军以一旅之众，决死力战，伤亡多员，现正在激战中。”

△　晚，刘镇华由河南抵太原访阎锡山。刘语记者称：“此来系奉蒋命，向阎报告豫战近况，并商晋出兵事。阎表示极坚决，一切均在准备，候命进行。”

11月18日　国民政府公布《铁道部组织法》，凡21条。

△　晚，苏军4000余人围攻密山县城，另外两支各1000人向密山县属平阳镇、梨树镇一带进攻。19日，苏军占领密山县城，东北军退至离城15里下亮子待援。

△　何应钦到郑州谒蒋介石，报告阎锡山就职经过，及其对西北军善后之办法。

11月19日　国民政府下令嘉奖对西北军作战有功将领。令称：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第八军军长刘兴、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第四十七师师长王金钰、旅长上官云相，“均属忠勇奋发，为国宣劳”，均着传令嘉奖。徐源泉并加陆军上将衔，“以励勋绩”。

△　苏军攻占札兰诺尔，守军黑龙江第十七旅旅长韩光第、团长

林选青等相继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后自杀。该旅5000余人殉难。

△　国民政府密令上海军政机关将改组派组织之所谓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严格侦查封禁，以遏乱萌。

△　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由沈返哈，谈辽宁会议结果，略谓：会议决定“对俄交涉，仍完全服从中央，决不单独进行。中东路我方应有之权益当始终保持，决不放弃丝毫”；并决定“增加边防军队，以防不虞”。

△　总司令许昌行营电国民政府报捷，谓：“我军自本月删日开始总攻击以来，节节胜利，筱克复登封、临汝镇，巧晨占领偃师、平等、自由、伊阳各县……逆军精锐，丧失殆尽，现我先头部队已占领洛阳东南各关。”

△　第二路总指挥刘峙下总攻击令，向在鄂北老河口一带西北军展开全面进攻。

△　外交部公布，改组上海临时法院会议，因各国特派委员尚未确定，展期开会。同日，中国方面出席委员吴昆等在外交部会议，议定若日本派代表参加，决加以拒绝。

△　驻沪日总领事重光葵由沪抵京访王正廷，要求早日继续进行宁案赔款委员会之调查事务。王大体承认，并要求日方从速解决青岛纱厂罢工问题，胶济铁路问题，及各地方不正当之课税问题。

△　厦门国民党指委会协同警探大肆搜捕共产党“嫌疑犯”。厦大学生苏吉晖、寿山学校校长陈醒鹤、教员林仕龙，及集美学校因“共党嫌疑”被开除之张馥秋、沈培堃、陈铨、叶松青等十余人均被捕。次日，厦大学生200余人到市公安局、指委会请愿，要求释放苏吉晖，如21日不释，即全体罢课。

11月20日　　蒋介石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称中央军是

日已完全占领洛阳。

△　苏联军队攻占满洲里，守军梁忠甲旅力战数日，因后路被苏军截断，图取道呼伦池往海拉尔退却。

△　粤军是日起由梧州退却，回广州。

△　内政部准云南省新增县治，谓："滇省近年所增县治计有：西畴、曲溪（今属建水）、永仁、双江四县。改县计泸西、祥云、会泽、双柏、峨山五县。内部已呈请行政院转呈备案。"

△　红四军攻克上杭，23日入长汀。

△　青岛四方日商纱厂失业工人与被迫复业工人械斗，日人开枪射击，双方受轻伤者30余人，重伤者12人。市指委会要求外交部向日使提严重抗议。

△　中共鄂豫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坛子石召开，选举徐朋人、徐向前、王平章、徐玉珊、周纯全、詹才芳等九人为特委委员；并决定建立鄂豫边革命政权领导机关鄂豫边苏维埃。12月27日至29日在光南云细吴家召开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鄂豫边苏维埃，曹学楷当选为主席。

11月21日　　粤、桂战事紧急，蒋介石拟回南京主持对桂军事，特电太原请阎锡山赴郑州坐镇，指挥西北军事。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选任朱培德、唐生智为国民政府委员。

△　国民政府任命龙云、胡瑛、金汉鼎、张维翰、张邦翰、周钟岳、卢汉、朱旭、张凤春、唐继麟、孙渡、缪嘉铭、龚自知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并指定龙云为主席。

△　厦门大学学生因苏吉晖被捕事组织扩大委员会，委员25人，

派吴方桂等三人为代表，赴省设法营救，并自今日起罢课三天。厦门公安局今晨将苏吉晖等四人押解省城。

11月22日　　上午，蒋介石离许昌返汉口。蒋命唐生智代行总司令职权，办理豫省军事及善后事宜。同日午，唐生智率队赴洛阳坐镇。

△　晨，何应钦专车由开封取道陇海路返南京，蒋以前方军事进展，已令将汴行营撤销，行营各处人员均随何离汴返京。

△　刘峙自樊城电国民政府告捷，谓是日下午蒋鼎文第九师占领老河口，赵观涛第六师占领谷城，敌军向郧阳、房县方面溃退。

△　粤军将领陈济棠、陈铭枢等通电对张发奎、李宗仁、黄绍竑作战，宣称："张发奎狼子野心，好乱乐祸；李宗仁、黄绍竑幸逃显戮，蹒跚重来，举戈内犯，蹂躏岩疆"，"为拥护统一，完成革命，谋两粤安宁而战。"

△　王正廷招待新闻界报告外交近况，谓中俄问题日来形势颇严重。又谓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国家共有19国，截至今日止，已有九国放弃（德、奥、俄、意、比、丹、葡、西、墨），所余10国，内中瑞士不成问题，亦可放弃；日本、瑞典、秘鲁三国条约已期满，挪威亦正进行修约；最无办法者为条约尚未到期之英、美、法、荷兰、巴西五国。

△　青岛特别市指委会电告国民党中央，谓："日厂复工问题交涉毫无进步。日厂招募新工，希图抵制。二十一日，大康纱厂开工，数百工人前往探视，被日人毒打，开枪击伤五十余人。嗣据报告，四（方）、沧（口）又发生工人被日人枪毙数名，日本陆战队陆续登岸，形势严重，请即饬外部严重抗议。"

11月23日　　上午，蒋介石偕邵力子、周佛海、刘文岛专车抵汉

口，旋在行营召集张治中等会议军事。议决：一、肃清鄂北、陕南残敌；二、肃清各属共党；三、维持平汉路交通；四、武汉行营于本月内办理结束，并令刘文岛赴沈慰劳东北军。下午5时蒋乘舰返南京。

△　滇军范石生师五团及陈诚第十一师罗霖独立第四旅攻占鄂北南漳。

△　青岛市党部与市政府举行会议，对青岛工潮问题作出决议，宣称："无论如何应先行复工，然后与日方交涉条件及此次事变之解决方法。"同日，青岛市长马福祥在青岛国际俱乐部与日领藤田签字无条件解决日厂工潮问题，定自26日起，沧口、四方等处各日厂一律开工。

△　宋子文由汉口抵南京，转赴上海，与金融界洽筹军费。

11月24日　　蒋介石乘"永绥"舰抵安庆出席石友三就安徽省主席职之宣誓典礼，旋偕石等往慰方策。下午，原舰返南京。

△　上午11时许，苏联飞机六架自札兰诺尔方面飞至海拉尔上空，掷弹数十枚。胡毓坤令海拉尔商民悉退回内地。同日下午，苏军攻占海拉尔。

△　王正廷在上海发表声明，谓苏联塔斯社电讯称，此次苏军进攻中国边境，系由中国军队向苏军民挑衅而引起，显系苏当局之反宣传。又谓渠愿邀请世界人士组织国际团体实地调查犯边挑衅者为苏俄军队，抑为中国军队，公告世界。

△　张发奎在广西边界石桥与黄绍竑会晤，商定攻粤计划及联络信号。

△　蒋介石编韩德勤、孙常钧两旅为第五十二师，任叶开鑫为该师师长，韩德勤为副师长。

11月25日　　晨，蒋介石抵南京，即令何应钦赴粤主持对桂军事，令陈绍宽率第二舰队，石友三率所部南下援粤。

△　国民政府电各非战公约签字国，宣布苏军攻占满洲里、札兰诺尔情形，希望各国主持公道。此电已先由外交部电驻美公使伍朝枢向美政府询问，是否电美即可，抑或由中国直接电非战公约国。

△　何成濬电北平行营，称："阎锡山廿五日来电云，关福安师已渡河，杨效欧师到风陵渡，决同中央军歼灭关外之敌。"

△　夜，黄绍竑抵德庆。26日，李宗仁由南宁到梧州设立大本营。

△　外交部电驻英、美两国公使施肇基与伍朝枢，请英、美两国政府派员来华会议撤废领事裁判权办法，并声明如再延宕，中国政府将于明年元月1日起自动宣布废除。

11月26日　　驻德公使馆发表中国外交部托德转致苏联政府之照会，提议组织共同调查委员会，调查中苏冲突真相，以明边境冲突责任，并要求各自边界撤退军队30英里，以免再起冲突。中国政府准备将全盘事件交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宗旨之中立公正机关解决。

△　东三省农业联合会、商工联合会、教育联合会等团体致电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及国际联盟、北平外交团等，评述苏联军队四阅月来进攻中国事实，要求"主持正义，组织国际调查，以明真相"。

△　晚，满洲里、札兰诺尔苏联军队撤退一部，尚留一部在嵯岗附近。

△　贺耀组、刘镇华同车由郑过徐赴京。贺语记者，谓西北军两路均已退却，我军陇海线退到渑池，襄樊线到鄂北。刘语记者，谓此行赴京谒蒋，报告在晋与阎接洽经过，阎已令周玳、赵承绶实行两路出兵，共六师兵力。

△　青岛四、沧等处日厂尚未复工，市长马福祥与市指委李郁亭假总商会召集工人代表50余人谈话，决定对退出工友生活费概由市府负责，另由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工整会、总商会五机关组织救济工友委员会。市政府拟具复工条件12项，送达日厂方，俟其承认方能复工。

11月27日　　中央军攻占陕州，西北军败退灵宝。29日，徐源泉部进抵陕州。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决议：中俄交涉迄未能解决，东省牺牲极大，外交当局应负责任，请中央立免外交部长王正廷职，并拿办周龙光。

△　何应钦由南京乘舰赴粤。

△　晨，石友三自安庆到南京，即往谒蒋介石，请示一切。蒋令石抽部分军队援粤，以分散石之兵力。石当天离南京赴蚌埠，表示将亲率第二十四师南开，另一师由秦德纯指挥留皖。

△　陈铭枢偕蔡廷锴、蒋光鼐等赴粤北视防。据探报：黄绍竑任右翼，率部7000余人，经肇庆出广利，侧击三水；张发奎任左翼，由广宁、四会攻清远。粤军香翰屏师布防四会，舰队守马房河口。

△　晨，青岛日厂四方之内外棉、大康、隆兴三纱厂，台东区铃木丝厂及山东、华祥两火柴公司部分工人复工。惟沧口之钟渊、宝来、富士三纱厂尚未复工。青岛市政府派参事孙绳武等30余人莅场监视复工。28日，青岛市长马福祥通电各界，报告“工潮”已完全解决。

11月28日　　苏联发表“辽俄交涉”经过，谓张学良已接受苏方提出之“一切恢复原状；苏正副局长俱复原职；释放侨民”等三项条件。称：本月21日，在德领馆任职俄员库库林偕译员聂嘉夫与中国王团长携带蔡运升之正式文件，赴伯力与西门诺夫斯基协商，结果张学良承

认8月29日苏方托德政府提出之初步条件。

△　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复张学良26日电称：“接奉26日尊电，宣称阁下完全接受本月22日由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转致之书面初步条件，希望阁下派遣代表赴伯力与西门诺夫斯基讨论，并解决中苏会议时间及地点等问题。”

△　东北军胡毓坤军长自博克图电张学良报告前方军情，谓：“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敌人飞机先后二十余架飞至博克图投掷炸弹二百余枚，将车站炸毁，火车烧去二列”；并称官兵伤亡30余名。

△　北宁路局长高纪毅由沈阳抵津，对记者谈称：“自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东北公私方面损失已逾五千余万元。以三省之兵力，御苏俄倾国赤军，诚虑不足。”并称：“中央不暇兼顾，仅给编遣库卷二百万，前途如何，诚难言矣。”

11月29日　　王正廷招待记者报告外交，谓中俄交涉外传地方与中央意见不一致，完全不确。同日，王否认中国已承认苏方“三项条件”说；并称苏要求中国代表赴伯力谈判，倘与我条件相同，可以照办。

△　晨，石友三由蚌专车到浦口，旋即过江会晤蒋介石，商洽南下援粤事。

△　朱绍良、毛炳文奉蒋介石令，率第六路军第三、八两师由南京开赴广东讨伐张、桂军。

11月30日　　蒋介石电武汉行营主任张治中，令将武汉行营结束；关于卫戍武汉暨湖北全省“剿共”事宜，统归刘峙负责。

△　外交部次长张我华对记者谈中苏问题交涉情形，谓：“中俄形势近日已稍和缓，外部接东北报告，满、海方面俄军已撤退。”“现在交涉已不在柏林，在伦敦。”“我方已经决定一种办法，由施（肇

基）、伍（朝枢）等公使向各关系国进行。此项办法较任何办法为有益。”并称：“此项办法，在十日内当有结果。”

△　外交部电令东北当局调查苏军“迭次侵入同江、富锦、满洲里、札兰诺尔等处，人民死亡、财产损失及军队死亡损失”，备作将来交涉根据。

△　蔡运升与李绍庚奉张学良命，离沈阳赴伯力与苏方代表进行谈判。

△　中央军刘茂恩师占领阌乡，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潼关总退却。

△　工商部咨各省府，规定明年元旦为《度量衡法》施行日期。全国分三期完成。

12　月

12月1日　唐生智、宋哲元、孙连仲、徐源泉等75人联名通电反蒋，略谓：当此之时，唯有立息内争，同心御侮，“有违斯旨，仍存自私者，即为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

△　国民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外交部辞职。

12月2日　是日下午4时，北平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完整的“北京人”头骨化石。28日，该所举行公开讲演，报告发掘经过及各专家研究之结果。

△　石友三因参预唐生智、韩复榘、方振武、马鸿逵等的倒蒋密谋，是夜在浦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起兵反蒋，随即在浦口隔江炮轰南京，并发表通电，历数蒋的罪行，宣布反对蒋介石对广西、河南用兵。3日，师退蚌埠；石在滁州通电就“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职，宣称：“谨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还我国都。”

△　外交部接驻德公使蒋作宾电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我方所提合组调查团及双方军队各退三十里以外之两办法，已拒绝接受。"

△　美、英两国政府为中东路问题照会中、苏两国政府，劝履行《非战公约》，两国边境军队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解决两国纠纷。

△　何应钦抵广州，对记者谈此行任务，"系与二陈（陈铭枢、陈济棠）商讨逆军事"；并称第三、八两师已由京开来。是晚，陈济棠、陈铭枢宴何，并开重要谈话会。

12月3日　唐生智、刘文辉、徐源泉、何键等53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汪（精卫）联张（发奎），与石友三通电相呼应。同日，唐在郑州发表时局讲话，内容要点如下：一、"团结全国武装同志，速息内争，一致对外"；二、蒋因被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等所包围，才把政治败坏；三、主张汪、蒋、阎合作；四、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三大，主张"护党救国，促成统一"；五、表示要与张发奎"始终结合，一致援助"；六、放弃第五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

△　下午，蒋介石邀集胡汉民、谭延闿、赵戴文、戴季陶、孙科、朱培德、古应芬、陈果夫、宋子文等20余人讨论唐、石部反蒋事，一致主张要争取阎锡山、张学良，讨伐"叛逆"。同日，蒋命令马鸿逵由徐州堵击石友三部，并派张之江、李鸣钟劝导石友三。

△　下午，石友三部北撤到安徽临淮关，被中央军第五十六师阻击，一部在三界下车，进入定远县境内。

△　蔡运升与苏联西门诺夫斯基在尼阔立司基乌苏里司克（位于伯力与双城子站中间）签定会议录。双方声明：各遵守中俄、奉俄协定；该路正副局长，苏俄另行推荐新人；中国所派东路人员，亦得易人。

△　晚，何应钦在广州以行营主任名义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剿灭张、桂军办法，在省各军事长官均列席。

△　驻美公使伍朝枢代表国民政府正式照会美国及《非战公约》之各签字国政府，申述中国始终遵守《非战公约》及苏联屡次“开衅”之经过情形，谓：“俄军屡次由陆地、水路及空中截击中国驻军，侵略中国土地，如8月14、16及17日东宁之役，8月18日、9月4日及8日札兰诺尔之役，9月20日绥远（抚远）之役，10月1日及2日满洲里之役，及10月12日同江之役。……11月17日，俄军复大举进攻，较前更烈，次第占我满洲里及札兰诺尔。”并称：“中国军队击退侵入领土之敌人后，亦始终未越国界一步。”

12月4日　吴铁城奉蒋命以劳军名义赴东北联络张学良，是日自南京抵北平，宣称到平任务有二：一、为携党旗一面赴东北授张学良，并慰东北官兵；二、阎就副司令后，迄未举行宣誓，本人将代表中央监誓。并称：一二日内赴太原，俟阎补誓后，即回平转沈阳。

△　何应钦在广州下令分兵五路向张、桂军进攻：第一路谭道源师由连江前进；第二路余汉谋师由清远、三坑进；第三路李扬敬师由白泥、国泰进；第四路香翰屏师由芦苞、黄冈进；第五路陈继承师扼三水。蔡廷锴师守军田，蒋光鼐师守炭步，策应前线。海陆空同时进击。

△　晨，蔡运升、李绍庚自绥芬返哈尔滨，9时15分原车赴沈阳。蔡在哈站语记者，谓：“俄方力持先解决正、副局长问题，并恢复中东路原状。”

△　刘峙第二路军李云杰旅会同新编第十四师杨虎城部孙旅攻克荆紫关，西北军向西撤退。

△　何键奉蒋介石令，派刘建绪师入桂讨伐张发奎部。是日刘师入桂林。

△　行政院为实行编遣减薪，通令各部、会及各省府：对于文官减薪，不得意存观望，尤不得于扣减时增高薪级，致有折减之名，无折减之实。

12月5日　　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劝蒋介石下野，并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职。

△　东三省政务会议依照国民党中央、外交部长指示，讨论对苏议和所应取之步骤。会议承认蔡、西会议录，即电苏联政府，派蔡运升为正式代表往议。

△　下午，傅作义、苏体仁由天津赴沈阳，代表阎锡山慰问东北将士。傅语记者称：此行携有阎锡山致张学良慰问国防将士函，并汾酒二万瓶，罐头三万个，豆腐干60箱，酱菜494包，香烟10万盒，毛袜10万双，外有现款两万元，抵沈晤张学良后，即赴哈尔滨。

△　监察院长赵戴文奉蒋命回山西劝阎锡山讨唐，是日偕第十一路总指挥刘镇华由沪乘轮赴青岛，转程赴太原。

△　全国农政会议开幕，到会员60人。农矿部长易培基主席，并致开幕词，宣称：“训政时期工作分配年表，农政一门列有项目一百三十余项，若能认真办理，不过十年，即做到家给人足，耕者有其田，使总理民生主义完全实现。”

△　青岛英烟公司工潮扩大，厂方坚持非开除工人36名不复工，谈判破裂，厂方正式宣告停业。

12月6日　　王正廷招待记者，报告外交近况，略谓：中苏问题，张学良前次来电报告政府后，政府即去令，谓在一定范围内可先同苏代表接洽。

△　张学良电国民政府报告中苏交涉近况，略谓：中苏交涉已派蔡运升与苏俄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在伯力（尼阔立司基乌苏里司克）接

洽妥贴，其办法为：一、中东路正、副局长重新由俄推举；二、责任问题由中俄双方派员调查，无须第三国参加；三、中俄纠纷由中俄双方会议解决。请国府决定，并派大员正式谈判。

△　杨杰、方鼎英、王均、王金钰、徐源泉、刘春荣、魏益三等通电讨伐唐生智，称唐忽于支（4日）起盘踞郑州，对各部友军作军事行动，且扬言回师武汉，并冒杨杰等名义通电附逆。除派队在潼关严密扼守外，决先率所部集中洛阳，即日向逆部进攻，应请中央明令缉拿唐生智，并冀一致声讨叛逆。

△　李鸣钟奉蒋介石命飞赴徐州，与马鸿逵接洽围攻石友三部计划。李留徐指导一切，7日飞回南京，携有马致蒋函一件，略谓："鸿逵父子受恩深重，誓死坚守徐防，拥护中央。"

12月7日　国民政府以唐生智"背叛党国，附逆有据"，明令褫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文武各机关一体严缉拿办。

△　蒋介石召集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议，讨论张学良6日电，决对张电意见完全采纳。同日，国民政府电张称："中俄交涉既已接洽妥协，准如所请办理，派蔡运升为正式代表，明令不日颁发，尚望以拥护国权为重。"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委何应钦为广东行营主任。

12月8日　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余为党国一分子，且负有重任，决不忍自鸣高蹈"，"决以全力扫荡一切叛徒。"

△　阎锡山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讨伐冯玉祥、唐生智，称"钧座对军事上必有把握，锡山唯命是从，并请详示方针，俾有遵循"。9日，蒋复阎电，慰勉有加，称"讨逆杀贼，义无反顾，务望吾兄共同一致，扶持正气"。10日，阎致蒋电，报告赵戴文已抵太原，称"承谕军事上确有把握，山自当共同奋斗"。12日，蒋复阎电，

称“区区叛逆，相信弟与吾兄，必能于短时间了之”。上述四电，国民政府于12日公布于众。

△　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夏斗寅、范石生、陈诚等17将领在湖北发通电讨伐冯玉祥、唐生智、韩复榘、石友三。顾祝同部轮运至浦口，与冯轶斐部同任北上正面攻击。夏斗寅部开赴信阳。

△　张学良电外交部，请任莫德惠为出席中苏会议首席代表。同日，张令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调省，遗缺由郭福绵代理。

12月9日　蔡运升被任为中苏预备会议代表，是日偕李绍庚由沈阳抵哈尔滨。11日经绥芬赴会议地点伯力。

△　孙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时局，其要点为：一、唐生智虽有电令何键、徐源泉、王金钰，但彼等将原电送京，不受其命，坚决表示拥护中央；二、两粤有中央军六七万，对付张、桂军三万，也有余裕；三、中俄问题，中央早令张学良相机接洽。张7日晨有电到京，称接洽妥贴。中央已批准任蔡运升为会议代表，正式交涉。

△　蒋介石发表正告第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将士书，略谓唐生智引两师将士“入叛逆邪途，务望辨明顺逆，诛除叛逆，效顺中央”。

△　张、桂联军兵分三路图广州，每路约一万七八千人，中路由张发奎指挥，左路由李汉魂指挥，右路由黄绍竑指挥。粤军方面亦分三路对付。是日在新田、九传湖、两龙墟、银盏坳、国泰圩一带激战。陈济棠亲自督战。11日，两军在太婆山（距花县15里）激战，张军败北。

△　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改组会议在南京开幕。美、英、法、挪威、荷兰、巴西等国代表参加，华方以徐谟等为代表。王正廷致开会词称，“盼最短期内得一满意办法”。挪代表欧尔答词称，“愿得一双方共利之办法”。旋徐谟提出中国所拟草案，略加说明，即散会。

12月10日　　西北军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通电即日东下，声明倘有阻止前进者，定以敌人对待。

△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整委会电中央党部报告，谓本日有改组派钟竟成等率领百余人到会扰乱，旋被军警逮捕90余人。现钟竟成等七人暂留候审，其余80余人均由各县党部函令取保释放。

12月11日　　陈济棠电南京总部告捷，谓张发奎所部主力军被第八路军击破，向花县溃退，现正在追击中。同日，粤军占花县，前锋进至龙圩。

△　农政会议第六次大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农业贷款、农业教育、农业统计、农业仓库、农业作物、农业预测、禁种有害植物等10余案。下午闭幕。

△　晚，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在广西举行百色起义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部队1000余人，各族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共3000余人，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红七军辖三个纵队和直属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一部，东兰韦拔群所部农军（约六七百枪）及奉议农军一营，全军约5000人。张云逸就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同日并在平马镇召开右江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

12月12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明令通缉，送中央监委会；二、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危害党国”，交国府通缉。

△　何应钦自广州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报捷，谓：“本晨张、桂逆军，经我第八路军及第三师猛力攻击，已全线溃退。”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委何成濬为第五路总指挥兼汉口行营主任；杨杰为洛阳行营主任；王金钰为第九军军长；徐源泉为第十军军

长。

△　刘峙召集在汉军官会议，商讨唐军事，决定分兵两路直趋许昌、郑州。刘语人谓，讨唐计划非常周密，一星期内可完全解决。

12月13日　何成濬由京乘飞机抵汉口。行前语记者称："余回京后奉蒋命派充五路总指挥，现决定赴前线讨唐"；并称："唐部枪支不满二万，比较国军仅二十五分之一，十日内决可还我郑州。"

△　何成濬电刘兴、龚浩两师长，请劝唐生智停止反蒋，略谓："望两兄切劝孟潇（唐生智）急流勇退，藉图自全。倘孟兄不肯见信，亦请两兄各行其是，以免随孟潇作无益之牺牲。"同日，何又电唐，劝立释兵权。

△　蔡运升抵伯力，与苏代表西门诺夫斯基会见，双方讨论正式会议日期、地点及以中俄协定为正式会谈根据等问题。

△　黄绍竑率桂军四团渡河猛攻赤泥、炭步，拟乘粤军尽调往花县之际，冲出粤军防线，攻占广州，但因粤军防御工事坚固，未能冲破第一道防线。14日，黄部在清远一带集中，会合张发奎军从四会撤退。

△　进攻三水之桂军，因张发奎军在花县向银盏坳败退，是晚亦退回四会。同日，桂军杨腾辉部两团在军田附近攻击粤军，掩护左翼张发奎军退却。

12月14日　哈尔滨交涉署接蔡运升伯力电，谓苏方代表二人为西门诺夫斯基及前驻哈俄领事梅里尼可夫，交涉定16日开始，前途可望顺利。

△　改组上海临时法院会议开第七次会议，除荷兰代表已于前日愤然离京赴沪外，余均到会。会议先讨论华洋诉讼案，各国坚持凡有各国侨民者，不论民事、刑事，须由关系国领事承审。中国代表不同

意。次讨论法警问题，中国代表主张沪公共租界应由中国法警行使职权，各国代表亦不同意。对华方所提各点，各代表允向本国请示。

12月15日　何成濬乘“永绥”舰抵汉口，通电就“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职，并数唐四大罪状，声称“讨唐军事，两星期内可完全解决”。

△　晚，刘峙访何成濬，会商讨唐军事，决定平汉路南段由第二路军担任，北段由第五路军担任，陕南方面由第二路军担任，潼关方面由第五路军担任，陕北由晋军担任。讨唐军费请中央拨100万元。

△　何应钦在广州通电，宣称：“此次奉命来粤讨逆，于一周内将张逆所部完全消灭，桂系残余无复成军。唐逆生智反复无常，殃民祸国，应钦奉命回汉参加讨唐，即日动身，灭此朝食。”次日，何乘舰北上。

△　晨，苏军引蒙古青年党千余人入据海拉尔。

△　红四军进攻龙岩，与金汉鼎部激战后，转移新泉（位于上杭北）。

12月16日　国民党中执会发表告全体党员书，略谓：“中央截获唐逆之证据，深知此次之反叛，实与汪兆铭及其所卵翼之改组派多所勾结。”

△　中苏预备会议在伯力外交员公署开幕。苏方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及前驻哈苏领梅里尼可夫提出中东路局长为鲁迭意、副局长为简尼索夫，征求华方理事同意，并称待通过理事会予以任命后，再续议其他两项，未任命前停议。

△　晨，陈济棠率海、陆军出发西征，决定在三水设行营，指挥攻桂军事。

△　陈铭枢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报告粤战经过，略谓：当张发奎未到桂时，我们已用政治手腕把俞作柏赶走了，办法是以吕焕炎制俞作柏，因此桂省军权便归吕执掌。后来张发奎到桂，与李宗仁、黄绍竑等联合，吕焕炎受李、黄运动，与张勾结，想在桂把我们的军队消灭，但我们消息灵通，所以马上把香、李两师调回，因此李、黄、张的第一步计划便告失败。

△　青岛大英烟公司工潮暂告一段落，是晨由保安队莅场“维持”复工。退职工友35人，每人给工资五个月。

12月17日　　中苏预备会议继续举行，苏方对铁路警备权允在最后讨论，其他各件无甚争议，撤兵一事无结果。

△　石友三在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石任省府主席，毕广垣兼建设厅长，邓萃英兼教育厅长，袁德性为安徽省警备司令。

△　何成濬在汉口就湖北省政府主席职。

△　晚，刘峙率参谋长刘耀扬等200余人，离汉赴信阳督师，行前语记者谓：“唐部确已分化，盲从者不过七八团人。我方军队在陇海路及平汉路包围会剿，达二十师以上，以之讨唐，如鼓洪炉燎毛发耳。”

△　陈铭枢电南京总司令部称：“海军陈策部及蔡廷锴师铣（16日）克复肇庆。”

12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依中常会决议，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案。

△　外交部电告张学良，谓中央决定派蔡运升为中苏会议正式代表，莫德惠为副。

△　第二路总指挥刘峙抵信阳，即与夏斗寅、蒋鼎文、陈诚等讨

论讨唐作战计划，决定由夏、蒋担任前线指挥。20日，刘下总攻击令，所属各军陆续向前推进。

△　洛阳行营电南京总部报告豫西战况，谓："讨唐军十七、十八续开动。杨杰令左翼沿陇海进，先头队十八日抵巩县，向汜水、荥阳进，右翼由禹县攻许昌。"同日下午，第五路军王金钰、刘春荣两师攻占郑州。

12月19日　　蒋介石电令各路讨唐将领韩复榘、何成濬、刘镇华、石友三、杨杰、王均、徐源泉等，统归阎锡山指挥。

△　中苏预备会议自17日至是日，着重讨论新任正、副局长就任手续，及恢复东铁7月11日以前原状、释放被拘侨民等问题，是日议决：正式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双方释放侨民，定十九年1月1日开始，至于中东路局长及双方人民与军队损失，待正式会议解决。蔡运升即返宁，莫德惠在沈阳待命。

△　蔡运升电沈阳当局，报告中苏预备会议情形，谓："十七日下午，开议恢复东铁原状步骤。郭福绵报告华方理事对苏联所提正副局长已同意，但俄理事未返，开会不足法数，须待补行正式通过。"

△　外交部发表墨西哥放弃在华领判权之往来照会。按：1889年所订《中墨商约》业于上年11月30日期满失效，墨政府于上月12日照会驻墨公使李锦纶，表示自愿放弃条约所定在华领事裁判权。

△　何应钦由粤抵沪答《申报》记者问，谓桂事已大部解决，余无在粤指挥之必要，此后粤省军事概由陈济棠负责。张发奎现存残部至多不过二三千人。桂军不过万人。经痛击，损失在二分之一以上，且内部复杂，李明瑞及吕焕炎部殊不值李、黄、张之行动，余在粤时曾来接洽输诚。汪精卫现在香港，港政府对汪行动监视颇严，近汪发电报亦被限制。

△　陈济棠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称，第六十师协同海军本晨克复梧州，“桂逆”向贺县溃退。20日晨，陈抵梧州督师。

△　夏斗寅军攻占遂平，唐生智军退守郾城。23日，夏部占郾城，唐军退许昌。

12月20日　　国民政府令：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反动，危害党国，着京内外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归案究办。

△　蒋介石电何成濬，谓：“百川（阎锡山）既将亲赴石家庄守候面晤，未便在汉久稽，应即乘轮返京，转由海道赴晋。”何接电后，当晚乘轮东下。

△　阎锡山、张学良、刘镇华、陈调元、王金钰、刘春荣、魏益三、马鸿逵、万选才、刘茂恩联合通电，声明拥护中央，铲除改组派，反对唐生智。21日，阎续发通电，声明韩复榘、孙殿英、王均、杨胜治要求追加列名昨日之联合通电。

△　苏体仁奉阎锡山电召，是日由津抵平，转赴太原，报告赴东北劳军与张学良接洽经过。苏在平称：“与东北诸政务委员晤谈，均主拥护中央，与阎同一志趣。”

△　下午，何应钦由沪抵京谒蒋，报告讨张（发奎）经过。

△　方鼎英电南京总部，报告前方军事，谓：“本师前头部队二十日到登封，唐逆退许昌，无险可守，现正向西北方面溃退。”

△　何键奉蒋介石令，免第八师师长周斓、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唐哲明、团长唐生明职务；委罗藩瀛代理师长，谢煜涛代理旅长。

△　午，中苏预备会议继续举行，讨论西线撤兵及警备权问题。

12月21日　　晨，何应钦再晤蒋介石，对平汉路军事有所讨论。

蒋因何成濬另有差遣，特改任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次日，何应钦赴汉主持行营。

△　石友三通电表示反对改组派，赞同主和，并派代表余信持函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罪。23日，石又发电响应阎锡山等20日电，称“嗣后友三一切举动，自当以钧座为转移，务恳不弃庸愚，示以周行”。

△　方本仁抵太原，当晚赴总部谒阎锡山，协商攻豫办法。

△　刘镇华由新乡专车抵开封，与韩复榘等磋商“讨逆”办法。

△　国民政府电张学良，准予取消梁士诒、顾维钧、罗文幹、王克敏通缉原案。

12月22日　　下午，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在伯力签定预备会议记录。其要点为：一、恢复1929年7月10日以前东铁状态；二、由苏改派铁路正副局长，即日就任，东铁理事会亦先行恢复；三、两国签约后，各将国境军队撤退30里，并停止军事行动；四、两国签约后，至迟不得逾两星期，即将逮捕之侨民释放，政治犯送出国境；五、东北准许苏领馆及国营贸易机关于正式会议前先行恢复；六、欧亚交通一月内恢复；七、东铁嗣后用人以苏俄国籍、中国籍人为主，白俄人绝对禁用；八、正式会议于三个月内召开。

△　马福祥奉蒋介石命率随员十余人离青岛赴徐州、蚌埠、郑州等地，与石友三等会晤，斡旋时局。24日，马抵蚌埠与石友三会晤，劝石服从中央，并称蒋应许不究以往。

△　吕焕炎在南宁通电声讨“桂逆”。

△　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居正、蒋尊簋及许崇智之参谋长耿毅，在上海因运动第五师反蒋，是晚被熊式辉诱捕，送至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禁。

12月23日　　王正廷在外交部纪念周报告外交称：中俄交涉，东省地方始终秉承中央，蔡运升系奉部令办理一切，今年本部最大任务，为撤销领判权，明年元旦起，必有相当办法。明年工作，为恢复内河航权、收回租界、租借地及撤退外国驻军三事。

△　赵戴文在太原党部报告此次赴晋任务，称系促阎赶快出兵，并称："中国现在捣乱者不外两种人：一欲成立改组派的政府，一欲离开党成立政府。此两种人均罪在不赦。"

△　刘镇华由开封抵太原，旋即致电南京，报告与阎锡山会晤情形，谓："阎意俟五路军到达目的地，即与余专车南下，俾会合各军，在最短时期将唐逆完全消灭。"

△　何成濬奉蒋介石命，由上海北上晤阎锡山磋商讨唐军事。

△　北平市卫戍司令部宣布：第三编遣区奉中央命令，原定兵额不敷，仍添设晋、冀、察、绥四保安司令，每司令约增一师，计四师，丰玉玺驻北平，杨澄源驻太原，周士濂驻张家口，秦绍观驻绥远。

12月24日　　晚，蔡运升、李绍庚与苏新任驻哈代理领事西门诺夫斯基、东铁局长鲁迭依、副局长简尼索夫等14人，专车离伯力。26日抵哈埠时西氏发表宣言，谓中俄误会，系有人挑拨，俄无对华野心，否则问题当不如此容易解决，将来当依中俄原来协定持平解决一切问题，以彼此有利为原则。并称此次赴沈后将返国商陈正式会议。27日夜，抵沈阳时，李绍庚语记者，谓正式会议地点在莫斯科，日期为下月25日。28日，蔡运升偕苏新任局长往谒张学良，报告会议经过。

△　吴敬恒偕李石曾、徐永昌由北平赴太原，劝冯玉祥出洋；并与阎锡山会商时局。

12月25日　何应钦在汉口以代总司令名义，发《告讨逆将士》文，并于次日电劝唐生智速即离开部队，“否则长围既合，败溃立待，身死名辱，势所必至”。

△　司法院长王宠惠回国抵上海，对记者谈出席海牙国际法庭经过，并称曾赴日内瓦与出席国联之伍、蒋、高三公使晤商一切。关于撤废领判权问题，各国原则赞同，但均主张有一过渡办法以为救济，即以开会方法讨论一切，各国最后态度如何，尚在审慎考虑中。租界问题，我国未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故国联无表示。

12月26日　外交部接张学良电，谓根据最近中苏议定书恢复外交关系的规定，请转电驻海参崴总领事许熊章、驻黑河领事韩述曾、驻伊尔库茨克领事管尚平、驻阿拉木图领事杨德善等，即率领事馆人员回馆复任。

△　李鸣钟奉蒋介石命离京赴蚌埠会晤马福祥，商洽时局。

△　陈济棠布告，暂以第八路总指挥名义，权理广西政务，称：“一俟负责有人，当立卸仔肩。关于政务之处理，暂由本部政训处负责，不另设机关。”

△　上午，改组上海临时法院会议开第十三次会议。外国代表认为：改组法院问题与租界问题有关，在租界问题未解决前，应当拟订一过渡办法。下午5时，华方代表徐谟、吴昆吾、刘师舜、钱泰、梁敬錞五人对此项意见作详细研究。

12月27日　国民党中政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外交组提出撤废领判权案，决议：一、由国府即日命令公布自民国十九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二、对于管辖外国人民诉讼之实施办法，由国民政府从速颁布施行，以资遵守。翌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太原各界千余人开欢送晋军出师“讨逆”大会，梁先觉主席，辜仁发报告出师意义，谓唐叛变，“乃欲根本推翻党国，故晋必出师，彻底解决”。又谓阎锡山候部署妥当，即前往督师。

△　马福祥由蚌埠专车抵南京，语记者谓：石友三现已觉悟为改组派利用，嘱向中央解释。石部原驻京代表关树人同行到京，定明日谒蒋当面恳求。石部将来调驻何处，当依中央命令是从。

△　吕焕炎代表伍蕃由香港赴梧州会晤陈济棠请收容，陈未决。

12月28日　　王正廷招待记者报告外交，略称：一、撤废领判权案，一俟国府命令发表，即行电各国知照，并毋须取照会形式；二、中苏预备会议记录，已经张学良来电报告，并声明须即恢复驻苏各领馆，本部亦同意；三、改组上海临时法院问题，谈判甚有进步。惟改组法院与撤废领判权二者是相互联贯的，若领判权问题解决，则改组法院即不成问题。

△　朱绍良率第六路军占平乐。

△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红军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

12月29日　　何成濬抵太原，即偕方本仁往谒阎锡山，会谈三小时，翌晨又继续会谈。31日，华觉民语记者，谓：“何、阎已晤两次，结果圆满，阎对消灭改组派、安定党国颇具决心，讨唐及维持大局办法均有具体决定。豫中战事统由阎主持。何决与阎同车赴郑。”

△　外交部发表办理对苏交涉经过，略称：本月2日以后，各《非

战公约》签字国发出牒文，均请中俄两国以和平方法解决东路问题。“当此时适据东北长官来电，沥陈地方困难情形，并称已遵照中央指示范围，与苏联方面接洽”。苏联声明切实遵守协定，中央审查内外情势，允宜及时解决，因即派蔡运升为代表与之谈判。

△　苏联新任驻哈尔滨总领事西门诺夫斯基发表谈话，谓：“此次中苏间因些许误会，并因有人挑拨，故一时断绝交谊”，“将来一切问题，当依奉俄、中俄协定持平解决”，“此次赴辽见张长官（张学良）后，予将返国陈商正式会议。”

12月30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永远开除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鹿钟麟、薛笃弼、刘骥六人党籍，鹿、薛并免中央候补执委职；二、函国府通令禁止本京各机关另设广播无线电台；三、促监察院赶速筹备，限十九年2月底务须成立。

△　蒋介石招待新闻界作年终演说，并答记者问称：吴敬恒、李石曾赴太原，政府没有什么使命；居正、耿毅当交付审判。蒋并诡称：政府不敢挟制舆论，“希望自明年一月一日起，舆论界对政治尽量发表意见，政府当尽量容纳”。

△　外交部发表撤废领判权宣言，略谓：中国自受领判权束缚以来，已届80余年。民国十九年为最紧要之时期，并定是年元旦起撤废领事裁判权，恢复中国之主权。故已令行政院、司法院拟具办法，以便施行。国民政府12月28日之命令，实系一种步骤，各国对现由政府准备之办法，如有意见，亦愿于相当期内与之审议。

△　第六路军第八师师长毛炳文由梧州电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报告该师29日克恭城，桂林指日可下。

△　第九师师长蒋鼎文自豫省前线电南京陆海空军总部谓：“本师已于八时占领驻马店，逆军龚浩部投诚来归者三团。”

△　东北政务委员会发表任命莫德惠为中东路督办；翟文选准辞辽宁省政府主席职，以臧式毅继任。

12月31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嘉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文。略谓："自桂系军阀倡乱武汉以后，以至于冯玉祥、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张发奎等，其称兵作乱，目的无不为破坏中国之统一，编遣之实施。"本党决议兴师，"陆海空军蒋中正同志，宵旰忧勤，指挥若定……斩当途之荆棘，致训政于康庄。……以奠国家，以完成主义。则所以慰蒋同志尤大矣"。

△　上海交涉署照会领事团，《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本日期满，嗣后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移归中央直辖。

△　外交部通令撤销各地方交涉署，又定于新疆、云南、辽宁、吉林各设外交部办事处。

△　中国与西班牙《友好通商条约》，双方互换政府批准通知书，是日起条约生效。

△　苏联新任中东铁路正副局长由长春回哈尔滨。午刻，东铁开理事会，正式任命苏方推荐之鲁迭依、简尼索夫为正、副局长。午后新局长到路局视事，以局令发表机务、车务、电务、会计各处苏籍处长及职员，各复原职。华方副局长郭宗熙亦复任，范其光回任理事。

是年　　本年外贸输出为11.27亿两；输入为12.98亿两，入超为1.71亿两。

△　1928年度（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国库收入为4.34440712亿元；支出：军费2.09536969亿元，行政费2808.8394万元，党费404万元。

△　本年公债共发行16种，总额为2.555亿元。

- 本年各省灾民约计5762万人。

1930年（民国十九年）

1　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题为《以气节廉耻为立党立国之本》之元旦文告，指斥改组派等反蒋派“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好乱反复为勇”，声称“本党同志苟能以各个的革命人格，团聚为整个党的人格，则前途一切困难，一切敌人，皆如摧朽拉萎”。

△　陆海空军副司令阎锡山离太原经石家庄赴郑州督师讨伐唐生智。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令确山正面各部队向唐部全线出击，杨虎城部冯钦哉旅由刘岗突袭唐军右侧，下午占领唐总部驻地驻马店，守军溃散。唐仅以身免。

△　国民政府发表授勋令，阎锡山给予一等宝鼎章；张学良给予青天白日章及一等宝鼎章；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给予一等宝鼎章。

△　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到沈阳，谒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声明是日双方同时撤兵。同日，驻哈尔滨苏领事西门诺夫斯基及新任东铁正副局长到哈接事。

△　驻沪日总领事重光葵在南京就小幡使华事会见蒋介石，转达日本外务省意见，催请重行审议，因中国政府早已议决拒绝，不得要领而返。

△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发行民国十九年电气事业长期、短期公债两种，长期定额150万元，作为收办戚墅堰电厂事业之用，年息六厘，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12月31日本息全数还清；短期定额250万元，作为扩充首都及戚墅堰两电厂事业之用，年息八厘，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31日本息全数还清。

△　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公布民国十八年海关税收，共关平银1.5276亿两，约合2024.86万英镑。

△　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是日起改隶司法部。

△　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发表鲁迅的杂文《流氓的变迁》、《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开始连载鲁迅由日译本转译的苏联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该刊从第三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出至第五期，被国民政府查禁。

△　《坦途》周刊在天津创刊，周震鳞、刘人瑞、黄一欧等人创办。

△　故宫博物院上书国民政府，列举《清史稿》存在问题，请查封停止发行。

1月2日　　唐生智以门炳岳师两个团、龚浩师一个团反攻驻马店，被新十四师杨虎城部击败，全线动摇，4日拂晓前开始总退却。

△　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前在南宁通电反桂，是日派代表伍蕃到梧州见陈济棠，并于6日亲抵梧州与陈济棠协商反桂军事及收拾桂局。

△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声称：“南京政府所下关于领事裁判权之命令，未可视为废除在华美侨所享领判权已告成功。”

△　法国驻华公使玛太尔致牒国民政府，声明法国不能接受中国

片面取消法人在华所享之领事裁判权。

△　台湾民众党向国际联盟控告日本殖民当局准许吸食鸦片。

1月3日　　讨逆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自广州乘飞机赴藤县指挥各军会攻桂平。北路第六路军毛炳文第八师、谭道源第五十师计划攻桂林。第八路军李扬敬、余汉谋两师出抚河攻柳州。

△　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令成光耀第一四八旅由吉安分三路进攻永新红军王佐、袁文才部，又令戴岳第五十二旅分六路进攻弋阳县漆工镇磨盘山红军方志敏部。

△　日本政府声明不接受对华取消领事裁判权。

△　济南齐鲁大学学潮结束后，是日校役200余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工会经费又罢工。

△　南京下午6时05分发生地震。6时10分镇江地震，草房多有倒坍，江面有船只倾覆。江苏六合、松江（今属上海市）、扬州，安徽芜湖、滁县均有震。

1月4日　　阎锡山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以徐源泉、王均、杨胜治、刘桂堂各师夹击唐生智部。次日，阎委韩复榘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王金钰为中央军司令，刘春荣为副司令，王均为右翼军司令，杨胜治为副司令，张德顺为左翼军司令，由韩复榘指挥南下讨唐。

△　第二路总指挥刘峙通电报捷，称二路军在平汉路南段与唐生智军激战10余日，是晨击破唐军。是役毙敌约六七千人，俘敌约五团，缴枪6000余支，大炮、机枪数十门。

△　冯福祥偕马鸿逵、李鸣钟到郑谒阎锡山，商石友三部善后，阎主张一切服从中央，以维大局。

△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电外交部报告释放苏侨经过，谓拘押在松北看守所者1346名，在本埠待遣所者64名，在护路指挥者98名，特区法院已判决者36名，均于31日分批释放。

△　前因枪杀海州党部委员被拘囚之谭曙卿，经朱绍良、毛炳文、谭道源、陈继承等联名电蒋保释，并请其赴粤效力。经蒋批准，是日将谭释放。

△　法使馆参赞欧思德罗洛自平到沪，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续商中法越南陆路通商条约。据驻华法使玛太尔在平告记者称，因滇省近对由越南输入货物，在关税厘金外，又征10％至100％之特别税，致使修约发生困难。

△　东铁客车是日由东线绥芬河站直达西线博克图。

1月5日　　王金钰、韩复榘等电劝唐生智解甲出洋，“免遭屠戮”。6日唐复电表示愿即将所部军队暂交刘兴，即日出洋，但须保安全，并酌给川资。7日又电阎锡山自请下野，阎复电允纳，并委刘兴为第八军军长，负责收抚唐部。

△　被何键免职之周斓新八师副师长兼旅长唐哲民、团长唐生明在宝庆率部反蒋，挟新任旅长谢煜焘取道祁阳、永州入桂投张发奎。8日，何键令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等部分途追堵。月底，唐部抵桂，改编为“护党救国军”第十二军，迎周斓任军长。

△　赣、闽、粤三省集中14个团的兵力，以金汉鼎为总指挥，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

△　何键召集新七师副师长范宿钟、新八师师长罗藩瀛、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等协商湘省“剿共”防务，并电赣省主席鲁涤平、二路总指挥刘峙，与赣、鄂各军协同“清剿”，克期“肃清”湘、赣红军彭德怀、黄公略、袁文才、王佐部及湘、鄂边红军贺龙等部。

△　毛泽东在古田就时局和红军的行动问题复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

△　红四军为粉碎蒋介石之赣、粤、闽三省“会剿”，实现“争取江西”计划，是日从古田出发，兵分两路，由朱德率第一、三、四纵队经连城、宁化越武夷山入赣，16日占广昌；另一路由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到龙岩地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后，亦由连城、清流、宁化、归化越武夷山入广昌，到宁都东韶与朱德部会师。

△　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电驻京代表张凤九，表示竭诚拥蒋，请中央彻底讨伐冯玉祥。

△　中东路督办莫德惠抵哈尔滨就职。

△　外交部呈国民政府请饬各省、市政府详查各地外国驻军及警察确数，以便与各国交涉撤军。据最近日本外务省调查，目前在华驻军共1.56万人，计上海5500人，天津4700人，北平1400人，香港4000人。其中美国2300人，英国7700人，法国3400人，日本1800人，意大利400人。

△　上海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创立，资本总额20万元，董事长沈知方。

1月6日　　福建地方派系争夺省政权，卢兴邦新二师旅长卢兴荣联合海军系省防司令林忠、萨福畴等，在福州逮捕省政府委员林知渊、陈乃元（兼民政厅长）、许显时（兼建设厅长）、程时烽（兼教育厅长）、郑宝菁（兼秘书长）及水上公安局长吴澍，次日分别送至龙溪、南平扣押。省府例会亦改为党政军联席会议。7日，“福建省党政军联合大会”以林知渊等勾结张贞，图迎改组派入操闽政为由，电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下令将林等六人撤职查办，以除改组派之内应，并讨伐张贞。

△　刘峙讨唐第二路军攻下河南遂平，唐部向郾城溃退。10日，二路军占郾城。

△　原与唐生智合作之孙殿英在郑州倒戈通电讨唐。

△　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同时成立。考试院长兼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副院长孙科，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邵元冲，考选委员焦易堂、刘芦隐、桂崇基、陈立夫、余井塘，铨叙部长张难先、副部长仇鳌宣誓就职。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任命蒋介石、吴敬恒、王宠惠、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11人为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

△　王金钰在郑州通电继何成濬任第九军军长职。

△　东北边防第一军奉令结束，待车回辽；吉军张作舟旅是日起自哈开回吉林。

△　中东路苏方局长罗德伊到局办事，将车务处、机务处、工务处7月10日以后到差之职员停职，仍以前被裁撤之苏员接充。

△　日本公使驻沪办事处对中国撤废领事裁判权事非正式表示，谓日本利害关系与英、美相同，决与英、美采取同一态度。

△　蒙古青年党经苏方授意退出海拉尔。

△　越南华侨40人因无力缴纳人头税，被越南政府驱逐出境，是日到达汕头。

1月7日　　古应芬、陈铭枢抵梧州，与陈济棠等协商桂局，决定由吕焕炎负责收编桂军，不服者由第八路军协剿；第六、八两路军负责肃清张发奎部。桂局收拾后，仍由吕焕炎任主席及第八路军副指

挥。

△　改组上海临时法院会议开第二十次会，就取消领事观审权、收回监狱管理权、限制该法院终审权及工部局不得干预法院行使职权等问题进行讨论，各国代表以所奉各该国政府训令范围有限为借口，对中国所提各点未能完全接受，讨论无结果。9日续开第二十一次会，对于双方争执各点，各国代表声称须候接得各该国共商后之总训令再行表态。

△　石友三之代表关树人到南京见蒋介石，商洽该部驻防问题。9日，石电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

△　阎锡山委万选才为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万之代表吴邦杰是日由豫到京谒蒋介石，报告该部“一致效命中央，誓死不渝”，并请示讨唐机宜。

△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第十五师师长；罗藩瀛为第十六师师长。即日起取消新编第七师及新编第八师番号，改用陆军第十五师及第十六师番号。

△　陆海空军副司令阎锡山委任孙殿英为第十四军军长，是日孙通电在许昌就职。

△　阎锡山委第三十三师师长孙楚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兼郑州警备司令。

△　台湾民众党修改纲领，主张：一、废除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二、拥护伸张民众的日常利益；三、反对总督专制。

1月8日　　马福祥、刘镇华由郑州抵南京，9日谒蒋介石，报告阎锡山在郑处理军事情形及唐生智自愿出洋经过，并代阎请示处置唐生智部办法，磋商石友三防地问题。

△　唐部师长刘兴、龚浩致电蒋介石，称："此次事变，出人意表，职等分属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并称："唐氏已于二日前离军，所部五十一、五十三各师统交职等负责维持，现已令饬各部一律撤至西平以北，藉免冲突。职等翊戴中枢，维护统一，耿耿此志，始终不渝。"

△　刘兴、龚浩、晏勋甫致电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称："唐于两日前离军，一意养疴，所部各师概交兴负责维持，现已遵示停止军事行动。除派彭熙同即乘飞机请示一切外，敬乞电告刘峙、蒋鼎文等停止前进。"9日，何复电称："孟潇既为人所误，而兄等事前又未与闻，中央当可原谅。"嘱唐速乘飞机赴汉，"当保其安全，搭轮赴沪或放洋"。

△　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因"一六"事变电国民政府自请处分，国民政府复电令其负责查明，呈报核办，并令卢兴邦等保全被拘者生命。海军编遣委员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旋亦奉命率舰自沪赴闽镇慑。

△　驻华英公使蓝普森由平抵南京。9日访外交部长王正廷交换关于中英修约及中国预定2月1日实行新税率问题的意见。10日，蓝普森再访王正廷，以中英条约未满期为词，要求延至相当时期逐渐撤销领事裁判权。

△　金价暴涨，银价暴跌，市场动荡不安，是日上海、伦敦间汇价，低至一先令11便士又四分之三。

1月9日　　唐生智通电下野，表示悔过，即日出洋，请中央不咎既往，并电何应钦要求保证其生命安全。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讨论整理金融方案，财政部长宋子文报告金价高涨情形及整理办法，通过发行关税公债2000万元，除收回前发到期之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外，即以余额调节因金价暴涨，

关于外债方面之损失。10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令财政、工商两部迅速设法救济，并制止标金投机交易。

△　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唐生智已决计引退，所部官兵，要求发给薪饷一月，旅费若干，派车安全遣送回籍；负伤官兵，设法收容抚恤疗养。如蒙允准，请即饬令各方停止军事行动。同日又电何应钦、刘峙、韩复榘，请饬前方军队停止攻击。

△　蒋介石以河南军事行动即将结束，是日派贺耀组赴郑州劳军，并与阎锡山协商收拾豫局、改编唐军办法。同日，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赴驻马店召集师长蒋鼎文、夏斗寅、杨虎城、赵观涛、陈诚等开军事善后会议，讨论肃清唐军及收编办法。

△　沧石铁路局长何澄与日商华昌公司签订《沧石路借款合同》，铁道部以内容与原则条件均多谬误，将何免职惩戒，何抗不接受。是日，铁道部再训令何澄，驳斥该合同谬误之点，并将该合同即予取消。

1月10日　何应钦电令刘兴、龚浩迅将唐部集中整理，指定两路为整理地点，一路在项城集中，退集豫东；一路在泌阳集中，退集鄂北随县等处。限两路均须离开铁路线，两路任择其一，唐生智须迅速离开部队。何奉蒋令准委刘兴为第八军军长，蒋锄欧为副军长，龚浩为师长。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京招待记者，谓伯力中苏会议记录现已到京，中央以其内容有超越规定范围者，决召莫德惠到京面授机宜。铁道部长孙科旋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主张根本否认会议所签草约之效力。

△　阎锡山令豫中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在24小时内放还所扣车辆。

△　驻哈尔滨苏领事西门诺夫斯基宣布，第一批释放华侨765人由满洲里站遣回，1557人由绥芬河站遣回。前哈满警备司令梁忠甲及部属8000人亦被释回到满洲里。

△　教育部与蒙藏委员会拟定蒙藏教育实施方案要目。

△　《拓荒者》月刊在上海出版，蒋光慈、钱杏邨主编。

△　清东陵纯惠皇贵妃墓上月22日发现被盗，金棺损毁。清室载涛等是夜宴请军警要员，请注意防掘。

1月11日　　国民政府令："查近日金价暴涨，银价低落，于国计民生，关系甚巨。此种情形，虽为国际汇兑之变动，惟上海交易所商人投机买卖，影响金融经济，亦复匪细。着财政、工商部迅筹办法，以资救济。"同日，财政部长宋子文赴沪调查有无操纵嫌疑，并与银行界会商救济办法。工商部长孔祥熙亦于12日电沪社会局、全国商联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就近查明真相，并电令金业交易所不得有操纵垄断行为。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汪精卫"勾结陈公博、顾孟馀等设立小组织"，并"应各叛将之请，回香港主持逆谋……以图坏破中央，颠覆党国"，议决永远开除其党籍。13日，汪发表《怎样树立民主势力书》，指责南京"不但不能扫荡反革命，反与反革命势力结合一致"，"有党治之名而实与之反"，宣称"要为树立民主势力而努力"。

△　立法院通过《民事调解法》。20日，国民政府命令公布。

△　唐部刘兴、龚浩、晏勋甫及各旅团长到漯河车站会商投降办法，决定12日全部缴械。同日，唐生智离漯河转道豫北赴津。

△　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通电报告桂局，称："桂局经梧州会议后完全解决，现正筹备善后，李（宗仁）、黄（绍竑）将自动下野。"

△　暂编第一师师长兼福建“剿匪”司令张贞通电，谓卢兴邦勾结反动派林忠等谋叛，掳押省府委员林知渊、许显时、陈乃元、程时煃、郑宝菁及水上公安局长吴澍六人，诬指林知渊等有改组派嫌疑，请中央迅速处理。

△　中东铁路苏方局长罗德伊下令裁撤7月11日以后所用华员280余名。同日，东铁督办莫德惠召集中东路局各华处长会议，恢复东铁航务处，被裁华员按日给薪。

△　驻华德国公使卜尔熙照会外交部，声明中苏预备会议草约已签订，德代理中苏侨民利益之义务理应卸除。同日，德使代表费须尔晤王正廷，请令我国驻苏使馆人员及各地领事赴苏回任。

1月12日　日本政府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为驻华代理公使。国民政府拒绝小幡使华事结束。

△　云南省为巩固边防，在腾冲设第一殖边局，思茅设第二殖边局，并划临蒙华永沿边荒地移民开垦。

△　中国公学校董会准胡适辞校长职，推马君武继任。

1月13日　唐生智残部1.6万余人在漯河以南姚庄、万庄等处全部缴械，计步、马枪1.3万余支，炮30余门，机关枪20余挺，迫击炮150余门，其他辎重物品若干。同日，第二路总指挥部在驻马店发布唐部即日复员令，总指挥刘峙通电宣称“讨唐任务已告完毕”。

△　陈济棠9日下令限期克平乐。是日粤军第一纵队李扬敬率余汉谋第五十九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抵平乐，张桂联军闻风于先一日向荔蒲、修仁撤退。第二纵队继续追击，并与左翼军及吕焕炎部会合，进攻柳州。

△　国民政府任命臧式毅为辽宁省政府委员，并指定为主席，准原任省府委员兼主席翟文选辞职。

△　东北交通委员会议决本年建设五条铁路线：一、兴京—抚顺线；二、齐齐哈尔—黑河线；三、盖平—复州线；四、呼兰—巴彦—鹤岗线；五、九台—张家湾线。

1月14日　阎锡山不战而胜唐，拟凯旋归晋，是晚召集在郑军事将领会商豫省善后，复令王金钰部进驻许昌，刘春荣部进驻许昌以南，孙楚部进驻黑石关，魏益三部留郑州。为防止遭韩复榘暗算，委其参谋长辜仁发留郑办理一切。次日，阎偕赵戴文等迅速离郑返晋，行前电张学良、陈调元、方本仁、何键、陈济棠等，声称返晋“料理晋钞兑现事”。

△　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通电辞本兼各职。电称：“半生戎马，未谙政治，复值豫省连遭灾祲，既乏术以拯救，而军事迭兴，又无力以制止。”16日，蒋介石复电挽留。18日，马福祥奉蒋命赴汴慰勉韩继续供职，并商收拾豫局。

△　汪精卫再发《怎样树立民主政治宣言》一文，声称：“我们主张励行党治，完全为的是促进民主势力以实现民主政治。”“南京当局假党治之名，以摧残民主势力，是我们所要根本推翻的。”

△　工商部长孔祥熙就金价飞涨、银价低落事向行政院提出以关税改征金币、发行金元券、废两改元、辅币划一等为初步救济办法。是日，由行政院送请中央政治会议参考。

△　山东省政府会议议决，取消孔氏家族特殊待遇，规定除孔子祀田外，其他孔族田地一律照章纳税。

△　中东路因大量裁减华员华工，东铁总工厂华工罢工，提出恢复被裁华工工作、增加工资等12条要求，并派代表向路局请愿，无结果。

1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财政部所拟救济金价暴涨、

银价低落办法及实行海关税收采用金本位提案，工商部所拟取缔上海金业交易所标金投机交易具体方案，交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同日，国民政府下令，自2月1日起，所有海关进口税一律改收金币，以值60.1866公厘纯金为单位计算。简称关金。

△　唐部刘兴、龚浩、晏勋甫秘密逃津。

△　张学良致电阎锡山，主张力谋统一，不使再启纷争，辽、晋互相提携，消弭反侧。18日阎复电响应。

△　阎锡山为收编唐军残部为己用，委李品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是日李在郑州通电就职，即赴许昌、郾城招抚前第五十一、第五十三师旧部。

△　东北政务委员会通过发行整理东北金融公债，总额2000万元，是日起开始发行。

△　吴佩孚筹办已久之陆军大学在四川绥定正式成立，投考者1000余人，全系国家主义派分子。1月20日正式授课。校长吴自充，副校长刘湘。

△　广州市改特别市。

△　中共中央军委主办之《军事通讯》在上海创刊。

1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决议，选任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

△　首都废约会决定，伯力会议记录之签订，有违国际惯例，呈请中央宣布无效；蔡运升有损国权，要求撤职严办。

△　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抵京访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修订中日通商条约、宁、汉案及其他悬案作非正式商谈。旋访财政部长宋子

文，对中国实行国定新税则及海关税则改用金单位制有所协商。

△　梅兰芳首次在美国演出京剧，受到热烈欢迎。

1月17日　国民政府令：自本年10月10日起，所有全国厘金及类似厘金之一切捐税，一律裁撤。

△　财政部电令全国各海关，谓近因金价暴涨，银价低落，致偿付海关担保外债已有不敷之虞，为妥筹根本救济办法，决定自2月1日起征收进口税一律改用海关金单位。

△　阎锡山在太原总部召集财界人员会商晋钞兑现事，拟令赵戴文回京，与财政部商未付军费及豫局善后等财政问题。

△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任命程志远为哈满护路司令，所部由骑兵第十团、步兵第十六团编成。

1月18日　讨唐军事结束，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偕参谋长刘耀扬是日由驻马店返汉口，第二路军总部亦于次日迁汉。平汉线防务分交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接管。唐部俘虏二万余人，大部先后运汉改编或给资遣散，余一万人尚在漯河、驻马店一带候车南下运京改编或遣散。

△　立法院通过国际劳工大会之最低工资公约。

△　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接见记者称，国定新税制因海关改征金单位，税银略增，将延期实行。

△　北平使团打消联合抗议中国撤销领事裁判权之提议，决定由各国自行交涉，惟约定标准三项：一、逐渐撤废可以容纳；二、保留至华会各国撤废时同时行之；三、另订过渡办法。

△　湘赣红军第六军成立，黄公略任军长，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

奇兼任政委，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全军共3000余人。

△ “满铁”地方委员会在“满铁”社员俱乐部开第七次会议，议决不用华人员工。

△ 北宁路唐山铁路工人5000余人因要求增加奖金，被当局拘捕多人，押送天津军事法庭。

1月20日 石友三部移防发生障碍，蒋介石派军队向津浦线集中，形势转紧。是日，徐州、蚌埠间符离集南及固镇南两铁桥被炸毁，鲁省军队亦纷向鲁南集中，石友三由汴赶回蚌埠。

△ 阎锡山撤销在郑州之副司令行营，令孙楚师回河北。

△ 何应钦、刘文岛由汉口专车到长沙，与何键会商肃清桂系及善后，决定抽调部分湘军入桂协助第六、八两路军会剿张、桂两部，会攻桂林。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关税公债条例》，债额2000万元，作为整理旧中央政府及国民政府所欠湖北债务和收回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发行之整理湖北金融公债之用，年息八厘，至民国二十六年12月底本息全数偿清。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财政部整理山西省金融公债条例》，总额2400万元，充作收回山西省银行纸币之用。民国十九年1月1日起发行，年息八厘，至民国二十六年12月底本息全数偿清。

△ 彭德怀红五军第五纵队与赤卫队配合进攻鄂东南阳新城，守敌邓英独立第十六旅第三营及常练队仓皇向武穴逃窜，红五纵队占领阳新城，释狱囚，焚县署。旋于春节期间分途向粤汉路出击，打击大冶县的金牛、保安和咸宁县的柏墩、汀泗桥、马桥、贺胜桥、官埠桥等集镇的地主武装，歼灭十多个民团，获枪400余支，活捉咸宁县长

黄思犹。

△　红三十三师在安徽六安、霍山一带成立，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团，共200余人。30日，与霍山赤卫队配合，攻占霍山县城。

△　国民政府任命靳云鹗、詹旭初为军事参议院参议；莫德惠为中东铁路督办。

△　清东陵二次被盗。据载泽对记者谈，此次被盗为乾隆纯贤（按：当系慧贤）皇贵妃及乾隆废后那拉氏之陵。河北省府是日命令将遵化县长方懋撤职查办，另委王睿增接任。

△　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　台湾新竹、嘉义实施市制。

1月21日　蒋介石电韩复榘、石友三，任命石为河南省清乡总指挥，归韩节制指挥，所部离蚌移驻归（德）、亳（州）。23日，石率部离蚌向指定地点开拔，前月成立之皖省政府各机关及有关人员亦随军北去。

△　改组上海临时法院第二十八次会通过新协定十条及附件三条，交涉即告结束。俟分别向中国外长及各该国公使请示同意后即定期签订新协定。

△　莫德惠向南京请辞中苏会议代表，希望外交部长自当全权之任，“俾外交一贯，责有攸归”。

△　驻哈尔滨苏领事西门诺夫斯基因南京方面否认伯力协定，特向东北当局及各国声明：一、伯力协定任何条款不得变更；二、中苏正式会议不能变换地点及迁延；三、苏联缓撤满洲里一带军队，俟正式会议开成，即扫数撤退；四、东北代表于短期内口头答复。

△　陈策率海军占领琼州，同日召集琼属13县及各界代表，讨论“剿共”安民办法。

1月22日　阎锡山在太原总部补行陆海空军副司令宣誓典礼，吴铁城监誓。阎借机发表对抗蒋之演说，提出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之主张，要求蒋“礼让为国”，表示愿与蒋一起下野。

△　汪精卫应阎锡山之邀商谈联合反蒋，特派王法勤、陈公博北上联络。是日陈离香港绕道日本北上，于3月间抵天津。

△　国民政府公布《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章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直隶交通部，管理全国邮政储金及汇兑等业务。

△　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在交通部开会，就大东、大北两水线公司声称其在我领海内安设水线享有永久登陆权事进行讨论，决议不予承认，由该会驳复。按：大东系英人所办，其线路经香港、新加坡、印度过地中海达欧洲各国；大北系丹麦人所办，其线路经东三省、西伯利亚至丹麦达欧洲各国。两水线已创办50余年，与清政府前后签订合同20余件，是年合同期满。

1月23日　工商部为救济金融，咨请各省政府急办五事：一、厉行国货运动；二、整理各业工厂，改良产品，增加产额；三、振兴特产，补助输出；四、停止征收附加货捐；五、开发各种富源，渐图输出。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妇女团体组织原则》、《妇女团体组织大纲》、《文化团体组织原则》、《文化团体组织大纲》。

△　上海丝厂104家因欧销不振，先后停闭。

△　日本向南满路增加驻军，是日辽阳开到日军两队，计470名。

1月24日　石友三率部入豫，中央军陈继承第三师自张八岭北进接防蚌埠。27日起津浦路恢复通车。石友三23日、24日两次电蒋介石，表示痛悔前非。

△　卫立煌通电就第八军军长职。

△　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高纪毅与荷兰治港公司驻华总代表陶普施在天津签订《葫芦岛海港合同》，建筑费640万美元，限1935年10月15日前竣工。

1月25日　是日为伯力协定所定中苏正式会议开会日期，因国民政府不承认伯力协定，会议未能如期举行。26日，苏联当局为此发表声明称：会议日期及因此发生的结果，应由中国方面负责，苏联当局仍视1月25日为开议日期。

△　张学良召集王树常、汤玉麟、万福麟等各师长在沈阳举行编遣会议，拟将东北国防军24个师缩编为16个师。

△　何成濬辞湖北省政府主席，专办军务，国民政府是日复电慰留。31日，何自汉乘飞机到京见蒋介石，仍坚辞。

△　教育部通令禁止小学再采用文言教科书，各小学严厉推行部颁之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各师范学校、高中师范科厉行国语教育，养成师资。

1月26日　苏联政府宣布中苏会议无限展期。

1月27日　国民政府令任命王金钰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并指定为主席，免去石友三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30日，王金钰电蒋介石辞安徽省主席职。

△　国民政府任命马吉第、冯象鼎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国民政府令：赈灾委员会改为赈务委员会，另定组织条例，公布施行。特派许世英、唐绍仪、王震、熊希龄、刘镇华、汪守珍、朱庆澜、严庄、赵丕廉、水梓、李环瀛为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汪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许世英为主席。

△　国民政府外交部通令各级政府及公安局，谓领事裁判权撤废后，外侨在内地发生民、刑各案，均受中国裁判。

1月28日　蒋介石以粤桂战争紧张，电令何键第四路军出兵讨伐张、桂。何键乃委刘建绪为“讨逆”前敌总指挥，动员第十九师全部、第十五师、十六师各旅、第二、第三警备部各一团参加。2月2日，刘建绪下令由永州进攻桂林。

△　东铁督办、中苏正式会议全权代表莫德惠奉召于27日晚抵京，是日向蒋介石面陈伯力会议记录真相及东省当局签字原因，并称：“外交事项，东北绝对听命中央。”同日，莫对记者发表谈话亦作同样表示，并对担任中苏会议代表表示坚辞。

△　国民政府训令中央研究院在沪各研究所移至南京，所有在沪一切建筑即日停止。2月20日又训令南京市政府，饬划拨中央研究院清凉山院址。

1月29日　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拓相、藏相、陆相及仙石总裁等，出席南满铁路改革第二次协会，决定经营满铁方针：一、改革满铁组织；二、整理旁系会社；三、扩展昭和制钢；四、实现制油计划；五、交涉吉会路线；六、撤废三头政治。

1月30日　司法院业经决定上海临时法院改组为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其上诉机关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预定于2月1日实行。是日，司法院长王宠惠召集会议，决定改组具体办法。是为我国司法机关在上海租界执行职务之始。

1月31日　蒋介石嫡系中央军连日纷调津浦线。邵力子是日衔蒋命赴豫见韩复榘，视察韩、石部队。韩电蒋表示："惟中央之命是听。"

△　国民政府以"首都警政腐败"，撤销姚琮警察厅长职务，遗缺以宪兵司令吴思豫继任；所遗宪兵司令一职由国民政府警卫团长俞济时代理。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批准《中希友好通商条约》。

△　外交部长王正廷电张学良，表示不能接受苏联对中苏会议延期之抗议。同日，蒋介石召王宠惠、王正廷研究对苏交涉补救办法，以"中央与地方意见一致"为原则，次日又召莫德惠商谈。

△　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受外货竞争影响，宣告停顿。

是月　中共中央军事部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支较大的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一至八军。

△　全国各地奇寒，贫民冻毙颇多。豫省113县十室九空。5日东南各省奇寒。10日汉口连日奇寒，为43年来所未有。10日《申报》载称，绥远17县今冬冻死1.5万人。13日《申报》又称，北平近日冻毙736名。16日，上海附近内河交通为冰阻断。全国一月来均受到严寒影响。

△　和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创立，资本总额50万元。

△　旅越侨商梁康荣在西贡创刊华文《中国日报》。

△　香港保护儿童会成立。

△　上海纱厂工会成立。

2　月

2月1日　　财政、工商两部会拟救金融办法，呈报行政院监核。其主要内容为：一、关税改收金币；二、发行专为纳税用之金券；三、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四、增加生产；五、便利交通；六、提倡国货；七、免除苛税；八、开采东三省、西藏等处金矿等。4日行政院会议决议，除开采金矿由财政、农矿两部妥筹计划外，余准备案。

△　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广西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斌（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俞作豫、何世昌、何键南等为委员。左右江根据地从此连成一片。

△　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詹森抵京，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

△　日本新任驻沪领事（代理总领事职务）三浦义秋抵沪。

2月2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讨唐军事结束，重新配置军队，令刘峙第二路军（除夏斗寅师外）全调津浦路，兼卫戍南京；由何成濬第五路军担任湖北及平汉路南段防务与武汉卫戍。

△　前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因与冯玉祥密谋倒蒋，于1929年10月被关押于南京，蒋介石将其发交军法会审，委朱绶光为审判长，张治中、贺耀组为审判官，是日在南京进行第一次审判。4日判决方暂禁汤山思过。

△　唐生明部由永明（今永江县）入桂，3日经灌阳向灵川退却。何键电令第十六师师长罗藩瀛及司令陈光中速将唐部歼灭于全州附近后，即向桂林前进。

△　蒋介石派第二路军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及公秉藩师到赣，与

张辉瓒第十八师“会剿”红军。是日，蒋介石电令第二路军入赣各部统归鲁涤平节制指挥。

△　外交部就美舰及鱼雷艇于上月20日、26日先后在重庆大佛寺撞沉商轮及民船七艘事照会驻北平美使馆抗议。是日美使馆复照外交部，称此案正在调查中。

△　英公使蓝普森晤外交部长王正廷，商撤销领事裁判权及交还威海卫问题。英使声明奉该国政府训令，希望分五年逐渐撤销领事裁判权。同日，驻美公使伍朝枢电外交部，报告美政府对领事裁判权无急切解决之意。5日，蓝普森向王正廷提出关于领事裁判权交涉意见书，注重在华英侨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对外侨诉讼法详加考虑。

△　驻哈苏领事西门诺夫斯基奉苏联政府令向东北当局提出节略：一、请速承认莫斯科为正式会议地点；二、请制止路工罢工及仇视俄员；三、中苏会议有正当办法时，满站苏军即撤，希望中国军队撤退，以免对峙发生误会；四、各项交涉望以友谊关系交换意见。

△　莫德惠在京与周龙光等续商对苏交涉补救办法。南京各界对俄后援会决定联合废约会向莫德惠建议：一、伯力协定不生效力；二、严拒在莫斯科举行正式会议；三、发还没收华侨财产；四、前中东路苏籍局长不得复用。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社会团体组织程序》；批准童子军于4月18日举行第一次全国总检阅及大露宿；核定工厂每年停工日数及星期日休假给资办法。

△　行政院令各省修葺郑成功、戚继光祠宇，连同福州鼓浪屿水操台一并依照古迹条例保存。

△ “台湾工友总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号召“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被日警强行解散。

2月3日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王正廷为商订中捷友好通商条约全权代表。

△ 国民政府特任贺耀组继何成濬为国民政府参军长。

△ 陈济棠派飞机12架轰炸桂、柳张、桂军阵地，象县张、桂军电台被炸毁。

△ 沈阳城南苏家屯农民李景春误过南满铁道，被日兵枪伤头部。

2月4日 刘镇华衔蒋命自南京抵太原，次日见阎锡山，述蒋对西北事愿交阎负责办理。

△ 伦敦发表英政府为领事裁判权问题致中国备忘录，略谓英政府去年12月31日致中国备忘录中最紧要者，为勿使不幸事件发生，致妨碍行将开始之谈判，希望中国政府严谕各省、各地方官吏，凡关于英人地位与权益在条约上之规定，在未经谈判而协定修正之前，应完全继续有效。

△ 波兰驻华代办魏登涛与外交部交涉修改中波商约，外交部以商约既经签字，不能再提修改，只允另加附件或换文。

△ 铁道部发表与中英公司改订京沪路合同结果：一、裁撤洋总管，由铁道部另派董事会主席；二、中英公司放弃代购材料价款5%之酬金，改为该部年付3500镑，作为经营铁路债权及经理人之酬劳金，付托公司购料等事不另受酬金。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于1930年5月1日召

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5日，中共中央和全总联合发表《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

2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伯力协定补救办法，大致议定：关于恢复中东路原状及互释侨民，因事实上已生效力，不得不承认；关于恢复中苏国交及中苏通商，暂作悬案；关于苏俄在东北商业机关，可以恢复，但不得为“宣传赤化”之所；关于解除白俄武装，驱逐出境，正式会议中须声明中国决不利用白俄颠覆苏俄。

△　蔡运升向哈尔滨领事团表示，伯力协定签订时，中央声明与东北完全一致，并无所谓两歧，该协定仅十条，无密约，依政府所承认之中苏协定办理，无其他损失国权之处。

△　蒋介石重新确定讨桂军事策略，以何键第四路军由阳朔进攻桂林，朱绍良第六路军由平乐出修仁，搜索柳州附近之桂军，陈济棠第八路军则沿大河西进，肃清桂平、贵县一带桂军。吕焕炎部负责绥靖桂省各属。是日陈光中率部由阳朔向桂林进攻。

△　鄂西红军段德昌独立师在监利汪家桥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孙因病未就职，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段德昌，第二纵队司令段玉林。全军约6000人，先后占领沔阳、潜江、华容、石首等地，开辟洪湖根据地。

△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自动改组，法总领事甘格露公布办事简章五条：自1月27日起，刑事案初审、复审概由中国法官单独审理，租界代表得观审及发表意见；华洋刑事及引渡案由中法会审；1月27日以前之案件，仍维原状；在该公廨登记及被承认之中国律师，得出庭于刑事会审公堂；会审公廨对其他法庭之管辖权，仍依1920年7月2日协定办理。

2月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临时会议，商定对苏外交方案

原则，以完成中国独立自主权为惟一标准。

△　工商部长孔祥熙电呈蒋介石，请饬财政部训令海关禁止外国银币进口，并令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向国际汇兑会议提议，请英、法政府转知印度、安南政府，于一定时期内，停止向外输售现存银货。

△　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飞运公司所订之中美航空合同经军政、财政、交通三部与参谋本部会议，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根本取消。美飞运公司已先借口中国不履行合同，径向美外交部呈诉，由该部向驻美公使伍朝枢提出交涉。

△　蒋介石委杨杰为长江要塞总司令，将镇江、吴淞、江宁、江阴、镇海五区要塞划归指挥。

△　日本谋以武力强筑吉会路，在六道沟朝鲜银行附设吉会路办事处。13日，东北大学学生组织护路会反对。

△　据《民国日报》讯：由于外商打击和税捐加重，南洋烟草公司三年间亏损575万元，上海总厂停工，职工3000余人给资一月遣散。

2月7日　　据《申报》讯：国民政府变更编遣划区办法：划苏、浙、皖、闽、赣为中央编遣区，由中央直接处理；新疆、西康、晋、陕、绥、冀为西北区，由阎锡山处理；东三省及热河为东北区，由张学良处理；豫、鲁为豫鲁区，石友三、孙殿英、韩复榘等部归韩处理，马鸿逵、陈调元、刘珍年等部归陈处理；湘、鄂为湘鄂区，由何成濬处理；粤、桂为东南区，由陈济棠处理；云、贵、川为一区，人选未定。各区在2、3两月内，照中央指定师数，自行编遣，4月底中央派员赴各区点验。全国以60师为限。

△　日代公使重光葵抵京，与财政部长宋子文接洽修改商约中之关税问题。关于对日修约方针，中政会外交组最近决定以下原则：

一、关税完全自主；二、撤废领事裁判权；三、废除以前商约条文上所有不平等待遇。

△　朱绍良赴荔浦督战。第八路军先后攻克浔江右岸蒙江、白马（位于平南县东南）、武林、丹竹、平南各地，蒋光鼐、香翰屏两师会同吕焕炎部向柳州方面攻击前进。9日晨，航空一、二队共派飞机24架，对张桂军阵地总轰炸。

△　毛泽东在吉安之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及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讨论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为夺取江西全省而斗争等问题。9日结束。

△　汉口、长辛店分别举行“二七”惨案纪念会，两处共到万余人。长辛店会通过提案四项：一、抚恤死者家属；二、建立纪念碑；三、购地改葬死者；四、请中央严缉吴佩孚。

2月8日　　外交部发表对苏宣言，声明对伯力协定中有关解决中东路纠纷办法，予以承认，该协定所载两国其他关系事项，超越中国政府训令范围，中国代表无权讨论。我国准备派代表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讨论中东路善后问题，至两国通商及其他一般问题，苏联政府如另派代表来华，亦愿与之商议。

△　国民政府惩办前办理对苏外交人员，外交部司长周龙光免职查办，驻芬兰公使朱绍阳、前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交行政院转饬外交部严加议处。

△　蒋介石召莫德惠商对苏交涉计划，劝任中苏正式会议代表，莫坚辞。

△　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由闽乘“普安”舰到沪，当晚赴京，次晨谒蒋介石商闽局。蒋决派上海市长张群前往查办。杨当夜返沪促张

赴闽。12日，杨偕张赴闽。

△　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立，选举孙本文、许仕廉、吴泽霖、杨开道、钱振亚、吴景超、陶孟和七人为理事，应成一、王际昌、游嘉德、胡鉴民、吴文藻五人为候补理事。

2月9日　　蒋介石致电阎锡山，称平定两粤，极有把握；请敦促赵戴文早日来京，共商大计。并说：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点，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此责。暗示阎要慎重，不要蠢动。

△　赣省“剿共”军开始总攻击，11日张辉瓒部朱耀华旅占乐安，唐云山旅占永丰。16日金汉鼎师占宁都。

△　阎锡山电请中央拨款办理西北善后，要求按前第二集团军编遣饷费为标准拨款。

2月10日　　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赵戴文联名发表《告全国军人书》，重申“和平统一为政府之根本大策”，痛斥“挑拨离间”、“称兵作乱”者之非，要求全体军人力行四项要旨：一、须视军队为国家之武力；二、须从保障国家生存中求本身之生存；三、须不存利用别人之心而亦不可为别人所利用；四、须居心作事，光明磊落，不必多所疑猜。并宣称：“中央所知且必力行者，惟在抑制内战，实施编遣，以完成统一，保障和平。故凡称兵作乱，扰乱和平者，中央必根据人民之要求，以之为人民公敌，且为谋国家之统一与独立，是万不得已而讨伐之。”14日、17日，何成濬、陈调元分别复电响应。

△　国民政府决议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何成濬、黄昌谷、方达智、吴醒亚、彭介石、张贯时、熊秉坤、黄建中、谢履为湖北省政府委员，指定何成濬为主席，吴醒亚、张贯时、黄昌谷、黄建中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同日，何成濬抵汉接收湖北省政府。五路总部呈请撤销，军事仍由行营负责，由何应钦主持。

△　阎锡山发表致蒋介石“蒸电”，指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并称：“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持，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又以“礼让为国”之名，提出与蒋共同下野。

△　第四路军刘建绪部罗藩瀛第十六师进驻全州，旋刘亦抵全指挥各部攻桂林。朱绍良部调平乐，毛炳文、许克祥师各一部赴容县，协助第八路军攻贵县。同日，粤军余汉谋、蒋光鼐两师由藤县抵容县，向郁林进攻。11日，蒋师占郁林，蔡廷锴师攻贵县。

△　国民政府公布《民法债编施行法》、《民法物权编施行法》，定5月5日起施行。

△　行政院据中国驾驶员联合会、中国扬子江领江员会呈请将领海引港权与航权同时收回，是日训令外交、财政、交通、工商四部会同核议。

△　沈鸿烈访东铁华理事沈瑞麟，交换中俄会议收回东北航权之意见。

△　卢兴邦通电在延平就陆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2月11日　蒋介石电武汉行营，在何应钦未到前，由何成濬代行行营主任职权。12日，何到职视事。

△　驻徐州第十一军马鸿逵部10日调皖，是日顾祝同率第一军军部人员由蚌抵徐接防，在刘峙未到前，由顾驻徐主持军事。

△　挪威驻华代办爱尔由沪抵京见王正廷，转达该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撤销领事裁判权表示赞同。

△　国联禁烟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通过中国代表吴凯声所提各国

政府应与中国政府合作禁烟议案。

2月12日　　蒋介石复阎锡山蒸（10日）电，批驳阎锡山“礼让为国”的主张是“自鸣高蹈”、“奖乱助争”。坚决表示：只有和平统一完全实现，国民革命进行无阻之时，才能共息仔肩。

△　张学良电南京五院院长，表示“拥护中央，以固国家之统一”。张电发表后，王金钰、徐源泉分别在17、18两日电张，称“一切惟公马首是瞻”。

△　驻防临沂县、峄县（今属枣庄市）、诸城等地之暂编第十九师师长高桂滋响应阎锡山反蒋，是日电阎锡山、韩复榘、石友三等，表示“即当联合友军，攻取济南，进窥南京，整装待命，听候驱策”。该电经济南转发时，为山东陈调元总指挥部扣留。16日，高又电阎，仍为山东总部所扣。

△　《中捷友好通商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捷代表倪慈都在南京签字。4月7日，外交部公布条约全文。

△　国民政府令：派驻法公使高鲁为互换中希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全权代表。同日，外交部公布1929年9月30日在巴黎签订之《中希通好条约》全文。

△　银价续跌，工商部长孔祥熙向行政院提议禁止外国银币进口及在日内瓦国际汇兑会议中商请英国缓售印度大宗存银。

△　吴佩孚在绥定设“讨逆军”总司令部。连日各方代表往来甚众，尤以国家主义派为多。

2月13日　　阎锡山复蒋介石文（12日）电，仍要求蒋“共同下野”，并责蒋：“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主张“凡属国民党者团结一致，取决多数，以解决国事，完成整个的党”。蒋置之不

复。14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发表蒋之谈话，宣称“目前正吾人努力奋斗之日，决非高蹈远飏之时”。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使蓝普森在南京签订收回威海卫租借地草约，计专约20条、协定六条及附件。

△　西北军代理总司令鹿钟麟呈国民政府，表示愿依编遣方案缩编陕、甘、青、宁四省军队，请发行西北善后公债2400万元。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陈少白、萧佛成、张静江为该会名誉委员。

△　上海进步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夏衍、彭康、画室（冯雪峰）、王学文等51人发起组织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

△　蒙藏委员会派赴呼伦贝尔之慰问专员恩和阿木耳，由辽宁抵海拉尔。呼伦贝尔副都统表示“服从中央，效命党国”，并向交涉员赵仲仁示意，蒙军虽驻旧街，黑龙江军队仍可开进200名协防，市街公安庶政，仍请黑省负责。

2月14日　　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坚决表示“出处进退，不能不以党国之命令为依归，决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见，变更决议，违反法令”。

△　据《申报》载：北平各大学教工会派代表入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要求停止移用庚款。

2月15日　　南京、太原间因阎复蒋元（13日）电，发生大论战。是日，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电阎，责以不顾党国纲纪，谓“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吴敬恒、何应钦亦各电赵戴文，对阎进行指责，要求赵予以“匡正”。

△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致电阎锡山，称：“顷诵蒸电，促蒋下野，以谢国人，欣具同心，无任感佩，惟蒋私心自用，怙恶不悛，望以武装迫其引退，和平初衷，始能确保，南部义师，当为公继。”

△　国民政府特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解决中东路善后问题。

△　国民政府任命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职务。

△　第二路军已全部移驻津浦线，总指挥刘峙进京见蒋，报告移防及汉口行营交接情形。

△　鲁迅主编的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研究》季刊在上海创刊，仅出一期即被禁止。

2月16日　　蒋介石发表《告诫军人书》，宣称：“和平统一之方策……以实施编遣与制止内战为惟一之纲要”；“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而制裁反侧，戡定内乱，是为讨伐，而非内战”，望军人明察顺逆之分，公私之辨。

△　阎锡山电复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删（15日）电，谓党国以个人中心之武力为基础，党治精神不能真正实现，而与蒋在野负责，于党国无害。17日复发一电致谭、胡、王，提出依照编遣会议议决，组织元帅府或机枢、元老等院以镇乱，而实现在野负责之主张。

△　蒋介石制定讨伐阎、冯之战斗序列及作战计划，决以主力集中丰沛、新安镇、徐州、萧县、宿州、蚌埠、寿州、正阳关、阜阳、颍上之线，先行击破石友三、孙殿英等部，以孤阎、冯之势。大部则集中平汉路沿线之许昌、漯河、西平一带，及以东之商水、项城、正阳、上蔡等地，与主力相呼应，以阻阎、冯南下。于舞阳、信阳、广

水、花园、安陆、孝感、武昌、汉口等地集中四师兵力以为后援。以原驻济南附近陈调元第一路军之第四十六师、兖州附近之第五十五师在原地集中，以山东警备旅之一部在黄河北岸警戒，防止阎军入侵；以刘峙第二路军驻徐州之第一师，萧县之第三师，阜阳之潘善斋独立旅在原地警戒，担任主力军之集中掩护。以第五十一、五十三两师集中襄阳、樊城，第十七师集中南阳、紫荆关，担任左翼之掩护，并封锁陕南冯军之出动。

△　蒋介石制定肃清石友三、孙殿英部作战计划，方针如下：出陇海路及豫东、皖北、鲁西，全力包抄石、孙；同时以一部速占平汉路之郑州，以北抗阎、西对冯，及截断石、孙图与阎等连接之退路；在孝义、洛阳间与南阳、襄樊一带各置守备部队，构筑工事，以遏阻西北军之出动。

△　桂省战事双方在北流激战二昼夜，是日陈济棠第八路军攻下北流。张、桂军退兴业（今玉林）。是役双方死亡4000人以上，为桂省十余年来战争牺牲最大者。是役后双方因牺牲重大，入休战状态。

△　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张作相、万福麟均到，各旅长多列席。19日，东北驻晋办公处处长葛光廷在沈对记者谈称，此次会议纯系中俄冲突后整顿内部军队，不干预外事；对关内时局，东北素主和平，但望全国统一，努力对外。

△　鲁迅、柔石、夏衍、阳翰笙、冯雪峰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咖啡馆集会，总结革命文学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任务为：一、严厉地破坏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二、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和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建立新的文艺理论。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

△　天津宝成纱厂是日起将12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工作制，开中国劳动界创例。

△　据《申报》讯：陕西旱灾，凤翔县原20余万人，已死亡9.9万余人。

2月17日　　改组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协定由中国代表徐谟与英、美、挪威、荷兰、巴西代表在南京正式签字。18日，外交部正式公布改组上海临时法院协定及换文。法代表以未奉法使训令未出席，22日补行签字。

△　蒋介石以驻海州的第四十九师师长任应岐与高桂滋、石友三、孙殿英等部互为声援，威胁徐州，令其移驻寿州、正阳一带，原防由独立第十三旅徐声钰部接替。是日任部遵令移防，在向睢宁前进时，被第一军军长顾祝同指挥部队包围缴械。

△　内政部长杨兆泰奉蒋介石令启程赴晋，敦促赵戴文返京斡旋大局。22日到石家庄后因病停进。

△　何成濬在武汉行营召集在汉高级将领会议，一致决议联名电阎规劝。电称“国事如此，尚希珍重，倘若误听流言，为人利用，实足为兄惜，为大局惜”。

△　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未到职前由李蒸代理。

△　国民政府为中央研究院发掘安阳县殷代故址，训令河南省政府对该院工作加意保护。

△　上海市银行创立，资本总额100万元，总经理徐桴，经理顾逸农。

2月18日　　阎锡山因闻蒋介石已下令动员，肃清平、豫，问罪晋、冀，是日急电蒋，声明无负蒋之心，无须劳师动众，一纸命令，无不服从。同日，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复阎铣（16日）、筱（17日）两电，谓“在野与负责二事势不能两可，既未忘情镇乱，自应巩

固中央”，劝阎“高拱中枢，弼成训政”。陈铭枢亦于是日通电斥阎“发矢无的，在野救国，理复何居”？

△　蒋军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自南京抵徐州坐镇，声明“中央抱和平统一之宗旨，始终不渝，迫不得已时始用兵”，“凡背叛中央，决无幸存之理”。19日刘电阎称：“革命未成功时，国是须待执监会解决。”刘部精锐，悉集徐州。

△　改组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坊所设之对外联络点“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遭蒋介石之特务袭击，改组派上海总部负责人王乐平及潘行键被击毙，赵麟强受重伤。旋蒋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严缉凶手，并赙赠2000元。

△　上海特别市长张群奉命赴闽查办政变，是日在福州遇刺。张因赴宴未回幸免，副官一人受伤。

2月19日　　蒋介石复阎锡山巧（18日）电，责阎“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部署对中央作战。并称“兄果有服从命令之诚意，则请立即取消下野引退之说”。要求阎“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并切实负责实行编遣会方之决议案，以示大信于天下”。阎复蒋电，仍言服从，声称“北方今仍安谧，此间迄今尚无备战之象”。

△　阎锡山电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建议：一、原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均摆脱军权，入元老或机枢等院，维护党国；二、各地停战，党是由全体党员投票表决，以息党争。24日，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复电责其“离中央而言党”，“以他人为牺牲而己获其利，陷他人于水火而己不居先”，“不惜为乱国之祸首”。望阎速撤侵扰鲁西之晋军，停止一切不祥行动。28日，阎复胡、谭、王电，称“弟多作辩论，无非为党为国，既不见谅，尚何多言。冯师系在直境剿匪，并未至鲁西”。

△　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夏斗寅、陈诚、陈继承、赵观涛、

徐庭瑶联衔通电，响应五院长10日《告全国军人书》，表示指导四项，绝对接受，始终拥护中枢，完成编遣，实现统一。

△　闽省政府主席杨树庄通电斥阎“谬托名高，动摇视听，名为礼让，实启纷争”。

△　粤军将领在梧州会商结束对桂军事及应付时局，是日陈铭枢偕范其务、黄强自广州飞梧参加。21日，梧州会议结束，议决：一、第六、八两路军全体将领联衔通电促阎觉悟；二、以武力戡定全桂。

△　中法悬案中之美金债票拨还中法实业借款一案，国民政府如约履行，计还本息2.2亿法郎，又零星付还小款外债多起。

△　国民政府以“清史稿纰缪百出”，训令行政院转饬所属禁售，并将故宫博物院现存之该项史稿悉数运京，永禁流传。

△　国民政府令准湖北警备司令夏斗寅辞职。

2月20日　　阎锡山复蒋介石皓（19）电，称：“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必一齐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并称“津浦、平汉准备军事，系挑拨离间者之言，祈勿轻信”。

△　鹿钟麟等通电反对南京三全大会，并推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

△　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电促院长赵戴文返京，谓监察院若早成立，“中央命吏，皆在监察院严正督察之下，反动者或不敢越轨犯法”。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招待新闻记者，中委孙科报告中央对时局之态度，驳斥阎锡山“礼让为国，在野负责”之主张，声称“凡有称兵作乱者，中央当然以武力削平之”。

△　蒋介石以驻鲁南之新编第十九师师长高桂滋有倾向阎锡山迹象，密令鲁军会同蒋军将其解决。是日陈调元派阮肇昌第五十五师由兖州、临城东进，包围枣庄、峄县，高部一团被缴械，另二团退临沂。阮部继续进逼。适石友三部进攻济宁，阮部迅即开往兖州防石。第四十六师范熙绩部两个旅由胶济路南进包围诸城、安丘，高部坚守诸城。

△　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到达吉水、乌江一线，分左、中、右三路进至水南、富滩、值夏，企图合击红四军。红四军放弃原定进攻吉安计划，将所部集中富田，诱敌深入，待机歼敌。24日，红四军以一部钳制值夏、富滩之敌，主力对水南之敌猛攻，歼敌两个营。次日在富滩、值夏经过一天激战，又歼其大部，俘敌1600余人。敌向吉安逃窜。

△　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李济在北平发表关于发掘安阳殷墟古物之谈话，谓发现雕刻、瓷器、铜模、白铜器、龟甲、牛骨、麒麟头颅诸物，其价值足可令中国美术、文化、社会史重行编定。

△　东北当局决定，自本日起，吉林官贴、热河兴业银行纸币及东三省官银号发行之奉票，一律中止发行，另发行新纸币以整理币制，并组织金融整理监察委员会协助整理。

2月21日　汪精卫就王乐平被暗杀事以英文发表对外宣言，谓王在上海被暗杀系政治性质，是想给反对派一个直接的打击，使用这种无耻手段，明显是政府懦弱无能的供状。

△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通电请蒋介石下野，以谢国人，谓“党国破碎，民苦流离，推原祸始，皆介石一念之私有以致之，介石一日不去，则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一日不成”；并推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军权，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夹辅阎锡山。

△　冯玉祥西北军改编为三个军团，受阎锡山指挥，孙良诚、刘郁芬、宋哲元分任第一、二、三军团司令，鹿钟麟任总司令。西北军总部由西安移潼关。

△　国民党广东省各级党部通电响应阎锡山蒸（10日）、铣（16日）两电，称阎“提倡党员团结一致，取决多数，主张军人推诚合作，为党国整个之武力，实今日人民所渴望，多数党员所蕲求”；斥蒋“恃暴力以为统一由我，征伐自专”，必将不戢自焚，为当世所共弃。23日，阎复电致谢，并指责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选出者仅73人，“党既不党，国安能国”？

△　苏联派中东路前局长叶木沙诺夫为东铁副理事长，于20日抵哈，是日就职。中方反对无效。

△　交通部与德国汉沙航空公司签订合办欧亚航空邮运合同，规定合办公司须完全遵守中国法律；公司股本中方占三分之二，德方占三分之一；董事及监察人之三分之二皆由中国人担任。

△　交通部为日本提议开设中日航空路线拟订协定事咨复外交部称，应俟我国批准《国际航空公约》后依约办理，无另订协定必要，并请与日交涉促速撤除南满日邮。

2月22日　蒋介石复阎锡山号（20日）电，责阎对皓（19日）电所提取消礼让引退之议及实践请冯出洋之约、实施编遣二点“概未置复”，对阎电所称“个人中心之武力”的指摘有所辩解，声称“在党国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定叛乱”，是“天职所在”，下野“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

△　训练总监何应钦电沈阳阎锡山之代表梁汝舟，谓阎“此次竟假礼让之美名，为倡乱之主动”，望劝阎“临崖勒马”。

△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电驻京代表李培天，谓对晋阎“必须严予

制裁，云南始终拥护中央”。

△　第八路军蔡廷锴、余汉谋两师占领贵县。

△　国民政府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四次常务会议决议，训令直辖各机关，禁止以孙中山遗墨手迹等售与外人，违则严重处罚。

△　立法院通过《党员犯罪加重处刑暂行条例》，凡五条，规定：“凡党员犯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罪者，加重本刑三分之一”；“现任职官虽非党员，以党员论”。25日，国民政府公布。

△　国民政府特派伍朝枢为编纂国际法会议全权代表。

△　国民政府指定张之江为全国禁烟会议主席，钮永建为副主席，决定本年4月21日召集第二次全国禁烟会议。

△　教育部令停闭上海私立东亚大学。

△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洪深组织群众反对大光明电影院上演侮辱华人之美国影片《不怕死》，并呈请上海市当局取缔。

2月23日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何键、韩复榘、刘文辉、宋哲元、金树仁、徐永昌、石友三、黄绍竑、张发奎、傅作义、邓锡侯、杨虎城、刘桂堂等45人联名通电，谓党内纠纷迭起，由党争而变为兵争，“所争者三届续统与二届复统两点。而主张息争者，拟由一、二、三届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党员外组织临时国民党党员干部会议，于最短期间成立四届”。“锡山等拟请由我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以实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28日，何键、刘文辉、金树仁、王金钰、杨虎城、刘珍年等声明否认列名阎该电。

△　蒋介石电令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濬将第二路、第五路军统归行营指挥。

△ 据《申报》讯，日本对沪法院协定，认为并未参预，不受拘束，须中日另行直接交涉，日保留期满未修旧约精神，不放弃领事裁判权。

2月24日 阎锡山复蒋介石养（22）电，声称“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施编遣”；并派代表指定过半数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钧座一人之命令，党国危乱，实肇于此”。

△ 汪精卫电阎锡山，表示极赞成全体党员总投票解决党内纠纷，称此举为“全体党员之公意”，“实为本党最高主权之所在”，“无论何人，均当服从”。责蒋“好乱怙权，悍然不顾”，“如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陆军第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三师，第二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均系反动军队，又陆军第三十四、四十四、五十二等师及第二十二军业已改编，所有各该军、师特别党部应一律取消。

△ 据《申报》载：第八路军蔡廷锴、蒋光鼐、香翰屏三师及空军在容县、兴业一带击退桂军黄绍竑部。

△ 据《申报》讯：豫赈灾会函请华洋义赈会协助移民东三省，经该会核议，须中国国内停止军事，则募赈及运输移民均可尽力办理。

△ 新任挪威驻华公使欧伯向国民政府主席呈递国书。

△ 上海各丝厂因去岁洋庄丝市不振，干茧原料枯薄，于去冬先后停机休业。一月以来，各丝厂相继开工，至是日止，全沪104家丝厂，开工已达70%。

2月25日　阎锡山亲到五台建安村晤冯玉祥，表示讨蒋决心，双方言归于好。28日偕冯同返太原，共商讨蒋大计。冯对阎所拟讨蒋电稿表示赞许。

△　河北省政府奉阎锡山令派员赴英、美、法、日各国公使馆，告以蒋介石若不下野，将予武力制裁，并声言万一战祸波及外侨，由省府负责保护。

△　太原组织各方将领联合办事处，专司计议军事方针及接洽机要。

△　何成濬电阎锡山，斥组织元帅府及枢密、元老两院之非，劝阎勿“立异鸣高，以退为进”。

△　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大会开幕。陈果夫代表国民政府致词，声称“建设障碍在破坏分子尚未肃清，扫除反动即为建设工作之第一步”。该会副委员长曾养甫报告该会成立以来工作概况，各省代表分别报告各该省建设情况及今后计划。大会通过确定全国建设经费保管支配方案，整理扬子江镇江、瓜洲水道码头等55项议案。27日闭幕。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财政、经济三组开会，审查工商部长孔祥熙所提救济金贵银贱意见书（内容分禁止现金出口、充实银行发行准备、进口生银酌量征税、铸造五角银币四项），及孔祥熙前提禁止外国银币入口，向国际汇兑会议提议商请英、法政府转知印度、安南政府于一定期内停止向外输售现存银货案，决由外交部与英、法两国代表商救济办法，关于禁止外国银币入口及铸造五角银币，由财政部酌办，其余俟统一币制时再议。

△　工商部呈行政院，请指借民国十九年以后之俄、英、日、美、意、比、荷七国庚款余额3.7亿元作抵，发行海关金单位公债券2.2亿元，名为民国十九年七厘庚款债券，以创办特殊银行，俾实行

金本位制及办理国际汇兑之准备。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朱绶光准辞代理军政部长兼职，特任何应钦兼任军政部长；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王金钰辞职照准，任命马福祥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国民政府令：各省前经设立之最高法院分院，在法院组织法制定施行以前，准其暂缓裁撤，至各该分院处理事务暂行办法，应由司法院转饬司法行政部拟具条款，呈候该院核定饬遵。

△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致电行政院长及外交、财政、工商三部部长，请于中日关税条约中，不得以日制棉纱、棉布两项作互惠品，并请披露“互惠协定”全文，以待国人研究。

△　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河南的商城、光山、潢川、固始、息县，安徽的六安、霍山、英山、霍丘、颍上、寿县、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界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4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郭述申任特委书记。

2月26日　蒋介石复阎敬（24日）电，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有所申辩，谓：“三全大会代表产生之方法，系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所决定，指派或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务会议经众公决。”忠告阎“结束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

△　国民党中政会开临时全体会议，决定下令讨伐阎锡山，推邵力子拟稿，提交中常会或三中全会讨论后颁发。

△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规定党“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

△　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派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兼社会局长鲁荡平，因将军方截获之李宗仁等致阎删（15日）电以密电抄呈南京陈立夫，被警备司令部监视。其他整委刘不同、陈石泉即晚避入法租界，市党部人员逃避一空。

△　汉口市长刘文岛抵京向蒋介石报告何键态度，称何绝对拥护中央。

△　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政府已决定不征生银进口税。

△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电国民政府，反对中日关税条约互惠协定，称日本输出都属工业再制品，中国输出都属原料品，此项协定成立，足制中国棉织业于死命。上海面粉公会亦电行政院，称“互惠固托空言，华厂竟蒙实害”，要求在协定未签字前，将全文公布。

△　上海邮务工会发布《告各界书》，反对交通部设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称“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名为发展储汇，实为野心家破坏邮政之屠器”，要求交通部收回成命。旋交通部以工会不应干涉行政，严电邮政总局严切训导。3月1日，交通部采纳前邮政总办刘书蕃之建议，决定开办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各地邮务职工纷起反对。

△　尼泊尔恃英为后援，派兵进攻西藏。28日，达赖电南京请兵三师防边，班禅亦请南京援兵，俾资应付。按：尼人在藏经商，向不纳税。去年达赖因尼侨抗税，处决一人，因是引起藏、尼纠纷。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十九年度试办预算章程》。

△　据《申报》载：美商美川桐油公司总经理瓦林特抵渝，拟以美金一亿元垄断四川桐油贸易，在渝、宜、汉、沪四处建五万吨油池各一所，另造大小江轮24艘，浅水拖轮四艘供转运，并在扬子江、嘉陵江沿岸设分行，招商收购桐油。

2月27日　驻军陇海路开封与归德之韩复榘、石友三联名通电突

倡和平，谓党国伟人，“即使意见偶有冲突，当别有排解之良策，何至诉诸武力”，声称“苟于武力之外，另有维持和平之术，誓当追随其后，勇效驰驱”。

△　陈济棠接蒋介石电令，限半月肃清全桂。同日，陈派程璧金赴滇见龙云，请出兵攻桂。

△　美国飞运公司派代表勃来斯到南京，与中国航空公司接洽修改中美航空合同。

△　国民政府公布《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组织大纲》、《参谋本部各省陆地测量局组织大纲》、《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条例》、《各区陆地测量学校条例》、《陆地测量标条例》及《测量标条例施行细则》。

2月28日　　冯玉祥偕阎锡山抵太原，西北军将领数十人联电欢迎，冯之旧部均列名，惟无韩复榘、石友三。同日，各方参加反蒋代表34人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议决八项，决定晋、陕两军同时出发，全力攻平汉、津浦两线。反蒋阵线大联合形成。

△　津浦路北段晋军以陈调元拥蒋，解决高桂滋、任应岐，决将主力集中德州，由傅作义指挥南下。津浦路北段车辆被扣运兵。

△　平、津时局紧张，国民党中宣部所办之北平《华北日报》及天津《民国日报》停刊，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亦停止活动。

△　阎锡山复蒋介石宥（26日）电，称：“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声明“自此以往，不再言国事”。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批准第十一次国际劳工大会所通过之最低工资公约。

△　日人“满铁”理事大藏公望抵吉林，为武力强筑吉会路作重要视察，3月2日返大连。

2月下旬　　湘鄂边红四军奉命离开鹤峰去洪湖与红六军会师，向松滋、公安方向进发，遇蒋军郭汝栋等部阻挡，于占领五峰县城后，又折回鹤峰，待机改途东下。

△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之名，通知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带领本县武装到永新城集中。原井冈山地区绿林头领、受毛泽东团结改造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领导的王佐、袁文才率部开进永新城。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误认为王佐、袁文才会叛变，率部包围其住所，将袁文才枪杀。王佐逃离，在涉水过河时溺死。

是月　　五年悬而未结之五卅惨案，以上海英工部局允赔偿抚恤费15万元了结，工部局与五卅惨案家属会已正式签字。

△　李浩吾（杨贤江）著《新教育大纲》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　林柏生奉汪精卫之命在香港创办《南华日报》。

3　月

3月**1**日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出席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44人。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一、中执委汪精卫业经开除党籍，遗缺以候补执委丁超五递补；二、阎锡山受党国重任，并为中央执委，乃于最近联合武人，倡为谬说，违反党纪，动摇人心，并有调遣军队、破坏交通情事，应即设法制裁，特派李石曾、张继、赵戴文切实查明真相。

△　张学良通电劝蒋、阎息争，谓“政见无妨磋议，而不可为意气用事之争，武力有时必需，而不可为萁豆相煎之具”，望“融袍泽之意

见，剖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

△　蒋介石电告第三集团军各将领，望“认清是非，力持正义”，劝阎“及早自拔”。

△　韩复榘、石友三上月27日通电主张和平后，是日朱培德、何应钦致电勖勉韩、石，并告以如阎武力压迫，河南首当其冲，可整队引退，苏、皖、鄂、鲁诸省均可暂驻。同日，刘峙电劝韩、石进一步表示反阎态度。

△　张发奎派司徒非、王超到梧谒陈济棠，请准退出桂境，勿进逼。陈不理，将二人扣留。25日，陈释王超，令携函劝张归降，勿与桂系合作。

△　美参议员麦克玛司德在参院提议，由农委会收购麦粉运中国赈灾，款额以美金2500万元为限，中国政府须在十年内陆续归还。参院农委会主席麦克纳莱对该提案表示赞许，拟即公开征求意见。

△　江海关改为征收金单位币后，因金价涨落不定，外汇汇率时有变更，海关总税务司报经财政部批准，是日起以汇丰银行挂牌价格为标准，按日公布各国货币换算率。

△　上海金价受伦敦、纽约银价跌落及印度征收生银入口税影响，是日标金突涨至519.5两，为前所未有。上海金融界人士建议政府征收生银进口税或限制生银进口，加以挽救。

△　《无产者》月刊创刊，陈独秀主编。

3月2日　　阎锡山与唐生智捐弃前嫌，是日唐之参谋长臧卓自天津电香港告唐，谓阎对豫事表示歉意，此后愿与唐共谋国是，并盼唐到晋一行。5日，臧卓电阎，称唐对阎之讨蒋，必从旁赞助，已嘱湘、鄂旧部相机响应。

△　阎锡山复张学良东（1日）电，声称：“和平息争，弟之素志，日来与介公迭电商承，戡乱不如止乱，亦正为吁恳和平起见。”

△　阎锡山曾于2月24日致电吴敬恒，对三全大会指派代表事有所指责，是日吴复阎电，申述指派代表理由，略谓：“一届指定，为防腐也；二届指定，为亲共也；三届指定，为汰共也。”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柔石、殷夫、冯铿、洪灵菲、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郑伯奇、冯雪峰、阳翰笙、田汉、潘汉年等40余人到会，鲁迅在会上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阐明无产阶级作家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和劳动阶级打成一片，要造出大群的新战士，要发展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大会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提出“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方向，并使之发展”，“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选举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郑伯奇、洪灵菲、田汉七人为常委。设中共党小组，潘汉年任书记。

△　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红军围攻江西吉水唐云山旅，是日成光耀旅、朱耀华旅到达城郊，红军退富都。

△　外交部允许日本航空株式会社飞机于本月5日至8日做上海、福冈间试验飞行，是日转知航空署并上海市政府检查违禁品。

3月3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第二次大会除通过临时动议撤销整理晋省金融公债案外，并通过推进党务工作、训练党员工作方针、建设方针等九案。建设方针案中提出今后要注意农业发展，注重农民教育，提倡农业合作，各省限期成立农业银行以辅助农村经济发展；规定有逆产关系之煤铁矿为国家公有，未开发之矿产归国营，准外人投资或合资倡办；政府应在两年内借外资兴办大规模制铁、炼钢、造船、电机制造厂。

△　蒋介石复张学良东电，指责阎“联合武人倡为谬说”，无中央命令而擅自动员，进占他省，擅委总司令、总指挥，扣留车辆，阻碍交通，没收机关，拘捕官吏，弁髦法令，自创中华民国军，包围党部，拘捕党员等，望张调查事实，“仗义执言”，以促阎之省悟。

△　张学良东电发出后，南京政府即将青岛交与东北海军维持。是日，青岛驻军两营调回南京。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12日由长山岛抵青岛视察。

△　阎锡山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称：“锡山以衰病之躯，久思退休，重以主张国事，未蒙鉴纳，自应请准开去本兼各职，以遂初衷。”

△　赵戴文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谓晋军调动，系在河北境内换防，破坏交通更无其事，急盼张继、李石曾克日赴晋会同查察。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工商部长孔祥熙请救济金贵银贱案议决，由外交部电令国际联盟中国代表与英法两国参与国际汇兑会议代表会商救济办法。至于禁止外国银币进口等，由财政部酌办。国民政府据此训令行政院转饬遵办。

△　工商部拟具整理币制方案呈行政院，主张废两改元，统一币制。11日，行政院决议交财政部审查。

△　张群查办闽事完毕回上海，谓林知渊等六人确有不惬舆论之处，经请示中央将六人送省，由陈季良解京究办；省防军司令林忠等三人擅自逮捕中央任命官吏，有违法规，已电自请处分。

△　国民政府令准安徽省政府主席王金钰辞职，任命马福祥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并指定马为主席。

△　国民政府准免朱绶光军政部代理部长职务，特任何应钦兼军政部长。

△　国民政府任命李禄超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原任李锦纶免职。

△　国民政府任命马玉仁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卫生部在上海召开中外联席防疫会议。

3月4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第三次大会通过重要议案多件：一、修正中央政治会议条例案，其要点为：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执委会负责；委员从中执监委中确定；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事项为：甲、建国纲领，乙、立法原则，丙、施政方针，丁、军事大计，戊、财政计划，己、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副院长及委员，及特任特派官吏之人选；二、限制官吏兼职案，规定中央官吏不得兼任地方官吏，各院、部、会官吏不得兼任其他院、部、会官吏，各省市官吏不得兼任其他省市官吏，事务官除在本机关外不得兼职；三、训政时期党务工作方案等。

△　阎锡山致电鹿钟麟、韩复榘、石友三，表示决心下野出洋，声称韩、石“通电主张和平，甚洽鄙怀”。同日，命驻豫之第三十三师孙楚部、第四十二师冯鹏翥部向河北省复员。

△　赵戴文离太原返五台原籍，表示不再预闻党政，并电蒋介石称“阎近日大彻大悟，已决心下野”。

△　汪精卫电阎锡山，指斥南京方面所谓第一、二届代表皆指派之说，谓一届代表由总理指派，乃国民党采取总理制所当然；二届代表皆依章选举，指派之说纯属谰言；三届代表指派圈定至80％以上，非私人垄断，尚有何说。

△　陈调元电南京报告，晋军是日进驻德州，“我军为避免冲突，退驻平原、禹城”。

△　第六、八两路军将领朱绍良、陈济棠及毛炳文、香翰屏、蔡

廷锴、蒋光鼐等各师长与吕焕炎等，集梧州商时局及桂事。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密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组织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李立三、军事部欧阳钦等。

△　国民政府任命夏斗寅兼武汉警备司令。

△　上海邮务工会承市党部意旨，打消反对成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之运动。

3月5日　　阎锡山通电声明偕冯玉祥出国，谓“此次主张国是，原为止乱，既不能荷蒙鉴察，何肯因止乱而起乱”。

△　国民党三中全会第四次大会通过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等案，民众训练方案规定以“训练”人民认清国民党训政之精神等为基本原则，并规定人民团体受各地党部指导，受政府监督，“使人民对党义有深确之认识与信仰”。

△　阎锡山决调晋军南下，以傅作义为津浦线北段总指挥。

△　蒋介石以阎锡山部五师兵力集结沧州、清河、道口之线，并以一部进驻曹县、菏泽一带，判断其目的为沿津浦路及其迤西地带南下，先略取山东，后相机进攻南京，一部则于鲁西扰津浦线侧面，掩护主力渡河，是日乃制定作战计划，确定先击破黄河两岸附近之晋军，乘胜追击，肃清河北，收复平、津，然后廓清晋、察、绥等地。

△　石友三、马鸿逵分别电张学良，响应张之东电，力倡和平。

△　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复阎锡山勘（28日）电，称“为政不在多言，止谤莫如自修”，望以事实证明服从中央，劝取消中华民国联军名义。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准王金钰辞第四十七师师长兼职，遗缺以旅长上官云相继任。次日，蒋介石电委王为平汉南段警备司令。

△　上海法租界祥昌棉织厂因受金涨银跌影响亏损停业，是日，工人千余名拥入厂内要求开工，厂方召法巡捕弹压，工人邢友成被枪杀，20余人受伤。9日，工人要求《时事新报》登载宣言，该报馆惧租界压力，未予刊登，致被工人捣毁。21日，厂方允发退职职工每人津贴70元，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1500元，伤者给医药费，工潮解决。

3月6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第五次大会通过筹集首都建设经费案等决议案23件。下午全会闭幕。大会宣言指出：今后必须注全力于地方自治工作；以举国之心思、财力，发展各种基本工业；普及三民主义教育。

△　蒋介石因韩复榘、石友三联名通电拥护中央，并遵照命令如期调防（石部由归德移驻郑州，韩部曹福林师由郑州移驻归德），是日分电刘峙、何成濬、陈调元等总指挥，变更2月16日策定之作战计划，以韩复榘为前敌总指挥，统率津浦路方面军及第一总预备队，与平汉路方面军及第二总预备队，从事讨伐准备。

△　晋军孙楚部奉阎锡山令将驻郑州部队撤至新乡，石友三部奉蒋介石令自归德开至郑州，即将孙楚未撤一部包围缴械。陈调元电告鲁西晋军退离鲁境。

△　交通部决定收回大东、大北两水线公司水线登陆权及电报收发权。

3月7日　　晋省要员在太原开重要会议，讨论阎锡山下野问题。8日，傅作义、张荫梧自平赴太原出席会议。阎锡山派岳开侁、宋澈赴日本筹备住所，所有第三编遣区及一切善后问题由赵戴文负责办理。

△　编遣委员会通告各军、师，国民政府迭经张学良呈请，已准予撤销王克敏、顾维钧、梁士诒三人通缉令。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各地军民长官嗣后不得直接派遣陆军学生赴外国留学。

△　中日关税交涉由外交部长王正廷、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代使重光葵在上海开正式会议讨论，对税率问题及互惠货品之种类，双方争执甚久；对于协定有效期间，日方主定五年，华方力主缩短。

△　日本国际航空运输会社组织之中日国际航空运输试飞成功，是日该公司飞机一架由福冈飞抵上海。

3月8日　　冯玉祥在太原拒见宾客，与阎锡山长谈数小时后，于晚8时离太原秘密回陕。

△　国民政府任命魏益三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彭德怀红五军占安福，12日克分宜。

△　日轮“信阳丸”在沙市下流20里处被红军贺龙部猛烈射击，弹伤50余处。

△　满海警备司令梁忠甲在海拉尔因心脏病暴卒。

3月9日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受所部将领拥戴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总部设在太原，任刘骥为总参谋长。

△　华丝外销疲滞，浙江又因提倡人造丝而有日趋衰落之势。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及上海丝厂协会是日召集同业大会，讨论救济丝市现状，议决呈请政府发行丝业公债，减征丝茧捐税。

△　马鸿逵在浦口就“讨逆军”第十五路总指挥职。

△　丹麦太子斐列特立克一行来华游历抵沪，13日，抵南京谒中山陵。

3月10日　国民政府令准阎锡山辞去本兼各职；特派阎赴欧美各国考察实业。当晚又将命令撤回，并通知各报勿登载。

△　阎锡山致电马福祥，称“和平本属素志，下野休养，早具决心，日内即返五台，料理家事就绪，即行出洋”。

△　冯玉祥与阎商妥共同倒蒋后，是日自太原返抵潼关。同日西北军将领23人由鹿钟麟领衔，由潼关发出留阎通电，望阎“消除患难，打消去志”，表示“自愿追随百公之后，奋斗到底”。

△　晋军退出豫境。石友三军由郑州开抵新乡，韩复榘部经道口开往彰德联络北进。

△　外交部电令驻美公使伍朝枢向美交涉禁映侮辱华人之影片《不怕死》。

△　蒋介石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江西全省“剿匪”总指挥，所有驻赣部队概归其指挥。

3月11日　冯玉祥在潼关召开西北军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宣布联阎打蒋，会上除师长葛运隆主张讨蒋外，多数未表态。

△　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向国民政府呈称，尼泊尔大举犯藏，请准予组织卫队入藏，并发给枪弹、服装、月饷。蒙藏委员会拟派员调解，并组织蒙藏特殊事务讨论会。

△　国民政府特派王正廷为议订收回威海卫租借地专约及与本案有关系事项协定全权代表。

△　教育部训令各大学自十九年度起不得再招预科生。

3月12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命顾祝同为“讨逆军”第十六路总指挥，是日顾率部进驻济南。

△　陈调元通电，在济南就“讨逆军”第一总预备队总指挥职。23日，蒋委陈为第一路总指挥。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代使重光葵在南京签订中日关税草约。

3月13日　汪精卫致函覃振，主张以党驭军，谓“此后新旧忠实同志之合作，应以如何始能以党驭军为悬前待决之根本问题”。

△　吴敬恒致电冯玉祥劝摒弃干戈。14日冯复吴电，斥吴“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18日，吴复冯电，再请“俯纳前电之意”。

△　晋军将领商震、徐永昌、杨爱源等23人通电阻阎出洋，称阎曾负国家重任，“言国事而不见谅，求下野而不见容，夫复何言。震等除坚决阻止阎副司令出洋外，惟有在军待罪而已”。

△　韩复榘电何成濬，报告晋军完全退出豫境，该部及石友三部进至道口、彰德，请派兵至郑州接防。何即令王金钰之第九军开郑接防。

△　1911年受袁世凯指使，参与谋杀吴禄贞之凶犯张光武，是日经山东高等法院宣判，以反革命图谋杀人罪，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利15年。

△　中共中央发《中央通告》，提出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

△　上海药业职工会因租界药店资方拒绝安插失业工人，决议在租界区内罢工。24日，当局令53家药铺分别录用128名失业职工，罢工获胜，决定次日复工。26日，资方又雇用大批巡捕武力阻止店员进

店。27日，职工乃继续罢工，并列队向上海市政府请愿，学生联合会及闸北水电工会等32工会均发宣言援助。

△　交通部与德国汉沙公司签订欧亚航空合同，规定设立中德公司，合资经营，资本总额300万元，华方占三分之二，汉沙公司占三分之一，营业期间定为五年，先办两国间航空邮务，再经营载客事业。

△　渡海大水管正式启用，九龙水塘用水开始输至香港。

3月14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改组江苏、安徽两省政府，以叶楚伧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马福祥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　关内时局紧张，东北地位为各方所重视，各方使者络绎于北宁道上。张学良因南京及山西代表均在沈阳活动，是日在沈召集最高会议，商议应付时局，蒋之代表方本仁、刘光，阎之代表梁汝舟、温寿泉，冯之代表邓哲熙、门致中等均列席参加。

△　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任命黑龙江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苏炳文继梁忠甲为第十五旅旅长兼呼伦贝尔镇守使、哈满护路司令。

3月15日　西北军高级将领鹿钟麟、宋哲元、石敬亭、刘郁芬、孙良诚、孙连仲、张维玺等临时会议，决定鹿即解除西北军代理总司令职务，军队仍由冯玉祥统率，继续沿陇海线进军，要求阎锡山陆续接济军队给养。

△　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57人通电讨伐蒋介石，略称蒋介石“窃踞中枢，毒痡四海，邦基杌隉，日即倾危”，历数其六大罪状，表示誓歼残贼；并加推李宗仁为陆海空军副司令，拥护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领导讨贼。阎、冯反蒋联盟形成。

△　高桂滋以一旅兵力坚守诸城、莒县，陈调元屡攻未下，高一面托马鸿逵向蒋介石输诚，请求改编，一面与阎、冯通信待援。

△　国民党全国训练会议在南京开幕。18日第二次大会通过开除阎锡山党籍并明令讨伐案、统一并推进各级党部训练工作案等多案。20日闭幕。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建都南京及清党三周年宣传要点，要求“彻底肃清共党，努力铲除改组派以及破坏统一、阻挠建设之一切腐恶分子”，“从事清党清心工作”。

△　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30余县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沪正式成立，后迁南京，总办（后改称局长）刘书蕃。经营储金、邮政汇兑、人寿保险等业务。

△　陕西省赈务会华县分会致电旅平陕灾救济会，吁请救济陕灾。电称华县连年大旱，去冬严寒，冻饿而死者几达3.5万之数，逃荒外出者2.78万人，全县14万人口中13万罹灾。

3月16日　　讨桂军下总攻令，第六、八两路军向南宁、柳州进攻。第六路军总部移梧。

△　鹿钟麟致函蒋介石，责其以总理自居，而事事反其道而行之；据党私有，使自身与党国不分；北伐完成，攘为己功；排除异己，不遗余力；陕甘灾荒，充耳不闻；劝其“翻然悔悟，急流勇退，即日宣布下野”。

△　蒋介石任命王金钰兼第二总预备队总指挥，第六师赵观涛部归王指挥；委徐源泉为“讨逆军”鄂北总指挥，限所部20日前集中襄樊，驻防鄂北各部交徐指挥。

△　国民政府对工商部所拟救济金融办法内之禁止外银入口及铸造五角银币两项，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遵照办理。

△　据《申报》讯：撤销领判权问题，外部拟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先取消侨居内地外人之领判权；第二步取消侨居次要商埠外人之领判权；第三步取消侨居重要商埠外人之领判权。

△　满洲里苏领馆派警29名在东铁工厂驻扎，哈尔滨长官署以其侵我主权，饬警务处交涉。

3月17日　冯玉祥抵陕县，向西北军下动员令。所部张维玺、刘汝明部旋即由紫荆关东进，庞炳勋部前锋抵洛阳，万选才部聚集汜水、巩县一带。

△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发表演说，声称“阎锡山自知已无办法，就骗出冯玉祥向中央捣乱”。声明中央对时局决取守势，“待反动势力暴露殆尽，再不能不用兵的时候，然后方起来去消灭他”。

△　何应钦在军政部纪念周报告中央对阎锡山方针称：“如阎此时能悬崖勒马，及早觉悟，将军政权奉还中央，未尝不可博得人们之原谅而加以宽恕。如仍执迷，甘心与一切反动分子互相勾结利用，处心积虑，破坏国家和平统一，则其结果亦惟有与反动分子同归于尽。”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交通部电政公债条例》，总额为1000万元，年息八厘，4月1日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民国二十年（1931）起分10年还清全部本息。

△　国民政府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法》。

△　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既经取消，是日外交部照会驻华法使玛太尔请迅速会商收回法租界会审公廨，改设中国法院。4月25日，法国政府复照外交部称“对于贵部收回法公廨建议，刻下正在审查中”。

△　国民政府任命叶楚伧、胡朴安、陈其采、陈和铣、孙鸿哲、何玉书、王柏龄、李明扬、罗良鉴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叶楚伧兼省政府主席，胡、陈（其采）、陈（和铣）、孙、何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改组安徽省政府，除委员兼主席马福祥、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王之觉业经明令简任外，任命孙绳武、程天放、李范一、马吉第、张克瑶、李应生、金维系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孙、程、李（范一）分别兼任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令：驻荷兰特命全权公使金问泗另有任用，应免本职。

△　梁启超所遗藏书4.2180万册，由其家属尽赠北平图书馆。

3月18日　北平警备部奉阎锡山命令，勒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之《华北日报》停版，封闭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驱逐该社办事人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外交部档案保管处、电话局、电报局、陆军军医学校均被晋方武力接收。19日，北平市党部被封，封条署名为“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各区分部联合办事处”。国民党中宣部所办之天津《民国日报》亦被封闭。

△　蒋介石电在粤各军，限十日内解决桂局。20日，第六、八两路军会攻桂平县，朱绍良亲往前线督师。25日，第四路军攻入桂林。

△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制定土地法、劳动法、军事条例、婚姻条例、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政策等。大会选举邓子恢、张鼎丞等35人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为主席。

△　红五军第五纵队在鄂东南向粤汉路沿线城镇举行“三一八”武装示威，袭击据守咸宁城之夏斗寅两个团，又一次扫荡贺胜桥、官埠

桥、马桥、汀泗桥等地民团，破坏铁路几十公里，粤汉线交通停顿十几日。

△　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红军合编为红一军。

△　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以红军声势日大，是日电京自劾，蒋介石复电慰勉。同日，张辉瓒通电就全省“剿匪”总指挥职，次日进驻吉安指挥。

△　广东商人谭礼庭等发起组织之丝业银行在广州成立，资本总额毫银100万元，董事长谭礼庭。

△　吉林永吉电影院失火，死300余人，伤数十人。

△　华文《三民晨报》在美国芝加哥创刊。

3月19日　阎锡山、冯玉祥为在北平组织军政府，派员访各国公使、代办，探索外交界态度。

△　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平汉路总指挥，朱培德为津浦路总指挥，王金钰为第二路总指挥。20日命顾祝同移驻鲁南。

△　蒋介石委第十一师师长陈诚为蚌埠戒严司令。24日蚌埠宣布戒严。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叶楚伧辞政治会议秘书长兼职，由陈立夫继任。

△　上海剧团联合会成立。

3月20日　国民党山西省各县市党部联合办事处通电迎汪回国讨蒋，指斥蒋介石之独裁。宣称：“本办事处否认伪三全大会，主张二届委员行使职权……深望迅速回国，集中革命力量，铲除一切障碍。”

△　阎锡山派代表赵丕廉赴天津，迎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傅汝霖、覃振等到太原共商联合反蒋大计。

△　北平国民党各省市党部联合办事处电阎锡山，促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23日，阎复电称："自当即日就职，与我诸同志戮力同心，共奠国基。"

△　蒋介石偕宋美龄离京检阅沪宁、沪杭甬沿线部队，次日到上海，22日返奉化原籍。

△　张学良电京，重申东电和平解决时局主张。

△　韩复榘、孙殿英两部在归德（今商丘）以西发生战争。韩于19日令驻归德孙殿英部即日调防河北，孙拒不听命，并将离马牧集三公里处之铁桥炸断，以防徐州方面中央军进攻。韩即派兵东进，是日拂晓向孙部攻击。

△　北平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被封，封条署名为"河北省各县市党部联合会"。22日，北平平汉铁路局、交通部短波无线电台及财政部印刷局亦被晋方接收。

△　第六、八两路军部署对张、桂军发动总攻。第六路军总部由梧州移戎圩（位于苍梧西南），第八路军大部开拔完竣。23日，平南、北流两线发生激战，陈济棠、朱绍良先后赴藤县督师。

△　国民政府据3月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训令训练总监部，军队政治训练事宜应归并各该级军队特别党部办理，除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以外，各级政治训练处一律裁撤。

△　国民政府任命钮永建代理内政部长。

△　国民政府据本月1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训令直辖各机关，在国歌未制定前，以党歌代替。

3月21日　阎锡山委徐永昌为前敌总指挥，张荫梧为津浦路前敌总司令，孙楚为平汉线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为预备队总指挥。

△　石友三通电响应鹿钟麟领衔之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删（15日）电，谓："曩者浦口之役，即期除阴霾而倒独夫，惜为环境所迫，未能早竟事功，忍辱待时，匪伊朝夕，备受压迫，志意弥坚"，表示将"执戈前驱，贯彻初衷"。同日，石又与孙殿英、万选才、刘春荣联名通电响应鹿等删电。

△　蒋介石派吴铁城自沪赴辽，24日到沈晤张学良商谈时局。27日，吴应张约再次晤谈，张表示拥护中央，"削平叛乱"。

△　驻哈尔滨苏领事梅里尼可夫访莫德惠，谓苏主张扩大中苏会议范围，除中东路善后问题外，松花江航行权、外蒙古独立、新疆边境划界等，均请开谈。29日，外交部令知莫德惠，中苏会议专商中东路问题，范围决不扩大。

△　中东路电政权交涉，莫德惠曾在中东路理监联席会议上提出允许电权恢复原状等七项提案，是日东铁理事会进行讨论，苏理事主张此项问题移至中苏会议解决，无结果。

△　江西建设银行在南昌开业。

3月22日　太原"各市县联合办事处"接收国民党山西省、太原市党部，《民国日报》及晋新书社被查抄停办。24日，太原各界代表开讨蒋大会，各校青年团沿街张贴欢迎汪、阎、冯及讨蒋标语。

△　据《申报》讯：冯玉祥派人游说石友三，谓冯深悔向日双方误会，致深裂痕，深自引咎。如能弃前嫌，共图国事，冯当开诚布公，安乐患难共之，并商请阎以平汉沿线归石。

△　阎锡山之秘书长贾景德由晋抵平，与各方面接洽时局问题，奉阎命在平组织军政部。

△　张学良电蒋介石，谓对鹿钟麟等通电事前毫无所知，“个人心迹，屡于呼吁和平通电中明白表示”。

△　编遣委员会缩小组织，将总务、经理、编组、遣置四部一律改编为科，办事人员、经费裁减约十分之四五，不及办理事件分别划归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及军政部办理，4月1日起实行。

△　刘和鼎第五十六师是日起由永泰、福清陆续开向福州，卢兴邦就近抽调军队加紧布防各要隘，并将林知渊等六人移禁黄山，闽局又趋紧张。26日，刘师在福州布告辟谣，声明所部开省系移防性质。

3月23日　汪精卫在香港答南华通信社记者，谓蒋倒以后，最低限度之政治设施，其大者约有数端：一、须注意组织民众，否则自国民会议至地方自治皆成空谈；二、继续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自由；四、财政公开；五、重新厘定党部与政府机关权限，党部处指导地位，不可直接干涉行政；六、不可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

△　太原方面派员接收天津电报局、商品检验局、津浦铁路局、华北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封闭天津市党部，封条署名“天津特别市各区党部联合会”。

△　红四军与江西金汉鼎部激战，红军克南康等地。

△　红军贺龙部在华容与湘、鄂军接战。

△　据《申报》讯：陕西大旱，灾情益酷，沔县（今勉县）等灾民，烧食死尸，结果食者亦继死，近又饿毙数万人。

3月24日　汪精卫自香港电阎锡山，请阎在主持讨蒋军事同时，组织国民政府，并担任国府主席。

△　石友三电何应钦，表示拥护中央不渝，称“现晋军南移，冯师

东进，弟因外边环境、内部将士之关系，不得已敷衍晋冯，发出马电，请陈转总座，万勿介意”。据29日《申报》载：阎曾允拨发石友三现款100万元，子弹200万发，面粉五万袋及机关枪、炮弹等物，但迄未发给，石乃与阎决绝。

△　蒋介石命韩复榘部集中山东。

△　万选才通电就阎锡山任命之中华民国陆军第六路总指挥职。

△　陇海线附近之孙殿英部已告肃清，其在归德之大部被韩复榘部包围解决；其在马牧集之一部亦于同日晨被陈继承师解决，残部退鹿邑、太康。

△　国民政府令：故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着晋赠陆军上将，交军政部照陆军上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　国民政府令：废止民国十九年财政部《整理山西金融公债条例》。

△　教育部通令变更学校假期，十九年度起旧历寒假停放，国历年假延长至三星期，并发表《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

3月25日　太原各方代表团征求陈公博对时局的意见，陈建议以各省区党部联合办事处名义，即可代表全国，以二届中央委员主持党务，将来再召第三次代表会议，推举正式政府。

△　北平各省区党部联合办事处致电二届中委，声称：“诸公皆革命领袖，党国先进，请速结合，主持大计，本办事处愿追随公等。”

△　韩复榘电京，报告万选才称兵东犯，被其击溃，万继派代表到汴向韩解释两军误会，称该部东进系被冯玉祥军所迫。

△　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被阎锡山封闭，通县党部亦停办。

△　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准军事参议院参议詹旭初呈请，任命姚以价为山西宣慰使，米文和、袁德性、宋照奎分别为新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师长。

△　中国佛教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圆瑛法师再次当选会长。

3月26日　冯军孙良诚部兵不血刃占洛阳，西北军先头部队已过巩县东进。

△　日代使重光葵抵京，与王正廷就中日关税协定作文字校订。重光葵提出将该协定改为专约，其时效不受中日新商约成立迟早之限制，并表示法权问题须待关税协定正式成立后方可开议。

△　日人在北平所办《华北正报》（英文）停刊。该报创刊于1919年，受日本政府津贴。

△　上海米荒，米价每石逾20元。

3月27日　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在党统问题上有争论，陈公博等主张恢复广东二届中央执委会职权，在平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推选常委会，产生政治会议和政府，邹鲁、谢持认为既然合作反蒋，上海二届中央也应参加，联合召集扩大会议。嗣因陈公博、王法勤接受邹鲁、谢持先在北平成立中央干部秘书处之主张，党务争论告一段落。

△　日本在北平之机关报《顺天时报》停刊，终刊号为9286号，载有题为《本报临别赠言》之长篇社论。该报于1901年10月创刊，初名《燕京时报》，一贯支持亲日派军阀，为日本侵华重要舆论工具。

△　关于收回大北水线主权交涉，是日中国代表庄智焕、吴南如等与大北水线公司代表彭生、史温生等在交通部举行第一次会议。

3月28日　晋军重占德州，赶修黄河涯铁桥，准备南进。鲁军以未奉中央令未加抵抗，节节后退。

△　蒋介石假中央宣传部名义发《告革命将士书》，宣称“阎、冯一日不除，则违害党国之祸源一日不绝，今阎、冯既以叛党、祸国、殃民而倡乱而称兵，我中央自应为救党救国而止乱而声讨”，要求革命将士与逆敌作殊死战。

△　阎锡山派赴沈阳的代表温寿泉回太原。张学良以致阎函交温带回，表示不参加内战。

3月29日　陈公博、王法勤与邹鲁、谢持商定由一、二、三届委员发表共同宣言，并由一、二、三届部分委员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今后党政问题。

△　万选才通电占领开封。阎即委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万以“愿为前躯，不谙政治”为词，请另委贤能。

△　国民政府特派韩复榘为冀鲁豫剿匪总指挥。同日，韩奉令移防济宁。

△　财政部公布甘末尔财政设计委员会拟定之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及理由书，主张中国币制逐渐推行金本位，金货单位定名为“孙”（一孙含纯金60.1866公毫），作为计算价值及国外汇兑标准，以银币为辅币在国内市场实际流通。

△　中日法权交涉，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代使重光葵提案：一、请日本承认撤废原则；二、1930年起内地日侨受中国法庭裁判；三、“间岛”韩民应归中国地方官厅管辖；四、日本在华租界期满后，所有日侨一律受中国法律保护。4月4日，重光葵将中日法权草案电日政府请示。

△　浙江鄞县名刹育王寺失火，损失20余万元。

3月30日　阎锡山下令结束第三集团军办事处及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在太原设立中华民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委徐永昌为总司令。傅作义、孙楚、杨效欧、冯鹏翥分别为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路总指挥。31日，阎复改制，将全军分为十个军，委孙楚、杨效欧、王靖国、李生达、李服膺、杨耀芳、关福安、张会诏、冯鹏翥、傅作义分任第一至第十军军长。

△　日本海军第一水雷战队军舰16艘由少将司令后藤章率领抵上海，载兵2000余名，定4月1日以实习长江航路为名，开赴南京、九江、汉口等处。日海军第一舰队军舰18艘同时抵青岛。

△　哈尔滨开明书店因传布共产主义被特警处查封。

△　青岛大英烟公司是晚借口工人中有“不良”分子，突发停工布告，3000余工人顿告失业，工人提出补发工资、奖金及赔偿损失等意见六条。后经连日协商未获解决。

△　广东西江上游都城（位于郁南县）发生百年未有之飓风巨雹，损失惨重。

△　香港币制审查委员会成立。

3月31日　尼泊尔犯藏，拉萨危急，达赖数次派员赴尼媾和无结果。班禅派代表三人偕同驻京办公处长罗桑坚赞是日到京向国民政府请求援助。4月2日，该代表等由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吴鹤龄偕同谒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马福祥报告一切。

△　蒋介石上日偕宋美龄由奉化到杭州，是日蒋在浙江省党部扩大纪念周演说，声称：“对一切反动不肯断然处理者，期以主义感化。”表示：“我对时局无穷乐观，政府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反动。”

△　东北边防长官公署组织航空总司令部，张学良兼总司令，是日就职，职务由张焕相代理。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卷烟税库券条例》，总额2400万元，月息八厘，4月1日起按票面十足发行，分36个月还清本息。

△　安南华工130余人因无力缴纳人头税，被当局驱逐出境，是日抵汕头。

△　应国民政府邀请来华之德国实业调查团一行八人，由团长勒慈曼率领，是日抵广州，陈铭枢设宴欢迎。4月9日抵上海，勒慈曼对记者称，该团来华使命，为视察中国经济及实业状况，然后拟订开发计划，协商投资。4月14日由上海抵京，次日谒蒋介石。

△　淞沪铁路是日起改驶蒸汽火车。

3月下旬　　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下赣南南康，到新城，指向南雄。赣省政府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生擒者五万元，击毙者三万元。彭德怀红五军占袁州（宜春），消灭守城的靖卫队及警备队。

是月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废除道制，定地方行政区域为省、县二级。内政部通咨各省政府将所有道尹公署或类似之特种行政机关一律裁废，以符现制。

△　日本极力限制华工入境，要挟中国对商订法权问题让步。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进行交涉。上海30余团体为反对日本排华，联合发表宣言，主张继续对日经济绝交。

△　日本渔轮“姬岛丸”于1月26日在我国领海温州洋面捕鱼，撞沉我国渔船，复将船主朱阿良押赴长崎，至是月底方释放回沪。上海市摊贩等30余团体具文呈请外交部提出严重交涉，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　“满铁”当局发表《朝鲜总督府铁路建筑计划》（日本称《韩满联络铁路网计划》），包括安东大连直通线、江界通化线、甲山抚松线、镜城延吉线，目的在将韩、满连成一片，以利日本对华侵略。

△　美商桐油公司以四川桐油质优，特在鱼洞溪、木洞两处种树万株，并收买大批树苗运美。近复派员赴广西调查桐油出产情形。

△　江西建设银行在南昌创立，资本总额100万元，该行由江西省建设厅拨资经营。

△　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院中亚调查团要求今夏赴蒙古采掘古动物标本，是月，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马衡与该团团长安德思在北平团城签定协定，规定所得学术资料，凡与以前所采相同者，统留在中国；与以前所采不同、必须运往美国研究者，研究毕后须将原物运还中国。5月26日，安德思率中亚调查团离北平赴蒙古。

△　桂军杨腾辉部进攻龙州，红八军失利，由军长俞作豫带领向粤桂边境转移，旋编入张云逸红七军。

△　闽西苏维埃政府将闽西各县赤卫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邓毅刚，政治委员邓子恢。4月，红九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全军约3000余人，在闽西各县开展游击战争。

4　月

4月1日　　阎锡山通电在太原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通电宣布："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编桂军为第一方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出衡阳，攻长沙；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担任平汉线作战；晋军为第三方面军，以阎锡山兼总司令，徐永昌为前敌总司令，担任津浦线作战；第四方面军以石友三为总司令，由鲁西南之济宁会攻济南。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为第五、六、七、八方面军总司令。以西北军、晋军为主力，迅即开赴陇海、平汉、津浦各线。同日，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分别在潼关、桂平就副司令职。鹿钟麟通电就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职。2日，石友三通电在新乡就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职。

△　改组派陈公博、王法勤等离平赴太原，与阎锡山商组政府，并携去与西山会议派草拟之共同宣言稿，征求阎同意。宣言主张由阎主持政治，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汪精卫主持党务，先由一、二两届反蒋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中央干部委员会，推汪、阎、冯等21人为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会产生政治会议与政府。

△　国民政府航空署组织“讨逆”空军，并以飞机轰炸退守山东诸城之高桂滋部，以促其缴械。

△　国民政府驻沈阳代表方本仁电何成濬，谓张学良令于学忠部集中滦州，听命中央。

△　国民政府任命陈季良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绍宽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训泳为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曾以鼎为海军鱼雷游击队司令，郁邦彦为马尾要港司令。

△　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克南雄，3日克始兴。

△　东三省交涉总署、奉天交涉署改组为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由前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兼奉天交涉署署长王镜寰担任。外交部特派哈尔滨交涉员署改组为外交部驻哈尔滨吉林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由前交涉员钟毓担任。外交部特派黑龙江交涉员署改组为驻辽宁特派员黑龙江分处，主任王春。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署改组为驻哈尔滨吉林分处，主任施履本。

△　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正式改组，改组后之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同时正式成立。

△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开幕，22省市1700名选手参加，大会主席蒋介石，会长戴季陶，副会长张静江。会期10日，男子部上海、广东、香港并列第一，各得总锦标；女子部广东第一，得总锦标。

4月2日　　阎锡山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代办，通知已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并声明在本军所辖境内负责保侨，望勿以精神、物质援助蒋介石。

△　陈公博等抵太原，宣称拥阎锡山主持政治，汪精卫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浙江省执委会呈请废止破产者剥夺公权之处分案，决定交立法院于起草破产法时加以注意。青岛党务指委会呈请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案亦交立法院。教育部所呈改进全国教育方案交教育组审查。

△　外交部照会英、美、法、挪威、荷兰、巴西六国驻华公使，谓中国各地交涉员业已裁撤，此后所有华洋诉讼案件，均归各省区高等法院处理。

△　太湖匪船30余艘与苏州水陆警队在阳澄湖激战。4日，匪船10余艘向吴江方面驶去，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令所辖各县政府不分畛域，协同军警兜剿。剿匪总指挥胡祖玉呈请南京总司令部派飞机两架协剿。12日，湖匪在莲花垛被昆山驻军及县水陆警队击溃，毙三四十人，擒获八人。15日，匪陷长兴泗安镇，旋被军警击溃。16日，复陷苏皖交界之金锁镇，杀掳镇民各千余人。

△　哈尔滨《国际协报》因拒登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被工人、学生捣毁。同日，东三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借口哈尔滨学院学生“行动越轨”，将该院查封，并声称“严拿反动”。晚，哈尔滨各报馆、通讯社开紧急联合会议，议决到长官公署请愿，要求三日内逮捕祸首，否则各报一律停刊。17日，哈尔滨特区一中学生数十人包围国际协报社，质问为何不登其宣言，被警察驱散。

4月3日　　粤二届中委王法勤等为反蒋介石召开三全大会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是日在北平

正式成立平津执行部。6日，该部发表成立宣言，主张粤二届中执监委为正统。7日，西山会议派邹鲁著《对党事国事之意见》一文予以驳斥。

△　阎锡山电冯玉祥，略称："山受国人推戴总揽戎机，整顿中原，在此时惟有与兄共策良图，方克有济，望勿轻信人言，致生误会。"

△　万选才部占领开封后，是日向徐州进攻，韩复榘部退集济宁、韩庄一带。山东省主席陈调元令将济南黄河铁桥拆毁，准备必要时将省府迁兖州。

△　阎锡山委朱鹤翔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朱访北平各国公使、代办，面交阎对外宣言，并声明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请各国勿助破坏中国统一与压迫民众之徒。

△　上海市药业职工为要求安插失业职工，被资方拒绝，发生罢工风潮，是日市总工会筹委会召集全市各工会举行会议，讨论援助药业职工罢工斗争。

△　历时数月之南京下关英商和记工厂工潮经市社会局调解，由工会与厂方订立协议：工人经工会介绍，厂方得同意雇用。是日复工时，因厂方不履行协议，上工工人与失业工人发生冲突，数人被殴受伤。各校学生组织"四三惨案"后援会声援。5日上午，失业工人复至工厂附近示威，500余学生出城援助，与军警发生冲突。教育部长蒋梦麟召集各大学校长到部，嘱阻止学生结队游行示威。8日，沪工人、学生四五十人在租界集会援助和记工潮，为西捕驱散，捕去三人，击毙工人刘义清。

4月4日　　冯玉祥副司令部在潼关组织就绪，梁建章任军事厅长，石敬亭任参议厅长，阎锡山于数日前命令晋军受冯玉祥统率。

△　万选才通电在开封就阎锡山所委之河南省政府主席职。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代表庄智焕等与英商大东公司代表柏乐德就收回电权在南京举行首次谈判，无具体结果。

△　日本水雷舰队16艘，官兵2000余人抵南京，各舰官兵上陆谒中山陵，重要官佐先后谒海军部次长陈绍宽及市长刘纪文。5日，海军部设宴招待。9日，日舰16艘抵汉口，何成濬、刘文岛、夏斗寅等设宴接待，市党部对此反对，电请中央抗议。

4月5日　　国民政府下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着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

△　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表《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通电全国将士讨伐阎、冯，称阎“迭次叛乱，无不作祟　　于其中”，指冯“受阎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潼关，进犯郑、洛，与阎共肆披猖”。

△　沈阳举行追悼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在沈代表均参加。7日，吴铁城代表蒋介石举行授勋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及高级将领王树翰、张焕相、荣臻等均参加受勋。吴训词称民国最后完成统一之功者乃张司令长官，以一隅之力抗全俄之众者，亦张司令长官，今阎锡山破坏统一，望再奋纾内乱捍外侮精神，保持统一。

△　陈公博遵阎锡山嘱，自太原电香港促汪精卫北上。

△　冯玉祥电杨虎城，欲饵以江苏、浙江地盘。杨即电蒋介石报告。

△　石友三派代表毛以亨到南京见蒋介石，面陈石“拥护中央，决不受阎冯诱惑”。蒋予嘉勉。

△　济南宣布戒严，山东省政府颁戒严令15条，由警备司令施忠诚、副司令李钺负全责。

4月6日　　赵丕廉代阎锡山电请北平之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赴太原，磋商组党问题。

△　鹿钟麟、石友三、孙良诚、万选才、孙楚等在郑州开军事会议，决定各路进军大体方针，准备不日开始积极攻势。

△　新编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赖心辉在京谒蒋介石，请示所部出川办法及此后防务等机宜。

△　晨，闽西红军邓子恢部占漳平，保安队陈国华部退华安。

4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之党籍，送中央执委会执行，称阎“称兵作乱，背叛党国，逆迹昭著”。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第三编遣区武装同志书》，劝告阎之部下不要为阎所骗。同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发《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

△　据《申报》讯：冯玉祥电张学良促就副司令职，张复电谢绝，称“如此足使中国破裂，而促其灭亡”。

△　徐永昌抵石家庄，组织前敌总指挥部。11日，阎锡山委徐兼平津卫戍司令。

△　蒋介石离南京北上阅军，邵力子、贺耀组偕行。蒋并饬飞机百余架分布津浦、平汉两路。

△　鹿钟麟、商震、黄绍竑、刘郁芬、白崇禧、徐永昌、宋哲元、石友三、张发奎等61人通电，谓已警告上海财团，自4月1日起拒绝蒋介石所发公债（蒋拟在上海发行卷烟公债2400万元）及私人借

款，“如果承受，即为助逆，国人决不承认”。

△　何键电何成濬表示愿为讨阎后盾。

△　首都卫戍司令部以“印发反动传单，破坏交通”为由，令晓庄师范学校暂行停办。12日，卫戍司令部又奉令将该校解散。同日，国民政府以该校校长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为借口，下令京内外各军警机关严缉究办。

△　班禅代表罗阶阿汪敬巴康福安偕罗桑泽仁谒蒋介石，报告尼泊尔派兵犯藏情形，请政府派兵援救。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通饬各省市不得任意收税及增加附捐。

△　国民政府任命卢师谛、李景曦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代表庄智焕等与美商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代表陶特在南京举行收回电权首次会议。

△　日内瓦国际劳工局决定在中国设立分局，以该局秘书陈宗城为中国分局局长。

△　台湾民众党在基隆举办促进自治运动。

4月8日　　据《申报》载：陈公博、王法勤等连日在太原同阎锡山及各方代表会议，决定政治、军事均由阎锡山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全权处理，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均以总司令名义发表，待正式政府成立后追认。党的问题不受总司令部支配，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决定根本方针，在政府未成立前各级党部工作暂停。政府所在地定为北平。

△　韩复榘由济宁抵徐州，电汉口行营称所部俟总攻令下，即作前锋，沿津浦路“讨逆”。次日，陈调元亦相继抵徐。

△　前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陈石泉由京到津，被市公安局会同法租界工部局在宝祥里捕获。

4月9日　　蒋介石抵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刘峙、顾祝同、韩复榘、陈调元、马鸿逵参加。会议决定陈部调鲁西，韩部调鲁北，委韩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担任整个山东方面之防务，陈调元第二十六军、刘珍年第二十一师、马鸿逵第十五路军统归韩指挥，蒋并派蒋伯诚为第一军团军事联络员，监视韩复榘。11日蒋返南京。

△　阎锡山委石友三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率部由豫东攻鲁；孙殿英为安徽省政府主席，率部攻安徽亳州一带。时阎、冯各部，合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樊钟秀、刘桂堂、高桂滋、任应岐等部，总数逾50万人。

△　国民党江苏整委会呈请中央党部抗议日舰驶华，称日驱逐舰以实习航路为名，长趋直入我长江各要口，“开国际未有之怪例，侮辱我国家，侵夺我主权”。

△　芬兰政府派威海梅夏为驻华代办。

△　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潮经市社会局等调解平息，工人700余人复工。行政院仍分令内政、工商、教育三部对工人、学生加意防范。

△　青岛大英烟公司罢工工人因拒绝复工被青岛当局逮捕九名。是日工人向市政府请愿，又遭警察镇压，伤数十人，另有30余名被捕，制烟、印刷两工会被解散。

4月10日　冯部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鹿钟麟任命各路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张维玺，副总指挥刘汝明，第二、三、四、五路总指挥分别为孙良诚、庞炳勋、宋哲元、孙连仲，后防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

△　国民党中常会又决议撤销阎锡山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

府委员职务。

△　赣粤闽三省“剿匪”总部由福建移江西赣州。总指挥金汉鼎是日由京抵南昌，与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旅长唐云山等会商“剿共”计划。

△　朱德、毛泽东红四军攻克江西信丰，击毙县长吴兆丰、警察队长王覃勋。

△　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因刘和鼎师入福州，林知渊等六人移押何处无确实下落，愤闽事久不解决，是日在上海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

△　厦门全禾汽车公司之“便利”汽船载客渡五通港出厦，中途船破沉没，溺毙乘客189人。

4月11日　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招待记者，声称晓庄师范内有不良分子，发布与三民主义相违反之宣言，特派部队前往强制停办；检查《新京日报》事，因该报登载海军鸣炮迎日舰消息，恐引起海军界误会，不得不作如此处理。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公务人员及在职军人应以身作则，尽先购用国货。制服限用国货，不得有违；家常物品，日用所需，亦应互相劝勉，务购国货。

△　芬兰新任驻华代办威海梅夏到南京向外交部呈代办证书，并接洽签订中芬通商条约。

△　溯航长江之日本第一水雷舰队由汉驶抵江阴。该队司令后藤章少将电在青岛之日本第一舰队，约定16日开我领海舟山群岛海面会操。我国各界一致反对，督促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3日，王正廷答记者问，否认日舰将在我领海会操。15日，驻京日领赴外交部，诡称日舰由沪开往台湾或须经舟山群岛一带，但演习地点决不在中国领海

内。16日，日舰不顾中国人民反对，仍在舟山群岛附近会操。

△　《巴尔底山》旬刊在上海创刊。鲁迅主编，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

△　晚，河南嵩县华乐里猝降冰雹，历数小时，积厚尺余，东西40余里、南北30余里内房屋损坏、禾苗摧折。

4月12日　汪精卫就北方党务争执问题电平各省区党部联合处，声称“亡党之痛，甚于个人失位”，主张牺牲成见。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应阎锡山邀是日抵太原，与阎锡山、陈公博等会商党务，陈有让步表示。

△　西北军逼近鲁山，杨虎城、徐源泉两军奉令出击。

△　河南旱灾严重，朱庆澜运赈粮八列车到郑州，是日河南建设厅长张钫自开封赴郑接收。

△　阎锡山任命高桂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

△　外交部驻哈尔滨交涉员钟毓赴苏联领事馆向苏领事梅里尼可夫面交通知书，通知中国政府已特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定5月1日前往莫斯科。

△　财政部前因全国实施编遣，发行编遣库券7000万元，并在各省市设立劝募机关。刻因时局变化，编遣暂难实施，是日令各劝募机关暂停劝募。原令京内外各机关八折减薪以充编遣费用案亦予撤销。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清党三周年纪念大会，中委刘芦隐作报告，号召“继续清党”。上海市执委会定是日为清党宣传日，扩大反共宣传。南京、徐州、芜湖等地均召开清党纪念会，戒备甚严。

△　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以“巩固首都，防遏乱萌”为名，取缔

各团体、学校、机关集会结社。

△　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团体电外交、财政、工商三部，请将华绸、夏布、瓷器、南货等列入对日互惠物品。电称：中日商约内规定“运华日货之得互惠达一百零一种之多，而华货运日，能否得到互惠，究为何货，税率若干，均莫明其中情形”。

△　国民政府中央侨务委员会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请饬外交部抗议荷兰政府虐待华侨，要求取消“猪仔制度”，称：“西人诱往荷属垦地华工，每日工作十三四小时，每人每年所得净利不过五六十盾，尚有种种剥削与凌虐，终身劳动，永无出樊笼之日，不死于苦工，即死于鞭挞。”

△　台湾总督府《临时产业调查令规则》公布。

4月13日　何应钦抵汉，对记者称系奉令主持武汉行营，襄助何成濬筹划军事。

△　阎锡山为防蒋方宣传品入境，令卫戍部检查邮件，对一切印刷品及邮件，不问署何名目，均须拆视。

4月14日　国民政府任命王家桢为外交部常务次长；吴铁城为内政部政务次长；魏道明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朱履和代理司法行政部长职务；刘纪文为江海关监督；特任刘瑞恒为卫生部部长；免魏道明司法行政部长、刘纪文南京特别市市长职。

△　蒋介石电委曹福林为第十四军军长。

4月15日　阎锡山赴傅公祠访邹鲁、谢持，劝对党务问题化除成见，与汪精卫改组派共同负责。16日，西山、改组两派及各方代表再晤阎，促速组政府，阎称“余个人对此，并无特别意见”。17日，阎决定原有县市党部停止活动。

△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开幕，到各省、市、县教育厅局长、大学校长等共122人，蒋梦麟为大会会长，23日闭幕。会议通过改进全国教育方案10章，作为今后20年内努力之方向。内容包括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成人补习教育，训练各种师资计划，改进初等、中等、高等教育计划，社会教育计划，改进并发展华侨教育计划，实施蒙藏教育计划及经费总预算等。

△　是日至17日，首都建设委员会在南京举行，议决由财政部发行首都建设公债3000万元等议案。18日，首都建设委员会通电全国共谋完成首都建设。

△　上海美精致总绸厂及八个分厂工人罢工。

4月16日　陈公博、邹鲁在太原对粤、沪二届党统争论激烈。陈公博最初坚持粤二届为正统，认为扩大会议应由广州二届中央召集，后承汪精卫意，让步至会合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邹鲁、谢持则坚持既然合作反蒋，上海二届中委也要参加召集，谓“欲团结整个的党，只有就一届，或粤、沪两个二届，或合各方各届之执监委员，组织一种委员会，以执行党之职务，最为适当”。谈判成僵局。是日，晋主席商震电北平覃振赴并调停。覃未即往，讨论直延至21日，终无结果。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任田桐等人为党史史料编纂委员。

△　行政院令内政部常务次长张我华暂行代理部务。

△　中央研究院召集之全国气象会议在南京举行。17日，审定气象电码及天气旗号两委员会决定，国内各气象台天气预报一律采用徐家汇气象台所定之天气旗号。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与上海租界纳税西人会同日开会。纳税西人会否决纳税华人会将华董由三人增至五人之决议。纳税华人会17

日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议决登报声明纳税西人会无权措置华人会华董问题，并推代表王晓籁、虞洽卿等向外交部请求严重交涉。工部局为俯顺舆情，拟召纳税西人特别会议挽救。

4月17日　李宗仁的代表叶琪前赴太原谒阎商承一切，是日返北平，语记者称："余代表李宗仁与阎商军政，顷已商妥，电港促汪北上。"

△　沪公共租界工部局举行第一次董事会议，纳税西人会否决华董增额。19日，新任华董袁履登、虞洽卿、徐新六、贝淞荪、刘鸿生致函工部局诘问，称："对于4月17日第一次董事会议，事前未接到任何通知，致不得出席，应予以正式抗议，并保留应有之一切权利。"

4月18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在南京签订收回威海卫专约及协定，专约议定英国将威海卫及刘公岛与威海卫湾内之群岛交还中国。但刘公岛仍由英国续租十年。

△　是日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三周年纪念。南京、上海、江苏、山东、福建、浙江等省、市党部均召开纪念会。

△　阎锡山派人迎覃振赴并（太原），调停陈公博、邹鲁粤、沪二届中委问题争执。同日，陶冶公由并函覃振称，"陈、邹辩论二届问题甚力，弟从事调停，恐力不逮，盼兄速来并"。

△　阎锡山委刘桂堂为第十五军军长。

△　冯玉祥在郑州设司令部，反蒋前线各军一概受冯节制。

△　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　蒋介石令第三、第二、第五路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军团，委韩复榘为一军团总指挥，由河南退入山东，防守鲁西之线；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防守徐州、砀山、宿县等处；何成濬为

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平汉线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据守黄河南岸。杨杰为总参谋长，蒋锄欧为铁甲车司令，俞鹏飞为兵站总监；张惠长为航空署长，指挥空军助战。在汉口设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行营，任何应钦为行营主任，对付李宗仁从广西方面的进攻。

△　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命杨森为川陕边防司令。旋冯玉祥亦委杨为川陕边防司令及第三路总指挥，被杨拒绝。

△　全国童子军总检阅在南京小营举行，到121团，蒋介石、吴敬恒、蔡元培、戴季陶到会训词。蒋宣称："中国的童子军是要在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培养发挥智仁勇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国童子军的根本信条。"22日检阅结束。

△　华文《侨民新报》在马达加斯加创刊。三日刊。

△　贵州省思县更名岑巩县，凤泉县更名凤冈县，麻哈县更名麻江县，罗斛县更名罗甸县，紫江县更名开阳县。

△　天津天气昨起骤热，是日达华氏92度，与16日前相差20余度。

4月19日　陈济棠通电否认辞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及派员赴晋接洽事，并谓俟桂局定后，即请命中央移师北指。旋即率总参议杨鼎中、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等出发大湟江督师。

△　何应钦电告朱培德称："均县西北，逆军第二师被我边防军张藩部会同四十四师于删日（15日）完全解决，俘获师旅长以下官兵千余名。"

△　立法院通过《中捷友好通商条约》，国民政府于22日公布。

△　上海日商会会长米里纹吉为内河航行权及日侨司法权问题，

乘“上海丸”轮回日向日政府请愿。

△　国民政府任命石陶钧、闻捷、方鼎英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上海公共租界公共汽车全体司机因要求增加工资未遂相率罢工，各路汽车完全停驶。25日，公共租界电车工人约2000名罢工声援。

4月20日　　北平学生及各界代表200余人集会筹备纪念“五一”，会后并游行示威。军警当局认为学生有共产党嫌疑，逮捕58名。21日，北大学生集会声援，复有32人被捕。北大学生因是贴出罢课通告。北平市长张荫梧23日在市府召集各大学校长及各校学生代表谈话，声称被捕学生已有多人承认为共产党，将设特别法庭审判，望劝告学生勿作“轨外”行动。

△　长沙何键通电否认派代表赴太原、北平接洽，称：“湘省言动，悉以中央意志为依归，如因公事须派员陈商时事，先当有专电，否则概不负责。”

△　行政院通令全国各机关，裁汰冗员，缩减经费。

△　驻哈苏俄领事馆以正式公文答复中国拟派莫德惠出席中俄会议事，称苏俄预备接待中国代表，望莫准于5月1日前往。

△　沪61名外侨联名呈请领袖领事，授权工部局召集公共租界纳税西人特别会议，将工部局之华董由三人增为五人。

4月中旬　　西北军张维玺第一路军、孙良诚第二路军、庞炳勋第三路军，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周玳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进入豫东兰封一带，驻冀南、豫东、皖北之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津浦路方面晋军，在傅作义、张荫梧指挥下，进出德州和济南。

4月21日　冯玉祥自潼关抵洛阳，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商讨蒋军事。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庞炳勋、鹿钟麟、刘春荣、杨爱源、徐永昌、潘宜之、万选才、孙殿英、任应岐、刘骥等均赴洛与会。23日，冯以副司令名义向各军颁对蒋作战令。

△　阎锡山、冯玉祥联衔电汪精卫，称讨蒋军事布置就绪，大战即在目前，望北上领导一切。是日汪电复阎、冯，允即就道，并称“一切大计，悉赖我公主持，请勿留待，免误事机”。30日，汪复电平国民党各省市临时联合办事处，允“摒挡就道，共策进行”。

△　蒋介石派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组到济南视察山东防务，调和韩复榘、陈调元两军关系，稳定韩对阎作战决心。

△　蒋介石派姚以价、詹旭初到新乡，劝说石友三反阎、冯附中央，被石扣留解往太原。29日，姚解至石家庄后逃脱。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时局发表告海外同胞书。

△　国民政府任命林国赓为厦门海军要港司令；任命吴凯声为驻瑞士代办，兼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等12人所提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并拟定推行办法案。5月2日，国民政府通令各机关推行注音符号。

△　在广东五华、惠来、普宁、潮阳等处活动之红军游击队古大存部克五华、梅林。

4月22日　蒋介石偕海军部次长陈绍宽、总部秘书长邵力子、政训处长周佛海等离南京赴汉口。24日夜召何应钦等开军事会议，部署平汉线军事。次日偕何成濬、邵力子、赵观涛等赴信阳、确山、郾城等处视察防务。

△　外交部照会驻华英、美、法、比、意等国公使，称“阎、冯以沧石路向外国借款事，如果确实，中国政府不承认”。

△　内政部规定完成县组织期限：一、苏、浙、晋、冀、粤五省，限本年6月终完成；二、赣、皖、鄂、湘、闽、鲁、豫、辽、吉、陕、滇、桂12省，限8月终完成；三、川、黔、甘、新、黑、热、察、绥八省，限10月终完成；四、宁、青、康三省，限12月底完成。

△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与财政部、工商部协议，指定荷庚款全部为东方大港、北方大港之测验、计划经费。

△　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电国民政府请辞本兼各职，谓“剿匪计划无由实施，防军远征，匪势转炽，事违初愿，治丝益紊”，“与其更误将来，曷若早避贤路”。28日，国民政府复电慰留。

△　财政部长宋子文密电汉口蒋介石，称第二十军郭汝栋部由宜昌移防武穴，夹带大批私货（鸦片），贬价兜售；平汉路局扣留抵税，致使办理特税发生困难，请令饬各方协助，以维持驻鄂部队二百数十万月饷。

△　南洋烟草公司上海厂停办整理已过两月，迄未开厂复工，而将出品转托三友、中原、新民三厂代制。是日，失业工人代表团发表宣言，吁请各界援助，请主管机关限厂方立即开工，并制止各烟厂代其制烟。

△　四川省设立宁南县（由会理县析置）。

4月23日　晋方接收国民政府机关报英文《北京导报》，阎锡山聘顾问英国人辛博森为主笔。是日辛正式就职。

△　鹿钟麟、徐永昌等71将领再电张学良，促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

△　中央军第六路军谭道源、毛炳文两师进攻张、桂军，是日到达平南。

△　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不承认阎、冯以沧石路向外国借款。

△　中东铁路更调理、监事，理事李绍庚升首席理事，原首席理事郭福绵调监事长，原监事长刘泽荣调理事。

4月24日　　邹鲁致电冯玉祥，攻击改组派“不配再言党统”，内称：“党事未能商妥之故，由于改组派必欲存其彼方之二届，而否认沪方之二届”，“沪二届本团结之精神，不否认改组派二届于人人排斥之时，而改组派乃必否认沪二届于人人言团结之际，究不知是何用心。”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冯思定、林寄华、林学渊、詹调元、丁超五、陈乃元、方治、杨树庄、冯济安九人一律撤回，另派詹调元、甘沄、冯济安、陈联芳、唐绍周五人为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二、通过各市县邮电检查办法八条。

△　何键委第十五师旅长张其雄为湘东“剿匪”指挥，并令会同江西部队进攻红军。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严禁水陆交通机关员役夹带或纵容他人寄递鸦片及其代用品。

4月25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准赣省府委员刘芦隐辞职等案。

△　阎锡山令集中平汉路北段之孙楚、赵承绶、杨效欧等部向黄河以南推进。

△　苏、皖产米区米荒，是日安庆市市民因购米困难，集众向各

米店强买。安徽省政府特召集各机关团体讨论解决办法，一面布告制止“滋事”。

4月26日　东铁理事会议讨论电权问题，通过莫德惠所拟八项办法，内容略为：在东铁电权新合同未正式签订前，暂按1922年11月22日所订之电权合同处置一切，俟新合同成立后，所有东铁及沿线所有中国电报局，不得接发商电及私人电报。此案咨行路局派副局长简尼索夫、电务处长梅尔滋洛夫等五人为代表，与东北交通委员会开会交涉。

△　蒋介石抵确山视察防务，并召附近驻军团长以上军官训话，次日返汉。何键谒蒋，请缨“讨逆”，并报告湘政。29日，蒋自汉乘“永绥”舰返京。

△　晋军万选才先头部队进抵归德，与亳州孙殿英部联络前进。石友三部由道口绕道封邱渡河，前部一师到达考城。石并派代表邓崇熙、宋克宾赴德州筹组山东省政府。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第七条，修改条文为：“自首应经所在地高级党部允许后，向法院或其它官署为之。”

△　国民政府公布《管理成药规则》。对成药调制、原料成分、注册核准等各项作出规定。

△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奉蒋令讨伐张、桂军，是日派兵入桂。

△　阎锡山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行战事通用票600万元，称俟军事结束，即由国家银行兑现收回。

△　据《申报》讯：外交部消息，收回租界、租借地问题，除天津德、奥、俄、比租界，浔、汉、镇英租界，汉口德、俄租界已经收回外，尚有23处现正筹划收回。租借地除德之胶州湾已交还，英之威海卫已收回外，其余日之旅大、英之九龙、法之广州湾亦准备收回。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以“五一”劳动节将届，训令所属部队及市公安局切实防范。28日，上海市政府暨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严禁罢工、罢课及聚众示威，违者以扰乱后方军律治罪。

△　国民政府任命王典型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4月27日　晚，商震、薛笃弼、赵戴文、赵丕廉、陈公博、邹鲁等及各方代表50余人在太原集会交换党政意见，决定先邀汪精卫及党中负责人到北平，共商进行办法。

△　冯玉祥夜抵郑州，次日在机场阅兵，29日北上新乡。

△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制止青年集会，借口“共产党徒希图捣乱租界”，在仁济善堂拘捕青年学生和工人百余名。

4月28日　川边防司令杨森电蒋介石请缨讨伐阎、冯。

△　上海法捕房破获徐家汇路宝安里第二十七号共产党地下印刷机关，抄走印刷机两架，拘捕五人。

△　国民政府派朱懋澄、吴凯声为出席第十四次国际劳工大会中国政府代表，指定朱懋澄为第一代表。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成立。

△　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　广东省当局因金价暴涨、洋米成本奇昂，米价飞涨，每元仅购六七斤，是日由广东赈务会召开临时特别会议，决定联合慈善、商界组织平粜委员会，筹款100万元，分两期办理。

4月29日　孙科呈行政院，请令财政部饬税务司将俄国退还庚款三分之二拨交铁道部管理，教育经费仍由母金盈余内支拨。

△　据《申报》讯：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在汉口会议，决各出一旅以上兵力，约期“会剿”湘鄂赣边红军。

4月30日　砀山方面前哨战开始，冯玉祥西北军主力集中郑州，以四师兵力沿陇海线东进。阎锡山晋军孙楚等部集中黄河以南开封一带。蒋介石中央军飞机连日在郑州附近投掷炸弹。

△　晚，阎锡山偕徐永昌、杨爱源、杜春沂离太原南下，次日与冯玉祥会晤于新乡。

△　阎锡山截留天津关税，令津海关关税及代征之二五附捐在津保管，不得汇往他处。5月1日，阎令津海关将扣留关税及附税分存中、交两行。

△　诸城、莒县高桂滋部由马鸿逵收编，高部调往泰安。诸城自2月20日起被围两个月零十天，是日解围。

△　日本政府正式批准中日关税协定草约，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奉外务大臣币原令准备由上海赴南京签字。

△　中东路理事会决定1929年红利分配办法，中苏两国各分50万。

△　班禅驻西康办公处成立。

△　朱德、毛泽东红四军到大庾，粤军吴文献部开南雄边境拒红军入粤。

△　张云逸红七军占领贵州榕江县城。

△　以华人为主体之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比劳成立。

是月　阎锡山为统一四省财政，令晋察绥财政整理处改晋冀察绥

财政处，自兼督办，规定河北及平、津财政机关均归其管辖，并称南京政府一切命令均无效。

△　蛰居四川绥定河市坝之吴佩孚，因时局变化移居绥定城内，打出“讨贼联军西南总司令”旗号，派人四出招募新兵。

△　鄂豫皖边红十一军之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政治委员曹大骏。三个师依次编为第一、二、三师。旋大败川军郭汝栋部及戴民权部，沿京汉路进窥武汉。

△　中共东江特委在广东五华、丰顺、揭阳交界八乡山召开东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

△　中共琼崖临时特委改为琼崖特委，冯白驹任书记。

△　山东省政府公布孔族待遇办法，其内容为：一、曲阜县孔氏蠲免土地清丈升科办法；二、孔族土地除孔氏祀田外，一律照章纳税；三、改革特殊待遇，铲除封建余毒。

△　驻华英使蓝普森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商订英国退还庚款用途新协定。该项退款约银2000余万两，将完全由中国政府支配，英方无权干涉。退款用途，经国民党三全大会决议，以三分之一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三分之二用作建设经费。

△　台湾劳动互助社举办“文化协会及民众党批判演讲会”。

△　工商部举行第二次工会调查，据九省27市统计，共有各行业工会741个，会员57.625万人（不包括各地工会整理委员会和总工会）。

△　中央银行发行金单位本票，凡进口商缴海关税者，可向中央银行开立户头，购买该行金单位本票，向海关缴纳税金。

△　中国第一信用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创立，资本总额20万元，总经理潘学安。

5　月

5月1日　　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宣称："阎、冯叛逆，割据称雄，破坏统一，乱国害民，纠集盗匪，反抗革命，西北何辜，遭此兵凶，革命军人，救国保民，仗义讨逆，不辞牺牲。……"令各部队于10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　中苏会议中国全权代表莫德惠率代表团由哈尔滨启程赴苏，9日抵莫斯科。

△　中东铁路由官方于哈尔滨成立华工事务所，以统一华工工会事权，经费完全由督办公署拨给。

△　上海工人举行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五一劳动节。

5月2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阎锡山截留天津海关税收发表宣言，声称"若阎氏截留津关税款之举许其成为事实，将开从来未有之恶例，不特破坏中国对内对外之信用，且对于国内购买大宗公债者亦将与以巨大之打击"，政府自当用全力阻止。同日，阎锡山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朱鹤翔在北平招待新闻记者，声明北方对关税、盐税在不侵犯外国利益的范围内有扣留权。北平及外国银行团因阎接收关、盐税，集议办法，决请外交使团即开会议商定对策。

△　中央军李云杰新二十一师与晋军第五路军孙殿英之前锋岳相如部在亳州南淝河口接触，岳部阵线被攻破，新二十一师随即占领淝河口。

△　太原商洽北方党务无结果，陈公博、傅汝霖、黄少谷、陶冶公等自太原回北平。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关于提议召集国民失业问题研究会案，令行政院征集各部及京、沪、苏、浙、皖各方工商界意见，速求救济。

△　中东路电权会议在东铁督办公署开幕。5日正式会议，开始讨论提案。12日，中东路电权会议开专门委员会，中方委员提出电权议案10项，为苏方委员所拒绝。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特别会议通过工部局关于华董自三人增加至五人案。

△　蒋介石委李云龙为陆军新编第三师师长；王振鹰为暂编第八师师长；将邓英独立第十六旅升编为新编第十三师，以邓升任师长。

△　中央禁烟会以荷印等地华侨受鸦片毒害，特开会决议咨请外交部转饬国联代表吴凯声向国联提出抗议。

5月3日　济南惨案二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纪念活动。

△　行政院密令实业部严防共产党在红五月发动工人罢工示威活动。

△　朱绍良电南京报告讨桂军情，称张、桂残部窜匿深山，时出时没，攻剿不易，现第八师毛炳文部会同谭道源部分途围攻，并调飞机两架助战。

△　阎锡山外交处通告外交团，北平仍称北京。

5月4日　阎锡山、冯玉祥相偕于3日抵郑州，是日在郑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军作战计划，决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津浦路以第三方面军担任，攻取徐州；陇海路以第三方面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一部均归第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指挥；平汉路以

第二方面军为主力，樊钟秀配合作战。陇海、平汉两路暂取攻势防御，在平汉线以东、陇海线以南三角地带兰封（今合并于兰考县）、杞县、扶沟、许昌一线设防。至是，中原大战序幕揭开。

△　陈公博偕冯玉祥之代表黄少谷到天津。由陈公博、覃振、张知本、茅祖权、傅汝霖、胡宗铎、郭泰祺、叶琪、陶冶公九人召开天津会议，讨论党务问题，决撇开“党统”不谈，而从“非常”二字着眼，重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务，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遂由覃振电汪精卫征求同意。5日，汪复电赞同。

△　武汉行营令郭汝栋一月内“肃清”鄂东红军。郭是日返防指挥，并令王清澄率二团出发赴皖。

△　金汉鼎与鲁涤平、张辉瓒、邓英在南昌会商“剿共”第二步计划已竣，是晨乘轮溯赣江赴赣州，与闽、粤军“会剿”朱德、毛泽东红四军。

△　阎锡山委齐燮元为江北招抚使，孙传芳为江南招抚使。齐是日通电就职。

△　上海市教育局发表收回租界教育权宣言。

△　晚，河南登封附近突起飓风，飞沙走石，雷电交加，猝降冰雹，大者重数斤，小者如鹅卵，历一小时，厚积尺余，50里内田禾屋宇多被损坏。巩县境内亦遭烈风巨雹击袭。6日，温县同罹雹灾。

5月5日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召开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九周年纪念会。胡汉民演说，望“认清是非顺逆，一致奋斗，铲除叛乱，以安大局”。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特别党部纪念会报告，宣称将在半年内消灭阎、冯。同日，蒋在南京检阅冯轶斐教导第一师，誓师讨阎、冯。

△　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关于刘公岛之协定及附件在南京、伦

敦同时公布。英国将威海卫地域及刘公岛与威海卫湾内之群岛交还中国，1898年7月1日所订租约即行取消。英借刘公岛作为海军消夏之用，为期十年。约定10月1日前交换批准书。14日，外交部派徐祖善办理接收威海卫事宜。

△　卫立煌改编之方振武旧部、驻溧阳之第四十五师一三三旅二六五团刘营一、四两连哗变，搜县署、缴警械；次日，二、三两连亦变，均赴茅山。南京卫戍部队闻警，开至句容等处设防，南京、镇江各要塞戒严。

△　阎锡山委鹿钟麟为第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司令，统一指挥陇海线方面作战。鹿、徐是日通电就职。

5月6日　阎锡山自豫回晋，军事由冯玉祥全权主持。

△　吴佩孚自四川发出通电，声称“即日出川，调解时局”。

△　《中日关税协定》由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在南京正式签字。协定及附件换文同时公布。

△　阎方外交处长朱鹤翔向津海关交涉保留关税，津关拒交，朱以派员接收相威胁。

△　行政院会议，讨论建设委员会呈请将庚款三分之一拨交该会管理支配案，决议送政治会议核定。

△　香港体育界为即将赴日本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的游泳选手饯行。11日，领队庄成宗、黄家骏率游泳选手离港往上海集中。

△　国民政府公布《商标法》。

△　彭德怀、黄公略红五军攻占平江县城，全歼余贤立一个团和两支挨户团队，缴枪千余支。湘东“剿匪”总指挥何键委新编第三十一

师师长陶广为平浏绥靖处长，令其率部会同第十五师四十三旅旅长张其雄分路“围剿”红军。9日，彭、黄率部撤出平江城，向江西修水转移。

5月7日　　汪精卫起草之北方党务问题宣言稿到津。宣言除申讨蒋介石外，并述倒蒋后对党务、国事之办法，称“最短期间，必须依法召集本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及根据总理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并称“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最亟之图，谨以精诚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参加天津会议诸人赞同宣言稿，并据此提出由非常会议产生中央干部扩大委员会，再产生中央政治会议之过渡办法，然后再由干部会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产生政府。

△　土耳其代办福特培与外交部次长李锦纶在南京商改订两国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由李将拟就之条约草案交福特培。次日，福特培提出对案，并希望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订约。

△　财政部为救济银价低落，通令各海关禁止墨西哥银元进口，以为应急之治标办法。

△　苏联正式发表任加拉罕为中苏会议苏方全权代表。

5月8日　　蒋介石自南京北上检阅津浦线驻军，邵力子、周佛海随行。夜抵蚌埠，通令“讨逆”各军于5月10日完成战备。作战部署为：以韩复榘军担任津浦正面，在山东禹城布防拒阎；以陈调元、马鸿逵两军布防山东济宁、曹县一带拒石；命刘峙率第二军团主力沿陇海路向河南归德、兰封攻击前进；王均率第三军布防皖北，拒孙殿英南下；叶开鑫率第八军攻河南淮阳、泰康、鹿邑等处孙殿英部，并策应第三军围攻亳州；卫立煌、张砺生分领第四十五师、骑兵第二师警备皖北及徐浦路线；令何成濬以第三军团第九、十两军攻取河南襄城、叶县，第七军攻取河南鲁山，先挫平汉路正面南犯之冯军，再会

攻许昌、郑州；令蒋鼎文率第二军由周家口间道北袭河南杞、睢，与第二军团主力夹击兰封。

△　晋军万选才部从陇海线北侧虞城方面向中央军阵地攻击。孙殿英将马牧集以东四里的铁路破坏，以防中央军铁甲车袭击。

△　冯玉祥电陈公博，告以在豫和阎商谈党务问题，阎决请汪精卫出面主持，“意确诚恳”。陈公博等九人天津会议结束，议定由各方代表召开非常会议，产生党部的扩大会议，然后由党部扩大会议召集“三全大会”。

△　上海银钱两公会电陈财政部，要求阻止晋阎截留津关税款，称此举“对关税自主暨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前途大有妨碍”。

△　美国各大杂志社及日报社等组织之东方考察团一行18人抵沪。

△　太湖中之海州帮土匪首领张兆华等15人，由太湖剿匪总指挥部在苏州执行枪决。

5月9日　　阎方外交处长朱鹤翔在北平招待外国记者报告北方时局称：军事完全交冯，党务、政治完全交阎，军事已开始推进至相当地域，实现总攻击。关税问题，系扣留新增关税，至外债及旧案内债基金，照旧维持。

△　阎锡山为筹措军费，公布棉纱、棉布、麦粉、火柴、肥皂等增收二分五厘制造税。天津商民反对，市总商会电阎要求取消，否则将总罢市。

△　行政院训令财政、教育两部将俄庚款三分之二由财政部拨交铁道部管理支配；自铁道部接受之日起，由俄庚款项下分付之教育经费改由铁道部担任。

△　驻华美公使署照会中国外交部称，关于华洋上诉案件统归中国法院审理一案，其美方原告而未结者，请勿以新定手续处决。

△　国民政府免郭泰祺驻意大利公使及立法院立法委员职，任命彭养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任熊式辉为苏、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

△　是日为签订“二十一条”十五周年国耻纪念日，青岛、济南、蚌埠、南京、徐州等地有纪念活动。

△　四川大学工学院院长杨懋实枪杀学生，激起学潮。是日，重庆全市学生5000余人游行向省政府请愿。

△　陕西全省连年旱荒，饥民遍野，全省1300万人中，饿死者300余万，流离失所者600万。上月朱庆澜等曾赴陕办理运粮赈济，但缓不济急，是日朱回北平募捐购粮，以便再运赈粮接济。

5月10日　晚，何成濬离汉北上指挥平汉线各军。11日抵信阳，第三军团总部亦移驻信阳城内。何旋赴确山召集徐源泉、王金钰、蒋鼎文、上官云相、郝梦龄等开军事会议。

△　蒋介石到济南，与韩复榘、陈调元会议，允调赴陇海线的范熙绩第二十六军、马鸿逵第十五路军俟攻占考城后，即调回津浦线归还第一军团建制。

△　驻华法使玛太尔自北平到沪。次日，外交部长王正廷与玛太尔晤商中法越南商约。12日，中法越南商约谈判告一段落，玛太尔向法国政府请训。

△　立法院会议通过《矿业法》及《西医医师暂行条例》。委员卫挺生以《中日关税协定》未经该院审议，即由外交部擅自订定生效日期，认为不合法，临时动议请外交部派员出席说明，因外长王正廷未在京，改订于12日举行临时院会专议此事。

△　国民政府指定广东省中山县唐家环（亦作唐家湾）开辟为无税口岸，以60年为期，定名中山港，由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负责经营办理。

△　外交部令福建思明县政府从速调查鼓浪屿会审公堂状况，以便交涉收回。

△　海军编遣处奉中央编委会令撤销，嗣后仍沿用海军司令部名义。

5月上旬　　晋军、西北军主要兵力集中陇海线，以石友三为左路，由考城向菏泽、定陶前进；以万选才为中路，孙殿英为右路，分别由归德、亳州向砀山、徐州前进。晋军杨效欧、孙楚、关福安三个军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集结于开封、兰封一带，徐设司令部于兰封，以大部兵力策应万、孙两部。

5月11日　　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由济南抵徐州，设行营于陇海路，以居中指挥。当晚下总攻击令，以中央军第二军团为主力，沿陇海线向归德进攻，与晋军、西北军开展大规模接触。孙殿英部被迫退往鹿邑、亳州，万选才部退至归德附近。

△　孙传芳被阎锡山委为江南招抚使后，是日离津赴太原，13日见阎，声明愿以私人情谊在野为阎帮忙。14日赴郑州，17日衔阎命赴沈阳晤张学良，请其加入反蒋联盟。7月6日又由津赴葫芦岛与张联络。

△　唐生智离港经日本北上。13日阎锡山委唐生智、赵恒惕为湖南招抚使。

△　蒋介石委刘珍年为第十七军军长，以胶东防务重要，仍令暂驻原防地。

△　莫德惠访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及中苏会议苏方代表加拉

罕，非正式商榷中苏会议程序问题。

△　浙南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编成红十三军，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全军共2100余人。

5月12日　拂晓，中央军第二军团陈继承第三师以第八、九两旅沿陇海路两侧向马牧集进攻，顾祝同第二师在铁道以北齐头并进，陈诚第十一师为预备队，沿铁道线跟进。13日，陈诚部周至柔第三十三旅占领马牧集，第三师向朱集车站与归德之线猛进。晋军万选才部退守归德城。是役为陇海线战事之开端。

△　中央军第二军团杨胜治、王均两部在亳州附近与晋军第三方面军孙殿英部激战。13日，蒋介石下令猛攻亳州、归德，冯玉祥令郑大章、赵承绶两骑兵军抽调精锐由归德驰援。15日，蒋介石亲赴马牧集督战，令第三、十一、二等三个师乘胜前进，并以教导第一师围攻归德。

△　立法院为《中日关税协定》开临时会，对外交、财政两部多有责难，谓该协定未经立法院审议，即订明签字后十日生效，此于立法尊严殊多蔑视。决议交全院各委员会联合审查。13日，立法院第九十次会议根据五委员会审查报告，通过《中日关税协定》。

△　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工人昨得巡捕房及公司应诺增加工资等最低条件，已部分复工。是日公司复又取消，工人愤而继续罢工，并列队游行。

△　赴南京出席蒙古会议之内蒙五盟旗代表51人，由张学良派员护送抵上海。

△　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为豫民请命，特电请蒋介石，请前方飞机抛掷炸弹时，认清军民，以重民命，而免蹂躏。

△　冯玉祥在陕、甘、宁、青四省公布禁止贩卖人口令，规定已

被卖者，拘而还之家族，设灾民收容所，给以食料，教以手工，给农民以种子，以军马耕田。

△　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委张泰为暂编第十师师长，石维清为暂编第八师师长。

5月13日　陈公博、王法勤、覃振、谢持、白云梯、茅祖权、傅汝霖七中委及陶冶公、卢蔚乾、黄少谷、郭泰祺、张知本、胡宗铎等在北平什刹海会贤堂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起草之宣言稿，均表赞同。同日，阎锡山亦电傅汝霖赞成汪所拟之联合宣言。

△　朱绍良第六路军占领桂平。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猛攻贵县，战况甚烈。桂军及唐生明部由恭城龙虎关入湘境，张发奎部取道全州，图入永州。15日，唐生明等部占湘省道县，主力克全州，向黄沙河推进。攻桂湘军刘建绪部退永州、黄沙河之线。

△　上海公共租界公共汽车工人罢工将近一月，是日劳资双方签约，资方答允一律增加工资、三个月内不准开除工友等条件，14日，全体工人复工。

5月14日　阎锡山电劝汪精卫速驾北来，称："公以元勋先进，重负本党誉望，此后党务，自应悉听主持。国家既取党治，一切政务自应由党主持。"16日，汪复电称"期勿责以过重"。

△　国民政府临时国务会议，照立法院意见通过《中日关税协定》。协定除规定日本在华仍享受最惠国待遇外，并将优惠待遇项目扩至船钞、关税等项，共达110种，而中国输日货物享受优惠待遇者仅11种。中国在协定附件中承认整理无担保或担保不足之日债，以致协定签订后，日本即据此向国民政府讨索旧债，协定成为偿还西原借款之法律根据。

△　行政院秘书处函外交部，称日政府借名保侨，拟派陆军一师

团来华，请提出抗议阻止。

△　上海标金猛涨，价格最高达526两。

5月15日　　中央军刘峙第二军团先头部队占领归德以西柳河车站。第三军团所属第二军蒋鼎文部亦逼近杞县，图与正面部队配合围攻兰封。晋军孙殿英部在亳州被中央军王均部包围。鲁西方面石友三部亦被陈调元部所阻。

△　国民政府以金价暴涨，决定禁止黄金出口及外国银币进口。是日，行政院训令财政、工商两部转饬全国海关一律查禁。16日，江海关布告此令生效，上海日本住友银行500万元金币自沪运美，为江海关所阻，上海标金价格即跌至502两。

△　外交部派徐谟、刘师舜、周纬、吴南如、于联模为筹办收回英、法、意租界委员会委员，指定徐谟为委员长；派王家桢、刘师舜、胡世泽、方文政、徐营秋为筹办收回日租界委员会委员，指定王家桢为委员长；派李锦纶、刘师舜、嵇锦、谭绍华、许沅为筹办收回公共租界委员会委员，指定李锦纶为委员长。

△　粤军蔡廷锴师占领广西贵县，桂军退宾阳。陈济棠以浔州、贵县已克，令飞机队全部返省，梧州航空行营结束。旋因张、桂军北上，广东北江告急，陈济棠委蒋光鼐为北江前敌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等三师归其节制。

△　教育部通令取消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名誉校长。

5月16日　　平汉线何成濬下总攻击令。中央军第三军团总部由信阳向驻马店推进。何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17日，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等包围晋军第八方面军樊钟秀部于临颍城，第三军团大部进逼许昌城。

△　朱绍良、陈济棠通电移师北指，声称：“我军十三、十五先后

克桂平、贵县，已将张、桂残余势力扫荡净尽，惟阎、冯叛变中央，我六、八路军将士，效忠党国，拥护中央，现经呈准中央，移师北指，助我友军，铲除叛逆。”

△　彭德怀红五军攻克修水，鄂罗霖师、赣朱耀华旅、湘陶广师会攻修水彭部。18日，朱耀华旅复占修水，彭部向铜鼓方面转移。

△　《中法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简称《中法越南专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法国驻华公使玛太尔在南京正式签字。17日，驻华法使馆向各国记者声明，称《中法越南专约》签字，华方得在海防、西贡设领，至通过税采适宜办法，其他法权、租界等问题，不在越约范围，并未讨论。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以中日沪、崎（长崎）水线合同已属满期，函外交部促日派员来中国协商撤废。

△　国民政府令：《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施行期间，自十九年（1930）5月18日起，再延长六个月。

△　河北省政府决议，统捐加征三成，延长半年。

5月17日　陇海线中央军刘峙部击破柳河阎、冯军阵线，占领民权县野鸡岗，前锋逼内黄集，右翼第二师取考城（现合并于兰考县），左翼下睢县。

△　南京官方发表：阎锡山借修路为名，发行公债2000万元，勒令冀、晋、察、绥各省商民承销。

△　福建红十二军邓毅刚部由漳平返龙岩，与傅伯翠部会合，向峰市进军，18日，至永定炉下坝，歼灭大股民团，击毙团总王石甫、范衍秦，活捉团总陈尚文、范畅庭，打死和俘虏团丁200余人。

△　上海电车工人罢工20余日，是日复工。公司方面应诺增加米

贴、工资及释放被捕工友等七项条件。

5月18日　受阎锡山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之万选才，通电在前方就省主席职，并成立河南省政府。

△　陈诚第十一师进逼宁陵，致书宁陵守将万选才部军长刘茂恩，劝其投蒋。

△　中央军刘峙部冯轶斐教导第一师及陈诚第十一师攻占陇海线战略要地归德，晋军万选才部第三十五师师长万殿尊被俘。蒋介石亲到归德视察。刘峙第二军团主力向兰封猛烈进攻。

△　张、桂军入湖南零陵，湘军刘建绪部退守祁阳、衡州（今衡阳），罗藩瀛师回防邵阳。

△　粤桂战争停止，吕焕炎部不战入南宁城，粤军陆续由广西班师。陈济棠、朱绍良是日离梧州返粤。

△　广东东江地区红军古大存、李明光部在丰顺八乡召开东江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以陈魁亚为主席，古大存为副主席；并成立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古大存任军长，颜汉章任政委。

△　《记者周报》创刊，上海市新闻记者联合会主编。

△　《图书周刊》在上海创刊，随《申报》附送。

△　由改组派总部主办之《民主日报》在北平创刊。

5月19日　阎锡山因陇海线形势吃紧，是日由太原抵石家庄召集军事会议，傅作义、王靖国、张荫梧等参加，商以晋军为主体之津浦线进军计划。

△　晋军主力孙楚、关福安、杨效欧、张会诏、杨耀芳五军开赴

陇海线，与中央军顾祝同、马鸿逵等部在民权、考城、东明、宁陵、柳河一带激战。20日，马部攻占东明，会攻兰封。

△　邹鲁偕赵丕廉自晋抵平，参加党务讨论。同日，李宗仁之代表叶琪持阎函赴香港迎汪精卫北上，解决北方党务问题。

△　外交部以我国侨越商人被越南当局强迫改用法文簿记，迭向法政府交涉取消，迄无结果，是日再向驻华法使提最严重抗议。

△　湘军陶广师占虹桥，朱耀华旅到白水，“会剿”修水、武宁彭德怀部。陶广悬赏捉拿红军将领，拘彭德怀者赏1000元，拘孔荷宠、吴溉之者各赏800元。

△　国民政府令饬直辖各机关撤销各部驻沪办事处，以一事权。

△　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辞职后，经校董会议推定马君武继任。马于是日就职。

5月20日　晋军万选才第六路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刘茂恩受其胞兄刘镇华策动，与中央军陈诚部进攻宁陵相呼应，在阵前诱捕晋军万选才倒戈投蒋，并与师长阮勋、徐鹏云、武庭麟等通电讨伐阎、冯。万军之第六路军解体，宁陵、民权、睢县等城尽入中央军之手。蒋委刘茂恩为第十五军军长，刘镇华为“讨逆”第十一路总指挥，参加对阎、冯作战。

△　在平国民党中委及代表胡宗铎、叶琪、陶冶公、张知本、覃振、傅汝霖、谢持、茅祖权八人在怀仁堂讨论发表联合宣言与发起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问题，陈公博、王法勤、白云梯、郭泰祺未到。因最近汪精卫来电主张“团结须依党统”，而西山派则坚持汪既然合作，就应迁就事实，抛弃党统，双方争持未获解决。

△　中央军第三军团蒋鼎文师抵杞县，与陇海路中央军联络进攻兰封。

△　阎锡山电促吴佩孚北上协商时局。

△　中苏会议在莫斯科开幕。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致开幕词，加拉罕、莫德惠发表演说。因中国要求将赎路问题列入议程，苏方反对，致正式会议未有确期。

△　国民政府公布《市组织法》，废除“特别市”，规定凡下列情形之一者设市，直隶于行政院：一、首都；二、人口在百万以上者；三、在政治、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但为省府所在地者应隶属于省政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设市，隶属于省政府：一、人口在三十万以上者；二、人口在二十万以上，所收营业税等占该地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者。

△　工商部长孔祥熙受日内瓦国际工商管理研究院函请组织工商管理研究社，是日特函上海实业界领袖及工商管理专家开会筹备。

△　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决定本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　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提出主要任务为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光大和发挥这个伟大的革命的理论，来促进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选举邓初民为主席。朱镜我为第一任党团书记。

5月21日　冯玉祥自郑州通电报告万选才被刘茂恩诱捕经过，并称第二方面军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张维玺、刘汝明、孙连仲六路，第三方面军杨爱源、孙楚、杨效欧、张会诏四路，会同石友三、孙殿英、樊钟秀等部，是夜起在陇海线实行全线攻击。

△　中央军刘峙部对柳河晋军关福安、杨效欧等部发动总攻击，

占领李坝集，分途向兰封、陈留追击。蒋电令王金钰进攻许昌，限一星期攻下。

△　蒙古会议在南京举行开幕式及第一次预备会，到蒙藏委员会全体委员及蒙古代表40余人，主席马福祥未到，由王培天代理，讨论蒙古交通建设、敷设电信、恢复蒙藏邮路、航测蒙藏地形四案，结果均交第三组审查。

△　国民政府指令批准外交部呈复所拟前芬兰全权公使朱绍阳、中苏预备会议中国全权代表蔡运升因中苏预备会议丧失国权，已予撤职，免予议处。

△　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接河南省商会联合会、华洋义赈会、红十字分会等来电，报告归德、兰封、开封及郑州以南各地被飞机轰炸惨状，特转电蒋介石代恳免派飞机向豫境商民掷弹。

△　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蒋介石，建议否认阎锡山在华北发行之纸币证券。

5月22日　孙殿英部困守亳州，是日蒋介石派新任河南省主席张钫到亳向孙劝降，嘱副军长谭温江于晨6时送张出亳州。

△　万选才被解往南京。鹿钟麟委石振清暂代万选才之第六路总指挥职。

△　张、桂军一部抵祁阳。湘军第十九师刘建绪部继续北撤。蒋介石派汉口市长刘文岛到长沙，与何键商作战计划。

△　广州举行欢迎第六、八路军凯旋大会，陈铭枢主席，陈济棠、朱绍良均到会演说。会后通电称第六、八路军继续讨伐阎、冯，“百粤民众，誓为后盾”。

△　外交部派陶履谦与英方洽商收回厦门租界办法。

△　上海航业公会及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对于中日商约内容有所怀疑，会呈外交部请求宣布将来航海条约之方针及收回航权之实行步骤。

△　上海航业公司具呈交通部称，大连日本海务局阻止中华轮船由大连运货往日，任意摧残我国航业，实属有心侵犯我国主权，吁恳咨请外交部迅予严重交涉。

△　中东铁路局以局令停办扎兰诺尔煤矿，矿工6000人失业，华理事要求开监事会讨论。

5月23日　陇海线正面主力战开始。阎、冯军阵线在兰封以东，由徐永昌指挥，配有孙楚、杨效欧等晋军主力约九个师，冯玉祥又调宋哲元、孙良诚各一师增援。24日，冯又令考城石友三部南下应援。25日，孙良诚率部五万人，由野鸡岗、兰封之间向北推进，击敌侧背，郑大章骑兵部队迂回敌后，中央军主力刘峙、顾祝同大败。是为两军对峙以来第一次主力战，双方伤亡惨重，中央军失利。25日，阎锡山通电告捷。

△　津浦路晋军傅作义、李生达部以三师之众攻禹城，与中央军第一军团韩复榘部作战。韩由济南赴前线视察。津浦路左侧因石友三分兵援兰封，陈调元部由曹州西进。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治黄事宜由建设委员会统筹办理；公布《矿业法》、《西医条例》、《杭州市自来水公债条例》；派藩荫棠为出席万国量地家联合会代表。

△　国民政府令：阎锡山所发纸币、债券及各项票据，商民应一律拒绝。同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亦电津、沪、汉、粤银行团禁销南京新库券，声明自4月1日以后复认销者即为甘心附逆，将其财产全部没收。

△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因学生提出关系校长进退之议案，是日电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于26日去电挽留无效，罗认为“整顿学风，为目前环境所不许”，乃于6月7日离平。

△　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31日闭幕。我国选手113人参加，总成绩日本第一，中国第二，菲律宾第三，印度第四。

△　据《申报》讯：豫省120县，受兵匪之灾者达104县，其中匪祸76县，兵灾28县，水旱灾者尉氏、博爱两县，全省绝食者800万，每月饿死千余人。

5月24日　夜，津浦路晋军约一师由铁路两侧迂回至中央军韩复榘部后方，拟袭洛口铁桥，被韩部乔旅阻击于洛口北岸，晋军向临邑退却。

△　蒋介石任命骑兵第二师师长张砺生为“讨逆军”骑兵集团总指挥，统率前方各师骑兵。张是日在蚌埠就职。

△　云南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电驻南京代表李培天，谓入桂先头部队已抵百色，向南宁推进。

△　立法院第九十二次会议核议邮政总局改为邮务总局，议决交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工会法施行法》、《古物保存法》等。

△　国民政府声明：阎锡山所发行之一切内外债、公债及所缔之合同概不承认。

5月25日　平汉线中央军何成濬第三军团徐源泉部占领临颍，俘敌5600名，西北军师长孙士贵被击毙。

△　守许昌之阎、冯第八方面军总指挥樊钟秀在许昌南门外被中央军飞机炸死。冯派吉鸿昌继樊为第八方面军总指挥。

△　上海特别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以南洋烟草公司去年骤然停业，未遵党政机关处理办法，延不复业，致使数千工人失业，特具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请转函国民政府饬令该公司克日复业。

△　福建思明县共产党人劫狱，释囚48名，毙看守长，伤警兵多人。

△　湖南常德大火，共烧民房500余栋，损失在100万元以上。

△　国民政府发表江西省81县中报灾者达70余县。

5月26日　津浦线晋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率李生达第四军及第十军南下图渡河夺取济南，是日与中央军韩复榘部在禹城接触，傅向德州败退，韩部占领平原。

△　莫德惠在莫斯科出席加拉罕之宴会，加表示中东路系苏方出资兴建，全为苏联所有，中国之权利仅属于分红事项，如欲谈赎路，则先解决中东路财产问题，主张根据伯力协定进行交涉。

△　国民政府公布《矿业法》。

△　国民政府派徐寄庼、王晓籁、李馥荪、陈光甫等18人为国民失业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

△　上海租界华洋德律风公司将电话营业投标出让，由国际电话公司得标，工部局给予40年专利。交通部以此事侵害中国主权，特函请外交部向租界当局交涉给价收回，由部自办。

5月27日　阎锡山秘密赴德州，召集傅作义、张荫梧、李服膺、王靖国、李生达等开军事会议，决定晋军攻鲁方针。29日返石家庄。

△　阎、冯军将领百余人由鹿钟麟领衔，联名电催张学良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张置之不复。

△　北方党务争执经赵丕廉斡旋有解决希望，陈公博、白云梯、王法勤、覃振、傅汝霖等在北平赵宅密议，商定由汪精卫、阎锡山、王法勤、冯玉祥、邓泽如、邹鲁、谢持等31人联名发表宣言。29日，北方下级党部反对联名宣言，主张以粤二届为党务最高机关。

△　长春日军在吉长路举行军事演习，以长春城为射击目标，发炮500余发，践踏田禾2000亩，东北当局抗议无结果。是日，国民党南京市执委会常会决议请中央党部函国民政府严重抗议。

△　台湾劳动互助社举办“台湾社会运动清算演讲会”。

5月28日　张、桂军攻下衡州、邵阳，湘军何键部刘建绪师退守湘潭、株洲，长沙戒严。31日，粤第八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由平乐入湘，尾追张、桂军。

△　津浦路晋军李生达部陈长捷师在惠民以南清河镇渡过黄河，占领青城县桥头阵地。

△　国民政府公布《浙江省杭州市自来水公债条例》，总额250万元，年息八厘，自本年7月1日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分20年偿清。

5月29日　阎锡山进攻禹城失利，舍津浦正面，以第十军傅作义、第四军李生达、第三军王靖国、第五军李服膺、第九军冯鹏翥等五个军由铁路左右两侧渡河抄袭济南。是日台子黄河渡口及青城一役，韩复榘军第二十师徐桂林旅长战死，晋军冯鹏翥部次日在东河渡口渡河，直逼泰安。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司法院严缉《巴城新报》总编辑谢佐舜、泗水《泗滨新报》总编辑叶善如，声称该报“言论极为反动，警告不悟，益形猖獗”。

△　湘、赣两省因张、桂军北上告急。赣省府主席鲁涤平奉令兼任第九路总指挥，统率在赣各军，与何键合力堵截。同日，何应钦调

武汉军校教育长钱大钧率一团兵力入湘。

△　蒙古会议在南京励志社正式开幕，会议主席马福祥致开幕词称："本会任务，在研究蒙古实况，而为训政之推行，建设之猛进。"谭延闿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称："欲建设事业之实现，必须全国人民通力合作。"

△　"左联"在上海召开全体大会，各部各研究会报告工作；"五卅筹备会"代表、"社联"代表和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代表作报告。大会决定参加"五卅"示威和"艺大"启封活动。

5月30日　平汉线中央军直迫许昌城下，何成濬下令即日克复许昌。

△　交通部再函外交部，请即向各国驻沪领事团提出严重交涉，将上海租界电话交由该部收回办理；所有华洋德律风公司出卖给外商之任何办法，政府概不承认。

△　五卅惨案五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军警机关防务加严。

△　国民政府财政部将甘末尔设计委员会所拟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草案送中央政治会议审查。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公布《工会法施行法》、《古物保存法》，抚恤前第十六军第四师师长彭健初等。

△　上海标金涨至540两。

5月31日　平汉线阎、冯军前敌总指挥鹿钟麟乘连日大雨全线反攻，又遭失败。中央军王金钰第九军、徐源泉第十军是日围攻许昌，太康亦被中央军占领。6月1日，徐源泉部占领许昌南关。

△　冯军郑大章骑兵部队袭击归德马牧集中央军飞机场，烧毁飞

机12架，俘虏驾驶员及地勤人员50余名。

△　阎锡山到沧州召集第二路总指挥傅作义、第四路总指挥张荫梧、第四军军长李生达开军事会议。

△　蒋介石令张钫、张鸿烈等在归德组织河南临时省政府。

△　冯玉祥通令全军严申纪律，称："烟酒嫖赌，在所必戒，守纪律，真爱民，在所必行，此为治军救国之要诀。"

5月下旬　　彭德怀红五军入鄂东南，克崇阳、通城，进攻阳新城未下，主力撤围打援，转移至大冶、阳新边境，击溃川军郭汝栋五个团，乘胜占大冶、黄石港、鄂城。

△　东北政务委员会严令各地官厅防止"赤化"，凡主谋宣传"赤化"者处无期徒刑，知情而参加者处十年以上徒刑，保护或援助"赤化"宣传者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　外汇奇紧，市场恐慌，国民政府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暂收生银进口税30％，以资救济。

△　据《银行周报》调查，日本在东北设立之银行（不包括总行设于日本国内的银行），资本在50万元以上者18家，资本总额3497万元，连同正金、朝鲜银行之分支行，其机构遍设东北各城，经营放款达12.38亿余元，其中放与华人者占五分之三，以不兑现之朝鲜银行金票与在牛庄发行之钞票为交易本位，发行额日增。

是月　　中央苏区党内肃"AB团"。是月，赣西南党内发现"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甚至确认"AB团"分子已经"混入党团内及各政权机关"。肃"AB团"在赣西南党内开始。7、8两月，普遍开展。9月，赣西南东路行委发出《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进入高潮期。10月14日，毛泽东给党中央写信，说各级指导机关"多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

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整军中开展肃“AB团”半个多月，在四万红军中肃“AB团”4400余人。12月发生“富田事变”，肃“AB团”持续进行，从赣西南到全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据事后调查，苏区杀“AB团”达七万余人。按：“AB团”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直译为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段锡朋、郑异根据蒋介石、陈果夫指令，于1926年12月在江西南昌成立的反共团体，1927年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手发动“四二”暴动，“AB团”骨干分子少数外逃，大部被捉。仅存三个月的“AB团”当即解体，不复存在。“AB团”并未混入共产党内。

6　月

6月1日　　中原大战重心移至陇海路兰（封）杞（县）线。是日，中央军第二、第三军团分别在陇海、平汉两线开始总攻兰、杞。

△　汪精卫通电主张即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解决党务问题，并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坚持粤二届为合法党统，不承认沪二届地位，致再次引起西山会议派不满。邹鲁、谢持于5日通电驳斥，主张打破党统，沪、粤二届合作。

△　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讨逆军”第九路总指挥，是日在南昌通电就职，并呈报蒋介石，称将统辖在赣各军与第四、六、八各路军会师解决张、桂军。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曲阜大成殿维修后定为孔子纪念堂。

△　朱应鹏等创办《前锋月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我国提倡新闻学最早之徐宝璜在北平病逝。

△　晚8时半，济南小北门里军械库爆炸，147户被炸毁，96户受损失，死三人，伤200余人。

6月2日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偕刘文岛及援湘军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赴株洲、湘潭前线视师。

△　韩复榘委孙桐萱为济南警备司令，孙是日就职。3日，济南戒严。

△　国民政府令公布《古物保存法》。

△　关于收回大东、大北水线交涉，英国、丹麦联合要求中国偿清债务，照价收回该两线，在债务未偿清以前，坚持旧约有效。

6月3日　　张学良30岁生辰，蒋介石除电吴铁城就近道贺外，又特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借机请张出面调停蒋、阎、冯争端。张表示愿意促进和平。

△　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电张作相、万福麟望东北军移师入关，称“倘两公能敦请汉公（张学良）即日饬部西进，我平津不战而定，其功诚伟”。

△　张、桂军攻占醴陵，湘军大败，何键、夏斗寅匆返长沙。何键召集省务会议，布置退却。

△　行政院会议议决，改特别市为市，京、津、汉、沪、青五市直隶行政院，北平、广州二市分别改隶冀、粤两省政府管辖，各市长重加任命，转呈政府照办。

△　中苏会议因讨论范围未获协议而搁浅。苏方又根据《伯力协定》提议将会议范围扩大，不仅东铁之争执，且两国间一般争执，均须在此次会议中解决；中国方面主张会议仅根据奉俄、中俄协定讨论中东路本身问题。是日张学良据莫德惠所陈电行政院请示。

△　交通部《收回上海租界电话理由书》在各报发表，列举理由六项，内有租界当局欲将华商股权交由外商承购，不啻攫取华商企

业，授之外人；倘政府不及时交涉收回，将来实行收回租界之时，阻碍势必益多。

△　上海银价续跌，金价暴腾，是日最高飞腾至569.3两，又开新纪录，入口品涨价20％—70％。

△　驻沪美总领事署发表：本年4月份中国金块出口运至美国者计18.4793万条；1至4月份运美金块共45.995万条，计值939.8754万金圆。

△　中国禁烟纪念日。各地有纪念活动，南京纪念会后焚毁烟土2000余两，烟具5400余件，并举行禁烟展览。

△　上海龙华兵工厂炮弹装药间试炮时引火不慎，发生爆炸，死七人，重伤10人，轻伤15人。

6月4日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率省政府、第四路军总部、清乡司令部全部人员退出长沙，在岳阳成立临时办公处。长沙商绅组织临时维持治安会维持城内秩序，并派员欢迎白崇禧入城。

△　蒙古会议第五次大会通过振兴教育、解放蒙古奴隶等提案多件。

△　教育部重申废止大学预科令，各大学自十九年度一律不得再招预科生，如或故违，已立案之私立大学应由所在地之教育行政机关严予取缔；未立案之私立大学以后呈请立案概不受理。

△　上海金价继涨，达598.5两，英、美等国仍有大批条银装运到埠。

6月5日　　东北各要员借祝贺张学良生辰之机集会沈阳商议应付时局，张作相、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沈鸿烈、臧式毅、荣臻、鲍文樾等人均出席。张作相等主张不与任何

方面合作；王树翰等赞同与蒋介石合作；万福麟等无何意见，听从张学良决定。张举棋不定，希望双方息争言和。

△ 谢持、邹鲁通电对汪精卫东（1日）电不放弃粤二届党统有所指摘，主张打破党统。

△ “中华民国军”第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第七军军长杨腾辉先后抵长沙。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各部北逃。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党内各种会议决议案不得对外发表。

△ 蒙古会议第六次大会通过建议送班禅回藏等案。大会提案讨论已毕，6日至7日上午各组加紧审查。

△ 朱德、毛泽东红四军自寻乌经吉潭，到达福建武平，击溃民团，克县城，8日续克上杭。

6月6日 李宗仁及李品仙抵长沙，白崇禧赴前敌。桂军决定暂不成立省政府，以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处代行其事，并令各级党部停止活动。

△ 唐生明第八军、张发奎第四军与粤军前锋在攸县接触。

△ 行政院长谭延闿复张学良江电，谓经第十七次临时政治会议议决，中苏会议除讨论解决中东铁路问题外，其他关于复交、通商问题，亦可以次讨论；另由外交部训令莫德惠代表，必候中东路问题解决之后再商其他问题。

△ 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代办，声明保护战地外侨。

△ 国民政府公布《工会法施行法》。同日，工商部对工会组织

法中之“工会联合会”及“工会区域”有所解释，并称《工会法》并无总工会名称，所有旧日成立之省、市总工会应即解散；旧时工会组织条例已奉令废止，不得再行援用。

△　教育部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大学部招收不劳动之学生，工厂纯用非学生之工友，毫无成绩”，奉蒋介石令停止该校招生，重新改组。9日，劳动大学校务委员会议认为按法令学校有招生全权，决议继续进行，并推教授代表章友三等五人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说明。

6月7日　　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谓莫德惠赴苏，原奉中央指示讨论范围仅以中东路为限，其他复交、通商等问题，应先期遴选大员，俟东路问题解决后即行派往代莫交涉。

△　中央军何成濬第三军团占领许昌，进逼新郑。

△　在平之国民党各省市党部联合办事处通电全国，赞成汪精卫东电主张。

△　工商部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沪召集银行界及工商界虞洽卿等20人讨论平准金银办法，孔、宋提出：一、制止标金交易；二、外国生银进口，概由中央银行办理。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准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所请，以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张钫暂代省政府主席职务，并在归德组织办公处。

△　农矿部拟具《救济国民失业意见书》，呈请行政院鉴核，推算中国失业人数在1.7亿左右，提出救济失业办法四项：一、维持劳动；二、扩大生产事业，增加工作机会；三、介绍职业；四、扶助失业。

6月8日　　桂军杨腾辉第七军占领岳州，张发奎第四军在醴陵击破鲁涤平部，进抵平江。何键部退湘西，临时办公处移常德。海军司

令陈绍宽率“楚有”、“江元”等11舰入岳州洞庭湖一带协攻桂军。

△　闽战复起，卢兴邦师攻福州，与驻福州刘和鼎师发生接触。刘和鼎调所部陈万泰旅由泉州开赴福州助防。12日，陈旅抵福州，刘师开始对卢师发动总攻击，次日，卢师败退西乡桐口，福州战事告一段落。

△　上海美亚绸厂总厂及第四、第六两分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提出四项条件：一、恢复无故被开除工人工作；二、履行民国十六年劳资双方协订条件；三、发还储蓄金；四、撤销临时雇用书。

△　美商友邦银行上海分行成立，资本50万元。该行系由原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储蓄部改组而成，专营储蓄业务。

6月9日　　韩复榘部逼近青城，晋军王靖国第三军由临邑开青城增援。10日，晋军向津浦线左右两翼进展，韩往来青城、东阿间督师防御。

△　援湘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师攻占衡州，进逼衡山、醴陵，威胁桂军后方。何键亦于11日由常德督师反攻长沙。桂军已被粤军截成两段，黄绍竑第十五军前锋在零陵，急电李宗仁回师破敌。13日，白崇禧、张发奎等部自岳州撤回株洲一带。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浙江省赈灾公债条例》，总额100万元，年息八厘，定7月1日按票面九八折发行，从12月起分九年偿清本息。

△　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出席瑞士万国量地家联合会代表。

△　内政部长钮永建、常任次长张我华、南京市长魏道明在京宣誓就职。

△　南昌环城街茶店失慎起火，延烧161户，为该市罕有之大火灾。

6月10日　冯玉祥为配合桂军作战，下令向平汉线中央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中央军向漯河以南溃退。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救济金贵办法，决定先由主管各部切实调查后，再议救济办法。19日，行政院训令财政、工商两部调查金银数量。

△　蒙古会议第七次大会通过各组审查报告案。12日，第八次大会后闭幕。会议讨论议案125件。

△　第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朱懋澄当选为副主席。

△　美商香港沙逊银行上海分行成立，资本英金50万镑。

△　长沙三公祠火药库因桂军士兵搬运手榴弹失慎爆炸，燃烧达12小时，焚房数十栋，死伤士兵数百人。

6月11日　蒋介石令第四路军何键、第八路军陈济棠、第六路军朱绍良、第九路军鲁涤平、海军司令陈绍宽、航空署长张惠长务于10日内歼灭张、桂军。

△　兰杞线中央军转移阵地，谋诱敌至民权、睢县附近歼灭之。阎、冯军果以大部队向睢县及其以南地区攻击前进，中央军随即分左右两翼，以刘峙、陈调元分任指挥，于12日拂晓袭击阎、冯军，形成相持之势。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决议提出：“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

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而“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是“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其决议标志着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又一次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　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长汀南阳（今上杭）召开联席会议，13日结束。会议对闽西党的土地、婚姻、财政、经济等政策作补充和修改，通过《富农问题》等决议案，推动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　外交部就上海租界当局将电话营业权出卖给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事发表宣言，声明所有华洋德律风公司出卖与外商之任何办法，概不承认，惟有由政府给资收回；中国各电话无论华界、租界均应归中国自办。

△　据上海《民国日报》讯：华洋义赈会贝克发表陕灾视察报告，谓西安围城时所挖战壕，已埋饿死灾民25万，灾民食品与平、津野犬所食者同，且不易得，各处粥厂停办后，饿死者激增，灾民总数尚逾百万。

6月12日　　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一文，希望反蒋派携手合作，对付共同敌人，宣称：“与西山派及实力派妥协决不可动摇。务以党治军，永绝内战。尤应文人与武人领袖精诚结合。故军事领袖参加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共同负责，今日实为必要。”

△　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冯玉祥，表示愿出面调停蒋、阎、冯之争，称：“战争对外则为耻辱，对内为党为国为人民均非所取，如能同意罢战，愿执调停之劳。”

△　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在衡山与桂军黄绍竑部激战一昼夜，蒋师教导团攻占衡山。

△　陇海路阎、冯便衣队潜入朱集、马牧集附近，破坏中央军飞机数架。

△　阎锡山以天津海关税务司勃尔拒绝截留新增税款，将其免职，改任阎、冯军总司令部顾问辛博森兼天津税务司，令即赴任接收天津海关。

△　川军刘湘、邓锡侯分电何成濬，愿率所部讨伐冯、阎。

△　内政部公布《省市县勘界条例》。

△　日本借口延边共产党活动，陈兵图们江彼岸，待命出动，驻鲜日要员纷来视察。吉省当局以情势严重，急派民政厅长章启槐、警务处长王之佑等赴延办理镇慑布防事宜。

△　青岛市公安局派员率同沧口第一派出所警士昨夜捕去日商纱厂被裁工人七人，钟渊纱厂工人请求保释无效，遂将第一派出所包围，公安总局派保安队前往弹压，并捕去为首工人17名。

6月13日　津浦线晋军傅作义部从右翼渡河进迫济南，是日攻占长清县。

△　陇海路冯军仍守兰封。14日，蒋调平汉线上官云相师赴陇海线。16日上官师攻占上蔡，进入周口。

△　靳云鹗在徐州宣称："即将转往亳州与孙殿英接洽共同讨逆工作。"

△　军政部次长朱绶光潜离南京，绕道大连于21日抵沈阳，即晚赴北平，应阎锡山召转赴太原。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其擅离职守，呈国民政府明令将朱免职。

6月14日　陈公博、傅汝霖、赵丕廉与郭泰祺、胡宗铎、覃振等

在津商议党务问题，主张速发扩大会议宣言。王法勤、白云梯主张须汪精卫来主持党务，故未赴津。谢持、邹鲁发表声明，认汪东电以粤二届为主体成立扩大会议为不当。

△　中央军总部发布湘江止航令，略谓：为免入湘张、桂军自水路孔道逃窜，已令海军封锁湘江口，禁止中外商轮及其他船舶通过。

△　陈绍宽率舰夺回岳州城陵矶，陆战队登陆进驻岳州，张、桂军向南撤退。

△　司法院筹备行政法院，拟就《行政法院组织法》及《行政诉讼法》送立法院审议。

△　中苏交涉中东路赎买问题，估价该路财产为五亿元，中国代表以该路系中苏合办，主张中国支付总额之半即2.5亿元赎路；但苏方代表认为该国对中东路投资额为五亿元，外加30年利息，总额为15亿元。双方主张悬殊，中国代表因此主张以旧俄羌贴赎路。

△　去年9月30日在巴黎签订之《中希友好通商条约》，是日由中国驻法公使与希腊代表在法国互换批准书，该约即日起生效。

6月15日　长沙张、桂军被中央军五路包围，是日，李宗仁率部退出长沙，集中醴陵，长沙秩序交李品仙、冯天柱维持。在平江、岳州前线之张发奎、杨腾辉等部，亦陆续退往醴陵。

△　蒋介石任命贺耀组为徐州行营主任，是日贺就任。

△　桂省主席吕焕炎在广州新亚酒店被其卫兵冯名声刺死。后冯被获，据供系受白崇禧遣副官贿使。

△外交部宣布，收回沪法租界会审公廨问题，法使玛太尔非正式表示，法方拟待新使韦礼德到任时再交涉。

6月16日　武汉“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行营”下讨伐张、桂军总攻击令，并派参谋长贺国光赴湘指挥作战。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令危宿钟率部占领长沙之岳麓山，与张、桂军隔江对峙。蔡廷锴师由攸县进逼醴陵，蒋光鼐师由衡州转向湘乡，金汉鼎部抵萍乡，与修水、铜鼓张辉瓒师联络。海军占领湘阴江面，掩护武长路正面部队向汨罗出击。张、桂军分三路溃退：一路由白崇禧率领向攸县，一路由张发奎率领向浏阳；一路由唐哲明、唐生明率领向醴陵。

△　中央军总部截获亳州孙殿英致鹿钟麟、孙良诚之乞援电，内称“粮弹早罄，危在旦夕，请速派大队增援”，遂令王均第三军将亳州严密封锁。

△　辛博森会同天津市政府代表陈鸿鑫、警备司令部代表段茂澜、海关监督葛敬猷接收天津海关。天津市长、警备司令、津海关监督联合布告称：对于担保债务部分之关款，按旧案妥善保管；所有该关收入税款，存放原指定银行；该关人员一律照支原薪，应享利益充分保障，抗令者斥革不贷。原津关税务司勃尔携重要文件避匿英领事馆，电英使蓝普森抗议。同日，驻津各国领事会商应急处置，并电各国公使及本国政府请训。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爱德华，请协助将租界电话由我国收买管理。

△　下午，沪金价最高达603.2两，外汇发生大变动，市面大起恐慌。17日，沪市商整会分函金业交易所、银行公会、洋商银行公会等团体，提议限制标金营业，以救济金贵风潮。

6月17日　蒋介石在陇海线发动新攻势，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由杞县、太康间进攻郑州、开封。冯玉祥将计就计，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杞县、太康之线，诱敌深入。19日，蒋军克杞县，向开封挺进。

△　何键第四路军危宿钟之敢死队由岳麓山渡江，占领长沙。陈绍宽亦率海军舰队驶抵长沙。张、桂军南撤。

△　靳云鹗前奉蒋介石命由徐州赴亳州劝孙殿英投诚，是日返徐，称孙“反复不定”。

△　北平外交团领袖欧登科集《辛丑和约》国公使及善后借款银行团代表在荷兰使馆就阎锡山接收天津海关事交换意见。各公使以中国关税已初步自主，主张持慎重态度，不轻抗议；银行团代表则着眼于不妨碍债权本利，遂各电本国政府及总行请示。

△　本周上海存银增多，银价难有起色，是日，上海三井银行及大通银行将银块100余万两运伦敦炼制销售。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晋方强行接受天津海关事决议办法三项：一、照会英国公使驱逐辛博森出境；二、停闭津海关，调回华洋关员；三、津海关税款由大连、青岛各海关代征。19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通告各国，取消天津海关。财政部经总税务司令津关税务司以下全体职员撤退，并令大连、青岛海关开始征收津关税款。20日，外交部长王正廷代表政府发表声明，略谓阎派辛博森接收津海关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不与各国相干。

△　阎锡山由平原经石家庄回太原，同日电复汪精卫东电，谓对党务毫无意见，一任汪主持，盼汪早日北来。

△　何键率省政府各机关抵长沙，布告安民，委危宿钟为长沙警备司令，令刘建绪师会同蔡廷锴、蒋光鼐及谭道源、戴斗垣各师分途追击张、桂军。张、桂军大部退醴陵、株洲一带。

△　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奉令致函上海领袖领事克银汉转致英、法等领事，声明租界电话决由中国政府收回自办。27日，克银汉复文称：华洋德津风公司将召集股东会解决收回租界电话权问题。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代表庄智焕等与英商大东、丹商大北两水线公司代表开第二次废约会议，庄提出从前合同一律废止，如欲继续在中国经营水线，须按中国新原则办理。两公司代表允电总公司请示后答复。

△　上海市商整会主张以提倡国货为救济金价暴涨之根本办法，是日函各省、市商会组织提倡国货专门委员会，专司调查研究宣传之责；并普遍设立国货合作社，便民随时购选国货。

△　国民政府派黄慕松、陈绍宽、张静愚为出席国际联合会裁减军备筹备委员会高级专门委员。

△　上海法租界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未遂举行罢工。资方雇白俄20余名代理，23日又雇用马路小工20余名在巡捕保护下修理水管，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

△　教育部为推行国语注音，组织国语注音推广会，聘吴敬恒为常委，并指定该部各司、处各派若干人为委员。

6月19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议，李文范、朱家骅、邵元冲递补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通过各地商人团体改组办法。

△　唐生智离津南下，赴港迎汪精卫。

△　张、桂军主力退至安仁、茶陵、耒阳一带。蔡廷锴师占耒阳。

△　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电国民政府，否认派代表与晋接洽，表示至诚拥蒋。

△　上海海关全体华员宣言反对辛博森为天津海关税务司。

△　工商部就外国公司注册问题电示驻沪办事处，称：“凡在中国

境内设立之公司，不问中商外商，均应依照中国公司法呈请注册，方取得法人资格。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支店，应依照中国法令呈请支店注册。”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与大东、大北两水线公司代表开会清算所欠电费，该两公司允对交通部所提折合法郎价目新原则，电公司请示后答复。

△　香港立法局通过增征烟草税。

6月20日　平汉线冯军停止向南追击，是日起中央军转为攻势。23日，第三军团徐源泉部占郾城，旋即会合右翼周家口上官云相部、左翼舞阳杨虎城部围攻襄城、临颍。

△　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由汉口抵长沙，指挥各路军队进攻湘赣边境张、桂军。何键偕钱大钧赴株洲督师。张、桂军在株、醴一带与蒋光鼐军相持。

△　国民政府下令将南京、上海、汉口、北平、青岛、天津、广州各特别市改定名称为市，并依据《市组织法》，改任原南京特别市市长魏道明、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广州特别市市长林云陔为各该市市长；准青岛特别市市长葛敬恩辞职。23日，任命胡若愚为青岛市市长。

△　外交部在广播电台播发外交近况，称：关于保护海外侨民及解除种种不平等待遇，本部已通盘筹划，按照预定步骤节节进行。对于有约国则尽力协商废除旧有苛例，对于无约各国则分别进行缔结商约，一本平等互惠原则以谋根本改善。至于虐待华工、入境留难、征收苛税等项，现已积极对关系国分别交涉。

△　外交部长王正廷向英公使蓝普森提出严重抗议，略谓：辛博森受阎锡山命就任天津税务司，系助长中国内乱之违反国际法律行

为，有损中英关系，请予严重处分。

△　天津税务司勃尔奉总税务司令，通告即日停闭津海关，河泊司仍照常办公，津关中外职员均未到关办公，辛博森以开除相威胁。

△　法国驻华公使玛太尔卸任，新任公使韦礼德抵沪。

△　上海药业安插失业职工案，以资方允安插50人解决，药业职工会后援会是日结束。

6月21日　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并由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立即出兵入关。

△　张学良是日及次日两次电阎锡山、冯玉祥，主张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地区，立即撤军停战，公开政见，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阎、冯以军事形势有利，未予理睬。

△　陇海线战事渐趋激烈，中央军左右翼各进数十里。冯玉祥令后撤之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由通许出太康正面堵击中央军，又从平汉线调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高贤集中央军左侧背兜抄，左翼由陇海路正面之晋军防堵，孙殿英部则在鹿邑、柘城方面扰乱中央军后方，形成口袋形包围圈。是日中央军由通许方面回师侧击，双方激战于鹿邑、柘城一带，中央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陷于阎、冯军包围中。

△　刘建绪师李觉旅占领醴陵。张、桂军向攸县退却。23日，刘师占攸县。

△　东北边防公署举行张作霖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张学良、张作相、吴铁城、方本仁、刘哲、张焕相等参加祭奠。国民政府派代表王家桢、祁大鹏、温世珍致祭。

△　天津关系国领事就津海关封闭事商议应付办法，日、英领事

主张由领事馆代管税务，美、法领事认为海关停闭，天津即为自由港，不需外国领事代行事务。23日晨续开会议，决定对津海关封闭事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分别电各该国公使向本国政府报告。

△　南京关务署令上海总税务司梅乐和，所有运往天津之货物，由江海、粤海、厦门、青岛、大连、安东、秦皇岛、营口八关征足抵津税款始可放行。

△　辛博森率同海关职员至天津海关办公，并招募海关失业人员准备录用。又电朱鹤翔请英公使令驻津英领事驱逐勃尔出境。同日，朱鹤翔发表声明，称勃尔应负津埠发生遗憾事件之全责。

△　国民政府令：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邦“为贼作乱，扰害地方”，着即褫职剿办，“所有伙同作乱之人”一律严拿惩究。

△　刺杀许卓然之凶手陈德麟在同安缉获，供称系受集美学校校董叶渊与陈延香所主使。叶、陈即由思明法院拘押。

△　国民政府据陈嘉庚电称，因三年来橡皮事业失败，其独立创办之厦大、集美二校将难维持，请予补助经费；复据中央侨务委员会函恳，念陈毁家兴学之热心，请将陈嘉庚公司所有制造品应纳关税，全数拨充厦、集二校经费等情，特训令行政院准由财政部从国库内按月补助5000元。

△　沪标金连日迭涨，是日最高价达615两。

6月22日　刘和鼎师陆续开出福州城外，准备大举进攻卢兴邦，海军亦派飞机助战。卢部五个旅已集中水口以下，阻止刘军前进。

△　马鸿逵派参议曹济青赴莒县，接洽收编高桂滋部。

△　教育部令燕京大学撤销宗教科目。

6月23日　阎锡山在太原与王鸿一、刘汝贤、梁式堂、李书城商改组政府问题，并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阎主再征各方意见后再决定。

△　蒋介石为解高贤集、龙曲集之围，急调上官云相部应援，又令平汉线积极反攻，以分散冯军兵力。蒋并于是日亲赴柳河车站督战。

△　天津海关监督葛敬猷奉阎锡山令接收常关。

△　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派东北舰队至大沽口外封锁天津，监视逃税船只。

△　交通部电上海商整会，请赞助政府收回租界电话。25日，上海工商界领袖虞洽卿等开会筹商办法，决定公告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华股东不出席27日召集之股东会，以示维护国家主权与法令之决心，并复电交通部长王伯群，表示赞助政府收回租界电话，请政府严重交涉。

△　中央大学学生会为力争每年300万元学校经费召开紧急会议，并于是日分赴行政院、教育部、财政部请愿，教育部允极力向中央声述。

6月24日　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放弃济南，所部沿胶济路东撤，第三路总部移驻潍县。鲁省府在青岛设立临时办公处，执行省府职权。同日，第十五路马鸿逵部放弃泰安，向兖州方面撤退。25日，晋军傅作义部占济南。

△　何键抵衡州督师，与第八路军蒋光鼐商歼敌计划。

△　行政院会议决议，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呈请“唐家环奉令辟为无税口岸，现在随时可与各国开始贸易交通情形，知照各国使馆”案，交外交部照办。

△　北京外交团举行会议，决定对津海关问题不加干涉，暂取观望态度。天津领事团自动撤销代办关务之议。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委员庄智焕、吴南如等与美商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代表丁甘陶开水线废约会议，庄提出合同废止后如欲继续在中国经营，须按中国新原则办理。公司代表允电美国总公司请示后答复。

△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进攻南昌、会师武汉的通电。

6月25日　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各区分部联合办事处发表宣言，主张牺牲粤、沪二届党统之争，以反蒋之过去中央委员及现在反蒋之党领袖，共同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国民党中政会外交组讨论津关事件，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处置津关经过及照会英使请惩辛博森情形，决俟英方复照到后再定办法。

△　国民党山东省各县市联合办事处筹备委员会杨宝庠、济南市区分部联合办事处筹备委员会丘青萍、于惠民分别接收省、市国民党党部。

△　阎锡山委温襄城为国家银行行长，阎嵩峰、吴扶青为筹备主任。

△　阎锡山所委清华大学校长乔万选，率随员到清华接收该校，为学生拒绝，乔签字表示以后不再前往接收。

6月26日　陇海线石友三部突以五六万兵力侵入曹县西南高坝园、刘同集一带，拟袭击柳河、归德。冯玉祥调孙良诚、孙连仲及炮兵约10万人投入陇海前线。同日，傅作义部李生达师占领泰安。

△　国民党中常会推朱培德为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决议将《妇女团体组织大纲》第五条修正为："妇女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之范围以外为政治运动，凡为政治运动之妇女团体，须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核准。"

△　总税务司奉国民政府令宣布所有天津海关应收之进出口税，统由江海关代征。上海华航商决定天津航线之北洋班轮正式停航。

△　沪三轮抵津，均称津关应征之入口税，已由沪海关征收，不肯再缴。葛敬猷与辛博森商决通融办法，规定报关验税一切手续仍照旧章办理，应缴关税款项如数存放津关，由各商持据向前征收机关要求索回；如实无法索回，亦得呈缴纳税证据，以便交涉发还。

△　外交部令驻巴西公使戴恩赛就近与阿根廷接洽订立中阿商约。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刘芦隐著文指摘在华日文报纸自冯、阎叛变以来，只刊载不利国民党中央言论，不见刊登冯、阎失利消息，已成为反动派的宣传工具。

△　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校务会亦电阎锡山，均谓校务未因校长罗家伦去职受影响，反对阎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同日，清华大学学生会向报界宣布：一、清华不为一党所操纵；二、清华不介入军政漩涡；三、未经全体同意，拒绝任何人接任校长。乔万选亦宣称本人受命，今既被拒，即返太原向阎锡山复命。

△　国民政府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称，中华书局出版之《武昌革命真史》一书诸多失实，特训令行政院转饬所属禁售。

△　柏林、南京间传真电报试验成功，交通部长王伯群接到驻德使馆告公使蒋作宾行踪亲笔电文。

6月27日　青城方面晋军开始出击，韩复榘令各部次第转至淄河

东岸布防，与晋军隔河对峙。中央军夏斗寅师奉令自湘调津浦线作战。钱大钧教导第三师除留一部警备武汉外，亦调津浦路。

△　何键、陈济棠两军与攻衡阳之张、桂军发生大战。激战两日，张、桂军向永兴、耒阳、郴州退却。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行政年度应与会计年度同由国民政府公布；公布《土地法》、《票据法施行法》；军政部政务次长朱绶光免职。

△　华洋德律风公司不顾中国迭次抗议，是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投票多数通过接受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之投标，将租界电话营业转让该公司。华股东以不出席表示抗议，西股东亦有反对者。

△　天津海关税务司勃尔离津南下，向总税务司梅乐和报告封关经过。

△　驻美公使伍朝枢向外交部报告，《中美公断条约》是日与美国务卿史汀生正式签订。但立法院认为有未尽妥善之处，迟迟未予批准，以致该约不能发生效力。

6月28日　方声涛自沪抵厦门，29日与张贞会晤，筹划自兴化、泉州进攻卢兴邦。

△　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通过标卖将租界电话权让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后，国内各团体及上海市民极为激愤，是日华人用户发抗议宣言，市商会、市民联合会、纳税华人会及用户联合会等已联络一致，准备作第二步抗争，以促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自动放弃，否则消极抵制，以护主权。

6月29日　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在上海成立，会章规定该协会“以研究科学管理方法，增进工商业生产效率，实现民生主义为宗旨”。孔祥熙、穆藕初等15人当选为理事。

△　鄂豫皖红一军第一师在湖北孝感杨平口地区歼第二十军独立旅第一团，毙伤俘敌1000余人。战后，红一师扩编，人数达1500余人。

6月30日　　阎锡山连日与各方代表商议组织政府，拟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汪精卫、唐绍仪、许崇智七人为政府委员。因党务问题未决，是日派代表赵丕廉、冀贡泉到北平，劝谢持、邹鲁让步，以便由党部产生政府。并派代表到郑州与冯玉祥商组织政府事，冯表示听命于阎。

△　中央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突围，被冯军截成数段，损失严重，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方向退走，一部经睢县东南向永城、砀山退走，张治中教二师掩护退却，损失尤巨。此役中央军死伤2600余人，被俘4200余人，损失枪支3000余、炮数十门、汽车20余辆及大批辎重物品。

△　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凡397条，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375‰，并不得收取押租。是为二五减租推行全国之始。

△　陈济棠委陈策为琼崖“剿匪”司令，限三月肃清“土共”。

△　万选才由南京解武汉，押于武汉行营军法处，7月5日解往河南。

△　沪蓉航空管理处结束，候移交中国航空公司。京沪航空公司邮件7月1日起改由中国航空公司递送。

6月下旬　　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光山王家湾召开，成立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以甘元景为主席，正式形成鄂豫皖根据地。

是月　　朱德、毛泽东红四军在汀州（即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

议，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红四军总的发展路线是夺取武汉。

△　中国工农红军以朱德、毛泽东红四军为骨干，集合闽西、赣南红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旋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以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林彪、黄公略、伍中豪分任第四、第六（后改第三）、第十二军军长。

△　彭德怀红五军在鄂东南大冶县刘仁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为政治委员，由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黄公略为副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全军团共一万余人。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在闽西成立，军长胡少海，政治委员邓子恢。

△　杨杰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

△　行政院令内政部转各省查禁《公民日报》、《自救晚报》、《世界日报》、《华北晚报》、《小小日报》、《木铎余音》、《国民公报》七种报纸，《北平各界讨蒋大会告武装同志书》、《告农工青年妇女军人商民书》、《北平各界讨蒋大会宣言》、《告党员书》、《平市各区联合办事处告民众书》等10种传单及《蒋介石总检阅》、《讨蒋拥汪宣传大纲》、《革命主力军》三种小册子。

△　平汉铁路工会联合办事委员会因北方政局变动，奉令停止活动，《平汉工联周刊》随同停刊。

△　沪、杭等地火柴工会为瑞典商人在沪周家渡收买日商燧生火柴厂，并扩大经营，致使我国火柴业有破产危险，百万火柴工人行将失业，特递文国民政府请愿严行制止。

△　广州总商会组织富国煤矿有限公司，集股开采北江韶州、曲

江、乐昌地区无烟煤矿，并着手建筑轻便铁路。

△　中国留日学生500余名因受金涨银跌影响，学费困难，废学归国。

△　陕西汉中旱灾严重。略阳西北区40余村人烟灭绝，留坝灾民因食毒草死者5000人，凤县褒城镇巴佛坪树皮剥食无余，西乡、沔县（今勉县）、宁羌（今宁强）、洋县灾民掘食石质面粉，滞塞而死，绝户者日有所闻。汉南300余万人，死亡在100万以上。

△　据广东、江苏、辽宁、福建、东省特别区统计，至是月止，出国华侨共计13.6238万人，归国华侨共计14.3267万人。

7　月

7月1日　自6月29日至是日，张、桂军为夺回衡阳，与粤军第八路军第六十三师李扬敬、第六十师蔡廷锴、第六十一师蒋光鼐各部在衡阳西回龙寺、弹子山一带激战。第四军团长李汉炯阵亡。粤军旅长张世德也被击毙。张、桂军向祁阳、永州败退，损失极重，所余仅十分之二三。

△　蒋介石任命贺耀组为徐州行营主任，指挥马鸿逵、夏斗寅等军扼守兖州、曲阜；施中诚、陈孝思、梁鸿恩等旅扼守济宁，警备徐州以北，以与退守胶济路之韩复榘军相策应。次日，蒋介石任贺耀组兼津浦路总指挥。

△　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陆军大学校长刘光由辽宁携张学良致蒋介石亲笔函返南京。5日，刘抵柳河与蒋密谈，旋告外国记者，谓张学良收拾时局之意见，系主张阎、冯先下野，晋军暂由傅作义、赵戴文监理，冯军暂由鹿钟麟监理，一方面召集国防会议，确立全国军队统率权，以期将来不能依个人意志而动兵。蒋介石对此主张亦表同

意，并谓倘阎、冯二人下野，其余无论如何条件皆可允诺。

△　冯玉祥赴开封督师。

△　江西红三军黄公略、红十二军罗炳辉率部分五路围攻吉安。国民党军新十二师邓英部固守，至5日，红军攻吉安未下，遂撤退。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波兰代表魏登涛在南京签订《中波商约附加议定书》。

△　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王士珍在北平病故，遗嘱希望和平统一。

△　英轮“卡摩拉号”自沪装载现银400余万两外运香港、印度等地，此为上海第二次大批现银出口。

△　新疆省银行成立，总行设迪化，以财政厅长徐益珊为总办兼理事会主席，教育厅长刘文龙为协办，民政厅长李桀为监事会主席，孙国华为经理，资本暂定500万元，由财政厅陆续筹拨。

7月2日　　晨，平汉线中央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偕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等赴大石桥督师。第十军第四十四、四十八两师驱走颍桥之西北军。第七军杨虎城部攻鲁山、叶县，与第十军联络北进。

△　黄昏，平汉线西北军南路军张维玺、田金凯、石振清等部约六师之众，开始向中央军漯河、青龙潭、郾城、十五里店等处阵地进攻，未能得手。3日夜至4日晨，复屡向郾城、十五里店、新店进攻，均被击退。

△　陇海线阎、冯第四方面军石友三部与中央军第一路军陈调元、第二军蒋鼎文、第一军顾祝同各部在考城一带激战。是日，中央军绕道进击，将石部包围，阎、冯复以安树德、张印相两师增援，亦被击溃，后石率部突围而去，至6日战事告一段落。

△　中央军第四、八两路军联合追击张、桂军，第四路军何键部占领茶陵、耒阳、常宁、邵阳，沿白水、大忠桥抄出永州，截其归路。第八路军在桂之余汉谋、香翰屏两师复由平乐出道永兜剿。

△　张学良整理东北空军，聘日本航空技术专门教官12人，并向日本陆军省借用战斗机六架、侦察机三架，以备日教官传授技术之用。

△　国联劳工局中国分局在南京成立。

△　葫芦岛筑港举行开工典礼，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铁道部代表吴铁城为纪念碑揭幕。该港建筑费为美金640万元。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南京开第六次年会，议决本年补助各文化教育机关35万元。

△　孔德成及孔教总会全体会员电阎锡山，请仿耶路撒冷例，将曲阜划出战线之外，保护孔林孔庙。

△　比利时代办昔美韦克鲁司抵南京，谒王正廷谈中国收回津比租界协定业在比下院通过。同日，中国驻比代办罗怀英亦电告外部，称该项协定是日在比上院通过。

7月3日　　津浦线战事呈胶着状态，中央军贺耀组赴兖州主持夺回济南之战事。韩复榘部与刘珍年部取联络，候令反攻济南。夏斗寅第十三师在曲阜前线与晋军接触。同日，晋军将领傅作义在泰安，张荫梧在周村，积极准备津浦、胶济两路战事之进行。阎锡山连日向津浦线增厚兵力，驻济南之第九军第二十六师高鸿文部已奉令向前方开拔。黄诗桐第十二旅是日到济担任城防。晋方所委之山东省代理主席邓崇熙亦于同日就职。

△　朱绍良接任陇海线讨逆军左翼军总指挥，亲赴前线指挥所部第八师、第四十七师等由陈留围攻开封，连日战事颇激烈。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检查拍发电信办法》，规定军事时期中外新闻记者拍发电信一律须受检查，10日开始实行。

△　财政部裁厘委员会办事处发表裁厘方案，规定在11月底前将各种局、卡一律裁撤，由财政部举办粮类税、织物税、出厂税三种特种消费税。

△　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发表结束宣言，声明因《工会法》无设总工会之规定，奉市党部令结束。

△　红三军团彭德怀部克浏阳、岳阳。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令各县整练团防，防范红军。岳阳红军向平江转移，随即占领平江。

△　工商银行月来发生数次提现风潮，是日起总分行一律停止营业。上海分行停业主要因经营汇兑、标金、证券等投机失败，损失达150万元。

7月4日　　津浦线马鸿逵部马腾蛟率其第六十四师连日于曲阜北官村、柳沟、宁阳一带，与晋军傅作义、冯鹏翥、李生达各部作战。兖州方面双方在二十里堡附近激战，均有伤亡。5日，贺耀组令第十三师夏斗寅部死守曲阜，第六十四师马宝琳旅死守兖州，并派军警戒邹县以北，其余各部撤至滕县。

△　平汉线正面中央军下令总攻许昌，何成濬偕徐源泉、萧之楚、郝梦龄等在前方督战。

△　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以湘南战事结束回广州。同日，该路黄质文旅占领湖南祁阳、永州。张桂军退广西全州。

△　蒋介石在陇海路前线接见上海外报记者团。午前兵站总监俞飞鹏陪同外报记者团前往柳河参观战迹。6日，记者团回南京，谓据蒋介石称一个月内，必可消灭叛军。

△　讨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在驻马店枪决“暗来煽惑军队”之孙殿英参谋长张履安。

△　湘鄂边红四军与洪湖地区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中旬，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红四军改称红二军，军长由贺龙兼；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段德昌。全军团共一万余人。

△　闽海陆军决定分三路进剿卢兴邦部。以刘和鼎任一路，由古田、闽清进攻延平；方声涛担任二路，由德化、大田进攻尤溪，双方同时并进；海军并派战斗机协剿。是日，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对卢兴邦部发动总攻。

△　行政院令财政部转饬各海关注意检查并禁止携带木印古本、墨刻古本书籍出境。

△　日本政府正式委任重光葵长期代理驻华公使，小幡使华问题无形打消。

△　中国侨日工商业者因金贵及日本金解禁影响，纷纷失业，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第一批40人于上月底抵上海，第二批300余人是日到上海，尚有100余人待第三批运回。自费留日学生因日金突涨，废学归国者亦多。

7月5日　　胶济线晋军对韩复榘军开始攻击，正面王靖国部隔淄河与韩军对峙，右翼李服膺部抄攻青州（益都），左翼冯鹏翥部已由临淄渡淄河，直攻大王桥。次日战事愈烈，青、济间交通完全断绝。

△　粤军沈荣光部占怀集，万全策部占昭平。桂军周国治部向平乐撤退。次日，桂军李宗仁、黄绍竑先头部队抵桂林，白崇禧由永州分途退平乐、柳州。

△　淞沪警备司令兼苏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熊式辉在沪召集三

省“剿匪”会议，通过联防“分剿”计划。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立法两院，准孔祥熙提议，外商在我国设立公司，应依据相互认可原则，以对方国家是否允许我国公司在彼国注册为先决条件。

△　据《申报》讯：最近一周间，上海汇丰、大通、麦加利、有利四家外国银行出口银块200万盎司，运往孟买销售，沪生银存数因之减少颇多，银价亦得维持不替。

7月6日　蒋介石下令将横亘200余里的陇海正面战场分成六个守备区，第四十六、五十五师为第一守备区，教导第二师、第五师为第二守备区，第六、二十三师为第三守备区，第一、二、三守备区统归右翼军总指挥陈调元全权负责；第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师为第四守备区，第八、五十二师为第五守备区，第九军为第六守备区，第四、五、六守备区统归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负责。第一军、第四军、第十六军及第一师为总预备队，由顾祝同任总指挥。

△　冯玉祥到许昌，即召集邓宝珊等会商军务。

△　红十军方志敏部攻克赣北重镇景德镇。7日，红十军独立团邵式平、李上达部围攻万年，与江西省警备大队等激战。9日，景德镇红军转移。

△　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各市政府，定南京、上海、青岛、天津、汉口五市直隶行政院。

7月7日　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调粤军第五十九师余汉谋部往桂截击张、桂军，余师是日抵梧州。同日，何键第四路军占全州，张、桂军向桂林退却。何键兵分两路，向界首、兴安推进。

△　刘光奉蒋介石令由南京赴东北，携带国民政府任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之委任状密交张学良。

△　王正廷在外交部总理纪念周上就外交使团之地位问题发表谈话，略谓使团领袖决无代表各国向驻在国说话之理，前清办外交者不明使团性质，一任使团越轨要求，现决不让不合理之习惯存在。8日，北平使团领袖荷使欧登科以关于津海关事件之照会交由驻沪美总领事克银汉送至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办事处奉部令将原件退回。

△　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在沪开第一次理事会议，选举孔祥熙为理事长，刘鸿生、陆费伯鸿、荣宗敬、徐寄庼为常务理事。

7月8日　　蒋介石任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先领第一、第九、第十一、新编第二十师及教导第一师是日起陆续开赴滕县、邹县、兖州、曲阜、汶上等地；又调蒋光鼐、蔡廷锴、钱大钧、金汉鼎各师迅向津浦线集中；李韫珩师由海道航运青岛支援韩复榘军反攻济南。26日，各师到达津浦线集中完毕。

△　韩复榘联合第二十一师刘珍年部连日向济南猛攻，第二十六军范熙绩部与晋军战于姚家店一带。是晨蒋军占巨野，10日占定陶、菏泽。

△　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及省府各委员因全省半入作战范围，省府迁避一隅，电行政院辞职。

△　行政院会议通过交通、海军两部请在西沙岛建筑无线电观象台案，建筑费18万元。

△　《中美航空合同》由交通部长兼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王伯群与美国飞运公司代表波林在上海正式签字。31日，《中美航空合同》公布。公司规定双方合组股份有限公司，定名中国航空公司，经营中国航空载运业务，资本定为1000万元，交通部认550万元，飞运公司认450万元，期限十年。

△　教育部通令严限南京私立学校在本届暑假期满以前，即十九

年度第一学期开学以前一律立案，各地私立学校立案期限，至迟以下届暑假期满，即二十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前一日止。

7月9日　　蒋介石电陈济棠奖勉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湘南破敌，并谓蒋光鼐“屡建奇勋，自当令其专任一路”。

△　闽西红十二军邓毅刚部克永定。10日，邓部返龙岩。

7月10日　　青岛出入口商200余人以在青岛纳税后，过潍县以西仍须重复纳税，是日联合将大港货物统捐局及分卡捣毁，警察及保安队赶到，逮捕为首者10余名。

△　福建省政府主席兼海军部长杨树庄自沪乘舰返闽主持政务，是日抵福州，次日即召集军政要员商彻底解决卢兴邦办法并令海军封锁南港。闽南各军由方声涛与新一师师长张贞商定即出兵讨卢。

△　上海报界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发表反对美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承购租界电话宣言，声称“敝会等痛心国权丧失，无泪可挥，唯有拼洒满腔之热血，追随国人，与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以争最后之胜利”。次日华人用户再呈国民政府，请饬交通、外交两部据理力争，表示决作政府后盾。交通部亦咨催外交部严重交涉。惟上海租界工部局表示，在中国未收回租界前，彼方享有售让租界电话之权利。

△　晚，闽西民团攻入泉州。驻军高为国部退出城外，继复反攻，民团败退，高部复入城，于11、12两日大肆劫掠。

7月上旬　　冯玉祥再令陕、甘、宁、青四省府饬教会交还土地于中国。据《申报》北平电讯称，如实行后，冀、晋、察、绥四省亦将援例办理，仅冀、察、绥三省教会土地、房产即值两万万元以上。

7月11日　　江海关监督公署奉财政部训令，为奖励出口货物，所有各商运销海外之商品，无论土制、机制、仿制，均由就近海关征收出品税一次，以后经过各关，则仅验照单，不再纳税。

△　上海法商水电公司工人罢工已逾半月，仍未解决，资方态度强横。10日，法商电车被工人捣毁六辆，是日晚法界电车、汽车又被击毁四辆。

7月12日　陇海线右翼晋军孙楚部约三团，拂晓乘中央军第五师与第二十三师移防，在两师阵地连接处突入，一部猛袭中央军阵地后方，一部进占霍楼、戴岗各要点，第五师不支，撤至萧老家、周庄之线。是役第五师伤亡失踪800余人。13日，中央军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率教二、第一、第五各师恢复戴岗附近阵地，双方反复进出，战斗异常激烈，中央军又伤亡400余人。是时晋军复向中央军左翼第八师及第四十七师阵地猛攻，晋军伤亡亦达千余人。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已成混战局面。晋军因伤亡太重，至14日停止攻击。

△　国民政府令准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辞职，任命邵裴子继任。

7月13日　下午，北平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预备会在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仅邹鲁、谢持、覃振、陈公博、王法勤、白云梯、潘云超、傅汝霖、张知本、赵丕廉10人；另有代表郭泰祺、冀贡泉、黄少谷、麦焕章、刘况五人。会议由王法勤主持，赵丕廉宣读《联合宣言》，即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由出席之中央委员及未出席之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薛笃弼、鹿钟麟、商震、茅祖权、陈树人、朱霁青、柏文蔚、郭春涛、陈璧君、陈嘉祐、熊克武、李宗仁、顾孟馀、许崇智、邓泽如、黄绍竑共30人署名发表。北平、天津悬旗三日志庆。《宣言》历数蒋介石种种罪行，称“蒋中正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变民主集中制度为个人独裁；“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宣言》表示“誓为本党去此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

△　胶济线中央军第一军团韩复榘部开始总攻击，与晋军第三十七师王靖国部、第三十八师李服膺部，隔淄河互相猛烈炮击。晋军调平、津保安第一纵队丰玉玺、保安第四纵队秦绍观两部助战。同日，

韩复榘在青州召集军事会议，决任第十四军军长曹福林为前敌总指挥。

△　晋军第四军军长李生达率周原健、霍原璧各师及张会诏军一部，沿津浦线南下，是日与曲阜、兖州之蒋军接触，激战三昼夜后，向大汶口、泰安退却。

△　平汉线西北军增加刘郁芬部生力军两个师、骑兵一个旅，是晚开始进攻沙河北岸，与中央军第十军徐源泉部激战三昼夜，至16日被击败。

△　鄂豫皖红一军第一、二师在英山游击队配合下，于英山县大金铺地区歼国军独立第二旅1000余人，乘胜占领英山城。

△　交通部令无线电管理局接收管理美商大来洋行在沪所设之无线电台。

△　沈阳自13日起连日暴雨成灾，浑河、辽河水势暴涨，淹没农田甚多。北宁路新民、白旗堡一带，因饶阳河、柳河山洪暴发，冲毁田地千顷，火车被阻。连日沈阳通至外地的电报、长途电话，除哈尔滨二线外，余俱遭风雨摧毁。北宁路局调查此次被水冲坍桥轨，损失200万元。

△　上海江海关在“加拿大皇后号”轮内，搜获偷运出口之金条300余条，共值七八十万元之巨。另据电通社是日大阪电称，大阪造币局在最近一个月间，陆续购入自华运到黄货已达400万元之多。

7月14日　冯玉祥为解亳州之围，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吉鸿昌四路对宁陵、归德迂回出击，牵制中央军主力大部，复将新调左翼援助石友三之孙连仲一路全部秘密抽出，由考城、兰封经杞县、太康、柘城斜趋鹿邑。13日，孙部与原守鹿邑之孙殿英部一师会合，自是日晨起突向围亳中央军猛攻，孙殿英亦自城内以全力出击。围城

之中央军第三军王均、第八军叶开鑫、第十师杨胜治各部腹背受敌，由晨战至午，向东南退却，亳州解围。

△　国民政府特派伍朝枢、蒋作宾、高鲁为出席国际联盟第十一届大会代表。

△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命薛岳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吴奇伟为第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　国民政府接收威海卫专员徐祖善在威海卫与英国驻威大臣庄士敦商定接收细目，是日由威海卫返南京报告。

△　上海沪东杨树浦路老怡和纱厂工人3000余人，因反对厂方实行三日调班工作制举行同盟罢工，提出取消三日调班工作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期内工资照给、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要求。

7月15日　汪精卫由香港搭“加贺丸”赴长崎，陈璧君、顾孟馀、曾仲鸣同行。19日抵达长崎，20日到门司。

△　教育部以《中日文化事业协定》现正交涉废止，暂停序补庚款生缺额。同日，教育部通令，赴日调查教育无论团体或个人，概不得领受日本对支文化事务局之补助费用。

△　广东省政府通过总额1500万元之地方善后库券，定8月1日发行。

△　《动力》杂志在上海创刊。

7月16日　平汉线西北军南路军第八师张维玺、第七师田金凯、石振清及刘郁芬等部，是夜分四路向中央军全线进攻，刘郁芬部向郾城攻击最猛，至次日黎明，冯军不支，向北退却。中央军左翼十五里店、新店及右翼消遥镇、青龙潭之线，亦与西北军激战竟夜，西北军全线退回原阵地。

△　关于中苏间黑龙江、额尔古纳及乌苏里河之航务设备及码头修理等事，经双方磋商结果，是日由黑河道尹张寿增与苏联黑河领事阔尔臬夫签字，协定有效期间为两年，至1932年1月1日止。

△　上海太平银行开业，资本总额100万元，实收55.5万元。董事长李木公，总经理朱静安，经理万茂之。

△　上海中华国产联合大商场开业。

△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为了坚决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路线，决定在南京、武汉举行暴动，上海实行总同盟罢工，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国际批准。

7月17日　晋军杨效欧、孙楚等部约数团于16日夜向中央军新二十三师申庄、杨帝庙、华陀庙阵地猛烈进攻，并突破申庄、杨帝庙阵地，第二十三师伤亡600余名。晋军在两日激战中亦死伤千余名。

△　晚，何键第四路军李觉、陈光中两旅占领广西灵川，张、桂军退桂林。陈济棠第八路军第五十九师余汉谋部15日已越过阳朔向桂林进展。滇军三团18日由龙州抵南宁。桂军一部退大河，一部退武鸣。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废止《社会团体组织程序》。修正方案规定：凡欲组织团体者，须有50人或30人以上之联署，向当地国民党党部申请，经国民党党部认为合法方可组织，并须受国民党之指挥。惟上海市政府曾奉行政院指令称：商会及工商业同业公会之组织，一则以公会商店为单位，一则以公司行号为单位，与其他人民团体不同，自可不受《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之限制。

△　自美国所拍侮辱华人的《月宫宝盒》、《不怕死》两部影片

在沪上演后，公私团体纷起反对，外交部当即据情向美使詹森提出抗议书，美使已正式向外部道歉，保证以后决不会再有是项影片发行，并已令饬美国电影商人将该项影片迅予销毁。是日教育部长蒋梦麟、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衔发布命令，今后严禁外人在我国内地拍摄关于华人举动之影片。

△　蒋介石委杨鼎中为桂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办理广西善后，杨是日赴梧州就职。

7月18日　　陈济棠第八路军范德星部占领平乐，黄廷桢旅抵恭城。19日，第六十三师李扬敬部由龙虎关出恭城，会同第四路军夹攻桂林。

△　蒋介石委杨虎城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是日杨在舞阳就职。

△　红十二军罗炳辉部三四千人，17日开始围攻江西永丰，是日占领该城，复与红三军黄公略部沿赣江东下，向新淦、清江进展。22日占新淦，次日又占清江。

7月19日　　津浦线晋军傅作义部从正面反攻，与中央军第十一师陈诚部在大汶口南面激战。晋军李生达、冯鹏翥等部分由左右两翼向曲阜之线侧攻，激战甚烈，晋军不支，退至肥城一线构筑工事。

△　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乘飞机往亳城前线指挥第三、八两军攻亳战斗。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电攻击北平扩大会议，略谓："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则诋邹、谢为叛徒，而阎之与冯，积不相能，又为国人所共见。以历史上互相水火之人，竟称同志开会议，为一时利害之结合，目的只在于产生伪党部、伪政府，以遂其害国殃民之诡计，与袁之筹安会、段之善后会，尚复何异。"

△　是晚，方声涛自漳州抵厦门，教导团长萧叔萱亦自同安到厦

门。20日，方、萧及林寿国开会讨论闽南出兵事，林称省已决定分三路讨卢，共出兵十三四个团。

△　平浏岳“剿匪”指挥官危宿钟指挥第十五、十九两师出发平浏，与鄂、赣军“会剿”红三军团彭德怀部。20日，危部与红军战于平江，21日被击败，何键急调邵阳驻军增援。

7月20日　平汉线郾城西北军全线总退却，张维玺、田金凯等部退至许昌，中央军向临颍、许昌追击。

△　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应张学良电约赴葫芦岛，21日与张学良洽谈东北出兵讨阎。

△　军政部接川军将领田颂尧、刘文辉、刘湘、杨森等联衔电，略谓：“同人决一致拥护中央，报效党国。前奉钧部命令，监视吴佩孚意图活动一节，自应恪遵办理。”

△　湘省废约会以日轮在常德撞沉民船，呈请国民党省指委会转请国民政府向日领严重交涉，并请从速收回内河航行权。

△　永定河决口合龙典礼是日举行。河北省河工局招待各界，到200余人。永清、固安等11县代表要求改变向来只顾北岸、不顾南岸之方针，称中央不拨付修堤工程经费，由河北省府向银行借款60万元及向各县摊派借款，已将工程初步完成。

7月中旬　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电英外交大臣及上、下议院，请按英国法律治辛博森应得之罪，以维中英友好。

△　上海日人所办同文书院，于每届毕业期间，辄组织考察团，分赴我国各地调查市政、经济、交通、海港、铁路、森林、植棉等事业，窥探国情，现又分派18队，其足迹几乎遍布我全国。内政、外交两部转咨各省市政府，通令民政、公安各厅、局注意取缔。

△　第四路总指挥何键批准《湖南“铲共”义勇队组织章程》，规定18岁以上、40岁以下男子均须参加，规避者以通“匪”论罪。

△　教育部令北平市教育局查禁燕京大学宣传宗教。

7月21日　拂晓，孙殿英部向围亳中央军阵地佯攻，22日夜2时大部由河北寨撤走，余部出西门随同孙连仲援军齐向西北退去。中央军遂占亳州，解除了阎、冯军对其侧后的威胁。23日拂晓，鹿邑之冯军亦撤退，中央军进占鹿邑、柘城，向太康追击。

△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委危宿钟为湘东“剿匪”司令，并限三个月内“肃清”湘赣边红军，危于是日就职。同日，危就蒋委陆军第十五师师长职。

△　晨，上海法商水电工人开扩大会，机务、车务两部工人200余名齐集法租界马浪路工人俱乐部内。法捕房立派武装警察、巡捕100余人，对工人滥施枪击，并捕受伤工人20余人，流弹击毙一无辜行人，群众大愤，参加罢工人数遂达1000人以上。各界工会起而声援，请外交部向法方抗议。是日，法租界实行戒严。

△　浦东英美烟厂工会因近来金贵银贱，物价飞腾，工友生计难以维持，是日上午派代表顾若峰等三人会同市党部、社会局代表，向厂方正式谈判，要求增加工资。结果决定由7月1日起全厂普遍加薪，每人一成半，由工会通告各工友知悉。

△　教育部准私立岭南大学立案。

△　前广西副都督王芝祥在通州原籍病故。

7月22日　平汉线西北军张维玺部于21日晚突然总退却，中央军第四十四、四十八、十七等师乘势尾追。是晨，第四十八师占临颍，第十七师占颍阳，23日占领颍桥、小商桥，西北军退许昌以北。

△　蒋介石电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将“讨逆有功”将领王均、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顾祝同、蒋鼎文擢任各路总指挥，上官云相擢任军长，郝梦麟、萧之楚、杨胜治擢升副军长，请准备案。25日，国民政府复电嘉勉蒋介石，各将领擢升准予备案。

△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红十军正式成立，周建屏任军长，胡庭铨任前委书记兼代政委（后由邵式平接任），下辖三个团一个独立营，共2000余人。

7月23日　汪精卫、顾孟馀等改易姓名自日本门司搭“长城丸”抵塘沽。阎锡山之代表贾景德、冯玉祥之代表薛笃弼及陈公博、邹鲁等往迎，旋即赴北平。汪在津各界欢迎宴会上演说，要求蒋介石觉悟自己的责任，自动下野；声明与阎在政治与党务方面的主张已趋一致，希望阎任国府主席，自己“对于政府则拟处于赞助之地位，而专心于党务方面”；重申以党治国的原则，反对蒋以党代政，以党代民意机关，独揽一切的做法；呼吁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切关系”。

△　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已面临新高潮，指出右倾仍然是主要危险。

△　法属殖民地越南当局强迫华商改用法文簿记，行政院是日令外交部再向驻华法使严重抗议。

△　晨，闽南陈国辉突派兵两路约千人进攻永春湖洋乡，25日再次猛攻。方声涛迭电制止无效。26日晚5时，民团不支，湖洋为陈部攻陷，全乡人民被杀数百人，逃散仙游及各乡者达万人。

△　广东海关正式宣布中山港为无税埠。

7月24日　外交部公布《中法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及附件，全文共11条，有效期为五年。其要点为：一、以前所订商约一律作废；二、双方在龙州、思茅、河口、蒙自、河内或海防、西贡互派

领事。两国人民过境手续享受最惠国待遇；三、经越南北部出入滇、桂、粤的中国货物，照值百抽一纳税，矿产、生皮及中国政府的军火免收捐税。越南船只得在松吉江、高平河间航行，所载货物免税；四、双方应互相查缉、逮捕、引渡对方的罪犯。

△　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奉蒋介石令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率部参加津浦路右翼作战。

△　红一军团红十二军罗炳辉、红三军黄公略部占领樟树镇，续至丰城，并渡赣江向高安进军，26日经过高安，于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并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

△　中东铁路电权会议自21日开议，经三日之讨论，于是日由中苏双方将议决各项签字，为将来商订合同细则之根据；其未决事项，留待东铁理事会开会议决。

△　成都市学联会、工会、自由大同盟等团体发起成立成（都）华（阳）反帝大同盟，是日在北道街省师附小开会，军警派便衣混入，侦悉该盟通过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等议案，即将会场包围，逮捕工人11名，男女青年36名，后转送军法处，判死刑者四人，余判长期徒刑。

△　上海美领克银汉6月26日复函外交部关于公共租界电话出售事件之抗议，谓租界电话公司之出售，系遵照英国公司法，工部局负有管理公共租界之责，其允许在电话营业权给予国际电报电话公司，颇为正当；并否认此项营业权之存在，足以妨碍将来关于租界地位之各种谈判。是日，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华人用户联合会电外交部，谓“收回租界为党国之明定政策，钧部且有准备于一年以内交涉收回租界之宏图”，请本革命外交之精神，严词驳斥美领之复函。

△　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在沪福州路外滩招商局门首遇刺身死。28日，交通部委航政司司长蔡培暂兼招商局总办。

7月25日　北平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连日开谈话会，汪精卫与扩大会议各委员拟定基础条件七项，以筹备国民会议、制定根本法、集中人才、均权制等为主要原则。汪并招待记者发表谈话，谓宁方一切措施，直为“训政”之敌；并谓：“现在组织政府，主席一职以阎百川氏（阎锡山字百川）最为适宜。”

△　平汉线中央军徐源泉第十军先头部队是晚逼近许昌，冲破第一道防线；左翼杨虎城部由小商桥向北推进；右翼徐源泉部占领苏桥，向和尚桥猛攻。西北军全线动摇，纷向北退。

△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以红军多次迫近南昌，任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兼南昌戒严司令。是日，张辉瓒宣布南昌临时戒严。

△　晨7时，厦门共产党人袭击当地盐务局，思明监狱28人越狱。

△　据《申报》讯：交通部对内河航权问题决本收回主权精神，对日本之以互惠内河航行为交换条件，英商之以合办为条件，均万难承认；并定沿海航权交涉原则，外轮在中国此海口至彼海口仅能卸货，不得载客运货，将据此续与各国交涉。

△　阎锡山派徐一清到平筹组中华国家银行，以徐为总经理。该行定8月1日开幕，基金定一亿元，由晋方及各省分担，晋方先拨2500万元，发行1000万元兑换券。

△　上海法商水电公司工人罢工运动逐渐扩大，人数已增至1200人，该公司电车全部停驶。29日，上海全市各业70余工会联衔发表总宣言，声援法商水电公司罢工工人。

7月26日　交通部咨外交部，请对于收回南满日邮案从速交涉。

△　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布告悬赏10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

△　国民政府训令裁撤财政委员会，限9月30日以前遵令移交。

△　主办山西村治学院并促使阎、冯合作之王鸿一病殁北平。村治学院由梁漱溟接办。

△　青岛人力车工人百余人赴市党部请愿，公安局派警在该部门前守候，工人一出即拘捕，工人避于市党部内，警察即将市党部包围，入内捕去工人81人，并查抄该部办公室。27日，青岛人力车工人全部复工，车租降为0.38元，同日，市党部认为市政府有意摧残劳工，破坏党务，遂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惩办市长葛敬恩，并严饬市府释放被捕工人。国民党中央电青岛市府，对人力车工潮妥为防范处理，以期早日解决。

7月27日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在平江、浏阳工农武装的支援下，由浏阳、平江、金井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经五昼夜激战，是日克长沙。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割须易服，狼狈逃走。长沙街上遍贴“暴动夺取长沙，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工农兵联合大暴动建立苏维埃自己的政府”、“打倒国内混战的军阀”等革命标语，极受劳动人民欢迎。

△　第四、八两路军向桂林总攻，第八路军第六十三师李扬敬部黄任寰旅出恭城，绕道攻桂林正面；第五十九师余汉谋部由阳朔攻桂林；第四路军由兴安击桂林之背。张、桂军因四面被围，大部沿桂柳公路退柳州。

△　驻琼崖定安县军队两连兵变投入红军，随即向县中各区团和乡团进攻，缴团械数十。8月7日红军占陵水县，9日攻下万宁县。海口驻军乘长途汽车前往陵水、万宁、定安等县进攻红军。

△　5月间汉口警备司令部查获“裕川”轮载运未缴特税、价值200万元之鸦片烟土案，是日经武汉行营所组织之审查委员会审查完竣，依湖北省向例，凡经宜昌不贴印花之烟土即为私土，认为该轮所载全

属私货，主张由行营下令没收，并惩办假托联运而通同舞弊之前特税处长等。

△　日商石原公司操纵大冶铁砂，湖北省府以未经签订正式合同，取消其承买权，日商遂请驻汉日领事向湖北省府抗议，并电请日代使重光葵向外交部提出抗议。是日，外交部据鄂省府复函所述案情，照会日使据理驳复。

7月28日　　汪精卫在北平通电慰问反蒋军全体将士，声称“此战为民主与个人独裁之战”；并与外国记者10余人谈话，宣称南京政府以党部代替地方议会，人民“在南京政府下所享之民治，较在军阀手下为少”，对于南京无妥协希望，“必须在此间建设政府”。

△　北平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开第一次谈话会，通过并正式公布党政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根本大法，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根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大会议宣布，将来候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作起，要“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贯彻总理遗教“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的原则，应集中人才，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七、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定8月7日召开正式会议。

△　蒋介石从陇海战场急调陈诚第十一师、冯轶裴教一师增援兖州。阎锡山转对津浦线取守势，对胶济线取攻势，对韩复榘步步紧逼。同日，韩复榘在潍县通电下野，称：“煮豆燃萁，摘瓜抱蔓，我退一寸，人进一尺。”

△　青岛市政府以市党部指委李翼中煽动工潮，并利用《民国日

报》、《青岛民报》进行宣传，“污辱”政府，特令两报自29日起停刊。29日，被捕之人力车工人80余名被释，尚有数十“情节较重者”仍被扣押。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等电青岛市党部，谓：“此次纠纷，中央已定调处办法。本部根据中央意旨，已电葛市长恢复《民国日报》及《青岛民报》自由，以便照常出版。并望诸同志本巩固后方之旨，静候中央调处。”3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青岛市长恢复两报自由。同日，李翼中奉召赴南京。

△　外交部第二次向英国政府抗议辛博森助阎夺津海关。

△　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张之江以禁烟法令无法贯彻，再呈行政院辞职。行政院指令慰留。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函上海市府电外交部，请收回外人在沪西越界修筑之路，并向工部局抗议，要求交还。

7月29日　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教导第三师长钱大钧、汉口市长刘文岛、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叶蓬等开会，讨论进攻长沙红军之计划及武汉方面之警备问题，决定调宜昌之独立第十四旅彭启彪部及黔军新十师谢彬部至武昌，担任武汉警备事务。

△　鄂豫皖红一军第一师攻占湖北花园，全歼钱大钧第三教导师一个团，俘敌官兵千余名，缴获长短枪700余支、重机枪八挺、迫击炮四门。

△　南京市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参加扩大会议分子，将有党籍者开除党籍，并请查办监察院长赵戴文。

7月30日　津浦路中央军云集，蒋介石由归德乘专车到达兖州，召集刘峙、杨杰、陈调元、蔡廷锴、蒋光鼐、冯轶裴等开会，部署反攻，决定兖州附近会战计划，晚由兖南返，赴曲阜视察。

△　上海特区法院奉国民政府令搜查卡德路苏联塔斯社驻华社长罗佛寓所，毫无所获。

△　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长沙成立，李立三任主席，当即颁布《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劳动法》与《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土地法》，以保障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和农民获得土地。

7月31日　北平扩大会议再开谈话会，推顾孟馀、陈公博、傅汝霖起草“中央党部”规则；王法勤、覃振、赵丕廉起草“中央政治会议”规则；并就红军占长沙发表“灭共驱蒋”宣言。

△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拟具进攻红军办法，电请武汉行营核示，并电告已令湘军在湘潭集中，即大举“进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亦暂行留汉，主持行营，并规定鄂、豫、皖联防办法。麻城、罗田由郭汝栋负责；商南、光山由戴民权负责；英山、六安由潘善斋负责。

△　九江因瑞昌方面红军迫近宣告戒严。市政府奉江西省政府令，通知在庐山牯岭避暑的外国人于24小时内离开。

△　农矿部以外国电力渔艇驶近我国沿海捕鱼，为维护渔业起见，除已函请外交部切实交涉外，是日咨请工商、海军两部，对划分领海界限，速拟妥当办法。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不顾中国人民反对，正式通过准许华洋德律风公司依照原订合同出售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并准于8月1日办理交割手续。

△　上海法商水电工潮迄今40余日，尚未解决。下午，工会会员开谈话大会，到500余人，张其祥主席，报告30日与资方代表杜月笙谈判情况。厂方表示要开除工会负责人徐阿梅及张阿毛两名。工友闻悉，愤慨异常，议决警告厂方，在复工后不得开除任何工人，否则仍

进行罢工。

是月　　日本大量吸收中国铜币。据统计，本年1月至6月底止，中国铜币以及住友矿业公司将中国铜币溶解混入煤渣，输入日本价值共达146.9万元，是月自中国输入铜货即值24万余元。

△　上海内国公债维持委员会以国内公债价格狂跌，金融市场极度混乱，特致函财政部长宋子文，提出四项补救意见，要求十日内付诸实行：一、请令证券交易所对卖出期货者，于成交后必须以现货交付交易所作为担保，其手头无货者，概不准投机卖出期货；二、请令中、中、交三行对各种库券本息票，仍照向例准予贴现；三、请宣布公债基金实况，并准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及市商会推派代表按旬清查账目，俾明真相，而杜谣诼；四、请令中、中、交各行对于以编遣、裁兵各债券抵押借款不得拒绝。

△　四川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查封西南、民立、岷江三大学。

△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上海成立。由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社会科学研究会、新闻记者联盟、电影演员联盟、世界语联盟、话剧演员及美术工作者联盟等组成。同月，在“文总”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

△　晏阳初等制定定县平民教育十年计划。分作三期：第一期三年，注意文字教育和县单位的教育系统；第二期三年，注重农业改进和生计教育；第三期四年，注重公民教育与地方自治；卫生教育则贯穿十年间。

8　月

8月1日　　中央军与晋军争夺济南之大规模战役开始，中央军部署如下：刘峙任津浦路总指挥，以陈诚、夏斗寅、马鸿逵、胡宗南四

师任中路，由兖州前方沿铁路进攻；蒋光鼐、蔡廷锴师附张乔龄骑兵旅为右翼，由新泰西端间道抄袭；以冯轶裴、胡伯翰、杨胜治各师及施中诚、陈孝思、梁鸿恩等旅为左翼，由铁道西侧汶上、宁阳之线进攻。另以许克祥师附第六十四师之骑兵一团为左侧纵队，经郓城、东阿、平阴、长清，向济南钳击晋军背后。以韩复榘为胶济路军总指挥，以从青岛登陆之李韫珩军两师为左翼军，第三路军为中央军，由昌乐以西地区沿铁路侧击，另以刘珍年军为右翼军，堵截晋军归路，全军共15万人，对晋军发起全线总攻。

△　晋军关福安、杨效欧、孙楚、杨爱源各部，已由陇海右翼调至津浦线。关福安、杨效欧两部布防于历城、泰安之间；孙楚、杨爱源两部集中泰安以南，前线设防于大汶口。晋军形势非常不利，胶济线方面晋军18个团是晚全部南下驰援。

△　冯玉祥通电各将领："望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决斗。先下归德者赏洋百万元，直下徐州者加赏二百万元，有敢迟疑不前、畏缩不进者，军法俱在，决不宽容。"

△　长沙红军与外舰之炮战益烈，英、美、日、意军舰均开炮，国民政府海军亦继续炮攻。何键之反扑部队已接近长沙。美、英、日公使馆协商对付长沙事件之办法，决定先向国民政府提出保留随时要求赔偿损失之权利。

△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上月31日关于长沙事件之照会，是日由驻南京副领事上村送交外交部。代理公使重光葵并赴南京交涉。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奉令往访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对长沙事件表示道歉并声明负全责。

△　马鸿逵奉蒋介石命，由青岛过胶州赴高密，极力慰留韩复榘。韩表示未将所属军队善后处置办妥以前依然负责。

△　红一军团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

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同日，红军撤围南昌，前往安义、奉新一线休整。

△　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在弋阳成立，方志敏任主席。

△　云南省领事裁判权已收回。自是日起云南省华洋诉讼概由中国法院受理。

△　上海法商水电工潮，资方拒绝调解，是日外交部奉国民政府命令，向驻华法使韦礼德提出严重抗议。

△　招商局内河轮船受英、日商轮排挤业已辍业。浙江省航政局将该局停航轮船全部租下，于是日恢复苏浙航路21条。

△　广东省政府核准发行民国十九年广东省整理金融库券，定额广东毫洋1500万元，为清理十八年度短期军需库券及维持广东中央银行纸币之用。自8月1日起发行。

△　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会衔布告严禁工人罢工，谓任何企业发生劳资纠纷，务须先行呈请主管机关依法调解仲裁，不得以罢工要挟。擅自罢工者，以扰乱治安论，由军警机关严行拿办。

△　北平师范大学学生300余人手持“打倒汪精卫”、“反对扩大会议”传单及红旗举行游行，被军警逮捕50人。

△　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八一”游行，有工人、学生多人散发传单、呼口号，被中外探捕拘捕八人。华界戒备甚严。

△　“艺术剧社”、“南国社”、“摩登剧社”、“大夏剧社”、“戏剧协社”、“光明剧社”、“辛酉剧社”在沪共同成立左翼剧团联盟。

8月2日　　北平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电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称，“本会议决，请李（宗仁）进兵长沙，必要时放弃桂林亦可，请

劝告各方将领与我方一致行动”。

△　中央军击破汶河南岸之晋军，强行渡河，占领南夏、北弈任、辉南、漳城等，并包围汶上县；另一部在郓城北击破晋军，迫近东阿。同日中央军占领新泰。次日，中央军击破泰安东南店子之晋军秦绍观部，俘1000余人。

△　益阳方面何键军已集合完毕，自1日起向长沙进发。第十五、十九、十六各师一部由湘潭向长沙前进，各军先锋队约两个团是晚经岳麓山下集中长沙对岸，集全部民船于左岸，由炮舰“勇胜”、“咸宁”二舰掩护炮击长沙。

△　长沙10余万工人在教育会坪举行“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和庆祝湖南省苏维埃成立大会，湖南省总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等80余团体参加，会后举行盛大游行示威。

△　日代使重光葵访外交部长王正廷，就长沙事件提出保留赔偿损失之要求，并请保护长江各地日侨生命财产。王表示遗憾，允于查明后答复。

△　财政部以奸商私运大宗铜元至日本图利，仅7月份一个月即达600吨，特令各关卡查禁。

8月3日　　阎锡山2日派冀贡泉专车到北平迎汪精卫，是日，汪乘专车赴石家庄，陈公博、邹鲁、覃振、薛笃弼、赵丕廉等同行。次日抵石家庄，汪、阎晤谈，交换关于党务等意见。

△　何键军向长沙发起总攻，在海军掩护下由岳麓山渡江，飞机亦飞往助战。4日夜9时起，何键军开始第二次总攻，由刘建绪率陈光中、陶广任第一路，罗藩瀛率陈渥等部任第二路，危宿钟率戴斗垣等部任第三路，分三路总攻击，在军舰“勇胜”、“咸宁”掩护炮击下渡河强攻。5日晨攻入长沙城，与红三军团进行激烈巷战。两小时后，红

军主动撤出长沙，向平江、浏阳地区转移。

△　方声涛通电称在泉州就福建省政府所委之军事特派员职，节制闽南各军讨卢。陈国辉在永春县之湖洋焚劫仍甚。

8月4日　　津浦线正面中央军第十一师陈诚部占领南驿、大汶口，绕道出左翼，攻下大辛庄、小辛庄、黄草岭、红岭、王家堂、凤凰山，绕攻界首。右翼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绕过曲阜，继续北进，6日围攻泰安，10日占领莱芜，当即分为三路北进。左翼冯轶裴等部亦绕过汶上、肥城，占领东平、东阿，一面包围汶上、肥城之晋军，一面攻取长清。防守汶河之晋军，因中央军左右两翼已迫近济南，恐归路断绝，乃下令北退，未及退完，即仓皇将大汶口铁桥炸毁，致使未及过河之晋军及民夫坠河溺毙者甚多。

△　国民政府公布《江苏省建设公债条例》，总额700万元，年息八厘，分两期发行，第一期400万元，于民国十九年8月1日发行，第二期300万元，于民国二十年（1931）8月1日发行，按票面九八折收款。自发行之日起每六个月还本一次，十年本息全数还清。

△　邮务总办韦以黼与上海邮务工会代表朱学范、职工会代表傅德卫等会谈解决两会要求改善邮务职工待遇之10项悬案，除增薪一项外，余款经修正后均予接受，邮务人员月加米贴二元，悬案圆满解决。

△　晨，福建邵武监狱暴动，数十人越狱。

△　连日来北方大雨成灾，山海关内外洪水益涨，留守营至北戴河间路轨被水淹没，是日起西行车仅通至白旗堡，秦皇岛迤西路轨亦被水冲毁数十米。秦皇岛海口发现多具浮尸。绥中县水灾奇重，死千余名，难民3000余人逃至山海关无家可归，北宁路局9日拨2000元前往救济。山海关迤东电报线、电话线亦均被水冲坏。

8月5日　　汪精卫、阎锡山在石家庄续议新政府之组织及人民与政府之权利义务问题。阎允任政府主席职。同日，阎对《大公报》记者谈与汪晤谈结果，谓有四点：一、人民求安，国家图治，三民主义当在安与治上设施；二、党员是为党，党是为国的，党员不得借党图自身之利益，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三、先定实行训政规约，以资遵守。规定严密办法，为实行训政前提，即社会安宁、财政公开、政治廉洁、取民有制以作实行训政基础；四、以革命精神整理破碎国家，以公道原则处理党政事务。

△　外交部以日本对长沙事件所提照会措辞有失国际礼貌，决定不书面答复，并令驻日公使汪荣宝将此意转告日外务大臣币原。

△　红军克湖北大冶。同日，据电通社发布消息，日本外交界极重视红军在大冶铁山之活动，以该铁山有担保债权关系，且供给日本制铁所原矿，若至原矿不能输出时，日本将对红军采积极的“自卫”手段。6日，大冶红军转移。

△　蒋介石委顾祝同为陇海护路司令，兼归德警备司令，顾于是日就职。

△　重庆新闻界因弁兵一再捣毁《西蜀晚报》举行全体大罢工。12日，新闻界全体组织罢工委员会，并发表宣言，请求各地新闻界声援。重庆市50余民众团体亦成立新闻界罢工后援会，作有力之援助。四川省政府恐风潮扩大，负摧残舆论之名，由刘湘第二十一军师长蓝文彬出面，于15日宴请新闻界，表示“愿负全责”。各报、各通信社遂于18日复刊。

△　行政院议决准贵州省设置贵阳市。

△　教育部聘高阳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

8月6日　　汪精卫自石家庄回到北平，即召开扩大会议预备会，

议决扩大会议组织大纲、扩大会议成立宣言及中央政治会议规则，并决定常务委员及组织、宣传、海外三部部长及民众组织委员各人选。

△　冯玉祥乘中央军分兵攻阎（锡山），突以主力迂回陇海线中央军右翼，攻击中央军侧背。中路以孙连仲所部三师攻归德；右路以孙殿英部三师攻马牧集；左路以孙良诚、宋哲元等部七八师之众向右策应，压迫睢县、宁陵之线，遂形成宁陵附近会战。蒋介石即调第三军团之第三师陈继承、第七师王均两部增援，并令第三军团副总指挥朱绍良将阵地变更，以适应兵力。相持至11日，蒋介石将兵力分为三个纵队，以上官云相、王均、顾祝同分右中左三个纵队，指挥兵力约七个师，三面围攻西北军。

△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议决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是日，由党、团中央及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的指导全国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机构——中央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向忠发、李立三、徐锡根、袁炳辉为主席团成员。李立三在成立会上强调党的总任务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致函中共中央，要求停止执行冒险计划。

△　日本海军省因长沙事件借口护侨，由柳原司令率领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到沪，完全取作战时紧急准备之形式，是日到三艘，次日又到一艘，并到陆战队300名。

△　美国驻华海军司令官署命令驻沪各军舰官兵即日起一律不准离船上岸，待命出发，并调华北及小吕宋之驱逐舰六艘到上海集中。

△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我国早欲收回改组为正式法院，迭经外部与法使交涉，迄未得确实答复。是日外交部正式照会新任驻华法使韦礼德，催早日商订解决办法。

△　外交部电驻英公使施肇基催询惩治辛博森真相。

△　何键派刘建绪师向株醴，危宿钟师向平浏追击红军，并在长沙大肆屠戮。次晨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向旅京湘人表示，“现在湘局，非何键不能收拾……”，但“若不分皂白，概行株连，则危险甚大”。

△　红十六军孔荷宠部在平江与罗霖新编第二十二师激战，晚向长寿街转移，罗部占平江。

△　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克江西安义。

△　太原成立山西省防共委员会，由军警宪各机关负责稽查，防止共产党人活动。

8月7日　　北平扩大会议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发表宣言，对七项基础条件加以具体解释，并通过《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和《党务宣言》。《扩大会议组织大纲》共九条，规定扩大会议设常务委员会，其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会议又决定以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为常务委员；汪精卫、邹鲁、陈公博、赵丕廉、朱霁青为组织部委员，以汪为秘书主任；顾孟馀、张知本、薛笃弼、潘云超、傅汝霖为宣传部委员，以顾为秘书主任；覃振、白云梯、陈嘉祐、陈树人、商震为民众训练委员，以覃为秘书主任。

△　前湖南省长赵恒惕在汉口日租界被日警捕获，拘押警署内。武汉行营交涉引渡。月末，赵经日当局释出，仍匿居日租界。

△　驻沪英军115名开赴汉口。同日，法东亚舰队司令已将天津之炮舰“摩里号”调沪；又从越南调炮舰“法里号”到沪待命。

8月8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所有湘、鄂、赣“剿匪”事宜，特派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负责办理，各该省驻军概归其节制指

挥。同日，武汉行营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

△　江西红一军团所部红三、四、十二等军，一部分沿瑞河经上高趋万载，一部分由奉新、靖安趋宜丰。是日占上高，9日占宜丰，12日占万载，拟赴湘边与红三军团会合。鲁涤平急电总司令部请派飞机来赣“助剿”。

△　江苏启东县红军百余人劫狱，放火焚毁看守、拘留两所，释囚百余名。指挥劫狱之红军连长陆凤岩受伤赴沪求医时被捕，16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杀害。

△　福建省政府下令陈国辉撤退湖洋军队，方声涛亲赴永春晤陈传达命令，陈表示服从。是日方声涛自永春回泉州，次日即令张贞新编第一师一团自泉州出发，11日抵湖洋，陈部即开始撤退，13日撤尽。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东北通古斯族调查团在《民报》发表《考察松花江下游赫哲族报告》，称赫哲族已由清初之3000人左右减少至500余人。

8月9日　邓演达等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30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纲领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指出中国社会的前途，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目的，阐明斗争的手段，并制定了具体的革命方案。次日，中央干部会发布该会正式成立第一号公告。选举中央机构——干部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

△　阎锡山令李服膺部开泰安增援津浦线。李设司令部于济南。是日，阎派其参谋长辜仁发向第二、四两路总指挥傅作义、李服膺传达命令，令其死守泰安、肥城、长清之线；更恐兵不用命，又派周

玳、谢濂为督战司令。

△　《中德国际航空合同》签订后，德国汉沙公司因时局关系，派代表石密德来华商变通办法，是日抵南京与交通部接洽。13日，中德双方代表王伯群、石密德等在南京开会，商定变通办法，其要点为：一、一年半之开航限期得比照中国方面军事延长之久暂，予以比例展期；二、除购机件款按照合同应由德方垫借外，中国方面应出之营业开支，因经济困难，亦由德方垫借半数；三、试航期内所用之机件由汉沙公司就现有机件中之最精良者运华备用。

8月10日　　1日至是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先后枪杀共产党人李惠荣、程之期、唐英洲、何恐等46名，逮捕嫌疑者86名。又公布禁令16条，违者一律处死。

8月11日　　津浦线中央军大部到达汶河南岸，刘峙本人亦到，遂下各路总攻击令。13日，第十一师陈诚部攻下界首。第六十一师第八旅旅长毛维寿亦由小道进至长城岭，与晋军血战两日夜，迄13日晚，占领距济南仅50里之仲宫镇。14日午复由仲宫北进，到达大涧沟，与晋军激战。同时陈诚部攻下张夏车站，左翼冯轶裴部教导师亦到达长清。各路晋军被截成数段，失去联络，中央军迫近济南，晋军遂下总退却令。

△　胶济线晋军缩短战线，开始后撤，以昌乐为第一战线，青州（今益都）为第二战线，一举放弃坊子、潍县阵线。韩复榘部曹福林军占领潍县，向昌乐追击。韩将司令部移峠山，并亲在该处督师。第十七军刘珍年部进抵白狼河。

△　何键一面对长沙总商会勒索军费40万元，一面挨户搜查，捕人盈千，杀害者达数百人，市民怨声载道。是日长沙盛传红军反攻讯，何键急下特别戒严令。

△　何键令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任长沙留守司令，王东原任警备

司令，亲率十九个团进攻浏阳，红军向赣边转移，是日戴斗垣部占领浏阳。

△　国民党中央发布告国民书，谴责北平扩大会议汪精卫等人，要求全国人民追随南京国民政府“戡平逆乱”。

△　内政部通咨各省市，称太平天国为“光荣革命史之一页”，被清廷加以种种蔑视之名称达五六十年之久，迄今各地修志及报纸记载，仍沿旧习加以轻蔑，嗣后如有记述太平事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等之名称。

△　天津英美烟厂反对增加统税，宣布停工抵制，华工因而失业者4000名。13日，统税局电阎锡山请示办法，谓自上月21日实行增税，至本月10日止，烟商少作56.8万元之买卖，税局减收28.4万元。14日烟商派代表朱子琦赴平，向赵丕廉报告。同日，英美烟公司经理皮勒见天津市长崔廷献，报告停工情形。

8月12日　阎锡山由太原乘专车秘密抵济南，召集张荫梧、傅作义、冯鹏翥、李服膺开会，以济南关系重要，如一放弃，则恐张学良出兵，平、津亦将不保，决定死守济南。阎并下令，“无论官兵，凡有后退者，一律枪毙”。

△　陈济棠在梧据报，桂军白崇禧、杨腾辉有分路攻大河之企图，急调第五十九师余汉谋部回驻蒙山，并将分布阳朔、平乐、荔蒲各师，悉数南移大河方面防堵。是日陈汉光、吕定祥等团回驻陈村塘、昭平一带，策应大河军事，黄任寰旅则开返大河平南江口，并与浔州（今桂平）之黄植楠团联络，警戒武宣江口。14日，黄任寰旅抵平南，扼守大河腹部。第六十三师李扬敬部亦陆续开回藤县、蒙江。

△　日本驻汉总领事坂根以近日外传有北方代表匿迹汉口日租界内暗中运动事，遂于是日警告日侨如下：“凡我侨民有与此种中国人同居或藏匿此种中国人者，一经查出，当处严罚不贷。”

8月13日　胶济线晋军继续退却，张荫梧部主力已弃青州，是夜韩复榘先头部队占领青州。刘珍年前锋各部迂回至博兴、高宛等地。

△　国民党中政会议定禁止金饰出口标准，规定凡个人携带金饰，须具饰品形式，且价值不得超过500元，旧式金叶及器皿一律不许携带；并令财部，对于私运金条出口商人“严予惩办”。

△　广西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及廖光华、王敬轩等在龙州失败后，奉上级命令，由龙州取道越南到香港，准备由香港乘广九车转赴东江。是日俞等由九龙乘车途经深圳时被捕。9月6日，俞与廖、王同在广州红花岗就义。

△　招商局为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抹煞外交历史，曲解该局向法教会三德堂租用金利源码头租约，判决毁约事，呈交通部，请转外交部于执行期前劝告法领事制止公廨执行，并恢复原租约。

△　欧亚航空公司设立。

△　荷属东印度政府又增华人入境税，决自1931年起，外人入境，须纳码头税150盾，华侨联合会是日电请国民政府迅向荷印政府交涉。

△　上海法商水电工人工潮经调解解决，双方签订条件为：一、罢工期间工资照给；二、每月增加工资2.4元；三、释放被捕工人；四、在工会任职之40名工人工资照发，其待遇与在厂工人同；五、抚恤金、退职金、年赏金原则接受，办法另议；六、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是日下午工人开胜利大会后整队往公司复工。

8月14日　平汉线正面中央军占临颍，右翼达扶沟、鄢陵，过许昌以北。16日，杨虎城部第十七师占领裴城，冯军退向苏桥。

△　济南晋军因受蒋军重大压迫，决定即退黄河北岸。蒋军飞机连日轰炸济南，是日炸死炸伤30余人。

△　山海关发生马旅事件。曾充寇英杰参谋长之陶敦礼，在山海关、北戴河间煽惑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及团长孟百孚、安福魁哗变，被于发觉，密报张学良，是日陶、马及两团长被张学良逮捕看押，即组织军法会审。

△　红十军进占赣北景德镇，帮助成立景德镇苏维埃政府和中共景德镇市委，继向鄱阳、都昌、湖口、彭泽一带推进。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关税短期库券条例》，凡14条，规定该库券为调剂金融、财政之用，总额5000万元，月息八厘，8月1日发行，按票面九八折收款，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本息全部还清。

8月15日　中央军蒋光鼐部第六十一师入济南城。蒋光鼐奉令兼任济南警备司令。同日，新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抵洛口黄河桥，截断晋军归路，俘获晋军官兵、械弹、辎重甚多。

△　陇海线冯军开始向汴洛撤退，兰封以西铁桥均被炸毁。18日，冯玉祥将一部分有力部队及多数武器弹药、粮食等运往陕西，以保存实力。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批准伦敦国际邮政汇兑协定等案，并决议拨款10万元办理长沙急赈。

△　天津法工部局在北方书店逮捕共产党人30余名，书店被查封。

△　陈国辉派兵两营自永春出发进攻卢兴邦。19日，陈部抵德化与卢部发生剧战。20日，方声涛电福建省府，谓已率各军向永春、德化前进。

△　全国税收会议在上海召开。

△　美国人安得思由内蒙古回到北平，窃取我国古代化石甚多。

△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发表《我们的任务》为题的发刊词，并发表8月14日之《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称“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号召“全中国劳苦群众都迅速的组织起来，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　《文化斗争》在上海创刊，“社联”、“左联”联合主编。

△　《申报》载：《不怕死》影片主演罗克致函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表示道歉。

△　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刘少奇率中国工人代表团20余人参加。

8月16日　中央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抵济南，召集蒋光鼐、蔡廷锴、陈诚等开军事会议，讨论渡河追击晋军方案。令蒋光鼐以一旅任济南警备，一部由洛口渡河向德州追击，一部沿胶济路向周村夹击晋军；杨胜治师担任肃清长清晋军；冯轶裴师、马腾蛟师、陈孝思旅分任解决肥城、泰安、汶上之晋军；许克祥师集中菏泽；夏斗寅师调往陇海；胡伯翰师调往汉口。

△　蒋介石通电告捷，详述津浦路作战经过，宣称克济南之役，夺获步枪三万余支，大炮230门，飞机三架。同日，国民政府发给首入济南之蒋光鼐部赏金20万元。

△　何应钦调动18个师兵力，下令对湘鄂赣红军发动总攻击。

△　蒋介石令任戴民权为新编第二十五师师长兼鄂北“剿匪”指挥官，戴是日在小河溪就职。

△　红军占领长沙后，英、日、美、意各国均增加驻华军舰，在

汉新式炮舰已达24艘。是日英国又将驻香港巡洋舰、驱逐舰各一艘调到上海。

△　天津《震报》因载军事消息，被检查处下令停刊。

△　外交部长王正廷、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商局代理总办蔡培等在沪进行金利源码头租约案交涉。18日，蔡培偕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副处长刘云舫与法总领事甘格林会谈，结果圆满，制止法廨执行，继续维持租约，即日进行公断。

△　南京卫戍部公布《首都新闻检查暂行条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首都卫戍司令部、首都警察厅共同派员组织首都新闻检查所，规定禁令六条，违者即予以扣报、停版、封闭或拘留负责人之处分。

8月17日　平汉线中央军开始总攻击。新第二旅刘培绪部在铁甲车协助下，于18日占领小商桥，即向大石桥前进。西北军晨起总退却。19日，中央军杨虎城第七军一部绕过许昌，抄袭郑州。

△　津浦线中央军集中济南附近，左右两翼越过历城，抵黄河沿岸布防截敌。新二十师许克祥部，已由洛口渡河，直趋晏城。18日，中央军左翼、右翼分左右抄攻德州两侧。19日，杨胜治部前锋抵禹城，晋军大部退德州。

△　胶济线晋军第三军王靖国部集中周村附近，向青城方面撤退，渡河北去。韩复榘部15日入青州，16日，韩到青州指挥各军向青城追击晋军。是日，第一军团总指挥韩复榘率参谋长张钺、总参议蒋伯诚等抵济。

△　红四、五、八军占领湖北武穴。19日，日本军舰“小鹰”到大冶，中国军舰“江贞号”随同出发。

8月18日　平津铁路天津、北仓间之第二十五号铁桥被中央军便

衣队炸毁。由太原密赴津浦路视防之阎锡山，早已通过该桥，幸免遇险。

△　晨，中央军飞机四架在郑州市内投弹20余枚，商民死伤数十人。

△　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市委任雪涛、北区区委谭籍安等20人在南京雨花台遇害。

△　武汉警备司令部组织数百便衣警察，加派汽车队往来巡逻，检查行人，遇有形迹可疑者即押送警备部审讯。该部并通令所属即日实施各区户口检查，遇有嫌疑者，立即逮捕枪杀。

8月19日　何键为筹集反共军费，聘请绅商各界左学谦等25人组织军资委员会，该会是日在长沙成立，决定第一期筹款抽收房租，向各行商派借款及挪用赈款、教育基金共200万元；第二期筹款决定举办善后特捐，征收田亩、资本、房屋捐，预计三月办完，可得600万元。

△　天津警备司令部布告禁止一切集会、结社、罢工斗争以及革命刊物之发行，违者以军法治罪，立处死刑。

△　闽西红十二军邓毅刚部攻下平和，旋向粤边推进。

8月20日　湘军戴斗垣旅三团人在浏阳文家市被朱德红一军团全部歼灭，旅长戴斗垣被击毙。何键在长沙十里近郊布置战壕，绵延五六十里，壕外布以电网，壕内满载竹钉等物，准备死守。

△　津浦路晋军组织变更，阎令将第二、四、五、六各路军合编为第三方面军左翼，自兼总司令，由张荫梧代行职权。

△　蒋介石为奖励津浦线作战有功将领，发表以夏斗寅升任第二十一路总指挥，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嗣后凡属外交事件，悉提中政会讨论后再交外交部执行。

△　廖仲恺五周年忌日，各地均有纪念仪式，何香凝自柏林发表感想文，对南、北均不满。

△　湘省府为彻底“清共”，特制定五家挨户联结实施办法12条，责令长沙市公安局切实执行。

△　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逮捕南昌市社会局长、共产党员熊国华，主张即予严惩，少数赣籍要员表示不同意，鲁遂电请国民政府准予辞职。17日，国民政府电赣慰留，勉鲁“奋勇从事”。18日，鲁将熊国华免职，交戒严部法办。是日熊在南昌大校场遇害。21日晨，与熊案有关之王湘等三人亦以“共匪”罪名被枪杀。

△　武汉政府发出布告，悬赏缉拿共产党人。21日，汉口警备司令部枪杀在江汉关中山公园示威之王仲友等五人。22日，将王笃庆等18人杀害；24日，又以“主谋暴动，接应红军袭取武汉”罪枪杀王纯仁等五名。

△　日使署及日外务省合派调查员三人，由上海赴汉口转长沙实地调查日侨在长沙事件中之损失。

△　王晓籁继徐寄庼任上海市商会主席。

△　南京市教育局奉教育部令派熊翥高接收晓庄师范学校，晓庄附小由江宁县接管。

8月中旬　　西康13县民众选举丁伯衡、马仲贤为全权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请速解决藏兵、土匪及苛政痛苦。国民政府令蒙藏委员会召集会议，拟具解决办法。

△　驻华外国使团令各地租界侨民，不许赁房给中国共产党人居

住，违者解回本国法办。

△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函教育部转饬各教育局严防共产党人在学校活动，如有发觉，即须拘惩。

△　河北、东北连日霪雨，河北省东南部、辽宁省西南部千余村庄被淹，若干村已绝食多日，居民栖于树巅及屋顶之上，溺毙者已达3000余人。

8月21日　　南北双方代表云集北戴河包围张学良，各以甘言相饵。是日，吴铁城奉蒋密令赴北戴河晤张，要求张就海陆空军副司令职。吴并语人，谓赶走阎锡山后，南京政府拟将北方地盘完全让给张学良。同日，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门致中、孔繁霨等亦自津赴北戴河。22日，张作相电张学良，谓必须始终严守东北门罗主义，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张学良旋复电谓一举一动必以东北四省地盘为前提，而加以慎重考虑。23日、24日，扩大会议代表陈公博、覃振接连在北戴河顾维钧别墅与张晤谈，苦劝张加入北方。但张不即不离，称自己一人难于明确答复，要等回奉和各重要干部商量后，再表明态度。

△　蒋介石由归德乘飞机到济南视察，命令韩复榘部担任津浦路追击任务。刘峙率津浦路作战各军陆续调往平汉、陇海两线，集中力量打击冯军。

△　夏斗寅部开往胶济线，会同韩复榘部肃清残敌。李韫珩部三师兵力22日起由潍县到济集中，准备渡河。

△　孙桐萱就蒋介石委任之济南警备司令职，并公布《戒严条例》，凡18条。

△　蒋介石任命第六十一师副师长戴戟代理该师师长，是日，戴在济南就职。

△　黄绍竑马电宣布自动辞去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职，并另电蒋介石呼吁和平息兵。黄辞职后，副总司令职由白崇禧接任。

△　东北政委会通令各地严禁生金出口。

△　台湾宜兰东南海中发生七级地震。

8月22日　陇海线中央军占杞县，陈继承第三师占柘城，谭道源第五十师进驻高隆集。同日，秦庆霖新四师占鹿邑，西北军退集太康。

△　何成濬由漯河飞陇海前线见蒋介石，报告平汉线军事情况并请示进攻许昌、郑州事宜，当晚回漯河召集军事会议，准备一切。25日，何成濬、贺国光制定进攻许昌、郑州计划。

△　蒋介石自津浦路调三师兵力赴湘鄂赣“围剿”红军，是日教导三师指挥官胡伯翰率部三团由南驿乘车南下，23日乘轮赴鄂。

△　财政部长宋子文、教导第三师师长钱大钧及前湖北财政厅长李基鸿由南京飞汉口，筹款作军费。汉口银行团已允筹100万，宋子文认为不足，夜宴银行界，商请完成盐税300万借款。

△　北平警备司令部开治安会议，议决对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分子格杀勿论。

△　浙属各县茧商近因大批日茧运沪廉价竞销，华茧业大受影响，是日联名电呈国民政府请求严密取缔，或课以重税，寓禁于征，称“若不禁止，则源源运华，我国蚕桑事业，从此破产”。

8月23日　国民政府据蒋介石养（22日）电下令谕导阎、冯方将士来归，谓“苟能去逆效顺，政府自必录瑜弃暇”，“若尚执迷不反，是甘与阎冯诸逆同其恶终”，“中央当尽力讨伐”。

△　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三万余人。与此同时，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一方面军组成后，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

△　立法院秘密会议通过《处置共产党条例》，决定对共产党人“加重治罪，格杀勿论”。

△　晨4时，南京卫戍司令部军警百余人依次检查中央大学各斋舍，捕去寄宿该校之外校员生72人至警所审问。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与大东、大北、太平洋三水线公司开议增加水线价目，讨论增加借线转递电费，决定以专员会议形式定出办法，以减少正式会议之困难。

△　日华纱厂工潮至今已一个多月。是日日华纱厂工会整理委员会发《敬告全国同胞书》，吁请各界援助，在罢工期间，一律抵制日货，声援罢工。

8月24日　中央军马鸿逵部第六十四师第一旅从泰安西门外挖掘地道炸毁城墙一角，城内晋军秦绍观部第四保安纵队全被缴械。困守肥城之晋军向张家店逃跑，被中央军三面截击消灭。汶上晋军见泰安、肥城已破，全部溃散，在东平附近被歼。

△　冯玉祥代表门致中由北戴河赴天津，25日到北平会见汪精卫，报告与张学良晤谈经过。26日赴郑州见冯玉祥报告并请示办法。

△　蒋介石升任杨虎城所部第一旅旅长冯钦哉为第七十一师师长。

△　浙江嘉善后方医院伤兵2000余人突然出院，关闭城门，挨户

搜劫。

8月25日　陈济棠第八路军下总攻击令，分三路攻来宾、宾阳，余汉谋师任中路，黄任寰、杨鼎中任左路，李扬敬任右路。中路余汉谋师占领石龙、来宾，宾阳桂军退向南宁。26日晨，余师进占宾阳，柳州、南宁交通已断。陈以军事进展顺利，遂于27日乘舰离梧回粤，与省当局协商广西善后。

△　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由辽返南京，在外交部报告，称“东北对中央始终一致”；东北在政治、经济方面常受日、俄之侵害，深感有对付外敌必要，因此对时局不表示积极态度。

△　国民政府令准陆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张贞呈请取消陈国辉、陈烈臣、叶定国、叶起文四人通缉案。

△　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汉口华商银行团接洽第三次鄂岸盐税借款300万元，作为军费之用，是日签订合同。借款自9月1日起分七期（每期五天）如数解交南京国库。月息一分二厘，以鄂岸盐税收入期票500万元作为还债担保基金，至次年4月底本息如数还清。

△　重庆大火，午后10时始熄，北至三牌坊，西至大梁子，南至金紫门，下至太平门，广达数里，尽成焦土，被灾逾3000余户，毁房5000栋。

8月26日　国民党中政会外交组以英方关于处置辛博森之复照，措辞多失礼貌，且对辛博森多所庇护，决交外交部驳复。30日，外交部照会驳复英使蓝普森，谓“辛博森助逆事实昭然，应尊重英国法律予以严惩”。

△　龙云滇军分两路二次围攻南宁。卢汉所部向城西之西乡塘进攻，朱旭部则向城北之陆公祠山进攻。桂军韦云淞、陆福祥等以守城兵力薄弱退回城内扼守。27日，滇军前锋占领南宁城外木行街及东门

外三四标营一带地点，对城内桂军取弧形包围之势，但缺乏重炮，屡攻南宁未下。

△　新编第十一师师长赖心辉部戴天民、向成杰两旅由巴东乘轮东下。是日，赖心辉乘轮抵宜昌，整理所部出川军队，被当地驻军奉刘湘命拘捕监视。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委员庄智焕等与大东、大北、太平洋三水线公司代表在交通部开水线废约会议，双方讨论废止水线合同后的新办法，争执激烈。对交通部所提办法最后有部分已经同意，惟关于报价尚未解决。各代表29日返上海。

8月27日　　北平扩大会议第三次临时会议决定党员登记审查办法。

△　中央军飞机到北平投弹10余枚，过天津时并以机枪扫射。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代理公安局长王锡符开紧急会议商防止办法，决定在景山、天安门、前门、永定门各置高射炮。

△　交通部再咨外交部，请向沪法领抗议顾家宅法商电台收发商电，以维护主权。

△　红二十军段起凤、肖之铎、曾炳春等指挥赣西南地方武装数万人进攻吉安未下。

△　红十四军第二师第四团第六营会同苏北各县暴动农民五六万人，攻下南通、如皋之间的交通要隘平湖市五楼桥，驻防警队悉被缴械，该地著名土劣王品山等被枪决。红军旋攻如皋。

8月28日　财政部发行关税库券5000万元，令各省摊募。闽省摊销120万，闽省府电请核减。鄂省府则请宋子文派员驻鄂会同劝募，否则只能承销一二十万。是日财政部公布《民国十九年关税短期库券发行简章》，规定奖惩规则，以昭激劝。

8月29日　　陇海线中央军下总攻击令。次晨，右路各军已过考城、红庙，迫近兰封；中路各军亦越野鸡岗、内黄，西抵仪封、双溃集、田陈寨、郭楼之线；左路各纵队进至高贤集、头段口等处，俘虏阎、冯军官兵2700余人，缴步马枪3000余支，野山炮10余门，重迫击炮30余门，机枪20余挺。

△　北平扩大会议为促阎锡山早日组织政府，派覃振、傅汝霖、陈嘉祐、赵丕廉四委员赴太原，贾景德、薛笃弼及郭泰祺偕行。

△　阎锡山下令赶修由通州至古北口军用汽车路，日人通讯社则借此谣传是日东北汤玉麟部三师入关驻北平附近之消息。同日晚，日军在天津南郊演习，枪声大作，事前未通知中国官署。

△　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龟缩长沙，即召危宿钟、刘建绪、罗霖、公秉藩等开军事会议，决由第十五、十六、十九三师拨六团死守长沙，危宿钟等率八团守易家湾，并由何键电请武汉行营加派飞机“协剿”红军。

△　赈务委员会主席许世英以各地灾重，纷纷请赈，而政府则借口财政困难，未能拨款，劝募又属不易，遂电请辞职。30日，蒋介石电许慰留。

△　新任招商局总办陈希曾因筹措招商局经费困难辞职，仍蝉联上海电报局长。同日，国民政府派李仲公代理招商局总办。

8月30日　　张学良由北戴河返沈阳，孙传芳、吴铁城、方本仁、刘光、王树翰等同行。张抵沈后即召集王树翰、臧士毅等开会，询问政务消息，协议此后东北四省各种方针。

△　红一方面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朱德、毛泽东率第十二军到达株洲附近；黄公略、林彪率第三、第四两军抵关刀铺；彭德怀率第五、第八两军主力，抵湘阴港附近，一部则沿浏长大道抵黄花市附

近。是晚起，红军对长沙发起总攻，迭以火牛为前驱，猛冲何键军所布电网，终因敌方火力太猛，未能攻破。

△　武汉行营令航空五队入湘，公秉藩、罗霖两师亦全部抵长沙，湘鄂铁甲车队次晨开猴子石协助第四路军迎击红军。何键严令官兵只准向前，退后者斩。同日，钱大钧教三师赴湘增援。

△　阎锡山委前晋方胶济路局局长梁上栋代理北平市长，梁是日接任。

△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中央联席会议，议决开展武装斗争，谋得一根据地，以图发展。

△　辽宁省政府通电请赈辽西水灾，称近因阴雨连绵，山洪暴发，河流泛滥，本省西部各县位于群河下游，西起绥中、锦县、义县、北镇、盘山、黑山、彰武，东迄新民、辽中、台安，长六七百里，宽二三百里，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淹毙人民万余口，冲倒房屋数万间，被水围困无食无喝之难民，不下四五十万。

8月31日　讨逆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归德下达对平汉线西北军总攻击令：第一号命令区分部队为六个纵队，分别准备由淮阳、周家口、漯河之线向郑、洛进攻。9月1日，第一师抵周家口，蒋令第十一、六十、六十一等师相继由归德向周家口推进。3日，蒋介石复下第二号命令，令平汉路各军于4日以前就集结位置，5日起开始攻击。

△　陇海线中央军张治中教导第二师于29、30两日开始总攻，是日占领民权县。

△　李宗仁之代表张震欧、吕竞存、温廷修，由香港搭轮抵达塘沽，搭午车过津赴平，向汪、阎、冯接洽联合反蒋。

△　南昌共产党人吴明典等七人遇害。

8月下旬　　海军部据东沙岛气象台呈报，日船不悬旗侵入我领海区域，任意拍摄照片，事关主权，咨请外交部向日方提出警告。

△　张宗昌运动山东红枪会，谋扰鲁东。栖霞县有于某联合大刀会、红枪会两团余，迫近县城。福山县亦有300人活动。刘珍年率部在各地进剿张宗昌乱党。

△　长沙市内严查共产党，枪杀已达千人。“清乡司令部”近令长沙县知事逮捕女共产党员，予以严处。

是月　日本派人在东三省境内向各金店及小银铺秘密高价收买生金，扰乱东三省金融。东北政务委员会特下令查禁。

△　警厅调查南京户口，计总户数10.5991万户，总人数54.272万，其中男33.1482万人，女21.1238万人。

△　英属海峡殖民地颁布移民限制法令，限制华人进入海峡殖民地。

△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土地法》。

9　月

9月**1**日　　北平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同日，扩大会议委员汪精卫、柏文蔚、陈璧君、顾孟馀、陈公博、陈树人、经亨颐、张知本、黄复生、茅祖权、郭春涛、潘云超、刘守中、王法勤、白云梯、朱霁青16人宣誓就职。

△　平汉线何成濬、刘峙、徐源泉、上官云相、杨虎城、岳维峻、萧之楚等均到驻马店分别晤蒋介石，蒋即日返归德。刘峙在漯河

指挥铁道以东部队，此路新增郝梦龄第九、刘茂恩第十五两军及一师。何成濬回周口指挥铁路以西部队，此路新增陈诚第十一师、夏斗寅第十三师。贺国光则在驻马店负责联络，传达命令。

△　冯玉祥之代表门致中由平抵津，次日转赴沈阳与张学良接洽参加北方政府事。

△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红一军朱德、毛泽东部由跳马涧、铜井铺，红三军黄公略部由渡头市，红三军团彭德怀、红十六军孔荷宠部由永安市、大坝桥，分路向长沙进军，各部集中冲锋二三十次。2日，红军冒雨攻破长沙电网阵地一角，何键军顽抗，且以空军、炮舰、铁甲车向红军猛袭。3日晨，何键军开始反攻。4日午，红军向长沙城郊之东山及永安市方向转移。

△　谭道源第五十师岳森旅开抵九江涂家埠，开始“会剿”红军。赣军分向修水、铜鼓、万载一带推进，防止湖南红军入赣。4日，鲁涤平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出兵入湘。

△　蒋介石任命马腾蛟为陆军第六十四师师长，是日马在泰安宣誓就职。

△　李宗仁为稳定内部，巩固军心，成立秘密政治组织“革命同志会”，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中央常务干事。

△　来华推销日本干茧之日本丝茧同业会理事高桥在沪晤记者，谓因华商反对甚烈，日茧难以运沪。同日，高桥电告日本内地各茧商停止装货来华，拟改往法国销售。

△　中日电信交涉之日方委员，由日政府派定代理公使重光葵、贮金局长吉野圭三担任。重光葵通知外交部查照。

△　第二国际领袖、比利时前外相樊德维（王德威尔得）应中央研究院之邀，来华游历讲学。是日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演《第二国际与

第三国际之区别及其在国际上之地位》，3日到达北平。

△　重庆川康殖业银行正式开业，资本额400万元。董事何北衡、卢作孚、刘航琛、杨粲三、张茂芹等，总经理卢作孚。

△　重庆市民银行成立，官商合办，资本额50万元，重庆市政府认股五万元。市政府派温少鹤、潘昌猷、陈怀先、赵贤生、连世之五人为该行监察委员，是日开始营业。

△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机关刊《革命行动》半月刊在上海创刊。邓演达主编。

△　中华职业指导机关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9月2日　　阎锡山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及主席职。扩大会议推汪精卫、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顾孟馀为约法起草委员。

△　贾景德、薛笃弼自太原携政府组织案到郑州征冯玉祥同意。冯对政府问题表示愈速成立愈好，所有一切办法，全听阎锡山主持。4日晨，贾、薛抵石家庄向阎报告，阎表示满意，遂命贾、薛二人即日赴沈阳向张学良报告。

△　南京代表吴铁城、方本仁、张群同见张学良谈时局，张表示东北拥护南京中央，当贯彻初衷。同日，张学良电召东北各省要员赴沈，会议应付时局方针。晚，南京代表李石曾由北戴河到沈。

△　平汉线西北军孙长胜骑兵部队由安子岭开禹县，刘桂堂部守西华。鹿钟麟、张维玺两部退许昌，继向郑州撤退，并在临汝、登封一带布置防线。

△　福建红军阮山部2000人，自永定占平和县城，张贞新一师第二团自小溪分路反攻。3日，红军退却。

9月3日　　冯玉祥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职，并电促汪精卫速组政府。同日，顾维钧应陈公博等催促，自北戴河抵北平，与汪精卫晤谈组织政府事，顾表示不愿参加新政府活动。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称：据外交、交通两部会呈大东、大北两水线合同本年底期满，即行取消，已由交通部通知各公司查照，并决定嗣后对于无论何国政府或公司及个人，在中国境内不再许以海底电线登陆之专利权。

△　达赖全权代表堪布棍却仲尼见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转达达赖拥护“中央”诚意。

△　晚，红六军3000余人，在湖北沙市城外东南之栖霞寺附近，与新三师李云龙部激战竟夜，至5日上午，向岑河口方面转移。23日，海军“德胜”、“楚观”两舰奉令进攻驻监利之红二军团贺龙部。

9月4日　　北平组织政府，推张学良为政府委员，并任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幹为部长。张学良是日面告傅作义称，对此完全拒绝，并谓东北方面任何个人绝不能代表东北。

△　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请开始交涉收回南满日邮权问题。

△　共产党人张叔昆、李林泮、罗仲卿、刘列、石璞、冯爱萍（女）、何月芬（女）、师集贤（女）八人是晨在南京雨花台被南京卫戍司令部杀害。5日，汉口警备司令部又枪杀尹文钦等五人。

9月5日　　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谓“余已拒绝就任北方政府委员，并命罗文幹、顾维钧、汤尔和等即时归沈”。张并以此事电告阎锡山。同日，沈鸿烈亦电北平贾景德、薛笃弼，声明“本人除东北职务外，其他概不接洽”。顾维钧、贾景德与薛笃弼同车赴沈。罗文幹及东北驻平代表危道丰、汤尔和也离平回沈。

△　北平扩大会议电促各政府委员即日到平就职。

△　平汉线中央军开始总攻击。刘峙、何成濬、王金钰等分别指挥平汉、陇海两路间军事，一部抄抵和尚桥，直趋新郑；一部由长葛、尉氏横断中牟；何成濬第三军团各部则向登封进攻。6日午后，蒋介石到漯河指挥各纵队进攻。西华西北军刘桂堂部顽强抵抗，自5日起激战两日夜，6日晚被中央军第一纵队攻占。中央军杨虎城部7日克宝丰。刘茂恩部8日占汜水；同日杨虎城部克登封。刘峙指挥中央军开始向许昌之线实行总攻击。

△　河北省府奉阎锡山令移保定，取消各附属机关。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改组山东、安徽省政府，任韩复榘为山东省府主席，陈调元为安徽省府主席。

△　行政院发出通令，略谓我国现正进行撤销领事裁判权，对于外国在华法庭自未便承认。嗣后政府各机关遇有对外合同发生纠葛，如进行司法手续，不得向各国在华法庭起诉。

△　国务会议决议公布《整理招商局暂行条例》。13日，交通部次长李仲公就任招商局总办兼职。

△　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南满铁路守备队司令森连中将视察南满路军队后，午后到沈会见张学良，表示到任问候。晚间张设宴欢迎。6日，菱刈隆、森连赴抚顺视察，下午返沈。

△　晚，红军复攻长沙，与何键军激战。6日，红军向株、醴、浏南方转移，何键令李觉、陈光中两旅任先锋，公秉藩、罗霖两师追击。

△　江西方志敏红十军克九江下游之湖口，谭道源第五十师前往与红军激战。8日，红军向景德镇转移。16日，鲁涤平令两团由湖口、都昌，另两团由玉山、德兴向景德镇包抄。21日，红军自景德镇向皖边转移。

△　徐圣禅、竺梅先、俞佐庭、吴岂汀、陈杏初等在沪创办大来银行，资本50万元，是日行开幕礼。

9月6日　　唐生明、颜仁毅、冯天柱率部三四千人，分两路攻湖南衡阳，与第四路军湘南警备司令、第十九师旅长段珩部激战于五里牌之线，唐军向祁阳败退。同日，龙云第十路军卢汉部第九十八师孙渝旅进占广西武鸣，桂军向上林等地撤退。

△　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通电响应北平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促蒋下野。

△　桂军代表胡宗铎在平见汪精卫，密陈张、桂方面情况。

△　阎锡山准津海关税务司辛博森建议，由津海、常两关项下每月截留35万元，以充北平八校经费。是日，辛电上海总税务司公署，声明北平八校经费无着，奉命每月拨35万元以充经费，请即归入俄国退还庚款下，如有意见，请在三日内见复，逾期即照所订计划施行。

△　武汉警备司令部在汉口杀害共产党人刘云等21名。

△　樊德维在北大二院讲《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及过莫斯科之观感》。11日，汪精卫宴请樊德维夫妇。14日，樊德维赴天津，在南开大学讲演《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比较》后，即晚渡日游历。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认为，公共租界自来水加价二成五案应停止执行。是日，该会主席王晓籁、徐寄庼发出函电通告全体委员，所有订立用水合同仍照旧价计算。20日，工部局复函上海纳税华人会，表示仍按原议增价。

9月7日　　晚，阎锡山偕张荫梧抵平。阎在车中对记者团宣布“公平内政，均善外交”之八字施政方针。

△　贾景德、薛笃弼奉阎锡山、冯玉祥命到沈见张学良，表示

阎、冯愿以察、绥、平、津永久让与为条件，请求援助，被张拒绝。

△　蒋介石在漯河召开军事会议，决议平汉线取守势；如平汉军事不利，陇海再反攻。9日，蒋返柳河。委张钫任第二十路总指挥。

△　蒋介石电令停办黄埔军校。17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派总部参议王仁荣接收该校。

△　何键电何应钦，请令赣出重兵堵截红军。何应钦即电鲁涤平令第十八、五十等师向湘边挺进。

△　闽军张贞部陈林荣团从永福出发，攻击漳平之卢兴邦部，卢部不支退大田，张贞部占漳平。

△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革命互济会定是日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斗争日。上海南京路举行反白色恐怖大示威，参加者2000余人，九人被捕。

△　重庆是夜二次大火，城内起火八处，南纪门外延烧千余家。14日午，重庆城外复有大火，毁屋千余栋。

9月8日　　阎锡山以沈鸿烈拒任海军部长，张学良又召顾维钧等回沈，特电张学良，略称："倘能参加政府，同意政府成立，自当以各部部长椅子半数相让；倘不欲参加，则请发出和平通电，出任调停；设两者皆不能办到，则本人将放弃北方警备，率晋军归晋，将河北委诸冯玉祥。"

△　北平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

△　国民政府任命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　陇海线中央军分为左、中、右翼三军：蒋鼎文指挥第二十六军、教导第二师、第九师为右翼军；顾祝同指挥第五、第二十三、第六、第二各师为中央军；朱绍良指挥第五十二、第八各师为左翼军；陈调元指挥金汉鼎、王均、冯轶裴三个师为总预备队。4日起，中央军开始全线总攻击，即日许克祥部克菏泽，朱绍良第六路军进至睢县。

△　鲁涤平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全部抵达江西萍乡，由戴岳指挥向湘东推进。江西防务，南昌由张辉瓒、吉安由邓英、赣州由金汉鼎、九江由温森、南浔路由岳森等分任警备。

△　交通部对中日电信交涉拟定进行程序，先讨论沪崎海线，次及落石山—台湾间、青岛—佐世保间、大连—芝罘间各海线及满铁沿线之陆线，决主张收回上述各线以维主权。

△　武汉警备司令部枪杀组织纱厂工会之共产党人李惠牙等五人。

9月9日　　上午9时，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就“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职，汪精卫居右，谢持居左，同就委员职，王法勤监誓。就职典礼完成后，即将汪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并分请唐绍仪、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

△　平汉线西北军刘汝明部被中央军第五纵队孙蔚如部在曹店、南召截击，分向鲁山、叶县退却。10日，驻太康之西北军王泰部投中央，即开豫西。同日，中央军第一师占小商桥车站。11日，驻襄城之西北军张瑞堂部投中央，归中央军第四纵队收编。中央军第五纵队占领自由县。西北军宋哲元部在龙门及巩县、偃师一带构筑工事。12日，西北军主力向洛阳移动。驻禹县、临颍、小商桥一带之田金凯部与中央军激战。

△　何应钦偕钱大钧乘飞机抵长沙，即召何键、公秉藩、罗霖等

会议，决定“剿共”具体办法，并偕何键、张开琏同赴易家湾、平、浏前线阵地视察，当晚返长沙后即乘原机返汉。

△　陈济棠梧州行营下令总攻迁江、来宾。何键第四路军第十九师占领湖南祁阳县城，即向永州追击唐生明、颜仁毅等部。

△　国民政府令：免去安徽省政府委员马福祥、王之觉、孙绳武、程天放、李范一、马吉第、张克瑶、李应生、金维系职务；任命陈调元、朱熙、袁家普、陈鸾书、程天放、于恩波、卫立煌、刘复、郝国玺为安徽省政府委员，陈凋元兼主席，朱、袁、陈（鸾书）、程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蒋介石任樊钟秀部参谋长郜子举为新编第五军军长，王学聚为副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是日在太康防次宣誓就职。

9月10日　张学良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最高干部会议，东北军政要员除热河主席汤玉麟未出席外，吉林省府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府主席万福麟、长官公署军事厅厅长荣臻、秘书厅厅长王树翰、军令厅厅长王树常、辽宁省府主席臧式毅、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哈尔滨特警处长鲍文樾等均与会，榆关驻军司令于学忠亦列席会议。会上张学良详述出兵华北原因，声称：“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会上无反对意见。

△　9日，蒋介石在李坝集召集陇海线各将领面授11日总攻机宜。是日，蒋赴野鸡岗巡视炮兵阵地，召集各军团长以上指挥官训话。

△　冯玉祥通令所有陕、甘、宁、青四省军政悉由后方总司令刘郁芬统筹办理。

△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分兵五路进攻长沙郊区红军，并令海

军“咸宁”、“勇胜”两舰，飞机第五队及铁甲车协同进击，是日在槊梨市、易家湾、昭山、跳马涧各线发生激战。鲁涤平第九路军第十八师亦由萍乡出动堵击。晚及次晨，红军数万人两次猛攻长沙，蒋军出动飞机轰炸。12日晨，何键亲赴前线视察督战。13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向株、醴转移。

△　蒋介石任命马全良为陆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是日，马在泰安宣誓就职。

△　前津关副税务司季尔生接到南京财政部及上海总税务司反对截留津关正税移充八校经费电，是日走访辛博森，并代表南京方面向辛氏提出书面警告，谓如果挪用津关税款，应由辛博森负责。

△　武汉警备司令部在武昌汉阳门杀害共产党人王东山、陈清臣两人，在华清街杀害共产党人阮老七、张培信、林元培、袁哲华四人。

△　“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月刊）在上海创刊，仅出一期即被查禁。

9月11日　阎锡山赴津浦路视察，赵戴文同行。12日，到平原、黄河涯、禹城一带视察，目睹晋军士气颓丧，军纪荡然，极为懊丧，令张荫梧、王靖国“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13日，阎由德州折回天津赴石家庄。

△　陇海线中央军开始总攻击。西北军左翼石友三部向中央军输诚，渡过黄河向北撤退，右翼因中央军向平汉线方面进展，亦渐次后退。15日，平汉、陇海两路中央军同时实行总攻击，西北军右翼增加孙连仲之第二、三两师，但大半系新兵，不堪作战。同日，石友三让出考城，中央军右翼挺进军右纵队第十二师即日进占考城、四门堂及前金庙一带。

△　冯玉祥电告汪精卫、谢持，在郑州就政府委员职。

△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奉蒋令调动湖南将领：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调任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以旅长王东原升任该师师长；第十六师师长罗藩瀛调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代行湖南全省清乡司令，以旅长彭位仁升任该军军长；划第十五、十六、十九师为第十九军，以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升任该军军长，以旅长李觉升任第十九师师长；第七独立旅旅长陈光中兼湘东“剿匪”司令。

△　中德欧亚航空邮件公司在南京召集双方代表会议，决定由交通次长韦以黼任总经理，德代表石密德副之，并由德方出资30万元为筹备经费。

9月12日　外交部就北方成立政府事发表宣言，声明不论中外国籍，任何个人、商号或公司，凡与北平政府订立任何性质之合同或契约，绝对无效，国民政府不受任何约束，并认订立此项合同或契约者为助长此次叛乱；北平故宫及他处所藏古物均系中国国家所有，绝对不许盗卖转移，私买或占有该项古物者，严惩不贷。

△　国民政府令免山东省政府委员陈调元等11人职务，任命韩复榘、李树春、何思源、王向荣、张鸿烈、马鸿逵、刘珍年、张钺、王芳亭为山东省政府委员；韩复榘兼主席，李、王（向荣）、何、张、王（芳亭）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各厅厅长。

△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将“中准会”移到苏维埃区域，在白区设中央办事处，将原定11月7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改在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会议还讨论通过“全苏大会选举条例”等多项议案。

△　津海关前副税务司季尔生奉南京命抗议津关扣拨每月教费35万元无效，是日将抗议书送请中外各大报纸刊登。辛博森因八校教职员及学生支持，态度十分坚决，惟恐引起外交干涉，即晚赴平与阎军

总部外交处长朱鹤翔等商洽办法。13日，朱鹤翔发表声明书，谓此款系指定为北方大学经费之用，北方政府有支配权。

△　日本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借口护侨侵入长江各埠已一月有余，是日柳原司令奉日政府电令率四舰离沪，开回佐世保。

△　中国航空公司以水陆两用机“九江号”试飞上海、重庆。15日，飞行遇阻，由宜昌折回汉口。交通部长王伯群电四川当局询问原因，旋接复电谓对飞行事业极表赞同，惟事属创举，又值国内军事未终，恐川人少见多怪，易致误会，请先派员解释，较为妥当。交通部即派员前往接洽。

9月13日　北平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约法起草委员会通电全国征询关于约法之意见。

△　平汉线中央军两翼侧抄汴、洛。西北军主力集结郑州，分向两侧增援。通许、扶沟、登封、临汝一带战事激烈。是日西北军刘汝明部复占宝丰。

△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主办之辽西水灾赈济会在沈阳成立。蒋介石即电汇20万元至沈，令吴铁城转交辽省发赈。16日，北平亦成立辽宁水灾急赈会，次日阎锡山令晋、冀、察、绥四省速筹款10万赈辽水灾。

△　《民事诉讼法草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　中央财务会议通过《中央派遣留学生学费领取规则》，凡八条。每月美国100美金，英国20英镑，德国400马克，法国2000法郎，日本90日元，每年分6月、12月两次汇发。

9月14日　阎军津浦路督战司令谢廉率领八个督战队到平，即赴石家庄见阎锡山。同日晨，阎锡山抵石家庄，即密令退兵：令德州张荫梧除一部分警备队外，速将主力部队全部集结大名及石家庄；令兰

封孙楚将陇海线晋军主力集结新乡以北。

△　红一方面军停止进攻长沙，撤出阵地，向湘东、赣西进发，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是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抵醴陵，后向萍乡进军。彭德怀、黄公略之红三军团仍驻易家湾、跳马涧一带。15日，由跳马涧、永安市向浏阳、平江、岳阳进军。同日，何键在第四路军总部开军事会议，议决分头追击，统限16日动员出发，并电赣军堵截。

△　福建军事特派员方声涛率所部4000余人于1日开始分三路总攻德化。是晨占德化城，卢兴邦部徐飞龙率残部逃大田，方声涛即统率各军，向大田推进，直迫尤溪。

△　蒋介石以郭汝栋在鄂北“剿共颇著成绩”，特将该部升编为陆军第二十六师，并任郭为师长。

△　蒋介石委岳盛宣为第五十七师师长。是日岳在柳河就职。

9月15日　蒋介石通电告捷，谓平汉前线五个纵队已分别迫近通许、和尚桥，占领扶沟、襄城、密县、伊阳及郑州西南密县、洛阳咽喉之白沙。陇海前线已占考城，向兰封、开封进展中，石友三完全与其一致，战事不久可告一段落。

△　冯玉祥致电阎锡山，要求阎以大部兵力攻济南，以一部兵力攻归德，运二万兵至郑州作总预备队，参加郑州会战。

△　北平扩大会议电促四川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出兵讨蒋，谓“党国分崩离析，罪在蒋逆一人”，“非以武力制裁，决不足以去此凶残”，“能于此时指戈东向，会师江汉，则逆军背腹受伤，灭亡立待”。同日，扩大会议通过阎、冯推荐之石友三、刘文辉为政府委员及阎锡山所提之《训政规约》及《地方保安条例》。扩大会议即电促石、刘就职。

△　北平扩大会议约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聘罗文幹、吕复、高一涵、梁式堂、郭泰祺、周鲠生为专家，推汪精卫为委员长，郭泰祺兼秘书长。

△　国民政府令：免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马福祥本职，任命王之觉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湖南省政府委员陈嘉祐着即免职，听候查办。

△　英公使蓝普森9日抵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洽谈中英间各案。11日，蓝、王谈判威海卫交还我国，决定10月1日交接。12日，双方谈判收回厦门租界问题，大致决定照收回镇江英租界之前例，无条件收回，并以照会方式了结。英使并表示对惩办辛博森案不持异议，已电英政府请示。是日，谈判庚款及交收威海卫手续问题，结果极为圆满，惟对中英法权问题各有数点未能相让。

△　长沙举行“铲共”大会，通过成立“铲共”义勇队等三案，当场杀害共产党人陈桂林等五人。

△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机关刊。

9月16日　　国民党中政会外交组开会，王正廷报告中英庚款交涉，谓英方已决定将庚款全数退还中国，充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并由中英双方组织董事会，董事人员中方占三分之二，英方占三分之一。另在伦敦设购料委员会，购料方式以投标行之。关于法权问题，王谓英方主张逐渐撤销，且有数点请求保留。经各委讨论，决定以不违背撤销领事裁判权之原则为主旨，交外交部审查后再与英使续商。

△　财政部训令上海海关，所有日茧一律禁止入口，以保国产。

△　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重庆设立第二十一军总金库，委任孙棣华为金库总经理，并以总金库名义发行粮契税券200万元，在防区内照票面十足流通使用；并命令重庆市各税收机关，自本日起对征收

税款满一元以上者，概收粮契税券，不得收受其他银行券票和使用现金，各税收机关解拨税款时，一律以粮契税券缴纳；并规定万、涪两县自10月16日起实行，防区内其他各县自下年1月1日起实行。

9月17日　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自沈急电到平，谓张学良将于18日夜发和平通电，并有军事行动。汪精卫等接得此报，惊愕不知所措。18日晨，汪精卫等开紧急会议，聚商时局。同日，北方代表以东北当局对时局已有鲜明表示，留沈亦无作用，孔繁霨即于早9时返平转石家庄，贾景德、薛笃弼亦于19日上午离沈返平。

△　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张学良下动员令，以于学忠为第一军，王树常为第二军，胡毓坤为第三军，张焕相为前敌总司令，向关内进兵。同日，张学良接见《大公报》记者称："现在民困已达极点，北方尤不宜再受兵祸，故余已不能不被迫而出于干涉。"又称："唯余之表示，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盖余乃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而已，余决不为落井下石之举。"

△　平汉线中央军以重炮、飞机、铁甲车掩护向临颍、纣城等地攻击，第一纵队萧之楚师完全占领鄢陵，郝梦龄师占长葛。冯玉祥为缩短战线，放弃临颍。18日，西北军在邸阁镇之张印相、孙殿英部，尉氏西南之孙连仲、郑大章部，全面向中央军第一纵队徐源泉第四十八师反攻。同日，中央军第一纵队第十一师攻占长葛东南之石象镇，上官云相部攻占和尚桥。

△　王正廷、蓝普森会谈中英厦门租界交涉有结果，双方议定中国对于外侨在厦门英租界内土地产权易以永租地契，自该项地契交厦门英领事转发外侨之日起，该租界即行取消。遂即双方互换照会。10月7日，外交部公布收回厦门英租界文件。

△　中日电信会议在南京举行开幕式，中方代表为庄智焕、吴南如，日方代表重光葵、吉野圭三。18日，续开第二次会议，详细磋商

交涉程序，中方提出交涉方案，日方亦提出对案。日代表允电本国政府请示。19日，东北交通委员会电南京，派陈士瀛出席中日电信会议。

△　湖南湘乡县党部所办《民报》，因载不满当局言论，经检查员查出，呈报第四路军总部。20日，长沙警备司令王东原奉令派士兵20名驰往湘乡，将县党部委员汤渭良、颜莹、曾瑀及《民报》编辑谭祖武捕获，并将《民报》封闭。21日，汤等四人被解往长沙第四路军总部军法处讯办。

9月18日　　张学良发出和平通电，声称拥护中央。略谓："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同日，东北军入关。

△　阎锡山因张学良已发和平通电，即发出倒填日期之寒（14日）电，痛陈蒋军使用毒瓦斯之暴行，宣称"我惟有退避三舍，以救民命"。北京政界极为惶惑。

△　美国国务院宣称：美国愿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国务院已草定提案，与英国对中国提出之议案大致不相悬殊。

△　日代公使重光葵访王正廷，对于中日宁案、汉案及长沙事件有所接洽，要求南京政府对日本船舶在长沙被红军射击事实行应急措置，并催促调查长沙事件损失，要求对长沙日侨努力保护。

△　国民政府准免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本职，任命朱家骅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南京中央大学教职员80余人联名发表索薪宣言。20日，中大校长张乃燕召集临时校务会议，商定向财部催索经费。24日，中大理学院教职员会议讨论经费问题，以薪水积欠三月，同人枵腹从公，虽

经发表索薪宣言，而9月底转瞬即届，如10月4日以前，还不能发清7、8两月薪水，决定于10月6日起全体怠工。

9月19日　　石友三发出响应张学良之通电，宣称“顿兵河朔，希冀和平，此后誓当静听张司令官之措置”。

△　汪精卫电张学良，谓“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提出即开国民会议；召集合法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员选举代表；制定约法；“防剿”湘、鄂、赣共产党等四点主张，询张如何实现。同日，谢持、邹鲁、覃振亦电张学良，提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四项意见。

△　下午，北平扩大会议要员在怀仁堂会商应付时局方针。会后汪精卫接见记者，谓“如张愿意和平，而能将余所举四项谋其实现，一切自无问题；如张决进兵而情势恶化，则无论太原、西安，吾人均可作为根据地”。

△　东北军入关先遣部队于学忠部第一军渡滦河，向滦州前进。阎锡山、冯玉祥知大势已去，决定先将军队退至郑州以西、黄河以北。同日，冯玉祥在郑州召集军事会议，会后即发布总退却令。西北军大部开始由兰封前线向郑州撤退。20日晨起，驻滦州至唐山之晋军杨爱源第十六军退石家庄。阎锡山并令徐永昌于五日之内，将陇海线之晋军撤退至新乡线。

△　蒋介石令陇海路各军策应平汉路各军会师郑州，并于兰、汴、郑、洛四处悬重赏督饬各军前进。是日拂晓，平汉线中央军第一师占大石桥，向许昌进攻。第五纵队孙蔚如部接近宝丰，向刘汝明部进攻。西北军田金凯部八九千人退许昌西南地区。

△　东北军向平、津进军消息传开后，是日北平山西省银行、国家银行关门；天津河北省银行、山西省银行发生挤兑。20日，阎锡山拨国家银行现款数万办理兑现。该行于21日晚结束，未兑尽钞票由商

会代兑。25日，平津开始通用奉票，规定奉票50元合现洋一元。

△　外交部电令中国驻秘鲁公使魏子京向秘鲁新政府转告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之意。

△　杨树庄于14日委刘和鼎、方声涛为闽北剿匪东西两路指挥官，并令乘势进攻延平（今南平）、尤溪卢兴邦部。西路指挥官方声涛奉委后，是日由永春返泉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进兵大田、攻取尤溪策略。东路指挥官刘和鼎奉委后，即委第五十六师副师长严尔艾为前敌指挥，令亲赴前线督战，分三路会攻延平。

△　第四路军陈光中、李觉两师过株洲进攻醴陵红军，罗霖、公秉藩两师过永安市进攻浏阳红军。20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分兵进驻攸县、茶陵、萍乡等县。21日，李、陈两部占醴陵。湘南各县联防团队于23日占浏阳，24日占攸县，27日占安仁。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派张群、李仲公、陈希曾、郭乐、黄汉梁、李国杰、王延松为国民政府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委员，指定张群为委员长，并派李仲公为招商局总管理处委员。

9月20日　谭延闿、孙科、胡汉民等在南京集议北方善后办法。同日，国民政府电张学良，略谓："巧（18日）电诵悉，倡导和平，弥深佩慰。中央但求完成统一，保持纪纲，其他均可和平解决。至阎、冯部属，均属国家军队，中央自应一律待遇，不应歧视。"同日，韩复榘、马鸿逵等发出响应张学良通电，表示"谨当追随张公之后，静听中央措置"。

△　蒋介石再发《忠告前第二、第三两集团军将士书》，要求"于敬日（24日）以前毅然反正，各就原防，静候中央处置，中央必仍一视同仁"。

△　赵戴文到北平，传达阎意决守山西，邀扩大会议中委赴晋。

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白云梯、陈树人、陈嘉祐、经亨颐、茅祖权、覃振、邹鲁、谢持、潘云超、傅汝霖、赵丕廉、冀贡泉因东北军已入关，即随赵戴文赴石家庄，曾仲鸣、何其巩等同行。车至琉璃河，为冯玉祥所派之邓哲熙、王化初所阻，要求诸委留平镇慑。赵戴文等10余人随即偕邓、王折回北平，汪精卫、谢持等六人继续南行。同日汪抵石家庄，即往晤阎锡山，嗣往郑州晤冯玉祥。

△　东北军第一军于学忠部午前从前所站出发，先头为董英斌旅，因待唐山、塘沽间晋军之撤退，乃止宿于塘沽。于学忠、高纪毅派员携函至天津，与市长崔廷献接洽和平交替。同日，东北军第二军王树常部自沈阳出动。日、英、美、意各国之天津警备军在日本军司令部开干部会议，集议天津之防备及交通维持问题，决定暂取观望态度。

△　蒋介石由陇海抽编第七、第八两个纵队，分由王均、顾祝同指挥，增援平汉线。21日晨，中央军第三纵队占须水镇，截断郑、洛交通。西北军梁冠英、安树德两师由柘城开新郑。同日，中央军刘茂恩部占荥阳。22日，中央军第五纵队孙蔚如部击退西北军李化龙部占叶县，并向鲁山进攻。陇海、平汉两线西北军开始总退却，晋军各部同时西撤。

△　蒋介石以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霖“在湘反共，迭建奇勋”，特电令改为中央陆军第七十七师，罗任师长。

9月中旬　　内政部咨各省、市政府，将阎锡山在各地所置财产概予查封没收，并限期将办理情况报部。

△　国民政府美国顾问林百克近向国民党中央建议，选任中国负有众望人员及有关主管长官，组织废约研究会；并谓军事结束后，中国应利用外资，兴办实业，发展国营事业。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新设编译委员会，委员12人，以胡

适为委员长。

9月21日　晨，贾景德、薛笃弼自东北回北平，赵戴文等始彻底明了东北态度，知北平确已不能久留，即晚8时偕留平扩委匆赴石家庄。

△　阎锡山、冯玉祥部将领鹿钟麟、徐永昌、石友三等69人复张学良巧（18日）电，表示“究竟如何循正当之途以定国是，谋目前及永久之计以图永安，敬祈详示”。

△　东北边防军第五旅旅长董英斌抵达天津，晋方市长崔廷献等到车站欢迎。董部与第二十七旅刘乃昌部即日分向平津路之张庄、廊坊及津浦路之杨柳青等处接防。董英斌对记者称：东北军入关者为第一、第二两军，共12万人，必要时胡毓坤即组第三军出发。22日，东北军先头部队进抵西直门。

△　天津常关因奉军入津，为南京方面收回，由前税务司丕尔正式接收。

△　南京发表中英法权交涉之英方对案：一、民事案件由中国法庭办理，如该国使领认为裁判不公时，得提出撤回；二、刑事案件须保留五年；三、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30里或40里地区内，须保留领事裁判权。国民党中政会认为有违元旦宣言，令外交部长王正廷口头驳复。英使即电伦敦请示。

△　上海码头工会成立。

9月22日　津浦线晋军总退却。洛口黄河北岸晋军退往德州，下游青城、利津及上游东阿、平阴晋军同时撤退。中央军韩复榘第一军团曹福林部由青城渡河，第十五路马鸿逵部由东阿、郓城渡河。第一军团第十二军孙桐萱部奉韩复榘令于次日拂晓在洛口渡河追击。

△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代理国府主席谭延闿在南京逝世。国民

政府即开临时紧急会议，决议：一、举行国葬；二、推胡汉民代理国府主席；三、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并令财政部拨发治丧费一万元，派宋子文等六人前往治丧。谭延闿遗体24日入殓。

△　张学良派危道丰抵北平，与晋方接洽军政善后问题。

△　中英庚款交涉换文由王正廷与蓝普森在南京正式签字，换文共四件。

△　波兰代表魏登涛抵南京接洽中波议定书批准事，并与王正廷商互派使领。

9月23日　　张学良请南方代表转请国民政府：一、中止攻击郑州；二、平、津一带由东北军收拾残局，以于学忠部警备；三、促阎、冯下野，其部队部分改编。

△　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通电响应张学良巧电，主张“务使阎、冯早日下野，以谢国人”。

△　董英斌率旅部到达北平。北平晋军已撤尽，完全由东北军接防。街上遍贴不加捐、不拉民夫、不索给养等标语。同日，晋军之北平卫戍司令楚溪春释放政治嫌疑犯70余人。

△　杨树庄、方声涛、刘和鼎在福州会商攻击卢兴邦军，决定由杨树庄派军舰三艘，并海军陆战队一部抄袭尤溪口；刘和鼎派一团抄闽清，方声涛为预备队。同日梁齐川、徐炳武两部由闽侯之竹岐分途进占永泰、闽清。林寿国部入古田。

△　国民政府派王家桢为接收威海卫专员，派徐祖善为威海卫管理专员。

△　蒋介石任命乔立志为陆军第七十四师师长，是日乔在济南就职。

△　首批日本米数百包到沪，是日有81包运往汉口。东洋米入长江，尚属创闻。

△　红三军团攻占湖北监利县城，歼国军新编第三师教导团和监利保安团共2000余人。

△　上海人力车工会罢工委员会颁布总同盟罢工令，代表全上海12万人力车工人宣布最低要求：一、反对涨车租；二、减少车租十分之三；三、反对逮捕工友，释放被捕工友；四、工人有罢工及组织自己工会的绝对自由。同日，虹口区参加罢工工人已达1000余人。

9月24日　陇海、平汉两线西北军梁冠英、安树德、赵登禹、刘春荣、孙良诚、庞炳勋等部均开到郑州。宋哲元部由汜水绕中央军右后猛力反攻，并以两师兵力由荥泽、河阴迂回王口，复由新郑、禹县断中央军归路，意图包围中央军第三、四纵队。蒋介石遂以第六纵队增援第三、四纵队。

△　津浦线晋军过禹城北退，将城北铁桥炸毁。中央军孙桐萱率部由洛口渡河，进驻晏城督师，该军马进贡旅抵平原。同日，韩复榘在济南召集军政要员开会，讨论军政计划，并令各军到德州后，即转向西追击晋军。驻德州之石友三之副司令秦建斌电韩复榘表示服从命令。

△　张学良已任命邢士廉为天津市长，陈兴亚为北平市长。是日，在津晋军撤退净尽，东北军派王树常、何丰林、邢士廉为接收平、津行政机关专员。

△　是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报告》。通过《中央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停止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正式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全会补选

中央委员七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中央审查委员二人，并改选中央政治局。毛泽东重新选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此后，由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　国民政府令准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本职，任命陈大齐代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准免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孙科兼职，任命黎照寰为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准免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兼职。

△　上海恒丰纱厂工人罢工，10月2日被迫复工。

9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临时会，决定在蒋未返京前，国务会议主席暂由胡汉民、戴季陶、王宠惠三院长轮流担任，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宋子文代理；推戴季陶重拟国葬条例。

△　北平扩大会议中委覃振、赵丕廉、陈嘉祐、经亨颐、刘守中及职员40余人，24日晚由石家庄抵太原，是日午后扩大会在太原举行会议，讨论今后工作。同日汪精卫、陈公博由郑州晤冯后返石家庄。

△　阎锡山新委之平绥线护路司令楚溪春离北平，所部移南口、张北暂驻，宪兵四营仍留北平。

△　晋军王靖国、李服膺两军开抵保定，德州晋方人员均向西撤。同日，津浦线韩复榘追击部队李汉章旅进抵商河，谷良民部进至保定。26日，第十二军孙桐萱部进驻德州。阎、冯第四方面军后防司令秦建斌同晚专车抵天津。

△　李宗仁召集“革命同志会”常务干事会议，李分析军事形势，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打粤军，一是打滇军，经讨论，李提出肃清广西的战略部署：“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危。”

△　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当选为海牙永久国际法庭审判官。

△　全厦同业大会决议，组厦门各同业公会，反对常关10月1日起征收内地复出口税，并电蒋介石、宋子文请加以制止。在财政部未明令禁止前，决自10月1日起进出口一律罢运，并电港、沪停止配货。

9月26日　于学忠、高纪毅抵北平。于发表宣言，望各方大彻大悟，立罢兵戎，并声明军事以外，地方措施不愿表示意见，不敢滥行干涉，免蹈军阀覆辙。

△　平汉线原万选才旧部石振青部向中央军投降，蒋委石为第十二军军长，所部退往许昌东南之陶城待编。

△　中央军第八、十两路军会攻南宁，南宁城防设施因连日遭飞机轰炸，大半被毁。28日，前桂省代理主席伍廷飏活动粤、桂和平解决，桂方请南京起用李济深收拾桂局。

△　靳云鹗奉蒋介石令任两河宣抚使，是日在归德就职。

△　晋方津海关税务司辛博森抵沈阳见张学良，拟商洽东北接收津海关及其本人留任事，遭张拒绝。张表示，海关应保持统一精神，本人不便过问；并称新任海关监督韩麟生10月1日到津，请与之接洽。

△　武汉警备司令部在武昌第一监狱杀害男女共产党人李政国、常仁卿、万春官、张九成、冯占鳌、李云清、魏和尚、易元庆、林必顺、马菱舟、傅剑、傅湘、向静、黄子才、林谦炳、蔡济湘、吴祖康、李锦文、江长浩、常卫汉、刘楚明、汪信立、朱西闰、万金波、胡春阶、刘少莪、汪春山、叶炳松、汤应金、翁士靖、秦绪藻、唐良荣、朱玉林、黄楚侠、白炎老、白炎星、唐潭清、刘逸民、曹书文、胡天经、王寿山等44人。同日，南京卫戍司令部亦杀害共产党人五人。

9月27日　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长谭延闿特予国

葬，一切典礼俟国葬条例颁布后，由治丧处遵照慎妥举行；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任命王树常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任命宣铁吾为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　西北军主力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吉鸿昌率三师之众倒戈投中央，次日在淆川通电就中央所委第二十二路总指挥职，向开封开进。同日，郑州西北军张占魁之骑兵第二师亦全部投中央，被改编为骑兵第三师，张被委为师长。

△　东北第二军王树常部之骑兵由天津过津浦路直开泊镇，第一军于学忠部由平汉路开保定。

△　蒋介石任命展书堂为陆军第七十三师师长，是日，展在山东安丘宣誓就职。

△　江苏省中小学全体校长任中敏、谢继曾等40人，为宿迁中学校长萧明琴被驻军殴劫案迄今月余尚无结果，是日决定向教厅总辞职，以资声援，借促军政当局严重惩处行凶官兵。

△　京沪学界为我国女教师萧信庵于8月下旬乘荷兰渣华公司轮船赴南洋，被该船大副、二副污辱，反被诬为神经病事，通电全国请主持正义，一致声援，并请国民政府严重交涉。

△　匈牙利人斯坦因改易姓名，带大批俄人，将赴新疆考古并从事测量。北平方面因斯坦因前曾盗取敦煌藏经，特电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严行阻止。

9月28日　中央军师长以上将领43人，由何应钦领衔复张学良巧（18日）电，望“贯彻主张，督促阎、冯下野”，以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确保永久和平。

△　李宗仁命白崇禧统率张发奎、杨腾辉等部由柳州出发往南宁迎击滇军。白崇禧先以李品仙部在宾阳一带佯攻粤军，主力则从北面

绕过宾阳，经高峰隘、五塘等地越过粤军防线逼近南宁。

△　冯玉祥之代表何其巩、熊斌到沈，表示希望由张学良收编西北军。

△　福建东路讨卢军刘和鼎师刘尚志、陈万泰等四旅会同省警二队刘宗彝部侧攻延平，卢部不支溃退。30日，东路讨卢军完全占领水口。同日，林寿国会同省防二旅钱玉光部反攻谷口附近梧桐坪，即晚占领之。方声涛令陈国辉、萧叔萱、林清龙、王祖清各部分攻大田。

9月29日　　蒋介石电国民政府，谓“冯玉祥退无可守，所部离心，即日通电下野。冯军大部均向中央投诚”。同日，蒋并电令马福祥、张之江收拾西北残局，促即日启程赴柳河。

△　西北军除驻许昌及新郑之各部以外，全线退却。中央军右翼第二十六军进占兰封县城，左翼于拂晓占领杞县，郜子举部占禹县。次日，孙蔚如部击退冯军刘汝明部，占领鲁山。

△　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袁州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举行会议。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经毛泽东等多方说服，会议一致决定，放弃再打长沙，先打敌军力量较弱的吉安。

△　樊德维夫妇由日本神户乘船抵达上海。上海工人张贴标语反对，谓彼为帝国主义走狗。

△　全沪丝厂同业公会开代表大会，到朱静庵等90余人，坚决反对生丝公量检验，决议如10月1日商品检验局不将公量检验取消，各丝厂即行全体停业。

9月30日　　瑞典火柴商人向国民政府要求在华火柴专卖权事件，曾引起各地火柴同业及工商界之反对。是日，日本代使重光葵以违反华盛顿条约中规定外人不得在华占有专卖权为词，正式备文向外交部提出抗议。

△　行政院会议，对内政部长钮永建所拟“剿匪铲共治标办法”六项，决议先交内政、军政两部会商拟定具体办法后，再呈国民政府。

△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现状，肯定了“朱毛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　1900年庚子赔款本年9月份应解规银391.982686万两，由上海海关交付各经理银行。

△　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命令：取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中国革命互济会、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革命学生会以及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团体组织，并通缉鲁迅。

△　加拿大颁布《华人移民枢密院令2115号》。

是月　　重庆盐业银行成立。该行为扶助川省盐业，额定股本300万元。由各盐商以每月认销盐160僦，每僦先缴银2000元，以后每僦每月认缴200元作为银行股本，至足额为止。盐商即时认缴32万元，另由盐业公司筹措资金四万元共计36万元，先行营业。

△　上海大来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实收资本50万元，专营存放款及储蓄业务，董事长兼经理竺梅先。

△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改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　月初，东北四洮路沿线及农安县发现鼠疫。通辽县因鼠疫死亡50余人；洮南地方鼠疫蔓延，开通县死亡200余名；突泉县水泉地方死亡30余名；内蒙白音泰来亦发现鼠疫。疫情正沿洮昂线向齐齐哈尔发展。

10　月

10月1日　　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及臧启芳、张学铭等抵天津。2日，开始接收天津各机关。公安局长张学铭、社会局长臧启芳、财政局长刘亥年、长芦盐运使洪维国、津海关监督韩麟生等均以代理名义就职，天津市长由臧启芳代理。

△　蒋介石以陇海、平汉两路军已联成一线，是日将作战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军团会攻郑州。同日，中央军占领许昌、通许、长葛、朱仙镇。豫军万选才旧部宋天才、樊钟秀旧部焦文典率众四万人投降。2日，中央军复占陈留及洛阳附近之龙门，3日占开封。杨虎城部经由登封、临汝间袭取洛阳，已将洛阳包围，截断西北军西退秦、陇之路。

△　马福祥、张之江应蒋介石电召赴前方筹商收抚西北军办法。张之江是晨由上海赶到南京，偕马福祥渡江北上。西北军前敌总指挥鹿钟麟向蒋介石提出归顺条件如下：一、冯玉祥下野外游；二、对冯出洋给以特别便利；三、西北军归鹿节制，照编遣会议决议改编为10个师，以河南一部及陕、甘、宁三省为驻地；四、拨300万元作为编遣费。

△　湘南警备司令段珩调五团兵力，于上月29日开始，分三路进攻永州，是日，占领永州。唐生明部向全州黄沙河退却。

△　汪精卫、陈公博抵太原。扩大会议连日在太原开会，继续研究起草约法工作。

△　阎锡山所委津海关税务司辛博森在天津私宅遭人狙击受重伤。英使蓝普森闻讯后，即电张学良表示抗议，望认真缉凶。15日，英使访于学忠，再次表示希望缉凶。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驻南京英领事许立德在南京互换《中英交

收威海卫专约》及租借刘公岛协定批准书。同日，国民政府特派接收威海卫专员王家桢及管理专员徐祖善抵达威海卫，与英方海军提督庄士敦举行交收仪式。被英人强行租借达32年之久的威海卫，终于重归祖国。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暂缓实行裁撤厘金案。同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甘末尔设计委员会所拟之税收政策意见书。6日，国民政府下令，原定本年10月10日起一律裁撤之厘金及类似厘金之一切税捐，因军事尚未结束，暂行展缓至民国二十年（1931）1月1日起实行。财部为筹裁厘后补偿办法，通令各省财厅在裁厘尚未实行前，筹备试行营业税，定为补偿厘金之一种。

△ 福建讨卢军刘和鼎部占领福州上游之重要门户水口，卢兴邦残部纷向谷口、黄田、樟湖坂溃退。

△ 第七届全国拒毒运动周在上海举行。

10月2日 东北军于学忠第一军接防南口、居庸关、保定。同日，留津之山西宪兵两营及步兵一营于装车待发时，被东北军第二十五旅缴械，汽油、给养、汽车等悉被扣留。

△ 内政、外交、军政、教育各部及中央研究院在教部开联席会议，讨论美国约克·罗伯森等请赴新疆考察科学；德国黎克麦尔斯请携械赴新疆测量研究冰河地质；美国斯密司请携械赴滇、黔两省考察动物三案。决定前两案暂缓前行，理由系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在新疆考察；后一案则准其入境，条件由中央研究院与教部商决，有“中国派员参加考察；采得标本之半数归中国，无副件者应留归中国”等项。

△ 国民政府公布《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同日，威海卫邮政由中华邮局接收。

△ 江西红十军方志敏、邵式平部占景德镇，即成立工会、农民

协会。

△　台湾进行第二次户口普查。

10月3日　天津海关由海关监督韩麟生及前任副税务司季尔生率旧关人员接收，辛博森手下职员发薪一月遣散。7日，津海关税务司帮办李桐华奉命署理副税务司，为海关任用的第一个华人副税务司。

△　东北军接收北平市政府，王韬就代理市长职。同日，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及财政厅长姚鋐、建设厅长林承秀、农矿厅长常炳彝在天津就职。

△　蒋介石任命吉鸿昌、张自忠、庞炳勋分别为“讨逆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路总指挥，张印相、葛云龙为军长；吉鸿昌、张印相、葛云龙分别就任新职。张自忠、庞炳勋拒绝蒋委，率部退往黄河北岸。

△　何键第四路军罗霖、王东原、李觉三师由萍乡入赣。公秉藩师过浔转南昌，赴高安“协剿”袁州（宜春）红军。袁州红军即向安福、吉水转移。

△　蒋介石自开封电国民党中执会，提议在最短期内召集四中全会，商决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日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

△　蒋介石电国民政府，拟请于军事大定后，或民国二十年1月1日，明令将所有军事、政治上之罪犯，概予赦免。惟陈炯明、阎锡山不在赦免之列。至共产党个人如能“悔过自新”，得有切实保证人，亦得暂予缓刑，至三年之后，实无“犯罪行为”，得确定“赦免”之。

△　法商“大广东”轮到汕头，法人船主指使船员殴伤上轮接待归侨之工友10余人，击毙工人蔡裕钦，并将尸体抛入海中，邓典桂等六

人受重伤，激起全市公愤。广东总工会汕头支会即请市府扣留该轮，并通令轮船工会勿与该轮驳货，起卸工会停止起卸，联安工会停止落客，该轮只得停泊海面。驻汕法领事欧仁急向市府交涉。5日，汕头市长张纶允法领所请，将“大广东”轮放行赴香港。同日，广东总工会汕头支会电请外交部向法国提出严重交涉。

10月4日　河北省府各机关由张学良所委之财政厅长姚铉等接收。6日，张学良电平，谓处理平、津军政全权系中政会及蒋介石所赋与，并非自作主张。13日起，河北省政府陆续由北平迁移天津。

△　汪精卫、阎锡山密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当日汪、阎离郑北返。

△　阎锡山电张学良，谓“关于军事、政治善后问题，完全惟执事主张是从”。

△　中央军克中牟。6日占郑州、登封。8日占荥泽。新郑附近西北军张维玺、田金凯、冯治安及豫军樊钟秀旧部任应岐、邓宝珊等七个师，共六万余人，全被缴械。

△　朱德指挥红一军团会同赣西南地方武装击溃新十三师邓英部四个团，午夜占领赣西吉安城。

△　鲁迅在上海举办版画展览会，展出收藏的俄、德、法等国作品。

10月5日　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从石家庄致电张学良表示实行停战，略谓：“顷见蒋介石本月江（3日）电，对于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及另行召集全国大会诸点，均已表示服从。锡山等赞同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先生和平主义及促其实现起见，已下令前线各军一律退回黄河北岸，实行停战，以俟和平解决。”“尚望汉卿先生暨国内贤达，本和平主张，以公平方式发起会议，决定办法，使纠纷早解，祥

和早见……苟能贯彻上述主张，即当克日引退。”

△　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之代表王金钰携蒋亲笔函抵沈阳，即晚与张群等会见张学良，协商时局对策。张学良同意于双十节前后就陆海空副司令职。

△　武汉行营主任兼湘鄂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由汉口飞抵南昌，召集鲁涤平、张辉瓒、公秉藩、岳森等10余人开军事会议，协商“剿共”办法，即晚飞回汉口。

10月6日　张学良委富葆恒为北平崇文门关监督，是日富接收崇文门税关。平市商民呼吁取消崇关，而北平官方宣称，崇关每月收入10余万，旺月可达20万，北平教育等费指此开支，在未有相当抵补款额以前，纵各界如何呼吁，难有相当效果。

△　夜，日警10余人闯入吉林延吉龙井村中国陆军哨线，诘问口号不应，反开枪射击，遭守军还击，毙日警二名。驻龙日总领事即下令紧急戒备，并立电朝鲜总督府告急。7日，日武装警察百名以此为借口由鲜境开入龙井村。吉林省府于7、8两日连开紧急会议，并向省府主席张作相请示应付办法。

△　胡汉民在立法院作《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的演讲，认为召开国民会议必须有先决条件，即须“脱离了军阀的淫威和压迫，社会已暂趋安静”等，表示不同意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导致与蒋介石矛盾激化。

△　国民政府令：“展缓裁撤厘金两月，改于民国二十年元旦前实行。”

△　汕头各工会就法商“大广东”轮击毙工人事举行联合会议，议决请市府向法领交涉，提出要求五项：一、惩凶；二、向我国政府正式道歉；三、赔偿伤者药费；四、赔偿死者家属抚恤费；五、保证今

后不得再有此事发生。

△　鄂豫皖红一军第二、三师袭占光山县城，歼新编第二十五师补充营。次日，红一师强攻潢川县城未克，西进克罗山城，歼一个团和民团一部。

△　西北军主力孙良诚第二路军第一师师长梁冠英部投中央，被中央改编为第二十五路军，是日梁在荥泽就该路总指挥职。

△　刘建绪通电在长沙就第四路军第二十八军军长职。同日，王东原、彭位仁、李觉通电分别在长沙、醴陵就任第十五、十六、十九师师长。

10月7日　蒋介石在开封通电告捷，报告克复郑州经过。晚抵郑州。9日上午在郑召集将领会议，决定以少部兵力奠定陇、陕，大部调回各省“剿共”；并设郑州行营，委何应钦为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令何应钦将武汉行营交何成濬主持。蒋即日返南京。

△　国民政府任命刘峙、刘茂恩、万舞、刘耀扬、刘积学、张斐然、张钫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刘峙兼主席，万、张（斐然）、张（钫）分别兼任财政、建设、民政各厅厅长。8日，任命李敬斋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20日，原任省府委员韩复榘、张钫、张鸿烈、马鸿逵、李树春、何其慎、王向荣、袁华选、张静愚均免职。

△　国民政府令：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未到任前，着朱熙代理。

△　国民政府公布《国葬法》，规定国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举行国葬。15日，公布《国葬仪式》。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民国十九年关税短期库券条例》，规定该库券用于调剂金融，定额为8000万元，于民国十九年8月开始发行，月息八厘。以增加之关税收入作为还本付息基金，至民国二十四

年（1935）5月本息如数还清。

△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发布《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说明政府的性质、任务。曾山任主席。

△　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问题久悬未决，日前全体学生大会议定校长标准，推派代表詹纯鉴、刘培坤赴南京请愿任命新校长，是日詹、刘抵南京。11日，教育部长蒋梦麟对劳大校务会议代表表示：劳大不停办，亦不改为学院，先派人接收，但一年内不派校长，由教部直接管理。

△　美国人安德思搜集古物队在我国戈壁沙漠盗掘史前遗迹五个月，是日回抵北平。该队格兰杰告路透社记者，宣称所得古物共约75种，为1922年开始工作以来之最丰富而在科学上最重要者，内有数种为科学上之新发现，皆属古奇兽之遗蜕，并无人之遗骸。

10月8日　外交部发表中英解决庚款换文大要，要点为：所有自1922年12月1日起应付之庚款，英国政府经议会通过后，即将该款全数交还中国政府管理。中国政府当将交还款项之大部分创立基金，即以之整理及建筑铁路，并投诸其他生产事业，作为借款，以便日后用于教育事业。中国政府以交还之庚款或以该项庚款担保所借得之款购买材料时，当向英国订购。

△　苏联政府照会张学良，抗议东三省不断发生白俄仇视苏维埃之活动，要求立即将白俄解除武装，驱逐出境，以免妨碍中苏邦交。

△　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邓彦华、林云陔奉蒋介石电召赴南京会商桂局及粤省财政。

△　晋军第二路总指挥傅作义因在鲁全军覆没，是日夜在津寓自戕被救。

10月9日　张学良在沈阳就南京所委之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吴铁城、张群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监誓。

△　韩复榘派山东省农矿厅长王芳亭赴东北与张学良接洽划分地盘。25日，王返抵济南，称张决不使驻河北之东北军入山东一步，但青岛系特别区，故由东北海军陆战队驻防。

△　卢兴邦通电表示下野，请求停战。杨树庄接电后，即召集刘和鼎、方声涛、陈季良等各将领，在闽省政府讨论应付办法。

△　北平—吉林间开通直达列车。

△　南京中央大学授予樊德维、林百克博士学位。

10月10日　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国庆十九周年举行盛大纪念典礼。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告国民通电，宣称目前最切要之五项工作为："肃清匪共"、"整理财政"、"澄清吏治"、"开发经济"、"厉行地方自治"。

△　中央军杨虎城部占领洛阳、新安，冯部宋哲元军西撤。

△　山东汶上晋军自7月被围，困守三月之久，是日被山东警备第二旅陈孝思部缴械。

△　白崇禧与南宁城内黄旭初相约，内外配合，向滇军发动进攻。黄率部从城内向外突围，白率部袭击滇军后背，经一天战斗，滇军全线溃退，被困三个月之南宁城遂得解围。被围期间军民以黑豆为食，李宗仁、白崇禧定每年10月10日为"黑豆节"。

△　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永井柳太郎来华考察政治，是日抵沪。13日，访唐绍仪，交换对中日问题意见。14日，访上海市党部，借以探明中国外交政策及一般人对日心理。16日，永井抵南京，声称此次来华并未带所谓特殊使命，仅与各要人交换意见，促进中日"亲善"。

△　意大利新任驻沪总领事、意首相墨索里尼之婿齐亚诺伯爵偕其夫人爱达抵沪。

10月11日　　汪精卫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议，冯玉祥派刘骥、张允荣两人出席，结果决定阎、冯、汪均下野。13日晨，汪精卫离石赴太原，准备出国，16日阎锡山返太原。

△　国民政府驻东北代表、上海市长张群偕方本仁离沈南归，14日抵上海，16日到南京见蒋介石，详述与张学良洽谈经过、东北准备出兵总数及张学良处置阎、冯意见。

△　立法院通过《电影检查法》，规定由内政部、教育部合派七人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请中央党部派员参加指导；凡“有损中华民族尊严、违反三民主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提倡迷信邪说”等影片均不得核准。

△　中苏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苏联代表加拉罕、中国代表莫德惠先后致词并互换证明书后，即因《伯力协定》承认问题发生争论，无结果而散。14日，加拉罕致牒莫德惠提四项要求：一、履行《伯力协定》；二、急速解散白俄政治团体及军事活动；三、交还哈尔滨市自动电话权于中东路局；四、中东路警备权，中苏平均负担。莫德惠电南京请示。

△　招商局整理债务委员会委员长李仲公在上海对记者发表整理招商局意见，称招商局资产价值4000余万两，今为债务1400余万两所束缚，以至不克振拔。个人意见，惟有收回国有一途，稍加整顿，担保能恢复到收支相抵。16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招商局收归国办原则。

△　北平地质调查所运回周口店发掘之古物中，发现猿人女头骨一具。英国伦敦大学史密斯教授认为是科学界空前之贡献，是日史密斯赴周口店作进一步考察。

△　9日北平各报载有国民政府决定取缔万国储蓄会消息一则，内称：“全国工商大会审查会关于万国储蓄会一案审查结果，谓有奖储蓄，性质类似赌博，贻害社会，尽人皆知。政府对于各项彩票，早有明令禁止。而万国储蓄会性质与彩票相同，且系外商吸收华资，因而审查会一致通过，应即通饬各省严禁。”北平总商会见报后，于是日致电国民政府及全国，请实行工商会议议决案，一致监视万国储蓄会，以防借词收束，损及储户。

△　国民政府任命张维玺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部自湘抵赣，即日由分宜进占新喻（今新余），第一军团第三军黄公略部在袁州，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在吉安、峡江一带。中央军公秉藩师到达高安。17日，中央军罗霖师席旅、李觉师陶旅占领袁州。罗霖师即向高安前进，李觉师留守袁州，湘、赣两军遂联成一气。19日，陈光中旅进攻浏东，陶广师围攻平江。

10月12日　　第七军军长杨虎城自前方抵郑见何应钦，商追击西北军事宜，次日返防。14日，杨虎城部克渑池。15日，杨召集干部会议，讨论攻取潼关计划，委王迺文旅长任右翼纵队司令，同日王部先头部队过渑池逼近灵宝。

△　北平市公安局正式将北平市党部及河北省党部启封，承认南京国民党中央任命之整理指导委员，惟对民众运动及下层工作主张慎重。

△　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是日及次日在镇江中学举行第七届代表大会，议决请教厅限管理处于10月底以前发清7、8、9三个月欠费，倘无效果，全体会员当作严重表示。20日，该会为要求发放积欠经费发表联合宣言。

10月13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略称：“半

年来讨逆军事，中央军死伤人数，有数目可稽者，计九万五千余人”；“逆方死伤人数在十五万人以上”；“总计两方死伤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同日，发表《巩固统一与确保和平》一文，宣称：“苟有祸国政客，妖言煽惑，导军队以叛乱之渐，劫制中央，破坏统一，无论其事态大小，皆必以极严正之法纪相绳，而不稍予姑息。”

△　第三军团总指挥兼鄂省府主席何成濬奉令继何应钦任汉口行营主任，是日到职视事，旋赴鄂省府报告与阎、冯作战经过，并谓蒋介石已调六师兵力返鄂“剿共”。又召集吴醒亚等会议，商鄂省“绥靖”及财政问题，决电令徐源泉、萧之楚、岳维峻等部速到鄂“剿共”。

△　石友三投蒋事，经韩复榘从中斡旋，蒋介石于是日电济，允石恢复第十三路总指挥名义，归张学良节制。

△　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通令河北省各县即日停征晋方临时增加之军事特捐。17日，河北省府令平市财局停办晋方所征军事特捐及附捐。

△　闽省府电卢兴邦，谓应将前被扣之六省委送省，军队退入尤溪。同日，闽省党部电中央党部，请迅转国府即电闽省军政当局彻底讨卢。

△　张贞自漳州赴泉州晤方声涛，即夜开军事会议，商讨卢事；14日，会议结束，军事仍照原计划进行，即进兵大田。

△　豫军万选才旧部薛传峰奉蒋介石令任新编第六军军长，是日，薛在山东阳谷宣誓就职。

△　哈尔滨特区警务处奉国民政府电令，查封薛大可主办之华俄文版《东华日报》。

△　劳大教职员151人电南京中央党部及教育部，谓教部直接派人接收劳大，直接管理，一年内不派校长，此种办法，既无先例可循，

亦非教育行政当局对于国立大学应有之态度。同日，教部令派高等教育司长孙本文、参事朱葆勤、科长谢树英及该大学教员张毅、庄权等五人为点验劳大委员。15日，劳动大学校务会议决议，不承认教部不派校长直接接收办法，在继任校长未到前，由校务会议负维持全校之责。

△ 褚民谊自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电外交部，报告中国出品在比国博览会中共获奖凭339张，名列第三；博览会于10日举行授奖典礼，中国徐悲鸿得绘画特等奖。

10月14日 蒋军“讨逆”军事将结束，前方各军事将领陈铭枢、朱绍良、钱大钧、谭道源、蒋鼎文、许克祥等纷纷到南京向蒋报告一切经过。蒋在私邸设宴招待，杨杰、邵力子等作陪。17日晚，蒋介石宴请鲁涤平、陈铭枢、蒋光鼐、刘文岛、张群、陈诚及来京各省委数十人，备致嘉慰。

△ 冯玉祥在泽州地区将军权交给鹿钟麟，自带少数卫队到晋城。

△ 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以军事结束，应即编遣军队，节减军费，从事建设，是日自许昌电蒋介石，请先从该师实行编遣，并通电全国倡导裁兵。

△ 鄂省“剿共”计划已定，何成濬令徐源泉、萧之楚等部，限25日前一律开回平汉路，在汉口集中。16日，何成濬电湘当局，谓已呈准蒋介石抽派十师，三个月内彻底“肃清”湘、鄂、赣三省共军，各师均已开拔。

△ 罗霖在江西萍乡就任第七十七师师长。

△ 卢兴邦之弟卢兴明“一六”政变后即赴上海，借表明未加入政变，留为最后转圜余地。日前卢兴明以卢兴邦、卢兴荣已通电下野，

遂于是日由沪转浙回闽，甫抵浙境江山县，即被新编第一师张贞所委之延建邵民团团总何望部截获，暂拘江山公安局，闽省府据何电报后即令克日解省惩办。

△　吴淞中国公学政经系国民党党员学生李雄、严经照等企图包办系学生自治会，与持正义之同学邓中邦、魏佑翰等发生冲突，邓、魏等被指控为共产党，当即被军队逮捕。15日，该校校长马君武将邓、魏二人保释，以李、严二人擅自报告军队，扰乱学校秩序，予以开除处分。25日，上海国民党第八区党部通电反对马君武，所加之罪名为：一、不设党义课程；二、蔑视该党总理；三、不悬党、国旗；四、包庇“反动”分子，该校为共产党在吴淞一带之大本营；五、马君武在该校兼讲近代文化史，课授至近代政治制度一章时，公然宣称中国应行代议制，反对以党治国。

10月15日　　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孙连仲、孙殿英、庞炳勋、刘骥、郑大章、刘汝明、马鸿逵10人自焦作通电，略谓见本月3日蒋电，为民请命之目的可望完成；依5日阎、汪、冯三公罢兵息民通电，即日遵令撤防，至于军事善后，静候公平措置。

△　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自广州抵梧州，即召集军事会议，决以武力解决张、桂军。同日，第八路军黄廷桢、朱为珍两部进攻来宾，在石龙击败薛岳部；范德星、陈光汉两团亦在黎塘、樟木与张发奎军遭遇，占领樟木。19日，陈济棠赴平南督战。

△　张辉瓒第十八师朱耀华旅是夜占领新淦（今新干）；同日戴岳旅占领清江。17日，王捷俊旅抵樟树。清江、新淦之红军沿袁河及赣江向江南转移。

△　蒋介石任命樊钟秀旧部李万林为陆军第七十六师师长，是日，李在宝丰县宣誓就职。

△　外交部据张学良报告延吉龙井村日警肇事情形，向日代使重

光葵提出严重抗议。17日，间岛日领事岗田向延吉市政筹备处处长张书翰交涉，提出谢罪、给恤、处罚、保证等条件。19日，日警又有二十一队由朝鲜开到龙井村，并有日机在中国领空示威，长春日守备军亦相应作攻击长春之演习。

△　汕头民众组织“大广东”轮击毙工人案后援会，参加者二三万人，是日议决一致对法经济绝交。18日，汕头三万民众举行示威大游行，全市商店停业，工人停工，表示强烈抗议，并电请国民政府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法国公使将工会所提六点意见圆满答复。

△　上海海员总工会开全体大会，厦门海员代表对荷轮侮辱萧信庵女士案提出议案，当经议决：一、电请国际劳工会执行仲裁；二、电请国民政府令外交部向荷使提出抗议；三、由各地分会警告渣华公司，速将侮辱萧女士之大副即行撤职重惩，并赔偿名誉损失，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情事。厦门各界对此案亦极愤慨，厦公团通知民众，对渣华轮实行不载货、不乘客，以断绝营业关系。近日渣华轮船公司因此在厦门不能工作营业者，达八艘之多。

△　中华国民拒毒会具呈国民政府撤销两湖特税，严禁栽种罂粟，略谓：“查两湖特税之设，原为一时清理存土之计，讵知一延再延，取消无期。”“据汉口市政府社会局之调查，汉口全市共有商户1.3017万家，粮食业仅536家，而鸦片业占764家。全市店员6.2721万人，而业鸦片者竟达3056人”，望采取完全禁绝政策。

△　日商三井洋行运日米1.38万石抵上海，尚有10万石续运。沪人孙振同著文号召米业抵制。16日，上海社会局告诫各华商米业勿购办日米，违则重究；上海碾米业公会亦通告同业拒销日米，日米销路停顿。

△　上海盈余、安丰、预丰、晋泰、镇和五丝厂工人抗议资方八折发给工资及取消每月赏工四天，一致罢工。19日，上海纬纶、公

益、厚福三丝厂工人亦以同样原因罢工。八厂罢工工人共4000余人。20、21两日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工资不打折扣，赏工事以后再议，各厂工人遂于21日复工，但坚持赏工不容取消。

△　据《华北日报》讯：据内政部最近调查，灾情遍及全国16省，牺牲生命6000万人，计有疠疫、旱魃、洪水、地震、兵灾、土匪、雹灾、蝗虫、风灾、水灾、霜灾等等。湖北灾情最重，灾区亘62县，919.72万人或丧生命，或流为饿殍。

10月16日　阎锡山由石家庄返太原。晚8时许，召冯玉祥、汪精卫、陈公博、邹鲁、谢持等各要员会议，决定根据微（5日）电主张，采取和平办法，希望东北将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早日实现。如果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自动下野，军政大权将交给才力优裕的大员接任。

△　石友三就蒋介石所委第十三路总指挥职，所部约五万人到达磁州轰击晋军，并积极向邯郸开进。正定、石家庄、顺德（今邢台）一带晋军，依照阎之总退却命令向石家庄集中，转正太路向太原退却。同日，李服膺电于学忠，谓："奉谕将正定、石家庄防务即日让渡，请派员来石，与警备司令接洽。"17日，晋军全部撤娘子关，并炸毁洛、沙两河铁桥，以阻石友三部队北行。18日，东北骑兵第六旅白凤翔部接防正定、石家庄；骑兵第一旅郭希鹏部由大名开抵顺德。

△　冯部孙连仲派参谋处长李汉辉由新乡抵济见韩复榘、蒋伯诚，请代为疏通收编。次日得蒋介石电允。19日，蒋伯诚偕李汉辉奉召抵南京见蒋介石，蒋委孙连仲为第二十六路总指挥，指定鲁西为驻防地点。29日，孙在新乡就第二十六路总指挥职。

△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黄公略部与浏平赤卫队万余人三面围攻浏阳城，多日不下，是日向古港、高坪转移。

△　北平总商会开撤废崇文门税关大会，到千余人，决推冷家

骥、杨以俭等六代表赴沈向张学良请愿。20日，张学良见北平商民代表，允电财政部通盘筹划。

△　法国水兵两人在上海杨树浦乘渡船不付渡资，反将船夫忻鼎香击毙，制造暴行。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涂巨尧等290余人联名发出改进校务宣言，要求撤换掌握大权、营私舞弊之秘书长张佐时，改进校务。校长张乃燕允作详细考虑。20日，学生许自诚等600人又提出改进校务之18项主张。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会亦开会决议赞助。张佐时被迫匆匆离校。次日，校长张乃燕向蒋介石辞职。

△　《佛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佛学书局出版。

10月17日　　湖南省府常会决定设立平浏绥靖处，以刘建绪为处长。24日，刘拟具“绥靖”意见六条，呈何键鉴核施行。25日，刘赴平江规划，经费每月50万元。

△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峡江举行扩大会议，对时局的估量、红军的行动方向、土地问题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进一步决定停止执行进攻南昌、九江的计划，将部队部署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以备战的姿态开展群众工作和筹措给养。

△　午后，广西梧州大火，江边游船茶肆中座客650人悉被焚毙。

△　据哈尔滨北满贸易局发表：北满死于鼠疫者已达300余人，中东铁路医务局正致力防疫。

10月18日　　何应钦在郑州行营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进攻洛西。徐源泉、郝梦龄、刘峙、贺国光等均列席。

△　万选才、王老五在南京被枪决。

△　张学良委任东北边防公署高等参议官汲金纯为山海关警备司令。

△　牙买加华侨创办华文《中华商报》出版，每周两期。

10月19日　　张学良派军务厅长荣臻赴平筹设行辕，并与于学忠接洽军事。20日，张学良在沈举行第二次最高干部会议，决定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设沈阳，在北平设行辕。组织大纲由军事、军令、秘书三厅起草。

△　第九军军长上官云相抵汉口，次日乘机飞南京，21日见蒋介石，蒋委上官云相为平汉护路司令。

△　驻黑河苏联领事科尔聂夫与中国黑河市政筹备处长张寿增商订黑河中苏局部通商条约共11条。议定中、苏在海兰泡、黑河作部分通商，苏方在黑河筹设国营商务代办所及其他商业机关，华商集资10万，在黑河组设东北贸易公司，谋对苏发展商业。

△　新任崇文门关监督富葆恒由沈阳返抵天津，对记者谈称，崇关年收140万，担任北平中小学经费90余万元。关可废，教育费不可不另筹。且崇关既废，洋货到平少纳一重税，无形为洋货畅销造机会。28日，富葆恒抵平，称关务照常进行。

10月20日　　鹿钟麟由焦作电张学良，谓冯玉祥事实上已去职，命本人指挥西北各军，愿将全军由中央编制，关于西北军此后兵数及驻屯地，恳代为向中央请示。

△　国民党河北省整委会、北平市指委会举行联合扩大纪念周，中央委员吴铁城出席并讲话，提出阎、冯残部中央交张学良处置，华北党务趁此时机严加整理，并痛斥改组派与阎、冯勾结，破坏统一。

△　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令，率部第三、第四两大队由沈南下，是晨第四大队在天津下车驻防，午率第三大队抵北平。

△　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演说，称：“现在一般社会因党员多为个人谋幸福，少为民众求利益，致对本党常抱不满之态度。且各地控告党员违法之案，指不胜屈。”

△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委员张钫等在开封就职。

△　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在北平宣誓就职，吴铁城代表中央监誓。

△　教育部令朱葆勤、谢树英、庄权三人为接收劳大专员，令即日前往接收，如该校抗令，即予停办，并电沪市府于必要时协助。21日，劳大校务会电请行政院速委校长，并请教育部收回改点验为接收之命令。因劳大校务会一再电请，蒋介石遂决定办法如下：一、举行点验；二、暂由校务会议摄行校政；三、物色继任校长，并面嘱张群电知教育部照办。

△　广东中央银行开始收回前行长黄隆生时期所发行面额五元、十元之钞票，并于16日起，先期停止收存广东中央银行纸币定、活期有息存款，其已存入尚未提取之定、活期纸币存款，亦于同日起停止计息。

△　陕西士绅井崧生邀集陕北23县士绅王季斌、曹颖生、王鼎丞等筹设陕北地方实业银行于榆林，股本额50万元，先由各县筹集12.5万元，于本年12月1日开幕，第一任经理马秉初。

10月21日　　鹿钟麟之代表李炘、冉愚谷、李广安抵南京，次日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归顺之意，但蒋欲冯、鹿均下野。冯、阎对鹿亦不满，授意刘骥、刘汝明出面反对，使鹿处境困难；加以鹿不愿东北军将黄河北岸西北军之军、师长废除，改旅归东北编制，遂于24日自焦作发漾（23日）电声明“解除军职，息影遂初”，并派秦德纯赴沈见张学良说明情况。鹿本人即日离焦作赴天津租界隐居。

△　吉鸿昌由蒋介石任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是日吉由周家口防地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改编经过，并请示驻扎地点。蒋即调第二十二路军往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共”。

△　第八师师长毛炳文率部离郑州到南京见蒋介石。25日，毛赴沪，所部开闽、赣边境“剿共”。

△　国民党中政会外交组讨论进行交涉领事裁判权问题。对中美法权问题，令驻美公使伍朝枢留美继续进行交涉，期于本年内解决；对英待研究英方所提法权答案拟定对策后，再交外交当局交涉；对法俟法使到京后由外部进行谈判。

△　行政院会议决定，威海卫区域定名为“威海卫行政区”。

10月22日　　平绥路宣化、张家口之晋军奉阎锡山令，陆续向大同、浑源一带撤退。东北军第五旅董英斌部开始从南口、顺义向张家口进展。是日，晋军张家口警备司令张诚德电张学良，表示欢迎东北军进驻。同日，董英斌抵宣化，与尚留宣化之晋军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同赴张家口，即日接防。残留张家口之晋军完全退入晋境。

△　上海市政府训令所属，谓奉行政院训令，中央第一一〇次常委会决议：“开除党籍或停止党权之党员，与褫夺公权无别，并不得享有《乡镇自治施行法》第七条之公民权及被选为乡镇闾邻各长之权。”

△　莫德惠电国民党中央及张学良，谓苏联坚持伯力协定，会议无法进行，请准暂停交涉回国。23日，外交部电召莫德惠回国。同日，苏联报纸辟谣，否认有要求以苏军充任中东路护路队之事。29日，国民政府电令莫德惠暂缓回国，避免中苏交涉破裂。30日，莫自列宁格勒返莫斯科。

△　红二军团贺龙、邝继勋两部攻克湖南南县、华容、梅田湖，

常德、岳州震动。24日，何键由汉口返抵长沙，急令川军赖心辉部，湘西陈渠珍、戴恢垣、李国钧等部分途向南、华反攻。27日，又加派彭位仁第十六师星夜开赴湖口一带“协剿”。同日，川军占麻河口藕池，戴部占三仙湖，围攻南县。28日，彭位仁率部赴沅江督师。30日，川军、湘军向南县总攻，占南县。

△　湘军新三十一师钟光仁旅、第十五师侯鹏飞旅复占平江县城，红十六军孔荷宠部由平北向平东梅仙转移。

10月23日　　中原大战反中央之靳云鹗旧部刘春荣第二十军在豫北辉县发生兵变。该部团长陈耀武、特务营长陈北壬乘军部开重要会议时，将军长刘春荣及旅、团长多人击毙，并拘留多人，陈耀武自任第二十军代军长。该部旅长刘万春、申体臣闻警，趋避淇县，通电陈述真相，并请友军援助。驻新乡之石友三部据报，于28日派遣第一、二两军及教导师协同孙连仲一部，赴辉县进攻陈耀武、陈北壬，毙千余人，刘万春、申体臣于29日率所余官兵4000余人至顺德归附石友三。31日石自顺德发出通电，陈明该部解决变兵经过。

△　蒋介石偕宋美龄自南京抵沪，赴宋宅参与宋母之祈祷礼，蒋受洗礼为基督教徒。该教派属监理会。24日蒋等送宋母赴日就医后，即离沪赴甬，转返奉化原籍溪口游览山水。

△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招商局应收归国营，关于股权债务之清理，由整理委员会妥拟办法，呈请政府核定施行。

△　晚，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在汉口三军团总部举行，参加者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徐源泉等，对“剿共”部队配备、经费筹措及联络方法均大致决定。

△　闽财厅长何公敢以茶税押借10万元作讨卢军费。方声涛派孙本戎自泉州抵尤溪晤卢兴邦，接洽释放五省委及卢部输诚事。同日，蒋介石电复闽省当局，对卢军事可酌核情形，全权办理。

△　阎锡山为整顿山西金融，连日在总部集议维持省钞办法。但省钞价格跌落，物价续涨，官方虽布告令各商家降价，均无效果。是日，太原总商会召集20个商行会董开金融会议，议决办法三项：一、本市商行自11月20日起售买货物，一律以现洋或国家银行钞票为交易本位；二、所有商民往来债务，于阳历年终清还时，得用省钞，自二十年1月1日起，均须以现洋清还；三、请省政府借给现洋100万元，由太原总商会担保，一年为清还之期，一面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100万元，由总商会烙印，当现金通行市面，不得折扣，随时兑现，一年收回。此三项办法议决后，由会长王肇泰面呈阎锡山核办。

△　上海统一纱厂工人罢工，30日被迫复工。

10月24日　　广西张、桂军乘围邕滇军退驻平马（田东），连日来集结柳州、南宁、隆安，分向第八路军阵地进攻。是日，张、桂军之便衣队在石龙、良村一带与第八路军朱为珍部相持，次日始退去。27日，桂军朱涛部千余人由柳南下，复攻朱为珍部，另一部500余人，由苏梅森率领，从小路抄出良村、对河，牵制第八路军武宣后方，28日晨袭武宣，炮火极烈。第八路军派兵截击，张、桂军退向来宾。

△　接收劳大专员谢树英回南京向教育部报告接收劳大困难。26日，蒋梦麟在南京就劳大问题发表谈话，谓教部接收劳大本意拟收归部办，以便从事整顿，现既接收困难，当俟新校长产生后，由校长负责办理。

10月25日　　杨虎城军占领潼关，冯军刘郁芬部即晚自西安退走。杨部马青苑旅27日占领西安。

△　孙本戎电告闽省府，卢兴邦愿无条件送还林知渊等六人，林等日内可赴德化。26日，福建旅京同乡因收编卢部将成事实，特呈请国民政府彻底讨卢。27日，卢兴邦拍长电一则，向闽省府请罪，

谓“一六”事变，为一二宵小所酿，与卢兴明无涉，已将卢兴荣革职待罪，请停止军事进行。闽省府复允即日退兵。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蒋伯诚在沪对记者发表谈话，略谓：蒋介石曾表示，倘西北军以个人名义完全脱离冯、鹿关系，则与中央袍泽一视同仁，否则绝难通融。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第二师师长顾祝同为洛阳行营主任。

△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江西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军“围剿”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于运动中。经反复讨论，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同。26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

10月26日　　陈济棠在梧州召李扬敬、杨鼎中等开军事会议，决定先攻南宁，后攻柳州。李济深、陈铭枢鉴于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张发奎等均为马晓军旧部，故邀请马氏主持两广和平。同日，国民政府派前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任马晓军自沪赴港，转往梧州收拾桂局。

△　石友三第十三路军归东北军指挥，石应张学良约自新乡到沈。是日张学良令石友三不许招兵，静候点编，驻地问题俟蒋决定，石表示遵办。

△　冯部孙良诚派代表王景波抵济，请韩复榘代向中央接洽投诚，得韩应允，是日王返河南。

△　吉鸿昌在淮阳就豫鄂皖边防“剿匪”副司令职。

△　交通部以军事已告结束，令各有线、无线电管理局及电台将

以前颁布之取缔国内外商电使用密语办法取消。

△　台湾文化三百年纪念会在台南召开。

10月27日　台湾雾社高山族人民因不堪日人苛虐，1500人举行抗日大暴动。在高山族领袖摩那·罗达粤领导下，经过周密准备，并推本族日名花岗一郎、花岗二郎兄弟参加领导，乘是日雾社公立学校运动会开幕时包围会场，袭击日人，同时袭击警所、学校、邮局及官员宿舍等处，击毙日人134人，击伤215人，占领雾社全区。

△　扩大会议在太原傅公祠开正式会议，汪精卫主席，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所拟之约法草案全文，并发表向全国征求对该约法草案意见之宣言。次晨，汪离太原南下，该会其他要员亦相继离太原，扩大会议随之消散。

△　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率各厅长到沈阳，向张学良报告接收冀省府经过及军事布置情况，并请示方略。31日离沈返平。

△　何成濬电令回鄂各部队，务自11月1日起，三个月内“肃清”红军。

△　第九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辞职，王金钰奉令兼任，是日在郑州就职。同日，何应钦自郑州电军政部，谓军事告一段落，郑行营事交王总指挥金钰办理，本人即返南京。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发表任命赵守钰为山西宣抚使。

△　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四、十二各军，由新喻峡口攻取上高，图断袁州罗霖师与高安公秉藩师之联络。是日，红军遭罗霖部袭击，弃上高向清江（今临江）转移，集中新喻、清江以北及高安西南地区。鲁涤平令所部分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谭道源、罗霖分任指挥进攻红军。

10月28日　中央军飞机连日在晋南投弹，太原发现“中央限阎、冯于两星期内离境，否则用飞机催行”，并警告晋人“为免惊恐，送二人出境，俾部下可受中央新任命”之传单。是日，中央飞机一架开始在太原投弹轰炸，死伤人民10余名。29日，又有中央飞机六架到太原轰炸。

△　晚，桂军黄绍竑部经蒲庙、永淳进攻距横县20余里之第八路军杨鼎中部阵地，被击退，杨部向横县推进。31日，杨亲率分驻永淳、横县各旅，取道蒲庙向邕宁城东南进攻。

△　蒋介石以军事结束，通令各军，战时名义一律撤销，所有各部善后事宜就近与各该省府商承就近各行营妥筹办理。

△　张辉瓒、谭道源、许克祥、李觉、罗霖、公秉藩、邓英等师包围进攻吉安红军。汉口行营分电湘、赣当局切实联络进击，并派飞机三架轰炸吉安。

△　被卢兴邦扣押之闽省六委，除陈乃元病死尤溪外，林知渊、许显时、程时煃、郑宝菁、吴澍五人是日由孙本戎等护送至福州。

△　国民政府以招商局为我国设立最久之航业机关，因经理无方，濒于破产，虽经派员整理，仍少成效，是日明令将该局收归国营。

△　南京中央大学总务长黄曝寰在纪念周报告中大改组经过时，被学生所逐，风潮益形扩大。是日，张乃燕复教职员、学生书，声明辞职之真相，颇以教育部长蒋梦麟为此纠纷之幕后人。同日，中大八院长联名急电蒋介石，请令张乃燕校长即日回校。蒋梦麟发表谈话称：“本人无不以良心任事，对中大处处维持，反受责难，甚为痛心。”30日，张乃燕致函蒋梦麟，指责“何以小小学潮，小事大报，有劳主席亲裁”。双方互函责难。

10月29日　台湾高山族起义人民占领雾社全区后，遭台中日本守备队之进击，退入山区，化整为零，据险抵抗。被围山中妇女儿童皆行自杀，以送父兄丈夫出战，绝其后顾之忧。男子组织决死队与日寇搏斗，战败亦均自杀，绝不忍受俘，英勇坚持抵抗50余日。台湾总督石塚　与台中日寇部队均感无法入山，竟惨无人道筑长堤将山区包围，出动飞机施放毒气。高山族人民生存者仍奋勇作战，弹尽粮绝即集体自杀。事后于岩窟中发现，战士及妇孺往往连成一串，每串十余人，凄惨壮烈。日寇后捕获起义领袖摩那·罗达粤之妹马洪·摩那，逼其不断携带鸡肉酒饭前往诱降援尽食绝之兄。摩那·罗达粤及其子泰拉粤·摩那，偕同起义人员40余人于弹尽粮绝后，于卡萨溪上流之一岩穴中集体自戕以殉。

△　国民政府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30日，杨进驻西安，组织省政府，任马青苑为西安警备司令。

△　日本立教大学校长雷甫奈达在东京谈其在北平研究北京人之结果，谓北京猿人头骨经学者判明为距今60万年前之人类，可谓人类之元祖，为学术界惟一之研究资料，各国均欲收买，华方不允，拟永久保存于北平。

10月30日　教育部前曾呈请国民党中央废除《中日文化协定》，要求：一、日本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由中国自由支配；二、取消日外务省对支文化事务局，根据平等原则，由中日另组机关，处理中日文化事业。外部向日交涉后，最近接日本复文，对方案第一项办法完全不同意，对第二项仅允将补助中国留日学生之学费办法加以变更，并坚持文化协定原议。是日，教育部将驳复各点，再请中央向日本外务省严重抗议，废除《中日文化协定》。

△　上海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被中华学艺社推举为出席日本学术协会代表东渡赴日。是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决议以马君武“干犯党怒”，着即免职，选于右任继任校长。

△　汪精卫、冯玉祥抵太原与阎锡山相晤，决定阎、冯下野，汪离晋。11月1日，汪偕陈璧君等离太原赴津。

△　中共中央创办之《实话》报在上海创刊，至次年3月5日停刊。

10月3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善后短期库券条例》，券额5000万元，月息八厘，自民国十九年11月1日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还本付息基金由财政部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如数照拨。从民国十九年11月起分66个月还清本息。

△　日本阁议决定，今后公文及教科书一律将“支那”改称为“中华民国”，并任命村井仓松为驻沪日总领事。

△　阎锡山派代表温寿泉、梁汝舟持阎亲笔函自太原到沈，与张学良接洽山西军事善后办法。

△　蒋介石委陈光中为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

△　蒋介石以杨虎城第七军入陕“讨逆”有功，特擢委第十七师第二旅旅长孙蔚如为第十七师师长；第三旅旅长马青苑为第五十八师师长；第一旅旅长冯钦哉为第七十一师师长，仍由第七军指挥。

△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25日起在江西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分析政治形势，总结攻打长沙、夺取吉安的经验教训，作出相应决议。是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决定主力红军东渡赣江，准备反“围剿”作战。

是月　　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介石战争失败，山西省银行在阎统治时滥发之纸币，亦随阎之战败而狂跌，每元钞票只值0.3元左右，并继续下跌。正太铁路车站、邮局、电话局等首先停收省银行钞票，改收现洋，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山西省银行由省政府接管。

△　热河兴业银行发行新纸币。东三省官银号亦发行新纸币。

△　日人在南满铁路安奉线（自安东至沈阳苏家屯），自去岁中苏战云紧急时，开始兴修炮台，至是月底止，全线修成大小炮台已达77座。

11　月

11月1日　阎锡山之代表温寿泉在沈阳会见张学良，传达阎之希望，谓阎现拥有军队16万，山西一省无论如何不能养此大军，请将察哈尔、山西、陕西三省仍为晋军防地，如能容纳，阎即下野；晋军统率因赵戴文已老，拟委诸徐永昌。张当即电南京请示，旋接南京复电称，须阎确实出国后，晋军编遣经费方可由中央负全责。

△　何成濬调集张辉瓒、谭道源、熊式辉、蔡廷锴、蒋光鼐、邓英、许克祥、公秉藩、罗霖、彭启彪10师兵力，图先消灭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然后消灭湘鄂红军。是日起，湘、鄂、赣三省“剿共”部队开始动员。第十八师张辉瓒部开抵樟树镇，即向南进攻，新编第二十师许克祥部抵丰城。红军主动退出上高、高安及新淦（今新干）县城。4日，第十八师朱耀华旅占领新淦，戴岳旅占领袁河、赣江汇合处之清江。红军大部向峡江、新喻西南退却。

△　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率部兼程向湖南梅田湖进攻红军，与贺龙红二军团激战甚烈，是日占领梅田湖，并分三路进攻华容，3日占华容，5日又占领南县。红军由公安、监利、石首回洪湖根据地。

△　何键赴平江、浏阳一带视察，并召集刘建绪等开军事会议，讨论“剿共”办法。6日，刘建绪赴浏、平督战。

△　广东省府主席陈铭枢代表蒋介石自南京飞抵汉口，2日，慰劳并检阅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3日，蒋、蔡两师开始向

湘、赣开拔“剿共”。

△　午后2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新喻县罗坊之园前村发布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之”的第一次“反围剿”命令，部署红军作战计划如下：一、先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二、第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应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准于本月5日在新淦对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并在樟树通丰城、新淦两大道附近筹款20万，发动群众。以后之集中地在永丰之藤田附近。三、第四军、第十二军为右路军，应于3日集中部队，4日检查工作，5日开到峡江附城，6日渡江（归林彪、杨岳彬指挥），经崇仁向抚州前进，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40万，发动群众。以后集中地在乐安之招携市附近。如中路军受优势之敌威逼时，则应提早集中时间，向中路移靠，以便应敌。四、第三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为左路军，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包括安福）扰敌工作，与第二十军及中路军取联系，牵制敌人进攻吉安。五、第二十军应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确取联络。六、总司令部拟于5日在峡江城渡河，位置于峡江县城对岸通新淦之大道旁，以后则随中路军（第三军团）行止。

△　郑州行营令道格拉斯飞机四架飞往太原掷弹，阎锡山大本营被命中，伤亡甚重。

△　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沪呈蒋介石，以军事大定，盐税亟待整理，请将驻防九江之缉私特务队调回，实行改良缉私，以维税源。

△　外交部令驻日大使汪荣宝交涉修改《中日文化协定》。

△　全国工商会议在南京开幕。主席孔祥熙致开幕词，提出巩固工商金融、协谋工业建设、改进工商组织、推行科学管理、振兴固有

国产、发展国外贸易六端，请大会商榷。同日，上海80余同业公会为工商部议驳市商会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已未入会同业均应一律遵守行规”一案，致电参加全国工商会议之沪市商会常委王延松，请提出工商会议复议。

△　上海丝厂同业以销滞亏本，遵照上月19日公议停业，全沪丝厂106家全体停机，工人陷于失业者达四万人。

△　天津妥信银行受市面萧条影响，亏欠10余万元，是日倒闭，经理王竹生潜逃。

△　《苏报》在江苏镇江创刊。

11月2日　蒋介石在奉化溪口对记者发表对于中央大学风潮之意见，谓：“中大校务废弛，国家主义派、改组派、共产党混迹其间，余两年来早有所闻，并非蒋（梦麟）部长报告，学风如此败坏，校长应负全责。”

△　杨树庄在福州召集刘和鼎、陈季良、张贞、方声涛等开闽省军事会议，商闽局改造计划，决定对陈国辉、钱玉光、张子明、刘宗彝、梁济川、卢兴邦等部实行改编，并议定以卢兴邦为闽西“剿共”前敌总指挥；卢部悉数退出尤溪，集中清流、宁化，然后即向闽西前进，限一个月内肃清闽西共军。

△　朱德红军一部由江西莲花进入湘东之茶陵、攸县、安仁一带，会合陈韶部克茶陵，6日克安仁。何键急电湘南警备司令段珩及湘南团防第一纵队指挥曾正炎扼守耒水、湘水之线，严为防堵；并急电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赶率萍乡各部回湘，在攸（县）、醴（陵）进击。

△　沪公共租界工部局为实施文化侵略，破坏我国教育行政系统，近添设教育部，限令租界内各小学于11月底以前填表呈报，以便

收归管理。是日公共租界20余校校长开联席会议，对工部局添设教育部一致否认，并决议组织收回租界教育权运动委员会等四项具体措施。

△　晚10时半，天津日本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仓库失慎起火，烈焰冲天，延烧八小时，余烬3日晚始灭，焚毁中吉、大信等洋行棉花、麻丝、豆油、纸类等物，价值百余万元，此为天津数年来未有之巨灾。

△　下午，上海闸北共和路福昌军衣第三厂突然发生火灾。该厂楼房一栋、平房五间均付一炬，死工人36人，伤70人，全厂损失约三万元。火起后，厂方不但不设法令女工逃命，反将门户关闭，以防货物漏失，竟至一发不可收拾。

11月3日　外交部宣布，苏联发表王正廷致李维诺夫电，谓莫德惠在苏正式会议，对中东路、通商、复交三问题有讨论签字全权之说，并非事实；王正廷仅电莫德惠，关于中东路、通商、复交三事，可依次讨论，惟不得并为一谈，此三问题之决议案，须由政府核准，始得签字。

△　南下斡旋解决桂局之马晓军抵梧，与陈济棠确定解决桂局办法：一面由马晓军联络主和之黄绍竑派，一面由粤军急攻邕、柳，促主战之李宗仁、张发奎、白崇禧下野。2日，黄旭初之代表周渤雄赴梧与陈济棠、马晓军商收编事。是日，赴梧与陈济棠商和平条件之黄绍竑代表四人抵广州见古应芬。

△　湖南红三军团之孔荷宠、李实行两部与自江西入平江之红三军黄公略部会合，是日开始即在长沙、平江间之朱砂坳、更鼓台一带，与陶广师激战四昼夜。

△　国民政府特任张之江为江苏绥靖督办，李鸣钟为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刘镇华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

△　国民政府公布《电影检查法》，规定凡电影片无论本国制作或外国制作非依本法经检查核准不得映演。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违反三民主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提倡迷信学说者不得核准。

△　中国公学学生1200余人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坚决挽留校长马君武。同日，蔡元培亲往敦劝于右任早日就职。5日，该校学生又推代表八人谒于右任，于表示“余不辞职，马先生断无重来长校之理”。6日，中国公学全体学生代表团招待上海各报记者，详述此次风潮之远因及其影响，表示非达到挽马目的不止，请校董会收回成命。

△　苏、浙、沪丝业代表王晓籁、沈骅臣、王晋臣、朱静安等分赴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工商部，请愿发救济丝厂公债1000万元，各机关表示接受。

11月4日　　阎锡山通电下野，声明“即日释权归田，借副父命”，将晋、察、绥、陕、甘、青各省政治交各该省政府，军队交各该警备司令，整理结束，以善其后。同日，阎赴晋祠晤冯，劝其暂勿离晋，5日晨返五台河边村原籍。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北省政府，免去徐永昌、段宗林、朱绶光、孙奂仑、李鸿文、沈尹默、温寿泉、吕咸、李竟容、赵丕廉、严智怡省府委员职。除委员兼主席王树常业经明令简任外，任命王玉科、姚铉、张见庵、林成秀、常炳彝、何玉芳、严智怡、陈宝泉为该省省府委员。王、姚、张、林、何、常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工商、农矿各厅厅长。

△　赣东红十军方志敏部由彭泽、湖口转移，占领皖南秋浦县城（今属东至县）。皖省主席陈调元急调五十五师阮肇昌部，会同许克祥师防堵围击，7日占秋浦。红军向赣边深山转移，10日，到达浮梁（今并入景德镇）、德兴一带。皖军第五十七师岳盛宣部由婺源出浮梁，第五师胡祖玉部由九江进抵彭泽、湖口夹击红军。海军部并

派“江元”、“江鲲”、“勇胜”三舰至湖口一带游弋“协剿”。

△　红二军团贺龙、邝继勋部占领津市，次日又占澧县城。何键闻报，急电第十六师彭位仁等赶回安乡向津、澧追击；令戴恢垣、李国钧率部由常德、临澧向津、澧抄袭；陈渠珍率部在石门、合口一带堵击。

△　何应钦乘机由郑州赴西安视察，与杨虎城会晤，商定：一、请中央在两年内修通陇海路；二、杨虎城兼陕西省民政厅长；三、西安解除戒严。

△　晋军北退后，困守山东诸城之高桂滋部高健白旅由韩复榘改编为山东警备第二旅，以吕欣五为旅长。是日，吕应韩召到济开会，即被扣留。吕部军队开至高密，亦被第七十三师师长展书堂借宴会为名，将该旅连长以上军官一律邀至高密城内扣留，并将吕部包围缴械，计俘虏士兵1120余名，枪900支。至是高桂滋残部全部解决。

△　行政院通过工商部关于裁撤崇文门设关征税之提案，并交工商、财政两部会商抵补办法。5日，平商会以取消崇关另筹抵补不适当，决派代表入京请愿。

△　全国工商会议讨论工商部交议之《实现劳资协作方案》，发生大辩论，结果决定重新审查。孔祥熙向记者表示：该会提案及决议案不过供政府之选择，决非一经大会议决，随即实行，政府借此明白工商界现在之趋势与需要。5日，会议原则通过《实现劳资协作方案》，取缔有奖储蓄会，请工、财两部拟具办法。6日，会议通过提倡国货、失业救济、工商业救济等要案。对上海各同业公会所争之“已未加入公会一律遵守行规”案原则通过，请工商部采纳施行。

△　江苏省政府决议发行第一期江苏建设公债400万元，向各县摊派250万，向银行抵押150万。

△　上海中国饭店开业。

11月5日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实行湘、鄂、赣三省会合“剿共”，将所部分为三个纵队，分三路全线总攻。第十八师张辉瓒部、新编第二十师许克祥部为第一纵队，张任指挥，集中丰城、樟树，沿赣江进攻新淦、峡江之红军，以吉水、吉安、永丰为目的；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独立第十四旅刘夷部为第二纵队、向瑞河、高安、新喻、清江之红军攻击，以新喻为目的；第七十七师罗霖部、新五师公秉藩部为第三纵队，集中高安、上高，向分宜、袁河之红军进攻，以分宜、安福为目的；中央缉私团及毛炳文、熊式辉两师担任预备队。

△　晋军张荫梧、李服膺两部对受徐永昌节制表示不满，主张由赵戴文单独与南京接洽。晋军分化之势已成。

△　延边龙井村日警寻衅，日趋严重，近日又由朝鲜调来日警106名，占据中国岗位，夜间且到乡间任意搜索扰民。外交部据报后，已向日使馆提出第二次抗议。是日，新增龙井村之日警106名，奉日外务省电令撤退。

△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整理中央大学及继任校长问题。教育部长蒋梦麟列席报告中大校务纠纷真相。同日，中大学生全体会议决定：一、张乃燕校长辞职不予挽留；二、提出继任校长标准四项，不合者誓以全力反对，并于7日发表宣言。

△　中国公学及光华大学教授罗隆基，因被人控告“反动”，下午在吴淞中国公学被捕，解送公安局。蔡元培、宋子文等前往具保，6时即释出。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与大东、大北、太平洋三公司代表开第四次水线交涉联席会议。三公司代表对交涉委员会坚持年底撤销旧约，另定平等合同，均表示让步。

11月6日　财政部财政整理会秘书长曾镕甫对记者谈，内外国债及铁路交通等各项债款，共有200余种，债额总数共为20亿元，外债12亿元，内债八亿元，现决定自本月15日起在上海开始整理。

△　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决议：讨逆军事业告结束，停止检查新闻；并训令各级党部厉行新闻登记，借防“反动”而便指导。

△　国民政府以辛博森破坏海关制度，滥用国课，殊违国家法纪，下令通缉重惩，通缉令是日到天津。

△　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由湖南抵江西萍乡，向莲花、永新之红军进攻。同日，红军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各部分抵抚州（临川）、新喻及闽、粤边境。何成濬即令鲁涤平、何键“跟剿”。次日，公秉藩师由新岗岭向新喻推进。

△　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任命陈兴亚为东北宪兵司令，陈是日在北平市就职，下午即赴津收编津市宪兵。

△　第二次世界革命作家大会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萧三代表中国“左联”出席，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

11月7日　张学良偕吴铁城、张继、刘光等乘车离沈赴天津，由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及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8日，张学良抵津。10日，中央所派迎张之贺耀组、张群等到津，与张学良会晤后，即偕同南下赴京。

△　黄绍竑在香港电古应芬，谓“桂苦战经年，元气已伤，军民皆望和平……恳公鼎力斡旋，和平解决，至为容易”。古遂电请国民党中央予黄以桂善后督办名义。黄亦派代表赴京接洽。

△　石友三部米文和旅进占辉县，刘春荣残部陈耀武旅被缴械。27日，主谋杀害刘春荣之陈耀武在郑州被捕枪决。

△　石友三离沈回防，15日在顺德通电就第十三路总指挥职。

△　湘南警备司令段珩部复占安仁，红军退茶陵。何键以茶陵失守后，攸县危急，于14日电南京告急。蒋介石遂令何成濬转令萧之楚即日率师入湘。同日，段珩部占领茶陵。

△　李鸣钟通电即日在郑州就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职。

△　全国工商会议原则通过筹设人造丝厂、救济茶业、提倡丝业、解决工商目前困苦、集资组织银团、提倡科学管理法、增加进口成货税等案，其详细办法交工商部核办。

△　厦门各界组织援萧（信庵）委员会抵制渣华轮。8日，该公司“芝巴德”轮自沪抵厦，仅卸客，空轮赴香港。上海渣华公司为挽回营业计，派代表为“萧案”到华侨联合会道歉，并声明惩处侮萧人员。华侨联合会表示，应向全国民众道歉。

△　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之山东古迹研究会开始在济南附近之龙山镇发掘谭国古城。不久即发现被誉为龙山文化之黑色陶器，在我国新石器时期之陶器体系中独树一帜。

△　国民党中宣部通令各省、市党部宣传部转饬当地报馆，今后新闻记载，一律采用白话。

11月8日　余汉谋指挥第八、十两路军再攻南宁，兵分三路，直袭南宁城，激战甚烈。马晓军电劝李宗仁、白崇禧等出洋，谓中央可给考察名义，各给川资五万，两年归国后优用。

△　阎锡山下野后，诡称归里服侍“亲疾”，但仍在五台河边村设军政办事机关，令山西分晋南、晋北、晋东三面布防，并发表赵承绶、张会诏、杨澄源、李生达、杨效欧分别任绥远区、平绥区、河东区、孟县辽县区、潞安泽县区守备司令，徐永昌、杨爱源分别为晋绥警备总、副司令。是日，中央军飞机复至太原掷弹威胁，死伤商民50

余人。

△　国民政府任命上官云相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在第三军团总部召集徐源泉、夏斗寅及各军、师长、各省府委员开绥靖会议，讨论湘、鄂、赣三省“剿共”及鄂省政治。

△　闽省政府令卢兴邦部退出尤溪、延平、建瓯三属，集中沙、永、邵、光四县，听候改编加委。卢兴邦于是日在延平就闽西“剿匪”先遣指挥，并保卢兴明、张兴龙任旅、团长，另派员与闽省府接洽暂缓调防。同日，闽省府电浙省府请将拘押在江山之卢兴明释放。

△　全国工商会议闭幕，并发表宣言，谓会议讨论议案共406件，工商界切要根本问题，如劳工问题、科学管理问题、工商金融问题、保护关税及废除苛捐杂税问题、提倡国货问题等10项均审慎议决。但工商部仅采纳议案中设立国际贸易协会一项，在闭幕式前宣布：聘张嘉璈、陈光甫等89人为筹备委员。

△　禁烟会发表财政部关于民国十九年上半年度各海关查获鸦片及麻醉毒品统计报告，总数共值银47万余两，其中江海关查获者占70％。

11月9日　　何键派余湘三赴澧城督战，川、湘军向津、澧之贺龙、邝继勋红二军团总攻，红军自津市移驻澧北大偃塘、张家厂。10日，川军占领津市，并驰澧增援，与湘军第一警备司令陈渠珍部及湘西“剿匪”指挥戴恢垣部联络，大举围攻红军。贺、邝兵分两路，一向湖北公安、石首、监利等县转移，并先后占领之；一向石门、慈利进军，于13日占领石门，15日晨分路进逼慈利，反攻桑植。

△　宁波、苏州、福建、湖北、湖南等27个旅沪同乡会，为舢板船夫忻鼎香被法水兵推落黄浦江溺毙一案发表宣言，要求惩凶、赔

偿、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并严办私纵凶犯之警捕，进而撤退驻华外兵，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11月10日　　西北军后方总司令兼代陕西省主席刘郁芬在天津通电下野，谓："兹幸三秦治安负责有人，遂于上月二十五日脱离陕境，退让贤能，副我素愿。"22日，刘派代表郑达如到南京见蒋介石，蒋交亲笔函一件，嘱迎刘去南京。29日，刘到南京见蒋。

△　山西旅京同乡王用宾、弓富魁等电劝阎锡山早日离晋，谓"十九年治晋成绩，晋人痛之刺骨已久，今惟出国远走一途"。

△　何键因受湘人攻击甚力，加以军饷竭蹶，应付不易，是日电呈国民政府，力辞第四路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清乡司令、湖南省党部委员本兼各职，并另电蒋介石，谓湘省军费自6月起至10月止，欠饷达300万元，请速予接济。12日，蒋复电挽留。

△　蒋介石任命韩德勤接替叶开鑫为陆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是日，韩在徐州防次就职。

△　中苏会议苏方代表加拉罕致函中方代表莫德惠，谓就东三省目下之状况而论，《伯力协定》可谓业已履行，开始讨论关于中东铁路及中苏商务、外交关系诸事之具体问题，不复有任何障碍；又谓渠为建设中苏友好之稳固基础计，深信中国必能接受苏联开始谈判之建议。后因加拉罕不俟我方同意，先将原函发表，莫德惠奉外部电令，于17日函加拉罕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中东路现状，其不违背中俄、奉俄协定所规定者，在未经双方同意变更中东路现行办法，或由中国赎回中东路前，任何一方不应加以变更。

△　中国公学校长于右任，定是日到校视事，全校遍贴欢迎于之标语。然学生分为"代表团"、"同盟会"两派。"代表团"方面开紧急会议决定，先行罢课，以示拒绝，并贴出"誓死拥护马校长回校"等标语。"同盟会"方面，亦有各种标语贴于"代表团"标语之上，致两派发

生冲突。第七区区长即派警赶往弹压。午后于右任赴校，声称并非前来接任校长，系受校董会蔡元培与胡适之委托，前来暂行维持。下午，马君武由日本抵沪，中国公学学生代表前往迎迓，恳请马回校主持。11日马托胡适、王云五持马亲笔函到校训话，劝学生即日复课。学生接受马之劝告复课，但仍坚持马复职。19日，马返校授课，备受学生欢迎。

△　沪商吴蕴初、朱子谦等集资在沪西创办天原电化厂，专制盐酸、烧碱等工业用品，经一年筹备，是日行开工礼。

11月11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中委张静江、戴季陶、陈铭枢、王正廷、李石曾、陈策自奉化溪口回到南京。同日，接见马福祥、梁冠英、马鸿逵、刘峙、张之江、杨树庄、何应钦、何成濬、孙连仲、袁英等。晚设宴招待各将领。

△　被刺受伤之阎锡山所委津关税务司辛博森不治身死。12日，英使馆讨论善后，草电沪总领馆，向外部催办缉凶，并另函催张学良缉凶。

△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谈视察陕灾情形，谓该省人民之苦甲于全国，武功一县原有人口15万，一年之中饿死八万余人。

11月12日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主席胡汉民致开会词，声称三全大会议案，因受军事影响，未能实现。此次会议对一年余之工作，不可不有所检查，应议出“与人民有益”，且能实现之议案；对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动，要力行矫正。胡重申有条件地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反对制定约法。

△　张学良抵南京，军政要员何应钦、王宠惠等700余人到站欢迎，张即赴总司令部与蒋介石会晤，表示外交问题由外交部负责办理。随即共同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六十五周年纪念及四中全会开幕礼。

△　郑州行营电复太原总商会感（上月27日）电，限阎锡山10天内离晋，否则即派大批飞机轰炸。阎急召商震、徐永昌商议军政善后事宜。

△　鲁涤平第九路军之第一、二、三纵队，自5日总攻后，先后将清江、新淦、新喻、分宜四县占领。红军大部由峡江渡赣江，经永丰、乐安，于10日占领崇仁。是日张辉瓒、谭道源两师由丰城、清江星夜向崇仁、抚州急进，与邓英师会合夹击红军。

△　红三军团彭德怀部近在平江会议，宣言再取长沙。孔荷宠部移驻汨罗、新市，以断湘、鄂交通，拟西与贺龙部会合。11日，陶广师由官家桥一带向平江推进。是日，湘军彭位仁急率刘旅占领汨罗、归义（位于湘阴县北）。

△　第八路军将领李扬敬、余汉谋等在贵县会议，决限张、桂军早日投诚，否则进兵邕、柳。陈济棠欲以政治手腕收拾桂局，已由缪培南、马晓军派代表马展雄、韦超雍往邕宁，与李、白、张接洽收编事。李、白、张要求改投降为合作，陈济棠坚拒。

11月13日　　国民党四中全会开预备会，决议：推定胡汉民、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为主席团，陈立夫为秘书长，会期自13日起至18日止，通知张学良列席会议。会后即开第一次会议，决议如下：一、以候补中执委王正廷、陈耀垣递补阎锡山、谭延闿二执委缺；二、以朱培德补谭延闿之中常委缺；三、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分为党务、政治、军事、教育、经济五组，并推定各组审查委员。

△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偕谭道源飞赴樟树督师，并与张辉瓒等会议军事。15日，第一纵队张辉瓒师占崇仁，红军大部退集南城、石城、宁都。鲁急电闽省府出兵防堵。第二纵队谭道源师一部驻新喻，一部进抵抚州，罗旅已达临川会同邓英师向闽边出动。许克祥师由新喻向峡江推进，策应第二纵队攻取吉安、吉水。第三纵队自克新

喻、分宜后，罗霖师由安福绕出吉安红军彭德怀部之后，公秉藩师由新喻、清江经峡江攻吉安红军之左。16日，湘、鄂、赣“剿共”军下第三次总攻令。

△　龙井村中日冲突案，经延吉市政筹备处长张书翰与驻龙井村日总领事岗田交涉了结，议定由中国方面给予伤毙日警吊慰金日币一万元，并表示惋惜。

△　国民政府决定承认巴西新政府，是日由外交部电令驻巴西公使戴恩赛查照办理。

△　刘翼飞在张家口通电就察哈尔省委员兼代主席职。

△　顾祝同遵令进驻潼关，并于同日在潼关通电就洛阳行营主任职。洛阳行营改称西北行营。

△　北平教育部电蒋介石、张学良，请示崇关裁撤后经费抵补办法。

△　招商局交涉上海金利源码头案，法方三德堂允出卖该码头地皮，惟1.16亩地索价银39万两，并限次日答复，否则即请公廨执行。招商局以限期太促，特派人访法领事甘格霖，请展限一月，法领答允。

11月14日　　国民党四中全会第二次大会，决议省区应重行划定，并酌量缩小。关于议处北平非法扩大会议分子案，经中央监察委员会常会议决，除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黄绍竑、鹿钟麟、薛笃弼、王法勤、陈公博、顾孟馀、朱霁青、柏文蔚、潘云超、白云梯、郭春涛、陈树人、张知本17人早经另案开除党籍外，决定将赵丕廉、赵戴文、陈嘉祐、经亨颐四人永远开除党籍。商震虽列名扩会，但因张学良之解释，未议处，仍保留党籍。

△　张学良、蒋介石磋商北方善后，决定：一、北方政局由张学

良全权处理；二、整理山西、西北两军之具体办法，待军事善后会议决定；三、该两军之整理办法决定后，张学良负责执行。张发表谈话，宣称此次来京任务，纯为完成中国统一及研究保持永久和平之适当方策，以期今后不再有因个人或党派不同而发生内争之事件。

△　张学良电商震、徐永昌，嘱速派代表赴南京讨论晋军改编问题。

△　教部训令中国驻南洋英、荷属领事调查各该地政府对于侨校用书限制情形，并晓谕所属侨校自由采用本部所审定之教科图书，一律拒绝各该属政府所编印之课本。

△　捷克新任驻华代办拉法尔到外交部驻沪办事处通告就职，并称中捷商约已经政府批准，令彼为全权代表，与中国代表正式订约。

△　辽宁凤城前曾发生日守备队惨杀华人事，迭经交涉无结果。是日，日本守备队又枪杀凤城西沟村农民刘德才，县政府与日方据理交涉，日方竟声称出于误伤。

△　厦门警备司令林国赓奉令取缔援萧委员会抵制渣华轮，是日起，海上已无纠察队。19日，漳厦司令亦布告制止抵制渣华轮。20日，沪华侨联合会、海员总工会、上海妇女协会等团体电请福建省政府，迅电令林国赓收回“取缔抵制渣华轮”之成命，并将受敌人运动、妄请取缔之思明县长撤职。

11月15日　国民党四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一、拨款200万元完成总理陵墓工程；二、于民国二十年5月5日召集国民会议；三、取消编遣委员会。关于约法问题，有人认为在总理《建国大纲》中关于国权及土地两部分，已有细密阐明与规定，关于人权之解释，纤细无遗，政府所订之各种法规皆根据民权主义而定，凡此种种皆足以代替约法，无须再画蛇添足。次日，各组审查会对约法案仍有激烈争辩，决留交国民会议讨论。

△ 整理内外债会议开会，中国方面出席者为委员长王宠惠、委员宋子文、孙科、王正廷、孔祥熙、张学良等，各国出席者有日、英、美、法、意、比、丹、荷、瑞九国代表。王宠惠致词谓中央政府对于内外债务中之无担保不确实债务，拟从速整理，并将中国《内外债务一览表》及《整理方案纲要》分发各国代表。《整理方案纲要》规定，自本年度起，按年拨还各国债款。会议结果，以各国债务性质不同，决定以后由各国分别进行，以不违背债务、债权任何一方利益为原则。

△ 法国新任驻华公使韦礼德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香港《工商晚报》创刊。

11月16日 张学良在南京招待中外记者，略谓：对苏交涉，当本中俄、奉俄两协定精神及和平方法进行；北方军事善后，国府已定有“永久和平”方法，阎、冯、汪出国绝无问题；召开国民会议事，原则已经四中全会通过，办法正在研究；东北党务整理办法，正在交换意见中。

△ 商震、徐永昌、张荫梧、王靖国、宋哲元、孙良诚、孙殿英、高桂滋、杨爱源、傅作义等26将领联衔电蒋介石、张学良，称阎锡山下野后，决定出洋游历，表示惟有秉承教令，勉维现状，特派荣鸿胪、吕咸、黄胪初晋谒请训。

△ 阎锡山以大势已去，令其岳父徐一清等退出山西省银行股东，提走现金，晋钞即告破产。是日起，全晋各官营事业及一切税捐悉改收现洋。商民怨声载道。各县因省府征收国家、地方税款，一律限用现洋，亦拒收晋钞。曲沃、新绛等10余县民众群集县府请愿，发生包围县署、罢市、骚动等情形。连日商震、徐一清在太原集合全省商会代表，筹商维持晋钞办法，均无结果而散。

△ 杨虎城经赴临潼、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大荔、三原等

处视察灾情，是日通电全国，乞赈陕灾。18日，杨飞赴南京见蒋介石，并以救济陕灾、兴办教育、澄清吏治三事请示具体办法。

△　加拿大商务考察团一行38人由团长叶姆里率领于上日抵上海。是日，上海市商会宴请该团，王晓籁在致词中提出要求两点：一、加对中、日两国人民入境应一律待遇，不应对中国特设移民专例；二、对于商人往来应绝对许其自由。叶姆里允转达政府。27日，该考察团离香港回国。

11月17日　　上午，国民党四中全会开第四次大会，通过关于党部组织、党务工作、特许东北将领入党各案。决议中委赵戴文开除党籍，以张贞递补，并推刘芦隐、陈布雷起草大会宣言。下午，开第五次大会，将关于中央改制及“限期剿共”等五案合并讨论，通过刷新政治及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两案，并决定杜绝九龙海关案，建设中山自由港及发行公债800万救济陕灾案，农、工两部合并暂改实业部，卫生部并入内政部案。

△　郑州行营派飞机续炸太原，并散发传单，促晋人驱阎。20日，商震之代表吕咸、徐永昌之代表黄胪初见蒋介石，蒋谓关于收拾西北办法，以阎即日离开部队下野出国为先决条件。22日，商震、傅作义及阎锡山均有电致吕咸，谓阎锡山愿偕冯玉祥出国，请转告中央。24日，徐永昌、商震续派代表赴京见蒋介石、张学良，申述晋方将领愿服从中央，并商山西善后。

△　张学良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示誓以精诚拥护中央。张并向蒋建议，对晋军事善后须周密考虑，以免妨碍永久和平。

△　浙江永嘉统捐局与温州洋广货税捐局合并，宣布废止旧章，洋广货捐改征统税。各商家以洋广税轻，一经认征统税，负担即须增加20％—30％，决一致反对，是日起发生罢运风潮，运输完全阻断。直至29日统捐局决定废止改征统税，各业始恢复装运。

△　平绥路平地泉附近发生700余全副武装匪徒劫车并绑去路员、旅客30余人事件。

11月18日　　上午，国民党四中全会开第六次大会，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行政院长，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长。旋续开第七次大会，通过对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下午开第八次大会，决议修正通过大会宣言案，即闭会。大会宣言举定期召开国民会议以立建国基础、集中人才以充实建国力量、改善制度刷新政治、确定“剿共”剿匪及军事善后施政急务、救济灾民与振兴实业、完成地方自治更定地方区划等六端，为今后戮力之途径。

△　徐永昌、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晋军11将领，在太原就阎所委之新职后，在总部集议，决暂采保境主义，积极向各县征收捐款、粮秣，并令两兵工厂加紧工作。同日，阎召诸将领赴五台，商议阎走后之军权、军饷支配，结果仍无具体办法。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荷使欧登科在南京互换1928年12月19日签订之《中荷关税条约》批准书，至此中国与各国签订之关税条约全部生效，中国关税完全自主。

△　红军向兴国之东固、永和（吉安东南）作战略退却，公秉藩、罗霖两师占领吉安。

△　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奉令“进剿”平江红军，是午抵金井，当即召集前方将领开军事会议，详细制定“进剿”计划。

△　上海同文书院无理开除本科一年级中国学生王昭乾、郭启蒙二人，是日，全体中国学生罢课抗议。20日，日籍学生以开除郭、王理由欠当，亦提出抗议，并为经济不公开，剥夺言论出版自由，封禁江南学报（日文版）等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议决与中国学生赤诚团结，同盟罢课。

△　教育部奉行政院令，办理中执会交办之彻查中央大学改进校务风潮案。24日，中大学生代表20余人赴国民政府及教育部请愿，要求依照所提校长人选标准迅速任命校长。

△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选举华董，张啸林、杜月笙、朱炎之、魏廷荣、陆费伯鸿五人当选。

△　东北筹办大造纸厂，定名东北造纸厂，资本官商分担，辽、吉、黑各出10万元为开办费，不足部分招商股加入。官方派张惠霖为总经理，筹备处是日正式办公。

11月19日　　张学良宴请蒋介石夫妇，并偕游紫金山、汤山等处。次日，张学良偕张学铭分访蒋介石、胡汉民、于右任、戴季陶、何应钦、邵力子等数十要人，准备北归。

△　外交部发表中英庚款换文五件。

△　蒋介石与张学良、何应钦等磋商豫北防务，决定以第四十七师王金钰部及卫戍郑州之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克日渡河，进驻新乡；驻新乡之孙连仲部向山东移防。是日下午，蒋介石在总部召见王金钰，嘱其即日赴郑督师开拔；郝师开拔后，即由驻扎许昌、漯河之第六师赵观涛部开郑州，担任郑州卫戍。

△　第十八师张辉瓒部占永丰，新二十师许克祥部占吉水，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岳森旅占领抚州属之宜黄，成光耀旅占领乐安。赣东红军退南丰，赣西红军退兴国，赣南红军退集宁都。蒋介石电鲁涤平传令嘉奖各军。

△　新编第十六师奉令改编为陆军第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是日在禹县防次宣誓就职。21日，葛率部开往归德一带驻防。

△　在日华工因被各工厂裁汰革职赋闲，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者，先后已有2000人以上。是日，又有潘培富、张仕圭等11人被逐

回沪。

11月20日　　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券执券人联合会在沪成立，主席吴德裕在成立会上致词称：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系民国十五年北伐时所发行，流通市面，十足行使，实有尽先整理，十足收回之必要。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券，系十六年6月30日发行，于同年12月31日到期，现已逾期三年，理应即行收回。联合会议决进行办法八项，推吴德裕、潘家桢、戴达诚等九人为代表进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将该两项兑换券予以十足兑现收回，以恤民艰。

△　上海银行公会以财政部已进行整理外债，而内债整理事不容缓，是日召集中国、交通、大陆、金城、盐业等银行经理开会讨论组织中国内债在银行部分之债权团，并电平、津银行公会征求同意。决定在银行内债债权团成立后，登报征求全国债权人举行内债登记。据调查，内外债总数约合国币13亿元，内债占十分之三强，外债占十分之七弱。24日，上海银行公会推定十位会员为内债债权团发起人。

△　两星期来江海关迭次破获意大利货轮夹带大批毒品案，是日又在德货船“克洛棱号”上查获价值100万元的烟土100箱。

△　捷克新任驻华公使拉法尔，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京互换《中捷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下月5日生效。

△　夜，夏斗寅第十三师第三十八旅卢本棠部占领湖北黄安县城，红军大部退向黄安西南百华里之长轩岭，与该处红军会合。

△　上海市丝厂劳资纠纷经社会局再三劝解，资方表示让步，是日下午签订调解条件，决定工人工资暂照原额八五折计算，至厂方营业有起色时，力求恢复原有工资。被减工资时间，迟至明年5月底止。全市丝厂已开工者达36家。

△　沈阳刘庆暄开设多年之小北关天增顺棉花工厂、天增元织布

工厂、天增利铁厂、天增东织布工厂、天增利丝房等五大工厂，因营业萧条，亏损30万元，同时倒闭，是日刘呈请商会予以查封，以免债权人争拿货物。

11月中旬　　据北满贸易局10月中旬发表之统计数字，北满死于鼠疫者，已达300余名，并有更加猖獗之势。经辽宁省政府、东北防疫处及中东铁道医务局派员前往防治，至是月中旬始将四洮沿线鼠疫扑灭。

11月**21**日　　国民政府为制止外米进口，谷贱伤农，令内部及外、海、农、卫各部会商办法。是日下午，各该部开会议决增收进口税。

△　石友三通电将所部缩编为六个师，孙光前等分任师长，余下手枪团等六团一大队归指挥部直接指挥。

△　红军孔荷宠部克湖南湘阴，何键急调大军“追剿”。23日，王东原、彭位仁两部复占湘阴，红军向新市、长乐转移。24日，刘建绪率陶广部及王东原部占领平江。红军彭德怀一部及孔荷宠全部，向平东三眼桥转移。

△　鄂军刘培绪旅占领洪湖苏区监利县城。

△　广东汕头法领事函请汕头市政府制止各界断交运动，表示愿早日解决“大广东”轮案。24日，汕头市民以法方无诚意解决“大广东”轮案，决定抵制法货。26日，法领事向汕头市府抗议，市府令“大广东”轮惨案后援会勿妄动。

11月**22**日　　北宁、京沪、陇海各路局长在铁道部报告路政状况，交换整理意见。孙科称全国路债原额七亿元，现以金贵及延付利息，合并计算已达12亿元。关内原存车9000辆，前年关外开去4000辆，近又毁损千余辆，现仅存3000余辆，不敷运输。23日，蒋介石

通令各军不得任意扣车干涉路政。25日，国务会议限令各军将所扣车辆于12月5日前放还。

△　厦门援萧会以渣华公司总经理劳巴德对萧案已道歉，并撤办大、二副，决议暂停抵制。26日，上海百余团体代表1000余人开援萧反荷大会，一致主张抵制渣华公司，通过提案20项。27日，上海各界援萧反荷大会代表抵京，赴外部向王正廷请愿：一、废止荷约，另订新约；二、要求荷方停止虐待华侨暴行；三、废止暂行护照法，要求荷政府取消查验入境华侨苛例；四、要求荷方严办萧案之大、二副，并质问王正廷“贵部既欲民众援助，何以电厦取缔抵制渣华轮”。王正廷再三否认，谓无其事。

△　上月16日在沪发生法国水兵击毙船夫忻鼎香案，是日忻案后援会呈外交部请严重交涉，提出治本、治标要求八项，治本要求为：一、撤退驻华各国海陆军；二、撤销领事裁判权；三、收回租界；四、废除不平等条约。治标要求为：一、法当局向我国政府正式道歉；二、惩办凶手；三、赔偿忻家属赡养费银10万两；四、发给忻鼎香治丧费三万两。同日，闸北50余工会，亦为忻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向法当局作不妥协交涉，以期达到惩凶、道歉、赔偿、赡养等目的，并于最短期间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驻华各国海陆军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川、湘两军开始总攻湖北界首，武汉行营派飞机前往助战。红军孔荷宠部乘湘军分向新洲、津市进剿之际，又克汨罗，湘鄂路中断。24日，彭位仁、陈诚两部重陷汨罗。

△　赣边红军克福建长汀。29日，长汀红军分向上杭、永定及连城、宁化等处进军。

11月23日　　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由天津秘密乘近海邮船亡命日本。

△　加拉罕复函答辩莫德惠17日函，谓：“阁下在6月8日等数次谈判中，曾企图使敝人相信中国政府，特别东三省中国当局，已经履行且继续履行《伯力协定》，是故中苏会议上无须再提出正式承认。”“贵代表于11月6日向敝人申述：对于遵照中俄、奉俄及《伯力协定》而恢复之中东路现状之保持，无有且不能有任何怀疑。尊函对于中国政府已在中俄、奉俄及《伯力协定》中承认，且由中国代表发出之官方正式文件中确定之不能否认的责任，含有如此模棱之词，使人不能不对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出人意外之地位，产生最严重之疑虑。苏联政府郑重声明，关于中东铁路之任何片面的任意行动，概不承认。”

△　红二军团贺龙、邝继勋部二万余人是日由石门南下，占领临澧，欲进攻湘西之重镇常德、桃源。何键令戴恢垣部迎击，并急令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由江西萍乡撤回，驰抵常德增援。川军张英新十一师由安乡侧击临澧；川军马旅与第四路军第一警备司令陈渠珍部两团及慈利之川军周旅夹击石门。26日，红军贺龙部放弃临澧，仍返石门。12月2日，又由石门、新安、合口二次进攻津、澧，次日占领津市，围攻澧县县城。红军邝继勋部亦于2日二次进攻华容，即占领之。

△　福建晋南民团与高为国部在秀涂激战终日，高部百余人被缴械，死80余人。因东园之围已解，晋南民团24日撤回蚶江，高为国残部亦回惠安城。26日，萧叔宣教导团奉命接防秀涂，民团与高为国冲突平息。

△　卢兴邦得孙本戎电告卢兴明在杭州陆军监狱服毒自毙，遂于是日电闽省府请自兼第一旅旅长。

11月24日　　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于右任、江苏绥靖督办张之江，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委员吴敬恒监誓。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推蒋介石、胡汉民等14委员起草召集国民会议方案；二、修正《政治会议条例》，于第三条第二项后增加“负党国之重任，其地位在特任官以上者，经执行委员会议决，亦得为政治会议委员，其名额不得超过中央委员之政治会议委员名额四分之一”；三、推张学良为政治会议委员；四、推吴铁城、张群、何成濬、刘芦隐、马超俊为政治会议候补委员。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　阎锡山发表《告别三晋父老书》。张学良自南京电令王树常派车赴石家庄接阎锡山出洋。29日，阎离五台赴大同，取道平绥路赴天津。12月3日，阎在津接见记者，表示略休息后即出洋，“晋军政交徐、商，善后听中央，本人下野之身，一切不问”。

△　蒋介石接见山西宣抚使赵守钰，并召孔祥熙、赵守钰、王用宾、弓富魁等商谈晋局善后办法，对晋省内部军队，令赵守钰办理，随时请示张学良。

△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指示闽、赣“剿共”办法，并促朱赴赣转闽率部追“剿”。

△　鲁涤平在吉安召集张辉瓒、谭道源、许克祥、公秉藩、罗霖五师长及各旅长开军事会议，决定三期“会剿”红军计划。同日，邓英师占领南丰、黎川。

△　据《申报》讯，张、桂军提和平先决条件：一、滇军退出桂境，以便集中候编；二、以宾阳为谈判地点，30里内双方不驻兵。张、桂军18日曾退出南宁，向龙州、百色前进，拟入滇，因滇军有备，复回邕固守。

11月25日　　冯玉祥偕刘骥、黄少谷由五台之西会村赴晋祠，旋迁往绛州（今新绛县）汾阳洞，后又移居汾阳峪道河。至此，冯玉祥

军事集团完全瓦解。

△　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名义下令将旧有第三方面军之18个军裁去八个军，成立10个晋绥警备军，分任王靖国、李服膺、杨澄源、赵承绶、张会诏、冯鹏翥、袁庆增、杨耀芳、孙楚、杨效欧为各军军长。

△　外交部照会法国公使韦礼德及日代公使重光葵，提议无条件收回汉口法、日租界。27日，东京各报纸社论竟宣称："中国和平尚未有保证，故收回汉口日本租界之要求，时机尚未到达。"

△　国民政府公布《襄试法》及《监试法》；《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施行期间自民国十九年11月18日起再延长六个月；定民国二十年1月1日为《商标法》及《海商法》施行日期。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陕西省政府，除委员兼主席杨虎城业经明令简任外，任命李志刚、李协、李百龄、李范一、胡逸民、井岳秀、王一山为陕西省政府委员。杨虎城兼民政厅长，李志刚兼财政厅长，李协兼建设厅长，李范一兼教育厅长。

△　国民政府令：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并暂行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依陆海空军勋章条例，褫夺曾授予阎锡山、傅作义、周玳、赵承绶、孙楚、杨效欧、李生达、王靖国、李服膺、杨耀芳、关福安、张会诏、冯鹏翥、辜仁发、刘春荣、万选才之各等宝鼎章。

△　行政院第一次国务会议（按：据国民党四中全会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将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改称国民政府会议，将行政院会议改称国务会议）讨论国民政府交议之建设委员会应注重设计指导国民建设，不必列于行政机关，直隶于国民政府案，决议已办事业核交

续办，未办事业由国务会议决定；决议请国府任命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金曾澄为中山大学校长；严令各军限12月5日前放还被扣留的机车车辆。

△　第五十五师阮肇昌部分四路进攻江西景德镇之红军，并占领之。赣东红军向乐平、上饶转移。

11月26日　　石友三到津迎候张学良。石所扣车辆，平汉路局已派员赴顺德点收，商定由局方每月协饷30万，车辆候石、张晤商后再交。石告记者，称该军共3.2万人，淘汰7000人，中央允月给60万元，不敷之数，由东北担负。

△　宋子文以军事善后需款甚急，特电鄂财政特派员李基鸿仍用原担保抵押品，续向汉银行界商借300万元，不足再以善后短期库券补充，务于12月1日缴款。28日，汉银行界请减财部借款额，李基鸿电部核示。

△　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电蒋介石辞职，民政厅长程振钧、秘书长刘石心亦同时电呈中央辞职。

△　古物保管委员会呈国府、行政院及教育部，以英人斯坦因借口探求古迹，向外部领得普通护照，携美哈佛大学燕京研究院、英博物院及印度陆军测量局补助费入新疆，大规模发掘古物，在美言论复侮辱党国，请转饬新疆省府驱逐出境，并取消其护照，以保古物。

△　中美洲尼加拉瓜取消华人入境苛例，尼外长与中国驻尼总领事李世中商定《中尼协定草案》12条，是日经中政会讨论认为可行，即令外部电李签字。

△　上海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是日起照常到校视事，并规划下学期一切计划，校内一切仍由马君武主持。

11月27日　　武汉行营已批准鲁涤平之“剿共”计划，是日三期“会

剿”开始。罗霖、公秉藩两师集中吉安、吉水，谭道源师集中崇仁、宜黄、乐安，张辉瓒师集中永丰，毛炳文师集中南城，成一弧线，下令总动员，继续深入向苏区进攻。蔡廷锴师已由萍乡向吉安推进。

△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第四号通令，“要准备充分的经济”粉碎敌人“围剿”，决定创设江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一百万元”。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取消教导师名称。原有三个教导师，冯轶裴第一师改为国民政府警备师，张治中第二师改为陆军第四师，钱大钧第三师改为陆军第十四师。

△　杨树庄请辞海军部长及闽省府主席职，蒋介石慰留。

△　北平商会代表杨以俭、冷家骥等到南京请愿取消崇文门关税及其他苛捐，并保存故宫古物。

△　据《华北日报》载：河南许昌、临颍以至郾城及沿平汉路线各县，自去岁至今，大军云集，人民困苦已达极点，所有财物、牲畜、米粮、器具损失无余。最重要者，为豫省东南沦入战区各县，如杞县、睢县、兰封、考城，南至民权、宁陵，又东南至太康、商水、西华、鹿邑、柘城等县，纵横连贯数百里，人民户口数百万，衣食住三项俱无，急需救济。另据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章元善谈，豫东宁陵、陈留、睢县、兰封、通许五县，战壕凡170余道，占地约9000亩，若动工填平，则需100万经费。

△　据北平市公安局统计，全市待赈男女贫民共29.7846万名，其中内外城15区界共有极贫男女17.8149万名，次贫男女11.9697万名。

11月28日　　第一次国民政府会议决议，特派王宠惠、张学良、王正廷、孔祥熙、孙科、王伯群、宋子文为内外债整理委员会委员，以王宠惠兼委员长。

△　国民政府派驻意代办蒋履福为商订中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　加拉罕致莫德惠照会，表示苏联并不坚持华方承认《伯力协定》。莫德惠电告外交部后，经王正廷与中政会外交组商定，苏联既然表示不坚持《伯力协定》，则谈判仍可进行，是日外部电莫相机进行交涉。

△　国民政府训令总司令部、行政院，停止新闻检查，并训令各级党部厉行新闻登记，“借防反动而便指导”。

△　教育部长蒋梦麟呈国民政府及行政院辞职，称受职两年，“力不从心，时遭横阻……默念前途，殊多障碍”。

11月29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制定“剿共”赏罚令九项，规定凡遵令肃清者均予嘉奖；凡逗留不进，或私自撤退，不遵命令贻误军机者，均以军法从事。

△　红十军在江西万年县珠山桥击溃第五师一个团，毙敌150余人。

11月30日　　汤姆森爵士率领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一行15人抵上海，12月4日蒋介石与王正廷分别设宴招待。

△　原任第十三路总指挥王金钰，因前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友三已复职，改任第五路总指挥。

△　上海、天津、北平银行界发起组织之中国内债债权团在上海组成，并设立债权事务所，着手办理全国内债债权人登记。同时推举孙衡甫、张嘉璈、卢润泉、周作民、谈丹崖五人为代表，赴南京同财政部商谈内债整理方案。

是月　　据河北省政府调查，该省自民国二年迄今之外债，共达

2000万元。阎锡山占据平、津时代，亦拖欠800余万，多有抵押。现冀省设外债委员会，自行清理。

△　四川当局为镇压共产党，不惜以最严厉之屠杀政策对待青年学生。是月成都学生被明令枪决或遭杀害者，达300余人。据报刊揭露："军警机关之杀人，既不搜查证据，亦未宣布罪名，凭一连、排长之喜怒，即演流血之惨剧。"

12　月

12月1日　王树常派参谋长陈钦若会同于学忠之参谋长陈贯群，率军一团自天津乘专车抵达石家庄，迎阎锡山出洋，惟阎早已离并，遂于3日原车返津，仅带回商震一函，谓"百公为避免迎送计，已于二十九日启程赴大同，转平绥路赴津"等语。于学忠、王树常即将情况电告张学良。

△　陈立夫访张学良谈北方党务。

△　驻湖北黄冈县新洲之郭汝栋新编第二十六师一个旅与共产党联络，发生兵变。武汉行营命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亲率所部出动镇压。3日，行营电令郭汝栋部改调阳新、大冶。11日，蒋介石以郭汝栋"剿共"不力，令停职留用。

△　张贞新一师奉蒋介石令改为陆军第四十九师，是日张通电在福建漳州就该师师长职。

△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风闻金曾澄将任本校校长，举行罢课。

△　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在榆林开业。

12月2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沪抵南京，邵力子、孔祥熙、马福祥同行。晚，蒋设宴为张学良饯别，即席讨论西北善后，张力荐商震

担任晋省主席。

△　国民政府颁布《整饬纲纪令》，略谓：“在此时期，骈枝迭出。政令既不统一，权责尤欠分明。驯至于其主管事项，寝多旷废。……似此政本不清，纪纲日弛，若非迅予纠正，力图改革，其何以收除旧布新之效，而树久安长治之基。”“嗣后全国政军各机关，务遵系统，恪守职权，督饬所属，切实负责，不得再有泄沓、偷惰、割裂、纷歧之恶习。服务人员如尚习于宴安，放弃责任，除依法从严惩戒外，并予该管长官以失察失职之处分。其有执法营私，侵公冒利者，尤为罪在不赦。一经察觉，定按非常程序惩办。”

△　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等，由沪乘船抵广州，即偕各要员参加省府会议。10时，黄绍竑之代表高元勋见陈商和平解决桂局办法。

△　交通部在上海真如建筑之国际无线电台业已竣工，预定6日开业，日使馆驻沪办事处人员称，民国七年，段祺瑞政府曾与日本订立双桥无线电台合同，规定中国建筑无线电台，日本有独占权。此次交通部向美国订立材料借款，建立真如无线电台，日人认为与双桥旧约抵触，前曾由日代使重光葵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书，因外部尚未批复，是日又续提抗议。

△　是日至4日，中日电信交涉在交通部开非正式会议，讨论烟大、沪崎、青佐三线问题。华方代表庄智涣、吴南如，日方代表吉野圭三。因双方意见不符，讨论无结果。

△　驻华美使詹森偕海军参赞哈利根访交通部长王伯群，对收回太平洋电讯主权问题表示赞同，望我国当局以平等互惠原则解决此问题。詹森并表示将转令太平洋公司代表克日到京，会商解决办法。

△　上海金利源码头案，三德堂方面已愿售与招商局，索价39万两；而招商局方面，照工部局估价，仅值12.8万余两，以相差过巨，

未得解决。招商局代理律师高朔最近特函代表三德堂之巴和律师据理驳斥。是日，法总领事甘格霖为此召集会议，并请高朔律师即行提出公断意见书，以便从中调解。

△　上月28日，安东朝鲜人纠众捣毁海关江桥分卡，伤关员一人。是日，鲜人再次捣毁分卡，关员皆负重伤，日警反将巡缉员殴辱，关员大动公愤，日租界各分卡全体罢工。4日发表宣言，吁请当局交涉。22日，外交部照会日本使馆转饬安东日本使领迅速惩凶、赔偿。

12月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组国民政府，外交王正廷、军政何应钦、交通王伯群、铁道孙科、财政宋子文、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张之江均仍旧；农矿、工商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以孔祥熙为部长；教育部长蒋梦麟辞职照准，调驻法公使高鲁继任；内政部长钮永建调任考试院铨叙部长，以刘尚清继任；派陈其采筹备主计处；卫生部改为卫生署，隶行政院，仍以刘瑞恒为署长；另通过预算案多起。北宁路公债案原则通过。

△　日代公使重光葵与外交部长王正廷接谈收回汉口日租界及调理外债。日政府对汉口租界事已有训令致重光葵。

△　陈铭枢、陈济棠在广东省府再商桂局。4日李扬敬抵省谒二陈报告桂局。夜，陈济棠召集总部要员及李扬敬等开对桂会议，古应芬亦列席。

△　杨树庄之代表林知渊谒蒋介石，请示整理闽省军政方法。蒋促杨即日返闽，主持一切。

△　参谋总长朱培德呈请辞职，蒋介石指令慰留。

△　梁漱溟应韩复榘之请自平赴鲁，商乡村自治实行办法。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自来水公司加价

事。到王晓籁、徐寄庼、褚辅成、虞洽卿、陆费伯鸿、吴蘊斋等30余人。议决一致否认自来水公司增加附费、修改合同，并由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付办法。

12月4日　　国民政府特任刘尚清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杨树庄为海军部长，高鲁为教育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钮永建为铨叙部长，陈其采为主计处筹备主任。原任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农矿、工商、教育、交通、铁道、卫生各部部长免职。

△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议：一、总理生平为革命所举办各项债款、捐款，为数甚巨，亟应加以整理，以便由国家分别偿还、奖励，特组织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并推张静江、林森等17人为委员，定期成立，从事调查整理；二、推刘芦隐继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马超俊继任中央训练部部长；三、派林森、陈耀垣两委员往海外巡视党务及各地侨情；四、派杨虎城、苏资深、田毅安、孙明经、于国桢、张文生、李范一七人为陕省党务整理委员。

△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机关及行政院，厉行四中全会通过之“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饬纲纪，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又令“嗣后各级官吏绝对不得兼任商业机关职务与从事投机市场之交易，如敢故违，定予撤惩”。

△　蒋介石电汉口行营，限赣、鄂、湘三省“剿共”军队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已失城池，否则以违令论罪。

△　湖南滨湖之南县、安乡、沅江、汉寿各县均电省告急。何键电令李觉、陈渠珍、张英、戴恢垣等四部统受李觉指挥，以20团之兵力，于6日大举围攻红二军团。8日，红军向松滋、公安方面转移，李觉等部占领石门，9日占津市，14日占华容。

△　朱德、彭德怀一、三军团由赣边入闽，占领宁化、长汀、光泽、崇安。各县纷纷电省告急。福建省府除请张贞第四十九师速由漳州开赴龙岩堵截闽西红军外，又令刘和鼎师一部协同周志群、卢兴邦两旅以守势对付闽北红军。4日闽南张贞师全部离漳，10日、11日分路进占龙岩之适中、漳平之永福。龙岩红军大部退连城。

△　张学良与蒋介石在京作最后之国事洽商，即晚偕夫人于凤至渡江北归。蒋派国府秘书高凌百及刘光随张北行。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浙江省政府，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张静江、委员兼建设厅长兼代民政厅长程振钧辞职；省府委员钱永铭、陈布雷、蒋伯诚、叶琢堂、黄郛、何辑五、周骏彦、沈士远均免本职；任命张难先、周骏彦、石瑛、陈布雷、蒋伯诚、方策、王澂莹、张乃燕、叶琢堂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张难先兼省政府主席并兼民政厅长，周、石、陈分别兼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令：禁烟委员会委员张之江免职，以刘瑞恒继任。

△　国民政府令：任命蒋梦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易培基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朱家骅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金曾澄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礌、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均免本职。

△　国民政府任命冯轶裴为国民政府警卫师师长。

△　刘镇华通电，在郑州就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职。

△　国民政府公布《船舶法》，该法规分为通则、船舶检查、船舶丈量、船舶国籍证书、罚则、附则六章，凡43条。

△　中苏会议在莫斯科开第二次会议，议决交涉分中东路、通商、复交三组进行。关于中东路问题，中方派刘泽荣、李琛、屠慰曾、王曾思为委员。苏方派罗夫斯基、依兹马依罗夫、罗谟三人为委

员。

△　中山大学全体学生2000余人开二次大会，决议继续罢课，并推李绍华等四代表晋京请戴季陶校长返校主持，并派代表冯铉等向古应芬、陈铭枢请愿。

12月5日　蒋介石偕邵力子、周佛海等乘“永绥”舰西上视察湘、鄂、赣三省“剿共”军队，即发表《告民众书》，声称此次“剿共”，大军共有30余万众，海军有兵舰20余艘，飞机数十架，四面围堵，无异网罗，“惟诚心悔过投顺者赦免，携械或擒杀匪首来归者有赏”。

△　王正廷在京招待各报记者，报告外交近况称：一、政府注意撤销领事裁判权，期于最短期内完成对英、美、法工作，外交部已拟具对英、美答案；二、收回汉口法、日租界事，已照会法公使、日代公使商结束及收回办法；三、政府已派专员办理北平使团移京之指定地址事宜；四、中日交涉除法权外，均在商约内讨论。

△　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是日立法院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会，院长胡汉民报告两年来工作成绩及将来希望。第二届立法委员候国民政府任命。

△　国民政府为发展西北垦殖及化兵为工，派驻陕第二师顾祝同部、第三师陈继承部、第十师杨胜治部开赴甘肃。是日，顾、陈两师接到开赴甘肃命令。

△　日代公使重光葵见蒋介石，谈收回汉口日租界及整理外债事。10日、22日，重光葵两次访问外交部长王正廷，谈判中日宁案问题。王正廷表示，日本方面要求宁案赔偿300万元，数目过巨，实不能承认。谈判无任何进展。

△　《中捷友好通商条约》是日起生效。

12月6日　晋钞狂跌，商震在太原召各厅长会商维持办法，决由

财政厅筹资1000万元，并将公债基金交付省行，用抽签法每月兑现50万元，以后晋钞只收不发。

△　国民政府令：教育部新任部长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兼理。

△　上海法租界华董杜月笙受法领事之托出任调停忻鼎香案。是日虞洽卿率忻家属及宁波同乡会、后援会代表前往杜宅商洽解决办法如下：一、由法当局下令撤回驻扎天主堂街之法水兵，不再登陆；二、抚恤忻鼎香家属洋4000元。忻案至此结束。后援会发表宣言，望全国同胞一致团结，督促政府以革命外交手段，将我国历来所有惨案作一总解决，并将危害我国公权、屠戮我国同胞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

△　行政院严令教育部整饬全国学风，声称学风不良，“不惟教育破产，抑且有亡国灭种之忧”，宣布一切罢课、集会皆为非法，责令“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涵养身心，凛古子思不出位之训戒，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得干涉行政，致荒学业”，如有违令越轨者，政府“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

△　积欠五个月之平、津国立各院校经费，是日才汇到7月份款25万元。后经李石曾迭向宋子文交涉，宋允拨公债165万元，先以二十年（1931）关税库券100万元作抵，自次年1月30日起，分10个月拨付，其余65万元另行筹措。

△　上海真如国际无线电台举行开幕礼，交通部长王伯群报告筹备经过，谓自开始至今，历时一年有半，全部建筑费为美金40余万元，国币54万元左右，11月全部竣工，与美国旧金山及德国柏林试行通报，成绩极佳，自民国二十年起，我国国际通信即可不仰给外人。

12月7日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经黄绍竑劝告，致电古应芬、陈济棠、陈铭枢，提出和平解决桂局初步条件：一、中央给黄绍

竑主持桂军民政名义；二、重新指定张、桂军集中地点。古、陈转电南京中央请示。中央复电主张以上二事决定后，李、白、张即须出洋，第二步由黄与粤接洽。

△　蒋介石偕赣省主席鲁涤平、鄂省主席何成濬抵南昌，晚与何应钦、朱绍良、鲁涤平等会议湘、鄂、赣、闽联络“剿共”方针。

△　红十六军孔荷宠部及平、浏红军集中在平江属献钟南端之高山构筑工事，准备迎敌。第十五师王东原部派队进攻，同日占献钟，10日又占长寿街。孔荷宠部向黄金洞转移。

△　日本拓务省大臣松田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满蒙权益问题，参加者有“满铁”总裁仙石，外务省吉田、永井二次官，亚细亚局长，条约局长，拓务省小村、小坂二次官，“满铁”理事木村，陆军省次官阿部及参谋本部负责人员等。会议商定：一、奉派欲将满蒙外交权名实皆归并南京，吾人对此取外宽内严方法以反对之，强其仍以张学良为负责长官，帝国以便保持其特权；二、对奉派铁道网之建设取干涉态度，以阻其实现，持以迫战求和策略，诱其与我协调满铁运价与货物吸收区域之限制，以保南满路与大连港之繁荣。

△　华洋义赈会引泾工程在西安钓儿嘴行开工礼，杨虎城等均参加。据安立森工程师报告，就原有郑白渠改筑宽二丈之新渠，将来可灌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醴泉之田50余万亩，五个月内可收大效，全工一年可完成。

12月8日　江西省政府依蒋介石指示，在永丰、乐安、吉安三县成立三个“剿共”清乡委员会，以谭道源、张辉瓒、罗霖三师长分任主席委员，每区并已领到经费一万元，厉行“剿共”、清查户口等。令第九路军向永、吉、乐三县交界之东固红军根据地包围，第十九路军由赣西抄出赣南，第六路军由赣东抄出赣西南，向红军朱、毛、彭、黄各部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是日，赣西红军趁第十九路军开走，占领分

宜。

△　黄绍竑离南宁，取道龙州入安南转香港。临行前，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设宴饯行。白恐黄到港后去南京投蒋，在祝酒辞中称："广西人不会投蒋。我们要争取生存，必须奋斗到底，一息尚存，此志不渝。"黄答称："今后行动准则有两条：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是不再破坏广西。"

△　张学良在津派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访阎锡山，劝早日出洋，告以对山西善后若有意见，可开诚相告。阎答"晋事已托商震、徐永昌，可与直接商议，余以下野之身，不愿谈时事，并不愿发表何等意见"。刘复命后，张即电促商震、徐永昌去津协商。

△　上海各界援萧反荷大会议决组织之"中华民国对荷外交后援会"开第一次大会，选举华侨联合会等51团体为执行委员，上海市党部等21团体为监察委员，并以大会名义致电外交部，请求严重交涉萧案，提出道歉、赔偿损失等最低限度之要求五项，照会荷方，以雪民族之耻。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发出通告，谓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于本年9月1日起征收附费二成半一案，经本会代表会议根据审查自来水公司账目报告议决，不承认该项附费，应与工部局严重交涉，并经执委会议决，登报通告全体用户；在交涉未解决前，所有水价应照旧价（即8月份以前之价）付给，如确因不付附费而被断水者，请即报告本会。

△　戴季陶电促金曾澄就中山大学校长。同日，戴电劝中山大学师生同德同心，以亲睦精神守大学之共信，一致欢迎金校长迅速就职。

△　午后2时20分，台南地震，死四人，伤60余人，房屋全毁者57所，半毁及受损者数百所。22日，发生较强余震，"道路龟裂，屋

舍倒塌亦颇多”。

△　香港万国宝通银行因传闻纽约总行倒闭发生挤兑风潮。9日，美国驻港总领事布告辟谣。10日，香港各报刊登美领事通告，称纽约该行系美国大银行，实力雄厚，倒闭一说纯属无稽之谈。挤兑风潮平息。

12月9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何成濬、朱绍良、鲁涤平、张辉瓒、罗霖、公秉藩、邓英、邵力子、周佛海等开军事会议，讨论“围剿”江西红军革命根据地有关军队配置及联络，“剿共”之经费及肃清之期限等，决定限一个月恢复各城池，两个月肃清红军，是为第一次“围剿”之开始。这次国民党军总计出动11个师、三个独立旅和二个空军中队，共10万人。同日，蒋令南昌行营印发《误入共党之官兵临阵归来办法》数万份，由空军携往红区散发，内称：“士兵带枪来归者，赏三十元；带梭标者，赏十五元；带机枪一架者，赏五百元；带炮一尊者，赏一千元。”蒋并电令各路指挥部悬赏五万元购缉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

△　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濬调集八个师三个旅约10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对红军进行合围，是日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占领黄安（今红安）城。次日又以一个团占领黄安西之河口镇。

△　蒋介石在南昌召张辉瓒、公秉藩及新十三师师长邓英谈话，谓吉安失守，邓应负责，即命将军权交出，随即将邓扣留，交第九路军总部关押法办，吉安县长彭学游亦被押惩办。蒋委现任江西省府委员兼第九路军高等顾问路孝忱兼代新十三师师长。

△　国民政府任命王景岐为国立劳动大学校长。

△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应蒋电召，偕参议杨永泰自上海龙华乘飞机赴赣，飞机起飞时，与江中沙船大桅相撞下坠，熊、杨重伤，飞

机师中美各一，乘客中外各一均毙命。

△　蒋介石发出《告诫全国学生书》，声称“言建设当首重教育，兴教育必先正学风”，“各地学校学风之败坏与学潮之蜂起，若非立即严加纠正，将如洪水横流，为害无所底止”；“学校若任意反对校长，即不啻反对任命校长之政府；若任意干涉校长行使职权，即不啻破坏国家法律；反对政府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连日与大东、大北、太平洋三水线公司续开水线交涉联席会议。10日，中方提出收回沪、烟、沽水线问题，经长时间磋商获得解决，定本月22日将该水线移交中国接管。

12月1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第二届立法委员人选案，名额仍49人，除将上届未到任及已辞职之八委员遗额另补充外，余41人仍蝉联，交国民政府任命。12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任命名单，新任命者为张默君、史维焕、朱履龢、竺景崧、李书华、郗朝俊、黄右昌、刘师舜八人。

△　驻美公使伍朝枢电南京，呈报美国政府对法权交涉所提出之新方案：一、美国政府对中国全体国民希望司法权独立，表示同情，惟请采取逐渐实施办法。美侨与华人相互间发生诉讼案，将民事、刑事分别缓急，凡涉及民事者，在美政府表示已同意撤废领判权之区域以内，可归中国法院审理；二、在中国内地，即非通商口岸，美国可放弃领判权，俟有成效，再议通商口岸领判权之撤废，惟租界及租借地有特殊关系者，或条约规定者除外。

△　财部税务整理委员会成立，即日开始办公，其任务为整理旧税，计划新税。同日，财部令准张福运、邹琳、贾士毅为该会当然委员，蒋尊士、黄开疆为专门委员。

△　国民政府据中央研究院呈称，英人斯坦因在新疆窃掘古物，

并私测地势，关系我国文化及国防甚巨，令行政院转令新疆省政府就近制止。

△　国民政府令派驻尼加拉瓜领事李世中为签订华人赴尼待遇协定全权代表。

12月上旬　　东北政务委员会核准公布《东北国货火柴专卖条例》，令辽、吉、黑、热四省积极进行，并饬各国货火柴公司妥为筹备。

△　鄂豫皖三省边界区绥靖督办李鸣钟将三省边界划分四大区，委吉鸿昌为第一分区指挥官，担任潢川、固始一带；张印相为第二分区指挥官，担任光山、罗山、商城一带；夏斗寅为第三分区指挥官，担任黄安、麻城一带；范熙绩为第四分区指挥官，担任霍山、霍邱、六安一带，成一大包围式，妄图于最短期内消灭三省边区红军。

12月**11**日　　蒋介石偕何成濬等离南昌赴九江，临行召集军事会议，各军、师、旅长、江西省府各委均列席，对各路军联络及军需分配等，有具体议决案。蒋抵庐山后电召在京之吴敬恒、陈布雷、陈立夫、马福祥等前往。12日，吴敬恒等到庐山谒蒋。

△　商震、徐永昌应张学良电召抵津，即访王树常及张学良商晋省善后问题，决定晋事由张指挥，军队由徐维持现状，政治交商震，军费一部分由张发给。12、13两日商、徐与张续商晋、绥军政善后办法。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会决议将方振武开除党籍一年，录案送中执会执行。

△　湘鄂赣边孔荷宠红十六军占修水。继攻武宁，未克。国民党军第十五师、新编第三十一师、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第十师、第五十四师各一部，奉令分由浏阳、平江、通城、崇阳、武宁等向修、武

地区合击红军。红十六军乘隙西移，于18日克通城，歼守敌新编第十师一个团和地主武装挨户团一部。

△　陈光中在浏阳就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职。

△　戴季陶再次电劝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欢迎金曾澄长校，被学生拒绝。14日，该校学生800余人因闻金将率宪兵20名接长中大，议决以全部实力抵御金武装上台，并请当局将印信交评议会保管。15、16两日，中大学生贴出布告，封锁校门，不准外人进内。

12月12日　　第二次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公布《民法》第四编《亲属法》、第五编《继承法》及《民事诉讼法》、《出版法》、《交通部航政局组织法》、《工厂法施行条例》，并定自民国二十年2月1日起为《工厂法》施行日期。

△　“富田事变”发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命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到吉安县富田村肃“AB团”，将省行委机关包围，刑讯逼供信，滥捕滥杀。9日，李韶九带一个排，前往东固，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肃“AB团”。五天之内，抓捕“AB团”20余名，人人自危。12日，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从前线回东固，被疑为“AB团”后，率第一营包围省行委，捆绑军长刘铁超，释放“AB团”犯，李韶九闻讯逃走。酿成震惊中央苏区之“富田事变”。

△　山东省政府接驻济日领田畊一公函，谓是年蒋军与阎、冯军作战，波及山东，张家坊子一带日侨被损害抢掠者共77户，损失总额2.7473万元，要求赔偿。是日，山东省政府议决令各县调查呈复后，再转咨外交部核办。

△　上海公共租界自来水增价一案，公司采取高压手段，于10日、11日断绝住户章天凯等用水。是日，纳税华人会议决请工部局采纳市民公意，修改合同，并要求自来水公司必须恢复供水，以后不得

再有此种压迫行动，并电请政府严重交涉。房产公会亦有此举。次日，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奉部令向工部局及英总领事接洽和平处理办法，英总领事白利南及工程局总董麦克唐均赞同和平解决，并通知自来水公司恢复供水。

12月13日　　蒋介石在庐山准备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共”会议，计划三省“剿共”方略，是日何键应蒋电召携“剿共”计划赴浔。次日，何偕汉口市长刘文岛到庐山谒蒋。徐源泉、萧之楚、夏斗寅、谢彬及张印相、岳维峻亦奉蒋召分别于14、15两日赴庐山。15日，蒋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剿共”计划。

△　国民党中央以“讨逆”军事已告终，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无存在必要，决于本年底实行裁撤，蒋介石是日电令总部准备结束。嗣因全国军队改编正在开始，湘、鄂、赣三省“剿共”亦在进行之中，经蒋介石核准，从二十年1月起，总部展期三个月结束。

△　原驻新乡一带之第二十六路军，奉调鲁西济宁，所部已陆续到达。该路总指挥孙连仲为报告移防情况及商量缩编问题，是日上午由济宁专车赴济南晤韩复榘。次日，第十五路总指挥马鸿逵由泰安赴济南，与韩、孙二人协商防务及军队缩编事宜。

△　红二军团贺龙部占领公安，小部进城，大部向黄金洞转移。17日，何成濬电令公安、石首、松滋、监利等处驻军严密堵截，并令李觉、张英两师跟踪“追剿”。19日，李觉部占公安，红军向藕池方向转移。

△　上海招商局公断员高朔律师就金利源码头案提出公断书，声明招商局方面不受法方任何拘束，招商局有特许之永租权。

12月14日　　张学良与商震、徐永昌会谈晋、绥善后，徐拟请驻晋客军10余万人出境，但无适当地点，久谈莫决，乃力请将孙殿英、高桂滋等部直接听张学良指挥节制，张允。晋军改编及请驻晋客军出

境并军饷三大问题，大体解决。张学良即将详情电告蒋介石请裁可，并请由国民政府予商震、徐永昌以新任命。

△　陈济棠、古应芬派马晓军、韦荣超、马展鸿等于上月25日到南宁谈桂和局。桂军黄旭初、梁朝玑、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亦到南宁。会议结果，李、白表示，如国民党中央果有适当处置，个人去留不成问题。是日，韦荣超、马展鸿由南宁返梧州。22日，马晓军应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电召赴广州。

△　宋子文奉蒋介石电召，自南京到庐山谒蒋，商洽赣省财政整理等问题，并参加牯岭军事会议。

12月15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通电实行裁厘，全国厘金及类似厘金之一切捐税限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另订良好税制，以期与民更始”。同日，国定新税则经立法院呈国民政府核阅批准，定明年元旦实行。

△　第十五师王东原部攻占平江黄金洞红军根据地，将所捕苏维埃委员荣锦全、红七师参谋长刘建彪等十余人就地杀害，并焚毁黄金洞附近30里之房屋。

△　全国现有陆军280师，国民政府拟缩编为100师，内中央军60师、国防军40师；四川军50万人，将缩编为12师。中央军费年定4000万元。是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令各部队，限本年12月底一律改编竣事；民国二十年元旦实现新编制，并同时派员点验。

△　国民政府令准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辞职，以副委员长邵元冲继任；任命王用宾为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布雷为教育部常任次长，刘瑞恒兼内政部卫生署署长。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召开特别董事会议，讨论自来水加价问题，决定对已断水用户即行恢复接水，但增加附费为已成之事实，用

户须暂行承认，并议决由工部局聘请专家组织委员会，专门研究减轻水价之两全办法。次日，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决定水价暂照公司账单缴付，将来专门委员会认为不应加价时，则多付之款仍须扣回。

12月16日　　鲁涤平令各路军向江西红军根据地中心区进攻。公秉藩师进攻东固正面；罗霖师自左翼攻安福，与蒋光鼐第十九路军联络，谭道源、许克祥两师自左翼与朱绍良第六路军联络进攻。次日，罗霖师占固江、安福。

△　蔡申熙红十五军由商南转战到达鄂东北黄、麻地区，是日突入河口镇，因地方武装配合失时，未能全歼守敌萧之楚部。

△　古应芬已被委为接洽桂局和平全权代表。是日，陈济棠访古应芬详商桂局。17日晚，古应芬接到国民党中央关于解决桂局电数通，遂于18日赴总部与陈济棠面商后，于21日离广州赴香港，在港曾与黄绍竑会晤，23日乘轮北上，25日抵沪。

△　国民政府任命吕志伊、宋美龄、焦易堂、史尚宽、陈肇英、林彬、马寅初、戴修骏、陶玄、彭养光、马超俊、恩克巴图、钮永建、孙镜亚、冯兆异、楼桐孙、吴尚鹰、张志韩、王用宾、蔡瑄、刘盥训、赵士北、庄崧甫、卢仲琳、刘积学、周纬、罗鼎、郑召荫、曾杰、卫挺生、傅秉常、张凤九、陈长蘅、方觉慧、刘克隽、王荷真、朱和中、吴铁城、刘景新、刘忾辰、魏怀、史维焕、朱履龢、黄右昌、郗朝俊、张默君、刘师舜、李书华、竺景崧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又令行政院取消通缉许崇智案。

△　辽宁省政府委员会议修正通过《辽宁省管理金融暂行章程》11条，规定以该省官银号及四银行号（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联合准备库所发行之现洋兑换券为本位。兑换券与现大洋一律通用，不得折扣，违者严惩。除官银号、联合准备库以及经专案核准之边业银行所发行之现洋兑换券外，其他外埠所发行之

兑现纸币，应即逐渐收回；并规定禁止带运百元以上之现洋出省城，违者除将现洋没收外，并科以扰乱金融罪。

△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迎戴拒金运动大会代表李绍华、周可法等抵南京向行政院、教育部请愿。17日，学生代表电中大同学，称戴说明中央任命金为校长乃经戴提出，由董事会再三斟酌而后决定者；此次蒋介石发表整顿全国学风令，旨在严厉执行，若不从速转机，前途危险，不堪设想。18日，朱家骅电劝中大学生复课。

12月17日　　蒋介石特令闽省各军积极准备进攻闽西红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以杨逢年为前敌指挥官，于14日起对龙岩分三路总攻击，次日占领之。是日又占龙门，闽西红军退向大小池。

△　全国律师协会对明年元旦大赦案，向国民政府建议，称“因政见上之错误，造成政治上之纷扰者尚可矜宥，则于受政治环境之影响，不幸而罹于罪者，似未忍令其除外于赦免范围”。

△　何成濬偕何键、范熙绩、徐源泉、夏斗寅、萧之楚、谢彬、范石生、刘茂恩、刘文岛自九江乘轮到汉，即召集在汉各军领袖开重要会议，协议“剿共”办法。

△　宋哲元、庞炳勋应张学良电邀自山西抵津，次日谒张报告西北军现状。杨爱源、傅作义及孙殿英之代表亦于同日抵津。

△　驻日公使汪荣宝奉国民政府训电，到外务省访币原外务大臣。汪对记者称：今日与币原氏会见，系交换关于近日报纸所传国民政府对日强硬政策及满蒙铁路问题之意见，国民政府目下正在汲汲于全国统一及建设等内政改造问题，并不对日本采取何种强硬政策，深望日本言论界谅解中国方面之真意。币原亦已充分谅解，且明言彼亦信可以共存共荣之方针，使将来两国邦交圆满无碍。

△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再函大东、大北、太平洋三公

司，略谓中国与该公司水线旧约，截至本年底均届满期，经迭次会议，毫无结果，请再派代表到京会商办法，否则届期惟有宣布旧约失效，并停止一切权利。

△　广州中山大学拒金派集会，通过：一、继续罢课；二、继续封锁校门；三、寒假期间各生不准离校；四、请学校当局封存校印；并电中央请复任戴季陶长校。

△　上海市典质业109家，职工3000余人，自9月1日正式向资方提出修改劳资待遇条件，迭经严重交涉，迄未解决。是日由上海市党部最后调解，但资方缺席。全市典质业职工会即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议决自18日起一致总罢工。

12月18日　　北平报界公会致电国民政府，以法人在华所办万国储蓄会仅以20余万元之开办资本，利用有奖储蓄相招徕，遍设分会于各城市，20年来吸收华人资金，仅储户基金一项即达4000余万元，投资于外人在华经营事业，用华人之资金，向华人吸取暴利，而华人储户之权利却毫无保障，其经济侵略计划之毒，实莫甚于此，要求政府查封该会，将其财产摊还存户。

△　外交部照会美、英、法、荷、挪威、巴西六国，促解决法权交涉。

△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选任张作相、王树翰为国民政府委员暨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监会函方振武开除党籍一年案照执行；订定建筑中央党部捐款奖励办法。

12月19日　　红军为诱敌深入，主动放弃东固，该地遂为公秉藩师占领。红军退集宁都、兴国、雩都。右翼第十九路军从莲花、永新向兴国进犯，20日占泰和，22日占万安；其左翼第六路军向宁都、瑞金进犯；中路第九路军进到兴宁一线；粤军已出“三南”（定南、龙南、虔南），企图四面包围红军。

△　内政部以鲁省聊城海源阁杨氏藏书丰富，宋、元、明木版古书尤多，为海内冠，杨氏后人拟以20余万之价格将所藏古书倾箱售与日人，特于是日电鲁省府令转民政厅迅令聊城县长查明制止，如已运津，希即电冀省府转饬扣留，以保国粹。

12月20日　　蒋介石下庐山赴汉口，政训部主任周佛海及吴敬恒、邵力子等随行。21日，蒋抵汉，即召集何成濬、何键、夏斗寅、徐源泉、萧之楚、范石生、范熙绩、岳维峻、郭汝栋、袁英、方本仁、吴醒亚、刘文岛等，询问“围剿”红军情况。同日，第十一师师长陈诚赴汉谒蒋后，即转湘指挥“围剿”红军。

△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南京去西安，是晨赴渭北一带查灾，并赴钓儿嘴参观引泾工程，即日返西安。

△　香港、广州首次飞机通航。

12月中旬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抵上海。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支持王明为首的小宗派，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

12月21日　　财政部决定实行特种消费税，抵补裁厘。全国分为若干区进行征收，以苏、浙、皖为一区，粤、桂、闽为一区，湘、鄂、赣为一区，鲁、豫为一区。是日，财政部分别令委王家驹、郑芷湘、谢奋、潘耀荣为各该区征收局长，即日前往筹备征收。此外，又决定以东三省为一区，以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为一区，以山西、陕西、甘肃、宁夏为一区，惟四川为特别区域。

△　古应芬、陈铭枢、陈济棠等在广州会商对桂方针，决俟黄绍竑、伍廷飏到香港，即派全权代表往商。

△　红军李明瑞、张云逸两部自桂边重入湘境，是日占领绥宁县城，第四路军总部电令宝庆第十六师章亮基旅会同黔军第二十五军王

家烈部驰往督“剿”，23日陷绥宁。25日，李、张两部红军向武冈进攻。章亮基部星夜驰援，何键并加派刘济人旅于26日开宝武“会剿”。

△　国际联盟卫生部长拉西曼偕随员及国联秘书吴秀峰，由日内瓦绕道西伯利亚来华，是日抵达北平。

△　中苏会议代表莫德惠由莫斯科启程回国，29日晚抵达哈尔滨。

△　据《民国日报》讯：日本向东北移民，据统计共21.1258万名。

△　上海市党部等召集典质业劳资双方调解工潮，决定全体典质职工分甲、乙、丙三等普遍加薪，资方并承认职工会有代表会员之权，双方签字，定22日全体复工。

12月22日　　阎锡山携眷离津，搭乘日船“武昌丸”赴大连。临行对记者称：“在大连过新年后拟赴日本，今后专意研究文化及社会事业，先在日本视察都市及乡间，然后转赴欧美，经一年后再返日本。”阎并致《大公报》记者一函，有“自问行能无状，何幸获得闲暇，身亲两洋文化，乐此余生”等语。24日，阎抵大连，即入市外黑关庄之临时寓所。

△　外交部长王正廷、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王伯群、铁道部长孙科、实业部长孔祥熙、代理内政部务张我华、教部政务次长李书华、常任次长陈布雷、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在南京宣誓就职，胡汉民授印，王宠惠监誓。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令各军即日将战时“讨逆军部”一律裁并，归各该师部办理，其军长名义仍照旧存在。

△　沪、烟、沽水线收回自办，由交通部派沪、津、烟三电局人

员分别向大东、大北公司实行接收，所有机件均移至中国电报局安设。至该线借款、欠费及利息，截至是日止，总额国币300万元左右，已由交通部一次交还大东、大北，惟津外商公司以未奉到总公司电拒绝交付。

△　厦门海港检疫事务向属英人管理，是日全国海港检疫处处长伍连德奉派到厦门接收，同时并商得厦门海军司令林国赓之允许，拨地建筑防疫医院。

12月23日　　蒋介石委徐源泉、王金钰分任川湘鄂及湘鄂赣边区“剿共”清乡督办。24日，蒋又电令湘、鄂、赣、闽、皖、豫六省主席慎重县长人选，并发表告六省县长书，谓“放弃县城之县长，不论情节如何，必照军法从事”。

△　蒋介石以新五师公秉藩部占领东固，特赏洋万元，并将该师升格为陆军第二十八师，以示奖励。

△　蒋介石任命刘峙为郑州行营主任；鲁涤平兼南昌行营主任。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

△　湖南平江红十六军孔荷宠部于18日攻占通城。第四路军总部电新三十一师师长陶广会同新十师师长谢彬迅速规复。是日午后，陶广部向通城攻击，陷通城，并向修水追击。

△　黄绍竑之代表伍廷飏奉蒋介石电召赴庐山面商桂局和平，已有结果，是日离沪南下赴港，奉蒋命迎黄绍竑入京。

△　财政部长宋子文再度通电贯彻明年元旦裁厘政策，并令各税捐机关，遵限裁撤厘金及类似厘金之杂税苛捐，如有阳奉阴违，决以法律绳治。26日，蒋介石复就此事通电各省市，严令各地方不得以任

何理由请求展期实现，并宣称：“此项裁厘能否实力奉行，实为革命与反革命、军阀与非军阀之试金石。”

△　中日电信交涉在交通部举行正式会议，中方出席代表庄智焕、吴南如、沙曙云、郭金镍，日本出席代表吉野圭三、饭野毅及野村等，讨论青佐水线移交问题。结果决定，日本在青岛所设之青佐线运用局定明年1月1日移交中国。下午，续议沪崎线收回问题，吉野允将中国主张转电本国政府请训。同日下午，重光葵访问王伯群，交换青佐水线问题意见，双方颇为接近。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致函国民政府，核定十九年度国家教育文化岁出经常预算为1442.2475万元，临时预算为29.94万元。

12月24日　　张学良在津分批召见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庞炳勋、孙良诚及晋军将领徐永昌、商震、杨爱源、傅作义等，议定晋绥军整编方案：一、晋军原有十军，人数约15万，现缩编为四军，约八万人，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等四人分任军长；二、西北军约五万人，减为三万人，缩编为一军，以宋哲元为军长，辖三师，以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分任师长；孙良诚另有任用，所部交宋哲元统辖；三、杂牌军队约三万人，全部遣散。庞炳勋、孙殿英各缩编为一师，月饷105万元，由晋负担，遣散编余军队之经费另行设法。

△　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召开总前委会议，讨论部署反“围剿”任务，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张辉瓒师或谭道源师。次日，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　立法院发表各委员会委员长暨委员名单：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焦易堂，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邓召荫，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钮永建。

△　国立中山大学拒金迎戴风潮，瞬及一月，行政院批斥该校学生的请愿书，严令安心上课，并令赶紧自行解散非法组织，以端学

风。戴季陶复于是日再电警告该校员生，声称“政府告诫学生命令之严厉执行，必自中山大学始，蒋主席自兼教部，以整理学风自任，言出法随，诸生勿再儿戏，以自绝于学校”。

12月25日　　王金钰于是晨抵汉向蒋介石请示，所部第四十七、第五十三两师连日陆续抵汉转赣“剿共”。同日，蒋介石又将川、湘、鄂、赣边区划为八区，分别委李觉、王金钰、刘建绪、郝梦龄、刘夷、萧之楚、徐源泉七人为“剿匪”司令。蒋介石即日离汉口回南京，以湘、鄂、赣三省“剿匪”事宜责成何成濬办理。

△　国民政府明令优恤已故军事参议院参议、四川省政府委员、前广州大元帅府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

△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推陈布雷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通过《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各县市党部设立平民学校办法大纲》。

△　据《民国日报》讯：据调查，国民政府共辖军舰54艘，计：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辖舰13艘；第三舰队司令陈绍宽，辖舰23艘；鱼雷游击舰队司令曾以鼎，辖军舰10艘；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辖军舰三艘；归测量局调遣之测量舰五艘。

12月26日　　张辉瓒第十八师进至东固。28日，张辉瓒探知红军驻黄陂一带，谭道源师已占源头，奉令将该师金耀华旅留东固，自率王捷俊、戴岳两旅向红军进攻。

△　第六路军总指挥部电京称，毛炳文师向超中旅是日在广昌附近与红军7000余人激战四小时，红军向头陂转移，即将广昌占领。

△　蒋介石电令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于岁末之前，平定中山大学“风潮”。

△　交通部与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续开水线交涉会议，公司除对

宝山、上海间之地缆，允自明年起接至宝山，中国水线应归中国管理开放外，其他如收发报价等，均无切实让步表示。27日，双方对收款权、登陆年限及报费等问题比较接近，但无最后结果。两天来，交通部与大东、大北两公司交涉，也无结果。交通部次长韦以黻对三公司代表表示，倘能容纳我方最低要求，则请于29日答复，否则双方至本年底止断绝一切契约关系。

12月27日　　立法院通过《政治犯大赦条例》，呈候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年元旦公布。《条例》，凡九条，规定“凡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政治犯均赦免之，但背叛党国之元恶，怙恶不悛之共产党，或有卖国行为者，不在此限”。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驻沪办事处约见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洽谈中日宁案。王对记者表示，甚望宁案能于年内解决。

△　武汉行营令湘、鄂、赣省府实行边区联防，计湘之长、平、济、醴等六县，鄂之崇、通两县，赣之修、铜、萍、万四县，共12县，以刘建绪兼主任，并令即日召集会议，妥订办法。

△　沪法租界捕房政治部长萨利令政治部全体探员查禁《苏维埃画报》、《硬的新闻》、《十月评论》、《赤色海员》、《革命工人》、《武昌革命》等40种报刊。

12月28日　　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抵天津。29日，该团代表汤姆森谒张学良，希望中英直接贸易，请张协助，并询投资东北保障。张称：“希望外商投资，辅助中国工商业发展，则中英国际间感情，当益亲善。”并称：“中国有统一巩固政府，无须他种保障。”

△　郑州行营遵蒋介石令移至开封。

12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定于次年1月1日起实行。这是继1929年，由国民政府颁布的

第二个“国定税则”，由七级税率变为12级税率，税率大约提高一倍。

△　国民党中常会修正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凡23条，代表总额520名，自公布日施行。

△　中国社会学社在南京中央大学科学馆举行第一次年会，到42人，孙本文主席，吴景超报告学社组织情况，谓该社共有社员80余人，以籍贯论，以江苏为最多，浙江次之；以职业论，以教育界为最多；以社团论，以中大为最多。

△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及财厅，谓盐税收入，关系中央财政，断不容再见纷歧割裂，有妨统一，凡属原有盐附加税捐省份，均限于民国二十年3月1日一律划归财部，统一核收，以便分别减免，通筹整理。

△　岳维峻奉蒋介石令任陆军第三十四师师长，是日在孝感防次宣誓就职。

△　谭道源第五十师在源头龟缩不出，红一方面军无法利用小布有利地形歼敌，遂转移目标，准备消灭张辉瓒第十八师。是日，红军主力转移到距龙岗圩约30里之君埠及其以北地区，隐蔽待命歼敌。同日上午张师先头部队已到达龙岗圩。

△　国民政府令准免禁烟委员会副委员长钮永建职。

△　中日电信交涉会议议定青岛—佐世保水线部分合同内容。

△　中山大学师生全体会议决定复课，但拒金宗旨不变。在戴季陶未回广东前，校务如有变动，教授全体辞职。次日，中大学生全体复课。

△　新华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召开董事会，决定由中国、交通两银行增拨该行资本，扩大营业，更改行名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并将

上海分行改为总行，北平、天津两地改设分行。董事会推定冯耿光为董事长，张嘉璈、胡祖同、宋汉章、王子崧为常务董事，王志莘为总经理。

△　国货银行经理朱成章于23日被刺，是日不治身死。所遗国货银行总经理职，由董事兼协理宋子良代理。

12月30日　　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在龙岗附近遭黄公略红三军阻击，张部等“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红军终将敌全部歼灭，毙伤俘敌9000余人，张辉瓒被生俘。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年卷烟库券条例》，总额6000万元，以充办理善后周旋国库之用，月息七厘，自民国二十年1月1日起照票面十足发行，九八折收款，本息六年半全部偿清。

△　日代公使重光葵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胡世泽拟定中日解决宁案协定草案条文。

△　新任驻华葡萄牙公使那伐洛偕代办福特利司抵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

△　财政部电令全国各厘金局各被裁常关，限31日止停止征税，自明年1月5日至20日止办理结束事宜，如有不遵限结束，或有私自敲诈情事，即严重罚办。

12月31日　　交通部国际电信交涉委员会与英商大东、丹商大北两水线公司签定交涉大纲七条。两公司于新合同成立后仍获得十四年之登陆权。关于报价、收发权等问题，亦有相当解决。

△　英人斯坦因在新疆大规模盗掘古物，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26日曾发表宣言反对，并请政府制止。斯坦因乃托英使馆代为声明：“在新所获古物，非得中国政府许可，决不运出华境。”是日，古

物保管委员会再发英文宣言反对。

12月下旬　南京户口调查完竣，为26.9766万人，失业与无业者过半数。

是年　全国年产煤2603.6564万吨；铁225.2468万吨；石油36.4137万桶；锰7.0722万吨；钨6736吨；金11.3986万两；银11.9595万两；铜345吨；铅7752吨；锡7217吨。

△　据工商部调查，全国共有各业工厂1975个，其中纺织工业695个，饮食工业405个，化学工业261个，机械工业225个，教育工业132个，建筑工业77个，公用工业54个，交通工业33个，衣服工业15个，器具工业14个，美术工业二个，杂品工业58个，其他四个。

△　全国设立商业公司68所，资本额共计3190.3385万元。全国累积共有商业公司944所，资本额累计达5.22730978亿元。

△　全年对外贸易输入额为13.09755742亿海关两，输出额为8.94843594亿海关两；入超达4.14912148亿海关两。

△　中国留日学生3049名，由王克仁任留学生监督。是年，日本文化事业部资助由中国至日本视察团体共20个，为上年之一倍。

△　据国民政府公布，全国初等教育（包括幼稚园）共有学校25.084万所，在校学生1094.8977万人；中等教育（包括师范及职业学校）共有学校2992所，在校学生51.4609万人；高等教育（包括专科）共有学校85所，在校学生3.7566万人。全年教育经费占总预算比例1.46％，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22.07％。青海省每两千人中，入学儿童仅有两人强，而西康省更少，仅有0.17人。

△　中华书局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

△　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

△ 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野草闲花》一片，以蜡版配音，是为中国摄制有声电影之始。

△ 美国友邦银行在港设立分行，经营人寿保险业务。

△ 香港电话公司采用新式电话自动接线机，用户也改用带有号码的拨盘机。

△ 东京华侨成立东京华商商会。

△ 新加坡华文女子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创立。

△ 菲律宾华文《侨声日报》创刊，林籁余主编。

△ 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发起成立参战工善后委员会。

△ 美国华文《纽约中国日报》在旧金山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六卷
(1931—1933)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六卷

(1931—1933)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31年（民国二十年）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返回总目录

1931年（民国二十年）

1月

1月1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元旦大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等党政要员在南京首都机场阅兵。同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民国二十年最切要之两事为敬教、劝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发表《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称今后惟一的任务是协助人民筹备地方自治。

△　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特赐荣褒。

△　国民政府令：授予刘峙、韩复榘、何成濬、陈调元、王金钰、陈济棠、朱绍良、徐源泉、王树常、于学忠等68人宝鼎勋章。

△　国民政府公布《政治犯大赦条例》、《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卷烟税库券条例》。

△　全国军队开始编遣，分甲、乙、丙三种师，各“剿共”部队暂缓实施，俟“剿共”完毕后再行编遣。全国军费每月暂定1200万元，以师为单位支配。

△　张学良通电宣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河北、察哈尔、山西七省是日起裁撤厘金；浙江、陕西、河南三省府亦均于同日宣布裁厘。5日，河北各税局以各税局均系出资包办，大都限期未满为由拒绝裁厘，并称在当局无新办法前仍继续征税。

△　北平崇文门关所属十三门税局及各地所设分局、关卡50余处，是日均停止征收厘金。

△　第十八师之第五十二、五十三两旅于龙冈被红军全歼，师长张辉瓒被俘后，富田、东固、头陂等地国民党军是日纷纷撤退。

△　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督率所部向洪湖红军贺龙部发动总攻。第四十八师徐继武旅从潜江，韩昌峻旅从天门县岳口、沔阳县仙桃，张振汉旅从沙市，补充一、二团从武穴，新三旅徐德佐部从仙桃至张家沟，湖北警备旅容景芳部从螺山市，特务团从新堤，新二旅刘培绪部从监利，同时向洪湖缩紧包围，攻击前进。3日，徐德佐部攻占沔阳。4日，红军3000余人反攻沔阳，激战五小时，不胜。5日，特务团攻占汊河口红军第十四区苏维埃政府。8日，容景芳旅占领周家湾。10日，徐继武旅占领渔阳镇。11日，刘培绪旅占领柳家集。13日，徐德佐旅攻占峰口。17日，刘培绪旅攻占翟家湾。至此，红军主力退出洪湖。

△　何应钦、顾祝同、陈继承在西安倡办的《西北文化日报》出版，陈海观任总编辑。

1月2日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电令第五十师谭道源及第二十八师公秉藩继续向龙冈进攻。红一方面军得知谭道源师东移消息，以红十二军为正面、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三军为右翼，向东韶星夜急进。

1月3日　　红一方面军在东韶从西、南、北向谭道源师发起猛攻，至下午，红军突破谭师阵线，形成合围之势。谭率残部突围东逃。是役，谭师被歼大半，团长黄敬、团附谭济康被击毙，弃步枪千余支，机枪40余挺。至此，对江西红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结束。

1月4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开封行营主任刘峙因驻河南宁陵新编第四师师长秦庆霖不服调遣，纵兵扰乱地方，派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

杰率部将秦师包围缴械。是日，秦被押往开封。5日，刘峙奉蒋介石令委秦为开封行营中将参议。

1月5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本年政府最重要的两大工作，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

△　内政部长刘尚清在南京宣誓就职。7日，刘谈内政部施政方针是“剿匪安民”、“甄别县长”、“推行自治”。

△　前隶属甄寿山部之杨万青、苏纪昌部被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收编后，编入李云溪特务师，驻陕西凤翔一带。是日，苏、杨率部哗变，将师长李云溪、参谋长尚天初等杀死，并将凤翔城劫掠一空，向西逃去。杨派孙蔚如、赵观涛两师追剿，将叛军歼灭。

△　山东平市官钱总局在济南开业。该局经理宋福祉称过去山东全省发行纸币共1008种，“可算纸币最紊乱之省份”。

1月6日　　国民政府任命马麒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派吴凯声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十四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代表。

△　国民政府铨叙部成立，为负责官吏的甄别考核和任用之政府机构。

△　山东省政府以济南市政府焚烧毒品误烧炸药，死伤公务员多人，决定将市长陈维新免职，并取消济南市政府，市属各机关归省府直辖。

1月7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应张学良电邀，由南京启程赴天津，与张商洽北方各省裁厘后军政费用抵补及晋绥军善后费用诸问题。10日，宋在津对记者谈，全国裁厘后损失约9900万元，中央办统税五种、特种消费税19种，各省所受裁厘损失当由中央酌补。18日，宋子文离津返京，19日向蒋介石报告办理北方裁厘及与张商洽北方军队编遣费情形。

△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提出《两条路线的战争》（又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会议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改选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王明（陈绍禹）等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　湘赣红军李明瑞部攻克湖南道县城。欧冠正率附近各县民团会同彭位仁第十六师章亮基旅反攻。

△　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因坠机受伤未愈，电总司令部请辞本兼各职。10日，蒋介石准熊辞第五师师长本职，遗缺以该师副师长胡祖玉升任。

△　上海招商局船员罢工，经调解于12日复工。

1月8日　　国民政府任命钱永铭为驻法国特命全权公使，原任高鲁免职。

△　财政部令撤销苏、浙、闽、皖、赣、湘、鄂、川、豫、鲁等省财政特派员公署，惟广东、河北两省暂准设置；本月下旬开征特税；特税总局设于南京，各省及商业繁盛地区设分局。

△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湘鄂赣边区“剿匪”督办王金钰、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抵长沙与湖南省府主席何键商讨“剿共”计划。19日，何、王、夏在京谒见蒋介石，详陈湘、鄂、赣三省“剿共”情况及今后三省联合“剿共”军事计划。

△　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邵元冲在京对各报记者谈考试问题，略谓欲使国家吏治澄清，“必须拔取专门人才，服务专门之事”；自本年起，将实行各种考试遴选官吏。

1月9日　　外交部就外人近二年来非法贩运鸦片到华事发表宣言，略称：“现且筹备管理全国鸦片贸易，将来鸦片进口与出口，统

由内政部设一机关管理”，每年进口额由国务会议决定。并限定上海为惟一进口鸦片口岸，希望各关系国予以联络合作。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饬财政部迅速发行陕西救灾公债800万元。

△　山西善后协进会在太原开会，决议：一、山西驻军以师为单位，一律编为国防军，开往边疆；二、财政绝对公开，向中央力争2400万元金融公债；三、将山西兵工厂改为农具制造厂，收回正太路；四、厉行军民分治。

△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在上海举行年会，董事长蔡元培、董事胡适、蒋梦麟、司徒雷登等九人到会。会议以该基金至1945年即将用完，为预筹财源，决议凡以后从该基金中取款时，提存三分之一作将来基金。并决议为资助北京大学的革新事业，每年捐助20万元，以五年为限。

△　上海虹口鸭绿路67号大中印刷所承印共产党刊物《红旗日报》，被公共租界捕房查获，搜去所有刊物，承印该刊物的店主钱金淦及店员被逮捕。

1月10日　蒋介石在励志社设宴招待在京党政军要员，并发表演说，略谓“中国贫弱的原因是由于现在处在二十世纪的消费时代，而中国本身只有十八世纪的生产能力”，并强调要“节流”。

△　英、美、法、荷、挪五国分别照复外交部，请开会议解决撤销领事裁判权事。

1月11日　胡汉民召集国民会议方案起草委员会开会，审查《国民会议组织法》。胡宣称召集国民会议的目的在于“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打倒列强政治经济的侵略”，“博采国民对今后政治的意见”。

△　蒋介石原定新年后北上巡阅，因“剿共”紧张，须坐镇调遣，是日宣布延期北行。同日，蒋电令各“剿共”部队，限本年4月30日为“剿共”结束日期。

△　孙连仲奉蒋介石命率部赴江西“剿共”，是日率所部旅、团长抵南京，向蒋请示具体行动方案。旋即返回济宁防地，准备开拔事宜。

△　财政部因裁厘后据各省报告政费支出不敷甚巨，决定令各省财政厅催办营业税，以资抵补。

△　第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奉蒋介石令由徐州调往江西“剿共”，是日先头部队开拔。韩部在南昌集中后，归鲁涤平指挥。韩之徐州防地由第七师王均部接防。

△　江苏省清乡督办张之江在扬州召开全省“绥靖”会议，决议分区“会剿”，徐海区由张砺生骑三师和张华堂骑一师负责；扬州区由赵建勋旅负责；淮阴区由梁冠英第二十五路军负责；宁镇区由谷正伦负责；淞沪区由熊式辉负责；苏常区由李明扬负责。预定四个月将全省“匪患”肃清。

1月12日　胡汉民在国府纪念周讲演，指责国府简任以上官吏违背国府禁令，不经请假擅自离京赴沪者比比皆是，并在租界内广置房产，经营种种，寻欢作乐，此事必须加以矫正。胡自称“本人在租界无一草一木”，“二三年来未离京一步”。

△　总税务司公布1930年海关税收，全国总数合关平银1.8057亿两。

△　中东路理监事会议结束。中方理事长莫德惠所提关于中俄文并用、平均用人、整顿路务、开源节流、修改运则、振兴路有林矿业等提案均通过。

△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代表熊育锡及省府代表罗一东到京向中央请愿，请求速派得力军入赣“剿共”。蒋介石允派孙连仲、徐庭瑶两部前往。

△　新编第三十一师陶广部攻江西中央苏区修水渣津一带，大肆杀戮。

1月13日　国民政府特派邵元冲为高等考试复核委员会委员长。

△　国民政府以刘衡、戴王思怙、戴董淑敏、俞福谦于民国十九年中捐资兴学各在三万元以上，特予明令嘉奖。

△　司法院通令规定，政治犯请求赦免，须向住在地地方法院申诉呈请，由高等法院组成委员会核审；军法会审案不在此例。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原第十一师师长陈诚任第十四师师长，原任第十一师副师长罗卓英代理该师师长；第十四师师长钱大钧调武汉军校任教育长。

△　国民政府特派调解桂局代表、广西善后会办伍廷飏向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当面传达中央意见，要求桂方限期通电服从中央，和平解决桂局，否则将以武力解决。

△　湖北省政府通令各县积极组织“铲共宣传团”。同日，武汉行营令崇阳、通城、修水、万载、萍乡、铜鼓、平江、浏阳、醴陵、岳阳等县县长到浏阳开“湘鄂赣边县联防会议”。25日，联防会议开幕。

1月14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察哈尔省政府：原省政府委员杨爱源、彭赞璜、张砺生、童效先、索狄木拉普坦、顼夔益、杭锦寿，均免本职，彭、顼分别免去民政、财政各厅厅长兼职；任命刘翼飞、伍庸、文光、高惜冰、赵兴德、德穆楚克栋鲁普、杭锦寿为察哈尔省府委员，刘兼省府主席，文兼财政厅长，高兼教育厅长，赵兼建设厅长。

△　国民政府令：派臧启芳为接收天津比国租界专员。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将威海卫口岸暂定为自由商港，税收原则交行政院规划决定。

△　国民政府警卫师改编完毕，共编步兵三旅，炮兵一旅，师直属坦克、特务等营及教育队，共三万余人，冯轶裴任师长。

△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向中央建议彻底解决山西问题措施四项：一、军民分治，消除以军专政之害；二、对晋军实施编遣，以谋“苏民固防”；三、改组兵工厂，“以永绝国家乱源”；四、发行整理金融公债，以维持晋省金融。

△　旅京甘人百余人由马福祥领衔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早日视察甘肃，以定西北大计，并速派甘省府人员及西北行营军队入甘，以固边防。

△　据《申报》报道：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决定取消市总工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并函市公安局会同派人接管。

1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施行法》。2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全国内政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代表55人，内政部长刘尚清主席并致开幕词。中央代表王宠惠致词称，内政工作在训政时期最主要的任务是“完成地方自治”。大会指定民政、警政、土地、卫生、礼俗等各组审查委员。大会收到提案102件。

△　国民政府令：军政部常任次长陈仪改任军政部政务次长；任命曹浩森为军政部常任次长。

△　天津比租界收回。中国政府在天津比租界工部局举行接收典

礼，中国外长王正廷，接收专员臧启芳，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及比利时总领事代表比国政府出席。收回之比租界改名为天津市第四特别区。

△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兼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

△　据《大公报》载：铁甲车司令部将铁甲车队改编为铁道炮队，司令部设于浦口，下辖四大队：第一大队队部设于济南，归韩复榘指挥，巡防津浦、胶济两线；第二大队队部设于开封，归刘峙指挥，巡防陇海线；第三大队队部设于徐州，归王均指挥，巡防津浦南段；第四大队队部设于汉口，归何成濬指挥，巡防平汉线。

△　陕西省建设厅为开发陕西发表启事，欢迎“国内同胞、国外侨胞之热心祖国实业者，关怀西北民生者，来陕投资”，兴办农、工、矿、林等业，以改善陕省民众之饥寒困境。

1月16日　蒋介石、张学良联名代电，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别为陆军第三、四、五、六、七军军长；委任庞炳勋、孙殿英、杨效欧、冯鹏翥、孙楚、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分别为陆军第一至第九师师长，傅作义兼任第十师师长。周玳为炮兵监。至此，西北编遣问题告一段落。

△　武汉行营通令，“铲共剿匪”区域政务，除财政、司法外，均由该区军事长官监督指挥。

△　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攻陷红军龙岩大池根据地，红军退往古田村。闽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军官学校均被刘部烧毁。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第六十师蔡廷锴部、新编第三十一师陶广部等同时对湘赣红军根据地进攻。

△　国民政府通电，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业已宣誓就职，自本

年1月起，总司令部各公文均由张学良副署。

△　教育部公布《华侨中小学规程》，令驻外各领事转饬所属中、小学一体遵行。

1月17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林森、刘纪文为首都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

△　国民政府令：《清乡条例》施行期延长至本年6月底止。

△　国民政府据内政部呈准河南省府咨请裁撤开封、郑州两市，是日指令照准，并令行政院转饬遵照。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北平招待报界，答复所提各问题。王称，对外法权问题已有13国解决；使馆南迁者已有四五国；中俄问题，中央主张先将东铁问题解决，再议通商问题；汉口日法租界、广州湾收回案，已由各公使电本国请示；银借款问题，政府并无此意。

△　中国国际贸易协会在上海成立，张嘉璈等17人为理事。

△　晋军将领孙楚、杨效欧、杨澄源、王靖国、李生达、李服膺、杨耀芳、张会诏、冯鹏翥等联名电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张学良，陈述天津善后会议决议只将晋军编为四个军，“与晋军实在情形，过相悬殊，万难容纳”，请求将“晋军编为国军，俾与中央军同等待遇”，“否则惟有解甲归田”。2月3日，蒋复电称：此次改编晋军，中央根据国军编遣计划，斟酌晋省财政情形编定，不容轻易变更。

△　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将其所属部队缩编为两个甲种师、一个乙种师、一个炮兵独立团及一个独立旅。19日，韩派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往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该路军缩编情况。

1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各级党部在3月1日前，按中央规定办法改组各种人民团体组织，并呈报中央。

△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鄂、赣两省“剿共”近状，谓张辉瓒在东固失败“乃过程中必经”，“剿匪进行，必能依预定计划及时完成”。

△　于右任视察陕灾后返京，是日在中央纪念周报告陕西灾情，略谓陕西自民国统一后，死亡人口已达300余万，十室九空，穷人卖儿卖女达40多万，冯玉祥、阎锡山两军阀从贩卖人口中还各自榨取税收200万元之多。此非只阎、冯之罪恶，全体党员亦应负责任。

△　蒋介石设宴招待出席内政会议的各省民政厅长，并指示“介绍当地官吏加入国民党”。21日，蒋函嘱内政会议秘书处通知出席会议人员，凡有未加入国民党而愿意入党者，均可入党。

△　红军李明瑞部攻克粤北连县。湘、粤两省当局急派军队反攻。

△　上海《时事新报》18日“星期评坛”发表《外交部长献地图》一文，称王正廷北行，“言为参加收回天津比国租界，实则别有所为”。是日，蒋介石指责该报向来投机，“批评外交当局，完全失去报纸的价值”，并声言“政府必要制止”。

△　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席黄楚九逝世。上海日夜银行及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因此宣告倒闭。各种存款委托上海银行自6月18日起按存款额一成发还。

1月20日　　蒋介石在京面谕何成濬，湘、鄂、赣三省“剿共”事宜，统归武汉行营全权办理，并面授“清剿”机宜四项：一、招集流亡；二、实行连坐法；三、扶植自卫力量；四、实行推进办法。并限令各军两个月内务将湘、赣共产党完全肃清。

△　黄绍竑离香港赴南京，临行时托何荦转告陈铭枢、陈济棠，谓本人及桂各将领均愿和平，现已停止军事行动。同时，黄表示另函

二陈，请恢复桂省水陆交通，停止轰炸邕、柳，缩小警备范围。桂对和平次序分两步：一、通电拥护和平，第八路军、第十路军停止封锁水陆交通；二、桂省军政长官由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通电下野。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决定由苏区中央局承担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提出“不应机械的一定要在二月七日来开，再延期与否应由苏区中央局去决定”。

△　红军孔荷宠部及赤卫队在湖南浏阳东汇集，准备进攻古港。是日，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通电各部队，生擒或斩取孔荷宠首级送往本部者，赏大洋一万元。

1月中旬　　许继慎、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与蔡申熙、陈奇领导的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长竹园会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下辖第十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及独立团，全军共1.25万余人。红四军由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

1月21日　　国民政府据考试院呈以《考试法施行细则》业经公布，自民国二十年起，所有各省呈请举行考试，应一律停止；各项考试概由考选委员会按照需要，随时呈考试院核夺施行，是日训令行政院转行所属知照。

△　国民党中政会议决议：一、承认巴拿马新政府；二、议定对“有功于革命者”给勋办法。

△　内政会议通过《修正县组织法施行法》，规定完成县组织期限最迟不得逾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底。

△　张学良在沈阳东北边防公署接受日本天皇所赠旭日大勋章，日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代表日天皇授勋。东北各军政要员均参加授勋仪式。

△　郝梦龄师全部到达修水，郭华宗师到达万载，“会剿”湘赣边区红军。

1月22日　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韩复榘、孙连仲、马鸿逵等部师、旅、团长训话，并按师、旅、团三级分别各赏给大洋5000元、500元、300元。

△　蒋介石电委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并令孙部自本月27日开拔，限2月14日前全部入赣。

△　财政部电令全国各银行禁止非法业务，凡不遵正当营业手续，私自经营非法储蓄及类似诱惑性之业务，一经查觉，即予严惩。

1月23日　国民党军罗霖、公秉藩、许克祥、路孝忱、毛炳文、蒋光鼐、蔡廷锴、胡祖玉、韩德勤、刘和鼎、张贞等师配置于吉安、吉水、永丰、南丰、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兴国、赣州、泰和等地，完成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包围。

△　徐源泉电监利、宜昌、江陵、沔阳各县长，限一周内分别组织“临时清乡委员会”。

1月24日　张学良在辽宁省府礼堂报告南京之行的感受，宣称蒋介石对国家“励精图治，惟缺乏良好之帮手”，“中央之富有朝气，实令人景仰”。“予自思中国之所以紊乱如斯者，我等军人必须负完全责任”，“今后我等应以廉明守法相勉”。

△　全国内政会议闭会，并发表宣言，略称今后要务为“安靖地方”，“整饬吏治”，“完成自治”，“开发疆土”。

△　武汉行营委周朝武为鄂西游击司令，令其即在潜江组司令部，协助各县清乡。

△　徐源泉电请何成濬在洪湖地区办团防，组织“铲共团”，清查户口，实行村区联防。是日，何复电，谓所请已令民政厅转饬遵办。

△　红军贺龙部退往鄂西恩施、鹤峰一带，国民党军罗启疆部进至鹤峰县境，陈渠珍部进至桑植，徐源泉部亦由宜都等地西进。

△　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军长黄公略部攻入铜鼓，警队民团溃逃至距城十五里处三都顽抗。27日，警队民团搜罗各地武装反攻，被红军击毙击伤极多，余溃逃，急电蒋介石请令鲁涤平派兵援救。28日，黄公略部攻下三都，在铜鼓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

△　延吉市政筹备处长兼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四县行政监督张书翰奉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之令，在延吉召集该四县县长讨论延边“防共”实施方案。

1月25日　黄绍竑应蒋介石召，偕伍廷飏等抵南京，向蒋报告解决桂局经过及桂省近情，表示桂省“拥护中央，一致清共”。

△　红军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孔荷宠、李实行部三四千人攻占南昌附近高安县城，鲁涤平急电驻吉安省独立第十四旅刘夷部及赣北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速往反攻。

△　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刊《党的建设》杂志。

1月26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戴季陶为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主任。

△　蒋介石在国府向何成濬、王金钰、陈仪、杨杰、贺耀组、冯轶裴、张治中、张惠长、贺国光、陈绍宽、俞飞鹏、谷正伦、夏斗寅、上官云相等参与“剿共”作战有功的军事将领24人授予宝鼎勋章。

△　蒋介石任命韩德勤为南昌卫戍司令，所有第五十二师及独立第十四旅均归其指挥。

△　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应蒋介石电召，从广州启程入京商议桂局善后。29日，陈抵上海对记者谈，桂省军事行动已停止一月，第八路军最前部止于宾阳、迁江（今并入宾县）一带，该军现由余汉谋负责，桂局解决办法唯中央之命是遵。同日，云南省主席龙云以桂局即将和平解决，令第十路军除留张冲旅驻桂南外，其余全部撤回昆明。

△　蒋介石电令第二师师长顾祝同、第三师师长陈继承、第十师师长杨胜治各率所部于2月1日前全部进入甘肃。

△　张学良在沈阳召集辽、吉、黑、晋、察、热、哈、平、津等北方各省、市财政厅、局长开会，讨论厘金裁撤后另办新税抵补办法。

△　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来华考察已三月，对东北、华北及长江一带考察完毕，即将赴粤考察后回国。是日，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设宴为该团饯行。

△　红四军邝继勋部第十师围攻湖北麻城县北部磨角楼守军第十三师一部，第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冰率四个团自麻城前往营救，与埋伏在骑骡铺的红十二师激战三日。28日，红军攻占磨角楼，重创朱怀冰部，缴获枪千余支。

1月27日　　蒋介石为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剿共”事宜，特令军政部长何应钦任“湘鄂赣闽剿匪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四省“剿共”部队及武汉、南昌两行营。同日，蒋电令鲁涤平兼任第十八师师长。

△　国民政府公布《教育会法》，凡38条。

△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罗章龙等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非法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日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随即付诸实施。

△　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在太原召集晋军各将领开军缩会议，各军长仍主张缩编为10个师，每军拟裁三个团，留六个团。商震表示愿让出所兼军长职务。28日，经庞炳勋、宋哲元两人与晋军各将领斡旋，商震与各军长间隔膜已消除，预定裁兵三分之一，设军事委员会办理善后。

1月28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保障人民自由案及中央遴选工作人员交国民政府派赴各省指导地方自治工作暂行办法；又通过戴季陶所提扩充医药卫生教育案，该案内称，现在中国九万人中才有一个西医，30年后要达到1000人中有医生一人。

△　国民政府公布《棉纱火柴水泥统税条例》。

△　中日电讯交涉在京正式举行，讨论沪崎（上海—长崎）线合同及修改青崎（青岛—长崎）线合同。

△　红军贺龙一部进至华容县境，新编第十一师师长张英令所部两团由南县、安乡，第四十八师刘培绪旅由藕池，两路同时向华容进攻。同日，红军孔荷宠、邵式平两部占领江西樟树，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电所部各军向樟树围攻，航空五队出动战斗机协助。

△　上海各同业公会因江、浙两省所征营业税率超过政府规定税额达10倍以上，特推代表骆清华等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29日，沪各同业公会通电号召各商家，凡逾越财政部所颁征税纲要2‰最高限制之营业税，概不缴纳。

△　红军俘获之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东固经群众大会公审后

处决。

1月29日　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攻占高安，红军孔荷宠部退宜丰一带。

△　贺龙部抵达石门新关，与李觉师激战后退磨子隘，武汉行营令湘、鄂、川各军联合向贺龙部“围剿”。

△　上海中国公学教职员会上书该校董事会，陈述马君武长校以来，违背董事会章程、变更学科系统、任意独裁、经费不公开、招收伪造文凭之学生、重用教育部明令撤退之教授罗隆基等办学措置失当，要求准马立即辞职。31日，校董王云五等调停，马坚持己见。2月2日，马又指使罗隆基率领“学生代表团”30余人在校内挑起武斗，学潮扩大，马走。同日，董事蔡元培、王云五、高一涵、杨杏佛等函董事会声明无力维持局面，提出辞职。5日，教育部派顾树森、朱应鹏等为中国公学临时接管委员。

1月30日　陈济棠抵南京，对记者谈称，桂军枪械全数不到一万支，而张发奎仅有1000余人，桂事善后绝对遵中央意旨去做，个人无成见。当晚，蒋介石约陈济棠、黄绍竑、何应钦等共商桂局善后。31日，陈再向蒋报告第八路军入桂情形。

△　晋军各将领与张学良所派点验晋军代表戢翼翘等续商改编晋军。晋将领多数认为天津会议决议晋军只留八师32团，被裁太多，主张留10师60团。协议结果，推戢赴沈阳向张学良报告。同日，张学良电晋军各将领称，晋军缩编仍须维持天津原议。杨爱源劝大家顾全大局，遵张决定办理。

△　教育部训令国立各大学、专科学校暨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各公、私立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规定军事教育修习期为两年，每周三小时，各校校长应亲自负责指导，认真办理。

△　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林康侯分电行政院、财政部，谓安徽、江苏两省自裁厘后，所征营业税加增五倍至10倍之多，请政府严加矫正。

1月31日　国民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该法规定，凡“扰乱治安者，私通外国图谋扰乱治安者，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均处死刑；凡“为叛徒购办或运输军用品者，以政治上或军事上之秘密泄露或传递于叛徒者，破坏交通等行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犯法者，戒严区内由该区最高军事机关审判，在“剿共”区域由县长及司法官二人组织临时法庭审判。3月1日起为实施日期。

△　国民政府任命各部常务次长：内政部张我华，外交部王家桢，军政部曹浩森，财政部李调生，教育部陈布雷，交通部韦以黼，铁道部黄汉梁，实业部郑洪年、穆湘玥。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山西省政府：原省府委员商震、杨兆泰、冀贡泉、马骏、邱仰濬、孟元文、耿步蟾、陈受中、李尚仁、王录勋、陈敬棠均免本职，邱、孟、陈（受中）、王、耿、李分别免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工商各厅厅长兼职；任命商震、张济新、常秉彝、冯司直、仇曾诒、张维清、郭宝清、李尚仁、胡颐龄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商震兼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厅长，张（济新）、冯、仇、常分别兼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各厅厅长。

是月　话剧剧团大道剧社在上海成立，主要演员有郑君里等。

△　上海青年旅行家潘德明只身单车环游世界启程（历时七年，于1937年回国）。

△　台湾总督石塚英藏离任，由太田政弘接任第14任台督。

△ 台共在凤山成立改革同盟。

2月

2月1日 蒋介石约陈济棠、黄绍竑商谈桂军编制及桂省善后事宜。同日，蒋介石、胡汉民接见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向育仁，询问川事。

△ 交通部在沪成立国际电信局。

△ 中德航空公司成立，韦以黼任董事长，双清、史密德为副董事长。其航线定为由上海经南京、北平、齐齐哈尔至满洲里；出满洲里后改由苏联组一新公司，自海参崴经伊尔库茨克、莫斯科而达柏林。

△ 山西省代表温寿泉在南京谈，晋钞基金被阎锡山提走，仅剩300余万元，而省银行所发钞票已超过5000万元，现晋钞每元仅值现洋三角上下，晋省经济已临绝境。

2月2日 军政部部长、湘鄂赣闽“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离京赴赣，组织指挥对江西苏区红军第二次大“围剿”。参谋长贺国光、副参谋长王纶等随行。4日，何应钦抵南昌后，召鲁涤平、贺国光等商议“围剿”红军计划，决定俟各部重新布置完竣，孙连仲部到达前线后，再发动总攻。

△ 第六十师蔡廷锴部由赣州开赴兴国，旋向广昌、宁都一带红军进攻。

△ 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电告南京总司令部，谓田颂尧、刘存厚等川军入侵陕境，已被击退。5日，蒋介石电邓锡侯、田颂尧，令其饬所部未得中央明令，不得自由开赴陕、甘境内，以免误会。25日，国民政府电令刘存厚迅将入陕川军撤回四川，以后如军队自由行

动，即将该管长官严惩不贷。

△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举行宣誓就职典礼，蒋介石、胡汉民、王宠惠等及各机关代表200余人出席。

△　内政部奉行政院令，电咨各省、市政府将阎锡山在国内财产照《修正处理逆产条例》查封。

△　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公署从信阳移往汉口，督办李鸣钟向何成濬报告豫边“围剿”红军情形，并提出“清剿”豫鄂皖边境红军计划，计划规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及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所部仍驻鄂东，为“围剿”主力，第三十三师葛云龙部由豫边进攻黄安（今红安）。

△　刘湘部抵五峰县渔洋关，罗启疆部到达鹤峰走马坪，李觉部到达石门磨岗隘，陈渠珍部到达大庸、桑植，共同对湘鄂边境红军贺龙部实行包围。

△　晋军各军长所推代表景耀月去沈阳见张学良后，返抵太原向各将领报告与张接洽经过，谓张对晋军编遣仍主张维持天津决议，保留军长制，仍编四军八师，添设护路军及晋南、晋北、太原三警备司令部问题，可酌情商办。军队总额为56团，军饷由东北及河北设法筹拨，被裁军官均送讲武堂。各军长认为结果圆满。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介绍，由南京到上海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商洽其所拟《改善中国经济状况计划》。该计划要点是，因德国现在无财力向美国偿付战败赔款，其生产之产品又无销路，计划由德国在华开辟一市场，由美国转账，德国藉此偿付战债。

△　河南省赈务会电中国红十字会，谓樊钟秀、刘桂堂、孙士贵、任应岐等部20余万人驻长葛县七个月，滥劫横征，勒粮派款，不

下百万元，该县罗掘俱穷，人民除死亡流离者外，赤穷不能举火者逾5000余家，请速予赈救。

△　广东省政府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县长，并电沪促唐速归就任。

△　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在上海病故。

△　红军方志敏部自赣东进入浙边，占领玉山临江湖一带，常山县县长急电浙江省府及驻杭第四师师长徐庭瑶乞援。

△　甘肃省赈务委员会代表杨作荣到京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求拨赈款救济甘肃。据杨称，该省年来死于荒旱、疫疾、地震、兵匪之灾者，已逾250万人，奄奄待毙者不下300万。

△　河南修武、博爱两县收回英商福矿权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电，要求收回英商福公司矿权，略谓与该公司所订矿务合同为最不平等之条约，两县数十万人民誓死不再与该公司合作，爱国保矿，不达目的，誓不中止。

2月3日　　行政院公布《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及《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

2月4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严惩商店与政府机关交易私给回扣案》及《贪赃惩治法案》，公务员回扣者，以舞弊治罪，共同舞弊之商店，亦以犯罪论；《共产党自首法》因办理大赦案对自首范围发生疑义，交法律组审查。

△　蒋介石召见甘肃党务整理委员田昆山、凌子惟，青海党务特派员方少云、翟宗涛等，指示办理西北党务方针。

△　海军部次长兼江南造船厂厂长陈绍宽由京抵沪，对记者谈海军近况和任务称：一、规划海权为当务之急，领海范围业经拟就，定

为离海岸三浬以内；二、长江防务甚巩固，自宜昌至南京，均有军舰驻防；三、象山设立海军学校，俟建筑计划拟定即进行；四、改造军舰。

△　红军陈韶、谭思聪两部由湘东酃县向资兴进发，击溃资兴民团，缴枪数百支，占领资兴县城。何键急调军队前往围攻。

△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各省商会联合会限期改组，以便推选代表参加国民会议。

△　训练总监部决定在南京、汉口、北平、辽宁、广州各设陆军中学一所，招收初中毕业学生，每校每期200至500名，并议定学制大纲、组织条例及毕业后派往东、西洋各国陆军大学肄业办法。

△　铁道部通令京沪、沪杭甬、津浦、胶济、湘鄂、南浔等路推行交通部编制的国音电报，限本年6月底前普及全线。

2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推定中央委员分区视察人选及分配区域：辽、吉、黑、热，吴铁城；平、津、冀，张继；察、绥，苗培成；晋，孔祥熙；湘、鄂，曾养甫；两广，李文范；闽，陈肇英；滇，王柏龄；赣，何应钦；皖，桂崇基；苏、沪、京，朱家骅；浙，张道藩；黔，褚民谊；陕，焦易堂；豫，程天放；鲁、青岛、威海卫，刘纪文；川，方觉慧、丁超五；海外，林森、陈耀垣。二、圈定陈济棠、陈铭枢、黄麟书、林云陔、黄季陆、林直勉、蒋光鼐为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三、推孙科、林森、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马超俊、余井塘、吴铁城、郑洪年、陈耀垣、萧佛成为暨南大学董事。四、通过《文化团体组织大纲及细则》及《省、特别市党部及县、市党部指导农会组织办法》。

△　禁烟委员会委员伍连德发表《流毒已极的鸦片问题》一文，主张政府准确调查各省种烟，由政府监视生产，种烟烟民每年减50％，定15年禁绝，在此期间海关按月抽烟土税每担2000两另储；

一切操之过急的政策均应废止。13日，中华国民拒毒会开会反对国民党当局变更禁绝鸦片的政策，抗议伍连德散布鸦片公卖言论。

2月6日　　蒋介石颁布豫鄂皖边区“绥靖”计划，并召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到京面授机宜。

△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电何键，略谓本行营已电令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转饬该部向恩施、鹤峰“协剿”贺龙部，望何速派所部“进剿”湘西。

△　晋军将领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庞炳勋、孙殿英、杨效欧、孙楚等通电，表示遵天津会议决议，就军、师长职。

△　据《申报》报道：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在清宣统元年官厅立案时，计有经、史、子、集四部书3236部、20.83万余卷，宋、元书464部，1.1328万卷。民国以来，颇有损失，近来聊城杨氏藏书被兵匪蹂躏后，部分运往济南，部分运往天津，部分被股匪薛传峰、王金发抢去，流失保定，已有12种被日本买去。运济部分，省教育厅提出捐出、半捐半卖及收买三项办法。与书主杨敬夫庶母交涉无结果。

△　何应钦电南京总司令部，催孙连仲部急速赴赣。

△　陕西省赈务会西路查灾委员报告，武功未埋死尸约万具，乾、郿两县共六万余具，兴平、咸阳、扶风等县未埋尸体亦颇多。

2月7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导淮委员会，原导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黄郛及委员陈其采、陈仪、陈辉德等18人均免本职；特派蒋介石为导淮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为副委员长，庄崧甫、陈其采、陈立夫、吴忠信、杨永泰等17人为导淮委员，并指定庄崧甫、陈其采、陈立夫、吴忠信、杨永泰为常委，黄郛未到任前，由庄崧甫

代理副委员长。

△　国民政府令：特派孙科为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副主任。

△　国民政府任命沈尹默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原校长李石曾免本职；任命徐炳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原校长易培基免本职。

△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林育南，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李求实，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欧阳立安，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阿刚，中国“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干部汤士伦、汤士德，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王青士，中共机要工作者李文，上海总工会沪东区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24人于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是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杀害。

△　教育部派顾树森等为整理中国公学临时委员，该校所有非法团体一律解散，前发各教员聘约停止发生效力，开学延至3月1日，所有职员另订聘约，学生入学手续另俟布告。

△　全国各实业团体在上海组织国际商会中国分会，选陈光甫、郭秉文为正副会长，林康侯为秘书长，并于13日电巴黎国际商会表示正式加入。

△　湘省公布去年全省人口调查统计，男1677.5847万人，女1324.1734万人，共3001.7581万人。

2月8日　蒋介石邀莫德惠商洽对俄方针。

△　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之首级于本月2日为罗霖师哨兵在吉安河中一木匾上捞获，7日送到南昌，是日，大殓。17日，蒋介石电赣省主席鲁涤平致唁。23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恤，按陆军上将阵亡例从优

议恤，并予公葬。

△　参谋、海军、财政、内政、实业五部会商领海界限问题，拟以沿海岸落水处三浬为原则，如遇战时中立则扩大界限。参谋部为便利巡防，提议以12浬为限，海军部仍主张三浬，会议无结果。

△　河北省磁县县长陈中岳致电蒋介石、张学良，谓本县历年受军事之苦，现石友三之第十三路军又驻本县就地征饷，“竭泽而渔”，已到“民穷财尽的绝地”，请政府速给石部发饷，令其停止就地索征，以解民众倒悬。

△　日本南满铁道社经营之抚顺煤矿发生硫磺自燃事故，矿主将洞口封闭，矿内华工3000余人丧生。

2月9日　　国民政府公布《倾销货物税法》及《民国二十年湖北省善后公债条例》；改组禁烟委员会，任命刘瑞恒、张学良、李基鸿、钟可托、罗运炎、伍连德、张树声、田雄飞、胡毓威、陈炳光、史赞铭、陈绍宽、马寅初为禁烟委员会委员。

△　国民党中央监委张继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讲演农村问题，谓“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为人民生活基础”，“故中国应以农业为主，工业为宾，为立国之本，而不应工业化”。

△　徐源泉部张振汉、徐德佐两旅会同新十一师张英部马昆山旅向华容县城猛攻，红军段德昌退往万庾、调弦一带。

△　山西善后协进会代表张策等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提出要求五点：一、晋军应照中央军编制，一律改编为国防军，开驻边境；二、实行军民分治，打破军官独裁；三、恢复中央前颁2400万元整理山西金融公债，省银行收归公有，由人民组织监督机关；四、兵工厂改为生产事业工厂，兴修同蒲路，收回正太路；五、各级学校立即复课。

△　上海邮务工会及各地邮务工会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中央拟依照《工会法》重行改组邮务工会，表示拥护原有之组织。

2月10日　国民政府公布《工厂检查法》。

△　张学良在沈阳对日本新闻记者谈：东北拥护中央及四中全会决议。西北军军费由中央负担，晋军军费由晋负担。又称：要区别对待共产党中研究学说者与搞武装暴动者，对暴动分子坚决取缔。中日东北铁道问题现状，无交涉必要。

△　张学良电复戢翼翘、商震等称，晋军应按天津会议原案迅速编遣。

△　李鸣钟、吉鸿昌、刘镇华等电请河南省主席刘峙取消附加保安费，略谓河南连年大灾，历经战事，军费征集已困难，现全省又分六区办保安团，每年在地方筹款不下数百万元，保安队经费规定由省库支给，豫省各县丁地税早超过正税数倍，“民穷财尽，劫后孑遗，何能堪此”？3月13日，河南省政府决议，取消保安附加税，以前所征者均退还。

△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会同市公安局、日租界警察署、法租界工部局在日、英、法租界及华界逮捕中共热、察、绥三特区特种委员会主席韩麟符、军事委员会北方区主席曾丕烈等30余人。16日，韩麟符等押解北平。24日，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电张学良，请对韩等“从严惩办，以绝赤色根株”。

△　红四军第十三师攻占河南光山南部新集镇。此后，新集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2月上旬　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端为军委副主席。

2月11日　张学良主持召开的北方各省财政会议闭幕。共开大会13次，各省、区、市预算案收支相抵悬殊，议无结果，其他各类决议共76案，未决各预算案另提东北政委会取决。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马晓军在上海对记者谈桂局善后，略谓桂局和平解决已告一段落，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给予考察名义出洋。部队交黄绍竑缩编，暂编警备军16团，各区设警备司令部，办理“剿共清乡”，清乡完成后，再缩编为10个团。桂局善后期间，定为三个月，军队遣散费由中央贴补。入桂之粤第八路军分两期撤离桂境，第一期由宾阳退至横县、桂平，第二期由桂平返粤。

△　教育部训令整顿北平大学，办法为：一、女子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合并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二、俄文法政学院自本年起逐年结束，不再招生，暂属北平大学；三、艺术学院照前令切实办理结束；四、女子学院自本学期起改称女子文理学院。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饬教育部在文化基金款下拨专款收购古籍文物，严禁转售外人，以保国粹。

2月12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由京抵沪，对中外记者谈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希望各国尽早确定取消领事裁判权日期，中国决心以最大努力达到此目的。

△　教育部奉行政院令规定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三校进行整顿办法：一、充实设备，减少薪资开支，以增加设备费用；二、教员不得逾部令兼课；三、学生上课的考查、试验，都要明定规则，严厉实行。

△　孙殿英派代表王实坪到沈阳向张学良报告该部缩编经过。孙部原有三军八师，四万余人，此次奉令改编为陆军第二师，统率二旅七团，另编一独立营，留三万人，孙自任师长。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召集各书店经理开会，提出严禁宣传共产主义的办法两条：一、查禁之书籍，请即烧毁；二、以后出版书籍，先送党部审核。

2月13日　国民政府会议决议：今后中央、地方一切对于人民强制之征收，无论其称为税或捐或费或他种名目，一切事业、企业或契约订定之含有专卖、独占、特许或其他特殊利益性质，无论其为官办、商办抑或华洋合办，非因执行法律而发生者，其设定及废止，均应先经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则，立法院审议内容，始得成立。

△　蒋介石、张学良联名电委高桂滋为第十一师师长。

△　晋军缩编达成协定。根据蒋介石、张学良电令，除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四个军外，孙楚部编成护路军，其体制与各军相同。警备军为三团，以荣鸿胪为警备司令，张会诏为副司令。李服膺部仍编一师，归徐永昌节制。赵承绶为“剿匪”司令，骑兵编为三个旅，归赵指挥。是日，各军长开会决议：由商、徐、杨、傅四军长及孙楚组织一军事委员会，办理晋军善后事宜。

△　山西善后协进会致函晋军各将领，质问扩增军队理由，略谓天津会议留四军八师之议已不合民意，今闻增八师为11师，在津议之外并增护路、警备、“剿匪”各司令，山西民穷财尽，巨额军费从何而筹，中央能否源源接济，晋省人民能否承担，晋善后问题能否解决，望向全省人民答复。

△　张学良召石友三面嘱速放还所扣各路局全部车辆，并定石部编为二个师，军费由东北负责发放。

△　国民党中委褚民谊对记者谈中法学术考察团行程计划：该团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李石曾与法国西托安汽车公司及法国政府代表于安订立合作办法，双方各委团长一人，团员若干人。其考察经过路线，法方用爬行汽车七辆由欧洲出发，经小亚细亚、土耳其至新疆

伊犁；中方亦用法国运来爬行汽车由天津出发，经北平、张家口、绥远、宁夏、兰州至迪化，然后与法方团员会合。因新疆边界多高山峻岭，汽车不易通过，故法人须舍车步行，越过新疆境后与中国队会合，返至北平，然后南行，经汉口、出龙州至越南，中国方面旅行团即告一段落，法方继续前进。

△　何键召第四路军驻何成濬第三军团联络参谋缪梅亭返长沙，向其传达蒋介石命令：第四路军在湘西、湘南、平、浏各驻二师“围剿”红军，其余各部策应长、岳。同日，何键电汉，欢迎萧之楚部入湘，协攻湘西红军。

2月14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伍廷飏为广西善后会办。

△　行政院令财政部保障教育经费独立，凡一向由国税指拨之教育专款，如厘金、烟酒盐诸税，在未确定抵补办法前，应指定地方国税机关照原定实数拨给。

△　湖北省十九年度财政空前困难。该省府为保证进攻红军军费，向武汉银行界借款60万元，并于15日开始发行善后公债300万元。

△　国民党北平市整顿委员会宣传科办理日报及通讯社登记，共计日报登记者26家；通讯社登记者18家，尚有九家未登记。

△　教育部令上海市教育局停闭私立南洋医学院，并商同中央大学医学院组织甄别委员会甄别该校学生。

△　中国公学临时接管委员顾树森等与该校董事商议善后问题。旋由董事长蔡元培召集全体校董会议议定：选举邵力子为校长；加推陈果夫、邵力子、潘公展、朱应鹏、吴开先为校董。3月2日，邵力子就任中国公学校长，并致词称：中国公学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而创设，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极光荣之地位，要求学生不要再闹学潮，一心一意在国民政府管理下求学。

△　晋军各将领开会，决定15日各师长返防，依天津会议实行编遣，限本月25日前完成，26日至月底由张学良派点委点验。下月起军饷由张学良发给。编余高级军官酌任各师副师长，中级军官择优委以参议、参事，其余送北平讲武堂。编余下级军官设差遣队择优用之，再余者送教导团。

2月15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组织“剿匪”宣传处，委贺衷寒为处长，下设70队，各“剿共”军每团附一队，随军前进，宣传国民党党义。28日，“剿匪”宣传处所属人员400余人离京赴赣，并调中央军校高等班学员200人、特别班学员50余人编成10个队一同入赣，分配到各师工作。

△　1日至是日止，川东禁烟查缉处重庆分处进口川、黔烟土约7.56万余两，出口约44.6万余两，重庆已成为鸦片口岸。

△　陈调元部驻六安之第四十六师两个营，在共产党员、营长魏孟贤率领下发动兵变，将该部带入鄂豫皖苏区。后编为红军独立师第三团，魏任团长。

△　驻美公使伍朝枢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判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事，美国要求在领事裁判权撤销后，中国法庭应永设外籍顾问法官，伍公使坚持外国顾问只能临时服务于法庭。

△　据《申报》报道：近半年来，华北输入海洛英价值一亿元。一般有烟癖者，均改服海洛英，因其价格较廉，烟价反落。海洛英毒素较鸦片更烈，已有五万人中毒。

2月16日　国民政府任命刘三、朱庆澜、周觉、周利生、刘成禺、萧萱、于洪起、吴忠信、高一涵、袁金铠、李梦庚、姚雨平、叶

荃、王平政、刘莪青、田炯锦、邵鸿基、高友唐、乐景涛、奇子俊、罗介夫、谢无量、郑螺生为监察院监察委员。19日，朱庆澜以“奔走陕灾，日不暇给”为辞，电辞不就。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规定“剿匪”期间审查、扣留邮电标准：一、“剿匪”计划及“剿匪”部队之详细番号；二、虚张“匪情”淆惑观听者；三、宣传共产主义及类似者；四、文字暧昧，令人可疑者；五、其他未至披露时期之军情。是日通令南京、上海、南昌、汉口各卫戍警备司令部遵照执行。

△　贺龙亲率红军5000人攻占鄂西长阳县城。守城军望风披靡，县长等官吏均逃走，县城大劣绅邓静皆等被红军捉拿，贫民欢欣鼓舞。

△　行政院决议，在《公务员任用条例》施行前，各省任用县长，要慎重遴委，每月月终将现任县长姓名呈报中央，各省民政厅不得自行任免。

△　国民政府令各党政机关旧历新年照常办公，工作人员在此期间严禁请假，商家不得停市，学校不得停课。但上海、徐州、济南、青岛、太原、北平、哈尔滨、武汉等各地仍照旧休业放假。18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昨天》的社论，指责国民党当局强令人们废除过旧历年习惯不合民意。

△　国民党中政会外交组胡汉民、王宠惠、孙科、王正廷、孔祥熙讨论对俄问题，莫德惠、李锦纶列席，决定东路、复交、通商三事交涉原则，交莫德惠作为赴俄交涉准则。

△　财政部决定自本年度起，发行新银辅币，定三个月后着手铸造。

2月17日　　陕西省赈务会报告该省灾情近况：一、凤翔县百姓死

亡9.6999万人，逃亡1.0948万人，绝户1850余户，财产损失44.3万余元；二、扶风县死亡七万余人；三、醴泉县户口减少一半，人口减少十分之七，乡村中求一耕牛亦不可得。

△　国联交通部长哈斯到达沈阳会见张学良。次日由宋子文派员迎接赴京。25日，哈斯在京与蒋介石接洽金借款事。

△　罗炳辉部红十二军进出吉安、泰和一线，拟强渡赣江，与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王懋德旅激战，南昌行营派出飞机为王旅助战。罗部退入江岸山中。

2月18日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外交部长王正廷关于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的报告，决议由外交部与英、法两国交涉，由驻美公使伍朝枢与美接洽，务求短期内解决。

△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在南京成立。20日，总事务所电令各省选举总监督积极办理代表选举事宜，限4月20日前完成，不得延误。

△　武汉行营召开“剿共”会议，通过决议案多件，大致分“剿共”、“绥靖”两类：一、“剿共”由行营统一计划，统一命令；伤亡官兵按《战时抚恤条例》实施抚恤，费用暂由鄂省府垫支；二、举办清乡，从事宣传，慎选县长；防区县长不良，得由驻军呈报行营转省府处理。并议定：张印相、葛云龙、范熙绩、范石生、夏斗寅“围剿”鄂东，刘培绪、罗启疆与川、湘驻军“搜剿”鄂西，徐德佐、萧之楚、客景芳“兜剿”襄河。

△　江苏“绥靖”督办张之江电告上海水陆军警各部，江苏分六个“绥靖”区，蒋介石已任命各分区指挥官，淮扬区梁冠英，通海区赵建勋，徐海区张华堂，宁镇区李长江，淞沪区曹滂，苏常区朱锦。所有各该“绥靖”分区之内“绥靖”部队，各军及水陆公安、警察、保安队、保卫团等队伍，均一体秉承各该“绥靖”分区指挥官指挥办理。

△　《民国日报》载：据铁道部统计，津浦、京沪两路民国十九年因内战所造成的损失总数达1500余万元。全国铁路总计损失达7200余万元。19日，交通部公布民国十九年有线电因战事所受损失共达446万余元，无线电局尚不在内。

△　国民政府美籍顾问林百克由华盛顿电请国民政府加派专员赴美洽谈美国对华贷款事。同日，林宣称，胡汉民已来电令其与美政府谈判借银1000兆盎斯，照目前银价合2.6亿美元。次日，林百克之子林百乐对记者谈，美国朝野人士均赞同借银予中国，中国政府各要人亦赞同向美借款。

△　台湾总督下令解散台湾民众党。

2月19日　内政部为整顿全国警政，将公安局改为警察局，省警务处改为厅，分咨各省、市遵行。

△　中东路理事会开会，对督办权限问题争辩甚烈。俄理事、处长均出席，华理事、处长只出席半数。俄局长鲁德意发言，称东铁督办署居监督地位，无直接命令路局各处权，前督办署招收翻译未经路局办理，应作无效。华理事争辩多时无结果。

△　陕赈会电请财政部速发行陕赈公债，并称武功灾重，全县灾民达10万以上，未埋尸骨万余具。

△　英国下院通过以300万英镑之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　第十独立旅兼湘西“剿匪”指挥戴恢垣不满何键缩减所部，是日率特务营在常德哗变。

△　徐源泉令徐继武、张振汉、韩昌峻、刘培绪、徐德佐、罗启疆及驻湘西之张英、陈渠珍等部，立即动员向鄂西红军贺龙部总攻。武汉行营派飞机两架协助。

△　行政院再次电令安徽省政府撤销皖南浙盐、皖北淮盐、鲁盐附捐及出口米粮护照税。

2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会议选举各省市事务所组织条例》。

△　太原各界80余团体3000余人，举行裁厘宣传大会，通过函请省府取消一元附加，减轻人民负担，依照中央命令实行裁厘及电告全省各县市商民停止交纳厘金及类似厘金之一切苛捐杂税等提案。

△　李鸣钟、夏斗寅、范熙绩、张印相、李云龙、朱传经、陈光组等在武汉开会，讨论豫鄂皖边区“围剿”红军实施方案，决议推选吉鸿昌为“追剿”总指挥，并即发动总攻。

△　海军部次长陈绍宽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海政与国防计划，谓建设海军之治标办法为先购巡洋舰、潜水舰，治本则须建设60万吨之各类型军舰。另在胶州湾、象山港、大鹏湾建设军港。

△　国民政府特任茹欲立为审计部部长，审计院撤销。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京开考古成绩展览会，展出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及山东历城等处之出土文物。

2月22日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由港抵沪，对记者谈，考试院现拟对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省所举行的各种考试录取人员加以复核，及格者给予文凭，北京政府时期之各种考试及格人员不能承认。

△　第十四师师长陈诚、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由汉到京向蒋介石请示“围剿”红军机宜，蒋令罗师日内由岳阳、华容一带向萍乡开拔，陈师分驻武昌、咸宁一带。

△　民生改进研究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工人生活、工人教育、小型工业、近代工业、劳动福利等议题，28日闭幕。

△　武汉航运局调查十九年度进入汉口中外商轮情况，华轮不及外轮五分之一，仅英轮装载吨数即超过华轮一倍多。

2月23日　莫德惠定24日离京赴沈阳，是日在京招待新闻记者，略谓：中央对俄方针已定，即将赴俄继续交涉，俄方只要尊重1919、1920年对华宣言精神及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各条，会议进行自能顺利。

△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通令各部队切实遵照执行《剿匪会议决议案》。湘、鄂、赣各“围剿”红军部队经蒋介石批准提前发给薪饷，财政部本月补助各军48万元。

△　华北水利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委员大会，决议：一、筹备建筑永定河上游水库工程；二、计划筑永定河上游拦河坝；三、研究规划箭杆河、蓟运河整理工程；四、计划大清河流域洼地排水工程；五、完成苏庄顺水坝；六、完成堵筑马厂新河决口工程；七、筹筑灌溉试验场；八、测勘黄河上中游地质、地形、水文等。

2月24日　国民党中训部通令各省、市各级党部在3月底以前，将农会一律组织成立。

△　李鸣钟通令鄂豫皖边所属各部队，谓红军集结六安之麻埠一带，应切实联络，严加防范，并调吉鸿昌、张印相两部精锐“追剿”，令葛云龙、赵观涛、李云杰、岳维峻等部加强信阳、广水与花园一带联防。

2月25日　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整委会呈请中央严厉取缔国家主义派，速将国家主义派重要分子北平教育局局长王捷侠撤惩。

△　蒋介石在总司令部召见孙连仲部首批入赣部队营、团以上军官训话，并分别犒赏大洋。

△　交通部电饬平、津两电报局，自本月26日起，收回平、津、

大沽间借给外商大东、大北两公司的陆线、水线电报局。

△　国民政府民食委员会讨论各省粮食登记办法，决议咨请财政部固定税则委员会厘定外米入口税率，并按县组织法于各县设立粮食管理局。

△　教育部公布《华侨教育会暂行规程》，规定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督指导下组织华侨教育会，于本国首都设总会，国内外各重要地点设分会。

△　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航业界联合成立哈尔滨官商航业联合局，推选东北军海军司令沈鸿烈为董事长。

△　晋军杨效欧部驻潞安第四师师长王弼因不满编遣，率部哗变。变兵将城内大小150余家商店掠劫一空。

2月26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文化团体组织大纲实施细则》，凡15条，是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遵照。

2月27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有四川各军归刘湘全权编遣；撤销刘湘、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赖心辉、郭汝栋、杨森、胡若愚、刘文辉、李家钰、孙震等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名义。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原四川省府委员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任鸿隽、刘湘、田颂尧、黄复生、吕超、熊骅、卢仲琳均免本职，田颂尧、邓锡侯、任鸿隽、向传义分别免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兼职；任命刘文辉、郭昌明、向传义、张铮、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嵇祖佑、林耀辉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刘兼省府主席及民政厅长，郭、向、张分别兼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命周大文为北平市长，原市长张荫梧免本职，周

未到任前，由青岛市长胡若愚兼代。

△　国民政府令：训令行政、司法两院，对已核准被赦之政治犯，为防其“脱离法网后仍趋反动”，除由核准机关呈报其隶属之上级机关备案外，并须摘录案情连同犯人相片，呈报中央备案。

△　财政部拟定海关检查华洋轮船办法，分全国为八区：一、大连、牛庄、天津、安东、烟台、青岛；二、哈尔滨；三、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四、汉口、宜昌、重庆、沙市；五、南京、芜湖、九江；六、厦门、温州、汕头；七、广州三角洲；八、九龙。每年增加经费30万两。

△　山西省政府电国民党中央称，该省连年荒歉，今又大军云集，粮秣供给，搜罗俱穷，衣薄天寒，死亡载道，请急施赈济。

△　国联交通部长哈斯访交通部长王伯群。王对哈斯谈，今后中国将本着国际平等原则收回航权。其办法为，外商在中国领海、内河之航运公司由中国出价收买，或由中国出资暂时合营，但名称、主权由中国支配，外股定期还清。哈斯表示愿向国际宣传。

2月28日　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问题矛盾激化，蒋极力坚持在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制定“训政时期之约法”，胡则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议及“约法”。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指许崇智）、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宁粤分裂自此开始。

△　国民政府任命张静江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曾养甫为副委员长；任命熊崇志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原驻墨公使李禄超免本职。

△　第五路军总指挥、湘鄂赣三省“剿匪”边防督办王金钰率军部人员入赣，督署设南昌，并通电就督办职。王部郭华宗第四十三师及

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已到达赣西集结待命。

△　全国商会联合会分电行政院、外交部、财政部、实业部及对俄交涉全权代表莫德惠，请向俄严重交涉，要求以俄从前在华发行的卢布赎回中东铁路。

△　青海省政府代表王廷瑞在南京对报界报告该省状况，谓自冯玉祥部退出该省后，马麒代理省主席，其部队1.5万余人，全省每年收入只150万元，不敷军政各费甚巨，大规模建设更无从筹措。

△　陈济棠、林森、陈耀垣同轮抵香港，林森、陈耀垣直接乘该轮往菲律宾，视察海外党务。

△　国民政府令：刘镇华、蒋光鼐晋给一等宝鼎勋章。

3月

3月1日　　全国铁路商业运输会议在南京开幕，铁道部长孙科主持并致词，略谓："自铁部成立以来，因财政困难，不但新的建设未有设施，即原有建设，亦无法维护"，"国有各路所负债额因金涨关系，将达十万万元以上"，"整理方法，首在恢复运输力量"。7日，会议闭幕，共通过决议案160余件。

△　闽西肃"社会民主党"。是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县虎冈开大会，宣判红十二军第一〇〇团政治委员林海汀等17名"社会民主党党魁党员"，次日枪决。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30余名，有近半数作为"社党"分子被处决。9月，执掌肃反大权滥捕滥杀的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林一株亦被他人供成"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书记"，被处决。原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被诬为"社民党领袖"，中共闽西特委派兵围攻其家乡上杭县第四区，傅拥兵自卫取胜。在肃社党深入开展后，一些被怀疑、受追捕的"社党"分子纷纷来投，上杭县第

四区遂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巢穴”。闽西“社民党”肃反，共杀6200人，党、政、军大批骨干被捕杀，革命元气大伤，战争节节失利，闽西苏区由原来48个区，急剧减少为22个区。

△　中国航空公司派机作沪平线试航。该公司有飞机五架，每架可坐六人，另载邮件400磅。6日，试航圆满成功。

△　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被委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

△　湘鄂赣三省“剿匪”边防督办、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及第十四师师长陈诚在南昌行营向何应钦报告三省红军状况及“围剿”计划。王部第四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已达修水、铜鼓及赣西安福、萍乡、永新一带。同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从广州启程赴赣督师进攻红军。

△　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派张振汉旅进攻藕池红军段德昌部，徐继武、韩昌峻两旅进攻白露湖红军。

△　美公使詹森及英公使蓝普森抵南京，是日分别会晤外交部长王正廷，商洽法权问题。

△　河南赈委会主席张钫电《申报》转济生会、红十字会等，陈述河南连年战事浩劫，豫西洛阳等20余县粮食断绝，死者不计其数，陇海沿线赴开封乞食者日必数千，原筹经费已尽，务恳速拨款粮急赈。

△　中国语言文字学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之宗旨在于研究中国语言及文字之种类问题，研究政府公布的国语罗马文字，提倡上海、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兴化、厦门、汕头、广州客家及其他处之罗马字为注音之用，并提倡广用注音符号。

3月2日　　国民党中常会开临时会议，出席者为丁惟汾、叶楚伧、朱培德、于右任、戴季陶、孙科、蒋介石，在京中央委员均列

席，通过蒋介石等12人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并推吴敬恒、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蔡元培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会议以胡汉民反对在国民会议上制定约法，决议免去胡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本兼各职，选任林森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林森未回国前，由邵代理院长。

△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约法”问题，略谓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是“中华民国能否确保和平统一、永免战祸之唯一关键”。胡汉民“身负党国重任”，对制定“约法”“独持异议”，“不顾本党与国民全体之公意，在中央未有具体决议以前，徒凭个人见解，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之言论”，“重贻党国无穷之祸患”。但念胡“曾著劳绩”，准胡“称病辞职”，以求“公私两全”。

△　红四军邝继勋部二万余人进攻平汉路南段孝感、广水等地，在柳林站与李家寨站间，歼灭袁英之新编第十二师一部，击毙旅长侯镇华，缴获大量军用物资。5日，红军攻占柳林车站，歼灭新编第十二师一个营，击溃两个团。

△　安徽怀远船民反对省府规定之米照捐，是日结队向该地稽查处请愿，要求放还被扣米船。稽查处开枪打伤船民二人。3日，蚌埠工商航民千余人游行，向驻军第四十五师师长卫立煌请愿，要求主持公道。同日，蚌埠商会暨36个同业公会致电国民政府，控诉安徽省当局苛征米捐罪行，谓沿淮一带，扣留民船千余只，交通遭阻，两万余劳工生活陷于绝境。

△　福州商业研究所召集联席会议，讨论营业税税额问题，认为省府所规定之税额太苛，不适商情，商行应拒绝认纳，决议派代表携带该省所颁营业税条例进京请愿。

△　晋军各将领为解决晋军编遣问题，派代表景耀月再去沈阳向

张学良请示。是日，景在北平谈，晋境有兵20万，该省难以负担，数十将领自动请求“剿共”，若征调湘、赣、鄂，将唯命是听。

△　陈渠珍师顾家齐部与红军贺龙部在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之铁榈冲激战，红军击毙顾部排长二人，士兵数十人。李觉师一部急从鹤峰走马坪前往援救。贺部因兵力悬殊，撤往峦河。

△　国联财政经济部长苏尔德应国民政府之邀来华调查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是日抵沪。

3月3日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偕参谋长赵博生等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入赣机宜。5日，蒋在总司令部召集孙部入赣营以上军官训话，交待进攻红军的手段和方法，并派人对孙部官兵分发赏洋。9日，孙率指挥部全体人员离京赴赣，骑兵师长关树人随行。

△　上海各界设宴招待朱庆澜，当即成立筹募陕灾急赈会，推许世英、张群、朱庆澜、虞洽卿、唐绍仪、钱永铭等85人为委员，募捐期定一个月，即席认定特捐共1万元。

△　张学良委戢翼翘、富占魁为晋军正、副点验委员长。戢点验晋北及绥远各驻军，富点验晋南及正太线各驻军；另委朱力宇为炮兵点验主任，彭振国为骑兵点验主任。

△　开封行营主任刘峙电令新编第十二师师长袁英同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妥为部署，严密防范红军袭击信阳。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令袁英师猛攻平汉路李家寨红军。

△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各省、市商会，鉴于裁厘后改办营业税，各省政府所颁营业税征收条例与商情不符，为核议品类税率妥筹办法，各省、市商会应组织营业税研究委员会。

△　东北大学改行委员制，张学良任委员长，臧式毅等任委员，副校长刘风竹辞职。

△　上海光陆大戏院试映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故事片《歌女红牡丹》，15日起在新光大戏院公映。为中国最早有声片之一。

3月4日　　蒋介石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并报告胡汉民辞职经过，略谓“约法问题，为本党与中国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胡汉民主张“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中央各同志对此甚为不满”，“余对汉民之主张，事事皆可迁就，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胡“称病辞职”，此乃胡“个人政见关系”，也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希望大家“谅解”，“不致以个人感情，而牵涉整个政治”。

△　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奉武汉行营令率部向红四军发动进攻。8日，岳部在孝感双桥镇与红军激战，至次日，红军集中兵力分三路进攻，岳部弹尽粮绝，大部被歼，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被俘，红军缴获枪6000余支，迫击炮10门，山炮四门。岳维峻被押解红安七里坪。1932年8月11日被红安苏维埃政府处死。

△　东北交通委员会代表邹恩元在京对中央社记者谈，中日南满铁路交涉应根据两原则：一、日本在我国已得利益，不论合法与否，均应声明放弃；二、经济性质问题不应涉及政治范围。6日，中日南满铁路交涉重开谈判，日本木村理事与中国东北交通委员长高纪毅在北宁路局驻沈办事处正式接谈，决定先组专门委员会。

△　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由沪抵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谈判中日宁、汉两案中国赔款问题，议定汉案赔款30万元，宁案赔款75万元。

△　上海市商会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请迅令皖省撤销米照捐，并严惩蚌埠稽征主任宗缄之等。5日，上海各同业公会税则委员会通电全国各地商会，揭露宗缄之等苛征米捐，公然开枪残杀徒手请愿商民的罪行，望全国一致声援蚌埠商民。

△　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北新、联合、江南、群众四个书局代售

华兴书局出版的左翼作家刊物，将该四书局封闭。

3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增选张景惠、刘尚清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圈定蔡廷锴、谢仪仲、余汉谋、冯天如、陆匡文为广东省党部第四届监察委员。

△　甘肃省政府代主席马鸿宾通电全国，报告该省灾区蔓延几十县，春耕在即，籽粒无出，吁请全国各界赈济种籽。

△　戴季陶、孙科往汤山看望胡汉民，陈济棠电胡表示慰问。

△　山东省政府明令恢复济南市政府，委派闻承烈为市长。

△　国联财政经济部长苏尔德来华调查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是日抵南京。

3月6日　　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召集所部师长商编遣事宜，决定留编七个师，且多起用唐继尧旧部，各师长甚为愤慨。11日，第九十八师师长卢汉、第九十九师师长朱旭、第一〇〇师师长张凤春、第一〇一师师长张冲各带特务连离省城赴宜良开会，临行时将龙云委任的总参谋长孙渡一同带走。12日，卢汉等四师长通电，表示坚决严惩现居要职的唐继尧余孽孙渡、禁烟局长马为麟、民政厅长张维翰等，并表示拥护龙云。13日，卢汉等四师长回省城，给孙渡滇币2.1万元，将其送往河口，并令其出洋。唐之旧部一一辞职。16日，龙云回省府主政。22日，蒋介石电卢汉、朱旭等师长，令其遵中央令实行编遣，同时电龙云，令其将编遣情况报告中央，并勉其安心处理省政。

△　徐源泉部张振汉旅攻陷红军根据地湖北石首县城，贺龙率部退往湘边。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训令上海市商会称，各同业公会不得自行召集代表大会；本市商界联合先后组织的行规维护委员会及营业税税则研究委员会等，在法律上均无依据，应立即纠正。

△　招商局“新昌”轮由大连运豆饼三万担行至吴淞口北马鞍山群岛附近遇雾触礁沉没。

3月7日　　戴季陶、邵元冲、刘芦隐、陈立夫在立法院会商胡汉民事，决定由戴、邵二人赴汤山迎胡回京。同日，南京卫戍司令通知各报，不得登载胡发表的任何文字。

△　古应芬由广州电国民政府请辞文官长职，并表示俟病愈后即出洋。

△　国民政府任命魏子京为驻秘鲁全权公使，张履鳌为驻智利全权公使。

△　江西红军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议定“分散密布，坚壁清野”的反“围剿”计划，其要点为：撤离东固、龙冈，红五、红八等军分别开往宁都、兴国、永丰、宜黄、乐安等处山中，红九、红十两军分别进入万安、遂川一带策应，红十二、红二十两军进入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一带，红二十二军及第五、第六、第九各纵队进入永新、宁冈、莲花与攸县、醴陵联络，各部必须避实就虚，乘机进攻，分散密布，随时变动，使敌无可捉摸，难以防范。各军均限于10日晨向指定地点进发。

△　皖省公民救省请愿团赴监察院控告皖省主席陈调元违抗中央裁厘命令，苛征捐税，枪杀人命；擅开烟禁，勒税自肥；玩匪纵兵掠劫等祸皖事实，请依法弹劾。

△　红军贺龙部万余人反攻石首，战斗激烈。徐源泉急调大军前往救援，红军撤出战斗。

△　海军部次长陈绍宽偕“海容”舰长及美国工程师，前往浙江象山视察建筑海军学校基础工程。

△　上年底因经营亏损停业之上海厚生纱厂，日商意欲收买，是

日上海市社会局令禁该厂售与日方。10月，该厂由申新公司收买，改称申新六厂。

3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解释胡汉民辞职原因，谓胡“积劳多病，不胜繁剧，固其一因，同时因关于国民会议之约法起草问题，胡同志之讨论与中央同志相殊，愤而辞职”，“中央经再三郑重考虑之后”，“准其辞职”，以明“中央对制定约法之决心”。

△　胡汉民由汤山回南京寓所。门前贴有“遵医生嘱须静养，凡来访宾客概不接见”的启事。

△　西康总商会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报告康、藏边境情况，谓藏方于本月2日（有说上月25日）占觉母寺，刘文辉以无中央明令，不发一兵一卒，康民现处水深火热之中，渴思拯救。20日，行政院电令四川省府主席刘文辉对康、藏纠纷应妥慎办理，无论战衅肇自何方，均应切劝停止军事行动。

△　奉命入赣“围剿”红军之第五、第六、第十九、第二十六各路军共14个师，约20万人，布防就绪，刘和鼎驻建宁，路孝忱驻头陂，孙连仲驻东韶，郝梦龄驻沙溪，郭华宗驻东固，蔡廷锴驻兴国，王金钰、公秉藩驻富田。

△　班禅率随从者百余人由乌珠穆沁赴热河，转沈阳讲经授礼。班禅在乌旗贝子庙半年来受顶礼者孝敬礼达数十万元。班禅将金块存于北平六国饭店。

△　北平《华北日报》编辑部、印刷部被自称国家主义派的数十名青年捣毁。10日，北平报界公会通电全国，请报界一致声援《华北日报》。同日，于学忠因《华北日报》事件推迟去沈阳，促平军警当局将肇事者缉拿严办。15日，张学良复电《华北日报》称，已令北平公安局暨卫戍司令于学忠严行查办肇事者。

△　山西省府电国民政府称，该省鸦片、金丹料面等毒品盛行，政府所颁禁烟法对犯者处罚太轻，若不加重治罚，实无救济良策，请准该省制定单行法，对贩卖、制造毒品较重者处死刑。

3月9日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讲演，略谓胡汉民“因为政见不合引退辞职，乃是一件极普通极平常的事，用不着奇异”。胡辞职后行动是否自由，这亦“不是什么重大问题”，“党员个人的行动，谁也不能自由的”，胡亦曾说过此话。胡“因为避嫌止谤，打算此后长住南京”。胡“病源由来甚久”，“故亦非短时间所能痊愈”。

△　国民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凡七条，即日实行。

△　约法起草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约法起草范围及原则，认为人民权利、义务及训政纲领，均属必要，决定列入约法之内。推王宠惠、邵力子、邵元冲三人先拟初稿。限两星期完成。

△　何成濬电何键，请令李觉、张英两师迅出湘西，与徐源泉师“会剿”红军贺龙部；并电海军派“犀王”舰巡弋监利一带，严防贺龙部返回洪湖。

△　上海大达商业银行开业。

△　中共中央主办之《红旗周报》在上海创刊。

3月10日　陆海空军讨逆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主祭。于右任、王宠惠、蒋介石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致词。蒋称自北伐以来六年中死亡士兵达30余万，上年阎、冯叛变及“剿共”死亡官长2480人，士兵3.4453万人，伤者七万余人，抚恤费已发2200余万元。同日，北平、上海、武汉、济南、太原、吉林、广州、徐州、石家庄等地同时举行追悼会。

△　王正廷与驻华英公使蓝普森商谈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王表

示中国方面主张坚决撤废领事裁判权，不能只解决枝枝节节而留后患，深望各关系国早日实行放弃。英使表示待政府训令后再谈。

△　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刊《群众日报》，31日，改名《每日时报》。

3月11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设立警察总监，直隶于行政院，总揽全国警务，首都警察厅移归其管辖。14日，国民政府特任吴铁城为警察总监。

△　红四军全部撤离平汉路南段柳林站。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开抵广水一带警备。平汉路恢复通车。同日，安徽霍丘县叶家集苏维埃工农政府及南河渡红军学校均被萧部捣毁。

△　孙连仲到达南昌，何应钦、鲁涤平立即召开“围剿”红军会议，议定待孙部全部到达前线后，对江西红军第二次“围剿”即行开始。

△　河北省财政特派员荆有岩到南京向宋子文报告华北八省财政会议情形，称“华北因情况特殊，对中央裁厘制度，事实上难以施行，请予暂时便利”。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年江浙丝业公债条例》，发行额600万元，年息八厘，3月10日起发行，七年六个月内分期还本。

△　大达轮船公司“大吉”轮由沪开往扬州，行至天生港，有士兵数十人登船，强行进入装有硝磺的货仓，在仓内喧哗吸烟，拒人干涉。该轮行至张横港附近之龙驹沙地方，硝磺货仓起火，全轮被焚，死亡旅客150余人，船员70余人，失踪多人，损失20余万元。23日上海航业公会就“大吉”轮事件电蒋介石、张学良，请令各军队凡乘商轮，必须遵守乘轮规章，倘酿灾祸，严责该管长官负责赔偿。

3月12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驻华代使重光葵会商法权问题，

重光提出大纲：一、治外法权为渐进撤废；二、以开放内地承认日人在内地杂居权及土地商租作为交换条件。王正廷主张无条件撤废，决不能承认渐进主义。

△　李文范自香港电国民政府请辞立法院秘书长职。

△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抵赣州，并决在赣州设立“剿共”总指挥部。

3月13日　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员会在南昌成立，以何应钦为委员长，鲁涤平为副委员长，孙连仲、王金钰等为委员。

△　哈尔滨航业界推代表王理堂等九人赴中东路督办公署向莫德惠面递请愿书，要求莫在中俄会议上拒绝俄方交换航线提议；与俄订立黑龙江、乌苏里江共管协议，不让俄国独占；并要求俄方赔偿1929年中俄事变中俄方扣留商轮损失445.5366万元。

3月14日　蒋介石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其要旨为：一、孙连仲部入赣“剿共”，此去定可奏效；二、晋省兵多财困，晋善后办妥，则西北自安，顾祝同师下月入甘，政府今后定以全力建设西北；三、国民会议不展期，在开会之前，本人不离京。

△　何应钦召集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员会委员开会，何主张对赣省灾民以工代赈。同日，江西省府决议：吉安、吉水、永丰、兴国、泰和、宁都、乐安之间的东固，万山丛杂，交通不便，将驱灾民修筑吉安至东固公路，以利“进剿”红军。

△　福建南日岛警务局长邱振杰以捉拿匪徒为名，派警兵包围该岛欢度元宵的群众，无故将一群众打死，激起公愤，岛民手持枪械，将该局重重围困，警务局警职人员59人全部被打死。

3月16日　新任捷克驻华公使费哲尔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国联交通部长哈斯及工程专家鲁克希由导淮委员会设计主任汪胡桢陪同视察淮河。

△　上海航业公司“长江号”轮由海防驶沪，在闽瓯海面北渔山触礁沉没，14人死亡，损失百万元以上。

△　空军第六队由周宝衡率领飞赣，奉令助攻红军。同日，驻长沙空军飞行第四队派两分队飞往武汉，协攻鄂豫皖苏区红军。

△　陈济棠在广州第八路军总部召开特别军事会议，讨论桂省局势及派兵入赣等问题，各师长均列席。

△　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率该部猛攻乐安，红军顽强抵抗后撤向永丰方面。

△　《文艺新闻》周刊在上海创刊。为“左联”创办之综合性文艺周刊，由楼适夷、袁殊等编辑。

3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所派晋军点验委员殷祖绳等20余人抵太原。同日，戢翼翘谈：晋军有机枪1000余挺，炮兵共10团，炮360门；晋军现有兵10余万，宋哲元、庞炳勋、孙楚部达四万余人，晋绥宪兵共12营；兵工厂原来每月开支百万元，全厂机械均系造枪炮及子弹、炮弹，改工业厂不可能，须与总部商讨方能解决。

△　湖北省政府根据徐源泉建议，令各县统一警团指挥，与军队合作“围剿”红军。

△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自北平抵南京，谈判中荷法权问题。欧登科称，如各国均愿解决在华法权，荷政府亦愿放弃在华各地领事裁判权。

△　中央国医馆在南京开成立会，各省、市著名中医代表200余人出席，陈郁主持。会议推王宠惠、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

△　上海钱业公会以现行《银行法》窒碍难行，特通告国内各埠同业，希望一致向国民政府请愿，另订钱庄法。

3月18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所提修改现行出口税则草案原则；决定发行民国二十年短期关税库券8000万元，以补民国十九年度收入之不足。蒋介石就该案发言称："全国现有收入每年4.1亿元，支出5.5亿元，不敷1.4亿元，唯有裁减军费，俾达收支相等，此项公债发行后，不能再发行任何公债。"

△　国民政府决定将英、俄庚款余额三分之一作兴办水利及电气事业之用，其中导淮40%，为3360万元；黄河水利、广东治河、电气事业各20%，各为1680万元。

3月19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推戴季陶、刘芦隐、邵元冲、邵力子起草国民会议组织法；通过《各级党部党务工作考核办法》；废止《各级党部党务工作考核条例》；改派张学良、朱光沐、邢士廉等七人为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万福麟、王宪章、王秉钧等七人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张作相、熙洽、石九龄等七人为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张景惠、邹尚友、臧启芳等五人为哈尔滨市党务特派员；推丁惟汾为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加派张学铭为天津党务整委，于学忠为北平党务整委，王树常、马愚忱、何玉芳为河北省党务整委。

△　全国国煤产销联合会电铁道部称：自行政院通令提倡国煤后，该部曾登报标购国煤，但近却购进日煤，切望该部能言行如一，不使利权外溢。

△　《哈尔滨日报》因刊登宣传苏联方面的消息，被市特警处查封。

△　陕西省赈务会主席康寄遥在上海对各报记者谈陕灾情况，谓陕省灾民死亡已达200余万人，尸体遍野，无人掩埋，四中全会通过发行赈陕灾公债800万元，至今未办，望报界给予声援，督促政府办

理。

△　黄绍竑到广州，与陈济棠、陈铭枢商谈广西善后问题。

△　广东英文《新报》在广州创刊。

3月20日　国民政府会议决议：一、修正通过西北学术考察团计划大纲，决定由政府令饬各学术机关遴派专门人员组织西北学术考察团，规定路线，考察西北地质、生物、人种各项学术，以四年为期；二、内政、教育、实业、铨叙等部及考选委员会各派一人，行政院、考试院各派二人，赴日本考察各项行政及考选、铨叙诸制度，4月上旬首途，为期40日；三、各盐业自本年4月1日起，每担加征附税三角，专充偿还外债之用。

△　全国商会联合会分别电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湖北省水利局，陈述长江一带“堤堰日增，农人与水争地，江形由碗变碟”，望即派员沿江详加勘测，早日疏通淤塞，以利民生。

△　四川奉节县长唐家仲电沪蜀商公益会乞赈，谓该县“民生凋敝，已达极点”，“绝食户口，不下20万”，“四乡贫民无可觅食于原野，甚至草头、麻根、蔗茎、树皮采食一空，甚有掘食白沙泥名曰观音土者”，急请赈救。

△　张作相因张学良即将赴北平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办公，是日回沈阳坐镇。

3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特种考试法》。

△　立法院通过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自由买卖；盐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设立、采制；产盐场区及年产量由政府限定；食盐每100公斤征税五元；中央设盐政署及稽核总所，各地各场设公署及分所，掌管一切。

△　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视察鲁北各地后是日返济南，韩称各县法警仍为旧日衙门，涉讼者被勒索不敢言，县府及法院积压案件有过数月不一讯者；沾化县党部直接审案、罚款，致惹地方恶感。

△　宋哲元部张自忠旅一部在山西绛县哗变，商号数百家被掠抢。

△　石友三之第十三路军铁甲车四个大队奉张学良令是日由顺德（今邢台市）开往沈阳改编。

△　上年10月3日法商“大广东”轮船主殴毙华工蔡裕钦案是日在汕头市政府签约解决，法方允惩凶、道歉、赔恤死者1.05万元。

△　中共中央代表夏曦指示改编红二军团为第三军，仍以贺龙为军长。

3月22日　　蒋介石发表题为《总统产生与革命环境关系》的谈话，声称“国民会议中只应制定约法，不必而且不应提出总统问题”。“外界传说本人要在国民会议里面提出总统问题，自己要做总统，实行独裁，这种谣言实在太没有意义”。

△　蒋介石令夏斗寅、钱大钧分担武汉防务，夏负责警备区，钱负责要塞区。

△　韩复榘第三路军、马鸿逵第十五路军及王均第七师、陈耀汉第二十六师奉命会同围剿临城悍匪孙美松部。是日，各部分别出发。

△　安徽旅沪同乡会等团体在沪开联合大会，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撤惩纵兵抢劫及惨杀怀远米商的陈调元，并明令皖省府从速取消盐米附捐，退还非法征收的盐米捐款，拨充六安急赈。又通过请中央严究皖省巧立机关抽收烟税案。27日，安徽省府会议决议，撤销轮船、帆船米照稽查总、分各处。

△　何键电蒋介石，陈述湘省财政特殊困难，至2月底已积欠170余万元，第四路军军饷已欠七个月之久，无法发清，请中央每月就特税款项下拨30万元作“剿共”部队临时经费。

3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凡21条，规定省府委员七至九人，省府主席及委员不得兼任他省行政职务，省府设秘书处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必要时得增设实业厅及其他专管机关。

△　“剿匪”宣传处赴赣宣传队队长蒋坚忍在京向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训部主任周佛海报告该队宣传工作近况，据谈入赣军队共有16个师，近20万人，现已集中完毕，待令总攻。25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为大规模进攻红军，特组第二“剿匪”宣传处，内定蒋坚忍为处长，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宣传。

△　蒋介石电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以该师在吉安附近进攻红军有功，特呈国府颁给二等宝鼎勋章一枚，并赏给该师及罗霖之第七十七师各一万元。

△　西藏达赖代表棍却仲尼由北平赴南京，商洽西藏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事宜。

△　徐源泉部会同张英师向华容红军段德昌部发动总攻。24日，陷华容县城，段德昌部退往东山、桃花山一带。

△　西康全民援甘促进会通电称，藏军又大举侵入甘孜，残害汉民，袭击汉军，请中央派兵讨伐。

3月24日　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青海省添设共和、亹源（今门源回族自治县）、同仁、互助、民和、玉树、都兰七县。28日，国民政府令准。

△　蒋介石通令全国各军、师，今后对“匪共”一律改称“赤匪”，

一利宣传，二利军事。

△　驻汉口之军政部航空署飞机第一、四两队，联合飞往罗山侦察红军活动，45号与44号两机在黄冈县团风上空互撞。44号坠地焚毁，两驾驶员死亡。45号亦坠毁，驾驶员幸免。

△　蒙古各盟旗驻京联合办事处呈蒙藏委员会转呈中央通知约法起草委员会，请在起草约法时，注意扶植国内“弱小民族”，使其能自决自治；蒙古地方以旗为自治单位，盟为旗与中央的联络机关；开发蒙古土地及各项利源时，应先保障蒙民生计安全；中央应指拨专款协助蒙古兴办教育、文化事业。

△　外交部据英公使蓝普森照会称，中英庚款分配方案已于3月3日经英女皇批准，并即日生效。

3月25日　蒋介石令各军总指挥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务将各地红军彻底消灭。同日，蒋再令各部队，拿获红军者发奖金；藏匿红军不报者与“匪”同罪。

△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俄、英、意庚款余额使用办法，决议：一、将俄款三分之二、意款三分之二的一部分用以完成陇海铁路修筑工程；二、将英款利息、俄款余额中每年提500万元现款担保发行1000万元之教育、文化建设公债；三、将未经确定用途的俄款三分之一及意款三分之一作为首都建设经费发行公债还本付息之基金；四、拨款开发石油、金、铜、煤四矿。同日，中政会核准撤销中日文化协定。

△　晋军第六军军长杨爱源在北平对记者谈，晋、绥两省全年收入总数仅1700余万元，而开支总数则有3600余万元；专就军费一项而言，每月不足之数即达130万元以上。

△　国联财政经济部长苏尔德在南京讲演世界金银问题，谓当今

因金不流通，如各国尽用金本位，金价将愈贵，故中国不必用金本位。

△　福建省政府决议发行公路公债800万元，以公路盈利及丁粮附加税为担保，于募集后第六年起分10年偿还。

△　河北、福建两省电政管理局、天津电报局遵交通部令将大东、大北两公司借线及报房并鼓浪屿支局一并收回接管。

3月27日　　南昌行营下达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总攻击令，限各部4月1日开始攻击前进。各路军均已调集完毕。第五路军王金钰部第二十八师、四十三师、四十七师、五十四师、七十七师分别集中于永丰、吉安、吉水、泰和。第六路军朱绍良部第八师、二十四师分别集中于康都、瑶湖，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集中于安远，新编第十三师路孝忱部集中于南丰、抚州、黎川。第十九路军蒋光鼐部除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防守赣南外，均集中于兴国附近地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分别集中于宜黄、乐安，骑兵一师集中于樟树，独立第四旅周志群部集中于宁化，独立第三十二旅卢兴邦部由闽西向长汀进发，第五十五师阮肇昌部及第四师之汤恩伯旅分布于浮梁、万年、贵浮、铅山、玉山间。鲁涤平部第十八师朱耀华旅及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分布于武宁、修水、上高、万载间。第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分布于清江、峡江、新淦间。第六十二师香翰屏部向粤赣边蕉岭进发。

△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组成，中央代表夏曦任书记。

△　国民党中政会财政、经济两组联席会决议：茶、木、瓷器、纸张、丝绸及毛皮等特种消费税税率最高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各省特税局一般设立于省府所在地，特殊情况可以设立于物资集中地点。

△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事务所电各省解释出席代表选举程序，略谓：国民党代表选举不用造送册籍，不必经过审定公告之手续，由

党部在党内办理。各省代表，必须按中央提出的候选人选出半数或过半数，余者方能自由选举。凡中央指名的，即使票数不够半数，也须当选。

△　新任巴西驻华公使魏洛索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3月28日　　行政院令湘、鄂、赣、闽、皖、豫、浙省府在本年8月1日前将保卫团组织完成。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裁厘之后，在中央未规定办法以前，应即通令各省、市不得自由抽税。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管理英国退还庚款董事会章程》；派朱家骅、叶恭绰、王家桢、陈其采、李书华、黄汉梁、程振钧、曾熔甫、宋子良、曾养甫、马锡尔、卜隆贺耐、端纳、康德利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指定朱家骅为董事长。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民国二十年关税短期库券条例》，该库券定额为8000万元，月息八厘，自4月1日发行，分100个月还清本息。

△　国民政府公布《北平实业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及《银行法》。

△　国民政府明令豁免鱼税、渔业税。

△　军政部次长俞飞鹏由前线返南昌，对记者谈：进攻江西苏区各部均伐木烧山前进，崇仁、宜黄、乐安、永丰、雩都、兴国的红军，均退往广昌、瑞金、会昌等地。

△　中苏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莫德惠等一行32人应苏方代表团团长加拉罕电邀赴俄参加中苏正式会议，是日，莫等一行抵达莫斯科。

△　石友三由沈阳到天津，据谈1月份军饷40万元已领到，此后按月由平汉路协助40万元，东北助20万元。该部共编三个甲种师，13个团，另有三个独立团，石自兼任一师长，另两师长为米文和、孙光前。遣汰万余人。

3月29日　班禅派代表罗桑囊嘉自内蒙乌珠穆沁旗到京，向国民政府各机关呈送信件、公文，接洽班禅进京事。是日罗桑招待报界记者50余人，报告中央和西藏历来关系，并望国人一致注意，以固边陲。

△　日军第三十三联队在沈阳西十里码头野操，适与追捕土匪的华警相遇，日兵借口妨碍演习，出动大队包围马路湾华警所，强缴枪械13支，子弹253发。后经多方交涉，始将枪械退还。

3月30日　山西钞价暴跌，社会极为不安。省府主席商震为安定人心，决定将每日收回中签晋钞分批焚毁，并于是日在中山公园将2、3两月陆续收回中签的晋钞250万元焚毁。

△　国民政府特派蔡元培、戴季陶、吴敬恒、李石曾、陈布雷、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朱家骅、秉志、傅斯年、杨铨、钱昌照、徐炳昶为西陲学术考察团理事会理事，并指定蔡元培为理事长。

△　广西善后督办黄绍竑派代表陈适向蒋介石报告在港、粤与粤、桂将领交换意见结果，是日陈抵南京并对记者谈，谓李宗仁、张发奎等对中央收拾桂局办法并无异议，惟白崇禧尚无积极表示，且有成见。

△　柯维喇出任澳门第112任总督。

△　中国航空公司沪宜（宜昌）线正式通航。每周二、四、六由沪飞宜，一、三、五由宜飞沪。

3月31日　第四路军总部令陶广、陈光中、王东原等各师长督饬

所部联合进攻平江、浏阳、铜鼓、万载等处红军孔荷宠部。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所设战史编辑委员会组织就绪，朱培德、葛敬恩分任正、副委员长，陈绍宽、杨杰、陈辉、毛思诚、俞飞鹏、邵力子等13人为常委，钱卓伦等22人为委员。定一年后完成北伐以来的战史。

△　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暨省府各委员电国民政府称，鲁省迭经兵灾，孔庙残破，拟请中央拨助10万元。4月17日，国民政府会议核准通过。18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省府决议组织修复孔庙筹备会，推韩复榘为会长。并请戴季陶起草捐款书，电请全国要人、名流为赞助人。25日，戴季陶、蔡元培、邵力子、宋子文、丁惟汾、何应钦、刘纪文、张作相、李石曾、何成濬、于学忠、刘镇华、张钫、孔祥熙、王金钰、陈调元等38人联名通电各方募捐修复曲阜孔林。

△　日本联合舰队大小军舰64艘由山本司令率领抵达青岛。6月3日，该舰队离青岛开往大连，沿途练习夜战。

是月　台共领导高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

4月

4月1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各项特种消费税税率。家蚕干茧、竹、桐油、纸、药材、生漆、麻、干果均抽5％；木材、茶叶、皮裘、鞭炮等抽10％；锡箔抽25％；野蚕干茧、棉花、豆、芝麻、花生均抽4％。

△　何应钦奉蒋介石命率部队20余万人，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围剿”，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逼。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之第二十五师及二十七师分左右两路从宜黄、乐安出动，向东韶、小布（今小浦）进攻。同日，

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率区寿年、张炎、刘占雄部向宁都进攻。

△　第三飞机队在广州成立，陈济棠兼任队长。陈宣誓就职后，举行广州空军总检阅，50余架飞机参加检阅。

△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陈昌浩，由上海启程赴鄂豫皖苏区。14日，到达黄安七里坪，旋即布置红四军以一部兵力肃清苏区顾敬之团匪，打通商城至光山的联系，主力准备截断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配合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　张学铭就任天津市市长。同日，天津卫戍司令部成立，王树常任司令。

△　驻汉口日海军打靶击伤农民倪照美。4日，倪伤重死亡。汉口市政府向驻汉日领事提出抗议，又经外交视察员周泽春向日领事严重交涉，6日，日方允惩凶、抚恤、道歉。

△　上海闸北福昌泰等40余家丝厂全体女工因上年丝业不振，工资只发八五折，现丝价已恢复，要求发放原工资，厂方不允，午后相率罢工。3日，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布告称，此次丝厂罢工，其中不无捣乱分子居间煽动，除严加究办外，限令即日复工，静候核办。各丝厂工人被迫即日复工。

△　克莱格抵达香港，就香港币制问题进行调查。

4月2日　　何应钦在南昌行营召集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开会，议定对红军“剿抚兼施”，限令各县成立保卫团；通过《处理附乱人民办法》及《邻右连坐暂行办法》，并通令各县长切实执行。

△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增设农工科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学中添设职业科或职业科目，县立初中应附设或改设乡村师范及职业科，各职业学校应增加经费充实设备。同

日，教育部又令，为减少实业部选派专门人材赴各国工厂实习，今后改派留学生毕业后赴各该留学国著名工厂实习一、二、三年，如机械、化学、电气、冶炼、纺织等选择一种，回国致以实用，留学理工科学生尤应注重实际，各省、市教育厅、局将该省留学欧美学生人数及经费，拟定留欧美毕业生实习规程，一同呈报教育部统一安排。

△　蒙藏委员会讨论阻止英国远东探险家在新疆边域用飞机测量我国地形案，决议要求外交部查明事实后送行政院核办。

△　东北屯垦督办邹作华抵南京，向蒋介石面述东北垦务计划，略谓本人办理垦务已两年，垦地30余万亩，惟垦荒三年后方能获利，而兴安区煤、铁、金及石油等矿甚富，遂改变计划，从事开矿，对开荒则听其自然，现日产煤500吨，金矿正聘欧美矿师进一步测查。15日，邹乘大来公司“亚当号”轮船离沪赴欧美考察各国农业情况。

△　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为扩充势力范围，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令该部向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陈书农师进攻。6日，刘湘部将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等县占领。四川省府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保定同学关系，允陈书农驻防安岳。刘湘遂令所部停止前进，自此，二刘防地直接接触。

△　交通部据上海、宜昌等航业公会呈报，去年航业所受战事损失为663万余元。又据福建、广州、三江等地航业公会呈报，去年亦因战事共损失1078万余元。

4月3日　　国民政府以前曾明令限于本年1月1日裁撤厘金，另办特种消费税，现恐此项新税沿袭积弊，成为变相厘金，是日下令宣告免于举办。同日又令：各省政府尚有对裁厘命令阳奉阴违，或巧立名目擅自征收各项类似厘金之捐税情事，应责成监察院派员实地查明，呈候惩处。

△　何应钦再令在赣各路军务于本月内攻下被红军占领各县，会

师广昌，在国民会议前，将朱德、毛泽东各部肃清。

△　内政部、教育部规定4月4日为儿童节。

△　山东省府决议呈请国民政府饬铁道部及建设委员会从速修建道（河南道口）济（济南）铁路。

△　吉林省设立修建吉林至同江铁路筹备处。该路完全省办，准备5月间动工，工期预定五年，需费2500万元，先筹500万元。

4月4日　　贺龙率红三军攻占巴东，渡长江进攻秭归、兴山、远安、荆门、当阳，图解洪湖苏区之围。

4月5日　　国民政府令总税务司通告上海、汉口、九江、天津、芜湖、山海关、闽、浙、粤、潮、汕头各海关税务司，转令各该地50里内常关于文到之日即停征税，办理结束。所有赔款担保部分俟出口新税则公布后，一律转于出口税收。

△　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吴贞缵、省整委张苇村、民政厅长李树椿等组成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将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隆真等22人判处死刑，是日邓等在济南被杀害。

△　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茶陵赤卫队总指挥刘鸿陵被俘后解往长沙，是日何键下令将刘杀害。

△　亚洲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高丽、印度、暹罗、安南、缅甸均有代表参加。中国代表黄绍美任主席团主席，并致开会词，称：该会最近的任务是“宣扬亚洲文化，发展亚洲文化”。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电复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同意“剿共”军事由行营主持，准第三军团总部逐渐结束。12日，第三军团总部正式宣告结束。

△　晋军将领孙楚、周玳、杨耀芳、冯鹏翥、傅作义离太原赴沈阳，向张学良报告各部编遣经过。

△　欧亚航空公司两架飞机抵北平，该公司营运组主任李景枞对记者谈，满洲里站因气候严寒，山地多，中俄战事留下的战壕亦未平，飞行危险殊多，俟公司筹备周全后航期方能确定。将来俄国邮件运满站后，改装俄机运往莫斯科，再改装俄、德合办飞机运往柏林。

△　绰号“太保阿书”的太湖匪首徐正明，率众2000余人，横行江、浙两省长达四年之久，是日在上海被江苏水上公安队密探捕获。16日，徐正明及其弟徐福元经江苏绥靖督办署判处死刑，押往松江附近之张堰镇斩首。

4月6日　　中苏会议苏方代表加拉罕在莫斯科对莫德惠谈，中苏正式会议宜先议复交问题，再议通商、东路两项。

△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对记者发表取缔新闻纸意见，称武汉居全国中心，目前武汉小报之刊行，通讯社之成立，犹如雨后春笋，论说纷纭，影响社会治安，行营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取缔一般小报。

△　浙江舟山群岛沈家门渔栈公所、渔业公会具呈国民政府称，日本200余艘渔轮侵入我国领海大肆捕捞，以上海为其销售市场，横行于江、浙海面，在嵊山、海礁、佘山、鳓鱼山、洋安、将军帽等处撕毁我国渔具，儿戏我国人命，以致渔场破产，渔民生计无着，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并明令禁止日轮捕鱼。

△　日本“丰浦丸”轮在长江不遵守航规，将我国由汉口开往上海的“江裕”轮在安庆下游50里处江龙礁附近撞坏，日轮肇祸后，开足马力驶向上游逃去。

△　上海市煤业同业公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会议讨论并收回1910年2月19日英国商人墨林及比墨公司用欺诈手段

攫取的我国开平矿务局全部产业。

△　中国边疆学会在南京成立，并决定在上海、北平两地设立分会。该会由巴黎大学教授盛中及杨质夫、李卓、蒋唯心筹备，后有蒙古、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各省区驻京要人参加。该会宗旨在于研究边务，促进开发边疆。

4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告海内外党部，略谓按本党总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应于本年4月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近因召开国民会议，本党亦要选代表出席，两会不能同时兼顾，特依据总章同条第二项规定，通告展期，俟国民会议完成后再筹办。

△　行政院决议铁路增加运费办法：道清、胶济两路客货票均增加20％，南浔路客货票增加15％，湘鄂路客货票增加10％，平汉、津浦、平绥、陇海四路客票不加价，货票均增加15％，北宁、正太、广九、广韶四路客货票均不加价。自5月1日起实行。

△　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及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一旅攻占富田，原驻富田之红军退往东固。同日，第四十三师郭华宗部攻占丁江。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攻占藤田。

△　闽保安队总指挥罗介人率陈荣光、陈德隆两支队进攻永定县城，在龙安寨与红军张鼎丞部激战一昼夜。8日，永定县城被保安队占领。

△　上海海味业长和行职员忻海珊路经法租界永安街普安里口，突被法捕房西捕开枪击伤，行凶西捕肇事后企图逃走，被过路群众将其领章号码摘下送交法捕房，忻被送往同济医院抢救。28日，上海各界各业190余团体之代表580多人举行大会，愤怒谴责法捕罪行，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自动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即日收回全国各租界，并电外交部要求向法方交涉。5月29日，该案解决，法租界当局赔偿忻受伤损失费1000元及全部药费，并向中国政府作口头道歉，将

凶手革职惩办。

△　陈诚奉蒋介石令任第十八军军长，节制第十一、十四两师及炮兵、攻城两旅，是日在武昌成立司令部。

△　湖南省府通令各县，省银行为活动市面，于4月1日起特发行辅助币券50万元。

△　考察我国西北之中法学术考察团中国方面团长褚民谊到达北平，法方团长卜安已先期到平。该团使用的法方汽车未经检查，擅自行动，不听褚指挥，北平学术界对此极为不满，要求褚对法方交涉妥后方可出发。

4月8日　　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董事长朱家骅报告称：英退庚款分两部分：一、积存部分，自民国十一年底至本年3月止，共存344.2731万镑；二、未到期部分，自本年4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35）12月止，应存770.9638万镑，该款原作教育费用，因建设铁道，极关重要，乃决定以三分之二借充建筑铁道，三分之一借作水利电气之用，但借用机关须给年息五厘。董事会决议，所有英庚款全数存入中央银行。

△　辽宁外交协会通过赎回中东路案决议：一、电莫德惠在中苏会议上力争赎回中东路；二、通电全国并电各国声明赎路理由；三、对苏联政府及民众发表宣言，请苏联根据1919年及1920年宣言交还中东路。

△　豫、皖、鄂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奉命移设潢川，是日督办李鸣钟率该署全体人员离汉赴潢川。李临行时谈，抵潢川布置就绪，即下令总攻，限5月5日前肃清三省边区红军。

△　宜昌警备司令部为防红军贺龙部从巴东东下，在宜昌上游三游洞派兵检查到宜各商轮。美商轮“宜宾号”行至该地，与检查士兵发

生武装冲突，“宜宾”轮伤三人，检查士兵伤25人。后经驻宜美军炮舰舰长比比少波与宜昌警备司令郭彝之交涉，是日双方议定各自处理善后。

△　山东省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自济南赴泗水督师围剿蒙山抱犊崮孙美松等股匪。16日，韩复榘由枣庄赴峄县，令各部对孙美松股匪于18日发动总攻。次日，韩亲赴滕县指挥。

4月9日　　何应钦电令江西各县县长：限令到之日起，有红军活动之瑞金、宁都等32县，在三个月内招集流亡，办理善后，组织保卫团，包括清查户口，办理连坐，训练团丁；其余各县限两个月内将保卫团组织完毕，不得托故因循。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将以最严密之审核调查，厉行奖惩。如期完成者，确保其任期三年；逾期无成绩者，立即撤惩；渎职者，加罪不赦。

△　何应钦飞赴吉安视察，与王金钰商议进攻红军办法后当日返回南昌。何对记者谈，中央军采取“步步为营，沿途清剿”办法，已有显著进展，富田已收复，广昌指日可下。

△　褚民谊率中法学术考察团中国方面团员自北平前往沙河视察，发现考察团所用汽车均只悬法国国旗，无中国国旗。褚返平后即向法方交涉，并表示如无结果，则取消原订合作成议。11日，褚再向法方交涉，要求考察团行动路线，应遵照华方所定地点前进，运输汽车应加中国国旗，并拒绝汽车上装置手提机枪。

4月10日　　国民党中执会通电各级党部称，国民会议将“确立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遵守之约法”，“此种约法为中国整个民族生存所寄，关系至为重要”，“望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尽量发抒意见”。

△　行政院令实业、财政、铁道三部会商孔祥熙所提拟开发西北金、煤、铜、石油之具体办法。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将陈耀汉第四十师改为第五十八师，刘茂恩第六十师改为第六十四师，张钫第六十八师改为第七十六师，冯钦哉第七十一师改为第四十二师，刘夷旅改为独立第三十二旅，唐云山旅改为独立第三十三旅，罗启疆旅改为独立第三十四旅。

△　国民党中央监委张继电国民政府，报告秦皇岛黑暗达于极点，日本兵横行无忌，包运“白面”，官府无法制止，商民强烈要求政府帮助解除痛苦，务望外交部向日方早日交涉，撤走该地日兵。

△　财政部令中央银行就财政发展需要，先在各省会所在地建立分行，然后再推及各县成立支行或兑换所；并令各国税机关，凡有款项应随时存入中央银行，否则以违抗命令论。

4月11日　蒋介石在浙江省党部对党政官员训话，略谓浙江近来财政极为困难，浙省当务之急是清丈土地，调查户口，如能限期丈清土地，必能增加税收二三倍，经济有办法，则一切迎刃而解。13日，蒋向浙省党部各执委垂询该省党务情况。随后在党部纪念周演说，要党、政共同努力，发扬民族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16日，蒋到浙江大学训话，要求学生应立志自强、守纪律、有秩序、培养德性品行。并向学生推荐戴季陶著《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

△　立法院审查通过《宪兵条例草案》，该案规定宪兵直属军政部，主任军事警察，兼任行政与司法警察；首都设中央宪兵司令部，置一中将司令，统辖全国宪兵。

△　中苏正式会议在莫斯科开第三次会议，莫德惠依中央制定方针提出先讨论中东路赎路问题。俄方代表加拉罕亦提出大纲，定21日继续开会讨论。

△　班禅到达沈阳。

△　据上海《民国日报》载：自中国新关税实施以来，日、英、

美等各国陆续将其国内之工厂移设于中国，自本年2月以来，日本在华新设工厂达500余所，沿长江一带即有375所，资本达日金7000万元。美、英各国亦相继进行大规模转移，各种金属、橡胶、纺织工业，均相继派员来华在租界内觅地建厂，英国在香港新设厂24所，在上海新建18所，长江沿线为数颇多。

4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举行“清党”四周年纪念，戴季陶演讲，声称“清共要努力建设”，“深信在三民主义领导下，共产党不能在中国立足”。同日，上海、天津、北平、青岛、武汉、济南、徐州、太原等地党部分别举行“清党”纪念活动。

△　商震、杨爱源、徐永昌联名通电各军、师、旅部，公布发饷办法：自本月起，除伙食费外，每月另给各官兵发现洋，“中将100元，少将70元，上校50元，中校30元，少校20元，上尉10元，中尉7元，少尉5元，准尉4元，上士3元，中士2元，下士1.7元，上等兵1.5元，一等兵1.2元，二等兵l元，夫役8角”。

△　武汉行营遵蒋介石命令，通令各部队对随从红军的群众一律称“匪奴”。

△　梁漱溟对记者谈：准备在山东设立村治学院，现正着手创设及筹备招生，鲁省府拨邹平县为试验区，并允月给经费一两万元。

△　《现代文学评论》创刊号在上海出版，由现代书局发行。

4月13日　刘纪文在中央党部报告视察山东党务情况，谓该省现有党员5400人，全省108县已有14县成立党部，69县正在整理，其余各县均在筹备中。

△　管理英庚款董事会开会，决定即日成立购料委员会，准铁道部先直接向购料委员会购办第一批材料，规定款项在50万镑之内。

△　军政部航空第五队中校分队长伍兴鉴及驾驶员荆树庄在南昌

驾机出发赣东前线侦察红军活动，起飞后当即坠落，机毁人亡。

4月14日　　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一、增加江、浙丝业公债额200万元；二、实业部拟呈工厂检查人员养成所规则草案及最低工资法草案，送立法院审议。

△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令各级党部严行查禁自称“中华民国国民会议国民自决会”刊行之《国民自决》刊物，指称该刊内容“纯以破坏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会议为目标”。

△　毛炳文师占领广昌。红军退往白水镇、头陂一带。

△　湖南省政府通过民国二十年度收支预算，总计收入为1412.3714万元，支出为1712.3714万元，收支相抵差300万元，决定发行300万元公债弥补。

△　据《申报》载：实业部调查各省、市工人总数，根据已报数字，全国共有工人114.4396万人。

4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各省征收营业税大纲及财政部所订补充办法原则，并决定在营业税法未颁行以前，已办营业税之各省，暂照财政部已核准者办理。

△　山西各界裁厘宣传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誓死反对晋军再征500万粮秣巨款。同日，省党部及裁厘会电请省府和中央严厉制止此项非法特捐。16日，裁厘会紧急会议决议，通电各县政府不应奉非法之晋察绥总司令部征收粮秣之命，再向人民肆意勒索，并函省政府立即制止，又函教育厅令各学校派学生到社会上向群众讲演。

△　财政部咨各省、市政府，解释征收营业税办法五原则：一、凡厂或公司已纳统税或其他捐税者；二、凡未营盐业已由中央征收盐税者；三、凡未营烟酒业已由中央征收烟酒牌照税者；四、凡交易所由中央征收交易税者，以上四者，各省均不得再抽营业税。但各营业

商店仍须交营业税。五、凡营业证应贴用印花税票，资本在500元以下者，每证一角，资本在500元以上者，每证五角。

△　日本渔轮潜侵江、浙海岸案，外交部向日代使重光葵照会请饬令日渔轮退走，日政府反派员来华交涉，要求维持，我国政府除严拒外，即令海关自5月1日起，令在华一切外国渔轮概行退出我国海岸。

4月16日　考试院公布第一届高等考试种类及报名、考试日期。种类分为：一、普通行政人员考试；二、外交官领事官考试；三、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四、财务行政人员考试；五、警察行政人员考试。6月15日至7月5日为报名日期，7月15日开始举行考试。

△　驻德国公使蒋作宾在苏联考察历时一月后，是日离莫斯科回国。5月1日，蒋抵上海，对记者谈考察苏联观感，谓苏之五年经济计划，确足惊人，其举国上下一致之奋斗精神，尤为可贵。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将所产货物以极廉价向外国销售，以购取各种机械改进国内生产，预料数年中成效定为可观。

△　王宠惠对《大公报》记者谈“约法”重点，谓“约法”与“国民直接有关者莫过于权利与义务、国民经济、国民教育三章。不求发展国民经济，人民无法生存。不振兴教育，人民知识难以提高。余全部精神，皆贯注于此”。

△　英国新任驻华海军舰队总司令凯莱中将抵沪。

△　财政部特派员荆有岩离天津赴沈阳，向张学良报告晋军编遣费事并商冀特税问题。荆临行前对记者谈：自华北裁厘后，冀政费正赖特税稍资弥补，若不停征，则违中央法令，若停征，则冀省今后政费无着。

4月17日　何应钦代表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布告

称：“政府此次剿赤，早具消灭决心，赤匪一日不灭，大军则一日不他调”，希望地方人士努力协助。

△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开第一次扩大会，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中央局委员。同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地方武装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游击战术。并通令设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　张学良离沈阳赴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18日，抵平，驻顺承王府。20日，张对记者谈晋军饷问题，略谓本人在沈与晋各将领已议有成案，愿再与商震谈洽后，再正式决定。张又谈东北铁路运价悬案，中日双方正在商谈，近因日本内阁改组而停顿。21日，商震奉张之召抵平报告晋省财政、军政现状。称晋省每年收入1600万元，军费支出3120万元，政费800万元，收入不敷二千三四百万，今后新税开征亦仅一二百万元，要求张帮助解决。

△　吴铁城视察东北党务完毕，是日从沈阳抵北平。

4月18日　　国民政府派张群为国民会议代表招待处主任，邵力子、陈布雷等54人为国民会议代表招待处招待员。24日，特派叶楚伧办理国民会议秘书处筹备事宜；派程天放为国民会议秘书处主任秘书；派吴思豫为国民会议警卫处警卫长。

△　导淮委员会常委会议决议，先拨款1000万元开办第一期重要工程。

△　开滦煤矿公司因积欠北宁路运费150余万元延不付还，双方争执不下，各界主张收回该矿矿权之呼声日高。近来井陉、门头沟等地之煤运往天津甚多，开滦煤矿已陷于困境。是日，该矿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自19日起，将赵各庄、林西、马家沟等矿区一律停工四个月，意在使数万工人失业，引起纷扰，以迫北宁路屈服。

△　上海公共租界捕房西探长罗炳生率队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破获共产党地下机关及宣传品发行处，抄出宣传小册、传单共50万份。逮捕共产党员22人，其中女性三人，当即押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　教育部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每年春季举行民众业余体育运动会，项目为田径、国术、游泳、球类等。

△　巴金长篇小说《激流》在上海《时报》开始连载。1933年1月改名《家》，由开明书店出版。

4月19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自奉化返南京，王正廷向蒋报告法权问题交涉情况。

△　何成濬分令李鸣钟、徐源泉、王金钰各自负责肃清所辖区域内之红军。同日，何成濬电令张英、李觉、彭位仁三师长，限一星期内将桃花山一带的红军段德昌部肃清。

4月20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谈中央银行概况，略谓该行于民国十七年政府集资2000万元，同年11月正式开幕，当时上海各行均拒收中央银行钞票，经向各行存入五万元方许。民国十七年资产总数4700万元，民国十八年达8700万元，民国十九年已有1.24亿元。至本年3月资产总额已超过二亿元。此纯由政府极力扩张，中行除普通业务外，凡政府所有银行事务概由中行办理。今后五年内，中行资产可增至20亿元。

△　外交部电驻西班牙代办王麟阁，正式承认西班牙新政府。

△　红军贺龙部进攻湖北荆门县后重返远安县，是日武汉行营再令徐源泉率部切实“围剿”，凡擒获贺龙者赏洋10万元。

△　全国航空会议在南京开幕，军政部次长曹浩森主席，蒋介石出席并致训词。24日，会议决议：一、扩充并创设完备之航空学校，筹备航空大学；二、选派航空员生赴外国留学，在国内各著名大学增

设航空工科，普及中小学学生航空知识，设立航空研究所，试验国产航空材料；三、筹备设立大规模航空飞机制造厂，利用外国资本、人才制造飞机；四、发行航空公债5000万元，每月拨出陆军军费的十分之三扩充航空；五、请政府扩充航空经费，实行航空救国。25日，会议闭幕，并发表宣言，提出从速扩充空军、配备航空设备、培养航空人才等发展航空计划十条。

△　程天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视察河南省党务情况，略谓该省各县党部对中央所规定下级党部应做之社会事业及各种运动做得极少，党部离开民众，没有民众做后盾。一般党员思想、行动仍以共产党与改组派的理论为指导，认为斗争就是革命，不斗争就是不革命，认为革命是有阶级性的，对本党的宗旨不甚明了。该省贫困原因有二，一是过去军阀盘踞横征暴敛；一是人民保守性太重，生产退化。

△　韩复榘令各军追剿抱犊崮匪，各军均由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统一指挥。时谷师唐尧迅旅在崮西，马鸿逵师马腾蛟旅在崮北及崮东北，陈耀汉师在崮东南，王均师李文彬旅在崮西南。郭马峰、尹士贵、尹士喜、马景岱、张黑脸、孙美松各股匪共3000余人。22日，韩复榘电令剿匪各军，凡捕得土匪首领者赏洋5000元。23日，韩复榘再电令各军，“获匪一律枪毙，通匪杀勿赦”。

△　上海市中华国货维持会召集工商代表大会讨论阻止外人来华开设工厂办法，决议：一、发表宣言；二、继续电请国民政府制止；三、扩大宣传；四、出货出品须注明“华商”字样。

△　绥远省府主席李培基向张学良报告绥省近况：该省每年收入400余万元，裁厘后仅剩200余万元，消费税未征收，又减收60万元，绥省地瘠民贫，每感兵多之苦，该省驻军有骑兵赵承绶、郭凤山、孙长胜三旅，步兵王靖国、傅作义两师，宪兵袁庆曾部三营。

△　铁道部派工程师凌鸿勋会同陕省派员查勘灵宝至潼关、西安一带路线，预定本年6月由灵宝开工，10月初旬灵宝至潼关段可通车，两年路轨铺至西安，其经费由俄庚款发行公债。

△　华文与西班牙文《东方月刊》在秘鲁利马创刊，创办人陈汉荣。

4月21日　广西善后督办黄绍竑之参谋长陈适向蒋介石报告桂省情况，并述黄准备编遣李宗仁、白崇禧等桂军之计划，请蒋拨经费数百万元。蒋允诺，促黄速先就督办职。

△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在南京成立，选李仪祉为会长，李书田为副会长，张自立为总干事，茅以升等为董事。

△　哈尔滨市因防范共产党，全市实行戒严。同日，南满铁路日军守备队第三大队借口防备共产党，开入长春。

△　北平各界首领在外交大楼欢宴张学良。张继讲演，称张学良年轻有为，对国家贡献很多，帮助蒋介石完成统一，尤为可佩，可与唐朝李世民相比，但“不望张为李之做皇帝”，而望张“为现代青年领导者”，维护和平统一，巩固边防。

△　中苏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赎路问题，苏方主张先议建筑原价，后谈赎路方式，再将结果交东铁组织专委会讨论。莫德惠对该案驳复后，提出暂行管理东铁办法，双方讨论甚久，仍无结果。

4月22日　国民党中央规定庆祝国民会议办法：一、5月5日由各地高级党部召集各该地机关、团体开庆祝会；二、全国各地于5月5日一律悬旗志庆；三、各报于5月5日一律加刊国民会议文字；四、国民会议期间，各级党部要扩大庆祝宣传。

△　宋子文宣布，中央银行奉中央之令于本年5月1日起发行关金兑换券，以谋进口商在沪或他埠缴纳关税之便利。

△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令各级党部，为提倡国货，各机关及在政府服务人员所需物品，应以采用国货为原则，由主管长官提倡督促之，以引起人民注重国货之观念；如无国货可资采用者，方得酌用外货。

△　教育部因香港54所私立中学编制、设备、师资多与国内现行法令不符，课程标准尤多不合，令广东教育厅通告香港私立学校向香港政府注册外，并应依照私立学校规程向该厅立案。

△　上海筹募陕灾临时急赈会接西安华北慈联会电告赈济陕灾情况，略谓郿县（今眉县）散赈已结束，每家仅得一元。该县原有11.8万人，现仅存6.3万余人，不赈能生者，只有一万五六千人，余者不赈不能活命。目下仍久旱不雨，岐山、扶风、兴平三县最近外逃者三万余人，死亡者约五万，卖去妇女1.6万有余，凤翔灾民投井、跳岩、服毒自尽及饿死者共9.6714万人，逃亡贱卖者一万余人，20余万灾民渴求救济。

△　武汉行营调军图围红军贺龙部于远安、当阳县境。范石生部驻宜都、荆门、南漳、保康一线，徐源泉部驻江陵及当阳一线，郭勋部驻宜都、宜昌一线，王陵基部驻兴山、巴东、秭归及竹山一线。红三军主力向鄂西北转移。

4月23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分别与挪威公使欧伯、荷兰公使欧登科签订中挪、中荷撤销领事裁判权协定草案。

△　交通部令：自5月15日起，天津、北平、南京、宜昌、安庆、杭州、宁波、芜湖、定海、青岛、南昌、重庆、万县、烟台、长沙15处电台开放国际电报。

△　蒋介石电令武汉行营，升任第四十八师旅长张振汉为第四十一师师长，张师由该旅原有部队扩编。

△　上海市政府为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设有婚姻介绍所，致函法总领事柯格霖要求迅予查禁。

△　欧亚航空公司“欧亚三号”飞机运载英、法、德邮件飞抵上海。

4月24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凡28条。该法规定国民会议由各省、市之职业团体、中国国民党及蒙古、西藏、海外华侨所选出的代表组织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均得出席会议；设代表资格审查、提案审查及特别审查三委员会；国民会议之决议案由国民政府分别办理。

△　张学良召集副司令行营全体职员训话，谓本人不在北平时，行营工作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同日，张在私邸接见欧美记者，谓此来平专为组织行营，将来沈阳设办公处，北平设办事处，本人三分之二时间住沈阳，其余时间分住北平、南京。

△　韩复榘、王均、陈耀汉及马鸿逵部先后占领抱犊崮，各部奉韩复榘之令，凡山内匪区村庄全被焚烧，山林同被焚毁，被捕土匪，多被当场杀戮。所有山洞及险要路径亦全部破坏，以防土匪重来盘踞。5月4日，各剿匪部队均撤回原防，该地善后交由民团总指挥王万清办理。

△　《申报》报道：湖北全省清乡局建立完毕。全省设一总局，318区分局，何成濬为总局局长，吴醒亚为副局长。

△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务委员会委员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后，私滞汉口，是日因叛徒指认被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逮捕。次日，顾叛变，供出所知驻汉各机关，并愿带领特务赴沪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同日，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顾叛变的情报，迅即赴沪报告。中共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采取紧急应变措施，转移了顾顺章所知道的

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

△　教育部聘褚民谊为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

4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民国二十年江浙丝业公债条例》，定额800万元，年息八厘，4月15日发行，每半年抽签还本付息一次，共七年六个月全部付清。

△　监察院监委周利生、高一涵、王平政等弹劾安徽省府主席陈调元擅用兵力，强行勒征米盐捐税，打死航商，公开贩卖鸦片。是日，陈调元电蒋介石申辩其被弹劾各节并非事实。27日，监察院将该弹劾案公布。

△　广东连日大雨，东、西、北三江潦水同时暴涨，东江沿岸各乡均成泽国，潦水漫进石龙市，马路水深数尺。惠州（今惠阳）城厢内外一片汪洋，居民死亡甚众。

△　北平、天津各报近日刊载石友三部有异动行为。是日，石友三通电辟谣称："我部均仍在防地照常训练，绝无丝毫动作，既归副座指挥，敬当服从到底。"

△　"左联"机关刊《前哨》在上海秘密创刊，由鲁迅、茅盾、夏衍等编辑。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鲁迅以L.S笔名撰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纪念被杀害的"左联"五烈士。自第2期起改名《文学导报》。

4月26日　　鲁涤平到达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赣省最近"剿共"情况，称"剿共"军齐集广昌、宁都，正联络由湘入萍乡、万载之各军联合对红军实行大包围。第十八师以三个团驻扎省城，会同韩德勤部警卫旅担任省区防务，余者派往万载、永丰等处协同各军进攻东固之红军。

△　参加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之航空第三队进驻吉安，

原驻南昌之航空第五队进驻樟树。此后每日派出飞机一架次或两架次在红军占领区域进行侦察或轰炸。

△　胡祖玉师进攻头陂，红军顽强抵抗后撤退。同日，毛炳文师以两旅之众猛攻白水镇，与红军激战，该镇终为毛师所占领。

△　西藏驻京办事处成立。该处总代表为棍却仲尼。

△　上海东南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由张澹如、李静涵、徐寄庼、林康侯等集资一百万元创建。

4月27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改派陈果夫、刘纪文、林焕庭、黄为材、赵棣华、蒋介石、何应钦、王柏龄、熊斌、傅焕光、夏光宇为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委员，刘纪文为主席；中央政治学校增设乡村教育系；通过《党员犯罪加重处刑暂行办法》，凡犯“内乱罪”、“外患罪”、“侵占罪”、“贿赂罪”、“诈欺取财罪”之其中之一者，加重本刑三分之一。

△　曾养甫在中央党部报告视察湘、鄂两省党务情况，谓两省党务有很大进展，但还存有两点错误：“一、在党言党，不顾民众；二、只知责备他人，不知检查自己。”

△　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文辉、田颂尧、张铮、邓锡侯等宣誓就职。省府主席刘文辉演讲今后施政纲领：一、肃清盗匪；二、整饬吏治；三、统一财政；四、促进自治。

△　武汉行营通电湘、鄂、川各军称，红军贺龙部现偷渡长江占领兴山、秭归、远安等地，令各军分追合围，并悬赏10万元生擒贺龙。

4月28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电国联秘书处，谓奉蒋介石令，决定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统筹规划全国一切经济建设事宜，拟请国联各专门组为顾问，派干员来华协助委员会工作。

△　行政院决议：通过内政部转呈河南省府主席刘峙汇呈上年蒋、阎、冯大战中飞机掷弹伤民众共1891人，请给抚恤费，平均每人以30元计，共需5.67万余元案。令财政部照数筹拨。

△　吉鸿昌等部攻占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湖北黄安七里坪。5月6日，蒋介石电令武汉行营拨款三万元犒赏攻占七里坪之吉鸿昌、张印相、葛云龙三师，并电令湖北省府速派员前往办理善后。

△　张学良在北平接见晋、绥各军将领，对晋、绥善后提三办法：一、各军自动实行裁减，俾达收支适合；二、晋、绥驻军太多，拟请中央调开一部；三、晋、绥裁厘后，收入甚微，拟整税收，维持现状，核发各军军费。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刘桂堂、张诚德等部，5月份起均按新规定发饷，每月需140万元，由冀、察两省筹给；晋、绥军费月短百余万元，俟赴京与蒋介石磋商后解决。晋军每人每月比东北军少军饷一元。

△　福建省政府全体委员因该省旧税裁撤，新税难办，财政已无办法，联名电国民政府辞职。5月3日，国民政府复电慰留，劝其“同心共济，共度危难”。

△　教育部颁布《乡村小学充实儿童学额办法》及《繁盛都市推广小学教育办法》，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遵行。

4月29日　张学良离北平赴天津，次日自津飞京出席国民代表会议。

△　中苏会议召开第五次会议，仍讨论东铁赎路问题。苏联代表加拉罕提出：一、中国赎路是否用外资；二、赎路用何种货币；三、赎路分期付款年限；四、筑路费估计方法。莫德惠表示此数问题待请示中央后再行答复。

△　原中共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杀

害。

△　庞炳勋在北平对记者谈，与张学良两度商谈驻晋各军编遣结果，庞部及孙殿英部均按新编制各编一师，宋哲元部编两师，宋、孙两部因编遣困难，张允孙部多编两团，宋部多编四团，三四个月后再缩编。庞、宋、孙三部自5月起由东北发饷，士兵5.7元，军官照东北军六至七成发。

△　旅沪全皖公会以陈调元对监察院弹劾案饰词强辩，是日再电国民政府，陈述陈在皖拒不撤厘、加兵勒征、枪杀船户、征收烟税、发售烟照等，俱属事实，务请依监察院弹劾案立即将陈撤职惩办。

4月30日　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于广州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电中胪列蒋介石违法叛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养兵自重、“剿共”不力、包庇宋子文侵食烟赌款项、操纵金融、鬻官卖缺、滥发公债、起用群丑、迫害功臣等累累罪行，请“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对蒋介石给予严厉处分。

△　国民政府通电各省、市政府，国民会议凡属政府方面之报告、建议及提案，应全部由国民政府提出，各院、部、会及地方政府不得自由提案，以重政治责任及行政之系统；如有建议，应送政府核审，然后由本府提出。

△　商震与银行团代表在北平签订晋军编遣费200万元借款合同，月息1.1分，六个月还清。

△　印刷局职工代表呈文张学良力争邮票印刷权。

是月　国民政府决定，今后外国军舰来华，在吴淞口停泊。

5月

5月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及《首都建设案》，张学良列席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北方治安负完全责任。

△　古应芬电吴铁城，谓自蒋介石拘禁胡汉民事件发生后，“凡党人悉愤慨”，若蒋立即能将胡恢复自由，“则众怒可平，南方即可安定”，望吴转告蒋“能以民命为重，不事穷兵，当能纳弟最后之一言”。

△　汪精卫通电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略谓蒋介石祸党祸国，“暴横日甚，言之痛心”，现广东方面奋起讨蒋，“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

△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略谓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弹劾本人，而手续不合，似别有作用。本人对此电决不计较，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

△　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宣布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中央委员除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等八人外，又补充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三人。随后，重新调整了红四军的领导：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曾中生；所辖各师为：第十师师长刘英、政委康荣生；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三；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委陈奇。蔡申熙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　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以梁干乔、区芳为首的“我们的话”、以刘仁静、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以王平一为首的“战斗社”在托洛茨基指示下，是日至3日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联合组成“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又名“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或“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陈独秀为总书记。

△　上海市公安局是日起检查外人入口护照，凡无护照者，一律不准登岸；日人入口因有中日互约关系，免于检查。

△　实业部与古巴夏湾拿国际糖公司在南京签订借款建厂合同，借款500万元，分五年还清，利息六厘。

△　中央银行奉国民政府令于是日起发行“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券”），专供缴纳关税之用。

△　江、浙各渔业团体电国民政府，务请政府限制外国渔轮进入我国港口，并严令沪海关水警，即日禁止日渔轮进口。

5月2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决议：一、通过向国民会议提出的《六年期内实业建设程序案》，其主要项目为：（一）完成粤汉路、陇海路运河至台儿庄支线、沧石路、新陇绥路、京湘路的建筑；（二）完成全部导淮工程，修治黄河；（三）将东方、南方两大港口及葫芦岛、海州两港之一部工程完成；（四）增加20万公里公路，五万里以上航空线，1000架商用飞机，增加国营河海航运业20万吨—30万吨；（五）努力开发东北、西北的矿业及移民屯垦；（六）兴办水利、电气、钢铁、酸碱、煤、糖、煤油、汽车等基本工业；（七）增加农业生产。二、通过《确定教育设施之趋向案》，其要点为：（一）根据孙中山恢复民族精神之遗训，注重培养学生刻苦勤劳、遵守纪律的作风；（二）中小学教育应体察当地社会情况，以培养学生有独立生活技能与增加生产之能力为中心，务使大多数不能升学之学生有自立之能力；（三）社会教育以增加生产为中心；（四）尽量增加职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内容应接近经济情况；（五）尽量增设各种有关产业及国计民生之专科学校；（六）大学教育应注重以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为原则。

△　蒋介石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自请议处，略谓广州邓泽如、古应芬等四监委联名通电“指斥中正罪状”，“倘果确实，则在党纪国法皆无可恕”；邓等通电，虽“于正式弹劾手续有所不合，但中正为尊重党纪计，不得不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决不稍有恋栈”。中监会旋致书蒋介石，谓邓泽如等

通电，“其语皆摭拾浮言，任意指斥”，所言不合弹劾手续，请蒋“暂勿深究”。

△　吴铁城电复古应芬，略谓：“华北赤祸伏流，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绝非现在之江西所可同日而语”，“稍一不慎，同归于尽”，中央及蒋介石已决定请胡汉民出席国民会议，望粤方释除误会，共维大局，以免同室操戈。

△　汪精卫致李宗仁、白崇禧等冬电，提出“此次倒蒋，宜由各方同志同时并举，只以打倒独裁实现民主为共同目的”，希望“桂省在军事上宜与精诚合作。至于党务政治则宜依旧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

△　河北省财政特派员荆有岩对记者谈，虽中央明令停征特种消费税，但河北情况特殊，如将此税停征，军政费用将无着落，经财部同意，冀省自本月15日起开征特种货品产销税。

△　陇南14县民众代表通电，控诉马廷贤盘踞该地，屠杀人民，苛征捐税，中央特派赴甘视察专员严尔艾受马廷贤12万大洋之贿赂，甘为马当走狗，其视察报告颠倒黑白，为马歌功颂德，陇南14县人民誓死反对。

5月3日　　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偕师长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杨鼎中、朱为珍，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独立旅长黄任寰、张瑞贵，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航空司令黄光锐联名通电响应上月30日古应芬等弹劾蒋介石之通电，要求蒋引退。略谓：“今蒋氏恶罪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吾辈沐总理之遗教，受国家之豢养，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有伸张正义之举。谨以至诚，昭告天下：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利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谊所在，义无反顾。”

△　蔡元培、张继、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电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略谓邓等30日通电“可归诸绝对误会，彼此可不再论”，一切皆“释然于介（蒋介石）展（胡汉民）之间一切如常”，请消除误会，免起纠纷。

△　国民政府公布六件重要文电：一、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萧佛成4月30日联名弹劾蒋介石之通电；二、蔡元培、张继、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五监委致邓泽如等电；三、蒋介石向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呈文；四、中央监委复蒋介石之公文；五、古应芬5月1日致吴铁城电；六、吴铁城5月2日复古应芬电。

△　国民会议宁夏代表任冠军在京谈宁夏情况，谓该省省府委员有不识字者，全省每年收入340万元，其中鸦片罚款占180万，支出300万，尚有余裕。该省学生仅5000人。

△　台湾召开全台实业大会。

5月4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敦劝胡汉民出席国民会议。

△　国民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定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1月1日起施行。

△　外交部就法权谈判停顿事发表宣言，略谓国民政府对领事裁判权的撤废，曾发表命令，在此国民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更觉应负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应负废除领事裁判权之责任，惟与中国有法权关系之各国未能完全接受中国方面要求，法权谈判不幸宣告停顿，国民政府特命令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其目的在力谋免除中外人民间之争执，增进中外人民间之友好关系。

△　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赴上海与孙科商议解决粤方通电劾蒋事，请孙从中斡旋，以求由党内解决，不致牵入军事、政治范围。

△　班禅抵南京出席国民会议。蒋介石所派代表贺耀组、邵力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及各机关长官之代表均到浦口车站迎接。13日，班禅在京招待报界谈，谓西藏为中国领土，最近九年来，政府未能从速解决藏务，兹值国民会议开会，政府不遗边鄙，力求统一，望舆论界一致赞助。

△　张学良在南京宴请辽、吉、黑、热、哈等省、市出席国民会议代表，并发表演说，谓现在教育消费与农村经济相距甚远，“民众竭全家之生产供一子弟读书，犹嫌不足”，毕业之后，不愿回乡村，而走远方，“此则不啻为求学而家破人亡”，希北方各代表对平民教育问题，切实注意救济办法。

△　胡汉民电劝古应芬、陈济棠等顾全大局，勿以渠一人引起纠纷，重苦人民。

△　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在中央党部报告视察浙江省党务情况，略谓该省下属县党部59个，直属区党部16个，区党部222个，区分部957个，党员1.1421万人。党员最多之杭县801人，最少之余姚仅18人。

△　开滦煤矿工人要求改良待遇，每工加薪二角，局方置之不理，是日复借口与北宁路局运费纠纷，煤多不能运出，布告通知每星期停工两天。11日，开滦矿工四万余人宣布怠工。同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王涤文抵唐山，向工会委员训话，劝工人勿走极端，静待中央解决。14日，劳资各方代表成立调查委员会，工人停止怠工。28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每工每日加薪八分，外工年赏每人15元，津贴、抚恤、储蓄、慰劳金等俟新工厂法实行后，由资方制定章程，由实业厅核行；资方承认改善工人子弟学校及矿内医院，取消第二包工制，改由工人直接承包。

△　本年长江潮汛较大，是日镇江市对岸之五圩与四圩间江堤被

江潮冲溃，江边至虹桥镇一片汪洋，淹没农田万余亩，房屋两千余间，人多攀缘树上，牲畜损失无数。

5月5日　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出席大会代表447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共44人。各国公使、参赞、领事12人，并有各方人士及新闻记者千余人参加开幕式。蒋介石致开幕词，详述召集国民会议之意义，历举北伐以来作战之经过，希望保障和平统一，共谋建设事业。同日，南京、上海、武汉、青岛、北平、太原、福州、沈阳等地放假一日，并举行庆祝大会。

△　孙科在上海电蒋介石，谓邓泽如等四监委联名通电，“诚不无过当，然动机完全为展公（胡汉民）抱不平而起”，若立即“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

△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敦促下，在上海召开各苏维埃区域代表会，到会代表49人，20日会议结束。会议通过《全国形势及苏维埃任务》的宣言及《土地暂行法》、《劳动保护法》、《扩大红军及武装农民计划》等法案。

△　海军部自民国十七年以来自行建造“咸宁”、“永绥”、“民权”、“逸仙”等四舰后，由江南造船厂建造的第五艘军舰“民生号”是日下水。该舰排水量为505吨，马力2400匹，时速18海里，价值150万元。

△　广州市附近37英里处之中流砥柱鱼珠炮台火药库爆炸，死亡10人，重伤八人，鱼珠兵工厂厂房被毁，军火损失50余万元。

5月6日　出席国民会议的全体代表由蒋介石带领冒大雨前往中山陵谒陵，并在陵前宣誓，誓毕，一一在誓词上签名盖章。

△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选定张继、戴季陶、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女）及国民党中央推派的于右任、国民政府

推派的张学良共九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　云南省府主席龙云通电驳斥古应芬、陈济棠各次通电，并呼吁全国一致拥护中央，“扫除蟊贼，巩固统一”。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会商法权问题，重光称日本政府拟不采用具体方案，今后随谈随制定条文。

△　自陈济棠3日发表反蒋通电后，粤军调动繁忙。香翰屏第六十二师、李扬敬第六十三师分别在东江、北江布防；驻桂第八路军全部回粤，桂省全交桂各将领办理；陈光汉警卫团调回省城。是日，独立第六旅黄任寰部调集梧州准备东下，余汉谋第五十九师分批由梧州东下，杨鼎中新编第十六师由郁林移防肇庆，朱为珍新编第一师亦调往西江布防，决定驻梧州第八路军总部行营职员分批回粤，大批军火运往韶关，发往各部队。

△　军政部因航空署长张惠长在粤参与反蒋活动，副署长黄秉衡赴欧美考察未归，特委任毛邦初代理副署长，并暂行代理署务。

△　日轮“湘江号”在湘江下游将我国商船“泰顺”轮撞沉，淹毙旅客多人，货物全部沉没。

5月7日　　国民政府公布《海关出口税则》，自本年6月1日起施行。该税则共列商品270种，分六类。最高类征税75％，最低类征税5％。茶叶、丝绸、茧、蜜饯、花边、绣花、图书杂志、报纸、草帽、石膏、漆器、伞、包装用品等免税。

△　国民会议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于右任为临时主席。主席团指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47人，由吴敬恒召集。特许班禅及蒙、藏代表30余人，北宁、平汉、津浦三铁路工会代表五人，海员工会代表二人，军队党部代表候选人15人及妇女团体代表10人为会议列席代表。

△　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及省主席刘文辉通电指责广东军政当局弹劾蒋介石为“藉端倡乱，希图破坏统一”，表示“拥护中央，矢志不渝”。

5月8日　　国民会议举行第一次大会，于右任主席，讨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蒋介石讲演“约法”意义，戴季陶报告“约法”起草经过。于右任提议将“约法”提交约法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再交大会讨论。次议《实业建设程序案》，蒋介石对该案作说明，强调“倘若我国对此计划不能完成，五六年后，必将亡国”，“望各代表扶助政府实现此项提案”。会议决定将该案先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联席审查。于右任宣布，各代表之提案，须有50人联署方可提出。大会还议决给海外各级党部、各华侨团体及全体华侨拍发“慰劳海外侨胞电”。嘉勉华侨历年赞助革命功绩。

△　孙科在沪电陈济棠、古应芬，内称“自胡案发生，弟以尸位中央，挽救无策”。粤提出劾蒋之举，“深虑争端一起，战祸重生”，“调停之责，再不忍辞”，望粤方“力持静默”，非万不得已，不“穷兵黩武”，免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

△　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孔祥熙等持蒋介石亲笔信由南京赴上海，请孙科、王宠惠返京出席国民会议，并从中帮助调停粤方反蒋事端。13日，李石曾、张静江返京向蒋介石汇报在沪会商情况。同日，王宠惠以拟赴欧任海牙国际法庭永久法官为由，向蒋介石请辞立法院院长职。

△　绥远各界电国民会议，陈述该省与外蒙接壤相处，虑唇亡齿寒，请通过移民殖边，实行屯垦，以固国防。

5月9日　　国民会议开第二次大会，张学良主席，讨论《教育设施之趋向案》，蔡元培对该案作详细说明。王卓然提议增加一项“一切教育以使用国语为原则”，该案交教育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项定

荣等70余人临时动议，提出督促政府限期取消不平等条约案，全体一致通过。主席团指定邵力子、陈布雷、刘芦隐、项定荣等11人起草废约宣言。

△　国民政府向国民会议提出《政治总报告》，蒋介石对该报告作说明，并强调指出：一般人认为国民政府五院中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不知立法院所通过的重要法律案必须由中政会议决定原则，“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才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导机关，而国民政府只是在党的指导下一个最高的行政执行机关”。全国“一切权力，全操于中国国民党”。

△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称：目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如下：一、“政治局本身对于苏区的领导任务，必须更实际地进行”；二、“反国民会议、反黄色工会、反军阀战争、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为目前主要任务；三、全国中心市党部，积极做艰苦地发动群众的工作；四、深入到敌军中做工作及设立农民部领导全国农民运动；五、加强党内的思想整顿。

△　行政院公布领海界线，领海范围定为三海里，海关缉私界线定为十二海里，在领海界内，任何外国渔船不许侵入。

△　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通电称，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师在进攻黄安七里坪泼皮河等地的战斗中，死亡营长、营附各一人，连、排长四人，士兵172人，民团40人，伤营长三人，营附五人，连、排长21人，兵士416人，民团59人。

△　福建省政府因收编民军为省防军、省警、保安队，需要巨款，特发行50万元库券，强行摊分给福州、厦门两市各商帮。福州摊32万元，厦门摊18万元。省公安局长郭咏荣是日派警传集福州各商帮代表在总商会谈话，限本月10日先交12万元，其余20万元于15日交清。各帮代表议论通宵，仅能凑集五万元。郭咏荣下令将24名代表全

部逮送公安局关押。10日，商会开紧急会议决议，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福建代表团，陈控军警勒迫借款，滥押商家，请求援救。

5月10日　南京中央体育场举行奠基礼，国民党党政要员及各界代表300多人出席，蒋介石奠基。该体育场于8月底全部完工。

△　新亚细亚学会在南京成立，通过会章58条，选出林兢等10余人为该会理事。

5月11日　国民会议举行第三次大会，张继主席。一、原则通过催促国民政府早日公布新盐法并限期成立盐政改革委员会案；二、《确定发展农业五年计划案》并入《实业建设程序案》，交财政、经济两组审查委员会审查；三、《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案》决议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　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粤事，略谓陈济棠勾结张（发奎）、桂军及改组派，图叛中央，作陈炯明第二，中央自有处分办法。

△　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联名电陈济棠，对陈领衔3日所发之通电发出警告，劝其“取消前言，停止一切行动”，“勿为破坏和平统一之罪人”，“背弃中央，则政治之生命且绝”，“拥护中央，则革命光荣永存，吉凶祸福，在兄自择”。

△　粤桂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率总指挥白崇禧、军长张发奎、李品仙、黄旭初、杨腾辉，师长梁朝玑、薛岳、吴奇伟、廖磊、韦云淞、唐生明、黄鹤龄、覃连芳、韩彩凤通电声斥蒋介石“包藏祸心，自盘据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表示决心讨蒋，“会师长江，底定金陵”，“救党救国”。

△　福建省政府临时代主席方声涛查悉福州绸布帮法律顾问陈光

律师为商帮起草控诉军警强行向商家借款，拘押商家代表的通电，是日将陈拘押保安处。次日，福州律师公会决议：一、向地方法院控诉方之违法行为；二、向中央监察院控告方渎职，请求将方惩办；三、在此案未解决之前，全体律师罢职。14日，在商界和律师公会激烈反对下，省政府令保安处将被捕的商帮代表及陈光释放。

△　在新三十一师独立团第三营充任营长职务之中共地下党员张洁吾，因人告密，昨夜该师副师长周希武突将张营解除武装，并将张及匿居张家的华容苏维埃副主席范少英、中共石首县委秘书余业勤等三人同时逮捕，是日，范等三人在长沙被杀害。第四路军代理总指挥刘膺古令湖南士兵“实行五人联结，如一人是赤匪，五人同罪”，并实行官长联坐，以资严防。

5月12日　国民会议开第四次大会，戴季陶主席。一、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交国民政府公布，定“双十节”施行；二、讨论《剿灭赤匪报告》，蒋介石对该报告作说明，声称在“三个月内，一定可以将其完全消灭”，决议将该报告交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陈布雷、刘芦隐等及各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共同审查。

△　国民会议宁夏代表潘秀仁等60余人向大会提交《早日收回外蒙库伦以维民族而固疆圉案》。

△　前广东省府主席陈铭枢由香港抵上海，与中央代表商洽粤事。16日，陈乘轮东渡日本。

△　整理海河委员会委员长王树常同天津各银行代表签订《海河整理公债合同》，总额290万元，共分三期于本年9月1日前发行完。

5月13日　国民会议开第五次大会，通过《接受中国国民党总理遗教案》；《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案》；《政治总报告决议案》；《确定教育设施之趋向案》。

△　教育部为保证地方教育经费独立，拟定《地方教育保障办法》14款呈行政院，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遵行。

△　外蒙国民会议代表车臣汗亲王那彦图、内蒙哲盟图什业图亲王业喜海顺，由北平抵南京，出席国民会议。

△　中国佛教会主席太虚等电促达赖来京与班禅消释猜忌，携手合作。16日，中国佛教会具呈国民政府，请遴派汉、蒙佛教领袖入藏，劝说达赖与班禅和解，欢迎班禅回藏，以固边陲，而杜英人觊觎。

△　詹以昌、陈昆仑、简吉组织台湾“赤色救援委员会”。

5月14日　国民会议开第六次大会，于右任主席。通过如下决议案：一、《实业建设程序案》；二、《剿灭赤匪报告案》；三、《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实业及保障华侨救济失业案》；四、《工人失业救济案》；五、《切实救济丝、茶叶案》；六、《设立编译馆案》。以上各案均交国民政府办理施行。大会临时动议通过两案：一、辽宁代表阎宝航等150人提议《由大会申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努力建设案》；二、福建代表毛一丰等300余人提议《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

△　何成濬、李鸣钟、徐源泉等武汉行营所辖25名将领联名通电拥蒋，指责粤方劝蒋通电是“信口雌黄”，并严厉声讨陈济棠。

△　广州保安团反对陈济棠，据守长州炮台与陈济棠部开战，陈调“坚如”、“海虎”等八舰，黄任寰之炮兵两营及陆战队、宪兵各两营围攻。同日，蔡廷锴之第六十师设在广州的枪弹库被陈封闭。17日，广州保安团长翁腾辉（即翁照垣）逃往香港，陈将该团仍保留，军官全部撤换。

△　红军孔荷宠部在宜丰与国民党军刘夷独立旅激战后，是日孔部突驰往奉新、高安县境。南昌行营急令谭道源、胡祖玉两师各调一部及刘夷旅急往奉新、高安围堵。

△　中苏会议举行第六次会议，仍议中东路赎路问题，双方对赎路方式意见不一，具体问题未解决。

5月15日　国民会议开第七次大会，张学良主席，通过以下决议案：一、《由中央指拨专款并奖励兴办蒙古教育及各项文化教育事业案》；二、《通告国内外特许外蒙自治，以期早日完成统一案》；三、《保障蒙古盟旗及蒙民生计案》；四、《急速向各国交涉取消待遇华侨苛刻条例案》；五、《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修正案》；六、《请以国家全力救济甘、青、宁三省案》及《开发西北办理工赈以谋建设而救灾黎案》；七、本年6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八、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电；九、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电。

△　蒋介石密电粤军师长香翰屏，谓陈济棠称兵反对中央，请香继陈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之职。香复电斥蒋“为国人共弃久矣”，来电“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

△　中央禁烟委员会决议：一、将天津海关在东关“新丰”轮查获的烟土1.15万余两全数充公，并罚船主银400两；二、安徽阜阳县长王云龙令该县遍种烟苗，咨皖省政府处理。

△　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事务所通电各省市，每省市选举费用总额最高六万元，在此限度内，如数核准。同日，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事务所正式撤销，未了事项移交国民政府文官处办理。

△　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等驻晋各将领联名通电忠告陈济棠，劝其拥护中央，勿自绝于党国。同日，湖南、湖北两省政府分别发出忠告陈济棠，拥护国家统一的通电。

△　国民政府派马超俊为欧美各国劳工考察专员。

△　郝梦龄师协同郭华宗师进攻赣省潭头，该地红军顽强反击后，退往东固地区。

△　武汉行营令徐源泉、范石生、赵冠英二师，王光宗、郭勋两旅围攻远安红军贺龙部，并限于本月20日前肃清。

△　交通部令：自是日起，天津、北平、南京等15处电台开放国际电报。

△　长岳关税收督办杨纫侵吞鄂省堤款20余万元，携款潜逃。鄂省府派视察员张泽雄前往调查，是日将调查结果呈报省府。

△　上海市政府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指令，令饬社会局，禁止轿夫、人力车夫组织工会。

5月16日　国民会议开第八次大会，戴季陶主席，通过如下决议案：一、通过《大会宣言》，其要点为：接受孙中山遗教，废除不平等条约，拥护和平统一，“消灭共产党”，实业救国；二、通过《告粤将士电》及《告粤民众书》。通过临时动议六案：一、在国会会场前建造孙中山铜像；二、建造国民会议纪念碑，上刊《约法》全文及全体代表姓名；三、严厉禁绝鸦片；四、用大会名义嘉慰蒋介石；五、赠蒋介石及张学良纪念章；六、以党歌作国歌。

△　于学忠、王树常、刘翼飞、李培基、石友三、宁哲元、孙魁元、庞炳勋联名通电驳斥陈济棠之反蒋通电。谓此次粤事之起，无非借口于胡汉民个人问题，胡仅一党员，其进退应以公意为从违，非任何个人所得左右。

△　财政部令全国各海关代理征收一切统税，原统税机关驻海关办事处一律裁撤。

△　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及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一部向东固红军发动进攻，该部进入东固西端时，彭德怀红三军团四面发起围攻，经两天激战，将其歼灭。与此同时，红军一部向公师在富田留守部队进攻，亦将其全歼。粮食器械、无线电台全被红军缴获。

△　上海律师公会电呈蒋介石、司法部、外交部，陈述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制度诡奇，审判黑暗，破坏我国法权，刍狗我民众”，请政府克日交涉，收回改组。

5月17日　国民会议举行闭幕典礼，周作民主席，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及《慰勉国府主席蒋介石词》；戴季陶致闭幕词；蒋介石发表演说，提出“巩固统一与尊崇法治”、“确认民生为建国之首要”、“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设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六项今后救国方略。

△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张景惠、臧式毅等东北将领通电拥护和平统一，希望粤方以党国为重，勿再引起内战。

△　张静江等10名中央委员访胡汉民，劝胡留京，取消原辞职要求。胡答以仍需休息。

△　红军彭德怀部将公秉藩师大部歼灭后，集中主力猛攻潭头郭华宗师。郭师向水南败退，红军直追，郭部在水南街无险可守，背水作战，大部被红军歼灭。与此同时，郝梦龄师应援郭师，遭红军阻击，正当郝师集中主力与正面红军决战时，其后方又被红军攻破。郝师惨败，郝率残部败退藤田。

△　陈铭枢之代表孙希文由沪抵京向蒋介石报告粤省形势。18日，孙携蒋亲笔信离京赴赣，慰劳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部。

△　商震携带借款200万元离北平返太原。商震谈，此款一半分配各军，补发欠薪勉强可供两个月。同日，张学良电商震，谓中央对晋

军决即拨款百万元，整理晋省金融公债，已与宋子文议妥，希速派专员携方案入京商洽。

△　石友三以外传该部有异动行为，是日电张学良辟谣称，“蒙副座特知，自当拥护到底”。

△　中法学术考察团自张家口向喀什噶尔进发。

△　白崇禧为与粤陈济棠联合反对蒋介石，偕同李品仙、叶琪、冯祝万等到达广州。白称，张发奎18日可到，李宗仁稍迟数日亦将到达。

5月18日　　湘、鄂、赣、闽、皖五省国民会议代表123人联名电邓泽如、古应芬、萧佛成、林森、陈济棠等粤方要员，劝其“同舟共济，贯彻始终”，切莫再同室操戈。

△　行政院据湖北省府呈请，是日训令内政部饬各省、市严密查禁《群众日报》及《群众画报》。

△　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奉令急援沙溪被红军包围的郝梦龄师，高部正从南团向沙溪进发，郝部已被歼。是日，红军集中主力将高师就地包围，经两昼夜激战，高部弹尽粮绝，几被全歼。20日，高率残部逃亡招携。同日，孙连仲第二十五师亦被红军包围于南团附近，势孤无援，伤亡甚重，孙率残部退回东陂。

△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使蓝普森继续谈判法权问题，蓝普森重申前次会晤意见外，要求对沪、汉、京、粤四地之法权仍须保留，并主张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查研究具体保留办法。会谈无结果。

△　据《大公报》载，自东北军入关后，河北省新委县长84人，多数为辽、吉、黑籍人，该省人保有县长地位者不足30人。

△　中国银行公布1930年度营业情况，该行活期存款余额为

4.1638881556亿元，定期存款余额为6968.89023万元，获纯利208.594477万元。

△　英国人斯坦因曾屡次窃走新疆、甘肃等地古文物，新省府应国内学术团体要求，勒令其出境。是日，斯坦因由哈密取道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离新回国。

5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略谓对内消灭红军，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今后两大主要任务。自今以后，“当积极完成训政建设，凡有破坏和平统一者，皆为国家之公敌”。

△　驻豫、鄂、陕、甘将领刘峙、刘镇华等29人联名电中央党部声讨陈济棠。

△　国联理事会通过国联专家各组与中国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进行合作事宜案。

△　陈济棠派人入赣晤蒋光鼐、蔡廷锴，拟拉拢第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或保持中立，被蒋、蔡拒绝。是日，蒋光鼐电该军驻粤办事处，限本月25日前全部退出广州。

5月20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张继见蒋介石，商调停粤事。

△　胶济路沿线之淄川、博山、章丘、潍县等地煤矿商，因胶济路增加运费，是日起全体罢业，沿线燃料大起恐慌，煤价飞涨。

△　禁烟委员会决议：一、咨军政部，核办闽省南安、惠安等县驻军不肯铲除烟苗案；二、咨黑龙江省府查办安达韩侨商人出售麻醉毒品案。

△　日本人久原由山东潍县盗买我国古物七箱运至青岛，被扣

留。

△　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武汉市长刘文岛在南京与蒋介石议妥，为解决鄂省财政收支不敷，主张省与武汉市合并，省府局部改组。鄂各省委得息后，是日电南京中央总辞职。

△　横行徐州东面宿迁县境达10年之久的土匪何正心部，是日在新安镇附近之段庄被金汉鼎第十二师工兵营包围消灭，何之首级带往宿迁县城示众。

△　孙科夫妇乘日轮由上海秘密赴广州，陈友仁夫妇随行。

5月21日　何应钦乘“豫章”舰离京返赣，临行时对记者谈，本人到南昌后，当再以全力“剿共”，深信最短期内必可肃清。

△　河北省特种产销税是日开征，北平各商界召开代表大会一致反对，并呈张学良、东北政委会及财政部，请免予举办该税。

△　第四十五师奉令从皖北调往豫北，是日该师师长卫立煌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一切。

5月22日　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与张继在上海商妥粤方反蒋和平解决办法，并决定由张继携议定方案赴粤接洽。23日，张继离沪赴粤。

△　王正廷对记者谈外交近况，谓取消领事裁判权决不与任何国家讨论交换条件；中苏会议已颇接近；上海法租界公廨即可收回，改组为中国法院。

△　鲁涤平访许世英，请拨赈款200万元，修筑南昌至赣州汽车路，实行以工代赈。许允俟赈款拨到后，立即拨给赣省。

△　陈济棠通告驻粤各国领事，因军事上之必要，已在汕头港敷

设水雷，请各国领事通知各该国籍船舶注意，以免发生危险。

△　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前因驻湘第十独立旅旅长兼湘西“剿匪”指挥戴恢垣叛变将其撤职，并令该旅副旅长兼独立团长洪本枏率该部编入新三十一师陶广部为第三旅。洪部改编后，仍盘踞安化一带，不服陶之命令，是日总指挥部下令将洪职及所部番号一律取消。

△　山西省政府会议通过省府主席商震所提筹办晋军军饷办法，按人平均向各县派粮秣捐共400万元，并令全省立即实行。自本月起，晋军按七成发饷。

△　天津《大公报》为创刊至今一万号发表《纪念辞》。宣称该报将始终坚持“不党”（不加入党派）、“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报纸向全国开放，使之为公众之喉舌）、“不盲”（实事求是，不趋炎附势）的宗旨，“为求光明自由的新中国之成功”而努力作舆论宣传。按：该报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902年6月17日）由英华（敛之）主办创刊，中间于民国十四年底停刊，民国十五年9月1日复刊。

5月23日　　吴敬恒电劝古应芬“本和平统一初衷，勿以细故而牵动国本，重启干戈，务望善为斡旋，挽救危机”。

△　刘文辉抵重庆晤刘湘，协商川局善后。

△　公秉藩由吉安抵南昌见何应钦，报告在东固被红军彭德怀部击败经过，称此次失利乃其参谋长张民权措置乖方，调度失当所致。何对公表示慰勉，允电呈蒋介石给以补充，并将张民权扣押。

△　“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遭受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悉被逮捕，整个托派中央陷于瘫痪。

5月24日　　孙科、陈友仁、许崇智抵香港，即赴汪精卫宅与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会晤，讨论两广形势。当日，汪、唐、孙、陈等

乘车往广州，与陈济棠举行会议。

△　中苏会议开第七次会议，续议关于赎路问题，在会前苏方提出港口、航权及特派领事和驻兵要求，并表示对外蒙库伦、呼伦博克洽克既得权，坚决不放弃。议无结果。

5月25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追述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之反共历史，指责汪精卫纠合右派在广州反对政府，破坏统一，“罪大恶极”，望政府同人一致声讨。

△　唐绍仪、古应芬、林森、孙科、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李文范等在广州联名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孙科并另电蒋介石，声明支持唐等通电。

△　陈济棠任命李扬敬为韶关行营主任，张瑞贵为潮梅警备司令，香翰屏为惠州河源警备司令，黄鹤龄为梧州行营主任，以从事讨伐蒋介石的军事戒备。

△　武汉行营奉蒋介石命，重新分配鄂西防务：塔市驿、石首、藕池一带归张英部接防，荆州、沙市、公安、郝穴一带归郭勋部接防，荆州以西至宜都防务归袁彬部，宜都以西归王陵基部，松滋、枝江防务归李宗鉴部，恩施一带防务归罗启疆部，以上各部统归刘湘第二十一军宜昌行营指挥。并加派军舰巡弋公安、石首、沙市一带长江江面。

△　蒋介石在南京陵园设宴招待班禅及蒙古代表，班禅就康、藏问题有所陈述。同日，格桑泽仁离京赴沪，取道滇境入康办理党务。

△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演说，指责蒋介石独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反蒋不须顾虑投鼠忌器，“蒋介石这个鼠子，不比普通的鼠子，真是个疫鼠，我们不论如何，都要将他铲除”。

△　东北日人在沈阳成立“全满日人自主同盟”，并议决该组织任务为：一、满洲日侨自成一自治单位；二、拥护满洲已得利权；三、关于满蒙之一切外交，应由同盟会指挥。

5月26日　　陈济棠、孙科等再次电促蒋介石立即下野，“放弃党国所付与之职责”。

△　上海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在康脑脱路益志里及浙江路同益旅馆等处捕获共产党员桂仰之、吕昌、许金珊等五人，声称查获共产党文件及宣传品。桂等三人被押往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吕、许被押往警备司令部。

△　上海出口各业公会代电蒋介石、司法院及财政部称，上海江海关所定土货出口新税则比旧税则加税达三四倍之多，商民万难担负，要求政府撤销新税则，从轻征税，“以存出口商业一息之残喘”。

△　甘肃陇西警备司令鲁大昌派代表何世雄到北平见张学良，报告甘省近况：鲁部驻陇西，陈珪璋部驻陇东，马廷贤部驻陇南，马鸿宾部驻省会兰州防区。去年甘省人民饿死者，每县平均三四千人。马鸿宾已向中央辞甘省主席职。

△　华北第五届运动会在济南开幕。参加本届运动会者有冀、辽、豫、晋、绥、察、鲁、平、津、青岛、哈尔滨11个省、市、区，运动员1000余人。运动会历时五天，30日闭幕。女子标枪创远东纪录，女子跳远、50米短跑及男子铁饼、撑杆跳高、1500米中跑均创全国新纪录。

5月27日　　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许崇智、李文范、傅汝霖、伍朝枢、陈友仁、陈树人、刘纪文、经亨颐、陈济棠、柏文蔚、覃振、阎振、阎锡山、冯玉祥、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林森、邓青阳、陈璧君、谢持、张知本、李宗仁、李福林、林云陔等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

常会议”。汪精卫、邓泽如、孙科、李文范、邹鲁为常委。同日，发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宣言》，称其主要任务在于推倒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

△　广州“非常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唐绍仪、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邹鲁、邓泽如、萧佛成、林森、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唐生智、蒋尊簋、李烈钧、陈友仁、熊克武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随后伍朝枢辞驻美国公使回国，被加推为委员），并决议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

△　武汉行营通令各部队，严防红军在汉购买枪械，将贩卖子弹接济红军之商人王清洁、胡开胜枪杀，并四处张贴布告，昭示周知。

△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是年第一期在上海出版。该刊载，据全国各地灾区调查，全国灾民在5000万以上，苏、赣等省尚不在内。

△　拂晓，红军主力二万余人分数路向驻扎在广昌的胡祖玉、毛炳文两师发动猛烈进攻，毛师阵地迅为红军突破，毛率残部逃遁。胡祖玉亲自上阵督战，被红军击中两弹，胡师溃逃（胡本人于6月3日在南昌医院丧命），该师由副师长周浑元指挥。是晚，红军克广昌城。

△　北平赈务处接豫赈会函，内称豫省自民国九年以来，天灾战祸不已，民国十七年之后，灾患日甚，至今“全省无县无灾，无灾不剧，民不聊生，亟待赈济之难民遍野”，吁请平赈会急赈。

5月28日　汪精卫、唐绍仪、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介石独裁的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对于军人，“信赏必罚”；对于财政，“收入支出，一切公开”。

△　蒋介石电复孙科，对孙25日附和唐绍仪等通电大加指责，并

表示决不放弃现有职责，对唐等通电“惟有一笑置之”，但念孙科系“总理之子”，劝孙“勿为一时诱惑，误入歧途”。

△　李宗仁抵广州，寓退思园。

△　清华大学教授、学生掀起反对校长吴南轩风潮，指责吴“大权独揽，不图发展校事”，要求吴立即离校，请教育部另简贤能主持校务。29日，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议驱逐吴南轩，由学生会电教育部请改任周诒春为校长，新校长未到任前暂由教授会维持校务。

△　第15届国际劳工大会召开，中国代表朱懋澄等出席。

5月29日　27日红军猛攻广昌时，刘和鼎师奉朱绍良令从安远南面的中沙调回建宁防守。是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为攻城主力，红十军罗炳辉部为预备队，乘刘师调回建宁立足未稳，遂发动猛攻，经一夜激战，至30日，刘师伤亡重大，刘率残部逃往延平。建宁、泰宁均为红军攻占。至此，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围剿”被红军完全打破，15天内，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共歼敌三万余人。

△　国民政府任命铁道部政务次长连声海为铁道部代理部长。

△　广州“国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决议：推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为常务委员，以陈融为秘书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

△　吴敬恒发表对时局谈话，略谓：自国民会议后，中央应先干两件事：一、大规模“剿赤”；二、督促地方政府肃清各地土匪。中央此次对粤决不轻易再下讨伐令，免再上当。粤之“非常会议”只是在北平扩大会议后又垒起的一大垃圾堆。列名于25日唐绍仪领衔通电的22人，共分六个派：一、超然派：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二、国民党右派：古应芬、陈济棠、陈策、马超俊、李文范、刘纪

文、林云陔、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三、西山会议派：孙科、许崇智、邹鲁；四、改组派；汪精卫、唐生智；五、陈济棠、古应芬之死对头李宗仁；六、第三党：陈友仁。

5月30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决议：通过《中国国民党告全国民众书》，声明国民党今后的任务是完成训政建设，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红军。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致广州中央监委邓泽如、古应芬，中央执委孙科、李文范、刘纪文及候补委员陈济棠、陈策、林云陔、邓青阳电文。略谓当前国家之大敌是湘、赣之共产党，中央“愿以宁息之中怀，定是非于他日”，劝邓等中止反蒋。同日，国民党中央分别电暹罗（今泰国）萧佛成、檀香山林森、上海李烈钧，略谓广州邓泽如等滥发通电，请其详察。

△　国民政府公布《盐法》；《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自二十年5月18日起再予展限六个月。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北省政府：原任省府委员何成濬、方达智、吴醒亚、张贯时、黄建中、熊秉坤、谢履、彭介石、陈光组均免本职；兼省府主席何成濬、民政厅长吴醒亚、财政厅长张贯时、建设厅长方达智、教育厅长黄建中均免兼职；任命何成濬、刘文岛、吴国桢、方达智、黄建中、朱怀冰、马登瀛、彭介石、陈光组为湖北省政府委员，何兼省府主席，刘、吴、方、黄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电兼理教育部长职务蒋介石，谓“本校学生受反对分子煽动后参加风潮，由学生会通过决议案，迫南轩及教务长、秘书长、院长即日离校”，“风潮扩大、事机迫切”，请速电示机宜。

△　天津市24个商行代表赴市党部请愿，要求取消冀省产销税，

速令税局发还扣留货物。天津商会表示坚决与北平商会联合，对产销税反对到底。同日，北平各行商家500余人开会，决议如下月2日以前产销税不能取消，则全市各商家于3日罢市。同日，河北省财政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坚持产销税必须征收。

△　山西省政府决议，由省府发行兑现新钞，将旧钞作四折兑现收回。

△　北宁路与开滦矿局自2月以来因运费问题引起纠纷，经外交部长王正廷及其弟东北矿务督办王正黼从中调停，是日正式商定解决办法。车辆延期费与煤价差数，矿方认缴125万元，照旧合同恢复运煤至本年6月底止，期满后另订合同。

5月31日　广州“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联名发表就职通电，略谓：一、反对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二、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三、政府委员17人，现有16人，余者待补入。

△　教育部公布《县长市长（行政院直辖市除外）办理教育行政暂行考试规程》，规定每年对县长、市长办理教育行政考核一次。如果省教育厅或者民政厅认为必要，可随时进行。以敦促县长、市长在任内必须重视，并切实推行教育。

△　欧亚航空公司沪满段开航。所有由上海寄至英、法、德、奥、荷等国航空邮件，均由欧亚第四号飞机运往北平，再由北平换欧亚一号或二号飞机，运至满洲里。再经俄国及德俄航空公司运达目的地，共需时六天。

△　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横征暴敛，遭皖人强烈反对，又因该省财政枯竭，两次电蒋请求辞职，称皖省裁厘后，仅皖北能收19万元，支出70万，政治无办法。均为蒋所慰留。是日，陈应蒋电召入京面议解决办法。

是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委员、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周逸群到洞庭特区检查工作，在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牺牲。

△　第一辆国产汽车——民生牌七五型载货汽车建成。这辆汽车除发动机曲轴等少数部件委托国外照民生厂图样代制外，其余部件均为民生厂自制。载重量二吨。

△　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远征日本，是为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出国比赛。

6月

6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即日生效，并发表宣言，谓约法“为训政时期之根本大法”，全体国民应对约法“竭诚拥护”。

△　国民政府举行“约法”告成及孙中山之灵榇奉安紫金山两周年纪念庆祝大典，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均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同日，全国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之命，均开会庆祝。

△　财政部发行民国二十年统税短期库券8000万元，以充补国库之用，月息八厘，以卷烟税余款及棉、纱、麦粉等税为担保，自民国二十年6月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底止还清本息。

△　陈友仁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旋即照会驻北平各国公使，宣称：“中国国民党业已将蒋介石从前在南京所行使之国府主席一切职权，概予撤销，并令该政府立即解散。”“国民党已于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请各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暨任何事件或行为，为各该机关所给予或造成，以及任何款项支付与各该

机关者，均一律不生效力”。

△　广东省财政厅奉广州“国民政府”令发行第二次军需券1000万元，专为备支军费之用，按商人资本大小摊派，年息一分，自发行之日起满一年后，分10个月平均偿还本息。

△　全国各海关奉财政部令撤销50里内常关，并停征常关税（50里外者已于2月撤销）。同日，财政部新出口税则开始施行。

△　全国律师协会在杭州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5日，代表大会末次大会决议：司法院长王宠惠总揽司法三年，成绩毫无，措置失当，电请监察院即日专案将王提出弹劾，并请国府明令将王免职。

△　交通部国际无线电台宣布是日起中德两国正式通报。

△　山西省政府公布《整理金融办法》，即日实行，并规定此后全省境内公私收支均以现洋为本位，晋旧钞每元当现洋四角。

△　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电令所部将领将现有枪支人员速调查呈报，以便改编。其改编计划已定，共编三个师，马毓智、黄逸民、陈书农分任师长，每师直辖三旅。

△　长江川江航运华商轮船招商、三北、中兴、蜀平、渝江、永庆及川江等八轮船公司为抵制外轮，是日正式成立商运联合会。但重庆商运联合会经外商拉拢，容纳外轮加入该公会，6日后又改名为华洋商运联合会。川江航行之轮船30余艘，而华轮仅八艘，因运价猛涨，华轮陷入绝境。

△　南非华文《侨声报》在约翰内斯堡创刊，每周三期。

△　英人韬朋在上海京沪路开枪打死两名巡路宪兵，次日韬朋在昆山被捕，旋被苏州驻军团长黄珍吾擅自枪毙，黄经军法会审，处以14年徒刑，11月4日，外交部发表韬朋案经过。

6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设治局组织条例》、《官吏服务规程》。

△　蒋介石电令原陆军第四十五师番号改为陆军第十师，师长仍由卫立煌充任。6日，卫师奉令调往江西“围剿”红军，所遗蚌埠防务由骑三师张砺生部及财政部驻东海第三团、驻松江、九江第一、二两团接替。

△　广州“国民政府”常委会决议：一、通过《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李文范等九人为政务委员，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为常务委员；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并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陈济棠等19人为军事委员；二、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三、任命林云陔、林翼中、金曾澄、胡敬贤、许崇清、程天固、范其务、邓彦华、李鹿澄为粤省政府委员，林云陔为省府主席兼长财政，金曾澄长教育，胡敬贤长建设；四、任命程天固为广州市长，许崇清为中山大学校长；四、决定粤、桂两军之编制：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参谋长缪培南，辖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第三军军长李扬敬；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辖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

△　何应钦、刘峙、陈调元、鲁涤平、何键、杨虎城、杨树庄、韩复榘、何成濬联名通电，指责孙科参与广东反蒋政府，“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促其“及早回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天津日军官二见中尉在海光寺附近，骑自行车将一华人老妇撞倒重伤，华警上前查询，亦被二见殴伤，二见骑车逃去。市公安局得讯正欲究办，日宪兵多人冲到二区警署取闹，叫嚷要把被殴伤的华警带去惩办。后经公安局与日驻津副领事后滕交涉，日宪兵方退去。次日，天津各民众团体通电全国及国民党中央，控诉日军侵我主权之

暴行，请政府向日本严重交涉。23日，经多方向日交涉，日方答允赔款、道歉，此案了结。

△　陇海线西行列车在豫西渑池西出轨，惨死30余人，伤50余人。车辆、路轨毁坏严重。

△　吉林省教育厅长王世选，强令禁止各校使用白话文，改用文言，并取缔女校演剧，激起吉林全城学生反对。各校代表决议6月3日游行驱王。省府获讯，是夜，即派军警赴各校制止，令学生不得外出。

6月3日　长春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于4月16日在长春县万宝山租得民地500垧，租期10年，契约未经县府正式核准，根据契约规定，应作无效，郝即将所租之地转租韩人李升薰等人耕种，租期亦为10年。韩人租得该地后，立即招集大批劳力强行从我国农民开垦的熟地上挖长达20余里的水渠直接伊通河，并在伊通河筑坝引水，此工程毁我国农民良田100余垧，另2000余垧有受河水淹没之虞。该地农民群起反对，韩人不理。长春县政府派员前往交涉，韩人依仗日本军人势力亦置若罔闻。是日，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致函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抗议日方支持韩侨民挖沟行为，并将韩人在此事件中肇事最烈者申永均等10人引渡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讯办，并请日领事田代重德制止韩人挖渠。日领置之不理。

△　禁烟委员会举行“六三”禁烟纪念会，委员长刘瑞恒讲话，谓至今烟毒不能禁绝之原因，一是连年战争，政令不能统一；再是不平等条约未废，外人不断运毒来华；三是烟民多借租界贩卖烟土。

△　教育部公布修正学校休假规程，本年8月1日开始实行。第一学期为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第二学期为2月1日至7月31日。暑假专科以上学校以70天为限，小学以50天为限，寒假各类学校均为14天。年假三天，春假七天，孔子诞辰（8月27日）、国庆（10月10

日）、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中华民国成立（1月1日）、孙中山逝世（3月12日）、革命烈士纪念日（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革命政府纪念日（5月5日）、国民革命军誓师日（7月9日）均休假一天，并开纪念大会。

△　铁道部公布该部直辖国有铁道民国十九年度营业统计，津浦、道清、京沪、杭甬、平绥、正太、北宁、广九、湘鄂、胶济、南浔、广韶、呼海、四洮14线之收入共1.04889352亿元。平汉、陇海、漳厦、吉长、洮昂、沈海、吉海、吉敦等路因战事影响未能完成统计。

△　赵亮功等代表西康13县难民3.728万人发通电，详述达赖受英国指使两次派兵侵入西康之经过，请求各界声援西康，严惩达赖，并附民国二年达赖与英国订卖国密约及达赖在布达拉宫召集会议企图背叛祖国之决议案全文。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公安局、社会局联合布告称，劳资双方如发生纠纷，应先各推代表直接和平协商，如争议不决，应即请本社会局调解。凡不呈请社会局调解而擅自罢工停业者，一经查明，定加严惩。

△　美国参议院议员兼银价委员会委员长毕德门来华调查中国银价问题，是日到达南京，分访宋子文、孔祥熙，对银价低落问题有所讨论，宋对借银问题表示冷淡。9日，毕德门离沪赴北平调查银市。24日，毕返沪，对记者谈，主张近期召集世界银价会议解决银价低落问题。30日，上海国际贸易协会等六团体设宴欢送毕德门回国。毕称，此次来华，旨在考察中美贸易不振之原因，以求改进补救。

△　上海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开业。

6月4日　　海军部奉令将“海筹”、“海容”、“逸仙”、“应瑞”、“永绩”、“永健”各舰，鱼雷舰“建康”、“豫章”，练习舰“通济”，运输

舰“华安”等全部能在海上作战的战舰调往福建，以应付粤局，必要时令军舰占领汕头。

△　驻浙江第四师奉蒋介石令调往湖南布防，是日该师师长徐庭瑶在京向蒋请示。

△　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奉蒋介石电召到京汇报该部在东固作战经过，蒋嘱将所部重加整理，即速补充，再参加“围剿”红军。

△　刘文辉、刘湘对解决川事已趋一致，刘文辉发表解决川事先决办法两项：一、统一政治权力；二、扫清政治障碍。19日，刘湘之代表刘航琛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川事，谓二刘在重庆会晤，结果良好。

△　第四路军王东原、彭位仁、李觉、陶广、陈渠珍五师长以军费支绌，欠饷八个月，亏款500余万，联名电呈中央，请速拨巨款，并请将湘省煤油特税指拨归湘省征收，藉以稍清积欠，而固军心。

△　河北各县、市商会88团体联合呈请张学良立即严令取消病商害民的货品产销税，以解河北3000万人民倒悬之苦。10日，北平市12个自治区公所主席联名具呈张学良，请下令取消产销税。

△　上海市党部电国民党中央，请严厉制裁现任官吏作投机事业，切实制止买空卖空，并检举中央造币厂厂长郭标抛卖公债3000万元，使市场价格一落千丈，要求立即严予制裁。

△　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庄崧甫抵蚌埠察勘淮河，以蚌埠为起点，凤台为终点。庄谈淮河治理，宜上下游同时进行，蓄泄兼顾，淮之干道由国家治理，支河可仿古时力役之征，利用农闲，令附近农民分段疏浚。

△　中苏会议开第八次会议。苏方代表加拉罕对赎路补提理由多出讨论范围，莫德惠反对，双方争论甚烈。加拉罕又提出变更中东路

管理规则，中国不必赎路，莫与争辩无结果。

△　长春市政筹备处致函日本领事田代重德，谓日警助万宝山韩人，破坏中国法律，请日警立即撤回，并令韩人停止挖渠活动。

6月5日　　蒋介石宴立法院全体委员并演说，略谓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如万一不幸事变发生，中央亦可制裁。惟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中央现在决以全力扑灭”。

△　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任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为军事委员会常委。

△　王正廷在京对各报读者谈外交情况：伦敦购料委员会已成立，英政府已拨庚款350余万镑，将在英国购车辆、机车及钢轨。法权问题，中国方面已告一段落，司法行政部正积极筹备10个专庭及监狱之建筑。外交部本年的主要任务是收回租界，现正积极进行准备。

△　《商业月刊》在上海创刊，施伯珩主编。

6月6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宣称“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中正秉命党国，督率军旅”，“誓集全国之力，弭此民族巨患”，纵然“有十倍百倍于今日之侮辱逼本人下野”，只要“一息尚存，决不忍轻弃职责”。“完此素愿，决当解甲归田”。

△　国民政府令：特任何应钦兼空军司令，未到任以前，由朱培德代理；特任金树仁为新疆边防督办；特派戴季陶为高等考试主考官；陆军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在赣“剿赤”，“弹伤殒命”，从优给予丧葬费五万元，以陆军上将阵亡从优抚恤，并准予公葬。

△　石友三因军费支绌，对南京政府不满。是日，邵力子奉蒋介石命到济南晤韩复榘、马鸿逵，托韩、马向石疏通。7日，石友三外交秘书刘览进京谒蒋介石，谓石竭诚拥护中央，该部七万余人，中央月拨40万元，仅够伙食费，恳请中央增加饷项。16日，邵回南京谈，

此行接洽圆满，中央已允给石部增饷10万元。

△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奉蒋介石电召入京商谈后返沪，对记者谈，中央对广东事件置之不理，将听其自生自灭。中央认为当今最大之隐患为“共匪”，现已决定“以全国力量集中赣省，限一个月内将其肃清，最多不得超过两个月”，蒋将亲往“督剿”。

△　吉鸿昌部攻占鄂豫皖苏区东方办事处所在地安徽六安西南之金家寨，红军退往麻埠、流破幢一带。

△　河北省商界强烈反对开征产销税，财政特派员荆有岩被迫允诺缓征。是日，该省各商界再呈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请明令将产销税取消。

△　京、沪教育界300余人在中央大学庆祝教师节，决议：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规定6月6日为教师节；组织全国教师联合会，推选邰爽秋、马客谈等15人为筹备委员。

△　司法院长王宠惠离沪赴荷兰，出席海牙国际法庭，审理国际联盟行政院提诉的德奥关税同盟案。

△　红军攻占黎川，旋向南丰、南城进展。7日，红军彭德怀、黄公略部集中主力向南丰第六路军朱绍良部猛攻，朱率部死守。

6月7日　　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因该部在江西“剿共”受损，6日在北平电南京中央请辞军长职，并推荐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接替。是日，蒋介石电王慰留。

△　英公使蓝普森乘飞机离京返平，中英法权谈判重趋停顿。

△　中央银行将金条152箱（每箱125磅）交“亚细亚皇后”轮运往美国纽约储存，共值美金510万元，作中央银行在海外存金。

△　天津《大公报》刊载：东北陆军遵中央命令更换番号后之情形，步、骑兵共117个团，人数在35万之上。辽宁省驻步兵15个旅，骑兵一个师、四个旅，炮兵三个旅。吉林省驻步兵八个旅，骑兵一个旅、一个团，炮兵一个团，工兵、辎重兵各一营。黑龙江省驻步兵二个旅、一个团，骑兵一个旅，炮兵一个团，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热河省驻一混成师（内编步兵三个旅、骑兵一个团），步兵二个旅、一个团，骑兵、炮兵各一团，工兵、辎重兵各一营（以上不包括已入关的于学忠、王树常的第一、二两军）。

△　天津海河工程局内华工因待遇与外国人待遇悬殊，要求加薪，局方以高压手段压制，是日全体华方职工宣告怠工。16日，天津市党部召集华北水利委员会、整理海河委员会、建设厅、公安局等方面的代表开会，决定进行调解。20日，怠工持续，海河日益淤塞，航运颇受影响，上海航业公会各会员相约一律不入津埠，招商、怡和等12轮船公司函工程局，要求赔偿不能抵埠之损失，并函海关停纳海关附税及船捐。29日，工潮解决。工程局允对华工按比例加薪。

6月8日　　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讨论时局，决以“剿共”为前提，全力责成蒋介石在短时期内肃清赣南红军，并认为在蒋“剿共”之际，粤方不至乘机为难。会议决定本月13日召开五中全会。

△　立法院院长林森由美国旧金山电蒋介石，请将胡汉民迁庐山疗养，谓胡一经转移，“群疑尽释，纠纷自平”。蒋旋电复林森，谓所请当代转告，大江东南，山明水秀，处处可由胡自择。

△　张学良电蒋介石，对蒋6日之《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师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同日，马鸿逵、罗霖、马腾蛟、马鸿宾等联名电蒋，表示“自当追随钧座，勉竭驽钝，纵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王正廷在沪对记者谈，中日宁、汉案完全解决。此次与重光

葵讨论赔款数额及付款手续问题，大致宁案赔款70万元，宁、汉案合计在100万元以下，分10个月付清。

△　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视察贵州情况，谓该省现有党员406人，在省内者仅有382人。每月党务经费开支6000元。该省每年收入约800万元，支出1500余万元，相差700万元，不得不力行简政。过去贵州向由四川协饷80万元，现川省田赋已征到民国三十年（1941），人民困苦不堪，民国八年以后，协助已停止。全省现有公路1400里，汽车30多辆。

△　鲁涤平在赣省府纪念周报告，谓红军采用“蜂蝶采花”之新战略，国民党军虽“步步为营”，但红军飘忽无定，“剿共”难如“雨天行路”。

△　上海市商会开临时会员大会讨论时局，决议除用商会名义发一通电外，再分别电国民党中央、蒋介石、胡汉民、陈济棠、孙科及各省商会，表示共同维护国家和平统一，拥护蒋介石赴赣督师“围剿”红军。

△　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禁烟大会代表施肇基在大会发言，谓取缔毒品原料与限制毒药之化学生产二者不能分开。代表伍连德发言指出：“海洛因走私运入中国，为害之烈，不堪设想，取缔此物之出产，实急不容缓。”中国代表提案均被大会搁置。

△　何煮石、黄士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漫画研究会，该会为国内研究漫画之惟一团体，成员20余人。

△　长春市政筹备处与日领事议定解决万宝山案办法：中日双方警察均撤离万宝山，由韩人与地主、农民双方派员调查，并延请中日双方调解人协同调查，韩农立即停止引水工程。

6月9日　　陈铭枢奉蒋介石电召由日本回国，是日抵赣州，召集

第十九路军将官训话，勉以维护和平统一，努力“剿共”。同日，陈在赣州通电重任军职，督率第十九路军努力“剿共”。并电陈济棠，劝其息兵，共同“剿共”。

△　国民政府任命冯轶裴为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俞济时为第二师师长。

△　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黄旭初、黄蓟、朱朝森、李任民、黄荣泰、黄钟岳、李任仁、杨腾辉、白志鹃、张任民、梁朝玑、曾其新为广西省府委员，黄旭初兼省府主席，黄蓟兼财政厅长，朱朝森兼民政厅长，李任民兼教育厅长，黄荣泰兼建设厅长。

△　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朱绍良、陈诚、李鸣钟、孙连仲、徐源泉、吉鸿昌、许克祥等驻湘、鄂、赣44将领联名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巩固统一，“以和平为职志，与赤匪不并存”。

△　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电蒋介石，要求调该部出川“讨共”。

△　北宁路局为该局第一号机车“洛克提号”开行于该路唐山至胥各庄段五十周年举行盛大纪念会。北宁路局自“洛克提号”首次运行，经50年惨淡经营，现有干线847公里，七条支线共长505公里。机车255辆，客车345辆，各种货车4365辆，守车及公务车145辆，在唐山、山海关、皇姑屯设有三个铁路工厂。1930年营业额3886.9324万元。全线有工役人员2.8061万人。

△　上海海昌轮局“毓大”轮行至山东成山角西北，在航道上与英国留驻远东之潜水艇“柏斯登号”互撞，英艇当即沉没。“毓大”轮立即抛锚放舢板救护，英官兵拒绝中国船员营救，仅救出35人，二人已死，18人失踪。

△　“滇缅界务研究会”代表贺焜具呈国民政府，请在划清云南与缅甸边境线时，坚持以怒江下游起北纬二十度迄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止

妥为测量，以保国土。

△　长春之日军在警察署长武波、旅团长中川等指挥下，借“满铁”占用地带举行街市巷战演习，不顾我国公安警士阻拦，强行越界架设枪炮。

6月10日　唐绍仪电美国总统胡佛，请其援助广州“国民政府”。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设测量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为委员长。

△　藏兵占领西康理化（今理塘），距康定县仅200里，康军不足1000，藏兵约3000。川军志在割取鸦片与东进，不肯援助康军。

△　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自动收回粤海关，自即日起，粤海关税收悉解交广州“国民政府”。

△　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员在中国电报局内组织电报检查审译处，中外来往电报均须经该处检查后方可送发。

△　蒋梦麟电教育部报告清华大学学潮原因，谓除党与非党派之争外，原校长罗家伦离该校后，教育部对该校学生会所呈请任命的四名校长人选均不采纳，亦是导致风潮之原因。

△　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宣传家蔡和森本年回国赴香港任南方局中央代表，因叛徒出卖被香港英当局逮捕，引渡到广州被陈济棠杀害。

6月上旬　内政部据最近各省区查报统计，全国人口总数为4.74487亿人。

△　司法行政部筹设的中央反省院及苏、赣、浙、皖、鄂、豫、粤等省反省院均已成立。闽、鲁、冀、滇等省正在进行中。四川正在

调查，其他各省应受反省人犯极少，暂不设反省院。

△　驻美国公使伍朝枢因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向南京提出辞职。

△　土耳其因国内缩减预算，裁撤驻华使馆，土国在华一切事务均托荷兰公使代理。

6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致各级党部训令，内称自粤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到广州，对中央攻击目标集中蒋中正同志，此真丧心病狂”，党国存亡皆系于蒋，本党今后应集中一切力量“剿共”，全党均应为此目的共同努力。

△　广州“非常会议”招待新闻界，邹鲁发表谈话，谓广州组织“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意在“根据总理的主张，养成民主制度，巩固民主势力”。现在大家均主张“分共”、“反蒋”，当能团结一致。

△《中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由波兰驻华代办魏登涛与外长王正廷在南京换文，该条约自本年7月9日起生效。

△　蒋介石为入赣“督剿”红军，在总司令部下设党务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专司设计指导各“剿匪区域”的党务及政治。党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中央执委程天放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由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担任。同日，蒋委熊式辉为总司令部南昌行营参谋长。13日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公布《剿匪区域党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剿匪区域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

△　海军部长杨树庄及海军将领陈绍宽、陈季良、陈训泳等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拥蒋，“当勉率艨艟，悉供鞭策”。

△　监察院弹劾立法院立法委员史尚宽利用职权，向安徽高等法院私函请托干涉司法，公然袒护土豪劣绅叶芬，请国民政府移付惩戒。

6月12日　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各党部、各民众团体以及陆海空军将领均参加，全场观众达10万人。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至150团，桂军李宗仁部扩编至72团。

△　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等晋军将领联名电蒋介石，表示“当振师旅，追随钧座”。同日，于学忠、王树常、孙殿英及张作相、万福麟亦分别通电拥护蒋介石。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委任杨虎城代理洛阳行营主任；20日，杨电总部称，因不能离陕，请设行营于潼关。7月6日，杨在西安宣誓就任潼关行营主任。

△　河北128商会通电要求取消产销税。

△　安徽合肥午前大火，至午后5时始灭，延烧周围约三里，烧毁房屋数千间，商号正附户千余家，损失数百万元，万余贫苦灾民无家可归，哭声震天，惨不忍睹。

△　何成濬由汉抵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对记者谈，自粤事变发生后，驻防鄂西军队调移湖南，鄂西红军乘机大肆活动，现刘湘已决定派川兵三万入鄂，驻鄂西、新堤、汉口等处，现驻汉部队将移作“剿共”之用。

△　驻豫第二十路军张钫部缩编为两个甲种师，第二、第三两独立旅取消。

6月13日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开幕，出席者为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叶楚伧、朱培德、吴铁城、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柏龄、邵元冲、朱家骅、杨树庄、周启刚、陈立夫、陈肇英、丁惟汾、曾养甫、方觉慧、王伯群、丁超五、王正廷、孔祥熙23人，候补委员刘文岛等六人，中央监委吴敬恒、蔡元培，候补监委陈布雷等。推于右任、叶楚伧、丁惟汾为大会主席团，陈布雷为秘书长。讨论中

常会提出的三案：一、报告处理广东事变经过，并请决定方针案；二、全国一致协力剿灭“赤匪”案；三、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案。决议三案均交审查委员会审查。

△　张学良副司令行营参谋长戢翼翘在平对记者谈，华北安靖，此次收编各军，自5月起照特定饷章发饷。此后晋、绥各军每月军费100万，由副司令行营筹85万。宋哲元、孙殿英、庞炳勋、石友三各军每月经费百余万，均由副司令行营筹寄。

△　太湖水利委员会决议：一、请划庚款疏浚吴淞口及常州、镇江间的运河；二、与地方政府有关团体接洽募工疏浚浏河；三、勘测长江故道；四、环湖马路工程计划交付审查；五、建设东方大港，应由本会参加意见。

△　日本政府经天皇批准正式公布内田康哉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江口定条为副总裁。

6月14日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大会决议：一、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广东事变处理适当，该案由中央监委会查明处理。二、修正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三、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由国民政府制定《剿匪期内各级行政人员考核办法》。四、废止征求预备党员实施办法，另订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五、定于本年10月10日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六、修正《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第三条，规定政治会议委员不得超过中央执监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并设候补委员，但人数不得超过执监委员的二分之一。七、改推蒋介石、胡汉民、叶楚伧、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何应钦、戴季陶、杨树庄、宋子文、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林森、王宠惠、张继、邵力子、朱家骅、邵元冲、陈立夫、孔祥熙、王正廷、王伯群、朱培德、吴铁城、陈铭枢、焦易堂、张群、何成濬、刘芦隐、马超俊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依《中央政治会议条例》第三条第三项推张学良、张作相、王树翰、张景惠、刘尚清、方本仁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推

方觉慧、王柏龄、陈肇英、丁超五、周启刚、曾养甫、余井塘、桂崇基、程天放、陈布雷、恩克巴图为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八、恢复李济深党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九、中央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各设副部长二人。十、改推中央各部、处人选：秘书长丁惟汾，组织部长陈立夫，副部长余井塘、张道藩，宣传部长刘芦隐，副部长陈布雷、程天放，训练部长马超俊，副部长苗培成、丁超五，马未回国前由方觉慧代理。

△　张继由广州回京，是日在五中全会上报告粤行经过，称汪精卫、唐绍仪态度极和平，古应芬、陈济棠、孙科尚待觉悟。

△　红军贺龙部红三军与李柱中旅在湖北均县武当山激战数天后，向西南退走，武当山被李部占领。18日，红三军攻克房县县城，开创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6月15日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一、通过《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二、通过政府人选：选任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蔡元培、张静江、胡汉民、丁惟汾、于右任、张继、戴季陶、林森、张学良、朱培德、杨树庄、何应钦、宋子文、陈果夫、叶楚伧、邵力子、陈铭枢、王宠惠、邵元冲、刘芦隐、韩复榘、刘峙、何成濬、刘湘、张作相、王树翰、吴铁城、张景惠、刘尚清、孔祥熙、王伯群、王正廷、马福祥、刘瑞恒、龙云、徐永昌、陈调元、何键、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委员。三、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林森任立法院院长，邵元冲任副院长；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张继任副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刘芦隐代理副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陈果夫任副院长。四、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同日，三届五中全会闭幕，吴敬恒致词，称这次会议最大成绩有四：一、确定10月10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二、修改了国府组织法；三、通过了全力消灭“赤匪”决议案；四、对粤方之分裂仍抱和平宗旨。

△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发表《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声称为消灭红军，要求全国同胞“勿存侥幸之心理”，“勿存畏怯之心理”，“勿存推诿之心理”，“勿存观望之心理”。并要求各级党部务必“集中心力完成剿灭赤匪之工作”，“不懈不挠，有进无退”。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凡10章52条。

△　蒋介石在总司令部召集赴赣人员杨杏佛、何其巩、凌勉之、常鸿钧、程天放、曹浩森等谈话，谓此次总部以全力“剿赤”，所取方法与策略为“剿”、“抚”兼施，注重培养民间“自卫”力量，感化“胁从”民众。

△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第十九路军办法。香翰屏、李振球、叶肇、张惠长、陈策、张瑞贵等实力派主张设法与之联络，唐绍仪、孙科、汪精卫、邹鲁、邓泽如等文治派主张用断然手段处置。最后议定：令第十九路军在广州后方办事处一律解散，卫兵缴械改编为工程队，派往燕塘开掘战壕，职员遣散，该路军在各地所募之新兵一律扣留，该路军原官兵在韶关以南者，均扣留。

△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股英籍探目哥尔特率领警士在四川路235号内第四公寓将第三国际派往中国的共产党人牛兰及其妻范特鲁森拘捕，设于该房内之秘密机关被破获，大量机密文件及宣传品被抄去。8月9日，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牛兰夫妇。14日，牛兰夫妇由上海警备司令部解押南京。

△　陈济棠缩短防线，调余汉谋、香翰屏两军驻防广州近郊。

△　梁漱溟与梁仲华等筹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正式开学，梁漱溟任院长、研究部主任。

6月16日　蒋介石拟定“剿共”计划，限一个月肃清，随后立即开始办理清乡，限三个月内完全恢复各地秩序。是日，蒋召集赴赣“围

剿”红军的各参议、处长、主任、秘书讨论出发事宜，并分配工作。晚，总部参谋、副官、机要、交通等处人员集合南京下关乘轮出发。

△　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员会电国民党中央，谓该会成立已三月，届期已满，即日宣告撤销。

△　收回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交涉在沪正式开始，华方代表为司法院参事吴昆吾等，法方代表为法使馆参赞莱加尔等。19日，收回协定议妥，在上海法租界设立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分院各一所，一切均按中国法律进行诉讼和判决。

△　军政部委任毛邦初为航空学校少将校长，负责筹备航校。

△　教育部公布《省市督学规程》，同时废止1929年2月公布之规程。

6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定蒋介石为政治会议主席。

△　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电令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谓自5月28日之后，南京政府发行的债券概行无效，仰该会拒销宁府公债，“如敢故违，不特甘受损失，且系有意助逆，一经查出，定当以反革命论罪”。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重编驻晋各军新番号，是日颁布令到北平副司令部，即立即实行。宋哲元部为第二十九军，辖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商震部为第三十二军，辖杨效欧第六十六师、冯鹏翥第六十七师。徐永昌部为第三十三军，辖李服膺第六十八师、杨澄源第六十九师。杨爱源部为第三十四军，辖王靖国第七十师、杨耀芳第七十一师。傅作义部为第三十五军，傅自兼第七十三师师长，辖李生达第七十二师。另庞炳勋部为第三十九师，孙殿英部为第四十师。孙楚部为正太路护路军，辖一师七个团。荣鸿胪、张会诏部为太原警备军，辖三个团。赵承绶部为大同剿匪军，辖三个旅。周

玳部为炮兵监，辖11个团。

△　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分访宋子文、王正廷，当面抗议大连征收日本从抚顺运回日本的煤税，宋、王严词拒绝。

△　湖南省府决议：自本月21日起，全省开办特种物品出产税；发行救灾公债300万元。

△　加拿大颁布华人移民枢密院令1378号。

6月18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推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程天放及秘书长、宣传、训练、组织三部部长共同起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议题；派程天放、曾养甫、张道藩指导并就近处理江西等处“剿匪”区域地方党务。

△　行政院通告，谓自粤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离省之后，“粤方所发行的一切公债库券或处分官产、公产及以税款预借者，一律应当无效，政府概不承认，该商民等亦不得买受垫借，致干查究而自受损失”。

△　广州“非常会议”决议：本年双十节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约法草案。

6月19日　国民政府特任李书华署理教育部部长；连声海署理铁道部部长；王树翰为国府文官长，王未到任前，由叶楚伧代理；派刘大钧为中国出席国际统计会议代表。

△　华洋义赈会会员颜惠庆、李仪祉、陶孟和等37人在绥远开第五届年会。颜致词，盛称该会在该省萨拉齐、托克托开凿民生渠之功绩。该渠主干工程已于本月18日完工，干道长150里，支渠14道，共长800余里，可灌地二万顷。陕西代表李仪祉报告引泾工程经过及对治理黄河之意见。该会现在共办理三大工程：一、绥远民生渠；二、陕西陇洞渠；三、陕甘大道。今后该会之方针将注重平时防灾工程，

如水利、造林等。22日，萨、托民生渠开闸放水。

△　红四军邝继勋部收复黄安县七里坪。是日吉鸿昌、萧之楚奉武汉行营命赴武汉商对策。

△　上海大地产主、爱俪园及哈同洋行主英籍犹太人欧斯·爱·哈同在沪病死。按：哈同1874年来上海，历任法租界公董局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其后，哈同在沪以6000元资产经营鸦片，获暴利数百万两白银，再经营房地产投机，南京路大量房产均为哈同收买，哈同遗产在一万万元以上。

6月20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会议规程》；特任韩复榘为鲁豫清乡督办。

△　广州“非常会议”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谓全党目前主要任务是：一、在蒋管区成立秘密反蒋组织；二、“共（产党）藉蒋为掩护，蒋挟共以自重，故剿共必须倒蒋，倒蒋必须剿共”；三、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前功”；四、各省反蒋党部要精诚团结，同心同德奋斗。

△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发布《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原定在8月1日召开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在本年11月7日举行。

△　张继在北平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略谓中法学术考察团法方团长卜安在绥西乌盟哈亚尔麻图地方殴辱中方团员，沿途不遵协定，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19日紧急会议决暂停止该汽车队前进，一切工作听候查办。请迅电甘肃、新疆省政府速令沿途地方官查明该汽车队到达地点，即令停止前进。同日，中法学术考察团中方团长褚民谊在北平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谓经与法方商榷，决委曲求全，“继续合作”。

△　上海江海关宣布为保护税收，领海界程奉行政院规定，以落潮标志为起点，自海岸线向外展12海里为海关实施一切海上缉私职权范围。

△　实业、外交、财政三部会商保护沿海渔权办法，决议：制定取缔日渔轮侵入我领海捕鱼办法，除由海关派员巡查外，再由外交部照会日使；实业部7月1日执行取缔日轮办法。

△　河北省各县产销税稽征所多勒收税款，扣留货物，商民极为怨恨，是日新安县产销税稽征所被商民捣毁，所长、职员被殴。

6月21日　　蒋介石离京赴南昌亲自组织对江西红军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其方针为：“厚集兵力，分路围剿”，以主力分由南丰及永丰方面进攻，以一部守备吉安、泰和、万安、赣县等地，先击破红军主力，再逐一“清剿”。其组织为：一、“剿匪”前敌总指挥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三军团总指挥朱绍良部周浑元（代理）之第五师、毛炳文之第八师、许克祥之第二十四师；第四军团总指挥蒋鼎文之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总指挥赵观涛之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陈诚之第十四师、罗卓英之第十一师。二、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下辖第一军团总指挥蒋光鼐部韩德勤之第五十二师，蔡廷锴之第六十师，戴戟之第六十一师。三、第二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之第二十五师、高树勋之第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之第四十七师、李云杰之第二十三师、郝梦龄之第五十四师。四、预备军总指挥卫立煌之第十师、李延年之攻城旅。五、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为公秉藩之第二十八师、罗霖之第七十七师、第十二师马昆之第三十四旅。六、空军第一、三、四、五、七队。25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该“围剿”计划及战斗序列编制。

△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电令所属各部队“拥护中央，巩固统一，清剿赤匪，绥靖地方”，严防政客游说，如有潜入本部游说者，应一律遣送总指挥部发落；如有秘密接洽者，各该部长官可随时拿办。

△　鲁南土匪郭马蜂率匪徒1500余人窜入新泰县境，烧杀抢掠，县城三面被围，是日该县各机关派代表到济南向省府报告，请派兵急救。

6月22日　　蒋介石到达南昌，当即召集何应钦、陈铭枢、鲁涤平、熊式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开会，确定对江西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计划。

△　广州“非常会议”颁发誓词，要求全体党员一律宣誓。誓词内容有“实行三民主义，在最短期间，肃清共祸，推倒独裁。不立派别，决不凭借武力毁法乱纪”等语。

△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逮捕。24日向叛变，淞沪警备司令部奉蒋介石指令，将向就地枪杀。

△　外交部为收回租界，前派李锦纶、王家桢、徐谟分别组织公共、英美、法日三租界情况调查委员会，分赴长江、黄河、珠江三流域调查后，已制定收回租界交涉方案。是日，外交部分别照会各关系国派代表协商。

△　国民政府所派出使西藏专使、缅甸《华文日报》主编谭云山完成使命后途经印度，是日返回上海。另一专使谢国梁因年老体弱，难逾关山险阻，死于途中。

△　自美国总统胡佛提议德国赔款停付一年的消息在沪公布后，标金市场骤起变化，是日金业交易所标金狂跌65.6两之多，为自有交易所以来之巨变。

△　航空署长张惠长因参加广州事变被免职，由副署长黄秉衡升充。

△　中法学术考察团杨钟健等六名团员联名具呈国民政府，指责

法方违约，殴辱中方团员，决心一致退出该团。

6月23日　国民政府核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为训民要则，是日训令各直属机关并转饬各学校及地方团体将此八字制成蓝底白字之匾额悬挂显处。

△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函国府文官处称：首都自本年3月以来，从邮件中扣留“反动”刊物已达140余种，经中央决定，“交通部所请提前停止邮电检查一节，应暂缓议”。

△　红军李明瑞部与国民党军李国钧、王育瑛两旅及团防队在酃县激战一天后，次日李明瑞部退出酃县县城，撤至宁冈境内。

6月2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指定国民政府委员蔡元培、杨树庄、张学良、朱培德、何应钦、王树翰、丁惟汾、刘尚清、孔祥熙、王伯群、王正廷11人为国民政府常会出席人；二、设置卫生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设计全国卫生事宜。

△　国民政府以班禅额尔德尼“志行精诚，翼赞和平统一”，加给“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为剿灭赤匪告同志书》，内称本党将以最大努力和决心，“誓在短期内根本铲除湘赣赤祸”，“望全国同志与政府军队共同努力”。

△　湘省清乡司令部通令：“邻省匪商一律不得入湘境”，省内外真正商人也不能与赣省“赤匪”贸易，对各交通要道、码头，清乡队及各县保安队均须严加防范。

△　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于南京病故。26日，国民政府令，冯轶裴照陆军上将积劳病故从优议恤。

△　福州市因闽江洪水暴涨，全市除东、北两隅外，尽成泽国，

居民溺死甚多，房屋倒塌无数。

△　台湾召开资源调查会议。

6月25日　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在该部防区将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现役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及随从三人在四方台附近拘获，经搜查审讯，中村等人间谍罪证确凿。26日夜，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四人处死，为保密计，并焚尸灭迹。所有证物均送往北平呈报张学良。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任贺耀组、钮永建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二、改推于右任、戴季陶、朱培德、丁惟汾、叶楚伧、方觉慧、陈立夫、周启刚、陈布雷九人为党务工作人员甄别审查委员；三、批准青岛市党部成立；四、改任王宠惠、胡汉民、王正廷、孔祥熙、宋子文、吴敬恒、李石曾、张群为外交组委员。

△　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肇英奉蒋介石之命赴闽宣慰刘和鼎、卢兴邦两师，共商防止红军入闽事宜。是日，陈经上海对日日社记者谈，此次蒋介石赴赣“围剿”红军，文武并进，赴赣前曾规定中央委员除年迈者外，均须分头出发各处督令地方绅士联络团结，借地方力量作政府后盾。

△　汪精卫发表致“改组同志会总通讯处筹备委员会”公开信，内称现在政治上的两大敌人，一、共产党，二、蒋中正，攻击目标已日益显著，今后一切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应团结一致，于最短期间，“肃清共祸，推倒独裁”。

△　国民党中央以广东省党部及广州市党部倾向广州“国民政府”，“不能恪遵中央意旨，指导地方党务”，且时有“蔑法悖理”之宣言，是日令该省、市党部即日起一律停止活动。

△　外交部布告上海中外商民，谓租与日商海洋社之浦东扬子码

头，因该社延不交租，本部按照合同取消其租借权，并将码头完全收回，日方存放该处货物限十日内完全提清。

△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举行落成典礼，由馆长蔡元培主持，到中外来宾2000余人。新馆由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占地70余亩，建筑费70万元，建筑师丹麦人莫律兰，采中国宫殿式，书库容50万册，阅览室同时容200人。现藏普通中文书籍1400余种，14.39万余册，蒙文书籍76种，3713册，以及外文书刊多种。

6月26日　　蒋介石为集中一切力量“围剿”红军，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鲁涤平、曹浩森、程天放为副委员长。杨杏佛等16人为党务设计委员，杨绵仲等17人为政务设计委员。

6月27日　　国民政府任命陈布雷为教育部政务次长，钱昌照为教育部常务次长，钱宗泽为铁道部政务次长。

△　行政院令中法学术考察团全体团员暂停绥西，勿再前进，候与法方交涉查办法方团长卜安。

△　海军部派司长唐德炘在中央广播电台宣传海军扩充计划，略称中国炮舰大半陈旧，总计仅几万吨位，不及英美百分之一，本部拟向外国订造6000吨巡洋舰二艘，1500吨驱逐舰四艘，800吨潜水艇二艘，300吨浅水炮舰二艘，但经费十分困难，望大众出力赞助。

△　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呈海军、交通、财政三部，请迅明令规定中国各港口引水人应由中国国民充任，限期收回现由外国人霸占的各港口引水职权。

6月28日　　蒋介石在南昌分别发表告民众、告将士、告官吏及告党部人员四书，告诫各级党部人员对“赤匪”猖獗应负责任，今后须受政委会指导；各级官吏如再擅离职守，将“明正典刑”，各将士此次“剿

共”如再事因循，勿再见面；各地民众应努力自卫。

△　何应钦在南昌总司令行营与蒋介石密谈后，即带领贺国光、王纶及前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赴抚州督师。

△　南昌卫戍司令涂维藩以接受鸦片烟税贿洋一万元被控，是晚，蒋介石将涂扣押，并令鲁涤平兼任南昌卫戍司令。

△　旅平河南赈灾会电蒋介石及河南省府主席刘峙称：近日河南调赣军队在该省强抓前往关外谋生的难民为伕役，“逃者排枪击毙”，“所抓之伕，锁入闷车中二日，闷死多人”，请下令禁止，“约法新颁，应首重人权”。

△　张学良就东北军一部调入关内引起社会不安发布安民告示，略谓此次入关部队“步兵三旅、炮兵一旅，分驻平、津一带，以重防务”。部队调动乃武备之常，希望各地人民勿轻信谣言。

6月29日　　蒋介石发表《告赣省县长书》，申明“为纠正过去，儆诫将来，凡因公殉难者由国府重恤；畏敌弃城者杀无赦”。

△　上海市教育局公布最近全市各类学校调查统计：国立学校15所，省立学校四所，市立学校200所，私立学校124所，共343校。其中初等学校17，初级小学124，完全小学128，初级中学13，高级中学31，师范学校三，职业学校七，专科学校五，独立学院五，大学10。

6月30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再次发布《告剿赤军将士书》，要求全体官兵须以“决死之心尽军人天职，必忠必信，一心一德，效忠党国”。“倘有攻剿不力或违令、贻误戎机者，将以军中连坐法治罪”。同日，南昌行营参谋处通令各“剿共”军队实行连坐法，“如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长先退者，杀无赦；余以类推”。

△　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取消中法学术考察团；巴黎殖民地博览会称中法考察团为黄种巡察团，与法国人巡视非洲殖民地之黑种巡察团等同相视，决议电驻法公使就近调查，并向法政府提出抗议。

△　西藏达赖驻京办事处长棍却仲尼等具呈蒙藏委员会，内称达赖对于康、藏纠纷早已遵中央主旨停止军事行动，并迭请派员查办，仍有人妄造谣言，诬称达赖进兵不已，以耸国人听闻，引起外交恶感，虽办事处呈明真相，尚难得到谅解，惟有引咎辞职。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顾问费唐应聘来沪已逾一年半，其起草的对公共租界考察报告已发表，工作完毕，是日离沪回南非。7月1日，上海70余工会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工部局发表费唐报告书，痛斥费唐力赞租界制度，反对我国收回租界之谬论，要求政府立即驱逐费唐出境，并要求工部局收回费唐报告书。

△　长春二区、三区受害农民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唆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议决除继续催请政府当局进行外交干涉外，联合各受害村庄进行填沟平坝斗争。

△　教育部令：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辞职慰留，近因吴以暑病时侵，特派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代理清华校务。

△　教育部公布《华侨中、小学校董会组织规程》，凡14条。

是月　中共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河南光山县新集召开，选出鄂豫皖区省执行委员会，沈泽民为省委书记，徐立清、郭述申、王平章、郑位三、周纯全等20余人为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军分会同时改组，并改名为鄂豫皖区军事委员会，直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张国焘、沈泽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钟圣、王平章、郑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邝继勋、周纯全、陈昌浩为委员。张为军委主席，蔡任参谋长，陈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原军长邝

继勋调任第七十三师师长。

△　明月歌舞团与联华影片公司订立集体合同，改称联华歌舞班，黎锦晖任主任，演员有王人美、聂耳、周璇、黎莉莉等。

△　上海大华饭店举办时装表演，参加及观摩者千余人，展示服装有男西服、女长旗袍、晨服、晚服、婚礼服等九大类。

△　“台湾文艺作家协会”成立。

7月

7月1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第三次“围剿”江西苏区红军的命令，蒋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30万国民党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即日开始行动，何应钦之左翼集团军赵观涛部、陈诚部及卫立煌部向南城以北地区攻击前进，陈铭枢之右翼集团军上官云相部由永丰向沙溪前进，孙连仲部由招携向宁都、黄石之线推进。

△　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之韩人强占当地农民之熟地开渠引水种稻事件，地方当局几经交涉无效，日本军警袒护韩人，武装监护韩人在伊通河筑坝引水。是日，该地农民300多人前往平坝填沟。长春公安局第二分局局长田锡毅率七名警察赶往万宝山马家哨口，制止农民填沟。

△　鄂豫皖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河南光山县新集召开，到会代表397人。讨论了强化苏维埃各级组织、重分土地、解决粮食困难、推行财政经济政策等问题。通过了苏维埃政府的临时组织大纲及土地、粮食、劳动、军事、外交、肃反等决议案。

△　广东西江暴涨，江水横溢。三水县上塘附近之大墙围崩决数百丈，围内一片汪洋；北区梅垣围亦决堤百余丈，附近各村难民逃生

者仅三分之一；大埔围决口数十丈，10余乡尽成泽国。北江流域灾情亦重，英德、清远、源潭等地灾民达四万余人，溺毙或饿殍达四五千人，损失数百万元。9日，粤省府拨赈款五万元。

△　上海航政局正式成立，凡苏、浙、皖三省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均归该局管理。

△　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电行政院及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谓巴黎殖民地博览会将中法考察团照片与非洲黑种巡察团并列，“对我国体侮辱太甚”，请严令制止中法考察团前进。2日，金树仁复电称，该考察团仍在玉门附近逗留，屡电要求入境，均被拒绝；法方宣传新疆欢迎法人入境，绝无此事。

△　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议：由日本国内移调一师团常驻满洲，为永久的常驻师团，废止驻满日军每隔二年调换一次的制度。常驻师团在辽阳设步兵旅团司令部一处及步兵一个联队，长春、旅顺各驻步兵一个联队，沈阳驻骑兵一个联队，公主岭驻炮兵一个联队，海城驻工兵一大队，共增关东军二三千人。

△　据《申报》载：驻沪外国领事馆对中国设立禁烟查缉处一事，认为此举是“确增收入而不病良民之政策，尤有益于岁计”。“将来烟土价格高于黄金，则不禁自灭”。据外人估计，中国现有烟瘾者至少有500万人，山西、陕西、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地服代用毒品者，超过五百万，每人年纳烟税20元，即有二万万元收入，足可负担中国全部军饷之一半。惟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办公费将耗费一半。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在江西永丰创刊（后迁瑞金），8月，因反“围剿”停刊，同年12月1日复刊，陆定一等任编委，初为半月刊，后逐渐改为旬刊、周刊和五日刊。

△　上海地产经理处开业。

7月2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修正国民党入党手续；二、通过《党旗、国旗之制造及使用办法》，规定党旗为天青、纯白二色，国旗为深红、天青、纯白三色，以国产原料制做，各单位、各团体均得悬挂党旗、国旗，党旗居左，国旗居右，中间挂孙中山遗像。

△　蒋介石偕随员离南昌赴抚州视察。3日，蒋在抚州再申令各军实行连坐法。同日，何应钦在抚州就任前敌总司令及左翼集团军总司令。公秉藩师整顿补充就绪，向吉安开拔，参加右翼“剿赤”军。

△　晨，万宝山受害农民400余人前往马家哨口继续平沟。日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田义治郎率武警50余名及便衣13人赶到，将与之对话的农民代表孙荣卿逮捕，农民将孙氏夺回，日警即向农民开枪，农民被迫用猎枪还击。中国警察出面制止农民射击，农民被迫解散。

7月3日　　国民政府常务会议决议：添设驻波兰、捷克两国使馆，以驻波公使兼驻捷公使；班禅年俸12万元，中央每月另津贴办事费三万元。

△　全国经度测量会议在南京开幕，由杨杏佛主持。决议组织全国经纬度测量委员会。4日，全国经度测量会议决议，以南京紫金山为基点地址。国内主、次要点由全国经纬度测量委员会决定。测量期暂定二至五年。指定天文研究所、全国陆地测量总局、青岛观象台、辽宁东北大学天文学系、广东中山大学天文台、华北水利委员会、北平研究院、浙江陆地测量局参加国际经度测量。

△　日方先后派出500余名日警前往万宝山，大批日警到达马家哨口后，禁止中国农民进入该地区，并督促韩农加速施工水坝。

△　日人在朝鲜煽动排华暴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汉城、仁川各处日文报刊竞出号外大肆造谣，诬称东北当局下令驱逐韩侨，万宝山之韩农被华农屠杀。韩人受日方煽惑，是日晚起成群结队去华侨居住区游行示威，殴打华侨，捣毁华人商店。仅仁川一处华侨被打伤者

即达百余人。

7月4日　　国民政府公布《剿匪期内各级行政人员奖惩条例》；任命顾祝同为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该军第一师师长；派焦易堂、刘光华、胡仁源等12人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

△　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为动员准备第三次反“围剿”紧急通知各级党部：一、立刻召开群众大会，加强宣传工作；二、迅速整顿各地地方武装；三、彻底肃清“AB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四、立即实行苏区戒严；五、对赤卫军、交通队、侦探队、运输队等组织重新整顿，加强领导和督促；六、立即坚壁清野；七、做好清扫战场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　蒋介石电令闽、浙各将领，谓“剿赤”军已分别到达目的地，总攻已开始，凡与赣省毗连之地区派重兵堵截，严防“此剿彼窜”。同日，蒋介石令赣省各县本月15日前成立保卫团，“协助清乡，实行自卫”。

△　何应钦之左翼军在南丰、广昌间与红军激战。中路孙连仲与陈诚各部进攻宁都。红军孔荷宠、李明瑞部从湘边入赣，与彭德怀、黄公略部连成一气。同日，陈诚部攻陷黎川。

△　驻吉林日总领事石射就万宝山事件向吉省府表示绝对反对从万宝山无条件撤退日警，要求吉省府保障韩农在万宝山安全开垦耕种。

△　驻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第一团第二营第八连排长刘玉珊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打入该部的共产党干部苏一雄（谷雄一）、赫光（万锡福）等遂组织该部士兵千余人发动起义，占领了县政府等机关，打开监狱，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苏一雄任政委，蒲子华任参谋长。高桂滋派大队人马前往“围剿”，起义部队从平定县城向北撤走。24日，起义军攻占阜平县城，26日，成

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府。张学良部沈克师以伪称“投降”的伎俩，将部队开入红军驻地附近的王快、华法。8月10日，苏一雄率红二十四军干部数人前往王快沈部慰问，当即被沈部扣押。11日，赫光率军部重要干部八人到华法慰问，亦当即被沈军逮捕。除苏一雄被解押北平外，赫光等红军干部全部被沈克在当地杀害。起义至此失败。26日，苏一雄被张学良副司令北平行营军法处杀害。

7月5日　　红三军团彭德怀部在硝石口向朱绍良部发动猛烈攻击，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三、四、八、十二、二十二等军同时向南丰、南城何应钦指挥之左翼军发动反攻，战斗异常激烈。因陈诚部已陷黎川，红军恐腹背受敌，遂南撤。

△　朝鲜排华风潮愈烈，汉城龙口华侨宅舍被焚毁，日警当即拘捕韩人101名。同日，朝鲜其他各地均有暴力排华事件发生，华侨避难于中国领事馆内者已达1500余人，伤者300余人。

△　山东坊子日人经营之磨局煤矿积水暴发，淹毙华工28人。

△　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在上海大马路（今南京路）新址开业。

7月6日　　张学良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　汉城中国领事馆电外交部，报告朝鲜排华仍在扩大，汉城、仁川领事馆避难者络绎不绝，平壤新旧街市华人商店全被捣毁，损失40万元以上。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教育部组织法》，规定该部机构设置、职责及人员配置。

△　红军李明瑞部进攻赣州，另一部攻兴国，陈铭枢急电戴戟堵

截。

△　全国各界对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暴力排华事极为愤慨。是日，河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通电呼吁奋起救国。平绥路及平、津两市党部均请中央向日政府严重抗议。北平各报均指出此为日本对东三省武装侵略之先声，东三省前途危急。

△　北宁路唐山南场制造的中国第一辆机车由唐山试驶北平成功。该机车与英、德出品无异，能拖动150根轴。

7月7日　　外交部就朝鲜暴力排华事向日代使提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制止韩人暴行，同时保留要求赔偿权利，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　驻华日代理公使重光葵就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暴动事在沪向中外发表声明书，声称朝鲜排华起于“满洲韩人被华人压迫”，并表示日本决以全力镇压韩人暴徒。至日本出兵吉省说，全无事实根据。

△　国民政府特派施肇基、蒋作宾、王家桢为出席国际联盟第十二届大会代表。

△　张作相到平见张学良，商万宝山案解决办法，张学良主张万宝山案就地解决。8日，张作相离平返吉。

△　日本政府根据前朝鲜总督斋藤提案，拟定今后对朝鲜及满洲问题之根本方针，即所谓满鲜融和政策，内容为：一、韩人归化任其自由选择，准入华籍；二、向东北当局交涉，务使中日韩人在东北能共同生活，日人投资，华人业农工商，韩人耕种水田；三、日人在东北有内地杂居权，要求韩人亦有同样权利，并有土地所有权。以上条件，中国若能承认则可，否则将用最后之手段。

△　何成濬电刘湘、何键，请合力“围剿”洪湖地区红军段德昌部。同时派“威胜”舰驶往助战。

7月8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通过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重要议题，并通告全体党员：（一）修改总章案；（二）改善党的组织案；（三）充实训政时期各级党部实际训练工作及指导社会工作案；（四）改进党的宣传方略，并确定新闻政策案；（五）确定国计民生实施计划案；（六）确定教育设施计划案；（七）确定推进地方自治案；（八）确定国防与外交方针案；（九）促进边远省区之实业及文化建设方案；（十）历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留交全国代表大会案。二、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法》，代表总额为420人。

△　驻华日代理公使重光葵派参赞林出到京见王正廷，答复我国对朝鲜排华之抗议书，谓抗议书已转告日政府，所提惩凶、赔偿、保证三项要求，待本国政府训令后方能答复；内阁已决定严惩韩人暴徒，对死伤华侨及财产损失将与朝鲜总督府协议赔偿办法，现经军警制止，韩人暴动不致再行扩大。

△　外交部令驻朝鲜总领事张维城、驻新义州总领事宋带、驻元山副领事杨佐共同调查韩人排华真相。

△　长春市政筹备处致函驻长春日领事，要求日警立即撤退，严惩开枪之日警，日方必须对其派警在万宝山强占民房、夺取船只、修筑水坝负责。

△　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与美国农部签订《中美美麦借款合同》，中国政府向美国承购麦粉45万吨，供中国水灾区域慈善赈济之用。

△　陈铭枢电告陈济棠，红军一部退入闽境，现奉命绕道出粤闽边境追击，过粤时请勿误会。是日，陈济棠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决议如陈铭枢部入粤，即令前线军队撤回惠州或韶关，必要时再退入广州近郊，以20个团固守东北郊防线，30个团内外游击，并请桂军调

两师驻贺县，必要时进驻小北江。

7月9日　　旅韩华侨代表到京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侨务委员会递呈，请求对韩人暴力排华事件迅向日使严重交涉，并急电朝鲜总督迅速制止韩人暴行，保护华侨生命财产安全。

△　台北印刷工人、基隆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

7月10日　　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即赴朝鲜调查旅韩华侨情形，并加抚慰，事毕回京报告。

△　由朝鲜返回安东（今丹东）避难华侨至是日止已达2881人，各娱乐场所均成临时难民收容所。各界纷纷自动捐资救济。

△　韩族同盟会就全韩排华事发表声明书，指出此次流血惨案发生，全系日本帝国主义者虚构事实，煽动无知群众所为，并非韩族人民本愿，愿中朝两国人民今后更加紧密团结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京对记者谈，万宝山事件系地方性质，外交部已派驻吉特派员钟毓协同吉林省府负责解决。

△　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改用广州“国民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将所部六万余人重新改编为五个军：第一军军长孙光前，第二军军长米文和，第三军军长张学成，第四军军长沈克，第五军军长梁芳启；孙光前兼副总司令及前敌总指挥。

△　溥仪之弟溥杰由日回津，向溥仪转达其旧交鹿儿岛驻军少佐大队长吉冈的话：“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不久或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令兄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　亚洲文化协会南京分会通电反对太平洋国际讨论会在中国举行第四届会议，谓该会系各帝国主义者侵夺太平洋及亚洲之大集团。

又谓万宝山事件及韩人屠杀华侨暴行，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亚洲各民族应一致抗争，以图生存。

△　上海炼钢厂开炉，11日首次出钢。

7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褒扬条例》；任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主要官员：秘书长王树翰，副官处长汤国桢，经理处长苏全斌，医务处长刘荣绂，秘书处长叶弼亮，总务处长朱光沐，军法处长颜文海。

△　石友三部扣留平汉路火车，将存彰德（今安阳市）弹药运往顺德（今邢台市），并向顺德集中兵力。

△　上海劳动大学及附属中学因不断发生反对国民党政策之学潮，教育部下令暂行解散，大学部学生限即日离校，重行登记，中学部停办，学生听候甄别转学。学生被押出校。

△　日本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及副总裁江口定条到达大连。

△　山东德州美国教会设立之卫氏博济医院副院长德佛兰枪杀该院华工王国庆。15日，德州县各团体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宣传大会，到会千余人，决议请省府向美国领事提出最低要求：一、惩凶；二、道歉；三、抚恤；四、停止基督教活动。20日，德佛兰被押解济南，美领事要求释放未准，山东省府将德氏送公安局管押。23日，山东省府受外交部电饬，将德佛兰移送美国领事馆。

7月12日　蒋介石电令何键、鲁涤平，红军向闽边、赣南发展，所有湘、赣毗连之平江、浏阳、万载、茶陵、莲花等处驻军应不分畛域，协同“兜剿”。

△　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让，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13日，于右任电张学良称：“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　李明瑞等率红七军远征到达江西瑞金壬田，与中央苏区红军会师，归红三军团指挥。

△　特派考察西藏专员谭云山向国民政府条陈治藏政策，略谓对藏外交宜取强硬态度，对藏政府宜取柔和方针。并请速派驻藏代表，奖励藏人，宣传三民主义，开设学校，兴办交通，尽妥解决康藏争端问题。

△　汉城全韩民众团体联合大会电中央通讯社转中国国民，对华侨在韩横被蹂躏，深表歉疚，并声明此事并非出于韩人本愿，希中朝切实合作，以谋善后。

△　世界红十字会蚌埠分会电国民政府、安徽省政府等，报告皖北沿淮各县水灾情况：阜阳县被淹五万余家，淹毙2000多人，寿县城垣被水包围，颍上、凤台等县濒淮两岸乡村尽被水淹，怀远县附近数十里一片汪洋，淮河下游各县因洪水决堤，灾情奇重。

△　日军板西中将一行以游历为名，由青岛抵济南会晤韩复榘，窥察中国各地对日民情。

△　威海卫管理专员徐祖善电外交部，报告“利通”轮、“共同丸”运到由朝鲜返国难侨2800人。

7月13日　江西红军撤离广昌城及附近地区，何应钦之左翼军进占广昌，并继续南进。

△　《上海租界略史》出版，岑德彰编著。

△　上海各界代表1000余人联合召开反日援侨大会，决议组织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大会发表宣言，指出此次全韩各地剧烈排华行动，完全为日本政府积极侵略满蒙之表现，为维护中华民族将来之生存起见，一致决议永远对日经济绝交，望全国同胞一致奋斗。并请国民政府拨出一部救国基金电汇旅韩华侨予以救济，切实保护在韩

侨胞。17日，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正式成立，选虞洽卿为主席。

△　朝鲜各地警察当局调查此次参加排华暴行的韩人，总数达1800人。

△　汪精卫在广州总理纪念周作题为《政治的剿共与政治的讨蒋》的报告，声称“剿共与讨蒋，是我们的最大目的”，欲达此目的，归结起来为16个字：“军事剿共，政治剿共，军事讨蒋，政治讨蒋。”

7月14日　行政院决议，电令新疆、甘肃两省政府禁止中法考察团继续考察，并保护其立即出境。

△　蒋介石为防石友三叛变，电令骑兵第三师张砺生部集结郑州附近，第三师陈继承部集结许昌，第十一路军刘茂恩部集结洛阳，完成作战准备。

△　第三十四师师长何振藩被该师第二旅旅长王俊杰在沔阳仙桃镇防地谋杀，王随即假借全师军官名义电武汉行营，请委其担任师长（王曾在宜昌戕杀新一师师长刘鹏，在德安谋杀新三师师长李云龙）。何成濬因王率兵在外，恐生变，虚为优容。8月13日，王奉何电召抵汉，何令军法处将王等一行11人拘捕，并另委张万信为第三十四师代理师长。

△　晋钞突跌，三元四五角换现洋一元，太原市商会会长王肇泰因兑换现金被军警痛殴。

△　四川旅沪同乡会电蒋介石，谓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省府主席刘文辉主持四川军政，川民困苦不堪，7000万人已减至4000余万，恳请俯念民瘼，将二刘所请发行四川善后公债与省公债各2000万元予以驳斥。25日，该会再电国民政府，请严令川军不得向外国购买军火，并饬军政部派员接收重庆等地兵工厂，令饬长江海关查禁军火入

川。

△ 张学良为稳定北方局势，电召与晋军各将领有旧之井陉矿务局长富双英到北平，派其赴晋“宣达中央意旨”，“联络感情”。18日，富与晋、绥各将领接洽圆满结束，晋军各将领表示决不受石友三之任何牵动。

7月15日 石友三电广州“国民政府”称，已遵令组成第五集团军。同日，石部开始由顺德北进。16日，石部米文和师从彰德北进，是夜炸断漳河铁桥。18日抵高邑，19日至元氏，20日抵石家庄，五日内长驱直入300余里。东北军为缩短防线，主动放弃石家庄，撤至滹沱河一带布防。石友三抵石家庄后，与孙殿英、刘桂堂、张学成、孙光前、米文和、沈克等27人联名通电广州“国民政府”及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张学良。

△ 蒋介石下令，凡活捉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来降者，各赏银五万元，割取首级来降者，各赏银二万元。

△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朝鲜排华事件交涉经过，谓朝鲜暴力排华与万宝山事件两案性质不同，应分别向日本政府交涉。

△ 日本驻华代公使重光葵向外交部长王正廷面交日本政府复文，谓朝鲜排华事件，日本政府深为遗憾，惟朝鲜总督府对镇压暴行，救护华侨确尽全力，但认为此次事件是由华地方官压迫，造成万宝山案所致。并谓在韩华侨被害情况传闻失实，据鲜督府之公报华侨死者仅百名，伤者120名。日本政府决以国法严惩韩人暴徒。

△ 中央侨务委员会以快邮代电致海外各地党部及华侨团体，略称日本侵略满蒙，处心已久，万宝山案显系日人暗助，韩人排华更系预谋，在此严重时刻，务望海外侨胞一致奋起，作政府后盾。

△　长春日驻军第三旅团司令部宣布，自是日起废除过去在铁道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华方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日本军队一切军事演习自由实施，无论昼夜。

△　驻沈阳日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府主席张作相提出解决万宝山案要求四项：一、保留万宝山水田契约效力，准韩人来年耕种，所有沟、坝工事，华方不得损坏；二、赔偿万案中韩人损失；三、华方准许韩人在东北自由居住；四、保障万宝山韩人生命财产；华方承诺上述条件，日方军警方能从万宝山撤出。同日，万宝山马家哨口韩人挖渠放水，两岸民田被淹数百垧。日军警在该地搭帐棚20余座，附近三里内不许华人进入。

△　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在南京开场。参加者共2100人。其中或为大学毕业生，或为委任官三年以上，为取得资格，以图进身者均去投考。

△　上海反日援侨大会发出警告，谓自本月14日后仍私自再进日货者，一经查明，当严厉制裁。并通告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自即日起停止进办日货，厉行对日经济绝交。

△　河南省府主席刘峙及全体委员通电报告该省水灾奇重，“旬余以来，信阳、罗山、固始、西平、正阳、淅川、叶县、邓县、郾城、襄城、商水、临颍等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来仅见”，恳请各省市、各慈善团体助赈。

△　《申报》报道：广东水灾严重，北江源潭、清远两属崩决基围数千丈，塌屋逾千，农作物全被淹没。英德、源潭、琶江等处房屋冲毁过半，不下万余家，难民无家可归者达三万余人。粤韶路损失不下100万元，民间损失不可胜数。西江灾情不亚北江，佛山城内街道被水淹者60余处，广三列车停开。东江各县，河源城至观音阁一带，一片汪洋。韩江上游，淹死人畜很多。20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

饬财政部拨款10万元救济广东三江地区水灾。

7月16日　蒋介石电令刘峙为“剿赤军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彭启彪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军团：刘镇华为第一军团总指挥，辖刘茂恩第六十四师、刘镇华第六十五师、李韫珩第五十三师；顾祝同为第二军团总指挥，辖胡宗南第一师、楼景樾第二师、陈继承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唐云山第三十三独立旅；第三军团总指挥王均，辖王均第七师、曾万钟第十二师、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及蒋锄欧铁道炮队，晏玉琮、张有谷两航空队。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各地党部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各省、市党部代表242人，特别党部代表71人，中央指派边疆代表25人。

△　阮肇昌第五十五师攻陷红军方志敏部根据地葛源，捣毁赣东北特委会干部学校、横峰苏维埃赤色团等红军机关。

△　外交部因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抗议朝鲜排华事件之复文推诿责任，无圆满答复，是日向日提出第二次抗议书，重申要求赔偿、惩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　朝鲜京城《东亚》、《朝鲜》两报驻长春特派记者金利三，因宣传鼓动排华，受到韩人责难，金亦引咎自责，登报谢罪，声明系受日领事愚弄，并到吉林省城道歉。是日，日领事竟嗾使日籍巡捕朴昌厦将金枪杀。华警将朴捕获后，旋即为日方索去。

△　邵力子再次离京赴济晤韩复榘，商议石友三部军事异动问题。同日，张学良亦派代表范浦江由平抵济，与韩商共维华北和平事宜。18日，邵与韩、范会商，韩、范表示自当服从中央命令，并愿向石友三作最后劝告。

△　北平卫戍司令、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对记者谈，石友三

部异动，为维护华北治安，不得不增兵防范，已调二旅入关，另六旅随时可以入关。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四路已联合成立军运处，中央军已备有七个师的兵力，第一、二、三师日内可到新乡，第四、第七师及警卫军两师正往华北运输中。

7月17日　国民党中执会电令褚民谊，谓中法学术考察团因法方团长卜安违反合作条例，蔑我团体，辱我民族，即行禁止其继续在甘、新两省考察，并保护法方团员即行出境，令褚即回京。

△　蒋介石从抚州返南昌，电令刘和鼎、张贞率部在两周内肃清入闽红军。同日，南昌行营出动飞机六架散发30万张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的传单。

△　驻晋将领孙殿英电张学良，诋斥石友三不顾信义，并表示对张唯命是听，决不作忘恩负义之事。

△　班禅由北平到天津，对记者谈，本人即赴呼伦贝尔代表中央宣慰，并拟赴青海、西藏进行宣慰工作。

7月18日　立法院会议，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万案、韩案情形及交涉经过。决定交付审查，并指定王用宾等六人为该案审查员。同日，立法院秘密会议通过《民国二十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债额2000万元，由财政部主管发行，8月1日开始发行，至民国三十年（1941）7月底还清本息。

△　刘湘电武汉行营称，已派王陵基师负责鄂境“剿赤”，并电何键请令驻龙山、桑植军队夹击湘鄂边红军。

△　刘峙、刘镇华、李鸣钟、杨虎城、顾祝同等驻豫、陕将领32人联名通电表示拥蒋，声称“凡不顾国家之急而作轨外行动者”，誓当率部讨伐。

△　驻京日总领事上村访署理铁道部长连声海要求减低日货运

价，称日货运价往往高于华货，殊失平等原则，要求减低日货运价。连答以奖励国产政策，各国均有，不能谓不平等，予以拒绝。

△　自上海反日援侨会提出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后，外埠各地到沪采办大宗日货者更多，日商乘机抬价，大量劣货亦推销一空。是日，该埠长江装船出运的货物十分之六为日货。同日，日本邮船会社决议，在中国抵制日货未充分实行之前，将日货尽量运华，开往他处之船只集中开往中国。

7月19日　国民党军八万人猛攻红军重要根据地宁都。陈诚第十四师首先攻入城内，红军向长汀、会昌方面退去。

△　外交部派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驻吉林、长春领事石射、田代在吉林省城会谈万宝山案。日方连退警和取消契约均不答应，更不考虑赔偿问题，经交涉，中方答允“保护韩人”，“维持现状”。

△　通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业，杜月笙任董事长，朱如山任总经理。

△　《星期文艺》在上海创刊，汤增敭主编。

7月20日　驻日公使汪荣宝由汉城电外交部报告视察情况，谓平壤检事局查验、埋葬死难华侨95人，投江失踪者尚多，商店全毁，损失在200万元以上。

△　何键派彭位仁、王东原、陈光中各部分三路进攻湘赣毗连区域红军。

△　上海反日声中日货销路愈畅，转运愈忙。是日，三北、招商、太古、怡和、日清等公司轮船几全数满载日货。日商川崎汽社因货多船少，特电日本调派两千五百吨“龙平丸”来沪加入北洋班内专运日货。大东轮船公司南华班“瑞昭丸”亦提前到达上海，助运日货至汕头、厦门、广东各埠。

△　吴佩孚受成都国学会会长宋育仁之请为会员讲《易经》，以“天德、王道、圣功”为提纲，归结为以“礼教救国”。

7月21日　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

△　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加推邓泽如为国府常委，并特任伍朝枢为最高法院院长，陈融为国府秘书长。同日，颁布《国民政府剿共讨蒋令》，动员第一、四两集团军北伐讨蒋，以与北方石友三反蒋战争相策应。

△　陈铭枢、孙连仲、何应钦三路军在兴国境内会合，“剿共”第三期工作告一段落。蒋介石令呈报有功将校名单分别奖赏。同日，陈铭枢令围攻兴国县城各部先入城者赏洋三万元。

△　驻华日代公使重光葵分别与外长王正廷及外次王家桢、李锦纶会谈韩案善后、万宝山案、在满韩人问题以及取缔中国排日运动问题。

△　于学忠离北平赴保定指挥对石友三作战。次日，于在保定召集旅长会议，布置对石作战方案。

△　孙殿英通电声明，否认参与列名于石友三通电，谓本人向抱“忠义”，“酷爱和平，拥护党国”。

7月22日　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剿赤军总预备军团总司令”，马鸿逵、孙桐萱、曹福林分别任总预备军第一、二、三军团总指挥。

△　韩复榘通电响应刘峙等18日拥蒋通电，并派代表唐襄赴赣向蒋介石报告该部拥护中央。

△　蒋介石电令商震率部出兵娘子关，杨效欧部速由长治、潞城开赴娘子关，向长寿（今新乐）、石家庄进击石友三部。28日，商震

率部经娘子关、井陉向石家庄进发。

△　张学良电勉东北军各将士讨伐石友三，为国除奸。次日，张学良通电奉中央之命，督率诸军，对石友三施行讨伐。

△　何成濬、刘湘、何键等41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对反蒋动乱者，共同讨伐。

△　外交部照会驻华日代公使重光葵，请其转饬即将万宝山日警撤退，并谕令韩农一同退出。同时声明：万宝山非韩人垦居区域，韩农与郝永德佃种契约应根本取消，农民所受损害，应责成补偿，至契约内补偿问题，由特派员钟毓与驻当地日领事商洽处理。

△　南京各界召开反日护侨救国大会，发表宣言，吁请全国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誓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斗争；要求政府厉行革命外交，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日本在华一切特权。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会以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日公使汪荣宝、驻韩总领事张维城对韩案“应付无方，庸懦误国”，决议呈请中央迅予撤职。

△　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偕刘纪文、甘介侯到日本活动。陈在乘轮赴日本途中化名为“外三友三郎”，其妻化名“道子”。

△　教育部颁发“整顿学风”通令称，学生在求学时期“宜悉心为学，不得干涉学校行政，或滥发电文，凌越失言”。

△　豫西悍匪张寡妇（张冰清）被第六十五师在平等县第七区捕获，送交洛阳督办公署审讯后是日枪决。张部匪徒约万余人，枪数千支，匪部已被第六十五师打散。

7月23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告全国同胞通电，略谓接读朝鲜华侨惨案，与石友三叛变，暨粤、桂诸逆犯湘、赣之报，总阅各方

报告，始了然此“四者皆互为因果”，在此“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必期于最短期内剿灭赤匪”，“赤匪有一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

△　蒋介石调集大军完成对东固红军之包围后，是日发出总攻击令。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由富田出发，孙连仲部两师由宜黄、乐安出发，围东固之东；郝梦龄、韩德勤两师由吉安、吉水、永丰攻潭头而围东固之北；罗霖师由城岗围东固之西；蒋鼎文率第九、第二十三师在东固之南为预备队。

△　蒋介石电告于学忠，中央军先头部队已过磁县北进，限期占顺德、逼石门，与东北军夹击石友三叛军。

△　何应钦、陈铭枢、鲁涤平、孙连仲、朱绍良等在赣“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31人联名通电，声讨石友三，并表示服从中央，对石严加讨伐。

△　张作相、商震、万福麟、徐永昌、王树常、宋哲元、于学忠等北方将领76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讨伐石友三。

△　财政部长宋子文偕同机要秘书唐腴庐等由京乘火车抵沪，在沪车站突遭狙击，唐伤重毙命，卫士两人受伤，宋本人脱险。凶手乘混乱逃走。

△　蒋介石之代表葛敬恩在北平与张学良商议讨伐石友三。葛对记者谈，此次讨石部队共计20余万，消灭石部绝无问题。

△　上海市各界为旅韩被难华侨举行追悼会，全市休业半天，并降半旗志哀。

7月24日　国民政府以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带兵叛乱，反复成性，特下令褫夺石本兼各职，着各省市军民长官一体拿办。石所部军队，弃石投新者，中央当一视同仁，甘心附石者，痛加剿办。

△　国民政府令：近月以来，雨量过多，江河暴涨，水灾时闻，着行政院立即派员分往各灾区调查，按灾情统筹救济。

△　陆海空军总、副司令蒋介石、张学良联名发表告第十三路军将士书，宣布此次出兵仅讨伐石友三一人，其余概不深究；如有能献石首级来降者，除超升二级外，另赏洋二万元；带军队来降者，超升一级；带枪一支来降者，酌给洋20元。

△　石友三派代表黄广源到太原分访驻晋将领宋哲元、庞炳勋等乞援，均无结果。

△　驻日公使汪荣宝赴朝鲜各地视察华侨被害状况后，是日抵沈阳。汪谈，在韩华侨遭受损失达240万元以上，目前无法恢复产业，故要求日方全部赔偿，但日方则认朝鲜事件是中国官民压迫在满韩人所致。

△　苏、皖各地大雨成灾，江北运河水势大涨，镇江、扬州间汽车停开，京沪线龙潭至栖霞间铁路被淹没冲断，京杭公路冲坏极多，长途电话不通，苏省水灾为百年所未见。同日芜湖之凤林、麻浦两大圩相继溃决，淹没田地20万亩。津浦、平汉等线因大水，火车亦均停开。

7月25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许世英等九人为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王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以许世英为委员长。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年四川省善后公债条例》，总额为2000万元，年息八厘。8月1日发行。

△　东北军第二军军长、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离天津赴沧州指挥津浦线军事。王部沿沧石路向石友三部进击。同日，东北航空司令张焕相飞抵保定，与于学忠商陆空联合对石作战办法。

△　陈铭枢所率“围剿”江西红军之右翼军攻占东固，红军设立的农工银行被焚毁。红军退往瑞金一带。

△　粤、桂党政军要员在广西梧州开联席会议。27日，会议结束，决议五项：一、李宗仁常驻桂省；二、粤拨飞机12架归第四集团军指挥；三、粤每月助桂款150万元及子弹若干；四、桂军调一师入粤，拱卫广州“国民政府”；五：对滇、黔取远交近攻政策。

△　湖北、湖南两省驻军将领何成濬、何键等33人联名电张学良，一致拥护讨伐石友三。同日，安徽省府主席陈调元、第四十师师长孙殿英亦分别致电张学良表示支持。

7月26日　　南昌行营为严密控制民众，厉行“围剿”红军，于6月在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内成立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该处草拟出保甲法规，由行营颁布在修水、武宁、铜鼓等43县率先实行“编组保甲，清查户口”，规定以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保、甲长由户长“公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充任：一、未满20岁者；二、非本地土著者；三、有“反革命”行为者；四、剥夺公权者；五、曾为“匪”胁从者。

△　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根据地内的武装进行整顿和扩编。所有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称赤卫军，由村到县，编成班、排、连、营、团、师。凡年满18岁的男子，除地主、富农分子和残废者外，均动员加入赤卫军。17岁以下者，组成少年先锋队。至10月间，全区赤卫军组成15个师，县独立团20多个。

△　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在日本与日外务相币原喜重郎举行会谈，提出以对满蒙问题让步，换取日本供应武器的要求，接洽无结果。8月6日，陈自日返粤。

7月27日　　蒋介石电令何成濬与何键“协剿”湘鄂边红军。同日，蒋又电令在赣前线“剿赤军”各将领，自本月28日起，限一日内将东

固、兴国、雩都、瑞金等地红军根据地全部攻克，完全肃清红军。

△　蒋介石通告赣省被国民党军重新占领的各县逃亡在外之土豪、绅士，自即日起，速回原籍，维持地方。

△　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称，目前国内最重要的工作仍是“剿赤”。再者是“实现地方自治、清查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办学校，此数举至今无一个地方能做到，实是政府失职之证明”。

△　驻吉林外交特派员钟毓与驻吉日领事石射在长春就万宝山案进行交涉。钟毓提出，以停工、撤警、废堰、解约为先决条件，再谈赔偿韩农损失问题。石射则要求华方先承认租种契约完全有效，再谈日方撤退军警问题，双方各执己见，会谈停顿。

△　中央军和东北军分南北两路对石友三军发动总攻击。南路军刘峙部攻入邯郸，北路军于学忠部在新乐一带向石部反击。是夜，东北军飞机20余架彻夜轰炸石部驻地。石改攻为守，以清风店为第一道防线，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

△　长江、汉水暴涨溢岸，湖北各地受灾者达40余县。是日，汉口水标高49.5英尺，为长江数十年来未有之新纪录。江、汉两水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侵入汉口市区。

7月28日　收回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协定在外交部由欧美司长徐谟、法国参赞赖歌德分别签字，29日公布。8月1日，法租界会审公廨撤销，正式成立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及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

△　内蒙各盟、旗长电国民政府、内政部及蒙藏委员会，提出保留盟旗制度、维持待遇条件及禁止开垦等项要求。

△　英籍少年韬朋在江苏昆山失踪，是日，驻华英使蓝普森由北

戴河飞抵南京，向中国政府交涉。29日，蓝普森将照会交王正廷，要求中国政府当局查明韬朋下落，交还英当局。王答称此类事件均系因各国不放弃治外法权之故，韬朋原住沪租界，入中国内地不向地方政府呈验护照，地方官对其安全当然不能负责。但允以友谊关系函江苏省府代为查询。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惇发表取缔中国反日运动文章，并训令巡捕在公共租界内，无论何人，凡检查并扣留日货者立即逮捕。

△　汉口长江水位续涨，达52英尺半，水面高出租界道路四英尺多，为近60年来所未见。汉口江堤溃决，数万灾民无处可归。安徽芜湖、合肥良田被淹50余万亩，死亡人畜无数；贵池大圩决口，全埠被淹十分之七。

7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年盐税短期库券条例》，该库券定额800万元，充补助国库之用，月息八厘。本年8月1日发行，分78个月还清本息。

△　财政部长宋子文就广州“国民政府”扣留两广各海关所收新增部分关税，并拟以之作抵发行有奖库券一事发表通告，宣布广州政府所发行的一切库券均属无效。

△　粤桂讨蒋军张发奎、李品仙部分别由全州、桂林动员入湘。8月2日，李部先头部队到达永州（今零陵），张部开抵东安。

△　石友三部猛攻保定，于学忠部从保定退走。刘峙之南路军攻占彰德后继续北进，王树常部由津浦线向石家庄方面西进，石友三部陷于包围中。

△　汤恩伯旅进攻赣东红军方志敏部。是日，汤旅偷袭红军根据地杨村，惨杀红军家属60余人。

△　富双英携张学良指示再赴太原，促晋军迅速出兵紫荆关，侧击石友三部。

△　长江、汉水续涨，汉口市除一高地外，全部浸水，灾民死伤极多。武汉三镇商店大部停业，粮食缺乏，物价倍涨。同日，重庆、九江等地均报水灾。

△　据《申报》载：中国济生会旬日之间迭接安徽、河南、江苏、湖北等省请求赈灾电，全国水、旱灾区已达300余县。灾情严重，该会救济无策。

7月30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新疆省党部原特派员方棣棠等一律调回，改派金树仁、徐益珊、鲁效祖等七人为新疆省党部特派员；二、凡未尽依照中央规定之改组或组织法令进行改组或组织成立之人民团体，暂不予改组，凡未能依照中央规定期限改组或成立之人民团体，须于本年10月1日前一律改组或组织完毕，逾期即视为不合法团体。

△　外交部照会驻华日代使重光葵，内称陈友仁到日购买军火，聘日军事顾问，如日政府允许，将助长中国内乱，盼予注意。

△　蒋介石电中央称，赣南红军重要根据地东固、黄陂、小布口（今小浦）等处均已占领，在赣红军10天内定可完全消灭。

△　赈委会委员长许世英电蒋介石并呈行政院，谓此次被水灾区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16省，灾民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请饬财政部续发赈灾公债1000万元，其基金于新增卷烟税项下或于庚款项下拨充。

△　上海市各界联合召集“剿共讨逆反日援侨”大会，到会者10万余人。王晓籁为大会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反对共产党红军，反对石

友三及广州政府，反对日本唆使韩暴力排华。

7月31日　　国民党中执会电慰蒋介石，称许蒋“围剿”红军“指挥得当”，望“继续扫荡，早竟全功”。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慰勉“剿匪”将士书》，要求一心一德，彻底消灭红军，“安内攘外，在此一举”。

△　国民政府为宋子文遇刺案，重赏缉凶，除上海公安局悬赏5000元及京沪铁路管理局悬赏1000元外，行政院又加赏格二万元。

△　于学忠急调后方预备队反攻保定，王树常部从高阳向石友三后方迂回侧击，石部被迫从保定溃逃无极、深泽一带。同日，石部孙光前师放弃正定向邢台溃退，将正定、新乐、滹沱河等五座铁桥拆毁。南路中央军与石友三部在内丘一带激战。

△　外交部照会日使馆，以东三省日侨无理要求停止大虎山、通辽间中国铁路运输，东三省日侨“自主同盟会”提议封锁沈海铁路交叉点，并反对撤废领事裁判权，拒纳中国政府规定的四项统税，促日当局切实注意，采取适当处置，免生纠纷。

△　朝鲜革命党在长春散发《敬告中国同胞书》、《敬告真正大韩民族，不做日本走狗书》等反日宣传，揭穿日人制造万宝山案及朝鲜排华事件的内幕真相。日人对此极为恐慌。是日驻吉领事命日军警，在日界内挨户搜查朝鲜革命党人，并威胁韩侨如有知情不报，或容留革命党人者，一律以通党反日定罪。

是月　教育部公布《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普通科体育课程标准》。

△　北京师范大学校与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合并，成立北平师范大学。

8月

8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银行业收益税法》；准海军部福州海军学校校长夏孙鹏辞职，任命杜锡珪继任。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中法学术考察团团员自西入新疆者准其通过，停止沿途考察，并令新疆省府派员护送到北平，其由东而西者，仍依照原令即速由原路回北平，禁止其在甘、新两省考察，保护其出境。

△　财政部制定扶植新闻事业办法：一、不征收报馆或通讯社营业税；二、印报用纸，凡系外国进口，分别减免税率，如系国产，一律免税；三、由国库提出指定款项，补助全国新闻事业；四、国际通讯机关由政府倡办。

△　张学良电蒋介石报告讨伐石友三军事进展情况，略谓：自7月31日起，东北军向石部全线出击，在定州（今定县）、安国一带将其包围，石部退滹沱河北岸，第一、二两集团军分头跟踪追击，骑兵在安国、安平、饶阳接应。除电刘峙之南路军在南宫、冀州（今冀县）、衡水一带截击外，并令商震部向无极、藁城挺进。

△　商震率所部抵达石家庄。冯鹏翥部奉令出娘子关，是日，到达井陉，继续向获鹿、石家庄推进。杨效欧部由长治、潞城开娘子关接防。3日，蒋介石以商部出师迅速，迭占要地，电商表示嘉慰。

△　徐向前、曾中生率红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攻占湖北英山县城，生俘该城第五十七师岳盛宣部1800余人，缴枪千余支，重机枪18挺，迫击炮四门。3日，红四军主力从英山向南出击，8日，攻占浠水县城，旋即又攻占罗田县城。19日，红军进攻蕲春漕家河，新编第八旅旅长王光荣以下1000余人被俘，缴枪1200余支，炮14门。旋又

攻克广济县城，直逼蕲春、武穴、黄梅，与江南湘赣红军相呼应。

△　九江江北皖属宿松、鄂属黄梅、广济防水屏障皇堤之潘兴圩、杨家塘段溃决40余丈，江水高出圩内地面三丈多，洪水如瀑布泄溢，人畜死亡无数，被淹田地达5.4万多亩，财产损失约达50万元。

8月2日　　北平张学良副司令行营公布讨伐石友三战报称：一、商震率该部两旅及高桂滋师已抵石家庄；二、傅作义电请出兵三旅参加讨石；三、北路军在定州缴获石部大炮12门、机枪80余挺，步枪甚多，子弹两列车；四、定州、安国间战斗中石部死伤5000多人，中央军死约2000人。

△　汉口丹水池溃决后，张公堤子堤继溃，是日汉口全市被淹，自铁路至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深达三四尺，人民逃避不及，淹死无数。同日，武汉行营成立防水保险事务处，徐源泉为督办，夏斗寅为会办，负责武汉赈灾善后，维持交通及防匪事宜。

△　日本政府将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调充军事参议官，以第十师团长本庄繁中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3日，本庄繁上书陆相南次郎，提出必须“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国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出兵西北利亚各地之目的”。

△　内政部以土司制度有碍行政统一，特咨川、滇、甘各省筹议改革办法，或归并县治，或改置设治局，以符合现行制度。

8月3日　　蒋介石电北平副司令行营，令将石友三残部设法包围，悉数缴械遣散，以免后患。张学良除转电前方将士遵办外，并令派南苑机场飞机10架，连同前线航空队及中央所派飞机一齐出动向石部轰炸，令步、骑各部队迅速完成对石部大包围。

△　讨石（友三）南路军陈继承第三师占领获鹿，胡宗南之第一

师在晋县以东俘石部3000人。顾祝同部抵宁晋。

△ 驻日公使汪荣宝抵南京，向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朝鲜华侨损失情形。

△ 邵伯、高邮、洪泽三湖同时泛滥，淹没田圩万亩以上，为70余年来未有之大水灾。苏、皖两省边境民畜损失甚巨。26日，三湖湖堤多处溃决，邵伯全镇被淹。

8月4日 蒋介石在南昌电国民党中央，坚持“安内可以攘外”，中央对当前国民排日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借口”。

△ 何应钦令陈铭枢右翼军加紧围攻红军重要根据地瑞金，并派机五架助战。

△ 赵观涛部攻占兴国，红军穿过国民党军包围空隙向莲塘转移。蒋介石令赏赵部大洋五万元。

△ 石友三及其弟石友信、参谋长唐邦植率部六七千人溃退鲁境武城县。同日，石致电韩复榘，请向张学良关说，只要保其下野出国安全，愿将所部交韩收编。

△ 邵力子与韩复榘会晤后离济返京，据谈石友三部问题，将由韩在最短期内解决；韩表示将遵中央之命收编石部，石本人若来鲁，必保其生命安全。

△ 张学良所派代表范浦江见韩复榘，表示希望各方共维北方大局。韩表示除与石友三部难以作战外，其他无不唯张命是听。

△ 驻华日代公使重光葵复照外交部，略谓“朝鲜案之直接动机在于万宝山案”，朝鲜总督保护华侨“尽其最善”，而中国政府对“排斥日货运动”不能作有效之取缔，中国政府对此应深切考虑。

△　日本陆相南次郎召集师团长及各军司令官会议，极力抨击日政府当局对华政策软弱，力主增兵满蒙，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日报登载这一内容后，日本全国军人会、青年同盟会及全国各国粹主义团体相与呼应。南次郎随即更换驻华各领馆武官，并令饬新任武官密切注意中国动向和形势。

△　驻朝鲜日军第十九师团、第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进行军事演习。

△　晋军矛盾尖锐。商震率部出关讨伐石友三后，是日，孙楚、李服膺、马骏、高步青等召集各界在太原开会，指责商主晋无何成绩，决议请中央委派徐永昌主持晋省军政。

8月5日　　于学忠之东北军第一军抵束鹿，会同南路军顾祝同部将石友三部二万余人全部缴械，石部师长米文和、孙光前被俘。沈克部9000余人在曲阳投降。手枪旅2000余人，骑兵旅200余人退山东德州，待韩复榘收编。同日，刘峙电告蒋介石，石部被缴械者共三万余人。至此，讨石军事基本结束，南路军开始分批返回原防。

△　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陈光中由浏阳赴醴陵，督部入赣“围剿”红军。

△　外交部电吉林特派员钟毓，饬其与日领事交涉万宝山案时，须向日方切实声明：万宝山一带，既非杂居区域，韩民不得适用垦民权利之规定，韩民必须退离该地。

△　阎锡山由大连返抵大同，旋赴五台河边村省亲。阎表示回晋只为侍奉父病，决不干预外事。

△　上海绸业银行成立，由绸业界暨金融界要人共同发起组织，股本60万元，推王延松、潘公展等11人为董事。

△　青海省府主席马麒病逝，省府主席职暂由民政厅厅长魏玉堂

代理。

△　前浙江都督蒋尊簋在上海病故。

8月6日　　蒋介石电令赣南各县县长，饬其将本县及邻县红军活动情况，及时电告行营，即情况无变化时，亦须每日报告一次，经费准作正式开支核销，提供情报准确及时者，从优议奖。

△　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在上海成立，推许世英、王一亭、王晓籁为主席团成员。该会决议：一、电请政府拨2000万元现款施赈；二、组织500个劝募组分头劝募，每组筹募1000元。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升任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为驻华公使。按：日政府于1929年曾派小幡酉吉为驻华公使，我国政府以小幡曾参与日政府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活动，予以拒绝，两国政府为此事争执甚久，至此方告解决。

8月7日　　国民政府电慰张学良，赞其督师讨伐石友三之功，并对所有前方将士传令嘉奖。同日，国民政府又电讨伐石友三的南路军总指挥刘峙，责其“彻底肃清余逆，底定中原”。

△　商震以晋省情形复杂，向张学良电辞晋省主席及军长职，并保荐徐永昌继任省府主席。张以商督师讨石有功，仍希商能回晋继续任职。

△　蒋伯诚奉蒋介石命，连日与韩复榘及张学良之代表范浦江在济协商改编石友三残部办法。是日，蒋伯诚对记者谈，中央已汇来收编石部经费20万元，石部到鲁境者一万余人。

△　至是日止，汉口灾民增至22万人，急待赈济者15万人，入收容所者仅三分之一，灾民无食者由公私团体每日发给馒头两次。

8月8日　　国民政府公布《河南省民国二十年善后公债条例》，

总额300万元，年息八厘，分10次还清本息，每半年一次，8月10日发行。

△　红军集中主力第三、四、八、三十五军及独立第四师，乘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自沙溪经四昼夜行军至莲塘立足未稳，分防距离过远，首尾不能兼顾之际，向其发动猛攻，第四十七师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某及第一六〇旅旅长张鸾诏、第一六一旅旅长王育德、第一六二旅旅长谭子钧等均被红军击毙，残部逃回沙溪。红军主力乘胜东进小布、黄陂等地，直向毛炳文师紧逼。

△　张学良副司令行营公布，原石友三沈克部改编就绪，委沈为新编陆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归副司令行营节制。

△　石友三在山东德州通电声明解甲归田，将所部交孙光前、米文和统率，归韩复榘指挥。

△　商震、顾祝同、刘峙由石家庄抵北平见张学良。刘峙谈，现讨石军事结束，南路集团军仍回豫原防，豫省有地方保卫团70万人，豫土匪渐肃清。

△　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王家烈电南京称，桂军因石部叛变，急谋响应，准备即日进攻湘南，因衡阳、宝庆（今邵阳）防卫甚固，又改为进攻湘西。同日，桂军李品仙、覃连芳所部已抵全州、黄沙河等处，湘西吃紧。

8月9日　　汉口长江水标达50英尺五英寸之新纪录，灾民惨状日益加甚。何成濬电行政院请拨庚款浚江。

△　驻吉林外交特派员钟敏对《大公报》记者谈，万宝山日警已于8日撤尽，本人与日领石射会谈六次，仅达成撤警协议。其余赔偿等问题均未谈及，华农损失正派人调查，韩农损失当责令郝永德破产赔偿。

△　何成濬因武汉下游水灾，曾电何键开放米禁，是日何复电拒绝，谓湘省滨湖产米各县亦遭水灾，秋收绝望，补救无从，本省谷米自给犹不足，碍难开放米禁。

△　石友三残部王心德、张国乾两旅及特务旅由参谋长唐邦植、师长梁芳启统带，开到指定地点临邑等地候韩复榘派员收编。

△　河南省赈务会主席张钫电行政院、内政部、财政部、赈委会，报告豫省受严重水灾者已达40余县，请求急赈。20日，张钫电蒋介石、张学良及救灾会，报告该省水灾祸及53县。9月1日，张再电告蒋介石、张学良，灾区已达67县，难民1500万人以上，请急赈。

△　吴佩孚偕眷属、随员及卫队百余人离四川灌县，取道汶川、茂汶、松潘出黄胜关进入甘肃，结束了自1927年败逃四川后的逃亡生活，图谋利用甘、宁、新、青四省之旧部东山再起。

8月10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甘肃省政府，省府委员刘郁芬、杨慕时（兼建设厅长）、李象臣（兼财政厅长）、叶蓉（兼民政厅长）、郑道儒（兼教育厅长）、赵元桢、韩俊杰、马麒、张允荣、赵席聘、李朝杰均免本职及厅长兼职；任命马鸿宾、杨思、谭克敏、张维、水梓、喇世俊、贾缵绪、马文车、李朝杰为甘肃省府委员，马鸿宾兼省府主席，杨、谭、张、水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命高鲁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免去其教育部部长原职。

△　红军主力重创上官云相部后，是日对龙冈、黄陂、中村、石马等地的第八师毛炳文部发动猛攻。11日，彭德怀部由蜈蚣埡袭击毛师侧背，李明瑞部绕至钧峰及杨依等处袭击毛师右侧，毛师四面被围，四个团被歼，团长陈肇璜、杨茂财被俘，萧中立等12个营长被击毙，被俘官宾4000余人，枪3000余支，子弹40多万发。毛残部退回

宁都。

△　日政府答复朝鲜排华案我国第二次抗议的复文送达外交部，日政府认为该案起因于满洲境内韩农受华人压迫，又谓仅平壤死华侨190多人，其他地方无死伤，总督府措置无何失当，不承认国际法上之国家责任，对鲜案无赔偿损失义务，仅允对被难华侨自动抚恤。

△　鄂省发生严重水灾后，各方对水灾责任问题极为注意，各报亦有评论，指责灾前未能预防，临急不能应变，贻误苍生，不严加处罚不能平民愤。是日，何成濬在省府纪念周上报告，谓此次水灾为60年来仅有，据本人实地调查，责任决不能归咎任何个人，任何妄图趁此机会排挤别人下台，决不能得逞。

△　河北省民政厅长王玉科对《大公报》记者谈，该省天灾人祸交集，受重水灾者18县，损失土地1.62万顷，价值4860万元，被灾人口26.24万余人；旱、雹、蝗、蝻及讨石战争被灾者不下90余县，民房毁坏无数，溃军所至，十室九空，兵灾损失远过水灾。

△　刘镇华晤刘峙，请拨石友三部被俘士兵3000人归其收编，刘峙电令汴行营照办。

△　戴季陶在中央党部暨国府联合总理纪念周报告举办首届高等考试经过，本届共录取99人，考生来自全国16省，2184人。其中女生20人，无一被录取。陕西、甘肃、宁夏、内蒙、热河、绥远、黑龙江、云南等省因参加考生较少，无一被录取。今后大学毕业考试，由政府组织，以补救国家考试不足，边远各省及蒙古考试制度，要有同等建设。

8月11日　国民政府令：任命马麟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准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辞职，任命徐永昌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嘉奖讨伐石友三战役的全体官兵，其伤亡者，从优议恤；兵灾区域着该省政府妥筹救济。

△　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批准青海省政府所拟取消土司办法。所有土司原征地亩改归县府征收，每年酌给土司赡养费若干，并体察情形，予以相当名义。

△　石友三部被俘师长孙光前，是日自束鹿解往开封审办，临上车时企图乘机逃跑，被押解士兵开枪击毙。

△　东北军暂编第六旅刘桂堂部在大名叛变。刘在大名通电诡称，本人因病住院，部队已交团长刘怀志全权办理，善后事宜本人概不负责。13日，中央军第四师徐庭瑶部奉令围攻大名城。21日，刘率本部从大名城突围，向山东边境逃窜。韩复榘部骑兵旅李宣德部会同徐庭瑶部追剿。

△　新疆富蕴卡拉先格尔山（北纬46°44′，东经89°54′）于5时18分43秒发生八级地震。波及东至蒙古，西达苏联的赛米巴拉金斯克，东南抵兰州，断裂带长达170公里，宽数十米至数百米。

△　据《申报》报道：长江下游一带，发生61年来特大水灾，沿岸城市陆上交通几乎断绝，湘、鄂、皖、赣、苏五省受灾人口约达2300余万，倒塌房屋一万余户，耕地被灾者达全国总面积的12％，整个损失超过20亿元。

8月12日　立法院呈国民党中政会称，本年国家财政预计不敷总数达2.8万万元，舍募集公债库券外，几别无办法，中政会对此重大问题应有整个妥善计划。

△　王树常在天津对记者谈：讨石战争虽已结束，但第二军暂不能复员，现驻扎河间、任丘、高阳、沧县一带从事清乡。此次讨石战争河北省被兵灾波及者达90余县，划入战区者40余县，全省所受损失达2000万元。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推戴季陶、丁惟汾、方觉慧、朱家骅、

刘尚清、邵元冲、王树翰、钮永建、焦易堂、程天放、刘芦隐、叶楚伧12人为法制组委员，指定戴季陶、钮永建为召集人。

△　中国出席第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代表朱懋澄返抵哈尔滨，对记者谈，大会5月28日开幕，6月18日闭幕，通过非工业童工之最低年龄案，煤矿工人工作时间案，重议满期公约案及修改会章案等，中国以27票当选为副理事。

△　上海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派员检查日货以来，屡有查获，是日，又在浦东码头查获大批正欲运往牛庄的日货匹头棉纱，当即全数扣留。日商人引来日水兵武力截夺，将检查员四人劫持而去，并加以殴辱。14日，上海市长张群向驻沪日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严重抗议，指责其蔑视中国主权，违背国际公法，要求依法惩凶、赔偿，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8月13日　国民政府令：免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兼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蒋作宾本兼各职，任命蒋为驻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任命王广圻为驻波兰特命全权公使。

△　内政、财政两部及赈委会联席会议，讨论筹款急赈水灾，议定将盐税库券200万元向沪各银行抵押100余万元急赈苏、浙、皖、鄂、豫、赣、湘七个重灾省，另请行政院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

△　宋庆龄因母病故由柏林回国，是日抵达上海。宋旅欧二载，游历法、德、瑞士等国。本年南京政府、广州政府屡电宋，请回国参与政事，但均不答复。

△　韩复榘邀马鸿逵等商鲁省防务，议定：马之第十五路军防地为泰安、兖州至济宁，鲁西由马酌情处理；韩之第三路军曹福林第二十九师任兖州以南、临城（今薛城）、枣庄、临沂一带防务，接替王均、陈耀汉之防地；谷良民第二十二师驻防曲阜、邹县；新收石友三残部6000余人，因程希贤坚不就任改编之师长，将其一部拨给乔立志

之第七十四师，另一部拨给展书堂之第五十八旅，将展部扩编为师。

△　澳门弹药库爆炸，俨如地震，炸死外人五名、华人19名，炸伤外人、华人数十名，损失在100万元以上。

△　上海日商开会讨论运输日货办法，决定用武力反对反日会检查日货，装运日货请日海军保护。日领事及海军当局对此表示默许。

△　美国洛杉矶市总商会组织的远东商业考察团到达上海。该团将在中国各地视察商务情形，成员20人均为洛杉矶商界要人，团长为商会会长麦德逊。

8月14日　国民政府为统筹救灾，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16日，水灾救济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决议聘中外知名人士为该会额外委员帮助募集赈款。

△　赈务委员会开第一次委员会，许世英主持，决议请国府令饬各主管部、会从速实施治水方案，并通知各省府调查水灾情形。各省赈款分配为：皖、湘、鄂各17万元，苏、赣、豫各13万元，浙八万元，汉口防疫费二万元，川急赈一万元。21日，赈委会呈请国民政府将一切不急之建设事业暂缓兴办，提前实施治水方案。

△　考试院长戴季陶兼本届高等考试主考官，因对考生刘锡章的考分计算错误，向国民政府提出自劾，呈请国府撤职查办。21日，国民政府常会决议，罚扣戴俸饷三个月。

△　张学良在北平对韩复榘的代表宋式颜谈，石友三部各师长，除孙光前身死，沈克改任新编第一师师长，米文和被委任为副司令行营参议外，其余各师、旅、团长多在逃，但概不深究，允其悔过自新。

△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电中央，请咨国府令晋省府及驻军将阎锡

山拿办，以肃法纪。

△　哈尔滨官商航业联合总局因营业与当地商帮冲突，为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14县商帮所反对，是日结束。该局自4月23日成立半年来，共获利200万元。

8月15日　国民政府任命吴凯声为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并令吴继蒋作宾为出席国联第十二届大会代表。

△　蒋介石训令在赣“剿赤军”各部，“务须以成仁之志，与赤匪决死生，于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并拟手令数道，劝红军撤退区域民众立即返家，三日内返家者一律以良民加以保护。此手令由政训处印就10万份，派飞机散发。

△　行政院通令各部、会及各省、市政府，重申中央银行为惟一国家银行，各机关汇存各款均应交存中央银行，不得交其他银行。

△　南昌行营划分江西“剿共”区域及非共区域，修水、武宁、铜鼓、宜丰、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吉安、莲花、吉水、遂川、永丰、泰和、万安、安福、永新、宁冈、金溪、宜黄、乐安、南城、南丰、黎川、广昌、资溪、上饶、玉山、广丰、铅山、弋阳、贵溪、横峰、余江、德兴、南康、赣县、雩都、信丰、兴国、宁都、瑞金、石城43县及东固改设之“平赤县”为“剿共”区域，其余38县为非共区域。

△　驻墨西哥公使熊崇志就墨大规模排华事向墨总统抗议，墨总统表示对华侨允予保护。

△　外交部接驻北平罗马教皇代表安多尼电称，教皇对中国各灾区深表同情，特捐助25万里拉（意币），由扬子江流域各罗马教会分别经办救济事宜。

△　长江水势续涨，凌晨汉口日租界防堤亦溃决，浊水横溢，一片汪洋。汉口发电站被淹，全市断电。同日，武昌大堤亦溃决，该地

无自来水，水井被大水淹没，市民苦无饮水。

8月16日　汉口长江水位续涨，水标已突破53英尺，数万灾民惟一避难处所铁道线，已没水底，现已无栖身之地。武昌灾民已达20万人，汉阳灾民五万余，汉阳兵工厂深水处达两丈。

△　据贵州省驻京办事处向赈灾会报告，该省30余县遭水灾，恳请救济。

8月17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邓演达，因叛徒陈敬斋告密，连同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十余人于下午3时许，在沪愚园路愚园坊20号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会同公共租界探捕逮捕。当日晚，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余洒度等20余人也被逮捕。21日，邓演达由上海押送南京总司令部军法司暂押候审。蒋介石对邓案批示："煽动军人，扰乱邦家。"

△　国民政府特令嘉奖张学良、于学忠、王树常、商震、韩复榘、刘峙、顾祝同诸将领，赞其讨平石友三叛逆之功。

△　李培基电行政院及张学良，请辞绥远省政府主席职。19日，国民政府准免李绥远省府主席职，遗缺由傅作义代理。

△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赴省府会晤省主席臧式毅，交涉中村事件，臧表示立即调查。同日，在沈阳之日本陆军当局发表"中村被害之第一次报告"。

△　鲁迅在上海发起举办中国现代木刻第一次技法讲习班，邀请日本内山嘉吉讲授木刻艺术。鲁迅任翻译。

△　上海各轮船局接汉口急电，武汉江水已达55英尺六英寸，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被淹没。同日，住有千余名灾民之汉口甲子旅馆倒塌，其他民房，亦不断倒塌，死伤甚多。

△　鄂省民政厅长刘文岛在省府会议报告称，这次武汉发生重大水灾，是萧耀南在鄂主政时只求个人打算，在樊口为彼个人筑堤造田所酿成。

△　哈尔滨双合盛皮革工厂被火焚毁，损失500万元。该厂为全国惟一国产皮革大工厂。

8月18日　日本政府公布中村事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对于中村在我国兴安屯垦区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曲意隐讳，略称：中村一行五人6月27日左右到达洮索路终点葛根庙附近之民安镇，正在该处餐馆用餐之际，突有兴安屯垦军第三团所属官兵数人入餐馆检查，命中村一行停止旅行，中村示护照，亦无效，均被捕。枪六挺及随身衣物都被掠去，未经提示任何理由，竟将中村一行绑赴兵营后之山林中枪毙，7月1日复堆积木材焚毁尸体。

△　国民政府电调处西康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争产案之蒙藏总务处长唐柯三，饬其对康藏交涉地点问题，无论在昌都、在甘孜均暂不议，以藏方先从西康撤兵为前提。

△　陈诚、罗卓英两师与红军在宁都、兴国之寒下、寄下一带激战，红军利用山地有利地势作有力反击。陈诚乃于是日令部纵火烧山，红军及民众烧死甚众。

△　江西省旅京同乡会以安徽省府主席陈调元将调任江西省府主席，特电蒋介石表示反对调陈入赣主政，并电请赣各级党部、团体一致反对。

△　内政、外交、财政、实业四部会商，以各地水灾奇重，秋收无着，决议缓禁外米输入。

△江苏省政府决议由财政厅再拨10万元急赈本省水灾，并令全省公务人员捐俸助赈。

△　国民政府美籍顾问贝克等抵武汉视察灾情，并调查救济灾民及粮食供给办法。贝克巡视后谈，武汉灾情之重，超过原来想象，救灾实无具体办法。

△　鄂城樊口江堤溃决数百丈，淹没阳新、大冶、鄂城等七县。

△　驻沈日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街市战斗演习，交通断绝，华警惧惹日军，不敢干涉。

△　青岛日商志摩正彰与华人孟吉瑞因细故发生争执，警察前往排解，志摩召来日侨“国粹会”打手数百人，持刀棍参加殴打，华人重伤10人，轻伤30余人。19日，青岛日侨开会，请日政府派军舰保侨，妄图重占青岛。市政府向日领事抗议。25日，市政府与日领事商定彼此道歉，此后双方切实防范，对于当日肇事人，双方各自查实严惩。

8月19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责成财政部及主计处调查各省目前经济状况，并将各省分为“自给省区”、“不足省区”、“有余省区”三类，订定标准呈核。

△　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北平私寓拜太虚法师为师，行参拜礼。

△　上官云相返南昌行营报告丧师经过，谓所部第四十七师、第五十四师自本月6日起在良村、莲塘被红军六七倍兵力包围，血战四昼夜，弹尽援绝，损失极大。

8月20日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称，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定本年10月10日召开，大会经费预算为44.584万元。令转饬财政部如数拨发。

△　国民党中执会决议：侨务委员会改隶于国民政府，推吴铁城、周启刚为该会正、副委员长；中央党部另组海外党务设计委员

会，指定陈耀垣、萧吉珊为该会正、副主任。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略谓此次灾区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5000万以上，“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望全国同胞“拥赞政府，力图挽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孙本文在中央广播电台报告“近三年来全国大学及专科学校概况”，称全国根据大、专学校组织法办理之公、私立大学共58所，专科学校27所。

△　陕西灾情通讯社报告汉中大水，称汉水河堤横决，沿江石泉、镇巴、紫阳、岚皋、镇坪、平利、白河等10余县尽成泽国，待赈者数十万人。

△　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内阁会议上提出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中村）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等人则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公开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利益”。

△　日本驻朝鲜第十九、二十两师团全部调往我国边境图们江沿岸。

△　张学良副司令行营通令所属各军队，声称“近两月来在北平市破获共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共党华北军委会、河北省委会、北平市委会等各重要共党机关五十余处，捕获共党男女要犯百余人”，并称根据所获证物，共产党在华北的工作“多以我东北军作对象”，特通令华北各军一体严防。

△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日本民政党议员菊池良一，作长时间会谈。蒋希望日中及亚洲各民族为黄种大联合而奋斗。菊池请蒋酌用日本教官10余人及中止排日行动。蒋均采纳。

8月22日　外交部就朝鲜暴力排华案照会驻华日公使重光葵，提出第三次严重抗议，声明日本政府应对该案负全责，要求日政府正式道歉，处分负责官吏，严缉暴徒，赔偿损失，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

△　蒋介石离京赴赣继续“督剿”红军，23日抵南昌。

△　广州“国民政府”在德购买大批军火，由德商利克茂轮船公司“波那号”轮运抵沪，是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搜获，全部没收。

△　日皇对长江水灾赠款10万日元，是日由外务省汇往上海驻华公使重光葵，嘱转交宋子文。27日，重光赴外交部，代表日政府慰问中国水灾，并告日皇捐款10万日元赈灾事。

8月23日　宋庆龄函《申报》、《大公报》声明：“此次因母丧回国，暂拟留沪休养，外传和平运动，绝未参预。”

8月24日　蒋介石在南昌再次悬赏捉拿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除原赏五万元外再加五万元，并宣称，红军中凡能指认以上四人而活捉者，亦“免罪重赏”。

△　邵元冲在国府总理纪念周上报告全国水灾情况，略谓近两周来各地水灾更加严重，长江流域被灾区域，南北约1000余里，东西约1500余里，面积达150万平方里，灾民达六七千万，望政府及民众动员整个国家力量共谋救济。

△　蒋介石复电韩复榘，准将石友三残部改编为一个丙种师，番号为陆军第八十一师，以原第二十师第五十八旅旅长展书堂升任师长。

8月25日　甘肃发生政变。该省驻军原冯玉祥旧部、现新十八师师长雷中田会同国民党中央派赴视察甘肃之特派员马文车将省府主席马鸿宾扣留。30日，蒋介石据报，即电令马文车查办，称此事“如果

属实，实属反抗中央，目无法纪，限文到即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中央命令决不更改”。

△　导淮委员会讨论整理淮河流域土地条例，规定在淮河流域水道系统以内，所有滩荡湖田及旧时河漕机关或其营弁、船户、屯户等所经营的土地凡未经依法正式确定私有权者，均收归公有，由导淮会整理。

△　河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电国民党中执会，请严缉阎锡山，并将阎自民国成立以来十九年中所剥夺山西民脂民膏数千万元全部没收，用以赈济江、淮水灾。

△　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及全国37家影院联合发表赈济水灾义演电影启事，由联华供应影片，全国影院于9月1、2两日日夜放映，以售票所得半数交中央赈务会赈灾。

△　徐永昌、杨爱源、葛敬恩由太原抵达北平。徐对记者谈，阎锡山自本月5日返晋后，本人曾与阎会晤两次，阎表示根本不愿再问政治，愿在晋乡间作一老百姓。

△　上海飓风，外海、内河航运全部停顿，水面交通断绝历48小时。是日，政记公司“广利号”轮船由安东开往青岛途中，亦因飓风在青岛港外触礁沉没，死乘客15人。

△　南京市郊江宁县沙洲圩溃决数十丈，农田被淹七万余亩，被灾难民三万余人。

△　天津各界对日外交后援会决议严厉抵制日货，定9月2日开始检查，由各校童子军担任，并派检查队封锁海口，制止日货上岸。

8月26日　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公职人员捐薪赈灾办法，规定月薪百元以下者捐5%，200元以上者捐10%，400元以上者捐15%，600元以上者捐20%，以三个月为限，于本年9月至11月内扣缴。

△　何应钦、陈铭枢奉蒋介石电召由前线返南昌，何应钦向蒋报告赣东南之广昌、宁都、石城、乐安、雩都及赣闽边与红军作战情况，陈铭枢报告赣西南之吉安、永丰、泰和、兴国等处与红军作战经过。随后，蒋与何、陈商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　北方将领在北平开重要会议，徐永昌、韩复榘、傅作义、戢翼翘等均出席，讨论阎锡山出洋问题，韩主促阎立即出洋，徐主暂缓。

△　青岛日侨凶杀华人案发生后，日人不断挑衅，是日日侨所办《青岛新报》发表社论，公然提出应向国联提议“将青岛之租借还原”的狂妄主张。

△　外交部正式发表驻日公使汪荣宝关于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该报告主要记述了朝鲜平壤、镇南浦、京城、釜山、仁川、新义州、元山等排华最严重之地的大略情形以及万宝山事件的真相。

△　驻华日公使重光葵将日政府答复万宝山案牒文送交外交部，该文诡称万宝山事件系由中国当局引起，竟引用废弃的“二十一条”为依据，申辩日领派警至万宝山为合法。

8月27日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救济水灾办法：全国一切非切要建筑一律停止，将经费移借救灾专用；中央党部之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部作用购买赈灾公债；严惩忽略堤防建设之官吏；奢侈品加税，移救灾民；禁止屠杀耕牛。

△　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召韩复榘、徐永昌、傅作义及东北军各将领讨论阎锡山、冯玉祥出洋问题，议定阎、冯若出洋，旅费可由中央及东北负担，中央可给予相当名义，并保障其沿途安全。31日，张学良与韩复榘等对阎锡山出晋问题商定三项措施：一、劝阎自动离晋；二、如不听从劝告，以北方全体将领名义去电劝告；三、如劝告不听，则用必要手段敦促。

△　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飞抵武汉视察水灾。朱谈称，鄂灾奇重，须大规模救济。同日，天津市各界成立水灾救济委员会，推张学铭为委员长，市府决议先垫二万元，并向银行界借10万元即日汇汉办赈。

△　汉口美国德士古火油公司发生火灾，损失储油10万桶，价值400万元左右。

△　中国工程学会与中华工程师学会正式合并成立中国工程师学会，推韦以黻、颜德庆、凌鸿勋三人为会长候选人。

△　国民政府主计处制定民国二十年度中央各类总概算，计党务类624万元，国务类1098.5347万元，军费4.06617220亿元，内务类710.4386万元，外交类953.0670万元，财政类7885.7665万元，教育文化类1848.5505万元，司法类209.7273万元，实业类750.4634万元，交通类352.9519万元，建设类241.9579万元，债务类3.43404644亿元，补助类8031.1319万元。

△　驻大连柳树屯之日本铁道守备队秘密调至沈阳。

8月28日　蒋介石乘“永绥”舰到武汉视察水灾，翌日在舰上召集何成濬等商议赈灾办法，并令湘、赣两省弛米禁，令武汉中央银行拨30万元活动金融。

△　驻墨西哥公使熊崇志电外交部报告墨政府限华侨9月2日前全体出境，经交涉无效，美国政府已准华侨过境暂避。

△　庞炳勋部改为第四十军，是日庞在河间防地就军长职。

△　刘桂堂率残部窜入鲁西，是日抵鄄城县境。第二十二师谷良民部第八十六旅、八十七旅、骑兵旅及各县民团联合围剿。

8月29日　署理铁道部长连声海因前部长孙科经手各项公款多无

着落，公谊私交，处境两难，特向中央辞职。是日，行政院指令慰留。

△　江苏省政府全体委员因无力救灾电国民政府自请惩处，略谓此次运河决堤，淹及七八县，省府“防御无方，救济力薄，使数十百万人民，死无所窆，生无所归，溺职之罪，无所矜逭，请严予惩处，以敬泄沓，而谢人民”。同日，省府临时会议决议：通电全国助赈苏灾；通令告诫各县长及所有公务人员，不得借故请假，擅离职守，如违严惩不贷。

△　山西炮兵总监周玳谈晋省剿匪近况，谓晋南晋北，十县九匪，广灵、浑源一带，高桂滋之叛兵已聚1000多人；天镇一带石友三旧部悍匪王大美部数百人。以上两股均由赵承绶、张会诏两司令负责会剿；兴县、临县、岚县一带，陕匪吉老六等股，正由杨耀芳师追剿；蒲县、隰县一带有匪2000余人，由杨澄源师联合杨耀芳师会剿。

8月30日　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吉鸿昌自河南光山通电声明，因“剿赤”无功，不堪治军，所任本兼各职于是日移交李鸣钟接任，本人将解甲归田。

△　据《申报》讯，武汉警备司令部公布武汉水灾情况调查，全市被淹者16.3万余户，78.2万余人。另据同日《申报》报道，湖南省受水灾区域达54县，灾民1400万，其中死亡20余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长沙市大部浸水，中央所拨赈款17万元无济于事。

△　陈铭枢闻粤桂联军出师湘、赣，电陈济棠劝阻，请停止出兵，勿为共产党张目。

8月31日　国民政府任命吴铁城、林森、周启刚、曾养甫、陈耀垣、肖吉珊等37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以吴铁城为委员长。

△　芜湖水势续涨。淹毙尸体因无棺掩埋，为防止漂流，整批系于树上，西梁山已积尸600多具。

△　蒋介石在湖北省政府各机关扩大纪念周作报告，谓“水灾并非奇事，政府办理救济亦甚努力”，今后党政军各界应共同努力战胜自然，人定可以胜天。同日，蒋发表《告水灾被难同胞书》，要求“被难同胞遵守秩序，镇定心神”，政府必尽全力救济、保护灾民。

△　湖北省水灾救济委员会顾问方本仁谈该省灾情，谓灾区占全省面积五分之三，灾民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二，已达2000万，仅汉口一地死男子3000，女子5000。目下该省非赈莫生，坐以待毙者数十万人。

△　外交部派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驻吉日领事石射继续谈判万宝山案，石射坚持不允韩人从万宝山一带迁走，声称根据民国四年5月7日签订的中日“二十一条”，韩人有杂居东省内地权。

△　现代诗人、小说家蒋光慈病逝。

是月　杨贤江在日本长崎病逝。

9月

9月1日　蒋介石在汉口发出“弭乱救灾”之通电。略谓“中正奉命视察灾区，自苏而皖，自赣而鄂，上下千里，氾滥洋溢，横决浸淫，庐舍荡然”，全国灾民当在5000万之上，人民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凡我忠实之革命同志应共同救国，协力保民”。“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次日，蒋离汉返南京。

△　马福祥电告国民政府及行政院，甘省政变，中央视察员马文车实为主谋。

△　何成濬电令鄂西各将领严密堵截贺龙部红军，限期将贺部肃清，又令徐源泉部“围剿”退往鄂东广济的红军。

△　第六师赵观涛部及第十师卫立煌部分别由广昌、头陂向黄陂、小布红军进攻。是晚，红军退入黄陂西部上淮、下淮山区。

△　粤桂军下入湘动员令，第四集团军任前锋，第四军第十二师吴奇伟部欧震、沈又成两团由副师长韩汉英指挥进驻祁阳。同日，陈济棠之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新编第五独立旅陈铁坚部进抵湘边，第三军李扬敬部亦向湘边进发。

△　福建省府主席杨树庄电中央报告灾情，谓该省自8月10日飓风之后，暴雨不断，洪水成灾，人畜死亡，财产损失不可胜计，灾情最重者有连城、宁德、永安、闽侯、霞浦、古田、连江等10余县，请中央派员视察，并拨巨款赈济。

△　广州至香港长途电话正式通话。

△　葡萄牙、芬兰、智利等国向我国慰问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款10万美元专赈武汉水灾。

△　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成立。

9月2日　　蒋介石电令杨虎城负责处理甘肃政变。6日，杨电令雷中田、马文车速恢复马鸿宾自由，俾得行使职权，并制止对陇南马廷襄部用兵。

△　国民政府任命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中法学术考察团中国方面团长褚民谊由哈尔滨返北平，据褚谈，该团已在新疆解散。

△　中央特派前往安徽勘查水灾专员庄严等报告，芜湖地区共有

难民24.4万余人，死亡4000余人未掩埋，该处现仍一片汪洋，普遍水深丈余，无法改种其他杂粮，请中央予以急赈。

△　驻长春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与独立守备队，事前不通知地方当局，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农民田禾多被践毁。

9月3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第三党首要分子邓演达应从严惩办，其他重要分子应一律通缉逮捕，次要分子准予一定期间内自首。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为赈济水灾购买美麦45万吨，半数为面粉。自本年9月起，每月至少运回五万吨。

△　张学良通电吁请宁粤两方“深体时艰，共策和平，泯夙见以蠲畛域，开诚心以援饥溺”，为国家树不世之功。

△　第二路进击军罗卓英师及陈诚师到达君埠，蒋光鼐部韩德勤、蔡廷锴、戴戟三师亦到达君埠以南之南坑、北坑一带，取密集包围态势向上淮、下淮一带红军接近，最近处仅五里多。红军乘隙借丛山掩护，顺利摆脱“围剿”，到达兴国西均村一带集结休整。

△　救济水灾委员会灾区工作组主任朱庆澜发表灾区工作大纲，内容为：工作方针以救命为前提，以培养人民元气，恢复生产能力为目标，分救急（9月15日以前）、过渡（9月16日至1932年2月15日）、恢复三个时期；收容所每所1250户，约6250人，下分十闾，每闾下属五邻，每所设管理员一人，闾、邻长由村民选举，实施村自治。

△　日本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在政友会关东大会上演说对华问题，略称：满蒙问题之本质乃欲使彼地国民经济生活同在共存共荣的轨道。日本人口过剩，自当以农工商人向四邻融和，此为日本民族最小

限度生存要求。但现政府蔑视此本质，实为对华外交之恨事。

△　山西省政府以晋钞狂跌，五元难兑现洋一元，物价暴涨，决议惩办奸商，当晚将太原之晋裕、晋益、聚源、通复、盛太、源盛川等银号经理扣押。7日，物价续涨，晋钞六元始兑现洋一元，省府制止无效。9日，省府以各银行经理确有捣乱金融证据，因系初犯，仅各罚款2.3万元予以释放。

9月4日　　国民政府为已故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南京举行国葬，蒋介石主祭，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各要员均送灵。谭墓位于紫金山东麓，国葬费共用19万元。

△　由于广州“国民政府”派粤桂军进抵湘赣边境，是日，何应钦遵国民党中央决定，遂令在赣“围剿”红军的左右两翼集团军就地监视红军，并令第一军团蒋光鼐协同第五十二师韩德勤部，于五日内撤至兴国附近；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及第十师卫立煌部于五日集结吉安、吉水待命。

△　据《申报》报道，江苏全省受重水灾者共18县，灾民达240万人。

9月5日　　刘文岛、顾祝同、周佛海奉蒋介石令由鄂抵长沙，与何键洽商防御粤军入侵湘境计划。

△　张学良电蒋介石，响应蒋1日通电，表示对“和平统一，矢忠护持”。

△　宋庆龄到南京谒孙中山陵，并与蒋介石夫妇在陵园晤谈。

△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由沈抵平，向张学良请示应付“中村事件”方针。张训令省长臧式毅及荣臻立即就地进行第二次调查。

△　教育部核准四川私立华西大学立案。

△　托陈取消派理论机关报《火花》创刊。

△　张学良电嘱北方各省、市迅筹赈款、赈粮、赈衣。同日，张电告宋子文，东北五省区共捐赈粮三万石，小米，高粱各半。

△　武汉被淹一月，近来江水略退。何成濬在省府纪念周上报告，武汉灾民70万，无衣食者17万，外地来汉者10万余人，每月需饮食费80万元。

9月6日　　国民政府电令甘肃驻军师长雷中田、兰州公安局长高振邦等将甘省政变主谋马文车拿办，恢复省主席马鸿宾自由，主持省政，胁从人等一概免究；并分电宁夏、陕西、青海省政府及陇东第一路警备司令陈珪璋、陇西第二路警备司令鲁大昌知照。

△　内政部长刘尚清在平电蒋介石称病辞职。

△　何应钦、陈铭枢等37名在赣“剿赤”将领联名通电拥护蒋介石1日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　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9月7日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报告，声称赣省“剿赤”已获大胜，如粤省不出兵进犯湘境，不久即可完全解决，“本人留京数日，即再赴赣督师”。

△　国民党中委陈肇英在中央党部报告赴闽视察经过，谓闽省党员多不明党务，精神涣散；每遇红军，党部及地方相率逃避。闽省民众受“赤化”宣传影响者甚众。

△　中央空军自德国新购飞机15架装备部队后，连同原有飞机已

编成八个队，每队飞机九架，是日，四个队飞往湖南充实防务，其中两队飞株洲，两队飞长沙。

△　红三军黄公略部在兴国老营盘截击蒋鼎文师，李明瑞之红七军在兴国牵制韩德勤师。朱德之红一军团、彭德怀之红三军团及毛泽东之中央直属军团等主力红军袭击高兴圩蒋光鼐师，激战两昼夜，双方死伤均为3000多人，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在是役中阵亡。9日，红军退回龙冈。

△　国际联盟第十二届大会在日内瓦正式开幕，西班牙外长乐勒任大会主席。中国代表施肇基出席会议。8日，国联大会通过英国代表薛西尔关于由国联卫生部协助中国救济水灾的提议。

△　日本军用飞机六架奉令在国内各主要地带散发传单，诡称日本在满洲之特殊权力与利益现处于危急之中，向国人大造侵华舆论。

9月8日　　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月内先发3000万元，12月内续发5000万元。年息八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本息分10年偿清，11日，公布该项公债发行条例。

△　张学良为赈济中南各省水灾，在北平副司令行营设立各省水灾筹赈会，并于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政府及哈尔滨、威海卫、北平、天津、青岛各市政府设立分会，张自兼会长，各省、市长官兼任分会长。

△　日本阁议讨论中村事件，决议视中国当局第二次调查结果如何再定对付方法，如中国“不迅速以诚意从事彻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

△　雷中田电国民政府，声述甘省政变系马鸿宾收编土匪扩充武力所激成。为安秩序以平民愤，故将马暂拘，一旦匪队解散，立即恢复其自由；马文车系中央代表，故托其暂代省府主席职，以表对中央

信任并避免门户之见。

△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电陈济棠、李宗仁，略谓湘省“匪患未靖，天灾继至，疮痍满目”，“贵部纷向湘边进犯，并收集土匪以为先驱，暴力所及，群情骇怒，夫乘人之灾，是谓不仁，师出无名，兵家所忌”，“尚望熟审利害，毋启衅端”。

9月9日　　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离沪赴任，以日本对满蒙问题有急进态势，故绕道北平与张学良面商。12日，蒋抵北平，对记者谈：中村事件在南方不似北方宣传之严重，本人前来时，中央对此亦无任何训令，待本人到日本后，当可迅速解决，事态不致扩大。

△　外交部驻吉特派员钟毓谈称：中村失踪案较万宝山案更为严重，日方有意寻衅，步步紧逼。本年5月，日驻哈领事馆曾送一商人名中村的护照，请本人签证，失踪者或即此人。惟民国十八年后兴安区非东三省内地，且地方不靖，曾照会日方禁外人游历，原案具在，今中村以军人冒充商人前往，失踪与否本人自不负责。

△　救济水灾委员会在沪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宋子文报告该会成立以来的情况及今后的工作计划。拟定今后六个月赈灾用费，计购麦（施赈与工赈）3750万元，运费1200万元，救灾工作费1000万元，灾民寒衣费350万元，卫生工作费100万元，已拨急赈费100万元，准备金500万元，共7000万元。

△　鄂省救灾急赈会电宋子文，鄂省灾民1000万余人，仅得中央赈款17万元，连同中外捐款亦只100万元，赈款太少，无济于事，请速拨巨款赈济。

9月10日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会见辽宁省府主席臧式毅，面交日本政府对中村事件照会，要求东北当局：一、正式道歉；二、严惩责任者；三、对生命、财产损害予以赔偿；四、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臧表示待第二次调查队返沈后方能答复。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圈定黄宇人、马钦冰、张静江等七人为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二、国庆典礼照常举行，其他一切娱乐、宴会一律停止。

△　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电广州“国民政府”，谓我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国势危难。劝粤方捐弃成见，息兵言和。

△　日军参谋本部派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回东京，向参谋总长金谷报告中村事件，称人证物证俱在，华方对日本实力低估，故对中村事件敷衍，要解决此问题，须将满蒙问题根本解决。

△　山西省五台县西会村发现刺客二人，图刺阎锡山未遂，被捕送太原。

9月11日　蒋介石召见刘郁芬询问甘省政变事，并指示刘电令雷中田（系刘旧部）将马文车扣管。

△　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顾祝同奉令调湖南衡阳主持防堵粤桂军事。是日，顾电南京总部，谓粤桂军虽有窥湘行动，但均属乌合之众。

△　韩复榘召集师长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乔立志、展书堂开剿匪会议，令各将所辖防区匪患肃清，务使本省三年内无匪迹。

△　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会同省府主席刘文辉商定将川军缩编为15个师，其中刘湘、刘文辉两部编10个师，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李其相各部共编五个师；是日派代表嵇祖佑、吴晋航将缩编办法送达南京。

△　张学良嘱荣臻、臧式毅对中村事件力持镇静，尽快交涉解决。同日，汤尔和向张报告在日与币原外相等商谈和平解决中村事件经过。

△　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提请大会注意“如甲国谋以武力侵略乙国，国联应如何设法制止”问题。

9月12日　国民政府令：商震、戢翼翘给予一等宝鼎勋章；公布《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任用规程》及《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分发规程》。

△　宋庆龄患肠胃病，是日离沪赴南洋槟榔屿疗养。

△　马鸿逵之第十五路军奉令调郑州。是日马从济南返泰安准备开拔。马部所遗泰安、济宁一带防务，韩复榘派第二十二师谷良民部接替，临沂一带由展书堂之第八十一师接替。

△　粤邮局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是日起将沪报一律扣留。

△　全国第一次路市展览会在上海开幕。会上陈列各种汽车百余辆，中国制造者仅一辆，系辽宁民生工厂生产，为辽宁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所制造。

△　石友三部被俘之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文兴邦、旅长郭豫德、第八师旅长刘申福、团长刘九如在开封被讨石军南路军总司令部枪决。

9月13日　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受张学良命，率随员20余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同日，据《申报》报道，张学良谈中村事件如调查确实，对肇事军队及带领长官定将严惩。

△　粤桂军进攻湘南，是日抵达衡阳城下，与顾祝同部激战。次日，攻湘总指挥龚浩督率陈铁坚、颜伯刚、覃连芳三部攻克衡阳城。

△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偕参谋板垣、武田、田原等一行50余人由旅顺抵长春，检阅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并训话，要求日军服从命令，尽保卫日本在满洲利益之天职。15日，本庄赴四平街、公主岭等处检阅日军。

△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财务组公布，收到各界捐款银元253.422455万元五角五分，小洋2935角，铜元3318枚，银两7.33167万两七钱。

9月14日　蒋介石在中央总理纪念周谈称："太平洋国际协会"应国民政府之邀，本年将在杭州举行会议。该会由各国国民自动推选代表所组成，非政府机关，其目的在于以国民资格集合研究国际间各种矛盾问题，这对我国外交影响很大，对国府及本党关系尤深，望反对者勿受宣传所惑，盲从妄动。

△　蒋介石再令在赣"剿赤军"限一个月内将赣南红军全部肃清。

△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

△　张学良的日本军事顾问柴山少佐奉日政府令回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中村事件。

△　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改选，中国当选为非常任理事。

△　山西临县第四区兔坂镇一带发生鼠疫，死亡已近百人，疫势凶猛。是日省府派医生前往勘验。

△　"满铁"日守备队中级军官16人抵哈尔滨进行军事考察。同日，日驻哈领事大桥赴伯力，就中村事件向苏联远东当局作解释，求其谅解与同情。

9月15日　国民党中政会令外交部分令驻外各使馆，对俄籍或无国籍人民来华者，除确有国家证明者准予签证外，如仅有地方许可证者，均不得签证。

△　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复张学良3日通电，略谓"和平之破坏者，厥为共产党与蒋介石，蒋利用共党，致招今日之天灾人祸，蒋下野，和平自可实现"。

△　毛泽东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军及红三军在方石岭歼灭“剿赤”军韩德勤师六个团及蒋鼎文师直机关及炮兵、步兵各一营。韩师损失大半，毙旅、团长三人，营长六人。

△　外交部就万宝山案第二次照会日本驻京领事馆，对日方来照逐一驳复，并重申第一次照会中所提韩农离开万宝山、租佃契约作废等各项要求。

△　日本驻华武官产代少将访军政部次长陈仪，对日援粤武器一事力加否认，并代日陆军本部声明，日未供粤一枪一弹。

△　刘建绪、陶广分电何键称，粤桂军已从郴州撤退，中央军分途追击，衡南各属次第收复。

△　贵州省府主席毛光翔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就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并报告贵州军政情况，该省共三个师四个独立旅，裁厘后新税未实行。

△　蒋介石从美国所购私人用武装飞艇一艘由沪飞南京。该艇为西柯尔斯基式，水陆两用，价值美金7.5万元，艇中陈设均极华丽，并装有防弹玻璃及防卫武器。

△　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抵南京，即向卫生署长刘瑞恒询问灾区情况，随后与刘同见蒋介石，对灾区整个防疫计划有所商谈，并拟赴汉口长江一带作实地考察。18日，水灾救济委员会聘拉西曼为卫生高等顾问。

9月16日　王正廷在京对各报记者谈中村事件，略谓外交部因未接东北地方详细报告，故尚未至发言时期，外交部对此事甚为注意，将来如调查确实，自当公平处理。同日，张学良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谓中村案件将由辽宁省长臧式毅及东北当局自行处置，不由外交部办理。

△　荣臻在日方威迫下，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队赴兴安屯垦区将中村事件主要肇事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拿办。是日，外传关由洮索押抵沈阳并投入监狱，实则关悄然入沈住于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20日，关玉衡趁乱离沈阳逃往北平，所有关于中村事件案卷全被日军掠去。24日，张学良委关为参议。

△　国联通过《救济中国水灾案》。

△　中英庚款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拨1.4万英镑作导淮用款。

9月17日　广州“国民政府”电复李石曾、吴铁城、张继，谓粤桂军仍驻两省边境，并未北进，粤方决不轻启战端，犯湘边境者非粤桂正规军队，乃唐生智之旧部。

△　驻南满之日关东军宣称满铁沿线“马贼”横行，令各军自是日起，至“马贼”消灭为止，见行踪可疑者即行调查。应处罚者，即行严重处罚。

△　晚，沈阳日本在乡军人全体集合，臂缠黑纱，叫喊要为日本在东北之权益而战。

△　中国航空公司南京至北平航线复航。“徐州号”、“沧州号”两机对开，每机乘客以五人为限。

△　前“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中共党员杨度在上海病逝。

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晚10时20分，日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制造了所谓“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守备队。11时许，日守备队会同第二师团之第十六、二十九、三十联队大举进攻沈阳。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力持镇静，不准抵抗”之严令，仓皇退走，营地被日军攻占。

△　蒋介石乘“永绥”舰离京赴赣再次督师“围剿”红军，周佛海等同行。

△　救济水灾委员会灾区工作组主任朱庆澜电导淮委员会，对导淮提出五项建议：请立即开始导淮工作；导淮入海仍用黄河故道，并将涟水县河湾取直，经七套镇出套子口入海；实行兵工，并多招灾民，以工代赈；导淮入海，对于下游亦宜预筹兼顾方法；两岸如有溢地，可划出村落，以酬开河官兵。

△　《新天津报》因误用电通社所发何应钦在赣被刺消息，虽经两次更正，仍被市政当局查禁，该报13日被迫停刊。16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40余家报社、通讯社联名电中央党部，请求恕其往咎，准《新天津报》复刊。是日，天津市政府称奉中央命令仍将该报查禁。该报曾为反对河北省府征收产销税作过激烈宣传。

△　晋钞跌落不可收拾，负贩小商破产自杀者不断发生。山西党政当局拟具办法三项：一、加征赋税，发行短期公债；二、以煤产出口量相抵，向银行界借款；三、清理全省官产。同日，徐永昌在平筹现款60万元运晋济急。

9月19日　　零点20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阳师团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攻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凰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同时急电青岛日军司令及朝鲜日军司令派援军入东北。凌晨3时，日军第二师团攻入沈阳，6时30分，日关东军宪兵司令二宫率大队日军入城，将政府各机关、银行占领，城内警察全部缴械，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王以哲旅沿沈海路北撤开原，途中又遭日军截击，死伤甚众。

△　凌晨4时，驻长春日军向长春市发动总攻，袭击宽城子担任护路的我国军营，该营士兵奋起抵抗，营长傅冠军阵亡。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电话命令“毋须抵抗”，该营一部被日军缴械，一部坚不缴

械，边战边撤，长春城南之南岭军营炮兵一团、步兵一团、辎重兵一营，均奉熙洽“不抵抗”命令，含愤撤退，辎重被日军掠去，营房被烧毁，我国军队被日军打死打伤199人，晚10时半，长春完全被日军占领。同日，日军将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湖、抚顺、沟帮子攻占。

△　日本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未接敕令擅自派出飞行大队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侵入东北援助关东军。飞行大队于当日下午4时到达沈阳。21日，第三十九旅团进入安东，夜10时到达沈阳附近，接替第二师团的防务。

△　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由日本返安东，声称沈阳事件“乃属当然，此时须将日本之满蒙既得权利彻底解决，倘有第三国出面仲裁，应断然拒绝”。

△　国民党中执会通电各省、市及海外各党部，谓日军突出重兵侵占沈阳、营口、长春、安东等地，呼吁全党团结一致，除“赤匪”必须根本铲除外，必须一心一德充实政府实力，努力救国。

△　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

△　李石曾、张继、吴铁城急电广州“非常会议”汪精卫等，劝其停止反蒋，谓今日形势，“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一切利害之上，今日惟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望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停止反蒋活动。

△　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同日，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大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入侵东北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

△　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报告日军占领沈阳情形，略称已严令沈阳近郊各部“力持镇静，不得抵抗”。同日，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对《大公报》记者谈，“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射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

△　施肇基向国联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日代表芳泽打断施发言，宣读“满洲事件”声明，称“沈阳事件”是“地方事件”，要求国联不必过分重视。芳泽发言完后施肇基声明：“中国保留解决关于此事件之权利。”是晚，中国代表团就“沈阳事件”发表宣言，指出日军对此事件应负完全责任。

△　吴铁城、李石曾、张继、戢翼翘、于学忠等同赴北平协和医院见张学良，会商应付日军方针，决定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持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

△　驻京日领事馆通知外交部，称日本政府对关东军占领沈阳，认为是不幸事件，已极力阻止其行动，不令扩大。

△　全国人民对日军侵沈阳义愤填膺。北平各大学立组抗日救国会。全国各报均揭露日军入侵罪行。上海市党部、市商会、反日会、各同业公会分别发出通告、通电、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同日，北平市党部分电中央党部、广州古应芬等要员、全国同胞，请息内争，共抗外敌，以救危亡。

△　北平、天津中外记者19人自动组成“新闻记者沈阳事变视察团”，赴辽宁实地调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记者潘纳禄为团长。

△　国民政府令，《工厂检查法》自本年10月1日起施行；特派施肇基为国联理事会代表。

△　导淮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导淮由黄河故道入海，指拨七

万元为导淮工程开办经费。

△ 德国《柏林指导报》就九一八事件发表评论指出："不宜把此项事件视为局部问题，此事将使世界忧虑，并将使国联遇一严重工作。"同日，《德意志时报》指出：国联对此事件将"照例"使一般之期待失望，而屈服于既成事实之下。

9月20日 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决议三项：一、电粤方对外交表示态度；二、定本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沈阳被陷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同日，发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训令》。

△ 外交部就日军侵略东北事向日政府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 熙洽急电张作相，报告日军攻击长春二道沟及南岭炮兵团，驻军伤亡数十人。并称在未奉有副座（张学良）、钧座何种命令之时，决避免冲突。

△ 日本驻关东长官塚本与内务局长三浦、警务局长中谷、外事课长河相等讨论满洲问题，一致主张继续军事占领，以待满蒙诸悬案全部解决；并向中国提出扩大南满日司法权行使范围，确保日本既得权利，扩大日警察行政权、处罚权，满铁并行线由中日合办，由日本铺设吉会铁路，厉行关税协定等要求。

△ 日军在沈阳组织军政、市政两公所，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命对华主战最力的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为市长，并改沈阳为奉天市。21日，土肥原召集市政府各机关主要成员开会，举行"奉天城市政成立会仪式"，原沈阳市长李德新被迫于当日办完移交，中国官吏被赶出机关，由日军实行"军政"统治。将我国设于沈阳的银行全

部封闭，并强令各银行呈报存款数目。同时，搜罗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

△　日军第二师团司令部自沈阳移至长春。

△　全国人民反抗日军侵占沈阳的浪潮迅速发展，中央军校学生开紧急会，决议组织救国先锋队，静待驰驱。南京新闻界组织对日外交后援会，通电全国报界一致行动宣传救国。上海各界纷纷集会，通电表示为救国救亡，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并决定组织抗日义勇团。北平各大学学生纷纷集会、通电、组织团体，促政府停息内战，一致抗日。

△　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将领及所部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要求统一全国意志，集合全国实力一致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商震、高桂滋分别电张学良、蒋介石，愿率部抗日。

△　朱庆澜代表全国5000万灾黎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及全国各团体，呼吁“举国团结，一体奋斗，同舟风雨，共济艰危”。

△　粤方因日军侵占东北，停止入湘军事行动，令粤桂军撤回原防。同日，何应钦中止赴湘，率总部人员返赣。

△　江西红军主力一部向兴国老营盘蒋鼎文师发动猛攻，另一部向高兴圩毛炳文师进攻，赵观涛师、周浑元师向兴国驰援，激战竟日，双方伤亡甚多。蒋鼎文师退墩田，赵、周两师退守东固。至此，第三次“围剿”结束。

△　韩复榘发布鲁南剿匪令：展书堂师追剿窜入日照县境之刘桂堂匪部；乔立志师围剿抱犊崮之张黑脸匪部，谷良民师协助乔师行动；谢书贤之鲁南民团剿办临沂、蒙阴一带郭马蜂匪部。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北斗》月刊在上海创刊，主编丁玲。为“左联”第一个以发表创作为主的刊物，亦为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主要阵地之一。

9月21日　蒋介石自赣回京，在陵园官邸召集在京中央委员讨论时局及应付日本侵略办法。议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部队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赴粤，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及党员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要求国民“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　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全国，宣称“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伏望全国同胞，一致赞助，促蒋下野，以挽危亡”；并主张蒋下野后，另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一致抗日。同日，广州“国民政府”分电蒋介石、张学良，促蒋即日下野。

△　考试院长戴季陶将该院及立法院日本顾问副岛及随员一并辞退，并备车护送出京。

△　王正廷在外交部报告对日外交方针，谓日军侵占沈阳及东北各地事除向日本政府递交两次照会强烈抗议外，已将详情电达国联本国代表，国联当能主持公道处理此事；深信《凯洛格非战公约》确能保障和平，排除武力。

△　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报告日军侵占沈阳及东北各地情形，请国联根据《盟约》第十一条规定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　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日军2700人不费一弹占领吉林省

城。吉林省府代主席、吉林边防公署参谋长熙洽于20日开始令城内驻军全部撤出城区，是日向多门无条件投降，并将省府主席办公室让与多门作司令部。

△　平、津中外各报记者赴沈调查团19人，于20日抵达沈阳皇姑屯站，因日军严厉检查，外籍记者行动被日人监视，中国记者更无行动自由，且生命无保障，全部折回。是日，《申报》记者返津报告调查情况，略谓沈阳各银行、储金会均被日军封闭，张作霖大帅府古董、财宝损失甚巨，兵工厂库存弹药及机件悉被运往大连。

△　日本内阁会议开会，军事当局欲对满洲下正式动员令，因外相币原反对，提案未能通过。阁议对于驻朝鲜军队未奉敕令即自行开赴满洲之行动予以追认。

△　全国民众群起声讨日本侵占东北，北平、南京、上海、福州、香港、镇江、扬州、武汉、太原、徐州等城市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政府抗日救国。

△　陈诚率全体官兵电蒋介石、张学良请缨抗日，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

△　阎锡山电徐永昌，劝晋将领共赴国难，并托徐转告张学良，本人愿与张取一致行动。

△　韩复榘电张学良称：“弱国无外交，惟有暂行忍耐，力持镇静态度，是非曲直，将来得由公论，且既经呈报国府，应候中央依法办理。”

△　中东铁路召开理事会，苏方以日军入侵东铁，华军无保护能力，提出抗议，并表示苏将出兵护路。华方允转达军界尽力护路。

9月22日　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演说，谓日本侵华暴行必将受到

国际公法制裁，全国民众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并要求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大会决议：一、通电全国各军政领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二、呈请中央即日宣布对日绝交，准备作战；三、通电全国民众总动员；四、急电中央并张学良转东北全体官兵誓为抗日保国而战；五、通电全国对日永远经济绝交。会后大会主席团全体赴胡汉民住处，敦促胡即日视事，共谋国是。

△　行政院讨论治理水灾办法。蒋介石提出，应饬受灾各省政府详查辖境旧时各大湖面积、界限，本年被大水冲破各堤若在近60年内新筑，又确在旧时湖身以内者，一律不准再修，以期废田还湖，免除今后田赋，严禁与水争田；导淮工程应江海并疏，先从入海着手。决议将此案交内政、实业、交通三部审议。

△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　国民党中央为日军入侵东北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救国御侮”。

△　蒋介石邀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等协商对日方略。午后，戴往访胡汉民，商榷对日方针并劝胡重新任职。

△　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等16名晋军将领通电吁请停止内争，抗日救国。

△　国际联盟讨论施肇基所提要求干涉日兵强占满洲事件案。施

详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经过，要求国联“仗义执言、出而干涉”，使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事变前状况，并赔偿一切损失。日本代表芳泽极力为日军侵华辩护，反对国联干预，力主两国直接交涉，就地解决。双方辩论激烈，最后理事会通过英国代表薛西尔的提议，授权大会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劝告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会议并决定派遣委员会前往满洲调查。

△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同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两大佐及石原莞尔中佐等密谋制订《蒙满问题解决方策案》呈日陆军大臣，其方针为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以东北四省与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中国政权。

△　颜惠庆、章宗祥、曹汝霖应张学良电召到平，研究对日外交问题。

△　全国抗日声浪沸腾。国民党鄂、滇、冀、晋、平等省、市党部及菲律宾总支、墨西哥、利物浦等海外支部纷电国民党中央，请立即进行全国动员，与日决战。中央军校成立反日运动委员会，电请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严守国土，不得取无抵抗主义。东三省旅京同乡及东三省籍军政两校学生1000余人赴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抗日。上海800余团体代表5000余人集会，决议将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更名为抗日救国委员会，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政府对陆海空军下总动员令，驱逐日军出境，收复失地。广州召开反日大会，组织抗日救国会，大街小巷皆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

△　蒋介石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

△　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宪兵司令陈兴亚等抵北平。荣、陈见张学良报告东北情况。据与荣同行者谈，兵工厂现存步

枪八万支、机枪4000挺，飞机场新旧飞机200架全部被日军缴获，损失达一万万元。

△　苏联外交委员会正式通知驻苏日本大使及中国代办，声明苏联政府对于满洲方面之冲突不能坐视。23日，日使通知苏联，声明日军军事行动以南满、东蒙为限。

△　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孙殿英为第四十一军军长。

△　刘桂堂匪部1000余人攻入鲁南日照县城。民团及警备队竭力抵抗，城破后多被屠杀，商民被杀者数百，城内多处被烧毁。

△　日本所赠我国水灾赈济品运沪，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决定对日赈品拒绝接受。

9月23日　国民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略谓日军入侵东北，关系我国存亡，“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全国同胞应团结一致，信任政府。

△　国联理事会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满洲问题。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力主由英、法、意、德等列强派遣外交委员团前往满洲实地调查，日本代表芳泽极力反对第三国干涉。

△　外交部接国联理事会紧急通知，内称为解决满洲问题，务请中日政府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碍和平解决之行为，由中日代表会商切实办法使两国立即撤兵，希两国政府能答应此提议。同日，王正廷电复国联，对国联提议表示满意，重申中国一切听命于国联，已严令中国军队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告诫全国人民持严肃镇静态度。

△　外交部向日政府提第三次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撤退日军，将

占领各地完全交还。

△　张学良通电宣布，沈阳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均被日军占领，不能再行使职权，现将该两机构暂移设锦州办公，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省府主席。28日，米春霖偕同在平省府委员离平赴锦州组织临时省署。

△　张学良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和护路军司令部，如日军向哈尔滨推进，“向我军施行压迫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

△　国民党河北、北平、天津、平绥路、北宁路五党部联衔电请国民党中央强硬对日，电请粤方息兵共救危亡，并致电全国军人积极备战。

△　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电蒋介石、张学良，略谓日本“无端称兵，侵我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在眉睫”，除请政府对日严重抗议外，全国上下应团结一致，共同御外。表示“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命”。

△　南京党、政、军、学、农、工、商、妇各界10万余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呼吁团结一致，平息内争，抗日救国。并决定组织救国义勇队，为政府后盾；请中央将卖国媚日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撤职严办；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以振民心；请蒋介石集中全国兵力对日宣战。

△　南京卫戍司令部队宪兵教练所日本教官加藤、工兵团教官时目、警卫第二师教官本达等15人解雇，是日离京回国。

△　四川省府主席刘文辉、四川省善后督办刘湘联名通电呼吁“破除畛域，泯释猜嫌，戮力同心，共御强寇”，并表示愿督率川军“荷戈前驱，共赴国难”。

△　张继、李石曾、万福麟、鲍文樾由北平飞抵南京见蒋介石，商议对日入侵问题。蒋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即张学良），现在他一切要听我们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大局。同日，蔡元培、张继与陈铭枢离京去沪转轮往广州，与粤方会商联合对日问题。

△　驻重庆日领事清野长太郎增调日舰一艘开重庆，欲以武力镇压该市人民反日运动，并致函威胁刘湘，若反日过激，与军舰发生冲突，概不负责。刘湘除电请国民党中央交涉外，劝人民力持镇静。

△　日内阁会议，外交、陆军两相就对满蒙策略问题争论激烈。外相币原认为陆军如欲吞并东三省，无异吞一炸弹，将陷德国覆辙。会议决定，对东北三省以外交保障占领。

△　吉鸿昌被蒋介石所迫离沪赴欧美各国考察。吉临行表示，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忍去国远游，但“各友人以一切齐备，仍促前往，余遂不能不含泪登舟”。

△　香港各界集会悼念东北受难同胞，与会者袖缠黑纱，团体下半旗志哀。

9月24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至11月12日召开。

△　国民党中央公布《义勇军教育纲领》，规定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组织童子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纲领。

△　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通过提请政府设立大规模国际通讯机关，宣传日军侵华事实；集中外交人才派充各重要国公使；通令全国各地驻军实行正当防卫；南京与广州商彻底解决纠纷等14项决议案。

△　广州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推倒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为今日共同努力之目的”，“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一日未推倒，则对外一切皆未由进行，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凭陵于中国，将有加无已。”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进行抗日救国。

△　张学良之代表万福麟、鲍文樾离京回平，向张报告见蒋介石经过，并转交蒋之亲笔信，略谓“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随后，万对记者谈，东北当局对日军入侵事件，一切听从中央办理。

△　粤桂军自九一八事变后，相继从湘边开回本省。是日，余汉谋、李扬敬部从韶关回广州。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决议：请中央调集大军驱逐日军出境，并请中央通令全体党员一律受军事训练，为民先锋；市执委会组织上海义勇救国军，通令全市党员一律加入；市各区党部定期刊物一律改出抗日救国报。

△　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同日，太原10万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徐州、蚌埠、平汉路党部及工会，均成立抗日救国会、宣传队。

△　袁金铠在日军卵翼下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袁任委员长，于冲汉、丁鉴修、阚朝玺、李友兰、孙祖昌、张成箕、金梁、佟兆元为委员（李友兰、佟兆元先后声明退出）。25日，该会向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呈“请愿书”，请求日军不要撤走，以维持秩序。27日，该会遵日军旨意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并声称暂代省政府职能。

△　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诡称日本不愿在满洲动用武力，只愿日本臣民能在满洲从事和平事业，使其投资

有安全保障和获有开发地方的机会。诬指中国打消日本增进友谊之企图，日军此次行动，全系华军炸毁南满铁路沈阳附近一段路轨所造成。日本在满洲仅1.4万人，而华军则有22万，恐一旦铁路截断，日人生命难保，故不得不占据满洲各要地。但“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主张该事件就地解决。

△　日本政府函复国联，诡称日本仅为保护日侨及南满铁路而采取军事行动，始终防止扩大，专心于中日两国交涉，以求和平解决；并称沈阳、吉林留有驻军若干，以为戒备，并非军事占领。同日，日政府训令芳泽答复国联理事会：一、“满洲事件”系自卫，性质系局部冲突，国联及第三国不容置喙；二、满洲之中日关系有特殊性，国联派遣调查委员，恐反碍两国关系，日政府不能应命。

△　日飞机连续轰炸北宁路列车，竟违背国际公约使用达姆弹，打死打伤旅客多人。

△　美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转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22日代表美国政府就“满洲事件”召见时的意见，史汀生称“自沈阳事起后，军事行动之扩大，其重大责任似须由日本负之”。但公使在转达时声明，“美国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务，此文不得视为抗议”。

△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要求两国政府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事端。

△　美国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在旧金山成立。

9月25日　国民政府任命颜惠庆为驻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原任伍朝枢辞职照准。

△　国联理事会讨论中日复文，主席勒乐宣称：“对日牒所称‘日政府极欲保障中日间交涉之和平解决，大部分日军已撤回南满铁路区域内，现驻沈、吉等以资戒备之少数士兵待形势许可时即须撤回’一节，

甚为满意。”施肇基请国联派中立委员会赴满洲监视日本撤兵，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芳泽反对国联干涉及派调查委员会，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虽施肇基激烈反对，但国联屈服于日本压力。英代表薛西尔表示赞成芳泽由中日两国解决满洲争执之主张。

△　何应钦、陈铭枢、朱绍良、孙连仲等30余在赣“围剿”红军的将领联名通电，吁请全国袍泽一致奋起，息争御侮，同赴国家危难。

△　原东北军第二十五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县宣布抗日。

△　赣南各地红军为团结抗日，力避与国民党军作战。是日，徐源泉部进占湖北蕲水一带，该地红军亦未加抵抗，主动撤走。

△　日舰两艘运载陆战队开往海州（今连云港），强行登陆，驻军梁冠英部交涉无效。

△　日军驻长春守备队第六大队所属一部及羽山支队共500余人由上田中佐率领占领洮南，控制洮昂铁路。

9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宋子文、刘尚清、连声海、王伯群、孔祥熙、李书华、张静江、张学良、李石曾、张嘉璈、李铭、周作民、晏阳初、虞洽卿、吴鼎昌、荣宗敬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朱家骅为秘书长。

△　驻陕、豫、湘、鄂、赣、皖等省将领百余人由何应钦领衔联名电汪精卫、陈济棠等粤方要员，主张团结一致，“泯除党争”，“肃清匪患”，“拯救灾黎”，“抵御外侮”，“毋以填海之心，致贻下井之诮”。

△　上海各大学学生代表赴京请愿团刘旋天等51人向国民政府请愿：一、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二、惩办不力外交官员；三、令张学良迅速出兵；四、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五、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　上海800余团体20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王晓籁主席，决议：电中央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地，否则对日宣战；电蒋介石统一军权抗日；电促粤方泯灭私见，一致对外；电全国永久对日经济绝交；严惩奸商；枪毙王正廷，严惩臧式毅，令张学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实行征兵制，确定义勇军为永久组织。同日，南昌、宁波亦举行10万人抗日救国大会。

△　吉林省政府在日军控制下改组。多门中将、坪井大佐在吉省府召开地方士绅会议，宣布解散吉林省府，另组长官公署，以熙洽为长官，坪井为警备司令。公署下设民政、军务两厅，职员中日各半。长官公署须受日方监督，任免官吏须得日方同意。省城防务以留守日军担任。28日，伪长官公署发表声明，同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

△　沈阳《四库全书》被日军劫走。

△　国民政府授飞行来华之美国飞行家林德伯上校中华民国航空奖章。

△　国民政府任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　由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组织的加拿大维多利亚抗日救国会成立。

9月27日　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以首批代表赴京请愿未得满意结果，决定28日第二次赴京请愿，不再选代表，各校学生自由参加，并决定在未得圆满结果之前，各校一律罢课。同日，中央大学学生成立反日救国义勇军，志愿加入者，先组反日救国十人团，以10人名义，一同加入并于成立时宣誓：“誓以热血，誓以赤心，誓以至诚，牺牲身家，牺牲性命，牺牲一切，以扑灭侵略我国之敌人。”同日，北平、济南、武汉、广州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

△　从东北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外交协会主席阎宝航、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500余人，聚集西单旧刑部街奉天会馆，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选举执行委员31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九人为常委。

△　台湾遗民会向南京蒋介石、北平张学良、广州汪精卫上书泣血陈词，谓：“台湾四百万同胞受日寇奴役40年，深知为日寇奴隶之苦。今辽、吉1000万同胞又将成为日寇之奴隶，望祖国衮衮诸公，蠲除己见，一致协力抗日。昔台湾虽割让，尚抗倭经年，今全国民气可用，民力可恃，切莫漫言‘镇静无抵抗’，台民愿奋起作后援，否则今日一省，明日一省，四万万同胞将尽成奴隶。”

△　张景惠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委员会”，自任会长，布告称该会“统管东省一切政务及治安”。该会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将哈尔滨城内驻军全部调出，另招募2000名特区警备队维持市内治安。

9月28日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由该校抗日救国会主席何浩若教授带领，上午9时冒雨整队赴中央党部请愿。该校校长朱家骅适在中央党部，在学生强烈要求下，亦随学生队伍一起到外交部请愿。王正廷初匿不见，学生大愤，冲入王正廷办公室当面责问，王语言支吾，遂被殴，头部受轻伤。军警赶往弹压，将王护送医院治疗。同日，朱家骅向教育部请求辞职。

△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800余人，由沪到达南京，会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及上海各大学请愿代表共5000多人，冒雨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丧失领土之东北负责长官，惩办丧权误国的外交部长，对日军不得再抱不抵抗主义，令全国军队誓死驱逐日军出境。蒋介石在学生要求下，迫不得已亲自出见，告诫学生要“持其志无暴其气”，如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要求学生回校安心上课。

△　北平各界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到240余团体20万人。会后大游行，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打倒王正廷”等口号，并推举代表往见张学良。张答称：外交问题必听命于中央指挥，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不抵抗主义实是误会，事前为防日人挑衅，故令部队不抵抗，绝未料到后果如此。“现各军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并表示“我张学良如有卖国行为，请你们将我打死无怨”。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谓对日宣战与否，政府自有处置权衡，告诫学生不得相率罢课，“隳吾淬厉之气，示弱于敌”，应效法普法战争时法国学生“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的精神，刻苦读书，“磨厉以须，来为政府之后盾，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

△　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纪念周讲演，要学生对日暴行“力持镇静”，听政府命令。

△　军政部通令所有部队，对日军入侵东北，应“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务避轨外行动，免为反动所乘，致滋口实”，并应饬所属严密注意保护日侨。并切谕人民听候政府正当解决。

△　何应钦在南昌为日军入侵东北发表《告全国将士书》，谓军人应“以忍辱负重之苦衷，练刚毅沉着之勇气，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尽保国卫民之天职”。

△　张作相、商震、万福麟、汤玉麟、徐永昌、王树常、傅作义、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以日军入侵，国势危急，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彼等军人愿为抗日救国捐躯糜踵。

△　晨，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到达香港。汪精卫、李宗仁、孙科亦相继抵港。是晚，宁、粤双方代表在港会商和平条件。29日，决定解决办法：一、蒋介石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同时通电取

消；二、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可以安心来京，在总理灵前，宣誓开会，决议统一政府办法”。

△　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及全校师生以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两校学生备受日军蹂躏，不能就学，特电邀南下前往该校就学。

△　日本外务省就“满洲事变”善后问题发表声明，宣称将由日本政府根据既定方针办理，绝不容国联或其他国家置喙。

△　国联理事会讨论中日“满洲争端问题”，主席勒乐希望两国“和平解决争端”。施肇基再三请求国联援助，只要理事会规定日兵完全撤出新占领区之日期，中国即放弃国联派调查团入满要求。因芳泽坚决反对，理事会未作出日军撤退的具体规定。

△　日关东军扶植阚朝玺、赵欣伯等在沈阳分别成立“辽宁四民（按：即指商、工、农、学）临时维持会”和“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策讨论会”。并发表“独立宣言”，为日军制造“满洲国”造舆论，声称“本会不特对张学良设于锦州之政府誓死否认”，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亦绝对反对”，只依靠日本“援助”。

△　贺龙红三军第七、八师东下，与自洪湖地区北上之段德昌第九师是日会师于荆门刘猴集。

9月29日　蒋介石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接见上海第二次晋京请愿的各大学学生请愿团3000余人，蒋表示“本席亦抱定与国民共同生死之决心，以不负人民之信托”。又说，学生请愿不仅损失学业，也分散政府精力，影响政府政治与外交之筹划。如愿读书，应即日返校，车已备好；如愿从军，立即去孝陵卫编入义勇军训练。当晚，大批学生返沪，余者亦于次日返回。

△　中央大学抗日救国会为校长朱家骅辞职事具呈教育部，声明殴伤王正廷，本校全体教职员学生完全负责，请详查事实，退还朱家

骅辞呈。

△　国民党中央以外患日亟，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特令南昌行营即行取消，所有文件交前敌总司令部接收，工作人员即日由赣返京。

△　广州“非常会议”为日军侵占东北再次通电声明“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推倒蒋中正个人独裁为今日共同努力的目标”。同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日本币原首相提出严重警告。

△　驻日公使蒋作宾派员赴日外务省转达非正式文书，称东北地方有企图组织独立政府之事，此种破坏中国领土之举动，在日军未撤退前，中国政府无法制止，日本政府对此应负完全责任。

△　杭州省立高中学生抗日救国会700余人到省教育厅请愿，要求发给枪械，并请转呈国民党中央对日宣战，随后到日领事馆前游行示威，沿途加入游行队伍群众甚多。同日，杭州各报刊登交通部长王伯群及女眷中秋节来杭在其别墅赏月消息。游行队伍群情激愤，将王之别墅玻璃及屋内日本瓷器、什物打毁，惟未伤人。

9月30日　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

△　国民政府颁布维持全国秩序令，略谓“近今国难方殷，时机日迫，政府当负其全责”。巩固国基，必须保持政府威信，“嗣后国内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　国民政府颁《保护日侨令》，略谓日军入侵沈阳，政府已向日政府抗议，着“各师旅饬属严密注意保护日侨，并切实劝谕人民，务守秩序，听政府为正当之解决”。

△　宁、粤双方和谈代表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等由香港乘车抵广州继续议和，洽谈顺利。

△　上海各工会代表张克昌等21人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抗日救国，丁惟汾接见，表示国民不应再对丧师失地的东北当局进行责难，应给予同情，否则今后东省事更无人负责。

△　上海《申报》发表《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的时评，谓东北半壁山河，尽失于日军铁蹄之下，而负有保卫国家之责的军队竟不发一弹而退，今日事，退让不能救亡，呼吁公理亦不能救亡，惟自起努力，乃能自救。人民出其血汗、国家罄其财力供养的200万军人，今日应站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

△　沈阳被日军占领后，东北海军司令部主要官员陆续逃至青岛。是日，该司令部开始在青岛办公，所属各舰仍分驻长山岛、秦皇岛、营口、威海卫、烟台、龙口、青岛等处。

△　第四路军总指挥、湖南省府主席何键电国民党中央暨蒋介石、张学良，请即日下令全国动员，一致武装，分队训练，轮流出战，并表示“四路军师旅警团十万，克日可效前驱”。

△　日本在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将溥仪带往司令部海光寺兵营，与罗振玉及关东军板垣参谋之代表上角利一相见。罗振玉向溥仪呈交熙洽亲笔信一封，请溥仪速回“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在“友邦支持下，先据满洲，再图关内”，并称现吉林全部控制在日军手中，只待溥仪一到，即宣布复辟。

△　国联理事会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九条，理事会休会至10月14日再开。侵占满洲各地之日军应在国联下次理事会议召开之前撤回原地。施肇基再次声明，中国仍保留根据国联会章要求理事会断定日军对侵占满洲事变应负完全责任，中国有要求日本赔偿权利。并要求国联“遣中立国人所组合之委员会前往满洲就地设法监视撤兵”。日代表芳泽反对施之声明。主席勒乐宣布不得对决议再作解释。遂休会。

△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派遣教育考察团抵上海开始考察。

是月　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率部在江西吉安、东固转移途中，遭到空军飞机轰炸扫射，中弹牺牲。

△　古巴中华总会馆主席林元亨发起成立旅古（巴）华侨抗日后援总会。

10月

10月1日　蒋介石电复粤方，声称宁、粤两方代表在港会议所定各条件，尚须斟酌修改；对恢复胡汉民、李济深之自由，随时可办；对本人去留问题，俟开和平会议时讨论；并力促粤方迅即赴南京开统一会议。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招待新闻记者，陈布雷报告，希望新闻界对日军侵略东北事件作宣传时，要为人民之诤友，不要附和；可鞭挞政府而不可指摘非难；对于一般悲观颓丧心理，要予以补救。

△　顾维钧由北平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交涉情况。4日，顾返平对记者谈，在京与蒋面晤三次，综合所谈，对日外交方针为“一、促日迅速撤兵；二、恢复9月18日前状态；三、交涉责任与赔款”。

△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阎宝航在上海青年协会讲演日军侵占东北情形，略谓：日军进攻沈阳后不到24小时，即将东北各要隘全部占据，若预先有所布防决不会至此。东北军士兵愤激万分，均愿决一死战，但长官严令不准抵抗。今日之事，唯全国人民一致对日武装奋斗，经济绝交，方能拯救危亡。

△　冯玉祥通电主张武力抗日，反对依靠国联，略谓：“今外患紧急，间不容发，若候国联主张，试问中国数十年来深受帝国主义压迫

之惨，国际公理究竟奚在？唯有团结民众，督促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雪无上之奇耻，本人誓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返顾。”

△　上海80余妇女团体2000余人联合组织妇女救国大同盟会，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全国动员对日进行军事抵抗，妇女界誓作政府后盾。

△　妇女运动元老林宗素发表《告女同胞书》，号召妇女共赴国难。

△　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由日军一手炮制成立，熙洽任长官，军政厅长郭恩霖、民政厅长王惕、财政厅长孙其昌、教育厅长荣孟枚、实业厅长张燕卿、秘书长李铭书。吉林日军警备司令坪井代表日方授印。

△　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在日军唆使下在洮南宣布独立，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派兵向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开进，图攻占黑省。

△　驻沪北站之铁道炮队第五队传令兵侯占元等三人在宝山路张贴反日标语，被虬江路口警亭警察郭文汉制止，发生冲突，双方扭打至第五区公安局。一路群众纷纷拥向该公安局，要求惩办肇事警察。警察开枪驱逐群众，当场打死两人，打伤五人。事后，市长张群令将该区公安局长游伯麓撤职查办。

△　新疆省府与苏联在迪化签订《临时通商协定》，凡七条。

△　孙传芳抵天津，声明绝未担任日军所委任的东北治安维持会委员等职。

10月2日　蒋介石电在粤商洽和议之蔡元培、张继、陈铭枢，重申与粤方议和三原则：一、粤方若能负全责，中央尽可退让，请前来南京，改组政府，本人可通电下野；二、粤方若不能负全责，则应归

中央负责主持，粤政府自当取消，粤方人员应来南京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表示欢迎，但必须来京面商。

△　国民党冀、平、津、绥、热五省、市整委会及北宁、平绥两路党部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在广州进行的宁、粤有条件的和议，表示拥护中央及蒋介石，除此之外，皆是破坏统一，为国人之公敌。

△　辽宁省政府在锦州设立，米春霖代理省主席。

△　上海全市150余工会代表开会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决议：由大会名义发表告世界各国工人书；电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粤方团结抗日；通电全国工人一致对日经济绝交，组织义勇军，并请中央发给枪械；请抗日救国会通令本市自本月11日起查有日货不交出者一律以奸商论罪；请政府将枪杀抗日群众的游伯麓处以极刑。

△　日军运送大批械弹助蒙古王公独立，将沈阳兵工厂军械、弹药装满五列车运往伊古苏，转运内蒙。次日又将两列车弹药运抵洮南附近，发给驻大河之蒙兵千名，该蒙兵由曾留学日本的30名蒙古青年统带。

△　沈阳日军300名开往通辽，将东北军第三旅张多峰部一营缴械。

△　沈阳日军发表公报，谓9月18日夜日军进攻北大营之役，历时七小时，华兵死300人，日军死二人，伤32人，并谓此役日军仅以700人对华兵一万人。

△　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当晚平息。

10月3日　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外交部长王正廷呈请辞职，准免本职，特任施肇基为外交部长，施未到任前，由外交部政务次长李锦纶代理部务。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山西省政府，省府委员商震、张济新、常炳彝、冯司直、仇曾诒、张维清、郭宝清、李尚仁、胡颐龄均免本职；兼省府主席商震已于8月6日准免兼职外，兼民政厅长商震、财政厅长张济新、教育厅长冯司直、建设厅长仇曾诒、实业厅长常炳彝均免兼职。任命徐永昌、孟文元、仇曾诒、苗培成、田见龙、常炳彝、胡颐龄、李尚仁、马骏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徐永昌兼省府主席，孟、仇、苗、田、常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实业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电请美国驻华使馆于10月14日以前派代表调查满洲局势及日军撤兵情形。同日，美国驻哈尔滨领事翰森奉美国政府电令调查日军从吉林、长春撤退情形。

△　张学良电复上海抗日救国会称："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现正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许身为国，宁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

△　东北绿林豪客代表盖三省、震东洋、小北侠、齐李靖、镇华北、张国威、草上飞、赛叔宝等联名通电表示愿率10万绿林为讨日前驱，请政府立即下令，"早剪倭寇，共雪国耻"。

△　全国各地民众抗日运动不断高涨。是日，南京各校学生停课一日，组织讲演队深入各街巷进行抗日大宣传；天津市民91个团体的代表开会，决议与学生、工友联合起来，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武汉大学学生赴武汉行营请愿，要求中央对日宣战，并要求行营发给学生义勇军枪械；南昌数千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清华大学停课，进行三周军事训练。

△　何香凝自巴黎寄信给《申报》，发表对日主张。呼吁全国爱国士兵与民众团结起来，制止一切内争，共同救国。并表示马上回国，作救护死伤之工作。

△　曹福林电山东省府报告鲁南匪情：郭马蜂股四五百人，尹士

贵股500人，尹士喜股300人，张黑脸股600人，杨光胜、李鹏军及大老石三股共六七百人，刘桂堂部约千人，安丘、临朐等地王子明等股300人，现各军正在进剿中，“俟天寒草枯，决纵火烧山，使匪无处容身”。

10月4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范石生为平汉路南段警备司令，徐源泉为鄂豫陕边区“清乡”督办，陈诚兼第五十二师师长，原师长韩德勤改任副师长，张英为第五十九师师长。

△　李烈钧、徐谦、程潜、张知本、陈嘉祐等九人联名分电京、粤、平各首要，呼吁停息内争，共纾国难。

△　上海妇女界300余团体一万余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决议电请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宣布对日具体方针；通电全国妇女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组织女界义勇军及看护队。

△　安东地区日军守备队司令岛本与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之代表傅布庆订立“保护日侨合同”，规定于芷山对其所管区域内日人及韩人生命财产负保护全责，于部如不履行，日军即可采取任意行动。15日，于芷山成立伪东边道政府，宣布“独立”，将所部4000余人改编为保安队，自任保安司令，充当汉奸。

10月5日　广州“非常会议”讨论宁、粤和议，同意先开和平统一会议，但须先将胡汉民释出并参与政事，粤方先派数代表偕蔡元培、张继赴沪，接洽统一会议地址及时间等问题。同日，陈铭枢及粤方代表李文范离省抵港转赴南京。

△　国民政府电饬施肇基请国联通知日本，由日本政府命令在东北日军长官与我国接收专员接洽交收办法，望在14日前完全解决，张学良已委派张作相、王树常为接收东北失地专员。

△　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　日本政府决议：对我国华中及华南的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即训令驻华公使重光葵照办，促中国政府反省。

△　南京各工会团体成立工界抗日救国会，并通过以下决议：一、通电全国工人，一致坚持抗日方针，并发表告世界工人书，宣布日军侵略满洲真相；二、通知全体会员不买日货，不作日佣，不供给日本原料；三、从日商洋行退出的失业华工请市党部、市政府救济；四、请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　香港各界抗日会和商会联合举行示威大游行。

△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第四百号刊载横田喜三郎教授所著《满洲事变与国际联盟》一文，认为日军侵占东北完全出于自卫范围之外，要求日本政府撤兵，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

△　伪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会长袁金铠及该会各委员联名发表宣言，声称该委员会专为维持地方治安，并无组织政府、发表独立宣言之举。

10月6日　广州“非常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表通电，提出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后必须致力者数端：一、应领导人民雪耻自卫，收回东北领土；二、扶植民权，培养民力，完成地方自治；三、结束武力挟持政治的历史，使武力受政治支配；四、政府与人民共同设立全国财政整理委员会。

△　粤方派汪精卫到香港晤陈铭枢，再商和平办法，商定先释放胡汉民、李济深，然后在沪开和平预备会议，俟陈抵京商妥，粤方始派代表赴沪。7日，陈铭枢离港赴沪。

△　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请国联在“满洲事件”调查范围内加入日军修筑吉会路一项；并向国联声明，日军仍然占据沈

阳、吉林、长春、辽源、新民屯、牛庄、安东、抚顺、敦化、凤凰城、昌图等处。至是日止，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正式送交日军侵占东北的文件已达41件之多。

△　西班牙驻沪总领事富尔奉该国外交部长、本届国联主席勒乐训令，是日离沪前往东北调查“满洲事件”发生原因、经过、现状及日军撤兵情形。富尔临行时谈，其调查报告仅送给勒乐，并不向国联报告。

△　鲍文樾奉张学良命赴山西邀阎锡山赴北平共商对日办法，阎表示愿以国民资格共御外侮。是日，鲍离并返平，谈称此行接洽圆满。

△　何成濬自汉飞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武汉水灾善后及复兴武汉办法，并请补助鄂省政费。

△　张学良派东北政委会委员刘哲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情形，罗文幹同行。

△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沈阳布告称：“排日侮日一切反动行为，无论何人，尽认为抵抗运动，不但饬属严拿主办，断然膺惩，以断乱根”，“仰尔一般人士，须慎其行动，勿轻举贻悔。”同日，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亦在吉林发出同样布告。

△　日本借口我国上海民众抗日救国气氛激昂，令佐世保军港大批军舰开沪。是日，日海军第二十四舰队驱逐舰“桧号”、“柳号”、“樫号”、“桃号”四舰由田中操海军中佐指挥开入黄浦江。据新声社调查：日本原在华之海军泊长江一带者为第一遣外舰队，计15艘，分泊华北青岛、天津等处者为第二遣外舰队，计五艘，分泊华南广东、福州、厦门等地者为第三遣外舰队，计六艘。至是日止，日在华军舰共31艘。

△　国联教育考察团施培克等一行八人在南京由教育部引导参观各教育机关后，是日赴北平、天津各地考察。

△　谢六逸、赵景深等发起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

10月7日　国民党中政会加推罗文幹、刘哲为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同日，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并电驻日公使蒋作宾对日本派大批舰队来华事提出抗议。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宣布对日政策，发给中大步枪2000支，并就日本政府要求中国48小时内答复长江流域停止一切反日运动一事质问政府将如何应付。因蒋介石不在，由教育部长李书华代见。学生拒绝，转赴中央军校见蒋，蒋作答复后，学生方返校。

△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就日军舰到沪事对记者发表谈话，谓“上海与沈阳情形不同，日本亦不致以对待沈阳者对待上海”，并断言“上海决无意外之事发生”。

△　自日本第二十四舰队到沪，各国均增加驻沪舰力，至是日止，各国在沪驻舰共22艘，其中日舰七艘，美舰五艘，法舰三艘，意舰一艘，英舰六艘。

△　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全部到达锦州。10日，王在锦州对《申报》记者谈，该旅“退出北大营时，士兵均抱枪痛哭，愿拼死一战，惟格于上峰命令，不敢违抗，遂各带武器，冒弹雨逃出，士兵死伤共三百余人”。

△　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辽南凤城小汤沟宣告成立，邓铁梅任司令。

10月8日　国民政府令：根据国际联合会决议，令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迅速派负责人员接收日兵撤退后之各地，切实恢复治

安，安抚流离，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嗣据该司令长官呈电，已派定张作相、王树常两员负责办理。兹据各种报告，东北各地方颇有利用时机，依恃外力，组织非法机关者，其叛国害民，应着该司令长官严密防止，并负完全责任督同张、王及各地官员迅速妥为办理。

△　国民政府训令各机关，谓现在国家多故，凡属官吏，自应共体时艰，在此期间，所有在京公务人员，一律不准请假，如有擅离职守者，即以弃职潜逃论，严加惩处。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圈定韩克温、赵连登、李汾、胡伯岳、梁贤达、苏寿余、刘冠儒为山西省执行委员；准安徽省党务委员程天放辞职，派刘涟漪继任；通过《中央审查党义教师资格委员会组织条例》。

△　张学良电国民政府报告日军仍占领营口、沈阳、长春、吉林、铁岭等地，辽、吉两省各机关均在日军手中迄未交出，无从恢复原状。同日，张又电告外交部，谓据辽源县长徐维新电告，日人煽动蒙古青年首领甘珠尔扎布（按：即民国初年被张作霖消灭的蒙匪巴布扎布之子）等乘机独立，成立独立军，由日军供给大批武器。

△　日军飞机12架由营口飞往锦州轰炸，投弹80枚，攻击主要目标为辽宁省府临时所在地锦州大学及锦州车站，炸死19人，其中有交通大学俄国教授一人，伤32人，炸毁机车一辆，辎重车二辆，房屋损坏极多。同日，日飞机五架轰炸新民公主屯，并在哈尔滨投弹10余枚，伤亡数人。

△　日陆相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教育总监武藤在东京集议对“满洲事件”今后方策，决议向日政府提出如下意见：一、“满洲事变”由中国不法行为所引起，故一切责任应由中国负之；二、满蒙悬案，特别如铁道及商权问题等，当乘此时期解决之。满洲新政权之实现，应以地方问题交涉之：（一）新政权树立，日侨之生命财产得有

安全保障后方能撤兵；（二）“满洲事件”为日中两国地方问题，国联倘欲干涉，当促其反省。

△　日军强令四平街市改制，日军委商会会长翟书田充伪市长，市政公所设日本顾问三人，咨议若干人，一切市政要项均由咨议会审决定。

△　日临时阁议通过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反日运动；并决议在抗议书发表之日，同时派遣军舰“常盘”、“天龙”两艘载陆战队向上海急行示威。

△　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递交请求书，请求放还被扣日货，取缔民众反日运动。市政府当即口头驳复，次日又正式致函该领事驳复。

△　空军参谋长李靖滨驾机由南昌飞吉安，途经樟树遇雾坠机身死。

△　红三军经钟祥、京山，回师洪湖，驻潜江县境，夏曦接任该军政委。

△　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旅长徐德佐率部进攻岳口红军贺龙、段德昌部时被击毙。

10月9日　　国联主席勒乐会同秘书长德鲁蒙分别致电中、日政府，谓东三省与中国其他各处发生意外事件，足令两方感情日趋恶化，解决更加困难，请双方在国联理事会重开以前注意遵守前次理事会所商定彼此约束勿令事态更严重之成约，履行各自在理事会上的诺言。

△　驻华日公使重光葵由上海赴南京，向外交部交付日政府对我要求撤兵照会复文，仅谓准备协商有关必要基本大纲，竟又向我国提出关于抗日之觉书式的抗议。

△　国民政府秘书朱文中及参事林竞会见来京请愿的上海各大学学生代表，表示蒋介石已令训练总监部于下星期内发给上海各大学义勇军步枪5000支，由派驻服务之各军事教官携往分发。学生代表遂乘夜车返沪。

△　上海市民联合会推代表钱龙章等四人前往公共租界工部局向总裁费信惇要求禁止日军在租界内示威，并保障市民之爱国运动。费表示日军在租界武装示威，工部局限于章程，无权限制；日军在沪仅700人，故沪市治安可保无虞。费并表示对华人之合法爱国运动不加干涉，望华人恪守范围。

△　辽宁省府代理主席米春霖因日机轰炸锦州，是日离锦赴平，各省委及重要职员均随行，临时省署已空无一人。

△　施肇基以日军飞机轰炸锦州，满洲局势严重，急不容缓，申请国联理事会提前开会。

△　驻长春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发出布告称，凡“谋排日”者，“或庇护此种行动者，或知此情不向日军报告者，均认为对日军之敌对行为，照军律严重处分”。

△　日军铁甲车一列载兵数百名开抵通辽，将南站、北站之间铁路拆毁，并埋设地雷，又将四洮车站与北宁路大（虎山）通（辽）支线接轨处炸毁，以破坏四洮路与北宁路的联运。同时，日飞机散发传单，内称中国军不能维持治安，致使土匪骚扰，故日军不得不来保护。

10月10日　蒋介石为“双十节”撰书国庆誓词，谓：“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望我同胞共同努力一致于和平统一，守法自强二语，以达救国御侮之目的。永为中华民国双十节之誓词，共矢勿渝。”同日，蒋在南京国庆纪念大会上阅兵并发表演说，望国民及将士不忘“和平统一，

守法自强”八字。

△ 施肇基照会国联理事会，谓日本已组织一起蒙古军队，发枪3000支，子弹100万发，迫击炮、山炮各四门，飞机两架，此军械全系从沈阳兵工厂所掠夺。日军正准备指挥蒙军进攻郑家屯。同日，日本代表芳泽照会国联理事会，称中国排日运动极为猛烈，显见中国决心企图与日本断绝经济关系，日本曾照会中国，所有在华日军一切行动皆系合法自卫行动，中国应负完全责任。

△ 驻美中国代办容揆正式照会美国政府，请美国指派外交人员至辽、吉省政府，在中国接收日兵撤退各地时充任顾问。

△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因英使林特美要求日政府解释日机轰炸锦州事件，是日发表宣言，诡称日机轰击锦州，系因中国军队正集中该处，日军在“自卫”上与“维持秩序”上有迅速行动之必要；如中国兵士不向日机开火，则日机不致轰击该地临时省政府及兵营；日机掷弹自卫，并不违犯国际公法。

△ 日本“常盘”、“天龙”两舰抵沪，停泊于杨树浦江中。“常盘号”载来海军陆战队400名，其中240人由汇山码头登陆驻入北四川路底之日兵营。“天龙号”载来陆战队240名，登岸后驻戈登路日兵营。日方声称此举系为保侨。

△ 广州永安路公安分局局长杜煊泰所开设的新世界洋货店专卖日货，是日因拒绝焚毁日货，群众愤而将店内日货焚烧。杜指挥警察三次开枪，打死群众15人，伤80余人。广州市公安局长陈庆云率警备队到场指挥，将行凶警察缴械。

△ 北平邮务工会组织抗日救国会，通电请全国一致备战，成立邮工义勇军，组织邮工宣传队，组织全国邮工抗日救国会及北平工人抗日联合会。

△　辽西著名绿林首领老梯子（高鹏振）在新民县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自任总司令。

△　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特兰成立。

10月11日　　国民政府照会英、美等国驻华公使，请派员调查日军轰炸锦州事件。同日，张学良电施肇基，声明锦州驻军并无扫射日本飞机之事。

△　调查康藏问题专员唐柯三以数月来调处无方，电蒙藏委员会引咎辞职。

△　广州各界就永安路公安分局局长杜煊泰指挥警察残杀爱国群众事件到粤府请愿，汪精卫、邓泽如、萧佛成等接见，谓公安局长陈庆云已引咎辞职，对杜将组织特别法庭审讯，死难者将予抚恤，并表示促保民众运动。

△　驻华日公使重光葵向外交部代理部长李锦纶面交日本政府9日发出的对华抗议书，声称“满洲事变”为中国多年排日思想所引起，日军为应付中国军队挑战而自卫，中国政府对此事件当负其责。并宣称中国排日运动与中日间现存条约之规定及精神相背驰，中国政府若不予以取缔，则与中国代表在国联关于“防止事态扩大”的言辞相违背，中国政府对排日团体之行动应负全责。

△　旅沪日侨举行居留民大会，讨论对付中国民众抗日救国运动之办法。散会后，日侨中之暴烈分子数百人三五成群，出发赴虬江路、北四川路一带，强撕各商店门窗所贴之爱国标语，稍有抵抗者即加殴辱，并将俭德公司所设孙中山遗像打碎，撕毁中国国旗。12日，上海市政府派秘书长俞鸿钧向驻沪日领事白井当面抗议，要求日方对此非法举动严加限制。白井表示尽力制止，惟要求市政府对抗日运动亦加限制。

△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伪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长袁金铠发出指令，沈阳东三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开业后，必须置于日军支配之下，以确保日军之利益，日本军认为必要时，无论何时，可停止东三省官银号营业之全部或一部。

△　抚顺伪自治委员会在日军扶植下成立，夏宣、刘汉卿为正、副委员长，聘日人山口文雄等为顾问，改挂黄色旗，宣布废除旧县政府。

△　美国国务院发表致国联照会，略谓国联对于纠正中日行动应勿爽宿诺，亟宜猛进勿懈，美国未忘《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争执者应负之义务，愿为国联后盾。同日，美国务卿史汀生电日外相币原，指责日军轰炸锦州，“与日政府在国联理事会对9月30日议决所作之诺言，殊不相符”。

10月12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对日问题称：日军虽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我国仍要镇静持重，拥护公理以抗御强权。“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不到日本侮辱太甚不得已时，决不与日开战。

△　国民政府任命张维翰、王柏龄、胡庶华、南桂馨、黄序鹓、董修甲、赵迺 传、王伯秋、程中行、狄膺、诺那呼图克图、何遂、凌陞、广禄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国民政府颁《蒙古盟旗组织法》；公布《民国二十年江苏省运河工程短期公债条例》，该公债总额500万元，于本年11月1日发行，年息八厘，票面按九八折发行，分五年偿还本息。

△　张学良在北平对路透社记者谈，日本要本人下野，系日妄图发展满洲独立运动，建立满洲国，为其将来完全兼并满洲作准备。指出日本之举，是干涉他国内政之无理行动。

△　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日机轰炸锦州的报告，要求理事会派遣国际委员会赴辽宁、吉林调查日军侵华情形。

△　陈铭枢抵南京，谒蒋介石报告赴粤接洽和谈经过。陈对记者谈，值此国难当前，各方一致对外，京、粤商谈和平统一已完全一致，蒋介石、胡汉民二人已消除意见。同日，陈到胡汉民住处转告蒋想与胡见面，并对胡说："蒋介石因粤方坚持须先恢复先生自由到上海，然后再谈和议，所以已有意送先生到上海了，我看先生要快些走，一迟怕又要变卦。"胡允诺。13日，蒋、胡在中山陵会见，蒋同意胡于次日离京赴上海。

△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决定对日方针：一、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切实指导、保护各种爱国运动；三、组织人民义勇军；四、设立救国银行。

△　日本外务省对我国政府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南满铁路线内之照会内容拒绝接受。外务大臣币原并照会驻日公使蒋作宾称，日政府关于日军驻扎满洲事项已将其可声言者通知南京及日内瓦双方。

△　广州中山大学全体学生罢课并就杜煊泰惨杀民众事件发表宣言，表示"誓以鲜血争民意，以头颅保卫国土，内除殃民大憝，外抗日本帝国主义"。是日，陈济棠调大批军队入城保护各机关，令香翰屏为广州公安局长兼戒严司令。

△　据上海《民国日报》载，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在我国东北掠夺军械"战利品"，价值共在8000万元以上。主要为：沈阳兵工厂大炮32门，速射炮41门，迫击炮61门，机关炮26门，步枪8.9万支，炮弹370箱，子弹800箱。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获大小炮共75门，步枪共8.57万支。兵粮、汽车、军衣、皮带、鞋类等价值1000万元以上。

△　据《申报》报道：长绥路护路司令丁超奉张作相令，就任东

铁护路总司令。东铁护路军划定新防区，哈长线苏德臣旅、哈绥线邢占清旅及赵芷香旅，哈满线苏炳文旅、张殿九旅及程志远旅。

△　陕军苏雨生部进攻宁夏，是日陷宁夏省城，马福寿部被缴械。

△　据《申报》报道，晋西临县、兴县、保德各县鼠疫猖獗，岚县、苛岚亦波及，兴县已死于鼠疫者达2000余人，学校均解散，省防疫处电令疫区各县断绝交通。

10月13日　外交部驳复日本政府本月9日对我抗日的抗议照会，略称中国政府自事变发生以来，不作任何敌对行为；对于日军继续进逼，不作任何形式之抵抗。惟日本政府不履行撤兵之诺言，日军继续扩大侵略，如发生不幸结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　国联理事会讨论日本强占东北问题，法国外长白里安代理主席。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休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日代表芳泽为日军入侵东北辩护，竟谓东三省为日本所开发，已成为日本生存所系，由于中国反日民心激昂，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勿生增重局势之事件，理事会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

△　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电国联对日本通牒所称中国反日运动为国民党指导下之国策手段力加驳斥，谓日谍不但措词错误，且将远东历史颠倒，中国的反日运动，是中国人民对异族侵凌的一种心理感情之表示及道德力量自然的发动，任何政府均无权制止。

△　伪吉林长官熙洽遵吉林警备司令天野少将之通牒，布告全省民众严禁排日行动。

△　内蒙达尔罕王抵达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日军强迫其召集内蒙48旗宣布独立及从沈阳逃出之经过。张以达尔罕深明大义，慰勉有

加。

△　驻汉日领事赴武汉行营见何成濬，要求保护在汉日侨生命财产，取缔华民反日运动，何表示负责保侨，民众无越轨行动，反日宣传与经济绝交系人民爱国运动，政府不能干涉。

△　全国商会联合会前奉行政院训令举行俄币卢布登记，是日该会向实业部呈报各方报告总数为550729561.5元。

△　广州全体警察发表宣言，谓10月10日惨案系警察当然之防卫，对杜煊泰不得有所处分，倘以三数“反动者鼓动民众捣乱”为合理，则全体辞职。同日，广东省政府训令全体警察照常上班，不得擅离职守。

10月14日　胡汉民离南京赴上海，结束了自2月28日以来被蒋介石幽禁的生活。陈铭枢、吴铁城、张静江偕行。胡抵沪后，旋筹备宁、粤和谈会议。

△　国联理事会召开秘密会议，中日两国理事未参加。会议讨论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解决中日满洲问题，一致同意邀请美国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后白里安晤中日代表征求意见，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日代表芳泽声明需向本国政府请示。争端所在，中国坚持先撤兵后谈判，日方则要求先谈判后撤兵。

△　白里安令法国驻北平武官邦德维特代表国联主席赴锦州、沈阳调查，并将调查情形随时电告日内瓦，邦德维特是晚离平赴锦。

△　沈海路自日军入侵东北后停止通车，后改为中日合办，并组成沈海路保安维持会，以土肥原为监事长，丁鉴修为理事。是日，土肥原与丁联名发出通告，称该路自本月15日起恢复通车。

△　受日人指挥之大股蒙匪二三千人沿四洮路进击通辽，与驻通辽之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第四十团激战，蒙匪被击退，双方死亡均众。

同日，日机轰炸通辽。

△　日外务省就我国政府抗议日机轰炸锦州事件复照外交部，谬称：日机轰炸锦州，系因据报中国方面在锦州集合军队，计划扰乱满铁沿线治安，故日机飞往侦察，受中国军队射击。日机投弹轰炸，乃自卫之当然行动。

△　日军封锁大连港，断绝交通，暗中运输连队。北宁路列车四列被日军扣留运兵。

△　张学良召集在北平各要员讨论时局问题，决定除对日侨切实保护外，并拟令各地驻军勿轻举妄动，所有对日外交完全听命中央办理。

△　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部自9月18日撤出沈阳北大营后，绕行千里，是日抵达北平。张学良令该部驻平绥线的南口、怀来休整。

△　财政部次长张寿镛对华东社记者谈，财政部绝无停付外债之举动，自民国五年至今已偿付外债10余万万元，至民国二十九年，即可逐渐还清。

△　教育部通令各公、私立大学，因日军入侵东三省，凡辽、吉、黑三省学生，均豁免或减免学费一学期。

△　中国航空公司南京至北平航线正式通航。每日京、平对开，每机乘客三人。

10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圈定王祺、何键、张炯、谭常恺、朱浩怀、谢祖尧、黄家声为湖南省执行委员；圈定潘秀仁、赵允义、陈国英、曲步霄、乔秉华为绥远省执行委员。

△　胡汉民在沪电促粤方唐绍仪、汪精卫等到沪与宁方举行和平会议，谓现在外患急迫，正为团结紧要时机，宁粤团结，“今后安内

攘外之力，亦可确定”。

△　广州“非常会议”决议，派汪精卫、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五委员偕同宁方代表蔡元培、张继赴沪议和，并推定汪精卫、孙科、许崇智、邓泽如、萧佛成、邹鲁、谢持、覃振、林森、李文范、熊克武、顾孟馀12人出席统一会议，陈济棠、李宗仁留粤主持政务。

△　日军侵占东北后，留日学生纷纷退学，欲回国参加抗日。是日，训练总监部特令留日军事学生管理处主任章鸿勋转饬各专科及士官学校之官费留学生不得擅自退学，如至万不得已时，可与驻日公使蒋作宾取一致态度。

△　广州惨杀民众之祸首杜煊泰在押脱逃，粤当局悬赏二万元缉拿。汪精卫为此引咎辞职，广州“非常会议”慰留。

△　外交部就日军近日增兵新民、辽源，封锁大连海口，炮击北宁路客车等种种军事行动电请国联对日方提出紧急制止，并声明国内民气异常激昂，但政府服从国联主张，一再训谕民众，听候国联解决。

△　前四洮路督办马龙潭凭借日军势力在四平街成立“中满联合独立自治会”，包括昌图、梨树、辽源、怀德、开原五县。马发表宣言，声称该会“重新设置一切政治机关”，“依世界人类爱善最高之宗旨，建设中日亲善之乐土”。

△　洮南镇守使张海鹏部开抵嫩江桥，在日机两架掩护下发动进攻，遭到东北边防军驻江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阻击，张部支队长徐景隆触地雷毙命，张部溃退泰来。马占山之黑龙江省防军将嫩江桥炸坏三处，以阻日伪军过江。

△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沈阳召集各旅团长及重要军官开会，

决议联名电请陆相南次郎要求日政府退出国联，对华宣战。

△　日机五架轰炸通辽车站，行车房被炸毁，死14人。

10月16日　　国联理事会举行全体大会，讨论邀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共商解决中、日“满洲事件”问题案，日本代表芳泽极力反对美国代表出席理事会，并提出修正案，主张组织法律委员会进行研究。理事会主席白里安以日提案付表决，仅一票赞成，13票反对，被否决。原邀请案以13票赞成，一票反对获得通过。白里安即向美国发出邀请书。同日，美国接受邀请，派吉尔白列席。日本政府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谈话，谓国联如不审慎考虑日本意见，日本将退出国联。

△　日陆军武官永津中佐奉陆军部令正式通知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日顾问柴山少佐、今田大尉及吉林省军事顾问大迫、沈阳高等兵学教官矢崎、须田两少佐，决定自本月15日起解除聘约。

△　胡汉民在上海就对日外交发表谈话，谓对日应确定一原则，即“绝对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之下”与“绝对不丧失国家之权利”。同日，胡又对沪各大学学生代表谈，当此国难之际，学生应“为民前锋”，应多注意“力”的准备，毋作“气”的发泄。

△　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由黑河抵齐齐哈尔就职，并电各军协剿张海鹏军。

△　上海金业交易所即日起以美元为基准。

10月17日　　国民政府任命刘文岛为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王广圻兼驻捷克斯拉夫（今译捷克斯洛伐克）国特命全权公使，张志良为东三省盐运使。

△　国民政府令：现查山西、陕西两省地方发生鼠疫，人民死亡甚多，着行政院转饬内政部遴派卫生署医官带同护士及各项药品前往该疫区协同省政府妥速办理。

△　国联理事会讨论中日满洲问题，鉴于中、日意见分歧严重，欲拟一折衷办法，即一面由日本分期撤兵，一面在撤兵期内由中日两国开始谈判。并决议，由白里安电所有《非战公约》签字国，请各该国政府电其驻中、日公使分别劝告中、日政府遵守公约。

△　上海各业70余工会联名发表促和平救国宣言，谓日寇入侵，亡国之祸，危在眼前，“倘竟互相犹豫，只图私利，不顾大局，或敢有垄断跋扈者……均为我全体国民之公敌”，全国上下应一致图救国大业。

△　据《申报》报道：吉林省府暂设哈尔滨大帅行辕，代理主席李振声、参谋长王之佑、财政厅长徐晋贤、民政厅长詹允、农矿厅长王宽善、建设厅长徐箴、教育厅长李树滋、警务处长高齐栋、外交特派员钟毓。

△　日本上议院领袖开会，通过促政府对满洲问题坚守原定政策，勿顾忌国联之决议。同日，陆相南次郎与参谋长金谷会商后，向报界宣布，无论国联或其他第三者取何途径，日本对满洲政策决不改变。

△　教育部转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凡九条，并通令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遵行。

△　16日晚胡匪200余在日人指挥下进攻新民县城外六里之南台子村，是日该村被攻陷，全村壮丁19人被杀，妇女被污，并纵火焚村，全村300余家尽成焦土。

10月18日　　国民政府令教育部通令南京各学校整饬学风；又令各机关禁止公务员参加民众抗日运动。

△　李烈钧、徐谦、程潜、张知本、陈嘉祐等拟定向宁粤和平统一会议提案大纲九条，其中有“切实保障人民实行集会、结社、言

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人民得自由组织团体或政党”，“缩短训政时期”，“唤起民众捍御外侮”，“恢复苏俄国交”等项。

△　韩复榘布告各界，谓自东北事件发生后，迭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命令，对外务须力持镇静，听候中央解决。此后凡贴标语，召集会议，必须省党部及省政府审查允准方可行动。

△　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参加者有邮务、火柴、粪夫、缝纫、地毯、报贩、电车、自来水等工会，决议从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积极募集爱国捐款。

△　据《申报》载：美国红十字会职员兼著作家、讲演家艾迪将其于10月9日在天津美总领事前所作的关于日军入侵满洲之宣誓证词书寄给实业部长孔祥熙，证书按法律方式立言，在任何法庭可提出作证，证上除艾迪本人签名外，还有监视人美驻津总领事乔治亚吉森的签名及美总领署印。

△　世界著名发明家美国人爱迪生病逝。19日，国民党中执会致唁电哀悼。

10月19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

△　蒋介石接见东北民众代表向宸等，代表提出请政府否认辽、吉非法组织政府及其与日所订密约，并严令通缉袁金铠、熙洽等汉奸；统筹全国自卫方针；恢复与苏联邦交；速令黑省军队阻击张海鹏北犯；积极扶助学生义勇军等要求，蒋对所请各点，分别答复表示接受。

△　张发奎率第四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主张对日本宣战，表示愿为抗日先遣，万死不惜。

△　国联理事会对中日满洲问题之讨论，因日提基本要点五项及日政府正式照会重提美国参加之法律问题，发生剧变，宣布延会，授权白里安与中、日代表直接商榷解决办法。同日，日代表芳泽发表声明书，声称日军暂不能从东北撤退，并提出日军撤退的两项条件：一、中国军队不对日本有敌视行为；二、中国政府及地方长官须尊重日本在中国的条约权利。

△　施肇基在日内瓦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谓任何解决中日争执的办法，只要全世界认为公允有理，中国皆愿接受。中国完全信赖国联，绝对受理事会决议约束。

△　外交部接莫斯科电，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水火不相容，决不与帝国主义者协谋以图他国，甚望中国自行从速制止日本在满蒙之阴谋。

10月20日　　蒋介石在南京招待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英、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等国代表，希望代表在会议期内研究如何联合世界公众之舆论，以谋世界和平。

△　张学良电施肇基，谓东北军为尊重国联决议案及友邦劝告，无不处处对日军退让，已将日方最为重视的王以哲部调至与日军不能接触的平绥线南口一带，请向国联声明。

△　外交部昨今两日先后收到英、法、德、挪、南斯拉夫五国致中、日两国请注意《非战公约》义务之照会，并表示各该国现正积极协同国联为促使中、日满洲问题和平解决而努力。

△　日代表芳泽向国联代主席白里安及秘书长德鲁蒙递交关于日本政府对满洲撤兵的五项条件，其要点为：一、中日相互担保各不侵略，并保障彼此领土完整；二、中国境内各种排日形式，包括抵制日货在内，须永远取消；三、保障中国境内日人生命与财产之安全；四、中国须偿付用以筑造满洲各铁路之日款，并承认满洲筑造铁路之

现有条约；五、承认现有条约权利，包括日人在满洲租地之问题在内。

△　南京全市学生开抗日救国大会，一万余人参加，通过关于促进和平统一、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严惩叛国分子、恢复民众运动、实行强硬外交政策等项提案多件。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西北反帝同盟军组成，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总、副指挥。

△　沈阳市地方维持会长赵欣伯继土肥原任伪沈阳市长，土肥原任市政公署顾问。赵并兼沈阳高等法院院长、保安队监督及东三省民报社长。沈阳维持会扩大权限，管理辽宁全省民政，各县均取消县政府，改组成维持会分会。

△　阚朝玺在沈阳通电自白，声明其于9月28日所组“四民临时维持会”是在日军入侵，达官富绅相率逃避，一般民众既不能避，又不及呼吁，生计复遭断绝的情况下所为，近因各机关成立，该维持会已于10月10日取消，本人亦脱离地方维持会。

△　外交部次长李锦纶就“韬朋案”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谓据军政部次长陈仪调查，韬朋被昆山驻军团长黄珍吾执讯，因态度不逊，被黄杀死，消灭尸首，黄已被判徒刑14年。

△　上海法租界发表户口调查统计：中外居民共45.6012万人。其中华人占44.0866万人，外侨1.5146万人。外侨中俄人最多，为5671人，英人2629人，美国人1572人，法人1326人，其他各国侨民为数百、数十不等。

10月21日　　蔡元培、张继偕同粤方出席和平统一会议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陈友仁到达上海。唐生智、张发奎、甘介侯、郭泰祺以及随员91人同行。同日，广州“非常会议”电沪邹鲁，请担任粤方出席和平统一会议代表。

△　何应钦奉蒋介石电召由南昌返回南京。南昌行营事务由参谋长贺国光代理。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增派朱兆莘为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

△　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正式就任黑龙江代理省主席。马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

△　冯玉祥电汪精卫等粤方出席宁粤和议代表，陈述对时局主张，其要旨为：一、设立国防局，集中专家，共筹国防计划；二、应迅速起用真正有功于革命之人员；三、恢复党的民主制，整饬党纪；四、首都应迁于适当地点；五、恢复民众运动；六、厉行减缩政策，裁并机关；七、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算决算制；八、严订惩处官吏渎职贪污条例；九、制定生产计划；十、严订累进之所得税及遗产税；十一、规定公务人员最高薪及工农最低薪；十二、制定社会保险法；十三、修正教育计划，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　粤省府取消对平、津、沪等地各报入口禁令。

△　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沪正式开会，共到中、澳、英、日、菲、美、荷、加拿大、新西兰九国代表131人。徐新六致欢迎词；胡适发表讲演，略谓这次会议的东道国，正遭到史无前例的国难，中日虽没公开开战，但已在战争状态之中。希望会议能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做出努力。

△　安徽省府主席陈调元电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濬称："国难临前，赤氛未息，攘外安内，全在负责有人，无论如何更张，一国元首，不宜更易"，请何劝阻蒋介石引退。23日，何复电表示："当存亡危急之秋，欲一致对外"，应如期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是。

△　沪蓉航线汉渝段正式开航。

△　施肇基致白里安备忘录，重申：一、解决满洲纠纷之谈判，必须以立即撤退日军为基础；二、日军撤退时及撤退后，必须有一中立委员团视察；三、必须承认中国因日军侵犯满洲所受损失有要求赔偿之权；四、必须成立一中日之间调和与公断的永久机关。

10月22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抵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在上海孙科住宅会谈，宁方出席者为蒋介石、于右任、蔡元培、李石曾、张继、张静江、陈铭枢、邵元冲，粤方为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邹鲁、胡汉民。会谈商定：一、外交方面决先求得一致，以利共赴国难；二、党、政、军诸方面问题，俟南京推定代表来沪与粤方代表先开预备会共议详细草案，然后再赴南京开正式会议决定。同日，蒋介石返回南京。

△　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等联名致函蒋介石提出宁粤议和办法七项：一、为共赴国难，先谋外交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请宁方派代表到沪共商解决办法；三、党国根本问题在于集权于党，完成民主政治乃根本原则；四、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德、法总统制，以年高德劭者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拟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七、到统一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双方应照常担负。

△　国民政府通令南京、上海、镇江各地方当局，禁止拘日货商游街，略谓民众买卖日货，悉应本其自由意志，政府无法干涉，但拘人游街，不特妨碍社会秩序，且亦超越法律范围，应予制止。

△　行政院下令严禁用粮食酿酒，以维灾民食用。

△　汪精卫在沪接见沪各大学抗日会代表表示：“对日宣战问题，不但须有最后之决心，且须有最后之准备”；“对俄并非不可恢复国

交”，“对共仍须排除”。

△　国联理事会开全体会议，白里安提出解决满洲问题决议草案，内容要点为：一、限日军在下月16日理事会召开之前撤至铁路区域以内；二、重申中国保侨诺言，并望中国采取可令他国代表察视满洲诺言之实行方法；三、撤兵实现后，中日直接开议双方之间各悬案；四、设调解委员会。中日代表各向本国政府请训该案。23日，理事会开会，中国代表施肇基声明：中国为屈从理事会之意愿，接受草案。日本代表提出修正案，对撤兵限期及美国参与调解均不接受，仍坚持先直接谈判后撤兵。24日，理事会就白里安所提草案进行表决，13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因未能一致通过，无决议效力，白氏遂宣布休会，11月16日再开，并声明该草案有道德价值，永久为理事会舆论记录。

△　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吴鼎昌演说中国经济计划，应注意三点：一、应注重地方发展；二、应发展交通，首先全力建设铁路，急需国际合作协助；三、其他工、商、农业应由本国投资。24日，会议继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着重讨论交通、水利问题。关于中国人口问题，会议认为“节制生育，改良家庭制度及治安种种，为目前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之切要”。

10月23日　　粤方出席和平统一会议代表汪精卫、孙科等在沪招待新闻界，汪称今后将不再检查报纸，“使人人有自由发表意志的机会”；又称，事实证明，用武力不能求统一，今后应“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

△　蔡元培、张继由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报告粤行经过，并商洽党内各领袖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办法。蔡遵蒋命当晚返沪，向粤方代表转达蒋意。

△　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国联关于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佥

谓只要国联认为是公正之解决办法，中国一本初旨，绝对尊重公意之判断。

△　日本政府训令芳泽向国联理事会声明，如中国允认中日各条约之约束，并取消抗日运动，则日本亦允开始将满洲军队撤退至南满铁路区域，并尽力于三星期之内完成此举。

△　鲁迅发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文。

△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

△　日军召集沈海路局长丁鉴修、四洮路局长阚铎、洮昂路局长万咸章、吉长、吉敦路局长金壁东及伪沈阳市市长赵欣伯开会，决议重新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该会自九一八事变后停止工作），管理东北诸省交通行政，推定丁鉴修为会长，金壁东为副会长。27日，该委员会成立，并发宣言，宣称该会管理四洮、洮昂、吉海、吉敦、沈海等铁路。

10月24日　　蒋介石函复粤方代表汪精卫等22日函，内称：来函所提诸问题，已派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就近接洽，并请胡汉民就近商酌，望早日到京，共赴国难。

△　国民政府令：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副委员长马福祥、王瑚及全体委员均免本职；特任朱庆澜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李仪祉为副委员长。

△　日本政府训令芳泽向国联理事会解释，关于中日条约问题，日本将1915年条约（按：即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列入“现有之条约约束”，“此约束中国必须承认”，并请国联理事会纪录日本本月20日向国联提出的关于解决中日满洲问题的五项要求。

△　前安徽省府主席方振武及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居正应汪精卫、胡汉民电邀参加宁粤和平会议，是日抵沪。

△　彭位仁之第十六师由浏阳东黄茅向张家坊“清剿”，苏维埃县委宋发根等三人被逮捕枪杀，张家坊红军设立之学校、医院及机关均被捣毁。同日，该师刘济人旅“清剿”浏东云溪岭一带，杀害革命群众多人，并将该处苏维埃乡政府烧毁。

△　据《申报》载：蔡廷锴在赣州召集第六十师及第六十一师官兵训话，勖勉将士要“与国俱存，与国俱亡，死要死在国亡之前”。

△　日关东军司令部代表林义秀向黑龙江省府要求，七日内务将江桥修复，否则由日军掩护“满铁”修理。

△　美国著名律师达洛、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文学家杜兰苏、自由思想者纽约著名之《民族周刊》之编辑者加纳脱、美国自由主义联合会之秘书长鲍尔温等著名人士，闻中国政府将牛兰夫妇秘密判处死刑消息，大为震动。是日，联名电南京政府对该项判决提出抗议，并另电宋庆龄设法营救。

△　教育部核准四川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三校合并，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

10月25日　　南京政府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张静江、李石曾五人为出席宁粤和平会议正式代表，与粤商讨和平统一问题。

△　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谓宁、粤统一后，两方约定同时发表蒋先生下野通电与广州国府取消通电，其最大意义，是把几年以来的纠纷，做一个结束，而从此以后，展开一个新局面，“把政治从军事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　宋庆龄致函《申报》，声明《时事新报》登载宋庆龄参加宁粤和平会议消息，完全不确，谓本人若对时局有意见发表，当正式送给各报刊登。

△　前清恭亲王溥伟由日军从大连带到沈阳，帮助日军筹建伪政

权。

10月26日　　国民政府就国联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发表宣言，略谓“国民政府深信国联理事会决议案能早日实行，并盼国际联盟继续努力，务使目的能完全达到，我国国民自当刻意忍耐，恪守法律，以助正义公道之成功”。

△　宁、粤双方参加和平统一会议代表在沪开谈话会，讨论外交问题。双方认为国联对中日满洲问题能主持公道，应促国联贯彻其主张与精神；中俄复交问题，不必与中日问题并论。

△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谓国联关于中日满洲问题的决议案，“以一般国民立场而论，当然未能达到吾人所要求之目的，但国联经过种种苦心，不能不说已尽到责任，亦不能不说国联已表现其精神与力量”。故我国应谅解国联，为保护世界和平而表示对决议案接受。全体国民应以“忍人之所不能忍”之精神等待国联伸张公理。

△　施肇基致函白里安，表示中国政府随时可与日本政府商订中日仲裁公约，但该种公约内容应与《中美仲裁公约》相同。

△　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因不愿参与日军策划之东北“独立”运动，被日军送东京。冯托言赴英留学，设法辗转回国，是日抵沪转赴南京。27日，冯向蒋介石报告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被难经过，并请政府设法救济。

△　上海各大学教授王造时、沈钧儒等200余人联名致书宁粤和平统一会议全体代表，陈述对时局意见：一、对日交涉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并保留要求赔偿、道歉之权利；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权利，党治以来人民权利剥夺殆尽的局面必须终止。

△　上海特区市民联合会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对内应改进党务，澄清吏治，集中人才，努力建设，实行主权在于民之政纲；对外应从速决定对日方针，以恢复中华民族之地位。

△　日本政府就中日满洲问题发表声明书，声称国联24日通过的决议案不能成立，日政府统观中日大局，凡关于日本国民的生存之利益，绝不改变决心，日军若退回铁路附属地内，则势必使事态恶化。日本政府为确保在满日人之利益，认为中日直接交涉所“必要的基本大纲”是：“（一）否认相互的侵略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三）彻底取缔足以妨害通商自由，或煽动国际之间仇恨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对于在满洲各地之日本人民之和平业务，须加有效之保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方面条约上之权利。”

△　溥伟带领废清复辟派40余人在沈阳祭告昭陵，日军沿途布岗保护，并驱乡民数千人前往“观礼”。日福田井上大将及贵、众两院议员均送花圈。溥伟等在陵前三拜九叩后三呼“中日亲善万岁”，并宣读誓词，狂妄声称：“仰仗祖宗威灵及日本正义，推翻盘据廿年之仇敌，臣今后当竭其心力，恢复祖宗之基业。”

△　沈阳日军司令部借口“剿匪”，派兵占领四洮路各重要车站。日本官方声称此举系受南满路局之请。

10月27日　　宁粤和谈会议代表在沪伍朝枢宅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会议名称原定为“和平统一会议”，因宁方反对，遂改为“统一会议”，宁方仍不同意，最后议定称“京粤代表会议”。会议讨论粤方提案。

△　土肥原贤二由沈阳赴天津，秘密进行劫持溥仪活动。其计划是：一、扰乱北平、天津治安，破坏张学良在华北的政权，如成功即扶植溥仪在北平建立朝廷，将东三省让给日本；二、如扰乱不成功，则将溥仪劫持到沈阳作伪满洲国傀儡。

△　何键在湖南省府讲演“抗日救国国人应注意事项”，强调要严防共产党，要严守秩序，要努力职业，要加紧军事训练。

△　昨今两日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太平洋外交机关设置问题，中日代表对满洲问题争论激烈。大会认为，国联已有限日撤兵决议，若日本不执行，将来再设任何保持世界和平之外交机关，对日本皆属无效。

10月28日　　京粤代表会议第二次预备会议决议：关于外交事件，其方针及原则即在代表会议中讨论；进行交涉则由南京政府负责。双方一致决定，在日本未撤兵前，决不与日交涉。

△　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日领事清水就黑省代理主席马占山拒绝日人修复嫩江铁桥，坚持中国自行修复一事提出抗议，声称洮昂路系“满铁”借款铁道，且与日本交通运输、经济上有重大关系，日本方面决定派人修复。又称，黑省军队对日人必须加以保护，“如有妨碍，日本方面将以适当措置”。

△　阎锡山电京粤代表会议，希望双方“抱定牺牲主义，努力完成统一的党、统一的国，协力御外，以救危亡”。

△　中共江西临时省委制定颁布《反帝大同盟章程》，凡八条，以“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豪绅地主阶级、国民党以至‘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拥护苏维埃政权，联合苏联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

△　溥伟、汪喜、桂香等复辟派在沈阳商埠地八纬路一号正式组成“东北四省纯正民意政府建设研究会”。

△　山东日侨在青岛召开全山东居留民代表大会，通过“努力造成重大事件”、“解决山东悬案与满洲问题同样断然处置”等五项决议，并发表宣言，声称“本会今当中日国交危急之际，对于非武力之敌对行

为，如排日排货、经济绝交等事，凡危及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必设法剿灭，以图彻底解决中日条约”。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古应芬在广州病故。

10月29日　　京粤代表会议第三次预备会议决议，对所谓外交一致作明确解释：“所谓外交一致，系有限度的，如外兵侵入而言，不抵抗，丧失国土而无人负责，此种政策及情况，会议不能表示一致。”

△　张学良奉蒋介石电召从北平飞抵南京，面商东北外交问题。30日，张偕顾维钧谒蒋，商谈东北外交及接收办法，对准备接收辽、吉问题已拟定具体办法。31日，张返平。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电中央及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提出确定对日方案；在沪同志应速入京，实现团结等对时局之八点建议。

10月30日　　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等就各地来电要求团结对外问题联名通电全国，略谓：数年以来，党不团结在于民主集权制尚未恢复，国不统一在于未能实行训政，完成民主政治，京粤代表会议重大职责在于根本解决党国诸疑难问题。现状与民国十六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中央全会预备会议相同，故此会议亦在上海举行。

△　京粤代表会议第四次预备会议决议：一、由双方代表各电双方中央党部，请展缓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俟双方商定就绪再定日期；二、通过中央政制改革原则；五院独立负责，行使职权；使政治系统与组织简单化，以增加政治效能；使政治实际的民主化，中央政治机关应加民选分子，以使政府与人民共担建立宪政之目的。

△　南京方面正式公布京、粤商洽和议以来全部往来电文。同

日，南京方面电蔡元培，谓粤方所提关于党政改革方案违反总章，不能接受讨论。

△　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银价”问题，大多数代表认为世界之金不够世界之用，各国币制势将发生变动，以后银价或不致再大跌，银之风潮已告一段落，中国代表吴鼎昌发言称“现在国家中，完全以银充货币者，只有中国，故中国经济事业发展，银之用途增加，然为中国计，不愿为银之尾闾”。11月2日，太平洋国际学会闭会。

△　训练总监部、教育部公布《学生义勇军训练办法》。

10月31日　　京粤代表会议开第五次预备会议，京方加派吴铁城为代表，通过中央政制改革案，其内容要点为：国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责任，不兼他职，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废除中央政治会议，设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为当然委员，行政院负实际责任，其他四院连带负责；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院；行政院各部长人选不必限于国民党员。

△　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电令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照会，驳斥日本政府26日的声明书，并向国联表示“日本如依期撤兵，一切困难均可解决”。

△　日外务省复蒋作宾26日照会，声称不承认国联理事会24日决议为有效，惟希望中国政府赞助日本方针，开始商议确立平常关系之基础大纲协定问题，及军队撤回南满路附属地。

△　孙连仲在京向蒋介石报告该路军驻防宁都一带情形及“清剿”红军状况。同日，蔡廷锴以该部即将由赣调京，特赴上海向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请示入京后的防务事宜。

△　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通电督促宁粤和平统一会议迅速正式召开，要求派代表列席会议，并以公开信致张学良，请其解答不

抵抗之意义及此后收复失地计划。同日，上海160个同业公会为促进国内和平，联名致电蒋介石、胡汉民及京粤代表会议各代表“捐弃成见，努力国是”，“国难当头，攘外为先”。

△　日本共产党反对日军出兵东北，自日军占领辽、吉两省后，该党亦秘密到东北活动，总机关设大连，以松井隆等七人为领导人，各地分机关亦纷纷建立，并在抚顺秘密出版《满洲赤旗》，散发颇广。日本警署自本月26日在抚顺查到《满洲赤旗》后，28日在大连实行大逮捕，其他各地相继进行。是日，在满洲医科大学捕获日本共产党学生20余人。

△　溥伟在沈阳北陵举行市民大会，就任伪四民维持会长，声言“满人治满，决与日人合作到底”。驻沈阳日司令部应溥伟之请，通令全市悬日旗志庆。

是月　中共中央电苏区中央局：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　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安徽六安县麻埠成立，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

△　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港设立中央党部。

△　上海文总创办《九一八》周刊，成仿吾主编。第二期改名《公道》，潘梓年主编。第三期起改名《中国与世界》。

11月

11月1日　国民政府派顾维钧、张作相、张群、吴铁城、罗文幹、汤尔和、刘哲为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委员，以顾维钧为委员长。

△　京粤代表会议就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商定三种方案，由两方代表各自向中央请示择定：一、京、粤两方代表合并开会；二、京、粤两方分别开会，但以合作精神行之，中央执监委员名单先经双方确定，再由双方大会通过；三、展缓至明年开会，另选代表。

△　蒋介石在南京就京粤会议议案对《大公报》记者谈：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粤方诸人苟能负责，请其径来京主政，现在中央工作者尽可让开；一、二、三届中央委员混合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断不可行。否则“将来各届俱可混合，是为国家永留不安之祸根”。“挽救国家危亡，首在稳定政治中枢”，“个人进退，不成问题”。

△　国民政府电施肇基转致国联复牒，略谓中国一直拥护国联决议案，请国联主持公道，促日军从东北各占领地撤退，和平解决中日纠纷。

△　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马超俊等由粤电在沪之粤方代表，务求贯彻在粤商定之主张。

△　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分批离赣移防京、沪地区，临行发布《告赣民众书》，略谓“际此国难声中，自当敌忾同仇，以御外侮，本师誓效前驱，踏平三岛，饮马东京，以雪国耻”。同日，蔡廷锴由赣飞沪。

△　全国各地学生抗日救国代表60余人在南京开谈话会，决议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首先组织筹备会，以各省市为单位，每单位推选一人为筹备委员。

△　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又称赣南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表示完全接受中央9月指示信的批评，承认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强调“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

△　湖南旅京同乡会召集紧急会议，反对何键以赈灾、筑路名义附加本年田赋一倍，盐税每包加一元五角，营业税照新税则加五成之决定，并推代表彭新民等向中央请求制止。

△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督促京、粤双方代表即日正式开会。并宣称“若再迁延，破坏和平统一会议者”，“咸为国家之罪人，民族之公敌”。

△　日军铁甲车四列开抵通辽北站，炮轰通辽城，死五人，伤数十人。我国驻军为防日军前进，已将南北两站外之铁轨拆去一段。

△　日本侵占我国长江航权之大本营日清公司，因我国民众抵制日货以来，沿江各埠一致停装日货，是日又有一批轮船被迫停班。该公司为保留长江航行权，强留“洛阳”、“凤阳”、“大贞”、“大福”四轮自上海至汉口开空船往返。

11月2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发表演说，指责粤方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京方合作，故意为难京方，实是间接援助日本。又称，本人现在决不辞职，“我早已决心，即使全国国民、全体同志都不惜违背约法和党章，但我中正个人决不能毁坏约法，违背党章”。

△　京粤会议粤方汪精卫等六代表在沪共同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略谓：蒋介石若实践前言，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粤方拟提议请蒋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此职对蒋更合适。中央政制改革案若能通过实行，则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自以年高德劭者任之为宜。

△　外交部将政府所派接收东北委员名单致电施肇基转告国联秘书长；并称中国政府正在履行国联关于满洲问题之决议案，请国联对日本撤兵态度及日军在占领区之行动严加注意。

△　国民政府公布《预算章程》及《办理预算收支分类标准》。

△　张海鹏率新募之伪军向黑龙江省进攻，日军300名、铁甲车一列掩护张部前进。

△　本庄繁派代表林义秀少佐至齐齐哈尔向黑龙江省府代主席马占山送交通牒，要求黑省军队从嫩江桥防地退回10公里，让日方修复江桥。马占山为尊重国联决议，令黑省军队退驻江桥北岸18华里处大兴站。

△　土肥原在天津静园与清废帝溥仪秘密会晤，土肥原促溥仪前往东北建立“新国家”，溥仪表示：“如系回沈阳复辟，当前往，如非复辟，即不去。”土肥原含糊允诺。

△　教育部转发训练总监部拟订之《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方案》，通令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及各省、市教育厅局遵行。

11月3日　外交部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驳复日本10月31日拒绝商订撤兵细目照会，告以中国政府已派定接收委员会，仍请日政府速派代表共商日军撤退及中国接收之细目。

△　行政院通过教育部关于从民国二十一年度（1932）起全国学校设置奖学金办法之提案，规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每年设奖学金额500名，每名国币400元，由国库支付，各省、市中学及中等职业学校每年设奖学金额2000名，每名国币200元，由省库支付。

△　陈铭枢由京抵沪，向粤方各代表解释蒋介石2日在国府纪念周之演说，称蒋之演词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经京方代表劝说，蒋态度已缓和，劝粤方消除误会。

△　蒋介石电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对其主张和平解决中日满洲问题表示谢意。4日，墨索里尼致蒋复书，表示法西斯党政府渴望中日两国纠纷得到和平解决，决不亚于其他各国。

△　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就中日满洲问题再次提出声明

书，谓“中国政府在军事占领压迫下，绝对不允开始谈判，同时中国政府确信国际联盟各会员及美国必不能坐视《国际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被摧毁无遗”。

△　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致函日代表芳泽称“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所提出之各项基本原则，业已给理事会以充分之保证”，“鄙人深信日本政府渴愿履行其在9月30日决议下庄严订立之义务”。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将中、日两方各自关于解决满洲问题之声明书分送各会员国。

△　粤方代表在沪向记者谈话，就蒋介石2日演说各点分别加以辩驳。同日，胡汉民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负责谈话称，国难当前，如以个人之私见，增加党内之分裂，致陷国家于沦亡，我人固无面目见人民，亦且无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

△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各省、市代表出席会议者60余人。大会收到关于抗日救国及和平统一运动提案100余件。4日，大会决议：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促迅速实现和平统一，如沪和平统一会议破裂，全国学生将一致罢课，并声讨破坏和平统一之罪。

△　废田还湖及导淮入海会议在南京开第一次大会，通过废田还湖原则：一、阻碍寻常洪水下流之沙田、滩地及侵占寻常洪水所需停留之湖田，一律应废；二、沙田湖滩地除照第一项所规定应废者外，仍予保留。

11月4日　　江桥抗战开始。日军700余名、铁甲车一列运载“满铁”职工百余人开进洮昂路，强行修理嫩江桥，强令驻该桥附近的马占山部省防第一骑兵旅吴松林部退出铁路线外10公里。吴部拒绝，日军即日发动猛烈攻击，吴部奋勇抵抗。随后日军出动七架飞机轰炸，吴部虽伤亡极重，但仍将日军击退。

△　京粤代表会议开第六次预备会议，双方对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办法意见不一致。粤方代表提议待粤中央“非常会议”回电后再续开会议。

△　内政部通令各省市：豫省平等县裁撤，原有区域分别划归伊阳（今汝阳县）、嵩县、自由等县管辖。

△　施肇基致函国联，报告日军将东三省盐税全部强行提取，资助傀儡政府，并说明该税为中国政府抵押外债之专款，日人此举，对外国利权影响甚大。

△　上月10日广州警察枪杀爱国群众案主犯杜煊泰秘密乘轮逃往汉口，是日在汉轮埠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缉获。16日，汪精卫电蔡元培、陈铭枢、张继，请速设法将杜递解粤方，按律惩治。

11月5日　　张继等由沪往京向蒋介石报告京粤代表会议会谈情形，京方各中委仍主京、粤合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施肇基致牒国联秘书长德鲁蒙，略称日军数百名已越过嫩江桥向黑龙江省军发动攻击，毙我军百余名，请立即通知理事会主席白里安制止日军挑战。

△　晋省政府报告，限六个月内禁绝金丹料面等各种毒品，逾期再犯者均处死刑。

△　上海银行公会发表宣言，略谓自国民政府成立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党国自身亦复不能保持完整，卒为外患所乘，要求京、粤双方立即互相谦让，以期统一于必成。

△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请国民政府对日本厉行革命外交，并拟具五项办法：一、按国联规定期限，限日军无条件撤兵，并保留要求日方赔偿、道歉条件；二、坚决否认日本所谓五个“基本原则”；三、日军暴行如不停止，与日绝交；四、请政府公开

对日外交政策及对日交涉经过；五、请政府自动取消中日不平等条约。

△　冯庸大学学生千余人由冯庸、王化一等率领从北平南下请愿，要求国民党中央实现和平统一，共赴国难。

△　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再函日本代表芳泽，请日本注意国联9月30日及10月24日关于解决中日满洲问题之决议案，并建议中日立即派代表商定东省撤兵办法。次日又分电中日两国，力劝依照国联决议，勿使事态扩大。

△　沈阳日军司令部发出公报，谓4日午后日军与黑军马占山部在嫩江桥激战，死日兵15人，日军决定占据嫩江桥北岸车站，以确保日方修桥。

△　马占山电张学良，称日机10架在昂昂溪投弹轰炸，我军伤亡200余人。同日，张学良、万福麟电马占山，令其坚守黑省，非至万不得已，绝不宜放弃。

△　“沈阳地方维持会”袁金铠、于冲汉、阚朝玺、赵欣伯等及日军代表举行高级会议，议定“沈阳地方维持会”执行辽宁全省行政权，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7日，该维持会正式布告与“张学良旧政权暨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

11月6日　　国民政府任命谷正伦为宪兵司令。7日，谷向蒋介石请示关于组织宪兵司令部及其职权问题。各所属部队除现有之卫戍三团为宪兵外，总部宪兵处亦归其指挥，各省、市宪兵事务，亦将受其节制。

△　京粤代表会议续开第六次预备会议，通过设立全国财政委员会案，规定该委员会由政府、银行界、工商界、经济学者、专家以相等人数共同组成，负责整理国家财政等事项，由行政院长兼委员会主

席。

△　南京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奉蒋介石令取消。南京卫戍司令部改番号为第八十三师，移防蚌埠。

△　蒋介石电张学良接收东北委员会派员调查东北各地由于日军暴行所受损失，以便接收时商谈赔偿办法。

△　张学良通电报告日军自10月31日至本月5日连续在东北各地向我军发动军事进攻，我军死亡颇重，并称对日军进攻，“除随时报中央转报国联要求设法制止外，并饬各部切实采取正当自卫办法”。

△　凌晨，日铃木旅团数千人增援多门师团，在飞机、野炮配合下冲过江桥，向守军大兴站阵地全线猛攻。马占山部第三旅两个营前来增援，合力与日伪军拼搏。激战至午后6时，日伪军“气竭不支”败退，马部亦撤至三间房第二道防线。

△　黑龙江省府代主席马占山通电全国报告日军进攻黑省，谓“占山原以此事国联已有办法，力主避免冲突”，但日军侵略不止，“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厉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　上海70余工会及全国学生会代表向京粤代表会议请愿，要求早日实现和平，一致对外。

11月7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到会者有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琼崖苏区的代表，红军代表，从白区来的全总海员总工会、反帝大同盟、“左联”等代表及韩国（朝鲜）的来宾共计610人。大会推选项英、朱德等为主席团。上午，毛泽东、朱德在阅兵典礼上检阅红军。下午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会议期间，毛泽东作政治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

红军问题报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20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

△　鄂豫皖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新集召开，到工农兵代表397人。高敬亭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平章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府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正式成立，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各师干部为：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第十二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红四方面军共三万人。

△　国民政府任命刘文岛为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筹办农民借贷所，对被灾农民实施借贷，借以恢复农村经济，而为将来创设农民银行之基础。

△　京、粤代表开谈话会，粤方代表提出恢复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自由问题，谓邓非共产党，不宜继续拘禁。京方代表表示对此案无权擅决，允转呈南京当局。

△　京粤代表会议第七次预备会议决议：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为：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党之统一；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名单；由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当然取消。上列决议分别由吴铁城、张继、

蔡元培回南京报告，由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广州报告。同日，预备会议通电全国各界将历次预备会议之决议案一并公布。京粤代表预备会议结束。

△　国民政府复白里安6日电，重申“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省各地之举动，始终信任国际联合会，希望达到以和平方法解决本问题”，并表示深信国联理事会会员国必能以盟约所许最有效方法，遏止日本之侵略行为。

△　晨5时许，日军骑兵在密集炮火掩护下进攻三间房阵地，遭守军孙鸿裕团伏击，马部骑一旅旅长吴松林派骑兵乘势向大兴站发起反攻，苑崇谷旅抄日军后路。马占山亲临三间房指挥，激战至午，日伪军溃退，马占山部复进守江桥。同日，黑龙江省军在三间房击落日机一架，俘获驾驶员三人。马占山通电全国，表示“一息尚存，不敢使寸土之地失于异族”。

△　白里安会见芳泽，讨论辽、吉事件最近发展情况，指出日军入据洮昂路之嫩江桥，距条约所许日驻兵之满铁附属地已在500公里之外，实违背日代表在国联会上之诺言。芳泽称，日军深入，系因中国排日，抵制日货愈加激烈之故，洮昂路为系借日款所修，日本负有维持该路交通之义务。

△　全满日人大会在沈阳举行，决议请政府当局增兵满洲，并解决中日各悬案。

△　黑省各界代表300人在省党部开抗日救国会，决心请中央进行全国总动员，与日本决一死战，并请中央派飞机来黑省助战。

11月8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虞洽卿、王晓籁、史量才、汪伯奇、黄炎培等上海各界领袖，征求对日外交意见，讨论东北问题。

△　土肥原在天津策动失意军人李际春、张璧等组织游民千余于

是晚发动武装暴乱。暴乱队伍自日租界蓬莱街出发，在海光寺日军枪械库领得武器，越墙子河向天津第二区发动进攻。天津市当局宣布特别戒严，令宪兵、保安队、手枪队、自行车队、铁甲车队全体出动。公安局拘获暴乱者61人。

△　本庄繁派驻齐齐哈尔武官林义秀以书面通告送交马占山，逼马立时下野，将黑省政权交与张海鹏接收，并限马当夜12时前答复。马电平请示张学良，张复电饬死守勿退。马占山当即答复日方表示拒绝。

△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各省、市设立抗日救国言论机关；电慰马占山部全体将士努力作战，保守国土，并请国民政府派兵援助。

△　江宁水灾义赈协会常委魏家骅等呈文行政院、内政部及江苏省政府，谓该县本年江堤溃决，损失农田63万亩，灾民20余万，实因沿江垦芦为田所致，请政府下令蓄芦护堤，禁止开垦。11日，内政部特咨苏、皖、赣、鄂、湘省府，请通饬所属，今后凡圩外非近堤基之地，应蓄芦苇，禁止放垦。已垦者，应查核情形，酌量恢复。

△　吴佩孚率随从100余人到达兰州，旋极力调停雷中田与马鸿宾冲突事，劝雷将马释出。并派随从青年党成员刘泗英与青、宁、新三省军阀代表在兰筹议拥吴办法。15日，邓锡侯、田颂尧、杨森、金树仁、马麟、雷中田等川、甘、宁、青、新五省17名将领联名通电，请国民政府重新起用吴佩孚主持对日军事，并拟拥吴为“五省联军总司令”。

11月9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会决议：一、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为京方四全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另二人由代表中推选；二、推定丁惟汾、陈立夫、周启刚为四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另从中央监委中再推二人参加；三、推定叶楚伧为

四全大会秘书长。

△　国民党中央监委全体会议决议：委员古应芬病故，由褚民谊递补；自二届四中全会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的俞作柏等348人一律恢复党籍。

△　施肇基通知国联理事会，谓日军指使其所组织的傀儡机关强提长春中央、交通两银行积存盐税216万元，移至东三省官银号。中国行政权遭受破坏，请各国注意。

△　清晨，驻天津日领事向王树常第二军军部口头抗议，谓日军一排长被中国兵打死，限令华军迅速撤离日租界300米之外，否则采取严厉手段。王为避免冲突，令保安队按日方限令撤退。6时半，日军在闸口用炮向市区轰击，午后又炮击河北一带，华人死伤200余人。同日，天津市长张学铭照会日驻津总领事桑岛，指出暴乱发生，为租界当局放任所致，日租界当局应对此负相当之责任。

△　张学良在北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急调万福麟部驻廊房之于兆麟第十三旅及姚东藩部第十五旅开驻天津维持治安。同日，各国驻平使馆参赞亦与张商定，令各国在华驻军制止日军越轨行动，帮助维持平、津交通。同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报告日军组织华人游民在天津发动暴乱之经过。

△　国民政府公布《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组织规程》。

△　上海市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上海律师公会以及上海160余同业公会分别电慰马占山，对其率部挥戈抗日，表示愿作后盾。同日，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分别电蒋介石、张学良，请政府明令慰勉马占山，并赶派大军驰援。

△　营口盐务稽核分所所长皮尔生电盐务稽核总所会办葛佛伦，谓日关东军当局以武力强取东北盐税两次，10月30日向营口分所提去

辽宁省盐税67.2万元，11月6日向长春分所提去吉、黑两省盐税72万元；日军当局并声称此后决定每日提取4.5万元。

△　伪辽宁地方维持会财政整理委员会决议，废除木植、票照等六种税捐；出产税、豆税、油粮税、茧丝税等减半，田赋等八种直接税，拨归县、市自治会自收。借此推行所谓“善政主义”，为筹建伪满洲国张目。

11月10日　　外交部就日军进攻嫩江桥事致牒日政府严重抗议，要求日政府立即制止日军进攻，日军在黑省所造成之损害，应负完全赔偿责任。

△　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关于日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报告书。

△　鲁省府常务会议决议以政费协济军费办法：一、从省政府及各机关临时费、教育预备费、建设厅工程局建设费项下月筹15万元；二、各机关职员月薪60元者扣二元，60至200元者每加20元扣二元，200元至560元者每加20元扣三元，从11月起扣至军饷有着时停扣酌还。

△　中央银行将金条24箱由日本“皇后”轮装运美国，价值150万美元。

△　马占山与黑省军参谋长谢珂联名通电报告黑军抗御日军经过，略谓日军以修复嫩江桥为由，要求黑军撤离江桥18华里的大兴车站，并要求马将黑省政权交与张海鹏。日军无理要求被拒后，遂出动飞机、大炮向黑军猛烈进攻，黑军被迫自卫还击，因无防空武器，伤亡官兵五六百人。

△　上海邮务工会等77工会电慰马占山，望“鼓励将士，继续奋斗，全沪工友，誓为后盾”。

△　溥仪在日人挟持下深夜乘“淡路丸”离开天津，13日到达营

口。18日，关东军受陆军省指示将溥仪严密监视于旅顺大和旅馆。

△　日军指使于冲汉在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入部学员须有日军大佐二人介绍，由日人直接指导训练，训练结束后，分发到各县充“自治委员”，以控制各县行政。此为日人策划组织伪满洲国的第一步。

△　日方公布洮昂路战事日军伤亡人数：4日至7日共死167名；伤600多人，张海鹏部死700人以上。

△　8日至是日，天津军警共捕暴乱者300余人，枭首及枪毙者40余人，击毙60余人。同日，王树常悬赏缉拿暴乱首领李际春，全市商民仍关门闭户，行人交通断绝。

△　日驱逐舰“刈萱号”载陆战队300名开抵塘沽。同日，驻津日军司令香椎发表声明，宣称天津动乱“苟有蹂躏我国国家之名誉”或“迫害我居留民生命财产”，“我军当行使自卫权而采妥当之处置”。

11月11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选任施肇基、钮永建为国民政府委员；发布实现团结之通电。同日，临时全会闭幕。

△　马占山通电声明未接受苏俄援助，日方宣称黑龙江省军与苏俄军队密结等情绝非事实。

△　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600余人由冯庸率领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提出要求八项：一、宣示京粤和议经过；二、解释“四全大会”分开意义；三、立即完成统一；四、克日收复东北失地；五、暴日如再侵扰各地，立即以武力制止；六、准备对日宣战；七、悬赏拿办媚日汉奸袁金铠、熙洽、张海鹏等；八、失地负责官吏，应如何惩处？张继、吴铁城代表中央接见，表示中央对东北问题已抱定极大决心，誓必收回失地。

△　10日深夜11时至是日凌晨5时，天津便衣队继续发动武装暴乱，与警察发生激战，日军在海光寺、闸口两处开炮，并有铁甲车一辆助战，天明后暴徒全部退入日租界。同日，北平市宣布戒严。

△　驻津日领事桑岛访市长张学铭，声称对便衣队暴乱事件，日本不负任何责任，并要求派人合组检查团，如搜检日租界无便衣队，中国应负诬蔑之责。张答："每晚便衣队均由日界冲出，事实俱在，毋庸检查。"是晚，驻天津日军司令香椎访张学铭，自称代表各国领事意见，要求中国军警再退离日租界外500米，被张拒绝。

△　旅鲁日侨以山东居留民会名义电国联日代表芳泽，请向国联提出：1922年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迄今未履行，条约中订明日人参与青岛市政权，亦未实现，中日共同利益不能实现，实为遗憾。

△　日本政府声明，在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重议满洲问题时，日本决不作丝毫让步，上届会议时所提五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据的立场亦不稍改变；并称日本将"筹划一种外人管理中国方法"，"努力使国联确解欲使中国有一忠实政府，不可不有一种外人干涉。如国联赞同日本此种见解，而中国真正有信任国联之诚意，则中国应即依允此项计划"。

11月12日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临时主席于右任致开幕词，蒋介石作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的唯一出路》的演说，声称四全大会使命，"主旨在于使党内团结一致"，"领导国民完成国民革命"。

△　白里安分别致电中、日政府，要求两国严禁东三省再发生战争，力言国联派遣中立国视察员往嫩江桥实地调查之必要，并请两国政府对视察员予以便利。同日，外交部电复白里安，表示欢迎国联调查团，并予以一切必要之便利。

△　吉林省政府在宾县成立，诚允代理省府主席，李振声代理吉林边防副司令，丁超代理护路军总司令。

△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最后通牒电致马占山，要求马下野，黑省军队由齐齐哈尔撤退，日本军之一部为保证洮昂路安全起见，应向昂昂溪站开进，并限11月12日夜12时以前答复。马即电张学良请示，张电令马“严词拒绝，死守到底”。同日，施肇基将本庄繁所提要求向国联秘书处提出紧急照会。

△　日本政府电白里安，谓日政府已训令驻嫩江桥日军，若中国军队无战斗行为，不得扩大军事行动，但中国方面在齐齐哈尔、昂昂溪以南地区集结的军队超过日军10倍，请国联注意。

△　日公使重光葵照会外交部，对天津暴乱提出抗议，称中国军警违犯1902年中日天津协定，在离外国驻屯军地点20华里以内开枪，如日侨受损害，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11月13日　　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林森、于右任、宋子文、何应钦、徐永昌、李石曾、邵元冲、张学良、韩复榘、胡适、马寅初等23人为财政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任委员长；任命温应星为宪兵副司令。

△　汪精卫、伍朝枢、邹鲁联名电京蔡元培等六代表，谓黑省主席马占山率部英勇抗日，报载日本增兵图黑，“请转达主管者迅速增援，勿使爱国良士陷于绝境”。

△　张继、陈铭枢奉南京国民党中央之命到沪访汪精卫，请粤方于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统一通电时，照京方所发通电大意发表，并向汪表白蒋介石对和平统一意极诚恳。汪允将京方之意转告粤方，并请张、陈二人返京速促中央研究政治大赦案，以使全党从速团结。

△　马占山驳复本庄繁12日通牒，略谓本人下野须有中国政府命

令，否则决不交出政权；关于撤兵，在中国领土内，日方无权干预；昂昂溪站为中俄合办铁路之车站，本人奉命保卫疆土，在未有政府命令放弃之前，决不退让。同日，马占山对哈报记者谈：黑省已有相当准备，“即剩一兵一弹，亦当与战壕共始终”。

△　上海商会主席王晓籁对新声社记者发表谈话，略谓黑省军队为国苦斗，奋勇抗日，吾人决不能隔岸观火，应竭力筹款急济，勿使黑省成为当年台南第二。按：1895年刘永福坚守台南抗日，因饷断援绝而败。

△　天津各校学生代表300余人组成之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提出组织统一政府，共同御外，设立国防会议，积极对日备战，恢复民众运动，划分党、政、军之权限，明白规定人民在法律上之义务与权利并予以保障等项要求。

△　武汉警备司令部布告，谓外交情势严重，为维地方治安，特严约三条：一、假爱国之名，行倾陷之实者，杀无赦；二、在外资下劳力解雇者，报请主管机关交涉，有直接交涉引起外交事件者，处死刑；三、开会、结社须请行营核准，否则当场解散或拘究。

△　日代办矢野真在北平访张学良，要求中国尊重《辛丑条约》，不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扎重兵。张答：中国一向尊重国际条约，天津附近无驻重兵之事；惟近日有利用租界而发动暴乱者，保安警察有所扩充。

11月14日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代表341人，中执监委24人，蒋介石任大会主席。大会决议电慰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及黑军将领；通过刘家述等43名代表关于“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作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的提案，并决议将此案交国民政府切实办理。

△　国民党四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吁请各国对日本占领满

洲事件严重注意，并表示对日本的侵略，“本大会自当领导全国民族奋斗到底”。

△　外交部就日人在天津组织暴乱事向日使重光葵提出抗议复照，要求日政府迅令天津日本租界当局制止一切暴徒，如不幸再有上述情事发生，日本政府仍应完全负其责任。

△　孙科、李文范、陈友仁抵广州，广州“非常会议”开会决定本月18日粤方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5日，继续开会，表示对京粤代表会议在沪预备会议之决议案全部接纳。

△　国民政府令：《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施行期间，着自本年11月18日起，再予展期六个月。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电京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略谓暴日侵华，变本加厉，“为求国家之独立，民族之生存，更应下最大之决心，作最后之准备，不宜徒恃他人，因循自误”。

△　上海各团体纷纷响应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关于筹款汇济黑省抗日军之倡议，是日汇款者：市商会、市抗日救国会各一万元，纱布交易所二万元，证券交易所5000元，面粉交易所1500元，邮务职工会1000元，煤业公会2000元，协盛昌沪行李见三200元，威海路民智小学全体师生300元。

△　日军12日起由矢野、长谷、铃木三旅团长及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指挥7000多日军进攻三间房等阵地，马占山亲临指挥，奋力抗击，令调第二骑兵旅两个团开驻昂昂溪。苑崇谷、吴松林、张殿九三旅长各自督战，至是日午时日军退却。

△　日陆军省指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马占山提出交涉条件：一、马占山军撤退到齐齐哈尔（含）以北；二、马军不得将兵力调到中东路以南；三、马军不得妨碍洮昂路运行，否则日军立即实行有效

手段。以上条件，10日内必须实行。15日，本庄将此条件送交马占山。

△　日本民政党、政友会及其他15团体举行公民大会，与会五万人，讨论满洲问题，决议促请政府增派大军入满洲，并促请国联重行考虑前持态度，解决满洲问题应由中日直接谈判，反对外方之干涉与压力。

△　本庄繁之代表林义秀再访马占山，对12日之通牒作说明，谓该通牒中所载日军将进占洮昂路昂昂溪车站应为齐齐哈尔，并限马14日上午12时前答复。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日政府在国际上宣传苏联资助华军等向日本驻苏大使提出口头抗议，谓苏联当局对中国东省军队并无任何形式的协助，故日本政府对日军进行之恶意宣传，应即加以取缔。

△　美国纽约报纸除《世界电闻》外，几全持袒日论调。是日共和党及现政府之《纽约时事论坛报》社评，不仅指责国联调解为错误，且竟然声称日人之军事行动，乃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的反响。《纽约晚报》则称，“日本为一强国，我人愿与之亲善”。

△　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通知各华文报，自是日起，所有新闻稿一律送检，开外人干涉我国人民言论自由之先例。

11月15日　　全国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主席蒋介石。何应钦报告军费状况，宋子文报告财政状况。决议：一、军费每月不得超过1800万元；二、党政费每月不得超过400万元；三、除每月不敷一千三四百万元应由公债抵补外，不再发公债；四、政府全力巩固各公债信用；五、竭力提倡国内实业。同日，该委员会发表紧缩预算宣言。

△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蒋介石报告经济建设、农工商振兴及交通建设等情况和计划。国联经济部长拉西曼报告国际经济情况，并对中国表示亲善。会议决议，关于振兴工商业、整理金融及其他与国民经济有关者，一律组织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

△　国民党四全大会代表程天放、鲁涤平等邀湘、鄂、豫、闽、皖、汉等地代表会商“剿共”问题，刘峙表示，红军不肃清，对日感困难，故应集中力量消灭红军。同日，杨一峰、商震、刘镇华、马福祥等51人提请国府迅调大军“围剿”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红军。

△　新编第四师师长井岳秀到达南京出席四全大会。井谈称，该师驻防陕北榆林，本月初旬陕北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蒲子华率部千余由河北阜平至陕北之府谷、神木一带，被该师“围剿”，蒲被俘即处决。

△　中国国民党护党同志会、东南五省抗日救国会、江苏民众救灾联合会、苏浙皖三省和平促进会联名电蒋介石、张学良、陈济棠等，谓“今日吾国胜败安危之局，即定于公等，一念能战，则条条生路，不能战，则条条死路”。请诸公团结一致，派兵援助马占山抗日。

△　马占山部在离昂昂溪25里处之汤池、蘑菇溪一带与日军激战。骑兵团长沙力布受伤。

△　云南省出席京方国民党四全大会代表张邦翰等在南京报告云南三年来施政状况，略谓该省军队改编后，共九旅、四个独立团，约三万余人。自裁厘后，收支公开，政府收入以三分之二作军政费，三分之一拨金融委员会整理金融，现已有两年的积蓄。全省六条公路干线已完成。省立大学本年成立，中师及乡村师范正欲扩充，期于四年内，全省学龄儿童能就学。矿产开发正聘英国地质学家调查。

△　本庄繁派林义秀再晤马占山，威胁称：日方所提要求马既未

照办，日军将截断中东路西线，以断黑军归路，然后直取齐齐哈尔。马占山答以“守土有责，自当严重守卫”。

11月16日　　国民政府令：所有国内森林、矿产、荒地、渔、铁道及各项企业无论公有私有，凡未经中央主管部门核准而与外国订立租售或类似租售之契约者一概无效。

△　国民党四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各类提案审查委员会人选名单；中执委所提各案交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收到湘省在监人李云清等1.56万人电恳四全大会各代表提议赦免全国监犯等请愿书多件。

△　胡汉民在沪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谓对于日本的侵略，如果政府当局仍不觉悟，“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对此当严加注意。

△　湖南旅京同乡会周鳌山等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陈述何键治湘种种罪行，要求立即停止其出席大会，并交国民政府查办。大会秘书长叶楚伧接见并允予转达主席团核办。

△　马占山电复上海各公团，略谓：“国难方殷，军人责重，仍当督饬将士，努力自卫。即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务乞唤醒民众，一致御侮，后援有人，前锋必锐。”

△　上海各界纷汇巨款支援黑省马占山抗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汇2000元，中兴银行转汇菲律宾华侨救国委员会捐款一万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汇一万元，华商纱布交易所汇一万元，面粉交易所昨日汇1500元，是日汇一万元，印染公司汇5000元，杂粮业同人汇2000元，中国红十字会汇救济药品费2000元，爱国女校汇300元，各团体并分致慰问电。同日，上海各工会代表急电国民政府，请立即进行全国动员，整军抗日，驱除倭贼，收复失地，全沪80万工友誓作后盾。

△　吉林民众代表向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呈书，哀诉东北沦亡，人民在日军蹂躏之下的悲苦，要求严惩东北失职官员，另派贤能，以实力收复失地，并速援马占山。

△　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开幕，主席白里安致词后，宣读中日满洲争执事件文件，并谓国联理事会仍当设法和平解决中日争执，旋即散会。

△　日本政府答复我国要求日军从满洲占领地撤退之照会，声称中国要求日本履行未得国联一致通过之决议，以求自利，日本不能接受。非俟中国承认中日条约之尊严及停止排日运动，日本不考虑撤兵问题。

11月17日　　国民政府令免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万福麟本兼各职；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府主席。

△　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日本挟持溥仪潜赴东北企图复辟问题，决定将此事向全世界各国及国联声明。同日，外交部电饬施肇基就此事向国联声明，日破坏我国行政主权之完整，应对严重后果负责。

△　国民党四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央执委会关于“国计民生”及“国民教育实施方针”两提案。

△　广州“非常会议”推定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为粤国民党四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通电，略谓国难方殷，全党已知必须重新团结，月来已得解决纠纷之途径，将以四全大会为共同一致之决议，结束以前分崩离析之残局，共谋今后国难之解救。

△　张学良电马占山：除原驻黑龙江军队统归其指挥外，所有原驻哈尔滨之吉省军队及洮索路各军、东北屯垦军及前由邹作华所统率的炮兵均归马指挥。

△　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与前东北第二十二旅旅长石青山在哈

尔滨与驻黑日领事清水策划反对马占山，成立伪组织。25日，赵仲仁等亲日派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28日，赵仲仁自哈尔滨以电话通知在海伦的马占山，宣称马如交出黑省府印信，仍可任黑省警备司令。马之参谋长谢珂接话，当即予以严词驳斥。

△　中央大学全体学生向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要求迅速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训令施肇基援用国联会章第十六条强制日本撤兵；通缉背叛民国之溥仪。

△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电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及“非常会议”请缨前往黑龙江协助马占山抗击日军，表示“誓与为国效命之军人同亡，不与以‘无抵抗’三字而腼颜偷生之军人同存”。

△　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电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请促张学良克日出兵应援马占山。

△　国联理事会开秘密会议讨论东三省事件，中日代表均未参加。会议讨论两项试行建议案：一、商讨所谓“东方洛迦诺条约”；二、组织两委员会处理中日争端，一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一委员会在欧洲开会商定中日条约地位。

11月18日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在广州开幕，主席孙科致开幕词，略谓在此内忧外患交迫中，望全体党员精诚团结，领导民众，从事救国运动。陈济棠代表“非常会议”演说，希望全党一心一德、奋斗牺牲，对内推倒独裁，对外抗御强邻侵略。

△　国民党四全大会决议：一、以最严厉之方法一年之内禁绝鸦片；二、筹款救济归国华侨。

△　陈铭枢抵沪与汪精卫、邹鲁、伍朝枢等磋商四全大会有关内政、外交要案。同日，汪精卫致电粤方，谓京方四全大会将于本月22日闭会，盼粤方在22日前提出第四届中委名单。

△　铁道部制定建筑国道计划，第一期先筑京桂线及京滇康线、京藏线、闽新线、绥新线之一部分，约长1.6万里，计划六年内完成。所需费用，计划以全国汽油税、汽车牌照税及汽车夫执照费之收入除应抵拨公债基金外，其余专供筑路用。按：全国公路民国十五年仅2000里，到民国十九年已有5.1万多里。

△　国联理事会续开秘密会议，讨论调和英、美、法三国对于中日条约及其与东三省事件关系之意见。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美代表道威斯并向中日代表声明，美国不能放弃其反对在华特殊利益之传统政策。

△　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组织全体学生一万余人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要求实现统一政府，武力收复东北失地，以实力援助马占山，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救国运动。蔡元培代表大会接见，对各点要求表示接受，将提大会议决，转国府采纳实行。

△　广东一未满20岁、不愿发表姓名的女青年将其先人所授遗产兑换现金2.5万元交上海生活周刊社，请汇交马占山。并致马慰问电云：“今将先人所授遗产，勉筹2.5万元电汇麾下，幸各将士饱战饭，加戎衣，永保疆土。某倘有寸丝粒粟之余，当继续为国家军事后盾。”

△　日军调动1.7万余人，坦克12辆、炮30门、飞机12架，沿洮昂路向黑龙江省城猛攻。黑军战壕均被日炮火击毁，仍与日军作殊死抵抗。苑崇谷之步兵旅，程志远之骑兵旅伤亡过半。下午6时，马占山下令洮昂路各防线军队撤退，以乌黑马（离昂昂溪18华里）为第一道防线，新立屯为第二道防线，昂昂溪为第三道防线。

11月19日　　国民党四全大会开第五次会议，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报告，谓国难当头，外侮紧迫，全党应一致奋斗，共谋御侮，对粤方所提出的中执监委员人选，应尽量接受；并表示“个人决心北上，竭

尽职责，效命党国”。

△　张继代表国民党中央由京赴沪，敦促汪精卫、胡汉民即日入京主持党、政。

△　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陷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部掩护各机关职员及商民千余人沿齐克路退却。日军越过中东路，开始向大兴安岭及巴尔虎各旗进犯。

△　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提出诘问，要求答复：一、国联会章是否有效？国联应否不援用会章第十五、十六两条切实遏止日人举动？二、《非战公约》是否有效？三、《九国公约》是否有效？四、日本是否可滥用天津日租界作为妨碍华人安全之根据？五、日人夺取盐税，是否不为直接破坏中国财政制度之行为？

△　芳泽致函白里安，声称：“满洲日人生命财产纵似获有保障，日本亦将维持满洲之军事占领”，非俟对华直接议定新条约，追认现有各条约，并承认日本所提出之“五项基本要求”后，日本方可撤兵；又称日本政府不能承认国联理事会若干会员关于中日谈判与日本撤兵同时进行之提议。

△　《申报》发表题为《吾人能坐视马占山孤军抗暴乎》之时评，略谓马占山以孤军守土抗暴，誓拼生死，而万福麟之子万国宾在日军增援不已之际，席卷黑省库存款1100万逃至哈尔滨，致使省库如洗，三军绝粮。我民众敢抗声质问，“谁应负此责任”？吾人向政府建议三点：一、以武力收回失地；二、充分予黑军以实力援助；三、勒令万国宾缴回卷走之省款。

△　何键等20余名将领向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提案，请准备武力收回东北被陷各地。

△　汪精卫、邹鲁、伍朝枢在沪电广州“国民政府”，谓马占山以

一旅之孤军抗御暴日，势难久持，必须速予有力之援助。

△　上海生活周刊社陆续收到各界团体捐款共6.4万余元，支援马占山部将士抗日。同日，上海东南医学院救护队30人离沪北上黑省前线救护马部伤兵，各界代表及群众4000余人到车站送行。

△　京平航空公司“济南号”飞机在津浦线济南站南30里之黑家庄触山坠毁，两机师及诗人徐志摩均遇难。

11月20日　　国民党四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一、蒋介石立即北上抗日；二、确认马占山对日军进攻之正当防卫，为保障国家领土和世界和平之正义行动；三、国府对于日军侵占东三省行为发动以来，一切对内对外所取之政策及一切处置，本大会认为确能尽忠于国家与民族，今后关于捍卫国权保护疆土，本大会应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

△　国民政府以日本入侵，公债发行困难，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自1932年1月起，在关税项下附征10％作救灾费用，原发行的8000万元赈灾公债除已发行3000万元外，其余5000万元已无发行必要，着即停发。

△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决议：一、本日开正式会议；二、电促汪精卫、胡汉民即日回粤主持会议；三、嘉勉马占山尽职守土；四、统一政府未成立前，否认南京政府续发公债；五、督促南京政府责成张学良克日恢复东三省领土。

△　粤方推派马超俊、覃振迎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伍朝枢等赴粤出席“四全大会”，是日马、覃抵沪。同日，汪精卫电粤，称在沪接洽，不能擅离，故不能返粤出席大会。

△　汪精卫、伍朝枢、邹鲁等电蔡元培等京方出席京粤会议之代表，指责南京政府舍坚持日本撤兵主张，而谈中日条约为“最大失

策”，应令施肇基“只讨论撤兵，不能谈及别事”。

△　行政院就日军攻陷黑省府齐齐哈尔电请国联紧急处置，并致牒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马占山率黑龙江省军政两署人员及党部退往呼海路终点站海伦，并在海伦成立省政府。马部军队分驻海伦、拜泉、克山一带。

△　日关东军利用汉奸袁金铠、于冲汉等组织的“地方维治会”之名义，宣布自是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

11月21日　　国民党四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一、通过《国家建设初步方案》；二、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三、通过第四届中执监委员人数，中央执行委员72人，候补委员48人；中央监察委员24人，候补委员16人。

△　胡汉民电复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谓“宿病未愈，难遽离沪”，并表示“汉民虽未到会，然精神意志，无时不与诸同志一致”。

△　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抗议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并望日政府急速改变武力侵略中国的既定方针，与中国政府所派东北接收委员商定撤军办法及接收细目。

△　张学良委万福麟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总参议。

△　国联理事会讨论派调查团赴满洲问题。日本代表芳泽声称，日本认为调查团不仅视察满洲，还须视察全中国，尤须调查抵制日货运动，调查员对以往中日军事不得批评，对中日交涉一概不得干涉。白里安将讨论意见归纳为八点：不得因调查延滞撤兵；美国允派员参加调查；调查项目由各会员自由提出；按盟约第十一条调查；望日本在数月内撤兵；停止战争，但不限期；望中国勿反对；望日本勿乘机扩大事变范围。

△　特种外交委员会电饬施肇基，向国联提出用解决保加利亚与希腊争执办法解决中日问题，勒令日本限期撤兵。按：1925年保加利亚与希腊武装冲突，国联立即勒令希腊军队60小时内撤退，由国际军官团监视撤兵。

△　张发奎在沪对新声社记者表示援助黑省决心已定，并指责政府不求自立，专靠国联，养兵数百万，竟不发一兵一卒援黑，坐视孤军陷于绝境。“现在国内民心均未死，民气异常愤慨，将来至忍无可忍时，必有民众自起对抗暴日之时”。

△　上海全市中学生一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督促政府收回东北领土大会，通过以下提案：请政府立即援助马占山；警告失地长官张学良、万福麟、王树常，令其带罪立功；请政府即日公布对日方针。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电促蒋介石迅速北上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同时，省党部又电令各县党部立即“电促蒋主席迅速北上杀敌，并举行欢送蒋主席北上救国大会，预祝胜利”。

11月22日　　国民党四全大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原候补执委丁超五、王正廷、王伯群、陈耀垣、张贞、孔祥熙为正式执委，增选周佛海、顾祝同、夏斗寅、贺耀组为中央执行委员，增选杨杰、萧吉珊、朱绍良、龙云、谢作民、马福祥、钱大钧、段锡朋、郑占南、黄慕松、张厉生、罗家伦、戴愧生、李敬斋为候补委员；增选张学良、杨虎、蒋作宾、洪陆东为中央监察委员，黄吉宸、方声涛为候补委员。大会决议：一、在中央领导下，设立国难会议，延揽各方英才，共筹救国方略；二、恢复李济深的党籍；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之总章，继续有效。

△　张学良电令马占山就地整理队伍，继续筹防。同日，张学良在北平用英文发表对外宣言，宣布“若日本不首先撤兵，不能讨论其

他问题”。

△　国联理事会讨论派遣调查团问题，施肇基声明，无论派遣调查团与否，日军撤退应立即开始，理事会当务之急在于监督日本撤兵，中国拒绝日本不撤兵而派调查员之任何提议。

11月23日　国民政府特任顾维钧代理外交部长。

△　国民党四全大会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全体同志竭其忠诚”，“作积极救国之准备”，对外则捍御强侮，对内则刷新政治，努力建设，并要求一切精神、物质力量，听命于中央之指挥。

△　国民党粤方四全大会开第二次会议，邓泽如、萧佛成等实力派以“非常会议”名义提出否决京粤代表会议关于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为第四届中委的决议案，孙科等反对无效，该案被通过。孙科、陈友仁、李文范认为大会对彼等不信任，遂退出大会，于24日赴香港。经亨颐、张知本以及北方代表赵丕廉、郭春涛等数十人亦同时退出大会。大会遂分裂。

△　杭州13校学生1600余人到南京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接见，要求青年安心求学，以学术救国。

△　陕西省政府公布该省民众因鼠疫死亡情况：横山死2000余人，安定（今子长县）死3000余人，米脂死亡300余人，葭县死100余人，陕北、晋西鼠疫仍猖獗。

△　据《申报》讯：北平市政府近调查全市人口，总数约140余万，其中56万市民系文盲。

11月24日　蒋介石召集出席京方国民党四全大会各将领50余人讨论国防、省防及军需诸问题，各将领对暴日侵略，表示愿效命疆场，御侮救国。

△　国民政府紧急训令施肇基必须坚持国联议决之下列要点为解决中日满洲问题之基础：一、国联必须立刻议决最有效的方法，制止日军之侵略行为；二、日本必须自国联决议之日起两星期内撤兵；三、日本撤兵必须在中立国监视之下。

△　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通电否认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监委，并请四届一中全会将张严办，请中央敦促蒋介石即日北上抗日。同日，镇江市各界万余人召开欢送蒋介石北上救国大会，并电蒋即北上驱逐日军，收复国土。

△　沪各校中学生5000余人赴北站准备入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南京当局得报，电路局劝阻无效。京沪线客车下午均停开。

△　驻沈阳日军大举向西进攻，在巨流河、新民县间与我国军队发生战斗。同日，日关东军司令本庄令驻齐齐哈尔之第三十九旅团调长春，临时野战重炮大队调奉天。

11月25日　　外交部就日军集中沈阳西南谋攻锦州，并于22日协助土匪攻击新民事向驻华日使重光葵提交抗议照会，声明："锦州、新民一带，如有事件发生，日本政府应负重大之责任。"

△　施肇基奉政府训令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主张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该地，日军在"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

△　胡汉民为调解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分裂局面，是日离沪赴香港，伍朝枢等偕行。

△　孙科等一行由香港赴澳门转中山县。广州当局因香港中西各报载有孙科等退出四全大会到港消息，一律予以扣留。同日，曾仲鸣因反对粤四全大会推翻上海和会决议案，率代表200余人离粤抵港。

△　国联理事会秘密讨论日军攻击锦州报告及考虑中日复文，12

国理事（中日代表未参加会议）通过决议案之修正文，撤兵与调查，分别处理。但多数理事声明，如中日两国有一方不同意，保留另拟之权，将此案让诸美国，希望美国政府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讨论处置办法。美使道威斯大体赞同理事会计划。

△　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请愿团一万余人相继到达南京。

△　国民党河北、北平、天津、平绥路四党部联名电请中央令蒋介石即日北上，出关御侮；并电令张学良，在蒋未到前，“出驻锦州，以正当防御勿使领土再有尺寸损失”。同日，上海各团体亦纷纷电促蒋实践北上之诺言，督同张学良收复东北失地。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由15人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取消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

11月26日　　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上海中等学校学生请愿团4000余人，表示决心北上，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捍卫国家。学生认为满意，决定次日回沪。

△　国民党在京的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临时会议，暂推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朱培德、叶楚伧为常务委员。

△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确定兵工政策实施办法、巩固国防、速行征兵制、肃清共产党、组织华侨义勇军等决议。

△　国联理事会通过派委员团赴满洲调查决议草案，规定撤兵与调查分别处理。中日代表均未出席会议。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发表施肇基关于在锦州境内设立一中立区，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在国联理事会主持下进行据守之提议。白里安再次电中日政府令在满

各自军队停战。

△　《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各界欢送蒋介石北上及学生请愿大加指责，宣称："蒋主席身负国政之重责，又统率全国之军队"，何时出发，"惟其自身可决定，任何他人均不能督促。"

△　上海各大学合组之督促政府对日出兵请愿团2000余人赴国民政府请愿，适蒋介石不在，于右任接见，学生不满意，坚决要求蒋亲自答复。下午4时，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学生亦前往加入请愿队伍，请愿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鹤立于雨雪之中，彻夜未散。

△　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蒋介石北上讨日大会，到会学生万余人。蒋派贺耀组代表出席，大会向蒋赠旗一面，上书"为国杀贼"四个大字，右书"蒋总司令北上讨日纪念"，贺代蒋接受，并声言："唯希望于诸同学者，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勿被"反动派利用北上之说，作种种恶意宣传"。

△　万福麟、鲍文樾奉张学良命到达南京向蒋报告东北与平、津情况，并请蒋立即到平指示应付办法。

△　菲律宾华侨3000人在马尼拉召开国民救国大会，主张对日宣战，并拟向旅菲华侨筹募500万比索以助国内抗战。

△　土肥原制造第二次天津事件。晚，暴乱之便衣队与我国军警开火，日借口流弹飞入日租界紧急出动，在中原公司六楼及海光寺、闸口等处同时向华界发60余炮。

△　据《申报》载：川康边防军旅长羊仁安因刘文辉委陈书农、陈鸿文为川康边防军师长，认为待遇不公，突宣告独立，自称川康总指挥，移兵内犯，势甚浩大。

11月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

主席。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中央人民委员会为中央行政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检察人民委员。又于人民委员会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本政府“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为屠杀而借用的外债”。本政府的“最后目的，不但在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在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全世界永远和平”。

△　红军彭德怀部攻克会昌城。

△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退席代表220余人在香港通电，声明退出会议真相，并电汪精卫表示拥汪，“同尽救国之责”。同日，胡汉民等由沪抵港，与孙科、陈友仁、李文范等会商调解粤分裂局势之办法。

△　上海各大学请愿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守候一昼夜，蒋介石方出接见，除口头表示接受请愿，声明“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外，并书写保证：“本主席效忠党国，早具决心，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望诸生转告同学，安心求学，拥护政府，各尽天职。”请愿团认为满意，乃于次日返沪。

△　中央大学教授发表《告学生书》，劝学生在此国难严重时期，不宜互相责难，应对内团结，对外不屈，决莫空言宣战，奔走请愿，罢课废学，应致力于救国之知识准备。

△　东北军旅长10余人在北平向张学良请缨抗日，张答：“一切已

派万福麟面向蒋总司令请示，即有答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当以中央命令为根据，学良与各旅长在同一立场之上，中央苟有命令，自当身先士卒。”同日，张学良电令各军，严加整饬，淬砺部属，准备为国效命。

△　日军乘铁甲车一列、兵车两列由新民向饶阳河攻击，经饶阳驻军抵抗，日军暂退白旗堡。

△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令混成第四旅团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第三十九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天，迅速集结，出击锦州，进入山海关。

△　驻天津日军继续向华界开百余炮，毁坏建筑多处。日租界当局令界内居民，在12小时内退出，否则不负保护责任，日界内居民遂纷纷逃出租界。驻津日军司令香椎向河北省、天津市当局抗议，要求中国保安队及警察在36小时内解除武装，中国军队沿铁路线间20里内不得驻扎，河北省内不得有军事行动，取消反日运动，并限两小时内答复。河北省府主席王树常电张学良请示，张复电称，对于日方抗议，与各国驻津领事磋商办法，相机办理。

△　外交部公布：锦州安全问题，中国政府已完全接受国联设立中立区域之决议，并将相应之训令电告锦州驻军将领照办。

△　日本参谋部以北宁路战事开始，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不问国联理事会如何行动，日军不再延迟进攻锦州的行动。同日，日外务省电告白里安，声称日军自9月18日以来，所有一切行动皆属“自卫”，并诬我国军队集结锦州，扰乱日军，致发生目下锦州危急情形。

△　法国驻日大使马戴尔通知日外相币原，谓张学良已向驻平法使声明，准备将锦州驻军撤入关内，并准备设立中立区，警务与民政由中国负责。日政府答复：日本欢迎张学良撤兵，但中立区警务与民政须由中日双方协商，无须外人干涉。

11月28日　　国民政府令：外交部长施肇基代表政府出席国联会议，责任重大，一时不能回京，特任顾维钧署理外交部部长，即日就职任事。

△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电呈国民政府及军政部，请将“总指挥”、“军长”等虚号取消，“一以防军队私有，养成军阀之萌，一以杜叠床架屋，骈拇枝指之弊”，所部各师，直属政府主管机关指挥，以利国防。

△　驻平日代办矢野奉外务省训令访张学良，商洽沈阳与山海关间设立中立区域办法。矢野声明：该区域内之日军现正向沈阳撤退。张学良表示，愿将辽宁省府与该省驻军由锦州撤至山海关，但须俟南京政府核准方可办理。

△　天津日军继续炮击华界，晨1时，暴乱便衣队二三百名从日租界冲出袭击津市警察防地。警方奉令不准抵抗，死伤30余人。

△　外交部急电白里安，请国联制止日军攻击锦州。

△　日军沿北宁路南进，占领大虎山，我军在盘山县与日军激战。

△　本庄奉陆军省电令，中止向北宁路进犯，令进入辽河以西日军立即退往辽河以东。第四混成旅团及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从巨流河、沟帮子退回奉天。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2月1日起施行。

△　何香凝由法国返抵上海，翌日语新声社记者谓，本人将以国民资格办对日作战之伤兵救护等事宜，对国内政治，十九不拟参加。同日，于右任到沪请何入京，何以身体不适拒绝。

11月29日　　蒋介石致电汪精卫，请促粤方早息纠纷，从速入京，俾中央全会得以定期举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图北上，立待全会开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

△　蒋介石下令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　天津日军复向华界开炮，并指使便衣队向保安队进攻，保安队奉令不准还击，只在暴徒冲近时掷手榴弹自卫。下午，保安队接受各国驻津领事调解，在总队部集合后退至海河以北，各队员皆悲愤满腔，含泪而行。

△　沿北宁路南进之日军撤回沈阳，新民、巨流河等处日军亦开始撤退，政府派保安队分别接防。日第二师团长多门已率一部撤离齐齐哈尔，司令部移至长春。

△　芳泽致函白里安，声明日军除自卫外不对华军作敌对行动，日政府愿避免锦州地方发生武装冲突，并称：“倘锦州之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以西，则除华北之日侨生命财产与华北所驻日军之安全发生严重危险之时外，日军不开入撤兵区域。”

△　日陆军省声称，东北日军已在过去16小时中退回满铁附属地。陆相南次郎正式声明撤兵理由，谓中国方面有将锦州附近军队撤至山海关以西之意，故日军终止前进。但扬言倘中国军队将来有威胁满铁等情形时，日军仍将采取适当军事行动。

11月30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何应钦为驻赣绥靖主任，刘峙为驻豫绥靖主任，何成濬为驻鄂绥靖主任。

△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正式取消。所有文职人员交国府文官处任用，武职人员分发国府参军处及军事参议院任用。

△　蒋介石在京分别接见沪工界代表请愿团、北平民国大学请愿

团，对请愿抗日诸要求，表示接受。

△　马占山电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劝以国难为重，从速实行京、粤团结，“消弭党争，唤起民众，一致对外，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地位”。

△　日军师团长多门致马占山通牒称：马如能劝说克山等地之中国军队使之降服，可通知新井顾问；马如确定回省日期，亦可先通知新井，林义秀少佐可担保无意外发生，并准许马带卫队80名入城。

△　上海民众高冠吾等30余人联名通电反对在锦州设立中立地带。略谓日军不宣而战，侵我辽、吉，如果依照国联划锦州附近为中立地带，不啻直认辽、吉为我因战败而已失之土地，实系侮辱我国全体国民，万难忍受。

是月　　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召开，40多个县的代表1000多人到会，正式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崔琪当选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2月

12月1日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接受胡汉民、伍朝枢所提调停粤会分裂办法三项：一、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120人由主席团提出，大会通过之；二、除此120人外，大会另选出24人，与南京方面选出的24人于四届一中全会以三分之二的委员通过承认之；三、以前因政治关系被开除党籍者，除共产党外，一概恢复党籍。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内称，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苏区召开，会议通过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

策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最高政权机关。

△　财政部拟定取缔现银出口办法，令各海关及上海银行公会照办。该办法规定由银行公会组织登记现银调查团，各银行、各商家即日起将现银出入用途、存储数按日汇报银行公会；海关严厉检查，外运之银如无护照证书，一律扣留归公，并在海关加派缉私队。

△　国联理事会12国委员会通过解决满洲问题决议案草案：一、确定9月30日理事会通过之决议案继续有效；二、当事国双方采取必要之手段，禁止易致酿成丧失生命之任何行为；三、中日双方随时将东三省最近情况报告国联；四、理事会各理事国应将彼等接到各该国在东三省代表之报告，供给理事会；五、派五人调查委员会到东三省调查，中日各派襄助员一人；六、在理事会明年1月25日开会之前，请白里安注意中日纠纷之发展。

△　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发出布告，告诫学生毋再奔走呼号，旷废学业。

△　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北平20余所学校学生代表千余人南下请愿，北大校长蒋梦麟奉教育部令前往劝阻，除一部分学生被劝回外，其余仍坚持南下。3日，北平各大学学生南下请愿团1600余人到达南京。同日，教育部遵行政院令，通饬各省、市教育厅、局，劝谕学生请愿团以后乘车应照章办理，不得有强迫登车情事。

△　武汉大学发起组织武汉学界救国请愿团，并决定即日起停课，于本月3日赴京请愿。

△　徐州市七所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南下请愿团2000余人往谒中山陵，学生韩如纯在孙中山石像前断指血书，并称“在生一日，誓与日对抗到底”。

△　中华国民拒毒会常委会决议：一、全国拒毒代表大会延期至明年3月1日举行；二、福建军人在闽南北勒民广种鸦片，破坏烟禁，安徽省府主席陈调元、禁烟查缉处处长郝子华包庇种、运、贩、吸鸦片，证据确实，再请中央党部及监察院查办。

△　日本增兵天津，日军300余人随带军火1500余箱、钢炮五门、机枪三挺到津，即在日租界武装游行示威。

△　陈炯明发表《敬告国人书》，以“前有日寇侵凌不已，后有共产党伺机而动，中有国民党人盘踞于国、省、县区”称为“三害并至”。

12月2日　蒋介石在京接见北平及徐州各校学生请愿团，蒋对请愿各点表示接受，并谓本人“誓赴国难之决心已屡对各请愿团表明”，“俟中央全会开过之后，即当北上”。

△　广州市省立工专、女师、女中、一中、二中五校学生向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并绝食露宿，要求粤方与南京实现和平统一，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　国联理事会讨论在锦州设立中立区问题，施肇基参与讨论。理事会议认为日军已履行北宁路撤兵之诺言，拟使中日间有一协定，俾中国军队可退入关内，双方不得派兵越境。日代表表示，中国仅将军队撤入关内，尚不充分，必须将张学良设于锦州之辽宁省府亦撤退，使袁金铠管理锦州。讨论陷入僵局。

△　施肇基在国联理事会提出国际委员会接收天津行政之建议，并表示“中国政府准备以最可恃而最好的华兵500至1000人，交国际委员会遣用，此项军队可由国联所派任何外人军官指挥之，以成维持法纪与秩序之充分力量”。国联对此建议不欲详细讨论。

△　美国武官马格莱、英国武官达安纳、法国武官蒙斯由朱光沐带领，自锦州出发分赴饶阳河、通辽视察被日军破坏情况。同日，

英、美、法、意、波等国驻日武官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武官永井带领到黑龙江省视察。

12月3日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加推胡汉民、伍朝枢为主席团成员。下午第十次会议通过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等人提案：一、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于若干省府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下监督各省行政；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为国防及“剿共”起见，于必要地点在军委会指导下设军事分会。并通过中央在粤发行公债由国库偿还案。

△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退席代表170余人在沪得悉粤全会通过胡汉民等调解办法，重新选举消息，是日开会讨论，由汪精卫提议，选出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谷正纲、邓飞黄、刘文辉、唐有壬、范予遂、黄少谷、萧忠贞10人为国民党第四届新中央委员。陈孚木、郭春涛等14人为候补委员。

△　国民政府令：准驻赣绥靖主任何应钦辞职，特派朱绍良继任。

△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偕参赞林出访顾维钧，重光表示日政府已令满洲铁路沿线日军撤退，希望中国方面亦表示诚意。顾答，中国政府绝对遵守国联理事会决议案中所提办法，别无其他意见。

△　旅欧华侨救国总会电《大公报》转全国同胞，略谓国联助日亡我，施肇基又放弃日兵限期撤退案，政府已与日直接交涉，接受亡国条件，划锦州中立区，开共管恶例，此种卖国外交决不能接受。

△　上海抗日救国会通电坚决反对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及国联关于在锦州设立中立区的提案。同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就顾维钧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划锦州为中立区事致电警告顾勿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第二。

12月4日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为实现民治，防止武人跋扈，全国大小军官直接或间接均应隶属行政院，平时不设陆海空军总司令或类似之军职；选出白崇禧、李扬敬、余汉谋、林翼中、张惠长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香翰屏、唐绍仪、张发奎三人为中央监察委员。同日，林云陔辞粤省府主席，以伍朝枢继任。

△　蒋介石在京接见北平各大学学生南下请愿团1200余人，表示接受请愿各项，并对学生训话，略谓政府决心本着外交上最合理之方针，断不承认有丝毫丧权辱国之条件，国民亦必须信任政府，俾增合作精神与对外力量；学生应本“学术救国”宗旨，潜心学业，勿虚耗光阴。

△　外交部在全国各界人士及各地学生坚决反对下，被迫以紧急训令致电施肇基，告以日本向国联所提在锦州设立中立区案不能接受，日军如进攻锦州，我国将不能不采取自卫办法。

△　施肇基因出席国联交涉困难电外交部辞职，次日蒋介石复电慰留。谓“一切交涉，秉承既定方针，自有政府负责”，国难当前，惟望任劳任怨。

△　顾维钧在南京招待各报记者，声明外国通讯社对锦州报道失实，中国一面准备自卫，一面用外交方法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　英、美、法、德等国武官、参赞由锦州赴山海关视察。

△　日本陆军省公布，自9月18日起，满洲日军死伤总数为684人，其中死军官12人，兵198人，伤军官28人，兵446人。

12月5日　　北大南下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由中央大学出发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队伍行至成贤街时，遭到警宪镇压，当场被抓走185人囚于孝陵卫，一人被打死，33人重伤，一部分学生跑回中央

大学，宪警亦随之追往中大，又与中大学生冲突。中大学生千余人即整队至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交涉代表反遭扣留。大队学生遂冲进卫戍司令部大门，在部内伫立至晚10时余，终以无人负责，乃整队返校。

△　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结队到京请愿，无论何项团体，如有意见欲陈述于政府者，均应书面呈请当地行政机关或学校校长转呈。

△　蒋介石电张学良严令阻止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如不能劝阻，宁可停车，不予通行，以免效尤”。

△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闭幕。同日，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召开首次临时会议，推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伍朝枢、经亨颐、白崇禧、居正、石青阳、陈济棠九人为中执会临时常委，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香翰屏、李宗仁为中监会临时常委。并决定在粤设立中央党部执监两会临时常务委员会，接收原“非常会议”档案。“非常会议”宣告结束。7日，粤方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成立。

△　粤方国民党四全大会所选中执监委员由胡汉民领衔电促蒋介石下野，若蒋不下野，解除兵权，粤方中委决不到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

△　署外交部长顾维钧以外交棘手，向蒋介石请求辞职，蒋表示殷切挽留。

△　教育部召集南京各大中学校校长开联席会议，由部长李书华报告中央外交方针，略谓：日本不撤兵，决不直接交涉；锦州中立区誓不承认，辽省府决不迁移；天津共管说，并未接到正式报告。同日，教育部将该项内容通电全国中等以上学校知照，令学生静候中央处置，勿得有“越轨”行动。

△　南京各校学生代表180余人抵沪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

计，口号有“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领导全国青年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接收东北失地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等。6日，汪接见代表团谈：当前外交方针是“一边抵抗，一面交涉”，本人待粤方四届中委到沪后一同入京，共赴国难。

△ 济南高中学生南下请愿团在火车站候车入京，路局以奉铁道部严令不发车，学生在风雨中露宿月台，坚持彻夜。6日，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济南市长闻承烈、警备司令雷太平到车站宣读蒋介石电令，谓“平、津、济、徐、浦各地学生多团体无票乘车，行为放恣，阻碍交通，此后非奉国民政府命令不得擅准开车”。学生仍坚守车站不退。8日，省府被迫同意备车送学生南下。

12月6日 北大南下示威团学生在中央大学开会决议发告民众书，宣布5日事件经过；请校长蒋梦麟即日来京；联络南京各校学生继续斗争。同日，北大学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援助南下请愿被捕同学。各校集聚东站准备南下请愿之学生已达4000余人。北京市长周大文召集各大学校长会商制止学生南下办法，各校长均表示学生爱国运动，势难劝阻。

△ 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抗日联合会为北大请愿学生被捕事件举行紧急会议，决议：一、援助北大同学；二、质问政府为何逮捕北大同学，并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全市总罢课，向南京出发；三、反对锦州中立区及天津共管计划；四、明日全市学校总示威，准备向南京出发。

△ 上海青年自动赴东北援马（占山）抗日团280余人拟乘车离沪北上，各界民众万余人到车站含泪相送，因路局奉令不让该团免费乘车，欢送者当场筹集资金购买车票，登车后路局又奉命阻止发车。该团遂于翌日沿京沪路步行北上。

△　蒋梦麟因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劝阻无效，是日电教育部自请免职查办。

△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决议电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北平学生，撤回禁止请愿命令，停止检查新闻。

△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参谋板垣自沈阳赴哈尔滨与张景惠商洽黑省政务，板垣令张通知马占山与日方直接会谈。次日，马占山在呼海路绥化站与板垣会晤，板垣要求马与日“彻底合作”。马答称黑军此次行动纯为自卫，日军不加压迫，我自不进攻。

△　驻华各地日侨42个团体代表暨上海日侨1000余人在上海举行“全支日本人居留民大会”，以对付我国抗日运动，并将决议分别电告关东军司令部及驻津日军司令部：一、帝国政府要以实力安固满洲已得权利及保障日人生命财产；二、中国必须履行与帝国政府之条约；三、中国必须改善外交态度，废除排外教育，取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四、帝国政府应用积极手段消灭全中国抗日救国运动；五、帝国政府应整个解决中国问题，并拒绝第三者干涉。

△　鲁省当局决定收编鲁南刘桂堂、郭马蜂等股匪。13日，刘桂堂、郭马蜂派代表到省府接洽投诚。该两匪部共3000余人。

△　万国竞走锦标赛在上海举行。中、英、法、俄、爱尔兰五国64名选手参赛，中国队获团体、个人两项锦标。

12月7日　　北大南下示威团被捕学生185人，被武装押送登车返平。

△　汪精卫就南京当局镇压北大学生示威团事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略谓对学生运动不宜从事禁压，必须采善导之法；此时最好请民众团体选出真正之代表组成一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之机关，以助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使政府与人民真正合作，一致对外。

△　上海学生1.5万人举行总示威运动。

△　张学良发表告北平各校同学书，表示本人保证“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劝同学勿空喊口号与请愿游行，应“痛下苦功，实心做事”，号召学生要做两事：研究中日关系，以求解决办法；愿当兵入伍者，先报名听候训练。

△　上海29所大专院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决议电南京政府立即释放北大同学，并提出反对与日直接交涉、反对设立中立区、反对共管天津、反对调查团来华、反对顾维钧长外交等项主张。

△　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在北平东站坚持三昼夜，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方准给乘车执照，是日19所学校学生2000余人离平南下。列车进入天津，河北省府主席王树常恐学生逗留天津激起事故，向津浦路驻津办事处交涉将该车开往沧州候令。

△　南京各校学生代表张树德等40余人赴国民政府请愿，援助北大被捕同学，蒋介石亲自接见，谓北大被捕学生185人，已于今晨护送回平。同日，蒋接见武汉大学学生请愿团，对请愿各点表示接受。

△　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日。

△　戴季陶以各地学生为抗日救国纷纷进京请愿，发表《告全国教育家及学生家长书》，声称：“树苗自由，不能成长，青年自由，不能成人。全国的教育家醒来，全国学生的父母兄弟姊妹醒来，救国先救国家命根的青年，救国先救教导青年的学校。”

△　李宗仁、白崇禧电国民政府，表示愿率第四集团军全体官兵赴黑援助马占山。

△　日本代表芳泽向白里安提出设锦州中立区划界主张，一方以长城为界，一方以锦西七公里一小河为界，锦州则在日军管辖区域以

内。白里安将日提案交安理会讨论，英国代表薛西尔首先表示不能接受，其余各国代表亦赞同英代表意见。国联理事会遂决定放弃中立区计划。

△　台湾再公布《禁止兑换金币令》。

12月8日　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明政府绝未有在锦州设立中立区、中日直接交涉与天津共管之主张；指责最近请愿学生之“越轨”行动，系受“卖国者所驱策”；并声称：政府惟有本其政权，尽其责任，保障法纪，安定秩序，如有行动越轨、乘机“反动”者绝不姑息养奸，定将严惩。

△　国民政府文官处代蒋介石复电上海大、中学学生联合会，声明政府对日始终未变既定方针，决心自卫，誓不丧寸尺领土；北大学生示威团“行动暴烈”，“公然有煽动扰乱打倒政府之表示”，政府为“爱护青年”，将一部分“移地隔离”，送回北平，望同学毋为“反动者所乘”。

△　行政院通过废田还湖办法，规定凡阻碍寻常洪水之沙田滩地及侵占寻常洪水所需停蓄量之湖田，一律废掉。

△　南京各校学生举行大游行示威，武汉大学、北平大学到京请愿学生亦全体参加，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际联盟宰割中国”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消防队携带高压水龙头防卫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外交部等处，准备随时镇压。

△　马占山通电各省、市党部、政府、各学校、团体、各报馆，请转告各地赴黑援马青年应努力学习本领，将来为国干城，此时勿赴黑“作煮鹤焚琴之举”。23日，马又对前来投军的学生训话，略谓青年为御侮而牺牲虽觉值得，但在国家终属自斩元气，且东北招兵并不乏人，投军青年除坚决愿留者可以收留外，所有已到及续到者一律给资

遣回。

12月9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一、召开国难会议，推定叶楚伧等为筹备委员；二、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推定蔡元培、戴季陶、吴敬恒、何应钦、李石曾、朱培德、邵力子等25人为委员，蔡为委员长。

△　国民党中政会议定国难会议组织纲要：其职责在决定国难期内关于外交、财政、军事及一切临时设施方针，所通过之各案，由中政会转交国民政府执行，其委员名额定49人至99人。

△　特种外交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戴季陶、宋子文在京招待虞洽卿、王晓籁等40人，解释外交方针：日本不撤兵决不交涉；日军如再犯，决准备抵抗；日军在东北剿匪权问题，正在国联力争否认。

△　国民政府再次训令施肇基，对国联理事会关于满洲问题之决议案中日军剿匪权一节坚持要求删除。

△　国联理事会举行公开会议，白里安宣读1日通过的解决满洲问题决议草案，逐条加以解释。并归纳全案两个行动方针：一、终止目前危及和平之举动；二、便利争点中现有原因之最后解决。下次理事会定于明年1月25日召开。

△　北大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中央大学代表江学乾在沪向各界报告南京当局镇压北大请愿学生真相。是日，许、江列席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后突遭市党部武装便衣绑架，许被架走，江由学生夺回。下午，各校学生5000多人赴市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市公安局长及市党部人员，释放被绑架学生，市长张群允学生之请，于是晚下令查办公安局长陈希曾，通缉市党部常委陶百川。同日下午5时，学生300余人整队到市党部请愿，因无人接见，引起公愤，将市党部办公室捣毁。

△　张发奎抵广州见李宗仁、白崇禧，商议援助黑省抗日事宜，李允尽量供应军械。

△　杨虎城部孙蔚如师是日夜进入兰州，雷中田率残部千余人经渭源向武山、陇西方向溃逃。吴佩孚逃往兰州乡下，高振邦部表示服从孙蔚如。

12月10日　　国联理事会关于解决满洲问题决议案正式通过，施肇基表示接受，但提出八项保留意见。日代表芳泽亦表示接受，但仍声明决议案第二节不能阻止日军在满洲各地的“剿匪行动”。理事会至此休会。

△　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陈友仁等粤方国民党中央委员到达上海。伍朝枢对《申报》记者谈，粤方以蒋介石下野为原则，否则粤方各中委决不晋京。

△　汪精卫向全国各级党部、各民众团体发出通电，提出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组织国民救国会议，京、粤双方选派代表参加，共谋应付国难，并先在沪组织预备会议。

△　张学良在北平招待平、津记者，谓东北事变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一重大不幸事件，望各位以真正舆论指导民众，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本人今后当竭力维护国家，即个人生命亦所不惜。

△　南京各大学及公、私立中学25校学生一万余人举行联合大请愿、大游行，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切实担保锦州不设中立区，天津不共管，并撤办外长顾维钧；二、切实保护民众运动，严办殴伤北大同学之负责长官；三、履行以前对各地学生请愿之一切诺言。于右任接见，对各点要求均表示允诺。

△　上海市政府被迫释放北大学生许秀岑。上海各校抗日救国会组织临时民众预审法庭，审问绑许暴徒之一王福生。王供认，绑架及

殴打许秀岑者均系国民党员，受公安局指使。同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就此事发表宣言，指斥上海市党部及公安局此绑票行为卑鄙恶毒达于极点，要求依法严惩与该案有关的主从人犯。同日，上海学联代表赴市政府向市长张群请愿，要求严惩市党部常委陶百川及公安局长陈希曾，并请张呈中央将市党部全体委员撤职查办。张允于三日内拘获陶、陈二人，并当即将学生要求电呈中央。张群以学潮澎湃，抚绥无方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引咎自劾，等候查办。

△　杭州市学生全体罢课示威游行，捣毁省党部及省教育厅长张道藩私宅，殴伤省党部委员胡健中、许绍棣等。张道藩为此电教育部辞职。

△　新编第十师奉令改番号为第八十五师，师长谢彬。

△　美国总统胡佛在国会报告美对中日满洲问题之政策，谓美国为《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签字国，负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之切实责任，对于满洲问题之一切谈判，美国仍保有完全自由之判断与行动。

12月11日　　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汪精卫关于组织民众团体与政府共商外交主张，认此种机关宜永久存留。胡并补充三点：一、该机关之代表必须真能代表民意，应以学、工、农、商为主；二、该机关应设沪，不应设宁；三、代表一旦不能代表民意时，应由其团体立即召回。

△　北平八校赴京请愿团1500余人赴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对请愿各点逐一答复，允尽量接受，并表示日不撤兵，决不交涉。

△　国民政府文官处通电，略谓国家多难，内忧外患并至，国民政府愿与国内明达之士共摅荩筹，以济艰危，依国民党四全大会决议，在本月召集国难会议。

△　国民政府令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彻查上海学潮及上海当局对学潮处置案。后陈呈报查处情形，略谓学生大多数以爱国为动机，但难保有少数危险分子，但学潮发生的原因，应归咎于市公安局及市党部处置乖方。

△　太原23所学校学生2000余人至山西省府请愿，要求拨车赴京请愿。省府正开会，大门紧闭，不理学生。学生破门而入，直冲会议室，各省委员弃鞋遗帽逃散，学生将会议室内陈设捣毁，随后沿街示威游行，又将省教育厅及山西民国日报社捣毁。

△　特种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关于各地学生请愿事宜由该委员会负责办理，其他教育方面之重要设施，由该会决定原则，交教育部处理。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国民党政府已经承认在锦州设立中立区，提议组织在天津的国际共管，承认一切以前的卖国密约”，这是“将满洲几万里的土地，数千万的民众断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号召“民众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一切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谈判的密约”。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周以栗主编，瞿秋白、王观澜、李一氓等参与领导和编辑，为中共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刊期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在瑞金创刊，陆定一主编，邓小平负责编辑。

△　张景惠偕秘书长梁雨襄等由哈尔滨过江至松浦镇与马占山会晤，马率参谋长谢珂、卫队团长徐宝珍及卫队300人赴会。马允张入黑省府主政，但不得有日人干政，并且马部军费仍由省府照拨。

12月12日　　张学良在北平发表宣言，略谓日军事当局诡称东北军对日军发生威胁，纯属造谣，欺蒙世界，并声明若锦州附近有任何严重事态发展，其责任将由日本完全负责。

△　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声称，进京请愿团体中有共产党乘机活动，要求各团体“自加检束”，免被“利用”。

△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接见济南学生请愿团2000余人，声称“救国御侮，须内部团结，须全国青年一致拥护政府，始可收最后胜利”。同日，南京各校学生代表26人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外长顾维钧、宪兵司令谷正伦及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

△　山西省府、教育厅停止办公，《民国日报》停刊，各校学生亦均停课，官方加派军警维持治安。太原各校学生与警备司令荣鸿胪谈判，荣允私人资助学生派代表入京请愿。

△　国民政府公布《户籍法》。

△　红二十二军陈毅部及红二十军刘铁超部攻克南康之唐江墟。

12月13日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全市市民大会，决议：反对锦州设立中立区；反对共管天津；反对中立国调查团赴满调查；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对日宣战；否认国联对满洲问题决议案。

△　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发表谈话，认为学生爱国运动“系总理恢复民族固有精神之遗训”，无可非议。

△　中华林学会在南京举行年会，决议：请实业部迅予成立林垦署；请政府颁布森林法及狩猎法；请政府明文规定各省林业经费至少应占省支预算的百分之五；建议导淮委员会于淮河流域建造大规模之水源涵养林。

△　日本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织新内阁，主要成员为：外务大臣

芳泽谦吉、内务大臣中桥德五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司法大臣铃木喜三郎。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及前海军大臣安保清种任军事参议官。14日，荒木声称，今后对华仍将继续执行前任南次郎政策。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同日，以第六号训令颁布。

12月14日　　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率该部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参加工农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该军团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兼，政委何长工；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政委黄火青；第十五军军长黄仲岳，政委左权。该军团旋即开入中央苏区根据地。

△　陈铭枢由南京抵沪与孙科晤谈蒋介石下野及粤中委进京等问题，陈当晚返京复命。孙科电胡汉民及粤各中委从速来沪。

△　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报告该会任务，谓国难时期学生之爱国运动决不能荒废学业，荒废学业其害“几与丧失领土相等”；为集思广益解决国难时期教育上之种种特殊问题，故设立本委员会，待将来国难会成立后，本会即可取消。

△　济南市学生请愿团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行抵外交部，拟向顾维钧质问，因顾未到部，遂在部长办公楼上及部内各室墙壁上大书“反对秘密外交”等标语。

△　上海各校学生二万余人决定进京示威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进行抗日，蔡元培电沪各大学校长劝阻无效。是日，示威团首批代表500人乘车离沪赴京。

△　日本政府向国联致文抗议中国政府参加抗日宣传，略谓：中国政府教育部曾令大中小学讲授日本侵华史；政府令国民党组织领导抗日会；政府令抗日会筹款五万元援助马占山，此款由扣留之日货拍卖拨充。

12月15日　　蒋介石通电下野。略谓因粤方“胡汉民等同志微（5）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决议：准蒋介石辞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职务，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

△　张学良电蒋介石，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同日，国民政府令准张学良辞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苏省政府：原江苏省政府委员叶楚伧、胡朴安、许葆英、沈百先、陈和铣、何玉书、李明扬、罗良鉴、王柏龄均免本职，兼省府主席叶楚伧、民政厅长胡朴安、财政厅长许葆英、建设厅长沈百先、教育厅长陈和铣、实业厅长何玉书均免兼职；任命顾祝同、赵启𨱎、舒石父、董修甲、程天放、何玉书、王柏龄、罗良鉴、李明扬为江苏省政府委员，顾兼省府主席，赵、舒、董、程、何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实业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浙江省政府：原浙江省政府委员张难先、周骏彦、石瑛、张道藩、王澂莹、蒋伯诚、方策、张乃燕、叶琢堂均免本职，兼省府主席及民政厅长张难先、财政厅长周骏彦、建设厅长石瑛、教育厅长张道藩、代理财政厅长王澂莹均免兼职；任命鲁涤平、吕苾筹、周骏彦、陈布雷、曾养甫、蒋伯诚、蒋锡侯、王澂莹、

杨绵仲为浙江省政府委员，鲁兼省府主席，吕、周、陈、曾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西省政府：原江西省政府委员鲁涤平、王尹西、杨绵仲、蒋笈、龚学遂、路孝忱、熊育锡、黄伯忠均免本职，兼省府主席鲁涤平、财政厅长杨绵仲、教育厅长蒋笈、建设厅长龚学遂均免兼职；任命熊式辉、吴健陶、陈剑脩、龚学遂、熊育锡、袁良、李德钊为江西省政府委员，熊兼省府主席及民政厅长，吴、陈、龚分别兼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令：免马鸿宾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职，任命邵力子为省府委员兼主席；甘肃省府委员马文车免职听候查办，任命贺耀组为省府委员；特派贺耀组为甘宁青宣慰使；任命孙蔚如兼甘肃宣慰使。

△　国民政府令：马鸿宾前已被任命为甘凉肃边防司令，所有该三路军队归其节制。

△　北平各校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500余人赴外交部示威，将各办公室捣毁，随赴中央党部，蔡元培、陈铭枢延见，被学生殴伤架出门外。警厅保安队鸣枪镇压，将蔡、陈二人夺回，并逮捕学生五人。于右任恐事态扩大，欲将被逮学生释放，党部及军警强烈反对，于跪地相求，方将被捕学生释出。

△　中国留学比利时学生500余人在比京日本使馆前游行示威，抗议日本侵略中国，被警察拘捕数人，为首者判监禁一月，余者各罚款25法郎。

△　上海各大学学生赴京示威团第二批原定二万人，因蒋介石已通电下野，大多数认为已无赴京必要，是日赴京者仅1300余人。

△　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任伪省长。袁金铠组织之伪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解散。16日，臧通电就职，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之张

学良政府，驻扎锦州之东北军应服从奉天政府命令，若持反对态度，决加讨伐。

△ 洮昂、四洮两路接轨，是日四平街至龙江客车通车。

12月16日 粤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决议：一、粤中委定18日北上；二、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俟南京统一政府组成后裁撤；三、留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香翰屏在粤处理党政。21日，陈济棠因闻邓演达被南京当局杀害，中止赴京。

△ 国民政府开谈话会，蒋介石发言，声称“本人前因负责任而进，今因负责任而退，自后仍当以党员资格为党国努力”。

△ 各地学生赴京示威团电汪精卫转粤方各委员，质问新国府当局能否与日宣战，能否收回失地，能否退出国联，能否惩办张学良，若不能，抗日民众将与对待原执政者同等对待之。

△ 邵力子向国民政府呈辞甘肃省政府主席职。

△ 全浙公会电国民政府，反对鲁涤平以现役军人任该省府主席，并电原省府主席张难先勿向鲁移交。

12月17日 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各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共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党部紧闭大门，学生愤而将悬于大门口党徽砸毁。下午，示威团学生千余因《中央日报》不真实报道学生抗日活动，将报社捣毁。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约百人。上海东亚体专女生救护队30余人手执红十字旗前往救护，被军警开枪阻止。

△ 国民党中常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一、撤销江西省党政委员会，改组江西省党部，派熊式辉、王冠英、陈剑脩等七人为江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二、派陈铭枢、邵力子、吴铁城指导上海党务。

△　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在京各监委开会，推定林森、蔡元培、张静江、张继、邵力子为临时常委。

△　粤国民党中央委员孙科、伍朝枢、陈友仁等14人由沪抵达南京，孙谈此次入京任务在筹备召集四届一中全会，以实现在沪和会之各种决议。

△　张发奎因粤府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不批准其率部北上援黑，呈请辞去军职，略谓日军“横侵我国，辽吉沦亡，黑垣继陷，中国养兵数百万，无敢言战，坐以待亡，宁非自杀”，并声明虽一再请缨援黑，而出发无期，“再四思维，惟有辞去本兼各职，俾得以国民资格赴难东北”。

△　日本阁议决定派一混成旅团赴满洲，两大队赴天津；满洲军费增加176万元，天津军费增加40万元。同日，日陆军省发表声明，声称“关东军全部兵力（包括朝鲜旅团）不足以维持满洲之治安，保持帝国臣民生命财产之安固”，决定再由第五师团抽调一混成旅团赴满洲。

△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令独立守备队司令森连指挥所部及混成第三十九旅团、骑兵第二联队进攻昌图、法库；命令第二师团长多门进攻辽中、牛庄、田庄台等地，为进攻辽西作准备。

△　广州学生两万余人前往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请粤中委立即北上与宁方组织统一政府，并要求明令准许学生自由参加救国运动。

△　中国政府照会国联理事，报告日军最近不断制造严重事件，请国联密切关注。

12月18日　　国民政府通电严令各地军政当局制止学生团体出境赴各地游行示威，“如有危险事件发生，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

藉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

△　国民政府发表《告诫各地学生书》，指斥北平学生在京围攻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馆，“扰乱”治安，显系“暴动行为”，此后对借口爱国之暴动行为“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全国学生应“迅即觉悟，服从法纪，遵守秩序”。

△　胡汉民在港电促阎锡山、冯玉祥赴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略谓本人与汪精卫因病不能出席会议，而此次会议使命重大，“至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发布紧要启事，宣称本月9日发生之学潮系由共产党所指示发动，否认党部串通市公安局绑架、殴打北大学生许秀岑，并诬指许是“冒充学生犯”，显系“实行暴动，反抗政府”。

△　太原各校学生千余人整队赴省、市党部请愿，工人千余人亦参加学生队伍。省党部委员韩克温等指挥党徒及党部纠察队向请愿学生开枪，死学生五人，重伤50余人。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从中调解，将韩等拘送警备司令部，解除省党部纠察队武装。19日，太原全市罢市，学生游行示威，要求组织民众法庭审判该案主犯。

△　京沪卫戍司令部派第六十师两团、宪兵一团及南京警察厅保安队千名，将成贤街、大石桥、石婆婆巷及中央大学包围，将各地来京示威学生强行押登车船，遣送回原地。

△　吴佩孚抵宁夏，马福寿迎吴入省城。

12月19日　宋庆龄在《申报》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其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蒋介石个人独裁，“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宁、粤对峙，虽各自美名标榜，实则两者“同为革命之罪人”。宣言表示“深信中

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他们将奋起斗争，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前进。

△　国民党中央委员何香凝在《申报》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要改变腐败的政治局面，必须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建议由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并无党无派者及各省市县士农工商、妇女、兵士、民众自行组织一“人民监政委员会”，对政府及官吏严加监督。何并对国民政府杀害邓演达严加谴责，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政治犯。

△　江苏耆老马相伯等就国民政府发行公债事以通函致全国金融界暨全国国民，指责国民党以党治国，五载于兹，就全国金融而论，除田赋、关税、盐税、统税以及一切尽量搜刮之苛捐杂税不计外，即公债一项本息已达11亿余元，而于“全国建设毫无措施，数千万灾黎亦未沾溉”，“惟用以构成内战，荼毒生灵，拥护独裁，诛锄异己，钳制舆论，剥夺自由”，金融界及全国民众对政府今后滥发公债必须严加监督，“以绝政府罪恶之源”。

△　驻日公使蒋作宾奉政府急召启程返国。

△　王树翰到南京代表张学良向中央陈述北方情况及政治意见，并请辞国民政府文官长职。

△　南京各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决议：一、暂忍痛于21日复课；二、发表复课宣言；三、援助此次被难同学；四、要求卫戍司令部释放爱国学生。

△　全国16省旅沪人士500余人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推褚辅成等为主席团成员，并发表救国宣言。22日，该会致电国民政府称，暴日大举进犯锦州，再不抵抗，何以立国，请即动员，力图自卫。

12月20日　　外交部长顾维钧为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对世界宣

言，谓“满洲问题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一国际问题”，《非战公约》、《国际盟约》均受到最严重之考验。

△　宋子文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暨财政部长本兼各职。

△　冯玉祥从汾阳派代表高兴亚等携带果品及款100元前往太原慰问被省党部打伤的请愿学生，并致电慰问，劝学生以后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之精神”进行斗争。

△　太原各校学生开会追悼被山西省党部惨杀之请愿学生，全市停工、罢市，下半旗志哀。山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会电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请缉拿逃往南京之祸首国民党山西监察委员、省教育厅长苗培成。

△　福建长乐县北区各乡农民因反对海军陆战队第一旅旅长金振中派部下乡勒种烟苗，征收烟苗税，是日集合农民500余人举行暴动，攻入县城，将驻县陆战队两连全部缴械，打开监狱，放出人犯，并于县政府内设立联乡保卫团总指挥部，发布告号召“农工商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

△　旅沪浙人成立国难救济会，推章太炎等35人为理事，并发表宣言，表示要发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精神，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

△　上海永安纱厂男女工人6000余人因要求厂方发给四个月奖励金遭厂方拒绝，举行怠工。是日，厂方将各车间封闭，宣布停工，并由市公安局派出警察大队守卫，不准工人进厂门。工人愤而攻开大门，警察开枪镇压，打死打伤多人。

△　日关东军司令部宣布自21日起，日军将大举在南满各地“剿匪”。长春、沈阳、营口、北宁路、四洮路一带日军待命西进锦州。

△　日本前陆相南次郎由东京启程赴满洲，南对记者谈，日军在

东北之军事行动，除锦州区域外已大致完成，目前问题在于如何整顿满蒙。24日，南次郎抵沈阳。

12月21日　　国民政府任命戴戟为淞沪警备司令，原任熊式辉免职。

△　胡汉民在香港电林森、陈铭枢，请恢复人民言论自由，谓“今日唯一之急务，在人民言论自由之恢复。过去因政治上之猜忌，而使人民丧失自由久矣。我人日言民权，而所作所为，几尽相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故凡一切电邮报馆之检查，应立予废止”。

△　日军以“剿匪”为名，以夺取锦州为目的，是日拂晓在南满路沿线、四洮路、大虎山与通辽间及开原铁岭等地同时开始总攻击。

△　张学良在北平令于学忠之第一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89人，于右任主席，林森、伍朝枢发表演说。下午预备会议决议：一、推举孙科、丁惟汾、顾孟馀、居正、伍朝枢、何应钦、于右任七人为主席团成员；二、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教育六组；三、全会会期定为五天。

△　蒋介石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下午偕宋美龄乘飞机赴沪转返原籍浙江奉化。临行前致函于右任等，表示决还乡归田，从此拒绝任何函电来往。

△　张学良电蒋介石，谓“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　顾维钧向国民政府再辞外长职，乘机飞沪。外交部务由常务

次长金问泗代理。

△　沈钧儒电蔡元培转四届一中全会，指责南京政府当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略谓："东北不战而丧地数千里，未闻戮一误国之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务请提议大会力加纠正，并确定以后教育方针。

△　上海各大学代表团31人到达南京，招待首都报界谈进京目的：一、要求南京当局释放被捕同学，查办惨案主使者及凶手，抚恤遇难学生；二、要求惩办上海"一二九事件"凶手陶百川、陈希曾；三、向四届一中全会及政府请愿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失地，反对秘密外交，永绝一切内战，保障民众运动及人民自由等。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猛攻湖北黄安县城，以"列宁号"飞机飞黄安城上空，投掷迫击炮弹及大量宣传品，给县城守军第六十九师赵冠英部极大威胁。入夜，总攻开始，红军从东、北、西三面强攻，23日凌晨1时，赵冠英率残部弃城从南门逃跑，红军乘胜追击，赵师大部被歼，赵本人被活捉。红军缴获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一部，生俘近万人。

△　欧亚航空公司西北航线试航成功，一号飞机安抵迪化。

△　日军步、骑、炮兵3000人向黑山猛烈进攻。同日，日军由天津运军火1200余箱抵山海关。

12月23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二次预备会议决议：一、推定伍朝枢代理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二、推定顾孟馀、邹鲁、李文范为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三、增加王祺、何世桢、唐生智、范予遂、陈孚木、曾扩情、王懋功、陈庆云、谷正纲、唐有壬、杨爱源、王陆一为中央候补执委，增加邓飞黄、孙镜亚、黄少谷、萧忠贞、纪亮、李次温为中央候补监委。

△　阎锡山与冯玉祥在太原附近之兰村会晤。同日，冯在太原发表一简单宣言，内称“现在独裁政治已打倒，吾人从此必须更加努力，务使今后之中国，永绝独裁政治之根株”。

△　教育部长李书华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职。

△　日军四五百名携大炮10余门，占领营口西北之田庄台镇，田庄台车站的驻军与日军激战。日军死二人，伤八人。

△　上海各公债库券持票人因传闻国民政府将展期拨付公债库券本息，是日成立“中华民国内国公债库券持票人会”，并电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请按期偿还公债本息，“以安群情而定国信”。

12月24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出席委员共100人，孙科主席。讨论孙科、伍朝枢、邹鲁、李文范四人所提《中央政治制度改革案》。该案内容要点为：一、国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不兼其他公职，以年满50岁、众望素孚者任之，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二、国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设常委三人；三、行政院负实际责任；四、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不与行政院负连带责任；五、行政院各部长按才录用，不必限于国民党员。

△　阎锡山、居正、王法勤、程潜等16人向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案，请选拔10万劲旅死守锦州。

△　武汉大学全体学生在武昌阅马场召开追悼南京被难同胞会，因武汉警备司令部及武汉绥靖公署令军警机关严禁学生游行示威，各校均未到会。原定是日举行的抗日救国总示威亦未能进行。武汉学潮告一段落。

△　沪学生代表团向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办惨案主使人。陈铭枢、陈公博接见，谓沪、京、济各校被捕

学生多数已释放，北平学生已移交法院，因有“危险”分子，不能即释放。政府对惨案，非预定的，更无主使人。如必要主使人，本人自任之。军警处理失当，政府自应予以处分。

△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致电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称：“日军进逼锦州，情形异常严重，公等群聚首都，对此作何态度？务恳提前决定，明白宣告国人，幸勿重蹈故辙，仍以空言搪塞。”

△　国民政府警卫军两师改番号，警卫军第一师顾祝同部改为第八十七师，调第二师师长楼景樾充任师长，警卫军第二师改为第八十八师，仍由俞济时任师长。

△　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赵丕廉奉四届一中全会之命飞赴太原迎接阎锡山、冯玉祥入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

△　东北财政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兼任委员长，王克敏为副委员长，执委张振鹭，常委戢翼翘、周大文、荆有岩等。

△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达进攻辽西命令：一、第二师团28日从辽河一线出发，向沟帮子进攻；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策应第二师团；三、混成第八旅团集结奉天，准备向大虎山、沟帮子间地区进攻；四、飞行队以主力协助第二师团作战。

△　美、英、法三国驻日公使分访日首相兼外长犬养毅，致送各该国对日照会，略称日军在东三省之军事行动，万一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本将受世界舆论诘责，请日政府对锦州局势予以严重考虑。犬养毅口头答称，为消除中日军事冲突，中国政府应将所有军队自锦州撤入关内，日军在锦州区域之军事行动纯为“剿匪”，并无向中国军队进攻之意。

12月25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中央政治制度改革案；通过李烈钧等所提切实保障人民实行集会、结社、言

论、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权案；通过焦易堂等所提改善财政制度案；通过令张学良应付锦州局势案。会议讨论锦州问题时，吴敬恒发言，称东北事件“南京绝未卖国，卖国者另有其人，锦州之危，其咎不在张学良，咎在某某”。孙科疑为讽诟粤方，会后即离京赴沪，李文范等同行。伍朝枢等本团结初衷，仍主持会务。

△　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谓本日中执委会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毋稍懈忽”。

△　林森在京电请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略谓一中全会虽召开，因蒋介石离京，汪精卫留沪，在京委员总乏导师，“非仗我公德望，无以镇定人心”，“我公为党国柱石，万统共仰”，情势迫切，务望立即命驾来京。

△　粤国民党中委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一行因闻孙科退出四届一中全会赴沪，均留沪中止进京。

△　张学良电南京国民政府，谓日军以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之兵力，长驱攻锦州，务请一周内调拨大批枪弹运往前线，并乞调遣大部援军增援。26日，国府复电称，“已由府密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

△　戴季陶坚辞考试院长，是日偕其妻钮有恒乘汽车返湖州原籍。

△　东北政务委员会公布委员名单：张学良、韩复榘、万福麟、王揖唐、李石曾、徐永昌、熊希龄、庞炳勋、张继、方本仁、沈鸿烈、王树常、胡适、蒋伯诚、刘哲、汤玉麟、蒋梦麟、鲁荡平、宋哲元、傅作义、吴鼎昌、于学忠、商震、刘镇华、周作民、汤尔和、赵戴文、门致中、张伯苓、张作相、罗文幹。

△ 冯玉祥电南京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三项提案：一、组织全国国民救国会议；二、组织国防委员会，武力收复失地；三、为对日备战，抚恤、奖励历年在革命诸战役及抗日战役有功官兵。

12月26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一、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其中第十条规定，国府所属五院正、副院长“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第十五条规定，“各院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二、通过国民政府主席选举标准；三、中央组织、宣传两部改为委员会，取消训练部，另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四、原则通过何香凝等关于实行征兵制之提案。同日，全会讨论锦州问题，决议由张学良全力抵抗。

△ 国民政府令：任命杨杰为陆军大学校长。

△ 代理行政院院长陈铭枢急电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请从速制止日军进攻锦州。

△ 陈铭枢、邹鲁赴沪与汪精卫、孙科洽商，督促留沪粤方中委速赴京参加一中全会。27日，孙科等赴京，惟汪精卫、张发奎仍留沪。

△ 马占山以锦州形势紧急，为牵制日军行动，是日令苑崇谷、程志远、吴松林各旅向齐克路推进，并电张学良请下令反攻。

△ 张学良急电南京政府，“对锦州必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实力相较，众寡悬殊”，锦战一开，华北全局牵动，“究应如何处理，敬请统筹全局”。

△ 邓铁梅率东北民众自卫军于是日午夜攻打凤城，经四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日伪军50余人，缴步枪300多支，机枪三挺，小炮二门及大量弹药。自卫军首战告捷。

△ 由佐世保出发之日军第一批官兵550名到达天津。次日，又有

两批共1000余人由大沽口到达天津。日军前后在津增兵共达1700余人。

12月27日　　南京各界万余人召开拥护和平统一督促国民党中委共纾国难大会，李烈钧、经亨颐、商震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通过通电拥护和平统一，永远制止内战；电请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即日到京共主中枢；请中央电张学良力守锦州；切实保障人民各项自由；请中央严禁军人干政等多项提案。

△　日步、炮兵各一连进攻营沟线大洼车站，为驻军铁甲车击退。

△　日本政府对锦州事件发表声明，诡称日军全面出动进攻辽西，乃为维护南满治安，“鉴于满洲当前之特殊情况，日军必须继续进行‘剿匪’行动”。

△　日内阁批准从朝鲜再调一混成旅团前往满洲。陆军省声称该部调入满洲后，除保护铁路外，并肃清辽河以西之“匪”。

△　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少将通知驻沪各兵舰，定于1932年1月4日举行海军联合大会操。

12月28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一、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叶楚伧、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叶楚伧为秘书长；二、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静江、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薛笃弼、刘尚清、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刘

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充当会议主席；四、通过关于召集国难会议、关于应用外国技术资本发展国民经济等多案。

△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大会宣言，称暴日入侵，际此国家存亡之顷，本党将“一方面应切实认识最近世界情势，为一切急迫之有效行动，一方面将立即召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以定救国之根本方针”；并宣称“心腹之患，胜于外敌”，决定“继续努力肃清赤匪，以安定社会秩序”。29日，该宣言正式发表。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绥远省政府：原绥远省府委员兼主席李培基已于8月19日免本兼各职在案，委员陈宾寅、冯曦、蕴栋旺楚克、沙克都尔札布、仇曾诒、张钦均免本职，陈、仇、张分别免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厅长兼职；任命傅作义、鲍竹荪、郑道儒、冯曦、潘秀仁、沙克都尔札布、蕴栋旺楚克为绥远省政府委员，傅兼省府主席，鲍、郑、冯、潘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以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对学生运动处理乖方，下令撤职。

△　张学良急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谓日军进逼，锦州危急万分，“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请火速拨发款弹，以济眉急。同日，国府复电：“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

△　前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表《救济国难之主张》一文，要求停止“剿匪”实行“容共”政策。

△　湖南旅京、沪、汉等地同乡会代表向四届一中全会请愿，痛陈何键祸湘事实，请予撤惩。中委曾仲鸣接见，表示接受。同日，安徽各县自治区长代表汤济舟等15人向四届一中全会陈诉陈调元荼毒人

民，摧残自治，请从速将陈撤惩，大会允即以书面答复。

△　日军由田庄台向辽河以西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是晨，多门师团长下总攻击令，分三路直逼锦州。

12月29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孙科致闭幕词，宣称此会“为党开一新纪元”。冯玉祥出席大会并演说，表示此次来京，目的在于共赴国难，并希望蒋介石复出任职。

△　李烈钧离京返沪，行前对记者谈话说：此次全会结果，本人未能认为十分满意。本人主张开放，与国民共同负责，案虽通过，但未实现。观此次各部部长人选，仍系分配于党内人物，可以概见。大会宣言空洞无物，对国民无有恳切语调，仅示敷衍而止。依目下情势，蒋随时可以入京。

△　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首次常务会议决议：推吴铁城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为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知本为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启刚为中央海外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增选王正廷、刘守中、杨树庄为国府委员，推曾仲鸣为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

△　国民党中政会议定对日外交方针：一、信赖国际公理，防止事态扩大；二、正当防卫，如遇侵犯，则抵拒之；三、将东三省版图确实置于国民政府管理之下，任何时候不得变更。

△　伍朝枢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司法院院长及代理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职。

△　国民政府令：本年5月4日公布之《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原定民国二十一年（1932）1月1日施行，因本年天灾变故，尚未筹备就绪，暂缓执行。

△　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

乏，后援不及”为由，令锦州及附近驻军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军络绎向关内撤退，辽宁省府机关重要人员亦多数逃入关内。只留黄显声、熊正平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治安。

△　日军攻陷盘山，续向沟帮子进攻，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伤亡达1300余人。

12月30日　　国民政府令：内政部长刘尚清、外交部长施肇基、署外交部长顾维钧、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杨树庄、财政部长宋子文、署教育部长李书华、交通部长王伯群、署铁道部长连声海、实业部长孔祥熙、代理司法行政部长朱履龢呈请辞职，均准免本职。特任李文范为内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黄汉梁为署理财政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陈铭枢兼交通部长、叶恭绰为铁道部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长、罗文幹为司法行政部长。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　国民政府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呈请辞职，准免本职。特任石青阳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

△　国民政府令：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何应钦、军事参议院院长张景惠呈请辞职，均准免本职。特任朱培德为参谋总长、李济深为训练总监、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　冯玉祥携武力收复东北计划由京赴沪会晤汪精卫。

△　陈铭枢主持召开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锦州问题。各委员均主张一面以锦州现有军队尽力抵抗，一面将日军行动电告国联，请设法制止。

△　国民政府再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谓“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

何，必积极抵抗”，“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望“激励将士，为国牺牲”。

12月31日　　日军大举向沟帮子、大虎山等地进攻，驻该地东北军第十九旅孙德荃部、第十二旅张廷枢部及民团义勇军与日军战斗后，向山海关内撤退，各该地遂为日军占领。日军距锦州仅40里。

△　新任外交部长陈友仁对记者谈，锦州驻军退入关内一事，过渡政府不负责任，应由张学良负责，因过渡政府迭令张学良坚守锦州。新政府成立后，亦必赓续此旨。

△　东北军下级军官在锦州前线发表联合宣言，谓日军攻锦，血战五日，东北军死伤枕藉，“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东北将士，决心为东北而死，“望南方同胞，弗徒以空言作抵抗”。

△　国民政府致电国联，报告日军进攻锦州，情势越趋严重，请速采有效措施，制止日军进攻。同日，致电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声明日军攻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日政府须负完全责任。

△　广州“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议：一、统一政府元月一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各机关、财委会、政委会、侨委会及财政、外交两部同时结束；二、设立中执委会西南执行部；三、广州“国民政府”结束后，成立国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四、军事方面成立国府西南军事委员会；五、财政方面设立国府西南财政委员会。

△　胡汉民、孙科、冯玉祥、李济深、李烈钧、居正、程潜、唐生智、黄绍竑、张发奎、刘芦隐等24人联名在《申报》刊登《为发起筹备邓演达同志追悼会启事》，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同志努力于国民革命，艰苦卓绝，任劳任怨，始终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不幸被南京政府杀害，为慰忠魂，特先组筹备会，拟

择吉日追悼。

是年　据《中国经济年鉴》载：本年钢产量1.5万吨，锰3.185万吨，钨矿砂6550吨，金12.85万两，煤2724.4673万吨，焦炭61.3863万吨，石油25.9632万桶，铜413吨，铅矿5996吨，锌矿1.4618万吨，锑矿1.1755万吨。

△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商抵制日货风潮剧烈，日本对华输入减少。据《申报》统计，本年9月比上年9月减少34.7%，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68%，12月减少63.8%。

△　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在天津成立，资本23万元，宋棐卿联合山东韩复榘创办。宋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1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新任各院、部长等宣誓就职。参加宣誓者为行政院长孙科，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内政部长李文范，外交部长陈友仁，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铁道部长叶恭绰，财政部长黄汉梁，实业部长陈公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朱培德，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幹等。林森致词，提出“要振刷精神，负起建国救国的责任”。

△　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联名通电声明广州国民政府即行取消，略称：“上海和平会议告成，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已完成其使命，蒋中正同志复能勉从国人之期望，翩然下野，统一政府本日成立于南京，本会（按：指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及本政府谨践前言，同日取消。自兹以往，以党权统一于中央，以治权还诸统一政府，并遵四全大会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负均权共治之责，以努力于剿灭共匪，巩固国防。”同日，中执委会西南执行部等三机关成立，推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七人为执行部常委；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27人为西南军分会委员，陈为委员长；唐绍仪、邓泽如、萧佛成等27人为西南政委会常委。

△　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对东省问题宣言，略谓：“本政府最急之

任务即在于消灭战祸，并保主权，誓本此旨努力奋斗。前日政府已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　中国驻国联代表胡世泽会见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请国联采取手段，制止日军扩大侵华行动。次日，白里安电各国政府，询问对日军攻占锦州之态度。

△　日机轰炸锦州，投弹20余枚，军民伤亡七人。辽宁省政府出锦州移至滦州，驻锦州东北军全部撤至关内，沟帮子失陷。

△　张发奎第四军在广西南宁举行北上援助黑龙江马占山将军抗日誓师大会。3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分批由南宁出发，取道邕柳公路北上。

△　张景惠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指使下在哈尔滨发表所谓《独立宣言》，宣布黑龙江省和东省特别区“独立”。7日，伪黑龙江省政府成立。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就伪省长职。

△　香港《破产条例》、《竞博税条例》公布施行。

1月2日　下午2时，日军嘉村旅团侵占锦州。

△　国民党中政会紧急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敦请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

△　国民政府为日本侵占锦州，照会美国政府请采取行动，防止事态扩大。

△　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决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特种教育委员会均应即结束；侨务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加推陈公博、刘芦隐、马超俊为国难会议筹备委员。

△　国民政府特派杨虎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福州各校学生在西湖公园开游艺会宣传抗日，驻福州日本领事及日本军舰“北上号”正、副舰长进行干涉，撕毁会场标语，与学生发生冲突，正、副舰长面部受微伤，经军警护送回日领署。学生数百人先后到市公安局及市政府请愿，要求扣留日领事及日舰正、副舰长。5日，驻福州日领事提出惩凶、道歉、取缔反日会等项无理要求。福建省府已允照办。

△　上月31日晚6时，哈尔滨俄侨数人在中央大街和盛利杂货店购物，店主以有行窃情事报警，俄人金多维赤被拘审后开释。是日外间讹传金多维赤在医院身死，晚6时，俄人聚集中央大街达万人，有些暴徒演说煽动，设置路障阻交通，捣毁商店牌匾，寻殴华人，至次日凌晨始渐散。3日午时，肇事者再聚集上千人，要求交出店主送日领事馆究办。经特警管理处调警两队晓谕不听，开枪示警驱散。暴徒四人被击伤，由同伙抬至南岗日领馆请愿。

1月3日　日军西进，占领辽宁连山，黄显声率警备队退兴城。4日日军占葫芦岛。5日陷绥中。6日下午到万家屯，距山海关仅九公里。

△　何成濬、李鸣钟、徐源泉、夏斗寅等21将领电行政院，请对日速定大计，下令动员抗日。

△　国民政府令：免国民政府文官长王树翰、代理文官长叶楚伧本职，特任魏怀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准免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组本职，遗职由吕超继任。

△　东北军前线下级军官署名发表第二次联合宣言，声明：“东北为中国之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故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

△　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声称：“我东北民众固犹为国家之民众也，未知政府负责诸公，尚有无有效办法解救此种危急。”

△　全国医师联合会电国民政府，请迅速以实力援助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

△　福州日侨水户参雄夫妇，晚9时在日俱乐部宿舍暴毙，日居留民谓系华人所为。4日，日舰圆岛陆战队100余人在福州登陆，并由马江运来水兵80余人，声言保侨。5日，福建省府议决限晚8时起36小时内缉到凶手。

1月4日　　中国政府照会国联理事会，要求召开理事会特别大会，制止日军侵华。

△　中国驻国联代表胡世泽由巴黎赴日内瓦，就日军侵略我东北事要求国联采取紧急处置。

△　汪精卫在沪发表谈话，望蒋介石、胡汉民从速入京，“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

△　冯玉祥派熊斌赴奉化谒蒋介石，劝蒋入京。

△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召开省府会议，议决第三路军军饷中央如不能发下，则暂借用本省中央税款。

△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松木侠等，讨论“满蒙独立”的构想，拟在“二月中旬，至迟到二月下旬乃至三月上旬”成立伪“满蒙国家”政府，“首脑预定由溥仪充任”，并确定“国防军”要由日本军充当。讨论结果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由板垣于1月6日带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

1月5日　　北平绥靖主任张学良通电报告锦州失守经过，略谓：“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皆远胜于我，自其发动以后，竟以飞机、坦克车及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日失守锦县。”

△　行政院长孙科招待新闻界，告以新政府内政、外交、财政等大政方针。

△　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以“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无人”，电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入京，团结御侮。

△　张学良在北平召集财政整委会议，讨论冀、晋、察、绥四省财政问题。会议认为：四省每月收入约数为500万元，中央协款百万元，但照六一折发，尚积欠两三月，实际每月收入仅400万元，而军、财支出每月700万元，不敷达300万元。各军若感不敷，可自动裁缩。

△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与英、法驻美大使讨论满洲问题，表示三国对于满洲事变，彼此携手办理。

1月6日　　中国驻国联代表胡世泽访国联代理秘书长爱文诺，请制止日军继续向山海关进袭。

△　国联“满洲调查团”委员名单已确定，有英国李顿、法国克劳德、美国麦考益、德国希尼、意大利马柯迪，李顿为团长。21日，该团正式成立。

△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致国民政府电，提出三点要求，限政府三日内实行，即：一、退出国联；二、出兵收复失地，并令北方将士不接受张学良不抵抗命令，自动抗

日；三、枪毙丧权辱国的长官张学良。同时致电张学良称：“执事以东北最高军事长官，未能尽军人守土卫境之天职”，“不惟不以拼命抗寇为务，反至朝歌暮舞，优游享乐，置水深火热之东北同胞于不顾，是谓败类，吾国民所当共弃。”

△　国民政府令免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南京市市长魏道明、上海市市长张群本职；特任蒋光鼐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任命马超俊为南京市市长，吴铁城为上海市市长。

△　国民政府令：刘峙已特派为驻豫绥靖主任，所有从前任命兼充之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讨逆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剿赤”军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官各名义，均即予撤销。

△　张学良邀孙殿英、李服膺、商震、徐永昌等及在北平各将领协商华北军政问题。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要求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

△　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在长沙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到50余校约二万人。大会通过全国一致团结抗日、请发给各校学生枪支、全国总动员出发东北等决议案。

1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决议，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委会、西南军分会应停止设立，在常会未决定办法前，应请粤各委尊重一中全会交常会办理之决议案。

△　汪精卫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辞两常务委员职。

△　日军嘉村旅团自锦州向义县、北票推进，图侵热河。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电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入京就国

府委员职。

△　国民党中政会召开临时会议，加推李文范、罗家伦为国难会议筹备委员。

△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外交部，反对国民党对日丧权辱国的秘密外交，并宣称“如万一堕其术中，国民誓难承认”。

△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速派大军收复东北失地；明白宣布对日方针；绝对禁止军人干政。

△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　上海市民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联电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声明：“所有外部与暴日丧失国权交涉之结果，全沪商民，概不承认。”

△　上海市商会电国民政府，要求“迅决大计，整饬军旅，以武力收回失地，实施革命外交”。

△　招商局船员代表向招商局总管理处专员郭外峰要求与海关、铁路等局员同等待遇，发年终双薪被拒，遂成立请愿团，是日起已到沪之“新江天”等12商轮停开，在轮各职工午后起停辍工作。招商局航员双薪请愿团发布请愿宣言。

△　南京中央大学留校学生数百人，联名发表宣言拒绝桂崇基长校，并函请学生自治会召集留校同学大会，讨论拒桂进行办法。

△　北平广济寺大火，焚毁佛殿禅堂100余间。

1月8日　　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表“剿共”抗日通电，声称：“我一、四集团暨海陆空全体将士，认定今日之剿共抗日，为死中求生之

急切要图。”

△　外交部声明，否认1905年中日密约，谓“我国自始即否认其事，嗣后亦屡经驳斥，早成死案，有案可稽”。

△　日军侵占锦州后，伪东北交通委员会在沈阳设立奉山铁路局，强占北宁路关外段，并改称奉山路，本日委阚铎兼该局局长。阚铎9日就职。

△　驻天津日军2000余人全副武装，举行大操，绕行各马路示威。

△　国民政府任命徐寄庼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并代理总裁职务。

△　国民政府令：所有对于电报及新闻施行检查之事一律取消。

△　国民政府令免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本职，任命桂崇基为中央大学校长。

△　上海总工会电国民政府，要求出兵收复失地，宣布对日方针。按：上海总工会系由上海市南、北两总工会合并而成。

△　南京金陵大学学生500余人赴行政院请愿，要求政府即日宣布对日外交方针，以实力援助东北将领，无结果。9日全体罢课，决定促汪、蒋、胡入京。

△　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请愿团代表47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外交部请愿，要求即日出兵收复失地，实行革命外交，宣布对日方针，惩办张学良，保护民众救国运动。

△　北平国立七院校教职员因积欠薪金五个月，派代表赴京索薪。北平中学教职员亦派代表赴北平市府索薪。

△　美国政府援《九国公约》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声称：“凡中日

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

1月9日　　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长孙科表示独力难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吁请汪、蒋、胡入京主持一切。孙对记者称：“现在国家环境，备极困难，余屡次宣言，必须蒋、胡、汪三先生共同到京主持中枢，始有办法。”“三先生在党国均有深长之历史，无论如何，决不能长此恝然置国家之危急于脑后也。”

△　外交部照会日使重光葵，中国政府对日本在东北组织的伪政权机关和设立之伪交通委员会概不承认。

△　张发奎第四军到达柳州，27日到桂林，2月1日全部集中全州。

△　国民政府令免教育部政务次长陈布雷本职，任命段锡朋为教育部政务次长；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未到任以前，由段锡朋暂行代理部务。

△　军政部规定，高中以上学校施行军事训练，练习实弹射击，每年举行二至三次。

△　福建省政府因日领反对《新潮》、《东方》两报记载、评论日皇被刺事，逮捕《新潮》报社长、记者，令《东方》报停刊，并决定施行新闻检查，重新登记各报。

△　上海市政府密电行政院，请下令制止该市成立中国军人救国会组织。

△　南京中央大学留校学生组织拒桂护校运动委员会，并致信警告桂崇基。10日，桂崇基赴中央大学视事，被学生殴打，头部受伤，

从后门逃走。

△　上海市28所中等学校代表53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从速收复失地，保护主权。

△　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　欧亚航空公司一号飞机，由北平到迪化试航成功，是日返抵北平。

1月10日　日关东军第八师团古贺骑兵联队和松尾辎重部队在锦西、锦州间遭我辽西义勇军郑桂林部伏击，被全部歼灭，古贺被击毙。

△　军政部、参谋本部及训练总监部合组军事整理会议，由军政部长召集，商讨全国各部队整理事宜。

△　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在平招待新闻记者，表示拥护统一，安定北方。

△　福建各团体代表团9日在上海青年会招待沪各团体及各报新闻记者，报告日人在福州挑衅情形及省府媚外辱国等经过。是日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中央就福州事件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限令日舰即日离开福建，保证此后日水兵不随意登陆，并否认福建省政府承认日本所提之五项无理要求，要求国民党中央对媚外辱国的福建省府严加惩办。

△　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赴京请愿被难同学杨同恒追悼会，与会者数千人。会后在南京路抬杨棺示威游行，至百老汇路，被公共租界探捕驱散。

△　日本“八云”舰由旅顺开赴青岛。

△　锦西一带义勇军六、七、八等大队以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名义，与东北军前线下级军官联合发表绝命宣言，表示誓死抗日，“无所悔恨”。

△　驻天津日兵三名，夜闯入居民李振亭宅，欲轮奸李妻，李夫妇抗拒，被日兵用刺刀将李削断三指。

△　中共中央军委下达攻打赣州令，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担任攻城和打援任务。

1月11日　日军依田旅团侵占锦西县城。

△　何应钦、张继到沪转奉化促蒋介石入京。孙科等俟何、张晤蒋探其意志后再定须去奉与否。

△　司法院副院长居正到院视事，并通电称：“在司法院院长伍朝枢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依法代理。”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反对桂崇基长校。该校教授会议议决，请行政院令江苏省教育经费委员会依照成案，如期拨发中大教费，并请罢免周佛海江苏教育厅长职。12日，行政院议决，南京中大经费132万元维持前案，永由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支给。

△　国民政府任命楼景樾为第八十七师师长；俞济时为第八十八师师长；钱大钧为第八十九师师长。

△　国民政府令派黄君度、黄艺博为宣慰南洋华侨专员。

△　丁锦、朱清华等百余人，以“国难日亟，国府陷于停顿”，在上海发起组织全民救国大同盟，主张废除党治，实行宪政，全民总动

员，收复失地。

△　招商局全体船员罢工风潮解决，经杜月笙、虞洽卿等调停决定：双薪照发，以12月份薪工单为标准；局员、船员一律平等待遇；船员不得无故被开除。同日，双薪请愿团通告“候命开航不误”；招商局专员郭外峰电国民政府辞职。

△　沪西日商日华纺织厂、喜和纺织厂、东洋绢丝厂华工因日人压迫全体罢工。上海市公安局长温应星、社会局长麦朝枢派人前往调解。罢工延续到28日。

1月12日　孙科、于右任、冯玉祥、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在沪讨论应付国难紧急办法，议决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下设立特务委员会，以应付目前国家严重问题。

△　日军于锦朝线失利，改由大通线分三路进袭热河。大通线有激战。

△　东北义勇军第四路耿继周部千余人克复大虎山。日军宝师团死伤惨重。14日，日军猛烈反攻，复陷大虎山。

△　黑龙江省府主席马占山电国民政府，称“江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恳速觅策，设法交涉，以解危亡”。

△　冯玉祥函汪精卫，并分电蒋介石、胡汉民，促即入京，共赴国难。

△　行政院长孙科在沪发表时局谈话，略谓：“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仍需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需四百万，不敷数目达一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

△　日暴徒数人借口青岛《民国日报》刊载韩国志士谋刺日皇事，到《民国日报》馆纵火、鸣枪寻衅。下午2时，全青岛市日侨集会，决定向市府提出解散市党部、查封《民国日报》、惩办该社社长和总编辑等三项无理要求。会后结队出发，将市党部包围。晚9时半，在日国粹会员数百人参预下，将市党部焚烧，第四分驻所办公室捣毁。午夜，日巡洋舰“出云号”、“八云号”水兵600人登陆。日领馆向市政府提出市政府书面正式表示遗憾；《民国日报》社长登启事道歉；《民国日报》停发十日并撤换该事项之编辑人等。13日，青岛市府向日方道歉，令《民国日报》停刊十天，并将该报总编辑撤职。

△　南京政府于年初成立后，广东、北平、天津、山东、福建、湖北等省、市均截留国税，国家每月税收由3000万元降到600万元，财政极度困难，财政部次长林康侯为此延不就职。沪市银、钱业两公会及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是日分电中央暨广东、北平、天津、山东、湖北等省、市当局，呼吁“勿截国税，税收报解中央”。

△　上海永昌煤号私进大宗日煤，上日被上海煤业公会查获。上海煤业公会召开执委会联席会议，讨论制裁永昌煤号事，决议：一、登报宣布永昌煤号主人吴吉昌私买日煤破坏抗日运动之罪状，并函请银、钱业两公会与奸商永昌绝交；二、同业全体与永昌断绝关系；三、推陆祺生、潘以三、毛春圃三人督促抗日会积极处理本案。

△　上海国难协济会及青年会会员抗日救国会两团体，联电山海关第九旅旅长何柱国，请“死守天险，以保关内”。何复电称：“誓率健儿，为吾华留此堑垒。”

△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电何柱国，表示“本会决将唤醒全国同胞，为将军后盾”。

△　邵力子辞甘肃省主席，行政院决议慰留。

△　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兼鄂东区“剿匪”总指挥李鸣钟因“剿

共”屡遭失败，前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本日国民政府复电慰留。16日，再电何应钦等请辞。

1月13日　孙科、冯玉祥等自沪至南京，开始组织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在中政会党务委员未到京前，负责处理“中央各紧急政务”。

△　张学良电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入京，略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

△　熊希龄、马相伯、章太炎、张一麐、沈钧儒等代表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及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胡汉民等，略谓：“事至今日，诸公倘犹认救国全责可由一党负之，则请诸公捐除一切，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尚有难言之隐，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

△　蒋介石由奉化抵杭州，14日在杭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汪、胡如能推诚入京，余虽身在诟谇之中，为党为国，也无不乐从其后”，“惟熟审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

△　行政院通令各部、会，国家财政困难，“一切应采用紧缩政策”。财政部长黄汉梁、次长林康侯因财政困难，无法解决，分别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

△　湘省主席何键电中央索军政欠款，请速汇10—12月补助费60万元，并拨还省库垫用军费500余万元。

△　北平大学七院长徐诵明、虞振镛、程子云、王之相、杨仲子、夏元瑮、白鹏飞，因教育经费困难总辞职。校长沈尹默亦电教育部辞职。

△　国民政府以财政困难，每月挪用公债偿付本息基金1400万元。上海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银钱业两公会、沪市商会，均电国民政府表示反对。同日，北平、天津银行公会分电沪银业公会，请一致主张维持债权基金。

△　华北人民抗日救亡会成立，发表抗日宣言，略谓：日本长驱西进，国势日蹙，应唤醒全国上下，共同致力于消弭内战，共御外侮之运动。

△　上海各民众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出席有沪杭路抗日会、上海革命青年会、上海海员工会等50余团体代表，大会通过电慰东北抗日将士及义勇军等案。

△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自黄安北上豫南，与自皖西西进之红七十三师会合，19日发起商（城）潢（川）战役，经过十余日战斗，至2月2日商潢战役胜利结束，击溃敌第二、第十二、第七十六师、独立第三十三旅共19个团，商城守敌第五十八师弃城逃麻城。红军占商城及商潢公路沿线。

△　《中国论坛》英文周刊在上海创刊。

1月14日　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常务会议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并推于右任、张静江、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馀为该会委员。《组织大纲》规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会未实行负责以前，特务委员会迅速处理紧急事务，并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所决定方针和事项，交由政府各主要机关依法定程序迅速执行。

△　外交部照会日驻华公使，就日驻汕头军舰连日向中国军队驻所挑衅；汉口日海军在汉口越界构筑防御工事；青岛日侨聚众滋事，焚毁青岛市党部等情事提出严重抗议。

△　外交部发表复美国公使照会，称中国政府本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绝无与日本订立任何条约之意。望美国政府继续增进国际公约之效力，以保各国际公约之尊严。

△　张学良在北平召集华北各将领商震、宋哲元等会议，讨论华北治安、财政及各军缩编减费等问题。

△　伍朝枢电林森请辞司法院长职。

△　旅京华侨抗日救国会召开救国大会，通过请政府克日调遣大军收复东北失地、对日绝交宣战、宣布对日外交方针等项要求。

△　上海农、工、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抗日主张，决定17日开市民大会，并实行罢课、罢市、罢工、罢税、罢岗、罢操。

△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通电全国，号召“各民众自动组织，共赴国难，收复失地，驱逐倭寇，还我山河”。

△　东北民众义勇军总司令赵飞鹏到京报告抗日情形。

△　江苏淮阴全县车夫2000余人，因反对增加车捐，举行罢工。

1月15日　　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在中央党部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对日外交问题。要求国联援用会章第十六款，对日施行经济制裁，由外交部电颜惠庆秉承办理；对日取不妥协态度，以保障领土主权为原则。

△　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飞杭晤蒋介石，携孙科敦促蒋出山函，

词意恳切，蒋为动容。

△　于右任赴香港促胡汉民入京。

△　行政院第四次会议决议组织国难会议筹备处，由李文范、陈公博、段锡朋、叶恭绰、罗文幹、马超俊、吴铁城负责办理，李文范任主任。

△　日军村井旅团占阜新，向新邱推进，为骑三旅及义勇军击退。

△　驻美公使颜惠庆启程赴日内瓦，代施肇基出席国联理事会议。

△　国民政府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蒋光鼐未到任以前，着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邓世增暂行代理。

△　上海市长吴铁城奉国民政府令，与沪金融界代表会商财政问题。吴称，现中央军费每月减到1600万元，政费减到200万元，合计1800万元，每月仅收入700万元，不足1100万元，请金融界设法协助，以两个月为期。协商未获结果。

△　湖北天门县长刘赓飏率天门、应城、汉川三县地主武装及军队一团，进犯芦家口红军，全军覆没，刘被活捉。

△　江苏高邮筑堤工人因反对政府克扣救灾筑堤款项，剥削工人，举行罢工。

△　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电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陈述东北民众义勇军抗日情形，请予协助弹械。

1月16日　陈铭枢自杭返沪，携蒋介石致汪精卫亲笔函晤汪，转达蒋促汪赴杭意。下午，汪去杭晤蒋，商谈入京事。17日，蒋、汪联

电促胡汉民北来，一同入京，共支危局；并电孙科称：“俟展兄（胡汉民字展堂）驾至，即联袂入京”。“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决定”。

△　张学良召开华北财政会议，决议军费按六四成发，政费冀、察、热、平、津按八成发，晋、绥由该二省自行减缩，结果仍不敷50余万元，拟由国税项下暂行支拨。

△　中华民国退职军人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仇鸾燮等电国民政府，主张敦请冯玉祥统率全国义勇军，领导抗日。

△　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抗日救国团50余人至军政部请领枪械子弹，与值日卫兵发生冲突，领队叶斌及律师吴迈被击伤，全体团员被扣。经新闻媒体刊载，各民众团体支援，19日被释放。

△　财政部电全国各税收机关，称“军政各费，急于星火”，着即将税收款项一律扫数解交国库，毋得贻误。

△　广州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团到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明令各省军队克日开赴东北，收复失地。

△　南京国民外交后援会电慰东北义勇军，望再接再厉，为国家留生气，为民族争殊光。

△　上海国难协济会等70余团体召集各界代表大会，讨论民众自卫救国等要案。

△　英使蓝普森因日方将北宁路榆沈段划归南满路公司附带经营，有妨害英国在该路之债权，并破坏中英间之借款合同，向日方提严重抗议。

△　连日来晋钞价格暴落。本日晋钞一元仅换现洋四分，持票购现金者甚多。山西省府通令各县15日起赋税等款，一律改收现洋。金

融异常混乱，商民恐慌万状。

1月17日　胡汉民复电汪精卫，称血压未退，非长期休养不可，并称："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副国人之期望。"

△　张继、张静江赴杭迎蒋介石、汪精卫来京。

△　清逊帝溥仪由汤岗子赴沈阳积极准备复辟。

△　黑省主席马占山电孙科、陈友仁等，略谓："国难日亟，复辟将成，危亡即在旦夕，恳速觅交涉途径，以救垂危。"

△　行政院电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全国商联会、上海市银行业、钱业公会等团体，声明"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18日，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也电上海各团体，声明维持公债信用。

△　孙洪伊等发起之宪政促进会成立，选孙洪伊等17人为理事，声称该会目的在"实现全民政治，反对一党专政"。

△　上海30余民众团体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通过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反对政府停付公债本息等议案14项。会上有人散发共产党传单和高呼反对国民党口号。会后游行至上海市府及市党部，被警察驱散。

△　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在中央大学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决议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并以实力援助东北义勇军。

△　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为日军攻陷锦州发表告国民党及国人书，略谓："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断不能因国民党领袖不团结或疾病而被断送。同人等诚不信蒋、汪、胡三公不来，国事遂毫无办法"，国

民党“应整个交还中国人民所付托之政权，俾中国人民自谋生路”。

△　中国著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陈望道、冯雪峰、楼适夷、丁玲等。

△　晨1时50分，天津工业印刷局大火，延烧中华书局、丽生大药房等八家商店，焚房屋63间，损失约在50万元以上。

1月18日　孙科、何应钦等应蒋介石之召飞杭州，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张继等在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共同入京。

△　日僧天崎等五人在上海引翔港一带，手敲钟鼓铙钹，行至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棉纺织厂附近，向围观之群众投石，三友社工人向前劝阻，发生冲突。日女间谍川岛芳子事先收买之流氓趁机袭击日僧，蓄意制造事端。日僧二人乘间逃脱，三人被群众殴伤。19日，驻沪日领村井苍松向上海市政府口头提出严重抗议，除要求缉凶外，保留其他要求条件。21日又提书面抗议，要求四项：一、道歉；二、惩凶；三、对被害者给予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侮日”行动，尤应将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同日，驻沪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对上海市府提出警告书，要求圆满答复总领事所提四项要求，否则“为拥护帝国之权益计，已具有认为适当手腕之决心”。

△　胡汉民电蒋介石、汪精卫，声明暂不北上入京，称：“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

△　各师、旅驻京代表40余人向军政部索饷。陈仪延见，称财政部长尚未就职，沪方洽款尚未成交，俟日后财政部负责有人，发饷有款，再行支配。

△　国民政府令：定于2月1日在南京举行国难会议，“广集忧时之

士，经世之才，各本救国之诚，共谋自卫之道，一心一德，济此艰危。所有会议一切事宜，着由行政院妥为办理”。

△　国民政府特派颜惠庆为国联行政院代表，原驻国联行政院代表施肇基因病辞职照准。

△　国民政府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已组织成立，前设之首都卫戍司令部应即撤销；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免职。

△　张学良委荣臻为北平绥靖公署参谋长。荣20日就职。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举行全体大会，确定校长人选标准：一、纯粹学者；二、办理高等教育有成绩者；三、绝无政治色彩者，并推举竺可桢、翁文灏、任鸿隽三人，呈请国民政府择一任命。

△　天津市商会电广东、山东、湖北、北平等省、市政府，请熟权利害，俯顺舆情，勿截留关、盐等税。

1月19日　　汪精卫、蒋介石再电促胡汉民入京，称：“此值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

△　孙科电促胡汉民北上入京，略称：“此次中央政制改革之后，行政院实对政治会议负责，但政治会议常委三人均未在京主持，对内对外党国大计无从决定。”

△　阎锡山电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盼早日入京。

△　行政院会议决议裁员减政，各院、部、会经费自本月份起，六个月内暂按原额发五成。各省、市照中央办法，一律减缩。

△　行政院决议：派顾维钧参加国联满洲调查团。

△　各军驻南京代表开会，议决请军政部维持军费每月1800万元，并第二次向军政部请愿索饷。

△　国民政府令：任命邹鲁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章太炎、张一麐、沈钧儒等联名通电，“请国民援救辽西”。

△　安徽旅京同乡会及铁路协会等各团体，因皖人阚铎受伪命为奉山路局长，咸深愤激，决议开除其会籍。

△　南京各界抗日会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自决图存”。

△　日机向宾县大量投弹，轰炸吉林临时省政府。

1月20日　　晨2时20分，在沪日浪人32人烧毁中国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并冲入附近华德路警亭，砍断电话线，杀死正在报警之华捕田阔生一人，刺伤二人。下午，上海日侨2000人在公共租界蓬莱路日侨俱乐部举行居留民大会，会后赴驻沪日领事馆及日本海军陆战队请愿，要求日政府增派海陆军压制排日，并持木棒游行，在北四川路一带捣毁电车、公共汽车及中国商店。至6时许，到狄思威路始散。

△　上海市政府就日浪人烧毁三友实业社事，派秘书长俞鸿钧口头向日领村井仓松提出严重抗议，日领表示遗憾，并声明负责缉凶严办。

△　国民政府为日机在吉林临时政府所在地宾县轰炸，照会国联请加制止。

△　粤国民党中委唐绍仪、伍朝枢等21人通电拥护中央，否认扣留国税。

△　何应钦电各军军事长官，说明中央因财政困难，决自本月起军费减为1600万元，以前积欠亦决设法发放。

△　外交部就日军占领北宁路关外段阻止交通事，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

△　国民政府特派吴铁城为国难会议秘书处主任，郑洪年为副主任；任命蔡增基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任命俞飞鹏为交通部常务次长。

△　上海市国难救济会成立，通过该会公约、会章和宣言，推举沈田莘为主席，王晓籁、史量才等25人为理事，并通过以经济实力援助东北义勇军案。

△　班禅率随员多人抵锡盟，张学良派张九卿前往欢迎，并以金表等贵重礼物数十种，分赠班禅及锡盟各王公，以示宣慰。

△　骑兵第一师第一旅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河南息县暴动，投入红军，旅长王春长当场被起义士兵打死。

△　福建长乐县农民因生活困苦举行暴动，捆捉县长陈希彭，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农民，并布告列数其对农民剥削的罪恶。

△　《中国日报》在南京创刊。康泽创办，社长顾希平，总编辑邬绳武，总经理唐忍安。

1月21日　　蒋介石离杭赴京，临行对记者谈称："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当局，绝不担任何种职务。"晚宿汤山。汪精卫晚10时亦自沪到京。

△　上海市政府对20日日侨居留民在北四川路沿途滋扰、捣毁店铺事，向日领村井仓松提出抗议书，要求惩办肇事者，并严切制止，以后不得再有类此情事发生。

△　行政院各部厉行减政，缩费、裁员是日起实行。十部及附属机关公务员约一万余人，需裁三分之一。留职人员薪俸按等减成发

给，雇员八成，委任六成，简任对折，办公费津贴停止。

△　国民政府颁令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略称：“嗣后各院、部、会及各地方长官，务须砥砺廉隅，以身作则，所属如有贪污之行，务立予举发，勿得稍涉徇庇。”

△　孙科电上海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六公团，希每月勉任1000万元，“以安大局”。翌日，孙科发表谈话称，政府已向上海银行界每月借800万元，以两月为限。

△　黄汉梁、林康侯打消辞意，到财政部视事。

△　国民政府任命吴景鸿为立法院秘书长；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长。

△　南京中央大学教授20余人向行政院、教育部、财政部请愿，要求拨发欠薪。

△　全国苏区少先队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少共中央局陆定一、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及中共代表任弼时到会并发表演说。大会通过目前少先队的政治任务和章程等决议。选举王盛荣、陈丕显等13人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执行委员。25日闭幕。

△　国民党海军“豫章”鱼雷艇在南通芦泾港触礁沉没。

△　国联成立关于九一八事变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派员组成，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任团长。

1月22日　上海市政府对日浪人烧毁三友实业社案，向驻沪日总领事署提出书面抗议，并要求：一、日本总领事向沪市长表示歉意；二、迅速逮捕及严惩纵火杀人之罪犯；三、充分赔偿被害者；四、切实保证嗣后不得有同样事件发生。

△　上海日本陆战队因21日《民国日报》刊载日人焚毁三友实业社之题为《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之文章，是日向该报社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陈谢；二、揭载半张大地位之谢罪文；三、保证嗣后不再发生此种事情；四、罢免直接责任记者职位，并限23日上午5时前答复。

△　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李宗仁、冯玉祥等在南京励志社开谈话会，共商对日外交及财政等问题。

△　国民政府举行会议，通过蒙藏委员会增加常委六人；决议照行政院所拟聘任国难会议会员。

△　段祺瑞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后，是日在沪发表谈话，略谓："余以为处置国家大事不在夸大虚矫，而在能实践所言。国事至此，吾人惟有效越王勾践刻苦忍辱，以求最后之胜利。但屈辱非妥协之比，以后须在'求己'二字上用五六年苦功夫，国事终有可为，决无用其悲观也。"

△　日军骑兵各一中队分别侵占长岭、农安两县。

△　驻汕头日领因《汕报》称日兵为兽，日人为倭，向市政府要求道歉及令该报停版。

△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为了贯彻《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夏曦领导下召开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决议，选出以夏曦为首的新湘鄂西省委。29日大会结束。

1月23日　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至7时始散。晚，孙科及何应钦、朱培德等复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对日应否绝交问题，政府要员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蒋对陈友仁等之对日

绝交主张，认为“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

△　国民政府敦聘丁文江、王克敏、王世杰、王造时、王云五、王揖唐、王昆仑、王晓籁、朱庆澜、吴佩孚、吴鼎昌、李书城、何公敢、沈尹默、周作民、周诒春、胡适、段祺瑞、徐谦、马寅初、孙传芳、陈垣、陈寅恪、陈嘉庚、郭泰祺、张伯苓、章士钊、章太炎、陶希圣、陶行知、黄炎培、黄金荣、黄郛、汤尔和、曾琦、翁文灏、傅斯年、罗隆基、顾维钧等188人为国难会议会员。后又聘左舜生、周震鳞、赵恒惕等38人为会员。

△　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对日抗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人参加，并发表重要讲话。蔡称：“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戴称：“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蒋称：“从物质方面说，我们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下午7时，向全军各部发出密令称：“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丹阳六十师黄茂权团限明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

△　日海军第十五驱逐舰队“葛”、“藤”、“薄”、“荻”四艘及巡洋舰“大井号”到沪，第一特别陆战队457人同时到达。上海形势危急，晚吴铁城召集沪各界领袖数十人，商治安及对付日浪人暴动办法。

△　南京中央大学护校运动委员会派代表蒋绵荪等五人，赴教育部索薪。次日，全校教授停教索欠薪。

1月24日　外长陈友仁以对日绝交之外交方针未蒙中央采纳，口头向孙科辞职赴沪。次日，陈在沪发表辞职谈话，称："过去蒋介石对东三省事件，原一贯主张其消极不抵抗政策，以致锦州失陷。""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不接受日人之要求。""蒋氏至今实力犹存，而其反对余之外交主张，又若是其坚决，此余所以不能不即日辞职以谢国人。"

△　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南京励志社开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之一掷，决不可行，故毅然不采用。对陈之辞职，经讨论决定不予挽留。

△　蔡廷锴等到苏州召集第十九路军驻苏将领举行紧急军事会议，传达解释23日所发密令，与会各将领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

△　沪续到日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并飞机六架。巡洋舰"大井号"中之日海军陆战队400余人在汇山码头登陆，分驻公大纱厂及杨树浦日兵营房。26日，日又续由佐世保军港调派驱逐舰"皋月"、"文月"、"水无月"、"长月"、"三日月"、"菊月"、"望月"、"卯月"、"陆月"、"如月"、"弥生月"、"夕月"及统率该舰等之巡洋舰"夕张号"等13舰到沪。"夕张"舰上之陆战队468人在沪登陆。

△　南京各界抗日会因日军在沪横行，复调大批军舰相威胁，特呈国民政府要求对日严重抗议，并调大军往沪防卫。

△　国难会议会员吴佩孚由五原抵包头，表示"非团结不足以救国"。

△　皖省主席陈调元电请行政院取缔蚌埠中华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四支队筹备队。28日，行政院长孙科、军政部长何应钦复电"应予禁止"。

△　全国邮务职工总会在沪成立。

△　上海兵工厂运输火药船三只，在黄浦江爆炸，死难30余人。

1月25日　行政院长孙科在沪分电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辞职。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决议慰留。居正、张继、张静江等晚乘车赴沪挽留孙科。

△　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

△　国民政府令：兼陆军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辞职照准，任命该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七旅旅长万耀煌为陆军第十三师师长。

△　中央大学维护学校经济运动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推代表赴教育、财政两部催索积欠之80万元校费。

△　北平中小学教职员、校长，分别向市政府、教育局索薪。

△　国联行政院开会讨论中日事件，中国代表颜惠庆发言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略称：九一八满洲事件后，日本不独不实行撤兵之诺言，且逐渐增兵，“自六星期前行政院开会以来，侵略继续悍然进行，中国政府在南满所剩最后政权卒被摧毁，锦州及其以南土地如山海关等现皆步沈阳等后尘。日本现尚侵犯热河省而危及中国北部、中部与南部之要区，其最近威胁，为福州与上海之占据”。同日，国联行政院会员国（中日两国代表未出席）举行秘密会议，决议对中日两国代表作温和之劝告，请中日两政府消弭上海重大事变。

1月26日　日领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对21日所提要求，限48小时答复。27日，村井又口头通知上海市长吴铁城：所提要求限于次日下午6时以前，当得一满意之答复；并要求下令将凡有抗日字样之团体一律解散，否则日人将采取必要之手段，以实现其要求。

△　上海闸北一带、宝山路车站、天通庵路、江湾路及其他各要隘，均有军警戒备，构筑工事，预防日军入侵。

△　行政院第六次会议决议，国难会议展期至2月11日开幕。

△　财政部长黄汉梁、内务部次长兼首都警察厅长陈群、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外交部常务次长甘介侯同日辞职。

△　上海《民国日报》在工部局出面“劝令”下于本日被迫停刊。同日，北平公安局通知各报馆：“嗣后对日本皇室暨日军各项事务，须审慎登载，万勿贻人口实。”英文《北京导报》因“侮辱日本”，在日方一再要挟下于次日停刊。

△　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所部陈东山团协同冯占海团占据滨江县公电局、滨江镇守使署，与吉长镇守使兼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等部反抗熙洽，27日，在哈东大败熙洽伪军。

△　中德签订炼钢厂草约，中国向德借美金1600万至2000万元。

1月27日　上海市政府令取消本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并密令社会局、公安局派员会同各区所前往查封。吴铁城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本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以来，组织既未遵法定程序，举动又时逾常轨。扣货拘人，屡滋物议，宣判处罚，俨如法庭。……为保全地方，安定社会起见，政府职责所在，不能不令饬取消。”

△　夜，何应钦、朱培德三次急电第十九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

△　日本海军省发表声明，谬称：“中国各地之排日运动，根底于多年酿成之排外思想，非一朝一夕之故。”“至于上海事件，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合理的妥当的要求，毫无诚意，不肯承认。……万一国民政府不肯反省，不停止不法行为，日本于自卫不得不采适当之行动，以保护日侨及拥护既得权，以期万无遗憾。”

△　上海中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到市政府请愿，反对市政府接受日领要求，以保障抗日团体永远公开存在，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中国言论机关。

△　军政部训令各军事机关，并通告各绥靖公署及各省、市政府，嗣后除正式学校之学生外，各地民众团体一律不得擅自组织义勇军，亦不得招兵募饷及委任军、师、旅长等。

△　居正、张继、张静江等自沪回南京，向汪、蒋报告在沪因孙科拒见，致无结果等情形。同日，中政会决议一致慰留孙科，在孙离职期内，院务暂由副院长陈铭枢代理。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撤销特务委员会；设立外交委员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

△　刘峙电何应钦，请转陈中央准予辞去豫省主席职，专任绥靖事务。

△　南京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推教授代表12人、学生代表二人，赴江苏教费管理处催索欠费。

△　中共中央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发表《告全国民众书》。

△　红三军段德昌第九师，在湖北应城附近歼灭敌军第四师徐庭瑶部一个旅，活捉旅长、团长、参谋长各一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　义勇军克复锦西，并一度克复北镇。

△　李杜、冯占海等部击退向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进攻之于琛澂、马锡麟部伪军。

1月28日　“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夜10时许，驻沪日军挑起战端。日舰13艘驶进三夹水，向吴淞炮台轰击。11时10分，驻沪日海

军陆战队千余人占领淞沪路天通庵车站，旋由淞沪铁路及虬江路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防地进攻，遭到守军英勇还击，未及撤防之宪兵第六团也并肩作战。天通庵路、横浜路、宝兴路、虬江路等处均发生剧烈巷战。江湾方面日陆战队亦发动数次冲锋，均被守军第七十八师第六团击退。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自龙华步行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作战。

△　上海市政府复日领最后通牒，完全接受日领21日所提四项要求。下午4时，日领事对上海领事团表示所接吴铁城复文完全满意，并称所要求各项大都已见实行，暂时不再取何行动。

△　下午3时，蒋介石电令第十九路军移防，第七十八师移驻南翔，真如、闸北防务改派宪兵第六团接防。因宪兵第六团当晚只有一营到真如，兵力不足，且时间已晚，未交接。

△　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宣布戒严。在沪各国将领组织防守委员会，以英国陆军总司令佛平曼任各国联军总司令，并令华捕即日迁入租界；闸北宝山路河南路口及沪西梵王渡、曹家渡一带通租界路口，均有英国陆军警戒；法租界在徐家汇路一带增设电网，戒备森严。

△　夜11时后，驻沪日总领事村井仓松致函上海市府及公安局，附送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公告各一件，谬称："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将驻日军于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退。"

△　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议：外交部部长陈友仁辞职照准，特任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接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任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孙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覃振代理。

△　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联名电邀张学良、阎锡山入京。

△　留粤中委唐绍仪等21人电孙科、陈友仁，对其辞职表示支持。

△　行政院加聘国难会议会员马叙伦等19人。

△　铁道部长叶恭绰电呈行政院辞职。

△　财政部电各省勿扣留国税，如各省财政困难，可与财政部协商办法。

△　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推派代表余华龙等六人向市政府请愿，反对取消抗日会。

△　开滦煤矿马家沟矿工人要求分花红举行罢工。驻开平军队前往弹压。

△　津浦路工会电浦口总局要求驱逐机务处长杨毅及改善工人待遇，限当晚答复。29日，因总局未答复，津浦路沿线天津、沧州、德州、泰安、兖州、临州、济南、徐州、蚌埠等站工人数千人罢工，其中数百人分两批赴南京请愿，行至徐州，被当地驻军制止。30日，请愿工人返回济南，因沪变发生，国难当头，全路工人复工。

△　上海日华纱厂浦东厂布机车间女工350人，因反对厂方增加工时，减少工资，于去年12月24日至本日举行罢工。因一二八事变发生，罢工无形停顿。

△　上海永安纱厂二厂工人6000余人，因要求发给四个月红利，于去年12月19日至本日罢工，共计41天，因一二八事变，该厂被毁，罢工无形停顿。

1月29日　　晨，第十九路军反攻，翁照垣第一五六旅丁荣光第五

团与宪兵第六团机关枪队，公安局第六中队配合，夺回天通庵火车站。下午，日海军陆战队袭占京沪路上海北站，经我军增援反攻，复将北站夺回。江湾路、天通庵路、宝兴路、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等处进犯日军均被守军击退。

△ 日机轰炸闸北、南市，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焚毁，损失约值1000万元。

△ 外交部发表宣言，略谓："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

△ 日军利用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向第十九路军攻击。第十九路军为此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声明："我军准备进攻北四川路日军防线，为自卫起见，不得不尔。"

△ 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 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上海事件"的声明，诡称事变是由于中国的排日运动所引起，中国官民对此"采取鼓励的态度"，"因此，排日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日本在上海的行动，"完全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我方权益为目的"，要求中国军队从日本侨民居住地区附近撤走。

△ 驻沪日副领事白井康一面直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停战，一面托英、美、法各国领事出任调停。第十九路军接受要求，于晚8时许即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同时即将原驻镇江以东之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调运来沪，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　国民党留沪中委孙科等11人联名致电汪精卫、蒋介石，请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请设法接济第十九路军饷糈。同日，孙科、李宗仁、陈友仁等18人通电全国军民，要求一致猛醒，准备抵抗，同赴国难。

△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官会议，决心抗日到底，议决巩固国防办法及电第十九路军请坚持抗日。

△　中国代表颜惠庆奉国民政府训令照会国联秘书长，要求援用《国联盟约》第十条与第十五条，制止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国联电驻沪英、美、法、意、德、西、挪七国领事立时就地调查，其报告书将为国联作最后决定之根据。

△　上海市商会及金融界集议，因暴日侵沪，决议罢市三天。同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翌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号召全国工农兵援助上海罢工。并电上海罢工工人予以支持。

△　上海市民联合会、上海各界商业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及中华民国国民救国会四团体，联电国民政府及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等，表示："全市人民已具决心罢市御侮外，已起为后盾，务祈当机立断，决定强硬抵抗政策，通令全国一致准备，以尽救国保种之责。"

△　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通电声明："日军突于本月28日占领中东路宽城子车站……侵犯中东铁路，本总司令负护路专职，不得不急为制止。"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先迁政府于洛阳，免受敌舰威胁，并决议：一、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准予辞职，由宋子文继任；二、设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三、财长黄汉梁辞职照准，由宋子文继任；四、中政

会秘书长曾仲鸣辞职照准，由叶楚伧继任。

△　何成濬令留汉各将领即日各赴防地督师“清剿”红军，徐庭瑶赴应城，萧之楚赴孝感，湖北“绥靖”公署并派飞机五架到红军地区侦察。蒋介石电令何成濬、徐庭瑶，徐部第四师应集中武昌，严防日海军行动，切勿分散。

△　武汉中小学教职员代表赴财厅，彻夜坐索欠薪。

△　北平小学校长索薪团向市政府及教育局催索教费。

1月30日　　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声称：“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决定迁都洛阳办公。”军政、外交两部仍留南京，其他院、部人员是晚启程赴洛。

△　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抱玉碎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并称：“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　日海军省增调驱逐舰四艘抵黄浦江，海军特别陆战队7000人全数调沪，其中“龙田”舰载来之3000人下午在黄浦码头登陆。

△　晚11时，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所部军官30余人至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寓所，向何请求开往上海参战，被何拒绝。后经宋等质问，僵持至深夜，何始同意视情况发展，如有必要，再派该旅开往上海参战。次晨，第二六一旅官兵致电第十九路军，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并表示全旅官兵抗战决心，誓以全力支援。

△　外交部长罗文幹发表对日宣言，表示：“日本军队如复攻击中国领土，则必从事正当防卫。”

△　外交部为日侵沪事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请“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

△　上海市政府就日军利用公共租界向中国进攻事，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

△　上海市政府为日海军滥用飞机轰炸闸北事致书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其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日本的侵略行为“不独违背国际公法，抑且惨无人道”。

△　留粤中委陈济棠、伍朝枢、萧佛成、邓泽如等电国民政府，力言不抵抗之失策，望当机立断，舍弃从前软弱外交政策，迅谋对付，并充分接济第十九路军。

△　驻日英大使林德赛照会日外相芳泽，促其注意因日本在沪之行为而危及英人生命财产，并抗议日人以公共租界为进攻之根据地，请日政府努力在可能的最早时期内恢复寻常状态。

△　宋庆龄、何香凝到上海真如慰问第十九路军。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数百人赴行政院请愿，要求调兵援助第十九路军。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及工界国民救国促进会联席会议决电慰第十九路军奋勇杀贼。南京各界抗日会议决征募物品慰劳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主张对日绝交，并要求政府准许民众组织义勇军。

△　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议决：一、电慰第十九路军；二、电吴铁城反对解散抗日会；三、电国民政府请调劲旅增援上海。

△　上海总工会电请国民政府要求克日对日宣战，以拯救此垂亡待毙之民族及水深火热之国民。

△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电号召全国工、农、兵、学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致起来革命，自动组织义勇军，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以革命的战争来消灭世界大战和压迫民众的反革命战争”。

△　中华民族自救会电慰第十九路军，略称：“你们用热血在中国

史上写成光荣的一页，用热血为中国军队洗去‘不抵抗’三字的奇耻。”

△　北平冯庸大学员生电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恳求拨给枪弹，俾便“南趋江沪，尽力所能，求心所安，誓以碧血洗国耻，微躯赴国殇”。

△　国民政府特任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特派颜惠庆为中国出席国际军缩大会首席全权代表，黄慕松为全权代表，胡世泽、夏晋麟、姚锡九、吕德元、王鹗、郑楷为专员；严禁各军截提国税款项。

△　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张学良、李石曾、于学忠、徐永昌、周作民五人为常委。

△　东北义勇军在新民县与日军40余人激战，将其全部歼灭，并缴获装甲车一辆，手枪40余支，子弹千余发。

△　开滦、唐山、林西、开平等五矿响应马家沟矿工人举行全体罢工，总局答应工人要求，发给花红，罢工取得胜利。

1月31日　驻沪英、美领事邀请中、日两方在英领事馆调停上海战事，上海市长吴铁城、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日方司令官盐泽、总领事村井及英、美防军司令佛平曼等均出席。英、美领事提出停战办法：日军让出越界筑路线及附近地带，由英、美军队暂行代为维持秩序，以待解决；并主张我国军队亦稍向后退，以免冲突。日领托词护侨，不肯遵行，谓须请示本国政府。乃约定以三日为期，在此期内，双方暂各不相攻。

△　晨，日航空母舰“加贺”、“凤翔”运载第一航空队飞机约30架抵沪。下午，第三舰队“那珂”、“由良”、“阿武隈”三巡洋舰载特别陆战队4000人及大炮、炸弹、硫磺弹等抵沪，随即分批登陆，运往前线。

△　上午11时，日机一队飞真如投弹数十枚，被守军击落两架。

晚11时20分，日军又在北四川路靶子路口、七浦路等处向我军防地发动进攻，被我军击退。

△　国联决定组织沪案调查团，由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挪威、英、美、法、意、德七国驻沪领事组成。

△　何应钦致电吴铁城、蒋光鼐等，略称："一、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二、望蒋总指挥等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三、对各国侨民与军队，务求亲善，不得稍有冲突，以保全已得之同情。四、对假托爱国名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为，亦须周密注意。"

△　孙科及在沪中委等19人联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上海战事非局部问题，事机危迫，已不容延误，"务乞迅下决心，速令近畿劲旅及军用飞机火速应援，以御强寇"。

△　上海市总工会为日军侵沪发表宣言，称"亡国灭种，迫于眉睫，当斯生死关头，幸赖我十九路军诸将士深明大义，奋勇抵御"。"本会愿以万分热忱，率领全沪八十万工友誓死拥护，共作后盾"。朱学范率各工会组成之义勇军开赴前线，协同第十九路军作战。

△　上海总工会为日本侵华，电请海外各埠华侨"速作经济上之援助，踊跃输财，以拯救此垂亡待毙之祖国"。

△　上海沪西17家日本纱厂四万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组织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

△　上海市商会就租界为日军进攻中国军队提供便利事，向驻沪领袖领事美总领事克宁瀚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公共租界维持中立地位，将驻在租界内之日军解除武装。

△　蔡元培、刘光华、邹鲁、蒋梦麟、王世杰、梅贻琦六人为日炸毁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暨南大学等文化机关事，致电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要求制止日军暴行。

△　上海市民联合会通告继续罢市，称："本会为贯彻御侮意义计，议决通告各商店仍继续罢市，非至日兵全数被逐，决不开市。"

△　粤银公会汇10万元慰劳上海第十九路军将士。

△　燕京大学学生抗日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议决为上海事件发表宣言，电慰第十九路军将士，并电请国府明令恢复上海抗日运动。

△　中央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告全国军人书，请负责守土，积极抗日，并电第十九路军，对其奋勇抵抗，表示钦崇。

△　国民政府令：行政院秘书长郑洪年呈请辞职照准，任命曾仲鸣为行政院秘书长；准免桂崇基中央大学校长职，任命任鸿隽为中央大学校长。

△　国民政府任命彭振山为陆军第三十师师长，原任李鸣钟免职。

△　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府，杨思、谭克敏、张维、水梓、喇世俊、贾缵绪、李朝杰、马鸿宾均免甘肃省府委员职；除委员兼主席邵力子、委员贺耀组业经明令简任外，任命孙蔚如、马鸿宾、邓宝珊、林竞、谭克敏、刘汝璠、水梓为甘肃省府委员，林、谭、刘、水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　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召集东北各将领开会，讨论华北治安问题。2月1日始散。

△　东北军第十五师师长李杜等发表宣言，宣告成立吉林自卫军，李杜任总司令，并表示对"凡有侵略疆埸扰乱治安者，愿共击

之”。

△　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通电全国，揭露日军破坏中东铁路的罪行，表示决心为护路而战，为救国而战。同日，所部3000人在哈尔滨西南双城堡车站与日军进行肉搏战，阵亡400人，激战数小时后退却。

△　天津宝成纱厂工人罢工，要求春节放假三天，并按十日工资发给。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

△　中国新音乐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聂耳、冼星海等。

是月　淞沪抗战爆发，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言：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八百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战军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

2月

2月1日　夜11时后，下关江面日舰炮击南京城内狮子山炮台等处，炮台未回击。外交部为此于2日照会日使提出严重抗议，申明：日舰“在下关无故发炮放枪，实属故意扩大事态。因此挑衅行为所发生之一切责任，应由日本方面完全负责”。

△　日轮“照国丸”载陆战队一队秘密抵沪。日使重光葵也由日回沪，令日侨准备即日回国。

△　美国陆军第三十一联队与驻马尼拉海军陆战队约1000人赴沪。英国由香港调派运输舰一艘，载步兵一营、炮兵一中队共600余人赴沪，3日晨抵沪。

△　何应钦复孙科及在沪各中委世（31日）电，称："日方有增兵三师之说，如果属实，其侵略范围当不限于上海一隅，军事委员会自有全盘计划，决不屈服。政府迁洛，系抱长期御侮决心，如土耳其迁安哥（卡）拉，并非示弱。"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及军委会各委员电勉全国将士，"以大无畏之精神，作长期之奋斗，以绌暴力而伸张正义，保国家之人格，为民族争生存"。

△　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面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连续两天讨论，决定了划分为四个防卫区的"全国防御计划"。

△　外交部长罗文幹电国联秘书长德鲁蒙，略称："各国报纸多称中国拟向日本宣战，该项消息全无根据。中国对上海事件，并非向日本宣战，不过采取正当防卫。此项行动，为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

△　国民党在沪中委孙科等，组织留沪中委办事处。

△　国难会议会员吴佩孚抵北平，张学良等至西直门车站欢迎。吴告记者称："日人侵我国土，国亡无日，凡国人均应坦白相见，共赴国难。"

△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民众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出卖上海，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武装拥护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等。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亦通电全

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　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发紧急动员令，限令各分会义勇军于2日上午9时集中出发闸北前线，协助第十九路军抗日。同日，上海各大学义勇军司令部亦命令各报名义勇军齐集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候令出发。

△　中国抗日救国军铁血团由南京赴沪杀敌。

△　上海实业界、银行界虞洽卿、王晓籁、秦润卿、张啸林、杜月笙、史量才、陈光甫、张嘉璈、钱新之等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史量才任会长，从事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等项事宜。

△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决议：一、电国民政府质问国难会议何以不容纳民众团体代表参加；二、募捐慰劳第十九路军将士，详细办法交下次会议讨论；三、电上海工部局质问何以容许日军凭借公共租界攻击我军；四、发表告世界民众书，宣布日人暴行；五、通电激励全国将士效法第十九路军奋起御侮；六、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一致总动员抗日。

△　马占山、苏炳文等15人通电全国，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事表示："占山等谨率部曲，效死杀敌，念兹在兹，义无反顾。惟望我海内外同胞，共凛匹夫有责之义，群起力抗，毋任各个击破，而保我子孙，还我山河。"

△　吉林治安委员会成立，公推东铁护路军总司令丁超为委员长，所有军事、行政、外交、财政均归辖理。

△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剧联"）成立。由北平文化总联盟领导。

2月2日　　下午1时后，沪日军战斗机数架飞闸北、真如、南市、浦东上空盘旋侦察，并在闸北、真如投弹多枚。3时许，日军在天通

庵车站一带开炮轰击闸北，遭到第七十八师炮兵还击，双方炮战至夜12时始息。

△　沪各大学义勇军500余名和救护队300余名奉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长之命集中闸北，是日下午第一批出发，次日上午悉数开赴前线。同日，沪市民联合会义勇军300余名，在闸北太阳庙平江公所集合，听候第十九路军收编，加入前线工作。

△　下午2时50分，驻沪日总领事村井仓松电话通知上海市政府，谓日本政府对于1月31日在英总领事官舍会议所建议之避免两军冲突办法，不能同意。

△　上海市政府就日军违约进攻事向驻沪日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书，谓1月31日英总领事官舍会议约定避免两军冲突办法，因日方须请示政府，经约定以三日为期，暂行停战，“乃自该日会议后，贵国军队屡向我国军队袭击”，“且在本府未接到贵总领事署通知前一小时，贵国军队已向我方驻在闸北之军队复行攻击，且用飞机任意炸轰该处……所有一切责任，当全由贵国政府负之”。

△　上海市政府为日军违约进攻事致美、英各国总领事通告书，称：“日军已向我方驻在闸北之军队复行攻击，且用飞机任意轰炸该处”，为此，“除向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外，相应声明并函达贵总领事，请烦查照，主持公道”。

△　美国就上海事件提交中日政府之照会到达南京，内提出四条停战建议：一、中日两方须即停止敌对行动；二、双方军队退至原防；三、双方区域由中立国军队填驻；四、双方根据《国联盟约》及《凯洛格公约》开始交涉。

△　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通电全国，表示“十九路军将以纯洁之心，纯洁之血，贡于党国，贡于全民”，“切望散处各方之中央委员政治领袖，发挥其拯救危亡抱负，致力应付存亡一发

之危局”。

△　上海各医药学院抗日战地医事联合会成立，决派180人赴前线从事救护医治工作。全部医药费用由何香凝主持之国难战士慰劳救护会供给。

△　中国国民救济会通电全国军界称：“本会愤倭焰之方张，痛国亡之无日，爰本救国之义，敢请我全国海陆空军界同胞，抱敌忾同仇之志，卫国救民之愿，一致奋起，自动开沪援应。”

△　阎锡山电慰第十九路军抗日将士。

△　北平女界抗日会、平等抗日会、工界同盟、弱小民族同盟、青年抗日会等五团体，联电慰劳第十九路军。

△　沪“日清”、“大阪”等日轮华员、华工为反抗暴日侵沪，全体举行罢工。

2月3日　日海陆空军向上海闸北发动总攻击，上午8时许，由横浜路、宝兴路、福生路、北河南路等处向我第十九路军防线猛攻。我军厚集兵力于北站及青云路，沉着应战，阵线并未移动。同时，敌机约20架飞闸北向我军阵地投弹轰炸，商店民房多被焚烧。10时许，日军舰炮轰吴淞炮台，被第十九路军击沉一艘，击伤三艘，并击落敌机一架。

△　英、美、法、意、德五国公使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建议两国在沪停战撤兵，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

△　上海市政府就日军残酷杀害华人，致函日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严正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中国居民，严惩凶犯，以后对此项情事负责取缔等。

△　上海市府就公共租界工部局容许日军以租界为攻击中国军队

之根据地事，向工部局提出抗议。

△　陈铭枢代表第十九路军发表谈话表示：“不论遇到如何侵犯我国土之强敌，决不畏惧，虽全数牺牲，亦决不离开京沪线上。”

△　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军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　上海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日。自是日至5月31日，共募得大洋27万余元。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洛阳通电全国各省、市政府称：“现值国难方殷，财政奇窘……自即日起，所有在国府及所属各机关服务人员，一律停止薪俸，每月仅酌发生活费若干，以维持个人生活。”

△　上海市商会决定银、钱、米业是日开市，并组织粮食平价维持会。

△　北平各民众团体发起追悼邓演达。

2月4日　　上海日海陆空军继续总攻，炮轰宝山路一带，并由新民路、虬江路、宝通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全线攻击，均被第十九路军击退。日舰十余艘于上午11时起再攻吴淞，亦被击退。敌海军遣外第一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因此被免职调回日本，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继任。

△　沪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被日机轰炸，付之一炬。是日该馆董事会决议停业。

△　外交部分别复照英、美、法、德、意五国，接受关于停止中日冲突，在上海划中立区的照会。日本拒绝调停，并反对第三国干涉满洲事件。

△　上海市商会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反对于公共租界之外另设中立区，谓“为避免战祸计，只须租界当局能以实力保持，万不可于原有中立区域之外，再设置所谓中立区域”。

△　上海绸缎业、棉布业等160个同业公会急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和军政部，对五国所提在上海划中立区的主张表示誓死反对，指出此主张为“巧立名目，断送国土”。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通电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

△　何应钦致电吴铁城转孙科、顾孟馀及在沪中委，请在沪共同筹措巨款，以报国难。

△　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大举进攻哈尔滨市区，李杜亲临前线指挥，马占山速派苑崇谷旅前往增援，行至何家沟附近，遭日军袭击，伤亡惨重。

△　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科学社、江宁律师公会等联名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吁请予以制裁。

△　上海肠业等150个同业公会急电国民政府、军政部，要求速派军援沪。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史量才等亦电国民政府，为第十九路军请援，略称：“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试问全国失此经济中心，今后将何以自立。”

△　国民政府特任李济深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6日，军事委员会在洛阳正式成立。

△　徐永昌电行政院请辞晋省府主席及委员职。

△　彭德怀红三军团发起赣州战役，围攻赣州国民党军。

△　上海银钱业今起实施同业汇划制。

△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答应宝成纱厂工人春节放假三天，并发三日工资。8日，该厂工人又罢工，仍要求发给十日工资，并每日增加工资五分。经调解，厂方答应发给八日工资，自本月16日起每日加给工资三分。

2月5日　　日军在沪总攻第三日。日陆战队及久留米混成旅团向闸北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第一二〇旅阵地发动进攻，新民路、虬江路、宝山路、横浜桥、天通庵路、青云路、八字桥等处均有激战，敌我双方死伤均甚大，至下午4时，敌被全部击溃，战斗稍息。日机在闸北、真如、吴淞掷弹轰炸，被击落一架，伤三架。晨9时，中央飞机第六、第七两队自京飞沪助战，但未携带炸弹杀敌。

△　日军久留米第十二师团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4000人抵沪。6日，旅团长下元熊弥又率4000人到沪，在张华浜登陆。7日全部抵沪，总数约万人。主力在徐家宅附近，为攻占吴淞炮台进行侦察。

△　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到真如将随行之200多名童子军交第十九路军指挥。

△　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在沪发表谈话，声称：据陈铭枢称第十九路军现在加入前线作战者仅有数营，无需援助；各军事长官未得军政部长命令自由行动者，虽激于爱国热忱，亦须受抗命之处分。

△　蒋介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指示上海作战计划称：“刻闻倭寇陆军登陆作战，未知果有几何？如其有二师以上之陆军，则我方应重定计划，须与之正式决战。”

△　军政部长何应钦通告各报访员，称“中国为古文明国，从未向他国宣战，即在被攻时犹然。此次日本侵略中国，苟非外交方法绝望，决不用武力抵抗。近外间盛传中国将对日宣战，此属有意造谣”。

△　军政部长何应钦电请粤、沪各中央委员“体念将士之牺牲，党国之存亡，民族之浩劫，即日命驾，共集行都，主持大计”。

△　在沪国民党中央委员孙科、孔祥熙等35人联名通电全国，对日本发动入侵上海表示愤慨，赞扬第十九路军及各军忠勇不屈，誓死抵抗。号召全国各界，群策群力，抗战图存。

△　国联调查沪案委员团（按：由意代办及法、英、德、挪威、西班牙各总领事组成）之第一次报告书电达日内瓦。

△　日军对哈尔滨发起总攻，下午，若松联队攻入市区，李杜、丁超各部在哈与日军巷战。6日，多门师团攻陷哈尔滨，李杜等退宾县、依兰。

△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决议电慰吉林自卫军丁超、李杜；通电慰问东北义勇军；函促张学良即日出关，收复失地。

△　李石曾、蔡元培、王景岐等名流在上海发起成立国际和平促进会，分电各国名流“速起响应，制裁日本”。

△　国难会议会员王世杰、周鲠生等以政府迁洛阳，国难会议召集不便，电国民政府请取消召集国难会议。

△　伍朝枢电行政院请辞粤省政府主席职，专就琼崖特区长官。9日，伍再电洛请辞主席职。

△　河南省党政军各机关合组豫南特区抚绥委员会，专负“剿匪”之责，以张钫为委员长。

2月6日　　上午10时许，日军向闸北横浜桥、青云路、中山路一带进攻，以天通庵路至中山路阵地战斗最烈，至12时许被我军击退，敌转而向我左翼移动，猛攻八字桥，经守军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第二团回击，于午后6时开始撤退。吴淞方面战争沉寂。

△　日本第三遣外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出云”舰抵沪，代替盐泽指挥上海侵华军事，在沪之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奉命调回，由植松少将继任。

△　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上海市长吴铁城，主张接受英、美调停，对日停战，略称：“各地军队已呈绝粮之象，事态若再延展，实有全国崩溃之虞。”“能以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

△　外交部致函英、美等国公使，称：“日舰之已在吴淞上游沿江一带者亦复不少，此后若再任其陆续增加，难保不攻击我沿江之其他要塞，以至有战祸益加蔓延之虞”，请阻止日本兵舰再向长江增加，以免战事扩大。

△　外交部就上海陆战队残杀市民事，照会日使提出严重抗议，并通牒英、美两使勿再任日军凭借租界为作战之根据地。

△　上海市府就大队日军昨由租界汇山码头登岸，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工部局答称：“日本军队在租界内之一切行动，自应由日政府独负责任，而与工部局无关。”

△　行政院长汪精卫及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等电慰第十九路军将士，勉以固守原防，“贵军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尚祈继续努力，以获得最后之胜利”。

△　汪精卫、冯玉祥、何应钦于安徽滁州会商对日外交、军事等事。

△　驻天津日兵百余名，全副武装，马驮机关枪七架，弹药车七辆，上午8时擅入华界游行示威。

△　故宫博物院协助会成立，选举熊希龄、司徒雷登为会长。

△　国联行政院开紧急会议，讨论上海事件。

2月7日　　日军改变战略，移其主力攻吴淞、江湾。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主力由张华浜进攻吴淞，黄浦江日舰开炮协助，猛攻两次，均被第一五六旅翁照垣部击退。另一部协同特别陆战队于午前9时起进攻八字桥，激战六七小时，亦被击退。闸北炮击终日不息。

△　第五军张治中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宋希濂部集中昆山，顾祝同部第八十八师俞济时部移驻南翔，准备援沪。

△　行政院长汪精卫由滁州南下，在浦口发表谈话，声称："余去年在沪，即主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张至今未变。"

△　汪精卫电复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史量才4日电称："政府对日方针，在外交上确保中国主权，尊重国际信义；在军事上严戒挑衅行动，力谋正当防卫。十九路军为正当防卫而战，将士奋勇，克尽厥职，政府爱护不暇，岂有听其孤军失援之理。"

△　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电促在沪粤中委孙科、胡汉民等赴洛"力戡大难，使一般同志有所矜式"。

△　湘省各界在长沙召开抗日示威大会，到百余团体10万人，通过武力收复失地、慰劳沪军、请海外侨胞助饷等七案。

△　上海市商会发布公告，劝告各界援款抚恤前敌阵亡将士家属，以慰英魂而励士气。

△　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等通电对海内外同胞给予的精神或物

质援助表示感谢。

△　国难会议会员陶希圣电洛阳林森、汪精卫，主张停开国难会议，谓“国难会议非由民选，不足以集中群力，应迅速召集以普选所产生之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

△　财政部长宋子文通电苏、鄂、湘、浙、皖、赣、鲁、闽、豫等省当局暨各“绥靖”主任、各总指挥、军、师长等，要求“停止借用国税，悉数解部，平均分配”。

△　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全总执行局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临时中央政府代表项英、中央军委代表叶剑英等先后在大会上致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大会选出袁国珍等15人为江西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林松善等13人为福建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13日大会闭幕。

△　上海北苏州路招商内河轮船局私进大批日煤，被煤业公会查获。

△　日机轰炸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

2月8日　日军久留米旅团自拂晓起倾全力总攻吴淞，截止下午3时，冲锋达十余次，均被第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击败。闸北日海军陆战队向克明路、宝兴路猛攻，遭我伏兵袭击，向横浜桥方面败退。八字桥方面敌进攻未遂，向北四川路方面败退。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致电慰勉守沪将士，称：“旬日以来，陆军、空军及要塞方面，迭告胜利，敌受重创，寸土尺地，并无失陷，吾将士为国家作正当防卫，为世界维持和平，允为全国、全球所矜式。”

△　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等，要求从速设法停止战争，称：“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

束，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也。”“目前沪事交涉，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纡缓迁延，牺牲我十九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抑且失地，吴淞、真如、南翔各地亦必相继断送。”

△　上海市政府致电洛阳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行政院，称今晨英领事偕英海军司令访晤日使重光葵提出停战办法，被拒绝。重光葵要求中国军队撤退15至20英里，方可停战。

△　上海市府通告各国驻沪总领事，请严饬公共租界工部局采取有效办法，制止日军利用租界为攻击中国军队之根据地，并郑重声明：“中国军队为自卫起见，对于利用租界为根据地之日本军队施以进攻时，各国侨民之生命财产受有损失情事，中国政府概不负责。”

△　上海市政府接美总领事克宁瀚函，请转知中国军事当局，停止军用飞机在租界上空飞行。市政府复函称：“租界内领空主权，本我国所固有，故不能受任何干涉。”

△　国民政府令免李文范内政部长职，特任冯玉祥为内政部长；免叶恭绰铁道部长职，特任汪兆铭暂兼铁道部长；任命陈继承为洛阳卫戍司令。

△　日外务省提议，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各通商口岸，划不驻兵区，向各国探询意见。外长罗文幹发表谈话驳斥日政府此种谬论为“剥夺中国全部生存之自卫权，及独立国一切法律上应享之权利与保障”。

△　上海文化界戈公振、陈望道、丁玲、郑伯奇、王亚南、叶圣陶、胡愈之、郁达夫等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9日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推举戈公振任主席，陈望道为秘书长。

△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电盼北方各大学各团体切实督促当地各将领自动抗日，北以援马（占山），南与第十九路军遥相呼

应，既可表示举国一致之决心，亦可制止政府犹存两可之态度。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致函工部局，要求制止日军非刑吊打华人。

△　第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招待报界，对民众各团体纷加慰劳，并予以种种物质之援助，向各界表示谢忱。

△　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通电全国，报告因作战失利，由哈尔滨退守宾县经过，并谓已在宾县与护路军通力合作，组织联合军司令部，整饬部属，再图规复。

△　马占山往哈尔滨秘密会见日军师团长多门，提出黑龙江省不设日本顾问的自治问题。多门请示本庄繁，得到“只要不打仗，诸事都好办”的承诺。

2月9日　　日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炮击吴淞镇及炮台，民房被毁不少。日军偷渡蕴藻浜，被击退。闸北、江湾无大战，日特别陆战队数百人向八字桥进攻，被第一一九旅击溃。

△　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及第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等通电援沪，称：“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沪……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

△　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促与日商洽停战，称：“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

△　国联行政院开会讨论沪案，中国代表颜惠庆报告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促日撤兵。议长彭古表示：中日冲突“全部事件，似为可悲的误会之结果”。

△　美国政府对日方所提在沪、汉、津、穗、青各通商口岸作为不驻兵区的建议，认为违反华府公约原则，不能接受。

△　上海市商会通告，吁请国内外商会暨本市各界筹款御侮，以期团结军心，振作士气。

△　上海银钱业开市，其他各业大部仍未开市。

2月10日　　沪前线战事沉寂。下午1时，日舰以重炮轰吴淞炮台，第十九路军还炮相击，至4时始息。日机两度在闸北投弹。入晚宝山路口有激战，战一个半小时日军被击退。

△　粤空军将领张惠长、黄光锐等通电援沪，第二中队长丁纪徐率飞机一队共七架自广州出发。

△　军政部长何应钦派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同驻沪日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在沪密淡中日停战。王电何称："田代对于双方撤退，及我派警察维持中间地区治安问题，无甚反对意，但恐实行困难。盖以济南、天津两处成案为例，疑我无法防止便衣队与反动分子暗中活跃惹事之故。"又称："田代自称自始至终努力于调和。"

△　日军在汇山码头屠杀华工百余人，斩首级运往日本，以示侵沪"胜利"。对此，沪市商会派代表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制止。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代表市商会等81个团体及300万民众，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一、公共租界所驻军队应限于中立国，所有日军应扫数驱除；二、日军不得利用租界登陆，亦不能退避租界。

△　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响应财长宋子文2月7日关于"停止借用国税，悉数解部，平均分配"的通电。

△　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通电海内外同胞，请

援助抗日。

△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肖云鹄上年在开封被捕，是日在洛阳就义。

△　陈独秀主持“托派”常委会议，起草通过《政治决议案》。

△　香港东华医院筹款赈济一二八淞沪战役中的难民。

上旬　新加坡华侨成立“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中华总商会负责人李俊承任主席。

2月11日　上午8时起，日军以重炮、飞机向闸北、八字桥、江湾阵地轰击。11时开始向八字桥进攻，使用世界禁用之达姆弹，至午后5时许始被第十九路军击溃。吴淞蕴藻浜附近敌向我铁桥边阵地攻击，旋被击退。日机在沪各处掷弹，永安第三纱厂、吴淞各大学均受损，持志大学全毁。

△　王俊密电何应钦，称：“本日与蒋、蔡、戴商谈，双方停止射击，以为和平交涉之准备，因日方陆海军闹意见，陆军不能讲海军之话，故无圆满之结果；但本日战况已比以前缓和。”

△　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致电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等，不同意何应钦等“避免再战”之议，表示“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初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勖勉“再接再厉，完成此空前启后之绝大使命”。

△　吴铁城复牒日领，中国方面力求防止战祸扩大，希日方勿重起纠纷。

△　吴佩孚在北平招待新闻记者，称“家不和，外人欺”，主张“攘外必先和内”。

△　上海市商会发表宣言，反对日外务省所提沪、汉、津、穗、青为不驻兵区的主张，指出此主张为“日本军阀之发狂”。

△　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电第十九路军将领，表示愿抚恤殉国将士遗族：“凡殉难将士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无力赡养者，均为设法照料，其无父母之子女，则尽收入各慈幼院及其它孤儿院，为之教养。”

△　立法院在京职员电请孙科入京主持院务。

△　汪精卫电促朱家骅到教育部主持工作。

△　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成立，理事长为张学良。张在成立会致词称：“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之组织，即根据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在北平设立分会而成立，因华北驻军甚多，颇不一致……故设立一军事整理委员会，以便整理划一，俾易于联络感情。”

2月12日　　闸北上午停战四小时，下午4时起，日军开炮轰击，入晚尤密。9时后天通庵路、虬江路等处有激战，至11时许敌全部溃退。吴淞方面，日军七八百人于6时进攻蕴藻浜，并分兵至曹家桥偷袭，均被守军击退。下午，日军千余人由曹家桥南岸偷渡蕴藻浜，被第六十一师第六团击退。

△　陈铭枢电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等，略称：“达天（王俊别字）求和当然无效，如日军早退入租界，闸北由第三国军队居间，我军方可与磋商，否则全功尽废”；“民族一线生机，只有不计死亡，持久抵抗”，望坚持到底。

△　汪精卫以外交紧迫，沪案未决，电蒋介石、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等在徐州举行会议，会商大计。

△　何应钦将与日方商洽停战办法电告蒋介石，称：“商诸真如（陈铭枢）、钧任（罗文幹）诸兄，共同决定办法如下：双方自动撤

退，即：日军撤至租界内，我军撤至相当地点。两军撤退之中间设一和平区，由双方公同请中立国酌派小部队暂时驻扎。所有和平区域内之行政、警察，仍由中国照常办理。”同日，何应钦将以上办法电达蒋光鼐等，请遵照与日方切实商洽。

△　宋子文致电徐州蒋介石报告在沪与英使商谈调停沪案办法，称英使“愿调停如下：一、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特别市全区，由警察维持，至国联调查委员会三星期内到沪后再定；二、日军退至未战前原防，并退出吴淞所占各地”。

△　英、美、法三使到沪斡旋中日和平，是日英使蓝普森、法使韦礼敦晤日使重光葵，交换私人意见，对于和平问题尚无具体意见。

△　何应钦致电吴敬恒解释“适可而止”，称：“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

△　何应钦致电蒋光鼐等，“请即严令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挥射击，避免南市糜烂”。

△　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通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赋予之权利，召集国联行政院特别会议，讨论中日事件。

△　上海领事调查团第二次报告书电送国联，略称：“虹口入于恐怖之中”、“攻势完全出于日军之手”；“何方破坏休战协定，委员团不能决之。”

△　国民政府令：特任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

△　驻沪英、美领事与中、日当局商定，是日晨8时起，停战四小时，救出战区难民3000多人。

△　沪纳税华人会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并表示非达目的，决不开市：一、日军完全退出上海；二、工部局收回租界警权，追查失踪居民；三、制止日人暴行。

△　宋庆龄在上海亲往前线慰问第十九路军。

△　中法学术考察团抵北平。

2月13日　上午日军三次在蕴藻浜偷渡，一、二两次均被防军第一二二旅张炎部击退。第三次在纪家桥偷渡过河，至北岸曹家桥登陆，猛烈袭击我军防地，被第一二二旅三面包围，血战至晚9时40分，始将渡河之敌全部解决。是役日军遗弃战场之死伤官兵在千人以上。我军死伤官兵五六百人。闸北日军向新民路、虬江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处发动总攻，至10时许不支溃退。日飞机在闸北投弹，被击落一架。

△　日派援军第九师团兵额约两万名来沪，第一梯团是日抵沪，第二梯团次日抵沪，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同时到达。植田发表声明，声称："我带着保护侨居上海地区的帝国臣民的任务于本日到达"，"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

△　何应钦、罗文幹、陈铭枢致电蒋光鼐等转告蒋介石对沪事停战意见，称："介公今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其办法如下：一、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停战；二、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撤退至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

△　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略称日总领事村井希望于第九师团未参加战斗以前，"将双方休战之事议妥"，请释去疑虑，迅结停战之约。同日，何又另电吴译转王俊，告以与原田谈话内容：一、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停战之余地；二、停止射击后，再谈判双方如何撤退，及撤退区之维持治安方法。请即与田代洽商进行。

△　上海市政府为日机炸毁持志大学事，向驻沪日总领事提出书面抗议。

△　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在军事上主张：一、援助第十九路军将日军逐出上海；二、撤销解散各地义军命令，切实组织民众成为抗日中坚；三、速调劲旅，收复东省失地；四、严整沿海战备，真实谋长期抵抗。对外交主张仍推行孙（科）、陈（友仁）政策，造成国际新形势，期以正义与公道解决中日问题。

△　驻沪国民党中委孙科等25人电请国民政府当局迅速定计，并陈述四项：一、决定彻底抵抗政策；二、萃海陆空军力量固守上海，予第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三、即令北方各军乘机向外反攻，收复失地；四、外交方面，非日兵全部撤退，不即交涉，上海问题当与东三省问题同时解决。

△　津浦铁路工人开会，组织抗日义勇军，签名参加者达千余人。冀南、豫北人民三万余人，枪三万余支，组织救国军，请求抗日。

△　华北妇女抗日救护队在北平成立，并电告淞沪及东北抗日军，该队将“赶赴前方，效劳疆场，以尽国民之天职”。

△　冯庸大学义勇军三中队由校长冯庸率领于是日自北平到达上海真如，援助第十九路军抗日。

△　南京各界开代表大会，通过应付国难提案19条。

△　南昌各界冒雨在体育场召开市民救国大会，到二万余人。会后游行示威。

2月14日　上午日军对八字桥方面重炮猛射，飞机六七架在空中侦炸。下午7时以后，闸北至江湾之线日军又向第十九路军阵地射击，至9时始停。8时自宝山路至江湾全线有激战，至9时30分敌不逞

退却。

△　日军侵沪司令官易人，野村吉三郎免职，由第九师团司令官植田谦吉中将继任。植田发表谈话，声称：日军亦希望沪事迅速和平解决，故现暂停止攻击行动。拟向第十九路军发表要求撤退之哀的美敦书，并拟给相当撤退之时间，不答应时，当即以实力决行该军任务。

△　蒋光鼐等致电何应钦称："日方连日增兵，和平必无诚意；如能和平，当屈从之。但敌欲维持其强国之威风，非终求一胜不可，我军只好准备与之一决。"

△　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称："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赤两难兼顾"；"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现在进行似应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则。"

△　何应钦致电汪精卫，略称：张发奎部先头已抵零陵，即将来汉，日海军"倘因是发炮阻渡，双方必起战事，则武汉要区，更不免形成沪局第二矣。钦等熟商结果，似以该部暂驻萍乡，协同剿赤为宜"。

△　何应钦电令第八十七师长楼景樾另有任用，遗缺委张治中接充；张并兼第五军军长，指挥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

△　外交部第三次照会英、美两使馆，严重抗议优容日军在租界码头登岸，声明"如因上海日军继续攻击中国管辖区域，中国军队实行正当防卫，致租界内发生生命财产之损失时，中国政府不负任何责任"。

△　驻沪日军司令部警告中国抗日军，声称"华军必须由上海附近撤退，南市与闸北均在其列。华军如不撤退，则集于上海之日军将用极端方法以对付"。

△　陈济棠调遣粤军入赣，协助“剿共”。是日，崇义县城已到粤军一团。19日，陈济棠电告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熊式辉，业已派两师入赣“剿共”。

△　朱德、王稼祥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军进攻上海告十九路军士兵书》，赞扬第十九路军士兵奋起抗日的英勇行动；呼吁第十九路军士兵和工农群众密切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

△　南京各界抗日会发出数电：一、要求国民政府迅令军政部拒绝日方要求，增兵援沪；二、请全国各军长官积极准备出兵；三、请第十九路军如日军再借租界攻击我军时，即入租界驱逐日军。

△　旅美华侨七团体募款慰劳第十九路军抗日，共募得500万元。

△　徐州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30余人，赴徐州北站向汪精卫请愿：一、请政府对日绝交；二、援助第十九路军；三、请政府维护爱国运动。汪答：“绝交问题，关系重大，各国将守中立，不啻自蹈危亡”；“至援助十九路军，国府已进行，不便宣布”；“爱国运动，政府当然维护，但须循轨道，守秩序。”

2月15日　日第九师团进攻布置未就绪，闸北、吴淞前线仅有小冲突。日机三两成群不时飞绕我军阵地侦察投弹。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一带遭敌炮击。

△　何应钦致电吴铁城，望“本私人资格，继续与田代等商定和平方案，并采取其真意，以供外交当局之研讨”。

△　午前10时，王俊与日军参谋长田代在沪日领馆会谈。王俊声明：“双方以撤退为原则；当我方开始撤退中或撤退后，保证日方无出击或进占；撤退区域由我方宪警维持治安，亦可依日方意见，请万国商团担任。”田代称：“目下停战及近距离之撤退等姑息动作，不足

以解决中日间永久之和平问题。”“十九路军先退相当距离后，经调查其确实无伪，日方始能有适切之承置。”

△　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徐州各界扩大纪念周上报告“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声称：“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　北平中国国联同志会电英、美、法三使，对日提在沪、汉、津、穗、青划不驻兵区事，表示“毅然拒绝”。

△　沪公共租界工部局声明，工部局对于各国军队，并无任何权威或管辖权，对日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　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军50余人赴沪抗日。

△　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电谢各界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表示“敝军将士誓以最后一滴之血，洒之黄浦江头，以副我爱国同胞之期望”。

△　财政部长宋子文由沪汇200万元到南昌，充反共军费。

△　沪日浪人扰公共租界，向南京路商号开枪。

△　天津新华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一、每人每日加薪五分；二、每年终发花红40天；三、春节假期内发双薪；四、打倒指派的工会理事王玉贵、张文良等。

2月16日　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率部赴沪参加抗日，晚11时抵南翔，担任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第十九路军左翼防务。

△　日军第九师团忙于换防，部署总攻。仅以炮声示威，沪战全线沉寂。江湾有小接触。

△　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军委会通电全国将士，准备长期抵抗，称："现在国家存亡，间不容发，舍屈服于强邻暴力之下，丧失主权，自辱辱国，则惟有出于积极抵抗之一途"；望全体武装同志，"以大无畏之精神，作长期间之奋斗"。

△　国联理事会12个会员国决定向日本严重照会，勿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各地扩大事变，以武力所得之土地不能享有。

△　上海市总工会发表宣言，反对在上海设中立区，主张应集合全国力量拥护第十九路军抗战救国。

△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电国联，请主持公道，迅予采取有效方法，制止日人进攻上海，残杀市民等故意破坏各国公约、惨无人道之非法行为。

△　苏区中央印刷局工会为声援上海罢工工人，召集该局工人全体大会。工人当场捐款39元余，支援上海罢工工人。

△　财政部以盐税作抵，向汉口银行界借款百万元，充鄂反共军费。

△　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召张景惠、马占山、熙洽、臧式毅在沈阳召开所谓"四巨头"会议，确定伪满建国问题，板垣操纵通过日方炮制的《新国家建设大纲》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新国体为满蒙独立共和国，溥仪为终身元首。17日继续开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马占山、臧式毅、熙洽、汤玉麟任委员；马占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臧式毅任伪奉天省省长，熙洽任伪吉林省省长，汤玉麟任伪热河省省长。起草通过《独立宣言》。马占山"以人格担保"，未在《宣言》上签字。

△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派员调停华新纱厂工潮，厂方承认：一、每日每人加薪三分；二、撤换工会理事王玉贵、张文良等，对年终花

红及春节假期工资，均可斟酌照办。工人本日复工。

2月17日　　晨4时许，日军向八字桥、江湾我军阵地炮击，拂晓即停。午后敌小股向我万国体育场东端排哨攻击，战半小时即退。吴淞前线无战事，黄浦江敌舰不时向我炮击。

△　蒋光鼐等致电何应钦称："对和议事，请政府派负责人员参加谈判，商定后自当遵从。""但敌极狡诈……一面谈判，仍望不忘作全般之备战。"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代表300万市民发表宣言：一、非日军先行退出中国领土，绝对无调和之余地；二、反对设中立区域；三、拥护第十九路军武力抗日到底；四、全国总动员，实行正当自卫，拒绝日方任何要求。

△　朱庆澜、许世英等联合组织华侨救国经济委员会，朱为主席，吴山为总干事。该会以尽鼓动收转华侨捐款之义务为宗旨。

△　广州市民召开救国大会，通过长期抗日提案19条，并通电世界公布暴日罪行。

△　前清两广总督、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岑春煊电慰第十九路军，并捐助一万元，以为抚恤死伤官兵之用。

△　财政部通令各省国税机关，所有库存随时扫数解提，俾资周转。

△　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张国焘的意见，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和准备夺取武汉"的口号。

△　达赖派藏兵千余人向青海进军，占玉树，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马麟电北平告警。

△　汉阳高公桥大火，烧死百余人，延烧1300余家。

2月18日　日军司令植田谦吉向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于20日上午7时撤退第一线，20日下午5时前，浦东、浦西（含狮子林炮台）各撤退至距离租界边界线20公里以外，如不能实行，日军将不得已采取自由行动。日总领事村井仓松并有同样内容之通牒送达上海市政府。

△　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将日本所提最后通牒报告国联，请求国联召开大会解决中日事件。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3月1日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准汪精卫辞国府委员职，以黄绍竑递补。

△　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张惠长等通电全国，表示“今后惟有赋同仇之诗，懔阋墙之戒，努力于抗日剿共”。

△　上海市商会等81个民众团体组织之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集全体理事大会，议决要案两件：一、派代表北上，促张学良带兵出关，收复失地；二、募集上海房租一月，作为救国捐。

△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全国，主张：一、日兵不全部退出吴淞，不与谈判调和；二、上海非局部问题，不能单独解决；三、反对设中立区。

△　教育部以复旦大学义勇军“奋勇杀敌，牺牲盈百”，特致电嘉勉。

△　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国家财政困难，于18、19两日在沪邀银行界等商讨“内债是否缓付问题”。

△　伪最高政务委员会闭幕。是日板垣嗾使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委员臧式毅等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声

称：“为救人民痛苦”，决定“东北四省独立，组织行政委员会，执行一切政务”。

2月19日　　外交部对日18日通牒发表宣言，声明“此种要求，实危及中国主权及国格，中国地方当局无论其具有何种避免流血之诚意，亦绝对不能接受。……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得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

△　外交部照会日使重光葵提严重抗议，指出日通牒“实属无理已极……所有因此发生之一切结果，应贵国政府负其全责”。

△　沪市长吴铁城驳复日领村井19日通牒，指出：“来函所述上海方面严重之形势，均系贵国军队违反公约、公法，任意进攻吾国领土、惨杀吾国人民所造成。”“此次贵总领事所请转达本国军队要求实行之各项条款，本市长未便转达。……惟应声明者，贵国军队现仍实行挑衅……在此情形之下，所谓抗日运动，自难消灭。”

△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答复日军司令植田谦吉通牒，指出：“本军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统辖之军队，所有一切行动，悉遵国民政府之命令。来函所开各节……本军长未便答复。”

△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自桂电李济深，谓入赣部队已经派定，即日出发，但中央对桂按月拨款接济若干，方能持久，请中央勿撤驻赣之兵。

△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代表颜惠庆之请求，召开大会，讨论中日事件，决定3月3日召开国联行政院全体大会。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认为日通牒“无视我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上海人民誓与日本军阀周旋。

△　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举行反帝反国民党、参加革命战争的武装总示威大会，参加者1.2万余人，当场报名参加红军者400余人。会后

游行。

△　太原学联会定今日召集各界举行市民抗日大会，因警备部阻挠破坏，未能举行。

△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维持公债宣言，声明："对于公债减付本息之议，绝对不可行"，"只能展期一部分，专供抵抗外侮之用。"

△　国联水利专家德人西卫金等一行四人，由京抵津。下午赴华北水利委员会参观。

2月20日　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于晨7时20分下总攻击令。7时半以海陆空军开始全力向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发动进攻。其攻击目标趋重江湾方面。8时后，日军4000余人借大炮飞机掩护，以坦克车20余辆为前导，猛攻江湾万国体育会一带阵地，激战至晚9时，三次进攻均被击退。吴淞方面自晨至午激战不止，日舰亦向吴淞炮台轰击。闸北方面战事以八字桥一带为最剧烈，日军以坦克车十余辆猛冲，被我守军阻击，不逞而退。

△　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通电全国，谓对日之最后通牒，"本军惟以铁血答复之。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分内事……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能得逞。惟愿全国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免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仆后继"。

△　汪精卫通电全国，宣称对日军侵沪"全国应以最大之决心，为长期之奋斗"。

△　国民党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电促张学良收复东北失地，称："敌军侵沪，迭遭挫败，正在增兵长江，不能专力东北，机不可失，幸勿坐误。"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推熊希龄、张光亚、王造时、左舜生四人北上，请张学良即日出兵，收复失地。

△　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特设太原“绥靖”公署，指挥、节制山西、绥远两省军队，保卫地方，其组织权限，照北平及豫、鄂、赣各“绥靖”公署成例办理。

△　国民政府任命王兆荣为四川大学校长。

△　教育部长朱家骅电慰被日军炮火所毁之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机关。

△　国民党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电请中央迅调广东军队入赣“剿共”，即以原驻赣军队援京、沪。

2月21日　日军自晨至暮，继续向吴淞、江湾、闸北总攻，仍趋重于江湾。自晨7时起，日军以坦克、大炮进攻江湾第六十一师阵地，激战竟日，数次冲锋均被击退。敌我伤亡均重。吴淞方面敌偷渡蕴藻浜未逞。吴淞镇因日舰炮击及飞机投弹，民房被毁甚多。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路、新民路等处均有战事。

△　日机数架17日飞苏州侦察，18日以机枪射击苏州飞机场。是日又飞苏州侦察。外交部为此向日方提出抗议。

△　外交部发表宣言，否认东北独立及一切伪行政组织。宣言声明：“凡东三省或其一部分之分离或独立，与夫东三省内之一切行政组织，未经国民政府授权或同意者，一律否认之。”

△　孙科等电汪精卫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对日自卫，长期奋斗，称：“沪战前途极可乐观。”

△　黄绍竑电白崇禧转全桂将领，促桂军援沪，称：“沪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弟不敢存临难苟免之念，拟赴洛阳，冀尽所能，以存人格。弟念我省同志，素以公忠为国自命，若犹袖手不前，则数年来之奋斗，固无以自解于国人，亦无以告慰于先烈。”

△　陈济棠等粤方各要员在广州白云山开会，决定以后对国民党中央“改诋毁态度为善意之贡献”；凡有碍统一及团结对外之言论记载，令报纸检查员抽去；并决定派兵援沪及入赣“剿共”办法。

△　吉林国民救国军在敦化成立，由原东北军第二十七旅营长王德林联络大刀会等组成，王自任总司令。

△　北平民众救国会成立，熊希龄等百余人到会。25日通电全国，申明抗日主张。

△　天津裕元纱厂工人宣布罢工，要求每日每人加薪五分。经社会局派员调解，公司允加二分。22日工人复工。

2月22日　　日军攻江湾不逞，移其主力攻庙行。晨3时许，日军两万猛攻庙行镇第八十八师阵地，5时许，该师大、小麦家宅之间阵地被突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军校教导队至冯家宅督师，并令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二五九旅加入庙行正面与第八十八师同时出击；宋希濂第二六一旅以主力由蕴藻浜渡河出击。张炎第六十一师两团亦由江湾西北向敌侧击。激战至晚9时，突入庙行南端之敌被击退，并将金穆宅之敌两连包围。是役第八十八师钱伦体旅长、陈普民副旅长负伤，官兵伤亡1000余名，第八十七师伤亡600余，第一二二旅第五团伤亡过半。敌伤亡2000以上。

△　日机六架飞往苏州，中国航空队教练员、美机师夏特驾商用航机遭日机攻击殉难。中国飞机迎战，日机师小谷被击伤，次日殒命。23日晨，日机九架向苏州机场投弹12枚，未伤人。

△　国民党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指责蒋介石对日妥协，称：“寇既深矣，国人咸主抗战，以救危亡，介公独谓若与日战，五日却可亡国。”“十九路军兼旬血战，已打破日人足以亡中国之痴梦，外交局势为之陡转，此诚我起死回生之机，政府允宜及时振奋，用挽颓局；何必犹作妥协之迷梦，竟派王俊与日本武官作

私密之交涉。”“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今则兵已渡河，而议论未定，宁不大可哀耶！”

△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致三函与工部局，一请负中立区责任，制止日军在租界内横行；一请免除战区内巡捕捐；一请驱逐横暴之日军。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招待中外新闻记者，胡庶华主席，报告本会成立宗旨及经过，略谓：“本会应国难而产生，其宗旨为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坚持到底。”

△　吴佩孚电慰淞沪抗日军队，并称：“日人增兵未已，我军虽不畏强暴，仍盼多加兵力，出以慎重。”

△　南京中央大学留校学生派代表常纶等赴教育部请愿开学。

△　内政部、教育部、海军部及参谋本部驻京办事处，各推代表联合向财政部索欠费。

△　溥仪昨由大连抵沈阳。是日张景惠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见溥仪，表示该会拥戴溥仪为“满洲国”第一执政意，溥仪表示接受。

△　东北民众义勇军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否认东北伪国组织，决心抵抗。

2月23日　金穆宅之敌尚在被包围中。日军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庙行镇南端之塘东宅及小场庙猛攻，被第八十七师孙元良旅及第六十一师张炎旅击退。第八十八师连日苦战，伤亡重大，是日撤回庙行西南地区整理，所遗庙行至江湾一线防务由第六十一师及王赓旅古鼎华团接替；庙行至胡家宅之线防务由第八十七师孙旅接替。闸北第六十师阵地不断遭敌炮击。

△　日本内阁接受植田请援，决定派遣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组“上海派遣军”，由白川义则任司令官。

△　驻沪日领通知日侨除与战斗有关者外，全部撤离上海回国。

△　上午，日大队飞机轰炸沪西虹桥机场，投弹18枚，日飞机三架被毁。

△　南京各界救护队30余人出发赴沪。同日，中国红十字会张家口分会救护队队长王志谦带救护员27名赴沪。

△　外交部为东北建立伪国，曾迭次声明不予承认，是日复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声明“所有自日军非法侵占东北各地后，在该处建立所谓独立或自主政府之举动，及令中国人民参加此种傀儡之组织，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及平绥路特别党部联电中央，请迅发大军讨伐东北伪国。

△　章太炎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愤而大书：“吴其为沼乎！”篆轴一副，并由沪北上见张学良。

△　军政部迁往洛阳。

△　国民政府任命曾仲鸣为铁道部常务次长，褚民谊为行政院秘书长。

△　石青阳电行政院辞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

△　红军十二军罗炳辉部进占福建武平县城。

2月24日　　沪战况沉寂。闸北方面日炮兵不时向青云路、宝山路、天通庵路一带第六十师阵地射击。八字桥至江湾附近敌机投弹炸伤人民。敌攻小场庙，发生剧战，被第六十一师击退。

△　蒋介石、汪精卫、陈铭枢、罗文幹等在南京开会，讨论沪局问题。

△　蔡廷锴在沪招待外报记者，表示："余系军人，责任捍卫疆土，抵抗到底，成败利钝，在所弗计。"

△　上海市政府就日军利用租界为掩护向中国军民攻击事，向各国总领事暨领事提出抗议和严重声明，表示"所有关于租界当局不能制止日军利用租界区域为攻击中国之根据地所发生之一切结果，本政府概不负任何责任。再：为安全计，本市长请贵总领事、领事通饬住居于战区附近或日军驻在地附近之贵国侨民设法迁避，及转知贵国海军当局勿将军舰及其他船舶，停泊于日军根据地附近"。

△　行政院通令各机关，规定"本院各部、会暨所属机关职员，若有无故离职者，应即查明，一律停职"。

△　国民政府以上海战事影响债市，特公布维持公债令。规定减轻利息，展期还本，每月由海关关税划出860万元，作为支配各项债券基金，其利息长年六厘，还本期限按照财政部拟定日程表办理。

△　国民政府派颜惠庆及驻丹麦公使罗忠诒、驻西班牙公使王麟阁为出席3月3日召开的国联特别大会代表。

△　马占山在日本关东军导演下在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2月25日　日军六七千人，以空军配合，猛攻庙行镇以南至小场庙之线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阵地。午后2时30分，小场庙阵地被优势之敌突破。晚11时许，敌攻八字桥第六十师阵地，战约半小时即退。闸北、天通庵一带，不时有敌射击。吴淞无战事。

△　外交部照会英、美、法、意四使，要求制止日军在上海租界登陆，并利用该租界为军事行动之根据地。

△　上海律师公会电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转各国代表及各国律师、各国国会，请注意远东之危机，勿作壁上观。

△　国民政府派李世中为议订中爪《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通电，宣布建伪国，定名“满洲国”，称元首为“执政”，年号“大同”，“国旗”为新五色旗，伪都长春（改名“新京”）。

2月26日　江湾镇被日军炮火猛烈射击，房屋被烧殆尽，且因敌突入小场庙，张励第一二一旅第三团乃于上午自动放弃江湾镇，改守竹园墩、夏家荡、杨家楼下之线。闸北八字桥有炮战，阵线无变动。吴淞镇遭日舰炮击，民房被毁甚多。

△　下午2时许，日舰炮轰浙江平湖乍浦口岸，陆战队图登岸未逞。

△　晨9时，日机一架到苏州车站侦察。下午4时，又有日机五架在昆山投弹，继向苏州机场投弹，死伤各一人。日机15架分两批飞到杭州，在车站投弹数枚，炸毁民房数所。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主张由武装的工农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组织民众的义勇军和游击队，参加前线作战。

△　李济深、陈公博奉命抵平请张学良赴洛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　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翁文灏等致电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对其向美国总统胡佛建议给日本在华之暴行以经济制裁之举，表示感谢。

△　英、美、法、意四国驻日大使分别通知日外相芳泽，要求如日军增援赴沪，不得在租界登陆，“否则华军炮轰码头，势将危及租界”。

△　汪精卫、何应钦电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及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等，要求“查明所有阵亡将士姓名、等级，造册具报，当照章从优议恤，以彰忠烈”。

△　宋子文在沪与银行界商妥，减轻公债利息，延期还本，将每月内债所还本息1800万元减为每月拨还880万元，余900万元发行救国公债。

△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发出通电，声讨张景惠在东北组织伪国。

△　鄂“绥靖”公署指定“剿匪”五区指挥官：何成濬任总指挥兼鄂南区指挥官，夏斗寅为鄂东区指挥官，袁彬为鄂西区指挥官，徐源泉为鄂中区指挥官，范石生为鄂北区指挥官。总预备队为第四十四师朱怀冰，相机协“剿”。

2月27日　沪战全线沉寂，敌机不时飞昆山、苏州一带侦察。前线我军伤亡日多，援军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只调两营到黄渡作工事。第十九路军因后援无望，是日有退守罗店、刘家行、大场、真如、龙华一线之议，但由于官兵愤激，誓与阵地共存亡，最后决定仍在原线固守，以待中央来援。

△　日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补充兵员407人到达上海。次日又有第九师团补充兵员518人到上海。

△　上海南市救火会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兵强迫开车运送军火，由日兵押解。驶至黄浦江边时，胡激于爱国热忱，开足马力，将车开入江中，壮烈牺牲。

△　驻沪国民党中委再电张学良促迅下决心，即率全军，直趋东

省，“执事补过图功，全在此举”。

△　孙科、陈友仁电林森并转国民党中央，说明未出席二中全会原因，称：“适值淞沪抗日战事紧张之际，科等正从事于国际宣传，留沪接洽，较为便利而有益，故全会开会，恕未克出席。”

△　第八十八师独立旅旅长王赓在公共租界黄浦路被日海军士兵捕去。29日晚，上海市政府向美总领事克宁翰及各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3月1日王被释放。

△　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在沪召开筹备成立大会，推定朱庆澜等15人为临时执委。当场认捐基金万余元。

△　上海市绸缎印花业同业公会发表宣言，主张房租减半，以纾商困，并将应付租金作为军饷，援助抗日军。

△　国难会议添聘张元济等30人为会员。

△　天津济安自来水厂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全体罢工。28日，工人又将电线割断，水源断绝。

2月28日　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等应英海军司令凯来之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犬养首相私人代表松冈在英舰“康特号”上会晤，商定停战办法，要点为：双方同时撤兵；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行政权；中国军队退真如，日本军队退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南翔，日军退回舰上。此议因日方拖延无结果。

△　英、美、法公使各奉本国政府命令调停上海战事，要求中日双方于3月3日国联召集大会讨论中日问题前停止战争。英使蓝普森到京，偕法使韦礼敦晤罗文幹、陈铭枢，商讨双方停战办法，希望中日双方撤兵。罗文幹答中国可接受，但须中日同时撤退；如日方欲保持最后通牒之条件，则绝对不能接受。

△　蔡廷锴以沪商罢市御侮一月，影响贫民生计，是日特函上海市商会劝告开市。

△　日援军第十四师团1.4万人到上海。

△　日机又袭击杭州。

△　冯玉祥函汪精卫辞内政部长职，略称："际此国难紧急之时，诚恐以一身之微，负繁巨之位，设有贻误，个人之负咎犹其小事，其如国家何。"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开上海抗日血战周月纪念大会，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并请第十九路军、第五军代表报告作战情形。大会分别电国民政府和国联。致国民政府电要求当轴诸公速与民众一致下决心，出实力，以增援沪战，并速令张学良提兵出关，收复失地。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等11个团体，为庆祝第十九路军抗日胜利周月纪念发出启事，定28日至3月5日举行庆祝第十九路军抗日胜利纪念周，并于3月5日召集全上海市民庆祝大会。

△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决议：一、派代表组织请愿团赴平，请张学良出兵东北讨伐伪国；二、联络其他团体筹备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三、电国民党中央下令出兵东北讨伐伪国。

△　汪精卫电告陈济棠、李宗仁，已令财政部月拨粤、桂入赣"剿共"部队补助费50万元。

2月29日　日军全线发动总攻，庙行、江湾方面由植田指挥，闸北方面由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植松指挥。八字桥、天通庵站、西宝兴路、虬江路各口，日军3000余频频冲锋，均被沈光汉第六十师击退。

△　日军侵沪司令官三易其人，由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替代植田谦吉。是日白川偕厚东笃太郎之第十一师团先遣兵团抵沪。

△　第十九路军发表《告全国民众书》，称我国对日“应谋长期之拒抗，以待国际之变化，及敌国自身之崩溃。毋以目前军事之胜利，期侥幸之成功，毋惧战祸之延长，生苟安之妄念……日本一日不罢兵，外交一日不胜利，则我国一日不停止武力拒抗”。

△　日驻沪总领事村井函市府声称：“3月2日以后，不得不企图将苏州、嘉兴、上海间供给贵国军队使用之铁道线路及军用列车破坏。”沪市府函复日领，表示“倘贵国军队仍复攻击，我军自不得不采取相当自卫办法，因此发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国负之”，并将此事函知各国领事，指出日方此举“乃欲轰炸一般人民，破坏上海交通”。

△　上海市地方维持会电北方同胞，请勿售敌货以肥身家。

△　北平协和医校救护队由队长万福思率领，赴沪参加救护工作。

△　国联满洲事变调查团抵东京。

△　沪公安局调查，全上海2月份人口，较“一二八”战前减少81万。

△　何成濬电财政部，以鄂省中央协款积欠五个月，请先拨50万元济急。

△　“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在沈阳召开，选出11名代表赴旅顺迎接溥仪就任伪职。

是月　海外华侨汇款慰劳第十九路军抗日。菲律宾华侨救国会、国难后援会等汇款44.318万元。11日，檀香山国难救济会汇沪10万元。13日，孙科收到各地及海外华侨捐款10万元。20日，旧金山华侨募美金100万元。其他如缅甸、加拿大、越南、美洲等各地华侨均多次汇款到沪，总数达17.25万元。

3月

3月1日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开幕。主席汪精卫致开会词，称会议将讨论并决定：一、中国将来之永远都城；二、如何集全国之力坚决抵抗日本之侵略；三、外交政策无兵力以为后盾，如国联不能援助中国，当取何政策；四、筹定具体财政善后计划。

△　日军在沪全线总攻，闸北方面，以飞机、坦克掩护步兵向八字桥、天通庵一带第六十师阵地猛攻，进退凡五次，激战至深夜。敌第十一师团主力沿长江西上，绕道中国守军背后的七丫口登陆，占领浮桥镇，然后向东攻占浏河。午后6时，庙行镇附近之第八十七师及第八十八师阵地被突破。吴淞方面，日舰不时炮击，尤以宝山及狮子林方面为烈。敌援军第十一师团由白川统率企图与第十九路军决战。蒋光鼐以援军只到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团，寡不敌众，乃避免决战，命令全军乘夜撤退至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第二道防线待援。

△　外交部照会英使蓝普森，请注意日军破坏京沪、沪杭两铁路交通。

△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暨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电请国联维护《凯洛格公约》及《九国公约》，以保世界和平，俾恢复远东商务。

△　“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自召集黄埔少壮军人在南京建立最高秘密政治组织，滕杰、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康泽任常务干事，滕杰任书记。设四处：总务处长李一民，组织处长肖赞育，宣传处长康泽，特务处长桂永请（后易戴笠）。建二级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三级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为严守“力行社”核心组织的秘密，一般以“复兴社”名义相称。

△　张景惠等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公布伪满洲国《建国宣

言》，声称“即日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创设满蒙新国”。同时公布伪《中央政府组织法》和伪《维持公安律》。

△ 行政院决议：裁撤鲁豫清乡督办公署；公布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

△ 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电告何应钦称：因红军“聚钟祥、京山、应城、天门各县，势力猖獗，后方调度重要，兼以武汉谣风甚炽，人心浮动，须防维镇慑”，故不能参加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 正太路因中法合同期满，铁道部本日起开始接收，定一个月接收完竣。

△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表告民众书，请民众督促政府军事当局立即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 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揭露日军侵沪暴行，勉国人勤劳、节俭、忍耐、协助。

△ 南京中央大学留京学生开同学大会，推代表30人赴教育部请愿维持校费。

△ 青岛各业公会分头募捐10万元，分批汇沪慰劳第十九路军，并赈济难民。11日，青岛市各机关及市商会又集现款12.78万元汇沪。

△ 台北至马尼拉间无线电开通。

3月2日 第十九路军通电说明撤至第二道防线之原因，略谓：“日人猝增援兵，而我以运输艰难，后援不继，自2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人以一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抽调，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

共戴一天。”

△　日军二万余人并军舰多艘环攻吴淞炮台，与第十九路军谭启秀、翁照垣部激战，至傍晚始停止。上午大场亦有激战。第八十七师孙元良旅一部在朱家桥头被敌包围，激战数小时，突围退集葛隆镇，伤亡甚大。

△　外交部发表宣言，指出在中日双方未商定停战办法期间，“日本海陆空军复向中国军队全线总攻，且日本总领事并经通告中国市长，日军决议炸毁京沪、沪杭两路。此项和平之努力，在中国方面至为恳切，倘使仍归失败，则其责任当由日本再度负之”。

△　军事委员会以国难当前，通电全国绥靖区暂缓结束。

△　中国自强协会电国民政府，谓：“淞沪失守，咎在中央，误国殃民，悲愤何极，恳迅调大军，收复失地。”

△　沪代表熊希龄、王造时、左舜生等在北平谒见张学良，请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表示须有中央命令始能出兵。

△　东北义勇军占领锦西。

△　国联行政院主席彭古在日内瓦分别接见中国代表颜惠庆和日本代表佐藤，要求日本在3月3日以前停战。中国代表对此表示接受。

△　华侨捐款慰劳第十九路军。是日及4日菲律宾各地华侨救国会捐款2.6万余元；12日，吕宋华侨联合会捐款1367元；26日，旅法华侨抗日募捐团捐款3000元。

△　南弘任第15任台湾总督。

3月3日　　日军第十一师团占真如，前锋抵南翔，向嘉定、太仓间我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阵地攻击，被击退。旋以主力分途攻娄塘

镇、朱家桥头。第三五九旅受数倍之敌包围，阵地被截成数段。一部冲出退集葛隆镇，其余伤亡殆尽。俞济时第八十八师被优势之敌压迫，撤出嘉定城。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陆续到达昆山附近。

△　翁照垣旅应地方团体坚请“保全武力，留作最后奋斗”，自吴淞沿蕴藻浜向嘉定西退。上午7时至8时间，吴淞炮台被日军占领。

△　日军司令官白川以国联限本日下午4时停战，遂下令于今日下午2时停战，并正式通知英海军提督克莱转致外交次长郭泰祺。白川并与海军司令野村联名发表宣言，声称：“驻上海日本陆海各军为遵守职务起见，曾以和平方法保护日本侨民，但被迫而出于敌对举动。现在中国军队已照日本原有之要求退出本区，日侨获得和平，公共租界治安亦已恢复，如中国军队不再有军事行动，我军即停止进攻。”

△　第十九路军、第五军暨各师、旅、团长发出通电，表示退至第二道防线后之决心，略谓：“我十九路军、第五军亦惟有收拾余烬，背城借一，事之不济，则拼命于沙场，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

△　日舰抵汉口，下午陆战队200余人登陆演习。

△　孔祥熙电四届二中全会，对沪战请迅定自卫整个计划。5日，二中全会电复孔祥熙，表示“至于抗日准备，政府已具长期抵抗之决心”。

△　国民党留沪中委孙科、陈友仁等电蒋介石、汪精卫称：“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责任”，“为今之计，当局即宜下大决心，迅速增兵，收复淞沪。”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电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称：“沪战因政府屯兵不援，坐待孤军陷敌包围，迫命退却，前此所谓决心抵抗，全系欺骗伎俩”，“盼勿自绝国人，速出兵收复失地。”

△　旅沪黄埔同学段远谋等252人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指责其不派兵援沪，“即请缨杀敌之军队，政府亦不予征调，言行之矛盾若是，其何以自解于民众”。

△　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指责国民党“当道诸公，后援不发，且严止各省请缨”，因而第十九路军不得不“退至第二道防线”；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同执干戈，以卫地方”。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紧急通告全市各公团，指责国民党政府“一兵一卒不肯派援”，致使第十九路军“不得不忍痛退却”；表示“对所有中立区、和平区、自由军等破坏我领土主权之方案，誓死反对”。

△　上海市商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上海特区市民联合会、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电国民政府、何应钦等，要求“速派军队增援，收回淞沪，以救危亡”。

△　天津各界电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表示誓与暴日周旋到底。

△　中国著作者协会致书全世界著作者，公告暴日侵沪，破坏中国文化事业。

3月4日　　下午国联开会，颜惠庆要求制止日军行动，以和平方策解决纠纷。大会通过请中日实行停战的决议案，提出停战办法三条：一、中日两国政府令军事当局颁布之停战令，立即为有效之实行；二、各关系国及中日政府应将实行第一条规定之条件通知国联大会；三、中日双方代表应即进行会商停战，并洽商日军撤退办法。

△　日军虽于3日午后2时对国联宣布停战，但仍在南翔赶筑工事，在真如建飞机场，向各线运送军队和重炮，准备进攻。第十九路军因援军未至，决令各部相继撤至昆山附近之线待援。

△　日机一月来八次飞苏州骚扰，外交部为此向日使提出严重抗

议，并照会英、美各国公使，请制止日机扰苏。

△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举行正式会议，通过军事、外交等施政报告，并发出慰劳淞沪将士电及慰劳战区同胞电。

△　外交部长罗文幹招待新闻记者，表示对日交涉“一切损害国权领土或有辱国体之任何条件，严予拒绝”。

△　《生活》周刊社在沪梵王渡青年会中学创办伤兵医院，是日开始收容伤兵。

△　清华、燕京两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七人电国民政府质问对日方针，称：“敌兵压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则请斩蔡廷锴以谢国人。万勿阳战阴和，以欺国人。”

△　章太炎在北平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政府意志散漫，迄无一定计划。对日本之侵略，只有战之一路”。

△　阎锡山在太原召集徐永昌及各留并将领举行军政会议，讨论晋、绥出兵及军饷暨兵工厂复工等问题。

△　湘省立各校校长因经费无着总辞职。教育厅长曹典球亦辞职。

△　天津华新纱厂工人因要求发放花红举行罢工。保安队前往镇压。资方答应发放花红后，工人16日复工。

3月5日　　日军进犯第二道防线之嘉定、太仓、黄渡，各处有小冲突，日便衣队百余人今午进至葛隆镇。南翔日炮兵不断向我射击。

△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一、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

以洛阳为行都；二、颁行大赦案；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修正案；四、讨伐东北叛逆案。

△　黄埔同学抗日救国会电责二中全会，谓“京、沪咫尺，当局竟不遣一卒增援，误国殃民，莫此为甚，公等所谓决心抵抗，殆皆自欺欺人”。

△　宋庆龄、何香凝创办之国民伤兵医院落成。宋庆龄亲临淞沪抗战前线，慰问第十九路军官兵，有感前线给养不足，医护条件缺乏，便与何香凝等一起筹建伤兵医院。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出部分校舍，华侨胡文虎及上海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资助，在杨杏佛具体筹划下，拥有300张床位的伤员医院在交通大学内落成。

△　上海邮务职工会等电国民党二中全会，要求派兵增援淞沪，并令饬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　江苏国难救济会电蒋介石、何应钦，要求迅派大军克日规复淞沪。

△　太原警界因公安局长王锡符编遣巡缉队及任用私人，是日赴省公安局请愿，要求发饷及撤换局长。

3月6日　　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18日蒋就任。

△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电令前线各将士停战，谓：“现在国联大会业经决议，请中日两方实行停战，自应依照办理。倘日军不向我军攻击，我军亦不向彼攻击。如日军违背国联决议施行攻击，我军仍须抵抗。”

△　日军攻嘉定娄塘镇，日机飞青浦侦察。日援军陆军第十四师团一万余人自是日至10日在吴淞登陆，开前线与植田第九师团调防。

△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闭幕。大会决定对东北方针，否认日本武力构成之东北伪政权，由国府迅筹办法，以实力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大会宣言》称："方今之急，首曰御侮，全国军队应抱同一长期抵抗之决心。战区固应战略需要而时有变更，然中国抵抗之决心则将历久而无间，任何屈服难堪之条件，决无承认签订之理。"

△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电全国各将领，称"中央对于长期抵抗，夙具决心，一切艰险，均所不避"，勉全国将士"人人抱存则共存、亡则共亡之志，以与暴力相周旋"。

△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电慰第十九路军暨第五军将士，宣称："我方以交通不备，运输不便，当第十九路军苦战之际，第五军驻在苏、浙，犹及赶紧赴援外，其余各处部队尚在长途跋涉之中，因是之故，众寡悬殊，我忠勇之将士遂不能不为战略上之退却，此诚中央同人之所歉然于怀，而深愿循省弱点，亟图补救者也。"

△　上海总工会电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称："为维护真正和平计，应以保持整个领土主权为原则，故先决条件，必须由日本将在华驻军一律撤退，否则我人民决不惜任何牺牲，为政府后盾，奋斗到底。"

△　上海中华自救协会分函留沪中委，请齐集行都，讨论一致对外，"庶几坐言不如起行，有裨国家大计，否则近于各树一帜"。

△　潮州旅沪同乡会电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国妇女救国大同盟、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电何应钦，均请援第十九路军。

△　溥仪被日人由旅顺挟赴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于7日往迎。8日溥仪、张景惠、臧式毅等到长春。

△　河南省主席刘峙因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官，电汪精卫辞主席职。

△　粤决派余汉谋军、张枚新师、范德星、陈章两旅，共20团，

桂派廖磊军六团，入赣“剿共”。

△　鄂省清乡会议开二次大会，通过清乡促进会章程，清剿经费定为1000万元。

△　日步兵第十五旅团天野部侵占黑龙江省宁安城。22日从宁安出发，次日集结乌吉密河。28日到达同宾，协同方正西南之伪吉林军李文炳部作战。

3月7日　　沪日军攻朱家桥，激战竟日，至翌晨被第十九路军击退。晚，攻黄渡之敌被我击退，逃南翔。白龙口有敌3000余人登岸。

△　上海市政府致函驻沪日总领事及各国领事，声明“本国军队业已撤离吴淞、江湾、闸北等区，所有关于各该区之公安、卫生、公用等业务，亟应继续维持，本府职责所在，决令主管机关分别办理”。

△　赣州战役结束。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以后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2月4日起发动赣州战役，攻城打援，围攻赣州33天。赣州城池坚固，红军缺乏重武器，屡攻不下，反遭重大伤亡。6日，第十八军陈诚部驰援，是日，红军撤围。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推陈立夫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二、推陈公博为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陆一为副主任委员；三、推罗家伦为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国联大会下午续开，颜惠庆报告中国已接受国联4日关于中日停战之三条办法。

△　上海市商会电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要求派大员督师抗日，并电蒋介石要求亲出捍卫国难。

△　中国自强协会李国谟等电慰第十九路军，并勉以“继续奋斗，

以竟初衷”。

△　汉口《正义报》发表题为《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的社论，被湖北绥靖公署勒令停版，并候“查办”。

△　湖北国难救济会电张学良，要求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　行政院决议，准西安绥靖公署在甘肃设置行署，委任邓宝珊为主任。

△　浙省主席鲁涤平电军政部辞第九路军总指挥职，并请以谭道源继任。军政部复电照准。

△　湘鄂西红三军在湖北天门县文家墩地区经两日激战，歼敌第四十八师2000人，俘旅长韩昌俊，至此红三军扩大到1.5万人，根据地扩大到襄北的京山、应城以南地区。

△　鄂省立各校教职员因经费无着发表宣言，实行停课停工。

△　晨，西康（今四川康定）地震，房屋倒塌，死伤数百人。

3月8日　　日军进攻黄渡、太仓东陆渡桥及朱家桥、浏河附近诸村镇，被我军击退。

△　日前任海相安保大将偕同川少将等抵沪，视察日军及调查“沪案善后办法”。

△　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发表声明，谬称：“中国军今后侵入左列地点，即六渡口、浮桥镇、岳王市、外冈镇、安亭镇、白鹤港镇以东苏州河为界……由此引起事端而使事态再度恶化，其责任尽在中国军队。”

△　日机飞杭州、苏州侦察。

△　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声明：东北关盐税关系债款担保，伪国非法提拨，概不承认。

△　国民政府特派褚民谊为国难会议秘书处主任，彭学沛为副主任。

△　财政部长宋子文公布2月份海关收支数：收入规银12516037.17两，支出规银13833778.05两，不敷规银1317740.88两。

3月9日　　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参加者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以及清室遗老、蒙古王公等人。由张景惠呈国玺，臧式毅捧呈执政印绶，郑孝胥代读《满洲国执政宣言》。

△　英使蓝普森斡旋中日停战。驻华日使重光葵以意见书交英使转外交次长郭泰祺，称“日本军政当局准备依据3月4日国联决议案条文，与中国当局开始谈判”。10日，郭泰祺将声明书交英使转日使及国联会议，称中国政府接受3月4日国联会议决议案，准备依据该决议案条文及中国首席代表颜惠庆所声明之下列谅解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一、此项谈判仅限于有关实行停战及日军完全撤退之事件；二、撤退不得附带任何条件。

△　王俊致电何应钦，略称中日交涉，各种方法已进行无遗，“至昨晚英军司令官发表方法，完全失败。盖重光葵态度转强硬，要我方退出闸北之故”。“我方处不攻不退之际，徒延时日，锐气一销，补救益难。目下全国积极作战既不可能，宜速乘此小战小利之机，图收亡羊补牢之效。万一吴淞、闸北俱失，始穷促而求人，则损失巨矣”。

△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自前方电该军驻沪办事处并转沪市长吴铁城及外交部驻沪办事处，略谓日兵数千8日在浏河登陆，有向西进模样；9日晨又有敌兵2000余进犯陆渡桥，有侵太仓企图。日军

在沪“一面进兵，一面对外宣布停战，以欺骗国联”，望将其阴谋迅行布露。

△　日舰集中舟山群岛，太仓有小接触，日机在苏州掷弹。

△　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归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指挥。

△　天津市工联救国会电国民政府，请迅调兵收复淞沪及东北失地。

△　吉林东北区军、政、商、农、学、警各法团，自伊兰通电称：“我东北民众一息尚存，对于满洲伪国乱命，誓死反对拒绝，应即声罪致讨，以伸国纪，尤盼早日出师，复我山河。”

△　国民政府特任顾孟馀为铁道部长。

△　何成濬以主鄂省政两载，红军力量强大，电林森、汪精卫辞鄂省主席职，专任绥靖主任。电中并称：“洪水为患，疮痍满目，财绌民困，负咎良深。”

3月10日　日军约500人猛攻太仓，炮毁城东南角。

△　日军一面宣传停战，一面仍积极调兵来沪，自是日起至12日止，日援军到沪共七八千名。

△　军政部通令查禁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

△　第八十八师独立旅旅长王赓因被日军拘捕时有泄露军情嫌疑，是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解往南京审讯。

△　颜惠庆电外交部报告国联大会决议案内容，要点为：一、再度声明尊重《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二、声明不得侵犯他国之领土、行政之完整；三、声明国联维持条约之效力；四、大会委员会应努力调停，以便促成停战及日军之撤退；五、委员会负应付中日纠

纷事件之全责。

△ 据《申报》讯：苏联正式宣布否认伪满洲国；又讯：“日本利用白俄，图扰苏联沿海各州，意在要挟苏联承认日方在东省非法权利，但苏联决不示弱。”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巩固国防案及长期抗日案。

△ 国民政府宣布国难会议改期于4月1日在洛阳举行。

△ 溥仪颁布伪满洲国组织大纲，并按关东军内定的伪政府各官属名单任命郑孝胥为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为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马占山为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熙洽为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谢介石为交通部总长、冯涵清为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为实业部总长、丁鉴修为交通部总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

△ 吴佩孚通电申讨东北伪国，对溥仪大张挞伐。

△ 张发奎第四军由全州出发前往江西“剿匪”，13日抵永州，15日抵祁阳，休息两天后，向醴陵前进。21日抵衡州。

△ 国民党中委刘芦隐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反对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棠等亦表示反对。

△ 白崇禧、黄绍竑离邕到粤，商两广联合抗日“剿匪”。

△ 台湾民主党成立。

3月11日 国联通过和平解决远东争端之决议案，请中日两国政府立即实行停战；主张中日于中立国扶助之下开始谈判，切实终止战争；并布置日军撤退。大会并通过授权由19会员国组成之特别委员会监视撤兵及过去各决议案之实行。日本代表弃权，中国代表因训令未

到，未参加表决。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凡五条。

△　行政院通过《国难会议组织大纲》及《议事规则》。《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为集中全国意志，共定救国大计起见，召集国难会议；国难会议委员由国民政府就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之人士中聘任。

△　张学良为遵二中全会决议，电国民政府恳辞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　吴铁城电国民政府辞沪市长职。12日，汪精卫复电挽留。

△　胡汉民发表谈话，主张除共产党和保皇党外，承认各党同时并存。

△　内政部设立“剿共计划专门委员会”，研究“肃清”共产党方法问题。

△　湖北旅沪同乡会电国民政府：“十九路军失援撤退，日军追踵进逼”，要求“迅调劲旅驰援，立赴前线杀敌”。

3月12日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否认东北伪组织，声明“在日本军队非法占领东三省期间，所有该处政治组织，中国政府始终认为叛乱机关，同时并认为日本政府之变相的附属机关，对于其一切非法行为，绝对不能承认，并应由日本政府负其全责”。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谬称满蒙“可以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为达到这一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

△　颜惠庆通知国联大会，表示中国接受中日停战决议案。

△　蔡廷锴对记者谈，和战关键“不在我方，而在日方之是否觉悟，能否放弃其侵略政策”。又称：“万一和平破裂，日方向我进攻，我决继续抵抗，但存一兵一卒，亦必奋斗到底。”

△　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发布命令，重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

△　北平各界500余人在中山公园举行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有人上台演说，反对一党专政，会场秩序大乱，王化一等六人被捕。

△　日机又扰杭州及松江，机关枪扫射伤人。13日，杭州市政府函驻沪日总领事馆及驻杭日领米内山庸夫提出抗议，此后如再发生同样入侵情事，“本府为保护全市民众及各国侨民起见，当为合理之御击”。

3月13日　日军在南翔、嘉定间筑汽车路，在嘉定设司令部。朱家桥敌军数百，时出时没，焚杀甚惨。陆渡桥增兵千余。

△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路透社记者，表示对沪军事决不诿卸责任，“中国愿意和平解决争端，但若日本不停止侵略行为，则中国准备奋斗到底”；并称“日方正在筹备军事行动，如日军实行攻击，华军决计力抗，其责任当在日方”。

△　沪社会局公布，自沪战以来，上海住户、商店、工厂、房屋四项损失在14亿元以上。

△　国民党中执会电复留沪中委江（3日）电，谓收复东北，应由国府迅筹办法，以实力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

△　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上海成立。

△　北平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成立，通过简章，选出邱昌渭等11人为理事。

△　东北义勇军晚11时占领大虎山。

3月14日　中日停战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在驻沪英领署举行，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日使重光葵及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出席。日方提议设中立区，由中国警察在外人指挥之下警卫地方治安；并涉及1月28日吴铁城对日领复文所允四项要求。我方以越出国联大会决议案之精神，拒绝讨论。后经英使居间调停，双方代表允请示本国政府后再谈。

△　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鉴于上海形势逐渐平静，是日下令第十一师团、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回国。19、21日，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两批离沪。第十一师团亦正集中待运中。

△　晚，国联调查团包括英、美、法、意、德五国委员及随员专家等一行，由李顿率领自日本乘轮到沪，顾维钧、吴铁城、郭泰祺等往迎。

△　英、美、法、意四国参赞代表四国驻华公使赴闸北、江湾、大场、浏河等日占领区域视察。

△　国民政府派蒋光鼐为中日上海停战会议军事代表。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准朱培德辞参谋总长职，遗缺由蒋介石兼，3月18日蒋就任。

△　天津市商民救国会成立。

3月15日　国联调查团访宋子文、顾维钧、吴铁城，顾开茶会招

待，吴设晚宴。李顿招待中外记者，表示调查团对上海之停战十分关心，如果列强同意，准备参加和议谈判。

△　日机飞苏州、昆山侦察并扫射。

△　据《大公报》讯：日方在前线实力分配：正式陆战队5000人，由近卫师团改编之陆战队1.5万人，第十二师团1.5万人，第九师团战时编制2.5万人，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战时编制四万人，飞机200架，轻重炮350门。

△　吴佩孚通电全国国民，申述救国大计，主张“动员全国之兵，以谋抵御，从速化除一切党派意见，与全国人才共图建设”。

△　汪精卫、朱培德、陈铭枢、李济深、王柏龄等赴昆山前线劳军。

△　粤政务会议议决发行国防公债3000万元，作要塞设备用。

△　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总指挥韩复榘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请辞本兼各职，推荐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李树春继任主席，师长孙桐萱、曹福林择一任总指挥。

△　广州公安局军械库被人掷弹炸毁。

△　3月11日天津《大公报》之《军事周刊》第七期因载《枯树又萌芽》讽刺画，讽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日领向天津市府抗议，是日市府将该刊查禁。

△　上海律师吴迈前曾赴上海公安局要求保释中学生联合会学生，与该局发生冲突，竟被扣押，是日被解送南京卫戍司令部。16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纷纷开会，通电要求释放吴迈。

△　伪满洲国决定将长春改为“新京”。

3月16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原任朱培德辞职照准；特任朱培德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任命吴奇伟为陆军第九十师师长。

△　李顿调查团委员分访英、美、法、意、德五国在沪公使、代办及海军司令，咨询上海事变之事实，并在旅寓华懋饭店接见各国领事搜集调查材料。

△　日舰载第十四师团工兵及军械到沪，次日又有师团直属部队到沪。

△　日机第五次飞杭州侦察。

△　北平大学教授抗日会电促各省军事长官积极抗日，万勿妥协。

△　重庆各界122个团体，向第二十一军军部请愿，请刘湘出兵救国。

△　广东第一集团军余汉谋等以全体将士名义通电讨共，声称“非抗日无以救亡，非剿共无以抗日”。

△　北平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成立。

3月17日　吴铁城答拜国联调查团，称“日本允撤兵至租界内，停战会议在调查团离沪前可开成”。午，上海报界宴请国联调查团，《申报》馆经理史量才致词，声述日人压迫中国舆论情形，请调查团维护公理与和平。晚，应顾维钧邀宴，顾演说希望调查团对中国人民对中日关系的愤慨表示，作进一步研究。

△　据外交界消息：上海事件连日经各方斡旋，中日双方代表会晤结果似较前进步，但日方仍坚持我国不能驻兵上海。外部已训令我方代表，略谓“日方如有和平诚意，则谈判不妨开始，惟须坚持立即

停战，及日军无条件全部撤退至1月28日以前原防”。

△　东北各法团自北平电沪国联调查团，声述暴日侵略蹂躏东北真相，表示爱护乡土决心，请主持公道，使东北问题早日得公平合理解决。

△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简派胡世泽、谢东发为第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代表，并拟指定胡为第一代表（19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二、请任命程天放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三、中央大学每月经费16万元，自2月份起，一并暂由财政部拨发。

△　陈济棠发表告第一集团军将士书，声称：一、此次“剿匪”系下大决心，非达到成功，誓不回师；二、“剿匪”与抗日同样重要；三、“剿匪”是打倒赤俄的间接侵略。

△　上海糖业同业公会因糖类新税则较原有税率陡增一倍，电宋子文请暂缓执行。4月2日，财政部批复不准。

△　伪满洲国在长春设中央银行，溥伟任总裁。

3月18日　上午，国联调查团接见日外相之代表松冈洋右及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晚，赴上海市商会邀宴，主席王晓籁演说，对日人突然用兵占据满洲事详为批驳。李顿答词声明：“在国联公断以前，必尽量容纳双方意见，务使中国不因信赖国联反而吃亏。”

△　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分函中日代表，请双方向国联特别委员会报告对决议案实行程度及准备采取之步骤。

△　北平市商会发表《告平津商胞书》，称“妻子且不保，何爱于金钱；尸骨且无托，何忧乎生计”，要求商胞宁死勿购日货。

△　锦西义勇军800余名占领连山。

△　北平日军百余名荷枪实弹，并携大炮，经东长安街出地安门，游行示威。

△　北平纪念“三一八”惨案市民大会，因军警阻挠未开成。

△　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汀州开幕，21日闭幕。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财经问题、苏维埃建设问题等决议案。通电拥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作战的决议。宣告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选举张鼎丞、张思垣、范乐春、郭滴人、李六如、罗明、谭震林、罗炳辉等35人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张鼎丞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　鄂省立各校代表400余人，齐集省府请愿拨发教费。

△　沈阳城内工业区大火，延烧400余家。

3月19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电国联调查团，希望主持正义，将中日争端谋一公正解决。

△　上午10时，中日停战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在沪英总领署举行，出席者中国郭泰祺，日本重光葵，及英、美、法公使、意代办，讨论实行停战及日撤兵事，具体办法大体已经拟妥，郭泰祺、重光葵分别向各该国政府请示。

△　蒋光鼐、蔡廷锴等通电说明义款用途，胥用于抗敌救国。

3月20日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集紧急理事会议，各团体代表50余人出席，讨论应付上海外交问题，议决：一、反对丧权辱国条件；二、通电全国一致主张，反对日兵未撤退以前开始任何谈判；三、通电国联及国联调查团，绝对不承认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

△　中国青年救国会就中日和议发表宣言称：“如日本果具和平之诚意，则我国应本四项原则谈判：一、日本须无条件撤兵；二、不承

认设置中立区、和平区或扩充租界；三、淞沪战区内一切损失须由日本赔偿；四、东北案件必须与沪案同时解决。”

△　国民党中央统计处发布，沪变损失达15.64亿元以上，受直接损害人民逾81万，其中死亡6080人，伤2000人，失踪1.04万人。

△　日机第八次飞杭州。昆山、青阳港及沪租界、南市均有日机侦察。

△　东北义勇军拆去打通路绥中以东铁轨七八里，与日军开火。第四路支队占黑山县城。

△　济南市公安局是日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至22日，先后从第一乡村师范、女子师范、正谊中学等处捕去60人。

△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在上海成立，联盟斗争纲领强调“争取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束缚压制新闻文化之发展的法令”，使新闻事业“成为鼓动大众、组织大众之武器”。

△　台湾艺术研究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3月中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圩举行会议（江口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遭否决，会议确定“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中央红军分为两路，一、五军团组东路军，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西路军，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

3月**21**日　下午4时至6时，中日代表及各使第三次非正式中日停战会议在英驻沪领署举行，议定停战三原则：一、中国军队暂留驻原防；二、日本军队撤退至1月28日前之原防；三、由参加各友邦代表在内之共同委员会证明第一及第二两项之实行。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外交部长罗文幹报告沪停战会议谈判经过，及目前应付方针，决仍照原定方针相机进行。

△　陈立夫等闻汪精卫等有请蒋介石推动张学良出师关外之议，急电蒋趁机率师北上，略称："综其利益，约有五端：（一）收复国土，湔雪国耻；（二）牵制日寇，实现钧座持久抵抗之计划；（三）融和内部，顺应人心；（四）率北方健儿，巩固军事重心；（五）树立北方革命。""外交问题，须切实与英、美联络，最好以东三省经济利益为交换，既可败日，又可防俄，军实接济亦可由此向英、美设法。"

△　孔祥熙据金融界人士言及日机轰城由于在城驻军所致，特电蒋介石，"此后驻军筑垒，拟请饬令前方务必远离城市，避免敌人目标"，以保东南精华。

△　国联调查团在沪视察真如、闸北、江湾、吴淞等战区。

△　日机第九次飞杭州侦察，常熟亦有日机侦察。

△　湖北民众驱何救省团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请愿，列举何成濬荒淫暴虐、倒行逆施、任意搜括诸罪状，请迅予撤惩，以肃国纪。

△　西南政委会决议委任刘纪文为广州市长。28日刘到任。

△　陈济棠派余汉谋为江西"剿匪"总指挥，李扬敬为福建"剿匪"总指挥。

△　红四方面军在豫南发起苏家埠战役，是日至23日，将敌六个团分别包围于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主力待机打援。31日，击溃由六安、霍山出援之敌岳盛瑄第四十六师。4月下旬，敌皖西"剿匪"总指挥厉式鼎指挥第十二、第五十五、第五十七师等15个团两万余人，由合肥西援。红军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之敌，

主力东移，于5月1日至2日在苏家埠东之戚家桥、大岗头地区，将援军全部消灭。

3月22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改组鄂省政府，以夏斗寅为鄂省政府主席；二、国难会议改于4月7日举行。

△　国民党中央统计处发布东北损失概计，其中官方财产178.5364亿余元。

△　张发奎亲赴南京谒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第四军抵醴陵后进止，决定该军仍向南昌涂家埠前进。

△　杭州市教育会通电反对与日签订辱国条约，郑重宣言："在此敌兵压境之秋，如不思积极抵抗，甘为城下之盟，签订辱国条约者，本会认为民族之叛徒，誓不承认。"

△　何香凝通电全国同胞，略称："此次日祸中国，为我国数千年来最惨痛之事，中日停战会议，我方如先签订丧权辱国之条件，我民众当一致反对，万难承认。"

△　上海各界就上海停战会议发表宣言，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　铁道部电令平绥、北宁各路局，拒绝军事机关提取路款。

△　梅兰芳在北平义演得洋3900余元，汇沪作伤兵医药费。

△　驻北平日军百余人，全副武装，在东单、王府井南口一带演习巷战。

3月23日　颜惠庆就日本扣留东北关税事，通知国联提出抗议，谓日军在东三省强留关税及委派日顾问，并要求嗣后关税应交东省傀儡政府，中国绝对不能认为合法。国联虽有决议案，但日本吞并东三

省之工作已将完成。

△　中日停战正式会议因日司令白川不出席，改期举行。

△　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等电国联秘书长，揭露日本操纵伪满洲国之阴谋，略称："凡参加此项组织者均为性质可疑之以前官僚与军阀，受恫吓与贿赂之胁迫，成为日人之傀儡"，"以日方之傀儡视作中国人民之代表，不仅为一种损害，且为侮辱。"

△　徐州实验小学13岁学生吴书骥，捐款50元慰劳第十九路军。当日蔡廷锴等复电致谢。

△　台湾总督府设糖业实验所。

3月24日　上午10时，中日停战首次正式会议在沪英领署举行。中方首席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及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首席代表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军事代表日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海军参谋长岛田繁太郎，驻华日使重光葵。英、美两公使、意代办均参加。讨论停战草约绪言及我国军队暂驻现防问题。日方提出取缔便衣队问题，要求载入停战条约，戴戟当予驳复，否认我军有便衣队，故无载入条约之理由。午后二次会议继续讨论便衣队问题，无结果。

△　日机12次飞杭州，苏州亦有日机侦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保留赔偿损失权；同时，电颜惠庆转告国联。

△　国民党在粤中委萧佛成等电国民党中央，请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贯彻长期抗日主张，"战则迅派劲旅以相从，和亦以不丧权辱国为原则"。

△　国民政府特任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何应钦兼第二厅主任，朱培德兼第三厅主任；任命夏斗寅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朱怀冰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沈肇年为湖北省政

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王世杰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李书城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孔庚、孙绳、程汝怀、晏勋甫为湖北省政府委员；任命石瑛为南京市市长。

△　交通部任命李国杰为招商局总经理。

3月25日　中日停战会议在上海举行，讨论日军撤退程序问题，因日本代表态度强硬，主张日军退至真如狮子林线，我方代表坚决反对，会议几乎破裂。经英、美两使调停，决定由中国代表黄强和日本代表田代另组军事小组委员会，研究撤兵程序问题。

△　下午，中日军事小组委员会在英领署开会，就日军人数及撤退时暂驻地点等问题加以研究。日方代表极为蛮横，无结果而散。

△　日军攻太仓，江湾日军筑防线三道，并在沪新建营房。

△　沪日侨开居留民大会，议决主张开辟闸北为中立区，请求白川大将、植田中将不得撤兵。

△　日海军第一外遣队司令盐泽抵汉口。

△　川军刘湘部范绍增师出发援沪。

△　沪社会局训令市民联合会、各路商界联合会，劝告各业自25日起一律开市。

△　上海市教育局公布各学校因日寇侵沪所受损失：受害学校共228所，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

△　冯玉祥因抗日主张得不到蒋介石支持，以养病为名，自徐州赴泰山隐居。是日，冯对记者称：已三次请辞内政部长职；对日必须抵抗，切盼全国团结御侮。

△　汪精卫电请蔡元培留居南京，支持其政权。蔡婉函拒绝。

△　吉林自卫军两度攻克宾县，中东路形势严重，日军积极备战。

△　傅作义请辞绥远省政府主席。

△　安徽省府常会决议：安徽大学校长何鲁辞职照准，聘程演生继任。

△　平津院校教联会发表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清偿积欠，实行教育费独立计划。

3月26日　中日停战会议续开，停战协定草案已大部议妥，会议空气和缓。决定组织由参加会议各友邦代表在内之共同委员会，其职权规定为证明双方履行撤兵，不干涉撤退区域之行政。

△　中日军事小组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日方以军队众多为词，坚持驻兵吴淞、江湾、闸北。中国代表予以驳斥。

△　日军在太仓、嘉定间进攻被击退。

△　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等由沪赴京。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发表通电，主张克期组织民意机关，实行解除党禁。

△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沈阳招待英、美、法、德、奥及各国领事代表等，疏通调查团到东北视察事。

△　行政院决议，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　刘文辉遵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辞四川省政府主席职。

△　国民政府令准免邵裴子浙江大学校长职，任命程天放为浙江

大学校长。

△　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归并南京本校，编为第八期第二总队。

△　陕西关中黑霜成灾，田禾枯槁。

3月27日　中日停战会议休会。沪西曹家渡一带苏州河日军向河南税警团哨兵开枪射击，经守军抵抗，相持半小时始息。

△　粤救国抗日联合会电林森、汪精卫、蒋介石，表示“拒绝一切丧权辱国条约，粤同胞誓为后盾”。

△　上海复业委员会决议，定4月1日忍痛开市。

△　沪失业工人激增至16万余人，何香凝除自捐洋1500元救济失业工人外，并函沪市银行公会等商业团体尽量捐助。

△　国民政府下令嘉奖赣州“剿匪”将士，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晋级，并传令嘉奖该旅官兵；第十八军军长陈诚“调度有方”，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指挥得力”，均予嘉奖。

△　杨虎城通电声讨东北叛逆，表示“分属军人，一致誓保疆土”。

3月28日　中日停战会议讨论修改后之《停战协定新草案》，中方代表郭泰祺提出日军应在一定期限内完全撤退，恢复1月28日以前原状。日方反对。反复讨论无结果。

△　中日军事小组委员会续开会，日方仍坚持军队众多，须暂退至吴淞、江湾、闸北、真如四区。中国代表指出以上四区非原则第二项规定之撤兵地点，仍坚持照1月28日以前原防。

△　日机三架飞杭州市低空侦察。

△　汪精卫、罗文幹分别宴请国联调查团。汪致词略称：中国无排外之意，对于和各国订立的条约，无不尊重维持。中国人民排日是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行为所促成。“中国人民对于现在时局所抱的希望及志愿，为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对东北傀儡政府的出现，“决不能容忍”。“至于在东北从事于经济的开发，则中国人民必乐与各友邦携手进行”。

△　国民政府令：内政部长冯玉祥未到任前，着政务次长彭学沛暂代部务。

△　东北民众自卫军约3000名攻克吉林农安县城。

△　陈独秀发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前途》一文。

△　伪满洲国宣布关税、盐税独立。通令大连、营口、安东、哈尔滨、松花江、满洲里、绥芬河、珲春等海关，自4月1日起归伪满洲国财政部管辖。

3月29日　中日停战会议继续讨论《停战协定新草案》，正式通过正文第一条，实行停战。第二条中对我军暂留原防一句无争议，但对我方主张战区秩序恢复后，日军即应由暂驻线归原防，日方坚不同意。第三条撤兵事全未决，日对张华浜、蕴藻浜、张翔港及江湾淞沪路以东，不肯撤退。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晚宴国联调查团，即席致欢迎词，称“望经过此次调查之后，得一公正及一永久之解决，藉以整理中日关系，保全远东和平”。

△　行政院决议特派陈济棠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南宁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九路军副总指挥。4月2日，国府明令发表。

△　第三十六军军长路孝忱在京晋见蒋介石，条陈“剿匪”意见，

并报告赣东最近“剿匪”情形。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电勉东北义勇军将士团结奋斗到底，“本会各团体必尽力为助，不以道远而坐视”。

3月30日　中日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撤兵地点问题，日方提出以下各地为日军暂驻区域：一、吴淞方面，暂撤至吴淞镇、蕴藻浜以南及张华浜一带；二、江湾方面，暂撤至淞沪铁路迤东、万国体育场一带；三、闸北方面，暂撤至六三花园日本公墓一带；四、杨树浦东部，暂撤至引翔镇江边一带。我方以此项要求与撤兵原则第二项不符，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争执不决。

△　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幹等与国联调查团开谈话会，就中日争端及东北问题再次交换意见。晚，蒋介石宴请调查团。

△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救国会和中国学生救国会三团体，推派代表郑杰等晋见外交次长郭泰祺，指责政府外交软弱，提出四点要求：一、坚决主张无条件撤退暴日在华海陆空军，在未撤退以前，反对任何谈判，出卖民族利益；二、坚决反对中日问题局部解决；三、对日惟以武力抵抗才是出路；四、外交方针绝对不得违反民意。

△　国民政府令准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辞职。

△　立法院举行第一七八次会议，通过《贪赃治罪法》。

△　东北同胞救国大会由吉林发出宣言，代表东北3000万民众誓死否认伪满洲国。

3月31日　中日停战会议通过第二项原则，日军撤至1月28日前之原防；但撤兵日期，日方以须视秩序能否恢复为辞，不作肯定。

△　日机一架飞江阴侦察。沪前线日军数百人向我纪王庙附近之

北渡场及陶泥巷两处进攻，被我军击退。

△　南京新闻界发表《敬告国联调查团书》，揭露日本自九一八至“一二八”之暴行，表示“中国无论如何，决不以尺土寸地让人”，“东三省一日不收回，在华日军一日不撤退，中国人民则一日不停止其抵抗暴日之行动，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　蔡廷锴电劝粤方陈济棠等将领，为抵抗暴日，“国内诸公虽有杀父之仇，都可捐弃”。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吴忠信为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专任安徽省“绥靖”主任。

△　国民政府令湖北陆、空军联合进攻洪湖贺龙红三军，以徐源泉任指挥。

是月　　伪满国务院通令伪民政部转知各中小学校：“着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

△　天津大公报社是月代收天津各界捐款10.4万余元慰劳第十九路军及救济上海难胞。

4月

4月1日　　英使蓝普森邀中日代表及各使举行茶会，向中日双方调停沪战。外交次长郭泰祺表示日军最后撤兵期必须明白规定。日方仍坚持须视以后情形而定。

△　国民政府急电沪停战会议中国代表郭泰祺，详示对日军撤退问题之方针，对撤退时间及暂驻区域均作规定。

△　蔡廷锴在京对蒋介石谈，上海系中国领土，日军撤退，应以撤回本国为合理，若撤兵时间不确定，则停战会议之效力等于零。

△　国民政府将意见书交国联调查团李顿，内容分：一、中日甲午前后之国交；二、中日历年之悬案；三、东北铁道之关系；四、辽案突发之真相；五、上海事变之经过；六、和议谈判之进行；七、我国政府之意见。

△　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亦称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成立。戴笠任处长，设一室二科，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任侦察科科长，邱开基任执行科科长。后增设交通科，梁干乔任科长。编制145人。

△　外交部抗议日政府嗾使伪满强接海关，截留盐税。

△　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率第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师，分别从湖北孝感、天门、沙洋出发，三路进攻天门瓦庙红军贺龙等部。

△　军政部电赣“绥靖”公署，允月拨50万元充反共军费。

△　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及各学院院长以经费困难，向教育部总辞职。

△　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正式成立，选举许世英、史量才、朱庆澜、王晓籁、虞洽卿等41人为执行委员。

4月2日　　中日停战会议续开，日仍坚持不确定日军撤退期限。日方利用汉奸组织闸北地方维持会。

△　日方代表陆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在军事小组委员会上讨论撤兵地点时，节外生枝，询问我国军队在苏州河以南与南市、浦东等处之防务情形，我方以此事与停战会议无关，严词拒绝。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见外交次长郭泰祺，要求对日军撤退地点及时间勿迁就。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外交问题，集中讨论如何应付僵持之中日停战会议。

△　国民党中执委复电粤中委萧佛成等3月24日电，说明此次上海停战谈判是根据国联决议确定停止敌对行为及撤退日军办法，不涉任何政治问题，表示中央对日方针，“具长期抵抗决心，以不丧权辱国为主旨”。

△　四川省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队员百余人，由队长陈潜夫率领，是日到达淞沪前线，编入第十九路军翁照垣之第一五六旅。

△　国民政府改组侨务委员会，免去林森、吴铁城、周启刚等38人侨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吴铁城、周启刚、林文庆、陈嘉庚、胡文虎等53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指定吴铁城、周启刚、曾养甫、萧吉珊、黄吉寰、戴愧生、陈孚木、曾仲鸣、林柏生为常务委员，吴铁城为委员长，周启刚为副委员长。

△　国民政府任命洪中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原兼署长陈仪免职。

△　西康省防军司令格桑泽仁在康叛逆行动，经蒙藏委员会向行政院请示处理。是日，行政院电令刘文辉勒令格桑泽仁自行取消西康省防军司令及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听候查办。

△　张发奎部由醴陵出发入赣“剿匪”。

△　日伪军总攻吉林农安。3日，李海青自卫军弃农安退扶余。

△　教育部发表1931年留学生人数，共为730名。留学国别以日本最多，占总数41％强；所习学科以法科最多，几占总数三分之一。

△　浙江建设厅丝绸救济会决议：一、请国民政府规定茧价；

二、旧存丝茧设法推销及补偿损失；三、增加人造丝原料及织物进口税；四、劝民众勿买叶养蚕；五、电国民政府设法代为烘茧，并组织丝绸救济会。

△ 上海《时事新报》馆资方为增加收入，强迫工人代印《大晚报》，工人以未得报界工会命令，拒绝承担。资方诬陷工人“煽动罢工”，将全体工人驱逐出馆，封锁大门，又擅自拘捕工人马德仁等八人，事件遂扩大。《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全体工人均发表宣言，支持《时事新报》工人斗争。

4月3日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通过促日撤兵宣言，称上海300万民众誓死反对有条件撤兵，任何外交当局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日本有条件撤兵，即一致认为出卖中华民国的主权与领土的国贼，以最严厉的方法对付之。大会并警告郭泰祺不得接受任何条件，否则“爱国民众决不能为贵代表恕也”。

△ 日机40架飞沪示威。

△ 天津电报局同人首倡救国飞机基金，将月捐354元送《大公报》保存，并通电全国各电报局同人速起进行。

△ 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任鸿隽以经费困难，再次向教育部辞职。

4月4日 中日停战会议在沪续开，日方提议要中国代表说明苏州河以南及浦东等处驻兵情形。中方据理反驳。日方坚持撤兵时间不能先行决定，当由日方自定。谈判无结果。

△ 汪精卫晨接见郭泰祺商外交事，并将政府最后意旨训示后返京。临行发表谈话，否认国难会议之召集有将和战责任诿诸国民之意。

△ 郭泰祺电国民政府，因停战会议进行困难，坚辞外交次长及中日停战会议代表职。5日，政府复电慰留，郭打消辞意。

△　汪精卫在沪发表谈话，声称："国难会议会员为政府所聘任，并不是由人民选举，讨论国家大事是有限制的（按：以御侮、救灾、绥靖为范围），政府绝无以任何责任使所聘任的人负担的道理。"又称："训政到宪政，须经过时间与条件"，政府的决心是把训政时期缩短，使宪政早日实现。

△　国联调查团抵汉口，次日赴武昌视察，分别接见各界代表。

△　行政院训令各部、会，"嗣后一切义勇军及类似之组织，一律禁止"。

△　潮州旅沪同乡会电军政部反对屈辱条件，称中日停战会议不得有妨害中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之条件。

△　上海公安局破获公共租界戈登路701号共产党机关，逮捕金味园、谢铭远、柳青及陈仙曦等四人，并搜去大批文件。5日又捕女共产党员一人，均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　天津高等商业学校雪耻救国基金储蓄会及天津电报局机器房同人，响应救国飞机捐款，捐257元交大公报社保存，作将来购机之用。

△　伪满洲国向日本财阀三菱、三井无息、无担保品借款2000万日元。

4月5日　　日代表植田发表声明，声称日军来华目的，在保护侨民及商务上权益，决无永占中国领土企图，撤退须视地方情形自主，不得限定撤退日期。同日，前线日军仍继续增援修筑工事。

△　沪市府通缉闸北维持会长胡立夫、副会长汪度、警务处长常玉清。

△　国难会议沪会员张耀曾、黄炎培等66人电国民政府，陈述不

到洛赴会理由，称政府既定国难会议以御侮、救灾、绥靖为限制，“则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

△　中共中央发表《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

△　伪满洲国外交部电外交部拒绝顾维钧随国联调查团入境。

△　国民政府任命吴忠信、罗良鉴、何其巩、叶元龙、程振钧、光昇、江彤侯、张鼎勋、吴叔仁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吴忠信兼省府主席，罗、何、叶、程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任命贺耀组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派胡世泽为出席国际禁烟顾问委员会第十五届常会代表。

△　夏斗寅电军政部，请辞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及武汉警备司令各军职。

△　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奉令改组为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是日该会正式成立，选举总税务司梅乐和、王晓籁、李铭、虞洽卿、谢韬甫五人为常务委员。

△　东三省邮务员工通电，反对伪满接收辽宁邮政管理局，宣布不受乱命，并停止东三省一切邮务。

△　教育部长朱家骅赴平，将晤蒋梦麟、任鸿隽等，商平、津教费维持办法。7日朱抵平，表示平、津教款自3月份起可发五成。

4月6日　　中日停战会议军事小组开会，议定日军暂驻地点四区：一、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东邻黄浦江；二、江湾方面，东北自殷行镇，西南临万国体育场；三、闸北方面，在横浜桥东，包括六三花园、日本公墓及天通庵车站；四、引翔港方面，东临黄浦江，南接公共租界杨树浦东部，但撤兵仍无日期。前线形势紧

张，双方均备战。

△　国民政府核定全国军费每月1000万元。

△　戴季陶呈国民政府请辞考试院长职。11日，国民政府复电不准。

△　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表宣言，反对闽省代主席方声涛实行鸦片公卖。

△　湖北麻城地震，房屋倒十之七，人畜多死伤。波及汉口、鄂城、浠水等地。

△　伪满洲国公布土地租借法，承认外人土地租借权，限定租期30年。

4月7日　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到会会员144人，国民党中委12人，各机关团体代表700余人。汪精卫致开幕词，略称："国难会议应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

△　上海中日停战会议续开，讨论关于日军完全撤退日期问题。日方代表植田再次询问苏州河南及浦东一带我军驻防情形，并表示不同意规定日军撤兵日期。英使蓝普森提出折衷办法三条：一、上海秩序完全恢复可确保日侨安全时，日军希望于六个月内完全撤兵；二、增加中方附带声明，非至日军完全撤退，中国认为本协定尚未履行；三、中方发表单独宣言，非至日军完全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区域越界马路，中国认为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及本协定尚未履行。北平《晨报》对此发表评论，指出此项折衷办法，"空洞无实，效用等于零"。

△　国联调查团由汉乘轮返南京转车赴北平。

△　汪精卫在洛阳发表谈话，声称"伪国扣关盐税，政府除发表声明外，并有最后处置办法，现在仅为日军撤退问题，若日撤退，则伪

国自消灭”。

△　实业部开会讨论利用外国资本发展国民经济问题。

△　浙江建设厅曾养甫向沪金融界商借巨款，救济浙丝绸业。

△　安徽盱眙县饥民与停泊该地之米船数百艘发生械斗。

△　天津英商和记洋行女工2000余人因不堪忍受工头剥削全体罢工。8日，经调解每日增加大洋三分，遂复工。

△　沪《晨报》创刊，社长潘公展，主笔陶百川、何西亚。

4月8日　　国难会议开第一次大会，由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作关于御侮、救灾、绥靖问题的报告。外交、军政、财政部代表分别作外交、军事、财政报告。

△　四川旅沪同乡会致函全沪各民众团体，为英公使所提折衷办法“公然偏袒日方”，“请我全沪同胞一致起来，监督政府当局及出席代表立即拒绝此项办法”。

△　陈济棠与朱绍良商定“剿匪”计划：张贞、毛炳文二师负责“围剿”长汀、广昌一带之红军罗炳辉部；李扬敬、黄质文、路孝忱、李韫珩等师负责“围剿”武平、岩前、弋阳、横峰之红军方志敏部；余汉谋、李振球、叶肇、陈诚、周至柔、罗卓英、公秉藩、张英等师负责“围剿”赣南彭德怀、朱德、李明瑞部；陶广、李觉、罗霖、刘夷等师、旅分区负责“围剿”修水一带之红军孔荷宠部。陈济棠派空军第三、四两队飞机20余架抵赣州助战。

△　平、津各院校因教费无着实行罢教。朱家骅与各方设法疏解。同日，北平师大学生百余人到德国饭店面见朱家骅，请速派校长，并催拨经费。

△　浙大校长程天放赴京，面请教育部发欠费。

△　闽省政府撤销鸦片公卖。

△　伪满洲国公布日货进口无税。

△　豫南潢川、光化、固始、商县、息县去年水灾，灾民约30万，豫南特区抚绥委员会通电请筹款百万急赈。

4月9日　　上海中日停战会议续开，对英使蓝普森所提三项折衷办法之第一条，日撤兵为六个月，中方主张日军限四个月内撤完，双方争执甚烈，几濒破裂。讨论无结果。日方允会后向东京日政府请示。

△　军事小组委员会继续会议，日方代表要求中方代表说明浦东及苏州河南有无我军驻扎问题。中方代表加以驳复，并称日方此项要求违反国联决议与停战协定，枝节横生，日方应负会议破裂之完全责任。

△　国联调查团抵北平，张学良等到车站欢迎。

△　汪精卫在洛宴请国难会议会员，发表演说，说明在洛开会之要义，称“足以振励打破国难之精神，对日作长期之抵抗”。

△　立法院通过1931年度总预算案，收入共计7.13亿元，支出共计8.93亿元。

△　马占山7日潜赴黑河。是日电北平张学良、国民政府、国内各报馆，表示继续抗日，称“占山一息尚存，誓本以身许国之初衷，决不负期许之至意”，并称“所有军政各机关，即时成立，照常办公”。

△　国难会议电慰吉林自卫军。

△　格桑泽仁在西康巴安独立，刘文辉部进剿。

△ 鄂清乡促进会成立，方本仁等七人为常委。

△ 江西石城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参加革命战争等八项决议案。12日闭幕。

4月10日 国联调查团晨访张学良，晤荣臻，询九一八事变经过。同日，调查团李顿对外报记者发表声明，略称“中国代表顾维钧为国联代表之一员，反对华代表无异反对国联，华代表有赴东北必要”。

△ 伪满洲国电外交部，拒绝顾维钧出关，外交部拒收退回。

△ 上海日军仍在前线积极备战，在吴淞建营房，杨林口日舰炮击太仓。日机29架先后在闸北、浦东等处侦察示威。

△ 旅沪九省同乡会通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外交部，称“如日方不自动撤兵，我即当驱逐出境”，“苟政府当局一味避战求和，竟贸然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置土地人民于不顾，我旅沪各省民众为不愿为亡国之民，惟知誓死反对”。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函英使蓝普森，对中日停战会议上所提折衷办法表示反对。

△ 国难会议开二、三次大会，讨论御侮及政制，并电慰东北义勇军。

△ 上海国难会议会员张耀曾等人组织政党“民宪协进会”。

△ 广州《新闻报》刊登涉及日皇小品文字，刘纪文应日领要求勒令该报停版。

△ 中国青年救国会等团体通电全国，反对在上海设立自由市。

△ 粤军余汉谋部入赣“剿匪”。

△　江西宁都县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3日闭幕。

△　红军一、五军团占领福建龙岩城，张贞第四十九师第一四五旅杨逢年部逃适中、南靖方向。

4月11日　国联调查团在北平开始调查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晚张学良在怀仁堂宴请调查团，力述中国统一之必要。

△　沪中日停战会议延期。军事小组晨赴引翔港视察，下午开会，讨论浦东及苏州河南之我军驻防问题，我方代表黄强以此系中国主权问题，拒绝讨论。

△　国难会议电请国联调查团主持公道，“望根据事实，为正确之报告，使日本强暴情形，得以明白昭著于世界，受正义与公理之裁判”。

△　国难会议决议，宪政未实施前提前设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会。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本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出工部局华董虞洽卿等五人，华委六人及该会执行委员27人。

△　河北省民生银行总行在天津成立。

4月12日　国难会议闭幕，通过请政府克日将张学良撤职查办，所部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失地等案，并发出四电：一、慰勉颜惠庆；二、嘉慰华侨捐款救国；三、嘉慰上海民众；四、勖勉全国将士。会议闭幕，发出宣言称：“中国在此严重局面之下，非集中全国才力，共作长期抵抗，无以图存。”要求政府接受御侮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及主持正义之友邦，共同排除日本暴力。

△　国联调查团在北平与张学良、万福麟等原东北军政官吏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对东北问题作详细之恳谈。

△　沪中日军事小组会续开，日方仍提浦东、南市中国驻军问题，我国代表以其无稽，加以辩驳，争论达二小时无结果。

△　鲁涤平、熊式辉、吴忠信、顾祝同在南京军校与蒋介石商浙、赣、皖、苏四省政务。

△　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举行“四一二”清党五周年纪念会，全市严加戒备。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杨虎、陈群等晚在杜宅大宴宾客。南京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亦举行纪念会。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根据昨日该会代表大会决议，发表宣言，声明租界安全责任应属中国，自由市之主张为侵略者之迷梦。

△　马占山自苏境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通电全国，揭露日本制造和操纵伪满的真相，称伪满洲国之成立，对东北民众“迫勒威胁，无所不用其极，所谓民意，纯出日人制造而已”。同时致电国联调查团（发洛阳国民政府、北平张学良译转），以亲身经历事实揭露日本侵占东三省，炮制伪满真相，要求实地调查。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定5月1日生效。

4月13日　沪中日停战会议暂停，郭泰祺已通告各关系国。郭语记者，大会须俟国联解释日本撤兵时期再开。

△　国联调查团与原东北军政官吏举行第二次谈话会，并接见荣臻、王以哲询问沈变经过。

△　国民政府特派孔祥熙为考察各国实业特使。

△　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成立，共有34个团体参加，推举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等15个团体为执行委员，主张暴日未撤退在华海陆空军以前，反对任何谈判；誓死反对中日问题进行局部解决；反对依

赖国联。

△　上海市民联合会等百余团体发表宣言，主张中西纳税人互相合作，研究解决今后租界之联防。

△　上海各团体电国联，反对英使蓝普森所提折衷办法。

△　交通部订定招商局整理计划，取清年终双薪，革除分局包办制度，减裁职员。

△　日兵车一列在哈尔滨郊区出轨，死伤百余人。

4月14日　沪中日停战会议军事小组会续开，日方仍提浦东、苏州河南我军不驻兵问题。无结果，小组会展延。

△　国联调查团上午10时在北京饭店接见在平满蒙王公代表。11时接见日代表。李顿等至外交档案处阅1905年铁路条约。下午4时调查团至顺承王府与原东北军政官吏举行第三次谈话会，商谈吉、黑及中东路问题。

△　外长罗文幹以日方节外生枝，上海停战谈判无从进行，于晚8时往铁部晋见汪精卫，对沪事有极重要之接洽。

△　蒋光鼐晨抵京，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沪中日停战会议经过情形，并请示一切。

△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蒋介石为中国童子军总会正会长，戴季陶、何应钦为副会长。

△　晋绥军事委员会在太原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徐永昌、傅作义、张荫梧、楚溪春等11人为委员。

△　蒋介石在南京军校邀中大、金大及金陵女大三校长讨论教育经费问题，各校长请蒋转请政府特别救济，蒋允设法。

△　刘纪文辞广州市长职。

△　红军攻占湖北蕲春，县长王道中被俘，黄梅队长胡佐民被击毙。

4月15日　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入京报告沪中日停战会议经过。

△　上午国联调查团在北平先后接见东北各法团民众代表、北平各文化机关及学术团体代表、北平各大学教授代表。12时接见平、津新闻记者。

△　汪精卫到陵园访蒋介石，商谈目前外交问题。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沪访孙科，敦促进京共赴国难。林称：孙科对外意见与中央一致。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首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　上海各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通电全国，谴责国民政府承认划闸北、吴淞、引翔、江湾诸要区为敌军占据之地，自甘居于战败国之地位，表示“对此甘心屈辱之谬妄外交，誓死反对”。

△　国民政府令：《惩治绑匪条例》、《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暂行特种刑事诬告治罪法》、《贩运人口出国治罪条例》，均着废止。

△　国难会议会员蒋梦麟等返平。据北平某会员谈：“国难会无拘束政府力量，无法实行，此次集合如许所谓知识阶级于一堂，不能寻出一解决国难切实办法，可见解决国难，决非此百余人聚坐空谈所能解决。”

△　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布告，以频年军事支出浩繁，致财政支绌，不可名状，拟提前于16日发行国防公债3000万元。

△　广州脑膜炎流行。

△　《台湾新民报》改周刊为日刊。

4月16日　国联大会所组织之监视远东情形之十九国特别委员会开会，讨论日军从上海撤退问题，各小国代表赞助中国之主张，应将撤兵日期加以限定。

△　国联调查团接见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和前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详谈吉、黑情况。次接见东北大学教授代表宁恩承等，听取对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种种暴行的陈述。

△　上午行政院开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郭泰祺出席报告上海停战会议经过。下午会议决议：一、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苗培成辞职应予照准，请任命冀贡泉继任；二、陕西省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杨虎城辞厅长兼职，应予照准，请以该省财政厅长李志刚调任，任命韩光琦为财政厅长。

△　上海各大学教授电国民政府主张对日抗战，称："不为乞和之秦桧，即为死战之岳飞，何去何从，望即早决。"

△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成立。

△　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与张东荪等联络一些研究系成员在北平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议，建立"再生社"。

△　中华国民拒毒会函请行政院法办闽省鸦片公卖罪魁闽省代主席方声涛。

△　上海市商会推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暂缓实行新糖税。25日，

财政部复电不准。

△　哈尔滨白俄暴徒4000余结队游行示威，冲入中东路办事处捣乱破坏。

4月17日　晨，蒋介石据颜惠庆电陈国联特委会形势，与汪精卫在南京汤山俱乐部召罗文幹、陈铭枢、何应钦等商议对策，包括我国最低限度之让步、伪国拒顾维钧出关对付办法等事项。

△　章太炎就伪满拒绝顾维钧往东北事致函顾谓："足下此行，为日人所忌，其极不过一死耳。牺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启国联之义愤，为利于中国者正大，岂徒口舌折冲所可同比耶。"

△　朱家骅离平返京，谈平、津教费7月份起，准可按月拨35万元；4月份应拨经费，返京当催财政部速汇。

△　上海《时事新报》工人斗争仍在坚持中，邮务工会、上海海员工会等大力支援该厂工人。

4月18日　下午5时，外交次长郭泰祺自京赴沪，黄强同行。行前接见记者，称沪会不过停顿，本未决裂，迟早必开；并称：过去因日方枝节横生，致使会议陷于困难，今后续开，亦不抱乐观。

△　日军第十师团2000人，随师团长广濑寿助中将抵哈尔滨，主力部队1.4万人19日全部到达，与第二师团交接防务。

△　驻北平日军130余名晨9时在东长安街演习。

△　马占山电沪各界表示抗日决心，略谓："山一介武人，只知中国人爱中国，已于月之三日统率文武将官急来黑河，一面向国联调查团揭穿日人阴谋，一面作誓死之抵抗，救我民族。至于成败利钝，非所计也。"

△　东北民众在北平举行东北沦亡七周月纪念会。东北大学学生200余人在北平师大研究院公祭抗日阵亡将士。

△　上海各界组织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成立，选史量才等27人为理事。

△　晨沈阳大火，皇姑屯之关东军粮库被焚，延烧达数小时。

△　英高地团第二营士兵900人乘“坎特号”旗舰由上海撤至香港。

4月19日　外交部次长郭泰祺由京到沪，沪中日停战会议将续开。我方已定停战会议重开日期须在国联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案之后。英使蓝普森电话通知日使重光葵，请与郭泰祺磋商中日停战会议再开事宜。

△　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通过上海中日问题之决议案，希望最近期内日军完全撤退，上海混合委员会有权决定撤兵期限。

△　国联调查团离平过津赴秦皇岛转东北，顾维钧同行。

△　国民政府特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辞职照准，任命叶蓬为武汉警备司令。

△　国民政府特派章嘉活佛为蒙旗宣化使。

△　军政部令派陈调元办理皖省“剿匪”事宜。

△　沪各界复电慰问马占山，表示“上海已成立规复东北后援之组织，互为策应”。

△　财政部电各军事机关，对已征统税之各种货物不得再行重征，以免妨碍税收。

4月20日　外交次长郭泰祺赴驻沪英领署，与英使蓝普森交换中

日停战会议续开意见。

△　汪精卫在京宴美使詹森，罗文幹作陪，就中日事件交换意见。詹森21日离京赴沪。

△　何成濬、刘镇华、张钫等赴信阳与刘峙筹商鄂、豫“剿匪”办法。何行前表示“攘外必先安内”。

△　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占福建漳州，歼国民党守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2000人。福建省府电国民政府及军委会告急，电促粤省派部协助，并加强厦门防务。

△　粤空军总司令张惠长抵京，谒汪精卫、蒋介石，请示扩充空军。

△　鄂教育界派代表谒鄂省府主席夏斗寅，要求教育经费独立。

4月21日　外交部训令颜惠庆完全接受国联十九国委员会关于要求日军完全撤退上海的决议案。

△　国联调查团抵沈阳。

△　行政院决议：驻英公使施肇基因病请辞应予照准，请任郭泰祺为驻英公使；在中央大学校长任鸿隽未到校以前，派刘光华代理中央大学校务；裁撤编审处，设立编译馆，任辛树帜为国立编译馆馆长。

△　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县成立，唐聚五任总司令。在誓师大会上，唐用手指鲜血写下“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字。

△　豫省党政军联席会决议，借中原公司15万元，汴商八万元，郑商七万元，共计30万元，作“剿匪”军费。

△　达赖率藏兵千余占青海南部，马麟调兵抵御。

△　华北教师联合会发表宣言，主张平、津教款绝对独立，发清一切积欠。

4月22日　美使詹森回沪，与英使蓝普森同邀郭泰祺交换续开上海停战会议意见。

△　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改进全国军队编制问题，拟定将全国军制实行划一，仍以师为单位，每师改为二旅四团，每连改为135人，全师暂定一万人。

△　何成濬由信阳抵汉口。何谈：在信阳与刘峙商定两事：一、由刘镇华派一师接防襄樊、光化；二、会剿鄂东“匪共”。

△　逮捕向忠发的凶手、上海警备部督察员王斌在沪法租界维尔蒙路被人开枪打死。

△　伪满发表日人驹井德藏任伪国务院总务长官，坂谷喜一任财政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任外交部总务司长，三谷清任奉天省警务厅长。

△　红军攻克福建海澄、石码，23日克同安，25日克漳浦，27日克云霄，至月底，长汀等九县全被占领。

△　据《申报》讯：邮资加价办法业经邮政总局电令各省于5月1日实行，辽、吉、黑三省情形特殊，暂照旧例，俟东北失地收复后再行加价。22日，立法院讨论邮资加价案，以此案既未经中政会讨论，又未经本院审议，行政院实无权独自决定实行日期，决定推陈长衡起草质问书，送行政院转饬交通部立即停止执行。

4月23日　国联调查团赴驻沈阳日本总领事署会见代理领事森岛守人，征询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情况。

△　蒋光鼐抵苏州视察防务。同日，汪精卫、罗文幹、陈铭枢由

京抵昆山转前线视察。

△　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入京，向蒋介石报告上海中日停战会议经过。

△　沪日军一部撤退回国，太田少佐率海军陆战队第七大队离沪。重炮大队亦开吴淞，从张华浜登轮回国。

△　行政院讨论筹设各省、市、县民意机关问题，决定先在京、沪、平、津、穗、汉等大城市筹设参议会。

△　立法院通过兵役法原则，规定年满18岁至40岁男子，均有服兵役义务。

△　杨虎城电呈国民政府，报告陕西36个县降黑霜，恳办赈以资救济。

4月24日　英使蓝普森与郭泰祺由沪抵京商沪事解决折衷办法。晚外长罗文幹宴请英使，随即在外交官舍非正式会谈沪事。

△　孙科在沪对记者谈，已拟定目前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主张召开三中全会，促成宪政，彻底抗日。

△　上午，国联调查团在沈阳访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询问目下军事情况。

△　最高法院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牛兰夫妇罪状调查报告》，声称“牛兰夫妇确与湘、赣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并与近在上海枪毙之共产党员向忠发有关系”，并称最高法院已训令江苏高等法院依此报告起诉，“如法院证明被告确犯图谋推翻现政府罪，则应处以死刑”。

△　黄绍竑抵京谒见蒋介石，报告对粤、赣联合防共事。

△　鄂省政府主席夏斗寅及省府委员欢宴党、政、军、商、学、新闻各界。夏报告施政方针，望各界援助，并望军界领袖切实“剿匪”；商界领袖繁荣市场，提倡国货，协助政府。

△　日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针对马占山揭露日本在东北的阴谋，表明反满抗日态度，拟定对伪满的方针与“满洲平定方略”，拟于5月下旬乃至6月上旬开始对黑龙江讷河、海伦、黑河等地的“平定”行动。

△　李杜吉林自卫军占领黑龙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25日又被日军第八旅团村井支队攻陷。

△　上海《时事新报》被迫离馆工人发表第二次宣言，要求：一、立即恢复4月2日以前之状态；二、反对填写志愿书；三、离馆期内工资照发；四、馆方向报界工会道歉。提出“反对破坏工运的《时事新报》资本家”等口号。

4月25日　　罗文幹、郭泰祺偕英使蓝普森晤蒋介石、汪精卫谈沪事。罗文幹告记者，政府对沪中日停战会议抱两原则：一、停战协定内绝对不能含有政治问题之条件；二、必须确定日军撤退地点与日期。

△　国联调查团第二次访本庄繁，询问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的经过。

△　孙科在沪寓所对报界发表谈话，详细解释由其所拟之抗日救国纲领，征求各记者意见，谓今日中国欲求出路，惟在全国一致抗日；苟非政治易辙，全国团结抗日势无可能；主张速行宪政，开放党禁，联合美、苏共同对日。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居正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长冯玉祥辞职不就，特任黄绍竑为内政部长（5月3

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特任陈树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　赣粤闽“剿匪”总司令部发表贺国光为该部参谋长，下设参谋、副官、军法、交通、军医、军需六处，以杨珏等分别为主任。

△　湖北财政厅呈财政部，谓月收109万元，支出216万元，计差百万元，请将中央原有补助费50万元继续拨济。

△　东北义勇军占领安达站，哈尔滨日军一旅团东下谋攻伊兰，李杜率部扼险防堵。

△　马占山自黑河电溥仪，切劝勿为傀儡，指示“为今之计，欲绝处求生，惟有俟国联调查团到达长春于接见之时，将日人压迫我公及组织政府之非出己意情形，据实详述，并请求调查团保护我公出国”，即使因而牺牲，亦优于身处樊笼因循坐误。同日，并电郑孝胥，责其“以溥仪孤注一掷”。

△　西安各校学生2000余人在民乐园举行欢迎戴季陶大会，因戴发表反共媚日演说，激怒学生，将戴乘坐之汽车烧毁。晚，公安局封闭学生抗日总会，逮捕总会职员两人。次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学生举行驱戴游行示威，被省府派兵镇压，伤十余人，被捕100余人。

4月26日　英使蓝普森及郭泰祺返沪。郭答记者称，英使之折衷办法为友邦善意，吾人当然乐于接受，但以不违背前协定之精神为原则。

△　国联调查团第三次访本庄繁，征询九一八事变当时之满洲方面状况。

△　蒋光鼐到京谒蒋介石等报告前方情况，并商洽关于日军撤退交涉之应付事宜。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联席会议决：一、唤起西南民众监督政府勿与日妥协；二、由一、四集团派劲旅于最短期内肃清赣、闽“匪”共，并电中央饬邻省友军“会剿”；三、陈济棠、李宗仁表示，在抗日“剿匪”事件未告段落前，暂不就中央所委新职，由陈、李将此情形报告中央。

△　湖北省府会议议决劝销善后短期公债300万元，充“剿共”经费。

△　国民政府派刘绍先代理陆军第四十三师师长；任命林秉周为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

△　湖北“绥靖”公署划京山、天门、潜江、应城、沔阳、汉川、钟祥、宜城等八县为“特别剿匪区”，行政、公安均归徐源泉指挥。

△　日军三个混成旅开吉东总攻义军，义军已于25日克中东路西之兰西城。

△　冀、晋、察、绥诸省以财政奇绌，定5月1日实行鸦片公卖，以充军费。

4月27日　中国代表张似旭与日本代表冈崎在沪英领署开会，整理中日上海停战有关协定文字。日使重光葵通知英使，日政府对折衷办法表示接受。

△　国联调查团第四次访本庄繁，询问九一八事变情况。攻击北大营之平田联队长及岛元大队长说明事变时沈阳城内之状况。

△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由苏州到京向蒋介石报告前方情况。

△　宋庆龄在上海谈：接欧洲电，请其代表中国出席7月28日在日内瓦召开之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已复电愿任该会

中央执委，但是否能代表中国出席，须俟牛兰夫妇之生命安危而定。

△　行政院会议通过救济江、浙丝业办法：一、减免生丝出口税；二、增加人造丝入口税率；三、发行兑换券1000万元。

△　李宗仁电吴奇伟回师入闽“剿匪”。

4月28日　沪中日停战会议在英总领事馆举行非正式会议，通过英使蓝普森所提之折衷办法。

△　国联特委会召开不公开会议，主席希孟报告修正上海停战决议案草案经过。国联秘书厅接日本代表团通知，内称日本已接受英使蓝普森折衷案，拒绝再参加十九国特委会讨论。

△　国联调查团起草第一次报告书，将于5月1日提交国联。

△　宋子文以伪满将东北盐余担保向日本银行借债，特呈请国民政府通知国联，在中日事件未解决前，伪国对外借款，中国政府不负偿还责任。

△　马占山通电声明：“黑龙江从未与日人订有条约。如有伪造占山名义，或任何人出面订立之契约，概不承认，均属无效。”

△　日军村井支队占黑省尚志东南之海林。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岁入岁出总额各为8.93305073亿元；公布《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施行条例》。

△　国民政府令准免侨务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林柏生本兼各职；中华民国驻英国特命全权公使施肇基因病辞职照准。

△　行政院决议将国难会议决议案分送各部、会施行。

△　内蒙王公联席会议，决接受章嘉宣化内蒙佛教，但请中央另委熟悉内蒙政情人员领导政治。

△　蒋梦麟自平赴京向教、财两部接洽平、津教费。

4月29日　　驻沪日军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举行阅兵式。韩国独立党员尹奉吉掷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公使重光、师团长植田、舰队司令官野村、总领事村井、日居留民会长河端均受伤。尹奉吉当场被捕。晚，外长罗文幹按国际惯例电重光慰问。

△　驻京日领馆举行庆祝日皇“天长节”，外交次长徐谟、亚洲司长沈觐鼎、警备司令谷正伦及各机关代表均前往祝贺。

△　国联特委会开秘密会，决定按照3月11日大会决议案草具报告。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谈话会，讨论召集国民代表会方案，各委员认为国民代表会名称须更改，10月10日召集嫌迫促。

△　鄂省府议决：呈请行政院抚恤李汉俊、詹大悲；拟发之短期公债改发“剿匪”及市政公债各150万元。

△　留京国民党中委举行谈话会，选任邵元冲为考试院副院长，送洛阳中央执行委员会核行。

△　粤空军总司令张惠长由宁电粤辞空军总司令职。陈济棠手令空军参谋长黄光锐代理粤空军总司令，任张惠长为第一集团军高等顾问。

△　粤赣闽三省“剿匪”总司令何应钦赴赣部署三省“剿共”事宜，5月1日抵南昌。

△　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联电闽省方声涛、刘和鼎、张贞、

卢兴邦、陈国辉等，请派兵夹击共产党军。

△　山东济南公安局将上月逮捕之共产党人袁兰荣等46人解送“军法会审委员会”裁判。

4月30日　国联大会通过十九国特委会所提中日停战决议案，共14条，主要内容有：停战撤兵谈判应依据国联3月4日、11日之决议案进行；日本政府担任履行将其军队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一如1月28日事变以前；日军撤退应于最近之将来履行；设立共同委员会证明双方撤兵，并协助华警接收日军撤退区域。

△　国联调查团第五次访本庄繁，询问沈阳市政、东北要人之个人财产及银行公司之处理问题。

△　汪精卫在京接见《大公报》记者称：“沪事即将了结，只要日本撤兵，事即可了。”又称：“东北问题将公开向日交涉，仍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

△　上日被炸伤之日居留民会长河端医治无效死亡。日总领事署派警由法租界当局协助，拘捕韩独立党人安昌浩及其他嫌疑人共17人。同日，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电慰日使重光葵等。

△　是日为《申报》创刊六十周年，该报发表纪念刊词《六十年来之国难》，谓：“最近五六年来……军阀政治与官僚政治重新抬头，国成割据，党成分裂，争夺权利，内战迭兴，尤以前年内战相持年余，死兵30万。为充作军费而发行之公债，亦数万万元。凡此战乱，实皆为斫丧我国家元气之斧斤，亦实即致今日国难之恶因。”

△　国民政府令：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另有任用，应免本职，任命王懋德代理该师师长；特派王麟阁、李范一为国际电政会议中华民国全权代表；任命公秉藩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行政院决议：任李建勋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任蒋鼎

文、周浑元分别为陆军第九、第五师师长。

△　南京警备司令部在雨花台杀害共产党人陈三等25人，另有判徒刑者数十人。

是月　监察委员高友唐弹劾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兼卫生署署长刘瑞恒，谓刘“蒙蔽政府，组织禁烟查缉处”，“名曰禁烟，实即利用职权，公开卖烟”，请将其交付惩戒。

△　东铁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电致国联调查团，陈述东省日军之暴行，表示自卫军抗日决心。

△　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在上海成立。

5月

5月1日　外交部训令郭泰祺签订沪停战协定。日外务省对停战交涉亦有训电到沪，表示“不问4月29日之事件，按原方针进行”。

△　国联调查团赴长春，顾维钧同行。

△　邮资加价是日起实行。《大公报》以《邮政加价问题》为题发表短评，指出：“人民普遍的增加负担，而没有经过中政会和立法院，为什么政府连自己的办事系统也不遵守？”

△　行政院训令“五一”节禁止游行。

△　北平学生200余人，持“五一劳动节纪念”旗帜出宣武门游行，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上海各业工人除交通、公用事业外，均一律放假一天。上海总工会召集全市各工会举行纪念“五一”代表大会。

△　张发奎第四军由醴陵出发赴赣“剿匪”，11日抵樟树。

△　江西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兴国县城召开，到会代表240余人，项英、陈毅、曾山等23人为大会主席团。大会发表《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宣言》，会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

5月2日　　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英军事参赞桑布尔对苏州河南及浦东方面我军驻防问题提出折衷新方案，即于会议录中由我方声明浦东本无驻军，苏州河南龙华、莘庄一带我方虽有驻军，但与日方相约各不前进，双方不得有敌对行动。中日代表一致接受。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急电蒋介石、汪精卫及罗文幹反对日本提出所谓南市、浦东永远不驻华军之要求。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惩治贪官污吏办法》，于最高法院设惩治贪官污吏专庭，以最高法院院长为庭长，监察院及行政院代表参加组织之。

△　立法院为邮资加价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书。

△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滇、黔、湘、桂、闽、赣等八省军事反共会议。

△　上海市民联合会通电发起举行全国各团体救国会议，讨论救亡大计。

△　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部占领湖南汝城。13日又被敌王东原第十五师攻占。

5月3日　　上海中日停战会议中国代表郭泰祺在寓所接见上海各救国团体代表，应众要求宣读停战协定草案。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用铜元、茶杯掷伤郭之左额。汪精卫对此发表谈话，主张痛惩，并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迅即查明殴伤郭的凶徒，“递解归案，严加讯办”。

△　行政院会议，外长罗文幹报告沪停战会议经过及日撤兵后接

收被占区域计划。

△　国联调查团抵长春，五委员访溥仪。

△　于右任在上海各报发表《对孙哲生谈话之献疑》，反对孙科所谈“国民党中央不能领导全国，信用完全失掉，主张筹备实施宪政”之说，认为国民党还在“革命”时期中，不能放弃“训政”，否则即是“革命之危机”。

△　蔡元培电汪精卫称，牛兰案“政府应令法庭公开审判，并许自聘律师辩护”。汪精卫4日复电称：“牛兰案一切手续，均依照刑事诉讼法办理，与尊电相同。”

△　沪日军闯入租界新闸路乌镇路桥附近，刺伤华人七名。是日上海市政府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要求严重交涉，并饬属保护居住租界内之华人，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　国民政府任命郎官普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韩立如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周维泰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实业厅长，邹邦杰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　全国邮务工会通令各地分会反对邮资加价。同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交通部，反对邮资加价。

△　吉林自卫军冯占海部克复宾县。

△　中华民国拒毒会函汪精卫称，除江、浙、鲁三省外，其余各省均次第实行鸦片公卖，外传中央酝酿公卖复活，请宣布禁烟政策及制止各省实施公卖之办法。

△　自九一八以来，各地禁止现金出口，本日财政部通电各省市“一律取消禁令”。

△　广东省政府改组，林翼中任主席，林云陔任广州市长。

△　粤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裁撤海军总部，改隶第一集团军管辖；陈策任第一集团军高等顾问。同日，陈济棠准备以武力接收粤海军。

5月4日　　国联调查团第一次报告书全文在南京发表，遵国联决议述东北实际情况，关于东三省军事情形由日本军事当局供给；并称恢复和平安全办法尚待考量。

△　颜惠庆向国联报告日本阻挠顾维钧与国联调查团各委员合作，顾之寓所侦察密布，且有侵入室内情事，并阻挠顾与人谈话及发电。

△　江西清乡会在南昌开幕，何应钦训词宣称："改良政治，发展交通，组织民众，为剿赤根本工作。"

△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各教授发表悲壮演说，下午集合游行，被警阻止。同日，广州学生召开五四运动纪念会，通电反对签订上海丧权协定。

△　国民政府任命刘通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任命邓家彦、傅汝霖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任鸿隽未到校以前，派该校法学院长刘光华代理校务。

△　中华民国拒毒会通电全国各拒毒团体，请响应高友唐弹劾刘瑞恒案。

△　马占山召开全体将领会议，决定联合黑、吉两省抗日义勇军进攻哈尔滨。

5月5日　　《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由中国代表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等在沪签订，共五条及附件三号，规定自是日起中

日双方军队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军撤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1月28日事变之前；组织共同委员会证明双方撤退，并协助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

△　国联调查团李顿等五委员在长春晤溥仪，并接见熙洽与驹井。

△　天津市工联会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以武力收回淞沪及东北失地，反对签订上海停战屈辱条件。

△　孙科在沪寓所接见记者，答复于右任3日之驳议，仍主开放党禁，速行宪政。

△　日驻华公使重光葵上午在病床签署停战协定后，下午施行手术，将被炸受伤之右足截断。

△　粤海军将领陈鼎、金彦文及“中山”等20余舰长通电指责陈济棠拥兵自固，对海军蓄意剪除，表示竭诚拥护原海军总司令陈策。为避陈济棠暴力压迫，将舰队移驻琼崖唐家湾。

△　晨1时余，津浦路第九次车行至连镇以南被匪劫，夺去押车警察手枪二支，旅客银钱搜去甚多。

5月6日　　外交部长罗文幹发表宣言，申述停战协定经过，并声称国联大会于4月30日通过决议案，声言依照大会1月4日及11日决议案之精神，日军之撤退应于最近之将来实现，非俟日本军队完全撤退，3月4日之决议案不得视为完全遵行；中国政府深信国联大会关于上海时局之各项决议案及本月5日签订之协定，必能极早完全见诸实行。

△　粤西南政务委员会开紧急会议，议决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萧佛成电林森、汪精卫，略谓“今置东三省于不问，上海条件又暧昧不明，诚不知我国所求为何事，望将真相公布，以解国人之惑”。

△　陈友仁发表谈话，认为上海停战协定是“日人胜利”，表示日军不仅应退出上海，同时要退出东三省，不然只有拼命抵抗。

△　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登报郑重声明否认对日协定，指出此项协定实质，包括我国领土内一切政治、军事行为，以及关于民众“抗日救国”一切言论自由，皆受协定干涉，其责应由郭泰祺暨命令者单独负之。

△　陆渡桥、黄渡、浏河日军撤退。日第十四师团主力5日及是日从吴淞港乘船离沪，9日及10日在大连登陆，11日到达哈尔滨。

△　国联调查团访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日人驹井德三，质询其就任伪满官职之理由。

△　行政院决议：一、邮资加价因各地一再吁请收回成命，改订邮资加价办法，就所加之费分别核减，书籍、印刷物暂免加费；二、派定温应星、俞鸿钧为中日停战会议共同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改组贵州省政府，除委员兼主席王家烈业经明令简任外，任命何辑五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郑先辛为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双青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谭星阁为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　张学良派刘翼飞为察哈尔“剿匪”司令，黄显声为副司令。

5月7日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成立，由中日双方及英、美、法总领事、意大利代办组成，美总领事克宁翰为委员长。是日，第一次会由日方委员原田报告日军撤退情形，略称日军主力部队已向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线以东撤退，并由6日起三日内，先将驻浏河、嘉定步兵各一营，驻南翔之团司令部及步兵一营完全撤退。

△　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成立，以殷汝耕、温应星、郭德华、朱锡百、韩德勤五人为委员，殷汝耕为主任。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反对中日停战协定，并发表宣言，通告全国民众，主张在东北及上海日军未完全撤退前，不与日方举行任何会议。

△　李宗仁、白崇禧电西南政委会，称“南京政府签订卖国协定，应即鸣鼓而攻”。

△　上午9时半，国联调查团抵吉林，会见多门师团长，询问“满案”发生时吉林状况、吉林独立前后之形势等。

△　海军部长陈绍宽呈请辞职，汪精卫予以慰留。

△　粤空军总司令张惠长、粤海军总司令陈策反对粤空、海军改组，在港商投中央，并派代表赴桂林联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厚声援。同日，陈策致海军同学函，称陈济棠知海、空军主持正义，有碍其操纵把持，以政会名义改组海、空军，欲师军阀割据故智，请主持公道，力抗强权。

5月8日　　浏河、嘉定、南翔前线日军陆续撤退，9日撤尽，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派干警500名前往接收。

△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通电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列举协定五大缺点：一、不提东北；二、淞沪被占领土不得驻兵与《辛丑条约》天津50里内不得驻兵相同；三、规定日军驻地模糊；四、无我军保护淞沪路明文；五、共同委员会无强制日人履约权。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电国联，“坚决否认中日停战协定，因其足以破坏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

△　国联调查团访伪满交通总长丁鉴修，提出25项有关铁道之质询。旋赴伪立法院，听取伪院长赵欣伯说明参加“新国家”之动机及伪立法院组织之内容。

△　平、津、济邮务工作会代表在天津开联席会议，决议：于6月12日在北平召开华北邮工联席会；反对邮资加价；平、津、济邮务工会共发宣言，反对上海丧权辱国停战协定。

△　何应钦电汪精卫、蒋介石称：在赣“剿匪”交通不便，请中央迅拨巨款，兴筑公路及铁路。

△　川军师长王陵基、范绍增与何成濬、徐源泉、夏斗寅等商定，由川军派十二个团在鄂西“剿共”。

△　苏家埠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3月21日发起苏家埠战役，是日苏家埠、韩摆渡之守军全部投降。该战役历时48天，歼敌三万余，俘皖西“剿匪”总指挥厉式鼎及旅长五名，团长11名及以下官兵两万余人。

△　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部占领湖南桂东。

△　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长王造时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一文，驳斥汪精卫、于右任等人不同意结束训政的言论。指出“像国民党近几年来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始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法”。

5月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居正为司法院院长、覃振为司法院副院长，准伍朝枢辞司法院院长职；任命邵元冲为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为立法院秘书长；任命钮永建为考试院副院长；任命张继、伍朝枢为国民政府委员。并议决：在上海暂设临时市参议会；核准邮资加价办法，国内信件加一分，明信片加半分，挂号信件加二分。

△　萧佛成、唐绍仪、邹鲁、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出佳电，反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认为该协定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同

为秘密卖国。

△　是日为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国耻日，北平学生300余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统治阶级”等口号，至市党部，将匾额卸下击碎，将党旗撕毁，并散发传单，下署“反帝大同盟”字样。南京、长沙、汉口、安庆、天津、镇江等地均举行“五九”国耻纪念会。

△　国民党中央党部留京办事处举行“五九”国耻纪念会，汪精卫作报告：一、训政时期中央民意机关用国民参政会的名义，不用国民代表会名义；二、《淞沪停战协定》完全为停战撤兵，无政治性质；东北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交涉，今后外交仍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态度。

△　沪市商会电行政院，称：“历来外交恶例，往往于正式约文而外，另附议事录、声明书等类，丧权辱国，贻害无穷”，要求明白宣示此案除公布文件外，绝无其他秘密附录。10日，汪精卫复电，声称上海停战撤兵协定“无其他秘密文件或接受任何秘密条件”。

△　国联调查团由长春抵哈尔滨。

△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的协定》通电，否认此项屈辱协定，号召群众进行民族战争来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　国民党海外党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任胡仲维等六人为总干事。

5月10日　　罗店日军步兵一营、过山炮队一连于中午12时半撤退，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线迤西已无日军。

△　李宗仁、白崇禧电汪精卫，称：“承示东北事件仍以交涉与抵抗并行，绝不因此而松懈……仁、禧当益奋勉，整饬所部，以为后盾。”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函郭泰祺，质问其先后言行不符，竟签丧权辱国之协定。

△　交通部长陈铭枢赴沪晤孙科，陈述汪（精卫）、蒋（介石）两氏对孙所提抗日救国纲领之意见，孙称：本人所提之抗日救国纲领完全根据汪精卫来沪晤谈时之谈话意见。

△　鄂绥署主任何成濬发表救灾“剿匪”谈话，声称“救灾较剿匪尤为重要”，但“救灾须与剿匪同时并进”。

△　王陵基由汉飞宁，向蒋介石汇报鄂西“剿匪”情形，并请示“方略”。范绍增电刘湘，催川军速东下“剿匪”。

△　国民政府令：准免吴铁城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职，任命陈树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委员长。

△　行政院决议：一、海军部长陈绍宽呈请辞职，决议慰留；二、派殷汝耕、温应星、郭德华、韩德勤、朱锡百为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委员。

△　西北科学考察团回到北平，带回采集品42箱，团长袁复礼报告在新疆、蒙古考察经过。按：该团系于1928年5月10日由北平出发。

5月11日　日陆军中央部命令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及第九师团等部队回国。第十四师团最后一批撤离上海，从吴淞港登轮去大连。

△　上海市政府商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转请停战共同委员会向日方交涉，即日将闸北、吴淞、江湾等处日军迅速撤退，以便早日接管。

△　陈济棠电汪精卫，表示“此后惟有遵命努力于剿共，完成革命，以副先生之期望”。

△　国民政府特派颜惠庆为参加法国故大总统杜美尔丧葬典礼专使；任命郭泰祺为驻英国特命全权公使。

△　陈济棠委邓龙光为第一集团军海军舰队司令，是日邓接收海军总部。

△　陕西省赈务会为陕省70县灾情惨重，致函华北各慈善团体，吁请赈济。

△　何应钦电汪精卫、朱家骅，请督饬全国各校注重体育，提倡尚武，严禁女学生束胸、缠足、高履。

5月12日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委员俞鸿钧、温应星与日方委员冈崎、原田、伊藤会商闸北日军撤退日期，日方允本月16日将闸北铁路区域内之日军撤退；并声明一个月内，日陆军全数撤离上海。

△　粤西南政务委员会训令第一集团军称："本会议决，反对中央所签丧权辱国停战协定，仰饬属一体严重反对，并筹拟进行抗日。"

△　马占山自黑河向各报界发出文电，表示"誓死长期抗日"，"并请全国竭诚御侮"。

△　军委会改革陆军编制，通令各师按新编制每师改编为二旅四团，前定之甲、乙、丙各种师制一律取消。

△　粤军李汉魂到仁化，率陈汉光、陈章甫两旅会同湘军围攻汝城红军彭德怀部。13日，第十五师王东原部陷汝城，陈汉光、陈章甫两旅亦先后到达，粤、湘军联络会"剿"桂东。

△　鄂豫皖红军发起潢（川）光（山）战役，至16日共歼国民党军近万人。至此，鄂豫皖苏区迅速扩大，"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米，人口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跨越

26个县的区域。主力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20余万人。

△　上海工部局在沪西一带越界筑路，上海市政府向工部局提严重抗议。

△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反映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抗日作战事迹影片《四达通》（意译星石）在沪公演。

5月13日　日侨在沪日商俱乐部秘密集会阻挠日军撤退，决以全沪日侨名义致电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及政友、民政两党总裁，称“此次出兵侵沪，其结果对我仍毫无权利，则此次作战之损失，其代价将向谁取”；“外务省限侵沪军队于一个月内退尽，旅沪全体日侨必反对之”；“如不乘此战胜余威，向支那政府要求在上海设立自由市，则以后将永无机会可得，我旅沪侨胞亦将永无扩大居住区域之可能”。

△　日外务大臣芳泽邀英、美、法、意四国驻日各大使集议，促开圆桌会议及提议改上海为国际自由市，四周不得驻中国军队的荒谬主张。外交次长郭泰祺就此事在电话中对记者发表谈话予以驳斥，称圆桌会议不能开，自由市更谈不到。

△　上海特区市民联合会发表宣言，反对丧权辱国之上海停战协定，指出该协定之丧权“直为《辛丑条约》以后所无”。

△　淞沪抗日各军、第十九路军总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移驻苏州。

△　李宗仁、白崇禧函萧佛成，谓“两粤辅车相依，存亡与共，合则足以救国，离则两败俱伤，桂今后对时局方针，决在西南政委会领导下，以粤之主张为主张”。

△　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开谈话会，讨论党务方案，决定在“剿共”未告段落前，三中全会不致召集；国民参政会对于中央政事有审

议权，但须由国民党最后决定。

△　国民政府任命徐庭瑶为陆军第四师师长，李建勋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　财政部正式发表本年前四个月海关收入，共计规银6184.7918万两，较去岁同期收入规银8244.399万两，减少2059.6072万两。

5月14日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日方委员原田函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称：大场日军定17日下午1时撤退，所有接管事宜，盼先向该地守备队长接洽。

△　据《大公报》讯：日本驻沪陆军全部撤退后，即专以海军陆战队及宪兵驻沪，其数为陆战队2500名，宪兵100名。此数较事件发生前之800名约增二倍。

△　北平、天津、济南邮务工联会为维护邮政制度及保障邮工待遇，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反对邮资加价，不承认限制邮员额数之新令。

△　行政院决议：一、组织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派宋子文、黄绍竑、陈公博、顾祝同、吴铁城、王晓籁、史量才、虞洽卿等为委员，指定宋子文为主席；二、刘瑞恒辞禁烟委员会委员长职，慰留。

△　鄂清乡促进会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决以善后公债150万元、市政公债150万元，摊销绅富，为“剿共”经费。盐税附加决请每月拨20万元。

△　河北省教育厅通令各院校切实防范共产党。

△　国民政府公布《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实业部全国度量衡

局组织条例》。

5月15日　榆关日军挑衅，驻榆日守备队、宪兵队，分别在车站南、北进行实弹演习。是晨并有伪满警察120余人由前所到榆，纷在大街游望。晚，驻榆日守备队又在南关实弹演习。蒋介石、汪精卫等就榆关日军挑衅事，在南京协商应付方略。

△　马占山黑河誓师出征。发布《告绅商书》、《告农民书》，通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誓言长期抗日御侮。

△　津浦、北宁、平汉、平绥、胶济、道清、正太、陇海八铁路工会，在天津津浦路工会举行正式联席大会，讨论工会组织及工人待遇等问题。

△　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会电请教育部发表易培基、张乃燕、经亨颐三人中择一长校，三人之外，任何人均不欢迎，并绝对拒李建勋长校。

△　北平市妇女救国同盟会开执委会议，建议国民党中央妇女科在最短期召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并请速定妇女救国运动方针。

△　陈策在琼崖宣布成立海军行营，通电反对陈济棠强迫改编海军。

△　西康总商会、教育会等于6日电驻京代表马泽昭，请转恳中央迅颁明令讨伐达赖，并接济飞机、高射炮械弹、无线电等军用品运康。马接电后于本月呈蒋介石、汪精卫，陈述军事情形，恳予照准。

△　天津商民救国会电国联行政院，请制裁日军对我东北三省的暴行，并电请国民政府速定大计，以武力收复失地。

△　日本海、陆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枪击身亡。翌日，国民政府、汪精卫、罗文幹分别电唁。

△　李宗仁、白崇禧在邕召开“剿匪”会议，决派第四集团三分之一兵力两万余赴闽、赣“剿匪”。

△　红军占领安徽霍丘。

△　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始营业。

5月16日　中日上海停战协定中、日文副本经文字修改后，由我方代表郭泰祺与日方代表重光葵等签字。双方文字经修改者各两点，中文本为：“战斗行为”改为“敌对行为”；“地点”改为“地方”。日文本为：“当分の间”改为“暂时”；“附近”改为“邻接”。

△　闸北苏州河北、京沪路南、浙江路西、广肇路东周围约七里之地区日军撤退，我方警察大队及北平保安队入驻接收。

△　日本政府派驻巴西大使有吉抵南京，请求会见汪精卫。17日，汪在官舍会见有吉，汪除对日首相犬养毅被刺死表示悼惜外，并谓：“中日关系密切，邦交上不应有似亲善而非亲善之现象，应使两国间相互得到满足，不受若何损害，达到真正的共存共荣之亲善邦交。”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关于行政院呈送市、县参议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各草案修正如下：1.市参议会议员应全体由市公民选举；2.市参议会议员任期规定为一年，县参议会议员任期为二年；二、覃振请辞司法院副院长职，慰留；三、特派刘守中赴绥远、察哈尔调查实业事宜。

△　蒋介石中央军校演讲《革命哲学的重要》（后定题为《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提出要御外侮，救中国，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尤其是“知难行易”的哲学，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寻找理论根据。

△　马占山部才鸿猷旅在松浦镇与日军交火，焚毁呼海路局大楼

和日军军需库。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委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榆关问题等。

△　11日，河北省国民拒毒会主席曹鸿翥曾电张学良，请通令查禁鸦片公卖，并严惩主办人员。本日张学良复电谓“烟土变售，曾未前闻”。

△　汉口银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鄂绥署“剿匪”借款事，允增至50万元。

5月17日　　驻沪大场日军自晨7时起分批撤退，至下午1时半撤尽，由江苏保安队进驻接收。

△　伪满洲国当局阻止国联调查团与马占山会晤。伪外交总长谢介石声言，“如与马占山会晤，不负保护责任”。

△　行政院决议，派王伯群视察川、滇、黔军政。

△　日军翻译官、朝鲜人金枳率伪警多人往临榆县东八里之乐善堡村，围困、搜查保安团所，抢夺枪支、弹药，捕去该所人员四人。

△　沈阳县长谢桐森与伪满洲国官吏五名及其他人员十余名，谋推翻伪满政府，事泄被捕。

△　陈济棠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提议讨伐陈策，委陈章甫为琼崖剿匪司令，拨六个团归其指挥，另派“广金”、“坚如”等舰水陆并进。

△　蒋伯诚等奉蒋介石之命赴济南与鲁省主席韩复榘商妥，今后鲁省国税交还中央，鲁军费由财政部拨发。

△　何应钦在南昌发表谈话，声称：“上年剿匪，调集大军十数万，围剿经年，收效甚微，原因虽多，而我军不注重精神教育实为主

因。今后剿匪部队须注意军人精神教育，除去畏匪心理，则战必胜，攻必克。”

△　萧之楚赴鄂省应城，代徐源泉指挥“剿匪”。

△　红军李明瑞部再次占领汝城。

△　豫南颍河决口，西华、商水等县被淹。

5月18日　　国民政府令：《民事诉讼法》定自本年5月20日起施行。

△　华侨联合会发表宣言，反对鸦片公卖，要求“制裁一切纵毒敛财之不肖官吏，扑灭一切教唆怂恿主张公卖之无耻民贼，以树民众自决之先声，而挽国族沦亡于一发”。

△　胡汉民调停粤海军风潮，主张设江防及海防两司令，由陈策任海防司令兼琼崖特区委员及陆战队司令。江防司令由陈荐人。陈济棠表示接受胡之调停，拟令南路军队中止开拔。

△　粤空军两队长刘植炎、周柏成通电反对粤空军改编，决然引退。

△　国民政府任命李默庵为陆军第十师师长，戴民权为陆军第四十五师师长，岳盛宣为陆军第四十六师师长，张贞为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　何键在衡阳召开上校以上军官会议，布置“剿匪”。

△　北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表袁永清等，在鼓楼饭店招待新闻界，报告拒绝李建勋，请改任该校同学所拟想之校长。

△　浙江安吉县雷雨、飓风、冰雹交加，房屋倒坍无数，屋顶盖瓦吹飞尽殆，拱宸门大石桥亦被折断。

△　西兰（西安—兰州）线正式开航。

5月19日　江湾日军于上午11时许完全撤退，由我方自北平调沪之保安队第三中队接防。彭浦、庙行亦均由我方派警进驻。江湾日军撤退区域，仅余瓦砾。

△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全国，否认上海停战协定，略称："协定第二条规定我国军队在常态恢复未决定办法以前，暂驻现在地位，等于设定暂时不驻军队之区域"；"协定未经立法院议决，在我现行国法上未具备有效条件，不得认为已生效力，我国家殊无受其拘束之理由。"

△　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对《申报》记者发表关于考试问题的谈话，称："俟国难问题解决，当厉行考试制度，拔取真才。"

△　行政院会议，陈铭枢、陈公博相继报告在沪与孙科接洽情形；决议设立全国水利委员会。

△　国民政府令：一、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公署撤销，派刘镇华为鄂豫陕边区"剿匪"督办，派徐源泉为湖北全省清乡督办；二、任命李松山为陆军第五十七师师长。

△　国有七铁路（缺正太路代表）工会联席会议通过反对伪满洲国、收复失地等案。会议否认按月征收铁路员工所得捐充实财政案。20日又决议组织全国铁路工会联合会。

△　鄂省政府再颁现金出口禁令。

5月20日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日方委员冈崎正式通知中方委员俞鸿钧、温应星，决定于本月23日上午11时将杨行、狮子林炮台、炮台湾营房以及三官塘火药库方面之日军完全撤退。

△　沪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召集有关各方举行联席会议，会商接

管闸北铁路以北区域办法。

△　上官云相自浔乘飞机到京，向蒋介石报告在赣“剿共”情况。

△　国联调查团长李顿请苏联政府签证护照，准团员由中东路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至海兰泡渡江至黑河访马占山。苏外交部门以严守不干涉政策拒绝。

△　沪邮务工会因所提归并汇业局、维持旧邮资、停止邮航津贴、改善邮务管理四项要求，为交通部批驳，本日开会决议采取直接行动。

△　北平邮务工会邮务职工会召开谈话会，决议为响应沪会所提救邮方案电呈交通部采纳施行。

△　财政部申令川、鄂、赣、湘四省现金出口，切实弛禁。

△　韩复榘在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捕获共产党及嫌疑学生24人。

△　章太炎、景耀月等组织之中国学会在北平成立。

△　《再生》月刊在北平创刊。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创办。宣传“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后为其机关刊。

△　河南鹿邑、柘城两县春荒，粮食告竭，死亡枕藉，惨不忍睹，鹿邑县设人市五处，幼女不值10元，幼童仅易1000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

5月21日　监察院长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长汪精卫违法批准上海停战协定，不交立法院审查，呈中监会请予惩戒，内称：国府组织法规定，立法院有议决宣战媾和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职权，沪停战协定未闻送立法院议决，遽行签字，“设不严予惩处，则以后国家主权、疆土有此成案可援，皆将断送于协定二字之下”。

△　真如日军撤退，由沪保卫团进驻。接管委员会预备会议决定本月23日上午11时接收真如。

△　国联调查团由哈尔滨启程返长春。

△　行政院决议：拨国币两万元汇法，遣送失业华工回国。又拨一万元汇驻荷兰领事馆接济失业华工；公布修正《沪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组织条例》。

△　蒋介石令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参加“剿匪”战争。

△　何应钦令湘、粤、赣三省军队“会剿”红军彭德怀部。

△　上海市长吴铁城约邮务工会、职工会、邮务长、总局长等在市府谈话，谓储金汇业局归并及取消邮航津贴问题，涉及国家行政制度，不能随意变更，更不能以罢工要挟。

△　国有七铁路工会联席会发表告全国铁路工友书，并电国民政府，要求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

△　陕、甘霪雨、黑霜成灾，灾民达数十万，杨虎城电国民政府请急赈。

△　长江水位连日陡涨，是日达35尺。

5月22日　上海邮务工人大罢工。上海邮务工会、上海邮务职工会以该会等提出巩固邮基方案未被交通部接受，令沪市3500余邮工今起大罢工。《罢工宣言》略称：“本会等所拟巩固邮基方案，为救邮之唯一良箴，本会一再电催，交部乃迁延至今，竟未容纳，群情愤激，无由遏抑，认为非实行最后行动，不足以促当局之猛省。”23日，沪邮工罢工风潮扩大，沪设临时邮局，邮政总局局长钱春祺因邮务工潮被看管。

△　吴铁城在沪市府接见邮务职工代表张克昌等四人，劝邮工即日复工，然后再商办法。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电监察院长于右任，对其弹劾汪精卫违法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案表示支持。

△　上海《时事新报》工潮仍未解决，被开除工人推代表与该报经理熊少豪谈判，无结果。

△　徐源泉返汉，就任鄂省清乡督办。

△　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创办《独立评论》周刊，胡适为总编辑。是日创刊号在北平出版。

5月23日　　上午，日军第九师团自真如撤退，下午2时半日海军第一、三两大队自闸北撤退。由北平到沪之保安队入驻接收。

△　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成立，吴铁城为委员长。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弹劾汪精卫案，认为“行政院依中政会决议案办理，手续并无不合，所请惩戒事应毋庸议”。蒋介石表示：“本案手续上办理既无错误，当然不成问题。”

△　中监会开会讨论监察院提请弹劾汪精卫案，认为“理由不充分，本案不成立”。

△　汪精卫电令吴铁城劝导沪邮务员工即日复工，必要时“执行严厉之处置”。

△　交通部部长陈铭枢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求处理邮工罢工办法，必要时“执行严厉处置”。

△　外交部照会法使韦礼德，抗议上海法租界捕房将拘捕之韩人安昌浩引渡日本当局。

△　西南外交协会通电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并望政府下大决心抗日，否则不对外而对内，甘为国人公敌，恐为全国共弃。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联电各省军政当局，请资助东北义勇军。

△　马占山部才鸿猷旅在呼兰与日军血战，将日军压逼到松花江边，隔江猛烈射击哈尔滨道外日军指挥所。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飞哈尔滨督师。

5月24日　国民党中常会否决于右任弹劾汪精卫案。于右任、汪精卫均呈中执会辞职，中执会决议慰留。

△　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对否决弹劾汪精卫案提出：一、应由各团体环请立法院切实声明关于上海中日停战协定全部无效；二、应由各团体环请监察院继续提出弹劾，责成汪精卫引咎自劾，否则应处以法律相当惩戒。

△　杨行、狮子林炮台日军于正午12时撤尽，由江苏保安队接收。

△　下午3时，国民党中常会讨论沪邮工潮事，决定交民运会依据《工会法》分别处理。

△　行政院决议：邮政总局局长钱春祺免职，听候查办，任命黄乃枢为邮政总局局长。

△　沪市府布告，劝邮工先行复工，听候中央解决。

△　交通部招待新闻界，次长俞飞鹏声称：“工会对此次沪邮罢工应负责任。中央早已取消工会组织……不知何来邮务总工会之名目”；邮工“干涉国家行政制度，不能允许，所谓巩固邮基方案，根本不能提出，在此国难期中罢工，尤为绝大错误”。

△　平、津、济南、杭州、无锡、开封、洛阳等地邮工援助上海邮工罢工相继罢工。

△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特派章嘉呼图克图为蒙旗宣化使。6月6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追认。

△　闽省政府代理主席方声涛由厦门赴同安，即在同设行营，指挥“剿匪”。闽党政军联席会议，决议推刘和鼎代理省防委员会主席。

△　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续调12个团到宜昌“剿匪”。鄂绥署电王陵基，鄂西“剿匪”事宜由王全权指挥。是日，王陵基在宜昌下总攻击令。

△　河北省政府决议开采密云等四县金矿，筹组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

5月25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沪市商会、沪银行业同业公会、沪钱业同业公会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发表通电，声称：“鉴于内忧外患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以期安内对外”，并制定章程十条。沪银行界吴鼎昌、张嘉璈、陈光甫等18人电平、津、汉、宁、穗等各地名人征求加入。

△　北平保安队接收吴淞，炮台、兵舍及火药库同时被接收，炮六尊被日军运走。宝山县城亦于上午11时半由宝山县长孙熙文偕江苏省警接收。

△　宋子文由沪返京，向中央报告淞沪战区善后会讨论经过，并接洽筹划财政办法。

△　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各省、市政府，谓“沪邮务员工关于要求邮工待遇者，均经交部酌予容纳。关于归并储汇局及停止航空邮运经费，关系国家行政及交通建设事业，自应从长计议，非该部所能解

决”；“如已实行罢工，应限令二十四小时内复工，逾限一律开革”。

△　上海邮务工会、上海邮务职工会罢工委员会通告，非得本会命令，一律不准复工。

△　下午5时，吴铁城、杜月笙邀各界领袖及邮工代表集议解决邮潮。

△　杨杏佛致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责“政府屡言大赦政治犯，至今口惠而实不至”，要求将牛兰释放。

△　萧佛成电促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即动员所部入闽“剿匪”。

△　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谓“自十七年来，均为军阀之治，而非党治，今欲救国，必先救党”。

△　蒋介石电蚌埠第四师师长徐庭瑶，蚌埠及皖北所有鸦片税收机关一律禁止。又电陈调元、吴忠信、徐庭瑶，皖北盐斤附加，自26日起一律取消。

△　南京各校抗日会举行慰劳抗日将士大会，第十九路军及第五军连长以上军官百余人，各校代表百人出席。

△　长沙学生抗日救国会定于26日总检查仇货，将已登记贴花之仇货一律封存。何键为此查封学生抗日救国会，宣布戒严令，各校禁止学生外出。29日，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开紧急会议，要求省政府于6月1日前启封学生抗日救国会。

△　驻齐齐哈尔马占山部旅长程志远投敌，进攻呼海路沿线马军，是日，日军占领呼兰，马占山部北退。

5月26日　　沪撤退区域接管委员会召集会议，讨论恢复日军暂驻区域（包括引翔区、殷行区、江湾区、吴淞区、虹镇区暂时驻扎仍未

撤退之部分）市行政权事宜，决定28日起次第实行。

△　郭泰祺昨晚到南京，是日分谒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幹，报告上海停战协定签字。

△　国联调查团由沈阳到达大连，往访“满铁”总公司，听取有关地方设施及铁路问题之说明；并与由北平来大连之英国公使蓝普森会见。

△　日本斋藤内阁成立。暗杀犬养毅案责任者陆相荒木贞夫留任原职。

△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于4月29被炸伤后，是日死亡。其职务暂由第九师团长植田代行。

△　邮政工潮和解成立。邮政罢工经中央特派专员陈公博、吴铁城召集各界领袖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及上海邮务工会、上海邮务职工会代表陆京工、朱学范共17人举行会议，签订调解方案如下：一、由地方各界接受邮工所建议之原则，转向政府请愿；二、组织邮政经济制度研究委员会，研究巩固邮政基础方案实施办法，转请政府核夺施行；三、邮工代表允即午复工。罢工委员会发复工通告。下午1时沪邮工复工，其他各地邮工相继复工。

△　何应钦派刘建绪、余汉谋、陈诚分任赣、粤、闽三省“剿匪”指挥。

△　西康民众代表五人向行政院请愿，要求派重兵戡平藏乱。

△　教育部以部令公布《中小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定》，凡13条，并修正《中小学条例及毕业证书规程》。

5月27日　罗文幹、郭泰祺在外交部招待新闻界，说明《淞沪停战协定》真相，称协定之外，绝无秘密记录及附件。

△　蒋介石在南京汤山召集罗文幹、蒋作宾协商应付东北问题及解决中日整个外交办法。

△　胡汉民派其女胡木兰持胡亲笔函到广州谒留粤中委及陈济棠商时局，并请陈接济第十九路军军饷。陈允月助20万元。

△　国民党留沪中委李烈钧等，为粤省海空军改编事分电西南政委会和陈济棠，劝告息争。

△　行政院决议：简派张钫为河南清乡督办；加派刘瑞恒、彭学沛为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委员。

△　上海各大学学生自动抗日救国会成立。

△　鄂水灾会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财政部，陈述鄂省灾情，请拨美麦数万吨以救灾民而维大局。

△　中川健藏任第十六任台湾总督。

5月28日　　萧佛成、邹鲁等16人电国民党中央，略谓“此次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查，乃行政院及中政会既违法于先，而中政会在职常委又自行袒庇于后，况此丧权辱国之协定乃由违法而签订，则尤难曲恕，伏望中央不畏强御，执法以绳”。

△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表通电，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

△　沪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派人会同公安局分赴吴淞、殷行及引翔三地日兵暂驻区域恢复行政权。

△　立法院会议讨论释放政治犯案，决议：将此案交付法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于审查大赦案时参考。

△　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到会军民五万余

人，主祭官居正。全国各地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一天，以志哀悼。

△　广东各界在北较场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到会数万人。同日，第八十八师在武汉及汉阳驻地，分六处举行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

△　天津市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开会，一致赞成废止内战运动，并电上海全国商联会等称："废止内战，本为全国一致之心理，矧在困难期间，尤有安内对外之必要，此项组织，敝会极端赞成。"

△　上海出版业工会等35个工会因闻第十九路军将调闽，特派代表赴苏州向该军军长蔡廷锴请愿挽留，并表示如无结果，再往南京当局请愿。

△　国民政府令：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楼景越免职，任命张治中为该师师长；任命王均为陆军第七师师长。

△　上海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电唐绍仪、邓泽如、萧佛成等，请斡旋粤局，"以定粤局而安人心"。

△　沪公安局公布闸北五区境内沪战损失情形：原有人口10.1万余，现仅800余；房屋7627所，被焚达6435所。

△　韩独立党员尹奉吉由沪解往日本，12月19日在日本金泽就义。

△　新疆增设巩留县，由伊宁县析置。

△　香港第一届英帝国货品展览会开幕。

5月29日　汪精卫召罗文幹、蒋作宾及外交委员会委员商外交问题，决定外长仍由罗继任；郭泰祺担任驻英公使，日内赴英履任；驻日公使仍由蒋作宾回任。

△　上海引翔港三友实业社总厂日军撤退。

△　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全体复员。

△　唐柯三在京招待记者报告调解康、藏纠纷经过，称：“康、藏纠纷，发生于大金、白利两方财产之争执，不意甘孜知事措置失当，激成变乱，以致藏番猖獗，迭陷甘瞻。余秉中央意旨，与藏方议订条件，国人不满意，以割地赔款见责，实太冤枉。”

△　上午5时，日军第十四师团平松支队进攻肇东李海青义勇军，旋占领肇东。

5月30日　本日为“五卅”运动七周年，上海防范甚严，杨树浦工人乘车至体育场拟开会，被军警阻止，捕去一名。北平学生游行被军警制止。

△　沪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接收吴淞铁路机厂，机械损失千万元。

△　国联调查团离大连返沈阳。

△　北平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电上海全国商联会及市商会，响应废止内战大同盟，一致赞同加入发起之列。

△　中共中央为纪念“五卅”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学及劳苦群众，“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江西苏区50万赤卫军检阅大会致电全国工农群众和工农红军，表示在中央临时政府领导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求得中国民族完全独立与解放。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交教育组审查。此方案由陈果夫提议，其内容专重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

材，各大学十年内停招文、法、艺术等科学生。

△　皖省府常会决议，奉蒋介石27日电令，撤销皖南、北盐斤附加税及特税。

△　蒋介石电令徐庭瑶任蚌埠警备司令，驻蚌各军概归其指挥。是日徐在蚌召开警备会议，讨论整顿军纪，维持治安。

△　吉林自卫军占阿城。日机数架轰炸海伦，全城起火。马占山在海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集中攻打哈尔滨的作战计划，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术。翌日率部退至海北。

5月31日　我宪兵两连到沪维持治安，日方认为违反停战协定，双方发生争执，沪停战共同委员会为此举行会议调解。日方代表冈崎认此举为敌对行动。中方代表俞鸿钧驳复，称宪兵到沪并无敌对行为，系我主权，日方不能干涉。最后经共同委员会主席克宁翰转圜，中方答应以后军队调动须通知该委员会。

△　侵沪日陆军除宪兵外全撤，第九师团长植田返日。虹口越界筑路周围地区尚留海军陆战队未撤。

△　吴铁城赴京向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报告日军撤退经过及请示善后。同日，吴对记者谈，沪战区善后，农业区如吴淞、江湾、大场、庙行等地由政府及地方协力救济为主，工商业区如闸北一带应以恢复和平秩序及进行防疫为主。

△　南京、济南市商会分别致电上海全国商联会等，响应废止内战大同盟，京商会派濮仰山等三人参加，济银行公会已函沪商联会等加入。

△　马占山部骑兵千余攻入安达县境，6月1日占领安达县城。

△　行政院决议，特派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决设邮政经

济制度研究委员会，聘陈公博、吴铁城、林实等为该委员会委员。

△　军政部发表：一、第三师师长陈继承升任第一军军长，遗缺以李玉堂接充；二、第九师师长蒋鼎文兼任军长职务，遗缺以李延年补充；三、第九十八师师长钱大钧升任第十三军军长，遗缺以汤恩伯补充。

5月下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电全国邮务罢工工人，希望“本着无产阶级的坚决精神并防止黄色领袖出卖罢工，以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

是月　　清华大学自3月份起，庚款即停付，学生组织经费维护委员会，反对停付美庚款，几经交涉，才由财政部借垫100万元作为维持费。

6月

6月**1**日　　颜惠庆将日军进攻北满详情报告国联，请从速履行12月10日保证日军退入铁路沿线之国联行政院决议。

△　河北省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该会宗旨为加紧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　马占山在海伦附近三门谢家接见由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密派的美国记者海米斯和一名瑞士记者。马对其陈述日本制造伪满及江桥抗战情况，表示“唯一心愿就是把日寇打走，消灭伪组织——满洲国，收复我东北三省同胞安居乐业的国土”。

△　5月份东北关税受伪满压迫，未解中央，外交部向日提出抗议。

△　川、鄂军总攻鄂西红军，刘湘增兵一团、飞机一架，出川助战。

△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报馆工人，为援助《时事新报》被迫离馆之工人，一致举行大罢工。

△　北平大学工学院学生为驱逐压迫反帝学生运动的校长沈尹默和院长程干云，于本日举行罢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北省委发表《援助工学院罢课宣言》，对驱程斗争表示援助与支持。

△　国民政府令撤销第十九路军卫戍司令部，派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　韩复榘派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为鲁北剿匪总指挥，民政厅长李树春为副总指挥。2日，韩在济南召集各军开剿匪会议。3日，孙、李赴鲁北指挥剿匪。

△　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成立，居正等11人在司法院就职，该会通告本日起实行惩戒职务。

△　汉口20余商会向鄂总商会请愿，因水灾后营业无法维持，请减轻全市房租。

△　江苏教育厅明令禁止小学校教职员罢教索薪，以“防止借口索薪，暗图掀动教潮”。

6月2日　　沪西同文书院等处日陆战队未遵照协定撤退，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委员俞鸿钧函日方委员冈崎抗议。

△　蒋光鼐、蔡廷锴奉命分率两路入闽“剿匪”。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设宴欢送第六十一师少校以上官佐。

△　陈诚、刘建绪部进犯红军湘赣边根据地鹅塘。

△　国民政府派张钫为河南全省清乡督办。

△　海关巡逻舰在吴淞口外佘山洋面遇武装走私船数艘，遭开枪拒检，华员四人、瑞典籍一员中弹身亡。

6月3日　　行政院决议：一、指定吴铁城为邮政经济制度研究委员会主席；二、任命驻瑞典兼挪威公使诸昌年兼驻芬兰公使；三、任命刘和鼎为陆军第五十六师师长，毛炳文为陆军第八师师长。

△　国民政府任命周浑元为陆军第五师师长。

△　战区视察团视察宝山、吴淞、江湾各处，孙科、顾祝同均前往。

△　国联调查团赴柳条湖九一八事变现场考察。

△　日本首相斋藤发表对伪满新政策。对伪满洲国决先承认独立；日本对满依然遵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并谓如不获谅解，不惜退出国联。

△　济南市商会议决，通电响应沪废止内战大同盟主张。

△　何应钦派飞机多架轰炸湘鄂赣苏区龙港。

△　驻蚌航空队飞机自光山轰炸红军后返回，在蚌落下炸弹一枚，炸死市民22人，伤41人。

△　上海《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三报馆工潮工人先后复工。《时事新报》问题仍未解决。

△　日平贺旅团占海伦，马占山部向通北方向撤退。

△　徐州房山下发现古墓，尸长丈余未腐，并掘出瓦瓶、瓦瓮、水盂三种，考古学家谓为汉代陶器。

6月4日　　中日停战共同委员会讨论日军完全撤退问题，日方委员冈崎表示，沙泾港驻日军仅事巡逻护侨；吴淞纱厂、同文书院、丰田纱厂仅各驻少数宪兵，且战前亦有陆战队驻入。中方委员俞鸿钧驳斥，指出市政府自可负责护侨，毋须由日军越俎代谋；未闻同文书院等处以前有陆战队驻入。声明日军之驻各地不撤，有违协定，遂无结果而散。

△　财政部长宋子文电汪精卫、蒋介石辞财政部长职。5日，汪复电慰留。

△　国民政府令：派黄乃枢为邮政总局局长，派杨建平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

△　军委会统一各师编制，军为军政部直辖单位，军长不兼师长，全国共48个军，96个师。

△　航空署增派航空第五队赴汉，第七队赴赣，“协剿”红军。

△　总税务司梅乐和训令东北各关税务司，谓关款关系内外债基金甚巨，各税务司应遵照关税行政完整原则，严拒其他方面提拨税款或扰乱税务独立行政与事权独立。

6月5日　　国联调查团晚9时由东北回到北平，张学良、于学忠等前往车站迎接。李顿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声称：“调查团第二步工作，即望利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一种诚意，用此种诚意来谋一种解决方法。”

△　陈铭枢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请辞交通部长及军委会委员职。

△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通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之兵力部署，指令各地红军反围剿任务。

△　何应钦电令何键断绝赣西苏区交通，禁止运米、盐、银钱，禁止邮电。

△　吉林自卫军冯占海部攻入阿城。

△　宋子文电何成濬，表示鄂省“剿匪”经费将“提前支给”。

△　经学家廖平在四川井研县病逝。

6月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对苏复交问题，决定第一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步复交。

△　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政府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分别复电慰留宋子文、陈铭枢，劝“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7日晚，汪精卫、顾孟馀、邵元冲、叶楚伧、黄绍竑、褚民谊等，赴沪挽留宋子文、陈铭枢。

△　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讲演《中国的立国精神》。

△　鄂省清乡会以5日宋子文否决提取盐税为“剿匪”军费，本日呈财政部声称决自即日起直接提用盐税，否则即援赣例，请中央直接发放，或援湘、豫例，增加盐税附加。

△　汉口商会决议赞成沪废止内战大同盟，11日电沪全国商联会等响应，并主张各军、师长以至诚发表消灭内战意见，请中央彻底革新政治。

△　苏、沪、锡各团体代表到京请愿挽留第十九路军，褚民谊和陈仪分别代表行政院和军政部予以接见，均表示该军开闽“剿匪”，系整个军事计划，似难变更。

△　中国征信所在上海创立，由上海各大银行共同创办，以收集调查各工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金融界放款提供信息。

△　南京中央大学全体教授因索教费无着，全体罢教。

6月7日　下午5时，蒋介石离开南京赴汉口“督剿”红军。

△　红二十五军攻克正阳关，嗣又自动撤离，以霍丘为根据地。

△　张治中向军政部请辞第五军军长及第八十七师师长兼职。

△　上海地方协会成立，选举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王晓籁为副会长，并通过章程10条，第一条称：“本会由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起，以协力图谋本市市民之福利，与各项地方事业之改进为宗旨。”

△　浙江戒严司令部通令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不得擅自集会。

△　行政院会议决议停办劳动大学。该校师生极为愤慨，于11日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组织学生护校委员会护校。

△　日陆军省发表战报，公布从九一八到1932年6月6日在华日军死伤4163名。

△　伪满溥仪颁布国籍令：一、居住满洲华人非生长满洲者，被视作外国人，但可申请加入满洲国籍；二、各铁路或满洲机关雇员不入满洲籍者，将解雇；三、已入中国籍之在满洲俄人，在入满籍以前，亦以外国人看待。

△　陇海路技师汤仲明发明以油炉代替汽炉开动汽车。实业部电拨巨款资助。

△　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工人约3000人，为反对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罢工。10日，电话工人开会，被租界捕房驱散，并捕去代表四人；工人改在华界开会，又被国民党党部及公安局等干涉。22日，美商和市党部联合对工人进行镇压，工人忍痛复工。

△　鲁南股匪张黑脸2000余众经招抚后由鲁省府将其北调，是晚车抵两下店时下车逃往抱犊崮。

△　陕西省70余县报雪、霜、风、雹、旱各灾情，省赈务会通电乞赈。

6月8日　　英、美、法、意四国大使访日首相斋藤，密商上海问题，表示反对在东京举行上海圆桌会议之预备会议。

△　国联调查团离北平赴青岛视察。

△　外交部就日本嗾使伪满派中东铁路理事长、理事、督办等情事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承认，所有一切责任，应由日本负之。

△　浙江大学教授因积欠薪金三个月，全体请假。当晚该校当局发给全体教授一个月薪金。因学生学业关系，9日起全体教授一律授课。

△　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以工学院风潮扩大，联合各院长电教育部请辞。11日，教育部复电沈慰留，并令沈对学生“严厉制止，以肃校风”。

6月9日　　蒋介石自汉口到达庐山，准备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剿匪”会议。同日，与何应钦等商赣、闽、粤“剿匪”计划。

△　汪精卫返京。10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赴沪挽留宋子文、陈铭枢经过，称宋允打消辞意，陈须请假略事休养。

△　第十九路军分三批入闽，第一批毛维寿师计1.2万余人，于7、8、9三日抵泉州。

△　邹鲁在香港谈中苏复交问题，宣称中苏复交于国情上便利，

决非联苏，复交后，政府仍抱防共之旨。

△　粤空军总司令张惠长由香港抵沪，与前往欢迎者谈，“本人素主张空军不参加任何内战”。

△　上海市公安局布告严禁谣言，称“近有不肖之徒，造作种种谣言，意图煽惑，倘再有人造谣滋事，一经查明，定当依法严办”。

△　青海省府派马步芳为玉树宣慰使。

△　北平大学法、工、农、女四学院反对校长沈尹默，全体罢课。10日，平大各院校联合会招待报界，称沈尹默三日内如不辞职，决心武力驱逐。

6月10日　外交部电令在意大利之莫德惠赴莫斯科，与苏联交换复交意见。24日，莫赴苏。

△　行政院会议通过《中小学组织法》（草案）；决定8月中旬召集全国体育会议。

△　军事委员会通令申明职掌：“除关于绥靖、军令及重要情报事项由本会直接掌理外，其他军政、教育训练及国防事项，均由主管各部呈由本会作最高审核决定，交部执行。”

△　沪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告，1月28日起所宣布之戒严办法，自6月13日上午6时起终止。

△　“剿匪”总部在汉口开运输会议，鄂民政厅长及各县代表参加，决在各处组织军运车船代办所。

△　青岛各业工会等11个团体开会，响应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通过拥护通电。

△　北平师大学生因反对李建勋长校举行总罢课。11日，师大学

生集合准备赴南京索校长，警察百余将师大包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至夜，学生以砖瓦、石子乱击警察。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在上海创刊，由姚蓬子主编。

6月11日　　立法院通过《大赦条例》，规定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者均赦免之；犯外患罪者不在赦免之列，“反革命犯”赦后得移反省院。24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宋子文在沪发表谈话，说明辞财长原因，谓“将来财难，必甚于今，军政支出将有增无减”，“在势惟有举债，然挖肉补疮，终将至肉无可挖”。“余心力已瘁，不能再肩财政重任”。

△　北平市商会及银行同业公会等四团体电沪，拥护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并建议在各省、市成立分会。

△　汉口商会电复沪全国商联会等团体，响应废止内战，并主张：一、各军、师长以至诚发表消灭内战意见；二、请中央彻底革新政治，以杜战源。

△　开滦赵各庄、马家沟二矿工人1.6万余人，因反对资方取消花红，要求增加工资，相约罢工。后因资方答应工人部分要求，罢工坚持两日后复工。

6月12日　　蒋介石电召何成濬、徐源泉、夏斗寅等赴庐山，指示“剿匪”机宜。何、徐、夏等于13日抵九江。

△　顾维钧到京。13日，汪精卫在京召集各部长及顾维钧开谈话会，先由顾报告出关调查经过，然后讨论外交问题及国内财政问题。

△　上海各界2000余人在市商会召开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及被难同胞追悼大会。王晓籁主祭，蔡廷锴等出席致祭。蔡致词称：“以后国

难甚多，望大家一致团结应付。”

△　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暨全体委员因财政困难，库空如洗，所定救济办法又未能顺利进行，向行政院辞职。

△　日军第十四师团平贺支队自海伦出发，对马占山部发起总攻。在距海伦20里之大榆树激战三小时。

△　红四方面军发起的潢（川）光（山）战役开始。战役历时五天，至16日胜利结束，共歼敌新二十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六师共八个团和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获枪支7000余支，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南被敌侵占的广大地区悉行恢复，并扩大了部分新区。

△　皖西地主武装两万余人，随第四师徐庭瑶部进犯霍邱。

△　红军占领湖北广济，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开抵武穴。13日晚红军自动退出广济城。

△　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再电教育部请辞职。

6月13日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讨论日军完全撤退问题，日方委员冈崎称再候三五日作正式答复。

△　国民政府聘张继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居正、覃振、刘守中、杨虎城、李协、褚民谊、陈璧君、王陆一、何遂、戴愧生、石青阳、黄吉宸、李次温、李敬斋、贺耀组、邓宝珊、恩克巴图、陈果夫、焦易堂为委员。

△　蒋介石令豫、皖、赣、湘各省主席于15日齐集庐山会商“剿共”事宜。

△　蒋介石电邀顾维钧赴庐山，并派自用飞机抵京迎顾。罗文幹

在京宴请顾维钧。

△　何香凝、柳亚子等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组建国难救护队，杨庶誉任队长，是日救护队由沪启程北上。

△　阎锡山任满泰为蒙边司令。

6月14日　　日本众议院通过久原等45人提出之关于“满洲国即时承认”之决议案。

△　行政院会议决议，慰留江苏省府主席顾祝同暨王柏龄等全体委员。

△　汪精卫、罗文幹、顾维钧等飞庐山晤蒋介石，商外交、财政及“剿共”事宜。15日下午，顾与罗返京，顾旋乘飞机到沪，对记者宣称：在庐山两度会议，“对东北失地，决以积极方法从速收回。对日外交，仍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则努力进行”。

△　前外交部长陈友仁离上海赴法国。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沪慰留陈铭枢和宋子文，并访孙科。孙称病未见。

△　第四师师长徐庭瑶由蚌埠赴正阳关指挥“剿共”，师部及直属部队随行。15日，第四师在正阳关集中，准备进攻六安、霍山、霍邱。

△　国立编译馆成立，直隶教育部，掌理学术文化书籍及教育用书的编译与审查。辛树帜任馆长。

△　劳动大学护校委员会召开执行委员会，通过驳复教育部文及对外宣言，并派代表陈悲农等赴京请愿。

△　下午2时10分，广州地震。“全市房屋均微微摆动，悬空之物

动荡不止”。

6月15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何应钦、李济深、何成濬、何键、陈诚、钱大钧、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等将领及汪精卫、顾维钧、黄绍竑、李石曾、熊式辉、俞飞鹏等参加。16日会议闭幕，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红军，蒋介石亲兼三省“剿匪”总司令，以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并制定《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

△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我方委员俞鸿钧与日方委员冈崎于驻沪美领事署晤谈，冈崎允将淞沪路以东、沙泾港以西、虹口以北一带之日海军陆战队撤退，即日由我方接收，惟六三花园方面须稍缓时日。

△　日骑兵吉冈第一旅团在大连登陆，17日到达齐齐哈尔，协同第十四师团进攻马占山部。

△　马占山为扭转被动局面，由才鸿猷、邓文同时进攻海伦、海北。才部从西南方向海伦进攻，进至城下，屡攻不下，被迫折回。邓部于晚间突入海北城内，敌撤至天兴泉酒厂内凭高墙铁门死守。至次日晨，日军从海伦增援，日机六架配合轰炸，邓撤出。是役毙日军大队长一员和百余名日军，邓部副团长张云亭阵亡，官兵伤亡70余名。

△　国民政府令：任命诸昌年兼驻芬兰国特命全权公使，毛炳文为陆军第八师师长，刘和鼎为陆军第五十六师师长。

△　中华国民拒毒会、全国律师协会分别发表谈话和通电，反对鸦片公卖。

△　教育部派次长段锡朋赴平调查北平学潮。

△　兰州中等以上各学校教职员为要求发三个月欠薪未达目的，全体宣言总辞职。

△　任鸿隽再电教育部辞中央大学校长职。

△　中央大学学生及教授代表在中大开会，议决：一、用学生全体大会名义电促任鸿隽校长到京视事；二、要求政府在中英庚款及卷烟税项下所拨之款为本校独立基本经费；三、由财政部、教育部、本校校长、教授、学生会代表，共同组织本校基金保管委员会；四、由本校学生推代表五人，联络教授会，共同组织中大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

6月16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平贺支队及平松支队合击克东马占山部，占克东。马部义勇军自动撤退，日军无大收获而收兵，平贺支队20日回海伦，平松支队18日回克山。

△　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援助东北义勇军。

△　上海市民联合会电国民政府，反对鸦片公卖。

△　国民政府准免甘肃省政府委员贺耀组本职；任命李思愿为陆军第八十师师长。

△　邓宝珊就驻兰州“绥靖”行营主任职。

△　南京、上海、济南、安庆等地，举行孙中山广州蒙难十周年纪念。

6月17日　鄂、豫、皖、赣、湘五省民政建设会议在庐山开幕。五省将领、省主席及民政、建设厅长均出席，讨论决定五省“剿匪”全盘计划，对红军取大包围方式，以政治、建设配合军事，为根本的“清除”，并着重讨论“各省剿共部队之分配联络办法”及“进剿方略”、饷糈筹措等。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并分别对各省军事长官表示：“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必须早日将匪类肃清，然后始能充实力量对外”。19日会议闭幕。

△　行政院就日本议会承认伪满洲国事发表对外宣言，略谓：“此次日本政府竟抛弃最后之面具，明目张胆承认伪国，此种行为不独对于中国为最显豁之侵袭，抑且将《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完全撕毁”，“中国国民为自卫计……对于日本政府此种行为，决定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反对。”

△　外交部就日本议会承认伪满洲国事发表宣言，略称：“东省伪组织，完全为日本政府以武力所造成……中国政府断不能承认”，“中国政府除以最严厉之国法处置该伪组织外，对于日本在东省之前后非法行为，始终认为武力侵略之一贯。”

△　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接管公共租界以北、淞沪铁路及北河南路以东、沙泾港河以西区域。

△　汪精卫由京赴沪，敦劝宋子文、陈铭枢复职，并访孙科，沟通政见。

△　广东陈济棠部梁公福团在唐家湾与陈策部四舰发生激战。四舰败退澳门。唐绍仪以梁部在中山港作战，愤而辞去西南政委会委员及中山县长兼职。

△　韩复榘通电取消刘桂堂山东警备军名义，略谓：“刘桂堂自投诚以后，编为山东警备军……乃狼子野心，反复无常，又纠党叛变，并敢驱逐县长，勒缴团枪，逆迹昭彰，殊堪发指”，“所有前编山东警备军名义即行取消。”

△　伪满国务院通令东北各省对爱国青年、国民党员，一律以扰乱治安罪驱逐出境，如不出境，“即处死刑”，并取缔各法团自由开会。

△　伪满中央银行成立，荣厚为总裁，日人山成乔六为副总裁。

6月18日　　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幹、顾维钧、王树翰、曾仲

鸣、刘宗杰等自京同飞北平，往访国联调查团，并与张学良协议对日交涉方针。

△　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团结一致，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中国革命的新胜利”。

△　国民政府重颁禁烟令，略称：政府曾先后颁布各种禁烟法令，并三令五申表示禁绝，“诚恐偏远省分，日久玩生，奉行不力，或诿卸职责于地方特殊情形，未能革除净尽，致隳前功”，“嗣后各地方长官对于实行烟禁，务各遵照现行法规，切实实行，毋得阳奉阴违，视为具文”。

△　上海劳动大学学生发表护校宣言，望全国同胞共起积极援助。

△　上海市商会召开代表大会，发表三项宣言：一、本年工作应注重于废止内战及提倡国货；二、反对上海设置自由市；三、反对鸦片公卖。

△　伪满秉承日人意志攫夺东北关税，是日伪财长熙洽发表声明，声称“先将大连以外满洲海关之全部税收，停止汇往南京政府”，“若总税务司及南京政府依旧采取反抗态度，则断然处置”，准备掌握大连及其他海关税收之全部。

6月19日　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幹、顾维钧等在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交换意见。20日继续会晤，调查团对东北义勇军及抑制日货问题颇注意。22日，汪、罗离开北平返京。

△　鄂省民政厅长朱怀冰自庐山电鄂，声称：“庐山会议结果，对肃清赤匪整个方案有缜密之讨论与决定，决以政治力量随剿匪军事向前进展，使匪区收复后不致再陷匪手。”

△　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和第十师李默庵部奉军委会令由浙调鄂“剿共”。23日，第八十三师全部抵武汉。

△　国民党中委马超俊抵沪，发表调解粤事经过，称经数次调解结果，“陈策决顾全国运民命，不予抵抗，如粤方定欲攻琼，则愿退让，是非请国人评判”。

△　由黄郛、张嘉璈等发起之“新中国建设学会”在上海成立。

△　上海青年会会员抗日救国会电告全国同胞，反对鸦片公卖。

△　河南渑池县降雹两小时，被打死者200余人，有400村庄房屋、田禾、树木尽毁。

6月20日　财长宋子文发表宣言，对伪满强夺东北关税事予以指斥，略称：日政府假借伪满洲国名义干涉东三省海关行政，哈尔滨、牛庄、安东三处海关解交总税务司之税款，分别于3月28日、4月16日和4月19日被迫停止解出，并扩充其侵占行为于大连，构成直接违犯国际条约。

△　沪日陆战队声明，沪西丰田纱厂、同文书院、吴淞路华丰纱厂、平凉路公大纱厂四处日军必须长期驻防，决不撤退；第四暂驻区剩余日军亦暂不撤。

△　蒋作宾奉召赴庐山谒蒋介石。

△　陈济棠在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纪念周报告粤海军历年走私漏税，为政治污点，又不能“剿匪”，故奉令将其改组。

△　许世英电行政院请辞赈委会委员长职。

△　兰州中等以上各学校教职员罢教事，经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调解，并发给一个月欠薪，各教职员即日复课。

△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决议反对教育部停办劳动大学。

△　中央大学教授、学生举行经费独立运动联席会议，决定：一、以下周为本校经费独立运动周；二、推定代表赴国府请愿；三、电慰任鸿隽并促从速南下长校。21日，中央大学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教授和学生代表九人，赴行政院请愿，因汪精卫在平未返，无结果。

△　北平市小学教员会召开执委会，议决：一、21日全体执委往访宋子文，面索协款；二、推葛济欧、吕流长二人为代表，持呈文于日内赴绥靖公署，要求张学良从速筹拨补助费。

△　陕西举行泾惠渠落成放水典礼，中央派吴敬恒、褚民谊参加。

6月21日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开会，俞鸿钧促日军速撤。日方委员冈崎答允最短期内撤退。

△　上海市商会呈请行政院免征淞沪国税，庶战区得稍苏息。同日，上海市政府布告减免战区捐税。

△　蒋介石任命曹浩森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参谋长。

△　豫、鲁、苏、皖边界商丘、睢县、宁陵、永城、曹县、夏邑、虞城、柘城、单县、亳县、鹿邑、考城等15县为“剿匪”清乡，在商丘召开15县联防会议，议决于7月1日正式成立15县联防委员会。

△　江苏省商联会呈行政院，请严厉制止苏省财政厅兴办特种营业税。

6月22日　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成立，并发表公告，声明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等四团体，鉴于内忧外患之严重，拟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决先行设立废

止内战大同盟会筹备会于上海，即日起开始办公，并定于8月6日在上海举行发起人大会。

△　蒋介石电令鄂、赣、皖、豫省府及“剿共”部队，在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一律仿湘办法，举办团防与剿共义勇军”，以扰乱苏区。

△　财长宋子文就伪满政府强劫牛庄、安东税款，移往满洲银行事，再次发表宣言表示反对。

△　上海银、钱两业同业公会电请行政院、财政部、外交部，抗争东北关税。

△　孙科由沪赴香港调停粤二陈纠纷。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所属89团体，举行留别第十九路军将士大会。

△　南京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淞沪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追悼大会，南京市市长石瑛主祭，到万余人。

△　青岛大学学生于16日向校方提出取消学费、取缔不良教员、修改学则、制发校章四项要求，未得确切答复，是日一致罢课。24日，校方布告开除学生九人，全体学生赴校长杨振声宅请愿，要求收回成命，杨允俟校务会再讨论处置办法。

6月23日　外交部为日本嗾使伪满破坏中国海关行政完整，特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分别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之驻华代表，请各政府对日政府准备正式承认“满洲国”事，加以严重之注意。

△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发表宣言，称：“现在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正集其全力，实行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冒险的行动”，“本政府号召全国的

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一致的斗争起来，武装起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四次大开战。”

△　行政院令冀、鲁、豫省政府及平、津市政府，筹划有效办法，救济自九一八以来由东北逃至华北各处之灾民，协同慈善机关及路局将灾民遣送还乡，或设法为之谋生。

△　财政部以伪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两亿元，呈请行政院速谋应付方法，并咨外交部向日抗议。

△　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电广东陈济棠和陈策，吁请悬崖勒马，另图和平解决；并电广州各团体婉劝力诤，联合阻止二陈互相残杀。

△　中华国民拒毒会就国民政府重颁禁烟令一事发表宣言，表示“疑信参半”，谓“证以当局以往言行之不一致，殊令人难以置信”，“政府果有禁烟诚意，宜于煌煌功令之外，更作事实上之进行”。

6月24日　外交部为伪满将于7月1日起实行贴用日本代印之邮票事，特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本此种行为“破坏中国邮务行政完整，实属违法已极”，“所有一切责任，应由日政府完全负担”。

△　国民政府公布《大赦条例》。

△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重要任务的决议》。

△　全国商联会及上海银、钱两公会为东北关税被夺事发表对外宣言，略称：日本借自造傀儡伪满，“劫夺东北关税，匪特违反现有条约，且足酿成中国财政及政治之瓦解”，“为保障条约尊严，并顾全国际贸易与金融关系起见，应请各友邦速起设法制止日本施此下策”。

△　行政院决议，北平师大校长李建勋辞职照准，任命李蒸为该校校长。

△　中央大学教费独立运动委员会推代表20余人赴行政院请愿，要求拨定庚款为该校经费独立基金。汪精卫手谕答复：“英庚款与英有换文规定用途，当查明办理，如无款可拨，政府必须设法维持中大教费。”该代表认为满意返校。

△　汉口商会全体执委赴鄂省府，要求停办营业牌照税，省府主席夏斗寅允停办。

6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汪精卫详细报告东北情形，对日人在东省练兵窥伺关内及在东省之各种侵略措置，陈述颇多。会议通过追认国民政府特派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多案。

△　大连税务司日人福本因拒绝汇解关税至沪，经上海总税务司梅乐和于24日予以免职。是日，中国政府为日本嗾使伪满接收大连海关事向日本提出抗议。27日，日政府向中国政府抗议福本褫职事。

△　孙科到香港访胡汉民。陈济棠军两路渡海攻琼崖，并派飞机在伶仃洋炸陈策之“中山”等舰。

△　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决议，展缓讨论远东问题，待调查团报告书完成。

△　教育部颁发《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规定以1932年8月起至1935年7月为第一期，此期内全国各县、市设义务教育实验区，收容县、市区内失学儿童十分之一。同时颁发《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收容10至16周岁失学儿童入短期小学班。

△　上海市商会电行政院反对江苏实行特种营业税。29日，该会再电行政院力争。

△　上海虹口区怡昌、云成、祥成三丝厂工人1000余人因反对延长工时，要求增加工资，一律宣布罢工。26日虹口通纬、裕经、兴纶三丝厂工人加入罢工。其他各丝厂资方自动宣布停工，27日虹口各丝厂全部停顿。30日，闸北区15家丝厂工人全部参加虹口区丝厂工人大罢工。闸北区丝厂亦完全停顿。

△　连日大雨，长江水陡涨至36.9尺；湘水亦涨。

6月26日　伪满强占哈尔滨海关，北满各关均易帜。大连关日员因福本被免职而全体辞职，并声明自即日起，与中国政府脱离关系，投入“满洲国”海关。

△　新任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续派飞机飞伶仃洋轰炸陈策各舰。各舰以高射炮还击，旋避入香港英界。

△　第十九路军由参谋长黄强率领入漳州“剿共”，第六十师向南靖、龙岩推进。

△　河南省红军将平汉线花园附近铁轨拆断，火车出轨。陆家山车站被捣毁，平汉车不通。

△　北平青年群众代表大会在平召开。大会致电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表示“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建立红军，创造河北的新苏区，来积极完成拥护你们的战斗任务”；并另电东北义勇军称：“坚决号召河北省的劳苦青年自动武装起来，帮助你们与敌人作战。”

△　中央研究院与陕西地质调查所订定勘查陕西油矿协定。中研院担任供给技术人才，地质所担任调查、测绘。

△　钱塘江水大涨，杭州、海宁、萧山一带沿江滩地坍陷三万余亩，禾秧尽遭淹没。长沙因连日暴雨，全市殆受水浸。湘水续涨，长潭、长宝、潭衡各汽车路均被水淹停驶。

6月27日　汪精卫在京中央纪念周报告，声称将五省红军消灭，方可并力御侮；财政当取决于政治，必须政治修明，财政始能充实；鸦片公卖不可随便举行。

△　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

△　伪满正式接收安东、营口、哈尔滨、珲春及大连各海关，福本接受伪命，重行到关。

△　教育部电各大学、专门学校、各省、市教育厅、局指示暑期军事训练办法，凡受军事训练之学生，在暑期内应一律留校，连续训练三周。

△　中央大学师生全体会议决议：校长仍请于任鸿隽、翁文灏、竺可桢三人中择一任命；驱逐刘运筹、杨公达、黄仁浩、方光圻四教授；请政府彻查中大水灾捐款舞弊事，限朱家骅将挪用水灾捐款三日内送还会计组；通过要求行政院撤换教育部长朱家骅。11时整队赴行政院请愿。

△　青岛大学全体学生开会议决：一、否认学校当局将开除之九名学生改为准其休学一年的处置；二、驱逐校长、教务长；三、请教育部另选贤能；四、请各教授组织维持会；五、全体赴京请愿，并通电全国大学，请一致援助。

△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全体委员大会决定该会于7月1日起办理结束。

6月28日　蒋介石由九江抵汉口，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成立。

△　国联调查团离平赴日本。

△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段锡朋暂代中央大学校长（30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二、裁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三、颜惠庆、郭泰祺以大使待遇，并增加驻英、美两使馆经费；四、创设官商合办中国建设银行，并通过该行条例。

△　上海淞沪、沪杭两铁路管理局举行追悼两路殉难职工大会，铁道部长顾孟馀主祭。

△　赣江、抚河水涨，南昌、新建等县各圩决口数处，田禾淹没，收成无望。江西省赈会电中央及省军政当局，请速颁巨款，以资急赈。

6月29日　段锡朋赴中央大学接事，被学生殴伤。中大全体学生集会，声明段不合校长人选标准，誓死抗拒，并推13人组织拒段护校委员会。同日，行政院因段被殴伤，召开临时会议决议：国立中央大学除在沪设立之商、医两院外，着即暂行解散，听候彻底整理，所有教职员应重行聘任，学生应重行甄别；教育部长朱家骅呈请辞职，决议慰留。

△　蒋介石电令各部队将领，未奉召不得来汉口，在汉者即日返防。

△　蒋介石令禁“剿匪”各军就地筹饷，鄂军饷由中央发给。

△　蔡廷锴到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会商“剿匪”办法，并调停粤海军冲突。

△　国民政府任命李韫珩为陆军第五十三师师长。

△　苏州商会召各业开会议决：如省府实行开征特种税，苏州各业对于应纳省税一律停缴。

△　青岛大学学生发表宣言，反对校长杨振声，并驱逐教务长赵

畴、图书馆长梁实秋。杨振声抵京向教育部报告学潮经过，并引咎辞职，听候中央处分。

6月30日　蒋介石决定分三路进犯鄂、豫、皖三省革命根据地红军，并任命各路司令官，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自兼，刘峙副，下辖六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张钫，第二纵队陈继承，第三纵队马鸿逵，第四纵队张印相，第五纵队上官云相，第六纵队卫立煌，进犯平汉线红军；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兼，王均副，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第二纵队王均兼，第三纵队梁冠英，预备队阮肇昌，进犯津浦线红军；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濬，徐源泉副，下辖四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万耀煌，第二纵队萧之楚，第三纵队张振汉，第四纵队刘培绪，进犯鄂中红军。此外，长江上游总指挥王陵基，进犯鄂西红军。

△　蒋介石在三省“剿匪”总部召集旅长以上军官面示“剿匪”机宜，声称“要救国救党，御侮对外，须先肃清赤匪”，并表示“匪如一日不肃清，本人即一日不回京”。

△　皖西敌军分三路进犯红军，一入六安，一入霍山，一侵霍邱，其空军连日来向霍邱一带轰炸。

△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议，电请留粤各中委调解海军冲突，一致对外。

△　南京警备司令部昨今两日逮捕中大学生会主席骆纪常及学生陈克诚等。

6月下旬　红一方面军一、五军团自闽南回师赣南，经安远、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县境，向粤北之南雄水口地区推进。彭德怀红三军团移师崇义、新城。

是月　中央苏区创办列宁师范学校，徐特立任校长。

△　民族音乐家、作曲家刘天华逝世。

△　成通纺织公司在济南成立，纱锭一万枚，布机200台，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3年5月建成投产。

7月

7月1日　　何应钦由浔抵京，向汪精卫报告赣省“剿匪”近况，并称：决定分区“清剿”，政治、军事双方并进，标本兼施，稳扎稳打，逐步“肃清”。夜，汪精卫、何应钦、曾仲鸣、李济深、褚民谊等乘车赴沪，与宋子文商筹“剿匪”军费问题。

△　行政院决议：任命李杜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丁超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任命冯占海为哈绥警备司令，王德林为宁安警备司令；青岛大学应即解散，听候整理；交通部长陈铭枢呈请辞职，应毋庸议，给假三个月休养，陈请假期内，由黄绍竑兼代交通部长。

△　南京中央大学代理校长段锡朋布告限学生三日内离校，听候重行甄别。学生会向各界发表紧急宣言，呼吁“全国人士一致主持正义”，“力争吾校之生存”。同日，该校教授代表向行政院索薪。

△　北平师大学生致电行政院，要求撤回解散中央大学令。

△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元，半年期，年利一分，1933年1月1日起还本付息。

△　张学良在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典礼上宣布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　西北各省霍乱蔓延，潼关、包头死十五六人。

△　山东官商合办之民生银行在济南开幕，总经理王向荣。

△　日外务省训令驻长春日领照会伪满洲国当局：“满洲所有税关除大连关外，一律归满洲国管辖；大连税务司福本复职”，督促“满洲国”接受此项计划，不能有任何更动，倘“满洲国”拒绝接受，将蒙不利。

7月2日　　晨，蒋介石在汉口接见张难先、方本仁等，下午接见鄂省政府委员及武昌县长。蒋要求各县县长“应抱城存与存决心，遇有匪警，不得弃城离职”。

△　林彪红一军团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击溃由南康向大余集结之李振球第一师，敌退守大余。4日红一军团开始围攻大余，粤军李汉魂独立第三师、张枚新第四师等向南雄集中，企图夹击红一军团。

△　红三军贺龙部围攻京山，15日在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压迫下撤围。

△　牛兰夫妇因国民政府不准聘用外籍律师进行辩护，又因不允其请求移回上海法院“管辖”，本日起绝食，以示抗议。

△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筹备会在沪举行第四次会议，讨论制止广东内战办法，决推代表赴粤请愿停战，并邀请粤各团体加入。

△　午后4时，教育部派易克嶷、周淦等接收中央大学，教员解聘，令学生三日内离校，听候甄别，如有违抗，将强迫执行。

△　中华国民拒毒会通电揭露国民政府对鸦片公卖“一向态度模棱，均采取明禁暗行之策略”，号召“各界同胞，亟起自救，继续抗争”。

△　阎锡山在太原成立“造产救国社”，阎任委员长。

△　安徽旅沪同乡会因安徽省政府实行特种营业税，联衔电请行政院转饬立即撤销。

7月3日　　北平学生、士兵、市民及其他劳动者1000余人，在天桥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投降，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日本进攻华北。

△　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以中俄复交关系重大，令各区分部充分发表意见，何键以“我国既一意剿赤，自不能对俄复交”为由，电请中央“详加察核”。

△　旅沪日侨以公共租界工部局有通过华方收回越界筑路地段之可能，日侨居留民会等两团体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除面促工部局日董冈本等表示反对外，并郑重发表反对宣言，声称工部局放弃越界筑路权，“我侨民顿失生命财产之保障”。

△　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

7月4日　　国联调查团抵东京。团长李顿昨日在大阪发表声明，谓“余等之使命系搜集此次纷争之一切关系事实，报告国联，此种关系事实之中最重要者，为中日两国在纷争地域内所有之永久的权益”；“余等之调查，确信为中日两国之死活的权益所寄与”。

△　军政部长何应钦、训练总监李济深前往吴淞、江湾、闸北各处视察战区，详询当时作战情形及我军防御工作。

△　日本海军中将左近司继野村任第三舰队司令，是日左近司自佐世保军港乘“出云号”旗舰到沪。

△　吉林抗日义勇军图取长春，以冯占海为总指挥，宫长海为副。冯军主力月初起与日军战于新立屯一带，次日占舒兰、五常。

△　浙江海宁2000余农妇因灾向米商索米，军警开枪镇压，伤妇孺五人。

7月5日　　广东陈济棠、陈策混战，陈济棠令雷州空军二次轰炸泊琼海之“飞鹰”舰，“飞鹰”舰用高射炮还击，互不中。雷州空军复飞琼山、海口掷弹轰炸，伤残颇重。

△　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委员俞鸿钧访该委员会主席克宁翰，报告D区日军延不撤退情形，要求转向日方交涉。

△　江苏高等法院首次公开审判牛兰案。牛兰夫妇不承认江苏高院有管辖本案之权，要求转送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次日续审，牛兰夫妇以沉默相抗。

△　总税务司梅乐和在沪发表声明，称东北海关被伪满洲国夺取，关税收入不敷偿债，“6月份债务与赔款偿付总额为上海银1293.5万两，而总收入额则为1282.7万两”。

△　江西各业公会以江西省政府值此民穷财尽之际，竟借口“清匪”善后，征特种物品产销捐，加重人民痛苦，呈请行政院电饬该省政府收回成命，速即撤销。

△　行政院会议决议：任朱绍良为太湖“剿匪”总指挥，张寅为副指挥。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因学潮多日未解决，是日保定驻军及公安局奉令前往接收该校，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被枪杀六人，伤八人，被捕38人。

△　山东省政府政务会议决议，请行政院改国立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旧有文、理学院设青岛，济南添设农工学院。

7月6日　　朱德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南雄进攻。余汉谋派张达师开翁源堵击，派张枚新师固守大余，并急电中央派兵增防赣州。

△　教育部派易克嶷接收中大工学院，为院长顾毓琇拒绝，并表

示“如强迫执行，仪器工具等如有失落，应由接收者负责”。

△　行政院议决设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聘蔡元培为委员长，李四光为副，顾孟馀、周鲠生、俞大维、竺可桢、钱天鹤、张道藩、罗家伦、谭伯羽等为委员。

△　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鸦片公卖。

7月7日　　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向日本内田外相转达国民政府所拟解决东北问题方案：一、承认满洲自治，中国保有宗主权；二、承认日本在满权益；三、日本从满洲撤军，改变军政状态，公布纯粹的文治制度。内田拒绝接受。

△　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沪召集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原则确定采用银元制度，以统一币制，旧铸银元照旧使用；一俟法定重量标准规定后即开始鼓铸新币。

△　粤陈济棠攻琼军5日晨在榆林港偷渡，被“海瑞”舰察觉击退。是日晨，粤机投弹炸沉琼舰“飞鹰号”。

△　季振同红五军团击溃乌径、新田之敌张枚新第四师。次日占领信丰城，张师几被全歼，退守水口待援。

△　牛兰夫妇继续在狱中绝食，坚持移沪审讯。

△　国民政府令：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建勋辞职照准，任命李蒸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任命郭汝栋为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　山东淄博煤矿工人因公司降低工资，群起反对，万余工人7日至9日次第罢工。

7月8日　　汪精卫邀请各地学术专家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等32人在京集会，讨论外交、内政、建设、教育等问题，外交侧

重对日方针，建设侧重财政，教育侧重制度经费。13日闭会。

△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推举代表朱庆澜、查良钊、陈立廷三人赴粤制止陈济棠、陈策之争，是日乘“胡佛总统号”轮离沪。

△　蒋介石任命杨永泰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秘书长，杨是日到职。

△　国民政府任命郝梦龄为陆军第五十四师师长。

△　蒋介石新聘之美国顾问裘伟达上校抵沪，协助开办航空学校。

△　粤二陈争端，经蔡廷锴调停，是日双方接受条件，停止战争。条件为：一、由谭启秀部赴琼接防；二、琼舰队全移厦“剿共”，陈济棠每月助海军费10万元，七个月为期。

△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通过会章34条，选举徐悲鸿、田汉等21人为执行委员，蔡元培、吴敬恒、汪精卫等七人为监察委员。

△　中国首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启程赴美。在上海码头举行数千人参加的欢送会，中华体育协进会董事王正廷授旗并致词。刘长春接旗致答词，表示为国争光的决心。于希渭因日伪阻挠未成行。

7月9日　　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季振同红五军团所属各军与粤军20个团在池江、梅关岭、大庾、南雄县水口圩展开争夺战，经过三天两夜战斗，于11日将粤军全部击溃，红军克水口圩，敌退南雄。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提高常委职权，在国难期间，由常委全权处理一切政务。

△　国联调查团委员在东京往晤日本陆相荒木，荒木谬称“满洲为日本生命所系，日本防务问题与满洲防务问题不能分开”，“日本一俟满洲国组织完备，当予承认”。

△　台湾公布《资本逃避防止法》。

7月10日　文化界鲁迅、柳亚子、茅盾、陈望道、丁玲、洪深、田汉、郁达夫等32人致电汪精卫等要求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同日，江苏高等法院允对牛兰夫妇以移送医院为“通融办法”。

△　红军占领福建龙潭。

△　孔荷宠红十六军在湖北通山与敌军谢彬部激战，歼敌两团，缴获甚多，并占通山县城。

△　谭启秀奉蔡廷锴命抵广州与陈济棠商收编琼州陆战队事，“中山”、“海瑞”、“福安”三舰及陆战队交蔡廷锴带闽“剿匪”，琼州由陈济棠派陈汉光旅接防。逃港各舰交回陈之第一集团军，海军欠饷由粤发给。

△　豫北六河沟煤矿工人罢工，丰乐镇驻军第十五旅第六四三团派兵前往镇压，逮捕41人。

△　晨，南京水西门外大王庙军械火药库突然爆炸，附近民房延烧百余家，居民被烧死烧伤者甚多。

7月11日　宋庆龄由沪到京探视牛兰夫妇，劝其进食。牛兰对送医院表示赞同。同日，上海中外各界人士在宋庆龄领导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委员会”，并发表英文宣言称：“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应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应立时应允。”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决设党政委员会，是日公布该委

员会组织条例。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财政部整理产区盐税暂行税率案，宋子文为此发表谈话称，产区盐税暂行税率案，其目的在于平均税率，取缔走私，增进税收。

7月12日　宋庆龄在京访汪精卫、罗文幹磋商营救牛兰夫妇。宋要求于人道上而不违背中国法律想一折衷办法。罗表示为保法律威信，当依法办理。同日，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幹、次长郑天锡因反对外籍律师为牛兰夫妇出庭辩护，并以牛兰保释“违背法治精神”，呈行政院辞职。

△　牛兰夫妇经宋庆龄、蔡元培具保移沪就医问题，蔡得悉罗文幹、郑天锡因此案辞职，“恐因此引起政治纠纷”，特向高等法院退保并撤回保证书。宋庆龄亦只得连带退保。晚宋怫然去沪。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争取释放牛兰夫妇发表宣言，谓“本政府已预备释放各苏区所羁留之帝国主义侦探——外国传教士，为南京政府释放牛兰夫妇之交换条件”，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　国联调查团与日外相内田康哉会谈，内田态度强硬，声言“满洲国家业已成立，无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满洲问题的必要”。

△　驻日公使蒋作宾访日外相内田康哉，转达国民政府对于日本承认伪满洲国问题的意见。蒋去东京途经神户时对记者称：如日本承认伪组织，不惟证明日本违背《九国公约》信义，且将使其在世界之声望大受损伤。

△　蒋介石在汉口三省“剿匪”总部召见湖北各县县长41人训话，强调县长职责最为重要，应抱城存与存决心，有好县长，可抵过一万兵，应在政治上力谋改进。

△　徐庭瑶第一纵队攻占皖西霍丘城。

△　朱德部红军集结信丰、南康、大余一带，并分出一部绕道南雄，袭击广东仁化，直逼韶关，图断绝南雄粤军与广州的联络。

△　行政院议决将统税署与印花烟酒税局合并为税务署，任谢祺为税务署署长。16日，该署在上海成立。

7月13日　宋庆龄、杨杏佛在沪发表声明，谓“前因牛兰夫妇绝食十日，本人等出于人道观念，并基于与关系当局事前之谅解，故愿以个人资格保释，俾到沪就医，经努力两日，未达目的，同时司法部长罗文幹因此呈辞，现本人等不愿再出为牛兰等作保，希望罗氏即可打消辞意”。18日，罗文幹、郑天锡打消辞意，到部视事。

△　江苏高等法院向牛兰夫妇最后警告，准其于南京中央医院、鼓楼医院择一出外诊治，倘再拒绝，将强制执行。

△　豫、鄂、皖三省党政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并派定委员九人：张难先、仇鳌、彭介石、萧萱、洪陆东、贺衷寒、张群、杨永泰、耿伯钊。张难先为监察处主任；洪陆东为党务指导处主任；张群为政务指导处主任。

△　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就任临永警备司令，辖临榆、昌黎、抚宁、卢龙、迁安五县。

7月14日　国联调查团再晤日外相内田，内田表明日本不能放弃其固定政策，永远不能承认将东三省归还中国，并声称：“日本欲先等满洲地位稳定后，再与满洲国商订条约，同时承认满洲国。”

△　蒋介石颁发《告匪区民众书》及《悬赏招抚胁从民众命令》四道，凡属胁从，一律优待，并悬重赏劝红军来归。

△　蒋介石手谕湖北各县长：一、应厉行本党政纲对内政策；

二、严格清查户口；三、全民军事化。

△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从速处理热河问题，务请从速派队星夜驰进，以免受制于倭。

△　福州全市商民反对省政府以暴力强征房铺捐而罢市。市警察第一署署长施泰桢率警劝令开店，被众围殴重伤。

△　据《大公报》讯：杭县四乡及海宁、德清各县乡镇，最近发生老妪抢米，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千余人。抢米风潮扩大至湖属一带。

7月15日　　宋子文、何应钦、刘瑞恒等飞赴汉口，与蒋介石商洽“剿匪”经费，并报告“剿匪”计划。

△　国民党南京市执委会决议，请国民党中央函国民政府转令司法机关，对牛兰夫妇“应依法办理，不得瞻徇”。

△　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决再为牛兰夫妇作保，并要求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将牛兰夫妇移沪高等法院分院受理。保状由陈瑛、斐斯两律师夜车赴南京呈递。

△　牛兰夫妇绝食消息传至欧洲后，欧洲各界异常愤怒。是日，巴黎劳动界、文化界向中国公使馆示威，柏林大学教授联名质问南京国民政府，英国独立劳动党领袖舍克司登亦向南京提严重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　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偕秘书哈斯离日来华。17日顾维钧过津赴青岛迎候。19日，国联调查团抵青岛，次日抵北平。

△　左路军司令何成濬、副司令徐源泉率部十余万人向鄂洪湖根据地红三军贺龙部发动总攻。

△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号召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提出红一方面军要“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　外交、财政两部决封锁东北海关，由各关代征东北入口税。

△　全国高等教育问题讨论会在沪举行，到各地代表67人，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报告筹备经过，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致欢迎词。大会连开三日，通过增进高等教育效能、大学教学问题、普及体育、提高专任教员薪额等提案24件。17日会议闭幕。

△　上海国际电台致电交通部，以该部与美国马凯公司密订无线电报务等合同，“实足危害我国甫经自主之国际通讯事业”，请立予撤销合同。

△　沈阳邮局被伪满劫夺，邮务长巴立地被迫办理交代，副邮务长刘耀庭脱险到北平。20日，邮政总局负责人对远东社记者称：东北邮政乃东北交通经济之主要命脉，决不能任人劫夺，必要时决将东北邮政全部封锁，亦所不惜。

△　浙江嘉兴、桐乡交界之濮院镇贫苦农民结队向米行抢米；同日，镇海人民因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一倍多，举行抗捐运动。

7月16日　　何应钦致电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何键，商定“剿匪”军事计划，即以粤军主力由粤北向赣南推进；湘、桂军由湘、赣边东下；闽军由武平、长汀、上杭向瑞金、石城进攻；赣军则自永丰、南丰之北向宁都、广昌以袭红军后方。五省动员总兵力约在30万人以上，对中央苏区之宁都、瑞金、石城、广昌、会昌、寻邬、雩都、兴国、汀州、宁化、上杭、武平等县形成大包围圈。

△　蒋介石在汉口再度召集湖北各县长训话，令其效法曾国藩、左宗棠，并分赠手编之《曾左语录》一册。

△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福建漳州开军事会议，动员“剿匪”，其第六十、第七十八两师除留一团守漳州外，其余全部限三日内向闽西前方推进。

△　北江方面粤军改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攻南康，以余汉谋为总指挥；第二纵队攻信丰，以香翰屏为总指挥，限期克复信丰、南康。

△　国民政府任命马鸿逵为陆军第三十五师师长。

△　财政部发表6月份海关贸易额入超4000余万元，日货进口骤升至第一位。

7月17日　牛兰夫妇经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具保，出狱移南京鼓楼医院就医，法院派警前往看守。

△　日本陆战队200余人自上海停战协定中所规定之D区（东自沙泾港起，沿淞沪铁路至横浜桥止；北自沙泾港起，沿新市路至奚家桥止；西自奚家桥起，沿水电路至八字桥止；南自八字桥起，沿日本公墓循横浜河至横浜桥止）撤退，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及市公安局、保安队前往接收。

△　日军借口关东军联络员石本权四郎在热河境内被义勇军扣押，铁甲车二列向朝阳寺进犯，我军阻拦，即被开枪射击。次日，日机五架飞朝阳轰炸，投弹30余枚，步兵第三十一联队一部占朝阳寺。

△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再次请辞军、师长各兼职，并请升王敬久为第八十七师师长；所遗第五军军长职，请派员接任或撤销，“以节糜费”。9月7日，国民政府令准张治中辞职，任命王敬久为第八十七师师长。

△　蒋介石决定对鄂、豫、皖三省红军“清剿”计划，分三步进行：先鄂，次皖，再豫。

△　鄂省组织“剿共义勇队”，本日公布章程，县设总队，区设大队。凡15岁至45岁之男丁均编入。

△　江苏省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民众大会在上海共和剧院开会，被上海公安局侦悉，派警包围，捕去94人，并搜出各种革命文告、刊物、证章、密码本等。其中88人于21日解送淞沪警备司令部，28日审讯。29日解往南京。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整理产区盐税暂行税率，是日公布。原轻税地区税率均有增高，最高者增税1.45元。原有税率最低者仅0.3元，增后为一元。原有最高者为5.5元，增后为六元。

△　闽省红军占华安。

△　天津《益世报》创始人杜竹轩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7月18日　何应钦到沪，对记者谈“剿匪”军事，声称“剿匪”军约60万人，约半年可告一段落，“剿匪”全部经费原支2000余万元，今减至1300万元，非常困难。

△　红军贺龙部二次占领湖北潜江城。

△　江苏第一监狱奉令办理大赦。在押920人，大赦出狱者35人。

△　下午2时，日机五架轰炸朝阳，炸死居民20余人。

7月19日　粤军以全力向信丰红军进犯，以缪培南师任前锋，黄光锐亲率飞机队出发掩护。

△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辞军长职，拟出洋游历。

△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代表与日方交涉，说明石本被掳，与正规军无关，完全是偶发事件。日军要求七天内找到石本，驻朝阳第一

〇九旅旅长董福亭亲赴锦州向日方道歉，否则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　浙江余姚运盐船200余艘要求酌加运费，遭资方拒绝，船工联合绍兴帆船业大罢工，盐运停工。

△　据《大公报》讯：浙西农民今春茧汛失败，无以自给，杭县、海宁、乌镇、菱湖、练市、德清、吴兴、桐乡等地饥民纷纷聚众抢米。

7月20日　国民政府任命沈光汉为陆军第六十师师长，毛维寿为陆军第六十一师师长，区寿年为陆军第七十八师师长。

△　国民党中央制定《保障言论自由法》，凡12条，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或谋破坏团体之刊物没收”。

△　日军“鉴于当前内外诸般情势，不宜立即对于热河方面进行武力解决”，是日退出热河朝阳寺。

△　教育部呈行政院整顿各大学办法数项：一、确定经费；二、裁并各大学重复院系；三、规定延聘教授标准；四、严格限制招收及甄别学生；五、慎重任命校长。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瑞金用无线电向南京政府发出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愿以释放苏区所有西方教士为交换条件，并表示牛兰为中国革命之友，愿为牛兰夫妇辩护。

△　废止内战大同盟在沪举行第八次筹备会议，秘书处报告截止是日加入发起之团体203个，个人493名。代表大会展期至8月27日在上海举行。

△　上海各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以日军“袭热河，攻榆关，窥平津”致电国民政府，质问“有无收复失地准备”，并称“诸公秉持国政，败坏于前，岂仍因循坐误，使敌寇纵骑关内，以沦我华北，涂炭全

国”。

△　天津商民救国会致电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请对攻热日军妥加防御，矢志抵抗。

7月21日　行政院以日军窥热，急电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抵抗，电促张学良加派大军助汤，并决定：一、向日提出抗议；二、电知国联。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督促国民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实行总动员，争取最后胜利，并电促张学良出兵，“决国家存亡于一旦，定个人功罪于千秋”。

△　蒋介石划豫、鄂、皖区域为鄂中、鄂东、皖西、豫南四个“剿匪”区，本日派刘秉粹、张迺葳、石毓阳、向兆余分任视察。

△　日军分五路包围吉林自卫军：一由敦化沿牡丹江南进；二由敦化沿牡丹江南北两路东进；三由延吉北进；四由珲春向西北进；五由中东路海林站南进。自卫军亦分五路迎击。

△　国民政府公布《铁道法》。

△　晚，汉口《大同报》被警察捣毁，并捕去三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以“特别事故”为名，令该报于22日停刊。

△　美兰德出任澳门第一百十三任总督。

△　广州大风雨，全市成泽国，坍屋极多，溺毙压死者千余人。

7月22日　汪精卫以日军进攻热河，电令张学良作自卫抵抗，并电促蒋介石回南京共商应付策略。蒋复电称：“剿匪紧张，暂难返京”，并称已令张学良“于受侵袭时尽力抵抗”。

△　行政院通过教育部所提之整顿教育令：国立北平大学及国立

北平师范大学近年来学潮迭起，办学困难，均应从事整理，除平大农、工、医各学院外，其余各学院及平师大一律停招新生；又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并入文学院，改为教育学系，法学院裁撤，学生转入中央大学肄业。中央大学商学院、医学院，改名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27日教育部令三校遵行。

△　红军击溃敌毛炳文、许克祥部10个团，攻克南丰、抚州，南昌大为震动。

△　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庄崧甫，因兵工导淮不能实行，又无经费而辞职，是日，国民政府令准，特派陈果夫为导淮委员会委员，并代理副委员长。

△　宋子文与上海银钱业续商币制改革事，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为主席委员，任命贝淞荪、胡笔江、刘鸿生及西人凯末、麦照特、雷祺为委员。

△　下午1时，郑州骤起大风雨，夹冰雹巨如鸡卵，历四小时始止，行人被击伤者比比皆是，倒塌房屋数千间，田禾伤十之八九。贾鲁河上游水暴发，沿河房屋漂没，浮尸数十具，为近数十年来未有之奇灾。

7月23日　邮政总局奉交通部令，封锁东北各邮务，邮件、汇兑均停寄发。同日，交通部长黄绍竑发表宣言，谓日本指使叛逆攫夺邮政，业务不能执行，被迫封锁东北邮务，以致影响公众交通，一切责任应由日本政府负之。

△　蔡廷锴在厦门谈第十九路军“剿匪”计划，决定分三步进行：第一步集中兵力，于短期内克复龙岩；第二步由龙岩推进闽西之永定、上杭、连城、武平等处；第三步直捣长汀根据地。

△　外交部就日攫夺东北盐政事，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　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召开紧急宣传会议，电促张学良效死战场，以谢国人，并电勉汤玉麟效第十九路军精神，扫除日寇。

△　女共产党员区梦觉（即周爱霞）及女友莫琼兰，在沪被跟踪的广州公安局侦缉队员扣留，寄押在上海公安局，是日押回广州。

△　华侨140余人去旧金山谋生，被美国当局驱逐回国。

7月24日　陈诚部周至柔、李明两师协同夹攻粤赣边红军，占南康。粤军余汉谋部攻占大庾。第十军徐源泉部黄新、刘培绪两旅攻占湖北潜江县城。

△　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结束，经办事宜摘要连同卷宗交上海市政府保管。

△　西康旅京人士在京召开救省全体大会，决请国民政府明令讨伐达赖，并准康人组织自卫军。

△　军委会调第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为中将参议，遗缺由副师长冯兴贤暂代。

△　安徽宿县石乡劣商陈廷芳、张炳怀包办烟税，索价苛重，农民数千人愤起焚毁陈等之房屋。第十二师派第六十八团前往镇压。

△　河南鹿邑县长亲带团丁下乡催缴烟款，鞭笞农民，激起众愤，鸣枪抗缴，数十村农民举行起义。

△　日人在长春成立大同学院，是日开学。

7月25日　何应钦在京中央纪念周作关于御侮与“剿匪”的报告，声称：“中国目前重要问题，为御侮与剿匪。外侮不御会亡国，赤匪不剿也会亡种。”

△　邮政总局致电国际邮政公署，宣布封锁东北邮务情况，请国

际邮联一致行动。

△　何键在湘省府纪念周发表演说，坚决反对中苏复交。

△　西北问题研究会在沪举行成立大会，胡庶华主席致开会词，说明该会系用科学研究之结果去开发西北，纯为学术团体而非政治团体。大会通过简章，选举职员，并发表宣言。

△　国民政府令：公布《修正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免蒙藏委员会委员石青阳本职；任命张笃伦、陈炳光为蒙藏委员会委员。

△　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溥仪为名誉总裁，本庄繁为名誉顾问，郑孝胥为会长。该会系日本关东军直接筹建的从思想上统治东北人民的“国民组织”。

7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通电“剿共讨逆”，谬称：“非灭绝共匪无以巩固国基，非讨伐叛逆无以御邻寇”，“尤冀全国同胞，确认今日之剿共讨逆，为民族争生存之唯一出路，毋误解剿共即兴内战，毋误谓讨逆必招外扰。”

△　颜惠庆就日本掠夺东北邮务权案，再次向国联提出报告。

△　北平政务委员会开临时大会，到张学良、韩复榘、徐永昌、商震等，张学良报告最近军事、外交及热河情况，决议正式大会于本月29日举行。

△　行政院会议决议：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因病辞职照准，遗缺由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升任，并暂兼代闽“绥靖”公署主任职。8月2日，国民政府任命正式发表。

△　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朱家骅发布整顿教育令，以近来学风嚣张，学潮迭起，若不厉行整顿，“国民教育即可完全破产”。

△　旅京西康人民请愿代表马泽昭等到行政院、国民党中央党部、参谋本部等处请愿：一、请速决方针，电令刘文辉继续前进，乘胜收复西康失地；二、请中央电川、青出兵援助西康；三、接济军实；四、撤销达赖驻京办事处；五、准西康民众组织自卫军。

△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热河分会致电汪精卫，表示“决率全热八百万民众，为政府先驱，誓死抵抗，以保疆土”。

△　华侨义勇军缅甸队130余人，由许笑影等率领，本日由京出发赴东北各地参加抗日工作。

△　江苏公安局奉省政府密令，逮捕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并勒令该报停刊。省府秘书长金体乾谈捕刘原委称：“江声副刊时有宣传阶级斗争文字。”

△　北平小学联合会代表40余人为反对市政府非法撤免六个小学校长，赴社会局请愿无结果，就地绝食抗议，宣称“复职始复食”。

△　日本政府任命武藤信义为驻伪满全权大使；任命林博太郎为南满铁路总裁；任命有吉明为驻华公使。

7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惩戒委员会，审议政务官惩戒案件；准庄崧甫辞立法院委员职，慰留其导淮委员职；任命贾士毅为立法院委员。

△　蒋介石派机飞京，迎汪精卫、宋子文、李济深、黄绍竑至汉口，共商财政、封锁东北海关及废两改元等问题。

△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湖北党政会议谈话会，张难先等党政委员五人及湖北省委、省、市党部全体委员出席，决定由党政委员会、省府、省党部各推委员，分区赴全省各县调查。蒋介石训话，强调“须实地调查各县情况，以为实施指导之依据”。

△　鄂豫皖红军为粉碎敌第四次“围剿”，将各部队化整为零，全面扰敌。是日蒋介石令三省“剿匪”部队照预定计划，节节清剿，并称“彼以化整为零之法四出我周围，而我须以整齐严肃之阵收抚民众”。

△　日驻长春领事馆改为总领事馆，并设置锦州领事馆。

△　是日至29日，马占山军800人渡过海伦河，在安固镇附近遭日军田中大队伏击追击，主力被围罗圈甸子一带，大部官兵牺牲。日军误认被难之参议韩述彭为马占山，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天皇报功。

△　全国邮务职工代表会发表维护邮权宣言，声明对日本攫夺东北邮权，誓予反对，并要求国民政府对入关邮工，无条件分配各邮局服务。

△　废两改元研究会在中央银行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新币制度，意见不一，定30日续议。

△　上海青年爱国组织“血魂锄奸团”，警告奸商如再买日货，决戕杀无遗。28日向贩卖日煤之永昌煤号投炸弹一枚。

7月28日　国民政府训令各机关公务人员，对政府设施，如认为不妥，应用书面建议于长官，不得径自向外发表，违者交付惩戒。

△　日本阁议于26日通过派遣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兼任关东军司令官，为承认伪满之先声，是日外交部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对日政府提出抗议，并命顾维钧请国联调查团注意此事。

△　李济深向蒋介石请辞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及右路军司令、驻蚌行营主任兼职。蒋电复慰留，准将“剿匪”指挥事宜着王均负责兼代。31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驻蚌行营结束。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略称：“日军已决定重新占领虹口越界筑路及八字桥一带之地面，北四川路一带人心浮动，纷纷迁避，如大祸之将至，且已运来便衣警察，准备遣浪人前往肇事，恳请迅令淞沪附近驻军火速驰赴闸北实力镇慑，以安人心，而保国土。”

△　上海市香业工人400人因要求改善待遇，资方屡加拒绝，最近各店资方更陆续开除工人百余名，于是日起宣布罢工。

7月29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7月份起教育经费发足，2至6月份短发各费不再补发。

△　北平政务委员会决议，呈请中央修改北平政委会组织条例，加推张群、顾维钧、石友三等10人为委员，张群、刘哲为常委。

△　国民政府令：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准辞代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职。

△　徐源泉、何成濬、夏斗寅商决悬赏10万元购捕贺龙。湖北省政府令财政厅筹款以待。

△　上海劳动大学奉令停办，该校校长王景岐电教育部遵令于8月1日办理结束。

△　天津陆军监狱在押犯人要求特赦未遂，晚9时40分越狱暴动，抢走步枪、手枪十余支，打死卫兵多人。军警尾追，捕回20余名，逃走26名。

7月30日　　立法院会议通过中政会交议之海关征收附加税，并增加进口税之种类及税率案。附加税按关税税率征收5%，以一年为期。附税、进口税两项年可增收2000万元。

△　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声明，因日本违背国际协定，掠夺东北

税收，决定暂停拨付日本庚子赔款3.3万镑。

△　国民政府令：公布《县长任用法》；任命孙桐萱为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颁布命令，凡红军师、旅、团、营、连长“率部来归”者，提升一级，并赏师10万，旅三万，团一万，营5000，连1500元；个人“自首来归”者，保留原阶级，听候录用，不究既往。

△　天津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国难救济会、市商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等38团体200余人，在银行公会宴请张学良、韩复榘、傅作义等，呼吁各将领下最大决心，收复失地。

△　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代表队临时拼凑而成，刘长春执国旗，总代表沈嗣良及代表宋君复、刘雪松、申国权、托平共六人。刘长春百米预赛成绩11秒左右，排名第五，被淘汰；200米成绩21秒9，列第四。

△　“国民自救会”在沪成立，发起人为褚慧僧、褚文绮、李永祥等。该会宗旨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救国。

△　沈阳伪公安局长张凤岐因筹划起义被日军惨杀，株连数十人，该局督察长杨某被割舌而死。

△　上海日商对“血魂锄奸团”之行动恐惧万状，特开会议定应付办法五项；一、催领事从速交涉；二、组织便衣侦察队侦察该团行踪；三、将存货廉价赶快出售；四、请日军保护；五、急电日本国内各埠暂停装货来沪。

△　广州连日大雨，今晨全市被淹，塌屋数十间，溺毙98人，伤53人，无家可归者甚多。

7月31日　北平政委会连日会议军政防务，是日闭幕，发表宣言称：长期御侮，应以改善内政为根本之图，各省当局“应亲身巡视，或派员调查地方应兴应革事宜，克期实施”；恢复失地，巩固国防，为全国军人之专责，华北军人“更应遵照中央命令，同心努力，共谋捍卫”。

△　马占山军在罗圈甸子遭日军八个联队近万人设伏围困，是日，马率部从北山口突围，受阻，转东南山口，乘黑冲出包围。

△　平、津43个团体请愿代表团代表80余人，在平向张学良请愿，提出下最大决心，收复失地等六项要求。

△　“津沽民众救国会”致函国民政府，要求转饬张学良率部援热，并函请国联调查团主持正义，制止日军在热河的军事行动。

△　华侨救国经济委员会公推该会副主席何永贞赴津调查义勇军抗日状况。何表示侨胞素爱祖国，对抗日军民当有充分之接济。

7月下旬　湖南省政府聘胡庶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

△　军政部为封锁苏区消息，订定《匪区邮电扣留办法》，咨请交通部令各省依照办理，并将设在苏区之邮务分局暂行撤退。交通部通令实行。

△　冯占海吉林抗日义勇军袭击并占领榆树城，该城伪军、伪保安队数百人起义。

是月　国民政府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邮递。

8月

8月1日　张学良电京报告热河情形，称：“日方已开始军事行

动，形势渐趋严重，榆关亦告紧急。”

△　南京各界民众团体为日军侵热开代表大会，讨论应付方策，决定致电国联调查团及国联，报告“暴日侵热”真相，请强力制裁，以伸公理；并致电张学良及华北各将领，请率军抵抗，援助义勇军收复失地。

△　国民党中央以近时各地新成立之团体常对于政治“作不负责任之批评或攻讦”，特规定嗣后各团体发布文电，须有会长或主席署名，以重责任，除通令各级党部转饬遵照外，并函知行政院。

△　闽“绥靖”公署在漳州召开漳、泉、龙、汀四属“绥靖”会议，研究“剿灭”红军计划。蔡廷锴主席，出席者第十九路军师长沈光汉、区寿年、张贞及毛维寿、黄强，并龙溪、海澄等14县县长。第十九路军其他高级军官列席。

△　粤军李振球第一纵队占领信丰城。

△　为防共产党人举行“八一”纪念，上海市政府下令断绝交通，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游行。北平亦戒严。

△　南京市“血魂锄奸团”成立，宣言称有团员数百，分布全市，其任务在调查事实，锄灭奸商。

△　国民政府任命谷良民为陆军第二十二师师长；曹福林为陆军第二十九师师长；乔立志为陆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展书堂为陆军第八十一师师长。

△　广西银行总行在桂林成立，资本800万元，实收521万，官商合办。

△　上海商务印书馆1月间被日机炸毁停业，是日总馆恢复营业，仍推王云五为总经理。

△　香港《妇女杂志》创刊。

8月2日　　据《申报》讯：国民政府财政困难，曾由外部照会英、美、意三国，商请将各该国庚款，自本年3月起，至明年2月止，缓付一年，三国近均复照表示同意。

△　荷使杜培克赴外交部欧美司洽商退还荷兰庚款事，双方意见甚接近。

△　粤空军将领黄光锐、丁纪徐等由广州赶回韶关，组织第六航空国防队，决心以空军全力向红军总攻击。

△　行政院接西藏达赖电，表示对康、藏纠纷愿和平解决，盼政府适当处置。是日行政院致电达赖、刘文辉详询对此事意见。

△　晨，辽南抗日义勇军袭击海城，猛攻营口，切断南满路；辽西义勇军郑桂林部占领葫芦岛。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及靖安游击队自沈阳出发，3日晨到达海城。

△　前第八十八师独立旅旅长王赓，在淞沪抗战中被拘，经严密侦察确无通敌嫌疑，本日以擅离戒严地点之罪，判处徒刑二年六个月。

△　财政部通令各省、市财政厅、局限制田赋附捐，不得逾越地价1%，附加总额尤不得超过正税。其已经超过者，应即切实核减；未超过者，非迫不得已时，不得率请加征。

△　财政部电令各海关增加丝织等类货品进口税率，即日实行。

△　国民政府任命高桂滋为陆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　上海全市电报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实行罢工，当晚经劝告复工，局方允每人加工资二元，分期实行。

8月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北平政委会委员增加10人，常委由九名增至11名，加推张群、顾维钧、王树常、刘翼飞、易培基、石友三、孙殿英、刘尚清、王克敏、秦德纯为委员，加派张群、刘哲为常委；二、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辞职照准，聘任张群为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副会长；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由黄郛继任，在黄未到任前，由张群代理；四、铁道部长顾孟馀辞职慰留。

△　行政院召集各院、部副院长、次长、总务司长会议，讨论国难期间政费支给办法，彭学沛主席，决定根据中央颁布核减成数，请求酌量增加。

△　日侨在沪、平、津、青设邮政所，收寄东北邮件，不贴中华邮票，对此外交部向日提严重抗议。

△　交通部以东北各发报局台延期不解所收国际电报费，特令全国电报局停止为东北转发国际电报。

△　李济深再辞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及右路军司令兼职，蒋介石致电慰留。

△　上海又出现“赤血”、“铁血”两锄奸团，用警告信和炸弹警告煤业公会勿再卖日煤、贩仇货。

△　海关公布进口货新税率，定4日起实行。

△　河北省各河均大水，北运河大堤决口。北满水灾严重，中东路路轨数处被水冲毁，停止通车，数百方里成泽国。

8月4日　　蒋介石令鄂、豫、皖三省各县长兼“剿匪”总部军法官，准其在各县任意逮捕、审讯、杀害革命人士。

△　伍朝枢因海南问题遭种种障碍，致原订计划不能实施，今夜宣布辞西南政委会委员职。

△　冯玉祥在泰山发表谈话，略谓：“我无病，来此系养心，非养病。调查团游泰山时欲见我，我因中国疆土失了三省，自己不能收回，反哀求人家帮忙，我觉着没脸见人，故托病谢之。现在热河又吃紧，假如仍不抵抗，则华北危矣，故很焦急。”

△　财政部公布，7月份关税收入规银10070135.46两，应拨借、赔各款规银13278258.62两，相抵不敷规银3208123.16两。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六路所属之第八、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三个师划归第三十七军指挥，以第八师师长毛炳文升任第三十七军军长，9月20日行政院通过。

△　驻英公使郭泰祺抵伦敦，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自日本侵略开始以来，中国对于国联行政院与大会之决议案一一遵守，对于国联调查团之纯正公允极为信任。”

△　南满线辽南抗日义勇军张海天（老北风）等部在营口附近与日军激战，驻沪日陆战队600人开往营口。5日，义勇军续攻海城、营口。

△　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以联系国内外化学家共图中国化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宗旨。陈裕光任会长。

△　上海渔商公会致电国民政府，反对重征渔税。

△　上海锄奸团抵北平，警告平奸商勿贩卖日货。

8月5日　汪精卫由京赴沪访宋子文，商财政问题。

△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以中央政费只发八成，要求财政部十足发放。宋子文表示财部发放政费，系根据国民政府命令，请体察财政困难情形，个人无权增加。

△　江苏高等法院以牛兰夫妇自请提回看守所，是日派武装警察40名自鼓楼医院提回至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收押候讯。

△　鄂“绥靖”主任何成濬下令封锁洪湖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

△　山东潍县国民党县党部派军队包围胶济路坊子工厂，逮捕共产党人八名，将解往潍县，坊子厂全体工人卧轨阻止，只得改由旱路解出。

△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铁道部长顾孟馀辞职慰留；二、设立青海七呼图克图联合驻京办事处。

△　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继钱永铭为驻法公使。

△　军委会准津浦路南段警备司令王均辞职，遗职委第二军军长蒋鼎文兼任。

8月6日　　汪精卫以“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分别致电中执委会、林森、蒋介石、各院、部长，请辞行政院长职。致中执委会、林森电中称：“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致各院、部长电中称：“个人引退之原因，与行政院全体无关，在中央未选出继任人以前，敬请宋（子文）副院长依法代理院长。”

△　行政院长汪精卫致电张学良，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部者，即筹500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　蒋介石接汪精卫辞职电，急电恳切劝挽，内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度难关，决不可于国难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务。”

△　蒋介石电请林森慰留汪精卫，并电何应钦、宋子文、朱培德、吴铁城共同挽劝。蒋表示与汪共进退。

△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李春润部3日起进攻抚顺，是日占抚顺。

△　上海锄奸团成员爱国少年恽惠芳，因用炸弹警告奸商，被市公安局逮捕，沪市总工会、各同业公会等各团体纷纷发表宣言，要求释放。11日，恽惠芳被判徒刑两月，缓刑两年。

8月7日　　国民党中执会召开临时常务会议，讨论汪精卫辞职事。一致议决由中执会急电慰留，并派何应钦即日赴沪会同居正代表中央挽留。

△　蒋介石再电何应钦、朱培德促赴沪恳切挽汪回京。何夜车赴沪，朱8日晨赴沪。

△　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学良决定辞职。张复电汪精卫，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同日，张并电蒋介石请北来主持。

△　罗文幹呈行政院请辞司法、外交两部长职，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

△　蒋介石电张群转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宜忍隐处之。北方同袍尤不宜亟有抗辩，以免益陷僵局，更增纠纷”。

△　蒋介石下令总攻鄂豫皖苏区。命令各路“进剿”军疾速进击，

深入根据地中心。10日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纵队进抵河口一带。

△　李济深再电蒋介石坚辞三省“剿匪”副司令职。

△　张学良令天津公安局枪决扰乱破坏天津治安之大汉奸刘学古。

△　张群电中央请辞北平文化整委会副会长及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职。25日，张再电请辞。

△　汕头商界反对国民政府举办营业税，组织反对营业税委员会，各业自动罢市。

△　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发表宣言，说明伪满洲国劫夺满洲海关经过。

△　锦州日军向汤玉麟下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交还石本权四郎，否则进攻热河。

△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管理及铁路线的敷设、管理协定》，规定伪满将这些交通设施交给关东军，由关东军委托“满铁”经营。

△　山西突降大雨，祁阳、阳曲等30多县遭百年来未有之奇灾。8日，汾河决堤，太原被淹，正太路被冲毁，火车停开。

8月8日　　汪精卫在沪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学良下野，略谓：行政院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玉祥、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

△　汪精卫再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政院长职，指责张学良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被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如雪片。所谓财者，平日已被吞尽，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之中央。

△　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军委会、行政院辞北平绥靖主任职，内称："原思忍辱负重，尽力职责，奋其待罪之身，勉图方来之效，乃以识力短浅，事与愿违，匡济无力，寸功未立，长此素餐席禄，诚恐陨越贻羞。"

△　张学良复电汪精卫已电请中央罢免本职，略称："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良职责所在，凡有吁请，均为自卫所必需，若夫明知中央困难而故作要求，良虽至愚，亦曷敢出此"，"倘以为良如在职有碍于内政或外交之进行，自当立时引退"，"惟念我公党国柱石，万不可飘然远引，置国难于不顾"，望即日复职，主持大政。

△　陈树人为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请辞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职。

△　吴佩孚致函蒋介石，主张重整伦理纲常，略谓："窃谓天灾不足患，而人祸堪忧。困难不足平，而心死是惧。""今礼教尽废，国之所以不国也。所望政府鉴于天秩之不可沦亡，民彝之不可废弃，速定国是，明布宪章，重整伦理纲常，奉若天经地义，上以是教，下以是学，凡有不忠不孝，不友不弟，不信不义者，从严惩处之。"

△　蒋介石召见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嘱转电蔡元培挽劝汪精卫回京复职，并派武大教授周鲠生代表赴沪面劝。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　武藤信义在东京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派全权大使职，26日武藤抵沈阳。29日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离沈阳回日本。

△　皖北灵璧县农民数千人由李小白领导，向尤集区公所索回已收之烟税，并捣毁区公所。9日，农民聚集不散，攻占村镇多处，尤集区长逃至县城请兵镇压。19日，县派警镇压，农民抗争暂告结束。

△　松花江堤防冲毁，哈尔滨被水包围，灾民达20万。

8月9日　　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宋子文等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林森，请总辞职，略谓："子文等奉命供职行政院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原期在汪院长领导之下，于国难期间勉尽绵薄，今汪院长既表示辞职，子文等自当共退，敬请准予辞职。"10日，林森、蒋介石分别复电慰留。

△　汪精卫以沪各团体对其辞职事致书劝勉，特在报端刊载启事作答，略谓："连日接各界团体来书对兆铭辞职事或盛意挽留，或严词责备，均已领悉。兆铭辞职原因已俱详致张主任鱼电（6日）及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齐电（8日），恕不复一一声述，谨此裁答，诸祈鉴察为幸。"

△　林森致电汪精卫，"希仍本受任时救国初衷，迅即回院，主持大计"。

△　国民党中委叶楚伧、邵元冲、陈果夫、曾仲鸣、陈立夫等十余人，在孙中山陵园举行非正式会议，交换对汪精卫辞职原因及解决办法意见。

△　北平政委会讨论张学良辞职问题。张对汪致中执会齐电甚愤慨，谓："本人已电中央呈请辞职，昨汪又电中执会，本人处此环境，只有引退，以成汪先生之志。"各委员劝以地方治安为重，勿引退。张仍表示坚辞。

△　蒋介石电复张学良，假拟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择一

而行。勉出兵收复热河为上策。

△　华侨救国经济委员会代表何永贞北上调查义勇军抗日情况完毕返津。何谈："义军饷械俱感缺乏，而能与倭奴激烈抗战者，咸赖其全副热血，人人俱抱必死之决心……料倭寇虽万分强暴，将来终必被我义勇军驱除净尽。鄙人敢代表侨胞，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充分之援助，决不致坐视成败而不援救。"

△　李纯华率辽南抗日义勇军袭击海城。

△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二届社员大会及第十届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在福州开幕。11日闭幕，决议：一、社员大会由两年开会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二、下次开会地点暂定沈阳、广州、开封三处。

△　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代表爱尔培博士来华调查中国实业，是日抵南京，实业部长陈公博设宴欢迎。

8月10日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致电中央请撤惩张学良，内称："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张持不抵抗主义，丧失东北土地数十万里，陷三千万同胞于水火……暴日侵陷锦州，熟视无睹；义军艰苦奋斗，置若罔闻，已非党纪国法所能容。今又值热河告急之际，未闻其出一兵放一矢……应请中央严加撤惩，以维国纪，而振全国抗日之精神。"

△　蒋介石在汉手谕"剿匪"总部广招反共"贤才"，声称："愿与本总司令共同革命，清剿赤匪，以内安乡邑，外御强寇者，本总司令必厚遇优礼，引为同志，破格任用。"

△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撤围麻城，率领红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兼程向黄安进发，迎敌第六纵队。同时，以红十师开向七里坪，阻击敌第二纵队。

△　江苏高等法院开审牛兰案，牛兰对审判长询问不作答复，只

迭要求移转沪法院管辖，并要求准斐斯律师出庭为其辩护。

△　国民政府公布《县参议会组织法》、《县参议会选举法》、《市参议会组织法》、《市参议会选举法》。

△　驻沪日兵50余人闯入租界内陈万兴营造厂内殴伤工人十余人。12日，纳税华人会函工部局要求采有效手段消灭此种不稳势力。

△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会晤日使出渊，并声明反对日本武力侵略中国。

8月11日　蒋介石电令豫省主席刘峙、鄂省主席夏斗寅、皖省主席吴忠信整练团防，略称："民团组织含有安内攘外意义，民团革新为救国救亡唯一关键，望竭力领导，加以改造与训练，并将现有团队实情，及研究整理改造具体方案，克日具报备查，凭其效果，以资考绩。"

△　陈济棠汇20万元助第十九路军军饷，并致电蔡廷锴，请速饬部开赣东，助粤军"围剿"红军。

△　卫立煌师攻鄂豫皖苏区黄安，为红四方面军所败。

△　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上年在罗山被红军俘虏，是日在光山被处死。10月19日，国府明令褒扬，赠陆军上将。

△　北平师范大学全体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请收回停止招生成命，以维教育。12日师大学生开会决议：由教授、学生共组招生会，自动招生，并联络各院校一致行动。

△　"血魂锄奸团"警告南昌市商会转各商停营日货。各商纷纷将日货藏匿。

△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人为反对公司不履行增加工资诺言

及要求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是日开始罢工。经过41天斗争，公司同意酌加薪金，工人始复工。

△　毛里求斯华文《中华日报》在路易港创刊，李伯宇任社长。

8月12日　左路军徐源泉部以海、空军配合“围剿”洪湖根据地红军。蒋介石令限月内肃清。13日，蒋令左路军四面向洪湖红军压迫，完成封锁。

△　上海市商会通电全国，共起制裁私售日货之奸商，剥夺其人格名誉。

△　张学良在平召见东北高级军官训话，勉各旅长等“安心供职，勿以本人去留为虑”。训话毕，并商谈善后办法及防地布置。

△　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部2000余人攻入岫岩城，伪军大部被缴械投降。14日退出岫岩县城。

△　“血魂锄奸团”驻蚌分团成立，并致函蚌商会请通知各业公会，晓以大义，如查出奸商贩卖日货，当严厉对付。

△　据《申报》讯：黑省水灾甚烈，灾民36万人，已查明死者2.8万人，无家可归者18万人，农产损失2000万元以上。

8月13日　何应钦等赴宋子文宅晤宋，何称汪辞意甚坚，对国是仍允共负艰巨；又称汪辞职无须交三中全会讨论，三五日内当可解决。

△　蒋介石请吴敬恒劝汪复职。吴敬恒自京抵汉，征求蒋介石意见，并请蒋即日返京，俾中枢负责有人。

△　中路军卫立煌部、刘峙部向鄂省新集、黄安、七里坪等处红军进攻，下午占领黄安城。次日第二纵队陈继承部占领七里坪。

△　晚，张学良在北平再次召集各将领训话，宣布辞职经过及决定赴外国游历考察，并嘱各旅长“团结一致，维持地方，服从命令，拱卫国家”。

△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代理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李纯华等，分电汪精卫、张学良吁请复职。称：“陡闻政变，士气顿为沮丧，覆巢之下，必无完卵，值此时势危急之秋，团结御侮之不遑，岂容彼此诘难，互相诿卸。”

△　教育部令取消北平华北学校立案，该校全体师生电教育部请收回成命。

8月14日　蒋介石再次电促汪精卫复职，关于华北军政各事，表示愿遵汪意，即为解决；并称：“如仍坚持，当亲至沪面挽。”

△　吴敬恒由汉乘机抵沪，携蒋函偕宋子文、何应钦、朱培德、朱家骅等晤汪，并代达蒋劝汪回任意。汪辞意坚决，但允日内返京。

△　红军贺龙部七、八两师分二路进攻湖北沙市，已抵土城，与川军王陵基部激战一昼夜后，向东北撤退。同日，贺龙红军一部入草市，逼近江陵。

△　河北省立各院校联合会派代表谒见省教育厅长陈宝泉，请恢复二十一年教育经费预算，陈允提省政府会议讨论。

8月15日　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对汪、张辞职拟定方案，汇送中常会决定：一、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16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二、裁撤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8人，以万福麟、荣臻、蒋伯诚为常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军分会委员长；三、再由中常委切实慰留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长。

△　张学良召集所部各将领在平开会，各将领希张顾念国难当头，取消辞意。张训勉三点：一、努力为国，“不忘党国福利”；二、

勿蹈军阀割据覆辙，不以一人之去留危及国家；三、凡事三思而行，平心静气，态度安详。

△　蒋介石乘飞机赴浔转庐山。张学良派参谋长鲍文樾携亲笔函至庐山谒蒋，报告华北军政诸事，并请示机宜。

△　蒋介石将自序之《胡林翼军政语录》分发给豫、鄂、皖三省官吏。

△　张学良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20日，辽宁省政府正式成立，以裴焕星、杜枫廷、高惠民分别任民政、财政、实业各厅厅长。

8月16日　江苏高等法院续审牛兰案。牛兰夫妇对10日至12日三次口供笔录颇多修正，以高等法院笔录多处错误，拒绝签字。

△　蒋介石为杜绝挟嫌诬告之风，制订《控告官吏须知八条》，是日在豫、鄂、皖颁行。

△　西南政委会决议，设立最高法院西南分院，为粤、桂、闽、滇、黔五省终审审判机关，派广东高等法院院长陆嗣曾兼管最高分院行政事务，并通过该分院组织暂行条例。18日，最高法院咨西南政委会，反对设立西南分院。

△　行政院会议通过：李四光请辞中央大学整委会副委员长及代行中大校长职务，决议慰留。

△　国民政府特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联第十三届大会代表。

△　全国体育会议在南京开幕。21日闭幕。会议通过《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发表宣言，强调普及全民体育。

△　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17日，攻克乐安城，20日占领宜黄城。第二十七师高树勋部四个团大部被歼。同时，闽西红军19日占领宁化，红十二军23日占领南丰。

△　济南、苏州、平、津、嘉兴等地锄奸团警告各商店勿贩卖仇货。

△　吉林义勇军破坏吉敦路，颠覆列车一列，克沈海路支线东丰县城。

△　辽南抗日义勇军袭击鞍山制钢所。

△　鲁南滕、峄、邹、兖等县及苏北铜、邳、沛县蝗蝻成灾，秋禾树苗食尽。

8月17日　汪精卫回京，出席国民党中执委会临时常务会议，报告辞职经过。汪表示此次辞职之本意，决非一般所谓消极主义，要求中央鉴其真诚，另行物色接替人选，“本人辞职后，仍担任中政会事务，不敢推辞”。吴敬恒、叶楚伧、居正等发言慰留。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北平绥靖公署暂行停设，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北平军分会暂行组织大纲》准予备案；三、任命王树翰、万福麟、张作相、张群、韩复榘、徐永昌、王树常、宋哲元、鲍文樾、于学忠、商震、荣臻、庞炳勋、沈鸿烈、汤玉麟、蒋伯诚、刘翼飞、萧振瀛为北平军分会委员，指定万福麟、荣臻、蒋伯诚为常务委员，蒋介石自兼委员长（19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北平军分会委员名单）；四、免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职，免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职，任于学忠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任王树常为平津卫戍司令（9月11日就职）；免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翼飞职，任宋哲元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18日，国民政府发表冀、察省府主席任免令。

△　外交部就日本任命武藤为伪满特命全权大使事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政府“此项举动显然为正式承认伪满之初步，藉以达其最终吞并之目的”。

△　华北军、师、旅长61人由宋哲元领衔，联电张学良劝勿辞职，略谓：“值此积极抗日之日，请顾念华北重大责任，勿因各方意见灰心言去，如必去，职等只有避位让贤。”

△　丁超、李杜、冯占海、王德林等派代表赴平，代表东北15万官兵，恳求张学良“顾念国难家仇，万勿遽萌退志，以资振奋军心，而利长期抗日”。

△　驻沪日总领事村井和驻津日总领事太田就锄奸团的抗日活动，分别向各该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予以取缔。

△　交通部因各方反对该部前与马凯公司所订无线电合同，是日以“财政支绌，无力办理”为由，向该公司商请取消。

△　山东武城县运河决口，淹没房屋甚多。

8月18日　汪精卫、宋子文、何应钦、朱培德、吴敬恒等由京飞庐山晤蒋，商讨汪辞职事及热河军事、对苏复交、财政困难之补救等问题。

△　余汉谋、香翰屏联呈陈济棠，以第四师师长张枚新前在赣南“违令误军”，请将其撤职重办。

△　赣闽粤三省“剿匪”总部在南昌开军事会议，讨论向赣江东岸之红军进攻及阻挠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主力北进等问题。

△　辽南抗日义勇军张海天部包围南满铁路南台车站，将电报、电话线全部破坏，断绝南北交通。激战六小时始撤。

△　第十九路军之第六十一师在福建泉州枪杀准备起义参加红军之士兵（其中有下级军官）69名。

8月19日　荷兰庚款退还问题，外交部与驻华荷使欧登科大致商妥，未偿还数尚有关平银50余万两，作为向荷购买机件材料之用，俟新使来华再商条件后签字。

△　驻锦州日军借口营救石本，由义县及朝阳寺两路侵入热境，与南岭守军董福亭旅激战，董部退守口北营子，日军攻占南岭。

△　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

△　沪丰田纱厂、同文书院日军未撤，不时武装通过华界。驻沪日领声称，此系上海停战协定所许。是日，俞鸿钧对报界辟谬，称停战协定内并无此规定。

△　江海关公布关于领事签证货单章程，自9月1日起实行，违者罚签费三倍，外国一切入境货物均适用此项签证办法。

△　蒋介石指示中路军副司令官刘峙统率各纵队进攻鄂豫皖红军根据地之新集及商城。

△　黄绍竑赴香港转广州晤陈济棠，促陈早日就广州“绥靖”主任职。

△　国民政府委员马福祥去平就医，过良乡时病死车中，11时半护送抵平。

△　据《大公报》讯：黑省水灾以松花江下流齐克路沿线一带最为严重，灾民共达180万。

8月20日　蒋介石电张群、蒋伯诚转令张学良，以军委会委员资格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裁撤北平“绥靖”公署。

△　国民政府公布《宪兵令》。

△　蒋介石令鄂、豫、皖三省驻军“保护农民秋收”，封锁红军区域，禁盐粮输入。

△　左路军副司令徐源泉电令第三十四师协同主力“围剿”洪湖红军。

△　立法院修正通过《森林法》。9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国民政府任命梁冠英为陆军第三十二师师长；罗霖为陆军第七十七师师长。

△　鄂省府前以水灾电请行政院拨款赈济，虽经照准，但历时数月，未拨分文，省主席夏斗寅特再电行政院乞赈。

△　甘肃大雹成灾，灾区达27县。

8月21日　汪精卫、宋子文等一行由庐山返抵南京。汪谈关于辞行政院长问题，“已在庐山会议拟定辞职、挽留两方案：一为本人所提，坚辞院长职务，仍在行政院服务；二为林森、蒋介石所提，留待三中全会讨论”。

△　蒋介石、何应钦在庐山商定六省“剿匪”严密计划，并决定消灭赣、粤、闽红军办法：粤军直攻赣粤边红军根据地，驻赣州、吉安、抚州、南丰各军向宜黄、乐安红军包抄，切断赣粤边红军归路，再以新调到赣各部加入，在赣东将红军整个消灭。

△　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外交部，报告日军侵热情形，称日军突向南岭攻击，图占北票全线，窥伺朝阳，驻军董英斌部奋勇应战。

△　第二路军陈诚部“围剿”江西红军，是日占领兴国。

△　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电教育部坚辞校长职务。9月2日，行政院批准，以赵畸继任。9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伪满派鲍观澄为“驻日全权公使”。

△　上海“双宫”各丝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8月22日　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决定，汪精卫暂不卸职，俟三中全会再讨论，汪在京主持中政会，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

△　蒋介石颁发《剿匪区内编查保甲户口条例》40条及《各县区公所组织条例》18条，令发鄂、豫、皖三省府遵行。

△　日军再度犯热，国民党中央电汤玉麟及华北各将领“誓死守土，坚决抵抗”。

△　国民政府任命陈树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周启刚为副委员长。

△　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成立，李书华任会长。

△　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函北平当局查禁北平之《认识》、《火星》、《文艺新闻》、《大众文艺》、《大众周刊》、《反帝特刊》、《红旗》、《红军》、《北方青年》、《河泉》、《流星》、《北平学生新闻》、《评论周报》等十余种革命进步刊物。

△　南京各界抗日会紧急会议决议：一、呈请市党部于五日内召集市民大会，将包运仇货之陈家树、井然二人处以极刑；二、赴中央报告陈、井舞弊案真相、判决根据，请顺从民意，勿生阻力；三、司法院长居正对本会处理陈、井发表违反民意、公然阻碍抗日运动的谈

话，致函警告。

8月23日　外交部就日军侵热事令蒋作宾公使向日提严重抗议，要求从速停止军事行动；并声明因此事件所引起之一切纠纷应归日方负责。

△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任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二、管理中英庚款会董事程振钧病故，简派李四光补任；三、准甘察青宣慰使贺耀组辞职。

△　蒋介石以第二师第八团团长杨少初，第十师营长郭罡、石泽乾，第八十三师连长李肇中，在“剿共”战争中“临阵退缩”，令就地枪决。

△　北平政委会例会，张学良请辞委员职，决议慰留。

△　沪银界推张嘉璈、卢润泉、胡笔江三代表会见宋子文，要求缓征纸币税。

△　为赈济东北难胞，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是日在沪成立，推史量才、王晓籁、郑洪年等七人为委员。

△　东北义勇军进袭铁岭。义勇军郭景珊等部进攻抚顺。

△　晋南永济县黄河决口。

8月2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美公断条约》。条约规定签字国间一切纠纷，应交公断，不得诉诸武力。26日，立法院通过。9月24日，国民政府批准《中美公断条约》。12月15日，驻美代办严鹤龄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正式换文，条约即日生效。

△　锦朝线日军在南岭一带与热军董福亭旅相持中。日机五架晨飞朝阳、赤峰侦察。

△　张群辞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蒋介石致电慰留。

△　山西省水灾，遍及56县。

8月25日　宋庆龄、蔡元培因牛兰夫妇被判无期徒刑，特向国民党中央请求予以特赦。居正至中央党部访汪精卫、叶楚伧等会商解决办法，汪称能否给予特赦，应由司法当局考虑。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牛兰夫妇被判无期徒刑发表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号召“全世界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坚决反对献媚帝国主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牛兰及其同案妇人之判决，立即释放牛兰及其同案妇人”。

△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汪精卫主席，决议行政院长由宋子文代理。

△　日外务大臣内田在国会发表侵华演说，宣称日政府准备立即承认伪满洲国，并谓日对华军事行动，并不违反《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继称日新外交政策在确立远东门罗主义。

△　上海抵制日货运动发生三星期以来，截至目前，在沪堆积日货达9000万元之巨，是日驻沪日陆战队司令杉坂下令组织陆战队特别警备队，从事防遏一切抗日抵货运动。

△　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围剿”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是日占罗田，红军转移英山。

△　罗家伦请辞中大校长任命。26日，行政院决议慰留。

△　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举行常会，决议：一、张学良请辞委员职慰留；二、北平军整会改称北平军事训练委员会。

8月26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侨务委员会委员兼常委曾仲鸣辞职

照准，任命梁宇皋为侨委委员兼常委。30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北平日军170余人晨3时由东交民巷兵营至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处越界露营演习，5时始回。

△　教育部决定，各大学经费自8月份起先发五成。

△　北平东郊农民700余人向市政府请愿，反对“公益捐”。

△　晋省虎疫（霍乱）猖獗，蔓延28县，死一万余人。

8月27日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在上海开全国代表大会，到各省、市代表449人，宣布大同盟会正式成立，推吴鼎昌、王晓籁、朱学范等57人为常委，马相伯、段祺瑞、胡适等15人为名誉委员。28日闭会，宣言称该会“誓期消弭内战，共御外侮”。

△　日本制定《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时局处理方针》，令关东军暂停向热河进攻。

△　上海虹口各人民团体以日浪人在虹口路一带横行，本月10日日军又在扬州路等处刺伤华人多名，特开紧急会议，议决推派代表向市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浪人在虹口一带活动，并赔偿损失。

△　山西省商会以晋税奇重，商况艰窘，无力担负，特向省政府请求豁免所得税，如不允许，即拒绝缴纳营业税。

△　日本公使馆代办矢野到南京，就锄奸团警告奸商事向外交部提出抗议。

△　陈诚部占领江西宜黄。红军向广昌、宁都、东韶方面撤退。

△　国民政府任命蒋伏生为陆军第八十三师师长。

8月28日　北平东北流亡学生以张学良前曾答应发给救济费五万

元，但长期未兑现，是日三四千人包围北平市政府，进行“要饭吃”、“要五万元救济费”的斗争。

△　太原除奸团迭函市商会请速警告贩卖日货各商号自动封存，勿再出售，否则决用非常手段对付。是日市商会开紧急会议，决通告各商号，限三日内将日货一律封存，下月1日起市内不再见日货踪影。

△　山东青州农民80余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暴动，韩复榘派钢甲车及军队镇压，逮捕冀虎臣等27名，是日押解济南。31日，韩复榘亲自审讯，杀害14人。

△　上海学生义勇军80余人，赴热河参加抗日。

△　李海青抗日义勇军占领安达。

△　浙省财政厅发行金库券600万元，本月起各机关俸给及经费每月平均搭二成。

8月29日　外交部长罗文幹在外交部纪念周上演说，对日外相内田25日侵华演说痛加驳斥，并阐明国民政府对目前时局所持之外交方针，表示“中国绝对不因武力之压迫而放弃尺土寸地或主权之一部”；“解决东北之办法，苟以东省伪组织为前提者，中国绝不同意”；“解决东北之合理办法，必以不背国联规约、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与中国主权，又能巩固远东永久和平为必要条件”。

△　驻沪日陆战队司令杉坂印发反华宣言数百份，分发旅沪日侨，声称对血魂除奸团“不能极端忍耐”，希望“竭力取缔”；如“发生不幸事件，则在上海方面，海有第三舰队之精锐，陆有富于战斗力之陆战队，其实力较之一二八以前更为雄厚”。

△　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赵殿良等部28日夜袭击沈阳城，与日伪军激战，在飞机场毁日飞机库一所，击毁飞机12架，打死日军

十余名，由于日军炮击，义勇军未入城，于是日中午撤退。

△　何应钦电粤陈济棠，请速增兵吉安“剿匪”。陈复电称吉安路遥，运输不易，请赣省附近调军“围剿”。

△　徐源泉部连日大举进犯洪湖红军。是日，张振汉部陷洪湖要隘老新口。

△　铁道部长顾孟馀打消辞意，到部视事。

△　日本议会通过向伪满首批移民500名计划。

8月30日　驻津日领署致函河北省政府抗议锄奸团爱国活动，声称“排日行为，愈趋愈烈，中国官府显有袒护排日之嫌，应请严行禁止，否则日本军警将取断然之对策”。

△　行政院会议决议：准张发奎辞第四军军长职，遗缺以吴奇伟升任。

△　蒙藏教育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以白云梯为主任委员，专司计划、推进蒙、藏教育办法及审核蒙、藏教育文件。

△　教育部令国立编译馆编辑曾被红军解放地区之特种小学用国语课本，并令在课本中编入“暴露”共产党“罪恶”的内容。

△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学校倡用国货，学生制服限用国产，日用所需亦务购国货。

8月31日　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于9月18日举行国难纪念，停止娱乐，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住户于上午11时停止工作五分钟，对殉难同胞默念志哀。行政院亦于9月8日发出同样通令。

△　外交部长罗文幹偕常务次长刘崇杰由京飞浔见林森，旋飞汉口见蒋介石，商外交问题。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一、发行江、浙两省二十一年度救济丝业公债300万元；二、鄂省府请发短期公债，议决交财政组审查。

△　李烈钧等以江西“清共”善后捐“扰害商民，迄无宁日”，特电蒋介石、宋子文、熊式辉请迅予撤销。

△　北平军分会决议增加孙殿英、门致中、秦德纯、高桂滋、张焕相等14人为委员。

△　洪湖苏区周老咀被徐源泉部攻占，9月3日徐部又占瞿家湾。

9月

9月1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现值剿匪急进，中央委员中担负军事责任者颇不乏人，在此时期，势难分身与会”，决议三中全会延期举行。

△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平“绥靖”公署旧址正式成立，蒋介石再电张学良，请以军委会委员资格主持。

△　国民党粤中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日政策，并致电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请“迅定对日大计，由抵抗之宣言进为抵抗之实行，督促得力军队出师关外，收复失地”。

△　蒋介石训令湖北省政府等机关，劝导各地逃亡地主还乡“筹办善后”，协助反共，如9月内不归者，即将其田产另行分配。

△　南京警备司令部杀害共产党人仲继成、朱寿臣、陈正兴、陈正富、张长贵、何朵文、于四殷、逢斌、冯世仁、孙正兰、郑金礼、仲三、方茂清13人。

△　“热察义勇军军事处”正式成立，通电全国誓死抗日。同日，

辽南抗日义勇军大举进攻沈阳；吉林义勇军对长春取包围形势。

△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致电北平教育界，请就近调查出卖故宫古物真相，并致电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请宣布真相。同日，北大教授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等联名致函政府请勿迁移故宫古物。3日，张群函香港《工商日报》，声明该报8月24日所载蒋介石指使李石曾、易培基盗取故宫古物售与美国消息，“纯属无根”。4日，易培基函复上海各大学教授，谓处理故宫物品，系遵照政府命令办理，“确系无关文化历史，且不能永久保存之物，院中有案可查，并无丝毫古物”。

△　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选举高一涵、周鲠生、刘师舜、杭立武、杨杏佛等22人为干事。

△　《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林语堂、明耀玉等主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　国际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苏联开会，各国代表2000余人签名发表宣言，反对列强瓜分中国。

9月2日　　上海闸北形势顿紧张，闸北、虹口居民惧日军生事多迁徙，路局奉命将机车集北站升火以防万一。警察劝告居民，勿轻信谣言。

△　汤玉麟电汪精卫报告热河近况，并称财政万分困难，要求速接济300万元。

△　行政院会议决议，任命翁之龙继胡庶华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15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监察委员周利生弹劾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违法征收产销税，并擅设各区行政长官公署，经监委周觉等审查属实，呈请依法将熊交付惩戒。

△　教育部派徐诵明代理北平大学校长。徐因平大经费无办法，于次日向教育部辞谢不就。

△　蒋介石令前方各部队合组粮食保管会，企图封锁苏区红军粮食。

△　国民政府考察各国实业特使孔祥熙自上海启程赴美转欧考察。

9月3日　　国联调查团总报告书已完成，各委员及秘书长在北平签字。下午4时，该团团长李顿等向张学良辞行。

△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一年江浙丝业短期公债条例》，凡14条，定额300万元，充救济江、浙丝业之用。

△　最高法院咨请西南政委会撤销西南高等分院，以维司法系统。

△　张宗昌在济南车站被郑继成及陈凤山枪击毙命，郑称系为其叔郑金声报仇。

△　内政部前为遏止进步报刊出版，曾咨上海市府成立新闻、报纸、杂志审查委员会，办理登记。但各报刊多延未执行。是日上海市府又令各报社“依照办理”，否则“取消邮局挂号立卷特权，依法处办”。

△　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训令湖北省政府紧缩支出，规定该省政费每月总额为70万元，划出30万元为保安处与行政督察专员经费及临时“善后”等项之用。但“剿匪”经费每月64万余元，须筹足六个月。

△　江西红三军撤离南丰去广昌，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占领南丰。

9月4日　　“东北国民救国军首都后援会”在南京成立，通过组织

大纲及大会宣言，并决议：一、呈请中央明令出师，讨伐东北叛逆，收复失地；二、呈请中央实力援助东北国民救国军；三、呈请中央撤惩畏缩不前、摧残义勇军之汤玉麟；四、电请各地民众团体积极援助东北抗日同胞；五、电慰东北抗日将士及被难同胞；六、呈请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于九一八国难纪念日将包运仇货之陈家树、井然二人执行枪决。

△　是日为共产国际青年节，上海戒严，沪西有工人、学生集会，被警察驱散。上海各处发现《国际青年节告各界书》传单及《工人书报》等革命书籍甚多。南京市政府禁止示威游行及一切群众行动。

△　全国各地抵制日货与锄奸运动高涨，尤以上海为最。是日，日舰23艘集沪示威。

△　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有吉明抵沪，5日与日总领事村井、代理公使矢野密商对付我国抵货运动办法。

△　中国社会学社第二次年会在北平燕京大学开会，研究“家庭问题”，是日闭幕，选陈达为理事，钱振亚为副理事，吴景超为书记。

9月5日　　蒋鼎文谒蒋介石，报告津浦路警备状况，及处理灵宿民变经过。蒋嘱组织民众，严防共党鼓动。

△　国民党中央民运指导委员会讨论“农民运动计划纲要及文化事业团体监督指导”等方案。

△　右路军徐庭瑶纵队占鄂豫皖苏区独山（位于六安县西南），11日占麻埠。

△　红军占领福建清流县城。

△　江苏萧县（今属安徽）县长王公玙率警队逮捕萧县及灵璧交

界处青家湖农民起义首领共产党人王效白、窦仪敏、徐怀龄。6日解徐州警备司令部。14日王等被害。

△ 国联调查团李顿一行离沪返欧，驻法公使顾维钧赴任偕行。

9月6日 张群上日在太原晤阎锡山，商讨国是，是日与晋军将领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等共商御侮及维护华北治安问题。

△ 汉口各学校教职员向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党政委员会索欠薪。

△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常会，通过常会、分会简章，并决定在天津、北平、汉口、南京、重庆、广州等地设立分会。

9月7日 外传满洲问题有直接与日交涉说，是日，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唐有壬否认，对记者称：日使有吉抵沪时并未与汪精卫晤面，关于中日问题，经汪与顾维钧会商，“仍信赖国联，以谋解决，我国之态度毫不变动”。

△ 是日为《辛丑条约》签字国耻纪念日，上海失业工人准备举行示威游行，向市政府请愿。沪市当局闻讯后，与租界当局商定全市戒严，断绝交通。但各处仍发现革命传单。

△ 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致电蒋介石、何应钦，报告红军入浙边江山经过，请迅饬驻闽军队大举协“剿”。

△ 铁道部准备修筑西北之石沽、大潼两铁路，向法国银公司借款3.5亿法郎，本日签字。

△ 国民政府任命岳森为陆军第五十师师长，陈耀汉为陆军第五十八师师长，赵观涛为陆军第六师师长，张印湘为陆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冯钦哉为陆军第四十二师师长，谢彬为陆军第八十五师师长，李

延年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9月8日　　郑继武击毙张宗昌案，国民党鲁省党部为郑电请中央党部恳转国民政府特赦。连日来阎锡山、宋哲元、庞炳勋、商震、刘镇华、张之江、孙连仲等均电韩复榘为郑缓颊。冯玉祥亦派员到济为郑请赦；徐州县党部亦电请韩复榘从宽处理。

△　左路军进攻洪湖苏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徐源泉令第二纵队司令萧之楚率第四十四师主力向白露湖北岸进攻，第四纵队司令刘培绪率独立第三十七旅向湖东岸进攻。

9月9日　　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外相内田对记者发表谈话，谬称日率先承认伪满之三大意义：一、他国无论如何压迫，日对满政策固定不变；二、安定伪满人心；三、明示日本无并吞满洲之野心。

△　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唐有壬奉中央令到沪敦促汪精卫返京主持政务。

△　陈济棠召粤军各将领返广州。夜，少校以上官佐在黄花岗举行秘密宣誓仪式，以“精诚团结”为口号，拥护陈济棠及西南政府为目的，陈济棠主盟。

△　中路军二纵队第三师、第八十师，六纵队第八十三师攻占黄安、光山间新集，红四方面军退商城。13日，一纵队张钫部占商城。

△　日本与伪满签订《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须的矿业权的协定》，伪满政府将38处矿山的矿业权交给日满合办，并规定伪满政府在制订或修改有关国防上所需矿物的矿业法规时，应事前取得日本政府同意。

△　上海求新造船厂因工人12名被开除，全体工人大罢工，提出四项要求：被开除工人复工，罢工期内工资照发，外勤照例津贴车

资，重新修订契约。

△　河北省正定等23县发现蝗灾，秋禾被食，各县长纷请省府免粮。

9月10日　林森由京到沪，劝汪精卫返京。11日，蒋介石又派张群自汉兼程赴沪，促汪入京主持政务。12日，张群由汉到京，遍访中央各委员，次日抵沪，代蒋慰问汪疾，并促汪入京主持中枢。

△　汪精卫致电中政会，以蒋（介石）在汉，胡（汉民）在港，在本人离京就医期间，请援向例，另推委员暂代中政会主席职。

△　驻日公使蒋作宾以日承认伪满在即，特访日陆军大臣荒木。荒木诡称“中国应将满洲、上海之事变，以区区之问题而忘却，并反省从来态度，而为东洋和平尽力，于两国亲善外别无他途”。

△　何应钦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上月20日在宜黄“临阵畏缩，放弃防地”，呈准蒋介石将其撤职查办。

△　第五纵队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攻占鄂东红军根据地英山之鸡鸣河。13日占英山。

9月上旬　粤军黄任寰部在福建上杭破坏中共青年学校，逮捕学生七八百名，全部解往广州交“惩教场”收容。

△　日军悬赏10万元购缉辽宁义勇军首领朱霁青。

9月11日　外交部照会英、法、美政府，声明日本劫夺我国盐税，自4月1日起，迄8月底止，共108.9万余元，另征附税每担0.3元尚未在内，税收短少，故本年度应付各债本息难如期偿付。

△　国民党留沪中委程潜、李烈钧等致电中央党部及韩复榘，请特赦郑继成、陈凤山。

△　汉口特税处在由川抵汉的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所乘之“永年号”船中，查获价值十余万元之烟土、吗啡。24日，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以“永年轮贩土案，涉及政府高级官吏，与中央威信有关”，电蒋请予严惩。

△　中国国民救国义勇军后援会在南京成立，宣言希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督促政府出兵收复失地。

9月12日　国民党中委谈话会讨论中政会常委代理问题，决定不另推人，在汪精卫未康复前，中政会改开谈话会，重要议案电汪请示办理，次要者待汪病愈回京补行签署。

△　蒋介石在汉口总部报告，宣称鄂省“剿匪”计划第一期已完成。

△　财政部长宋子文声明到期外债本息仍照付，不因东三省盐税被掠夺而停拨。

△　李宗仁、黄绍竑由港抵广州，与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等讨论时局。

△　香港当局通告，自本日起，两周内各报不许刊载有关九一八问题的文章，其他抗日文章亦应少登，言论不得“过激”，所有文章题目、小标题以及电报事先均须送检。

9月13日　日枢密院通过承认伪满洲国案。同日下午，内田外相电训武藤全权大使依预定计划签字。伪满外长谢介石告记者，妄称：“日本承认满洲国，足戢张学良之野心，并足予中国以警告。”

△　蒋梦麟在北平政委会所提取缔新闻记者案通过，规定以后凡非该会公布消息，各报不准刊登。

△　教育部通令称，九一八国难周年，各学校在校内举行纪念活

动，停止星期例假，讲演国耻事实，讨论救国方法，以示卧薪尝胆精神。

△　闽省“绥靖”主任蒋光鼐由沪飞汉口晤蒋介石，商闽省改组及“剿匪”问题。14日，蒋由汉返沪，告记者称：在汉与蒋介石商闽省“剿匪”事宜，即与蔡廷锴赴闽就“绥靖”主任职，闽省府暂不更动。

△　行政院会议决议，任王文锦为陆军第七十九师师长。21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福建“民治讨论会”推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改组闽省政府，军民绝对分治，军人不得干政，裁撤省防军及保安处，财政绝对公开，教费绝对独立，全省划数县试行县、区长民选。

△　山东青州续捕共产党人段文敏等七人。

△　南昌市商会常委兼南货业公会主席许梦策因勾结奸商贩仇货，被锄奸团枪毙。

△　中国工农红军反帝拥苏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反帝拥苏总同盟，并发表通电，号召该盟会员粉碎敌人的“围剿”，以民族革命战争来赶走帝国主义出中国。

9月14日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为日本承认伪满电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要求迅定对日大计，主张出兵讨伐日伪，收复东北失地；并通电全国，对日厉行经济绝交。

△　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以“导群通讯社”、《时代公论》、《中西民治》“捏造谈话或标题错误”等罪，令警部饬令分别停刊三日至半月。

△　南京警备司令部以九一八纪念日即届，特令警厅转令所属防范，自即日起至24日止，凡一切集会一律禁止，中央党部批准者在

外。

△　北平各救国团体代表阎宝航、查良钊等电沪中华职业教育社，提议全国人民在九一八纪念绝食志痛，以示收复失地决心，并以餐费救济东北难胞。请在沪提倡。

△　全国商会、上海市商会、上海银钱两公会以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电请国联予以制裁，并电国民政府对日严重抗议。

9月15日　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称该国确认并尊重日本根据以往日华两方之条约、协定、其他条款及公私契约以享有之一切权益；两国共同担负该国之防卫，日军得驻屯满洲。

△　外交部决对日承认伪满事提抗议，外长罗文幹命外交次长徐谟携带对日抗议书及照会稿本赴沪分谒汪精卫、宋子文，请示最后决定。16日，外交部就日承认伪满洲国事向日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本应负违犯国际公法、《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等责任。同日，外交部照会《九国公约》各当事国，请采有效办法制止日本侵略。

△　马占山、丁超、李杜、冯占海等联衔通电反对日承认伪满洲国，宣称“倭国中秋承认伪国，三省从此名实俱亡，各军应从此日起，一齐奋发，人人抱不共戴天、与敌偕亡之志，非扫灭敌逆不止”。

△　粤对外协会致电国民政府，请速下令讨伐叛逆，收复东北失地。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关于九一八纪念决定，下半旗一天，机

关、工厂照常工作，学校照常上课，自行集会纪念。

△　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抚顺，在平顶山烧毁日军配给站，然后向东岗等地进发，在杨伯堡杀死杨伯堡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打死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人，将采炭所烧毁。

△　中共淮阴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陈霍、方超、宋振鼎、王葆华、葛玉清、梁锡伦、马树模（女）等八名共产党人被捕，并搜去许多文件和宣传品。10月29日，陈霍等被解送镇江军法会审处。

9月16日　平顶山血案发生。日本宪兵抚顺公遣队长小川一郎和守备中队长川上精一率大批日兵至平顶山，集合平顶山、千金堡、栗子沟等村居民3000余人于平顶山西南洼地，用机枪疯狂扫射，除极少数人逃脱外，男女老少2700余人死于非命。事后用汽油将尸体及民宅700多座焚烧。

△　外交部就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事致牒国联，请采最有效方法，以对付目前之局面；指出日本政府之承认伪组织，实系对历来在东三省侵略中国领土完整之一切行为自划招供；所谓日伪议定书，仅为日本遂其在东三省建设保护国之野心而已；日本不顾国联告诫，制造并承认伪组织，蔑视国联之权威已达极点。

△　行政院会议，外交部长罗文幹报告对日承认伪满的严重抗议及致九国公约签字国之照会。决议任孙蔚如为陆军第三十八军军长，马步青为新编陆军骑兵第二师师长。

△　伪满洲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海关独立。大连关已改悬伪国旗。

△　蒋介石电豫、鄂、皖三省“剿匪”部队将士，要求人人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决心，奋勇“剿灭”红军。

△　汪精卫赴莫干山养病。

△　全国人民团体救国联合会通电各民众团体、各报馆，要求国民政府速定大计，出兵讨伐东北日伪。

△　广州市为防共产党在“九一八”举行暴动，是日起特别戒严。

△　《上海商报》出版。

9月17日　留沪国民党中委程潜、柏文蔚、李烈钧等16人，致电中央请昭示对日方策，内称“究竟政府对日承认伪国持何对策，收复失地有无切实准备，应速以事实昭示全国”。

△　冯玉祥在泰山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立开三中全会、国内团结、枪口一致对外、实行自动外交、出兵收复失地五项抗日意见。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就日伪订约事再次电促中央讨逆，内称：“当局以不抵抗故，演成今日之局，悔无可追，为今之计，惟有一面对此伪约切实宣言否认，一面迅集大军讨逆，恢复失地。”

△　朱庆澜致电上海各慈善团体，请对流亡北平的30万东北同胞给予赈济。

△　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函张学良，要求保障言论自由。

9月18日　国民党中执会发表“九一八”告国人书，妄称“今日之剿匪，实为御侮之要着”，“本党今日愿忍受一切，以求国家之生存”，望全国同胞“予以充分之同情与协力”。

△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留京办事处举行“九一八”周年纪念会。上海、武汉、广州、南昌等地分别举行国难纪念，纷请讨逆。

△　曾仲鸣受国民党中央委托，自京赴沪转莫干山谒汪精卫，商国民党中政会主席问题，并促汪早日返京，主持中政会事宜。

△　韩复榘第三路军与第二十一师刘珍年部，因协饷问题发生冲

突，在平度、掖县附近正式开火，韩致电国民政府陈述鲁变真相。

△　吉林自卫军司令冯占海为纪念“九一八”通电全国，表示“躬率所部十三万众，誓与倭寇周旋到底，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　马占山为“九一八”国难周年纪念日发表《痛告国人书》，历数日伪罪状，表示“东北失地不复，决奋斗不息，余最后一弹，亦须杀敌一人”。

△　教育部长朱家骅为“九一八”纪念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号召“全国学生亟需振奋，坚毅刻苦，尽除萎靡之蔽”。

9月19日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为解决康、藏纠纷，巩固西陲国防，在南京召开“西防会议”，川、滇、陕、甘、青五省及有关部、会代表参加。21日，该会决议请中央召开康、藏和平会议。26日，该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西藏建省，请中央迅筹实现。28日，会议闭幕。

△　韩复榘在昌邑督师前进，刘珍年部退出沙河、平度。中央电令韩、刘停止冲突，刘复蒋介石电称，“现正待钧座指示机宜，非至最后一步，决不使为民族耻诟之内争，发生于国难严重之今日”。

△　内政、财政、实业、教育四部在京会商开发西北办法，决组垦殖调查团，议定任务四项：一、实地考察河套宁夏荒地及垦殖情况；二、选定垦殖区域；三、拟订垦殖计划；四、编制调查报告。

△　驻英公使郭泰祺会晤英外相西门，面交中国政府关于日本承认伪满洲国致英照会。

△　上海市民联合会致电行政院，吁请“急令出兵剿灭伪国，收复失地，并召回驻日公使，以示决心”。

△　中国代表颜惠庆致牒国联，对日正式承认伪满提出抗议，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

9月20日　行政院会议，由何应钦报告胶东韩复榘、刘珍年冲突情形，决议严令制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处理。同日，军委会派蒋伯诚赴鲁调查。

△　废止内战大同盟和上海市商会分电韩复榘、刘珍年，劝其停止军事行动，静候中央处理。21日，大同盟公推张伯苓赴鲁，劝韩、刘停战。

△　蒋介石由汉电京、沪军政当局，称："京、沪毗连，人口繁杂，闻有不肖之徒，假救国人民团体名义，希图越轨行动，望以后对此项举动从严取缔。"

△　内政部公布禁止蓄奴养婢办法八条，规定禁止步骤：一、劝告，二、解放，三、救济，四、处罚。

△　行政院发布通令，称："工人中发现共党分子向工人募集航空救国捐，以助红军，应严令各地党政机关彻底取缔。"

△　第六纵队卫立煌部李默庵第十师攻占皖西红军根据地金家寨。三省"剿匪"总部特于22日准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将新集改称经扶县。

△　上海纱厂赤色工会联合会在共产党及赤色工会领导下在沪开会。出席34个纱厂代表80余人，代表六万余工人。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37人，常委19人。

△　伪满为弥补财政亏空，支付驻满日军军费，在日本指使下实行鸦片公卖。

9月中旬　徐源泉在岳口杀害红三军第七师政委鲁易等六人。按：鲁易于是月上旬敌进攻洪湖苏区时被俘。

9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汪精卫请假休养二星

期，在请假期中，中政会主席由中常委轮流担任；准湖北省政府发行“绥靖”善后短期公债300万元；准安徽省政府发行公路公债500万元；派江瀚暂代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制服一律采用国货；增补严庄、王子壮、王觉民、李元鼎、谷正鼎为监察院监察委员。

△ 蒋伯诚赴济南转潍县晤韩复榘调解战争。韩部进至掖县郊外。

△ 蔡廷锴于漳州通电就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职。

△ 杭州航空学校改归中央直接办理，蒋介石自兼校长，以原校长毛邦初为副。

9月22日 刘珍年参谋长韩洞由烟台到京谒何应钦，报告刘对鲁事悉听中央处理，所部遵命退驻掖县。

△ 蒋介石抵庐山，电请林森往商要政。林语记者，称“意、日两使呈递国书在即，事实上暂难离京”。

△ 鄂豫皖苏区罗山独立团与仙居区赤卫军在邓家桥之大包山，阻击由宣化店开赴七里坪之敌第十三师，激战终日，迫敌绕道而行。

△ 牛兰夫妇送往江苏反省院监禁。

△ 汤玉麟收编在热省之刘桂堂部，并令率部驻鲁北（又名扎鲁特）抗日。

9月23日 国民党中执会电复广州、香港、上海各地中委，解释对日方针，并促联袂入京，内称：“中央对日悉本二中全会之决议……至于对策之不仅抗议，准备之力求切实，尊指所示，非特具有同心，且正力求有效。”

△ 胶东前线刘珍年、韩复榘军有激战，韩经蒋伯诚调解后，允

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查明处理。

△　行政院通过封锁东北海关案，并公布封锁后移地征税办法。宋子文发表封锁东北海关宣言，内称：“自9月25日起，中国及‘满洲国’间一切往来商品，均将开始征收进出口税。国民政府因此训令财政部，以中国海关目前既未能于东三省各埠征收合法关税，自应将东北海关封闭，以待后命。所有应征关税，应就可能范围，暂在长城以南各海关征收之。”

△　上海虹口区祥成等12家丝厂女工50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恢复月赏举行罢工。上海市府及租界当局派大批警捕镇压。

△　上海码头工人反对国民党市党部委派工会委员，组织请愿团，捣毁市党部，市公安局派警察镇压，逮捕工人代表七人。

9月24日　刘珍年部向栖霞撤退，韩复榘致电蒋介石、军委会，称已遵旨停止行动。韩本人返潍县转济南。

△　红十军攻克闽北浦城，浙边告急，福建省政府电令保安队防堵。

△　东北难民救济协会陕西后援会在西安成立，推李仪祉、康宗遥等15人为委员。该会宗旨为以精神、物质援助朱庆澜，唤醒国人，直接救东北，间接救西北。

△　国民政府公布《预算法》。

△　上海虹口丝厂工潮扩大，罢工人数增至9000人。是日租界各丝厂工人亦一致加入罢工。

9月25日　中央拟定处置韩复榘、刘珍年冲突办法：补足刘师军饷每月14万元；缩小刘之防区，所遗防地着调他部填防；胶东各县之行政、财政权一律交由省府办理。

△　蒋介石召在赣各将领赴庐山，会商第二步“剿匪”计划。

△　蒋介石由汉电苏、浙、皖、鄂、豫、湘、赣、闽八省政府、各“绥靖”主任及各军高级长官，将“境内烟苗，铲除净尽，永远不得再种”。

△　孙科由港抵沪，谈外交方针，主张大陆方面与苏联携手；海洋方面与英、美携手；对日仍主绝交，认为蒋介石、汪精卫对日政策软弱。

△　内蒙张家口商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商会自动商订通商办法，并约定由德意洋行经理。

△　哈尔滨、牛庄、安东、龙井村各关，按财政部封锁东北海关令是日封闭。所有应征合法关税，暂于别处口岸征收。

△　伪满营口海关榆分关成立，是日起开征出入税，税率极高。

△　旅京湘人呈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委会、行政院、监察院，称何键假名筑路，以全省人民所有之汽车路抵款购械，请从严究办。

△　南京中央日报社是日起发行《中央夜报》。

△　荷属东印度土生华人政党“中华党”在泗水成立。

9月26日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所部北移，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部署第四次反“围剿”战场。

△　蒋介石以“剿匪”清乡需费，令湖北省政府将棉花营业税由2.5‰增为10‰，其余各税亦酌加。是日，湖北省财政厅令各县自10月1日起实行。

△　粤当局继发行“有奖航空债券”1500万元之后，是日又发行“国防债券”3000万元，用作扩充空军军费，并已拟定扩大空军三年计划。

9月27日　韩复榘派骑兵旅接防胶东黄县、莱阳、蓬莱、海阳、文登、牟平、栖霞、荣城八县，并委派八县县长。韩并电蒋介石为进兵攻刘自请处分。

△　第二十路总指挥张钫致电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略称：鄂豫皖边区红军“已化整为零，散匿谷中，意在候大军开拔，再图集合。当此时期，非清乡搜山不能断绝根株”，“拟请令三省民政厅长亲率自治及保安队人员……到三省边区毗连各县办理自治，指导民众，期以三月之工作，除永久之祸患”。

△　日政府就我外交部16日之抗议，复照外交部，诿称：“日军在东省行动，系本正当合法之自卫权”；日本承认“满洲国”与否，“乃日本之自由”。

△　蚌埠全市大搜查，逮捕共产党嫌疑犯11人。

△　蒋光鼐以收编之福建省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陈国辉不服调令，将其扣押。泉州宣告戒严，陈之党羽大部被捕。

△　中东路护路军苏炳文率部在海拉尔、满洲里反正，将伪国境警察队缴械。

9月28日　中华民国救国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熊希龄、李次山、褚辅成等电国民政府，要求严禁苛捐杂税，确保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研究“剿共”收复区善后委员会；通过合作社法原则。

△　宋子文由京飞庐山晤蒋介石，商财政问题。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同往。

△　内政部长黄绍竑奉蒋介石命赴莫干山探视汪精卫疾，并商要政。

△　江、浙渔业界分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反对重征渔业税，要求维持废止渔税原令。

△　日使有吉由沪抵京，向林森呈递国书。

△　北平全市小学教员举行总罢教，要求市府发清积欠，市府允尽力筹还。30日，朱家骅电请北平小学教员顾全国难，教费则由财政部筹拨。

△　北京大学学生要求缓交学费，校长蒋梦麟不准，学生集会驱蒋，蒋即晚电教部辞职。

△　德文《上海报》发行，总主编爱伯哈德。

9月29日　　日使有吉在南京告记者，声称："中日纠纷已成僵局，直接交涉殆不可能。鄙人亦未奉有直接交涉使命。"

△　军政部派李钺、万毓璜赴鲁调查韩、刘冲突真相。10月6日抵济南。

△　热河国民抗日军事委员会通电成立，以何民魂、张咨照为正副委员长。

△　国民党中常会彻查沪码头工会纠纷，决定：一、电沪党政当局释放被捕工人；二、派王祺、杨虎、吴醒亚赴沪彻查纠纷原因；三、纠纷未经中央解决前，沪党政当局不得自由处置。

△　实业部为提倡国货，令各省、市从速设立国货陈列馆，并设

国货商场。

△　朱家骅电蒋梦麟严厉处置北大学潮。蒋以“关锁校门，迫胁校长”罪名开除学生靳瀛等九人。学生即召开全体大会，历数蒋营私事实，议决总罢课。蒋惧而逃避西山。10月1日，朱家骅复电蒋梦麟，谓对北大学生“应继续从严彻查惩处，首事学生九人业已开除学籍，处置实为得当”。

△　日军第十四师团在齐齐哈尔南围攻李海青抗日义勇军。

9月30日　行政院会议，何应钦报告韩复榘、刘珍年两军近况，称军委会决令刘军缩小防区，韩军后撤，派蒋伯诚赴前线监视，纠纷即可解决。

△　川军刘文辉与刘湘争夺地盘，有一触即发之势，是日，行政院决议严厉制止，派何应钦负责处理。

△　蒋光鼐呈行政院报告扣押陈国辉经过及列举其虐民罪状，请示处理办法。行政院决定由该绥署组军事法庭会审严办。

△　国民政府令免甘肃宣慰使孙蔚如本职，另任为陆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　司法院令最高法院、司法行政部否认西南成立最高分院，咨西南政委会迅行撤销。

△　晚7时，英使馆职员梯莱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送达外交部。

△　张群电劝刘文辉、刘湘息争，听候中央秉公处理。西康民众驻京代表马泽昭呈请中央制止川战。同日，废止内战大同盟电请川军将领息争御侮。

9月下旬　内政部统计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86亿人。

是月　陶行知在上海大场孟家木桥村创办“山海工学团”，开始新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

△　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左联”领导下的新诗歌团体，由森堡（任钧）倡议，穆木天等人发起，以推起进新诗歌运动、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保障诗歌权力为宗旨。

△　《海外月刊》在南京创刊，报道华侨事务为其主要内容。

10月

10月1日　苏炳文在满洲里通电正式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率部进迫齐齐哈尔。

△　四川刘文辉部与刘湘部为争夺防地，发生战争。晨1时，刘文辉令顺庆、潼南该部驻军向武胜烈面溪、二郎场两地新编第二十三师罗泽洲部防地猛攻。何应钦、朱培德去电箴劝二刘罢兵。

△　日籍伪警强占榆关东罗城门楼，进而强占天下第一关城关，击毙我哨兵一名，何柱国为自卫计，下令还击，毙日籍伪警一名。驻南关日守备队出动。经何柱国会同日守备队长落合及日宪兵队长同赴现场调查，东罗城始恢复原状。

△　林森由沪赴闽，调解闽省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陈国辉被扣事。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一年湖北善后公债条例》，发行额300万元，年息八厘，10月1日起发行，至1939年6月止还清本息，以该省营业税收入为基金。

△　立法院修正通过《统计法》及《导准委员会组织法》。

△　内政部通令全国各省、市筹款设仓，购粮囤积，以调剂农民

经济。

△　察哈尔省教育会、农会、商会等各团体派代表王润亭等到北平向宋哲元请愿，反对察省财厅提高营业税率和增加捐税。

△　《女声》半月刊在上海出版。

△　荷属东印度政府颁布限制华人教育的《野校条例》（又称《取缔私立学校条例》）。

10月2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同时发表。《报告书》承认“九一八”为日方“预定精密计划”所造成，但认为满洲问题之解决，必须“遵守现行多方面之条约”，“承认日本在满洲利益”，并提出国际共管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的荒谬主张。

△　韩复榘部与刘珍年部在胶东掖县县城炮战甚烈。何应钦再电促韩、刘切实停战，并电蒋介石请示处置办法。

△　刘文辉部与刘湘部开战，刘湘急调鄂西“剿匪”部队回川。同日，蒋介石致电刘湘、刘文辉等令各饬所部，勿轻启衅端。

△　旅京江西同乡千余人集会，反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强征产销税，增重江西人民负担。

10月3日　外交部长罗文幹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宣言，谓“报告书包含许多性质极重要之问题，现中国政府当局正在悉心考量之中”。

△　胡适在平对“路透社”记者称：彼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感觉满意，认为颇属公允，对报告书中所列解决中日问题之十项原则亦表同意。

△　何应钦、顾孟馀在京召集川军代表，商议消弭川争办法。

何、顾发言，望“一切纠纷均应诉之中央，听候中央处理解决，不得擅自用兵”。各代表表示接受，转电各将领知照。

△　陈国辉部经第六十一师包围后，派代表到泉州向蔡廷锴请降，以不杀陈为条件。8日，蔡廷锴称陈部已大致解决，零星溃散者即可肃清。

△　交通部通令各邮电机关，凡新闻纸类挂号须先验登记证，否则不准立卷；前已立卷而无登记证者，应一律取消。

△　福建旅京同乡会决议：一、电蒋光鼐遵行政院命令，速将陈国辉枪毙；二、电中政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及蒋介石，要求彻底改组闽省府。

△　郭汝栋部在阳新之龙港、咸宁之杨林桥、通山之大畈与红独立第三师激战后，陷鄂南红军根据地龙港。次日，续陷燕厦。

10月4日　　行政院会议讨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以事关重要，决将该报告书分发各部、会长审阅。晚7时，由宋子文汇集意见。

△　孙科向报界发表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意见，认为报告书能认清“九一八”责任，并说明日本造成伪国，该团“能辨是非，明公道”。又谓关于解决东北方案及建议，“日本实获益较多”，“自治实现，东北无异名存实亡”。

△　胡汉民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意见，谓此书决不必要，调查团草此报告，为自毁立场。应否认有所谓满洲政府之存在，及所谓满洲国境之存在。东北问题之最终解决，不在国联，不在公约，而在我国人民最后之自决。

△　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称调查团报告书“显系抑弱扶强”，表示“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全

力自救。

△　中国博爱会等15团体致电国民政府，内称：“调查团报告书无异国际共管，求救不如自救，求人不如求己，速与日本经济绝交，出兵讨伐叛逆。”

△　行政院决议，在颜惠庆出席国联会议期间，驻美公使职务由施肇基代理。

△　鄂省府决议，以吴国桢继任汉口市长。

△　北平小学教员因对经费解决办法不满意，经全体大会决议赴市府请愿。10日，北平市府向银行借款五万元发放教费。12日，市长周大文答应拨给十万元（中央协款五万、银行借款五万）充作小学教职员维持费，并商定17日复课。

△　《社会新闻》（三日刊）在上海出版。

10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以案关重要，决先交外交委员会详加研究，签注意见，再行集议。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加推朱家骅、居正、陈果夫、叶楚伧、何应钦、贺耀组、黄慕松、朱培德为外交委员会委员，推定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幹、朱培德、顾孟餘等为常委。

△　韩复榘致电蒋介石，历数刘珍年“纵兵殃民”罪状。鲁省府委张苇村赴京向中央请示制止韩、刘冲突之有效办法。

△　何应钦电川军将领刘湘等息争御侮。7日，刘湘电复何应钦陈述川省情况，遵令制止一切纠纷，并请示今后处置办法。

△　国联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表示遗憾，但称中国对报告书中之建议，愿加以慎重之考虑。

10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指斥调查团出卖中国以取好日本，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报告书，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解放和独立。

△　全国民食会议在南京开幕，到浙、闽、粤、湘、鄂、赣、皖、沪等省、市代表16人。7日，开第二次会议，通过确定国外食粮进口税则，成立省、县、区食粮管理委员会等案。12日闭幕。

△　军政部代表李钺、范毓璜抵济南，转赴胶东前线调查，并监督韩、刘两军实行停战。

10月7日　宋子文偕褚民谊乘机飞沪征求汪精卫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意见，并促汪入京主持中枢。

△　邹鲁由香港回广州，与唐绍仪、陈济棠商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应表示之意见，邹主根据胡汉民评论，唐主暴露日本历来阴谋，陈则称结论绝对不能接受。

△　冯玉祥自泰安北上易地休养，临行前在济南车站发表书面谈话称："抗日问题，予仍主张以武力收复失地。惟有抵抗方是中国唯一出路。"

△　国联大会开会，中国代表胡世泽发言，主张除医药及科学用途外，完全禁售鸦片。

△　三省"剿匪"总部公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规定土地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

△　凤城双庙子村长李春光和民团长陈友天、王寿山等组织辽东抗日军，共700人。

10月8日　刘文辉以主力军威胁刘湘。刘湘在重庆调在鄂各"剿

匪”军队集中宜昌，准备参战，川局益形紧张。

△　四川在京同乡制止川战特委会决议：一、呈请国府及军政部，停发四川各军一切军用物品；二、呈请中央严令制止川战，并禁止各军额外征收；三、致电四川各民众团体一致抗纳非法税捐，并运用民团实行武力制止；四、致电平、津、沪、汉、粤、宜及其他各地四川同乡会一致行动；五、联络废战大同盟及四川党务特派员一致行动。

△　何香凝组建之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发募捐启，披露救护队在辽宁一带救护遭日军飞机炸伤之军民工作紧张，经济竭蹶，吁请海内外各界募集捐款。

△　班禅电劝刘文辉、刘湘息争。

△　三省“剿匪”总部令豫、鄂、皖三省赶筑边区公路，限年内完竣，“以利军运而便行旅，应需款项，先由总部拨垫”。

△　蒋介石电令鄂、豫、皖、赣四省府，“注意‘匪’区城镇，办理农村合作，编查保甲户口”。

△　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河口与敌胡宗南部及第八十八师一个旅遭遇。10日，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一军政委甘济时牺牲。

10月9日　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等15中委通电全国，指摘《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并要求国民政府“于政策上须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

△　戴季陶提倡诵经救国，成立“时轮金刚法会”，是日在平开会，决定由班禅主持祈祷和平，经费由中央、张学良各助两万元。

△　东北民众救国军与日军在嫩江西岸之富拉尔基一带激战三昼

夜，是日撤出富拉尔基城。

10月10日　　“双十节”纪念，全国各机关学校遵照中央电令不放假，仅举行仪式。

△　三省“剿匪”总部令鄂、豫、皖三省在所陷各苏区实行“殖兵屯田”办法，“用军制之严密部署，组织农村保甲”，“士兵家族一律计口授田”，“兵民共组合作社”。12日，公布“剿匪”区内“屯田条例”18条。

△　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等于黄安西北之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

△　达赖在拉萨大昭寺召集军事会议，决乘川军内讧，进攻西康。

△　吴奇伟在江西乐安就第四军军长职。

△　上海国货展览大会开幕，展期两周。

10月上旬　　宁都会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全体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决议和指示，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反对打赣州等是“纯粹防御路线”、“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合围开始之前，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10月11日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中共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红十一、红十二师，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两万余人，枪15000余支从四姑墩地区出发，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　行政院决议分电刘文辉、李家钰、罗泽洲停止军事行动，各饬所部退回原防，听候中央处理，并电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杨

森、刘存厚从中疏解。12日，行政院再电刘湘、刘文辉等，严令停战。

△　刘文辉与罗泽洲、李家钰两部在顺庆附近激战，罗致电刘湘请援。

△　军政部代表李钺等与刘珍年代表李恒华在掖县十里堡会晤，李恒华表示：刘珍年“一切服从中央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指驳《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表示“今后惟有迅下坚决意志，本牺牲之精神以为继续抵抗，而求失地恢复”。

△　北平工联会通电全国反对调查团报告书，并要求国民政府拨巨款援助东北义勇军。

△　韩复榘发表《告胶东父老书》，历数刘珍年苦害地方，并谓已下除刘决心，决不半途中止。

△　陈树人因其子共产党员陈复被害，向国民政府辞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职。行政院决议慰留。

△　东北各部抗日军首领协议，为便利抗日，决定改为军团制，共分六个军团，初步拟定宫长海、王德林、丁超、马占山、苏炳文、唐聚五分任军团长。

△　日伪军五万余人分三路进攻通化等地民众自卫军唐聚五部，13日陷新宾、柳河，16日占通化。19日，辽宁民众自卫军解体，唐聚五等人化装逃北平。

10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一、汪精卫患肝硬化症，准续假三个月；二、通过“匪”区善后问题讨论会组织条例，推陈立夫、何应钦、黄绍竑负责主持；三、通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计划，

推戴季陶、于右任等为筹备委员，交行政院饬教育部负责进行。

△　川军将领唐式遵等94人联名致电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提出“治川纲要”16条，主要内容为打破防区制，订立互相保障之统治制度，各军实行比例裁军，共讨违背纲领者。刘文辉未列名。

△　上海市商会以外货倾销，对中国工业打击甚大，特电财政、实业两部，请实行倾销税。

△　西康民众因藏军乘川事纠纷侵康，特组请愿团向中央党部、国府各院、部、会请愿，要求中央负责制止川战，决心收复失地，接济义军饷款，并要求确定康、藏界址，速建西康省治。

△　苏炳文致电国联，报告日军在满暴行。

10月13日　　韩复榘、刘珍年表示服从中央命令，掖县前方实行停战。

△　外交部公布中、英文本《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全文。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号召“全苏区工农群众，要以最大的速度，来充分准备一切战争工作，要准备一切牺牲去为争取战争的胜利”。

10月14日　　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特别党部通电指摘《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称报告书“无一非破坏我主权独立，干涉我自由，而为迁就强权欺压弱国之乖谬论调”；“所谓国联调查团者，不啻强国雇用之巡捕，徒为虎作伥，而不能为弱国主持公道”。

△　外交部长罗文幹飞汉口，征询蒋介石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意见。罗在汉对记者称：“国人于此时研究报告书外，尤应留意国际情势及日人态度。”

△　周恩来、朱德签发《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战役计划》。又称《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

△　牛兰夫妇移押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执行无期徒刑。

△　刘湘、杨森、田颂尧、邓锡侯、刘存厚所部各师、旅长联合发表宣言，主张弭战救国。

△　军委会训令各部队、各军事机关，留俄归国学生未经审查给有证书者，一律不准任用。

△　军政部任命郭炳生为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陈时骥为第五十九师师长。

△　日本第一批武装移民423人抵达佳木斯。

10月15日　　由于谢立功、费侠告密，陈独秀在沪被市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逮捕。同时被捕者有谢少山、王武（即宋逢春）、王兆群（即罗世凡）、张次南（即彭述之）、濮一凡、王晓春、梁有光、王之平、何阿方、王剑堂共11人。

△　蒋介石电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顾全川局，竭力避免冲突。

△　济南地方法院公审郑继成刺张宗昌案，律师谓郑非预谋杀人，应请减刑。19日，该案判决，以预谋杀人罪判郑有期徒刑七年。

△　驻满洲里苏联领事应日政府之请，致文苏炳文，请求释放被俘之日侨移居俄境。22日苏炳文照会苏领事，允其所请，决照日领署所开名单予以释放。

△　国民政府准国联行政院代表颜惠庆辞职，特派顾维钧继任。

10月16日　　晚，戴季陶宴川军各驻京代表冷杰生等20余人，劝

告息争。

△　马占山与苏炳文在扎兰屯举行会议，决分兵三路攻打齐齐哈尔，终因敌强我弱未能实现。

△　上海救国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熊希龄等致电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建议将党务经费移充东北义勇军饷械之用。

△　吉林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围攻吉林市，在小白山、温德河子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始退。

△　山东日照县共产党率领农民、雇工千余人在北乡于家村、安家岭，西乡山子河、牟家小庄子，南乡平家村等处暴动，鲁陆海军同时出动镇慑。

△　全国各地邮工抗日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在沪举行，陆京士主祭，中央及沪各界代表均参加。

△　废止内战大同盟四川分会在重庆成立。

△　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电外交部，谓鲁、川内战，国际对华舆论恶劣，影响中日问题者至大，望政府力予制止。

10月17日　　杨森、李家钰、罗泽洲部在顺庆附近与刘文辉连日激战。刘湘集中兵力于荣昌、遂宁一带，准备武装调停川战。

△　下午5时，外交委员会开秘密会，讨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由罗文幹报告赴汉与蒋磋商经过，讨论至7时始散。

△　上海市长吴铁城密电行政院，称捕陈独秀事先曾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并“协同捕房侦察”达月余之久。

△　第十九路军奉命“围剿”红军，是日该军第六十师占福建龙岩，第四十九师占坎市。

10月18日　　刘湘部全线出动，派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三师长分任川东各路指挥。北路指挥王缵绪协助李家钰、罗泽洲攻顺庆、遂宁，中路指挥唐式遵攻永川、江津。双方伤亡甚众。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分电鲁省韩复榘、刘珍年及四川刘湘、刘文辉，劝各消除成见，克日息争，协力御侮，以救危亡。

△　蒋介石拟具鲁战解决办法，由行政院分电韩复榘、刘珍年切实遵行，内容为：指定莱阳、牟平、烟台等五县为刘军驻地，所有政权交还鲁省政府，刘部让出之其他防地，交“民团”负责守备；韩部须退出潍县以西。

△　行政院决议，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国联特别大会代表，颜任首席代表。

△　红军占领江西黎川、福建建宁。

△　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在东兰西山遭叛徒杀害。

10月19日　　何应钦电令韩复榘、刘珍年限期撤驻原防，听候中央处置。同日，何电令刘珍年，该师暂驻福山、掖县、莱阳、栖霞、牟平五县及龙口，严饬军纪，维持治安，关于地方民政、财政，完全由省政府主持，毋稍干涉，以明权限。次日，刘接受命令，所部暂驻掖县、莱阳等五县。

△　胶东13县代表李玉洲等通电，谓五年来刘珍年在胶东勒捐巨款共达五六千万元。

△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再电刘湘武力制止川乱，刘遵命准备。

△　四川旅京同乡会电川人速集合各地民团武装制止川战，继之罢市、罢工，最后抗捐、抗税，绝彼财源，促其自毙。

△　国民政府公布《统计法》。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监督地方财政暂行法原则五项、调节民食意见九项，交行政院办理。

△　晚，陈独秀、彭述之解往南京。20日到京，在军政部军法司拘押。

10月20日　　李杜、丁超通电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略称书中“举军政各权，中日平衡操之，是与共管无异”，东北3000万民众决“与日寇周旋，非达到完全收复国土不止”。

△　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召开三中全会日期，均主12月上旬，决分电征求京外各中委意见后再定。

△　何键颁布全湘“绥靖”计划八项，包括整训保安团、义勇队，调查户口，稽查行旅，实行连坐、反坐等。

△　蔡廷锴及“剿匪”总指挥部行营进驻龙岩，准备进攻长汀红军。

△　段祺瑞、王揖唐、孙传芳等由京到平，参加“时轮金刚法会”。

△　刘文辉令顺庆驻军退遂宁，以示对刘湘让步。

△　吴佩孚电劝川中各将领“力求缉睦，共挽国危”。

△　胡适致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宽容陈独秀。

△　陇南扇子会起事，国民党军杨渠统部前往镇压。

△　广州各界援助义军大会分别致电马占山、汤玉麟、何柱国及热河民众，勉以努力抗日，誓为后盾。

10月21日　　四川各师、旅长等90余人联名电中央请免刘文辉职，交付惩戒。邓锡侯、刘湘、田颂尧、杨森等部公推刘湘为川康“绥靖”总司令，田颂尧为副。

△　韩复榘因军政部调处胶东问题为刘珍年划五县为防地，特电林森、宋子文、蒋介石等请辞鲁省主席职。宋复电慰留。蒋介石、张学良亦电劝“打销辞意”。

△　汪精卫决定赴德国就医，行政院各部、会长集沪与汪话别。22日，汪及家属、秘书等七人离沪赴欧。

△　“时轮金刚法会”在故宫太和殿开坛，班禅率喇嘛僧众诵经，段祺瑞、吴佩孚、朱庆澜、孙传芳、王揖唐等均入坛参礼。各界参加者数万人。

△　江西公会常务理事李烈钧等通电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主张“亟宜调遣大批军队出关，协同原在东三省之义勇军积极与日军抵抗，收复失地”。

△　天津全市电车、电灯工人因提出要求改善待遇等七项条件，公司延不答复，是日起总罢工，市各民众团体予以支援。30日，天津社会局劝电车、电灯工人复工被拒绝。11月5日，于学忠奉张学良命实行强制调停，勒令工人代表承认“仲裁”条件，次日工人复工。

△　交通部长陈铭枢电行政院宋子文代院长坚请辞职。

△　江苏各县鲜猪同业推派代表40余人组请愿团赴省及京请愿，反对苛征猪只营业税。26日，财部电复该业临时代表联合会，称已令饬该省财政厅迅即查明制止拦征过路猪税。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

△　热河抗日军何民魂部攻克阜新。

△　《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王造时主编，仅出三期即被当局禁止而停刊。

10月22日　　刘湘接受邓锡侯等百余人之请，领衔电呈中央，表示采纳“治川纲领”，召集遂宁会议，以解决四川积年纠纷。

△　西康各喇嘛庙联名电请中央制止川战，令刘湘撤销战备，令刘文辉集中兵力，收复边疆，以固国防。

△　立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法》。

△　江苏全省商联会以美麦倾销，国产粮价低落，农商交困，决议电请中央将第二次续贷美麦45万吨一案停止进行，以慰民望。

△　江苏江都县政府因清查田赋逮捕乡民50余人，是晨审讯时，乡民数千人持械入城，冲进县府，捣毁什物，焚烧卷宗。县长从后门逃跑，军警赶到，又捕200余人。23日，乡民要求渡河进城，被军警阻拦，枪杀七人。省府令各县暂停清查田赋。

10月23日　　四川善后督办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通电斥责刘文辉反复无常，好乱称兵，誓与友军左右提携，全力制止。

△　刘湘、田颂尧、邓锡侯、刘存厚各派代表同谒蒋介石报告川况，蒋再电令四川各将领立即息争，各守原防，听候中央处理。

△　夏斗寅恐因病久旷职守，再呈蒋介石请辞鄂省府主席职，蒋派杨永泰问病并慰留。

△　刘珍年派代表杨力川谒何应钦，报告刘军遵令驻扎掖、莱等县情形，并请示解决鲁事办法。

△　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致电南京中央

党部、国民政府请释陈独秀，内称：“顾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伏望矜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

△　广州宣布戒严，清查户口，以“清除”共产党。

△　中央红军在福建邵武与敌周志群第四旅发生战斗后，歼敌一个团，是日经麻沙入建阳。

10月24日　　蒋介石自汉口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称陈独秀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刑，早在法律上有明白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是日，经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后议决交法院公开审判。

△　胡适等电蔡元培，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　鲁省府全体委员对划五县给刘珍年表示异议，电请中央重定对刘办法。

△　刘文辉撤退后，川战中心移遂宁以西，永川开始主力战。同日，刘湘通电各方，联合川中各军民众，对刘文辉予以制裁。

△　江都乡民反“清赋”运动取得胜利，县长被迫释放所捕乡民250人，“清赋”暂停，死伤乡民抚恤费由商会设法解决。

△　浙江省政府向中英庚款董事会借款20万镑，向英国购买铁路材料，以备修筑杭江铁路之用，是日借款合同签字。

10月25日　　国民政府令张学良全权调处鲁事。同日，刘珍年电呈中央，请将该师调离鲁境。

△　行政院决议：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王玉科、兼财政厅长姚鋐、兼实业厅长何玉芳均免本兼各职，任魏鉴、鲁穆庭、史靖寰

为河北省政府委员，魏鉴兼民政厅长，鲁穆庭兼财政厅长，史靖寰兼实业厅长。2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陈独秀、彭述之移押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移押前何应钦在军政部秘密“传询”陈，陈答称与鄂赣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何请求写字，陈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国民党江苏常熟县党部以《民众日报》等八家报刊“违反出版法”，勒令停刊。

△　正太路由法移交国民政府，是日在石家庄举行接收典礼，由山西省府齐厚之参加接收。

10月26日　　国民政府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意见由外交部电达国联中国代表，凡妨害主权、领土完整者明白表示不接受，凡无害主权、领土者原则接受。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交通部长陈铭枢辞职照准，内政部长兼代交通部长黄绍竑呈辞兼职照准，任朱家骅为交通部长，翁文灏为教育部长。2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刘文辉退出成都，邓锡侯部入城维持秩序。潘文华部占江津。

△　国民政府派李世中为议订中巴（西）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　蒋介石派张钫赴济南调解鲁事。

△　中央限韩复榘28日前撤兵，是日韩电请展缓，俟海军接防烟台、龙口，再撤潍西。

△　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　华北回民护教团因南华文艺社登载侮辱回教之文字，派代表马文清等四人赴京请愿，要求查封该社，将主编人曾仲鸣撤职治罪，并将撰稿人娄子匡逮捕法办。27日，马等到京。

10月27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12月15日召开三中全会。

△　何成濬乘飞机视察樊城，指挥所部“追剿”红四方面军。

△　刘文辉再电蒋介石，请迅派大员入川制止战争，并谋正常解决。

△　国民政府令派萧吉珊为宣慰华侨专员。

△　沪市商会及百余同业公会以江海关搜检漏税货物，擅入商店，搬运货物，任意处罚，公推代表到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改善海关制度，制止关员不法行为。

10月28日　川北联军推杨森为前敌总指挥，进攻简阳。30日，罗泽洲、李家钰等部联军占安岳，向资中、内江推进。

△　蒋介石之代表张钫、刘峙之代表刘耀扬，在济南与韩复榘商鲁事，张转达蒋意：令韩部包围掖县、莱阳等县之军队后撤，以便让刘珍年部离鲁。韩表示服从。

△　闽省府委员因财政困难向国民政府总辞职。

△　蒋介石自汉口抵长沙，部署“剿匪”。

△　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南宁召开桂系党、政、军要员会议，讨论两广经济提携合作问题。

△　《大公报》发表题为《营救陈独秀》之短评，称：“如果用哀

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蔡元培们致中央电内“矜惜耆旧，爱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

10月29日　蒋伯诚到济南与韩复榘磋商解决鲁事途径，决定韩复榘先撤至潍河以西，11月8日以前撤完，然后再调刘部离鲁。烟台、龙口暂归东北海军驻防，俾刘由两处他调。中央派蒋伯诚、熊斌、高凌百监视双方撤兵。

△　刘文辉致电中央表示愿将所部悉交刘湘，不愿延长内战。

△　立法院通过《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　红一方面军总部发表文告，指出国民党军已将四次“围剿”的重心移到江西，号召军民保卫苏区。

△　江都反“清赋”运动领导人葛广兴、陈友善、罗才良、杨德昌、刘玉山、卜登云六人经江苏省府委员、省保安处长李明扬等亲自审讯，是日被杀害。

△　甘肃省府政务会议决议预征1933年田赋。

△　兰州教育界以9、10两月未领到薪金，是日起罢教索薪。

△　广东揭阳遍地皆蝗，晚稻被害。

10月30日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呈中央党部，请依法严办陈独秀，不准保释；并通电全国，称蔡元培、杨杏佛等请保释陈“系徇情庇护，为反动张目”。

△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北平分会成立，胡适任临时主席。胡致开会辞，称该会为“中国之生命线”。

△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在沪成立。主席团主席张军光致开

会辞称：“本会成立后之唯一任务，便是切切实实的为救国而抗日。”

△　军政部奉蒋介石电谕，以陶峙岳升任第八师师长。

△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沈阳移长春，另设特务机关于沈阳，以板垣征四郎少将为特务机关长。

10月31日　　蒋介石电令财政部转饬各海关扣留入川军火，并令军政部停发运输护照。

△　戴季陶在中央纪念周会上报告治川办法：治标，根据民国十七年（1928）11月国民政府发表之治川纲要10条；治本，根据民国十一年（1922）9月孙中山致川各将领之电令，以废除内战、振兴实业两点为原则。

△　宋庆龄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特种委员会，专理“政治犯”事件。

△　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致电外交部长罗文幹，请转达山东韩、刘及四川二刘立即停止内争，以免日方利用，而利外交进行。

△　马占山军与苏炳文军配合进攻齐齐哈尔。

△　闽北红一、五军团会同进占黎川东南之红三军团逼南丰。

△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免收入关求学青年学费。

是月　　蒋介石以豫鄂皖三省“剿总”总司令名义发布训令，颁发《匪区内各省农村金融紧急救济条例》，决定在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成立之前，先在“剿总”内部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负责监督农村金融“救济事务”。

11月

11月1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慰留鄂省府主席夏斗寅；二、电令川、康军及达赖停止军事行动。

△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由秘书长翁文灏、副秘书长钱昌照负实际责任。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国防、财经、文教、工矿、交通、农林等方面的调查，写出专题报告，供蒋介石等作决策时参考。

△　刘湘部继10月31日进驻荣昌、合江之后，是日又占隆昌。杨森部进驻安岳。

△　张群在京向川省各军驻京代表详询川局情形及各军现状后，即与戴季陶、石青阳、顾孟馀等会商解决川事办法。2日乘轮赴汉向蒋介石报告。

△　在沪被捕与陈独秀案有关之共产党人李荣生、苏正海、饶志陆、陈善甫、纪维方、刘志福、吴俊臣、刘阿芳、陈王氏（即帅孟奇）、吴陈氏、朱彩弟（即朱镜如）11人，由沪市公安局押解南京交江苏高等法院，寄押江宁地方法院候审。

△　沪回教代表因上海北新书局发行《小猪八戒》一书，侮辱回教，在京向中央请愿，要求惩办编辑人员，封闭北新书局。

11月2日　何应钦电令韩复榘、刘珍年撤兵原防，并致电沈鸿烈，在第二十一师未到达前接防烟台、龙口。

△　蒋介石委朱绍良为湘、鄂、赣三省边区“剿匪”总指挥。

△　川籍旅沪中委杨庶堪等50余人拟具解决川事办法，推谢无量、黄胜祥携节略到京，交石青阳提交中政会讨论。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在汉口召集七省公路会议，蒋介石之代表曹浩森及国联所派修路专家敖京基、特赖贡尼、巴勒加、蒲德利、伯利参加。会议拟定修筑京黔、京沪、京陕、汴粤、京川、洛韶、京鲁、沪桂、海郑、株祁、京闽11条干线。10日闭幕，蒋介石到会训话宣称：“剿匪”根本办法是“发展交通，组织民众”。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上海市政府发行复兴市政府公债600万元。12日，立法院通过该项公债条例。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解决川省纠纷案，议决重申国民政府十七年11月7日命令，并交行政院详定实施办法，制成方案，报告该会议。

△　陈济棠召余汉谋、香翰屏、缪培南、李汉魂会商，决定联络在赣中央军分三路进攻江西遂川红军。

11月3日　韩复榘电何应钦报告撤防令已下，俟海军接防烟台，第三路军即开始撤退。

△　刘湘压迫泸州、内江边境，刘文辉电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请阻刘湘进兵，称旬日以来，一让顺庆，再让遂宁、潼南，三让江津、永川，四让大足、安岳、乐至、合江诸县，将士愤慨，咸愿粉身，而刘湘仍督所部积极猛攻。表示决再退让，并提出治川三方案：一、军民大政奉还中央；二、遵照中央编遣方案施行编遣；三、由中央明令改组省政府。

△　红一、三、五军团攻占黎川。建（宁）黎（川）泰（宁）战役结束。

△　蚌埠盐业职工反对政府垄断盐业，是日举行罢工，游行示威，要求撤销北盐公共营业处，维持民食。12日，蚌埠盐商公推杨剑伯等三人到京，向盐务署请愿，要求撤销该营业处。

△　外交部电催法政府履行《中法越南专约》。

11月4日　蒋介石电令赣、鄂、皖各军限12月15日前彻底肃清红军，“逾期以纵匪论”。

△　四川联军猛攻泸州，刘文辉以10万人防守，双方发生激战。

△　刘文辉为缓和各方围攻局势，与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在成都商定弭战办法，将温江、崇庆、华阳（今并入双流县）、简阳、乐至、潼南、安岳七县划为邓锡侯防区，金堂、新都、彭县、成都四县划为田颂尧防区，顺庆（今南充）、遂宁、蓬溪等七县划为杨森、李家钰、罗泽洲防区，意在保留川南富庶区域。

△　刘文辉划地与邓锡侯，正式让出遂宁、潼南、安岳、乐至四县，并将陈鸿文部仍归邓指挥。

△　常熟《民众日报》等八家报刊前因未依法登记，且登淫秽新闻被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不许该八家报刊复刊，亦不准改名出版，是日函省府饬县严办。

△　香港邮政总署首次试行空邮服务。

11月5日　沪市府将上海粮食委员会电转呈行政院，请停止续借美麦，免粮价更落。7日，湖南商会电中央反对续借美麦。8日，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即或政府不购美麦，而厂商亦必同美国或加拿大订购，此为事实所必需，与米价跌落毫无关系。”9日，北平商会电请中央反对续借美麦。

△　刘珍年电军政部报告，称掖、莱、栖三县情况仍未稍变，鲁东各地韩复榘军尚未撤退。

△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致电中央，请严办陈独秀，并称蔡元培等袒陈，“贻祸党国，应予警告”。

△　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十四路齐福臣部，袭击南满路十家堡车站，打死日军五人，焚毁车站。

11月6日　张群在汉召集四川各军驻汉代表开谈话会，请各代表分电各将领于21日前实行停战。

△　张学良派彭士彬等三人赴济南监视韩复榘、刘珍年自胶东撤兵。

△　内政部令各省、市取缔高利贷，称借贷年利率超过20％之契约不能成立，亟应取缔。

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成立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学及一切劳苦群众，驱逐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出中国，粉碎四次大“围攻”，推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争取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和解放。

△　何应钦电令刘珍年调鄂中“围剿”红军。韩复榘军开始向潍河以西撤退。8日，沈鸿烈所部东北海军“海琛”、“楚豫”、“镇海”等舰接防烟台、龙口，并布告安民。

△　国民党中委谈话会讨论处分刊登侮辱回教文字案，佥主查封上海北新书局，将登载讽刺回教徒文章之《南华文艺》停刊，依法惩办作者，并通令全国，此后严禁刊布侮辱任何宗教之文字。

△　为防止共产党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十五周年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周年，军政部通令各省、市严予防范。南京、上海、北平严密戒备。北平、上海等市共产党人张贴“打倒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庆祝红军胜利”、“拥护苏维埃政府”等革命标语，散发《中华苏维埃告工人书》、《苏联十月革命宣传大纲》等革命传单。上海租界有工人、学生集会，被捕探逮捕六人。

△　国民党湖北省执委会电请国民党中央依法严办陈独秀。

△　翁文灏函宋子文辞教育部长职。9日，朱家骅兼理教育部部务。

11月8日　　宋子文由京飞汉口，9日与戴季陶等晤蒋介石，商内政、外交及鲁、川内争解决办法。

△　行政院会议决议将招商局收归国营。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

△　法使韦礼敦到京，与外长罗文幹会商中法越边商约问题。同日，罗文幹宴越南回国请愿实行《中法越南专约》之华侨代表黄安、许亦鲜等，席间商谈《中法越南专约》问题。罗允请法使转促法政府依约实行。

△　阎锡山通令山西各军警机关及各县政府“缉拿”共产党人。同日，国民党在上海破坏中共设立之“互济会”机关，并捕共产党人韩葆春等二人。

△　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克光泽。

△　康、藏纠纷经年，血战已达半载，是日西康代表康军旅长邓蟠村与藏方代表琼让代本在西康正式签订《康藏停战协定》，规定双方防地以金沙江为界，不得互相侵犯，“所有历年康、藏一切悬案，听候中央与达赖解决”。

△　行政院发布保护宗教通令，内称“以后各种刊物，对于任何宗教，不得稍存侮视”。

11月9日　　行政院令上海市府查封北新书局，令南京市府转饬《南华文艺》停刊，并批示华北及上海回教请愿代表知照。

△　内政部规定禁止蓄奴养婢办法，不论以买卖、赠与或慈善关系而蓄养者，均予禁止，违者以“使人为奴隶罪”送司法机关办理。

△　闽省府召集党、政、军及银行界代表开联席会议，讨论东省财政救济办法，决组财经委员会，推詹调元、陈培锟、何公敢等为委员。

△　刘文辉电蒋介石，请制止刘湘进逼，略称“川战突起，辉遵奉中央迭令，始终力避冲突，让防已达十数县，辉部十余万众，今已局促一隅，再退无地。刘湘近且躬赴前方指挥战事，泸富尤在必争”，“刘湘处心积虑，不至兵连祸结不止”。

△　张发奎由香港乘意轮“干德华地号”赴德国。

△　东北抗日救国军苏炳文部在齐满路连日与日军激战。

11月10日　刘湘、刘文辉两军主力在泸州、内江一带决战。

△　何应钦加派毛炳文部陶峙岳、许克祥两师到闽“会剿”红军，陶师前锋逼近光泽。

△　张学良飞汉晤蒋介石，面商东北、华北问题，并协议海军接防烟台、龙口。12日飞杭，16日复飞汉见蒋。

△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电国民政府反对续购美麦，称“若再续贷美麦，则国内粮食价格将更形惨落，已呈破产之农村经济，必将陷于万劫不复之途”。

△　东北民众救国军在富拉尔基以西腰库勒歼日军原冈轻机枪队，后被迫退至碾子山。

△　北新书局因出版《小猪八戒》一书，激起沪市回民公愤，除遵照书业公会决定登报向全市回民道歉外，是日并自动宣布停业。

△　罗文幹派谢冠生飞汉，向蒋介石报告国联最近主张成立国际委员会，解决中日纠纷，请示应付机宜。同日，外交委员会研讨国联

国际委员会讨论中日问题时应取之方针。

11月11日　　外交部长罗文幹代表国民政府电贺罗斯福当选美总统。

△　豫鄂皖“剿匪”总部规定“改良”鄂地方政治办法12项，内容有“慎选保安队长及铲共义勇队人选”等，是日令鄂省府遵行。

△　蒋介石电皖省府严防皖人反对米捐，令饬安庆、芜湖、蚌埠警备司令部，凡鼓动商民破坏者，以“妨害政治，扰乱社会”论。

△　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开幕，讨论儿童健康教育等问题，13日闭幕。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各地机关、学校奉令不放假，不开民众大会，仅由国民党党部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会。

△　国民政府新建之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幕，并正式播音。

△　“剿匪”总部电令豫、鄂、皖各省，限本月内肃清各该省红军。

△　韩复榘军总部参谋长刘书香及第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指挥所部分返原防。13日，韩军全撤潍西。

△　湘鄂西省苏维埃主席崔琪在湖南洞庭湖区游击战争中牺牲，是日在长沙悬首示众。

△　伪满监察院长于冲汉在大连病死，以罗振玉继任伪监察院长。

11月13日　　交通部发现招商局总经理兼董事长李国杰与交通部次长、招商局监督陈孚木以招商局栈房、码头等财产向美商中国营业

公司押借3000万元，是为非法，是日，上海市政府奉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手谕，将李暂行扣押。李将向交通部招商局监督处呈文及陈孚木9月3日批复指令发表。

△　蒋介石以第十师第二十八旅旅长刘戡在鄂“剿共有功”，着调升第八十三师师长。

△　红军徐向前部自鄂、豫、陕交界之南化塘地区西移，是日在漫川关突围入陕境。15日到达离商县50余里之杨家斜。

△　苏炳文正式宣布拒绝与日人进行和平谈判，并否认谣传愿与日本在苏联境内进行和平谈判之消息，称“未与日人有任何接洽”，日人提议和平谈判，“决不给以答复”。

11月14日　　外交部训令日内瓦中国代表团，拒绝《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设东北顾问会议事，谓如依照李顿建议举行顾问会议，则东北代表即是日本代表之变相，中国之代表决不能与未承认之地方政府之代表开同席会议，以演成世界各国所未有之现象。

△　王家烈电黔省府驻京办事处，否认派兵参加川战。

△　马占山率部由讷河驰扎兰屯与苏炳文部会合，士气大振。日关东军部向各路局调军车40列，运兵富拉尔基、龙江一带，威胁苏、马等部。

△　兰州中等以上各校教职员罢教，向担负教费之榷运总局索教费积欠2.7万元。

11月15日　　国民政府明令将招商局收归国营，由政府继承该局原有一切权利及一切合法债务。令派刘鸿生为招商局总经理，叶琢堂、刘鸿生、史量才、张寿镛、张嘉璈、杜月笙、杨英为理事会常务理事。

△　交通部长朱家骅电沪前任招商局监督陈孚木入京，俾就私自与美商订立借款合同事询明真相。

△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属“反动”；凡批评国民党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一律禁止”。

△　何应钦电刘珍年部先行调浙。刘通电全国称该师调离鲁境，“实良心所驱使，并非正义不能抗彼暴力”。

△　鄂党政会议在汉口开幕，张难先主席，蒋介石出席致词。次日闭幕，通过“实施训练民众方案”等案。

△　福建拒毒会、禁烟后援会以该省有鸦片公卖说，特电国民党中央反对，并请明白表示，以释群疑。

△　上海市复兴公债600万元由英商利安洋行承销，并委托汇丰银行经理还本付息事宜，市政府按票面八折实收。

11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调节民食案，决定设立民食委员会，商同财政部，向美国借购大宗美麦。

△　交通部发表李国杰违法秘签之招商局与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押款契约四种：一、合同；二、备忘录；三、租约；四、规定押款付给日期数额之合同。

△　刘文辉、田颂尧两军在成都南门外草堂寺、东门外兵工厂发生激战，旋于城内煤山等处接触。邓锡侯派部队将城内刘、田两军隔断，并商刘、田各派负责官员制止，18日两军停止战争。

△　陈济棠令粤各县调查“民团”枪械，烙印存案。

△　是日起伪满洲国废除中国通用时间，所有钟点拨后26分钟。

11月17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定12月1日由洛阳迁回南京；二、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交政治会议筹办。

△　在粤国民党中委开谈话会，讨论国民政府改组及防止独裁制之再出现问题，萧佛成自曼谷来电主张“分权共治、防止独裁”的意见，亦提出讨论。

△　蒋介石赴襄樊，指示“围剿”红四方面军。18、19两日在樊城召集何成濬、刘镇华、卫立煌等会商。21日返汉口。

△　刘珍年部退出莱阳赴烟台。军政部电令刘部缩编为乙种师。

△　河北省各市商会在北平开代表会，反对营业税增高税率。18日推代表赴省党部请愿，请转达省府及财政厅收回成命。

△　国民政府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

11月18日　　朱家骅数电陈孚木入京，陈拒不应命，是日陈自港复电，略谓招商局困难情形已陷绝境，非抵押不足以挽危机，故批准备案，职权上并无不合。

△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在粤再发二期航空券1000万元。同日，省务会议决议，发行新纸币400万元。

△　上海华商电车工人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保安队与工人发生冲突，工人死伤12人，保安队伤排长一人、士兵三人。

△　上海绍兴同乡会紧急会议议决，分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及浙省府主席等，反对刘珍年军调浙东，并联络各地同乡会、社团一致行动。

△　日本外务省发表日本政府向国联秘书处提出对李顿调查团报

告书之意见书，声称日本对“满洲国”所取之态度，不违反国际条约；报告书中“关于满洲之诸提议，使满洲成为变相的国际共管，殊为‘满洲国’及日本所不能受诺”。21日，日政府发表意见书节略。

△　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因财政困难，电中央辞职。22日，邵暨甘肃省府全体委员致电行政院总辞职。

11月19日　　刘湘部轰炸泸州，民众伤亡甚多，房屋大半被毁，刘文辉部退至城外，刘湘之第二十一军占泸州。

△　邓锡侯电刘湘、刘文辉、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主张各方立停军事行动，商定集会日期，不再兴戎马于桑梓。刘文辉及田、杨、李、罗等即复电响应，刘湘对邓电暂置不复。

△　红军一、五军团攻占金溪。

△　朱家骅通知上海市长吴铁城，将招商局前总经理李国杰押解上海市地方法院审判。

△　司法行政部电促各省法院办理大赦至本月底截止，不得再延。

△　沪华商电车工人罢工，各路电车停驶，市党政机关会商处理办法。下午会衔布告，限令明日午前复工，“如敢故违，准资方解雇，另招新工”。

11月20日　　刘湘部占领贡井后，续向叙府（今宜宾）进攻，是日占荣县、威远。

△　国民政府出席军缩会议首席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秘密商定中苏复交。

△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决议通电全国各民众

团体一致援助东北义勇军，武力收复东北失地，并电日内瓦顾维钧，请拒绝李顿报告书中之共管满洲建议。

△　热河国民抗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民魂等发表《告国联大会书》，请制止日本侵略，提出：一、中国民众坚决反对基于调查团报告书建议原则而成立之解决满洲问题之任何办法，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之侵占与瓜分；二、中国民众要求中国民族之真实独立自由与解放；三、满洲领土主权未完全收回以前，中国民众之抗日战争不能终止。

△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以东北救国军总司令苏炳文奋勇抗日，特电表示“集合民众力量，誓为后盾”，并希望“努力奋斗，坚持到底，驱除敌军”。

△　顾维钧访国联行政院主席狄凡勒拉，盼速解决东北问题。下午，颜惠庆告各国记者，称“中国政府无意推翻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国政府将不至宣布不顾李顿调查团之劝告，采取一种直接违反李顿建议之方针”。

11月中旬　　内政、财政、实业、教育四部商定分年开发西北计划，并请华侨投资开殖。

11月**21**日　　国联行政院开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和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相继发言，互相指责。23日，国联行政院继续开会，各国代表发言，均不承认“满洲国”，主张日本即速取消“满洲国”。24日，顾维钧发言再驳松冈九一八事变为日人自卫行为，“满洲国之成立，为当地人民自由志愿之行为”之谬说。26日，国联行政院将李顿报告书及本届会议记录移送十九国委员会讨论。

△　国民党中央开中委谈话会，推陈果夫、程天放、段锡朋、邵元冲、蔡元培五人为电影文化委员会委员。

△ 北平商会召集各团体开会，反对续借美麦，电请中央停签合同。

△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会衔通电停战，共谋善后。22日，刘、邓、田继续会商，决定五项善后办法：一、刘、邓、田联名通电停战，三部将领通电赞成；二、田自动表示与邓、刘合作到底，不受他方利用；三、由邓担保开放成都北门，使城内田部扫数安全退出城外；四、由三部共谋整个和平办法，期在三数日内川省战争一概停止；五、最短期内召开全川将领会议，以谋军事、政治、交通诸重大问题之整个解决。

△ 温州旅沪同乡会分电军委会和军政部，反对刘珍年调浙。

11月22日 行政院会议，交通部长朱家骅报告处理招商局经过，并通过准刘珍年辞鲁省府委员职。

△ 立法院通过《行政执行法》。

△ 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反对续借美麦。

△ 东北义勇军将领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杜、王德林、李海青等联名致电国联，声明东北民众誓必抗日，决不屈服，除非杀尽东北3000万人民，决不许傀儡组织存在，更不能抛弃主权，造成所谓共管局面，政府纵不能收复失地，人民则誓驱日寇，还我河山。

△ 第九路军孙连仲自20日起率五个团分三路进攻金溪，红一军团一部偷渡抚河袭临川，孙部侧背受胁，是日撤出临川。

△ 苏省京沪民食调节协会致电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请速明令各省开放省界米禁，免除米谷捐税，并推代表赴省府请愿，要求立即撤销苏省米禁。

△ 安徽旅沪同乡会代表李振亚等，控告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

会办赈人员杨树诚、余绍武、查良钊、王范五等在皖北办赈贪污巨款案，是日，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开审。

△　川军邓锡侯通电戴季陶、石青阳、张群及旅外川绅，请转恳中央严令各军停战。

△　河南灾民500余人乘车至长辛店站，要求换车至浦口，因无车皮，与路警发生冲突，捣毁车站玻璃门窗等，经站长及公安局劝导，并允将灾民送至郑州再转浦口，始平息。

11月23日　　国民政府为息川事，重申民国十七年整理川政之命令，交行政院详定实施办法，并令川军各将领暨行政专员“引咎互让，立止干戈”，依院决办法实行。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建设陪都西京、行都洛阳案，交行政院、军委会妥议办法进行，并通过保留行都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现有地址等案。

△　上海市拥护国联盟约会发表告全国商人书，勉全国商人御侮救亡，提出五事勉商界共同进行：一、拥护国联盟约；二、保持领土完整；三、实施经济封锁；四、援助东北义勇军；五、制裁破坏盟约及世界和平之野心国家。

△　刘珍年部第二旅约6000余人，由烟台分乘五轮，开往温州。

△　松江《松报》因登载调查仇货新闻，被国民党县党部以“故违法令，鼓动风潮”罪勒令停刊。

△　抗日军李海青部收复吉省长岭、瞻榆（今通榆）等县。

11月24日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在成都再度协商息争，谓川战发生，皆刘湘所操纵，今后当制止其野心，一切请命中央，谋川局善后。同日，刘湘分电潘文华、王缵绪、唐式遵、穆瀛洲等各督所

部分路西进，期于月底攻下成都，完成统一。

△　南京农、工、商、学、妇各团体联名电请国联对日有效制裁，谓对于日本若仍持宽容态度，不予迅速有效制裁，则世界和平基础从此即破坏无余。

△　皖省旅京同乡电国民政府反对米照捐。同日，宋子文电皖省政府，粮食照费商民不得抗缴，如有赴京请愿，定予申斥。

△　翁文灏就任教育部长，但不辞地质调查所长职。

△　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徐诵明电教育部辞职。

△　天津裕元纱厂工人因要求发放制服被开除四人，是晨开始罢工，又被开除12人，工人被迫复工。

△　日阁议决定，任命武藤信义为驻伪满大使。

△　吉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进攻黑省珠河（今尚志县），与一面坡日军激战。

11月25日　　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幹向各国驻华公使声明，否认中日直接交涉之说，并称日方造谣已司空见惯。

△　鄂豫皖“剿匪”总部制定对所占苏区新设县治建置大纲14条，凡新设县治，其应隶属之省区、县治所在地及疆域，悉由总部规定，县长亦由总部任命。是日通令三省遵行。

△　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和《商品检验法》。

△　北平各团体决议反对故宫古物迁至洛阳，电请中央取消原议，如无效果，迁移时各团体民众定在神武门前设法阻止。

△　上海社会局发表一二八事变损失统计，总数达1.9亿余元。

△　吉林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致电国联并通电全国，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声明不承认伪满，誓死抵抗。

△　江西九江商会以洋米倾销，农村经济破产，特函全国商会联合会转请中央对洋米进口从重征税，以保护我国农业。

△　宋哲元以察省财政困难，办事棘手，电蒋介石辞察省主席职。26日，蒋复电慰留。

11月26日　东北在平难民数逾10万，是日张学良等邀请平、津党、政、军、绅、商、学各界举行茶会，讨论筹款赈济办法及筹设难民工厂等事宜。

△　刘湘令各军全线停止进攻，静候中央命令。

△　刘珍年部梁立柱旅开抵浙江温州，骑兵团调驻安徽滁州。

△　江、浙两省渔业团体再电宋子文，要求豁免重征渔税。

△　教育部通令全国高、初中下学期起取消学分制，取消选科制，不设党义科。

△　河南灾民四五千人乘专车由北平赴南京，是日在泰安被扣留。

11月27日　国民政府通电各省、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定12月1日同时迁回南京。29日，国民政府公布12月1日迁回南京令。

△　李济深、黄绍竑电邀粤中委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余汉谋、邓家彦等出席三中全会。

△　蒋介石通令各县驻军尊重县长地位，凡团长以下各长官，对

县长如有凌辱行为，由各该师长负责论罪。

△　太原山西大学等校学生因要求生活费，爆发学潮。全市师范、初中学生因官费取消，生活困难，连日向山西省府教育厅请愿，要求恢复官费制或酌予津贴。

△　南开之豫灾民第一列车抵明光，在泰安被扣之第二列车经劝阻折回天津。

11月28日　　国联行政院一致通过将调查团报告书交大会讨论，日代表反对援用盟约第十五条，放弃投票。是日，国联行政院会议结束。

△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日内瓦中国代表颜惠庆等，称“日本表示甚愿东北门户开放，与各国机会均等主义，慷他人之慨，希图博得各国之同情”，“务请坚决痛驳报告书，声请执行盟约第十六条，保障会员国应享之权利”。

△　中华全国回教协会致电国联，吁请对东三省案主持公道，并表示“不能承认东北独立”，“决收复东北失地”。

△　刘珍年部梁立柱旅奉命由温州开闽北。

△　国民政府水灾救济会在南京“长江”轮上举行江、淮、汉运干路堤工落成典礼。

11月29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杨树庄、委员兼民政厅长刘通、委员兼财政厅长何公敢、委员兼教育厅长程时煃、委员兼建设厅长许显时、委员林知渊、陈培锟、林寄南、卢兴荣、丁超五、方声涛、江屏藩均免本兼各职，任命蒋光鼐、范其务、郑贞文、孙希文、李章达、高登艇、林知渊、李清泉、陆文澜为福建省政府委员，蒋光鼐兼主席和民政厅长，范其务兼财政厅长，郑贞文兼教育厅长，孙希文兼建设厅长，国民政府于12月7日公布；

二、任命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　国民党中委柏文蔚、刘芦隐、张知本等在香港会见胡汉民，征询对三中全会意见，并商严防三中全会重新产生独裁政府之办法。

△　张群通电中央及川军各将领，主张各军应引咎停战，悉听中央处理，并由中央临时设置川政整理委员会解决川事。

△　蒋介石电嘱邓锡侯负责调停川事，候中央解决。

△　行政院决议派徐诵明代理北平大学校长。12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次日，红二十五军组成，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全军约7000人。

△　日军大举进攻扎兰屯之苏炳文救国军，救国军退海拉尔。

△　济南一中、育英、正谊、东鲁、爱美五校学生，为援助因反对会考而被开除的高中学生，全体罢课。次日，济南高中、一中、爱美、育英、正谊、振华、东鲁及齐鲁八校学生万余人游行，向省府请愿，要求准被开除之学生立刻回校，严惩教育厅长何思源，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军警压迫学生事件，并表示被开除学生未回校前，誓不复课。

11月3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王用宾为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任命陈大齐为副委员长；推定张静江、张继、叶楚伧、陈果夫、经亨颐、杨树庄、恩克巴图为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　西南政委会决定修筑粤桂黔铁路，令三省各派一人为筹备委员。

△　铁道部将即将建成之陇海路东段海港定名为连云港。

△　徐诵明坚辞平大代理校长职。12月2日，徐再电宋子文、朱家骅，请收回成命，另委校长。

△　甘肃军事会议通过裁兵案，军费缩减三分之一，以解决各军发饷困难。

△　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周保中到吉东地区抗日联军中工作。同时派遣杨靖宇到南满地区组建抗日武装，不久在盘石、龙海将义勇军改编为游击队。

△　徐州破获制造毒品大案，捕获人犯慈善会长曹紫亭、大昌粮栈主姜临如，搜出海洛英数十包，其他要犯前任县长刘炳晨、前任商会会长丁荫周、粮米业主席周景昌、博施医院院长郭蔼如等逃逸。

是月　澳门中文报纸《朝阳日报》创刊，社长陈小伟。

12月

12月1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自洛阳迁回南京，是日分别举行回京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南京。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外影片标准。国产影片应鼓励其制造者之标准为“阐扬总理的遗教及本党主义、政纲政策者”等17项；所需外国影片之标准为“不违背本党主义而有利于本党宣传者”等12项。

△　刘湘联军在隆昌会议决定分三路逼成都：杨森、李家钰部取道资阳，王缵绪师取道仁寿，唐式遵、潘文华两师取道乐山。是日，前锋过简阳西进。

△　陈诚由南昌赴临川，就抚河“剿匪”总指挥职。

△　蒋介石制定派员查禁十省种烟办法九条，分电苏、浙、皖、鄂、湘、豫、赣、闽、陕、甘十省主席遵行，规定以上各省先行禁种，如有包庇或玩忽者严办。7日，再电十省，严令禁烟。

△　翁文灏因母丧电国民政府恳辞教育部长职。

△　东北民众救国军李杜部张殿九旅与日军在碾子山激战后退扎兰屯，日军占碾子山。3日，日军又占扎兰屯，李杜率部自海拉尔退满洲里。

△　韩复榘严令济南罢课各学校限2日一律复课，违者解散，另招新生；如再发现标语，公安分局长须监禁三年；捕获贴标语者，赏洋200元。2日，济南罢课各校除高中外均复课。

△　天津电气工人罢工斗争结束，市府允代公司发给工人罢工期间工资。

△　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决定6日召集国联大会特别会议，中日问题移交大会。颜惠庆申请速定解决中日问题期限案被否决。

△　巴拿马国会通过禁止华侨移民入境法案。

12月2日　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率部自贵阳退守黔西，待何知重援军到后再战，该军副军长犹国才率第二师于上月25日进驻贵阳，欢迎毛光翔回省主持一切。是日，毛光翔电京，攻击王家烈祸省殃民，为保犹国才继长黔政。

△　蒋介石增派卫立煌部两个师入赣“剿匪”。

△　河北唐山粮食街余祥号经理刘国昌因贩卖仇货，被锄奸团掷炸弹炸伤。

△　实业部发表10月份各海关调查报告，内称各国对华贸易，以

前以美国第一，英国第二，日本第三；最近则以日货独旺，已居英、美之上，尤以棉纱、布匹为大宗。

12月3日　顾维钧致函国联驳复日代表松冈洋右11月21日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的演说和日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之意见书，略称：日方之意见书与言论，无一处可变更李顿调查团所证实满洲时局中之最重要事实及调查团依此事而得之结论。九一八事变乃日本大陆政策所促成，东三省现状之维持与承认，中国绝不能接受，“满洲国”必须解散，损失必须赔偿，日军之撤退必须尽早实行，中国问题之解决，应不违背《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

△　外交委员会在京开会，讨论应付国联大会步骤，并训令日内瓦中国代表团据以进行。

△　蒋介石电日内瓦颜惠庆等三代表，郑重声明否认中日直接交涉，称“中正绝未主张直接交涉”，深信国联必能“为中日问题谋公平适当之解决”。

△　华侨委员会通过《侨民教育实施纲要》。

△　朱绍良在鄂绥署召开鄂南“清剿”会议，决定“剿匪”新方案。9日，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在咸宁成立，以朱为总指挥。10日，朱赴鄂南“督剿”红军。

△　陈诚部周至柔第十四师陷江西金溪。红军向大、小竹枫林、资溪转移，主力仍在硝石、黎川及南丰间。

△　据《大公报》讯：日伪在东北实行“五家连坐法”、“良民证”制度，并在铁路沿线设瞭望台，窥视义勇军行动。

12月4日　日军猛攻海拉尔，东北义勇军苏炳文弹尽援绝，通电撤兵，官兵民众4000余人退入苏联国境。7日，马占山部亦被迫入苏境。

△　黔省王家烈、蒋在珍两部混战，相持于遵义新城狮子桥。

△　刘湘以九个旅兵力进攻仁寿、井研刘文辉部。

12月5日　鄂豫皖“剿匪”总部举行扩大纪念周，蒋介石讲话，略称：三省“剿匪”，“七分政治力量已做到五分，政治以经济为根据，对三省经济基础有初步方案，望国人继续努力”。

△　陕西省府主席杨虎城因财政问题电南京辞职，行政院复电慰留，并允对财政设法补助。

△　胡适在长沙“肇和军舰起义纪念会”上讲演《中国政治的出路》。

△　济南高中被勒令解散，学生限8日前出校，以候甄别，除事先请假离校，确未参予学潮者外，均各呈悔过书、家长保证，由校甄别。

△　招商局成立债务整理委员会，公推叶琢堂为该会主席，将以合法手续向银界另借新款以偿旧欠，再谋改革。该局全部所欠，大约1700万元。

△　吴奇伟率第十四、第九十两师占硝石及资溪镇。

△　刘文辉部分三路反攻，一出仁寿攻叙府、泸州；一出简阳攻资中、内江；一出成都攻新都、乐山。

△　中英庚款会通过铁道部借款案，粤汉路先发行公债120万镑，增加南京轮渡料款1.6万镑。陇海路借款因有比国款项关系，决定缓议。

12月6日　国联特别大会开幕，讨论中日问题，颜惠庆发表对调查团报告书意见，提出大会应令日本解散所谓“满洲国”政府；宣布不

承认“满洲国”政府；宣布日本破坏《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确定日期发表最后解决双方争议之报告等四点要求。

△　日军在抚顺制造“平顶山惨案”，经我方宣布后，日政府照会我国外交部否认，并对沪新闻报所载消息，认为有损“皇军名誉”，要求取缔。是日外交部驳复日本来照，并对抚顺日军在平顶山等村屠杀村民2700余人提出严重抗议。

△　《康藏和约》告成，康军分返原防，援康青军两旅奉命撤回玉树。

△　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致电行政院、外交部，请速救济苏炳文部。同日，沪市教育会亦通电全国教育界援助义勇军。

△　驻华英代办应格兰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因招商局收归国营，该局前向上海汇丰银行以财产抵借巨款，本利尚未归还，请予注意。

△　午后2时，日军宫本先遣队陷满洲里。

12月7日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以苏炳文部受日军压迫，退入苏联国境，特通电全国军人奋起抗日，收复失地。

△　上海总工会、全国商联会等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请速援救苏炳文部。

△　刘湘改委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潘文华为第一、二、三、四各路总指挥，并下令进取成都，与刘文辉部激战于仁寿、井研，双方死伤均重。成都各街工事又继续恢复。

12月8日　夜10时，日关东军第四旅团第五联队铁甲车一列自绥中驶抵山海关车站东口，向车站开炮数发，将车站旁水塔击毁，伤看守夫役一人；旋向山海关城内开炮十余发，并投掷炸弹。守军第九旅

旅长何柱国当与日驻榆守备队长落合严重交涉，允将日铁甲车退至车站静候交涉，至次晨2时始停止射击。

△　蒋介石为对鄂、豫、皖三省原红军根据地13县实行经济控制，令农村金融救济处迅筹设农民银行。

△　陈诚电约蔡廷锴第十九路军进攻赣闽边中央红军。

△　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电国民政府请出兵援助苏炳文，并通电全国援助义勇军。

△　国联大会第三日，爱尔兰、西班牙、捷克、瑞典四国代表提出议案，请国联否认九一八事件为日本自卫行动，不承认日本卵翼下之伪满洲国，并建议邀请美、苏加入十九国委员会参加协议调停。日使松冈反对，要求将该案撤销。郭泰祺郑重声明拒绝中日直接交涉，谓任何解决方案，必须以盟约及中国主权完整为基础。

△　由建设委员会、国防设计会、扬子江水道整委会合组之长江上游水力勘察团发现宜昌葛洲坝有巨大流水量，每秒为6.5万立方尺，向建委会建议筹设水电厂。

12月9日　下午，国联大会暂休会，对中日问题无切实决定，调查团报告书及各项有关意见，移交十九国特委会草拟提案，再送大会讨论。

△　蒋介石以安徽人民抗缴米照捐，特电该省主席吴忠信制止，并称："倘仍有此等情事，即以妨害政治，扰乱秩序论。"

△　刘文辉急谋与田颂尧携手，令所部退出成都，转移新津。是晨田部占领成都。

△　驻津日领谒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提出抗议，诬山海关我驻军枪击日军，并以同样内容通知驻津各国领事，混淆听闻。日驻华使馆

武官永津致函北平军分会参谋长荣臻，诡称日装甲车赴山海关车站装水，忽被何柱国军所射击，“不得已而应战”。

△　退入苏联境内之苏炳文及其随员征求苏联政府同意假道赴欧。上日，日驻苏代办天羽要求引渡苏炳文等，苏政府依据国际公法严辞拒绝。是日再声明凡随苏炳文入境之华人愿留苏境工作者悉准居住，代觅职业。

12月10日　　何柱国与日守备队长落合及日军第五联队长谷仪一等在山海关南关谈判。日方以高压手段强迫何承认炮击事件“系出误会”，由中方赔礼道歉。何为缓兵之计，予以妥协。是日下午，日军退回原防。

△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在南京开幕。下午，举行首次大会，黄绍竑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讲话，声称“此次内政会议实为今后政治修明之关键，其重要直与国民会议相仿佛”。

△　蒋介石乘舰离汉赴京，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12日午抵下关。

△　训练总监李济深离沪赴港养病，致电蒋介石，称即日具呈国府，请辞本兼各职。

△　自本日至15日，刘湘、刘文辉两军于乐山、井研、仁寿等地血战五昼夜，双方伤亡均重。

△　废止内战大同盟总会常委会决议：一、推林康侯等三人为代表，向三中全会请愿制止内战，一致对外；二、普征会员，增厚力量；三、电请中央严厉制裁刘湘，通电全国勿与刘湘合作；四、实行与内战者不合作；五、联合旅沪贵州同乡设法制止黔乱。

△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接中央党部密令，饬即“严捕共党负责分子解京法办”。是日，北师大教授马哲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11日平大

教授侯外庐被捕，13日北大教授许德珩亦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农学院进步学生18人被捕。

12月11日　　何香凝复函第十五师特别党部不出席三中全会，略称：现接中央及贵师特别党部来函，催促入京参加三中全会，“衮衮诸公，党国名流，出席者大有人在，如能各出真诚，一致共趋国难，对于一二人之出席，不成问题，否则亦何补于事，凝以抱病之躯，无裨于事，不愿力疾入京，以增病苦”。

△　中国驻英使馆在伦敦发表宣言指出，据正式统计，九一八以来，日军屠杀我国同胞达5.8248万人，上海一二八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　蒋介石向内政会议提出重新制定县、区、地自治法规，区或镇以下施行保甲制度案。

△　蒋介石委任卫立煌兼鄂东“剿匪”总指挥。

△　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团总指挥部通电，奉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闽浙赣新苏区正式宣布成立。方志敏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辖区达20余县。

△　中央红军在闽赣边战斗后，分成三路：红三、五两军团由黎川入建宁；红十二军由资溪入光泽；红十军回信江北岸。

12月12日　　下午，中国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两国政府自即日起恢复正式外交关系，照常交换使领。

△　国民党留粤中委邹鲁、邓泽如、李宗仁、刘芦隐等14人电三中全会，借口“职守羁身”，不出席会议，希望今后“执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一中全会之各项对外对内决议案，永远阻止独裁，协同剿共，实行抗日”。

△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总会常委王晓籁、杜月笙、林康侯等37人通电中央党部、行政院等，以刘湘无故枪杀四川大学学生，封闭《新蜀报》，封闭川省裕通银行，要求中央予以严厉制裁，褫夺刘一切职位。

△　沪杭甬铁路各站职工因加薪不平等，经派代表赴总局请愿，未得圆满结果，是日举行罢工，要求当局迅予解决。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陈兴汉向铁道部辞职。

△　自政府明令将招商局收回国营后，该局股东起而组织法益维持会，研讨维护股东利益，是日该会在沪招待报界，反对政府以每套价银50两收回股票（按：依该会主席李次山报告，每股应得资产价值银600两以上），决派代表入京向三中全会请愿，并向监察、立法两院商议此次政府收回招商局手续问题。

12月13日　　外交部长罗文幹发表中苏复交宣言，并公布中苏换文。

△　河北省商会代表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及财政部，请求取消营业税新税率。31日，财政部批示已咨行冀省府转饬核议。

△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代表林康侯等赴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制止内战。

△　陕省干旱日烈，灾民400万，死亡逃徙日有增加，灾情严重，各县灾民代表是日在西安开紧急会议，决推郭子兴等赴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一、履行二中全会决议案，速发陕灾公债800万元；二、豁免灾区粮赋及一切苛捐杂税；三、所有驻军一律由中央直发饷糈，以免同归于尽。

12月14日　　蒋介石在内政会议讲话，声称“救国必先改革人心，攘外必先安内，刷政首须痛除积习”。

△　蒋介石在南京各界迎蒋大会上演说，声称：“欲民族复兴，须从民族固有之精神，即恢复礼义廉耻作起。”

△　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就中苏复交事发表谈话称：“两民族间自由往来之途径，已清除一切阻碍，深信定能于实现远东和平上大有助力。”南京《新京日报》著文称“中俄复交与反共判若两事”。

△　江苏淮阴点心业200余家罢市，反对政府启征营业税。17日，经商会会长劝导，各代表答应秋冬两季缴税40元，并于次日复业。

△　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苗可秀率学生大队和自卫军大刀队在凤城和龙王庙之间伏击歼灭日伪军百余名。

△　辽吉黑热义勇军后援会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建议武力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　东北抗日各军代表刘丕光、王子耀等12人以日本伪造东北人民请求独立函件3000余件寄日内瓦，特电国联大会，称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人民先后牺牲于日人之手者，已达5.8万余人，“东三省3000万人民誓死不承认满洲国，务希大会予以正义公平之裁判”。

△　新加坡华侨开设之华商、和丰和华侨三家银行合组华侨银行，在国内设上海、厦门、香港三分行。控制东南亚许多地方华侨的信贷和汇兑业务。

△　据《大公报》讯：伪满实行鸦片公卖，鸦片专卖公署及分署已分别成立，开始营业。

12月15日　　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到执监委百人，阎锡山、胡汉民、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李济深、程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均不出席。于右任主席。下午预备会议，推蒋介石、孙科、于右任、顾孟馀、丁惟汾、戴季陶、居正为主席团。

△　全国内政会议历时六日，共开大会七次，是日下午闭幕。通过“地方自治”、“整理土地”、“确定地方卫生制度”、“改良礼俗”、“执行调查统计工作”等议案400余件，审议建议案200余件，并发表宣言。

△　陈济棠召集粤党政要员讨论时局，决议力促三中全会实现“防止独裁再起”，“联合肃清共患”、“切实长期抗日”三要案，并提议分权共治及扩充西南政务委员会各部会组织案。

△　国联特别委员会通过英、法、捷克、西班牙、瑞士五国起草委员会之决议草案，其要点为：一、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为调解的基础；二、重行确定3月11日之决议案；三、提议以十九国特委会为调解委员会，而辅以中日代表；四、宜请美、苏参加调解工作。但草案既未规定制成最后报告书的期限，更无阻止日本侵略办法，为日本预留狡辩余地。17日，国联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陈述中国政府不能接受十九国特委会决议草案并要求加以修改。日本拒绝接受。

12月16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首次大会，蒋介石主席，决议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推戴季陶、宋子文、于右任、孙科、顾孟馀、王正廷、朱培德、朱家骅、伍朝枢为委员，并指定外交部部长、次长参加，由宋子文召集。

△　李济深再电蒋介石坚辞训练总监职。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蒋介石先后慰留。

△　蒋介石邀梁漱溟咨询对改进社会及农村建设等问题。梁曾于15日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讲“村治问题”。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呈请中央撤刘湘职，并通电全国共起制止刘湘用兵。

△　红十六军孔荷宠部第七、九两师由赣万载入鄂东。

△　山西省立一师因校方开除学生杜连秀等五人，向教育厅请愿无结果，是日联合女师等七校发动驱逐教育厅长冀贡泉运动，沿街遍贴驱冀标语。

△　江苏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决议赴教育部请愿发清积欠省校经费四个月。

△　东北义勇军电三中全会，要求集全国力量抗日。

△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电请第十九路军出关杀敌，收复失地。

12月17日　　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在沪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称该同盟之目的：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是日，以筹委会名义代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要求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由陕西城固南进，越大巴山，先头部队于18日进入四川通江县境。蒋介石电令田颂尧派兵于川北堵截。田部分两路出动，刘汉雄率三团开广元；李炜如率四团开通江、南江。刘存厚亦派一旅防边。

△　刘茂恩、胡宗南、萧之楚、范石生等四师奉命入陕“剿共”。是日，刘、萧两师已过陕西鄠县以西。

△　刘湘、刘文辉两军激战竟日，双方伤亡甚重，刘湘到荣县指挥，潘文华师到乐山对岸之笋子山，田颂尧师到仁寿清水镇，刘文辉部退井研、乐山、仁寿。

△　太原一师、成中等校学生千余人，为一师开除学生事赴省府请愿，被军警镇压，伤14人。

△　辽宁日参事官成泽直亮同指挥官山岸等率日伪军自凤城孙家店进入岫岩境。18日，辽南抗日义勇军司令刘景文发动岫岩关门山战斗，活捉成泽直亮。

12月18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蒋介石等以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人数过少，应加充实，提请加推于右任、孙科为中政会常委。

△　日机12架由义县飞朝阳滥炸。

△　国民党中央令各省、市查禁伪满宣传报纸。

△　辽宁救国军司令耿继周电请三中全会援助义勇军，收复失地。

△　刘文辉以12团兵力由陈鸿文率领向犍为方面第二十一军穆瀛洲部猛攻，穆部损失过半。

△　全国商业联合会电行政院，请速制定印花税法，并通令全国印税局，在税法未制定前，不得任意苛罚。

△　苏俄研究社在南京成立，选陈立夫、张冲、康泽等15人为干事，贺衷寒、邓文仪等五人为监事。

12月19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二次大会通过“定期召集国民参政会”、“督促政府完成肃清‘共祸’工作”、“慰勉蒙藏来京各员，并团结各族以固国基”、“澄清吏治”等多案。

△　财政部实行开弛米禁，米谷运至国内口岸，一律免税放行。

△　国民政府任命刘戡为陆军第八十三师师长。

△　陈诚部陷资溪。20日，又陷黎川。中央红军主力由资溪、黎川开至光泽、邵武、建宁、广昌一带。毛泽东、朱德在黎川曾召集军事会议，进行战前改编整顿，充实连队战斗力。

△　刘珍年师全部抵温州。大部向闽北政和、寿宁等县开动。

△　刘湘调后方部队驰援，向刘文辉部猛攻，在敘府间相持。次日晚，双方敢死队在泸县、敘府间肉搏，至21日午后始停。

△　全国海员代表严华生等五人到京向三中全会请愿，要求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名义，并修正该会组织规程。

△　北师大学生会决议电三中全会，反对停办师大，要求将该提案撤销。

12月20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三次大会通过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和取消省政府委员制改为省长制等案。财政部向大会提出1930、1931年度财政报告。

△　行政院召集各部、会长等举行临时谈话会，讨论解决川事及康、藏纠纷等问题。推定戴季陶等负责草拟计划。同日，蒋介石邀戴季陶、宋子文、张群等商川局善后，决组川事整委会。

△　平、津各院校教联会电三中全会反对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所提改革全国高等教育案，并派代表见张学良请向全会力争。该提案要点为：一、减少独立学校数量，以集中财力谋质量之改进；二、于全国各重要城市分别设立大学一所，以谋文化之平均发展；三、各省、市政府、团体、私人暂不得设立大学及文法学院；四、师范教育不另设专校等。

△　国民党陕西省党政要员电请三中全会速拟具体办法救济陕灾。

△　上海洋商大东、大北、太平洋三电局投递工人全体罢工，要求改善待遇。22日，公司宣告全体开除，另招新工。同日，工人派代表向市党部请愿，要求迅速解决。

△　山西省政府处理一师风潮，为首学生陈希愈等13人被开除，交警备部押送回籍，校长黄丽泉撤职。

△　日驻伪满特使武藤信义剥夺伪满警权，由日本国内和南满调来大批日警宪分别取代，以控制一切行政权。

12月21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第四、五次大会，通过确定教育标准与改善制度案、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开放米禁厉行积谷案、恢复农村经济“改进”青年思想以谋赤区善后彻底办法案、救济陕灾案等17案。22日，三中全会闭幕。

△　外交部长罗文幹向三中全会报告中日问题及对日外交，历述日人侵华罪状，并申述解决东北事件始终坚持最要二原则：一曰决不容维持东省伪组织为前提；一曰必不违背《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之文字与精神。

△　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何知重电林森、蒋介石、宋子文等，恳速令何辑五入黔兼代省主席。22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电黔省府令犹国才暂代。

△　许德珩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保释，于下午4时出狱。

12月22日　　司法部咨湘、闽、滇、桂四省迅速筹设“反省”院。

△　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朱绍良下令郭汝栋、容景芳、谢彬、李定五、张刚各部向鄂南红军总攻。

△　山西省教育厅以太原学运高涨，无法制止，转令太原各校提前停课放寒假。

12月23日　　日军图热，驻锦州之第八师团及铃木旅团连日向热边运输，日军用汽车2000辆已由沈阳运锦州，备攻热之用。

△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因热河告急，特举行督促政府出兵恢复东北失地大会，并致电请国民政府“飞调大军讨伐伪满，恢复失地，全国人民誓为后盾”。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原则通过唐有壬等审查实业部所拟整理及发展实业计划案的报告，交主管机关参照成规酌量办理。

△　福建前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陈国辉被闽绥署以“纵匪殃民”罪在福州枪决。同日，省防军第三旅副旅长何显祖亦在漳州被枪决。

△　中央苏区红军克崇仁。

△　废止内战大同盟总会讨论制止内战，解决川、黔问题办法，并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军委会等，要求：一、严令川军即日停战；二、迅组川政整委会；三、授权整委会编遣川军；四、严禁军火入川；五、查办川战祸首；六、调王家烈部离黔。

△　中央禁烟委员会以最近在江北徐、蚌等地破获官绅大规模制毒机关，特呈行政院请饬苏、皖两省切实查获，依法严惩。

△　热河告急，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在沪举行大会，通过督促政府收复失地、立即施行征兵制、编义勇军为正式国防军、特赦爱国志士等提案10项，并电国民政府要求飞调大军出关讨逆，收复失地。

△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府、各部队禁止私设空军机关及航空队，如必须购机，应以商用或教练机为限，不得购战斗机，并须申请批准。30日，李宗仁拨款300万元扩充桂空军。

△　吴忠信辞皖省主席，蒋介石、宋子文挽留。

12月24日　何应钦电饬闽北各军入赣“协剿”红军。蔡廷锴自漳州赴龙岩部署策应赣方“剿共”。

△　宋子文电促在德之汪精卫回国，称：“现在救亡图存，刻不容缓，吾兄假期届满，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国，领导一切。”

△　韩复榘偕沈鸿烈到平，与张学良商华北防务，并报告胶东事件经过。26日，张学良与韩复榘、宋哲元等详商团结御侮等问题。

△　陕甘游击支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在陕西宜君成立，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该军只辖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随后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

△　英政府突征滇缅生银进口税，并禁中国货币输入缅甸。全国商联会特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请速向英国交涉取消。

△　班禅在京宣誓就西陲宣化使职。

△　北平中华民众教育协进会成立，聘蔡元培、李石曾等为董事，推蔡元培为董事长。

△　北平师大奉教育部密令，开除学生涂茅若、杨振声、于佩琛等32人。

12月25日　热河告急后，各界电请抗日。是日，沪市160余同业公会电热省主席汤玉麟“迅调大军誓死抵抗”。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亦电全国军人自动请缨，出兵讨逆，收复国土。

△　徐向前部红军占领通江县城。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于通江成立，邝继勋任主席。

△　南开大学校方奉教育部密令，开除学生30余人。27日又开除20人，未宣布理由。学生不满，殴伤校长张伯苓。

△　上午8时，甘肃玉门、酒泉、高台等县发生强烈地震，震源在玉门县南之祁连山麓昌马区，该地区“房屋完全被震倒，人死四百余名，牲口约在五百以上”。金塔“城垣四周倒塌约四十余丈，城内外民房亦有倒坏者，幸未伤人”。鼎新“城垣房屋强半坍塌”。安西“摇塌民房二百余处”。兰州、青海、蒙古、四川等地亦受余震影响。

12月26日　　日军在锦州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进窥热河问题，决定先肃清热边义军，再进窥热河。

△　国民政府令免王家烈贵州省政府主席兼职，遗职由犹国才暂兼代。

△　刘文辉连日苦战，阵线动摇，是日派代表携亲笔函向刘湘请和，提出：一、自动辞省主席兼民政厅长职；二、全部改编为四师；三、以川康军边防总指挥名义退守西康；四、成都财产保留。

△　章嘉在京就蒙旗宣化使职。

△　何成濬离汉赴陕“督剿”红军徐向前部。何告记者，声称“三周内即可结束军事”。29日，何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商“追剿”徐向前部计划，由杨虎城任总指挥。次日，杨飞汉中指挥。

12月27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特任颜惠庆为驻苏联大使；二、任陶峙岳继毛炳文为第八师师长（31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三、派胡世泽为国际劳工局专家会议代表。

△　罗文幹辞司法行政部长兼职。

△　上海地方法院以招商局前总经理李国杰犯共同损害招商权利罪、渎职罪处徒刑三年，褫夺公权四年。李声明上诉。

△　北平政委会开常会，张学良主席，到韩复榘、宋哲元、杨爱源、庞炳勋等十余人，讨论热河问题，对日军图热决誓死守土。

△　国民党西南政委会决议电中央增兵援热并严饬汤玉麟死守。

△　蔡廷锴通电劝刘湘、刘文辉息争，留军力供抗日及收复失地之用。

12月28日　　国民政府令：特任朱培德兼代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唐生智兼代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

△　国民党中政会会议决议西京设市，直隶行政院。

△　陈济棠派李叔尧北上，与韩复榘、冯玉祥、阎锡山商时局问题。

△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发表水灾赈务报告，称该会自1931年8月14日成立至今，急赈支款668万余元，麦12.7万吨，受惠者496.4万余人；工赈受惠者逾1000万人。

△　义勇军何民魂部克彰武，分兵攻击法库日军。

△　北平各界电促国民党中央速筹对策，抵抗日对热侵略。

△　全国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张军光从事抗日运动甚力，前曾接所谓“保障团”及“中日大同盟”恐吓函多件，警告其停止救国活动，否则“将以相当手段对付”。是日张在沪突告失踪。

12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推定戴季陶、孙科、伍朝枢、茅祖权、顾孟馀、段锡朋、陈立夫草拟国民参政会法规。

△　北平军训会讨论华北军事训练问题。张学良、韩复榘、万福麟、宋哲元、庞炳勋、荣臻、孙殿英、王树常等均出席。

△　国民党粤省党部电勉汤玉麟抗日守土，并电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力争到底，不达收回失地目的不止。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电北平公安局，请即释放被拘全部师生。电称：“闻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各学校师生，仅许德珩君经保释，其余数十人，仍羁押贵局，政府方力言保障人民一切自由，而贵局所行如此，何以自解。”

△　外交部电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向国联报告热边日军行动，万一发生事故，其责任应由日方负之。

△　刘湘及联军各将领开内江会议，商对付方针。决议：一、设立四川善后委员会，各军长均为委员；二、民政由善后督办主持；三、第二十四军须让出岷江流域；四、准刘文辉保留少数部队经营西康，余部由联军处理。

12月30日　　赣粤闽边“剿匪”总司令部下达第四次“围剿”江西红军命令，限次年元月6日前各部队在指定地区集中完毕。蒋介石调集29个师、两个旅约四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围歼中央苏区红军。以陈诚指挥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担任主攻任务。

△　国联中国代表顾维钧致国联备忘录，声明中国向无排外政策，日本在沪、满无驻兵之权。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训令，决定划建宁、黎川、泰宁地区为一警备区，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该地区各部队、机关以及军事、政治事宜。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工厂法》及《工厂法施行条例》。

△　行政院通令苏、浙、闽、鄂、湘等10省厉行禁烟。

△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公务人员一律服用国货。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招待中外记者，由副主席蔡元培代

宣读宋庆龄演说词，略称：“新闻界与同盟会员实有比肩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之责，应予同盟以诚实之赞助。”“诸君对众多国人之被非法拘禁与秘密军法审判，将长此静默不加抗议乎？抑将一心一德，与同盟共肩此责任乎？”

12月31日　　张学良电外交部长罗文幹报告石本案，称日本关东军侦探石本权四郎因破坏我领土治安，前被义军拘留在热河，日陆军省为侵犯热河，捏造石本被我义军杀害，以为第二中村事件之借口。石本现仍被禁在热河义军营中，在日军放弃侵略军事以前，不能轻易释放。

△　热河省府秘书长谈国桓奉汤玉麟命由承德抵平，向张学良报告热河情况。汤对人表示：“热河不守，平津华北均危殆，热民穷财困，难抗暴寇，但人有脸，树有皮，余决舍此老命，拼一死战。”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再电热河汤玉麟切实抗日。

△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给中共河北省委的信，要求必须“加强天津、唐山、北平、内蒙的领导”，“特别是加紧京东一带及唐山、天津、北平四郊的农民运动”。

△　刘湘派员到京谒蒋介石报告川情，称：外传内江会议讨论解决川局善后，并无其事。仅刘湘与田颂尧晤商答复刘文辉提出之条件。刘湘已允刘文辉保留三师，按乙种编制，给与总指挥或军长名义，由中央决定。

△　何成濬自西安电“剿匪”总部，请电令川边刘存厚部合力堵截徐向前部红军。

△　国民政府电复苏联政府同意鲍格莫洛夫为苏驻华大使。

△　陈立夫介绍章嘉活佛加入国民党。

12月下旬　　邓铁梅率民众自卫军在岫岩县东文家街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打退日军三次冲锋，迫使日军逃回县城。

1932年是月　　安徽增设嘉山县，由盱眙、滁州、定远、来安四县析置。

是年　　钢铁产量两万吨，生铁54.8391万吨，钨砂2245吨，锑1.803万吨，锡7370吨，汞三吨，煤2637.6315万吨。

△　全国纱厂总计128家，其中华商84家，外商44家，内英商三家，日商41家。布机4.2596万架，内华商2.0599万架，英商2691架，日商1.9306万架。锭子490.4788万枚，内华商273.079万枚，英商17.061万枚，日商200.3388万枚。

△　本年度中国生丝产业由于蚕种退化，养育无方，价格低落，衰落特甚，仅出口7.66万余担，较上年度减少约5.64万担。

△　统原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上海成立，资本2000万元，董事长陈子楚，总经理陈绳武。

△　龙云将1912年成立的、云南惟一拥有发行纸币权的富滇银行改组为富滇新银行，使其成为云南的金融中心。

△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成立。

△　澳门自来水公司成立，在青洲设立机房。

△　澳门南湾填海工程动工，由华商集团组成的申达置业公司承建。

△　香港颁布《离婚条例》、《离婚规程》。

△　菲律宾洪门秉公社成立，为菲华侨社会中洪门组织五大支派之一。

△ 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落成。

△ 《华侨旬刊》在上海创刊。

△ 旅美华侨在洛杉矶创办首家华文图书馆——罗生图书馆。

△ 豫、陕、皖、甘、青、鲁大旱。吉、黑、晋、豫、皖、赣、冀、湘、陕、鲁、粤、北满等大水灾，晋尤重，灾民达数千万人。鲁、皖、豫虫灾。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1月

1月1日　　日军制造榆关（山海关）事件。上午，绥中日军往榆关调动，下午2时，驻榆日宪兵守备队通知榆关日侨迁至南海日兵营“避难”。晚9时30分，日兵车一列由绥中开抵榆关车站，日军步哨将爆炸物投掷于车站附近爆炸，同时，日军在南关外鸣枪并爆炸手榴弹，嗣向我南门外步哨射击，迫其退入城内，经我驻军东北军第九旅派员诘问，反诬为我驻军挑衅。日步兵守备队第五联队一个中队出动南关外。驻临榆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在北平闻报，星夜回防。

△　赣粤闽边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按蒋介石关于先期“清剿”金溪附近红军，巩固临川，继以主力向赣南推进的计划，令第二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调第十四师周至柔部、第二十七师孙连仲部、第九十师吴奇伟（兼）部集中临川待命。

△　中国航空协会在上海成立，理事王晓籁、史量才、王正廷、杜月笙、虞洽卿等21人就职。此会系蒋介石授意杜月笙等人发起建立。筹建时名中华航空救国会。

△　蒋介石令驻皖第四师徐庭瑶部分编为第四、二十五两师，归第十七军节制，徐庭瑶任军长；原第四师副师长邢震南升第四师师长，独立旅旅长关麟徵任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日，徐在蚌埠宣誓就职。11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苏联政府任命鲍格莫洛夫为驻中国大使。

△ 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罢工，9日允暂复工。

△ 香港《裁判司条例》和《简易治罪条例》公布施行。

△ 《中国与苏俄》月刊在南京创刊。

1月2日 晨2时，榆关日军向临永警备司令部提出：一、撤退南关中国驻军、警察及保安队；二、撤退城上中国守兵；三、南关归日方警戒；限即时答复，否则武力夺取。临永警备司令部允南关暂由日方警戒，南关稽查兵暂撤城内，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交涉解决。日军得寸进尺，要求开放南门，门内及城上均归日军警戒，遭我拒绝。日军竟将南关公安分局局长扣留，缴去警察枪械。上午8时前复由前卫开来兵车三列，步炮兵3000余人，配备大炮20余门。10时，日军炮击临榆县城，步兵爬城进攻。守军第九旅第六二六团官兵愤极，不顾“不准还击”之令，以石头、手榴弹回击，毙日军儿玉中尉等。同时日军3000余人于石河铁桥、南关、二里店、五眼城、吴家岭之线展开，将榆关城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何柱国遂下令还击。是晚，日第八师团长西义一命铃木第四旅团增援。

△ 晚，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就榆关事件电张学良提出“警告”，妄称榆关事件系中国进兵热河，宣言抗日所致。同日，驻平日使馆代办中山亦访张学良提出同样“警告”。

△ 张学良密电蒋介石，认为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并非即欲作真面目之战斗，仍为借此对我方军事部署加以试探”，希望“设法对榆关事件谋一缓和延宕办法”。同时提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谋无效，则我亦不得不尽其全力以与周旋”，并表示自己“决无丝毫犹豫”。要求蒋“迅示机宜，并乞迅饬启宇（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所部火速出动，其他军队速行集结”。

△　北平邮局邮务长、意大利人巴立地勾结军警机关非法拘禁该局邮务工会抗日会执委13人，并封闭邮务工会。邮务工人强烈反对，电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当局要求惩办巴立地，释放被拘人员。

1月3日　　榆关失陷。上午，日军第八师团铃木旅团以飞机、坦克配合猛攻临榆县城。泊于南海之日舰两艘频繁向榆关城发炮。午，占南门及东南城角。下午2时，由东南城角攻入，坦克由南门冲入，城内发生巷战。何柱国部第九旅第六二六团守军伤亡逾半，一营营长安德馨及二、三、四、五连连长均阵亡，全营伤亡几尽。下午3时，守军撤出，临榆遂陷。城内商号毁于炮火者500户以上，民众死伤千余人。日方称日军死亡官兵80余人，伤200余人。

△　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复电张学良，略谓："无论倭寇行动如何变化，我军速入热河计划，万不可稍有变更，只要能达成此任务，则为缓寇计，不妨相机应付。"并表示商震部"调动与接济筹备，弟当负责"。

△　驻日公使蒋作宾自东京电蒋介石，报告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原因："日军部久欲驱张，使反动分子在华北另组政府，因欲与我公提携，迟迟未发。近因中俄复交，三中全会提议全国长期抗日，我公又无意出而负责，其对华感情日形恶化……荒木、松井等虽欲先用政治手腕，促我公与之妥协，而在满军人则以荒木计划尚嫌过迟，现又值国联开会期近，故即夺取榆关，压迫平津，使热河归其掌握。"望蒋"负起全责，速组健全政府，确定方针，或战或和，当机立断"。

△　孙科、吴铁城等在沪邀请各界名流200余人，发起建立中山文化教育馆。8日，开第一次筹委会，蔡元培、吴经熊、伍朝枢等15人参加，通过筹委会简章及办事细则，24日，经国民党中执会及教育部批准备案，并由国民政府每月补助事业费五万元。

△　马占山于上年底退入苏境，所部二万余人由军长邰斌山、邓

文，司令檀自新等率领撤至热河。是日，外交部代电行政院要求对马部拨款购粮，解决给养。5日，热河省府主席汤玉麟亦电国府各院、部及蒋介石、张学良，要求速筹救济办法。

△　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通电“警告”张学良，妄称榆关引起不幸事件，应由张学良负完全责任。

1月4日　　外交部就榆关事件照会日驻华使馆，要求日政府迅饬日军退出榆关，严处肇事者，嗣后不得再有此种举动，至我方一切损失，保留要求赔偿之权。同日，该部发表宣言，指出日军侵榆为其预定计划，要求国联迅即以最有效方法予以制裁；并电令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将日军侵榆情形报告国联，要求采有效措施。

△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日军侵榆事件，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事件经过。会议仅决定“交付各常委会同军事当局负责处理”。

△　日军五六百人在战车掩护下沿平榆大道进攻五里台附近阵地，被何柱国部第九旅第六二七团守军击退。同日，日机轰炸石河阵地。临永警备司令部移海阳镇，电北平军分会要求增援。

△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指出：“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提出军分会及张本人“应即迁保定或张家口，一面与各公使馆交涉，声明北平驻军他移，以北平为文化区，不愿与倭军在北平附近冲突，并望各国互尊条约，保持平、津之和平”。

△　驻日公使蒋作宾电告外交部称：本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向英、法、美、意、俄大使说明山海关事件经过，并声明不愿扩大，认为局部问题已训令前方官宪直接与张（学良）之代表交涉”。

△　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是日苏《真理报》载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占据山海关，并非是偶而发生的

所谓地方事件，乃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热河与华北之整个计划之一步骤。”并说：“此种侵略之结果，将使帝国主义者间之冲突，愈益严厉尖锐化。”

△　江西黎川、资溪一带红军一、五军团主力，乘国军调动之际，向北进展，计划夺取金溪、临川，扩展苏区。是日，红军一部在金溪黄狮渡附近围歼第五师周浑元部第十三旅。该旅伤亡大半，旅长周士达被俘，残部于次日拂晓向南城溃逃。红军占金溪。

1月5日　胡汉民在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力主御侮。指出：“日人攻占榆关为意中事，其目的不仅在东三省，实为所谓东四省及整个华北及整个中国”，“榆关守否为华北存亡所关，中国安危所系。”又谓：“今日只当问抗日方面有何进展，如旁及其他，不但无意思，亦且无意义。”

△　蒋介石电林蔚转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请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代委员长。

△　蔡廷锴电询国民党中央，“已否确定大计，北平张主任有无抵抗决心”，表示愿率所部北上抗敌。同日，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亦均致电国府及蒋介石请缨抗日。蒋分别复电“嘉慰”，并令切实整顿部属，静待命令。

△　中华民国救国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熊希龄、褚辅成，东北义勇军后授会常务理事江问渔、杜重远等电国民政府，指出“榆关失陷，强寇日深，徘徊歧路，势所不许”，要求即日宣布对日绝交。

△　国民政府任陈时骥为第五十九师师长。

1月6日　日军在榆关增兵达6000人左右，是日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攻石河阵地，并轰炸秦皇岛附近村庄。驻秦皇岛日第二遣外舰队司令津田扬言要求中国驻军撤出秦皇岛。

△　国民党西南中委召开紧急会议，反对榆关事件局部谈判。同日，西南政务会决定布置西南各省国防，令第一、四集团军对各港口及要塞布防，并电驻国联代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向国联声明，国联应对日军作有效制裁，如事态扩大，国联应负其责。

△　上海市商会、上海地方协会电华北军政首领张学良、庞炳勋、汤玉麟、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何柱国等，要求积极御侮。同日，南京各界举行紧急会议，通电全国誓死抗日。

△　泊秦皇岛英国“福克斯顿号”军舰舰长奉英远东舰队司令克留提督令，访日第二遣外舰队司令津田，提议由英斡旋停战。津田答以非中国方面有明确表示，遽难应诺。9日，日驻华使馆书记官中山将此事电告日外务省及军部，外务省复示拒绝。

△　红军一、五军团一部围攻江西东乡县城，当地守军突围西逃，红军占东乡。8日，国军第五十三师向东乡反扑，红军主动撤退。

△　国民党中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在临川集结完毕。晚，吴奇伟下达攻击令，令第十四师为右翼，沿浒湾、琅琚向假源方面进攻；第二十七师及第九十师第二六八旅为左翼，向金溪进攻。

△　鄂东“清剿”总指挥卫立煌在黄安（今红安）河口成立鄂东“清剿”总部，第十三、三十、三十一、八十、八十三等师均归其指挥。卫并在黄安召集鄂东地区专员、县长开“剿匪”会议。

△　国民政府特任颜惠庆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翌日，免颜驻美国特命全权公使本职，遗缺以施肇基继任。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委宋庆龄、蔡元培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释放被北平公安局拘捕之马哲民等师生，以重民权。

△　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4000余人因资方借故不履行劳资合约宣言罢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出面调解，资方表示“妥为计议”，要求工人先行复工。9日，工人允暂复工。

△　十四世达赖选派中伊青布为全藏代表，与玉树宣慰使马训在香达开会，谈判青、藏和议。

1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侵占山海关，“是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中国的强盗战争的许多步骤之开端”，提出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开展一切形式的群众的反帝争斗，组织吸引并提高他们到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中去”。同日，中共中央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工、农、学、城市贫民，进行“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　蒋介石返抵南京，与国府主席林森、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幹商应付榆关事件。随后接见张学良代表鲍文樾，听取榆变经过。

△　冯玉祥就榆关事件自张家口电国民党中委邹鲁，内称：“倘再不全力抵抗，则华北各省随时可沦于日人之手”；蒋介石等人对日妥协，“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表示“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抗日者，皆为吾友，应互相提携之；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　江西南昌各界召开救亡大会，到500余个团体，成立江西民众救国会，电请中央动员备战。

△　国民政府令准居正辞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兼职，遗缺以覃振继任。

△　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善后督办刘湘通电声明结束四川内战，内称："国难至此，救亡之责，我辈奚辞，自当团结同胞，枕戈待命"；并声称正与各军商撤兵善后诸问题。

△　上年退入苏境之东北义军领袖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率全体留俄将士通电要求政府"翻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1月8日　　红军第五军团在江西金溪黄狮渡、后车附近重创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周至柔部；在枫山埠截断第二十七师孙连仲尾部。孙部立即转移，从外线向红军包抄，途中遭红军猛击，大部溃散。次日，红军又在浒湾大败第二十七、九十两师。是役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牺牲。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改宁都县为博生县。

△　张学良在平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日方关于榆关事件系中国方面调动军队所引起的谬论，谓"榆关事变与九一八柳条沟（按：应为柳条湖）事件如出一辙"；表示"惟有以吾人之精神与赤血，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

△　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通电全国各报馆，号召海内外同胞输财效力，挽救危亡。同日，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刘镇华电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表示愿为御侮前驱。第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第五十师师长岳森、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在京谒蒋，请缨杀敌。

△　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电国民政府，要求出兵抗日。湖南人民抗日会、广东学生抗日会、上海市教育会、上海特别市民联合会、上海全浙公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平津各工会联合会、平绥路工会、福建民众救国会等民众团体亦先后电促国民政府、蒋介石出兵抗日。

△　日参谋本部开军事会议，部署侵热军事，决定派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赴天津传达。梅津当晚由东京启程，15日到津。

△　日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决定《山海关事件处理方针及纲要》，规定将榆关事件“做为中国驻屯军执行任务上的一局部地区问题和以后用兵不受约束的原则处理”，以所谓张学良军妨害日驻屯军行动引起日军保护侨民的附带任务为处置基调，并要求张学良军今后不得向榆关一定距离以内“侵入”。责成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及第四旅团长和中方交涉。

△　英驻华使馆代办由英驻天津领事馆安排，与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晤面，提议解决榆关事件“仿照沪案成例，由英、美、法、意四国出任调人”。

△　驻平日军200余人在东长安街演习战术。驻津日军举行大检阅，并邀各国武官参观。9日，沪、汉等地日军均举行阅兵。

△　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关于我东北问题之决议草案及说明书于上年12月15日通过后，经日本代表提出修正，要求将决议草案中邀请美、苏参加谈判一节及说明书中“对满洲现在政局维持而承认之，亦不能视为解决之道”等内容取消。十九国特委会认为调解既难生效，遂将原定1月16日以前保守秘密之上项决议草案及说明书提早于是日公布。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令郝梦龄、戴民权、宋天才三师“会剿”豫南商城、固始、光山等县红军，限一月内肃清。

△　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电国民党中央请辞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表示愿率部出川抗日。

△　上海协和医院开业。

1月9日　　汪精卫在德国柏林杜平根疗养院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目前不思与日本正式宣战”，“中国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战。”

△　日关东军司令部密派伪满高等顾问、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往天津组设特务机关。16日，板垣在津与日天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谋划。

△　张学良、宋哲元、庞炳勋分别电复上海市商会、上海地方协会，表示对日坚决抵抗。

△　日军上年底大举进攻吉省义军，以第十师团为主力分三路向绥芬河、下城子、密山进犯。本月5日，竹本支队占绥芬河，园部支队占梨树镇。6日，密山支队占密山，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率部撤出密山转虎林。是日日军占虎林，李率卫队一旅退入苏联国境，余部由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收容。

△　国民政府派胡世泽为出席国际劳工预备专家会议政府代表。

△　前行政院长谭延闿陵墓、纪念堂举行落成礼，蒋介石、林森、于右任、宋子文等往祭。谭墓及纪念堂坐落于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1931年动工，建筑费20万元。

△　中国地学会创始人张相文逝世。

1月10日　　晨，日军田中部队、三宅骑兵部队纠合伪军分由榆关、万家屯进攻九门口要隘。守军东北军姚东藩第十五旅退沙河寨、石门寨，九门口失陷。

△　行政院会议，一、决定设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聘张继、戴季陶、蔡元培等11人任委员；二、通过《举办航空公路建设奖券计划大纲》及《奖券条例》，规定每年发行奖券四次，共2000万元。

△　红军第一、五军团乘胜分三路围攻临川。陈诚令调第十一、十四、二十三、九十等师防守。18日，陈亲赴临川坐镇指挥。

△　日军第十师团园部支队骑兵第十联队9日从绥芬河出发进攻东

宁。是日，吉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在东宁抗敌，因弹尽援绝，王率部600余人退入苏联国境。

△　张学良电令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所辖各部应即移驻平东三河、宝坻、蓟县、玉田、香河一带驻防训练。"宋即令所部于当晚8时从驻地张家口开拔，23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集结。

△　第二十一师刘珍年部奉蒋介石命由山东南调参加"剿共"，是日刘在南京分谒蒋介石、何应钦，要求将所部调往东北杀敌，蒋嘱其暂时协助地方建设，静候中央命令。

△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即共产党员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致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控诉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滥施酷刑以及反省院种种残酷虐待的事实。随后又再函民权保障同盟，要求政府释放，以便参加抗日，并希望该同盟为争取释放一切政治犯而斗争。

△　天津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成立，致电国民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抗日。

△　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会电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要求即日宣布对日绝交，调全国大军抗日。

△　海外华侨团体纷电国民政府要求抗日。南非华侨反日总分会、菲律宾华侨救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美洲维多利亚华侨救国会及锡兰全体华侨先后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出兵抗日收回失地，表示华侨誓为后盾。

△　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国政府分致节略，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特权，侵略山海关，屠戮该城数千和平无辜中国人民，促请注意日方行动。

△　西南政务会常委兼中山县县长唐绍仪因与陈济棠争夺政治权

力和中山县权益，陈策动中山县民众倒唐，是日，中山县民众到广州向西南政务会请愿，要求撤唐县长职。

△　上海银行公会兼办之票据交换所开幕，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四明、金城等32家银行均加入。

△　上海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吴淞”轮中舱工人事件自上年发生后，是日，公司方面雇用流氓突以武力驱逐工人154人，打伤四人，一人失踪。12日，上海海员工会发起成立“吴淞”轮后援会。13日，被逐工人向公司提出无条件复工、寻找失踪工人、赔偿被殴伤工人损失、惩办“吴淞”轮买办等四项要求，遭公司拒绝。6月，粤省海员工人起而援助，拒绝起运所有太古公司货物。太古公司被迫于11月27日恢复“吴淞”轮全体华工工作。

△　中国航空公司沪平线开航，是日首班由沪飞平，遇雾两次折回，14日始抵平。

△　《新中华》半月刊在沪创刊，周宪文主编，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　伪满奉山路局长阚铎以该路屡遭义军袭击，通饬所属段站员警，全力保护路线及行车安全。

1月11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马寅初、傅秉常等90人为第三届立法委员。12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蒋介石在南京陵园私宅与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幹、陈立夫等人商对日外交，决定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平向张学良传达中央对华北外交方针。当日晚，刘离京赴平。

△　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4日所提抗议复照外交部，反诬榆关事件系中国军队向日宪兵住宅掷弹、开枪及开炮所致，日方“不能不采自卫行动”。同日，日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

部……而‘满洲国’对于该省内扰乱治安或侵入该省内之不逞分子，自得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

△　南京工界召开代表大会，通电全国一致誓死抗日，并通告工会会员禁用日货。

△　出席国联代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电国民政府要求迅速出兵收复榆关。

△　驻日公使蒋作宾致电蒋介石，报告日军急欲侵犯热河。电称：“在满日军料定三四年内不致惹起世界战争，决定积极侵略，况伪国财政困难，故急攻热，兼收鸦片，聊充军费……倘中国真行抵抗，或可稍敛其锋。”

1月12日　　汪精卫在日内瓦发表宣言，略称：“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立交涉及抵抗并行之方针”，“中国始终信任国联，听候解决，此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间，日本侵略不已，中国为领土主权人民生命财产计，断难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奋起而为正当防卫，此为抵抗之本旨也。”

△　西南政务会是日起连日在广州开联席会议，参加者广东陈济棠、邹鲁、邓泽如、刘芦隐、刘纪文、林云陔，广西李宗仁、梁朝玑、马君武，福建李孝侯、赵一肩，云南张冲，贵州杨秋帆、甘嘉仪，四川张明九、但懋辛，湖南戴静园，冯玉祥代表王建屏，胡汉民代表胡木兰，热河义勇军代表何民魂等。会议作出：一、促中央履行三中全会决议，出兵抗日，收复国土；二、拟西南大联合，筹组西南国防委员会等项决定。

△　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薛笃弼以榆关失陷，华北垂危，政府不积极抗日，愤而电辞国府委员职，并于15日通告在上海、苏州执行律师职务。

△　上年冬新疆鄯善暴动发生后，吐鲁番维吾尔族民众起而响应，在麻木提等人领导下秘密组织武装，是日起事进攻吐鲁番老城，省军守将马福明投降。马降后焚烧县府，杀戮汉人，并将金树仁派往进剿之熊发育诱杀。金树仁遣盛世才率部由哈密前往镇压，相继将鄯善、吐鲁番攻占，暴动民众退焉耆。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部将领马世明，利用民众武装于下旬在焉耆成立第三十六师“剿匪”总司令部，马自任总司令。

△　爱国志士刘崇武等上年11月在上海以炸弹、手枪对付私贩日货之奸商，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审理。是日刘崇武被判徒刑七年，潘鸿生、曹松寿、田水阳等亦均判刑。

△　国民政府上日令行政院办理《流通国内米麦案》及《开放运米禁令并厉行积谷办法挽回利权调节民食案》。是日行政院电饬各省、市政府等，“省与省及县与县间，应绝对流通，不得阻留”。

1月13日　湘鄂西红二军团贺龙部一部由鄂入湘，是日占领桑植县城，并向慈利、大庸等县进展。湖北保安处长范熙绩到恩施率各县保安队会同陈渠珍部“进剿”。20日，何键派李觉率部赴常德、临澧“督剿”。

△　日军第十师团饭冢支队从佳木斯出发进攻宝清，9日占宝清。吉林省府代主席、护路军总司令丁超所部第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率部投敌，余部被日军缴械。丁超在宝清藏匿。是日，丁遭日军搜出被俘。

△　监察委员高友唐弹劾前上海特区法院院长杨肇熉与审判厅长郑毓秀狼狈为奸，贪婪不法，要求政府将杨、郑及同案人书记官钮传椿、会计主任郑慧琛依法究办。15日，杨、郑登报声明否认有贪污不法行为。2月25日，监察院将该案移最高法院，杨、郑逃逸。

△　交通部令邮政总局将所有东北各邮局与外界所订合同，在失

地未收复前暂时解除。

1月14日　　全球华侨总公会通电，提出“造成一个有组织有秩序之救亡运动……以为救国之有效准备”。

△　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对该省囚犯200余人已关押一二年以上者，分别情况，取保释放。

1月15日　　日军纠合伪满军千余人，在坦克配合下，向河北境内石门寨进犯。

△　上海全浙公会电促蒋介石克期北上督师，并反对将刘珍年师调驻浙境，要求蒋率同北上。

△　北平佛教青年救国团发表告全国僧界书，指出僧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当此民族存亡生死关头，应立即团结一致，努力抗日，宁作战场鬼，莫为亡国僧。

△　江苏南通县平湖镇保卫团逼交保卫捐，将农民沈宏奎全家六人扣押，农民二三百人到区公所抗议，要求开释。桥东乡农民往援，被开枪打死四人，群众愤而捣毁区公所，将沈全家救出。县长陈栋被迫将肇事区、乡长等撤职讯办，并抚恤死难农民。

1月16日　　新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及第三届全体立法委员宣誓就职。

△　美国政府向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表示“山海关事件应视为中日两国间冲突之事件，并非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所发之事件”，不予考虑。施当即指出：“借《辛丑条约》规定驻在山海关的日军亦参加了战斗。”美方竟称“事件发生伊始，驻兵虽被牵入，但攻击之举，则系锦州开往之军队及海军、空军所为”，予以推卸。

△　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是日就职，

辖第九旅、第十五旅、骑三旅。

△　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由吉林退入热河开鲁，张学良派代表劳军，旋将冯部改编为第六十三军，冯任军长。

△　河北石门大兴纱厂3000余工人，因厂方无理取消年终双薪，是日举行绝食斗争。厂方多方威胁无效，竟捏造事端，勾结河北省府、法院，将工会理事、干事等四人拘押。2月9日，又将工人170余人开除。4月，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拟具解决办法两条，由行政院饬河北省府遵照办理：一、被开除工人一律复工；二、被拘押工人构成刑事犯者应俟法院审判。

△　伪满国务会议决定3月1日为“建国”纪念日，成立“建国周年纪念大会中央委员会”，郑孝胥任委员长，并在长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地方委员会，筹备盛大庆祝活动。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侵入华北，国民党及其政客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80万大军进攻苏区。宣言号召在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鲁迅、蔡元培、周建人、邹韬奋、胡愈之、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许申、吴汉祺、陈彬龢、林众可、郭慰然、王造时、郑大朴16人出席，通过宣言和分会章程，规定主要任务为反对国民党对革命者的监禁、酷刑和处决，营救被捕的革命者，给政治犯以法律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公民权利和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龢、胡愈之九人当选为执

委。

△　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谓“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催促蒋“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

△　立法院任命焦易堂为该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马于31日辞职，改由陈长蘅代理），吴尚鹰为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翌日，国民政府任命梁寒操为该院秘书长（原任张维翰于4日辞职）。

△　行政院任命蒋鼎文为长江各省水警总局局长，辖川、湘、鄂、赣、皖、苏、浙七省。23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29日，该局在武昌成立。6月复奉命撤销。

△　国民政府令准免俞济时第八十八师师长职，遗缺以该师副师长孙元良升任。

△　国联秘书长德鲁蒙与副秘书长日人杉村阳太郎背着中国及其他国联会员国，擅自对十九国特委会拟定之决议草案及说明书达成妥协案，内容一味迁就日方主张。是日，外交部长罗文幹发表谈话，表示“如国联强令中国接受不能同意之决议，则政府必致坚决之训令于代表团”。由于其他各国也表示反对，此项妥协案未能正式提出。

△　上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褚辅成、杜重远等电行政院、外交部，要求急速设法接运退入苏境之义勇军将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张殿九、谢珂等归国。

△　北平朝阳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学院、商学院、工学院等16校组织抗日总会。2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学院、法政大学等24校

组织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

△　全国邮务工会购置“邮工号”飞机一架，捐献国民政府抗日。

1月18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四川善后办法》，决定派张群赴川办理善后。21日，国民政府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转行遵照。

△　蒋介石通令各省加紧“清乡”和整顿“民团”。22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公布《剿匪区内民团整理条例》。

△　上海地方协会及交易所联合会等团体因据闻日在平、津假借段祺瑞名义诱惑其旧部，特分电隐居天津、北平之段祺瑞、吴佩孚，促其“速发宣言，表明态度，勿堕日人狡计”。

△　日本以新提案提交十九国特委会，要点为：一、草案勿涉及“满洲国”之存在；二、拒绝邀请美、苏非会员国参加调解；三、中日纠纷以直接交涉为原则。同日，十九国特委会讨论日提案，发表公报称，如取消邀请美、苏加入调解，日本是否准备接受决议草案，要求于20日前答复。

△　由沈阳南行第18次列车在千山汤岗子被义军炸毁。北行货车两列行经该处脱轨颠覆。

△　粤空军队长丁纪徐电国民政府，要求率飞机一队北上抗日。与此前后，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第四十五师师长戴民权等均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缨抗日。

△　日军第十师团自上年开始对吉东一带抗日义勇军的进攻结束，是日第十师团长广濑于穆棱站下令所部除留置一部分兵力负责各要地的警备外，主力于20日开始返回哈尔滨。日方宣布此次作战义军死亡1300余人，投降日伪7000人。

△　山西太原警备司令部召开治安会议，决定镇压人民办法九条，其要旨为：一、不问军、警、宪、工、商、学各界，有捏造黑白，谣言惑众者，捕获讯明枪决；二、凡关于交通设备如电线、桥路等，有故意破坏窃盗，以妨事机者讯明枪决；三、凡未经许可之集会、结社妨害治安者，分别讯明枪决；四、凡有不利于治安之“反动”宣传及“煽惑”民众之印刷品，一经查获，印者及承印者，一律讯明枪决。

1月19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新闻检查法》及检查标准，其中规定：各大城市一律设立新闻检查所，由党、政、军、警机关派员组织；凡关于军事、外交秘密以及治安方面足以“动摇人心，引起暴动”之新闻，一律扣留或删改，各地新闻机构违者依法处分。翌日，内政部宣布，凡未经申请登记而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省、市政府有权停止其发行。

△　北平人民自卫会电促蒋介石即日北上御侮，并电请全国接济抗日将士。21日至24日，北平工联会、上海总工会、首都工界抗日会、汉口市工会、汉口市商会等团体以及国民党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市党部均先后电请中央任蒋介石为海陆空军总司令，北上抗日。

△　日军加紧作攻热部署，是日三宅骑兵部队、茂木骑兵旅团开入锦州。绥中各部队向锦西调动。

△　冯玉祥募款赶制皮背心一万件赠抗日战士，是日函张学良请转发前方士兵，并表示此举系于“万不得已之中尽其心力之所能及而已”。

1月20日　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开会，日本对该特委会18日征询尚无答复。中国代表团知悉该特委会对原决议草案及说明书有修改之意，特发表宣言，声明：“中国代表团所坚持之最主要点之一，即否认并废止所谓满洲国之原则，应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延请美、苏

参加调解，“非特有利，且属必要”；“国联若仍主直接交涉，仅由特别委员会从中调解，则中国代表团仍不能接受”。并将上年12月26日致国联秘书长备忘录公布。

△　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重新部署“剿匪”兵力：第九师于21日推进临川，接替抚河东岸防务；第十一师于22日向宜黄、乐安移动，俟主力第五十二、五十九师集中后进攻黎川、南丰；第二十三师接替乐安第四十三师防务，第四十三师移永丰、吉水、峡口、吉安，接替第五十二师任务；第十师到临川接替第十四、九十师城防，第十四、九十师向浒湾推进，巩固临川外围；第二十七师向崇仁、宜黄，第五十三师向乐安；第二、三两纵队俟主力集中完毕，即向赣南推进。

△　第三届立法委员举行第一次大会，孙科派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36人，由孙自兼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任副委员长。

△　上海80余同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及财政、实业部，要求废止本年5月16日期满之《中日关税互惠品目协定》，并推代表晋京请愿。

△　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举方液仙、蔡声白、王志莘、史量才等为理事，以方液仙为总经理。该公司于上年11月由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发起筹办，集股10万元，2月9日正式营业。

1月21日　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贵族院作外交方针演说，公然宣称“热河省为满洲之一部”，“张学良麾下之正规军有越过国境而进入热河省之模样，属于满洲国领域之地方治安维持，根据《日满议定书》，固须两国共同负责，故所谓热河问题，乃纯然满洲国内部问题”。

△　国民党中央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赴粤，向西南当局传达中央“安内攘外”方针，动员两广出兵江西“剿匪”。

△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派代表彭醇士赴南京谒蒋介石，促蒋早日赴江西坐镇指挥“剿共”。

△　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自上年7月非法拘押镇江《江声报》经理刘煜生后，经密呈军事委员会核准，是日以“宣传共产，背叛党国”罪将刘杀害。

△　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再次集会，知悉原决议草案关于邀请美、苏参加调解一节，即使按照日方要求予以取消，日本亦不准备接受原决议草案，而日本所提种种修改意见，特委会又不能接受，因此决定宣告调解失败，并依据上年3月11日大会决议案，由德、英、法、意、捷克、瑞士、瑞典、比利时、西班牙组九国委员会起草报告书，但同时声明仍留调解余地。九国委员会于23日组成。

△　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书古物120箱由津浦路运南京。

1月22日　　蒋介石向豫、鄂、皖三省“剿匪”部队发出特急令称：“限期肃清残匪已三令五申，各部兵力十倍于匪……残匪猖獗如故，言之痛心。现限期已到，望各将领督饬所部，淬励精神，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

△　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日本再提照会，驳斥日方来照所称各节“既非事实，更多附会”，并对日军最近复在九门口、石门寨等处进攻中国驻军，在北平等处持械游行及举行作战演习等提出抗议，要求迅将占据榆关及其附近之日军撤退，严重处罚肇事者，并对北平等处日军严加约束，勿令再有妄动。

△　外交部长罗文幹就日外务大臣内田演说发表谈话。略谓：“仅就其关系日本在东省之暴行一段而论，已足证日本之武力侵略与扩张领土之迷梦，去清醒之期尚远。”声明：“满洲国”必须取消，中国在东三省必须恢复固有主权，在日本之傀儡组织宣告取消前，任何调停与

和解办法均不可能。

△　蒋介石派钱新之为特使持蒋函19日到天津邀请段祺瑞南下。是日，段偕前陆军总长吴光新等到达南京，蒋介石亲往下关，登轮迎接，执弟子礼甚恭。段向记者发表对时局书面意见，称："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23日段离京，于24日到沪。

△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致电蒋介石，略谓："自率部退出贵阳后，被犹国才叛军逼迫，故到榕江后，群请回师。固于13日到龙里，19日进驻贵阳，犹部先后被击溃……将于最短期内结束贵州军事。"

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以纪念"一二八"为名，是日起至28日，举办"航空救国"宣传周，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均召开大会，号召人民捐款购机。

△　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会同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向巴中进军，在恩歌嘴、清江渡等地击溃川军李炜如、罗乃琼部共八个团，是日进占巴中。同时，第十一师击溃川军另一部，占通江南之得胜山。

△　监察院以江苏省府主席顾祝同非法拘捕、枪杀镇江《江声报》经理刘煜生案，经监委刘莪青、田炯锦提出弹劾，监委周利生、高一涵、李梦庚审查成立，是日监察院以顾"违背约法，蹂躏人权"，呈请国府交付惩戒。

△　出席国联代表顾维钧发表宣言，驳斥日本外相内田之演说，指出内田演说外交方针，"此实其侵略计划第二步之实现也……日本对满洲问题之全部政策，假内田之口而大白于世"。

△　日机连日轰炸热河开鲁，是日又投弹数十枚。

△　伪满奉天警备司令于芷山亲率卫队团第二次"进剿"辽西义军，是日分三路总攻。

△　北平民众在中南海成立保护古物协会，由周肇祥任主席，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运。同日及上日，北平工联、北平各团体救国会亦通电反对。

△　国民政府任命容景芳为第八十二师师长。

1月24日　川省各军自签订停战协定后，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集中眉山、彭山、新津、双流等地，准备回驻成都，为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及驻成都之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等部所阻。嗣经双方协商，田、刘、李等同意撤军。是日，第二十四军由新津回驻成都。

△　废止内战大同盟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要求速停黔省内战。

△　蒋伯诚自北平电蒋介石，报告北方将领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均以此次对日作战，非钧座北来，前途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要求蒋“当机立断，以安将士之心”。蒋批示：“待南方布置后，必北上与共生死也。”此后蒋多次作北上督师许诺，均以“剿匪”不能抽身而作罢。

△　上海市工界第二届代表大会主席团朱学范等电国民政府，指出：“时至今日，则依赖国联之迷梦当可醒矣！”要求政府当机立断，实行抗日，表示全市80万工人誓为后盾。

△　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发《敬告中国国民书》，提出“满华各安疆土，共笃邦交，中日提携，东亚诸国互求亲善，力谋消除国际恶感”等谬论。

△　伪满实业部发第一号布告，接收官商合办之北票煤矿公司，饬伪奉山路局长阚铎及伪实业部官员、日陆军省驻满人员组“复兴委员会”。2月下旬北票陷后，在长春开第一次委员会，设立北票临时营业局，任李作民为局长，改为官督商办。

1月25日　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连日在锦州召开攻热军事会议，日伪军重要将领铃木、程国瑞、于芷山、李际春，日参谋本部梅津少将以及各师团大佐以上人员出席。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召冯玉祥到京“共谋决策”。是日，冯电复，以“内感风寒”辞不应召，并陈述抗日意见12条，主要内容为：组织统一指挥之军事机关，统筹抗日军事全盘计划；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开赴前线；筹拨巨额军费；赶制各种器械弹药；派飞机协助作战；接济义勇军；恢复各种民众组织；令军队严守纪律等。29日，冯电于右任表示：“此时国家出路，惟武力抗争之一途，倘介石先生具此决心，弟当即日南下。”

△　蔡廷锴抵广州出席西南政务会，发表谈话称：“目下情势惟有一战乃可图存，苟再玩忽，非至亡国不止。”并表示一旦中央令下，即统率兵力北上抗日。

△　东北义勇军独立第八梯队王慎庐部会同东北民众救国军第四路郑桂林部联合进攻九门口，与日第八师团在九门口周围旋战近十日，曾一度占领九门口东、西城，击毙不少日伪军。

△　红军一、五军团围攻临川以来，因国民党军集主力于临川，为避实计，东乡一带红军转移资溪，翌日让出浒湾，28日放弃金溪黄狮渡等地，向南城、黎川转移。

△　闽浙赣新红十军成立，王如痴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　新疆维吾尔族民众反对金树仁的斗争波及北疆，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部将领马全禄趁机在北疆集合暴动民众绕道天山进攻迪化（今乌鲁木齐）。金树仁遣团长邹某率兵数百人往堵。是日，暴动民众在达坂城乘旧历除夕，邹部戒备疏懈，实行夜袭，邹部逃脱者仅百余人。随后暴动民众直趋迪化。金令陈品修任南路总指挥应援，暴动民众入南山暂避其锋。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对“九一八”后东北形势作出估计，分析东北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和前途，提出“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须要坚决的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领导权而斗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的组织，是目前我们党最要紧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并指示组织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等具体任务。

△　日陆相荒木在众议院答辩时宣称：“张学良若不反省而与日军构衅，则日方亦已作相当准备。”2月2日，再次在众议院宣称：“关东军已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军九万人。”

△　日步骑炮联合部队，以伪满蒙军为前驱，在飞机掩护下进犯开鲁。东北义勇军李海青等部奋起抵御，将其击退。

△　国民政府任命冯兴贤为第三十三师师长；俞大维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

1月27日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及黄绍竑等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抗日、反共双管齐下，第一、四集团军及第十九路军抽兵北上抗日，粤、桂、闽增兵入赣“剿匪”。

△　川军田颂尧部第三混成旅旅长任玮璋，率两个团2000余人在南江桃园寺通电起义加入红军，起义后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任玮璋任师长，刘杞任政治委员。

△　国联九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决定两点：一、东三省系中国领土；二、九一八事变发生非由中国所引起。30日再次召开会议，英国对否认伪满一项不同意，遭各国反对。法国同情小国，但不愿与英正面冲突。

△　蒋介石派王法勤赴张家口邀冯玉祥赴京“共商抗日大计”，21

日王抵平。是日偕黄少谷到张与冯多次晤谈。冯表示如中央有抗日决心，当即刻启程到南京供驱使，虽粉身碎骨亦所不辞，并嘱黄随王赴京向中央表明态度。30日，王、黄返平，2月8日抵京复命。

△　蒋介石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名义，发第九号训令，任命郭外峰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筹备主任委员。

1月28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下令准备进攻热河，令第十师团接管第六师团现行任务，并将第十四旅团于2月20日前返回第八师团原属；第十四师团接管独立守备队铁路保护任务；第六师团在2月24日前集兵力于所警备区域及奉天、四平街铁路沿线要地；第八师团在2月24日前将主力向饶阳河以西奉天省内各要地集结，准备尔后向承德前进；混成第十四旅团做好在2月24日以后开始行动的态势；骑兵第四旅团即日起受关东军司令官直辖，第六、十、十四师团各准备一部兵力于2月20日以后供军司令官使用。

△　上海各界举行“一二八”纪念大会，通电全国一致抗日，捐款购机。全市休业一日，上海公安局及日海军陆战队均严密防范。同日，全国各大城市均举行集会，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天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决定每月捐薪10％支援抗日，并派代表赴各地联络抗日工作。北平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警察以“非法集会”罪名驱散，并捕去学生20多人。

△　美国芝加哥群众600人高举反日旗帜，包围日本领事馆，抗议日本侵略中国。日领事逃出领馆躲避，警察前往弹压，数千群众用石头与警察搏斗，嗣经大批警察开到始散。群众受伤30人，被捕180余人。

△　外交部照会日驻华使馆，抗议日机轰炸开鲁。

△　热河省府主席汤玉麟通电全国各报馆，表示“守土有责，抗日救国，贯彻始终”。

△　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成立，以“研究改进教育为宗旨”，选刘廷芳、刘湛恩等15人为理事。

△　田颂尧就任川陕边区绥靖督办，孙震任总指挥，率部进驻阆中，决定以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任“进剿”军左纵队司令，指挥第四、五独立各师由广元向南江进攻；以第三师师长罗乃琼任右纵队司令，指挥第一、二、三师由阆中向巴中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进攻。

1月29日　　蒋介石到达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　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通电全国，列举义军抗日业绩，吁请全国续作后援。

△　热河省府主席汤玉麟电林森、蒋介石等，称：热河境内义军、溃军，连同正式军队已达20余万，要求速筹办法给予粮饷接济。31日及2月3日，又连电催促办理。3月1日，实业、财政、内政三部议决呈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商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直至3月21日，实业、财政、内政三部始会函向行政院呈报。

1月30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该分会经杨杏佛到平组织，发展会员40余人（内美籍三人），议决以同盟总会所订分会章程为章程；主张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其他侵害人民权利之单行法；营救平、津各地被非法监禁之政治犯；要求国民政府查办顾祝同。举胡适、蒋梦麟、李济、成舍我、陈博生、徐炳昶、许德珩、任鸿隽、马幼渔九人为执委，胡适任主席，李济任副主席。

△　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训话，声称“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国家之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卫自存之试金石”，号召部下要“硬干、实干、快干”，“个个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

△　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为筹办“剿匪”给养，成立江西绅商各界民众协助“剿匪”委员会，分设贩卖、采办等部。

△　中国航空协会成立上海会员征求总队，由吴铁城任总队长，王正廷任总参谋。规定家庭个人、学生、工人、店员、社团员工尽量全体入会，入会者交纳会费两元、10元、50元不等。职工所交会费由店主、厂主一次代缴后按期扣还。

△　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杨杰到平。杨致电蒋介石报告称：谒张学良，防御部署已经部分着手。阎锡山要求中央略为拨款，“俾其军队克日开拔”。“北平积粮至多仅敷月余”，“前方各军生活极为艰苦”。

△　山西学联组织铁血救国团出发抗日，是日派代表向阎锡山要求物资帮助，阎不允。

△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公开建立法西斯专政。

1月31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拟订“剿匪”具体计划。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总部”参谋长贺国光、第二纵队总指挥吴奇伟、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等均参加。

△　北平故宫古物3000箱预定本日启运南下，因本市人民群起反对，搬运工人罢工而未果。北平各民众团体函国民政府，要求速定救国大计，不必急于迁移古物。同日，鲁迅著《学生和玉佛》、《崇实》两文，揭露国民政府只要古董、不要人民的倒逆行径。

△　杨杏佛偕胡适、成舍我往北平陆军监狱、军人反省分院等处慰问政治犯。

△　监察院对顾祝同提出弹劾后，行政院训令苏省府查复。是日苏省府呈复，诬称刘煜生所办《铁犁》副刊“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

动红色恐怖”，对刘案“戒严司令部有权办理”，指责监察院“徒以普通法理平时状况相责难”。

△　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在中山门外遭暗杀。2月1日，沪各报驻京记者联合会决定分呈中央党、政、军、警机关彻查真相，严缉凶手。2日，首都新闻协会开紧急会议，决定与沪各报驻京记者联合会一致行动。

△　国民政府委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梅思平为江苏省江宁自治实验县县长，叶楚伧、罗家伦等为县政委员。

是月　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　冯玉祥为在张家口筹组抗日武装，向中共党员肖明提出要求中共派员协助。本月中共北方局特科及河北省委派张慕陶（即张金刃）、武止戈、吴化之到张家口，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委，助冯擘划。随后又派宣侠父、张存实、许权中等前往帮助。

△　“三民主义力行社”外围组织“西南青年社”建立，康泽任主任委员。

△　《中国警察》月刊在南京创刊，中国警察协会创办。

2月

2月1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顾祝同枪杀刘煜生事件发表宣言，称“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在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致〕”，要求国民政府迅将顾祝同及其他有关人员免职，依法惩办。同日，上海市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亦决议要求政府严办顾祝同，并组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北平、安徽、杭州、徐州、芜湖等地记者公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亦相继为刘案发出抗议代电。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攻克南江，川军刘汉雄部逃向广元。

△　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自英抵京返任，两次访晤外交部长罗文幹，解释国联英代表西门在国联大会对中日问题态度，“并非有意左袒，实以各小国一致反日，英国不得不取大国立场，以调剂会场空气”。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设行政法规整理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孙科任副委员长。

△教育部召集专家会议，拟定民众教育办法，30日闭会。

△交通部决定本日起国内航空邮资加价，除纳普通邮资外，每一飞航区域收航空费二角五分。

△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王云程因叛徒告密，在沪被捕。团中央重要干部13人亦先后被捕，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吉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退入苏境后，余部由副司令吴义成率领继续抗日，是日吴就代理总司令职。

△　伪满国务会议决定将驻日代表公署改为驻日“大使馆”，以丁士源任伪大使。

2月2日　　西南政务会组西南国防委员会，公布该会组织条例。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林云陔为委员，并电请川、湘、滇、黔等省加入。国民党中央疑西南此举别有作用，曾指示在粤之黄绍竑疏通可否暂缓组织。西南表示此会系为巩固国防，决意组织。

△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捐款购机，党、政、军、警机关人员以实发薪额若干成捐助，共六个月，勤务、公役人员均不例外。

△　上海市总工会致电行政院，反对续订中日关税协定。

△　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袒日和对西藏有野心，内称："英帝国政府及印度政府始终未有在西藏自由行动之野心。对于中日纠纷从不以西藏故而为左右袒之态度。"同日，英代表西门在日内瓦表示，若国联调解失败，则英国政府准备接受李顿报告书。

△　日本为加紧在满洲、蒙古倾销日货，在东京成立满蒙输出总会。

2月3日　　蒋介石在南昌视察赣粤闽三省"剿匪"总部，并向总部人员训话，略称："此次剿匪关系革命成败，民族存亡"，希望大家"实干、硬干、快干，立功立业"。

△　上海成立东北协会，以"研究东北问题，救济东北同胞"为宗旨，史量才、虞洽卿、王晓籁、朱庆澜、熊希龄、吴铁城、杜月笙等27人任理事。

△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未经许可，通知军警机关勿予备案，并呈中央核示。是日，国民党中央复电称："所谓保障民权分会包庇共党一节，仰先设法防止为要。"

△　出席国联代表顾维钧访晤十九国特委会主席西姆斯，称："排货为弱国对侵略者之和平报复手段"，要求于缮具大会报告书时特别注意此点。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宁夏省政府。原省府委员邵遇芝、扈天魁、李进军、魏鸿发、马福寿均免本职；邵、扈、李、魏分别免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兼职；任命罗震、梁敬錞、葛武棨、余鼎铭、马福寿、海涛、达理扎雅、马继德为宁夏省政府委员；以罗、梁、葛、余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

△　国民政府派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

△　日军为大举侵热，继续往辽西调兵，是日起奉山路全线客车停驶，供作军运。

2月4日　日机连日轰炸开鲁，掷弹200余枚，民众伤亡惨重。

△　日驻华使馆情报部主任须磨由沪到京，分访英使蓝普森及外长罗文幹，提出将榆关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就地解决，声言“否则恐再起误会，势如燎原，更难遏止”。罗答以“时至今日断无局部解决之理”。

△　红四方面军进占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地方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四川军阀极其恐慌。是日，刘湘、田颂尧分电国民政府，告以决调45000兵力“围剿”红军。

△　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谒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示宣化方针。7日，班禅离京北上，往青、康等地宣慰。

△　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江西瑞金创刊，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报委员会编辑，旬刊，由《战斗》和《党的建设》合并而成。至1934年9月30日停刊。

△　《自由言论》半月刊在沪创刊，王造时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王自撰的《安内必先攘外》一文，痛论非对外抗战，不足以安内，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亡。该刊出至本年12月，遭国民党当局以“言论荒谬”的罪名查封。

2月5日　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向日本提三项办法，听其自择其一：一、接受十九国特委会决议草案及说明书，可依照日方对说明书所提出之修正案说明应保留各点；二、由十九国特委会起草报告书，日本不予阻挠，由国联负采取任何行动之责；三、日本可以十九国特委会拒绝日本提案为理由，与国联决裂。日方拖延未作答复。

△　张学良电蒋介石，报告“热边风云日益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有军队实属不敷分配”，要求蒋“筹定大计”。蒋批复以“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推诿，并表示他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说：“吾人处此忧患，横逆之来，惟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

△　前外交部长陈友仁由意大利返国抵沪，翌日对中外记者称：“以前所主张之对日绝交等意见仍未变更”；“依赖国联，终必失败。”13日，又对路透社记者称：“对日局部抵抗，决不能有何成功。”

△　交通部宣布“一二八”战役中，航业直接损失421.5万余元。

2月6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第四十四师师长萧之楚、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郭炳生、总部参议马青苑等商“剿匪”军事。

△　南昌各界“协剿会”为“剿匪”急需，作出征借本市房铺租一个月，征收商店特别捐三个月，以及摊派店员每人一元捐等决定。

△　锦西日军沿小凌河推进，凌南、凌源等地形势紧张。

△　行政院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将北平故宫古物首批2118箱启运南京。天安门至西车站一带戒严，并将北平市民众保存故宫古物协会主席周肇祥逮捕，至22日古物在浦口起卸时始予释放。

△　贵州省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电西南政务会，同意加入西南国防委员会。7日，西南政务会推王为西南国防委员会委员。

△　犹国才到达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报告黔省内战经过，并要求相当名义。

△　伪满国务院通过《商租办法》，确认日本军民在东北享有居住、往来和拥有土地的一切权利。

2月7日　　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召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在渝开军事会议，决定增调刘湘部十个团、杨森部四个团赴川北，由田颂尧指挥堵截红四方面军，并电复西南政务会同意加入西南国防委员会。

△　蒋介石电令第二军军长蒋鼎文，将该军由湖北宜昌调往江西“剿共”。

△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第四号训令，提出“争取江西和邻近数省首先胜利”，训令“各级政府应以百分之百的精神，为成立新的红六军团而动员而努力”。

△　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四川通江建立，张国焘任主席。

△　日军1000人纠合伪满军千余，由辽宁新立屯出发进犯热河阜新。

△　立法院聘戴季陶、覃振、伍朝枢、王世杰为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10日，立法院会议通过宪法起草委员会组织条例。3月初，又加聘胡适、张君劢为顾问。

△　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发动农民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参加人数达7000左右。

2月8日　　蒋介石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钱大钧为行营办公厅主任。

△　田颂尧到通江“督剿”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是日下令总攻。

△　国联裁军会议召开，中国代表颜惠庆出席，大会竟将原定颜惠庆之演说取消。颜当即离场，以示抗议。

△　国民政府以与日尚未断交，令外交、财政两部研究续订中日关税协定问题。12日，财政部令海关总署作修改细则准备。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参谋长曹浩森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三省“剿匪”军事。

△　天津地方协会举行成立会，推选熊希龄等九人为常务委员。该会以抗日后援为其主要任务。

△　云南省成立民众救国会，以“协助政府筹备国防，募集救国基金”为宗旨。由胡蕴山、卢永衡、周惺甫等人任常委。

△　前江西都督、国民政府参军马毓宝在上海病死。18日，国民政府令军政部照上将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

2月9日　　国民党中常会为指导华北党务工作，决定于新乡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华北临时办事处，由张继任主任，王法勤、张厉生、陈立夫、王陆一、赵丕廉、刘守中、白云梯、克兴额、傅汝霖、黄慕松、纪亮、苗培成等为委员。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要求释放因参加“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嫌疑被捕之袁春霆等30余人。又电交通部，要求释放被捕之北平邮务工会抗日会执委13人，惩办北平邮局邮务长巴立地。

△　胡汉民为刘煜生、王慰三被杀事件电林森、孙科，指出：“数年来，人民言论、出版、居住自由为军人剥夺净尽，纲纪坠毁，民无死所”，要求“为死者求昭雪，为生者求保障”。

△　日陆军省发表侵热声明，妄言“满洲国为保持主权威信，已决定肃清热境华军。日本军部根据《日满议定书》合同，则满军剿灭叛徒，此种行动已有英、法前例可援，断非日军之侵华战争”。

△　外交部公布与英、美、法、荷、巴西公使及挪威代办互致照会，同意1930年4月1日与上述各国在南京所订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自本年4月1日起延长有效期三年。

△　国联十九国特委会致函日本代表团，询问日方是否能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关于满洲地方于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范围内，建立高度自治权之原则，作为拟议的调解基础之一。14日，日本复文仍未明确答复，仅称："确信维持与承认满洲国之独立，为远东和平之惟一保障，而此全体问题，将终由中日两国依此基础解决。"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北省政府。原省府委员夏斗寅、朱怀冰、沈肇年、夏元瑮、李书城、孔庚、杨在春、陈达勋、晏勋甫均免本职；夏斗寅免省府主席兼职，朱、沈、夏、李分别免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兼职；任命夏斗寅、李书城、贾士毅、李范一、程天放、范熙绩、杨在春、陈达勋为省府委员，夏斗寅兼主席，李书城、贾士毅、程天放、李范一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

△　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沪成立，选出执委及候补执委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聂耳、沈西苓等31人。协会发布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在今日已更见严重"，号召电影工作者"亲切地组织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开展电影文化运动。

△　行政院令准云南靖边行政区改置屏边县。

2月10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召集各兵团主任参谋会议，布置关东军热河作战要旨：派第六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在热河东境作战；派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急速进兵热河南部及河北省边境，"构成把华北与热河真正割断的铜墙铁壁"，以压迫张学良的势力，使热省华军及义勇军陷于孤立无援，尔后席卷西部及西南部。除另有命令外，不要在河北省内实施作战。本作战由本月下旬开

始，在结冰期间结束主要作战行动。

△　辽东民众自卫军第三方面军王凤阁部2000人攻占抚松县城。

△　江西省成立经济委员会，以范争波任主席，金融界徐槐青等任常委。该会以筹措“剿匪”军费为主要任务。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决议请求中央解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予宋庆龄、蔡元培等以警告。

2月11日　蒋介石严令各“剿匪”部队，除厉行纵的连坐法外，并遵行横的连坐法，规定同一战斗序列各部，必须密切联络，同进同退，否则杀无赦。

△　代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由京飞平，与张学良等商华北财政，并拟发行公债2000万元作华北军政费用。宋迭与平、津银行界周作民、卞白眉、杨荫荪、许汉卿等人商洽，望平、津两地承销半数。银行界表示平、津经济力量有限，数目过多，实难负担。

△　行政院令内政、财政、实业、交通各部及蒙藏委员会派员会商内外蒙通商办法。

△　财政部召开整理田赋会议，确定原则两条：一、附捐不得超过正税；二、正赋、附捐共同征收额不得超过田价1%，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整理田赋附加办法11条。7月12日通令各省遵办。

△　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研究员李捷、朱森、丘立我在桂林发现百万年前化石。

△　行政院令准广西古化县改名百寿县。

△　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电令驻日内瓦伪代表卜朗逊（美人），与日本代表团协同动作。13日，卜将备忘录一件递交国联，为伪满所

谓“独立自主权”作辩解。

2月12日　张学良制定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防御方针，成立华北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是日发布华北军两个集团军、七个军团战斗序列及任务：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学良兼，辖第一军团总指挥于学忠，由第五十一军、第四十军组成，于天津附近集中，担任塘沽方面防务；第二军团总指挥商震，由第三十二军、第五十七军组成，于滦东附近集中，担任滦东方面作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由第二十九军组成，于通县、三河附近集中，准备担任热河凌南方面作战；第四军团总指挥万福麟，由第五十三军组成，担任热河中路凌源、平泉、承德线之防守。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副总司令汤玉麟，辖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由第五十五军、骑二军组成，担任热河北路开鲁、赤峰及中路南岭、北票线防守；第六军团总指挥张作相兼，由第四十一军、第六十三军等部组成，担任赤峰、围场线防务；挺进军总指挥刘翼飞，由热河境内五路义勇军组成，按原驻地分别配合正规军作战。另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直隶总司令部，由第五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组成，预定用于察东方面，暂于察省沽源集中待命。

△　陈诚在南昌就任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赣东各“剿匪”部队属之，所属原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升任第五军军长，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任第五军副军长，该师副师长霍揆彰升任师长，第十一师副师长萧乾升任师长。

△　南迁故宫古物首批2000余箱因事先未定妥存放地点，在南京浦口停搁。是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分置河南洛阳、开封，由行政院电令豫省府主席刘峙妥觅地点。嗣因蒋介石不同意，遂将古物分存京、沪。至5月，故宫古物自北平分五批运走1.956万箱，运费达43万余元。

△　上海回民举行追悼榆关阵亡军士大会，吴铁城、张之江、王

晓籁以及段祺瑞等出席。为悼念营长安德馨（回族），大会决议捐购“安德馨号”飞机。

△　全国艺术家捐助东北义勇军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开幕，本日前往参观者达万人。至20日闭幕。

△　上海全浙公会电外交、财政两部，主张中日关税协定期满失效，反对在日人武力侵略状态下与日本重订协定。

△　浙江慈溪县三北乡农民千余人反对县基干队驻扎该乡，将基干队物件焚毁。县府增派基干队前往镇压，拘捕农民七人。

2月13日　红军一、五军团及独立第四师围攻江西南丰。陈诚急令第一纵队各师速在宜黄集中，又令驻南城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驰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在新丰街以南地区阻击第二十四师，并重创南丰守军毛炳文部。14日，红军撤退，移主力至东陂、蛟湖、霍源一带，待机行动。

△　国民党中央党部令各级党部及各团体组织，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20日，教育部公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亦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依据。

△　热河全省民众联合会及地方各法团联电国民政府，以冯占海、李海青等各义军陆续入热，所有粮秣等项地方不堪负担，吁请政府“俯念边区劫重，筹集巨款，分别作储粮备荒及赶办急赈之用”，并要求对入热义军“从速补充编制，俾便向外发展”。

△　前东北军旅长、吉林省代主席丁超因抗日被俘后，本月11日解长春，是日伪满军政部总长张景惠开军事法庭审讯，将判决时奉伪执政溥仪传令予以特赦。丁被赦后任伪军政部顾问。

△　伪满国务会议通过满洲中央银行继承资产审定委员会官制案，并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任会长。23日，该会查定伪中央银行由旧

行号继承之资产亏损额近二亿元，拟定填补办法为：由行号资本金、公积金、东北政权存款、“叛逆”人存款抵补外，发行公债3300万元补偿。

2月14日　　冯玉祥致电胡汉民、邹鲁，指责国民政府“自榆关失陷以来，表面上虽有大军开赴前线之举，而实际上如兵站之设置，弹药之补充，军费之筹拨等等迄未筹办，是无异驱十万大军于绝境，此云抗日，真欺人之谈”；要求胡等“应时势之要求，顺人民之意向，奋起救亡”。

△　行政院通过实业部所拟《创设硫酸铔厂招收商股办法大纲》，规定该厂资本1100万元，英、德或其他外国公司投资500万元，实业部投资300万元，中国商人投资300万元。每百元一股，利息与红利，官商股同。次日，实业部公布《大纲》。

△　蒋介石委蔡廷锴任赣粤闽边区进剿军左路总指挥，闽省各“剿匪”部队均归其节制。16日，蔡在福州就职。

△　段祺瑞在沪与日驻华公使有吉明会晤，要求日本缓和侵热军事。有吉表示侵热不能中止，对平、津可不积极行动。

△　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部入苏官兵2500余名由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等率领，于是日、翌日及18日分三批由苏联鄂木斯克运送回国，27日抵新疆塔城，3月下旬陆续到迪化。

△　日大藏省认可“满铁”增资3.6亿元，资本金达8亿元；新增资金充本年后新建事业经费。

△　浙江镇海农民与城镇居民二三千人举行元宵赛会，因遭警察阻止，起而暴动，将公安局捣毁。翌日，县府紧急会议决定严禁迎赛集会，城厢戒严，并拘捕群众七人。

2月15日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公布编查保甲户口总动员办

法，要求各县加紧办理。

△　赣省党政会议为强拉民伕供“剿匪”军运，通过《铁肩队组织规程》，定人数5640人，分47队，每队120人，由各县挑选壮丁组织，限月底组成，熊式辉兼总队长，各队长由县长兼任。

△　日关东军司令官为伪满“建国”一周年布告民众，宣称“建国期年，从来秕政，概行革除，日满国交，益加敦厚”；扶植伪满系“义之不容看过，情之不可坐视”。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戴季陶等提议，设立建国奖学委员会，其条例规定：设总裁三人，考试院长为当然总裁，余二人由国府简派；奖学金来源为中央拨款、政府机关补助、社会团体或私人捐助。

△　广州市海珠桥落成。此桥于1929年由美国马克敦公司以银103.2万两承建。

2月16日　黄炎培、穆藕初、朱庆澜、熊希龄、杜重远等发起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本日在平成立。宋子文、张学良莅会发表演说。会议通过章程草案和工作计划大纲。称该会主要工作和目的为：一、集中民众抗日力量；二、使民众力量与抗日军队力量相结合；三、唤起国际的同情与援助。推选朱庆澜、丁文江、胡适、王克敏、熊希龄、周作民等45人为理事，会长朱庆澜、副会长周作民。决议通电全国人民报告该会之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前方军需；并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团结御侮。会后商定朱庆澜等翌日随宋子文赴热河视察，推动汤玉麟抗战。

△　日军以九门口两次被义军攻入，为扫除侵略热河的牵制，调步骑800余在九门口外进攻义军郑桂林、王慎庐等部。

△　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修订反省院组织办法，反省院仍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院长不由高等法院院长兼任，而就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交付

之人员任用之。

△　实业部江浙区渔业改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实业部长陈公博兼任主席委员，林康侯、方椒伯、杜月笙等任委员。4月，该会开征渔业建设费，遭渔商强烈反对。11月21日，陈公博以经费不敷，无余资从事渔业改进，呈请行政院停办。计划中之闽粤、鲁冀两渔业改进委员会亦未成立。

△　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工人，因厂方不遵上海劳资仲裁委员会关于开工问题的调解和江苏高等法院勒令开工的判决，数千工人无以为生，是日推代表樊臻涌等40余人到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

△　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抵绥远百灵庙，对蒙古王公谈称："中华五族，宜化除畛域，一致抗日。"并派安钦活佛返京，取道印度入藏，与达赖商班禅回藏事。

2月17日　十九国特委会于14日修正通过《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是日全文公布。内容与李顿报告书大体一致，虽载明不能承认九一八后日本在中国东北之军事行动为自卫手段，对日本所操纵的伪满"不能认为自动及真实之独立运动"，却仍以李顿报告书中十项原则作为解决中日争议的建议，亦即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满洲自治，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即国际共管）等等。18日，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报告书内容均甚公正，可表示满意，但"国联若不能以经济绝交制裁违背盟约之日本，则此项报告书，亦系一纸空文"。

△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以侵热准备就绪，是日下令第六师团以主力于2月23日从打通路沿线出发，经开鲁、绥东、阜新，接着向天山、下洼、朝阳一线进攻，然后再向赤峰及林西、多伦方面作战。又以较强一部于2月23日从朝阳寺附近出发，从北票铁道方面开始经朝阳、建平向赤峰方面进攻；令第八师团一部2月23日开始行动，迅速

占领北票，并统一指挥在该方面作战的第六师团。主力成二路纵队，于2月27日从北票及绥中附近出发，尽快向建昌附近至其以南一线挺进，不失时机地以一部确保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要隘，掩护军主力侧翼，尔后以主力占领承德及古北口；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主力按随时可出动的态势作好整备；飞行队以一部协助第六师团，主力协助第八师团作战。

△　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朱庆澜、黄炎培、杜重远、穆藕初等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属宣传大队由平到承德。

△　日驻华使馆通告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日侨，限两周内回国，违即强迫遣送。此前，驻津日领曾两次下令撤侨，因日侨反对日军侵华，回国者寥寥。

△　英国著名文学家、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萧伯纳游历远东，是日到达上海，宋庆龄等往吴淞口迎接，并设午宴招待，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以及美籍记者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作陪。南京市长石瑛邀萧伯纳到京，被拒绝。当日，萧伯纳乘轮北上。

△　上海公共租界英商自来水公司因任意增加水费，遭市民反对，13日起连续割断水管多处，引起汽缸爆裂，酿成人命事件。是日，上海房产公会大会决议拒付水费，以示抗议，并于翌日派代表向上海市政府请愿。3月1日，上海沪东区市民组拒绝断水会。

△　上海至海参崴航班恢复。

2月18日　热河省府主席汤玉麟与承德各界设午宴欢迎宋子文、张学良等一行。宋致词称：“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学良勉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致答词表示决心与日周旋。宴后，宋、张联电驻国联代表团，要求向国联和世界各国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侵略。

△　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冯占海等27将领自承德发抗日通电，谓："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要求全国声援。

△　外交部为十九国特委会通过《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发表谈话，表示对报告书"大体上自可满意。国人如不欲吹毛求疵者，则当不致有人欲拒绝此项报告书者"。

△　国学泰斗章太炎、马相伯联名宣言，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东北与热河同属中国领土，且热河与满洲无关。"热河在明时，本朵颜等三卫之地。朵颜种类，即古之山戎，汉之乌桓、唐之奚，与契丹种类甚近，而与满洲各类相远。其后清人夺取其地，本非满洲人之旧居，至于今日，则热河所有汉人几四百万，而满人无几，更不得谓热河为满洲人所应有"。

△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由北京大学、中国学院、法政大学等24校参加。

△　日陆军省召开紧急军事参议官会议，菱刈、铃木、本庄繁等出席，由陆相荒木报告国联处理中日纠纷情况，并详细说明侵热军事计划。会议决定要求政府断然退出国联。

△　伪满"讨伐热河作战军"总司令部发表进犯热河声明，宣布成立讨热军总司令部，任张景惠为总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指挥，统率数万大军，与日军协同作战。

△　中国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在上海开幕。

2月19日　　黄绍竑由广州返上海，语记者称："西南对中央意见一致，粤桂决调劲旅'协剿'，如政府有令抗日，西南自当派遣援军北上。"23日，黄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西南之行经过。

△　张群到南昌晤蒋介石商入川办理善后事。自上月18日中政会决定张群入川后，刘湘、刘文辉等深恐川政整理后影响个人地位，对张入川未作任何表示。张与蒋商晤后，决定暂缓入川。

△　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通电，说明黔变经过，表示“当于最短期间，奠定全省，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举措设施，悉依民意”，并要求中央对犹国才予以通缉。

△　新疆维吾尔族民众在马全禄率领下围攻迪化，占领市郊妖魔山、西大桥、红山嘴等处。西大桥一带维吾尔族民众加入反金行列，直迫西北城角。金树仁令将西大桥一带民房烧毁。24日，马率部稍退，29日复攻，双方坚持达月余。

△　刘桂堂通电投降伪满。刘原任山东警备司令，上年脱离韩复榘，窜往热河开鲁、林东一带。刘降敌后，任伪满护国游击军司令。

△　上海市新闻记者239人为抗议顾祝同非法枪杀刘煜生案发表宣言，列举顾违法12项，要求政府予以国法制裁。

△　厦门市公安局以各行商反对福建省财政厅任意增加营业税包额，将各业公会代表大会临时主席严灼如逮捕。全市商人罢市，迫使公安局将严释放后始复市。

△　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三十八号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反对民权保障运动的宗旨。内云：“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又云：“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

2月20日　中国华北军总部制定“确保冀热，巩固平津”的作战方

针，规定在热河方面：一、以有力之热边守军，务极力迟滞敌之前进，予后方主力军以运动之余裕时间；二、如强敌突然进袭，务宜死守各要点，以待主力军来援；三、按预定计划扼守凌源、赤峰、乌丹之线；四、如敌以主力自朝阳向凌源方面进犯，则以右军团固守叶柏寿、大城子一带，以第二集团军主力经建平以东向南压迫；五、如敌主力自开鲁方面西进，则以二集团军主力守备小河沿、乌丹线，以骑兵军直袭通辽，以后方援军主力速向经棚、林西间集结，构成左翼重点，与骑兵合力采取攻势；六、如敌对开鲁、阜新、朝阳等地同时进攻，则令各军扼守凌源、赤峰各要点，以待援军。此计划未及下达，日军进攻已提前开始。

△　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国联大会如通过十九国特委会报告书，即断然退出国联。同日，外相内田训令出席国联代表松冈对报告书投反对票。

△　蒋介石电示第三军军长王均，声称“热河形势渐紧，残匪不清，实为攘外障碍”，令王“务尽一个月之内东西驰逐，不避劳瘁”。

△　军政部制定处置共产党员补充办法，规定各地所获“共犯”，除军人外，一律在当地公安局审讯后，直接解至法院，上海则解至淞沪警备司令部；若系军人，则解至军法司审讯。

△　宋子文在平与银行界商定发行救国公债2000万元，月息七厘，以冀省烟、酒、印花税收入作担保，债票未印就前，由平津银行界先借垫1000万元。宋以任务完成，24日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

△　桂北瑶民起义爆发。广西兴安、全县、灌阳、龙胜等县瑶民为反对官绅地主的剥削压迫，同时举行武装起义。兴安瑶民进占大溶江，切断全县与桂林间交通，与龙、灌取得联络。灌阳、全县瑶民皆进袭县城，龙胜瑶民于23日占据纳寨，进迫大小溶江。起义民众中心

口号为“杀财主佬、杀官兵、杀汉人”。兴、全、灌、龙、义宁五县起义民众达六万人，波及灵川、平乐、永福、阳朔、荔浦、修仁、蒙山、榴江、象县以及湖南之永明、道县、江华，纵横千里，少数汉、苗、僮族民众亦加入起义。各地官绅仓惶失措，纷电广西省府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告急。

△ 监察委员王平政弹劾监委高鲁受行政院委令，离京监运古物，“实违背《国民政府组织法》第51条之规定，而开监察委员兼任其他公职之恶例”。院长于右任发交监委刘成禹、邵鸿基、郑螺生审查成立，移付惩戒。

2月中旬 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指导川陕省各项工作的根本大法，通过《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选熊国炳任主席。

2月21日 正太铁路全体员工2800余人，捐款10万元购机抗日，定名“正太号”。

△ 上海正泰橡胶厂不顾工人安全，超额使用机械能力，引起汽缸爆炸，死工人82人，重伤20余人。27日，上海永和实业公司橡胶部又发生汽缸爆炸，死伤工人数十人。两厂厂方均推卸责任，对死伤工人草率处理。全沪橡胶工人在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组后援会，力为死伤工人向厂方交涉。市总工会亦于3月17日发表宣言，要求厂方按工厂法规抚恤。

△ 行政院令准甘肃临洮、临潭、和政等县析置康乐设置局。

2月22日 日军铃木旅团派早川支队由锦州出发分二路纵队进攻北票。21日占南岭，是日占北票。守军汤玉麟部董福亭旅汤玉山团在口北营子略作抵抗即后撤。

△　汤玉麟通电抗议日军进犯热河北票、南岭，表示“大战既已开始，玉麟谬膺疆寄，守土有责，誓与国土共存亡”。

△　广西省政府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接兴、全等县官绅关于瑶民起义告急电，即决定痛“剿”起义瑶民、编组区乡保甲及用宣传教育方法使全省瑶民“归化”等三项“剿抚”办法，饬各军政机关办理。是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电令驻榴江清乡之第十九师副师长陈恩元会同桂林民团指挥官张淦等率部赴兴、全、灌、龙等地武装镇压。翌日，各部急赴起义地点。瑶民用土制武器与官兵顽强搏斗。总司令部复派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率该师全部人马往“剿”。

△　陕西省府主席杨虎城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表示将派遣部队“出兵抗日，效命疆场”。

△　陈诚奉蒋介石令到临川指挥“围剿”红军。同日，蒋电令蔡廷锴即督率左路军进攻，会师赣、闽边境。

2月23日　日驻南京领事上村就日军侵热事向外交部部长罗文幹面递日政府备忘录，妄称：“热河省内张军及其他反满军队之存在，不但与满洲国主权抵触，且与热省治安恢复不能两立。”此次日军攻热系“因张军等留驻热省内，不得已而出此”，其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担”。并扬言如张学良等部武力抵抗，“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

△　晚，外交部将致日政府之备忘录交日领上村，指出：“热河为中国之领土，与东三省之为中国领土相同。中国政府派兵往热防御外国之武力侵略，乃系行使其固有之主权。日本政府竟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显系扩大侵略范围，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日本政府自应绝对负攻热之全责。”“如日本军事行动侵及华北，中国军队自必行其自卫守土之权。”翌日，复将备忘录电达国联，要求采有效方法制裁日本。

△　日本外务省决定对付次日国联大会最后步骤，要点为：一、

对希孟议长演说，须以绝对强硬态度回答；二、报告书在大会表决时，用最大力量反对，最后投反对票，发表不合作宣言；三、代表团退出日内瓦，准备回国；四、最后说明日本与国联断绝原因，并准备3月1日正式通告退出国联。上述决定于同日电令出席国联代表松冈洋右执行。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法》。

△　山东济南金融恐慌，是日义聚盛银号突然倒闭，市面亏空30余万。次日，成德厚银号跟随倒闭。在此前后，因日货倾销，布商倒闭十余家，亏累百余万。

2月24日　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中国代表颜惠庆投赞成票，并在大会致词表示无条件接受报告书。日代表团投反对票，并中途退席。大会同时通过组织顾问委员会，襄助大会继续处理中日纠纷，由十九国特委会成员国及加拿大、荷兰代表组成，并邀请美、苏代表参加工作。

△　国防委员会成立，以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院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铁道等部部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组成。

△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奉北平军分会令，往义院口一带接第四军团万福麟部防务。宋令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先行开拔。

△　日茂木骑兵旅团纠合伪军于23日由通辽出发进攻开鲁，守开鲁热军骑九旅崔兴五率部逃林东（3月上旬投敌）。是日，日军占开鲁，续沿辽河直趋下洼。同日，武藤命在沈阳待命之混成第三十三旅团立即向绥中附近集结，准备对付冷口以东长城各口之华军。

△　国民政府任李元鼎为审计部部长；熊育锡等28人为监察院监

察委员；决定划全国为14监察区，各区设监察使。

△　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军第一纵队总指挥罗卓英主力集于宜黄以南，图与第二纵队合歼红军于南丰、广昌地区。是日，罗下攻击令，限各部28日到达指定地点待命。

2月25日　朝阳失陷。日军铃木旅团与第十一旅团主力于拂晓进犯朝阳。守军董福亭旅弃朝阳向凌源急行退却，日机跟踪轰炸董部溃兵。午时日军占朝阳。

△　蒋介石得悉朝阳危急时电示杨杰：“应决以凌源、平泉、赤峰为据点死守之”，“朝阳则以现有兵力固守。”同时分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河南省府主席刘峙，指示“第二、第二十五两师速集中洛阳、徐州二地，限本月28日由集中地开始输送北运”。次日第二十五师关麟徵部开拔。

△　汤玉麟令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迅速进入赤峰附近阵地”。孙部原驻山西晋城，于2月间奉命集结围场、隆化一带。孙奉命后，即率第一一七旅向赤峰急进。

△　日本代表团向国联提交陈述书，对国联不顾日本反对通过十九国特委会报告书表示“遗憾”；指责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之独立由于自动及满洲国主权属于中国”等提法；并表示设置顾问委员会违反日本主张，“绝对不能接受”。

△　美国政府电复国联，赞同大会通过之报告书以及关于伪满洲国问题的结论。3月11日，美政府复文国联，表示愿意参加国联顾问委员会。

△　日外务省令驻外各使照会各国政府，要求谅解日军侵热。英国外相回答日使松平称：日满军行动如仅以热河省内为限，英默认其行动；如在国联讨论时，英将对联盟各国进行斡旋。

△　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向罗文幹、张学良发表宣言称：华北军进驻热河“系侵主权”，现按《日满议定书》由日军协助对热河境内华北军“实行彻底扫灭”。如果华北军使日“满”“自卫”行动受到阻碍，所引起的后果将由南京及北平当局负责。

△　鄂空军创立总会在汉口成立。叶蓬任总主席，夏斗寅等49人为理事，张难先、何成濬等为监事。

△　上海法租界一越南巡捕在新桥街殴打人力车夫，引起群众激愤，该捕即开枪射击，死潮州人朱固庭与宁波人刘福高，伤数人。事后，潮州、宁波旅沪同乡会组后援会，要求租界当局惩凶抚恤。4月11日，法领事署公堂审讯，认为该犯开枪，“乃由华人之行动所激起”，仅以“违章携带实弹之枪”，判处该犯徒刑三个月。

2月26日　　蒋介石手令华北军各将领，宣称：“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同日，电令长江各商埠、要塞于27日起秘密戒严。又密令各军事机关与各部队自28日起“军官佐一律不准告假，已告假者应一律回任”。

△　日军茂木骑兵旅团前锋进至下洼；第十四旅团占白石嘴。热河守军节节败退，各线义军因指挥不一，亦各自后撤，防线全部动摇。汤玉麟电国民党中央，掩饰败退实情，诿称：“系我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故集中兵力，缩短战线，诱敌深入，与敌决一死战。”

△　上海180多个同业公会联合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经济绝交。同日，上海各大学教授召开大会，要求蒋介石北上督师抗日。28日，北平人民自卫会亦电促蒋北上。

△　陈济棠令丁纪徐率飞机第二队开赣“助剿”红军。

2月27日　　赣粤闽边“进剿”军中路军主力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

以10个师兵力分三路向广昌进犯。西路罗卓英所率第五十二师李明部、第五十九师陈时骥部暴露于红军面前，经两天激战，第五十二师在宜黄县黄陂地区遭红军分段截击，该部第三〇八团、三〇七团相继被歼灭，师长李明被打伤后自戕，其他被打死打伤旅、团长六人、营以下军官三分之二，士兵6000人；损失枪支3000余支，机枪80余挺，炮10余门。残部向乐安逃窜。第五十九师在霍源地区同遭红军伏击，第一七五旅旅长杨德良被打死，第一七七旅旅长方靖、第三五四团团长李青等被打伤，师长陈时骥被俘。该师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二，仅存官兵约一团，枪300余支。同时，由宜黄南进增援之第十一师萧乾部三个团亦被歼，死伤官兵300余人。是役，红军五军团第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牺牲。

△　蒋介石电令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除暂留三团仍照常担任现在鄂东防务外，其余各团迅即准备北运”，“限3月5日前准备完毕”。

△　上海60余工会发联合宣言，要求国民政府集中力量抗日，誓守国土。

△　英国政府宣布对中日两国禁运军火令。3月13日，由于其他国家政府不采取一致行动，复将该禁令撤销。

2月28日　日军第十四旅团攻击纱帽山附近阵地。守军利用防御工事及险要地形进行抵抗，但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全线退却。同日，日米山先遣队乘车向冷口急进；第六师团主力在下洼集结完毕，师团长坂本下攻赤峰令。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联席会议，电勉张学良、汤玉麟“积极御侮”，表示“自当率领西南全体同志，各界民众，极力援助”。

△　行政院会议决定续拨北平军分会协饷100万元及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币换算率自3月10日起施行案。

△　行政院以经费困难，决定停止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实业部急电沪筹备委员会办理结束。3月3日，各厂商集议，决自动赴美参加，5日，正式成立出品人协会，作为民间组织参加。

是月　上海世界语协会成立。

△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刊《艺术新闻》在上海创刊。

3月

3月1日　国民党中政会原则通过行政院制定之《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及施行办法。财政部发布命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并定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同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银元。

△　日军铃木旅团川原部队从朝阳乘车急趋叶柏寿，骑兵队和第八师团主力亦一齐前进。守军董福亭部抗敌，后因第一营投敌，董部四散，日军乘虚直入，占叶柏寿。绥中日军占纱帽山后趋凌南，同日凌南陷。

△　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热河战事惟有汉兄亲出督师，方能如计奏效。"提出张学良果赴热河，他"即可随时启行"。

△　原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为抗日由上海到山西介休、孝义一带联络旧部鲍刚、张人杰等成立抗日救国军。是日，方在介休通电就总指挥职，电称："惟念国亡无日，不忍不尽匹夫有责之义，益以同志之敦促，部属之推情，友朋之责望，不揣谫陋，爰集我军于锦山，誓师援热，就任抗日救国军总指挥之职。"

△　全球华侨总公会在上海成立，通电海外华侨准备经济力量为抗日后援，并电请闽、桂、粤各军出师抗日。

△　新疆维吾尔等族民众武装反抗金树仁斗争继续发展。是日，北疆阜康为起义民众占领，省军南路总指挥陈品修弃守达坂城。

△　伪满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提出四条基本原则为：一、“以国民全体的利益为重”，“排除一部分阶级垄断利益之弊”。二、“综合发展各个经济部门”，“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三、“广求资本于世界范围，特别要吸取先进各国的技术、经验及其他文明，加以适当有效的利用”；四、“达到东亚经济的融合”，“把重点放在同日本的协调上，而愈益加强相互扶助”。

△　伪满在长春及各地庆祝“建国”周年纪念日，伪执政溥仪发表“教书”。

△　伪满设置伪宪法制度调查委员会。10日，溥仪任命该会委员人选。4月26日，开第一次常委会讨论“国体”、“政体”，因意见分歧，未得结果。

3月2日　　凌源失陷，承德危急。日军占叶柏寿、凌南后西犯凌源，混成第十四旅团米山先遣队配合攻击。守凌源万福麟部于兆麟师一度抵抗后向平泉撤退。驻平泉王永胜旅见前方溃退，随之弃平泉经宽城退往喜峰口。凌源遂陷。至是，朝阳、承德大道完全敞开。同日，张作相命汤玉麟在承德东黄土梁子布防，汤部官兵不从，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张、汤认“大势已去”，汤扣留军用汽车及后援会汽车200余辆，由承德装私物运津；张作相于是晚将司令部从承德撤出，逃古北口。承德汉奸分子往前线迎日军。

△　赤峰失陷。日茂木骑兵旅团纠合伪军共四五百人从下洼奔赤峰，1日晚开始在赤峰东面高地进攻，被孙殿英部击退。是日，日增兵分向东南、东北再攻，日机十余架配合轰炸。孙率所部丁旅三个团抵抗，一度夺回东北建昌营子等五六个村镇，旋在日军加强攻势下于下午弃守赤峰。日第六师团左、右纵队亦于当晚入赤峰城。孙殿英部

在赤峰周围与日军周旋后转往围场。6日，孙电北平军分会称，该部毙敌四五百名，本身阵亡团长两员，伤营长以下军官19员，士兵伤亡170余名。

△　武藤令第六师团占赤峰后以一部向围场、隆化方面作战，令混成第三十三旅团确保清河沿以东长城主要关口，策应第八师团主力攻承德。翌日，武藤抵锦州，设置司令部指挥各线作战。4日令将第三十三旅团增加给第八师团指挥。

△　外交部照会日驻华公使有吉明，对“日本政府不顾世界公议与中国政府迭次去文”，反而调集大批军队侵犯热河再提严重抗议。

△　蒋介石在南昌召见第二军军长兼长江水警总局局长蒋鼎文与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安排蒋部入赣及徐部北上问题。

△　北平军分会任命北上抗日的第十九路军将领、青年党人翁照垣为东北陆军第一一七师（由青年党人组织的东北义勇军独立第八梯队改编）师长。4日，复任为华侨救国军总指挥。

△　驻国联代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以政府抗日态度踌躇，对国联抱依赖心理，联名呈请辞职。旋经复电慰留，打消辞意。

3月3日　　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抵凌源，下午下令挺进队在六沟以西地区作攻承德准备；令第二先遣队5日从凌源出发，向承德以东地区前进；混成第十四旅团沿凌源——平泉——喜峰口大道前进，尽量把住从洪山口到清河沿长城主要关口；余部由铃木少将指挥尽快向承德推进。当晚，挺进队进入六沟。

△　下午，汤玉麟率特务队、工辎营千余人放弃承德西逃，行至离承德30里处，得悉平泉尚未被日军占领，复率部回承德。

△　日第八师团挺进队由凌源乘车趋平泉，途中猛袭万福麟部溃兵，是日占平泉。同日，第六师团左纵队入建平。

△　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及国民党中委李烈钧往北平，应付华北局势，并作取代张学良兵权之准备。5日，何、黄等抵平。黄旋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

△　胡适、丁文江、翁文灏联名密电蒋介石，略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中央必难逃责"，要求蒋即日北上指挥。翌日，蒋复电"即日北上"。

△　蒋介石通令江西"剿匪"部队悬赏缉拿红军领袖。令称："缉获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者，赏洋二十万元"，对其他各将领，亦均订有不同赏格。

△　国民政府令免钮永建铨叙部长职，遗缺由林翔继任。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胡适多次发表反对"同盟"会章的言论，对"同盟"作毫无根据的攻击，且拒绝公开更正，将胡开除出盟。

3月4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日军侵热发表宣言，指责国民党当局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步步撤退，放弃开鲁、北票、朝阳，而把最大部分兵力用于进攻苏区。重申："中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但对于一切侵犯苏区的军队与武装，将给以最严厉的打击。"

△　承德失陷。汤玉麟返承德后，与前方联络中断，是日早7时，复率部弃承德西逃。日军第八师团川原挺进队突破天朝山附近华军阵地，得汉奸提供承德空虚的情报，派先头部队于午时不费一弹扬长进入承德。汤逃跑途中遭日机跟踪轰炸，率残部于次日逃至丰宁。

△　蒋介石为承德弃守致电张学良，指示"紧急处置，应以规定各部收容阵地与制止其后退，力图反攻，冀挽颓势"。

△　日军第十四旅团由凌源出发，进占冷口。6日，晋军第三十二

军商震部黄光华师将冷口夺回。

△　蒋介石致电赣粤闽边区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对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在黄陂、霍源的惨败“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而“悲愤填膺”。声言惟有“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并指示为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制订《封锁“匪区”条例》，规定封锁物资为米、面、盐、家畜等食物，铜、铁、煤、汽油、电料等军用材料，以及中西药品等卫生材料。

△　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郭泰祺、罗忠诒为中国出席国际军缩会议全权代表。

3月5日　　张学良据报汤玉麟放弃承德，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

△　孙科就承德弃守在上海对记者谈称：“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计算日军每日进展，途径五十里，如入无人之境，谓为抵抗，谓有激烈战争，其谁能信？”“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事长官，应予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　驻日公使蒋作宾奉令由东京启程回国，11日到南京向中央报告中日情势后即北上谒蒋介石。

3月6日　　晨，蒋介石由南昌乘机抵汉口，当晚转车北上，杨永泰、何竞武等随行。蒋离赣前将“围剿”江西红军事宜令陈诚、贺国光负责。

△　蒋介石致电杨杰转示张学良、何应钦，指示反攻战略：“以宋（哲元）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冷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则必得策。”又电杨杰转示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将领，望“协同一致，力图反攻，以报党国”。

△　湖南省党政军联席会议议决《湖南救国借款募集章程》，规定借款500万元，其中抗日费385万元，“剿匪”费115万元，从1935年起分20年偿还本息，借款在三个月内收讫，应募借款人于接通知后10日内全数交纳。7日，省府会议通过。

△　考察欧美实业专使孔祥熙回国抵沪。

△　《日内瓦报》主笔威廉·马丁来华考察中日冲突实况，是日抵沪。

△　上海标金市场受美国金融风潮（截至本月9日，当时美国48州中有44州银行全部停业）影响，价格大跌。2日，上海标金价为774两（银），3日，落至756.5两，是日更加狂落，开盘为698两，最低降至660两。14日，美金潮略平，上海标金价始回升。

3月7日　　张学良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略称：“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

△　监察委员邵鸿基、刘莪青、周利生、高友唐等以汤玉麟弃职潜逃，张学良失地丧师，动摇国本，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是日，监察院将此案移送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并呈请国民党中政会惩治张、汤。同日，中政会决定电询蒋介石意见后再作决定。

△　日军第六师团茂木骑兵旅团及高田支队奉命由赤峰往围场追击孙殿英部。是日，茂木旅团在广道河西北高地进攻孙部阵地。孙部

奋勇抗敌，于同日电北平军分会报告战况，请求接济。翌日午后孙部不支，向沽源、多伦一带撤退。

△　新任丹麦驻华公使奥克斯霍尔谟向国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致电国联表示不加入国联顾问委员会；如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之行为与提议，目的在谋求中日争议之迅速与公允解决者，苏始终愿意赞助。

△　新疆焉耆汉、回首领马占仓会同库车脚夫揽头铁木耳在库车起事，先后攻陷轮台、库车，拜城、库尔勒、阿克苏等地维吾尔族民众纷起响应。铁、马率部进攻阿克苏，驻喀什省军师长金树智派团长杨庆明率骑兵两连往援失利，是日铁、马部占阿克苏，官兵逃往巴楚。乌什、墨玉、叶城旋均被起义民众占领，金树智服毒自杀。

3月8日　　蒋介石到达河北石家庄，何应钦由北平往见。张学良拟同行，蒋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拒绝。同日，宋子文亦奉蒋召由沪到石。蒋、宋、何预商张学良下野办法。

△　国民党中委石瑛向中政会递交提案，要求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撤职严办，汤玉麟缉拿枪决。同日，上海全国商联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地方协会等八团体联电国民党中央各机关，要求将张等按军法惩治。

△　国民政府令：“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葸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褫职，交行政院、监察院会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　日军第六师团骑兵第十联队从赤峰出发北进，占领全宁（今内蒙喀喇沁旗）。

△　国民政府任命唐淮源为第十二师师长；准王均辞第七师师长

兼职，遗缺由曾万钟继任。

△　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动上海30多个民众团体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到代表50余人，宋庆龄、杨杏佛均与会。该会主张争取中国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集中救国力量，援助义勇军，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宋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政府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派全国80％以上的军队北上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恢复民权，停止进攻苏区，号召“形成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　川军田颂尧部上月开始大举进犯川陕苏区。是日，红四方面军为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退出巴中。11日，田部占巴中。

△　实业部与德商喜望公司在南京签订试探安徽宿县雷家沟煤矿垫款合同。

3月9日　　蒋介石召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先授意宋子文与张谈去留问题。张提出两项办法：一、各路东北军由张率领，克复承德，中央负责接济；二、准张辞职，中央负抗日全责。宋转达蒋旨意：热河失守，张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蒋也同样受到国人攻击，“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张只得接受辞职。下午4时，蒋到保定与张晤面，准其去职。

△　国民政府分令行政、监察两院及军委会，迅即会同彻查汤玉麟案。15日，监察院派监委邵鸿基，军委会派上将参议方本仁参加。20日，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电告何应钦会同办理，何即派黄慕松参加。

△　喜峰口战役开始。午，日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

步兵第二十七联队、米山先遣队抵达喜峰口，即向守军万福麟部发动进攻。傍晚，与松野尾先遣队一起占领北侧长城线及喜峰口东之董家口等阵地。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旅长赵登禹奉令派王长海团为先锋急行军前往增援。王团组大刀队500人，是夜分两路潜入日阵地，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双方均受重大伤亡。次日拂晓，日援军四起，大刀队始撤还。

△　热河朝阳、凌南民众以联村自治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指出：国民党军在热不下十数万，“讵未战而弃朝、凌，再迫而退承、平，热省山河，弃如敝屣。然军可退，民将何往”？表示朝、凌民众将力谋自卫，誓死抗战。

△　晚，胡适致函张学良，促其“毅然自责求去”，“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并将他及丁文江准备在《独立评论》发表的《全国震惊以后》、《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两文原稿附送给张。翌日，张约胡、丁及蒋梦麟、梅贻琦等谈话，说明已遵蒋介石意辞职。

△　新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向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呈递国书。颜致词表示对“中苏两国之恢复旧日友谊，深为庆慰”。加里宁致答词谓：“苏联政府对中国之关系，始终秉承1919年及1920年之重要宣言及1924年北京协定的基本精神。”

△　国民政府对晋绥军重加任命，杨效欧、李服膺、杨澄源、王靖国、杨跃芳、李生达、傅作义分任第六十六、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师师长。

3月10日　日军服部旅团长令步兵第二十七联队一中队及步兵第二十六联队山炮分队、炮兵中队增援喜峰口，在炮火掩护下由董家口、铁门关等处发起进攻，占第二关门及两侧高地。第二十九军除赵登禹率部赶至前线御敌外，宋哲元又令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暂二师刘汝明部增援。赵登禹负伤，伤、亡营长各一员。同日，日军第八师

团第十六旅团在古北口外青石梁、老虎山等地发动进攻，占将军楼口高地及炮石口长城线一角。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徵部开到，部署第二道防线，协同王以哲部第一一二师御敌。

△　武藤令伪护国游击军刘桂堂部经热河北部速向多伦前进；伪洮辽军张海鹏部担任热省地方治安；李寿山军速向全宁前进，以后向林西或经棚派遣，担任该地治安；中止伪暂编第二军程国瑞部前进，给予整理或解除其武装。

△　日军第十师团东宁守备队被抗日义军包围。经伪国境警察队、伪东宁警察队往助，战斗四天，义军撤退。

△　张学良召于学忠、万福麟、荣臻、王树常、刘哲等东北军要员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及原因，并宣布已与蒋介石商定军事善后，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

△　中共中央就第四次反围剿问题向鄂豫皖省委发出军事指令，指出："目前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并没有完结"，"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就是努力的继续与加强与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以便保持现有的和恢复以前的苏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苏区。"16日，再致鄂豫皖省委信。

△　国民政府任命马麟兼青海省政府主席。任命郭任远为浙江大学校长，原任程天放免职。

△　天津北洋火柴公司借口受外货压迫，捐税过重，未经管辖机关允可宣告停业。工人群起反对，派代表向市政当局请愿。21日，社会局制定调解方案，规定每月工作20天，照原工资三分之二发薪，假日不发工资等。工人被迫接受，于24日复工。

△　上海各业开始实行银元本位制，银钱业取消洋厘行市。中

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合组之兑换管理会开始办公。同日，海关税收亦改收银元。

△　世界动力学会分会在南京成立，由实业、交通、铁道三部筹组。

△　上海中华国货介绍总所成立。

3月11日　　张学良通电下野，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并表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期望"中央俯察彼等劳苦"，"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

△　晨，日军在喜峰口全线炮击。复攻喜峰口正面西侧高地，我官兵拼死迎击，毙敌百余名，至下午3时30分，西侧高地弃守。宋哲元手谕全军："无论如何要拼命保阵地"，"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下午4时，赵登禹令第二一七团团长刘景山率部反击，经两小时肉搏冲锋，将西侧高地夺回。是日夜，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再次派队绕敌后，占领日军炮兵阵地，卸毁日军大炮18门，烧毁辎重粮秣，砍毙日军官兵数百名，在日本国内引起震惊。我军阵亡中校团附胡重鲁、营长苏东元及两名连长；受伤团附一人，营连长九人；"士兵死伤亦极伙"。

△　日军第八师团川原第十六旅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再次进攻古北口，以主力部队向我龙儿峪、将军楼两阵地猛攻。我守军奋勇抵抗，伤亡甚重，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亲率特务连赴前线阵地指挥，中途遭日军狙击负伤，由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代师长。是役除关麟徵负伤外，"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壮烈殉职，其余官兵伤亡尤多"。

△　阎锡山到石家庄见蒋介石，商由山西调部分军队担任察哈尔防务，交北平军分会指挥调遣。翌日，阎返太原。

△　下午6时，上海申新纺织一厂工人与搜身巡丁发生冲突，被巡丁开枪击伤15人，混乱中坠河及被扎伤者30余人。全厂9000余工人自动怠工。翌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总工会等派员与厂长严裕昆及工人代表等商定，将巡丁头目撤职惩办，受伤工人由厂方给予医药费及家属抚恤金，停工养伤期间工资照给。惨案指使者该厂协理王云程未受任何追究，凶手也早逃逸。工人对此项解决办法虽不满意，但在国民党当局压力下被迫复工。

△　国民政府公布《县参议会组织法》、《县参议员选举法》、《市参议会组织法》、《市参议员选举法》，均自12日起施行；又公布《公务员任用法》及《公务员任用法施行条例》，4月1日起施行。

△　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与莫斯科直达线路正式开放。

3月12日　国民政府明令准免张学良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日，张离平飞沪，何到会接任。何对东北军官员表示："一切照旧，望各安心。"

△　蒋介石由石家庄到保定坐镇，罗文幹同行。

△　日军在喜峰口遭我军沉重打击后，未敢继续进攻，下午始利用空中优势以轰炸机四架对我喜峰口、澈河桥阵地轮番轰炸，并驱伪蒙鲜军约一团由董家口向郝家峪窜扰。

△　日军第八师团川原第十六旅团增加重炮、飞机向古北口再次进攻，主力指向我龙儿峪阵地，同时向右翼延伸包抄。午时，我军通讯设备遭日机炸毁，联络中断。下午3时后，龙儿峪阵地守军第一四五团在日军重炮火力下伤亡惨重，潮河北岸高地之第一四九团亦受日军包围，在日军源源增加，我军后援不继下，被迫后撤至古北口西南10里之南天门阵地。翌日晨，第二十五师撤密云休整，由暂二师接防。

△　中山文化教育馆在南京成立，以林森、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29人为理事，蔡元培、戴季陶等八人为常务理事，孙科为理事长。

△　桂第四集团军派往兴安、全县、灌阳、龙胜等地镇压瑶民起义之部队，遭瑶民顽强抵抗，复派第七军军长廖磊前往督师。廖于是日将行营移兴安。至此，参加镇压起义之官兵达四万余人。同日，湘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在衡阳召保安团长等开“剿瑶”会议，决定派兵分途“围剿”。

△　汤玉麟自丰宁电在津原热省民政厅长李树春转电何应钦、朱庆澜，饰词解释退出承德经过，并称所部在丰宁、隆化集结。21日，李树春在平谒何、朱，为汤疏解。

3月13日　　蒋介石电东北军将士，略称：“张代委员长所爱护之将士，皆中正之将士，爱护之责，决无二致”，勉以“一心一德，再接再厉，益矢服从”。

△　刘峙到保定谒蒋介石，蒋令刘代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日，胡适、丁文江、蒋梦麟、翁文灏等亦应蒋召，到保定面谒。

△　红十军周建屏部与独立一师黄立贵部由资溪向光泽进攻，歼灭新编第四旅周志群部第一团，占领光泽。周急派第三团往援，亦被歼于和顺地方。驻邵武第五十六师刘和鼎急向蒋介石请示办法。

3月14日　　蒋介石为对日直接交涉事，派外交部长罗文幹在平征求英、美、法、意等国使节意见，各使均表反对。是晨，罗偕蒋作宾到保定向蒋介石报告，商定对日直接交涉暂取慎重态度。同日，罗在保定对路透社记者谈称，外传蒋介石北来与中日直接谈判有关，“实系谣言”。又称：“中日交涉迄未断，但日逞强，不与我交涉，今后如何当看日态度。”翌日，罗由平返京，临行前发表谈话称：“我国既与

国联合作，决根据国联报告书进行。”同日，外交部发言人称罗北上纯为与蒋“商洽一种外交之新途径”。

△　日服部旅团在飞机掩护下由喜峰口后撤。至傍晚，我第一一〇旅将喜峰口正面高地完全收复。其西北侧尚有少数日军据险顽抗，旋由刘景山团将其驱逐。进犯董家口、铁门关一带之日军，一度向我右翼进扰，亦被我守军击退。

△　日驻津总领事桑岛向河北省府提出抗议，宣称中国在白河驻军“违背1902年《天津条约》”，万一发生事件，应由中国负责。

△　中国学术界人士在上海举行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蔡元培、陈望道、李石岑等出席演讲。

△　郑继成因刺杀张宗昌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后，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是日，国民政府明令予以特赦。

3月15日　国民政府任命王树常为北平戒严司令，邵文凯、鲍毓麟为副司令。

△　何应钦遵蒋介石指示，对华北军重新编组，撤销华北军总司令部，所有准备参战部队统归北平军分会指挥，并对原军事序列及任务作相应调整：一、第一军团总指挥于学忠，辖第五十一军五师一旅，担任天津塘沽、大沽方面作战及河北境内津浦路之警备；二、第二军团总指挥商震，辖第三十二军、五十七军，担任滦河以东地区作战，并固守冷口附近；三、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副总指挥庞炳勋，辖第二十九、四十军，第二十九军仍担任喜峰口、马兰峪方面之作战，第四十军以其主力集结三河策应各方；四、第四军团总指挥万福麟，辖第五十三军，一部协助第五十七军扼守冷口以东各长城要隘，余部整理；五、第八军团总指挥杨杰，辖第十七、二十六、六十七军，第六十七军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翁照垣师、刘多荃师担任北平附近治安并准备守城；六、傅作义部、赵承绶部、孙殿英部担任察

哈尔东方之作战。

△　北平工、农、商、妇、学等六群众团体代表到保定要求蒋介石督师抗日，不订辱国条约。蒋派杨永泰代见，声明决不签辱国条约，望民众勿信“谣言”。同日，北平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电促蒋介石率师收复失地。

△　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到保定谒蒋介石报告滦榆间防务等问题。

3月16日　日军因攻喜峰口未得逞，武藤亲自到承德调度，变更战略部署，改由中路突破罗文峪、龙井关，西路攻马兰关、红山口，东路攻冷口、界岭口。是日晨第八师团铃木旅团早川支队由空军、炮兵配合，沿半壁山向罗文峪正面进攻，先以骑兵一连企图抢占该处最险要之三岔口，被我阻击未逞。旋以重炮火力集中轰击罗文峪城垣，掩护步兵进扑。我暂二师刘汝明部据城垣及碉楼为阵，双方展开拉锯战，经多次反复，将日军击退。

△　天津《大公报》社评，称宋哲元部喜峰口抗敌“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18日天津《风报》社评，呼吁国民党当局“勿使宋军又陷十九路军之悲境”。

△　日军第三十三旅团12日由绥中进至界岭口，是日以第四十联队及第三十九联队一部为右翼，第十联队及第六十三联队一部为左翼，在野炮十联队主力协助下占领界岭口。17日，万福麟部第一一六师反攻夺回。24日，日军第二次进攻，万部撤退，日军亦退至长城线，双方相持至4月中旬。

△　蒋介石电令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认真办理各学校军训，规定凡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不合格者投考大学不予录取。21日，蒋令训练总监部饬各地驻军协助训练中学以上学生。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指导海外侨民组织团体办法》五条。29日，国民政府令行政院施行。

△　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演讲《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

△　浙江萧山县县长张宗海强迫农民使用改良蚕种，不顾农民损失，派警至七区弥南乡挨户强缴土种焚毁。农民愤而聚众千余人，砸毁乡、镇公所多处。张亲率基干队前往镇压，农民坚持斗争。18日，省保安队开到，农民始散。事后，县府将农民丁芳勋、高德瑞等拘捕。

△　江苏十二圩盐帮船主、船工以政府明令提倡轮运，致使帆船船工面临失业，是日推代表徐海珊、李少泉等六人晋京请愿。次日请愿代表向中央民运会、行政院及盐务署提出三项要求：一、限定相当期间，俾船主、船工得另行改业；二、在此期间不以变样方式消除江船；三、期满后，以国家财力安插劳务工，并以相等价格收买江船。

△　成都商人五万余人为反对四川军政当局滥设关卡，强征捐税及私制国税印花，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履行早经当局认可之废止苛捐10项办法。翌日，全市停业，并电告上海、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停止运货到蓉。

△　日本东京警视厅派警将中国各界救济国内难民联合会毛世猛等17人拘捕，其罪名为毛等曾以救济长江水灾募款汇交义勇军。随后又继续拘捕达40余人。6月，将其中20余人驱逐回国。

3月17日　汪精卫由德返国抵沪，宋子文等百余人往迎，褚民谊持林森促汪返京复职亲函迎汪。汪发表书面谈话表示："病体既未痊愈，只能在中央党部随时献替，以尽寸心。至于行政院长一职，事繁任重，若勉强担负，则偾事误国，为咎滋大"，坚辞行政院长职，并推宋子文实任，宋未允。同日，宋电中央及各部、会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务。

△　晨8时，日军铃木旅团步、骑、炮混合部队三四千人再次向罗文峪、沙石峪等处进攻，并以飞机20余架助战。第二十九军暂二师刘汝明部奋力抵抗，阵地忽得忽失10余次。晚，刘部从两翼夹击，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入敌后，重创日军，王牺牲，该营生还者仅70余人。18日，日军再度进攻不逞，于19日撤退至半壁山，25日主力返承德。

△　何应钦电令第二军团各部："拟集结优势兵力，在滦河之线与敌决战"，令何柱国部经昌黎向滦县撤退，限20日晚到达；缪澂流部在界岭口掩护何部撤退后，将主力撤退至卢龙附近；孙德荃部固守桃林口附近，掩护滦西主力侧背；杨正治部进至卢龙西部；第二军团商震部，以一部扼守冷口及其附近各口，俟何、杨两部到达滦河线后，即在沙河驿附近集结，为滦河线作战军之预备队。各部统归商震指挥。

△　日增派蒲穆第十六师团参加长城作战，是日开抵沟帮子。

△　孔祥熙到保定谒蒋介石报告赴欧美考察实业情形，18日到平，21日随宋哲元赴前方代蒋劳军。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在武昌设立地方政务研究会，是日公布该会章程，规定凡三省现任县长及有县长资格者，均须入会研究，并施以军事训练。

△　监察委员邵鸿基以前任南京市长魏道明勾通前财政局长齐叙等伪造收据、舞弊吞款案提出弹劾。23日，该案经监察委员杨天骥等审查成立。4月10日，监察院呈请国府转送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核办。

△　江苏省仪征县第五区农民3000余人为反对举办保卫团发生暴动，捣毁蔡湖等五地乡镇长住宅，省保安处派队前往镇压。

△　美国银行界因受金融风潮影响，生银缺乏，在上海购银140余万两，是日由上海运往旧金山。

3月18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令第八师团负责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口附近的筑城及师团补给；令混成第三十三旅团复归第十师团原属；令第六师团作向多伦作战准备；令第十、十四师团各准备一联队随时供关东军司令部使用。

△　日军第八师团鲶江部队、嵯峨部队是晚占潘家口。

△　驻鄂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钱大钧在保定向蒋介石分别报告陕、赣“剿匪”情况。蒋令何成濬留驻北平，西安行署暂行撤销，川、陕“剿匪”军事交田颂尧、杨虎城负责。21日何赴平，电令参谋长朱传经率西安行署人员返汉。

△　青海省府主席马麟与省府委员黎丹、马步芳、李乃棻、张心一等通电表示愿率边疆各族健儿，齐赴国难。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举行会员大会，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七人已任临时全国执委，按章不得兼任分会执委，改选郁达夫、洪深、吴迈、沈钧儒、王造时、钱华、宁明宇接任；并通过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名义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再次声援刘煜生、王慰三两案以及推代表往上海公安局调查犯人待遇等议案。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公布《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条例》，训令四省府遵办。

△　侨商胡文虎汇款一万元并运送永安堂万金油等药品30箱交北平军分会救济前方军民。

3月19日　赣粤闽边“进剿”军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奉蒋介石令，继续部署进攻赣南中央苏区。以第一纵队为主力，将第三纵队第五、九两师配属一纵交罗卓英指挥，再次向广昌进犯。是日下达进攻令，由第十一师萧乾部为先头，第九师尾随，向宜黄县东陂、黄陂一带推

进。

△　陈济棠召余汉谋、香翰屏等开会，决定赣南二期“剿匪”计划。令余汉谋短期内赴赣主持。

△　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应蒋介石召到保定商防务，蒋允对宋部补充军费。

△　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成立，选康选宜、胡朴安等31人为执委，郑洪年、褚辅成、沈钧儒等七人为监委。

3月20日　汪精卫、宋子文、褚民谊、曾仲鸣、陈公博、唐有壬等一行由沪到京。上午汪在总理纪念周会上致词：“今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抗”，“我们第一固然要有抵抗的决心，第二还要有抵抗的能力”，“抵抗能力不限于武力一项。”旋出席国民党中央重要会议，商讨国防、外交。

△　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到保定谒蒋介石报告鲁省军政，当日经平返济南。

△　驻平日使馆就滦东军事调动对记者称：华方已开始撤兵，对中国最后通牒止发。何应钦即日语记者称：“滦东军事调动，完全为策略上必须之行动，无政治关系。”

3月21日　进犯广昌之陈诚中路军先头部队第十一师萧乾部，行抵宜黄县东陂霹雳山一带，遭红军第五军团围歼，萧乾受伤，旅长一名受重伤，团长三名被打死，第六十五、六十六两个团被歼灭，该师残部撤至黄陂。与此同时，在东陂之第九师、五十九师（上月底被歼后的残部）均遭红军堵击，被打死打伤团长三人，其他官兵伤亡500余人，残部于25日败逃宜黄南之霍源、河口等地。是役，前往增援之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郭炳生（原系红三军团第二师师长）被击毙。

△　国民政府令行政院施行《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暂

行章程》。

△　何应钦派鲍文樾代荣臻任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

3月22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设立救国飞机捐款筹办委员会，朱培德、朱家骅等20余人为委员，汪精卫任主席。

△　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奉命北上抗日，是日开抵北平市郊。

△　日军第六师团迎支队配属给第三十三旅团攻冷口，是日起进犯南面高地我军阵地，遭第三十二军商震部黄光华师奋勇抵抗。商震曾亲往前线督战。经连日战斗，日军未达目的，25日中止进攻，倾全力保口外萧家营子。

△　宋子文在上海连日召见金融、实业界钱新之、李铭、虞洽卿、王晓籁等，洽商财政问题。

△　前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民政厅长王尹西，因处理南昌民食维持会，被控假借名义、私禁勒罚一案，经政务官惩戒委员会议决，鲁涤平申诫，王尹西免职并停止任用三年。

3月23日　汪精卫由京到沪，即电国民党中常会提请正式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取消代理字样，以专责成，而一观听”。宋谈话坚决表示“不能担任”。同日，中常会决定派孙科、顾孟馀赴沪敦劝汪复职。

△　何应钦以万福麟部第一二九师师长于兆麟、第一三〇师师长王永胜在热河作战不力，均予撤职，派周福成、朱鸿勋分别接替。

△　蒋介石致电何应钦、黄绍竑，略谓“此次剿赤挫失，短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同时电陈济棠，请其代理“剿匪”军总司令职。

△　蒋介石为加紧“剿共”，电令何键限三个月内完成湘粤公路，同时赶修粤汉路株韶段轻便铁道。

3月24日　蒋介石偕杨永泰等由保定到平，召何应钦、蒋伯诚、杨杰、王树常等开军事会议，听取各方军事报告。杨杰要求蒋介石调部增援长城各口，蒋指示要以现有兵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当晚蒋返保定。

△　国民党中委李烈钧由平到济南，语记者称：“时局至此，应另辟一新途径以拯救危亡，故最注意开放政权，使全国人民得尽力于救国与建国。”

△　外交部再次照会日驻华公使有吉明，驳斥日本政府3月20日复照，对外交部3月2日照会“多所规避”。再次抗议日本凭借武力强占热河。

△　上海市公安局在北京路将红军将领陈广（即陈赓）逮捕。翌日，会同捕房往梅白格路捕陈广之妻未得，将陈藻英（谭国辅，辛亥革命元勋谭人凤孙女，时伪称陈赓之妹，化名陈藻英）捕走。

△　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团代表李玉聘到南京，将美洲华侨所购飞机12架捐助国民政府抗日。

△　浙江余杭县农民为反对省、县政府强迫推行改良蚕种，聚众2000余人将该县西湖改良种场焚毁。翌日，县府成立取缔土种事务所，张贴布告，声言土种不得有一粒遗留。26日，省府派保安队前往镇压。

△　青、藏冲突自上年9月中旬经川、青、藏三方代表议定各守边界后，是日藏军再次进兵，将青、藏间大小苏莽占领，青军退守玉树，迨援军赶至，将藏军迫退。

3月25日　孙科、顾孟馀到沪敦劝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汪允入

京商量。晚，汪偕孙赴京。

△　福建援热部队第二纵队由谭启秀率领自漳州出发，计划经潮汕、东江至粤汉路与粤桂军会合。27日，张炎率第一纵队由龙岩出发入粤境。

△　北平军分会委张焕相兼北平市防空司令。

△　红二十三军在江西会昌成立，杨宁任军长。

△　冯玉祥于本月20日派高兴亚赴平、津，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接洽抗日经费筹措事宜，并向吉鸿昌陈述冯在张家口组军情况。吉鸿昌在天津变卖家产，购置枪弹，于是日亲莅张垣。

3月26日　蒋介石上午返抵南京。下午，与汪精卫就今后内政、对日方针进行商谈，并敦劝汪复职。

△　红军江西军区陈毅部攻乐安。陈诚急令驻南城、南丰第二纵队星夜驰援。30日，第十四、九十两师主力到达，红军主力退往崇仁山地。

△　湘军第二十八军刘建绪部与粤军余汉谋部会同进犯永新、宁冈、莲花等苏区。是日，刘部第十五师、六十三师进占永新。4月初，湘、粤军以湘东防务重要，撤回原防。

△　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与日驻“满”大使武藤信义签订日“满”合办通信会社协定，5月6日生效。9月1日成立“满洲电信电话会社”，凡“满洲国”境内所有有线无线电报电话事业均归其经营。资本5000万日元，伪满设备折价600万日元，其余另行招募。

3月27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重要会议，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孙科、陈果夫、叶楚伧、李烈钧等30余人出席。蒋介石报告华北军事情况，于右任、孙科提统一全

国军事案，李烈钧提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案，因李案着重于开放政权与集中全国力量御侮，以事关重大，决定交中常会“从长缜密讨论”。

△　日军攻长城各口受挫，将攻击目标转向滦东，是日武藤下达作战命令：令第六师团主力立即向冷口前进，确保长城线；令独立守备队、第八师团、靖安军各一部尽快赶走石门寨附近之华军，掩护九门口——义院口大道补给路；第八师团在义院口部队协助前项作战，并受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指挥；飞行队协助作战。

△　日枢密院通过退出国联通告书，经日本天皇批准，由外相内田电达国联秘书长。同日，首相斋藤发表退出国联声明书。

△　蒋介石致电湖南省府主席何键，要求何赴赣“督剿”红军。电称：“江西进剿失利，匪势猖獗，众议非中亲往主持，则应另派大员督剿。中此时以抗日之任，未能诿卸，故不能兼顾剿匪”，希望何能赴赣代行职权。

△　顾维钧出席世界军缩会议总委员会会议，发言表示：“中国遭人侵略，至今未已，侵略行为且严重日甚”，要求“确定更速的而更有效力的共同负责制止侵略之制度”。

△　汉口日商泰安纱厂宣告停工，强迫工人离厂，不发工资。工人愤慨，筹议对付办法。汉口警备司令部闻讯，饬军警机关严密防范，不许工人与厂方直接交涉和停留厂内，违即拿办。

3月28日　　外交部长罗文幹为日本退出国联发表宣言，指出：“中日争议在国际联盟下之公允处置，毫不因日本现所采取之步骤而受有任何不良之影响”；表示深信国联“将采取紧急有效之方法，以应付日本宣告退出国联后之新局势”，“中日问题终必得公平之解决”。

△　蒋介石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厅长熊斌由平往张家口

访冯玉祥，促冯入京。30日，冯亲函蒋介石，主张对日拼命抵抗，用全力早日收复失地，并提抗日办法十二条，要旨为：抽调军队80%开往前方，由蒋亲自统率；拨军费80%作抗日之用；大赦政治犯，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要求蒋实践、实作、实行、实施。冯并派代表邓哲熙随黄、熊到京晤蒋、汪，陈述冯抗日志愿。4月4日，黄、熊等携冯函返京。

△　国民政府令派第六师师长赵观涛为第八军军长，第六师副师长周碞升任师长。

△　上海市公安局伙同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在山西路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及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三人非法逮捕。29日，何香凝通电全国，并电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人提出抗议。何语记者称：廖在德国留学，近因暴日入侵，愤而返国，到沪为时仅两周。

△　红二十八军在皖西遭敌第二十五军两个旅及安徽省三个保安团共万余人的进攻，是日，红二十八军政委王平章在商城门坎山的激战中牺牲。

3月29日　蒋介石返京后与汪精卫密商对日方针与“剿匪”问题，确定汪复职主持对日交涉，蒋负责全力“剿匪”，是日召开国民党中政会议，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孙科等50余人出席。汪精卫表示复行政院长职。翌日，汪向中常会销假，到院视事。

△　汉口申新纺织四厂失火，除栈房、公事房外全部焚毁，4000工人失业。汉口公安机关将最先发现起火的五名工人拘捕。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陆军官佐各级晋阶规则》。同日，明令行政院施行《指导海外侨民组织团体办法》。

△　宋子文返沪，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日关税协定至5月16日以

后，即告期满失效，无所谓续订与否。关于整理税收一项，华北方面既归中央，华南方面亦无问题。

△　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南昌号”轮泊于牛庄口外候引水员时，遭海盗袭击，二等机师白鲁、三等机师裴尔斯、约翰逊、哈格莱夫被挟入海盗船而去。英国领事美卓于事发后访沈阳日本领事，请求协助营救。

△　台湾公布《米谷统制法》。

3月30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是否如期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照常举行及中央委员改选等问题。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廖承志等人被捕事发表宣言，指出：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由间谍报告被捕，未得任何证据。“若据空言可入人于罪，则吾国民之前途尚堪过问耶”？要求立刻释放廖承志等人。

△　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对日妥协、与敌签订任何屈辱条约，并督促政府倾注全力，筹定积极反攻策略，收复失地，“如有敢违此旨与敌妥协者，即视为全国公敌”。

△　北平军分会任萧之楚为第二十六军军长。是日，萧在三河县就职。

△　浙江余姚二区梁衙乡民众因反对烟酒税局强征酒捐，将稽征员宿舍烧毁，县府将乡民张徐良拘捕，并查缉“余犯”。是日，乡民吕能贵等率众进县城请愿，要求释放张徐良，免除酒捐。团丁开枪镇压，打死群众一人，伤二人。后群众聚至千人，县府被迫缓征酒捐，释放被捕者及抚恤死伤民众。5月3日，浙江省府主席鲁涤平报行政院称：“此案系酒捐按缸征收未能合法，自应责由该县切实查报，依法

惩处。至该乡民聚众入城要求释犯免捐，其行动亦属不合，应由该县法院择尤惩治一二。”

△　日军鳌刚村一指挥3000多人“追剿”吉东马家大屯一带中共领导之抗日游击队。关东军间岛辎重队、日共党员伊田助男用汽车运送十万发子弹至游击队活动之松林，留下奉送子弹给游击队的遗书后自杀身死。事后日特务机关在鳌刚旅团进行大搜捕，并将该旅团调往延吉解散。

3月31日　　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开庭审判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陈赓等五人，罗等在法庭上严辞驳斥所谓“反动”、“反革命”等罪名，审判官无言以答，律师吴凯声要求释放。法庭遂判决由工部局巡捕房移提给中国当局。是晚，廖承志由何香凝、国民党中监委柳亚子具保释出。4月1日，其余四人被解至南京投入军事监狱。

△　日本前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前日外务次官岩城隆德等一行抵沪，进行秘密外交活动。4月1日，北平市工会救国联合会电请国民政府拒绝芳泽来华活动。芳泽等经青岛、济南、北平、大连等地活动后于4月25日返日。

△　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简玉阶函上海市长吴铁城，该公司愿捐款十万元供政府作训练航空人才之用。

△　日本在长春设置驻伪满海军部。

是月　　浙江杭县乡、镇长劳勤余等24人联名呈请行政院减免田赋附税，略称：“省、县府违背附税不得超过正税之明令，田赋附税竟达十二种之多，每亩正税仅需五角一分，而附加税竟至六角有奇”，农民“自十六迄二十一年中历五年之久，每户欠额竟达正税十三倍之巨”，要求饬浙江省府将旧欠田赋附加税并罚金一概豁免。

△　日军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年初起在临江、通化、辑安、桓

仁、柳河、兴京等所谓东边道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等“三角地带”对抗日义军反复“围剿”，迄是月底，屠杀我抗日武装人员8700余人。

4月

4月1日　　日军攻长城各口未得逞，转攻滦东。上日，日砂川部队、岩田支队及伪满靖安军由和田少将指挥，分由九门口、义院口向沙河寨、石门寨进犯，占沙河寨。是日，又占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第一一五师退守海阳镇、平顶山、亮甲山一带。

△　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密电蒋介石报告“剿匪”失败情形，请速调部队赴援，略称：“现在匪势益张，昨复扰及新淦，赣东、赣西，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略地更无可奈何”，乞蒋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派大员到赣“督剿”。

△　宋庆龄发表《告中国人民》一文，指出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上日审判罗登贤、廖承志等五人是“公开的滑稽剧”，“是蒋介石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另一个例证”。罗等五人“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

△　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于汉口开业，郭外峰任总经理。该行额定资本1000万元，蒋介石从“剿总”特税（即鸦片税）收入中拨付250万元作为开业资本。

△　桂北起义瑶民在国民党军残酷镇压下逃匿深山崖洞后，因时值春耕，被迫出洞下山，起义失败。廖磊除以部分军队留驻外，是日率部回柳州。同日，桂省府主席黄旭初电湘、黔、滇等省府主席，提出“编制保甲，使瑶民剪发易服”，“取消苗瑶名称，以期泯除界限”等

民族绝灭主义的处置办法，要求一致办理。

4月2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委会与上海分会联席会议，决定组设营救政治犯委员会，选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吴凯声、王造时、沈钧儒、陈彬龢为委员；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陈赓、陈藻英、罗登贤、余文化等一切政治犯，废止“特别法”，开放言论与集会、结社自由，严禁私刑，予政治犯以人道待遇等；并推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为代表晋京营救。同日，宋庆龄电汪精卫、罗文幹，指出对罗登贤等“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之违法，要求“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翌日，汪以“谨当依法办理”电复。

△　国民政府致电西南当局陈济棠等，要求迅即派军入赣“协剿”，并电第十九路军，“即派劲旅由闽推进”。

4月3日　　江西红军罗炳辉部由雩都秘密东移，进攻新淦，红军三、五军团各部进攻永丰，闽浙赣军区红军方志敏部同时进攻金溪策应。新淦第二十七师仅抵抗两小时即败退樟树。金溪地方团队甫经接触即败逃临川，红军遂占新淦、金溪。同日，蒋介石急令陈诚一面固守永丰、临川，一面派第五师周浑元部与独立第三十六旅组独立支队，限期收复新淦，并令停泊赣江之“浔阳”、“黎明”、“复兴”号军舰配合。

△　汪精卫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声称，自国民党宣布训政以来，尚未能依照《建国大纲》克期完成地方自治，其最大原因在于“敌国外患、共匪、各省的军人割据”。

△　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以上海市公安局长文鸿恩吞没鸦片，私释烟犯，予以三个月减俸10％处分。

△　沪商叶鸿英捐私产50万元（一说百余万元）办图书馆及乡村教育，是日成立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叶任董事长，沈信卿、穆藕初任副董事长，蔡元培、黄炎培、钱新之等为董事。

4月4日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议定应付临时全代会办法：一、电中央请撤回召集临时全代会决议案，以免野心者利用；二、如中央不顾一切，如期召集，在粤中委则联合西南各省一致不派代表出席，以示消极抵制；三、如中央果于是日召开，西南亦决援照全代会成例，在粤另行召集西南各省代表开会，以监督宁会。

△　唐绍仪、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称："抗日、剿共早决于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体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不能再失寸土，曾几何时，关外抗日诸义军始终未得政府之救援而相继失败，榆关、热河亦以政府始终不定抗战之计而相继沦陷。……政府不能努力贯彻已成立政策，则惟有深自引咎以谢国民。……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之召集不独无此必要，且不当行，尚希全党同志，一致反对。"5日，吴铁城密电汪精卫称，陈济棠等此举系"利用胡系反蒋，以固粤局，延缓出师剿共"。

△　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岩田支队纠合伪军靖安游击队共3000余人，在河田少将指挥下进犯海阳镇，占领海阳、侯庄两地。何柱国遵何应钦必须固守海阳的电令，由第一一五师令派第六二七团协同骑兵第三十九团反攻夺回，当晚再失。经得而复失多次，7日何部反攻，再次收复。

△　驻平英、美、法、意各使以日军在滦东扩大侵略，危及北宁路沿线榆关、秦皇岛、北戴河等地外侨生命财产，是日晨召开使节团会议，向日驻华使馆提出交涉，促其尊重《辛丑条约》，注意各该地外侨生命财产及驻军给养等问题。

△　中荷庚款经双方迭次会商，外交部长罗文幹与荷兰驻华公使杜培克本日在外交部正式换文，规定荷兰政府将1926年1月1日后应得庚款全数退还中国，用于中国水利及文化事业。

△　黔军犹国才部被王家烈击败退入滇境后，得滇省府主席龙云

之助恢复军力，是日入黔占领南龙、兴义。8日再占兴仁，盘江等地旋亦尽为所占。退入川南之蒋在珍部得刘湘之助，闻犹部得胜，立即挥师回黔。

4月5日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立法、监察院自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凡本日以前原订以银两收付者，应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发生争执，各司法机关应将以银两收付之请求驳斥。又规定出口银类征税2.5%，以示限制。

△　蒋介石以江西告急，4日由京乘舰赴赣，是日抵南昌。

△　宋庆龄偕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及吴凯声到南京。汪精卫、罗文幹往饭店访宋，宋等除要求立刻释放罗登贤等人外，以民权保障同盟名义提交书面要求四项：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政治犯以阅报读书自由，禁用镣铐；四、严惩狱吏敲诈受贿。汪允提交中政会。同日，宋等往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罗登贤等人，又往江苏第一监狱探视于1931年被捕之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

△　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在财政预算和对日方针上与蒋介石分歧加深，被迫提出辞职。是日国民党中政会准宋子文辞中央银行总裁兼职，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

△　国民党中政会将湖南省救国借款章程交行政院迅速核办。25日，蒋介石因此案遭湖南人民强烈反对，电汪精卫维持原案，不得削减。5月12日，国民政府以抗日“剿匪”紧急需要，易名为“湖南救国库券”，密令批准发行。

△　方振武部抵河北邯郸，翌日北开。何应钦为控制方部，以军权须统一为名，迭电方到平商洽收编，均遭拒绝。9日，何派平军分会参谋徐宗恩等赴顺德（今邢台）晤方洽谈收编，仍遭拒绝。11日，

方部抵宁晋，方在民众大会上演说称：“当局派员来嘱我在此暂住，听候接洽，我售产成军，为的是杀倭救国，现敌已打进长城，眼看就要杀到平津，商震来电，叫我速去援助，形势紧张如此，何能再留住。”辞毕立即率队开拔。

△ 伪满于上年派代表丁士源赴欧美各国游说，乞求承认，遭各国拒绝，是日返回长春。

△ 交通部与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美国太平洋公司水线合同于1930年期满，是日三公司代表偕英、美驻南京领事及丹麦驻沪领事与交通部代表颜任光签订新合同。原合同系前清与北京政府时期迭次与三公司签订，各种合同不下20余起，丧权辱国，利权外溢。新订合同亦仅取消水线登陆专利权，收回直接收发电报权，收回地缆及架空线等。

△ 浙江余杭农民继续开展反对强迫取缔土蚕种的斗争。是日东乡农民向县府请愿，被县基干队开枪打伤五人，引起激愤，各乡农民纷集县城达五六千人，捣毁取缔土种事务所。7日，全城商店罢市。经法团代表向省民政、建设两厅请愿，答允缓办取缔土种。

4月6日 蒋介石在南昌电令“剿匪”各将领，宣称“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同日，蒋偕熊式辉、贺国光到临川视察。7日，蒋召中路军各将领作布置，并训话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却没有多大关系。”当晚，蒋等返南昌。

△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常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上报告宋庆龄等要求保障民权。汪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办法两条：一、捕获共党直接、间接有危害军事证据者，交军法审判；二、捕获共党有暴动行为者，交

法庭审判。关于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问题，俟江西、湖北“乱事敉平，再行提议”。

△　国民政府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15日，孔就职。

△　日本策动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浩济特旗、阿巴嘎旗及外蒙车臣汗部于热河赤峰开所谓内蒙王族大会，宣布脱离中国，与伪满合流。

△　财政部通令本日起废两改元，上海钱业同业公会、银行业同业公会分别召开联席会议，议定实行办法。同日，财政部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合组之银两银元兑换管理委员会即日起撤销，停止兑换。

△　浙江临安农民千余人反对省、县政府强制取缔土制蚕种，将县制种场及改良蚕种所捣毁。县府士兵开枪击毙群众一人，拘捕二人。9日，省府召开临时会议，派保安队前往继续镇压，续捕16人解省。

△　四明储蓄会在沪开业，资本50万元，孙恩甫任会长，俞佐廷任经理。

4月7日　　日军服部旅团再次进犯喜峰口，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千余名向老婆山、孩儿岭我军阵地攻击，遭赵登禹旅阻击未逞。翌日，日复增兵力续攻，双方均有较大伤亡。

△　英政府向日政府提出照会，严重要求日方应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能发生战事，否则英海军陆战队将登陆维持治安。

△　新疆汉、回首领马占仓与铁木耳自上月在库车起事，占阿克苏等地后，喀什行政长马绍武招募柯尔克孜族兵以固城防。铁为谋取喀什，争取柯族兵首领乌斯曼参加起事。是日，乌斯曼率柯族兵会合

铁、马部起事民众攻占回城（疏附），大肆劫掠，杀戮汉人。马绍武由喀什外逃。翌日，铁木耳率部进入喀什。11日，马占仓率部占汉城（疏勒），全喀什陷。

△　东北民众救国军前敌总指挥张玉挺、旅长郑润成、参谋长苏国自迪化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等，要求电催苏炳文等速由苏返国，整理旧部，重上前线抗日。

△　法国于是日及10日、11日先后派军舰侵占我国南沙群岛中之南威岛、太平岛等九个小岛。

4月8日　　国民政府令：暂行兼代贵州省政府主席犹国才毋庸兼代，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　蔡廷锴以北上不能再缓，请前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到闽主持绥署，派邓世增到漳州代行指挥“剿共”，是日由厦门赴粤与西南当局商“剿共”、抗日等问题。

△　湘鄂赣军区孔荷宠部一部在江西万载朱木桥击败国军第十六师彭位仁部四个团。另一部由上高进占高安，直逼奉新。

△　日本与伪满为索还上年被苏联扣留之中东路车辆，与苏交涉无效，是日借口中东路与后贝加尔间之通车并无协定，将该线封锁，并由伪满外交总长丁鉴修声明此举系为“矫正俄方专断”。10日，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向伪满提严重抗议，指责封锁该线违背1896年中东铁路经营合同及《奉俄协定》。

4月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唐绍仪、胡汉民等反对7月1日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事通告全党，略谓“国难当前，集合全国人民之心志才力以共同解决，尤刻不容缓”，必须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以便决定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并要求全党对抗日、“剿共”不问国民大会召集与否，均须坚决进行。

△　何应钦电告何柱国称：为加强滦河防御，王以哲军全部已陆续向滦河之线前进，高桂滋师主力推进至卢龙，翁照垣师12日可到达永平。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在四川巴中得胜山击败川军李炜如部。

△　北平数十个抗日团体千余人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下，在新华门举行前线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后游行，队伍行至绒线胡同时，被军警堵截冲散。

△　海军部发表声明，略称：张学良在北平时擅将天津海军医院医校全部地皮房产越权私售与法租界当局，并于上月8日为法兵警占领，要求将此项不法契约取消，将原产归还海军部。18日，行政院决定交涉取消。

△　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在上海病死。

4月10日　　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演说，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惩处在宜黄、东陂一带"围剿"失利长官：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萧乾"骄矜疏忽"，记大过一次。

△　国民党中委李烈钧电中央党部要求保障人民自由，略称；"中常会决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并议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中央既决定公开政权，欲集人民智能，共决国事，首当以诚意示天下，人民所渴望者在此，政府所当努力者亦应在此，则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屡次所宣示者，宜不致再托空言。"

△　日军进犯滦东，大队飞机轰炸海阳，守军何柱国等部纷向西

南后撤。

△　古北口日军于上午8时起以猛烈炮火向我南天门阵地轰击，继以飞机配合步兵千余人向我阵地进攻。守军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奋力还击，至下午4时日军退回古北口南侧高地与我对峙。

△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以外货倾销，生产过剩，营业艰难，决定本月22日起全国华商纱厂一律每周减工一天，减工期间工资减半，并通知全国各厂一致实行。天津工联会（12日）、上海市总工会（18日）先后电实业部及有关当局表示对此非法减工誓死反对，要求制止。

4月11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赣、豫、陕、苏、浙、皖、鄂七省治安会议，各省府主席熊式辉、刘峙、杨虎城、顾祝同、朱绍良，各“剿匪”部队长官陈诚、梁冠英、张钫、刘镇华、徐源泉、蒋鼎文、王均、上官云相、刘茂恩，内政部长黄绍竑、赣粤闽三省“剿匪”总部参谋长贺国光、秘书长杨永泰以及各省保安处长出席。蒋介石作整理部队、训练民团、办理保甲、清乡等指示；决定派刘峙任抚河信河“剿匪”督办，取代陈诚指挥临川一带的“剿匪”；并决定从刘峙、张钫等部中抽调三师一旅入赣。14日会议结束。

△　日军第六师团长坂本指挥第三十六旅团主力及八师团第十四、三十三旅团各一部共三万人9日晚开始猛力进攻冷口。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奋力御敌，因伤亡甚重，是日放弃冷口，沿建昌营、迁安向滦河右岸撤退。日军占冷口及其附近刘家口、白羊峪诸口后跟踪占建昌营，并派骑兵数十名进占迁安（是役日军死38人，伤131人）。同日，守界岭口之第五十三军杨正治部缪澂流师因冷口等处失陷，该部左侧受威胁，由界岭口之马坊、双岭线向十八里铺以北之线撤退。何应钦闻报，急令商震部恢复刘家口、冷口、白羊峪之线；杨正治部须在台头营南面高地扼守，不得再行后退。电达时各部已迅速退却。

△　蒋介石以华北垂危，为求对日妥协，拟委其盟兄、前外交部长黄郛主持华北政务，是日电邀黄到南昌晤谈。次日黄电复“容稍事摒挡再行”。14日，蒋再电询黄“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黄经向政学系张群、杨永泰等征询意见后决定受任。24日由沪偕张群赴赣晤蒋。

△　闽浙赣军区红军方志敏、邵式平部攻克东乡。18日，撤出东乡退金溪。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司法、监察三院于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内迅速成立惩治贪污专庭。

△　张学良按蒋介石出洋考察的安排，是日从沪乘轮赴意大利，顾问端纳及眷属等18人随行。

4月12日　　新疆“四一二政变”发生。新疆迪化城防指挥官白毓秀、迪化县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陈中、航空队长李笑天及白俄归化军团长安东诺夫等人密议倒金树仁。是日午后2时，安率归化军进攻督办公署，金树仁越后墙逃出。督办公署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盛世才闻报，率部返迪化。是晚，举事诸人邀集省教育厅长刘文龙、财政厅长朱瑞墀、迪化行政长李溶、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等20余人会议，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刘文龙为临时省府主席，原东北民众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文龙提出保全全省各族人民生命财产、保全金树仁全家生命财产、保护苏联领事馆三项信条，经全体委员赞成。是为第一次“新变”。

△　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哲元因汪精卫3日在国府纪念周谈话中指责各省的军人割据为地方自治不能克期完成的原因之一，引嫌辞主席职。是日，国民政府以宋哲元在前方督师，于宋未回任前该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长仵庸暂行代理。

△　西南政务会召开临时会议，蔡廷锴要求西南当局努力抗日、“剿共”，陈济棠表示愿负“剿共”全责，推蔡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对粤出师抗日取消极态度。

△　为牵制日军进攻冷口方面长城各口，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遵何应钦电令，命第二、八十三两师各组一别动队由古北口两侧向敌袭击。是日晚，两别动队分由左右侧出长城口向敌侧背袭击，第八十三师第六旅四个连趁势从正面冲至古北口敌军前沿，将敌逐至古北口街区及迤南高地，我军占领潮河关一带高地。相持至13日晚，我军撤回原阵地。

△　周浑元部分两纵队在“浔阳”、“黎明”、“复兴”号三军舰配合下进犯新淦，红军主动弃新淦向崇仁山区集结。

△　中东路伪方理事长李绍庚及伪满外交特派员答复苏方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10日所提抗议，声称所引条约不合，亦且失效，限苏联一个月内将中东路机车82辆、客车190辆、货车3200辆归还。同时将海参崴——莫斯科国际列车扣留。14日又将绥芬河之苏联税关封闭。在此期间，日军由齐齐哈尔西开，苏联亦增兵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处。

4月13日　喜峰口失陷。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步兵第二十七、二十八联队，野炮第七联队，骑兵第七联队各一部12日起进攻喜峰口，同时董家口、建昌营日军分向口内滦阳城、摩天岭等阵地侧击。宋哲元部第三十七、三十八师各一部以腹背受敌，是日奉何应钦命放弃喜峰口，撤往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

△　金树仁在市郊调兵向迪化反扑。盛世才率部抵迪化近郊，占城北要地拥兵观望。陈中等人请出由苏回国之东北民众救国军助战，并与白毓秀往请盛率部入城，白于中途遭金部杀害。金见大势已去，遁昌吉，24日在塔城提取省府存塔城公款黄金1270两后通电下野。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事规则》；通过中央宣传委员会拟具之《电影事业奖励条例》及《文艺创作奖励条例》。

△　汪精卫发表对时局谈话谓，“关于对日主张，仍抱定抵抗与交涉同时并行之方针”。

△　周浑元部进占新淦后率第五师回崇仁，准备进犯永丰。红军三、五军团主力移向崇仁、乐安中间地带。

4月14日　盛世才率部入迪化城，陈中等随即召开临时维持委员会及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临时军事委员会撤销，推盛世才任临时督办，陈中任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陶明樾任省府秘书长，李笑天任航空处长。同日，刘文龙、盛世才向省内各区通电就职，并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

△　何应钦电令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第五十三军代军长杨正治部主力向滦西撤退。当晚，杨军翁照垣师全部退守滦西。15日夜，何军逐次由昌黎开始撤向滦西。

△　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密电何应钦，表示对察、绥军事指挥困难，“晋省将领中求其资望相当，能指挥察、绥全般军事者，亦实难其选”，要求将察防仍由军分会直接主持。18日，何转呈蒋介石、汪精卫。

△　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公开审判上年被捕之陈独秀、彭述之等10人，检查官以陈“组织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等罪名提出公诉。陈辩词承认是托洛斯基派，“照中国现状，组织红军还不可能。革命政党要夺政权，当然要暴动……说我反对国民党，我承认，说我危害民国，我不承认”。次日续审。

△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一行66人由苏联阿穆尔州汤木斯克市乘专车赴莫斯科。18日抵达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及苏外交人员到车站迎接。

4月15日　　何应钦下令驻秦皇岛守军撤退，士兵大哭，不肯退却，在军官用机枪威胁下被迫于傍晚撤出，暂集昌黎。是日晚，游弋于秦岛海面之日海军陆战队遂登陆占秦皇岛。

△　何键奉蒋介石召抵南昌，蒋拟委何负“剿匪”全责，何未允。嗣商定设湘鄂赣、闽粤赣、豫鄂赣三个“剿匪”边防督办，分由何键、陈济深、刘峙担任。旋又改设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西路、南路三个总司令部，重新划定“剿匪”区域。

△　比利时新任驻华公使纪佑穆向国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河南省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清剿”，呈请设立煌县，由安徽之霍山、霍邱、六安及河南商城、固始等县析置。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

△　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以军用浩繁，本日起发行印花烟酒库券500万元，分50个月偿还本息，以所收印花、烟、酒税为偿还本息基金。

△　《中国经济》杂志在南京创刊，中国经济研究会创办。

4月16日　　国民政府令派宋子文参加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之经济谈话会。

△　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向日驻苏大使太田提交抗议，指责日、“满”在中东路损害苏联权益。5月26日，太田答复称：损害中东路权利之事实大半系“满洲国”权限内之行为，与日本无关；在“满”之日本官吏虽或参预，但系在“满洲政府”监督之下行动，日本不能负责。

△　蒋介石分别致电黄绍竑、何应钦，谓我军应速构筑平、津最后决战线。

△　上海大学生联合会成立。

4月17日　昌黎失陷。日军高田、中村部队于16日陷抚宁后，是日又陷昌黎。同日，喜峰口日军陷滦阳城。何柱国部骑兵第四十团守军最后撤退滦西，与日军隔河对峙。

△　日驻华使馆代办中山访晤美使詹森，提出能否由外国驻华武官安排中日停战谈判，并示意日军可退至长城线。詹森即将此事电告美国务院。

△　蒋介石令湘、赣等省“厉行法治，严惩贪污”。令称：“地方官吏身糜国禄，罔顾民瘼，贪墨成风，庶政败坏”，各司法、军政机关“对于惩治贪污仍不免姑息徇隐，或明知而不举发，或经举发而不究办”。要求“上下官吏应各洗心革面，互相督责”，并制定各机关处理“危害民国”及贪污案件月报表二份，要求按月切实填报。

△　北平市政府下令整顿学风，要求对学生严加管理。其“有屡犯校规，言行越轨者，宜分别惩戒”，“企图作大规模之破坏行动者则授权当地军警严厉制止”。

4月18日　日在天津负责策反工作之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密电关东军司令部称，张敬尧预定21日在北平发难，要求关东军加紧进攻长城线，造成前方军事紧急，以配合平、津内变。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遂令第八师团于21日猛攻南天门等地。

△　冯玉祥向国民政府提议，应于最短期间内完全撤销各省田赋附加税，以后更不得巧立名目，附带征收。是日，行政院训令各省财政厅“遵照”。

△　宋子文偕贝淞荪、秦汾、杨格、魏文彬等由沪乘轮赴美与美

总统罗斯福会谈经济问题。同日，行政院决定由邹琳代行财政部长职。

△　汪精卫由沪返京，语记者称：中央屡函电促西南各省出兵“剿匪”，迄今仍无出兵之期，若再延搁，则蒋不能亲自北上督师，希望西南毅然出师入赣。

△　国民政府命令撤销东北交通委员会。

△　何键由赣到汉，与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会商湘、鄂两省“剿共”计划。

4月19日　　何应钦召蒋梦麟、胡适、丁文江、于学忠等商谈时局，决定派蒋梦麟往访英使蓝普森，请为安排中日停战谈判。同日，黄郛、张群、陈仪等在沪与日武官根本博洽谈停战问题。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亦为谋求停战事，即日由京往平。

△　蒋介石电何应钦，指示赶筑平津防线。电谓：“预备三道防线，应如计赶筑，而最后防线似以三角淀为左翼依托点，由杨柳青经杨村，通县至怀柔，或左翼固守密云。”要求“应最速着手，并限期半月完成”。

△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经扶、潢川、商城、罗山各地部队概归其节制。23日，卫就职。

△　唐山交通大学迁上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遵教育部令，将图书、仪器装箱，26日南运。

△　东北籍青年党人王捷侠、霍维周等1568人在天津《大公报》刊登退出青年党启事，略称：“吾等深痛国破家亡，决心放弃党见，誓不对日妥协，故毅然退出青年党，愿与忠心为国者协力对外。”另发声明称：“反对政府一党的专政”，“仇视共产党的破坏”，“不赞成青年党的对日政策。”21日，中国青年党天津特别市支部函《大公报》

称，王等“虚构人数，含沙射影，显系有意破坏”。

△　张静江、李石曾、杜月笙等发起组织江南铁路公司，是日在沪开创立会，选举李石曾、张静江等19人为董事，褚民谊等七人为监察，张静江任总经理。该公司计划修筑芜（湖）乍（浦）铁路，开拓乍浦东方大港。25日，在芜湖行芜乍路奠基礼。

△　日皇颁诏宣示对伪满“友谊”，是日，伪执政溥仪颁布“教书”感谢日皇“盛情”，并训谕伪官吏“应体友邦援助之诚，益相惕励”。

△　由日、‘满’支持之伪军李际春部占据昌黎，组临时政府，划滦东地域为特别区，揭五色旗。

△　上海泉漳中学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指为共产党秘密机关，于3月11日被勒令停办。留校学生组国民御侮自救会沪南区泉漳分会，并与驻校警察发生冲突。是日，上海市公安局派警前往镇压，遭学生奋力抵抗，结果学生45人、校工三人被拘捕。事后，华侨联合会、闽南同乡会、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等分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被捕者。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西人会修改《洋泾浜地产章程》附则第三条，将原所列各项事业内加入“工厂”、“工场”等字样，企图攫夺界内工厂检查权。27日，上海市政府向领事团书面抗议，声明“租界为中国领土，租界内外人民同一有服从本国法律之义务”；指出“似此滥用扩充权限，不独侵略我国主权，抑且违背中国与各国所订之条约”。

△　国民政府令准上海法租界设置中国法院协定有效期延长三年。

△　上海市商会以外国米、麦、粉大宗进口，致使粮价暴落，农商交困，要求国民政府对进口米麦粉课以重税。

4月20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令日军退出滦东。昭和天皇恐日

军越长城进犯河北省境将引起国际纠纷，19日，就此事诘问日军部参谋次长真崎甚次郎，是日武藤遂电令日军撤出滦东。

△　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以平、津危殆，电促汪精卫早下决心，“乘可为之时，决然自负，一切毁誉皆所不计。抱全民忍辱一时之决心，以求伸于他日”，与日作停战交涉。

△　蒋梦麟奉何应钦命往访英使蓝普森谈斡旋停战事。蓝表示：英调停淞沪停战曾引起中国人误解；停战谈判内容应严加限制范围；中方代表必须由政府任命等。何应钦即电告蒋介石、汪精卫。旋得汪复电称：中国对英调停淞沪停战至为感激，保证以后不发生任何影响；停战谈判范围限于军事，不涉及东三省及其他问题，建议只作口头协议而不形诸文字；指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为中国官方代表，汪愿负一切责任。22日，蒋将汪复电内容面告蓝普森。

△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一行60余人抵德国柏林。23日，马在柏林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问，称“在中国脱离日本之压迫为止，在满洲脱离日本之支配为止，决不休止斗争”。

△　陈济棠增派粤军第三军李扬敬部入赣“围剿”红军，是日第八师黄质文部抵寻乌，余部续向赣省推进。

△　江苏高等法院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庭续审。陈对检察官所指“危害民国罪”提出抗辩，律师章士钊驳斥法庭所谓“叛国”论断。是日止辩论终结。

△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千余人集会反对校方无故开除学生，要求校长邹鲁辞职，组驱邹救校委员会，并发通电、宣言。同日，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林云陔等以中大董事名义函该校学生要求即日一律上学。

△　日本海军当局修理旅顺要港部竣工，是日正式开放，任命第二遣外舰队司令津田静枝少将为司令官，海军大佐久保田久静为参谋长，第二遣外舰队所属舰艇全部拨归统辖。日海军省宣称：鉴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情势益形复杂，旅顺、大连对“满洲国”之发展及增进日、“满”贸易颇重要，故于旅顺设置要港部，担任关东州沿岸防卫。

△　日与伪满在龙井（今延吉）举行吉会铁路（吉林至朝鲜边境会宁）竣工典礼。该路为日本多年所梦寐以求，九一八前已完成吉林至敦化段，欲接通会宁而未得我国许可，九一八后始继续修筑。该路通车为日对苏联作战提供极大方便。

4月21日　　日陆军省发言人为滦东撤军发表谈话，宣称日军自4月10日战于长城以南，以图终止华军对热边之压迫，及逐之至长城炮程以外，今已奉命不再追击；如华军不再进攻，日军即退至长城。

△　日军第八师团遵武藤令派步兵第十六旅团、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及飞行一中队进犯南天门，在川原第十六旅团长指挥下猛攻南天门左翼支撑点八道楼子，以另一部约千余人绕攻八道楼子左侧翼。第二师黄杰部官兵与敌苦战经日，碉楼得而复失者再，战至翌日拂晓，官兵伤亡达千人，放弃东端碉楼，扼守八道楼子西端碉楼。22日，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千余人向西端碉楼猛扑，于上午11时我军放弃八道楼子，西退界牌峪一带。

△　日军第八师团第三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上日从龙王庙出发，是日侵占兴隆县城。

△　湘赣军区红军萧克部在安远、寻乌一带与粤军第四师张枚新部，桂军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战斗后向雩都方向撤退。

△　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原任翁文灏辞职照准。

△　教育部呈请行政院准予印行《四库全书》珍本，将其中向未

付印或已绝版之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

△　日伪为防止抗日武装袭击，是日由伪满首都警备司令发布不准种植高杆作物的命令，规定在县城附近三里以内，集镇二里以内，铁路、公路两侧一里以内禁种高粱、玉米等作物。

4月22日　日关东军司令部以幕僚谈话的方式发表声明称："关东军本拟确保长城线之后，不欲向关内进击，惟因华军逆袭挑战之态度炽烈，兹为确保国境线起见，遂不能不进击滦河右岸地区之华军，现已达成所期之目的……乃渐次退还本来之配备地点。"并威胁称："将来华军倘仍不改其态度"，关东军将"断然处置"。

△　外交部长罗文幹反对北平当局请英斡旋中日停战谈判，是日及次日连电北平刘崇杰，指出绝对不能直接交涉，即停战亦需在《国联盟约》及迭次决议案之内，不论外交或军事当局均不宜向任何方面乞怜求和。此后蒋梦麟即中止与蓝普森接触。

△　蒋介石电何应钦、黄绍竑，指示对付日军进犯平、津"应作最后准备，且以最后抵抗线工事与平城内复廓应最先着手。万一倭有取平津之征象发现，则准将古北口方面之精粹陆续秘密抽入北平城中，以为背城借一之计"。

△　张群以中华民国抗日军四川后援会筹备委员名义电国民政府，要求中央调陕、鄂部队北上抗日，陕、鄂两省改由川军驻守。次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表示赞同。

4月23日　滦东日军开始撤走，留下伪军李际春、程国瑞等部驻守。第三十二军商震部李杏村师跟踪占迁安，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翁照垣师占卢龙。

△　日军从晨起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猛攻，另一部由左翼迂回进占小桃园一带高地，并续进企图侵

占大小新开岭，遮断我南天门后路。我军激战竟日，打退日军进攻，并将已失之小桃园等高地收复。翌日及25日，敌又连续进攻，终未得逞。

△　革命先烈李大钊遗榇，经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安排，公葬于北平香山万安公墓。上午8时由浙寺发引，各校师生及市民700余人参加送葬，至西单举行路祭，演说李生前事迹，唱国际歌。至西四，学生散发传单，宪警以“妨害治安”为名，捕去学生40余人，并于5月6日将其中15名押解南京。

4月24日　李济深由港电促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缪培南、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人北上抗日，内称：“西南对出师已数度会商，而顾虑太多，持重过甚。抗日主张虽屡次标为口号，而事实未见诸实行，最近且闻有决不出师之定议，此尤足令人失望。”并指出：“若复觍颜苟安，划地自守，则国终不国，何有于省？”

△　何应钦电令第三十二军商震部由滦河地区向平谷、三河、通县一带撤退，以防日军由兴隆、古北口南侵。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为筹集“剿匪”经费，向汉口商界摊派善后公债300万元。汉商界几经抵制，是日开联席会议，决定只认销50万元。

△　江西南昌各界“协剿会”决定强拉民丁修筑南昌城防、道路，拨经费12万元。

△　国民政府特派李仪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王应榆为副委员长，原任朱庆澜、李协免职。

△　甘肃红水县改名景泰县，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

△　美国政府于19日宣布放弃金本位，抬高银价，致使上海标金

暴跌，18日收盘为1076.7元，22日最低价为933元，25日更跌至899.5元。大英、荷兰等银行趁机在中国收购白银，是日，由上海运美100余万两。

4月25日　　行政院聘任张嘉璈、钱新之、李铭、陈光甫、虞洽卿、刘鸿生、史量才、荣宗敬、徐新六、唐寿民、胡筠、穆湘玥、王晓籁、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王志莘、杨永泰等36人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

△　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趁日军向长城线撤退跟踪前进，何应钦恐日军回击，是日电令何“至多占领昌黎后，可暂行停止前进”。

△　黄郛在南昌晤蒋介石。蒋说明个人无力同时应付“剿共”军事与华北危局，要求黄担负华北党政军重任，以筹统一之效。黄鉴于自己既非国民党员，且军事已有何应钦主持，仅应允负责对日交涉及华北政务。

△　外交部照会日驻华使馆，抗议汉口日海军陆战队擅设电台，私与长春等处通报，妨害中国电政特权；日本电政局未经中国方面同意，擅将长春日电局名称改为“新京”，违反中日电约规定，要求日政府迅速制止。

4月26日　　吴铁城密电汪精卫转告所接港方密报，胡汉民反对西南实力派先行“剿匪”，内称：“陈（济棠）蔡（廷锴）多日会商先剿匪，后北上，大致已决定。……援热总指挥香（翰屏）与蔡暗争，蔡亦不欲将部队交别人，致总指挥问题今尚未决。政客方面（指胡汉民）现极力反对剿共，与实力派发生意见争执，曾以全体离粤省恫吓，新粤系军人缪培南等对政客极不满，蔡昨来港晤胡，劝勿操纵时局，致碍剿共进行。”

△　日军连日来攻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不逞，是日增第四旅团加入战斗，飞行队主力协助，并使用烟弹射击。第二师黄杰部伤亡甚

大，由第八十三师刘戡部接防，下午在日军猛攻下刘部放弃中央据点421高地。

△　北平军分会会议，何应钦、于学忠、宋哲元、商震、徐永昌、庞炳勋、傅作义、蒋伯诚、万福麟、王树常、荣臻、鲍文樾等出席，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为阻止方振武抗日救国军行动，破坏冯玉祥联合义勇军组织抗日同盟军，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一、河北省境内义勇军、救国军等名目一律取消；二、如有仍用义勇军、救国军等名义，勒收枪款或骚扰地方者，各该地驻军长官须严厉制止；三、由关外归来仍主张抗战之义勇军，调后方改编；四、非正式军事机关，应严密检查取缔。除分令外，29日由何应钦电告汪精卫。随后，将冯占海部改编为第九十一师，邓文、邰斌山、檀自新等部改编为骑兵第十师，李忠义部改编为骑兵第二十四旅，刘震东部改编为骑兵第二十五旅。

△　江苏高等法院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名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等当庭申明上诉。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同盟章程，规定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为营救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而奋斗；设总会于上海，设分会于国内各重要都市。

△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四川各军驻京代表会议，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刘存厚分别派代表出席，蒋介石要求川中各军全力“剿匪”，限期肃清后再谈出兵抗日。30日结束，各代表分电各川军首领报告蒋所授旨意。

4月27日　蒋介石电令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任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兼任鄂西“剿匪”总指挥，毗连鄂西之湘省团队及鄂西驻军均归其指挥。5月26日，徐在江陵就职。

△　陈诚令周浑元率第五师及第五十三、五十九师各一部组独立支队进攻金溪。翌日，又令驻东乡第五十三师及驻南城第二十四师各一个团配合。29日，红军主动放弃金溪。

△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进袭兴隆之敌，一举攻入县城，将残敌分别围困于县署及兴隆山。日军第八师团长急调柴河守备队及承德日军往援，遭我掩护部队阻于中途。正待将被围之敌聚歼时，何应钦以“主力应避免决战”，急电令萧部转移。萧遂命第一三二旅旅长于兆龙率两个团附一山炮连留置兴隆，陆续将主力转移墙子峪附近。日援军趁我主力撤走，于30日急进兴隆，猛扑城内我军，另一部日援军亦于5月1日赶到。我军在腹背受敌下，一面阻击日援军，一面以炮火猛袭县署，房屋几乎全被摧毁，日军藏匿地窖中。此时何应钦以“策应古北口之战”，再命萧部将主力集结关内。萧部不得不撤围而去，使其功亏一篑。

△　外交部为日军侵入河北照会日驻华公使，指出“似此肆意侵略，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实属违法背理，应与其侵占东三省、山海关及热河负同样责任”。

△　何柱国部骑三师杨团、王以哲部翁照垣师分别进占昌黎、抚宁，伪满军分向留守营、界岭口撤逃。同日，何应钦电令何柱国“骑兵可用全部协同铁甲车前进，以便早日恢复交通；步兵主力不可离滦河过远”。翌日，再令何柱国“此后步兵进至昌黎为止，其骑兵全部可相机搜索前进”。

△　前清两广总督、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岑春煊在上海病死。

4月28日　日军27日夜以新增第十七联队第二大队夜袭南天门东侧高地，守军受创，是日南天门陷敌，第八十三师刘戡部退守磨石山、大小新开岭等处阵地。南天门之战历时八昼夜，我军“伤亡共3000余人”，日方披露日军战死80人，伤336人。

△下午，日军四五百名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五等部进犯多伦。

△　国民政府令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史。翌日，黄赴南昌向蒋介石请示处理“新变”方针。

△　国民政府派胡世泽为中国出席国际禁烟顾问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代表。

△　伪满将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及局长鲁德义免职，并驱逐出境。30日，苏军用机两架飞越满洲里边境；5月1日，苏驻满洲里税关人员撤回，形势顿趋紧张。

4月29日　多伦失陷。多伦在日伪军优势兵力进攻下，守多伦晋军赵承绶骑兵旅不支，是晚弃守多伦退沽源。日伪军占多伦后分两路向沽源进犯。

△　何柱国部骑三师杨团一连由昌黎进抵北戴河附近。翌日，师长王奇峰命刘团向北戴河增援，经与伪军李际春、赵雷部战斗后，5月1日伪军撤走。

△　蒋介石以第四次“围剿”以来迭受巨创，手令刘峙、陈诚要求各将领“运用其智慧，振作其士气，不限时日，不定地区，相机应变，因地制宜”，“在《孙子吴子兵略问答》中研究明澈”。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反省院条例》。

△　国民政府任命樊崧甫为第七十九师师长，原任王锦文辞职照准。

△　国民政府聘任宋子文、朱培德等40人为全国航空建设会委员。

△　日拓相永井及两次官与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协议满洲一般产业及移民开发根本方针，决定创设农业、林业、畜牧、金矿等日、“满”合办各种重要产业会社；并决定设立满洲农地拓植会社开发农地及移民。

4月30日　何应钦令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开往昌平集结，以备接替第十七军防务。傅立即率部开拔，于次日下午4时前全部抵达昌平。

△　江苏南通大生纱厂工人因反对减工早已酝酿罢工，近日该厂经理李升伯强制女工剪发和购置该厂所制服装，更激起工人愤慨，是晨6时宣布罢工。厂方派警团实行镇压，工人8000余人遂离厂。

△　武昌民生纱厂经理汪镜甫出布告宣布减工，工人以事先未预闻，派代表向汪要求收回成命。下午6时，交涉尚无结果，上下班工人集于厂门内外不能进出，厂方以维持秩序为名，向戒严指挥部请军警向工人射击，五名重伤。工人愤而将办公厅门窗、家具捣毁，军警见势不妙脱逃。当晚经工人代表向厂方严重交涉，厂方被迫贴出不减工布告。

4月下旬　冯玉祥令调山西汾阳军校3000余人取道太原、大同到张家口，改编为第二师，由支应遴任师长，作为冯组抗日同盟军的基干武装。

△　方振武部抵达定县，何应钦派黄绍竑前往改编，拟编为两旅，以鲍刚、张人杰分任旅长，遭拒绝。方部继续步行北上，到达徐水、满城附近。

是月　国家社会党在天津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选出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罗隆基、诸青来等11人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并以张君劢兼总秘书。其纲领共98条，要点为：“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政治制度中使专门家占

有地位，以减少党派操纵与捭阖之作用”，“确认私有财产”，“确立公有财产”，“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渐趋于平衡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保障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等。

△　云南丘北地区苗族佃农为反抗官府及豪绅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起而暴动。丘北县长黄守义率团队一二千人前往镇压，遭苗族佃农沉重打击，至5月间在县府镇压下平息。

△　东北协会常务理事吴铁城、史量才、王晓籁、林康侯、齐世英向国民政府呈称：该会接济东北义勇军以现在关外之义军为限，并拟派人赴东北分设秘密机关，为指挥及接济联络之用，要求政府每月拨助二三十万元。

△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建立，在港正式发送新闻稿。

△　“中国童子军励进社”成立，由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主任、“三民主义力行社”候补干事干国勋兼任主任委员。社员多系各省、市从事童子军工作人员，约300余人。

5月

5月1日　　国民政府特派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何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总司令；刘峙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3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上述任命之追认及各路司令部暂行组织大纲。6日，国民政府核准施行。

△　鄂豫皖红军一部向鄂东麻城进击。13日，在黄安七里坪与万耀煌、汤恩伯、李思愬等部战斗。

△　日驻华公使有吉明照复外交部长罗文幹，诡称日军侵犯河北省境系“本身之自卫及确保满洲国国境之安全起见，遂不得已而采取

必要之行动”。

△　南京、天津、北平、上海等市工人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严加戒备。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集会时，50余人遭军警拘捕，自救会会所被查封。天津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电请全国工人一致武装抗日。

△　国民政府派萧继荣、谢东发为出席第十七次国际劳工大会政府代表。15日，派李永祥为劳方代表。

△　台湾实施《外汇管理法》。

5月2日　　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制定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作战方案后返抵长春。同日，日陆军省发言人就滦东形势对记者谈话称：如华军继续在“边境挑衅”，则日满联军将有严厉应付之充分准备。4日，又再次发表同样声明。

△　汪精卫密电福建省府主席蒋光鼐称：“如仇货风潮发生纠纷，地方当局应注意设法勿令事态扩大。”

△　国民政府令免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本兼各职，着即来京，另候任用；同时发布命令告诫新省民众“各安所业，静候办理，毋得聚众越轨”。汪精卫另电新疆省府各委员、厅长，要求“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和辑军民，嘉靖地方”。同日，黄慕松由赣返京，作赴新准备。

△　川军田颂尧部进占通江。上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巴中交界处得胜山一带重创川军田颂尧部后撤离通江。是晨，田部罗乃琼、李炜如两师进占通江。田致川省旅外人士“报捷”电中称，是役“川军伤亡千人以上”。

△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鲍

致词称：“苏联政府于最初之时，即宣布以完全平等并真实尊重中国国民权益为根本政策，此种友谊政策于过去及现在均实行之，始终未渝。”林森答词称：“国民政府以为中苏邦交之恢复及发展，乃促进世界和平之一法，将不惜努力。”

△　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太田提议出售中东路，太田立即电告日政府。4日，日外务省次官有田与苏驻日大使尤列涅夫作私下商议。

5月3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下达关内作战命令，令第八师团到石匣镇附近继续实行攻击，将第十四旅团主力配属第六师团攻击当面华军；令独立守备队将第五十联队主力派遣至山海关附近，入列第六师团指挥；令第十四师团将一步兵旅团及骑炮联队主力派遣至山海关入列第六师团指挥；令第六师团以一部占领永平及迁安一带，以主力从迁安上游给华军以彻底攻击，并令飞行队协助。同日，日外务省发言人称：长城以南如再发生战争，其规模当较前为大。上海日领事馆发言人表示：如华军继续向日军“挑衅”，战事将危及平、津。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独立第三十六旅旅长戴岳在江西“剿匪”有功，升任为第四十六师师长。

△　国民党“剿匪”南路军粤军独立第一师与福建军区红军在上杭水西渡战斗，粤军一个营被红军歼灭。

5月4日　　国民政府依国民党中政会决定，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令派黄郛、黄绍竑、李石曾、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指定黄郛为委员长。同日，公布《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并撤销北平政务委员会。

△　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孙殿英、吴光新、魏宗瀚、秦德纯、

门致中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杨虎城免职；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邵力子免职。

△　驻榆关日军以华军进驻滦东，“威胁”伪满为借口，要求何柱国部退回滦西，并限6日晚7时前答复，“否则派空军轰炸”。6日，何往平、津向何应钦、于学忠请示应付办法。

△　日陆军省发言人为滦东局势发表声明，诬蔑中国军队“挑战”，为再次进犯制造借口。

△　白崇禧电国民政府请辞“剿匪”军南路副总司令职。6日，国府复电慰留。8日，白再电请辞。

△　蒋介石电上海筹募豫鄂皖灾区临时义赈会催交赈款。11日，又电该会称：“前筹汇之十万元早经如数告罄，现在各处呈电交驰，待赈万急，务希即将认募余款早日扫汇。”

△　教育部令各省、市教育厅、局严格遵行中小学毕业会考；各省、市如有不遵照举办或学生个人有不参加者，均否认毕业资格。

△　中德文化协会在平成立，丁文江、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17人任理事，朱家骅和德驻华公使陶德曼任名誉会长。

△　福建省闽侯县析置为福州市及闽县、侯官两县，厦门设市，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

△　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离长春往东京赴任。

5月5日　　湘赣军区红军李天柱部是日及翌日在江西莲花册水坳一带与湘军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激战，消灭陈部一个团。8日，陈向何键报告称：是役陈部伤旅、团长各一名，营长二名，被打死营长三

名，连、排长及士兵伤亡七八百名。

△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汪精卫主席并致开会词称：行政院设立该会，目的在于“集中朝野力量，筹集巨款，分途救济，充实金融，改良技术，发展交通，调剂粮食，期于抗日为巩固后方之图，于剿匪收釜底抽薪之效”。委员穆湘玥提出保障农民安全、统一辅币、整理铁道运输、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等四项拯救农民办法。会议通过设立技术、经济、组织三个组并设立各省分会，于6日闭会。

△　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趁新乱由甘肃酒泉第二次入新疆。先遣其弟骑兵旅旅长马仲杰于上月20日进占木垒河，击溃守军黎海如部，继迫奇台，马仲杰战死。是日，马仲英率部抵木垒河，月底攻占奇台、孚远。

△　天津恒源纱厂因纱业不振，不遵党政当局八折以上发薪规定，是日以“五五”放假为名，突然宣布停工，并事先请来保安队在工厂四周布防，驱赶工人。全厂2700余工人顿时生活无着。6日，工人千余名赴市党部、社会局请愿。7日，工人景留生服毒死在该厂门前以示抗议。至6月20日，经社会局与该厂御用工会达成协议，工人被迫接受工资七五折的条件复工。

5月6日　　国民政府委员、原交通部长及第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由欧洲回国，是日抵港。蔡廷锴、邹鲁、香翰屏等往迎。陈表示：第十九路军负民族的使命，继续抗日。7日，陈偕蔡、香到广州后11日返港。蒋介石、汪精卫电邀陈到京，陈未允。

△　蒋介石密令浙省府主席鲁涤平将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扣押。刘前奉蒋令调由鲁入赣“剿匪”，因蒋策动该师驻福建浦城独立旅脱离该师，直隶中央军交鲁涤平指挥，刘不服，离江西河口防次到杭州。蒋借口刘未遵令及时返防，乃有此举。19日，国民政府以“破坏

法纪，违抗命令”为由，明令将刘褫职查办。军政部令该师副师长梁立柱代理师长。

△　日参谋本部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下达上海武官、平津特务机关并通报关东军，要求于6月中旬实现。其要点为：日军继续进行强压方针，沿长城线对华军进行反复、彻底打击，并继续进行华北的内变策应工作，促使华北、华中、华南自行分裂。作为停战条件，中国方面应主动撤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以南以西地区，切实取缔排日活动，条件成熟时签订停战协定。

△　日驻华使馆武官根本博在沪晤黄郛，以华军在前线仍时有局部“挑战行为”，向黄示意关东军决心再次出击。黄即电军政部次长陈仪，略谓：“前线步骤参差，致因局部而牵涉全线，引敌前进，将无止境”，嘱陈密陈汪精卫“严密注意，妥为纠正”。

△　闽省福清县税局因任意加征营业税，殴打拘押店主，被商民数百人捣毁，局长被殴。商店罢市，各店门首悬“不惩捐蠹，誓不开市”纸旗。

△　天津《大公报》载杭州通信称：浙江杭州织绸业，因受农村衰敝、金融呆滞及北方市场断绝之影响，全市机户6000余张、大小绸厂130余家大部停工，失业工人达一万五六千人。

5月7日　　日军第六师团再次进犯滦东地区，次日平贺、常冈部队占抚宁，高田部队占迁安。驻抚宁翁照垣师退卢龙；驻迁安何柱国部骑三师退滦西。

△　前湖南督军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遇刺，8日晚在德国医院毙命。刺张为复兴社特务处特派员郑介民指派天津站、北平站所为，旋以锄奸救国团名义发表通电和通启，揭露张受敌人收买，以数百万巨款在平、津阴谋组织便衣队，捣乱华北治安，并警告其他汉奸分子以张的下场为戒。按：张敬尧为日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收买，化

名常世古在平、津从事汉奸活动。

△　四川内战再起。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上年居中策动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停战后又阻第二十四军回驻成都，遂举兵攻邓。5日，刘部王元虎师与邓部黄隐师在崇庆石羊场接仗，是日扩及简阳、温江、仁寿一带。9日，刘部占邓部在成都之税收机关。邓锡侯驰赴新都调集兵力，从灌县起沿毗河构筑工事布防，并电田颂尧请援。

5月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项英暂行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线移到瑞金。

△　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侵略华北声明，诡称因“华军执拗的挑战”，“威胁承德”，日军“不能再受华军之挑战，决定起而加以大打击”。同日，日驻华公使复照外交部，为侵略河北诡辩。

△　方振武率部开抵宣化，发表援察通电略称：“迭接前方各友军电告，倭寇西侵，凶焰益炽，沽源垂危，察省告急”，表示“率所部星夜驰援，冀复国土”，“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　东北义军千余人攻占宁安东京城，伪军全部缴械。日军宁安守备队往援，至10日义军撤走。

△　国民政府令派刘存厚为第二十三军军长，萧之楚为第二十六军军长。

△　宋子文6日抵华盛顿，是日起开始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9日发表联合声明称：“美总统与中国财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　外交部电令驻苏大使颜惠庆就苏联出售中东路事向苏联政府

提出抗议。同日，外交部长罗文幹召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明中国政府对此事之态度。

△　法国驻日大使玛尔泰访日外务次官有田，查询中东路售卖问题，并提出法国曾投资道胜银行，中东路与法国有极大利害关系，提请加以充分考虑。

△　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刘镇华、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参谋长曹浩森以及徐源泉、上官云相、梁冠英、张印相、万耀煌、彭振山、汤恩伯、郭寄峤等将领在湖北绥署举行会议，重新部署“剿共”军事，决定以十个师为“围剿”部队，其中四个师从事“追剿”，六个师从事堵截。12日，刘镇华赴南昌向蒋介石报告“围剿”计划并请款。

△　蒋介石在崇仁总指挥部讲演《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同日，电令豫、鄂、皖、苏、浙、赣六省府主席及保安处长称，“以后训练民团及保安队之训育与精神教育，要以总理所著《军人精神教育》与中正所编《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为标准，考试时尤应注意此二书”。

△　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召集会议，讨论地方自治问题。

5月9日　　外交部为苏联出售中东路发表声明，指出：中东路仅中俄两国享有合法权益，中东路一切事宜应继续依照1924年中俄两国所订协定处理，不容第三者干涉，任何新订办法未经中国同意者应视为无效，中国政府绝对不予承认。驻苏大使颜惠庆亦于同日向苏外交人民副委员加拉罕面致节略，加拉罕矢口否认有售路之举。

△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商会等团体电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表示苏联出售中东路，“中国民众绝对不能承认”。11日、14日，上海钱业公会、银行公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上海大学教联会等团体纷纷电苏外交人民委员及苏驻华大使表示反对。

△　日军占卢龙，翁照垣师退滦西。滦东各地悉被日军侵占，中日两军复成隔河对峙状态。

△　绥远省地方保卫指导委员会代表到平向何应钦请愿并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大员，加调劲旅增防绥省。

5月10日　日军第八师团步兵第十七、三十一联队各一部在炮火掩护下进犯大小新开岭一带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守军阵地。刘部奋起御敌。夜，日增加兵力向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大举进犯。同日，日军六师团下渡滦河命令，常冈部队攻占永平。

△　上海英美烟公司一、二、三厂工人万余人，因厂方继续将工时减为每周三天，工资减半，宣告罢工。18日，厂方允每周开工四天，停工期工人损失再作调处。工人先行复工。

△　宋子文在华盛顿语记者称，与罗斯福总统对将在世界经济会议上讨论之关税、银价及其他经济币制等问题，意见已趋一致。又称：在伦敦会议上，中国最大目的在稳定银价，中国赞成美国建议，成立关税休战协定。

△　湖北省蕲水县改名浠水县，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

5月上旬　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向中共驻北方代表机构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报告张家口行将崛起的抗日同盟军酝酿准备情况，要求派得力干部承担这一工作，即由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邹春生、王少春等到张垣，成立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

△　陕西省临潼、凤翔、扶风等19县遭受黑霜、狂风、冰雹之灾，庄稼悉被摧毁。

5月11日　李维诺夫对“塔斯社”谈话，承认确曾对日驻苏大使太田提起“由满洲国赎回中东路之可能，意即由苏联以中东路出卖于满

洲国当局，作为解决目前困难之一最彻底方法”。并称：“中苏及奉俄协定中均未曾规定中国在合法期限前有赎回中东路之权，亦未曾限制苏联以该路售之他人，尤以对方为满洲之一现存势力，且在实际上行使中苏及奉俄协定中之华方权利义务者。”又称：“中国政府十八月以来，既未能完尽中苏及奉俄协定中之义务，遂使中国政府失去自协定所取得之正式及道德权利。”同日，加拉罕接见颜惠庆，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售路与伪满。

△　日军继续猛攻我第十七军各阵地。小桃园、笔架山、郝家台等阵地相继失守。守军第八十三师伤亡重大，下午3时后撤，由第二师接防。日军在空军、炮兵配合下复向磨石山、大新开岭、小新开岭等处进攻，守军与之肉搏。

△　何应钦、黄绍竑密电汪精卫，要求由黄郛或陈仪与日方商谈，“在双方默契之下，以整理战线为言，指定某一线上为双方同时撤退地区”。又密电黄郛，要求在沪与日人接洽，“寻得和平途径”。

△　湖北省增设礼山县，由黄陂、孝感、黄安、罗山等县析置，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

5月12日　日军渡滦河西犯。第六师团主力松田、高田部队及服部旅团分由东寨庄、西寨庄、小营、吴庄、潘家口等处强行渡河，突破何柱国、王以哲等部阵地。

△　日军第八师团以战车为前导，配以飞机、大炮继续猛攻我第十七军各阵地，双方在小新开岭左翼405高地展开激烈争夺。同时敌战车八辆由白河涧大道向我瑶亭冲击，被我守军击毁战车一辆，敌始向北回窜。我第二师黄杰部上日接战以来，“伤亡官兵2000余人”。

△　日机九架次飞密云轰炸。

△　黄郛密电何应钦、黄绍竑，告以连日在沪与日方接洽情形，

推测日军必进至密云，建议“大胆下一决心，用极速度撤至后方密云约二十里炮程不及之地如牛栏山一带从事整理，则无益之牺牲可以减少，对外之运用较为便利”。翌日，又将上述内容分电蒋、汪。14日，何应钦、黄绍竑复电同意，定18日前撤至密云、平谷、玉田、蓟县、唐山之线，要求黄从速与日接洽，求日军保证停止进逼。

△　行政院决定停止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后，商人发起自由参加，获旅美华侨赞助，仍决定以政府名义参展。是日，国民政府令派容揆为芝加哥博览会中国驻会代表。

△　张学良在罗马谒见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　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全市童子军总动员，即日起出发征募“航空救国”基金三天。沪市征募“航空救国”基金业已两月，所获仅及预定200万元之半数。

△　上海大中橡胶厂诬指该厂组织工会的工人为“反动分子”，勾结上海市公安局将周惠华等三人拘捕，并吊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发许可证，指为伪造。经该厂工会筹备处向公安局交涉后，公安局被迫释放工人，发还许可证。13日，厂方竟宣告停工，并雇用打手将工人驱散。该厂工人遂组被迫工人呼吁委员会，于6月9日向行政院呈文控诉。

△　陆隐耕为领队的天主教罗马朝圣团乘意大利邮轮启程赴罗马。

5月13日　行政院会议，由外交部长罗文幹报告关于中东路问题交涉经过，经讨论，决定由外交部提抗议书，当晚电驻苏大使颜惠庆送致苏人民外交委员会。

△　北平军分会决定放弃南天门一带阵地，将守军第十七军撤至石匣以南九松山一带，并派员与日武官永津密洽，乞求不再追击，达

成默契。同日，徐庭瑶令第二师后撤，日军占南天门石匣镇，古北口全失。徐部第十七军在古北口伤亡重大，14日调密云整理，由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接防九松山预备阵地。17日，徐部复奉命调驻怀柔、顺义线。

△　第四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令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与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于黄昏时向唐山、丰润之线以西地区撤退。

△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根据“华北应急处理方案”，命令第八师团主力驻石匣镇附近，保持对北平重压的态势；第六师团主力驻遵化附近，保持对平、津威胁的态势；其余所有在关内作战的日军行动范围，以密云、平谷、玉田、丰润、永平以北之线为界，以待时局变化。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委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赴驻沪德领事馆递交联名签署的《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抗议希特勒法西斯政府对工人、进步文化人士、共产党人逮捕、残酷迫害与屠杀，摧残文化事业，焚毁书刊等暴行。

△　国民政府特派宋子文、郭泰祺为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代表。19日，又加派颜惠庆为代表。

△　国民政府令免王广圻驻波兰兼捷克特命全权公使本兼各职，遗缺以李锦纶继任；免张履鳌驻智利特命全权公使职，遗缺以张谦继任。

△　刘文辉、邓锡侯继续在郫县、灌县、崇宁（今彭山）一带大战。是日行政院电令刘文辉、邓锡侯各将所部退回原防，听候查处，并电刘湘以诚意切实调解。

△　河南焦作英商福公司工人因要求援例发给烧煤并反对包工剥削，向厂方交涉无效，酝酿罢工。是日公司总经理代表蔡克士率厂警

挨户拘捕工人，工人群起反抗，蔡竟命厂警开枪，击毙二名，重、轻伤多人，工人立即罢工。14日，焦作各界组五一三惨案后援会，推代表向省府请愿。15日，福公司矿区民众代表通电各界声援。

△　江苏南通大生纱厂工人罢工后，厂方竟勾结县长，出示布告，趁机开除工人千余名，并贿请县警队、实业特警队、省保安第一团武装驻厂。工人即往中国纺织学会年会开会处向董事长张孝若请愿。是晚，实业特警队将工人17名拘捕，殴打逼供为“共党”。翌日，工人往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在返回途中，被省保安一团开枪击毙一名，重伤八名，轻伤甚多。17日，南通县城区纺织工会向实业部呈控，该部以“已据情咨请江苏省政府核办”了之。

5月14日　陈济棠、蔡廷锴联名电何键称：粤、桂、闽抗日部队开拔入湘，均先集中湖南郴州。翌日，何在湘省府纪念周上谈话称：闽、粤、桂三省此举，纯系“剿匪”、抗日双管齐下之救国行动，并无其他作用，已电令沿途经过各县妥为招待，并复电陈、蔡表示欢迎。

△　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遵外交部令，向苏副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递交抗议书，内称：中国政府受武力压迫，暂时不能行使中东路管理权，固不能影响中苏协定之效力及中东路之地位。苏拟将铁路出让，是不啻承认伪国，援助侵略。声明该路为中苏共有，非得中国同意，不能处理。

△　作家丁玲、潘梓年在上海租界地区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应修人前往访丁，遭留守特务拘捕，应与之搏斗，坠楼而死。丁被解往南京。23日，文化界人士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洪深、邹韬奋、柳亚子等38人电汪精卫、罗文幹要求释放。

△　黄郛由沪启程北上。15日，黄到京与孙科、居正、罗文幹、陈果夫、叶楚伧等人交换意见后渡江北行。

△　中国考古会在沪成立，以“搜考古迹、古物，发扬本国文

化”为宗旨，选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杨杏佛等19人为理事。

5月15日　丰润失陷。北平军分会令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各部撤守蓟运河西岸。次日，各部开始后撤。

△　美国驻津总领事馆紧急通知临近战区各地美国学校、教会、教堂一律关闭，所有美籍教员、教士、侨民均到津避难。

△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称：日军已击破长城附近华军，如华军抛弃挑战态度，由长城线撤至滦西，则日军亦复返长城，否则日军将继续“反击”。

△　日本当局与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忠一（日人）在东京会商中东路问题。日本以国际视听及中苏、奉俄协定关系，决定名义上由伪满收买，日居中斡旋，由日、苏、伪满在东京开谈判会议。29日，日本将上述提议通知苏联。6月3日，苏答复接受，并提议6月25日开会。

△　中共中央委员、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原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被捕时化名施义，后因叛徒出卖，8月被引渡中国当局，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　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接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军长黄守中、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独立第七支队司令周汉电，指责国民政府将大批军用飞机用于内战而不调赴抗外战争，要求转促国民党中央速调飞机北上抗日。

△　国民政府任命第八十五旅旅长李汉章为第七十四师师长，原任乔立志免职。

△　北平文化总联盟发表宣言，号召各文化团体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反动文化宣传作斗争，深入开展反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巩固和扩大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

△　《远东月刊》在上海创刊，张军光主编。

△　前北京政府浙江督军卢永祥在天津病死。

5月16日　日军服部旅团攻遵化。宋哲元部王团抵御，团长王淦尘受重伤，该团官兵伤亡逾半，傍晚遵化失陷，宋部西撤。同日，日军占唐山，开滦矿停工，何柱国部撤至卢龙等地。

△　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刘镇华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吴忠信准辞本兼各职。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即日起恢复征收进口货物之关税附加税和救灾附加税。中日关税协定是日期满，进口日货亦一律照征上列两项附加税。

△　四川通江、南江、巴中等县民众代表张子贞、李正权等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控诉田颂尧横征暴敛，残害人民，称："通江、南江每年正税不过二万元，而勒派则在四十万以上"，"其苛酷前所未有"。要求将田颂尧免职严惩。

△　美总统罗斯福向参加世界经济会议44国发出声明书，提议订立世界不侵略条约，呼吁各国政府减少军备，取消侵略武器，禁止派遣军队超越国境。

△　全美华侨救国团体代表大会在华盛顿召开。

5月17日　黄郛抵平。车达天津时发生投掷炸弹事件，随将路过铁路、年仅17岁之清洁工人刘庚生（一作刘魁生）逮捕，诬其"受日人指使"，予以枪决。黄在津听取于学忠关于前方军事实况报告后接见记者称："外传本人到平后，有与日本妥协说，殊属不确。本人想此时中华民国国民无一人敢来与日本妥协……本人当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下午抵平。经与何应钦磋商后电召宋哲元、商震、庞炳勋、何柱国等到平会商。

△　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密电蒋介石称：日军不到平、津之表示绝不可靠，“如中央决守平、津之线，最后之打算不可一日再缓”，“白河线万一不守，平、津两处须早为守城准备……我大军若退过平、津之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洲国亦意中事”。

△　广东各界数万人在中山大学召开欢送粤、桂、闽三省抗日军北上大会，将“忠勇杀敌”旗三面分赠三省抗日军。粤军潘彪团即日乘车赴韶关。

△　红四方面军在南江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粉碎川军田颂尧“围剿”的部署。

5月18日　西南政务会致电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联政府，指出：满洲与热河为我国主要部分，万不能容认其分割；日本参谋本部正就解决满洲与热河事件与中国政府当局秘密进行交涉，其所提条件与国联贬责日本对满政策与行动之决议及《九国公约》之规定相抵触，且极端漠视中国独立主权；全国人民决不承认此种压力下之妥协。

△　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令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挥下担任接洽停战任务，以密云、平谷、蓟县为日军追击范围，中国军撤退到顺义、宝坻、芦台以西。翌日，关东军司令部电询板垣征四郎策反工作有无希望。

△　黄郛接见北平各报记者，宣称：“余奉派来此办理一切，总不违中央意旨。……外交方面，决秉承中央意旨办理，而希望于互相谅解之程度下，谋一和平解决办法，借以维持大局。”同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代表王葆真致函黄郛，反对对日妥协，指出不能“求一时之苟安，贻无穷之浩劫”。

△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奉北平军分会令由蓟县向三河一带撤

退；第十七军徐庭瑶部由密云撤往北平城内及市郊，“以为背城借一”。日军步步跟踪。同日，占唐山日军沿铁路线侵占胥各庄、塘坊。

△　武藤命日军第八师团向密云一带挺进；第六师团以一部向蓟运河线追击；驻赤峰骑兵旅团主力快速转向玉田一带。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无条件接受罗斯福声明书。同日，汪精卫电黄郛称：美总统声明书将使“国人兴奋，以为得此声援，无须对日缓和，但远水不及近火，此时务须依预定政策，保全平津，徐图转圜”。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地方自治指导纲领》，该《纲领》分引言、指导原则、指导方针、指导程序、附则五个部分。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撤销湘鄂赣边“剿匪”指挥部。

△　蒋介石电促何键从速组西路军总部，即就西路总司令职。西路军经蒋定为三个纵队，共14个师两个旅。

5月19日　汉奸郝鹏、石友三等受日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指使，以“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名义在津举行暴乱，袭击保安队。日军并与之配合，在八里台及南开大学等处将中国保安队缴械。天津地方当局为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将日租界附近岗警20处撤退。次日，黄郛遣程远帆携款赴津安抚暴乱之汉奸分子。

△　日军第八师团陷密云，东路日军服部旅团陷蓟县，宋哲元部退抵三河、香河一带。

△　宋子文与罗斯福会谈结束，发表联名公报，略称：“关于解决今日世界主要问题所必须采取之种种实用办法，彼此意见一致”，“非先实行军备之缩减，不能解除经济之困难。”对中日问题，表示“信赖此种敌对行动不久即可停止”。“白银为东方交易之主要标准，故其价

格应当提高并使之稳定”。“整理中国及世界经济状况所必需之其他办法，意见亦极一致”。下午，宋由华盛顿赴纽约。

△　林森电复罗斯福表示赞同16日声明书，并称：“中国现已为侵略之牺牲者”，“此次外国侵略已使中国国家政治及经济之组织动摇”，中国政府对罗提议各点“较之任何其他政府更为切望”。

△　国民政府任命戢翼翘、胡毓坤、邹作华、张焕相、高维岳、刘尚清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派何其巩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王树翰、王克敏分别兼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政务、财务处主任。

△　蒋介石电令第一军陈继承部由河南潢川开赴鄂南。6月，陈部抵大冶，编入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三纵队。

△　行政院令财政部及江、浙两省，将二十年度封存未发之丝业公债200万元发行，由财部认付利息，江、浙两省府分担还本。又令实业、财政二部会同江、浙两省妥筹根本办法，以挽救丝业凋敝。

△　安徽旅京同乡会为刘镇华主皖事推代表向汪精卫请愿，要求：一、刘主皖不得带军队随同到任；二、各厅长人选不得以军人充任；三、不增加人民负担。

△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谕令特务团将福建龙溪民众教育馆长兼抗日会常委林惠元逮捕，不加审讯，立予枪决，并宣布其“罪状”为“曾入共党，历次暗运械弹接济共党”。31日，宋庆龄、蔡元培分电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指出林未交法庭审讯，竟至冤死，“未免有沾贵军抗日荣誉”，要求予以昭雪。

△　刘文辉、邓锡侯两军继续在灌县激战。邓部竟将都江堰调节水量之马杈砍去部分，增高内江水位，图阻第二十四军渡河，致大量农田被淹没。

5月20日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为“五卅”八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平、津，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和投降政策，以及向苏维埃红军的进攻，并再次声明愿在三个条件之下同任何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电粤方中委唐绍仪、陈济棠等，对西南政务会19日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电表示“至为诧异”，指责为“无端轻信谣言，虚构条件，以耸动国内听闻，且宣诸国际，授人以隙”，要求粤方“共体时艰，并切实奉行政府所订计划，出兵围剿赤匪”。26日，上海、南京等市党部亦电粤指责。

△　爱国青年赵敬时怀利刃至北平日驻华使馆，刺伤日卫兵，当场被日兵逮捕。日使馆卫队长率日兵八人到平军分会向何应钦质问。日方借此事对停战谈判取强硬姿态。赵敬时至翌年2月始由日方交还北平公安局，黄郛派殷同前往研讯，以“小不忍几误大局”斥责后释放。

△　日军第六师团鲶江支队陷三河，松田部队占平谷。宋哲元部退白河右岸。日机11架次飞北平上空示威。同日，武藤下令第八师团主力向密云一带集结，保持对北平强压态势；第六师团主力在玉田一带集结，保持对平、津方面强压态势。

△　蒋介石电示何应钦：如日军进攻平、津时，“应即通知各国公使迁移驻地，并声明各国在平损失应由日本负责”。同日，又电示何：如日方要求在前方协商，“则万不可行”。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于本月在万源竹浴关地方消灭川军刘存厚部两个团。是日起又在通江柳林溪一带进攻田颂尧部主力王铭章等部，战线长200里，战斗历三昼夜。田颂尧电蒋介石称：是役官兵死伤千人以上，因伤亡过重，于22日移平溪坝整理补充。据《红色中华》报道，是役消灭田部七团之众，活捉旅、团长三人，打死打伤

营、连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

△　闽浙赣军区红军方志敏部分向福建浦城及浙江江山一带挺进。

△　国民政府任命胡世泽为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原任吴凯声免职；张乃燕为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原任傅秉常免职；金问泗为驻荷兰特命全权公使。

△　全国航空建设会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出席并致训词。宋子文、朱培德、史量才、钱新之、葛敬恩为常委，葛敬恩兼任秘书长。

△　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致函苏联政府反对出售中东路，指出苏“以扶持弱小民族相号召，以国际和平相标榜，竟欲乘敝国上下抗日之际，反予日本以援助，不知将何以自圆其说”。

△　段祺瑞电王揖唐、曾毓隽、陆宗舆、姚国桢、姚震、魏宗瀚云：“余养疴海上，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　《微言》周刊在沪出版，潘公展创办。

5月2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下设三部四厅，军务、机要、军机三部主任分别由熊式辉、杨永泰、贺国光担任；作战、谍报、团队编练、党政四厅主任分别由贺国光（兼）、晏勋甫、刘兴、朱怀冰担任。杨永泰兼任秘书处长。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部结束，23日停止办公。

△　板垣征四郎电复关东军司令部告以对华策反内变工作困难，因：一、华北反蒋部队缺乏统一号令的中心人物；二、反蒋派内容复杂，合流不易；三、反蒋派并非就是亲日派，更非就是亲满派；四、南京中央政府的威权尚未骤失，反抗中央的人仍多顾虑。

△　北平军分会召各路将领会议，历数小时无结论，惟决定在白河线作抵抗。此时各路守军继续后撤，溃兵涌入北平，强占民房，加之当晚有便衣队在平暴动之谣传，市民争相趋避出城。

△　午夜，汪精卫电北平当局，表示“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授权何应钦、黄绍竑、黄郛“便宜处置”。

5月22日　北平军分会通令各部撤兵，集中平郊，任徐庭瑶为北平城防司令，军政首脑机关作撤出北平之准备。三河、宝坻、密云日军分别占领香河，进逼通县、牛栏山，北平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同日，日陆军省军务局长山冈对外务省亚洲局长表示军部意向称：“日军仍基于既定方针，如华军不继续出于挑战之行为，则日军决停止进占平、津……依关东军迭次所声明，有将日军迅速撤回长城线之意向。”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则在长春对“路透社”记者声称：“为保持满洲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

△　黄郛召殷同由青岛到平，嘱赴长春从事侧面斡旋，与关东军洽商停战。

△　日参谋本部电令武藤转告板垣结束天津特务机关工作，催促武藤进行停战谈判，并指示签订停战协定后日军撤回“满洲国”境，但对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均须保留进驻权利。同日，武藤电令永津负责接洽停战，其条件为：一、中国军队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以后不得越线前进；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追击；三、日方于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同时嘱永津不必坚持中国派遣军使阵前求和。

△　汪精卫电黄郛，指示与日方谋停战，“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

△　晚12时，黄郛偕李择一至日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问宿舍与中山、永津、藤原会谈，永津根据武藤电令，擅自增加“今后不准一

切之挑战行为”及阵前求和等内容，提出停战条件四条：一、中国军队撤退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二、日本军亦不越上述之线进击；三、何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往密云对日本军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志；四、以上正式约定后，关东军司令官指定之日本军代表与中国方面军事全权代表，定某日某时于北宁线某地，达成停战成文协定。黄郛一一接受，翌晨2时谈判结束。4时30分，黄郛至军分会与何应钦、黄绍竑、张群、熊斌等商议后由何答复中山，表示对四项条件完全接受。

△　汪精卫在国府纪念周作政治报告称：“华北战事，我军虽因战略关系，不得已而撤退，然三月来前线将士壮烈之牺牲与今后继续奋斗之精神当为国人所共谅。”汪辩称：“今有人动辄以为中央无整个计划，试问中央如何能有整个计划？……其它各处军队或调不开，或调不动。所谓调不开，如江西是。更有人谓中央何不与赤匪妥协，如果妥协，不但可以抽调我军兵力，并得借其兵力以为御侮之用，此乃一相情愿之言。”最后希望留粤之部分中委到京“共负救亡责任”。

△　财政部以伪满截夺东北各关，收入受损，对原定进口税则重加修订，是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税则对棉毛织品、食品及未列名货品进口征税率有所提高。

△　全国华商纱厂减工一月期满，是日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开会，决定今后由各纱厂斟酌自身情形决定办法。上海恒丰、申新、永安、纬通等28家纱厂分别决定继续实行减工。

△　武昌震寰纱厂胁迫工人接受减少工资，延长工时，遭工人反对后又借口货物滞销，金融周转不灵，宣布停厂歇业，并请军警到厂对工人实行弹压。工人代表及武昌纺织工会分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政府及警备司令部请愿、控诉。

5月23日　晨，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认为：一、外交方面，近来英、美意见日益接近，对日斡旋，俾我得较有利之解决，当可做到，但恐缓不济急；二、军事方面，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听调；三、财政方面，宋子文赴美赴英，正在接洽，即使有望，亦缓不济急。对应付平、津危局的原则决定：（甲）如日攻平、津，惟有尽力应战，不可轻易放弃；（乙）如暂时休战希望尚未完全断绝，仍希继续进行，即在交战中，此种接洽仍不妨并用。汪精卫将上述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

△　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作守城之计，内称："此时人心惶惶，全在主将主宰在心，北平非死守不可"，"非至最后时不宜轻离北平。"

△　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联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与日方商谈停战情况及其条件，认为："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汪即复电表示支持。

△　日军第八师团第四、十六旅团进攻怀柔，占领怀柔南、石厂西一带阵地。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与敌展开猛烈拼杀，不仅击退敌人的多次冲锋，且将失去的阵地恢复。何应钦电令停火，限傅部于24日后撤至高丽营附近一带。傅拒不撤兵，何遂下手令强制执行。怀柔陷敌。此役傅部阵亡367人，伤484人。日方称日军"伤亡约300余人"。

△　日军以赵敬时刺伤日卫兵事件为借口，援引《辛丑条约》，22日要求由津调日兵500名到平"保护侨民"。黄郛、何应钦以"无法拒绝"，表示应允，并为之提供车辆运输。是日日兵携武器弹药开平。

△　陈铭枢偕蔡廷锴等由港到达福州。陈于17日离港时表示将在闽作长期逗留，不愿再作"冯妇"。陈到闽后即开始作发动福建事变之

准备。

△ 《北平晚报》因刊布停战内容之号外，遭军警搜查，发行主任被拘，北平军分会予该报停刊二日处分。24日，何应钦派代表陈楚雄召北平各通讯社、报社记者谈话，要求对军事、外交消息特别慎重。

5月24日 蒋介石自牯岭就停战条件电复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表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但认为“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要求签订正式条款时避免东三省、热河字样杂见其中。

△ 国民政府再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停战谈判问题，决议要点为：“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需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

△ 何应钦、黄郛召军政重要人员会议，决定派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燕谋）为军使，到密云日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阵前求和。

△ 日骑兵200余配合伪军赵雷部占宁河，守军何柱国部杨团退守西关。同日，察边伪军刘桂堂部占沽源。

△ 宋庆龄在纽约《民族》杂志发表《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一文，揭露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欧洲扩展，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号召工人、农民、学生、义勇军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中国的解放、统一与完整而斗争。并要求国民政府派遣全国80％以上军队、全国所有飞机抗日，收复东北、热河；武装人民，组织义勇军；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立即停止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和杀戮；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

△　川军刘文辉部进攻邓锡侯部，田颂尧分“剿匪”兵力到彭县助邓，刘湘亦集兵于乐至，声言武力调停川战。25日，蒋介石再电刘文辉、邓锡侯，令双方速即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调回原防，听候处理。

5月25日　军使徐祖诒由日使馆永津、藤原二武官陪同往密云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阵前求和。徐与永津签订“觉书”，要点为：中国军应撤退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之线以西及以南，尔后不仅不越该线前进，并不为一切之挑战行为；日本军为认识诚意，第一步随时以飞机侦察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方面必须给予保护及便利；有以上之确认后，双方代表在北宁路上某地作签订停战成文协定；成文协定成立为止，在中国军不挑战之限度内，日军不越前记撤退线追击。当日，徐返平。何应钦、黄郛、黄绍竑等人集议，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临时加北平军分会总参议衔）为正式谈判代表，并决定派黄绍竑赴庐山向蒋介石作详细报告。

△　北平军分会电令前方各部依“觉书”规定线撤退，“以免资对方口实”。同日，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令各军停止战斗行动（日参谋本部称：关内作战日军死163人，伤838人）。

△　汪精卫电告何应钦、黄郛本日南京国防会议情况称：前方停战谈判已经开始，逆料对方进行方针不出两种：（甲）对方以强力迫我屈服承认伪组织及割让东四省，如果出此，我方必毅然拒绝，无论若何牺牲，均所不避；（乙）对方鉴于我牺牲之决心与列强之环视，此次停战目的，在对方军队退出长城以北，我军不向之追击，保留相当距离以免冲突，如果出此，则我方鉴于种种情形，可以接受。

△　上海市长吴铁城是晚在沪发表时局谈话，宣称：“中央盱衡全局，估量情势，接受停战之谈判”，“国人亦正宜深谅中央之苦心，绝不应强指停战为屈服妥协，以为攻击中央之口实”；并威胁说：“苟有

不顾民族国家之利益，居心煽惑，希图扰乱地方，反对中央者，自必严厉惩处。”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党动员起来，组织广大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

△　蒋光鼐、蔡廷锴电林森、汪精卫、蒋介石反对停战妥协，电文在批驳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欧美间矛盾近似解决，可合同制日”等谬论后指出：“非我全民族争生死存亡于呼吸之间，舍唤起全国民众的意识，集合全民族的力量，领导全民族的革命，共誓死志以抗日，尚有何道乎？”26日，吴铁城密电汪精卫称：“沪各报本晚接到蒋光鼐、蔡廷锴通电反对妥协，力言妥协之害，但未明指中央与日妥洽，此电已禁止发表。”27日，各报不顾禁令，纷纷登载。

△　国民党加紧实行文化“围剿”，鲁迅经常投稿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受到压力，是日刊登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从6月起鲁迅换用虞明、桃椎、丰之余等笔名继续在该刊发表杂文。至11月，汇集64篇，题名《准风月谈》，借以揭露和讽刺国民党当局不准谈政治、只能谈风月的行径，于1934年由上海兴中书局出版。

△　上海申新纺织一厂9000余工人因厂方取消工人赏工，迭经交涉无效，是日下午宣布罢工，并向厂方提出一、照发赏工；二、履行劳资契约；三、分派历年盈余；四、解决一切悬案；五、停工期间工资照给等五项条件。公司总经理荣宗敬表示“碍难接受”。次日，申新总公司函请淞沪警备司令部及市府派军警勒令工人离厂。后经市公安局、社会局、市总工会等协议，订出妥协方案：5月份赏工照发，6月以后照本埠其余纱厂同样办理；怠工期间工资发半工。28日晨工人复工。

△　国民政府任命钱泰为驻西班牙特命全权公使，原任代办王麟阁免本职；任命张歆海为驻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

5月26日　冯玉祥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吉鸿昌、宣侠父等人推动，冯积极作抗日军事准备，一面调留驻汾阳之教导团到张家口，连同宋哲元部驻张的一个团为基干扩大编练；一面与退入察境之义勇军广取联络，加之方振武率抗日救国军张人杰、鲍刚两师亦已到达宣化。筹备就绪后，是日冯在张家口通电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并派员分赴广州、济南、天津等地向有关方面说明抗日决心。通电略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安定民心之词，自欺欺人。""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　冯玉祥以原察省府代主席仵庸及各厅长不愿合作抗日，纷纷离张往平，是日委佟麟阁暂代察省府主席，派吉鸿昌任察省警备司令，张砺生任副司令。29日，冯令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总部。

△　蒋介石电黄郛，赞扬其对日妥协称："忍辱负重，临难不苟，固佩公忠，尤见交谊。"

△　古巴华侨抗日总会、旧金山旅美华侨抗日会电国民政府，反对与日订妥协条约。29日，印尼雅加达华侨电汪精卫称："公等可下野，亡国协定万不承认。"

△　顾维钧在世界军缩会议总委员会上发宣言称：“中国政府在中国主权未伸张，并在此时残害中国之侵略未解决前，不能允诺限制其采取御侮防卫所必须之自卫权。”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安徽省政府：原省府委员罗良鉴、叶元龙、刘贻燕、朱廷祜、光升、江彤侯、张鼎勋、关叔仁免本职；罗、叶、刘、朱分别免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兼职。任命胡汝麟、马凌甫、毛龙章、刘贻燕、叶元龙、杨廉、李应生、范滋泽为安徽省府委员；马、毛、刘、杨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

△　入新回军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部进攻奇台。是日，盛世才率省军及白俄归化军四五千人出发抵御。29日行抵阜康、孚远间之三台，得知奇台失陷，恐省城有变，于6月1日率部返迪化。

5月27日　张家口工人、贫民、士兵、学生3000余人在共产党员带动组织下召开群众救亡大会，提出“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察哈尔”、“民众与士兵联合”、“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铲除苛捐杂税”等要求和口号，会后游行示威，捣毁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惩罚汉奸分子及“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分子。

△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免除苛捐杂税、释放政治犯、党费不得由公帑开支等三道命令。

△　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第一军军长张人杰、原马占山旧部军长邓文分别通电响应冯玉祥组民众抗日同盟军，表示愿率所部誓死追随。

△　日陆军省发声明宣称：停战已进行交涉，“日军现作和战两项准备，倘因中国一方不诚意而致交涉不能成立，或因其挑战行为再惹起中日两军间战斗之际，其影响之处甚大”。

△　汪精卫偕孙科等乘舰赴赣，行前电何应钦、黄郛、黄绍竑

称：中日停战之成文协定，关系重大，“一字一句实为后来祸福所倚伏，敬祈设法延缓”，俟晤蒋后再电达进行。

△　进逼通县城东日军后撤30里。北平军分会令驻通县庞炳勋部亦相应撤至城西30里。

△　蒋介石电令粤、桂、闽当局将北上抗日部队改调入赣“剿共”。

△　驻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委孙楚任晋察绥边防司令，是日孙赴大同组司令部。

△　汤玉麟部旅长刘玉才、副旅长刘英辉通电全国，声称汤玉麟在沽源策划率部投降伪满，宣布决不跟从，已率全旅投隶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

△　天津市政府函呈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要求以棉纱统税作担保，发行公债500万元，救济纱业。8月4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转呈实业部。实业部咨财政部后，9月2日，以“该项统税向来拨充华北军费，饷源有关，自未便移作别用”批复不准。

5月28日　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罗文幹、马超俊、曾仲鸣、王世杰、陈绍宽、梁寒操、杨永泰等人分由南昌、南京到庐山，当晚至次日晨举行重要会议，由汪精卫、孙科、罗文幹等报告军事、外交及对日停战等问题。同时，何应钦、黄郛在北平与张群、于学忠、宋哲元、商震、庞炳勋、万福麟、傅作义、蒋伯诚等人商谈停战谈判具体问题。

△　汪精卫将与蒋介石会商结果电告何应钦、黄郛称：“成文协定，至关重要，能避免最好，若不能避免，祈参照国防会议决议：（一）限于军事，不涉政治；（二）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类似文句；（三）先经中央核准。……觉书签订后，我方不挑战，对

方自不进攻，则时间稍宽，从长讨论，宁迟勿错。”

△　冯玉祥通电反对与日签订停战协定，略称：政府当局自九一八以来“始终站在不抵抗主义之立场……坚主安内先于攘外，究其实则为真对内，假抗日”，“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

△　吉鸿昌、佟麟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自张家口联电冯玉祥响应抗日，内称：“奉读宥电，慷慨陈辞，抑郁精神，大为振奋。”表示今后愿在冯总司令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复我失地”。

△　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自宣化电冯玉祥响应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表示“誓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决奉先总理之遗教，及真革命之精神，捍卫疆域，惟力是视”。次日，方通电诘责当局丧权辱国。

△　新编第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通电已于27日在张垣防次就任抗日同盟军第四路总指挥职，表示“痛国家之阽危，愤强敌之凭陵，矢志救国，义无反顾”。

5月29日　晚，黄绍竑抵庐山，即向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详细报告华北军事情况及平军分会与日方交涉停战所作的处置。蒋、汪赞同华北当局所作的决定。同日，何应钦、黄郛电蒋介石告以经与日方交换意见，协定内容绝不掺杂承认伪组织、放弃东四省或类似影射文字。蒋当即复电表示“欣慰”，鼓励何、黄“照常办理，放手进行”，并表示共尝艰苦之宿约“始终不渝”。汪精卫亦连发三电致何、黄表示支持。

△　中美棉麦借款合同签订。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银公司（一作金融复兴公司）签订棉麦借款合同，总额美金5000万元，棉花借款占五分之四，麦及面粉占五分之一；年利五厘，五年内还清

本息；中国以统税收入作担保，其中烟酒税为第二担保，另以海关赈灾5%附加税作第二担保。6月4日，美方正式公布，宋子文于同日电告国民政府。

△　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自大败川军田颂尧、刘存厚部后，是日再克南江，并乘胜回驻通江。田部分向长池、恩阳河等地败逃。

△　南洋八打威华侨致电汪精卫，反对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　胡适著《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认为中国此时所处局势“决无解决的能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是文载6月4日出版之《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号合刊。

△　原东北民众救国军将领李忠义、第四军团总指挥刘震东、新任抗日同盟军自卫军军长张砺生通电拥护冯玉祥组抗日同盟军。

△　西南政务会常委萧佛成、邓泽如、唐绍仪、陈济棠、李宗仁、邹鲁电冯玉祥，支持冯组抗日同盟军抗日杀敌，表示西南当力图为后盾。30日，吴铁城向汪精卫报告，已将此电扣留。

△　上海各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电贺冯玉祥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师抗日，表示“敝会情殷御侮，义切同仇，永矢热忱，以为后盾”。同日，济南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电冯祝贺，并派该会常委刘之田、谢一楚赴张家口慰劳。

△　国民党当局为防止孙殿英部参加抗日同盟军，命孙部集中怀来、康庄一带，并命第二十五师关麟徵部尾随监视。是日，孙电汪精卫表示：“职意彼部到达何处，职即将防地退让，纵使交枪，亦决不再参加内战。”6月1日，汪复电赞许。

5月30日　晨，参加中日停战谈判之中国首席代表熊斌、代表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军委会顾问雷寿荣、

李择一、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由平出发到塘沽与日方谈判停战。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大佐喜多诚一、炮兵少佐远藤三郎、步兵少佐藤本铁雄、师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大尉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比佐重等人。下午4时，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举行预备会谈，双方交换全权证书，约定次日上午9时举行正式会谈。

△　蒋介石电何应钦、黄郛、黄绍竑告以庐山会商情形，对停战协定形式、内容及手续“众意均已谅解”，要求确守25日国防会议决议原则，“中央内部当可一致”；并希望“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则电呈核准，自亦可不成问题”。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出卖平津宣言，号召全中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而战斗。

5月31日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上午9时，中日停战谈判正式会议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举行。日方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由冈村宁次声言这是最后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中国首席代表熊斌披阅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内容四点：“（一）为恢复远东和平，并改善中日两国之关系，商讨停战协定，互以至诚相晤，互求谅解，共同排除前途之障碍，冀能达成所共同之目的；（二）中国军队已退回约定之线，再向后撤以表示中国军之诚意，今后在尽可能之范围内，互相避免中日双方之冲突；（三）希望贵国军了解上述事实，为表示诚意起见，尽早恢复战区之原状，以奠定和平之基础；（四）贵国军基于以上之了解，敝军以后在该区域内，如发现妨碍治安之武装组织，必须由中国军予以处理时，希望贵军勿因此而起误会。”冈村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有“诺”与“否”的答复，

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的情势下正式签署《塘沽协定》，内容为：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二、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与以便利；三、日本军确认中国军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概归还至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五、本协定签字后即发生效力（按：《塘沽协定》文字根据《亦云回忆》一书所影印熊斌致北平当局电报原文。其中第四项末句“右述警察机关……”当时未予公布）。

△　下午2时，中日代表继续会谈，讨论熊斌所提意见书，冈村表示“断难照办”。嗣经中国代表再三要求，日方始同意增加一“觉书”作为附件，内容为：“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另外，日方向中方口头表示希望：一、丰宁西面之骑兵第二师，望即撤去；二、平、津附近之第四十师，望即他调；三、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即撤去；四、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熊斌允诺前三项（按：上述内容，当时未予公布）。是晚，中国代表专车返平，即向何应钦、黄郛报告。

△　汪精卫由庐山返京，发表书面谈话称：“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人谓昔以不抵抗而失地，今以抵抗而失地，此言诚然。苟一量度现有国力，则抵抗之不能得到胜利，自始而知之。知之而犹抵抗，亦惟视其力之所能至，以行其心之所安耳。”“局部缓和不影响于领土主权及此国际所得之地位，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以苏息计，政府将毅然负责为之。”

△　外交部将停战“觉书”电达出席国联代表顾维钧、郭泰祺、施

肇基。旋各代表陆续复电外交部。顾表示："日方所开一切条件，内容与字面均片面口气"，并指出即使签停战协定，日军以我"不能遵守"，随时可以进攻，"结果平、津仍不能保"。郭表示："敌以飞机迫我撤兵，既许其破坏我领空权，更须予以保护与便宜，未免太虐。"施表示对政府目前政策，"未能表示同情"。是日，罗文幹将上述意见电刘崇杰转告何应钦、黄郛。

△　日外务省为停战协定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方面放弃排日、抗日。

△　山东全省民众抗日会电贺冯玉祥组成抗日同盟军，表示"誓从公后，湔雪国耻"。同日，马相伯、章太炎电贺冯"仗义兴师，为国请命"，并建议冯切实联络东北军。

△　万福麟、于学忠、宋哲元等27名将领通电全国，否认30日无线电台广播万福麟、张作相等28将领通电加入抗日同盟军之说，声明是项通电"纯属假借名义"。张作相因未列名本日通电否认，引起北平当局注意，亦于6月1日致函何应钦否认加入抗日同盟军。

△　蔡廷锴电令行抵湖南郴州之北上抗日部队谭启秀、张炎一周内率部返闽，转赴长汀参加"剿共"。

△　伪满武力封锁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断绝货车直达运输。次日，苏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向日外务次官重光提抗议。

是月　山东莒县县政府强迫民众组织联庄会，遭第八区盛家庄黑旗会成员反对。第八十一师旅长运其昌及该区区长前往强制实行，激起会众反抗。运其昌率部镇压，会众退入沂水县境。莒县、沂水一带青旗会、青钟罩（与黑旗会等统称五旗会）等会聚众万余人，将沂水二、七等区公所占领。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派第八十一师展书堂部前往镇压，会众以武力抵抗。韩又令省民政厅长李树春前往勒令解散。经李等拉拢离间，旗会内部分裂。7月间，韩复榘宣称共击毙会徒

4000余人，完全肃清，鲁南各种旗会亦全部消灭（五旗会起事原因另说为：五旗会与红旗会因故械斗，运其昌将五旗会首钟志道、薛明会处决，五旗会徒为钟、薛复仇而起事）。

△ 蒋介石令熊式辉在江西组保卫师，规定每县组一团，若干县为一区，区组保卫师，直辖于省保安司令部。

△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阮景云及秘书长周春申被捕叛变，省委受破坏，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罗森（又名赵琛）、党中央驻北方代表秘书长洪灵菲、军委书记王在朝等多人相继被捕，1934年夏在南京牺牲。

△ 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刊物《文化新闻》周刊在上海创刊。

△ 第二届英帝国货品展览会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

6月

6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发表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塘沽协定》，驳斥其所谓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中国没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等谰言。表示“绝对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寸土地，不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样无耻的大胆地出卖中国！”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一起，扩大民族战争与收复东北失地，为保卫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 《塘沽协定》签订后，全国愤慨，舆论哗然。是日，天津《大公报》以《中日停战协定痛言》为题发表社论，指出《协定》“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式，狰狞面目，活跃纸上”，“殊如‘挑战’字样之外，更有‘扰乱’之语，含义之广，直可使中国动辄得咎；又

如彼方得以飞机或其他方法来我指定的地点之内视察，我且须负保护及予以便利之责，尤为令人难堪”。并指出国民党政府“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同日，天津《益世报》在《评中日停战协定》一文中质问：“前此政府当局否认华北对日交涉是‘屈辱求和’者，目前尚有何词自解？”

△　福州市各界举行罢市游行大示威，反对国民政府与日签订《塘沽协定》。7日，福建长乐县民众召开反对停战协定大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此举“非特失地收复无望，即亡国灭种亦迫在眉睫，屈辱卖国，何异自缚”？

△　北平军分会召开临时会议，何应钦、商震、万福麟、宋哲元、庞炳勋、蒋伯诚等出席，熊斌、钱宗泽等列席，由熊斌报告塘沽会谈签订停战协定经过，与会人员传阅协定原文后讨论华北各部队归还建制、调整防区及移防等问题。

△　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西南各省国民对外总会、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分电祝贺冯玉祥率师抗日，表示竭诚拥护。次日，广州市参议会、广州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均发电表示支持。

△　国民党中常会以“时局关系，筹备不及”，决定停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径于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选出之临全代大会代表，拟即作为正式大会代表，临全代大会选举法适用于正式大会选举。

△　行政院会议，根据蒋、汪在庐山会商结果，提出整理川局军政原则四项：一、对四川军事纠纷，不究既往，不迁就现在事实，不偏袒一方；二、全省军队由中央分别抽调出川，供御侮、“剿匪”之用，其留以为保安地方及边防者，经中央核定实数后，不得增添；三、打破防区制，以谋整理四川全省行政系统；四、确实调查全省财政状况，国税归中央，地方税归省府，量入为出，公开支配，一切苛

捐杂税悉予免除。次日，废止内战大同盟电国府，要求迅速履行，不遵者执法以绳，并严禁军火入川。

△　陈济棠在广州通电就“剿匪”军南路总司令职，随颁“剿匪”计划，决定先行占领汀州、寻乌、安远各属，继向瑞金、会昌等地“进剿”，配置兵力三个纵队。蒋介石于4日、7日两次电陈济棠，对其积极参加“剿匪”表示“欣慰”，并令军政部由本月起增拨粤军协饷30万元，对闽增特别费10万元。

△　苏州国学会会刊《国字商兑》第一号出版，陈衍任编辑，第二号起易名《国学论衡》。

△　中原公司与英商福公司在河南焦作签订合资经营煤矿业合同，合资期限10年，流动资金100万元，中原公司51万，福公司49万。21日，国民党中政会加以批准。

6月2日　　汪精卫为中日签订《塘沽协定》通电向国人解释，略谓：政府“对于休战运动，确立最低限度，俾无害于中国之领土主权，及关于世界和平之各种公约”。对于《塘沽协定》虽承认“隐痛实深”，但又以“痛心仅属军事，不涉政治，于政府向来所抱根本方策，不生影响”自解。该通电译送驻英、美、法、苏各使馆及驻国联办事处，令其就地发表。译文后面增加郑重声明：“……中日问题，仍须依照《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及国联历次决议案图谋解决。”

△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称：“中日停战协定业已缔结，如彼确实遵守协定，我军即概撤回长城线，否则，破坏协定有侵正义之时，我军有断然膺惩之准备。”

△　熊斌、徐祖诒、雷寿荣、张熙光、李择一等由平到津，与日方磋商伪军处置及北宁路恢复通车等问题。3日上午与冈村及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会晤，日方对处置伪军的方式及手续等仅表示“不轻易干涉”。熊等旋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商洽伪军处置、日军撤退后地

方接管和警察组织等问题后返平。

△　北平军分会派参谋温建刚、邵华赴沙城晤孙殿英。孙表示本人始终服从中央，对抗日救国之举素表同情，绝不参加内战，愿率部赴西北屯垦。

△　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

△　国民政府任命茅祖权为行政法院院长。23日，该院正式成立。

△　教育部训令北平大学将艺术学院结束，商学院停止招生，女子文理、法学二院裁并学系，北大高中停办。训令到平后，学生及教职员群起反对。19日，北高、艺院组联合护校会，发表宣言反对部令。校长徐诵明愤而向教部呈辞，北大校务停顿。

6月3日　　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通过追认《塘沽协定》。又讨论冯玉祥组抗日同盟军问题，责成华北军事当局就近查察，否则中央当谋相当之处置。

△　国民党中央电蒋光鼐、蔡廷锴，对签订《塘沽协定》一事，要求体谅“中央谋国之苦心”。

△　蔡廷锴电告陈济棠：“中日妥协已成事实，抗日军救国有心，请缨无路，除电知邓龙光归回节制外，并饬敝部日间取道粤边回闽。”张炎、谭启秀奉蔡电于5、6两日分别由郴州、耒阳开拔回闽。士兵不愿回师“剿匪”，纷纷退伍，第十九路军北上部队原有四个团，13日返抵源谭时仅余两个团。另开抵韶关之桂军第二十四师先头部队改趋南雄转赣南“剿匪”。粤独立第四师在乐昌候命。

△　前黑龙江省府主席马占山、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苏炳文、参谋长谢珂等一行14人由苏联取道德国、意大利回国，是日抵沪，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往迎。马、苏语记者称：今后抗日当集中全国力

量，作整个抗日计划。6日，苏、马等到京，8日晚离京赴赣见蒋介石。

△　伪军李际春部韩福臣旅1500人突占芦台以东村落与闸口一带。国军以遵守停战协定，不予驱逐。

△　北平军分会开会，决定将作战时期各军所组织之指挥部、兵站、医院及其他临时机关一律分别裁撤。12日，各军战时组织及北平市防空司令部结束。

6月4日　　日茂木骑兵旅团纠合伪军刘桂堂部进犯宝昌、康保，宝昌失陷。冯玉祥急令驻张北之张砺生率所部骑兵赶往堵截。

△　国民党中委李烈钧自京电冯玉祥支持组同盟军抗日。

△　盛世才返迪后电马仲英呼吁和平，马要求省方派代表至奇台洽谈，盛乃派赵国栋、吴蔼宸等五人以新省民众联合会名义前往，是日抵奇台。马以民众代表无权决定政治问题，乃派其政训处长杨波清于7日随同省方代表赴迪。与此同时，和加尼牙孜亦与省方接洽和谈，由苏领事馆居间签订条约，盛允和加尼牙孜任南疆警备司令，盛军不入南疆。

△　中华律师协会第五届年会是日至7日在青岛举行，通过《统一法权运动宣言》，表示“自今以后对法权横肆侵夺者，当奋大无畏之精神立起纠正”。

6月5日　　红四方面军收复通江、南江后，3日进抵巴中，击溃川军田颂尧部曾南夫师，是日收复巴中。曾残部败退恩阳河。

△　刘镇华在汉口通电就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职。

△　国民党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市党部及北宁、平绥路特别党部联席会议电冯玉祥，反对冯组抗日同盟

军，要求“幡然改图”，“即日停止一切异动”；并电西南国民党中委唐绍仪等，要求“一致声讨”。9日，国民党上海、南京市党部亦纷电讨冯。

△　第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经其舅父张作相拉拢，率部脱离抗日同盟军，是日致电北平军分会表示服从国民党政府指挥。军分会接冯电后，立将上月30日查封之该军驻平办事处启封。

△　武藤下令日军从关内撤出，仍留驻一部监视中国军队。即：令骑兵集团将主力置于玉田附近监视平、津；第八师团以较强一部停置于密云及石匣镇一带监视北平，其他主力撤至承德附近警备；第六师团主力置于锦州附近；混成第十四旅团一部置于建昌营附近，主力置于山海关、绥中附近；从第十四师团抽一步兵大队和一工兵小队在玉田附近入列骑兵集团。

△　外交部长罗文幹因反对中日直接谈判，签订停战协定，主张依赖国联调解，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职。蒋介石电罗，以外交紧急，请勉为其难。林森、汪精卫亦均促罗打消辞意。罗乃请“病假”，至20日销假视事。

△　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宗敬函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表示欢迎中美棉麦借款，并谓：“以后复兴农村及关于建设事项皆可次第实施，其为福利岂有涯涘，不特纺织业感纫已也。”

△　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宣言，陈述救国大计，要求国民党对历年党治“反省引咎”，指出“中国之病根在文化，而起死之良方在学术”，吁请开展“学术救国”与“文化复兴”两大运动。

△　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满洲石油股份公司设立纲要》，规定“满洲国政府不把石油精炼事业许与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人”，“本公司在战时、事变当中有义务按满洲国政府指定价格交售日、满军所需数量的石油”。

6月6日　　红军第五军团围攻宜黄，独立第三十二旅柏天民部由临川往援，是日在宜黄北遭红军截击，柏天民受伤，所部一部分入宜黄，一部分向龙骨渡退走。

△　行政院会议原则通过为救济河北战区所拟具之农赈办法纲要；修正通过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草案。

△　吉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偕孔宪荣、于太一由苏联取道欧洲回国，是日由港抵穗。

△　吴铁城密电汪精卫，报告日使有吉明将于7日上午自沪到京，并称有吉等在沪对“华北停战协定成立之速，又少争论，均欣欣然有喜色，以此为改善中日关系之嚆矢”。7日，有吉到京，8日谒汪精卫、罗文幹。

6月7日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中美棉麦借款案，认为原则可行，交立法院审议。同日，胡汉民电孙科反对棉麦借款，指出“国府发行内国公债已十二万万……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须秘密借款至二万万之巨”，表示“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8日，西南政务会电美国财政善后银公司及美国务卿，反对此项借款。17日，孙科谈话称：已电复胡氏，此项借款，绝不消耗于内战。

△　日本为向满洲大规模移民，是日由关东军特务部和朝鲜总督组织之移民会议在长春开会，提出日伪合办“农地开拓会社”，正式协定签订前由东西劝业公司为租与土地及移民事务的代行机关。日陆军省旋即开始训练移民团500名，施以武装移民军事训练。

△　国联顾问委员会通过不承认伪满洲国办法七条，要点为拒绝伪满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及国际团体，不与通邮，禁止用伪满钱币交易等。12日，国联秘书长以通告形式送达国联会员国及有关之非会员国。

△　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宪法初稿，经孙科同意，是日用吴经熊私人名义发表。初稿分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及宪法保障等五章共214条。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陕西省政府：原省府委员王典章、韩光琦、赵守钰、周学昌、李克刚、李协、冯钦哉、井岳秀免本职；王、韩、赵、周分别免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兼职；任命胡毓威、宁升三、赵守钰、周学昌、王典章、李克刚、张赞元、雷宝华为陕西省府委员，胡、宁、赵、周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

△　国民政府特派徐源泉兼鄂湘边区“剿匪”总司令。

△　伪满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宣布教育方针为“重仁爱，讲礼让”，“发扬王道精神”，“尚节义”，“亲仁善邻”等。同时规定各级学校均设“经学”课程。

6月8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湘、鄂、赣各“剿匪”部队副军长、副师长、参谋长出席，粤、桂、闽各军派代表参加。11日，蒋介石演讲《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12日，演讲《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会议通过党务、政治、军事、教育、谍报、宣传等“剿匪”方案后结束。会后分发《作战手本》、《剿匪手本》、《孙子吴子兵略问答》等书。

△　陈铭枢、蒋光鼐7日由闽抵港，是日偕香翰屏到达广州。陈谈此行系与西南当局商军政大计。蒋谈救国之道惟有誓死抗日，誓本沪战精神，以求贯彻。同日，李宗仁偕李品仙亦由广西到达广州，李表示对日虽反对妥协，但桂决增兵入赣“剿匪”。陈、蒋、李等旋出席西南政务会谈话会，交换对时局意见。次日会后，陈铭枢赴港谒胡汉民交换意见。

△　平绥铁路工人千余人在张家口召开大会，封闭国民党平绥路特别党部，解散国民党御用工会，驱逐其头目，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

组织，并用自造的铁棍、大刀武装自己，组织百余名纠察队，参加抗日活动。

△　新疆和阗发生暴动。喀什人沙比提得英国特务分子支持，利用民众反金树仁的斗争，是日在和阗起事，进攻县府，参加暴动者不过数十人，十余日后占领和阗。

△　国民政府任命王东原为第十五师师长。

△　中波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由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蔡元培、吴敬恒、魏登涛（波驻华公使）任名誉会长。

6月9日　何应钦电冯玉祥，借口日军图察系因冯“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故欲借口乘机侵入察省”，要求冯“忍辱负重”将同盟军取消；并电请阎锡山敦促。12日，冯电复何表示：“日军来侵，誓迎头痛击，成败非所敢计，决以热血溅国土。”

△　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吴敬恒、唐生智、何应钦、朱培德、李济深、张治中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兼校长。

△　东北民众救国军副司令张殿九等一行40余人经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张语记者称：“关于抗日等一切问题及本人嗣后行止，均以中央及马（占山）主席命令是从。”

6月1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宣布绝对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所签订之华北停战协定，号召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以坚决的革命斗争、罢工、罢课、罢市、群众示威、组织民众自己的武装队伍来反对与阻止协定任何一条的实行。

△　黄慕松率庞大宣慰团抵迪化，听取刘文龙关于事变经过的报告后，电嘱盛、马两军各驻原地待命，并接见马仲英代表杨波清，表示对马倚重，同时电伊犁屯垦使张培元，表示中央对他寄有厚望。

△　港英南约里民府通告九龙城居民，他们所居之屋地限于1934年底前由政府征用，酌情给予补偿，并指定城外狗蚤岭（在慈云山麓）为重建房屋地段。城内共有中国居民436人，民房64所，多为农民、小贩、苦力。他们担心搬迁影响生计，且得补偿数额无法新建住所，遂向中央政府及广东省政府请愿求援。中国外交部派五省特派员甘介侯进行调查。

△　河北战区各县临时联合救济会筹备委员王馨泉、苏人镜通电申述战区19县受日军侵略，直接损失近一亿元，提出国民政府速施农赈、缓征捐税、将难民输送回籍、各县行政长官选贤充任等项要求。19日，苏人镜等六人到津向于学忠请示办法。

6月11日　　国民党当局为制造武力镇压抗日同盟军的口实，由“中央社”、“军息”（北平军分会情报股）捏造冯勾结日本、联俄投共等种种谣言。是日，冯通电驳斥，声明“此间一切动作，绝对未逾越民族解放运动之范围”，同时坚决表示“竭全力保卫察省，为国守土，不辞牺牲”，并请当局命宋哲元回主察政，或另在孙殿英、方振武中择一任命，以示“绝不割据自雄”。

△　北平军分会令派庞炳勋、傅作义两部入察，冯钦哉部待机于平绥线，以武力威胁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同时令孙殿英部离开铁路沿线。13日，孙饬各旅、团向赤城、龙关一带转移。

△　马占山、苏炳文在南昌谒见蒋介石，报告抗战经过及撤往苏境情形。

△　方振武电国民政府反对棉麦借款，指出棉、麦皆美国过剩物品，在我国谷贱伤农之时，再倾销巨量棉、麦，是不啻为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吾民血膏，压迫我国经济，以此为理财要素，何异饮鸩止渴，自促死亡。

△　北平军分会令驻芦西警备师郑桂林部开赴马厂从事训练。

△　湖北蕲春是日及翌日因长江水涨，连破48圩，被淹田地10余万亩。沿岸人民纷电省建设厅告急，要求速拨抢险经费。省府与江汉工程局相互推诿。翌日，蒋介石电令鄂省府与江汉工程局切实合作。

△　财政部发表财政实况及中央银行成立经过与现状两报告书，前者称：国府自奠都南京，财政全靠借债，前后三四年间“剿匪”军费等支用浩繁，募借内债不下八万万元。

6月12日　世界经济会议在英国伦敦开幕，66国派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宋子文、颜惠庆、郭泰祺出席。英王乔治莅会致开幕词，呼吁与会各国从事经济合作。会议为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将讨论货币及信用政策、物价、关税协定等议题。

△　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意旨，召宋哲元、庞炳勋等人在平开会，拟定解决抗日同盟军具体办法：察省府主席由宋哲元回任或由庞炳勋继任；取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名义，另给冯以某种名义或由冯另就他职；中央畀予冯边防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使之离张西去，孙殿英任屯垦督办随冯离察；冯部安顿交宋哲元办理。宋哲元即派张吉镛为代表携方案赴张垣晤冯。

△　国民政府任命薛岳为第五军军长，刘绍先为第五军副军长，罗卓英为第十八军副军长。

△　黄慕松到迪化后，马仲英恐黄在迪化有不利于己的决定，便先发制人，自奇台挥军向阜康进攻。盛世才闻讯，率部出发迎击，是日双方在孚远、阜康间滋泥泉接战。初盛军不利，嗣因气候变化，马军装备单薄，前锋失利。14日，盛军进占三台，马恐和加尼牙孜与之为难，后退乏路，越天山退走。盛令陈中追击，陈与盛意见不合，纵马仲英从容退吐鲁番。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将甘肃东乐县改名民乐县。

△　日关东军特务部决定创立满洲采金株式会社。7月，在长春设置创立事务所，由日陆军主计总监广濑正德任创立委员长，开始在日本招股。

6月13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设立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及该会组织大纲草案，派黄郛、于学忠、李石曾、张继、王克敏等25人为委员，以黄郛任委员长，于学忠任副委员长，会址设北平。14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行政院会议通过铁道部长顾孟馀提请修筑江西玉萍铁路及筹款办法。通过救济旅墨（西哥）难侨案。

△　红军一、三、五军团各一部向临川进逼，是日及翌日分别占领上顿渡、藤桥等地，先头达距临川七里之七里冈。

△　红二军团贺龙部在恩施县南击败范熙绩部两个保安团。

6月14日　张吉镛抵张家口，向冯玉祥传达北平当局解决察省办法。冯提出七条意见：一、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系因日军图察，多伦、沽源相继失守，平、津危急；二、望宋哲元返察；三、孙殿英抗日有功，开发西北心切，望促其实现；四、方振武毁家报国，请予以军事名义；五、义军邓文、李忠义、富春等部由当局统一编制；六、如宋返察，本人自然告退，所部二万余人由宋负责改编；七、取消名义，不成问题。

△　国民党中委王法勤、朱霁青、邓家彦、李烈钧、傅汝霖由沪联电林森、蒋介石，称冯玉祥组同盟军抗日，“精忠卫国之心皎然共睹”，请授冯以军权。

△　国民党中央派黄绍竑、李烈钧赴港、粤向西南当局解释华北停战，促西南一致“剿匪”。是日，黄、李由沪启程，16日抵港，分晤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

△　蒋介石电浙江省府主席鲁涤平、建设厅长曾养甫，指示限期修筑屯溪经淳安至兰溪公路和奉化至宁海公路，建筑费准由军事委员会每月津贴三万元。

△　日拓务省否决台湾自治案。

6月15日　　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到代表61人，历时五日，通过同盟军纲领决议案，要点为：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不承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绝交，联合世界反帝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肃清汉奸国贼，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又通过军事问题决议案、财政政策决议案、军队中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决议案、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议案等。并选举军事委员会委员35人，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此时抗日同盟军实力及序列为：第一军佟麟阁部约万人，第二军吉鸿昌部6000余人，第六军张凌云部4000余人，第十六军李忠义部7000余人，第十八军黄守中部5000余人，第五路邓文部7000余人，骑兵挺进军孙良诚部6000余人，第二十四师富春部4000余人，第二十五军马冠军部2000余人，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二万余人，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7000余人，总计八万人左右（7月，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为6.3万余人）。

△　天津中华民族自救会电贺冯玉祥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　张吉镛返平，报告冯玉祥所提主张。次日，黄郛、何应钦电蒋介石、汪精卫提出解决办法：一、令宋哲元回察主席任；二、第十九军、第四十军移驻察省；三、委庞炳勋为察省剿匪司令；四、上项

命令发表后，冯取消名义；五、冯离开察、绥；六、方振武部暂驻张北、蔚县，方如遵令，请中央任为林垦会办。同日，暂停入察军事行动。

△　红四方面军进克阆中、苍溪等地，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以无力抵御，通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林森、蒋介石等，声称“尧部苦战半载，官兵伤亡，已逾万数”，“今者匪焰益炽，我力渐衰，而内战方殷，莫肯应援，饷绌弹缺，难事补充”，向蒋介石请辞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职务，并表示“仍率所部任一方进剿之责”。

△　《青藏和约》签订。西藏达赖谋趁川军内战，刘文辉无暇西顾之时攫取西康，遂与青海达成和议。规定：一、朵旦寺以后佛教活佛喇嘛事项由藏方办理，青方不加干预；二、青科寺、当头寺双方均不驻兵，避免冲突；三、藏若犯青，由玉树边界各族负安全之责；青若犯藏，由玉树25族百户完全负责。

△　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三次大会上演说，表示中国殷望与世界各国通力合作，解决世界经济危机；“中国于可能范围内，予中外资金一最好运用之机会”；希望各国“于谋获金币稳定时，亦当谋白银之稳定”。

△　蒋介石核准任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是日何应钦电孙征其同意，孙即电该军驻平办事处向何表示“遵命”，并要求早日颁发开拔命令。

6月16日　立法院财政、经济两委员会于14日审查通过棉麦借款案，是日提交立法院全体委员会，经长时间讨论，始附条件通过。其条件为：设管理委员会，负保管、支配、监督之责，由五院院长充任政府代表，再由农、工、商各界推代表六人组成；借款用途限于发展工业，复兴农村经济，兴办水利，发展重要交通，不得移充任何对内

用兵或其他消费之用。

△　国民政府任命袁良为北平市市长，原任周大文辞职照准。21日，袁就职视事。

△　行政院会议修正通过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管辖范围为冀、鲁、晋、察、绥五省及北平、青岛两市，加派沈鸿烈为委员。19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江西省县长会议在南昌举行，熊式辉主席，讨论“剿匪”、保甲、团队、筑路等问题。19日，蒋介石莅会训话称：“要以拨乱反正的耐心，舍身救人的志愿，平赣祸乱”，“本席可予你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之权，各县长如遇紧急时期，即用行营军法官之名义去做。”

△　宋子文在伦敦对路透社记者谈话称：中国将向世界经济会议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白银问题的建议，希望银市稳定，银价提高，并表示仍望国联处理中日争议。21日，中国银行公会电宋反对提高银价。

△　外交部通知国联组织委员会加入《关税停战协定》；11月15日通知退出。

△　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借国民党中央命其调停川局之机，与田颂尧、邓锡侯、罗泽洲等部，组联合军分两路进攻刘文辉，一路由乐至向简阳、资阳，一路由威远、荣县向嘉定、井研。是日，第一路与刘文辉部在资阳北斗镇交战。

△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以存纱过多，纺业衰败，要求国民政府购买存纱三万包，以缓和纱厂危机。

6月17日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黄郛在成立会上致词称：“北方政务整理方案，以及将来实施步骤，头绪纷繁，决非一手一足之劳所能擘划周详，自当随时秉承中央政府，商同地方长

官，并博征民意所趋，以期适应环境，便于进行。”汪精卫致贺电称，政整会成立“实为华北政治前途馨祝无量”。该会成立时发生警察驱逐新闻记者事件，报界在下午集议，决定平、津各报本日不登载该会成立之新闻，以示抗议。

△　蒋介石、汪精卫电复何应钦、黄郛，接受冯玉祥七项意见。下午，政整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接受冯玉祥七项意见；二、请国府撤销仵庸代察主席令；三、命宋哲元回察整理察政；四、电请中央任命冯玉祥为林垦督办，方振武为会办。同日，军分会、政整会发出第二十九军、第四十军开察及宋哲元回察主政命令。

△　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凡12条，规定分国民兵役与常备兵役两种，男子18岁至45岁在不服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常备兵分现役、正役、续役；现役三年，正役六年，续役以正役期满者充之。

△　教育部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在上海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主要内容为：影印缩成小六开本，每部分订中装1500册，由教育部呈请行政院特许将拟印未刊珍本由图书馆雇员伴同商务印书馆至故宫博物院上海储藏处摄影，六个月摄毕，二年内将书出齐。

△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东北大学教授霍维周因联合多人退出青年党，并从事抗日工作，是日在北平遭暗杀。事后北平公安局内二区署拘获民铎中学校长杨崇仁等青年党人10余人，杨等供认系受党命杀霍不讳。23日将人犯解公安局。

△　上海棉花业同业公会具呈行政院，以棉麦借款使外棉源源输入，纱商势难支持，要求政府收回成命。

6月18日　杨杏佛遭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任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是日晨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前

遭戴笠指挥的华东区行动组特务暗杀。杨连中三枪，送往医院急救时不治身亡，其子杨小佛受伤。一凶手逃逸时被同伙枪击灭口。同日，蔡元培电林森、汪精卫要求缉凶。

△　国民党“剿匪”军南路第八师黄质文部进占江西寻乌，红军向澄江、筠门岭方面撤退。

△　《申报》6月26日载是日成都电讯称：去冬以来，四川抗捐军遍布，组织深入民间，声势极为浩大。抗捐军初起之际仅邛崃一隅，占据县属各乡镇，雅安方面曾火焚该县五申口，如丹稜、蒲江、名山、大邑各县边境亦警报频传，有波及宁远七属之势，与邛崃相连之青神、彭山、洪雅、夹江等县亦相继响应，参加抗捐军者多系民团，因不满四川军阀横征暴敛而起，七县抗捐大同盟为最高机关，分四路总指挥，初共五千，现扩充势力，其势愈猛。刘文辉派四旅兵力往剿，被抗捐军打败。

6月19日　宋子文由伦敦飞抵巴黎。翌日，偕驻法公使顾维钧与法外长彭古晤谈。21日访法总理达拉第，均就远东局势交换意见。22日偕顾维钧返伦敦。

△　宋庆龄为杨铨（杨杏佛名铨）被害发表声明，指斥国民党特务“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表示“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

△　汪精卫电令各省市政府一致负担救济华北战区灾民经费；并电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称，救济资金由政府及银行界各筹1000万元。

△　苏联政府就出售中东路与伪满事复照驻苏大使颜惠庆，以苏与东北当局签订《奉俄协定》时中国政府并未抗议为理由，否认中国在所有权法律上政治上之根据，并称出售中东路与伪满“与中国实际上之利益亦不冲突”。

△　汪精卫派南京市长石瑛、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前往港、粤，与粤方会商共同“剿共”及动员陈铭枢到京。23日，石、段抵港。

△　川军刘湘等部在嘉定、井研、资阳一带与刘文辉部激战。20日新编第六师李家钰、第二十三师罗泽洲联合占资阳，并向简阳推进。邓锡侯、田颂尧部见刘文辉阻抗捐军失败，准备会攻成都。

6月20日　　抗日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佟麟阁、邓文、张砺生等26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为民族生存而战争，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吾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友，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宣布“重整义师，克日北指，克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四省不复，此心不渝”。

△　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率领大军克日北进，收复察东。翌日，吉鸿昌将所部主力分组为三个梯队，集中张北。22日，冯特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

△　杨杏佛遗体入殓及追悼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沈钧儒、李四光等前往吊唁。宋庆龄对记者指出：杨被杀害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

△　国民党“剿匪”军南路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13日起进犯安远。是日红军主动撤离，王部占安远。

△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剿匪”南路军师长会议，决定：一、维持南路原定计划，正式委余汉谋、香翰屏、黄任寰分任一、二、三路纵队司令；二、独立第四师改调入赣“剿匪”。

△　川江水连日暴涨，沿长江东下，是日汉口水位达44.1尺，较1931年高出5.7尺。武昌金水新坝崩溃成灾。浙江省连日来水陆交通

停顿。湖南省水灾达20县。

△　香港颁布《教育条例》修正案。

△　日本与伪满中央银行合组大兴股份公司成立，经营原由伪满中央银行所经营之典当、粮业、制粉、油坊、造纸、林业等获利丰厚而又能操纵民间经济的行业，资本伪币600万元。总公司设长春，在沈阳、吉林、哈尔滨等处设分公司，在各重要城市设分店65处。

△　上海大沪商业储蓄银行成立，资本50万元，刘鹤皋任董事长，俞国珍任经理。9月2日正式开业。

△　伪满黑龙江省省长韩云阶因中饱、受贿、卖缺等罪被免职查办。22日，伪满国务院命孙其昌继任黑龙江省省长。

6月中旬　　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六军团。

6月**21**日　伪军李际春等伙同津变祸首郝鹏、石友三等在战区成立“华北民众自治联军军政府”，在唐山、秦皇岛两处设军政最高机关。“唐山派”李际春、程国瑞、郝鹏、李甲三等称“自治军”；“秦皇岛派”马廷福、石友三则称“安国军”。两派人数共达万人，粮糈就地取给，军械由日方暗中接济，活动地区十一二县。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二十二年度岁出预算，计13类，总概数为：一、党务费548.91万元；二、国务费971.32万元；三、内务费406.9042万元；四、外交费1066.2989万元；五、财务费6496.9175万元；六、教育费1661.8184万元；七、司法费267.6359万元；八、实业费423.4922万元；九、交通费508.3738万元；十、蒙藏费134.0192万元；十一、建设费71.5万元；十二、补助费2987.8449万元；十三、抚恤费602.981万元。合计1.6148016亿元。

△　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购运之枪械在万县、重庆两地被刘湘

扣留，刘、杨两军为此一度发生武装冲突。是日，杨森到渝向刘湘索还军火，刘除全部发还外，另赠新枪3000支，令杨出兵六旅赴川北防堵红军。

△　北平军分会任庞炳勋为察省“剿匪”司令，以对付抗日同盟军。

△　长江水位续涨，江西九江全被淹没，鄱阳、建昌10余县纷电省府告急。湖北蒲圻、黄陂等县被淹，汉阳鹦鹉洲一带长堤溃决。

6月22日　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县城，伪满军向宝昌溃逃。

△　西南政务会电劝关麟徵、黄杰、萧之楚勿进兵张家口，“屏绝内争，共御外侮”。

△　黄郛派殷同、雷寿荣往长春就战区善后问题与日方举行长春会谈。

△　国民党中常会任命马占山、苏炳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20日，马电蒋介石、汪精卫表示东北民众处于火热水深之中，此正尝胆卧薪之日，而非居官受禄之时，要求收回成命。

△　蒋介石命张印相任第四十二军军长。

△　外交部照会日驻南京领事转日本政府，抗议在东京举行中东路售卖接洽，指出日政府以第三者地位对中东路前途横加干涉应负其责任，声明日、伪、苏订立任何协定或契约均属无效，中国绝不承认。

△　全国经济委员会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在京召开苏、皖、湘、鄂、赣五省防汛会议。决定五省划分为六大工区，各区分段进行防汛工程。定经费百万元。次日闭会。

△　实业部发表日本侵略我国渔业概况称：日渔轮大多数在我东海、渤海、南海、东京湾经营渔业，并以旅顺、大连、青岛、上海、香港、台湾各地为根据地，使我国渔业每年所受损失达1.6亿余元。

6月23日　宋哲元于20日再派张吉镛到张家口晤冯玉祥。冯在方振武、吉鸿昌等26名将领20日通电鼓舞下改变态度，表示不愿放弃抗日就高官，决不取消抗日同盟军离开张家口，决意进军察东。是日，张吉镛返平报告，宋哲元对回察也取消极态度。何应钦、黄郛遂决定宋暂缓回察，并电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报告。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就签订《塘沽协定》以漾电（23日）致国民政府提出质问，略称：政府果无丧权辱国之罪，何至迄未将协定内容明白宣布？对冯玉祥等抗日军队，政府既不加以接济，而又外引暴日，以迫察境，内调关、萧各军向察省推进……此种举措是否为实行对日屈辱协定、贯彻降日卖国之计？要求明白圆满之答复。

△　在独石口设防之方振武部师长鲍刚，与方振武意见不合，是日率部离独石口开赴大同，脱离抗日救国军。

△　何应钦、黄郛电蒋介石报告长春会谈日方四项决定："（一）停止平、津间无意义之飞行；（二）关于接收及难民回乡，极力援助；（三）李军三千乃至四千改编为保安队，余听遣散，关东军允派幕僚协助；（四）铁路接收事件即可与铁路当局直接接洽实行。"

△　北宁路列车由北平试开唐山，日宪兵队与北宁护路队同行，迫伪军李际春部撤离铁路线20里。

△　财政部布告中央造币厂所铸新币定7月1日开始发行（7月4日始流通），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一体行使。

△　汉口水位达46.7尺，部分市区被淹。河北永定河山洪暴发，

良乡、房山、宛平是日及翌日决口五处，宝坻、通县、顺义等县均受灾，淹没大片农田。

6月24日　东北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在青岛乘小火轮登“镇海”舰时，遭同行之“镇海”舰炮正冯志冲枪击，未中，冯被沈枪杀。事件发生后，该舰队中下级军官要求沈下野。26日“海圻”、“海琛”、“肇和”三舰擅自离开青岛，在长山岛联电该舰队参谋长谢刚哲称，如欲三舰回青，须沈鸿烈辞职。

△　日本海军当局以所谓“以广东为中心之排日运动”及“十九路军与陈济棠购入美国机关枪及飞机等军械”为借口，派军舰开往闽、粤海面，并令驱逐舰三艘待机出动。

△　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合同签订后，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应，特别对版本选择，多不主张限于库本。是日，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专程赴京向教育部陈述意见。袁临行前语记者称：“此书卷帙浩繁，其中已有普通刻本者占三分之二以上，而版本多较四库本为佳；故决无重印之必要”；并指出：“四库本经馆臣窜改之处不一而足，而近年以来发现之孤本秘籍，远胜于四库本者不在少数。……今如不利用此项极重要之新发现，而仍影照四库原本，匪特有‘开倒车’之讥，而尤贻误后人。”

△　国民政府令派顾维钧为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代表。

△　考试院公布：本年高等考试分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人员；会计、统计人员；外交官、领事官、司法官数类，定10月20日在南京、北平举行。

△　京芜（南京——芜湖）公路竣工，是日晨在南京雨花台行通车礼。

6月25日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调天津市长周龙光为该会

参事，令于学忠兼任天津市长。

△　外交部向苏联政府致送节略，驳斥苏19日复文，指出苏出售中东路实与苏政府所宣示之中苏友谊愿望不合，要求重加考虑。

△　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员朱溥泉向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递交对苏政府抗议书，指出该行为中东路全部股票证券之主人与持券人，“为银行债权人利益起见，请苏政府首先解决对于东铁股东华俄道胜银行之赔偿问题”，警告苏“对于东铁有出售或任何他种情事，概不能认为有效”。

6月26日　第二次“新变”发生。盛世才在新疆督办公署以邀宴为名，即席将省府秘书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陈中及航空处长李笑天枪杀，并宣布三人罪状为在大局未定之时“破坏团结，诱引省军谋叛”。盛且表示不愿恋此高位，将率部前往塔城。临时省主席刘文龙在惊慌中亦当场表示辞职。应邀赴宴的其他各人在震慑之余，除表示对盛、刘慰留外，并往新疆宣慰使黄慕松处要求速电南京维持督办制，对盛、刘早日真除。按：黄慕松抵新后，与陶、陈、李接触颇多，陈又曾向黄力主废除督办制。盛疑陶等有夺位之谋，遂发动此次事变。

△　苏联与伪满、日本在东京举行中东路售卖会议，苏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外交委员会远东部长哥兹洛夫斯基、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日本外相内田、外务次官重光、外务省欧美局长东乡，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忠一（日人）、中东路伪满代表沈瑞麟等参加。本日及28日第一、第二次会议均讨论程序性问题。

△　前在热河投敌之伪满护国游击军司令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刘反正前曾派副军长尚武到张家口接洽，冯玉祥抱抗日者即为友之宗旨，开诚相与，予以接受。

△　国民政府令：派孔祥熙为国货银行董事长。

6月27日　冯玉祥令吉鸿昌速率各部收复宝昌。次日，吉编所部主力为三梯队二掩护队，向宝昌推进。

△　行政院会议通过第四十三师师长刘绍先升任第五军副军长，并以华北军事结束，抗日部队分别复员，将各部将领进行更调如下：翁照垣升任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升任第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任第一一七师师长，原第一〇七师师长张政枋调任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

△　国民政府令：派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

△　上海美商英文《大美晚报》刊登“海陆空青年刺杀团”一份所谓“声明”，捏造杨杏佛“前曾加入第三党”，“把党中组织情形暗中报告蒋介石”，致邓演达被蒋枪杀。“吾等同志历为复仇”，“待杨外出，乘机行刺”。以嫁祸第三党。

△　近来上海外商纷至长江各埠及内地收购民间所藏银元、银锭，昨今两日又有400余箱白银运美。

△　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违法征收产销税，任意变更地方制度，经监察院弹劾，是日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决定予以申饬。

△　江西南昌马王圩于午时溃决，农田三万余顷被淹。

6月28日　宋子文自伦敦致函国联秘书长亚普诺尔重申1931年4月25日中国向国联提出之技术合作六条件，并请求国联派技术合作接洽员来华，从事国联与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之联络。

△　黄慕松在盛世才压力下被迫以明码电报致蒋介石、汪精卫称，“新疆偏处强邻，情形复杂，隐忧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请中央对盛世才、刘文龙即予真除，并要求迅速派飞机往接回京。

△　外交部五省特派员甘介侯对九龙城情况进行调查后，是日奉外交部命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重申1898年所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关于九龙城问题的规定，既然九龙城应由中国官员控制，城内中国居民就有权自由居住。港英政府命令迁走城内所有居民，完全违背《专条》条文和缔约精神。要求英领转告港英政府撤销迁移九龙城中国居民的决定。

△　湘、鄂、皖等省纷电国民政府要求拨款防汛，是日国民党中政会据行政院呈请，决定拨发长江防汛经费60万元。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废止《各省临时军法会审组织大纲》及《各省临时军法会审审判规则》。7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苏（苏州）嘉（嘉兴）公路竣工，是日在苏州行通车礼。

6月29日　北平军分会宣布成立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于学忠任委员长，魏鉴、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任委员，限7月1日在河北省府成立，所有关于接收战区内之行政、警察、交通等事项，统由该会负责处理。

△　日使馆武官永津由长春返平，向何应钦、黄郛等说明有关接收战区、北宁路通车事项在长春已商有端倪，要求北平当局派员赴大连作具体商议。黄郛即派雷寿荣、殷同于当晚赴津乘轮往大连。同日，黄郛电告蒋介石称："7月1日可在连详商，如能顺手，大约十日内外当可见诸实行。"

△　沈鸿烈电蒋介石、汪精卫辞东北舰队司令及青岛市长职。7月5日，国民政府准沈辞东北舰队司令本职。

△　颜惠庆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邀请各国对华投资，略谓："中国人民一向注重工业现代化"，"顷间中国需要大宗机械以发展富源，中国实为勇敢投资家之一大市场。"

△　天津油漆、颜料、海货等35业公会呈请市商会转请财政部及省、市当局俯恤商艰，援照沪市前例暂停征营业税，并发表宣言请全国各地商会一致援助，决定在未得结果前各业一律暂停纳税。

6月30日　刘文龙、盛世才联名电行政院，以平定马仲英殊功自诩，声称枪杀陈中等人系因陈等“勾结谋叛，证据确凿”，要求中央派“关心边局”之陈立夫、彭昭贤、刘光、张凤九四人即日来新，调查真相。刘文龙另电新疆驻京代表张凤九，嘱张与中央各方接洽，早日发表盛世才新疆边防督办的任命。

△　冯玉祥任命察省右翼四旗镶蓝旗现任总管富龄阿为抗日同盟军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军长。

△　蒋介石为加紧内战，筹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是日电训练总监部兼代总监朱培德，告以“在江西剿匪各师军官决自7月15日起分班轮流训练，每班训练时期为14日，每期约1500人”，要求选派射击、通信与工兵、山地战术与步炮联合学习等最优顾问届时前往。并“约同各兵监中优秀官长”与杨杰、张治中及骑、炮、工兵各校长带同最优教官先到牯岭，“拟定教育计划与视察训练地点”。

是月　红四方面军在巴中西北门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粉碎川军田颂尧等部“围剿”的作战经验，并进行扩编，将第十师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辖第十、十一、十二师；第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第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第七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

△　伪满中央、省、县、旗各级成立地方维持会，取代清乡委员会，以配合日伪军对抗日武装的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民间武器，拼凑汉奸武装自卫团等为任务。

7月

7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南昌暴动纪念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　中共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缺第六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为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

△　吉鸿昌率抗日同盟军收复宝昌，伪军北逃多伦。

△　刘桂堂反正后，由冯玉祥任为抗日同盟军第六路总指挥。驻沽源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遂陷孤立，是日抗日同盟军乘胜将其击退，沽源遂告收复。

△　湖南省政府遵蒋介石令，为将宝洪公路（宝庆桃花坪——洪江）改建轻便铁道，决定是日起发行建设公债1000万元，除以300余万元偿还中国、交通两银行旧欠外，以600余万元供建设宝洪轻便铁道之用。10月18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

△　国民政府加派钱宗泽为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黄郛、于学忠、周作民、张伯苓、章元善、王克敏、钱宗泽为常务委员。

△　天津电车公司因不履行劳资纠纷调解条件，无故开除工人，并殴伤工会理事张广兴，全体工人罢工，各路电车停驶。翌日，市工联会派员赴党政机关请愿，并通电全国吁请声援。工人为顾及社会交通，先行复工。

△　香港《公司条例》公布施行。

△　《文学》月刊在上海创刊，由郑振铎、王统照编辑，生活书

店发行。

△　何键电国民政府报告湘省水灾情形，灾区达30余县，溃溃200余垸，“损失之大盖与民国二十年如出一辙”。

7月2日　　华北战区接收委员殷同、雷寿荣、薛之珩在大连与日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参谋喜多诚一开始会谈接收战区及改编伪军等问题。伪军李际春、伪奉山路局长阚铎及“满铁”代表亦与会。日方要求在滦东部分地区及遵化、蓟县、密云、顺义等县留少数警备部队监视华方；收编伪军李际春一部为武装警察维持战区治安；北宁路先试通唐山，芦台至榆关段由中日及伪满共组委员会管理。同日，殷同等将日方要求电北平当局请示。

△　蓟县、宝坻、玉田、遵化、三河、平谷六县民众代表具呈平军分会、政整会，反对将伪军收编为武装警察。

7月3日　　黄郛电蒋介石报告大连会谈情况：一切交涉，决定按两原则进行：“（一）除停战协定系正式签字外，余均口头商榷；（二）对手方为日军，商谈地（方）不越旧时南满铁路区域。”并称：谈判伪军收编已有相当进步；交通恢复“先试通至唐山，然后再由唐山推进至滦州”。同日，北宁路北平至唐山段正式通车。

△　蒋介石决定对冯玉祥采取军事行动，是日电汪精卫称：冯“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并告业已电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及电阎锡山、宋哲元一致协助。

△　国民政府任命邹洪为第四十三师师长，原任代师长刘绍先免职；任陶广为第六十二师师长。

△　国民政府军委会任何知重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李觉为副司令，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

△　伪满国务院任命罗振玉为伪监察院院长。

△　售卖中东路谈判第三次会议，苏方提出售卖价2.1亿卢布，另加木场及与铁路有关之附属事业4000万卢布，日与伪满仍给价5000万日金，不包括其他财产。

△　印度华文《印度日报》在加尔各答创刊。

7月4日　　吉鸿昌派第六军军长张凌云率乜玉岭、胡云山、余亚农三师及刘桂堂部苏致广师骑兵一部参加收复多伦。是日，吉率部出发。

△　冯玉祥为解决抗日同盟军粮秣，令察省财政厅发行军粮代购证40万元，由各县绅商组购粮委员会，向富户以代购证作价购粮，9月1日起三个月内准商民以此证交纳田赋税捐，余额由财政厅届期收回。

△　蒋介石在杭州对第三师军官讲演《如何发扬历史的光荣》。

△　华安商业储蓄银行在沪开业，资本50万元，俞寰澄、方苏庵等任董事，胡莼芗任总经理。

7月5日　　驻河南第七十五师宋天才部程道容团起义，并将反对起义之团附、营长各一名处决后率部开往商城西北，配合红军进击潢川刘镇华部。

△　行政院电召黄慕松返南京，另派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彭昭贤二人入新调查。中旬，宫、彭以马仲英阻挠飞机过境，向汪精卫要求中止去新。

△　“海圻”等三舰驶抵香港海面，要求广东当局收编，并提出发清东北舰队之欠饷三个月，来粤后依海军部饷额按月发给；各舰士官不得更易等条件。陈济棠即电蒋介石请示，旋经蒋复电暂准收容。9

日，三舰驶抵黄埔。22日，西南政务会发布收编命令，将三舰划归第一集团军管辖，委任姜西园为司令。

△　刘文辉、邓锡侯在毗河对峙两月之久，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认为摧毁刘文辉力量、统一川事的时机成熟，经联合李家钰、罗泽洲等部，是日分三路向刘文辉部进攻，刘文辉分六路防守。战线东起资阳、简阳，西达灌县，开川中空前大战。

△　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电何成濬、刘镇华，报告所部奉命复员，6日起开始向鄂境输送。

△　北平国立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副馆长袁同礼为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事呈具教育部，要求用旧抄旧刻善本代替经过篡改的库本。19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复函以“版本追究无穷，采访尤费时日，善本虽有，乞假非易”，而且刊印《四库全书》未刊本“已成定议”，决定仍纯采库本。8月14日，学术界傅增湘、叶恭绰等21人又函王世杰表示反对。

△　日军桑原部队纠合伪军从梨树县小城子（今吉林省辖）出发进攻辽东抗日义勇军，中途被义军围歼，击毙桑原中尉等30余人，伤20余人。关东军闻讯，急派小川、山崎部队往援。

△　上海闸北正丰、正大、祥成等11家丝厂5000多工人因要求恢复原有工资津贴举行罢工。上海市公安局派警弹压，拘捕工人七名。8日，厂方答应恢复原工资津贴后复工。

△　中东路售卖第四次会议，苏方提出保有中东路所有权，遭日伪拒绝，会谈陷于僵局。

7月6日　　何应钦遵蒋介石令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采取军事行动，是日令庞炳勋率第四十军8日出发，沿平绥路北进，12日达下花园一带；冯钦哉率第七军10日自沙城出发，13日达涿鹿附近；孙德荃

师13日以前完全到达沙城及土木堡间集结待命；第二十五师13日以前集结怀来、康庄间待命；冯占海于13日以前以主力集结化稍营待命；第五十五军何遂以一部驻防独石口、赤城、延庆，以主力集结龙关等处待命。

△ 日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向日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要求内阁据以制定对华政策。其要点为："（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抵制与抗日活动，保持并延伸此一情势的发展；（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其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

△ 殷同等在大连与日伪会谈结束。商定战区伪军三分之二遣散，三分之一收编为河北省保安队，仍驻滦东；北宁路芦台至山海关段于日军撤退后，仍归中国管理。并定10日起，由中国依次接收滦东、平北各县。会谈不作正式文件发表。

△ 在天津扰乱之伪华北民众自治联军总司令郝鹏，因内讧被其副官苑某等三人用汽车架出日租界，送交第一军团司令部。天津日领事田中向于学忠口头抗议华方越界捕人，要求将郝引渡并要挟中国方面不得处理。翌日，日宪兵队长森木亦到河北省府要挟。于学忠即电中央及北平军分会提出三项办法：一、解平发落；二、交法院裁判；三、由军法处判无期徒刑。日方复派员至平向黄郛、何应钦要挟，黄、何恐接收战区发生阻碍，竟令河北省府取消对郝之通缉令，并于9日将其释放。

△ 刘湘由隆昌电国民党中央及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称："川北赤祸势已臻燎原，苍、广、阆中相继告急，全川震动"，告以"即日出师以大部兵力会同田、杨、刘各军等协力剿赤，以一部西上，制止刘、邓之争"。

△ 河北唐山华新纱厂2000余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及发给花红，向厂方交涉无效举行罢工。8日，河北省政府实业厅电唐山公安局及当地驻军前往饬令工人出厂，并准该厂暂停工。13日，厂方允每日加给工资一分，并由公安局强制复工，同时将罢工领导人孙玉邦等八人拘捕。

7月7日 夜，吉鸿昌率抗日同盟军分左、中、右三路围攻多伦。战至翌日拂晓，夺取敌壕两道。下午6时，右路占领多伦西仓西端敌阵地。

△ 国民政府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川中各军悉归节制。

△ 国民政府令准免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夏斗寅本兼各职；遗缺由张群继任。

△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电新疆刘文龙、盛世才，略谓：“两兄当金树仁弃职出走之后，（马）仲英违令进攻之时，一则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一则督励将士奋勇前敌，保靖之功，中央良深嘉慰”，要求刘、盛“万不可自生携贰，致隳前功”，应“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20日，刘、盛复电表示“仰赖中央，万无携贰之理”。

△ 中共北平市委在西城府右街拣果胡同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因打入西城区委的国民党特务告密，市委书记陈镜明及各区委组织部长雷明生、宫曰健、李朝梁、余敬夫等人被捕。

△ 中国航空公司沪粤航线开航。

7月8日 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全国，揭露中央军政当局趁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进兵多伦之际，不仅不予接济，反以兵力压迫，造谣栽诬，特列举事实予以驳斥，并表示决“于血泊中求挣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

△　刘文辉在刘湘等军联合进攻下，放弃成都，退守岷江（上自灌县，下至乐山），并电蒋介石、汪精卫，指责刘湘等部大举西上，表示为“顾全川局，不忍省会糜烂，请中央准辞川省主席及民政厅长兼职”。同日，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等部进入成都。

△　午，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由苏联取道欧洲回国抵沪。10日，往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各团体救济东北难民会致谢后招待记者，谓抗日非局部进行所可奏效，今后当仍本初衷，继续抗日，希望举国上下，共谋团结，一致对外，并郑重表示决不参加内战。

△　侨务委员会通过《华侨文化团体登记规程》，9月15日公布。

7月9日　　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在张家口成立，由在察之东北义勇军官兵、东北籍抗日军人及爱国青年等组成。

△　冯玉祥派孟宪章到平，向黄郛提解决察事办法两项：一、宋哲元回察，专理行政；二、冯本人居察，努力收复失地。冯致黄函中表示“俟抗日工作完全结束后即收束军事，对各方误会望为解释”。11日，黄函复冯，仍要求：一、结束抗日军事；二、取消同盟军总司令名义；三、宋哲元回察；四、就全国林垦督办职。

△　福建各县党部驻省代表团电冯玉祥，谴责北平军分会令庞炳勋、冯钦哉、关麟徵各部对察军事行动，勉冯“矢效武穆，勿堕秦奸”。

△　晚，黄郛召殷同、雷寿荣、薛之珩、李择一等在平商改编伪军问题，决定派员赴唐山与李际春接洽。12日，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派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前往。

△　中国国产绸缎展览会在上海举行，至9月1日结束。

7月10日　　汪精卫在行政院总理纪念周会上报告华北停战、棉麦借款、新疆事变、四川“剿匪”等问题，略称：新疆善后三大原则为外

交要统一于中央；军事要统一于中央；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四川设“剿匪”总司令是因为最近共产党入川“滋扰”，形势严重，故不能不统一军事，以资应付。

△　冯玉祥电李烈钧谓：“宁方乘我多数健儿奋死攻敌之际，竟公然调兵遣将，入察攻我”，要求李“联合三二十正人义士，为我义师主持正义”。14日，李复电表示愿“联合诸人，再申正论”。

△　国民政府以黄慕松出差新疆，派葛敬恩代理参谋本部次长；以徐培根继葛敬恩任军政部航空署长。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决定将李际春丰润原籍于北伐时被没收之田地1200顷全部发还。

△　招商局“图南”轮由营口驶沪，在山东威海卫东之成山头附近被日轮“长春丸”撞沉，乘客、船员200余人，遇救者仅30余人。事件发生后，招商局派员向大连日汽船会社初步交涉，日方函复竟表示不负责任。15日，中华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要求招商局对被难者作好善后，并电请外交部向日提严重交涉，要求赔偿损失，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情。

△　反共刊物《汗血》周刊创刊，陶百川主编。为招揽顾主，以订阅《汗血》月刊全年赠《汗血》周刊半年作宣传。

7月11日　蒋介石积极准备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在庐山组设军官训练团，由陈诚主持，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美军事教官，抽调赣粤闽湘鄂北路军军官施以训练。蒋特手编《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是日，蒋在牯岭饭店对军官团各教官演讲《庐山军官训练的要旨和训练方法》，声称：“此次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

并实施训练。”

△　黄郛、宋哲元分函冯玉祥，要求迅速取消抗日同盟军。冯当即复电，略谓：同盟军已在多伦附近发生激战，收复多伦可期，平方所提四项办法，如多伦攻下，一切不成问题。

△　张继夫人崔振华控告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舞弊，经最高法院检察署调检，是日批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25日，江宁地方法院传易培基及有关人李宗侗到案，易等匿避。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北省政府，原省府委员李书城、贾士毅、李范一、程其保、范熙绩、杨在春、陈达勋、吴国桢免本职；李书城、贾士毅、李范一、程其保分别免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兼职。任孟广澎、贾士毅、李范一、程其保、范熙绩、李书城、吴国桢、卢铸为省府委员，孟、贾、李（范一）、程分别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

△　国民政府任命谢刚哲为海军第三舰队司令。

△　宋子文由伦敦抵意大利罗马。13日，意首相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接见，并代表意王赠宋大十字勋章。14日，墨索里尼宴宋，张学良作陪。16日，宋由罗马往巴黎。

△　马仲英电国民政府，表示“仲英始终服从中央，效力党国，而只遵黄使（慕松）命令”，要求“速颁明令，实授黄使主持新政”。他个人当听其调度，决不使中央有西顾之忧。

7月12日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吉鸿昌部自7日开始围攻多伦后，9日晨将城外据点占领，10日晚，吉鸿昌等亲率敢死队攻城。11日开始总攻，是日，同盟军分由南、西、北三门攻入城内，复经巷战，肉搏三小时，伪军始由东门逃窜，多伦遂告收复。

△　冯玉祥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黄郛等报告收复多伦，

要求蒋等“慨念东北同胞亡国之痛，废停战协定之约，兴收东四省之师”，否则，惟有“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　北平军分会自下令各军向察推进后，为防对同盟军表同情、横亘沙城柴沟堡一带之孙殿英部捣其后路，以开拔费十万及预支薪饷若干为饵促其西开，同时调驻平西黄杰师至青龙桥一带监视。是日，孙驻怀来一带部队第一批西开抵包头，庞炳勋部跟踪接防。

△　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民联合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200多团体召开“上海市各团体欢迎抗日英雄大会”，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均发表演说，报告抗日经过。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建设委员会为扩充首都、戚墅堰两电厂，并建设淮南电厂，发行民国二十年续发电气事业公债600万元。18日，国民政府训令立法院遵照。

△　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举行，参加单位12省、市、区，选手千余人，田径、游泳破全国纪录八项，15日结束。

7月13日　察哈尔民众庆祝收复多伦胜利大会在张家口召开，并电吉鸿昌、邓文、李忠义、刘桂堂祝捷。

△　冯玉祥委张凌云任多伦警备司令，并调吉鸿昌、邓文二部驻防沽源、独石口。

△　黄绍竑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赴港经过。同日，新任湖北省府主席张群到南昌谒蒋。

7月14日　驻华日使馆武官柴山访何应钦，声言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有违塘沽停战协定”，要求中国方面注意。同日，驻承德日军第八师团一部往热、察边境调动。

△　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海员工会，邮电工会，教育、学生、妇女等团体组织，江苏省各县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以及朱庆澜等纷电冯玉祥祝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先后发贺电的还有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河北及平、津各抗日团体，福建省公务员，上海教育界，上海电信同人救国会，中国国际宣传社，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中国国民党护党同志会以及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

△　南昌行营制订《剿匪区域各县县长兼军法官暂行条例》，规定凡非军人犯军事上法令规定者，该兼军法官均得拘捕审理。

△　薛之珩、雷寿荣抵唐山与李际春商编遣。李初索编遣费30万元，嗣改索45万元，最后增至50万元。所部头目亦趁机索名义。

△　第十九路军援热部队回闽后，经蒋介石同意，将第一纵队改编为补充师，谭启秀任师长；第二纵队与第四十九师合并，将原师长张贞撤职，任张炎为师长。是日张炎在永定就职。

△　上海天厨味精厂捐献“天厨号”飞机一架，向禅臣洋行定购，原定16日行命名礼，是日在沪试飞，坠地重损。

△　由梁漱溟、晏阳初、章元善、黄炎培、江问渔等发起之全国乡村建设协进会，在山东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第一次大会，各方参加者60余人。16日确定乡村改造工作三要点：一、不能急进求速效；二、不能专法欧西，须注重本国情状，因地制宜；三、不能偏重一方，须以整个社会为对象，才有整个的办法。以上作为全国乡村工作的共同守则。同日闭会。定名乡村工作讨论会，决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

△　中东路售卖第五次会议，苏代表尤列涅夫反驳伪满声明，强硬主张中东路及附属事业的所有权属于苏方，售卖价格应以建设费为基准，计2.5亿卢布。伪代表大桥主张以现有价值为基准，双方争执

不决。17日尤列涅夫访日外务大臣内田，要求日积极斡旋。

△　是日出刊之《中国论坛》第三卷八期刊载国民党特务组织（代名“华”）6月15日匿名投寄该刊之秘密通告抄件，内称：“经过‘华’的讨论，当决在最短时间内对共党、西南政府、北洋军阀以及其他反动派别的领袖实行严厉制裁，并责成各区分社自接此通告后即开始计划，相机进行。”陈绍禹、秦邦宪、鲁迅、茅盾、胡愈之、杨杏佛、冯玉祥、吉鸿昌等人均列其中。20日，上海美商英文《大美晚报》亦刊载此项消息。21日，上海市府遵国民党中央电令，向驻上海美总领事提书面抗议。

7月15日　红军叶剑英部在赣南筠门岭进攻粤军第七师黄延桢、第八师黄质文部，将粤军欧阳新团击溃。18日，红军向会昌撤退。陈济棠命驻韶关之飞机第二队增援。

△　李烈钧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院，指出冯玉祥“一举而复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应为有功”；要求对冯“明令授权，示以方针，共扶危局”。

△　蒋介石电何应钦，指示对察事于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由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离去张垣，另谋安置”。

△　故宫博物院在南京召开理事会议，汪精卫、褚民谊、于右任、张继等人与会，通过准易培基辞院长职，李石曾辞理事长职；举马衡代院长，张静江任理事长；补孙科、朱家骅等19人为理事。

△　闽西善后委员会改组，定名闽西善后处，直接归闽绥署管辖，蔡廷锴自兼处长，邓世增任副处长。连城、永定、龙岩、上杭、漳平各分会同时改为善后分处。

7月16日　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电宋哲元、关麟徵、庞炳勋

称："察省异军突起，迭克各城"，"辽、吉、热、黑各地义军已蜂起抗敌"，要求宋等趁此时机与冯玉祥共同抗日，"雪城下订盟之大耻"；并电孙殿英回师抗日。

△　日关东军参谋部提出《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要案》，阴谋挑拨察北汉、蒙民族情感，煽动蒙民从事分离运动。10月，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又向关东军提出《有关建设蒙古国之意见》，内容为在察、绥境内建立伪蒙古国，以便于"帝国大亚细亚政策之实践"，其设想的"蒙古国"领域，除长城以北蒙古盟旗外，尚包括察哈尔的口北道（辖宣化、赤城、万全等10县）和山西的雁门道（辖大同、宁武、五台等26县）。

△　沈鸿烈电蒋介石、汪精卫辞青岛市长兼职，翌日离青避居威海卫。嗣经蒋电韩复榘慰留并由青岛市民代表往威海卫敦请，23日沈返青复任。

△　皖省各中学反对中学会考，组织反考大同盟，并发出反会考宣言。13日，蒋介石电刘镇华责成教育厅认真整饬，教育厅即将省立高中及一中两校长免职。是日，两校教职员五六十人赴教育厅申辩责任，并将办公室捣毁。省高、一中两校长旋到庐山向蒋介石请愿，被蒋扣留。25日，皖省府撤换大批中等学校校长。

7月17日　　由中国共产党河北前线委员会（书记柯庆施）领导的、由工农劳动群众参加的华北民众御侮救亡总会筹备会发表政治纲领，主要内容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南京政府进攻南方工农革命武装，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巩固国际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等项。该会原定8月26日开正式成立大会，后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未果。

△　日茂木骑兵旅团是日起由围场向多伦开动，与此同时，伪军张海鹏、崔兴五部奉命进犯多伦、沽源，日机连日在多伦侦察。抗日

同盟军吉鸿昌部遂回驻多伦。

△　庞炳勋、关麟徵、冯钦哉各部共11师陆续向察境推进，是日庞部先头部队抵宣化下花园。冯玉祥在日伪军及中央军夹击下，一面严饬同盟军不得擅向中央军还放一枪，以守枪口不对内之宣言，一面加派乜玉岭等三师增防多伦对付日伪军，并调孙良诚部进驻宣化辛庄子以防中央军进攻。

△　李济深、陈铭枢电汪精卫、居正、于右任、孙科，请中央停止入察之师，以化除阋墙之祸。略谓："焕章（冯玉祥）同志愤暴侵凌，奋身朔漠，捍卫边疆……乃者中央竟遣重兵入察……窃有期期出为不可者。"并谓："国家多难至此，应共奋同仇敌忾之心，化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为千古所悲。乞我公主持大计，即饬令停止入察之师，为国家惜人材，为社会留元气。"

△　西南政务会分电晋、冀、绥、陕各绥靖主任、省府主席及各军、师长，勿目睹抗日同盟军"将被夹击消灭于妥协政策之下袖手旁观"，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又电庞炳勋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

△　蒋介石令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转令第五、第六两师限期到达硝石、资溪与金溪防地，向黎川、光泽方面猛烈进击。并令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速令连城部队驰往清流应援。

△　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派陶尚铭负责接收平东、平北各县，殷同、李择一接收滦东、滦西各县。河北省府所委战区各县长及唐山、临榆两特种公安局长，事前均征得日方同意。是日，于学忠、殷同、陶尚铭率新委战区各县长在平向黄郛请训，黄指示：一、治标须积极急赈战区灾民；二、治本须注重复兴农村。同日，黄分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接收情况称：本日止已接收通县、香河、顺义、宝坻、三

河、宁河六县，其余各县务期于月底办竣。

7月18日　中央军铁甲车开过下花园，抗日同盟军将平绥路辛庄子附近104号铁桥拆毁，次晨同盟军即将该桥修复。南京方面宣称“拆桥之举，已揭开冯氏反抗中央之态度”，大造对冯用兵舆论。

△　汪精卫电复李济深、陈铭枢，指责冯玉祥在察抗日是“不秉命于中央”，诋毁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并要求李、陈劝冯放弃抗日，“举察省军政之权，还之中央”。

△　多伦商会、教育会、自治公所、农务地方救济会及全县民众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北平军政当局，陈述多伦民众“饱尝亡国之痛，深恐再为鱼肉”，要求“以全国大局及人民痛苦为念，迅移攻察之师攻热，令杀戮不再及于同胞”。

△　华北战区接收委员刘石荪会同日天津驻屯军参谋大桥，是日赴秦皇岛与石友三接洽改编，决定石部900余人运唐山，俟李际春部改编竣事后改编。8月，石部在老庄子改编完竣，开玉田驻扎。

△　庐山军官训练团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学员1840人。蒋介石作《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宣称“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举办训练团，“其目的是要训练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同日，又对教官演讲《革命军官须知》。训练团至10月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完成三期，调训军官7500余名。

△　国联行政院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在巴黎开会，中、德、墨西哥、西班牙、英、法、意、挪威、捷克等国代表参加，美国派观察员出席，中国由宋子文、顾维钧出席。宋在会上声称合作性质纯属技术性的，绝无政治意味。会议应宋子文的要求，决定派国联秘书处卫生股长波兰人拉西曼为国联驻华技术联络员，任期一年，其职责为：

一、将国联各种技术机关之消息转达中国；二、将中国方面关于技术合作之请求送达国联；三、襄助中国政府选任技术人员，从事中国建设；四、襄助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对于国联技术机关各专门人员之工作就地予以调度。

7月19日　华北战区接收委员李择一偕日使馆武官柴山赴唐山，协同薛之珩等与李际春最后商定收编李部伪军4000人，遣散6000人。付与编遣、善后等费共48.4万元。李任战区军事编遣委员长。收编之伪军分隶两总队，委郑燕侯为第一保安总队长，第二总队长由接收委员会另委。

△　国民政府令派刘建绪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何键兼第二纵队司令，陈继承任第三纵队司令，郭汝栋任第三纵队副司令。

△　刘湘由隆昌入成都，四川省府主席暂由赵香畹代。同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联电要求刘文辉率兵两师入西康，余部概交刘湘率领“剿匪”。

△　中国领土保障同盟会在上海成立。

7月20日　冯玉祥通电全国驳斥汪精卫对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所作的诽谤，吁请全国民众团体及新闻界派员到张家口视察，多伦是否不战而克，“一白其冤”。

△　留沪国民党中委程潜、杨庶堪、陈嘉祐、张知本、李烈钧、张定璠、薛笃弼联电林森及各院长，望与冯玉祥“虚怀相处，共拯危亡”，停止入察用兵。同日，马相伯亦电汪精卫，指出“李际春为日作伥，公等置之不论，独于抗日军必加压迫，是非颠倒，何至于此”，并驳汪所谓多伦不战而得之说，斥为“悖谬”。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常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

邹鲁、林翼中等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速将入察之师，停止前进”，并表示如南京当局“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同日，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以及国民党广九、广三两铁路党部，亦纷电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制止对察用兵。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华北临时办事处结束。

△　驻河北马厂之临永警备师郑桂林部分别于是日及22日哗变，开离马厂，攻占任丘、高阳等地，收缴民团及警察枪支，何应钦派兵“进剿”。

△　国民政府敦聘王晓籁、王正廷、王志远、史量才、朱庆澜、杜月笙、李铭、林康侯、林我将、陈光甫、胡笔江、胡文虎、翁照垣、张伯苓、张嘉璈、虞洽卿等为中国航空协会理事。

△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惇会商公共租界工厂检查办法，初步决定合设工厂检查处，租界区域内外各厂同样施行中国劳工法；违反中国劳工法案件归中国地方法院起诉处分。事后，因法方阻挠，未予实行。

△　日本第二批武装移民493人到达依兰县。

7月21日　蒋介石为策划对红军第五次“围剿”及镇压抗日同盟军等问题，决定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是日，汪精卫偕顾孟馀、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乘舰离京赴赣。戴季陶、黄绍竑、张治中、陈仪、孔祥熙等已于上日前往。

△　冯玉祥电上海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各慈善团体联合会称：“连日运平之伤兵车，均在半途受阻，运回张垣、医药缺乏”，要求“主张人道，主持正义”，予以救济。

△　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分农赈、急赈、财政三组，章元善任农赈组主任；于学忠任急赈组主任；卞白眉任财政组主

任。决定先办急赈。行政院拨赈款100万元，另由河北省政府发行公债400万元以充救济经费。同日下午，黄郛邀宴平、津银行界，要求对发行公债予以协助。

△　刘湘在成都召川军各将领晤商川局。决定对刘文辉用政治方法解决，请其入康屯垦；“剿共”军事由田颂尧、杨森派所属全部军队担任广元至阆中一带防堵，刘存厚部在万源至宣汉一带防堵。刘湘出师三万，即日集中大竹、梁山（今梁平）进攻红军。

△　宋子文由意大利抵德国柏林，谋增进中德两国经济合作与发展航空交通。

7月22日　　中国、印度、西班牙、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美国九国在伦敦签订《白银协定》，约定：世界存银最多之印度1934年1月1日起四年内售银不逾1.4亿盎斯，西班牙每年售银不逾500万盎斯，中国政府自1934年1月1日起四年内不将熔毁银币所得之生银在市场出售，澳大利亚等六个产银国每年各向该国银矿吸收定额白银，并不售过剩存银，其收购数额共3500万盎斯。并约定该协定于1934年4月1日以前由各国政府批准生效。

△　黄慕松由迪化飞返南京。25日赴江西庐山向蒋介石报告新疆二次事变情况。

△　黄郛派马伯援赴张家口游说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是日，马携冯致黄函返平。冯在函中表示：一、抗日目的始终不变；二、欲求和平，平方须将入察部队撤回；三、须俟察省各军善后有办法之后始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

△　南昌行营制订《剿匪区内实施教育方案》，规定教材需以“揭破赤匪的错误和罪恶”为标准，“施行保甲、保卫、侦探的训练和组织”。实施办法为“责成各该驻地最高军事长官负责督办，由政训人员主持，师、旅、团服务人员辅佐”，开办后“先宽而后严，先易而后

难，先自动而后强迫”。

△　废止内战大同盟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及北平军分会，要求停止对察军事行动。

△　驻京日领事须磨对记者声称：对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不能忽视，如有政治作用表现，难保证不酿成第二“满洲国”或“上海事变”。

△　张学良为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国巴黎。30日，飞抵英国伦敦。

△　天津裕元纱厂违反劳资双方议定之减工办法，工人5000余人宣告罢工，市党政当局派军警前往镇压。翌日，逮捕工人73人，8月12日复工，被裁工人千余名。

△　伪满公布新税则，定23日起施行，规定商人应以伪币付税，并减低进口税商品50余种。

7月23日　　蒋介石、汪精卫及各军事将领在庐山集议第五次“围剿”，决定华北驻军除一部分留驻外，悉南调江西参加“剿匪”，并确立五次“围剿”实行碉堡政策、经济封锁。

△　雷寿荣、李择一偕日使馆武官柴山赴唐山办理接收战区、改编伪军事宜。

△　河北战区各县临时联合救济会通电全国各党政机关、各法团，并呈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指责政府对战区救济“明明以二千万救济费宣布全国，而所拨现款仅只一百万元，待发之公债仅四百万元，余者尚须向各省市筹募，画饼何以充饥，望梅焉能止渴”，要求政府如数筹拨。26日至29日，战区各县法团代表及农民代表纷电河北省府陈述灾情，要求急赈。

7月2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

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说："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最凶恶的步骤，它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及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的出路的斗争，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并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

△　国民政府令准张继辞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职；陆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张印相"鼓动旧部，违抗命令"，着即免职查办。

△　冯玉祥电庐山汪精卫，驳斥汪所谓"抗命"、"割据称雄"以及"多伦克复初无战事可征"等诽谤，并要求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所制订之救国方案，列入庐山会议议案。

△　日外务省对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问题发表非正式声明称："中国政府暗派其代表在美国及欧洲各国策动，列国竟不察其究竟而援助中国，有对华成立借款及供给武器之事实，结果将助长中国内乱及达成其抗日之目的。然日政府视此为破坏东洋和平，故对列国之此种援助政策，则绝对加以反对。"

7月25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朱培德、唐生智、陈仪、张治中、杨永泰、陈绍宽等20余人出席，讨论军队编制、空军建设三年计划等。午后，汪精卫、顾孟馀、朱家骅、朱培德、黄绍竑、曾仲鸣等会商时局。

△　陶尚铭率密云、遵化、蓟县、怀柔、平谷五县长及公安局长赴密云与日铃木旅团长商洽接收问题。

△　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年4月间所侵占我国南沙群岛中之太平岛、南威岛等九个小岛属于法国领土。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国际间确认该九小岛为中国领土，法方竟正式宣言占领，何所依据而出此，法政府亦未宣布其理由。除电驻法使馆及菲律宾领事探询真情

外，并会同海军部筹谋应付办法，对法此举将提严重抗议。

7月26日　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盟长、副盟长及部分旗王公在百灵庙集会筹备内蒙自治，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规定“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族之治权”，“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族之领域为统辖范围”，“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

△　伪军李际春部士兵4000余人是日至28日分由安山、滦县、胥各庄等地运马厂遣散。沿途士兵跳车逃跑，日军竟在唐山车站用机枪扫射逃兵，死伤不少。运抵马厂后大部被募往江西编入“剿共”部队，余1300人就地遣散。

△　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电黄郛、何应钦陈述接收战区困难称：“（一）交通一时未能恢复；（二）接收员警只限九百人；（三）唐山日军仍无期撤退；（四）迁安尚有李夙文部占据。有上四点，即令收回各县，仍然不能行使职权”，要求“暂缓接收，以免徒生枝节”。

△　冯玉祥电促李烈钧“努力和平运动”，表示“不愿以抗日武力为国贼作鹬蚌”。

△　国民党中政会准财政部续征关税5％附加税11个月。

△　爱国志士刘崇武等于1月间经上海特区第一法院判刑七年后，该院又以刘等与沪上其他投弹案有关，改判刘有期徒刑12年，潘鸿生等亦均加刑。是日，上海70余同业公会联电国民党中政会、行政院、司法院称，刘等纯出于为国除奸，要求予以特赦。

△　黄河在山西永济决口，永济、平民二县被淹。

7月27日　殷同率滦东、滦西各县长、公安局长及保安队官兵约2000人赴战区接收，车至唐山，日军司令发给各接收县长通知一件，

要求施政一切手续严守中日停战协定；到任时应将接收之布告，公安局配置地点及警察人马武器数，自卫团枪支数等申报榆关日第十四混成旅团部。同日，滦县、昌黎接收。

△　日驻伪满大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死于长春，日政府派菱刈隆继武藤职。

△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该会系同盟军总部出兵收复东北之设计机关，隶属同盟军军事委员会。8月1日发成立通电。

△　湘鄂西红二军团贺龙部放弃鹤峰，集中邬阳关。是日，徐源泉部猛攻邬阳关，战斗两昼夜后，红二军团撤离。

△　日本为国联派拉西曼为驻华技术合作联络员事向国联秘书长提警告，谓日本鉴于拉西曼过去在华行动之不谨慎，请中止其东行。嗣后，国联复文称：拉氏活动限于技术范围，本会嘱其在华活动勿涉及政治方面，此事并非日本所当抗议。

△　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指出香港英当局限令九龙城居民迁居，改建公园，与1898年中英两国所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原意不符，要求转饬香港政府取消成议。

7月28日　蒋介石、汪精卫于庐山联名通电全国各省、市，各军政机关，除表示国民党政府于最短期间调集大军，悉力“剿匪”外，指责冯玉祥“在察省一切举动，深为国危惧”，要求冯接受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并称：“以上诸端，中央认为不仅关系察省存亡，且关系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同日，蒋、汪电陈济棠、李宗仁等，诡称

对察无用兵意，要求陈、李婉劝西南诸委相忍为国，勿轻信“谣言”。

△　抚宁、乐亭两县接收。同日接收专车抵榆关，被日军以事先未经允许阻其下车，并迫其驶回秦皇岛。

△　据“中央社”西安电称：陕西省前数日大雨，迄是日止受灾区域已向省报灾者有蒲城、三原、蓝田、渭南、咸阳等26县。

△　第十九路军开设之闽西农民银行开业，资本100万元，由闽西善后处分期筹拨，委第十九路军总部军需处长叶少泉任总经理，总行设龙岩。

△　黄郛电河北省府，拟于滦东、滦西及平东、平北各设行政督察专员，要求定出管辖区域。河北省民政厅即拟定方案报省府，划为二区，第一区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九县及都山设治局；第二区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13县。

△　伪满在哈尔滨附近拘捕反满农民83人，是日被伪哈尔滨市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　伪满中央银行通告，旧纸币一律至1934年6月30日为作废期。

7月29日　　临榆县接收。临榆城仍为日军盘踞，新县府设海阳镇。同日，黄郛电蒋介石、汪精卫称：北宁线各县已全部接收，恢复1月1日榆变前之旧状。

△　孙科抵庐山参加时局会商。

△　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推李际春为战区杂军编遣委员长，是日李通电就职。

△　孙殿英留驻柴沟堡部队是日全部开抵包头，柴沟堡由晋军接防。

△　河南豫丰纱厂以缺乏棉花，营业亏损，宣布停业，工人被遣散。该厂工会以厂方不遵守与工会所订“厂方如终止时需三个月前通知对方”的协约，提出抗议。

7月30日　怀柔、密云两县接收。日铃木旅团长向新任密云县长孙书堂、怀柔县长许文泉提出非武装区内注意事项：一、武装军队不准开入；二、反日暴力团体不准进入；三、对日本治下所经办之事业及用人不得压迫；又要求暂留一部日军驻守观察履行停战协定。接收人员一一答应。密云伪县长要求先发放亏空款项3000余元，经铃木调停，至翌日始接收。新县长受日军监视甚严，出入均由日宪兵紧随，一切政令须先向日方报告，警察人数及枪械均经日军点验，公安局长所佩手枪，因未经报明，被日军缴去。

△　冯玉祥电秦德纯，表示“决自即日起收束军事”。

△　东北民众大同盟电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冯占海等东北军将领，要求勿在国民党当局派军入察之际“囿于名利，甘为爪牙”。

△　抗日同盟军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以参谋长古松年“有蓝衣社确实证据”，予以枪决。

7月31日　冯玉祥通电全国答复蒋、汪28日通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其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种种污蔑，表示曾“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该电至平，被当局扣发。

△　北平军分会遵蒋介石令增调入察部队。除原有庞炳勋、关麟

徵、冯钦哉各部11个师外，续增调王以哲、黄杰、王敬久等五个师，共达16个师，15万余人，另派有飞机二队。因庞炳勋部下级官兵不愿攻打抗日同盟军，纷纷投奔同盟军，平军分会将该部自前线调往沙城后方，改调中央军关麟徵、王敬久等部接防，是日调度完毕。

△　北平军分会以方振武、冯玉祥“欲提用平绥路款项”、“破坏交通”为借口，饬平绥路局将该路下花园至柴沟堡段暂停通车。至此，抗日同盟军仰给于外间之弹药粮食等完全断绝，数百名伤员无法启运到平医治。

△　抗日同盟军第五路总指挥邓文在张家口被暗杀，该路参谋长檀自新继任总指挥。8月3日，檀自新、刘桂堂、李忠义等通电各省市、各报社，以邓被杀离古松年被枪决仅16小时，称系“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误称）分子所为。

△　褚民谊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报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问题》，谓“开发西北，不但是巩固新疆，并且是为全中国开一生路”。

△　刘湘电刘文辉，对川局提三条解决办法：一、由刘文辉率领一部专驻西康，并须迅速移动；二、其余各部交刘湘统率“剿匪”；三、为促成前项办法计，刘湘军先以一部渡河监察实行。刘文辉未作表示。

是月　南昌行营加紧封锁江西苏区，规定粮食、食盐、电料、煤油、药材均设专局公卖，凭“良民证”购买，如有“济匪”者处死。

△　中共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军团为基础组成中央军，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

△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货在华倾销激增。停战前日货每月进口总值约二三千万元，7月份突超过5000万元，其中华北一带占3000万元。

8月

8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决定12月11日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改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

△　汪精卫、孙科、顾孟馀、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自庐山返抵南京。汪在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报告庐山会议经过。

△　冯玉祥代表邓哲熙对平、津各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冯绝对主张和平，不愿再见内战，仍希望宋主席回察主持一切，他本人进退不成问题。翌日，北平军分会在各报发表消息，声明军分会及政整会早已明令宋回察。

△　行政院会议通过由财政部发行华北救济战区短期公债400万元，次日经国民党中政会批准。

△　上海《时代日报》、《东方日报》、《明星日报》、《大晶报》联名登载《为唤起各界注意并贡献清查抗日义捐意见启事》，指出：各界人士义捐总数达二三千余万元，马占山过沪时声称只收得140余万元，为此特发起组织抗日义捐民众共同清查委员会。上海市商会、总工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等团体即日成立上海市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委员会。同日，马占山公布收到捐款详数总计为171.3万余元。

△　蒋介石令组公路工程队四个大队，先将粤赣、湘赣、浙赣、闽赣四大干线修通。是日各工程队分途出发。

△　《科学画报》在上海创刊，中国科学社创办，冯执中编辑。

8月2日　　孙殿英发西进屯垦通电，表示“为国家前途找出路，为整个民族谋生存……誓不参预内战，而愿率所部努力屯垦于边陲，作

异日收复失地之根据”。

△　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电汪精卫反对富龄阿就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军长职，并要求将察省右翼四旗划归绥省管辖。6日，蒋介石电汪，饬行政院与蒙藏委员会制止富龄阿就职，切实划清四旗之管辖。

△　国民政府任命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新疆边防督办；张培元为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兼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伊犁屯垦使。

△　国民政府派王星拱代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河北省政府在迁安、抚宁两县所属长城以外各地方设置都山设治局。

8月3日　冯玉祥电庞炳勋表示“决自本日起结束军事，所有察省军政权，即由中央派员接收”，请庞将此意转达南京及北平当局。次日，何应钦电汪精卫称：“冯忽然软化之故，日军确有一周内攻占多伦之准备……又因尚武、邓文等被冯枪毙后，义军首领人人危惧，时有倒戈相向之虞，不能不见机而作，以图和缓。”

△　何应钦对记者发表谈话，对察事再提三项办法：一、冯即日取消同盟军总司令名义；二、将张垣、宣化让出，移住张北、宝昌、康保，以便宋哲元回察；三、过渡期察省军政事宜由佟麟阁暂时维持。

△　彭德怀所部东方军上月底围攻福建连城，在朋口、庙前等地重创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区寿年部，歼其四个营，团长丁荣光、钟经瑞受重伤，营、连长死伤十余人，是日红军占连城。

△　黄郛以接收战区工作告一段落，是晚离平赴汉转庐山向蒋介石述职。

△　鲍刚脱离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后，由北平军分会委为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是日鲍电何应钦表示遵即通电就职。

8月4日　　冯玉祥派代表到沙城与庞炳勋、关麟徵接洽，表示接受何应钦三项办法。同日，何令宋哲元回察。次日，宋通电复职。

△　外交部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声明对法占南沙群岛九小岛，中国政府在未经确实查明以前，对于法国政府7月25日之宣告，保留其提出异议之权，并要求将各岛名称及经纬度查明见复。10日，法使照复外部，告以各岛名称及纬经度（九岛位置为北纬7°52′—11°42′，东经110°55′—114°25′之间）。

△　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蒋介石演讲《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道——向最危险道路急进》。

△　售卖中东路谈判第六次会议，双方继续为所有权问题发生争执，苏代表声明售价可减至二亿卢布，伪满代表表示售价5000万日金已相当高，增额绝无考虑余地。双方决定进行私人折冲后再正式审议。

8月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动员它的武装力量向着察哈尔、绥远前进，准备在‘满洲国’之外，创造它的‘蒙古国’”，“英法帝国主义正在西康、西藏、新疆、云南、广西、贵州进行侵略”。谴责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与投降政策，并指出“第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重要的与主要的步骤”。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认清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中国的道路，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围剿”。

△　宋哲元偕参谋长秦德纯、秘书杨镇南、处长张吉镛、军委会总参议蒋伯诚、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及冯玉祥代表邓哲熙等率卫队乘专车由平到沙城。冯派邱山宁、佟麟阁、孙良诚、王汉门四人到沙

城，当晚与宋等会谈。决定：一、冯通电取消名义，此后一概不问；二、冯居处以不在张垣为宜；三、宣化及宣化以南军队于6日移开；四、张垣附近军队除留驻两团外，其余悉数于7日离开；五、宋哲元手枪队6日午后到达宣化；六、宋调冯治安师接防张垣；七、6日起所有察省军政事宜，统由佟麟阁负责，邱山宁协助。

△　冯玉祥通电宣布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　上海市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五团体函中国航空协会，声明所捐购飞机五架不供内战，要求将“不供内战”四字漆于机上。

8月6日　　宋庆龄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主席名义，在《中国论坛》发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声明》，宣布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将于9月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阐明召开这次大会的必要性及其性质，号召一切愿意参加反战运动的人们派遣代表出席。

△　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自本日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负责办理。同日，宋部卫队200余人进驻宣化，抗日同盟军开张北。

△　黄郛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华北停战经过及接收战区情形，并商讨今后施政方针。13日，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亦到达庐山谒蒋。

△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剿匪”军事会议，讨论应援闽西计划，令黄任寰师与第十九路军张炎部联络，向坎市推进策应龙岩；第一独立师张瑞贵部开赴蕉岭、大埔一带，以保粤边。又令黄延桢、黄质文两师速向筠门岭推进。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变更检查新闻办法，规定由中央党部发表国际国内政治情报及宣传大纲作为各报发刊标准。翌日，宣传部长叶

楚伧召集新闻界训话，要求遇事与中央协商，被扣留的消息一律不准刊布。

△　红一军团在瑞金举行运动会，8日结束，是为中国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运动会。

8月7日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电冯玉祥，促其离察入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军政”。9日，冯复电拒绝。

△　宋哲元、蒋伯诚、秦德纯等抵宣化，冯治安师先头部队两团同时进驻，布告安民。同盟军北撤，吉鸿昌率部回驻多伦。同日，何应钦在平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察事已初步解决，冯既无发号施令之名义，此后不足虑，惟共产党在察活动颇力，将成隐患。”

△　红二军团贺龙部撤出邬阳关，于蛟驽坪集合改编后，佯向来凤撤退，作入川之势，突于是日冲出野熊关（野三关）入湘，次日达龙山。徐源泉派部追击，并电请何键派部堵截。

△　中荷庚款董事会在南京成立，南京市长石瑛任董事长。同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议，决定由荷政府即日指派工程师一名，于9月1日前抵达南京，参加南京市水利工程。

△　黄河水暴涨，河北长垣县（今属河南省）决口，河南汜水、武陟决堤多处。

8月8日　　日陆军省发表声明称，向长城以南进出之关东军已逐次开回长城线，“截至8月7日业已退回完毕”，并宣称此举“系对于中日提携与东洋永远之和平，踏入第一阶段”，要求中国进一步“一扫两国间不快之感情，互相提携”，并威胁说“倘有威胁满洲国之独立及扰乱治安，或违背本协定之精神时，则不问其如何，决意有予以排击之意”。但截至此时止，除榆关、都山长城以内地区及长城各口仍为日军占据外，迁安、建昌营、密云等地亦均有日军盘踞。

△　日使馆武官柴山访何应钦表示：多伦现为冯玉祥所属吉鸿昌部驻守，赤化色彩甚浓，日关东军对此不能漠视，决计加以进攻。日机五架曾于昨日在沽源平定堡一带投弹20余枚。

△　方振武、吉鸿昌、张慕陶等人集议冯玉祥收束察省抗日军事后之出路，拟推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继续抗日。因方部将领阮玄武等反对，未得结果。同日，中共察哈尔前线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员领导的第五师、第十六师、第十八师教导队等部撤至张北。

△　日本内阁作出《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明确规定对伪满国体、军队、财政经济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内称："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

8月9日　　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宋哲元派秦德纯、过之瀚等到张家口接收察省民政、财政两厅。同日，冯治安部由宣化开入张家口，第四十一军军部由沙城移驻宣化。

△　国民政府令：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各路总司令部业经先后成立，所有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应即撤销。

△　国民政府任命彭位仁为第十六师师长。

△　国民政府令：准戴恩赛辞驻巴西特命全权公使职，遗缺由熊崇志继任；由黄芸苏继熊崇志任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

△　黄河水涨八尺余，与平汉铁路黄河铁桥平，南北交通断绝。至15日始恢复通车。

△　日陆军省制定《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将伪满军作为关东军的"补助因素"，兵力控制在最少限度；战斗兵种只设步兵、骑兵，不许拥有坦克、重炮和飞机。此后，大量日军被派入伪军充当各级指

挥官。

8月10日　　庞炳勋、关麟徵部向张家口开拔，宋哲元恐引起误会，令各军暂止于宣化。是晚，宋派秦德纯、邓哲熙、李炘、陈希文、张吉镛、过之瀚谒冯玉祥，促其离张。邓、李等劝冯赴鲁居住，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亦有电邀，冯遂决定仍回泰山。

△　北平军分会以察事解决，令平绥路恢复通车。

△　国民党中委唐绍仪、萧佛成、陈济棠等自广州电中央党部，反对在宁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略称："今日本党最重要之任务，唯在领导全国民众，抵御外侮，以保我主权及领土之完整，若不努力于此而徒召集大会，为决而不行之议案，适足以增同志之惶惑，堕国民之信仰，而速党国之覆亡。"表示在未实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抗日之决议案以前，无论以何种名义再在南京召集大会，必不承认。

△　《十日谈》旬刊在沪创刊，邵洵美主办。

8月11日　　汪精卫偕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到庐山，与蒋介石、黄郛等商谈华北战区善后、军队整编及结束察事等问题。14日返京。

△　宋哲元电请蒋介石任庞炳勋为察省府主席。次日，蒋电复仍令宋主察。

△　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派县长李英接收兴隆县长城以内地区，在马兰峪设县府办公。26日，李英电河北省政府称，日方以该县由伪满划归青龙县，属伪满领土，令该县长速退。

△　山东东明，河南兰封、考城（今兰考）、温县等地黄河决口，汜水一带河水漫堤出险，南至广武，西至巩县200余里成泽国。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电行政院要求发急赈及抢险费用。

8月12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毛泽东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15日，大会作出关于推销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筹办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以及对外贸易等问题的决议。

△　宋哲元偕蒋伯诚、庞炳勋等进驻张家口，随即到新村谒冯玉祥，冯表示对察事已不过问。宋即通电中央及各省、市党部等报告进驻张家口。

△　“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及“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在张家口行落成典礼，冯玉祥偕宋哲元等往祭。

△　北宁路通车事经殷同与日关东军洽商结果，日方允通车至山海关。是日24时，日方将关内段交出。但塘沽至山海关之间路段仍由日天津驻屯军派兵驻守，故时论有“所谓平榆通车，无异借地行车”。

△　蒋介石电湖北省政府，以大冶、阳新、通山各县与赣边各县间公路关系“剿匪”军事，限10月底前修筑完成。

△　国民政府重申禁止刑讯令，明令“嗣后无论何项机关，绝对不得再用刑讯”，并令“将在押未决各犯，察其情节轻重，依法厉行保释”。

△　蒋介石电令各路“剿匪”军及各省、县政府加紧“剿匪”，倘遇“匪”警，必须负责死守待援，否则以临阵畏缩论，处以极刑。

8月13日　伪蒙军李守信部是日午侵占多伦。北平军分会函日使馆武官柴山，请其转达日政府及关东军尊重停战协定，将多伦伪军撤退。柴山复函谓，李守信军原系驻多伦，因被共产系之冯军驱逐，今将其夺回，实为维持该地治安。

△　北宁路平榆段正式通车。

△　川军刘文辉部困处岷江南岸，所部陈鸿文师一部倒戈。是日，刘湘部渡岷江，占崇庆。刘文辉部将领彭诚孚、邓和亦在岷江上游接受刘湘委任，林云根师一部又在彭山青龙场哗变。14日，刘文辉下令迅由岷江往雅河撤退，师长陈鸿文、旅长石绍武被俘，石被刘湘在邛崃枪决。

△　王以哲部特务队四五百人哗变，往河北易县紫荆关与郑桂林部会合。15日，驻满城第一二〇师一个连另一个班亦受郑部影响哗变。

△　天津宝成纱厂为缩小营业范围，要求裁工改制，是日突趁工人例假休息，通告自翌日起停工，并请调保安队70余名到厂阻止工人上工。1800余工人顿时失业。次晨，工人推代表向市党部请愿。

8月14日　冯玉祥离张家口，宋哲元、秦德纯等陪行。下午车抵北平，汪精卫代表傅汝霖、何应钦代表刘健群、黄郛代表何其巩到站迎候。傅遵国民政府旨意，促冯去南京就训练总监或全国林垦督办或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遭冯拒绝。次日到达济南，全市悬旗欢迎。17日，冯由济南到泰山。

△　导淮委员会，江苏省府主席顾祝同，河南省府主席刘峙先后电国民政府，报告黄河暴涨，堤漫恐入故道，危害下游，要求设法预防。是日，国民政府训令黄河水利委员会立派专员主持，迅堵豫堤漫溢处所。

△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大会在加拿大班府开幕，中国代表胡适等出席。大会主席福尔孔纳致开幕词，示意避免讨论中日问题。大会进行中，中日代表对日向满洲移民问题展开争论，双方曾多次秘密接触谋求解决中日问题办法。

△　日新任驻伪满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由东京启程赴任，临行表示“愿埋骨东北”，贯彻日本侵华方针。

8月15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着陕、豫、冀、鲁、皖、苏各省府联合防堵黄河决口，并令财政部移拨扬子江防汛委员会未付之款作经费。

△　刘湘电蒋介石称："闻共匪有进扰仪陇之举，情势至急，非迅速结束岷江军事，必致贻误剿匪时机，迫不得已，乃于元（13）日饬令各军分别前进。……大约岷江军事旬日内定可结束，即当回师剿赤。"

△　朱庆澜为各报揭发其侵吞救国捐款事电行政、监察两院及军事委员会，表示"自信办理此事，始终谨慎"，要求政府派员彻查。

△　陈济棠饬广东省公安局是日起向广州全市商店开征航空救国捐，按资本额2%征收，限一个月内收竣。

△　香港各校优秀选手组成香港东方体育会女子篮球队赴上海。

8月16日　北平军分会决定察省善后办法四项：一、改编察省杂军为18个团；二、任方振武为北平军分会委员；三、吉鸿昌、孙良诚仍任上将参议原职；四、张砺生部枪支皆得自地方，应照数发还。以上交由宋哲元与方、吉等代表协商办理。吉鸿昌、方振武等坚持抗日，反对收编，并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蒋军"。同日，方在张北通电出任代理总司令职。

△　国民党中政会议，汪精卫报告在庐山与蒋介石会商经过及察、新近况；通过：一、新疆省府委员名额遇特殊情形时可增至13人；二、黄河水利委员会改由行政院直辖；三、通过《巩固邮基方案实施纲要》建议案，将邮政储汇局改隶邮政总局；四、派罗文幹赴新疆视察司法、外交，在离京期间由汪精卫兼署外长，郑天锡代司法行政部长。国民政府分别于17、19日明令发表。

△　上海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

府及行政、司法、监察各院，要求政府令上海特区法院检察处迅予彻查侵吞救国捐款案。9月4日，汪精卫谕军政部次长陈仪、财政部次长邹琳前往查账。

△　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绘《中国分省新图》，由申报馆出版发行。

8月17日　　黄郛由浔赴沪，20日在沪出席新中国建设学会欢迎会，详述华北停战经过，并谓：中国之出路只在“求己”二字，“既往必须各具责己之心，以后尤须同抱求己之志”。

△　晨，孔祥熙应蒋介石召，由沪飞赣。

△　清查救国捐款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及人员相互责问。14日，李杜指责朱庆澜以捐款50万在热河开银号，并在中央所拨抗日军费40万中以一部送汤玉麟等。是日，朱函复李杜否认。同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监察委员会电国民政府，要求派员到会查账，以明真相。

△　刘文辉自雅安通电，宣布入康致力国防，留川部队分交向传义、冷寅东统率。

△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司令、国民义勇军辽东总指挥李春润率义军在辽东塔沟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小彬少将、伊藤中佐、中村和井原大尉等。李春润受重伤，转往山东施行手术，9月4日牺牲。

△　鲁西菏泽地带黄河决口，河水泛流东下，循故道入苏境，达砀山、丰县，苏省府急令铜山等10余县急速防堵，并派员赴京向导淮委员会求援。

8月18日　　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团英人马莱爵士、法人环音考托、比利时人波比等到沪，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反帝反战大会。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欢迎宣言，号召中国及全世界劳动者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团结战斗。

△　晚，宋哲元与何应钦在平商定处理抗日同盟军办法：对“杂军”按收抚原则分别收编，首领给予军事参议名义令其离开队伍；电催方振武到平任军分会委员，孙良诚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张允荣任军委会参谋；并要求中央转饬财政部筹拨8月份华北接济费200万元，从中拨一部作察省善后及编遣费。

△　蒋介石电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作战厅长贺国光，指示“剿匪”部署：一、第八十师主力由杭州经樟树开新淦；二、第三、十四、九十四、四十三各师大部为一纵队，归薛岳指挥，限20日前到达中州、龚坊一带，以第九师跟进为预备队；三、第十、八十三及保卫二师限20日前在新淦附近准备完毕，以第八十师主力为预备队；四、以上两纵队及永丰、吉水部队归卫立煌统一指挥，限21日开始“进剿”。

8月19日　　驻法日代办泽田向法国外交部口头抗议法占南沙群岛九小岛，以日商磷矿公司曾在该诸岛经营为借口，要求由日、法两国直接谈判解决所有权问题。

△　孙科偕马超俊由济南到泰安，冯玉祥偕邓哲熙下山晤孙，详谈察局经过、国家危机及华北近况。孙邀冯入京，冯未允。

△　行政院令黄河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速召开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防汛会议，联合会商防堵黄河水患。

8月20日　　新任日本驻伪满大使兼关东军司令菱刈隆抵大连，发表告驻伪满人士声明书，声称：“本职之来任，固体日本之方针，然对于国防之强化，治安之完成，尤其对于满洲国家之坚实的发达及永远确立日满共存之事，将贡献满腔之支持与协力。至于本人对满政策经纶大纲，悉皆踏袭前任武藤元帅之所行者。”

8月21日　　蒋介石电汪精卫转中政会，称“鄂豫皖赣剿共军事或已分头进击，或方厉行封锁”，“标本兼治，非财莫举”，提出需治标费

180万元，治本费1500万元，要求汪力予主持，提请中央核议定案，并先拨治标费180万元以应急需。23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26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筹拨。

△　江西省政府呈请蒋介石批准发行筑路流通券400万元，以一五盐税附加为担保。是日，财政部训令盐务稽核总所将附加盐税延长三年。

△　唐有壬在沪访日使有吉明。此事引起中日关系转变、中国将改变外交方针等传说。次日，日外务省发表谈话称：中国如有诚意容纳日本主张，确实与日本谋亲善，则日本亦当可考虑一切。

△　刘文辉部师长张志和在洪雅下游渡河投刘湘。刘湘部于是日占峨眉、夹江、洪雅。

△　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通电各省、市、县分会，呼吁赈济黄河水灾。

8月22日　刘湘部占雅安，刘文辉败退天全、荥经、汉源一带。刘湘声言须将冷寅东、夏首勋两部解决方能停止战事。冷、夏遂先后离开队伍。冷建议刘湘将部队撤到名山之线，俾刘文辉仍回驻雅安，双方停止军事，派员从长协商善后。二刘双方对此均表同意。至此，从1918年以来四川军阀剧地为雄、互相争夺之长期混战局面告一段落。

△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免刘崇杰外交部常务次长职，遗缺以唐有壬继任；二、着铁道、实业、财政三部，京市府，农村复兴委员会于一周内调查国内产麦滞销情形，设法补救；三、建筑新疆直达公路，由铁道部主办，聘赫丁等为顾问，由铁道部先拨五万元为开办费。

△　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电蒋介石、汪精卫，要求从棉麦借款项

下拨200万元救济水灾。

8月23日　国民政府令派孙连仲兼任第四十二军军长，田镇南任副军长。

△　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在仪陇紫观场击溃川军李炜如残部，占领仪陇、阆中及南部嘉陵江以东地区，俘虏、缴获枪支各500左右，得盐10余万斤，并乘胜向营山、渠县进展。

△　宋哲元电告汪精卫收编抗日同盟军情形，称：秉承“少编大遣”旨意，现已编定檀自新部一师共六团，张人杰部一师共三团，李忠义部一旅共两团。

△　黄河上游山西保德一带河堤溃决，数百里被淹。

8月24日　宋哲元召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各部负责人宣布处置办法：委阮玄武为商都县警备司令，方振武、阮玄武各部共编两团，富春部编一团，归阮指挥；委张允荣为张北县警备司令，张与吉鸿昌部合编两团，由张负责肃清“共党”；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两团；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三团；孙良诚部编一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解除兵权离察；刘震东部先编一团，唐聚五部编一团；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各部编余人员给资遣散。

△　吉林抗日武装攻打宝清县城，战一昼夜，伪满军弃城而逃。

△　伪满吉林省富锦县同江街保卫队长张子峰率部哗变，架走县长庞某，击毙伪商会会长。31日，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警察第二中队反正投抗日义军，并将阻拦反正之队长吴成海处死。

△　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在青岛举行，参加者300余人，马寅初主席。

8月25日　　四川茂县一带发生大地震。北平时间下午3时50分26秒，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松潘、理番（今理县）发生7.5级强烈地震。震中区茂县之叠溪镇房舍278所，仅镇东一城隍庙尚有部分残垣，亦南移十余米，叠溪附近20余村庄纵横30里，南北十余里全部沉陷。当日晚20时30分再次强震，至次日晨大震五次之多。茂县被灾镇、堡、村、寨150余处，死亡6800余人，伤1900余人。松潘受灾范围900多平方里，伤亡6000人以上，房屋倒塌十分之三。理县伤亡六七百人，房屋倒塌十分之三。开初每日一大震，每时一小震，波及四川全省及陕西、云南部分地区。27日下午2时，成都地震，“房屋振振有声，瓦片坠落，墙垣多有震倒者”，伤亡百余人。

△　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指示信，指出目前四川形势，提出红四方面军及四川党在冲破五次“围剿”中的具体任务，要求巩固现有苏区并将这些苏区联合成为一个不互相隔离的整体，在渠江与嘉陵江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加强和扩大红军，年内创造主力红军五万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对十数县以上抗捐军的领导，发动川中和川陕边及川滇边的游击战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任务；加强各级苏维埃工作，确立正确的经济政策等。并责成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

△　方振武、吉鸿昌、张砺生、米文和、阮玄武通电声讨北平军分会对同盟军的镇压，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仍督同抗日同盟军急救多伦、沽源，“倘再有阻遏抗日进程而为亡国之催命符者，决以深仇大敌视之”。该电至平，何应钦令电局扣留。

△　萧振瀛就镇压抗日同盟军问题电汪精卫称：“拟将‘自新’各部先行调开，专对赤化部分……再将其他各军逐步编遣，以便易于就范。”

△　罗文幹离南京飞西安转新疆。

△　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在代总司令吴义成率领下继续抗

日，是日攻克东宁，缴获日伪货车。

△　山东菏泽、寿张等18县灾民代表电国民党中央称：鲁西黄河水灾受害十数县之多，遭劫生灵数百万之众，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派队一旅至兰封以护堤为名，决堤下灌所致，要求政府申明法纪而平民愤。28日，刘峙电国民党中央及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否认此事，要求“查究有无奸人煽惑”。

△　红二军团贺龙部攻克湖北松滋县城，毙县长江文波。28日，由松滋刘家场东进，占闸口、槐市，威胁湖南津市、澧县。

△　日新任驻伪满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长春向伪执政溥仪呈递国书。

8月26日　宋哲元令冯治安、赵登禹两师开张北。是晚宋偕萧振瀛等到张北，谋与方振武、吉鸿昌晤商收编该部。宋到达前一日，方、吉离张北北开。宋即派陈希文、张允荣在离张北百余里处追及方振武，劝其收编，遭方拒绝。

△　孙良诚自张家口通电宣布“即日解甲归田”，所部改隶察省府。同日，檀自新就暂编骑兵第十师师长职。张允荣、阮玄武在张北分就张北县警备司令、商都县警备司令职。

△　原汤玉麟之第五十五军除一部分自动随孙殿英部西行外，一部留置察省，另一部则随汤占据察东。北平军分会以该军“分散三处，系统已失，纪律荡然”，是日下令将该军番号取消；将开往包头之部队由第四十一军严加淘汰，缩编为三个团；留察境残部由庞炳勋将其缴械遣散。翌日，该军北平办公处被查封。

△　湖北堤捐侵吞案达28起，数近70万元，是日，蒋介石令该省府严缉舞弊人员。

8月27日　红五军团攻占福建延平（今南平），英、美、日等国

调舰驶往福州护侨。随后，红军撤出延平，在延平东南地带歼第十九路军先头部队后占水口，威胁福州。福州当局调海军协防，并赶筑碉堡。红军遂在顺昌、延平、尤溪等地与第十九路军迂回战斗。

△　方、吉部由张北撤出后，方开独石口。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是日在张北县北面二泉井集结，召开中共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批判张慕陶散布的“联日反蒋”主张，坚持抗日路线，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推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总指挥，决定西开入太行山。当晚开拔，经大青沟时被张凌云部包围，吉率部突围往商都。

8月28日　陕、冀、鲁、豫、皖、苏六省防汛会议在南京召开，要求国民政府于国库项下急拨1000万元办理黄河沿线堵修工程，并建议行政院转请中央设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

△　方振武、王中孚率部由独石口向赤城南进，宋哲元令冯钦哉部往龙关堵截；吉鸿昌率部开往商都，宋哲元令所部王子良团及高树勋师之一部尾追，并令雷中田部进驻商都。

△　蒋介石派朱绍良为甘、宁、青三省绥靖主任，特电劝勉，略谓：“西北军事，情形复杂，回汉情感未孚，更有统一指挥、妥为编配之必要。诸马（马麟等）对兄均表拥戴，幸勿谦辞，勉维大局。”

△　实业部在江西设立钨矿产销局，与英商安利洋行订产销合同，将赣南钨砂廉价售与外人专利，遭到江西民众强烈反对。是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该项合同。31日，赣南各界决定改由粤省出口，使产销局不能控制。10月2日，实业部长陈公博电复熊式辉称：该项合同迄未实行，已决定废除，由部自办。

8月29日　上午9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回国抵沪。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均派代表往迎。宋发表书面谈话，宣扬此行“成果”，并表示“冀望全国上下化除成见，集合全国之资力、物力与人才，以友邦建设之精神为救国唯一之途径”。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察哈尔省政府：原省府委员宋哲元、仵庸、文光、赵兴德、高惜冰、德穆楚克栋鲁普、杭锦寿免本职；宋免主席兼职，仵、文、赵、高分别免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长兼职。任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瀚、吕复、张维藩、庞炳勋、卓特巴扎普、索诺木拉布坦、德穆楚克栋鲁普为省府委员，宋兼主席，秦、过、吕、张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

△　驻福州英、美、法、日等国领事谒蒋光鼐探询闽边“剿共”军事情况。晚，英、美舰各一艘驶抵福州。

△　《反战新闻》双日刊在沪创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创办，报道远东反战大会消息，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和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9月29日停刊。

△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8月30日　　行政院昨日起开会讨论黄河水灾事宜，是日决定：一、呈请国府明令组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特派有关各部、会部长、委员长及有关各省建设厅长为委员；二、呈请国府明令拨400万元办急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在会上报告称：黄河地域受灾面积1.5万余平方里，受灾人口114万余。

△　河南省府主席刘峙通电全国称，河南各县被淹村镇达两千以上，而省库奇绌，呼吁各界赈济。

△　北平军分会委张人杰为暂编第三师师长，是日张通电称，遵于31日在察省防次就职。

△　河北战区各县联合救济会电呈行政院、财政部，要求豁免战区19县1933、1934两年正杂各税。

△　平沪直达列车通车。

△　绥新长途汽车公司由绥开车五辆往新疆探路。至10月10日，第一辆车始抵迪化。此线路经两年多筹备，用费20余万元。

8月31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审查中等学校公民教师资格条例》及《审查训育主任资格条例》。9月18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遵照。

△　全国商联会以国内麦产滞销，粮价过低，洋米无税入口实为主要原因，呈请国民政府重征洋米入口税。

△　故宫博物院理事、清史馆代馆长、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新元史》撰者柯劭忞在北平逝世。12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是月　　马仲英退吐鲁番后，盛世才先后派吴兆熊、蓝彦寿、刘斌等到吐与马商谈和平，又经马派张雅韶、姚治平随省方代表到迪化进一步商谈，是月双方在迪化达成协议，由省府委马仲英为东路警备司令，驻防哈密、镇西、鄯善等地，饷银由省供给。盛遂任吴兆熊为吐鲁番县长，蓝彦寿为鄯善县长，携带饷银省票20万两去吐鲁番促马履行协议，但马借口和加尼牙孜进攻焉耆，暂时不拟东撤。

△　财政部总税务司报告，本年1至8月底止，江海关进口总额共计5.32755543亿元，出口总额共计2.14396877亿元，入超3.18358666亿元。

△　日陆相荒木上奏天皇《由日本见地论及满洲事变之政治经济的效果》称：九一八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之特殊权益及其扩充，如铁道守备兵驻屯权，满洲治安保持要求权，南满铁路经营权，吉会线敷设权，各铁道干线行政权，煤铁等矿采掘合办权等政治、经济权益“不亚于日俄战役之功绩”，“可谓日本肇国来第一之大事件”。

△　日本以所谓“经济提携”，谋求统制中国东北及朝鲜的产业，

特在长春设立东亚产业协会，由日人宇佐美任会长，郑孝胥任名誉总裁，张燕卿任副总裁。

△　李杜、吴焕章、萧振瀛、傅汝霖联名具呈蒋介石，提议策动东北义勇军扰乱日军及伪满，待机会成熟，中央出兵收内外策应之效，并提请组设东北民众救国委员会等具体方法。南昌行营复示称："事关抗日举动，应由中央统筹兼顾。"

△　年初，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溃散时，共产党员李延禄将所掌握之补充团改编为游击军，由牡丹江地区转移至密山，与中共密山县委创建之密山游击队汇合，是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

△　香港大旱，月降雨量仅一寸七分三厘，开49年来新记录。

9月

9月1日　　何应钦、宋哲元电国民政府报告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处理情况称："已改编者：檀自新为暂编骑兵第十师师长，李忠义为暂编骑兵第二十四旅旅长，张人杰为暂编第三师师长，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黄守中为游击第一支队长，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姚景川为宝昌警备司令，张允荣为张北警备司令，雷中田、高树勋、柳青庭、张凌云、乜玉岭、唐聚五、刘震东等部属之。"又称："惟吉鸿昌千余人已明白赤化，尚未完全就范，若张慕陶、宣侠父等著名共匪能完全除去，仍决从宽处理。"

△　国民政府令组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拨400万元为急赈之用，派宋子文、黄绍竑、陈公博、顾孟馀、许世英等23人为委员，宋任委员长，黄绍竑、陈公博、顾孟馀、朱家骅、许世英、李仪祉、刘瑞恒、秦汾任常委。同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9月2日　　红军一部进攻江西南城、南丰间交通要地里塔，击败第八师毛炳文部一个团，占里塔。3日及12日毛部各一团两次反攻，均被击退。

△　“剿匪”西路军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在江西宁冈企图包围红军萧克部。红军诱敌至下水湾加以歼击。王部撤回砻市（宁冈县治）、古城阵地后，红军深夜乘虚进占新城。

△　宋子文由沪到京，出席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报告出国经过。同日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张厉行统制经济。

△　瑞典亲王卡尔游历远东，经日本来华，是晨由沪到京，午访晤林森，林设宴招待，汪精卫、宋子文等作陪。晚，卡尔离京北上游览。

9月3日　　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联电蒋介石、汪精卫，要求：一、停止召集五全大会；二、公开厘定棉麦借款用度，必须用于生产事业；三、公布《塘沽协定》全案；四、维持察省抗日部队，停止中央部队前进压迫。

△　罗文幹乘机到达哈密，会见哈密王之子白锡尔和马仲英部重要人员，并以中央名义给当地居民赈款1000元。下午飞抵迪化。按：当时盛世才高谈抗日救国，指斥帝国主义分裂新疆阴谋，宣称要与友邦苏联保持亲善关系。罗鉴于盛难驾驭，积极作拉拢马仲英等活动。

△　英国政府任命贾德干继蓝普森为驻华公使。

△　日关东军及伪满代表60余人在沈阳开会筹设满洲棉花公司，资本定伪币100万元。

9月4日　　吉鸿昌率部越商都西行，为晋军赵承绶部所阻，遂东趋独石口谋与方振武部会合。宋哲元命张凌云、乜玉岭、赵登禹部三路围堵。

△　国民政府令派周浑元为第三十六军军长。

△　行政院会议决定免鲍毓麟北平市公安局长职，遗缺由青岛公安局长余晋龢继任。

9月5日　　蒋介石于午夜起召开牯岭谈话会，至7日结束，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孔祥熙、吴敬恒、张静江、陈绍宽、曾仲鸣、唐有壬等出席。首由宋子文报告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棉麦借款与国联技术合作等问题。会议决定改组全国经济委员会，由汪精卫、宋子文、孙科任常委，实行统制经济，棉麦借款归全国经济委员会全权支配；将海军、陆军、训练总监三部划归军委会管辖；确定应付日本方针为："除割让东三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之行动及言论，对华北当局赋以相当自由之权限。"其他如"剿匪"、财政等问题亦均有所策划。

△　自上年康藏停战协定后，藏军乘刘文辉在川战中失利，进兵西康，并于上月下旬侵占云南省中甸县。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除派部镇压、派机轰炸外，是日电国民党中央告急。24日，滇军夺回中甸。

△　汉口邮工于4月间组织邮务工会，遭邮务长史密斯（英人）无理阻拦，经多方交涉无效，是日一度罢工。武汉警备司令部声称："在剿赤期间任何罢工均是危及治安。"后经津、沪等地邮工声援，20日，邮局方面承认邮务工会等条件，罢工始告解决。

△　东北义军四海仁等部400余人袭击兴京县城。

△　日关东军为阻止华北工人进入东北及为日本移民创造条件，是日，关东军特务部决定设立劳动统制委员会，由小矶国昭兼任委员长。

9月6日　　蒋介石、汪精卫电复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称：停

止召集五全大会问题，可由陈、李以中央委员资格向中常会提议，以符手续；棉麦借款，中央政治会议早已决定用于生产事业；《塘沽协定》全案早已尽行公布，此外绝无任何秘密附件；对察省部队已收编就绪。

△　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余晋龢任北平市公安局长。东北军将领纷起反对。

△　宋哲元电方振武作最后“忠告”，要求立解兵权，将军队交政府。

9月7日　　蒋介石电蒋光鼐、蔡廷锴指示“剿匪”方略，略谓：“只要延平各城能固守半月，一待北路军发动，则匪必西退，回顾老巢。故此时我闽军主力，应先待其向西撤回时而邀击之。”同日又电南路总司令陈济棠，要求“克期规复瑞金、会昌”。

△　蔡廷锴由漳州飞抵福州，并调部增防福州。同日邓世增奉蔡命到广州，要求陈济棠派部警戒长汀或急攻筠门岭，以牵制闽北红军。

△　平市公安局易长问题，引起各方反对，何应钦以余晋龢难接任，拟以军分会第三处处长黄师岳与鲍毓麟对调，以达去鲍目的，是日电张群转黄郛征求意见。

9月8日　　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在麻城宋埠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剿匪”、清乡问题。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第一纵队总指挥刘茂恩、第二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三十军军长彭振山、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第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等出席。

△　黄郛为执行对日妥协方针，向蒋介石保荐殷同为北宁路局局长。是日何应钦电蒋，以公安局易长已引起纠纷，要求“暂维现状”。

△　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中国佛教会等九团体联合组织

上海各慈善团体筹募黄河水灾急赈联合会，许世英任委员长。

△　江苏省政府议决征收永佃契税章程，每亩向佃农征收银元五角。是日，国民党无锡县党部电请省党部转呈中央严厉制止。

9月9日　　吉鸿昌、方振武两部于独石口之云柴堡会合，决定东移热河丰宁。

△　罗文幹偕刘斌、李溶（迪化区行政长）及马仲英代表张雅韶由迪化到吐鲁番，向马仲英传达国民党中央调解盛、马冲突旨意。马表示服从中央，于11日就新疆东路警备司令职，但对退驻哈密持异议，提出须有饷糈保障。

△　日关东军为在察省树立傀儡组织，是日由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及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昭弥五郎分别函邀牛羊群等八旗总管于25日前到多伦参加察哈尔八旗总管会议，讨论“日后复兴蒙族重要关系事件”，会后由多伦特务机关部宣布设立察绥蒙古各盟旗联合办事处。

△　中国航空协会接受上海捐机五架并举行命名礼。

9月10日　　驻平中央宪兵第三团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是日将上月中下旬逮捕之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有志（刘宁一）、宣传部长刘德明（赵丽卿）等38人押解南京。

△　红二军团第七师卢冬生部由五峰进入湘境桑植。是日贺龙率部4000余人乘陈渠珍新三十四师周旅“追剿”卢部之际，进占永顺。15日，贺率部回师鄂西咸丰、来凤，卢回鹤峰。

△　蒋介石电示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转北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及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声称“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要求对《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作为时时对将领“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之决心如何”。

△　日本为监视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派前驻国联代表杉村阳太郎于是日启程来华活动。

△　反日山林队东三好部300余人将中东路八道河子西面之铁轨拆毁，日满由绥芬开出之列车行经此处颠覆，并遭东三好部袭击。27日，由宽城子北行货车在蔡家沟、双城堡间因路轨被拆毁而颠覆。

9月11日　何应钦在平召开裁军减饷会议，由军分会军需组长沈振荣报告华北财政称：每月收入250余万，支出550余万，亏欠300余万，除由中央月助200万外，尚差百余万元。继由何应钦提出整理军队、裁军减饷办法。13日，通过裁军减饷方案，每月减饷54万余元，共裁军5.7万余人。

△　湘赣军区红军萧克部月初在宁冈下水湾战斗后，主力潜伏于大陇、葛田以东一带高地。是日，在大陇包围第十五师王东原部一个营。王调三旅兵力包抄，于13日在宁冈新城发生战斗，王部被打死团附一名，红军向永新转移。

△　红五军团一度进攻延平未下，是日向顺昌、邵武、泰宁等地转移。13日，第十九路军参谋长赵一肩率部入延平设行营。

△　新任北平公安局长余晋龢定是日上任，平市商会、工联会、贫民救济会、东北同乡会、东北难民会等30余团体及40余学校代表1000余人到局请愿。同日，汪精卫致电黄郛称：“东北将领，反对去鲍，致余未能接事，此等反动，本在意中。弟意宜一意坚持，贯彻政府明令。”次日，各团体、学校组平市各界挽鲍联合会，讨论进一步办法。13日，黄绍竑密电蒋介石称：此举不仅是反对余，市长、政整会委员“皆为其反对目标，拒余实为借端”，要求“早为收拾”。

△　国民政府任霍揆彰为第十四师师长。

9月12日　国民政府批准财政部发行库券400万元，作华北战区

施赈补助农村之用。

△　行政院准河北省设滦榆、蓟密两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　黄郛由沪电蒋介石称：连日与宋子文、王克敏晤谈，已决定遵照蒋的旨意将华北财政归财政部直接办理，要求蒋电王克敏“嘉慰”。

△　刘湘在成都召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讨论川战结束后“剿匪”办法。决定先抽十团兵力驻防南部蓬安、营山等处，以防红军西进，然后大举“进剿”。同日，刘湘通电宣布川战结束，即日起总动员“剿匪”。

△　罗文幹由吐鲁番返抵迪化。盛世才原要求马仲英随罗到省，因未见同来，认马缺乏诚意，遂准备再次攻马。

9月13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扩大全国经济委员会职掌范围，直隶于国民政府，采常委制，以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常委；棉麦借款交全国经委会支配，另组监督与保管机关。

△　国民政府特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联第十四届大会代表；令刘崇杰继刘文岛任驻德意志兼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任刘文岛为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公使。

△　国民政府特派朱绍良兼驻甘宁青三省绥靖主任。

△　蒋介石电黄郛，提出平市公安局长由北平军分会暂派蒋孝先代理。

△　宋哲元部赵登禹师进驻沽源。

9月14日　日机在张家口投下“警告书”，要求赵登禹部由沽源撤退至张北、龙关以西，否则将取断然处置。北平军分会即派员与日方

交涉。

△　平市各界挽鲍联合会电林森、汪精卫、蒋介石，要求顾念华北安危，俯顺舆情，收回公安局易长成命，否则虽罢工罢市亦所不惜。同日，何应钦、黄绍竑联电黄郛另荐军分会高级参谋门炳岳接充平公安局长。

△　日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崛内有野在南京与汪精卫及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晤谈。日方宣称于中日外交有所商谈外，拟向中国提出中日商约谈判。唐有壬否认谈及中日商约。

△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辞职，由广田弘毅继任。广田表示对华仍循既定方针。16日又语记者称："苟中国能承认满洲国与其现在地位，中日关系必可转佳。"

△　《实业季报》在上海出版，全国商联会主编。

9月15日　北平20余团体二万余人挽鲍毓麟续任公安局长，定是日集会游行，被当局阻止。旋派代表赴市府再次要求中央收回成命。蒋介石、汪精卫认为此系东北军人别有他图，以事关中央政令，执意不变。余晋龢乃于28日上任，至12月16日国民政府始明令发表。

△　盛世才拒绝罗文幹调解，在迪化召开军事会议，重启战衅，并将马仲英代表扣押。马知代表被扣后，宣称誓死消灭盛，并遣代表往伊犁联络张培元，协商夹击迪化。

△　国货运动展览大会在上海举行。

△　沈志远撰《新哲学辞典》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9月16日　汪精卫、孙科到沪与宋子文会商扩组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其常委人选，确定棉麦借款用途。旋晤黄郛促其北返。

△　张学良由罗马抵柏林，德国防部长布隆堡、航空部长戈林接见。25日，张离德国往丹麦。

△　《长风》政治文艺半月刊在上海出版，林庚白主编。

9月17日　闽浙赣军区红军方志敏部攻克浙江开化县，浙省保安处长俞济时急调保安三团往援。18日，红军撤出开化。

9月18日　察北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领衔通电要求自治。翌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以未到自治时机电复，并决定派巴文峻前往调查真相。

△　汪精卫召戴季陶、陈果夫、朱培德、叶楚伧、居正等30余人在京讨论华北事件及党务、外交等问题。

△　“剿匪”军西路总司令何键赴萍乡坐镇指挥“剿匪”。

△　贵阳学生举行九一八游行，省教育厅长谭星阁派兵分据各道口，并以汽车冲击游行队伍，死二人，伤40余人，伤者多半为小学生，并拘捕学生50余人。

△　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经与海龙游击队汇合，又争取联合反日山林队殿臣、双江、老双胜等部，是日在磐石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发表成立宣言，表示“誓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斗争到底”。

△　天津北洋工学院一年级生为要求免费及更换陈旧课本与校方冲突。代院长李书田以学生“侮辱高级教职员”，向教育部请示处理办法。翌日，教育部电令将全体一年级生取消学籍。21日，公安局派警将该年级生强行驱逐出校。30日，该院布告除允64名限期觅保悔过作暂读生外，不准悔过返院者19人，开除五人。

9月19日　外交部训令出席第十四届国联大会代表颜惠庆、顾维

钧、郭泰祺，应重申原有主张，仍信赖国联，盼能以最善努力解决中日纷争。

△　国民政府令派丘正欧、戈公振为出席在西班牙召开之国际新闻会议代表。

△　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谈各省请拨棉麦借款情况称：截至本日止，计有湖南省请拨疏浚洞庭湖，卫生部请拨500万添卫生设备，安徽省请拨1000万赈灾及复兴农村，山东省请拨治水，陕、甘、青等省请拨一亿元完成陇海路，江苏省请拨2000万整理垦殖区，导淮委员会请拨完成导淮，湖北省请拨疏浚长江，河北省请拨600万造林凿井，华商纱厂请拨2000万元周转金融，广东、广西请拨珠江流域改良农作物准备金等，总计已达九亿元之多。

9月20日　方振武、吉鸿昌两部经怀柔北之长园口入河北境，是日，方振武一部入怀柔城。

△　热河义军百余人攻开鲁，毙日军守备队小队长山本。29日，再次在开鲁附近与日伪军战斗。

△　蒋介石电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指示“剿匪”军前进序列：一、依第九十、十一、六十七及十四、九十四各师次序，向新丰街、都均一带集中，第九十师限24日到新丰街后派一旅占领新丰街以东30里要地，并对黎川方面搜索；二、周浑元纵队应于25日占领硝石，同时向黎川进攻，限26日至28日间占领黎川。

△　罗文幹由迪化抵塔城，动员留在当地之东北义军牵制盛世才。22日，罗离塔城往苏联。

△　河南省政府以光山县地界湖北，为红军活动地域，特析置经扶县，县治设新集。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

△　香港各米行因上日粤方宣布征抽洋米税，是日一律停运。香

港米行公所主席邹鹏展电请广东当局停征米税。

△　吉林农安、辽宁开通、通辽一带鼠疫流行，18日止农安已蔓延23村，死亡200余人，通辽死亡90余人。是日，日、“满”联合成立防疫委员会，由伪民政总长臧式毅任委员长，指定农安、开通、通辽为疫区，断绝三县与长春间一切交通。22日，哈尔滨市亦决定检查行旅，限制交通。25日蔓延至洮南。10月，农安一带疫情稍减。

9月21日　方振武在怀柔召开军民大会，散发、张贴抗日反蒋传单及标语。同日，平军分会派第二十五师一部往顺义附近设防，并派殷同访日武官柴山，要求日方干预。柴山立即电日关东军司令部请示办法。

△　湘赣军区红军萧克部占新城东南之焦陂、白石、上坊等地。第十五师王东原部急将主力集古城，图袭红军后路。24日，红军占毛坪、葛田。王部派一个营包抄，26日反被红军包围于毛坪附近，俟援军赶到始解围。

△　国民政府令派王用宾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

△　滦东股匪张魁元（浑名“老耗子”）陷抚宁，旋窜三河。于学忠令战区保安总队往剿。按：滦东股匪以“东亚联合同盟军”为旗号，编为两军，第一军军长郭亚洲，第二军军长孙魁元，共约2500余人。另有新加入之小帮大五龙、荣山等部千余人，巢穴在榆关一带。

9月22日　日武官柴山根据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复电，派驻密云日军官赴怀柔向方振武提出“警告”，限26日晚以前撤退至非武装地区以外，否则即派兵进攻。翌日，日机飞平及顺义、怀柔散发“警告”方振武部传单。

△　日关东军总特务机关于多伦设置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伪蒙古军司令李守信任行政长官，是日李通电到任。

△　蒋介石由庐山到南昌，设“匪区”党务处。

△　蒋介石编印《前代御寇良规》，本日令颁各军、师、旅及省府、民政厅、保安处，要求详加研究，“以供师法”。

△　国民政府免戴戟淞沪警备司令本职，遗缺派吴铁城暂兼。

△　财政部令上海各银行停止办理有奖储蓄。

△　前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病死香港。

9月23日　红四方面军集中第四、九、三十军主力是日起进攻营山川军杨森部，击溃杨部李朝信旅，占领鼎山场、玉山场、双庙场等要地。

△　吉鸿昌率部抵怀柔与方振武部会合。方振武一部进占牛栏山，作袭击北平准备。

△　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代表四川省安抚会请援之中国青年党人李璜，旋派员陪同考察赣省被“收复”之苏区情形。

△　国联行政院全体会议接受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报告书，并派拉西曼为国联与中国间之联络员。顾维钧在会上声明此举完全无政治性质。

△　国民政府特派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特派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前敌总指挥。

△　国民政府任命裴昌会为第四十七师师长。

△　孙殿英西进后，得阎锡山所助开拔费25万元，又将留驻晋城旧部调往包头。是日，孙部由包头开拔，假道宁夏入青。

9月24日　方振武、吉鸿昌联名发反蒋通电，提出非打倒蒋介石不能遂行抗日工作，此次举兵非个人行动，乃国家立场之实行而已。同日，方振武答复日方“警告”称，此次行动目的在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属中国内政问题，要日军不作干涉。

△　方振武部在牛栏山附近与驻军第二师发生战斗。同日，日军一个连到密云，将地方保安队缴械。次日，日第八师团第五联队继到密云。

△　滦东股匪张魁元部复占抚宁县城，县长刘兴沛率保卫团逃昌黎，居民万余随之外逃。

△　日与伪满将中东路局苏方运输、厂务、会计、业务四处长及满洲里站长扣押，绥芬站长传讯。翌日，苏《真理报》、《消息报》载文警告日本称：满洲境内发生各事以及破坏中东路苏联权利之完全责任，须由日方担负，若日人一味挑衅，则日必将受到相当之报复。时苏已调兵力14万、飞机300架驻远东。

9月25日　宋子文在沪语记者称：首批美棉即可到沪，委托中央银行出售，日商采购自亦不能禁止。

△　日海军省向内阁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主张使华北政权在安定的状态下，加速履行《塘沽协定》，拒绝抵制日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国民党势力，并在华北鼓起亲日空气。

△　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举行全体会议，李仪祉提出治黄纲要，要求治标治本同时进行。27日闭会。

△　国联第十四届大会在日内瓦开幕。顾维钧在会上发表演说，望国联维持盟约尊严，勿使大会前所通过之调处中日争端报告书成为一纸空文。

9月26日　蒋介石在南昌连日召见各军将领商“剿匪”军事，是日

午亲赴前方视察指挥。

△　吉鸿昌部进占汤山东之牛坊及昌平茶坞，方振武部进占高丽营，在高丽营附近与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战斗。何应钦急调西苑、南苑驻军开往顺义等地。同日，日使馆武官柴山访何应钦，声言日军将从27日起对方、吉部开始行动，并表示容纳中国要求，制止方、吉部向滦东行进。

△　日军第八师团第五联队由密云开赴怀柔及牛栏山，日机四架至高丽营轰炸，并飞平散发《告中国军当局官宪民众书》，要求方部撤退，宣称："届时彼若不肯撤退，我军即断然讨伐。"

△　塘沽日军借酒醉滋事，占据塘大公安局，强迫华警缴械。经天津市府向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交涉，日军于晚间撤出塘大公安局。

△　黄郛在沪访晤驻华日使有吉明，商谈对付进入非战区之方振武、吉鸿昌部办法。

△　日外务大臣广田向中国驻日临时代办江华本表示，要求蒋作宾速回公使任。28日，蒋在沪分访黄郛、宋子文商中日问题，作回任准备。

9月27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新疆省政府，除省府委员兼主席刘文龙，委员盛世才、张培元业经明令任命外，任邓聚奎、朱瑞墀、张馨、高惜冰、李溶、沙里福汗、满楚克扎布、马仲英、胡萨英、和加尼牙孜为省府委员，以邓、朱、张、高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原任委员朱瑞墀、李溶、陈继善、鲁效祖、徐益珊免本职，朱瑞墀、刘文龙分别免财政、教育厅长兼职。

△　方振武、吉鸿昌部向大、小汤山转移。北平军分会令万福麟、商震、徐庭瑶率部分三路堵击。28日，在小汤山发生战斗，日机配合轰炸，方、吉部不支，退昌平西北部山中。

△　蒋介石连电催促黄郛北上，并告以平市公安局长问题已解决，“无论日军是否27日再进怀柔”，北行不宜再缓。

△　蒋介石派何成濬到四川为刘湘就四川“剿匪”总司令职监誓并布置“围剿”红四方面军事宜，是日，何飞抵重庆，29日专车赴成都。

△　湘赣军区红军萧克部与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在永新白石发生战斗。翌日，红军退永新。

△　伪满公布《积欠善后公债法》，定伪币600万元，年息三厘，7月1日发行，20年偿清本息。

△　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向理事长李绍庚抗议日伪逮捕中东路苏方职员事件。

9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陈济棠、李宗仁电请五全大会延期，且华北战区各事尚未就绪，各地“剿匪”尚未完成，决定五全大会展期至明年11月召集，国民大会仍定1935年3月举行。

△　北路军周浑元部三个师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隙，于25日由南城、哨石向黎川进攻，是日占领黎川，是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前奏。

△　日军在怀柔张贴布告称，方、吉部队已退出停战协定区域以外，日军仍留驻防范。

△　河北省府派保安队周毓英部2000人开往滦东剿匪，车抵滦州，日军以携带有机枪数挺为借口迫令返津，机枪被扣留。旋经平军分会向日使馆武官柴山交涉，允不带重武器始准放行。29日，车抵芦台，又被日军阻拦返回。

△　苏联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向日外务大臣广田提交抗议书，指出逮捕中东路苏方职员手段“乃系哈尔滨日本军司令部及所有现在满洲

国当局中最负责之日本首领若干会议所拟定，在必要时，苏联政府将发表此种文件之全部原文”。同日，广田外相听取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关于伪满对今后交涉方针之意见。

△　罗文幹于24日到达苏境塞米巴拉金斯克，是日在新西北利亚与驻苏大使颜惠庆会晤，了解苏对“新变”态度及金树仁1931年与苏秘密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等问题。

△　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以原浙江省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张难先、建设厅长石瑛“滥用职权，罢免无辜，朋比为奸，滥用私人”，予张以申诫处分，石不受惩戒。

△　国民政府以招商局总经理刘鸿生捐资兴学在20万元以上，是日明令嘉奖。

△　天津宝成纱厂于10日复工后，厂方一味增加工作强度，工人难以忍受，遂于是日罢工。厂方将工人王德海等六人送公安局关押，并开除任宝成等10人。翌日，天津工联会就此事向社会局请愿。

9月29日　汪精卫在京召集林森、居正、于右任、陈果夫、黄绍竑、陈公博等开会讨论新疆事变、内蒙自治以及镇压方、吉部等问题。决定派黄绍竑、石青阳赴察、绥视察。同日晚，汪乘车赴沪。

△　方振武、吉鸿昌部欲回师独石口，北平军分会令驻察庞炳勋部、驻延庆关麟徵部堵击。是日，方部王中孚师所属三个团被俘；吉部袭昌平，占明陵，数百人在昌平被万福麟部围击，同时日机跟踪轰炸。

△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在巴中佛楼寺击溃川军杨森部杨汉忠旅。次日占佛楼寺，并沿巴河南下。刘湘、杨森急从大竹、合川调王陵基、范绍增两师增援渠县、营山、蓬安。

△　闽北红军攻顺昌城，不克，退建宁、泰宁。

△　顾维钧在国联大会演说，指出“国联大会特别会议全体通过之报告书迄未见诸实施”，“中国政府决心坚持其一切权益与要求，对任何不合法之已成事实决不承认”，并再次呼吁国联大会遵守盟约。

△　棉麦借款之首批美棉运抵上海。

△　上海电力公司新厂工人千余人因厂方无故开除工人，不发养老金，宣告罢工。厂方请杨树浦捕房派警百人到厂。30日，工人整队向工部局请愿。

△　山东滕县城北发现大规模汉墓，被附近民众挖掘，内皆汉画石刻，获五六十方，均甚完整。

△　日陆军省为加紧侵略中国和对付苏联，加紧扩充军备，是日发表陆军急需整备之理由称：“确立满洲国治安，对外敌充实防卫设施”，为陆军紧急需要。

9月30日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又称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在上海大连湾路秘密召开，到上海工人、东北义勇军、平绥路工人、第十九路军士兵、河北、福建、江苏以及苏区红军代表，国际反帝非战同盟代表等65人，由马莱（英人）、环音考托（法人）、波比（比利时人）、宋庆龄等为主席团，并推举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鲁迅、高尔基、巴比塞、台尔曼等为名誉主席。宋庆龄在会上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谴责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罪行，颂扬中华苏维埃道路。大会通过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和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的抗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等。成立远东反帝非战同盟中国分会（一说世界反战委员会远东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按：大会原定9月3日在上海租界地区召开，全国各省、市均派代表参加，由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当局阻挠破坏，虽经马莱多方奔走交涉，未得允许。

各省、市代表60来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有的在途中被阻回）。

△　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在沪与宋子文商谈财政及经委会事，次日续商。孙科谈话称：现军政费每月需3000余万，不敷千余万，筹款极感困难。

是月　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麻公路受阻，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率第七十五师回鄂东，仍保持红二十五军序列；第七十四师由师长徐海东率领至皖西，第三次组红二十八军，徐任军长。

△　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

△　监察委员曾道以江苏省府主席顾祝同袒庇民政厅长赵启𨱎违法案；拘押邳县县长彭国彦一年以上，蹂躏人权，侵害司法；镇江县县长张鹏经国府议决降二级改叙，顾反将其擢升为专员，违抗明令，目无国府，特提出弹劾，经监委姚雨平、张华澜、杜羲审查成立，呈国府移送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惩戒。

10月

10月1日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乘胜向渠县进攻，是日占领三汇镇，打死、打伤杨森部团长各一名。红军旋占渠县、营山，并以一部兵力进抵嘉陵江边。刘湘急调范绍增等师往援。

△　汪精卫在沪晤黄郛，促其北返。黄允即日登程，并电告蒋介石。当晚，汪、黄离沪往南京。

△　上海华通商业储蓄银行受时局影响，兼营公债失败，是日倒闭，亏空70余万。该行兼营之乾元钱庄亦随之倒闭。

10月2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剿匪”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讲演《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提出战略要点为“严密封锁，

发展交通，稳扎稳打”；战术要点为“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等。同日，颁布《剿匪区内文武官佐士兵剿匪惩奖条例》。

△　汪精卫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报告财政问题称：自九一八以来总是不敷，政费仅能维持，军费尤不足，军事和财政当局均感到困难。这两天在沪对财政已商有救济办法。

△　下午，方振武、吉鸿昌部大举进攻昌平县城，激战一昼夜。

△　菱刈隆下令对吉林抗日义军进行秋季大讨伐。由第十四师团抽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一骑兵旅团，黑龙江警备军两个旅及靖安军山炮连入列第十师团长指挥，把中东路东线以南到京图路沿线之间分成数个地区分片“扫荡”。11月下旬“扫荡”结束，各部分别返原驻地。

△　国联技术联络员拉西曼到沪，翌日由宋子文偕同到京，5日返沪。

△　“东亚同盟军”股匪窜入北戴河，驻地警察一部被缴械。另由义院口窜入股匪千余，散布在台头营、榆关一带。

△　上海电力公司老厂工人为响应新厂工人斗争是日起罢工。除发电部分照常生产外，其余工作全部停顿。同日，沪市各工会发表宣言声援。9日，公司职员亦加入罢工。

10月3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民国二十二年关税库券条例》，发行额一亿元，充作国库周转之用，10月1日起按九八折发行，月息五厘，到1946年3月底偿还全部本息。宋子文在会上就发行该项库券有所说明，略称：因日军攻热，进窥平、津，临时军费急剧增加，致财政支出3月至7月溢出4900余万，加之华北各项税收受战事影响，异常短绌，两者合计在5000万以上。赖各银行暂时借垫，财部亦允予最短期间为之偿还，始得度此难关。现在军事暂告段落，拟发行二十二年关税库券一亿元，为上项垫款之抵押品。4日，该条例经国民党中

政会原则通过；27日，立法院通过；11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

△　国民政府令准刘峙辞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职，遗缺派顾祝同继任。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苏省政府。原省府委员兼主席顾祝同、委员赵启录（兼民政）、舒石父（兼财政）、周佛海（兼教育）、董修甲（兼建设）、韩德勤、王柏龄、李明扬、何玉书免本兼各职；任陈果夫、辜仁发、赵棣华、周佛海、沈百先、程天放、罗良鉴、王柏龄、余井塘为省府委员，以陈兼主席，辜、赵、周、沈分别兼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

△　行政院会议以进口米麦日增，国内粮价低落，通过停止执行粮食外运禁令，准予自由运销，免征出口税。

△　黄郛北返途经泰安，偕马伯援访晤冯玉祥于泰山。黄语冯：“安定华北，冀国人知耻雪耻，远效吴越，近效德法，孰知国人并不了解，毫无觉悟，真是痛心。”冯答谓：“现在的困难还不是国人自招？……现在的社会只有利害，无有是非。”

△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到达上海。翌日在沪著作家笔会上演讲《新爱国主义》。

10月4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通告成立。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就常委职。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拉西曼列席，决定任秦汾为该会秘书长，推定该会委员；拟定棉业统制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其委员人选。

△　全国经济委员会为统制棉业发表告国人书，宣称：“自今以往，对于棉业应有设施，凡属国家权责所及，由该委员会制成方案，当予实践履行，斯界从业人士，亦应全体动员，共同迈进”；“如有步趋不力者，国家亦当予以制裁。”

△　黄郛抵平，接见记者谈华北财政称：华北军费必须恢复张学良时代之预算，每月450万元；今后华北财政完全由财政部管理；战区救济款项初定2000万，因中央财政无此力量，减为500万，100万为现款，400万发行公债。

△　方振武、吉鸿昌部分两路在汤山及高丽营一带与东北军万福麟部战斗。翌日午，高丽营战事稍停，汤山仍继续战斗。同时日军在高丽营北之水泉村设防，图阻方、吉部东进。

△　刘湘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何成濬代表蒋介石监誓。随即召开“剿匪”军事会议，决定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路总指挥，六路“围剿”川陕边区红军，参加兵力33个旅共12万人，战线东起两开（开江、开县），西迄广元。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立法院，遵中常会决议筹备国民大会，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建筑大会会场。

△　罗文幹由苏联塞米启程往新疆伊犁。8日，为伊犁屯垦使张培元补行就职礼。16日，返塞米取道海参崴回京。

△　福建省政府会议通过征收洋谷米入口税，取消全省茶叶出口税。

10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方振武假借名义，纠集散兵，抗命窜扰，行同流寇，实属目无法纪”，决议免方振武国府委员职并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严议处分”，并补任陈立夫、黄复生为国府委员。

△　蒋介石加紧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是日南昌行营重颁封锁“匪区”办法，规定：凡武器、装具、药品及其制造原料，粮、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均在封锁之列；邻近共区、半共区居民日用品需经保长统计按月购买；道路、河道设封锁管理所缉查，查获者

半数充赏；凡与红军私相买卖、通消息者枪毙。

△　中共中革军委发布《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紧急命令》。

△　日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偕第十四旅团参谋远藤到平，与何应钦、黄郛商谈战区剿匪及对付方、吉部办法。

△　黑龙江省木兰县伪满警察第二、三小队反正，处死日参事官久泉隆，焚烧县署，释放监狱“囚犯”后开往县东北山林加入义军。

△　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华伤亡人数：死1845人，伤4968人，其中本年3至5月长城、滦东作战期间死500人，伤2125人。

10月6日　彭德怀所部东方军第四、五两师及第七军团一部由福建顺昌回师江西准备收复黎川，4日行至黎川洵口，北路第六师师长周碞急派葛钟山旅由黎川飞鸢来犯。是日，周部在洵口遭红军伏击围歼，两个团被消灭，团长、团附、营长各一名被打伤。翌日，红军又击败前往增援之第五师，除两个团败逃黎川外，包围其残部与第六师一个团，至10日下午，除极少数脱逃外，余均被消灭。

△　国民政府令：派陈光甫、李升伯、谢作楷、唐星海、邹秉文、陈立夫、荣宗敬、张嘉璈、杜月笙等21人为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指定李升伯、谢作楷、唐星海、邹秉文为常委，陈光甫为常委兼主任委员。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临时会议决议开除方振武党籍，移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

△　北平军分会派关麟徵部赴平北立水桥一带会同万福麟等部合击方、吉部。方振武电何应钦表示愿和平解决。是晚，万福麟等部停止攻击。翌日，平军分会电方速派代表到平接洽。

△　汪精卫为便于对日执行妥协方针，以“滦东、冀北一塌糊涂”为由，电黄郛“最好以战区十九县完全直接受支配于政整会”，“至少亦当使河北省政府能以政整会之意志为意志”。翌日，黄复电表示“不能求之过急”。

△　蒋介石电令苏、浙等10省切实查禁种植鸦片。

△　陈铭枢由香港秘密至福州，与蒋光鼐等商发动反蒋事变。

△　孙殿英部到达宁夏境。是日，宁夏省府主席马鸿逵电孙称：奉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电令，甘、宁、青三省境内不准其设立兵站，不准其假道通行。

△　四川松理茂屯殖督办邓锡侯通电报告松潘、茂县大地震灾情，请求政府及各界人士“悯此灾后孑黎，大解仁囊”。

10月7日　　驻日公使蒋作宾由沪乘轮赴日，9日抵神户时语记者称：“中日关系近已好转，且信今后将愈益增进其亲善关系”，“国内共匪虽仍炽烈，但拟于中日关系告一段落后，即竭力从事讨伐。”11日，蒋抵东京。

△　黄郛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与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商谈滦东剿匪及镇压方、吉部办法，决定由华方增派保安队2000人往抚宁剿匪；日方允华军以一师兵力十日为期开入战区“围剿”方、吉部队。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派陶尚铭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

△　刘湘电北平军分会称：营（山）、渠（县）失守，情势严重，已增调重兵集中大竹、邻水声援，并分令各军依照“剿匪”会议决议案限期肃清。

△　中共大连市委因叛徒告密遭破坏。宪兵队随即在大连、旅顺

等地大肆搜捕，至25日，共捕走53人。

10月8日　方振武派政治部主任郭云龙往平洽商和平解决办法。翌日，郭抵平见何应钦，何要求方离开部队，将所部调指定地点由军分会改编。郭即将何意电告方。11日，方复电希望本人不离开军队。何应钦即令关麟徵、万福麟对方、吉部再行攻击。

△　苏联政府公开发表日驻伪满大使菱刈隆9月4日、9日及19日致日外务省秘密报告书，揭露日在中东路谈判中曾唆使伪满对苏讲求压迫手段。次日，日《读卖新闻》、《国民新闻》等报刊发表短评，指为“伪造”。

△　由明星影片公司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拍摄的同名影片今起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导演程步高。

10月9日　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于百灵庙召开内蒙自治会议。各盟旗对此意见不一致，除锡林郭勒盟追随德王之10余人外，伊克昭盟无一人参加，乌兰察布盟仅一二旗参加。德王宣布会议宗旨，并提议组织自治机关，各旗均无人发言；继提议组织自治条例起草委员会，亦无应者。德王遂自行担任起草条例。会议无结果而散。

△　茂县震灾继续。茂县叠溪大震时，岩石将岷江堵塞成三大堰塞湖，是日下午7时许，大水倾湖溃出，“霹雳一声，四围山岳，皆为大震”。大水于晚9时到茂县，夜半达汶川，次日凌晨3时到灌县。溃出时水头高达20丈，至灌县水头仍有四丈之高。自叠溪沙湾起，下至崇宁、郫县、温江、双流、新都各县止，纵横泛滥千余里。茂县死亡340人，冲没田地2680余亩，房舍700余所，汶川全县死亡488人，毁房屋346间，农田353亩，灌县“全县共死1600余人”。

△　红三军团第四、六两师自洵口经资溪桥、潭头市向南城硝石急进，第五军团第十三师亦由福建建宁回师攻打硝石，图“御敌于国

门之外”。是日午后，与守硝石第二十四师黄子咸部接战。由于硝石工事巩固，有空军配合轰炸，周浑元部又从水口增援，红军连日数度猛攻不克，乃于13、14两日分向大竹、小竹、潭头市等地撤退。

△　蒋介石限令半月内一律完成赣浙、赣鄂、赣湘、赣粤、赣闽五大干线公路桥堡，并通令各军事长官负责指导守护。

△　拉西曼由沪到京，旋乘机飞赣见蒋介石。

△　杉村阳太郎由日使馆参赞原田陪同在平分访何应钦、黄郛。12日，离平往塘沽、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活动。

△　香港航空学校开设于启德机场，定明春开学，学员不限国籍。

10月10日　　上午，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开幕。林森任名誉会长，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孙科、宋子文任名誉副会长，王世杰任会长。林森、汪精卫、孙科、戴季陶等出席，汪精卫致训词。参加单位33个，选手2000余人，费用近八万元。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纠正、防止分田查田斗争中所发生的偏向，除批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对土地斗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决定。

△　中共珠河县委以秘密地方自卫武装为基础，成立珠河东北抗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并发表《珠河东北抗日游击队成立宣言》。

△　盛世才电国民政府，声言定11日率师对马仲英部发动进攻。电称马被委为新疆东路警备司令职后，“阳奉阴违，包藏祸心，且使其驻省代表姚治平等煽惑省军哗变，继遣其前师长马黑鹰潜赴阿尔泰

山，勾结回匪二千余人，分扰西路。……若不及早扑灭，终至遗祸边局”。

10月11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人选，除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常委外，派黄绍竑、顾孟馀、朱家骅、陈公博、蔡元培、钱新之、陈光甫等32人为委员。翌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日关东军参谋喜多返长春向菱刈隆报告后，是日电平军分会，称华方派保安队东开剿匪，日方表示已“谅解”。

△　宋子文接长芦盐运使王章祐电告，日军运盐至永平七县放赈，每县千包。是日，宋电黄郛以“兹事不独破坏税收，影响饷需，且关系国权甚大”，要求“克日交涉阻止”。14日，黄郛电复称“日方已允为查禁”。

△　广州日代理总领事吉田丹一郎要求市长刘纪文取缔抗日运动及解散抗日会。是日，刘命广州新闻检查员将各报中“暴日”、“东夷”、“灭日”等字样删去。18日，广州抗日会停止活动。

△　北平小学教员要求当局发清积欠工资和按十成发薪未得结果，是日上午召开47校代表大会决定下午起实行怠工，赴社会局请愿，40余所小学教学停顿。25日，社会局具结保证短期内设法补发积欠和切实按十成发薪，各校复课。

10月12日　　驻日公使蒋作宾在东京访日外务大臣广田及次官重光。翌日，访首相斋藤，蒋谓中国政府已在庐山会议中决定对日方针，本人为期使中日关系恢复常态而回任。

△　方、吉联军因迭遭中央军及日军堵击，内部动摇，方部军长王中孚力主投降，吉鸿昌坚决反对。是日，方、吉部队统由吉率领经板桥村过牛栏山东走，行至白河被河东日军所阻，遂折向南到达顺义

以西杜林庄一带。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规定在《出版法》未修正前所有小报呈请登记案一律缓办，已登记之小报如发现有“言论荒谬，记载失当”等情停止其发行权。30日，国府训令行政院转饬遵行。

△　盛世才率部离迪化直扑达坂攻马仲英，另一路由奇台取道七角井绕攻鄯善，断马军归路。盛指挥失当，东北义勇军不满盛之所为，纷纷后撤，于17日败归迪化。

△　河南开封信昌银号因营业亏损，存户挤兑，宣告停业。同日，该号济南分号亦宣告停业。按：信昌银号为秦昆生开设，在该省较大县城及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均设有分号，经营汇兑及储蓄，资产总值100万元，负债已达120万元。该号倒闭对全省金融影响颇大。

△　香港《娱乐场所条例》颁布实行。

10月13日　　宋子文连日在沪以关税库券作担保向中国、交通等10余家银行借款1500万元。是日，该款汇交财政部。

△　湘赣军区红军萧克、蔡会文部上日在株萍铁路湘赣交界处老关将铁路掘毁，电线割断，长沙、萍乡间交通联络一时断绝。何键急令陶广等师前往“进剿”。是日，红军分三路进攻萍乡、醴陵。翌日，在萍乡附近痛击陶师后退永新。

△　黄郛派李择一赴东京谋与日本商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19日，李由沪赴日。

△　宁夏省府主席马鸿逵电国民政府称：孙殿英军屯垦青海，系奉中央明令，拒之中途，于事不顺；任其入境又违朱绍良命令，表示“进退维谷”，请求辞职。翌日，该省省府委员电京总辞职。

△　上海英美烟公司第三厂工人因厂方无故解雇工人，干预工会活动，宣告罢工。30日，厂方与工人意见接近，在工会劝告下工人暂行复工。

10月14日　　汪精卫偕曾仲鸣、唐有壬赴庐山与蒋介石商宋子文辞职及“剿匪”军费、福建政局等问题。翌日，离庐山回京。

△　日外务省就苏联公开发表菱刈隆秘密报告书发表非正式声明，称苏此举是意欲获得日本国内对苏关系持和平态度者之同情，是“谋使中东路交涉迁延”，表示如“苏联不改变其认识，在满、苏间酿成重大结果，完全为苏方责任”。

△　日本修筑长春至清津铁路（即吉会路）竣工通车。

10月15日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通令所属，严禁在京、镇、沪、杭、徐、浦、洛、津、平、汴、郑、汉等重要城市商埠招兵。

△　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刘坦如、宣传部长覃文在成都被国民党四川当局杀害。翌日，中共重庆市委李烈光在重庆就义。

△　中央研究院派董作宾与山东古迹研究会王献唐负责发掘山东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古物，是日董抵济南，谈工作任务称：一、考察春秋战国古城址及其文物；二、考察汉画、石刻、汉墓。

10月16日　　方振武、吉鸿昌两部连日受中央军及日军围击，飞机轰炸，伤亡惨重。是日，平军分会派北平慈善团体代表刘砥泉等四人到战地晤方、吉，促其罢兵；日军限其下午3时前退出战区。方、吉被迫派代表米文和随刘砥泉等到顺义第三十二军商震部洽商解决办法。下午2时，方、吉至马家营与商震、徐庭瑶晤面。方提三项要求：一、卫队200余人从优给资遣散；二、军队盼政府收编；三、本人及吉鸿昌愿出国，要求给予名义及旅费。商震即向何应钦请示，得答复如下：一、卫队给资5000元遣散；二、军队交方、吉部将领李德

新等暂行统率，集中东、西杜林庄听候改编；三、保障方、吉安全，出洋旅费待向中央请示。下午4时半，方、吉通电申述抗日经过及不得已离军之苦衷，旋被押解北平。二人中途脱逃，吉避入天津租界，方则辗转流亡国外。所部6000余人被缴械。抗日同盟军至此完全失败。

△　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令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撤销，未尽事宜交行政督察专员继续办理。

10月17日　　蒋介石开始实行对苏区第五次“围剿”，是日颁发行动纲要及“围剿”计划，指示各“进剿”部队遵照“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计划规定“以歼灭赣南匪军主力及流窜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匪军为目的，区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及浙赣闽边区。于10月中旬开始同时围剿，以政治配合军事，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及组训民兵之原则，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防止匪军流窜，逐步缩小包围圈，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兵力配置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一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兼），刘兴为副；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兼），汤恩伯为副；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薛岳为副，共28个师，二个旅，一个税警总团。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九个师三个旅。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14个师二个旅。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辖五个师。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辖五个师。直属空军五个队。总计陆军61个师七个旅一个团，空军五个队。

△　行政院通过《变更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方案》、《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及《蒙古行政用人之标准案》，要点为：规定设边务部或称蒙藏部，直隶行政院，为处理蒙藏之最高机关；在蒙人聚居省分设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办理地方行政，受边务部指挥监督；地

方政务委员会设蒙古代表会议，为蒙古人之民意机关；行政用人尽量容纳蒙人；并就适宜地点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翌日，中政会原则通过。

△　国民政府令：派黄绍竑巡视内蒙各盟旗，派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协助；派张培元为新疆边防帮办。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甘肃省政府。除省府委员兼主席兼民政厅长朱绍良业经任命外，任朱镜宙、许显时、水梓、李拯中、邓宝珊、喇世俊、张维为委员，朱兼财政厅长，许兼建设厅长，水梓暂行兼代教育厅长。原委员谭克敏（兼财政）、刘汝璠（兼建设）、水梓（兼教育）、邓宝珊、孙蔚如、马鸿宾免本兼各职。

△　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故宫舞弊案具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反诉张继夫人崔振华与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朋比勾串，贿买人证，蓄意构陷”，要求将郑暂行停职，与崔同至法院对质。

△　国民政府公布《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分发规程》。

△　国民政府令：派胡世泽为中国出席保护难民会议代表。

10月1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发《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指出：“这一战斗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决战的紧急的关头！”“争取这一决战中我们的全部胜利，这是整个苏维埃政权当前最中心的最尖锐的任务。”要求各级政府、各红军部队立刻召集会议，详细说明目前革命战争的紧张情形，用尽全部力量来进行战争的动员；完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红军的计划；迅速恢复与扩大赤卫军模范营与模范少先队的组织；保证红军的供给等。

△　红军进攻硝石不胜，红三、七军团进至飞鸢、洵口、湖坊附近山地，准备先期进占资溪桥，截断硝石、黎川间交通。红一军团一

部由广昌北移策应。陈诚令第七纵队薛岳率第九、十一、十四、九十四等四个师于是日进占资溪桥，速在该地筑碉固守；令八纵队周浑元在黎川筑碉固守，并由周率第五、六、九十六共三个师于同日到达资溪桥，交由薛岳指挥。21日，工事完成。

△　行政院驻平政整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各省主席于学忠、徐永昌、韩复榘、宋哲元等均出席。会后，黄郛留各省主席交换意见。24日，黄电蒋介石称：各省主席“大致对中央尚无恶意，然却各怀不安之念。简言之，剿共得手，深恐武力转而向北；剿共失利，深恐中央摇动，华北亦宜设法自保。经开诚坦怀，力加解释后，结果尚称圆满”。

△　北平军分会得日方同意，由河北省府派保安队第二大队长周毓英率一、二、三中队开往昌黎剿匪。

△　国民政府以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前膺宣化使命，寒暑遄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特予崇褒”。

10月19日　西蒙各盟旗首领电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等称：“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议决案，已有特许外蒙自治之先例”，要求“采用高度自治，建设内蒙自治政府”。

△　陈铭枢由闽到港。同日，蒋光鼐以为子完婚为名赴港、粤，到港后分别与李济深、陈铭枢、徐谦及川、黔、桂等省代表商谈发动“福建事变”。

△　刘湘以出师“剿匪”，急需军款，令向戍区各县借垫一年粮款一次，名曰“安川军费”，限11月底扫数解省。

△　日使有吉明偕有野、须磨由沪抵平，与何应钦、黄郛讨论通车、通邮及滦河航运等问题。24、26日与黄郛再度晤谈。

△　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陈宝泉、委员严智怡在4月间列名电呈国民政府、军委会要求迅饬华北当局设法救援华北民众，“措词多系摭拾传闻，不符事实”，“散布流言”，予以申戒。

10月20日　　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军主力在渠县、营山大败川军杨森等部后移师东向，是日起进攻刘存厚部防区，经两天战斗，攻下万源、宣汉、绥定（达县）三县城。刘部仅存四个团退守距绥定50里之江陵、溪浦一带。红军在绥定兵工厂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旋即乘胜渡渠江进逼开江、万县。此时川东游击军主动出击刘部溃兵及王陵基增援部队八个团，将其围困于宣汉南坝达一周之久。月底，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

△　黄绍竑由京前往内蒙视察。

△　北平军分会呈请国民政府批准，任刘桂堂为察东剿匪司令，令该部缩编为四个团，是日，何应钦将委任状及关防交刘部参谋长楚英翘。

△　日首相斋藤以陆军、海军两省的提议，经五相决议的方式作出《帝国外交政策》之决定。有关中国部分为：尊重门户开放政策，中“满”间树立和谐关系并根绝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11月30日，陆军省又提最后修正案，主张“在日本帝国的领导下，建立中、日、满的友好关系，以促进亚洲的和平”，同时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的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的势力于华北之外”。

△　马仲英派代表向盛世才乞和，盛复电要求马将军队撤回哈密，饷由省发，如仍延迟，即武力接收吐鲁番、鄯善。25日，盛复率军讨马，马表示愿退哈密，要求延缓时日，双方未作接触。

△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闭幕。田径、游泳项目破全国纪录者30余项，上海男女队获总锦标。年仅15岁的香港游泳女选手杨秀琼在女子

五个项目中，一人独得五枚金牌（一项接力），创造四个单项的全国记录，轰动南京，被誉为南国“美人鱼”。东北选手发表《告别书》称：“诸位有家回去，我们随地漂流。热烈希望下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恢复东北河山颜色。”同日，全国体育委员会决定下届全运会于1935年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

10月21日　　林森以返里扫墓为名，离京赴闽，谋劝阻蔡廷锴、蒋光鼐等酝酿反蒋事变。

△　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联合宁、青两省马麟、马鸿逵、邓宝珊等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孙殿英部从缓西移或另筹办法。23日，孙奉命暂缓西开，滞留五原一带。

△　国民政府派川军第二十三军第一师师长刘邦俊兼任该军副军长。

△　铁道部任殷同为北宁路局长，原任钱宗泽回任陇海路局长。

10月22日　　南昌行营召豫、皖、鄂、湘、苏、浙、赣、沪八省、市代表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行长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杨永泰主席，通过杜绝外米倾销、限制田赋附加、组织粮食运销机关等各案。次日闭会。

△　蒋介石调整南昌行营机构，将原四厅并为两厅，第一厅司军事，贺国光任厅长；第二厅司党、政、经济，杨永泰兼任厅长；另设办公厅，由熊式辉兼任主任；夏斗寅为总参议。

△　陈诚为恢复南城、南丰间交通，电令七纵副指挥吴奇伟率第三、九十两师由南城新丰街进占里塔圩。吴部到达前红军已南撤。

△　新疆缠回首领和加尼牙孜宣言反对马仲英，进攻吐鲁番，马退哈密。盛世才为孤立马，即委和加尼牙孜为南疆警备司令。

△　南京、浦口间火车轮渡工程竣工通车，建筑费300万元。

10月23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何应钦所呈“吉鸿昌背叛党国，称兵作乱，其原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应即先行褫职”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顾祝同、蒋鼎文分别就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军总司令及前敌总指挥职。

10月24日　　红军三、五军团各一部连日进攻资溪桥北部第五师阵地，国民党军凭强固工事据守，经数次猛攻，未能取胜，于是日晚北撤。

△　中航公司沪粤线正式开航。

10月25日　　国民党中政会原则通过赣省发行玉萍铁路公债案，数额1200万元，年息六厘，指定以中央拨还地方盐附税为还本付息基金，1934年1月发行，1943年6月底偿清。

10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大要为：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四、福建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方面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八、本协定在福建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十、双方贸易关系，依互助互惠原则另订商务条约。

△　蒋介石以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在防守绥定战役中“防守无方，有负职责”，予以革职查办处分；并电令刘湘将该军所余部队着由该军副军长刘邦俊负责收容，切实整理。11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革刘存厚职，28日，行政院会议议决任刘邦俊代理第二十三军军长职。

△　刘湘令五路军同时并进，克日收复绥定、宣汉。是日，杨森部向营山行进途中，在凤凰寺与红军发生战斗。

△　黄绍竑、赵丕廉先后抵平。是日，部分蒙族青年及旅平王公在德王怂恿下以内蒙旅平同乡会、蒙古救济委员会等名义上书黄、赵，称德王系根据“全蒙民意而要求自治，绝非其一人操纵把持，更无其他背景”；“章嘉阻碍自治，为全体民众所愤懑，如其仍本过去之主张，必将激起意外事件”。黄、赵在平期间，分别接见旅平蒙古王公及章嘉等人。

△　国民政府任命原第八十七师副师长宋希濂为第三十六师师长。

△　监察委员郑螺生弹劾前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祸新酿变，违法擅订《新苏条约》，交付监委罗介夫等审查成立，依法交付惩戒。

△　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以原湖南省建设厅长谭常恺将军用原料锰、锑及白铅等矿砂售与长沙同昌公司及中央贸易公司转运出口，予以免职停用十年处分。

10月27日　　立法院通过《华北救济战区短期公债条例》。翌日，天津《大公报》社评称：“华北战区早该救济了，从《塘沽协定》到公债发行整整过了五个月，这和一个中央委员死了之后，十天八天便能拨给治丧费的手续比较起来，不免令人发生感慨。”

△　黄绍竑、赵丕廉离平抵张家口，与在察内蒙王公晤谈。

△　驻察汤玉麟与刘桂堂两部发生冲突，汤部枪械被缴去甚多。翌日，刘电察省府要求派兵堵截汤部，汤亦电平军分会声讨刘。宋哲元令双方停止战斗，静待解决。

△　南昌行营为封锁苏区，设江西粮食管理局。

△　财政部公布取消米粮出口禁令。

△　四川“剿匪”督办公署令官产清理处变卖四川大学校址，充“剿匪”军饷。是日，川大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反对。

△　香港颁布《各种营业牌照条例》。

10月28日　　蒋介石为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请辞职事由南昌飞京，经与汪精卫、孔祥熙晤谈后，蒋、汪联电促宋由沪到京，并派专机往接，宋未应召。

△　中共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成立红九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　开封同和裕银号受信昌银号倒闭影响，发生挤兑，所存80万元现金被提一空，要求省府出面维持。省府除布告商民限制取款外，是日决定发行公债80万元，维持同和裕并助信昌复业。

10月29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并于同日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至宋请辞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则予慰留。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职，选孔祥熙继任，并选任宋为国府委员。会后，蒋返南昌。汪精卫对记者谈宋辞职原因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一千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伦敦路透社电称：宋子文辞财长职，英人认为系国民政府内反对依赖国联及主张亲日派之胜利。

△　蒋介石颁布《剿匪区临时施政纲要》，令各省政府通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并责成各路总司令、各总指挥、各纵队司令严切督促实行。《纲要》包括清乡、编查保甲、整理民团、封锁“匪区”、筑碉、公路、财政、教育等13项。

△　黄绍竑、赵丕廉一行抵归绥，与绥省府主席傅作义商内蒙自治。翌日，黄语记者称：中央本允许人民自治，蒙人要求，自无不可，但自治目标，要从改进经济利益与人民生活着眼，非只立一名目了事，必须在中央及省允许之下予以自治，并从而辅导之，以收自治之利。

10月30日　　行政院以前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犯有重大刑事嫌疑，着司法院令检察署依法检举，并令首都警察厅将金扣留，令外交部将金与苏联私订条约全案交司法部转交检察署检举。金于29日到京，即被警厅监视，是日晚被逮。

△　上海电力公司工人罢工以来，对公司影响颇大。是日，公司派员会同捕探开车往工人居所，强迫工人上工。工人十分愤慨，登报声明，表示此次罢工系为民族地位而抗争，非仅为简单之劳资纠纷，在未获胜利前誓不复工。

△　据天津《大公报》载：江苏省农田负担繁重，田赋附捐名目不下30种，超过正税竟达20倍以上。

10月31日　　陈铭枢再次由港赴闽，是日经厦门到漳州，与蔡廷锴进一步商谈发动反蒋事变后复返港。

△　汪精卫由京到沪，促宋子文入京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宋语记者称，是否继续担任经委会常委尚待考虑。翌日，汪返京。

△　黄绍竑派内政部警政司长李松风等携改革内蒙行政系统方案至百灵庙晤德王、云王，并安排黄绍竑入蒙。

△　蒋介石为加紧第五次“围剿”，规定自本日起，每晚7时在行营无线电台作广播训话，要求各军、师及各县按时收听，记录呈报。

10月下旬　　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北平市委及党的外围组织同遭破坏，省委代书记、组织部长兼北平市委书记高洁明、市委组织部长何成树、市委秘书长廖静波及团市委、反帝大同盟等负责人被捕。

是月　盛世才为对付与马仲英的战争，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以医眼疾为名，偕同航空队附姚雄经塔城赴苏联莫斯科乞求军事援助。

11月

11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二年华北救济战区短期公债条例》，总额400万元，年息六厘，以展限续征之长芦盐税项下附加农田水利基金全部为还本付息基金。定11月发行，至1938年7月底本息偿清。

△　红一军团再攻硝石，与第二十四师彭旅、第八十七师张旅发生战斗。第十四、九十四师增防南城，第九十四师第五六四团一个营在硝石东曹家亭渡河时被红军歼灭。

△　社会民主党人喻翊忠策动驻湘西靖县湘保安第四区第一团团长贺竟成哗变，称“全民救国军”，揭五色旗，喻任前敌总指挥，贺任第一师师长。宣称：“（一）取消一切稗政，解除民众痛苦；（二）肃清各地共匪，恢复固有文明；（三）建立民众武力，准备御侮救亡。”7日，由靖县向洪江进发。何键令第十九师李觉部往剿，并分电桂、黔当局派部协剿。贺部团长杨某投降。

△　第十九路军军官补习所在漳州开学，蔡廷锴兼任所长，余华沐任教育部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改为军事政治学校，蔡兼任

校长。1934年春“闽变”失败时结束。

△　台湾公布《全台湾高山族集体移住十年计划》。

11月2日　何应钦在平接见德王代表包悦卿等人，表示希望内蒙各王公开诚布公与黄绍竑商谈蒙事，站在中央立场办理自治。

△　日使有吉明抵平后向黄郛等提出解决交还长城各口、设关、通车通邮等局部问题的谈判。是日，黄郛电行政院请示，主张“在不丧权辱国之外交方针下”，未始不可商议。行政院即将黄电发交有关各部拟具方案。同日下午，日使馆武官柴山就此事再与何应钦、黄郛晤谈；4至5日，又接连与殷同商通车事。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剿”运动的紧急通知》。

△　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邵式平任主席。

△　国民政府令免朱培德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主任兼职，遗缺以杨端六继任。

△　盛世才由前方返迪化晤苏联驻迪领事，商请苏出兵援助，次日午返前方。因连接刘文龙电告马赫英部副总指挥李福兴犯绥来，又传张培元已派部东进，盛又于5日率师返省，急命刘斌由塔城往御马赫英部，马部败走。

11月3日　交通部长朱家骅电告黄郛称：国防会议对通邮事主暂缓讨论，仍维现状。同日，铁道部长顾孟馀电告黄郛，铁部派员赴平协助商谈北宁路通车事宜。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甘、宁、青三省当局及民众团体反对孙殿英部西开，是日电令孙部暂停西进，驻宁夏平罗以东、绥远包头以西地区过冬。

△　日苏因中东路问题关系日益恶化。是日，日侦察机八架及轰炸机一架越苏境侦察。6日，苏驻日大使尤列涅夫访外相广田就此事提严重抗议，广田否认日机越境。

11月4日　据《申报》本日长沙通讯：湘省发行救国库券以来，因各县、市纷起反对，省府减为六折，实募300万，以250万改充西路军“剿匪”费用，50万为征工筑路补助费，原限三个月募足，现已阅六月，仅募得六七十万，尚系从严追催而来，衡阳一县被系在狱者人为之满，长沙则派枪兵驻店坐索。长沙各业代表会议决定政府不收回派兵勒派成命，各钱商即与政府实行经济绝交，中旬，驻店坐索之枪兵撤走。

11月5日　蒋介石电令赣、湘、鄂、皖、苏、浙、冀、豫各省府主席及上海市长，限制田赋附加及撤销米谷苛捐杂税。

△　冀省保安队连日在抚宁进剿“老耗子”等股匪，是日克抚宁城，匪部向台头营方面逃窜。驻榆关日军参谋远藤要求保安队周毓英部撤回天津，窦希哲部撤返昌黎。

△　李际春通电结束战区杂军编遣委员会及所任委员长职务，并向冀省府索编遣费五个月计四万元，军事垫款7.5万元。冀省府允照发。

11月6日　日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偕参谋喜多诚一等一行四人从长春到平，与华北当局交涉停战善后事宜。下午，冈村分访何应钦、黄郛。晚，黄郛宴冈村等人。宴后，日武官根本博向黄郛提交《关于北支善后交涉商定案》，内容为：一、长城线各关门警备权属于日、“满”，凡有日军驻屯之住民地，（中国）不应配置武装团体；二、北支政权容认“满洲国”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界岭口设置必要的各种机关，并对这些机关业务予以最善的援助；三、北支政权在接收地域内对日军提供必要的土地、房屋，以备日军暂时

驻屯；四、北支政权为设定与“满洲国”间相互的通商贸易、交通通讯、航空联络等起见，应从速决定必要的委员，开始交涉。根本博声言此案系关东军再三审议所决定，中方只可修正文字，绝对不容更动实质。黄郛连夜与何应钦研讨应付方针，确定不谈政治问题，凡文内有涉及“满洲国”字样者应绝对删除；不讨论越出停战协定善后范围以外的问题。

△　财政部长孔祥熙宣誓就职，汪精卫、叶楚伧相继致词，孔致答词，均强调要尽先充实“剿匪”军费。同日，孔在中央纪念周上报告称：“最近财政确已臻困难，每月不敷1200余万，自应由整理旧税源入手。”

△　上海各界“剿匪”运动宣传周开始，各御用团体派代表参加大会，航空署派飞机二架散发反共传单，全市100多处路口悬挂反共标语，影院加映反共标语影片。吴铁城、吴开先等20余人于宣传周期间分别作反共广播演说。

△　中共江苏省委为国民党当局举办“剿匪”宣传周发表《告江苏民众书》，指出这是国民党“进行对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欺骗与武断宣传作垂死挣扎的呼号”，号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动员起来，组织打狗队、纠察队、宣传队、标语队，粉碎国民党的“剿匪”宣传周。同日，上海总工会亦发表《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反革命武断宣传告江苏工友书》。

11月7日　　上午9时，黄郛、何应钦、殷同、殷汝耕、陶尚铭与日方冈村、喜多、菊池（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根本博、柴山、花轮义敬（书记官）在平会谈。冈村声称：“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除非日本灭亡，则满洲国无可移易。”黄郛声明：方案“内容如带有承认‘满洲国’之意味者，在我方立场上决办不到”；日方所提方案应容纳我方意见，商谈范围应以地方的局部善后问题为限，“不能涉及政治、外交问题”。中国方面指派殷同、殷汝耕、陶尚铭，日方指

派喜多、根本博、花轮为会谈代表，下午会谈开始，殷同就日方所提方案表示长城各口警备权委于日军与停战协定意旨相反，要求将长城全部从速交还中国；第二项无异承认“满洲国”，要求删去；第三项并入修正后的第一项，不必另列；第四项通商、贸易、航空联络等项，目前无谈的必要。喜多声称，如照此修改系推翻原案主旨，表示不能办到。局面僵持，约定翌日续谈。

△　青海各族代表马绍武等到行政院请愿，要求收回孙殿英部西开成命。此时，宁、青两省已派军两旅在宁夏平罗县北石嘴子阻孙军渡河。

11月8日　汪精卫上日应蒋介石召到南昌共商对日交涉，是日联名电黄郛、何应钦，指示对日交涉以在事实上、法理上不涉及伪国之原则，可酌量商谈，并以不换文，不签字最为重要。

△　罗文幹出巡新疆后，经苏联新西伯利亚、乌苏里到海参崴乘轮返国，是日抵达天津，发表书面谈话称：“欲治理新疆，必首先结束军事，然后整理财政，开发交通。”11日返抵南京。

△　孔祥熙应蒋介石召，赴南昌商“剿匪”经费等问题。

△　粤军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因倾向闽省发动反蒋事变受陈济棠排挤，提出辞职。是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准香辞职，遗缺由陈济棠兼任。

△　国民政府令：派邓宝珊为新编第一军军长。

11月9日　中日北平会谈连日进行，日方一味强压，执意坚持接收地点“不含长城线”等，声言若中方“完全以对等态度，遇事龂龂争辩，则大属错误”，并多次以“罢议归去”相威胁。殷同等在强压面前乞称：“吾人以弱者地位应付强者，既不能以力争，又不能以理争，只好强颜以好意奉求。”历时三日，六次会谈，又经黄郛与冈村几次会

外接触，是晚达成《关于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会谈》，仅就日方原案略作文字修改，将“北支政权”改为“华北当局”，“满洲诸机关”改为“关东军所指定必要之诸机关”，“航空联络”句删去等。日方容认中方提出希望三点：一、在接收区域内暂驻之日军，及暂置之关东军所指定诸机关，对所在地中国之一切行政，不得有干预或妨碍之情事；二、除依本会谈已经华北当局同意者外，其他任何军队不得开入接收区域内；三、为完成察东地区及多伦诺尔之接收起见，关东军同意中国对于察边抗命部队及土匪得自由剿办。冈村表示同意一、二两项，第三项俟返长春讨论后答复。夜12时，黄郛、何应钦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

△　陈铭枢、蒋光鼐由港到厦门，翌日到漳州与蔡廷锴晤谈发动反蒋事变。

△　川军“剿匪”第五路军王陵基部第三、四两师，第六路范绍增师上月31日起在东线进攻红军，连续在观音山、中心场、杨柳关等地战斗，被红军歼灭5000余。红军因兵力分散，川军后续部队增加，是日，向宣汉、达县一线撤退。

△　国民政府令：派李松崑为第三十军副军长；任命冯安邦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准李调生辞财政部常务次长职。

△　伪满公布《银行法》，令民营行庄在1934年6月以前登记，经批准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准继续营业。结果登记者169家，发给营业执照者只88家。

11月10日　　黄绍竑、赵丕廉在徐庭瑶及装甲车队护送下由归绥达百灵庙，内蒙云王、德王及王公代表等以上宾礼接待。

△　汪精卫在立法院会议上否认中日直接交涉，诡称：“中央对外政策，始终不变更原定方针，绝对不承认伪组织……此次华北方面，日代表有要求开始局部谈判之意见，华北当局电达中央请示办法，关于通车、通邮、设关各事，应否与之谈判，此刻尚未确定，外传会谈

之消息，颇多不实，绝非中日直接正式交涉。”

△　孔祥熙由赣到沪，下午召金融界贝淞荪、李铭、胡孟嘉、吴蕴斋、胡笔江、徐新六、钱新之、傅筱庵以及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等商筹款办法。会后，孔向记者宣称“剿匪”军费已有办法。

△　徐州各大商号合组之公裕银号因商业萧条影响，加之滥发无准备金之纸币，是日晚发生挤兑，随即倒闭。次晨，该埠春泉等六家银号同时发生挤兑。县府布告设公兑处，每人暂限兑换一元纸币。部分商店停业，全市商业处于瘫痪状态。

11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中日直接交涉的内容“显然不限止于国民党政府公开承认满蒙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以中国承认华北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帮助南京政府以金钱武器伸长他的反动势力，进行他的五次‘围剿’为直接的交换条件”。

△　上海市商会、航业同业公会等团体电行政院、外交部，指责与日本直接协议通车、通邮、设关“是直承认伪国、断送四省”，“是直将两年来民众一切牺牲尽付流水，其何以保国土系人心”。16日，汪精卫复电称：中央对外方针，“决以不损害主权为原则，希告各界勿滋疑念”。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宣告冈村此次来平，与中国当局商议讨伐抚宁土匪之善后处置及接收榆关附近地带之办法，“已告圆满解决”。翌日，冈村返抵长春，报告北平会谈经过。

△　陈铭枢、蒋光鼐由漳州到福州谒林森，林劝其打消发动反蒋事变，陈等未接受。翌日，林返京，陈等派黄琪翔赴港迎李济深到闽作最后决定。

△　刘湘电北平军分会称：“自赤匪陷绥定后，我第五路军即计划进攻，殊匪企图东下，进扰两开（开县、开江），竟以全力猛扑我第五路军，盖欲接通南江〔江南〕，以与贺匪联合，故连日不惜冒死来攻……自上月世日至本月歌日止战六昼夜，我军伤亡五六百人。”

11月12日　　黄绍竑、赵丕廉在百灵庙与云王、德王等首次会谈。德王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呈黄、赵。黄表示中央虽赞同自治，但只限于组设蒙古自治委员会或在中央另设边务部管辖一切，并劝其接受中央方案。德王等对“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表示不满，坚决要求成立自治政府，坚持自治范围除三盟外，还包括察、绥、宁省属之原有蒙地，并要求废察、绥两省，将治权交给自治政府。会谈无结果。

△　红七军团第十九、二十师上日起袭击临川附近浒湾。顾祝同令第四师驰援。是日，第四师在浒湾东南吴家岗地带与红军激战。13日晨，红军退守黄狮渡东北一带。

△　由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特务组织在上海实行全市大检举。是日及翌日，所谓“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暴徒先后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和良友图书公司捣毁，并向各影院发出警告信，不准上映田汉等编导之影片。14日，又捣毁承印《中国论坛》之勒佛尔印刷局。其他如联华影片公司、光华书局亦受“警告”。上海左翼文化界群众曾给予还击，将专售《社会新闻》、《社会主义月刊》等反动刊物之新光书店捣毁。

△　伪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南疆喀什陷后，马占仓、铁木耳、乌斯曼为争实权相互火并，铁为马枪杀，乌被和田王拘押。和田王之维吾尔族势力据回城（疏附），马占仓据汉城（疏勒），维兵攻汉城七月之久而未得。此时和田王联络缠回首领沙比提到达喀什，征得在阿克苏之和加尼牙孜同意，是日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和加尼牙孜任“总统”，沙比提任“国务总

理”，首都喀什。颁“建国纲领”30条，规定“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据回教教条而成立，谨遵万世不渝之《古兰经》所载条文命令以为准则”，反苏、反盛世才政权及汉人。起初，英国曾极力支持，后来认为这个傀儡希望不大，遂取消极态度。该“共和国”成立不久，派员往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印度等国要求承认而未逞。翌年2月，在新疆军阀混战中瓦解。

11月13日　　行政院将印有汉蒙合璧文字的布告派员交黄绍竑分发各盟旗。布告略称：中央政府对内蒙人民自治极愿扶植辅导，俾底于成，惟自治之先决条件尚未具备，倘若一旦实行高度自治，不过虚有其名；试行初步之自治，则不唯可免扞隔之弊，亦可辅助省政府之不及，而收合作之效。要求各王公、盟旗长官及地方人士与黄绍竑开诚磋商。同日，黄、赵与云王、德王在百灵庙续谈，仍无结果。

△　何应钦由平到津邀宴各界，靳云鹏、高凌霨、齐燮元、孙传芳、曹汝霖、陆宗舆等均出席。翌日，先后出席靳云鹏等及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宴会后返平。

△　国民政府以第八十师师长李思愬“调度无方”免职，遗缺由副师长陈明仁代理。

11月14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一、与日方交涉通车、通邮、设关事，送中政会处理；二、交通部部长朱家骅请拨1500万元整理国营招商局案，送全国经委会核办；三、准宋子文辞全国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及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常委职，遗缺以孔祥熙继任。

△　红军一、五军团各一部为策应浒湾附近战斗，突破见贤桥封锁线，进入佘家山、南源一带，将第四师包围。17日，陈诚调第五、七两纵队分向见贤桥、云盖山进攻红一军团，经一日战斗，红军主力向五都、神岗、党口等地撤退，第三师李玉堂部占云盖山。

△　周浑元率第五、六、九十六各师由硝石、洋墩一带分三路向

百顺、八都圩之线前进。午，第五师在周家圩附近遭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伏击。俟第九十六师赶到，红军退资溪。

△ 蒋介石电汪精卫、孔祥熙，催拨“剿匪”善后治标费180万元；又电豫、鄂、皖、赣、苏、浙六省严催各属田赋。

△ 国民政府任命唐云山为第九十三师师长。

11月15日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行政院有关部所拟之通车、通邮、设关等方案，同意交付审查。又通过《修正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17日国府明令公布。

△ 刘湘下总攻令，要求六路军齐向红军占领区推进。

△ 英使蓝普森调任驻埃及总督，北平各界200余人茶会送别。

△ 台湾花莲港厅里垄支厅大竹区少数民族40余人反抗日本压迫，杀死日警，夺走枪弹，逃往深山。日警派大队往“剿”，捕走18人。民众闻风响应抗日。宣称若见日军则杀尽。

11月16日 罗文幹由京赴赣向蒋介石报告出巡新疆详情及在京与各中委晤商处理新疆问题意见。

△ 何成濬、刘镇华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川鄂湘边及豫鄂皖边区“剿匪”情形。

△ 财政部为筹“剿匪”军费，以关税库券500万元，向上海钱业抵借现款250万元。是日，上海钱业公会全体会员临时大会决定勉认100万元，由65家钱庄每家摊认一万元，余由钱业准备库垫拨。20日，如数缴付财政部。23日，孔祥熙函钱业公会，要求再借150万，遭拒绝。

△ 长沙市各业代表秘组反对加派救国库券临时办公处，推崔伯

鸿等11人负责，决定在省府捉人勒派时罢市。次日，市长何元文向何键告密，18日，省警备司令部遵何令将崔伯鸿等七人捕解萍乡。

△　第六十三军冯占海部宫长海旅自蔚县移防怀来，途中300余人哗变，冯派部围剿，宫旅伤亡200余人。冯发现该军郝旅亦有哗变迹象，遂将其缴械，旅长被拘押。

△　上海天一保险公司成立，由金融界王伯元、秦润卿、钱新之等人创办，资本500万元，先收足250万元。选王伯元、秦润卿、钱新之等为董事，孙鹤皋等人为监察。

11月17日　　内蒙自治谈判因黄绍竑对德王派力量进行分化瓦解，德王处境孤立。是日，黄将德王方案退还，并扬言翌日返绥，以示谈判破裂。云王挽班禅出面疏通，表示愿在察、绥两省省辖范围内各设自治机关方案的基础上与黄续商，并于晚间向黄递交自治办法11条，规定“内蒙设统一最高自治机关，定名为内蒙自治政府”，黄仍不同意。

△　立法院通过洋麦面粉进口征税原则，税率最高额麦为1.25，粉为2.5（海关金元），税率条文交财政部草拟。

11月18日　　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由港到福州，即日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邓世增、沈光汉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政纲、政策以及军事、财政等问题。决定20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有关宣言、政纲草案；决定派李超恒、叶少泉分别接收福州、厦门两地中央银行，以防南京国民党政府断绝财政。

△　内蒙自治谈判经班禅等向德王劝说，遂改为设内蒙第一、二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府间设联席会议。黄绍竑认为基本符合中央原则，表示允转呈中央鉴核。翌日，黄、赵一行返归绥。

△　上海市商会通电中央、省市政府、党部，要求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立定方针，确立“靖外安内”原则，靖外“应先认清利害，勿以一隅之幸全误将来之大计”；安内“必须痛自反省，各就其军事政治职守所及，实践躬行”。

△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沪开首次常委会，汪精卫、孙科出席。财政部长孔祥熙、实业部长陈公博、交通部长朱家骅列席。会议决定聘蒋介石、孔祥熙为常委。

△　广州受闽局影响，广东省银行纸币币值猛跌至八成，因商店拒用，发生挤兑。该行共发纸币2700余万，准备金仅500万，难以应付。同日财政厅决定除一元、五元纸币照兑外，10元纸币停兑。同时，港币市价猛涨，广州银业发生恐慌。

△　京沪、沪杭甬两路员工捐献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命名典礼。

11月19日　蒋介石于日前电陈铭枢，诡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侮”，劝其“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希望和衷共济，放弃发动福建事变。是日，陈复电斥责蒋仍坚持“剿匪”惧日政策，表示发动福建事变“决非他人挑拨所能离间，亦非一时误会所能隔阂”，“所见不同，自唯有各行其是”，并指出：蒋“年来所为者，果何有于民族？果何有于民生？”“公自信有谋国之忠诚，何不于国民共怒之前，自决其进退！”

△　第三党首领黄琪翔由厦门到福州，南北各省代表亦均先后到达，筹备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同日，黄强就漳厦警备司令职。福州戒严，禁止无故搬运物品出境。

△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电桂省李宗仁、白崇禧，要求贯彻历来主张，及时响应发动反蒋事变，“一致动员，兴讨逆之师”。

△　晨，陈济棠召萧佛成、邹鲁、缪培南、余汉谋、林云陔等人会商闽事，决定对闽局暂取静观态度。

△　陈诚令第七纵队主力进占神岗、党口，七纵派第四军全部协同第九师前往。是晨，第九师第二十六旅在大雄关与红军一、五军团之一部战斗。第五十一团团长谢辅三被打伤，第五十二团阵地被红军突破。陈诚遂令第二师增援，第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策应。翌日，陈诚部第七纵队占党口，红军撤退。

11月20日　　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是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推举黄琪翔、徐名鸿等17人组成主席团，黄琪翔为总主席。各省代表相继演说后，黄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中国为中华全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人民有劳动之权利义务；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宣言指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大会通过与《宣言》基本要点相同之12项决议案，并通过安徽、福建代表提议，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旋行升旗礼，新国旗为上红下蓝二横条组成，中嵌黄色五角星一颗。礼成后出发游行。

△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告民众书》，揭露蒋介石政府的黑暗统治，指出“南京国民党系统与南京政府现为中国人民经济发展与彻底民主政权实现的最大障碍物”，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中正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

权”。

△　晚8时，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首都设福州，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方未到，后改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何公敢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任主席，定22日举行成立典礼。

△　蔡廷锴密令马尾要塞司令云应霖、漳厦警备司令黄强分别派部队接收马尾、厦门两要塞司令部、马尾海军造船厂、厦门海军航空处、长门炮台、长门海军练习营、弹药库等。晚，马江要塞司令李孟斌率“江贞”、“江元”、“楚观”三舰脱逃。

△　国民党中政会为“闽变”通电各省、市政府，着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克日敉平”。晚，汪精卫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言“中央于最短时期内，即可将此种异动消灭”。

△　外交部电示驻外各使馆向各国政府解释“闽变”，称闽事分子复杂，有所谓国家主义、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均纠合一起，意见纷歧，绝难成事。中央正妥筹办法，期消弭于无形。

△　蒋介石电国民政府，要求对“闽变”一面用政治解决，一面调军严防浙、粤边境。

△　晚，广州因“闽变”宣告戒严。

△　上海证券市场因“闽变”大起波动。各种证券跌一元左右。翌日，大户纷纷抛售，多者跌2.3元。公债亦出现新低价。

11月21日　　陈铭枢、李济深等联名电粤、桂胡汉民、陈济棠、萧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促其合作讨蒋。电云：“惟救国必先讨贼，而讨贼必先西南实行一致实力行动，故弟等再三矢推戴之诚，共谋救国之举。”“今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

期发动……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

△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李章达、徐谦、戴戟等联名通电，宣告自11月20日脱离国民党。李、陈等退党后，由陈发起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织生产人民党（简称生产党），由陈铭枢担任总书记。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令饬各地方政府及各驻防军队，对“闽变”严加防范，“务使叛乱早日敉平”。同日，又电令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到京商闽局。晚，张由汉启程。孙科亦由沪到京。

△　蒋介石将“闽变”情况连电黄郛，是日，黄电蒋献策，认为闽方提出取消党治、联络共军两点“最宜注意”，应急筹应付办法，并建议：一、明白宣布宪政实施时期，使闽方取消党治口号失其意义；二、揭穿闽方联共事实，力予宣传，“使国人嫌恶而共弃之”；三、对冯玉祥“釜底抽薪，从速依照前议，由中央发表其林垦督办名义，如其接受，则闽方定滋疑虑，在彼则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在我或可以收分化之功”。

△　国民党南京、湖北、汉口等省、市党部，平汉、武长铁路等四党部及南京市商会等团体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陈铭枢等人，解散人民政府，并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反对“闽变”。

△　驻闽第五十八师师长刘和鼎自建宁电国民政府，表示服从中央。

△　日外务省电训驻华公使有吉明及驻福州总领事守屋和郎称：如新政府采非友谊的排日行动，以确立关税自主权及撤废不平等条约为名，威胁日侨之生命财产，防卫上决采适当处置。同日，日借口保侨，派驱逐舰六艘由马公港分驶福州、厦门海面威胁。

△　全国经济委员会续聘外籍顾问国联财政股长英人沙而泰，前

国联秘书英人莫纳及前国联秘书长之子德鲁蒙等到沪，随即访谒宋子文。

△　晚，广州市银行受省行影响，发生挤兑，广州当局令官民一律收用一元、五元纸币，违者严惩。先施、新新等大商号为避免收用纸币，闭门停业。

11月22日　　上午，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主席李济深及委员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11人宣誓就职。

△　下午，福建人民政府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一、发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二、政府机构先设军事、经济、文化三委员会及财政、外交二部，推举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兼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余心清代）任经济委员会主席，陈友仁兼任外交部长，蒋光鼐兼任财政部长；三、建立军事委员会，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邓世增、徐景唐、沈光汉、毛维寿、谭启秀、区寿年、张炎、李章达为委员，李济深任主席，戴戟兼任参谋团主任；四、任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萨镇冰为政府高等顾问；五、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此外还决定通令12月1日庆祝革命政府成立，赦免一切政治犯；定11月20日为革命政府纪念日。

△　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宣布成立。宣布新政府五项使命：“（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卖国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号召全国人民及各政治集团与各军队“一致奋起，拥护革命政府，与蒋中正御用之国民党卖国政府作殊死战”。

△　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人民政纲——最低纲领18条，大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制裁、没收有违害中华民族利益之外资企业；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实行外贸统制；厉行关税自主；开放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确认民族自决；确定人民身体、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实行普选；废止一切苛捐杂税；耕者有其田，计口授田；严禁高利贷；取缔奸商；改良农工生活；厉行教育普及；实行征兵制等。

△　蒋介石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表示“决不以闽变牵动剿匪之军事”，号召“十九路军将士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毋见挠于乱命”。25、28日，多次派机往福州散发。

△　胡汉民、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复李济深、陈铭枢，对李、陈等“揭橥讨贼，期伸正义于天下”表示“至所同情”，但对其“宣言脱离中国国民党，废止青天白日旗”，“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则认为是“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表示“不忍苟同”，要求李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通电海内外党部，表示本三民主义及国家民众立场，对“闽变”“决不苟同附和”。

△　财政部停拨闽省协饷，将此款项转拨给南路“剿匪”部队。

△　第一集团军军事会议决定对闽采取“自固边圉”政策，令独一师黄任寰部由闽省上杭、武平等地撤回粤边大埔一带固防。陈济棠决定停发粤对闽协饷补助。晚，陈济棠赴北江视察部队。

△　国民党上海、浙江、山东及华北各省、市党部，江宁实验县党部，浙江省政府，南京各界抗日会，上海市总工会、农会、大学联以及一些同业公会通电反对“闽变”。

△　驻福州日总领事守屋和郎电日外务省报告是日各国领事集议对福建人民政府态度，决定暂采取不干涉主义，并称新政府于今尚无反日态度，但仍继续监视，如有侵犯日本权益，则将采取断然处置。

△　国民党中政会派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贺耀组为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委员，指定朱培德为常务委员。25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蒋介石以川军“剿匪”多持观望，日前曾派杨德源、陈醒亚等七人为四川“剿匪”督察专员入川“督剿”。是日，再电刘湘称：“如再观望不进，决以军法从事。”同时又委程泽润为军事特派员常川驻川“督剿”。

△　北平军分会讨论华北军饷，何应钦称：经上次裁减后尚不敷百余万，冀、察两省协饷未能解交，致华北军饷益感困难，要求于各军饷项中商议缩减办法。讨论良久无结果。

△　粤省召开经济会议，拟向中央借款300万，向港商借款700万，以维持纸币信用，解救金融危机。

△　上海电力公司工人罢工后，经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惇及华董顾问杜月笙等“调解”，订出折衷方案：未罢工前工资一律如数发给，罢工期间工资由公司发给一个月，工人所提其他条件，俟复工后由杜等继续与公司谈判解决。工人被迫于是日起复工。

11月23日　　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会议规程》、《最高法院组织大纲》。

△　福建人民政府发布对外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内亲日、亲英美及依赖国联各派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罪恶；声明推翻蒋介石政权为中国独立与救亡所必需；警告列强勿借款与南京政府。

△　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由蔡廷锴领衔通电拥护人民革命政府。

△　福州工联会通电拥护人民革命政府，并请求人民革命政府克日出师，大张挞伐，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南京政府。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提请监察委员会追认，并交政府拿办。定12月20日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　蒋介石为福建事变发表《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声称对“闽变”“深信最短期间，必能廓清一切，使此复杂矛盾之集团粉碎瓦解”，要求“剿匪”部队“一本原定之计划，照常进击，不特不可因闽变而稍生疑虑，且应因闽变而益加淬励”。

△　陈济棠与何键在乐昌会商，议定由湘省派重兵至赣南“剿匪”，使粤军专力对付闽局。同日，陈乘飞机至赣州与蒋介石商应付闽局办法。翌日，陈返广州。当晚，召缪培南、余汉谋、李扬敬、李汉魂、邓龙光等会议，报告入赣谒蒋经过，并决定固防粤边等计划。

△　粤第三军李扬敬部开始由赣南回防兴宁、梅县。

△　国民党四川、北平等省、市党部，香港、澳门党部以及杨虎城、邵力子、龙云等通电反对“闽变”。

△　红军一、五军团各一部袭击江西大雄关国民党军阵地，经一日激战，红军撤退。

△　湘赣军区红军之一部在湖南攸县分水坳附近击溃湘军第十六师彭位仁部杜旅。

11月24日　　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邓世增为副指挥，沈光汉为第一军军长，毛维寿为第二军军长，区寿年为第三军军

长，张炎为第四军军长，谭启秀为第五军军长，刘占雄、庞成、张君嵩、谢琼生、司徒非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师师长，赵一肩为第七师师长，阮宝洪为第四十九师师长，邓志才为第六十师师长，梁世骥为第六十一师师长，云应霖为第七十八师师长；原福建绥靖公署结束，改作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漳州、延平两地设行营，由谢东山、邓世增分任主任；并决定即日出师讨蒋。同日，沈光汉等五军长通电宣布自动脱离国民党。

△　漳州各界民众五万余人举行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通过全国一致讨伐蒋介石等10项提案。

△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为“闽变”发表《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党员同志书》，声称“本孙总理至大至刚之精神，与叛徒为不屈不挠之奋斗”。次日，又发《告福建同胞同志书》。

△　海军部电令驻闽、浙各舰严密封锁闽江要口。海军主力已集中三都澳。粤、赣、浙三省与闽交界各隘口均已增兵设防。

△　南昌行营为掩护入闽各军前进，遮断福建人民军与红军之联络，重订北路军“剿匪”计划，第一路顾祝同约八个师仍向白沙、龙岩推进；第二路蒋鼎文约六个师集中黄狮渡，准备入闽。第三路陈诚13个师集结黎川，向闽边进展。

△　中国天文学会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举行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同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举行大礼弥撒。

△　滦榆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临榆县长尹寿松与日武官柴山同抵榆关，与日驻榆第十四旅团参谋远藤商谈接收榆关问题。

△　南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金树仁案。

△　前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在北平病逝。

11月25日　福建人民政府任余心清、蒋光鼐、章伯钧等17人为经济委员会委员；决定设置农工幸福委员会，以徐谦任主席；确定官员俸额标准，最高不超过200元。

△　蔡廷锴及各军军长就职，会商部队统辖、防务配置及官兵饷额等问题。确定第一军辖第一师、第六十师；第二军辖第二师、第六十一师；第三军辖第三师、第七十八师；第四军辖第四师、第四十九师；第五军辖第五师、第七师；以翁照垣任第六军军长，辖第六师、第八师，以洪文德、余承学分任第六、八两师师长；确定各部队将官薪俸不得超过160元，士兵饷额酌予提高。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以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乘内忧外患国难严重之时，背叛民国，残害人民，着即严行拿办”。

△　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电蒋介石、汪精卫，表示不予赞成闽省行动。

△　华北军政首领何应钦、韩复榘、宋哲元、于学忠、万福麟、商震、徐永昌、傅作义、王树常、庞炳勋、孙殿英、何柱国、王以哲、徐庭瑶、鲍文樾、高桂滋等电国民党中央，反对“闽变”。

△　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将领何成濬、徐源泉、孙连仲、梁冠英、陈继承、上官云相、萧之楚等27人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对闽省明令讨伐。

△　刘文龙、盛世才通电，以马仲英“未退出吐、鄯一步”，宣布出兵“重张挞伐”。

11月26日　国民党西南当局驻京代表杨德昭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闽变”后西南各中委态度、陈济棠应付方针及东北江、潮汕等地布防情况。同日，桂省代表黄建平到京，旋赴赣谒蒋，蒋嘱转告李宗

仁、白崇禧要“以大局为重”。

△ 胡汉民电复何应钦，指责南京政府两年来的倒行逆施，“掌兵者威权愈大，言莫予违；执政者自营其私，变本加厉。由媚外而公然卖国，由专制而任意杀人……”表示拒绝应其邀入京。

△ 杭（州）徽（州）公路竣工通车。该路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督造之七省公路干线之一，全长230公里。

△ 晚8时55分，伪满由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第三号国际列车在扎兰屯附近被义军炸毁，火车出轨颠覆，死伤日护路军10余人。

11月27日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指出“闽变”发生，“推寻原始，不能不深咎于独裁政治之罪深恶极”，“国事至此，军政当局，应知乱源不宜再深，不妨一避，使全党全国得以恢复自由，以公同解决当前一切之纠纷，重定今后之国策。舍此之外，实无弭乱救亡之途”。

△ 福建人民政府任命陈铭枢兼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

△ 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邦自永安防次电贺蔡廷锴及沈光汉等五军长就任新职，并表示愿率所部静候指挥。福建人民政府旋任卢为第十五军军长。卢虽接受任命，但按兵不动，后在蒋介石军事进攻时倒戈。

△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名电复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等，劝其“宣布讨蒋，另组政府”。提出“虽政见不尽相同，军事政治之合作，无不可商量”。

△ 国民党中宣会发《告十九路军将士书》，要求“及早为谋，速图自拔”，脱离福建人民政府。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张云逸和福

建人民政府代表陈小航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依据《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具体划定闽西上杭、长乐、永定等地区边界。

△　蒋介石电北平军分会称："自上月开始五次围剿以来，一战于硝石、资溪桥，二战于浒湾，三战于藤田，四战于大雄关，五战于神岗、党口，无役不胜。"又称：江西自吉安、吉水、永丰、乐安以迄黎川、金溪沿线以北之碉堡，均已筑成。

△　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七十九号发表《福建的大变局》一文，认为闽局"只是一群同床异梦的军人政客用骤然的手段临时凑合成一个反国民党的革命局面"；"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不会得着大多数人的同情"。12月18日陈铭枢发表谈话，称胡是"以懒惰庸俗的方法来分析革命，在现状下寻求改良方法。是马粪上装金，与〔于〕国家社会毫无利益"。

△　河北蓟县民众教育馆长孟新周等五人被县团警以"共党"罪名逮捕。

11月28日　　福建人民政府任命陈铭枢、胡秋原、欧阳予倩等14人为文化委员会委员。

△　蒋介石令航空署全部飞机俟命出发。海军部宣布本日起检查进出口船只。同日，西南当局派"海圻"、"海琛"两舰开汕头拱卫。

△　国民党中委马超俊到南昌与蒋介石商洽迎胡汉民等人入京问题。同日，上海保安处长杨虎到南昌向蒋报告上海治安。

△　行政院会议决定硫酸铔厂准由商人承办。该厂原与英商签合办草约，因英商条件太苛，未订正式合同，草约期满作废。该厂后由天津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承办，资本1000万元，厂址设南京，于1937年2月开工。

△　绥远当局依照黄绍竑旨意，在归绥举行汉蒙联欢大会，并举行阅兵礼，各盟旗王公、黄绍竑、赵丕廉、傅作义等均参加。

△　日人杉村阳太郎在华活动两个多月，是日由台湾返抵神户，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华南及南洋为日本民族之重要发展地，台湾为日本之南进根据地。又称：今日中国之最大问题为“共匪”问题，亲日派力量甚弱，我等对于此等亲日之人，应尽力援助。

11月29日　　南昌行营特设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任赵观涛为司令，统辖该区“剿匪”部队及督促党政机关“清剿”。

△　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奉命由苏入浙增防，是日师长孙元良到杭与浙省府主席鲁涤平、保安处长俞济时商防务。翌日，孙等赴前方视察。

△　粤军黄任寰师撤出上杭、永定等地，闽人民革命军前往接防。

△　闽浙赣红军方志敏部日前在上饶罗桥、枫林头消灭第八十师一个营。是日，复在铅山县河口附近歼第二十一师两个团。

△　闽变发生后，军警机关加紧在各地搜捕共产党人。是日，驻平中央宪兵第三团将上月下旬拘捕之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高洁明等62名解京。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增加卷烟、水泥、火柴统税税率，由财政部参照市面情形暂行试办。

△　杉村阳太郎向外相广田报告在华视察经过，并对今后对华政策提出建议：一、中国中央政府之失势，致地方政权有扩张之机运，对华政策应一变向来之单一的而为多面的；二、中国民众关于满洲问题“已认识抗日政策之无效”，应迅速确立1935年之非常时对策，届时免被中国所困；三、确保中日提携计，由有力者至华与华方交换意

见。同日，广田召开对华问题官民恳谈会，声言以文化工作打开中日关系。

11月30日　　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转告各该国政府勿对“闽变”予以任何接济。

△　陈济棠召各军事将领商军事，决定仍以巩固粤防治安为原则。同日，李汉魂偕湘代表张沛乾赴桂，与李宗仁、白崇禧商湘、粤、桂三省军事联络问题。

△　福建人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政治及普通刑事等犯，凡系本月20日以前之行为者，概予赦免。

△　李烈钧致函蒋介石，望对“闽变”和平解决。

△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为筹措饷糈，发行“剿匪”奖券，券额定五万张，每张分10条，售大洋五元。

△　河南豫丰纱厂自7月间停工后，8月劳资双方曾达成发给工人维持费的协议，但资方拒不执行，工人多次交涉无效。近因天气严寒，工人无衣无食，被迫于是日上午赴厂抬纱变卖，为驻军所阻，旋往专署请愿。

是月　陕甘红军刘志丹、王太吉部由陇东各县进展至陕北，并在甘肃合水（庆阳县属）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

△　贵州军阀继续混战，犹国才之车鸣翼部进占镇远，前锋达黄平。同时，云南龙云所派援犹之滇军到达毕节，贵阳震动。王家烈率部东下，在镇远围攻车部七日，迫使车部撤离镇远。是役给镇远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　藏军数月来不断侵扰康边。本月又由昌都向金沙江进兵，经川军、青军进击，大败于竹巴笼，藏军被迫后撤。

△　日本神户华侨成立南洋输出协会。

12月

12月1日　福建泉州各界召开庆祝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空军飞机三架向会场投弹11枚，死伤群众20余人。同日，厦门各界亦召开庆祝大会，通过拥护《人民权利宣言》及讨伐蒋介石等提案多件，并致电林森、陈绍宽告其勿作蒋介石傀儡。

△　废止内战大同盟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要求对“闽变”处置“一秉政治解决初衷，设法斡旋，免祸生灵”；同时电蒋光鼐、蔡廷锴，劝其“听候政治解决，毋为亲者痛仇者快”。

△　日使有吉明抵京访汪精卫，表示：一、日政府对“闽变”不干涉，无援助之意；二、望中国政府深切注意，勿危及居闽日侨生命财产。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公务员惩戒法》，同日起施行。

△　宋哲元委汤玉麟为察省府总参议。

△　湖南省财政厅为抵补“剿匪”军费垫款，决定是日起加征产销税二成，一年为限。嗣因商人反对，未能如期开征。

12月2日　国民政府令准罗文幹辞外交部长职。

△　国民政府公布《颁给勋章条例》。

△　孙科由京到沪，谈闽事用政治解决已绝不可能。

△　上海召开讨闽大会，到党政军各界十万人，通电全国一致声讨福建人民政府，并电请中央从速讨伐。

△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继续搜捕共产党人，是日公安局在北平师范大学、安徽中学附小等处拘捕共产党员蔡时济等九人。

△　北平军分会以华北各军军饷积欠达四个月之久，派万福麟等赴赣向蒋介石请求拨发。是日，万抵赣，蒋答允连同服装费、杂费等项由中央一次拨发75万元。23日，孔祥熙对报界称，前欠当逐渐支付，但非一时所能办。

12月3日　福建人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号召认清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恶，分别革命的战争与内战，共同担负中国革命的责任，在人民革命政府旗帜指导下，联合广大农工群众，对帝国主义者和出卖民族利益者作殊死斗争。

△　财政部长孔祥熙拟具统一国库四项办法，呈行政院审核。办法规定中央各部、会及其所属营业机关收入款、盈余款、非营业之经费款等均解交国库核收。

△　陈济棠电呈中央要求补助军费，如中央无法筹措，则援华北前例发行公债2000万元，以粤海关收入为还本付息担保。

△　藏军千余人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与川军冲突。是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电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静候调解。达赖电复表示遵令饬前方制止军事行动。

△　天津市公安局特务队将天津电车工会理事张广兴、秘书陶子明、扶轮中学教员阎兴华等以“共党”嫌疑逮捕。

△　中法联谊会在上海成立。

12月4日　福建人民政府发布命令阐明工商政策，内称：“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之初，即有最大决心发展人民生产，对于私营工商事业尽力扶植，于人民私人财力所难兴办之事业亦当竭力举办”；“如有奸宄不法，借端扰乱，挑拨离间，致使社会不安者”，“决不宽贷”。

△　闽高等法院遵福建人民政府令释放“政治犯”38人。翌日，又释56人。

△　孙科在沪语“中央社”记者称：第十九路军能战者不过三师，中央军八万集中浙边，粤军五个师集中闽边，“讨伐”开始，一个月可解决。

△　国民党“剿匪”军北路将领刘峙、顾祝同、陈诚、蒋鼎文、赵观涛、薛岳等电请蒋介石对闽“明张挞伐”。

△　马来亚华侨组织中华改进社致电福建人民政府表示支持，越南华侨救国联合会、中国致公堂总部亦先后致电表示拥护。

△　北平军分会经理监察委员会讨论华北军饷发放办法。何应钦提议，1934年1月起改每月发放，按400万元平均支配，下级官佐、士兵饷额按六折发放。9日，该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　国民政府任郭思演为第九十九师师长。

△　英使蓝普森由平乘机到赣向蒋介石辞行，翌日离赣到京。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青海省增设囊谦县。

12月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自从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到现在，它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不是革命的。”“如若停止于目前状态……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号召福建广大工农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农会、反日会、义勇军，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武装他们，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废除对日不平等条约，没收日资本家企业与财产；逮捕卖国贼及汉奸，开展罢工、抗租抗税，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与红

军联合一致去进攻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最后指出："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

△ 财政部定是日起增加卷烟、火柴、水泥统税。6日，上海各华商卷烟公司开会反对无条件加税，并要求财政部于加税后发给津贴。

12月6日 福建人民政府布告通缉蒋介石及汪精卫、何应钦、杨永泰、黄郛、张群、熊式辉等，列举蒋等卖国殃民罪恶，宣布凡能捕杀蒋、汪、何、黄等诸逆及破获蓝衣社党徒者，均属拥护人民革命，自有重赏；其有匿藏不报者，即以通逆论罪。

△ 日、美舰各一艘开抵厦门"护侨"。8日，日舰一艘到厦，两艘到马江。11日，英驱逐舰、日巡洋舰各一艘抵福州。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此后凡有泄露外交或捏造谣言致妨害国家政策者，当由常委查究，严厉处置。"

△ 无线电发明家、意大利人马可尼为考察各国使用无线电情形，经日本、朝鲜来华，是日由平到京，分谒林森、汪精卫。翌日到沪，8日上海各学术团体举行茶会欢迎。12日离沪回国。

△ 英使蓝普森向国府主席林森呈御任国书。12日离沪返国。

12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派张继、马超俊、陈肇英、王陆一以"私人资格"赴港、粤，敦促西南各中委到京出席四中全会，共商国是，并说服粤、桂支持中央对闽军事行动。9日，张等由沪乘轮赴港。

△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中执委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业经永远开除党籍，遗缺遵照总章规定，以候补执委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递补。"

△ 苏、浙、皖、豫、赣、湘、鄂、沪八省、市政府及粮商代表

在沪举行粮食会议，按10月八省、市会议所作决议，设立中国粮食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粮运局），推顾馨一、吴恒如为正副筹备主任，办理设置堆栈、运销粮食业务。设总公司于上海，各省、市设分机构，资本100万元，由各省、市粮商认付，另由中央拨借100万元作辅助金。

△　监察委员乐景涛弹劾北平市长袁良调验区长梁家义致死，经监委杨功亮等审查同意，是日监察院以袁良滥用职权，草菅人命，呈国府移送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惩戒。

12月8日　何键呈准军事委员会任刘膺古为“剿匪”军西路第二纵队司令，是日刘在萍乡就职；14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福建泉州因警察殴打瓦窑工人，激起群众愤怒，与警察搏斗，被警察捕走12人。群众500余人拥到县府请愿，要求拘办警察所长，惩办肇事者，释放被捕群众，赔偿医药费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情事。下午被捕群众释出。晚，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议决呈请总工会向当局提出严重交涉。

12月9日　川军“剿匪”部队除刘湘部在东线行动外，其余各路因迭遭红军打击，心有余悸，加之内部矛盾重重，仍按兵不动。是日，蒋介石再电令刘湘转促邓锡侯、田颂尧两部迅速行动。

△　浙江省制定民国二十二年追缴民欠旧赋办法，规定民国十六至二十年止均为旧赋，三个月内追缴，顽抗者拘捕。办事人员及县、局长等追完各年旧赋总额三成以上者记大功，七成以上优先拔委，允县、局长从征收中提留作办事人员奖金，反之记过撤职。是日，孔祥熙将此办法报请行政院备案。

12月10日　汪精卫由京到沪，分访孔祥熙、宋子文商时局。晚，汪答记者称：闽事最令人感困难者，在其联共一点，使“剿匪”包围之已成局面转变，其影响实大。又称：西南有贤路不妨一让之语，

本人之意，当此“剿匪”紧急之际，军事当局决不能让开。翌日，汪返京。

△　蒋介石电湖北省教育厅及武汉、中华两大学称：“据报自闽变发生，反动分子潜伏都市，伺机蠢动，利用青年，为其工具”，要求会同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严密侦察，随时拿办。

△　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关于福建事变宣传大纲》，称“福建事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一派”。

△　盛世才将10月间在达坂失利责任归咎于郑润成、杨跃钧、应占斌等东北义勇军将领，诬为“散军纪，谋叛乱”，是日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郑、杨、应逮捕。嗣又将其他东北义勇军将领苏国、徐国光、姚华亭等14人逮捕。13日，以“图谋扰乱边防”罪名分别判处徒刑。郑、杨于1935年被勒死，其他各人不到一年均死狱中。

12月11日　　第三党以“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人民日报》刊登《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声明“解散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之原有组织，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运动”。

△　汪精卫借镇压广州起义六周年著《广州共祸纪念》一文攻击胡汉民、李济深等人，略谓：“当日以共党工具厚诬同志，杀人如麻之军事首领，今乃公开的在福建与共匪妥协，向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进攻。而当日以共党工具厚诬同志，并利用军事首领之刀斧以诛锄异己之中央委员，今乃对于福建事变有如隔岸观火，不特不思扑灭，反欲借其燎原之势以驱异己。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惟有同志一致奋发，贯彻初衷，向反革命者之联合战线悉力进攻。”

△　张继等一行抵港，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南来目的，系宣达中央意志，与南中诸同志对“闽变”商谈纠正办法，请南中各同志入京出席四中全会。记者问：“闽变”能否调和？张答：陈铭枢、李济深等改换国旗，变更国体，不但叛党，且已叛国，尚有何调和可言。下

午，张等往谒胡汉民。

△　红军三、五、七军团各一部由黎川熊村进至德胜关附近。陈诚为切断红军与闽方联络，是日上午在黎川召第五、第八两纵队团长以上军官会议，部署向红军进攻，谋夺取熊村及德胜关等地。下午5时下达作战命令。

△　红军第一军团第一、二两师向宜黄南之五都进攻，与第九十六师在制高点多次拉锯搏斗。陈诚令第四十三、七十九两师及空军一队增援，红军遂向东陂、黄陂撤退。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调充第六师团长，遗缺由梅津美治郎接任。是晚，中村向官兵话别。

12月12日　　红军三军团及五军团第十三师、七军团第三十四师在黎川东南之团村伏击第六师、第九十六师及总预备队第五师等部，伤第九十六师团长二人，毙第五师团长一人，突破贯前山阵地，进至三都附近。陈诚令第十一师即日由黎川向三都推进，第十四、第九十六两师向团村附近红军右翼包围夹击。翌日占团村，红军向德胜关方向之东山、熊村转移。

△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并指定蒋介石、孔祥熙为常务委员。

△　日关东军为总揽对中国东北军事指挥与经济统制，由特务部发起改组“满铁”，与外务、拓务省发生争执。是日，参谋长小矶与“满铁”副总裁八田在长春商定改组方案，确定要旨八点，将“满铁”所属铁路、煤矿、石油、采金等重要产业建立支会社，脱离拓务省之监督，直接由陆军大臣或内务总理大臣监督，将“满铁”经济调查会并于关东军特务部，成为经济参谋部，为监督机关之中枢。

12月13日　　福建人民政府决定将福建划分为四省，任命各省

长、副省长：闽海省，辖闽侯、长乐等15县，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延建省，辖南平、沙县等18县，省长萨镇冰（未就），副省长郭冠杰；兴泉省，辖莆田、晋江等11县，省长戴戟（未就，由副省长代），副省长陈公培；龙漳省，辖龙岩、漳浦等12县，省长许友超（未就，由副省长代），副省长徐名鸿；另任黄强暂代厦门市长。16日，又决定各省省会，闽海省设闽侯，延建省设延平，兴泉省设晋江，龙漳省设龙溪。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处分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决议称："军委会委员陈铭枢，训练总监兼军委会第一厅主任、中央军校校委、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李济深，驻闽绥靖主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前敌总指挥、第十九军军长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背叛民国，罪恶昭著，先行明令将该逆等本兼各职褫革"。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国民党中央决定处理康、藏纠纷办法三项：一、令达赖代表贡觉仲尼再电达赖，切实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大青、青柯两寺喇嘛及甘孜等防地问题，应候中央秉公处理，不得自由行动；二、为巩固西防起见，对刘文辉驻扎西康边境军队之饷械等，饬令刘湘酌予接济；三、令青海省府主席马麟加派部队屯驻金沙江上游玉树一带，与川康边防军切实联络，以固西防。

△　张继等一行由港抵穗，翌日列席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联席会议，与陈济棠、林云陔、邹鲁等商宁、粤团结，解决"闽变"办法，促西南中委出席四中全会。西南各中委表示无意到宁出席。

△　第四师邢震南部占资溪，红军向闽省光泽撤退。

△　上海公安局加紧搜捕共产党员。是日，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将"打狗团"成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张德新、董纪全五人以所谓"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日，中华海员总会组织部

长、共产党员李爱德在虹口被捕。

△　天津北洋、丹华、荣昌等六家火柴厂经理向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请愿，要求缓增火柴统税。

12月14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西南中委拒绝到宁出席四中全会，决定全会展期至明年1月20日举行，并电张继等人“在粤从容接洽”。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闽省党务整理办法：一、推林森、杨树庄、方声涛、丁超五、张炎、曾仲鸣、戴愧生为党务审核委员；二、就审核委员中推定特派员，赴闽执行省党部职权，俟军事结束，再召集省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省党部；三、原派省代表大会筹备员蒋光鼐撤销。

△　陈诚令第六师、第六十七师向东山进犯，第九十六师向熊村进犯，是日占东山。陈诚亲临东山督战，并下达以占领德胜关与红军主力作战为目的之作战令。

△　英国政府为支持英采矿公司在云南西南边境班况所开银矿向班洪（今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扩展，是日派员潜入该地，勾结当地土司进行秘密勘测活动。

△　民孚商业储蓄银行在沪开业，资本50万元，闵瑞芝任董事长，刘祝三任经理。

△　上海百乐门大饭店落成。

12月15日　　胡汉民发表对时局宣言，表示：“如宁方不能放弃其独裁之政策，闽方不能痛改叛党联共谬举，则无间宁、闽，不仅为本党之叛徒，亦且为国人之公敌”；并提出八项主张：一、遵照总理遗教，力行三民主义；二、消灭蒋介石独裁统治，组织真能代表国家人民利益之政府；三、新政府对外必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保障国家独立，对内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自由，依《建国大

纲》，实行地方自治；四、防止军阀统治复活，凡带兵者，绝对不能干预政事；五、军权操于政府，全国军队统一编制，分负抗日、“剿匪”、戍边之责，撤废军事委员会；六、中央与地方实行均权制度；七、培植农村，开发交通，扩展工商业，厉行关税自主，绝对公开财政，废止苛捐杂税。南京统治之公债政策，误国害民，尤当彻底制止；八、政府用人以选贤任能为原则。

△　日伪军千余人由装甲车配合进犯察边沽源东南喜峰砦等地，刘桂堂等部撤集赤城。翌日，日武官柴山诡称，系日第八师团一营从事“剿匪”，决不越热河省境。17日，宋哲元电示刘桂堂、黄守中、赵登禹、董福亭等“妥维防地治安，避免与日伪误会”，“已由平当局交涉令其后撤，在此期间驻军切勿擅动”。

△　为策应入闽作战，陈诚令第十一、六十七师及第六、十七师分左右翼向德胜关进犯，空军助战。晚9时，占德胜关。红军主力于陈诚部到达前撤至闽西。

△　国军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向江西遂川潞田进犯，湘赣军区红军萧克部将罗部第四六一团包围，毙营长一名。翌日伤其团长，将全团歼灭。

△　江西省民政厅令各县整饬“铲共”义勇队，提出训练标准四项：一、能否背诵“铲共”义勇队口号；二、能否人人表演武术；三、能否不预期的迅速集合；四、能否保卫本境。

△　张学良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轮回国，行前意相墨索里尼赠以皇冠大十字勋章。

12月16日　　孙科由京到沪，语记者称：中央赞同胡汉民主张；殷同擅与日方洽商北宁路通车，实属越权，应予以撤职处分。

△　黄绍竑返抵南京，向汪精卫报告赴蒙经过。29日，黄将内蒙

自治问题报告书及建议大纲呈行政院提交国民党中常会审核。

△　为抵制外粮倾销，各海关奉财政部令自是日起开征外粮进口税。税率米每担1.00金单位（海关金元，下同），谷每担0.50，小麦每担0.30，面粉每担0.75，大麦、玉米及其他杂粮一律按价10％征收。粤、桂、闽三省因民食关系缓征。开征前两日，各地大粮商大肆抢购囤积。

△　西藏加派藏兵5000人屯驻青海边境牵制青军，并将大青寺喇嘛编成军，准备大举进兵西康。是日，蒙藏会再电达赖，警告不许发动军事进攻，听候中央处置。翌日达赖去世，过金沙江之藏军后撤，局势暂缓和。

△　拉滨铁路建成通车。由吉林省拉法至黑龙江省哈尔滨之滨江，全长272公里，由伪满委托“满铁”修筑，上年11月起日夜施工，强拉民工400万人次，耗工费2000万元。该线通车后，黑龙江、乌苏里江广大地域之物资将全部经该线及京图线输往日本。

△　江苏邳县警察大队以有“加入共党，密谋暴动”嫌疑，被该省十二区行政专员假检阅之名包围缴械，逮捕官兵39人，周占魁等七人被枪决。

12月17日　　张继等一行抵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会谈。李、白否认同情闽方。

△　蒋介石令颁“擒获共党首领”或因“招抚”、“诱降”来归者给予奖金或奖章标准，规定甲种：总司令、总指挥给奖3000元；乙种：军、师长2000元；丙种：旅、团长1000元等。

△　罗炳辉率红军九军团第三、十四两师袭击国民党军团村后防，与国民党军第九十六、五师战斗后向西北转移。

△　国民党军第十、八十三师协同第四、九十九师由资溪向光泽

红七军团阵地进犯，占光泽。红军向西南方撤退。

△　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派代表赵泰保等到京“答谢”国民政府派员入蒙“盛意”，并呈递自治建议书。

△　北平东北难民救济院因经费竭蹶，通告宣布自明年2月底起，停止施放难民米煤。

△　达赖十三世（阿旺罗布藏塔布元嘉穆错）在拉萨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噶厦负责。

△　行政院派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会同外交、海军两部代表到平与法使韦礼敦签订天津北洋海军医校医院新约，规定划地24亩为复兴医校医院之用，15亩为扩建马路之用，中国政府担任偿还法籍教员欠薪。

12月18日　　国民党当局策动北平各界召开讨闽大会，国民党中委张厉生、苗培成等出席，通过提案四件：一、电中央党部、国府，明令讨伐陈铭枢、李济深；二、电蒋介石积极“剿匪”；三、电粤、桂中委即日出师讨闽；四、电各地中委克日赴京，翊赞中央。

△　川军王陵基等部连日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攻，是日占宣汉。同日范绍增部占绥定。王电告国民党中央称“是役川军伤亡约一千余人”。

△　福建人民政府任命原福建独立旅旅长陈齐煊为独立师师长。翌年1月3日，陈倒戈，在寿宁就新编第十师师长职。

△　滦榆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与日使馆武官柴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仪我在津会谈接收榆关事。

△　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通州成立，专员殷汝耕到署视事。

12月19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二十三年湖南省建设公债条例》，为修筑宝洪轻轨铁路及清偿银行旧欠，发行1000万元，年率六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自1934年12月31日起十年偿还本息，以湘省契税及营业税等为担保。

△　行政院会议决定东北难民救济办法，一般难民之救济由政府就北平现有私人设立之东北难民救济机关予以津助，不另设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其筹备处即行结束。

△　晚，孙科偕其妻由沪乘轮赴菲律宾。行前对报界声明系“耶诞旅行”，过港时将访晤胡汉民交换对时局意见。

△　吴铁城密电汪精卫报告西南将组织政府情形。电云，“顷接港电如下：西南组第三政府，宣传已久，当局表面虽否认，内部进行仍力。最近闻已决定以桂为武力中心，依胡宣言在粤组国府，如汪、蒋下野，即将国府移京，伯南（陈济棠）如不赞同，则设梧州，已有急转直下势，但粤方实力派仍主张与中央条件合作，现在互商中，本周内可决定。……”

△　汤玉麟部经宋哲元改编为暂编骑兵第一、二两旅，由张北开抵张家口训练。是日，宋密电蒋介石、汪精卫及北平军政当局，以汤“自退出承德后，虽已负失土之咎，尚能收合部伍，转进察省，中经敌人之威迫利诱，卒克守志不渝”，请撤对汤通缉明令并给予名义。27日，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对汤通缉令。

△　英国复遣武装人员2000余名侵入云南班洪，强迫当地人民修筑公路、桥梁，架电线，开辟矿山，激起当地民众强烈反抗，此后曾多次进行武装反抗。

△　天津卷烟业同业公会具呈市商会反对增加卷烟统税。略称：期年之间，华商相率倒闭者已达十之七八，增加统税，不啻保护外货。翌日，山东全省火柴公司代表到省府请愿，要求收回增加火柴统

税成命。

△ “满铁”总裁林博太郎、副总裁八田及关东军人员分别返东京呈报改组“满铁”方案。是日，拓相永井访首相斋藤，表示“碍难赞同”，斋藤及内相山本、藏相高桥等均持反对态度。后经折冲，陆军省允拟新方案，但仍意欲夺取监督权。

12月2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福建人民政府与第十九路军，指出自订立反日反蒋的协定草约以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但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的反日反蒋的行动”。“蒋介石却已经派了三个纵队向福州与延平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亦已经准备好以占领福州、厦门来响应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你们与福建广大民众是在极端危险的中间”。“在这一危险面前的任何消极与迟疑不决，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大的罪恶”，要求“立刻依照我们反日反蒋草约中所决定的基本原则，采取断然的行动”，并表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

△ 福建人民政府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废止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廨，令思明地方法院对所有涉外诉讼行使独立审判权。此事遭领事团反对，不肯将诉讼案移送。

△ 国民政府令：“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蒋光鼐甘心从逆，背叛民国，应褫夺本兼各职。”

△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决定自1934年元旦起在成都、重庆、万县、涪陵、合川、宜宾、泸县、自流井、乐山九处开征房捐四个月，并预征各县烟苗捐充作“剿匪”军费。

△ 国民政府令派李平衡、谢东发为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政府代表，指定李平衡为第一代表。

△ 河南豫丰纱厂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决定1934年1月5日开工，

工作时间每班延长至12小时，裁减工人500余人。

△　湖南新化锡矿山陷塌，工人百余人仅救出30余人，余皆压毙。

12月中旬　　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中央军第一批部队约10万人分别由浙江南进，由赣东东进，本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经激烈争论后确定放弃闽北守福州。会后，蔡廷锴往漳州、泉州、龙岩等地区贯彻军委决定，变更兵力部署。闽人民军全部兵力共33个团，除留置前、后方守点守线及各港口共11个团外，主力21个团均调往福州周围。

12月**21**日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通电赞成胡汉民时局宣言中所提八项主张，要求“闽省当局宜幡然改图，中央军政当局亦应退避贤路，使全党全国得恢复自由，以公同解决当前之纠纷，而重定今后之国策”。

△　孙科抵港访晤胡汉民，力促胡到南京，胡未允。当晚，孙离港赴菲律宾。

△　海军部长陈绍宽到临川向蒋介石请求处置“闽变”办法，是日午后返京。翌日，陈语记者称：按蒋指示，海军对闽一切布置就绪，日内下令总攻，海陆空同时并进，以期“一鼓荡平”。

△　月初西南政务会曾派黄河澧赴闽，提出三项条件：一、放弃联共政策；二、取消人民政府；三、恢复党治。闽方未接受。是日，闽派代表朱某偕黄抵穗续商。

△　国民政府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　湖南滨湖各县水灾善后联合委员会呈省水灾善后委员会，要求体恤民艰，反对省方派员在滨湖各县催收1931年水灾工赈贷款。

△　台湾停止100万石谷贮藏计划，改行奖励稻田改种代用作物。

12月22日　　福建人民政府发表第二次宣言，提出完成建立生产人民政权，扶助生产人民之组织，解除生产人民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痛苦，保障人民自由平等权利，以及恢复国权，求国家统一等为目前最中心的工作，要求于最短期间内完成。

△　福建人民政府任许锡清为中央银行行长，并通过中央银行组织大纲及章程。同日，文化委员会推陈铭枢兼任人民大学校长。

△　福建人民政府最高法院续释“政治犯”58名。

△　国民党中央电张继等，表示对胡汉民八项主张“可以酌量容纳”，提交四中全会讨论，促胡入京说明一切。同日，张继等再次晤胡，翌日离港返京。

△　空军飞机14架轰炸漳州，死伤群众300余人，全城大乱。厦门市商会、龙漳旅厦同乡会电蒋介石等抗议“以民众之机，戕民众之命”，要求电令制止，以重人道。

△　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由沪赴闽活动。28日，由闽到台北与台湾总督松井石根商对“闽变”应付办法。

△　内蒙各盟旗代表谒汪精卫，要求中央承认黄绍竑与德王等所订自治办法，早颁自治政府组织法，勿经立法程序成立自治区政府筹备处。汪答以黄所承认条件中央当然接受，组织法必须经立法院审查，筹备处可早日成立。

△　汪精卫电唁达赖逝世；又电百灵庙邀班禅日内入京会商藏事。

△　伪满公布《暂行保甲法》，规定居民以10户为一牌，村或相当于村区域为一甲，一个警察区域为一保，某牌出现“扰乱治安”之“犯

罪人”时各户负连带责任，课以“连坐金”。

12月23日　　海军马尾要港司令李孟斌率舰进驻马江，占领长门要塞。同日，海军部正式封锁闽江。

△　驻皖第三军王均部奉命开浙江攻闽，先头部队第十二师昨已入浙，是日第七师开抵蚌埠，俟令出发。

△　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前甘肃省府主席马鸿宾等联电行政院为金树仁缓颊，略称：金被拘“无非以私订商约为词”，金在边省“历年维持苦心，似难一概抹煞”，表示“不忍坐视”，“恳予营救”。

△　国民政府任命李觉为第十九师师长。

△　上海中华水泥厂联合会具呈财政部，要求顾念民生困蔽，实业艰危，收回水泥增税成命，并要求发还各公司已缴之新增税款。

△　沪市传美国政府将提高银价，标金狂落，晨开699.5元，一日间跌至671元。翌日开始回升。

△　据天津《大公报》载称：苏省附税名目合各县计之，有150余种之多，税额较正税多至20倍。28日，该报又报道各省人民纷向监察院控诉田赋附加超过正税。

12月24日　　汪精卫以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电各省、市，以“必须废除苛细捐税，而后可言复兴农村”，令饬将各该地方捐税情形“切实查明，据情胪报”。

△　空军飞机七架轰炸福州，次日，又有六架飞机飞福州轰炸。厦门商会、旅港福建商会等电请国民政府切实制止，“为闽民留一条生路”。

△　蔡廷锴电请陈济棠仍助第十九路军月饷30万元，陈置之不

复。

△　上海丝业因丝价跌落，营业亏损，相继停业者达63家，是日，全国经济委员会筹组丝业统制委员会，以谋救济。

12月25日　　国军占闽北屏南县；海军开始作掩护攻击，“海宁”、“应瑞”、“海筹”等舰驶抵离吴淞百余里之鸭窝沙待命。

△　蒋介石由杭州至浦城，亲自指挥对闽军事行动，分兵三路向闽进攻：一路集中浦城一带向建瓯推进，规取南平；一路由光泽向邵武、顺昌前进，以拊闽人民军之背；一路集结于德胜关附近，遏制红军，并相机向泰宁进攻。

△　红二军团贺龙部进占四川黔江，牵制川军刘湘对红四方面军的进攻。杨森急派陈万仞师前往堵截。

△　晨，张继等四人由港到沪，发表共同谈话称：此行对于中央所有之使命，大体慎重达到。当晚返京。

△　宋哲元令刘桂堂率部开驻阳原训练，并派张树声前往宣示。刘恐宋有解决该部之意，是日下午在赤城抢掠后率部四五千人（第一旅夏子明部除外）向东南开走，自称“东亚协和第二军总司令”。

△　河北省战区各县临时联合救济筹备会向行政院、财政部、冀省府呈诉战区各县官产局利用权势，残害民众，要求明令将其撤销。

12月26日　　湘鄂赣边区红军孔荷宠部进占离南昌仅50里之万寿宫，南昌一片惊慌。熊式辉即派部“进剿”，并派飞机轰炸，又令南昌军警及侦察人员全体出动，日夜检查各客栈、公寓。28日，孔部撤走。

△　国民政府任命卢兴邦为第五十二师师长。

△ 行政院会议决定任驻闽黔军周志群为新编第十一师师长。

12月27日 蔡廷锴委邱兆琛为闽东警备司令兼右翼前敌总指挥。是日，蔡偕邱检阅所部并训话。

△ 海军部长陈绍宽由京到沪，召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及其他高级军官会议，布置对闽进攻计划。陈书面答记者问称，海军已总动员，现仅小接触，俟令总攻。

△ 黄郛电蒋介石，建议“用全力将闽事速决，决后续自动在可能范围内容纳各方意见，颁布改弦更张之道，以系人心而安反侧”。

△ 驻闽北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派旅长刘尚志赴赣谒蒋介石，又转杭谒鲁涤平，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是日，国民政府任命刘和鼎为第三十九军军长，仍兼第五十六师师长，叙中将级，加上将衔。

△ 国民政府任命马鸿宾为第三十五师师长，原任马鸿逵免职；任马鸿逵为新编第七师师长。

△ 张培元通电反对盛世才，自称北疆总司令，马仲英为南疆总司令，共同出兵攻盛。张即率部攻塔城；马向迪化进军。

△ 刘桂堂率部窜抵延庆一带，宋哲元令宣化张自忠部、涿鹿刘汝明部、怀来冯治安部共同防堵。

△ 前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衔杜锡珪在沪病逝。30日，国民政府令给治丧费3000元，派吴铁城往祭，并由行政院令海军部照海军上将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

12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由张继报告赴港、粤接洽经过，略称：西南对中央“即有责备，未忘献替”，“中央党政措施有应改革以求进步之处”，“粤桂地方现在并无反中央表现”，“对闽变南中同志认识甚清，持义亦甚鲜明……于中央之如何严厉制裁，西南方面均

表示赞同”。

△　杨邨人在《文化列车》第三期发表致鲁迅的公开信，对鲁迅进行攻击。是日，鲁迅著《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痛斥其造谣生事的无耻行径，揭露其叛徒嘴脸，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作有力抨击。

△　国民政府令：派王宠惠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任命王以哲、何柱国为北平军分会委员。

△　杭江铁路（杭州至江山）建成通车。

12月29日　　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沈光汉、谭启秀为左、右翼指挥；翁照垣为兴泉永警备司令。

△　福建人民政府财政库存空虚，除征收煤油、火柴进口税外，是日蒋光鼐电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市、县长及商会要求借款百万元充军费，厦门60万，福州20万，漳、泉各10万，限一周汇解，三个月内偿还。

△　孙科由菲律宾返港，发表谈话称：胡（汉民）政见已见其宣言，必要某某下野始肯复出，非为党国计，纯系私见。苟使政权归西南又如何？蒋下野后其嫡系军队将如何处置？不从实际做去，只日发通电宣言，于事无补。翌日，孙偕唐绍仪回原籍中山县。

△　“闽变”发生时，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曾有华北“联省自保”之议，并曾派员向黄郛活动，黄以对日对共两难题不好解决相敷衍。是日及翌日，黄连电蒋介石报告称：于学忠“主张少事”，徐永昌“尚慎重”，韩“未必拿得出具体合理之办法”，张学良下月抵沪，“纵有策动，亦须有相当期间运用”。决定下月4日开政整会例会，“趁此面谈之机会，作一度彻底之解释”。

△　外国驻福州领事团电南京领事团，转商国民政府划仓前山泛

船浦为中立区。

△　行政院讨论边疆要务，对解决内蒙自治问题决定以黄绍竑之报告书及建议大纲为原则；并决定派大员入藏宣慰。

△　日使馆武官谷荻为刘桂堂哗变向何应钦声明：刘曾派代表赴日本方面，谓所部给养困难，拟暂驻停战区内就食，被日方“拒绝”，如刘部开入停战区内，将予断然处置。

△　湘西“全民救国军”在洪江附近被保安第四区副司令陈子贤部击溃，“前敌总指挥”喻翊忠被俘枪决，贺竟成率残部向黔边逃逸。

△　蒋介石以对闽军事镇压开始，为防止官兵对中央苏区五次“围剿”作战松懈，是日由行营颁布斩则九项：一、不遵命令擅自撤退或逗留不进者；二、不遵日期到指定地点者；三、放弃城地，勾通“匪类”者；四、借端敛财扰害地方者；五、“济匪”粮械者；六、贿收重要“匪首”者；七、纵兵殃民，迫民从“匪”者；八、强以地方枪械抵补或蒙蔽邀功者；九、逃兵失械隐匿不报者，均立斩决。

△　天津《大公报》就国民政府调查捐税名目问题发表社评《请先废一种最苛之捐》，建议政府先令各省“先废一种不待调查而害民最甚之田赋附加税捐——鸦片地亩捐”。指出，最初种烟者罚，继而劝民多种，按亩收捐，仍以罚名；再继则每县派捐，强迫其种，且不许减成；最后则不论种不种，但要钱。要求不要空言整理税捐，徒耗时于调查之中。

△　伪满决定次年3月1日实行帝制。

12月30日　　最高法院以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买故宫古物案，经屡次传讯及发出拘票，易均避匿不见，是日对易下令通缉。

△　国民政府明令褒奖沪商叶鸿英捐资50万元办图书馆及乡村教育，并由教育部授予一等奖状。

△　胡汉民通电各方，指责“宁、闽两反动统治，已开始其蛮触之争”，呼吁“各方奋起，制止此次行动”。

△　国民政府准宁夏省中卫县黄河南部地域增置中宁县。

12月31日　海军部长陈绍宽派陈季良离沪赴闽指挥海军作战。

△　外交部要求各国驻京领事开具驻闽侨民名单，“俾能予以保护”。各国领事以国民党空军轰炸福建，危及外侨，提请南京当局注意。

△　日使馆武官根本博自东京返平，晤黄郛称，荒木嘱面告三点：一、闽方事前曾派青年党人分赴台湾、东京两地求谅解；二、胡汉民发表宣言之前曾托人间接与驻港武官接洽，谓华南立场不能不标抗日，但反蒋成功后彼此合作谋根本亲善之道；三、对张学良回国提出两点要求：（一）不来华北；（二）不掌军权。同日，黄郛将上述内容电告蒋介石、汪精卫。

△　川军田颂尧部李炜如师占仪陇，红军退兴隆场。

△　刘桂堂率部沿“战区”边界向西南移动，是日窜抵昌平明陵。宋哲元电请平军分会派队防堵。后刘部迭经万福麟、王以哲等部截击，分成若干小股由鲁北、冀西南窜。

12月下旬　下旬迄翌年初，中央军对闽军事行动为：蒋鼎文率第二路军，辖第三、九两师由赣东入闽后，经崇安、建阳过建瓯南进中，先头抵延平附近；张治中率第四路军，辖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由浙入闽，经浦城、建瓯，前锋迫古田附近；卫立煌率第五路军，辖第十、三十六、八十三三个师由赣东入闽后，经邵武、顺昌，先头抵延平附近；刘和鼎部第五十六师由建瓯南进达延平以北地区；后续部队汤恩伯纵队所辖第四、八十九两师由赣东入闽后，经邵武向顺昌前进中。蒋介石乘机抵建瓯坐镇指挥。福建人民政府军事领导人遂变更

原来部署，作驰援古田、延平之准备。

△　刘文龙被盛世才扣押。刘因对马仲英、张培元主和平解决，对盛与苏联结纳亦表不满，盛乃决计除刘，下旬，以“谋害督办，颠覆政府”罪名，解散省府卫队，押刘回私宅囚禁，并代拟向中央辞职电稿，迫刘签字发出。

△　黔省军阀战争经粤、桂两省当局调停，下旬于盘江召开和平会议，粤、桂、川、湘、滇均派代表参加。迄次年春，达成初步协议如下：一、联军车鸣翼、雷鸣九、杨其昌三部让出铜仁、松桃两县城，由柏辉章部接收；二、指定车、雷、杨三部暂驻石阡、思县二地听候整编；三、车、雷、杨由黔省府保障安全，并给予相当名义。

是月　安徽太湖、望江、宿松、至德等县各法团以省府欲恢复盐斤附加，向行政院、财政部等部门呈文，并推代表向省府请愿，要求减免。

△　澳门“海军航空中心”宣告结束。水上飞机及设施移交澳门港务厅。

△　日关东军在哈尔滨南岗宣化街设立细菌研究所，并于五常县背阴河建细菌工厂。

是年　第十九路军在福建秘密成立“改造社”，蔡廷锴兼任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各师成立分社，由各师长兼任分社长，分社下设支部。该社任务为秘密防范蒋介石派人暗中渗入第十九路军策动叛变及防范“力行社”特务的渗入，作为上级将领的忠实耳目。“闽变”发生后解散，部分社员加入生产党。

△　本年外贸出口净数6.1182799亿元，入口净数13.45567188亿元。出口以生丝第一，占出口总额的7.9％；入口以大米第一，占入口总额的11.21％。全年入超7.33739198亿元，占入口总额的

54.53%。

△　本年公债发行额1.24亿元，公债还本6594.7211万元，年末负债滚存9.17748151亿元。各省、市地方公债发行额不完全统计，共4852.7731万元。

△　国民政府本年共负外债3632.6928万英镑。

△　本年度全国关税总收入3.3952449亿元，较上年度增加8.83%（据1934年6月24日海关总税务司公布）。

△　本年出国华侨13.2万人，归国华侨27.8万余人。侨务委员会称华侨大量归国原因：一、世界经济恐慌；二、各国矿产及种植业限制生产；三、新加坡限制入口；四、南洋施行苛税；五、各地排华运动等。本年汇回侨汇较上年减少90%。

△　全国华商工厂共达3167家，职工人数54.8万余人，全年总产值14亿余元（不包括30人以下小厂）。

△　清华算学系研究部指导熊庆来《关于整函数与无穷极的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国际数学界称熊庆来定义的无穷极为“熊式无穷极”或“熊氏定理”。

△　中国国民党总支部在法国巴黎创办《三民导报》。

△　日本对伪满投资总额1.37亿元，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63%。

△　日本掠夺我国东北航空事业，一年间在东北航空时间总计为1.8万小时，距离总计为270万公里，运送货物为24万公里，邮政6.4万公里。

△　金华实业储蓄银行在香港开业，资本港币100万元，实收40

万元，设总行于香港，设分行于广州。张拔超任董事长，朱荫桥任总理。

△ 香港华商公局改名香港华商总会。

△ 香港恒生银号、永隆银号创办。

△ 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影片《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

△ 联华影业公司故事片《三个摩登女性》在上海上映，田汉编剧。

△ 香港“反对蓄婢会”编《反对蓄婢史略》一书出版。

△ 澳门中文报纸《大众日报》创刊，陈元心创办。

△ 澳门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又称旬日堂）创立。

△ 菲律宾华文周刊《民众》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七卷
(1934—1936)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七卷

(1934—1936)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返回总目录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1月

1月1日　　中央军对福建人民革命军发动总攻。第二路军蒋鼎文、第四路军张治中及第五路军卫立煌三部共七个师，由顺昌、建瓯、屏南分别出动，布成品字阵形向延平、水口、古田推进。

△　福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沈光汉部、第五路军谭启秀部及福建农民自卫军等，继续分别进攻浙边平阳、庆元、泰顺等地，以求攻入浙江，突破中央军重围。翌日及3日，浙边庆元、八都、泰顺等地战斗均烈。

△　赣粤闽湘鄂“剿共”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令第十八师朱耀华、第六十二师陶广两部强袭湘赣苏区万载县高村。翌日，陶师由铜鼓出发任主攻，朱师配合。

△　湘鄂西红三军贺龙部撤离四川黔江，回师湖北利川。川军陈万仞师第十三旅达凤岗部两个团于是日晚进占黔江县城。3日，红三军攻入利川，歼鄂军两个团，溃其一团，毙鄂军新三旅团长一名。川军陈师派佟团赶赴云阳边境柏树坝地带堵击。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西线指挥所，以其预备队第二七一团和前沿的第二十七师，在四川仪陇城南五里墩，向川军第三路军罗泽洲部四个团发起袭击，用以阻滞和消耗川军的有生力量。翌日红军将川军击溃，毙团长以下400余人，俘100余人，缴枪200余支。

△　伪满召开各府、院、部等首脑联席会议，讨论准备实行帝制问题。

△　孙科由中山县返港晤胡汉民，转达南京方面协商条件：蒋介石保留职位，汪精卫下野；军政分离，另设国防委员会主持军事，组织比“中政会”更有权力的委员会主持政治；请胡汉民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往南京任职。胡表示如能接受他上年12月15日对时局宣言中所提八项主张即可到京任职。

△　新疆边防军帮办、新编第八师师长张培元派兵攻击塔城，截留盛世才从苏联运往迪化之枪械。盛部航空学校校长姚雄即邀巴品古归化军袭击张军。是日，张部所属原东北军千余人突然倒戈与阿尔泰军相应，伊宁大本营被围，张培元急由乌苏回援。3日，张军被巴品古归化军消灭于伊宁，张培元得悉后于惠远自杀。

△　原察东“剿匪”司令刘桂堂于上年末由赤城经延庆窜入河北昌平，是日入北平西北之明十三陵及大小汤山。3日越廊房南入安次、固安。4日，察哈尔省政府通令取消其察东“剿匪”司令职，并号召刘部官兵自拔来归。

△　中央银行国库局成立。该行汇兑局归并业务局，以席德懋任经理。

△　福建人民政府根据上年年底公布闽海关增收海关税的规定，是日起对福州地区输入之一般进口货，一律增征现行关税一成。

△　浙赣铁路杭（州）玉（山）段建成通车。

△　教育部在上海设立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

△　上海宗教哲学研究所成立。该所由吴铁城、王晓籁、王一亭等发起。宣称“对社会提倡精神治疗，冶儒、释、道、耶、回五教为一炉，培养固有道德”。举李玉阶、章文通、王一亭、王晓籁等九人

为理事。

△　日本借口“保护国际列车”，从本日起派伪满守备队100名，日关东军守备队三四十人，登中东路西段之国际列车随车“监护”。

△　齐齐哈尔之《龙江日报》和《齐齐哈尔日报》合并，改称《北满洲日报》，并发行海拉尔及北黑增刊。该报为日伪在齐市的重要报刊。

△　《长城半月刊》在沪创刊，潘文安主编，发行人陈一夫，上海河南路文明印刷所印刷。

△　北平《外交周报》创刊，北平外交月报社编辑兼发行，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圣五，委员吴颂皋、高宗武等，受外交部指导。

△　《文学季刊》在北平创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

△　《汉口商业月刊》创刊，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编辑，市商会发行。

1月2日　　张治中部抵古田北部，与福建人民革命军赵一肩部接战。次日，张部进攻古田外围；第五路军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炮击延平郊区。

△　福建农民自卫军范铁民部在福建寿宁、福鼎间组织地方人民政府；并设军官学校。

△　中共中革军委电令湘赣省委及红十七师速出宜春、分宜北渡袁水，会合红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地区活动。是日，红十七师萧克部由吉安三都圩渡沪水，经永阳镇入安福，突袭西路军第一纵队刘建绪部寮塘桥、竹江津等阵地，歼灭绥靖团一队。

△　日机轰炸察省赤城、永宁、龙门所地区。4日，北平军分会向

日驻平武官谷荻提出交涉。5日，日本借口堵剿刘桂堂，又增兵冀北密云、三河两县。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

1月3日　　福建人民政府闽东警备司令邱兆琛率李金波等三独立团增兵连江，进占罗源、宁德，与中央军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部战于白鹤岭、飞鸾岭之间。同日，陈季良抵福建三都澳部署进攻福州计划。

△　第二路军蒋鼎文部由浦城、建瓯线东进，拟断政和、庆元间福建人民革命军后路，其孙元良师向古田推进。

△　福建省军独立师师长陈齐瑄在寿宁通电投靠蒋介石。蒋委陈任新编第十师师长，令其充当进攻福建人民革命军之先锋。

△　福建龙漳、兴泉两省人民政府分别在龙溪、晋江正式成立。以许友超（未到任）、徐名鸿为龙漳省正副省长；戴戟（未到任）、陈公培为兴泉省正副省长。

1月4日　　中央军海军陆战队进攻罗源，并以一部分攻丹阳、连江。福州形势开始紧张。

△　国联技术合作专家刍贝尔（法国人）到平，遂在中法、北京两大学讲演《国际合作实现之可能》。谓“国联对日本占据东北，深致不满，中国现正遭严重危难，又因种种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不获与国联切实合作，至为遗憾”。希望努力促其进展。

△　驻沪日本水兵及海军陆战队2500人在虹口阅兵，并举行作战演习。参加者尚有在乡军人及少年兵800余人。

1月5日　　蒋介石驻浦城指挥进攻延平、古田第十九路军，由第

五路军第九纵队刘和鼎部第四、三十六、五十六师等师主攻延平，从正面强袭其西北高地；以第五路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冷欣师和第四路军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攻击延平各制高点；以第三十师孙连仲部进攻吉溪；蒋鼎文于安丰镇设指挥所，直接指挥炮兵第一团和空军助战。同日，第四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王敬久，率第八十七师（王兼师长）和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进攻古田。福建人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由南屏抽调两旅增援。

△　福建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李济深、陈铭枢等改变固守福州方案，决定命蔡廷锴火速率部驰援古田、延平击破中央军，保全福州。蔡即命毛维寿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第二军及第三军之一部，沿大湖经雪峰向古田急进解赵一肩师之围；命沈光汉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第一军及第三军之一部，沿白沙、甘蔗经水口向延平推进；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随总部行营由福州向白沙前进；以第四军张炎部为总预备队。限令该军于1月7日到达福州待命。

△　湘赣军区红三师和赣北独立师分途向修水县东部湖田坂、何子恕、木古港发动突袭，与郭汝栋部张、刘二旅在湖田坂作战。11日，红军经大桥北进，郭师刘旅、新七旅追击，红军直入走马场、紫荆山一带。13日，郭师等追至紫荆山包围红军。红军与之血战一昼夜，赣北独立师师长杨锡成牺牲，损失甚重。

△　刘湘限令各军于一周内攻占仪陇、巴中、江口及立山等地，完成其第一期“进剿”计划。是日，四川“剿匪”军第三路军罗泽洲部会同第二路军李炜如部进攻仪陇、巴中。10日，徐向前红四方面军自动撤出仪陇，退入旺苍坝、千佛岩、顶山场之线，李部于当日进占仪陇。次日，罗部亦至仪陇后山，向仪陇城开枪恐吓李部。李疑红军反攻，慌忙撤走，罗部即入仪陇。

△　第四十军孙殿英部自上年西进屯垦，为宁、青等省当局阻止，后遵军委会之令暂停西进。是日，孙军一部由五原循黄河河套，

经宁远、石千子向沃野移动。次日，孙军分抵宝丰、沃野一带。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在石嘴子、平罗及宁夏省垣间节节布防。10日，孙在临河设立军部，积极准备西进。

1月6日　　宋希濂部攻占延平制高点九峰山，汤恩伯部攻占延平东部。延平闽军第五师师长司徒非派人向刘和鼎接洽投降；第一军沈光汉部第一师刘占雄部不战而退。中央军占延平，一部进至雪峰。

△　陈济棠以福建战事激烈，电令粤军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第五师师长李振良、独立第四师师长邓龙光等加紧粤边防务。8日，独一师由大庾、蕉岭、平远开往上杭、永定；独立二师向诏安、云霄推进；第五师一部由兴宁向梅县开拔，拟转上杭。

△　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参事官谷正之根据日外务省及拓务省之训令，与关东军司令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审议“驻满之日本新警察制度”，决定：一、驻伪满大使馆内设警务厅统制全境之日籍警察；二、警务厅长由宪兵司令官兼任（初任厅长为田代司令官）；三、在东三省之外务省警察及关东厅与“满铁”附属地之警察均受其指挥；四、警察之最高指挥者为关东军司令官。

△　刘桂堂部在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徵等部截击下，由阜城分窜冀南、鲁西、鲁北。11日，刘部一股窜鲁北桑园、德州，一股窜鲁西濮县大王庙。12日，韩复榘派第七十四师李汉章及民团第二路军赵仁泉等堵截，以防深入鲁省。13日，刘部在冀南之一部窜深县，一部由景县南入清河、临清间油坊镇附近。何柱国军及骑兵师白凤翔等部紧追堵剿。

△　张学良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途经香港登岸访胡汉民。前张学良顾问端纳及东北军旧部荣臻、鲍文樾、冯庸、米春霖、刘鸣九等十余人在港候迎。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派陆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兼任甘宁边区“剿匪”司令。

1月7日　　中央军李延年、汤恩伯两纵队沿闽江而下，分东、西两路夹击水口。闽军谭启秀部背水作战，失守天竺山。同日晚，李部占水口，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闽人民革命军两师被歼。

△　湘鄂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令所部进攻利川，贺龙红三军在利川城郊与之激战。徐部不支，急向川军刘湘求援。次日，川军陈万仞调杨勤安独立旅由川东边区磨刀溪向利川北部南坪洞、凉露山、汪家营之线推进。12日，红军与徐部再战后南撤，16日入咸丰县大、小沙溪。

△　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召开各部总长会议，审议所谓《国策大纲》，准备实行帝制。大纲主要内容是：（甲）对内政策：（一）制定各种法律，取法制主义统制；（二）实行地方自治；（三）开发实业，统制金融；（四）振兴教育，提高文化；（五）整顿警察制度及武备，维持治安；（六）广收人才，选用贤能；（七）实行王道主义。（乙）对外政策：（一）以尊重国际主义为外交方针，与各国合作为原则，取亲善政策，遵守国际法及外交惯例；（二）维持治安，保护外侨之生命财产；（三）开放门户，欢迎外国之对满投资及经济合作；（四）侧重对外通商政策，等等。

△　三民主义力行社召开干部会议，决定三大活动政策：一、在全国各部队内开展工作，以监视各军长官活动；二、实行法西斯主义，扫荡国民党内部一切“反动分子”，收容杂色派别，徐图消灭，厉行党部法西斯化，集一切权力于领袖；三、没收军阀政客财产作为基金。

1月8日　　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讲话，坚持“厉行党治”、“厉行训政”、“扫除一切障碍”，反对以和平方法解决闽事。并谓

对第十九路军定非消除不可。

△　张学良回国抵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本人对于救国之主张，一如昔日，即为‘和平统一’四字。”11日，又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一、“姑容许一个领袖（指蒋介石）有实验的机会，姑拥护一个主义使得发挥其效能”；二、办教育的人共同起来刷新人才教育；三、速息“阋墙之争”，准备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全国“真正做到精诚团结”，并与政府商议东北难民及失业者根本救济办法。末谓，“如志不得行，拟再出国调查研究”。

△　伪满加紧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伪满国务院召开特别内阁会议，讨论向溥仪提出《国体建议书》。11日，日关东军授意伪省、市长向溥仪呈送《改帝制建议书》。18日，伪满在奉天召开实行帝制市民请愿大会，强迫市民参加。

△　《文学季刊》在北平创刊，谢冰心、郑振铎、朱自清、章靳以、李长之、吴晗、林庚等编辑，北平立达书局发行（自第四期起改由该社自行发行）。

1月9日　　蔡廷锴接红军彭德怀电告：“蒋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是夜蔡由甘蔗至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前线各部火速撤回福州，退兵闽南。会后陈、蒋、黄等星夜赶往福州，安排人民政府撤退。

△　福建人民革命军厦门守军张炎部李营退往漳州。同日，漳厦警备司令兼厦门特别市长黄强、公安局长林鸿飞撤离厦门，避居鼓浪屿。嗣后黄等降中央。

△　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县南洞召集该地区各抗日武装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共同抗日的办法和原则：一、各武装团体密切联系，互相帮助，继续开展反日反满活动；二、对日军前来劝降，应坚决拒绝，若有投降者应立即清算；三、当日军来攻时，不应以武装

抵抗，应取回避主义；四、同日军交战或袭击时消耗的弹药，应由反日士兵予以补充；五、同正在避难的同志取得联系，筹集粮食，同时应向亲日伪者征收，或夺取运输途中的粮食。

△　刘湘在成都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接见上海《新闻报》、《申报》及中央社、国闻社组成的上海记者赴川考察团。谓“目前四川最重要的工作即为剿匪计划的完成”，之后“再行着手开发四川，进行生产建设”。表示欢迎各省各界投资开发四川。

△　财政部统一全国盐税，通令各榷运局自本月起，发售盐斤除用新衡器外，每担一律收税10元。

1月10日　蔡廷锴在福州召集各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部署退往漳州、泉州的计划：第三军区寿年部首先渡江南撤，以急行军进占仙游，掩护主力部队总撤退；第七十八师在马尾附近监视蒋军海军行动，俟主力退出福州后南撤；第四军张炎部掩护主力渡越乌龙江后跟进；第二军毛维寿部随第三军之后，于惠安、泉州间轮番掩护主力撤出；第一军沈光汉部随第二军之后跟进；以先遣纵队司令邱兆琛部为总掩护以断后路。此外，并决定政府重要人员先去香港，俟军事稳定再返福州。同时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主力未撤退之前，暂委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同日，蔡、蒋联名电请陈济棠派兵接防闽西。

△　中央军鱼雷游击司令王寿廷由三都澳率舰艇两艘及陆战队两个营，会同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进占厦门。同日，蒋鼎文派刘光谦接收福建人民政府厦门特别市政府，杨廷枢接收思明县府。

△　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在萍乡召开“清剿”会议，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第五十师师长岳森、第六十二师师长陶广等出席。会议决定将湖南全省分为五个保安区，共编34团又两营。贯彻“军政并行，清剿兼施”方针。实行“筑堡封锁，筑路交通，清乡善后”三大政策。部署以“肃清”万载红军孔荷宠部为最主要任务。

△　蒋介石派德国军事顾问团上校军官韩英士（亦作亨因斯）持其亲笔信前往德国柏林，迎接前德国陆军总司令赛克特再次来华，正式担任军事顾问团总顾问。3月6日，赛离开柏林前夕，德国总统兴登堡、国防部长麦肯逊、外交部长牛赖特等曾分别接见，均表示德国政府将予以可能之支持。日政府得悉后，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要求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急电柏林外交部劝阻，德政府未允。其后，日驻柏林大使访德外交部，指责德助中国备战，以便将来对日。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财政部发行《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一亿元，作为偿还银行积欠、安定金融之用，月息五厘，七年偿清本息，由财政部指定关税收入为还本付息基金，本月起九八折发行。13日，国民政府公布《条例》。

△　是日为日本“日俄战争纪念日”，溥仪在长春举行阅兵式。同日下午举行“中央最高首脑部及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决定推郑孝胥为代表面谒溥仪，劝进帝位。

△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推行社会教育应切实注重国语，并附办法四条，以便推行。25日，教育部批准，通饬各地遵照施行。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前海军部长、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在上海病逝。

△　武昌鄂声通讯社创立。

1月上旬　　四川“剿匪”第一路军邓锡侯，以右翼第五师第十三旅陶凯部由剑阁县红岩子渡嘉陵江，右翼与第二路军遥取联系；中路以龚渭清旅、杨晒轩旅分别由昭化、广元出发；左冀卢济清旅由朝天驿沿大巴山脚东进，分别在广元县元坝子、王家坝、快活岭和苍溪县山川寺等地，多次向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发动猛攻。红三十一军王树森部在快活岭之役歼灭邓部近千人。其后，红军自动缩短战线向后撤退，

陶凯旅和第十五旅杨宗礼两部进占赵家场、麻桑树、张坝场、肖家梁及元坝子等地。

△　上年冬，黔东车鸣翼部在龙里县属观音山被王家烈部战败后回驻铜仁，得湘西陈渠珍之助积极准备反攻。是旬，王家烈派其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率部进攻车部，先后在岑巩县罗家山、铜仁县荣店场及亚渔场、猫猫岩将车部击败，占领铜仁。下旬，经何键派员调解，双方在龙溪口会商解决办法。

1月11日　海军部长陈绍宽率“海宁”等五舰由沪驶闽，次日抵三都澳向福州推进。

△　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电令第十六师彭位仁由莲花进攻永新，寻湘赣萧克红十七师、高咏生红十八师主力作战。次日，彭部开至桥头、朱岭坳，13日乘雪雾分途进占将军山、更鼓寨、梅花山等险隘。湘赣红军模范师等大部入莲花、安福交界之大山中，一部向永新。

△　内蒙各盟旗代表吴鹤龄、赵泰保等在南京面谒汪精卫，请速批准成立自治区政府。汪允尽早实现。

1月12日　张治中部自9日起，从延平、屏南、水口三路围攻古田，并以飞机进行轰炸。驻守古田之第十九路军第五军第七师赵一肩部连日遭到围攻，驰援古田之右路军第二军毛维寿部未能及时赶到，赵部不支，是日停止抵抗，向张治中投降。中央军占古田。

△　是日至次日，日海军陆战队200余人，乘人民革命军正在撤退之际在福州登陆，进驻仓前山。

△　陈济棠约晤第十九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处长陈福初，要求将驻广州河南第十九路军特务营撤退。次日，第十九路军特务营自动缴械，陈济棠派军警接收第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并停发对福建的协

饷。

△　是日及13日，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杨益谦、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先后急电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报告英兵入侵班洪情形。

△　初旬，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部万余人围攻迪化城，盛世才派外交处长陈德立前往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向总领事阿布列索夫请求军援。盛世才答应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等政策。是日，巴品古归化军佯称赵寿山任指挥官，分兵两路，一由霍尔果斯入伊宁，一由塔城向绥来。马仲英得悉后，乃派马虎山赴头屯河迎击。

△　孙殿英发出移防通电，谓“官民饥寒交迫，实不能坐以待毙，只有仍本屯垦令西行”。同日，孙部与宁夏马鸿逵军接战，占领宁夏磴口县，并电请蒋介石、何应钦令马鸿逵停止军事行动。次日，孙军分路进攻宝丰、黄渠桥各大镇。马鸿逵电北平军分会报告孙军进犯宁境。何应钦即电令孙停止行动，原地待命。

△　上年6月25日美籍教士辛普生（即新振华）在甘肃会宁县华家岭被土匪枪杀事件，经甘肃省政府严密查办，捕获凶手马荣华、马维和、范永德等三人。是日，甘肃皋兰地方法院判处主犯马荣华死刑，3月1日执行枪决。

△　国民政府特派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总司令。

△　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省政府暂设延平，由行政院转饬陈仪迅即赴任。又令，福建省各政府、各委员、各兼厅长，由行政院查明，未经“附逆”者饬回原任，其“附逆”有据者分别褫职，遴员补充。

△　国民政府特派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准张乃燕辞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职。

1月13日　福建人民政府及其第十九路军退出福州，撤往漳州、

泉州。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章伯钧、胡秋原、梅龚彬、何公敢等人民政府领导人分别乘飞机、轮船、汽车离开福州。同日，蔡廷锴等通电在漳州设人民政府，在泉州设总部，表示坚持战斗。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福州濒危，致电福建第十九路军，作六项紧急提议，其要点为：一、立即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允诺的人民民主权利；二、立即武装福州、泉州、漳州各地群众，赞助群众参加反日反蒋战线，以保卫福州及泉、漳各地；三、立即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不应借口战局紧张，妨碍或禁止这种组织的发展；四、实际赞助蒋敌后方民众武装组织和反日反蒋活动；五、决心肃清自己队伍中准备向蒋介石投降或请托帝国主义保护的分子；六、向第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与联合一致的有效军事行动。

△　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命令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为第一支队，以该旅旅长陶柳任支队长；第六十二师抽兵两团为第二支队，以钟光仁任支队长；第十八师抽兵两团为第三支队，以易振湘任支队长；第五十师抽兵三团为第四支队，以彭璋任支队长；第六十二师抽兵两团为第五支队，以李国钧任支队长，限22日前分别集结谢家坊、潭埠、三百兴、黄冈口等地待命，准备向小源、白水、菱湖等湘赣苏区根据地发动进攻。

△　王陵基趁红军撤出仪陇之后，是日命令所部主力分别向旺苍坝、千佛岩、顶山场一线继续发动总攻；田颂尧部之罗乃琼师及曾宪栋师之一部向恩阳河推进。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在胡家场等地截击王陵基部，一部在阆中县鸡梁山击败田颂尧部。

1月14日　河北省政府以“指导民运”为名，于本月初派员赴唐山解散开滦煤矿工会，妄图用官办的工会整理委员会取代原有工人自己组织的工会。是日，马家沟、林西、赵各庄、唐各庄等矿工三万余人

在中共唐山市委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恢复工会和失业工人复工。马家沟矿工人的罢工遭保安队镇压，死伤六人，工人要求省府严惩凶手。唐山启新洋灰厂工人起而声援。唐山矿工人表示如三日不得解决，将取一致行动。28日，唐山矿工人加入罢工。31日矿方在国民党党政人员的参加下被迫签字，允许取消包工、赔偿罢工损失、恢复失业工人工作，并答应工人有代表办事处之组织以为变相之工会。2月1日，罢工结束。

△　日军于上年12月假“剿匪”之名侵占察边沽源县后，是日又有日伪军千余名进占赤城以东之喜峰砦，并向龙门所推进，守军宋哲元部黄守中部队竟向后撤退。同日，日军驻黑河司令官森一郎用飞机在察东地区散发“警告”宋哲元驻军的《声明书》。次日，日军向赤城驻军提出警告。宣称：“（一）察东长城线系‘中满’国疆，中国驻军系违背《塘沽协定》；（二）立即撤退龙门所赵家营子一带驻军；（三）赤城、独石口等处系协定之延长线，亦不应驻兵；（四）察军撕去日方布告为不敬及挑衅。”

△　孙殿英部绕过石嘴子攻至平罗附近，次日起连日全力攻击平罗城。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孙、马停止军事行动，静候处置。孙部副军长于世铭率一部由葫芦州绕攻李岗堡，拟断马军平罗、宁夏间联络。17日，孙、马两军在李岗堡激战，孙军被马军击溃，退至蒋砦、陈砦。

△　英舰“白威克号”、美舰“杜尔萨号”借口护侨，各派水兵数十人在福州登陆，次日撤往马尾。

1月15日　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讨论《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及《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等问题。18日，通过《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政治决议案》等决议案，补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并改选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任总书

记，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为政治局委员。

△　第十九路军全部撤离福州。蔡廷锴离福州前，聘请萨镇冰出面担任福州维持会会长，并以省公安局局长丘国珍、商会主席罗勉侯等为委员。下午萨等就职，由福州维持会及商会等筹助第十九路军开拔费12万元，全市遍贴“欢送十九路军”等标语。蔡与其主要人员分乘汽车去峡兜。次日晨，第十九路军退尽，中央军海军陆战队进入福州。随后，刘和鼎、李玉堂、蒋鼎文也先后至福州。

△　蒋介石由浦城至延平部署军事，特委陈明仁为浦城警备司令，陈万泰为建瓯警备司令，以警戒闽北红军。17日又命蒋鼎文负责闽战全面指挥，进军泉州。20日，蒋鼎文抵厦门，命令以宋希濂、李延年两师由福州渡闽江向泉州追击；以王敬久、孙元良两师自延平南下渡闽江向西南转进，配合向泉州追击；以冷欣、李默庵两师向左行半径迂回，经永春、安溪向泉州西部压迫，并截断蔡廷锴所部西进龙岩的交通线；以万耀煌、刘戡两师从永泰南下，经仙游向泉州北部压迫；以第三师李玉堂部由福州经海路迂回至厦门、漳州南部登陆，直捣漳州，并遮断泉州闽军退路。

△　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政治上的责任》一文，重申去年12月15日对时局宣言的主张：一、推翻军阀统治（按：指南京蒋政权），然后实行“抗日剿共”；二、反对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政府，要求组织一个“真正代表国家人民利益”的政府；三、中国必须严格实行三民主义政治。并将其主张归纳为八个字：“蒋汪下野，福建回头。”

△　中华国货产销联合公司在上海成立。该公司由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出品协会之各省代表周贯虹等发起，得全国18省区响应，以“生产救国为宗旨，扶助实业之发展，实行产销合作”相号召，股本26.05万元。30日召开第一次董监事联席会，举杜月笙为董事长，王晓籁、史量才、许世英、林康侯、俞佐廷、邬志豪为常务董事，聘邬志豪任

总经理。

△　《音乐杂志》季刊在上海创刊。萧友梅、易韦斋、黄自编辑。该刊为全国惟一的音乐刊物。

1月16日　第五路军卫立煌部南进追击第十九路军，其所属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在仙游以南与第十九路军第三军张君嵩第三师接触。张师英勇反击，掩护各军南撤。同日，蔡廷锴抵莆田，主张先集兵力于仙游，击败卫立煌部后南下，遭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反对，遂改令第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一面掩护西侧部队继续南撤；并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隘，掩护主力昼夜兼程抵达泉州设防。

△　陈济棠电蒋介石，要求保留第十九路军名称，给蔡廷锴、蒋光鼐川资出国，并将闽南划归粤军防地，所遗第十九路军由戴戟、陈维远改编。

△　国民政府任命李敬明为陆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免邢震南第四师师长。

△　蒋介石密电孔祥熙，要求在沪与德国人福斯炮厂经理接洽购置重炮。18日，孔复电报告已遵意与该厂经理晤洽。

△　马仲英部由迪化北郊攻占东门飞机场及无线电台，19日攻占南梁及王家庄，其在头屯河之战七战七胜。盛世才因巴品古归化军的援助，尽力固守迪化，并派兵一部进攻昌吉。

△　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侯成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请阎出面阻止孙殿英军西进。是日，侯在太原要求见阎。阎以患“感冒”为由，未予接见。

△　日伪军进攻察东赵家营、郭家窑子，图占龙门所。守军张人杰令所部负责守土，对进犯者妥为应付。该部宋铁林旅胡文郁团予以

还击，至夜日伪军撤退。

△　刘桂堂部在鲁西民团总指挥赵仁泉直辖混成团和李德宣骑兵团袭击下，由曲周窜入邯郸、永年，19日占涉县，欲久居武安、林县及涉县地带。豫、鲁、晋三省军队对刘部组织会剿。

△　波兰首任驻华公使魏登涛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1月17日　　蔡廷锴率部由莆田经涂岭抵泉州，是日召开紧急会议。蔡决定本人离军去闽西，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闽西保存力量，凡不愿西进者自由择定，宣布将第一方面军部队归毛维寿代指挥。随后，蔡派副参谋长范汉杰率高级参谋陈心慕往厦门与蒋鼎文接洽，说明蔡已离军，愿和平改编第十九路军。傍晚，蔡乘机抵漳州。

△　蒋介石鉴于红军围攻沙县甚急，电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以第五纵队罗卓英及第七十九师樊崧甫部于20日向建宁推进，予以策应。陈即令罗卓英部由黎川、硝石之线向熊村、河塘一带集结；樊崧甫师经水口至长源、淹岩一带集结；均限23日到达，以备续向建宁推进。

△　国民党中政会第三九二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办法》，凡11条：一、内蒙古自治，分区设置自治政府，对区域隶属、组织权限、经费等各项另拟办法；二、内蒙古自治之实施，自治区政府未成立前，由中央或当地省政府派员组设筹备处；三、内蒙古自治区在察、绥两省未设县治的地方各设两区；四、自治区政府设委员五至15人，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区政府分科办事，为区旗两级；五、自治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并受中央各主管部、会之指导监督；六、自治区内之国防、外交均归中央，其特殊性质者，在不抵触中央及当地省政府法令范围内，区政府可发布或制定单行法规；七、省区关系，自治区内各蒙旗行政为中央未授权省政府者属之，如涉及省行

政范围者得与省政府会商。省政府得中央委托，可代表中央指导区政府办理自治；八、自治区经费，由中央核准后拨款补助，税收属国税者由中央征收，在已设县区由省政府征收地方税，自治区政府仅在未设县区征收地方税；九、经济问题，未开垦与未设县治的蒙旗，在该地住满一年以上，不分民族得享游牧垦耕种，森林矿产归国有，并由财政部在该区设中央银行分行；十、教育制度及经费，由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订具体办法；十一、司法由行政司法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订具体办法。

△　是日晨，内蒙各王公赴京代表尼玛鄂特索尔及各盟旗驻京办事处代表赵泰保等，在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率领下，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等机关请愿，要求设立自治区政府，该地未开垦土地暂予保留；自治区政府有一定税收权；并反对外族人移居蒙地。

△　上海市公安局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共同出动，前往福州路合众书局搜查，抄去鲁迅著作《二心集》1333本，解送捕房。鲁迅所著《伪自由书》出版后亦被查禁。

1月18日　胡汉民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对福建局势提出善后办法：一、宁、闽应即停战；二、第十九路军应即驱逐乱党，自承其咎，取消新组织，恢复党徽、国徽；三、依照淞沪抗日旧制，改编第十九路军，以保存此有历史之国家武力。

△　晚7时，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陶百川、上海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在上海“招待”本市各大报主要负责人。潘公展宣称：“当此中央讨逆剿匪均获胜利”之后，“中央仍将专力肃清赤匪”。“在后方之教育上与文化上，尤应排斥赤化宣传，摒绝匪徒一切活动”。要求各报“今后对军事政治消息之刊布要慎重，副刊文字之涉及左倾或过激者”完全不得刊载。次日，吴醒亚等又宴请各报副刊、电影专刊和

各杂志编辑、新闻记者数十人。续谓："兹后务望上海文化界一致摒绝赤化稿件"，倘再有不接受商量而发现不妥文字者，"则当以为有特殊使命论，自当另行制裁"。

△　内蒙代表吴鹤龄、赵泰保等在汪精卫所设招待会上，表示坚决拒绝17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办法》，要求照上年黄绍竑在蒙所商之原案通过。同时就《内蒙古自治办法》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三项补救要求：一、请保障盟旗部族之原有地位及区域的权益；二、实行自治，共御外侮；三、各盟旗部永远免除省县之侵蚀压迫。并声明：蒙古自治绝非分离运动，自治并非为少数人谋利益，非反对省县当局，仅求公允。

△　川军第五路军右方兵团中央纵队刘若弼旅（刘代旅长），经宣汉县隘口向绥定、宣汉、城口、万源之交通要道马渡关推进，是日占领罗鼓寨、大罗坪等要地。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再次紧缩阵地，先后撤至固军坝、罗文场、马渡关及红灵台之线。

△　班禅应国民党中央电召，离绥经北平转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临行时发表谈话称：解决藏事须由宗教入手，必须宗教推动方可言政治。24日班禅专车抵京。

△　财政部电令各省、市政府转令各地银炉业于令到之日一律停止营业，今后不得再行私开，并将公估局于同日一律撤销。

1月19日　红三军贺龙部由咸丰转战湘西龙山县茨岩塘。21日，湘军陈渠珍、龚仁杰部及保安团罗致英部来攻，贺部与之接战。23日，贺部入永顺西库，24日进攻马达铺、杉木村，陈渠珍等部驻守永顺城。

△　鄂豫皖徐海东红二十八军向河南固始出动，全歼民团三个队，后转移至安徽六安。

△　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常会，决定解决闽事四项原则：一、宁、闽克日停止军事行动；二、取消人民政府；三、李济深、陈铭枢引咎下野；四、责成蒋光鼐、蔡廷锴恢复第十九路军番号，整饬军纪，驱逐叛逆。俟执行部通过，即电请南京当局采纳。22日，胡汉民及西南政委会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停止对第十九路军用兵。指出“若压迫过甚，恐其铤而走险”，“殊非国家、地方之福”。

△　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在北平访日驻平武官柴山，要求制止日军对察东的骚扰。柴山答复系属“误会”，但仍主张在平与察省代表谈判，竭力借此要挟，划察东为“非武装区”，逼迫察省驻军撤至赤城以西。

△　蒋介石为反共军事需要，派浙江建设厅厅长曾养甫任闽赣浙皖道路建筑处处长，在军务工程专家协助下，调集工兵万人，工人数千，开始赶筑浦城、建宁线。并计划筑建宁、延平线，接至水口，使闽北各主要城市以汽车大道联成一气。

△　蒋介石、汪精卫、陈果夫、居正、孙科、于右任、顾孟馀、叶楚伧等联名分别致电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赵戴文、刘守中及在沪各中委，促速入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

△　孙殿英续攻平罗，翌日被马鸿逵部马宝琳旅击退。20日，阎锡山改变以前支持孙军西开的许诺，电劝孙停止前进。21日，孙部再攻平罗失利，退集平罗北部地带。

△　内蒙云王、德王自滂江电黄绍竑，质问上年在蒙所商自治办法为何擅自改变，要求黄促请国民党中央照原案通过。

1月20日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到中央执监委及候补执监委96人。22日，蒋介石由杭州抵南京出席。会议讨论各种提案共51件，其中以西南代表崔广秀、黄旭初根据胡汉民八项政治主张所提之提案最为会中所注目。会议通过改革政治案、分期促进训政案，

以及推行土地政策、统一水利机关、整理田赋、废除苛杂、安抚东北流亡人员等议案。25日，全会选举林森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并通过全会宣言后结束。

△　国民政府任命邓家彦为国民政府委员。

△　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谒伪执政溥仪，呈递劝进帝位建议书，并宣称于3月1日实行帝制，以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伪满外交部次长日人大桥忠一在广播电台作特别讲演，宣称：“满洲国”之国体变更，与复辟“完全无关”。溥仪亦发表宣言，谓“满洲三千万人民全体盼余践位，此为余之神圣权利”。同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发表声明，支持郑孝胥的声明，表示将促其早日实现，并电日本驻各国使臣向驻在国政府解释。

△　川军第五路军左方兵团之右纵队范绍增师在流江河东北双河场被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歼灭千余人。23日，王陵基急欲抢夺马渡关，亲临前线指挥所部续向马渡关推进，从东、西、北三面围攻红军，所部范师第十二旅在庆云场又被红军夜袭击溃，其左翼攻势遭挫。

△　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等部，为追剿刘桂堂攻河南涉县。29日，刘桂堂部由涉县西窜，绕道入太行山至林县。

△　伪满吉林省公署及省治安维持会，为镇压义勇军活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决定设立行政指导班、宣抚工作和施疗班，分向抚远、宝清、密山、同江、饶河、虎林等县执行任务。并于各地改组县公署，实施保甲条例，整编警察队，组织壮丁团，调查户口和枪支，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经费为20.655万日元。

△　北平“文化团体联合会”致电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建议设立“中央文化委员会”，集中人才从事编纂、译述以三民主义为范围的书籍，严格取缔“反动”宣传，以加强对文化领域的统治。

△　中国国际学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选举邬翰芳、徐泽予、许性初、王新命等15人为理事，项远村、黄造雄等五人为候补理事。会议通过建议教育部令各大学添设国际学院或增设国际课程、发刊《国际月刊》等15件提案。

△　黔桂公路于上年11月筑成，是日午后在广西南丹县六寨市举行通车典礼。

1月中旬　　上海《社会经济月报》创刊，社会经济调查所编纂并发行，孙成欧编辑，受农村复兴委员会委托进行经济调查与研究。

△　上海《时代漫画》月刊创刊，主编鲁少飞，发行张光宇，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1月**2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到会正式代表700余人，旁听1500人。毛泽东致开幕词。24日、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朱德、林伯渠分别作《红军建设决议报告》和《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大会通过《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大会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75人，候补委员36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35人。2月1日大会闭幕。

△　中央军李玉堂师由海道抵漳州南部，一部由嵩屿登陆进攻漳州，一部由角尾附近登陆进攻同安，于上午将漳州、同安占领。同日，李默庵师由仙游、枫亭进攻涂岭、驿版，第十九路军进行抵抗，与之鏖战三四小时，5000人被包围缴械，李师占领惠安；第九师李延年部越永泰、仙游经南安开向安溪。

△　蔡廷锴退抵龙岩，漳州后方部队随之到达，集结龙岩兵力约4000余人。蔡以与红军有边界协定，欲与闽西地方武装傅柏翠合作，遂下令破坏漳龙公路，将部队撤退大池、小池地区整理，计划以游击

战同蒋介石作最后斗争。

△　第十九路军第一军军长沈光汉、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第三军军长区寿年、第四军军长张炎受“力行社”特务头子戴笠拉拢收买，趁是日上午中央军进攻漳州时，通电脱离福建人民政府，投降蒋介石。

△　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王占祺奉外交部之命，就英国于上年12月侵犯云南边境事往晤驻滇英国领事哈定，哈定予以否认。25日，哈定又以个人名义致函王占祺，仍谓英缅人之开矿队未越边界进入班洪，无视事实接连加以否认。

1月22日　中央军宋希濂师占莆田，续向泉州推进；王敬久师与刘戡师相配合进逼泉州。对泉州取包围之势。

△　蒋鼎文拟定收编第十九路军办法，营长以上离营，余则点械收容。蒋介石即日复电照准，令第十九路军集合莆田、福清、惠安听候改编。次日，蒋鼎文电泉州第十九路军将领，限三日内作出明白表示。沈光汉等复向蒋介石要求仍驻泉州并保留第十九路军名义，另派戴戟来闽负责改编，至25日晚仍未开出泉州。蒋未允，仍以重兵压迫，准备以武力解决。沈等软化，表示听命调动，遵令候编。

△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毛泽东致函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表示向英勇的抗日战士致敬，希望继续坚持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发动群众完全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　宋哲元在北平邀集秦德纯、萧振瀛及赵登禹等会商应付日军要求中国撤退察东驻军的办法，决定派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协助察东防务，以对付日军对察东的侵略。23日，宋偕秦德纯抵北平，同何应钦商谈察东问题，决定对日之无理要求据理驳复。

△　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辞职，由沈瑞麟继任。

△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　上海《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发表宣言，声称“铲除电影界赤化活动”，并谓上海的明星、天一、联华和艺华四大电影制片公司，从1933年开始即被一般赤色作家和共产党人所“操纵”，“宣传赤化，鼓吹阶级斗争”；各电影公司今后绝对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描写阶级斗争和社会黑暗面的影片；凡已摄制者，“须自动删剪”，违者“定以炸弹轰炸”。并扬言将对田汉、沈端先、钱杏邨、茅盾、沈西苓、楼建南、许幸之等所编剧本进行取缔。

1月23日　国民政府任命阮肇昌为陆军第五十七师师长，李松山为第五十五师师长；准驻秘鲁特命全权公使魏子京辞职。

△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在议会发表外交方针演说，宣称：“满洲国”与日本有密切而特别的关系，此后应“极力为之援助”。“中国应速恢复其治安与繁荣，常保邻善互助关系”。表示日本政府“深切注意关心中国之共产党活动，及共产军横行之情况”。希望美国“增进历史上之亲善关系”，谅解日本在东亚之地位。并期望日、英两国“亲交关系之增进”。声称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唯一基石”，要求各国明白理解日本的现实地位。表示今后将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中国之权益应由日本独占，反对英、美之在华势力。按：此演说即为日本政府“天羽声明”的基调。

△　上海市邮务工会等50余工会，联名具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要求国民政府转饬立法院速即修改工会法，明文规定各省、市得组织总工会，或颁布上海市总工会单行组织法规；反对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擅改工会名称为“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致使市总工会组织无形取消。

△　河北迁安县西部农民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抗日反蒋暴动。是日晚，上下梨树峪农民百余人高举“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大旗，与苇子峪、上川的暴动农民汇合，收缴地主枪支，没收地主财物分给穷人，并攻打警察局。其后，国民党调大批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被迫转

移。

1月24日　内蒙代表赵泰保等连日向监察院长于右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求采纳原订自治大纲。是日，赵等再向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请愿，要求中政会重议蒙古自治方案。29日，赵等又谒蒋介石，并拟就长篇宣言，分派代表向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及行政、司法、考试、监察、立法五院再作最后请愿。强烈反对中政会所订自治方案，要求采纳蒙方意见，予以重议。

△　刘膺古部陶柳、钟光仁、易振湘各支队，分别由突石、分水坳、富财洲出发，总攻湘鄂赣红军根据地小源。红军徐彦刚部采取游击战术，迂回永新、安福、莲花边界。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福建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许锡清、委员兼秘书长李章达“附逆”有据，着即褫职；委员戴戟（兼民政厅长）、郑贞文（兼教育厅长）、孙希文（兼建设厅长）、高登艇、林知渊、李清泉免本兼各职。任命郑贞文、林知渊、孙家哲、孙希文、徐桴、李进甲、陈体诚、李清泉为福建省政府委员，陈仪兼民政厅长，孙家哲兼财政厅长，孙希文兼建设厅长，郑贞文兼教育厅长。

△　国民政府令免陈仪军政部政务次长职，遗缺由顾祝同继任。

1月25日　彭德怀红三军团，寻淮洲红七军团各一部于23日起，由福建将乐、夏茂进攻沙县，全歼蒋军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及靖卫队。是日，进占沙县城。

△　“剿匪”北路第三路军于23日以第十一、第六十七两师由河塘移集黎川；以第十四、第九十四师集结团村、五都围附近。24日晚，陈诚下令以第十一、第六十七两师为右翼队，受傅仲芳指挥进占横村；以第十四、第九十四两师为左翼队，由霍揆彰指挥进占樟村；第六师由龙安镇向横村。是日，左、右两翼同时发动进攻，董振堂红五军团踞守樟、横两村南部高地。战至下午4时许，陈部右翼队分经丁

路、杨家店占领横村；左翼队经铁炉、孔家田占领樟村。

△　刘膺古至万载，督率朱耀华、岳森两师及陶柳、钟光仁两支队，分三路进攻湘赣边区红军省军区及省苏维埃所在地小源，红军及苏维埃政府转移。

△　陈济棠委李扬敬、黄任寰为闽粤边防区正副司令，令黄克日调所部由闽西上杭开拔，先移永定，再移平和、云霄，向闽南推进。次日，又召集李扬敬，张瑞贵、缪培南等商订布防粤闽边防及处置第十九路军办法，决定以独立第一师黄任寰、第五师李振良、独立第四师邓龙光等分别开入闽西、闽南和广东大埔，设置第一、第二两道防线；对第十九路军残部允改编为一独立旅。佯称阻击第十九路军散兵，实为暗防中央军入粤。

△　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发表谈话，为伪满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谓“以往二十余年，中华民国废帝制，以共和相号召，实际上不过假所谓民主政治之虚名”，“故政治终致失败”。“我满洲国……应恢复旧道德，顺天意而实施君主”，“冶物质与精神文明于一炉”。

1月26日　林森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宣誓连任国民政府主席职，蒋介石、汪精卫等各中委、各部院会长官、各机关代表千余人出席。中监委员吴敬恒任新职大典主席，代表中央授印、监誓，并政训词，林森宣读誓词并致答词。

△　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委第一次全会通过决议：一、推定林森、吴敬恒、张静江、张继、蔡元培为监委会常委；二、推定萧吉珊为监委会秘书长；三、通过中央监委会组织法案。

△　“剿匪”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率罗卓英、樊崧甫等纵队由樟村、横村向建宁推进。同日，陈诚部第十一师黄维和第六十七师傅仲芳部进攻邱家隘；第七十九师樊崧甫（兼）进攻寨头隘；由第十四师霍揆彰、第九十四师李树森任掩护队，先分别

进占竹箕隘、大坪。董振堂红五军团猛烈反击，打退陈诚部冲锋十余次，但损失甚大，遂撤出战斗。傅、黄、樊等部进占邱家隘和寨头隘。

△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发表第二次宣言，指出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是改良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结果，是首领动摇妥协或叛卖的结果。号召全国工农及民众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政府。

△　红十七师萧克部奉中共中革军委命令由安福入分宜县境开始北上，准备会合红十六师和独立红三师共同东进南浔路。翌日，在萧公渡一举突破国民党军沿河防线，渡越袁水，北入分宜、新喻间之双林。28日，钟光仁部进占小源。29日，红军渡锦江入宜丰地区。刘膺古令所部朱耀华、彭位仁等对萧部主力“追剿”。

△　是晚，第八十三师刘戡部由仙游经泉州北部进占泉州。翌日，蒋鼎文自厦门抵泉州，下令第十九路军全部退出泉州，向指定之莆田、福清、惠安三县集中，听候改编。其中一部官兵，散处龙岩及闽西长汀、连城，彷徨无依。

△　孙殿英屡攻平罗不下，改以左翼队于世铭部佯攻平罗，由右翼队第一一七、一一八两师及一炮兵旅，在刘月亭指挥下经贺兰山潜入宁夏城郊北塔发动攻城。翌日，孙军爬城猛攻，两军激战数小时，午后，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抄袭孙军后路。孙军攻城失利，退集城西北之满达桥、礼拜寺、八里桥一带。双方形成对峙。

△　西藏驻南京代表接拉萨电称：西藏司伦噶厦益仓及僧俗官民大会举热振呼图克图为总摄政，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其军权仍由司伦噶厦负责。31日，行政院决议准热振代摄达赖职权，2月23日正式就职。

1月27日　国民政府任命李文范为国民政府委员。

△　林彪红一军团、罗炳辉红九军团各一部增援董振堂红五军团，分别向寨头隘、王坊发动反攻。次日，陈诚部第十四师、第十一师各以一团作掩护，将主力陆续撤回樟村，以便集中力量与红军作战。

△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南京谒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并请求予以经济补助。

△　西藏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代表程文渊、李春先等在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请愿，请求由政府设法驱除西藏宵小，改良政治，并派大员护送班禅回藏主持一切，以免西顾之忧。

△　财政部与中国、交通、中南、金城等16家银行合组之银行团签订4400万元借款合同，指定以意大利庚款余额为还本基金，海关税余款为付息基金，利率月息八厘，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偿清本息。2月8日，合同公布。

△　中华乡村教育社在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古楳、何玉书、彭百川等100余人到会。大会通过社章，提出调查、研究、实验、推广、编撰等五项工作任务。选举何玉书、陈剑修、吴研因、彭百川、梁漱溟等16人为理事。该社有社员200余人，团体社员20余个。分设事工、教育行政、社会教育、教材等四组分任工作。

1月28日　陈济棠以中央军占泉州、漳州，乃改订布防计划，指定独一师黄任寰驻上杭，独四师邓龙光驻永定，第五师李振良驻平和，独二旅严应鱼驻岩前。并于大埔、蕉平、蕉岭各县设警备司令部。布成弧形阵线，仍防中央军入粤。

△　蒋介石委派陈调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预备军总司令。2月7日，陈至南昌设总司令部。3月2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红新十军方志敏部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等三师由江西紫

湖口向浙江常山县球川镇出击。翌日，在江西玉山、德兴两县边界之大桥与当地驻军发生激战，常山县球川驻军前往增援，红军撤回。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主动放弃马渡关，退守大垭口、鹰背场之线。翌日，川军王陵基部右方兵团第八旅进占马渡关，第九旅本部进至马渡关左侧背之得胜场、鲁班河、百丈岩一线。

△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左倾”嫌疑逮捕民立女子中学秘书、《春秋剧社》主持人王大藻。市教育局以该校校长王本嵒“容留共党”，予以撤职，并派吴醒亚、童行白等11人改组校董会。

△　青海西宁青海电讯社创立，由陈秉渊主办。

1月29日　　国民党中央举行纪念周，陕西省府主席邵力子报告《西北开发与建设》。强调要开发西北，必先救济西北；要建设西北，必先发展西北的交通。

△　李济深于26日自汕头乘轮抵港，转赴澳门，随回广西。是日由梧州乘船经戎墟转回原籍苍梧县。

△　国民政府任命傅汝霖为内政部常务次长。

1月30日　国民政府任命班禅额尔德尼为国民政府委员。

△　蒋介石在泉州任命毛维寿、张炎为东路军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同日，毛、张在惠安通电就职。

△　行政院会议决议，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督办兼职（2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同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电令孙殿英率部退磴口以北地区，遵照北平军分会之编制进行缩编。

△　孙殿英由宁夏城北迁回宁朔，转攻宁夏城。是日在金家寨、

李家岩再次为马军击败。

△　滦榆行政专员陶尚铭与日特务机关长仪我在天津商定《改正榆关接收方案》六条，定于民国二十三年2月10日实行接收。按：1933年1月3日，日本陆海空军联合攻陷榆关，自此榆关为日军侵占。嗣经签订中日《塘沽停战协定》，日方将榆关交还中国接收。几经谈判，始达成《接收方案》六条。

1月31日　顾祝同委薛岳为北路“剿匪”第六路军总指挥。以第四十三、九十七、九十二、九十三等师编为第六纵队，由刘绍先任指挥官；以第五十九、九十、九十九等师编为第七纵队，由吴奇伟任指挥官。同时，命两部由永丰经古县、藤田向彭德怀红三军团和寻淮洲红七军团阵地沙溪、龙岗圩、古龙岗等地推进。

△　甘宁陕绥靖主任朱绍良由兰州赴中卫，调部支援马鸿逵抗击孙殿英军。2月2日，青军骑兵第二师马步青部抵宁朔，马得援军后，宣称将以全力反攻。

是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红一方面军总部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　南昌行营划江西全省为五大守备区。以丰城、清江、新淦、永丰、吉水、藤田、乐安、凤冈为第一路守备区；宜黄、新丰、南丰、黎川、南城、临川、崇仁为第三路守备区；资溪、金溪等县为第五路守备区；余江、万年、东乡、贵溪、乐平、德兴、浮梁、铅山、弋阳、横峰、玉山、上饶、广丰为赣东守备区；峡江、吉安、泰和、遂川、万安为赣江守备区。分别训练团队，建筑碉堡公路，防堵红军。

△　日本陆军参谋部决定所谓《对察施策》，依据其上年7月16日

关东军参谋所提《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要案》，以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地区为“施策目标”，并依情势的发展向西扩张，企图建立第二个傀儡——伪“蒙古国”。《施策》的项目包括：开辟交通、通商交易、开发产业、利用喇嘛教及回教、设置经营教育、医疗和善邻会馆。宣称建立蒙古军，强化蒙古自卫军，设置通讯机关、谍报等。

△　关东军、“满铁”与伪满共同组设劳工管理委员会，以管制和限制关内移民。

△　川军田颂尧第二十九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在川北潼属各县，先后破坏中共川北各地机关30余处，逮捕共产党员156人，查抄文件、刊物9000余件。

△　教育部在南京设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专门办理救济东北青年教育事宜。

△　广西省苗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特种教育委员会）成立，由省教育厅长雷沛鸿兼任委员长。其任务是在苗、瑶族中推行教育工作。

△　《四川经济月刊》在重庆创刊，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编辑出版。

2月

2月1日　　蒋介石由京抵杭，部署福建军事善后事宜。同日，张学良往杭州谒蒋，向蒋表示“一切听命中央”。

△　北路军第三路军陈诚部由黎川南进。林彪红一军团由毛坊、王坊附近再次反攻寨头隘、西成桥及平寮等阵地，战至次日11时许，撤至溪口坊（圩）、将军殿之线，会合董振堂红五军团、罗炳辉红九军团在鸡公山等地筑堡，阻击向南推进之樊崧甫、霍揆彰等部。

△　刘建绪电令第十五师王东原乘红军萧克部北入宜丰、同安之际进攻永新。

△　盛世才部西路军在伊犁集兵4000余人反攻昌吉，次日击败马仲英军。马部由昌吉撤退南梁。

△　中国青年党党员苗可秀、赵同等18人，在辽南三道虎岭改组原“劲斗团”，成立中国少年团，组织抗日铁血军，以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任总司令，赵同任参谋长。铁血军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满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的口号。8月，铁血军增至300人，年底约近500人。

△　云南各界在昆明组设“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对付英军入侵班洪等地。并致电国民政府，表示誓作政府后盾。

△　刘桂堂率部突破冀南皮岭至磁县，次日夜南入漳河，3日窜河集，何柱国部跟踪追击。6日、7日刘部窜辉县，8日至修武，遭王奇峰骑兵师和常经武师堵截。后于9日入孟县。

△　财政部规定：自是日起，征收田赋改收纸币。同日，又令所属各机关于本日起实行度量衡新制，所有各种非法度量衡器具一律禁止使用；并饬全国度量衡局从速举办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以推动全国度量衡的划一。

△　广东省政府组设经济设计委员会，对工商业实行统制。

△　粤汉铁路韶（关）乐（昌）段正式通车。

△　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在上海开幕。资本500万元，董事钱新之、秦润卿、王伯元、胡文虎等。董事长王伯元、总经理梁晨岚。

△　陕西考古会在西安成立，张鹏一为委员长，徐炳昶为工作主任，翁文灏等10人为委员。该会决定先发掘斗鸡台遗址。

△　南京《中国文学月刊》创刊。主编萧作霖、陆印全，编辑张资平、何德明、黑婴、汪馥泉、赵景深等，流露社出版。

2月2日　　红军第十七师萧克部由宜丰北进，是日占领宜丰、上高以北的找桥，东入奉新县黄沙坳、上梅、凤凰山一带。翌日，第十八师朱耀华部和第六十二师陶广部之一旅赶至，在黄沙坳地区与红军激战。红军突破陶广部钟光仁旅阵地，乘胜全线出击，朱、陶两部溃退潭山市。当夜，萧克部与红十六师高咏生部在黄沙坳会师。

△　陈济棠派员至龙岩谒蔡廷锴，接洽收编第十九路军残部。蔡为保存最后一点实力，同意粤方收编。6日，陈经中政会同意后，改编该部为粤军独立第三旅，任命第十九路军军需处长黄和春为旅长，退驻永定、上杭，受黄任寰指挥。

△　新任福建省主席陈仪、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召开省府委员及军事特派员联席会议，讨论编遣民军、“剿共”、整理民政、统一财政等问题。决定收编民军改为保安队，由陈仪兼任保安处长，萧乾任司令。军饷请中央拨付。

△　中国地方自治会在南京成立，于右任等发起组织，推举陈立夫、张道藩、谷正纲等24人为理事。该会标榜“以调查地方自治”为宗旨，通过《中国地方自治协会简章》，凡19条。

2月3日　　蒋介石为“剿共”军事电陈诚，核准“先由樟村西向南丰构成樟南间横缀碉堡线，由黎川以西钟贤、东坪一带守军推进接守”，“逐步交替向建宁推进”之意见。并令东路军以第八十八师孙元良、第八十九师王仲廉及第四师冷欣编为第十纵队进入闽西。先集中延平，次向沙县、泰宁进展。

△　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张学良在杭州开会，商定扩充空军之经费，以实现其四中全会通过于本年内向英、美购买大量飞机的决定，以备“剿共”和对粤作战。翌日，续商“剿共”军事，蒋立促孔、

宋速筹军费。

△　国民政府任命陈训泳为海军部常务次长，免去其原任海军练习舰队司令职。

△　上海真如国际无线电台举行中英直接通报开幕典礼。上海至伦敦间直达电路开放。

2月4日　下午3时，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余汉谋等2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粤军“剿共”军事方针及海空军之实力扩充。决议：一、陆军推进赣南闽边区“剿共”。其攻的方略是，与东、西、北各路军联络进行，听从军委会命令。守的方略是，饬新开上杭、永定之邓龙光师担任建筑防御工事，暂由黄任寰任指挥；二、海军补充“海圻”、“海容”、“肇和”三大舰之实力，除添换新炮外，由黄埔海军学生补足原额；三、空军将五大队各扩充一倍。同日晚，陈在谈话会上宣布，中止入闽部队之前进，对江西取守势；又令陈维远撤销闽南警备司令部。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以一部主力在东线进攻万源，川军城（口）万（源）游击司令陈部败退宣、万交界区红庙子、樊哙店地带，红军再占万源。红四方面军在西线一部退集柳池、木门。是日川军第一路军邓锡侯部进占旺苍坝。

△　孙殿英部以主力进攻宁夏城，所部夏维礼旅等由大礼拜寺、八里桥攻至城西南，被马鸿逵部骑兵击溃。翌日，孙军刘月亭部由宁夏新城西南绕至唐渠两岸，猛攻城北小礼拜寺、满达桥，马部骑兵迂回至孙军侧背反击，激战竟日，孙军又败。

△　伪满东北交通委员会通过《国有铁路归并四局案》，决定设立奉天、吉林、哈尔滨及齐齐哈尔等四铁路局（原为九局），分别管理奉天、沈海、京图、呼海、洮昂等铁路线。4月1日正式成立四铁路局，同时，并设哈尔滨水运局、铁路学院。水运局除掌管船舶及码头

外，并经营陆路汽车，日益成为全面控制我东北之交通机关。

△　湖南省政府令警备司令部、省公安厅、长沙市政府，严厉取缔未经登记的群众团体。

2月5日　　蒋介石在杭州出席浙江省党政联合纪念周并训话，大讲所谓“教、养、卫”。侈谈“教的根本在使人人知礼义廉耻”；“养的根本在人人知衣食住行”；“卫在训练保卫团基队”，“教其放枪射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要求首从江西做起，再推行全国。12日，蒋又在南昌行营训话，鼓吹“以实行教、养、卫三字造成复兴民族的基础”，并将教、养、卫三字归结成“礼义廉耻，衣食住行，共同一致”三句话，为其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做准备。

△　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令朱耀华、彭位仁、郭汝栋和岳森等师，分向奉新以西之上、下梅、凤凰山、黄沙坳地带红军发动总攻。并令“在进剿作战区域所有山林，应四面纵火焚烧”。红军萧克、高咏生部分别转入甘坊、九仙汤。

△　陶尚铭在天津向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请示接收榆关问题。晚，陶率临榆县县长袁泰、公安局长苏玉琦赴山海关，与日方代表仪我交涉办理接收事宜。组成榆关接收委员会，以陶为委员长，苏玉琦、袁泰、朱震五及榆关商会会长、邮电局长等为委员。

△　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分电阎锡山、傅作义、朱绍良、马鸿逵及于世铭等，通令免孙殿英北平军分会委员、第四十一军军长兼第四十师师长各职，并着即撤销第四十一军及第四十师番号，所属步兵交于绎庭、刘月亭两旅长负责指挥，各给三个团编制；所属骑兵交副军长于世铭指挥，亦各给三个团，均退集磴口以北整顿，归军分会直辖；如孙不听命，即由晋、绥、甘、宁各军将领以有效方法严厉处置。7日，国民政府公布免孙命令。

2月6日　　第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在莆田、惠安、福清等地

之原第十九路军二万余人，于是日及翌日被中央军宋希濂等师全部缴械。8日起，新编第六十师陈沛部开始由莆田徒手乘轮北上，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杨步飞第六十一师、文朝籍第七十八师等集中莆田、惠安等地，随后至上海、南京转乘津浦路专车北上，17日运完。其中下级军官分送南京、洛阳两军校受训，全部士兵分驻开封、归德等地，交河南刘峙整训，三个月后分发各部队。

△　上月24日红三军贺龙部由西库向永顺城进攻，因湘军龚仁杰旅罗致英团固守未克。是日，红军放弃进攻永顺，乘机以主力攻破桑植城。何键急令龚仁杰、朱际凯、罗致英等部反攻桑植。

△　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鉴于日伪军在察东活动频繁，是日偕秦德纯前往张北沽源、商都、宝昌、赤城等地视察，8日返回张家口。

△　新疆伪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沙比提率兵围攻马占仓、马绍武军，马仲英派东干回军6000千人由焉耆前往救援。是日，马军击溃沙比提伪军，进占喀什噶尔之疏附（回城），沙比提逃往叶尔羌，伪府人员星散，伪“东土耳其共和国”解体。

△　日军驻虎林司令官筱原大佐，以虎林义勇军红玉山部2000名自上月30日至本月1日退入苏境，竟向苏军司令意马纳夫发出通告，要求苏联确认已加以收留；并称“万一发生有悖友邦之谊时，于‘满’俄两国之亲善，将召多大之障碍，本官甚为忧虑”。

△　墨西哥加下省燕线拿打埠全体华侨向国内发出通电，报告墨西哥排华情形，呼吁援助。电称：从1月起，墨西哥排华党“保种爱国会”四处散发传单，宣告与华人经济绝交，驱逐华人出境。2月5日更有党徒分别把守华人商店，不准墨西哥人前往购货。华侨向当局进行交涉，不予接见。嗣经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多次交涉，始将其排华风潮平息。

2月7日　　国民政府特派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

△　国民政府令免第四十一军军长兼第四十师师长孙殿英本兼各职。

△　蒋介石为加紧“剿共”，下令苏浙闽皖赣五省边区公路局长曾养甫，限期6月前完成五省边区之公路。

△　朱耀华、彭位仁两部追击湘赣红军萧克、高咏生两部至甘坊。次日，高部转入石门楼附近塘埠一带，摆脱朱、彭两部追击。红军续向南浔路前进。

△　蔡廷锴离龙岩，乘机飞梅县。19日由汕头乘轮船抵香港，之后暂居九龙。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由经委会、内政部、财政部合组土地委员会，于六个月内将全国土地作有系统之调查。又决定全国水利机关暂归全国经济委员会统辖。

2月8日　　薛岳部自永丰向藤田进攻。是日以其先头部队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攻占藤田东北大、小旅岭。10日，分别在大、小旅岭、福华山、天台山、曾坊、上下秋陂、新墟、老墟、花木前、瑶岭、南华山、瑶华山、杏塘、瑶村、下严坊等地开始构筑藤田至瑶华山之碉堡共89座；并派出游击队一支，向沙溪、白沙、石马、螺田、大水街、水口、罗背街一带苏区进行侦察和破坏，以掩护其筑堡活动。16日，藤田、瑶华山一带碉楼完成。

△　红三军贺龙部退出桑植，在永顺县双溪桥、五里桥与米树勋部教导团激战。次日，红军分兵在毛坝、宫坝开展游击。12日，湘军龚仁杰、朱际凯部回驻永顺城。

△　红新十军方志敏部再次集中紫湖口，进攻浙边王板、华埠地

带。翌日，红军一部与浙江保安纵队指挥蒋志英部遭遇，即以主力绕道常山，将蒋部截为三段，溃其一营。10日，红军返回赣边玉山。

△　盛世才部借助苏联红军援助，在迪化西北头屯河大举反攻马仲英军。11日，马军作战失利，马虎山受伤，被迫从迪化退往达坂城。

△　川康边防军司令刘文辉派康藏交涉员兼德格知事姜郁文在矮达与西藏噶伦及三大寺代表琼沚等举行谈判。藏方提出：一、德格（包括邓柯、石渠、白玉等县）、甘孜、瞻化、朱倭（炉霍县属之一村）及康南之井盐、巴安县属河西各村之地，须完全交藏方管辖；二、康、藏前在冈拖所订立之停战和约无效；三、川、康军应无条件容许达结寺僧返寺，否则彼等将采取自由行动，藏方不负责任。刘文辉代表拒绝藏方条件，谈判三日未有结果。

△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〇八次会议决定派陈肇英为福建省国民党代表大会筹备专员，主持全省党务；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一律调回，派苗培成为安徽省党务特派员；四川党务特派员仍由曾扩情继任，限六个月完成工作。

△　孙殿英军继续进攻宁夏城，是日，何应钦下令晋、绥、甘、宁、青五省分别出兵，对孙殿英军实行围剿。由晋绥军任堵截，宁夏各军任截剿，甘、青、陕各军联合防堵。

△　国民党中央决定组设国民党党史馆，以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孙科、戴季陶等九人为建筑委员，拟定于南京明故宫旧址建馆。

△　宁波和丰纱厂因纱业疲惫停工，3月23日复工。此后时开时停。

2月9日　　蒋介石由杭州飞南昌，行前召见张学良指示豫、鄂、皖三省“剿共”计划，抵南昌后即饬赣西各县部队跟踪追击湘赣红军。

△　第五纵队罗卓英部于7日筑成樟村、横村北至龙安镇，南至邱家隘寨、头隘间碉堡，并集第十一、六十七、九十四、七十九各师于樟、横两村地带。是日起至15日，陈诚命其主力西移，以便筑成西成桥至南丰间封锁线，准备进攻凤翔峰、司令岩。罗卓英部向西成桥西南端大、小鸡公山发动攻击，占领大、小鸡公山。10日，林彪红一军团、罗炳辉红九军团反攻鸡公山未成，退集西成桥及其南部黄家隘、五通桥阻击罗部。

△　宁、粤商定粤、闽、赣边区“剿共”军事计划：决定由粤方派黄任寰师开抵永定、坎市、蓝家渡、合溪、樵市、湖雷等地；以李振良师四个团分驻上杭、武平、峰市、蕉岭；以第四师邓龙光师驻防大埔、枫朗、梅县、松口、五华、兴宁等处；独立第二师张瑞贵部驻饶平、浮山、黄岗、潮平一带。

△　川军罗泽洲部在杨森部配合下，在西线巴中县属天池地区与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一部作战，激战竟日，红军退鼎山场，一部据守黑山寨。罗部进占天池。

△　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派飞机三架在宁夏城郊助马鸿逵军，是日马军转守为攻，孙殿英军在飞机轰炸和风雪的袭击下撤至平罗以北。11日，孙殿英亲自督率敢死队5000人再攻宁夏城北，并以主力攻击马军左翼阵地千家寨、罗家湾、谢家庄等地。12日，朱绍良调集第一师胡宗南及甘肃新十四师鲁大昌等部援马。

△　据上海《时事新报》报道，财政部为统一华北税收机关，将河北省财政公署撤销，新设冀、察、晋、绥四省统税局，任命宁恩承为局长兼华北矿税专员，关吉玉为副局长。

△　立法院通过《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草案》，17日公布，决定原隶国民政府改隶行政院。

2月10日　蒋介石令蒋鼎文确定东路军战斗序列：以汤恩伯为第

十纵队指挥官，隶属第五路军，辖第四、第十、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各师，限期集中延平；李延年为第四纵队指挥官，隶属第二路军，辖第三、九、八十三、三十六师共四个师；刘和鼎为第九纵队指挥官，隶属第五路军，辖第五十六、五十二、八十、新编第十一师、第八十五师及独立第四十五旅；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为总预备队。17日，汤部集中延平，设立纵队指挥部。18日，蒋再令汤恩伯由青州直攻沙县，或先占将乐、归化。并令闽北前方各部队于卫立煌总指挥未到以前，概归刘和鼎负责，而以汤为闽北前敌指挥官。

△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东线王宏坤红四军、余天云红三十军各一部，趁川军准备春节休整之机向其右翼大举反击。翌晨3时，红军集中第九、四、三十军各一部夜袭宣汉、万源间的马鞍山楼门口，经昼夜激战，在罗大湾全歼警备第三路军（相当于一个旅）及另两个团，击毙第三路军副司令郝耀庭。

△　蒋介石以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据万源以东城口诸地，北连陕、鄂门户镇巴，电令刘湘、杨虎城转饬镇巴驻军相机“进剿”，以阻红军入陕。

△　榆关接收典礼在临榆县署举行。日方代表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天津驻屯军代表川合等，按照1月30日所商定之“方案”，移交部分行政权给中国代表、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是日，新任临榆县长袁泰及山海关公安局长苏玉琦分别就职。接收后，伪机关仍占据城外，日关东军一部及特务机关、宪兵队仍继续常川驻榆，其余日伪机关如牌照签证所、“国境”警备队、“国际”防疫所、绥兴捐税分卡及电报邮局等均继续存在。中国警察在榆关只限定200人，且须徒手站岗。一切抗日爱国活动更被绝对禁止。

△　云南班洪、班老群众在殖边督办李曰垓领导下，阻止英人在班洪强采金银矿及修筑道路、建筑营房。班洪王胡玉山已与英兵开战三次。英国侵略者收买班弄头目马美廷、户板头目宋忠福及永班王等

所属土民，于是日再次进攻班洪村寨。班洪头目率众在班洪老丫口寨拼死抵抗，连日坚持战斗。

△　日本在大连召开所谓“亚细亚民族合作”预备会议，诡称为亚洲有色民族“夺回自由与繁荣”，“脱出白种人压迫”。12日会议闭幕，推鲍观澄为会长，日人十河为顾问。

△　伪“协和军”司令石友三派其党羽由沈阳潜赴滦东鼓动旧部胡协五（滦东战区保安第一队队长）投敌不逞。是日，石即收买胡之部下张福堂将胡杀害。

2月上旬　　陈济棠电蒋介石表示其对第十九路军之处理意见：一、调该军前往江西“剿共”；二、粤方不再继续协助该军军费；三、改编后断绝与西南方面的关系；四、粤方入闽部队暂不离闽；五、该军各高级将领由“中央”制裁，以防野心再起；六、闽西、闽南防务仍由粤军负责。蒋接电后复陈，谓俟日后再定。

2月11日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通电，重申“剿匪”及生产建设之主旨。谓“救亡图存之方策，以为治标莫急于剿除‘赤匪’，治本莫急于建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同时，呼吁中央、地方开诚相与，亲密合作，救亡图存，共同迈进。

△　湘赣红军萧克、高咏生两部由山口渡修水，进入浬溪、甫田桥，在武宁附近击溃湘军第十六师彭位仁一个营后，于是日进占武宁北之芭蕉、横路铺等地。翌日，朱耀华等部星夜追至箬溪，郭汝栋等两师由龙港追向横路铺。红军在郭部到达前转移，16日进至瑞昌附近范家铺、王家洲、南田铺一带。西路军总司令何键除令刘膺古立即派队尾追，命湖南省保安司令李觉往万载指挥外，并请南昌行营于南浔铁路堵截。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何畏第九军在东线进占四川宣汉县毛坝场以西的红岩，以八个团攻克王陵基直属第三师驻地胡家场，歼灭该师

第七旅大部，活捉其第九旅旅长张邦本。翌日，红军掉头西向占领池溪场。14日，红军转攻为守，集主力包围第七旅许绍宗部于鸣鼓场、老木口。许旅在鸣鼓场地区被红军围困达27日之久。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发表第三次宣言，略述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协议联合反蒋抗日经过，指出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只在口头上宣布一些左的改良主义政纲，在军事上采取失败主义路线，在群众运动上不仅未给民众以民主权及武装民众，反而予以限制。宣言再次声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军事委员会决不因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而放弃愿在过去三条件下与任何抗日反蒋军队订立协定的提议。指出只有全中国抗日反蒋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卖国政府。

△　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派刘建承至太原谒阎锡山，协商晋、陕联防堵击孙殿英军。

△　国际邮政第十次大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国政府派驻瑞士公使胡世泽、驻葡萄牙公使张歆海、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黄乃枢为全权代表出席。

△　刘桂堂部众一股窜河南济源县，13日大股越黄河达孟津、磁涧，一部西入渑池。15日大股抵宜阳。17日窜入洛宁，该县县长秦硕弃城潜逃。

△　“中国文化协进会”南京分会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潘公展为秘书长，周佛海、王云五、张竹平、郑正秋、叶秀峰分任教育、出版、新闻事业、电影、广播事业等委员会主任。该会在国民党“CC同志会”操纵下，鼓吹孔孟之道，出版反动宣传书籍，配合蒋介石军事反共，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并于各省、市设立分会，极力拉拢各地大专学校校长、教授及文化界名人为理事。

△　刘家俭等在南京创办“中德编译社”，社址设励志社内。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王劲修为福建兴（化）泉（州）永（春）警备司令，指挥闽南地方军队。

△　陈铭枢离港，乘“康德罗梭号”轮赴法。

△　教育部在北平设“东北青年救济处”办事处，开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及私立东北中学，以收容东北流亡失学青年。

2月12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讲话，题为《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宣称：“今日国家之存亡，系于江西，故江西应作复兴民族之基础。”并谓：“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根本任务，为‘数’、‘养’、‘卫’。”

△　晚，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与杨永泰、熊式辉谈“剿共”问题，称“预定于三月十日前第二期作战开始，三月杪，到达连城、宁化、广昌、龙冈之线。四月杪或五月十日到达汀州、宁都、兴国之线。六月杪占领瑞金、雩都，肃清残匪”。

△　铁道部全国公路线自1931年6月6日公布后，至今完成第一阶段之路线，计：京桂、京滇康、京藏、闽新、绥新各路线共5100余里。

2月13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军代表举行军事会议，部署“剿共”军事，继续指挥第五次“围剿”；并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路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

△　阎锡山电北平军分会，谓其已向晋绥军下动员令共同堵击孙殿英军。同日，孙军驻晋办事处自动结束。

△　藏军千余人从南路绕道袭击德格后路，并以牛皮船20余只从北路渡金沙江进攻巴安。15日，藏方再次增兵猛攻金沙江东岸邓柯

城，截断与德格间交通，进而占领邓柯城。16日，川、康军增援部队赶到，将藏军击退，夺回邓柯城。17日，康、藏两军在德格展开激战。

△　上海具有数十年历史之老九章、何恒昌两大绸缎庄亏累歇业。

2月14日　北平军分会委傅作义任晋绥军总指挥，阎锡山亦派王靖国、赵承绶率部集中临河，袭击孙殿英军后路。同日，陕军井岳秀部进驻安边堡。

△　新疆克尼斯族军（亦称回兀兀）得英军暗助，与喀什噶尔守备队（东干回军）发生战争。是日，喀什噶尔守备队袭击英驻喀什领事馆，焚烧馆址，英四人受伤。

△　天津市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以天津北洋、荣昌火柴厂及北洋、恒源纱厂等相继停工，全市失业工人近万人，是日发出代电，呼吁当局严令各厂即日复工，以维工人生计，安定社会。

△　《新生》周刊在上海创刊，发行人兼总编辑杜重远。该刊继承邹韬奋所办《生活周刊》的反帝爱国精神，勇敢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会同警察厅查封南京神州国光社。

2月15日　陈诚以樊崧甫师为主攻，以傅仲芳师及税警团、迫击炮连协助，猛攻林彪红一军团阵地凤翔峰（江西康都县属）。次日，红军反攻宜古坳，击溃敌军一营，毙团、营长五人。红军亦受重大损失，撤入杭山圩、太和圩。樊师占凤翔峰、芦坑。17日，傅师攻占凤翔峰南部司令岩。

△　晨8时，红新十军方志敏部进攻浙边开化县大桥头，浙江保安队蒋志英部由华埠增援，红军与之激战至夜11时。翌晨，红军撤回江

西德兴县紫湖口、马岭。

△　黔东军车鸣翼与湘西军陈渠珍，在湘、黔边界之龙溪口会商解决双方军事冲突的办法，共同协定：一、陈渠珍部撤回湖南；二、车鸣翼离军，下野出国；三、车部由其部将李可达收缩；四、双方停火，弃嫌修好；五、铜仁由王家烈部柏辉章驻守，绥靖黔东。

△　中国工程师协会应刘湘之请组成四川实业考察团，以萨福均为团长，团员23人，是日由上海启程赴川考察钢铁、水利、交通及盐糖、皮革等各项工业，以备投资开发四川工矿业。

△　上海《国货月报》创刊，主编高时伯，中国国货月报社发行。

△　杭州全浙新闻通讯社创立，李志正主办。

2月16日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联袂抵平谒何应钦，商榷处置孙殿英军办法，决定对孙殿英本人再作最后一次劝告，希遵令将所部交于世铭等分别统率，退出磴口以北待命；如孙不听从劝告，则仍由晋、绥、陕、甘、宁、青军事当局加以围剿。

△　日军独立守备队发动“清乡”，对东边道、辽东、辽南之三角地抗日义勇军进行“大讨伐”。

△　上海《人言周刊》创刊。主编谢云翼、郭明，编辑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发行人章建之。

2月17日　　湘赣军区红军高咏生第十六师、萧克第十七师进攻德安县马回岭和沙河车站，九江、南昌震动。是日，蒋介石急令陈雷率三旅兵力，在瑞昌、珉山、德安、永修之线堵击并赶筑工事；命刘膺古抽调两个团于箬溪至白槎，沿修水、武宁间堵截；命朱耀华、彭位仁两师寻红军主力追击；命郭汝栋师兼程前至范家铺防堵红军西进；

并令刘膺古克日驰赴武宁统一指挥第一、二两纵队。同时，张学良亦派一独立旅开往大冶防堵。

△　刘湘以王陵基在宣汉、万源间之楼门口及胡家场惨败，于上日将其召回软禁，并撤其本兼各职。是日，刘召集各路正、副总指挥邓锡侯、田颂尧、李其相、杨森、罗泽洲、范绍增等举行军事会议，会商第二期“剿共”计划，决定以唐式遵、许绍宗分别接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和第三师师长（3月6日明令公布）；先将红军压迫到通江、巴中、木门以北，相机威胁南江牵制红军主力，再推至通江县石盘关至竹峪关以右一线进占万源，封锁川、陕边界及镇巴，切断红军通往陕西之退路，以谋全歼为军事方针，全部兵力约55个师。并着各路军正、副总指挥即赴前线准备进攻。3月3日正式发布川军第二期总攻令。

△　北平军分会召集晋、绥、宁、青、甘五省将领傅作义等开会，具体商讨对孙（殿英）军事，决定以晋绥军负责东北路，甘、宁、青军负责西南路，分别从大同、绥远、仓头及其他五处围剿孙军，并派空军助战。

2月18日　“剿共”西路军王东原师分兵绕攻赣西永新县黄竹岭，袭击湘赣红军侧背。次日，红军第十八师徐彦刚部由黄竹岭退守南华山，蔡会文等部亦撤至永新东南，王师进占永新。

2月19日　新生活运动开始。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称“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要求首先在南昌和江西推行、发动“新生活运动”。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自任会长，旋颁《新生活运动须知》。23日，蒋在南昌再次讲演，要求全国达到“国民生活军事化”。并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

△　湘赣红军萧克第十七师攻入瑞昌之黄老门、九源渡及上、下

陶庄。次日在陶庄与岳森部发生激战。20日，刘鹰古由万载前往武宁督战，至夜红军突围南移。21日，红十七师在柘林市巧渡修水，南进靖安北部前庙、东坑山，湘军岳森师尾追。

△　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北平军分会委员胡毓坤、戢翼翘等联名致电孙殿英，促孙遵平军分会令停止军事行动，交出军权离军引退。23日，孙复电表示愿离军。

△　英国驻滇领事哈定就英侵我云南边界事照复外交部驻滇特派员王占祺，坚持以非法的司格德红线（按：指英国司格德于1904年自划的界线）为中缅边界。王据理予以驳复。

△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奉中央宣传委员会第三十号密函，内称“查上海各书局出版共产党及左倾作家之文艺作品为数甚多。兹经调查，其内容鼓吹阶级斗争者计149种”，涉及上海市25家书店。要求“严行查禁，并勒令缴毁各刊物底版，以绝根据”。

△　全国经济委员会组设蚕丝改良委员会，以曾养甫为主任，谭熙鸿、沈百先等九人为常委，并议定《改良全国蚕丝大纲》。

2月20日　蒋鼎文在厦门就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总司令职，于厦门设总部，由参谋长赵南主持。22日，蒋计划指挥所部，一部由沙县、将乐进入泰宁、归化，向建宁进攻；一部由龙岩进攻代英、连城。并于漳州、龙岩、上杭、新泉、连城、将乐至永定一带，构筑东线堡垒封锁线。

△　北路军第六路军薛岳部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与红军警卫师战于江西崇仁县马鞍石，其一部攻占大排。

△　行政院会议通过铁道部为实现兴筑新路，整理旧路计划而发行“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期铁路建设公债”案，发行额1200万元，4月30日公布条例，5月1日发行。

△　班禅额尔德尼在南京就国民政府委员职。

△　刘桂堂部众窜至陕县，何柱国、唐俊德、高桂滋等部分别堵击。25日，刘部入卢氏县，继渡洛河入豫陕边地带。

△　行政院第一四八次会议决定筹组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以褚民谊为筹委会主任，聘于尔普、王曾善、杨虎城、林竞、李景枞、艾沙等25人为委员。

△　上海银行界张嘉璈、贝淞荪、李铭等以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名义致电美总统罗斯福，表示对美国政府实施新货币政策，提高银价之举不予赞同，请其考虑提高银价对华不利之点；并致电财政部要求“缓批世界经济会议所产生的白银协定”，以应付国外之货币侵略。27日，上海外侨公会亦电请罗斯福对白银法予以慎重考虑。

2月21日　　湘赣红军第十六师高咏生部转经瑞昌西部横港抵瓜坑。次日，刘膺古命令以朱耀华率钟、李、易各支队继续尾追外，改派彭位仁师经永修车站牛萍公路西进高安附近截击，命郭汝栋师向瓜坑前进，并电请蒋介石转饬德安驻军驰赴奉新、上富之线堵截；令第二十六师王镇东旅等部由武进开驻箬溪、河浒，阻止红军南进。

△　薛岳督率韩汉英与欧震两师，集中炮火轰击沙溪，红军江西军区陈毅部与之接战。经过顽强抵抗，红军分别撤至上固、潭头及上、下溪一带。薛岳部占沙溪。

△　刘湘增调第一师彭光仁旅、第二师林毅旅及陈兰亭部开赴梁山、开江一带，归第五路军唐式遵指挥，加强其主攻力量。25日，蒋介石电刘湘，嘱其“化除门户之见，团结一致，奋勇‘剿共’，由先生全盘指挥，调整补充，限一二月内收复通、南、巴”。

△　日使有吉在南京面谒汪精卫，交涉中日悬案问题，试探中国政府的对日方针。汪表示完全同意日本广田外相的外交方针。中日悬

案之解决，决先从易开始。

△　吉林国民救国军余部在中苏边境被日军讨伐队围剿，损失惨重，该部代总司令吴义成率60余人逃入苏联境内，余部30多人在吉东分水岭组成游击队。

△　国民党中政会第三九六次会议通过地方自治原则三条：一、确定县与市为地方自治单位；二、分扶植、开始、完成三期之程序进行；三、为推行政令起见，每省至少应设县政建设实验区一处，或分区设实验县若干处，以为研究及实验中心。

△　南洋华侨陈嘉庚公司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遭到巨大亏累，宣告破产，失业工人达6000余人。

△　上海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到会有北新、现代、光华、生活及新中国等30余家书局。会议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转令上海市党部分向各书局查禁大批进步书刊事作出决议：一、以全体出版业名义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暂缓执行；二、要求对所被禁书刊进行复查，并说明其被禁之理由；三、公推代表五人向当局请愿，要求收回成命。

2月22日　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指出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必须保障无产阶级的骨干及对领导权的实现；必须最广泛地武装群众，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名称，并号召其加入人民革命军；在党领导下的游击区建立起临时革命政权；坚决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对城市工人运动予以极大转变，建立极广泛的群众反日统一战线。

△　陈诚部筑完樟村、西成桥、沧浪、石沟圩至南丰之封锁线，令第三路军主力集结南丰，以备南进广昌。25日，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迁南丰城。

△　汤恩伯纵队第八十八、八十九两师达顺昌，准备进攻将乐。红军寻淮洲第七军团踞沙县高沙、鱼溪湾；彭德怀第三军团主力进入夏茂、富口、漠源。翌日，汤恩伯恐受夹击，乃改攻沙县，以第八十八、八十九师进攻夏茂、高沙线，警戒将乐；而以一部配合第四师进攻沙县，并令第五十二师由尤溪协攻。

△　蒋介石电汪精卫，要求拨中英庚款作为特种教育经费，计划在其侵占的苏区内施行反共教育。

△　国民政府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严厉执行新闻检查。规定凡有不服从检查者，予以停版三日到一星期的处分。24日，对南京新闻通讯社处以停刊五日的处分。

△　孙殿英将前敌总指挥刘月亭撤职，挑选班、排长800余人为骨干，亲自督率再攻宁夏城，图作最后大拼杀，一日间孙军死伤400余人。翌日，孙军又猛攻宁夏城，马鸿逵电平告急，两军激战两日。24日，甘、青军在宁朔之金积与孙军接战，晋军进迫磴口，对孙军形成夹击之势。孙部将领杨子卿等向马鸿逵投降。

△　内蒙哲里木盟、卓索图盟等盟长、王公通电表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求自治，决不受日伪诱惑；盼国民政府以黄绍竑在蒙所议方案为圭臬，从速复议自治办法。

2月23日　国民党华北各省、市党部联合十数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建议："（一）请中央提前于本年5月5日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当前一切国是，缩短训政，促进宪政，改变省长制。在提前召集'国大'前，现有各省、市党部应一律停止改选；（二）各省、市另设一评议会，由中央派大员一人为主任，指导监督各省、市党务，提高党威党权。"

△　吴铁城由沪密电汪精卫报告蒋光鼐等在港活动情形，谓由憬然主持《大众日报》为言论机关，拟召集流亡在港之福建人民政府分

子组织活动。

2月24日　红军第十七师萧克部于赣北庙前渡河，次日一部西进塘埠，一部由高湖折经麻田南入上富。26日转至修水县石溪作短暂休整。朱耀华督率钟、易、李三个支队尾追，分两路向南压迫；岳森督饬所部于葡萄津至修水线及铜鼓河堵截；彭位仁师向高安集中；高安团队于瑞河南岸警戒；李觉师推进东桥，上高夹击。

△　日伪将上年9月下旬拘禁之中东路苏籍职员六人释放，表示对苏联让步，以换取中东路售路谈判的恢复。26日，苏联表示愿将中东路售价减为二亿卢布。28日，日电讯社传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表示："切望从速解决售路问题。"中断六个月的谈判酝酿恢复。

2月25日　吴铁城由沪密电汪精卫，报告胡汉民已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由胡自任领袖，并秘密召集邹鲁等到港，以元老为基础，知识分子为中坚，号召群众向蒋介石夺权。

△　汤恩伯督率孙元良、冷欣、王敬久、卢兴邦等师，分由顺昌、青州、尤溪围攻沙县，在高沙铺渡河攻占养天峰和五里亭高地。寻淮洲红七军团第十九师撤往漠布。冷欣和卢兴邦师占沙县。

△　湘赣红军第十六师高咏生部由幕阜山南麓武宁县大德山、洪下源移向小坳、洋段，连日迂回应敌。蒋介石电令何键增兵白槎、柘林防堵。翌日，代理湘保安司令李觉率郭汝栋师赴万载县分兵于王家铺、望日台、夏家桥和金水铺抄截。

△　红三军贺龙部进占大庸县西教乡、教字垭地带。湘军陈渠珍令龚仁杰、朱际凯、罗致英各部分进合击。

△　第十九路军残部自被粤方改编为独立第三旅后，是日陈济棠突然密令驻永定第五师、驻大埔之独四师及独一师等部予以监视，并派李振良指挥所部第十三、十四两团，先将城内独三旅机炮营缴械。

翌日，又协同独四师及独一师将其全部缴械，旅长黄和春被监视。嗣后，黄被改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参议。

△　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与日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井，在古北口制定接收古北口方案：规定古北口定于2月28日接收（注：后改为3月4日）。翌日，蓟密区公署北平办事处将方案发表。

△　前第十九路军秘书、福建人民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龙漳省政府副省长徐名鸿，于2月19日由龙岩化装潜赴广东大埔，途经三巴河口时被捕，陈济棠令黄任寰予以就地枪杀。是日，徐就义，死前遗书，一致国人，一致家属，嘱葬汤坑，并请蔡廷锴书墓碑："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

△　中国保护动物会在上海觉园开成立会。举叶恭绰、许世英、陈无我、张一麐、王一亭、朱庆澜等21人为理事。3月8日举叶恭绰为理事长。

2月26日　蒋介石电令陈济棠速饬所部分向雩都、兴国及筠门岭进展，配合北路军、东路军进攻红军。

2月27日　蒋鼎文偕福州行辕主任林蔚等由厦门乘飞机赴广州，与陈济棠商定东、南二路"剿共"军事计划，粤军参加者尚有余汉谋、缪培南、邓龙光、杜益谦等人。次日继续会商，共同决定：一、东、南两路军取一致态度，互相联络总攻苏区，东路以长汀为目标，南路以会昌为目标；二、两军各分纵队（共10个纵队）前进，南路仍以余汉谋、李扬敬为指挥官，东路俟蒋返闽后再定；三、南路军日前接防闽南、闽西之军队一律调返粤边，由东路军派队接防，以东、北两路军担任闽南及赣西防务；四、攻击计划定本月下旬开始，闽西南由东路军派第三、九两师接防，设闽南行政专员公署，专员由东路军委派，副专员由南路军派温翀远充任；五、东、南两路连贯进攻，如南路开到赣某地，东路亦必开到相当地点。3月3日，蒋、陈会商结束，

蒋鼎文飞返厦门。

△　国民政府派王麟阁为议定中瓜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准原任全权代表李世中辞职。

△　暹罗华侨苏标旗等七人抵厦门，向厦门市华侨公会报告上年10月28日暹罗勿洞坡当地饥民暴动，华侨无辜被杀22人，嗣又有五人被杀，11月后掀起驱逐华侨回国风潮，80余人被拘禁。苏等请转呈南京国民政府救济。

2月28日　国民党中政会第三九七次会议复议内蒙自治办法，通过蒙古自治问题办法原则八项：一、在行政院隶属下设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总理各盟旗政务；二、各盟公署改称盟政府，旗公署改称旗政府；三、察哈尔部改称旗；四、各盟旗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五、各盟旗现有牧地停止放牧，以后从事改良牧畜，并兴办附带工业；六、盟旗原有租税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七、省、县在盟旗地区所征地方税，须割给盟旗若干成；八、盟旗地方以后不得再增设县治或设局。同日，内蒙各代表开会讨论，决定一致接受。

△　薛岳命令所部严守沙溪，并调韩汉英师移驻沙溪北岸，防备红军主力自南丰西进。

△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监察委员会决议，建议恢复总理制，推蒋介石为总理，并请提前召集全国代表大会。

△　原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胡秋原及刘叔谟、梅翊强在港被港当局逮捕。刘、梅经陈友仁疏通，旋被释放。其后，胡被驱逐出港，去南洋。

△　伪满协和会第一次全国联合协议会在长春召开。

△　国民党中政会原则通过批准上年7月22日中国与印度、西班牙、美国等九国在伦敦签订之《白银协定》。3月9日，立法院审议通

过，并附保留声明：“如中国产业有危险时，中国得采必要之行动。”

△　美国总统罗斯福电令美驻沪商务参赞及总领事调查中国金融状况、物价指数及商务情形等，以供施行白银政策之参考。

△　上海国泰商业储蓄银行开业，资本额100万元，经营储蓄及信托等业务。董事长王伯元，常务董事徐可城、郑秉权。郑兼总经理。

△　《中国经济评论》月刊在汉口创刊，中国经济评论社编辑。

是月　外交部根据驻苏大使颜惠庆的报告，拟定于月内开展对苏交涉：一、中苏新商约；二、取消金树仁与苏所订条约，另订通商新约；三、在苏增设领事馆等。

△　伪满奉天省政府下令各地实行10家连保制度，并广泛地施行打手印的办法。

△　上海大华火柴厂因火柴价格日趋低落，建议由华中地区的火柴同业共同组织售价维持会，大中华火柴厂总经理刘鸿生予以赞同，即授意由全国火柴业同业联合会出面，召集苏、浙、皖、赣、鄂等省火柴厂协商，计划于次年7月正式成立“国产火柴制造同业联合办事处”，参加者共15厂。

△　上海《大陆》杂志停刊，出至第二卷八期。

3月

3月1日　立法院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凡10章160条。计：第一章总纲。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第三章国民经济。第四章国民教育。第五章国民大会。第六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第七章中央政制，第一节国民政府；第二节总统；第三节行政院；第四节立法院；第五节司法院；第六节考试院；第七节监察院。第八章省。第九

章地方政制，第一节县；第二节市。第十章附则。其总纲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

△　溥仪在日本导演下僭位称帝，改称“大满洲帝国”，伪年号“康德”。公布伪《组织法》，规定即日改称总理各部职务为大臣，执政府改称宫内府，并新设国玺府。任命沈瑞麟为宫内府大臣，郭宝熙为国玺尚书，郑孝胥为总理大臣兼文教部大臣，臧式毅为民政部大臣，谢介石为外交部大臣，张景惠为军政部大臣，张燕卿为实业部大臣，丁鉴修为交通部大臣，冯涵清为司法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为兴安总署总长，罗振玉为监察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长，林棨为最高法院院长。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菱刈隆及参谋长等200余人参加称帝仪式。午后菱刈隆与郑孝胥交换伪帝国成立之公文，表示承认。

△　溥仪僭位，颁布《组织法》，规定：一、政府之政务与宫内府有别；二、“满洲帝国”由皇帝统治之；三、皇帝依立法院之翼赞而执行立法权；四、皇帝依法律命令法院执行司法权；五、国务总理大臣辅弼皇帝而任其责；六、皇帝统率海陆军；七、皇帝颁布“紧急训令”及大赦、特赦等等。

△　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就溥仪称帝发表谈话，表示：“全国国民，对于此种叛国行为，不胜愤激。”

△　张学良在汉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职。5日于武昌设立行营。

△　南路军黄质文师第二十二团谢铮部进占赣南盘古隘，向筠门岭推进。6日，红军周昆第二十二师在叶剑英指挥下，由筠门岭经罗塘向盘古隘出击，在清溪、三标地区击溃谢团。

△　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否认国民党将改行总理制。5日，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再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各报纠

正。

△　日军千余人由天津沿津浦路开至良王庄、唐官屯及静海一带，作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次日，河北省政府婉拒无效，特电请南京军政当局对日严重交涉。3日，日军演习始结束。

△　吉林省长白县24区伪满驻军30余人起义，击毙伪队长，捣毁日人采木公司，随即开入抚松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

△　刘桂堂部在商震部第三十二军追堵下窜入河南嵩县段树坪、白土镇。7日与王有股合流，分扰南召、鲁山，高滋桂师追剿。8日刘部窜方城、舞阳。

△　上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关于统一电影业务指导权案，议决：一、修正《电影检查法》第三条为“电影检查委员会之组织另定之”；二、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以中宣会副主任为主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为当然委员，并另推委员及常务委员若干人；三、电影检查委员会须受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电影检查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由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院派充之。是日，电影检查委员会遵令移交，由教育、内政两部合组之。6日，行政院派罗刚任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

△　前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吉林省督军兼省长鲍贵卿在北平病逝。

△　原福建《国民日报》改称《民报》，是日在福州市发刊。

△　上海《春光月刊》创刊，编辑庄启东、陈君治（“左联”成员），春光书局发行。该刊为左翼文化刊物之一，5月下旬出至第三期遭公共租界巡捕房查封。

△　《禹贡》半月刊在北平创刊。禹贡学会编辑，主编顾颉刚、谭其骧，主要内容为研究历史地理。

3月2日　　立法院第四十九次会议，以溥仪僭号帝位，决定向国民党中政会建议，订定裁制汉奸办法，昭告中外一致否认傀儡组织。

△　萧克部红十七师大部入赣西北古溪西梅岭山区，一部在七里山附近与朱耀华师相持。是日，刘膺古电请何键饬湘鄂边驻军于通城、通山间堵截。萧克部在来苏击破湘军防堵，3日由郭城、何家嘴进攻山口，在漫江击溃岳森师李邦藩、李炎林两团。5日抵幽居。高咏生部红十六师经渣津南入幽居会合。刘膺古命李觉、彭位仁、朱耀华、岳森及郭汝栋各部向幽居寻红军主力作战，并防堵红军北进。

△　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红一、三、五军团由南丰地区南进。薛岳为防红军西移袭击，本日起除抽调郭思演、韩汉英、欧震等部加紧建筑公路外，并饬所部赶运粮食弹药于藤田、古县两地备战。

△　何应钦奉蒋介石“从速结集甘、青、宁三省驻军约期会剿孙（殿英）军”的电令，召集徐永昌、庞炳勋、蒋伯诚、万福麟等开会，决定按原定军事计划令晋绥军从速西进。同日，孙殿英亲率谢璟田等旅及特务营、炮兵营等，猛攻宁夏城之九里桥一带马军阵地，战四小时，死伤数百人。4日，青、宁军攻占李冈堡、唐家寨。7日，甘、青、宁联军发起总攻。

△　国民政府任命李骏为驻秘鲁特命全权公使。8月2日到任，6日向秘鲁总统呈递国书。

3月3日　国民政府令免岳盛宣第四十六师师长职。

△　川康军刘文辉部攻占邓柯属之观音寺，藏军与之在邓柯、德格一带展开激战。5日、8日，藏军两次抢渡金沙江失败，但仍声称必须收回民国二十年被川康军占去的甘孜、瞻化、德格、邓柯、石渠及白玉诸县方肯罢休。15日，再由德格渡江又被川康军击败。17日，川康军攻占德格，藏军集兵攻占观音寺。

△　南美萨尔瓦多共和国表示承认伪满洲国。

△　驻英公使郭泰祺奉外交部训令，就英侵云南班洪事向英国政府外交部提出口头抗议。英方答复谓“偶有此事，但言过其实”，不予正视。5日，外交部向驻南京英使馆提出书面正式抗议，并主张勘定边界，以免益滋误会。

△　新任驻华英使贾德干由沪抵宁。6日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3月4日　　红五军团董振堂部由德胜关西南部平寮、杭山圩等处反攻古城岗，与樊崧甫师激战。

△　蒋鼎文由粤返厦后，是日决定将东路军总部由厦门迁至漳州，指挥所部第九、十两纵队向闽北推进，计划第一步进占龙岩。翌日，蒋又召集卫立煌等讨论东南两路军之具体联络办法。

△　陈济棠在广州召集余汉谋等将领商讨与东路军之联络及接济、运输等事。同日，陈委派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兼南路“剿共”第三纵队指挥官，辖独立第一、二两师及第五师、独立第二旅等部，免去前第三纵队指挥官区寿年职。

△　唐式遵赴双河场接任川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唐鉴于许绍宗旅仍被围鸣鼓场，遂调第二师第四旅王泽浚部前往解围。10日、11日，王部与红军作战，伤亡千余人，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何畏第九军自动撤至沿山场之线，许旅解围。12日，范绍增督率所部占领迎凤场、八面山。

△　刘湘电汪精卫请行政院拨款建筑川汉铁路，并派代表朱懋昭前往南京接洽。嗣后，汪批交铁道、财政、交通三部审查，拟订方案。

△　殷汝耕偕古北口办事处主任霍实、佐治局主任刘友勋、密云

县县长邱赫霆等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参谋板垣、承德特务机关长松井等办理接收古北口手续。11时，驻石闸保安队30余名分两路抵古北口，分至曹子路附近各口值勤。接收后，日伪驻古北口等地之军、宪、警察依旧存在，伪税关照常收税。

△　CC外围组织“诚社”骨干董霖、胡梦华等在北平召开“文化团体代表”大会。决议：一、定期举行全国文化团体总调查；二、由市党部组织出版审查委员会；三、推举董霖等去南京报告工作；四、定期举行文化讲演。

△　“四海”轮由广东四会县开赴广州，下午6时在珠江大涌口因超载沉没，死难者二三百人。

3月5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讲演《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要求学习曾国藩、胡林翼，以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准则。19日又讲演《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再次提倡“根据中国固有道德的习惯”——礼、义、廉、耻，“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运动军事化”。

△　湘军陈渠珍增调周燮卿旅等由凤凰出发，参加“围剿”贺龙红军。是日，周亲率第八团沿溪坡向教字垭进攻，贺部退至中湖附近与陈部发生激战。次日，贺部经大庸县康屯乡、施兰峪至走马坪，返回鄂西鹤峰根据地。

△　薛岳部分三路进攻永丰县沙溪，彭德怀红三军团与之激战两日。翌日薛部占沙溪。

△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在东京接见苏联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密议中东路出售案。此后谈判进入秘密状态。

△　天津北洋女子医院创办人、中国西医第一位女医师金亚梅在天津病逝。

△　上海美亚织绸厂4000余工人为反对厂方减低工资举行罢工。

9日，牵经部工人加入，斗争扩大。厂方勾结社会局强制工人复工，工人反抗，遭军警逮捕11人。11日，工人举代表40人向厂方交涉，千余工人随往，法捕房出动镇压，打伤工人多人。中共中央曾两次发表宣言，援助美亚罢工。全市40多工厂5000余工人罢工声援。

△　南京《边铎半月刊》创刊，边铎月刊社编辑发行。

3月6日　　孙元良、王仲廉、汤恩伯分由将乐附近黑山、蔗厂、水南、元坑、漠布进攻将乐，以孙元良部任主攻，由王仲廉师从高滩渡河协攻。王部在高滩遭寻淮洲红七军团伏击，被歼五六百人。同时，红七军团与孙师等激战两日，于黑夜由东门突围失败，转由西门冲出，向光明方向撤退。7日晚12时孙部占将乐。

△　陈济棠颁布第二期“剿共”命令，以八师实力总攻雩都、兴国、会昌，限15日前调动完毕；先攻雩都，然后分别南攻筠门岭和会昌，西攻瑞金。

△　刘膺古令郭汝栋、朱耀华、彭位仁、李觉、岳森各师分三路向幽居、靖林围攻湘赣红军。

△　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委派王锡钧（原任保安处副处长）为苏浙皖边区六县临时反共总指挥。16日，王于安徽广德设指挥部，负责反共军事。6月15日宣告结束。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反对溥仪称帝，表示“东三省、热河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溥仪借外力称帝于东北，狐掘狐埋，中华民国国民必须坚决谋所以讨平而匡复之”，希望各国“贯彻其不承认之政策，并进而共起制裁”。8日，汪精卫电陈济棠、林云陔，以“对外通牒，于统一有碍”相责。

△　驻英公使郭泰祺就英国侵我云南边境事向英政府提出正式抗议。14日，英方送达正式照会，声称英方并未越过“边界”。17日，英

驻滇领事哈定向我驻滇特派员王占祺面称，英人在3月3日与土人小有冲突，但系彼界内。一再予以抵赖。

△　盛世才下令总攻马仲英部，以苏联红军和由苏联退入新疆之东北军组成追击队，用飞机15架助战，是日进占达坂城。马军一部退甘肃，大部败退托克逊。8日，盛军占托克逊、吐鲁番、鄯善，马军分走焉耆、哈密，13日，盛军进占焉耆，马军又沿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西撤。28日，马军在巴楚及喀什抗拒盛军追击。

△　蒋介石德籍顾问德威，前往福建闽江口、长门、金牌等处视察军事防御工事，30日结束。

△　上海汇海银行开业，资本100万元，专营存款、放款、贴现、押款、押汇及国内汇兑等业务。董事长张芹伯，总经理洪苓西。

△　陕西三原裕泰纱厂股份公司成立，资本额100万元，冯钦哉、贾汉三、宋之石等15人为常务董事。

3月7日　　蒋介石集中兵力于闽西，以东路军向闽西、闽北两路推进。由蒋鼎文任闽西指挥，卫立煌为闽北指挥，并调北路军陈诚部三个师向建宁、泰宁推进。是日，蒋部李玉堂师入驻龙岩，李延年师续向漳州跟进。次日，陈部李默庵师抵延平。分别向建宁推进。

△　国民党中政会第三九九次会议，决议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特派何应钦、赵戴文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正、副指导长官，任命云端旺楚克（简称云王）为委员长，索诺木喇布坦、沙克多尔札布为副委员长，任命德穆楚克栋鲁普、阿拉坦鄂齐尔、巴宝多尔济、那彦图、杨桑、恩克巴图、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卓特巴札普、贡楚克拉什、达理札雅、图布升巴雅尔、荣祥、尼玛鄂特索尔、伊德钦、郭尔卓尔札布、托克托胡、潘第恭察布、那木洛勒色楞、阿育勒乌贵为委员。同日，国民政府公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凡11条，《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

例》，凡九条，13日于北平设长官公署，29日于百灵庙设自治委员会。

△　杨杰率中国军事考察团于3月2日由土耳其抵莫斯科。是日，苏联外交部设宴招待，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谈及日苏冲突事，谓苏联“今日军事准备，不仅在击退敌人，且在追击敌人”，“非特须排除日本军队于苏联领土之外，且将驱逐其出东三省”。表示苏联“尺土不取，必将东三省奉还原主”。希望中国政府早日决定政策，急起准备，否则将“铸成大错”。愿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合作，共同一致对日。同日，杨访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伏同样希望中苏联合对日。

△　中央社西安电：陕北三边群众不堪忍受法国教堂的压迫，推派陈骏三等为代表至陕西省府请愿，要求收回清季因民众仇杀法国教士而被强占之土地主权。其后，经多次交涉，始于翌年1月9日在北平签约解决。

3月8日　　湘赣红军萧克、高咏生两部由幽居、靖林转入朱溪厂、塔台，与郭汝栋师激战后，是日，萧部突围北进，高部折回南返。何键电命陶广督率岳森、郭汝栋及李觉师四个团尾追萧克部；彭位仁师于修河沿岸筑堡布防；朱耀华师以一部接收修河以南防务，大部搜索高部红军。

△　红新十军方志敏部由紫湖口进攻浙边大桥头，浙江保安团纵队总指挥蒋志英率部追至。红军绕攻常山，蒋部分三路夹击，红军撤退。10日，红军复攻玉山，仍以一部佯攻球川镇，蒋部追抵贲口北部，红军撤回葛源。

△　西南各省国民对外协会总会，为英兵入侵班洪事电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省党政机关，向英严重抗议，据理力争，责令英兵先行撤退，并速与英政府勘明划界。

△　中央研究院请求海军部于西沙群岛设立气象台。本月中旬，海军部转呈行政院，嗣由行政院饬财政部拨款兴建。

△　上海日人所办《上海日日新闻》报，是日及23日连续刊载各种谣传消息挑拨中英、中法关系。外交部先后派情报司科长向日驻南京总领事提出口头抗议，嘱其严重警告该报，速予更正。日领事表示照办。

3月9日　　蒋介石电令刘膺古“追剿”红军应改变以往“布置阵地，明张旗鼓”的堵截办法，而改用“扼要埋伏”的策略，出其不意予以突袭。

△　日本关东军在吉林省伊兰、勃利、桦川等13县大规模抢占耕地。日军驻伊兰第六十三联队队长饭冢朝吾大佐限当地群众于3月初办理“移让”手续，并以高压手段捣毁民宅，抢走地契，逼得当地民众走投无路。5日，当地大地主、太平保卫团团总谢文东，联络井振清等几个甲长，组成一支拥有700人的骑兵队，并鼓动各区壮丁队暗中准备暴动反抗。是日，谢文东等提出“反对日军强迫收买土地”、“反对收缴枪支”等口号，率领武装700余人及徒手群众千余人，分向土龙山、太平镇、九里河、金东沟等地进攻。在袭击土龙山警察署战斗中，解除警察武装20多名。暴动群众当即组成武装，参加东北民众自卫军，举谢文东代李杜任总司令，周雅山任前敌总指挥，率领群众坚持战斗。

△　上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富占魁赴磴口，晤孙殿英商议和平解决办法。是日富抵达磴口，12日再赴平罗，对孙作最后劝告。14日，孙到李岗堡向富占魁表示愿离军下野。但孙部仍在原地抵抗。

3月10日　　蒋介石分别电令蒋鼎文和陈济棠向福建红军发动进攻。以东路军进击闽西，限十日内夺取连城，月底攻占长汀；以南路军驻闽所部由龙岩出发侧击，由黄任寰、李振良两师出击武平、上

杭，并以梅县航空队助战。

△　蒋介石制定处理原苏区之土地办法：一、对前分田之农民概不追究；二、旧赋旧租免交，新租酌减；三、旧债屡期减成；四、设农村复兴会清理田地业权；五、设利用社合伙均耕等。

△　刘桂堂部众窜往叶县、襄城、临颍，经许昌张藩镇越平汉路，连日分扰鄢陵、西华、太康。14日，东北军骑兵第十师檀自新率部追剿。

△　青海省府主席马麟电全国经委会，要求开发青海，并拟定计划：一、设水利局；二、创办毛革厂；三、设农民银行；四、筹设省立医院；五、改良畜牧。

△　国民政府令派朱天森为海军学校校长。

3月11日　　国民政府为伪满溥仪改称帝制发布通告，称："政府始终认定此等傀儡，初无独立之人格，不成为讨伐之对象，而迹其卖国行为，自应与危害民国同科。"同日，训令直辖各机关严治汉奸。

△　彭德怀红三军团进攻江西广昌县白舍镇北部之东华山、五都寨，全歼第九十四师李树森部近两个团，击溃由三星、增田之援军，夺取东华山、五都寨阵地；罗炳辉红九军团一部进攻第十四师霍揆彰部石鼓山阵地；陈伯钧红十三师乘樊崧甫师主力转移之际进攻杨林渡。

△　侵滇英兵于3日起再攻澜沧江班老村寨。至是日止，数日间侵占下城、上城，猛攻猛角、猛董。18日，班洪各土司派代表赴昆明谒龙云报告一切。

△　晋绥军下达攻击孙殿英部总攻令。同日，晋军王靖国、赵承绶由临河开始进攻。14日，晋军步、骑、炮各部全线出动，与孙军卢丰年部接战，次日占三圣宫。17日，晋绥军占磴口。孙军失去根据

地，运输亦发生困难。孙军军心动摇。

△　戴季陶、褚民谊、居正、林翔、石青阳、赵丕廉及黄慕松等在上海发起组设“时轮金刚法会”，首开发起人会议，通过办事简章八条。推段祺瑞为理事长，戴季陶、褚民谊、许静仁、鲁咏庵、王晓籁、王一亭为副理事长，王揖唐、吴铁城、杜月笙、张啸林、闻兰亭、林康侯等30人为常务理事，请班禅往杭州建立“时轮金刚法会”。各地军政首要黄郛、张群、张学良、朱绍良、马鸿逵、刘镇华、商震、沈鸿烈、韩复榘、熊式辉等20余人响应。19日，该会开常务会议，推赵恒惕等九人赴杭州组织事务所。20日，函请杭州市长周象贤主持筹备一切。蒋介石亦电嘱浙江省及杭州市政府予以协助。

△　上海航业公会呈请交通部修订中英、中美商约，收回航权。18日，上海市商会亦电请交通部收回内河航行权。

3月12日　　汤恩伯纵队电令第四师（汤兼师长）集中将乐、水南，李默庵师集结漠源，王仲廉师集驻高滩，以备由将乐进攻泰宁。18日，蒋介石电促汤恩伯速占建宁，并指示如不能直进则先占泰宁，或打通黎川县再占建宁。

△　陈济棠执行先攻雩都之作战计划，令第一师李振球部克日出发安远，第二师叶肇部进驻信丰，第四师张达部推进南康、赣州。翌日，陈再召余汉谋等详商“剿共”军事计划。

△　世界文化合作院派国际劳工局助理局长莫维德来华，帮助国民政府改革职工教育及中小学教育。

3月13日　　林彪、彭德怀、罗炳辉红一、三、九各军团以主力进攻杨梅岭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向右迂回。陈诚急令所部主力全线出击，以李树森师进攻东华山；黄维师协攻王家山、五都寨；夏楚中师固守大排山、杨梅寨及光岭之线；傅仲芳一部攻瑶陂，并由陶峙岳、霍揆彰等师为策应。红军与之血战，牺牲甚大，遂向甘坊撤退，

李师占五都寨。15日，傅师占瑶陂，李师再占白舍。

△　英国掌玺大臣艾登在下院宣称，英国永不承认伪满洲国。

△　法国武装156人无理侵占云南省建水县峨哈寨。22日，建水县国民党县党部通电呼吁全国各界一致声援。

△　西南人民外交委员会为英兵侵入滇境事件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立即增强川、康边防。并谓：如不及时准备，则此数边省恐为东三省之续。该会同时电请四川各军领袖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御外侮。

△　行政院通过改组北平故宫博物院，聘王正廷、史量才、朱启钤、李元鼎、李书华、李石曾、李济、吴敬恒、吴鼎昌、周作民、周贻春、陈立夫、陈垣、翁文灏、张静江、蒋梦麟、张伯苓、张嘉璈、张继、黄郛、傅斯年、褚民谊、黄节、叶楚伧、蔡元培、罗家伦、王世杰、黄绍竑、顾颉刚等为理事，并建议增设监事会。

△　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在南京举行首次会议，主任委员褚民谊，委员丁心普、艾沙、唐柯三、张西曼、安石如、孙绳武、刘抡英、陈曾亮等53人出席，由刘抡英、陈曾亮起草《新疆建设计划大纲》。15、17日续开第二三次会议，推定委员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各组人选。

△　日本满铁公司建筑“间岛”（延吉）地区天图铁路竣工，是日在龙井村举行竣工典礼。4月1日正式通车。该路由上三峰起，经龙井村至朝阳川接吉会路，系日准备对苏作战之军用铁路，且为对北满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交通线。

3月14日　福建省政府划分防区：福州至仙游，以王敬久为福州警备司令；惠安至长泰，以宋希濂为泉州警备司令兼闽南区保安处处长。

△　吉林伊兰县伪军响应土龙山农民反日大暴动，打死日军守备队长，投入东北民众自卫军。

△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视察华北外交到平，16日访黄郛传达蒋、汪对日妥协外交之指示，23日返回南京。

△　浙赣铁路联合公司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以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任理事长。4月20日在杭州开第二次会议，通过理事会章程，资本额6000万元，正式成立理事会，设理事11人，下设浙赣铁路管理局，以杜镇远为局长，侯家源为副局长。

△　李宗仁等召开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27日通过广西经济建设纲要16则，并制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计划及政策。

△　上海等地华商纱厂50余家，因纱销呆滞、营业危困，特在上海召开谈话会，议定治标、治本办法：一、各厂自本月起所出棉纱，如有该厂直接或间接交入交易所时，由该厂于交货之下一月负责收回；二、定6月1日起实行减工，具体办法另订。

3月15日　第八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率领第五师谢溥福、第四十三师邹洪、第九十六师萧致平、第九十七师孔令恂等部向甘坊进攻。以孔师、邹师由寺前经村头向甘坊西北攻击；周亲率萧师由三溪圩向甘坊西南攻击；谢师由南丰向井源前进作策应。彭德怀红三军团洪超、黄克诚第四师据守甘坊西部元头寨、石下寨、金家寨、里乐寨一带高地。周部作战竟日无进展，被红军歼灭四个连。次日，周部以步、炮、空联合猛烈进攻，孔师攻占朱家岭，邹、萧两师攻占元头寨、金家寨、里乐寨等据点。红军退向广昌，周部占甘坊。

△　红军罗炳辉第三师进袭赣北瑞昌县双下桥，以备攻取瑞昌，与张瑞三旅激战昼夜，损失甚大。次日，红军撤至何家祠，大部至范家铺，一部入乌石街。进取瑞昌计划受挫。

△　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以两团兵力由沙县胡坊向归化（今明溪）进攻，归化红军分兵一部迂回，在大围头击溃卢部。17日卢部溃退永安，红军乘胜追击。18日，蒋介石电令李默庵师由将乐或漠布策应卢兴邦，协同进攻归化。

△　南京《农报》半月刊创刊，主编者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报社，至第三期起改出旬刊。

3月16日　川军唐式遵部右翼警备第四路司令陈国枢进踞万源县固军坝，第一师廖震由黄金口进犯通江、万源之重要屏障白合寨；第四师范绍增再攻金华寺、袁家坪。18日，独立第二旅杨国桢部两团进占刘家坪、马家坪之线。19日，范绍增、廖震两部取重点进攻战术，分别进攻红灵台、毛坪。经多次反复激战，被红四方面军击败，范部等死伤3000余人。

△　湘鄂赣红军徐彦刚部在永新北部高石岭附近与张彀中旅接战。19日进攻潞江附近五马山，全歼袁建谋团，夺得战略上的主动之后退入禾山。

△　红军警卫师、模范师活动于善和、招携一带。是日，薛岳率韩汉英、欧震及郭恩演等部由沙溪向藤田——善和——招携方向转进。次日起，分别赶筑万寿宫、上水口线及小王家一带碉楼。同时，以梁华盛师置于藤田为预备队，以唐云山师驻守沙溪，策应藤、沙防线。

△　刘文辉向蒙藏委员会条陈治理康、藏办法：一、划定西康区域界限，以消除康、藏龃龉的重大原因；二、运用政治手腕，决定达赖摄位人选，以收其亲汉之效；三、若使班禅回藏，必先调停达赖党，如班禅仍留内地传法，则明白宣告，务使藏人释杯弓之疑；四、须由内地酌予协济西康军政费用，稍举国防之责。

△　国民政府任命夏楚中为陆军第九十八师师长，韩汉英为第五

十九师师长，派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仍兼第一百师师长）。

△　刘桂堂部众经柘城北入归德（今商丘）。次日晨由小坝车站越陇海路，18日窜曹县、城武、定陶等地。20、21日，分扰金乡、巨野、郓城，鲁军谷良民师和李德宣骑兵团予以围剿。

△　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公开审判前新疆督办金树仁案，就金于1931年与苏联擅订《新苏通商协定》，1933年“新变”携公款出走以及强夺人民垦地、及其部属杀人放火等罪提起诉讼。同日，马麟、马鸿宾、邓宝珊等再次联名致电蒋介石、汪精卫及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保释金出狱就医。5月13日，金获准具保出狱就医。

△　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汪精卫、陈立夫、叶楚伧等为发起人。翌日，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通电全国各地提倡“新生活运动”。

△　天津市航业公会成立。由天津航业公司、北方航业公司、直东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通顺轮船公司、益记轮驳公司和振纪公司等组成。

3月18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川、陕、甘、豫、湘、鄂、闽、赣、苏、浙、皖11省行政长官会议。各省民、教两厅厅长、省府秘书长、行政督察专员66人出席。蒋介石致开幕词，指出：就我们国家的情势而言，就世界的大势来看，现在已到了最严重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亡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机会！”并谓：“现在我们国家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要想国家能够保存，民族能够复兴，全靠我们几个革命的基本省，能够深明大义，拥护中央……由此奠定革命的基础……做出真正统一的模范，给其他各省来看，感化他们，以完成整个国家的统一基础。”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在会上演说，鼓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会议通过权力集中省府、统一财政收支、划定地方保卫区域、提高警察权等议案。制定

《各省行政督察专员职责系统办法》、《剿匪军救济民众办法大纲》。规定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县长及保安司令，以统一指挥，强化其反动机构。20日，蒋宴请与会人员，宣称："中央预定明年4月召开全国国民大会，就要结束训政，开始宪政。"21日会议结束。

△　川军李其相部于月初由巴中西南之兴隆场、猫儿铺及恩阳河向巴中推进。14日由范绍增派敢死队进攻巴中，是日红军自动撤出巴中、木门等地，罗泽洲师进占巴中。随又以一部占领巴中前方白庙场、土林场之间的方头寨、鼓楼山。同日，李部与第二路田颂尧部配合向通江推进；邓锡侯部右翼陶凯旅两个团由大南山进占木门；杨森部强渡巴河。

△　湘赣红军萧克部由达浒、官渡间渡浏河，急走蒋埠江，东入湘赣边区东门市、张家坊一带；高咏生部转入黄金洞。刘膺古当即电令钟光仁旅南移小源、株木桥；欧阳烈团南移白水、黄茅，分别截击；命易振湘支队西移三百兴、白良；岳森师接防铜鼓、郭城、山口、大瑕、黄岗口、芳塘等地防务；彭位仁师南移万载附近；仍令陶柳支队尾追。

△　唐山华新纱厂因纱业疲敝停工，裁减工人400余人。20日复工。

3月19日　汤恩伯部孙元良师、王仲廉师于17日分别占领泰宁东部曹地、马岭；李默庵师抵漠布。汤在万安镇部署进攻泰宁战斗：以王师任主攻，孙师推进黄瓜地，以冷欣师为掩护队。是日，王师由八里桥进攻泰宁左翼高地毫无进展，又以一部从正面袭击亦无效，于是以空、炮军协助强攻红军主阵。董振堂红五军团、陈树香第三十四师等部阵地损毁甚大，乃撤往油胆、梅口，踞守新桥、建宁。王部占泰宁。

△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主持，在南京召开国

民党中央“新闻宣传会议”。会议通过：一、修正《出版法》；二、培植新闻人才；三、全国报界新闻记者之组织办法；四、制定保障新闻人员条例；五、筹办边疆省份党报及通讯社；六、注意国际宣传；七、创办大规模造纸厂；八、直属国民党党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合组视察团，按省分赴各地视察采访；九、修正国民党中央所设各级党部所辖报社管理规则。21日会议闭幕。

△　伪满派郑孝胥为赴日修聘特使，伪财政部大臣熙洽为副使，由长春出发前往日本访问。同日，郑发表“日满亲善关系”声明。26日，郑至东京向日政府表示申谢。27日向日皇递交溥仪手书，表示效忠天皇，甘为傀儡。

△　日军平冈部至吉林伊兰县土龙山镇压东北民众自卫军，中途遭到民众自卫军的伏击，死伤甚重。自卫军获胜后，破坏日伪交通线及联络设施，断绝伊兰的对外联系。

△　甘青宁联军分路反攻平罗、李冈堡，并以骑兵一部迂回石嘴子，俘孙殿英军2000余人。翌日，孙军卢丰年及其旅长彭振国、窦连玺、孙子瑜等联名致电北平军分会，表示愿脱离孙军，丁绰庭亦向宁夏马军投降。

△　侵察东之日军积极布置军事，是日上午新源日军百余人开抵黑达营子，并随运到军用品甚多，同时还强迫当地群众悬挂日伪旗欢迎。下午，日人所编之民团四五百人开至中流，并雇有鲜人前来建筑黑达营机场及黑达营至丰宁之公路。

△　英使贾德干在南京访汪精卫，就云南班洪事表示愿由双方派员实地调查。23日，贾德干将英政府指示转告中国政府，谓此事并不如外传之甚。极力大事化小。

△　新任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抵津，次日就职。原任司令官中村孝太郎22日离津回国。

△　国联事务局次长孟禄根据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的决定制定“孟禄计划”，日本进行干预。是日，广田外相将其《有关对华国际合作等问题》的照会发交有关各国使节。照会称：“位于东亚的日本的权威和实力，乃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础，因此对中国有关的国际问题，当然应以日本为主。”同时指示驻华公使：“关于指导‘孟禄计划’等，没有日本参加的国际协力，一律是徒劳的。”

△　外交部致函日本驻华公使馆，请其转饬北平日本国际观光局，不得递寄东三省之邮件入关。

3月20日　南路“剿共”军执行其第二期军事计划，分两路总攻筠门岭、会昌。第一纵队由安远、寻邬等地出发，以第一师李振球部任前锋，第二师叶肇部为第二路，第四师张达部任后卫；第二纵队由武平、平远、大柘等地出发，以第七师黄延桢任中路，第八师黄质文为左翼，第一独立师黄任寰任右翼，第五师李振良为预备队。是日，第一纵队前锋李振球师一部进占马岭，第二纵队右翼队黄任寰部第二旅进占永平寨、帽村。红军集主力于盘古隘、筠门岭抵御。

△　孙殿英部在晋绥、甘青宁等军东西夹击下陷于瓦解。是日，孙殿英被迫通电下野，离开部队。22日，孙由李岗堡去磴口，26日偕同富占魁至包头，28日入太原。孙部于世铭、刘月亭等部三万余人集结平罗、石嘴子及贺兰山地区听候改编。孙、马之战结束。

△　交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促进航业讨论会，交通部长朱家骅及各省代表60余人与会。会议讨论了航政机关、航政法令、人才训练及收回航权、开辟远洋航线、航业统制及减免捐税等提案100件。为了增进航商的团结，减除过度竞争，议定设立航业合作设计委员会，进行详细调查，计划于9月间完成合作方案。22日会议闭幕，择提案13件提交交通部参考。

△　中国妇女运动同盟会在上海召开临时大会，推定何香凝、王

孝英、刘王立明等15人为改组委员，指定刘王立明起草改组宣言。29日改组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改组方案，通过宣言。

△　日伪将东北划成七个军管区：长春区、哈尔滨区、奉天区、吉林区、黑龙江区、热河区、兴安区。

3月中旬　交通部制定有线电报与无线电报局、台合并办法，将一地方之有线无线电讯事宜，由一机关统筹办理。5月试行上海，11月后推行于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四处。

3月21日　湘赣红军萧克部欲南入万载县桐木，与湘军何平部激战三小时后越黄茅、兹化转入小洞。钟光仁旅抵黄茅，向桐木前进，协同欧团向小洞追击。朱耀华师向坑西山口急进堵击。王育三旅向萍乡、宜春间之芦溪、宣风推进，并以一营埋伏株亭山。次日，红军在宣风、芦溪间的株亭山附近以散兵线突击渡越袁水。大部南进沂源，欲回永新；一部折回竹坪、观前。

△　国民政府批准《白银协定》，但附保留声明。其保留声明称："中国政府批准此约事，声明因银币现为中国本位币，倘遇金银比价发生变动，至中国认为足以妨害中国国民经济，而与本协定安定银价之精神不合时，得自由采取适当之行动。"

3月22日　李默庵师由白莲、盖竹桥袭击铁岭、龙湖，进攻归化城，卢兴邦师由归化南面配合。寻淮洲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在铜岭、铁岭与李师作战失利撤向沙洲、葛岭，李师占铜岭、铁岭。次日，李、卢两师攻占归化。

△　蒋介石电令蒋鼎文："着东路军准备全线向赣东、赣南推进，克期到达闽赣边境。"

△　红新十军方志敏部再次攻占常山球川镇。次日，浙江保安团队由紫湖口进攻葛源根据地。红军撤出球川镇回援葛源。

△　刘桂堂部由汶上沿津浦路窜泰安，遭孙桐萱部迎堵，乃西进分股扰肥城、平阴、东平。翌日继续东窜，在界首以北、万德车站南之胡家岩图越津浦路东去，韩复榘亲临界首指挥堵击。

3月23日　　蒋介石在南昌分电苏、浙、豫、鄂、湘、皖、闽、陕、甘、赣10省主席，限4月3日以前，分别草拟清丈坻田、清查户口、办理警卫保甲及修筑道路交通等四大要政计划及实施步骤呈报，并限明年3月底完成初步工作。5月中旬，蒋重申此令，限5月底完成计划草案。各省接令后，未能如期呈报。

△　张学良命令东北军南下参加“剿共”。王以哲军移驻河南、安徽，司令部设信阳；何柱国军移驻豫、鄂境武胜关、麻城地带，司令部设麻城；刘多荃师移驻武胜关、信阳地带，司令部设信阳。张在信阳设行营指挥。其后，东北军所部共九个师先后南下参加“剿共”。

△　红军林彪、彭德怀一、三军团各一部，本日到次日在泰宁西北太阳山及东太阳圩一带，全歼王仲廉师一个团，击溃其一个旅，缴获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数十挺。

△　红军寻淮洲第七军攻占宁洋，林维邦民团溃逃，红军乘胜南进漳平。东路军蒋鼎文部以各段公路未通，后勤供应困难，暂停进攻，李延年、李玉堂及刘戡各师止于龙岩、龙门、大池、小池、古田、新泉地带。

△　教育部为压制学生运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饬各教育机关、各学校，对于学生“务必力予矫正，敦品励行，注重训导，俾趋求学正轨。如有破坏纪律，鼓动风潮，应严格取缔”。

△　南京《朝报》创刊，社长兼总编辑王公韬，副刊编辑张慧剑。

3月24日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一、施行集团围

剿办法“剿共”；二、速布置赣南、赣东防务；三、以两纵队攻筠门岭，克筠门岭、会昌后以一纵队向雩都、兴国推进；四、限期完成各地防御工事；五、令各部速将所在地之公路建成。

△　湘赣红十七师萧克部入钱山，次日在官渡市南部洋溪再与红十八师徐彦刚部会合，共同南进花溪，转回永新北部禾山、黄江、蔡家坪等山区根据地。陶广、岳森等部在蒋埠江、孙家埠、牌楼前、桐木、朱亭等地分途堵截。

△　刘桂堂以王有为为前锋，刘怀志任南路，自率北路，武子英充后卫，窜入莱芜、新泰一带山区。韩复榘分组六个纵队包剿。韩自兼第一纵队指挥，以孙桐萱、曹福林、展书堂、李汉章、谷良民分任第二、三、四、五、六队指挥。

3月25日　　陈果夫、邵元冲、吴铁城、叶楚伧、潘公展等发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日在上海成立。该会宣称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反对共产主义为宗旨。要求“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孔孟之道。选举理事61人，候补理事20人，以陈立夫、邵元冲、吴铁城、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潘公展、吴醒亚、李登辉、欧元怀、沈鹏飞、叶秀峰、张寿镛、斐复恒、黎照寰、翁文灏、刘湛恩等为常务理事。29日举陈立夫为理事长，邵元冲、吴铁城为副理事长。

△　新疆省代理主席朱瑞墀病逝。27日，该省委员会决议推李溶暂代。

3月26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经念周讲《新生活运动之真义》，要旨为：一、新生活运动之准则——由“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做到一切合乎“礼义廉耻”；二、新生活运动之性质——乃一种极平实、简明、普遍而久远之救国救民之运动；三、新生活运动之方法——先从自己身体力行，然后以身作

则来劝导感化社会上一般人。

△　汤恩伯师进攻德胜关至泰宁要道新桥。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红一、三、五军团在窑排岭与汤部发生激战。次日，樊崧甫师一部由水湖进攻新桥，向窑排岭西部夹击，红军撤向鹅眉峰、水元方向。汤、樊两部占新桥。28日，红军反攻新桥未成，退守梅口、弋口。

△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到会委员及列席代表共30余人。宋子文作中美棉麦借款经过及借款支配情况的报告，提出美麦、美棉销售的困难。大会通过宋的棉麦借款用途支配案，决定修改合同，美棉由原订5000万美元减为1000万美元，麦及粉仍为1000万美元，共2000万美元。大会还通过提高糖米价格、火柴统制及修治冀省各河计划等案。

△　广东惠阳海岸夜间飓风，刮走帆船及舢舨300余艘，死亡渔民800余人。

△　上海教授作家协会成立，举韩觉民、黄宪章等九人为执行委员。8月发刊《教授与作家》杂志。

3月27日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联席会议，讨论执行部与政务会两机关存废问题，决定暂时维持原状。同时，同意改革省制，拟推陈济棠为首任省长，推邹鲁、林云陔等七人为宪草研究委员。李宗仁表示悉听陈济棠指挥反共。胡汉民代表李晓生表示，对设军分会不加反对。

△　湘赣红军萧克、高咏生分别返回永新、黄金洞后，是日，刘膺古重新部署“清剿”区域：一、划萍乡为江西第二区保安团“清剿”区；二、宜春、分宜、新喻、清江、上高、宜丰等县为第十八师“清剿”区；三、修水、奉新、高安为第五十师“清剿”区；四、万载为第四路军补充总队“清剿”区；五、平江、浏阳、铜鼓为第十九师“清剿”区；分别赶筑碉堡、公路，加紧围攻红军。

△　川军第五路军城口、万源警备司令陈国枢之第一、第三两纵队由白沙河进袭万源。红四方面军少数留守部队自动撤至万源县筝墩、官渡等地，陈部第三纵队进占万源城。刘湘宣告第二期总攻结束，准备第三期总攻。

△　刘桂堂部众被围于彭山，次日在彭山突围入蒙阳县北鲁村镇。29日，被鲁军包围于沂水。30日分股入莒县南窜。

△　西康凉山越隽地区彝、汉两族群众三四千人，为反抗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及地方当局的残酷压榨举行武装暴动，歼灭驻在越隽附近之刘部驻军。围攻县城三昼夜。刘文辉由西昌急调部队前往镇压，暴动群众被迫撤退，隐入森林。领导人王义芳、蒋维洲等牺牲。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以安辅仁为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劳方代表，程海峰为顾问。

3月28日　国民党中政会第四〇一次会议，决议修正《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各路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一条内“南西北三路”改为“东南西北四路”。4月3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准予增设赣粤闽湘鄂东路军总司令部及修正《各路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一条，予以明令公布。

△　刘建绪电令彭位仁师开赴宁冈、永新，切实封锁澧田、永城、夏阳沿河之线；命王东原、陶广两师以主力专觅红军第十七、十八师穷追；着陈光中、成铁侠等部切实封锁蔡家坪、铜坑、夏阳河东及潞江至砻山口各线。决定于永新以北、袁水以南地区（禾山、黄江、花溪）攻击红军。

△　国民政府电令刘文辉，着将西康达结、打金二寺喇嘛寺产发还藏方。

△　考试院长戴季陶偕焦易堂、许崇灏及水利专家王应榆、班克

耳等30余人由南京启程前往西北考察水利及交通。

△　天津永利、久大、黄海和永裕等企业合组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添招股本200万元，合计资本总额1100万元，于上海设总管理处，由范旭东任总经理。

3月29日　薛岳率第四军，由水口附近进占善和，红军警卫师和模范师在善和东南孤山、蟠龙山等高地阻击。次日薛部赶筑善和至水口间碉楼封锁线。步步为营，向招携推进。

△　孙殿英在太原会晤阎锡山，经商谈决定孙留居太原。同时由阎向北平军分会提出：一、请保留其军分会委员之职；二、孙不再过问部下之事；三、孙暂居山西。30日，何应钦致函孙殿英，略谓："此次毅然解除兵符，具见为国忠，对友诚，极佩。吾人对国家只要抱定忠诚，不患无报国机会。"4月初，孙军残部在磴口、石嘴子附近者由傅作义收编成三旅；其在宁夏、平罗者由朱绍良收编。

3月30日　行政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庚款机关联席会议，就教育文化事业之分工合作原则作出决定：一、美庚款注重自然科学；二、英庚款注重农、工、医等应用科学；三、法庚款注重医药、生物及艺术；四、各庚款机关对社会科学与文艺，每年酌定部分款项以资奖进；五、各庚款机关对于文化事业之补助，宜注意乡村文化事业之发展。并决定英庚款机关拨款设农工职业学校各一所；美庚款机关增设一高等女子教育机构于南京；择定若干国立大学设立研究所。

△　第九师李延年部由龙岩分向连城、长汀推进，准备新的进攻。

△　唐山华新纱厂工人反对厂方减低工资举行怠工，警察局赶派干警队到场镇压。4月1日，工人向厂方提出：一、增加工资；二、恢复原有状况。并宣言与开滦工人一致行动，立即罢工。4月2日，厂方在陶尚铭等调停下接受工人所提六条件，下午4时复工。

△　国际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通过会章，选举吴颂皋、袁道丰等七人为理事，谢冠生等五人为监事。

3月31日　　马仲英余部窜入甘肃安西、敦煌等县。4月16日，该部100余人进入嘉峪关，在肃州附近被马步康旅包围缴械。

△　上海美亚织绸厂厂方制造“三一一”惨案后，是日又限令工人全部离厂，停止供应膳宿及薪金，以停业相威胁。4月1日，更宣告停业，各厂职员300余人全部离厂。工人斗争处境不利，至4月22日被迫复工。延至5月5日签订劳资和约七条，厂方允许略加津贴，被厂方停止工作的工人复工，罢工了结。

是月　　中共东满特委军事部负责人王德泰联合反日游击队、抗日军首领约15人在吉林延吉县三道威能芝营山顶举行会议，决定将“间岛”地区的“中韩游击队”改组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以前任游击队总队长朱镇（朝鲜人）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下辖四个团，六个游击大队，师部暂设延吉县三道威东沟。会议并通过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反对日本屠杀东北民众，破坏日军军用设施与工厂，并将其驱逐出满洲。下旬，朱镇联络山林队头目九胜共同合作抗日。

△　蒋介石设立侍从室，派晏道刚为主任。是月，蒋派晏赴长沙，与何键会同调整西路军战斗序列，并允何在湖南发行公债充作反共军费。

△　山西省政府、太原绥靖公署和绥远省政府共同组织的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决定组设晋绥铁路银行，作为两省地方铁路之金库，并发行多额兑换券。

△　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举竺可桢任理事长，以张星烺、董绍良、翁文灏等为理事。

△　南京《文史季刊》创刊，中正大学编辑出版。

△　《物理学报》第一期出版，编辑丁燮林、严济慈。

△　北平《图书季刊》创刊，由国联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与北平国立图书馆合办，主编袁同礼（守和），编辑谢礼士、向达等。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发行。出中、英文各一种。

△　武昌《华中小说》月刊创刊。

△　日本内阁制定《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

△　日在华设立“北支那协会”，是月举行成立大会，由会长芳泽谦吉主持。大会决定以华北方面为中心，强化“日华经济提携”。

4月

4月1日　　南昌行营在南昌再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就东、北两路军协同进攻，会师赣南之计划，颁发该两路军推进方法及具体部署，规定：一、北路军以第三、五两纵队4月取广昌，5月10日间向宁都推进，6月10日前占宁都；二、北路军第六、七两纵队4月底进占龙岗墟，5月底占古龙岗；三、第一路、第二十路、第二十六路及总预备队第五十三师等部，分别于5月中、下旬完成招携至新丰市之横缀碉堡线，并分期与南城、广昌纵缀碉堡线、富田沙溪碉堡线衔接；四、东路军第四纵队5月20日占连城，6月进取长汀；五、东路军第十纵队与第八纵队5月初占建宁，5月20日前抵宁化，6月中旬向石城进攻；六、东路军第八纵队协同第十纵队进攻宁化，5月中旬达建宁，下旬进攻宁化；七、东路军第九纵队以第八十、五十二两师攻占永安，第八十五师在5月5日以前接替泰宁以东防务。

△　南路“剿共”军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以黄延桢、黄质文两师任中路，由澄江主攻盘古隘，黄任寰任右路及时推进，齐

指筠门岭；以李振球任左路作策应，余汉谋坐镇信丰任总指挥，总计兵力达十余团。是日，黄部邓辉团攻占盘古隘。

△　湘赣红军第十八师徐彦刚部进攻文家市，3日在永和寺与湘军成铁侠部接战，5日转战东门市，7日在浏阳大幅溪破坏马坳大道，开展游击战。

△　陈调元在南昌正式就任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

△　南满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共产党人杨靖宇联络田麟、老长青、林青、六虎等18支抗日武装，于濛江县陈家砬子开会，决定联合组成“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共同抗日。一致拥戴杨靖宇为总指挥，在南满东边道的清原、柳河、金川等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　日军是日起在唐山沿线举行野战演习三日，19日再次于唐山进行攻守演习，并擅架军用电话线。当地政府畏势，任其横行。

△　日本对华北劳力流入东北采取管理措施，决定设一专门机构执行。是日在天津日租界浪速街设立大东公司，以日人三野友吉等为创办人，由日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中佐指导，资金一部由特务机关提供，一部取之劳工发证手续费收入。大东公司以对进入东北的劳工实行调查、审批、发证为其任务。11日，青岛大东公司亦成立。

△　刘桂堂在山东莒县遭鲁军谷良民师进剿，次日经海州、日照窜入江苏赣榆县境，3日分扰赣榆县曹城及石桥西南之吴山、庐山一带，苏、鲁省军在赣榆欢敦埠地区堵截。5日，刘部复返山东临沂、莒县，为鲁军孙桐萱、李宣德、许文耀等部追堵。

△　国联行政院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上年派遣来华之联络员拉西曼，是日完成其报告书共11章，论述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及其成绩，建议今后更密切合作之方法。10日，拉西曼离华返欧。

△　内外债整理委员会与各债权国协议，议定整理外债办法，其类别计49项。29日，财政部组设整理外债委员会以备进行。

△　日本与伪满联合在承德组设之大满公司成立。该公司专门收买热河地区之鸦片烟，于承德、平泉、凌源、朝阳、赤峰、围场等地设分公司，资本额伪币100万元，总经理张玉轩、副经理胡莫阶。

△　上海《民族文艺月刊》创刊，民族文艺月刊社编辑兼发行，主编刘百川。该刊以“民族”为幌子，攻击革命的左翼文化，与《血汗月刊》为伍，出至第六期止。同年10月15日起改名《国民文学》出版，主编张资平。

△　北平《西北春秋》半月刊创刊，西北春秋社编辑，内容为介绍与研究西北问题。

4月2日　　川军邓锡侯部右翼陶凯旅由木门进攻南江门户长池；中路裘渭清旅由旺苍坝、普子岭南下配合；左翼卢济清旅沿大巴山麓掩护南江左侧，是日进占长池。徐向前红四方面军自本日起在西线继续主动撤退，先后退出江口（平昌）、南江，逐步撤至贵民关、观关山、得胜山一线，集主力于镇龙关、石窝场、高白寨一线。7日，邓部陶旅占领南江及南江河。

△　张学良在汉口召见刘镇华、何成濬、徐源泉、萧之楚、张钫、庞炳勋、郝梦龄、罗启疆、潘善斋等九将领，商定反共军事。次日张由汉口出发巡视鄂东。

△　日南满铁路局长宇佐美在北平会晤黄郛，提出日方要求：一、扩大北平政整会权限；二、取缔抗日之党部人员；三、刷新华北人事；四、解决通车、通邮、设关等问题；五、与日本实业团提携等等，嘱黄往庐山面谒蒋介石时转达。翌日，黄郛离平赴赣，向蒋报告华北政况，请示华北外交方针。

△　张继由华北返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谓：目前山海关、古北口等各县行政权仍操之于日本之手。“值此暴日野心未泯，企图进犯察省之秋，战争恐将难免”。又谓，“华北危机四伏，北平大有朝不保夕之虞，与东北‘九一八’前夜形势相似，诚恐吾人作亡国奴之日已在眼前”。

△　开滦唐山矿工人千余人包围滦榆区行政专员公署。翌日，启新洋灰厂工人继起罢工。4日，开滦矿工再次包围滦榆区公署，要求立即答应所提要求。6日，实业部长陈公博请汪精卫电饬于学忠加派保安队至矿镇压。7日，保安队至矿限令工人复工，一面由陶尚铭向启新厂方交涉，要求其接受工人条件。8日，启新罢工解决，唐山矿罢工势孤。10日、11日唐山矿工相继全部复工，斗争失败。

△　浙江湖州机织工人上月13日因反对减低工资举行罢工，30日千余工人赴省府请愿，由省方派员召集双方调解未成。是日，罢工工人与零机户冲突，县署基干队开枪镇压，打死工人二人、伤一人，3000工人遂捣毁县署，保卫团又枪杀工人两人，全市商店罢市一日支援。次日，在省府派兵压制及派员调解下始息，8日起各厂陆续复工。

△　天津裕元纱厂倒闭，1600余工人失业。

4月3日　　蒋介石令樊崧甫纵队接替汤恩伯纵队守备新桥、泰宁间碉堡线任务，派汤纵队向东搜索，并于4月10日以前完成将乐、泰宁间碉堡线，以巩固闽北防线。

△　刘湘下达第三次总攻令，限期会师通江、南江，完成其第三期军事计划，并于南充设四川“剿匪”总部前线军事委员会，由刘从云任总指挥。同日，第五路军范绍增师全线出犯通江县岩口场、杀牛坪、毛坝场、红灵台等地，4日次第占领土地堡、鹿鸣场至长滩河一线，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撤至复兴场、刘坪、曲溪口之线。6日，范部

廖旅等进占泥龙场、石龙场、红灵台，续向长滩河前进。

△　自2月贵州反王家烈之东路联军车鸣翼失败后，西路联军犹国才之势亦孤，遂被迫与王家烈言和。是日，王家烈主持贵州省府会议，委犹为贵州全省清乡司令。

△　胡汉民就立法院公布宪法草案初稿，在《三民主义月刊》第三卷四期上发表《论所谓立宪》一文。称所谓“宪法初稿”与“民元约法”、“天坛草案”、“曹锟宪法”及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一样，是一种废纸。14日，又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军权统治不消灭，宪法等于废纸”，“徒然一张白纸黑字宪法，断不能臻于宪法之治。”

4月4日　财政部盐务署在南京召开整理盐务会议，6日结束。通过：一、取消引票；二、筹备两淮借款800万元；三、实行新盐法。

△　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代表中国与土耳其政府外长拉斯托签订《中土友好条约》，双方决定互派大使，对设领及商务日后另约规定。5月26日，立法院通过该约，5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6月4日，土耳其国会批准。8月17日，中土双方在日内瓦互换签字条约，定于8月31日起生效。

△　盛世才军越阿克苏追击马仲英残部。盛以其所部长途追击疲惫，是日改派伊犁东北军刘斌部开赴南疆继续追击，并令南疆保卫司令和加尼牙孜阻截马部外逃之路。

△　国民政府任命戴嗣夏为陆军第四十六师师长。

△　北平故宫博物院举行第一次理事会，举蔡元培为理事长，叶楚伧为秘书长，陈立夫、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黄绍竑、李书华为常务理事。

△　天津县淀北海河放淤区农民千余人包围县府请愿，要求停止官方占用民田，无结果而散。翌日及6日，农民结队续往县府再次请

愿，持续三日。

4月5日　　刘戡师进攻闽西白沙、邹坑，被红军寻淮洲第七军团刘畴西第二十师和周昆第二十二师、周建屏第二十四师击退。翌日，刘部从正面进攻，李玉堂师由石铭策应，又遭失败。7日，刘部等以补充团主攻红军左翼，以第二四七旅由邹坑附近迂回新坊左右夹攻。经激战红军退旧县，刘部占白沙。

△　湘赣红军第十六、十七师萧克、高咏生两部在永新西部三王庙伏击王东原师侯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等，全歼该旅。彭位仁师杜道周旅赶往增援，以六团兵力反攻，红军再次获胜，又歼六七百人，缴获甚巨，胜利撤回永新县禾山。

△　红军警卫师和模范师撤出江西招携，转入东南部大山中。是日，薛岳部郭恩演师进占招携。继后，赶筑金竹、招携间横缀碉堡封锁线。

△　黄郛在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南下，因华北最近各项外交问题，有向中央商办及请示必要”。“通车则纯为技术问题”。“此次谒晤蒋、汪时，将请示一磋商办法，希望在不承认伪国、不割裂四省之原则下交涉”。“至华工出关问题，多由汉奸招致”，“取缔亦极困难”。当晚，黄乘“德和”轮赴赣。

△　北平市公安局召集全市各报社负责人，宣布检查报纸、小说及其办法。到会各报请允由各报社负责人自行分别检查，免于送检。次日，北平29家报社又正式书面呈述理由。

△　《人间世》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林语堂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提倡所谓“闲适”格调小品文。

4月6日　　黄郛抵南昌面谒蒋介石，报告华北情形及日方侵夺华北所提之各项要求，与蒋讨论通车、通邮谈判方针。

△　蒋介石电令各省严禁汉奸招募华工出关。9日，北平军分会密令各地严禁华工流往伪满。

△　蒋介石通令各省、市政府严禁工人罢工。电称："嗣后各处工厂，倘有擅自罢工、怠工情事，应由当地主管官署严加制止。若发生上项风潮之工人组有工会者，并得由该管官署查照工会法……先将该工会勒令解散，使风潮得以迅速解决。"

△　红新十军方志敏部进至光泽县陈坊、杉田游击。北路第三路军第二十四师师长黄子咸电请陈诚派队堵截。陈复电无兵可派，只令由地方团队协助扼守。

△　伪满财政大臣熙洽在东京与日本拓相永井决定以"满铁"为基干之伪满经济建设方针，并与日本银行界接洽大借款。

△　法国巴黎华侨召开大会，对法国放映侮华影片《黄人巡察记》表示愤慨，决定推举代表向法国政府交涉取缔影片及同名小说，并呈请南京国民政府撤惩参与者褚民谊，饬外交部向法国提出抗议。10日又发表宣言，详述事实经过，再请当局严厉交涉。17日，旅法华侨刘振武等再次抗议法国继续放映该片。

4月8日　　德国前陆军总司令赛克特第二次来华抵达上海，20日前往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顾问。赛在南京稍事停留即乘炮舰前往庐山，蒋介石由南昌赶至与之商谈。5月1日，赛向蒋提出，要求以蒋之委托人名义出面任总顾问，其权限除指挥所属德国军事顾问外，并规定每星期二、五上午在南京蒋介石官邸分别召见有关军事人员商谈军事，处理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之后，赛在南京富桂山召集德军顾问人员讲话，谓其被授与有绝对指挥之权；并对顾问团进行整顿，将原有三个组扩大为部队组、装备组、军事教育组、人事组及编译组等。又决定先编练六到八个现代化师，配以德式装备与重炮（蒋提出装备60到80个师的计划），蒋介石令孔祥熙筹拨5000万元作该

项建军的额外经费；另一任务为长江下游及沿海之布防。

△　日本驻华武官柴山在北平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图尽快达到通车、通邮目的。内称：“中国方面曾于过去十个月间，凡属根据协定之各种问题从未进展，如通邮、通车等问题。”并以威胁口吻宣称：日方“持隐忍自重之态度有一定限度”。

△　伪满民政部命令各省公署及“新京”、哈尔滨两特别市，北满特别区公署，应于7月1日一律使用伪满“国币”，禁止旧币流通。

△　上海小报及电影界亲日分子冯梦云（《大晶报》主人）、施济群、来岚声等20余人离沪，前往日本参加长崎国际生产博览会，自称“中华报界同志东游队”。日本外务省文化局利用此会招待亚洲各国亲日分子，以便开展其所谓“亚细亚运动”。冯等不顾上海铁血救国团的警告，仍然前往。

4月9日　　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根据南昌行营的推进方法及部署计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向广昌推进：第一段攻占甘竹及其附近地区，第二段攻占长生桥、饶家堡、高洲瑕一带，第三段攻占广昌城及其附近。并命罗卓英指挥第五纵队为河西纵队，樊崧甫指挥第三纵队为河东纵队，分别沿盱江两岸并肩南下。同日，陈令第三纵队（欠第六师主力）集结河东罗家堡一带，第五纵队及第九十八师集结河西枫林圩、白舍一带：并令第八纵队及第六师主力由黎川方面逐次向南丰前进，以便执行第一期进攻甘竹之作战计划。

△　薛岳部完成招携——善和——藤田间横缀碉堡封锁线，共筑成碉楼94座。翌日，由招携、善和转进，13日集中沙溪附近，筑堡向龙冈推进。

△　英国政府为中缅南段边界问题照会国民政府，提出应由双方以妥协互让精神磋商，其谈判必要时可在南京，双方代表应包括缅甸代表在内。翌日，外交部复照，表示决定和参谋本部派定杨光灿前往

云南，会同在滇勘察江心坡地界的尹德明，与英方人员实地勘察中缅段界务。

△　上海113家缫丝厂因丝价惨跌，先后停工者达百家以上，勉力开工者仅宝泰、永亨等五六家，失业工人约达五六万人，各丝业工会联合组成失业救济委员会。是日中午，该会率各区工人代表500余人向市政府请愿，要求迅速照实业部所议救济办法予以救济。当局表示将积极筹划尽力设法解决。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向全国人民提出反帝统一战线斗争纲领七项，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

△　广昌战役开始。是日，陈诚部河东、河西两纵队沿盱江两岸南进甘竹。河西纵队夏楚中师进占罗坊圩，霍揆彰、李树森两师派队向牛鼻寨出击；河东纵队周碞师第十七旅向盱江东岸制高点延福嶂、白叶堡一带推进。翌日，第十七旅旅长丁友松以一部进攻白叶堡，彭德怀红三军团李天佑、钟赤兵第五师以一部进行反击，一部由延福嶂出击，歼其两个团，活捉团、营长各一人。

△　南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李扬敬在平远召开军事会议，余汉谋及东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李延年亦参加，共同商议总攻中央苏区筠门岭之计划。

△　汪精卫偕孔祥熙、顾孟馀、陈绍宽、陈公博、唐有壬、曾仲鸣等离京赴赣，前往参加蒋介石召集的解决华北问题会议。翌日，汪等抵达南昌。

△　美国白银问题专家罗杰斯抵沪，前来调查中国白银。12日至南京与财政部长孔祥熙交换意见后，当晚由孔陪同返沪。13日，孔在

上海举行茶会，介绍罗与上海银行界见面，之后在沪商定调查白银之步骤。

△　日军在北平东郊举行实弹野战示威演习。12日，又在西郊白石桥紫竹院附近演习。

4月上旬　日军蒲本（第十六师团）、若山（第三师团）两部于本旬陆续由日本京都等地出发开往东北，兵力三万余人，接防日军第八师团西义一等部。中旬，蒲本、若山两部先后开抵长春。月末，日军西义一、广濑寿助及畑俊六等师团由长春等地陆续回国。

4月11日　蒋介石、汪精卫和黄郛等在南昌商议华北问题及对日外交方针，汪主张通车问题“拟从速进行，恐愈久愈糟”；黄郛要求扩大平政整会权限，以顺应日方强求解决华北问题，首先以地方事件着手解决通车，然后再解决通邮、关税等问题，借以维持华北现状，并表示此为挽救华北危局惟一之出路。

△　蒋介石令第九十八师夏楚中由赣南开赴宜春，进攻湘赣红军。

△　刘桂堂部众窜入诸城、日照。12日，在诸城、日照间桃花山被鲁军包围。15日，经高密北往安丘、潍县扰昌乐。18日，南入莒城。19日，在莒城东南杨家官庄被展书堂师唐邦植旅截击，当晚返入江苏赣榆县。

△　考试院长戴季陶在西安致电蔡元培、汪精卫、王世杰、蒋介石等，请通令全国严禁发掘古墓，谓“纵寻取学术材料，亦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

△　前清政府陆军部尚书、军咨大臣、袁世凯大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病死于北平。

4月12日　交通部长朱家骅对记者表示，行政院对通车、通邮未

加考虑，交通部仍一秉过去封锁政策办理，并无变更方式之动机。至查获日人私运东北邮件，除令各地严密防范取缔外，并请海关协助，一面由外交部提出交涉。

△　南路“剿匪”军黄延桢部三路进攻筠门岭门户罗塘，先占黑风岭，次日在空军协助下占领罗塘。

△　贺龙部红军进攻黔江未成，14日占酉阳濯河坝、冯家梁，一部入黔江北部新场等地，并向酉阳进攻。

△　中英庚款财政委员会通过导淮借款210万元案，用以建筑淮阴、邵伯、刘老涧等闸。

△　财政部公布《币制研究委员会章程》九条。嗣后陆续聘请张嘉璈、吴鼎昌、钱新之、周作民、陈光甫、贝祖诒、胡筠、唐寿民、宋子良、胡祖同、沈元鼎、瞿祖辉、徐新六、秦祖泽、耿爱德、陈锦涛、孙衡甫、傅宗耀、齐致、卞白眉、吴震修、叶薰、吴蕴斋、顾季高、俞寰澄、刘大钧等为委员，令派曾镕浦、陈行、李觉、席德懋、陈端、沈叔玉、卢学溥、陶德琨、徐堪、戴铭礼、吴曾愈、杨其观等兼任委员，指定陈锦涛为委员长，令派戴铭礼为秘书长。5月开始筹组该会，聘任专家从事研究整理，拟订具体方案。11月1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开始办公。

△　北平燕京大学抗日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誓死反对通车、通邮；并派十余代表分赴本市各大、中学校联络，请速一致反对。

△　蔡廷锴偕谭启秀、邱兆琛等由香港启程赴欧。临行前发表谈话称：“对时局无意见，惟望一致对外，收复失地，虽在野亦不放弃国民责任。”“谁有救亡办法，即与谁合作。”

4月13日　　陈诚命河西纵队黄维、傅仲芳由瑶陂、白舍向甘竹右

翼咸水岩及紫灵山以西刘家堡等地进攻，以夏楚中师置罗坊圩、紫灵山进行掩护。董振堂红五军团第十三、十四师分别扼守咸水岩、刘家堡一带。是日，右翼黄维师第六十一团在坊坑北端遭红军伏击，损失甚重。下午1时，傅师攻占刘家堡以北高地后以一部协同攻占咸水岩。红军右翼暴露，遂退据罗家寨一带。翌日，黄、傅两师集中兵力进攻仙人嵊，红军被迫南撤，黄、傅两师占仙人嵊、甘竹市及其西部百子岭等地要。

△　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华北外交。发言人对蒋介石所持方针不予赞同，对黄郛尤肆抨击。经决定原则三项："（一）华北外交不必由黄郛办理；（二）通邮问题，应照欧战时比利时大部国土为德国军事占领后，邮政改用德国邮票，仍照常通行，如关外贴用日本邮票，亦可许其通邮；（三）通车问题决不可商，日如提议，只有拒绝，庶免有承认伪组织之嫌。以上原则由外交委员会整理及通过大会后，即送呈中政会，作为向中央之建议。"并一致通过请行政院长汪精卫于20日到立法院报告通邮、通车问题。

△　汪精卫训令北宁铁路管理局，准备与日本进行通车交涉，俟黄郛回平后即正式开始。

△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密电驻华公使有吉明，要求按照国联对华技术合作之日方态度，"对目前外国对华的策动"，首先予以破坏。

△　日军增兵北宁路沿线各站，扬言将强行通车、通邮，制造华北紧张局势。

4月14日　　蒋介石电令刘湘肃清南江、巴江两岸红军，"包围通江"，"早奠川局"。同日，川军第五路军唐式遵部杨旅由通江县三教寺进攻黄泥堡，刘旅由清花溪出击丝罗坝，廖师由双龙场进袭一家坪，欲夺镇龙关，直逼通江城。徐向前红四方面军集结主力御敌。至16日，红军在长滩河、曲口河、苔竹滩之线歼川军千余人。

△　中共川陕省委制定《红五月工作计划》。提出“全党集中力量领导整个红军和赤区千百万群众起来彻底消灭刘湘，保卫赤区”，是“川陕党的一等重要的任务”。要求加紧扩大红军，武装群众扩大游击战争，动员运输队、担架队，集中粮食，节省物资，加紧三次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以及建立对白区士兵中的工作和深入进行宣传工作等等。

△　汪精卫由南昌回到南京，向中政会临时会议作报告，讲述在南昌所决定的华北对日外交方策。会后，汪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在南昌讨论范围甚广，如年来华北办事经过及目前情形，以及世界大势、东亚时局，均在讨论之列，但尚无任何具体决定。”继又称：“外传通车、通邮问题，实则日本在去年即已提出……惟黄（郛）委员长至今未与日方谈判。”又称：“东北失陷未复，华北问题当然严重，惟不能谓绝对无望。”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通电，希望国民政府“一反过去屈辱投降之政策，毅然以维护国权，恢复失地为己任”，而对于“卖国之徒，尤当绳以法纪”；对日伪速定国策、方针，予以宣示；反对日本对华北通车、通邮之要求。

△　国民政府派曾养甫、颜德庆、卜隆荆恩、朱家骅等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指定朱家骅为董事长。

△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就戴季陶在西安通电请一致禁止学术团体随处发掘古墓事复电，谓学术发掘不仅未破坏民族历史，且足以向上恢复千余年之信史，故对于学术研究，不宜泛加禁止，发掘古墓对“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

△　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临时会员代表大会，苏、浙、皖、赣、鄂、鲁、冀等省38家工厂派代表参加。会上讨论实行火柴业统制问题，并选出统制委员七人进行筹备，以期共同应付外商火

柴的倾销及国内火柴业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

4月15日　薛岳部开始构筑沙溪——韶源间纵缀封锁线之碉楼及公路，逐段向南推进。是日，郭思演师由沙溪向韶源推进，与红军独立二、三团发生遭遇战。红军激战三小时，被迫向上固、含下方撤退。越三日，薛部筑成韶沙段碉楼37座。

△　3月初，第二十一师梁立柱部两个团由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分路进攻横峰，遭到红新十军方志敏部的英勇抵抗。是日，红军在横峰县漆家坊反击获胜。

△　汪精卫在南京会晤孙科，向孙详述南昌蒋、汪、黄会商华北对日外交之经过，孙以立法院长身份表示“深予谅解”。

△　日本政府召开驻华沿海地区各领事及海军省、陆军省特派员会议，决定华南诸问题：一、开放台湾人移居闽省，由厦门向内地伸展；二、改组“台湾公会”及“青年团”，派退伍军人进行训练，给予充分的经济和枪械之接济，使之成为有力的军事组织。以日人桑源为总指挥，于厦门、福州均各扩充至2000人；三、对知识分子及“上流社会”宣传“中日亲善”，组织“亚洲同志会”及“亚细亚协会”加以收纳。对其中具有地位及活动力较强者由总督署给以充分接济；四、由日人岩奇在厦门设总机关竭力收买分化民军；五、对下层社会之贫民，鼓励其加入台湾籍。如遇中国方面进行干涉，即由日方出面保护。

△　罗马教皇决定在伪满设布教区。

△　周启刚、刘士木、王培孙等在上海成立中南文化协会，以“宣扬中南文化及促进侨胞在南洋之地位为宗旨”。同年12月1日出版《中南文化》为会刊。

△　《中南情报》半月刊在沪创刊，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主办，俞君适编辑，以研究和解决华侨问题为主旨。原名《南洋情

报》，经改组后更今名。

4月16日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命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由南丰双田圩集结里程、凤冈一带，暂归河东纵队樊崧甫指挥，准备向广昌方面进展。

△　湘赣红军第十七、十六师萧克、高咏生部以赣西永新县之禾山、秋山、公公山为基地，分入永（新）莲（花）、永（新）安（福）、安（福）莲（花）各大道出击，在安福、莲花间的利田击溃陶广师王育瑛旅，湘赣苏区根据地暂获稳定。是日，刘建绪下令彭位仁、王东原、陶广、陈光中各师，分别在永新、宁冈、黄江、花溪、安福、田里、莲花及横界岭等地，赶筑碉堡线，封锁、围困禾山红军。

△　川军第四路军杨森，悍然撕毁1月份与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所订“互不进攻”的协议，增调第四混成旅高德周等部分别进攻通江、巴中之南的澜草渡。是日夜，高旅渡江口河进占玉皇场、罗丝顶，翌日攻占高庙子、小鹿山，向澜草渡推进。红四方面军一部击溃高旅乘胜反攻，共歼杨森部官兵千余人。杨森遭此巨败，利用山险设防江口河，改取守势。其后，杨森再次与红军联系，重申“互不进攻”前约。

△　黄郛由赣抵沪，下午在寓所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此行任务及通车、通邮等问题。宣称：“通车、通邮及各口设关卡问题，未曾单独提出讨论”；“鄙人对于外交问题，无一不承中央意旨以行，实无所谓华北外交。”为躲避舆论的指责，黄表示“留沪三四日即赴浙休养”。黄旋接受日本记者的访问，表示北上以后，决心“以快刀斩乱麻方式解决一切悬案”。

△　国民政府令派胡世泽为签订中土条约及商订中土居留、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部在武昌扩大组织，设参谋、

经理、总务、政务、机要等五处，钱大钧任参谋长，杨永泰兼秘书长。

4月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妄图独占中国的狂悖声明（简称“四一七”声明或天羽声明）。内容要点是：一、“维持东亚和平乃日本之根本政策”。若中国“利用他国以谋排日”，日本“断然反对”；二、日本反对“列国以共同之形式援助中国”，如投资、军事顾问、教育和出售武器；三、日本反对列国与中国进行“具有紊乱东亚和平秩序性质”的经济交涉；四、日本反对列国“以财政援助”为名“暗助中国抗击日本”；五、“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必须由日本“单独为之”。此声明经外务次官重光葵认可后发表。

△　黄郛在上海与日使有吉明会晤，表示通车、通邮等已得蒋、汪充分谅解，当于返回北平后急速解决；关于日资投资问题，亦将实行交涉。有吉告以21日离沪回国，将向日本政府报告一切。

△　国民政府派张钫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预备军副司令；任命萧致平为陆军第九十六师师长，谢溥福为陆军第五师师长。

△　伪满在朝鲜族集居的延吉、汪清等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延边设置集团部落25处。

△　盛世才在迪化召开新疆全省民族代表大会，提出“一切民族权平等和宗教自由”等口号。大会讨论“民族关系、土地纠纷及经济、文教、医疗”等问题，并表示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实行联苏反帝政策，宣布反帝、亲苏、民生、清廉、和平、建设等六大政策。打着革命的旗帜以扩张其实力。

4月18日　寻淮洲红七军团于9日起进攻永安，连日攻占南门、北门各高地。是日，第五十二师副师长卢兴荣率部至上坪增援，被红军击溃，损失机枪10挺。次日，卢部退杉口，红军攻占永安城。

△　南路军李扬敬督率粤军第七、八两师向筠门岭攻击前进。是日由平远进抵黄沙附近，首先进攻澄江桥阵地，遭红军第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及警卫师彭雄等部炽烈火力还击，伤亡甚重，毫无进展。陈济棠立令左右地区第一师驰赴平远以北增援，并派飞机五架助战。次日，李扬敬指挥三师之众在飞机助战下，将红军堡垒大部摧毁。红军第二十二师等部撤向盘古隘，下午4时许，黄部等占澄江。

△　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奉蒋介石之命，于本月2日率部由九江出发前往婺源，17日移其总部于婺源。是日，该部第三十三旅进驻婺源，协助赵观涛等部“围剿”赣东北红军，并防堵红军入安徽，分兵于景德、太白等地待机行动。

△　鄂豫皖徐海东、郭达申红二十八军在鄂东北与光山间之白鹤围、沙窝集与东北军某部接战，红军打死打伤东北军数百、俘5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0挺，长枪百余支。

△　日使有吉偕参赞有野由沪到京，与汪精卫晤谈。汪发表书面谈话称：“有吉公使之来，全系为辞行，无具体商谈。彼表示欲谋中日两国之和平亲善，回国向外务省报告。”汪又谓：“现在东北问题尚未解决，实为两国和平亲善的暗礁。”同日，有野答记者问称：“中日华北问题为地方事件，将来即由地方当局处理之。通车、通邮系事实上之要求，且中日在签订《塘沽协定》时已有谅解……此事正期待中国当局之表示。日方应付办法将视中国态度为转移。”

△　欧美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反对日本“四一七”之对华声明。是日，美国纽约《论坛报》社评谓：日本之野心“将使中国仅有空名之独立与主权，而成为日本之保护国”。英国自由党之《纪事报》表示：“西方各国决不承认日本之亚洲门罗主义。”20日，意大利《使者报》斥日本的声明“荒谬滑稽，毫无价值”。苏联《真理报》指出“日本帝国侵略程序尽行暴露，中国全部将为日本殖民地”。23日，德国社会党《攻击报》“希望英美共同行动对付日本”。

△　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假“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东京参谋本部提出一项极机密的《挽救华北的政策》文件，主张由李际春、石友三、白坚武等汉奸宣布建立所谓“新华北政权”，疆域包括长江以北各省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察哈尔、绥远与宁夏等地。其军队称为“定国军”，计划推举吴佩孚任总司令。东京参谋本部虽未正式批准，但此后土肥原却成了策划华北伪自治运动的主要人物。

△　国民政府任命欧震为陆军第九十师师长，免去吴奇伟第九十师师长职。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王揖唐应日人吉井芳纯邀请，以组织“中日真言密教会”为名由塘沽启程赴日。22日抵神户，28日达东京，先后与清浦公爵、近卫公爵、高桥藏相、平沼男爵、若槟男爵、大角海相、小幡酉吉及芳泽谦吉等会晤，大谈所谓“中日亲善”。王在东京恳亲会上说：“中日两国之亲善徒非以口述为倡导，应以文化事业为基础”，“余归国后决计努力从事此项工作。”5月11日至门司，又谓“中日关系应在精神上谋合作”，“以佛教为中心而图大团结”，如能将“黄郛政权扩大”，华北局势“更当安稳”。以后又至大阪等地活动。

△　杭州中国国强新闻社开办，主办人王乐水。

4月19日　　外交部就日本“天羽声明”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深信国际和平之维持，端赖世界各国之群策群力。”“世界无一国家，得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维持国际和平之责任。”中国有提倡国际合作之义务，“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中国与他国之合作，不论其为借款或技术协助，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用军事教练官、或专家，亦仅为国防上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他国对中国苟无野心，则对于中国力谋建设及安全之政策，殊不必有所过虑也”。

△　顾祝同电令陈诚部速由盱江两岸向长生桥、高洲堰 及广昌方面推进，并令河西纵队之第三、第八纵队改归周浑元指挥，第九十七师仍归还第八纵队序列；同时电令南城航空第一队沿盱江两岸甘竹、广昌间红军阵地及碉堡侦察轰炸。是日，陈诚根据电令部署进攻广昌第二期作战，命第三纵队主力进占饶家堡附近地区，增筑大罗山、如意亭、树德亭之线碉楼，再与第八纵队协同进攻沙坪上、樟树下之线；第八纵队于20日先以孔令恂师随樊崧甫师进至饶家堡、沙渡堡附近，策应樊师主力推进至石浒、河东间地区，逐次进占狗头坳、官府岭等地筑堡，向高洲堰 推进；第五纵队构筑白舍、甘竹间公路，第九十八师沿朱华山、伞盖尖筑碉前进，并占长生桥与第三纵队取连络；以上任务统限24日前完成。

△　樊崧甫纵队第六师周碞部在第九十八、六十七两师炮兵配合下，由杨林渡一带经白舍向甘竹东部大罗山要地进攻，以猛烈炮火摧毁红军阵地，攻占大罗山。是日，林彪、彭德怀红一、三军团各一部猛烈反击夺回。嗣经三日战斗，得而复失五次。22日，大罗山终为周部占领。

△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由沪返闽，26日前往延平主持反共军事。

△　川军第五路军范绍增部进占通江南部长滩河之线，以一部进攻巴陵寨、元山场，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一部据险防守，范部无懈可击，进入相持状态。

△　黄郛为通车问题致电汪精卫，谓：“通车问题，尊意拟从速进行，恐愈久愈糟，惟照在南昌所商定之程序办理，最早恐须在五月下旬，不知先生在京应付上有困难否？在余等三人赣中叙谈后，惹起内外双方之注意，此为当然之事，故一时必有种种揣测。但按沪情观察，逆料一二星期后，或可复趋沉寂也。”

△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外交审查会。决定：一、大会交付研究华北问题向外交当局质询各点，经汪精卫详细说明后不再提出；二、通邮、通车以外交当局最近确未考虑，故无表示意见的必要；三、目前外交不仅对华北应切实注意，尤应注意国际间相互之趋势及东亚时局之前途。13日该院秘密会议之三原则即完全取消。

△　伪满赴日特使熙洽返回长春向溥仪复旨。

△　日本就所谓“华北中日经济提携”提出具体计划。计划在汽车公路交通网及非武装区的棉花栽培方面，由日投资。待黄郛返平后，即着手具体确定。

△　交通部复电上海市商会及旅沪宁波同乡会，谓为统一邮政起见，特令全国民信局逐渐停止营业，限年底结束。

4月2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日本“天羽声明”发表谈话，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它“直接的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将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力量，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方，来进行反苏联的战争”。声明表示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号召全国人民“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才能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以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为组织基础，经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发起，在上海组设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由宋庆龄任主席，何香凝、马相伯、李杜、胡汉民等为委员，李杜兼军事部部长。该会制定简章，拟于上海设总会，各地设分会，以自动武装民众进行

抗日斗争。该会发起人及赞成人共1779人。是日，中共通过该会向全国人民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六条（亦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用作对日作战经费，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在国内人民、国外华侨及一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士中进行募捐）；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抗日的总机关；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才是中国人民自救救国的惟一出路。

△　北路军顾祝同依据月初南昌行营的部署，制定北路军“围剿”红军之部署和兵力推进计划：第三路军陈诚、罗卓英部，以其第三纵队樊崧甫、第五纵队罗卓英和预备队万耀煌等八个师，用主力进取广昌，待巩固广昌堡垒后再逐步向宁都推进，而以预备队巩固其后方，与五路军取联络；以守备队毛秉文部两师一旅分驻新桥、泰宁之线和资溪、光泽、杉关之线。第六路军薛岳、吴奇伟部，以主力七个师照原计划由沙溪经龙岗圩向古龙岗推进，计划5月底占古龙岗。第一路军郜子举纵队、税警总团和骑兵第一旅于5月初接防沙溪、富田之线。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三师一旅任永丰、藤田以东，南丰、广昌以西地带封锁之构筑及守备。第二十路军张钫部两师于5月5日前接防第八十三师防务。总预备队第五十三师于5月中旬完成富田、沙溪间碉堡线。

△　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电各党部，设法维护工商业。略谓：“我国方在萌芽之工商业，尤应特别维护，使之努力生产，充裕民生。”并谓：“劳资双方，更须确认休戚相关之旨，与整个国家利害所系之重大，竭力避免虐待工人，蹙其生计，以及怠工罢工等事。”

△　国民政府公布《工业奖励法》，凡12条，《特种工业奖励

法》废止。

△　日本政府为缓和“四一七”声明在国际上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发表声明。略谓：“日本不怀干涉中国独立之意。”“惟中国之统一与繁荣……不可由自私之列强越俎代庖。”“日本无意背离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政策，或侵犯现有诸条约。”

△　伪满军政部划定各伪军区划：奉天伪警备军混成第一旅辖柳河、通化、金川；伪警备第二混成旅辖辉南；伪警备第七混成旅辖临江；伪吉林省警备军第三旅辖珲春、延吉、汪清，骑兵支队在盘石；伪黑龙江省警备军第一混成旅辖安达、青冈、肇东、兰西；伪混成第二旅辖铁骊、张城、礼屯；伪混成旅第三旅辖牌楼春；热河伪骑兵第三旅在石虎沟。责各伪军分别“扫荡”所辖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　伪满委任满铁会社承办东北铁路七大线。计划兴建：一、牡丹江佳木斯线；二、凌源承德线；三、叶柏寿赤峰线；四、辰清（二站）黑河线；五、长春大赉线；六、大赉洮安线；七、怀远索伦线。

△　驻英、驻法公使馆分别在伦敦、巴黎向新闻界发表声明，严词驳斥日本“四一七”声明，指出：“此次东京对华政策之声明，不外为日本侵占亚陆传统政策之再度申说，益足以暴露其对中国之野心。”

4月中旬　　日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在哈尔滨得悉日军在土龙山遭受东北民众自卫军伏击，下令派出大部队，在飞机30架和战车掩护下，对土龙山地区进行报复性大讨伐。炸平土龙山地区村庄17个，炸死农民5000余人。

4月**21**日　　樊崧甫指挥第七十九、九十七两师，在周浑元纵队第九十六、第五两师的策应下进攻甘竹东南高地云际峰。彭德怀、董振堂红三、五军团各一部在羊山嘴、云际峰将其三个团击溃。同日，罗卓英纵队第十一师攻占长生桥。翌日，第九十六师在第五师的协同下攻占云际峰、高洲堰　。23日，第十一师再占伞盖尖，第八十九师攻

占火神岩。陈诚宣布完成进攻广昌之第二期计划。

△　南路军李扬敬继续督率黄延桢、黄质文、李振球各部向筠门岭西南之芙蓉堡及筠门岭进攻。是日上午，李振球、黄质文两师占芙蓉堡。午时，李部等侦探队进至筠门岭北端威胁红军退路，并以飞机五架猛炸筠门岭阵地。红军周昆第二十二师及警卫师撤出主阵地，下午3时许，李振球等部占领筠门岭。

△　薛岳部郭思演师向上固推进，进至韶源南端。红军李于辉第二十三师及独立团等部据韶源东南及上固一带高地抵御，激战四小时后撤至含下方。郭师等进占韶源及缺家坪一带。

△　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发表比“天羽声明”更加露骨的侵略言论，蛮横声称：“中国目前之纷乱状态，乃为一种对日本的直接威胁。”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与外国商订任何重要契约时，务必于事前商诸日本”。“任何对华援助，日本认为其适足以助长中国内乱，或对日本作战之准备，日本必须予以制止”。

△　日本任意解释《塘沽协定》，不断扩大对华北的侵略，黄郛亦感苦恼。是日，黄致电在沪与日方接洽之殷同，嘱其与日方交涉取消《塘沽协定》问题。谓如不能取消，“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时为扩大解释”。并对通航、通邮问题指示交涉办法。

△　刘桂堂部众由江苏赣榆再窜山东临沂，分入莒县、日照。23日，刘率亲信数人于赣榆乘日轮潜逃天津。至24日止，刘桂堂残部在临沂、莒县、日照一带被展书堂师全部歼灭。25日，韩复榘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报告剿平刘桂堂部众经过，并令展书堂师取道回济南。

△　国民政府令：派曹谟为出席第五届测量家国际会议代表。

4月22日　　蒋介石电饬各省政府指导实行新生活运动。略

谓：“新生活运动，乃为我全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惟其成败关键，端在我各地政府，以及宪警长官，与部队士兵，能否实施为断。”望各省政府，并由主管长官亲出督促，定时巡查监察，并特别注意于轮船码头及公共场所之实行情形，“乃不至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　李延年纵队刘戡、李玉堂等师攻占闽西庙前、新泉。红军周建屏第二十四师退守旧县。

△　薛岳部梁华盛师附炮兵一连再攻上固，红军第二十三师等部据守寿华山瞰制上固。梁师以猛烈炮火轰击，激战二时许夺取该山，红军遂撤退。翌日，薛部郭思演师进占上固东部之石头坑。

△　李济深在广西苍梧分电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主张西南执行部、政务委员会两机关趁时改组，在粤组设国防政府号召抗日，联合各方势力实行大团结，并电请国民党各中委暨各省代表赴粤，召开非常会议。胡等未作表示。是日，陈济棠为了表态，以公电致蒋介石，表示“我辈相约以诚，绝非此种谣传可以离间，请钧座对此可一笑置之”。“有我在，西南绝不背离中央”。

△　辽宁岫岩县及三角地带抗日义勇军邓铁梅等部，在明子谷与伪满警备军第二、三两旅激战。次日又于二道河发生遭遇战，日军小越大佐率队增援，义勇军遭到巨大损失。

4月23日　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纪念周上演说《日本之声明与吾人救国之要道》，略谓，日本“四一七”声明，“就是公开宣言要灭亡我们中华民国”，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并谓：“我们要如何才可以不做亡国奴，才可以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呢？”“我近来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我国全国国民，先从衣食住行四项日常实际生活起，恢复‘礼义廉耻’！只要大家立志救国，循此努力，加紧奋斗，我相信多则十年，少则五年，一定可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我们的国家，一定可以由我们手里复兴起来！”

△　川军第五路军唐式遵与第六路军李邦俊，以一师三旅之众猛攻通江东南部之镇龙关、石窝场、高白寨、老鸦城一线红军阵地。唐于双河场坐镇指挥，并电请第三、四路协同进攻得胜山。徐向前红四方面军集主力与之激战，至28日将其攻势挫败。在镇龙关一役即歼4000余人。刘湘第三期总攻被粉碎。

△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发表谈话，重申所谓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责任及利益。宣称：一、日本外交方针已于1月23日本人之演说充分表明，今后不变；二、对华政策在求列国共维和平；三、“四一七”声明与列国在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无抵触；四、列国对华援助如不带政治色彩则欣然欢迎；五、列国最近对华财政援助带有政治倾向，日本有充分监视之必要。对于种种援助“不得不排击之”。

△　英国政府训令驻日大使林德莱，向日本转告英对“四一七”声明之态度二点：一、遵守《九国公约》的条件；二、遵守1921年四国银行团对华投资办法的义务。如不违反此二原则，英国当不反对日本之对华政策。25日，林德莱访广田，探询日本对《九国公约》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态度，并声明英国必须继续享受各签字国所共有之在华权利。

△　蒙古自治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5月2日，全体委员24人通电就职。该组织分二厅、四处、一财务委员会，经费由国民政府每月拨给五万元，何应钦、赵戴文派参议常川驻百灵庙代理指导。

△　蒋介石电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决定全国高中以上毕业生，须受军训一月始发毕业证书。并规定以南京、武汉、洛阳为三大中心集训。

△　福州全球通讯社开办，主办人全克谦。

4月24日　日本内阁决定坚持外务省“四一七”非正式声明，表示将坚持1月23日广田在国会演说所声明的政策。

△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向外交部解释其“四一七”声明，谓日本不阻碍或加害中国之独立利益；外国与中国交易，日本表示欢迎，同时希望中国诚实实行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之主义；日本对外国在华利益毫无加害之意，但外国如以共同之力临诸东亚，且取有违背东亚之秩序及和平之行动时，日本惟有绝对反对。

△　郑州豫丰纱厂上年7月停工，经整顿后于本年春复工。是日，又以营业不振宣告歇业。嗣经当局出面调解，5月6日由厂方发给工人解雇费每人12元。

△　广东乐昌县鸡门山发生山崩，毁12村，死200余人。

4月25日　陈诚颁布进攻广昌之第三期作战计划，决由高洲堰、长生桥、伞盖尖之线，沿盱江两岸筑堡诱使红军主力决战，并包围广昌而占之。

△　第八十三师刘戡部以主力攻占上杭高峰扁山崃，并进攻旧县，红军周昆第二十二师、周建屏第二十四师撤至连水河右岸防御，次日晨刘部占旧县。26日，东路军总部于龙岩设行营。月底，蒋鼎文赴龙岩指挥，以便突破红军汀州、连城防线。

△　陈济棠令余汉谋、李扬敬两纵队准备续攻会昌、雩都；以第七、八两师直逼会昌，独一师由武北推进切断会昌、瑞金联络，第五师推进筠门岭策应；以第一、二两师分三路攻雩都。

△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四一七”声明作第二次声明谓“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稍以损害”；“中国与他国或与国联之一切关系”，“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稍加干预”；“日本过虑列国及国联以共管态度临于中国，无论现在国联方面或列国间，绝无如日本所虑之意思”；“中国不能容受列国间之共同束缚势力，犹如不能容受任何国家之单独束缚势力”；中国“对内工作之进行，不容他国干预，对外政策之实施，端赖有关系国之协作”。同

日，外交部训令驻英、美、法、意、荷、比、葡各国使节，向《九国公约》签字之各国政府，要求“根据该公约第七条规定，讨论维持该公约之切实办法，以限制日本之企图”。

△　宋子文由沪抵西安考察西北经济。翌日提出开发西北四项计划：一、兴修水利，先协助泾惠渠、洛惠渠完成，再进行导渭计划；二、建筑西（安）兰（州）公路；三、改良农业，发展棉产，改良兽种；四、兴办卫生事业。

△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四一七”声明，指出该声明“志在吞并中国”，全国当共起反对。

△　日使有吉离沪回国。28日抵东京，下午3时访外相广田，报告华北停战后之对华外交经过，并建议对华应取之政策。29至30日，有吉与广田、重光等商讨对华政策。有吉以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已趋缓和，现时已达积极解决中日问题，决定东亚大势之重大时期，建议取积极对华外交，提出以经济关系之调整作先决条件，不必采取直接交涉及其他非正式会议形式，分别以中央、华北、西南为对象，将各项问题实行局部交涉。一切交涉须使中国放弃提携第三国之手段。

4月26日　　汤恩伯纵队以李默庵师为左翼，由泰宁出发南攻弋口，以孙元良师为右翼进攻弋口西北之梅口。寻淮洲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等部与之激战，下午6时许，李师占弋口。次日，李师与孙师合攻梅口，孙师集主力于梅口以东吸引红军主力，李师乘势向梅口西端高地突击，于下午4时进占梅口，红军退守挽舟岭。

△　蒋介石以寝（26日）电重定北、东两路军推进方法及部署要旨：一、北路第三、五两纵队，限本月底攻取广昌，5月10日推进建宁，预定6月10日前以总预备军万耀煌、陶峙岳两师随第三、五纵左后方前进，与东路第五路卫立煌部联络；二、第六路薛岳部4月底进占龙冈墟，5月10日向古龙冈推进，预定5月底占领。命周浑元纵队在

攻占广昌后归入东路军序列，协同汤恩伯纵队进取建宁。

△　驻日公使蒋作宾在东京访日本外务大臣广田，解释25日外交部声明内容，并请广田说明“四一七”声明日政府之真意。广田声称：“日本因近来屡闻各国出售军火并供给军事顾问与中国之消息，颇为不安。”“外务省发言人有鉴于此，以为及时阐明前已发表而经众承认之日本态度，此项声明乃对报界而发”，“而竟引起海外许多误会。”“中国现呈现一种舆情，而为日本所甚不愉快。中国且发一种警告，令全国准备1936年之事变”以对付日本。广田续谓：“如国际对华之襄助，造成未预料之不良局势，则日本所感受之后果，最为痛切。日本处此情势，将反对不出于好意之任何对华襄助”，“故愿中国鉴于负有与日本并肩维持远东和平责任之重要，而于事前商诸日本。”广田末告蒋，愿在中东路谈判结束后，开中日直接谈判以解决种种悬案。

△　日本政府陆军、拓务两省决定对我东北之所谓《建设施政方针》：一、以日“满”共同防卫为根本原则，以“满铁”为基干，确立“两国”共存共荣之根本方针；二、结成日“满”经济联盟，先促进“两国”国防有重要关系之产业；三、“满铁”实行旁系公司，整理其他关系之公司；四、维持拓务省监督权与关东军经营权之现状；五、将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移交关东军，由拓务省收回教育行政权。

△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由潢川移设六安，刘镇华和刘茂恩坐镇指挥。潢川由王以哲部接防。

△　伪满总理大臣郑孝胥由日本返回大连，发表声明书，鼓吹日“满”友谊“更臻亲善”。

△　致祭达赖专使黄慕松离京赴拉萨。

△　苏日两国第二次中东路出售谈判是日由秘密转为公开进行，后在5月至7月的三个月中，双方讨价还价。7月23日，日本外务大臣

广田表示不能接受苏联方案，必以日方所提为最后方案。苏联方面无法接受。

△　孔祥熙就订购大批军火事电告蒋介石，谓已向英、德、法、美、意等国商妥，订购中小型坦克24辆、装甲车八辆，轻机枪5000支、驳壳枪5000支，配子弹500万发，大小炸弹样本五种250颗、穿甲弹4000颗，另有七九步枪一万支。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人民团体指导办法》，将一切群众团体统置于一党专政之下。

△　戴季陶考察西北后返抵南京。

△　教育部视察员调查湘、粤等省中小学语文教育，鉴于文言文和读经有压倒之趋势，特向教育部报告。是日，部长王世杰发出训令：全国各级学校务须遵照教育部的法令办理，并责成督学等对文言文和读经之风予以纠正。

△　伪满沈阳警察厅派员搜查各书店，焚毁抗日教科书二万余册。

4月27日　陈诚执行其进攻广昌之第三期计划，以第五纵队罗卓英、第三纵队樊崧甫、第六纵队周浑元取扇形攻势向广昌进犯。是日，第五纵队黄维师分兵三路攻击广昌附近芭掌形山及新人坪，红军洪超、曹德清第四、六两师凭堡抵御，经过激战，黄师占芭掌形山及新人坪。同时，霍揆彰师在李树森及傅仲芳两师配合下，分别进占广昌西部长阴、下南、清水塘等地；第八纵队夏楚中师进攻雷公嵊、竹篙上、珠溪堡，在西华山、排山下与红军展开激战；谢溥福师由高洲堰　进攻小坳溪、乌溪之线，红军罗炳辉部第三师、第十五师奋勇抵抗，谢师未得逞；第六纵队孔令恂师于苫竹坑、黄泥排附近，攻击藕塘下、桃花洲之线，红军陈光第二师及陈伯钧第十三师撤退长桥，孔部渡河向广昌追击。

△　红军警卫师等部由筠门岭北段夜袭南路军黄延桢部，黄急电李扬敬告急。李调黄质文部往援，并以黄任寰部严旅于盘古隘、罗塘策应。28日，陈济棠再饬王赞斌师由安远增援。29日至30日，红军反攻筠门岭更烈，李扬敬等被迫龟缩防守。

△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在东京接见英、美大使，美国大使格鲁向广田索取外务省“四一七”声明之英译本。广田再次声称：“如第三国有扰乱东亚和平及秩序之行动，不问其形式或理由如何，将断然反对。”

△　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各委员对日本“四一七”声明表示愤慨。佥谓对日外交，“宜从死中求生”。“目前对日外交并非华北问题，实为整个中国民族存亡问题”。指出25日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驳斥日本“四一七”声明过于软弱，应请政府提请召开《九国公约》会员国会议，对日本在亚洲之强暴行为，予以具体制裁。

△　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唐绍仪、陈济棠、李宗仁等致函国联，痛斥日本“四一七”声明。指出该声明不仅威胁中国之独立，且破坏远东国际条约所保证的秩序，要求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负起义务与职权，防止任何外国干涉和破坏中国内政与领土完整之行为。

△　胡汉民就日本“四一七”声明及广田外相声明在港发表《为远东问题忠告友邦书》，促英、美、苏等国对日之声明予以注意。认为对“国际条约之尊严，与彼此间权利的维护，尤在一切利害相关者，始能为共同一致之奋斗”。

△　日参谋本部派影佐祯昭至天津，召柴山、仪我及天津驻屯军军官会议。影佐声称：一、南京政府如只办通车，日方俟黄郛北返后再催其办理通邮等事；二、如黄不北返，则向华方中央当局或地方当局促其履行所约；三、如华方各当局均置之不理时，则日方自由设法实行所约。并称：从前因等待黄郛从容运用，所以没有急催，以后将

不再延待。

△　国民政府公布《户籍法》，定7月1日起施行。

4月28日　陈诚部继续全线进攻广昌，第十七师及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七旅向广昌西北高地猛击，红军千余人在平面岭东西之线顽强抵御，9时半，第六十七师进占广昌城，彭德怀红三军团南撤头陂圩。与此同时，周浑元纵队第九十六师在盱江东岸攻占中坊，第九十七师进迫顺花渡。红军以广昌失守，遂撤离顺花渡退入白水方向，第九十七师占顺花渡，第九十六师占百花山。在广昌战役中红军伤亡4000余人。

△　汤恩伯纵队李默庵、孙元良两师进攻建宁附近挽舟岭，董振堂红五军团陈树香第三十四师凭险抵御。李部等正面进攻进展困难，乃以一部迂回红军左侧，红军腹背受敌，与之多次肉搏，至7时半向建宁撤退，李部等占挽舟岭。

△　日外务大臣广田修正“四一七”声明，正式送达英、美两国，声称：“四一七”声明并未正式发表，日本之远东政策以4月20日之声明为准；日本担负维持东亚和平之全责，不干涉其他各国在华之权益。然日政府如见第三国实行扰乱东亚和平及秩序之行动，则不问其形式或理由如何，仍断然反对之。

△　戴季陶、褚民谊等发起的所谓“时轮金刚法会”正式开场，由班禅在杭州灵隐寺设置道场，以诵经宣扬“拔苦、祈福、消灾、超死”等迷信观念，诡称可以“祈世界和平，消除国内灾害”。同日，杭州市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等九团体发表宣言，杭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评，反对“时轮金刚法会”。翌日，上海中华爱国协进会亦发宣言反对。随后，蒋介石为缓和舆论，乃出面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谓：“查此次时轮法会意在慰劳班禅，联络汉、藏感情。”时轮法会的活动至5月15日始结束。

△　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抵重庆。

4月29日　蒋介石致电黄郛，指示对通车问题按本月11至13日在南昌所议办法，自动向日方作表示。电谓：“日军部对华政策，或采刚柔并用主义，应仍照面谈办法自动的表示，为釜底抽薪之计。”

△　日军百余人由宝坻开至宁河，下午在该地测图并举行军事演习，5时许又开往丰润县，恣意横行战区。

△　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日本“四一七”声明，由美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政府提备忘录，谓：美对华关系，有条约规定，非经合法手续，不得修正或废止。任何一国未经关系国之同意，不得一意独断而涉及他国之正当权利。

4月30日　薛岳部郭思演师以一部先攻大脑岭，以主力由石头坑侧击，利用沙溪、龙冈线，韶源、沙溪线及石头坑、韶源线公路堡垒进攻龙冈镇。周昆红第二十二师、李于辉第二十三师和独立第一、二团与之激战两日，5月1日郭师占龙冈。

△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派教育厅长龚仲钧至京报告英侵班洪经过。6月6日，外交部、参谋本部派杨光灿、尹德明赴滇，与英方代表交涉勘界问题。其后，班洪事件进入外交途径解决。

△　英外相西门在下院报告有关日本政府“四一七”对华声明之对日质询经过。谓英国政府认为日本“四一七”声明，并非侵犯他国在华之共同权利，或破坏日本自己的条约义务，宣布英国对日交涉至此结束。

△　伦敦中国留学生开会，通过“主张国民政府对日挑衅应取坚决态度”之决议，电达南京国民政府。

是月　日伪在哈尔滨对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实行大搜查、大逮捕，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同时，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吉东局亦遭搜捕。

△　日伪军对吉林绥宁及饶河游击区的山林农工义勇军进行大“讨伐”，该游击队在平南洋率领下进行顽强抵抗，终以武器不足被迫放弃天桥岭根据地。同月，平南洋又在宁安县重新组成宁安抗日游击队，并于5月袭击第二区伪警察署，继续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　日关东军为确保其侵占区的稳固和加强对义勇军的“讨伐”，并准备面向对苏作战，改变分散配置兵力为集中配置，力求加强教育训练，恢复原作战兵团。其兵力基干为第三、七、十六等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骑兵集团、第一、二、三独立守备队。

△　日关东军司令部与朝鲜总督府协定，实行第二次集团部落计划。规定各部落设正部落长兼甲长，副部落长兼自卫团长。实行保甲联坐法，沿铁路线区以50家为一集团部落，僻远及林区以100户为一集团部落。其中东边道地区特定建立10户到50户之小部落。

△　蒋介石改组湖北特税处，在汉口设立禁烟督察处，管理豫、鄂、皖三省禁烟事，隶属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计划由长江流域推及全国。该督察处由复兴社特务处掌握，以贩卖鸦片烟筹措反共军事经费为业。

△　西北公路管理局筹备处在西安成立。翌年1月1日正式成立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主办西北各省公路事宜。

5月

5月1日　　蒋介石电汤恩伯，令其“在第八纵队未到邱家隘以前，切勿单独急进，总须稳扎稳打”。汤接电后，即命所部赶筑泰宁、挽舟岭之线封锁线，等待周浑元纵队到达后进攻建宁。

△　湘鄂赣红军独立第三师趁湘军第十九师李觉部工兵营调往通城之际，是日向粤汉路羊楼司车站发动突袭，攻占羊楼司及尖山，击

溃保安团队。4日，湖南第一区保安部司令兼第十九师副师长罗树甲督同义勇队往援，在尖山与红军激战数小时。红军主动撤出战斗，退回湖北蒲圻、通城边区沙坪根据地。

△　日军藤原率伪警50人在临榆县九门口设置伪海关分所，搜查来往车辆。同日，又在该处设立伪警察所，强迫附近居民悬挂日伪国旗。虽经临榆县长及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交涉，日方仍置之不理。

△　兴隆民众军根据中共京东特委决定，改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下设四个总队，每总队800至1200人，活跃在兴隆、承德、迁西、遵化等地山区，建立了以黄花川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　美政府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发表正式文告，针对日本“四一七”声明重申美国对华政策。声明美国对华关系，系受一般公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美国所签条约规定之支配，期望他国政府对于美国之权利与义务及合法利益予以适当之考虑。

△　立法委员傅秉常等七人向国民政府提出外交方针建议：一、请政府根据《九国公约》严厉制裁日本暴行；二、训令驻外使领积极活动，勿为日本片面宣传蒙蔽；三、邀请各方要员来宁商讨边防和救国御侮大计。4日，立法院通过傅秉常等外交建议案。

△　国民政府委派胡世泽为出席国际禁烟顾问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代表。

△　国民政府任命陈明仁为陆军第八十师师长。

△　欧亚航空公司新辟平粤航线是日通航。

△　中国航空工程学会在杭州成立，举航空署技术处处长钱昌祚为会长，中国航空公司机航组副主任聂开一为副会长。

△　话剧家熊佛西等发起北平剧人学会，是日在平成立。

△　上海《大华晚报》创刊，主编殷再为。

△　《学文月刊》在北平创刊，创办人叶公超、闻一多，由叶公超任编辑，发行人余上沅，为新月派中自命“自由人者”之刊物，后迁上海改名《新月月刊》。

△　上海《小说月刊》创刊，主编梁得所，编辑仓可华、丽尼，发行人黄式匡，大众出版社出版。该刊自第三期起改为半月刊。

5月2日　“剿共”南路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声称以第二纵队为主力，由第一纵队协助，分两路总攻会昌。虚张其声势以应付蒋介石，议而未动。

△　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奉日政府外务省训令，向汪精卫正式提出从速交涉解决中日两国悬案，并要求由中日直接交涉，“不许第三国参与”。

△　美使詹森由赣至京面谒汪精卫商谈外交问题，提请修改中美商约。

△　日军在战区迁安县之澈河桥增兵150名，9日更在桥北设炮台三座，并强迫该镇公安分驻所及商民等一律改悬日旗，把持地方行政权。

△　北平军分会任命汤玉麟、孙殿英为高等顾问。

△　下午4时，绥远归化市雨雹成灾，历时六七分钟，冰雹如杏核大小，大者有如核桃，积有二寸厚，为40年所未见。

5月3日　汪精卫为通车事致电黄郛称：国联咨询委员会将于5月14日讨论英国所提出之满洲通邮事件，“通车问题如能延长至咨询委

员会对英国提议有所决议后，始着手进行，较为有利”。黄郛担心日方“久待无音而起怀疑”或“乘机要求通邮问题同时解决”，次日复电汪，提出：“在14日前，先密电饬殷局长与对方交换通车办法之大体意见，俟14日后再为最后之决定。”

△　日本屡欲通过大仓组租用天津南开广仁堂稻田建筑飞机场未成。是日，日方突派日警四五人率领华捕多人看守该地。天津公安局派员与之交涉，日方诡称为大仓组行建立农场，继续派警守护开工。8日，天津市政府向日领提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

△　刘湘在成都召开四川生产建设会议，各县建设科长、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和四川省内专家共400余人参加。会议讨论建设与善后、税捐减免、生产教育及金融等问题，通过成立四川建设委员会等议案200多件。13日会议闭幕。

△　伪满公布《采金会社法》，15日与满铁公司合组满洲采金公司。

△　王正廷率中国体育代表团由沪启程，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

5月4日　　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第二期总攻及东江防务之部署等问题。6日与李扬敬等续商进攻会昌计划。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一部于2日起反攻万源，击溃万源游击司令陈厚堃部，是日将万源夺回。

△　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逮捕东北抗日救国会政训班主任徐靖远等，并搜查该会机关。

5月5日　　蒋介石在南昌拟订《新生活运动纲要》，并改订《新生活运动须知》，详细规定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目的及组织等等，要求实现“国民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又定全国的新生括运动

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15日，全国各报发表《纲要》全文。

△　宋子文在兰州各界欢迎会上讲演西北建设问题。谓：“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提出西北建设的基本工作四项：一、先把公路修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西的科学灌输引进；二、进行引水开渠的水利工程；三、改良农产品；四、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等。

△　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由沪启程前往暹罗、土耳其、美国考察“大陆派”与“欧美派”两种司法。

△　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冯安邦部由江西乐安县南部增田进攻望仙，是日占望仙。27日进攻大湖坪及流坑。

△　教育、内政、司法三部就戴季陶提出禁止发掘古墓意见决定四项办法：一、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学术团体，为科学工作起见整理先人遗物及已发现之坟墓物件，应照《古物整理办法》第八条办理；二、因自然损毁及因建设工程而发现之古物，应照《古物保存法》第七条办理；三、建议政府从速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四、各地古董商以及地痞私人假借名义盗掘坟墓，应通令各省、市依法惩办。

△　河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天津成立，推定于学忠等11人为理事，张厉生等七人为监事，通过促进会章程草案及信条、戒条。同日，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贵阳成立，推定王家烈等21人为理事，何知重等15人为监事，通过章程及信条、戒约。

5月6日　卫立煌令第八、十两纵队进攻建宁。命周浑元部于8日由邱家隘、将军殿推进马源桥以东，与汤恩伯部取联络，随汤部之进展从西北方夹击红军；命汤纵队与周部取联络，保持重点于右翼方面，于9日起由现地进攻建宁；又命周部在红军攻击汤部时，应不失

时机与汤部联络，共同攻占建宁。

△　蒋介石决定在赣、闽两省组织地主还乡团“收复区地方善后讲习会”，施以反共的军事、政治训练。是日，南昌行营令饬福建、江西两省政府分别呈报，以备开办。

△　伪满炭矿株式会社正式成立，资本1600万日元，伪满与“满铁”各半。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协定：伪满政府或主管官厅在批准“满炭”负责人的任命、年度事业计划、股东大会讨论事项时，须事先征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并规定理事长为日人，其他负责人日本占半数。

5月7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纪念周上讲演，谓：“我国军队较任何国家为多”，但“属于‘国家’者少，现在我们要努力使全国的军队都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我们相信失地必能在我们手上收回，中国必能在我们手上复兴，我们要建设中国成为一个健全、坚强的现代国家”。

△　何键电陈济棠，谓中央红军万余由宁都、雩都向万安、永新推进，请派兵协助。陈即电余汉谋抽调部队往赣西配合。

△　南京市政府举行扩大纪念周，市长石瑛报告肃清烟、赌、娼妓三害问题。

△　波斯（今伊朗）首任驻沪总领事凯遥斯徒凡抵沪。凯氏为波斯自沙逊宁朝代至此400年来的第一任驻华代表。次日分别拜会上海市长吴铁城及外交部处长余铭。8日，凯氏向记者发表谈话，希望中波订定中波商约，发展两国通商。

5月8日　北路军第八纵队遵照卫立煌6日令，以谢溥福师配合第五纵队夏楚中师由邱家隘向建宁推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攻占将军殿、香炉峰。同日，第十纵队孙元良师攻占火炉山、象山。翌日，林

彪、彭德怀红一、三军团由郎君桥、头陂街、新安、白水镇东移建宁及其东北，增援董振堂红五军团坚守建宁。建宁战役开始。

△　红三军贺龙部由川东濯河坝北进，消灭川军一个营，攻占彭水县城。次日，川军陈万仞部三路反攻。10日红军主动撤出彭水，转赴酉阳、秀山及黔省后坪地带。

△　国民政府任命马步芳为陆军第一〇〇师师长。

△　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菱刈隆在长春召开第三次“全满领事会议”，日外务省特派根道、法华津二人参加，12日结束。会议决定：一、在日“满”合作有进展后撤废领事权；二、如客观条件为顺，可交还附属地行政权；三、在日人居留地区设置日警；四、课税应求合理化；五、与“满洲国”进行卫生合作；六、要求“满洲国”政府饬令人民遵行商租权；七、保护与鼓励鲜农来满，但严防鲜“满”农民纠纷；八、取缔不良日人，免贻国家百年大计之失败。

△　日军在河北蓟县散发传单，宣称日军5日由蓟县开往马兰峪途中，受到华方警察枪击，要求蓟县县长交出凶手，否则将断然处置。同时，日关东军亦向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抗议。10日，日关东军发表非正式声明，强指中国方面不履行停战协定。

△　藏军由巴塘北部白玉偷渡金沙江进袭康军，双方激战竟日。次日，藏军又于西里、八宝两渡口渡江猛攻，被康军章镇中部击退。

△　交通部电政司与日本递信省电务局在南京签订中日无线电台报务合同。

△　美国驻京总领事裴克在南京访蔡元培，商谈“中美文化合作”问题。

5月9日　　川军第五路军范绍增部第十旅进攻通江，是日占领巴陵寨、元山场，并以第十一、十二两旅各一团向刘坪钳形进犯，连续

以车轮战术猛攻。翌日，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某部以主力反击，至夜将范部击溃，打死打伤500余人。

△　吴铁城自沪密电蒋介石报告胡汉民在港进行五省联盟活动情形。

△　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子文与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商定由全国经济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合作实行开发西北计划四项：一、赶修甘省内西安兰州汽车道；二、整理甘肃水渠；三、组设兽医讲习所及牧马场；四、垦殖西北荒地。旋宋氏电告汪精卫、行政院开发西北计划。是日，汪氏复电赞同。

△　财政部长孔祥熙由赣抵汉。12日，张学良自豫专程返汉与孔会商，决定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设立华中经济讨论处，以张学良顾问端纳主持。其任务为详查华中各地城市经济实况，对其商业不振和农村破产实况进行研究。

△　国民党中政会批准补助山东曲阜孔庙及曾参、颜回、子思、孟轲等各庙修建费10万元。

△　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因编辑期间多刊登鲁迅等左翼作家杂文，遭国民党当局的恐吓，是日被迫在该刊登载启事辞职。

5月10日　东路军第五十二、第八十师按照月初东路军在延平召开军事会议的决定，于9日起分由西北、东南两路夹攻永安，并以飞机配合轰炸。寻淮洲红七军团一部据城顽强抵抗后，于是日退守明溪、连城。第五十二师和第八十师先后进占永安。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进驻沙县，下令第四纵队李延年部以一部守龙岩，主力经新泉进攻连城，并令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由永安向西协助，限5月20日前占领该地。次日，李率第三、第九两师由龙岩向新泉；第五十二师由永安西进。13日，李部第三、九两师占领新泉。14日，第五十

二师进抵小陶附近受到红军堵击。

△　前达赖心腹、西藏亲英派首领隆夏尔，因阴谋组织亲英政府，反对汉人进入和班禅回藏，被热振摄政发觉。是日，热振摄政将隆夏尔逮捕，于30日处决。

△　国联驻华技术合作联络员拉西曼制定的《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报告书》，分别在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公布，提出扩大技术合作及具体联络方式。同日，日外务省即表示反对意见。翌日又授意日联社发表评论，谓日本“对此不能容忍”，要求欧洲各国“停止对华财政援助”。并谓“日政府遇必要时，将取认为适合之计划以应付之”。

△　抚顺煤矿新屯矿因瓦斯爆炸，酿成矿工24人死亡，11人受重伤的惨剧。

△　北平《民间》半月刊创刊，民间社编辑、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为李景汉、晏阳初、孙伏园等，内容主要为中国农村问题。为乡村建设派刊物之一。

5月上旬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广昌战役后的战局及今后作战方针。毛泽东提出将红军主力分向福建、浙江、江苏、湖南进军，突入后方广大无堡垒地区，用以吸引蒋军并使其兵力分散，然后回兵江西收复苏区。最后决定在石城以北加筑工事，构成防卫瑞金防线，并紧急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以组织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力量。

△　何键电令划赣西万安、遂川及湘南酃县、桂东、汝城等23县为特别警戒区，命刘建绪负责构筑万、遂线外层封锁线，湖南保安司令部赶筑酃、桂、汝线，并限6月3日前完成外层封锁线及南北封锁干线。21日，蒋介石电令南昌行营派员前往督构。

△　第二十一师梁立柱部续分两路进攻赣东横峰，方志敏红新十

军在文笔峰以北及横峰附近抵御。13日，梁师赵旅进至文笔峰，红军在连荷以北猪头山、孙家山进行顽强抵抗，与梁师血战到18日，在文笔峰地区相持。

5月11日　蒋介石派顾问韩英士至杭州访班禅，促其早日回藏主持政教，并希望汉、藏关系日趋密切。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交通部合组军事交通考察团，以徐庭瑶、俞飞鹏为正、副团长，率团员22人由上海启程前往意、德、比、英、美等国考察。

5月12日　红军寻淮洲第七军团一部至建宁东北增援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红一、三、五军团。同日，周浑元纵队先头部队进至将军殿南部马源桥，准备向建宁西北攻击前进；汤恩伯纵队向建宁东端武镇岭、廖家源攻击。13日，汤纵队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攻占双峰山、武镇岭及廖家源等地。

△　远东第十届运动会在马尼拉开幕，中华体育总会由王正廷率选手130余人参加。20日，远东体育协会开会，讨论修改章程，日本为扶植伪满参预国际活动拉拢菲律宾，由菲提出将会章第十条修改为：主办国经多数通过，有权邀请非会员国参加竞赛。中国代表反对，愤而退席。下午，日、菲继续开会，通过日本的提案。21日，日、菲两国共组所谓东亚业余体育协会。远东体协遂破裂。28日，王正廷等经香港回国抵沪。

△　上海《大晶报》主持人冯大云上月受日方招引，冒用上海报界名义组织中华报界东游团赴日，归国后又在该报刊登媚日文字。是日晨，上海中华铁血救国团团员十余人前往，将该报社捣毁，并发传单。谓冯如不悛改，将有更进一步之办法严厉制裁。

5月13日　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在南京成立，通过《中国地方自治学会简章》，凡六章34条，选举钮永建等15人为理事，李毓九等九人

为监事。

△　日军杉原旅团200余人于下午2时由兴隆开抵蓟县，将县城占领，大肆抢劫粮食、财物及武器。同日，日机两架飞马兰峪上空演习，投弹两枚。翌日，蓟县县长吴明浩与日军数度交涉，日军拒不撤走，城内半数居民外逃。17日，殷汝耕向日武官柴山交涉，柴山借口民团拥有重武器予以拖延，经殷汝耕派员偕同柴山之代表坂亭赴蓟县，与日军队长村田商议，决定将民团重武器交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收存，日军始于18日、19日撤走。

△　罗马教皇第二任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于1月10日由意大利启程来华，先后在华南各教区视察后，是日到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递就任国书。

△　香港石嘴子华南煤气公司发生爆炸，死百余人，伤千余人，民房被毁数十家。

5月14日　刘湘在成都召开川军第四次“剿共”军事会议，商定各路军进攻计划。确定“合围扫穴”，定期半月占领通江、总攻万源，兵力增至140余团。以刘从云任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进驻南充指挥，派潘文华为总预备队指挥，急率所部配合唐式遵等部发动新的进攻。次日午后闭幕。

△　蒋介石电令各省、市政府严防鼓动罢课、反对会考，倘有故违，应断然处置，立即制止，一律拿办。

△　黄郛密派殷同、殷汝耕、陶尚铭与日人柴山、仪我在榆关洽商平沈路通车具体办法，交换对所拟通车方案意见。次日，双方在榆关商议，并会商战区解决各事，对通车问题定6月25日至7月1日为第一次试车期。

△　日本陆相林铣十郎在东京对王揖唐称：“以夷制夷之方针在现

今之中国不应为之，若不然，则中国之将来，将陷李顿报告书结论所书之事态。关于此点，希望中国上下之反省。”

△　天津北洋纱厂因新旧股东之矛盾及债权问题，自上年停工开除工人600余人后，一直未能复工。本月2日厂方又向天津国民党市党部及社会局要求解雇全体工人，未获批准。是日，该厂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将厂房、机器租与公记公司，改名公记北洋纱厂。20日，该厂日班开工，夜班尚无定期，工人被裁400余人（占全厂工人三分之一）。

△　上海美丰银行因金融恐慌停业。

5月15日　蒋介石为规范新生活运动之进行，是日颁布《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纲要》指出，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即是使国民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三者实现，是谓生活合理化。合理化所赖以实现之规律，曰‘礼义廉耻’所赖以之事项，曰‘衣食住行’。使我全体国民以‘礼义廉耻’为规律，实现于‘衣食住行’之中……是谓生活革命化之完成。而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亦即奠定于此”。

△　川军第二路军田颂尧部左纵队集中兵力13个团，向南江县东北空山坝一线猛扑，徐向前部红四方面军以王树声第七十三、何畏第十一、余天云第十二等师各一部于大、小骡马、小坎子及鹰龙山、鸡子顶等地阻其前进。同时，川军刘存厚以八个团配合，抢占竹峪关、草坝场。是日，红十一师、十二师进行反击，攻占竹峪关西北部仓台山、佛爷山。翌日，刘部全线败溃，退出竹峪关。红军乘胜追击，歼刘部800余人。

△　冯玉祥由山东泰山赴胶东潍县、黄县、烟台等地巡游。行前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世界大势一为帝国主义互战，一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战，社会主义必得最后成功。中国命运

全视能否抗日，抗则存，否则不亡于日，必为各国瓜分。”冯先后在邹平、黄县、蓬莱、烟台、掖县、青州等地作抗日演说，于30日返回泰山。是年8月，由随行记者将冯此次巡游编成《胶东游记》一书出版。

△　国民政府任命黄维为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曾三省为安徽反省院院长。

△　华北农产改进社在天津成立，由金城银行、南开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联合组成，以周作民任理事长。该社以“改良农村生产，调剂农村金融”为主旨。首从运销及植棉入手，计划五年内植棉1000亩，推及晋、鲁、豫三省。

△　北平《文史》双月刊创刊，中国学院文史社吴承仕编辑。

5月16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盘石游击队，联合国民党系统的马旅、赵旅等游击队在伊通县境召开抗日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组织江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抗日联合军总指挥杨靖宇任命袁德胜为总指挥，李红光为参谋长。该部拥有武装约千余人，于盘石南部金川、柳河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　东路军汤恩伯、周浑元两纵队以六个师的兵力，在航空第三队的配合下，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建宁城。上一日林彪、董振堂红一、五军团在城东北，彭德怀、寻淮洲红三、七军团在城东南分头御敌，经一天激战，红军虽奋勇抵抗，因伤亡甚众，是日下午9时许自动退却，撤入宁化大道。汤纵队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东门进占建宁城。

△　国联中国问题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讨论邮运通过伪满境内之问题，决定三项原则：一、国联会员邮政机关与伪满邮政机关，因邮件而发生关系时只能视为机关与机关之关系，而不能视为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之关系；二、在不背离不承认伪国的范围内，容许通常的邮

务关系之存在，且仅视为临时性的技术解决办法；三、伪满与各国间的邮政关系不能援用《世界邮政同盟公约》所定之各条款。

△　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举行密谈，至19日止共进行三次。日本提议由美、日均分东、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作为废弃《九国公约》的交换条件。美国方面未允，日本联美制华阴谋失败。

5月17日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以第十一师何畏部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第十二师余天云部主力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袭敌右翼；第七十三师王树声部扼守小骡马、小坎子等地，伺机转作正面进攻。21日，各部开始行动，将川军13个团包围在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至24日全歼川军七个团，溃其六个团，毙、伤、俘敌近5000人。26日，红七十三师乘胜收复南江，红十一师经平溪坝、官路口抵达长池附近。29日，红十二师收复通江。

△　藏方代表觉吉向让与康方代表姜郁文在德格签定《康藏协定》，凡12条。主要内容是：一、自本日起至6月6日止，双方各派员监视撤兵；二、达结寺所委堪布，由达赖委任，康方加委任状，负责院内教务；三、达结寺由汉、藏双方修复；四、达结寺所有土地一律发还；五、西康政府对达结寺与康定各寺同等管辖；六、达结寺僧民与康民一体待遇；七、准许达结寺留用枪支90支，但携出时需经地方官批准。

△　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共同决定所谓“铁则化的对华根本方针”，力促中国政府及亲日派强化“中日经济提携”，反对国际对华合作。

△　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在日内瓦开会研究拉西曼报告书及各项详细文件，通过拉西曼报告书。

5月18日　宋子文考察西北后返回上海。翌日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对“西北前途乐观”，“希望国内银行界竟往投资”。20日，宋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西北建设计划”，获得通过。

△　国民政府令免周象贤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遗缺由赵志游继任。

△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三年玉萍铁路公债条例》，规定发行公债1200万元，用以修筑江西玉山至萍乡之铁路，定6月1日起九八发行，年利六厘，指定以赣省地方盐附捐税作还本付息基金，八年还清本息。2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一周间》周刊在上海创刊，主编洪深、张常人，出版者洪雪帆，现代印刷公司印刷，评述一周间国内外大事，由上海现代书局杂志部总发行。

5月19日　蒋介石电令何键限期建成遂川、茨坪、汪洋界、七溪岭、寒江至潞江之封锁线，增筑莲花至吉安、砻市至吉安、陆公坡至梅花山等各纵横封锁线，用以防止湘赣红军南下泰和、遂川、酃县。

△　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令第二十一师梁立柱部续攻横峰。是日，梁亲率该师一部由上饶出发，另派赵旅由河口绕攻。次日，在文笔峰、龙山、台湖及郑家坊地带与新红十军方志敏部激战。23日，红军由横峰撤往东北方临江湖，梁师赵旅进占横峰。24日，梁部进逼葛源，又占葛源门户黄藤桥。

△　蒋介石致电汪精卫，提出通车问题“以事先通过中政会为正当”，但又担心是否确能通过，因而提出以他个人名义将提案直电中政会，再由汪精卫在会上说明，并要求中央授蒋、汪“考虑之全权”。翌日，汪复电主张由蒋、汪联名向中政会“临时提出，极力申说，使之通过”，并要求中政会“授权弟等在原则范围之内，督同主管机关相机进行”。“声明只求中政会秘密决定”，“不作为中政会议通过之议

案”。

△　日外务大臣广田与驻华公使有吉明等交换对华政策意见，决定：一、日本政府与中国共同担负维持东亚和平及增进繁荣之责，而排击第三国之干涉；二、解决中日悬案，为中日亲善、确定东亚和平之前提。中国如有诚意则日本当尽力提供援助，解决悬案；三、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之要求时常予以指导，力求避免地方交涉。

△　中美萨尔瓦多共和国驻东京总领事辛公佐在东京正式分别通知日本政府及驻日伪满代表，称该国已于“3月3日承认新‘满洲’帝国”。次日，辛公佐访日外相广田，面交正式承认“满洲国”通告书。23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谈话，指出该国承认伪满，“触犯国联盟约”，要求国联予以制裁。

△　江西南广公路（南丰至广昌）通车，在南丰车站举行通车典礼。

△　国民政府令免郭聚奎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本兼各职；免马仲英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职。任命陈立德、鲁效祖、彭昭贤、师世昌为新疆省政府委员，以彭昭贤兼民政厅长，陈立德兼财政厅长。

△　交通部令上海电报局及国际电台，于次日收回清光绪年间由英商大东、丹麦大北两公司代办之沪、烟、沽三水线，一次付清所欠借款2400余英镑，规定自20日晨起，该公司一切国内往来电讯，除经沪港水线转递者外，统归交通部电报局收发。嗣因该公司多方推诿，延至6月4日始由交通部正式接收。

5月20日　新疆省民族代表大会在迪化举行，省督办盛世才作治理新疆的演说。

△　吉林国民救国军秦文元、吴义成等部1500人是日起围困安图县城，伪县长、日参事官及伪警察队300名弹尽粮绝。6月21日，伪

满警务厅用飞机投放弹药粮食救援，围困达一月之久。

5月中旬　刘湘委陈万仞兼任川东13县民团总指挥。以团队为基干，于南川、彭水、石柱三县设立联团清乡分处，以防贺龙红三军再入四川。

△　苏北淮阴之大丰机器面粉公司因产品滞销倒闭。该公司为江北面粉业之巨擘，日产面粉1.1万袋，有工人700人，成立已达30年。

5月21日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南京召开，到会代表114人，通过确定地方预算、废除邮包税、办理土地陈报纲要草案、举办外侨营业税、改革财税制度、举办地契过户税以及所谓“整理田赋附加”、“救济乡村”、“废除苛捐杂税”等百余件提案，27日闭幕。该会标榜以整理田赋，改进税政，废除苛捐杂税，编制地方预算四项为目的。实则为增加中央财税，削减地方收入。苛捐杂税未能废除一项，受到各方抨击。

△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在上海召集沪商40余厂代表开会，讨论纱厂本身改良问题，并对目前生产作具体补救。会议发表《全国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书》，谓上年纱业衰落，实行减工之后，本年纱价仍然暴跌，销路停滞。提出“以后欲复兴棉纱，须与金融界互相提携”。并希政府“提高关税，减低对内税则”，以及奖励植棉、办纺织教育等扶植，以求补救。

△　何键、陈济棠共同决定在湘粤边境宜章召开粤湘“剿匪”会议。是日粤方代表陈伯英、湘方代表陈辉章出席，决定自7月1日起会同进攻红军李明瑞部。

△　江苏仪征县十二圩民船航运代表杨云汉等100余人至南京向全国财政会议请愿，要求废止商轮运盐。24日，孔祥熙召见杨等，谓已饬两淮盐运使转饬运商，即将湘岸轮运200票，改配帆运100票，皖岸完全帆运。代表仍有意见。

△　河南彰德豫新纱厂因营业亏损，难以继续经营。经15日股东会议决定，是日正式宣告停工，失业工人千余人。

5月22日　日外务大臣广田召见驻华公使有吉明指示对华政策：一、促使中国政府放弃反日政策，实现以日本为主体的中、日、“满”财政经济建设之合作；二、阻止国际经济技术援华政策；三、于最短期内积极向中方交涉取缔排斥日货、改订关税、整理旧债及解决通车、通邮等悬案，务使中国确认日本有维持远东和平的地位。

5月23日　红三军贺龙部3000余人，由酉阳、秀山攻入黔东北之后坪。31日，红军攻占后坪、婺川，黔军蒋丕绪师败退湄潭。王家烈增派李成章旅等部六团前往遵义增援。

△　实业、教育两部联合讨论筹设劳工教育案。决定组设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筹设劳工教育实验区。7月20日，实业部公布《劳工教育实验区组织章程》，指定上海、无锡、青岛、天津、汉口先行试办，并于其他工业区设立劳工教育实施委员会予以推行。

5月24日　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以六个团的兵力进攻富田、新安，被红军击溃。

△　旅日华侨学生叶木花在长崎被杀害。上日叶赴华侨时中小学上学，途中被长崎贸易学校学生渡边信义等数人无故以恶语相辱，叶避走无事。是日，叶在上学途中竟遭渡边等用短刀刺死。6月1日，外交部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转请日政府严惩凶手，并注意审判情形。7月20日，日政府仅判渡边二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送少年刑务所了结。

△　江浙丝业公会代表褚辅成，请求财政、实业两部救济丝业。次日，行政院核准实业部救济丝厂办法：一、豁免地方一切蚕及丝厂捐税；二、由铁、交两部减轻丝茧运费；三、函请经委会从速成立丝

业统制委员会等。并拟由上海市政府筹款或先发公债救济。

△　上海英美烟厂罢工委员会向厂方交涉老厂复工无效，是日全体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向上海市当局交涉。厂方态度强硬，采取扣发工资及雇佣白俄工人顶替重要部门工作等办法。28日，工人代表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请愿，遂由社会局于29日召集劳资双方调解。资方拒绝出席，斗争陷入僵局。

5月25日　蒋介石在武昌召开豫、鄂、皖三省边防“剿匪”会议。张学良、何成濬、刘镇华、梁冠英、郝梦龄、何柱国等十余人参加，会议议定对鄂东苏区“清剿”办法及善后，以进一步发动对豫鄂皖等苏区军事“围剿”。次日闭幕。

△　吴焕先红二十五军进入商城东雕翎集，与王以哲军所部作战。27日，红军伺机由曹家集西进梨树棚、宏家寨、崇山寨一带，与光山红军独立团会师。何柱国军和梁冠英部来攻，红军在凉亭东部北入砖桥，梁部时旅尾追。28日，红军进至泼皮河、谅树集、阚家棚附近，与梁部作战，30日起，在宣化店、陡沙河血战三昼夜。

5月26日　陕军王三春和川军陈厚堃两部会同攻占川陕鄂边区要道大竹河。

△　中东路东段吉林省穆陵县马桥河站附近铁轨被义勇军拆毁，是日下午日军兵车至该处颠覆。日军若山师团森田支队遭义勇军伏击，死12人，伤25人。

△　西南彝族文化促进会在南京成立。该会由旅京、沪的彝族人曲木藏尧、阿弼鲁德等发起组织。

△　南京《民生报》24日发表社评，谓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有贪污嫌疑。是日，行政院指为“恶意造谣”，令该报停刊三日。29日，该报复刊，又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公民公判》，表示依法

与之抗争。彭学沛为此向江宁地方法院起诉，指控《民生报》经理成舍我“恶意造谣”，“妨碍公务和名誉”。6月，法院几次开庭审理，双方激烈争辩。后经端木恺、程沧波等调解，双方表示谅解始暂息。

5月27日　第八十师陈明仁部两个营由沙县进攻梅列、徐坊，寻淮洲红七军团于碧湖附近将其全歼，获机枪五挺、俘300余人，占领梅列之三元。29日，红军又在湖源伏击陈明仁师第二三九旅，激战一日，击溃其两个团，俘1400余人，获炮数门、轻重机枪20挺。陈部残兵溃退沙县。

△　蒋鼎文下令进攻连城中央红军。次日李玉堂师进占杨屋坊、黄石潭；刘戡师占上装店、梁福山；李延年师占庙前。30日、31日，红七军团及第三十四师在莒溪、席湖营与之激战。

△　日军增兵榆关，并先后派兵在战区驻扎、演习，用武力要挟早日通车。

△　南京《新中华报》和《大风报》因刊载当局未经公布之公文，被警厅处罚停刊三天。

5月28日　北宁铁路局长殷同派其副局长许文国等，往北戴河与“满铁”技术人员商订平、沈通车细则。6月6日，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派员至山海关筹备通车事。

△　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中将到北平，为中华汇业银行复业进行活动。次日晨访王克敏、曾毓隽等，商讨汇业银行复业及其他经济合作问题，下午离平赴京、沪游说。31日抵达南京。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三年六厘英金庚款公债条例》。该公债由财政、铁道两部联合发行，金额150万英镑，作为完成粤汉铁路补充建筑基金之用，6月1日起九六发行，年息六厘，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1月1日还清本息，指定铁道部借得英国退还庚款为基

金。

5月29日　国民政府通令各机关禁借外债。6月12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声称“嗣后各机关无论以何项名义所缔结之货款契约，凡未经国民政府核准者，一概无效”（按：此系针对盛世才与苏联的借款而发）。

△　国民政府令派陈体诚、沈怡为出席第七次国际道路会议代表。

△　行政院会议决定设立海事法庭。

△　徐州《公言报》因日前评论县政，被铜山县政府封闭，社长秦子云以“妨害名誉罪”被捕。是日，该报编辑部主任龚晨声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同业主持正义，力争言论自由和保障记者自由。6月10日、11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及徐州新闻界相继通电声援。14日，经第三军军长王均出面调解，秦被释放，该报复刊。

5月30日　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由蒋介石提议，汪精卫、顾孟馀、叶楚伧附议的通车案，除张继、焦易堂二人持异议外，获原案通过，作出“在不承认伪组织及否认伪政权存在的原则之下，可与日本交涉关内外通行客车问题，密交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依此原则，负责考虑，妥善进行”的决议。其通车大纲九条，内容为：一、通车用南满路机车；二、北平及沈阳车站仅售票至山海关；三、组国际旅行社办理客票、货运行李等事；四、通车次数由技术委员会议定；五、北宁路与奉山路车辆用交换方式；六、通车帐目分别记有售票数目，双方清算；七、通车不挂旗，亦不得张贴布告；八、北平至山海关段，及沈阳至山海关段，分组铁路警备队；九、国际旅行社派中日铁道专门人员共同办事，总社设山海关，于北平、天津、沈阳设分社。同日，汪精卫以特急电致黄郛，告知通车案已照原案通过，并促其从速北返经办。

△　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及秘书横川等由日返任，有吉在上海发表谈话："此次归国感到外务当局及一般国民就日本对华问题甚具热心，本人以为观中国之诚意如何，诸悬案将能次第解决。至通车、通邮宜由关东军与华北当局接洽办理，本人并未奉外务省之特别训令。"

△　第三师李玉堂部分兵进攻朋口，以一部强渡小渡；一部攻击羊城。红军周昆第二十二、周建屏第二十四师驻守南岭、涂坊、朋口、羊城，在朋口河西与李部发生激战。其后红军北撤，李师进占朋口，赶筑朋口至莒溪之封锁线。

△　吴焕先红二十五军进据鄂豫边陡沙河、宣化店间的刘家桥、凌云寺、打人尖、黄土老一带高地，与梁冠英师一部发生激战。经三日战斗，将梁部时旅击败。

△　东北人民革命军王德泰第二军第二独立师在吉林延吉县大荒威成立，下辖三个团。以汪清县大汪清为中心，在汪清、珲春两县开展游击战。

△　南昌行营特派陈嵩岩等赴闽，在福州增设封锁事务股办事处，以为全省主持封锁之总机关，由福建省保安队管辖。该机关拟具对苏区之封锁法规及步骤，决定于闽江、汀江、漳江三要地设置封锁督察处，每县设一管理所，下设各区分会及小组。

△　东北民众抗日铁血军总司令邓铁梅在辽宁凤城县岫岩小张家堡子村被伪满靖安军郑希贤部密探逮捕。6月3日，邓被解送凤城，越日押至沈阳关进陆军监狱。邓口供反满抗日始终不渝，谓"国家大事，匹夫有责"，"七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日军对邓软硬兼施之手段失败后将其杀害，诡称邓于9月28日在军法处患急性肺炎死去。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一、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

日（6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二、通过《妇女运动指导纲要》。

△　天津火柴厂工人反对国民党官办工会，举行罢工。是日，市社会局召集工人代表与工会双方调解。其后，因厂方诬指工人王宝昌等三人“威胁煽动”，“妨碍营业”，由社会局将王等交警所拘留，工人20人被开除。斗争失败。

△　上海《国货周报》创刊，编辑杨重远，中华国货周刊社出版。

5月31日　宋子文、孔祥熙发起组织之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上海开成立大会。资本定额1000万元。由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张静江、宋子良、陈光甫等及中央、中国、交通、金城等10家大银行共同认股。6月2日，宋子文主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选出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等21人为董事，张静江等七人为监事。3日召开首届董事会议，选出常务董事11人，孔祥熙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宋子文、贝祖贻。宋子良任总经理。定7月1日正式营业。

△　蒋介石电促孔祥熙与德国商订合办飞机制造厂合同。

5月下旬　南昌行营决定对已占苏区实行“集权政治”、“经济统治”及“以经济为中心的施政方针”，并派杨永泰、王又庸前往“视察”。

△　北平师大、北大两校教授钱玄同、胡适、黎锦熙与吴敬恒、于右任、陈光垚等发起汉字改革研究会，计划开办简字印刷所，制造简字铜模，出版简字书籍和文字宣传，以期普及教育。

是月　何应钦分遣密使往太原、归绥等处晤徐永昌、阎锡山、傅作义，以秘密拨给军费及将改编孙殿英部所得武器无条件供给为诱饵，使之勿与冯玉祥、韩复榘及胡汉民等西南派结盟反蒋。

△　法国派兵侵入广东防城县敲梆岭及黑犬村勘界，又于白龙尾

测量海岸线，并派飞机侵入平江、白龙尾。外交部视察专员甘介侯呈请应付办法。外交部训令甘交涉制止。

△　据南京《中央日报》载，至本月底止，蒋介石在江西修建公路6000千余里、碉堡3000余座。

△　济南仁丰纱厂建成投产，发起人穆伯仁等，资本150万元，有工人700余人。

△　教育部颁布《研究所规程》。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已设研究所，饬照新章程积极整理外，并由部令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两校筹设研究所。

6月

6月1日　　李延年纵队及第五十二师于31日晚秘密向连城推进，是日由东、南两方同时向连城发动总攻，寻淮洲红七军团踞守阵地顽强御敌。10时许，李部在飞机轰炸助战下，以一部经三水塘迂回红军右侧。红军腹背受敌，牺牲甚大，乃以一部于连城东南阻敌，主力由西北撤出，退集清流、宁洋、大田。午时李部占连城。

△　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苏、浙、闽、鄂、豫、皖、赣、湘等省保安会议，讨论保安团队组织、军事训练及保甲组织等事项，会议决定训令各省切实训练保甲团警、统一名称、划定管辖区、统一经费、整顿训练，并制定《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次日闭幕。

△　殷汝耕与日武官柴山上月曾就战区特警问题交涉无结果，是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亲访驻津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就该项问题直接交换意见。日方表示人数至多不得超过5000，且重武器之类须置战区外。

△　陈济棠在赣州行政专员公署内设立赣南保安司令部，以统一

指挥训练赣南各属团警，由该区行政专员张弛兼任司令。

△　犹国才在贵州黄洲坝通电就任贵州全省“剿匪”总指挥职。

△　中日无线电路分别在上海、东京正式开放，由两地电台用高速自动收发机直接通报。

△　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在天津举行奠基典礼。该工程由华北水利委员会发起，基建费共30余万元，为国内第一个水利研究机构。

6月2日　　吴焕先红二十五军进入鄂东席家冲、老君山、李家湾、大竹园、胡家河一带，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于兆龙旅由宣化店追击，红军乘夜进至宣化店北部潘新店、杨家店。5日，红军继续北入青山店、丰店，一部至河南信阳、罗山间之五里店、栏杆铺。

△　蒋介石核定处理关内外通车问题四项办法：一、直接通车限于客车，并以每日对开一列为限；二、通车事务应交由商业机关承办，车票即由该商业机关发行；三、一切清算帐目及行车业务，应由该商业机关与路局接洽办理；四、该商业机关应遵照中国法律组织之。是日，汪精卫电告黄郛，要求黄“查照督饬办理”。

△　日本天皇派遣秩父宫为皇室特使，由东京启程前往伪满活动。4日乘轮抵达大连。6日至长春谒溥仪，向溥仪致日皇亲书及赠送勋章。13日至沈阳。15日由大连回国。

△　实业部派员至上海调查英美烟厂罢工后返回南京，是日同中央民运部、财政部会商解决办法。4日，厂方新雇工人六七百人进厂，罢工委员会派人劝阻，被厂方打伤十余人，英美烟厂第三厂决定举行怠工支援。6日，工人代表再向社会局等机关请愿。15日，代表又前往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机关请愿。27日，罢工委员会宴请各界，由上海市商会等团体组设上海市各界援助英美烟厂工友

委员会予以声援。其后双方僵持至7月下旬，始于26日由上海市党部会同劳资双方决定五项解决办法：罢工期内之救济由市政府办理；解散工人纠察队或维持队；厂方愿给老厂工人一个月工资并储蓄及年赏，外再加工资二月；将来老厂复工被解雇之工人得优先录用；新厂工人复工后，厂方不得无故开除。当日，新厂工人复工，罢工结束。

△　《民鸣周刊》在南京创刊，南京学术研究会编辑。原出《民鸣月刊》停刊。

6月3日　　湘军彭位仁率部攻占湘赣红军萧克部所在地茶子山、马岭、金华山。次日，红军乘大雨反攻，利用铜锣坪、五马同槽等山险，击溃彭部两个团，夺回金华山。5日，红军乘胜由石灰桥进攻永新，彭师以一个团在东华岭阻击，红军撤退。

△　薛岳部韩汉英、欧震两师由上固、龙岗、西水进攻表湖、大坪之线红军李于辉第二十三师等部阵地。是日韩部进占笔架山和表湖，欧部进驻伯公脑附近，红军退入兴国县边境。

△　北平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因上月31日刊登通车、通邮消息，是日被行政院下令停刊。社长刘真如免职，总经理陈国梁调南京受训，社务由安怀音暂负。嗣由国民党中宣会派科长胡天册前往主持，7月3日复刊。

6月4日　　红三军贺龙部由黔东红县塘至乾河坝佯攻婺川，截断正安、婺川至沿河交通。王家烈立调李成章旅由安顺驰援后坪、婺川，命蒋丕绪部固守正安，并电令驻铜仁柏辉章师和驻思南之廖怀忠部协助，派大队救援婺川，仅派一营戍守河沿。翌日，红军主力转至泉口、思渠，连日夜行小径，7日折回，以三路猛攻沿河。

△　何键为在湘南实施整理团防与义勇队，是日特在衡州增设西路军“剿共”总司令部行营。

△　第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国民政府派李平衡、谢东发、王志圣、安辅廷等代表出席。23日，中国当选为国际劳工局非常任理事。9月1日，国民政府派李平衡出任理事。

△　浙、赣、皖三省边区公路完成，在婺源城西站举行婺（源）白（沙）段通车典礼。至此浙、赣、皖三省公路接通。

6月5日　　实业部在南京召开苏、浙、鲁、皖、冀、湘、豫七省治蝗会议，到实业部代表及各省代表20余人。会议收到实业部及各省提案21项，通过省县治蝗办法等18项提案，于7日闭幕。

△　伪满军张海鹏部3000人，在承德被日方解散，分遣送回原籍。

△　黄郛在沪寓所被人投掷炸弹，并附有匿名恐吓信一封。蒋介石闻讯电慰，黄复电要求蒋对通车事尽快表明公开态度，“同时将事实量为公布，使奉命承办之人，对报界不必规避，则疑虑自消”。

△　国民政府任命徐培根为参谋本部厅长，免其原任航空署长职。

△　山西太原山西省银行及垦业银行因谣传阎锡山病重发生挤兑。6日风潮始息。

△　成都《社会日报》因刊登某项军事消息，被当地警厅罚以停刊七日。

6月6日　　西路军李韫珩部以四个团向红军徐彦刚第十八师松山一带阵地进攻。红军与之接战后，由牛田撤退，李部占松山。

△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在上海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吴开先、潘公展、吴醒亚等任委员，潘公展任主任委员，内设总务、文艺、社会科学三组，是日起开始办公。9日，公布《图书杂

志审查办法》，凡10条，通函各省、市党部切实执行事前审查原稿之规定。7月，该会修订《图书审查办法》，凡14条，规定书刊付印前必须送党政机关审核；如以为内容有不妥处得勒令删改，违者扣留核办；如出版后与原稿不符，得予以处分。

△　航空委员会电财政部，谓向美订购飞机机件七箱到沪，请饬江海关免税放行。

6月7日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制定进攻红军计划：第三路军陈诚部以第三纵队樊崧甫部10个团协同汤恩伯纵队完成南丰、建宁公路，6月中旬由建宁前进，进占安远、宁化，再会同罗卓英纵队取宁都；以第五纵队罗卓英部先占头陂，然后会同樊纵队取宁都；以预备队两师协同第三十一师构筑新丰市、黄陂间堡垒；第六路薛岳部20个团，先派一部“围剿”吉水、富田间红军，然后策应周浑元纵队取兴国，逐步向古龙岗前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20个团，6月10日向太和移动，集中太和，7月20日占兴国。

△　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部署进攻红军计划：以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李延年部及预备队第三十六师共19个团，由连城向清流推进，命于7月10日占清流，以第三十六师担任连城及其后方守备；以第五路军第九纵队刘和鼎部四个师一个旅约共20个团，巩固沙（县）、永（安）连络线交通；以第十纵队汤恩伯部四个师，兵力20个团，会同北路军第三纵队樊崧甫部进占安远，然后会合李延年部夺取清流，并以预备队第八十师加入闽南守备。

△　薛岳部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由江西龙冈县樊埠王家城进占中塘陂及杨家坊一带。次日，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由龙岗攻占银龙下，并续以一部进占杨公山。9日，彭德怀红三军团及李于辉红二十三师反攻，击毙郭部数百人，俘400人，夺回银龙下、杨公山。

△　蒋介石派蒋伯诚至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缪培南等会

商“剿共”军事。8日至9日，蒋与陈济棠商定东、南两路军联合进攻闽西清流、宁化、长汀等地红军事。

△　张学良在武昌对汉口英文《民声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凡属中国人民，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拯救中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否则，如今日萎靡不振，自相残杀之趋势任其发展，中国真无希望可言矣。”次日，该报全文刊登张之谈话，12日又撰文予以评述。

△　第五十师杨鍊煊团、第二十六师王团与第十九师傅团以及修水地方团队，分别进攻修水塘城坳和全丰桃树港湘赣红军第十六师高咏生部。是日，红军高咏生部在金台山与之战斗后，率部突围，由划坪、铜盆岭经南源向黄茅山撤退。9日，高咏生在全丰被俘，在解往修水途中趁机逃脱，在遭受追捕中跳崖壮烈牺牲。

△　日使有吉自沪抵京谒汪精卫，以所谓“中日经济提携”要求解决中日一切悬案及华北各问题，整理旧债，缔结中日商约。汪精卫同意解决一切悬案，并提出先由经济方面实行局部整理。9日，有吉返沪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称汪“对中日共存共荣一点表示同意。通车问题现已大致决定，所余者仅少数技术问题，一俟此技术问题商妥后，即可完全解决”。“至于各项悬案，在最近时期似有解决可能”。“关于中日债务之整理，现在华方正在研究”。

△　航空署在河南彰德县动工扩建飞机场。次日当地群众数百人向专署请愿，陈述被占地后生活无着，要求给与妥善安排。

6月8日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政府“对于田赋永远不准再加附加，并永远不准再立不合法之税捐名目，以副中央兴复农村，培养国脉之至意”。

△　日本制造藏本失踪事件，以为侵华借口。是日晚，日驻南京

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只身外出，至次日晨尚未回馆。9日下午，日驻京总领事须磨以藏本“失踪”通知外交部，要求于48小时内查出其下落。南京军警机关发动搜查。

△　第二十一师梁立柱由横峰进攻黄胆石、吴山，向葛源进逼。方志敏红新十军一部进行抵抗后于是晚撤退，集主力于黄藤桥保卫葛源。

△　日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师团长杉原谷实夫、承德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及日驻热河第六师团官佐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战区善后及察边军事等事项。

△　陈立夫在北平电黄郛，促其北返继续负责与日交涉。同日，黄在沪向记者发表谈话，谓“求去不能，惟有继续负责，但愿国人明了国难，望舆论界发表正当言论，以共渡难关”。

△　财政部修正出口税则，规定杂粮、酒、糖、竹木器等免税；蛋制品、毛类、油脂等减税；烟叶等增税。经财部呈行政院，送请中政会转立法院通过，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同日，财部饬令各海关于6月21日起施行。

△　《农行月刊》在镇江创刊，江苏省农民银行月刊社编辑出版，主编刘存良。

6月9日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王维周第三十三军由万源至大竹河进攻城口，攻占城口县城。

△　何键令准刘膺古辞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兼职，任命刘建绪为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　吉鸿昌上年与冯玉祥、方振武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失败后，避居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是日，吉致函冯玉祥，要求“本生平之大勇，号召民族，为民众而奋斗，组织同志，誓死抗日，誓死

反帝”。并表示“锋镝余生尚何所惧耶”的抗日决心。

△　福州《新福建日报》因刊登日欲租三都澳为飞机场消息，编辑冠望微（兼上海《大晚报》通讯员）被省公安局传讯扣留。11日，福州报界同人要求省政府及公安局依保障新闻记者条例予以释放。

6月10日　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在喀什常遭莎车和英吉沙等地方民族武装的袭击，同时盛世才亦派刘斌率队由巴楚分道进袭。是日，马在四面楚歌声中率幕僚三人、卫队70余人越界逃赴苏联。余部交马虎山统率，盘踞和阗，固守皮山。不久，盛世才宣告全疆军事结束，新疆全部受盛世才统治。

△　全国佛教会上日在上海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预备会，决议通告全国佛教徒概不参加日本举行的第三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是日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九省三市代表共70余人，选出圆英等36人任执委，印光等12人为监委。翌日会议讨论速定教规、保护寺庙僧徒教育事业等提案。下午开首次执委联席会推举常委，处理大会各案后闭幕。

△　行政院核准财政部在长城线各口设税务分卡20处。

△　旅日华侨陈崇喜等16人，在日本山形县米泽市开设缝纫店多年，向例每年4月间照章换领许可证。本月上旬，该地警察所在陈等已更换许可证后突然借口更换许可证，派警察数人将十余家店铺封闭，并将陈等拘禁。我驻横滨领事向日外署交涉无效。是日，日警将陈等押往大阪，12日押往横滨驱逐回国，财产悉遭没收。18日陈等抵达上海，次日至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严重交涉。

△　广东省政府下令通缉“福建事变”参与人员黄强、胡秋原等103人。

6月上旬　豫鄂皖“剿匪”总部为加紧“追剿”红军，从“剿共”各部

中抽调兵力组成四个追击队。第一追击队由第六十四师第一九二旅旅长杨天民任指挥，第二追击队指挥由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兼，第三追击队指挥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兼，第四追击队指挥由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姚东藩兼。

6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全国民众运动工作讨论会。孙科在会上提出："自治、自卫、自足为民运工作三大目标。"连日会议讨论提案90余件、决议案21起，15日闭幕。

△　国民政府特派航空学校校长毛邦初为考察欧美各国航空特派员。7月13日，毛等一行五人由上海启程，前往意、德、法、英、美及瑞士考察。

△　红三军贺龙部击败黔军蒋丕绪部占领沿河。14日，红军一部由婺川攻入正安、安顺场再败蒋部，占领川黔边之新州。是月在枫香溪召开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在红军中恢复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之后，红军分入沿河、酉阳、印江、德江等地开展群众工作，开辟革命根据地。

△　薛岳奉陈诚之命至广州谒陈济棠，会商北、东、南三路"会剿"中央苏区计划。

△　日外务大臣广田训令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如南京政府无调查藏本事件真相之能力，日本政府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之安全作重大考虑。命即迅速解决该案，倘有怠忽，则将提重大抗议。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为此实行户口总抽查，分派便衣队四处查访。并悬赏万元。外交部亚洲司长沈觐鼎午后特访须磨，谓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劝日方持镇静态度，勿过于张皇。同日，日驻沪第三舰队派"苇"舰开往南京，停泊下关之日舰已作战时准备。南京人心不安。

△　日驻滇领事前于九一八事变后撤退，是日，日领事根木长之助抵昆明复职。7月4日昆明爱国群众对其重行来滇极为愤怒，各报亦

主张对日绝交，并发生群众刺伤汉奸之事，对之进行警告。

△　保定行营大举搜查当地书店，搜去进步书籍30余种，计万余册，并逮捕群玉山房、竞新书社等书店人员30余名。

6月12日　日外相广田训令须磨通知国民政府，如藏本案处理失当而发生不测事件时，其责任由中国负之。下午3时，须磨偕使馆参赞有野访汪精卫，谓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警察职权难以信赖，处理此事件如有迟误，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之，要求严厉彻查。同日，日第十一舰队司令杉坂乘巡洋舰“对马号”开往南京。南京日本侨民召开大会，对我施加压力。行政院再饬各军警机关加紧侦察，情况极度紧张。翌日，陵园工人魏宗青在明孝陵山上将藏本寻获。所谓“藏本失踪”事件乃真相大白。20日，藏本由沪乘轮回国。

△　日本武官柴山及日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井等在承德召集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等王公聚会，以蒙古实行“自治”相诱。

6月13日　是日至16日，方志敏新红十军由安徽祁门程家山，分兵三路进攻历口、渚口、小口各地。该处团队、壮丁队被围，急电婺源陈调元调兵增援。

△　实业部公布经行政院核准之《挽救江浙蚕丝根本办法》。主要内容是：奖励植桑；指导育蚕；改良蚕种；用烘茧机；改良缫丝；实行官商合作的生丝贸易；组设蚕丝合作社；试验研究蚕丝；培养人才；减免捐税以及蚕丝统制等11项。

△　国民政府任命杨步飞为陆军第六十一师师长。

△　国民政府通令行政院及直辖各机关，一致依照蒋介石所著《新生活运动纲要》切实推行新生活运动。

△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自上年底受国民政府委派，担任绥新公路勘察队队长，率中亚汽车路调查团前往新疆哈密、吐鲁番、迪

化等地考察。是日止，已完成中亚汽车路建筑考察工作。

6月14日　蒋介石命何键限期建筑衡阳、郴州两飞机场。是日，湖南省府下令衡、郴等15县于次日起兴工，所需款项全由当地群众分摊。

△　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分路进攻潭头、东固、龙岗间表湖、述坑洞一带，红军第二十三师及独立团与之接战。21日，韩部由表湖进占述坑洞。红军转至笆头，退集伯公脑、钱炉下一线阻韩师前进。韩师第五四七团进占坪头山。

△　河北宛平土匪孙老四、侯文明、卢茂林等在北平西部抢劫美国医师宁亨利，并将其杀害。此案发生后，美驻津领事至北平坐候破案。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急令侦缉队限期破案。7月19日，主犯孙老四等在房山捕获，孙与侯文明等30日判处死刑，8月14日执行枪决。

△　河北昌黎县长梁熇对贩买烟毒者迭收罚金。是日，因该县长捕去受日军宪兵队等庇护的烟贩李某，榆关日警长左薙、关东军平田大佐、守备队崛尾中尉及滦州日领阿布等率日兵30余人包围县署，强迫昌黎县长交出罚金和烟贩，限于16日答复，并以带该县长去日军部，将其枪毙相威胁。嗣由滦榆行政专员陶尚铭请日驻津副领事田中从中调解，由该县县长赔偿数百元，日方仪我允电昌黎日军停止行动，18日始得解决。

△　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对记者谈话称："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大连关不复存在，大连遂成为无税口岸。进口货物咸由大连运入东北，转运华北各地倾销，或由大连用帆船运往山东、福建及广东等省。每年走私损失达二三千万元。"

6月15日　蒋介石由九江抵南京。当晚，黄郛亦由沪至京，与蒋、汪对通车问题作最后决定。黄表示此问题稍有眉目即可北返。

△　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师第五旅旅长刘光瑜指挥第一、四、五旅及汪铸龙部之刘、周两旅在飞机助战下向万源进攻。第一、五两旅进攻万源南部清花溪右前方；第四旅进占石马河附近据点；汪铸龙部周旅等进占万源西南青龙关。川陕红军万源保卫战开始。是日晚，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清溪右前方大举反攻，川军刘光瑜部第一旅叶、周两团伤亡400余人。

△　蒋介石再令赣、闽、皖等省各地军政机关严密封锁食盐、煤油等物资运往苏区。

△　据《时事新报》报道：日本在热河奖励种植鸦片。规定各地须以农田的三分之一种鸦片，并由各县贷款处发给贷款，实行轻税法鼓励运销华北各地。

△　鲁北滨县、蒲台、利津、霑化、无棣一带农民反抗该省建设厅整顿垦务，拒绝上缴地亩清册，与垦丈局办事人员发生冲突。18日，该局会同民团一排前往镇压，农民死伤十余人，酿成惨剧。

△　上海《社会月报》创刊，发行人胡雄飞，编辑陈灵犀，理事编辑冯若梅，上海社会出版社出版。

6月16日　南京中央军校举行总理在广州蒙难纪念暨黄埔军官学校十周年纪念会。蒋介石主席，先举行阅兵典礼，继由汪精卫主席，蒋介石发表演说，宣称“国民革命第一期之工作已可完全告一段落”，提出所谓进行“第二期国民革命”的口号。

△　川军范绍增师廖旅进攻刘坪，范旅进攻中岭梁及通江。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一部将其击退，范绍增令第十二旅黄、郑两团赶至巴陵寨协助周旅袭击得胜山，欲由此直达通江。次日，红军自动放弃刘坪，川军范旅、孟旅各一团占领麻石场及其前方要隘阻断红军交通。19日，红军再次撤出通江，集主力于通江北面之银鼎包、三花顶及乌烧背、关山梁、老鹰嘴一带据守。21日晚，范师周旅进占通江城。

△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吴焕先部由商城转战至白业山区，庞炳勋、上官云相等率五个师分兵四路围攻。红军集中兵力于长岗岭地带，歼灭东北军姚东藩第一一五师团长以下3700余人，缴获机枪200余挺。

△　山东威海卫、鹿道口等地发生群众抢盐风潮，至18日止已持续三天，人数由数百人增达数千人，共抢走盐三万余担，该处第三海军舰队陆战队派兵前往制止。

△　杭州《民国日报》改组，实行官商合办，更名《东南日报》。该报自备新式卷筒印刷机，扩充篇幅，日出四大张，销二万余份。董事长陈果夫，社长胡健中，为浙省第一大报。

6月17日　第三师李玉堂攻占连城县属北围，第九师李延年攻占牛尾山，齐向长汀推进。

△　卫立煌在延平电蒋鼎文，以红军主力由闽西、闽北集结，特请增援闽北兵力。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在省府所在地，或工商业异常发达，或居民复杂的特殊地区，因不适用一般县市组织法，特设地方行政局之组织。

△　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部攻占吉林临江县第五区伪军炮台，并将伪警察全部缴械。次日又袭击第八区伪警将其全部缴械。

△　日东亚兴业公司在热河开鲁、科尔沁旗一带开始实行大批武装移民，计划辟垦农场38万英亩。

△　河北唐山华新纱厂于本日起，将厂内三班八小时工作改为两班12小时，全厂1700余人被裁500余。下午6时，工人齐集厂门请愿，厂方召集军警前来镇压。后经调解，厂方允给被解雇工人每人发12元遣散费，于20日了结。

6月18日　新红十军方志敏部一支，由赣东玉山至大留、紫湖口与浙江保安队发生遭遇战。红军击溃保安队两连，挺进浙西开化，又在梅川打败保安团两队。

△　南路军黄质文师第二十三团经乌鸦桥攻占寻邬。次日红军周昆部第二十二师派兵两团反攻失利。

△　张学良出巡豫鄂皖边区，是日抵潢川。21日在潢川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反共军事。之后再赴商城及皖西立煌、六安，27日，张回武汉。

△　本月初旬，殷同自沪偕柴山去大连，与日国际观光局总裁铃木、大连经理齐斋等会商，决定由中日两国商务机关合组旅行社，日方由沈阳日本观光局承司其事，华方委托中国旅行社负责办理，并决定于7月1日实行通车。平、沈通车办法商妥。是日，殷同由大连返天津，向于学忠报告大连商谈结果。次日，殷赴平向何应钦报告。

△　太原市学生反对会考，自上月5日向教育厅请愿失败后，各校加紧联络工作，斗争扩大。是日，并州学院、国民师范、明原中学等校学生四五百人，集队游行反对会考，并往教育厅请愿。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备有绳索和卡车大肆逮捕，学生进行反抗与军警搏斗。结果学生被捕36人，并指为共产党。

△　汪懋祖上月在南京《时代公论》第一一〇期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提倡文化复古，引起上海、北平等地报刊的讨论。是日，陈子展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提倡大众语。接着有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议》，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叶圣陶《杂谈读书作文和大众语文学》，夏丏尊《先使白话文成话》等等发表。其后，《中华日报》之《动向》、《申报》之《本埠增刊》以及《新语林》、《太白》、《社会日报》、《社会月报》等刊物都卷入了论战，掀起关于推行大众语的

讨论，反对文化复古。

△　美国国际贸易协会函美国上海商会与中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以发展中美两国贸易，提议组织中美贸易协会。9月，该会在上海成立，张嘉璈任会长，美国上海商会会长佛兰西任副会长。

6月19日　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交换外交、内政、财政之意见。一致决定对日外交以安定为宗旨；对内不变动党部官吏而维现状；华北通车问题立即实行，委黄郛全权处理。

△　日关东军以旅顺、大连为中心，举行防空大演习。由旅顺要港司令安藤中将任总指挥，旅、大日陆海军及防空团均参加，出动飞机80架，以袭击旅顺、大连军港为假想目标。21日结束。

△　蒙政委员会委员郭尔扎布电南京蒙籍监委白瑞，谓“近来日本在东蒙强制收缴民间枪支，解散蒙兵，并连成林西至多伦公路，锡盟遭蹂躏”，要求转请南京国民政府支持其采取抗日措施，予以充分接济。

6月20日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一致拥护《抗日作战基本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求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共同组成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对日作战的总机关，决定抗日大计，管理抗日事项，并在所有地方、工厂、农村、学校、商店及机关设立基层委员会。预定本年9月18日在上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武装自卫委员会。

△　班禅派员到南京与安钦、兴额等商议回藏问题。23日，安钦派秘书长王罗阶到沪，面谒班禅洽谈回藏事。

△　山海关税关在榆关车站恢复，并在城内东街设置分关。税关长为英人巴达孙。该关派员分驻各邮局，课自东北入关之小包税。

△　欧亚航空公司新辟兰（州）宁（夏）支线开航。11月1日又由宁夏展至包头，更名为兰包航线。

△　教育部令唐继尧在滇创办的大陆大学改名省立云南大学，校长华秀升。

△　北平宪兵第三团逮捕共产党员张维连、史荆邱、胡成龙、高淑静、王益民、姚得生、王穉英、李锦生等30人，进步分子七人，是日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　台湾、日本间无线电通话。

6月中旬　豫鄂皖边区“剿匪”总部改委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兼皖西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刘茂恩任总司令，将公署由六安移至立煌。

△　陈济棠电令黄质文等赶筑由筠门岭、澄江达上杭、武平，由筠门岭北达寻邬，由筠门岭达平远三条军事公路，限一月筑成。

6月27日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何键及薛岳等在广州召开三省军事会议，何键传达蒋介石关于湘、粤两省联合反共的旨意。24日，商定：一、各路一致实行反共军事动员，发动进攻；二、遇红军集结突围，分别派兵堵截，各军不分畛域；三、互通军事情报。

6月22日　川军范绍增师占领通江城后，是日进攻得胜山，与红军战半日，占领得胜山。翌日，范师廖、孟两旅推进至竹兴场、麻石场、过街楼之线，以图巩固通江防线。第四路军杨森部和第三路军李家钰部亦达通江，均向刘湘争功请赏。

△　财政部长孔祥熙离京北上，前往华北各省视察财政及税收状况。24日，孔抵达北平，立派专家九人分赴晋、察、绥及平、津各地调查。26日后，接连在平召见华北各财政负责人询问财政状况。28日，孔召集税专学生讲话，希望学生能注意研究税务而谋改善，承认华北苛捐杂税严重，“少者十余种，多者四十余种”，应予改良。

△　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西北建设计划》、《西北水利事业进行办法》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等，决定变更原订西北事业建设计划。次日，宋子文发表《西北考察报告》，主要内容分为：一、水利；二、公路；三、卫生；四、农村建设。本年度西北建设费共计435万元。

△　行政院准外交部将原驻美国火奴鲁鲁领事馆改升总领事馆，以原任领事梅景周升任总领事。

△　伪满社会事业联合会在长春成立，以郑孝胥为名誉总裁，臧式毅为总裁，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为名誉顾问，会长为日人竹内。

6月23日　第九十七师孔令恂和第四十三师邹洪进攻广昌与藤田间大、小舍竹一带。林彪、彭德怀红一、三军团与之激战竟日。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于城口、万源之线进行万源保卫战。是日，川军唐式遵部陈、汪、邓各部由双河口向万源进攻，与红军激战于曹家沟、青花溪地带。翌日，红军发动反击，在石马河又展开激战。

△　西（安）兰（州）公路在西安举行开工典礼。

6月24日　殷同在北平与关东军代表后宫少将、南满铁路代表宇佐美、日使馆武官柴山等讨论通车手续及确定办理通车机关之名称。商定：通车由中国旅行社与日本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车票由该社发行；通车车辆用该社特定之标志；每日由平、沈对开直达三等以上客车一列；入关车辆一律在山海关受我海关检查等。预定7月1日通车，6月28日双方同时发表。

△　蒋介石以南昌行营名义通令各省禁烟，对吸食、种植、销售、运输等加以规定，以便由其禁烟督察处等机构统制鸦片烟的专利。

△　国民政府令免王世杰国立武汉大学校长职，任命王星拱为武汉大学校长。

6月25日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自本年7月1日起至12月底废除一切不合法捐税，并严饬所属不得借口地方需要，对物重征任何捐税。

△　察哈尔部各旗召开会议，决定依照蒙古自治原则第三项规定改部为盟，于旗总管之上增设盟长，选出卓特巴扎普为正盟长，富龄阿为副盟长，特木耳博罗特为帮办。

△　伪满吉林警备第二旅司令李文炳至宾县，指挥进攻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部，并布告悬赏伪币万元捉拿赵尚志。

△　国民政府任命李锦纶为驻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免去李锦纶驻波兰兼驻捷克特命全权公使；任命张歆海为驻波兰兼驻捷克特命全权公使，免去张歆海驻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

6月26日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集中十余团兵力于西线南江北部贵民关、观光山间分水岭地区向川军第一路反击，次日突破川军第一线阵地。随后撤过小通江河与川军对峙。

△　蒋介石在江西彭泽、浮梁、鄱阳、湖口、平乐及安徽东流、秋甫、祁门、婺源等县组设赣皖边区“剿匪”军指挥部，任命江西省保安处长廖士翘为指挥官，军事委员会参议李磊夫为副指挥官，负责筑路修堡，组织民团及地方民政，“围剿”鄂豫皖和赣东北红军。是日，廖等由九江乘兵舰前往彭泽设立指挥部。

△　上海市公安局勾结公共租界捕房，于夜间搜查成都路、戈登路各处中共地下党组织。次日晨捕走共产党员周先成、金其全、林子明、吴炳生、刘月英、刘志刚、郑玉龙、李文碧、张文清等16人，搜去文件甚多。

6月27日　蒋介石在杭州与黄郛商谈对日问题，黄郛因对日妥协已招致国人的强烈反对，以“难胜艰巨”，力辞北行。翌日，蒋以华北无人坐镇，再次敦促，黄始应允。

△　中国旅行社代表张水淇与日本观光局代表足立，在榆关签订合组东方旅行社合同，规定中日各出50万元存入银行作为车辆之损失担保，由该社承办平、沈通车客票事务。社址设榆关，中日分任正、副经理，下设总务、清算、营业、文书四科，人员中日参用。29日，东方旅行社在榆关正式成立，以张水淇任经理，日人平山贞斋为副经理。

△　伪满发表分担日“满”共同国防费900万元。次日，伪满内阁会议决定实行减俸办法，向日献纳“国防金”。

△　伪满实业部发表声明，宣布除通过特殊公司制度由伪满“国家”统制的重要产业，即国防、公共事业及一般产业之基础产业外，其他部门任民间“自由”经营。从此，日本产业界对“满”投资更加活跃。

△　日军在上海虹口区无故殴辱市民，并非法拘捕。此后，接连发生凶殴事件。7月3日、4日，日军装甲车横行虹口示威。5日，日侨协会集会，决定向工部局提出改组虹口警察，增加日人探捕，任日人为虹口各署署长，控制警权等无理要求。

6月28日　北宁铁路管理局公布平沈路通车办法：一、自本年7月1日起，恢复由北平至辽宁直达客车，每日以平、沈对开一列为限；二、由中国方面责成中国旅行社，日本方面责成日本观光局于山海关组设东方旅行社，负责经理此项直达通车事宜；三、一切行车规章、时刻、车辆编成、车票发售等项办法，均由本局另行规定。同日，该局发出通告称：“此案为中外视线所集，关系异常重要，现距通车之期为日无多，合行令仰在事内外员工长警，妥慎从事，勿稍疏

懈。”

△　日“满”合组“日满共同土地开拓公司”，资本2000万日元。

6月29日　　王家烈与廖怀忠、蒋在珍再次发生混战。黔军廖怀忠、蒋在珍两部发动进攻红军贺龙部时，王家烈即密令李成章率兵四团乘机袭击廖、蒋等部。是日，李成章部在湄潭将袁其冲部解决，逼迫史肇周部退出凤岗。同时令万奕桐（式烱）、张立功两团沿凤岗左侧袭击廖部。

△　监察委员刘侯武等向监察院弹劾铁道部部长顾孟馀在大潼路购料订约中有违法舞弊情事，请求依法移付惩戒。是日，监察院经委员杨天骥等审查，认定顾孟馀实有舞弊情事，应依法惩戒，并具文呈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予以法办。同日，由监察院将刘侯武等的弹劾案全文、审查报告书及呈林森、于右任之文件予以公布。

△　王揖唐在日活动后，于是日返抵天津，对记者谈话鼓吹“中日亲善”，谓中日“无论何方面均有共通一贯之精神”，即“由东方文化所培养之佛教儒教”。“今观中日两国虽有一时的误解纠纷”，然依此精神“相互谅解”，“殊为痛快”。

△　伪满民政部通令，禁止关内《大公报》、《申报》、《时报》、《庸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18种报刊输入东北。此外还有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等，共计36种。

6月30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海关进口税则》，订7月1日起施行。新进口税则规定五金、机械、化学品等增税，棉纱、人造丝等16项减税，使外货在华倾销得利。各地工商界纷纷表示反对。7月1日至

11日，上海市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华商纸厂联合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及机器、染织、绸缎、印花、棉花号等业，及天津裕源、华新等纱厂均表示坚决反对。各地报纸也纷纷发表反对之评论。7月14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谈话，谓“自信此新税则能顾到各方之利害”，不顾各方反对强制施行。日本表示满意。

△　行政院公布《办理土地陈报纲要》，凡35条。

△　立法院院长孙科由京抵沪，向记者谈《宪法初稿》审查经过。谓此次修改，由原之十五章又增添军事、财政两章，该初稿经整理后即于一二日内发表。

△　伪满通令，限自7月1日起，凡东北旧纸币一律禁止流通。

6月下旬　　珠河游击队扩大至400人，改编成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后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赵任军长。

△　据上海《时事新报》载，本年上半年日货倾销猛增，贸易额达1.1125亿日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550万日元。

7月

7月**1**日　　陈诚部第三、五两纵队集中广昌附近，是日，陈令第五纵队全部南移郎君桥附近，准备进攻头陂，以第三纵队之第八师作策应。翌日，第五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命霍揆彰师展开于郎君桥东南大坑一带；李树森师集结郎君桥、竹桥道路左侧；傅仲芳师于杨家湾附近警戒新安方面；黄维师置郎君桥附近为预备队。3日，各部分头向头陂进攻，林彪红一军团退守头陂南部高地御敌，李师进占头陂。

△　伪满为加强军警统制，实施军管区新制，将原省警备司令部改称军管区。是日，规定奉天、吉林、齐齐哈尔、热河等军管区各设

两个旅，哈尔滨军管区编组三个旅，伪兴安省称警备军，下分东、西、南、北四区。从本日起分别遵照办理。

△　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邓文仪等22人为干事，熊式辉、杨永泰、何应钦等37人为指导员。制定各省市、各铁路、海外华侨及江西省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通告各地改组及推行。

△　铁道部长顾孟馀对刘侯武弹劾案发表申辩，详述潼西路购料合同经过，对刘等的弹劾文及审查报告逐条辩驳，并对提案之监察委员破口谩骂，引起各监委极为不满。6日，监察院长于右任表示，如监察权不能伸张即决定辞职。监委杨天骥向记者表示，顾谩骂刘侯武，实属侮辱整个监察院，监院决予制裁。7日，刘亦发表谈话，痛斥顾的申辩。

△　平沈路今晨7时许，由平开出首次列车，日宪兵若干在站台巡梭，乘客稀疏。该次列车行至塘沽东之茶淀被炸，死伤乘客16人。后经北平宪兵第三团破案，查明炸车者为北平正谊暗杀团首领史灿棠策划。即将史逮捕。10月6日，史被宪兵团枪杀。

△　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原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病逝于上海。

△　华北政记、肇兴、大通等16家航业公司与外商太古、怡和、日清等26家共同组成沪津航运联合会，公订运价。同年冬，因会内少数公司私行跌价不受联合会之惩罚，遂无形停顿。

△　太原西北毛纺织厂开工。该厂为西北实业公司所办。

△　曹禺撰《雷雨》（剧本）在《文学季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

△　《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出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

研究室编。

△　胡梦华、谭庶潜等在张厉生（国民党CC骨干）支持下策动北平各大专院校部分学生，成立“北平各大学民国二十三年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是日下午，胡梦华在中山公园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该盟情形，报告组织宗旨。13日，召开第二次干事会，决定推派谭庶潜等为代表赴京请愿。14日，谭等离平前往，16日抵京。至21日止，先后向国民党中政会、南京政府行政院及教育部请愿，要求设置青年职业介绍机构，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南京、上海部分学生起而响应。30日，汪精卫答应设立“全国大学生工作咨询处”，进行调查、研究。

△　广州勸勤工学院创立，院长卢德工。

△　日本在兴安区郑家屯创设兴安军官学校，是日开学。

△　《当代文学》月刊在天津创刊，编辑王余杞，天津书局发行。该刊出至第五期被当局指为鲁迅所主持，下令停止邮寄，至第六期后被迫停刊。

7月2日　　蒋鼎文委派第九师师长李延年为进攻长汀前敌指挥。是日，李由龙岩前往连城督战，并电请南昌行营派空军协助。翌日，驻浔空军预备队飞赴漳州归其调遣。

△　川军唐式遵、刘邦俊商定，决分六路进攻万源。11日，第四期第二步总攻开始。第一、四两路军攻德汉城、苦草坝，第五路军攻万源，第六路军任预备队。

△　中山县李谦等于5月初联名电呈汪精卫，控告该县县长唐绍仪八大罪状，要求将其撤职查办。是日，该县郑鸿长等人组成请愿团至广州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再列唐十大罪状，请求立即撤换。次日，又有杨子刚等七人请愿，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唐罪状12条。一

致要求唐绍仪辞中山县县长职。

△　全国邮务总工会在济南召开执监委会议。是日通过决议，根本反对东北通邮原则。翌日闭幕。

△　北宁铁路局长殷同因1日由平开沈之列车在茶淀被炸案，向铁道部提出辞呈。同日，日人仪我到平与殷同商议通车安全。4日，铁部对殷慰留。

7月3日　　彭位仁、陶广两师进攻湘赣红军根据地永新县金华山、石灰桥、珊田及官山、松山。彭师由仰山、虚皇山夜渡高川占领吴郎附近高地。次日在石灰桥附近渡禾水，向金华山、铜锣坪发动猛攻。红军萧克等部主动撤出金华山，经三峙、鹿石角南进牛田、小湾。11日，红军主力攻入泰和县路店、港口，以一部入早禾市。陶广及李韫珩师分头尾追。

△　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镇江荧昌厂，借口“整顿”厂务任意迫害工人，于本月1日无故开除工人骆小连。骆与厂方论理反被殴伤。2日工人群情激愤，一面向法院控告，一面找厂长评理，在愤怒之下，将厂长击伤。是日起，厂方宣布停工，并以解雇工人相威胁。工人斗争愈烈，坚持半月，厂方又勾结镇江市政府开除工人18人。其后厂方被迫发给被开除工人解雇费，8月2日复工。

7月4日　　国民党中政会第四一五次会议，通过《民国二十三年度国家总概算》，核算总计7.77亿元。其中岁出及军费为3.0775091亿元，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

△　国民政府公布《储蓄银行法》，凡17条。该法令由财政部草拟，于上月22日经立法院通过。其要点是：严格规定储款之会计；储金之运用；准备金之提存，取缔有奖储蓄等。

△　伪满公布所谓“企业局官制”，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以实

现其《经济产业政策大纲》的要求。

7月5日　　蒋介石改组军政部航空署为中央航空委员会，自兼委员长，由黄秉衡、张惠长任委员。

△　南昌行营电令南路军总部酌抽所部出发闽西，协助东路军蒋鼎文部进攻长汀。陈济棠接电后，召集余汉谋、李扬敬等会商，决调第四独立师邓龙光部入闽，待东路军进兵后开拔。

△　鄂豫皖红军徐海东、吴焕先第二十五军由湖北杨家店、万家店进入涩港店北部。12日又由朱堂店南进，在吴家河、牛王庙一带与何柱国、王以哲两军激战两日。

△　江西南丰至福建宁化的南宁公路通车。

△　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创刊，主编徐懋庸，光华书局发行。内容有文艺评论、游记、短篇小说及诗歌等。该刊自第五期起，光华书局另组新语林社主办，改由庄启东编辑。

△　南京《创作与批评》月刊创刊，南京虹社主办，吴漱予主编。属文艺评论性刊物。

7月6日　　中共中央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敌人，于上月杪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是日，红军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长汀、清流、永安，19日以主力经宁洋、桃源墟攻占大田，取得第一仗的胜利。

△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电促黄郛返平。电云：“三人共挑一担，一人息肩，余人亦只能放下。”再次劝其担起华北责任。

△　外交部设置察哈尔特派员办事处，任命岳开先为特派员。

△　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至北平，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要求东北与北宁路及朝鲜实行货物联运，以利日货倾销华北。

△　何键到南京，面谒蒋介石，向其报告在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等商定湘、桂、粤三省军队共同反共之军事部署情形。

△　西南政务委员会就唐绍仪问题开临时会议，决定：一、用政务会名义电慰唐绍仪；二、派员调查真相；三、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次日，唐绍仪往广州呈请辞职，并请萧佛成出面疏通。

△　河北省三河县郝家疃村农民为反对官方圈地举行暴动，将丈地人员扣留。并由该县人民派出代表四人前往北平，向何应钦请愿。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三年上海政府公债条例》，凡15条，债额350万元。年息七厘，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底止偿清本息。此款充作上海市政建设之用。

7月7日　蒋介石离南京前往庐山主持反共军事，翌日抵庐山。

△　为了配合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绕道闽东、浙西，进入赣东北与方志敏部会合，中央红一、三、九军团各以一部，分兵攻入闽中、闽南牵制蒋鼎文部兵力。罗炳辉红九军团于是日集结连城东北，16日攻入小陶，23日攻尤溪，28日集结云潭、九都板；彭德怀红三军团于中旬经连城县琴洋集结香寮，20日以两路佯攻永安，中路主力入大田，30日进占蒲田；林彪红一军团于16日由江西石城经长汀，27日入大田。蒋鼎文穷于应付，处境困难。

7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邹作华为炮兵学校校长。9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在天津开幕。28日闭幕。

△　玉萍路南昌到玉山段开工。浙赣路理事长曾养甫由杭州前往玉山，参加开工典礼。

△　重庆《新蜀报》、《新民报》载文批评该市敷设裸体电线有碍市民安全。是日，该市市长石体元派军警将《新蜀报》记者张骏、唐纯青，《新民报》记者吴秋逮捕。12日，重庆市报界协会、新闻记者协会共同通电抗议，并请刘湘转饬释放，严惩凶手，保障记者安全。旋经刘湘电促石从速妥处，张等获释。

7月9日　　立法院发表《中华民国宪法初稿审查修正案》，凡12章，188条。条文之前增列弁言，较之初稿增加28条；章节、名称、次第亦稍有增减变更。其修改要点，主要有：一、弁言："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中山先生遗教，制兹宪法公布全国，永矢咸遵。"二、国民政府已改称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对大总统负责，大总统平时统率陆海空军，战时任命总司令。三、关于行政机构：内阁制变总统制。四、立法院对行政院长投不信任案之权取消。五、增加军事及财政两章。六、各级政府均须有合法之预算及决算。

△　5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设立陆军军官训练团筹备处，派陈诚为主任，徐国镇、王天鸣等八人为筹备委员，计划抽调各省部队旅、团、营长及校官以上参谋人员分期前往受训，每期大半月，人数约二千五六百人，共办三期。是日，第一期军官训练团举行开学典礼，由蒋介石兼团长，陈诚兼副团长。蒋介石于典礼中演说《做人的根本大道》，指出，"做人的道理—立定志愿，团结精神，共同努力，来实现三民主义，创造新中华民国"。"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三民主义"。25日结业。

△　第六路军薛岳部进占天府山，进迫驿前。

△　上海时事新报社记者随平沈列车出关视察后，是日在该报发

表文章谓：“榆关尽是日伪军警，盘查极严。失业之日浪人在榆关出售‘入国证’，7月1日晚已达48.7万余号。中国货已宣布死刑。中国商店改售日货，英美商行相继关门。”

7月10日　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由广昌向白水进攻，第五纵队霍揆彰师攻占天府山策应。是日，汤部在航空第三队助战下，以第八十九师王仲廉部进占驿前北部要地白水，彭绍辉、萧华红十五师退集大寨脑地带抵御。

△　烟台海关监察长高元济受财政部委派，至北平组设长城五口设卡筹备处。14日，高偕同财政部副税务司张勇年访殷汝耕商谈设卡问题。17日，高等与古北口办事处主任霍实会商，决定于古北口起次第设立。19日起，高、张二人先后视察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等，之后返回北平继续筹办。

△　行政院第一六八次会议，决议任命黄镇球为防空学校校长。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监察委员刘侯武因弹劾顾孟馀案，接到署名“人侠”之恐吓信并附毛瑟枪子弹一粒。次日，刘对记者表示：“决不因一封恐吓信一粒子弹，停止弹劾职责”，并至警厅报案。

△　上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彭述之二人有期徒刑13年。嗣经陈独秀“辩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是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改判陈、彭二人各为有期徒刑八年，并予以公布。

△　行政院第一六八次会议通过设立中国驻埃及开罗领事馆。12日指令外交部筹办。

△　南京《战士生活》半月刊创刊，南京中国青年军人社编辑、发行。

7月11日　殷同至南京面谒汪精卫，报告通车经过。次日转赴莫干山与黄郛详谈对日外交方策。

△　日陆军省召开非正式军事参议官会议，讨论加强与充实其侵略我东北四省之政治、军事力量：一、强化三位一体制；二、将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转移到日人手中；三、确定在“满”日侨之二重国籍问题；四、增加常备兵力，扩张后方部队及防空设备等等。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补定弹劾案办法》，用以压制如刘侯武弹劾顾孟馀案件之再起。补定办法规定：一、监察院弹劾案原文与被弹劾人申辩书及一切有关该案之内容消息，非经受理本案之机关决定公布以前，概不得披露；二、凡经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之政务官，经惩戒机关决定处分后，中央政治会议认为必要时，得重行核定；三、关于国策及有关中国在国际地位之重要文件，非经中央政治会议之核定，不得披露。

△　内蒙土默特总管兼蒙边司令满泰病逝于归化，由荣祥代理总管，陈玉甲代司令。

△　唐山市人力车工人千余人反对市公安局征收新年牌捐，全体罢工并示威游行。

△　据上海《时事新报》北平电，日伪在榆关至多伦线已设税关19处，被称“满洲国南疆关税线”。

7月12日　梁华盛师进攻方志敏新红十军革命老根据地赣东北之富林、龙回港及下石一带。

△　中英两国在香港召开广九路修约会议，中国代表张慰慈、英国代表布达自是日起举行谈判，双方就该路之收益、联运技术及互助等问题进行商讨。其中对收益之分配争执达十余日，23日就新约达成协议。

△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由叶恭绰等10人任委员，傅汝霖任主席，制定《工作纲要》，凡10条。

7月13日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衔汪精卫之命，由南京赴莫干山促黄郛早日北返复职，并与黄郛、殷同商谈华北外交问题。15日，唐离莫干山返京复命。

△　湘赣红军独一师转战修水蛇林坑，岳森师派队追击。是日，红军独一师师长喻行舟在黄沙岗岭与岳师进行血战，不幸与交通员等五人被俘。26日被押赴萍乡，转至南昌。8月23日，喻被赣省军法处枪杀。

△　白崇禧到港，次日偕黄绍竑往晤胡汉民，共商时局问题。15日，黄北返，白回广州。

△　中国棉纺业巨擘、上海申新纺织公司资金枯竭，各银行不予续贷，茂新、福新、申新公司总经理荣宗敬向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救济不应，上月底搁浅。是日，荣宗敬离职，由福新、茂新两面粉公司主持人王禹卿代理。国乒政府实业部企图趁机攫取申新厂，提出由该部整理。

△　南京等江南地区酷热，上月江、浙地区平均气温达摄氏40°左右，为60年同月份最高温度。是月12时至下午1时，南京北极阁之水银柱上升到摄氏43°。长江下游七八月份雨量之少，破历年最低纪录。

7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统一水利行政事业办法纲要》及《统一水利行政事业进行办法》。17日，决定由经委会组设全国水利委员会，管辖长江、华北及各省水利。

△　国民政府任命周至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　外交部咨各国驻华领事，通告将于本年9月1日收回领港权。

△　南京《朝报》因12日刊登《某院长昨狂怒》之新闻及社评《狗屁之中央日报》，被认未曾送新闻检察所检查。该报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勒令停刊一日。

△　济南酷热达摄氏43.3°，中暑至死者众多，该地劳工法院检验官全体出动验尸亦应接不暇。

△　北京大学教授、研究部文史部主任、著名语音律学专家刘半农（复）病逝于北平。

△　日本外务省举行第二次预算审议会，决定增设“满蒙”局。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发表宣言，表示：“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与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五项主张。

△　川军第五路彭诚孚师奉命由通江县简家山右移，由第四路军派周绍轩旅接替。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一部乘机攻占简家山，向通江挺进。其后周绍轩旅在彭部等协同下夺回简家山。

△　据中央社天津电：伪满组设“大陆研究院”，研究物理、化学、地质、农林、水利。经费400万元，定期三年为一期。

△　北平《文学评论》月刊创刊，编辑人吴组缃、林庚、郑振铎等。

△　南京《中国社会》季刊创刊，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主编，编辑人罗敦伟。

7月16日　行政院长汪精卫由京抵沪，就弹劾权问题发表书面讲

话称："外间有人以此次决议为有妨碍于监察权之独立，这种批评是绝对错误的。照监察院弹劾法，一切弹劾案在未移付惩戒机关以前，不得宣示其内容。如将内容对外任意宣示，甚至将弹劾全文在报上公布，而被弹劾者未申述意见，这是不公平的。至于对政务官之被惩戒须经中政会复核，乃是中政会应有的权限。"

△　北平军分会顾问雷寿荣赴莫干山谒黄郛，向其报告华北政情，并共商接收战区问题，18日返回北平。

△　日驻华武官柴山、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至北戴河与陶尚铭讨论：一、建昌营驻屯之日军撤退及非战区特别警察队之设置；二、山海关、古北口及长城其他各口设置税务分关；三、通邮问题等等。此次会谈无结果而散。

△　据《四川月报》载：四川新繁县预征田赋达80年。

7月17日　汤恩伯纵队由白水继续南进，第四师攻占天子嵊。

△　监察委员曾道向报界发表谈话，反驳汪精卫16日在上海的书面谈话谓：顾孟馀为行政院属官，汪为行政院首领，本党领袖如所属官吏果有违法嫌疑，纵不能引咎自劾，亦当严饬所司密查，以其真相昭告国人，倘情属确，不妨径予罢免，以表示大政治家光明态度。汪之谈话有矛盾之点，而限制弹劾案办法又为汪所发动，足示其为之袒护。

△　盐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至上海，原址改为天津分行。

7月18日　日本外务省在台湾召开华南领事会议（又称台湾对岸会议）。参加者台督中川、福州总领事宇佐美、厦门领事塚本毅、汕头领事竹内、广州领事服部、香港代领事芦野，以及外务省书记官田尻等。会议以所谓"保护居住对岸之多数籍民以及文化设施之改善"，"谋华南经济之进入，以达中日亲善之目的"为主题。通过指导籍

民殖产；奖励振兴台湾与华南贸易；扶助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恢复台湾总督府外事课；确定“中日亲善”宣传纲要等提案38件。会议末日进入秘密状态，讨论军事事项，20日结束。

△　监察委员朱雷章等代表监察院批驳汪精卫关于修改弹劾案之谈话。朱等谓：监察院弹劾案既经审查通过，又经惩戒机关议处，似不应再经中政会之复议。监察委员有保障法，有权公布弹劾案。《补订弹劾案办法》有碍监察权之独立精神。

△　福建省政府会议，决定在永安、云阳、漳浦三县及封锁区与毗连等区县份，制订发放通行路单办法，并通过请保安处设上、下游两食盐公卖总会以便封锁。

△　伪满发行“新京”（长春）、哈尔滨建设公债1000万元，由日本银行团承受，规定年利四厘，限14年还清。同日，公布《投资事业公债法》。

△　日本“满铁”理事长十河至北平与华北当局接洽北平、平绥路实行联运问题。

△　上海《申报电讯社》举行十周年纪念，发行《十年》特刊。

7月19日　　汪精卫在南京再次发表谈话压制监察院弹劾顾孟馀案。汪谓：“今日尚为训政时期，一切权力集中于党，无有一机关能独立于党外，不听从党之指挥监督者。监委虽有保障法，但若为党员，则党的纪律制裁固仍可加诸其身，尚望郑重发言为要。”20日，监察院长于右任致电全体监察委员，嘱对弹劾法案勿随意发言。

△　上月南昌行营函行政院要求将福建光泽和安徽婺源两县划归江西管辖，以适应其反共军事之需要，行政院于17日通过。本月14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案准。是日，南昌行营公布正式将福建光泽、安徽婺源两县划归江西管辖。

△　据上海《大美晚报》报道，日本近在热河增设新税，规定每只狗月捐三角，鸡每只月捐二分，牛、马每头月捐八角。对鸦片烟实行官卖，禁止私人贩卖。

△　国民政府命令统一盐税，规定各省地方永远不得在盐斤项下设立任何名目，抽收附加税捐。

7月20日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沪与日使馆参赞有野商谈取消《塘沽协定》事。会后，有野宣称："此次会见仅系友谊性质，关于撤废《塘沽协定》问题，应由关东军负责，日本政府与此无直接关系。"与此同时，殷同到沪与唐有壬商讨华北中日交涉问题，为大连会议进行准备。

△　日关东军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近通知天津各国驻屯军，要求各国驻军今后如在"中满国境演习，应先行通知"。是日，英驻华司令官表示拒绝，略谓："英军根据义和团事件之协定举行演习，'满洲国'为中国之一部分，英国有自行操演之权。"

△　本月初，太虚法师在奉化县雪窦寺为蒋介石讲佛法。太虚向蒋谈及日本将举行之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蒋表示理应参加，无反对理由。是日，太虚派其弟子哲音由上海前往东京，出席22日至23日大会。

△　申新第三厂股东反对由实业部整理申新纱厂，代总经理王禹卿难以应付，是日函公司股东表示辞职，请荣宗敬复任总经理。是月下旬，实业部长陈公博拟具"救济"申新纺织公司办法，提请行政院讨论。荣宗敬探知其吞噬阴谋，向蒋介石、孔祥熙表示反对。27日，吴敬恒出面函汪精卫、孔祥熙，主张维持申新。30日，无锡纺织厂联合会通电反对整理申新。嗣因财政部与实业部间派系矛盾，实业部阴谋未逞。

7月21日　　红军董振堂第五军团及林彪一军团之一部据守白水南

部大寨脑。是日，汤恩伯纵队第四师向大寨脑右侧翼首先发动进攻，第八十九师乘势由正面进迫大寨脑阵地。红军凭险固守，战至午时许退至王家山，汤部占大寨脑。次日，汤部向驿前推进，分别攻占斧头山、下子岭等地。

△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废除《塘沽协定》。声称：倘若要求废止，必须以终止战区排日、抗日运动，保持中、日、“满”关系为条件。23日，天津《大公报》就此发表题为《塘沽协定与战区善洽》的社评，指出日方所列废弃《塘沽协定》之条件，实属强词夺理，“日本帝国主义的欲望希图显然无界限，无止境”。

△ 日驻承德特务机关召开东蒙旗王公联合会，并在日军操纵下成立“蒙古王公联合办事处”，地址设承德。

7月22日 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电令各省、市政府，饬其严禁中国佛教徒前往日本参加所谓“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并谓“嗣后凡与日伪有关之行为，非经中央及当地高级党政机关认可，概须禁止。否则除解散其团体外，并依法予以严惩”。

△ 江苏嘉兴县王镇店千余饥民发动抢米运动，当局派保卫团前往镇压，将其驱散。

7月23日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萧克、王震红六军团由遂川菱塘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蒋军薄弱部，自行选择突破地段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关向应红三军取联络……探索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路线，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

△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进攻福建尤溪县万溪口，击败卢兴邦部。29日，红军袭击樟湖坂，击溃保卫团两连，获机枪二挺，枪100余支。

△　原湘赣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借巡视为名由兴国逃往泰和叛变。是日，孔在泰和向周浑元部投降，随被蒋介石委为南昌行营参议。8月20日，孔在南昌公开发表反共言论，表示在蒋介石领导下“决心消灭土匪，复兴中国”。9月下旬，又被蒋任命为湘鄂赣边区招抚特派员，在修水设立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

△　殷同抵大连，与日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参谋喜多诚一及日使馆武官柴山等就战区未了问题交换意见，至深夜始散。

△　国民政府任命傅铜为安徽大学校长。

△　华北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成立，推张伯苓为第一届主席。该会承受前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之农赈基金及赈余款，依法推办合作事业。

△　日军在天津南开八里台强筑飞机场，是日正式开工。天津市政府派外交顾问孙润宇访日驻津副领事，要求日方停工，日领不允，诡称该工程系筑运动场之用。

△　伪满奉天警务厅为防止抗日义勇军袭击，规定在全省4700余村遍设非常报警钟，以备青纱帐时迅速报警。

7月24日　　蒋介石手订《庐山军官团团员首要之任务》，提出：“恢复我军人自强、自立、自重、自尊之人格……奠定我军人救国保全千古不磨之基业……期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与本团之同学也。”并演说《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及《御侮图存之要诀》。

△　殷同与冈村宁次在大连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通邮技术等问题，殷同提议废弃《塘沽协定》，当日结束。会后冈村对记者谈话，谓通邮业经成立大纲，设关亦已协商，华北航空联络亦属重要问题，《塘沽协定》现下不能废弃。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一部猛攻陕南镇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

下令所部严密防范。

△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第三号通告，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决议及《出版法施行细则》作补充规定："凡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凡经中宣会批准，可发给免审证；图书杂志如出版后发现与审查稿本不符者，得转内政部予以处分。"

△　日本与伪满共同组织日"满"面粉会社，资本伪币200万元，以三菱、三井为投资中心，社长日人松平其平，于是日开工投产。

△　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派谢瀛洲为微风文艺社社长。翌日，该社召开第一次社务委员会，决定发表通电"反对普罗文艺"，对鲁迅进行攻击，并呈请当局严禁出版其著作。

7月25日　川军唐式遵、刘邦俊自22日起，集中七个步兵旅进攻清花溪，经连日激战进占南池坪、袁家山及瓜贝溪等地，向万源发动进攻。是日，复以第一、四、五、九各旅及第六路军刘育英旅一致行动，向大面山、孔家山、大山坡等徐向前部红军阵地强攻。攻至大面山山顶时大雨如注，红四方面军一部由正面及两翼猛烈反攻，川军各部伤亡逃散达万人左右，败退原阵。

△　红军周昆第二十二师乘粤军黄质文部与张瑞贵部换防之际，向筠门岭举行反攻，与粤军第八师叶寿尧团激战数小时。欧阳新团从清溪增援，红军始退。

△　殷同电南京汪精卫，报告大连会谈情形，谓日方对我保安队开入战区、日伪军撤退马兰峪各口及废《塘沽协定》等，因日方坚持恢复华北经济"合作"、中日全国铁路联运等强硬条件，无法解决，特电请示。同日，"满铁"理事宇佐美访殷同，商谈华北经济问题。当日殷同乘轮返沪。

△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与黔省“剿匪”总司令犹国才，经陈济棠、李宗仁等调停，是日，王、犹两人在盘江之关岭会晤，双方商定反共军事及黔省善后事宜，互相表示谅解。29日，王、犹联名通电表示，“互竭赤诚、共同努力”反共。

△　日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再次发表强硬谈话。谓“此后若各国驻军对通告轻视，竟敢在‘国境’演习时，我方决以既定方针，取断然态度而处置之”。同日，日军在天津市街举行演习。当天，法驻华司令官访仪我，表示拒绝日本的通告。

△　辽、吉两省西安、伊通、丰县日伪军分别派出骑兵、炮队进攻辽吉边区老西沟、横岭子、佟家沟等地，围攻天虎、仁义等义勇军。

△　日本制定所谓“促进中日经济合作原则”：“一、网罗中日财界代表组织调查会，调查华北足资开发之富源；二、使东亚、中日兴业、实业、中华汇业等银行及东拓特种银行团等的对华投资，结成统一活动；三、整理旧债，收回现金；四、开发新经济，获得利用方法，投资于实业方面。”

△　北平《世界日报》因本月22日社论《黄郛、于学忠进退问题》一文，被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该社论“措词失当”为词，令罚该报是日起停刊三日，28日起复刊。

7月26日　　监察院全体监察委员电请该院院长于右任返京，力争监察权。电文略谓：“委员等对于《补订弹劾案件办法》，一致主张上呈中政会，请求维护遗教与训政约法。”“五权制度为先总理所手创，果坐视破坏而不一言，将何以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务恳即日返京，将委员等意见转呈中央。”

△　国民党中央第一三一次常务委员会决议，以罗家伦专任中央大学校长，免去其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职，遗缺由程天放继任。

△　云南屏边县苗族民众不堪捐税盘剥及地主豪绅压迫剥削举行暴动，当地县署派兵前往镇压。是日，县预备团队将阿打破苗族房屋纵火焚毁，30日又搜山掳走牛羊等牲畜，苗族人民坚持反抗。10月1日，由当地驻军会同县府派员安抚，酌予赔偿损失始息。

7月27日　殷同由大连抵沪，就大连会议经过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谓此次会议“系由我方所邀请”，所谈事项为我方所提出，内容为清理战区种种麻烦问题。项目为：一、日、鲜不良浪人之取缔；二、李际春、石友三等部保安队之整理；三、新编保安队之开入；四、马兰峪、东陵之接收；五、日伪军之撤退；六、察东区域之整理；七、大东公司之取缔等等。此次谈判虽未能如我方期望，但确有进步，只需黄郛北归，归战区纠纷必可一扫而空。

7月28日　湘赣红军萧克等部于23日由江西拿山南部坳头、大旺、新江口围攻赣西遂川之衙前，一部由五斗江至长隆向湘东南。是日，刘建绪为阻止红军进入湖南，命令驻永新之彭位仁师驰赴宁冈（砻市）接替王东原师防务，王师集结黄坳、息锣附近，堵截红军跨越黄洋界、遂川线西进。并令驻莲花之陈光中师接防禾山防务，以陶广师火速完成天河至永酉碉堡线。

△　殷同至莫干山向黄郛报告大连会议经过。当晚又向记者表示，大连两日会议，对战区困难已局部解决，废除《塘沽协定》我方并未正式提出。日方不但盼望华北经济合作，且进一步想作中日整个经济合作之欲望。东陵、马兰峪之接收，伪军允撤退长城各口、建昌营、澈河桥等处，日军撤退尚无期，我新编保安队9000名即可开入战区。现黄氏正计划接收马兰峪、东陵事，并电令于学忠、殷汝耕、陶尚铭办理。

△　中英双方修订广九路协约问题经过香港谈判后，是日在广州正式签订新约，凡48条，附件三条。规定盈利分配，中方占七成二，英方占二成八，以五年为期。9月15日，铁道部与驻英香港总督正式

签订广九铁路联运合同，10月1日起生效。

△　实业部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安徽省政府，共同组设祁门茶叶改良委员会，创办祁门茶叶改良场。

7月29日　蒋介石制定《改善保安团队大纲》，函送中政会、行政院备案。大纲凡七章31条，要旨为统一名称；训练划一；统一经费等。令苏、浙、闽、豫、鄂、皖、湘、赣、陕、甘等省切实遵行。

7月30日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经樟湖坂入闽清县，进抵大田、黄田、谷口等地。在黄田、谷口两地击退第八十七师江防部队一个营。东路军闽江守备司令王劲修于湾口防堵，福州警备司令王敬久率部赴水口堵击。

△　汪精卫对中央社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谓：殷同此次去东北，其目的在谋解决战区内各种纠纷，现已得相当之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如经济合作等并未提及；近派唐有壬催黄郛北返，就近处理一切已发生或可能发生之纠纷，有赖黄郛的坐镇。

△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就大连会议发表社评。称该会议仅获通车问题的解决，诚属可喜，惟日本的希望是由停战协定之军事协定，更进而作政治协定。表示未能使华北特殊化，成为伪满第二而遗憾。

7月31日　唐有壬返回南京，向中政会报告大连会议经过。会后对记者表示：外传日方提议中日经济合作完全不确。并称黄郛自聆殷同报告后，已打消辞意，不久当可下山返任。

△　是日起至8月4日止，英兵在山海关城外二郎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日本调兵于长城沿线各口监视。8月2日至4日，日军亦在四炮台一带作对抗演习。

7月下旬　吉林延寿县黑龙宫镇群众为反抗日军强收枪支举行暴

动，吉林伪军派队千人前往镇压。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赵尚志闻讯率部往援，与日伪作战四昼夜，击毙日伪军200余人。

是月　　北路军总部在江西南城编组别动队约3000人，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等组成。其任务为在反共区进行反共之教育和情报间谍等工作。

△　溥仪之父亲载沣到长春，由伪宫内府派出宝熙等官员及护军一队前往车站迎接。日关东军司令部派员向其提出抗议，认为溥仪派武装护军去车站，系违反“满洲帝国”已承担义务的前东北当局与日本签订的协定，要求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溥仪当即派人向日方道歉并提出保证。

△　伪满奉天省情报处调查本月份该省义勇军活动情况，计3.4343万人次，共出动759次，较六月份增加50次。主要活动地区以岫岩为最多，次为安东、东边道、柳河及通化、金州、临江等地。

△　北平《史学论丛》创刊，北京大学潜行社编辑、发行。

8月

8月1日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为主席。同日，宋庆龄等以中英文向各方发送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公布之《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的纲领》。

△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渡越闽江，由黄田、谷口占领水口、古田，一部抵达离福州仅20里之白沙。福州驻军仅四个团及宪兵、保安队若干。3日，蒋鼎文急由漳州飞福州与陈仪商定，调王敬久师于福州大头岭、小北岭筑堡；命泊马江军舰及陆战队开桥南；并命伍诚仁师由浙返闽；以王劲修师及保安队等会同王敬久部堵截红军。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福州北部桃园坞击溃其一个团。当晚起，福州

施行特别戒严。

△　盛世才宣告新疆“和平统一”，规定每年是日为新疆和平统一纪念日。同时发表宣言，宣布八项政策：民族平等，保障宗教自由，实行农村救济，整理财政，澄清吏治，扩充教育，实行地方自治，改良司法。

△　盛世才派何语竹等发起，在迪化成立“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会长何语竹，秘书长郎道衡，组织部长王立士，宣传部长徐廉，青年部长程东白。嗣后并创办《反帝战线》为其机关刊物。该组织标榜反帝爱国，发展迅速。至次年，会员达2400余人，至抗战前发展到5200余人。

△　伪满协和会改组，原任官员全部退职，以矢部迁吉任中央事务局事务长，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兼事务局次长，其他主要人员几乎均为伪满政府的日人官吏兼任，下设人事、经理、庶务、组织等八系。各地事务长是：长春伊藤信夫，哈尔滨赤岭义臣，吉林高须裕三，热河佐田置澄，海拉尔铃木镰吉，依兰浅野十郎，间岛有马善夫。该会中央机构部分地开始实行“二位一体制”。伪满政府与协和会实行“一体化”。

△　日本与伪满在东北实行所谓“安业法”。规定：一、凡能悔过归服者不咎既往，一概发给“安业证”；二、领有安业证者与其他民众享同等待遇，身家受法律保护；三、凡自愿悔过者，发还以前没收之财产；四、凡受兵灾区免缴赋税，重灾区予以补助；五、凡土地执照被征收者一律发还执照。以上各条于本日起实行，三个月满期后不悔过者，概以“匪”人论罪。

△　伪满实业部召开第一次产业调查局筹备会议，讨论设置产业调查局及人选等具体事项，以期确定所谓“产业政策”。

△　伪满与日本之无线电话开通，是日在长春举行通话典礼。翌

日，正式营业通话。

△　荣宗敬自行整理申新纺织总公司，特组改进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并聘专家设计整理申新各厂。

△　南京国货公司创立，南京市市长石瑛任董事长，邬志豪、葛亮畴等为董、监事。

△　福州《南方日报》创刊，主办人吴玉衡，日出对开纸二张。

△　北平《文学评论》双月刊创刊，文学评论社主编。编辑李长之、杨丙辰，发行人张道一。

8月2日　　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指挥该路军“剿共”，决定分期向石城推进：第一期进占驿前，第二期进占小松市，第三期进占石城。其第一期兵力部署：以第十纵队为左纵队，附山炮、迫击炮各一连，集中白水至大寨脑大道以东，经良田南进，第一步占贯桥，第二步经大岭格占南岭脑，第三步占驿前及其以南，逐步推进封锁线；以第三纵队为右纵队，附第八师、第六十七师及山炮、追击炮各一连，由广昌推进白水、大寨脑大道以西，与第十纵队联系，同时并进。

△　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内政部、财政部合组之土地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由陈立夫担任主任委员，甘乃光、高秉坊等为常委。公布《全国土地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8日通过土地调查纲要六项。10月起开始进行土地调查工作。

△　中英庚款董事会决议，每月拨款40万元给蒋介石充作“特种教育”经费。

8月3日　　第三师李玉堂进占南科、龙钧岭、曹坊等地，进攻猪鬃岭。林彪红一军团第一、第二两师及第二十四师大部踞守罗坊、猪鬃岭，以一部分途袭击李部掩护队，固守中屋村等阵地。

△　上海日文《日日新闻报》就宋庆龄、李杜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组成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之事予以报道。谓宋等“鼓吹对日战争”，是为“可惊的暴论”，“颇具浓厚的赤色思想”，其字句“冒渎我皇室”。对之进行无理攻击。

△　据日人《盛京时报》报道，热河省平泉县穷苦人民粮食断绝，仅“食木皮草根等以充饥饿”，数日间被饿死者，约达300名。

8月4日　　湘赣红军萧克部，由江西拿山南部坳头、大旺市、横石、新江口一带南移遂川，进入横石、上镜、南北坑地带。次日，红军于东沙塘等地分路围攻衙前。

△　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沿闽江北上，向白沙推进，翌日攻占水口。6日，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转入大湖，再经江洋进至福州北岭前阳山、白鹤亭。

△　周作人至东京，在比谷山水楼受到日本名士佐藤春夫及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第二课课长柳泽健等欢迎。周之此行，系替日本宣传所谓“中日亲善”。31日，周由日乘轮回国。

△　财政部于北平设立津海关区长城各口分卡办事处，派津海关副税务司张勇年任主任。16日，津海关布告长城各口分卡征税办法12条，并派员往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设卡。

8月5日　　北路军第三纵队陈诚部由白水进占来禾嵊。第十纵队汤恩伯部进占王家山。是日起，第三纵队发动进攻高虎脑及贯桥。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红一、三、五军团集中重兵进行阵地阻击，巧妙采取防御配备，顽强打退陈诚部多次进攻，在高虎脑一战歼陈诚部约3000人。7日，第三、第十两纵队同时由良田、中司之线向贯桥阵地猛攻，红军与之激战半日。在连日阵地拼杀下，红军受到巨大牺牲，向驿前方向退却，踞守第二阵线。

△　湘鄂西红三军贺龙部攻占贵州沿河，南入德江、甘龙口、安南营。16日，红军分兵进占酉阳，王家烈派第四路指挥李成章率部取道乌江进驻湄潭，以柏辉章师开往甘龙口堵截。

△　川军唐式遵下令第五、六两路军分五路总攻万源竹峪关。唐亲自至高家山督战，猛攻万源之清山、大面山、香炉山等地。7日，川军第四、五、七、八各旅全面出击。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经三天两夜激战，将川军26个团的兵力全线击退。之后收缩阵地，集中红军王宏坤第四、何畏第九、余天云第三十各军主力，作好先解决东线战场的准备。8日，唐部占万源。

△　新任日军关东军宪兵司令岩佐绿郎少将由沈阳前往长春任职。

8月6日　　红九军团罗炳辉部与彭德怀红三军团一部在水口击溃王敬久、王劲修两部，随后乘胜撤返尤溪南部。8日经山兜西格入南涧桥，14日由三保至清水池，15日入西洋，转向洪田。24日返回清流，完成掩护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任务。

△　胡汉民在香港向北平法文《政闻报》（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蒋介石政府散布他将出洋之消息，正式加以否认，并声称将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　庐山军官训练团暑期第二期开学，2日上课，是日补行开学典礼，25日结业。

△　长沙绅士迎神进城，禁五荤求雨，湖南省主席何键竟通电全省禁五荤祈雨。次日，何亲至南岳祭神求雨。

8月7日　　蒋介石以际此新生活运动普及时期，特通令各省设立机关，收容乞丐，派作苦工，或教以手艺，俾资生产。并饬各省仿效江西，从速成立游民教养所。

△　红军萧克、王震长征先遣队分由永新、遂川地区突围西征，拟沿罗霄山脉穿越万洋山进军湖南。是日围攻藻林，击溃遂川第一纵队鲍刚旅，突越遂（川）大（汾）封锁横线。10日，趁湖南驻军分散之际进至左安。红军化装夜行，由小路越过险峻的万洋山区，向湘军封锁线前进，何键西路军第十六师狼狈溃散（师长彭位仁因此被撤职处分，10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11日进至湖南桂东寨前圩及增田、沙田，在沙田与湖南保安团徐石淑部接战。

△　殷同在南京谒见汪精卫，面呈黄郛致汪亲笔信，并陈明黄在蒋、汪督促下，决定向蒋请示后即返平任事。

△　伪满在敦化、蛟河、五常、延吉、安图等五处分别设立森林事务所，在海伦设立办事处，并计划于年底在东北各地增设森林事务所14处，大规模替日人抢占东北森林。

8月8日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威胁福州，进至镇海楼、北门楼及笔架、莲花、五凤等各山头，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仓皇回师福州。

△　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与陕西省政府合组西京市建设委员会，以张继任委员长。

△　教育部通令各大学设立职业介绍机关，助导大学毕业生解决职业。

△　南京市《远东报》和《宁报》，从4日起因刊载军事消息，被警备司令部勒令次日起停刊三天。

8月9日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在东线开始反攻。翌日晚10时，以王宏坤第四、何畏第九、余天云第三十军三大主力，突袭川军第五、六两路军结合部南天门（位于万源与通江间），攻占罐坝场正南青龙观、黑龙岩，歼灭汪铸龙部两个旅，打开敌阵缺口。11日晨3时，红

军分兵两路楔入敌阵缺口，红九军挺进青龙观左翼黄中堡，抄至川军后方；红四军直攻南天门、赵家坝独二旅杨国桢部，横扫第五旅刘光瑜部，攻占玄祖殿、后坪等阵地，全歼杨、刘两旅。川军边防第一路副司令吴锦堂部在五龙台、五龙岗一带闻风向河口场、秦家河溃逃。川军全线崩溃，星夜南撤百余里，退至渠河三汇始止。是为竹浴关反击战（川军称“中河之役”），歼川军1.5万人，活捉旅长一人，毙团长七人。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由莫干山赴赣，途经南京时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谓华北如将战区种种纠纷解决，即可稳定，望新闻界“起而纠正国人的悲观想象”。翌日经九江抵牯岭，11日面谒蒋介石报告华北政情。

△　国民政府派李石曾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图书馆大会。

△　胡汉民在香港再次向北平法文《政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谓远东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英、美、法等国切实合作，才能使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自行消灭。

△　日在辽北山城镇召开东边道15县治安维持会，伪奉天警务厅长日人三谷、总务厅长日人久米等参加，次日闭幕。会议决定强迫各县学生前往抗日游击队活动区进行“日满亲善”、“王道精神”等反动宣传。

△　上海人力车工人200余人为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新章程包围工部局，提出反对工部局新章程，要求减低车租等六项要求。工部局派出巡捕进行驱散或逮捕。翌日，连续逮捕100余人，并以强迫罢工及扰乱地方治安起诉，将罢工首领郑发珠逮捕。11日，工人被迫拉车，斗争失败。

8月10日　　蒋鼎文调动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堵击红军抗日先遣队。是日，伍师由海路抵琯头登陆，从东面堵截红军抗日先遣队。红

军围福州数日后总退却，11日撤至连江县汤岭、潘渡一带，分入连江、丹阳。

△　日本政府下令大规模驱逐横滨华侨，借故停发华侨营业执照，指为失业流民，将其驱赶回国，80余人被迫寄宿横滨中国领事馆。27日，华侨结队离开横滨回国。途经门司时，当地警署又以不许结队回国为由，毒打华侨多人，其中30余人被扣于门司。

△　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吉兴，调集吉海线驻军两个旅是日出动，进攻盘石抗日人民革命军。

△　日本决定在承德设立领事馆，任命中根直介为领事（原赤峰副领事）；于图们设“间岛”总领事分馆，以松原久义为主任。翌日，承德领事馆设立。

△　北平政整会总参议王克敏由沪至青岛，与宋子文商议华北财政。

8月上旬　　蔡元培等42人联合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国际问题研究会发起组织英文中国年鉴会，聘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陶孟和等任年鉴撰述，由商务印书馆承印，用以取代由英人任德海主编而质量甚低的英文中国年鉴。

△　吉林义勇军王德林、谢文东、孔宪荣、赵尚志等，于月初在东宁召开辽、吉、黑三省抗日义勇军代表会议，联合组成东北抗日联合军。在东边道和黑省分别成立联合军特别司令部，以孔宪荣任第二方面总指挥，王德林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赵尚志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谢文东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决议各军互相联络，协同抗日。

△　杭州飞机场失火，数十架飞机被焚毁，蒋介石大为震怒，立命军政部航空处处长兼杭州航空学校校长徐培根前往庐山，将徐以“通匪”罪枪毙，并令逮捕有关事件之南昌行营航空司司长唐文仪等

人。

8月11日　蒋介石电令赣粤闽湘鄂“剿匪”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西路军赶筑汝城、集陇经沙田、桥头、大汾、藻林、遂川、杨树村至英坑封锁堡垒线；令陈济棠南路军衔接集陇沿上犹、江下达赣城，折经五云桥、沙池至吴坑之封锁碉堡线，用以堵截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红十七师、红十八师。

△　国民政府特派郭泰祺、罗忠诒、金问泗为出席国联第十五届大会代表。

△　天津《益世报》因上日社论《华北战区之整理》一文触犯当道，是日被天津新闻检查所处以停止邮递及收发电讯之处分，至9月16日始解禁。

8月12日　红六军团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在湖南桂东县寨前圩进行战斗动员，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任弼时随军行动，任中央代表，并组成以任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作为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决定由内线打到外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是日，红军由寨前圩出发，穿越郴宜公路西进。何键闻讯后，急调刘建绪率王东原、彭位仁两师追击，并令李觉、岳森两师及地方团队于湘南堵截。同时，粤军第四师张达部两团由营前赶往三家村、鹅形防堵。

△　薛岳部韩汉英、欧震及唐云山、梁华盛等师及炮兵四个连，沿龙岗、中塘陂、银龙下之线，向杨公山、坪头坑一带推进。翌日，薛部以炮兵轰击杨公山—松山脑及下坑口两侧红军阵地，继以步兵冲锋攻占杨公山—松山脑之线。14日，又继续以主力攻击白毛山和走马岸以西地带。连日向古龙冈推进。

△　伪满吉林省公署在吉林召开吉林、敦化、延吉、珲春四大区“东南防卫地区治安维持会”，讨论“治安工作”之实施及确定方针，

16日结束。

△　平、津国立校院教职员联合会为要求发给积欠教育费与薪金，推派代表杨立奎等四人离平南下，14日至南京向教育部请愿，16日又向行政院请愿。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接见，答应转达汪精卫，并与财、教两部洽商解决。

△　河北省长垣县石头庄九股路大堤黄河决口。至15日止，黄河之豫北滑县、鲁西濮阳县等处决口连续发生，滑县60余村被淹。15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令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查明经办人员从严惩处。

8月13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装扮成湘军，以主力进抵田庄圩、暖水圩，以一部进迫汝城，进攻万年桥，击溃湖南保安第十八团胡凤璋部，进入黄草坪。胡部及代理湖南全省保安司令兼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奉何键之命追击，次日入滁口，一部至青要圩。

△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进入连江县白浪与中共闽东特委会合。其前锋于14日午夜攻占罗源后，在赤溪与闽东游击队会师，共同歼灭浙江保安团一营，民团百余人；15日晚，以一部进攻宁德城。连日在罗源、连江建立了四个苏维埃政府。15日，伍诚仁第四十九师由琯头向连江、罗源急进追击。16日，红军撤出连江、罗源，进入宁德县梦龙。

△　月初，传闻苏联将拒绝出售中东路与日本，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于3日发表谈话，指责苏方无诚意，日苏形势又告紧张。是日深夜，哈尔滨伪方出动军警将中东路东段苏方人员17人逮捕，均指为间谍。日军并于该段实行戒严，以便占夺。

△　财政部重申禁止外国银币如墨洋、日洋等入口，饬令各海关厉行监督。

△　中央宪兵第四团在福州西门外枪杀共产党员陈祥容等九人。

△　南昌2000余工人向国民党市党部及政府机关请愿，要求平抑米价。

8月14日　北路军第三路军恐红军堡垒阵地日臻强固，为急速进攻驿前计，将其第三、第十两纵队改为梯次配备，取狭小正面交互前进。是日，以右翼纵队第七十九师向刘季尖佯攻，以第六十七师在炮、空掩护下由贯桥向大岭格，对驿前作试探性进攻。彭德怀红三军团等以猛烈火力歼其两个团，11时后，第六十七师败退原阵。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进抵汝城后，何键急赴南岳与陈济棠商订共同防堵办法，之后急返衡州召开紧急会议。是日，决定派刘建绪为第四路军前敌总指挥，以第四路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任追击先锋，由永新开赴汝城、郴州；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部由莲花随王部跟进，第六十二师师长陶广部由茶陵向汝城侧击，湖南保安第五区副司令欧冠率三个团另一个营赶赴汝城，湖南保安第五区司令段珩率一个旅扼守彭公庙、青圩、渡头司、滁口、文明司。

△　刘湘应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之请，下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翌日，令唐式遵将放弃青龙观阵地的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旅长）汪铸龙撤职，解省究办。

△　东北人民革命军周保中部在团子山伏击日伪军，击毁汽车三辆，毙敌近百人。

△　伪满奉天教育厅没收各书店中小学教科书及月刊杂志等一万余册，在南关风雨台焚毁。

8月15日　国民党中政会发出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通知。规定大会议题为：召集国民大会，修改党纲总章，推进党务，确定施政方针等案。其代表仍以去岁临时全代会所选代表出席，不再另选。因通告

发出前即遭到胡汉民等的反对，南京方面派王宠惠去粤、港访胡等，向其进行解释。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进至资兴、汝城间之牛口垄一带，第四路军第十五、十六师两部尾追，红军经滁口北入东江掉头南进，寻小路越过湘军桂东、汝城间等二道防线。次日红军抵达郴州叉路口，17日入王仙岭、走马岭向桂阳前进。

△　新红十军方志敏一部由广丰县洋口至上饶应家口，渡河向均界岭推进，以策应红军抗日先遣队。

△　宋庆龄在上海函复上海《日日新闻》报。谓“上海日日新闻狂悖煽动之函件本不足齿，惟为对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一文，是否本人列名一节，祛除疑惑计”，兹特声明：“余不但列名宣言”，“且对诸同志之观点亦予以完全赞同”。中国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因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上海、热河、察哈尔等地接连的侵略我国。至于《日日新闻》所谓欲维持远东和平之虚伪宣言，“吾人绝不为所愚”。表示将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的志士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斗争。

△　广东省参议会成立，次日举林国伯任正议长，彭卓任、霍广河为副议长，议员38人。

△　实业部农商银行复业，资本300万元，有发行钞票之权。总管理处设上海，以陈公博兼董事长，梅哲之任总经理。同日，上海、汉口分行同时开业。

△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创办《武装自卫》期刊，为该会机关报。

8月16日　黄郛在牯岭与蒋介石商谈华北外交问题，随后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如何打开华北局面一层，以事殊为复杂，非三言

两语可尽。”“国人如能认清国内状况，熟察国际形势，体谅当局困难，和衷共济，同心协力，或可奠国家于稳定局面。”

△　行政院第一七三次会议决议，暂准设置新疆哈密区行政长，辖哈密、镇西两县。盛世才于是年夏派罗逸甫随同苏联顾问前往接防哈密，被原哈密首领尧乐博士拒绝。盛被迫改派尧乐为哈密警备司令，另派刘应麟（前孚远县县长）任哈密行政长，报请行政院批准。

△　山东《鲁南日报》在临沂创刊，主办人陶国强。

8月17日　　国民政府令免赵志游杭州市长职，遗缺由周象贤继任。

△　伍诚仁师由罗源至宁德，寻淮洲抗日先遣队在梦龙截击其后续部。激战后，红军北入霍童。

△　蓟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发表谈话，谓“现在浪人大概以蓟县、遵化为最多，日、鲜浪人在战区开烟馆，售海洛英白面者，约在3000处以上，因此，取缔浪人可视为肃清烟毒的初步工作”。

△　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胪举中东路东段从4月到7月发生要件13起，均由苏联人员所策划，以证明其日前逮捕苏联人员之正当。翌日，苏联塔斯社就出售中东路交涉经过发表声明：谓自13日交涉破裂后，日本与伪满即开展反苏运动，将经过实情大加粉饰，从而用以打击苏联。同时，伪满在日方指使下连续逮捕苏联员工，故意制造严重局势，并向英、美示意日本将在远东抵制苏联，争取英、美共同反苏，以达到逼迫苏联交出中东路的目的。

8月18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经保和圩、华塘铺西渡耒水至桂阳附近。南昌行营除令西路军派部追击外，并电两广部队于宜章、全州地带堵截。次日，红军绕桂阳入新田，在敖田圩分三路，一向土地塘，一进古楼市，一部入流渡峰与四洲寨之大富园一带。何键

调集湘西及衡阳防军分头开赴常宁、祁阳、零陵等处防堵。南路军陈济棠决定派独立第三师师长李汉魂为指挥，前往仁化布防，以陈伯英团守乐昌，吴以起团驻仁化，何麟瑞团布南雄。并令余汉谋派独立第二旅陈章部至上犹、崇义，李振球和张达师防守信丰江、赣江。

△　国民政府任命德穆楚克栋鲁普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8月19日　黔军廖怀忠、蒋在珍与李成章发生内讧，廖部等由印江袭击江口，移驻松桃。是日，红三军贺龙部乘机分兵三路进占印江、思南。李成章率兵两团在印江县砂子坡、松树滩、郎溪沟进袭红军。21日，李部张立功团在板溪与红军作战。

△　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抵津上任，原任参谋长菊池门24日由塘沽乘轮回国。

8月20日　南满反日总会在盘石正式成立。盘东、盘西、盘北及伊通等地反日会、反日妇女会等代表十余人出席。总会选出杨靖宇等九人为委员，修订通过反日斗争纲领，其要旨为：联合一般反日民众，对日、“满”实行联盟抵抗，拒绝一切日、“满”法令；武装民众进行反日民族革命战争，收复东北失地；支援和领导工农兵及学生群众进行一切政治经济斗争。南满反日总会在共产党员杨靖宇领导下，统一开展南满各地抗日游击战争。

△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攻占穆洋。23日，伍诚仁师追至，红军凭河抵抗后撤往福安北部，进入南溪、查南溪，在穆墙镇歼敌一部。蒋鼎文令伍师及新十师陈齐煊部尾追，并电浙江保安团堵截。

△　阎锡山、于学忠和韩复榘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粤、桂当局：“当此内外严重之秋，各方亟宜未雨绸缪，速图应付大计。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扫除障碍，发挥团结精神。”呼吁粤、桂与蒋联合一致反共。

△　湖北各地灾民千余人至武昌向省府请愿，要求救济。

△　天津《中国新报》创刊，资本10万元，社长陈小龄，9月1日起，在北平发行北平版。开办至10月即亏赔2.5万元，于10月28日自动宣告停业。

△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创刊，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辑、出版，每10日出版一期。

8月中旬　内蒙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派陈绍武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要求拨发蒙政会经费、武器、电台等物资。陈绍武按德王之意向蒋报告，称："伪满南警备军司令官巴达玛拉布坦、西警备军司令官乌古廷偕同日本高级军官一名，曾前来该盟王府，声言日军不久将西侵袭击察东，希德王即速表明态度，予以一切实力帮助"，问蒋如何对待。蒋要德王"以不亢不卑态度，相机办理"，并准拨给经费及枪械、电台等物。

8月21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进至零陵县白水岭、铲子坪、分水坳、白泥坳、菱角塘等地，准备渡越湘江。湘军王东原等部抵达新田附近紧追。

△　新红十军方志敏一部进入皖南歙县、休宁、祁门地区，浙江保安处派兵一营入歙县，由安徽保安大队驻防休宁，分别星夜开往屯溪等地进攻。

△　日外务省公布中东路交涉停顿经过，指责苏联"以随时发生之现状之纷议为理由，思欲迟延交涉，故交涉遂未见解决"。次日，日本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指责苏联违反国际信义。伪满亦就中东路交涉停顿事发表声明。翌日，伪满哈尔滨警察局出动军警，诬指中东路苏职员为间谍，又逮捕职员15人。23日，苏联对日再次提出抗议。至25日止，苏联人员先后被捕者达40人。

8月22日　桂军李宗仁委派陈恩元为入湘“剿匪”总指挥，率第十九师周祖晃和第二十四师覃联芳由兴安赶往黄沙河堵截萧克红军长征先遣队。

△　南路军余汉谋进攻信丰、会昌要地狮子寨。红军与之激战三小时，退守会昌。

8月23日　第四路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等部由新田向北追击红军。是日，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由白水岭、铲子坪进入零陵东北。分兵三路：以一部北向耒阳抵御王东原、彭位仁及陶广等师的追击；以一部趋临武、蓝山阻击粤军；而以另一部佯攻零陵，集大队在蔡家埠、略江口抢渡湘江。蒋介石急令何键堵截。何键得令急命长沙警备司令胡达调部至宝庆，令王东原师由郴州赶往耒阳，命陈光中、彭位仁和李觉各师集结衡阳、郴州，围困红军于湘南；李宗仁电促周祖晃等两师向湘桂边移动。

△　刘湘以反共军事失败，通电辞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其所遗各职暂交参谋长郭昌明等代行，即日离蓉赴渝。同时，前方军事委员长刘从云亦辞职。

△　鄂豫皖徐海东红二十五军由安徽六安县南岳庙西进破塘埂、郝集一带。24日，第十一路军刘茂恩部追至郝集，与红军激战六小时。

△　福建省政府根据南昌行营颁定之建造碉堡封锁苏区办法，由政府、绅商、军警合组“省会防务委员会”，加强其联甲巡防、清查户口、编查保甲、实行夜间戒严等措施。

8月24日　江、浙、闽、皖、鄂、豫、赣等省党部联电中央，拥护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望如期举行。

△　湘、鄂、赣、皖各省灾民，成千至南京乞食。次日，南京市

政府电请各省当局予以制止。

△　国民政府以今年各省水旱灾严重，通令各省、市赶办积谷。

8月25日　何键集结兵力九个团设置重围，阻击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渡越湘江。是日，红军由桐子坪、庙门口至黄柏洞，在冷水铺与王东原师张谷中旅遭遇。次日，红军突破第四路军重围至阳明山石家硐、白果市，第十六师副师长郭持平率部向白果市推进，王东原师以主力袭击石家硐，派其一部于新田、永安、平田之线防堵。何命段珩、晏国涛为湘江左岸守备司令，派钟光仁旅守耒阳，黄新团驻守冷水铺，唐肃团驻守高亭。

△　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在牯岭开会。会议通过：一、关于巩固对外信用利用外资；二、利用贱价电气原动力；三、提倡化学工业；四、筹办汽车制造厂以便军用交通；五、推广边疆教育以巩固边疆等议案。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胡适、吴俊陞、翁文灏、陶孟和等联名在会上提出以实验方法修正中小学教育制度之建议。该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参谋本部，本年4月起改隶军事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

△　北路军周浑元纵队向中央红军进攻，占兴国县老营盘。

△　致祭达赖专使黄慕松抵拉萨，受到西藏僧、俗官民的欢迎。翌日，黄入布达拉宫谒见热振呼图克图等，商议择日致祭达赖典礼，并商谈有关西藏建设问题。

8月26日　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部击破吉林拉林县之背荫河，攻入傅家油坊、二道林子及大盘道等地。

△　奉天日人举行集会，反对撤销治外法权及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反对伪满在附属地内课税。

8月27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率领南京政府各院、

各部等机关代表，参加山东曲阜祭孔大典。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陪祭。同日，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联合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大会”，汪精卫、居正、戴季陶、朱培德、陈公博等各界千余人出席。汪精卫报告纪念孔子诞辰之意义，戴季陶演讲《国民文化复兴的开始》。北平、上海、广州、南昌、安庆等地亦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

△　驻日公使蒋作宾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就日本无理大批驱逐秋田县、山形县及广岛县等地华侨问题提出交涉。

8月28日　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由广昌进驻良田，代理陈诚部署进攻驿前：以第十纵队（缺第八十九师）为左翼队，向洛寨、豹子山中间地区攻击，以洛寨为目标；以第五纵队之第十一、六十七两师为中央队，以豹子山为主攻目标；以第三纵队第七十九师附第六师之第十八旅为右翼队，主攻大岭格；以第五纵队第十四师置贯桥东南为总预备队，总计兵力六七个师。红军彭德怀、杨尚昆第三军团及彭绍辉、萧华少共国际师固守驿前北部豹子山、洛寨、南岭、大岭格及刘季尖等阵地。是日，罗卓英、樊崧甫、汤恩伯三个纵队在飞机20余架及卜福斯炮的配合下发动进攻，占领第一线阵地豹子山、洛寨及刘季尖东南牛屎台、南岭脑、金鸡寨。红军退守牛角山、大排岭、钟子寨、仙人嵊及驿前东北高地组织反击。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于阳明山突围，东出祁阳县白果市，绕过王东原师跳出包围圈，击溃第十六师，折经新田南进。次日，红军化整为零走荒山小径，一部经宁远向嘉禾、蓝山、临武；一部往道县，直奔江华、永明。王东原师向嘉禾追击。第十六师经桃林铺向临武，唐季侯团守单位铺至道县之线，桂军周祖晃师两团前锋抵永州，推进道县。

△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由闽东革命根据地入浙省，歼灭浙江保安队两队，进占浙江庆元县，刘和鼎部于松溪、政和紧急

设防。30日，红军挺进竹口、小梅、源尾乡一带，在竹口与浙江保安队蒋志英部作战，溃其一团，蒋志英受伤。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在东线击破唐式遵等部防线后，主力乘胜转战西线，以余天云、李先念红三十军直指巴中。是日，红军与川军第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部大战巴中东部右垭口，歼李部四个团。李、罗部仓惶退向清江渡。同日，王宏坤、周纯全红四军猛攻通江县银顶包，川军第四路军杨森部一触即溃，红军进占银顶包及通江县城。

△　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李绵纶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　印尼各地中华商会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召开代表大会，出席代表40人，25个地区，30日结束。大会通过成立中华商联会，决议重要提案数十件，力谋华侨经济力之发展。

8月29日　北路军陈诚部续攻驿前。汤恩伯纵队攻驿前东北高地，罗卓英纵队从中路正面进攻驿前，樊松甫纵队由右向驿前西侧南岭脑阵地攻击。上午，樊部第六师翁旅攻占南岭脑西侧高地，下午2时，红军组织兵力反攻南岭脑，并坚守刘季尖阵地，奋力进行阵地拼杀，但在飞机的猛烈轰炸扫射下伤亡惨重，刘季尖、黄土门、沙湾等阵地又失，乃退守驿前及其南部高地。

△　陈济棠、李宗仁联名致电何键，要求严令所部衔尾追击红军，由粤、桂与湘增调空军联合进攻，并表示已令桂东边防军往全县、灌阳驻防。

△　南满盘石江北抗日联合军，联合东胜、海龙等义勇军，达成共同武装抗日协议，计划于9月9日进袭盘石县城。

△　黄河河套永济、丰济、长济三大干渠溃决。

8月30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由嘉禾城附近折而西进宁

远下灌，进至水打铺，湘军继续尾追。次日，红军经四眼桥向道县城进军。

△　徐海东、吴焕先红二十五军经安徽六安之南岳庙进抵破塘埂、郝集一带，与第十一路刘恩茂部发生激战。

△　于学忠解散河北保安委员会，新组保安署，自任署长，管辖战区保安事务。

8月31日　北路军陈诚部第一、三、五各纵队续攻驿前，由中央纵队第十一、六十七两师和右翼队第六师翁旅等任主攻，以一部佯攻驿前东南古楼峰，在卜福斯山炮配合下，以其主力猛攻驿前圩、石子台。至午，陈部分别攻占驿前西南石马山、驿前市街及东南部古楼峰，其第六十七师占领驿前。红军退守小松市，在驿前南部钟子寨、中华台、罗家峰、分山坳一带加强防御工事，守卫石城。

△　中东路南线在抗日义勇军频繁袭击下，是日被迫宣布停开夜车。

8月下旬　蒋介石委派郭持平为西路军总部参谋长，升章亮基为第十六师师长。

△　中华基督教总会由沪迁平。

△　伪满实业部调查东北各省工厂，计纺织业1035家，金属业104家，机械业16家，窑业105家，化工业417家，食品业311家，杂品234家，总计2222家。资本总额2317万余元。

△　《东北消息汇刊》在上海出版，由上海东北通讯社主编，专门报道日本统治下东北状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每四个月出版一期。

△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本月建成，中央天文研究所由鼓楼迁入紫

金山。

是月　　据伪满黑龙江第三军管区司令部调查，8月份义勇军在齐齐哈尔、安达、泰来、克山、拜泉、黑河等区活跃异常，总数达3320人，较7月份增加2060人，约增三倍。

△　上年11月，教育部决定影印《四库全书》，计划分四期出版。是月，在沪将第一期59种426册出版。

△　广西《梧州日报》创刊，主办人任敏。

△　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发行。

9月

9月1日　　在朱德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红一军团及周建屏第二十四师等部夜袭温坊，罗炳辉红九军团与之配合。从钟屋村、曹坊迂回敌背攻占温坊，歼灭李玉堂师许旅近2000人。

△　刘建绪命令王东原师跟踪红军长征先遣队；令章亮基师出道县往全州、兴安堵截；派段珩部及补充第一、二团进驻零陵、东安；以胡达旅布防新宁；令补充总队主任何平率两团赶至宝庆待命；以保安团分段负责祁阳至东安间湘江防务；派钟光仁旅于宜章、郴州“清剿”。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于道县州背、九井渡、下茶园一带抢渡沱水，进至午田桥、新车渡、水堰头及达村地带，湘军第十五、十六两师分由蓝山及临（武）桂（阳）大道紧紧尾追。翌日，红军在永安关与桂军周祖晃、湘军章亮基两部激战，击溃章部，破坏了湘桂军三师（另一师为覃联芳）的堵截计划，经高明桥、沙田、庄村、寿佛圩分向广西全州、灌阳，一部向黄沙河。

△　新红十军方志敏部以游击袭敌，支援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是日由祁门、浮梁边界攻入祁门县城，守军保安队溃逃。第一路军第四十三旅五营闻讯赶至，红军撤出祁门。4日，红军一部攻入太湖县城，于次日退出。

△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组设战时工作研究委员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此时各地参加人数达十万余人。其后因种种原因，使原订9月18日正式成立总会之计划未能实现。其后仍以筹备会名义活动。

△　河北迁安县福山寺村民于上月30日捕获土匪多人，内有日本浪人两名，当即送往县府究办。是日，日浪人前往福山寺寻衅，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村民被击毙一人，重伤四人，被焚毁房屋17间。迁安县长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一面呈报滦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陶尚铭派员于5日前往调查后，将该案移河北省府与日领交涉。日方反称此次有鲜人六人失踪，系被福山寺村民杀死。被称为“迁安事件”。

△　是日至3日，全国邮政会议在南京召开，朱家骅部长主席，汪精卫与会演说，出席会议者56人。会议提案147件，议决要案132件。此次会议系小规模内部集会，议案仅作当局施政参考。

△　全国邮务总工会、全国邮务职工总会执监委员朱学范、陆京士、史诒堂等，为反对邮政当局干涉该会会务，宣言全体总辞职。

△　交通部以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行政主权即行停顿，是日令撤销东北邮务总局。

△　日本驻朝鲜总督公布华人入朝法令，从严限制华侨入境。法令规定：凡入境华侨须纳保证金100日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自本日起实行，但由伪满地区入境者不在此例。事后，旅韩华侨总会等分别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向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呈明反对理由，并提出抗议。

△　北平考古学社成立，容庚、魏建功、徐中舒、刘节、唐曾等任理事。

△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在镇江成立，陈果夫兼院长。

△　山西省实行统制贸易，是日起限制外省及国外货物入省。规定凡晋省商贾出省购货，外省商入省输入货物，均需省府核准。

△　北平、太原、杭州、镇江、长沙、厦门等地新闻界分别举行首次“记者节”庆祝会。北平记者公会决议：一、电请南京当局保障记者安全，维护言论自由；二、通电全国同业一致于每年9月1日休假一日。

△　南京《京声日报》创刊。

△　上海《江南正报》复刊，该刊为日人所办之中文报。复刊词中鼓吹“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高唱“大亚细亚主义”，要求共同对付欧美。

9月2日　　红军彭德怀第三、董振堂第五两军团固守小松市护卫石城。陈诚部樊崧甫、罗卓英、汤恩伯三纵队齐攻小松市。红军主动出击古楼峰，樊部等被迫暂停进攻小松市，集结主力构筑碉堡与公路待机再攻。

△　西路军刘建绪电令胡达率部开赴黄沙河，协同桂军截击红军长征先遣队；着胡建谋团开往东安归胡达指挥；命晏国涛以何、谭两团布防渌埠头（含）至石期站（含）沿河左岸之线，并分兵守备东安。

△　伍诚仁师及浙江保安二支队，分由宁德、浦城攻击庆元。是日晚，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退出庆元，转入龙泉县八都、小梅镇及松溪县源尾乡，主力在闽北苏区古楼休整。翌日，伍师进占庆元。刘和鼎派兵两团前往松溪、政和。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一部分兵追向清江渡，在铁匾山击破川军第三路军罗泽洲部。翌日，李家钰部经白杨河、杀牛坪、清江渡败退巴中，红军进逼仪陇城。

△　蒋介石致电刘湘，盼即行照常视事。7日，刘湘复电表示愿以私人资格留川，将驰赴五路前线视察整理军事。10日，刘离渝前往川东部署军事，13日经万县至开江，轮流召五路军各将领训话，并部署军事。

△　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学上课，9日补行开学典礼，27日结业。

△　日军在喜峰口外筑成飞机场，加强其长城线之军事设施。

9月3日　　第八纵队第九十六师由黄土坳分向蓝田圩、墩丘进攻红军，并由第九十八师攻击墩丘西北高地作策应，续向兴国推进。当天，第九十六师攻占蓝田圩、墩丘西北高地，红军曹德清第六师及陈树香第三十四师以主力于午时反攻，另一部迂回敌阵之陈岭栋为策应，反攻未成。翌日，第九十六和第九十八师续向红军进攻，经六小时激战，红军退守蓝田圩。

△　李延年纵队以第九师攻温坊，以李玉堂师任朋口至温坊侧面警戒，以刘戡师充预备队，共同向朋口及其东部推进。林彪、罗炳辉红一、九军团潜伏温坊南北，以一部猛攻李部西北，溃李部七个团，全歼两个团。李延年部溃退洋屋尾。

△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由小梅、八都折往福建浦城忠信街；一部往政和、松溪附近，途经闽北苏区。主力于浦城北部二十都休整二日后入鱼梁。伍诚仁部由八都尾追。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准备由全州、界首、兴安等地渡河西进，大队入羊角山、莲花塘一带。是日，白崇禧命令桂林区民团

指挥陈恩元部驰赴兴安，派第七军廖磊率覃联芳师增援桂林，命周祖晃师尾追红军长征先遣队。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王宏坤第四军一部猛追川军第四路杨森部，占领澜草渡，进逼营山。杨部漏夜经元山场，溃往同观寨，沿途被红军歼灭约3000人。

△　蒋介石训令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及赣、闽、鄂、豫、皖五省政府从速推行反共特种教育计划，成立“赣闽鄂豫皖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及各级教育处，颁定《赣闽鄂豫皖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及《计划纲要》。该《计划纲要》规定，在各地遍设“中山民众学校”或识字班，贯彻蒋介石所谓“教养卫”为内容的反共教育。特种教育委员会由南昌行营代表二人，中英庚款理事会代表二人，五省教育厅长及其他反共教育分子组成。

△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凡宗教团体设立学校传习教义，概不得沿用学校名称，并不得仿照学校规则编制课程。

△　辽宁东边道义勇军千余人袭击吉奉铁路烟筒山车站附近，砍断电杆，断绝交通及通讯。次日，义勇军围攻烟筒山镇，击败日伪警备队。日军由盘石赶派装甲车出援，义勇军始退。

△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月刊复刊。该刊前在一二八事变后停刊。

9月4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在兴安北部界首、咸水附近抢渡湘江，一举击溃湘军八个多团，顺利过江，进抵羊角山、莲花塘地区，当夜前锋入西延。随后，何键命令李觉率第十九师段旅二团、补充总队何平、成铁侠部四个团及胡达旅衔尾紧追，并督率新编第五十四师及湖南保安第二、三、四、六各团协同追击。李觉得令后，即率参谋长黄素符等驰赴宝庆督战。同时，刘建绪亦令第十五师暂驻道县防止红军倒回，又派第十六师协同桂军向全州推进；以晏国

涛率兵两团赶赴新宁、城步，胡达旅及袁建谋团从黄沙河赶往新宁、梅溪口，阻红军入湘西。

△　蒋介石急电何键西路军，令其严守湘省防线，构筑赣西南及湘粤边各纵横碉堡封锁线，并令由西、南两路互组参谋团勘查督筑。又令各纵队暂勿急进，以谋巩固防地，严密封锁。

△　川军第二路军田颂尧得悉第五、六两路军大溃败，遂与邓锡侯约定共同转移阵地，退守巴河，巩固南江。是日，田部前敌指挥刘汉雄下达转移令。6日，巴中告急，刘令所部全线退却，企图固守南江河。

△　苏联与伪满在黑河签订《满洲帝国航政局与苏联国立阿木尔船舶局间之航路状态改善协定》，凡10条。规定共同设立技术委员会处理双方共同事业，双方在边界河道共同设置并维护航行标志，双方共同遵守所定航务规定等。

△　杨杰考察欧洲英、法、德、意、比、苏等20国后回到上海。翌日，杨入京向汪精卫报告。

△　横滨华侨被日本政府驱逐后，是日第一批华侨50余人乘日轮“笠置丸”回国抵沪。翌日齐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市政府请求救济，并陈述日本暴行。

△　河南农工银行因总经理李汉珍前往彰德等地视察行务，被人误传其辞职离去，遂发生挤兑风潮，波及洛阳、陕州、信阳等分行。嗣由洛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出面维持，风潮始息。

△　厦门《华侨日报》因揭露日本移民及浪人设置赌场、毒窟，危害社会的罪恶行径，是日被浪人投弹一枚，炸伤职员数人。

△　交通部派该部技正吴保丰为代表，第一次出席是日至16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之国际电话技术咨询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按：今年7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电话技术咨询委员会。

9月5日　　日人宫越予三郎为日军采办军需，于当日晚途经河北玉田县范家坞，被民团疑为土匪开枪打死。翌日，唐山日军数十名前往范家坞示威，派兵一排进行搜索；驻津日领派山村、山原等向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交涉。事后，河北省政府及蓟密区公署共同派马兰峪办事处主任殷体新前往调查，并紧急下令严拿凶手。事称“宫越事件”。

△　川军邓锡侯与田颂尧约定退守巴河后，是日下午，邓部卢济清、杨栖轩、龚渭清、黄绍猷、周世英、黄时英等旅及第七旅副旅长钟开泽指挥的后续部四个团纷纷退向南江。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王树声第三十一军兼程追击。

△　据日人沈阳《盛京时报》刊载：本年义勇军活动异于往年，“多共产性质”，其特征为：一、出没于铁道沿路，多持优秀武器，共产党色彩浓厚；二、吉林省内地方，主要阻碍鸦片之收获；三、地域上以吉林国境方面为最。全“满”总数有4.5万人，较去年减少3.5万人。

△　《新潮杂志》在上海创刊，主编季小波，新潮杂志社出版。

9月6日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破坏江浦公路，进入浦城、崇安地带，在浦城地区之党溪、忠信街与伍诚仁部激战后，北入浦属小富岭一带。8日，红军返回浙江，开往江山县南部。

△　天津日领事馆声称迁安六名鲜人失踪，系被华人虐杀，乃派该馆书记生影内等由津前往滦州调查，8日返津，未能提出任何“被华人虐杀”的证据。

△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胁迫群众在吉林延吉组成所谓“协助会”。该会以朝鲜族为主，在“间岛”一带活动，是一以打击共产党为目标的

反共组织，在日本宪兵队和日本守备队指导下进行活动。该组织还组成有义勇军自卫团和协助义勇团等武装团体。

9月7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进占西延（资源）县。次日，进入苗族山区车田、五排、蓬洞地带。中共中央军委训令萧克红六军团前进湘西，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钳制敌人。翌日，湘军胡达旅由湖南资水推进大埠头、舍铺坪防堵。9日，红军一部在湖南城步县贺家寨、横水界、城江渡与湖南保安第二团谭有晋部作战，当晚经城步西之舟口西进。

△　陈济棠、李宗仁电请王家烈派队往黔东天柱一带堵截红军。次日，王家烈派黎平驻军开入三江、龙胜进行准备。

△　日武官柴山通知殷同，日方已派定伪满“邮务司长”藤原保明、“电政科长”代谷胜三、“奉天邮务管理局长”生岛俊天三人为通邮委员，以藤原为主席委员，与中方进行通邮谈判。并说明上述三日人虽在“满洲国”任有职务，均作为关东军嘱托代表出席，要求中方速定人选及初次会商日期。同日，黄郛接殷同电告，即电交通部长朱家骅，选派代表，并提出初步会谈原则四项：一、固持不承认伪国主义；二、参酌国联关于通邮之决议及各会员国对于此项决议之实施方法；三、不讨论通邮范围外之通讯事项；四、不用成文规定。

△　伪满协和会奉天事务局，由日人冈田任总指挥，组织“东边宣传班”，分三班由东丰、柳河、通化各地出发，前往东边各县宣传日本“王道”，指导调查户口、搜缴武器及镇压抗日武装组织。

9月8日　　北路军顾祝同部署进攻红军兵力及其推进计划：一、第三路军陈诚、罗卓英以樊崧甫、罗卓英（兼）、汤恩伯三个纵队，于15日完成白色、驿前间公路，16日起占驿前石城大道两侧，交互筑堡推进，22日前完成驿前、小松市间碉楼与公路，28日前完成小松市、长乐间碉堡与公路，第一步占小松市，第二步占长乐，第三步占

李塔石、西华山，于本月底占领石城；二、第六路军薛岳以吴奇伟纵队和第六纵队第九十二、九十三两师及惠支队等，于9日前完成渡溪、雄口间碉楼及公路，11日起由雄口经雄下、胡家虾、牛婆虾筑堡推进，约10月初占古龙岗；以周浑元纵队辖六个师，限9日前完成七斗以西公路，15日前完成七斗、老营盘、黄土坳公路，16日起筑堡推进，20日前占高兴圩，24日前完成高兴圩、蒙山墩碉楼，进占蒙山墩，28日前完成蒙山墩、文陂间碉楼，占文陂，30日前攻占兴国。

△　胡汉民、陈济棠等21人自广州以齐电致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否定国民党中央颁布的“五全大会议案”。指出“这种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针，故不适于救亡之需要”。胡等自提议案四项，要求列入大会议题，以决议实行：一、整饬政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案；二、严惩一切淆乱社会，危害党国祸首案；三、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生存案；四、确立最低限度生产建设计划，取消破坏本国工商业及国民生计发展之媚外关税税则，并整理财政救济农村案。

△　朱家骅复电黄郛，告知拟派邮政总局主任秘书高宗武、山西邮务长余翔麟、天津副邮务长曹鉴廷三人为通邮谈判代表，以高宗武为主席。说明“目前上海邮政员工纠纷”，要求会谈日期“能缓二三星期更佳”。

△　国民政府令免王仲廉陆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提升王任该师师长。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为统一全国军事训练，并提高军事教官才干，特在冀、皖、湘、鄂等八省成立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是日，派定第一批军训教官52人分赴各地。

△　财政部训令上海银行公会限制标金外汇买卖，取缔投机，规定上海金业交易所以现金割交，不得再用外汇结帐，一律以现金结

价。次日，上海银行界和金业经纪人极为恐慌。10日，金业交易所停市，召开理事会商议对策。同时银行界及经纪人亦开紧急会议，推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为代表，请求财政部展期至12月，财政部未准。

9月9日　　周浑元纵队奉命续攻蓝田圩，以第九十八师由墩丘东南进攻蓝田圩东北高地。红军陈树香第三十四师抵御，至午后4时退入蓝田圩，第九十八师占蓝田圩东北高地。后于11日又复攻占吴背东南红军阵地，从东北、西北两方直指蓝田圩。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王树声第三十一军进攻川军田颂尧部南江河后方，预备队李炜如部闻风由恩阳河撤逃仪陇，田部刘汉雄之十余团在南江河被红军包围。

△　南京《商业日报》创刊。日出两大张，为市商界人士创办，内容注重金融与经济消息。

△　重庆《商务日报》因刊载撤换刘湘部属李圭如、张华封、杨国桢三旅长之消息，刘湘以“捏造事实、动摇军心”为词，令警备司令部派手枪连前往查封，并逮捕总编辑尹静夫。翌日，刘湘训令各报于每日夜8时将有关军事新闻送审，否则严惩。

9月10日　　粤汉路北、中、南三段局长殷德洋、凌鸿勋、李仙根及铁道部代表夏光宇等在武昌举行第一届联席会议，决定设立粤汉路总局等案，夏等并向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重提建筑武汉长江铁桥事，要求协助。13日闭幕。

△　国联第十五届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郭泰祺等三人出席。国联行政院主席、捷克外长贝奈斯致开会词称：中日间局势、“满洲国”问题、日苏之紧张，三者均属非常严重之事实，国联会议实不容坐视。

△　日本陆军省召开首脑会议，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在会上主

张增兵东北，并提出请商定对苏之对策。

△　英、美、法、德、苏等国驻沈阳领事馆分别发出通告，以日伪无力维持地方治安，劝告欧美侨民切勿前往郊外闲游，以免绑架。

△　马兰峪办事处主任殷体新与日人山村、山原等会同调查“宫越事件”，查明确系被误杀。但日方仍不甘休，12日又由驻津日领唐山分领馆书记生山本顺三郎率日巡捕多人，前往玉田会同河北省保安队十余名于范家坞、林头村再次调查。

9月上旬　伪满成立奉天“和亲会”，以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于芷山为会长，日人满良等为干事，进行所谓“日满军官亲善”。

△　月初，陈济棠担心蒋介石一旦攻占苏区，将同他争夺赣南，从而危及自身在广东的统治，曾秘密派人向红军递交一份停战声明。随后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谈判，至红军长征突围前夕始止。

9月11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至毛田、大圳岩。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在城步县贺家寨观音阁与湘军补充总队成铁侠部谭团及何平部发生两次战斗。

△　月初，蒋介石电令薛岳速向古龙岗推进，配合第三路向驿前，第八纵队向兴国。是日，薛岳以梁华盛、欧震和唐云山三师之众进攻雄岭下，上午8时攻占之。红军孙超群、李于辉第二十三师集中兵力在雄岭洞、小松凹与梁部发生激战，梁部被击溃。17日，梁、唐两师协同进攻雄岭下北部高地，攻占中洲，进展缓慢。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余天云、李先念第三十军占领巴中。川军田颂尧部曾起戎旅，奉命由巴中县草帽山、两河口之线前往接防巴中。进至阴灵山，得知巴中、恩阳河已为红军所占，乃取道长池、木门向旺苍坝撤退，途中又与胡开莹旅会合。翌日，曾、胡两部在黄木垭为红军第三十军及第九十三师大队包围，经一昼夜激战，被歼1.4

万余人。

△　日使有吉明偕参赞有野谒汪精卫，要求在修改引水问题时，需事前征询日方意见。

△　财政部规定是日起，外汇行市及标金行市改以中央银行挂牌之英国伦敦金块价为新标准，国际汇兑标价由汇丰银行转为中央银行挂牌。

△　蒋介石电令上海市党部及政府，严禁工人罢工、怠工。并规定各厂工人除童工外，每日工作以10小时为标准。

9月12日　南昌行营下令何键西路军和黔军分别追堵红军长征先遣队，令何键督饬李觉率其第十九师及保安团、补充团等由城步向绥宁推进；西路军第十五、十六两师协同桂军第十五军由榨油坪向西尾追；王家烈派黔军于通道、黎平一带防堵。同日午后，李觉部及湖南保安旅由城步入绥宁，黔军周芳仁旅进至靖县，桂军第十五军和西路军第十五、十六两师分路向大寨及孟公坳追击，计划对红军进行围攻。翌日，红军避其主力，绕道绥宁以北进入绥宁、靖县中间地带寨牙，伏主力于绥宁北部山区。三路围攻计划落空。

△　日使馆武官柴山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就“迁安事件”及“宫越事件”提出口头抗议。声称“若不迅速以诚意解决”，“则中日两国间恐又将惹起重大之纠纷”，“绝不可以调查名目，而迁延解决日期”。

△　天津鲜侨召开“华北朝鲜人代表会议”，天津日领事馆派员参加，决定组织临时委员会，就迁安朝鲜人事件采取措施：一、组织华北鲜人联合会；二、对福山寺全村华人处刑；三、搜查“被杀者”六人尸体；四、追悼及慰问遗族；五、取缔“暴民”，保护鲜侨。14日，驻津日代总领事田中向河北省府提出交涉，要求赔偿每人抚恤费2000元并惩办凶手，担保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上主张实行日苏直接交涉，用以打开日苏中东路买卖谈判僵局。翌日，苏方派出塞列布利可夫任中东路要职以示响应。23日，伪满外交大臣大桥忠一（日人）应广田之召回国进行中东路第三次售路谈判的准备。

9月13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九一八国难三周年纪念办法》：9月18日全国停止宴会娱乐，各地分别集会纪念，上午11时停止工作五分钟，起立默念誓雪国耻，对抗日死难将士及殉难同胞致哀。是日，国民政府训令直属各机关并转饬所属遵照。

△　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在伪满“中央民政部”通令下，是日举行“秋丁祀孔”典礼。并召开尊孔讲演大会，宣传孔孟之道和日本“王道”。

9月14日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由浙、赣、闽交界地二十八都、仙霞岭、石人殿进至江山县清胡镇及贺村，与浙江保安团激战后，冲破浙赣铁路攻入常山城，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率保安二团尾追，红军急由东门出城。翌日，王耀武旅李团由广丰向常山堵截（是月王部由临川开赴上饶，受赵观涛指挥，任追击任务）。16日，红军越十里山绕常山城，在常山城郊与王部李团接战数小时，再次攻入常山城。

△　郭泰祺在第十五届国联大会演说，强调今日中国东北局势已成世界之危机，中国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并吁请国联制裁日本侵略，终止军事占领。

△　外交部就日本8月10日在横滨无理驱逐华侨事件，于是日及24日两度提出正式抗议。29日，日外务省正式复文，完全饰词置辩，抹煞事实。

△　日本政府冈田内阁会议决定，将日本驻满机构改为“二位一体制”，即废除关东长官，在关东州设置敕任级知事；关东军司令官兼

任驻满大使；关于外交事务，在外务大臣的命令监督下，设事务机构参事官；赋予驻满大使以行政监督权，但需受内阁总理大臣监督。同时，在内阁设对满事务局，其总裁由陆军大臣兼任，由有关各省的局长参加事务局的会议。将原有之“四头政治”统一于关东军。

△　日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公然派飞机在张家口上空散发所谓“警告”的传单。内称：一、中日协定所定昌平、延庆之延长线（即龙关、张北以东地区），如有中国军队进入，那是明犯协定的行为；二、近来宋哲元军擅入该线以东区域内，毫不顾到协定的精神，望该军速撤回昌平、延庆、龙关、张北以西之线；三、如不撤退，日满军必取断然措置，以维持协定，不但要攻击该军，且要炸毁张垣（张家口）；四、由此发生事端，全由宋军负责。16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殷同向日武官柴山提出质问，柴山答允致电劝阻，松室孝良才未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前北京政府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省长王占元病死于天津。

9月15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前锋红军第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各一部，在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进至贵州沿河县，在铅厂坝与红三军贺龙部会合。翌日，贺龙率红三军主力由水田坝出发，前往迎接红军长征先遣队大队。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木门一带山区，围攻川军曾南甫部。经过四小时激战，全歼该部两个旅，毙旅长二人，团长四人，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6000余支。

△　国民政府命令由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直接指挥豫鄂皖边区军事，撤销原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准免刘镇华总司令兼职。

△　河北省政府就日本驻津领事田中对“迁安事件”所提条件，表示允予斟酌办理。但日军及日鲜浪人仍于18日至19日前往迁安示威。

△　日军在张家口设武官室，派松井中佐任武官。

△　上海《西北问题季刊》创刊，主编郭维屏，为西北问题研究会之会刊，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9月16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由通道纽冲附近转入湘黔边牙屯堡、双江口、独坳坡向贵州前进。何键电令李觉迅率全部或大部部队绕道雍洞、怀沅、三流至黔边，觅红军主力截击，勿使之向西北；令胡达率所部并指挥谢明强团于18日入广平，由广平、运口至锦屏截击。翌日，何键派员赴黔与黔方接洽湘军入黔事宜。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何畏、詹才芳第九军一部再进仪陇县兴隆场、观紫场、三教寺地带，川军罗泽洲部从仪陇溃退。是日午，红军进占仪陇城。

△　上海《译文》月刊创刊，主编人黄源，内容专刊翻译作品和论文，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供稿人有黎烈文、茅盾等。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9月17日　鄂豫皖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在安徽霍山西部青台关东南方纸棚池地区，与第十一路军裴昌会师激战三小时。之后，红军接中共中央指示，火速率部进入鄂东转向西北进军。

△　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汇报红军突围的部署：“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攻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表示：“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王树声第三十一军（缺第九十三师）经贵民关攻占南江城。川军邓锡侯部经三江坝败退旺苍坝。

△　国联选举行政院非常任理事，中国落选，失去原任非常任理事席位。

9月18日　全国举行“九一八”国难三周年纪念。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会，陈立夫演讲，勉国人万勿自弃。南京各界千余人纪念，大会通电全国抵制仇货，提倡国货，誓死复仇雪耻，收复失地。全国各地举行纪念，停止娱乐，同申哀悼。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渡渠水，在某山口全歼李觉部手枪营；一部至湘边新厂山歼灭何平部追兵，一部抵贵州老锦屏与黔军周芳仁旅接战，又一部进至平茶、潭溪。李觉和廖磊督率大队湘、桂军继续尾追。次日，红军大队入平茶，向黎平推进。黔军周芳仁旅以其主力向黎平集中，周芳仁于马场坪指挥。

△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由常山北入开化县东南部芳村，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命俞济时调兵入皖，分派教导团等经富阳入遂安补充当地团警兵力。次日，红军至白马、衍昌地带，击溃遂安县保安队。其后绕道越过天官山，进至遂安大小坞，向安徽石门、屯溪，遭空军连日轰炸，陈调元部由屯溪派队赶往龙游、遂安布防。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沈海路附近关门山成立，并组设南满抗日联合军临时总司令部。杨靖宇任军长兼总司令，直辖教导团，以李红光任第一师师长，曹国安任第二师师长。人民革命军分别活动于临江、金川、濛江、抚松等地带。

△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该部包括依兰、密山、饶河、勃利等部反日游击队。主要活动于松花江沿岸及临江地区20余县。

△　国民政府任命陈琪为陆军第八十师师长。

△　朝鲜革命军总司令梁瑞凤，在桓仁县小荒沟被日军通化守备

队诱杀。

△　天津日总领事馆领事田中接江田大尉赴迁安调查报告，是日在津与日军司令部参谋浅口、日使馆武官柴山商讨对此事件的交涉步骤。当晚，柴山返平访殷汝耕，表示愿以私人资格折衷解决。双方商定由中国方面赔偿朝鲜人每一家属慰藉费2000元。26日，由河北省政府派秘书陈东升将全部赔偿费送交日方，事件遂告了结。

9月19日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王树声、张广才第三十一军（缺第九十三师）攻占三江坝、旺苍坝，歼灭川军第一路军邓锡侯部周世英、陈泽两旅各一部。邓部经元坝子败往广元、昭化县境。

△　黄郛由南京乘机返回北平，下午在外交大楼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对战区问题决本既定方针着手整理。

△　日军百余人会同伪军李守信等5000余，在飞机四架配合下进攻热河省大黑山。义勇军刘振东部奋勇抵御，击毙日伪军40余人。

△　江南通讯社在安庆创立，主办人王笑秋。

△　香港永安银行开幕，资本定港币1000万元，国内入股500万元。郭乐为总监督。

9月20日　蒋介石电促川军刘湘等各路对红军组织反攻。电中申斥各路“望风奔逃”，“争相推诿卸责”，不战而败。“今事势至此，自不应再持怨天尤人之故态”。要求“即日督励所部，一致反攻”，“否则中央唯有一律依法相绳”。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由平茶入黎平，前锋在中土桥与黔军毕骏团接战，一部在潭溪同周芳仁旅战斗；湘军何平、成铁侠两部紧追。红军后卫撤出新厂，然后回师击溃何平部追兵两团，斩断了湘军的尾追。

△　是日夜，方志敏新红十军一部，在江西婺源县太白以东新村黄坑分渡婺河，与陈调元部发生战斗。

△　长江下游治江委员会在镇江成立，聘英人米禄司为名誉顾问，推周尚书、萧开瀛、陈保初为常务委员。讨论治江计划、经费等项问题。

9月中旬　　西南政务会议决议，准夏威升第十五军军长，夏奉命在桂林设军部，指挥所部阻截红军长征先遣队。

△　伪满设立“南满工业会”，由奉天、安东、鞍山、抚顺、本溪湖、长春等地200余工业团体与日本工业俱乐部、朝鲜工业会等联合组成。

△　上海《太白》半月刊创刊。主编陈望道，编辑艾寒松、郑振铎、朱自清、黎烈文、徐懋庸、郁达夫、叶绍钧、曹聚仁、傅东华、徐调孚等。该刊提倡小品文，称为专登简明文字的语言艺术杂志。生活书店发行。

△　《漫画生活月刊》在上海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出版，由丰子恺、徐悲鸿等作画，茅盾、巴金等撰文。

9月**21**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红军第二十一和二十三两师合编成第八军团，以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

△　土地委员会公告将实行二五减租，并函托地政学院进行调查，以推行其土地政策。是日，在南京举办土地委员会专区调查员讲习会，培训工作人员。

△　国民政府任命马衡为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日，立法院通过《修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草案》，凡18条，10月2日公布，于理事会外，增设监事会。

△　王揖唐秘密至沪，访晤日本朝鲜银行总裁加藤敬之郎，商谈复活汇业银行问题。

9月22日　周浑元纵队以萧致平师任主攻，万耀煌师为辅攻，进攻蓝田圩。红军陈树香第三十四师及陈光、刘亚楼第二师顽强抵抗。经过激战，周部萧师攻占蓝田圩、象形山、新田之线。次日，红军一部由长汀增援，反击未成。

△　薛岳部进攻雄下岭红军，以韩汉英师为中央队攻占雄下岭东侧。翌日以右翼队唐云山师攻占雄下岭西南，左翼队欧震师攻占外寮，并筑堡续向古龙冈推进。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一部，由平茶经新寨、鱼山西进；一部在锦屏以北于瑶光、南嘉堡之南加山渡清水河。王家烈率部四个团开往黔东，其王团由天柱开瓦寨；李觉督率胡达等部八个团抵锦屏，分两路尾追；桂军廖部由湖南靖县入黔。分途堵截红军。

△　赵观涛、蒋志英下令江山、常山、开化、衢县、遂安等地驻军于晨起对红军发起围攻。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是日夜由遂安地区西进，越黄坛岭、藩洪岭冲出铜山口。翌日进至茅坪、云林及鲁村休整。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乘胜向嘉陵江追击，川军田颂尧等弃守苍溪、阆中，余天云、李先念红三十军、九十三师等部占领苍溪，何畏、詹才芳红九军一部占领阆中。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之嘉陵江东岸均为红军所占，取得了反川军六路围攻的胜利。

△　刘湘离开江返回重庆，行前布置前方军事，将其所部基干编成三个纵队，以王缵绪为第一纵队司令兼第五路军副总指挥，巩固南江防线；许绍宗为第二纵队司令，反攻恩阳河；范绍增为第三纵队司令仍兼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张本初为右翼指挥，负责驻守顶山场、坦溪。又调川南、川东35县民团集结下川东，由王缵绪负责指挥，并下

令对徐向前红四方面军进行反击。又命唐式遵部越嘉陵江进驻二道河；以李家钰和杨森部向双龙场、天马场推进；派范绍增部分三路进攻凤凰山、东岳庙。计划于24日开始反攻。

△ 日本与法国共同组设对满事业公司正式成立。

9月23日 外交部通过驻美公使施肇基就白银问题照会美国政府。指出因美国实施白银购买法，以致银价高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若银价再行高涨，则中国将受极大之损害。希望美国政府不取可使中国白银再有流出之行动，并与中国合作，依照伦敦白银协议之原意，阻止银价高涨而维持平衡。

△ 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赵尚志率领下一举攻克哈东重镇五常堡。

9月24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越过清水河，北入锦屏、剑河间孟有、王村、王桥及大小广地带；一部北攻瓦寨、三穗。湘军成铁侠、桂军覃联芳夹击红军，在大小广、孟有、王村展开激战。红军突围，转入王桥高山。次日，红军折向南入八卦河，至剑河元斗午。湘军第五十五旅与桂军周师追抵八卦河，与红军激战。

△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在鲁村等地北入鲍家村一带。在鲍家村附近伏击王耀武部及浙江保安第三团，激战后对峙于宏山岗。翌日，红军越大连岭入安徽屯溪。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向蒋介石表示，决率所部第十一路军六个团堵击。蒋即分令驻皖赣浙边区各部统归刘指挥。刘奉命后在屯溪设行署指挥“围剿”。

△ 行政院指令外交部于2月下旬筹设中国驻苏新西北利亚总领事馆。7月11日，外交部令派李芳为总领事并负责筹办。是日该总领事馆正式成立。

△ 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者159人，

28日闭幕。10月1日，召开第一次监、理事会，举蒋介石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会长，史量才、刘鸿生为副会长，王一亭、闻兰亭、林康侯、杜月笙、王晓籁为常务理事，钱新之、黄墨之、陆伯鸿为常务监事。

△　安钦呼图克图册封典礼在南京举行，由林森授予安钦多杰“全将普静法师”名号。

△　中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在郑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会为陇海路总务处副处长黄学周发起，各省出席会议代表70余人，大会主席黎锦熙。大会宣言主张实行罗马拼音字母，改革汉字，以普及文化教育，普及国语，统一国语，26日闭幕。

9月25日　　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下达进攻小松市红军之命令：于26日以主力向陈古岭以西发动攻击，尔后迂回陈古岭逐次攻占小松市；第三纵队于26日由钟子寨以北进攻钟子寨，占领后以主力左旋进入钟子寨东南，掩护第十纵队右侧并适时策应；第十纵队于26日分两路攻取中华山及其西侧，占领后以主力左旋，侧击并攻占黄泥寨；第六师以一部向陈古岭及其东部佯攻，集结主力于虎形山附近，配合第十纵队相机进占陈古岭；以第十四师于驿前、南岭脑一带为预备队；卜福斯山炮营进入陈古岭以北安子塘阵地，于26日向中华山、黄泥寨及钟子寨、陈古岭等地射击；航空从于26日飞临驿前上空助战，掩护各部攻击。

△　蒋鼎文下令进攻长汀，命第四纵队攻占温坊以南红军主阵后攻长汀；令第三师李玉堂（欠第八旅）及第十师李默庵之一部完成温坊南北碉堡，交由李玉堂师守备；命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由新泉集结朋口；第九师李延年部和李默庵部，由洋屋推进至朋口附近；定26日拂晓以弧形阵式围攻，由李延年师攻温坊以西，并以李默庵和宋希濂两部集温坊附近与李延年部阵地衔接；27日主攻白衣洋岭；并以卜炮营和飞机协同作战。

△　胡汉民、陈济棠等齐电发出后，国民党中央未予理睬。是日，胡等29人再发有（25日）电质问国民党中央，并提出二事要求采纳。即：一、履行本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之政纲；二、履行本党民主集权制度，“予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评之完全自由”。

9月26日　红军彭德怀、杨尚昆第三军团及彭绍辉、萧华第十五师踞守中华山、黄泥寨、钟子寨、陈古岭和仙人嵊，以保卫石城，罗卓英、汤恩伯、樊崧甫等三个纵队向小松市发动进攻。罗卓英进驻驿前指挥，由汤恩伯部分两路进攻中华山、小排岭，以樊崧甫纵队进攻钟子寨，并以周磊师协同孙元良师攻击黄泥寨、陈古岭。次日，汤、樊两纵队续攻大排岭、牛角山和源远寨。红军利用堡垒顽强反击，两天战斗歼其千人，但红军牺牲亦大。汤部占中华山、黄泥寨、大小排岭及牛角山。

△　李延年师在炮空协助下向温坊西部红军发动进攻，进占大头坑岭、白石脑、龙胸岭等地。次日，改以宋希濂师为主力进攻白衣洋岭东南，李延年师一部于白石脑附近助攻，李默庵师一部佯攻金华山。红军罗炳辉、何长工第九军团周建屏第二十四师集中2000余人向宋部左翼猛烈出击，突破其阵线，宋希濂被击伤。28日，又改以李默庵师接替主攻。红军在李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下，牺牲甚大，乃退至中屋村。李部等进占上古楼岭、白衣洋岭、猪鬃岭阵地。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入剑河巴野、梁上、元斗五。湘、桂军由大小广围攻剑河窝之元斗五；桂军廖磊部王、张两团向八封河尾追。

△　国民政府令准免卢兴邦陆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派郑天锡为“首都”承审员临时考试典试委员长。

△　汪精卫（兼外长）与意大利驻华公使鲍斯卡里交换正式文

件，确定中意两国公使馆互升为大使馆。28日，中意双方分别在南京、罗马同时宣布：中方由原驻意公使刘文岛升任大使，意方由原驻华公使鲍斯卡里升任大使。

△　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常会，讨论统一水利机关及开发西北等案。29日，公布该组织条例，决定以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孔祥榕、李仪祉为常委，陈果夫、黄绍竑、王正廷、朱家骅等十余人为委员。

△　日建成奉天、长春间铁路复线，是日通车。

△　上海《世界知识》半月刊创刊，主编毕云程，生活书店发行。为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知识性刊物。聘请戈公振、艾寒松、胡愈之、沈志远、周宪文、金仲华等为特约撰稿人。

9月27日　贵州犹国才通电，谓已电各军决与王家烈合作反共。10月1日，犹由兴义县黄洲坝启程入省，与王面商防务。

△　浙赣铁路联合公司与玉萍铁路借款银团商订借款合同签字，共借款1600万元。

9月28日　薛岳部续分三路进攻红军，以唐云山师为中路攻禾岗嵊，以韩汉英师任左翼攻大排嶂，以梁华盛部任右翼攻大平山。是日，薛部分别攻占大湖、大排障、禾岗嵊、石井坑及大平山，红军周昆第二十二师、黄甦第二十一师、孙超群、李于辉第二十三师等退古龙岗以北天子嵊、镇寇塔及胡家虾以东，并扼守古龙岗门户天子嵊。

△　第六十七师傅仲芳部在卜福斯山炮配合下向红军进攻，占领桐岗。翌日赶筑桐岗附近堡垒，向小松市推进。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避湘桂军主力，潜入岭松、施洞口，向黄平推进。次日，李觉由达顺洞、塘洞之线调兵一部往三穗、镇远，谭联芳部尾追，廖磊部推进瓦寨，分路包围红军。

△　红军贺龙部集全力由火烧场攻入木黄附近夕阳坝，欲与萧克红军长征先遣队主力会合。黔军李成章率五个团堵截，在印江县木旺与红军发生战斗，至夜后红军撤入平洞口、红石板。

△　川军各路军代表联袂抵渝，请求刘湘复职。是日，蒋介石再电刘湘，令即日遵命复职，刘湘暂时未允。

△　日方谈判通邮首席委员藤原与华方首席委员高宗武在北平殷同寓所正式会晤，藤原提出所谓“关于满华间通信办法之暂行协定”案，范围包括航空、电话、电报等项，俨然以伪满为“独立国”，为高宗武拒绝。日方以中方态度坚定，始同意两项原则：一、根据过去的事例与精神，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下，专谈通邮上的技术问题；二、双方完全以诚意为基础，不为成文之规定。

9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于是日发表。该社论发出了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突围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动员令。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一部由安徽屯溪南部隆坳，经石门、接竹营返回浙江开化县马金岭、左溪、十九都、九埠、大龙山一带。赵观涛、俞济时派兵堵击，在马金岭与红军发生战斗。

△　李延年、李默庵攻占中屋村西部高地。中央红军退集兴国。

△　日关东军代表藤原保明与中国代表高宗武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双方除正式谈判代表外，中方殷同、李择一，日方仪我、柴山均与会。就关于邮票、交换邮件、日戳、邮件种类等项进行激烈争论。日方要求使用伪满邮票，坚持由伪满直接交换邮件，中国方面表示反对意见。双方差距悬殊，谈判遂告暂停。

△　据天津《大公报》济南电，黄河在山东刘家屋子泛滥，改道经东南30里治涸沟（小清河海口20里）入海（按：原由利津县潭家屋子东北40里入海）。次日，故道水势猛涨，入徐州之北关、东关及附郭，沿岸均成泽国。

△　前北京政府安徽督军马联甲病死于安徽东流四区马坊村。

9月30日　红军林彪、聂荣臻第一军团及董振堂、李卓然第五军团踞守高兴圩。陈诚部赶筑蓝田圩公路堡垒推进，派周浑元纵队万耀煌师任主攻，以郭思演和肖致平师任侧击，在炮空协助下攻占狮子坳、竹篙山等高地。红军撤往高兴圩南部，周部万师攻占高兴圩，进逼兴国。

△　第六十七师傅仲芳部占领桐岗后，续向小松市推进，是日上午7时攻占小松市。红军彭德怀、杨尚昆第三军团及彭绍辉、萧华第十五师转入石城及其北部际脑、月光寨、鹅颈坳、石榴花寨、太平寨、丈夫嶂等阵地。第三路军宣告其第二期进攻石城之计划完成。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分别进入剑河北部山区瓮溪陇、黄坳一带。桂军覃联芳、湘军成铁侠两部紧紧尾追，胡达部至镇远防堵。

△　全国经济委员会公布《西北畜牧计划》。

9月下旬　中共南满特委派出巡视员前往盘石县委，传达组织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抗日联军由东北抗日救国人民革命政府领导；各军总司令、军长、政委由人民革命政府任命；坚持抗日反满，收复东北失地，拥护中华祖国，没收日寇及其走狗的财产，联合民众抗日救中国。

△　李宗仁决定在桂湘边筑三条碉堡线：一、自黄沙河迄桂林之边界线；二、自黄沙河文市迄富贺重要市镇线；三、沿湘桂江西岸

线。另于附近湘、黔各要点，筑设重层碉堡林，调第十五军夏威部于10月下旬进驻全州、灌阳、恭城之线。

是月　《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九号《一月来之中国》一栏指出：最近日本欲吞东蒙之野心勃勃，“派日本僧人四人由东京出发赴百灵庙，以研究黄教为名，拟晋谒德王作初步之联络工作，并向德王建议内蒙可派喇嘛四人至六人留学日本，所有学费川资概由日人担任，现内蒙在热河省辖之昭乌达盟八部十一旗，卓索图盟二部五旗已为日人所占领，察哈尔省辖之锡林郭勒盟五部十旗，察哈尔部八旗，达里冈崖牧场及绥远省辖之乌兰察布盟四部六旗，伊克昭盟一部四旗，土默特部一旗久为日人所垂涎”。近日人侧重经济政策，其初步之步骤，以宗教为联络工具，将来再以商业之联络，逐步西进。

△　盛世才吸收各族首领组设“新疆民众联合会”，以协助省政府在各地推行其政策，调解民族纠纷，于各地区、县设分会。

△　新疆省银行成立。资本官股900万元，商股580万元，以苏上达任行长（后为徐伯达）。于迪化设总行，伊犁、塔城、绥来、奇台、哈密、吐鲁蕃、乌苏、阿山、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等地设分行。

△　拉萨电台建成，电力100瓦特，开始与康定、甘孜两台直接通报。

△　广西《桂林日报》创刊，主办人李景周。

△　《地理学报》季刊在南京创刊，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南京钟山书局发行。创刊号首篇有竺可桢著《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对中国气候作出新解释。

10月

10月1日　中央红军李聚奎第一、陈光第二、陈伯钧第十三等师由石城县属竹篙山、殷富、松山圩反攻高兴圩谢溥福师，万耀煌和唐云山两师分由高兴圩、老圩附近增援。红军反攻未成，松山圩及其东部高地失守。

△　李觉、廖磊在镇远开会，决定湘、桂两军直入石阡防堵红军萧克、王震长征先遣队返回，派胡达旅为前卫，李觉、廖磊率部相继跟进。同日，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由雍谷陇、螃蟹、黄坳、施洞口向西北猛攻施秉、黄平大道。王家烈往黄平督战，急调龙质彬、江荣华两团迎击，并令王天锡率李维亚、刘鹤鸣两团从施秉配合。红军与黔军激战一昼夜后，攻占地主武装盘据的黄平城。次日，红军续进老黄平（旧州）。

△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宣布，决定从是日起实行所谓“统治言论之合理化政策”。规定“凡在××（地名）印行之日报、晚报、小报、通讯社稿及增刊、特刊、号外等，均须于发行前将全部新闻，一次或分次送新闻检查所检查”。是日起，平、津及各地报刊遵令执行。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行径，激起全国新闻界的强烈反对，平、津、沪等地各报，纷纷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

△　盘石日本宪兵队与领事馆警察组成48人的敢死马队，由盘石出发前往东北人民革命军所在地三明砬、大安屯及草庙子地区“围剿”。

△　黄慕松在拉萨举行达赖十三世致祭典礼，并代表国民政府追封达赖十三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

△　江苏省政府为导淮入海及减轻江北水患，在淮阴设立导淮入海工程处。3日，通告泗阳、淮阴等12县予以协助。

△　江苏崇明富安纱厂开幕，资本额50万元，拥有纱锭1.08万枚。

△　上海《世界文学》月刊创刊，主编伍蠡甫、孙寒冰，上海黎明书局出版。

10月2日　　第三路军电令各部于3日开始向石城推进，进行其第三期作战计划：以第十纵队附卜福斯山炮营集结桐岗、小松市间，向际脑、石榴花寨高地攻击前进，占领后三日内完成小松市、际脑地区碉堡封锁线；着第十四师推进江东坳一带准备策应；由第七十九师推进小松市附近接替汤纵队及霍师所守碉堡。翌日，第八十八师进攻石榴花寨，9时许攻占石榴花寨、升平寨及聂岗，续向鹅颈坳攻击。红军由石城增援固守石城北部门户，汤恩伯部集中火力猛袭鹅颈坳，红军阵地大部被夷为平地。11时前后，汤部占鹅颈坳、月光寨、火焰寨及际脑。石城北部门户洞开，红军曹德清第六师等部退石城。4日，第四师又占石城东北坝口，第八十八师占北部长乐。罗卓英令各师协力续攻石城。

△　铁道部聘夏光宇筹建武汉长江大桥，并定12月中旬在广州会同粤汉铁路南段各管理局开联席会议，商定进行办法及经费筹措。

△　伪满与日本议定邮政条约，内容规定：一、划一邮费；二、整顿伪满邮局；三、废止二重设施（即邮件之转递）；四、直接邮递包裹、小汇兑、普通汇兑及电信汇兑；五、废止“满铁”沿线与日“满”交换之邮局；六、邮票通用。

△　日本外务省命在吉林绥芬河设立领事馆，任命前通化分馆副领事兴津良郎任领事。

10月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全苏区人民联合起来，“最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以武装自卫扰乱和牵制敌人，以帮助和配合主力作战”。准备红军主力突围。

△　李延年部进攻连城西南白衣洋岭，猛袭南山坝第四线，罗炳

辉、何长工红九军团及周建屏第二十四师与之激战。翌日，李师由中屋村西部攻占南山坝，红军退守河田，顾祝同、蒋鼎文于龙岩督攻长汀。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大部入瓮安县梭洞、猴场和老坟嘴，一部至余庆。黔军王天锡部追抵老黄平。次日，红军在孙家、袁家、箐口各渡口抢渡乌江未成。5日，红军沿乌江入龙溪、河坝场，折回余庆。

△　寻淮洲、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进至开化之十九都、上桥庄，与浙江保安团队发生战斗。翌日，由左溪、枫岭过白沙关、石人殿，入德兴县重溪。新红十军方志敏等由德兴至重溪与寻淮洲等会晤，根据中共中革军委命令商议两军合组红十军团问题。会晤后，方率红二十、二十一两师，寻率红二十九师，先后分别由德兴、重溪向皖浙赣边区进发。

△　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幹呈请辞职。翌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将司法行政部改属司法院。4日，该部次长郑天锡、石志泉同时呈请辞职。17日，中政会决定以居正兼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任次长。2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第九届远东热带国际医学会在南京开幕，到会代表澳大利亚、印度、中国、越南、檀香山、香港、日本、澳门、马来亚、菲律宾、暹罗、海峡殖民地和美国等14个单位，共326人。孔祥熙、黄绍竑为大会正、副会长，聘伍连德、牛惠生、褚民谊等任名誉顾问。会议由卫生署长刘瑞恒代会长，宣读论文203篇，并对防止远东霍乱、鼠疫、疟疾等流行病作了重要决议。

10月4日　蒋介石偕杨永泰、晏道刚等由庐山出发，前往武汉、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等地视察。

△　通邮会谈在北平继续进行，日方声称接到训令，必须承认伪

满邮政厅，邮票须有“满洲邮政厅”字样，邮戳须用伪满现用者，入关普通邮件邮费只定三分等条件。中方表示另制表示邮资已付之印花，专为贴入关邮费之用；使用邮政封锁前所用之外文邮戳，并用公历，地名用长春，不得用“新京”；入关邮件照关内邮资；不直接交换邮件，而用第三者。彼此意见相距仍大，后决定中日各携对方条件请示后约期会商。高宗武向黄郛报告会谈经过，并电交通部请示行止。次日得朱家骅复电回京商酌。6日，高等返回南京。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规定除由当局拨款外，另由全国各校毕业生之证书附收捐税，大学及相等之学校毕业证书征一元，高中及相等之学校征四角，初中及相等之学校征二角，高小征一角，初小征五分。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通过撤销由军、政、党、警等机关所组织的新闻检查所，于次日另设一言论研究会。9日又通过设立出版物审查委员会。10日，西南政务委员会明令撤销新闻检查所。

△　江苏连云港工程竣工，是日举行处女靠船典礼，开始停泊轮船。

10月5日　林彪、聂荣臻红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红三军团开始撤出石城，集结平山、固原、长胜圩及黄石贯地区休整。

△　蒋介石乘“永绥”舰抵汉，召见有关军事将领，询问豫、鄂、皖边区“剿共”军事情况。翌日召集张学良等会商豫、鄂、皖三省边区反共军事。8日，蒋在武昌总部扩大纪念周上训话，强调“欲强，教民死；欲富，教民劳，何事不成”，直视人民为强化其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当晚又电令鄂、豫、皖、湘、赣、苏、浙、闽、陕、甘10省实行《民众应服工役办法》。

△　中山县警察以索饷为由发动兵变，围困县长唐绍仪和县卫兵处长林警魂，唐急电陈济棠派兵保护。翌日，陈济棠派罗策群团前往

中山。中山县党部、县参议会推举朱卓文任临时县长。

△　伪满举行祀孔大典，由孔学会筹备会会长郑孝胥主祭（周永谟代），并开讲演大会宣传孔孟之道。

10月6日　中共代表和陈济棠代表在江西寻邬会谈，数日后达成协议五项，即：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互相借道。其中借道一条规定，陈部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得事先告知陈所经过要点，并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这一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有利条件。

△　第十一师黄维部、第十四师霍揆彰部由李塔石进攻石城，林彪、彭德怀红一、三军团全部撤至长胜圩、瑞林寨和曲阳，黄、霍两部与第六师侦察队进占石城。翌日，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进驻石城，派第六师师长周碞为石城城防司令。

△　东路军李延年纵队占领河田，进逼长汀。

△　红三军贺龙、关向应部由秀山隘口再入黔东北之松桃。川军田冠五部往秀山，陈万仞师往龙潭分别防堵。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在北平举行第五次全体大会。到会委员17人，华北五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均出席，黄郛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一、设立战区整理委员会整理战区问题；二、设立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三、召开华北建设讨论会，商议华北建设；四、设立农村指导员训练所等案。

△　国民政府任命陈果夫兼江苏省保安司令，鲁涤平兼浙江省保安司令；刘峙兼河南省保安司令，张群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刘镇华兼安徽省保安司令，熊式辉兼江西省保安司令，陈仪兼福建省保安司令，何键兼湖南省保安司令。

10月7日　薛岳以欧震师为中路，以梁华盛师附炮兵三个连为右

翼，以韩汉英师附卜福斯野炮四门为左翼，以唐云山为预备队，向红军周昆第二十二、黄甦第二十一、孙超群、李于辉第二十三等师阵地天子嵊、镇寇塔、胡家虾发动三路进攻。是日，薛部在空军大炮掩护下攻占天子嵊、镇寇塔和青山，红军分入青塘山、古龙冈。次日，薛部赶筑风车坳至禾岗嵊间碉堡封锁线，准备夺取古龙冈。

△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陆续命令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红军主力防务。是日起，红军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先后奉命向兴国、雩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西征。

△　蒋介石指示杨虎城等“川陕鄂会剿”，决定派陕军分三路入广元、南江、城口援川。并派上官云相由河南率兵两师进入川东奉节、万县等地带。

△　日关东军广濑师团以大队飞机配合，向东满、南满、哈东、吉东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赵尚志、谢文东、吴义成等部发动第二期大“扫荡”。命斋藤部入安东，安井和三部迂回滨江，吉本部攻密山，田村部围依兰，在辑安、濛江、长白、临江等地区发动大规模进剿。下旬，人民革命军避开敌军，迂回转战，伺机游击日伪军。

△　边事研究会在南京成立，举朱霁青、冷融、白云梯、赵正廉、唐柯三等为常务理事，诚允、周馥昌、彭丰根等15人为理事，周涂等七人为监事。并通过边事研究会总章，决定于12月1日创刊《边事研究》月刊。

10月8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由乌溪返回走马坪等地，在甘溪大地方与桂军周祖晃部接战，李觉部追往走马坪、廖家屯，红军损失甚大。翌日，红军入营盘山，在路濑突破廖磊部重围，经白垛、大庆北进石阡。

△　薛岳部各师在风车坳—天子嵊—卢坑—禾岗嵊之线筑成碉楼

24座。次日，唐云山、梁华盛两师在欧震师及炮兵队掩护下，沿风车坳—古龙岗线逐步向南伸延筑堡。唐师在古龙岗附近与红军发生激战。

△　罗炳辉、何长工红九军团撤出长汀西移。次日长汀苏维埃各机关迁往瑞金。

△　蒋介石为通邮事致电黄郛称："邮票及邮戳均有争持之必要，否则不承认伪组织即等于空言，现正磋商者为交换局及邮资问题，似不妨稍示让步，以为票戳之交换。"11日黄将此电内容转告汪精卫征询意见，要求汪与交通部长朱家骅详商后复。汪当日电复："弟等所见与蒋先生均同，邮票、邮戳实不能让步，已面告高宗武诸君。"

△　伪满与日本在热河省喀喇左、右沁旗等14蒙旗，发起成立"蒙旗产业会"。以吴恩和为理事长，以"日蒙实业公司"为代行实施机关，于奉天设本店，并于赤峰、北票设支店，喀喇沁、翁牛特、敖汉、祭曼等左右八旗设事务所。

△　河北大名长芦盐务税警前往该县赵古村强制平毁私盐田，当地盐民反对，遂起冲突，税警开枪击毙18人，伤20余人，酿成血案。中旬，当局出面"调查"，竟认定警方为"正当防御"，仅允对死伤者抚恤了事。下旬，大名各界表示不受调处，派代表前往天津请愿，要求惩凶抚恤。长芦盐运使答允惩办肇事的副区长，并给伤亡者抚恤3000元，此案始结。

10月9日　蒋介石在张学良、刘峙等陪同下离开武汉北上，前往豫、陕、甘、宁各省视察。翌日，蒋等经郑州抵洛阳，主持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何应钦亦由平抵洛晤蒋。

△　寻淮洲、乐少华抗日先遣队由祁门查湾折回江西浮梁县流口、新桥，李松山第五十五师追至，与之发生战斗。翌日，红军一部至天目山东南鲍家村，在钧金山、送嫁岭与伍诚仁第四十九师发生激

战。嗣后，红军转入储田桥。

△　川军陈万仞得悉红三军贺龙部将至印江、松桃间追击黔军，并已占领沿河，遂命达风岗旅赶至沙子场。13日，达旅在沙子场与红军冉少清等部接战，红军主动撤退。

△　伪满奉天公署通令各县筹办各村连庄会，严密各村伪政权组织，以破坏抗日爱国组织及其活动。

△　英国“产业视察团”班毕一行至奉天。翌日抵长春，遍访伪满首脑，商洽向东北投资，公开发表对“满”经济投资声明。19日，转往日本。

△　国民政府任命陈公博兼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免去谭熙鸿兼所长职；准免彭位仁陆军第十六师师长职；派杨梦周为新疆省焉耆区行政长。

△　成都《明是日报》被警备司令部查封。

10月10日　　晚，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江西瑞金出发，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撤离中央苏区，向雩都集中，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后来被称之为红军长征的开始。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以项英为党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坚持中央苏区斗争。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划定瑞金、会昌、雩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带为基本游击区，率红军第二十四师、独立三团、第十一团、第七团及赣南军区杨（殷）、赣（州）军分区的红军，共兵力三四万人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成果。

△　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副总指挥吴奇伟分别指挥所部第九

十、九十二、九十三、五十九等师，在飞机、炮火配合下分左右两翼进攻古龙岗。红军周昆第八军团主力从古龙岗撤出，退往宁都准备突围西征。是日，薛岳部第五十九师进占古龙岗。

△　周浑元命令以第十三师万耀煌、第九十六师萧致平、九十九师郭思演等任第一线，以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一旅及第五师谢溥福为预备队，在炮、空掩护下进攻兴国。翌日，周浑元亲自指挥各师进攻，红军陈伯钧第十三师等部利用纵深堡垒及工事节节抵抗，周部进展困难，相持至14日，始进占兴国北部文陂、西部荷岭，12时许又占城北佛子山高地，继而跟踪追入兴国。红军由东南退出兴国，撤往龙岗头及宁都，万耀煌等部14日进占兴国。

△　中山模范县县长唐绍仪将中山县政务全部移交罗策群，由“执信”舰护送至广州。15日，唐由广州乘轮去香港。

△　日关东军为配合对抗日义勇军的军事进攻，特派出第三次“宣抚班”前往东边道各地，以第一班往临江、辑安、长白；第二班往兴京、桓仁、通化；第三班往西安、清源、东丰。29日返奉。

△　伪满于3日召开国务会议，通过将东北四省划成10省之决议。是日正式公布所谓《新省公署官制》，凡21条，规定除前旧兴安屯垦区改组为兴安省（分成东、西、南、北四分省）外，将东北划为奉天、安东、间岛、吉林、滨江、龙江、三江、黑河、锦州、热河10省，定12月1日起施行。

△　湘赣公路长沙至南昌线公路通车。

△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在沪开幕，由中国国际图书馆主办，参加陈列者有英、美、法、德、意等16国、66个图书馆，16日闭幕。11月1日又在北平展出，7日结束。为国内图书界的创举。

△　上海《申时电讯社》主编之《报学季刊》是日出版。内容包

括专著、讨论、调查、统计、史料，以及对中外新闻理论和技术的介绍。是研究中国新闻报刊史的重要资料。

△　北平文艺创作期刊《水星月刊》创刊，编辑人巴金、沈从文、郑振铎、李健吾、章靳以、卞之琳。

△　《中国农村》月刊在上海创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宗旨是“为全民族独立、全世界和平，而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撰稿人有孙晓村、薛暮桥、钱俊瑞等。

△　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创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该刊为国民党CC派所创办，鼓吹封建复古文化，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反动刊物。陈立夫在创刊号发表《中国文化建设论》一文。

10月上旬　汉奸戚文平在热河凌源、青龙地带组织伪“东亚同盟军”，声称将入滦东活动。

10月11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潜入石阡、余庆间马溪深山，次日再至走马坪、马伏堰，一部入紫金关往老木山。湘、桂军追抵大塘，黔军王天锡率两团追向石阡青梅拱，陈世道率一团向走马坪堵击，王家烈亲率一团于余庆策应。

△　第一次全国慈幼领袖会议在上海开幕，到会代表170余人，孔祥熙任大会主席，会议讨论通过请政府保障慈幼事业；重申严禁贩卖妇孺及蓄奴养婢；从速制定儿童法律；训练儿童卫生专门人才；拟请在上海设儿童医院；设立儿童感化所；健全组织育婴所；依法给童工以休息教养；救济灾区儿童及组织健全孤儿教养所等案。13日闭幕。

△　黄河又在河北长垣决口，鲁西寿张、范县等五县被淹。

△　上海中国兴业银行总行因经理秦抱元卷款潜逃，资金周转不灵发生倒闭。其附设之中国群益银团及六处分行同时停业。

10月12日　　陈诚由庐山返回部队，判断红军主力潜伏石城、宁都间堵击北路军，一部在长汀方面堵击东路军，即以第十纵队接替广昌至石城封锁线守备，以第三路军主力移至头陂、新安一带准备进攻宁都，再与东路军配合进袭瑞金。

△　蒋介石偕张学良抵达西安。15日在西安各界扩大纪念周上发表《陕游之感想与对于陕西之希望》的演说。17日飞兰州。

△　美国政府就白银问题致中国政府复文，略称美国政府购买白银计划系执行国会法令，在执行中将竭力注意中国政府之意见，尽量避免对中国经济及公共财政发生扰乱，并在将来之金银买卖时尽可举行友好之讨论，以达共同之利益。

△　立法院通过印花税法。15日，上海市商会电国民党中政会，指出该印花税法之课税，较现行率加重至50倍，商民万难负担，请予纠正。

10月13日　　林彪、彭德怀红一、三军团开始由长胜圩、瑞林寨、曲阳地区分途向雩都转移。

△　李宗鉴旅联络伍诚仁部，分入江西浮梁县新家源追击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红军在储田桥与第五十五师李松山部接战，随入浮梁、秋甫间的磻村、桃墅店、马郎口、观音阁和北坑一带，进至浮梁县北部鸦桥、源桥杓。翌日，李宗鉴部王团由新家源袭击鸦桥，红军伏于密林战斗数小时。随在源桥杓又发生激战。红军师长彭国魂在作战中英勇牺牲。

△　伪满军在日人藤井等指挥下，集中步、骑兵77个团，在大屯至南岭地带举行三天秋季大演习。是日，溥仪在长春检阅。是为伪满军第一次陆军大演习。

△　外交部于北平设立驻平特派员办事处，以程锡庚为特派员，

负责视察华北冀、晋、热、绥四省对日交涉事务。

△　上海五洲电讯社开始发稿，主办人魏青松。

10月14日　　南昌行营电令南路军陈济棠部于赣州、大庾、南雄，西路军何键部于汝城、郴州，分别赶筑碉堡封锁线；命东、北两路军续攻瑞金、会昌及雩都。北路军接令后，当即部署其作战计划：以第三路军向长汀、瑞金推进，由樊崧甫、罗卓英、刘绍先各纵队分经宁都、石城等地向长汀或瑞金进展，限一月内攻取瑞金；第六路军向雩都推进，由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由兴国附近经松富圩、黄冈向雩都筑堡推进，限三星期内攻取雩都，以求截断中央红军西进路线。

△　伪满奉天警务厅下令各县一律甄别警官，并一律于各县配置日人警官。经过所谓“整顿”，警政权完全落入日人之手。

△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关于白银问题的换文发表。国民政府表示不禁白银出口，改行征税。同日，财政部令关务署自是日起加征白银出口税，规定：一、银本位净征7.5%；二、大条银宝及其他银类加征7.75%，含原定2.25%，共10%。并规定如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兑之比价，与中央银行当日核定之汇价相差数，除缴上述出口税仍有不足时，应按不足之数加征平衡税。同时并令关务署转总税务司及各关税务司一体遵照办理。

10月15日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再渡乌江未成，折回新厂、塘头、板桥。红军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团分别在云台山、王家屯与湘军成铁侠等部作战后进入大麻石。次日，红军欲北进印江，又在板桥附近和贯口两地分别与湘军刘建文团、桂军廖磊部遭遇。红军旋入龙塘、甘溪、晏家湾，一部入龙津洞与李觉部接战，一部至川岩坝与湘军唐伯寅团等接战。

△　蒋介石委上官云相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军追剿队总指挥”，编为五个支队进攻鄂豫皖红军。

△　戴季陶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教育问题，以所谓“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为理由，反对中小学读白话文，主张读孔孟经书。声称“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学说均为充实”。

10月16日　　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长汀、宁化向雩都集中完毕。编为五个军团两个纵队：即由林彪、聂荣臻率领代号为“南宁”的红一军团（下辖三个师九个团）；由彭德怀、杨向昆率领代号为“福州”的红三军团（下辖三个师九个团）；由董振堂、李卓然率领代号为“长安”的红五军团（下辖两个师六个团）；由周昆、黄甦率领代号为“济南”的红八军团（下辖两个师六个团）；由罗炳辉、蔡树藩率领代号为“汉口”的红九军团（下辖两个师六个团）；以及叶剑英、罗迈、邓发率领的中革军委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代号分别为“红安”、“红章”；军委的代号为“红星”。总计8.6859万人。当日黄昏，从十个渡口分别渡过雩都河，向赣县、信丰、安远边界的王母渡、塘村地域集结开进。

△　立法院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凡12章178条。本年3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9月21日至10月13日，经立法院第三届会议二读修正通过第一至一百七十八条。是日，立法院第三届第七十四次会议举行宪草三读会议，逐条宣读完毕，表决赞成。宪草会议结束。

△　王宠惠由港返抵广州会见陈济棠等。翌日，晤英国路透社访员，称此次与广州诸领袖会谈，觉得广州与“中央”有接近之希望，至可满意。18日，王返港，19日北归。

10月17日　　冯玉祥由泰山至济南吊鲁西民团指挥谷良友之丧。事后冯发表谈话，表示不出席五全大会，无提案，最近决不离泰山。并谓“欲救济农村破产，非为贫苦大众设法不可”。

△　日军宣告对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二期“讨伐”结束。11月5日，日军撤回哈尔滨等地，11日在哈埠举行“阵亡将士追悼会”。“讨伐”以失败而告终。

△　江苏征仪县十二圩盐工要求保全帆运、废止私运及收回七公司北迁等成命，派代表到扬州向两淮盐运使请愿，被税警驱逐，是日即发动罢工。当晚两淮盐运使派税警前来镇压。17日，盐工代表赴镇江向省政府请愿，要求达到所提要求。18日，省府允再咨财政部就案核办，并集合各方研究善后救济，决定整个解决办法，代表始回。

10月18日　　通邮谈判代表高宗武、余翔麟由京返平，携带经核准之《通邮谈判大纲》七条及关于邮票办法六条作为谈判的依据。下午通邮会谈复会，高根据《通邮谈判大纲》说明中国政府对邮票、邮戳等问题的方针，系避免承认所谓“满洲国”之嫌疑，所以邮票问题应以第三者出面；邮戳不可有新京、奉天之地名，其他问题在邮票问题未决前不必再涉及。日方表示俟请示结果后另制邮票，但对“新京”之地名问题仍固执要求。会谈三小时，我方未予同意。

△　蒋介石训令各省军政机关，将各地反共军事史料汇编成册，上交南昌行营第一厅附设之“剿匪”战史编纂处，编写《剿匪战史》。

△　日在大连设置特务机关，派土肥原任特务机关长。翌日，土肥原由沈阳前往就任。12月1日解散该机关，改设奉天特务机关大连出张所。

△　唐绍仪在香港发出通电，略述中山县事变经过，谓因用人不当，过信蔽明，授权太重于林树巍，使其身兼四要职，手握全县军警，所部官兵悉易亲故，致太阿倒持，发生肘腋，表示引咎自劾，请政府派员查办，切实维持中山模范县法案。22日，唐正式辞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及中山模范县县长等职。

△　上海各交易所市场发生巨变，标金、纱花均狂涨。其中标金

较标准挂牌价抬高20余元，纱花远期花末盘一跳六角，涨风继续发展。

10月19日　蒋介石以皓电（19日）令东、北两路军，“着速抽队进取闽西、赣南未经收复各县，限于本月底一律占领”。

△　蒋介石在兰州甘肃省政府对党、政、军首领训话，要求厉行新生活运动。中午11时许乘机飞宁夏，翌日返西安。

△　国民政府任命李溶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免去刘文龙新疆省政府主席职。

△　林彪、聂荣臻红一军团渡贡水，经梅岭山脉向安远、信丰封锁线前进。次日在白石全歼信丰常备队两中队。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进占石阡江口大道及公鹅坳，抵达平寨、石耶司，湘军第十九师谢明强团追至平寨；唐伯寅团范营及黔军柏辉章师两个营衔尾紧追。22日，红军经小鸡公、平寨，于石阡、江口大道之公鹅坳突越湘军防线前往印江。红军在连日战斗中牺牲甚巨，约在2000人以上。红十八师在四方炉被湘军冲散，师长龙云潜入岑巩县，27日夜为该县民团所搜捕，随被押至镇远，解往贵阳。

△　刘湘于8日由渝至蓉，是日召集邓锡侯、田颂尧、李其相、杨森等20余人会议。会上刘湘说明辞职经过及今后办法，表示即发出复职通电，对军事方面重新规划，严申纪律，决心为“剿共”再次效力。次日复在总部续商军事。22日，电告蒋介石、汪精卫正式复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30日，刘由蓉飞渝，准备去南京谒蒋。

△　通邮会谈在北平续开。日方对邮票问题的态度转趋强硬，藤原谓彼方仅愿我方承认邮票上之邮政厅三字，否则何所谓通邮。用第三者出面在世界上并无先例，且难免周折。声言“似此情形，实不必再行继续谈判”。柴山、仪我均以强硬态度附和，谈判濒于破裂。

△　伪满奉天省公署通令各县筹办连庄会，以清查各地义勇军。

△　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组织的外汇平市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由贝淞荪、张佩绅、席德懋等任委员，24日正式办公。

△　苏州农民因愤恨当地乡镇保甲长在严重灾荒下谎报收成举行暴动。是日夜，首由苏州娄门外数百群众发动，拥至乡镇保甲长住处放火焚烧房屋。接着斜塘、郭巷、车场、湘城继起响应。数千群众在各地焚毁乡镇保甲长房屋100余间，历时达两天多。江苏省政府、吴江县、崑山县及苏州宪兵团共同出兵前往各处镇压，风潮始息。

△　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至北平检阅日军。

10月20日　　蒋介石在宁夏对各界演说《开发西北、建设宁夏》。指出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大家应同力合作，守成此重大的责任。要求各位同胞协助政府完成调查户口、清丈土地、开辟交通、振兴警卫四件事。末谓："当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关头，实行新生活，提倡'礼'、'义'、'廉'、'耻'，犹须在座的各位努力去做。"

△　蒋介石复电汪精卫，对"引用欧美资本，以开发新疆"，"原则上固极所赞同"。又以"恐遭苏俄之大忌"为由，指示须"尚祈审慎研究"。

△　陈济棠因中央红军进入广东仁化、乐昌，是日，急命第二纵队李扬敬部由东江入筠门、寻邬，派第一师黄任寰部驻梅县、蕉岭，以独立第二师张瑞贵部驻潮州，独立第四师邓龙光部驻惠州，巩固广东防务。翌日，余汉谋奉陈命赶至大庾指挥进攻红军。

△　日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接任，午后前往河北省政府拜会省主席于学忠。

△　蒙藏委员会举行第一八七次常会，决议呈请行政院：一、速

成立西康省政府；二、民众抗御藏兵损失予以抚恤；三、分派西康代表于各机关服务；四、达结寺勾结藏兵抢劫甘、宁，严令西藏如数赔偿；五、办理黄慕松专使条陈之西康教育、交通之意见。

△　青岛船坞建成，是日举行落成典礼。

10月21日　　中央红军各军团分别攻占赣州、信丰间之古陂、新田、韩坊、王母渡，进入第一道封锁线。粤军李振球师退集安息。

△　王家烈由余庆行营赴石阡，翌日与李觉、廖磊共同会商军事计划。决定湘、桂两军回兵堵截中央红军长征大队，由王家烈单独负责追击萧克红军长征先遣队和红三军贺龙部。24日，湘军胡达等部由石阡开拔回湘。

△　红三军贺龙部由乔家铺、大田坝南进天中井，欲在印江与萧克红军长征先遣队会合。黔军李成章部与红军遭遇。次日，红军一部进入路板铺、木黄。

△　通邮会谈续开，双方各持己案无法谈判，即决定改由殷同、李择一与仪我、柴山四人会商，另辟新途径。当夜，日方提出一份意存恫吓的备忘录，次日晨又主动撤回，并致歉意。

△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分别成立军事化研究组，成员蔡劲军、贺衷寒、黄光斗、萧赞育、袁守谦；生产化研究组，成员萧纯锦、龚学遂、文群、李毓九；艺术化研究组，成员程时煃、徐庆誉、张彝鼎、吕咸、罗君强、刘百川。

△　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在南京开会，决议：推孙科委员为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并呈请国民政府明令指定；推举杨子毅为中山县县长，并提请广东省政府任命。

△　上海艺术、教育两界发起的中华艺术教育社开成立会。该会以普及艺术教育知识，发扬民族文化，提倡实用艺术，推广生产教育

为主旨。推举马公愚、鄢克昌、傅伯良等11人为理事，丁念先、姜丹书等五人为监事，敦请蔡元培、李石曾、叶恭绰等为赞助人。

△　中国速记学会在上海成立，举许性初、薛光前、陈光东等九人为理事。会议通过会章，并讨论四项提案：一、举办中文速记讲习班；二、举办速记学术讲座；三、在经济的可能下出版刊物；四、汇集各式速记，编辑速记年鉴，交理事会讨论办理。

△　湖南长沙市《新闻夜报》创刊。

10月22日　　林彪、彭德怀红一、三军团在古陂、安息与李振球部接战，嗣经小河口、大塘铺入新城、小溪、池江、青龙和黄龙，与董振堂、罗炳辉红五、九军团会合。

△　国民政府任命沈觐鼎为驻巴拿马特令全权公使，免去张歆海驻捷克特命全权公使兼职。

10月23日　　中央红军以林彪、聂荣臻红一军团为右翼，彭德怀、杨尚昆红三军团任中路，董振堂、李卓然红五军团为左翼总攻安息。各部配合分别向信丰、安息、南康、新城及南雄进攻。全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信丰河。

△　陈诚以第六纵队为右翼，令其向秀岭隘、马迹隘推进；以第二纵队为左翼，令其由岩子岭袭击秀岭隘、马迹隘侧背；以第六十七师到达锡坊为预备队，共同进攻宁都，次日行动。

△　蒋介石偕杨永泰等自西安经洛阳抵开封，张学良已先一日由洛阳返汉。翌日，蒋等由开封经济南，下午飞抵北平。

△　蒋介石电请国民党中央将五全大会展期召开。2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四三次常会，决定：一、延期举行五全大会；二、定12月10日举行四届五中全会。

△　行政院驻平政整会决定撤销战区整理委员会，将其改组更名为战区清理委员会，呈行政院鉴核。是日，行政院会议通过，令平政整会予以设立，指定殷同、李择一、朱式勤、陶尚铭、殷汝耕、许同莘、岳开侁为委员，王弼侯为秘书。30日，平政整会公布《战区清理委员会组织大纲》，凡12条。

△　国民政府任命唐俊德为陆军第九十五师师长。

10月24日　　何键电令所部主力协同粤军扼守赣江上游西岸及湘东南各碉堡线。以罗森（第七十七师）、李生达（第七十二师附一旅）两部为赣江守备队，李生达为指挥官；以朱耀华（第十八师）、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两师为永（新）、遂（川）、万（安）大队守备队，李韫珩为指挥官；以陶广、陈光中两师及胡凤璋部为莲（花）、汝（城）、桂（东）守备队，陶广为指挥官；以王东原师附湖南保安二团为耒（阳）、安（仁）、茶（陵）守备队，王东原为指挥官；以章亮基师附机枪第二十连为衡（阳）、零（陵）、东（安）守备队，章亮基为指挥官；以段珩为湖南各县守备队指挥官。以上统归刘建绪指挥，以刘任总指挥官。又以岳森师附袁水等各县保安团、义勇队为袁水守备队，岳森为指挥官；以独立第三十七旅刘培绪部及第二十六师一部为修（水）、铜（鼓）、武（宁）、奉（新）守备队，刘培绪为指挥官；以湖南保安团第一、三、六等团及第十九师工兵营为平（江）、浏（阳）守备队，罗树甲为指挥官；以李云杰为总预备队指挥官，辖第二十三师及第十九师（欠段旅）驻守长（沙）、醴（陵）铁路线。以上统归刘膺古指挥，刘为总指挥官。何键集中其主力分别驻守赣江西岸及湘粤边与茶陵地带，防止红军折入井冈山。

△　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进入黔东后，是日贺龙、关向应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

△　通邮谈判在北平重开，日方再次提出备忘录，为高宗武等拒绝。高坚持邮票上除取消“满洲”字样外，尚须由第三者发行。几经交

换意见，未得结果。

10月25日　　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大庾岭，董振堂、周昆红五、八军团由王有至龙回、黄泥排和南康，林彪、罗炳辉红一、九军团经固原寨、马圳、禾秋入广东南雄、新田、乌径、邓坊与中站，一部抵青峰。次日在新田、中站之乌径与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第二师叶肇部接战。彭德怀红三军团由大塘铺北入新城之小溪、池江、青龙及黄龙。余汉谋令所部缩短防线，集结南雄、信丰间之新田、乌径地带。

△　南昌行营根据蒋介石23日电，电令何键加强第二线及万（安）遂（川）汾（大）横线，严密布防。由李云杰师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师，以巩固赣州以北防线；令周浑元纵队抽16个团集结泰和，薛岳部抽12个团集结龙冈，共同防堵红军西进或回返，仍命东路军及北路军第三路军加速向长汀、雩都分进。

△　薛鼎文将其东路军总司令部由漳州迁龙岩，以便指挥进攻长汀。同日，蒋电陈济棠请饬南路军各部协进。

10月26日　　红军萧克、王震第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红三军在印江县南腰界猫洞举行会师联欢大会。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并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六两军团。

△　陈诚部进攻宁都。第六师周碞部入莲湖附近，以主力置莲湖、城头，一部在侦探队先导下向宁都搜索前进。下午5时许一部进至宁都北门外，主力由西门进占宁都，红军退至宁都北部黄陂、小布。翌日，陈诚进驻宁都，派傅仲芳任城防司令。

△　西路军刘建绪命令第六十二师陶广部接守汝城、桂东南北封锁干线碉堡；以钟光仁旅防守查坪（不含）经汝城至新桥之碉线；补充第五团钟涤松部防守沙田（不含）经查坪至豪头圩之碉线；王育英旅防守沙田（含）经寨前至桂东城（不含）之碉线；第六十二师师部

等进驻寨前，于寨前设指挥部。分别防堵中央红军。

△　粤军余汉谋纵队在信丰、南雄间之乌径、新田与林彪、罗炳辉红一、九军团发生激战。红军大队集结安远、信丰、古陂地带。当晚，余汉谋下令紧追，27日进至信丰、古陂。在此前后，陈济棠调独立第三师李汉魂、警卫旅陈汉光及教导师两个团由南雄西移，进驻仁化、乐昌防堵。

△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浮梁之藏湾与浙江保安队何团作战。次日，红军东入大小花桥，28日达董门、黄沙。29日晨在杨树附近又与太白驻军李松山师张团发生战斗。之后主力渡昌江，一部向朱坑。

△　通邮会谈续在北平举行，双方各提最后希望，其分歧最大者为日方坚持通邮事务由双方邮政机关直接处理，我方要求不直接交换，而以商营性质的第三者名义居间承转。最后决定双方各自请示后再行会谈。同日，中方代表高宗武、余翔麟将谈判经过向黄郛报告，并即电汪精卫、朱家骅、唐有壬请示。电中叙述高等坚持通邮事务由第三者出面一节，黄郛不甚赞同，要求汪等电示。朱家骅电复称："第三者一节当庐山会议时曾早有以不承认伪国邮票戳记及不直接交换邮件等等为原则"，要求代向黄郛解释。

△　豫鄂皖三省边区追剿总指挥上官云相率所部兵力16个团开始向鄂豫皖徐海东、吴焕先红二十五军发动进攻。翌日，红军进至河南英山县陶家河，随在塔儿岗与上官云相部接战。

△　岫岩义勇军首领苗可秀率部50余在头道干沟，被日军未田部与哨子河伪军包围。苗可秀被俘。

△　日驻承德部队用飞机在石城、独石口、沽源等地散发传单，威迫抗日义勇军撤退。

△　中国实业银行因受上海中国兴业银行倒闭之影响，上海、天津、济南、青岛各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次日，芜湖、厦门两行亦发生挤兑。一二日后均告平息。

△　北平《立言报》创刊，主办人金达志。

10月27日　　中央红军经信丰、南康间之贤女埠、新城、新池口及青龙墟地区西渡章水，纷向义安、横江、扬眉寺等地急进。翌日，红军进占大庾、崇义、上犹、聂都，后卫仍在赣南八里镇、沙石坪。

△　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务书记官池田克已等八人，不遵事先报告中国官厅之约定，是日径行由张家口前往多伦旅行，途经张北南门时，宋哲元部赵登禹第一三二师卫兵要求检查护照，川口等无理拒绝，双方发生争执。日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借口中国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向该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日使馆武官高桥坦也在北平向宋哲元提抗议。宋为息事宁人，令该师师长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将守卫兵连长撤职。但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却要求在察东划界，要宋部退到长城线以西以南。宋答此问题应向外交部交涉，松井即单方宣称宋已允诺在12月31日以前撤兵，妄图借此划察东为“非武装区”。事称“第一次张北事件”。

△　前四川都督、北京政府内务次长蒲殿俊病逝于北平。

10月28日　　红军贺龙、萧克二、六军团撤出木黄、南腰界向湘西挺进，仅留一部于香枫溪组成黔东分区司令部，领导黔东斗争。翌日，川军田钟毅部由酉阳集兵秀山、龙潭，达凤冈部由甘龙口向酉阳推进堵击。红军迂回龙潭、龚滩间，于29日转入毛坝、兴隆坪、濯河坝，进入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　周浑元纵队万耀煌师由兴国出发，经泰和向遂川集中西进，追击长征红军。

△　王家烈鉴于红军二、六军团已经会合，而湘、桂两军又调回堵截中央红军，即重新部署黔东军事。派刘民杰任前敌总指挥，令李成章旅两团及宋华轩团为第一路，经合水至红石板设防；令王天锡率三个团为第二路，经天堂哨驻守火烧桥；令柏辉章率杨昭焯、蒋德铭两旅为第三路，分别开赴寨英；以余部扼守苗旺、萝溪。

△　台湾青年郑清水前往基隆警署掷弹，刺杀日本伏见亲王和黎本亲王，被警署逮捕。数月后郑清水自杀于狱中。

△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召开代表会议，决议反对增加棉纱统税二成，派代表郭顺等九人赴南京请愿，并发表宣言，请求各界援助。当晚郭等至南京向行政院请愿，行政院允转财政部考虑。

△　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哲学家李石岑病逝于上海。

10月29日　　中央红军分三路西进：董振堂、周昆第五、八军团经丰州入汝城集龙圩；彭德怀第三军团经文英营、百担圩入汝城热水圩；林彪、罗炳辉第一、九军团经文英营南入梧桐，下经长江圩往城口。同日，湘军陶广部钟光仁旅开抵汝城，会同驻军胡凤璋部及湖南保安独立第四营急忙布防。翌日，粤军警卫旅莫福如团由韶关进驻长江圩。31日，黄国梁部亦由南雄赶至。

△　南昌行营电告何键：已电令周浑元率部六个团与李韫珩、李云杰两师先行集中遂川、大汾机动“追剿”，令薛岳率部16个团，取道龙冈、泰和、遂川、桂东、资兴、郴州、桂阳、新田、永州之线堵击。31日，薛岳部由古龙岗启程西进。

△　王家烈电令犹国才出兵三团驰赴黎平共同堵截红军，并指定其取道自关岭、镇远、广顺绕定番出都匀、八寨而下三合等县。犹因愤王为防其假道贵阳而令其绕道，乃按兵不动。

10月30日　　南昌行营为消灭红军主力，电令何键：“追剿方针偏

重堵剿，截其西进”，希于遂川、万安、大汾以南，桂东、汝城、仁化、曲江以东地区及其西至湘、桂水间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带阻击，限周浑元纵队于11月3日前，集中遂川、大汾线上，限薛岳部于11月24日前向永州附近集中；着何键部先巩固大（汾）、桂（东）、汝（城）纵线及遂（川）、万（安）、大（汾）横线，所余衡（州）、郴（州）、宜（章）及衡（州）、祁（阳）、永（州）、黄（沙河）与茶（陵）、安（仁）、耒（阳）各纵横线，暂以保安队守备。令南路军速于汝（城）、仁（化）曳线上截堵，并以大部队追击之；桂军应速置于全（州）、兴（安）间，并从速巩固黄（沙河）、全（州）、兴（安）、桂（林）线；命空军逐日派机轮番追击轰炸。空军归周纵队指挥，暂驻吉安，尔后相机推进。

△ 蒋介石召见通邮谈判代表高宗武、余翔麟，询问通邮谈判情形并指示交涉要点。高说明争论点在邮票、邮戳及第三者出面三项后，蒋表示通邮与通车不同，邮政无第三者之办法。并谓庐山会谈时“未有用第三者之一点，朱部长或有误记”。“关于邮票可用两项办法，一由关内邮政机关致关外邮政机关一公函，委托关外邮政机关发一特种邮票，专贴入关邮件之用；一由关内邮政机关致公函认可此特种邮票，但声明此系不承认伪满邮票之意”。关于邮戳，可再力争以A、B符号代替新京之类。

△ 国民政府特任刘文岛为首任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

10月31日 蒋介石自北平致电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等，告以赣南共军已由赣州与大庾之间向西逃窜，“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 通邮谈判代表高宗武、余翔麟致电交通部长朱家骅，报告与黄郛商谈蒋介石之通邮训示情形。同日，朱复电高等，谓“直接交换公函邮件，虽未有承认伪机关之事实，亦有间接承认伪组织之嫌

疑”。“国外讥评，国内物议，均须考虑”。“对于全国人心趋向，不可不十分注意”。

△　盘石江北抗日联合军与伊通、双阳、盘东、盘西、东丰等地游击队，共同约定于冬季实行全面游击战，并制定行动计划。

△　中政会通过《补订弹劾案办法》，规定“弹劾案移付惩戒后，应由受理机关将弹劾文与被弹劾人之申辩书同时发表”；中央官吏之惩戒决定书，应呈报中央政治会议核定；凡关于国策及有关国际地位之文件，非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定不得披露。

△　伪满“满洲石油公司”成立，资本500万日元，日资占80%。社长日人桥本圭三郎，总经理佐藤谦三。该公司垄断伪满石油的开采与销售，是日军的石油生产供应部，在大连甘井子地方建设制油工场。

10月下旬　日军配合其第二期“大讨伐”，极力推行“集家法”，将村民集中交通沿线，并对告密者实行奖励。本月底辽宁东边道地区“集家法”完成。

△　何键合并西路、四路两总部，任命刘建绪为追剿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郭持平、陈浴新为参谋长，凌漳为办公厅主任。同时各部实行缩编，限11月10日前编竣。

△　日军铃木中将由沪前往两广活动，连日在广州、香港、桂林等地先后会晤陈济棠、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兜售其“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实行“大亚细亚主义”等等诱降谬论，11月16日始返上海。

是月　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与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在杭州合办中央飞机制造厂。

△　盛世才派包国宁、曾秀夫与苏联顾问于7月开始筹备“全省政治总管理局”，用以从事侦察搜集情报。该局本月正式成立，由盛自

任局长，包国宁等分任副局长，曾秀夫为秘书长，分设侦查、审讯、军事、国际、政治等科。是年冬在哈密、伊犁、塔城、喀什、吐鲁番、阿克苏、巴楚等地先后设立分局，于达坂城、额敏设派出所。

11月

11月1日　中央红军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第三、五、八军团分别进占汝城县连珠岩、羊山港、土桥、永安及八丘田等高地。翌日，红三军团由连珠岩、土桥进入东岗岭、苏仙岭，在新铺至官桥一带碉线与钟光仁旅一部作战。3日，红军第五、八军团由永安、八丘田进攻腊岭、大平、大来圩碉线与钟旅另一部作战。红军围攻汝城，并袭击其堡垒封锁线。

△　中央红军林彪、罗炳辉第一、九军团由粤北仁化县初兴圩进攻长江圩，与粤军警卫旅莫福如团接战。同日，余汉谋在韶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粤北现有兵力严守长江圩、城口、九峰、坪石之线，并将驻赣南部队陆续调回粤北相机堵截。翌日，红一军团陈光、刘亚楼第二师夜袭仁化县五里山、羊牯岭等地，歼灭粤军彭智芳团。其后，攻占城口。

△　上月29日，蒋鼎文由漳州至龙岩，下令进攻长汀，30日所部李延年等三师由蔡坊、河田全线向长汀推进。是日，李延年率李默庵、宋希濂等三师进占长汀。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所设临时战区清理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殷同、殷汝耕、李择一、朱式勤、陶尚铭、岳开侁、许同莘七委员及黄郛出席。成立会后开首次委员会议，通过办事细则七项：一、办理未完事项；二、负责对外交涉事项；三、整理保安队及地方警察；四、改进各县行政；五、整理地方治安；六、联络交通事项；七、调查及处理特种事项。

△　全国考铨会议在南京召开，出席者吴敬恒、邓家彦、汪精卫、戴季陶、孙科、居正、钮永建、叶楚伧及罗家伦、胡适等160人。会议议定关于公务员保障等95案，决定于各省设铨叙分机关，以考试办法录用各级行政人员，对公务人员实施补习教育。5日闭幕。6日发表宣言。

△　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发表“顾孟馀应不受惩戒”之决议。6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监察院正式公布。

△　立法院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南京市妇女救济会要求本男女平等之原则，变议其中某些条文，被否决。2日公布《刑法》。

△　国民政府任命孙科为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并公布《修正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组织大纲》第六条条文。

△　宋美龄在北平对欧美记者谈西北之行感想、新生活运动及赣南剿共近况。关于新生活运动，宋谓：“若言新生活运动之中心要点，一言以蔽之，则不外矫正官邪，恢复中国固有之美德而已，就中痛除贪污一事，尤为新生活运动之最大目标。”

△　伪满公布《矿业监督署官制》，所有矿务全部移归该监督署，集中统制全东北矿产，于沈阳、长春、龙江（齐齐哈尔）、承德分设监督署。

△　伪满与满铁公司共同创设电业股份公司，由日人吉丰彦（前日本关东军特务部顾问）任委员长，江正在郎和孙征任副委员长，资本额9000万伪币，总公司设长春，于沈阳、大连、营口、安东、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分公司。

△　江苏省导淮入海工程在淮阴县杨庄镇举行破土典礼。省府主席陈果夫破土，并报告筹备经过及导淮工作之重要。报告谓：“此次

疏浚计划，完全依照李仪祉先生所订之方案进行，共招工十六万五千人，全段长一百六十公里，此项工程范围之大，工人之多，堪说系民国以来，水程工程中之最大者。”

△　上海英商英美烟公司、大英烟公司、和泰烟公司联合改组，成立英商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商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原有三公司之在华营业概由该二新公司接收。

△　天津思庆永、思庆源及诚朋等三银号因做标金交易亏赔60余万元而自动宣告停业清理。该三银号已有30余年之开业历史。

△　汉口商业银行开幕，资本额84.22万元。

△　中英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王世杰、张道藩、石瑛、杭立武及英使贾德干等出席成立会。

△　中国童子军总会于上月20日经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理事会，推举蒋介石任会长，戴季陶任副会长，王世杰任理事长，陈立夫、刘咏尧、顾树森、陈剑修为常务理事。是日，该总会接收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及中国童子军司令部，正式宣告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

△　陇海铁路潼关至临潼段通车。

△　欧亚航空公司兰州、包头线通航。全程400公里。

△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11月2日　沪粤航空线经交通部组织委员会派专家至中国航空公司整理后，是日复航。

11月3日　鄂豫皖徐海东、吴焕先红二十五军由立煌县（今金寨县）西南红旗山西进，在水围子遭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和上官云相部

夹击，红军突围进入南溪乱泥壶。次日，红军经河南商城向西北入光山，在云雾山与上官部邢、刘两支队发生战斗。

11月4日　　蒋介石视察张家口，出席张北军民欢迎大会，演说《英雄之志业何在》，以张北地处国防前线，勉励长官在边疆创奇功伟业，做“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豪杰”，并以身作则，“推而至于所有的部下及一般国民，个个都要做一个‘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现代国民”。

11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核定1934年度国家普通岁出、岁入概算。计岁入经常门7.73470091亿元，临时门1.44640943亿元，经临共计9.18111034亿元；岁出经常门7.51813298亿元，临时门1.66297736亿元，经临共计数目与岁入相同。

△　中央红军自是日起开始突越汝城、城口间第二道封锁线。彭德怀红三军团以一部猛攻汝城濠头圩，另一部与董振堂、周昆第五、八军团大队经汝城南部天马山、大围山前往延寿、文明司、赤石司；林彪、罗炳辉第一、九军团由城口经东昌县杉木洞、茶料入大王山脚下，前往九峰。两部均沿湘粤边界西进宜章。

△　日使有吉偕参赞有野、秘书横川由上海启程前往北平活动，拟与黄郛等商议通邮问题。

△　东北人民革命军杨靖宇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粉碎了日伪对盘石地方秋季大讨伐后，是日在濛江县境召开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中共南满临时特委。

△　大潼路榆太段（榆次至太谷）改名正太支路，是日通车。

11月6日　中央红军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第三、五、八军团进至宜章县曹田、里田圩。钟光仁旅赶至大来圩、五里墩尾追，并以飞机轰炸。翌日，红三、五军团一部在里田圩等地击溃宜章义勇队。林

彪、罗炳辉第一、九军团由杉木洞、茶料经九峰、羊古田西进。翌日，一部至文明司，一部入上渡与第三、五、八军团会合，共同前进宜章。南昌行营判断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前往广西兴安、全州，即发布鱼（6日）电，命令何键、薛岳等：一、各方部队均须迅速出郴州、零陵以南，宜章、道县以北，分别堵剿与追击，堵截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二、薛岳部于7日由吉安出发，兼程经茶陵赴零陵，周浑元部本日过左安后，兼程直趋郴州迎堵，并电约陈济棠部速出宜章以北夹击；三、望何键部抽出湘中部队分别速出郴州、零陵以南堵截红军北进，俟薛岳部至湘后共同出击；四、桂军除巩固湘、漓二水及龙虎关一线外，望李宗仁、白崇禧以有力部队速出道县以北，与零陵部队共同堵截；五、各纵横碉线，每里以二个为宜。

△　第四纵队李延年遵照蒋介石电令，命李默庵率第十、三十六两师于8日集结长汀，于9日晨向瑞金推进；派第五十二师进取宁化、清流。

△　黄郛电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提出通邮谈判不能长久僵持，请其与汪精卫细商，谋一打开通邮谈判僵局之道，并邀唐赴平一行。

△　蒋介石电令孔祥熙速向美国订购飞机用以反共。次日，航空委员会向孔报告，已向美订购道格拉斯和弗力提式飞机52架。

△　伪满奉天军管区司令于芷山，率所部伪军前往东边道“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

△　华侨联合研究会在上海创立华声通讯社，社长吴郁文。

11月7日　刘建绪电令王东原率部沿耒阳、郴州汽车道兼程前往郴县堵截中央红军。翌日，王师开往郴县，10日该师汪旅李团至郴州，张旅抵宜章县平和，于12日集中完毕。

△　南昌行营电告顾祝同、何键，决定改定西、北两路任务、境

界及指挥系统，西路军总部由萍乡移驻衡阳，注重“追剿”，北路军总部由临川移驻吉安，注重“清剿”。西、北两路改以湘、赣省界为限，但现在鄂、赣境内之西路军第三纵队及所属各部仍归西路军指挥。其区域仍旧。西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之部队，其在赣境者，如第十八、五十、七十七各师均归北路军指挥。

△　何键接南昌行营鱼（6日）电令后，是日下令重新部署：一、命第七十七师抽其一部督同地方团队，接替皂口至凛阳（含）线江防；二、第七十二师派部接替遂川、万安间防务，兼顾遂城；三、第十八师以大部接替遂川、大分（含）线；四、第五十三师速开资兴附近，第二十三师速开郴县，向桂阳前进，第六十三师仍遵前令开赴耒阳、安仁之线，第十五师开赴郴县附近；五、第五十三、二十三、十五各师均限期速赴指定地点，由刘建绪统一指挥。各部协同固守湘江沿岸，并特别留意零陵上游与桂军联络。

△　国民政府国防会议通过通邮谈判新方案，作为谈判的最后让步界限，其要点是：协商用仅有花纹无文字的特种邮票，由商办机关委托彼方印发，彼方所用邮务之一切单据，其入关者仅用某邮局名义，年月用公历；邮戳用西文及公历，长春等大地名用字母代之，由商办机关交换邮件；邮资双方自定。同日，汪精卫将此方案内容电黄郛，请其大力斡旋。翌日，黄电复汪，谓日方胶执所提最后方案，虽一字一句亦难变更，与我国防会议通过案两相对照，距离尚远。黄提议以我方在山海关设置邮务代办所，代替商营机关，或者比较能为对方接受。

△　日公使有吉明在北平发表谈话，反对废除《塘沽协定》。谓“华北中日交涉事件，大部由于《塘沽协定》中所产生之根据，该项协定中所规定之各项事件，双方如均做到，则中日外交局面自然趋于常态”。“该协定之废置，须在各项义务双方完全履行以后”。9日，有吉分别访晤黄郛和北平市长袁良，在与黄郛会见中私下催促解决通邮问题。15日，有吉离平南下。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境成立，杨靖宇任政委兼军长，指挥所部在临江、金川、濛江、抚松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1月8日　中央红军全部由江西汝城南部天马山及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同日，粤军分兵三路追击：以李汉魂部任中路，分入乐昌县茶料、坪石；以叶肇部任右翼，由始兴经南雄、百顺开往城口；以陈章旅任左翼，命其取道长江圩开往九峰。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一部进攻湘西永顺县贾家寨，以主力围攻永顺城，击溃罗文杰保安团，进占永顺城。

△　江苏常熟县吴市镇农民，因灾荒严重，不堪大地主郑北琦催逼地租，聚众千余人拥至郑家义庄要求减租并发放麦种。翌日，张家市2000余人也拥入郑家义庄，声言无钱缴租，愿以身作抵。县公安局警察前往“维持秩序”。两日后经该区区长答应减租及发放麦种的要求，群众始散。

11月9日　中央红军大队集结赤石、平和，前锋推进白石渡、良田，后卫在茶料、文明司。湘军陶广师在文明司，粤军李汉魂师在茶料，分别尾追。翌日，红军一部攻占粤汉路要隘白石渡，以主力分攻宜章、良田，掩护大队冲越湘粤军第三道封锁线；一部于万会桥、保和圩及宜郴公路两侧警戒郴州。湘军王东原部张旅之一部在万会桥与红军接战。

△　何键以佳（9日）电电令湘军各部：以刘建绪为“追剿军”总指挥；以第五十二、二十三两师编成第一支队，受李韫珩指挥，集结于郴州、桂阳一线；由第六十二、六十三、十五三个师编成第二支队，受陶广指挥，集结于郴州、资兴、宜章、汝城一带；由第十六、十九两师（欠两旅）及补充总队和湘西南各保安队编成第三支队，受李觉指挥，联络桂军任湘江防务与机动，以堵击红军于湘南和粤汉路以

东。

△　通邮谈判代表高宗武、余翔麟电汪精卫并转朱家骅、唐有壬，申述国防会议通过之通邮谈判新方案实行极感困难：一、由商办机关书面委托彼方印发邮票难免激动对方情感，不易为对方所接受；二、承转机关用商办不易办；三、长春等大地名用符号代替，彼方反对。

△　在日关东军向黄郛要求改组河北省政府，以亲日派人物充任要职的压力下，是日行政院临时会议决议：一、改组河北省政府；二、将省会由天津移治保定；三、任命张廷谔为天津市市长。

△　国民政府任命刘维炽为实业部政务次长，免去郭春涛政务次长职务；派叶琢堂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

△　伪满国务院将兴安总署改称蒙政部，并设大臣，28日公布《蒙政部官制》，任命齐默特色木丕勒任该部大臣。

△　意大利政府宣布，任命原驻土耳其大使罗亚谷诺为驻华首任大使。

△　吉鸿昌自上年与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避居天津，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本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中共党员宣侠父、南汉宸等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力行社”特务处长戴笠遵蒋介石旨意，命北平站长陈恭澍指挥天津站特务对吉进行暗杀。是日吉和任应岐（原直鲁军军长，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与西南代表刘绍勋商议抗日问题时，行动组特务王文等闯入行刺，误将刘绍勋打死。吉、任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拘押。旋由北平军分会与法租界当局秘密交涉，于14日“引渡”天津市公安局，当日押解至第五十一军军部，被关进陆军监狱。

11月10日　　东路军李默庵率第十、三十六两师进占瑞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第五次“围剿”结束。

△　通邮谈判续在北平举行，高宗武等提出南京国防会议通过的新方案并加以说明，日方代表进行研究后由藤原答称：只能以日方提出的最后方案为准，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更改，中方只能作可或否之答复，态度骄横，并以如不接受，日方人员即行归去相威胁。高等立向南京报告及请示，汪精卫指示，力争以民信局为通邮机关，避免直接之通邮名义。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北省政府。原省府委员于学忠、魏鉴、鲁穆庭、张厉生、周炳琳、林成秀、胡源汇、史靖寰、严智怡免本兼各职。任命于学忠、魏鉴、张厚琬、郑道儒、张厉生、鲁穆庭、张荫梧、胡源汇为河北省政府委员，以于学忠兼主席，张厚琬兼民政厅长，鲁穆庭兼财政厅长，郑道儒兼教育厅长，张厉生兼建设厅长。

△　上海《沪江日报》创刊。

△　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创刊，主编李公朴，编辑柳湜、艾思奇、夏子美，发行人张静庐，上海图书公司发行。

11月11日　　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击溃湘军欧冠部和宜章义勇队，攻占宜章县城，越过粤汉路进入浆水、麻田、梅田，次日，经香花岭向临武、嘉禾推进。中央红军大队开始冲越第三道封锁线。

△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举行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转到外线，以桐柏山、伏牛山为初步目标，开辟新的根据地，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高敬亭留在根据地领导红二十八军坚持斗争。

△　上海酒精制造厂成立，官商合办，资本150万元。董事黄江泉、黄浴沂、刘鸿生、黄金琛、汤详贤，监事梅哲之、黄宝球、唐祥

福，通过公司章程，定于12月12日投产。

△　浙江省政府与铁道部成立钱塘江大桥工程处，以茅以升为处长，罗英为总工程师，本日在杭州闸口举行大桥工程开工典礼。该桥为当时国内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桥梁。

△　赣省泰和至兴国公路通车。

△　上海《现代杂志》停刊。主编洪雪帆，出至六卷一期。

11月12日　　蒋介石由武汉赶回南昌，当晚以南昌行营发出文（12日）酉电令，特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规定北路军入湘之第六路军薛岳及第八纵队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并统率在湘各部及团队共同“追剿”西窜之中央红军，务须歼灭于湘、漓等以东地区。

△　湘军陈渠珍急调龚仁杰、周燮卿及杨其昌、皮德沛等部共十个团围攻永顺城。翌日，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主动撤出永顺城，在王家坡、大西门同龚、周等旅发生战斗，陈渠珍进入永顺城。14日，红军撤至颗砂及皮匠坳、墨达湖一带，伺机再攻永顺城。

△　伪满决定增设工政部，以丁鉴修为大臣，日人直木伦太郎为次长，总揽伪满建设事项。

11月13日　　何键制定“追剿”计划，决定集主力于黄沙河、零陵、东安地区，期以桂、粤、湘三军包围红军于湘、漓二水以东，另以一部于桂阳、嘉禾、蓝山各县堵截。即日发出元（13日）亥电令，命章亮基、陶广、李云杰等师分别于16日、20日、21日到达黄沙河以西；李觉师以主力控制零陵附近；陈光中师驻东安待命；王东原师由良田尾追红军；周浑元部由郴县、嘉禾、桂阳、宁远、道县之线向南侧击；限薛岳部于24日前抵达零陵附近，并以一部于桂阳、嘉禾、蓝山各县堵滞红军。

△　刘湘随带幕僚杨毓芳、张必果、唐华等人，由重庆乘轮东

下，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军政事宜。

△　行政院例会决议，任命贺耀组为第一任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公使。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上海《申报》自九一八事变后，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经常展开批评，甚至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军事“剿共”政策。该报总经理史量才加入宋庆龄等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是日，史量才乘汽车由杭州返回上海，途经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突遭国民党特务行动组赵理君等阻击遇害。

11月14日　　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军总司令部，宣布就任总司令职。蒋介石特派刘文岛至衡阳监誓。何键专负军事，湖南省主席由省政府委员曹典球代行，以副参谋长吴家骏为西路军及第四路军总部后方留守主任。

△　何键将其所属“追剿”部队编组成五路军，命令刘建绪任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官，辖章亮基、陶广、陈光中、李觉（一部）各师及补充团四个、保安团三个，集结黄沙河附近，与桂军联络，并沿湘江堡垒至衡阳、东阳渡之线防堵；薛岳任第二路“追剿军”司令官，率吴奇伟纵队、梁华盛、甘丽初、韩汉英、欧震各师及惠济支队，由衡阳赶往零陵附近集结，与第一、三两路联络；周浑元任第三路“追剿军”司令官，率万耀煌、谢溥福、萧致平、郭思演各师，由郴州开往宁远、道县南部，尔后与第一、二两路及桂军取联络；李云杰任第四路“追剿军”司令官，率第二十三师（李兼师长）和王东原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南部尾追，与周浑元部取联络；李韫珩任第五路“追剿军”司令官，率第五十三师（李兼师长）由临武、蓝山赶往江华、永明堵截，并与第四路军取联络；并决定派刘建绪前往全州与白崇禧商订“联剿”办法。

△　红军留守赣南部队乘粤军黄任寰师调防平远、蕉岭之际，分

路进攻筠门岭、武平，与陈惕生、黄世途等部激战至16日。

△　王家烈由遵义至贵阳，召集犹国才、侯之担等贵州军阀商定：以侯部布防乌江以北，犹部开至乌江以南负责平越、瓮安战线，由王自任东路右翼相机推进，总计兵力21个团。

△　蒋介石通令各省继续加紧封锁苏区，限制民众购买食盐及婚丧用盐，多购者以通“匪”论罪。

△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华北对日交涉要案，出席中委多数表示不再迁就日本，以交通部长朱家骅为首坚持反对通邮协定。

△　通邮会谈在北平重开，中方代表高宗武等据理力争，驳回日方上次所提或可或否之要求。但日方则又提出所谓《关于通邮之申合事项案》七条，并表示对于第三者居间办理一节坚不赞成。声言该提案之第一条“通邮应由双方邮政机关间行之”非载入记录不可。中方认为无所谓提案，只能以双方同意之会谈记录为协议条文。因彼此意见相持，仍无结果。

△　伪满公布改订关税征税率，改订入口货180种，出口货23种，以便日货自由进入东北市场，使“日满经济一体化”。定于22日起施行。

△　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正式改组，在汉口成立总管理处，并于汉口增设分行，由徐继庄、陈淮钟分任总、协理，尹志陶、朱仲宣分任汉口分行正、副经理。

△　外交部组设之国民通讯社在上海发稿。

△　外交部与德国海通社合组之国民海通社在南京发稿。

11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七次会议，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规定：一、将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给特

任官待遇；二、四哲以旧赠名义，给以复圣奉祀官名义，并给荐任官待遇；三、至圣及四哲嫡裔，由国家资给培植至大学毕业；四、特设小学于曲阜，优待孔子、颜回、曾参、孟轲后裔，其优待办法由教育部定之。同日，国民政府训令教育部，“以《天下为公》歌为孔子纪念歌”。

△　中央红军全部通过湖南良田、宜章间第三道封锁线，兵分两路：一经桂阳五里桥、拐子亭、中和圩、太平圩、燕塘向嘉禾；一经梅田、牛粪头、两路口、清和圩、华塘铺向临武。王东原师张旅在万会桥、良田与红军后卫部作战。翌日，王师进占宜章城，派队沿宜章、临武大道向梅田尾追。

△　第二十一师梁立柱部赵旅再次进攻新红十军方志敏部根据地葛源，红军第八十三团及上饶独立营与之接战，赵旅之吕团进占李滩、廖村（距葛源仅10里），葛源处于危急之中。

△　日本与伪满在兴隆北部地区强迫收缴民枪，是日至22日止共收缴823支。同时强制征兵，规定每家三丁抽二，两丁抽一。群众不堪其害，纷纷逃往迁安、遵化等地躲避。

△　伪满齐（齐齐哈尔）黑（黑河）铁路通车，哈长800公里。

11月16日　　是日晨，中央红军一部占领临武城，一部向钟水进攻嘉禾。同日，何键为与粤、桂军联络，共同堵截红军于湘江、漓水之间，遂改定其部署，发出铣（16日）亥战令；命李云杰仍遵前令，率第二十三师置于蓝山、嘉禾、桂阳之线截击，并指挥王东原师在郴州以南，及蓝山、嘉禾、桂阳之线协同追击；令周浑元克日率部经桂阳向道县前进，限19日前到达，向嘉禾南部截击；命李韫珩克日率部进驻郴州、桂阳之线，与李云杰部取联络，阻截红军的回击或北进；薛岳部与陶广、章亮基、陈光中、李觉等各部均仍遵13日之电令。

△　刘建绪由衡阳飞至全州，白崇禧亦由桂林抵全州，共同面商

联合堵截中央红军。湘、桂两方决定，利用湘江、漓水之天险阻击中央红军沿红军长征先遣队故道西进，双方配定相当兵力进行夹击。桂军担任兴安、全州、黄沙河之线，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之线。翌日，刘、白二人各返原地。白在桂林与李宗仁商订，即调第七军廖磊部自桂林开赴全州、黄沙河之线；何键以刘建绪部布防于零陵、黄沙河之线。桂军第七军廖磊部即奉命开往兴安、全州布防。

△　贺龙、萧克红军第二、六军团以一部由皮匠坳、墨达湖佯袭永顺城，陈渠珍命杨其昌、周燮卿、皮德沛开往永顺，龚仁杰部驻守龙家寨。次日，红军主力开进龙家寨，在十万坪一战歼灭龚仁杰部大部，活捉龚部参谋长，龚率残部溃退石庙坝，红军占领龙家寨、杉木寨。18日，红军主力再攻永顺城，在皮匠坳地带消灭杨其昌等三部千余人，再占永顺城。红军两次战斗共歼湘军3000余人，威震湘西。陈渠珍急命顾家齐、雷世光两部集中保靖，朱树勋部退守大庸县溪口。

△　程子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西进，红二十五军长征由此开始。

△　刘湘途经武汉，是日在汉口中央银行寓所晤中央社记者，谓川省军政需要统一，而后方可谈到整顿政治，进而运用政治力量安抚地方，从事“剿匪”善后。至财政一端，已将盐税交还中央，以发行公债7000万元为整理四川之用。此次东下，除向蒋委员长请示“剿匪”方略外，对政治、财政亦欲作一度商请。

△　战区清理委员会常委李择一访日使馆武官柴山，商谈接收东陵及马兰峪问题。

△　上年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朱鹤龄视察南洋各领事馆后，曾向外交部建议采取总领事中心制，外交部采纳后已令新加坡总领事馆实行。是日，外交部复令驻新加坡总领事于驻印度尼西亚首都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设置总领事馆，指挥及监督荷属南洋各埠领事馆事宜。

△　上海华东商业储蓄银行以呆帐过多，自动宣告停业清算。该行为现任湖北省财政厅长贾士毅于四年前创办。

△　上海《旁观者图书月刊》创刊，主编为漫画家胡考，撰稿人有田汉、阿英、叶浅予等。

11月17日　　南昌行营电发湘水以西地区“剿共”计划大纲：一、方针：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占据湘西，计划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围歼”之。二、纲领：于红军抵达湘江、漓水前，在永州、宝庆、武冈、洪州、锦屏、黎平、桂林之线赶筑工事，构成据点，加强增密，于上述地区作坚壁清野之准备，并严密组织民团武装，扼要控置有力部队守备，若红军渡越湘、漓二水，各军应速相机堵剿。三、指导要领：湘军守备区为黄沙河以北，沿湘江经永州至宝庆，溯资源上游至黔阳，沿清江河至雍洞；黔军守备区为雍洞口，沿清江河上游至黎平，经中湖至洪州；桂军守备区为黄沙河，由漓水上游至桂林，经义宁、龙胜、古宜至洪州。各部均须完善各据点工事。计划重点在防止红军北入四川。

△　红二十五师于罗山朱堂店附近击退敌“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西进。19日进入桐柏山地区，旋向伏牛山区前进。

△　樊崧甫部进占雩都。

△　蒋介石电令第三师李玉堂速急攻占会昌，定18日抵长汀，19日抵瑞金，21、22两日占领会昌。同时，以李默庵师一部相机跟进策应。

△　日本铃木中将是日起在上海召集华南、华北各地驻华日陆军

武官举行秘密会议，到会者有驻济南武官花谷、驻广州武官知智、驻汉口武官渡边、驻南京武官高桥、驻北平武官柴山、驻上海武官影佐，以及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和驻伪满特务机关长大迫等。会议协议统一今后对华态度，并听取铃木中将视察两广经过等等。翌日结束。

△　通邮谈判继续，高宗武等就所奉准核定之会谈记录初稿婉转向日方说明。内容要点是：一、在山海关和古北口设置东方民信局为通邮机关；二、由东方民信局书面委托制成特种邮票专供入关邮件纳资之用，票面花纹由双方商定，不用文字；三、邮戳用西文，年月用公历；四、邮资各自自定；五、邮务上之文件等仅用某地邮局名义，年月用公历；六、普通信、明信片、快信、挂号同时办理，包裹汇兑另议。日方反对第一、二两条，双方争议仍无结果。

△　安徽各地及河南东部灾民数千人，连日纷纷前往陕西觅食。是日，在潼关乘火车十余列去渭北等地。21日，陕省政府电请豫、皖两省府阻止难民入陕。

11月18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黄沙河、全州线，恭城、灌阳线及富川、贺县线；以一部由道县王母桥及西头、东仙瑶佯攻黄沙河；又以一部由江华、永明出大路铺直指富川、贺县间白芒营牵制桂军，而以主力由蒋家岭出桂边之龙虎关、永安关、雷口关和清水关等四关，将桂军调至恭城、灌阳之线，用以破坏桂军移兵全州、黄沙河与湘军联防湘江之计划。是日，红军分别在白芒营和龙虎关与桂军接战。

△　薛岳部抵达衡阳，接任“追剿军”第二路军司令官。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军区共同指示红十军团进至开化、遂安、衢县、常山地区活动，争取建立皖浙边新根据地，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刘畴西红十军团的活动。同

日，方志敏、刘畴西率王如痴第二十、胡天陶第二十一两师北上，觅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北上抗日，由赣东德兴县之石人殿、九郎庙至叶家桥。翌日，红军经苏村开赴玉山，与浙江保安队第二纵队杜部作战。20日，红军进入浙西常山县草萍，又与浙江保安团蒋志英部接战。

△　黄郛为通邮谈判事分电蒋介石、汪精卫及唐有壬，报告通邮谈判与高宗武等意见分歧，致使局势闹僵，现时机已迫，要求从速决定方针以便应付。同日，蒋介石转汪精卫电致黄，希“注意磋磨，一字亦不轻轻放过”，“磋磨而不决裂，或亦交涉之一法。盖彼方贪得无厌，一问题解决，他问题又来，故不如多磋磨，使知我方亦不易与”。

△　中国会计学社在南京成立，赵棣华、卫挺生、潘序伦等九人任理事。

11月19日　　何键以薛岳、周浑元两部行动迟缓，是日电令改变计划：命第一路军刘建绪指挥所部主力集结黄沙河附近，与第二、三两路军联络，堵截红军北进；限第三路军周浑元部于22日全部到达道县，尔后与第一、二两路及桂军联络共同阻击红军；第四路军李云杰部经嘉禾向宁远及南部尾追；第五路军李韫珩部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临武、江华、永明尾追，并与桂军联络。

△　中央红军林彪、聂荣臻一军团攻占蓝山县城，全歼保安团一个营，各军团之大队集结蓝山附近，一部向连山方向南移。

△　余汉谋在韶关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实行缩短防线，巩固粤边及暗防蒋军入粤之方针；东江防务暂不更动，积极增固所有要塞工事；命张达师留守赣县、大庾，将黄任寰师开回梅县，黄质文师调返兴宁、五华，令邓龙光师开驻寻邬、安远，并将第三军军部由兴宁移驻惠州。

△　南昌行营电令宣告赣南、闽西反共军事告一段落，所有从前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西、南、北四路军及预备军等战斗序列，着于11月20日取消，改自12月1日起另行划域绥靖，限期肃清，完成公路、组织地方、训练民众，处理该区善后事宜。

△　陈济棠任命独三师师长李汉魂为南路“剿匪”前敌指挥。

△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作报告，宣称对江西苏区红军的“围剿”军事告一段落。并说过去“曾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口号，但事实上或者还是用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力量”。同日，蒋至九江乘轮往南京。

△　江西省政府遵照南昌行营训令，颁定兴国、石城、宁都、瑞金、雩都、会昌六县特区施政纲要。先在各县乡镇设置学校，任命乡长组织保甲等项反动措施，采用分区清乡，“剿”、“抚”兼施手段对付坚持苏区斗争的红军。

△　立法院与军事、法制两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重新审查《戒严法》。29日，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授与各地驻军司令官以“非常事变”随时宣布戒严权。

△　伪满发表新任伪省长名单：奉天省葆廉、吉林省李铭书、滨江省吕荣寰、龙江省孙其昌、锦州省徐绍卿、安东省王兹栋、三江省金昌世、黑河省钟毓、间岛省蔡运升、热河省刘梦唐。同日，发表伪总务厅长名单：奉天久米成男、吉林三浦禄郎、滨江金井章次、龙江永井四郎、锦州皆川丰治、安东别宫秀夫、三江樋口光雄、黑河成泽直亮、间岛松下芳三郎、热河中野虎逸。

△　宁波正大、南通通遂、临淮淮上、汉口楚胜及上海中国、大华、华明、大明等八家火柴厂在上海合组大中国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定额100万元。

△　中国天文学会发起，联合中央天文、气象、物理三所及北平物理研究所、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等共同组织日蚀观测委员会，是日在南京成立，举蔡元培为会长。成立该会系因1936年6月19日、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见于我国。

11月20日　　李宗仁鉴于中央红军进攻恭城、灌阳及富川、贺县之线，桂林吃紧，遂由邕宁（今南宁）至桂林与白崇禧等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团长以上军官出席。决定集中兵力于富川、贺县、恭城、灌阳、平乐之线，在兴安、全州之线仅留第四十五师黄镇国团部及民团防守，于咸水、兴安之线监视湘江西岸；以第十九师周祖晃部接防龙虎关防务，并赶筑富川、贺县及龙虎关至全州、黄沙河沿线碉堡工事；调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由粤北连山开往富川，以黄镇国与王部两师联防钟山、贺县；令第四十五师由龙州开赴恭城；命驻龙州督办李品仙负责左右两江防务；加派桂林民团陈恩元率一个团附民团两联队守全州；以平乐民团蒋如荃部注视富川、贺县；命梧州民团指挥石化龙率部驻防苍梧、昭平；于桂林设置第四集团军总部行营，由白崇禧坐镇指挥。同时，电请蒋介石允许桂军南移恭城，并要求蒋转饬何键急调所部南驻全州、灌阳之线。

△　刘湘抵南京，当晚接见各报记者，表示“四川为‘中央’之四川，本人负川省善后责任，一切惟‘中央’之命是从”。次日谒见林森、蒋介石等。旋与蒋等商订整顿四川军事、政治及财政办法。24日议定：一、军事由刘湘负责，刘湘同意蒋介石派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蒋答应给与军饷补助；二、改组四川省政府，确定其人选；三、整理财政，先由南京派员入川视察，之后再拟具体办法。

△　伪满公布，免张海鹏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职，遗缺由王静修继任。免去王静修原任军政部次长职。

△　山东齐鲁大学学生要求正式产生校长，反对少数西籍校董操纵校务，是日向校方请愿无结果。26日举行罢课，并要求撤换医学院

院长史尔德（西人）。28日，学生向省政府教育厅请愿。12月1日，教育部电省教育厅改组该校。6日，校董会决议暂由李植藩代校长，学生表示坚持反对。7日，校董事会决议以孔祥熙任董事长，聘梅贻宝任校长，学生同意。翌年1月4日，齐鲁大学复课，风潮结束。

△　江西省政府划瑞金、石城等六县为特别行政区，并拟具所谓《施政建设纲要》，从政治上加强其对该地区的反共措施。

11月21日　　中央红军彭德怀、杨尚昆第三军团一部于午夜攻占道县城。红军一、三、五等军团大队进入宁远南部之下灌、四眼桥等地，在宁远大道且战且走。翌日，周浑元纵队之萧致平、谢溥福、郭思演、万耀煌四师抵达宁远，向宁远大道及道县尾追。

△　庞炳勋第四十军李运通旅开赴新野防堵程子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入川。红军进入湖北枣阳新街内、鹿头镇，李福和师开至祁仪镇截击。翌日，红军由苍台进入双沟镇，被枣阳驻军第四十一师一部堵击。红军折向随县北部邢家川、四王山、响川、大张庆，在邢家川、四王山与上官云相部刘、邢两支队激战数小时，当夜转入石柱山、二郎冲。

△　唐有壬奉蒋、汪之命由京抵平，与高宗武等商讨通邮谈判中的问题，重新修订通邮会谈纪录初稿，使之与日意见接近，以作最后之交涉。同意日方在“通邮由双方邮政机关间行之”句下，增加“在山海关、古北口二处分设转递机关处理一切事务”一句；邮戳同意大地名用西文，小地名得参用汉文等等。

△　教育部派蒋梦麟、刘湛恩为出席菲律宾东亚高等教育会议代表。

11月22日　　蒋介石电告何键，已准桂军南移恭城，策应富川、贺县、兴安、灌阳之线，饬何部向江华、贺县推进。白崇禧即由桂林至恭城督战。桂军在兴安、全州的主力南移恭城，所遗防务由湘军填

补。兴安、全州防线一时空虚。同日，桂军韦云淞师在贺县白芒营与红军林彪、罗炳辉第一、九两军团接战。翌日，红军一部退返江华，大部入界牌、井塘。

△　南昌行营以养（22日）酉电要求湘、粤、桂各部队共同注意：一、无论追、堵部队，应不分畛域，合心同力追堵；二、任堵剿之部队，务须切实严密防堵，以便追击队之夹击，其守城及封锁者不得擅离职守，否则以军法治罪；三、任追剿之部队宜与红军保持接近，以主力击破之；四、空军除侦察轰炸外，应多置通讯筒以取联络，并与各部协同作战。

△　李玉堂师遵蒋介石令向会昌进犯，项英令红军第二十四师及独立第十六团等部潜伏湾塘岗，待李部第九旅行抵该处，突行出击予以包围。李玉堂赶率第八旅救援，红军主动撤入会昌西北大山。是日，李玉堂部进占会昌。

△　新红十军方志敏部进至常山县芳村，浙江保安处派兵两营间道赶往堵截，并电令常山、开化两县驻军及保安队防范。翌日，红军经芙蓉镇向西北入皖。

△　伪满“国务会议”通过《蒙族行政改革案》，将原兴安总署扩充为蒙政部，于大臣之下置总务、民政、劝业三厅。以原兴安署长齐王继任大臣，分设兴安北分省，公署设海拉尔；兴安东分省，公署设扎兰屯；兴安南分省，公署设王爷庙（乌兰浩特）；兴安西分省，公署设大板上（林西）。

△　长芦盐署特务大队在河北平山、深泽两县间与当地农民冲突。特务队开枪杀害群众多人，激起万余农民公愤，群起包围。于学忠第五十一军骑兵第四师郭希鹏率兵赶往镇压。

△　财政部为防止奸商将现银由内地偷运出口，命令江海关凡国内运输现银须有财部护照方准起运，如无护照，概以私运论，其货物

全数照章没收。同时饬关税署令各地海关严缉私运。

11月23日　　拂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第五团分别攻入道州城，潇水天堑被红军突破。当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直属部队进抵道州，组织工兵在潇江上多处架设浮桥，以保证中央红军顺利过潇水。与此同时，红二师第六团也在道州以南各渡口架设浮桥。红九军团也攻占了潇江上的另一渡口江华，为红军大部队迅速通过潇水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　何键接蒋介石22日命令南移江华、贺县电后，是日一面电复蒋，表示再无余力继续南移，一面以漾（23日）申电令命其所部接防桂军防线：命第三、四路军尾追中央红军；第二路军克日集结东安附近与第一路军联络，并派一部开赴城步赶筑工事；第一路军沿湘水上游伸展至全州线，与桂军联络；第五路军经临武、蓝山尾追，与第三、四路军之进展相策应，并与桂军联络。

△　红二十五军由鄂北迂回进至河南平氏东南之歇马岭、栗园，又与上官云相部裴昌会支队在歇马岭遭遇。当天，红军再东进张官带、石头坡，李福和师由湖阳镇开赴平氏防堵。次日，红军转入泌阳县东部之高邑、铜山沟。李师由平氏赶至竹园，与刘、邢、裴三支队共同开赴二郎庙，红军向马古田东部急进。26日晚，红二十五军在独树镇距许昌、南阳公路20公里处与第四十军一部遭遇战，突破包围圈，进入伏牛山区。

△　通邮会谈在平作最后之谈判。日方仍提出本月14日所提之七条“申合事项”案，声言除文字可稍作商定外，其精神绝不能丝毫变动，如不立时允诺，即作为谈判破裂。高宗武等俯首就日方所持七条作文字之讨论。至翌日晨，高宗武等完全屈从日方要求，接受日方所提七条大纲。详细办法由高宗武和邮务长余翔麟与伪满邮政督办日人藤原保明续洽。

△　日本强迫东北20万青少年组织“爱路青少年队”，规定凡10岁至20岁居住铁路沿线者一律加入，在日伪军宪监督下“强化其铁路爱护村”。

11月24日　　南昌行营以敬（24日）酉行战电规定闽、赣绥靖区部署如下：一、以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孙连仲、刘兴、毛炳文、陈继承、谭道源、余汉谋、张钫、赵观涛为第一至第八绥靖区司令官，李生达、郭汝栋为第二、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均归顾祝同指挥。陈诚为驻赣预备军指挥官，罗卓英为副指挥官，辖四个纵队，以樊崧甫、罗卓英、汤恩伯、刘绍先为第一至第四纵队总指挥，均归陈诚指挥。二、以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刘和鼎、卫立煌（兼）、李延年、王敬久为第九至十二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为第十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卫立煌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均归蒋鼎文指挥。三、以上部署，着自12月1日起实行，但各部在未负绥靖任务，或未交接防务以前，仍旧完成各原来任务。

△　中央红军各军团、纵队根据红军司令部的部署，从几个渡口陆续渡过潇水，已经渡过潇水的红一军团继续向蒋家岭、文市挺进。红一军团一师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彭德怀、杨尚昆红三军团在龙虎关一带击溃桂军周祖晃师。红军大队二万余人突破龙虎关、永安关、雷口关、清水关等四关。红五军与李云杰第二十三师在红岭发生遭遇战。当夜，迅速脱离追敌，陆续西行准备渡潇水。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由塔卧掉头北进攻占大庸，歼灭朱华生旅一部，以一部东进梧溪河，歼灭刘膺古部约二个团。至此，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已占领永顺、桑植、大埔三个县城及广大地区，为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创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至遂安县白马、上坊等地，在白马市击溃俞济时部第二纵队两个团。翌日，由上坊渡新安江经安阳畈入淳安港口，26日夜抵淳安北乡桥西金贤渡一带。28日、29日入临歧山

中。30日，红军北进分水，俞济时指挥浙江保安团队等部堵击。红军在百岁坊与王耀武部激战数日，击溃王部。

△　吉鸿昌、任应岐于22日被押至北平，关禁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23日受到审讯。是日，吉鸿昌在陆军监狱之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以手为笔在大地上疾书绝命诗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任应岐同被杀害。

11月25日　上午，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潇水。下行5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抢渡湘江，向全州、兴安西北前进。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红一军团第一师、中革军委第一纵队及红五军第十三师为第二纵队；红三军团、中革军委二纵队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为第三纵队；红八、红九军团为第四纵队。同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并强行渡过湘江"的命令，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25日，何键以有（25日）戌电令，命刘建绪部担任黄沙河（不含）至全州之线防务，置重点于全县东北，与桂军及薛岳部夹击红军。湘江战役开始。

△　唐有壬离平返京，携回通邮大纲全文，交汪精卫提出中央政治会议及国防会议报告，经两会讨论获准备案，准由高宗武在平就通邮事进行技术谈判。

△　天津日驻屯军集结唐山、滦州地区大演习。26日起，1600名日军在梅津指挥下于开平、雷庄举行攻守军事演习三日。28、29两日又演习争夺战，出动坦克、装甲车、重炮、飞机，枪炮密如联珠，居民受惊，数百亩农田被毁，农民损失甚大，北宁路唐、滦段交通中断，30日结束。

△　全国民信局各地代表100余人在上海召开紧急大会，决定于下

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时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展期结束民信局，倘不展期，则请政府救济。29日，12省代表又续开紧急会议，决定要求民信局延期五年结束。

11月26日　　白崇禧至平乐指挥，调集桂军主力夏威、廖磊两军于兴安、灌县之线阻击中央红军，以黄镇国师由富川、贺县移至兴安协同民团控制湘江沿岸之咸水、伏华铺、深布坪之线；以王赞斌、韦云淞两师移至灌北新圩、苏江、咸水、界首之线；仍以覃联芳师在道县尾追。

△　薛岳部奉何键命令推进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集主力于东安附近，策应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堵截中央红军。翌日，薛部第九十师经石期站开往东安，第五十九师亦经蔡家埠、井关墟开往东安，均于28日到达；其第九十三师除以一团守备零陵外，将主力开往渌埠，28日向火烧桥、东湘桥方面警戒；第九十二师28日进抵黄沙河，向文村、清水关、东湘桥方面警戒。

△　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缺红一师）为第一纵队，由文市向全州以南急进；红一师完成掩护后与第二纵队向文市、新圩前进；第三纵队向兴安前进；第四纵队向灌阳和兴安前进。

△　卢兴荣第五十二师进占闽西清流。

△　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在大庸县城宣告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以贺龙兼革命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2月10日省委迁永顺县塔卧，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等建设根据地的各项任务。

△　余翔麟在北平续与日方商谈通邮技术事项，至30日，我方提出补救办法，如要求在山海关、古北口现有邮局之下，由商民与天津邮局订立合同，组设一“汇通转递局”作为居间之承转机关等。日方以通邮目的达到，对细节问题未再纠缠。

△　国联发表关于满洲通邮问题文件一宗，略谓顾问委员会曾于5月16日决定，在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原则下拟定建议办法若干条，于6月4日及7月4日分别通函各会员国及非会员国征求同意，各国复文均接受建议。是日，国联秘书处公布国联通函三类和各国政府复文三类，各国均表示接受国联之建议。

11月27日　　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全州、兴安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控制界首到脚山铺之渡河点。桂军廖磊率韦云淞、王赞斌两师展开于灌北新圩、苏江、石塘至咸水南部之线堵截红军渡江。红军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第三、五、八军团在新圩等地连续四次突破桂军战线，双方死伤重大。红军第八军团在渡江中遭受严重损失。同日，刘建绪率湘军陶广、章亮基、陈光中等师由东安、黄沙河移驻全州，从全州向西南方与桂军配合堵截中央红军渡江。

△　南昌行营以感（27日）电颁发赣、闽两省“绥靖”计划：以占领赣南、闽西各县，同时以护路及封锁、构筑碉线和划区“清剿”、发展交通、组织地主武装为方针，以划分“绥靖区域”，搜索红军余部，完成各重要公路，完成地主武装之训练，处理原苏区善后为纲要，要求各绥靖区内部队应负守备“绥靖”等任务，各预备军应负“清剿”及构筑主要公路任务。其进行步骤：第一期以樊崧甫纵队及第四十三师自兴国进占雩都，并构筑兴（国）、雩（都）及雩（都）、会（昌）碉线；以汤恩伯纵队（欠第八十八师）由石城至宁都县长胜圩构筑宁（都）、瑞（金）碉线；以东路李延年纵队由瑞金进占会昌，并构筑瑞（金）、会（昌）碉线；另以卢兴荣师由永安进占清流、宁化，筑成碉线；并由卫立煌抽队筑建宁（都）、长（汀）碉线；由罗卓英纵队及第八、第二十四两师并第一一七旅构筑新安圩、宁都公路；赣、闽两省公路亦应派员参加，其余各队均需在其防区内加紧搜查红军。第二期从12月初至次年5月底，完成划区“绥靖”、交通、组训地主武装及处理该地善后等项。

△　汪精卫、蒋介石在南京联名通电，建议五中全会厘定中央与地方职权，并列举五项标准，俾集思广义：一、关于法制，中央规定政治原则，地方制定实施办法；二、关于用人，地方可选择保荐，由中央任命；三、全国财政税收，由中央管理；四、军队由中央统一，地方可调遣警察与保安队，若购买国外军火，统由中央代购；五、关于地方行政及经济设施，须呈请中央核定。通电并再次重申“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与和平，治标则反共，治本则生产建设”。

△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回答所提有关中日关系问题称：“中日两国惟有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方得解决一切问题。”

△　行政院第一八八次会议，决议任命杨震文为河南省立河南大学校长。

11月28日　　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红二师渡过湘江。红一师由寿佛坪、牛路口经高明桥、蒋家岭、永安关向文市前进，与红十五师在文市及其西北地区抗击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西进。同日，中革军委颁发关于各兵团行动部署之命令：“我军拟29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并坚决击溃敌人各路的进攻。”桂军周祖晃师在文市、新圩、苏江与红军彭德怀、杨尚昆三军团展开激战，廖磊率一部由李家枧、石塘向红军包围，黄镇国师由伏华铺、深布坪之线夹击，红军退出新圩转入麻子渡；湘军陶广、章亮基两师在路板铺、沙子堡、高车等处与红军一部接战。红军大队续由咸水、界首间渡河。

△　蒋介石电白崇禧等，责问“何以全州至咸水之线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饬令湘、桂军一面对已渡河之红军，照白崇禧、刘建绪原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严堵尚未渡河之红军。并照何键预定计划，速以大军紧追，迟滞红军之行动，使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

△　黄慕松离拉萨，12月5日经江孜赴印度，于翌年春返抵南京。黄离藏时国民政府特派刘朴忱等常川驻藏，担任国民政府驻藏官员，随时接洽有关事项。

△　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等11人在北平被捕，立即解往保定讯办，29日释放。12月1日，天津《大公报》对此发表短评，谓冯友兰教授事件“叫人感觉啼笑不得”，“实在予人以当局说话不应点之感”，“希望类似事件以后不再发生”。

△　江西省试行征兵制，是日省府通告各县广为宣传。12月10日，赣省政府设征兵委员会，令各县征兵，第一期定下年1月入伍。

11月29日　　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红二师在脚山铺、朱塘铺、咸水圩等地抗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刘建绪部的攻击，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师在兴安县与界首渡河点之间的光华铺，阻击桂军第四师的猛烈进攻。红军大队续经麻子渡、界首等处渡河。

△　蒋介石密电孔祥熙，邀约法国航空制造五大厂代表来华，商订购买飞机事项。

△　英商青岛大英烟公司无故开除工人73人，工人全体罢工反抗。嗣经社会局调解，仅允少数女工复工。

11月30日　　中共中央第一纵队从界首渡过湘江，军委第二纵队从界首以东月亮山附近，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各一师从凤凰咀一带涉水过湘江。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六师（缺第十八团）从界首抢渡湘江。红一方面军尚有四个师一个团未完成渡江。

△　何键致电南昌行营驻湘专员刘文岛，告知红军渡河及湘军战斗情形，指责桂军在“全（州）、兴（安）碉堡线无一守兵，兴安有桂军一团闭城固守”，借以推卸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责任。

电文并对蒋介石不肯增援湘西深表不满。略谓：大庸、常德、桃源、慈利、石门为红军攻占，“告急之电，雪片飞来，因迭电请求委座增调部队，迄未奉准”，“遂致无可置答”，“不解中枢对‘剿匪’大计何以忽尔淡视若此”。

△　白崇禧致电南京何应钦、黄绍竑及广州张任民等，以“我方兵力单薄，阵地太宽，无力将其击破”为辞，对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推卸责任。

△　卢兴荣第五十二师进占闽西宁化城。

△　陈济棠颁布新订封锁计划：电令余汉谋于连山、阳山、乐昌、仁化设封锁处，于长江圩各要口设分处，限本周内成立。

△　蒙政会为开发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实业，在张家口组织蒙古实业公司，资本额100万元，专制罐头、毛呢等项。

11月下旬　　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在陈毅提议下召开分局会议。会上陈毅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建议，决定派邓子恢、谭震林、陈潭秋等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派毛泽覃到福建，派李才莲到闽、赣，分别领导各地游击战争。

是月　伪满吉林省公署令濛江县公署择地建筑飞机场，以便进攻东边道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　天津福星面粉公司以营业不振停工。

△　教育部拟订实施义务教育五年计划，以为将来全国推行义务教育的根本办法。

12月

12月**1**日　　中央红军红五、红八、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尚未渡过

湘江，敌人从四面压来，红军阻击线或被突破，退路或被阻断，形势岌岌可危。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急电红一、红三军团，继续阻击由兴安北上、全州南下之敌，并钳制周浑元追击军。3时半，中共中央、中军革委、总政治部联名电令红一、红三军团，不顾一切牺牲，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凌晨，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中午，中央纵队及后卫相继渡过湘江。下午5时，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三十八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外，红军主力全部渡过湘江。自上月25日以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六个军16个师合围的第四道封锁线，脚山铺阻击战五天五夜，敌众我寡，且受敌机轮番轰炸，红军官兵血染湘江，由出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包括湘江战役前，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红军因打仗、掉队、逃亡造成的减员2.2万人在内），湘江之役结束。

△　湘军追抵咸水后折回湘西防堵，何键遂改编“追剿”军所部为第一、第二及后备兵团，以便指挥。是日，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辖第一路（司令陶广）、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第五路（司令李韫珩）及李觉师（缺两旅）并补充各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吴奇伟为副总指挥，辖第二路（司令吴奇伟兼）、第三路（司令周浑元）；以刘膺古为预备兵团总指挥。

△　何键将其兵力集中于湘、桂、黔边，防止中央红军北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合。是日以“追剿总部”名义下达电令：命其所部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方面转移；着刘建绪部除以一部尾追外，其第一路主力由现地经新宁、城步入第二封锁线截击；第四路着王东原出洪江，李云杰继后，置于海溪口、长铺子附近第三封锁线；第五路着置于武冈、花园、瓦屋塘第四封锁线；第二路薛岳部向武冈前进。

△　中央红军大队全部渡过湘江、漓水。湘军章亮基、李云杰及何平各部追抵咸水、麻子渡、珠兰铺、觉山、全州。翌日，红军先头部队进至越城岭（老界山）入西延山脉。

△　白崇禧电蒋介石、李宗仁、陈济棠、何键，对蒋电责各点，表示“读后不胜惶恐骇异”，除陈述桂军与红军作战经过外，并对蒋亲自指挥的闽、赣“剿共”军薛岳等部裹足不前，反唇相讥。

△　驻闽绥靖公署在漳州成立，蒋鼎文就主任职。翌日，驻赣绥靖公署在吉安成立，顾祝同就主任职；刘峙在河南开封就任河南保安司令兼职。

△　日关东军在锦州设立电台，专对关内广播。

△　美国政府训令驻日大使格鲁，对伪满石油专卖问题勿与伪满直接交涉。美国务院并令格鲁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谓石油专卖系违反《九国公约》维持门户开放之精神，其责任在日本方面。

△　外交部派童德乾为驻奥地利代办。10日，国民政府令免刘崇杰兼驻奥地利公使。

△　孙科、王宠惠、傅秉常等衔蒋介石、汪精卫之命由沪赴港往晤胡汉民及西南中委，商议召开四届五中全会事项。同日，西南各中委集议应付办法，并派萧佛成赴港与胡商榷。3日，孙等一行抵港访胡汉民，谋说服胡汉民等前往南京，结果失败。8日，孙等先行离港北返。王宠惠留港、粤再度与胡汉民、陈济棠等接洽。

△　是日起，全国水利委员会接收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整理海河善后工程处、永定河河务局暨工款保管委员会及内政部湘鄂湖江水文总站等水利机关，统筹办理全国水利事业。

△　伪满铁道部委托满铁会社添建林口至密山，索伦至温泉，四平街至西安三条重要铁路建成，是日通车。

△　伪满铁路总局新建汽车公路七条开始营业。其七条路为：热

河赤峰经乌丹城至林西；三角地带大孤山至凤城；珲春至东兴镇；绥芬河至东宁；扶余经大赉至洮南；洮南至突泉；索伦至五叉沟。

△　绥远毛纺织厂正式开工，由绥远省政府与中国银行、海京毛织厂等合办。资本额30万元，为绥远第一家新式工厂。

△　湖南长沙《大公报》发表短评，抨击何键扼杀新闻自由。略谓："今日大事不敢言，小事言也无用。不言又不足以尽言论之职责。""假使长沙各报均关门大吉，试问长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今虽云是新闻的厄运，亦未始非社会的厄运。"

△　上海《光华日报》创刊，由顾古香、季一株、杨曜三等发起。编辑及特约撰稿人王天恨、周一帆、冯葭初、王于一、袁流沙、龚乳凤、徐冰若、徐亮、谢静之等。

△　上海《大众日报》创刊，由吴卓愚主办。

△　上海《食货》半月刊创刊，主编陶希圣，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该刊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之学术刊物，内容有历代地租、赋税制度、农业、手工业、金融货币之沿革等等。出刊至1937年8月，共出63期。

12月2日　　"追剿"总司令何键改编"追剿"军，重新部署：一、原"追剿"军所属第一至第五路番号一律取消；二、派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辖第十五、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各师及第十九师一部，除第十九师主力由兵团直辖外，其余编为第一兵团，第一路军即日由全州移至新宁"堵剿"；三、派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除第七纵队吴奇伟部改为第二兵团，第二路军仍归指挥外，第八纵队周浑元部改为第二兵团第三路军，改归该兵团部指挥，并着该兵团即由黄沙河、全州一带移至城步"堵剿"；四、第二十三师李云杰、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即由东方向武冈推进"堵剿"，归"追剿"军总部直接指挥。

△　白崇禧至兴安编组桂军，以第十五军为第一追击队，由夏威任指挥官，辖第四十三师（师长黄镇国）、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入西延尾追；以第七军为第二追击队，由廖磊任指挥官，辖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第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于兴全一带尾追，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并防护柳江上游，以湘黔边境为进军方向，共计兵力14个团。

△　红军抗日先遣队寻淮洲部经浙江昌化白果庄越天目山再入安徽，4日入绩溪，拟由大石门进占胡东司，截断芜屯路交通。浙江保安队赶至双河口堵截，红军全力攻击丛山关，又为宁国、宣城各保安队及浙江保安队在观音桥所阻。6日，红军攻占旌德县城，浙江保安处处长俞济时赴昌化，督率所部尾追。皖保安处长兼督办皖南防卫事宜特派员蔡丙炎抵宣城，电请蒋介石加派重兵。其后，红军改入休宁县，在兰渡击溃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

△　上海狮吼剧社成立，社长朱学范，副社长徐治国，导演欧阳予倩、应云卫、袁牧之。

12月3日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接受担任中央红军殿后任务，同第三路周浑元部血战多日，被阻隔无法渡江。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先后牺牲。师长陈正湘决定率部返湘打游击。是日晚，师长在道县突围中受重伤被俘牺牲，参谋长王光道率余部在敌重围下，大部光荣献身。

△　何键派李觉于兴安会晤白崇禧，商定联合进攻红军步骤。白崇禧决定派廖磊及桂军民团由龙胜出古宜，会同李觉部向湘黔边境堵截，以夏威部担任追击。

△　方志敏率红二十、二十一两师入婺源县境，6日至浙西开化县边界塘火村与开化驻军接战，随又返回婺源县江湾、龙湾，北入安徽祁门县上溪口附近，赵观涛部衔尾紧迫。

△　程子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入栾川、陶湾、伊河，第六十师陈沛部一营进驻戴沟口附近防堵，一连入卢氏县城协防。次日，红军入卢氏县叫河附近。5日，陈沛派侦察连协同团警向叫河方向作火力侦察，红军向东北入大石河、文峪，连夜经卢氏城南，沿洛平向西前进。上官云相部尾追，将其总部由许昌移设灵宝。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大部集结嘉陵江上游仪陇、南部、苍溪、阆中地区。是日，红军抢渡嘉陵江未成，将主力移向宣汉西北官渡场。

△　高敬亭红二十八军一部在霍山、立煌南部长山冲附近与第十一路军刘茂恩部五团激战数小时。战后经前后坂北移。

△　伪满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在伪间岛省发展“集团部落”，全面推行归屯并户，以对抗日武装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举行紧急会议。决议公举郭顺、聂潞生、刘靖基、张则民等人再度赴京请愿，要求免于加征统税，以维持营业。6日，行政院及财政部接见人表示对纱厂方面的困难十分理解，郭等当夜返沪。

12月4日　　湘军王东原部抵全州，奉何键之命向湘西转进。翌日，王部由全州出发，经新宁、武冈、绥宁、靖州，于18日先后到达广平、会同之线。

△　薛岳部主力抵新宁，当即策定推进武冈之计划，并电请周浑元于6日到达新宁跟进。6日薛部主力达武冈，7日起直趋洪江，以期赶至红军之前。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一部由永顺南进王村，随掉头折入大庸。6日转往沅陵，进入四都坪，在湘西继续发动攻势。

△　行政院决议：河北省省会由天津迁回保定。

12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特任朱培德代理参谋总长，唐生智为训练总监，陈调元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内政部长黄绍竑辞职照准，遗缺由黄郛兼任；追认国民政府明令特派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并裁撤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西、南、北各路总司令部及预备军总司令部；盗窃及偷运故宫古物案，交该管机关严厉究办。

△　下行4时半，红军总司令部命令中央红军向通道以南地区前进。是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红九军团为右翼，翻越湘桂边界之越城岭（老山界），进至车田以西地域；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为左翼，翻越老山界到达河口、八滩地区；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红五军团到达千家寺宿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在大榕江一带交接防务。

12月6日　　胡汉民就孙科、王宠惠在香港商谈所谓“和平统一”及邀其北上南京之经过，向北平法文报《政闻社》记者发表谈话。略谓：“今日所争执者，为国家民族存亡之问题及主义政策之实行问题，决不能徒以情感两字掩盖一切。”指责蒋介石以“所谓均权政治，好名词欺饰外内，骨子里实行军制”。“蒋如果真正无意图南，应移兵入川‘剿共’。王、孙确已南下，如宁方接受齐、有两电（齐电9月8日，有电9月25日，电文见是月该日条目），一切可迎刃而解”。要求：“履行（民国）二十年和平会议及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方案，以期达到真正之和平、统一、均权：一、须开放人民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二、须确定入川‘剿共’，对西南各省不作大兵压境威胁；三、对朋友、同志不得敌视暗杀，立即解散杀人之组织。”

△　红二十五军经龙驹、黑沟西进，陈沛派队尾追。7日，红军经官坡入兰草镇，陈部第二团及陕西雒南县保卫团开驻雒南县属景村、黄村、箭竿岭、鸡头关防堵。8日，红军在箭竿岭击溃保卫团，经鸡头关入雒南县黄家村（三要司）。又于黄家村与陈团接战，歼其一

营，缴获甚多，战后入古城。9日，陈部向黄家村、古城尾追，红军转向西南，经雪家、泥岭、核桃坪入余家河。

△　察绥统税局榆关分所在山海关设立，所长荣树杞等开始办公。

12月7日　国民政府令免朱培德原兼代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职，特任朱为代理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免去唐生智原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特任唐为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特任陈调元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准免黄绍竑内政部部长职，特任黄郛兼内政部部长；准免贺耀组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职，任命杨杰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

△　日本冈田内阁根据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的提案制定所谓《对支新政策》。主要内容是：南京政府的“指示原理与日本国策根本不能相容”，必须将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减到最小限度，最大限度的扶植山西、山东、西南反国民政府的势力”；“使中国成为以日本为中心”，扩张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权益，以日本势力控制中国，“使该国只能接近我方”；“在一般官民之间，应创造对日依赖之气氛”，以便逐步使华北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亲日的汉奸政权，并创造便于使“日、满、支亲善”的环境和条件；诱导“中国政局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化”，“利用其走投无路的内政，使之除接近我方之外，至别无他路可行之境地”。

△　教育部在南京举行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议，出席代表50余人。会议讨论职业教育指导、法令、经费、毕业生出路及各省、市应如何实现部定中等学校的设置与经费支配等10案，决议由教育部督促各地实行职教法令，于各厅、局设置专员办理职教。9日结束。

△　陈济棠通电全国，宣告已遵令将南路军总部结束。15日，南路军总部交由第一集团军总部完全接收。

12月8日　“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奉蒋介石电令，命第一兵团总指

挥刘建绪、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窜匪”“似有沿湘、桂边境西窜贵州企图”，“应以不使该匪漏窜入黔，令合川匪或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将其围剿于湘、桂边境而歼灭之”。

△　日本走私船偷载日货由大连驶抵秦皇岛，抗拒海关检查，枪击海关巡员，致使三人受伤（重伤者一人，医治无效死亡）。税务司阿克特电请财政部、总税务司及平政整会向日使馆提出严重抗议，并往北平访仪我，未获结果。16日，阿克特返回秦皇岛候复。

△　中美银行在上海成立，美人赫克门任董事长，李鑫五等为理事，王治易等为监察。向美国政府注册。

12月9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杨靖宇部进袭通化东北部满里。

△　桂军桂林行营发出所谓“告捷电”，报告夏威部自6日以来在兴安地区司门前、千家寺、江底，廖磊部8、9日以来在龙胜县之河口、马蹄街等地与中央红军第八军团周昆部作战中，先后俘红军战士5000余人。

△　财政部布告，凡运往国外之银器及外国银币，均应一律视同银类，照征出口税10％，并加征平衡税。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反对革命文艺之传播，特在武汉成立“轮底文艺社”，举徐子衡等九人为干事，以推行其封建法西斯的反动文艺。

12月10日　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幕，14日闭幕。出席中央委员106人，会议通过宪法草案原则、刷新政治与民共始案原则、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纲要及切实整理军队并保障官兵待遇等提案，并决定于下年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发表宣言，重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声称“雪耻端在自强，救国图存之道当以充实国力、修明政治为先务”。

△　中央红军先头部进入湘西，占领通道城，大队至临口、下乡，一部由长安营、岩寨、江口与大队会合。之后，仍分两路：一向黎平；一向锦屏，后卫仍在桂北河口、江底与黄镇国师作战。次日，红军一部取道向黎平推进。

△　红军方志敏部抵达歙县汤口镇，寻淮洲部由休宁进至黄山麓汤口西部新村镇会合。两军按中共中央指示，正式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等组成政治委员会，作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以方志敏为主席，由刘畴西任军团长，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原第七军团改为第十九师，共同向北挺进。蒋介石调集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及地方武装，分路由北向南猛扑黄山红军。

△　刘湘离开南京，19日经武汉返回重庆。

△　日本陆军省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前陆相南次郎就任关东军司令兼驻“满”大使及关东厅长官，以板垣任参谋副长。19日南次郎由东京启程，25日抵长春任职。

△　财政部于8日公布《粮食运销局暂行组织章程》，凡21条，是日正式设立粮食运销局。

△　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馆和通讯社电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保障新闻自由之要求：一、检查新闻应一律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执行；二、对于新闻机关纵有言论失检，请依出版法及普通刑法制裁，不必诉诸非常手段；三、凡前此新闻机关从事新闻事业者，无论在中央或地方，苟非以武力或暴动为背景，倘有遭受停闭、拘禁或其他处分者，均应请一律开复。12日，上海日报公会、记者公会亦向五中全会提出同样要求，但全会未予正式讨论。

12月上旬　　日关东军下令搜缴热河省地区全部民间枪支，限本月15日前交完，逾期不交者以盗匪论。

12月11日　　薛岳部循光远寺、洞口、沙坪之线向洪江推进，次日所部韩汉英、欧震两师到达。薛随命吴奇伟纵队（欠唐、梁两师）于13日经禹新店、高竹溪赶至黔阳警戒；周浑元纵队惠支队继向洪江推进。16日，薛部进抵黔阳城。

△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电国民党中央、五中全会及蒋介石等，提出为阻红军转黔入川，“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竟全功”。25日，蒋复电李、白、陈等，望不分畛域，歼灭红军于黔境。

△　陈济棠呈请西南政务委员会委派李振球为第一军副军长，莫希德为第一师师长，张达为第二军军长，巫剑雄为第四师师长，黄延桢为第三军副军长。西南政务委员会随即照准。

△　福建第十一绥靖区司令李延年率其第九师由长汀出发，经漳州转往泉州设立司令部，是日至漳州。该绥靖区辖闽中、闽南之思明、晋江、龙溪、永春、莆田、永泰、大田、尤溪、仙游、沙县、长乐、平潭、福清等27县。

△　行政院第一九〇次会议，决议设置蒙古各盟旗行政人员研究所。

12月12日　　蒋介石为防止红军入黔，电令何键、李宗仁、王家烈，重申11月17日筱戌电令速建碉堡防守。并命黔军除巩固原防外，于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州线上赶筑工事，先择重镇构筑碉堡；桂军除巩固原防外，亦须以一部由古宜、长安堡至榕江协助黔军堵截；湘军亦以其尾追部队之一部赶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防线。

△　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事先同张闻天、王稼祥商量的意见，提出放弃原订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转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周恩来同意，

李德、博古反对。决定继续西进，到贵州黎平、锦屏再行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　薛岳电呈蒋介石请允所部经晃县、玉屏直出镇远兜截，或与黔军在贵阳、镇远间夹击红军。14日，蒋复电仍令其迅以一部进驻铜仁，巩固黔军左侧防线，主力推进于晃县、玉屏、天柱等处堵截红军北进。

△　国民政府任命鲁涤平为军事参议院副议长，曾仲鸣为铁道部政务次长，准钱宗泽辞铁道部政务次长职。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浙江省政府，原省府委员鲁涤平、吕苾筹、王澂莹、叶溯中、曾养甫、葛敬恩、蒋伯诚、蒋锡侯、杨绵仲免本职，鲁涤平免省府主席兼职，吕、王、叶、曾分别免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兼职。任命黄绍竑、徐青甫、许绍棣、曾养甫、黄华表、蒋锡侯、周象贤、朱孔阳为浙江省政府委员，以黄绍竑兼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厅长，徐、许、曾分别兼任财政、教育、建设厅长。

△　外交部就日本政府8月10日在横滨无理驱逐我华侨事，提出第三次抗议。

△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出席东亚高等教育会议，是日由沪抵港，转乘轮船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参加18日至21日召开的东亚高等教育会议。

12月13日　　王家烈由贵阳前往马场坪督战，并任命犹国才为贵州全省“剿匪”总指挥，仍令其率兵三个团增防黎平、永从；又命副军长侯之担为黔省“剿匪”后备军总指挥，令其在遵义、镇远分设行辕，并派兵三个团集结施秉、黄平。同日，任命第一师师长兼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何知重为贵州全省“剿匪”副总指挥，饬其星夜兼程径赴施秉指挥。

△　何键“追剿”总部电令第二兵团薛岳部速以一部进驻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主力推进于晃县、玉屏、天柱等县。薛部奉令后行动，迟至半个月后始达施秉、黄平之线，徘徊于镇远、焦溪之东。

△　白崇禧遵蒋介石关于以一部迅速绕至榕江协助黔军“堵剿”红军之电令，特变更桂军部署：第一追击队集于龙胜附近，第二追击队廖磊部之谭师由湘省长安堡向牙屯堡转进追击，周师由长安古宜经下江绕至榕江，助黔军防堵。

△　红十军团由旌德县汤口、焦村，经黄山麓苦竹溪、白马岭转入太平县谭家桥。俞济时率王耀武等部紧追，以一部于谭家桥南部乌泥关堵截；伍诚仁师由休宁急进谭家桥，赣东“剿匪”军总指挥赵观涛分四路围攻红军。次日，赵观涛以王耀武占515高地任主攻，以一个团占乌泥关至谭家桥间高地，以两个营占谭家桥西南及正南高地，而以一团置黄石塘、乌泥关间任预备队，向红军发动总攻。红军向王耀武部冲锋反击八九次，并于630高地南部争夺乌泥关。经过多次争夺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副军团长兼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英勇牺牲。红军从谭家桥东部孙村、观音桥连夜撤出战斗。

△　蒋介石电令撤销江西各地封锁区，并令江西各县停筑碉堡。

△　全国民信局12省代表印源通等，为展期结束民信局事再次请愿。是日在上海向党、政、警各机关请愿后，当夜入京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五中全会呼吁，再次要求取消本年2月所发关于年底结束民信局的指令。翌日，代表向五中全会、行政院、交通部请求从缓结束民信局。当局表示将坚决执行，仅允设法解决善后。

12月14日　　蒋介石在南昌电令第一师胡宗南部派队接防川北之昭化、广元防线。次日，胡宗南派其独立旅丁德隆部驻广元、昭化，并派第一旅第一团及西北补充旅之第一团进驻三磊、羊模坝一带，以其第二旅之第六团进驻阳平关为策应。

△　通邮谈判在北平北京饭店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中方出席者殷同、高宗武、余翔麟，日方为仪我、柴山、藤原等，双方将前通过的通邮大纲及谅解事项，各用本国文字缮写两份，当场宣读一遍后互换一份作为凭证。但在“不成文之规定”原则下，双方均不签字。双方决定于12月底公布通邮大纲及其谅解事项。

△　日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大使南次郎上日与广田外务大臣商议对伪满之政策。是日向日本内阁会议报告，提议今后日、‘满’两国关系，当以经济提携为主眼，其具体工作则提倡“日满经济会议”。内阁一致赞同。

△　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2500人，由荒木少将指挥紧急出动，在虹口苏州河两岸举行大规模示威式实战演习。

△　日本满铁会社建筑北安镇至黑河铁路竣工，是日在小兴安举行通车典礼。该路由黑河可直达大连，为一纵贯大干线。

12月15日　　林彪、聂荣臻电令红六团、红三团两路会攻黎平。黎平为敌于湘江战役后设置之第一道防线，黔军王家烈部第四旅周仁芳率第七团驻潭溪、十万坪、石单桥一线防守。红六团先下潭溪，驻守十万坪之黔军退五里桥，同红六团接战两小时即败退，红军下午占黎平。随后红三团亦进入黎平。

△　红十军团北入泾县茂林镇。17日，赵观涛率王耀武等部分两路向茂林追击，红军渡青弋江西进水东翟、新丰村一带。刘镇华再增调第十一路军两旅开往大通，推进青阳、太平交界处迎堵；俞济时亦奉命北进夹击。

△　福建绥靖公署通令将所有闽省封锁机关一律撤销，汀江、漳江两督察处15日前结束，余各限月底结束。翌日，省政府通令自即日起，全省一律停止封锁检查。

△　日军驻吉林省临江县八道江骑兵团与伪满军齐向临江石人沟地区，进攻东北人民革命军杨靖宇部。

△　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在南京成立，21日举行第一次理事会，推陈令仪、刘王立明为正、副理事长，决议设立女子职业介绍所、女子法律讲习所。

△　桂军前钦廉镇守使、广西边防督办沈鸿英病死于香港寓所。

△　西藏奇林湖附近发生七级地震。

△　上海《七日谈周报》创刊，主编李焰生、金笑鹭，七日谈周报社出版。该刊出至第十四期停刊，并入《新垒月刊》。

12月16日　　中央红军主力集结南嘉堡、平兆、瑶光一带，陆续通过鳌鱼嘴向剑河前进；一部渡过青水河进至瓦寨、榕江。

△　程子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经由漫川关南入湖北郧西县竹林关、吴家川，第五十四师师长兼豫鄂皖三省边区“追剿”总指挥上官云相由洛阳至西安，与杨虎城商定共同追堵程子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办法。翌日，萧之楚部陈团等集中白河、镇安迎堵。

△　日军在天津八里台建筑之飞机场竣工，诡称举行“体育场”落成典礼。日军驻津司令官梅津、参谋长酒井等均参加。

△　中华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及文化为宗旨，举蔡元培、黄文山、何联奎、凌纯声、孙本文等10人为理、监事。

△　伪满在沈阳成立日满教育联合会。

12月17日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一部经龙潭入余家坪、三阳港、梧溪河进攻桃源。罗启疆旅在三阳港、梧溪河被击溃，败退常

德，红军进占桃源。同时，红军一部由大庸进攻老鸦口、溪口、岩口，与朱树勋团接战。

△　东北人民革命军赵尚志部在吉林省五常、榆树之边区向日伪军发动进攻。

△　河北蓟县穷人会发动抗税暴动。是日，穷人会派代表前往县府请愿，要求彻底免征各项捐税，县长王公宾竟将代表扣留。当晚，群众包围县府，要求释放代表。翌日，县长电请蓟密公署进行镇压，指请愿群众为共产党。当晚，蓟密公署派队前往镇压，驱散群众。22日晚，穷人会发动暴动，包围该县第四区区分所及公安分驻所，与民团和保安队展开斗争，穷人会被捕60余人，保安队前往穷人会根据地打渔庄搜捕。24—25日，穷人会用少数武器向民团展开斗争。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进军，取消原定进兵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建立湘西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　薛岳部第五师谢溥福部组编一游击支队进驻天柱，其余各部先后由黔阳、芷江、晃县推进，于27日全部到达黔境。薛部入黔后，即贴出“进军贵阳”之标语。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经杜家河、白洋河围攻常德。常德城防司令刘运乾与罗启疆固守待援。何键以常德吃紧，除电请蒋介石飞兵救援外，并再电徐源泉派其一部向醴陵、鳖山出击；令派李觉为第六路司令，率部分由郴州、醴陵集结益阳兼程往援；派郭汝栋为第七路司令，率所部两团由长沙集于益阳驰援；令刘建绪急率章亮基、陶广两师自绥宁、通道及衡阳往沅陵急进常德；命陈渠珍部速出大庸堵截。翌日，红军一部在常德西河洑、陬市与罗启疆、刘运乾两部作战，一部西进羊毛滩、溪口，以诱敌于常德城外歼之。红军围攻常德

三日未下，退至漆家河，分往桃源、大庸。

△　蒋介石电令萧之楚等对红二十五军严加防范，勿使之入川。翌日，红二十五军由竹林关返入陕边山阳县高霸庙店、洛浴街，陈沛师柳旅由山阳县迎堵。

△　行政院第一九一次会议通过《森林法施行细则》。

12月19日　　南昌行营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正、副主任，令克日入川。该参谋团其他主要人员为第一处处长刘倚仁，第二处处长王又庸，政训处长康泽，总务处处长柏良，高级参谋李伯华等。29日，贺等由九江乘轮西上。

△　立法院通过《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邓泽如在广州病逝。

12月20日　　李宗仁、白崇禧遵照蒋介石电令，将在广西边境“追剿”中所俘之红军6000余人，于是日起由兴安、全州、灌阳分批押赴黄沙河交湘军接收。

△　英国实业协会“满洲”调查团公布调查报告书，主张英日两国缔结经济条约。

△　行政院召开第三次庚款机关联席会议。决议：一、由中美、中英、中法、中比各庚款机关各筹部分经费，作为推动与补助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之用；二、由上述庚款机关各拨部分经费协助各大学为设研究所之用。

12月21日　　侯之担由贵阳返遵义布防乌江；派教导师第一旅刘翰吾率两个团防守乌江江界河一带渡口及河岸沿线，以江界河作重点；由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易少荃率所属第六团防守袁家河对岸一带，并与湄潭之直属第八团万式炯部衔接；以教导师第三旅林秀生率所部

第五团及机炮营防守孙家渡、荣山关一带，与第三团取联络；以邹瑾坐镇赤水；以第二旅侯子玺部防守川南各县；侯之担率特务第一营驻守遵义。各部于12月下旬纷至乌江设防。

△　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抵陕北绥德，指挥所部于绥德、吴堡及清涧、靖边、安边、定边等县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发动进攻。25日，高又接替三边及延川防务，随与井岳秀商订“围剿”办法。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免去刘文辉、郭昌明、张铮、向传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嵇祖佑、林耀辉四川省政府委员，并免去刘文辉兼省主席及兼民政厅长，郭昌明兼财政厅长，张铮兼教育厅长，向传义兼建设厅长职。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为四川省政府委员，以刘湘兼省政府主席，甘绩镛兼民政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长。

△　王宠惠离港北返抵沪，立晤汪精卫转达胡汉民所提合作条件：第一步应消除怀疑，其次是双方谅解。23日，王由沪到宁波转赴奉化，向蒋介石报告南行经过。

△　伪满在长春召开警务厅长联席会议，讨论充实警务机关、收回民间武器与整顿进攻抗日反满军之方法、确立与普及保甲制度、取缔各种民间团体、取缔民间言论机关等等事项。次日闭会。

△　立法院通过《市自治法》及《市自治法施行法》。

12月22日　　何键以养电（22日）命陶广、章亮基两师急进沅陵；陈光中、王东原两师分由新厂、藕团及广平、会同尾追入黔；以吴奇伟部由晃县、玉屏向镇远堵截；以周浑元部由天柱向瓦寨、三穗前进；以薛岳总指挥部向清溪、镇远跟进。

△　中央红军一部攻占台拱县城，先头一部至施洞口向三穗、镇

远推进，黔军集中主力于炉山防堵红军入贵阳。王家烈令何知重部扼守东坡、滥桥；第二师副师长张銮以二个团置黄平、重安江截击；李成章部于炉山、台拱、丹江之线；杜肇华部两团布于黄平、螃蟹、凯里；江荣华部两团于麻江、台拱线；龙质斌团置下司、施洞口线扼要堵击；侯之担三团达瓮安向乌江前进，于旧州策应施秉、黄平。

△　何键令陈渠珍新编第三十四师以一部由沅陵向东，命郭汝栋第二十六师由常德向西，分向桃源追击红军二、六军团；并再电徐源泉所部请由澧县经临澧向桃源侧击。

△　国民政府令准免居正兼司法行政部长职，任命王用宾为司法行政部长；准免王用宾考选委员会委员长职，任命陈大齐为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准免谢冠生辞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职。

12月23日　　赵观涛令伍诚仁师兼程进入安徽黟县渔亭，王耀武旅跟进黟县，李文斌旅经大坦急进柏溪。刘畴西、方志敏率红十军团连夜由黟县风口苦竹地带转至当金街一带，赵部一面紧追，一面迎堵。

△　陈济棠设韶关行营，命余汉谋为行营主任。

△　伪满决定采取银本位制。

△　辛亥革命志士、香港《中国日报》创办人陈少白在北平病逝。

12月24日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退出桃源县城，经漆家河、大浒、溪口入黄石一带，李觉、郭汝栋两部进驻桃源县城。次日，李觉部陈子贤旅及郭汝栋部、王振东旅追至溪口、黄石，分向漆家河、盘龙桥。26日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朱树勋团溃退五雷山、野关。

△　罗卓英在宁都向记者发表谈话，谓自1933年10月开始第五

次“围剿”起，至1934年10月进占宁都止，一年内该部作战38次，死亡3000余人，伤7000余人。

△　殷同、殷汝耕与仪我、柴山等在北平商议：一、玉田保安队问题；二、长城各口税卡纠纷问题；三、马兰峪接收问题；四、东陵接收实行保管；五、滦东各地日、韩侨问题；六、新编特警队东开换防问题等等。其中长城沿线设关问题达成事务联络暂行协定。

△　国民政府令聘陈庆云、沈德燮、厉汝燕、聂开一、李景枞、伍仁硕、曾绍经、姚锡九为中国航空协会理事，蒋介石任名誉理事。

12月25日　　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在红九军团协助下，向镇远、施秉攻击前进，是日攻占镇远，瓦解王家烈的第二道防线。

△　刘湘委派独立第三旅旅长廖泽为援黔“剿匪”指挥官，率所部及川南边防第一路司令穆肃中部，前往贵州正安、绥阳、湄潭协助侯之担部布防；并委吴厚安为特派员，由綦江入黔与王家烈联络。

△　上官云相由洛阳赴武汉，向张学良请示该部入川事。

△　行政院第一九二次会议，决议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简派刘文辉、诺那呼图克图、向传义、冷融、禄国藩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以刘文辉任委员长。29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行政院通过《救济十二圩船户劳工生计办法大纲》，规定递减帆运，厉行原订取缔运盐帆船办法，凡船主自愿收业者酌给津贴，自1936年起，于五年内分期吊销帆船运盐船执照，并拟办造纸厂及介绍职业等项办法以解决失业船工生活。

△　北票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工人52人惨死，37人受伤。该矿系由日人把持，事件前虽发现险情，但为了掠夺我国财富，未作防范。

△　中华职业教育社沪郊农村改进区举行开幕典礼，到黄炎培、

江问渔、杨卫玉等千余人。该区自7月开始筹办，划分上海县吴家港等三处为改进会。在教育方面设有鸿英小学、民众教育场及生产合作社等等。

12月26日　　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攻占施秉县城，以一部向黄平、旧州续进。翌日，红军与吴奇伟纵队游击支队相持于箱子崖附近；黔军何知重部退守旧州，布主力于黄平、炉山之线。吴纵队四个师与黔军蒋德铭旅追抵镇远附近，进入镇远城。

△　胡宗南电约邓锡侯前往天水，共商对付川、陕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办法。

△　国民党中政会第四三八次会议通过第四届立法委员名单：焦易堂、陈璧君、梁寒操、马寅初、郑洪年、杨公达、程中行、陈顾远、楼桐荪、萧淑宇、林柏生等86人。

△　日本政府根据关东军所提一元化机构建议设置对满事务局，以林铣十郎任总裁，是日开始办公。同时于驻伪满大使馆内设关东局，任命冈隆一郎为局长，日下辰太郎为施政部长，岩使六郎为警察部长，大场鉴次郎为关东州长官。规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统一掌管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行政。由关东军司令官对伪满政治、经济进行所谓内部指导。

12月27日　　国民党中常会选任马超俊为国民政府委员，补邓泽如遗缺。

△　红一军团进入余庆县境。

△　日使馆武官柴山任满奉调回国，是日中止赴长春之行，返平办理交卸。遗缺由参谋本部部副高桥坦来华继任。

△　刘桂堂率残部200余人，打着“天下第一团”旗号，窜入通县石门；一股入门头沟。30日，刘部入昌平恒岭口。31日，经三岔入延

庆、永宁堡一带。万福麟、商震分别派队追击。

△　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临潼段修筑完成，于是日开始先行货运。陇海路连云港至西安段至此全线竣工。翌年1月1日正式通车。

12月28日　　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攻占黄平城，大队由小路向罗朗。黔军李成章、杜肇华两旅由五里桥、十里桥败退江口、马场街、老木哨。黔军副总指挥何知重随令柏辉章师布防重安江、老君关、观音山各险要堵截。

△　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兼浙江省保安司令，免去鲁涤平浙江省保安司令职；任命陆洪东为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

12月29日　　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主力两路进逼乌江。红一师由余庆出发，向龙溪、袁家渡、回龙场方向前进；红二师由黄平旧州、梭桐出发，向猴场、江界河方向前进；红十五师由施秉进至余庆；红四十五团在沙坪地域和红九军团迟滞敌前进。

△　何键以贺龙、萧克红军二、六军团在湘西一带活动于己不利，是日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提出“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萧、贺”的献策。

△　文学家郁达夫、刘大杰、孟寿椿等百余人发起儿童文学社，在上海冠生园开筹备会，订翌年1月12日正式成立。该社计划出版刊物及儿童丛书。

12月30日　　红一军团主力分别抵达乌江南岸龙溪、猴场、陈家寨。中革军委发来“红一师务必在1月3日前强渡乌江”的十万火急电报。林彪立即转发红一师。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绥定、宣汉北入万源竹峪关，集兵力12团向陕南挺进。

△　交通部邮政总局通告，自明年1月起实行东北通邮。邮件、包裹及汇兑业务，由山海关、古北口两邮局负责承转，所有寄往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之邮件，如封面、书名、省名及地名无伪组织字样者，从明年1月10日起均予收寄转发，其包裹、汇兑自2月1日起照章办理。同日，外交部为通邮事电各驻外使署说明通邮经过，并向国联作解释。翌日，日驻平使馆武官室用日文公布通邮协定内容。

△　财政部公布民国二十三年海关税收（进口税、出口税、转口税、船钞救灾附加税及海关附加税）状况，税收总合国币3.346亿元，二十二年海关税收总数则为国币3.395亿元。

△　鄂陕湘联络公路正式通车，其路线一由湖北黄龙镇至陕西白河；一由湖北沙市至湖南东岳庙。

△　中国法学会在上海成立，举郭卫等13人为理事。

12月31日　　红三军团张宗逊、黄克诚率前卫四师同王家烈黔军第五、六团激战一小时，占领瓮安。红三军团主力由老黄平向瓮安前进。

△　国民政府任命胡宗南为陆军第一师师长；准免潘恩培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职。

是月　　台湾竹州人民策划反日暴动，事泄被捕30余人，各判有期徒刑八年。

是年　春，三星堆遗址首次考古发掘。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春，由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安装水车掏沟时发现一坑玉石器开始，1933年秋，在获得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和发放执照后，由广汉县罗县长和华西大学林铭钧以及在该校执教的外籍教师葛维汉、戴谦和等人组成月亮湾考古发掘队，于是年春，进行了首次发掘。此系新石器晚期古蜀遗址，上限距今5000年，下限约2800年，延续时间达

2000年之久。

△　夏，黑龙江汤原游击队扩大达2000人，曾进攻鹤岗煤矿，声振北满。

△　陈济棠聘德国军官赛如斯多尔夫等组设一军事顾问小组，由德国提供武器、飞机、机车等装备及训练粤军。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李红光部以轻骑百余人冲破日伪军防线，渡过鸭绿江攻占朝鲜东兴城，夺获大批军用品，被日军称为“国境警备史上的空前事件”。

△　本年度国库收入总计为12.2635446908亿元，支出为12.0358259136亿元。

△　我国运美白银有增无减，几占美国白银总输入之半数。据民国二十五年《中国年鉴》统计，自6月起，至年底止，现银外流数计2.6亿元，输出者几全部为外商银行。

△　海关发表本年度全国对外贸易，计输入总值9.47630961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96476076亿元；输出共计4.9163429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953.0571万元，入超额为4.55996671亿元。

△　中华棉业统计会公布《民国二十三年全国棉产第二次估计》：全国11省及沪、津两市郊棉产面积约4480.7579万亩，皮棉产量为1117.2553万担。

△　本年全国棉纺业总计增加纱锭15.1683万枚，其中华厂纱锭增10.5341万枚，线锭增7182枚，布机增1845台。日厂纱锭增1.2736万枚，线锭增2.1992万枚，布机增1425台。英厂纱锭增1712枚，线锭增2720枚。与去年相较，华厂纱锭增率大，外商线锭增率大。惟纱线产量反较去年减少5.985万包（年产额为227.2834万包）。

△　本年丝业自1月中旬起丝价逐步下跌，生丝每担亏本350元左右，12月份估计江、浙丝厂亏损当在2000万元以上。江、浙缫丝厂在日丝倾销及人造丝竞争的影响下，二三月间开工者不过二家，六七月外丝市价上涨，开工厂家始增加。但7月后丝价又再下跌，10月初，上海开工者又不及20家，无锡不过25家，浙江十余家。12月初，上海开工者仅有六家。丝业陷于凋零状态。

△　教育部根据本年度统计，编成《最近高等教育概况》，所有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计110校（内有大学40所，独立学院38所，专科31所），教员7200余人，职员5300人，在校学生4.17万余人，毕业生9600余人。

△　本年度留日学生约2200余人，较去年增加一倍。

△　教育部统计，全国已办民众学校达3.4万余所。

△　本年被称“文化史上杂志年”，新创定期文艺刊物盛行，尚有年鉴及文学专号等。据舒新城估计，全年出版杂志达716种，和上年相较，增加了81种。

△　本年出版界出现翻印古籍之热潮。首由商务印书馆翻印《四库全书》为前导，继起者即有中华书局的《图书集成》、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书报合作社的《二十六史》等等。

△　本年音乐界产生了《渔光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凤阳歌》等作品。

△　本年自然灾害严重，被称为60年来所未有。从6月起，长江流域各省遭旱灾，江苏、安徽以及浙江灾情极重；接着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的河南、河北、山东及绥远、四川、广东又遭水灾，黄河数处决口，嫩江、黑龙江、松花江皆暴涨；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西、福建、广东、甘肃等省水、旱并重。据

《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一号达生的《灾荒打击下底中国农村》一文统计，全国旱灾14省333县，水灾13省162县，蝗灾八省69县，雹灾12省89县，全国受灾面积达三分之二。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1月

1月1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庆祝中华民国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强调国内所需要的是“和平统一”。并称：欲达到国内和平统一，“中央政府与各省关系，除了实行总理的均权制度主张，没有第二条路”。

△　汪精卫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上发表《救亡图存之方针》一文，宣称要抵御日本侵略，必先“剿除”红军，“剿匪即是御侮”，“要达到御侮的目的，必须同心并力先去肃清匪患”。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凡357条；《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凡516条。

△　蒋介石在杭州浙江省府主席黄绍竑及各委员、各厅长就职典礼上宣布今年为“新生活运动年”。下午，蒋自杭州返奉化。

△　中共中央于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强渡乌江。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野战军渡过乌江后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赤化工作，武装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财，建立政权。

△　林彪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及红十五师主力进抵余庆县回龙场渡口，掩护中央红军在上游岩门渡过河。傍晚，红一军团红一团在

团长杨得志指挥下，扎筏抢渡，第一批八名勇士偷渡，因风急浪高未成；又挑选36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其中13名勇士游过乌江登上对岸。

△　红二十五军程子华、徐海东部上月自河南入陕，是日进至陕南蓝田东之黑龙口。2日，一部进抵蓝田，一部与国民党军汪醒吾旅激战于商县、蓝田交界之淤水河。

△　日本驻沪海陆军数千人在虹口公园举行元旦阅兵典礼，日侨万余人参加，新任第三舰队司令百武源吾为检阅官，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荒木贞亮为指挥。

△　中英庚款董事会借款筹办之中央机器厂在上海行奠基礼。14日，庚款会决议续借开办费10万元。

1月2日　　红一军团红一团在13名勇士配合下，抢渡乌江成功。当晚红一师主力全部过乌江。

△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山东省党部常委兼省府委员张苇村在济南遇刺毙命。

△　财政部以久大等精盐公司销量骤减，请求救济，特重订《精盐行销暂行办法》，凡八条。

1月3日　　上午，红一军红一师及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红二师在瓮安县江界渡口与敌军激战后亦渡过乌江。

1月4日　　晨，林彪率红一军团部由回龙场渡过乌江，进至余庆司、茅坪场、朱场地域。红十五师和红九军团随后也渡过乌江。

△　“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到马场坪（今属贵州福泉市）与贵州“剿匪”军总指挥王家烈商定黔北部署：以黔军独立第二师侯之担部六个团固守遵义，以第一〇二师柏辉章部开赴遵义、刀靶水之

间，并保持乌江渡渡河点。

△　日本关东军在大连星浦旅馆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对华侵略方针，要求中国充分履行《塘沽协定》，调整华北中日关系，实行“中日提携”。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第二课长石本、第三课长原田、参谋河野、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驻济南武官花谷、驻上海武官影佐及驻平、津武官等均出席。晚，板垣之随员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会议曾讨论通车、通邮及关税问题。5日，会议结束。

△　法人于民国元年在我国设立万国储蓄会，借储蓄之名，以赌博方式骗取我劳苦民众血汗，20余年来获利已达7500万元。国民政府于上年7月公布《储蓄银行法》规定禁止有奖储蓄后，迭与该会谈判，令其设法结束，迄无结果。是日，驻华法使韦礼敦反向外交部抗议取缔万国储蓄会。

△　美国提高银价收购白银，上年上海流出白银两亿元以上。沪市银根奇紧，上海外汇平市委员会抛出纯金20800余条，向港购进现洋2000万元济急，首批金条是日出口。香港银价高于上海，依汇率计算，损失达250万元以上。

1月5日　　红一军团红十五师先头部队占领湄潭，红二师攻占珠藏、进抵固溪，先头部队正向遵义逼近。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直属队从余庆司抵达双香铺。当日，红一军团下达会攻遵义的作战命令，并制定了《关于进入城镇执行政策的规定》。

1月6日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渡乌江。红四师从桃子台渡江，经尚稽场向遵义前进；红六师随军团部由茶山关渡江，进驻尚稽场；红五师由马场、桃子台渡过乌江。

△　贵州省府主席兼贵州“剿匪”军总指挥王家烈由马场坪回贵阳，与第二路“追剿”军副指挥吴奇伟、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犹国才等

会商追堵红军计划。

△　张希哲在秦皇岛附近密组“东亚同盟军”500余人，自任总指挥，与悍匪刘桂堂勾结，窜扰冀东，是日占据蓟县北黄崖关。

△　胡适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是日在港侨中学讲演《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反对粤省当局提倡读经。9日抵广州，原定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演讲，因两校布告反对而中止。

△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近60年来我国耕地面积增减数字：以清同治十二年（1873）为基年，截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耕地面积增1％；荒地占土地总面积19.1％，可耕荒地占土地总面积6.36％。

△　河北长垣（今属河南省）、濮阳（今属河南省）、东明（今属山东省）三县因去夏黄河决口受灾，灾民多至27万余人，该省府黄灾救委会迭电请赈，迄无结果，是日再电中央请迅拨款救灾。

△　据海关报告：去年1至11月，全国对外贸易入超4.55996671亿元。另据国民社记者7日向海关探悉，去年全国海关税收为3.346亿元，因走私日多，较1933年减少490万元。

1月7日　　红一军团红二师在刘伯承指挥下占领遵义城。中共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林彪率红一军团团部进入遵义城内。红一师、红十五师进抵遵义城东虾子场、老蒲场。

△　孙科由北平到济南，会晤鲁省府主席韩复榘。8日抵泰安，赴泰山五贤祠访冯玉祥，商谈“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问题，当日离泰南下。

△　广东绥靖主任陈济棠召开援黔会议，余汉谋、李扬敬、张达及各师长出席。同日，陈济棠在西南联合纪念周上报告“绥靖”概况，并称“决以第二军四、五、六师组织追剿部队援黔”。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贺龙、萧克部在湘西慈利江垭一带与张万信师等激战后，转移至大庸属后溪。桃源顽石、太平桥一带红军阵地亦遭陶柳、陈子贤两旅及郭汝栋师、罗启疆旅袭击。

△　河北省邮务局局长曹建亭与民营榆关汇通转递局经理黄子固签订承办东北通邮合同，有效期限一年。10日，榆关汇通转递局及古北口分局开始收发东北邮件及经过东北取道西伯利亚之国际邮件。据黄子固电津报告：本日寄往东北邮件达1.58万余件，入关邮件2.6万余件。

△　西藏庄策觉林呼图克图由印抵京，拟北上请班禅入藏。

1月8日　　行政院第一九四次会议决议，以蒋介石兼任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兼教育长。1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为保持渡河安全，便于尔后进出乌江截击红军，是日率郭思演第九十九师进驻贵阳。同日，吴奇伟二路纵队亦已抵达贵阳附近，周浑元三路纵队抵达马场坪、贵定、炉山地区。

△　新任驻华日使馆武官高桥坦、关东军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先后到北平，同访北宁路局局长殷同及滦榆区专员陶尚铭等，续商战区保安队换防、接收马兰峪及取缔日鲜浪人等问题。

△　驻津日军骑、炮、步兵800人举行大检阅，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亲自参加。

△　北平市人民献机救国，购军事练习机五架，是日在南苑机场举行命名礼。

△　国联派遣水利专家聂育夫、顾德等抵开封视察黄河。

1月9日　　胡汉民派刘芦隐到沪，与王宠惠、孙科等会商宁粤合

作办法。

△　凌晨5时，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耿飚、杨成武部进攻娄山关，击退守军黔军第二十五军侯之担部，占领娄山关。下午占领桐梓。

△　陕西省府教育厅长周学昌、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靳志代表陕西省府与法国驻宁夏主教石扬休在北平签订《整理陕西三边天主教产协定》，将法天主教堂所占土地收回。按：陕西省北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堡之捕兔儿滩、白泥井等处东西200余里、南北70余里之地，于清光绪末因教案被法国天主教堂侵占，定期15年。到期后边民纷起索地，几经交涉无效，至此方始收回。

△　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旋乘胜在鄂豫陕边区南部创建新根据地。

1月10日　蒋介石企图在川黔边境消灭中央红军，是日电令各军作如下部署：四川刘湘推进川南，相机进出黔北堵截；湖南何键向黔东“追剿”；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向黔、桂边境推进；薛岳及王家烈向北“追剿”。

△　川军刘湘以14个旅兵力图阻红军入川。所部廖泽、穆肃中两旅开往川、黔边界；郭勋祺旅开往綦江、南川；陈鸣谦部由涪陵南开。11日，刘湘在重庆与川军将领会商。14日，组设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潘文华为总指挥，郭勋祺为总预备队指挥，范士杰为第一路指挥，陈鸣谦为第二路指挥，廖泽为第三路指挥，田钟毅为左翼指挥，徐国宣为特遣支队长。16日，刘湘飞泸州部署防务，下午原机返渝。

△　黔军尾追红军。王家烈部主力向黔北移动；新编第八师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面推进；第一〇二师柏辉章部及第一〇三师何知重部经息烽北渡乌江向遵义、桐梓方面进攻；侯之担部

在仁怀、赤水一带戒备。

△　龙云派滇军第二、五、七等三旅至毕节“协剿”红军。是日滇省府决议组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以孙渡为行营主任。

△　国民政府派毛维寿为“剿匪”军东路第二路总指挥。

△　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在漳州召开全省“绥靖”会议，到各区司令、师长、独立旅长以上30余人。讨论“绥靖、建设、保安团队、民众自卫”等问题。31日，蒋鼎文晋京向蒋介石面陈“绥靖”事宜。

△　热河省遵化县马兰峪日军宫间中队步、炮兵80人到河北省蓟县行军，沿途测绘地势、交通甚详。

△　青岛日侨组工商考察团，赴徐州、海州等地考察。

△　国民党CC系主办的《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幹、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等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称：“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国内“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因此主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应“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　《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号辟《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专栏。周予同、周文宪等认为教育不能救国，“教育不是独轮车，能够载着社会的重担向前推进”，“欲以教育的力量去挽救中国的危亡，那简直是倒果为因，不明社会原理的议论”。周佛海、邵元冲、马宗荣认为教育可以救国，可用教育的方法和力量“以谋中华民族之复兴”。周鲠生、赵廷为、吴俊升等认为“救国的工作是个极巨大的设计”，“教育不过其中的一端”。

1月11日　汪精卫、王宠惠、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在沪孙宅商谈“宁粤团结”问题。会后，汪精卫发表书面谈话称：“中央同人对胡（汉民）态度，三年以来始终未变，即：一、盼望胡先生能来南京共同负责；二、胡先生在港批评可以接受，如有误会则予以解释，若激于意气，远于事实，亦不与较；三、如胡先生有出洋之意，中央同人必乐于赞助，但此属于胡先生之自动。”

△　陈济棠通电出兵援黔，派第二军副军长张达率全军从广州出发，取道梧州、柳州，与桂军会合。桂军第十九、二十四、四十四等师已到黔省都匀、马场坪等地。

△　北平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预定建设工程包括古迹名胜之修葺、公路之修筑等，定两年内完成。该会当然委员有黄郛、于学忠、宋哲元、丁春膏、殷同、袁良、沈兼士、罗耀枢、马衡等人；聘任委员有翁文灏、袁同礼、朱启钤、朱深、程克、陈仲恕、周作民、方觉慧等人。

△　重庆金融混乱，申汇汇水每千元涨至600余元。是日地方银行因挤兑践毙六人，伤15人。刘湘为整理川省财政，特组财政委员会，自兼主席，以郭昌明等为委员。

△　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蜀商电请中央废除川省苛杂。

△　华北规模最大之纱厂天津裕元纱厂因产不抵债，宣告停工清理，工人2300余人失业。12日，工人推派代表分向天津市党部、社会局请愿，提出停工期间发给生活维持费等项要求。28日，经市党部、社会局调停，厂方同意发给解雇费每人数元，并出具证明，保证将来复工时，解雇工人有优先复工之权。

1月12日　国民政府任命焦易堂等86人为第四届立法委员。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遵义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毛泽

东在会上发表《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讲演，朱德向群众说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议选举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罗梓铭、邓云山等25人当选。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等一行200余人抵渝。14日，令川省各军派一高级参谋到行营办公。

△　四川“剿匪”总部决由蓉迁渝。25日在渝正式办公。

△　蒋介石电令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协同晋、察、陕三省会剿土匪杨猴小。

△　《新闻报》载，赈务委员会统计去年全国灾情，计旱灾有苏、浙、皖、赣、湘、鄂、豫、冀、甘、黔、晋11省，369县，被灾农田1.33803亿亩。水灾有鄂、湘、冀、豫、晋、川、皖、陕、赣、绥、闽、察、鲁、黔14省，283县，被灾农田3000余万亩。

△　导淮委员会与上海英商沙逊洋行签订借款23.8万镑（约合华币400万元）合同，年息六厘，分10年偿还。

△　日本千叶县警署无理拘捕华侨14名，诬有“密探”嫌疑，强迫归国。

1月13日　方志敏所率红军抗日先遣队（红军第十军团）在江西德兴县东十六都怀玉山一带，被国民党军以七倍以上之兵力包围。自13日至21日，迭与俞济时部浙江保安团及伍诚仁师等激战于港头、陆庄、分水关、金刚峰等地。一部于16日突围到达福建浦城、崇安。

△　“追剿”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向黔东尾追红军。所部第二十三师向铜仁、江口前进，第五十三、六十三两师向镇远北进，刘建绪自率补充团经天柱、玉屏向铜仁推进。

1月14日　孙科、王宠惠自沪到京，是日两次晤汪精卫商“宁粤

团结”问题。

△　湘旱灾救委会代表刘策成、周安汉与湘旅京同乡百余人开会商赈湘灾，决定请中央发行湘省赈灾公债1000万元，并推定仇鳌率全体同乡向中央请愿。15日，湘旱灾救委会又派傅定祥等到京，向行政院请愿，要求铁道部发还该省粤汉路米盐附加捐款公股740万元。

△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以《新生活运动纲要》为各大、中、小学补充教材。

1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王稼祥、凯丰（何克全）、邓小平等20人参加，博古主持会议并做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与会者批评了“总结报告”的主要错误观点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错误。16日，会议审查了上年12月黎平政治局会议关于黔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议决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赤化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　驻意首任大使刘文岛向意国王爱麦纽尔呈递国书。25日，意大使罗亚谷诺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上发表《和平协作的真伪》一文，指责南京政府对“宁粤合作”缺乏诚意，“团结既未见精诚，国难尤未见共赴”，要求“彻底改变其错误政策”。并举治标意见三项：第一，开放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第二，确定入川“剿共”，对西南各省不作大兵压境之威胁；第三，对朋友、同志不得敌视、暗杀，猖獗杀人之组织须即解散。

△　新疆省府主席李溶、边防督办盛世才以各地报纸报道新疆当

局卖国通外，特电汪精卫、蒋介石，声称：“无论任何国家，无一兵驻在新疆，无寸土为外人侵占，更无机关不遵照中央法令”；借用苏联款项，聘用苏联顾问，“既与主权无损，更为舆论所归”。24日，汪、蒋电李溶、盛世才“抚慰”，要求将借款合同全文及聘用顾问名单报送中央，以完手续。

△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察省沽源县（今属河北省）长梁、乌泥河等地与伪满自卫团冲突，伪军四十余名被缴械。关东军借口宋军侵犯“满洲国”境，命令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自承德开往热察边。

△　国民党中政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到山西唁阎锡山父丧，是日在五台县西会村与阎长谈“团结”。17日抵平返任。

△　《中国实业》月刊在南京创刊。

1月16日　察东形势紧张。是日热境驻赤峰日军若松联队开始向多伦输送，驻多伦伪警备旅李守信部向沽源调动。日机两队共六架亦由承德飞抵多伦。日军主力集结于热境丰宁县，前哨部队则在大滩一带配置伪军张海鹏部约3000人，而以日军千余人殿其后。17日，热河日军宣布，“决以相当计划对待宋哲元部”。

△　抚顺煤矿工人2300人因工人被日人凶殴罢工。日矿师开枪击毙矿工一人。工人800余人拥入煤矿总理室交涉，日总理明古江召矿警包围开枪，死86人，伤66人，捕去600余人。其中28人被日方指为“祸首”，惨遭杀害。

△　国际记者访赣团一行26人自南京出发，赴江西临川、宁都、黎川、抚州、南城等原苏区视察。该团系应国民政府军事、外交当局邀请，由英、美、法、德、日等国驻华记者组成。

△　蒋介石自奉化抵沪，是日在沪访晤段祺瑞。

△　第六路“追剿”司令郭汝栋、暂编第十九旅旅长罗启疆到常德

转慈利，第十九师师长李觉18日赴桃源，各督所部向大庸贺龙部红军阵地进攻。红军向永顺塔卧地区移动。

△　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电各路军总、副指挥严密防堵红军北上，并称“倘不努力，定照江西剿匪条例军法从事”。

△　刘湘电令川省各县长严守境地，实行“政治剿匪”，敢有溺职卸责，贻误军机者，当以军法绳其后。

△　贵州赤水造枪厂工人400余人响应红军举行暴动，焚毁侯之担住宅，与侯部某营激战。

1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闭幕，作出决定如下：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五、会上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

△　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独立第二师师长侯之担因迭失要隘，畏罪潜赴重庆，是日被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拘留法办，所部善后事宜由刘湘负责处理。19日，贺国光在渝各界宴会上声称：侯之担一失乌江，再失遵义，三失桐梓，更复擅离职守，本团为执行职务，不得不予以扣留法办。

△　晨4时，日驻沪陆战队2500余人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演习巷战，荒木指挥，至7时始毕。

△　上海金业、证券、面粉、纱布、杂粮五交易所理事会、经纪人公会联呈国民政府请免征交易所税。

1月18日　蒋介石自沪入京。同日电令南昌行营1月底撤销，往来文件自本月20日起停止收发。

△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常委进行适当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当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下令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先市、赤水、土城集中。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离平南下，过济与韩复榘会晤。

△　湘西红军第六军团萧克部击溃进犯慈利、大庸交界处溪口之朱际凯部后，向大庸金岩山、岩口转移。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日及次日向四川“剿匪”军第二路军田颂尧部苍溪、阆中、南部各防线突袭。第一路军邓锡侯部杨旅六个团到南部增防。

△　国民政府任命孔丘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并分别任命四配（颜、曾、思、孟）裔孙为“复圣奉祀官”、“宗圣奉祀官”、“述圣奉祀官”（后由孔德成兼）、“亚圣奉祀官”，均以简任官待遇。

△　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文告，妄称察哈尔省沽源县乌泥河一带为伪满领土，关东军将进击该地驻军宋哲元部。同日，日驻平武官高桥向宋哲元提出警告，声称独石口至沽源一带系属伪满热河省，要求宋军迅速撤退，否则即将采取断然态度。

△　日军擅在天津南开八里台建筑飞机场。是日，日航校高桥少佐、关东军航空队斋藏大尉偕天津日驻屯军参谋川口到机场视察。

1月19日　日伪军进犯察哈尔省沽源县境，主力部队由大滩向沽源移动，另部由大阁镇向独石口推进。

△　日使馆武官高桥向何应钦发出通知，略谓宋哲元不履行前约，于15日在乌泥河袭击“满洲国”自卫团，掳去40余人，“关东军不能坐视此种暴举，决定派兵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的该地方”。何应钦

令宋哲元“让步”：将长梁、乌泥河及其他处所民团机关等撤至后方，将驻守东栅子步兵连撤至独石口附近，改用保安队担任东栅子警戒任务。并令宋在长城以外竭力避免冲突，以免日军借口。

△　黄郛到京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华北政情，蒋表示日军进攻察东系“地方事件”，应“就地解决”。20日，黄又见汪有所商谈。

△　“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抵常德，指挥所部向大庸贺龙部红军总攻。22日，湘军陈渠珍部陷永顺。23日，第六十二师陶广部、第十六师章亮基部与红军激战于大庸黄庄坪等地。

△　刘湘派王蕴滋到西安，与杨虎城商川北“剿灭”红军军事。

△　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分三个纵队向赤水、土城攻击前进，拟从泸州上游渡长江。红一军团为右纵队，集中松坎，为红军向赤水转移作准备；红五、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中央纵队；红三军团为左纵队，担任后卫，掩护红军撤离遵义。

△　悍匪刘桂堂抢劫燕山口、界岭口两税卡，缴去枪30支，税款7000余元，已扩充至六七百人，声势甚大。

1月20日　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与日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在张家口谈判察东事件，秦表示愿意让步。松井要求察省当局派员到大滩和日军旅团长谷寿夫商谈。25日，日军第二十五联队永见联队长又致函秦德纯，要求派代表往大滩会谈“和平”解决办法。

△　何应钦致电汪精卫、蒋介石及黄郛，内称：“关于对日外交，应请中央从速决定根本政策，否则实属无法应付。”

△　王宠惠分访汪精卫及蒋介石，商谈迎胡汉民合作问题。

△　何键以陈渠珍拥兵割据湘西，为削除其势力，令陈将所辖七

个旅及独立团缩编为一个乙种师，余均遣散，税卡及造械机关悉撤销，所遗防区由陶广师接充。28日，何又颁整理湘西军政办法八项。

1月21日　黄郛向林森报告华北政务。同日，汪精卫偕同黄郛到军校见蒋介石。24日，汪、黄复同赴军校见蒋，晤谈甚久。

△　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与汪精卫、黄郛、唐有壬就察东事件举行预备会商。

△　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政训处长康泽进京，向蒋介石请示调特务入川事。康已调派特训班学员、别动队队员多人，准备月底赴川成立各军政训处。

△　新十师师长萧乾由闽福鼎乘轮赴霞浦“督剿”红军，途中船舱汽锅爆裂着火，萧跃水溺毙。副师长黄懋如暂代该师师长职务。

△　中、意两国无线电通讯开始正式通报。

△　京芜铁路芜（湖）当（涂）段正式建成通车。

1月22日　下午6时许，热西日伪军千人，飞机四架，装甲车十余辆，大炮20余门，分两路向察东大举进犯：一路由大滩沿长梁、乌泥河向沽源县城方面攻击，一路由大阁镇向独石口方面攻击，战争甚烈。

△　驻津日军为配合日伪军侵犯察东，擅入华界武装游行示威。25日，日军500余人复在日租界演习巷战，梅津亲自检阅。26日，日步兵200余人续在津演习。又古北口日军自23日至27日，连日在白河流域演习野战。

△　中共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协同中央红军作战，“以群众武装及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

△　红三十一军王树声部为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行动，攻占广元东北之转斗铺，歼守敌第一师胡宗南部第一、第二两游击支队。该军第二十五、第八十八两师自朝天驿渡过嘉陵江，包围羊模坝胡宗南部罗团。23日对羊模坝发起攻击。同时，红三十一军另部于广元、昭化间突破嘉陵江防线，占广元西之河湾场。24日围昭化。25日对守昭化之胡宗南部独立旅甘（竞生）团进击。27日占广元城郊飞机场。29日又占广元外围五龙堡。广、昭之胡军据城顽抗，攻城数日未下，红军乃主动撤广、昭之围，于月底将主力转至嘉陵江东岸。广、昭之役至此告一段落。

△　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第六十七届议会上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问题发表演说，略称：“中国共产军虽西移，日本政府不得不继续予以关切；各地排日风潮仍时有所闻，日本政府甚引为遗憾。日本极重视东亚诸国之和睦，故期望其能共同负担东亚和平及秩序维持之重责。因此日本政府切望中国之安定及对东亚局势之觉悟，并望中国谅解日本在东亚之势力及地位与日本之真意。”又称：“中国倘能将排日及抵货运动完全停止，日本政府将予以精神上、人才、物质上之援助。”

△　苏联与伪满、日本谈判出售中东路问题，历时一年半，会谈40次，是日达成协议：苏将中东路权作价1.4亿日元售予伪满；由伪满负担苏职员退职津贴。并确定由日本外务省欧亚局第一课长西春彦、苏联远东部长柯兹罗夫斯基、伪满外交部次长日人大桥忠一组成起草委员会，草拟中东路买卖协定。

△　国民政府派李敬明为陆军第三十军副军长；任命池峰城为第三十一师师长。

△　统一水利委员会在南京开会，到委员李仪祉、孔祥榕等20余人，讨论统一水利工程计划，并通过修正各水利机关组织章程。

1月23日　晨10时，日机在察东东栅子投弹七枚。11时，日关东军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又在该处发40余炮，保卫团团员及居民死伤40余人，全镇成为瓦砾。12时，日步兵向独石口东北方之长城线进犯。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三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经常、临时两门共计9.18111034亿元。岁入以关税为主，约3.8亿元；岁出以军费为主，约2.9亿元。

△　湘、鄂“追剿”军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贺龙部红军进行“围剿”，是日将第一线部队编成六个纵队：郭汝栋纵队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鸡口、大庸进攻；李觉纵队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断架山、大庸进攻；陈耀汉纵队由新安、石门向江垭、桑植进攻；陶广纵队以第六十二师主力进攻大庸，第十六师进攻永顺，新编第三十四师主力在红军根据地西部筑碉推进；徐源泉纵队和张振汉纵队由来凤、龙山地区向塔卧推进。

△　蒋介石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划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为特区，委王亦潜为该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率兵驻扎，图阻湘西红军向川、黔推进；另委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上官云相为该部第一路总指挥，图遏阻红军向鄂西发展。

1月24日　红一军团主力通过习水境内东皇殿、图书坝，击溃黔军刘翰吾旅残部，占领土城。林彪率红一军团大部队开进土城。中央纵队后卫红五军团与川军模范师第三旅郭勋祺在吼滩遭遇。次日，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抵达土城。董振堂、李卓然率红五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率红九军团分别开进东皇殿。至此，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均集中在赤水以东、土城以北地带。川军刘湘派郭勋祺旅尾追红军，企图与中央军周浑元部、吴奇伟部夹击红军。

△　上午11时，日机两架侵入察东独石口投弹八枚，下午3时投弹五枚，死伤军民20余人，毁民房50余间。又在东栅子投弹三枚，死伤

警民20人。是日，日军永见部队侵占东栅子。沽源方面又增日伪军千余人。

△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检查新闻原则：各报得自由发表善意言论，但凡对于国民党党政之设施持反对言论或涉及军事、外交之秘密，以及宣传与国民党不相容之主义者，均不得刊布。2月11日，国民政府据此训令各机关遵照执行。

△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高中一年级学生自4月11日起集中军训三个月。

△　去夏长垣黄河决口，鲁西寿张、阳谷、濮县、范县等县今仍水深三四尺。刻黄水续涨，灾情惨重，是日，灾民代表10人向鲁省府请愿，要求免征丁银，并速堵口。

1月25日　立法院开秘密会议，由孙科报告察东情势。

△　沽源以东南北石柱一带，又增日军一联队约1600人，前线日军合计约3000人，由永见指挥。伪军约2000人，由王永清指挥。承德、大滩间后方日军增至5000余人，并有日机一队共九架，时出活动。

△　《东方杂志》刊载许达生著《中国金融恐慌之开展》一文，称："截至1934年12月28日，去年全年白银外流共3.56160958亿元，较1933年外流增加2.5亿余元。上海存银1933年底为4.9亿余元，占全国存银之半，一年之中竟流出大半。"

△　股匪杨猴小部经绥远窜入陕西榆林，被陕军井岳秀部击溃并收编。

1月26日　红一军团军团部移驻赤水河边的丙滩，红一师到达旺隆场、七星坎、小关地区，与川军章安平旅在黄陂洞地区遭遇，激战五小时，红三团损失严重。

△　日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自张家口到北平，会同日使馆武官高桥，与察省外交特派员岳开侁、战区整委会委员朱式勤会商察东事件解决办法。

△　宋哲元电中央报告察东情形。下午，中央复电称："察东事件系'地方事件'，由地方交涉解决。"

△　何应钦为察东问题致电蒋介石、汪精卫，内称："为谋一劳永逸计，似不如于中日双方会谈之际，将察热边界即多伦方面纠纷情形，一并提出解决，已设法微露此意于高桥，谓如关东军愿将多伦方面纠纷情形一并提出解决，则此间可以请示中央办理等语。"

△　国民政府令准免许心武省立河南大学校长职，以杨震文继任。

△　教育部开会商讨编制简体字谱及注音符号推行问题，决定编简体字以力求易写、易识、笔简为原则；至开铸注音字模事，由汪怡、黎锦熙赴沪调查研究后再定。

△　教育部令山东省教育厅调查孔丘及颜、曾、思、孟后裔，列名呈报，以凭发给公费，资助升学。

1月27日　　土城之战。毛泽东令红一军团夺取赤水县，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进入阵地，击败从习水尾追红军的川军郭勋祺旅。是日，郭旅抢占土城北面青岗坡和石羔嘴东南，向土城步步进逼，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红四师的联络，红军形成背水作战。次日，敌我双方在石羔嘴、凤凰嘴、青岗城反复争夺。川军潘佐旅增援，打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所前沿，陈赓率中央纵队干部团拼死抵抗，红一军团红一团跑步前来救援，仍处于不利态势，红军撤退时，受敌人的突然袭击，朱德亲自带一个排的兵力掩护，安全撤出。此役系遵义会议后第一次大仗，红军损失巨大。

△　红十军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被国民党军围困10余日，损失殆尽。是日，方志敏在德兴县陇首村突围时，被独立第四十三旅刘震清部所俘。方志敏坚贞不屈，在狱中著有《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8月6日，在南昌百花洲从容就义。

△　日军强占察东东栅子，越过长梁、乌泥河一线。28日复退出东栅子。日军300余人占据距沽源城东约15里之乔家围子及义合成两村。

△　日军今起在天津南良王庄一带实弹演习三日。29日，驻平日军300余赴昌平县沙河、南口作耐寒演习。

△　据中央社重庆电，川“剿匪”总部令该省沿江各县克期完成碉堡，以资防守。又电川南12县成立联团临时办事处，定公约12条，设四道防线抵御红军。

△　蒋介石通令，凡红军“尚未肃清”地区，概禁外人或商旅往来。

△　青海活佛兴萨班智达呼图克图由平赴京，参加普济法师受封礼。

1月28日　胡汉民所派代表李晓生抵沪，是日与孙科、王宠惠会谈。李称胡仍留香港，并无出洋及北来意。王宠惠于29日、30日分别见汪精卫、蒋介石，对宁粤团结问题有所商谈，并访林森、居正、于右任交换意见。

△　国民政府派李骏为议订《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　晨，日机三架在热河省丰宁县大滩西20公里断木梁投两弹，死伤村民30余人。

△　桂军免黄镇国第四十三师师长职，以韦云淞继任；调第七军参谋长郭凤岗为第四十五师师长。

△　财政部赋税司长高秉坊在该部纪念周上报告，废除苛捐杂税已达2600余种，计2800余万元。

△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第七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说，称："苏联对于中国各部（包括新疆在内）之独立与不可侵犯，为无条件之拥护者。""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与外国以武力占据中国之领土。"31日演说中又主张"日本撤退满洲之驻军，保证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

1月29日　日使馆武官高桥在北平见何应钦，要求在大滩会谈。何应钦主张先在北平谈妥，再在大滩定议。上午11时许，岳开侁晤高桥，商察东问题。

△　驻华日公使有吉明来华，是日下午偕参赞有野访汪精卫，要求彻底取缔排日运动；并谓"察东问题不致扩大，可就地解决"。

△　大滩日飞机场已竣工。是日有日机三架自承德飞来。长梁、乌泥河已设伪警所，由日军指挥。

△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军委纵队由猿猴（今元厚）、丰溪口等处渡过赤水河，成为入川大军之右路，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由土城浑溪口渡过赤水河，翻越拖枪岭，成为入川之左路。是日中午，中央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

△　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通电在川各路将领："嗣后军事长官须常驻指定地点，倘仍玩忽，或因之失地丧师，以抗命辱职论罪。"

△　行政院决定，旧财政部核准之各银行发行纸币权，凡已停业及未开始发行者，概予取消。

△　刘湘以廖泽“剿匪”不力，撤去其第三路指挥及副师长职务，保留旅长，责令“戴罪图功”。

△　伪满外交部发表公报称，境内吸食鸦片者90万人，年消耗鸦片约达1640余吨。此外，千人中有七人吸食经制造过之毒物，共达21万人。

1月30日　　下午1时，殷同偕朱式勤与高桥在平谈判，日方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国对察热边境不幸事件口头表示遗憾；二、察省如数交还所收热河民团的枪械；三、中国军队将来绝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以东地区，并不得有威胁行动。商定下月1日至3日在大滩开察事“和谈”会议。

△　日公使有吉偕日驻京总领事须磨等见蒋介石，谈“中日亲善”问题。蒋称：“中日应该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遗策。”有吉对会见结果表示满意。

△　甘乃光向行政院请辞内政部政务次长及代部长职。

△　国联交通组长哈斯抵沪，继拉西曼任国联对华技术合作联络员。2月11日抵京，旋赴各省视察交通水利建设工程。

1月31日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鲁涤平病卒。2月2日，国民政府追赠鲁为陆军上将，并明令褒恤。

△　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大连发表谈话称：“日本坚信设立满洲国为远东和平之初步，如有任何因素足以扰及该国时，日本将以其生存为赌注。”又称：“中日友谊之根据在中国驱除共党与取消反对日本之态度。”

△　旅日被逐回国华侨至本日止已达30批，共239人。

是月　蒋介石以徐道邻名义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敌乎？

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宣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的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并谓：中日两国“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按：该文系蒋介石分章口述，陈布雷笔录，用徐名发表。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

△　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两个团进入陕南，并自湖北调第四十四师第一三〇旅至上津、白河，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第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在镇安歼灭第一二六旅三个多营，开辟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境工作。

△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派宝贵廷潜赴多伦，与伪满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李守信及日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山联系，商定从内蒙东部各盟旗招兵，在李守信隶属下成立一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

△　去冬退入苏联国境之吉林抗日自卫军李杜部3000余人经西伯利亚到达新疆伊犁。

2月

2月1日　　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略谓：“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中国人民因迭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感情，与日

本对华激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凡636条。

△　中日代表赴沽源转大滩会南察东事件。

△　刘湘电告全省：自民国二十四年起，田赋一年一征；在军事未经整理就绪前，暂照一年田赋数目附征临时税一次；凡百货物，完税一次后，省内贩运概不重征。

△　新任长江上游海军司令曾以鼎乘“民权”舰抵汉视事，川、湘、鄂舰队均归其指挥。

△　红二十五军大部在陕南蔡玉窑，小部向柞水前进。国民党军张飞生旅向柞水尾追。红军阻敌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于庙沟口，激战竟日。2日向曹家坪方向前进。

△　中共中央电报指示湘鄂西红二、六军团，要利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相互间的矛盾，“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作战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并确定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随后，红二、六军团依据这个决定组织军委分会，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

△　关内开始收递东北包裹、邮件。

2月2日　　蒋介石以红军已西入滇边，命令改编湘、黔、滇军为“剿匪”军第一、第二两路军，各辖四个纵队。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以主力“围剿”贺、萧红军，一部封锁黔东。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以主力集结滇、黔边境，“围剿”朱

德红军主力。

△　国民政府公布《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

△　蒋介石为处理南昌行营结束事宜离京赴赣。

△　军事委员会电各军悬赏“缉拿”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等，凡“生擒朱德、毛泽东、徐向前之一者赏洋十万元；生擒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之一者赏洋五万元”。

△　川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由绵阳赴梓潼指挥所部在川北广元、昭化前线对红四方面军作战。

△　上海各业因年关结账，银根紧张，荣康、益康、德昶、顺记及宝大裕等钱庄相继停业。其他各业也停闭甚多。是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开紧急会议，决拆放1500万元，以资救济。

△　上午11时，中日代表在热河省丰宁具大滩举行察东事件“和平”解决会议。察省府代表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沽源县长郭堉恺；日方关东军代表为第七师团第十三旅团长谷寿夫、第二十五联队长永见、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伪满丰宁县长亦与会。会谈半小时即结束，订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兵。

2月3日　　察东日军向热河撤退。长梁、乌泥河、南北石柱子及东栅子一带，由保安队及民团维持。

△　中央红军因刘湘重兵阻截，放弃原定渡江计划，以一部佯攻川南叙永，牵制川军；大军则南向云南扎西进军。

△　红四方面军向北发起陕南战役，进攻与红军订有互不侵犯协定的陕军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部。是日由广元黄坝驿一带向孙部宁羌外围贺家梁、七星池等阵地猛攻。4日占宁羌城。

△　张樾亭返平，向宋哲元、何应钦报告大滩会议经过。

2月4日　　国民政府特派徐源泉为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免去其原鄂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兼职。

△　北平军分会公布中日大滩会议口约解决察东事件办法如下：“日军即返回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所有前此二十九军所收热河民团之步枪，计37支，子弹1500粒，准于本月7日由沽源县长如数送到大滩，发还热河民团。”同日，日方公报则称：“日方提出要求：一、中国誓不以兵力侵入‘满洲国’境，或对‘满洲国’威胁。中国并立誓严禁刺激日本之行为，中止所有现在侦察关东军之行动。二、如中国违反此誓约，日本将采断然自主之行动，责任由中国负之。中国所有企图增强阵地、增加兵力之行为，日军将视为挑战之行动。三、中国所征收之‘满洲国’民团武器，应由沽源县长于2月7日以前全数送到南园子交日军。”并宣称以上各条均经宋哲元代表“承认”。

2月5日　　晚，中共中央常委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在川滇黔边界的云南扎西水田寨开会，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正式接替博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蓝田县葛牌镇击溃陕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第二五一团，并在九间房歼灭第二四八团之大部。

△　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等军在陕南分三路从镇锁关、宁羌、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孙蔚如急调第四十九旅王毅武部经沔县向西驰援。

△　行政院决议增加中央银行资本6000万元。

2月6日　　日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奉命侦察中国南北形势，是日偕北宁铁路局长殷同、蓟密区专员殷汝耕到北平。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军委会所拟《剿匪省份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准予备案。

△　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图歼灭中央红军于川南古蔺、叙永一带山地，令第二纵队周浑元率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等三个师，向土城、仁怀一带推进；第四纵队王家烈部第一〇三师主力向赤水、土城推进，独立第二旅杜肇华部向桐梓推进，新编第八师蒋在珍部扼守松坎；第一纵队吴奇伟部扼守黔西及乌江渡口沿岸一带，相机策应第二、四纵队。各部限于7日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再向古蔺进展。

△　川北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杨秀春师击退河湾坝抢渡嘉陵江之红四方面军后，是日占领羊模坝。

△　江西“绥靖”公署在南昌召开全省“绥靖”会议，顾祝同主持，到各“绥靖”区司令、各纵队指挥官、各行政督察专员等40余人，通过军事、交通、党政等要案多件。7日闭会。

△　财政部令海关免征土产出口税。

2月7日　　土肥原在北平扶桑馆与殷同、殷汝耕等密谈后，与何应钦、汤尔和、王克敏等会晤，并相互宴请。8日，土肥原接见记者，略谓：“中日关系前途已露曙光，依余考察结果，相信政府方面确甚和蔼可亲；人民虽偶有冲动，亦不难改善。”又谓：“徐道邻所撰之《中日关系之检讨》，确为解决中日问题之一途径，希望双方根据此篇文章共同努力。”

△　日陆相林铣十郎在众议院预算第四分科会议上谈对华关系，称：“日须充分援助‘满洲国’之发展，对华关系非圆滑进行不可。”

△　中英庚款会议议自民国二十四年度起年拨款110万元作为补助文化教育基金，以三年为期；其中以80万元办义务教育，15万元办职

业教育，15万元补助国立大学健全研究所。

△　东方旅行社呈准铁道部，增办关内外货物联运。按：该社由中国旅行社和日本国际观光局共同投资设立。

2月8日　　立法院修正通过《交易所交易税条例》，将原定税率酌予减低。12日，沪市纱布等五交易所经纪人公会仍感不胜负担，电请中央缓征。

△　自美国实施“白银政策”，提高银价，收购白银后，我国现银陆续大量外流，沪市存银骤减，虽经港银运沪补充，现银仍极短缺。是日，华商银行存银2.99812亿元，洋商银行存银3510.1万元，共3.34913亿元。与去年同日相较，计短银2.06亿余元，均系去年流出。

△　班禅额尔德尼在宁夏阿拉善旗西陲宣化使公署就西陲宣化使职。

△　红四方面军向陕南新铺陕军王毅武部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歼敌一部。9日溃敌一个骑兵团，占沔县。

△　川军彭诚孚师陷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县。9日陷通江。

2月9日　　蒋介石为探明日方对中日关系的真意，特自牯岭电汪精卫，提议由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乘返海牙任所之便，取道日本东京，访日当局交换意见，“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11日，汪电黄郛，嘱其与王商量此事。

△　国民政府任命刘湘兼四川全省保安司令。

△　沪交通、金城、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四省农民五银行为避免互争农贷，特合组中华农业贷款银团，推李钟楚、邹秉文为常务理事。本年计划以棉麦贷款为主，总额500万元。

2月10日　　张学良、蒋鼎文、顾祝同、刘镇华、熊式辉、赵观涛、毛炳文、罗卓英等高级将领及江西各“绥靖”区司令应蒋介石电召到庐山听训。

△　四川省府主席刘湘及各委员在重庆宣誓就职。贺国光在就职典礼上致词指出，四川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

△　土肥原自平到津，由日驻军高参大木陪同访晤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11日，访晤天津市长张廷谔。同日，于学忠招宴土肥原，并邀高桥、殷汝耕等作陪，席间对战区未了问题略有商讨。13日，黄郛致电蒋介石报告土肥原在平、津活动情形，“要点仍在‘多方侦察究竟为敌为友’”。

△　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偕萧振瀛见何应钦，报告察东事件解决经过。

△　《文化建设》第一卷第五期刊载郑振铎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意见，称：“文化问题固然重要，但中国民族本身如何能生存，却是更大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如何使民众都有自觉的为生存的斗争心，是今日的急务，而恢复旧文化却是死路一条。”

2月11日　　内政部会同行政院、中宣会代表审议修订《出版法》，修正内容有：一、增加地方权限；二、登记办法改为县府转呈；三、禁载限制较严；四、登记须纳保证金等。

△　中央红军占云南扎西，右路与主力大军会师。在扎西进行短期休整，扩军3000多人。13日乘敌后空虚，分两路由扎西、镇雄间回师川南，进入古蔺属营盘山。

△　战区清理委员会殷同、殷汝耕、陶尚铭等与日使馆武官高桥、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在津会商战区有关事项：新保安队开战区

换防办法，取缔滦东日韩浪人问题，马兰峪东陵接收事宜和玉田保安队、民团管理问题。

△　秦德纯由平抵津，向察省府主席宋哲元报告察东问题解决经过及善后情形。

△　刘湘第二十一军通令四川戍区各县县长，即日起将一切政务归还省府。15日，邓锡侯、罗泽洲电刘湘交出政权。20日，蒋介石电令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李其相、罗泽洲、杨森等，“妥商接收各戍区办法，克日移交具报，无稍瞻顾”。

△　辽宁省兴城县因日军收缴民枪，滥杀居民，壮丁百余人奋起反抗，被日军包围，枪杀过半。

△　英李顿爵士在美国演讲，鼓吹英、美联合抵制日本独霸远东。

2月12日　黄郛访王宠惠谈访日事。王表示准于16日赴日，已直接向日使有吉说明顺道访日之意。黄认为：“访日见人范围及谈话程度颇费斟酌，过露恐被利用扩大宣传；些微不露，又恐失访日意义，杳无所得。”

△　外交部为明了各省交涉署裁撤后地方接收办理涉外情形，特设视察员视察一切。是日，行政院通过《外交部视察专员办事处规程》，全国共分11个视察区，各设视察专员一人。

△　王晓籁当选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　中央银行公告收兑杂色银料，并定25日起先在沪开始收兑。

2月13日　殷同、殷汝耕、陶尚铭与日方代表高桥、仪我等在天津商定新编保安队开入战区原则：保安队5000名，警察4000名，共9000人；携带武器大枪数与兵数同，小枪数与官长数同，机枪每中队

两挺；东开时，由日使馆武官高桥、天津日军参谋川口及战区清理委员朱式勤共同点验。14日，战区清理委员会根据与日方所商原则，讨论实施步骤。

△　侨务委员会以暹罗政府宣布将于4月1日起封闭侨校，凡九岁至14岁华童均须转入暹校学习，特会同外交部、教育部讨论应付及救济办法。

△　汪精卫自京赴沪；次日与孔祥熙在沪商财政问题。

△　苏北贾汪华东煤矿公司有内工500名，外工1700名。外工以待遇不公，屡请加薪未遂，是日要求在煤井避寒，又遭矿警弹压，遂举行罢工，封闭煤井。18日，经国民党铜山县党部、县政府派人调停，商定解决办法：一、酌加外工工资每人每日三至五分；二、在矿场修建外工休息房间；三、酌给殴伤工人恤金；四、调走监工。劳资双方同意，19日全矿工人复工。

△　东北电信转报局成立，局址设榆关，由电信局退职人员负责，性质与汇通转递局同。

△　日第三舰队司令百武抵广州，访粤省当局。17日去香港。

△　越南增收华茶税，每斤自0.8元增至1.6元。是日外交部照会法使请制止。

2月14日　　蒋介石在庐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略称："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排日之必要"，中日"经济提携""应先从改善两国间之现状，并恢复其正常关系做起"。

△　汪精卫在沪与王宠惠谈访日事。次日，黄郛与汪精卫、王宠惠晤商对日问题后致电蒋介石报告，内称："三人共同详密研究决

定：（一）谈话程度，以京中所定四项原则为限度，而以探实彼方真态为主旨。（二）见人范围以外部为主体，旁及军事，以事敷衍，而免忌妒，但回避参部，以防利用。更与法界及国际法学协会等团体周旋，以资点缀。……”16日晨，王宠惠乘比“亚士总统号”轮取道日、美转欧返任。

△　国民政府公布《驻赣绥靖公署组织条例》、《驻闽绥靖公署条例》。

△　国民政府令准免李元鼎审计部部长职；特任陈之硕代理审计部部长。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三万余人进攻陕南南郑、褒城，自是日至25日，在褒河以西地区与陕军第四十九旅王毅武部、第五十一旅赵寿山部大小激战10余次后，向宁羌转移。26日弃沔县城。

△　日外务省听取驻沪商务官横竹对中国经济现状之报告后，协议“中日经济提携”意见三项：一、中国取缔排日运动为“中日经济提携”的前提。日本由中国购买棉花、农产品、铁、羊毛等原料，同时对中国输出工业品、机械类及杂货；二、为安定中国经济界，消除金融恐慌，促进中日贸易，在沪设立二亿元信用制度；三、研究白银流出所发生财政不安之对策。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梅津偕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矶谷到平，当晚何应钦招宴。16日，矶谷偕高桥等访晤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对该省军政情况探询甚详，并称：“际此中日关系好转，两国实有联合必要，希本已往中日亲善之意，共同维持东亚和平。”

△　中国旅行社声明承办平沈通车期满，于1月1日起依约停止参加与日方合组之东方旅行社。

2月15日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暨豫鄂皖边区各总指挥、军长、师

长，限本年4月前将该边区红军肃清，红军重要首领全部捕获或加斩杀，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

△　蒋介石分电鄂、豫、皖、赣、闽等省府主席，“确定建设及绥靖中心工作，以三个月为一期，按计划办到。第一期中心工作，限5月底完成”。

△　蒋介石令何键按计划“进剿”湘、川边境红军。何键25日赴常德，26日电令李觉、陶广、陈渠珍等师以主力协同徐源泉部，将湘西红军“包围于大庸、沅陵、桑植、永顺地区聚歼之”。

△　国民政府派俞家骥代何其巩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

△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包华国为出席第十九次国际劳工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并指定李为第一代表。

△　陕西“绥靖”公署电令第四十二师将该师驻防陕北部队悉数南调商雒“协剿”红二十五军。

△　张学良在庐山曾数次与蒋介石商“剿”红军军事，是日下午飞返汉口。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梅津偕参谋大木自北平赴张家口“考察”。

△　日关东军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访冀省府主席于学忠商谈新保安队开入战区问题，人数仍维持5000名，除携步枪外，得携轻机枪50挺，会谈至此结束。下午仪我离平经津转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复命。

2月16日　财政部金融顾问委员会在沪成立，委员21人，以孔祥熙为主席，张公权为副主席。该会为政府之财政顾问机关，亦为金融之辅助机关，其任务为听取银行界、商界建议，研究改进通货、安定

汇兑行市、改善国际收付、调剂内地金融等问题。是日第一次会议，讨论奖励白银进口办法，通过复出口白银免纳出口税案。

△　蒋介石由牯岭飞南昌。

△　国民政府赴藏致祭达赖专使黄慕松取道印度返国，是日抵京，发表藏行观感称："藏民坚心内向……藏局确极危险，驻大吉岭之英军只须六日即可到达拉萨。西藏当局处境困难，心存期望，意含责备，惟有大力助其建设，始不负彼团结之诚意。"18日，黄向汪精卫报告藏行经过。

△　土肥原由青岛抵沪。18日访晤吴铁城、黄郛及段祺瑞等；19日晚赴京。土肥原离沪前对记者谈："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中日关系近渐好转。"又称："中日争端可以终止，但边境冲突或属不免。"

△　殷汝耕访日武官高桥，商谈接收马兰峪及东陵问题。日方意见先交还政权，待承德至古北口、承德至山海关两铁路筑成后再撤驻军。决定由高桥请示关东军后再作具体协商。

△　新疆建设厅长高惜冰抵平见何应钦，何对外传新省与苏联关系问题有所询问。即晚，高对记者称："新省俄籍顾问一部已回俄，现仅余六七人。外传向俄借款，系俄垫款，计500万卢布，分五年以土产还清。"

△　日商在青岛沧口附近之沙岭庄设丰田、上海两大纱厂，资本均千万元。

2月17日　蒋介石在南昌接见赣省军政长官，指示"绥靖"工作方针。

△　陕西"绥靖"公署悬赏一万元，"缉拿"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郑位三。

△　财政部币制改革委员会合并于金融顾问委员会。

2月18日　中央红军于是日及次日分由川南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击溃黔军侯汉佑、犹国才部三个团及陆阁湘民团，至21日全部渡过赤水，再入黔北。23日至高桥。25日击溃黔军王家烈所属第四团蒋德铭部，克桐梓。黔军独立第二旅杜肇华部奉令向桐梓尾追，到达遵义北郊。

△　上海市面萧条，地方协会、商会、银钱业公会负责人杜月笙、俞佐庭、陈光甫、秦润卿、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以及银行界其他负责人林康侯、贝淞生、李馥荪等十余人，集议稳定市面、共渡难关办法。22日，杜月笙等六人晋见财政部长孔祥熙，请拨巨款稳定市面。孔应允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承办货物抵押放款；至地产押款，尚待研究。

△　长沙各界举行提倡国货运动大会，到民众5000余人。

2月19日　蒋介石为“新生活运动”一周年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新生活运动目的在以吾民族固有美德之礼义廉耻为国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之规律。”同日，在南昌讲话中妄称“新生活运动”可以“根本铲除”“赤匪共逆”。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密饬各省、市切实劝告停止检查日货及抗日组织活动。

△　财政部公布《奖励外银进口办法》，规定：凡由外国输入现银（每次至少不得在50万盎斯以下），得向海关登记，将来复出口时，准免正、附各税。

△　王宠惠抵东京。20日访日外相广田，交换“亲善”意见。王称：“中国排日风潮渐次消灭，远东和平实赖中日合作亲善，中国愿促进中日经济提携，希望日本予以好意援助。”广田答称：“中国果真

能严禁排日，披沥诚意，日本将予以一切援助。”

△　国民政府以瑞典人斯文赫定勘察绥新公路有成绩，特颁给大绶采玉勋章。按：斯文赫定利用担任绥新公路勘察队队长职务，在我西北各省盗走大批文物。

△　行政院电福建省府准厦门设市，以商埠范围为市区，取消思明县。

△　河北滦县保安队长刘佐周擅将民团统治权收归其指挥，并令每五户月出一丁饷。民团愤与抗争，于15日被缴械，发生冲突。经该县县长等调解，是日冲突始停，双方死伤百余人。

△　日军中尉队长三井率士兵40名，以护侨为名，从山海关开进河北省昌黎县城。次日，在昌黎筑兵营。

2月20日　　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外交方针，宣称：“中国愿意与任何友邦保持友谊与和平，中日两国所发生的纠纷，可用诚意来解决。广田外相的演说，与我们素来主张大致吻合。”

△　蒋介石电知各军政机关：南昌行营已结束，武昌行营于3月1日开始办公，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月底撤销。

△　蒋介石电四川省府主席刘湘，及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罗泽洲、李家钰各将领，谓：“今值该省府改组成立，各军将领已先后宣言打破防区，交还政权……殊堪嘉慰。”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特许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列席中央政治会议。

△　土肥原到京。次日访晤汪精卫、孙科等。汪设宴款待，陈立夫、朱家骅、唐有壬、曾仲鸣等作陪。22日，土肥原自京抵沪。

△　日新闻记者冈本房男等在汉口访问张学良，提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对“满洲国”的感想、取缔“排日”、讨共方针等九个问题，要求解答。张答称：“余系军人，以个人立场关系，不便发言。”

△　天津日军300余名在日租界演习巷战。21日，日军百余名又在日租界演习，机枪、坦克车、迫击炮及电信队均参加。街口遍设防御工事，交通断绝，至下午4时始毕。

△　黑龙江省北安镇至黑河间铁路，由日、“满”修筑完工，是日开始搭载客货。

2月中旬　上海外汇平市委员会委托中国、交通两行自港购银运沪，先后已到七批共293.65万元。原计划购银2000万元，现因港市银价提高，故改向英国伦敦购买，首批300万元已装轮驶沪，另1000万元正在洽购。

2月21日　王宠惠在东京分访日首相冈田启介、外务次官重光葵、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探询日方对“中日亲善”之真意。王对林铣言：“中国当局并无依托欧美排斥日本，中日提携系属大道，希望两国努力扫除障碍。”下午，王发表声明，称此次“趁过日机会，以私人资格，将中国方面普遍心理传达于日本朝野人士；并愿将日本朝野之意见传达于本国，借以增进两国友谊，此外无他任务”。

△　蒋介石自南昌抵汉口，接见张学良、何成濬、张群，询“剿”红军军务及政治设施。

△　日外相广田在众议院赤字公债委员会席上阐述对华政策，略谓：“余对蒋介石氏之态度，丝毫不怀疑义，若此信念推翻，不啻使东洋和平之方针为之瓦解。日本之永久安全市场在于中国，先成立经济联络，再谋民间提携。”

△　国民政府任命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

△　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主力到达黔北仁怀，先头部队第三十八旅到达茅台。第三纵队孙渡部由滇北之威信、镇雄东进，所属第二旅安恩溥部已抵分水岭，第五旅鲁道源部、第七旅龚顺璧部进至双和场。第四纵队第一〇三师何知重部进抵赤水附近，主力向土城推进。时中央红军已回师贵州。

△　何键任刘建绪为第一路军前敌总指挥，陶广、李云杰、李韫珩、李觉为第一、二、三、四纵队司令；原有“剿匪”军名义取消。

△　驻苏大使颜惠庆、出席苏国际电影展览会代表周剑云、胡蝶及应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之梅兰芳等一行30余人，乘苏轮“北方号”离沪驶海参崴转莫斯科。5月1日返国。

△　天津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由津到平检阅日军。22日，酒井及日军官14人到大、小汤山及昌平县一带窥察地形。

2月22日　王宠惠访日递信大臣床次、民政党前总裁若槻、外相广田、众议院议长滨田。晚，王在滨田举行的招待会上致词称：“广田恢复中日国交之演说，中国以诚意欢迎之，中国在事实上竭力消除对日不愉快之事，不愉快之原因。”

△　何应钦派毛侃等赴陕、晋红军撤退地区，调查红军活动实况，研究消灭红军办法，是日由北平出发。

2月23日　王宠惠访晤日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及海军省军令部次长加藤隆义，恳谈中日“亲善”。

△　红二、六军团贺龙部在湘西永顺县石锢与湘军陈渠珍部激战，次日向塔卧北移。

2月24日　王宠惠访日牧野内府，恳谈中日“提携”。午后，王出

席日众议院各派议员菅原传等75人招待会，交换意见。王表示“中日亲善应以道义为中心”。

△　蒋介石特任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并规定总司令不在前敌时，副总司令得代行总司令职权。是日，朱、杨在西安就职。

△　胡汉民之代表李晓生由港抵穗。25日，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讨论时局，李报告在沪与孙科、王宠惠、汪精卫、孔祥熙接洽宁粤团结经过，各委详细交换意见。下午，李返港向胡汉民报告会议情形。

△　中国劳动协会在沪成立，陶百川等19人当选为理事。该会工作纲领规定：“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劳动运动之最高原则，消极的消灭阶级斗争，积极的提倡劳资协调，以期努力于生产事业及劳动福利之建设，谋本党劳工政策之实施。”并称：“在文化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指出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

△　战区新保安队在河北沧州、静海、杨村编成。张庆余、张砚田分别统率第一、二总队，每总队辖四大队，每大队官兵640名。

2月25日　上海市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团体电行政院及中央有关各部，请迅速制止英商汇丰银行拍卖申新纱厂第七厂，并予救济。汪精卫电复：“申新事件，先由吴市长劝告汇丰暂缓拍卖，并由财、实两部会商救济办法。”26日、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两次派人前往劝阻汇丰拍卖，均无结果。按：申新七厂系实业家荣宗敬经营，有纱锭56284枚，线锭13440枚，布机449台，工人4000余名，资产600万元以上。1927年曾向汇丰银行押款200万元。去年因花贵纱贱，外货倾销，周转不灵，到期未赎，汇丰遂委托英商鲁意斯摩洋行将该厂拍卖。

△　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树常、万福麟到汉见蒋介石，请示整编事宜。

△　留平内蒙王公要人索诺木拉布坦、包悦卿等见宋哲元、萧振瀛，详商内蒙地方征税区域划分问题。

△　上午，王宠惠访晤日前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下午访晤政友会总裁铃木。日外务次官重光葵宴王饯别，芳泽谦吉、松冈洋右及东亚局长桑岛等作陪，席间就“中日提携”问题交换意见。

△　何键赴常德“督剿”湘西红军。原南昌行营公路处长曾养甫同行，前往督修湘黔公路。

△　伦敦中国艺展会委员达维德及拉斐尔来华选择运英展览古物，是日抵沪。

2月26日　　蒋介石电黔省各军严防红军进至遵义、桐梓以东地区。薛岳分令吴奇伟率第五十九、第九十三两师星夜驰赴遵义，周浑元部开往桐梓。时川军郭勋祺已率10个团向桐梓前进。

△　中央红军击溃黔军独立第二旅杜肇华部，占领娄山关。中革军委下令乘胜夺取遵义城。决定红一、红三军团仍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为第一梯队，直攻遵义城，红一军团为第二梯队，由板桥继续追击。

△　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应申新纱厂七厂第二债权人中国、上海两银行之请，将该厂假扣押。英商鲁意斯摩洋行置法院判决于不顾，于是日下午以225万元之最低价拍卖给日商丰田纱厂。

△　王宠惠向日外相广田辞行，并讨论促进“中日邦交”具体办法。王提三原则：一、中、日两国依照国际法互相尊重对方国家的完全独立；二、两国保持真正的友谊；三、遵循外交途径，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一切事件。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李择一衔命赴日。

△　日舰两艘窥察华北港口，是日抵塘沽。舰队司令滨田27日到天津会见梅津。28日访天津市长张廷谔。当晚到平。

△　新疆省建设厅长高惜冰到南京。28日，汪精卫接见，详询新省情形。

△　沪市商会具呈财政部，谓国债流通以交易所为媒介，请按美、日先例，免征公债交易税。

2月27日　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中政会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

△　日本外务省以英、美舆论纷起责难日本企图独占中国，是日发表声明称："外传日本援助中国，意在劝中国退出国联，驱逐在华欧美顾问，使中国参加东亚联盟等说，并无根据。吾人衷心希望东亚和平与中日亲善，各国应谅解日本真意。"

△　国民政府任命陶履谦为内政部政务次长，原任甘乃光免职；在内政部长黄郛未到任前，由陶履谦暂代部务。

△　日外相广田在日众议院预算总会席上答复议员关于中日问题的质询，谓王宠惠在日谈话内容有三：一、中日关系应以和平方法使其密切；二、中日外交为和平对等外交；三、两国国民亦应互相融和。

△　殷同等与日使馆武官高桥续商战区换防问题，意见不一致：一、华方主张一次换防完毕；日方则主张新编保安队先以一部开入滦榆区换防，经过相当时日，确证纪律佳，人数相符，再将另一部开入蓟密区。二、日方主张玉田保安补充队换防后开驻北宁线附近，驻扎一处；华方则主张调驻数地，分散其势力。

△　申新七厂职工4600余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汇丰拍卖该厂。28日，代表130余人开紧急会议，议决推举孙镇域等10人向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请愿。

△　华商纱厂联合会为汇丰违法拍卖申新七厂事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见吴铁城请求救济，并电请中央制止。是日，中华厂商联合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国货工厂联合会等亦开会声援。

2月28日　　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城。吴奇伟第一纵队集中第五十九、第九十三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红三军团在南门外老鸭山之红花岗、碧云峰与敌激战数小时，将敌击溃；红一军团从左翼出击，直追至乌江北岸，歼灭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韩汉英、唐云山两师及王家烈残部两个营的大部。是役，红军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　日外务省决定对华根本方针："根绝排日运动为中日经济提携之先决条件；中国政府应有禁止排日排货之具体事实。"

△　国民党中常会准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辞职，指定叶楚伧继任。

△　薛岳获悉遵义不守，即电令第二纵队周浑元率第五、第九十六、第十三三师向仁怀转进，构筑坚固工事防守；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第五十九、第九十三两师至乌江南岸大渡口、六广口之线，第九十、第九十二两师在息烽以北乌江沿岸布防。

△　行政院决议，定民国二十五年为儿童年。3月5日，行政院通过《儿童年实施办法大纲》，规定儿童年实施期间自本年8月1日至明年7月31日。

△　财政部公布修正《中国银行条例》，规定股本总额为银币4000万元，官商各半。按：股本总额原为2500万元，官股占五分之

一。

△　上海金融界决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筹款225万元，向汇丰交涉赎回申新七厂。同日，沪市地方协会召集全市各团体讨论应付汇丰拍卖申新事件办法，佥认汇丰所为“不但侵害中国法权，亦且摧残中国实业”。

是月　　英、美、日在华银行恢复发行钞票，吸收现银，外运牟利，汇丰首先实行。麦利加、横滨、花旗、正金等行亦在筹备发行。本月沪外钞流通额357.1万元，较上月增加59.5万元。

3月

3月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撤销，主任张学良，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钱大钧。蒋介石在成立典礼上称：行营今后工作，为“剿匪”、“禁烟”、“推行新生活运动”。

△　国民政府令在浙江之孔子嫡系南宗裔孙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并给以简任官待遇。

△　立法院讨论《妨害银本位币处罚暂行条例草案》，认为“阻止现银出口，无异剥夺货币本位三要素之一，亦即无异取消银本位，事关国家大政”，决议并请中政会决定原则，再行审议。

△　中国劳动协会开首次理事会议，推陆京士、程海峰、陶百川、张剑白、赵树声、朱学范、吴奂七人为常务理事，并通过扩大征求会员、举办劳动问题研究副刊、调查上海失业工人、拟订工作计划等案多件。

△　英驻美大使林德赛访美副国务卿费列浦，会商应付“中日提携”对策。英恐日独占在华利益，建议由美、法、日诸国共同对华财

政援助。美认为“中日经济提携，为两国新政治经济同盟，对国际政局影响甚大”，也赞成各国协力援助。

△　日外务大臣广田在议会宣称：“日政府将改变以前与中国地方当局交涉之政策，而与中央进行外交谈判，以解决各悬案。如中国愿与日本共存共荣，则日本将对华予以一切可能的财政与经济上之协助。”次日，日《大阪每日新闻》载广田“新对华方针”称：如中国“取缔抵制日货并履行其他某种条件”，则日本将予中国一切必要的赞助；中国必须尊重日本之条约权利与让予权；日本无意参加第三者给予中国借款之活动，但发现足以影响远东之情势时，亦不能坐视。

△　日本为垄断蒙盐，擅在多伦设盐务署，承德、赤峰设分署，收买蒙盐，征收盐税。按：察省年产蒙盐10余万担，东、西蒙民均赖此为食。

△　军事交通考察团于去年5月出国，前往英、美、法、意、苏等10余国考察，历时九个月，是日该团交通组俞飞鹏等五人返国抵沪。9日，军事组徐庭瑶等14人亦到沪。

△　刘湘电令川省各县，“田赋自本年起实行一年一征，比照赋额附征军费三倍”。

△　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张静江组设之南京商业储蓄银行开幕。

△　南京市铁路由江南铁路公司承租，租期20年，月租3000元，承租合同已正式签字，是日由公司派员接收。

△　鲁省建设厅决定成立采金局从事开采金矿。是日，省府通过《山东省采金局试办简章》，资本暂定五万元，分1000股，官商各半。

3月2日　蒋介石电汪精卫，对汪2月20日在中政会所作关于对日关系的报告表示赞赏，称：“灼见宏猷，至深钦佩，与弟在京时对中

央社记者所谈各节，实属同一见解。中央同人既有所决定，弟能力所及，自当本此方针，共策进行。”

△　蒋介石为“督剿”红军，整理川政，由汉口飞重庆。3日通电川、黔各军，由其统一指挥，“无命令不得擅自进退”。

△　孔祥熙、宋子文日前应蒋介石电邀赴鄂，商编军费预算、川、黔等用兵省份财政及川、鄂、陕、甘四省筑路等问题。是日，孔、宋离汉返京。

△　土肥原自沪抵港访胡汉民，交换“中日合作”意见。胡语美联社记者：“苟以先总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原则为基础，则南方领袖并不反对中日复交。”

△　日本北海道渔业组合近派渔船数十只，擅入我渤海湾渔区捕鱼，并以武力驱逐我渔船。沿海渔民特联合电请国民政府交涉制止。

3月3日　　蒋介石为夺回遵义，电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并指挥桐梓黔军于6日集中大渡里、排居场附近，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周浑元部6日集中枫香坝、鸭溪口一带，向遵义西北地区进攻；吴奇伟部主力集结茶山渡附近，在茶山渡至乌江取攻势防御，另派一部与周浑元部联络“堵剿”红军。

△　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在赣南仁风地区被困多日，是日分两路向赣粤边突围。粤军余汉谋以五倍于红军的兵力在马岭、牛岭一带堵截。6日，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在突围战斗中牺牲。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21日在大庾殉难。中旬，突围红军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领导之游击队在油山会合。

△　英政府为防止日本单独对华借款，正式邀请美、日、法三国会商共同以财政援华。

△　上海市长吴铁城邀汇丰银行大班赫区门会商申新七厂欠债分

期拨还办法，积欠利息尾数25万元提前拨还，余款分四次全部偿清。赫允撤销拍卖。同日，财政部次长邹琳访银行界负责人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唐寿民等，商贷款救济申新七厂事。

△　冀东战区保安队开始换防。战区清委会和河北省府联合下令玉田保安队孙宇臣、冯寿彭两部，分别开赴通县、唐山整训，周毓英部开玉田接防。

△　日关东军司令部航空科长岛田抵平，与高桥、殷同商定，仿通电、通邮办法开辟平榆航空邮路，定下月开始通航，每周往返二次，与关外山海关锦州段衔接。天津、唐山各设航空站。

3月4日　　蒋介石出席四川党务办事处扩大纪念周，发表题为《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讲话，要求四川党、政、军、学各界领袖认识自己所负的责任，建设新四川，担负起革命救国与复兴民族的整个责任。略谓："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然有了这种优越的凭借，如果各界同志大家能够本着'亲爱精诚'的精神，共同一致的努力向上，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功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

△　蒋介石电令在湘各军向湘西贺龙部红军根据地进攻。是日，徐源泉所属第五十八师、第三十四师由澧县向桑植方面前进，第二十六军郭汝栋之第二十六师及独立第三十五旅由慈利向大庸推进；何键部第十九师由桃源向大庸以南攻击，第十六、第六十二两师由永顺向桑植、龙山进攻。5日，何键至常德督师。

△　中革军委通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任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委。

△　王宠惠离东京赴横滨，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称：“余尝建议，中日之关系，仅能以和平之方法，藉外交之途径，依平等互敬之基础而改善之。广田对于鄙见殊表同情。”5日下午，王离日赴美转返海牙任所。

△　土肥原抵广州，分访林云陔、萧佛成、邹鲁、陈济棠等。西南当局禁止报纸刊载土肥原消息。而粤方各领袖本日发表谈话，对于中日谅解表示不接受态度。萧佛成表示不赞成任何协定，基于以中国为保护国，而以日本为统治者之观念。

△　上海工商业因国民经济枯竭及外货倾销，日趋危殆，工商界为谋自救，特成立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是日，该协会等160余同业公会及各产业职工会联名电请蒋介石、汪精卫给予救济。该会议定救济办法两项：一为信用小借款，总额500万元，由中国银行负责组织银团办理；一为物产公估抵押借款，总额一亿元。并致函市商会、地方协会及中国银行商具体办法。

△　驻美公使施肇基访美副国务卿费列浦，商谈国际对华借款之可能性及美政府之白银政策。同日下午，驻美日使斋藤亦访费列浦，询问英、美对华财政援助方针。费详告讨论财政援华经过，并谓：“美如与他国作有关中国之外交谈判，必告日本政府。”

3月5日　国民政府训令直属机关，严格履行约法精神，“对于人民之生命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切实加以保护，不得任意侵害”。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八万人开始退出川陕根据地，向川西作战略转移。一路由南江进攻二龙场，歼罗泽洲部、田颂尧部各两个团，占仪陇。一路由宁羌进攻广元。9日，红三十一军一部击溃守敌田颂尧部，再克苍溪城。28日在苍溪与阆中两县间之石家坝、苍溪上游之鸳溪口及阆中上游等处渡过嘉陵江。31日克阆中、剑阁。

△　驻华英使贾德干对合众社记者谈称：对华借款无碍中日谅

解，关系各国均应参加。

△　土肥原由广州飞南宁，访桂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征询对“中日亲善”、“经济合作”等问题意见。李答：“中日亲善须以独立与平等为原则，经济合作须具互惠精神。”8日，土肥原由梧返粤。9日去港，再访胡汉民。

△　逊清太傅陈宝琛病殁北平。

3月6日　　国民党中政会为解救财政困难，决议成立审查二十四年度预算计划委员会，以蒋介石、汪精卫等18人为委员，决定审查原则为“从困难中求生”，实行“苦干”方针，各就最低政务费之标准尽量节减。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中央地方划分权责纲领》，内容包括地方行政官吏之保荐与任命、地方行政官吏之任期与保障、地方行政及经济、中央与地方之财政、国防军及地方兵警和法制之制定等项。

△　驻华英使馆发表声明称：“英政府并未建议对华借款，只是与中国政府就财政情势交换意见，已将讨论详情通知各关系国政府，协商后再行动。”同日，美国务院亦表示：“国际对华财政协助仅系一般考虑。”

△　日拓务相儿玉在众议院称：“现拟积极树立大规模之鲜民移‘满’计划，最近正在研究，不久当能实现。”11日，日在热河承德设立领事馆，积极向热河办理移民。

△　日人在察东沽源测绘地形；并有伪满协和会人员将抄好的请求将平安堡改隶伪满之呈文，挨村劝村董签名。

3月7日　　中央红军西进。主力自遵义向鸭溪、长干山一带移动。9日先头部队占长干山。12日撤出遵义。14日主力进至仁怀南鲁班场附近，寻求与周浑元部第五师、第九十六师作战。周浑元部第十

三师由仁怀三元洞进至鲁班场西南。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周浑元部三个师激战一昼夜后，向仁怀方向前进。旋克仁怀县城。

△　驻华日使有吉偕参赞有野访晤汪精卫，对汪所持中日外交方针及蒋介石本月2日之赞汪电，表示满意。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设立国立戏剧音乐院及美术陈列馆，推于右任、孔祥熙等19人为筹备委员。

△　沪市米商订购洋米登记已达620余万包。是日，行政院召集内政部、财政部、实业部审议限制洋米入口办法，无结果。

3月8日　立法院通过《土地法施行法》。

△　河北长垣县境黄河贯台口门自去年8月决口以来，用款40余万，迄未合龙。今春黄水续涨，流势转急，西坝边坝溃陷，长垣县城孤悬水中。是日，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电中央请示防堵办法。至11日，全县被淹440余村，灾民14万多人。14日，河北省黄灾救委会商筹督工防堵及救济办法。

△　孔祥熙与上海金融界商讨救济市面，并发表声明否认即将改革币制。

△　何成濬应蒋介石电召，自汉飞渝。

△　东北人民革命军赵尚志部袭击哈尔滨东之方正县。9日一度占领县城。

△　影星阮玲玉在沪服毒自尽。

3月9日　外交部电令驻苏大使馆照会苏联政府，声明中东路非法买卖，“中国决不承认，中国保留对中东路之一切权利”。15日，驻苏大使颜惠庆将照会送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

△　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饬部协同湘军向湘西贺龙部红军进攻。红军开始撤离大庸，向桑植、永顺、塔卧转移。10日，第十九师李觉部占大庸。22日，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陷桑植。

△　日关东军司令部颁布《外国劳动者入境取缔规则》，限制关内劳工出关就业。14日，日伪合组之大东公司停售“入国证”，致出关劳工被阻于榆关者2000余人。17日，北宁路局在沿线各站遍贴布告，劝告慎行。21日，伪满民政部公布《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规定“凡非关外土著而无财产职业在关外者，一律禁止入境”，并责令榆关和长城各口以及营口、安东、大连等海口伪警严厉执行。按：数十年来，冀、鲁、豫、察等省劳工出关就业者年300余万人，汇银入关年约3000万元，“九一八”后，年出关仍有三四十万人。日人认为此为使其移民计划失败原因之一，故加限制。

△　军事委员会委刘和鼎、陈式正为浙闽赣边区“剿匪”正、副指挥，划定松溪、政和、浦城、崇安、龙泉、庆元、泰顺、江山、常山九县为“清剿”区域。

△　蒙藏委员会通过《创设蒙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大纲》，定资本百万元，董事12人。公司分设西宁、包头、张家口等处。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总参议王克敏应黄郛电召，离平南下商华北政务。12日，到达浙江莫干山，向黄报告冀省政情及新编保安队开入战区各事。17日事毕返平。

△　孔祥熙在沪召集各界领袖20余人，会商救济沪市工商业问题，决定由各业商议自救办法。

△　沪总工会常委会决议挽救工商业办法三项：一、请中央速定救济方策；二、请中央转令各厂商顾全大局，勉维现状，不得轻率停业；三、劝导工人与厂商“本休戚相关之谊与共存共荣之念”，努力加紧生产，不得任意罢工、怠工。

3月10日　红二十五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附近设伏，打垮敌军张飞生警备二旅五个营，消灭一个团，毙伤敌200余人，旅长张飞生身负重伤，俘第六团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

△　上午，日军以纪念日俄战争三十周年为名，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榆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塘沽等地先后演习巷战、野战。

△　日旅顺要塞司令滨田等一行29人率驱逐舰三艘到秦皇岛窥察，并绘摄海面。

△　国联对华技术合作联络员哈斯抵平。

3月上旬　日关东军在多伦设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以伪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兼任行政长官，日人中岛荣大任自治指导官，擅将察北乌珠穆沁等旗划入特别区，并编察东警备军两支队，共4000余名。

3月11日　外交部对日苏中东路买卖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出售该路为非法，声明中国保留对中东路之一切权利。16日，又向《九国公约》各关系国政府致送同一内容之声明书，并致文驻华日使馆，指出日政府应负之责任，中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　中东路买卖草约由日外务大臣广田、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苏驻日大使尤列尼夫在东京签字。20日，经日本枢密院通过。23日，苏、日、伪满代表在东京正式签订中东路买卖协定及附属文件共六种：苏伪基本协定、苏伪间最终议定书、日苏间声明日本保证支付之换文、日苏间关于解释支付保证之换文、日苏伪间关于物品代偿事之议定书、日伪间关于日本承认保证之换文。

△　行政院通过云南昆明设市，隶属省府。

△　北平市公安局及北郊区署警车队因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

谈会”，捕去学生赵文璧、柳无垢（柳亚子之女）等10人。至14日，被捕学生坚不承认有何嫌疑，全部释放。

3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合并举行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汪精卫报告，略称：“救亡图存的工作，治标莫急于‘剿除共匪’，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念导师之已逝，痛来日之大难，惟有本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格言尽心尽力的去做。”同日，立法院院长孙科向日本作题为《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敬告日本朝野人士》的演说，由日本广播电台播送。

△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全权负责处理红军的军事行动。

△　蒋介石电四川各路军指挥：“罗泽洲精神废弛，一再败退，着派大员查办；田颂尧督饬不严，致苍溪失陷，记大过一次；杨森谎报军情，加以申斥。”

△　蒋介石令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派陈诚兼任处长，分期整理全国陆军，要求四年内整理好60个师。是日，陆军整理处成立，聘杨杰、周亚卫、俞大维、邹作华、卢致德、郑大章、冯庸等为研究委员。

△　蒋介石发布保护孔庙令，规定：所有各省、市之孔庙，一律严禁军队驻扎；如有损毁，尤应设法修葺，以“砥砺醇风，立国化民”。

△　日本文化联盟会在东京青年会馆举行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由文化联盟会代表松本学主祭，头山满等朗读祭文。日外相广田亦前往参加。

△　土肥原自港抵福州；次日访晤闽省府主席陈仪。

3月13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实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到会员陈果夫、彭学沛等百余人。汪精卫致开会词。会议讨论合作事业制度与法规、合作业务、合作资金及合作教育等问题。17日闭幕。

△　日外务省决定《中日经济提携策大纲》：一、为中日经济团体之交欢起见，拟由民间组织中国实业视察团，派往中国；二、对中国农业方面，予以技术上之援助，奖励中国棉花大量生产，由日本大量购买；三、在贸易方面采用以货易货制，促中国商品输入之增加；四、对中国产业界之穷乏现状，由特殊银行在上海设二亿元程度之信用基金，以谋金融之圆满，而为应急援助之策。

3月14日　上海华俄道胜银行总清理处因中东路欠该行债款58万余元10年未还，请求上海法院将中东路浦东码头等在沪财产假扣押。旋法院以未缴讼费为理由，将请求驳回。

△　驻华英使贾德干访汪精卫，询问中日“经济提携”具体内容，并表示：“中日两国关系好转，非仅中日两国之益，对于世界亦有利。以此为基础，西方各国也可与中国发生更密切之关系。”

3月15日　鲁班场战役。拂晓，毛泽东下令在鲁班场地区消灭周浑元部两个师。命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及干部团为右翼，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坛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红五、红九军团和红三军团红十、红十三团为左翼，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由西南协同红一军团突击鲁班场，从9时激战至20时，敌依托堡垒顽抗，战斗极为激烈。红一军团死亡489人，伤1000余人，这是中央红军继土城之役后的再次失利。当晚中央红军各部奉命撤出战斗，转兵西进。

△　国民政府令准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本职，遗缺由黄慕松继任。

△　财政部公布《省地方银行发行暂行办法》，规定各省银行或

地方银行领用中央银行兑换券，其数额须与中央银行商定报财部备案，并应照领用数额缴存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于中央银行。

△　蒋介石严禁川省军人干政，特颁川军厉禁五条：一、禁止以武力干涉行政诉讼；二、禁止现任官佐兼任县局；三、禁止地方团队人员由驻军指派；四、禁止军政长官与民争利；五、禁止征收员丁需索。

△　河北黄灾救委会议定救灾方案："一、由贯台主管人员变更方策，速筑堵合龙；二、修培金堤，防黄水从故道北流；三、续发黄河奖券，并增加票额，以广救济；四、减低奖券办事职员奖金；五、移拨赈款，办理移民。"并临时动议举办春季赛马筹赈及续筹春赈，救济灾区。

△　洋米倾销（去年进口771.061万公担），影响农村，芜湖米市停顿，各业相随凋敝。是日沪市农会、商会分别具呈财政部及实业部，请求增加洋米、洋麦进口税，以拯救农村。武汉、天津等市商会均有同样请求。财政部电复武汉商会略称："进口米麦以二十三年与二十二年比较，数量已锐减，益以上年水旱被灾区域渐广，国内粮食不无恐慌，就现时情形尚无增加关税必要。"

3月16日　蒋介石策定计划，谋聚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电令周浑元派兵两团协同郭思演师占仁怀，筑碉防守，主力向古蔺方面截击。吴奇伟属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第九十师欧震部、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归周浑元指挥，"追剿"红军。川军郭勋祺师由两河口至仁怀、古蔺尾追。滇军孙渡部鲁道源、安恩溥、龚顺璧三个旅在大定赤水镇、毕节一带防堵，与川军取得联络。王家烈部固守原地，从黔西延伸至大定防守，并以一部出打鼓新场以北游击。川军则在古蔺、叙永一带防守，并与赤水镇滇军联络。旋又改令侯汉佑部在赤水、土城防守，蒋德铭旅守土城、茅台、小河。犹禹九旅在小河口、大河口至赤水镇防守，替出吴奇伟、周浑元、郭勋祺部

到川南截堵。

△　中央红军除第三军团外，从茅台三渡赤水河，重入川南古蔺地区。是日晚先头部队已到古蔺境之卢家坪、水口寺一带。围鲁班场之红军在大军渡河后，即停止攻击。旋由观音寺经大古村到茅台过河，与大军会合。

△　殷汝耕、仪我自津飞遵化马兰峪视察，并与伪方商洽接收东陵手续。双方约定，接收东陵俟清瑜、瑾两妃下葬后实行。

△　河北贯台黄河决口后，大水顺流东泻，沿金堤入鲁境，鲁西濮、范、寿、阳等县，一片汪洋，被灾区域东西长达450余里，灾民不下百万人。是日，鲁西灾民推代表姜鸣谦等电汪精卫、孔祥熙“速拨巨款，饬冀、鲁、豫省府堵修口门”，并电鲁省主席韩复榘转中央请救灾黎。

3月17日　陈序经在《独立评论》第一百四十二期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胡适在该刊《编辑后记》中对陈文表示支持，并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　淮南盐务局徐州缉私队击毙苏北萧县盐贩四人，重伤二人，轻伤11人，并捕去一人，激起民愤。萧县各界联名呈请专署及财政部惩凶。

3月18日　蒋介石在渝各界扩大纪念周上讲话，以禁绝鸦片、取消防区、实行征工、推行“新运”为建设新四川之方针。

△　四川省政府定21日开始对百货业实行一次征税办法。重庆商民认为“一次征税较前尤苛”，例如由沪运渝匹头一件，成本估值400元，沿途缴纳苛杂，仅18.6元多，若一次照15％缴纳，则非60元不

可。是日，各帮代表在重庆集议，佥主暂缓实行，并于19日向省府请愿。

△　刘湘聘胡庶华为重庆大学校长，兼川西实业调查团团长。是日胡抵渝。

3月19日　何应钦为统一陕北“剿匪”军事指挥，特设北平军分会驻陕参谋团，委前保定行营参谋处长毛侃为主任。是日，毛率随员20余人离平赴陕北绥德。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湖南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1000万元，10年偿清，以三分之一用于清偿银行旧欠，三分之二作修筑公路等费用。

△　日人在热河兴隆县组织兴隆采金株式会社，攫夺金矿七处，日是以机器开挖。

3月20日　国民党中政会根据孔祥熙提议，通过发行金融公债一亿元。28日，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金融公债条例》。4月1日，金融公债开始发行。该项公债用于：一、收回上年抵付中央银行之国库券3000万元；二、拨还中央银行垫款4000万元；三、增加中国银行官股2500万元，交通银行官股1000万元（不敷之数，由财政部另筹拨足）。该项公债发行后，中央银行增强实力，国家控制中国、交通两行，三行形成一体，受制于中央，便于财政调度。

△　日本朝日新闻社为中日“亲善”飞行之“朝日机”由东京飞抵南京。次日，该社东方部长神尾茂等分访国民政府各机关。22日，离京飞沪。23日，机师新野等访吴铁城，转交东京、大阪两市长致沪市民问候书，并设宴招待各界。吴亦设茶会招待新野等，并赠九层银塔。25日，“朝日机”飞返东京。

△　财政部为禁绝河北私盐，自江西调税警团800人到邯郸，平毁

硝盐池，激起民众反抗。是日，冀南大名、鸡泽、曲周、平乡四县民众3000人，在曲周附近集合，组织“红枪会”，散发传单，反对平毁硝盐池。27日，海州税警两团开大名弹压，“红枪会”遂与“黄沙会”赵德怀部3000余人联合行动，其势益众，于29日迫近南乐城郊，要求税警全部撤退。30日，经大名县长与绅民调处，允暂不平毁盐池，税警由大名撤至邯郸，遂告平息。

3月21日　国民党中常会推居正、戴季陶、叶楚伧、覃振、陈立夫、陈公博、钮永建、王用宾、陈大齐为中央及各省、市党部工作人员从事司法工作考试委员会委员，以居正为委员长，洪兰友为秘书长。

△　陈济棠突将“海圻”、“海琛”两舰长更调，改委方念祖为“海圻”舰长，陈浩为“海琛”舰长。粤舰队司令姜西园被监视。是日，陈又派李扬敬接收海军学校。

△　土肥原由沪经青岛返长春复命。土肥原对记者谈：“中国政府及人民均变已往态度，趋亲善途径，将来外交进行定可顺利。”

3月22日　中央红军回师黔北，由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至桐梓以西东皇殿一带。川军郭勋祺部向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尾追。薛岳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迅集主力于茅台、仁怀、坛厂一带堵截。

△　粤省府增发二十四年金融库券200万元。连前共发600万元。

△　沪中国、交通等10银行合组之中华农业合作贷款团由邹秉文率领抵津转平，旋赴冀南农村调查，准备发放棉麦贷款。

3月23日　冀省府召开黄河堵口会议，决拨3800元汇长垣抢险。

3月24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师，指挥各军在遵义、鸭溪间，遵义、刀靶水间及茅台、仁怀、坛厂、长干山、枫香坝、白腊

坎、鸭溪之线，构筑碉楼；并令王家烈率部在茅台、小河口布防；侯汉佑部在赤水、土城之线沿河筑碉，图困中央红军。

△　冀东战区清理委员会殷汝耕因玉田民团团总王继宗抗令改组，拟用武力解决，特赴天津海光寺日本兵营访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请准用机枪及重火器往剿，酒井同意。同日，玉山保安第三大队长周毓英、丰润县长张仁蠡等率部围歼王继宗部。25日，王在丰润县新军屯镇被当地团警擒获。4月5日，王在玉田被枪决。

3月25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入京见汪精卫，报告赴欧考察经过；并表示拟赴西北考察农村经济、社会教育。

△　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于上海病卒。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追赠石为陆军上将，并给恤金二万元。

△　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开幕僚会议，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副参谋长板垣均参加，听取土肥原关于视察中国的报告，审议“对支政策”，提出四项主张：“一、关东军严格伸张华北《塘沽停战协定》的既得权，导引华北当局服从；二、加紧开发华北棉、铁事业；三、秘密援助西南，使它与南京政府相抗衡；四、掌握西南经济，使它不脱离日本帝国的掌握。”

△　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正式成立。

△　索王（索诺木拉布坦）在五台县河边村晤阎锡山，商蒙、绥税收问题。

3月26日　蒋介石通电，新行营名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

△　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该行自4月1日起改称中国农民银行，以孔祥熙任理事长。

△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为红九军团政治委员，遗缺由原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继任。

3月27日　中央红军以罗炳辉、何长工指挥红九军团向长干山、枫香坝一带，佯装中央红军主力，北渡长江，掩护红军主力从鸭溪、白腊坝地域突破国民党军三个师兵力的封锁线，到达大庙场，分两路前进，至翁黄水会合，直指乌江北岸。28日红军先头部队在手扒岩突破乌江天险。29日红军大部渡过乌江，进抵息烽附近。

△　国民政府任命马超俊为南京市市长，原任石瑛辞职。

△　英沙逊银行董事长沙逊爵士在上海发表《救济上海金融计划》，主张国民政府“觅取英镑借款，作为抵押，发行‘上海镑券’与银币共同流通”。沪银行界及宋子文均认为沙逊主张“必使中国金融益趋紊乱”，表示反对。

△　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布告，限各地民军统于4月底以前自请收编，逾期不请求者“搜剿不赦”。

△　上海商业经济协会决议发行流通券4.5亿元。

3月28日　徐向前指挥红军第四方面军开展强渡嘉陵江战役。是夜下达命令，从塔子山强渡嘉陵江。至次日强渡成功。31日占剑阁。4月2日攻占剑阁关、南部县。3日克昭化。11日向青州、平武推进。驻江油川军邓锡侯部及驻绵阳川军驰往堵截未逞。12日起开始进攻江油，14日克平武，15日在涪江东与川军第五路唐式遵部激战。18日克桐梓，19日克彰明，21日克北川。历时24日之嘉陵江战役结束，攻克县城九座，歼敌12个团，共一万余人。

△　国民政府特任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陈行为副总裁；任命孔祥熙、宋子文、叶楚伧、张嘉璈、陈行、叶琢堂、王宝仑、唐寿民、钱永铭、陈光甫、荣宗敬、周宗良、唐有壬、徐堪、宋

子良为中央银行理事，李铭、虞洽卿、林康侯为监事，并指定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陈行、叶琢堂、唐有民、徐堪为常务理事。

△　冀东战区清委会议决新保安队开入战区日期与防地分配，蓟密区驻2400人，滦榆区驻2600人，俟于学忠返津即实行。

△　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法院开审前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案。金答辩被控各节，谓民国二十年所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是为保全西北边疆之权宜之计，并非有损主权；侵贪公款、杀人放火均非事实。

△　黄河水利委员会决定贯台堵口及培修金堤、太行堤计划。全国经委会允给工程费100万元，由黄河水利会领30万，冀河务局领20万，余给黄灾救委会。

3月29日　　蒋介石令周浑元部第九十九师由贵阳以北驰赴息烽“堵剿”中央红军；令周率所部由黄沙渡（金沙县东南）渡乌江截击。

△　国民党党史陈列馆在南京明故宫行奠基礼。

△　南京市商会以金融呆滞，工商凋敝，要求政府在金融公债项下拨款500万元维持市面。

3月30日　　中国银行召开第十八届股东会议，接受政府改组该行办法，增资4000万元，官商股各半。官股原为500万元，经拨付金融公债1500万元，增为2000万元。董事由17人增至21人，内官股九人，商股12人。

△　日关东军制定对华政策：一、关于中国政府的亲日政策，我方仍然采取静观主义，不再特意对其采取促进态度，更不进行任何援助。对中国是否真正觉醒，实现禁止排日到什么程度等，要予以监视；二、对华北要根据实际经济力量的扩张，逐步尽力加强不可分的

关系；三、对西南派应视为亲日的地方实力政权，使其存在。

△　晨，沈阳兵工厂一号汽锅爆炸，炸死工人64名。日军临时戒严，捕去副厂长袁希古及工人13名，指为受义勇军“嗾使”，逼供“主谋”。

△　上海市教育局会同公安局派人搜查新中国书局及现代书局，销毁《羊棚外之奇想》及《新写实主义之论文集》两书，理由是两书鼓吹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普罗文艺。

△　粤粮食统制会通过禁止暹米入口案，以对付暹当局压迫华侨。

3月31日　　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认为王新命、何炳松等10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主张“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

△　美国洛杉矶总商会远东商业考察团一行23人自沪抵平，考察商情，研究发展中美商务问题。

△　中国酒精厂在沪开幕，资本150万元，由实业部与华侨黄宗孝、黄江泉合办，官股占十分之一，日产酒精7000加仑。

是月　　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陕西蓝田县葛牌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任务是创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4月

4月1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特级上将。

△　蒋介石在贵阳对记者宣称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谓："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此国民经济运动，乃以振兴农业、改良农产，保护矿业、开发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实业为宗旨，而以革除苛捐杂税，减免出口税，与要求新宪法之实施，禁止纸币之滥发，为建设国民经济之初步。今日政府增加中央、中国与交通三银行之资本，以谋社会经济之安定与农工商业之进步，亦即此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之一种。"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并规定《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均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

△　财政部批准中国银行股东会议关于扩充资本总额为4000万元的决议，并派宋子文等九人为官股董事。是日，该行常务董事会推选官股董事宋子文、杜月笙、王定仑、钱新之四人为常务董事，宋子文并由财政部指派为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原董事长李馥荪、总经理张公权均辞职。

△　日本在察、热间各旗组旗公署三处，旗长由蒙人充任，余均日人，隶属于伪多伦察东特区自治长官公署。

△　厦门市政府成立，王固磐任市长。

△　班禅设边陲宣化使署驻京办事处，以罗桑坚赞为处长。

△　《中国新论》杂志在南京创刊，由雷震、徐逸樵、罗鸿诏等主办。《发刊词》宣称该刊宗旨"以复兴民族为中心，广泛地研求政治、经济、教育、外交、财政、社会等所以复兴之途径"。

4月2日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一部在乌江右岸六广渡、黄沙渡地区。蒋介石为防红军西渡，电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主力移至六广渡与黄沙渡间，并在六广渡、乌江渡间沿岸构筑工事，严密封锁。

△　蒋介石通令在川各军：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前在川北为红军所败，致使红军顺利渡过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迭失巴中、仪陇、昭化、广元、阆中、苍溪等城，“实属玩忽命令，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

△　汪精卫对美联社记者毛利士谈称：“中日关系已趋好转，东四省问题中日双方仍各守向来之见解。”当毛利士问“如此则所谓好转并非具体化”时，汪答称：“欲谋中日问题之好转，应先从调整其他关系着手。”

△　国民政府任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

△　驻日公使蒋作宾自东京抵基隆，访问台湾总督中川。

△　伪满傀儡元首溥仪自长春访日；27日返长春。

4月3日　　国民政府任陈调元、何成濬、朱绍良、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刘峙、万福麟、何键、白崇禧、刘镇华、顾祝同、商震、傅作义、徐永昌、于学忠、杨虎城、蒋鼎文、龙云、徐源泉为二级陆军上将。

△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迅速通过息烽、扎佐马路线，以脱离敌人而向东南机动。是日，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兼程向东南方向进军。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为右纵队从宋家渡、苦行塘渡河，进至贵阳地区。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为左纵队进至贵阳

东北。次日，左纵队前锋在观音山一带与贵阳敌军交火，红军在贵阳城郊遍贴大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　罗炳辉、何长工指挥红九军团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于打鼓新场老木孔地区击溃黔军犹国才部魏金镛的五个团，乘胜向西挺进。7日进至大定县属长岩圩，将民团100余人全部缴械。次日进袭毕节县属瓢儿井，击溃民团约500人，没收盐仓济贫。旋在织金县属猫场击溃第二十五军刘鹤鸣团及汪家寨等地民团的袭击，向滇东急进。

△　武昌行营公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规定：本年4月起，限各省、市、县三个月内成立戒烟所；1937年起，凡有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复吸犯处死刑；1937年起查获制造、运输、贩毒人犯一律处死刑；限六个月内完成烟民登记，分六年戒绝。

△　国民政府以范鸿仙讨袁之役被狙殒命，追赠陆军上将。

△　喜峰口外姥姥山民众不堪日伪压迫，聚众数百，反抗苛杂，捣毁警所，毙伪警所长。是日，日兵一队驰往弹压，并自马兰峪调飞机轰炸，双方发生激战。

△　沪商会以洋货倾销，国货岌岌可危，电请财政部迅裁国货转口税。

4月4日　国民政府任宋哲元兼察哈尔省保安司令。

△　国民政府任杨杰、贺耀组、黄慕松、曹浩森、周亚卫、张华辅、钱大钧、陈诚、卫立煌、张治中、夏斗寅、孙连仲、上官云相、梁冠英、陈继承为陆军中将。

△　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在津接见殷同、殷汝耕、陶尚铭，商谈战区保安队换防问题。

△　全国邮电航政员工及吴兴绉业小学儿童响应“航空救国”，捐献飞机八架，是日在南京行命名礼。

△　上海《新闻报》载：据政府统计，全国现有人口4.36094953亿人；其中不识字者占80％，除50岁以上、六岁以下之儿童及少数盲哑聋、精神病患者外，计有2.02435277亿人。

△　无锡丝业因成本过高，难与日丝角逐，外销日趋衰落，年销量自24000余担减至五六千担，丝价由每担1300余元跌至四百四五十元，丝厂亏损倒闭者过半。是日，余记丝厂又停工。全市缫丝工人失业者达三万余人。

4月5日　　国民政府任薛岳、刘建绪、刘兴、赵观涛、罗卓英、谷正伦、王树常、鲍文樾、贺国光、蒋伯诚、戢翼翘、荣臻、吴光新、魏宗瀚、高维岳为陆军中将。

△　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施行法》，凡91条。

△　立法院讨论《修正交易所法》，对新增“取缔公务人员投机”等条文争论甚久，卒经多数通过。27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前新疆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因于1931年10月间擅与苏联订立《新苏通商协定》，是日经江苏高等法院判决，按“危害民国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褫夺公权五年。

4月6日　　蒋介石乘调大军入黔追堵红军之机，压迫贵州省府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交出军政权力。是日，王以“身兼纵队司令，不能兼顾省政”为辞电蒋介石请辞省主席职。继又被迫辞去军职，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　国民政府任魏益三、门致中、王均、徐庭瑶、何柱国、王以哲、孙桐萱、郝梦龄、刘茂恩、谭道源、李云杰、李韫珩、毛秉文、萧之楚、周浑元为陆军中将。

△　国民政府发表各监察区监察使名单：江苏区丁超五，皖赣区苗培成，闽浙区陈肇英，湘鄂区高一涵，豫鲁区方觉慧，河北区周利生，甘宁青区戴愧生。

△　国民政府派郑天锡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特派员，督理中国展品出国返国事宜。

△　滇军第三纵队司令官孙渡奉蒋介石急电，是日率部开进贵阳。根据毛泽东部署："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7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乘虚向云南进军。

△　第一师胡宗南部开广元、昭化，接第二路田颂尧部防。

△　杭州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兴建。该桥系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之较大近代化桥梁，由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茅以升、总工程师罗英设计，并指挥施工。

4月7日　　蒋介石在贵阳召见"剿共"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指示"剿共"方针。称："剿匪方法应多加研究……对匪行动处处加以妨害、阻扰、截击、侧击、夜袭，使匪战又不能、不战又不能，处处受制，时时不安。"又谓："你们官兵都要信赖委员长一定打胜仗，一定消灭此匪，誓雪此次剿匪不力的耻辱。"

△　蒋介石自贵阳飞抵昆明。

△　陕西中部县桥陵（即黄帝陵）举行民族扫墓礼，国民政府派邵元冲、张继、邓家彦主祭。

△　江苏扬州各业因省税局强迫查帐，捕店员入狱，实行罢市。经党政当局与各业代表协商将捕去店员释放后，次日复业。

4月8日　　蒋介石电令刘湘严饬川省各县长督率团队抗击红军进

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不得轻率退避”，“倘有敢于闻警先逃或弃城不顾，即按临阵退却之律，悉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

△　国民政府任吴奇伟、汤恩伯、刘绍先、郭汝栋、孙楚、杨效欧、李服膺、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庞炳勋、秦德纯、王俊、刘翼飞、胡毓坤为陆军中将。

△　驻华日使有吉在沪召开驻华总领事会议，讨论中国各地民众反日情绪及抵制日货情形、日侨现状、中日经济关系现状及领事馆内情等。出席者除有吉及使馆参赞有野等，还有总领事须磨（南京）、石射（上海）、河相（广州）、川越（天津）、三浦（汉口）、坂根（青岛）、塚　　本（厦门）、西田（济南）、宇佐美（福州）。20日，有吉携驻华总领事会议报告书返国，呈广田外相。

△　察哈尔12旗改盟问题，酝酿经年，是日各旗总管齐集张家口见宋哲元，要求察旗改盟及绥远四旗划归察哈尔。宋允据情转达中央。

△　湘军钟光仁旅、章亮基师占永顺。同日，罗启疆旅进攻塔卧，郭汝栋部加入作战。红二、红六军团贺龙、萧克部反击后自动撤出塔卧。

△　沪外汇平市委员会向伦敦购进之现银第一批300万元已抵沪。第二、三批共400万昨晨至今晨起岸分储中、中、交三行库中。

4月9日　　中英关于滇缅未定界争端问题，经外交部和驻华英使多次交涉，是日两国政府互换照会，同意设立“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委员五人，中英各派二人；委员长一席，由国联行政院主席推选、双方同意之人充任。委员会定于12月1日开始工作。6月11日，国联行政院主席鲁舒第指派瑞士伊舍林上校为中英勘界委员会主席。

△　国民政府任胡宗南、周碞、曾万钟、陶峙岳、李延年、李默庵、万耀煌、王东原、朱耀华、李觉、冯安邦、曹福林、冯治安、张自忠、张振汉为陆军中将。

△　宋哲元偕秦德纯、萧振瀛赴张北阅军。

△　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汉口接见记者谈，中国银行今后营业方针注重于国际汇兑及进出口贸易方面。并称："外传政府增加三行资本后，将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绝对不确。"

△　红二十五军在蓝田葛牌镇以南之九间房歼灭尾追之敌陕军警备第三旅一个团另一个营，俘千余人。至此，红二十五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　章太炎以国民政府馈赠之医药费，在苏州寓所举办国学讲习会，先举行读经讲演，正式讲习会待暑假后举行。是日，其门生金震等20余人通告各界要求赞助。章本人亦在《大公报》等多种报纸上刊登启事招人入会。

4月10日　国民政府任岳森、阮肇昌、戴岳、陶广、宋天才、罗霖、樊崧甫、高桂滋、冯占海、沈克、李振唐、黄光华、郭希鹏、马法五为陆军中将。

△　蒋介石由昆明飞贵阳。

△　美国政府宣布提高新产白银收买价格，由每盎斯六角四分半升至七角一分。国民政府为防白银继续大量外流，除令驻美公使施肇基提出抗议外，由孔祥熙与京、沪当局及金融界商对付办法，并由宋子文迭与外商银行商合作办法。宋对外商银行声明，国民政府保证不禁银出口，不废除银本位，不减低银币成色，要求外商银行不再运银出口。16日，外商国际银行公会开会，成立"绅士协定"："即日起会员银行自动停运白银出口；与各银行有关系之商行，如有运银出口

者，由各关系银行劝告停止。”协定不采换文方式，仅以会议记录为凭。

△　蒋介石判断红军将渡司拉河（岔河），北上毕节、大定，决定将第二路军第一、二纵队配置在平坝、安顺、普定、镇宁等地带防堵，并在司拉河北岸各渡口筑碉守备，“限12日到达指定地区”。

△　9日，中央红军挤在贵阳、龙里之间不足40公里的地带向西南进军。是日，红一军占定番。11日占长寨、紫云，红三军团攻占广顺之后，向北盘江进发。

4月上旬　蒋介石限三个月内完成川黔公路工程。

△　蒋介石令闽西各县“跟踪搜剿”红军，“不得偏重封锁”。

△　伪满中央银行山海关支行大量收买现洋，以伪钞130余元换洋100元，每日运沈阳洋10余箱，约五万元以上。唐山以东伪币充斥，现洋已不多见。

△　杭州拱宸桥日租地期满，有关当局准日本续租30年。

△　财政部决定二十四年度开征所得税。赋税司长高秉坊宣称：财政当局开办所得税主旨，“在养成每人对国家应负义务，绝不在于开辟财源，增进收入”。

△　粤东江、北江与西江同时泛滥。东江河源堤坝溃裂，淹没村庄无数；北江自韶关以下马坝、英德、清远一带尽成泽国；西江四会、高要、德庆等地亦有潦患。

4月**11**日　殷汝耕、朱式勤、陶尚铭应高桥、仪我、大木、田中之邀，在津续商保安队换防问题。

△　宋哲元抵滂江，晤德穆楚克栋鲁普商察旗改盟等问题。翌

日，返张家口。

△　国民政府授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索诺木拉布坦都统衔。

△　黄河贯台堵口工程因负责机关相互推诿，新旧工程人员主张不同，以致一再延误，费时半年，用款超过预算数倍。自3月21日由黄灾救委会工赈组负责后，于是日始抢堵合龙。

△　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丁文江任主席。该会准备三年内完成自山东半岛以南至长江口一段测量工作，并决定在青岛、定海、厦门、威海或烟台四处设海滨生物研究所。

4月12日　财政部修正公布《交通银行条例》，资本增至2000万元。

△　国民政府任命许崇清为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任陈大齐免职。

△　红二、六军团贺龙部在湘西桑植附近陈家河渡口消灭国军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第一七二旅大部，击毙旅长李延龄。13日，将该师师部、直属队及第三四七团围歼于桃子溪，师长陈耀汉仅以身免。红军乘胜收复桑植城。

△　冀南盐潮未息，是日南乐县郊又起冲突，警民均有死伤。次日，赣税警一大队、邯郸税警二中队驰往增防。15日，冀民厅令饬冀南各县：乡民刮土淋盐，阻碍官销，自应随时查禁，敢有聚众反抗，甚或伤人夺械者，格杀勿论。25日，安新税警因搜查硝盐和村民千余冲突，警民均有死伤，经县长调解始息。

△　冀蓟密区专员殷汝耕、滦榆区专员陶尚铭偕战区清委会常委朱式勤等赴沧县马厂检阅新编保安第二总队张砚田部，日使馆武官高桥、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华北驻屯军参谋大木等被邀同往。翌日，又赴蔡村检阅第一总队张庆余部。至是新编保安队5000人全部检阅竣

事，候令开拔战区换防。

△　据上海《新闻报》载，前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由川返京谈：川省钱粮已征至46年以后，有在一年中征12年钱粮者，民众不堪负担，多将田契贴于门上，声明本人无力偿欠，要求官厅没收田契，勿再追索。

4月13日　蒋介石派李仲公为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李语记者，在新省府未成立前，所负任务为“拟定现政治之各项兴革计划，监察不肖官吏乘机营私舞弊”。

△　国民政府批准《国际电信公约》。5月3日，外交部备函将批准文件送驻西班牙使馆转送西班牙政府存案。

△　武昌行营令鄂省府推行农村合作事业，对于阻挠推行人员，依惩治土劣条例从严惩处。

△　中央红军分两个纵队西渡北盘江。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第三、五军团为右纵队，由百层附近渡江进占兴仁，红一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左纵队在罗炎附近渡江占安龙。16日，左、右两纵队分别走过彝族居住地区到达百层、罗炎。

△　上海市商会因我国茶叶国外市场为日本所夺，国内市场又受军事影响，茶业资金减少，周转失灵，特电请财政部豁免毛茶转口税。

△　赈灾委员会发表报告称：上年湘省69县因亢旱成灾，饿毙110余万人，长沙一处即死2254人；学校因灾停办者19751所。

4月14日　武昌行营令豫、鄂、皖、赣四省筹设合作金库，并由省库收入总额中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充合作金库基金，以增厚合作资金运用之力量。

△　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由渝飞黔见蒋介石，河南保安处长冯占飞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偕行。17日，张回汉口。

△　中国哲学会成立。

△　粤日侨组“斯文会”，以“发展东方文化”为辞，诱惑青年。

4月15日　驻华日使有吉回国述职，是日向汪精卫辞行，对中国政府禁止排日运动表示满意。汪设宴饯行。

△　冀省战区新保安队改编完竣，定名为冀省特种警察队。张庆余部为第一总队，张砚田部为第二总队，各编2500名。是日，张庆余等由津抵平见殷汝耕，请示开拔手续。

△　国民政府派胡世泽为出席第二十届国际联合会禁烟会议代表。

△　国民政府派宋子良、马锡尔、陈其采、刘瑞恒、戴乐仁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　孔祥熙在沪谈，决以2000万元救济上海工商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会同银行业公会办理。

4月16日　蒋介石令刘湘在成都设防。是日，蒋拨款六万元交成都卫戍部在成都附近构筑碉堡，限期完成。21日，成都成立保安司令部，费东明任代司令，指挥川西各县筑碉。25日，刘湘又自重庆调军官团及干校学员700余名协助。

△　江苏萧县（今属安徽）农民反抗土地陈报，持械聚众包围黄口区公所，捣毁利民乡公所。萧、铜（山）两县派警镇压，收缴民枪等自卫武器五六百件。

4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贵州省政府，准免王家烈省府委员

兼主席职，遗缺以吴忠信继任。24日，国民政府令免该省省府委员犹国才（兼民政厅长）、郑先辛（兼财政厅长）、谭星阁（兼教育厅长）、刘民杰（兼代建设厅长）、黄道彬、窦觉苍、侯之担、李锡祺职；并任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谌湛溪、王澂莹、牟琳、周恭寿、朱庭祜为省府委员，以曹、李、叶、谌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30日，国民政府又免万宗震省府秘书长职。

△　国民政府令派马超俊为管理中荷庚款水利经费董事会董事，并指定为董事长；原任董事石瑛准予辞职。

△　北平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在绥德与陕军将领商进攻红军计划，决定将陕北分为若干区，由井岳秀、高桂滋两师及晋军方克猷旅全部负责。

△　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渡过北盘江，向兴仁以北的安姑、排杉、马乃营地带前进，是日，进入云南。18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渡过北盘江，进至贞丰以南大河地域，奉命向兴仁、父邦地区前进。

△　财政部拟定救济工商业放款原则10项，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及上海银行业公会遵办。规定抵押放款1500万元，信用放款500万元，月息八厘，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并规定“银行应随时监督稽查其用途”；“对于工厂的技术改良及商号之营业方针，银行得随时派专家指导或矫正”。

4月18日　立法院通过裁撤转口税，自本年6月1日起实行；因裁撤此项税收而短少一千六七百万元之岁收，由增加关税抵补。按：因抵补办法未筹妥，是年转口税未裁撤。

△　薛岳将第二路军总部移至关岭场，并令所部尾追红军：第一纵队欧震、梁华盛两师由安南（今晴隆）向兴仁前进；第二纵队由花贡向普安以南地区急进；第三纵队由广顺、紫云间向关岭方向急进；

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集结镇宁。

△　西南政务委员陈中孚在东京访晤日本陆相林铣，交换“中日亲善”问题意见。

△　广东“绥靖”主任陈济棠宣布自兼海军总司令，张之英、姜西园为副。

△　上海市学生国货年推行联合会举行学生服用国货宣誓典礼，学生万余人参加宣誓。

△　绥远乌拉特前旗民众因设卡收税问题围攻王府。傅作义令王靖国派部队前往弹压。

△　伪满在山海关大量收购现洋，偷运出境者日达五万元以上。唐山运出已达70余万元，津东各县运出约200万元，银价暴涨，唐市每百元加水高达18.2元。是日，冀省府电令津东各县切实严防。

△　厦门市连日出口现银，数达130余万元。是日，市商会开紧急会议，议决具呈市府并函海关即日起禁银出口，并由商会组纠察队，协同警察查禁。

4月19日　　黄郛为关外、华北联航事致电汪精卫，内称：“近闻关东已于筱日（17日）起对华北自由飞航，定每周二次。果其事属实，放任之则空权被侵；而默不一言，将来群起效尤，国将不国。抗议之，则彼方既决心为此，空言可决其无补。若以实力扣押，或取妨碍手段，则事态必日益扩大，循至不可收拾，三者均非至计。”要求中央速作决策。

△　中央红军克兴仁。同日，薛岳令第二纵队速向青山附近集结堵截红军，第三纵队占领太平街向兴仁尾追，第九十二师于20日向兴仁进攻。20日，薛岳判断红军主力将进占兴义，布置一、二、三纵队尾追堵截。龙云亦令独立第二团由宣威至滇、黔边境堵截。

△　蒋介石电刘湘，升任孙震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　中美庚款董事会改选，以蔡元培为董事长，周诒春、孟禄为副。

△　蔡廷锴旅欧结束，自菲抵香港。

△　据教育部发表，自1929年至1933年五年内，派至各国留学生人数为409人，其中文、史、政、经各科为206人，理、工、农、医各科为203人。

△　据《大公报》载《安庆通讯》：客岁江淮大旱，皖省尤烈。据皖省灾区筹赈会统计，全省60县，被灾者达49县。灾民870余万，赤贫不能举火者占十分之一。稻米损失约5048.9356万石，损失总值约2.8亿元。秕糠、树皮、草根均已食尽，今值青黄不接，仅以观音土、野菜、青草充饥。

4月20日　蒋介石整饬川、黔财政。是日以黔省旧省府及文武各机关省会地方贱价出售预征通关税票，面谕黔特派员李仲公采取断然措施，着将预征通关税票一律作废（按："通关税票"即特税票，亦即鸦片烟出口税）。同日又以川省各县地方财政紊乱不堪，特将在豫、鄂、皖、赣督师时所订之《剿匪区内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暨各关系法规合订本》，令饬川省主席刘湘转令遵行。

△　下午4时22分，台北发生强烈地震，震源在新竹州与台中州间大安溪流域，浅见山突然炸裂，喷出熔岩，乌烟冲天，入夜更甚。轻井泽降石甚多。小沼村森林因落下熔岩起火，势甚猛。21日晨6时2分及27分，新竹州与台中州又相继发生强烈地震两次，截至22日晚12时统计，新竹州死伤4299人，台中州死伤9265人；新竹州损毁房屋2.2234万所，台中州损毁房屋1.5245万所。

△　交通银行增资改组。股东会议追认政府拨付金融公债1000万

元作为官股，资本增为2000万元，分20万股，官股占十分之六，商股占十分之四；设常务董事七人，由财政部指派一人为董事长。22日，董事会增选官股董事宋子良、杨敦甫为常务董事。财政部指定胡笔江为董事长，唐寿民连任总经理。

△　驻华日使有吉离沪返日。

4月中旬　　日本对东北、华北经济侵略机构榆关大东公司改组竣事，由日伪合办，资本5000万元。总社长为日人五十岚房吉，总支配人为三野友吉。总社设长春；支社设大连、天津；出张所共13处：天津、榆关、喜峰口、古北口、塘沽、青岛、芝罘（烟台）、龙口、威海、沈阳、长春、安东、营口。

△　日本在多伦设内蒙牧羊合作社一所，并在锡林郭勒盟各重要市镇设支社20余处，委附逆蒙人包尔达为总社长。大批日货由锦州经多伦输入内蒙各地。

△　日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以1000万日金为移民费，收买黑龙江省饶河、虎林、依兰、桦川等县腴地140万亩，五年内移民300万。

△　沪工部局格致公学采用英版世界地图，内亚洲全图上有“满洲国”字样，并定我国边疆线为长城一带，西藏、蒙古亦非我有。全校学生集会抗议，要求改换课本，销毁地图版本。

△　日关东军殖民部组织满蒙资源调查团，调查东北煤、铁、森林、金矿、水利、渔业等产量，并决定组织株式会社，进行开发。

4月**21**日　　财政部咨各省、市政府、各商会暨银钱业公会共同防白银外流。

△　战区清理委员会在北平西山集会，交换战区各项问题意见。

△　朝鲜浪人私运银元二万元，在秦皇岛车站被海关缉巡队发

觉，竟开枪击伤海关人员李景先等二人。

△　华北水利委员会为海河放淤问题，前议将武清县属龙凤河流域洼地辟作第三放淤区。是日，该地数十村民众推派代表王普安等向河北省府呼吁，要求收回成议。

△　京芜路由江南铁路公司修筑完成，全长93公里。今起通车。

4月22日　美国远东经济考察团一行15人抵沪。该团团长福勃斯发表书面谈话称：来华考察目的，“在研究中美两国过去、现在及将来之商务”。并称：“团内无政府代表，亦无政府财政帮助。”24日考察团到南京，分谒实业、交通、外交、财政等部当局。25日，谒林森后返沪。

△　国民政府公布《学位授予法》，分博士、硕士及学士三级。5月20日明令自7月1日起施行。

△　吉林省日本宪兵队发表，自3月5日以来，在沈吉路吉林至海龙一段，以抗日反“满”罪逮捕共产党人110余名。

△　上海钱业因市面不景气，资金周转不灵，续有倒闭。是日，同泰钱庄又宣告清理。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拆放1000万元以资救济，由中央银行主持；借款户以公债库券、地契等作抵押。

△　蒋介石陆续往陕南调集重兵30多个团，对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二十五军连日在雒南（今洛南）与陕军激战，是日向城外古城、景村转移。

4月23日　中央红军主力自贵州兴仁、兴义中间地区经睹彰、龙洞、古门坎西渡黄泥河入滇境。薛岳令第三纵队、第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军分路尾追，限26日到达平彝城（今富源县城）；第五十三师经盘县、龙洞，27日到达宣威“截剿”；第一纵队26日到达亦资孔待命；第

二路军总指挥部24日迁盘县，25日至亦资孔。

△　第一路军前敌总指挥刘建绪以“湘西北紧急，而入黔之红军已北渡金沙，长追无济于事”，经何键批准于本日返湖南沅陵。

△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大会，到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委员及委员代表26人。决定筹设蒙古地方自治讲习所，成立保安教导队、卫生院、文化馆、实验村、师范学校、生产合作社、贸易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并建立电业、驿站、公路三管理局。5月21日会议结束。

△　驻华日使有吉抵东京，向外相广田报告中国情势。翌日，有吉与广田协议“中日提携”具体方策，认为不仅限于经济，应推及文化与政治。

△　日关东军参谋河野由长春到北平。午，应何应钦招宴。

△　新任驻华日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偕武官影佐祯昭到京访晤汪精卫。

△　伪热河鸦片专署强迫长城附近各村种植鸦片，每亩预缴税收八元。是日，遵化北撤河桥等30余村农民聚众千余人反抗苛杂，包围、捣毁伪鸦片专署。驻凌源伪骑兵一队驰往镇压。

4月24日　　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蒋作宾与驻日暹使交涉中暹建交，并订中暹商约。

△　行政院讨论民国二十四年度国家总预算案，因财政困难，决定比照上年度预算数核减十分之一，由各部会核减重编。

△　美国政府再度提高银价，每盎斯增至七角七分五厘七。25日，美财长摩根韬声称：“财部将续购矿银，直至银价达到每盎斯一元二角九分，或库存白银达到货币准备金四分之一时始止。”同日，

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非正式向美国务卿赫尔说明中国对美白银政策之“不安”。

4月25日　中央红军主力经白水镇进入云南沾益县境内。是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沾益、富源两县交界的糯冈、东新口、朝阳箐一带，围歼滇军李嵩独立团200余人。深夜，残敌逃至曲靖城内。同日，红三军团行至白水镇，遭敌空军轰炸，伤亡300余人。军团政委杨尚昆等不幸负伤。

△　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经盘县过北盘江，进至土木卡、猪场一带。蒋介石电令第三十六军由羊肠营取捷径驰赴宣威“堵剿”。27日，红九军团攻克宣威城。

4月26日　立法院修正通过《简易人寿保险法》、《农仓业法》及《民事诉讼法施行法》。

△　二十四年度国家总概算，由主计处按中政会所定紧缩原则编成，计岁入7.42643340亿元，岁出8.98423452亿元，不敷1.55780112亿元，另筹抵补办法。

△　国民政府明令豁免贵州省本年田赋。

△　薛岳令第五十三师27日向白水进攻，第十三师策应，第三十六军至鳌家屯，第一纵队至平彝城及其以西地区，总指挥部向亦资孔推进。28日，第五十三师、第十三师尾追红军至沾益、曲靖县城。

△　红军师长毛泽覃率所部在江西瑞金东之黄鳝口，与毛炳文部许克祥第二十四师汤团遭遇。毛泽覃英勇牺牲。

△　河北省府颁《查禁私运现银出口办法》，凡九条，限旅客凭照携现50元；私运银币或银类出口，一经缉获，全部充公，并照偷运数额加倍处罚。

△　北宁铁路局长殷同赴日参加铁道省发起之东洋观光会议，是晚抵沈阳，出席土肥原举行之欢迎会。29日抵日本。

△　上海市商会等16团体欢宴美国远东经济考察团。27日，上海各界领袖与考察团开专家会议，讨论中美商务问题。

4月27日　国民政府任命张惠长为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原任凌冰免职。

△　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分两路经曲靖马龙开进，并占领马龙。同日，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占领沾益。

4月28日　蒋介石急电龙云将金沙江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材料全部毁灭，以防红军渡江。

△　财政部拟定地方银行发钞限制办法，规定："地方银行除经财部核准发行之数额外，有因调整金融呈请续发者，经审核后准其领用中央银行钞票及发行若干辅币。"

△　黄河水利委员会召集冀、鲁、豫三省河务局长会议，拟定修筑堤防计划。全国经济委员会电允协助培修金堤。

△　日本最大孔庙东京"汤岛圣堂"落成。是日，日本"斯文会"在"汤岛圣堂"举行孔子祭典和儒道大会。孔、颜后裔孔昭润、颜振鸿和山东省府参议赵新儒、聂澄泽等均前往参加。伪满也指派伪文教次长和奉天、吉林两省伪教育厅长前往。

4月29日　驻华苏大使鲍格莫洛夫拜会汪精卫，代表苏联政府声明"苏对新疆绝无领土野心"。

△　国民政府派王锦霞为出席第十九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劳工方面代表，吴闻天为顾问；王志圣为雇主方面代表，顾炳元为顾问。

△　财政部训令上海钱业公会取缔钱庄借辞停业。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同日，中央红军一部占寻甸，另一部由马龙经杨林克嵩明，威胁昆明，滇全省震动。红九军团进抵会泽城东郊。

△　薛岳令第十三师由牛街向寻甸尾追红军，第三十六军由沾益向寻甸以东水圩子附近推进，第一纵队由曲靖向马龙前进。30日，令第十三师、第三十六军在嵩明及其西北之武定、富民地区截击。时第三纵队主力由马龙进至易隆一带，第二、七两旅已到达昆明。

4月30日　　战区清理委员会结束，未了案件移交河北省政府办理。

△　行政院通过圣裔奉祀官准照前清例世袭。

△　驻华法公使韦礼敦访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商谈中法越南商约问题。

△　闽浙边境红军粟裕、刘英两部共600余人，在浙江庆元与国民党军接触后，经龙泉南庆元西北入闽北松溪境。

4月下旬　　冀东玉田城内日人广设押当，多至30余家。典押期分五日、十日两种。五日者值十押五，利息每元加一，到期不赎者变卖；十日者值十押三，息与五日者同，农民忍痛典当，受害者甚多。

△　日本以朝鲜江原道饥馑，向我东北移民。已移吉林边珲春等县382户，2697人。

是月　　闽西红军张鼎丞部为恢复发展根据地，在永定溪南里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闽西游击战方针，确定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

△　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项英、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主任陈毅、赣粤边特区书记李乐天等带领红军一排，从赣粤边油山转移至北山。

△　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原属参谋本部改属军事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

△　日韩浪人在长城各口设转运机关，包运烟土，输入冀东战区，四个月内运入热河烟土达1000万两。

△　1至4月，沪市进口洋米357万公担，全国达689万公担，值4810.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

5月

5月1日　　国民政府任命徐庭瑶为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免去其第十七军军长职。

△　张学良偕顾问端纳由汉口飞抵贵阳，向蒋介石报告在开封、西安检阅豫、陕驻军情况。

△　中央红军分三路抢渡金沙江：军委干部团在皎平渡渡江；一军团经禄劝、武定、元谋至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洪门渡江流太急，龙街渡江面太宽，敌机低飞骚扰，均不便渡江。4日，军委干部团二营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在皎平渡渡口成功偷渡金沙江。

△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强攫吉林省间岛（延吉）金矿，定6月1日由该社经营。

△　殷同在东京访问日外务省。

△　西兰公路建成，历时一年余，耗资200余万元，今起正式通

车，全长753公里，西安至兰州单程四日可达。

5月2日　　北平市长袁良偕驻平政整会委员李泽一抵莫干山，晤黄郛，分别报告北平政务及访日情况。会后，李泽一谓：本人此次赴日会晤广田，但日本外交多受军人牵制。他人以武力为外交后盾；我欲外交有力量，亦必须有雄厚之实力。

△　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枪击重伤，次日毙命。振报社社长白逾桓亦于3日在日租界被击毙。胡、白两人均接受日军津贴，受命办报，传播所谓“泛亚细亚思想”。

△　驻华法使韦礼敦访外次徐谟，续商中法越约，双方意见已趋一致。

△　红九军团攻占会泽，扩军千余人。4日，进至会泽西白龙潭附近。继在巧家南百余里处因民、落雪之间渡过金沙江。旋经披沙（今宁南）县境，到达西昌地区，与红三军团留守部队会合北上。

5月3日　　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在省党部礼堂报告今后建设新贵州之步骤。省政府施政大纲计划分为三个时期办理：一是“剿匪”时期；二是善后时期；三是建设时期。其建设为：第一步完成湘黔、川黔两段公路；其次进行生产建设、开发矿产、修筑由重庆经贵阳到广州的钦渝铁路，由昆明经贵阳到长沙的滇湘铁路。

△　立法院通过参加《国际邮政公约》及附属协定。

△　湖南省税收短绌，入不敷出，是日省府决议发行短期库券，总额150万元，作搭发各机关经费之用。6月1日起发行。

△　薛岳率部尾追中央红军，第三纵队安恩溥、刘正富旅向武定追击。4日趋元谋。空军三、四两队亦同时由贵阳移驻昆明。同日，薛岳抵昆明，会晤滇省主席兼第二路“追剿”军总司令龙云，报告“剿共”经过，并商机宜。

△　日外相广田在东京全国地方长官会议上演说，以中日关系极度转好，为实行“中日经济提携”，主张“由两国民间在上海、大阪设置中日经济委员会”。

5月4日　　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刊登易水（艾寒松）之《闲话皇帝》一文。文中说：现在的皇帝“有名无实”，是“古董”、“傀儡”。日本的统治者要保留天皇，“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

△　国民政府任陈立夫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焯为副。

△　孙永勤组义勇军1200人进攻承德，占下板城。驻承德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急调古北口日军及察东伪军李守信部驰救。

△　国民政府任翁文灏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钱昌照为副。

△　《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正约于1930年5月16日由前外长王正廷与前驻华法公使玛太尔签字，其附件由于征收洋米税等问题未决，致久悬未定，后迭经洽商，是日始由兼外长汪精卫和驻华法使韦礼敦在南京正式签字。其他附件同时换文。

△　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在昆明创刊。龙云为董事长，常董龚自知负实际领导责任。

△　日伪军在察东擅行划界，设国境警察队，并将察省沽源县属小厂子、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木梁等地地名，按日军官姓名改称，强指各该地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管辖地。16日，宋哲元谈：“日伪擅行划界问题，决依外交方式解决。”

△　河北临榆商办柳江煤矿公司本年3月以来在黑石窝采矿，与该公司矿区毗连之中日合办泰记煤矿公司日经理指为侵犯矿权。是日，

秦皇岛、山海关两地日警30余人，由署长佐藤率领，将柳江公司秦皇岛仓库、码头查封，并将柳江至秦皇岛间长40余里之轻便铁道拆毁，柳江公司被迫停产。15日、17日，双方推派代表会谈，泰记所持之民国六年矿图，注明该区让归柳江股东张德勋，泰记无法否认，表示愿和平解决。

△　日政友会考察团藤沼庄平等一行六人抵沪。该团宣称，来华目的为实地考察“中日经济提携能否实现问题”。

△　日韩侨民偷运现洋出口，天津、北平、塘沽、古冶、滦县、昌黎、秦皇岛等地日计十五六万元。是日，河北省府及天津市府特派员驻守中国、交通等银行监督兑现，截堵偷运。

5月5日　　英铁路专家哈孟德应国民政府聘为铁道顾问，是日抵沪。

△　国民政府以陈嘉庚捐资助学，特授予二等采玉勋章。

△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红一军团于7日兼程赶到皎平渡，红三军团限6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在皎西以南担任掩护，在石板河、皎西、沙老树一带阻击敌人。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随同军委纵队渡过金沙江，驻扎在中屋山，指挥中央红军渡江。

△　遵化马兰峪日军警备队为进攻义勇军孙永勤部，通知遵化保安队撤退至长城南25里处。保安队以25里处已在遵化县城以南，只撤15里。

5月6日　　薛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将在永仁北之仁和渡渡江，一部将在元谋北之金沙江渡江，乃令欧震师限7日午后到达金沙江，梁华盛师由元谋至永仁，“歼灭”渡江红军，万耀煌师向元谋、金沙江急进。并令空军第三、四两队于7日破坏金沙江红军架设之浮桥；第五

十三师李韫珩部在会泽、巧家间“速歼”红九军团。

△　四川“剿匪”军总部令邓锡侯派第一师师长陈鼎勋选精锐部队三团，由大石坝增防土门，以防红军西进。7日又电促于涪江、清溪河、岷江之间封锁红军，加厚土门兵力，并以有力部队向红军主力进攻。8日，再电严守土门。10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师及许绍宗师14日开始封锁涪江沿线，王缵绪师向大垭口进攻，邓锡侯、孙震两部原线出击；邓锡侯部增援土门三团兵力限13日到达，原驻土门陶凯师由土门进攻。14日，邓锡侯复电称：“攻击准备尚未完成，不能如期开始，且无法抽兵兼顾土门。”

△　中日双方在天津续商战区保安队换防问题，日关东军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日使馆武官高桥、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及参谋大木，北平军分会科长朱式勤、滦榆区专员陶尚铭、蓟密区专员殷汝耕均参加。7日，双方取得一致意见。8日，冀省府颁布战区特警队换防令。

△　中国律师协会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发表宣言，要求实现冤狱赔偿制度，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利。

△　国际间谍韩人白秉素等两人在四川自流井借行商为名，暗绘地图，拍摄军事设施照片，是日被捕获。7日，又有韩人一名被捕。

△　广东明德社开办“学术研究班”，轮训第一集团军政训人员。研究科目为《孝经》、四书、《群经大义》、宋明理学。6月8日，陈济棠在该班讲《明德要义》，提倡读经、祀孔。

△　行政院决议，青海省增设同德县。

5月7日　　国民政府任命柏辉章为第一〇二师师长，何知重为第一〇三师师长，吴剑平为第一二一师师长。

△　殷同在东京访晤日外相广田谈中日关系。广田称：“余意双方应尽量助长民间经济以及文化合作事业之协调。”“以后中国如在国际

间有所企图，无妨与日本商量，日本必能力为斡旋。”

△　红二、六军团围攻塔卧。翌日开始包围陶广部朱再生团及钟涤松补充第五团，历时达七昼夜。迄14日，经陶部钟光仁旅驰救，塔卧之围始解。红军转进龙家寨一带。

△　老同盟会员广东中山县建设局长朱卓文、第一集团军总部咨议袁带、粤海军参议蔡腾辉等秘密组织“大同救国军”，图在中山县举事，夺取广东政权。是日，朱、袁两人在石岐为驻军查获。陈济棠以“谋乱”罪将朱就地枪决，袁解广州。蔡腾辉和同党二三十人亦先后被捕。

△　察哈尔省12旗请求改盟，行政院以旗隶属县治，行之已久，未予批准。是日，复派代表赵成义抵京请愿。

△　厦门钱业大量收买白银，市上现银交易几绝，钞票以现洋跌价一二角不等。是日，厦市府严令取缔。

5月8日　　红一军团从龙街赶到皎平渡渡口，开始渡江。红三军前卫已于昨日渡金沙江，向会理进军。红五军团为全军后卫部队，继续与追敌周旋于皎西、坎凳一带。9日，红五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于洪门场渡口渡过金沙江。

△　日驻京总领事须磨向外交部转达日政府决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同日，日外务省将驻华使节升格事分别通知英、意、法、美、德各国驻日使馆。12日，日驻华公使升格咨文送达中国驻日使馆，并由须磨向外交部接洽。

△　蒋介石委李云杰为第二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官。

△　蒋介石准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辞职，遗缺派甘丽初代理。

△　据天津《大公报》载：江西省设立公民训练委员会，对全省

公民实行训练。择南昌、九江、萍乡、吉安、赣县、临川、广丰、浮梁（今并入景德镇市）、南城、宜春10县先行试办，渐次推广，预定三年完成。内容有军事训练、国民党党义及训政基础知识等。采强制办法，由联保主任、保甲长负责督率出席，不准请人代理；意图规避、抗不出席者，予以罚金或拘役处分。

△　河北省府及天津市府召集市商会及钱业公会再商杜绝白银外流办法，规定暂禁钱商兑卖现银，“私售者与偷运同罪”。16日，津市府又令各商家每日售货所得现洋，悉送各银行号收存，不得私自与人贴换或转手私售。

5月9日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在一周时间内，中央红军靠着七只渡船将两万多红军全部送到金沙北岸，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同日，蒋介石电薛岳，谓：“如匪已渡河，则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各部皆应迅速渡河，剿匪之成功，端在此举，务饬各部努力为要。”

△　立法院通过《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有“发行本位币及辅币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等特权。资本总额一亿元，招集商股总数不得超过40％。2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施行。

△　立法院长孙科等离京赴陕，考察西北经济及风俗民情。24日，考察完毕返京。

△　美国经济考察团在天津出席南开大学座谈会，座谈中美经济、金融问题。中国专家认为中国金融及商业显受美国政府白银政策危害，要求考察团回国建议政府改善。考察团避不表示意见。

△　广州商业萧条，今年以来，中等资本商店歇业者已达3000余家。是日，市商会电请财政部加重有国货可替用之舶来品进口税率，

以维持本国商业。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督剿”红军。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并规定《民事诉讼法》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

△　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称：“我们所揭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在时间上重视此时的动向，在空间上重视此地的环境，热切希望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和此时此地的需要相吻合。”并称：“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同期《文化建设》刊载陈立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所作题为《文化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讲演辞，略谓：“以中国本位之文明，不断的贡献人类而不让，同时不断的受人类贡献而不拒，时时造成适合中华民族自身之生存，与全人类共生共存之结果，谓之中国本位之文化。”

△　《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出《读经问题专号》，72人就中小学应否读经问题发表意见，多数认为：“把读经当做一种专家的研究，都可赞成；若是把读经当做中小学校中必修的科目，则不必。”陈立夫、何键、江亢虎等人主张“学校读经，宜从小学开始”。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古直强调：“舍经而言教育，吾惟亡国是惧。”柳亚子、周予同、林砺儒等人反对中小学读经。柳谓：“时代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倘然读经可以抵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那么我将引吭高呼，恭祝东方文明万岁！”

△　河北战区保安队开始换防。新编河北省特种警察队共分五总队，由滦、蓟两专署统辖。第一总队张庆余部自蔡村开通县，然后赴密云、顺义、怀柔、三河等县；第二总队张砚田部11日由沧县开唐山

集中，分往滦县、昌黎、抚宁、迁安、丰润各县。第一、二总队部分别在蓟县、留守营成立。旧保安队周毓英、赵雷、刘佐周等部改编为第三、四、五总队；杨玉成、范景华等部调出训练。

5月上旬　　第六十七军九个团和第九十五师三个团从雒南县向南，第四十四师四个团从郧西县上津向北，同时进攻红二十五军。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警二旅两个团、特一旅两个团，从南到北部署在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条长线，在西面对红军进行阻击。

△　禁烟会统计全国各省、市戒烟所及戒烟医院共600处，上年各省、市对贩卖、制造及复吸之毒犯判处死刑者263人。

△　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办之陕西泾惠渠竣工，灌溉面积可增至50万亩以上。该工程历时一载，费工款20余万元。

5月**11**日　　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封锁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加以“围歼”，电令：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以一部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军薛岳部以第一、二两纵队及第五十三师速渡金沙江，解会理之围，并以有力一部进至西昌筑碉，右与昭觉方面川军郭勋祺部，左与盐边、盐源之滇军第三纵队孙渡部相对筑成碉堡封锁；第三纵队孙渡部驰赴盐边、盐源，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并在永仁、元谋各县沿金沙江右岸筑碉防堵。

△　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哲元下令辖区禁用“满洲国”货币，违者处死。

△　日武官高桥会见何应钦，对白逾桓、胡恩溥被杀事提出抗议，声称此案“扰乱日租界治安”，“想系国家机构或有力的团体所为，省市政府或系知情不敢取缔，日方当彻底究明应负责任的人”。同日，又对外交部北平特派员程锡庚表示：此案“与中国的蓝衣社、宪

兵特务队及青红帮都有秘密关系”。

△　南京市商会、工会、农会以暹罗排华，特电政府速颁禁止暹米入口令，并吁请全国拒用暹米，以示抵制。同日，汕头华侨团体通电全国，请政府向暹提严重交涉，并停购暹米，作有效制裁。26日，沪各团体组援旅暹华侨联合会。

5月12日　　蒋介石在云南省党部及各界民众欢宴席上发表题为《全滇民众应负起复兴民族之责》，希望“大家起来建设一个真正工业化的云南，来作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　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两年财政报告：支出以军务费最多，二十一年度为3.21亿，占总支出49.7%；二十二年度为3.73亿，占48.5%。因黄灾、“闽变”、“剿共”等原因，关税收入大减，以致二十一年度赤字为8600万元，二十二年度赤字为1.47亿元。并发表今后财政要务九项：一、厉行更有效的预算制度；二、清理衍期债务；三、整理盐税；四、整理关税；五、调整地方税；六、奖励并统制实业；七、稳定货币，统一辅币；八、改进交通；九、救济农业。

△　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陈云、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刘伯承、何克全、邓发、邓小平等18人出席。张闻天主持，讨论今后行动，决定继续北上抗日，并绕道到川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　徐向前率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主力，击溃川军邓锡侯部11个团和各地民团之防堵，占领土门险关。15日占领茂县。

△　中德文化协会成立，朱家骅等为理事。

△　殷同在东京访晤近卫公爵。近卫称：日本外务省、军部对华所采手段虽异，但其目的均希求“中日之提携亲善”。谈及中国排日教

育问题时，殷同称：“敝国当局亦曾注意及之，期以今秋将全国教科书加以详密检阅校正，以期缓和国际感情。”

△　财政部准川省发行地方公债2400万元，作整理该省金融之用，由中央银行承押，分四年还清。

△　津海关是日起协同公安局于平沈车过境时检查可疑旅客，严缉私运现银。

5月13日　山东省中日合办之鲁大公司淄川煤矿第二坑，因防护设备简陋，漠视工人安全，发生大水，是日井下工人539人被淹毙。死难家属愤而群起包围该矿事务所。济南日总领事西田电韩复榘派兵。韩由博山（今并入淄博市）派兵一连驰往镇慑。

△　殷同与上海农商银行总裁蒋方震在东京会见朝鲜、兴银、三井、东亚、工业等银团，交换“中日经济提携”意见。

△　美国经济考察团在北平与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代表座谈，分物品、金融、海关、交通四组交换意见。14日，该团团长福勃斯在燕京大学新闻学会讲演，略谓：“本团此次到东亚考察，目的在调查经济状况，图谋发展美国与东亚之贸易，凡有足以为此项贸易之阻碍者，均将设法予以消除。”17日，考察团赴汉口。

△　中英庚款董事会决议拨粤汉路株韶段工款百万元，二十四年度教育文化事业补助费133万元。

△　前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在南昌被蒋介石枪决。

5月14日　蒋介石电令何键保护国家主义分子，略谓：“湘省迩来仍有对该派分子因其既往关系故意压迫情事，宁乡一县滋扰尤甚，此实违中央电令之意。苟其现在言论行动并无违反三民主义，均应一律加以保护，不得横加压迫，动予搜捕，其已被羁押者，立即迅予查明，分别省释。”

△　行政院决议任徐堪为财政部常务次长；原任秦汾准予辞职。

△　英莱斯德女士在平招待中外记者，报告昌黎之行，称："昌黎日韩侨民多借领事裁判权为护符，贩售鸦片、白面、吗啡等毒品，全县贩毒机关163处，其中日人经营者116处，韩人经营者47处。在战区中，昌黎之毒祸尚为甚轻者，唐山、山海关、滦县、开平、古冶及秦皇岛为祸更烈。"

△　日人中岛由唐山赴丰润运送毒品，在唐山韩城镇被韩浪人暗杀，日领诬称系民团所为。19日，驻津日军参谋长酒井借口白、胡及中岛两案，在津召集日"在乡军人"及"义勇队"等会商对策。24日，唐山日警捕去常玉书等五人审讯。

△　云南设昌宁县，由保山、顺宁两县析置。

5月15日　蒋介石为阻红军徐向前部西进，解江油之围，电令孙震、邓锡侯等部向红军总攻。邓锡侯部杨晒轩旅被困江油达40日，21日围始解。

△　国民政府派孙震为第四十一军军长；犹国才为"剿匪"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何知重为副。

△　国民政府任命柏天民为第五十一师师长。

△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击溃川军邓锡侯部陶凯师的堵击，克土门。16日又败王缵绪师及邓锡侯、孙震等部，克茂县。21日，另一部渡岷江占理番（今理县）。

△　荷属印度尼西亚政府自3月以来，对华侨迭颁苛例，取缔学校，限制居住、营业自由，近又勒令华侨离境。是日被逐难侨一批240人抵香港。

△　武昌行营修正重颁《"剿匪"各省区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兼任

行营军法官条例》。

5月16日　　为阻红军渡大渡河北上，川军第二十军杨森部沿西昌、越嶲至大渡河渡口一线及昭觉、峨边一线布防。19日，蒋介石令刘文辉部于一个月内完成雅河、大渡河沿岸碉堡，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拨四个旅归其调遣。

△　蒋介石以川军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副师长陶凯“作战不力，迭失要地”，将其“撤职留任，戴罪图功”；邓锡侯“不遵令增防，致失土门、茂县，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加申斥，以观后效”。

△　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公使贺耀组向土总统凯末尔呈递国书。

5月17日　　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公布中日互换大使，双方分别以现任公使蒋作宾、有吉升任。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日两国国交的增进，以互相尊重为原则，此次升格，亦即互相尊重的最明确的表示。”

△　中英、中美政府商定使节升格为大使。

△　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受日伪军压迫，撤入战区遵化县附近。

△　国民政府令免陈绍宽兼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职，遗缺由马德骥继任。

△　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上海市地方协会、新中国建设学会等团体公祭《申报》故总经理史量才。次日举殡。

5月18日　　林彪、聂荣臻率红一、红五军团自德昌向西昌前进。次日占礼州（西昌城北数十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礼州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敌军固守，决取道冕宁，通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　何应钦由平南下沿平汉路视察，20日抵太原晤阎锡山商陕北“剿灭”红军军事，并发表谈话称：“陕北‘匪’情非常严重，尤以刘志丹股最大，若不迅谋根本肃清，则滋蔓难图。”

△　蒋介石和龙云乘飞机察看元谋、龙街、会理，沿安宁河至西昌一线，复沿金沙江经巧家折返昆明。

△　张国焘在四川茂县一带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

△　中、德两国政府商定使节升格为大使。

△　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选马衡等12人为执委。

△　华洋义赈会在西安开年会，决定必要时将总会自北平南迁；选王正廷为会长，艾德敷（美国人，北平青年会总干事）为副，章元善为总干事。

5月19日　赣省主席熊式辉到汉谒张学良报告赣省军政情况，并与行营商洽庐山暑期训练县长事宜。

△　日军200余名由撒河桥开抵遵化。

5月20日　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近在遵化筹征粮秣，要求遵化县长供给弹药，被拒绝。是日，日军200余名向遵化城东15里小寨一带攻击孙部。日武官高桥致函何应钦，转达关东军意见，谓：“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的事实，关东军不得已派兵进入遵化一带，希望彻底消灭孙部。”21日，殷汝耕往访高桥，担保中国当局竭力“剿匪”，关东军无需派兵入关。

△　刘湘偕参谋长傅常等自重庆飞成都“督剿”红军。

△　国民政府任命孙楚为第一〇一师师长。

△　国联第二十届禁烟委员会在日内瓦开会。中国政府派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出席，并报告中国禁烟情形。

△　北宁铁路军粮城站查获韩人张昌复等11人偷运现洋8250元。23日，日田中领事向北宁铁路局面提抗议。24日，驻津日总领事川越亦函路局，要求“此后不得再有类此事件发生”。

5月中旬　《世界文库》第一册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刊由郑振铎主编，蔡元培、鲁迅、茅盾、巴金、冰心、胡适、丰子恺等一百数十人负责注释、撰述。第一册刊有蔡元培的《序言》。郑振铎在《发刊缘起》中说：《世界文库》将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献世界文学名著于一般读者之前。从埃及、希伯来、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

5月**21**日　行政院通过外交部呈报中美、中德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案。

△　天津日驻屯军是日起骚扰河北省府、天津市府、市党部等机关。日军官池上向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索白、胡事件凶手；并诬指天津市长张廷谔等为元凶，于学忠为纵使者。日武官影佐、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等主张逮捕于、张为质。张因此躲避，于亦戒备，天津市党部委员全部请假。

△　蒋介石由昆明飞贵阳。次日由贵阳飞重庆。

△　日人为统制蒙盐，由伪满财政部在多伦布告蒙盐收买办法。伪蒙政部亦声明，察省各盟旗所产蒙盐，每年12万匹库尔，均由伪满收买，不得外运。

△　暹罗海关税务司长华斯蒂抵沪，声称系来考察海关事业，无接洽中暹订约使命，并否认暹罗排华。

△　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被迫辞职，张景惠继任。

5月22日　国民政府公布以现任驻英公使郭泰祺升任中国驻英首任大使。英国政府同时公布以现任驻华公使贾德干升任驻华大使。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决定，对偷运银币、银类出洋，或运往不行使银本位币地方之人犯，一律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币额或价额五倍之罚金。

△　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冕宁经过彝族区域，和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在彝族同胞帮助下，红军部队通过彝族区域。

△　日本陆军、拓务两省商定于15年内向我东北移民10万户50万人。是日，拓务省东亚课长森重携移民计划自东京出发，去东北与关东军首脑协商。

5月23日　蒋介石令陈继承任湘鄂赣军区“剿匪”总指挥，率部进“剿”湘东红军徐彦刚部。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四十三、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第七十七、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一〇五、第一一七等师，独立第三十五旅、第三十七旅、暂编第三旅、第十九师邓南骥旅及鄂、赣两省驻军等，统归其指挥。

△　青岛明华银行因经营地产，损失甚巨，被迫停业。平、津明华银行因受青行影响同时停业。24日，沪明华银行总行因青、津分行停业影响，亦停业。

△　青岛中鲁银行昨发生挤兑，50万存款扫数提净。青岛中国实业银行因受中鲁、明华影响，是日发生挤兑。市长沈鸿烈召集各银行经理及市商会商维持办法。次日，该行厦门分行亦发生挤兑。

5月24日　美国经济考察团团长福勃斯等一行到重庆见蒋介石。25日，蒋宴考察团。28日，考察团在川考察毕，乘蒋私人飞机回沪。

△　立法院通过增加进口税案，规定海关除征原有附加税5％外，

再增附加税10%。

△　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在遵化茅山沟遭日军川岸部队围攻。领导人孙永勤、宫有元等在激战中牺牲，余部入迁安。

△　上海美商美丰银行以经营地产及外汇投机失败宣告停业清理；与其共资经营之普益地产公司、普益信托公司、美东银公司同时改组。天津美丰分行同日停业。美丰资产总额1900余万元，各项存款1000万元以上，发行钞票23.7万余元。

△　沪电通影片公司拍摄《风云儿女》告竣，是日上映。片中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系田汉作词，聂耳谱曲。

5月25日　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在团长杨得志率领下到达安顺场大渡河口，凭仅有的一只船，抢渡大渡河。9时，刘伯承下令渡河，由第一团第一营挑选连长熊尚林等17名勇士组成“奋勇队”，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冒着敌军的炮火，乘船登上河对岸。

△　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在日军威迫下，宣布省府自7月1日迁保定。30日，又决定提前在6月1日迁移。

△　国民政府任命朱鹤翔为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原任张乃燕免职。

△　汪精卫自沪返京，接见张发奎及粤考察团。

△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驻平使馆武官高桥会商对华北问题处理方针，决定利用白、胡被杀事件，逐步彻底驱逐东北系及中央系势力出华北。是日，华北驻屯军将此方针电日陆军中枢报告。

△　闽省民军人枪在20万以上，是日点编截止，受编者仅四五千人。省政当局声称：逾期不受编者将予剿办。

△　王西徵在《大公报》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要义》一文，略谓："三民主义是中国现在一切设施的依据。十教授大都是曾致力于党务的人，所发宣言自然也不能根本上脱开这种立场"，"十教授所宣布的'此时此地的需要'的三项，都可归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而没有'民权主义'。"因此，"'中国本位文化'之较为简单浅显的解释，为：不同于德、意的，中国的，'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更较简单浅显的解释，为'二民主义'的文化"。张奚若于6月17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三期上著《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指出，按照王西徵的解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

5月26日　蒋介石自重庆飞成都"督剿"红军，宋美龄、顾问端纳偕行。

△　进抵迁安追击孙永勤部之日军是日起分别向遵化马兰峪、撒河桥、古北口等地撤退。

△　明华、美丰两银行停业清理后，是日天津大中银行又发生挤兑。财政部为此对发行钞票各银行加强监督，除陆续派人驻守，监督其发行额及准备金外，并促沪市各银行限文到三日内造具营业报告、资产负债数目送部备核。

5月27日　林彪率红一军团通过彝族地区到达安顺场渡口。毛泽东随红一军团行动。是日，毛泽东决定北上抢占泸定桥。红军总部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部、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已渡过大渡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下，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两路协同夺取泸定桥。

△　国民政府公布《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规定由国民政府聘专门学者30余人为评议员，院长及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以院长为议长。该会主要任务为决定该院研究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

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

△　蒋介石令李韫珩师及川军刘元璋师编为第二路军第五纵队，以李韫珩为司令，刘元璋为副。

△　汪精卫在上海曾仲鸣宅召见黄郛、唐有壬商华北要政，并促黄返平。

△　广州中山大学发生驱逐古直教授风潮。按：古为该校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提倡读经最力，引起学生强烈反对。

△　热河义勇军孙永勤余部在遵化、迁安交界地带，遭河北战区特警第二总队张砚田部围攻。

△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在广州召各将领会商“剿匪”、“绥靖”事宜，参谋长缪培南、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20余人参加。

△　上海各私立大学法律系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下最大决心”收回领事裁判权。

5月28日　　行政院决议成立中央信托局，办理储蓄、保险等业务，由中央银行拨款1000万元充作资本。

△　行政院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规定于10年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年制达到四年制之义务教育。分三期进行：1935年8月至1940年7月推行一年义务教育；1940年8月至1944年7月推行两年义务教育；1944年8月起推行四年义务教育。违者强迫入学。

△　薛岳令第五纵队刘元璋师除留一团守备西昌外，主力向泸沽、冕宁追击红军。

5月29日　　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驻华

使馆武官高桥等，到平先后会见政整会秘书长俞家骥及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抗议中国官宪援助孙永勤部是“破坏停战协定行为”；白（逾桓）、胡（恩溥）被杀是“中国排外行动”，“对日本的挑衅”。声称“发动此等行动的根据地是北平、天津，因此，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平、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要求改变“对日两面政策”，罢免于学忠、张廷谔（天津市长）、蒋孝先（宪三团团长）、丁昌（宪三团团附）、曾扩情（军分会政训处长）、何一飞（蓝衣社天津办事处处长）；撤退宪兵第三团、国民党河北省、市党部、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北平支社；河北省府移保定；调走中央军；逮捕暗杀胡、白犯人，赔偿被害者损失；取缔排日书籍。30日，何应钦两次电中央请示。31日，国民政府电令何负责应付。

△　中央红军一军团第一师与干部团渡过大渡河后，组成右路，沿河东岸北上；主力（一军团缺一师，三、五、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为左路，沿河西岸北上。是日下午，由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指挥，由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员抢占桥头堡，夺取泸定桥，后续部队乘胜击溃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两个团，进占泸定城。30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通过大渡河，两路大军会合。

△　日陆相林铣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在长春商议驻东北日军改为常备军等问题。

△　下午2时，驻天津日军步兵百余人，全副武装，携钢炮三门，沿河北区各街游行。4时，日兵数十人乘装甲车、汽车游行。30日，复有日兵200余人在河北省府、省公安局附近游行，并在北洋大学附近鸣炮六响示威。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废止《禁烟法》，裁撤禁烟委员会；设禁烟总监，办理全国禁烟、禁毒事宜。禁烟总监由蒋介石兼任。

△　陆军第二十八军改称第四十五军，国民政府派邓锡侯为该军军长。

△　越南排华，对华侨课重税，随意没收财产。是日侨胞代表何兴农到京吁请国民政府解决。

△　沪四大钱庄之一鼎甡钱庄因受美丰、明华两行停业影响，兼以同业拆票明松暗紧，周转困难，是日宣告倒闭。与该庄有往来之协和钱庄亦同时改组。

5月30日　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银行先后发生挤兑，国民政府指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拨款“支持”。是日，财政部接管实业银行；6月1日、7日又分别接管四明银行和通商银行，均改为官商合办。总经理易人，实业为胡孟嘉代理，四明为叶琢堂，通商为顾诒谷。

△　天津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29日向何应钦提出多项要求后，日方从各方面施加压力。是晚上海日武官矶谷及影佐访黄郛；31日及6月3日，南京日武官雨宫又两次访唐有壬，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方要求。

△　五卅惨案十周年纪念，沪各界公祭五卅烈士墓，公墓董事长虞洽卿主祭。

5月31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奉令访日外相广田交涉河北问题，表示平、津不能划作停战区域，于学忠更调系中国内政，河北省府早已决定迁保定，即付实施，愿竭诚相商解决办法，力避事态扩大。6月1日，广田答复蒋作宾，表示“河北事件涉及《塘沽停战协定》，应由双方军事当局就地商决”。

△　天津日军续在河北省府门前示威，并有日军百余人闯入市公安局。日驻津总领事川越向于学忠提出与日军方所提同样内容之强硬

抗议。

△　蒋介石电令薛岳，以第一、第二两纵队之一部在西昌、泸沽之线筑碉守备，巩固后方交通，主力速向汉源挺进，第五纵队向泸定、康定之线推进合围；同时令安县方面孙震部，汶川方面邓锡侯部，雅安、汉源一带刘文辉部，洪雅、荥经一带杨森部合围红军。

△　蒙政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抵平，促何应钦就指导长官，并请示一切。

△　法外长赖伐尔通知中国驻法代办萧继荣，法国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

△　立法院修正通过减免出口税则，规定减免出口税率之货物百余种。

5月下旬　　蒋介石以刘文辉未遵令限期筑成金沙江、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锁线，致令红军自由渡过，特通令将刘“记大过一次，戴罪图功”。

是月　　抗日联军第二军第四师袭击京图路（长春至图们）之哈尔巴岭，拆毁铁轨，颠覆列车，歼灭日本军官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军用品等。

△　《芒种》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徐懋庸主编。

△　《新民月刊》在广州创刊，由陈济棠创办，陈玉昆、钟介民主编，明德社出版。该刊启事宣称宗旨在“阐扬固有道德，探讨中外文化，介绍西方学说，矫正唯物偏见”。

△　国民政府为统制钨矿出口，在赣省设钨矿管理局，收赣南民营钨矿为省营，并划全省产钨区为四区，禁止商贩自由运销。

△　上海日人所办同文书院本届毕业生62人，决定分赴中国各地“调查”，一般为50天，云南、广西为75天，以“调查报告”作为毕业论文。

6月

6月1日　河北省政府因日方逼迫，开始自天津迁往保定。4日省府各厅在保合署办公。

△　北平军分会应日方要求，将政治训练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撤职。

△　驻日大使蒋作宾电中央报告与日外相广田晤谈经过。同日，驻京日总领事须磨访外次唐有壬，表示外务省对华北问题不能斡旋，应向当地日军部交涉。

△　红九军团罗炳辉部进至汉源以西富庄附近。蒋介石以汉源地势冲要，关系川西安危，除令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固守待援外，急调洪雅、荥经第二十军杨森部和薛岳部驰援汉源。

△　武昌行营召开赣、闽、皖、豫、鄂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行营主任张学良代蒋介石致词，强调利用中山民校，采取“管、教、养、卫兼施”方法向所占红军根据地民众强迫进行反共教育。

△　中国银行储蓄部在沪成立，资本500万元，广泛吸收储蓄存款。中、小私营银行因存户纷纷提取存款转存，储蓄业务大受打击。

△　沪市华营工厂，因受美国白银政策及外货倾销影响，产品滞销，特组“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以图挽救危机。是日开成立大会，推亚浦耳电器厂等11单位任理事。

△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发表沪市华洋各银行库存数目，截至本日止，共计3.35081亿元，较上周减少65.3万元。

△　沪市钱庄续有倒闭，行将停业者达20余家，形势危迫。钱业公会是日漏夜开紧急会议，筹商应付办法三项：一、只能同业汇划；二、存户支取生活费以500元为限；三、各庄所存准备库保证品，按六成支用。财政部长孔祥熙特于次日自杭赶沪，决定拨给二十四年度金融公债券2500万元，凭向银行押借现款。并由政府派员组织钱业监理委员会经管贷放事宜，各借款钱庄每七日将资产负债情形报监理会审核一次。钱业公会原议应急办法取消。

△　广东明德社开办学海书院，以张东荪为院长，招考大学毕业生入院读经。

6月2日　　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劝告四川绅耆书》，勉以回籍“服务”桑梓，“协剿”红军。

△　中央红军分三路夺取天全、芦山，以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一军团、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向芦山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第五团为中央纵队，向天全前进；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取天全前进。同日，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电中共中央，称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请指示行动方针。

△　徐州律师公会电沪律师公会一致反对上海西侨倡设国际公断法庭，以保障国权。

△　山东淄川鲁大公司煤矿自上月13日发生大水淹毙矿工500余人后，公司不采有效措施排水捞尸，亦未作善后处理，仅由淄博工会会员捐款救济被难家属，且由日工程师勘定新矿区，准备另开小矿。是日死难工人家属五六百人出而阻止，并组后援会，推代表刘守经等24人到县府请愿，要求速先排水捞尸。

6月3日　　红二、六军团决定利用湘、鄂两敌军间的矛盾，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是日在贺龙、萧克率领下，自板寮一带向鄂西宣恩推进。12日佯攻椒园，迫使敌军来援。13日于咸丰、来凤间之中堡、三堡岭一带，截击援敌第四十一师，激战三昼夜，歼敌一个旅、一个特务营及师部，生俘敌师长张振汉。23日进攻咸丰，与郭汝栋部激战后，向川东黔江进军。

△　美国经济考察团到杭州。马寅初乘杭各界招待美国经济考察团之际，草就《我国银本位应放弃乎？抑应维持乎？》一文，说明中国所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并谓“美国政策损人未必利己”，“长此以往，恐中美贸易将全部停顿”。此文颇引起美方注意。5日，美驻华商务参赞安立德及美经济考察团团长福勃斯俱向马索取该文英文稿本。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电在暹之中委萧佛成就近向暹罗政府交涉取消虐待华侨苛例。

△　据《大公报》讯：苏省江北流行黑热病，重者旬日即死。去春调查，患者约11万人，卫生署虽设黑热病研究院，但限于经费，不能普遍治疗，去夏至今只医好3200人。此病传染极烈，现患者已达18万人。

6月4日　　行政院决议改天津市为直辖市，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市长，并任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

△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资本总额1000万元，分10万股，财政部认2.5万股，余由各省、市政府认股，少量由个人承购。总行设汉口。该行为政府特许农业银行，有发行兑换券及农业债券特权。

△　国民政府任命吴忠信兼贵州省保安司令。

△　国民政府任命李树森为陆军第九十四师师长。

△　行政院通过推行简体字办法三项：一、公布简体字表；二、酌定分期增订办法，采纳各方意见，逐渐扩充简字数量；三、强制适用范围，暂限民校课本、民众读物、小学课本。

△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日使馆武官高桥到居仁堂访何应钦。何答复29日所提各项要求：一、胡、白被暗杀事件，发生在日租界，政府无从知其详情，但因租界毗连天津市，已严令市府协同缉凶；二、孙永勤部受遵化接济一层，已严令河北省府转饬严查；三、于学忠已经中央决定他调，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已于6月1日免职；四、宪兵三团特务处已令其撤销；天津市党部将由中央令其停止工作；蓝衣社根本无此组织，如有妨害中日国交亲善之团体，即予取缔。酒井仍要求尽先办到以下各项：罢免于学忠，调走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及宪三团，撤销抗日团体，调走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市党部。何答："中日亲善提携为中央既定方针，当本此方针努力进行。"

△　蒙政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平招待新闻记者，承认日人在内蒙设置电台，搜集情报。按：日关东军派宍浦至苏尼特右旗，化名石田三雄，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掩护其执行特务机关长任务。

△　天津日军步兵200余在日租界宫岛街、芙蓉街等处演习巷战，下午4时始止。

△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美联社记者谈称："如平、津亦变为非战区时，在华北美国及外国侨商无须惧其利益蒙受损失。……扫除平、津之中国军队，商务定可增进。"

△　晚，黄郛在沪私宅接见北宁铁路局局长殷同，听取报告赴日经过。

△　因受美国白银政策及外货倾销影响，国内产品滞销，银根奇紧，民营工商业不断倒闭。是日沪江南银行、宁波实业银行相继停

业，上海国货公司亦宣告清理。5日，武昌第一纱厂因亏本百万停工。6日，扬州怡生、汇川永、志余、达昶四家钱号停业。22日，汉口继华兴百货公司、中华铜品贸易公司等停业后，裕昌银号又倒闭。25日，汉口又有源裕、中源、新源、达源等多家银号停业，通商银行连日发生挤兑。

△　第十九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开幕。中国政府代表李平衡在讨论大会报告书时发言称："上海工业灾害日增，自1932年7月至1934年6月，达165起，死亡194人，伤害141人，私人财产损失达230万元。"

6月5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再晤日外相广田商谈华北问题，陈述中国政府愿竭诚相商解决方法。广田告以应由中日军事当局就地解决。

△　日关东军"旅行团"山本等四人（尉级军官二人，军曹二人）由多伦潜入察境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师部军法处拘留八小时后始放行。

△　全国律师协会为保障人民权利，促进政府对过误裁判实行赔偿制度，特发起冤狱赔偿运动。委员沈钧儒曾于3日假座沪市商会招待政法、农、工、商、学、自由职业各团体，报告冤狱赔偿运动的意义及经过。协会定本日为"冤狱赔偿运动日"，发动全国各地律师界作扩大宣传。

△　财政部以沪市近来银行、钱庄时有倒闭，停业后又复延不清理，影响市面，特训令沪银、钱业两公会，规定监督清理办法，以三个月为限；如有违法舞弊情事，予以看管惩办，逃亡者通缉。

△　自北平市府通过市长袁良最近所提取缔私立中学男女同学案后，南京、镇江、北平、天津等地妇女界均发表宣言反对。是日，沪市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等四妇女团体亦发表联合宣言，指斥"这种反

潮流反时代的举动”。

6月6日　　国民政府调于学忠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河北省府主席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

△　行政院令天津警备司令商震在王克敏未到任前兼代天津市长。

△　红四方面军续向川西移动，进攻汶川县黄茅岗、观音山、锅石坊等地。8日，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克懋功，歼邓锡侯部两个营，继占达维。

6月7日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奉中央电令即日自北平迁保定。同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结束。

△　日本陆军当局向驻中国外交机构和驻军发出《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其中规定“要求事项”为：从平、津撤退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训处、与此事件有关的国民党党部和排日团体，并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罢免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同时，希望中央军、第五十一军移驻保定以南；禁绝平、津国民党党部、蓝衣社以及其他秘密团体的反“满”抗日活动；并希望外务省利用交涉机会，促使中国在全国取缔排日行为，解散各种排日团体。

△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举行扩大军事会议，讨论华北问题，梅津主席，永田（军务局长）、矶谷、酒井、高桥、堂胁（参谋）、仪我、石井（高级参谋）、青木（伪满总务厅驻津特务机关长）、池上（宪兵队长）等均参加。会上梅津宣读陆军省训令：“华北驻屯军应有采取断然手段之处置及必要之准备。”会议并作出对华交涉方式及占领平、津等军事准备之决议。

△　日关东军派步兵一大队及骑兵旅团一部到山海关，独立混成旅第十一旅团主力到古北口，飞机两中队到锦州，结集待命，随时准

备进入停战区。华北驻屯军亦命令津、唐驻军各抽一中队准备进入北平。9日，又有驱逐舰两艘自旅顺驶入大沽口。

△　班禅额尔德尼发布《告青康民众书》，号召青、康两省僧民“组织起来与本地驻军合作”，抵御“共祸”。

△　中国伦敦艺展古物1022件自沪由英舰“萨福克号”运英，艺展会秘书唐惜分、故宫博物院科长庄尚严随舰护送。

6月8日　汪精卫电蒋介石、何应钦，谓：“日本军部意见，非中央军撤退，不能罢手。”提出“即日由军分会以寻常调动军队之形式，命令在平、津附近之军稍为南移，使彼无所借口。”何应钦接汪电后，电蒋、汪，建议将北平中央军调往保定或长辛店以南，“借以缓和形势”。蒋介石批复，表示：“部队南移此时切不可行，否则非特不能缓和形势，且适中其计，徒使党国之崩溃。”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日本要求，决定将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调离河北。

△　何应钦严令平、津军、政、宪、警机关取缔有害中日邦交之秘密结社及秘密团体。

△　下午4时，何应钦接见大阪《朝日新闻》驻平记者本乡，称：“鄙人所采处置，已如贵方希望，皆有事实证明。”并称蒋介石主张“凡于中日两国国交有碍之情事，必须加以改善，以谋中日亲善提携之实现”。

△　蒋介石召见西康活佛诺那呼图克图，委为西康宣慰使，命往西康协助“剿灭”红军。

△　国民政府派郑天锡为出席第十一届国际刑罚监狱会议代表及第六届国际统一刑法会议代表。

△　香港政府宣布15日夜半起禁中国银币出境，但运往中国者除外。

6月9日　何应钦在北平居仁堂晤酒井、高桥，称："日本希望各点已完全办到"，"中日必须亲善提携，才能维持东亚和平，这是中央既定方针。"酒井等又提要求四项：一、撤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二、撤走第五十一军（按：即于学忠部），并将该军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第二师（按：即黄杰部）、第二十五师（按：即关麟徵部）必须调离河北省；四、禁止全国"排日行为"；并声称"绝无让步可言"，且要求必须在6月12日午前答夏。何允一二日内答复，并分电蒋介石、汪精卫请示。

△　军委会北平分会下令，中央宪兵第三团离平南撤。

△　胡汉民乘意轮"康特华第号"离香港赴意大利转瑞士养病，其女木兰及秘书程天固等随行。

△　英外交部公布，英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将于8月间启程赴华，与其他关系国专家共商"中国财政经济问题"。

6月1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告何应钦对日方要求处理意见，谓："今晨中央紧急会议，对于河北省内党部已有决议，由秘书处电达。对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府重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

△　下午5时30分，何应钦在北平居仁堂约见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面告国民政府全面承诺日军要求的决定，口头答复日方：一、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开始结束；二、第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自11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25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须延长数日；三、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已决定调赴陕西及豫皖边区剿共，预定一个月运毕；四、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

△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电告何应钦，河北省内各党部即日起一律卸牌撤退。同日，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平、津两市党部奉命结束。

△　国民政府发布《睦邻敦交令》，略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15日，又通令各省、市政府一体遵守。

△　华北日驻屯军司令梅津命参谋堂胁指挥步兵出动杨村。

△　日第三舰队司令百武对所属舰队下达战备令。

△　驻平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及第二十五师关麟徵部，分别调往豫、皖边及陕西进攻红军。日军派飞机监视该两师移动。

△　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南撤。17日，军部首批人员由保定赴郑州转陕西。20日，该军留保人员及特务营全部南下。

△　上午，日关东军在长春举行幕僚会议，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均参加，讨论河北问题，至下午6时半始散。土肥原当即离长春赶赴天津，向日驻屯军司令梅津传达会议商定办法。

△　韩复榘应日驻济南总领事西田邀请，赴淄川与鲁大公司日人商难工善后，决给每人抚恤金330元。对失业采煤工人4296人，另开小矿安置。

△　荷属印尼排华有增无已，禁止华茶及果类入口，加征中国酒进口税，驱逐华侨。是日又有被逐华侨116人抵港。

△　美国经济考察团在沪与中国经济专家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中美经济、贸易等问题。

△　沪铜铁厂商陆伯鸿等以金镑续跌，外货倾销，请政府迅增外国铜铁进口税，以维持本国铜铁业。11日，沪华商纸厂联合会亦请政府增加洋纸进口税。

6月上旬　　胡愈之等为研究中国语言学术，促进中国语言发展，发起组织中国语言学会，胡愈之、叶圣陶、陈望道、夏丏　尊、舒新城、曹聚仁、乐嗣炳七人为筹备委员。

△　浙丝织业衰落，市面大不景气，杭州机坊倒闭先后达数百家。丝织物自每尺三四角降至一角余，竞相甩卖。

6月**11**日　　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就张北事件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惩办直接负责人；第二十九军军长亲自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限五日内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　日关东军对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下达指示：“和中国驻屯军及驻北平武官辅佐官协商，要求宋哲元军撤退至黄河以南。”

△　日使馆武官高桥携自拟觉书文稿，交北平军分会办公厅副组长朱式勤转何应钦，要求照缮盖印送交日方。觉书中将国民政府承诺实行事项九条列出，即：一、于学忠、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切排外、排日之禁止。又提要求承诺附带事项如下：一、中国任命河北省、市职员时应“选择不致妨害中日关系之人物”；二、妨害中日关系之人员及机关不得重新进入河北；三、对约定事项之履行，日方得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是晚何应钦连拍数电向

南京请示。

6月12日　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于汉源等地击溃川军杨森部后，旋经天全、芦山、宝兴，是日自硗碛村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达维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所率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会合。

△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雒南、蓝田、柞水等县，创建鄂豫陕游击根据地，是日在山阳清油河一带与东北军王以哲部激战。

△　日方通知北平市政府称，将有飞机12架至17架飞平侦察中国军队移防情形。13日，日以军用飞机14架过平、津监视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行动，平、津居民纷纷南迁。14日晨，日机一架由津飞平，在南苑盘旋数匝，旋向西北飞去。

△　日军800余名由武藤指挥官统率，由塘沽开抵天津换防。

△　日驻华首任大使有吉偕参赞有野到沪；14日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6月13日　晨3时，何应钦以去京向中央报告河北事件交涉经过为由离平南下，平军分会公务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拆代行。同日，鲍告知高桥："何虽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仍均一一使其完成。"

△　何应钦南行后，平市治安交由市长袁良负责维持。袁发表谈话称："日来市面有种种煽动人心之谣言……嗣后凡有足以危害公共安宁秩序者，必执法以绳，严予制裁。"晚8时，鲍文樾在居仁堂召集袁良、王树常、万福麟、邵文凯等，商维持平市地方治安办法。

△　驻华英使贾德干访汪精卫，驻美公使施肇基访美副国务卿费列浦，均系讨论中日局势。

6月14日　蒋介石发表《劝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剿赤匪书》，

提出办法六项：一、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联保切结，以清“潜匪”；二、整理地方保卫团队，编组壮丁队，成立“剿共”义勇队；三、组织侦察网、盘查哨、守望队等；四、建筑碉堡，兴修公路，厉行封锁，必要时坚壁清野；五、民众间互相宣传；六、厉行“新生活运动”。

△　汪精卫电询陈济棠关于“港、沪、川、黔等地所传西南领袖乘华北多事宣布独立”实情。陈复电表示“矢忠中央”。桂省白崇禧、黄旭初及李宗仁亦先后以铣（16日）、巧（18日）两电致黔省当局辟谣，并请转达蒋介石。

△　日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是夜抵津，与土肥原、梅津、酒井、大木等彻夜商议察事，迄次晨3时始毕。旋偕大木搭机去承德与第七师团长杉原商洽。

△　日机飞沿津浦、平汉两线侦察。北平日军增至2400人。关东军一部抵山海关。

△　薛岳令第五纵队李韫珩部务于15日速经泸定向康定前进，并派两团驰赴丹巴协防，限21日到达康定建碉守备。

△　美经济考察团在华考察结束。晚，沪市商会等17团体设宴饯行。团长福勃斯称：“愿将考察所得与各界意见携归，藉作发展中美贸易依据。”18日该团离沪返美。

6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陆海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本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　何应钦抵京，向国防会议报告河北事件交涉经过。经讨论决议："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是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我方难以照办，应请日方原谅。"经蒋介石批准，由何电告平军分会办公厅照此决议答复高桥。

△　何应钦电莫干山黄郛，促入京共商应付北方危局。

△　文学社、世界知识社、译文社、读书生活社等17个文化团体和王鲁彦、方光焘、艾思奇、老舍、周建人、柳亚子、郁达夫等148人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复古读经可以救国的主张，指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维新'的路上走去，再没有别的办法"；"救国不必读经，读经和救国没有关系"，提倡读经的人"虽然未必是'王道'政治论者的同群，而其结果都是一致的"，所以"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　英驻华首任大使贾德干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原东北舰队"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于1933年4月间归陈济棠收编，改为粤海舰队。是晚，三舰官兵因不满陈撤换舰长及饷项纠纷，突相率离粤。"肇和"以轮机损毁，临时未行。"海圻"、"海琛"强驶出海，19日驶港；22日电请蒋介石准予驶往南京，听候海军部调遣。蒋复电照准。

6月16日　秦德纯连日在津与土肥原、松井商察北事件，是日双方达成谅解。日方对察事提四项要求：一、道歉；二、第一三二师参谋长撤职；三、惩处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四、今后日人赴内蒙旅行予以便利。秦均应允。17日，松井由津飞长春向关东军请示。

△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同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

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　黄郛偕王克敏由沪至京，与汪精卫、何应钦共商河北事件。

6月17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长春召集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等会商对付宋哲元方针，认为应使宋绝对无法阻碍日在察之行动。次日制订《对宋哲元交涉纲要》，交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负责交涉，配合热河军事行动，限两星期内完成。

△　日本通讯社发出消息称："包括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由阎锡山将军主持的华北独立政权，目前正在进行中。"

△　北平军分会各委员联名电促何应钦北返主持会务。

△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全部离保开陕。日机一架飞保侦察。

△　暹罗考察团到南京，连日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侨务、外交等各方面接触。是日与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交换订约、护侨等问题意见。

6月18日　国民政府特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　行政院决议，免宋哲元察哈尔省府主席职，遗缺由该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兼代。19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驻日大使蒋作宾密电国民政府，报告日本企图拉拢阎锡山建立华北傀儡政权。谓："据密报，若辈以中国将统一，认为不利，欲在北方组织一反中央势力，先以冀、晋、察、绥、鲁为范围，俾与中央脱离，以便为所欲为。现正积极进行，并欲利用阎主任（锡山）为

傀儡。”旋阎锡山于报端发表公开信，揭穿日本人将于此后20年内征服全中国的阴谋。

△　中共江西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于2月24日自中央苏区去沪就医途中，行至福建长汀县水口镇，被闽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所俘。后解至长汀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师部关押。蒋介石以刑讯、劝降均无效，于本月2日电令闽绥署主任蒋鼎文就地杀害。是日，瞿被害于长汀。就义时态度从容，高唱《国际歌》，呼革命口号。

△　廖仲恺灵柩自粤运京，其妻何香凝及许崇清护送。灵柩暂厝灵谷寺。

△　驻保定徐庭瑶第十七军军部结束，离保南迁。河北省府调特警队接防。

△　驻津日军本日起昼间演习巷战，夜间演习夜攻。是晚9时，日租界戒严，由宫岛街至花园街分左右翼演习。

6月19日　　孙传芳在天津接受联合通讯社记者访问，斥责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谓：“我对这种提议不感到兴趣，如果他们要我做自治运动的领袖，我也不能接受。我认定这种自治运动是要失败的！利用我的名义来乱发传单，我想一定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想藉此激起那些对南京政府不满意的人们发动暴动，并要我代替别人来做傀儡政权的首领。”按：6月14日，在北平使馆区内发现印有“打倒蒋介石，拥护孙传芳”的传单，故有此谈话。

△　日关东军外务课长石本发表声明，表示不使冀察事件扩大；关东军与华北日军当联成一体，严重监视华方态度，并与外务省协力，根本纠正中国之排日主义。

△　李庆麟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编《经济周刊》上发表《全国应速起预防灾荒》一文，说明去夏长江一带亢旱，为1858年以来所

未有。全国受旱地区计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11省635县，受灾面积3.29513亿多市亩，约占11省耕地总面积47％，灾民约9200余万人。加上甘、川、黔、闽等省，去年旱灾损失至少在18亿元以上。去年水灾地区，有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山西、四川、青海、陕西、江西、福建、贵州、察哈尔、绥远、甘肃14省约283县，被灾约4700万余亩，受灾损失仅就河南等九省不完全统计，即达4700余万元，若加房屋牲畜等冲毁损失，至少有一亿元之多。外加蝗、风、雹灾，全国受灾农民达一亿以上，损失20亿元以上。

6月20日　蒋介石令川军杨森率部第一三三、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各师向懋功尾追红军；并令第五纵队李韫珩部在泸定、康定一带构筑工事，防堵红军西进。同日，吴奇伟纵队全部集中雅安，周浑元纵队（欠第十三师）集中名山，构筑碉堡；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向雅安前进。

△　宋哲元自张家口抵天津，语记者称：对中央命令绝对遵从，第二十九军已交师长张自忠统率，外交由秦德纯秉承中央意见办理。察省过去向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宗旨，此后负责者将益本息事宁人方针而行。

△　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皇呈递国书。

△　天津警备司令部以日方对“警备”二字不满，改称津沽保安司令部，商震仍为津沽保安司令。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委员长王克敏由沪北上。

△　日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由津抵平交涉张北事件。

6月21日　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见鲍文樾，面交代拟文稿，要求何应钦签字。何未作答复。文稿原文为：“北平军分会何委员长送致

梅津司令官之通告：6月9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并关于实施此等事项之附带事项，均承诺之，并拟自动的使其实现。特此通告。”

△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四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岁入岁出各为9.57154006亿元。岁出中军务费为3.21亿元，占支出总数33.5％。3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蒋介石为巩固川中，相机向陕、甘方面截击红军，电令薛岳第一、二纵队主力及第二路军前敌指挥部、第九十九师之第二九五旅、第五十九师之第三四九团，28日起移绵阳集结待命。

6月22日　蒋介石为巩固川、康边境，电令薛岳部吴奇伟纵队暂缓开拔，即日构筑雅安机场，限7月10日前完成。23日，令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在未奉命开动以前，协筑荥经、汉源一带碉堡。24日，令周浑元纵队暂缓开拔，赶筑邛崃（不含）经名山至雅安沿公路两侧碉堡，限月底完成。30日，电令薛岳赶修天全至泸定碉堡线，并令周浑元派一师驰赴雅安协修机场。

△　驻日大使蒋作宾访日外相广田，表示“愿与日协议中日两国恒久友好关系”。广田称：“彻底取缔排日，为中日提携之基本条件。”

△　国民党在粤中委联名通电反对中央对河北事件之处置。

△　北平市明华银行歇业后，聚盛源银号等又告倒闭，25家银号危如累卵。是日，中国农工银行又发生挤兑，公安局逮去14人，至晚挤兑风潮始平息。

6月23日　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决议：察事由察省府与日方商议解决，惟须秉承平军分会与中央意旨；划定不驻兵区域问题，先交军委会详加研究后再行核办。

△　日关东军驻沈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日使馆武官高桥、张家口

特务机关长松井与察省代主席秦德纯、政整会顾问程克、陈觉生、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为张北事件在北平秦德纯私寓举行谈判。土肥原提出要求：一、昌平、延庆延长线之东，独石口之北，经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一线作为撤退区域，宋哲元军应撤至其西南，此后不得侵入；二、宋军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处罚肇事直接责任人；三、解散排日机关；四、本事件应自6月23日起两星期内办结；五、停止山东向察哈尔省移民。此外，还对上述要求事项作出解释：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在内蒙之活动，中国停止压迫内蒙；协助日本在华北发展经济与发展交通；便利日本人在内蒙旅行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招聘日人为军事、政治顾问；协助日本建立军事设备；用停战区办法来维持撤退区域的治安。秦德纯允向中央请示后答复。

△　秦德纯电行政院恳辞兼代察省主席职。24日，汪精卫复电慰留。

△　王克敏在津访梅津，商谈察冀事件善后及战区悬案。

△　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表示其所主张之“全盘西化”应改为“充分世界化”，“避免‘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争论，可以得到赞助”。并认为“充分世界化”与十教授主张的“充实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生计，争取民族生存”三个标准，其所用之最新工具和方法完全相同，因此，欢迎十教授做全盘西化论者的“同志”。

△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该校第十三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宣布将南大交国民政府办理。

6月24日　《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后，日驻沪总领事石射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及国民政府提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封闭《新

生》周刊社，没收该期周刊；惩办《新生》主编杜重远及《闲话皇帝》作者易水；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有关人员等。国民政府一一允诺，即令上海市府向日道歉，并由国民党中央宣委会主任叶楚伧向日方道歉，取消图书审查委员会，撤换沪市公安局长。是日，沪市公安局以“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罪名，迫令《新生》停刊。

△　国民政府电复秦德纯：“张北事件仍由察省当局负责交涉，并与军分会密切合作。”“凡在不妨碍我国领土、主权之范围内，皆可酌情办理。”25日，平军分会最后决定接受日方要求。

△　立法院批准参加国联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之《船舶起卸工人灾害防护公约》。外交部于11月将批准文件送达国联。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自渝迁蓉，最后一批人员本日到达。

△　察省独石口发现伪满便衣队百余名潜入活动。

△　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春季讨伐抗日军报告称，最近六个月内，东北抗日联军估计有2.8万人，在东北北部活动区域有40余处。与抗日联军交战达195次，死日兵25人，伤75人。抗日军多住于密林中，渐次集体化。服装与旗帜渐次模仿“满”军，战术巧妙，以共产主义为中心思想，以北满东部边境为根据地，现正继续活动。

6月25日　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程克为天津市长。原天津市长王克敏免职。

△　长城各口日军五六千人是日起陆续向热河境内撤退。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海关出口税则》，果类、火柴、棉织物、海产等88种免税，蛋类、油类等50种减税，共减免出口税年达300万元左右。财政部长孔祥熙谈，因抵补办法未筹妥，减免出口税

尚难实行。

△　据《大公报》讯：黔省自1915年以来，20年中前后自设苛杂税捐共有30余种，其名目计有：禁烟罚金、吸烟罚金、抬垫丁粮附加“剿匪”捐、征兵捐、筑路捐、军谷军米捐、金库券、善后借款、航空捐、“剿匪”捐、当押捐、房捐、地租捐、纳税流通券、执照捐、屠宰捐、斗息捐、油榨捐、碾捐、常练捐、区公所捐、查验捐、谷草捐、夫马捐及招待捐、督练官月薪捐、电话捐、购枪捐、草鞋捐、马刀捐、服装捐、煤炭捐。

6月26日　中共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地点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确定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28日，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中革军委作出攻打松潘的战役部署。

△　晨，秦德纯访晤土肥原，再度商洽察事，获得谅解。中央二次复电亦到平。遂通知日方，定明日上午10时，双方在日使馆武官室，完成张北事件交涉之最后手续。

△　蒋介石电令四川各部队筑碉防堵红军，谓：“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

△　古北口日军川岸混成旅团步、骑、炮各队4000余名，在南天

门小新开岭一带实弹演习。平市谣诼繁兴，形势顿呈紧张。

6月27日　上午，秦德纯、雷寿荣、陈觉生至日使馆访土肥原、高桥坦，以书面承诺土肥原23日所提要求及解释，并同意撤退察省境内国民党党部。这便是民国史上通称的《秦土协定》。

△　下午1时，土肥原和高桥坦对新闻界宣布，张北事件已“完全而满意”的解决。

△　中央红军越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马尔康的卓克基。

△　日外务省次官重光葵奉广田命筹拟“改善”中日国交方案，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守岛伍郎、第二课课长谷正之等参加。重光归纳各人意见，作成指导原则三项：一、日本不拟提出“改善”中日国交的细目，要求中国先解决日本期望的事件，以表示中国有亲善的诚意；二、日本不拟提列举式的要求，致蹈“二十一条”事件刺激世界舆论的覆辙；三、日本应用责难方法逼使南京政府承认日本在东亚的优越地位。

△　北平发生“丰台事件”。吴佩孚旧部白坚武受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日浪人组织的“北支青年同盟会”会长志村正三收买，组织“正义自治军”，自称总司令，是晚率匪徒300余人袭击丰台车站，强登铁甲车，次晨1时许驶近北平永定门，向城内发炮多发，声言要组织“华北国”，经商震、万福麟等部迎击后溃散，逃往通县以南燕郊一带。

△　日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与“满”电信电话会社、北宁铁路局、天津电报局、北平电话局代表，于北戴河商订中“满”电话联络协定，定7月1日开始正式通话。

6月28日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为冀察事件发表声明，略

称："中国部分官民在华北及察省之非法行为，中国方面已允诺日军公明正大要求，行将实施。日军所要求者，责罚违约之责任，除搅乱之祸根，去'满洲国'之威胁与中日'亲善'之障碍"；"中国政府日前重发布告，禁止全国排日排外行为，殊可敬服，希望中国方面绝灭一切反日抗'满'行为。"同日，日使有吉亦发表声明称："（一）日本公正要求，中国已容纳，甚望更努力维持该处和平；（二）应将中国排日运动扫除绝迹，望中国当局进一步努力。"

△　行政院决议改组河北省府，除已任命商震为该省府委员兼主席外，所有省府委员张厚琬（兼民政厅长）、鲁穆庭（兼财政厅长）、郑道儒（兼教育厅长）、胡源汇（兼建设厅长）、魏鉴、张厉生、张荫梧、查耀免职；任命李培基、李竟容、吕咸、何基鸿、张荫梧、南桂馨、刘逸南、梁子青为该省省府委员，以李培基兼民政厅长，李竟容兼财政厅长，吕咸兼建设厅长，何基鸿兼教育厅长。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张群、黄绍竑、陈仪、熊式辉在京晤汪精卫，商对日外交及政局。30日，张、黄、陈、熊分别离京，推黄入川谒蒋介石报告。

△　国民政府任命施肇基为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程天放为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棋为出席国联第十六届大会代表。

△　国民政府令陕西省府主席邵力子暂兼代民政厅长；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府委员。

△　国民政府特任刘瑞恒为行政院卫生署署长。

△　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调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拱卫北平。是日，冯部自张家口开拔，次日全部到平。

△　北宁铁路管理局正式公布平沈通车办法，由中国旅行社和日

本国际观光局共同投资设立东方旅行社，总社设榆关，自7月1日开始，每日对开列车一次。

6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公债条例》，债额一亿元，本月30日开始发行，用于弥补二十三年（1934）度总预算收支不敷之数，至三十四年（1945）6月本息全部偿清。

△　国民政府任命卢兴荣为陆军第五十二师师长。

△　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拟定《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消灭松潘地区中央军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以及东北各道路，以利红军北向作战和发展。

△　财政部根据《储蓄银行法》及即将施行的新《刑法》，严令停办有奖储蓄。是日，法商万国储蓄会宣布该会所有由华人代理之分支会、办事处7月1日起一律停办，但上海总会及广州、汉口、北平、天津、青岛等分会仍继续营业。

6月30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债额7000万元，定7月1日发行，用于“剿匪”、“善后建设”、“整理债务”，限九年还清本息。

△　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统计，截至6月，全国华商纱厂共有纺锭278.2936万枚，完全停工的62.6132万枚，占总数的22.5％；减工的24.4422万枚，占总数的8.7％。共有布机2.1757万台，完全停工的5134台，占总数的23.6％，减工的2189台，占10.1％。

是月　中央大学地理学系胡焕庸在《地理学报》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一文，划出自黑龙江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我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中一条最基本的分界线。该文指出：“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西与南北

两部，则处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胡氏所划之人口分界线，被称为“胡焕庸线”。

7月

7月1日　　日武官高桥因何应钦未答复上月21日交鲍文樾代拟文稿，是日又提修正文稿，要何签字。全文为：“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提出之各事项，悉数承诺，期以自动的方式实施之。特此通知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

△　北平军分会委员再次联名电促何应钦返平主持会务，并推何竞武赴京促归。

△　《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检举，是日到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受审。杜当庭申明《新生》周刊依法登记，每期稿件都经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编者不能负责。法官无词以对，令杜交保500元出院。

△　上午，梅津、酒井、土肥原、仪我、高桥、大木等在天津海光寺兵营会商华北及战区未决各案。

△　胡汉民抵意大利威尼斯。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在北川千佛山、大垭口一带与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激战后北移，孙部占北川。

△　三级三审法院组织法今起施行。首期实行者计有鲁、皖、苏、浙、闽、赣、湘、鄂、豫、冀、晋、陕、甘、宁、察15省；展缓

一年实行者有粤、青、桂、绥、黔五省。其他省未定。首期实行各省增设高分院29所，合原有共59所；增设或改设地方法院117所，合原有共178所。

△　香港当局改变歧视中国船只的做法，承认中国船员证书，华船过港，与欧美船只一律，可在港出售客票。按：过去中国船只须船长、大二副及轮机长等全系外籍，方能领到香港票牌。

△　海关今起续征5％附加税一年，至次年6月30日止。

△　青岛火柴业因外货倾销，各火柴厂除华北一家未停外，皆先后宣告停业，余皆日厂。上海火柴业亦滞销，价格低落，为求稳定市价，挽救危局，是日成立同业联合办事处，统一产销。

△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并入邮政总局，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

△　浙东各县水灾甚重，是日纷电省府请求急赈。兰溪田禾淹没，街市可以行舟；萧山尖山堤倒，村民避居楼上；龙游、浦江、汤溪、缙云、建德、桐庐、寿昌、衢县等县农作物悉被冲毁。

7月2日　　日关东军司令部、“满铁”、东拓、伪满财政部和实业部等在长春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对华北实行经济侵略。内容包括：设立强大投资公司，发展华北工商业、开发矿业；设立中日合办之各事业公司，在华北首设矿产业、交通业、贸易、棉花栽培等公司；发展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之母体；全力发展察、晋及其他未开发地区之交通；以山东之棉花栽培为基础，将来发展至日本用棉自给。

△　红军一、四方面军越过第三座雪山——长板山（位于四川西北今阿坝藏族自治州）。3日，红三军团越过长顿山。

△　红二十五军由陕南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在秦岭山区袁家沟与杨虎城部警备第一旅激战，歼灭两个团，俘敌旅长唐嗣桐，毙伤敌14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40挺、枪支1600余支。

△　殷汝耕自津返平，谈白坚武部已解决，捕获匪众百余名，余众溃窜，白本人逃逸。4日，白坚武自天津逃大连，受日庇护。

△　汪精卫因肝病在上海入诺尔医院治疗，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

△　关于《新生》周刊事件，日外务省回训到沪，下午2时，日使有吉邀外次唐有壬到其私宅晤谈。有吉称：事件直接责任者吴铁城对此事处置，予以谅解；对党部之处置，作严重之抗议。3日，唐到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与陈立夫、叶楚伧商《新生》事件。

7月3日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以介绍察哈尔局势为由，探询中苏签订“互助条约”之可能性问题。

△　为防堵红军向川东北挺进，薛岳部开始东移。总指挥部、第一纵队及第九十九师之第二九五旅决取道邛崃、新津、双流、成都、广汉、罗江到绵阳。6日，因连日大雨，岷江暴涨，薛岳令总指挥部及第九十师在新津，第九十九师之第二九五旅在羊肠，第九十二师在邛崃停止，在新津、邛崃各筑碉27座，羊肠建封锁线连络碉12座，限9日完成。

△　黄郛致电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论对日问题之困难，“万全之道，实不易求，盖不能防患于未然，必待事后而谋补救，实有来迟脚短之嫌”。

△　蒋介石召集四川各县逃亡绅耆六七十人在成都训话，令回乡协助“剿匪”、“清乡”。

△　长江水位猛涨，达46英尺，汉阳城南已进水。连亘鄂、赣、皖三省之马华堤危急。12日，赣、皖境马华堤溃决。

7月4日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招待驻华苏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谈话会，由鲍格莫洛夫详述苏联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情

况，并对中苏各问题详加探讨。

△　浙江余姚县六塘庵、东镇一带农民，因该县清理沙田办事处勒缴丈溢地价及测绘等费用，每至拘人，是日聚众500余人捣毁清理沙田办事处。县府派团队捕去农民王宗敖等14名。

△　汉口江水水位已达46.7英尺，较民国二十年同日水位（39.2英尺）超出7.5英尺，日租界东之分金炉一带已进水。武昌武泰等堤甚危急，白沙洲汪洋一片。湖北省防水会招募民工数百，以50名为一队，分发各堤抢护培修。

△　湘省岳阳等滨湖11县因连日大雨，西、南两水并涨，溃决堤防每县计10余处或20处不等，未溃之堤十分危险。是日湘省府特电请全国经委会速拨湘省防汛协助费，以资抢救。

△　安徽怀宁县广成圩溃决。灾区波及13县，灾民30余万。淹没农田41万亩，损失约600余万元。

△　国民政府派海军军令处长陈策赴港接收“海圻”、“海琛”两舰。9日晨，陈率两舰离港北驶。18日抵南京下关。

△　中法储蓄会结束，移交中央银行信托局接办，所有有奖储蓄储户，多数改为零存整取。各地分会同时停止收付。按：该会原为中法合办，于1918年在北平创立，1926年外股由华人收回，各省、市设有分会。

7月5日　　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密电各省、市党部严饬所属及民众团体切勿轻发救国言论，内称：“关于救亡图存之要政，自应悉听中央主持，以示一致。……切勿轻发言论，图快一时，致贻人以口实。”

△　驻京日总领事须磨访外次唐有壬，谈判《新生》事件。

△ 柳江煤矿公司秦皇岛码头及仓库被泰记煤矿日本人强行封闭后，泰记要求两矿合并，由日人经营，遭柳江拒绝。该矿已停产50天，根据股东会决定，除留电厂工人20名外，其余职工3000余人全部解雇。是日发工资一至二个月作为遣散费，职工纷纷离矿。

△ 国民政府公布《邮政法》、《保险业法》。

△ 铨叙部部长林翔在南京病卒。6日，国民政府令该部常务次长马洪焕暂代部长职务；27日，任命石瑛为铨叙部部长。

△ 湖南澧县城垣被洪水冲垮，淹毙居民2000余人。

7月6日 何应钦将高桥1日代拟文稿请示行政院同意后，是日电鲍文樾送交高桥转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关于河北事件之书面公函，世称《何梅协定》。通知全文为："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 红军一、四方面军越过第四座雪山——打鼓山（位于今阿坝藏族自治州）。

△ 日为实现"中日文化提携"，上月派外务省文化部长冈田来华，考察华北各大学教育实况。是日冈田离平去京考察，旋转道济、青回国。

△ 上海市商会以财政部迭次表示将于7月1日裁撤转口税，但至今仍无消息，是日电行政院要求即日实行，以救工商危局。

7月7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为《新生》周刊事件电令各省、市党部转饬当地出版界、报社、通讯社，"《新生》周刊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嗣后对于此类记载或评论，务须严行防止"；并要求各地切实遵守国民政府6月10日命令，取缔反日运动。

△　红军一、四方面军越过第五座雪山——仓德山（位于今阿坝藏族自治州）。

△　以“满铁”为中心之华北经济调查团内海治等一行七人，自长春抵津，访日驻屯军司令梅津及参谋长酒井等，交换对华经济调查意见。该团计划在平、津、晋、察、冀、鲁、绥等地，调查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各业情况。

△　驻津美军因瓜代期届，日前返国。是日接防美军100余人由秦皇岛开抵天津。

△　长江、汉水继续上涨，武汉积水难泄，汉阳鹦鹉洲淹没。截至是晚，武昌被淹1120余户，水最深处八尺余；汉阳被淹3300余户，水最深处六尺余。灾民两万余人。

△　北平军分会以原驻平保线部队多已南调，特令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分驻平保沿线，以固防务。是日，该军接防完毕。

7月8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以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闲话皇帝》一文未能检举，遵照日本要求，将该会审查人员项德言、朱子爽、张增益、戴鹏天、刘民皋、陈文煦、王修德七人撤职。同日，沪市公安局再发通告，此后各书店不准再代售《新生》周刊。

△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叶楚伧对中央社记者郑重声明：“国民党对中日关系所取之态度，与蒋、汪两先生之政策，完全一致，对于中日间任何问题，均愿以诚恳和平之态度，谋圆满之解决。”

△　孔、曾、颜、孟四奉祀官孔德成、曾繁山、颜世镛、孟庆棠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派戴季陶监誓。

△　国民政府任命王懋德为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

△　蒙政会驻平办事处成立，包悦卿任处长。

△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谋长叶琪在南宁坠马毙命。

△　豫西山洪暴发，洛、伊两河泛滥，水围偃师县城。入夜，县城陆沉，城内数千人被淹没，脱险者仅百余人。次日，巩县一、五、六、七等区及新、旧城亦被淹没，平地水深八九尺，人畜死亡甚多。

7月9日　　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开审《新生》周刊案。总编辑杜重远到庭申述刊载《闲话皇帝》一文经过，并声辩说："本人曾阅外国杂志，其中描写有甚于《新生》周刊之稿者，未闻因此获罪。我绝不会攻击日本某私人，我要反对的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律师吴凯声为其辩护，并请缓刑或改科罚金。庭长答称"环境不许可"。遂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没收，并不准上诉，当庭收押。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　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向英皇呈递国书。

△　驻日大使蒋作宾由东京抵沪，次日到京向国民党中政会报告中日邦交近情。

△　四川省府由渝迁蓉。

7月10日　　外次唐有壬在京访何应钦，转达汪精卫自沪来电，促何返平。同日，平军分会各委亦再电促返。

△　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克松潘附近毛儿盖，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被缴械。

△　黄河水涨，晚8时许，山东省鄄城县境临濮集、董庄间河堤漫决两口，一宽40余丈，一宽50余丈。

7月上旬　　日本为掠夺内蒙资源，倾销商品，由伊兰克商事公司

以资金60万元设别动公司。本店设长春，支店及出张所设沈阳、赤峰、多伦及内蒙其他各地，一面收购内蒙特产羊毛、兽皮等原料，一面倾销日货。

△　皖省长江沿岸各县一片汪洋。芜湖沿江天成、欧阳、东湖滩、义兴、章秋等圩堤均溃决，淹没田禾数万亩。皖中、皖南遭水灾区域约计30余县，溃决大小圩堤不下30余处，损失不计其数。当涂江水猛涨不已，水位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三尺左右。

△　湖南沅、湘、资三水猛涨，滨湖堤垸溃决甚多，湘阴、沅江、常德、汉寿、南县、华容、安乡、临湘、益阳等县，俱已成灾。

△　湖北钟祥县第十一号堤溃决，汉水流域田地几全淹没。天门县淹毙数万人，沔阳、汉川两县被害甚大。

△　江西连日大雨，赣、修、信各江圩堤多处溃决，全省圩堤先后冲决百余处，灾区达38县，旱稻收成几全绝望，灾民生机断绝。

7月11日　蒋介石在成都召集薛岳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吴奇伟纵队部及欧震师三单位连长以上军官训话，声称："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致贻隐患。"

△　"满铁"副总裁八田与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等在长春会商开发华北经济问题，决定：一、由关东军积极调查华北经济情况；二、"满铁"对关东军计划之经济工作予以帮助；三、在天津设机关统制调查工作，根据调查结果速订具体方案。

△　英下院辩论对华政策。外相贺尔宣称："英国对华政策广义的根据，即为维持门户开放以及充分承认中国有自己管理其命运之权。"

7月12日　立法院修正通过《出版法》，规定一切出版物须先经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能出版，出版物审核权力在内政部。地方政府

有监督、取缔新闻纸和杂志发行之权。全文七章49条，其中“登载事项之限制”、“行政处分”及“罚则”占28条。

△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四年广东省建设公债条例》，总额500万元，分五年偿还。

△　浙江省府主席黄绍竑偕驻日大使蒋作宾飞蓉见蒋介石，就汪拟辞职及缔结中日航空协定等问题有所请示。19日，黄自蓉返京。

△　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沪中央银行谈，中央决定以200万元救灾，已由国库拨付，以备应用。

△　鲁西鄄城临濮集黄河决口之洪水向东北一股，已到东平县境；向东南一股，冲陷引马集新筑民堤，直奔郓城；向南一股，已到菏泽附近。是日，鲁省决先拨款两万元办理急赈。但以为数甚微，无济于事，除请求中央拨款外，决定自下忙起，每丁银一两，加征水灾附捐三角，以筹足百万元为最小限度。

△　“满铁”东亚部社员森俊夫、大竹章等六人抵津，辅助华北经济调查团到平、绥、冀北、滦东调查华北经济；侧重港湾、水利、河道、交通。

7月13日　长江水位继续上涨，汉口张公堤裂口丈余，长丰、南垸、黄家湾堤及汉阳三眼桥堤均溃，浮尸满江。武昌各堤危在旦夕，万人出动防水。13日，汉口张公堤崩陷10余丈，灾民已达10万。湖北省当局征工抢救。

△　自昨晚迄本日下午，鲁全省阴雨不绝，寿张南岸及范县北岸民埝，均先后溃决。鄄城董庄决口展宽200余丈。

△　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第九十师到达广汉，第九十二师到达成都。蒋介石电令吴奇伟纵队经绵阳向江油推进，接替江油以北至平武一带胡宗南部防务。

△　天津市长程克接见日本记者团，表示真诚改进中日邦交。

△　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布敦睦邦交布告，略称：“奉国民政府令，凡中国国民应睦守邦交，不得有仇外及挑拨国际恶感之言论行为，更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致危害邦交。”

7月14日　蒋介石颁发《剿匪区内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等饬川省通令各县遵行。

△　天津纱业因日纱倾销，营业衰落，恒源、裕元两厂先后停业后，是日素称资本雄厚之宝成纱厂又宣告停工，1200余名工人失业。该厂资本300万元，纱锭2.7万枚，日产纱57包，年销售总值约240余万元。

7月15日　国民政府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凡七条，规定意图营利，销毁银币或中央造币厂厂条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意图营利，私运银币、中央造币厂厂条或银类出口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币额或价额五倍以下罚金。

△　何应钦自京电莫干山黄郛，邀入京共商应付北方紧急局势。

△　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伪满外交部大臣张燕卿签订《关于设置日满经济联合委员会的协定》。该委员会设伪满新京（长春），得对日、“满”经济联系的重大事项向日、“满”政府提出建议并备咨询。

△　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奉命开赴平武、青川、江油一带接胡宗南部防务。是日，第九十师欧震部到达绵阳，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旅周化南部到达罗江，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到达广汉。

△　汪精卫自上海飞青岛养病。

△　张学良派工兵一团炸毁平汉路汉口谌家矶一段，宣泄汉水入江。

△　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前以沪市工商业受美国白银政策及外货倾销影响，相继倒闭，迭请政府救济。历时四月，财政部拨付作为救济工商业放款第二担保品之国库凭证2000万元，是日始交上海工商业贷款审查委员会具领。

7月16日　薛岳令第九十师20日到达旧州（镇名，位于四川省平武县东南70公里），21日接旧州、平武防线；第二九五旅21日到达旧州，22日接青川、旧州、古城防线；第九十二师20日到达江油，以一部接守江油、旧州防线，主力控制江油。

△　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组织就绪，总司令于学忠在西安旅次就职。第五十一军各师到达西安后，分驻四郊枣园、十里铺等处。

△　日本国内及在东北之实业团体六会社合组之“华北经济视察团”一行20余人，是日自沈阳抵平。东北日商所组织之“奉天实业旅行团”24人亦于同日到平。

△　美经济考察团团长福勃斯在美商界欢迎会上演说，承认“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商业与贸易损害甚大”，并建议美国对华投资，称：“中国之复生正在进行途中，应得美国之积极合作，敝团团员皆有同感。中国之努力建设，可证明吾美对华作相当巨额投资为合理。”

△　全国水利委员会讨论长江、黄河防汛办法及各项水利工程方案，并通过本年度水利事业费494.2828万元。

△　鲁西黄河南堤溃决，大溜经郓城、巨野、嘉祥，是日入南阳湖，有夺流入运，改道徐淮入海之势。

△　湖北公安、石首、孝感堤垸均溃。沙市城墙高于江水仅数寸。天门县水灾惨重，岳口附近张截港口连日捞尸达1.4万余具。

7月17日　　日关东军司令部召集各特务机关长、武官、参谋会议，商华北经济问题，包括建立中日“满”经济合作机关、调查华北经济、开发矿业棉业等项，并定今后每月在长春、大连或东京开驻华武官会议一次，根据情势变化，研究对华方策。

△　零时20分，台湾发生地震，震源在台中新竹。至上午10时，统计新竹地震被害状况：死44人，重伤65人，轻伤92人，房屋全倒者153户，毁损未全倒者250户。

△　我国著名作曲家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溺死。

△　鲁黄水续涨，洛口水位增至29.3公尺，决口水漫流，自决口处迄东平、汶上、济宁，长300余里，宽80余里，灾区10余县，约达2.4万平方里，灾民200万以上。是日，鲁省府主席韩复榘电中央吁请急赈。

7月18日　　为巩固松潘、防堵红军北进甘肃，蒋介石令川军孙震派一部由北川至江油、平武（不含）接防；周浑元部7月底集中绵阳待命。19日，蒋令吴奇伟以五个团兵力星夜驰赴平武、青川一带接防，以其余四至五团速向甘肃文县前进，限本月杪集中文县后，以两团赶驻文县西之柴门关与会龙汛各隘路口筑碉固守。25日，又令孙震部接防江油后，即向川、甘边境文县、碧口一带推进。27日，薛岳为保证进出川、甘边区给养，决定屯粮半月于青川，并决定各师、旅分别于下月4、5、6日到达碧口，7、8、9日分别到达文县。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芦花召开，张闻天主持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恩来帮助。会后，中革军委通知：“奉苏

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　国民政府派许世英、王震、朱庆澜、叶楚伧、孔祥榕为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许世英为委员长，王震、朱庆澜为常委。

△　日本经济考察团一行10人到太原，19日晚乘正太路车赴冀南一带考察。自月初至今，日本国内及在东北之日人团体共五个先后到达平、津，调查华北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经济事业。

7月19日　　日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商讨对华北具体方策，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海军省军务局长吉田、大藏省理财局长青木等参加。26日，又续开会。会后由外务省将讨论结果草拟具体方案，派员携与驻华大使协议后，定为国策。

△　国民政府派萧继荣为互换《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全权代表。次日，萧赴法外交部签订越约换文记录，并收受原约正本。法方由兼外长赖伐尔签署。22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公布施行。

△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受理沪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部申请，裁定《新生》周刊应依照《出版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禁止发行。

△　沪公安局搜查抗日图书。文华美术书店前被查抄抗日图画《十九路军》等2840册，是日又抄去《日本侵略中国漫画鸟瞰图》、《日本侵略满蒙铁路网之计划图》26张。同日，北新书局《暴日侵略东北的研究》一书亦被查抄。

△　新《出版法》公布后，新闻界纷纷要求复议。是日沪报界公

会集会，要求国民政府另订原则，重行修改。24日，京、沪、平、津新闻界代表向国民党中政会请愿，要求暂缓公布施行。28日，南京新闻学会具文中政会，吁请交立法院复议。并通电全国同业一致主张。30日，该会又派代表陈铭德等五人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叶楚伧面递呈文。

7月20日　行政院长汪精卫因病电京辞职，请以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务。同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以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

△　暹罗排华变本加厉，先后下令海关禁止中国《新闻报》、《晨报》、《时事新报》、《申报》、《民报》、《时报》、《中华日报》进口，并向侨胞征收居住执照税等，稍有反抗，即被驱逐出境。是日，暹侨代表两人返国，向政府请愿。

△　“满铁”开辟多伦至张家口汽车路线，日人络绎到张家口推销日货，并于是日在多伦举办日货展览。

△　天津日军170名开榆关南大寺演习，北平日军120余名同往。

7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芦花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问题。决定以红四方面总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　丁文江在《大公报》上发表《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一文。文中叙述1918年苏联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史实后，认为当时苏联情形和中国今日处境相同，主张应付日本侵略方法，为让出华北、中南，退到云贵去“复兴”民族。文称：“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愿我们大家

准备到堪察加去！”文章发表后，各方议论纷纭，马相伯、徐公达等均著文反对。

7月22日　国民政府任命焦易堂为最高法院院长。

△　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委员长。

△　黄郛电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论中日政情及结束政整会事，内称：“政会令王（克敏）代理，原属不得已之举，可暂而不可久……此局过于持久，小则端拱无为，徒耗巨额之经费；大则为人挟持，酿成甚大之流弊……速电中央断然下令结束为宜。”

△　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衔蒋介石命由武昌飞西安视察陕省驻军。27日，张在西安召集西北区各将领开会，商讨进攻红军计划，于学忠、杨虎城、王以哲、庞炳勋、孙楚、李生达、高桂滋、孙蔚如、冯钦哉、井岳秀（副师长李藩侯代）及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等均参加，决实行碉堡政策和“稳扎稳攻”办法。31日飞返武昌。

△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调任第二师团长；遗职由前野战重炮兵第四旅团长陆军少将多田骏继任。

△　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允荣到津与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会商察东保安队开拔日期、点验手续、驻防地点等。

7月23日　蒋介石在成都召集“追剿”军薛岳部队官佐训话，题为《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其要旨为：此次长征，为有史以来之第一次；追剿胜利，实总理主义之力量，吾人不畏艰险，奋发苦干，天下事无不成功；中央军入川任务，除剿共外，应作四川军民之模范，完成救亡复兴之使命。

△　飓风袭击江西鄱阳湖，巨堤马王圩被冲决数十丈，纵横百里悉成泽国，损失数百万元，灾民数十万。

7月24日　国民政府任命陶广为陆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钟光仁继陶广升充第六十二师师长。

△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

△　中苏文化协会发起人在南京举行首次会议，到苏大使馆秘书沙拉托夫策夫及张西曼、徐悲鸿、王陆一等50余人。徐悲鸿主席。由张西曼报告发起经过。选张西曼、张冲西、门宗华、徐悲鸿、沙拉托夫策夫等九人为筹委，张西曼为召集人。

△　阎锡山在太原对日电通社记者发表谈话，主张中日提携，共同防俄。

7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定9月下旬召开六中全会。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凡10条，规定共产党人自首者可以免刑、减刑或缓刑；免刑、缓刑者，得保释或移交反省院；减刑者移反省院以代执行。

△　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率部进攻懋功，红五军团据城抵抗。杨以第一三三师牵制正面红军，以第一三五师、第一三四师由左、右两翼包围，红军腹背受敌，激战至傍晚向抚边撤退。杨部占领懋功城。27日，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占靖化，红九军团向梭磨一带北撤。

△　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确定对内蒙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也为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等方面规定具体措施。

△　据湖北水灾救济总会统计，截至是日止，全省被水灾区域，计有汉口市之一部及武昌等49县，受灾面积达4.4272万平方公里，直

接被灾人口714.97万余人，比民国二十年（1931）大水灾民人数约多近一倍。

7月26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条例》，发行额3000万元，用以收回所有地方钞票。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福建省地方建设公债条例》，定额300万元。

△　鄂财政厅以民国二十四年该省建设公债票面50万元及第一期善后公债票面八万元，向汉口各银行押借水灾赈款30万元，是日签订借款合同。

△　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率参谋阮西震等至浙南遂昌县成立“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进攻浙西南粟裕部红军。

△　日本中日实业会社副总裁高木在天津召开中日实业经济专家会议，商讨中日“经济提携”及日方投资开发华北资源等问题。中日实业会社、三菱银行、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仓组等负责人及驻华使馆、天津驻屯军人员均出席。天津盐业、大陆、中南、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经理或行长及市府代表亦被邀参加。

7月27日　　张学良在西安召集各军长开“剿匪会议”，决定积极完成碉堡政策，实行稳扎稳打之办法，由陕、甘、晋、绥、宁五省各部队出兵联合“围剿”共军。

△　国民政府令免陆军第九十六师师长萧致平职。

△　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调陶尚铭为该会参议，改以殷汝耕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苏玉琦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

△　微山湖水续涨，运河西堤倾塌，两水相接。是日，防黄会开会，决修蔺家坝。

△　鲁省府主席韩复榘为苏北筑堤迎截黄水事致电中央表示反对，略谓：沭水、赵王各河连日水势高涨，先后决口，究其原因，实由苏省境内修筑堤闸，迎截黄水，使下游不能宣泄，南阳湖水倒漫所致。

7月28日　武汉江水剧退，午后水位已低于48英尺之危险记录，防水告一段落。鄂省请中央拨款1800万元赈灾，但截至是日止，所得各方赈款仅许世英视察时带去三万，省筹10万，各地捐寄四万余。

△　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视察沿江水灾毕返京，谈鄂、湘、皖、赣灾民约逾千万，田地被淹达10万平方公里，公私损失不下五亿元，其中以鄂省最重，远过民国二十年。

△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赠蒋介石巨型机一架，是日由意空军大队长史加伦率领飞抵香港。8月17日，由史加伦代表墨索里尼在浔向蒋行赠机仪式。

△　英国记者琼斯、德国记者穆勒去内蒙百灵庙等处侦查日人活动，在返张家口途中，被日人利用土匪于宝昌县东北50里官马沟处绑架。30日，穆勒被释。8月13日，琼斯被杀，移尸宝昌县附近。19日，驻华英使馆电外交部要求缉凶。21日，琼斯遗骸运抵北平火葬。

7月29日　山西“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在省纪念周上宣布防共政策，宣称山西防共应有两途径：一、将全省“做共党目标”者共120万户人民自行武装起来，在“大空隙”中大奋斗，拼命自卫；二、实行“耕者有其田”，使佃农、雇农安定化，以消灭其“大空隙”，并使基干农民武装化，以保卫社会安宁。

△　西南政务会调边防督办兼龙州民团指挥官李品仙任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

△　美国政府宣布，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美财政部顾问卜凯为

中国经济视察员。卜凯自今春返华后，曾去辽、吉、黑、冀、湘、鄂、川等省调查经济状况，现正准备去闽、粤、桂、滇、黔等省调查，搜集经济情报，随时报告美国政府。

7月30日　国民政府任命汪惟仁为陆军第一〇八师师长；吕济为陆军第一四二师师长；李杏村为陆军第三十二军副军长。

△　鸭绿江泛滥，水位达27.8尺，为60年来所未有，安东灾情奇重，大小房屋浸水者1.5万余户。

△　行政院通过许世英所拟救灾办法：工赈以中央统筹办理为原则；农赈就中央救灾准备金项下动支；急赈以中央补助，地方办理为原则；防疫由中央指拨四万元，交卫生署办理；减免灾区田赋，由财政部核办。

△　开滦连日大雨，昨夜10时赵各庄矿第二矿井突坍陷，矿工150余名被埋井内。是日，矿工家属老幼哭向矿局索人。

7月31日　国民党中政会以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济南等地新闻界纷纷要求修改新《出版法》，是日决定将新闻界所提意见交付审查。

△　国民政府任命豫省府主席刘峙兼该省民政厅厅长。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考试法》，规定公职候选人、任命人员及依法应领证书之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均应经考试定其资格。考试分普通考试、高等考试两种。同日，公布《典试法》、《特种考试边区行政人员考试条例》。

△　国民政府令：《合作社法》自9月1日起施行。

△　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成立。主席许世英报告称：“本年度国库艰窘，救灾准备金如须全列七百余万，非财力所胜，现酌列二

百万，系于无可设法中格外编列。”

△　江苏省府主席陈果夫电韩复榘解释苏北筑堤事，谓“目的纯为防止黄灾扩大，不致影响黄水宣泄，请派员详查”。同日，据滕县府派工程师查复，谓“该省阻水一部，即本县存水一部，势将蒙害”。

△　上海日文报《每日新闻》因载日人室伏高信发表的对于“新生事件”及日对华政策的谈话，受日总领处分，是日起停刊三日。室伏谈话称：“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欲调整中日关系，应将驻华日本武官退出中国全境，同时减少关东军兵力十分之一。”

是月　红二十五军进至陕西西安附近，在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一部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外，大部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

△　据7月30日《大公报》讯：湘省受水灾县达20余县，被灾面积约两万余平方公里，直接被灾人口约400余万。灾区主要农作物均淹没。滨湖各县堤埝崩溃，人畜死亡，房屋破坏，农具损失甚巨。全省损失约在两亿元以上。

△　据侨务委员会统计，旅外华侨共783.7888万人。

8月

8月1日　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0月1日，《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

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号召一切爱国力量，“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抗日救国。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南省政府，任命何键、凌璋、何浩若、朱经农、余籍传、曹典球、黄士衡、黄家声、彭施涤为湖南省府委员，以何键兼主席，凌璋兼民政厅长，何浩若兼财政厅长，朱经农兼教育厅长，余籍传兼建设厅长。原任省府委员何键（兼主席）、曹伯闻（兼民政厅长）、张开琏（兼财政厅长）、余籍传（兼建设厅长）、朱经农（兼教育厅长）、凌璋、黄士衡、宋鹤庚、彭施涤、黄家声、刘建绪、吴剑学、曹典球免职。

△ 日阁议决议改组“满铁”，以松冈洋右继林博太郎任“满铁”总裁。

△ 新加坡华侨汇款两万元，交侨委会赈济长江、黄河灾民。

△ 全国儿童年开幕。

△ 江苏省丰县东鱼台大堤受黄水冲击决口。3日，苏北大堤溃决，宽达九里，水有入黄河故道势。晚，万福河又决口，鲁西南鱼台陆沉，单县危急。

8月2日 蒋介石为使胡宗南纵队集中全力防守松潘，令薛岳第一纵队接替胡部自平武至高庄坝一线及水晶堡、施家堡一带防务。

△ 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开会，讨论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问题。次日，派杨熙绩赴瑞士征询胡汉民对六中全会意见。

△　日武官高桥由平飞保，访晤冀省府主席商震。翌日赴太原，访晤晋“绥靖”主任阎锡山对中日经济等问题有所商谈。7日返平，语记者称：“晋省工业将来之发展，与冀省农业改进之情形相同，与未来中日贸易有重大关系。”

△　宁波市信源等11家银号前已停业，景源、汇源、裕源、元亨、裕丰、瑞余六家银号是日又告清理。

△　沪中华国货同盟会代表大会讨论救济工商业办法，议决请政府改革币制，以货物为本位，发行流通券等案。5日，派代表张子廉等赴京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面递呈文，孔表示兹事体大，允作参考。

8月3日　　红军总部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　红二、六军团在湖北宣恩县板栗园附近阻击增援龙山之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歼灭其大部，毙敌师长谢彬。中旬，再克桑植。26日至28日，连克石门、澧县、临澧等县城，常德告警，鄂西震动。武昌行营与何键急商“围剿”红军计划：以孙连仲部沿澧水北岸之线攻临澧；李觉部以一部守常德，一部推进澧水南岸，联络孙部夹击；刘建绪部扼守沅陵、桃源之线，相机行动；第七十八师开常德，参加澧水南北两岸之线作战。

△　韩复榘电许世英陈述鲁省灾情，损失在1.5亿元以上，请速续拨巨款赈济。同日，又电孔祥熙，谓“鲁省灾民500万，各县积谷放赈，旬日即完；灾民纷请护照，欲就食他方，多以南京为目的，虽经劝止，仍恐铤而走险”，恳迅拨巨款救济。

△　阎锡山派王靖国赴南京向中央请示进攻陕北红军事宜。

△　旅日华侨先后被逐归国已达73批700余人，是日又有71名抵

沪。

8月4日　　冀东滦榆区保安总队长刘佐周（原为伪军改编），在滦县车站迎接梅津司令官时被刺毙命。日军守备队长温井险遭狙击，日宪兵北村为流弹所伤。5日，华北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为刘佐周案向政整会代委员长王克敏及冀省府提出抗议。

△　中共中央在川北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与任务。5日，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在组织上做了若干调整。8日，中革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决定兵分两路经草地北上；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徐向前等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左路军以卓克基为中心集中，由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儿盖两地出发，经过草地北上。

△　何键向中央电陈湘省灾情称：益阳、常德等14县，共溃决1659垸，淹没垸田387.7946万亩，续溃283垸，淹垸田166.0858万亩，淹毙3.7508万人，稻谷损失2.846607亿担，房屋、家具、牲畜及其他损失1495万余元。其他湘乡、湘潭等22县被灾亦重，损失正调查中。

△　据《大美晚报》载《今年纱厂停工之总清算》一文称：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统计，今年年初全国华商纱厂共92家，七个月内倒闭及停业者18家；纺锭274.2754万枚，已停工者81.4076万枚；线锭14.3042万枚，已停工3.4476万枚；布机2.0926万台，已停工6817台；全国纺织工人15.6224万人，失业者达4.2948万人。

△　欧亚航空公司陕蓉线试航成功。

8月5日　　薛岳以川北地形复杂，决派少数部队先作实地侦察。令第五师、第九十六师各组一游击支队，分向陇南武都、文县前进。任务为：在碧口、乔庄各建碉六至九座，以为主力进出甘肃之据点；侦察红二十五军情况及天水以南，文县、碧口以北地区地形及给养情形。至11日已筑碉15座。13日，薛岳亲带特务营一部及第三四九团由江油出发，去文县了解甘肃边境地势。

△　《秦土协定》订立后，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自察哈尔移驻河北，长城以北汉、蒙地区分别由张允荣（汉）、卓特巴扎普（蒙）维持治安。是日，松井与张允荣又在察签订《秦土协定》的细节协定，规定由蒙古保安队维持汉人居民区治安，蒙古保安队遂进入沽源、宝昌、张北。

△　考试院公布修正高等考试普通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警察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卫生行政人员、外交官领事官、司法官、监狱官、建设人员、会计审计人员、统计人员11个考试条例。

△　日方怀疑前滦榆区行政专员陶尚铭与刘佐周被刺案有关，是日将陶邀至北平日使馆武官室扣押。

△　黄河在山东董庄决口后，鄄城、郓城等县均筑埝防护，黄水不能顺流入河，遂从鲁入苏，苏北亦筑堤阻水，致鲁西积水无法宣泄。是日，经济委员会治黄临时会议议决：一、分途泄水，将流入南阳湖、昭阳湖之水导入东平湖，挽归黄河；并将流入微山湖之水，由湖口闸蔺家坝导经中运河、六塘河、灌河出海；二、引大溜归入正河，速派员勘察、拟定引河地位及排溜挂淤办法。

8月6日　　河北省府讨论刘佐周案，决派员调查，严缉凶犯，并电令滦榆区专员殷汝耕悬赏5000元缉凶。同日，殷汝耕访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商刘佐周案。

△　行政院通过救灾办法三项：一、已拟办各项工程，尽量容纳灾民以工代赈；二、由赈委会依法动支本年度救灾准备金100万元，照各省受灾情况支配拨发；三、通令被灾各省查明灾情，酌减田赋。

△　沪法租界人力车工人四万余人，因反对登记总罢工。是晨，1000余人分向市党部及法界公董局请愿。9时行至斜桥，与法、越巡捕冲突，被枪杀两人，殴伤12人。工人旋派代表分向沪市党、政各机关及法界各社团请愿，要求取消登记、惩凶并赔偿损失。

8月7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自成都返京，携回蒋介石对日交涉提案：一、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二、中日关系应立于平等基础之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三、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促进中日经济提携；在经济提携之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　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自保定至天津访梅津，对刘佐周案表示道歉，并声明省府决“严令缉凶，清除乱源”。12日，河北省府令饬滦榆区专员公署对刘佐周案限周内破案。

△　河北省府公布刘佐周案善后处置办法两项：一、任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副队长李凤云为第三总队长；二、拨发刘佐周葬仪费2000元。

△　红二十五军由陕西凤县进入甘肃两当县，向天水挺进。12日，进至天水以南马跑泉附近，与国军第三军第七师曾万钟部激战。旋涉渭河，克秦安。

△　浙省府主席黄绍竑自沪赴粤，疏解京粤隔阂。

△　北平市政府决组赴日考察团，考察日本工商业及金融业等。市府各局各派高级职员一人，商会三人，银行公会二人，其他团体亦派员参加。

△　绍兴箔业工人反对专卖，捣毁专营公司、箔税局局长住宅及

箔铺等，县城临时戒严。

△　上海日文报《日日新闻》今起出华文版。

8月8日　　汪精卫自青岛电国民党中常会、国民政府，请辞行政院院长及兼外交部长职。9日至13日，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馀、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唐有壬、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亦先后请辞，与汪“同进退”。

△　蒋介石通电受灾各省办理水灾善后，并提出“国民经济建设初步要点”八项：提倡征工、振兴农业、鼓励垦牧、调节消费、振兴工业、开发矿产、流畅货运、调整金融。

△　江西庐山牯岭英租借地交还中国，庐山管理局长蒋志澄与英领默斯草签收回租借地协定。内容包括：一、将1905等年英人租地契约交还中国；二、原租地内公共事业交中国政府管理；三、住牯英侨得设咨询委员会，以供中国咨询，但中国有最后决定权。12月30日，蒋志澄与默斯签订《牯岭产业地交还江西省政府协定》。

△　为图封锁红军于松潘西南一隅，川军田颂尧部由北川方面开至岷江两岸黑龙池一带；李家钰、范绍增两部由茂县推进至黑水河南岸老君山一带；邓锡侯部推进至理番附近；杨森部驻扎在懋功一带。时第五纵队李韫珩部已完成崇化、靖化一带之大金川沿岸碉堡封锁线，以一部向梭磨、马塘方面“搜剿”。21日，范绍增师会同邓锡侯部占理番。

△　“满铁”决定投资1000万元，设立兴中公司，作为对华北经济侵略之辅助机关，以“满铁”前任理事十河信二为社长。17日，日本政府批准。

△　上海水灾义赈会成立，孔祥熙任会长。25日，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分配赈款：长江流域30万元，黄河流域20万元。

8月9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参谋本部组织法》，规定参谋本部直隶国民政府，“掌理国防及用兵事宜”。

△　国民党中常会派蔡元培、叶楚伧赴青岛慰留汪精卫。林森亦自庐山电汪慰留。

△　日本阁议决定所谓撤废在伪满洲国之治外法权，交还“满铁”附属地内行政权。

△　沪市当局严令法租界人力车罢工工人先行复工，静候政府处置。是日，200余人在社会局监视下复工，但不入法界，要求人力车公会向法界交涉赔偿罢工期间损失。

△　浙省府为弥补二十三年度亏欠并筹措二十四年度不敷经费，议决发行短期金库流通券600万元，流通市面，以中央拨补浙省之一部分盐税作为发行基金，六个月后偿还本息。

8月10日　　蒋介石为控制川军，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定本日到达点验地点，15日开始，分九组进行。嗣后每三个月点验一次。

△　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偕财政部专员巴琦、伦敦银行专家罗杰斯首途来华，调查中国货币、经济情形及英国在华投资利益。

△　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多次审议《对支新政策草案》，是日一致同意。《草案》宣称：“以帝国为中心之日、‘满’、支三国提携互助，确保东亚安宁并谋发展，是日本对外基本政策，也是日本对支政策的目的。”提出对华三基本原则，要求中国：一、彻底取缔排日，抛弃依赖欧美，采取亲日政策；二、正式承认“满洲国”；三、共同防共。

△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奉调回国，政整会代委员长王克敏设

宴饯别。

△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首次经济研究会议在沪召开，到孔祥熙、张公权、陈行及专门委员刘大钧、陶孟和、杨端六等40人，研究改革币制、统制贸易、平衡国际贸易及救济工商业等问题。

△　教育部发表全国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名单，王世杰、段锡朋、钱昌照、陈石珍、顾树森、吴研因、顾兆麟为当然委员，杨振声、郑晓沧、俞子夷等七人为聘任委员。31日，该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8月11日　蒋介石在峨嵋军官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略谓："以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大家一心一德，为国牺牲，使我们中华民国永远安固昌隆，巍然屹立于世界！我敢说：我们本部十八省，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能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

8月12日　国民政府任命宋天才为陆军第七十五师师长。

△　外交部为北平日武官擅自扣留政整会参议陶尚铭事，照会日使馆提出抗议，日方不予答复。17日，日方将陶释放。

△　日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离东京来华赴任。行前对记者谈，对华方针"仍循前司令官之方针进行"；华北方面，"今后以开发经济为主"。

△　为策动自治运动，日关东军参谋石本等一行六人飞太原访晤阎锡山。13日晨，飞大同转张家口。15日，抵绥与傅作义晤谈。

△　蒋介石驻粤代表蒋伯诚偕陈济棠代表孙家哲，于上月赴成都向蒋报告西南政情后，是日偕返广州。

△　黄绍竑抵广州，访晤陈济棠谈宁粤合作，翌日赴桂，15日抵邕晤李宗仁、白崇禧。

8月13日　　蒋介石委卫立煌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四省边区部队统归指挥节制。

△　冀省府主席商震通电全国，请赈冀灾。略称：黄河漫溢，长垣被灾320余村，灾民12万余口；濮阳120余村，灾民五万余口；东明150余村，灾民三万余口。自黄灾奖券停办，赈款来源断绝，省库罗掘已穷，吁请迅予赈济。

△　行政院决定分配赈款数目：鄂30万，鲁25万，湘10万，豫、赣各六万，皖三万，冀、闽各二万，陕、甘、黔、晋各1.5万，绥、察、宁各一万。另各省防疫经费六万，新疆防疫费一万，共100万元。25日，鄂、宁、甘诸省以赈款不敷，电请中央续拨。

8月14日　　蒋介石由成都飞抵庐山，电汪精卫往晤，汪迟迟未应。

△　国民政府公布《会计法》，凡10章127条。

△　山西绥署、省府在太原开防共联席会议。民政厅长孙奂仑在会上宣布划晋西河津等21县为防共区，归防共会议管辖。

△　黄水由鱼台南灌，丰县萧堰大堤、沛县龙固集均溃，黄流直扑丰、沛。

8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慰留汪精卫；通过“严惩共党反复”案，凡共党“自首”或“自新”而复参加共产党者，一律枪决，或酌处无期徒刑。

△　朱德、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从四川马尔康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推进。

△　红二十五军自秦安北分两路进军，一路越陇山向平凉，一路向隆德。17日，进至隆德县附近，击溃新编第十一旅刘宝堂部一个营，克隆德城。

△　由沈阳开往北平客车过榆关后遭受匪劫，损失三万余元。行至石河，匪下车逃逸，并开枪击毙检票员、路警各一人、旅客三人，伤10余人。

8月16日　行政院代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子文到庐山谒蒋介石，谈建设西北事。蒋介石谓西南、西北均非立即建设不可，并劝告上海银行界迅速前往投资。

△　美特派中国经济视察员卜凯赴华南调查经济、货币情况毕，是日到沪。18日，赴杭转宁波、绍兴等地调查。20日由沪去浔调查。

8月17日　蒋介石派张群携亲笔函飞青岛，促请汪精卫早日返京，主持政务。汪允即返。

△　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接洽会议，决定：一、华北治安之维持，以华北驻屯军为主，停战协定之贯彻，由关东军负责；二、由中、日、“满”三国共防苏联赤化东渐；三、开发华北经济以“满铁”资本为中心，动员中、日、“满”资本，从完成交通网及开发资源等着手。

8月18日　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就外交部抗议日机近来不通知中国政府，在平、津一带飞行、降落一事，在平宣称，此种飞行“系塘沽协定所许可”，中国政府所提抗议“实无根据”。

△　立法院委员吴经熊就各地新闻界要求修改新《出版法》一事对记者表示：“统观《出版法》原文，不无束之过严，新闻界之请愿，自不能非之。”但又宣称：“吾国言论自由虽有明文，而自由二字，系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组织尚未健全之过渡时代，其自由之范

围亦较缩小，未能尽量发展。”

△　韩复榘、李仪祉等在鲁西董庄开黄河防堵会议，共商防堵缺口办法，议决由韩、李会衔请财部速拨堵口费百万元，在江苏坝附近筑挑水坝，用以冲刷对面新淤沙地。

8月19日　　蒋介石自庐山飞京。张群往见，报告赴青岛挽汪经过。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沙窝开会，张闻天主持会议。决定中央分工：张闻天兼管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何克全）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　汪精卫自青岛飞沪。汪语记者称：“中央虽来电挽留，惟本人辞意坚决，刻已再电中央请辞，设若中央准予辞职，本人当立即入京服务于中常会。”同日，汪电蒋询会晤日期与地点。

△　黄郛应蒋介石邀自莫干山赴京。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开常会，到陈济棠、邹鲁、林云陔等讨论出席六中全会人选及提案问题，无具体决定。26日例会，粤、桂中委交换对六中全会提案意见，决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出，并推桂黄旭初、李任仁，粤邓青阳、李绮庵、关素人、詹菊似、陈中孚、黄季陆、刘芦隐、崔广秀出席六中全会。

△　陈绍宽请辞海军部长职。20日，行政院慰留。

△　新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到津，与前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交接军务竣事。21日，梅津离津回国。

△　微山湖水续涨，西大堤、蔺家坝均溃，徐北被淹300村，徐州危急，数万民工抢堵入城屏障车道口。

8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和夏洮战役的作战问题，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提出夺取陕、甘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　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向蒋介石送交《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全面阐述其对中国国防及抗日战略构想。《建议》预计，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在战略上确立一个“集结兵力区域”，以此为基地来部署对日国防。这个区域大概在徐州——郑州——南昌——南京一线。我军应在此区域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为绝对防御线”，“最后战线为黄河”。长江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宜固守”，华中则以南昌、武昌作为战略支撑点，全国以四川为“最后防地”。

△　新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访日陆相林铣，恳谈对“满”政策及经营“满铁”方策。林铣指示：开发华北经济以“满铁”为中心机关，望密切与关东军联络，对日“满”共同经济委员会协力。

8月21日　汪精卫自沪到京，与蒋介石、黄郛会晤。蒋力劝复职，汪表同意。

△　国民政府任命陈光中为陆军第六十三师师长。

△　红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27日，走出草地，到达巴西、阿西。同时，红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自卓克基到达阿坝地区。

△　红二十五军转战六盘山，是日到达瓦亭。复从瓦亭出发，日夜行军，在平凉以东四十里铺、白水镇一带击溃马鸿宾师一个旅，歼灭一个营。旋在泾川歼灭该师一个团，毙团长马培基，俘敌400余人。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是役中牺牲。25日，进至陇东太白山一

带。

△　晚，刺杀刘佐周之李振华在滦县柏各庄被捕。据供系因被刘撤职，故怀恨行刺。25日，殷汝耕去天津向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报告经过。

△　日人强占柳江煤矿。泰记煤矿公司日人多名，以代采为名，强占柳江矿区，并于24日强行开采，日产煤八九百吨，悉被掠夺。

△　新任驻美大使施肇基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国书。

△　教育部公布首批324字简体字表及推行简化汉字办法。

△　浙江兰溪纱厂女工千余人，因厂方擅用旧秤，侮辱女工，酿成罢工，引起冲突，女工多人受伤，纷往法院请验，城内秩序大乱。

△　徐州为防御黄水，筑成琵琶山横堤，长15里，参加筑堤民众两万人。23日，车道口口门抢堵竣工。

8月22日　国民党中常会在京开会，汪精卫、蒋介石均出席，讨论汪辞行政院长及兼外交部长案，决议慰留。下午1时许，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以汪允复任事通知各部、会。3时，行政院补开例会，陈公博、陈绍宽、王世杰、何应钦、陈树人、黄慕松等亦均打消辞意，出席会议。

△　蒋作宾在南京发表对日外交意见，略称："此次返国，除向中央报告日本朝野对我意见外，并请示对日外交方针。中央对报告各点，业经缜密讨论。我对日外交政策，当本过去事实，继续促进两国邦交，中日有如唇齿，甚愿日政府以平等为原则，开诚相见。余返任后，当本此精神，与日政府切商，期打开中日外交一切难关。"

△　吴经熊继焦易堂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8月23日　汪精卫通电复职，略称：卧病月余，一再具呈中央，恳请辞职，未蒙允准，兹遵照中常会决议，于本日销假回院视事。同日，蒋介石以汪已复职，离京飞成都。

△　财政部在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及四明银行各增官股500万元，并规定增股后，四明与中央、通商与中国、实业与交通各银行分别相联，成为“姊妹”银行。

△　日本东亚产业协会三村等五人到绥，“考察”产业状况。

△　平、津银行公会、商会、市府等为实行中日“经济提携”，共同投资开发华北，特组织华北经济协会，是日由王克敏召集在平开第一次筹委会，公推周作民（平银行公会常委）、邹泉荪（平商会主席）、清水（日使馆参赞）为常委，负责起草协会组织条例。

△　中东路苏籍职员2.1176万人，分批撤退回国，是日全部撤完。

△　7月以来，豫省阴雨连绵，山洪暴发，全境河流漫溢，遭灾甚重。是日，豫省发表水灾统计，被灾51县，内重灾35县，灾区达62万余方里，农田被淹2400余万亩，灾民260余万，淹死4279人，塌房42.7374万间。

8月24日　行政院驻平政整会代委员长王克敏，奉汪精卫电召赴京。

△　驻日大使蒋作宾在沪会见日使有吉，商谈中日问题。会后有吉称：“中国中央要人，全有非始终坚持中日亲善关系不可之一致意见，蒋介石对蒋大使言明，对此意见给以全部支持。”次日，蒋离沪赴日返任。

△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由津抵平，访王克敏、鲍文樾、袁良等。

△　胡宗南为堵击红军北上，电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即日自四川漳腊经柏木桥、上下包座向阿西前进。

△　川省裁军竣事。蒋介石电刘湘暨川军各路总指挥，凡编余可用官兵，凭证明听候甄别改编；其余一律遣散，劝令归家生产，不准逗留麇集，以维治安。

△　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对记者谈，鲁、豫、冀三省水灾面积共约四万平方公里，灾民约550万人，损失在三亿元以上。

8月25日　日地质调查团一行20余人，由团长木原率领，自东北抵察，开始调查烟筒山铁矿、辛窑子煤铁矿、石景山石灰矿、门头沟煤矿等，以作开发准备。

△　热河境内赤峰至叶柏寿铁路由“满铁”筑成。定9月1日通车。

8月26日　王克敏到京，与汪精卫、何应钦商华北问题。同日，王在京接见记者，答复日本在冀、晋、察、绥四省设立特务机关事，称：“此项特务机关，即旧日所谓军事联络员，察哈尔系由松井担任，早已成立；余均系向当地军政长官接洽设立，未征得政整会同意。”28日，王自京返平。

△　外交部根据中法越南专约，设置河内、西贡两领事馆，是日以部令发表许念曾为驻河内总领事，沈觐宸为驻西贡领事。

8月27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京联合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同日，曲阜隆重举行祀孔典礼，国民党中央派鲁省府主席韩复榘主祭。

△　自财政部限令结束有奖储蓄后，法商万国储蓄会除设于内地者少数已结束外，津、汉等处迄延未遵行。是日财政部分咨各省、市政府迅饬所属查明情形，依照新刑法规定加以取缔，限令结束。

△　驻日大使蒋作宾抵日本长崎，对记者谈称："举国一致向中日亲善迈进，系不变之事实……至于中日提携，余意应自民间之经济提携为始，对于'满国'之将来，似以不提及为妙。"复称："中日提携，非但系两国之问题，且为东洋和平之基础。"

△　冯玉祥在泰安向灾民放赈，路警向其开枪行刺未中，死卫队10人。

△　前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姚震于天津病卒。

8月28日　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调原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　北平军分会全体委员再电何应钦，促返平主持会务。

△　蒋介石为防红二、六军团进攻川、鄂边境，令第二路军薛岳部停止北开，以一部集中利川、万县待命。

△　驻津日领以北宁路劫车案伤亡韩人旅客多人，向冀省府及北宁路局提出抗议，要求道歉、缉凶、抚恤、赔偿。

△　滦榆区专员殷汝耕赴榆关，晤日关东军驻榆特务机关长竹下，商长城各口夹击土匪事。

△　美经济调查员卜凯在赣考察经济、货币情形毕，是日乘机飞沪，续至苏、浙各大县考察农村经济情况。

△　洪范在《大公报》著《中日经济提携》一文，指出："日本对华经济提携的主旨非独在获取其必需的原料及军需品，并且还在霸占中国的商品市场"；"中日经济提携的基本理论就是以中国为日本经济集团的一分子，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销其工业的生产品。"

△　沪国际电台与伦敦、东京、马尼拉三处试通电话。

8月29日　国民政府明令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　驻平政整会代委员长王克敏召集政整会全体职员讲话，政整会职员200余人出席，宣布中央已裁撤本会，自即日起赶办结束。今后各省、市政务、治安及地方外交事件，均为各省、市政府办理，其非地方性质之外交事件，则由中央处理。

△　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西沿河21县县长及文武官员开防共联席会议，研究“防共办法”。会议至9月10日结束，议决“防共根本办法”为：“发行村公债，将土地收归村公有，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补土地私有、共党造乱之隙。”并通过“现在防共办法”33案，令各县长携回遵行。阎锡山谈称：“解决土地问题，为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办法。若不急切解决，则所议之武力防共、政治防共、思想防共等之具体方案，亦将失其效力。”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丁惟汾为杨天骥案引咎自劾，请罢免其监察院副院长案，决议恳切慰留。按：杨系监委，今春因受托为交通银行支行经理江祖岱侵占行款经营公债案以巨款向江宁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行贿事被检举。

△　国民党中常会讨论救灾办法，决议：一、发行救灾公债；二、公务员捐俸助赈。

△　因受日方压迫，国民党绥远省各级党部奉命本日起停止工作，赶办结束。10月2日，绥远省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停刊。

△　柳江煤矿发表宣言，列举日人侵占事实五点，昭告中外。31日，河北省府派人协同滦榆专署处理柳江与泰记两矿“纠纷”。“调停”结果，由泰记煤矿出资65万元收买柳江矿产、发电厂、铁路、仓库、码头等。泰记只允付现款30万元，余款分期交付；柳江主一次交

清，交涉陷于停顿。

△　福建厦门海关税务司为解决台湾水客往来台、厦携货漏税问题，是日与日本驻厦门领事山田芳太郎签订《厦门台人输货协定》。

△　粤省规定凡从东北、天津、烟台、上海及长江一带口岸运往该省油饼、麸类，一律征收附捐，每担二角五分，9月1日起实行。各地商会及油饼、杂粮等各公会一再反对，均无结果，是日起联合罢运。

8月30日　　黄绍竑访粤、桂结束，是日抵沪，对新声社记者谈："此行曾晤及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西南对于时局无特殊意见，惟盼与中央共谋解决办法。"

△　"满铁"新任总裁松冈抵长春，访晤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商谈对"满"国策及"满铁"经营根本方针。确定二位一体，强化"满铁"机能，倾全力从事东北经济、文化侵略，并向华北发展。

8月31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抵横滨转赴东京。蒋对日记者谈："本人回国后，迭次会见汪、蒋两氏，协议中日亲善政策……本人今次回任，对于中日亲善已有决意与诚意，凡两国有利益之事均可商量。"

△　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第三十军在川北上包座，消灭西北"剿匪"军第二纵队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上包座。9月1日，该师师长伍诚仁向洋洞方向溃逃，后被蒋介石撤职。

△　国民政府令免陆军第八军军长赵观涛职。

△　铁道部指示北宁路劫车案善后处理办法五项：一、与各方协同搜索劫匪；二、受伤旅客医药费由路局全部负责；三、平沈车增设武装车，9月初实行；四、路警配轻机枪；五、车内设警报。

△　闽泉州山洪暴发，城区及四郊塌屋2000余间，死伤百余人，灾民数千，损失约300万元。是日泉州各界组救灾会筹赈。

是月　据湖南省赈会调查，今年该省水灾最重县份，计有益阳、常德、岳阳、汉寿、沅江、湘阴、安乡、华容、澧县、南县、临湘、平江、临澧、石门、慈利15县，被灾田亩总数923.4574万亩，溃决堤埝1659垸，被灾人口410.1870万口，淹毙3.7532万人，稻谷损失2919.4070万石，其他损失约计1582.6万元。

△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平正式成立。随后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大、中学校先后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开展救灾募捐活动。

△　为救济煤矿业，实业部与英商麦边进口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借款2000万元，限30年偿还。

△　满洲矿业开发会社委员会成立，资本500万元，由“满铁”、伪满洲国共同出资经营。

△　“满铁”在天津设立经济调查会，调查华北资源情况。

△　沈同午、钮传善、陈定远等受日指使，在天津日租界组织东亚经济协会，介绍日人向平、津及华北各大城市实业界进行投资，并代日人购买中国原料。

△　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委会发表“清共”数字：六年来共捕1.7万余人，其中省委委员60余人。

9月

9月1日　为打通北上通往甘南的道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率第三十军、第四军发起攻打包座（距巴西、班佑100余里）的战斗。8月

29日，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四团向包座附近之大戒寺敌一营守军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30日夜，援敌胡宗南第四十九师进入大戒寺南，第三十军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在第四军配合下，与敌激战，至是日凌晨，全歼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获枪支1500余支，电台一部，粮食、马匹甚多。

△　内蒙西公旗札萨克石拉普多尔济被蒙政会免职。石不接受，称："本人爵位世袭已数百年，非大逆不能革职；且任免权属中央，蒙政会无此权限。"蒙政会遂派兵130名进驻该旗。

△　天津一些商人、政客在日支持下，以"经济提携"为名，纷组公司、协会。是日，市商会决议组织东亚惠通贸易公司，推潘燕生等九人为筹备委员。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高凌霨等亦发起组织救济华北经济委员会，由东京国际银公司天津分公司出资，归中日实业公司、"满铁"、关东军司令部指挥。3日，龚心湛、钮传善等又组华北经济协会。

△　日本满洲采金会社在长春与伪满实业部签订专利开采权。该社已开采之金矿，计吉林20处，黑龙江80处，本年上半年共提炼赤金70余万两。

△　各地报界庆祝记者节。北平记者致电中央，请通饬全国各属认真保护新闻事业及记者安全，并请重新修正《出版法》。

△　廖仲恺国葬，上午在南京紫金山天堡城墓地行安葬礼，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叶楚伧主祭。

△　财政部公布，自本日起减征洋米进口税，由每百公斤1.65关金元减至1.35关金元；附加税由0.165关金元，改征0.135关金元。

△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第八届会员大会通过争取面粉统税平等待

遇等案；选郭顺、王云玉、胡西园等21人为执委。

△　淮南铁路田家庵至巢县段正式通车。

9月2日　　中共中央在四川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　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外相广田会谈中日关系问题。蒋表示航空联络、经济提携等问题可容纳日之要求，承认“满洲国”问题尚须考虑。广田称：“不承认满洲国，中日难真正亲善”；并希望蒋就中日两国关系调整问题，从速作第三次会商。

△　外交部情报司长李迪俊衔命赴日，就调整中日关系问题探询日方真意。是日抵神户，对记者谈称，中日间之关系，以蒋、汪两氏之努力，已渐次变好，两国如能立于平等地位，则一切问题均易解决。4日，访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商谈中日问题。27日返沪。

△　驻津日总领事川越以蓝衣社又潜入河北活动为借口，向河北省府主席商震提出书面抗议，要求速采有效措施解散一切秘密组织及恐怖团体。

△　天津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等30余人发起组织河北经济协会，是日在北平开发起人会议，推周作民、邹泉荪等起草会章。21日，河北经济协会在北平成立，推周作民、邹泉荪、翁文灏、吴鼎昌等九人为委员。会章称该会宗旨为“调查研讨河北经济事业之发展，并应其必要，协助国内外资金之运用”。

△　旅平东北难民千余人，因中央允拨救济费10万元迄未兑现，生活无着，向北平市府请愿，市长袁良允谋救济办法。

△　行政院采纳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所提决埝救灾建议，电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转饬鄄城一带，限五日内收讫高粱，掘埝放水归河。3日，韩复榘电经委会称，鄄城民埝攸关鄄城、郓城、范

县、寿张、阳谷多县民众生命财产，不能挖掘，若强制执行，恐激民变。

△　山东峄县民众恐不老河、运河之水倒灌，是日掘毁江苏邳县新堤，致生激烈械斗，双方死伤均重。

9月3日　　行政院通过孔祥熙所提江河水患标本兼治方案：长江以疏导、废田还湖、废田还江治本；黄河以征工堵口治标，以放淤宣积、植树固堤治本。

△　张国焘决定红军左路军退回阿坝“补粮改道灭敌”，并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回击松潘。5日，张国焘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　考试院修正公布普考教育行政人员、法院书记官、监狱官、警察行政人员、卫生行政人员、建设人员、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会计审计人员、统计人员、外交行政人员及领事馆职员考试条例11种。

△　国民政府任命何炳松试署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　何应钦电促宋哲元赴平就任平津卫戍司令。

△　教育部制定促进注音汉字推行办法九项，通令各省遵行。

△　孔祥熙偕经委会秘书长秦汾自京北上视察黄河水灾。

△　日、“满”订立邮政协定。

9月4日　　蒋介石电令各省、市军政长官，规定本年11月1日起至明年3月31日止为国民劳动服务水利季节，除一般人民应遵照《人民服工役法》规定服役外，公务人员及军队官兵一律参加服役。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在寒假内各服工役10日。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中央公务员捐俸助赈办法，规定月支薪俸在55元以上者，9月份扣捐半个月，54元以下者酌量捐助。军事人员捐助办法由军委会另定。

△　据《大美晚报》讯，日关东军在太原、归绥、多伦、张家口、山海关遍设特务机关，以土肥原为特务机关总长，搜集军事情报。

△　红二、六军团进攻桃源，常德戒严，城门紧闭。是日，第四路总指挥刘建绪赴沅陵指挥防堵。

△　第八十七师王敬玖部调闽浙边进攻红军，是日自延平（今南平）开拔。

△　黄绍竑自沪赴蓉，向蒋介石报告西南之行经过。

△　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诚允为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专使。

△　鄄城、范县、郓城、寿张等县灾民代表向鲁省府请愿，反对开掘鄄城民埝，并电国民政府要求收回成命。孔祥熙在济宁接见灾民代表，谓“两害相权，应避重就轻”，仍主开掘鄄城民埝。6日，鲁省建厅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磋商结果，决缓开掘，改采延长江苏坝，排溜使归正河。

△　广东银行香港总行周转不灵宣告停业，并分电上海、暹罗、旧金山、台山、广州、汉口六分行照办。该行创立于民国元年，由陆蓬山会同香港殷商李煜堂等创办。民国十五年后资本增为港币1100万元，纯系华资。

9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四届六中全会展至11月1日开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照原议于11月12日举行。

△　黄郛致电汪精卫请辞内政部长职。

△　红军北上先遣支队到达川、甘边俄界。

△　日使馆参赞崛内携“中日经济提携”方案自东京到沪，与日使有吉、驻京总领事须磨会后作为准备向中国外交当局交换之初步意见。方案包括四点：一、对中国之农业、工业，由日在技术上指导改进，中国农产品应以增进日本工业之利用价值为前提；二、由日本技术及资本开发中国煤、铁、锑、钨等矿；三、以日本技术及资本发展中国交通运输；四、组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以上工作。

△　实业部为救济矿业，特成立矿业金融调剂委员会，以王正廷为主任委员。实业部长陈公博在该委员会成立会上称，决先着重救济煤业，向银界借款1000万元分贷各煤矿公司。

9月6日　　国民政府任命陈绍宽为一级海军上将，陈季良、陈训泳为海军中将；特派胡世泽为出席国联第十六届大会代表。

△　英国政府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及随员巴琦、罗杰斯抵日本横滨，对记者表示，此次赴华使命在调查中国财政经济，报告英国政府，因日对华有重要利益关系，又与英有共同利害关系，故先与日朝野交换意见。7日，孔祥熙派乔辅三、李荣廷赴日，欢迎李滋·罗斯来华。

△　天津市政府解散潘燕生等组织之东亚惠通贸易公司。

△　天津日兵百余名入华界武装游行。

△　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为防陕北红军入绥，电召所部各团长即日到归绥会商防共方策。

△　立法院劳工法委会召集人史维焕考察各地劳工毕返京，语记者称，华北工业虽有基础，但甚危险，尤以纺纱、面粉、火柴为最。

原因在于外货倾销，外商在税制上较华商处境为优，难与竞争；农村经济衰落，购买力薄弱亦其一因。

△　四川省府准拨15万元兴修灌县都江堰。

△　河北省滹沱河在安平县杨油子村一带溃堤后，是日又在南皮、任丘等处决口。

△　鲁省府决定于田赋正税外，每亩带征赈灾附加三角，全省可带征70万元。是日，韩复榘电国民政府备案。

9月7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外相广田继续会谈。蒋重提2月26日王宠惠向广田表明之对日关系三原则，并说明：蒋介石认为倘能实现上述原则，对“满洲国”问题可置之不问；中国将比较容易地进行经济提携商谈，并将根据中日亲善工作进展情况，为“共同目的”进行军事商谈。广田要求中日两国“极力发扬东方文化，消灭共产思想”。蒋答：“吾国政府早已具此决心。”

△　国民政府公布《全国县市预算执行办法》，规定县市地方预算核定后，应公布城乡，并在当地发行或销售之报纸上披露全文；地方所有收支，应绝对遵守预算范围，否则惩处；人民对预算或法案以外征收，不负输纳义务；预算公布后，非重大特殊情形不得呈请修改。

△　国民政府公布《县长考试条例》。

△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举行成立会，蔡元培、王世杰、李书华等35人参加，蔡元培主持。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致词，表示“际此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救亡图存之道，最要在充实学术力量，行政机关决予充分扶植”。

△　驻京日领事须磨访外次唐有壬，以日人享有治外法权为理由，抗议中国印花税法用于日侨。

△　北宁路局局长殷同依照铁道部意旨，正式备文答复日领关于石河劫车案抗议：一、表示歉意；二、悬赏5000金缉凶；三、加挂武装车，确保客运安全；四、负担死伤旅客抚恤及医药费；五、旅客损失另议处理办法。

△　日第三、第五舰队军舰九艘抵厦门。

△　许世英在《大公报》发表《视察黄灾报告》，称鲁、豫、冀三省灾民约550万人，被灾面积四万平方公里弱，损失三亿元以上。与民二十二年黄灾不相上下。若与本年沿江各省水灾综合论次，则鄂最重，鲁次之，再次为湘、赣、豫、皖、冀。七省灾民约1950万人，损失八亿元。

9月8日　　阎锡山在太原对政治工作员谈防共办法，略称：现在防共要“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准出租或私相买卖授受，地主、富农多余土地由地方政府发行无利公债收买，以“和平方法”达到“平均土地”目的。

△　殷汝耕抵平晤日武官高桥，商长城“剿匪”及特警东开事。

△　“满铁”派出多起调查团调查华北资源，是日所派华北经济考察团中山重隆等11人抵津。14日，经济调查部长野中时雄等七人抵津。15日，经济考察团桑田等五人在平调查毕，赴察、绥调查。16日，石井正泰等三人来津协助野中时雄调查，该团21人离津赴平转宣化调查煤铁。27日，经济调查专员田边等四人抵津，次日赴石家庄入晋调查矿山、水利。

△　日拓务省决定投资3000万元（后改为1500万元），设立东北移民会社。第四次移民500人，分两批出发，首批赴哈达河及城子河一带开垦。是日，拓务省又决定明年度先移民2000户至东北。截至目前，东北日侨人数为24.3668万人，比九一八事变前11.2万余人增加

一倍多。

△　柳江、泰记煤矿纠纷，河北省府派人调处迄无结果。是日柳江煤矿铁路公司在沪开股东会讨论应付办法，决议：一、进行司法解决，向河北省法院控告泰记公司注册人孙贤熙，向日本领事馆控告泰记日本股东高久馨；（二）让渡矿产，以不损害国家主权及股东利益为原则。

△　天津律师公会为援助冤抑犯人，成立冤狱赔偿委员会，以苏明文等九人为委员，白鋆为委员长。

9月9日　　中共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是日及11日连续致电红军总政委张国焘，重申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令其“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并决定右路军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　英铁道专家海孟德应聘来华考察，历时四个月，是日自沪乘轮返国。

△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落比利时的华工林迪甫等31人被比政府驱逐回国，是日抵沪。

△　东北吉林、长春发现烈性鼠疫，传染甚速，是日起榆关检查旅客。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率红三军离开阿西向俄界进发，到达拉界。

△　应聘来华担任国民政府首席财经顾问之英人李滋·罗斯抵东京，偕英驻日大使克莱武访日外务大臣广田及外次重光，商讨有关中国币制与经济问题，并声明此次赴华仅在调查，英政府并未授予对华经济援助任何谈判之权，对复兴中国经济事宜，甚愿与日政府密切联系。广田答谓此次调查如能制成具体方案，商诸日本，当竭力合作。

△　晋军三团渡河入陕，由总指挥孙楚指挥进攻陕北红军。

△　行政院通过交通部发行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1000万元，用作整理及扩充电报、电话及无线电，年息六厘，分七年半偿还。

△　行政院通过孔、孟等奉祀官待遇案。孔子奉祀官支特任俸，其他奉祀官支简任俸。应承袭奉祀官之人一经达到学龄，即由鲁省府督促其入学，至大学毕业为止，奉祀官子女在公立各级学校就学者，享免费待遇。

△　蒋介石为整理川省币制，布告将地钞全数收回销毁，并规定自9月15日起，川省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中央钞为本位，地钞10元掉换中央钞八元，限11月20日前掉换完毕，逾期作废。

△　黄郛向行政院再次呈辞内政部长职。

△　皖省府主席刘镇华抵芜湖，与第四十六旅旅长鲍刚会商围攻皖南红军。皖省当局并令各县实行联防，协力“搜剿”。

△　商震访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及参谋长酒井，商战区治安及长城线“清剿”土匪事宜。

△　冀省府公布《保甲制度计划大纲》，决定编组保甲。各县编组保甲完竣后，应抽调24岁以上45岁以下壮丁编为常在民警及预备民警，分期训练，以代公安局及保卫团组织，实行警卫合一制度。

△　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派山井格太郎到津调查华北文化事业。25日，早稻田大学校长田中穗积等组织的“鲜、满、支考察团”到津考察平、津文化教育。

9月上旬　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绥德、吴堡。

△　日关东军司令部在西蒙贝勒庙设特务机关。

△　日本为统制我东北糖业，决定成立满洲制糖公司。资本1000万元，分10万股，台湾、明治、日糖、盐水港各糖业公司各认2.5万股，糖业联合会员认一万股，其余由商界招募。

△　日本为倾销日货，在津设天津贸易馆，由领事馆直辖。

9月11日　粤揭阳县农税局扣留抗税日米船，是日汕头日领向揭阳县府提出赔偿、保护日商货运、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此事件等要求。同日，日舰七艘到汕。27日，驻粤日总领事河相又向粤省府抗议，并再派日舰三艘、陆战队120人登陆示威。10月1日，外交部电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侯查明真相。

△　经委会水利处向经委会常会报告本年江河水势及堵口复堤情形，略称：长江汉口水位以7月14日为最高，达51.35呎，较民国二十年最高水位低2.25呎，此后水位逐日下降，至9月10日已降至40.4呎。江汉泛滥区域，据8月16日、17日航勘结果，约计2.5万平方公里，（约合4000万亩），计鄂省1.37万平方公里，湘省6500平方公里，赣省2900平方公里，皖省1900平方公里。扬子江、襄河干堤漫溃29处，现已堵筑合龙者八处。黄水泛滥面积达7500平方公里，山东鄄城、东平一带灾情最重。

△　广东银行停业后，是日，上海英驻华最高法院派谭约翰会计师接管沪、汉两分行财产并收取一切人欠债务。港总行及旧金山、暹罗等分行财产已由港政府派人接管，广州分行由粤省派员监视。

△　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星中日报》，是日出版。

9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与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讨论北上到达甘南后的方针，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会议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

德怀、林彪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

△　经委会常会通过成立合作事业委员会。10月1日，合作事业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　上海益利总公司（所属汽水厂、玻璃厂、轮船公司、地产公司、银号等）因美商美丰银行向其索取积欠透支40余万元，无法偿还，宣告停业清理。

△　天津日商组织“日本人输出入贸易组合”，调查华北毛纺织业，为投资作准备。至是日，日商参加者已达73家。

9月13日　　张学良由汉口飞西安，与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军事。

△　红军北上陕甘支队一、三军团沿白龙江右岸前进，通过栈道，向岷山要隘腊子口进逼。14日到达麻牙寺。1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进攻腊子口，击溃国军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三个团。17日，突破腊子口。18日，占领甘肃岷县、西固间之哈达铺。

△　国联行政院开秘密会议，讨论中国理事席位问题，决定无限期搁置。

△　黄绍竑、顾祝同由汉飞京。黄向汪精卫报告赴川见蒋介石经过。

△　山西绥署、省府防共会议发表阎锡山所拟《好人团制裁坏人办法》及《消除民间不平办法》，宣称“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集合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攻，吾人应不分阶级分好坏，集合好人制裁坏人”。并主张省、县政府考查、督促各级官吏主张公道，消除民间不平事项。

9月14日　　德首任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德

使馆由平迁京。

△　国民政府任命黄新为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

△　日“满铁”总裁松冈访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商开发华北。

△　日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率20人至绥远黑沙陀“视察”。

△　榆关海关负责人谈，今年上半年共扣留私运日货达百余万元。

9月15日　张国焘在川北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对抗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战线。是日发布《大举南下政治保障计划》，17日又发布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强令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自阿坝出发，重过草地南下。

△　中英会勘滇缅南界，中方委员尹明德由京赴沪，会同梁宇皋等前往滇边。

△　日外务省草拟“中日文化提携”具体办法，对华文化事业经费从300万元增至400万元。

△　榆关韩人聚众走私，秘密组织运输社，秦皇岛海关请日方取缔。

△　沪五金铁业考察团章均堂等一行20人应日三井株式会社之邀，离沪赴日参观。

△　据《农情报告》第三卷第九期载：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本年农业受灾损失，20个受灾省份夏收小麦、大麦、豌豆、蚕豆、燕麦五种合计，因旱损失1.4281亿市担，因风损失2989万市担，因病

害损失2989万市担，因虫害损失289万市担，其他灾害损失5655万市担，其中小麦损失约1.9272亿市担，大麦损失约4188万市担，豌豆损失约2159万市担，蚕豆损失约1039万市担，燕麦损失约194万市担。

9月16日　　全国司法会议在南京举行，至20日闭幕。讨论议案446件，较重要者为：一、各省司法经费拟改由国库负担，以所得税、遗产税及其他确定税收为底款，细则由司法院与财政部商定。在未实行以前仍由各省负担；二、整顿县长兼理司法，逐步做到司法权完全独立；三、试行巡回审判制度。

△　两广国民党中委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邹鲁、林云陔等联电国民党中央，请将去年9月8日西南执行部所提整饬政治风纪、严惩淆乱社会危害党国等四案，列入五全大会议题。嗣中央电复，请由西南中委以私人名义提出。

△　阎锡山发表《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主张由村公所发行村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分给农民耕作，一人一份。《办法说明》称："土地私有实为共产党露下一个大空隙"，要消灭共产党，"舍从解决土地问题，根本消除大空隙入手，恐别无良法"。山东文化建设分会认为此项办法"与总理三民主义大相违反"，表示反对，并呈请五全大会、六中全会不予讨论。10月3日，"土地村公有实施办法讨论会"在太原成立。

△　"剿匪"军第一路总部移驻常德。23日，总司令何键赴常德指挥进攻贺龙红军，并巡视湘西北澧水流域各地。

△　渝各界代表胡文澜等12人向四川省府请愿，要求十足收回地钞，暂缓实行新税，并收回发行善后公债成命，以轻人民负担。

△　《译文》月刊被迫停刊，是日出终刊号（第三卷第一号）。该刊由黄源主编，译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

△　《宇宙风》半月刊在沪创刊，林语堂、陶亢德主编。

△　苏州国学讲习会开学。18日正式上课。由章太炎主讲。该会并出版《制言》半月刊，以提倡国学为宗旨，由章主编。

△　上海房租高昂，平均占生活费用30％至50％。市民不堪负担，年前成立减低房租委员会。是日该会发表减租总动员宣言，要求政府早颁减低房租标准办法，并促地产业主自动减租。

△　前北京政府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张志潭在天津病卒。

△　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因受广东银行停业影响发生挤提，周转不灵，宣告停业。沪、津、汉各分行同时清理。该行创立于民国十年，资本500万元，由侨绅马应彪等所组织。

△　苏北黄水夺运入六塘河。宿迁桃园忽溃40余丈，淹田千顷。横流与骆马湖九龙决口混流，宿迁、沭阳同被巨灾。

9月17日　　国民政府派陈公博、秦汾、周作民、邹秉文、许仕廉、章元善、曾仲鸣、王世颖、高秉坊、寿勉成等17人为全国经委会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指定陈公博为主任委员，秦汾、邹秉文、章元善、许仕廉为常委。

△　美首任驻华大使詹森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美使馆自平迁京。

△　日驻汉口领事三浦以汉口警备司令部兵营中发现抗日标语，向武汉警备司令部提严重抗议，要求处罚责任者。

△　华北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召集参谋长酒井、参谋石井、中井、驻榆特务机关长竹下及步兵队长萱岛、长谷川、温井等商“战区治安”问题。

△　行政院决议慰留内政部长黄郛。24日，黄打消辞意，电行政院续假休养。

△　河北省监察使周利生以该省前民政厅长兼代省主席张厚琬违令更换县长18人，特提出弹劾，要求一律宣布无效，并将张移付惩戒。

△　闽省南平、松溪、政和、永春、诏安、龙岩等县鼠疫流行，龙岩尤烈，死亡甚多。是日省府分电行政院、蒋介石请拨防疫费五万元，并划龙岩县城为防疫实验区。

9月18日　“九一八”四周年，各地举行简单纪念式，平、津当局除下半旗志哀外，未举行仪式。为“防范扰乱”，平军、宪、警一齐出动“警备”。津重要街巷亦戒严。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长县永平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原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分别编为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共7000余人。

△　蒋作宾再晤广田。广田称，中国政府所提希望，日方总望做到，但如何实施，目前正与军方研究。

△　秦皇岛海关巡船被日宪兵强迫解除武装。22日，武器被扣，巡船释放。

△　国民政府聘王正廷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刘鸿生、杜月笙为副。

△　内蒙西公旗纠纷，蒙藏委员会已派鄂奇光赴绥调处。是日，行政院令云王（云端旺楚克）、石王（石拉布尔济）静候解决。

9月19日　蒋介石电邀退居泰山之冯玉祥赴京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23日，冯复蒋电，内称："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并提建议数点，关于党务：一、开放党禁；二、开放言论；三、真正团结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关于政治：一、获得民心；二、严明赏罚；三、设立救灾部；四、奖励抗日精神；五、起用抗日将领。关于外交：一、确定国际敌友；二、速赴苏美切实联络合作。关于军事：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30日蒋再电冯表示"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并促如期赴京出席六中全会。

△　王克敏以政整会结束，自平到津。次日分访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及司令官多田辞别。晚搭特快车赴京复命。22日抵京，向汪精卫报告政整会结束经过。

△　蒋作宾访日首相冈田，作归任后之拜会，并商"中日提携"问题。

△　张学良飞天水视察。21日飞返西安，与阎锡山代表张维清商围攻陕北红军。24日又偕杨虎城、邓宝珊飞兰州与朱绍良分商防共。

△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要求参加国联行政院事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深信国联所有会员国对于中国要求行政院一席，完全承认其合理，且将采取步骤。"

△　日国际银公司唐山支社成立，任务为推销东北大豆，收购滦东原料运日。

△　财政部决定明年元旦开征所得税。

△　广西省府为整理财政发行金融公债200万元。

△　四川因收回地钞发生纠纷。蓉、渝代表向当局请愿，要求收回按八折兑换地钞成命。内江地方银行被群众捣毁。是日蒋介石通令

川省各县严禁聚众请愿。

△　经委会拟定江河堵口复堤办法大纲七项，分电有关各省府及黄河、扬子江两水利会切实办理。是日，许世英到苏北一带勘灾，称“枝节防治，绝非善策，应以十年功夫，千万财力，设专门机关统治江河”。

9月20日　国民政府令准河南省主席刘峙辞民政厅长兼职。

△　中国法学会在南京成立。推蒋介石为名誉理事长，汪精卫等八人为名誉理事，居正为理事长，覃振、戴季陶为副理事长，叶楚伧、孙科等九人为常务理事，王宠惠等95人为理事，潘恩培等107人为候补理事。

△　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等电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流落巴黎十有余载，生活极为艰苦，请发给川资，俾能早日返国。

△　《立报》在沪出版。创办人萧同兹、程沧波、胡朴安等，严谔声任总经理，田丹佛任经理。

△　许世英自苏北勘灾毕返京。据谈，苏北灾情不亚赣、豫，灾区计有丰、沛、铜、邳、宿、沐六县，受灾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灾民约90万，其中以邳县为最重。

△　黄河水经苏北六塘河入海。

9月中旬　陕西省府悬赏缉拿陕北红军首领刘志丹，献首级者赏洋一万元，生擒者赏二万元。

△　日在多伦设蒙盐会社，资本百万元，设厂精制蒙盐，运销东北，抵制外盐。

9月21日　宋哲元在平就平津卫戍司令职。宋在对司令部职员训话中称："哲元夙信中国道德能维人心，能救国家，所以对共党永久反对，主张提倡道德精神来救国家危亡，安社会秩序。""平津为华洋荟萃之区，尤当本中央意志，敦睦邻邦，促进和平。"

△　李滋·罗斯及随员巴琦、罗杰斯抵沪，汪精卫代表余铭、孔祥熙代表徐堪及全国经委会代表唐海安等往迎。次日接见各报记者，谈来华目的在于"调查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希望中英两国能共同合作，使贸易能有更多发展"。

△　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举行理事会议，推张公权为理事长，陈光甫、周作民、郭秉文、徐新六为常务理事，聘孔祥熙为名誉理事长。通过筹组中德贸易协会等案。

△　沪信通银行因周转不灵停业。该行创立于民国十年，资本50万元，董事长谢伯殳。

△　晨5时，日炮兵在天津日租界演习炮战并巷战。

△　日产业协会理事山田武夫等16人在华北"考察"经济毕，是日赴鲁、豫调查煤、铁各矿。

9月22日　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宣布继续北上，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并宣布红一、三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聂荣臻为政委；第二纵队彭德怀为司令（兼，后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为政委，第三纵队叶剑英为司令，邓发为政委。

△　李滋·罗斯由驻华英使贾德干陪同在沪访宋子文，对中国经济、财政状况有所咨询。

△　日东方文学院研究员稻叶诚一等四人由平到陕考察文化事业。

△　日人持原武彦迭率宪兵到设在前清醇王府内的北平民国学院，声称代表醇王府收取欠租。是日又率宪兵及便衣数人入院占住。该校函请外交部向日方抗议。

9月23日　蒋介石电令川军刘湘部以主力在北川、茂县一带防堵红军徐向前部南进，以一部向川西“追剿”；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及第一九五旅在南充停止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由平武、旧州一带向甘边武都、文县一带推进，防止红军北进；第五纵队李韫珩部在康定、丹巴构筑工事，防红军西渡大金川。并令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及青海马步芳所部，分别在陇南及青海南部黄河沿岸一带扼要防堵红军北进。

△　国民政府令派陆军中将罗卓英为陆军第十八军军长；任命任鸿隽试署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　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召集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及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奇尔开蒙汉联络“防匪”会议，商定汉、蒙联防办法。同日，绥省各界防共会议决定绥、包两地各设防共会议，进行防共。当日绥远防共会议成立，以傅作义等11人为委员。

△　李滋·罗斯偕英使贾德干抵京，先后访孔祥熙、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朱家骅等。

△　阎锡山在绥署、省府总理纪念周中令各政工人员研究“剿”共、防共办法。阎称：“凭借枪杆的共产党好剿，凭借民众的共产党难剿；以武力来赤化的共产党易防，以民力来赤化的共产党难防。”“驻上兵也堵不住赤化的发展，甚而至于他还要赤化我们的军队，这实在是不知道他赤化无办法，知道他赤化了也无办法；已经赤化了的村庄不派兵去无办法，即派兵去也无办法。”

△　晨零时许，吉林京图路二〇一号列车通过吉敦线额穆县境二道河子时脱轨倾覆，抗日军约200人发起攻击，与伪军守备队及路警激战一小时半后退入山林地带。

△　江苏睢宁县四区板桥乡王海庄乡民七八百名反对土地陈报，聚众暴动，杀死区长李阊卿，并扣押保安队员八名。省府令该县长率队镇压。

△　驻土公使贺耀组赴柏林参观德国国社党会议后，是日途经日内瓦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盛赞国社党组织完善，能推动整个民族向前迈进，中国国民党亦应依据中国国情，逐渐推行；并表示必要时当出席五全大会协赞此项建议之实现。

△　豫省府令各县切实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认真查报户口异动；讲解保甲意义；严格训练壮丁。

9月24日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召日记者聚餐，即席散发《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侵略中国，实现“华北自治”，宣称日本应当“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乐园，以推行日本帝国的对华政策”，而“华北正是上述对华政策最易并最速实施的地区”。多田并对记者谈：为彻底扫清华北反满抗日分子，实现华北经济独立，防止赤化，必须脱离南京政府，确立华北政治新机构，实行华北五省联合自治。

△　日本陆军部发言人于东京发表声明：“日本陆军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权于华北之外是不可避免的。”并宣布其陆军的三点对华政策是：一、驱除华北的反日反满分子；二、华北在经济上脱离南京，自行独立；三、经由华北五省军事的合作，以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

△　北平军分会训令宋哲元、商震共负津市治安责任。是日，宋在平召刘汝明、张自忠、赵登禹、冯治安会商维持察省及平、津治安

办法。

△　北平各界赴日考察团一行15人，由团长吴承湜率领离平赴日本考察市政及工商业。

△　日东方协会会长河濑等七人抵津调查棉纺及水利。同日，大阪野田经济研究所所长野田等五人由沈到津，旋赴张北调查矿产。

△　晨，美国亚细亚舰队军舰10艘离青岛开往秦皇岛。

△　粤汉路乐昌至坪石段通车。

9月25日　广州湾法人越界兴筑军路，是日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侯向广州法领事提出抗议。27日，法方允停筑路。

△　日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偕驻承德特务机关长田中久飞抵张家口视察，并调查西公旗纠纷真相。日武官高桥亦飞张晤面。翌晨土肥原飞承德，29日返沈，发表谈话称“日方有援助蒙古自治必要”，并称“组织一个包括华北五省在内的自治政府将可帮助恢复和平与秩序”。

△　朝鲜《京城日报》、《每日申报》及英文《全罗日报》等三报馆派遣飞华访问机“萨尔逊号”抵沪。26日飞青岛。27日飞大连返朝。

△　“满铁”宣布凌源至平泉间铁路9月20日竣工，是日通车。

△　伪满洲国取缔关外道胜、汇丰、麦加利、花旗等苏联、英、美等国银行。

9月26日　红军陕甘支队自陇南武山县西北之鸳鸯铺出发，以急行军通过渭水封锁线，占领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方针，迅速率陕甘支队北上，会合

当地红军，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

△　内蒙云王电蒋介石报告西公旗纠纷经过，并请维持罢免石王札萨克原案。同日，乌、伊两盟各旗札萨克以蒙政会罢免西公旗石王，世袭制度将失保障，特联电中央，请重申明令，保障旧制。

△　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由平抵京，与黄慕松会商调解西公旗纠纷办法。

△　抗日军百名攻击距敦化20公里大石头河子警察署，俘去伪署长等六名。

△　日人向北平民国学院强索醇王府租金事，持原拒绝民国学院所提分期偿还欠租办法，并以醇王府代理人名义贴出公告，限学生10日内迁出，否则将房屋封闭。

△　中、日合组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是日由中国火柴同业公会主席刘鸿生等与日在华火柴业联合会代表植田贤次郎签订《中日双方同意书》；经理由两国分任。

9月27日　　行政院令河北省府，该省外交事件均归省府核夺办理。

△　日四相（首相冈田、外相广田、陆相川岛、海相大角）会议研究日本对华新政策，决以中、日、“满”提携为中心，共同开发华北，共同防共，取缔排日，“确保远东和平”。

△　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就日本“新联社”24日所发新省加入苏联消息一事特电该省平、津办事处辟谣。苏联塔斯社亦于25日声明辟谣。

△　李滋·罗斯在沪开始搜集有关经济资料，尤注重中国债务实况及税收情形。

△　晋军骑兵司令赵承绶向阎锡山建议防共办法，主张购地分给士兵，谓士兵于退役后若得赡养地，必能安心服役，则“共匪之煽惑不为动，盗匪之险路不肯走，御敌剿共，效死勿去矣”。

△　欧亚航空公司西安至成都线正式开航。

9月28日　孔祥熙在沪举行茶会欢迎李滋·罗斯，并介绍工商界领袖会晤。孔称：“我国经济不景气，不仅关系吾国，亦且影响各国在华投资和贸易”，“极盼其他友邦政府亦派专家早日来华。”李滋·罗斯答称：“英国政府对华经济颇为注意，盖中国经济繁荣、衰落，有关世界经济，而与英国尤为休戚相关，故此来拟对中国财政经济组织状况有所考察。”

△　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返回包头，即布置绥西防务，委所部旅长田树梅为五（原）临（河）安（北）保安司令，徐子珍为东胜保安司令，杜堃为包头城防司令，并在伊盟准格尔旗与托克托县境筑碉200处，复派骑兵一旅赴伊盟与井岳秀部切取联络，以防红军进绥。是日王又在包头召开包西防共会议。

△　行政院组成赴暹考察团，是日召开筹备会。该团以凌冰为团长，林康侯为副，团员13人，分别由农村复兴会、侨委会、外交部、实业部、财政部及沪金融界派出。

△　日外务省文化部第一课长林安抵平。翌日又派富田教授到沪，分别考察平、沪文化。2日，林安自平到津，视察日侨文化事业状况。

△　新任日陆相川岛义一向内阁提出《鼓励华北自主案》。10月4日，内阁通过。

△　胡汉民离德赴美休养。

9月29日　“满铁”为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日前在津设立“天津

事务所”，并决定在察、绥两省各设一调查机关，专司搜集产业情报及经济资料。察省调查机关设张家口，在多伦设分机关。是日渡边奉“满铁”命到达多伦。

△　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百武偕日驻东北舰队司令津田到平访宋哲元。

△　前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蔡廷幹在平病卒。

△　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发表世界各国失业华工统计，总数共达2.9万余人。其中以在美者最多，达1.3万余人。

9月30日　国民政府派陆军中将汤恩伯为陆军第十三军军长。

△　王克敏偕陶履谦、汤尔和、俞家骥赴莫干山访黄郛，报告华北情况。10月9日返平。

9月下旬　驻察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奉调卫戍平、津。

△　第十七军副军长邢震南继徐庭瑶任第十七军军长。

△　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主席刘湘迅组农村合作委员会，并指派刘航琛等四人为委员，刘湘为委员长。

是月　日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偕渡边、田中隆吉到内蒙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索诺木拉布坦（索王）会谈“日蒙合作”，建立“蒙古国”问题。

△　京沪实业界集资240万元在京筹设大江南水泥厂，推颜惠庆为董事长，陈果夫等为董事。

10月

10月1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红军将领率全体指战员向全国党、政、军界发出快邮代电，呼吁为了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共同御侮。

△　中美成立白银买卖秘密协定，美以白银一盎斯兑换美金6.5角之比值，向中国购进白银6500万盎斯。

△　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大劳山伏击自延安撤出之东北军王以哲部第一一〇师，战斗历时六小时，全歼敌军两个团和师直属队，俘3700余人，师长何立中重伤毙命，参谋长范庆兆被击毙，团长杨德新自杀。

△　红二、六军团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包围，准备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作战略转移。是日，一部由津市、澧县向桑植移动。

△　蒋介石以毛泽东率共军一、三军团入甘，是日电令张学良即令兰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绍良第三路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入甘积极进剿。同日，张学良飞抵成都谒蒋介石商谈要公。5日，飞返西安。

△　阎锡山确定晋西防共办法两项：一、各村均办“防共保卫团”；二、各村均办“主张公道团”。是日手谕各县长、公务员、村长等切实研究实行。

△　江西宁都县开始办理第一期公民训练，目的在养成忠于国民党之国民，攻破所谓“异端邪说”。凡年在21岁以上、45岁以下之男女公民，均须参加。每期三个月。

△　中央信托局开业。该局直隶中央银行，资本1000万元，办理信托、储蓄、保险、采购军火等项业务。总局设上海，理事长孔祥熙，常务理事张嘉璈、叶琢堂，理事宋子良、徐堪，监事陈行、李铭、陈光甫。局长由张嘉璈兼任。

10月2日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

副司令；以朱绍良、于学忠、杨虎城分任第一、二、三路军司令。

△　红军陕甘支队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通渭出发。3日，进入回民区，通过会宁、静宁间的封锁线，中路（第三纵队）到达界石铺，左路（第二纵队）到达界石铺以西的公益铺，右路（第一纵队）到达界石铺以东的西兰公路沿线，控制西兰公路东西数十里。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重订《漏纳国税处罚条例》原则六项及《全国稻麦改进办法大纲》。

△　国民政府令免管理中荷庚款水利经费董事会董事赫龙门本职，派鲍索文继任。

△　包头黄河水大涨，秋禾皆被淹没。绥省府派员调查灾情，计划修筑沿河防水长堤180丈。各县亦定灾民筑碉工赈计划。

△　赈务委员会分配各省赈款，计鄂、鲁各1.5万，苏一万，湘5000，赣、豫、闽、粤各4000，皖、冀各2000，共6.5万元。

10月3日　国民政府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主任；并裁撤驻赣“绥靖”公署。

△　国民政府派唐式遵为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十三军军长，王缵绪为第四十四军军长。

△　“满铁”新设中国部，以理事石本宪次郎为部长。是日石本离大连赴平、津调查华北经济状况。

△　驻华德使陶德曼出席立法院谈话会，报告希特勒秉政经过，并希望中德友谊日益敦睦，中国在复兴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

△　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偕萧振瀛、陈觉生等访晤多田、川越，作到任后之拜会。

△　云端旺楚克（云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电中央陈述西公旗纠纷近情，请中央主持解决。

10月4日　日阁议通过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方案》的决定。主要内容为："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提携互助，确保东亚安定，并求其发展"；要求中国：一、取缔排日，摆脱依靠欧美，采用对日亲善政策；二、默认"满洲国"独立，最后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三、共同防共。在日本确认中国有诚意和日、"满"两国亲善合作时，首先签订"日、华亲善合作关系总协定"，其次签订"日、'满'、华新关系协定"。

△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驻平办事处成立，包悦卿任主任。

10月5日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　国民政府任命刘崇杰为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

△　北平民国学院与醇王府租金纠纷解决，是日签订房租新约，欠租分四年清偿。次日住院两日人迁出。

△　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乘飞机视察长城各口。

△　美商信济银行沪总行及哈尔滨、呼伦两分行同时停止清理。该行创立于1927年，总行于1934年由哈尔滨移设上海。

10月6日　中国赴日经济考察团一行34人，由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率领自上海启程赴日。该团由各地金融界和工商界组成，团员有宋汉章、陈光甫、唐寿民、周作民、钱新之、徐新六、刘鸿生、俞佐廷、黄文植等人。赴日使命为视察日本工商业，促进"中日经济提携"之实现。

△　宋哲元、商震商定，平、津、沽治安由第二十九军及第三十二军联合维持，不分界域。第二十九军军部已由张家口移北平。是日，第一一六师缪澂流部与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交接完毕，移防平汉路北段。

△　白坚武在天津组“华北自治救国军”谋暴动。天津市戒严。

△　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因建议决开鄄城民埝放水归河以解苏北之危，为鲁省反对，特提辞呈。16日，经国民党中政会批准，其职务暂由副委员长孔祥榕兼代。

10月7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访广田外务大臣，广田根据日内阁通过的《关于对华政策方案》提出三原则：一、中国应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依赖英、美牵制日本，所有排斥日货及排日教育，均须一律停止；二、中国应尊重“满洲国”之存在，并设法促进华北与“满洲”之文化、经济联络；三、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这便是“广田三原则”。广田称“中国如能完全同意以上三点，日本就可以逐步商议实行中国所提希望条件”。

△　红军陕甘支队向六盘山挺进，在青石嘴消灭东北军骑第七师第十九团二个连，越过平（凉）固（原）公路封锁线。8日抵白杨城。陶峙岳师尾追。

△　国民政府令免岳森陆军第五十师师长职，遗缺以成光耀继任；任命陈铁为陆军第八十五师师长。

△　蒋介石自成都飞西安视察。翌日接见邵力子、杨虎城，听取军政情形报告。10日抵洛阳，赴中央军校分校参加开学典礼。

△　张学良飞太原，访阎锡山商“剿共”办法。次日飞返西安。

△　日关东军代表竹下义明及关外电报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前田直造在津与中方代表天津电报局长王若僖签订《关内外通电协

定》。津电报局定11月1日开始收发关内外日文电报；平电局六个月后实行。

△　热河省朝阳伪军金鼎部五营联合民众独立，占开鲁，捕伪县长，释狱囚。

△　哈尔滨伪满当局“以危害满洲国幸福”为名，拘捕苏、中、韩人120人，住所悉被搜查。

△　英美商人与买办邬挺生，在许昌设立公司，收购烟叶。

10月8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免甘绩镛省府民政厅长兼职；免省府委员郭昌明（兼建设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本兼各职；任命王又庸、卢作孚、李为纶为省府委员，并分别兼任民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10月9日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第三届大会在百灵庙开幕。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致开幕词，称：“蒙古自治，在外交上言为睦邻安邦，在财政上言为开发富源。”因到代表仅20余人，是日未正式开会；21日，到会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始正式开会，讨论防止陕北红军北进等案多件。至26日，大会闭幕。

△　中国赴日经济考察团自神户抵东京。上午访问冈田首相、广田外相、町田商相、高桥藏相、山崎农相；下午历访日华实业协会、商工会议所等。

△　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两军自马塘、梭磨、卓克基一带西移。10日，大部集中大金川东岸党坝以南地区。11日，在靖化（今金川）以北西渡大金川，与国军第五十三师激战，12日晚占靖化。13日占独松、崇化。15日占南街。16日克丹巴。

△　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第一课长林安自津抵沪“视察”文化事业。

△ “满铁”理事石本到津调查华北经济情况。13日，偕驻津事务所所长太田赴平调查华北工商业。

10月10日 蒋介石为消灭湘鄂川黔边区红军，在宜昌设行辕。是日行辕成立，以陈诚为参谋长，代行蒋介石职务。下辖第一路军、第二路军、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二十六路军等。

△ 武汉警备司令叶蓬为上月17日驻汉日领事抗议警备司令部兵营内有抗日标语一事，以“违反国府睦邻令”被免职。遗缺由第一军军长陈继承继任。

△ 红军北上先遣支队到达三岔。旋经环县、洪德于17日到达陕、甘交界之老爷山。18日到达陕西铁边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尾追。

△ 中国赴日经济考察团在东京与日本经济界商谈金融、贸易等，日银行总裁深井等27人出席。晚，日本经济联盟及日华实业协会设宴招待考察团，席间商定由中日双方各推出三人筹备常设提携机关。次日筹备会议决定设立“中日实业协会”，为中日经济提携常设机关。

△ 国民政府颁给英、美、法、意、比、葡等国在华人士赫里欧等34人采玉勋章。

△ 国民政府以前新疆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因公获罪，情有可悯”，明令予以特赦。

△ 上海生活知识社出版《生活知识》半月刊，由沙千里、徐步编辑。

△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沪开幕，参加者38个单位，运动员共2700余人。

10月上旬　　经委会拨款1000万元开办赣、皖、湘、鄂四省农村合作银行，并决定在四省各市、县重要市镇设立分行。

△　中国文艺社成立，叶楚伧、陈立夫为正、副社长，张道藩、曾仲鸣、萧同兹等17人为理事。

10月11日　　日本实业界经济考察团三岛云海等一行14人抵青岛。13日到济南考察经济。三岛称："日系工业国，华系原料国，盼华农业发达，始能供日工业之用，更望中国农村购买日货。"15日自济抵津。次日到平，旋赴察、晋等地考察。该团系由日本电报通讯社发起组织。

△　东方旅行社总经理张水淇在北平与北宁路局局长殷同、"满铁"代表小池大津等会商关内外货物联运实行办法。

△　沈阳伪警厅实行大检查，借口"思想不正"，逮捕严讯市民数十人。

10月12日　　国民政府令免宋哲元兼察哈尔省保安司令职，遗缺由秦德纯兼任。

△　蒋介石抵开封。次日飞太原，与阎锡山商陕、甘"剿共"军事。14日自太原飞返南京。

△　军事委员会密函交通部称："所有全国邮电检查事宜，着归本会统计局管辖，并令先行接办南京、上海、武昌、汉口等市邮件电报检查所，以后陆续推进各地。"25日，军统局局长陈立夫密函交通部，京、沪、武、汉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派员接收。

10月13日　　日关东军及华北驻屯军参谋官会议在大连开幕。参谋本部第二课长冈村宁次传达日内阁通过的《关于对华政策方案》，该案要求中国政府将"北方一切有害于日、满、华亲善关系的因素必须铲除"，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日本将坚决"使华北与南京

分离”。14日会议结束。日军司令部中国课长本田忠雄亦于13日由东京抵旅顺口，向海军首脑及旅顺要塞部武官传达《关于对华政策方案》。16日，冈村宁次在津召开华北日武官会议，就大连会议要项研究进行方法。

△ 日外务省东亚局课长守岛抵沪。19日，在沪召集驻华总领事开会，传达《关于对华政策方案》。到日驻华大使有吉、京领须磨、沪领石射、汉领三浦及粤领河相。

△ 北平军分会电促何应钦返平主持。14日，鲍文樾等又分电请蒋介石、汪精卫代为催促。

△ 丁文江在《大公报》上发表《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一文，主张“以土地公债收买土地，分给佃农。公债利息由佃农担负。五年以后以清理田赋所得收入用于还本”。

10月14日 驻汕日领为汕米案向粤省府致最后通牒，声称如不停征日、台米特税，日海军陆战队将于翌日登陆。同日，粤省当局被迫接受日领要求，允发还缉获私货，此后日货进口只纳关税，特税豁免。

△ 驻日苏联大使尤列尼夫访日外相广田，对“满”军于6日、8日、12日在绥芬河北三次越境射击苏军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由日、“满”、苏共同调查事件真相。广田诿称此系俄、“满”纠纷，允将此意传达“满”方后，再商调查问题。22日，关东军参谋部发表声明，谓“满”、苏边境频生纷争，根本解决之法，在于究明界线。

△ 汪精卫偕唐有壬在沪访黄郛，对外交事宜有所咨询。

△ 天津日驻军200余在郭黄庄等地实弹演习，击毙乡民阚双林，日方仅赔20元了事。同日，在津郊灰堆子演习，又以手榴弹炸毙农民一人。

△　李滋·罗斯偕随员巴琦、罗杰斯等由杭返沪。

△　苏省盐河决口，东海、沭阳两县百余村陆沉。宿迁骆马、黄墩两湖堤防全溃，窑湾被淹没。

10月15日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京晤谈中央最近政情。

△　国民政府任命李家钰为陆军第一〇四师师长。

△　长芦税警第八十一队与河北曲周、平乡硝民冲突，在张庄激战一昼夜，双方均有死伤，硝民17人被捕。驻鸡泽、平乡税警第八十二队及特务营千余名赴援。

△　国营招商局全体理事以该局负债太多，各项整理计划无法实现，呈请辞职。17日汪精卫、朱家骅分电各理事挽留，并允欠债由交通部、财政部筹还。

△　福建省银行开业，总行设福州，资本100万元，董事长徐桴，总经理寿昌田。

△　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四省黄河堵口会议在开封开幕，讨论董庄堵口及复堤事宜。

10月16日　黄郛应蒋介石电召，离沪入京。

△　日贵族院议员坂西中将至京访汪精卫。

△　张学良由西安飞抵武昌，办理行营结束事宜。19日飞返西安。20日，武昌行营结束。

△　汕头米案解决，驻汕日领至汕市府办理手续，领还前扣私米。翌日泊汕日舰六艘由下村率领离汕驶台。

10月17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宪法草案原则五项。立法院长孙

科派吴经熊、马寅初等七人遵照中央所颁原则审查修正。

△　红四方面军主力移至大金川两岸之丹巴、抚边、懋功一带。红四军、红三十军与防守抚、懋之川军第四路军杨森部激战。20日，红三十军一部克懋功。

△　日工业代表团一行27人，由团长工政会理事长井上匡四郎率领抵沪。

△　塘沽日守备队在乡军人在大沽炮台演习野战。榆关日关东军开抵留守营，18日沿北宁路演习野战、夜战。

△　河南六河沟煤矿公布裁工减资办法，将矿工之星期日、纪念日双资及养老金、房租津贴等一概取消。19日，工人600余人包围公司经理室，要求收回成议。公司被迫勉允工人要求，并请实业部调处。

△　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兼大生纱厂董事长张孝若在沪寓被其父张謇生前之卫兵吴义高击毙。

10月18日　　蒋介石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建议中苏订立“秘密军事协定”，对付日本侵略，保证远东和平。

△　宜昌行辕布置“进剿”湘西红军计划，指挥所部四面合围。除令湘军守保靖、永顺、大庸、石门碉堡线，鄂军守鹤峰、来凤、龙山至天皇庙碉堡线外，又增调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和樊崧甫纵队在新安至磨冈隘一线筑碉设防。红二、六军团遂陆续从津市、澧县、临澧、石门撤回，集中在桑植、龙山东南。

△　“香河事件”爆发。日人指使汉奸武宜亭等借口反对田亩附加税，要求实行“自治”。是日，武与日本浪人胜见、福田霞等同谋发动，在河北省香河县安抚寨胡承武宅召开“国民自救会”阴谋暴动。20

日，武纠众到县政府请愿，并派代表及日本浪人三名向县长赵钟朴交涉，要求交出政权，同时散发《县民自治自决自救传单》及《对华之基础观念》等文件。赵县长将代表扣留，并派人到省府报告。22日，日宪兵一队掩护变民入城内骚乱，释出被拘代表，赵县长逃走。县城被占，公推安厚斋为“民选县长”，实行“自治”。

△　国民政府追赠前大元帅府陆军总长张开儒为陆军上将，并从优议恤。

△　汕头农税局缉私稽查机构奉粤省府命于是日裁撤。汕头连日运到日米七八千包，须纳地方税之本国米商已告绝迹。

△　冈村宁次自津至京分访汪精卫及外次唐有壬，商谈中日问题，旋偕武官雨宫夜车赴沪。

10月19日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经过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进行300多次战斗，击溃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此时只剩7000余人，胜利结束长征。

△　国民政府派万耀煌为陆军第二十五军军长。

△　蒋介石再次电邀冯玉祥入京出席六中全会。23日，冯复电陈述关于党务、政治等方面意见多项，并表示本人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

△　汪精卫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否认日本对华提新要求传说。

△　宋哲元在北平向各报记者就所传宋与日密订丧权辱国条约事辟谣，略称：“外交事件责属外交部，余亦无权过问。余就职后，即本中央睦邻令谋求中日互相亲善。与日交涉，决无文字或口头上之任何秘密约定，外传种种，均系谣言，而不足听。”

△　新疆和阗鼠疫流行，罹疫死亡者达数千人。是日汪精卫同意苏派防疫队前往施救，但一俟中央防疫队到达应立即撤回。

△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新董事首次会议，推王正廷、褚民谊等为常务董事，以王正廷为主席；并决议组织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体协分会。

10月20日　天津旧政客、军阀百余人在日指使下，组织“东亚经济协会”，是日在日租界开成立大会。天津日驻屯军参谋堂胁、宪兵队长池上、副领事西田等均出席。日大亚细亚协会理事长冈元、中日实业公司驻津代表小林亦到会。选高凌霨、钮传善等15人为理事。钮谈，该会将着重发展路、矿、棉等事业。

△　日驻华陆军武官会议在沪召开，由冈村宁次传达《关于对华政策方案》。下午，续开驻华海军武官会议，由海军省课长本田忠雄作同样内容之传达。

△　杨虎城赴三原指挥所部进攻陕北红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飞西安向张学良请示机宜。

△　下午，兰州下东门火药库爆炸，延烧至21日始熄。军民死伤数百，毁房数百间。

10月21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外相广田转达中国政府对其7日所提三原则的意见：一、中国无“以夷制夷”意；在与各国关系中决不排除或妨害日本；二、在“满洲国”问题上政府之间虽不能进行交涉，但对该地方的现状决不用和平以外的方法引起变端，对于关内外人民的经济联系，当设法保持；三、如日本能完全实行中国方面所提之三原则，则中国在不妨碍主权独立的原则下，拟就北方边境“防赤”问题与日方协议有效办法。

△　伦敦英商中国协会总干事哥罗来华考察贸易，是日在京访外

次徐谟商谈中英贸易。

△ “满铁”理事石本连日在平、津调查经济情况，是日赴察、绥。石称“此行系考察华北工商业及金融情况，以促进中日经济提携”。

△ 广西省农业视察团欧仰义等一行12人赴日视察农业试验所。同日，天津五金商人视察团俞效章等11人东渡日本参观重工业。

10月22日 香河事件发生后，河北省府主席商震对安次、永清、霸县、静海、武清、通县、昌平等县颁戒严令。是日安次县有自称民众代表多人欲进城请愿，因违反戒严令被捕。

△ 红十五军团夜袭榆林桥（位于陕西甘泉南），全歼东北军王以哲部第一〇七师四个营，生俘团长高福源。

△ 日本在华北投资总数已近三亿元，其中在天津纺织、烟草、火柴、屠宰、冷藏、骨粉、肥料、制革等业投资3600万元；在北平投资700万元；在青岛纺织业投资约5000万元，火柴、制粉、仓库、榨油、罐头等业及鲁大采煤业等约1.4亿元。是日，“满铁”理事会决议再增资二亿元“开发”华北经济。

△ 日人在台北举行博览会“庆祝”侵占台湾四十周年。福建省府主席陈仪、厦门市长王固磐等先后赴台参加“庆祝”。是日陈仪抵台北，与台湾日军司令官寺内、日总督中川会见，商谈“台湾、福建亲善提携”。

△ 赴日经济考察团与日本实业界领袖在东京商定设立“中日贸易协会”，以两国从事实业及有关人员为会员，以研究中日两国经济状况，促进两国贸易为宗旨。上海、东京两地设总会，各设会长一人，由中日双方分任。必要时得在中日两国各重要商埠设分会。按：日外相广田五月间有组织“中日通商评议会”之主张，久而无成，改倡此

会。

△　殷汝耕偕冀省建设厅、天津市府代表陈东升等访驻津日领西田商谈柳江矿事。日方仍主以30万元代价完全售与泰记。交涉无结果。

△　中日无线电话通信达成协议，订于明年2月15日起在东京、上海间实行通话。

△　华业银行沪分行停业。该行于1934年1月开业，资本100万元，总行设香港。

△　名记者戈公振在沪病逝。

10月23日　　河北省政府派参事郑文轩访日武官高桥，表示香河事件将以和平方法解决，并派参议刘耀东代理香河县长。同日，刘会同特警第一总队总务处长孟昭兴赴香河。

△　赴日经济考察团考察结束，在东京正式解散，是日起团员开始自由行动。吴鼎昌在东京对记者盛赞日本工商业之发达，并称“中国原料与日本技术应提携之点甚多”。

△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阎锡山《关于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及《说明书》，决议交付审查。

△　天津日商会通过要求中国减轻外货进口税案，声称此为减少大批私货之唯一办法，并请上海及各地日人商会提出同样要求。

△　天津赵养三、张范九等11人组“中日经济提携促进会”，是日成立，宣称“依照国府睦邻命令，实行中日提携”。该会性质与东亚经济协会相同。

10月24日　　安厚斋、武宜亭等凭借日本势力，拒绝交出香河县

政权，并将新派县长刘耀东扣押。商震部第三十二军派兵二连开往香河，因日军警告，在距城10里处停驻。

△　河北三河乱民200余，高呼“民众自治”、“要求减轻租税”等口号，拟突入县城。县长率团队紧闭城门扼守，乱民未逞退去。

△　国民政府令免傅铜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职。

△　晨6时，驻沪美陆军沿苏州河一带举行演习。

△　上海标金猛涨，自9月冲破900元关后，逐日上涨，是日又破千元关，一日之间狂涨70余元，市价为1062元。26日较25日再涨49元，高达1174.8元。总计10日之内，飞涨200余元。财政部长孔祥熙令中央银行负责平定金潮。

10月25日　　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计全文为八章150条，较之去年10月16日该院所通过之宪法草案全文12章178条删除甚多（原有之军事与财政两章全删）。

△　河北省府主席商震到津访日驻屯军司令多田等交涉解决香河事件办法。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对香河事件发表谈话，谬称：香河及其他地区农民要求减税发起“自治运动”，与暴动不同，乃为“善意之自治运动”，不可进行军事干涉。同日，日武官高桥亦称，“香河接近停战区，军队不能开入弹压；治安应抽保安队维持，免再肇其他事端”。

△　天津地区连日发现《河北省自治宣言》传单，署名为“河北省各县代表联席会议”。津、沽戒备。是日，商震召津、沽保安部队各处长会商治安办法，决设军警稽查处，以补警力不足。晚，津公安局派出装甲车巡逻市区。

△　绥省府召开县长会议，至31日闭幕。主要讨论防共，对保甲、筑堡、凿井、积谷、乡训、减轻田赋、整理财政、人民服役、推行义教、训练壮丁等均有详细规定，并决定各县成立防共会议。

△　日华北总领事会议在天津举行，由外务省东亚局课长守岛传达《关于对华政策方案》，26日结束。会议决定：一、各总领事对新的对华方针，一致支持遵行；二、各总领事对各地外交、政治、经济方针，相互联络，采适当方法进行；三、华北问题与驻屯军部取紧密联络；四、中日经济提携为时尚早，所有方策暂行保留，静待时机再定进行步骤。

△　天津日人雇集流民五六百名，自称“民众自治请愿团”，借口要求自治，滋扰保安司令部、市府及公安局。市长程克、公安局长刘玉书预作防范，即派员分往劝告制止。

△　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孙科为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鲍格莫洛夫（苏联驻华大使）、颜惠庆、卡尔品斯基为名誉会长，梁寒操等15人为理事。11月3日，又推张西曼为常务理事。1936年1月以后，上海、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延安、晋东南、新疆、香港等地成立分会。

△　日工政会访华代表团一行20余人由团长井上匡四郎率领抵沪。26日起与沪学术界联合举行学术讲演会，日文学博士圆谷弘讲《日本之工业教育》，沪交大校长黎照寰书面发言，题为《工程学与实业》。该团28日由沪入京，旋赴青转平。

△　粤汉路与中英庚款会签订20万英镑借款合同，向英购料修筑湘鄂段。

△　苏北沛县微山湖大堤溃决，县城三面皆水，附近二三百村悉漂没。铜、沛、丰三县交通完全断绝。

10月26日　　何应钦电呈蒋介石，告以日使馆武官高桥业已宣称，天津等地日本武官会议之决议为促成华北五省“联合自治”，“表面上仍属中央，实则为独立”。同日，商震电呈蒋介石，谓河北香河事件为日方多田骏与日驻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所策划，其目的“即策预备迫使我方承认华北自治”。

△　商震与多田连日在津会商香河事件，尚无具体结果。是日武宜亭向刘耀东提解决条件三项：一、容纳“民众”要求；二、对事变责任者不加处分；三、死伤者给抚恤费。刘向商震请示后，允酌予接受。

△　中国驻国联代表办事处是日及29日先后函复国联秘书长，中国接纳国联对意大利制裁调整委员会通过之对意制裁方案，参加对意制裁。

△　刘湘奉蒋介石漾（23日）电，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擅自枪杀旅长王芝槐，着即撤职查办。是日，刘电罗遵照，并委唐式遵暂代第二十三师师长。

△　驻日大使蒋作宾访日藏相高桥探询对中日“经济提携”及中国财政问题意见。高桥称：“中国欲使经济发达，须先收回外国银行钞票发行权”；中国“为谋经济安定，首须政治安定与统一，始能促进中日提携，为维持东洋和平作出贡献”。

△　澳门政府强迫华人学校增授葡文，并规定凡商店、学校印发之广告或宣传品，概须兼用中、葡两种文字，因而激起华人反对。是日澳门华商总会及各团体派代表三人向粤省府请愿，要求速向澳政府交涉取消此种无理规定。

△　冈村宁次抵广州，分别访晤李宗仁、陈济棠，就中日邦交问题交换意见，并对航空、广东贸易、中日“经济提携”等问题作具体研究。27日访萧佛成、刘纪文、邹鲁等。28日飞南宁，晤白崇禧。31

日赴香港。

△ 阎锡山偕樊象离等自太原飞抵南京，出席六中全会。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沪开常会。蔡元培、李石曾、周诒春、胡适、司徒雷登等出席，美大使詹森等列席。会议通过拨款30万元补助义教经费等案。

△ 赴日经济考察团团员陈光甫、徐新六等在沪访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赴日考察经过，旋与孔商金融问题。

△ 绥西沿黄河五原、临河、包头、萨拉齐、托克托五县本年水灾灾情之重，为历年所未有。是日绥省府电中央请赈。28日又通电全国请赈，内称五县被灾1.51万方里，灾民6.24万余口，被灾村庄617村，淹没田禾3400余顷，毁房1094间，财产损失共约22.15万元。

10月27日 武宜亭在香河城内勒捐派款，散发《自救自决宣言》；乱民与民团合流，由高俊山指挥，在城外掘壕扼守。商震仍留津与多田商谈，要求制止日人参与香河事件。

△ 日实业界经济考察团视察武汉毕，离汉入京。11月7日离华回国。

10月28日 冀东战区特警队张庆余部奉令开香河维持治安，武宜亭逃天津。是日商震由津抵平，称香河事件已解决。

△ 国民政府任命沈久成为陆军第一四〇师师长。

△ 晚8时许，天津日驻屯军便衣队10余人突将天津新闻检查所主任王一凡等六人捕去，经省府、市府交涉，驻津日宪兵司令部始于29日下午6时释放。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通知北平市政府，日军定11月上旬在

平、津附近南苑、丰台、长辛店、良乡、黄村、军粮城一带演习。

△　北平赴日考察团一行在日考察毕返国，是日抵塘沽。

△　国联合作专家甘布尔赴河北定县、深泽、无极等县视察合作社发展情况。

△　海关发表全国1至9月金银输出入情形，白银入超近700万元，黄金出超1300万关金元。

10月29日　　西南国民党中委刘芦隐、邓青阳、詹菊似、李任仁、崔广秀在沪发表书面谈话称："吾人此次北来，固然是为六中全会及五全大会问题而来，但是否出席，当视中央对西南各代表主张是否有容纳之诚意而定。"

△　"川越公函"。日驻津总领事川越茂以226至229号公函，分致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河北省府主席商震、北平市长袁良及天津市长程克，要求"迅速彻底取缔关于妨碍贵我两国邦交之团体"，是谓"川越公函"。11月1日，宋、商、袁、程复函允严行取缔妨害中日邦交之分子。

△　"酒井通牒"。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中井增太郎参谋以代表参谋长酒井隆身份，偕同日使馆武官高桥坦往访商震，提出《关于华北协定实施事项之通牒》，要求商转告国民政府办理三章：一、罢免北平市长袁良；二、撤销北平军分会及其附属机构；三、彻底实行华北停战协定及《何梅协定》。是谓"酒井通牒"。旋商震报请中央指示，"以撤袁及废军分会完全属我内政"为由，予以拒绝。

△　冀东战区特警队张庆余部第五中队开抵香河城外待命。第七中队开往香河接防，为城内附逆团警所拒。

△　驻日大使蒋作宾访日陆相川岛，以中日关系诸悬案交换意见。

10月30日　　蒋介石就日人策动“华北自治”一事，复电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谓：“此时兄处境只听命中央，诿责中央为惟一之法”，“幸勿为威胁所动。”

△　香河城内仍由伪维持会长安厚斋、伪公安局长高俊山、伪县长张兴武把持。特警队留城外监视，刘耀东未释出。省府派参议王润身前往接洽，亦被拒入城。

△　北平军分会讨论日方要求取缔“秘密民众团体”之抗议，决呈请中央答复。

△　日宪兵队在天津金钢桥绑架市府社会局二股主任李铭。

△　苏北灌、沐等河水均落。韩复榘电行政院请迅发公债赈济鲁灾，并电宋子文请10日前再汇堵口费60万元。

10月31日　　北平市长袁良函复驻津日总领事川越关于“排日问题”抗议，略称：“本市人民如有妨碍两国邦交者，当即尽力取缔。”“惟亲善之道须双方国民间有甚深之了解。平、津一带贵国官民中，亦不无妨碍亲善之前途者，尚希贵领事亦随时留意查察，同时加以取缔，则两国邦交之前途实利赖之。”

△　冯玉祥因阎锡山敦促及蒋介石迭次电邀，于是日由泰安赴京出席六中全会。

是月　日关东军司令部与伪满民政部、实业部、财政部协议，创设满洲火药公司，资本500万元。

△　蒋介石为追堵红军，前令曾养甫督修鄂、湘、黔、川等十余省公路。本月通车已达二万余里。

△　四川省设八“绥靖”区，各区司令官为：第一区李家钰，第二区邓锡侯，第三区杨森，第四区刘文辉，第五区孙震，第六区唐式

遵，第七区潘文华，第八区许绍宗。“绥靖”任务限六个月完成。

△　冀省完县碱地试植美棉成功，省府令各县仿行。

△　沪光华煤油公司董事长许世英以该公司受外商倾销影响，支持不易，请实业部收归国有。

11月

11月1日　上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到中委百余人，各机关代表及党部职员共千余人。汪精卫主席。汪在开幕词中，承认“国难严重，比之四全代会时候有增无减”，强调以“精诚团结之精神”，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后接开预备会，推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戴季陶、丁惟汾、居正为全会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并通过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等案。

△　汪精卫致开幕词后，在会场外摄影时遇刺，枪伤左颊、左臂及背肋三处。刺客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亦被卫士击中，当场被捕。次晨，孙伤重在南京中央医院毙命。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水灾工赈公债条例》，总额2000万元，即日发行，至民国三十六（1947）年10月31日本息偿清。

△　西北“剿匪”总部在西安成立，负责指挥陕、甘、宁、青各省“剿共”军事。参谋长钱大钧，秘书长吴家象。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在重庆成立，主任顾祝同，参谋长贺国光。贺对记者谈，参谋团奉命结束，川、滇、黔、陕、甘、宁、青各省军政均受行营指挥。

△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为确保川、康交通及名山等据点，防

御红四方面军进攻，是日作如下部署：川军第一路邓锡侯部主力扼守灌县、大邑以西之线；郭勋祺部在名山、万古场一带构筑工事；第二路第四十一军孙震部集周公水一带，策应名山、雅安作战；第四路杨森部由抚边、懋功转至洪雅一带与第一路及郭勋祺师联络堵击；第六路王缵绪部守三角堰、朱家场一带；潘文华部扼守名山一带，一部守芦山附近；川康军第十二旅守备雅安、天全；第三路李家钰部由茂县向富林、西昌一带推进。

△　北平军分会再申敦睦邦交令，通令各军政机关严加侦察、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并答复驻津日领上月29日之抗议，允彻查妨碍邦交分子。

△　商震、宋哲元分别口头答复日领川越关于“排日问题”的抗议。商称：“据各县报告，决无排日机关之存在与活动。”宋称：“如在管辖范围内有此种团体存在，并获得确实证据时，自当严加取缔，以增进两国邦交。”

△　日方策动北平市粪夫千余人，借口反对粪业改归官办，请愿改组市府。

△　北平市长袁良电中央恳辞。3日，行政院批准袁良辞职，由宋哲元兼代北平市长。

△　平、津清华大学等11校学生联呈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青年，并将呈文以快邮代电发全国各机关、法团、学校，内称：“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

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所百思莫解者矣。”

△ “满铁”派西村逸次郎等八人到天津筹备兴中公司，资本1000万元。津方股本由高凌霨、钮传善等募集。

△ 日本“满蒙毛织会社”在天津设立支社，资本200万元，年营业额以800万元为目标。15日该社派平野到津研究毛织品倾销华北办法。

△ 江苏启东县大生纱厂第二厂因产销困难，宣告停业。该厂有纱锭3.5万枚，布机240台。

11月2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决议组织“宪草”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电促两广中委到京出席。

△ 国民党中委冯玉祥、李烈钧等22人联名向四届六中全会提出《救亡大计案》，主要内容为：一、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二、大赦政治犯；三、精诚团结；四、注意防灾救灾。

△ 国民政府令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专理军务，免去甘肃省政府委员暨主席职；任命于学忠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国民政府任命刘季洪试署省立河南大学校长。

△ 香河城门紧闭，不准出入。安厚斋避迹乡间，县城治安由伪公安局长高俊山负责。河北省府派参议王润生前往接洽交接，高因有伪“河北各县代表联合会”及“中华民主同盟会”支持，拒绝交出政权。

△　天津日租界发现“华北农民自救团”散发谋乱传单。

△　汪精卫被刺后，至是日南京市府警察厅已捕嫌疑犯20人，经严密审问，除留10人继续侦查外，余交保候传。

11月3日　　财政部颁布《币制改革紧急令》，自4日起实行新货币政策。规定办法六条：一、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钞票为法币，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二、其他银行钞票限期兑换法币；三、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法币发行收换及保管准备金等事宜；四、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类者，交发行准备管委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五、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到期以法币结算；六、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　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沪召集金融界领袖讨论改革币制问题，俞佐廷、钱新之、杜月笙等十余人出席。

△　行政院复电北平市长袁良辞职照准，遗缺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兼代。

△　上海钱业公会以币制改革，投机活跃，各货狂涨，特召集紧急执委会议讨论补救办法，决定所有现银缴存中央银行，请发钞票救济。

△　红四方面军中纵队（红三十、九、三十一军各一部）进攻芦山，与川军潘文华部激战。6日，进攻名山以北地区，突破川军第一路军木梯老、三角堰阵地，进至太平场、水口、马湖营一带。

△　日驻榆关特务机关长竹下抵平晤商震洽谈香河事件，称特警队入城为不妥。特警总队长张庆余昨呈商震，亦主采取外交途径和平解决。

△　天津市公安局长刘玉书偕保安司令部总务处长陈文洪访日驻屯军参谋中井，会商取缔天津市秘密社团活动事。

11月4日　财政部宣布实施币制改革，规定各银行所存现银应悉交向中央银行换取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并逐步取缔各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国民政府严缉晨光通讯社负责人胡云卿、贺坡光等一切与刺汪精卫有关人犯归案讯办。7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司法两院遵办。

△　戴季陶、马超俊衔命离京飞广州，敦促留粤各中委入京出席五全大会，共商国是。

△　财政部分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负责稳定外汇价格。5日，三行实行外汇买卖，规定外汇折合标准价格为每法币一元合英汇一先令二便士半；100元合美汇29.75元；又法币2.275元，合海关金单位一元。

△　财政部组织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负责法币准备金保管及发行收换事宜。孔祥熙任主席，宋子文等18人为委员。是日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宋子文、胡笔江、陈光甫、钱新之、李觉（李稚莲）为常委。

△　驻华英使贾德干通告英侨遵守中国新颁金融法令，“如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得处以三个月以内监禁，或连带苦工，或处以50镑以下之罚金，或处以监禁及罚金”。同日，英人在华银行遵令一致将银币缴存。

△　汉口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是日均按中国政府规定，以法币收付。

△　英国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及孔祥熙在沪先后访驻华日使有吉，否认中英成立借款。有吉称，中英间实行经济提携而将日本除外，必然使日本国民对华对英感情恶化。

△　平、津日驻军是日沿平津铁路开始大演习，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为统监，驻平日军大佐长谷川为指挥，所有义勇队、国防妇女会及在乡军人、学生等均参加，约1200余名。7日结束。

11月5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一、追认《改革货币办法》，交国民政府通令施行；二、《宪法（草案）》提交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三、通过冯玉祥等所提《救亡大计案》。

△　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京对记者谈，新货币政策“既非停止兑现，亦非放弃银本位”。“发行法币，仍须缴足准备，并非无限制发行，故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乃为实施通货管理”。

△　日藏相高桥与首相冈田讨论中国“币改”问题后，语东京记者称：“日本并不反对英国对华借款，以安定中国外汇。”但又声称：“如对华借款有引起政治发展之威胁，使中国入于国际共管一途，则日本将予以反对。”

△　日在华银行正金、三井、三菱、台湾、朝鲜、住友等行召开紧急会议，反对中国币制改革，决定：一、华方事先未征求日方谅解，而片面发布白银国有令，作成事实再求日方支持，实不能协力；二、银之交易价格固定为一先令2.5便士，与海外银价相差四成，无何补偿，则不能支持。如华方强制收回日本银行现银，则将以违反治外法权相对抗。

△　军事委员会制订《邮电检查施行规则》及《邮件检查所组织规程》，密函交通部查照办理。《规则》规定邮电检查目的为：“镇压一切反动，监视敌方间谍并防止危害国家、扰乱治安、破坏国防、外交之一切阴谋。”

△　经冀省府派蓟密专署日顾问金井偕日人小林德与香河高俊山等磋商后，高允将香河县政交还，并于是日释放香河代县长刘耀东。

△　天津市府函复日领川越上月29日之抗议，允取缔“妨碍邦交”分子及秘密活动。

△　日宪兵在平擅捕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解往天津。经萧振瀛交涉后，于10日释放。

△　河北省永清县乱民数百，受日浪人煽惑，到县府请愿。县府派团警将其驱散，并捕获为首者刘慕周等六名。同日，宝坻亦发生类似事件。

11月6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到中委85人。于右任致闭幕辞称：这次全会充分表现“精诚团结的历史精神”，经过情形“异常圆满”；要求“赤诚团结”，“集中国力，充实民力，以自身奋斗的力量”度过危难。

△　国民政府依据四届六中全会追认实施新货币政策决议，通令各省市政府、军警机关一体遵行。

△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沈抵津，谋策动宋哲元等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　行政院决议，以汪精卫因伤不能执行职务，由副院长孔祥熙依法代理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务由政务次长徐谟代拆代行。

△　粤省财政厅以币制改革令公布后，粤省银币纷纷外流，物价波动，是晚颁集中管理货币紧急令，规定办法六项：一、7日起以广东省银行之银毫券、大洋券及广州市立银行之凭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公私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私藏现金；二、“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发行，由政府、人民共组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三、银毫、大洋由政府全数收回，七日起向省、市银行兑换银毫券，银毫加二、大洋加四四给值；四、银类交省行按成色计值收买，不得私藏；五、六日以前所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到期以“法

币”结算收付；六、外币得自由买卖，不得直接行使。

△　香港汇丰银行停支硬币，发行新一元钞约10万元。港市投机活跃，纷纷收购银元，每千贴现90元。

△　杭市商会议定法币标准价格，法币一元换小洋12角，小洋一角换铜元25枚，每元法币换铜元300枚，兑换店兑换，不论出入每元取手续费一分，定7日实行。

△　戴季陶、马超俊连日访陈济棠、李宗仁、萧佛成、邹鲁等商团结。是日列席西南政务会议交换对时局意见，力请留粤全体中委出席五全大会。8日自广州飞南昌，翌日飞京复命。

△　驻日英大使克莱武访日外相广田，否认英国对华借款1000万镑说，并称中国币制改革，李滋·罗斯事前未有所闻，亦未参与筹划。

11月7日　　蒋介石与驻日大使蒋作宾、内政部长黄郛商对日外交。决定责成宋哲元、商震维持平、津局面，一面由蒋作宾与东京开诚协商中日关系。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与土肥原、高桥等会商“华北自治”问题。

△　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第九军之第二十七师）前锋进抵邛崃县境。

△　香河事件连日经各关系方面交涉，城中日浪人已全部离去。是日乱民又向冀省当局提出“抚恤死者、对贫民运动首领勿处罚、县长民选”等三项要求。

△　天津6、7两日续有法商学院卢郁文教授等多人被日人捕去，人心惶恐。

△　新货币政策实行后，全国各地物价波动。是日，南京市成立临时评价委员会，由宪、警、党政机关、商会及粮食、油、糖、南货、燃料、银钱等业派代表出席，决定评议米、面、煤、油、南货等物品价格。其他大城市亦相继仿行。

11月8日　国民政府任命萧振瀛、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萧兼主席，未到任前由张暂代；任命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

△　国民政府公布《技术人员任用条例》，凡七条。

△　驻日代办丁绍伋访日外务省次官重光葵，说明币制改革系中国当局独自见解，目的纯在安定通货，并未向英借款。

△　驻沪日领事馆武官矶谷廉介声明驻华日军部反对中国币制改革。认为中国事前既缺乏准备，复缺乏实行人才，又未得各国谅解，数月之内必发生破绽，其后决无收拾之道。“故余深信日本政府反对此次改革之理由，必将其态度明白宣示中外，以期改革案归于中止”。

△　参谋次长熊斌自京抵平，向宋哲元、商震传达中央应付日本计划，劝宋等切勿自作主张。

△　香河伪治安维持会长安厚斋僭称县长。

11月9日　戴季陶、马超俊偕同黄旭初自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南行经过，并对记者谈称：此次在粤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留粤各中委晤谈，结果甚圆满。留粤同志深以国事至此，实有精诚团结之必要，决来京出席五全大会。

△　红四方面军右纵队（红三十二军及红四军）击溃川康军刘文辉部，占领天全城。

△　蒋介石以天全不守，川西形势紧张，急令薛岳除以一部继续

控制川、陕、甘边境外，主力集中成都待命堵截红军。12日，薛岳除留第十三师及第一四〇师控制广元、昭化、绵阳一带外，亲率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由南充西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主力也由甘边之武都、文县一带南进。21日第一、二纵队先头部队到达成都，24日全部到达。

△　东京日军部发表非正式宣言，反对中国“白银国有”政策，宣称“强制施行白银国有之结果，定将引起社会与政治之纷扰”，日本对此“自不能忽视”。

△　日外务大臣广田电驻华大使有吉反对中国币制改革。略称：“按中国规定，白银比率为1先令2.5便士，则较时价1先令11便士约低40％，因此日本在华银行团不得不持反对态度，政府亦然。日方亦反对中国将现银集中中央。”

△　日武官高桥向宋哲元面提禁止现银南运要求。称：“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如贵方不能自动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同日，宋哲元被迫下令禁止白银南运。河北省府主席商震、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亦同时作此宣布。

△　广田电有吉向李滋·罗斯转达日政府意向称，不问各国属于单独或共同对华借款，日本政府均绝对反对。

△　参谋次长熊斌到津访土肥原，土肥原拒绝会见。旋往见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多田称“土肥原之要求（按：指要求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必须实现，无商讨余地”。

△　日本海军陆战队一等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窦乐安路被人枪击毙命。11日，驻沪日总领事石射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缉凶。上海市府悬赏千元缉凶，并令公安局限期破案究办。

△　香港政府改易币制，禁止各种白银出口。库务司授权银行发

行一元纸币以为法币，发行镍币替代银辅币。

△　皖省自实施新币制后，通货突感紧缩。省府为增加法币流通数量，决设地方银行，资本200万元，官商各半。是日，财政厅长杨绵仲等抵芜湖筹设总行。

△　外交部为平、津日驻军自上月下旬以来擅捕中国官民30余人一事，照会日使有吉提严重抗议，要求保证嗣后不得再有类此举动发生。

11月10日　　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彭泽民等在香港开临时代表会议，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日，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国当前的革命，其内容就是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宣布联俄政策，没收大地主土地，武装工农大众，对日作战。并发表宣言，要求国内团结，实行民主，进行抗日，反对对日妥协政策和官僚政治，完成民族解放任务。会议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

△　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联电李宗仁、陈济棠，敦促入京出席五全大会。

△　熊斌到保定、北平，分别会晤商震、宋哲元，告以中央通盘应付日人计划，戒其勿自作主张。

11月11日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津到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内容计有10项：一、成立“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二、领域为华北五省二市；三、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四、由最高委员会主持军事；五、财政截用中央在各该省、市之关税、盐税和统税；六、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成一单位；七、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八、扑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代以东洋主义；九、保留南京政府之宗主权；十、亲日

反共。限宋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和山东。

△　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接到土肥原所提限20日前宣布自治之通牒后，一面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应付方针，一面故意电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南京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集中人才，努力复兴大业。多田骏认为宋电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遂于次日飞济南，策动鲁省府主席韩复榘响应。于是，韩亦于13日向五全大会发出和宋同样主张之电报。

△　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为强制推行华北自治作军事后盾，特发布作战命令：饬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调步兵一联队，轻战车、工兵各一中队，野战重炮兵一大队于13日集中山海关、古北口附近，作进出华北之准备。又令旅顺口、青岛巡洋舰、驱逐舰驶大沽。

△　上海时代日报社、文化建设社、沪农社、中华邮工社、中华青年社、市教育会、市妇女协进会、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各大学学生联合会等36个文化、教育团体电国民党五全大会，建议树立自力更生外交政策；彻底改造中央、地方政制；从“民生国计上着想，为多数劳苦大众求生存”，而不“斤斤于训政、宪政之争论，为少数士大夫求出路”。

△　上海南京路日商比节洋行被捣毁。次日驻沪日领石射访市府，声称比节洋行事件系排日团体之活动，要求取缔。

△　日陆军大将、前军事参议官松井石根由沈到津，“视察”华北情势。程克邀宴，王揖唐、曹汝霖、孙润宇等作陪。

△　粤实施管理货币法令仅四日，即收集白银800余万元。是日，粤省银行又发行百元“法币”一种，即日兑出40万元。

11月12日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林森主席，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林森致开幕词称：“四次代表大会

举行于国难发生之始，到今天国难的严重，更十倍于当时。”要求大家充分表现孙中山“第一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这两句遗训的精神，尽应有的使命。

△　日外务省训令驻京总领事须磨，对近日上海日水兵被狙击及日商店被袭击事件，要求中国政府说明真相，严行取缔排日运动，并依其结果如何，采取有效的实力行动。14日，须磨访外次唐有壬，请严缉刺日水兵凶手，取缔“排日”行动。

△　平、津日军发言人声称，因中国当局自捕嫌疑人物，日方接受中国请求，自本月5日起，日宪兵停止在平、津逮捕华人；并称所拘捕者不过10人，大半已解交中国当局处理。

△　河北庆云县发生暴乱，汉奸、日浪人聚众数百占据县府。县长逃兴济。县中重要职员多人被扣，各机关悉被监视，并紧闭城门，检查邮电。

△　中法在南京签订航空通航合约。广州至河内设置定期航线，由交通部航空公司经营，与法远东航空线衔接。三月后实行，有效期三年。

△　币制改革后，外商银行中英商银行首先同意缴存现银，美商银行旋亦应允，惟日商银行力持反对。是日沪外商银行公会议决，各行须取一致态度。英商汇丰等行主张，“除日商银行外，其他外商银行意见一致时，将应诺中央银行要求，交出所有现银”。

△　天津银行公会函市府，声明各行现银决不外运，盼对私运银洋出境者从严取缔。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广泛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

△　留粤国民党中委邹鲁、刘芦隐、黄季陆、李任仁、崔广秀、邓青阳、柏文蔚到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唐绍仪等均托故请假。

△　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向外务相广田提出“关于促进华北分离工作”的建议，认为中国的币制改革，“有从根本上破坏”日本独占中国的危险，必须采取“彻底阻止的办法”。建议“利用这个机会一举”策动华北各省“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并称关东军“已将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国境’”，以巩固“华北实力者”的决心。

△　河北省府派滦榆区专员殷汝耕与日方交涉后，香河乱民代表允将政权交出，香河事件解决。武宜亭、安厚斋已逃逸。特警队张庆余部入城维持秩序。是日，省府派梁季述接任香河县长。

△　夜12时许，锦州日松井旅团先头部队开抵山海关，大部队在开拔途中。截至15日，由锦州调山海关之日军约达2500人。

△　行政院决定解决西公旗纠纷办法。是日，令西公旗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停职八个月；在停职期内，所有札萨克职务由该旗记名协理萨克都尔札布代理。

△　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诵经时被施剑翘（女）狙击毙命。施自首，声称系为父施从滨报仇（按：施从滨于1925年曾任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一军军长，同年1月与孙传芳军在安徽交战时，被孙俘斩）。12月16日，刺孙案宣判，施剑翘处有期徒刑10年。

△　财政部决定在天津、汉口、广州分设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分会，分管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通货，并保管分存准备金。指定周作民、王克敏等19人为天津分会委员；席德炳等10人为汉口分会委员。18日，财政部指定邹敏初为广州分会主席，区芳浦等为委员。

△　广东省府修正通过《广东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组织章程》，规定该会任务为：奉广东省府命令，保管准备金及办理法币发行额之审定事宜。

△　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在北平谈中国合作事业情况，称以往合作事业全由华洋义赈会主持办理，民国二十二年受全国经委会之托在湘、鄂、赣、皖开始兴办，迄今全国共有合作社约四万个。

11月14日　　国民党五全大会举行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蒋介石等23人为大会主席团。并决议以大会名义电请胡汉民、王宠惠等返国参加。

△　驻沪英总领事白利南召集在沪该国商界领袖会议，议决绝对遵守中国法令，行使法币，禁用现银。

△　天津日驻屯军将校团佐佐木等一行11人由天津抵济南，视察1928年日军杀害中国军民之“五三惨案”遗迹，并参拜所谓日本“忠魂碑”。旋访韩复榘，应韩招宴。17日返津。

△　北平市府议决平抑钱价、物价办法三项：一、铜元价格规定每元折合500枚，不得任意高下；钱市出入补水，差数每元不得过三大枚；二、为防铜元流出，限定出境携带铜元，每人不得过1000大枚，逾限没收。铜元票不在此限；三、物价平抑，依米粮各公会所定办法，米面价格以上海市价作标准，增价至多五分至一毛，逾一毛者惩罚。杂粮价格劝令粮商尽量平抑。

11月15日　　国民党五全大会举行首次大会，主席林森。于右任代表主席团报告各项工作。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党务报告。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组织及该委员会各组名单。

△　国民政府签发台湾日机访闽许可令。

△　滦榆兼蓟密区专员殷汝耕与特警总队长暨两区各县、局长

等，在日人策动下，联电北平卫戍司令宋哲元、鲁省府主席韩复榘，借响应促成宪政为名要求华北自治，促宋、韩“领袖群伦，更为有效之主张”。

△　日第十三驱逐舰队所属三舰由旅顺开抵青岛。榆关续到日兵车五列。

△　财政部公布《兑换法币办法》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办法规定：银币、银类自11月4日起限三个月内换成法币；古币、装饰品、工业原料等不在此限。通用银币兑换法币不得有丝毫差价，违者没收。高价收换银币、银类意图偷漏者，依法惩治。

△　桂省府颁布管理货币办法，以广西省银行、省金库所发之钞券为“法币”，严禁继续使用硬币生金银。

△　福州金融恐慌，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外，各银行、钱庄发生挤兑。省府公告：中国农民银行钞票一律通用，造谣破坏者严办。

△　自中山秀雄事件发生后，沪市谣诼甚炽，虹口一带居民纷向租界迁移。是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辟谣，声称中央对日亲善政策绝未变更，上海谣传全非事实。沪市府亦令公安局自16日起禁止居民无端迁徙。

11月16日　　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二次大会，蒋介石、何应钦分别作政治、军事报告。

△　蒋介石鉴于华北局势紧张，调兵备战。陇海路军队已西调河南，至是日，京沪路沿线屯集重兵达11个师。

△　萧振瀛致电中央请辞察哈尔省府主席。

△　日关东军借口中国中央军北上和保护山东日侨，是日命令空

军六个中队限11月20日集结榆关、锦州地区待命。榆关已开到日军约1.2万余名。驻承德川岸旅团本日起分向长城线喜峰口、潘家口、冷口、义院口移动。

△　平律卫戍司令宋哲元布告严禁任意捕人，“嗣后凡在平、津两市，无论何人查拿人犯，如果侦缉得实，或有重大嫌疑，必须通知管辖官署，会同军警依法办理，不得身穿便衣，滥行逮捕”。

△　日关东军参谋花谷由长春到天津，向驻屯军司令多田传达关东军对华北时局意见。17日到济南。

△　红四方面军中纵队（红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及红四军占四川名山东北要镇百丈。19日，川军十几个旅向百丈红军阵地反攻，战斗七昼夜后，红军撤出百丈一带阵地，转进至九顶山迄莲花山一线防守。

△　《大众生活》周刊在上海创刊，邹韬奋主编。邹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称：“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是当前全中国大众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次年2月被查禁，仅出16期。

△　财政部指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接收各发行银行之发行准备。中央银行接收中国农工、中南、农商三银行；中国银行接收四明、中国农民（因该行反对，致未接收）、中国实业三银行；交通银行接收中国垦业、中国通商、浙江兴业三银行。发行准备之六成现金即就各该行之保管库暂时封存，四成保证准备则分别移送中、中、交三行保管。

△　财政部准山东省府请求，济南存银不南运。

11月17日　　财政部函知中央银行，准各银钱业行庄按照原有领

券办法，以现金六成，搭配政府债券四成，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换取法币，或照章领用法币。

11月18日　　国民党五全大会举行总理纪念周，主席邹鲁讲话，略谓："中央若无切实之救国办法，则各方同志不能不各本其热诚责任，以谋救国之途径，不特意见将益见分歧，恐人更将从而骗、而吓、而拆，党不堪问，国更不堪问矣。"要求"党人团结救国，感愧补过，挽此危局"。同日，五全大会第三次大会通过《国民党党员守则》12条，内容包括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等方面。

△　李宗仁电五全大会建议确定国策，略谓："大会之无上任务即在确定举国一致之对外国策，如对外有最大决心之方案，则过去因对外政策之歧异而引起之内争矛盾，自可迎刃而解。"

△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各校"黄河水灾赈济会"转化为秘密的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是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在中国大学开成立大会，主要成员有：主席郭桂英（郭明秋，女一中）、秘书长姚克广（姚依林，清华大学）、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总纠察邹素寒（邹鲁风，东北大学）、交际股长王其梅。学联机关设在女一中。会议指定陈絜（燕京大学）起草宣言。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秘密召开代表大会，通过《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决议案。

△　驻日代办丁绍伋访日外务省次官重光葵，询商中日亲善提携具体意见。重光提出华北事态应与日、"满"间作成圆满关系，禁止排日行为，共同防御赤化，并称日本政府已令有吉大使与中国外交部直接交涉。

△　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大臣讨论对华政策，决定电有吉

大使向蒋介石提出“准许华北某种自治”要求，并告蒋日方对中央军北上，“决不默视”。

△　土肥原对宋哲元代表萧振瀛以口头作最后通牒：如果宋哲元不在20日前宣布自治，日本方面将自行宣布。19日，宋哲元秘密派人向中央报告请示，是日傍晚，宋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告以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令宋立即停止与土肥原的谈判。宋即派萧振瀛将蒋的电令通知土肥原，声明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土肥原遂于20日晨愤然离平赴津。

11月19日　　蒋介石在五全大会第四次大会上作对外关系讲演。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　红二、六军团主力两万人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傍晚，自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21日，集主力于大庸、慈利间之潭口、老鸦口一线；晚，先头部队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在潭口突破敌人第十九师李觉部封锁线强渡澧水，歼敌周昆源一部。22日晚，由洞庭溪渡过沅江，冲破李觉、陶广等部阻截。一部向新化前进，另一部向黔东推进。

△　红四方面军主力与川军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等军在四川名山县百丈、鹤林场一带激战。

△　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宴请北平教育界，征询对时局意见。到各大学校长、院长、教务长等50余人。由萧说明华北自治运动情况，与会者一致表示反对，要求宋、秦本一贯之坚忍卓绝精神，竭力撑持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招致分裂。

△　在日人策动下，有自称所谓“河北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总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业

联合会”等团体联名电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响应宋哲元真（11日）电，请开放政权，并电五全大会主张自治。

△　河北曲阳县日浪人纠众数百人，以要求废除苛杂为名，到县府请愿，乘机谋乱。县长督率团警驱散乱民，捕押为首者三人。21日，驻定县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驰往弹压。

11月20日　　驻华日大使有吉偕驻京总领事须磨等见蒋介石，提出“广田三原则”、调整中日关系及华北问题。有吉称：中国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华北自治“实基民意”，“勿对人民自治运动施用武力”，否则“关东军不能默视”。蒋介石表示，要日方抑制华北自治运动，愿以实行“广田三原则”作为交换条件。翌日，有吉电广田，劝勿以武力逼取自治，否则三原则无由谈判。

△　萧振瀛语平记者称：奉蒋介石电谕，华北事件停止谈判。

△　晨，驻锦州关东军铃木旅团村上大队步兵400余名由山海关开抵天津，驻扎海光寺。午后，日驱逐舰二艘由旅顺驶抵塘沽。

△　汪精卫自京赴沪疗伤。

△　广东省银行已收兑银毫达1500万元。因“毫券法币”将罄，是日又发出一元、10元大洋券，戳签作“毫券法币”用。

△　被逐旅日侨胞第91批项宗昌等三人抵沪。自去年以来，被逐旅日侨胞已达700余人。

△　美远东经济考察团发表报告书，主张在华设立机关，与他国进行商务竞争，尤着重利用庚款资助对华输出。

11月21日　　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五次大会决议，授权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

△　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指挥。拂晚，红一方面军红一、红十五军团对陕北直罗镇的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2时，歼敌大部。23日，红军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第一〇六师的一个团。24日，直罗镇之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直罗镇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　天津日驻屯军参谋中井到保定，与因病住院之河北省府主席商震会见，声称“华北自治，宋哲元、韩复榘已同意”，逼商三五日内速赴北平协商。商答“病愈后再谈”。

△　日内瓦华侨抗日救国会电汪精卫、蒋介石反对日本强迫华北独立，要求即派大员北上誓死抵抗，否则“应引退以谢国人”。

△　黄化南（前石友三部副官长）等四人自称“民众代表”，赴天津市府请愿“自治”。同时，有甚多来历不明之“便衣”陆续到市商会门前集合，均经警察劝回。

△　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成立，推周作民、卞白眉等七人为常委；决定平、津各银钱行庄所存现银就地封存。

11月22日　　蒋介石再次会见驻华日使有吉，提议以取消华北自治运动，中止自治宣言为条件，全面承认广田对华三原则；并称最近将派人赴日，推诚交换意见。

△　国民党五全大会第六次大会通过《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及对政治、军事、党务各报告之决议案。下午第七次大会选举五届中央执监委员。

△　日外务省东亚局讨论有吉大使与蒋介石20日在南京谈话，东亚局长桑岛、参谋本部冈村、军令部本田、海军省中村、大藏省青木均出席；议决：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华政策，并将以华北如何处理，为中国对日有无诚意之考验。同日，日外相广田训令有吉依据广田三原则解决华北问题，对华北自治运动无取消理由。

△　日阁议讨论对华方针，由陆相川岛报告华北情势，外相广田报告有吉与蒋介石在南京会谈经过。讨论结果，决定彻底坚持外、陆、海、大藏四省会议关于华北自治方针。

△　驻外各使馆电询华北真相，外交部复电称：中央对河北现状已定有适当办法，对类似独立之自治运动决不许可。

△　冀东停战区各县府均增聘日籍联络员一人，业经滦榆、蓟密专署发表。是日，抚宁等县日联络员田中二郎等到任。

△　李滋·罗斯偕助理罗杰斯由沪飞平，调查华北各省财政经济状况。

11月23日　　国民党五全大会续开第七次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冯玉祥、于右任、孙科、吴铁城、叶楚伧、何应钦、邹鲁、居正、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张学良、宋子文、白崇禧、顾祝同、蒋鼎文、陈济棠、何键、陈诚、周佛海、陈公博、傅作义、于学忠等120人；候补执行委员俞飞鹏、李品仙、刘建绪、王正廷、黄季陆、唐生智、宋庆龄、罗家伦、杨永泰、程潜等60人；中央监察委员林森、张继、蔡元培、吴敬恒、邵力子、李宗仁、杨虎城、王宠惠、陈璧君、柳亚子、蒋作宾、褚民谊、胡宗南、黄绍竑、宋哲元、商震、薛岳、刘镇华、林云陔、萧佛成、盛世才等50人；候补监察委员雷震、王世杰、何思源、邓青阳、唐绍仪等30人。大会闭幕，发布宣言，列举“建设国家挽救国难要计”10条：一、崇道德以振人心；二、兴实学以奠国本；三、弘教育

以培民力；四、裕经济以厚民生；五、慎考铨，严考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六、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八、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九、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十、恪遵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保持国家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

△　夜，滦榆、蓟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取得宋哲元的谅解，在天津召集停战区各特警总队长讲话，宣布在停战地区实行自治。

△　天津日驻屯军向津沽保安司令部要求租用津郊东局子机场迤西民地作飞机场用，保安司令部未予同意。次日，日军即径行动工修筑。

△　驻锦县、绥中日军松井旅团4000余名到达山海关。川岸混成独立旅团步兵200余名由承德开抵古北口，古北口日军增至千名。

△　红四方面军一部由天全南渡雅河（天全河），击破川康军刘文辉部抵抗，进占荥经。

△　夜，沪公共租界调查户口，华、洋户口共115.9775万人。其中：华籍居民112.0860万人，外籍居民3.8915万人。外籍居民以日人最多，共2.0242万人（包括韩人618人）；英人次之，为6595人；俄、印、美人又次之。

△　河南省设栾川县，由卢氏、嵩县、内乡三县各划一部分析置。

11月24日　　殷汝耕由天津抵通县，召集停战区特警队等开临时会议，宣示合并滦榆、蓟密两区为滦蓟区，划昌平、宝坻、香河、宁河四县归其管辖。是夜，发表脱离中央、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言。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县成立，以池宗墨、

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元声、殷体新、殷汝耕九人为委员，殷汝耕自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停战地区22县外，并包括延庆、龙门、赤城三县。委员会分设秘书、保安、外交三处，民政、财务、教育、建设四厅及税务管理处、唐山办事处等。《组织大纲》妄称：“本委员会根据《塘沽协定》特殊之区域为范围，脱离中央政权，完成人民自治，以防止赤化，刷新内政，敦睦邻邦，开发富源，尽力于确保东亚和平而增进人民福利为目的。”

△　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抵津，暗组“华北自治委员会”，勾结前骑兵师长郭希鹏、丰台暴动祸首张权本等谋乱。

△　天津日人收买流民举行示威，乘汽车散发要求“自治”传单，车悬蓝卐字旗，并有所谓“普安协会”者张贴“日满支联合，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等亲日标语。为防“便衣”伪装警察暴乱，各区值勤警卫一律易戴夏季警帽，通宵警戒。

△　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蒋梦麟、梅贻琦、李蒸、徐诵明、陆志韦、傅斯年、任鸿隽、胡适、顾毓琇、张奚若、蒋廷黻、查良钊等20余人发表郑重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机构的阴谋举动”，“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　国民政府为前大总统黎元洪在武昌卓刀泉举行国葬。

△　财政部公布《运输银币银类请领护照及私运私带处罚办法》，规定运银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负责，并应持有财部准运护照，关卡凭照验放，违者没收充公；如查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出口者，送法院按《妨碍国币惩治暂行条例》惩处。

11月25日　　外交部照会驻华日使有吉抗议日军催逼河北省当局参加自治运动。谓：“查所谓自治运动，乃出于少数不良分子勾结三数日本军人所为，其为促成内乱、破坏国交，彰彰明甚。兹特提出抗议，应请迅转贵国政府，力持正义，对于此等日本军人之非法行为，

立予严切制止，并饬令土肥原等即日离境，以遏乱源。”

△　冀省府对殷汝耕之叛国活动，除电中央请示办法外，并电宋哲元就近制止。

△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外交处长霍实赴平向日武官高桥报告“自治委员会”成立经过，并说明：一、主张脱离党治而非离开中国；二、尽力维持地方治安；三、负责保侨。同日，伪唐山办事处处长殷体新赴津向日驻屯军司令部报告该会成立经过。

△　殷汝耕训令停战地区各县长，迅将征存应解省库之正、杂各捐税款于三日内悉数解缴“自治委员会”。

△　唐山统税所被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唐山办事处处长殷体新派员接收。财政部通令各地国税机关拒绝承认伪税照。

△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派陆逑为北宁铁路新（河）榆（关）段监理处处长。是日陆在唐山就伪职。

△　驻日代办丁绍伋访日外次重光葵，声称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讨论具体而有实效之计划，以促进中日两国间之“亲善提携”。重光表示希望对调整中日关系继续交换意见。

△　驻滦县、唐山日军一部开北平。山海关日军专车一列同日开天津。

△　天津日租界有自称“华北民众自卫团”者200余人，由日人前导，至天津市府门前游行示威，要求“自治”，“还政于民”。又至津沽保安司令部门前呼口号请愿。经天津市长程克等要求多田予以制止。宋哲元遂令天津宪警，宣布戒严。是晚，宋哲元在北平公开声称：一切均听命中央，在其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之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11月26日　　行政院对华北情势作出如下决议：一、撤销军事委

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六、电令宋哲元、商震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殷汝耕。文曰：“查有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本月二十五日妄自宣言，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为委员长，勾结奸徒，企图叛国，于国家危难之中，为乘机扰乱之举，丧心病狂，自绝人类，一至于此。该逆殷汝耕着由行政院迅饬河北省政府即予免职，严行缉拿，依法惩办。所有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着即撤销，其一切职务，由河北省政府直接处理。”

△　鄂省府主席张群、闽省府主席陈仪在沪访日使有吉及武官矶谷，希日谅解行政院对华北之措置。

△　国民党中央电示冀、平、津军政当局应付殷汝耕叛变方针：一、对冀东脱离中央行动，绝不承认；二、平、津当局注意不因此事引起战区纠纷；三、在可能范围内对殷汝耕行动加以注意。并令一切妥慎从事，随时请示，候令办理。

△　河北省各院校馆全体教职员发表紧急宣言，反对殷汝耕倡言叛乱，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同日，沪商会、总工会、地方协会、中等学校协进会、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等团体分电中央请明令讨伐殷汝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　日本军事当局训令关东军及天津驻屯军之参谋长与各地武官，指示继续推进自治运动之方针与要领。土肥原遂再度限令宋哲元于11月30日以前宣布自治。

△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税收委员会接收停战区各税收机关，并强行截留各县田赋。

△　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电请韩复榘、商震赴平会商华北时局。是日韩复电称中央已命何应钦北上，对华北时局当有办法，无须赴平。商亦称病未行。

△　北平各大学校长、院长、教授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10余人见宋哲元，表示强烈反对华北自治。宋表示一切按中央命令行事。

△　晨，日军尾田中士等率兵20名，全副武装，自津出发赴正定，转石家庄、元氏、定县。同日，榆关日军专车一列西开，载日军官兵150余名，携小钢炮、机枪等，下午抵北平。

△　冀东宁河县各机关被日兵10人及张庆余部特警一中队武力接收，驱逐县长，将该县划归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管辖。

△　第一路军何键令所部尾追、堵截红二、六军团。李觉率第十五师、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向沅陵、泸溪、辰溪尾追；陶广率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向凤凰、麻阳急进；樊崧甫纵队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等师由慈利以南，经桃源过河，在新化堵截。

11月27日　　驻京日总领事须磨访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对行政院关于华北之措施表示不满，并谓：中国政府拿办殷汝耕，将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事态将“陷于恶化”。又谓：行政院之决定与蒋介石之提议“有相当距离”，任命何应钦为驻平长官，亦不能帮助解决华北问题。

△　红二、六军团一部攻克湘西辰溪、浦市，主力向溆浦发展；另一部占新化、锡矿山。28日克溆浦。

△　蒋介石令第二路军薛岳所部经洪雅取捷径向荥经、汉源一带“兜剿”堵截红四方面军。28日拂晓，第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军及第一纵队总指挥部分别由新津、成都西进。30日，第三十六军全部到达洪雅，第一纵队之第四军军部及第九十师到达丹稜，第九十二师到达母

店。

△　日外相广田电促有吉大使再赴南京向蒋介石征询中国政府对日之具体方策。

△　宋哲元电何应钦辞冀察“绥靖”主任新职。次日何复电慰留。29日，宋再电行政院坚辞新职。

△　日军90余名强占丰台车站，禁止放车南下。经交涉后，日方强行规定办法三项勒令遵守：一、不放空车南下；二、不载运军队；三、南下一列须同时北上一列。同日，天津日军进占总站及西站，并阻止津浦路二十一次快车及津济间七十五次车南下。其所强行规定之解决办法亦与丰台车站同，但南下车只许开至济南。28日，丰台车站日军大部撤走，只留十余人监视。

△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外交处长霍实在平声明脱离殷汝耕伪组织。

△　冀东临榆、昌黎、乐亭、卢龙、迁安五县县长拒绝参加殷汝耕伪自治政府，是日先后离县赴省。

△　天津东局子机场被日军强占。是日日机三架由榆关飞东局子机场降落。日航空大队并在东局子赶筑机场，占地千亩。冀省府向日交涉无结果。12月5日，外交部令津沽保安司令再交涉。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意同任何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和国人联合抗日，再一次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反蒋者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

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　外交部就日军人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及日军强占丰台车站两事，向驻华日使有吉分别提严重抗议，认此项行动足以妨碍两国邦交，应迅即予以有效制止。

△　北平各大学学生发表与北平共存亡宣言，宣称“决不南迁，决不离校，决不停课，抱定以数千大学生之头颅，效法国‘最后一课’之精神，作政府的后盾，与华北共存亡”。

△　自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各方纷电请讨伐叛逆。是日，南京中大、金大、金女大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商震，请讨逆靖难，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同日，武汉新闻界亦电请国民政府迅平乱逆。

△　伦敦中国艺展会开幕。展品共3000余件，其中除由中国运往约1000余件外，余均自英、美、日及欧洲各国征集而来。展览会由英皇、英后及林森任名誉会长，汪精卫、包尔温、蒋介石、麦克唐纳任会长。

11月29日　　外交部分别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声明殷汝耕一切行为，均应视为无效；同时电令驻外各使节分别通知所在国政府知照。

△　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海外全体代表马立三等电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希本过去精神，卫国守土。

△　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访日使有吉，商谈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币制改革善后等问题。

△　驻美大使施肇基访美国务卿赫尔，说明“华北自治运动”情况。

△　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在平与宋哲元会商华北时局后，是日返回太原并向阎锡山报告。

△　北平日宪兵借口北大校长蒋梦麟有反日行动，传蒋至兵营问话。蒋不屈，遂释放。

11月30日　　蒋介石与行政院等五院院长商决“华北自治办法”六条：一、实行共同防共；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等北上，根据以上办法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何等一行，即于30日夜车北上。

△　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连日与中央往返电商安定华北办法。因日方限30日答复，昨宋特召集秦（德纯）、萧（振瀛）等彻夜会商后，是晨由宋电蒋报告称：华北形势危迫，有倡自治者，有主自决者，望中央速定有效办法，以慰民望。

△　行政院议定对意制裁实施办法八项，自12月1日起，各商人及商业团体不得再与意方任何团体、公司或私人订立任何商业契约；凡违令之货物，不论输入或输出，均以私货论，按海关缉私条例处理。

△　华南日领事会议在香港举行，到会者有福州中村、广州河相、香港水泽、厦门小田、汕头原田等。会上交换各地情报并讨论对付中国排日政策等。

△　西南国民党中委邹鲁、林云陔、黄旭初、刘纪文、刘芦隐、邓青阳等由沪入京，出席五届一中全会。

11月下旬　　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本年水旱灾损失统计。陕、晋、冀、鲁、豫、苏、皖、鄂、湘、赣、浙、闽、粤13省730县，有水灾报告者216县，有旱灾报告者279县。水灾受灾总面积为3500.2万市亩，损失粮食5531.8万市担；旱灾受灾总面积5861.8万市亩，损失粮食7702.7万市担。水旱两灾损失粮食总数为1.32345亿市担，约合四亿元。

△　日关东军派遣小岛等七人往张家口，转赴各蒙旗调查地势、交通、人口、政治、兵力、特产等项，预期三个月完成。

△　冀省停战区各县旅平同乡会及各县民众代表联合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殷汝耕组伪自治政府。冀东停战区昌平、香河、玉田、宁河、顺义、三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11县县长亦先后声明绝不附逆。

是月　济南市自币制改革后，现银运往青岛外流者颇多，银价高于法币，百元现洋可易法币140元至150元。物价随之飞涨，面粉每包由2.8元涨至3.3元，小麦每担由4.5元涨至5元，新闻纸每领由3.5元涨至4.8元，煤油每桶涨1.5元，其他油、米、纱、布等必需品无不飞涨。

△　日人在天津大王庄及小刘庄购地百数十亩，建立富士纺织业株式会社。

12月

12月**1**日　汪精卫电国民政府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相继呈辞。

△　自称天津“自治界代表”刘孟扬等通电行政院、宋哲元、商震、韩复榘、萧振瀛、张自忠、秦德纯、程克暨各界各团体，要

求“援照庚子东南自保之先例，速定保境安民之策”，实行“自治自救”。同日，津市商会亦通电称：“目前似宜由负责当局速定保境安民之策，内修自治，外睦邻邦，用安民心，而弭祸变。”

△　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主持之大亚细亚协会天津支会在日租界成立，由在野军阀、政客组成，李盛铎为总裁，高凌霨、齐燮元为副，目的在散布“大亚细亚主义”，为日侵华张目。

△　日关东军兵车八列，载士兵3000余，自关外前所站开入榆关。铃木旅团司令部随行。同日，川岸旅团长由承德飞抵古北口部署军事，旋赴密云转怀柔视察。

△　河北沧县潜伏分子拟假名“自治”实行暴动，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派兵一营驰往弹压。

△　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及北平市公安局长张维藩以时局紧张，是日先后布告安民，禁造谣言。

△　天津市长程克致电行政院报告华北危迫情形称：“默察天津附近，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窃观大势所趋，恐非俯顺舆情（按：指华北自治），无以挽狂澜于即倒。”

△　北平市长秦德纯致电国民政府称：“自战区突变，津市惊扰，危疑震撼，民心动摇，自治自决，议论纷起，空言苦撑，难挽危局……切盼中央早定大计，因势利导，以奠北方。”

12月2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执监委174人。推蒋介石、孙科、戴季陶、冯玉祥、于右任、居正、邹鲁、顾孟馀、丁惟汾、陈果夫为全会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

△　何应钦、熊式辉抵保定，与商震、万福麟、门致中、鲍文樾等协商华北问题。何对日记者发表声明，希望中日“和平亲善，共存共荣”。夜，何与北平土肥原互通电话多次。

△　陈仪、殷同抵天津，先后访晤华北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及下野军阀政客曹锟、曹汝霖、齐燮元、陆宗舆等。

△　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徐诵明、李蒸、蒋梦麟、梅贻琦、陆志韦、胡适、傅斯年等数十人电国民政府声述华北各界民众“毫无脱离中央，另图自治之意”，盼当局“消除乱源，用全力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之完整”。

△　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要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当局迅即制止，以保领土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　河北省各界联合会致电河北旅京同乡张继、李煜瀛等，转恳政府速定解决冀省问题大计，并分电请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速定大计，共赴国难”。

△　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学生电请国民党中央以实力制裁殷汝耕，并分电宋哲元、商震，要求“当机立断，戡乱除奸”。

△　山海关日军约千名沿长城向古北口、密云、怀柔移动。日机十余架绕秦皇岛、榆关侦察。

△　关东军司令部部附永见俊德大佐继酒井隆任华北日驻屯军参谋长。3日，日方以华北事急，特令永见暂缓到任，仍饬酒井襄助多田。

△　王正廷访日外务大臣广田。12日由日返沪，语记者称：日本朝野对中日“经济提携”，态度良好。

12月3日　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首次全会修正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法》；推定林森、张继、萧佛成、吴敬恒、蔡元培为常务委员。

△　黄郛电行政院请辞内政部长职。

△　国民政府派黄显声为陆军骑兵军副军长。

△　何应钦、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福建省府主席陈仪抵北平，与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察哈尔省府主席萧振瀛、北平市长秦德纯会商华北问题。宋表示三点：一、不屈服于外力压迫；二、绝对听命中央；三、对外无秘密协定。

△　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海外代表陈志明、骆仇天等40余人致电北平教育界，响应反对华北自治通电，表示海外侨胞“誓为后盾”。

△　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劝宋哲元“勿自促国家分裂”。宋下令4日起停止该报邮递。

△　清华大学全体学生通电否认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坚决反对任何脱离中央或类似之华北自治组织。

△　战区特警队张庆余部一大队武力接收河北宝坻县，由殷汝耕派日浪人一名充顾问，组治安维持会。

△　中英滇缅勘界委员会在户算（位于云南双江县之西）开首次界务会议，核议任务大纲，国联指派之中立委员伊斯兰主席。

△　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英外相贺尔，促注意日本侵犯华北中国领土主权行动。同日，驻法代办萧继荣访法兼外长赖伐尔，提出同样要求。

△　平、津铜元缺乏，交易不便，物价上涨，津商会等连电商震请饬省行先发旧存铜元券30万元，以资救济。是日，商复电照准。

12月4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明年5月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　何应钦与宋哲元商谈关于解决华北危机问题。秦德纯、萧振瀛、熊式辉、陈仪亦与会。会后，宋对记者谈称："华北时局于无办法之中已有一些办法……相信亡中国者中国人，救中国者亦中国人……本人甚愿在何部长领导之下努力一切，绥靖主任亦可就任。"又谓："日本人应对自治运动负主要责任"，表示"服从政府的命令，在必要时将奋起抗日"。

△　日本不欢迎何应钦留平。是日，日使馆武官高桥托人转告何应钦说：在私交方面，他对何氏表示欢迎；在公事方面，如果何留驻北平，北方将会严重的困扰。是夜，日军方代表与宋哲元接触，并施加压力。

△　山西防共会议决定组织84县"防共保卫团"，所需干部约900余人，从各师、旅及失业军官中选充。

△　天津市长程克、秘书长孙润宇由津到平，访晤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商津市治安问题。

△　天津九区市民代表团发表对时局宣言，声明"汉奸勾结流氓地痞，假借市民公意、发出通电要求自治，绝非市民真意"。

△　南京91个学术团体举行救国联席会议，决议两通电：一、电请商震等保持疆土完整；二、声援北平各大学教授努力奋斗，该会愿为后盾。

△　沪全浙公会以会员殷汝耕假借自治，僭称独立，决议开除其会籍，并发电警告。

△　日机三架自津东局子机场起飞，沿津浦铁路线侦察。

12月5日　何应钦在平与秦德纯、萧振瀛、熊式辉、陈仪等密商应付华北时局对策，决定为适应北方特殊环境之需要，仿照西南政务委员会往例，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应付华北危机。并电呈蒋介

石报告：“职与公洽、天翼两兄一再考虑，认为惟有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1）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2）委员及组织由中央决定人选，以适宜于北方环境为标准，并任明轩为委员长；（3）一切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保持正常状态；（4）绝对避免自治名目及独立状态，如日人压迫，中央与地方一致行动。已托人示意明轩，大约能如此办理，则内外暂可相安。”

△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第三次大会通过周佛海、曾养甫、罗家伦、潘公展等56名中委所提议案：一、函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二、饬邮局将《大公报》放行；三、切实改善新闻检查办法。

△　宋哲元在平发表谈话称：华北大局自何应钦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　日机15架在北平上空散掷传单，煽动“自治”。同日晚，北平有自称“各自治区民众代表”24人赴居仁堂向何应钦递送请愿书，要求自卫、自治、自决，并请何速就驻平长官职。

△　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电令驻衡阳一带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驰赴湘西尾追红军。8日，该部抵溆浦城郊，与贺龙、萧克部红军激战后占溆浦。红二、六军团北向观音阁、底庄、谭家湾、烟溪等地转移。

△　北平社会局通令各大学将所用课本呈送检查，不许只字提及中国失地事实及外患情势。

△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发表宣言，反对“自治运动”。

△　江苏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讨伐殷汝耕，并致电警告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王厦材，促其反悟。

△　冀南肥乡县到日浪人及鲜人甚多，煽惑乡民谋乱。驻大名第五十三军孙多荃师派大部队驰往，捕获首犯七名，余众逃散。

△　英国下院中国委员会讨论华北时局，主张政府不能放弃责任。外相贺尔演说，表示“日本使用力量，支配中国内政发展及行政系统为不幸”。贺尔并答复议员史韬顿称：“对华北情势，自当由英国驻华大使密切注视。”

△　河北省银行开始发行铜元票，分10枚、20枚、40枚、50枚、100枚五种，平、津两市及冀全省通用。每460枚兑换法币一元。发行总额20万元。

△　香港政府禁止白银出口，收现银为国有，居民藏银不得超过10元，一切收付概用法币，违者拘罚。

12月6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中执会除原设财务、抚恤、党史史料编纂各委员会外，增设海外党务、地方自治、国民经济、文化事业四计划委员会。组织、宣传、民训三委员会仍恢复为部。

△　陈仪、萧振瀛携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赴津与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参谋长酒井交换意见。

△　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声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请各国尊重现有条约。

△　北平燕京、清华、师大等11所大学及第一女中等四所中学学生自治会联名通电全国，“誓死反对断送领土及主权之自治行动以及任何变相之独立阴谋”，要求政府下令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敌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

△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与驻京日总领事须磨、武官雨宫密谈华北

问题。

△　上午，日侦察机九架飞平，在东交民巷及何应钦官邸上空盘旋示威。

△　晨，日“菊号”军舰官兵百余名在津登陆后，到日租界内游行。11时，河北密云到川岸旅团官兵50余名，旋赴怀柔南关。

△　冀省邢台、高邑、尧山（今隆尧县一部）、南宫、隆平（今隆尧县一部）、临城、任县、平乡等十余县近发现汉奸假借“防共自治”聚众倡乱。大兴、宛平、房山、涿县亦到日浪人煽动“自治”。是日，任丘刘万鹏、马德彪又聚众2000余，以要求“自治”为名，武力占据县城，扣留县长李天民。第三十二军唐国良团自霸、雄两县赶赴镇慑。

△　北平市参议员吕钧等见何应钦，要求“依法办理地方自治”。

12月7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通过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正、副院长人选后宣布闭幕。名单如下：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丁惟汾、叶楚伧、孔祥熙、邹鲁、陈立夫。主席胡汉民，副主席蒋介石；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张人杰、阎锡山、许崇智、李烈钧、王宠惠、李文范、张学良、唐生智、陈璧君、宋子文、朱培德、顾孟馀、朱家骅、马超俊、邵元冲、刘守中、陈公博、王伯群、程潜、陈果夫、梁寒操、张定璠、何应钦、黄绍竑、王陆一。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四、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蒋介石（兼）、孔祥熙；立法院孙科、叶楚伧；司法院居正、覃振；考试院戴季陶、钮永建；监察院于右任、许崇智。

△　何应钦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电请南京批示，国民党中央复电照准。

△　财政部准许外商银行以六成现银、四成保证，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兑换法币。沪市外商存银总数4088.4万元。

△　山东全省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致电敦促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支撑华北危局，本过去光荣历史，保国家行政统一及领土完整。

△　日军唆使塘沽汉奸聚众数百人借口请求“自治”，占领公安局。9日，津沽保安司令部饬驻塘部队弹压，乱始平息。

△　红二、六军团进入黔东一部，击溃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克镇远。

12月8日　商震分电行政院、军委会请辞第三十二军军长、冀省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及冀全省保安司令本兼各职。10日，冀省府委员暨各厅长总辞职。

△　日步兵百名由古北口开抵通县。

△　红九军团罗炳辉部围攻四川汉源，与刘文辉部激战。

△　日海军驻旅顺要塞部为便于指挥在津日海军，特设驻津事务所，以久保田大佐为所长。

△　天津平民通讯社社长戴听潮被公安局特务偕日宪兵捕送日军部。

△　中央银行公告，因法币不敷，以中国农工银行红色一圆券改印中央行名，由该行负责发行。

12月9日　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是日各大、中学学生二三千人为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上午10时半，学生齐集天安门，被军队冲散，游行指挥部乃决定将集合地

点改在新华门前，请愿求见军政部长何应钦，何避匿不见，由参议侯成代见。学生提六项要求：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公布中日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领土主权；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并要求开放西直门，让城外学生进城。侯未允许，激起众愤，学生遂结队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在西单及东长安街转向东交民巷，遭到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大刀的攻击，许多学生受伤。下午6时，北平市长秦德纯到景山，站在大殿前的高台上，向游行学生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和政府协同一致，救亡图存。得到学生谅解，游行遂告结束。城外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城门关闭未能入城，在朔风凛冽中坚持终日。当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面对华北危机，惊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吁请全国同胞赶快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和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是日学生被捕者20余人。

△　北平市社会局长雷嗣尚发表书面谈话宣称：学生请愿事已由军政负责当局面请各大学校院长自行开导制止；尊重政府睦邻令，清洗并防止教育措施中“妨碍邦交”之成份；共产主义与国情绝不相容，必断然加以取缔。

△　实业部长陈公博呈请辞职，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

△　日关东军派田中隆吉指使伪多伦警备司令李守信进犯察东。是日上午11时，李部步、骑、炮兵900余名，在坦克车、飞机配合下，突袭沽源。察东保安队樊伦山部据城抵抗。

12月10日　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晓谕人民，“政府此次整理币制，停用现银，纯为集中准备，安定金融”，“与所谓膨胀通货，性质迥不相侔”，“慎勿轻信澜言，妄生疑虑”。同日，又训令直辖各机关，“切实保障正当舆论”。

△　国民政府任命杨爱源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

△　李济深由港回桂。

△　北平学生联合会决议全市学校自11日起开始罢课，并发出宣传大纲，要点为：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要求武装全国民众，扩大民族解放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　杭州浙江大学学生全体会议议决：一、响应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二、通电全国学校一致响应；三、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传反对“华北自治”。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电请国民政府保护学生爱国运动。

△　北平各大学当局集议“劝诫”学生不得罢课。是日，北京大学布告：不听劝诫，鼓动罢课者，开除学籍。

△　李滋·罗斯调查华北金融毕，是日离平赴沪。

△　深夜，伪军李守信部突袭宝昌。该处保安队为避免冲突，向张北方向撤退。

△　任丘乱事平定。驻沧县特警千余名协助第三十二军唐国良团开入县城，乱民逃散，县长李天民等恢复自由。

12月11日　　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刘哲、李廷玉、贾德耀、胡毓坤、高凌霨、王克敏、萧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周作民、门致中、石敬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

△　熊式辉由平抵京，向行政院报告解决华北问题商谈经过。

△　殷汝耕下令截留冀东关、盐两税。

△　宋哲元派秦德纯、萧振瀛与土肥原交涉察东问题。土肥原表示：李守信军退出，应准蒙古保安队进驻沽源、宝昌接防。

△　宋哲元为镇压学生运动，特派大刀队及手枪队分驻各大学门前，严禁学生出校游行示威。学生乃改取罢课手段。清华、燕京、北大、师大、平大均局部或全部罢课。东北大学被军警搜查，学生九名被捕。

△　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

△　上海各大学联合会致电平教育界，赞同其11月24日宣言，反对分割华北，力保主权，“虽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并通电全国教育界一致努力。

△　国民政府令准免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师长兼职，遗缺由刘尚志继任。

△　青岛海关查获日轮“原田丸”偷运现银两万余元。缉私关员被殴，伤华员五人，俄员一人。

12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长官人选。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各部长为：内政蒋作宾，外交张群，财政孔祥熙，军政何应钦，海军陈绍宽，教育王世杰，实业吴鼎昌，交通顾孟馀，铁道张嘉璈；各委员会委员长为：蒙藏黄慕松，侨务陈树人；卫生署署长刘瑞恒。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法制李文范，内政陈公博，外交王正廷，财政徐堪，经济宋子文，教育经亨颐，土地陈果夫，交通朱家骅。

△　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府委员兼主席；商震为河南省府委员兼主席；张自忠兼察哈尔省府主席；萧振瀛为天津市市长；并

特派刘峙为豫皖“绥靖”主任。原任河北省府委员兼主席商震、河南省府委员兼主席刘峙、察哈尔省府委员兼主席萧振瀛、天津市市长程克均免职。

△　商震电请蒋介石收回调豫省府主席成命。萧振瀛电辞天津市市长新职。蒋介石分别复电慰留。

△　国民党中常会首次会议通过中执委会组织、宣传、民训三部及政治委员会、各计划委员会组织条例。

△　王克敏电中央辞冀察政务委员新职。

△　何应钦以冀察政委会业经组成，在平任务已毕，是日离平南下回京复命。

△　晚，沽源方面战事已停。察警备司令张允荣偕日军事联络员松井赴前方制止冲突。李守信部伪军续自多伦方面向宝昌、康保、商都间增兵。

△　古北口日兵50余名，由井信少佐率领开抵密云。

△　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李公朴、钱俊瑞等28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出：“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要求政府“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等。并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名义，致电中央及北平学生会，表示同情、支持学生救国运动。

△　南京各中等学校学生自治协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响应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反对“华北自治”。

△　北平东北大学当局宣布“紧急戒严”，要求学生一律离开宿舍，集中教室或图书馆；凡在校园内散步或停留聚谈者，以扰乱秩序论罪，宪兵可以随时逮捕。下午又公布紧急处罚法，规定至14日仍不上课者开除。翌日，学生在临时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示威。学校当局被迫接受学生要求，撤退宪兵，释放被捕学生。

△　上海律师协会沈钧儒等电请政府及宋哲元释放北平被捕学生。

△　武汉中等以上40余校代表开联席会议，致电政府，要求以不丧权、不失地为外交原则，并保障正当爱国运动及言论自由。

△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决定罢课一星期，宣传救国。是日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扑灭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男生组义勇军，女生组救护队。

△　驻粤日领河相向广州市府抗议学生反日游行，要求严厉取缔。

12月13日　　国民政府准免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职，由翁文灏继任。

△　日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喜多大佐偕陆军省军事课员武藤中佐到达天津，晤多田司令报告来华任务后，即召开幕僚会议，传达参谋本部对华北方针。

△　陈仪偕殷同、李择一访多田、喜多、武藤交换华北时局意见。

△　北平六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徐诵明（平大）、梅贻琦（清华）、李蒸（师大）、王卓然（东大）、陆志韦（燕京）联名向学生发表《告同学书》，略称：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请愿及罢课目的已经达到，望同学即日恢复学业。20日，发表二次《告同学书》，

再劝学生复课。

12月14日　　据巴黎《救国时报》载，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目前力主停止内战和“剿共”战争，全民一致对外，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誓死抗日。

△　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并电请政府保障正当爱国运动与言论自由。

△　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等电中央请克日讨伐殷汝耕。

△　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同济）、李登辉（复旦）、刘湛恩（沪江）、何炳松（暨南）等十余人面见沪市长吴铁城陈述爱国运动意见，要求：一、保持行政统一；二、领土完整；三、言论自由；四、外交公开。吴称学生爱国运动须不违“不罢课、不游行”原则。

△　北平市长秦德纯邀集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茶话会，力劝学生即日复课，勿作“轨外”行动，甚望同学“顾及华北现在环境，勿因言语引起对外纠纷”。

△　何应钦抵京，向蒋介石报告处理华北时局经过。何语记者称：宋哲元等对中央始终忠诚拥护，中央为综理冀察政务便利起见，已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为委员长。何否认9日北平学生与军警冲突死学生事。

△　宋哲元邀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平委员讨论筹备冀察政务委员会事，除刘哲请辞，程克养病外，余均出席。

△　日武官高桥访萧振瀛，商谈沽源问题。高桥允电关东军转令制止伪军行动。是日沽源、宝昌附近均有冲突，康保、商都间发现伪骑兵。

△　喜多与多田等在津会商，决定增加华北日驻军一旅团。

12月15日　　上海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暨80余中等学校对华北问题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坚决消弭华北分离运动，反对无限度退让。

△　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干事会通过决议多项：一、电政府即恢复冀东原有行政组织；二、电请察省防军坚决保护疆土；三、筹备发起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四、筹办救国日报；等等。

△　北平市府与各大学当局宣布自16日起学生一律上课，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　纽约中华公所召集之华侨欢迎方振武将军大会电请国民政府，“建立国防政府，全国动员抗日”。

△　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一文，指责学生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学生爱国行动是“浅薄的煽惑”，“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宣称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学生救国“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

△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保安队第四总队赵雷部开抵塘沽，逼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二师吕济部让出营房，双方发生冲突。16日，第三十二军撤退至新河附近，赵雷部占领塘沽。殷汝耕将塘沽、大沽划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辖区范围。大沽造船厂、塘沽税局查验所皆被占领。

△　红四军、红三十军与第二路军薛岳部激战八日后，是日撤离荥经城。

△　河北房山县马宝荣等倡言“自治”，纠众600余侵入县城，拘县

长、公安局长。平津卫戍司令部派第二十九军刘汝明师一部前往戡定。

△　日军在密云修筑机场，即将竣工。是日，日军部开始架设密云至古北口军用长途电话。

12月16日　　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举行“一二一六”大示威游行。44所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参加，共组四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包括师范大学等八校；第二大队由中国学院率领，包括法商学院等四校；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包括中法大学等12校；第四大队由清华大学率领，包括燕京大学等五校。游行队伍在前往天桥集合途中，遭到军警大刀、皮鞭的袭击和水龙扫射，学生多人受伤。大队先后集合在天桥、正阳门前召开市民大会，市民两万余人参加，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多件。晚，游行学生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为军警所乘，不少学生在皮鞭、大刀下受伤、被捕，是日，北平被捕学生46人，受伤300人，重伤者75人（一说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八人，失踪者25人）。

△　国民政府新任五院正、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举行宣誓就职典礼。行政院长蒋介石本日就职后，对部、会首长谈施政方针，其要旨为：一、澄清吏治；二、努力经济建设；三、维护国家自由与平等。

△　济南省立高中以上学校学生罢课，组织救国团，发表宣言及告全省同学书。各校一致响应。

△　教育部电令北平清华、北京、北平、师大、燕京五大学校长及社会局长，“嗣后凡罢课游行或离校活动，必须由诸师长负责阻止”。17日，又电令北平各大学务须“切实劝导学生早复常态，万不可在此艰险之环境，造成意外事变”。

△　察省府主席张自忠偕同张允荣与关东军驻张家口军事联络员松井在平协商沽源事件。同日，伪军李守信部包围沽源，保安队损折过半，死守危城待援。

12月17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报告。经过三天讨论，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23日，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红军东征山西，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准备对日直接作战。25日，会议闭幕，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27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　国民政府令免湖北省府委员兼主席张群职，遗缺由杨永泰继任。

△　国民政府任命各部政务次长：内政陶履谦、外交徐谟、军政顾祝同、海军陈季良、财政邹琳、实业刘维炽、教育段锡朋、交通俞飞鹏、铁道曾养甫。

△　行政院通过各部常务次长人选：内政张道藩、外交陈介、实业周诒春、交通唐有壬、铁道曾镕甫。其余各部常次暨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副委员长仍照旧。

△　国民政府任命李顺卿为省立安徽大学校长。

△　驻华日使有吉衔日外务省命到京。

△　伪军李守信部陷宝昌。22日又占沽源。

△　红军二、六军团主力由溆浦到达龙潭司，向邵阳、武冈一带前进。另一部在新化、邵阳间之罗洪、五峰、平山、隆回等处与湘军

陈光中部激战。先头部队已到达巫水东岸，与湘军隔河对峙。何键调集14个师十万余人，图阻红军远征。

△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接防津东，赵登禹部2000余人开军粮城、新河、北塘一带。

△　宋哲元发表《告北平学生书》，声称“有共党煽动利用学生爱国运动”，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适当制止”。

△　武汉中等以上53所学校组成救国联合会。

△　河南大学学生全体大会决议：一、成立救国会，慰问北平受伤同学；二、请政府公开外交；三、发起组织全省学生救国会。

△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分电蒋介石、宋哲元等，要求饬北平当局释放被捕学生。

△　上海市纸业、米业、糖业等93个同业公会发表宣言，要求政府速下决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12月18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委员长宋哲元暨在平各委员就职。推秦德纯、刘哲、王揖唐为常委。宋就职后发表书面谈话称：“中央为行政便利起见，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处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一切政务。”今后施政方针，“应本善邻原则，力谋邦交之亲睦”，“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益计，为东亚和平计，尤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亲善”。又称：“此外，尊重礼教，消弭共祸，发扬东方文化精神，促进人民自治能力，亦为哲元素所主张。”

△　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免去蒋介石参谋总长兼职，由程潜继任。

△　外交部长张群招待中外记者谈外交方针，称：“在中国自身欲

谋独立平等之地位，在国际间欲求永久之和平，此项政策始终不变”；中国对外政策“以不侵略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以合法途径，解除不平等条约”。又称：“吾人明知受有种种不平等义务之束缚，但所有合法之义务，纵不合理……基于信用，仍须忍耐遵守。”

△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要求立即释放一切被捕爱国志士，取消冀察政委会，停止内战，武力讨伐叛逆；号召工人群众恢复“五卅”的英勇斗争精神，继续“省港大罢工”的光荣传统，学习“北伐”的经验和教训，一致团结，抗日救国。

△　北平晨2时起戒严。各通衢均增设岗警。各校门前派警探监视，电话线被切断。各校学生继续罢课，因无法出校集合，仅在校内活动。

△　南京各校学生5000余人请愿游行，反对华北自治组织，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北平被捕学生，保障爱国运动。宪警随行监视。三民中学等八校学生在中大集会倡议组织南京市学生联合救国会。同日，上海、天津、南宁均有示威游行活动。翌日，南京金陵大学等十余校学生8000余人再度游行，向行政院请愿。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表示所提请愿各点，政府当尽速处理。

△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永见由津抵平，与宋哲元、高凌霨、李廷玉商谈制止津市学生爱国活动及察东问题。

△　秦德纯、萧振瀛与土肥原会商冀东、察北问题。土肥原表示：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改为“冀察防共自治会”，彼愿与殷商榷取消冀东政府之事，否则不能考虑；察北六县须划归伪满管辖。

△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保安第四总队赵雷部两中队抵新河，占据第三十二军原防地，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接防塘沽。宋部第一

三二师为避免与伪保安队冲突，19日撤至津郊曹家花园、杨柳青等地。

△　四川省地震。下午2时至7时，马边等县共震十余次，雷鸣数次。各区乡墙屋倒塌，压毙人畜甚多。震源在会理一带。成都下午3时13分50秒震动一次，震级六级，自本日至19日共震动五次。

12月19日　　蒋介石派邓文仪赴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陈绍禹（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进行接触。是日，邓自上海启程。

△　教育部长王世杰对记者发表谈话，禁止学生游行、请愿、罢课，并决督促各地教育行政机关执行。同日，宋哲元再致北平各校校长书，望对学生运动“取有效方法，作严厉制裁”。秦德纯再邀北平各大学校长交换制止学生集会、游行意见。

△　天津各校学生开始总罢课，反对“华北自治”。同日，天津各大学校长、院长开会决定劝导学生复课，并规定指导学生运动三项原则：一、爱国运动须不带危险性；二、罢课期间应作研究工作；三、对当局要求条件不得太高。

△　广州市学生救国会成立。同日，安庆各校成立救国会。

△　上海复旦大学及附属高中全体学生向市长吴铁城请愿，提五项要求：一、取消华北自治组织；二、释放北平被捕学生；三、惩办压迫学生运动之官吏；四、保障学生爱国运动；五、讨伐殷汝耕。

△　厦门大学学生通电反对华北自治组织，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同日，长沙各校学生集会，议决援助北平学生运动。

△　驻华日使有吉晤蒋介石，询及行政院改组后之外交方针。蒋答：一本既定方针，决不变更。

△　河北武安县郭天庆等在日人唆使下组东亚同盟军第九路军，勾结天门会匪数千，倡言自治，在桃源沟一带滋事，县城危急。20日，第一一九师孙多荃部第六四三团自邯郸驰往协剿。

12月20日　　《中央日报》等11家报纸联合发表宣言，劝告学生“切勿罢课，切勿有妨碍秩序纪律的行动，勿做消极的破坏的爱国运动，与政府共同去做爱国运动，勿与政府对立起来去人自为战”。

△　上海暨南大学等40余校学生6000余人于昨夜出发，是日晨抵市府请愿，要求国民党中央制止华北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运动，出兵讨伐殷汝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要求市长立即释放交大本月9日被捕之学生李震声，保护上海爱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同日，武汉、梧州、长沙学生均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一切爱国青年同胞和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的义旗之下联合起来，到工人、农民、商民、军队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并声明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抗日救国青年团，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入。

△　南开大学学生300余人化装搭津浦路车赴京请愿，至沧县被路局阻止。学校派人苦劝无结果。22日，学生派代表五人赴京。教育部派员到沧劝学生返校。

△　杭州浙江大学学生决议赴京请愿。深夜，军警包围学校，军训教官率便衣进入宿舍指捕学生代表20余人（一说11人）。学生冲出学校前往车站，路局方面复拒绝上车。后经教授苦劝，并由省府将被捕学生送至车站，始整队回校，校长郭任远辞职。

△　红军二、六军团主力在武冈、绥宁边境，准备渡巫水。22日，在绥宁属瓦屋塘击退第六十二师钟光仁部进攻。26日，在武冈西北花园市一带与国民党军激战后，向黔阳一带前进。28日，主力一部

渡巫水抵靖县。桂军第七、第十五两军集结绥宁、武冈边境，阻红军入桂。

△　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兼河北全省保安司令，张自忠兼察哈尔全省保安司令。原任商震、秦德纯免职。

△　冀察政务委员会派戈定远代理秘书长，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

△　驻华日使有吉偕秘书有野访外交部长张群，转达日外务省对华意见。张群详释中国政府外交方针，并谈如何改善两国关系问题。

△　国民政府中央及河北省派驻塘沽各机关悉被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接收。

△　中国政府为平衡中美汇兑，是晚自沪运美白银4000箱，计2000万元。

12月21日　　上海市中华妇女同盟会、妇女生活社、妇女大众社、妇女园地社等百余妇女团体代表千余人组织上海市妇女救国联合会，以史良、王孝英、罗琼等11人为理事。史良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救国演讲。何香凝讲演，主张“全国妇女一致起来武装救国”。会议通过《要求政府取消冀察政委会》等决议案九件，并通电全国，发表宣言，支持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反对秘密外交，否认一切破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或协定，反对一切在中国境内由外人操纵的特殊组织。并在南京路、四川路一带游行示威。

△　桂林学生6000余人、民众2000余人及开封中等以上40余校学生是日均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

△　汉口学生4000人举行示威游行，至法租界被军警阻拦，未能到达日租界。同日，汉阳学生1000多人示威游行。

△　成都中学学生通电全国，反对伪自治组织，并电请政府准许学生从事救国运动，惩办北平加害学生之军警。

△　章太炎电宋哲元，谓："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23日，宋复电表示："重以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　北平社会局为制止学生运动，勒令各中等学校提前放寒假。

△　北平新增之日军300余开始撤往滦榆。津万国跑马场日关东军航空兵100余名亦开关外。22日晨又有日军180名离津开榆关。

△　日舰"出云号"自青岛驶往津、沽一带巡视。

12月22日　　河北省府主席宋哲元电令全省省立各校，诬称一二九运动"背景复杂，甚至共产党潜匿其间"，"遂至多数纯洁青年，均为少数不良分子所劫持"，令各校"即日提前放假"，以免学生"误入歧途"。

△　太原、扬州、苏州、保定等地学生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　北平学生联合会举行血衣展览大会，陈列"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运动中受伤同学血衣数百件。会场张贴"血淋淋铁的事实"七字大横幅。各校学生代表及学生家长2000余人到场参观。

△　武昌学生2000余人渡江赴汉口，联合汉口学生游行示威，沿途高呼"誓死反对一切丧权辱国协定"、"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等口号。

△　徐州学生联合会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请保护爱国运动，并释放被捕学生。

△　广西南宁学生会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公开外交，从速讨伐殷汝耕，释放北平被捕学生。

△　沪各界基督教人士刘湛恩、颜福庆、李登辉、朱懋澄等28人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称："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尽我们的力量，去作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

12月23日　　蒋介石令教育部召集交通较便省、市之专科以上学校及中学校长与学生代表，于明年1月15日到南京会见，"聆取政府方针"，并"贡献意见"。

△　国民政府派陆军中将樊崧甫为第四十六军军长；准免黄子咸第二十四师师长，遗缺由副师长李英升充。

△　南京中央大学全体教授166人发表告同学书，勉在不逾轨条件下从事救国运动。略谓："同人等爱护同学，始终一致，心存救国，尤与同学不殊。集议佥同，以最忠实恳切之词，告我同学，自今以往，虽强敌凌迫至于最后一刻，犹必尽职指授，毋敢懈怠；此外在不旷课，不违校纪，不逾轨范之条件下，凡有救国应为之事，必与同学共赴之。"

△　武汉、开封、安庆、徐州、宁波、南通学生分别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　经委会公路处长赵祖康谈称：全国公路九万公里可通车；广东省一万多公里，占全国第一。按：据赵氏称，我国公路民国十年仅一千余公里，民国二十年增至六万六千余公里。

12月24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北省政府，任命张吉墉、贾玉璋、梁建章、郑道儒、谷钟秀、张允荣、王景儒、段宗林为省府委员，张（吉墉）、贾、梁、郑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原任该省省府委员李培基（兼民政厅长）、李竟容（兼财政厅

长）、吕咸（兼建设厅长）、任基鸿（兼教育厅长）、张荫梧、南桂馨、刘逸南、梁子青免职。

△　国民政府明令交通部长顾孟馀未到任前，部务由政务次长俞飞鹏代理。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已故上将唐继尧。

△　上海学生在南京路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遭受英国巡捕攻击，学生五人受重伤，数人被捕。3000学生乘火车赴南京请愿，抵青阳港站时被预伏军警所阻。上海市政府为制止学生运动扩大，宣布戒严，并令各校提前放假。

△　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会计师公会、记者公会等14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请取消冀、察自治，讨伐叛逆，维护正当爱国运动。

△　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维护华北领土主权完整。

△　开封大、中学30余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支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提出严惩北平屠杀爱国学生凶手、保护学生爱国运动、抚恤死难同学等要求。

12月25日　殷汝耕宣布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称政务长官，以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李允声、殷体新为委员。辖区25县，人口500万。26日，公布组织大纲，并发表四厅、三处人选：民政厅长张仁蠡，财政厅长赵从懿，建设兼教育厅长王厦材，保安处长董凤祥，秘书兼外交处长池宗墨。战区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李允声等部，改编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第一、二、三、四、五师，张等分充师长。

△　下午5时，交通部次长兼外交部顾问唐有壬在沪寓遇刺毙命。

△　国民政府为制止学生运动，令军事委员会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蒋介石传谕，凡违反戒严令者，概以军法从事。翌日，南京、上海、武汉三市实行戒严。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全市各工会常务理事200余人谈话，指示“注意防范反动分子活动”。

△　湖北应城学生及民众千余人游行示威，并向县府请愿，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县保安队殴伤学生40余人。

△　江苏江宁县全体小学生2.5万余人发表《致全国儿童书》，号召全国儿童参加救国运动。

△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妇女节制协会、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中华妇女社、中国妇女会五妇女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保护爱国运动，立即讨伐叛逆，收复失地。

△　被阻青阳港之上海赴京请愿学生分抵苏州、昆山。部分学生被劝回沪。

△　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学生开会。决定26、27、28三日停课宣传学生爱国运动真相，并定26日联合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示威。是晚被蒋介石严令禁止。

△　芜湖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救国联合会，电请国民政府讨伐冀东伪组织，并电慰北平受伤同学。

△　外交部为日人佐藤在包头擅设电台事向驻华日大使馆抗议，要求制止。

△　天津市长萧振瀛借口“繁荣市面”弛禁烟赌，令公安局对鸦片

案件不得滥捕吸户，将由市府公卖土膏，限制购用；对以娱乐为目的的赌博，不得罚办；对娱乐场所更不得任意弹压干涉。

12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程远帆、伍廷飏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并以程兼财政厅长，伍兼建设厅长；伍未到任前，建设厅长一职暂由省府主席黄绍竑兼代。

△　平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反对冀察、冀东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等12项纲领，并起草对时局宣言，制定宣传大纲。同时，决定组织扩大宣传团；发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先组织华北学生联合会。

△　各地赴京请愿学生中途受阻。南通大学学生被阻于天生港。开封学生索车无效，在车站露宿。河南焦作工学院学生被阻于徐州。

△　南京《新民报》因登载学生运动消息，是日起被罚停刊三日。

△　旧金山华侨总会馆及美洲华侨拒日总会电北平学生支持爱国运动。内称："华北自治，自促国亡。诸君首倡反对，正谊可风，请唤起全民，合力救国，全侨誓为后盾。"

△　新编第一军参谋长续范亭，愤政府坚持内战，不抗日御侮，是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因剑不利未致死。

12月27日　　驻日大使馆代办丁绍伋衔命向日外务省提议在南京举行中日会议，调整中日关系。日方表示同意，并主张以广田三原则为重要议题。

△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选出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王造时、沈兹九、江问渔、邹韬奋、周建人、李公朴等35人为执行委员。是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提出

下列救亡主张：一、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公布过去的外交经过；二、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民族统一阵线；三、停止一切内战；四、武装全国民众；五、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六、罢免并严惩一切卖国亲敌官吏；七、对敌经济绝交，全国恢复抵制仇货；八、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

△　北平学生联合会召开大会慰问被捕、受伤同学，并向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各报记者及各校教职员致谢，参加者50余校学生千余人。大会并决议反对社会局提前放假命令，要求当局惩凶、赔偿医药费及保证学生有从事爱国运动自由。

△　上海赴京请愿学生在无锡被阻，宪兵并把前去交涉的上海学生扣押，无锡全市学生冒雨游行示威，冲破宪兵防线至车站与上海学生会合。上海学生自无锡被宪兵“保护”回沪。

△　南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数千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并向省府请愿。

△　蒋介石电令武汉戒严司令陈继承绝对禁止一切集会游行。

△　北平记者公会电请国民政府撤销新闻检查所。

△　沽源伪军李守信部向蒙绥边境进犯。伪热河省公署所委沽源、宝昌两县伪县长均到任，城门均改悬伪国旗。29日李伪军攻陷察省张北县。

△　刘桂堂股匪千余人窜犯河北南口附近40里之横岭子。原驻保安队罗紫宸部向昌平撤退。

12月28日　　苏联政府对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发出外交指示，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苏联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愿就蒋“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

△　开封大雪。赴京请愿学生露宿车站已二日夜，病者颇多。是日经政府会同学生代表商定解决办法如下：一、学生推派代表200人由政府妥送至京；二、代表启程后其余学生一律返校。

△　南通大学赴京请愿学生被阻天生港已三日，是日绝食抗议。

△　无锡全体印刷工人罢工，响应学生爱国运动，市各报为抗议警备司令部禁登学生运动消息，停刊一日。

△　苏州农民要求减租举行示威，警察开枪，农民死一人，伤数人。翌日，农民聚众千余捣毁警署，军队驰往镇压。

12月29日　　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应城学生被保安队殴伤事件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决议自30日起总罢课，并派代表赴应城慰问受伤同学。

△　宋哲元在天津私邸欢宴日驻屯军司令多田等陆海军将领20余人。

△　陆宗舆、高凌霨、劳之常、孙洪伊等组织“天津市公民协会”，宣称以“发扬民气，敦睦邦交”为宗旨。

12月30日　　商震请辞河南省府主席未准，是日赴豫履任。所遗津沽保安司令一职，由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代理。

△　武汉40余校总罢课。同日，武汉、太原当局为制止学生运动，令各校提前放假。

12月31日　　蒋介石为防阻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令薛岳第二路军即日攻取天全、芦山，并令刘湘饬部协攻。是日，薛岳策定先进攻红九军团在荥经西北之懒板凳、王家山、小河场一带阵地，然后歼灭红四方面军主力于天全、芦山地区。

△　红四方面军分别驻守四川雅河以南、芦山附近及金汤、丹巴一带，与第二路军及川军对峙。红二、六军团一部自芷江进至贵州玉屏附近。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南省政府，任命李培基、尹任先、张静愚、陈访先、方策、齐真如、常志箴、吕咸为河南省府委员；李、尹、张、陈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原任省府委员方策（兼民政厅长）、尹任先（兼财政厅长）、张静愚（兼建设厅长）、李敬斋（兼教育厅长）、常志箴、齐真如、张广舆、方其道免职。

△　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

△　国民政府任命傅汝霖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　行政院通过发行铁路建设公债2700万元，专充浙赣铁路南萍段筑路资金。

△　载至是日止，全国法币发行总额共6.72983亿元。其中中央银行发行1.76065亿元，中国银行发行2.86245亿元，交通银行发行1.80826亿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2984.7万元。

12月下旬　　中法越约公布后，越南方面于进口税之外巧立税目，任意估征，反较无约时纳税为重，上海电机丝织厂业及绸缎业等呈请行政院及外交部向法政府严重交涉。

△　财政部令中国建设银公司克期筹设不动产抵押放款银行，以“救济”地产业。

是月　蒙政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偕迪力瓦、陶克陶以及日驻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宍浦等到伪满新京（长春），会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并与副参谋长板垣、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谈。

决定由日本帮助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独立”，然后再建“蒙古国”，由日方给予财政上援助。德穆楚克栋鲁普接受关东军50万日元和5000支步枪，准备扩充蒙军。

△　上海市新闻记者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等71人发表《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根本撤废新闻检查，随时公开对日外交，坚决反对任何屈辱秘密协定，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收复失地，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前途。

是年　　国民政府本年度国家岁入岁出总预算及追加额，各为10.86049917亿元。国库收入总计13.513289902亿元，支出13.3692051051亿元。

△　国民政府本年对外贸易总额14.95120382亿元，不及1931年的40％，其中进口9.19211322亿元，出口5.7580906亿元，入超3.43402262亿元。

△　国民政府利用白银风潮，运用政权力量，以“金融公债”作股等方式，使官股资本在银行资本中占支配地位。全国164家银行中，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资本额占总资本额43％，而74家商业银行之资本总额尚不及中央银行一家之数。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存款额占115五家银行存款额60％以上。

△　国民政府全年发行公债达4.4亿元，其中：俄庚款凭证1.2亿元；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一亿元；二十三年关税公债一亿元；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7000万元；整理四川金融库券3000万元；二十四年水灾工赈公债2000万元。

△　据中央工厂检查处上半年调查，全国共有工厂6344家，工人52.1215万人。

△　据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调查：上海九家日本纺织公司共雇用中国职工4.4863万人，年用原棉216万担，出产棉纱34.2982万捆、棉布1150.5176万日匹。

△　天厨味精厂经理吴蕴初在沪创立天利氮气厂，资本150万元左右，年产液体阿摩尼亚1.98万担，硝酸3.22万担，硝酸铔铁1.86万担，硝酸钙3220担，氯化铔2720担。

△　山西阳曲县西北洋灰厂建成投产，资本50万元，日产水泥300桶（每桶约280斤）。

△　广东纺织厂全部建成投产。该厂绢丝麻纱部1月开工，资本53万余元；毛纺织部6月开工，资本94.8万元；棉纺织部9月开工，资本291万余元。

△　广东顺德糖厂、揭阳糖厂、东莞糖厂、惠阳平潭糖厂建成，资本各300万元（毫洋），三厂日产糖260吨（缺东莞糖厂产量）。

△　据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调查，由于工业设备简陋，不注意生产安全，是年全国各地工厂发生工伤事故2655次，死亡职工1506人，受伤4123人，工厂损失估计达1013万余元。

△　据日本外务省调查，在华日侨共5.5272万人，以上海为最多，共2.5万人，青岛、天津次之，三城市共占日侨总数87％，其余分散在济南、汉口和其他通商口岸。职业以从事商业为最多，共1.4134万人；公务员及自由职业者次之，共4045人；其余分布在工业、交通、水产等企业中。

△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全国22省1001县3960万农户中，全家离村农户192万余户，占总农产4.8％；有青年男女离家农户350余万户，占总农户8.9％。其中因水、旱、兵、匪灾荒离村者，占全部离村农民44％以上。

△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全国农村合作社共2.6224万个，信用合作社最多，占58.8%，其余为运销、购买、利用、生产、兼营等合作社。社员100.4402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2□。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1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发表广播演讲，题为《民国二十五年政府与人民应尽之责任》。同日，行政院长蒋介石发表题为《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的广播演讲，宣称以新生活运动奠定国家道德精神之基础，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促成物质文明进步；并称振兴农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整金融八项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主要工作。

△　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陈济棠一等云麾勋章；授予熊式辉、何键一等宝鼎勋章。7日，国民政府授予张学良一等云麾勋章。

△　国民政府按照1935年12月30日庐山管理局长蒋志澄与驻汉英总领事默思所订《牯岭产业地交还江西省政府协定》接收庐山牯岭英租界地，是日举行交接仪式。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3日，发布第一号布告，提出为在福建和闽西南区建立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决定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所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

△　上海民族救亡联合会致全世界各国友人书，要求立即解散卖

国的冀察“自治”政府和“冀东自治政府”，停止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一切外交事务都要公开进行等。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立夫偕张冲等自上海乘德国邮轮秘密赴欧，拟与苏联商谈对日军事同盟。

△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宁路新榆段监理处是日起截扣唐山以东各火车站每日收入路款。3日，铁道部长张嘉璈抵北平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北平市长秦德纯、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商议解决办法。7日，张嘉璈与陈觉生抵天津与驻津日军司令多田骏交涉。12日，决定北宁路新榆段监理处即日撤销，停止扣款，由铁道部北宁路局每月拨款10万元给冀东伪政府。

△　悍匪刘桂堂部数千人在日本扶持下在河北省延庆县永宁一带活动，与伪蒙军李守信部侵占察北六县相呼应。是日，刘匪一股在宛平、昌平交界处被第二十九军围击。5日，刘部千余人由平绥铁路西回窜永宁与石友禄等匪部汇合，向顺义县牛栏山、红螺山一带逃窜。7日，刘部攻入涞源县城。11日，大部集结南口附近，企图南窜冀、鲁、豫交界处盘踞。

△　上海市市民国货年运动大会开幕，以朱学范等17人为主席团。4日，通电全国，主张一致服用国货，拒用洋货。

△　上海天利氮气制品厂举行开幕典礼，实业部长吴鼎昌主持。该厂采用新式机器，制造硝酸等主要工业原料，日产硝酸1.3万磅，硝酸铔7500磅，液体氨8000磅，硝酸钙1300磅，氯化铔1100磅。该厂属天利氮气公司，资本100万元，后扩充至150万元。

1月2日　　日关东军参谋、驻承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代表日方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要求察北沽源、康保、化德、宝昌、张北、商都六县改驻蒙古保安队，并要求该六县的行政权一并让出，由日顾问及伪方人员接管。3日，蒋介石电宋哲元本维护领土完整原

则妥慎处理察事。宋电示察省主席张自忠察事交涉原则，对日所提察北六县改驻蒙古保安队勉为接受；但坚持伪军李守信部撤回多伦。

△　国民政府依照国联决议案，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实行经济制裁，断绝中意贸易关系。

△　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九十三团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与贩毒之日商大西洋行发生冲突。4日，天津日总领事川樾茂向宋哲元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一、正式道歉；二、撤销大沽驻军及公安局负责人；三、将“肇事”者逮捕、处分；四、赔偿损失；五、以后不得再有“侮日”行为；六、保障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16日，宋哲元在天津就大沽事件向土肥原、多田骏、永见表示道歉。28日，萧振瀛再与土肥原交涉，决定：一、赔偿400元；二、第二十九军不准进驻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东伪保安队负责。大沽事件解决。

△　上海市中华国货厂商联合会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抗议并制止在沪日侨发行纸币，并通告各会员一律拒绝使用。

△　日陆军省新闻班长根本博大佐自粤、桂考察后抵沪会见驻华日大使有吉明，并发表谈话，声称此次来华系奉陆军省之命，谋求“中日亲善”。6日，根本博抵南京。

1月3日　　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总指挥董毓华、江明、宋黎。辖四个团：第一、二团为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中学、镜湖中学等校学生。第一团指挥韩天石，第二团江明。是日，第一、二团出发，沿铁道东前进。第三团为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校学生，黄华、蒋南翔任指挥，于4日出发，沿铁道西南下。第四团由天津大、中学校学生组成，从天津直奔固安县城。8日，四个团在固安县城汇合，深入民间宣传抗日救国。

△　红军贺龙、萧克二、六军团大部抵贵州省铜仁。4日占玉屏。

6日占岑巩。后卫部队在湖南省芷江、晃县间的便水、上坪与“追剿”军何键部章亮基第十六师、李觉第十九师及陈光中第六十三师之一部激战，制止敌人急追。8日占领镇远等地。9日红六军团转移至贵州省江口，12日红二军团至石阡，作短时休整。由鄂西、川东和黔东突围之红六军团张振坤第十八师及地方武装亦于10日到达江口与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

△　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整治全国教育，尤注意整饬校风，严厉防范学生爱国运动。5日，蒋介石强令平、津各校学生放假，强迫学生离校。

△　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命赴苏联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国共关系，是日返抵莫斯科。

△　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旗潘王（潘第恭察布）在绥远省归化市（今呼和浩特）就任蒙旗“剿匪”司令，表示保蒙旗即保中国，当以最大努力，保全国家领土完整。

1月4日　　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与杨虎城自西安飞抵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陕北红军北攻榆林、绥德。5日，张、杨、高、毛抵榆林与井岳秀会商并飞往清涧、镇川、响水视察红军活动。7日，张等飞抵山西离石柳林与孙楚、杨耀芳会商对付红军办法。8日，张等又飞太原与阎锡山会商。9日，阎锡山为防止红军入晋，委杨爱源为“剿匪”总指挥，并于次日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军政兼施”，在军事上分工防守。

△　“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何键撤惩“剿共不力”军官，李觉“记大过二次，戴罪图功”；旅长邓南骥“革职留任”。

△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一文，首次公开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

△　山东省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致函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称，山东省灾民达200万人。

1月5日　　夜10时许，北平日兵30余名演习回城，朝阳门中国守军因开城门稍迟，驻守警士张玉亭及保安二队班长张巨挺等均被击伤。6日晨，北平卫戍司令部与日驻军派员调查，日方反诬“中国兵对日本军射击”，并由驻平武官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提出严重抗议。17日，宋哲元向关东军驻沈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等赔偿、道歉，惩办朝阳门事件中被打之中国军警，并应日方要求派石友三任北平保安司令，“朝阳门事件”了结。

△　中日双方在张北开会协商解决察北问题，日方主张察北问题应召开中、日、蒙、“满”四角会议就地解决，中方对此未表同意。同日，田中隆吉与多伦特务机关长植田、张家口武官大本飞赴长春，向关东军报告会谈情况。6日，宋哲元、天津市长萧振瀛就此事与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参谋长永见交涉。

△　蒋介石抵上海，与前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及段祺瑞等商谈冀、察外交及中日关系等问题。

△　胡汉民离欧返国。8日，陈济棠派其胞弟陈维周去南宁见李宗仁、白崇禧商讨对策。17日，李宗仁到广州晤陈济棠，主张两广应表示尊重胡汉民，邀其到粤主持一切。22日，李宗仁电召王公度赴粤，白崇禧嘱王转达李宗仁、陈济棠留胡在粤的三点做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

△　阎锡山为对抗中共土地政策，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等七个村试办“土地村有”，于上年12月22日在河边村召集“土地村有实施研究讨论会”，决定两项实施办法，即“真调查”与“假分配”。是日，阎对河边附近各村调查完毕，返抵太原。

△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地质学家丁文江在长沙因中煤毒转脑充

血去世。5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丁文江，谓其“对于地质一科精勤探讨，成绩尤多”。

1月6日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做人、革命与建国之道》，宣称：“大学之道，就是我们做人、革命和建国最基本重要的道理。”

△　中国工农红军闽北独立师黄立贵部由崇安、建阳根据地挺进敌后，是日进入屏南县境，旋克建瓯县之玉山街、迪口、临江、水吉、东溪等重镇，接着分散活动，开辟闽东北新游击根据地。

△　上海市华商卷烟公会为该会前任主席邬挺生被日人刺杀案召开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议决：一、分呈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缉凶究办；二、将邬挺生改良烟茶志愿、成绩及经过情形和设立河南许昌烟草公司之宗旨，送各报发表，广为宣传；三、邬君既因公被刺身亡，华商烟厂更应团结一致，以达同业自卫之目的。

△　日商在上海设日钞金库，发行纸币。同日，上海市商会劳资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家兴以日商此举破坏中国币制，特电行政院予以制止，并函告商会会员拒绝使用。

△　平津商会联合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请求救济商界。据统计，去年1月间北平商号总数为3.0106万家，至12月底减为2.8166万家，一年中倒闭1940家，目前尚有5000余家因营业不振，难以维持。

1月7日　　魏道明携蒋介石亲笔函由沪赴新加坡迎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返国。广东代表林翼中、李晓生，广西代表张任民、潘宜之也分别于8日、9日赴新加坡迎胡。

△　清华大学自行车宣传队与平津学联代表抵济南。是晚，齐鲁大学学生会召集全校同学听北平学联代表报告，并议决：一、健全济

南学生联合会组织；二、参加华北学生联合会；三、与平津学联发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四、筹备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后，齐鲁大学部分学生北上北平，部分参加清华自行车宣传队去南京。

△　前日本递信省政务次官、众议院议员中野正刚一行在北平访宋哲元、胡适等。当晚，中野正刚率日本东方会“满友视察团”赴济南、青岛视察。13日，中野正刚等到南京访张群。

1月8日　　宋哲元在保定就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并在南操场对全城民众训话，声称今后方针：一、枪口不对内；二、肃清共产党。

△　国民政府任命杨永泰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商震兼河南省保安司令；准免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职，遗缺以索诺木喇布坦继任；任命巴宝多尔济为乌兰察布盟盟长兼保安长官，原任云端旺楚克准予免职。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檀香山侨商陈宽捐资兴学，陈历年捐助国内外学校经费12万元以上。

△　日本外务省会议决定对南京会议方策，要求中国政府“提出以日首相广田三原则为基础的亲善具体方案”，“对于排日抗日运动，采取灭绝之措施”。日军部主张华北问题直接办理，不经过外交会议。

1月9日　　国民党中常会选任云端旺楚克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条例》。

△　平津金融维持会开首次常委会，推选萧振瀛为委员长，秦德纯为副委员长，并讨论救济平、津商业等问题。11日，萧振瀛召集冀察政委会经委会委员及银钱、商界代表周作民、姚泽生等会商救济平、津商业问题，决定由中央银行贷款150万元，中、交两行各100万元，四行各40万元，余行酌拨；各商号以房产、货品、铺底作抵押，并决定由经委会、银会、钱会、商会合组北平救济市面贷款委员

会，由张季鸾召集，于15日开会审查抵押品。

△　上海各大学教授沈钧儒、王造时、曹聚仁、周新民等60余人，发起成立大学教授救国会。决定援助全国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负起领导学生救亡的责任。

△　中国工农红军徐海东部、刘志丹部2000余人在陕北与井岳秀部激战后抵韩岔。

△　海南岛设置乐东、保亭、白沙三县。

△　天津日驻屯军参谋长永见在津召集华北日军武官会议，讨论增加华北驻屯军兵额及恢复华中日驻军等问题，北平日使馆武官今井、山海关特务机关长竹下、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济南武官石重、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大本、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石井以下全体幕僚均参加，日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亦出席。13日，日陆军省新闻班长根本博携此次会议议决案及华北、华中驻军扩编预算赴长春，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后回国。

△　伪满中央银行自去年12月20日至是日止，每周平均发行钞票1.7835亿元。

1月10日　国民政府令：《边远省份公务员任用资格暂行条例》是日起施行，定期三年，暂定新疆、宁夏、青海、贵州、甘肃、西康六省为适用省份。

△　北平学界代表胡适、梅贻琦等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之谈话会。12日，梅贻琦等向教育部长王世杰报告平市学生运动情形。

△　各国驻北平使节对察北、冀东及中日将在南京召开调整中日关系会议等问题，甚为注意。是日，驻华英大使贾德干由北平抵南京，13日会见张群。驻华法代办贺柏诺、苏联、意大利大使、美国、德国使馆参赞均先后到南京访晤张群。

△　国民政府首席财经顾问李滋·罗斯等在华北视察完毕返沪，是日由上海抵南京。13日，蒋介石宴请李氏。14日，孔祥熙会见李氏。16日，李由南京抵汉口考察经济，17日在汉口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行长谓：中国改革币制获意外成功，中国关税以不增加为妙，英国对华投资用途着重交通建设设备。20日，抵重庆访金融界。26日，返上海。27日，李在沪晤日使馆武官矶谷，发表对于中国币制改革的意见，说明英国对华援助态度，并听取矶谷意见。

△　上海特区人力车夫一万余人罢工，抗议“人力车夫互助会”拒绝借款救济。

1月上旬　　原张学良东北军第一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于上年10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获后，受红军优待和教育，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请求自愿去洛川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得到中共同意，于月初离瓦窑堡，前往洛川东北军防地。

1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辅币条例》，凡九条。采10进分位法，发行五分、十分、二十分镍币及一分、半分铜币。规定辅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其发行由中央银行专司之；伪造辅币及妨害辅币信用者依法惩治。

△　国民政府任命程潜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特任张作相为军事参议院参议；派豫宗濬为新疆伊犁屯垦使。

△　冀察政务委员会经委会在北平成立，以萧振瀛、张振鹭、王绍贤、冷家骥、钮传善、过之瀚、林世则等为委员。

△　国民政府军委会派晏道刚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

△　日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永见等在青岛举行会议，讨论增加华北驻军、恢复华中驻军等问题。12日，矶谷、板垣与伪满洲国

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到济南，策动韩复榘加入冀察政委会。

△　河南省六河沟煤矿工人因厂方积欠工资四个月，减薪20%，全矿工人5000名罢工。13日，实业部派劳工司长唐飞健抵六河沟调解，商定解决办法14条，为维持该矿营业计，决定减少工人工资50%，限期三年，非经呈准实业部，不得延期；厂方限期发给工人所欠四个月工资。双方同意接受，工潮遂平。

△　台湾日驻军参谋长荻洲少将抵福建省考察。15日到厦门访蒋鼎文等。17日，离闽去广东省汕头，飞广州转赴广西，与华南诸要员会谈。日方认为荻洲此行，为日对华南政策一大转机。

△　伪冀东防共自治军赵雷部奉殷汝耕之命侵入塘沽，占领新河、军粮城等产盐区，并向长芦盐运稽核所索款每月60万元，否则停新榆段运盐车辆。是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辖区内设立大隆大兴公司，专售辖区内所产食盐，归日人主持，长芦盐冀东销场完全断绝。

△　伪满洲国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在通县访殷汝耕，并代表伪满洲国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军事、外交、交通协定。

△　据《申报》讯：日实业家纷纷来华接洽投资，日在华纺织同业领袖船津辰一郎由东京抵天津，拟考察天津、济南、青岛三地纺织业，准备投资。“满铁”天津事务所派调查课长野中时雄赴山西调查矿业，拟投巨资。晋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标航、大同矿业公司经理梁世樵，应“满铁”事务所邀请到天津洽谈日投资开采大同煤矿事。

△　伪满洲国公布全境人口，截至去年底为547.4321万户，3286.9054万人，其中日本人、朝鲜人占413.6932万人。

1月12日　　日本增设驻绥远特务机关，以羽山喜郎为特务机关长。

△　天津日驻屯军参谋中井升太郎偕和知鹰二与羽山喜郎往太原访阎锡山，又访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策动晋、绥加入冀察政委会。24日、27日，土肥原两次飞太原策动阎锡山参与华北五省自治。

△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回长春请示解决冀、察问题办法后，是日抵天津。下午，殷汝耕偕秘书池宗墨自通县抵天津与土肥原、多田骏等商谈冀东、察北事件。

△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实行《自治保甲法》，公安局改组，局长由区、村“选举”，警长、警察也由各村“选送”，各县成立联甲长，负责征收田赋附加杂税。

1月13日　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莫斯科会谈，邓表示此来系代表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团“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并提出国共合作应该解决两个具体问题：一、统一指挥；二、取得苏联援助。双方表明了合作抗日的愿望，但对统一指挥及苏联援助存在分歧。

△　日本政府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下达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纲要》声称：“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目前通过宋哲元来进行……逐步实现实质性的自治，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当前的目标在于使南京政府毫无实行反对日满政策之余地……其他则逐步进行。如希望赶快获得独立权限，则应力求避免。”“我方的指导，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方面，并抓住大局”，“不推行被人认为扶植满洲国之类的国家政策。”

△　《北大周刊》第二期上发表平津学生联合会对时局通电，揭露国民政府“为缓和舆论、消灭运动计，乃一面宣布各地之戒严令，一面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入京”，“借训导之名，而行欺骗收买之实”。“且所谓学生代表，乃当局所指派……所能代表者若何”，“如政

府立即对日宣战，实行革命外交，恢复民众组织及爱国言论、出版之自主，则吾侪不但入京听训，且将入京叩首”。“但四年来政府行径适与人民背道而驰，非人民不信政府，实当道自绝于人民”。

△　清华大学20多名学生组成的自行车宣传队到达南京进行爱国宣传。17日，被宪兵押送回北平。

△　广州学生罢课，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西南政务委员会指使“市民救国除奸团”阻止，击毙学生一名，伤逾百。事件发生后，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辞职。陈济棠令其第一集团军总部宣布戒严，禁止罢工、罢课，取消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并在各机关门前架设机枪，派军队分驻各校。同日，大队学生前往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凶手，保障学生安全。14日，广州军警又大举搜查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及中学校舍，致使学生1000余人被迫到香港暂避。

1月14日　宋哲元由北平抵天津，15、16日与关东军驻沈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等会商，宋建议任殷汝耕为天津市长，取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日方拒绝。日方表示，须华北关税独立，盐税、烟酒税等不得向南京政府提解，邮政、电报、航运、铁路也须自主；由日方“开发”农村；冀东改为特别行政区，仍以殷汝耕为该区行政长官；成立冀、察两省地方参政会，选出所谓自治运动派为参议员，监督冀、察政务。俟上述条件一一实现，日方即令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销。30日，宋哲元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萧振瀛会商对策。

△　国民政府派陆军中将刘兴为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

△　行政院决议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司令，张发奎为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

△　冀察绥靖公署在天津成立，主任宋哲元，参谋长富占魁，总参议石敬亭，秘书长王式久。

△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到达高碑店遇阻，被便衣警察武力解散。第三团负责人蒋南翔等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继续进行抗日救亡的建议。16日，该团在燕京大学开成立会，团章规定“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宗旨”。21日，南下第一团和第二团部分学生抵保定，活动受到河北省政府的限制。在第一、二两团合并的全体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议。

△　国民政府明令特赦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被处徒刑七年之施剑翘。

1月15日　蒋介石为遏制“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京召集各地中等以上学校师生代表360人开谈话会，北平各大学学生会拒绝推代表参加。会上由胡适、张伯苓及北平市中学代表等发言，要求惩办汉奸、公开外交、反对任意修改教科书等。16日，蒋介石讲话，声称“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之条约，也决不订秘密协定”，“为维持国家生命计，不得已时决不惜为最后之牺牲”。要求学生“守纪律、负责任……勿受人挑拨离间，勿因爱国之故而反毁坏学校或社会秩序”。同日，谈话会结束，参加该会之全国18省、市中等以上学校校长164人发表宣言，主张：一、拥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信任政府，并反对任何分离运动；二、尽力实施切合国难时期需要之教育；三、保持教育的生命，制裁罢课及“破坏纪律”之举动。

△　陈独秀、彭述之的徒刑执行已届两年，当局拟送苏州反省院“感化”，遭陈拒绝。

△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小学教科书改订为亲日内容，是日向“日满文化协会”要求指导及援助，并由殷汝耕颁布冀东各学校更改课本令，实行奴化教育。

△　浙赣铁路南昌至玉山段通车，是日在南昌举行通车典礼。

△　黄河凌汛暴发，河南省贯台、孟岗大堤决口，河南封丘、河北长垣两县交界处被淹500余村。

1月16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谈话称，美电传我售银10亿元于美，非确数，计自前年来售银于美，前年为2000万元，去年12月为3000万元，总计5000万元。

△　财政部通令，兑换法币延期三个月，至5月3日止。

△　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洛川会见张学良，详细报告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和切身感受，劝张与共产党团结抗日。张决定与共产党谈判，让高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高于是日返回陕北苏区，将同张会见经过报告李克农。

△　据《申报》讯：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武藤中佐在华北及“满洲”视察各地实情归国后，即向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首脑部作详细报告。两部鉴于华北形势之复杂，决定改编日本之华北驻屯军，并强化其就地作战之准备，使其实力超过英、法、美等国之驻军以上。因对苏、蒙关系紧张，关东军实力尚须积极充实。同时，对于驻兵制度，将改革现在之交代制为常驻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以日驻台湾军司令部为准绳，加以扩充。

△　日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飞返长春向日关东军报告华北形势，关东军随即召开全体幕僚会议，主张“华北问题由日本军人直接办理”，不经中日外交会议。认定国民政府倡议召开之中日国交调整会议乃“华北自治运动牵制策”及“国内人心收揽策”，无甚必要，任外务省与国民政府折冲之，并就所谓华北“共同防共”、“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具体商议。

△　安徽省地方银行总行在芜湖正式成立。

△　同蒲铁路南段筑至蒲州镇终点，与黄河南岸陇海路潼关站衔

接。

1月17日　国民政府公布《冀察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凡12条，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政务便利起见，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综理各该省、市一切政务”，“本会在中央法令范围内，得拟定单行法规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备案”。后国民政府与冀察政委会又在财政方面就关税、盐税、铁路收入等分配达成原则协议，于2月1日批准施行。

△　邓文仪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会谈，邓提出三项条件：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它的全体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年至1927年的合作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可以独立存在。王明指出，红军与国民党若合作抗日，第一位的条件是互相信任，停止内战。经过协商，双方决定派代表回国内去谈判，南京方面承诺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

△　内蒙伊克昭盟防共总指挥兼达拉特旗“剿匪”司令康王在绥远见傅作义商议共同防共办法，当晚又赴太原见阎锡山报告伊盟防共情形，并请示伊盟与绥远联防办法。

△　王宠惠辞海牙国际常设法庭法官职。

△　伪蒙军李守信部侵占张家口至多伦的公路要隘大清门。

△　伪蒙古保安队卓什海部2000余人开到距绥远省平地泉70里处。傅作义、曾延毅、李服膺等部在绥东陶林、兴和、平地泉、丰镇至晋北得胜口、大同一带布防，防止伪蒙军西犯。

△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声明，主张恢复国联之满洲问题委员会，由美、英、苏三国合作制止日本侵略中国。声明并称美、英两国如认日本侵略中国之目的在预备进攻苏联，则英、美两国殆有卷入世

界大战之可能。

△　驻天津日总领事在津召开会议，各分馆领事、副领事均出席，决本支持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关税自主，与殷汝耕缔结互惠协定，助其防止漏税日货入境。

△　山东省鄄城退埝及董王民埝先后被凌水撞溃决口，鄄城、寿张、郓城、范县四县良田万顷被淹。

1月18日　北平市长秦德纯致电行政院长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称："平津学生联合会近来秘密进行甚力，其扩大宣传之要点：一、反对学生赴京代表；二、对于政府外交力持反对态度；三、要求停止国内战争；四、到处募捐，并组队向各县乡村宣传；五、组织武装纠察队，把持学校，压迫放假学生，不准离校；六、男组纠察队，女组妇女救国会，准备秘密危险工作。……显系共产党从中主持……究竟如何制止……伏乞电示方略。"28日，蒋复电秦称：据教育部称，"平、津各校学生如有共产分子作违法之活动，应由当地政府会同各校长妥商制裁，已由部密令各校及本市社会局转行各校遵照"。

△　阎锡山在太原与杨虎城商议"剿灭"红军办法。

△　行政院下令自是日起察哈尔省右翼四旗改隶绥远省政府管辖。

△　广东、广西两省政府对日向该省所提取缔抗日运动之要求予以答复，谓日方如不停止其在华北侵略行动，两省政府不能制止纯出爱国热情之学生反日运动。

△　中国社会教育社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年会。出席代表220余人。由梁漱溟任主席。本届年会以"社会教育助成地方自治并促兴社会生产"为讨论中心。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与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商议对华方针，

声称：一、日中两国调整国交，除具体实践去年秋季广田外务大臣提出之三原则外，无其他方法；二、华北为中、日、“满”三国之接近地带，要求中国政府善处。

1月19日　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胡汉民自法国返抵香港，蒋介石派司法院长居正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兼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中央委员陈策抵港迎接。胡在港对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声称：“余之党政主张，一如往昔……党应恢复有主义有精神之党，力除过去灭裂涣散之错误。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28日，居、叶、陈返南京见蒋介石报告迎胡经过并面交胡致蒋亲笔函。

△　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打通抗日前进道路，响应全国抗日运动，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　北平学生联合会召开执委会，议决：一、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二、各校开学时，各同学一律复课，但要求校方施行非常时期课程。

△　日人东北财政专家星野抵通州，调查冀东经济状况。

1月20日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陕西洛川与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张学良会谈。李说明中共中央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一致对外的主张。张表示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的颇不乏人，只要中共确有团结抗日的诚意，他愿为此而奔走。张“不同意讨蒋”。

△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立，主席委员陈中孚及委员陈觉生等六人宣誓就职。

△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各县应遍设乡村小学。

△　邹鲁、李宗仁等在广州开会讨论宁粤合作问题。

△　李宗仁过广州赴香港迎接胡汉民，发表一文，略谓："政府必须牢记，日本目的在实施大陆开拓政策，两国合作计划不足以解决目前难关。"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由石阡西进，突破镇（远）、黄（平）、余（庆）封锁线，24日抵瓮安，26日，占领贵定并攻占平越，击毙平越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聂光。贵阳市宣布戒严。

△　安徽省淮南铁路通车，自淮南矿山之田家庵经合肥、巢县等地至芜湖对江之裕溪口，全长220公里，主要运输淮南煤矿之煤，并兼营客运。

1月21日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贵族院演说外交方针，提出对华关系本三原则进行：一、中日两国积极亲善提携；二、中国承认"满洲国"，调整中、日、"满"三国关系，以保东亚安定；三、中日共同防共。并称：中国政府业已对帝国所提出之三原则"充分谅解"，"表示赞成"。

△　广东省汕头市日领署警员角田进患严重肺病倒毙街头，日领事诬指被华人枪杀，要求中国当局处理。22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下令军舰"夕张号"自厦门驶抵汕头示威。23日，该舰对汕头市海角石鸣枪百余响。29日，"朝颜"、"芙蓉"两日舰由福州开往汕头。31日，驻汕日领事向当地政府要求缉凶。

△　行政院决议通过发行铁路建设公债1.2亿元，拟兴筑湘黔、川桂等铁路干线及补助平绥、正太、胶济等铁路展长旧有路线之用。

△　上海复旦大学等七八校学生代表在南翔开会成立"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分赴嘉定、太仓、昆山等县进行宣传。25日，

组织昆山民众救国会。27日，到苏州宣传，被军警押送回上海。

△　外传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与蒙古保安队长卓什海宣布独立，用成吉思汗诞生后736年为年号。是日，德王电国民政府否认。

1月22日　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要求苏联充当国共关系的调停人，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南京政府。大使表示苏联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应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必须同中共直接谈判，谈判可以在莫斯科进行，但苏联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在谈及中苏签订军事互助条约时，蒋介石希望当日本入侵蒙古、绥远和山西等西北地区时苏联能依据条约规定，承担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义务。

△　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曾接受“广田三原则”。略谓：广田外相于去年9月中向蒋大使所提出之三点，“我方以措词过涉空泛，无从商讨，当要求日方提示其具体内容，日方迄今尚未提出，而广田外相演说谓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

△　驻南京日总领事须磨见外交部长张群，传达日外务省对召开中日两国关系调整会议所持态度，要求具体实践“广田三原则”。

△　蒙政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窃用蒙政会名义，擅将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四个牧群改为察哈尔盟。是日，察哈尔盟公署在张北成立，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达密凌苏龙为副盟长。自此，察北六县完全脱离察哈尔省政府管辖。

△　德国远东经济考察团团长克朴、团员罗森柏抵南京访外交部长张群、实业部长吴鼎昌。23日，访财政部长孔祥熙、代理交通部长俞飞鹏、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秦汾，了解中国经济情况。克朴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声称：“中国为德国一最大市场，而德国也为中国之原料与其他产品之购买者。”

△　国民政府公布《中医条例》，凡10条。

△　法国政府驻华使节升格，任命那其亚为驻华大使，并决定使馆于三月后迁南京。

△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反党的非法组织，并在全党公布其错误。27日，张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

1月23日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同日，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致信蒋介石，代表毛泽东、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　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蒙政会委员、军政部明安牧场场长尼玛鄂特索尔（尼冠洲）赴张北与卓什海、德王等商察旗问题，是日下午2时由张北返张家口途中，在万全县猴儿山附近被日本特务拦车击毙。

△　国民政府通令直辖各机关暂缓推行简体字。按：上年8月21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324个。

1月24日　　外交部声明未承认“广田三原则”后，华北人心大慰。是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太原见阎锡山后回天津，与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对此有所集议。

1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20位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该信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

△　国民政府明令设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

会，任命沙克都尔札布等20人为该会委员，并指定沙克都尔札布为委员长，巴宝多尔济、阿拉坦鄂齐尔、潘第恭察布为副委员长。同日，公布《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凡15条。内称该会直隶于行政院，办理乌兰察布盟所属各旗、伊克昭盟所属各旗、归化土默特旗、绥东五县右翼四旗地方自治事务。会址设于伊金霍洛。

△　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称："平津学联会始则嗾使各院校学生自治会反抗政府劝令，不推赴京听训代表，公然在各报登载启事，反对学校当局奉令指派之代表，侮辱国家尊严，淆惑国际视听，已擅出刊物毁谤政府，结队赴乡对政府作种种不利之宣传，意在煽惑民众，激起民变。……哲元既膺政府支持华北危局之重任……只有电请钧座转令教育部迅饬各该院校于2月1日上课以前，将下列各事先行办竣：（一）解散各学校学生自治会；（二）解散平津学联会；（三）开革鼓动风潮之不良分子；（四）严禁结队游行及赴乡鼓惑民众。"

△　日本军部为召开重要会议，决定对华根本方针，特召驻华日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返国。24日，矶谷由上海抵南京见张群，是日见蒋介石。蒋对矶谷宣称，"调整中日外交关系一举，不应坐失机宜"。矶谷晤蒋后谈称，蒋对改善中日两国关系具有十二分之决心，并称蒋"实已彻底了解日本之立场，实有真诚努力于两国国交改善之真意"。26日，矶谷返上海，30日搭船返日。

1月26日　宋哲元电国民党中央，保荐钮传善、陈觉生、陈中孚三人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　行政院会议决议江西、安徽、湖北三省重划江界：改划长江北岸三省界应以天然长江为界，南北分界以江中重要水道为准，马当及张家洲等处以江之北泓为界，长江北岸皖、鄂两省省界仍旧。

△　胡汉民昨由港乘舰抵广州。是日与陈济棠、邹鲁、萧佛成、

李宗仁、林云陔等会商时局。29日，胡与陈、李等再次会商，李认为："日本所持之大陆政策，其目的在吞并东亚，夷中国为殖民地，我国东北之被蚕食，是其一种过程，其最终目的在囊括全亚洲，以应其大亚细亚之梦。我整个民族国家生存权绝对不能断送在外交当局，今后应力矫前非，公开外交，使国民均有参加与监督机会。"

△　张学良飞抵南京，次日见蒋介石、冯玉祥报告陕西军情。

△　上海工商业界王晓籁、虞洽卿在南京见蒋介石，陈述上海市工商业不景气情形，请求低利贷款救济。次日，虞返沪谈："上海市工商业衰落为数十年所仅见，若不救济，将难支持。"

△　悍匪刘桂堂在河北省境啸聚匪徒一二千人入河南武陟一带，意图扰鲁。是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决定派第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为防剿总指挥，率部赴鲁西一带防剿。

1月27日　蒋介石在南京中央纪念周讲《公务人员训练的意义与政府财政经济建设的方针》，宣称要对一切公务人员加以训练，"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能"；严惩贪污官吏，建设"廉洁"的政府。

△　中日新派大使人选，经双方同意，中派许世英，日派有田八郎。

△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北平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马叙伦、武新宇、涂长望、许德珩、曾昭抡、刘尊棋、齐燕铭等150余人参加，选出马叙伦、白鹏飞、陈豹隐、张申府、许德珩、李达、崔敬伯等31人为干事，推马叙伦为主席、白鹏飞为副主席。并通过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所提出的一切主张，"坚决地反对正在进行中的广田三原则下的亡国外交，以及一切断送华北的新阴谋"，"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　蔡楚生和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

△　中日贸易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选出中国理事周作民等21人，日本理事船津等四人。会章规定该会在日本称日华贸易协会，“以共同研究中日两国间之经济状况，促进两国贸易为宗旨”。各设总会于中国上海及日本东京，设分会于中日各重要商埠。同日，日华贸易协会在东京成立，以儿玉谦次为会长，饭尾、周作民为副会长。2月1日，中日贸易协会首次理事会议推周作民为会长，徐新六为副会长，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兼该会副会长。

△　武汉学生罢课已一月，是日武汉学生救国会第四次全体代表大会通过救国工作原则，并决定即日起一律复课。

△　日陆军省议决扩充华北日驻军案，陆相川岛、次官古庄、军务局长今井及天津日驻屯军参谋池田等出席。

△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新编滦县民团萧再兴部千余人奉殷汝耕命开驻昌平，与当地石友三部保安队冯寿彭部冲突，萧部占领县城。

△　上海《晨报》停刊。

1月28日　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境内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华堂为副总司令。

△　林彪红一军团在陕北延长县临真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该军团下辖三个师：陈赓第一师，刘亚楼第二师，陈光第四师。共计6500余人。

△　贺龙红二军团由平越抵龙里北之虎场，一部向贵阳挺进；萧克红六军团由牛场向西，于29日渡过清水江，在开阳之羊昌集中。30日，红二、六军团从洗马河、羊昌向西挺进。31日进抵贵阳北面扎佐镇，歼敌两个营。

△　行政院训令教育部整饬学校秩序纪律，声称：“凡以任何方式

妨害学校课业之学生，应立即严令离校。校内、校外尤不得容许任何团体为煽动罢课或干涉学校行政或妨碍社会秩序之举，地方军政机关查有从事此种煽动行为之团体，应即予以制裁。”次日，教育部通令各教育厅及各院校，宣布国难时期教育宗旨。

△　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自南京取道粤、桂返黔，是日抵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剿共”军事。

△　驻华日大使有吉明到南京向林森、蒋介石、张群等辞行。29日，国民政府颁给有吉明红色白镶大绶采玉勋章。

△　上海农、工、商、学、妇各界代表800余人集会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通过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选沈钧儒为主席，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刘良模、沈体兰、沈兹九、张定夫、潘震亚、顾执中、潘大逵、彭文应、沙千里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市的抗日救亡运动。会后全体代表由主席团率领，步行至庙行镇，公祭“一二八”抗战无名英雄墓。

1月29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此系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明“联蒋抗日”的态度。

△　蒋介石密电复宋哲元25日电称：“对于不守纪律、妨害课业之学生，或从事煽惑罢课，或干涉学校行政，或妨碍社会秩序之团体，应分别由学校及地方当局严格制裁，已由院指示办法，令饬教育部及各省市政府遵照。”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甘肃省政府，任刘广沛、朱镜宙、田炯锦、许显时、喇世俊、张维、周从政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刘、朱、

田、许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章太炎致函冯玉祥，请冯向蒋转达其国事意见。函称：“敌人所以侮我者……一者上下相疑，二者人心渐去，三者赏罚倒置。”2月3日，冯持函晤蒋，痛陈章函所说三事均切中时弊；并称，现在的军队，一师与一师的人数不同，饷项待遇各异，对将来抗日有极大危害。

△　云南省与缅甸勘界委员会首段界线争执由该会主席伊立舍氏判定：即由南丁河北已定97号桩起，向西南近南滚河流入潞江处，再溯南滚河而上定线。

△　驻伪满日领24人在长春举行会议，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说明对“满洲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声称对违反日、“满”国民融和之优越感“宜充分训戒”。

△　伪满军百余人在连长周定萨带领下反正，杀死日军官四名，从金厂沟退入苏联格罗地科伏地区。30日，日“满”军一连侵入格罗地科伏地区，被苏联边防军击退。同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提蒙尼亚科夫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太田提出严重抗议。

1月30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电促胡汉民入京主持中央大计。胡因与蒋介石政见不一，复电林、蒋，借口“须稍休养”，拒不去京。

△　国民政府公布《第二期铁路建设公债条例》，凡13条。规定发行公债2700万元，专充玉萍铁路南萍段用，年息六厘，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30日本息偿清。

△　天津市府奉令改组，直属于行政院。

△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共同发起组织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是日在燕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推马叙伦为主席。

△　黑龙江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

1月31日　中共中央军委在陕北延长开会研究东征战略方针，毛泽东称：我们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会议决定了东征进军路线，部署了兵力，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　胡适撰《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一文，2月2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2日声明否认业已赞同“广田三原则”，“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第一壮举”；希望政府“全数公布那些造成今日华北危机的各种交涉文件”，包括1933年的《停战协定》、1935年的何应钦、梅津谈判和察东谈判。

是月　宋子文和宋庆龄商议，由宋庆龄出面邀见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中共地下党员），交董一信，请他送瓦窑堡交毛泽东、周恩来，传递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向。为了保证董旅途安全，宋子文为他谋得财政部调查员名义。

△　中共北方局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专程赴南京，旋经吕振羽介绍，周小舟同国民党方面的谌小岑见面。谌转达陈立夫、曾养甫的意图，要求中共和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则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国民党代表则要求中共：一、协助联苏；二、要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

△　高崇民从上海到达西安，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又见杨虎城，建议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杨表示同意。

△　宋哲元派第二十九军教育处长兼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赴南京见蒋介石、何应钦要求扩军。何允宋“可以成立混成旅，每旅以步兵两团为基干，装备和饷项由中央筹给；保安旅由地方筹给”。

△　日本关东军制定《对蒙（西北）措施要领》，决先对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进行整顿巩固，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日陆军省据此制定《对内蒙措施实施要领》，规定对内蒙目前时期的工作范围为锡盟、察盟、乌盟及阿拉善地区，使中国政令达不到这些地区。关东军对内蒙军政府的指导，应依靠隐蔽和内部进行工作，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以最小限度的日人顾问团等辅佐之。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以亲日、“满”为基准，以建设蒙古人的蒙古为根本。

△　1月份南京市人口，经首都警察厅调查竣事，人口总计101.7934万人。

△　日本松井石根大将嗾使李盛铎、高凌霨、齐燮元等19人发起的“中国大亚细亚协会”在天津成立。《宣言》声称：“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亚洲各国“应赤诚相见，孜孜谋求其共同利益”。

2月

2月1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与上海金融界、商界领袖及持券人公会代表杜月笙、俞佐庭等商定，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复兴公债3.4亿元，用于收换旧发债券，健全金融组织，扶助生产建设。4日，行政院通过两公债条例。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发行。

△　是日至4日，军委会禁烟委员会总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到总监蒋介石、委员许世英、吴鼎昌等24人，讨论依期完成禁烟计划。宣言昭告国人三项：一、政府确已下最大决心，务于六年内禁绝烟毒；二、政府决不因少数禁烟税收而改变其六年禁绝烟毒计

划；三、各界民众应作政府后盾，并督促其进行。

△　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自济南至乐陵会晤在原籍扫墓之宋哲元，就“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定华北等问题”举行会谈。据宋称二人谈话内容，对于安定华北大局，“虽无何决定，但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凡不利于国家民族者，决不办理”。

△　交通部代表赵以麐与法国驻昆明副领事康栋在昆明签定《中国沿边三省（云南、广东、广西）与法国越南有无线电通信制度协定草案》。

△　红军贺龙、萧克二、六军团自洗马河、龙里绕过贵阳进抵修文，2日西渡鸭池河，3日占领黔西，5日进抵大定。7日，“追剿军”前锋抵黔西大虎场。

△　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正式队员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李昌，主要领导人有敖白枫（即高锦明）、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孙传文、顾得欣、李哲人等。16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发表宣言，指出“中华民族的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一）揭破汉奸及其走狗的阴谋，并打击其种种阴谋的破坏手段；（二）联合一切抗日反帝力量，无党无派，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致团结起来”；并提出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抗日救亡会等八项具体斗争纲领。

△　“左联”所编《新文化》于上海创刊，发表同人的代发刊词《新文化需要统一战线》，刊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论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　西康大金寺喇嘛代表尼玛慈仁等三人抵南京，向蒙藏委员会陈述大金寺被驻军焚毁情形，请求救济。3日，翁文灏召见大金寺喇

嘛代表，询问寺庙被焚情况。

△　贵州省盐税由中央收回，此后每年由四川盐运使署直接拨付该省协款150万元，另加拨12万元作为教育经费。该省盐务处亦自是日起裁撤。

△　据《大美晚报》北平特讯，冀、察外交谈判无效果，土肥原仍坚持华北五省“自治”主张，不肯让步，认冀察政委会系过渡组织。日方曾提出察哈尔省不驻军及脱离中央“独立”的要求，宋哲元未同意。日方认为冀东及察北问题系“家内”问题，无讨论必要，目前仍侧重华北五省“自治”之实现。

△　驻陕北榆林之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所佩手枪走火，中弹自毙。

△　北宁路局近因该路各列车时有日、韩浪人行凶及走私等情，局方竟请日本宪兵押车，借以取缔私运。

△　天津北洋工学院部分学生将学校指派赴南京之“学生代表”所有衣物、书籍焚毁。晨1时，天津保安队400人及便衣侦探四五十人包围该学院，与学校当局按名单逮捕学生刘莹等七人，打伤学生多人，激起学生愤怒，将总务长及训育主任殴伤。2日，驱逐校长李书田，风潮扩大。5日起，学生自治会组织纠察队维持校内秩序。

2月2日　　贺龙红二军团、萧克红六军团抢占鸭池河渡口，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全部渡过乌江，占领贵州黔西县。6日，占领大定县城。9日，占领毕节县城。

△　苏联远东红军总部就“中国东北金厂沟地区伪满士兵反正逃往苏境”，日关东军声明诬称系“苏联鼓动”一事发表声明，指责日方此项声明“全系捏造”。

△　华北日军参谋长永见俊德飞通县访殷汝耕，商洽“冀东问

题”。

2月3日　　华北各界民众救国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议，出席者有天津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北平学联会、文艺青年协会等八个团体的代表。9日，在北平开扩大筹备会，到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地团体代表20余人。

△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为天津北洋工学院学校当局勾结军警逮捕爱国同学发表宣言，谓：“中日南京会议和华北五省自治的酝酿，以及内蒙的伪自治……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走上了更严重的阶段。”“我们全北平市的学生万众一心，誓死为被捕同学的后援！”

△　北平记者公会举行北平新闻记者救国联合会第二次筹备大会，决定命名为“北平新闻记者救国联合会”，以联络同志、争取言论自由及促进中华民族解放为宗旨，并推出出席华北民众救国会代表两名。

△　据南京《中央日报》讯：日商住友合资会社与广西省政府合办中日公司，开发锰、铁、锡等矿产，在台湾高雄设办事处，运台制炼。

2月4日　　蒋介石对全国学生发表题为《今日青年的责任》的广播讲话，声称：“如有利用青年扰乱秩序，破坏纪律，牺牲青年学业，损害国家生命者，即为汉奸。”

△　冯玉祥在南京电宋哲元勉以大义，万勿为敌人利用。是日，宋复电称：“哲元向有明白表示：一不屈服于人，二服从中央，三保卫国土；甚愿中央有整个办法，地方随之。”

△　刘湘偕傅常、王又庸由成都飞抵重庆，与行营主任顾祝同会商消灭红军贺龙、萧克二、六军团计划。

△　行政院决议任命蔡增基为国营招商局总经理，谭伯英为副总

经理。

△　占据昌平县城之刘桂堂匪部为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击溃，窜至北平市西郊猫儿峪、妙峰山附近，大部被北平市公安局俘获。刘自去岁12月25日以来，流窜冀、鲁、豫、晋四省30余县，经各军及地方协剿，至此遂瓦解。

△　日第三舰队司令及川抵广州，向当局游说扩大自治及防共，企图增强西南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力。

△　日外务省在东京次官官邸召开重行检讨外交政策的重要会议，出席者有驻英大使松平、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及重光次官等，讨论日本外交方针必须以东亚主义为基础，以中日为中心，以确定日本在东亚的牢固地位。

2月5日　　萧振瀛、陈觉生在天津就冀察问题访土肥原。冀察当局所持原则为取消冀东伪组织及战区名义，察北六县李守信伪军须一律撤回多伦。日方表示，既定方针不能改变，惟对运用方式可准冀察政委会在一定范围内略行变更。

△　日陆军省讨论对华方针。驻华大使馆武官矶谷在陆相川岛召集之陆军省军官会议上作关于《中国现状及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报告。旋以矶谷报告为中心，交换意见。决定：一、日本对华方针确立不变。加强陆、海与外务三省关系及地方与中央联络，积极实现对华国策；二、陆军部为实现与中国“共存共荣”，要求南京政府彻底清算“反日抗满”政策之态度，禁止一切排日运动；三、因华北政权与日本对“满”国策有密切关联，故日本军部将密切注视其动向，在能维持华北治安，予“满洲国”以良好影响下，日方将在“不干涉华北内政”的范围内尽力支援，使其圆满发展；四、中日间现有各悬案均望从速圆满解决。上述方针拟与海军、外务两省会商后决定。

△　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遭日本监工毒打身亡，是日该

厂工人4000余人举行罢工。7日，上海杨树浦、闸北及兆丰公园等地工人举行抗议示威，声援大康纱厂工人。8日，大康纱厂工人因梅世钧惨案未解决，一致拒领工资。同日，天津日人纱厂中之中国工人也相继罢工声援。

2月6日　　胡汉民与李宗仁、陈济棠、萧佛成、邹鲁、林云陔等在广州共商政局，历三小时，其内容为：一、整理西南党务，进而推及全国；二、西南仍以“剿共救国”为宗旨；三、胡汉民入京时机问题；四、整顿西南政务会领导机构等。对粤桂宁谈判合作也曾详尽探讨。8日，胡再邀陈、萧等会商时局。

△　财政部决定经营土地抵押放款及农村放款办法六项，规定中国农民银行至少应以5000万元经营此种放款。

△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致函孔祥熙，报告德国经济考察团来华任务：一、考察中国经济、商业状况，希望多购中国之原料如农产、矿产品等（矿产品钨、铜、铁、铅均要），并望中国多购德国机器；二、宣传德国之经济新政策；三、接洽中国以后向德国购买军火之办法。

△　绥远达拉特旗康王（康达多尔济）在太原见阎锡山，商谈伊克昭盟与晋西联合防共，阎允助枪百支、弹万粒，是日事毕返绥远。

△　北平市学联召开第十九次执委会，出席者有北大、清华、燕大、中大、师大、女一中、镜湖中学等院校代表，决定组织全国学联，并派代表赴各地联络组织华北民众救国会。会上还讨论了应付各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及对被开除学生营救办法。

△　日陆、海、外三省在外务省开联席会议，协议对苏外交方针，决再提设立划界委员会，以解决苏、“满”边境纠纷。次日，讨论对华政策，声称：“中日两国关系，依华方对于‘满洲国’之存在认识如何，当能渐次改善。中日提携与共同防共，为日本东亚政策实行上不

可缺之要件，努力迈进促其早日实现。”

△　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文告，谓苏联主张现有“满”、苏边界线应予承认，以免再发生冲突一节，断难赞同，并要求苏联引渡反正伪军。

△　日旅顺要塞司令官和田秀德少将与驻津日军司令官多田、参谋长永见、参谋中井、驻平日海军武官桑原及土肥原等，在天津商议旅顺海军扩充华北军港及与驻屯军联络办法，决挖深大沽、塘沽一段海河，使巨型军舰得以应急乘潮入口。此议案由和田携归，转报军部。

2月7日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条例》。会上立法委员马寅初报告审查统一公债案经过，称二十四年度国家预算，原预定须短少二亿元左右，现年度仅过半，而短收已达1.5亿元，为平衡国库收支，自应亟图弥补，故迫不得已，乃发统一公债。次日，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条例》，凡12条。

△　中国农民银行经政府特许发行纸币一亿元作为法币，半数充作地方农村通融资金，另半数则于停止各省银行发行钞票权后，以代替地方纸币。

△　据《东方快报》载中央社讯：全国囚犯约10万人，已呈请假释人犯达9000名。

△　国民政府令：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遗缺由朱庆澜、王震分别继任。

△　驻华日大使有吉明奉调离任返日本。同日，日本政府阁议正式任命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

△　侵入河北省昌平县城之伪冀东民众联合自治军第一混成旅被

第二十九军击溃，旅长林雨时窜至平西妙峰山杨村被捕，团长萧再兴下落不明，日顾问逃逸。昌平仍由伪冀东政府委唐祖熙为县长办理善后。

△　天津市西大沽海上公安局员警70余名，拟脱离河北省政府叛依伪冀东政府，被驻东沽第二十九军查悉，即予包围缴械拘禁。

△　华北各救亡团体为“二七”纪念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谓：“中国的工人群众从‘二七’斗争中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急先锋，是民族解放战线上的最坚定的斗士……希望中国目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会由工人群众的积极参加，迅速得到更广大的发展。”

△　北平市学联发表复课宣言，指出：“我们罢课，是为了更扩大我们的阵线，我们复课，是为了要巩固我们的力量，二者之间，完全是一致的，这完全是一个策略的两个方面的运用。”“在复课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充实自己和扩大斗争的两大原则之下来推进我们的工作。”

△　午后1时，山东省淄川鲁大煤矿汤家庄一号小井，石洞突然出水，流量甚速，排水机失去作用，井下工人淹死100余人。

△　下午3时30分，甘肃兰州发生大地震，震幅约二三寸左右，3时33分又震。3时39分第三次大震，较前更强烈，历时二分钟，其后续有微震。房屋多倒坍。8日晨5时许及10时又两度微震。

2月8日　　宋哲元由津返平，冀察外交事件宋与日方在津持续24天，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决定在北平继续商谈，由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负责与土肥原谈判。宋在北平晤记者称：“关于中日外交前途，本人以为先决条件，双方须处于平等地位，如一方为压迫者，一方为被压迫者，则势难有满意结果。其次双方应互相信任，若彼此怀疑，则根本难谈亲善，在东亚尤须中日提携，共同维持和平，故此际需要诚意的交涉。”“相互相信及有诚意之互让，始能实现‘中日

亲善’。”

△　国民政府任命许世英为中国驻日本大使，原任蒋作宾免职；驻法公使顾维钧升任驻法大使。

△　国民党中央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讨论推行地方自治及编查保甲调整办法11项，要点为：一、容纳保甲于自治组织中；二、地方自治系统，采取县与乡镇二级制；三、各乡镇设保甲副长，专司编查保甲任务；四、以区署为县佐治机关；五、县保卫团法应即废止；六、各地完成自治期限，不必强行划一；七、保甲组织应隶属于民政厅；八、省保安处仍属省府，受内政、军政、参谋、训练各部指挥。

△　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黔西县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建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陈希云为代主席。

△　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杜羲忧国投南京玄武湖自杀，有遗诗及自挽词留给于右任。

2月9日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中国存亡之路》，略谓今日我国所处之国际地位，极为危难，救亡图存，中华民族自当一致奋起，不可须臾或懈。

△　宋哲元在北平与土肥原、和田、今井、桑原等谈冀察交涉程序。晚，和田赴沈转旅顺。

△　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赴邛崃“督剿”川康边红军。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占毕节，主力集结于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追剿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追占大定。13日，红军第十七师由打鼓新场回师大定，旋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向毕节进攻之第十三师先头部队七个连包围歼灭，红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并在毕节成立川黔滇

省革命委员会、抗日救国军，以当地有名望的开明士绅周素园为主席和总司令，扩大红军5000余人。中旬，蒋介石亲飞贵阳督战，“追剿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大定、毕节地区进攻，相继占领黔西、大定。

△　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沙千里等任常务理事，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等为理事。至10月发展为七个干事会，共有会员1300多人，联系了沪市广大职工和店员。

2月10日　蒋介石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讲演《做人立业之道》，宣称：“《大学》一书即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又为中国伦理政治哲学第一要典。”“力行《大学》之道，乃做人立业之本。”

△　财政部明令农民银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并规定该行钞票发行额以一亿元为限，发行区域应注重陕、甘、川、黔、滇边远省区。

△　土肥原与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在北平协议华北各重要机关分配日人顾问事宜。冀察政委会允先承诺二人，并对冀东、察北外交作初步洽商。土肥原否认3月份将就任冀察政委会高等顾问。同日，萧振瀛在天津访永见，对冀东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12日，陈中孚访宋哲元报告接洽冀察外交情形。

△　广州、河内直达无线电路成立，以传递广东与越南往来报务，交换气象记录。

△　铜镍新辅币开始发行，南京、上海、汉口及江、浙、闽、赣诸省同时行使。

△　天津日海军前占东局子地亩筑飞机场，原约定2月后退还，河北省政府以春耕在即，是日派参议陈东升往驻津日军部交涉。

△　日外务、陆军两省开联席会议，矶谷及新任驻华大使有田等

出席，对华北防共、中央西南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决定对华采取一致方针。

△　据《申报》讯：日“满铁”调查部调查察、绥、晋等省经济、矿山、棉产、铁路、水道等，半月中派员达200名，分为十余批，由“满铁”驻津理事石本宪治、津事务所长太田雅夫指挥。最令人注意者为绥、察、内蒙、晋北一带之山川形势险隘，悉测量调查无遗。

△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在参议院痛诋日本政策，谓日本“现已决心关闭中国之门户，而摈弃美国于门外”，“日本侵占满洲，系违犯巴黎《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举”，“日若阻碍中美贸易，不恤一战，美极宜有充分军力保护在华权益”。

2月上旬　　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局联络书记王世英由天津到西安秘密会见杨虎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二、与红军保持友谊，和其他反蒋派联合一致，发动反蒋抗日战争；三、争取东北军共同联共抗日。杨同意联络东北军，要求南京抗日，与红军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帮助，建立电台联系等。

2月**11**日　　国民党中宣部为共赴国难发表《告国人书》，攻击上海救国运动。谬称共产党“欲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口号掩护之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诬蔑上海文化界等救亡团体“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汉奸”；警告知识界勿受利用而为“民国之罪人”，否则，“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

△　铁道部为建筑浙赣路南萍段，发行第二期铁路建设公债2700万元，是日向中国等八家银行及德国奥托华尔夫铁厂签订抵押现款及材料款总额共2000万元之合同。

△　第二路军薛岳所部六个师和川军主力在天全、芦山地区向红四方面军发动总攻；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由康定向丹巴进攻，策应东

线作战。15日，红军放弃天全，23日撤离宝兴，向甘孜方向转移。

△　广东省汕头市角田事件由日领原田与汕头市长李源和签约解决，以撤换一当地公安负责者了事。

△　陈中孚访日关东军代表土肥原，续商冀察问题。

△　伪满洲国外交次长大桥访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斯拉夫斯基，抗议金厂沟事件，要求：一、对事件责任者给予处罚；二、对伤害者给予赔偿；三、划定苏“满”国界线；四、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五、引渡遁入苏境之“满”兵。斯拉夫斯基指出此事全系日伪捏造，予以拒绝。

△　上海日商喜和纱厂工人3000人因不满人事科主任郭分被撤职，全体罢工，要求：一、郭分复职；二、不得开除老工人。厂方表示须无条件复工，并以停业相威胁。13日，厂方开除为首罢工工人赵忠学、陈品生等25名。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及曹家渡公安分局以调停为名实行弹压。14日，工人被迫复工。

2月12日　德王与李守信、卓什海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联合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大会。日关东军驻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宍浦、前川等人参加。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就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并兼政务部长；李守信为副总司令，兼军事部长。决定改用成吉思汗年号以纪年，用新制的蓝地上角有红黄白三条为表征的蒙古旗，改元易帜，标榜“独立自主”，走上背叛祖国、投靠日本的道路。

△　冀察政委会聘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白云梯为该会顾问，以备咨询蒙情。

△　李滋·罗斯离沪赴香港，转往华南调查经济。

△　日、“满”军进攻蒙古贝尔池附近之鄂洛贺杜加边防军，激战

数小时。同日，日、“满”军500人，乘卡车20辆、汽车一辆、坦克二辆、飞机两架，向蒙古布伦德生边防哨进攻，深入蒙境10至12公里，被蒙军驱出。蒙古当局急电伪满洲国政府，要求迅速调查越境真相，拘讯犯罪人员，并杜绝日、“满”军再侵蒙境。

△　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召开外交部首脑会，继续坚持对金厂沟事件所提之要求，声明如苏联不接受，此后发生重大事件，苏方应负全责，并向蒙古当局提出最后抗议。13日，“满”军部开首脑会协议对策，决定“确保自卫”。

△　日关东军在通县设立特务机关，派桑原少佐主持。

△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国民政府财政，决定“加强沿岸走私管理”，规定对走私货物只收取国民政府海关四分之一的进口税，并指定货物靠岸地及检查所。日人称此为“冀东特殊贸易”。从此日本商品充斥华北市场，并流入中国各地。

△　陇海路西安至咸阳段火车正式通车。

2月13日　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

△　美财长摩根索宣布，决定与中国合作，帮助解决币制问题。又谓美国向中国所购白银计有5000万盎司，中国此次购入之美金共计有3250万元，皆存于纽约各银行，其中1000万元已换成黄金，准备提回。

△　夜，前国民政府司法部长魏道明及中委李晓生、李仙根同船自香港北上，代表胡汉民到南京与蒋介石商洽合作。16日到沪，魏称：胡因身体未复原，故决俟天气稍暖即行来沪转京。18日，魏入京将胡亲笔函呈蒋。

△　日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在北平访宋哲元，密谈冀察问题。

△　殷汝耕对外国记者宣称："冀察政委会与冀东政府主义相背，目的也异，自难合作，本政府无取消准备。"

△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由包头到归绥见傅作义。沙称："本会一切设施，悉本中央意旨，至成立日期俟各委到齐商定。"

2月14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对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指出："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救国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倘使是中宣部一纸诬蔑文告所能恫吓得倒的人"，他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希望政府"示大信于人民，必须立刻解除舆论的压迫，开放民众组织的自由"。

△　胡汉民在广州招待各界，发表谈话，指责南京国民政府，略称："中国过去数年间之所谓大计，均属错误，所谓办法，亦尽属错误，诸如外交、财政、军事政策以及内政设施，均足以加速国家之分裂。"

△　冀察政委会第四次例会议决扩大外交委员会职权；并通过追认增聘唐悦良、张煜全、任援道为外交委员，叶弼良、童效先为经济委员，萧振瀛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案；河北省保安处呈拟《防共办法》及《感化共党计划》两草案交政务处审核，分项拟具体实施办法。

△　据《申报》讯：日、韩浪人偷漏关税货物运入平、津益多，每日由滦东各站装车，不交关税，运入日租界，关员及北宁路局不敢干涉，因浪人均携武器，动则行凶，一周来漏税额达百余万元。顷宋哲元令萧振瀛协助北宁路局、天津海关税务司向日军部及驻津日领交涉。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决议封闭驻沈阳总领事馆。

△　中法联运粤河航空线正式通航。该线自上海飞广州至越南河内与法国邮航机衔接，由河内直飞马赛而达巴黎。

△　伪满财政部以现金流出，伪钞跌价，特颁统制金融办法11条，规定凡东北人向关内亲属及商店汇款者，须取得当地警所证明，私人每次汇兑不得过200元，商店不得过1000元，每月限汇一次。

△　伪满军政部下令统制粮食、面粉，不得出口，以维军需、民食。

△　日外务省协议对华政策，有吉、有田两大使、重光次官等出席。有吉报告最近中国情势，经协议一致意见：一、依广田三原则谋实质的解决；二、谋对华外交之完全统制及其一元化；三、对中日间进行建设性“提携”等。

△　上海日商日华纱厂将前因虐待工人被撤职之日人山甸复职充任布机车间总管，山甸到任后，限制工人午餐只许20分钟。厂方又招募童工200名为预备工，遇有工人出缺，即用童工抵补，开除工资较高之老工人。是日，全厂工人2000人愤而罢工，工人18人被开除。15日，工人提出六项要求，厂方坚持于17日无条件复工，否则作自动退职论。17日，工人复工后，厂方又将女工高彩凤等11名开除。

△　据《时事新报》镇江电称：镇江全市丝业20余家，因洋货影响，完全关闭；机户停机者百余家，失业人口近千人。

△　晨2时20分，天津南市华商公会主办之粥厂两处，明德慈济会主办之暖厂两处，突然起火，四厂席棚皆被焚，死贫民150人。

△　北平市调查户口完竣，全市共30.1766万户，男95.6640万人，女59.9724万人，总数共155.6364万人。

2月15日　国民政府令平津卫戍司令部着即裁撤，津沽司令部着即裁撤；任命刘家鸞为天津保安司令。

△　山西“剿匪”总指挥孙楚在南京见蒋介石及何应钦，报告陕北军事。24日，孙赴太原，与阎锡山商“剿共”军事。

△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表第一次宣言，称：“我们鉴于华北危机更严重的发展，坚决地反对正在进行中的广田三原则下的亡国外交，以及一切断送华北的新阴谋。”

△　美副国务卿费利浦斯演说，声称：“中国门户开放主义乃系一种良好原则，无论对任何区域或任何国家，吾人决不能放弃。”

△　据《中央日报》讯：最近教育部调查统计，全国图书馆公私共2925所（西康、新疆未统计在内）。

△　中日上海至东京无线电话通话。

2月16日　上海庙行镇“一二八”阵亡将士无名英雄墓行揭幕礼，参与“一二八”庙行之役之前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到场讲话。

△　康王在归化就任伊盟七旗联军总指挥及达拉特旗“剿匪”司令。

△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机关报《冀东日报》在唐山发刊。

△　华北驻屯军参谋池田中佐由东京接洽扩军事毕返天津。日军部对华北军队强化方案大致决定增兵一个混成旅团，约多于现在军队两倍半，驻华北日军总数共8000余人。次日，土肥原在平对欧美记者声称，扩充华北日驻军，并非侵略华北，乃用以护侨。

△　德经济考察团克朴等抵北平。17日访宋哲元询问华北经济。

2月17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阐明红军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目的。

△　国民政府任命彭济群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任命陆军少将朱怀冰为陆军第九十四师师长。次日，国民政府任命陆军少将李铁军为陆军第九十五师师长，原任唐俊德另有任用免职。

△　宋哲元饬河北省政府驻津办事处长陈东升就沧县日、韩浪人强求杂居事向日总领事川樾茂交涉，无结果。沧县县长注意浪人行动，日方误为监禁。21日，天津日警署警务主任山田、司法署员佐藤往沧县调查。23日，山田将日、韩浪人50名带归天津。川樾并就此事向河北省政府驻津办事处抗议。

△　山西省主张公道团省团部成立，阎锡山任团长，赵戴文为副。

△　日“满铁”兴中公司社长十河赴济南见韩复榘，会商经济开发事宜。

△　驻哈尔滨苏领事通知“满”外交专员施履本，谓除哈埠外，苏拟关闭“满”境所有苏领署，苏仅允“满”当局在赤塔、海参崴及伯力三处择一地设“满”领署。

△　伪满外交部会议，决定对苏方针：一、关于金厂沟事件及确定国界之共同委员会，除日本外，无论任何第三国均须绝对拒绝参加；二、对于苏联主张设立国境纠纷委员会，亦须绝对反对；三、确定国界当由“满”、苏两当事国以及处于日、“满”共同防卫立场之日本参加。

2月18日　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谓新生活运动的成效“有退无进”，“不及推行第一年时来得有成绩”。同日，新运总会拟定新生活运动第二年度工作纲领：一、积极训练推行新运干部人员及劳动服务团员；二、厉行推行新运干部人员考核办法；三、实施公务员推行新运考核等。新运会主任熊式辉免职，由钱大钧继任。

△　国民党中委兼中政会外委会主任委员王正廷赴广州，衔非正式使命与胡汉民接洽蒋胡合作。23日，王抵广州见胡汉民。24日与胡汉民、萧佛成、邹鲁、陈济棠、李宗仁交换政局及外交意见。

△　财政部公布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换偿旧有各种债券办法，规定3月11日开始换偿，6月底截止。

2月19日　行政院密电天津市长萧振瀛、北平市长秦德纯下令取缔平、津两地学联。电称："若不取缔，势将燎原，拟请明令严行取缔，以弭隐患。"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离上海赴德国疗伤，曾仲鸣等随行。

△　绥境蒙政会委员在归绥开首次谈话会，决议：一、请中央明令保障王公制度，维护亲王、郡王等爵位；二、请中央增发经费及开办费；三、各旗交通不便，请中央发给电台，每旗至少安设一座；四、电请阎锡山早就任指导长官，入蒙指导。

△　外交部顾问汤良礼以公使衔身份，赴德、法、英、瑞士、荷兰、美国等国考察新闻事业，兼作国际宣传工作，与各国报界谋求接近，是日离沪出洋。

△　萧振瀛、陈觉生在天津访多田、永见，再商冀东问题。多田、永见未完全同意取消伪冀东政权，萧、陈即赴平向宋哲元报告。

△　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拨款百万元充华北文化侵略经费。以前日本驻青岛总领事森安三郎主持其事，是日森安在天津访多田、永见、川樾，接洽后赴平筹设事务所。

△　日松井石根大将抵香港，对记者谈称："此次南来除访晤粤、桂当局外，绝无任务，中日为远东两大国家，应实行携手。"

△　日浪人要求天津榆海关放行私货，与关员冲突，双方负伤数名。

△　德国经济考察团团长克朴等抵天津，20日访萧振瀛及天津商会、银行业公会，并至南开大学参观，与教授商谈如何发展中德贸易，渠否认德日同盟。23日，克朴由济南赴青岛考察经济情况。

2月20日　　晚8时，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万余人东渡黄河。沿黄河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沙口约100余里地段同时强渡，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在石楼县东辛关沿岸突破，次日占义牒镇、刘村一带，以一部包围石楼县城，大部直奔中阳县东山、关上。林彪、聂荣臻红一军团在中阳县之坪上村登岸，歼灭晋绥军杨耀芳第七十一师一个营，次日拂晓占三交镇，22日占留誉，向关上村追击。至23日，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均被红军攻占，渡河战斗结束。

△　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凡7条。规定“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抵拒解散之人”。依据此项办法，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解散救亡团体，钳制救亡言论。接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先后宣布军事戒严，以武力弹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随即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为名，查禁《大众生活》等24种抗日刊物，并逮捕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救国会负责人11名。天津、济南等地亦公开逮捕进步学生。

△　东北抗日联军发表《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废除抗日军的不同名称，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号召海内外同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　李滋·罗斯在香港告美联社记者称，中国货币之统一，实为贸易开展之必要条件。又称南京政府之财政与政治安定之后，始有商借外债之余地。此后英国对华投资，必将较前40年为多。就目前看，日

本对华贸易所得最多，但各国亦未始不能与之竞争。罗斯并主张广九、粤汉两路接轨。同日，广州市商会通电反对粤汉、广九两路接轨，因接轨后，洋货可直达中国腹地，将为华南经济之大害。次日，粤商会致函粤省府、省党部，要求在任何条件下拒绝考虑此项计划，指出如两线连接，广州将成一死埠。

△　交通部参事张维稷与法国驻昆明副领事甘当在昆明签定《云南铁路草约》。

△　英以许阁森继贾德干为驻华大使。

△　伪冀东自治政府治下各小学一律采用奴化新教科书，内容力言东洋民族大团结，提倡东洋固有文化，尤其是孔孟道德思想；并力主中、日、“满”三国协调。

△　日伪接收察北六县邮政，北平邮局请冀察政委会设法解决。

2月21日　　行政院令教育部禁止平津学生联合会活动。宣称：“平津学联会之组织，于法无据，复叠据报告，有少数不良分子密谋操纵，煽动风波，中央为爱护多数纯洁青年免为挟持计，应即禁止该学联会活动，以敦学风。”同日，北平军警逮捕中国学院学生13人。22日，北平又逮捕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学生25名。至月底，北平被捕学生共达200余人。

△　巴西新任驻华公使赖谷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通电。略称：“救国大计，事不宜迟，因此本政府今特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并实现苏维埃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十大政纲。”

△　中共中央代表团由李克农率领，由高福源引导，从瓦窑堡出

发赴洛川。25日，到达洛川，会见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王当即以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复电称因事去南京，嘱王先与李克农商谈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留待张返陕后再谈。王与李经过数日商谈后，就红军与第六十七军抗日合作问题达成口头协定：一、为巩固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延安、甘泉第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红军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进城，恢复寻常关系；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之第六十七军两个营换防，不加阻挠；五、恢复通商，互有保护之责。约定自3月5日双方秘密下达施行。

△　李滋·罗斯偕香港政府财政顾问杨格及英驻港商务专员史葛抵广州，分访陈济棠、林云陔等。罗斯此行任务有二：一、平衡港、沪汇兑；二、促成广九、粤汉两路接轨。

△　百灵庙蒙政会保安总队官兵800余人，连同土默特旗和绥东四旗的全部文职人员，因不满德王投日活动，在绥远当局策动下，由保安科长云继先等率领倒戈，在庙南集中。22日，傅作义派孙兰峰部在武川接应。25日，云继先等电南京军政当局，报告率部离百灵庙经过，称系“激于爱国热忱及不背叛国家”。27日，行政院令绥远省政府及绥境蒙政会对来归员兵妥筹安置办法。

△　英兵200余名突入云南省境，强占澜沧县景冒地方。

△　日本关东军电令北平日领署协助调查学生运动，日领署警察署长高浦按关东军指示，分访秦德纯及公安局长陈希文，详询北平学潮情形，表示愿协助平市防共工作。秦、陈均表示：平市军警有充分防共力量，无需日方协助。

△　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多田与参谋长永见抵北平晤土肥原，并访宋哲元商谈外交。24日，多田飞抵张家口，与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会见，然后赴绥远晤傅作义，并“考察”绥远、察哈尔各地情形。25

日，永见由天津飞抵沈阳转道回国，向军部报告华北、绥、蒙近状及驻屯军强化等事。

△　天津日军部决定与冀察政委会经济委员会合作，举办农村合作社，双方投资2000万，派“满铁”社员为指导员。

△　据《申报》讯：日浪人在冀南煽动组织“华北自治军”及“万国讨赤联合会”，谓得日军部许可，强向地方摊派负担，已煽动起愚民数万人。冀察当局倾向与日军部交涉取缔。

△　晨7时半左右，江苏镇江忽闻巨响如雷，有巨大流星一颗，光芒耀目，自南往北，如矢流射。7时35分，淮阴上空忽发巨响，房屋为之震动，声灭后，空中出现白云一片，旋即散灭。

2月22日　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均自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一日起施行，并公布《各省市地政施行程序大纲》，凡八章33条。

△　胡汉民在广州谈对日外交，谴责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中，对日本“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依赖国联”，遂使日本肆所欲为，得寸进尺，铸成中国今日危机及蒋、汪之错误。并指出，南京当局“最近复有所谓调整中日问题之进行，其调整原则，据日方负责人宣称，且谓已经南京当局认可者有三：（一）中国承认伪满；（二）日本派兵来中国协助剿共；（三）中日伪同盟，中国不得与他国合作。此种原则，如果成为事实，则不特割弃东北四省，简直中国已侪朝鲜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胡宣称将促进南京当局之觉悟，团结抗日，从事救国。

△　绥境蒙政会在归绥正式成立，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及各委员宣誓就职，并发表成立宣言，声称：本会仰承中央寄托之重，“于睦邻防共方策之下，提高蒙民生活，发展蒙旗文化，以及一切经济建设，藉图增厚实力，向防共之目标努力迈进”。

△　日本松井石根大将在广州见胡汉民，游说大亚细亚主义。胡答称："余为亚细亚主义者，同时又为一抗日之主张者"，并称："日本最近三原则之提出，殊属无意义无理由"，"苟日本不能改变其对于中国之手段，则中国民族之抗日情绪，纵为政府压抑，亦必愈益滋长，而出于最后抗战。"随后，松井石根又拜访陈济棠、李宗仁，劝说同蒋介石合作，改变蒋依附欧美的方针，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同日本推心置腹的统一政权"。

△　有田离东京，携对华新策：一、广田三原则具体化时，考虑华方之立场，谋渐进的并实质问题的解决；二、以三原则为对华政策之根本；三、谋外务与军部紧密联络，由外交一元化实现对华政策；四、华北问题、内蒙问题之解决，首要即中"满"关系之完全调整；五、讲求经济、文化方面积极对华援助。

△　陈中孚访土肥原，永见访宋哲元，续商冀察外交问题。

△　天津市长萧振瀛访兴中公司社长十河，谈兴中公司华北经济开发计划。十河并宴天津各界，曹汝霖等被邀。23日，十河在北平访宋哲元、秦德纯及实业界领袖，交换开发华北经济意见。

△　徐行在《礼拜六》第六百二十八期上发表《评"国防文学"》一文，对"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异议。后又在该刊第六百三十八期上发表《再评"国防文学"》，并在5月5日《新东方》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指出他们"把仇敌化为'兄弟'"，主张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来代替'国防文学'"，要求作家"描写目前大众反对侵略者、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

△　甘肃省兰州《新陇日报》停刊。

2月23日　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十几个师约20余万人，迅速开入山西，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去路；又下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陕、甘部队进扰红军后方革命根据地，以牵制红军东征

行动。

△　阎锡山下令禁止市民集会，太原各重要街道满布军警，原定是日召开之市民救国大会未克举行。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对记者谈：冀察外交，土肥原在平并未负有代表关东军交涉使命；中日应造成新局势，谋“亲善”。并谓：“冀东自治政府与冀察政委会合流事，本人甚望其实现。但两方有不同者，即冀东自治政府所标榜者为防共，而冀察政委会之设立，与南京政府为一命脉，故其目的稍有异点。双方能达于一水平线上，方可合流。”

△　陶行知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在上海成立，参加者400余人。

△　全国银楼业代表600余人在上海开代表大会，决定组织请愿团赴南京向财政部请愿修改《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按：财政部前颁《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规定，化学银制器皿饰物，必要时仅许搀用纯银30％。化学银利用机器制造，非手工所能竞争，如此全国数十万银楼业职工将遭失业）。26日，银楼业代表请愿团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请愿，财政部表示，打造首饰搀用纯银30％，技术上并无妨害，请按规定银量作实验，如确有困难，再作磋商。

△　据《大美晚报》讯：日本近运大批毒品鸦片，私销福建省兴化、泉州、漳州沿海，并有军火运惠安、莆田沿海。

2月24日　　教育部长王世杰就平、津等地学潮对中央社记者谈称：“本部对于此等情事异常重视，除一面责令各校严惩鼓动风潮分子外，并已决定于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

△　阎锡山在太原就任绥远省境内蒙古各旗盟地方自治指导长官职。

△　十河在天津布置兴中公司事务所，并赴北平访宋哲元、秦德

纯接洽经济开发事。同日，冀察政委会经委委员钮传善晤十河交换东亚经济“提携”意见及华北开发事。

△　大桥与日外务省取得对苏、蒙问题一致协议：一、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曾谓有积极援助之义务，故应阐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法律关系与今后之交涉基础；二、确立“满”、蒙之“国交”，并互换代表；三、设置“满”蒙国境确定委员会；四、从速任命金厂沟事件共同调查委员会之日、“满”方面委员。

△　上海福新烟厂实行计时工资，工人每月得薪只有大洋三四元，工人数次要求改善待遇，均被拒绝。最近上海市三区卷烟业产业工会正式向厂方提出要求，仍无答复。是日，全厂工人1000余名游行，宣布罢工，捕房派大批探捕到厂镇压。27日，工人被迫与厂方订立复工办法：一、28日下午1时复工；二、罢工期内工资由厂方按每日两角计发；三、解雇工人14名，每人发给三个半月工资，张巧群等三人复工；四、厂方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

△　华北当局决定准将食盐输入日本。

2月25日　　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民政府，反对日本对华“三原则”，略谓“三原则”之精神，日之视我直如其保护国，若予以接受，则国家人格将损辱无余，望政府据理驳斥，一切外交秘密尤应剔除，予天下以共见。

△　国民政府任陈庆云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原任周至柔另有任用，应免本职。

△　国民政府为筹集资金，兴筑湘、黔、川、桂等铁路干线，及补助平绥、正太、陇海、胶济等路展长旧有路线，公布《第三期铁路建设公债条例》，定额为国币1.2亿元，分三次发行，每次债额4000万元，年息六厘，22年后本息全部还清。

△　财政部、铁道部宣布整理津浦路债办法，自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938），每年各付利息二厘半，自二十八年（1939）起按原合同规定照付周息五厘；还本期展长30余年，预计40年左右，可全部还清。

△　实业部为明了国际贸易状况，以资改进本国工商业，特计划设置商务官于本国驻外使馆或驻外使馆所在地以外之重要商埠，决定先在日本及南洋各地开始实行。是日，行政院会议通过驻外商务官章程八项。

△　太原绥靖公署以此次红军东渡，守河官兵疏于防范，下令将第二〇七旅旅长温玉如褫职留任，督率所部，戴罪图功。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由四川省懋功向甘孜方向转移。次日，川军唐式遵部饶国华师陷懋功。

△　日本驻太原武官和知中佐到北平会见土肥原和驻平武官今井共商防共问题。

△　伪满外交部决定金厂沟事件交涉根本方针：一、引渡叛兵；二、日、“满”、苏平等组织委员会；三、在当地划定国界，并决定“满”、蒙国境纠纷处理委员会，拒苏参加。

△　西藏政府为申谢国民党中央委员去岁入藏宣慰，特派代表隆图嘉错等由印度绕海道抵南京，是日由黄慕松领见蒋介石。隆图嘉错为热振寺募捐，国民党中央拨助二万元，蒋捐5000元。

△　南京《华报》由王慎武接办复刊。

△　据南京《中央日报》讯：皖北太和、颍上、涡阳、蒙城、阜阳、霍丘、凤台、怀远、定远等县春荒严重，灾民以树皮、草根、麦苗、粗糠、水藻充饥，各县流亡载道，十室九空，灾民麇集蚌埠，沿门乞讨，风餐露宿，甚至踯躅街头，高呼出卖小孩。

2月26日　胡汉民之代表任援道携胡亲笔函到平见宋哲元，传达西南意见。任称：胡现留粤，俟天暖即可入京，与中枢合作，共谋国是。

△　河北省南部任县、尧山中共冀南地下党新成立之中国工农红军一部与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七团激战，河北省政府令冀南各县民团增援第二十九军。

△　张学良由西安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剿共”情况。

△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偕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书记官堀内抵上海。29日，有田在上海对《大美晚报》记者谈称：“陆军省、外务省两重外交时期已成过去，虽军部与外交人员于对华政策仍密切联络，但外交将全归外务省办理。”又称：关于广田所提三原则，“其中惟合力防共一点最为重要”。

△　日、德在荷兰京城阿姆斯特丹谈判两国在内蒙经济合作问题，目的在划分两国势力范围，由两国分别承筑铁路，并引诱华北各省参加合作。

△　冀察政务委员会通令严整学风，凡罢课、罢考学生均不给学业成绩，妨害社会秩序者应予以制裁。

△　美海军考察团一行17人由孟松率领，由济南到青岛。

△　苏州农民去岁歉收，无力交租，公安局派员下乡武装催收。是晚，目莲乡农民400人持灯笼游行，呼口号“誓死不交租”，被公安局镇压。

△　欧亚航空公司京滇线试航成功。

2月27日　上月间受宋庆龄委托前往陕北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意向之牧师董健吾偕共产党员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博古、

张云逸等的迎接。董、张介绍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称蒋介石开始有同红军实行某些妥协、反对日本的倾向。

△　林彪、聂荣臻红一军团攻占上村，全歼阎锡山部晋绥军独立第二旅两个团，俘官兵500余人，缴枪300余支，打赢渡河后的第一个胜仗。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尾追，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向水城、威宁截击。

△　驻日参事丁绍伋奉国民政府命令，正式向日本提议在南京举行中日谈判，促进中日“提携”。

△　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杨爱源、朱绶光、孙楚等参加，会商截阻东征红军，布置总攻。

△　国民政府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向德元首希特勒呈递国书。

△　绥远省政府委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为绥东四旗“剿匪”司令。

△　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发表宣言，要求撤废现行的电影检查制度。

△　“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平津学生书》，声称：“罢课非真正爱国之运动”，要求学生辟除目前障碍，“反对阶级斗争”，“以理智克复情感”。

△　十河在天津会晤东亚经济协会理事长钮传善，商洽华北经济“提携”办法，即晚赴济南、青岛考察。

2月28日　宋哲元派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石敬亭到南京分谒蒋介

石、冯玉祥等报告冀察近况及商洽北平军分会编余职员安插办法，并商洽由南京担负旧东北军和庞炳勋部军饷等事。

△　国民政府特派孔祥熙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长，叶楚伧、宋子文、张群、顾孟馀等为委员。

△　冀察政务委员会决议：电催在沪委员周作民、王克敏速到平就职；废除常委制，由全体委员受委员长指导，共同负责；设立教育、建设、交通三特委员。

△　康王派“剿匪”总部参谋长刘承斌去太原见阎锡山，请示蒙旗防共机宜。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进占西康道孚。

2月29日　　晨5时，北平宪警数百人由监察长钱宗超带领闯进清华园宿舍搜查，逮捕学生蒋南翔、姚克广（即姚依林）、方左英等三人及工友一名，清华学生救国会组织学生和教职工在民先队员带领下同宪警搏斗，夺回被捕同学，并砸毁警车数辆。宪警于9时许星散。同日晚，军警5000人又包围清华园，再次搜查学生宿舍，捕去学生20多人，至次晨5时许始退出学校。

△　北宁路局局长陈觉生赴平报告冀察外交受日本政变影响而停顿，日方表示暂缓商洽；多田与土肥原意见不合，冀东伪政权与冀察政委会合流抑或维持现状，三个月后再议。

△　国际青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日至3月1日在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召开，出席美、法、苏、英、比等23个国家青年代表300余人，一致通过援助中国学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3月14、15两日，世界学联和留英中国学生发起在伦敦召集援助中国青年运动大会，出席英、法等国45个学生团体。

△　国民政府令：《兵役法》定自3月1日起施行。

2月下旬　北平市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韩永赞、马绍周去西安见张学良。是月末，张特派宋黎（化名宋梦南）以其秘书名义返回北平，见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邵文凯（原系东北军宪兵）商谈营救被冀察当局逮捕的东北大学学生43名。

是月　据统计，华北日货走私计人造丝1262包，卷烟纸561包，匹头1151包，白糖48包，杂项428箱。

△　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组勘探队试探湖北阳新大冶铜矿。4月开工，用手摇钻机两架钻探，并开探巷两条同时并进。

3月

3月1日　阎锡山为阻挠红军东征抗日，调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率所部第二一五旅由绥援晋，任王为“剿共”预备总队司令。同日，阎在太原召开“全省人民防共会议”，并急电各县长，“凡暗通红军者，格杀勿论”。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一部600余人由石楼迂回南下，先后攻克永和县嘴头、社里等村。

△　日本松井石根大将抵厦门，与日台侨商议筹建厦门“大亚细亚协会”，命竹村英昌为主席。4日，松井抵福州访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5日召日台侨民谈话，筹组“大亚细亚协会”。

△　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选举黎照寰为会长，褚民谊、张寿镛、潘公展等11人为理事，黄炎培等六人为候补理事。

△　晨1时，江苏省灌云县监所囚犯暴动越狱，夺缴岗警枪械，闯出北门逃逸216名，被税警追击格毙八名。

3月2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在平招待新闻

界，报告该会职责，“在研讨及管理冀、察、平、津一切外交事宜”，并称该会产生，“旨在适应环境，安定北方”，表示“誓不丧权、不辱国，以保我国领土行政之完整”。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沿毕（节）威（宁）大道进抵野马山地区，被李觉、郭汝栋、郝梦龄三个纵队截断去安顺道路，遂决定继续西进，准备到妈姑地区折向南行。4日，到达妈姑、回水塘地区，被到达水城、威宁间的李觉、郭汝栋纵队截断南进道路。

△　中英庚款董事会决议通过铁道部请借26万英镑为粤汉、津浦、平汉及陇海等铁路购置路轨、零件等案。

△　日舰三艘非法驶入连云港，并有数十名日军登岸视察，后三舰向东北驶去。5日，国民政府电令江苏省政府呈报日舰驶入连云港窥测经过实情。

△　日驻广州沙面总领事署武官太平秀雄、炮兵大尉尾川勘治以游历为名赴东江一带窥视。是日抵惠阳，旋经平山、海丰、汕尾、陆丰、普宁、流沙、潮阳回汕头，对沿途山川形势和村落地名均志之甚详。

△　日纺织业考察团伊藤等九人抵天津，考察华北毛绒纺织业情况，以备大量投资。

3月3日　　张学良由南京飞返西安，次日即飞洛川与李克农第二次会谈，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张学良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并要求中共派全权代表作进一步会谈。7日，李克农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赴晋西石楼向毛泽东等报告与张学良会谈详情。

△　日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代表在津会商阻止工农红军前进措施。决定：一、对山西省反共军事，派遣专员负责搜集有关情报，逐日密报东京；二、冀察外交谈判暂缓举行。

△　天津市政府饬公安局、教育局严厉取缔学联会，禁止其活动。

△　国联行政院技术合作委员会通过中国建议，利用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经费每年预算之余款，作为中国每年派遣专家赴国外及国联技术考察之用。

△　土肥原以煽动华北自治立功，晋升中将，是日离津回国任第一师团留守司令官。4日，土肥原回国途中抵济南访韩复榘，声称“冀东应归并冀察，但时机未到”。“余主张大亚细亚主义，因中日同文同种，应负东亚和平与防共之责”。7日，经大连抵长春，向日关东军报告后返日。

△　据天津《大公报》讯：《河南省通志》自民国七年开始设馆编纂，迄今已18年，共用经费50余万元。现各稿件全部纂修告竣，成书500卷，金石部分搜集最富，其体例系仿《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而另置市、区、县志，分叙省会、行都、11专员区、110余县。

3月4日　　蒋介石召集张群、蒋作宾、何应钦、许世英等会商对日交涉事项，确定四项原则：一、察东事件以取消伪组织为终极目的；二、察北事件以交还行政权为原则；三、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实质上无改组之必要；四、以上原则，交由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平与日方代表，许世英大使在东京与日本外务省，张群外长在京与日使有田八郎，同时作许多方面之折冲。俟觅得一详细办法，再与日方议商召开南京会议，再作总的调整。

△　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由秦邦宪、林伯渠等接谈，并即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彭德怀电复秦、林，提出和国民党谈判五项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

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此项原则是日由董健吾携回，南下向宋庆龄复命。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南进受阻，西走则有孙渡纵队在昭通、威宁地区堵截，遂改变路线，自妈姑向西北彝良南之奎香方向移动。8日，突由奎香地区折回，在以则河反击樊崧甫纵队，歼敌两个连，急向镇雄前进。

3月5日　　日新任驻华大使有田抵南京，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6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据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发表1935年中国失业人数，估计共达589.3196万人。以粤省最多，达157.8482万人。按行业分类，以盐业最多，达140.1万人。

3月6日　　阎锡山3、4两日连电蒋介石，“请速定大计，盼中央及地方‘协剿’红军”。是日，蒋派张华辅等飞晋西侦察，并电告阎决派大军三路入晋“协剿”红军：一由风陵渡过河，经洪洞、赵城向隰县“进剿”；一由平汉路转正太路入晋，经汾阳向中阳方面“进剿”；一由道清路入晋，经晋城北上；每路兵力二师，入晋部队均归阎指挥。蒋并电张学良饬部向黄河西岸推进，以断红军后路。

△　阎锡山派参议员阎应堃抵北平与宋哲元会商协力防共事宜；宋亦派李忻入晋了解晋南“剿共”军情。

△　宋哲元召集张允荣、张吉墉、杨震南、秦德纯、萧振瀛等到北平会商“防共”办法，并令张允荣速加强冀南各县保卫团力量，并责令各县整顿保甲事宜，以阻红军进入省境。

△　卫立煌将鄂豫皖边区各县划成四个“剿匪”区，命李默庵、刘茂恩、梁冠英、何知重分别为第一、二、三、四区司令官，统限4月

底“肃清”红军。鄂东“剿匪”总指挥丁炳权是日抵武穴，即率部向红军进攻。

△　伪满外交次长大桥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外长肯邓，接受蒙方组织“满”、蒙混合委员会之提议，请将所拟提交该会讨论之问题及该会工作地点告知。14日，肯邓复文称：“拟以2月12日武装冲突之情形及原因之调查与确定为该会之基本任务。倘该会能顺利执行此问题，则颇可使之负责调查1935年及1936年内发生之其他事件及冲突，然后再使之筹划专为防止将来边境事件突发之方法。”该会工作地点，蒙方提议在蒙境之塔姆西克索米和伪满境内之甘珠尔轮流举行。

△　日天皇任命植田谦吉为关东军司令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原任南次郎调日参谋本部部附。

△　朝鲜实业界华北视察团田川等一行七人，由大连到青岛考察商业情况，旋赴济南、天津、北平等地考察。

3月7日　　宋哲元在北平召集第二十九军军官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商冀察防共办法，张自忠、刘汝明、萧振瀛、秦德纯、冯治安、赵登禹等10余人出席，决定对晋、察、冀交界地区派第二十九军扼险防守以阻红军东进。8日，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天津市长萧振瀛、冀察政委会外委会主任陈中孚在津与日军司令多田骏商察边“防共”问题。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占西康省炉霍。30日占领甘孜。

△　驻华日大使有田在南京接见中央社记者，声称：“此次奉使来华，日政府曾付以解决日中问题之方案。关于华北与‘满洲国’问题，须就地按广田所定三原则解决。”有田复招待各国驻京记者，略谓：“关于华北外交重大事件，将由本人与中国政府当局直接交涉。琐细事件，由关东军代表与华北地方当局就地解决。”又谓中国承

认“满”现状，为稳定东亚和平的基础条件。

3月8日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与晋绥军第一纵队杨澄源部激战后退出晋西隰县石口镇的山神峪和云梦山，向北转移。同日，中共冀南地下党新组建的红军数百人在任县与第二十九军一部作战后向南转移。

△　下午2时，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等七团体在北四川路青年会礼堂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何香凝、史良、刘王立明及全市妇女团体、学校代表1000余人出席，会后列队游行，至郑家木桥遭警察弹压，交大学生李觉非及一工人受伤。

△　青岛市长沈鸿烈因山东大学发生学潮劝告无效，是日令警察逮捕学生32人。

3月9日　　宋哲元派徐一清赴沧州一带检阅赵登禹部队，派门致中赴冀西蔚县检阅军队，视察防务，严防红军由晋入冀。

△　国民政府任命陆军少将章亮基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

△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包华国为出席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代表。

△　驻华日使馆参赞清水、武官今井访北平市长秦德纯，探询晋西“剿共”军事。同日，天津日军部派参谋中井赴晋省调查红军情况。

△　据《申报》蚌埠讯：安徽省西部霍丘、六安、霍山等县春荒严重，较之皖北各县尤甚。六安农村凋敝，已达极点，以致壮者铤而走险，老弱乞讨四方。四乡农民以草根、树皮充饥，最近树皮吃尽，多以榆树木块烤焦磨面度命。苏埠一带农民，竟有因欠二年田赋未完，粮差迭催，被逼投河而自尽者，此类情事，迭出不穷。企望官方速放春赈，拯救待毙饥民。

3月10日　全国有24个省市748个县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新生活运动自民国二十三年2月19日由蒋介石在南昌倡行后，全国响应，截至是日止，成立省、市新运会者，计有苏、浙、皖、鄂、湘、川、闽、滇、黔、冀、晋、鲁、豫、陕、甘、宁、绥、青、察等19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五个市；各县新运会，除川、滇等省尚未具报外，全国共有748个县。

△　彭德怀、毛泽东指挥林彪红一军团、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在孝义境内的兑九峪与晋绥军李生达、杨效欧等部三个师、一个炮兵旅，共14个团兵力连日激战，是日红军分三路撤出战斗。为了调虎离山，徐海东红十五军团沿文水、交城挥师北上，骑兵部队威逼太原附近的晋祠。阎为解太原之危，急调主力十多个团尾追十五军团至晋西北岚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地。

△　行政院长蒋介石通令所属机关铲除公务人员贪污，列举侵吞公款、公物、虚糜公帑等10种应除之积弊。

△　行政院就日方干涉津、秦两海关缉私，以致华北走私猖獗一案，决议由外交、财政、铁道三部采取有效方法，并由实业部与日中贸易协会妥商。按：华北走私，仅人造丝一项，数月来已达800余万元，其余糖、化妆品等类为数亦巨。

△　近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之王宠惠自欧洲抵香港，发表书面谈话称：目下国难日亟，受良心驱使，友好敦促返国，以私人资格共赴国难。下午招待记者，称返国欲促同志团结，先与京、粤、沪各要人交换意见，始决定一切。11日，蒋介石令前南京市长魏道明南下促王即日入京。13日，王晤胡汉民，共商胡所提之救亡方案，其要点为：一、救中国者只有中国人；二、须上下合作，具生要齐生、死要齐死之精神；三、胡入京使京、粤意见一致；四、树立全国拥护之中央政府，集中国力，以赴国难。

△　驻华日使馆武官今井、参赞清水赴太原与徐永昌等密商“防共”。

△　西藏代表阿旺桑登、子仲格登曲登、罗札洛桑穹勒及堪布四人取道印度抵南京，次日，向蒙藏委员会详陈西藏政教近情。

△　日本内阁新任首相兼外相广田弘毅对外务省次官重光等致训词，再次主张以中国当局接受“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日中邦交的条件。

△　天津日驻军举行“日俄战胜纪念”大会，多田在日租界阅兵，日步、炮、骑混合大队600余人在津南八里台演习炮战、野战。11日，日炮兵、装甲车队500余人在日租界演习巷战。

△　日军用飞机两架，分别侵入我甘肃、榆关领空侦察。

△　伪满委托“满铁”会社主持建筑及经理之锦承铁路完成通车，该线自锦州至承德，全长436公里，横贯热河全省。

3月上旬　彭德怀指挥东征红军越过吕梁山，进至兑九峪一带，逼近同蒲线。阎锡山调集了14个旅的兵力，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地区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红军发起攻击。

3月11日　新任驻华日大使有田谒蒋介石，就调整日中关系交换意见。

3月12日　日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抵南京晤有田，并访外长张群。下午，接见中外记者，声称：“中日关系欲求彻底解决，应彼此反省，各抱责己严、责人宽之见解，庶克有济。”14日谒蒋介石，15日离京返沪，行前散发其所著《大亚细亚联盟之必然性及意义》。18日，自沪乘轮返日。

△　驻华日使馆武官矶谷抵天津。13日，日武官在津集议华北时局对策，决定日方对华北防共应取态度及驻华武官今后联络办法。下午，矶谷赴北平，次日访宋哲元，交换外交意见及详询晋省红军情况，并于即日南下过济与驻济武官石野接洽，又访韩复榘，询其对华北问题意见。16日，抵南京，向有田报告北上接洽经过。

△　日本陆军省重视红军入晋，是日起草《关于防止山西赤化》文件，声称：日军要从内部指导冀察、山西两政权，要阎锡山在冀察协助下扫荡共军，日本方面可提供武器弹药、飞机或贷款，以及派遣军事顾问等加以援助。

△　红二、红六军团由奎香进至则章坝，与万耀煌第十三师激战一昼夜，消灭其两个多连；郝梦龄纵队及傅仲芳第九十九师自镇雄回援。次日，红军改向西进，在六曲沟以西之财神堂，与郭汝栋第二十六师发生遭遇战。

3月13日　　阎锡山以救援石楼为目的，对红军下第三次总攻击令。

△　宋哲元之代表张志冲抵粤访胡汉民，14日访陈济棠、李宗仁，报告华北近况，18日赴广西访白崇禧。

△　德穆楚克栋鲁普派代表敖云章抵归绥谒傅作义解释误会，声称“德王处境不无困难，但态度不变”，并称此行与绥远省府交涉三事：一、请省府归还收缴之教导队枪械；二、重商绥、蒙税收问题；三、百灵庙蒙政会给养困难，请接济或帮同运输。

△　天津、秦皇岛海关与北宁路局订定华北缉私办法六项，严缉漏税货物。

△　河北省平山、灵寿、井陉等与晋省接壤各县发现有“穷人会”组织，举“分粮吃大户”旗帜，聚众千余人。是日，平山县民团捕获

其首领贾、曹二人，并搜出宣传文件。

3月14日　商震奉蒋介石令抵太原见阎锡山，会商“协剿”红军事宜，晚返石家庄，督饬所部入晋，参加北路前线作战。

△　全国县政讨论会在南京开幕，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主席，讨论县行政及与上级政府之关系、省县间关系调整、地方财政之整理、县政人才培育、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设立、土地陈报之推行及征收制度之改善等问题。15日，会议闭幕。

△　国民政府颁令即日废止《土地征收法》。

△　驻北平英使署武官佛莱塞与司考特赴太原视察晋境红军情形及在晋英传教士情形。

△　中国民众友人会在伦敦开会，与会者有英、荷、法等国会员。会议严厉抨击日本侵华，并提议英、美、苏应立即联合遏日，吁请国联早日采取措施迫使日军退出华北、满洲及蒙古等地，并请《国联盟约》签字国、《九国公约》签字国尊重其担保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召集远东顾问委员会讨论集体安定远东和平。

△　安徽蚌埠人力车工人抗议增捐，举行总罢工，并殴伤岗警多名。15日，市督察局警察处布告，今后人力车夫如再暴动或三人以上聚会，“图谋不轨”，一经查获，即按军法执行枪决。

3月15日　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次日通过派代表李绍裕、朱学范等21人赴京请愿，要求国民党中央颁布邮务工会组织法规案。

△　汪精卫抵柏林疗伤。

3月16日　是日至19日，驻华日大使有田与外交部长张群作调整中日两国关系之首次谈判。19日，双方就日中关系调整问题发表公

告，声称“虽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但可认为有裨于彼此意思之疏通”。张群在会谈中表示“国民政府不赞成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日中邦交的基础”，“华北问题亦应视为日中关系的一部分，不能抛开东北、华北问题，孤立地空谈日中关系调整”。谈判陷入僵局。

△　国民政府特准中央信托局设立中央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业务，是日在沪开业，推陈光甫、李馥荪、陈行为监理委员会常委，陈光甫为主席。

△　德华经济协会全权代表师德威及理事德国铁路高级顾问雷德穆访北平市长秦德纯，旋访宋哲元，请宋提倡实业，多设工厂，即晚赴天津。

△　太原市连日对学校、客栈、工厂稽查甚严，捕获共产党嫌疑犯甚多。前在国民师范捕去之学生段若宗、邢思廉、乔增禄、曹直四人是日被阎锡山枪杀。

3月17日　东征红军退出中阳县郭家掌、西峡沟、苏家滩、南岭上、武家庄，向大麦郊转进。同日，红军五六百人由汾西进抵灵石县南关镇附近，截断同蒲线，与晋绥军第一四二师铁甲车队激战一小时，占领义棠镇。

△　关麟徵师第一五〇团抵霍县，林彪红一军团600余人包围霍县城。

△　行政院通过《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各省划定行政督察区，设专员公署为省政府辅助机关。25日，行政院命令公布。

△　行政院长蒋介石电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严惩盗掘安阳一带古墓罪犯。

△　日外务省根据广田内阁新政纲发表外交方针，声称：日本外

交根本方针，当置其基础于日本民族生存权之确保与发展，以资保持与各国间之友好关系。对华以中、日、“满”融和亲善之目的，促进中国之猛省，以期“三原则”之实现，并以“东亚责任者”之资格，使英、美在东亚作政治、经济活动时，必须得日本政府之谅解。

△　日驻苏大使太田访苏副外交人民委员长斯托摩尼耶可夫，提议：一、组织俄、“满”勘界委员会，确定兴凯湖至图们江一带之国界线；二、俟该委员会工作完成后，即可接受苏之建议，组一常设混合委员会，解决界务。苏同意此案，并主张“满”、蒙间设立同样之委员会。

△　河北省长芦盐运使署负责人在津对记者称：日本工业近需大宗食盐，决定就近向我华北购买，中国当局同意后，日本即由岩井商店、三井、三菱两洋行、大日本盐业组合等合组“芦盐共贩会社”，在长芦地区直接向盐户收购，由长芦盐场知事监督。长芦盐场年产盐约420万吨，日本拟购50万吨以内。

△　日驻沪第三舰队司令及川中将抵津，18日访多田司令、川樾总领事，商华北局势，并议华北设港事宜。19日，偕参谋长岩村等由海军驻北平武官桑原中佐伴同赴北平访宋哲元、秦德纯，探询冀察近况；20日晨赴通县访殷汝耕，晚抵秦皇岛返任。

△　日本大阪东亚输出组合华北巡回考察团抵津。日横滨工商界考察团赴香港转粤，调查华南市场情形。

△　伪冀东自治政府在滦县洋河口设税关征收关税，致使秦皇岛海关税卡不能行使职权，官员撤回，报请财部交涉。

3月18日　　林彪红一军团2000余人于是日及20日两度猛攻晋西赵城县城，未克。同日，红军退出中阳县之三交镇。

△　国民政府任命韩复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

△　冀察政委会接管北平《晨报》，派刘哲、戈定远、秦德纯等为该报董事，以刘哲为社长。该报编辑詹辱生、刘尊棋等16人在各报刊登离职启事，谓“与其因循而违厥初心，毋宁退避而还我本色”。原社长陈博生、经理林仲易亦辞职。19日，该报继续出版，社论题为《中日人士宜多接触》，论调为之一变。

△　驻津日总领事川樾与多田等共议“开发华北”步骤。

△　驻华德大使陶德曼回国述职，谒蒋介石辞行。

3月19日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七八百人抵晋西文水，围攻县城不克，向孝义转移。另部五六百人抵晋西交城，晚围攻县城，激战七小时未克。

△　张发奎抵京谒蒋介石，报告闽赣皖浙边区“剿共”情形。

△　李兆麟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六两军留守部队和第四团，歼灭小兴安岭查巴旗和老钱柜一带的森林警察大队，击毙日本指挥官以下七人，俘虏森林警察150余人。

△　前山东伪皇帝马士伟在津日租界组织“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是日会徒列队在华界游行。冀东滦东各地近也发现该组织。

△　天津鱼贩数万人反对22家鱼栈增抽鱼栈费49%，全体罢市。20日，经市公安、社会两局调解，鱼栈缓增1%栈租佣金，即日复市。

3月20日　王宠惠等离港赴京，称此行入京，希望促成南北切实合作。

△　日军飞机是日起不断赴晋侦察红军情况。

△　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飞抵西安，与朱绍良、胡宗南等共商

陕、甘、宁三省“协剿”红军问题。

△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由沪抵南京，接洽中苏外交。

△　日使有田调任日外相，在京向蒋介石辞行，声称：“关于中日关系之调整，深信在广田首相兼任外相及本人任驻华大使之际，乃属绝好时期，此机一失，在最近之将来，殊不易再逢。”蒋答：“调整中日国交，乃属向所切望之事，决意对此作种种努力。”有田离华后，馆务由若杉代理。

△　“满铁”驻津理事石本召集多伦、绥远、张垣、太原、青岛、济南、郑州等处驻在员30余人会商“开发”华北矿产办法。23日，石本赴大连报告会议经过。“满铁”已定“开发”华北经济计划为：一、修筑沧石铁路；二、开采察、鲁、晋铁、煤、石油等矿；三、接济农民试植棉产。

△　河南开封物价飞涨，法币暴跌，市民向省府请愿，省府主席商震派员密查惩办奸商，建、财两厅长张静愚、尹任先召商会、银行界人士讨论金融维持办法，决定请财政部发行辅币，并令各县均用法币。

3月21日　蒋介石与驻华苏大使鲍格莫洛夫会晤，蒋担保中国政府不会同意“广田三原则”，声称：“这三点是日本的心愿。但中国政府只同意同他讨论，到现在还没有同意这三点要求。”23日，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报告称：“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最近两个星期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同张群、蒋介石在南京举行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有田来南京前曾声明，调整中日关系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承认满洲国”，“不论哪一个中国政府，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

△　宋哲元抵保定布置防共，派秦德纯代理冀察政委会事务，石敬亭代理绥署事务。

△　津海关与北宁路局订定之华北缉私办法开始实行。日驻津总领事向北宁路局提出口头抗议，路局派路警署日籍稽查员山本答复，谓："海关严密缉私，系维护税收，保全国际信誉。主权所属，自有权衡，路局不过协助性质，且实行区域也仅天津东、总两站，并对各国货物同样对待，并无歧异。"

△　上午，日将校级军官21名由沪乘汽车抵苏州"视察"；下午，向苏常路方向驶去。同日，日驻沪陆战队将官四人分乘汽车经锡沪路至无锡。此军事行动引起各方对日垂涎华东之严重猜测。

△　安徽省英山县划归湖北省统辖。

3月22日　林彪红一军团2000余人进驻晋南曲沃县之侯马镇，受到驻军及保卫团夹击，向北转移。同日，红一军团退出晋西隰县水头镇。

△　贺龙、萧克红二、红六军团在宣威北来宾铺、虎头山一带与滇军孙渡所部第一、五、七旅及蒋军郭思演纵队激战。26日转移至贵州盘县北，28日占盘县、亦资孔。

△　是日至次日，有田在沪召开驻华日总领事会议，石射（沪）、须磨（京）、三浦（汉）、西田（济）、西春彦（青岛）、河相（广州）、中村（福州）及大使馆参事若彬、参赞堀内、有野等与会，听取各驻区现状报告，陈述对华外交意见及有田与蒋介石、张群会谈经过，旋对中国币制改革后各地经济状况进行讨论。

△　日旅顺要塞部参谋长海军大佐原忠一等到津，会见驻津海军武官久保田，接洽华北辟港事。29日，日陆军军务局长太田在津与原宗一、久保田等再商华北辟港事。当晚太田携决议案返日报告。

3月23日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四五百人占领山西省交城县古交镇，次日被晋绥军包围，红军突围至河口镇。

△　冀察政务委员会下令解散未经立案之非法社团“冀察各县自治代表联席会”、“河北省民众自治协会”、“中华民国人民外交协进会”、“中华民国全民自治会”等，其所发文电一律扣发。

△　冀南平乡县硝民反对税警平毁硝池，聚众示威，被商震部黄光华师镇压，捕400余人。同日，任丘县白洋淀、古洋河等30余村硝民亦集众反对长芦税警捣毁硝池。

△　据天津《大公报》讯：川省各县灾荒奇重，尤以川北为甚，竟发现人食人之惨剧。近有省赈务委员会派往川北之王匡础会同该县府人员赴片口一带视察灾情，尝在一萧姓宅中发现三女饥民围食死尸。

△　日本陆军省更动重要陆军官员：梅津美治郎调任陆军省次官，西尾寿造调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板垣征四郎继西尾任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调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兼军事参议院干事长，喜多诚一继矶谷任驻华大使馆武官。

3月24日　胡汉民与魏道明在广东省从化商国是。胡并电约陈济棠、李宗仁、萧佛成、邹鲁赴从化叙谈。25日，陈、李等与胡、魏在从化磋商应付时局办法。魏旋返港转京报告奉命赴粤与胡等商谈经过。

△　晚，上海公安局逮捕复旦大学救国会成员黄拔山、莫自新、包毅、蒋文蒸、郑通骘、江南俊等六人，25日又捕杨伯鹏。警察总队第三中队长李备武及警察两人被学生纠察队开枪击伤。26日，保安队与警察会同复旦大学董事长钱新之、校长李登辉、秘书长金通尹搜查该校达一小时。校方应允：一、交出开枪学生；二、交出尚未就捕之共产党人；三、解散救国会；四、保安队及警察撤退后，恢复正常上课秩序；五、军训所用之步枪、刺刀等由校方负责收回；六、对被指为汉奸、不得入校之学生，学校保障其安全，返校上课。保安队与警

察遂撤退。

△　南满日本教育考察团加茂等一行12人，由济南赴青岛考察教育。

3月25日　　陈诚奉蒋介石令，自汉口抵太原，与阎锡山协商“剿共”事宜。28日，阎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委陈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下辖关麟徵第五纵队、吕济第六纵队、汤恩伯第七纵队，令其迅速恢复同蒲路南段交通。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约2000余人由交城进至岚县境，连日数次攻岚县城，未克。27日向兴县方面转进。

△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在归绥召集阿王、康王、郑王、石王、齐王等筹商绥境各盟旗联合“防共”办法。

△　日首相广田弘毅招待各国记者，宣称：“中日关系乃最重要之外交问题，故日本政府对于调整两国关系，拟极其慎重。”并称“三原则乃调整中日问题之根本方针”。

△　驻华日大使有田抵津召开华北日领会议，天津总领川樾、张家口领事中根、榆关领事原田、济南总领西田、北平使馆书记武藤、参赞若杉等参加，讨论华北外交及冀察防共。下午访多田、永见，交换华北军事、外交意见。

3月26日　　国民政府以《四库全书》赠苏联对外文化交谊会转列宁图书馆，中国驻苏使馆参赞吴南如在赠书仪式上述《四库全书》历史，并谓中国政府认此举为两国文化合作之重要行动。

△　驻法大使顾维钧、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出国返任。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围攻石楼县城一月，是日撤围，向马门庄、会同村、王村等地转进。晋绥军刘光斗等旅占领石楼城。同日，

红七十五师由岔口镇向娄烦镇转进，晋绥军一团由静乐出发向娄烦堵截红军。

△　阎锡山制定学生自首及检举共产党办法，规定各校学生如有共产党嫌疑，于发觉前自首者应予免究；如能举发他人者，准免学费。

3月27日　关东军参谋花谷、专田、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到津晤永见，会商冀、察、晋“防共”事宜，午后飞太原一带侦察红军行动。

△　绥境蒙政会副委员长潘第恭扎布及沙王、阿王、巴王之代表等抵南京，28日向蒙藏委员会报告绥境蒙政会成立经过。

△　伪冀东自治政府新设沿海税卡，对私货只收华北关税四分之一，北戴河、滦州、昌黎海口每日到私货八九船，皆在伪税卡交税，每日由此地运津私货，仅砂糖一项即达一万至1.5万包，海关损失税款万元，津关总税司许礼亚是日访北宁路局长陈觉生，共商新对策。

3月28日　驻华日大使馆武官今井在北平访宋哲元，探询晋省“剿共”情形。

△　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少将携日军部意见由沈阳到津访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参谋长永见，协商对华北“防共”、冀察外交意见。30日，宋哲元在津宴多田、松室等交换“防共”意见。

△　日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抵长春履新，与前司令南次郎办理交接。席间南次郎陈述其五大根本方针供植田参考：一、确立关东军的威容；二、五族协和；三、日、“满”经济提携；四、维持治安；五、维持和接壤国的友好关系。

△　驻华日使有田在长春召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等会议，并听取关东军对华政策意见，要点是：“（一）自西南政权及冀察、冀东两政权确立后，南京政府威势削弱，在对华外交上必须重视这一变化。

（二）日本如以南京政府为唯一外交对手，则使新兴的冀察、冀东两政权长久不能安定。（三）鉴于过去专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外交毫无进展实绩，现下应乘机放弃过去的一元外交方针，除南京外，尤以华北、西南各新政权为交涉对手，使新兴政权得以发展巩固并资为‘满洲国’的健全发达。”

△　伪冀东自治政府在秦皇岛之东设立关卡，凡由东北进口货物，一律向该关卡纳税，到天津海关即言已经纳税，拒不再交。是日天津海关呈孔祥熙请示办法，并致函外交部转向日本等国声明：中国不承认有此海关，所有进口货物如经该关纳税，一律无效。同日，秦关缉私副班长英人鸠参因缉查走私船只，遭日浪人殴打致残，秦关总税司郝各得急电国民政府请示交涉。

△　前天津市长程克因患心脏病逝世。

△　国民政府任命李书华、叶恭绰、曾镕浦、康德利、李四光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创刊。

3月29日　林彪红一军团撤出对晋西霍县的包围，退出石楼县义牒镇、辛关渡，向河西作战略转移。关麟徵师占霍县。

△　苏联正式宣布与外蒙古政府订立《苏蒙互助同盟条约》。

3月30日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与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秘密订立《华北防共协定》，次日签字。其要旨为：一、冀察政权协同阎锡山“扫荡”红军，力争与阎缔结防共协定，阎若拒绝，在适当时机可独立出兵入晋与红军作战；二、交换有关共产运动情报；三、为贯彻防共方针，冀察政权可与鲁、绥方面共同行动，缔结防共协定；四、日方支持冀察有关防共行动，并给予必要援助。

△　汪精卫被刺案在南京公开审理，江苏高等法院五分院检察官

罗人骥之起诉书称："凶刺案之幕后主使人为陈铭枢、李济深。"31日续审，张玉华等否认与陈、李有关，但供认曾谋刺蒋介石、宋子文及国联调查员未遂。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田守尧第七十五师进到兴县地区，掩护刘志丹红二十八军渡黄河入晋。

3月31日　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从神木罗峪口西北强渡黄河，歼守敌一个团，到达康宁镇，向南推进。奉命堵击红军之晋绥军温玉如第二〇七旅在兴县曹家坡、刘家庄一带被田守尧红七十五师击溃，伤敌团长周森，温逃临县。

△　林彪红一军团占领洪洞县城，先头部队南抵曲沃侯马附近。

△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参议张连升抵天津见宋哲元，旋偕陈觉生、陈中孚、石敬亭访日驻屯军参谋长永见、驻平特务机关长松室、驻榆关特务机关长竹下交换冀察"防共"意见。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规定发行公债总额1500万元，年息六厘，还本期限定为15年。

△　北平学联为3月9日惨死狱中之河北省立高中学生郭清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大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大学等50余所院校1300多名学生，以"民先队"为骨干，会后抬空棺一具游行，反对国民政府出卖华北与镇压救亡运动，在北池子遭军警阻挠冲散，刘述云等54名学生被捕。

△　据《申报》讯：日商大仓组在冀省保定、正定一带招募华工二万人，应征者多为农民，已徒步抵古北口报到，发给工人证，并由日方派赴锦州一带开矿筑路。

3月下旬　驻察外交特派员罗家衡、察省府主席张自忠在张家口与驻张日特务机关长大本等会谈察北问题，大本表示日方正注意华

北“防共”，对察北问题交涉，须待“防共”问题了结之后再谈。

是月　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再次专程赴南京和曾养甫谈判。周带来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其要旨为：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爱国政治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周并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联名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等函。

△　宋哲元派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赴南京见蒋介石，报告平、津情况，并要求核发四个混成旅和保安旅之装备及饷项。结果由何应钦发给步枪2000支、炮八门、枪弹400万粒，并决定月发补助军费80万元。

△　陈光甫率领中国币制代表团去华盛顿，与美国政府谈判出售中国白银换成外汇，以维持国民政府实行之币制改革。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下辖一个直属教导团和三个师，活动于汪清、珲春、安图、抚松等地。

△　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

△　中法航空联运（自西贡至广州）开始试办。驻京日总领事须磨提出抗议，要求对日同等待遇。

△　日东洋纺织会社在天津开设裕丰大纱厂，预计安装机器2000台，纱锭10万枚，是月破土动工兴建。

△　天津裕元纱厂拥有七万枚纱锭，布机千台，为华北最大实业之一，售予日本东洋纺织会社、钟纺织社和大日本纺织会社。该厂负债550万元，卖价除抵债外，找现无多。

△　内政部重订禁止蓄婢办法，凡以慈善关系或收养养女名义蓄

养婢女者均应禁止。由各省、市公安局调查婢女数目，列表登记，无条件解放，恢复其自由。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动解散。

△　天津、秦皇岛、烟台、龙口四关是月税收2532.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收1327.5万元；其中津关减收更大，去年3月收2078.9万元，是月只收1090.8万元。四关税收平均损失约49％强。

4月

4月1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一方面军改编训令：“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

△　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1000余人在山西省赵城附近瓦窑头、石止、马牧一带与国民党军关麟徵部作战后，撤围赵城。刘亚楼红二师攻克晋西南襄陵县城及侯马镇。

△　陕北红三十军组成，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与原在石楼地区的红十五军团一个团另一个营及山西游击队为中路军，担任牵制国民党军，继续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

△　天津日军部经济顾问部成立，由松室、石井、中井及“满铁”专员矢野、风早等组成，是晨在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召开首次会议，讨论协助兴中公司、“满铁”开发华北经济策略。

△　天津日军部参谋中井堂胁、高级副官大竹乘机飞晋绥侦察红军情形。2日，又有日机一架飞晋侦察军情。

△　广西省政府通过各机关职员回避办法，规定各机关职员与本机关长官有配偶或三亲等内血亲、二亲等内姻亲关系者，应自行申请回避，并由省政府调换工作。

△　上海特区人力车商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人力车委会减租令而罢市，拒绝租车，二万余人力车工人生活恐慌，纷向工部局、市商会、纳税华人会请愿，要求车商放车，赞成减租，并要求继续办理车夫登记及停止征收互助会费。2日，上海车商继续罢市，人力车工人分赴各车行强曳车辆7500余辆。3日，车商代表殷芝龄与工部局总董事钟思及人力车委会主席麦西会商，决定车商先复业，车租暂按新章减至0.77元，互助会费缓缴，工部局对额外人力车工人继续办理登记。4日，上海车商复业，即日出租车辆。

△　据天津《大公报》讯：鄂省去年大水，全省70县中被灾者55县，乏食者达千万人，尤以汉水流域为最，饥民掠食之风大起。

△　广东省钦、廉各地发生剧烈地震，灵山、合浦也属震区范围，灾情以灵山县最重。是日上午9时30分，隆然发生巨响，继而地面颤动，在灵山二、三区一带，间有硝磺气味。罗阳、泗洲、佛子岭等山及平山墟、灵家村等处均有大裂痕，当爆烈时，频频开合，状最惊人，地陷成潭井者多处，有流出黄水者，有流出黑水如煤渣者，全县房屋倒坍，伤毙人命甚多，无家可归者达二万余人，自是日起持续10来日，日凡10数次，至11日方渐弱而止。

△　上午10时15分，香港发生地震，震源在港外东南280里处。10时20分，广州也有小震。

△　欧亚航空公司蓉滇线正式开航。该线由成都至昆明。

△　上海《大公报》发刊。

4月2日　　晋绥军第一纵队郭宗汾旅开抵临汾城西之界峪村、东

宜村、泊庄村、堡子村、乔家院一带与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作战，红军撤围临汾城。

△　阎锡山发表红军进攻山西之经过，声称：被围多日之洪洞、赵城、临汾等县城先后解围。红军渡过汾河西岸，进占陈村、柴市等地。

△　王宠惠抵南京见蒋介石，转达胡汉民粤、宁合作意见，并对记者称：胡来南京已无问题，所谓精诚团结，现也不成严重问题。3日，王赴蒋宴，对国是再度交换意见。4日，王返沪，称蒋对胡来南京，盼望至为殷切。

△　华北缉私棘手，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去南京请示对策。3日，孔祥熙召见林世则，听取华北走私及缉私之详细报告；下午，孔向蒋介石请示。

△　南京浦口发生火灾，延烧民房1352间。3日晨又大火，毁房约400间。两日来被灾难民达七八千人。

4月3日　　商震第三十二军与关麟徵师由山西省平阳、赵城分别向洪洞县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进攻。

△　日新任外务相有田八郎在东京发表对华政策谈话称：对华政策不必拘泥于所谓“三原则”，惟依事势所宜，逐渐调整国交，而将中日共同防赤先行实现。

△　国民政府派杨虎继吴铁城为淞沪警备司令。

△　天津海关在大沽口扣留载人造丝、砂糖900余吨之悬伪满旗走私船“海昌号”，罚款10万元，否则船货没收。伪满请驻津日总领事川樾茂提出抗议，要求发还，遭津海关拒绝。15日，天津日军参谋中井堂胁访天津海关日税务司赤谷，交涉放行。16日，天津海关允减低罚金为五万元。后经天津市政府与日领商定，将私货全部没收，另罚款

5000元了结。

4月4日　　为防红军由晋入冀，万福麟第五十三军一部开驻平汉线，正定以南沿线各桥梁均派军守护。驻大名骑四师王奇峰部奉调灵寿协防，该军驻南乐部队也动员待命。商震第三十二军开冀、晋边境扼守东洋关、壶口关、十八盘、黄泽关等要隘。

△　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一、二两师2000余人在临汾县刘庄、王庄、张堡、柴村、孟家庄一带与晋绥军杨澄源部激战。5日午向襄陵转移。晚，晋绥军第一纵队郭宗汾等旅占襄陵城。

△　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陈赓红一师占领史村镇，5日攻汾城县，汤恩伯第十三军翁旅驰援。6日，汾城围解。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占领瞻化县城。6日主力由四川天全抵西康丹巴、乾宁、德格、道孚一带，一部到达瞻化、康定西北。

△　北平日使馆武官今井、海军武官桑原飞晋侦察红军情形，并晤日驻并特务机关长和知。6日，今井等飞返天津见松室。

△　驻华英大使贾德干在沪接见记者称：一、英国对华，如有可能，愿与任何国家合作，固不仅日本一国；二、英国在华投资，重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尤以上海为甚，当随时维护其利益；三、华北走私事，英甚予注视，认为关系重要；四、英国已决定在上海及东京设置财政顾问，隶于驻两国大使馆，并经内定即由现在上海之李滋·罗斯爵士之助理巴志担任；五、英国为国联会员国，对承认“满洲国”问题，根本不谈；六、英国对华借款须视伦敦方面投资家的态度及中国担保品之性质而定。5日，贾德干离华返英。

△　据平津查缉处调查，天津吸鸦片者达20万人。是日，又由察、绥运到天津鸦片10万斤，交查缉处土药店出售。

△　川北蓬安、营山、岳池、仪陇、南部等八县，饥民聚众求食

达万余人，扇子队教乘机活动。该教以川北绵阳、梓潼为中心，信徒散处于川北各县，约计四五万人。

4月5日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攻占寻甸，7日由寻甸向普渡河上游西进，8日进至普渡河铁索桥，渡口被滇军孙渡部封锁。红六军团在小松园与另一部滇军遭遇。

△　山东鄄城董庄黄河边坝堵合。

△　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皇呈递国书。

4月6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恩来、李克农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会商以下问题：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五、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　津日驻屯军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少将抵平就任，接见记者声称："此来系代表津日驻屯军常川驻平，疏通中日意见，今后华北交涉，即由津驻屯军代表进行，与关东军无涉。"

△　日军部派松永忠恕大佐抵津，在日租界组织特务机关，直属东京陆军首脑部统辖。

△　美国纽约州银行事业管理部门核准中国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美伊尔文信托公司副经理勃杰斯与上海中国银行干部王正序分任该分行正、副经理。

4月7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严重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认为协定"侵害中国主权，违反民国十三年中苏协定之规定"，声明"中国政府断难承认"。9日，苏联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复照拒绝中国政府之抗议，指出：苏蒙协定"无丝毫损害中国主权之处"，该协定不容许亦不包含苏联对中国及蒙古"有任何领土之要求"，"且适合于

中国人民及蒙古人民之利益”。11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第二次抗议，声明仍维持第一次抗议所表明之态度。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在山西临县白文镇与刘志丹红二十八军会师。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兼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及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等，由驻美大使施肇基陪同访问美国国务卿赫尔与财政部长摩根索，商谈美援助中国管理货币之范围问题。8日，会谈继续。摩根索称：渠邀中国银行家来此交换中、美两国关于货币政策之意见，现正考虑两国间在金融问题上作更密切之合作办法。

△　顾祝同偕韩德勤由贵阳飞昆明，与龙云商“剿共”军事。

△　四川省西南部峨边县少数民族黑彝族因与汉人冲突，该族哈子家集合彝民13支，统众2000余人马，步、手枪千余支，围攻峨边县城，国民党军前往镇压，先后攻占化牛坪、金岩溪和上三夹洼，彝民不支，死200余人，向小凉山万石坪溃退。

△　据天津海关统计，因冀东私货输入猖狂，3月21日至是日，关税损失20余万元。同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南京晤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再商缉私办法。

4月8日　　宋哲元与日驻屯军司令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天津会谈冀察问题，结果如下：一、冀东伪组织在三周内撤销，殷汝耕的出路未定；二、察北问题，日方不允许撤退李守信部队，且称如“共祸”蔓延到绥远，日方还要增兵防堵；三、日方提议设置“中日防共委员会”，缔结“防共协定”，宋未接受，坚持自力“防共”，不假外力，免使主权旁落，土地被侵。是日，驻津日军司令部参谋长永见赴东京出席日师团长会议，请示对华意见，并提出增兵华北的建议，请陆军部指示。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由兴县抵方山县南之赵庄、大西沟一带与晋绥军李生达部激战四小时后，向南转移，驻大武镇一带。

△　红军叶飞部600余人由闽东福鼎、寿宁转移到浙江省泰顺、平阳。

△　美国非战协会秘书长李比氏宣称：美国在华之投资为数不过1.3亿元，武力保护，得不偿失。

△　禁烟总监部通令严禁公务员吸毒，并颁布检举办法，违者“立予免职或送惩处”。

△　湖北省政府警备部奉行政院令解散湖北省学生救国联合会。

△　冀南隆平、巨鹿、任丘、内丘等十余县硝民在郭汉良领导下起义，是日隆平县长张庆荣率团队“围剿”。郭率众突围转移。

△　河北省柳江煤矿董事会以66万元将该矿出让给日太记公司。临榆县长城煤矿及与柳江矿毗连之宝兴煤矿，均受日方压力停办。

△　广东省营钢铁厂由英商百利实业公司承建，分六年付款，三年筑竣。

△　凌晨1时50分，兰州发生较强烈地震，一分钟间先后连震两次。

4月9日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西北“剿匪”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就以下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同意这是中国当前的惟一出路；二、关于红军集中问题，张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六军团北上路线，因须经中央军防区，张愿任斡旋之责；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四、

张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以王以哲军继续驻防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

△　日武官今井再飞太原晤阎锡山及绥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等要员，调查红军入晋情形。同日，天津日军部高参石井等飞绥侦察红军情形。11日，今井返津称：红军在山西除北部兴县、临县外，大部在晋南汾城、同蒲线附近，总计万余人。

△　红军三四千人在山西省新绛县泉掌镇、西薛、郭村一带与汤恩伯部第十三军激战后，西向稷山县转移。

△　红军三四千人在汾城县北古城镇与晋绥军杨澄源部第六十九师激战后，向汾城西南稷县方向转移。

△　中阳、石楼境内红军千余人进抵隰县东南之陡坡、还珠、三交等村，与来自洪洞县万安镇之红军千余人会合，在三交与晋绥军激战。

4月10日　蒋介石偕陈布雷、钱大钧等抵汉口巡视军政事务，是日接见何成濬、杨永泰、高一涵等。次日赴武昌主持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

△　贺龙红二军团、萧克红六军团在柯渡会合，遇滇军孙渡纵队截击，西渡普渡河未成，遂折转向南，佯攻昆明。11日，攻占富明县城（距昆明20公里），昆明震动，全城戒严，龙云急调普渡河渡口的滇军救援昆明。贺、萧两部红军突然转向滇西，到石鼓、丽江渡金沙江。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三四千人集中在山西省离石县大武镇一带，其中一部千余人是日抵离石城下，11日与晋绥军李生达、杨效欧等部作战后，转移到离石、中阳间的朱家庄一带。李生达部抵离石县城。

△　财政部密令农民银行不得在原规定一亿元限额之外，再订印钞票。同日，财政部又电农民银行，根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命令，该行所请将已封存之湖北省银行钞券1585万元改印该行字样，与该行钞券同样行使一案，“姑准备案”。

△　天津东局子日兵营加紧修筑，工人增至2000人。新辟机场、扩建兵营，占地850亩，均购自民间，兵营五里内外，禁止农民耕作，土地任其荒芜。

△　上海民营大生纺织第二厂因外资竞争而倒闭。是日，第三次开标拍卖，价格由200万元减至120万元。

4月上旬　　蒋介石调集洛阳、徐州、浦口等地军队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入晋增援阎锡山。一路五个师经陇海路至豫西，从风陵渡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开赴晋中，增援太原。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由晋中向南进攻，驻守黄河以西的陕军沿河北上，滋扰红军后方，企图包抄红军后路。红军形势十分严重。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制定4、5两月战斗计划，在“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整训、筹集物资等准备工作。整编后的序列是：红四军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和独立师；第九军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和模范师，以上两军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实际每师相当一个大团；第三十军辖第八十八、第八十九两个师；第三十一军辖第九十一、第九十三两师，以上两军每师各为三个团。第三十三军已于1月间与原第一

方面军第五军团合编为第五军，原红五军团部队编为第十三师第三十七、第三十九团，原第三十三军部队编为第十五师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各团由军直辖，不设师部。另外，还集中各军骑兵共200余人组成骑兵师。总计连原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在内，共约28个团四万余人。

4月11日　立法院长孙科、中央党部秘书长兼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中委陈布雷、考试院长戴季陶等到上海访王宠惠，续商时局及宪草问题。16日，叶、戴、陈再访王宠惠谈宪草问题。

△　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在稷山城北与汤恩伯第一路军激战后向西转进。

△　日外相有田访首相广田，将在华所刺探之对日态度及华北情势详加汇报。有田、广田一致认为“力谋中、日、‘满’三国之亲善，须南京政府有真正认识东亚现状，非仅为口头上之中日亲善，例如抗日、排挤日货等事，须绝对取缔。”同日，方田召集东亚局长桑岛，听取对华政策意见。

△　日关东军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驻张垣军事联络官大本、驻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驻榆特务机关长竹下及多田、松室等在津讨论华北“防共”问题。14日，永见由长春抵津，在日军司令部开会，商冀察“防共”事，并由永见说明向日军部请示结果。

△　冀东昌黎城伪保安队借口“发现共党暴动”，关闭城门，搜捕74人。同日，伪保安四总队赵雷部亦在唐山大捕共产党人。

△　陈维周抵广州，向陈济棠、林云陔报告到南京商洽改大洋制经过称：“中央拟发大洋券来粤、桂行使，所有白银由中央派员保管。”

△　财政部规定余盐输往日本办法四项，分电长芦、山东、两

淮、福建四区盐运使署遵办。该办法规定，各区输日工业用盐税率，暂定为每公吨一元。

4月12日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主力约五万人在中阳县北被晋绥军李生达、杨效欧、孙楚各纵队包围，经肉搏，在师庄地区歼敌第六十六师一个团另一个炮兵营，击溃敌三个团，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尔后由师庄突围，转至大麦郊休整。

△　孔祥熙在上海召开华北缉私谈话会，关务署长郑莱、总税务司梅乐和、津海关监督林世则、秦海关监督奚定谟出谋，讨论华北缉私办法，决定侧重外交力量之辅助，充实并扩充缉私范围。

△　天津《大公报》载胡适《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指出："广田的三原则是增进中日仇恨的条件，不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调整中日关系必须以消除中日间的仇恨局势为基本原则"；并提出废止《塘沽停战协定》、取消非战区域，宣告所谓《何应钦梅津协定》的无效等七条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

4月13日　陈诚谒阎锡山，商定"进剿"红军策略后，是日飞晋南侯马镇红军占领区视察，并分别会晤汤恩伯、胡宗南等面授机宜。次日，陈诚赴稷山、河津各地视察，15日返太原。

△　刘志丹红二十八军到达山西中阳县以西之留誉镇。黄昏前，军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进攻三交镇。

△　松室由北平到天津，晤多田、竹下、和知、羽山、大本及日军部各参谋等，讨论华北"防共"问题。

△　日本增兵华北。是日起至6月22日止，日本增兵八次，计增7840人，原驻日军为2203人，合计共为10043人，其后有1600人换防回国，实际留驻华北者为8843人。此项数字为原驻日军数字的四倍，为美、英、法、意四国驻兵总额的两倍。

△　据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高级伪官吏六人，于去年10月受委托为代表交涉哈尔滨事件之际，与苏、蒙代表暗约反满抗日，拟建立内蒙人民政府，事泄被捕，解长春以军法审讯。

4月14日　刘志丹红二十八军抵中阳县三交镇、李家寨一带，与晋绥军方克猷旅章拯宇团激战。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南山指挥战斗时牺牲。15日，红二十八军向冀家垣方面转进。

△　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一部千余人撤出稷山县境，西渡黄河返陕；另部经乡宁县向北转移，15日占领吉县城。

△　留陕北红军集中在靖边、延川等地，重要机关在瓦窑堡、永平镇等处。张学良令其部队是日起，分由鄜县交道镇向拐茆镇、甘谷泽进攻。

△　日有田外相决定对华外交政策，将依下列各点积极进行交涉：一、华北问题与冀察政权直接交涉；二、由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援助冀察政权，使其扩大、强化，并与日本发生更密切关系；三、与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谈判，急谋调整中日经济关系，尤以要求国民政府减轻关税税率，为目前急要之图，至于军政方面，可暂置次要地位；四、俟经济关系调整成功后，再进一步促成中、日、“满”之关税同盟；五、对于“满洲国”之存在，固不必强迫国民政府承认，但最少限度须令其默认、参加中、日、“满”三国之关税同盟或经济集团；六、关于共同防赤问题，仍须以建立中、日、“满”之经济集团为前提，不可操之过急，但仍须促令对于由外蒙、新疆东渐之赤化势力，共同采取有效之防止办法。18日，有田将该政策在日议会发表。

△　西藏近开政教大会，热振继续摄政。是日，行政院开会讨论改进对藏关系。

△　行政院通过《土地赋税减免规程》，规定公有土地一律免

税，立案私立学校及学术机关办有成绩者免税，公园、体育场、农林试验场、医院酌减。

△　伪冀东自治政府秘书长兼外交处长池宗墨代表殷汝耕赴长春，讨论冀东与伪满联络问题。16日，池见日关东军司令植田及伪满外交大臣张燕卿，分别呈递殷之亲笔函，并接受张致殷复函，鼓吹签订“防共互助协定”。17日，伪满外交部发表伪冀东自治政府致伪满提议订立“防共互助协定”之公函。

△　冀察政委会在河北省近海处设立沧盐海岸各口稽查处，降低海关税八分之七。委前直鲁联军军长王锡三任稽查处处长。特警3000名改编为缉私队，归稽查处指挥，对未完税走私者，实行武力缉私。

△　汕头日浪人因警察阻止走私，寻衅报复，殴打岗警。汕头市政府向日领事馆交涉。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人力车委员会举行车夫登记，额定5000人，但前往登记者达两万余名，发生纠纷，击坏电车、公共汽车九辆，捕房派警弹压，双方发生冲突，各有微伤。

4月15日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分两路向滇西挺进，红六军团占牟定，红二军团下楚雄、盐兴，16日占镇南，18日克祥云。红六军团17日克姚安，19日攻占盐丰。

△　甘孜“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以格达活佛为政府主席，夏克刀登为副主席兼军事部长。23日，红四方面军与甘孜西北的德格土司订立互不侵犯协定。5月，红军俘获在甘孜等地活动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诺那呼图克图，给予优待，礼送出境。

△　萧振瀛、陈中孚在津代宋哲元访永见、松室，洽谈冀察外交及防共事务。日方认为冀察外交态度犹豫，防共情势紧急，有立须实现中日会拟具体办法必要。

△　殷汝耕偕王厦材到天津，与多田、永见、松室商冀东问题。

△　日军步、炮兵500余人在天津八里台演习夜战，由萱岛队长指挥。16日，日军一队在演习中，流弹击伤华警吴忠头部。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国民工役法原则，其要点为：一、国家为平时及其他时期的重要工作，得征工役；二、工役分服役及征工两种；三、平时工役，凡年满18至45岁之男子，每人每年至少须担负三日。

△　孟十还主编之文学月刊《作家》在上海出版。创刊号发表萧红的短篇小说《手》和陈荒煤的《长江上》，至11月出至第八期停刊。

4月16日　外交部以日方包庇走私、破坏关税，对日本政府提出书面抗议，略称：今年4月起，中国海关税收因走私损失已达800万元，破坏中国财政，侵害中国主权，莫此为甚，请对秦皇岛等处所驻日军严加告诫，不许再有干涉海关缉私及包庇私运之行为，并立将“石河转运公司”等私贩集团予以解散。

△　林世则返天津，向宋哲元报告在南京会商缉私及请拨冀省协款各事经过。

△　日联合舰队军舰65艘驶抵青岛，司令高桥洁大将访韩复榘、沈鸿烈。17日，韩至日“长门”旗舰答拜。韩称：近来国际纷扰，无论中日亲善或东亚和平，两国均有提携必要，盼共同努力。高桥答称：“近年中日虽多事，独山东安静如恒，皆贵主席维持之力。”19日，日联合舰队离青返日。

△　日外务省事务官曾弥由北平飞太原视察红军情况后，转长城口及战区视察。

△　行政院召开故宫博物院三届理事会议，推蔡元培连任理事

长。

4月17日　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一、二两师与由隰县午城镇东皮条湾前来之红军千余人会合，在北庄、苏家庄一带与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第五纵队关麟徵第二十五师激战，红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阵亡。红军旋向西进攻大宁城南之军岔山。

△　日内阁会议决定增强日本在华驻军。18日，发布陆甲第六号军令，规定驻屯军司令官亲任实职，并增强约三倍兵力；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其增强后的新编制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步兵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一、二联队，战车队，骑兵队，炮兵联队，工兵队，通讯队，宪兵队及驻屯军医院、仓库等。6月上旬完成新编制后，总人数达5774名，马648匹。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步兵第二联队和军直辖各部队驻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及步兵第一联队主力驻北平和丰台，其他一部步兵部队分布于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川樾茂升任驻华大使，须磨总领事访问外交部长张群，征求中国政府同意。

△　胡汉民、邹鲁等电慰王宠惠疾，并促早日南下，共商时局。

4月18日　立法院长孙科到上海访王宠惠，续商宪法草案增订问题。

△　华北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原隶前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后改隶实业部，今改隶冀察财务委员会。据该会委员刘炤称：该会自1934年7月25日成立，在冀察经办合作事业，迄今年4月16日止，共组成合作社1277个，互助社2541个。

△　晨1时，武汉天气骤变，狂风暴雨成灾，百年来仅见。全市倒房3000栋，死四五十人，伤三四百人。

4月19日　17日蒋介石飞抵成都。是日在成都召集川绅及教界训话，望协助政府启导民众。川绅由尹昌龄向蒋申述灾情，并交人吃人照片，请拨大批赈款。次日，蒋介石出席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话，题为《四川民众的光明之路》，并召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唐式遵、李家钰、孙震、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作“剿共”指示。

△　为迎接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北上，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以罗炳辉第三十二军和王宏坤第四军一部由道孚出动进攻雅江，16日占领东俄洛。是日，逼进雅江，守敌两个团逃窜，第三十二军在追击中歼其一部，占领雅江城，继占西俄洛。至此，遂将康定之敌阻于雅江以东，保障了第二、六军团侧翼北上道路的安全。

△　是日至25日一周内，自秦皇岛、北戴河、南大市、留守营及昌黎等处运往天津私货，计人造丝31.178万公斤，白糖726.939万公斤，卷烟纸202包，匹头货190包，杂货4253包。另自天津由北宁路、平津路运赴各地的私货，计人造丝8.379万公斤，白糖370.539万公斤，卷烟纸245包。由于私货大量销行，国货大受打击，影响外商正当贸易，引起英、美、德诸国商人及其政府深切关注。日商三井、三菱等，也要求由日方与中国政府合作防止走私。

4月20日　首次伪蒙古大会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开幕，至5月1日闭幕。参加这次大会的王公，以锡、察两盟最多。李守信、吴鹤龄等以蒙古军总司令部军政首脑资格参加。会上主要议案有：一、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二、关于征兵、扩军，组织“蒙古军”案；三、关于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案；四、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组织救济新村案。大会通过吴鹤龄起草的《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最后按照德王等事先拟定的名单，选出云王（云端旺楚克）为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索特那木拉布丹）、沙王（沙克都尔札布）为副主席，任命德王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德化”市成立，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元731年

年号，并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作为蒙古军政府的旗帜。

△　冀察政委会建设委员会成立，门致中为主席，王揖唐、高惜冰、魏绍武、张砺生等六人为委员。23日，门致中访宋哲元，商建设计划，并规划首先筑沧石铁路，全长500华里。

△　冀察绥靖公署参谋处长宋梅村、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应宋哲元召，到津商冀南“防共”。

4月21日　蒋介石电派龙云为滇黔“剿匪军”总司令。

△　蒋介石电希特勒祝寿，并力赞“中德友谊”与经济合作成功。希特勒电蒋答谢。

△　国民政府任命陆军少将王万龄为陆军第四师师长；任命陆军少将赵锡光为陆军第九十六师师长；任命陈又新为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原任柏天民另有任用，应免本职。

△　贺龙红二军团与萧克红六军团在宾川会合。22日，攻占鹤庆。25日，攻占丽江。

△　上午9时，萧振瀛、陈觉生、冯治安及宋梅村等在天津与永见、石井会商冀东外交与华北“防共”，日方主张先“防共”，后冀察交涉。

△　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占据矿坑，要求连班工作，增加收入，遭矿方拒绝。23日，矿工拒绝下井工作。

△　苏州郭巷乡下塘村一带农民300余人，聚众抗租，被公安局捕去农民王阿金等人。22日晚，苏州车坊乡上潭村农民百余人聚众抗租，鸣土枪向镇公所示威。23日，斜塘西金沙乡、张王坟等地农妇500余人到乡长杨益嵩处，声言无食，请求救济。下庄乡农妇千余人包围乡长。斜塘乡、莲慕乡、下庄、南沙、西华沙等村农民2000余人

纷纷请愿，鸣锣抗租，被军警鸣枪驱散。25日下午3时，车坊乡胡家巷、姚村等村农民也纷纷聚众抗租。23日，苏州县政府决严禁抗租，否则以《紧急治罪法》论处。

△　伪满军政部判决密谋反“满”抗日之前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警务厅长春德、第一警备军参谋长福龄、秘书官叶霖太死刑。前海拉尔警察巡官倭兴泰徒刑15年。前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少尉沙德尔图徒刑12年。

4月22日　蒋介石自成都飞抵昆明，见龙云等。23日，蒋在云南省府欢迎会上演说，勉励将士努力“剿共”。

△　“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陈诚抵灵石召集“剿共”各将领，面授机宜，饬令分途进攻晋西红军。

△　绥境蒙政会副委员长潘第恭扎布赴太原访阎锡山，商晋、绥联合“防共”。

△　下午4时，永见偕天津日军部附冈田少佐、航空支配长通口少佐等到津英租界宋宅访宋哲元、萧振瀛、陈中孚、陈觉生等，谈冀察外交及“防共”。

△　是日至29日，国际学联规定为世界青年援助中国学生周，号召全世界各国大学召开全体大会，实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

4月23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宪法草案审议报告，交立法院审查；又关于国民大会东北四省代表名额与其他各省同样，以人口为比例。

△　陈诚返太原，与阎锡山密商“肃清”灵石、孝义等处红军。

△　广州湾发生法兵枪杀中国难民惨案。广东省赤坎华商募捐购米3000包，运往坡头散发，赈济因天灾歉收之难民，坡头法国营官借

口影响治安，派兵驱逐，击毙难民陈大轩、许可福、李其福三人，群众追缉凶手，复被击毙陈卿贵、李芝和两人，击伤董马成等12人，赈米3000包亦被扣留。惨案发生后，难民代表陈保等五人到广州向当局求援，要求与法方交涉。

△　伪冀东自治政府秘书长兼外交处长池宗墨发表宣言，声称：冀东与“满洲国”之互助协定，已于长春商妥大纲，不日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细目，正式签约。

△　据《大公报》讯：甘肃省河西区10余县灾情惨重，玉门、安西、民乐等县瘟疫大作，每日因瘟疫饥饿死者，每县自500至千人不等。存者大半向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边境草地逃亡。

4月24日　　行政院长蒋介石令内政部转行各省“慎重县长人选”，“尤应选用体格健全，耳目聪明，通明治理，矢忠守职之人”。并“将现行县长任用考试法规，妥为修正，以资遵守”。

△　中央研究院由傅斯年主持在山东城子崖发掘商代古黑陶器。

△　上海洋庄茶叶同业公会会员吴信昌、洪源永、求兴隆、协泰等14家茶栈，反对安徽省政府统制祁茶。上海市商会也电蒋介石、全国经委和安徽省政府，要求制止皖省统制运销祁茶，以维茶栈生计。

4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出共同行动纲领六条：一、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二、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三、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实行外交公开；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　国民政府派陆军中将胡宗南为陆军第一军军长；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保安处处长。同日又命陆军少将陈安宝为陆军第七十九师师

长，原任樊崧甫另有任用，应免本职。

△　夜，红二、红六军团开始在滇西北丽江县石鼓、巨甸等处渡金沙江，至28日黄昏，红军1.7万人全部渡过金沙江，踏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征途。

△　云南省立鼎新初级商校童子军出外演习，欲乘便游览“英国公园”，由樊弥德（美籍）教练员及杨品金、马运前往交涉，被驻滇英领事哈定殴伤，童子军前往交涉请愿。29日，哈定访国民党特派员王占祺，态度强横，反称其行凶打人，系出于正当处置，意欲中方道歉，王据理反驳。

△　李滋·罗斯到天津，调查华北走私及对英国商业影响。27日，李滋·罗斯邀集英商询问英在华北经济状况及华北走私情况，并会见海关总税务司许亚礼。

4月26日　华北日武官会议在天津举行，永见报告归国出席师团长会议经过，传达陆军首脑部意见。会议着重讨论“防共”，决议催促冀察政委会成立“中日防共委员会”，此外并讨论“华北经济开发”问题。27日，石井高级参谋携会议结果飞长春与关东军司令部接洽后归国报告。

4月27日　华北实行缉私新法，以天津海关及北宁、津浦、平汉等铁路为主体，沧县、长辛店、津郊、小闸口各设税卡，对水陆转运私货，收买眼线百余名告密。海关并以低价拍卖没收之砂糖、人造丝。

△　国联行政院组织委员会在日内瓦开会，通过中国常任理事席案，任期一年。

4月28日　蒋介石于4月27日由贵阳飞抵长沙。是日对参加军训的2000多名各校学生作《军训的目的与救国的基础》的训话，勖勉学

生以湖南为中流砥柱，作复兴民族的贤豪，“负担起当前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责任”。

△　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以阎锡山又增兵力七个旅，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以东的狭长地区，鉴于敌情变化，为避免不利决战，是日奉命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

△　粤省当局派冯锐飞南京，商改大洋制详细办法。

△　李滋·罗斯在天津晤日新任驻华大使川樾，称华北走私影响英方经济，且足导致中国经济界不安。川樾强调走私起因为中国关税率过高，若中国改进关税，自可禁绝。罗斯称，渠已建议中国政府减税，望日领协助缉私，免英商市场受侵夺。川樾则称，此系中国政府事，无权过问。

△　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铺轨竣工，粤汉路全部接轨。

4月29日　张学良飞太原与陈诚、阎锡山、徐永昌、杨爱源、赵戴文、高桂滋等会商晋、陕夹击红军办法。30日飞返西安。张在太原期间，曾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必须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等等密告阎，以争取阎的支持。阎迫于红军东征的压力，亦表示同意，并愿与张配合共同行动。

△　立法院24人委员会通过国民大会选举代表名额案。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沿玉龙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分两路北进，至格罗湾越大雪山，经清香树，30日全军到达中甸。

△　英国下院讨论华北漏税私运严重情形。保守党议员却尔顿询问外相艾登，英国将采取何种步骤以稳固关税作抵之中国借款。艾登答称已向中日政府交涉，并积极考虑保障华北英人贸易及外债安全办法。

4月30日　　立法院通过《国民大会组织法草案》，规定：“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同日，又通过《行政院组织法》，规定行政院由内政、外交、军政、海军、财政、实业、教育、交通、铁道等部和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卫生署等组成。

△　驻法大使顾维钧向法总统勒勃伦呈递国书。

△　德国远东经济考察团团长克朴代表德国汇兑管理局在日本东京与伪满洲国政府签定《德“满”通商协定》，内容规定“满洲国”得自本年6月1日起之12个月内以值日金一亿元之产品运入德国，其货价75％由德国以外币偿付，其余25％以马克付之。德国输往“满洲国”之数量，以其输入额为限，不得溢出。

4月下旬　　北平中国学院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四项条件，面交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要点为：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政府，邀请各爱国党派、团体的代表参加；二、承认苏区政权的合法地位；三、集中南方游击队，择路北上抗日；四、释放政治犯，开放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　南浔路局欠日债1000万元，欠息约800万元，经中日双方代表商定，每月归还日金七万，由路局自筹1.5万元，铁路部摊5.5万元，于10年内还清。

是月　　国民政府公布《县司法处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凡未设法院之县，应一律暂设司法处，办理司法事务。时全国1700余县，已设地方法院者仅300余县，其十分之八以上，仍沿用县长兼理司法制度。

△　因受冀东走私影响，国民政府是月关税收入损失达800万元。自1935年8月1日至是月30日止，因华北走私，海关税收损失共计达2550.6946万元。

△　北平各界救国会成立，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

△　陈立夫自德国柏林回国。陈在柏林图与苏联谈判，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和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等候三个月，未得苏方回音。

△　日本关东军制定《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要纲》，妄图在三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计划以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

△　内蒙古大雪成灾，为数百年所未有，灾区达4000余里，受灾最重者为锡林郭勒盟，次为乌兰察布盟，再次为伊克昭盟。平均每日冻毙牛羊五六百头，居民冻死者甚多。中央允拨款赈济灾民。

5月

5月1日　是日至5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先后从山西省永和县铁罗关、清水关一带渡过黄河，撤回陕北。此次红军东征，历时两月余，扩充新战士约7000人，筹款40万元，并运回棉花、粮食等大批军需物资。

△　是日至3日，红二、红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余米的哈巴雪山，齐集滇西北康藏高原之藏族居住地中甸县。5日，红二、红六军团分路向甘孜前进。

△　驻汕头市日领事原田就1月21日日警角田进倒毙案，向汕头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定至迟须于2日下午6时以前作圆满答复，否则自由行动。2日，日驻马公港要塞司令华田乘“秋风”舰抵汕头交涉，日本第十三驱逐舰队司令西岗率“苦作”、“早苗”二舰开汕威胁。

△　日陆军省任命第十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华北日驻屯军

司令，原任多田骏调任第十一师团长。

△　台湾爱国青年20余人袭击离埔里社10余里之乡村，杀日警二人后，退向阿里山，临行留下油印传单数千张，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台罪行，号召全台民众一致反日。

△　关内外货物是日起实行联运。联运协定系北宁路局与“满铁”及关外铁路局签定。

5月2日　　国民政府特派孔祥榕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派张惠长为庆贺古巴国恢复宪法专使。

△　英驻日大使克莱武访日外相有田，就华北走私及冀察、“冀东”关税政策，询问日政府意见，并称英国贸易因华北私运受重大损失，“冀东自治委员会最近与‘满洲国’订立关税协定，承认四分之一之特惠，英国政府对此结果抱重大关心”。有田诡称：“日本也因华北私运所受影响与英国同样，应要求中国政府反省。”

5月3日　　晋陕军奉令对东征红军全线总攻。4日，晋绥军杨澄源部越过隰县西之桑壁镇联合关麟徵、汤恩伯两师向黄河沿岸进击。5日，关麟徵、杨澄源等部进至永和、大宁一带黄河沿岸。

△　河北省政府划四区“剿共”，一区平汉线西徐水、满城至井陉共17县，二区临城等七县，三区顺德以南，四区由涞水、易县越平汉线迤南，分别以王奇峰、林作桢、黄光华、赵登禹为各区司令。是日，一区第二分区指挥丛兆麟召所辖清苑、完县、唐县、望都、定县、新乐等县县长会议，讨论“防共”办法，决定从清查户口、建筑碉堡、反共宣传等入手。

△　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致书全国学生联合会及全国学生，建议：一、担负武装民众工作，本身也要武装起来；二、争取士兵抗日，争取军官抗日；三、继续到民间去，扩大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

作；四、注意建立人民统一战线，结成抗日救国联盟。

△　是日至5日，伪蒙古政务委员会第四届全体会议在百灵庙召开，德王主持，讨论请求中央增加蒙政会经费，请求中央发给枪支扩充保安队、防共、迁移会址至德化县加卜寺等案。

△　日本大藏、拓务、外务、商工四省合组之华北调查团一行30人由拓务省植场课长率领从东京出发，12日到达天津，13日转张家口，再赴北平、保定、正定、顺德、郑州、青岛、海州、济南调查，定7月15日到上海与兴中公司社长十河晤会，决定投资开发事宜，再返日报告。

5月4日　　蒋介石视察鄂、川、滇、黔、湘、赣六省结束，是日到安庆，5日抵芜湖，换乘汽车返南京。

△　李滋·罗斯赴上海访财政部长孔祥熙及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谈华北调查走私经过。

5月5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凡八章148条。后简称“五五宪草”。

△　东征战役结束。当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虽然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　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决分两路由云南中甸出发北上。是日，二军团由中甸出发到达西康得荣，24日到达巴塘县中咱，向巴塘城前进。

5月6日　　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由太原到保定与万福麟、张允荣商“剿共”军事。

△　阎锡山令兵工筑路，限10日内完成平遥至汾阳铁路，以便运兵入陕“追剿”红军。

△　青海省保安处长马步芳令德格（位于甘孜西北）土司所属民团偷袭甘孜波巴人民政府，遭红军还击，死350余骑。

△　日陆军省参谋次长西尾寿造中将与新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谈话，主要内容为：一、中国驻屯军驻屯地区，大体上限于自渤海湾至北平铁路沿线；二、中国驻屯军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内之治安，必要时准许行使武力。

△　永见访萧振瀛，续商撤销冀东伪组织问题，日方提出交换条件为：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冀察政委会与“冀东”合并。12日，多田偕永见访宋哲元，萧振瀛及陈觉生在座，多田希望冀察当局能依其方案，在其离华前解决冀东问题。宋表示原则同意，惟不愿接受交换条件。

△　《救亡情报》创刊，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编辑。

5月7日　　外交部就驻昆明英总领事哈定殴辱鼎新商业学校教练樊弥德事，照请驻华英使馆要求将该总领事撤换。14日，哈定正式照会昆明外交办事处，对殴辱鼎新商业学校教练事表示歉意。27日，英大使照会外交部表示歉意，并称已令该领事即行离华。

△　华北走私波及长江流域，上海租界私货日增，是日华商纱厂联合会电请行政院实业部取缔走私。8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执委会议亦请求迅速制止。

△　江苏南通秦灶乡农民3000余人，反对抽壮丁，捣毁乡公所。吴县县长以陆墓秧上乡农民聚众抗租，指令公安局查明密拿。

△　天津市政府以海河工程局大权操诸外人之手，近年来海河日淤，影响津港繁荣，函海河工程局要求将董事名额中增加河北省府、天津市府、华北水利会、商会各一人，俾期中外密切合作。是日该局开会讨论，决由董事长英总领事召集领事团开会，再向公使团请示。9日，领事团议决暂不表态，原函转公使团候示。天津市长萧振瀛谈：要求改组系正当权利，倘不采纳我方意见，当取有效强制手段，决不再容权责旁落。

△　日本上院议员三上参次在贵族院发表侮蔑我国之演说，声称："皇室之尊严，非但在国内须绝对保持，即在国外也无二致。""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民国，而我方竟以中华呼之，冒渎我国体之尊严，莫此为甚，此后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异常激愤，组织三上事件交涉委员会，派员分赴日本各地，联络华侨，一致对日抗议，请中国驻日使馆严重交涉。

△　日外务省前通商局长斋藤良卫偕外务省调查部第二课长水野伊太郎及南满铁路会社长冈伊八、横田英治等抵汉口，调查长江流域经济状况。

△　教育部通令各级学校为奖助家境清贫、体格健全、资禀颖异、成绩优良之学生，设免费及公费学额。

5月8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铁道部长张嘉璈与中英银公司代表戴维森、中国建设银公司代表宋子良在南京签订《中国政府完成沪杭甬铁路六厘金镑借款合同》，票面总额英金110万镑。

△　挪威驻华公使高兰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冯玉祥对美记者斯诺谈对时局五点主张：一、中苏联盟；

二、扩大救亡运动；三、保障人民自由；四、组织并武装民众；五、停止内战。

△ “满铁”理事石本宪治宴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及北宁路各重要职员，由“满铁”津事务所长太田等作陪，对建筑沧石路、津石路进行磋商。

△ 华北部分日在乡军人、日侨反对取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张最力者为日驻北平武官今井、驻济武官石野、驻通县武官上野等，殷汝耕也极力活动，图再保存。是日，多田赴通州访殷，劝殷自动取消防共委员会，以保证该会全体委员参加华北防共委员会为交换条件。

5月9日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反对中央派军队入藏，称：“中藏交涉未解决时，中央官军绝对不得入藏，假使班禅随带官军入藏，民众必然惊惧，发生意外，断绝中藏感情，最为可能。”

△ 财政部总税务司派缉私课税务司英人白立查到天津调查华北走私情形，并协助海关计划缉私办法，白旋赴秦皇岛调查走私情况及损失。

△ 1日至是日，从冀东一带私运到津日货汽油和石油在13000箱以上，美国石油在华北市场上被排挤。12日，美国驻津领事就此事向津、秦海关提出抗议，要求制止。

△ 萧克红六军团从中甸出发，11日到达翁水，14日到达四川乡城县，20日沿硕曲河北上，经水洼、百根、桑川，于22日占领稻城县，30日向理塘进发。

5月10日 行政院召开苏、浙、皖、赣、湘、鄂、闽、鲁、豫、陕10省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各方出席代表138

人。蒋在会上演说称：“会议的目的，在求明了行政专员督察制度施行后的利弊，并讨论改革的方法，可增进行政效率。”11日下午起，分民政、教育、治安三组讨论。13日，会议闭幕。

△　无锡锡成、隆昌、华盛三机器翻砂厂工人，因资方开除工人及延长工作时间而罢工。11日，无锡祥太、三新、广勤三厂工人罢工声援。

5月11日　重庆设市，将巴县、江北两县辖境各划分一部辟为市区，全市面积187平方里，人口53.63万余人。

△　实业部在上海设立之鱼市场开业，资本120万元，官商各半。杜月笙为理事长，王晓籁为经理。该市场规定，凡海产鱼类、淡水鱼类、咸干鱼类和其他水产品输入上海后，首次贸易须由该市场经售。上海大多数鱼行为维护自身利益，未肯加入，坚持自由营业。

5月12日　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胡汉民突患脑溢血，于下午7时40分在广州逝世。留有遗嘱谓：“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凡16条。

△　行政院通过实业部所拟渔业银团办法，规定渔业银团办理下列事项：一、提倡渔民组织合作社；二、渔业贷放款项；三、建造新式渔轮，租赁与渔民等。渔业银团资金暂定100万元，实业部出资20万元，其余80万元由参加银行负担。

5月13日　蒋介石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次日，陈维周飞京见蒋，蒋告以“中央将对桂用兵”，嘱其转达陈济棠。陈在南京探悉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蒋谋以此挑起粤、桂之间的摩擦。陈回广州后即密

告陈济棠，陈济棠深恐被各个击破，遂抢先行动，以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为借口策划反中央。

△　陈诚在太原与汤恩伯、阎锡山等商“剿共”军事。16日，陈诚与阎锡山协商中央军入陕事宜。

△　秦皇岛海关监督奚定谟应财政部视察走私专员萧希超邀到天津会谈缉私。奚谓秦关原有缉私队60名，因限于《塘沽协定》中滦东为非武装区之规定，日方强行干涉，乃收回武器，缉私人员徒手坐视私运猖獗。15日，萧赴平转保调查走私及统税情况。

△　日陇海路沿线经济考察团团员横山政重等十余人，由陕西到徐州，一部赴连云港考察。

5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

△　桂系白崇禧、黄旭初等奉李宗仁命赴广州与陈济棠、邹鲁、萧佛成等召开西南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反中央问题。

△　山西绥靖公署召开治安会议，决议除晋西沿黄河各县外，全省自16日起一律解严。

△　冀东伪组织代表王润贞到东京访问日本陆军要员，携有殷汝耕手拟日伪合作开发冀东实业计划，以为要求日军部维持伪组织之交换条件。15日，殷在天津宴日方要员，求保冀东。

△　冀察政委会交通委员会成立，主席陈觉生谈该会直隶于冀察政委，办理交、铁两部所不能办之事，与交、铁两部不直接行文，对外不负直接责任，所管事项为路、电、邮、航各政。

5月15日　外交部就日政府放任日、鲜人在华北走私事，提出第六次严重抗议，声明《塘沽协定》不能限制中国海关武装缉私工作，

要求严诫秦皇岛等处日军不许干涉海关缉私和包庇私运行为，并要求立即将私贩集团如石河转运公司等组织予以解散。抗议书指出，从上年8月至今年4月，中国海关因日、鲜人走私所受损失已达2500余万元，仅4月份一个月关税损失已达800万元，照此推算，每年损失要在一亿元左右，相当于每年全国关税收入三分之一。

△　宋哲元由天津返北平，向记者发表谈话称：“在津与多田、永见、松室交涉多次，多田、松室皆主张取消冀东伪组织，但是关东军方面有人反对，因此不能解决。”又称：“防止走私的有效办法有三项：（甲）中日政府筹议一种妥协办法；（乙）中国政府减低关税；（丙）在天津成立统一的海关管辖，收归国人掌握。”

△　美、英等国因华北走私影响外债的担保和对华贸易，相继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和谴责，是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为华北走私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日当局声称，华北走私与日方无关。

△　日本开始大举增兵华北。首批新增日军1800名，从秦皇岛开抵天津，一部分开驻通县、北平。日陆军省发表谈话，声称此次增兵华北目的，在于“防共”、护侨。16日，第五师团河边旅团部在北平正式成立。

△　外交部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外务省交涉制止日增兵华北。

△　国民政府派郭泰祺为议订中腊（拉脱维亚）友好条约全权代表。6月25日，郭与拉驻英公使在伦敦签订《条约》。11月26日，国民政府批准《中腊友好条约》。

△　国民政府《会计法》定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

△　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出版《觉报》。该报是继《学联日报》之后的平、津学生救亡运动的代表刊物。

5月16日　陈济棠宴白崇禧、黄旭初及粤要员商时局，决定贯彻以前主张，不因胡汉民逝世而有所变更。

△　美国政府就日本在华北大规模增兵事发表宣言，重申美国拥护《九国公约》，尊重中国独立及领土主权。

△　成都商民因与征税员发生争执罢市。

△　汕头市政府电广东省政府报告，谓角田案日方仍坚持缉凶及恤金六万元，已予拒绝。

△　广州湾惨案后援会代表30余人到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及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请愿，要求向驻广州法领事交涉：一、取消人头税及与人头税同等之苛抽；二、今后田赋应照中国税率抽收；三、惩办凶手，抚恤被难同胞家属，赔偿损失及保证以后不得发生同样事件；四、对广州湾中国同胞，应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之责任；五、根据华府会议之决定，从速收回广州湾。19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令西南外交特派员甘介侯向驻粤法领事抗议广州湾惨案，提出惩凶、赔偿、减税三项要求。

5月17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宣言，为安定金融、保障法币，规定三项新办法：一、政府为充分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内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25%；二、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元、一元银币，以完成硬币之种类；三、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之巩固起见，其现金准备业已筹得巨款，充分增加黄金及外汇。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于6日退出雅江，15日退出崇化，是日攻占理化（今理塘），并进抵距九龙约100里与木里交界处。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开代表大会，集中讨论“联合阵线”口号。北平民先队员200多人进行长达六小时的讨论，并在京郊举行军

事演习。

△　驻津各国领事对日增兵华北极为注意，是日在津举行联席会议，并分电各该国政府报告情况。

△　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对华北情势不能坐视。同日，美驻沪海军陆战队40余人由维赛朋上校率领开赴长城一带，声称此行纯属游览。

△　财政部通令修正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将银制品用银量“不得超过30％”修正为“仍照原有习惯办理”。

△　甘肃省陇西县遭雹灾，冰雹之大有重108斤者，人畜死伤颇多。

5月18日　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命令，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野战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约1.7万余人。左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右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中路军由红八十一师及骑兵团、红二十八军组成，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　国民党中央常会临时会讨论胡汉民丧葬事，决定：一、推居正、许崇智、孙科、叶楚伧、李文范、傅秉常、褚民谊、朱家骅八委员代表中央前往致祭，由居主持其事；二、举行国葬；三、定本月25、26、27三日为全国公祭日。

△　财政部代表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此协定，美国财政部购买中国白银5000万盎斯，每盎斯以美金五角作价，以卖价所得在汇兑市场上维护中国货币现行价格。是日，摩根索宣布协定内容，谓中美两国已成立协定，美国即将以现金或美元开始大批购买华银，以协助中国政府之新币制政策，

并履行1934年美国国会所通过之购银法。该项协定足以协助国际通货稳定之成功，以后并准备与他国采取稳定通货之同样行动。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称，中美两国新订白银协定，系两国谈判最佳之成就，并谓此项协定不仅能协助中国稳定通货，并能发展美国贸易。

△　英国开平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签定开滦产业信托及共同利益契约。

△　外交部发表《塘沽协定》全文，以示该协定与制止走私并无抵触，日方不能借此限制海关武装缉私。

△　湖北省商联会鉴于武汉私货充斥，电蒋介石、孔祥熙请速采取有效方法，严厉取缔走私。

△　冀察政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主席委员邓哲熙。

△　江海关监督唐海安在广州与陈济棠、林云陔、区芳浦、林翼中等商粤改大洋制问题，获原则同意。

△　日外务省决定扩充对华文化侵略经费，由每年300万元增至400万元，其目的：一、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语科；二、与中国民间私人团体谋“经济与文化合作”；三、在中国各处设立日本文化图书馆。

△　伪满答礼使高崇禄抵通州会见殷汝耕，面交伪满外交大臣张燕卿亲笔书，声称“‘满洲国’决定将于适当时期，与‘冀东政府’正式订立条约”。

△　参加英国艺展之北京故宫古物91箱自伦敦运回南京。

5月19日　彭德怀亲率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从延川出发，分左右两路西进。

△　国民政府任命王景岐为驻瑞典兼驻挪威特命全权公使，原任诸昌年免本兼各职；任命竺可桢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　英下院外委会讨论华北走私，议决以全力赞助政府促迫对目前局势获一总澄清，尤其当使中国有得力之缉私队，以巡船游弋河北省沿海及在铁路一带设立关卡，俾认真遏止走私。

△　松室由长春返天津，已与日关东军取得一致意见，欲使整个冀察区域效尤“冀东自治”办法。

5月20日　　奉蒋介石派到粤吊胡丧之王宠惠向陈济棠提出“宁粤团结”五条件：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二、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三、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出国者，将给以旅费；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五、统一币制。陈未接受。

△　李宗仁自南宁抵广州。21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邹鲁等对蒋解决两广问题的方针进行讨论，李、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陈济棠要求采取积极行动。同日，西南执行部与政委会开会决定李宗仁、余汉谋补执行部常委，林翼中补政委会常委，并派李仙根到南京见蒋介石，报告胡汉民逝世经过。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凡八条，训令海关实施，规定凡走私在5000元以上者，处死刑；偷漏税1000元以上者，处无期徒刑。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通过修改完成《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修正《滇越铁路合同章程》；准拨八万元赈济蒙灾。

△　海关发表自5月1日至20日，华北走私使税收损失达600万元。华北私货侵入内地，西抵平绥线之包头，西南至西安及郑州，以

糖类及煤油为大宗。

△　闽西红军谭震林部联合龙岩、永定张鼎丞、邱质文、邓子恢等部红军进攻永定县之金丰、上洋一带，与闽粤“围剿军”作战。

△　闽东“剿匪军”游击队一部抵浙江省平阳、泰顺，与浙军联络向红军刘英、范义生部开始总攻。

5月21日　　陈诚、朱绶光、关麟徵晨飞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剿共”。

△　河北省政府为“防共”设大名行政区，是日成立，包括大名、邢台、曲阳以南14县，由大名县长马润昌兼行政专员。

△　天津“满铁”事务所附设华北长途汽车运输公司成立，并用武力接收津唐线华商永固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仅付车价2.4万元。

△　无锡翻砂工人因劳资谈判无结果，再度罢工。24日，劳资双方议定解决办法：一、已开除工人24名暂不复职，由资方发给工资半月，并由全体翻砂工友提出一日工资，支援被开除工友；二、今后各厂工友如遇工作稀少时，须调班工作，膳食概行自理；三、厂方不得无故停歇工友。28日，工人复工。

5月22日　　财政部、铁道部会订《防止铁路走私施行细则》，凡七项，规定洋货由铁路运输，必须呈验海关纳税凭证，海关可在津浦、平汉、平绥、胶济、宁沪、陇海各路重要车站设稽查处，关员可随车缉私。

△　国民政府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

△　新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军部召集松室、永见、饭田、石井及武官大本、石野、和知、羽山等会商华北外交问题，并由田代传达日军部新计划及侵华政策：一、现除华北各省设置

特务机关外，对华南各重要省份当继续增设；二、日、鲜人走私问题，除说明日军立场外，余概不置答；三、关于取消伪冀东组织，暂取延宕手段应付之；四、对华北金融及开发经济问题应加强。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祭胡代表居正、叶楚伧、孙科、许崇智、朱家骅、褚民谊、李文范、傅秉常、吴铁城及韩复榘之代表徐彦之等抵广州；下午，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商胡国葬及“合作救亡”问题，宁粤关系又趋紧张。

△　伪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正式成立，由蒙政会委员长兼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任主席，蒙政会副委员长兼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和蒙政会副委员长兼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二人任副主席，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德穆楚克栋鲁普则任总裁，总揽军政大权，实际操纵一切。

△　天津日人汤浅等三人私运现洋500元出境，被天津关员搜出没收，日人抗拒，拟动武，经法租界警探协助，将三人拘获，午后由日警署引渡。事后，日领永井分访税司许礼亚、市长萧振瀛抗议侵犯日侨身体。

△　国民政府任命陆军少将高双成为陆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井下工人与外班工人因生活困难，要求准许连班，增加收入，遭矿方拒绝。是日，外班工人钱永泽等号召工人罢工，矿方即调动大批矿警驱散工人，捕去钱永泽等九人，双方引起冲突，互有受伤。次日，开滦矿工拟包围法院索回被捕工人，法院被迫下令释放。当日，工人推代表向驻矿劳资接洽处要求：一、准许连班；二、不得开除为首代表；三、不得再有虐待工人情事，复遭拒绝。25日，天津矿务总局电令严惩罢工工人，劳资接洽处即通告开除钱永泽等20人，永不复用。工人愈愤，继续罢工。26日，伪唐山保安总队长赵雷、公安局长吕良忱与劳资接洽处主任魏子吨组成调解委员

会，试行调解。

5月24日　　1日至是日，走私日货共计人造丝9744包，卷烟纸846包，匹头8379包，白糖23.7399万包，杂项3.4483万箱。25日至31日，走私日货共计人造丝2526包，白糖5.1957万包，卷烟纸613包。1日至23日，关税因走私损失600万元。

△　津海关缉私队在开往大连的日船“朝鲜丸”中，抄获私运白银1.2万元。

△　汤恩伯由陕赴太原与阎锡山会商“剿共”。

5月25日　外交部长张群在外交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阐明对日外交称：“中国之于邻国愿以最大努力辑睦邦交，乃势所必然，而中日两国间，以同种、同族、同文化之关系，亟应互相提携，共谋发展。”并谓：“本人受任外交部长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

△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称：“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今遣郭团长（按：郭登瀛，阎部第三九二团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　阎锡山于是年春截获蒋介石致晋军将领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密电一份，大意为蒋令李在“剿共”期间，配合关麟徵、商震作倒阎之内应。阎乃决心杀李，以除内患。是日深夜，李生达在从太原赴晋西离石县途中之柳林镇，被马弁熊希月枪杀。

5月26日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林云陔、林翼中、区芳浦、黄季陆、刘纪文等会同居正、叶楚伧、孙科、许崇智、朱家骅、

李文范、褚民谊、傅秉常八人赴从化商时局及宁粤合作办法。

△　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电外交部情报司，称："探闻田代司令携来日军部改造方案如下：（一）冀东政府取消，畀给伪满相当地位；（二）驱逐宋、萧，排去二十九军系统，由曹锟另组华北政府；（三）关税、盐税、统部均脱离中央，外债担保继续有效；（四）曹锟如不恰当，拟令陆宗舆、齐燮元、李厚基等组织多头政权，受日驻军监督；（五）迫晋阎、绥傅势力退汾河以南。此项办法即由松室向宋间接表示。……又闻宋决定让出冀主席予张自忠，以师长刘汝明继察主席，已向中央保荐。"

△　财政部设立防止路运走私总稽察处，派安斯迩为处长。

△　江海关监督唐海安再访广东省财政当局，商改大洋制。同日，广东省政府宣布收兑银币新政策，收兑分三期，第一期以银币兑换法币者加给二成，第二期内加给一成，第三期概不给。31日，唐海安离广州，广东省改大洋制决逐步施行。

△　日外相有田决定派东亚局长桑岛赴华北视察。

△　湖北省钟祥县襄河遥堤溃决，溃口扩大至700公尺，钟祥、天门、汉川、京山等县老弱妇孺多有溺毙。

5月27日　国民政府任命赵戴文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徐永昌准免本兼各职。

△　日增兵华北，天津已到二万余人，尚有从山海关外以便衣潜入者，为数颇多。是日，外交部再电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方交涉制止。28日，许以书面向日外务省交涉，表示日在华北增兵，"足以引起中国民众之疑虑，尚望查照前议，设法阻止"。6月1日，许亲赴日外务省访有田外相，询问日本强化华北驻军事件。有田诡称："华北现状的不安，使日本有强化驻军的必要，且增加驻军为辛丑和约所许

可，故不能中止增军。”

△　西征军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经安塞、靖边越过长城向安边、定边、盐池威逼。是日，分左、右两路向宁条梁、安边进攻。红七十三师首占宁条梁镇，守敌向西逃窜。红七十五、七十八两师向安边进攻，未克。

△　据《大美晚报》讯：最近汕头市私货充斥，日籍侨民原有二三百人，现已增至700余人，新设商店洋行，至5月中旬已达185家。

△　天津海关塘沽分卡在津驶塘之日汽船上，从朝鲜旅客田龙太等三名身旁搜获私运白银值8500元，银块值2900元。28日，永井访许礼亚提出口头抗议，要求发还钱款，并指责关员侵犯日侨人身自由。

△　夜11时，平浦路客车经天津东站时，日浪人170人暗藏武器，携人造丝百件、烟卷纸30包，强行登车占客座南运。

△　东北抗联第五军周保中部袭击图宁铁路三台站，消灭日寇数十名。

△　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

△　芦盐输日契约由长芦盐运使戈定远与天津日领岸伟一签字，准三菱、岩井两公司购买，年限33万吨。

△　国联禁止鸦片委员会在日内瓦开会，美国代表福勒、中国代表胡世泽发言抨击日人在华贩卖毒品。胡称，1935年因违禁贩卖、吸食、制造毒品，为中国当局处死者共970人。委员会英顾问赖尔发言指出华北非武装区内之昌黎县设有烟膏店131家，多为日人所设，故无从施禁。厦门之烟馆323家，福州之烟馆390家，也多为日人所开。

△　开滦煤矿工人继续罢工，工人要求：一、恢复被革20名工人工籍；二、准许连班。矿方不允，并派警察严密防范。

5月28日　国民政府派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归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节制指挥。

△　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学生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教职员亦参加，共万余人。日方要求冀察当局制止。29日，宋哲元发表谈话，拒绝日方要求，谓学生运动并未越轨，不便取缔。

△　中央滇缅勘界委员会委员梁宇皋返京，对国民新闻社记者发表勘界经过，略称：自去年12月1日中英委员在户算与中立委员相见，开始工作，共开会33次，双方检出人证物证，并亲往界线有关各地视察，以谋解决首段界线。随后连续迁驻金厂坝（炉房）、刚猛（班洪）、猛角、猛董、拉坝、老厂等地，一面实地调查，一面与英方开会讨论划界有关问题。在老厂时，清明节已过，雨水连绵，兼发瘴气，测量勘划工作无法继续，故决定暂行休会。

△　美国国务卿赫尔训令驻华财政视察专员布克迅即调查日本走私损害美国商业情况，并与美驻华官员商应付措施。是晨，布克分访美驻沪总领事戈士、商务参赞安诺德及美国侨商领袖，对华北走私问题详加商讨。

△　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艾登外相，讨论华北走私问题。

△　英驻日大使克莱武访日外务省堀内次官，要求日方取缔华北走私。堀内竟答称：“华北并无走私事，英、美诸国关于华北走私问题对日政府提出抗议，可以证明美、英等国不理解东亚事情之真髓。”

△　日军发言人称，关于走私问题，《塘沽协定》并未规定阻止

中国海关在战区及其沿海一带行使职权，惟海关巡船（艇）不得携带武器，今日如非另行成立协定，则海关武装巡船如驶入战区沿岸，日军将视为一种军队。

△　伪自治团体“普安协会”、“亚洲协会”、“华北自治促进会”等，最近又在日方支持下，由高凌霨、曹汝霖、陆宗舆等主持指挥，连日在天津日租界及市区各要地散发荒谬宣言及标语。是日，石友三与曹汝霖、陆宗舆、白坚武、张璧等10余人在天津石宅集议，至深夜始散。

5月29日　李宗仁、白崇禧访陈济棠续谈反蒋事。30日，白先返南宁准备发动反蒋，李留广州，与陈等主持西南大计。

△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为抗议日本增兵华北，举行示威游行。当日深夜，宋哲元在私邸召集第二十九军将领会商，各将领咸主对日人取强硬态度。次日，宋哲元发表谈话，称：“华北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我国主权问题。凡不损害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向前去做。余对交涉事……个人所能负责所应负责者，绝对负责。”

△　新增华北日军第三批抵塘沽，共步、骑、坦克兵1500余名，当日分组开赴山海关、天津、通县各地。

△　夜，北宁路军粮城附近41号桥被炸，由天津开出之平沈列车被阻，津榆交通断绝。日方以北宁路被炸，压迫冀察政委会要求第二十九军南调。30日，第二十九军将领及冀察当局在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宅集议，决不接受任何条件。

△　青岛保定路日本第一小学某女生在热河路日本运动场被另一幼童（中日人不详）殴伤右臂。下午6时许，黄台路市立小学学生姜万善、于慈复路经日本运动场，被该女生家长硬指为殴伤女生之人，将姜、于拳打足踢后，送日警署。30日，日本居留民团、青年团等召

开紧急会议，请日领提出交涉。日领遂向市府交涉，要求：一、市长亲向日领道歉；二、撤换教育局长雷法章；三、改定小学课本，不准有排日思想；四、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日青年团声称，如不允其所请，即电日海军部派舰来青保护日侨。

△ “满铁”财产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竹下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公布“满铁”财产总数为15亿1300余万日金元。

△ 国联禁烟顾问委员会决议，请日政府以重刑制止在华贩毒。30日，该会讨论二烷酐输入中国事，发现近六个月，输入一万基洛之多，其中9000基洛乃由日人输入。中国代表胡世泽称，因汉口日租界设有制造麻醉品之秘密工厂四所，每日能产八基洛，供全世界一日需要有余。

5月30日 日外相有田接见记者，重申日本对华政策之三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共同防共；三、遏灭一切反日运动。

△ 驻南京日总领事须磨归国，在神户宣称：“今之局势为中国必须在对日相互维系与对日作战两途中，选择其一。余已向蒋院长切实说明此点。日本如退让一步，即不啻总退却，日本必须抱其不可变更之自信心，勇往直前。”

5月31日 是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余省、市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共70余人。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重要文件。《宣言》指出救国阵线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人被推为常务委员。

△ 红军西方野战军左权红一军团经吴起镇直向陇东环县曲子镇

进发。6月1日，杨得志红一师占领曲子镇，俘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次日，向庆阳方向前进。3日，在曲子以南的阜城附近与马鸿宾部援军马玉麟第一〇三旅第二〇六、二〇九两个步兵团遭遇，援军被击溃，俘1000余名。后又占领庆阳及环县城。

△　郑州查获朝鲜人李基善、郑斗铭私运现银315公斤。

△　李滋·罗斯奉英国政府命，由上海乘轮赴日本，向日本政府交涉华北走私、保护英国在华利益等问题。

是月　宋哲元派张自忠到天津，继萧振瀛出任天津市市长。张到津后，为防备日军突然袭击，对第三十八师兵力作如下部署：黄维纲之第一一二旅驻小站，刘振三之第一一三旅驻廊坊，董升堂之第一一四旅驻韩柳墅，成为犄角之势，拱卫天津。另将其统辖的李致远之独立第二十六旅分驻马厂、沧州一带，维护津浦路交通；同时又将第三十八师特务营改编为天津市保安队，驻于市府内，保卫机关。

△　蒋介石命令陆军整理处长陈诚拟定同日本作战的全面计划，负责编制60个国防师，准备对日作战。

△　曾养甫、陈立夫、谌小岑商谈国共合作事，由陈口授意见四条，谌笔录，要点为：一、K（国民党）方欢迎C（共产党）方的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但须加以改编；二、C方武装部队改编后，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成立民意机关，C方可派代表参加；四、K方承认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谌将陈之四条意见写成两份，以一份送吕振羽转交中共。

△　中共长江局张子华（化名黄某）到南京见曾养甫表示愿去陕北。谌小岑将陈立夫之国共合作条件抄件一份交与张，并请覃振写亲笔信带交林伯渠。

△　陈济棠派范德星到港请蔡廷锴返粤协助反蒋，遭拒绝。

△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南郊王曲成立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训练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现任连至团长级军官。训练期间两个月，每期500多人。先后共办三期。训练目的为改造思想，准备抗日。张、杨亲临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并批判“攘外必先安内”以及“抗日准备论”。

△　东北旅陕人士高崇民、车向忱、刘澜波等人在西安组成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

△　西北抗日救国会改组为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以杨明轩等人为领导。

△　全国学联创刊《学生呼声》，宣传抗日救亡。共出版五期。

△　北平学联召开扩大代表大会，决定在北平举行服用国货扩大宣传周。在宣传周里，各大、中学校学生分头出动进行宣传，并劝说日货商人不再出售日货。

△　中国工农红军福建永定独立团与游击队恢复大片苏区，在石城坑成立永定县苏维埃政府。

△　日方近一月来，在广州增设商店40余家，专售私货，陈村、大良、石岐亦有此等商店设立。广州日浪人走私日盛，每月海关缉获私货有四五十起，但多为日领出面交涉取回。

△　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之欧亚航空公司，资本增至750万元，交通部占三分之二。

6月

6月1日　　“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以

抗日为名反对中央，并以“冬电”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次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委会又以同一内容通电全国。4日，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委会发电响应，表示拥护“冬电”内容，要求“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

△　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在太原成立，陈诚任总指挥，孙楚任副总指挥，杨爱源任前敌总指挥。

△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成立，校长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兼），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主任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第一期学生1038人。

△　北平各大学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是日起停课三日。2日，北平各校学生推派清华、燕京两校代表赴西苑，平大、农学院、东大、师大、法商学院等代表赴南苑，北大、中法大、朝大、平大、工院、大同中学代表赴北苑，分别与第二十九军官兵谈话，并对附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同日下午，北平市大、中学90余校在燕京大学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救亡工作进行方案。3日，北平当局决定制止学联活动，冀察政委会发令禁止学生罢课，扬言“学生如有企图罢课者，将予逮捕或开除”。4日，北平市学生与四郊农民、士兵联欢。

△　驻南京日总领事须磨向有田外相与堀内次官报告国民政府内情及其对华北走私问题之方针和其他中日两国间重要问题，并建议日本应取之对华政策。

△　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八郎，正式表示反对日本在华北增兵及走私。有田答称：华北现状的“不安”，使日本有强化驻军的必要，且增加驻军为《辛丑和约》所许可，故不能中止。

△　日陆军参谋部次长杉山元奉命来华“考察”，是日抵上海，4日转抵汉口。6日，飞南京会见雨宫武官，听取报告，并访代总领事松村，对中日关系交换意见。

△　日军事当局发言人声称，上月29日北宁铁路爆炸案继续调查后，若发现日军尊严感受影响时，则日方当诉诸强力手段。

△　萧振瀛、张自忠赴天津张园访田代、松室、永见交换冀察近事意见。

△　缉私总稽查处长安斯迩到天津。3日，安斯迩与许礼亚、陈觉生等洽商缉私。陈表示应一面保持中央关税制度，一面顾及冀察环境。

△　华北走私愈形猖獗，是日由北戴河运到天津日租界走私煤油及啤酒万余桶。同日，私糖50吨运到济南。兰州中山市场200家商号及市内各绸布庄、海菜店皆充斥走私日货。

△　实业部在南京召集全国煤业会议，与会者10省一市50余人，代表30家煤业公司和两个矿业联合会。重要提案有实业部所提各煤矿联售办法案和全国矿业联合会所提的产销之平衡、运量及运费的平衡、矿税之平等、官办商办之平等、出口税之减免等案。大会决定先在上海设立煤矿业联合事务所。3日下午闭幕。

△　天津、东京无线电报正式通报。

△　鲁迅与冯雪峰商议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日由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公开提出。

△　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在沪创刊。创刊号发表曹禺的剧本《日出》、巴金的长篇小说《春》。

6月2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争取合法公开，派沈钧儒、章乃器为代表会见上海市长吴铁城，说明全国救国会已经成立，并送去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表示向政府登记，希望得到认可。吴反诬指“全救会”为“少数野心家”所操纵，扬言要逮捕救国会负责人。

△　李滋·罗斯到达日本神户，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此来目的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调整日本与中国、日本与英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并称“中国经济财政恢复繁荣，若得日本的协力，一定可以成功”。5日，日外相有田在外、陆、海三相会议上称：“假使罗斯对日提议援助中国财政问题，则日本因与华北有特殊关系，不能与之商议具体事项。”三相会议决定：日、中有特殊关系，尤其在华北，因要考虑中、日、“满”关系及为东亚安定势力的日本立场，不能如英国仅从经济立场处理华北走私问题及其他一般问题。

△　国民党民众训练部转报厦门日侨勾结台湾人组织“华南青龙会”，并致参谋本部函称：“日人拟将旅厦台氓（号称三万人）组成台湾军。”

△　蚌埠公安局破获汉奸组织修真堂，捕获首犯李玉林，搜出天津日驻军司令部委任状10张、宣言百余张及蚌埠区调查军事主任委任状一张等。据李犯供称，渠在石友三部充上校副官，近奉石命来蚌，借办道为名，募壮丁，以修真堂名义收纳徒众，数月以内计收3000余人，秘送北上。李并派党徒潜赴各县，联络天仙道、圣贤道、一心堂、中央圣道会、光蛋会、金丹道、修身道、青红帮等邪教党徒，图谋不轨。

6月3日　　蒋介石通电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蒋自任会长，南京设总会，各省、县设分、支会，并颁发该会总章，称该会任务为：一、协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计划；二、倡导社会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三、培训及介绍各种经济建设人才；四、研究

发展全国农工副业及地方特殊产品；五、倡导节约，推行国货等。8日，该会总会筹委会成立，以刘维炽为总干事，委员冯玉祥等322人，委员兼专员67人，专员165人，共554人。

△　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在理化以南之甲洼寺和罗炳辉红三十二军会合。7日，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配合红三十二军击溃李韫珩部，攻克理化县城。

△　贺龙红二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巴安附近，旋向白玉前进，19日占白玉城。

△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右路军徐海东红十五军团进至陕北定边西南焦家湾、纪岭等地区，4日攻占红柳沟后，继续西进。

△　济南日警四人，率朝鲜人及汉奸殴伤缉私处主任叶春遇等，将被查获之私糖290吨、麻丝45吨强行运走。另有私糖40吨到济南，被日人40名强迫取走。

△　据《大美晚报》讯：华北日驻军司令田代到任后，经干部会议决定对华北政策五原则：一、协助冀、察二省共同“防共”；二、促使冀察政权一元化；三、增速华北与伪满经济合作；四、协助“满铁”对华北经济发展；五、保持华北已成事实及日本利益。

6月4日　　广州市各团体二万余人在省参议会礼堂开会，要求西南当局“出兵抗日，以救危亡”。会后列队向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及第一集团军总部请愿。

△　殷汝耕偕池宗墨飞天津，访田代、永见等。晚访石友三、齐燮元等。5日，田代、永见、石井、饭田、中井与殷汝耕、齐燮元、石友三、陆宗舆等30余人，在天津张园讨论华北时局。6日，陆、石等在天津宴殷汝耕，邀齐燮元、王揖唐等30余人作陪，再商时局。

△　天津海河近月来发现浮尸600余具，据是日《大美晚报》讯：

白河浮尸疑案，情节已渐判明，据谓系日方雇华工千余名近在津、沽等处潜修地道三处通往津市各重要地区，暗埋军火，工竣后恐秘密泄漏，将全数雇用工人秘密杀害，抛置河中。津市工人对此极表愤慨。

6月5日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南京见蒋介石。7日去沪，见陈济棠之代表杨德昭；8日复去南京，准备近期返桂省亲，调停中央与西南纠纷。

△　广东省财政厅开会，议决即日起实行禁止买卖期货，规定港币加七五补水；停止支付法币；禁止买空卖空及军人购港币。同日，银号拒收桂币，李宗仁派张任民访区芳浦，商维护办法。6日，西南政委会人员发表关于华南大局安定人心之谈话，广州金融危局逐渐和缓。

△　驻津日军步兵700余人，装甲车三辆、载重车两辆、炮八门由海光寺出发在市内游行。

△　据《大美晚报》讯：日方令石友三组织“防共军”，石委白坚武为第一军团长，王德禄为总指挥，在日租界积极活动。6日，华北当局表示：“我方为维持和平计，对日委曲求全，困苦撑持，已达极点，目前虽有不少丧心病狂之分子，潜伏某租界阴谋活动，但当局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大原则下，当随时予以制止，不稍姑息。”

△　交通部电政司与意大利无线电服务公司签订《无线电报务合同》。

△　文艺家协会机关刊物《文学界》在沪创刊，周渊主编。创刊号上载有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号召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强调必须把国防文学作为共同创作的口号。

6月6日　白崇禧派李品仙偕李觉飞长沙，敦促何键反中央。何

表示只有桂军到达长沙，湖南才能有所行动。

△　蒋介石电邀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国是。

△　各地学生陆续罢课，举行抗日示威，是日广西全省各地学生参加全省各界抗敌大示威。9日起上海学生罢课二日，组织抵制日货团，上街宣传。10日，南京学生大示威，参加者2000余人。21日，上海学生举行抗日大示威，包围北站，京沪车停开。

△　张国焘在甘孜被迫宣布结束伪中央，并于10日致电中共中央，准备于6月底北上。

△　国民政府令派徐永昌为山西清乡督办。

△　总稽查处长安斯迩抵济南访日领西田交涉走私事。7日抵青岛调查走私，9日返津。10日，访天津日副领事永井，交换华北缉私意见。

△　上海市40余各业职工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市各业职工检举走私委员会。8日，该会开始工作，通电全国一致实行检举走私办法。办法规定职工发现私货后，书面或口头向该会报告，该会派员秘密调查属实后，即呈报主管机关办理。检举走私之职工，给予名义或物质奖励。

6月7日　　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复电劝告粤绥靖主任陈济棠，谓："两广行动，果如外电所传，是不啻以御侮之名义，而适与侮我者以快心；以救亡之决心，而招致与救亡相反之结果。""和战为党国之大事，岂可不征求于全体多数之意见？""望推派负责人员来京共同商决一切。"

△　据《大美晚报》讯：内蒙日人最近激增，人数达6000余人，此等日人，名义上经商、设慈善机关或学校等，实际上联络蒙民，鼓动自治。德王府日籍供职人员亦达30余人，均受关东军指派。伪军李

守信、卓世海等部占据察东六县后，在张北设立两所陆军学校，招募蒙古青年加以训练。张北、百灵庙等处已由关外派来飞机20架。伪军主力集中商都，有进窥绥东企图。集宁一带几已被伪军势力所控制。更有许多日本青年以组织巡回医疗为名，联络蒙民，鼓动自治。

△　上海律师公会举行冤狱赔偿运动周第二届纪念大会，公推沈钧儒等为主席团。会议竭力主张以赔偿制平反冤抑，俾冤狱受害人得以根据此种法律得到损害赔偿。

△　中国文艺作家协会在沪宣告成立，由茅盾、傅东华、夏丏尊发起，王统照、艾思奇、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叶圣陶等111人参加。《宣言》称："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

△　邹韬奋和胡愈之、金仲华等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和附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旨在"唤醒国人，共起救亡御侮"，正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8月1日自动停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移到上海继续出版，从第一卷第十二期起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共出28期，于12月被迫停刊。

△　全国学联发表《为最近时局紧急宣言》，要求立刻"对日宣战"。

6月8日　　蒋介石在南京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否认中央向两广提出五项条件，对于两广来电所提意见，声称准备召开五届二次全体会议讨论。

△　李宗仁邀李济深到邕坐镇。胡宗铎离粤赴桂襄赞军务。

△　驻粤日总领事河相口头警告陈济棠，声称："日本无意干涉中国内战，即此次西南向中央作战，也严守中立态度，但广东政府及军

事当局利用抗日为宣传，不宜过度刺激民众团体，以免发生不祥事件。”10日，有田训令河相再度警告西南。

△　粤代表杨德昭抵南京，向蒋介石面呈陈济棠亲笔函，有所商谈。

△　国民政府前外长罗文幹就西南政委会委员职。

△　天津华北日驻屯军部召开幕僚及各联队长、大队长会议，由河边旅团长、永见参谋长主持，讨论内容分三项：一、由永见提示军部最近对华北外交指示。二、军部组织加强各部分混合工作，分为三课，一课掌军事战斗策划及军队调遣；二课掌政治、经济；三课掌外交、情报。第二课长由高级参谋石井充任。三、关于各地军队配备、军风纪整饬事宜。

△　李滋·罗斯抵东京，下午4时半在驻日英使馆内与日陆军省军务局长矶谷中将会谈。罗斯称：“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最完备、最有势力之政治机关，以财政助力给予国民政府，使得从事经济的振兴及其建设良好的国家行政，可大有益于中国大局之安定；日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改革方案，抱不赞成态度，殊为不解。”矶谷称：“中日两国在地理上有密切关系，日本今日所处地位，不能考虑以经济助力给予未呈任何政治和谐之南京政府。”

6月9日　　蒋介石派陈诚到长沙，急调两个军控制衡阳，以阻粤桂军北上，并派军舰九艘抵厦门。次日，蒋又令各军集中武汉，向衡阳进展。

△　蒋介石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谓：“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的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逾。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

△　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与中委李烈钧联名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劝告“促进全国团结”。10日，冯再电白崇禧，告诫勿单独行动，并盼早日到京参加二中全会。

△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商讨时局，对南京召开二中全会事，因未接明文，暂不表态。

△　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轮船业公会五团体联名电请南京蒋介石及广州陈济棠等精诚团结，一致御侮。同日，并通电全国一致主张。

△　粤军将领缪培南因不赞同西南当局反中央，被拘于广州总部。

△　上海《字林西报》和伦敦保守党《晨邮报》是日就中国国内局势发表评论，认为西南举动，有害远东和平。美国方面报纸认为，中国若发生内战，长江以北军队必纷纷南调，而日本在华北更可收渔人之利。

△　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自北平绕道大连、长春、东京到达广州，是日参加西南政委会会议，与陈济棠讨论时局。

△　西征军左权红一军团进抵甘肃省洪德、山城堡一带。12日，该部由双井子向七营进发。

△　西征军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张绍东第七十三师抵宁夏豫旺附近之大水坑。12日，向同心城进击，当即攻占该城，21日攻占王家团庄。

△　冀察政委会取消对汉奸白坚武的通缉令。

△　日关东军司令植田偕今村副参谋长飞抵榆关阅军，并视察长城各口。

△　李滋·罗斯偕驻日英大使克莱武在东京访日外相有田和次官堀内。罗斯极言中、英、日三国应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彼此合作，希望列强能辅助中国发展交通。有田答称，非俟中国政治安定，一切经济上的援助，和日本都没有多大利益。

6月10日　粤桂军分三路入湘，右路从粤闽边境北进；中路由粤第二军军长张达率领进抵郴州；左路由桂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率领，到达永州。驻饶平、云霄间粤军一部不愿参加作战，拒不奉命。

△　国民党中央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决议7月10日召开五届二中全会。

△　蒋介石因未得陈济棠复电，特再电陈，请撤粤桂军前进部队。电称："现二中全会已决于一月内举行，一切均当待决于党议。""中央已命衡州以南部队一律北移，冀免冲突，以待协商整个一致之方案，务希严饬粤所有北进部队即日停止行进，迅令归复原防，以扫除谣诼与不安。"

△　白崇禧令开抵祁阳大菅市的桂军部队停止前进，并宣传"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

△　阎锡山、韩复榘电请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会商救国大计。

△　何键在长沙绥靖公署对新闻界谈称："粤、桂当局竟出兵湖南，声言抗日，且派李品仙来长沙说明西南主张，征求湖南同情，余以湘省对外主张素与中央一致，要求西南当局即日停止军事行动。"

△　日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在南京访张群、何应钦。同日，喜多对中央社记者谈，日本对粤、桂军事行动极为重视，对日方出售军火给桂省事亦不否认，谓此系普通商业性质，惟对该项军火系信用借款售予一节则推称不知。

△　粤因政局发展，金融危迫，是日粤币跌至1801元折合港币千元。次日又下跌至1865元折合港币千元。米价上升约30%。桂币跌至每元值港币三角。广西当局决定严禁用桂币作投机买卖，并下令此后仅广西省银行能经营外汇交易。

△　张学良由陕飞南京见蒋介石，报告西北军事情形。

△　伪蒙古军师长包悦卿突由内蒙到北平，旋赴天津，与日方接洽后转赴榆关、锦州、热河，行踪甚秘密。25日，包返滂江，透露此行系奉德王令派赴锦、热一带招募3000名蒙兵，编游击队六队，每队500名，分防察、蒙边界，所有枪械悉由日本关东军供给。

△　冀东伪自治政府唐山查验所开始办公，所长查南疆，辖唐山、昌黎、南大寺、滦县、秦皇岛、榆关等查验所，夺取秦皇岛海关权，正式征收进口货税。

△　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于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居住和“满洲国”课税等条约。

△　李滋·罗斯往访日藏相马场，力言英日应辅助中国发展交通，以增加中国人民的购买力。马场则主张中国应改革现行税制，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罗斯所提英日协力对华投资问题，马场表示在中国政局未获安定以前，日本不能对中国积极投资。

6月11日　粤第二军司令部由韶关移至乐昌。是晚，粤军便衣30余名潜入湖南衡阳，与城中守军冲突半小时后被击散。桂军五师2.5万人由永州抵衡阳附近，中央军开赴衡阳扼守。

△　白崇禧派韦云淞飞广州，向李宗仁、陈济棠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期使旗帜鲜明，扩大号召力量。

△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电复蒋介石之9日电，重申动员抗日的决心，拒绝蒋所提各点，另提指定军队进行路线、集中地点及供应

军辎军火等要求。陈济棠并就粤、桂出兵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日，陈、李等再以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名义发表对时局通电。

△　粤籍中委李文范、马超俊、张发奎、陈策等10人电陈济棠称："日人企图本在分裂宰割，伪满造成之不足，又欲煽惑华北独立、蒙古自治，其于西南、于闽则收买汉奸，策动自治，于粤、桂则怂恿反蒋。""西南此次甘为内战戎首，何异为人扮傀儡戏耶？""务望临崖勒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　驻广州日总领事河相致函陈济棠、李宗仁，谓西南如非真心反日，务速取消抗日口号，并望立予答复。12日，河相再访陈、李，抗议反日游行。

△　日使馆武官喜多在南京访铁道部长张嘉璈、实业部长吴鼎昌。午后，与张群会谈中日问题。

△　日新任驻华大使川樾在东京访外务省堀内次官，协议实施对华政策。日政府授与川樾大使之训令，仍坚持对华"三原则"，惟使新大使应付时局变迁，实施根本政策须缓急得宜；同时要求中国确认华北"殊特"地位为其方针。

△　日陆军参谋次长杉山元与田代在天津召开华北日驻屯军部与关东军部会议，讨论应付华北政局方策，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之代表第二课长田中、华北日驻屯军部参谋长永见及松室、饭田、石井、河田等均参加。次日，继续讨论华北时局，并有重要决定事项，由田中飞返长春报告。

△　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在天津访齐燮元、石友三，接见陆宗舆、曹汝霖，策划时局。

△　广西省苍梧县夏呈区六堡乡农民反抗强迫征兵从事内战，纠集武装群众，焚烧乡公所，击毙乡公所职员，县长派去围剿之团丁被

包围两昼夜之久。14日，梧州民团指挥部调军队三个连前去镇压，东安、贤德两区农民奋起斗争，双方激战，农民死伤甚多。

6月12日　冀察当局表示，决不因西南事而受日方压迫，为分崩离析之举，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尤具内向心，不受任何方面利用。同日，宋哲元在平郊阅军时训话称，决不参加任何内战，对外则将竭力保卫主权。

△　中国科学社等各学术团体、平津各院校、河南省党部等单位纷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呼吁和平。

△　陈济棠电冯玉祥，谓已饬入湘部队就地停止。

△　桂军第一三五团覃兴部撤回永州待命。次日，桂军第四十五师全部开回永州。

△　粤省米价上涨，是月省财政厅布告，自本月15日起至7月15日止，洋米入口税每担减征大洋两角，洋谷减半。

△　日军舰载大批军火由台湾抵汕头，转运入桂。

6月13日　王宠惠在南京与蒋介石等商宁粤团结，并电陈济棠、萧佛成、李宗仁称："公等意欲救亡，敢请力避内争，速令出发军队停止进行，即派负责同志与中央接洽，并参加二中全会，共筹一致救亡之策。"17日，陈复电表示赞成团结御侮主张。

△　西南政委会代表潘宜之、王继文、黄建平抵天津，向各方活动联合反中央。16日，潘等秘密抵北平活动，并访宋哲元商西南大局。

△　陈济棠指定张瑞贵、叶肇两师为总预备队，集赣南候命；调海军陆战队梁开成团戍虎门，委杨幼敏为虎门要塞司令；命李洁之为增编独二师师长。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浙江省整理公债条例》，总额6000万元。

△　广州各工厂、学校及民众五万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　日强化华北空军，加派军用机一大队18架已陆续由沈飞抵天津。

△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除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彻查海河浮尸”等口号外，为争取第二十九军抗日，并喊出“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等口号。同日并在鼓楼召开市民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二十九军勿南调，继续抗日》、《武力保卫华北》等议案。16日，天津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举行示威游行，被军警捕去30余人，殴伤20余人。

△　苏州县长派张一骏为第十区处理田租纠纷委员，会同该区区长、小学校长及保安一中队，同赴斜塘、金庙等乡，挨户武装催租。26日，苏州渭泾塘等乡农民以土枪击伤武装催租之保安队员六七人，一人失踪。27日，县府派保安队百余人到渭泾塘、秧上等乡催租，逮捕农民顾子安、徐鹤林，农民鸣锣集合约300人，携土枪、锄头将顾等救出，双方发生冲突，农民死顾子安等三人，伤八人，保安队伤六人，失踪一人。

△　日浪人在天津联络80家商人结帮武装走私，当晚派人运私糖450吨赴济南。

6月14日　　陈济棠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各执行委员称：“此间抗日进行，正盼中央领导，而自相猜疑，自破抗日战线，似非党国之福，切望力予匡正。”同日，陈并致电冯玉祥，请其赞助抗日运动，声明已令西南军停止前发，以止谣言。

△　陈济棠、李宗仁、萧佛成、林云陔等在广州萧宅会商时局及

应付二中全会方策。

△　粤汉铁路停止运兵。粤军退出郴州，张达第二军巫剑雄师回抵汝城、宜章，李振良师回抵九峰，黄质文师回坪石暂驻。余汉谋所属第一军留赣南，缓回粤北。

△　唐绍仪坚辞西南执行部、政委会本兼各职，对两粤当局出兵入湘表示惋惜。

△　前湖南省长赵恒惕抵粤。吴佩孚亦派代表到粤。

△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在苏州寓所逝世。

△　天津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永见到北平访宋哲元，商外事问题后，返津向田代报告。宋哲元在北平颐和园宴山元、桑岛、永见、松室等。

△　津浪人组织“特殊贸易协会”，设于日租界福岛街95号，是日向北宁、津浦铁路当局强硬表示不得阻碍运输。晚，押私货人造丝70件、卷烟纸11捆、砂糖500余吨，强登津浦车南运。

6月15日　西南执行部商讨军队撤退后各问题，陈、李仍主战，对外则表示缓和，并拟派陈维周北上，向中央剖白一切。白崇禧派参谋长张任民到广州促陈继续出兵。

△　李宗仁、白崇禧电复各方，谓已饬部退让。缪培南等已恢复自由。

△　桂军王赞斌、苏祖馨两师到全州。入黔之廖磊师奉命由独山退却25里。桂军主力仍在永州与祁阳一带。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田守尧第七十八师奉命归建西进，是日在归建途中攻占定边，全歼马鸿逵一个连及保安团全部。旋在中路军配

合下，又进入宁夏，向盐池进攻，21日攻占该城，全歼守敌马鸿逵一个骑兵营及民团全部。

△　国民政府任命吴国桢为汉口市市长。

△　国民政府公布《铨叙处组织条例》，规定铨叙部于各省设铨叙处，办理各该省委任职公务员之铨叙事宜。

△　广东省农林局长冯锐及江海关监督唐海安抵沪，声称："此来系奉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及广东省主席林云陔之命，向中央有所解释。""两广军队绝对服从中央，现已遵中央之命向后方撤退。"次日，冯抵南京，向蒋介石面呈陈、林之亲笔函，并商陈时局。同日，陈所派另一代表孙家哲亦到京谒蒋等报告粤、桂情况。

△　广州日领事河相向粤当局提出关于粤省反日运动之严重抗议，特别注意6月13日广州之反日大示威游行，称此种举动足使中日关系大受影响，日政府视此游行违反中日友交之原则。

△　北平警察局在武衣库附近破坏一暗杀机关，当场捕获陈公佐等两人及日人川上、田原、朝鲜人金荣贵，并抄获相约暴动文件甚多。暗杀目的以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三人为中心。

△　日外相有田训令川樾暂时静观中国政局，先由华北实施"经援"，有棉花栽培之技术援助，开发煤、铁等矿山，在华北建设铁路，先由沧石铁路着手施工等项。

△　日东亚局长桑岛在北平访宋哲元，交换华北问题意见。

△　天津日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永见、饭田、石井、中井、滨田及驻军少佐级以上军官出席，议决要案两件：一、冀察、冀东合并问题，暂不接受谈判，两政权仍维持现状；二、对西南北进事，严密注视其变化，机会来临，立即利用。

6月16日　西南和蒋介石所派代表在衡阳进行和谈，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湖南绥靖主任何键参与谈判。同日，粤军总部发布三项命令：一、已出发部队全部退回湘、粤边界；二、奉命开动部队，就地停止前进；三、出发中的部队，停止前进，候命复员。

△　桂军夏威部继续北进，后方大队也纷纷开拔，17日逼近祁阳。

△　前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翁照垣抵广州，被任为桂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所部不断向永州集中。

△　王宠惠之代表前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离沪南下，分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劝告息兵。

△　徐海东红十五军团进攻宁夏省豫旺县城，未克。是日占领红水城。

△　粤当局答复日方抗议，拒绝遏止省内抗日活动。18日，驻粤日领河相第二次向陈济棠抗议，谓西南抗日宣传，不能诿诸民众。20日，河相复提抗议，警告粤当局，谓目前之“骚动”，恐将引起严重后果。21日，陈答复日领两次抗议，认为对民众抗日情绪不能制止。29日，河相奉日外相训令，又以公文书面向陈抗议。

△　日新任驻华大使川樾茂由东京启程来华，向欢送人员发表对华外交方针：一、在中国政治未安定前，日本对华经援实不可能，所以首先须以政治的力量实现中国政治安定；二、对华北经援，第一步先从铁道借款、农村提携以及矿山调查开发着手；三、关于华北走私，即华北“特殊贸易”，应先由中国政府表示减低税率，除去走私的内在原因，然后日本政府方可在可能范围内努力阻止走私；四、各国应注意中日关系为两国死活的问题，与英、俄对华关系不同，如不损及日本在华利益，日本愿与英国协调。

△　李滋·罗斯由日抵沪，访孔祥熙称，日本如不愿与英国合作，英国是否单独赞助中国，须视情形而定。旋赴南京，行前发表谈话称：中国虽竭力避免白银危机，但仍因金融制度不巩固，治安及华北特殊问题不解决，因而经济仍未臻佳境。又称：中国发展贸易，似须减轻关税。并表示，英国颇愿以巨资开发中国，但须有确实保障。

△　上海通易信托公司倒闭。该公司于1921年7月创立，董事长王晓籁。

6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国民政府前常务委员、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创办所得税原则八项，规定所得税为中央税，凡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2000元以上营利事业之所得及薪给报酬所得，均须征税。课税方法，以采用累进制为主。

△　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飞天津，会见田代、田尻交换意见。18日，桑岛到济南访韩复榘谈称，“中日经济提携应先鲁后冀，华人应认识日本近年国际地位的重要”。

△　日海军武官桑原、海军省军令部课长本田、事务官佐佐木、渡边，第十四驱逐舰队司令久宗未次郎，“荻”、“菊”、“葵”三舰长飞田、铃木、古贺及第十四驱逐舰队机关长国吉在天津开会。由天津武官久保田主持，讨论：一、塘沽海军筑港事；二、常川派舰三艘驻塘沽，与陆军联络事。

6月18日　蒋介石对《字林西报》记者谈及11月间国民大会选举总统问题时声称，彼绝不愿为总统候选人。

△　广东财政问题经粤方孙家哲、冯锐与财政部多次商谈，决定办法三项：一、中央允拨特别经费1000万元给广东省，以弥补因掉换

纸币所受之损失，同时广东省银行发行之纸币继续流通；二、广东省存银交由纸币发行监委会保管。该会有权运用3000万银元向中央银行购买同数“大元”纸币，省行逐渐收回所发之纸币；三、俟本省纸币收回后，仅认“大元”纸币为法币，广东省行只能发行辅币券。

△　入湘粤军先头部队已陆续撤退，集中小塘。桂军集中永州方面，未再撤退。

△　彭德怀率领之西征军步、骑各五六百人围攻宁夏省预旺北之韦州。20日，续有来自陇东洪德城之红军2000余人围攻。

△　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生第二次盗宝案，乾清宫失窃大批古物，内部人员涉有嫌疑。19日，故宫检验全院职工指纹。

△　日华北、关东两军部在天津举行武官会议，讨论：一、促成冀察政权明朗化；二、川樾大使所携国策，与实现华北经济提携互相呼应；三、军部对西南斗争应持态度；四、关东、华北两军部权限划分，平时以长城为界，战时紧密联络；五、天津市长张自忠就职后，监视其行动；六、非常时期特殊组织与人选准备等问题。

6月19日　李滋·罗斯任满回国，是日抵南京，向蒋介石辞行，询及有无要转告欧洲人士的话。蒋谓：“对日抗战是绝对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等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23日，李滋·罗斯乘轮离沪返英。

△　白崇禧致电湖南省主席何键，宣布占据永州之桂军已全部撤退，请何接防警备。但据是日申报社长沙电称：桂军在祁阳未全撤，永州续有大批军队，白电何派队接防，全系桂方宣传。

△　察北伪军李守信部派伪警向延庆属四海设卡，查户口收捐，被村民殴走。是日，日机一架飞往侦查。当夜，日军一中队、李守信伪军一个连包围全镇，以猛烈炮火轰击，全镇悉成瓦砾，老幼被屠杀无数，村民逃往南湾、西沟各村。20日，日方复饬保安队截堵，务达全歼为止。

6月20日　韩复榘晤宋哲元于津浦路泊头车站，后同至黄河崖站附近树林中，商洽华北时局及应付方策与冀、鲁联防事宜，主张遵照中央睦邻令，谋中日邦交亲善，并在互惠平等原则下，协商解决华北各问题。

△　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规定“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指出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是“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

△　西征军左权红一军团主力经毛居井进入宁夏，向七营、上新堡方面前进。是日拂晓攻占七营，切断敌北进去路，包围李旺堡，袭击黑城镇、杨朗镇，在清水河、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与东北军对峙。

△　日本“大荣丸”走私船载私货300余吨由大连向歧口进发，被津关缉私炮艇“榆光号”在烟台芝罘附近发现，船上七浪人、二华人以机枪对抗，炮艇被迫还击。“大荣丸号”船长和水手长均受伤，引擎被击碎，被我炮艇拖往塘沽。21日，日、韩浪人侵入塘沽海关滋扰，要求发还“大荣丸号”及私货。

△　日海军中将梅田到粤访陈济棠、李宗仁。

△　日步、炮兵500名、马10匹、炮16门，由山海关南海登陆，开往北平。

△　刘桂堂在天津日租界寓所被刺受重伤，系韩复榘买通刘旧部一连长徐一龙等所为。

6月21日　宋哲元、韩复榘联衔通电向中央呼吁和平，请“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23日，蒋介石电复宋、韩，声称：“中央自惟有一本精诚，力求团结，对于各省袍泽，皆推心置腹，开诚相与。所有军队，皆用以保卫疆圉，维持秩序，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惟望两广诸君共体此意，勿作阋墙之争。”

△　陈济棠、李宗仁及其他两广将领10余人，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由两广组织独立军事委员会，作为西南最高军事机关，下设西南联合军总司令部，以陈济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联合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委员长兼副总司令，并将两广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决定于南北两军正式交战时，任命白崇禧为联合军前敌总指挥。

△　据《大美晚报》讯：国内各地国人创办之纺织厂总计24家，纱锭数约270万左右，年来因金融界采取紧缩主义，致纱业在经济流通上遭受致命打击，相继停业减工，直至目前，各厂仍在减少纱锭数，每月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停工。而在华日商开设之纱厂，计上海、青岛、汉口三处，纱锭数达245万。天津裕元、裕大等纱厂被日收买后，大部扩充，纱锭数拟置66万。现上海日商之内外棉、日华、公大、丰田、上海等各厂，自上月起增加锭数15万，日夜开工出货，异常忙碌。

6月22日　冯玉祥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华北走私问题》。略谓：现在国家最感危险的莫过于走私。“据中国银行的统计，去年我们因走私而损失达二万万一千多万……又据最近海关统计，自去年八月十一日至本年四月三十日，九个月中间，因走私而损失有二千六百万。本年五月份内，只是三星期，损失六百万。假定每月以八百万计算，每年损失要一万万元”。惊呼：走私的结果，“工商业大受打击，经济

基础根本动摇……不费一兵一卒，来达到亡人国家的手段啊！”要求“全党党员做先锋，唤起民众的注意，严密缉私的方法，那么私货自然绝迹”。

△　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蒲玉隆，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在蒲玉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见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等，红四方面军与红六军团举行会师大会。

△　日领永井访津关税务司许礼亚，对“大荣丸”案提口头抗议，谓“大荣丸”未载货，受弹伤220发，所悬日旗中八弹。24日，日海军武官久保田访天津海关长奚理亚德，指摘中国缉私船。津日领岸伟访许礼亚，提书面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发还船只，税务司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　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小屯编号为一二七的灰坑内，发掘大批甲骨文，经清理发现甲骨共17096块，其中完整龟甲约300块，是殷墟历次发掘中收获最多的一次。

6月23日　近由湖南永州退走的桂军，现又向东北推进，已抵祁阳与衡阳间的某地。桂军一纵队也由祁阳向北往邵阳推进。

△　陈济棠就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

△　白崇禧下令禁止广西壮丁出省。梧州组织妇女义勇军数百人，是日开始训练。

△　济南走私商仿天津浪人组织贸易协会，专营走私。

△　日外务省决定：一、以日本为中心之国际形势倾向恶化，须充实国防，确立自主积极的外交；二、以日“满”不可分离的关系为基础，强化对苏、对华政策；力谋获得资源，发展通商，以确立国民生存权。

6月24日　陈济棠在广州召集西南海陆空军司令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同日，桂军先遣部队到达衡阳城外，袭击中央军驻地。

△　是日及25日，粤、闽交界之漳浦、云霄、漳安一带海面，发现日舰20余艘，由细萱率领，往来演习攻防及掩护登陆等战术，意在侦察华南海防情况。

△　据《申报》载申时社香港电称，桂当局以大广公司名义，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由广西省财政厅长黄钟岳代表桂省当局在港签字。主要内容为：一、借款总额500万元；二、日本供给广西水泥10万桶，来复枪一万支，飞机20架，其价值在借款内扣除；三、此项借款以广西所有镁矿为担保，给予日本以在该省投资之特别优先权；四、10年内分期偿还；五、日本得随时给予广西以物质上之帮助。

△　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等50余团体联席会议议决组织上海各界缉私协会，推定王晓籁、虞洽卿等35人为委员，并发表宣言。26日，上海市商会又组检私委员会，检查私货。

△　田代赴通州与殷汝耕商冀东与冀察合流事，是日回天津。

△　福建红军游击队攻占莆田黄石镇第三区署，获枪20余支，毙巡官一人，区警三人。

6月25日　蒋介石接见中央社记者谈对两广处理方针：一、中央必本对内和平统一之政策贯彻到底；二、中国应为统一的国家，凡国家行政必须统筹办理者，中央职责所在，决不放弃；但在统一国家中，尽有尊重地方状况之可能。中央以和平方法力求统一，各省也宜循正当轨道，拥护中央；三、全国军队行动，皆应服从决定国策之最高中央机关之命令，不得有丝毫之自由。如有关于国事之意见，必须用和平方式开诚洽议。近来粤、桂军队擅入湘、黔、赣、闽各省，不符合此项原则。

△　陈济棠决定扩编第四、第五两军，以黄任寰任第四军军长，曾友仁、严应鱼分任第十、十一师师长；缪培南任第五军军长，谭邃、陈章分任第十三、十四师师长。

△　朱德领导红四方面军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与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前进的部署。27日，右纵队董振堂第五军一部攻占崇化。29日，红四方面军颁发二次北上命令。

△　田代在天津与宋哲元商冀东伪组织取消办法，双方意见分歧。

6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刘汝明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会主席，原任张自忠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任命张自忠为天津市市长，原任萧振瀛准免本职。

△　何应钦、程潜、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联名致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劝迅即退兵，过去之事均可一概置之不论。

△　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对内和平统一政策，并电请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停战撤回原防。

△　李宗仁、白崇禧决定在桂恢复第十九路军，是日蒋光鼐赴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商妥条件，共编三师，将来翁照垣师也拨入该路军。

△　李宗仁委夏威为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　驻丰台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有军马五匹，因火车鸣笛受惊奔跑，窜入日兵营区域内，马夫追至，要求入内寻马，遭日兵拒绝，旋有日军大尉副官小川原野出来干涉，将马扣留，并殴伤马夫。华北

军事当局派兵一小队将马取回。29日，日使馆武官今井向冀察当局提抗议。7日，原丰台驻军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第二一七团崔营撤出，而以同师第一一〇旅蒋华延部约600人调驻丰台。丰台事件解决。

△　徐海东部田守尧红七十五师攻克豫旺县城，全歼敌马鸿逵骑兵一个营及民团总队。

△　日外相有田、陆相寺内、海相永野讨论华北走私及日轮“大荣丸号”案，决训令日领严重交涉，声称必要时可采取直接行动。同日，日巡洋舰两艘由旅顺开往青岛、大沽，载特派调查日走私船被击案的海军军官若干员。晚，青岛日侨包围海关，击碎海关门窗。

6月27日　国民政府公布《县司法处办理诉讼补充条例》及《县司法处刑事案件复判暂行条例》。

△　据《大美晚报》讯：国民政府向美国购运之1000余万美元之黄金暂存美国，作为平衡中美汇兑之用。截至现在，中国运美白银已达2000余万元美金。

△　广西学生军在南宁成立，即日开赴前方。

△　粤、桂学生组成西南学联会。

△　日大使馆松村书记官奉日外务省命令访外交部，就“大荣丸”案提出抗议。日旅顺要港部也派参谋大西乘驱逐舰“菊号”抵塘沽。

△　殷汝耕等再度到津，访田代、永见及石友三、齐燮元、陆宗舆、曹汝霖、孙殿英等。28日，永见、松室等与殷、石、齐、陆、孙等对华北时局有所策划。下午，在海光寺兵营由田代主持召集永见、松室、河边及军部幕僚与殷讨论冀东税收、行政、公路建设等事，并决定整理保安队，根据上周华北、关东两军部会议决定，置冀东于华北驻屯军管辖下。

6月28日　　王宠惠应蒋介石电邀入京，是日与蒋介石、居正商粤、桂事，并分访林森、孙科、张群等。次日晚车返沪。

△　丰台一贩毒韩人侵入华人住宅，日人助其驱逐宅内居民。中国士兵二人排解不成，将日人拘捕，韩人乘机逃逸。30日，日武官向冀察政委会提出抗议。

6月29日　　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广州、南宁就任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副司令职。

△　据《申报》讯：陈济棠以五师兵力，向闽、赣边境潜进。

△　行政院通过本年度各私立大学补助费72万元，受补助者39校。

△　防止路运走私总稽查处在南京开始正式办公。总稽查处长安斯迩向财政部次长邹琳报告设置津浦、平汉、陇海、胶济、京沪各路缉私稽查分处经过与视察华北走私情形。

△　日、“满”签订《关于工业所有权相互保护协定》，7月1日起生效，规定一方“臣民”有向另一方“政府”请求特许专利并登记商标而不纳税之优先权。

6月30日　　国民政府令：《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定于7月1日起施行；派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监督：蒋介石为国民大会军队代表选举总监督；蒋作宾为国民大会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自由职业团体代表选举总监督；黄慕松为国民大会蒙古、西藏代表选举总监督；陈树人为国民大会在外侨民代表选举总监督。

△　粤桂军与中央军在湘南发生激战，桂军占邵阳。

△　贺龙红二军团在甘孜西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的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会师。

6月下旬　　周小舟等第三次抵南京，同曾养甫谈判，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双方形成了一份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五条，要点计有：K（国民党）、C（共产党）双方一致确认，为求得民族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C方承认K方之主导权，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K方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进攻的军事行动；双方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式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以及联俄诸问题。

△　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长高桥秘抵广州。日本军官约100人到广州，陈济棠准备将大部派至陆、海军部队担任顾问，协助指挥作战，并以一部约30人派到天河机场及白云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官兵极大愤慨。

是月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派杨东莼去西南会见李宗仁等，阐述全救会主张：“内战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希望团结抗日，免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

△　李宗仁、白崇禧派邓初民往山西动员阎锡山参与支持“六一运动”，阎未作肯定回答。

△　马步芳之叔父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因病电国民政府请假三个月，马步芳串通主办人员在电尾增添“政务由马步芳代理”一语。国民政府复电批准。

△　国民政府与德国签订借款协定，规定由德国供给中国以一亿元军需品，如飞机、高射炮、战车等，其代价则由中国输出桐油、锑矿、钨矿、锰矿等机械工业原料及花生等农产品偿付。此协定由德国莱亨纳中将签订。

△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在化德检阅蒙古军。此时伪蒙古军的编制有第一军军长李守信，辖第一至第三师（每师约1500

人），第二军军长德王兼，辖近卫队及第四至第六师。

△　杨虎城密令驻防鄜县的王劲哉旅开设一所军用合作社，作为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并调田静忱任该社主任。

△　中共北方局在北平创办《长城杂志》，进行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指导学生救亡运动。

△　粤赣边红军“南山游击队”到达“三南”（龙南、虔南、定南），在南坑伏击保安团一个连，进抵南雄之水口圩。南山游击队在“三南”扩大组织，改编为“三南游击队”。

△　红军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领该师主力西出将乐、泰宁、建宁一带，开辟邵（武）将（乐）泰（宁）游击根据地。

△　抗日联军第一、二军奉命组成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杨率部转战辽宁、吉林两省广大地区，下旬于本溪县赛马集山区伏击伪军邵本良主力部队，歼敌1000余人。不久，邵之残部在四道江、蚂蚁河一带被包围，日军顾问英俊志雄被击毙，邵负重伤后丧命，邵部伪军被全歼。

△　鲁迅、巴金、曹禺、吴组缃、蒋牧良、张天翼、靳以、曹靖华、鲁彦、黎烈文、胡风、萧军、张香山、周而复、萧红等63人在《作家》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称，当前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将保持住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决不忽略或是离开现实”。“我们以后将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在这动乱的大时代中，担负起我们的艰巨的任务”。

△　中国航空公司由中美双方合资经营，中国股东为交通部，美国股东为美商飞运公司，资本1000万元，交通部占55％。至是月底

止，双方已缴股本416万元。

△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研究安徽地质，在黄山调查冰碛层，发现该地层为第四纪所有，距今约五万余年。

△　日人图占闽、粤交界之南澳岛作为南侵据点，近日台湾军事当局测量队10余人赴南澳岛，沿该岛四周探测海深。台湾当局并拨巨款作为该岛渔民移居台湾之奖励金。该岛渔民为日方利诱，先后偷渡移民台湾者，已有十分之七。

△　日在广州沙面领署成立特务机关，委臼田中佐为特务机关长。

7月

7月1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二十五年度岁入岁出总预算。岁入岁出各为9.9065845亿元，实际上收支相抵不敷二亿元。岁入主要是关税、盐税、统税。支出主要是军费，为2.930146亿元，其次为债务费，2.39037908亿元。

△　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宣誓接受胡汉民遗嘱，并发表宣言，声称："总理逝世后，依据遗教领导三民主义者，实胡先生一人。"

△　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到达甘孜之甘海，与红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会面，随即举行甘孜会议，决定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　鲁迅在《现实文学》第一期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它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总的口号"。并称："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

加重，更加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

△　日本关东、华北两军部、陆军首脑部负责人和大使馆武官等在天津日本兵营海光寺举行会议，先由永见说明华北政情、外交状况及与关东军协商意见，次由喜多、高桥分述访蒋介石、陈济棠、李宗仁经过，及目下国民党中央与西南情势，然后讨论：一、冀东政权存废问题；二、冀察政权改造问题；三、西南演变随时注意问题；四、驻华各武官密切联络问题；五、特殊工作发展问题，并作出具体决定，由田代等赴北平与宋哲元商谈。

△　天津日领田尻在青岛与日领西春颜商议日走私船“茂益丸”于上月在青岛港外被海关缉私船截击事。2日，日驻华使馆一秘堀内奉日外务省电令，由沪赴青调查。驻青日领西春颜向胶东海关税务司姜佩尔提出要求条件。3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抵青岛调查，预备向南京提出交涉。

△　伪满教育部制定奴化教育措施，规定：一、为实现“日、满亲善”，中小学以日文教授为主体；二、不设大学及专门学校，中学毕业后可至日本升学，以符日、“满”一体；三、中华民国留学生或有中华民国思想者，不得充“满洲国”官吏。

7月2日　　粤空军驱逐机三架、轰炸机四架、战斗机两架分别从广州、从化、韶关飞长沙投中央，并有空军尉官四五十人逃港。6日，粤空军人员黄志刚等40余人通电反对两广发动内战，电中指出：当胡汉民先生逝世之后，李宗仁曾秘密赴沙面与日人密商六天，又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要求日军进占华北，扰乱闽南，牵制中央。自陈逆霸据南粤，其苛征暴敛，旷古所无，单就个人资产而言，不下一亿元，广州之地产、香港之房屋，富甲全国，然军队欠饷达六个月，人民派捐有数十种，至其滥杀无辜，枉兴党狱，不论人民官兵，凡腹诽政治者，即加逮捕，非指为共党，即视为蓝社，非刑拷打，民众死

于“莫须有”三字者，不知凡几。

△　桂空军人员驾机12架离桂投中央。桂空军司令兼航校校长林伟成也离职去港。

△　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等再电陈济棠、李宗仁劝其罢兵并出席二中全会。3日，粤、桂举行联席会议，推黄麟书、黄季陆、邓青阳、李任仁、麦焕章、崔广秀、李绮庵七人去南京出席二中全会。6日，除黄季陆、麦焕章外，其他五委抵港乘轮北上。

△　陈济棠委何荦继缪培南任粤军总部参谋长。

△　李宗仁、白崇禧将第四集团军扩编为两纵队，由廖磊、夏威分任司令，所遗第七军军长职由王赞斌升任，第十五军军长由周祖晃升任。

△　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组成的中央纵队从炉霍地区北上。3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和第三十八军第八十九师及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组成的左路纵队从甘孜地区北上，红二、红六军团沿左路纵队行进路线前进。10日，董振堂率领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和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组成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北上，向甘南挺进。

△　广西省外贸全停，米价飞涨，每担21元。

△　红军西征军徐海东亲率红十五军团攻宁夏韦州城，与守城保安团激烈战斗。4日，徐又率红军2000余人攻城，马鸿逵回军骑二团团长马光宗率骑兵七个营驰援。5日与马光宗部骑兵作战后退出红城水。

△　日第十三驱逐舰队司令西岗茂太中佐访广东省汕头市长陈同昶及李汉魂，重提角田案，4日向市府要求恤金一万元。8日，西岗率

两舰，不通知市府擅自驶入汕头海域。

△　冀东伪组织欲编玉田民团为保安队，拟验收民团枪械，激起民变，民团图袭县城，与伪保安队开火。是日，民团仍集城外与城内伪保安队相持。

7月3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唐绍仪因不赞成粤、桂反中央，离广州抵上海。

△　陈济棠任命其胞兄陈维周为广东省警备军司令，全军辖三个师12个团。

△　日驻华大使川樾茂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冀察政委会代理外交委员陈觉生访驻北平日武官今井，接受日方对丰台事件全部要求。宋哲元将该地驻军营长崔蕴秋撤职留任，并将原驻该地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第二一七团第三营调往他处，由该师第二二〇旅第二营接防。4日，陈访永见，代宋哲元致歉，此案结束。随后驻丰台第二十九军又因田代认为影响日军安全，完全撤退。

△　日轮“天津丸”由津驶大连，日人高山龙三私带银块923两，现洋20.8599万元，被海关关员查获没收。28日，日浪人力武兴携现银1000余元由津南运，在总站被关员查获没收。29日，日领永井访许礼亚交涉发还，被拒绝。

7月4日　　蒋介石发起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在南京成立。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规定凡偷漏关税者，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　陕北驻军将领汤恩伯、高桂滋、李藩侯、毛侃等由绥德飞西

安见张学良、邵力子报告陕北军事。据高桂滋谈称：中国工农红军从山西撤回后，由毛泽东等率领分两路，一路经环县、一路由三边，向西进攻宁夏、陇北。留陕北红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及北路军等四军驻守陕北，并以第三十军扼守黄河西岸，阻止“中央军”由晋北开入，红军每军共九连，人数约1000，四个军总数不过3000余人。

△　陈济棠召集第一集团军将领会议，到余汉谋、缪培南、张达、黄任寰、陈维周等。决定将粤、桂现有七个军编为七个纵队，余汉谋、李扬敬、廖磊各为一路，余辖第一、二军对湘、赣，李辖第三、四军对闽、赣，廖辖第七、十五军对湘、黔，缪培南为预备队。对湘、黔暂取守势，而由福建、江西两路逐渐进攻。

△　粤军教导师先头部队抵赣州。进入闽西永定、武平、上杭一带之粤军，征集居民修筑防御工事。

△　粤空军飞机48架飞离粤境效投中央。6日，该空军人员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粤机九架飞抵南京。

△　绥西河套临河境内民兴渠决口，淹田百顷以上。

△　驻丰台日军百余名，分乘汽车三辆、巨型坦克七辆、军用大卡车六辆，开入北平游行示威。

7月5日　　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兼红二军团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

△　粤军第六师参谋长吴沧桑因反对出兵，主张“拥护中央”，被陈济棠枪决。

△　津日驻屯军司令田代、日使馆武官喜多由津抵平与渡久雄、高桥、松室、今井等会谈，由喜多报告南京政府对西南与华北的政

策；松室报告冀察政权最近动向；渡久雄传达日中央意见后，即商华北对策。会后，田代、喜多访宋哲元、秦德纯。6日，田代等应宋、秦宴请，共商签订冀察政治、经济协定，在“中日互利、不损主权”之下，开发华北矿藏、棉业、公路等。

7月6日　　粤第二军副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挂印封金，通电辞东区绥靖委员职，7日抵香港，致蒋介石、林森、陈济棠、第一集团军各将领等，“悬崖勒马，听命中央”。请中央对“西南此次举动，因势利导，纳诸正轨”，宣称：“当此举国一致对外之时，若挑起内战，实属丧心病狂。”8日，李又致电第二军将领张达等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　陈济棠令各军自20日起采取战时编制。

△　张学良、朱绍良、杨虎城、邵力子、于学忠、马鸿逵、马步芳等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劝撤退入湘部队，出席二中全会。

△　冀察政委会撤销石友三通缉令。10日，委石为冀察政委会委员。

△　日本近在内蒙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设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是日电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与宁夏省政府联合拒绝日方此举，行政院亦饬外交部向日方提严重抗议。

△　伪军李守信、卓世海等积极扩军，察匪颜东五、绥匪王英分别被任为伪军第二军第一、二旅旅长职，司令部设张北，日方连日秘密运军用品供给伪军。24日，据《大美晚报》华联社天津电称：察北伪军李守信部近又在百灵庙等处招兵，扩编内蒙古自治军两个师。

7月7日　　新任日驻华大使川樾在南京晤蒋介石，交换中日关系意见。

△　日外务相有田对中国政府所传日本政府庇护华北走私事，认

为诬赖日本，是日训令川樾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　陈济棠电令第一集团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黄任寰即饬前线部队向闽赣边推进。蕉岭、大埔一带续到粤军一批。中央军第十师李默庵部开闽增防，先头部队到达漳州。8日，粤新编第四军由兴宁向赣南会昌推进。

△　翁照垣率前第十九路军官兵约600人由广州赴桂编入“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

△　是日至14日，上海第四、六区15家丝厂工人7500名女工因要求恢复原有工资，减少工时，举行罢工，结果胜利，全市丝厂女工工资自6月份起复原，最高工资0.45元，每日工时10小时半。15日全体复工。

△　因大宗日本私货输入，天津商业凋敝，端午节后数日，倒闭商店500余家，是日天津市府召开扩大救济事业会议，决向银行商会筹款救济各业。

7月8日　　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秘密由大庾去南京见蒋介石，表示愿受蒋命收拾粤局。李汉魂于12日亦电蒋授权余汉谋办理粤局善后。

△　江海关监督唐海安抵广州访陈济棠、林云陔、区芳浦等商改币制。

△　华北日驻军高级参谋石井、部附滨田离天津赴长江流域调查，并转赴湘南探查西南军事状况。

△　桂军于六寨、独山、都匀等地调驻重兵，并积极布防，战事侧重桂、黔边境。

△　日贵族院议员板西利八郎中将由青岛到天津访田代，调查华

北情形。10日，坂西抵北平访宋哲元，11日赴长春。

△　浙赣边红军400余人攻占开化县城，开狱释囚30余人，当日退出，向北门高坑转移。

△　上海人力车工人陈惠章因英国水兵不给车资，发生争执，被殴身亡。20日，上海英水兵惨杀陈惠章后援会向市府请愿，要求迅向英领严重交涉惩凶、道歉、抚恤及保障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22日，后援会派张世英等向上海市党部及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作同样请愿。23日，后援会紧急会议决议，请上海市府函咨驻沪英领署答复办理陈案凶手经过。25日，后援会函请王晓籁、杜月笙、虞洽卿、黄金荣、张啸林等协助向英方交涉。

7月9日　余汉谋在南京电促粤各将领“服从中枢”，“团结御侮”，并称：“汉谋秉承蒋委员长面授方略，不日回军。”其所属第一军副军长李振球以下师、旅长20余人亦于同日联合发出通电，反对内战，力谏陈济棠停止军事行动。

△　晚，陈济棠与西南各领袖在广州开紧急会议，决派巫剑雄兼第二军副军长10日衔命赴大庾。

△　国民政府明令国葬章太炎。

△　王克敏、王揖唐到北平晤宋哲元，商谈中日在华北经济合作问题。10日，王克敏在冀察政委会例会上声称：“余在津访田代，在上海晤川樾，感觉中日政治关系复杂，双方须密切接近，而经济合作实为调整中日关系之首要步骤。”

△　日军坦克七辆，满载日兵之载重汽车八辆，六轮军用车两辆及汽车两辆，由丰台开入北平示威。天津亦有日坦克三辆及满载日军之军车驶入华界游行示威。

△　法驻华大使那其亚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7月10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委员约200人，粤、桂出席代表有黄麟书、黄季陆、邓青阳、李任仁、麦焕章、崔广秀、李绮庵。唐绍仪、余汉谋亦出席会议。预备会推蒋介石、孙科、冯玉祥、于右任、丁惟汾、居正、陈果夫、王法勤、孔祥熙九人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

△　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等数十人电二中全会，请讨论通过西南关于与日绝交、宣战等五项提案。

△　是日至12日，陈济棠召开粤、桂联席会议，陈济棠、李宗仁坚决主战，决定二中全会如不通过粤、桂五项提案，将另组抗日政府。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要求二中全会接受人民要求，决定由中央领导全国立即对日抗战，并实行：一、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二、释放政治犯；三、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以武力制止日本在华北增兵；五、以武力制止日本武装走私；六、罢免并惩办亲日派官僚政客。同日，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到达南京请愿。13日，五位代表至中央党部大会会场，要求准许“全救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遭马超俊拒绝。下午，章、史等在南京招待新闻界，介绍“全救会”的主张和成立经过，要求新闻界积极支援，尽量登载救国运动消息，扩大宣传。

△　白崇禧派黄旭初、刘斐由南宁到广州，与陈济棠商议，决定在军事上组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总司令部，并请粤军改取内线作战部署。同时，广西银行行长黄蓟与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商定：粤、桂两省钞票，彼此互相收受；桂对粤汇款，粤行尽量收受。13日，黄旭初、刘斐、黄蓟离粤回邕。

△　陈济棠调第十三师赴韶关，防余汉谋回师，并派机轰炸吉安

附近，威胁余军。又调重兵驻东北江，准备开赣、闽。从湘回桂之桂军也向黔推进。

△　粤宪兵司令利树宗、第一兵器制造厂厂长黄涛、虎门要塞司令李洁芝、军医学校校长张建及空军人员11人离粤投中央。

△　财政部负责人对记者谈广东滥发纸币情形，谓广东省所存现金，毫洋7000万元，大洋2000万元以上，合计不过9000余万元，而发行之纸币，已超过二亿元以上。

△　日军30余人由天津行军至大沽，第二十九军以事前未接通知，鸣枪示警，日军竟开枪射击。11日，宋哲元在北平召集第二十九军军官会商解决办法。13日，经陈中孚向田代道歉了事。

△　冀察政委会例会决定批准萧振瀛辞去该会经委会主席职，由王克敏继任。

△　上海日商三菱会社海产部职员萱生矿作在狄思威路被人开枪击毙。11日，驻沪日代理总领事杉原要求上海市政府缉凶护侨。16日，驻沪日总领事若杉访市长吴铁城，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水兵案及萱生案迅速处理。

△　上海外国领事团召开会议，讨论修正工厂检查协定草案，认为该项协定只能适用于租界内中国工厂及无领事裁判权国之工厂，享有领事裁判权国之工厂不能引用。

△　中法广州至河内航线开航。

7月上旬　中共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县。

7月**11**日　外交部长张群在五届二中全会首次大会上报告半年来外交经过，宣称：五全大会决定之对外方针，即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半年来政府

对外策略始终本此方针。“中日两国间，应经由外交途径谋整个关系之调整”，“中日负责当局，为东亚和平前途计，应迅由正当途径，谋有利于两国邦交之调整”。

△　赣南余汉谋军莫希德、叶肇、张瑞贵三师集中信丰、大庾、南雄间，以副军长李振球为先遣队司令，开始南返，提出“打倒陈济棠、拥护中央”等口号。粤第二军李振良师通电响应余汉谋，请陈悬崖勒马。

△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电蒋介石，申述动员抗日决心。

△　李扬敬、张达、黄任寰、缪培南、黄延桢、黄质文、陈汉光等在广州联电南雄余汉谋军，劝勿自分裂。同日，粤第二军第四师巫剑雄部进攻南雄余军。

△　宋哲元、秦德纯等宴王克敏，并就时局交换意见。12日，王离平赴津，访永见、田代、饭田、田尻交换华北“经济提携”意见。15日王到南京，次日见蒋介石报告北上经过。

△　是日至12日，川樾在沪召集全华日军武官会议，讨论两广问题、华北今后对策及国民政府最近对日态度等。14日，渡久雄返日向日外相有田及陆军省参谋本部报告津、沪武官会议结果。

△　驻苏大使颜惠庆返国抵上海。

△　卫生署长刘瑞恒等被控侵吞公款案在南京公审，证实侵吞公款可查者17万余元。

△　无锡五丰、瑞昌、万昶、永甡、乾甡、宝丰、永盛等11家丝厂女工3000余人要求厂方改善待遇而罢工。13日，续有大成、民丰、太昌等25家丝厂女工响应罢工。同日，太昌女工与警察冲突，伤10余人，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县府召开劳资调解会议，提出俟复工后，由党政各方会商解决。15日，女工数百人游行，被军警阻

止，发生冲突，全体警察出动驱散女工，并逮捕“鼓动风潮嫌疑犯”高德华、陆亮卿等数人，次日公安局又捕女工蔡妹一名。18日，各丝厂工人先复工。21日与厂方签订协定，对工作时间、工作标准等作出了规定。

7月12日　陈济棠在广州访李宗仁及白崇禧之代表黄旭初，共商时局。陈说明粤方关于二中全会的见解，并为补救广西财政困难，允对广西银行通融五亿元；要求桂方遣军至广东，以加强北部防备。李当即允诺，并电令桂军二万人集结梧州待命。

△　桂省主席黄旭初电粤省主席林云陔，建议粤、桂经济提携：一、两省纸币准在两省境内互相流通使用；二、必要时粤省银行透支巨款，助桂平定外汇，稳定金融。

△　立法院院长孙科电促陈济棠将粤军事交余汉谋负责收拾，并即去京共负中央任务。

△　陈济棠在广州召集海陆军将领会议，决定：一、彻底肃清不正分子；二、缩短战线，严守省境；三、极力扩充军备，恢复第十九路军；四、增派精锐部队，巩固北部及东部省境。

△　粤军第九师邓龙光部反陈济棠，在潮阳与陈维周警卫军激战；陈济棠调陈汉光部往援。13日，邓龙光辞职抵香港。

△　粤第一集团军缩短防线，驻小北江一带李扬敬部奉命向英德集中，小北江防务由桂军周祖晃、王赞斌两师担任。粤第一军第一师莫希德、第二师叶肇续向韶关、英德推进，陈济棠命炸毁清溪铁桥，以断广韶交通，广州戒严，宪警总动员。

7月13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居正主席，讨论通过以下重要提案：一、组织国防会议，指定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榘、何成濬、顾祝同、刘湘、龙

云、何键、蒋鼎文、杨虎城、朱绍良、徐永昌、傅作义、余汉谋为委员；二、改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并负责整理全省军事；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三、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四、中委唐绍仪等31人提议，明令撤销中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的同志，均集中中央，共同负责。

△　蒋介石在五届二中全会上代表主席团报告，否定萧佛成等所提《目前抗日救亡最低限度方策》一案，宣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半年来的外交形势，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并未到最后关头"，"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　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声称："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对外抗争的根本要件"，对两广异动，"中央始终不放弃政治的途径与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并称"中央决不能因外患之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之工作"。

△　军事委员会发表人事命令：一、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免去本兼各职。二、派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三、派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四路军第一军军长，李振球为副军长。四、派张达为第四路军第二军军长，李汉魂为副军长。五、派李扬敬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黄延桢为副军长。六、派黄任寰为第四路军第四军军长。七、派缪培南为第四路军第五军军长，林时清为副军长。任黄光锐为空军驻粤指挥官。任张之英为广东省江防司令。

△　陈济棠接中央撤职电后，邀李宗仁、李扬敬会商对策，并令第二军第四师向南雄推进。粤北省境战事激烈。

△　余汉谋自南京飞回大庾，14日通电就广东绥靖主任、第四路军总司令职，回师韶关，并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内离粤。

△　驻粤海军第一、第四两号鱼雷舰舰长邝光民、邓瑞功率舰离粤抵港投中央。

△　孔祥熙在二中全会作财政报告，指出：由于受巨量走私之害，二十四年度全国关税收入，按预算约短收9000余万元之多，加上盐税、统税俱属短收，全年岁入按预算数短收几达一亿元，是以一年之中，竭力整顿税务，并积极筹办所得税、遗产税。关于地方财政，截至本年6月底止，据报各省废除苛杂计5000余种，裁减数额5100余万元。

△　天津华新纱厂因欠外债无法偿还等原因，决定出售（该厂为北洋六大纱厂之一，有纱锭2.5万枚）。17日，天津宝成纱厂无力经营，售与日商裕大纱厂，售价37.5万元。28日，上海同昌、振华纱厂各有纱锭1.5万余枚，被日商内外棉纱厂全部收买。

△　济南鲁丰纱厂因机器陈旧、棉花缺乏而停工。1600余名工人失业。

△　浙江省定海岱山镇渔民2000余人集会反对地方当局盐斤归堆政策及增加盐税，被税警击毙一人，群众夺枪反抗，击毙税警队长胡不归，焚毁盐场公署和秤放局，杀死场长缪光、职员钱甸等20余人，渔民也死30余人。

△　近一月来，川东南及小川北各地旱灾严重，田畴龟裂，禾苗枯槁，秋收大都绝望。四川省财政厅决定组织旱灾民食救济委员会向金融界筹款，在上海、芜湖两地购米入川。是日财政厅长刘航琛召集金融界开会，商定经费110万元，由中国、中央、农民三行共认90万元，其余由各行分担。

7月14日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国防会议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孔祥熙、何应钦、陈绍宽、张群、张嘉璈、俞飞鹏、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榘、何成濬、顾祝同、刘湘、龙云、何键、蒋鼎文、杨虎城、朱绍良、徐永昌、傅作义、余汉谋30人为国防会议会员。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内务部组织法》、修正《财政部组织法》、《财政部税务署组织法》、《财政部关务署组织法》、《财政部盐务总局组织法》。

△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孔祥熙主席，通过电慰汪精卫及大会宣言草案等案后，即举行闭幕式，由冯玉祥宣读大会宣言，声称："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略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　国民政府西南政委会开会，萧佛成主席，讨论撤销执行部与政委会事，决议拒绝。关于拟在最短时期于广西召开非常会议，另组政府案，为萧佛成等反对，未通过。次日，萧以陈济棠、李宗仁"破坏党国统一，称兵异动"，携眷离粤赴港。

△　陈济棠派员强提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关税存款，未果。15日，陈派员去香港，向汇丰银行提取第一集团军公积金100万元。

△　粤第四路军莫希德师抵南雄、始兴，前锋距韶关仅30里。陈济棠为缩短防线，令粤军退出韶关，第二军集英德为第一防线，源潭

为第二防线，军田为第三防线。

△　粤第二军第一教导团团长张威、第四师第十团团长覃香、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超成投中央。

△　陶行知从香港出发，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去欧洲，8月间到达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同时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

7月15日　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会议，议决：一、以西南政委会、执行部名义否认二中全会各议决案，通电拒绝中央撤销两机关令，宣布将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特别会议。二、组织抗日救国军一、四集团军联军，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总、副司令。

△　陈济棠令第二军张达部向余汉谋军猛攻，并调坦克10余辆出发北江，同时下令炸毁粤汉路南段田头水及九峰两座铁桥，粤北韶关一带战事激烈。晚，张达部由韶关南撤，主力集中英德、军田与余汉谋部对峙。次日，余部莫希德、叶肇两师抵韶。

△　粤军第九师师长邓龙光电劝陈济棠“入辅中枢”。同日，何应钦、程潜等再电促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入京“共抒救国大计”。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名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阐述对联合救亡的立场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一、希望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共纾国难；二、希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三、希望宋哲元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不逮捕殴打抗日民众；四、希望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主要是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五、希望中共实行《八一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六、希望民众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并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

△　江海关奉财政部命令，撤销对意经济制裁。

△　冀察政委会令经济委员会委员钮传善在王克敏就职前暂行代理经委会主席职。

△　日军在伪满柳河县白家堡子屠杀居民三百六七十人，烧毁房屋五六十户。

△　苏（州）嘉（兴）铁路建成通车。

△　宋棐卿在天津英租界修建之东亚毛纺厂新厂全部竣工，生产驼绒及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

7月16日　　陈济棠、李宗仁就“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正、副总司令职，并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设置联军总司令部的部署及两广军事策略。任命张达为北路总指挥，第三军副军长黄延桢为中路总指挥，第四军军长黄任寰为东路总指挥。决定东江由惠州至广州、北江由军田至广州两线，加紧部署兵力，实行内线作战。

△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估计中日战争形势，提出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三个条件，“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并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坚决抗战到底，“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　桂军第四十五师奉白崇禧之命由龙虎关出动小江北，协助周祖晃、王赞斌两师加强英德前线防守力量。

△　粤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团长李绍嘉、第二十六团团长刘镇湘、教导团团长王德全等在五华通电“服从中央”，率部投余汉谋第四路军。

△　粤军第十四师参谋长罗隆、团长梁荣球、何联芳、李卓元等率全体官兵通电数陈济棠罪状，谓陈私人财产，存储外国银行达1.1亿元，其兄陈维周、其妻莫秀英等亦各有四五千万元，陈氏兄弟妻孥廉俸有限，巨资何来，而我三军将士竟至欠饷数月，且扣捐抽税，七扣八折，不得一饱。要求“驰赴前线，诛杀卖国贼”。

△　驻朝鲜清津随习领事孙秉乾等七人被当地日驻军指有探报军情嫌疑被捕，外交部电令驻日大使馆向日外务省交涉，要求迅速释放，同时电饬驻朝京城总领事馆向朝鲜总督府作同样交涉。25日，孙秉乾等被押送清津地方法院开始侦查。

△　宋哲元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期望日本对于华北之经济振兴，予以强有力的援助，其中最期望者为平绥路宣化之铁矿等矿山事业，目下正由中日双方进行研究。交通建设为经济开发的基础，故铁道建设刻不容缓，华北经济干线之沧石铁道务必敷设。惟经济提携，须负责得人，慎重人选。王克敏再度北上，必能于此方面开一活路。即冀察政委会的增强、扩大，亦须待王北上方能决定。

△　内政部通令各省、市查禁三种刊物：一、《创造月刊》，南宁桂军政训处出版；二、《火星半月刊》，北平“一二九”文艺社主编，因“宣传普罗文艺，鼓吹阶级斗争”；三、《史地知识》，因以“唯物论、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史地”。

7月17日　　午，陈济棠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提议离粤，实现和平；并电中央请停止派军南下。下午1时，又派陈汉光先飞南雄见余汉谋，后北飞见蒋介石，提出和平条件两项：一、请中央派员来粤主持军务；二、给陈济棠名义出国。陈离职后军权交缪培南主持。同日，陈济棠下令枪决以看相扶乩主战的粤军总部秘书翁半玄，并扣留其他主战者10余人。

△　粤空军司令黄光锐召全体空军官佐开紧急会议，决定率全部

机队投中央。18日晨6时半，黄与参谋长陈卓林、航校校长胡汉贤、大队长、分队长及全体飞行员160余人同时自广州起飞，其中58架飞韶关集中，余四架专载黄光锐、陈卓林、胡汉贤等直飞到港，并通电宣称：粤空军全部脱离西南，加入韶关之余汉谋军队。

△　余汉谋电陈济棠，限由18日午起，24小时内离粤。蒋介石也致电促陈引退下野，从速入京。

△　萧佛成致函陈济棠，斥陈勾结外敌，责令“克日离粤，还政中央”。

△　粤第二军军长张达派政训处长冯鸾晃飞大庾与余汉谋接洽后返军田。当晚，张电陈济棠称：“二军将士已无斗志，虽驱策再三，亦逡巡不前，时势至此，惟有请钧座临崖勒马。”

△　陈济棠军放弃英德，退集军田。

△　粤第二军第四师巫剑雄、第三军第九师欧阳新、第五军第十四师陈章等率部投中央，与第一军会合南进。

△　西南政委会布告，准许广西货币在广东省内自由流通，并声明以桂币交付各项租税亦属合法。

△　冀东伪政府实施奴化教育。是日，伪冀东教育处通令各县中、小学一律加授日本史地。19日，通令规定中学生升大学，应向伪教育处呈请审核，由处免费送往东京或伪满大同学院肄业；小学毕业后应在冀东升学，不得前往平、津入学。

△　日轮“长江丸”水手小林进、乌井真次在天津酒醉雇人力车，发生口角，警察窦文彬排解不听，反被刺伤后腰，殴伤两腿。18日，天津公安局一分局局长阎家桢访日警署交涉，要求道歉、疗伤。日方允接受。

△　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奉蒋介石令，指挥骑六师、骑十师和第五十一军之第一一八师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分两路向隐蔽集结于七营、豫旺城及其附近地区的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进攻。是日，骑六师被左路军左权红一军团击溃，四个骑兵连被俘。经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

△　晋省南部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漳河猛涨，南运河大溜汹涌下注。18日，沧县减河受南运河涨水倒灌，邢家庄新堤溃决60丈，沿河数十村被淹。漳河沿岸大名县属第一、二、三区老堤头、双井镇等百余村亦被淹，大名城处于水中央。20日，永定河水在卢沟桥上涨，武清县境鱼坝口村东河套一带决口扩大。

7月18日　陈济棠在广州宣布下野，在燕塘军校召集李扬敬、缪培南、林翼中、区芳浦、林时清、林益谦、何荦等处理善后：一、所有东、北两江及驻省军队交由李扬敬、缪培南统率。二、广州市治安交由公安局长何荦负责维持。三、政治方面则分别交林翼中、区芳浦、黄麟书暂维现状，俟余汉谋抵省，即分别办理移交。下午5时15分陈乘英舰“蛾号”离广州去香港。

△　陈济棠派师长陈汉光携亲笔函飞南京见蒋介石，函称：“国事至此，不忍作无谓之牺牲，故决遵令下野，以免掀起内战，但粤事交幄奇（余汉谋）主持，各将领均不服从，仍恐不免一战，应请钧座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职当摆脱一切，遂我初服。”同日，蒋电促陈去京，并称：“幄奇对兄，于公于私，均属忠诚耿耿，今彼既由中央委任，兄之视彼即应视为受中央命令之大员，以军权交幄奇实为交军权于中央，而粤中将领更应知幄奇系奉中央之命，负粤军之责，故听命于幄奇，乃所以服从中央，决不可以个人为观点，稍存彼此异同之见。”

△　陈济棠电大庾余汉谋，谓：“棠诚信未孚，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

兄独负其责。”余接电后，即召开部属会议，决定20日派员飞省晤何荦，商交接手续，并下令所部兼程前进，先遣队20日抵广州。

△　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逃抵香港。

△　李宗仁闻陈济棠下野，急调桂军两师入广州，缪培南率部赴江村（离广州市50华里）堵截，黄任寰率第三军一师往西江防桂军侵入。李以桂军被阻，遂于下午4时45分乘西南民航机返南宁。

△　蒋介石偕宋美龄、钱大钧等20余人由南京飞南昌转赴庐山避暑，并与湖北省主席杨永泰长谈。杨向蒋建议趁此千载一时的机会彻底解决广西李、白。

△　李宗仁与白崇禧为谋对蒋缓和，分电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抗日主张不变，如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盼将此意转达。

7月19日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在南宁开会，决定：一、服从中央命令，李就广西绥靖主任，白就副主任，黄就广西省主席；二、李、白、黄三人联名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20日，黄乘民航机飞长沙转赴庐山谒蒋表明李、白态度。

△　白崇禧继续备战，令梧州戒严，并在近郊赶筑工事。

△　留粤日空军人员60余人分批化装入桂。

△　广州市面渐复常态，宪兵司令利树宗、公安局长何荦分别布告安民，并与张达、黄任寰、缪培南、林时清、张文英、范德星、杜益谦等联名电请余汉谋即派员来省，处理一切。

△　陈维周之警备军第一、二、三、四团开赴西江，拟与集结三水、广州间之桂军合作，缪培南派第十二师陈汉光部前往包围解决。

△　据《大公报》讯：广东省工商业及金融界联合各界人士组织白银保管委员会，监视白银外流。粤省当局年来滥发纸币，竟达2.5亿余元，所存白银不过9000万元，近更将该项白银分运港、琼交与日本购买军火，2.5亿元纸币立成废纸。

△　日萱岛、铃木两联队长指挥唐山、榆关、秦皇岛日军千余人，在南大寺、秦皇岛间演习遭遇战。

△　据《申报》讯："满铁"驻津事务所调查华北经济情形，现已完成华北财政概况、晋省产业贸易及河川测量、华北港湾情形、鲁省纺织业概况及产棉情形、华北农村经济、冀省滦榆蓟密区内贸易概况等项调查。

7月20日　蒋介石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南京军委会任职。李、白复电指责中央"墨沈未干，自毁信誉"，表示"殊难遵令"。

△　余汉谋第一军副军长李振球率先锋部队1500人入广州。同日，余派陈章甫由韶关飞广州商接收手续。

△　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由香港回广州办公。

△　余汉谋电粤各将领，指示粤省今后措施：一、陈济棠决心下野，盼即通电，光明磊落宣示国人；二、委缪培南兼广州警备司令，所有广州水陆军警均归节制，维持治安；三、各部队暂在原防待命，不得擅自调动；四、白银由保管委员会切实保管，由缪培南、张之英负责监督，制止偷运出口；五、省行未发法币由保管委员会封存，不得滥发；六、即派工人修复广韶路，恢复交通。

△　孔祥熙派宋子良为广东省财政特派员，调江海监督唐海安代两广盐运使，调江西省财政厅长吴健陶代粤桂闽区统税局长，并特派财政部次长邹琳率秘书陈汝霖等赴粤视察财政。21日，行政院决议委

派宋子良兼代广东省财政厅长。

△　全国各省、市、县商会联席会议在上海开幕，到21省市、县商会代表，公推王晓籁（上海）、余蓉樵（汉口）、于小川（江苏）、蔡昌（广东）、袁端甫（浙江）为主席团。主席王晓籁报告召集会议主旨，在仰仗各省、市商会群策群力共谋挽救商业凋敝之方策。21日，会议议决：一、请立法院修改《民法》第681条关于合伙债务清偿责任的条文；二、电请行政院财政部撤废各省变相厘金；三、电请行政院财政部缓办所得税案；四、电请政府通令保障正当商品运销；五、组织中华民国各地商会检私委员会总会。22日，决议组织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会议闭幕。

△　察哈尔省边区永宁堡保安队罗紫宸部再遭冯寿彭部保安队围攻，冯炮击城内，毁民房无数。22日，察保安队日人顾问大山到津访永见，商遏止策。30日，察边保安队火并事平息，罗紫宸部正式改编为察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驻延庆县永宁堡。

7月中旬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问题，主张改变“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同时并举的方针，建议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代替“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7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凡六章22条。

△　粤各界团体及3000万民众电请国民政府通缉陈济棠归案，谓陈踞粤七年，横征暴敛，苛抽恣剥，公开烟赌，祸国殃民，串同区芳浦、林翼中、陈维周等，假国防、自治、军需、建设、航空救国、整理金融、维持纸币等名义，迭次发各种公债库券数十亿元，收支未明。

△　司法院第十九次常会决定撤销西南最高法院分院，派叶夏声代理广东高等法院院长。

△　粤各团体派代表检查银仓，计存毫银8000万，大洋1950万元。法币共发2.4亿元。

△　山东省政务会议议决设立乡村建设学校，以培养乡村建设各级技术人才。

△　天津人力车公会反对英租界工部局将颁布拉车验捐法，通告各车厂一律摘下英租界捐照，拒绝在英租界行车；并具呈市府声述拉车上捐影响营业，要求全体退捐。市府即派员访英租界当局交涉。22日，续有胶皮车商200余人到社会局请愿，要求向英工部局交涉，取消新验捐法。23日，市府派人访英工部局秘书长巴恩士交涉，英方允每辆车到局受验时，赔偿时间损失费一角，并同意将来发出车照数不加限制，人力车每年须到局受验两次。英租界人力车遂复市。

△　中日天津警探冲突。警卫天津市府之保安第九中队第三分队长邹凤岭便衣赴日租界购物，日工部局特务认邹形迹可疑，带往日警署讯问。22日，邹押经市府门前，门卫见邹被押，即开枪射击，毙特务张德禄。23日，日副领事西田口头提出四点要求：一、市长正式道歉；二、严惩开枪人及肇事分队长；三、从优抚恤已死特务及负伤汽车司机；四、保障以后不得再有此类行为。天津市长张自忠全部接受日方要求。

△　日外务省事务官相场、警察部长盐泽到天津访田尻总领，商平汉、津浦两线扩张警权等事。22日，盐泽召集北宁路及平、津各日警署警官在津日总领警署会议，对扩张警权及平汉、津浦两线设警察分署及日、韩人杂居事有所决定。29日，驻张家口日领事中根在津与盐泽会商在张北一带扩张警权事。旋由盐泽携决议案返日报告。

△　日陆、海、外三相会议讨论中日关系及上海萱生事件、青岛渡边事件之对策。22日，会议议决全力援助冀察当局及冀东政权，并促进绥、察、冀、鲁、豫、陕、晋七省“中日经济提携”，并要求签订

中日关税新协定。24日，又发表宣言重申三点：一、说明日本在华北“特殊地位”，倘南京漠然视之，仍取“以夷制夷”政策，则日本之华北政策将更趋强硬；二、南京政府无诚意，“取缔排日”不力；三、“忠告”南京政府，以日本可以接受之方式解决华北问题。

7月22日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组主任钱大钧飞韶关晤余汉谋，接洽粤省军务整理。23日，余偕钱抵广州开军事会议，决定：粤军一律照旧维持，饷项照旧发给，各军暂驻原防；裁撤广东军政学校，改设中央军校广东分校。24日，余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决定将第一集团军改为第四路军；任命徐景棠为总部参谋长，黄涛主持兵工厂工作，黄振球为防空委员长，李洁芝为广州公安局长，陈策为虎门要塞司令。同日，海军部次长陈季良、军委会海军处长陈策抵广州与余商整顿粤舰。

△　第四路军余汉谋第一军莫希德第一师开抵广州。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作适当调整，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指示》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情况很坏的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

7月23日　国民政府明令追赠陆军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为陆军上将。

△　铁道部胶济路局收买民营博山轻便铁路，购价78万元。

7月24日　国民政府特派汤尔和、曹汝霖、戈定远、刘汝明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　李宗仁、白崇禧联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定于8月1日就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请派员监誓。

△　各省、市商会代表请愿团由上海到南京分别向中央党部、行政院、立法院、财政部、实业部请愿：一、各省变相厘金克期裁尽，如湘省产销税、赣省“清匪”善后捐、粤省各种专税、川省落地税、江、浙蚕丝改良费、陕、甘、滇特种消费税等；二、所得税应俟变相厘金一律裁尽，外侨能依律交纳后，同时举行；三、修改《商会法》、《同业公会法》等。接见人允研究解决。

△　前任驻济南日总领事西田耕一被聘为冀察政委会顾问，是日由神户启程来华。

△　冀察政委会通过宋哲元提议之沧石铁道建设案。

△　河北省开滦煤矿马家沟矿区，近有陈荣设荣庆公司，允工人开采土矿，前后已掘井60余处，每矿日给陈保险费38元。开滦矿局以矿区被占，函滦县政府取缔。是日，县府派员制止，陈纠集各小矿工人3000余名，持械阻止入境。25日，县府将陈捕去，矿工数千计议暴动。

△　漳河又有两处决口，两岸30里被淹，人畜淹毙无数。25日，蓟运河三处决口，两岸40里被淹。同日，永定河水势陡涨，北埝溃决40丈。次日，天津北双口村杨家堤溃决百余丈，双口等村农民2000户万余人受灾，淹地四万余亩，损失30余万元，灾民代表到津请愿要求华北水利会赔偿损失。27日，永定河下游双口镇迤上平庄一带溃决，决口30公尺，天津、武清两县30余村被淹。同日，山东省南阳湖、微山湖溃决数口，湖田被淹。

7月25日　　国民政府令免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职；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负责处理桂局善后。

△　夜，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召集军政首脑开紧急联席会议，

决定拒绝中央对李、白的罢免令，并决议组织军政府。27日，李、白再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李品仙在广州与陈诚、钱大钧会谈结果，决定拒绝中央对李、白的新任命，以全省力量抗御中央。31日，李、白致电蒋介石，略称："更调新职，中央苦心措置，职等无不尽谅，唯关于抗战救亡大计，仍恳为更明确具体之指示，俾便遵循。"

△　陈诚抵广州访余汉谋，代蒋介石指示收拾粤局机宜。26日，余访陈诚商谈粤局。27日，余下令裁减兵额至6月1日前状况，凡6月1日以后由陈济棠所委的军、师长均复回原职。同日，余在纪念周演说，声称："军队乃中国之军队，并非隶属于一省或个人，此为余永矢勿忘之原则。"

△　余汉谋邀宋子良、邹琳、贝祖诒、唐寿民、唐海安等商议粤省财政，确定：一、军政费不敷，拟请中央对禁烟赌案延期半年；二、缩编军队，核减行政费，期收支平衡；三、军费由国税支给，不敷请中央补拨。

△　财政部次长邹琳在广州召林云陔、宋子良、唐海安、唐寿民、贝祖诒、沈代利等商整理粤省金融办法，决定短期内先整理广东省银行财产，并将其改组为中央银行广州分行，代理国库收支，然后再依改革币制程序，运法币至粤，将原有毫洋制改为大洋制。对苛捐杂税和非法的盐税附加准备废除。

7月26日　王宠惠偕孙科由上海赴九江转庐山与蒋介石会商两广事宜。

△　黄绍竑抵庐山见蒋介石，辞广西省绥靖主任职。

△　广西省银行奉令将存银440余万元集中南宁。次日，广东省财政厅撤销两广金融协约。

△　李宗仁、白崇禧电请息影梧州的李济深克日到邕面商一切。

次日，李济深偕胡鄂公到南宁，李、白即约翁照垣、刘斐、徐启明、戴石浮、夏威、廖磊、张任民、黄旭初、韦云淞、黎行恕与李济深研究关于抵御蒋介石进攻广西的策略。

△　贺龙红二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阿坝。

△　天津海关在津郊北仓一带缉获私货煤油2100余箱。近每日平均约有20吨左右私货运津，日浪人贸易协会为逃避缉私，不经津浦路，每夜改用汽车装砂糖、人造丝等品，插“日军用品”旗，由日租界驶过南大道西营转冀、鲁行销。30日，津海关缉私调查班开始工作。同日，许礼亚访张自忠，张允在可能范围内协助缉私。

△　日东京各大学来华考察团20余人在天津考察完毕，赴榆、秦各地考察。28日，日学术旅行团27人，由桥本率领抵北平，访秦德纯。

7月27日　国民政府公布《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废止《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并指定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札著、林沁旺都特为副委员长。

△　余汉谋令第四方面军恢复6月1日以前编制。调第二军副军长黄质文为第八师师长，第六师师长梁世骥为第二军参谋长，第四军军长黄任寰为独立第一师师长，第五军军长缪培南为教导师师长。

△　钱大钧飞庐山见蒋介石报告粤局。

△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

△　日外务省未经我国同意，决在成都设领事馆，并任驻华使馆情报部中国班长岩井英一为领事。是日，岩井抵沪向记者谈称：“此次奉派为驻四川成都领事，唯一使命厥系发展日本在该地商业及调查

川中一般农产物及贸易状况，余将以最大努力从事开发四川经济。”28日，四川旅沪团体发起组织四川旅沪各界反对日在成都设领。29日，四川旅沪同乡会和四川旅沪各大学同学会亦分别通电反对，要求外交部迅予制止。

7月28日　行政院在庐山开会，决议改组广东省政府及四川省政府、蒙藏委员会等人事任命案。

△　蒋介石任命黄光锐为杭州航空学校校长。粤空军指挥官由陈庆云充任。粤机队留杭训练。

△　李宗仁、白崇禧决定备战。白赴全州布置军事。桂军集结梧州戎墟一带。余汉谋调巫剑雄师开赴四会、广宁防桂，并调陈章师赴西江肇庆布防。

△　桂币暴跌，每元折合港币三角，南宁米价涨至每担80元。

△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飞庐山见外交次长徐谟，并代张群向蒋介石报告外事。29日，张群派高宗武抵上海访川樾，对中日“经济提携”及“中山”、“萱生”两案处理与王克敏北上等问题交换意见。

△　铁道部为钱塘江铁桥工程与沪杭甬路工程事与中国建设银公司、中英公司商洽改订新合同，借款110万英镑，是日呈报行政院备案。

7月29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黄慕松、王应榆、宋子良、刘维炽、许崇清、李煦寰、罗翼群、萧吉珊、刘纪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黄慕松兼主席，王、宋、刘、许分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林云陔应免本兼各职。同日又特任林云陔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原任黄慕松应免本职。

△　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议：一、拒绝新任命；二、扩大组织，成立军政府；三、请李济深到南宁主持工

作；四、扩编部队为四军。并决定对滇、黔取守势，对湘、粤取攻势，将民团120万名分“前头”、“准备”两组，“前头”归周祖晃、廖磊、覃连芳指挥；“准备”归夏威指挥。

△　余汉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付桂局办法。余已令独二旅陈章部第一团何联芳、第二团梁荣球往肇庆及粤桂边布防。

△　财政部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广州分会成立，宋子良兼主席。宋电告财政部，决定编民国二十五年度广东省地方普通岁入岁出预算案，第一步先废除苛捐杂税1700万元。

△　宋哲元与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室为“联络中日将校的情感，俾开发华北经济得以顺利进行”，在中南海怀仁堂联宴第二十九军营长以上官佐、军部各处长，冀察绥署、政委会处长以上职员以及冀察政委会所属五委员会主席，日军驻平旅团长河边及北平通州、丰台等地日驻军少佐以上军官赴宴者共百数十人，席间除宋及松室先后致词外，并有中日将校表演大刀及舞剑。宋书“东亚本色”四字以赠日方。

△　日河边旅团长偕参谋渡边、副官小野及士兵30名赴南大寺，指挥步兵独立第三联队，自30日起在秦皇岛留守营驻地作大规模演习。

△　殷汝耕令冀东22县，限于8月15日前抽选各地壮丁，组织防共义勇军，每县至少成立五队，每队人员约在3000左右，凡无壮丁应征之家，纳捐100元。

7月30日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旭初、刘芦隐、林翼中等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于8月5日组织军政府，内定李宗仁为主席，李济深为副主席，白崇禧为全军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刘芦隐、林翼中等任政府委员。31日桂军参谋长张任民不满李、白行动，辞职去港。

△　蒋介石电余汉谋，准香翰屏继李扬敬任第四路军副司令。

△　粤、桂两军在两省边界发生激战，余汉谋电蒋介石请示应付桂局办法。

△　国民政府令陆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陆军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另有任用，均应免本职；派陆军中将王靖国为陆军第十九军军长，陆军中将孙楚为陆军第三十三军军长，陆军中将杨效欧为陆军第三十四军军长。

△　国民政府任命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

△　厦海关监督戴恩赛抵广州接收粤海关。

△　桥本继永见任华北日驻屯军参谋长。

△　是日至8月4日，察北伪蒙西北防共自治军王道一部2000余人，以一部侵犯绥东陶林县土木尔台，被民众守备队击溃。其主力围攻红格尔图，被傅作义军赵承绶部和内蒙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骑兵击退。王逃回商都，后被日军处死。

7月31日　　桂军千余人图袭粤边封川、肇庆，被防军陈章部击退。桂军另部向贵县、陆川等地推进，谋打通海路。余汉谋令陈汉光率警备军往雷州半岛阻止。

7月下旬　　蒋介石派陈诚到广州筹设委员长行营，并借口对广西用兵，将嫡系部队第二十五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孙元良之第八十八师先后调到广东，后又调罗卓英第十八军的三个师驻粤汉路南段和广州石龙虎门线上；并派罗卓英为粤汉路警备司令，用以监视余汉谋的第四路军。

△　蒋介石调大军四五十万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循西江而上，余汉谋

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取道湖南向桂林一带压迫。

是月　　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巴金、沈钧儒等140人在《文学丛报》第四期上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提出用拼音的新文字，代替方块汉字。这种新文字，“确有力量帮助唤起大众挽救我们垂危的祖国”。

△　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农民离村统计，苏、浙、皖、赣等22省1000余县的农民，全家离村者为各该地农户数的4.8％，约200万户，1000万人。其中以佃农、自耕农最多，佃农占25％，自耕农占29％。离村去路，往城市者占59％，往他村者占32％，去处不明者占9％。离村原因是农村经济极度衰落，天灾人祸煎迫，诸般剥削加甚，佃农欠租者日多，租额不减，捐税照纳，不得不竞相逃亡。

△　陕北神府地区成立红军独立师。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任政委。

8月

8月1日　　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举行抗战宣誓典礼，决心抗击中央军。桂军各师、团长200余人参加。6日，李、白积极备战，将全省民团编为省防军，不数日，省防军由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

△　蒋介石电李宗仁、白崇禧促就新职，并解释调动彼等职务原因，声称中央新命，无非爱护其革命历史与勋业，解脱其环境之困难，彻底实现国家统一，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任命地方官吏，原属政府职权，全会亦无不得变更之限制，断不得视为违反决议，违法失信。并劝李、白到广州面谈一次，只要统一、和平，国家与地方都有好处，一切都可以尽情商酌。

△　冯玉祥应蒋介石电召赴九江转庐山，冯劝蒋对广西采取和平

解决方针。

△　桂军苏祖馨第四十三师一部与谭邃第三十五师越过隆盛、白马向广东信宜进发。第四十五师由陆川向粤北进发。余汉谋调陈章师由罗定堵击桂军。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抵达包座。王均第三军两个师在文县、武都、天水、西固，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两个师在陇西、定西，鲁大昌新十四师在岷州、洮州、西固，企图在甘南构成两道封锁线，阻止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

△　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及第二军到达下阿坝，第六军到达箭步塘及其附近。5、6两日，指挥部及第二军、第三十二军到达葛曲河，贺龙指挥部遭藏骑兵袭击，警卫部队将敌驱逐。7日，全军在水草地上跋涉，翻过一座大山，下午达严朵坝附近山沟露营。8日，第六军到达上包座。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委冯仲云，下辖九个师，活动于通河、汤原、巴彦、木兰、勃利等地。

△　是日至20日，天津海关共查获走私糖及其他走私货20万包。24日，天津海关、公安局破获北马路福康里台湾人许炳文走私仓库，搜出私糖2000包，并在直裕商行及裕太兴货栈缉获私糖600余包。25日，天津日领永井访公安局长程希贤，口头抗议公安局协助缉私。26日，日领岸伟一、西田长康分访海关、公安局，要求引渡人犯，发还扣货，被海关拒绝。日警署长和久井等率巡警干涉海关扣私货，与关员、华警对峙。和久井旋访公安局交涉。次日，双方议定将许炳文等三人及私糖引渡给日方。

△　第十一届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在柏林举行，中国派代表参加该会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比赛项目，由王正廷总领队。16日，

奥运会闭幕。

△　下午1时，甘肃天水发生剧烈地震，大小续震10次，房屋墙垣多有震坍。1时10分，兰州地震，地面成东西向摇动，10秒钟即止，震前大雨如注。2时，西安地震，地下有隆隆之声，室内桌椅电灯均摇动，约五六秒钟即止，震源由西来。

△　飓风在汕头、厦门间登陆。3日，东山、诏安等县发生海啸，死亡100余人，灾情奇重，为20年所未有。同日，飓风过沪。

8月2日　　国民政府任命顾祝同为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吴忠信辞职。

△　国民政府撤销滇黔“剿匪”总司令部；特派龙云为滇黔绥靖主任，薛岳为副主任。

△　据《申报周刊》载华联社天津讯：日军部为促进华北各省特务工作，除充实特务机关组织外，并决定在天津秘密设立特务工作人员训练班，专招日、鲜青年及汉奸子弟授以侦探及间谍技术，四个月毕业。毕业以后即化装商人、医生或僧道等，前往蒙古、河南、陕西、宁夏各地工作。

△　上海英水兵惨杀陈惠章案后援会招待各界，主席苏春莲称，陈案发生后，英三水兵被英捕房拘去，但未照章办理即行释放。18日，后援会推代表包振黄等偕死者家属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迅向英领署交涉，务达惩凶目的，市府科长俞和德允再交涉。

△　全国国糖产销协会在上海成立，宗旨为防止走私及外糖倾销。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赵一曼在珠河牺牲。

8月3日　　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梧州，

以平南为第一防线；并分别任命廖磊、李品仙、夏威为第一、二、三路军指挥，白崇禧自兼第四路军指挥。

△　第四路军缩编方案已定，全部粤军缩编为10个师一个独立旅，按乙种师编制，每师二旅，每旅三团。以莫希德、叶肇、张瑞贵、巫剑雄、李汉魂、黄质文、邓龙光、曾友仁、谭邃、陈汉光10人为师长。原任军长调回总部服务。

△　是日至8日，驻天津和丰台日军频频进行军事演习，每次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包括步、炮、坦克等兵种，先后赴南大寺、卢沟桥、长辛店、榆关、南海及津市日租界内演习攻守战、野战、巷战等。

△　财政部决定不在北宁路及津、平设立陆路稽查处，撤回在津工作人员，华北缉私全由天津海关负责。7日，津海关分函华北各县政府，请派保卫团查验各县境内运入货物，如无海关完税证，即予扣留。

△　粤省月来霪雨连绵，山洪暴发，江堤纷纷溃决，是日东江上游蕉岭县决口16处，该县兰畲堤、泗溪堤、山枣树下堤、白桥沥堤相继决口，水深10余尺，浸没田禾万余石，房屋数千间。12日，高要县第六区香山围及鹅塘围决口，堤内各乡尽成泽国，农作物完全淹没。

8月4日　　行政院第二七二次会议决定，将警官高等学校改组为中央警官学校，并推蒋介石兼任校长，原校长李士珍调任该校教育长。

△　桂机11架飞长沙，投降中央。

△　桂军三师由广东灵山进占廉州。

△　红军闽北独立师黄立贵部300余人由光泽石陇突围，向浙南松阳、丽水转移，遭蒋军堵击，一部入景宁、青田，一部往闽东北边境。

8月5日　蒋介石于2日接李宗仁、白崇禧上月31日电后，是日再电李、白促就新职，电称：“所谓救亡大计，关于外交方针与抉择国策之限度，二中全会已曾明白具体之宣示”，“兄等身为党员，分属军人，只有遵中央决定计划，依照执行。”

△　第四路军总参议邓世增奉命离粤到桂劝李、白就任新职，是日在南宁与李、白会见。8日，香翰屏、邓世增持粤军政要员联名函再劝李、白。10日，香、邓返广州谒余汉谋、陈诚，报告晤李、白经过，称此次赴桂斡旋时局，收效甚微，但和平尚未绝望。

△　中共西北局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将红四方面军编成第一、第二纵队，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

△　贺龙、徐向前红二、四方面军各纵队开始由包座地区向甘南挺进。9日，第一纵队先头部队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抢占天险腊子口。次日，红八十九师攻克甘南要地哈达铺、大草滩，歼敌千余，随即包围岷县城。第二纵队之第四军沿洮河北上，向洮州旧城进攻。20日，红十师在妇女先锋团配合下，一举攻占该城。同时，红十二师夺得临潭，并向临洮发展。26日，第一纵队之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克渭源。红五军与红九军一部续攻岷县。9月7日，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克通渭。岷（州）洮（州）西（固）战役结束。

△　甘肃盐池附近之红军西征军徐海东部约2000人到预旺。6日，据《大公报》中央社西安电称，陕北红军化整为零，分布于甘肃预旺堡、东沟滩、河连湾子、毛居井、庙儿掌等地。

△　冀东各县发现“反殷自治军”，军部设马兰峪，军长王道。20日，冀东石河区发现“反殷人民自卫军”约千余人，便衣持枪分赴抚宁、滦县、遵化、玉田等地，向民间宣传驱殷，并联络民团，自出枪械壮丁，谋求打倒殷逆，各地民众参加者甚众，殷电所属特警队严密

搜杀。24日，殷汝耕到天津，偕伪驻津办事处长沈达夫往谒田代、桥本乞援。26日，冀东兴隆、都山、马兰峪迤北姚镇、十里河一带，发现武装人民响应石河“驱殷自卫军”号召，连日散发告团警书，号召群起驱此奸恶。27日，驻宁南乡的伪特警张砚田部第四分队警士百余人哗变，留守营张砚田总部也连日发现反殷传单。

△　粤财政厅长宋子良告示禁止桂省纸币在粤流通。

△　日海军联合舰队到我国厦门海面演习，由海军大将高桥三吉率领军舰76艘、官兵2.7万人，于是晨抵达厦门鼓浪屿与胡里山屿。

△　陈觉生、潘毓桂在天津与“满铁”理事大渊、所长太田接洽筹筑沧石路事，关于技术、材料、日资援助已定，是日太田、陈觉生分别赴大连和北平请示。

△　河北省滦河上游溃决两口，淹农田无数。8日，蓟运河在香河县决口两处，淹40余村。

8月6日　　国民党第十八次中常会决议改组广东省和广州市两党部，采用特派员制；推陈立夫视察并指导该省、市党务。广东省党部特派员为黄慕松、余汉谋、曾养甫、罗翼群、香翰屏、陈策、萧吉珊、邓彦华、钟天心、李煦寰，常委黄慕松、曾养甫、李煦寰，书记长谌小岑。广州市特派员为余俊贤、邢森洲、陈绍贤、刘石心、曾三省等11人。常委余俊贤、邢森洲、陈绍贤，书记长陈宗周。14日，粤省、市党部特派员办事处接收粤省、市党部，15日，接收监委会。18日，蒋介石、陈立夫召见广东省、市党部特派员，指示整理党务办法。

△　李宗仁、白崇禧委程树芳为第二十四师师长，贺为珍为第四十三师师长，张义纯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刘士毅为第八军副军长，石化林为郁林警备司令。

△　白崇禧飞梧州视察防务。同日，桂第七军第十五师抵梧布防。

△　四川旅沪各界反对日在成都设领，派周君实赴京，请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交涉制止，并急电四川各团体制止岩井入境履任。10日，旅京、沪川人代表与四川旅沪同乡会代表李棠林、刘仙舟分别就此向中央党部、行政院及外交部请愿。外交次长徐谟答称："早已对日方提出交涉，并已训令川省府及外交部特派员妥为处置。"

△　绥远省乌兰察布盟西公旗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石王）前因与曼头依锡大喇嘛额宝斋发生争权冲突，被停职八个月，现期满复职，是日双方在包头第二区色登胡庐头乡附近又起冲突。11日，日人指挥大喇嘛军击败石王。12日，石王逃包头向绥省乞援。大喇嘛驱走石王后，宣称西公旗仍属庙蒙会德王管辖，不属绥蒙会。15日，绥省派王绶祺赴西公旗调处，谋使石王返任，遭大喇嘛拒绝，傅作义遂派田树梅部武装调停，击退大喇嘛，护送石王返任。

△　全国学联等救亡团体联名致电华北将领，呼吁："绥东事急，为自身计，亦当感唇亡齿寒之惧，望抗战到底，不以寸土让人。"

△　日本民政党发表宣言，主张调整中日关系，称两国关系之调整，对于东亚之前途有绝大之关系。

△　南昌受暴风雨袭击，毁房448栋，死伤272人，损失约100万元。

8月7日　　国民政府派香翰屏为粤第四路军副总司令；派张达、黄任寰、缪培南、黄延桢和李振球分任广东第一、二、三、四、五军区司令官。

△　绥东形势紧张，日人控制的王英等伪边防自治军二万余人进犯陶林、兴和。

△　日本内阁召开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基本国策纲要》，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的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并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尔后，很快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

△　华北日驻屯军司令田代为绥东事在天津海光寺日兵营举行会议，与会者有永见、石井、和知、中村、饭田、营岛及绥张通特务机关长羽山、大本、上野等20余人，首由羽山报告绥东及李守信、德王两部情况，然后商讨对策。会毕，羽山即由津飞绥视察。

△　李宗仁、白崇禧电请蒋介石派黄绍竑入桂谈判。蒋介石复电，决携黄赴粤。

△　桂军三个师入粤境北海。

△　前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奉陈济棠命与蒋介石接洽陈出国事。11日，黄在沪谈，接洽甚为满意，正由外交部代办护照。30日，陈离港赴意大利。

△　日本设立“鲜（朝鲜）满（洲）拓殖公司”，内定二宫中将为社长。

△　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议决：一、实行贸易紧急统制法，限制小麦、面粉、羊毛入口；二、增资扩充满洲煤油公司，在原资本500万元之外，再投资一倍，其中一半由伪满认交，余由“满铁”、三井、三菱分摊。

△　上海征信所职工因董事长祝仰辰声称要清洗救国会分子，不许职工参预政治活动，并无故开除职员三名；又因印刷工人工时过长，工资过低，任务过重，且常苛扣工资，于是日全体罢工，要求：一、增加工资；二、减少工作时间；三、津贴放假日饭资；四、无故

不得任意开除职工。11日，先复工，另推代表九人与董事会磋商。此次罢工经章乃器与宋子文谈判，撤换祝仰辰，取得胜利。

8月8日　国民政府任命林云陔为审计部部长，吴忠信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　李济深偕张文抵南宁，与李、白商反蒋策略，同时起用第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编组一个师，在广东南路活动。

△　日浪人小野菊池由唐山私运烟草2.5万斤到天津，在徐家庄被税警截获，发生冲突。小野自作伤痕到津向日总领报告，日警署即派山下部长往调查，日领永井并向长芦盐运使提出抗议。9日，日方又向运署提出道歉、赔偿损失、付医药费等要求。

8月9日　商都伪军王英部数千人，编成若干纵队向西南移动，并有日军约千人开入商都，运来大批枪械、粮秣。同日，晋军李服膺第六十八师一部到达兴和、丰镇防御。

△　上海工人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对最近时局主张的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即刻改正所谓对日‘和平’提携的错误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召集真实而不是挂名的国防会议，动员全国军队、全国民众立即北上抗日”，“本会号召上海及全国各地工友，誓为抗日战争后盾”。

8月10日　李宗仁、白崇禧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了解情况。

△　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并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指出他们在7月15日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宣言与纲领，“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

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

△　粤省农林局长冯锐以“贪污”罪被广州公安局逮捕，旋奉蒋介石令准枪决。

△　徐青甫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

△　日军两联队由热河开抵张北，并在多伦等地增兵，商都日机场停有轰炸机九架、侦察机五架、坦克七辆。

△　据《申报》讯：日浪人今村清在津日租界组织便衣队，成立所谓“自治救国会”，受川岛芳子指挥，得日军部同意，以扰乱治安、造成恐怖为目的，俾日方有所藉词，然后以外交手段逼使华北“自治”。连日天津探警先后逮捕赵振缳、曹文凯、刘绍周等五名，余犯逃大连、榆关及冀东。

△　山东省当局组“山东省孔教会”，以本省军界营长以上、政界科长以上及其他官阶相等之军政官员为当然会员，总会设济南，各县设分会，会员年交会费二元，总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由省主席韩复榘委聘。是日，省政务会议决修正通过该会组织章程。

8月11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陈布雷等由九江飞抵广州，召集长官会议，研究和平解决桂局办法。蒋电邀李宗仁、白崇禧到粤会谈，李、白以疾为辞，派李品仙为代表见蒋。12日，蒋续召余汉谋、陈诚、钱大钧等会商桂局。

△　参谋总长程潜电询桂军高级参谋刘斐，广西方面有无谋和可能，刘复电希望分途进行敦劝。程即与何应钦联名电蒋介石（时尚在庐山）建议主和。蒋复电同意，并要程赴广州详商。程即电约刘去广州见面。是日，刘抵广州与程晤面后即往见蒋。蒋问刘桂事如何解决，刘答：“只要不自己打自己，而是从事抗战准备工作，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表示首肯。13日，刘返南宁转达蒋对和平解决桂

局意见，并认为蒋处境不佳，确有谋和可能。当即商定以蒋接受抗战、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和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等三点为基础，拟定六项条款。

△　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暨《附录》。《纲要》宣称："处理华北的要点，在于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主的政治，在该地区建设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一切都为了建立日、满、华互助的基础。""分治的地区，最终以华北五省为目标。"策略上必须利用南京政府，使之"对帝国的处理华北政策抱合作态度"。在华北经济开发上，强调扩大日方利益为目的。

△　日本政府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指出对华政策所应采取的措施，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一、对华北政策；二、对南京政府的施策；三、对其他地方政权的措施；四、对内蒙方面的措施。"对国民政府的具体措施：一、签订防共军事协定。二、签订日华军事同盟。三、促进日华悬案的解决：1.使国民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最高级的政治顾问，参与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机要工作；2.聘用日军事顾问及军事教官；3.除设立华北航空公司外，利用台湾、福建之间的航空，上海、福冈之间的试航等方法，引导南京答应建立日华航空联系；4.减低关税。四、促进日华经济合作，并就南京政权和党部的机构及人事问题，加以必要的调整。

△　行政院第二七四次例会决议，派孔祥熙、蒋作宾、吴鼎昌、张嘉璈、俞飞鹏、秦汾、徐廷瑚、钱天鹤、蔡无忌等23人为农本局理事，陈振先为总经理，钱永铭、邹秉文为协理。

△　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及第二军到达下包座。16日，第六军经普济寺（甘肃）到达蔡里公坝，20日、21日，继续沿白龙江而下经哇藏寺、石门万险桥到达莫牙寺。23日，第六军经过腊子口、大拉山到曹子里。24日，第六军向哈达铺前进；指挥部及第二军到达蔡里公坝；

第三十二军在十八盘。25日，第六军一部到达哈达铺。26日，第六军在哈达铺与红四方面军某军直属队开联欢大会。

△　日外相有田在阁议席上宣称日外交政策已定，重心在对付苏联，拟在华北设立“理想区域”，作为缓冲地带。对英国应维持友好关系，使其明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对南进政策须审慎进行，以免增加英日间冲突。

△　德王赴百灵庙，称因“察蒙经费困难”，下令结束蒙政会事宜。

△　日军2000人由承德开往察北。日机在多伦大演习，并有20架飞张北视察。百灵庙伪蒙军向商都集中。

△　日商钟纺社以120万元收买天津华新纱厂，改名为公大第七厂。

8月12日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是为执行“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并由此“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　国民政府特派顾祝同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原兼司令吴忠信免兼职。

△　日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永见列席报告华北现状，并提出重要建议，力主直接行动。

△　察北伪军连日调动甚忙，绥东又趋紧张，傅作义下令加紧防御。

8月13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召徐堪、陈光甫、顾翊群、郭秉文在庐山商币制、金融问题，并与徐堪、宋子良、陈行、贝淞荪等商讨粤

省财政金融问题，对改革粤省金融、币制等有详尽研究。15日，宋子良、徐堪、陈行、陈光甫、顾翊群、贝淞荪等飞抵广州，整理粤省财政、金融。同日，粤印花税采用中央颁布之印花。

△　蒋介石电召财政部长孔祥熙飞粤，商整理广东财政问题。

△　毛泽东致书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略称："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河山，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兹派张文彬同志（红军派驻杨部之联络代表）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　国民政府驻朝鲜清津随习领事孙秉乾，前被日方指为刺探军情加以逮捕，现已获释，是日返国抵南京，向张群报告经过。

△　殷汝耕下令冀东22县，每县聘日籍教育指导官一名。又令各中小学实行亲日教育，教员均应兼习日语及日本史地，每年考试一次，凡有违背亲日的校长与教员考试不及格者，日籍教育指导官有权撤换。

△　日海军武官久保田与"满铁"调查课长野田等在津会商塘沽辟军港事，决呈军部审核。

△　德王在百灵庙遇刺未中，次日返滂江。

8月14日　蒋介石电召黄绍竑，指示解决桂局办法。是日黄抵香港，与李宗仁、白崇禧驻港代表张任民会谈。张将黄对桂局意见电告李、白。15日，李、白另一代表刘斐抵广州与陈诚、余汉谋会谈。16日，黄绍竑抵广州，分别与蒋介石、余汉谋、陈诚、钱大钧、朱培德、程潜等商议解决办法，并与李、白之代表李品仙详谈。17日，李

品仙返桂。李、白拒绝刘斐携回之蒋所提解决广西问题条件，主要内容为：一、白崇禧就浙江省主席职，或出洋考察；二、李宗仁暂留桂；三、桂政局由黄旭初主持；四、桂军由中央另颁番号，改编为六师等。李、白发电另提新要求。

△　蒋介石召见广东省军区司令及师、旅长65人，对广东省军政设施及解决桂局办法作详细训示。

△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令即与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策定围歼川甘陕边区红军计划。张无反应。

△　毛泽东致书全国经委会主席宋子文，呼吁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略称："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　毛泽东致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望宋"确立抗日决心"，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恢复西北军曾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提出愿与鲁韩、绥傅、晋阎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并派张经武为长驻联络代表。

△　毛泽东致函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呼吁全国各界联合抗日。略称，"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　桂军在北海附近与粤军冲突。桂空军第三队长郑梓湘、副队长李一飞、分队长梁伟如、队员罗士敏驾机三架飞广州降中央。16日，桂空军司令林伟成率队长宁明阶驾机离南宁飞广州降中央。18日，桂军夏威部4000余人抵广东省罗定、信宜边境，前哨与粤军发生

小接触。

△　蔡廷锴、刘芦隐、区寿年等20余人由安南抵龙州。16日，蔡廷锴偕区寿年抵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定恢复第十九路军。18日，在南宁设立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以蔡廷锴为总指挥，重新编成三个师，翁照垣为第六十师师长，丘兆琛为第六十一师师长，区寿年为第七十八师师长。

△　梧州桂军炮击英舰。

△　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在张北集会策划侵绥，日人多名参加。会上决定，王道一出师不力，立即枪毙，所部归王英指挥。

8月15日　国民政府特派任可澄为监察院云南、贵州监察区监察使。

△　鲁迅在《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徐懋庸8月1日给鲁迅的信进行批判，表示拥护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　伪蒙军由商都一带进犯绥东集宁，与傅作义军激战。

△　据《申报》讯，日钟纺社投资30万，在张家口设洗毛厂，收买内蒙羊毛供给纺织厂，拟二年内抵制澳洲羊毛输入华北，夺占其市场。22日，日东拓公司拟在张家口投巨资收买电气公司扩大经营，并收买长城煤矿，已派员调查。

△　据《申报》讯：伪冀东政府全年各种税收为：一、田赋及附捐800万元；二、关税420万元；三、烟600万元；四、盐税协款300万元；五、北宁路协款120万元；六、鸦片烟税500万元，共收入2740万元。

8月16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绥东事件宣言》，严正责问国民政府："是否犹认绥远为中国的国土？"要求践履五届二中全会"不再以尺寸领土和丝毫权利让人"之诺言，迅下御侮决心，停止内战，集中力量对日作战。

△　全国律师公会第二次执委会在青岛召开，沈钧儒报告冤狱赔偿运动进行经过，会后复开冤狱赔偿运动会。

△　我国各地米麦丰收，日商三井、岩井、三菱等会社在芜湖、无锡、常州等沿长江农产区域，大量收买小麦，作为战时储粮。截至是日止，三井等会社在华收买小麦，总数约达30余万担，小麦价格上涨至每担五元。苏、浙、皖各地面粉业公会纷呈实业部请禁小麦出口。旋经财政部批示，"暂无禁止小麦出口必要"。

8月17日　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开紧急会议，决定：一、召集非常会议，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刘芦隐、陈铭枢、黄旭初等为委员，李济深主席兼组织部长，陈铭枢兼国际特派员及侨务部长，刘芦隐兼宣传部长；二、设立"中华民国人民抗日救国军政府"，李宗仁为主席，白崇禧、蔡廷锴为副主席，廖磊、李品仙、夏威、覃连芳、杨震千等为委员；三、组织军部，李宗仁任总司令；蔡廷锴、白崇禧分任第一、二两路军前敌总指挥。

△　中国科学社发起与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在北平举行联合学会。蒋梦麟致开幕词，指出"我们是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没有牛顿，没有伽利略，没有达尔文，也没有爱因斯坦"。十几年来，经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科学还只是在萌芽中。"我们的希望是，将来我们的牛顿、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就要从这萌芽中生长出来"。

△　国民政府任胡庶华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

△　德王召察北六县保安队3000余人集嘉卜寺，编为一师，由日方训练。

△　东北抗联王德泰第二军收复抚松县城，歼敌700余人。

8月18日　行政院第二七五次会议决定：任命曹经沅、王澂莹、张志韩、胡嘉诏、周恭寿、韩德勤、何辑五为贵州省政府委员，由曹、王、张、胡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自10月1日起施行，先征公务员薪给及公债存息，余项自1937年1月1日起征。

△　蒋介石召见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及各厅长，指示整理广东省政方针。21日，蒋在粤召见党政军要员陈诚、余汉谋、黄慕松、曾养甫等30余人，指示党政军要政。

△　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由沪抵秦皇岛视察。19日，津秦关税司许礼亚赴秦皇岛访梅商缉私。25日，梅乐和在北戴河与许礼亚、郝格得商津关设津郊分卡事，决由三处试办：一、堵截平、津陆路；二、堵截由运河南下水路；三、堵截由御河西下水路。每卡关员四五名，与铁路线稽查分处任务同。

8月19日　日驻华大使川樾偕书记官荻原等在北平访宋哲元，对“共同防共”与“经济提携”交换意见。川樾谓：“日本希望远东和平与中日国交之调整，华北与日本有密切地理关系，两国实现经济提携对中日两国大局最为必要。”宋表示同意。午，宋偕秦德纯、陈中孚访川樾答礼，对川樾华北中日“经济提携”原则重申赞同，表示冀察方面有充分实行之意。同日，川樾对新闻界发表与宋谈话要点：一、中日两国应协力“防共”；二、关于华北经济开发问题，仅交换意见，无具体谈判；三、中日国交调整，两国当局应一致努力进行。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委会撤销李济深、陈铭枢因参加“闽变”之拿办令。

△　蒋介石在广州召朱培德、程潜、黄绍竑、陈诚、余汉谋等商应付桂局新办法。

△　广西空军司令兼航校校长林伟成等在广州函劝李宗仁、白崇禧停战谈判。

8月20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派唐星，陈诚派邓世增，黄绍竑派舒宗鎏三人到南宁重申南京谋和诚意。

△　外交部长张群通知刘湘，谓日本外务省决定恢复成都日本领事馆，以野村为领事。刘电重庆市政府转告重庆日本领事，以成都恢复日领馆事，民众纷纷反对，希望日人暂缓前往。是日，野村仍派四人由重庆去成都筹备恢复领馆事务。21日，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召集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等商议办法，决定由民众游行示威，省府根据民意电请外交部交涉拒绝，并电重庆劝阻野村缓行。

△　粤汉铁路广州至衡州段通车。

△　中华棉业统计会发表本年全国棉产第一次估计报告，主要棉区12省5000余万亩，产皮棉1600余万担，为近20年间之最高数。

△　“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长张自忠，副董事长石井，资本800万元，分整股（50元）、半股（25元）向中日双方募集。据天津支公司社长清野谈，中日现办汽车事业，系该公司试办华北经济项目之一，将来如举办成功，再办他项，如农业实验场、农业合作社等。21日，天津市政府称，中日合办电业公司用人及计划权，全归华方；日方仅作技术援助。

8月21日　唐星奉命赴桂传达蒋介石向桂方所提新条件：一、黄绍竑仍任广西“绥靖”主任；二、白崇禧必须出洋，浙江省主席名义仍保留；三、黄旭初留任广西省主席；四、桂军改称第五路军；五、中央军队不开入桂省，但党务由中央派员整理。

△　李宗仁、白崇禧为试探蒋介石谋和诚意，特书五项条件交唐星、邓世增、舒宗鎏带回广州：一、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二、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三、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实施的时期；四、照调解人所拟第二方案发表新命（主要内容是李宗仁留任广西绥靖主任，黄绍竑仍回任浙江省主席，实际上是撤销7月25日的南京国府命令）；五、第一条实现，第二条开始，即宣布就职。

△　孔祥熙电令宋子良执行整理粤省币制办法：一、广东省、市两银行原有毫券发行额为2.4858亿元，照常流通；二、一切税收其向以中央法币为本位者，仍照旧办理，如无法币，应按当日市价折合抵交，但不得超过加五计算（即法币一元最高合毫券1.5元）。

△　宋哲元委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

△　是晚，日侨森川太郎在丰台中国军营前窥视，被第二十九军士兵刺伤。次日，日宪兵队长赤藤少佐会同冀察绥靖公署杜副官、孙参谋等抵丰台调查真相。同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孚赴天津与桥本会商解决此案。9月17日，陈中孚偕松室孝良由天津抵北平，陈称："丰台驻军与日人纠纷事件，由华方赔偿医药费600元，已告解决。"

△　苏联代表罗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召开之太平洋学会席上演说，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

△　日陆、海、外三省代表影佐、中村、太田在天津召开时局会议，宣示三省重大意旨，讨论华北政权问题，并经济提携旨趣。会上决定华北时局应付办法：政权明朗化归陆、海两部官员负责促进，外交官吏从旁协助。经济提携及特殊贸易，减低关税，津警权、领权扩大等问题归使馆主持，陆海军从旁协助。绥东事由关东军部负责。22日起，由陆、海、外三方分别召开会议，贯彻时局会议有关议案。

△　天津市商会及银钱业公会招待川樾，中日财界各到30余人，

川樾致词，声称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必须政治合作，中日两国提携应由商人自己先行提携，然后谋求政治合作。

△　据《申报》讯：据内政部统计处调查，全国农民人口总数为3.20384018亿人，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佃比例除新疆、宁夏、蒙古、西藏等五省尚无结果外，其余25省计自耕农占23％，佃农占32％。

8月22日　　绥境蒙政会开大会，讨论对付日伪进犯绥东事，傅作义派代表参加。

△　内政部统计处发表全国耕地面积调查，总计全国耕地面积为11.6848亿亩。

△　行政院会议通过《所得税施行细则》，以院令公布，定10月1日施行。

△　台湾全岛发生强烈地震，震源在高雄东南71公里附近。

8月23日　　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由长春秘密飞抵百灵庙，晤德王、李守信、包悦卿等，举行蒙军最高军事会议，传达关东军对绥东的意见，怂恿西侵。25日，板垣由津飞绥晤傅作义交涉，日方提出“绥东五县，前身为察北四旗，应与察北六县一致，由德化管辖”。遭傅拒绝。

△　刘斐奉李宗仁、白崇禧命赴广州与蒋介石谈判。蒋基本上同意李、白所提六项条款，表示收回调李、白离桂的成命，由中央补助若干财政和复员经费，并告刘将派程潜、居正、朱培德到桂和谈。25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欢迎入桂和谈。

△　国民政府拨款8200万元助粤整理金融。

8月24日　　成都民众万人发生反日暴动。日本擅在成都设领并遣

人伪作商人及新闻记者至成都先事部署，寓大川饭店。市民闻知，愤慨万状，群起诘问，殴毙日人深川经二、渡边洸三郎，殴伤田中武夫、濑户尚，并捣毁大川饭店、交通公司及益晋、恒宝等商号，军警驰往弹压，军警民众互有伤亡。

△　成都事件发生后，复兴社和CC系干部当夜在康泽部属叶介仁宅开联席会议，决定：联电报告蒋介石，指控刘湘暗中派人打死日人，以图增加中央对日外交的困难，建议免刘省主席职，由康泽继任。

△　李宗仁、白崇禧邀李济深、刘芦隐、彭泽湘、李任仁、黄旭初、张文、王公度、杨东莼（代表救国会）、胡鄂公、邱昌渭、朱佛定、夏威、刘斐等举行会议，商讨成立抗日政府问题。初步拟定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张学良、刘湘征询意见。

△　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开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白崇禧任第一路军指挥，蔡廷锴任第二路军指挥，分两路进入粤南。同日，桂军入钦廉地区之张屋，次日占领廉江城。晚，周祖晃部及民团4000余人开进合浦县乌家、白沙墟等处。26日，第十九路军翁照垣师攻北海，进入灵山陆屋墟。桂军韦云淞等部由廉江城进抵安铺、永安，并派一团推进化县。廖磊、夏威及第十九路军共10万人，分三路进入粤境，第一路由岑溪攻罗定，第二路由梧州攻封川、德庆，第三路由怀集攻广宁、四会。27日，周祖晃、翁照垣等部抵遂溪。28日，桂、粤两军战于罗定、大兴、信宜等地。桂军占合浦西境。晚，封川桂军夜袭德庆。

△　南京当局为缓和桂省局势，令驻桂边封川、广宁部队后撤30里。蒋介石并电请李宗仁、白崇禧到港与程潜谈判和平办法。

△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在美加州召开之太平洋学会第六届

大会演说，抨击日本对华政策，指斥日“阻止中国民族之复兴”，称“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成为定策”。表示“中国民族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

△　财政部、铁道部通告整理陇海路借款还本付息办法，减付利息1.5亿余元。

△　财政部应粤米商之请，下令改变粤省征收洋米入口税办法：一、自7月20日至8月10日期间内已到之洋米免税放行；二、此后进口洋米，照税则规定税率减半征取，并征一成附加税，减税期至8月底为限；三、所有在粤免、减税米谷转销粤省以外时，概照税则补税。

△　厦门日侨组织台湾公会，将厦门市划分为若干区保，仿国民党保甲区方法，设区保事务所，办理日籍民户及人事登记，并自是日起至9月8日止，举行各区家长会议。当地政府以有碍中国行政权，曾向日领交涉取消，迄无结果。

8月25日　中共中央致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严词批评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并提出国共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建议。

△　行政院第二七六次例会决议：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王正廷为驻美大使，梁龙升任驻捷公使。26日，国民政府发表任命令。

△　晋军李服膺等师开抵绥东增防。

△　日本广田内阁发表向我东北移民“20年百万户计划”，自1937

年开始，20年间将向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并将此计划作为十大国策之一。

△　天津日军步、炮兵两队在市郊演习夜战。丰台日军300余名往卢沟桥演习野战。又自是日起至31日止，平、津、塘、通日军3000余人，在大沽口东西炮台大规模演习海港攻守战，由河边旅团长指挥。

△　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召集成都市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开会，商议24日反日暴动事件之善后措施，决定：一、用棺木将两日人尸体盛殓，备日方查验；二、由警备司令部提出已经判决之死囚苏德胜、刘成元二人，作为当场捕获的凶手枪毙；三、由刘湘密电国民政府，严正指出康泽部属叶介仁等指使学生打死日人情形。

8月26日　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电令刘湘查办成都事件负责人，谓“成都市内忽然发生人民殴击外人事件，虽属意外事变，防范究有未周，当地军警负责人保护不力，自应依法惩办”。外交部一面派员入川彻查真相，一面电令成都军警当局严行“缉凶”，弹压民众，并加紧保护外侨。

△　外交部长张群由庐山回南京接见日本总领事须磨后，立即电令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由重庆飞成都，准备接待日本调查团。28日，外交部特派调查员邵毓麟、专员杨开甲由南京飞成都查案。

△　华北当局对中日“经济提携”规定五原则：一、华北经济开发在中日互助原则下进行；二、进行此项交涉必须尊重中国主权，不损中国权利；三、开发目的与方式须共同研究，检考利弊；四、材料供给、资金贷予、技术援助须根据前项原则好意洽商，尽量接受；五、日方希望铁道建设、矿山采掘、棉花栽培，容认其协助与投资。

△　国民政府特派盛世才为国防会议会员。同日又派李平衡、包华国为出席国际劳工局第二十一届暨第二十二届海事会议中华民国国

民政府之代表，并指定李平衡为第一代表。

△　外交部派专员段茂澜抵绥晤傅作义，调查绥东情形。

8月27日　　华南日领会议在上海召开，到若杉（上海）、须磨（南京）、中村（广东）、三浦（汉口）及外务省代表太田、尚未赴任之驻津总领堀内和使馆华文参赞清水、情报部长吉冈等。首先交换成都事件意见，旋由太田传达外务省对华外交策略及华北日领会议经过。28日续开，由各总领事报告驻在区域内状况。29日，川樾返沪参加会议，听取若杉报告过去两日来会议经过，继续综合讨论制定决议案。

△　蒋介石密电孔祥熙称，前广东省财政厅长区芳浦以库券向省银行押借款项偿还旧欠，以余款用私人名义存入省银行，陆续提用1600余万元，案情可疑，应即严令彻查。

△　张子华携带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出边区商谈的信件和与国民党电台联系的密码第二次抵达保安。31日，周恩来复函曾养甫，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

8月28日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奉蒋介石电令将在张学良掩护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宋黎、马绍周、关雨苍逮捕。宋黎当场被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截住夺回，交与张学良。29日清晨，张学良派卫队包围陕西省党部，将马、关两人救出，并查抄出特务电台、密码、档案等。次日，张向蒋报告事情发生经过，并自请处分。蒋复电称：“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

△　日外相有田在阁议例会宣称，成都事件除惩凶、赔偿等惯常要求外，有采取基本步骤之必要。同日，有田在日陆、海、外三相会

议上声称，成都事件不应视为地方问题，当由中日双方政府处置之；两国当局应调查其起因而予以根本解决。

△　以驻华日使馆三秘松村为首的调查团由上海飞抵成都。29日，日本调查团传讯有关人证，寻找民众示威游行和政府方面的关系及证据，但毫无所获。松村等拜会刘湘，称：奉有田外相及川樾大使之命，调查成都事件。9月1日，松村等携两日人骨灰飞上海。

△　日关东军与日华北驻屯军高级将领在天津开联席会议，关东军代表板垣、武藤（第二课长）、福荣真次（部附）、泉可长义（副官），华北驻屯军代表田代、桥本、饭田、池田、浅井、专田等出席。商定一致对华外交意见，强化全盘政策，划定两军部权限，长城以外归关东军，以内归华北驻屯军。

△　据《申报》讯：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谈，全国政治犯在普通监狱者约2100余人，在各省反省院者1060余人。

8月29日　　国民政府为成都事件重申睦邻令，宣称："对于友邦，须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早经明令饬遵在案。最近四川成都竟因人民暴动，发生殴击外人情事，殊违政府睦邻之旨。"

△　桂军总部下总攻令。夏威部两师续向信宜推进。

△　冀察政委会交通委员会讨论修筑沧石路问题，决定将路线延至天津，由北宁路供给工人、资本，"满铁"及兴中公司供给材料及技术人员。31日，十河、潘毓桂等洽商沧石路技术援助与材料供给问题。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宣称，日在华北经济开发大体步骤为：一、开发范围系采永久渐进方式，并无限度；二、日本注意华北主权，中国尊重日方权益；三、初步开发地域及部门，即向华北当局谈

判；四、日本供应华方者为材料、资金、技术援助等；五、开发华北工作，初期以铁路建设、矿山采掘、棉花栽培等为重点。

△　天津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部强占南开六里台大清化学公司房地600亩，筑化学战车队兵营，是日，天津市政府与日驻屯军司令部交涉。

8月30日　蒋介石召朱培德、居正、程潜、余汉谋、陈诚、钱大钧、何键、熊式辉等会商桂局，对桂仍主宽大；推定朱、居、陈、程携和平方案及蒋介石、余汉谋、黄绍竑三人亲笔函飞桂；桂事未和平解决前，南京中央取监视态度。

△　陈济棠持中央签发之出国护照，离港赴瑞士。

△　蔡元培、于右任、吴敬恒、叶恭绰、卫聚贤等发起组织之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沪成立，推蔡元培为会长，吴敬恒、钮永建为副会长。

8月31日　蒋介石派王宠惠飞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谈和。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四川省建设及换偿旧债公债条例》，定额3000万元，以2000万元办理交通生产建设事业，以1000万元换偿旧债，本公债年息六厘，还本期限定为15年，应还本息基金，指定在四川省田赋正税收入项下划拨。

△　白坚武、刘桂堂、陈嘉谟在津分别为王英、包悦卿伪军秘密招募旧直鲁军，送察北训练。

△　国际学联召开之世界青年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全国学联派陆璀前往参加。9月1日，陆璀代表中国学联向大会作报告称：“我们的纲领只有一个‘抗日救国’，我们的行动，也只有一个‘抗日救国’。”

是月　张学良、杨虎城分别派出以下各路代表进行抗日联络工

作：一、派解如川到广西联络李、白，提出联合抗日主张，并调查“两广事变”真相；二、派栗又文到新疆联络盛世才共同抗日，并商谈如何沟通国际路线问题；三、派蒲子政到太原、北平、济南，向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提出逼蒋抗日主张，借以探询阎、宋、韩对抗日问题的态度；四、派傅剑目到四川探询刘湘对抗日问题的态度。

△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负责人为孙晓村、曹孟君、千家驹等。

△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东、绥远，呼吁援绥抗日。

△　中央军、粤军联合向闽西南红军游击队进行第四期“清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坚持抗日反蒋方针，在反“清剿”战争中加紧争取粤军工作。

△　国民党中宣部印发《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

△　黄立贵率红军独立师自崇安出发，经建阳、邵武，克界首镇，歼福建省保安团一部，旋下峡阳镇，渡闽江，挺进将乐、顺昌、泰宁。

△　红军西征军在宁夏预旺、海原地区，建立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回族人马和福任主席，并建立以回民为主体的县游击大队。月末，左权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由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第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　广东海南岛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第三支队，由冯白驹领导。

△　冀东伪保安总队缩编为四总队、一教导队，由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分任总队长，每总队辖二区队，每区队辖三大队。每大队官兵480名，配机枪八挺及山炮野炮等，并增设特务中队。每

总队人数超过3500名，重武器由日方接济。各保安队均归保安处统辖，刘宗纪任处长，殷汝耕兼教导队长。

△ “中日合办电力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公司总资本为400万元，中日各半。中方应出资金由兴中公司出面向“满铁”借垫，故名为合办，实为日方独营。

9月

9月1日 李宗仁、白崇禧电余汉谋表示和平诚意，请居正等赴南宁和谈，并令粤桂军撤退。2日，居正、程潜、朱培德抵南宁与李、白谈判，携有蒋介石亲笔信，劝李、白“协力完成国家统一”。3日，居正等电粤报告称：“桂态度已有转变，提数项折衷办法请转达蒋，并派李品仙随同来粤磋商。”

△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函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及陈立夫，重申中共“停战抗日”主张。略谓：“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

△ 中共中央电告在西安的潘汉年，任命潘为中共中央谈判代

表，与陈立夫直接面谈。11月7日，中共中央再电在沪的潘汉年，令其以中共中央正式代表资格赴南京与陈立夫会谈。

△　绥远蒙政会在绥东举行第二次大会，由沙王主持，讨论绥蒙边境“防共”及改革蒙政等问题。2日，议决绥东丰镇、凉城、兴和、陶林、集宁五县仍由蒙、绥共同防守，以杜伪军入侵。3日，通过议案四项：一、通缉西公旗叛首曼头；二、抚慰被灾难民；三、训练蒙兵“防共”；四、派员督导盟旗教育。次日，闭会。

△　贺龙红二方面军王震红六军到达甘南礼县附近，前卫部队攻城未下，将城内王均部一营包围。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3日，王均派一旅应援礼城。黄昏，红六军撤围退至东川一带。

△　新任冀察政委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离上海北上。

△　日陆、海、外三省会议讨论对成都事件处理意见。4日，日内阁会议通过交涉成都事件条件，除要求道歉、惩凶、赔偿损失以及在成都设领外，并要求中国彻底取缔反日运动。5日，日外相有田八郎就交涉成都事件、北海事件给驻华大使川樾训令称：“（一）使国民政府认识它负有自己践踏了邦交务敦睦谊令等精神的重大责任，要求它通过即时解决重要悬案（如航空联系，降低进口税等）及华北问题等，披沥诚意，采取措施。（二）要国民政府从根本解决排日运动，例如：彻底贯彻禁止排日命令、解散排日团体、修改一切排日教科书、禁止排日言论等。（三）对事件要求道歉，处罚肇事者，严惩主犯、从犯及煽动者，并赔偿损失。”同日，川樾召开使馆首脑会议，根据外务省训令，讨论交涉步骤。同时，日本在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宜昌、重庆、大沽、旅顺等地配置军舰24艘，作为对华外交后盾。

△　兴中公司社长十河信二召“满铁”天津事务所长太田、兴中公

司驻津理事平山敬三等会议华北经济开发具体步骤。4日，讨论设立天津发电厂事。18日，兴中公司对察哈尔省资源调查完毕。该省口北10县共有煤矿95处，铁矿三处，水晶矿二处，金、银、铜、铅、玉石、石棉、石膏等矿各一处，合计百十余处，总面积2000万公亩。

△ 北宁路局局长陈觉生访日本兴中公司社长十河，商谈修筑津石铁路（天津至石家庄）。据4日华联社讯：具体办法已定，建筑由北宁路局负责，由日方提供资本，用中日合办名义，定下月动工，明年10月内完成。

△ 粤汉路（广州至武昌）全线通车。

9月2日 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在北海组织抗日大示威游行。晚，日本间谍中野顺三在自己开设之丸一药房被便衣队数人入内刺死。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广州沙面领事要求派兵登陆调查，被余汉谋拒绝。

△ 国民政府派汪子刚为出席国际劳工局第二十一届暨第二十二届海事会议雇主方面代表。

△ 日本改派陆军大将小林跻造任台湾总督，原任中山健藏准其辞职。

△ 日方在化德开会，决令王英部伪军沿蒙古草地潜往绥西活动，谋先侵扰阿拉善旗及河套。

△ 天津海关税务司许礼亚赴北戴河与总税务司梅乐和商缉私及对冀察总稽察处之设立与海关职权冲突事。7日，冀察当局宣布设立总稽察处之原意，以求国人谅解，称华北走私严重，政府努力防止迄未收效，走私问题在未解决前，入境私货加以清查，酌收验费，借以调剂市面物价，此不过一时权宜之计，一俟政府有解决办法，当即停止。

9月3日　　晚，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广西省政府讨论和战问题。王公度仍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另创新局。会议直到深夜无结果。4日上午继续讨论。李宗仁称："'六一运动'以来，虽与各方面有密切联系，但只有救国会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张学良尽管抗日，但倒蒋未必参加；刘湘则始终不肯一同露面。在上述情况下，广西独力支撑，财政断难持久。如果蒋答应抗日，而又维持广西现状，应以和为上策。"于是议定和议方案如下：一、重申解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四、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五、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六、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七、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八、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电蒋以谈话方式宣示国人。下午，居正、程潜、朱培德携此方案返粤复命，李、白派刘斐随行。

△　李宗仁、白崇禧与李济深、蔡廷锴、黄旭初、刘芦隐等军政首脑50余人开联席会议，讨论蒋介石所提之和平办法，大部接受。同日，蒋在广州召高级将领会商桂事，并派唐星飞南宁传达意旨。

△　德王召李守信、王英、张海鹏、苏万龙及各伪师长、独立旅长等，在百灵庙开军事会议，策划侵绥。

△　广州湾惨案代表陈宝、陈致力抵广州，向粤省府请愿，要求向法国提严重抗议，并进行交涉。

△　上海各界缉私协会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冀察政委会征收新税。6日，中华国货维持会电蒋介石、孔祥熙、吴鼎昌，请制止冀察政委会征收新税。

△　上海市社会局召集益友、天成、永丰、宝华、裕村五丝织厂劳资双方进行调解，益友、天成、永丰三厂签订和解办法：一、益友

厂素缎工资每公尺一律照四分三厘计算。人造丝单绸照原工资增加8%。准备部工资增加5%。二、天成厂织工部四寸单绸，每码工资加五厘。准备部加5%。三、永丰素缎每尺工资加五厘，真丝缎每公尺工资加六厘，准备部工资自九折恢复至九五折。宝华、裕村两厂调解失败，工人继续罢工。

△　芦盐输日合同由中方芦丰公司与日方三菱、岩井两公司在天津签字，有效期三年，本年输日七万吨，规定每吨纳税一元，盐价及杂项共计三元。民用商盐比输日盐价贵40倍以上。

△　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中国代表团熊式一、陶行知、钱俊瑞等出席。会上，伦敦中国留学生代表王礼锡演说，略谓“九一八”以来，中国国难严重，空前未有，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中国人民素具和平精神，为今之计，厥宜组织团结，以参加广泛的和平运动。

9月4日　　居正、程潜、朱培德、唐星等偕刘斐飞抵广州见蒋介石。刘呈李、白复蒋函，内称桂方承认中央和解原则。5日，蒋召居正、程潜、朱培德及各将领会议，决定大致采纳李、白所提办法，并由蒋作长函劝谕，交刘斐带桂复命。10日，刘斐、邓世增携蒋函抵南宁。李、白召李济深、蔡廷锴、黄旭初及各军、师长开会，议决原则接受中央和平方案。

△　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突由廉江进占化县城，沿梅菉镇江边前进。

9月5日　国民政府派李扬敬为闽浙赣边区清乡司令。

△　国民政府任命李登辉、冯自由、王毓祥、林庚白、艾沙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9月6日　　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仁免职，特派

李为广西“绥靖”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白崇禧免本兼各职，特任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指派为常务委员；广西“绥靖”主任黄绍竑免职，任命黄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9月16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追认。

△　蒋介石派王宠惠抵香港，劝萧佛成赴广州协助中央处理广东省事务。10日，朱培德抵香港访萧，面交蒋介石亲笔函，促萧早日入京。18日，刘纪文抵港敦劝，萧表示病稍愈即北上供职。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沪组织300多个宣传队共2000余人，上街进行抗日宣传，并为援绥募捐。随后，南京救国会由孙晓村、曹孟君等领导，与王昆仑、许宝驹等配合，在冯玉祥大力支持下，推动国民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

△　德王在嘉卜寺开会，对犯绥商定新策，由包悦卿飞津和日驻屯军接洽。同日，日第一师团四联队抵察北。日机七架自多伦运兵至张北。

△　驻昌黎北郊之伪冀东保安队李海天部100余名反正，响应石河驱殷自卫军，绑架当地伪官11人，日军前往堵截，被该部毙、伤各一人。

△　河北省永定河水涨至1.9丈，破历年最高纪录。双口镇杨家地新堤决口30余尺，淹没十余村，农田千余亩。同日，滦河决口，宽20余丈，滦县城处水中。北宁路滦河铁桥附近决口四丈余，农田被淹。9日，北运河杨村段漫溢，两岸田园皆淹。12日大清河水暴涨，武清县史各庄、文安县吴家潭、霸县吴家罐堤均溃决，淹百余村。

9月7日　　华北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抵北平访宋哲元。宋表示希望实现中日亲善，并愿对此努力。18日，华北日驻屯军司令田代又访宋哲元，交换华北时局、冀察政权及“经济提携”等意见。

△　华北日驻屯军推举建川美次中将、桥本欣五郎大佐分任冀察政委会最高政治及军事顾问。

△　国联同志会总会在日内瓦举行世界青年大会，中国国联同志会派留欧学生钱钟书等约30人组成代表团参加。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占领甘肃通渭、洮州旧城。

9月8日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人民服兵役，称“服行兵役为人人应尽之义务”。

△　蒋介石听取刘斐报告北海事件经过，认为解决该事件，应撤退第十九路军。

△　中日就成都事件开始预备会谈，外交部长张群、次长徐谟、亚洲司长高宗武和日驻华大使川樾、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在南京连日进行谈判。

△　日驻广州代理总领事吉竹就北海事件向广东省主席黄慕松提严重抗议，并派日舰“嵯峨号”前往调查。

△　何成濬、杨永泰在汉口召开豫鄂皖边区“清剿”会议，对“追剿”驻军及防区分配等商讨改善办法。

△　因“新生事件”被判刑之《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是日刑满出狱，恢复自由。

△　天津海关奉财政部指示函复日领，接受日方对“大荣丸”事件关于赔偿损失、给受伤者医药费等全部要求。

△　上海市党政当局议决制止工潮办法：一、由市党部、社会局会衔布告，重申禁令，凡未经党政机关核准，工方不准自由罢工或怠工，否则依法究办；二、市党部对各厂工人进行指导，不被“利用”；

三、对于工潮消息，各报馆一律慎重登载等。

△　冀察政委会决定在天津设总稽察处，在北平、保定、张家口、石家庄、沧州、泊头镇、岐口等地设分所，对冀东输入的私货课以海关正税八分之一消费税，准其在冀察及平、津自由运输行销。是日，总稽察处在津成立，处长由北宁路稽察处长王鸿恩兼任。

9月9日　　蒋介石在广州出席总理首次起义纪念会，演讲《复兴中华》，并宣读《兴中会宣言及章程》，号召发扬总理与诸先烈之革命精神，共同奋斗，建设国家，复兴民族。告诫全党，如果“还像前清政府一样腐败”，“人家就要起来革我们的命，我们就要为亡清之续”。

△　李宗仁、白崇禧电居正、程潜等，表示接受新命。同日，蒋介石决定派陈诚赴桂整理军事，桂军改为第五路军，下设五个师，由王赞斌、周祖晃、覃连芳、苏祖馨、贺维珍分任师长。

△　日外务省训令川樾赴南京交涉北海事件。同日，日驱逐舰“若竹”、“早苗”两舰离沪驶北海。10日，川樾召使馆武官喜多、佐藤商讨北海事件，日大使馆一等秘书须磨谒张群，声称日政府决定派员赴粤调查，望妥为保护。同日，日舰“球磨”、“芙蓉”、“刈萱”、“朝颜”号南下。翁照垣宣布北海戒严。蒋介石令李、白撤回翁部。

△　伪蒙新募壮丁七八千名开往商都、化德，由日派军官训练。同日，张海鹏部伪军5000余名开抵商都，并有大批新武器及巨型坦克10辆由热境运抵察北。伪军并加紧修筑军用公路，架设电线，运输辎重。

△　王克敏在津访日驻屯军司令田代、桥本交换华北现状及开发华北经济意见。日方对王北上就职，意见分歧，天津日军当局对王不满，王决定中止赴平就职。12日，宋哲元派张自忠访王，王表示愿辞职南下，并将冀察经委会主席聘书退回。

△　中华工联会电行政院及财政部、实业部，请撤销冀察稽查处，并严惩建议或实施人。12日，上海市商会呈请财政部制止冀察稽查处活动，谓该稽查处的设立，并非辅助缉私，实乃保障私货入境。

9月10日　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官吏、人民恪遵准则，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侨。内称："所有外交案件，中央正在妥慎办理，不宜以局部之纷扰动摇大局，'九一八'纪念已近，尤恐或有'无知之徒'蓄意滋乱。"

△　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对上月16日《大公报》载反日文章《演不出的戏》一文，一再涉及"满洲国"，认为有煽惑他人抗拒《敦睦邦交令》之嫌，控该报总编辑张季鸾妨害秩序罪。是日，在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审。被告张季鸾驳称：中华民国迄今并未放弃东三省为本国领土，国民政府迄未承认"满洲国"，故并非与《敦睦邦交令》中所称之"友邦"抵触。

△　上海总工会召集80余行业工会代表开会，议决通令各工会告诫所属工友，不得无故罢工或怠工，实行劳资协调；忠告资方不得无故停业，无故开除工人；函请公安局，在劳资纠纷调解期中，未经党部许可，不得逮捕工人等；并将上述议案呈报中央党部、行政院。

△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乘陕、甘之敌分散的弱点，分三个纵队前进，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略阳之敌，袭取以上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是日，红二军第六师为左路纵队，由岩昌出发向康县、略阳前进。11日，红二军第四师和总指挥部及第三十二军为中路纵队，向两当、凤县前进，同时宣布红二军第五师归第三十二军编制，番号为第九十六师。15日，红六军由余家村经寻家底到平南川；第四师第十二团袭西和县未克.16日夜，敌先占娘娘坝反击，红十六师师长张辉牺牲。

9月上旬　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位于天水、泰安、武都地区的王均第三军，阻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红一方面军主力。

△　红军西征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七营、李旺堡歼敌一部，尔后以左权第一军团各个歼灭分散防守黑城镇、李旺堡、同心城、海原、郑旗堡等地的马鸿宾部。

9月11日　日舰“若竹号”自香港转驶北海。粤日代理领事吉竹访两广外交特派员刁作谦，坚持派员乘舰往查日侨中野被杀案，刁婉言劝止。12日，刁作谦所派秘书凌士芬抵北海，遭驻军拒绝，折返途中遇日舰“嵯峨号”，加以劝阻。日领署电该舰暂停港口待命。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募款兴学，为该校先后所募捐款计达2000万元。

△　伪满兴安北省西额旗和金厂工人2000余人，同抗日军联合，击毁金厂办事处、作业所、伪警察分驻所等24处，打死日伪军警八人。

9月12日　国民政府令陆军中将余汉谋特加陆军上将衔；任命张发奎为陆军中将，并加陆军上将衔。

△　天津日领馆致函津市公安局，声称南开中学学生连日开会筹备“九一八”纪念会，实为抗日行动，请予取缔。

△　前北京安国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复在北平病故。

△　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第五军在中东铁路代马沟水平站截击日军东行兵车，击毙日军官兵90余名，重伤50多名。

9月13日　蒋介石委陈诚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罗卓英擢升第三路军参谋长。委任李宗仁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委任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辖现驻湘各省部队；卫立煌为第二路军总司令，驻闽各部队归其指挥。

△　程潜、黄绍竑等由广州飞南宁，商桂局整理，并监誓李、白就职。14日，程、黄分访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李品仙商谈桂局，白拟下月出洋考察军事，经程、黄劝挽作罢。

△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点为：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红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红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个方面军提前会合，协同消灭胡宗南部。

△　新任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抵沪，对中外记者谈称：英国外交有固定的基础，不容轻易变更。英国不欲与任何一国结盟，以敌视他国。英日合作经济援华问题，必中、英、日三国共同合作，始可成功。

△　国民政府委员徐绍桢在沪逝世。

9月14日　李宗仁、白崇禧发出和平通电，谓："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此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16日，李、白在南宁偕黄旭初分别就任桂省绥靖主任、军委常委及桂省政府主席职。

△　北海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拒绝日方调查人员登岸调查中野事件。

△　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召黄慕松、刁作谦等商北海事件应付办法，决定先令刁之秘书凌士芬调查真相。

△　英船“泰利号”驶过广东省西江江门附近时，因激起江水，淹没稻田，农民开枪射击，死华籍舵手一名，伤船主英人裴里斯、二等机师比利时人蓝琴堡及美教士卡莱特女士。英当局获悉，即派炮船“西加拉号”往查。广州英总领费列浦亦向中国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缉凶。

△　驻平绥路察绥旗云继先部蒙古保安队500人、驻毕克旗400人，因欠饷哗变，击伤云继先。18日，云继先死。所部窜阴山黑牛沟，被绥军搜剿殆尽。26日，副队长朱实夫赴毕克旗集中余部改编，并与绥当局洽商名称及扩充办法。

△　彭德怀红一方面军陈赓第一师主力附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之特别支队占领将台堡，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以步、骑兵各一团组成之特别支队占领打拉池。

9月15日　李宗仁、白崇禧电令翁照垣部限20日前退出北海。同日，川樾偕须磨、清水访张群，交涉北海等案。新任日驻粤总领事中村抵上海，传达日外务省对北海事件的训令。16日，川樾再访张群，要求设法使日方人员前往调查。张群表示，促翁照垣部撤退，以解除现地调查障碍。同日，翁部分批撤退，由粤军谭邃第一五九师接防。21日，翁电广州报告北海驻军撤退完毕。

△　行政院决议任命马步青为青海省政府委员，任命乌珠穆沁旗护理札萨克图桑噶为察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

△　行政院会议通过北平发行市政公债300万元，青岛发行民国二十五年建设公债600万元。

△　实业部成立农本局，推孔祥熙为理事长。该局任务为：一、筹备农产品运销仓库；二、调节国内食粮；三、运销国内其他农产品如茶叶、烟草、棉花、麻等；四、辅助发展农业生产；五、辅助设立合作金库。该局由实业部联合国内各银行组成，资本分三种，固定资金3000万元，由政府分年筹拨；合股资金3000万元，由参加各银行合交；流通资金额数由参加各银行与农本局协定。

△　“九一八”纪念日将临，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17日至20日，上海市区临时局部戒严，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罢课、散发传单以及其他影响治安之行动。16日夜起，天津警戒三天，武装军警皆出动。17日，南京警备司令部下令“九一八”纪念日禁止游行、集会。18日，北平戒严，军警在各校、各街巷布防，严禁结队游行。

△　红军西征军左权红一军团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东北军何柱国以骑六师、第一零五师一个旅及马鸿宾三个团进攻西进红军。是日，李天佑红四师歼灭敌马鸿宾两个营，17日又消灭何柱国骑六师两个团。18日，红一军团占领界石铺。

△　日本军令部决定《处理北海事件方针》：“一、与成都事件一并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引导其走向全面禁止排日，从根本上调整邦交”，促进对此事件的解决；二、调查现场，依既定方针进行。不得已需要用兵时，应止于保持我方威信的必要程度；三、防备抗日事态波及全中国。”在第二项中，海军并考虑到对海南岛和青岛“实行保障占领”。

△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对华时局的对策》，主要内容为：一、对华中、华南方面，按目前形势，不以陆军行使实力；二、为预防因抗日行为波及华北而爆发不祥事件，看时机先派一个师团去满洲，在锦州附近待机；三、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断然给以惩罚；四、关东军作好对苏作战准备，以策万全。

△　日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由长春飞抵天津，王英随即亦到津会晤。嗣王携日方接济之六万元飞返绥东。

△　自是日至30日，平、津、塘沽、丰台、通县等地日驻军演习行军、打靶、巷战、野战和由坦克、汽车、炮兵、装甲车等配合进行游行示威，据不完全统计达22次之多，参加日军达5000余人。

△　驻沪领事团要求修正6月间所订《租界工厂检查协定》草案，认为实行该协定“不啻将领判权予以局部废除”。是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就此事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转请领事团不要曲解，以妨碍我国行使行政权，阻扰执行《租界工厂检查协定》。17日，实业部咨上海市政府继续交涉执行《租界工厂检查协定》。

9月16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徐绍桢出缺，选任汪精卫、黄郛为国民政府委员。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三四千人围攻甘肃临洮，是日与援敌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作战后，退出临洮东山一带。17日，临洮附近红军向官堡镇转移。18日晚，红军猛攻甘肃岷县。

△　财政部为保持关税的完整，特派参事李青选、总税务司缉私科税务司白立查北上与冀察当局协商缉私有效办法。是日，李抵津，访许礼亚、过之瀚等交换意见。20日，李青选以财政部指示办法与秦德纯、孙维栋、王鸿恩交涉：一、查验私货由海关或另设机关办理均可，但查验费须与海关税率相等，以免破坏关税完整；二、私货取消查验证，由商人补税免罚放行。

△　冀察总稽察处因各方反对，实行秘密查验放行，由各走私商担保，登记货数，将来总收费。是日，一次放行私货砂糖1.3万包、人造丝300箱。

9月1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

和国的决议》，指出：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南京政府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

△　中共中央电令各路红军全力以赴准备静会战役后，是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四方面军进出甘北继进甘西的主张，遭到朱德等反对。当夜在岷州的三十里铺举行西北局会议，讨论通过旨在迅速夺取兰西大道、会合红一方面军打击胡宗南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　程潜、黄绍竑偕李宗仁、黄旭初等飞抵广州会见蒋介石，承商桂省善后，决定取消第四集团军，改为第五路军，辖八个师，蔡廷锴部归并编入。关于整理桂省党政由中央负责，军事由李宗仁主持。

△　香港总督郝德杰爵士抵广州会见蒋介石。次日，蒋介石参加沙面驻广州英领事宴会，会晤英港督郝德杰爵士。

△　贺龙红二方面军第六军经高桥、百杨村、水泉沟、狗家店到徽县之马家庄；第四师占成县，击溃敌王均部一个团，缴俘人枪数百。

△　广东汕头市日商广志洋行厨房内发现炸弹一颗。汕头市公安局长丁杰萃亲往查勘，疑点颇多，该弹已废，无爆炸力。18日，日领山琦借此扩大事态，向市府要求协同调查，并谓该炸弹乃华人潜置，要求：一、查明真相，并缉凶究办；二、此后切实保护日侨，并担保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同日，汕头市长陈同昶以案情“严重”，命宪兵制止市民下半旗纪念“九一八”。

△　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发布告，宣称：“协和会、关东军与‘满洲

国’三者为一体，强化‘满洲国’之‘国体’。”

△　越南中华国货公司驻沪办事处为国货遭受越南政府苛税，阻遏在该国推销，特致函国产厂商联合会，要求转呈外交部交涉。

9月18日　　山西省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成立。阎锡山任会长；戎伍胜、刘玑、张隽轩、宋劭文、牛佩琮、宋维静、杜任之等为委员。10月，薄一波等到太原后，加强扩大牺盟会组织。在中共领导下，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　下午5时40分，驻丰台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张华亭营孙香亭连，与日军穗积中队发生冲突，孙连被围。丰台日军大队长市木率步、炮兵驰至将张营营房包围。驻平日军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亦率步兵数百人驰至丰台应援，在大井村将张营一连包围。陈觉生当晚访日军高级参谋饭田，要求下令制止丰台日军行动。夜12时后，华北日驻屯军部通知宋哲元，许可派员调查，并附带提出条件：一、丰台第二十九军于24小时内完全撤退，以后距车站20里内不得再驻正规军；二、丰台镇由冀察维持治安；三、距丰台20里外枣林庄、赵庄子许驻军一连；四、肇事张营士兵须整队向日军托枪敬礼，鸣军号致歉。饭田并电话警告宋哲元，否则日军将取断然行动。19日晨，宋派副师长许长林与池田等在丰台日兵营内签字换约。上午9时，日军始撤围。中午，第二十九军张营士兵忍辱自丰台撤退。21日，宋又调张自忠部三个连开往丰台填防，终因日军之胁迫，不得不退出丰台，丰台遂被日军占领。

△　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称对四先生所发表的抗日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为了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

先生的热烈希望”。

△　毛泽东致函宋庆龄，望其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派潘汉年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和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

△　上午9时，蒋介石到继园（广州陈维周寓）访李宗仁（按：这是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蒋、李首次会晤，蒋桂对峙局面至此结束）。20日李等返南宁。

△　国民政府嘉奖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称傅“比年主持绥省政务，剿匪安民，保固边圉，厥功尤伟”。

△　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兼广东省保安司令。

△　立法院通过《保甲条例》。

△　贺龙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在哈达铺下达命令，指出“我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通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同日，王震红六军前卫师占两当县城，守城地主武装保卫团及县府人员全部被消灭。午后6时，该军第十八师袭占徽县城。次日第六军向凤县前进。

△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代表朱瑞等三人和东北军骑兵白凤翔第六师签定《停战协定》，协定指出“抗日”为双方联合的基本条件。

△　北平各大、中、小学联合举行“九一八”纪念会，北平各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报告今后北平学运中心工作有三：一、保护十几万青年在华北求学；二、保护华北文化、教育界之安全；三、保留忠勇之第二十九军在华北。大会并通过四议案：一、通电全国，请政府公开成都、北海两案件之中日谈判经过；二、通电全国，请政府严遵二

中全会议决案，保卫绥东及华北；三、建议学联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四、请东北军北上抗日。同日，天津数校学生集会纪念“九一八”，节食资助傅作义部队。

△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西安各界举行大规模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举行盛大游行示威。

△　上海妇女界纪念“九一八”举行游行，队伍在南市老西门被军警阻挠，与军警发生冲突，史良等被打伤，19日，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通电要求政府惩办肇事者。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的工作。

△　据《大美晚报》讯：冀东反殷自治军顷分“滦榆”、“蓟密”两区活动，内部并有政治组织。抚宁、乐亭、滦县、昌黎、遵化、迁安等地，近均发现“反殷人民自治军总指挥部”编印之《揭发殷逆十大罪状告同胞书》。

9月19日　王震红六军攻凤县城未克，在县城附近桑园宿营；红六师占康县后即向略阳前进。20日，红六军撤凤县之围，退到双石铺。25日，红六军教导团突击队到永宁镇；贺龙总指挥部和红四师在徽县休整。27日至28日，红四师一部和罗炳辉红三十二军于成县以西之大船坝与敌王均部第三军第十二师激战。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向静宁、会宁进军命令。张国焘复于22日、26日连电中共中央，称目前与胡宗南第一路军在静、会地区作战不利，“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27日，中共中央下令张国焘停止西进，立即回占通渭。2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重下北进命令，从30日起，分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　汉口日租界日警吉冈庭二郎在租界内大正街日信码头被人枪杀毙命，日方捕去华人七名。日方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戒备。22日，日领三浦访鄂省府主席杨永泰，要求中国当局对吉冈事件负完全责任，立即缉凶。杨答：中国官厅极愿协助缉凶，但不能担负在租界内发生事件的责任。25日，汉口日居留民团电广田、有田、寺内、永相四相和川樾大使、及川司令请愿，要求对华取断然态度。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整理广东金融公债条例》，债额1.2亿元，用于整理广东金融、充实毫券准备，年息四厘，分30年还清本息。

9月20日　宋哲元在天津与田代商谈开发华北经济，宋向田代表示，在“平等互惠、共存共荣”原则下可以进行，并与田代商谈开发华北经济四大原则、八项要求。10月27日，宋电蒋介石报告称：中日经济提携日方提出已久，迄未与议，上月在津与田代面谈关于开发经济，决定四原则八要项如下：（甲）中日经济提携之原则：一、遵据共存共荣之原则，以收中日均等之利益；二、中日以平等的立场规划一切；三、由日本招集资本、技术援助中日合办之企业；四、谋民众安居乐业。（乙）经济开发要项：一、经营定期航空事业；二、铁路敷设，首先新设津石铁路；三、开发优良之煤矿，先与矿权者协商，促进井陉正丰煤矿之增产；四、开发龙烟铁矿；五、塘沽筑港；六、扩充电力；七、促进棉、盐、羊毛等之对日输出，以谋增进农村福祉；八、依靠日本资本、技术改善通信。

△　张子华携周恩来致曾养甫（8月31日）函及致陈果夫、陈立夫（9月1日）函离开保安，于是日抵广州，将信交谌小岑收转。

△　巴金、王统照、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夏丏尊、洪深、鲁迅、郑振铎、周瘦鹃、包天笑、黎烈文、谢冰心、张天翼、丰子恺、林语堂等21人在《新认识》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政府“加紧全国的缉私运动，竭力援助

东北义勇军，严命冀、绥当局坚决保卫华北各项主权，并尽量资助华北国军物质上的缺乏”；“对北海事件与成都事件之交涉，不作妥协之让步，对绥东伪军之侵扰与北海日舰之威胁，迅速以实力应援各该地方之爱国军事长官”；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立即废止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主张文艺界同人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

△　日外务省拟就侵华具体政策：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晋、鲁、绥五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其他权利、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统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解决中日交通合同，特别是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日本顾问。

△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成立，参加者有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华侨代表400余人。陶行知、钱俊瑞、陆璀在成立大会上发言，阐明全救会团结御侮的主张，并介绍国内救亡运动进行情况。

△　顾维钧从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联第十七次大会，争取英、法、美等国代表协助中日关系好转。30日，顾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换在中、日冲突中苏联给予中国帮助之意见。10月10日，顾与李维诺夫续谈远东局势，李维诺夫表示，一旦中日发生激烈冲突，苏首先给以物资支援，并愿与中国军事合作。

9月21日　李宗仁在南宁电居正，谓桂军各将领对蒋介石意旨均表示竭诚拥护，桂局将遵中央颁布组织条例改组。

△　国民政府颁布《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训令》，凡11条。规定：西藏对于中央应保持原来密切之关系，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西藏不得与外国订立条约；西藏与外国旧订之约，应提请中央政府处理；中央政府允许西藏自治，方案另订之；西藏之军政、外交及其他有关

全国一致性质之重大事项由中央政府处理之；中央政府派大员常川驻藏，执行国家行政，并指导地方自治各事宜等。

△　全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缉私课长白利查由沪抵津，访许礼亚再商缉私。22日，白利查访李青选，交换缉私意见。23日，白利查、许礼亚访张自忠商军警协助津郊缉私。

9月22日　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军政改革及桂局善后。到各军、师长、民团指挥官及省府各委员等数十人。次日，会议决定：军事依中央编制，编为三军八师；新省府定下月1日成立，省会决迁桂林；禁赌问题，因军费不敷，暂缓执行。

△　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因康境红军北进，是日将省会由雅安迁至康定。

△　毛泽东致书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提议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同日，毛泽东致书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商订抗日救国协定，称："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并对他们所提协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表示"如荷同意"即成定案。

△　毛泽东致书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赞其同情抗日救国事业，并希望"持此大义，起而率先"，"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

△　毛泽东派彭雪枫与甘肃省政府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

洽谈停战议和，合作抗日。

△　周恩来致函蒋介石，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提议：“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同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并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

△　据《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达1.4万名以上，其中驻北平4000人，驻丰台约2000人，驻天津市内海光寺兵营2825人，东局子1600人，驻通州700人，山海关800人，秦皇岛500人，南大寺500人，唐山400人，塘沽500人，昌黎、滦县各300人，其他在北宁路沿线及留守营等，每处驻一百七八十人不等，各地驻军均按战时编制。

9月23日　外交部长张群与驻华日大使川樾在南京继续会谈，日方提出解决中日争端五条件：一、日本在长江各地有驻兵保护日侨的权利；二、扩大华北缓冲区域，要求华北五省自治；三、中日经济合作，减低对日货关税；四、开通中日航空；五、修改中国学校教科书，取缔排日宣传与活动。张群态度强硬，提出：一、取消塘沽、上海两停战协定及“九一八”以来被迫签订的条款；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华北日军及飞机不得任意到处飞行；四、解散察东及绥北伪军（德王的蒙古军），日本勿予接济等。会谈无结果。

△　晚8时20分，日本“出云”舰水兵三人，在沪虹口区海宁路日商上海银行门前遭狙击，一名（田港朝光）毙命，伤两名（出利叶藏已、八播良胤）。日本陆战队遂全体出动，在虹口租界和闸北布防放哨，检查行人。虹口捕房亦派探捕往查凶犯。日使馆要求我方协助。

△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中日调查组往北海调查中野事件，据目击者谓：“中野恃势凌

人，大动公愤，为路人乱拳殴毙。”24日，日舰六艘退出北海。现场调查勉强结束。

△　日参谋本部决定《时局处理方针》：一、需要确定对华惩罚的国家决心；二、联合舰队立即从佐世保方面开始行动；三、促进对华作战准备；四、促进现正进行的对华交涉，并限期答复；五、根据中国方面的态度，可对河北、山东及青岛进行保障占领。

9月24日　上海市政府布告敦睦邦交，声称：凡我国人，对于友邦，须敦睦谊，不得有排外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倘敢故违，决不宽贷。

△　日陆、海、外三省开会讨论上海事件，决定由日海军省令驻华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负责保护在华日侨生命财产，同时海军中央部立即增派舰艇及特别陆战队去沪，并组成第11航空队在台北集中待命。同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日总领提出书面抗议，要求立即撤回派往市区的日本陆战队。26日，越界日军大部撤防，但仍构筑工事。

△　国民政府派赵班斧为出席国际劳工局第二十二届海事会议中国劳工方面代表；派姚定尘为中国劳工方代表顾问。

△　日方擅在包头修筑机场。包头县长奉傅作义令，向驻包日办事员滨田交涉阻止无效。

9月25日　财政部就冀察成立总稽查处事，电参事李青选称，如不破坏关税完整及行政统一，可由海关、财政部、冀察政委会各派委员一名，组织一委员会，处理私货补税行销及防止走私，税款仍按海关原税率征收，不得减低，委员会负监督之责，不经手收税，一俟私货补税完毕，委员会即取消；冀察总稽查处仍维持其成立，只许其查缉盗匪军火，与私货补税无关。

△　驻瑞典公使王景岐向瑞典国王呈递国书。

△　驻广东省日总领事中村访广东省“绥靖”主任余汉谋，要求防止“抗日恐怖行为”，余允负责制止。

△　日政府训令川樾与张群继续就调整中日关系进行谈判，并令川樾敦促国民政府请蒋介石早日返南京，以便与蒋直接会谈。同日，日外相有田邀驻日大使许世英就根除排日主义及调整中日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9月26日　国民政府特派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

△　据《申报》讯：芦盐输日合同修正后，由中日双方签字，要点有三：一、合同有效期限改为一年，明年售盐任滩户自由，日方欲买时另订合同；二、为优待日商出口，盐按青岛例九六折算，每百吨折实96吨；三、每吨价由2.6元减为2.4元，运费由汉沽运往口外，每吨合价2.9元。

△　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三届年会在上海举行。社员马寅初、董时进、陈长蘅、陈行等200余人到会，辩论题为新金融政策。会上宣读论文14篇，其中有陈行的《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马寅初的《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与纸币政策》，朱其傅的《非常时期我国农村金融应取途径之商榷》等。

△　日陆、海、外三省联席会议决定：一、敦促蒋介石速回南京进行外交谈判；二、如蒋拖延回宁，则以最后通牒强求之；三、再若不肯，则采取实力手段。

△　日在乡军人东京本会干部木谷美雄、古川政田力等七人抵天津，转绥、蒙“考察”，津日军部派员随往。

9月27日　蒋介石在广州召粤省府主席、各厅长等训话，提出今后改进政治根本要点四端：一曰勤考察以求得人；二曰求迅确以谋振

刷；三曰任劳怨以期改革；四曰当合作以策成功。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告朱德、张国焘等：“与南京谈判系国际指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这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　罗炳辉红三十二军自甘肃省小川镇向成县转移，29日退出成县，向徽县转移。

△　新任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偕日驻纽约领事泽田抵天津。29日，重光葵、泽田分别会见朝鲜、正金、三井、三菱、大仓各金融实业界代表，交换蒙、绥及华北经济商务意见。同日下午，宋哲元宴重光葵，谈华北经济问题。

△　宋哲元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报告与田代司令官商谈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之“四原则，八项要求”。其中，关于“经济开发事项”，计有：一、航空；二、铁路，首先新设津石铁路；三、炭矿，促进井陉、正丰炭矿之增产；四、铁矿，目下当着手开发龙烟铁矿；五、筑港，于塘沽附近先选定地址，随铁路、矿山之开发，开始筑港；六、电力，扩充电业并举行水力资源之开发；七、农渔之振兴，首先促进棉花、盐、羊毛等对日输出，并举行治水及水利事业；八、通信，实行改善与统合现存之设施，如需资金及技术人员，应依日本之助力。12月4日，行政院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作出八项指示，指出对外交涉属中央权限，各省、市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条款，非经中央核准者，一律无效。宋遵从行政院的训令。

△　据《申报》讯：晋省各地迭遭大雨，62县遭水灾，田庐人畜淹没不可胜计，其中灾情最重，急需赈济者有阳曲等15县。

9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江西省整理土地公债条例》，债额300万元，年息六厘，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9月30日本息还清。

△　日外相有田在东京向新闻界发表重要谈话，声称：近来中国发生之排日事件，中国政府与国民党不能诿卸其责任，中国应对排日运动作更有力之控制；并称中国现已临关系重大之歧路口，切望中国应速决定与日本携手与否。

△　上午，日大使馆秘书清水奉川樾命，访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中日一般问题探询国民政府意旨。下午，高宗武奉蒋介石命访川樾，交换中日交涉意见。

△　贺龙红二方面军王震第六军由永宁镇回师两当县城。

9月29日　蒋介石电令各省、市保护外侨，严维地方秩序，防止“奸徒”滋生事变。

△　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大会演说，促请注意远东危局，日本野心不戢，严重影响势将及于欧洲。

△　日本中日公司代表江藤丰二抵京见孔祥熙，要求偿清中国与该公司所订电信借款未偿之余款。

△　日外务省、海军省、军令部联席会议集议对华问题，要求中国取缔排日主义，解决中日各悬案，调整中日关系，并准备增派驻华军队。

9月30日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与宋哲元就“华北开发计划”达成《宋哲元、田代协定》，其要点为：一、建设津石（天津至石家庄）铁路；二、开发龙烟铁矿，复兴石景山钢铁厂；三、向日本输出长芦盐；四、改良华北棉花（设立华北棉花协会和进行技术指导）；五、开发井陉煤矿；六、修筑塘沽堤坝，兴修白河水利事业。

△　国民政府派曾养甫督办黄埔开埠事宜。

△　天津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与板垣、今村等在长春会议，决定：一、对于策动华北五省独立，除仍本过去嗾使汉奸自行活动方针，以免民众反感，引起国际纠纷外，尤应全力威胁冀察当局，割断其与中央的联络，迫其就范。威胁办法，除运用政治手腕、阴谋离间外，应使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实力成正比例增加，此次增兵则以商团义勇队、在乡军人名义进行；二、静观川樾与南京谈判结果，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由关东军派遣热河军及察北伪军袭击归绥、大同，驻屯军进攻第二十九军；三、要求海军派舰队于必要时集中胶州湾胁迫韩复榘。

△　日军百余人携小钢炮四门，由承德开抵古北口，派测量员分赴各村镇测绘地图。

是月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40册，分文集专集两部分，文集16册，专集24册。

△　冀东伪自治政府实行鸦片专卖。

△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成立，由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军长谢文东，下辖三个师，共千余人，活动于勃利、依兰、方正、密山等地。

△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成立，军长李华堂，活动于依兰、勃利、桦川、方正、汤原等地。

△　抗日联军王德泰第二军第二师代理师长陈翰章率部在牡丹江东北太平沟夜截日军军用列车，全歼日第十九师团阅边司令亲率之讨伐队三四百人，缴获大批军火给养。

10月

10月1日　蒋介石在两广问题解决后，即抽调胡宗南、关麟徵等师星夜开赴甘肃增援。是日，萧之楚师由郧阳进驻安康，图从陕南夹击红军。2日，西北“剿总”所属部队向两当、凤县贺龙红二方面军进攻，红军开始向渭水以北转移。

△　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在黄埔成立，行营主任何应钦未到前，由代理行营参谋长林蔚主持一切。

△　广西绥靖公署和第四集团军总部由南宁迁桂林。广西省政府改组成立，省会亦迁桂林。

△　为纪念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在南京成立“国民军革命纪念会”，推冯玉祥为理事长，于右任、鹿钟麟等为理事；并决定在北平、济南、太原、西安、郑州、兰州等处设分会，规定每年10月23日为纪念日。

△　日外务省发表声明，否认路透社所传日本对华提出四项要求。该四项要求是：一、中日经济合作；二、华北冀、察、绥、晋、鲁五省自治；三、日本有权在长江沿岸各地及海南岛驻军以保护日本利益；四、修改中国学校教科书，删除反日宣传。《密勒氏评论报》并载有第五条，即罢黜陈果夫、陈立夫、冯玉祥、孙科等。2日，日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大肆抨击路透社，指责该社为离间中日制造根据。同日，路透社电声明，该社对于日本大使川樾在南京谈判时提出的要求，向甚审慎处之，电讯大半取材于日本报纸。

△　田代在天津与宋哲元会谈中日“经济提携”，按日军部所定《提携大纲》分铁道、棉产、港湾、矿山、芦盐、电气六部门逐一洽谈。宋原则上接受。7日，宋在平召集秦德纯、刘汝明、戈定远、邓哲熙等商洽“经济提携”实施方策及冀察政权扩大案。

△　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到德化与德王举行多次军事会议后，是日确定犯绥目的旨在打倒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首先进攻平地泉附近，

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计划由伪王英军占领五原地区，把谋略部队推向第一线，伪蒙古军（第一、二军各扩充为四个师）摆在第二线。

10月2日　日首相广田、外相有田、海相永野、陆军省次官梅津在东京集议打开对华交涉僵局。是日，派桑岛赴南京向川樾训示：待蒋介石回南京后，川樾即和蒋会谈，在蒋承认日方提案的根本要点邦交调整问题和制止排日问题的大纲后，再和张群就其细节进行协商。关于调整邦交内容为：一、作为将来达到日华军事同盟的开端，签定华北五省防共协定和以防止赤化为目的的一般协定；二、承认华北特殊性，在华北设立特别的政治组织，如特政会形式，同时给予该组织以财政、产业、交通等有关权利；三、福冈、上海之间进行航空联络；四、降低关税等。关于禁止排日问题，要求将以前交涉中业经华方同意事项，立即付诸实行。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与日外交谈判，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

△　彭德怀红一方面军为接应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北进，于9月30日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主力为左纵队，南下和特别支队靠拢，以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是日进占甘肃会宁城，敌向定西溃逃。

△　中国工农红军五、六军围攻甘肃省岷县县城，不克，昨今两日全部东撤，先头部队已过荔川，岷县围解。

△　日水兵中山秀雄在沪被杀案审讯终结。上海特区法院判决该案嫌疑人杨文道、叶海生死刑。3日，杨、叶再次上诉。

10月3日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访驻华日使川樾及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交涉调整中日关系事，旋将交涉始末报告张群并详电蒋介石请示。

△　上海、南京各报联合发表《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一文，要求国人："局势无论如何特殊，吾人须一秉常道，处之以定，不摇于一时之感情，不慑于当前之事态，尽其所应尽之力，而整齐步骤，集中意志，以听命于整个之国策。""此时应重视破裂，期待挽回，事至无可如何，唯有率四万万人，以卫国殉国于最后之一瞬。"望日本朝野认清最近中国频发"不幸"事件之性质，勿借此而变更调整国交之本意；"日本新闻界应重视两国久远之利害，各尽其最善之努力，以谋国交常态之恢复"。4日至6日，粤、汉、黔、汴、渝各报界相继著文响应。10月下旬，上海杂志界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日关系之共同意见》一文，对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予以批驳。

△　白崇禧奉蒋介石电，暂留广西襄助军事。

△　驻日大使许世英应邀访日外相有田，有田表示希望蒋介石、张群在最短期内与川樾举行谈判，以达到"调整中日关系"之目的，声称："中国现在站于是否与日本携手提携之歧途。""望鉴于事态之重大性，充分认识日政府欲贯彻调整国交之决意。"

△　王宠惠由广州抵上海。4日对记者谈中日交涉问题，谓日方要求与蒋介石谈判，各国并无此例。

△　行政院派往欧洲考察农村经济专员薛光前返国抵沪，称各国力谋战事经济之准备，我国应先从健全组织入手，尤以健全工商业团体之组织为当务之急。

△　英、美两国政府交换关于远东危局之情报。日外务省表示，中日关系应由中日两国解决，不容第三国干预。

△　上月23日上海日水兵田港被杀案开审。30日，宣判嫌疑人张荣和无罪释放。

10月4日　　张学良在西安接见伦敦《先驱日报》记者海史脱夫

人，发表关于中日问题意见称：一、外报前传西北四省独立及联俄之说，纯属谣言；二、本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拥护领袖，拥护统一，一致对外；三、个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甚愿效命于国防第一线。又称：“国交能否调整，责任全在日本而不在中国，盖如日本所提条件为中国所不能容纳者，即使政府容忍，而民众亦难接受。”

△　贺龙红二方面军向渭水以北转移。是日，王震红六军放弃两当县城到高桥，6日经舒家坝、大湾里、达山镇到杨家湾；贺龙总指挥部、红二军和罗炳辉红三十二军到达娘娘坝。7日红六军到达横河镇。经罗家堡时，遭敌进攻，第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负重伤。9日，红六军经甘谷县、武山县间渡渭水。10日在杨家庄集结。11日，总指挥部、红二军、第三十二军到榆盘镇及其附近之毛家店集结。13日，经李家店、马河店到峡口、吴家村（离通渭东南约10里）一线，通过胡宗南、马步芳十余万军队布防的兰西公路封锁线。

△　天津海关新税务司梅维亮抵津到任。5日，津、秦两关发现合谋伪造税单查放走私货物之重大舞弊案，上海总税务司已饬梅负责根究；21日，此案经梅彻底查毕，报财部核办，漏税额在四万元以上，伪造税单者为津关缉私课长斯普、巡船长溥士德等。

△　据津、秦两海关统计，自去年8月至是日，由冀东走私入津货物，估计：一、人造丝12.0069万包；二、卷烟纸8432包；三、砂糖97.5807万包；四、杂货23.4166万捆；五、海味类6.3801万捆。合计偷漏关税1504.4416万金单位，以国币计共3460.2157万元。

10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张学良称：“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

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　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张学良在西安对各部队军官训话，题为《中国复兴的前途》。略谓：“国家的复兴前途之基本条件，不外两种：人民与自然资源。”“我们中国的复兴条件，一点不成问题，是绝对够的……我们的祖先曾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产，那末只要我们肯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还会有伟大的事业出现。”并谓：“中国绝对能复兴，何以能复兴？有我在。如果四万万同胞都能这样想，都能自觉自励，从自身做起，中国怎能不复兴呢？”

△　察北伪军图犯绥东，王英部主力集结陶林与商都，李守信部仍据张北，连日调动甚忙。是日至7日，德王召伪军政首脑齐集嘉卜寺集议犯绥事。

△　宋哲元在北平对记者称：“予在天津曾与田代晤谈数次，关于华北中日通航问题，系继续前政整会及军分会商而未定之谈判，至经济合作如开采铁矿、敷设铁道，只要真能平等互惠，于双方咸有裨益，予定一本真诚，促其实现。”宋否认与日方作政治谈判。

△　青岛日本总领事馆发表关于解决“茂益丸”事件的声明，谓6月19日中国海关缉私船射击“茂益丸”事，由西彦总领事与张伯尔海关长交涉，已完全解决。

△　天津海关奉财政部令，发出芦盐出口输日执照，交日商三菱公司收执，共核准6.4万公吨，并限制不得以多报少或中途变卖。
按：芦盐出口为近百年中国所悬禁例，防出口后供人制为硝酸等军火用品，日人要求开禁有年，今始达目的。

10月6日　　张学良召集胡宗南、关麟徵等会商“进剿”红军军事，决定首先防止川、陕红军会合，陇南军事由胡宗南指挥、陕南由关麟徵堵击，然后联合川、青、甘三省军队对红军采取大包围形势。

△　日军在沪制造紧张局势，各国军舰纷纷驶沪。是日，法国军舰三艘到沪。7日，上海谣诼繁兴，日侨纷纷离境，闸北我国居民争相迁徙。8日，上海市政府抗议日方越界布防。9日，日陆战队在上海江湾路、虹口公园与六三花园间，越界演习巷战。15日，英航空母舰一艘抵沪。16日，美舰20艘由青岛驶沪，连同以前抵沪之各外舰，共达42艘之多，创黄浦江停泊外舰最高纪录。

△　日华北驻屯军圈占塘沽盐滩，遍插木橛，上书“大日本陆军用地”之字样。8日，长芦盐运使李翰华就此事报请宋哲元向日方交涉。

△　国际劳工海事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中国劳方代表赵班斧提出议案，主张平等对待中外海员，取消各国轮船公司在华施行的包工制度。

10月7日　据《大美晚报》讯：宋哲元在天津数度与日天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会晤，对于华北整个问题，在梅津美治郎、多田骏任内商而未决之悬案为赓续之谈判。日方提出冀察政委会与冀东伪政权合流，在保存中国领土宗主权名义下，冀察内部政治、军事完全脱离中央，被宋拒绝，只就经济合作问题作具体讨论，其内容如下：一、航空问题，由中日合作投资开通航线，就日、华两方分别投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之草案续商；二、龙烟铁矿开采问题；三、修筑津石铁路问题，华方坚持接受投资，谢绝合办的原则。

△　是日至15日，日军在北平、天津、丰台一带举行大规模演习。26日，华北日军约7000人在良乡、长辛店一带举行秋季演习，为期10日，演习期间，强占津郊大直沽民房300余间，逐出居民，征集民夫、柴草、物品，断绝交通，大直沽土城一带民房多被摧毁，禾稼被刈除。外交部以日军此举违反条约与国际公法，破坏中国主权，于30日向日使馆提出抗议。31日，天津日军部声称“决不中止演习”。

△　是日和8日，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十师，在会宁东之

青江驿、界石铺等地，分别同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的第七十三师和第一师会师。

10月8日　驻华日大使川樾谒蒋介石。川樾表示中日双方应各尽其最大努力，消除增进友谊障碍，共谋互利之合作。蒋谓："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并表示对于成都与北海事件，中国政府准备依照国际惯例即时解决，其他问题仍应由外交部续商。同日，蒋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今日与川樾大使接谈，所谈者虽均为中日两国前途与东亚大局的关系，而未涉及交涉中的具体问题，但双方谈话精神，完全立于平等基础之上。""以今日川樾大使表现之精神，推而言之，则中日两国问题，皆可不采外交正当途径以外的方式，而以外交常规以平等基础解决。"

△　广州行营参谋长陈诚飞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桂局善后，讨论桂军缩编并敦促白入京。

△　国联大会选出中国、拉脱维亚为非常任理事。

△　国民政府前司法行政部长郑天锡当选为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　汉口日商思明堂药号内发现无爆炸力之炸弹一枚。9日，驻汉日领三浦义秋访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谈及炸弹案情形。驻汉日军在租界内演习，汉口人心浮动。12日，湖北省当局布告悬赏缉拿案犯。

△　太原无照日侨田中芳太郎、武田末雄买通奸民王俊德顶名租屋，设和中公司走私贩毒，被取缔。27日，日太原特务机关长河野访阎锡山，口头提出抗议。29日，和知衔田代命访堀内总领事交换意见。田代并电河野再访阎交涉，声称如交涉无结果，日军部将取"自卫"行动。

△　上海华商银行自1日至是日一周中，白银库存减少2100万

元，大部流入美国及香港。

10月9日　蒋介石为纪念民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以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略谓：今日之中国已非往日分崩离析时可比。八年来之成绩，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今后唯企求不受干涉、不遭阻碍之自由发展机会。

△　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0月10日　西安“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群众大会，发出宣言，驳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谬说，并游行示威。

△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率部200人，在吉林省敦化县东清沟附近，与日军激战八小时，击毙间岛军区副司令石川隆吉少将，重伤中尉一人，死伤12人。

△　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规定学联工作原则四项：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拥护政府抗日；三、师生合作；四、救亡不忘求学。

△　云南省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正式通车。

△　上海《福州日报》复刊。

10月11日　中共中央军革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要》，提出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央军革委并命令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迅速渡过黄河，控制两岸，配合主力在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其余部队于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迟滞敌军前进。

△　上海市学生界救国会正式成立，下午1时召集成立大会，到浦

东、东南、美专等50余校代表共80余人，全国学联、文化界救国会及职业界救国会均有代表列席，通过该会简章、宣言等。

△　日兴中公司社长十河访驻日英使馆商务参赞撒逊姆，提议华北经济合作，诱英投资天津电气事业。

10月12日　　北平教育、学术界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朱光潜、黎锦熙、冯友兰、梁思成、沈从文、黄子卿、杨秀峰、朱自清、雷洁琼等70余人发表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八项要求：一、集中国力，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等情事；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五、反对日本在华北特殊地位；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七、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八、立即出兵绥东协剿借外力作乱之土匪。

△　冀察政委会根据《矿业法》第七条铁矿应收归国营之规定，下令将龙烟铁矿公司收归国营。旋在日人压力下交陆宗舆筹办。

△　沙王赴归绥见傅作义，商绥东防务。

10月13日　　冀察政委会在日方同意下，发表李思浩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15日，李就职，对记者发表谈话，略谓：关于中日经济合作问题，宋哲元前曾与田代洽商，已决定在“平等互惠、共存共荣”原则下进行。方针有二：一、有利于华北的事业；二、不损害国家领土与主权。详细内容以及举办事业的先后，尚待研究。大致先易后难，修筑沧石路，开发龙烟铁矿等，自当继续进行。植棉问题，平常易举，且为有利事业，可先推广，此事由日方投资或中日合办均可。同日，李访日驻北平武官今井，表示今后全力促进华北“中日经济提携”。

△　山西省今春苦旱，夏季迭遭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泛滥，田

屋淹没，人畜漂走者不可胜计。秋来天气骤寒早霜，灾情奇重，各县纷呈报请赈。是日，山西省政府电请国民政府拨款赈济该省62县。

10月14日　　周恩来接到张子华来电，报告国民党的谈判条件：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次日，张子华携南京国民党谈判协定草案，由南京返西安。

△　察北匪军王英部进犯绥东兴和、陶林等地。17日，与傅作义部发生遭遇战，傅抵平地泉视察。伪军李守信部2000人和第四旅吴嘏庭部3500人集中商都，与驻商都、集宁交界处之王英部联络，对绥东取包围形势。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对目前政治形势宣言，略称：目前在敌人武装威胁下所进行的中日外交调整，一个新的屈服新的妥协有马上完成的可能。这一妥协如果成立，则中国将无以谈立国，中华民族将无以求解放。为挽救目前的危局，只有全中国人民大团结，统一在抗日的原则之下。

△　国民政府任命刘雨卿为第二十六师师长，原任郭汝栋免职；任命鲁大昌为第一六五师师长。

△　冀察当局决定修筑津石路，其路线展至天津与北宁、津浦两路接轨。是日，冀察政委会任命陈觉生督办津石铁路事宜。

10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国民大会延期举行，俟全国各地代表选竣，再行召集。

△　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推派居正、王宠惠、孙科、许崇智、陈立夫五委赴粤参加胡汉民国葬典礼。25日，胡汉民国葬典礼在广东番禺县龙眼洞斗文塑墓园举行，由孙科主持，参加者逾10万人。

△　是日至17日，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到谷头岔、

侯家川一线；王震红六军到青家驿，18日达老君铺。彭德怀红一方面军派杨得志第二师第五团一部迎接。19日，经六军在老君铺集合第十六、第十八师、模范师全部及第十七师连以上干部欢迎红五团代表。21日，总指挥部、红二军达滥泥河；罗炳辉第三十二军达旧营。22日，红六军到公阳镇。

△　行政院颁布施行《各省市征工服役办法大纲》，规定征工服役以自卫、筑路、水利、造林等工程为主；年满18岁至45岁之壮丁，每年须服工役三至五日；征工之召集、分配及遣还等事项，参照征兵原则办理。

△　李宗仁、白崇禧在桂林召集广西省军政首领开联席会议，决定停发纸币，继续收银，并请中央发行整理金融公债。

△　“满铁”在津设“日满商事株式会社”分社，资金1000万元，先收资本600万元，以经营煤、钢、铁、硫酸、煤油等80余种矿产品的输出入为目的。总社设大连。

10月16日　国民政府派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际联合会行政院代表。

△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山西清乡司令徐永昌抵杭州谒蒋介石，韩表示一切听命中央。次日，冀察政委会秘书长戈定远及张群、杨杰抵杭州。蒋召华北将领开军事会议。晚，宴华北将领。19日，蒋由杭飞返南京。

△　冀察政委会在华北日驻屯军司令田代授意下，指定齐燮元、贾德耀、秦德纯为办事委员，常川驻会办公；并聘章士钊、李思浩、曹汝霖为委员。

10月17日　宋哲元与日驻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签订《中国华北航空协定》，由双方合组惠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540万元，中日

各半，共同经营。23日，惠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津成立，张允荣任总经理，儿玉常雄任副总经理。

△　西南彝族代表高玉柱等赴行政院，请中央设立彝务委员会，提倡彝族教育，以挽救边疆危机。

△　日商三井会社、三菱会社合组粮食运输会社，在江、浙内地收购陈米及新粳用作军需，致使上海米价暴涨，是日，上海社会局呈请市政府禁粮出口。

10月18日　　甘肃“绥靖”主任兼第一路总指挥朱绍良命令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于21日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图围歼会师的红军三大主力。

△　日机三架由多伦飞绥东侦察。傅作义赴卓资山视察防务。19日，傅电平称，“绥东情事虽紧，但我方防务巩固，治安无虑”。25日，傅偕绥蒙政会副委员长阿王及李服膺到太原见阎锡山，报告绥防近况。

△　上海实业界、教育界褚辅成、穆藕初、项康元、沈恩孚、黄炎培等215人联合通电响应全救会《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称日本如有轨外行动，政府应“力以武力制止，遏未来之萌蘖，收已失之桑榆”。

△　冀察政委会任命石友三为冀北边区保安司令。

△　台湾志士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武装起义计划被发觉，400余人被捕。是日，台湾日当局开庭审问。

10月19日　　晨5时25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因肺病转心脏麻痹症病逝于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寓所。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毛泽东、周建人、胡愈之、曹靖华等组成。20日，吊唁及瞻仰鲁迅遗容者，有102

个团体，5000余人。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及在沪文艺界知名人士均亲往万国殡仪馆吊唁。21日，鲁迅遗体大殓，但灵柩未加棺盖，任各界瞻仰，吊唁者仍不绝于途，尤以学生与工人为最多。22日，鲁迅灵柩移上海虹桥万国公墓安葬，执绋者6000余人。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表示哀悼，要求对鲁迅遗体国葬，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23日，南京中苏文化协会接苏联对外文协及作协唁电各一通，称鲁迅逝世系中国文化界与全人类的极大损失。

△　外交部长张群与驻华日大使川樾作第四次中日外交谈判，日方提出“中日共同防共”及“华北五省自治”问题，被张群拒绝。对成都、北海各案，张群表示限期解决；对中日通航由惠通公司经营问题，虽由冀察政委会与日方签字，但宋哲元未报中央，故也难承认。

△　中比合资经营之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在天津开股东会议，通过将比商股份让与日商。

10月20日　　行政院通过任命章士钊、邓哲熙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　“东亚经济协会”成立，高凌霨等15人为理事，以“联络中日和平亲善，实行经济合作”为宗旨。

10月中旬　　福建省政府与财政部订立协助盐务缉私办法，以增加税款。福建省全年盐税收入，包括营运盈余，除外债附税、整理费及行政收入三项外，规定以500万元为标准数，超出项下，以五成补助福建省经费，自10月份起，按月先拨1.5万元，由省府设置协助盐务缉私专员一人，随时接洽办理，现征盐附加等一律取消。

△　据教育部统计，1935年度全国24省、市共有私塾8.5291万所，私塾教师8.6034万人，学生共有154.2961万人，全年所收学费共55.2698万元。

△　禁烟总会公布烟民统计数字，各省、市烟民登记总数共计264.2101万人、冀、察、浙、鲁、粤、桂、西康、新疆、南京、青岛、威海等省、市未包括在内。

10月21日　　川樾、张群作第五次中日外交会谈，对“共同防共”和“华北特殊化”等问题意见仍不一致。张群称日方要求华北五省特殊化，为华方所不容；防共属中国内政，毋庸日方代劳。次日，须磨奉川樾命返国报告。

△　国民政府特派李思浩为冀察政委会委员；冀察法制委员会主席邓哲熙辞职照准，由章士钊继任。

△　第四路军副总指挥香翰屏、广东各军区司令黄任寰、张达、黄廷桢、缪培南、李振球等组成国内军事考察团分赴各省、市考察，先后由广州抵上海，是日到南京分别见蒋介石。

10月22日　　红军胜利完成长征。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到静宁东北将台堡与彭德怀红一方面军陈赓第一师会师。23日，王震红六军到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亦胜利完成长征。

△　为粉碎国民党军合围企图，红军主动撤出静会地区，向北转移至海原、打拉池地区。国民党军乘势分四路追击：胡宗南第一军由静宁青家驿向打拉池、海原追击；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均第三军由会宁地区分别向靖远追击；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何柱国骑兵军、刘多荃第一〇五师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由隆德地区经固原向黑城镇追击。

△　蒋介石偕钱大钧等十余人飞抵西安布置反共军事。

△　据《申报》讯：桂省军队已完全复员，全省正规军编为两军七师，计第七军军长廖磊、副军长周祖晃，辖徐启明第十九师、杨俊

昌第二十一师、程树芬第二十四师；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副军长韦云淞，辖贺维珍第四十三师、王赞斌第四十四师、莫树杰第四十五师。此外尚有新编第一师翁照垣部。

△　宋哲元提倡国故，拨款在保定筹建莲池讲学院，是日组成筹委会，由河北省政府委员梁式堂任会长，王明、王承增任副会长。该会规定听讲人800名，由大学毕业生甄选，时间为三年，以经、史、文三门为主要学科，每年基金15万元，已拨10万元。

△　上海市商会常务会议议决，积极倡导该市《立报》发起的“以一日贡献国家”运动，通电各省商会仿办，并通告全市各业公会奉行。

△　四川水泥公司成立，资本定120万元，系省与中央合资，厂设重庆南岸玛瑙溪，日产水泥900桶。以潘昌猷为董事长，刘航琛、卢作孚等为董事。

10月23日　　蒋介石在西安先后接见晏道刚、张学良、邵力子、彭昭贤等，详询西北“剿匪”及陕西政情。张学良建议停止内战，进行抗日，遭蒋拒绝。蒋强令张加紧“讨伐”红军，指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并调蒋鼎文率中央军入陕，监视张学良、杨虎城作战。

△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抵成都，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参谋长傅真吾及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会谈，达成四条协议：一、四川方面向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建议；二、推动与联合南京抗日派准备抗日；三、与各实力派共同在政治上逼蒋抗日；四、国际上联合支持中国抗日的国家，孤立日本。

△　毛炳文第三十七军攻占华家岭，旋占会宁，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牺牲。红五军在激战中损失近千人。同时，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三军王均部也分别占领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

△　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遵南京训令说明不能接受日方所提“华北特殊化”与“中日共同防共”等要求之理由，并请其重行考虑日本的态度，部分解决中日悬案。有田表示拒绝。

△　宋哲元因冀察稽查处曾放行大批私货，经财政部电请制止，是日手谕该处着即撤销。29日，路运缉私总稽查处自南京移天津，首批人员乘津浦车北上。11月2日，总稽查处在津正式成立。

10月24日　　沪各界在龙华机场举行为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献机命名典礼。全市募款100万元购机10架，编为一队，定名中正队。

△　王震红六军在兴隆镇休整，准备战斗。第十七、十八师方向发现国民党军，战斗约半小时，将之击退。25日，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消灭来犯之国民党军，贺龙红二方面军继续向北移动，红四师到袁家河之线。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主力逐次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海（原）打（拉池）地区予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为北取宁夏创造条件。

△　日本派遣华商在徐州竭力购粮备战，并在苏、皖、鲁、豫四省边县乡镇设庄趸买，由青岛、连云港出口，致苏、皖一带米、麦、面粉价格飞涨，较两月前几增一倍。是日，徐州各乡镇长因粮价飞涨，联呈当局禁止粮食出境。27日，江苏省政府为维持民食，通过禁粮出口暂行办法。

△　须磨抵东京，日外务省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对华具体方针。日军部认为，今后日本实无固守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必要，而应向华北地方当局谈判。

△　中美航线在香港设站问题经英方允许后，中美全线试航成功，计历程万余里，首次试航机是日由香港飞抵上海龙华。

△　日华北农业调查团抵天津，访田代、桥本、堀内交换意见，并在津开会商讨调查华北农业方法。

10月25日　　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汉口遇刺身亡。凶手陈燮超当场捕获。31日，国民政府派省府委员兼秘书长卢铸暂兼代该省主席职务。

△　毛泽东致函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与傅洽谈共同抗日。函称："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总指挥部、第九军、第五军约两万余人相继在靖远城西南虎豹口西渡黄河，至27日渡毕。11月10日，过河红军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统一指挥西路军作战。

△　冯雪峰与四川省主席刘湘会谈。双方同意10月23日达成的四条协议，并商讨了川军、红军与东北军三方的军事联合协定问题。刘答应资助红军10万元经费，以表示与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

△　傅作义赴太原与阎锡山商绥东防务。

10月26日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望"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声明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

△　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陪同下，到西安城南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宣称："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要予以制裁。"

△　红军总部令红四方面军除第三十军、第九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并部署已过河部队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同时命令“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之决战。

△　川樾、张群进行第六次中日外交会谈，再议“华北特殊化”和“中日共同防共”问题，仍未获一致意见。同日，日外务省又两度集会，商对川樾新训令内容。

△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少佐谷荻那奉命到青岛组织陆军特务机关，并就首任特务机关长职。

10月27日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率回教徒朝圣团一行130余人由上海乘轮赴麦加朝圣，省主席一职由省府委员马步芳代理。

△　贺龙红二方面军罗炳辉第三十二军在甘肃袁家河与敌胡宗南第一师作战。红二军第四师到曹家洼遇敌何柱国骑兵阻击。28日，红六军经水头沟到冯家庄；总指挥部到杨明堡；第四师到股列堡与何柱国骑兵继续战斗。

△　日内阁例会通过有田提出之对川樾新训令，其内容为：一、日本已定政策并无变更。二、日方所提各项要求，仍以“华北特殊化”及“中日共同防共”为核心，最低限度要求达成原则协定。同日，须磨携新训令由东京返任。31日，须磨抵沪，对记者称：“日本对华方针，仍秉原定主张，决不让步。”

10月28日　蒋介石在华清池对《大公报》记者称，“中日交涉政府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以竭诚周旋，而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东匪祸之取缔，尤为必要。总之，中国外交，决以自主精神拥护国家，此种立场绝对不变，决不依赖人，亦决不受人束缚。”又宣称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

△　伪军李守信部500余人攻扰绥远兴和县东北庆益乡豆腐窑子附近，被晋绥军击退。

10月29日　　蒋介石由西安抵洛阳，名曰“避寿”，实则部署对西北红军军事。

△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第六师到仁井子及其附近；王震红六军到达相桐川；罗炳辉第三十二军于预旺西南之红羊房与胡宗南第一师作战后，到干盐池堡和古西安州之间。

△　驻朝鲜日总督南次郎与关东军司令植田在图们商朝、“满”合作，决定全鲜铁道归“满铁”经营，并在图们江、鸭绿江上架铁桥，以利军运。

10月30日　　胡宗南先头部队两个师逼近打拉池，毛炳文、王均、关麟徵各部尾追王宏坤红四军及萧克红三十一两军，分别进占郭城驿、大芦子、靖远等地，靖远以北之三角城渡口及浮桥被突进之胡宗南部所控制。王、萧两军被阻未能过河。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青岛市建设公债条例》，总额600万元，年息六厘，八年本息偿清。第一期300万元，定明日发行。

10月31日　　蒋介石50寿辰，发表《五十生日感言》。德国元首希特勒、日首相广田皆有电致贺。南京举行蒋介石寿辰献机典礼，各地捐献飞机70余架，由何应钦代表蒋受机转献国民政府。据蒋寿辰献机委员会常委周至柔报告，截至30日止，实收各方捐款国币655万余元。

△　蒋介石在洛阳召张学良、阎锡山、贺耀组、刘峙、傅作义、商震、徐永昌、陈布雷、朱家骅等开军事会议，商对付西北红军。张学良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痛斥。同日，蒋颁对红军

总攻击令。

△　国民政府国际贸易局长郭秉文致函实业部，报告赴美磋商白银问题及考察国际贸易状况。函称：“中国必须尽量售银于美，俾增厚政府库存之现金及国外汇兑，而保护中国货币对外价格。”

是月　教育部根据民国二十三年度统计结果，编成最近高等教育概况，内称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计110所，教员7200余人，职员5300余人，在校生4.17万余人，毕业生9600余人，图书487万余册。

△　据教育部发表，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留学生共计859人，以留日、留美为最多，年费212.7万余元。

11月

11月1日　国民政府明令撤销驻鄂“绥靖”公署，特派何成濬为武汉行营主任，陈诚为副主任。

△　平、津日军6000余名在北平大规模演习攻防战，4日演习完毕，5日分返天津、通县。

△　北平学联议决，日军在北平举行空前大演习，将由朝阳门至广安门穿行市内，耻辱空前，请学校当局于日军通过北平时，允学生停课一小时志痛。3日，北平各大学于日军演习穿行城内时停课一小时，以示抗议。清华大学师生800余人宣誓保卫祖国，并下半旗示痛。同日，河北省教育界460余人联名电行政院拥护统一。7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部派队员千余人分赴城郊发放赈品，慰问因日军大演习受灾难民。

△　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余人由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后，是日孙玉清红九军占领一条山之琐罕堡、打拉牌一带，将马禄骑兵旅600余人包围。2日，敌马步芳第一〇〇师骑兵两个旅向一条山红军阵地猛

攻，被程世才红三十军击退。马禄表示“接受”联合抗日主张，撤往凉州，红军撤围。

△　匪伪军李守信、王英部在商都集结步、骑兵9000余人，在日军官指挥下建筑防御工事。王英部3000余人窜扰武川、陶林间黑山子，以分散傅作义兵力。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由洛阳飞返太原。

△　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张学良由洛阳返西安。4日，张偕晏道刚、胡抱三飞兰州与朱绍良、于学忠会议西北反共军事。5日，张等返西安。

△　广西省政府宣布自是日起，改用大洋法币为本位，而以桂钞为辅币，法币与桂钞比价为法币一元折合桂钞1.6元。前发金库币券由省银行收回。

△　冀察总稽查处取消后，是日起仍恢复沧盐海防稽查处名义，专办沿海走私军火、盗匪等的缉捕，并秘密售卖查验证，放行私货。

△　安徽省自秋收迄今，输出米粮数百万石，致使粮价飞涨，民食恐慌。是日，该省政府决定禁米出境，以资救济。

△　陇海路通车至虢镇。

11月2日　　冀察政委会主席宋哲元在平宴华北日驻屯军司令田代，席间宋致词，谓中日亲善，应本互惠平等精神，冀察与日绝无密约；并谓目下铁路、邮政及航空联运之一切讨论，皆系赓续到任前业已开始之谈判，将继续采用保护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之政策。田代则否认日军演习有何秘密动机，并声称将根据平等、诚意及互惠原则，力谋中日两国之日趋密切，东三省事决不使之再见于冀察辖境。

△　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李思浩在上海访财政部次长徐堪等洽谈“中日经济合作”。6日，由杭州飞洛阳见蒋介石。8日，飞南京见翁文灏、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等，9日飞上海，对新声社记

者谈见蒋经过，谓所谈仅大体原则；关于经济提携，蒋表示在“不丧主权，不含侵略”原则下可相机进行。

△　傅作义与阎锡山协商绥省防务及治安，旋即返绥。同日，日机一架飞包头侦察。日方由热河续调两联队日军至多伦待命。3日，傅在归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绥省目下尚平静，惟环境复杂，东、西边防均吃紧。“余服务边疆，矢守二旨：一、凡属上级命令绝对服从；二、凡扰害绥民治安者，当予以痛击”。

△　北平名教授刘仙洲、卢郁文、李建勋、何基鸿、于树德、崔敬伯等485人联名电行政院称：“连日报载中日交涉经过，以‘华北特殊化’问题为主要症结之一”，“请政府坚决拒绝侵略者特殊化之要求，誓与全国民众，以全力为政府后盾，保护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　冀东伪政府派外交处主任秘书林东铭偕伪保安队张砚田部接收北戴河海滨自治区。

△　长沙日商金融组合店主山岸贤藏被人刺伤。3日，泊汉两日舰驶往长沙，外交部令湖南省政府将详情报部核办。5日，凶手黄某在株洲被捕，供称系图财所致。

△　前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因胃溃疡症转剧在沪逝世。段氏临终之前，于10月6日预书遗嘱，谓：“国虽微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慎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5日，国民政府明令国葬段祺瑞，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

△　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河西红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　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对记者谈建筑津石路事，谓原拟建筑之沧石路，今改为由石家庄直达天津，现正进行测量工作，资金、材料均已商妥。

△　上海中汇、江浙两银行合并营业，统称中汇银行。中汇原址改称总行，江浙银行宣告解散，改为中汇分行继续营业。资本总额为350万元，董事长及总经理均由杜月笙兼任。

11月3日　须磨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为张群、川樾第七次会谈作准备折冲，仍未获一致意见。7日，日使馆秘书清水与须磨访高宗武，为川樾、张群会谈再作准备，日方坚持以“共同防共”为谈判主题，希望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国民政府则主张先解决地方事件，仍未获妥协。

△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何家堡召开干部会议，朱德总司令传达中央关于集中红一、二、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主力的战斗动员报告。20日，总指挥部、红二军、第三十二军在洪德及其附近；红六军一部在刘溪、新集子一线备战。

△　为抗议日军在北平举行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师生举行悲痛纪念，并要求第二十九军“以演习回答演习”。

△　日军在平郊军事演习后，列队入城，一朱姓女孩因高呼“打倒日本”，惨死在日军坦克之下。

△　华联通讯社社长郁建中及电报员等在上海被法租界巡捕房捕去。

11月4日　绥蒙旗剿匪司令潘王到绥见傅作义，报告乌兰察布盟政情，并商防务。绥东形势紧张，日机六架飞绥东侦察。傅偕骑兵司令赵承绶分赴前线视察，与各部队讲话，表示“誓保国土”。

△　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偕广州市长曾养甫及两广外交特派员

刁作谦等抵香港访港督郝德杰。黄对记者称："中英两国邦交向称敦睦，粤、港关系向来密切，两地经济商务均应切实联络，共同繁荣。"

△　国民政府在云南省置宁蒗设治局，以旧宁蒗县原有区域改置。该地彝族人多于汉人，永守土司势力尤盛，且与川、康两省接壤，区域辽阔，乃设治以资整理。

11月5日　张国焘电令河西红军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称"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的局面"。根据此电，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决定放弃一条山和五佛寺渡河点，分三个纵队西进。

△　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伪军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侵犯绥远。王部由商都进犯陶林，李部由张北以西之南壕堑、大青沟直取兴和。同日，德王以伪蒙古军总司令及副司令卓特巴扎普名义向绥省发出宣战性通电，诡称绥省"企图分化蒙旗，推翻自治"，"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争取最后生存"；"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争。如演成事变，责任完全应由贵省负担"，并提出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军事设备、经济封锁等五项要求。6日，傅作义军击退侵犯陶林、兴和之匪伪军。

△　中国航空公司沪粤线通航，"福建号"巨型水上飞机自上海龙华机场起飞，经温州、福州、厦门、汕头、九龙抵广州，与英国皇家航空公司远东站连接。

△　国糖产销协会以日、荷两国成立贸易协定，将降低食糖价格向华倾销，特电财政部拒绝该两国政府要我降低糖进口税则的请求。

△　桂省锰矿砂因售价大跌，矿商经营困难，由桂省府咨请财政

部豁免出口关税以资维持。财政部以锰矿砂为炼钢及工业上重要原料，国内需要日有增加，出口未便免税，惟行销国内之转口税，可准予豁免。

11月6日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议决：一、补助国民政府教育部义务教育及特种教育费5万元；二、补助国立清华大学设置科学讲座费9000元，聘请法国名教授任教；三、通过考选留法公费生办法，年定五名，留学三年，1937年开始实行。

△　华北日驻屯军部开幕僚会议，讨论华北经济开发等问题。7日，该军部参谋池田抵长春见植田，征询关东军部关于开发华北经济之意见。8日，池田抵津，田代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对此交换意见。

11月7日　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在红山口（位于河北赤城县）举行对抗性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学生在学生会、救国会组织下，分赴演习地区慰问和宣传。

△　两广外交特派员刁作谦自港返广州，谓此次赴港曾与港方商九龙案，此案须由外交部直接与英政府交涉。10日，英国驻粤总领事访刁，解释港政府要求九龙华人他迁原因并探询粤方态度。20日，刁与英方续商九龙案。

11月8日　绥省府主席傅作义致电德王驳复5日电，谓“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翻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即解职，以明心志”。同日，蒋介石接得傅报后，也电致察境“蒙政会”，指责德王之挑衅行为，促令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

△　傅作义在归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加强防务，决定绥东由彭毓斌、董其武负责；绥北由孙长胜、孙兰峰负责，绥西由王靖国负责，并分别任命彭毓斌、董其武为绥东防守总、副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准备作战。

△　察北匪伪军变更计划，图由百灵庙犯绥北。日军官数十人乘机往来于百灵庙、察北间，调度甚忙。同日，察北匪首王英偕包悦卿飞天津，代表德王与日军部秘密接洽。

△　冀察政委会查禁救国组织，通令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谓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女同学会、民族先锋队等组织，“有碍治安”，令严密查禁，勿任自由活动。

△　绥远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呼吁全国援绥。9日，绥远旅平同乡定15日绝食一日，积资慰劳绥远将士。10日，清华大学学生议决停止煤火五日，积资千元，慰劳绥东前方将士。14日，天津14院校发起慰劳绥远将士募捐运动，北洋学院规定每生至少捐一元，并定15日绝食一天，节资慰问。15日，归绥教育界同人联合会为绥远前线将士购置皮衣出动募捐。16日，教育部及其在京直属机关职员捐薪一日劳军。天津各校代表集议决定扩大募捐。20日，天津学界再次发起募捐20辆汽车及万件绒衣劳军运动；北平学生也发起万件皮衣劳军运动。23日，平津教联代表杨立奎、师大代表熊梦飞等赴绥劳军。

△　长江江水猛跌不已，芜湖水位降至18英尺，较去年同时期低12英尺，为数十年所仅见。巨轮均到芜湖卸货，再用铁驳船转运上游，运费加收70％。长江航运衰颓。

11月9日　阎锡山电令颁发绥战战斗序列，任命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

△　财政部以冀、鲁、豫、晋各省农民煎制硝盐，影响耕作，致使民食发生恐慌，特令饬四省盐务机关查禁硝盐并改良盐碱地。

△　田代宴宋哲元等，席间就冀察问题交换意见。10日，宋在天津对记者称：“余对国家，凡所献替，自信绝无秘密。以通航言，此为由《塘沽协定》俱来之公案，余不过完成未了手续耳。譬如经济提

携及资本问题，余主张以平等互惠为原则，需要借款时，亦持三点为磋商根据：（一）款需十足兑付，不折不扣；（二）取消手续及佣扣费用；（三）利息务必减低。若津石路、若津沽港以及龙烟铁矿之恢复，均本此旨去做，彼此虽曾协商，但实现则非咄嗟间可立致。国家到此地步，国人宜免去猜疑，精诚团结。中国如不愿自亡其国家，孰又能亡之？”宋并表示决不甘为亡国奴，也决不做洪承畴、吴三桂。

△　国民政府通令会计年度改为历年制，“定二十八年（1939）一月一日施行”。

△　国民政府任命陶柳为第六十二师师长，原任钟光仁准予免职。

△　第三军军长王均在甘肃通渭马营东南坠机丧命。蒋介石令派该军第七师师长曾万钟暂代军长职务。

△　沪东日商同兴纱厂、上海纱厂一、二、四、五厂，大康、裕丰、公大纱厂一、二厂以及东华纱厂1.5万工人因反对日人压迫实行总同盟罢工。16日，各厂工人主动复工。

△　华北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偕参谋和知自天津飞抵青岛，晤驻青武官谷荻及青岛市长沈鸿烈。10日，赴济见韩复榘，探询韩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见情形。12日，桥本等返津，向田代报告。13日，日舰两艘先后由上海抵青岛，各舰陆战队登岸游行示威。

△　福州日人图以武力向海关索回被没收之私货，与中国警察发生严重冲突，旋包围税务司美人威廉斯寓所，后经日领事到场干涉，始撤。

△　青岛海关缉获运私货日轮一艘。

11月10日　　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约见潘汉年。潘口头传达中共中央草拟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的八条

件。陈代表蒋介石答复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的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潘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提是讨论合作。陈又提出：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愿和周面谈。12月初，中共中央指示潘拒绝蒋的要求。潘并通知国民党方面，红军只能扩充，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真要谈判，必须停战。

△　川樾与张群作第七次谈判。深夜，川樾电东京报告称：“中国态度强硬出于意外，对华北特殊地位与中日合作防共，坚持不同意。”张群坚持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规复及察北、绥东之安定为调整华北中日关系之前提，并要求取消冀东伪政权。次日，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国民政府令，往访日外相有田，说明国民政府关于“共同防共”与华北问题之立场，希日政府谅解。

△　绥北前方发生小冲突，匪伪军由百灵庙方面对绥军作试探性进攻，当即被击退。同日，王英、包悦卿在津与日军司令部接洽完毕飞返商都。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致函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称：“山西现在已成为国防前线，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山西之阴谋，也日进不已。”“抗日不是孤军的抗战，而是全国一致的奋斗。”“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们联合起来，在抗日救国纲领之下，共同推进我们的工作。”

△　国民政府令：《狩猎法》定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4月1日起施行。

△　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呈递国书。

△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孙玉清红九军在干柴洼突破马步青两个旅之截击，进至横梁山，经一昼夜激战，击退尾追之马步芳三个骑兵

旅。13日，红九军前锋部队占古浪城。15日，红九军全部进据古浪。

△　中日合办之天津电业公司行奠基礼。该厂之设计、监工皆由日方负责，技术人员全为日人。

11月11日　　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政府为便利军事，现特划定绥、宁、青及内蒙一带为剿匪区，深恐各该区内外侨之安全受影响，顷由外交部照会各驻华使馆注意，并不得发给该区内旅行护照，无照前往者不负保护责任。20日，绥远省政府通告外侨即退出绥境，否则如有损害，概不负责。近日来，美、英、法、意、日领已令绥、宁、青三省侨民撤退。

△　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秋季大演习开始。参加部队为冯治安所部第三十七师，赵登禹所部第一三二师官兵约3000人，宋哲元任总监，张维藩任参谋长，总监部设于平南庞各庄。12日，由冯治安指挥，两师在黄村、固安间演习对抗战。13日，为攻守演习，宋偕秦德纯前往指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300人分赴演习地区慰问，并赠“国家干城”锦旗一面。14日，演习毕，宋等由固安随军抵庞各庄举行阅兵式。华北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与参谋和知由津飞庞各庄参观。

△　关东军参谋部幕僚会议确定对绥策略：一、中国冀察军与绥晋军同时之迎击场合，则华北日驻屯军即为作战之主力，以伪军为辅，战时中心在冀、察、平、津，成为决死场；二、若仅有绥晋军迎战之场合，则华北驻屯军坐镇察冀，取监视宋哲元军之态度，以伪军匪军攻绥北、绥东，取包围之游击式作战方略，使晋绥军疲于应付，兵力分散，再集中猛攻；三、目前作战，以不引起冀察战争为主，俟两月后形势顺利，再图发动。但今绥远之进击，仍为侦察性质，伪匪军作战以严冬为得占时利，以充厚之给养，伪匪军之北方耐寒性，取得军事供给上之优势。

△　国民政府重申公务员应革除婚丧寿宴浪费令。

△　商都、南壕堑伪军李守信部向绥东陶林一带进攻，并有日机助战。12日，李守信部向兴和、丰镇进攻，均被击退。

△　中共中央军革委授予已过河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三个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共21800余人以西路军番号，并任命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

△　程世才红三十军进至大靖附近，守军马步青骑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继进围凉州，占领四十里铺。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进至甘北地区。

△　阎锡山遵父命将遗产87万元捐助绥远抗日将士。

△　陆宗舆在北平就任龙烟铁矿督办职。13日，陆在冀察政委会与齐燮元、门致中、贾德耀、邓哲熙等商议办矿事宜，晚赴津与田代接洽日方投资问题。

11月12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由沈钧儒主持。李公朴等讲话，抨击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呼吁团结抗日。沪东区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代表讲话，介绍日本纱厂和声援日商纱厂罢工的上海26家工厂4.5万人大罢工情况，呼吁各界给予经济援助。大会一致通过成立支援日商纱厂罢工斗争后援会，当即募款400余元。会后，上海各界救国会散发“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的呼吁书。

△　日本首脑部因张群、川樾会谈无望，故电驻华北陆、海、外机关首要征询意见。是日，田代与驻津日领事堀内、海军特务机关长久保田交换意见，结果均同意中止谈判，一切悬案保留，俟机再交涉，遂以此意电复东京。

△　刘文辉率步兵一团自雅安首途入西康，亲自主持西康建省委员会事宜。

△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绥发表慰勉武装同志文，谓："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罗代表中央大学3000名教职员和学生向抗敌将士致敬。

△　旅京绥远同乡集议援助并慰劳绥远将士办法三项：一、请国民政府、军委会、行政院实力援助绥远将士戮力抗敌；二、推国民党中央委员赵允义等晋京谒党、政、军当局，陈述绥省实况；三、按在京同乡月薪额捐款劳军，月薪500元以上者捐200元，最低月薪20元者捐四元，学生则减食一周，节款捐献。

11月13日　　红一、二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余部由靖远、会宁转移至海原东之同心城一带。是日，胡宗南第一军向同心城、王家团庄进攻，红军放弃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李旺堡，向豫旺转移。15日，胡宗南军分三路攻预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集中在预旺东之萌城堡、甜水堡一带据险还击。16日，红四方面军一部与红十五军团向萌城、甜水堡东进。17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四个团预伏在萌城西北之羊福山沟，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及第九十三师一部预伏于魏家山，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另一部在萌城西之石梁山正面，阻击胡宗南第一师之第二旅，胡军官兵死伤甚多。另一部红军在萌城西石板桥附近与胡军激战后，退入甜水堡。18日，红军在萌城击溃胡宗南部第二旅后，向山城堡及环县转移。

△　日陆、海、外三省开紧急会议，商对华谈判对策，议决对已同意诸点积极进行，尽早促其实现，对华北及防共问题，力获国民政府最低限度接受。

△　董其武在平地泉就绥东保安司令职。

△　日机三架飞平地泉侦察，投弹数枚向商都方向逸去。夜间匪伪军千余人猛扑绥东防地，与赵承绶部骑兵师激战。

△　伪军王英部驻百灵庙骑兵第一旅第一团团长苏义和率士兵1000余人反正。

△　杭州西湖灵隐寺罗汉堂因香客烧香不慎失火，500尊罗汉全部焚毁。

11月14日　　绥远抗战揭幕。在日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下，由王英部伪“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率领伪军2000余人向陶林境红格尔图推进。夜12时，先头部队进至距红格尔图四里之阳坡村，与傅作义之侦骑接触。次日，王英部伪军在飞机掩护、山炮配合下向红格尔图猛攻六次，激战至晚，卒被傅作义部及地方团队击溃。16日，王英伪军3000余人再犯红格尔图，战况激烈，企图夺取平地泉、卓资山。傅作义在集宁命彭毓斌率骑兵四个团、董其武率步兵两个团星夜驰援。敌机数架飞陶林、兴和一带继续轰炸，掩护伪军前进。

11月15日　　财政部准各省、市地方银行发行辅币券，其办法如下：一、发行数额须先呈财部调查核准；二、发行式样须绘图呈财部审核以资统一；三、印制委托中央信托局代办；四、须照法币发行办法预定法定准备金，由财部随时派员检查。

△　驻平汉线北段之东北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是日开始演习三天。参加部队为缪澂流、孙德荃、朱鸿勋三师及王奇峰骑四师一部，炮兵、工兵各一营，混合编成南、北两军，朱、缪分任指挥，万任统监，北军由望都、南军由新乐分别前进，在新乐附近作遭遇战。17日演习完毕。

△　西安市各中小学校扩大成立救国会，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

△　中国佛教会在上海举行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计15省八市127人，以圆瑛、叶恭绰、王一亭、雪峰、智圆五人为主席团，赵朴初为记录。大会议案有修改会章、弘宣教义、僧众教育、整理教规、保护教产、促进会务等项。

△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指出："四万余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每天要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他们所得的工钱，最低的每天只有一角八分，连饭都吃不饱。""援助抗日罢工，是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同胞的责任。""我们要求华商厂厂主及工友一致以实力援助日厂罢工。"

11月16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绥远问题宣言，提出：一、华北中日经济协定，已经把所有的国家命脉断送净尽，中央要负完全的责任；二、中央对于绥远的安全，应负绝对完全的责任；三、中央对于绥远如依然以消极抵抗，与敌言和，我们万万不能承认；四、政府应该发动全国规模的积极抗战，立刻停止内争，尤其应该停止南京谈判；五、要求全国实力派一致请缨抗敌；要求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军队。

△　马步芳部五个骑兵旅及民团一部赶至古浪一带，以两个旅从古浪东北及西南钳击孙玉清红九军，强攻不克，佯作败退。红九军以主力出击，遭逆袭，伤亡重大，撤回古浪城内固守。17日，马部突入城内，红九军与之激烈巷战，至18日晚，撤出古浪，向北转移至四十里铺。此役歼马军2000余人，红军也损失2000余人。

△　国民政府任命李及兰为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牟中珩为陆军第一百十四师师长，徐继武为陆军第四十八师师长。

△　蒋介石电令农民银行在宁夏、青海设立机构。

11月17日　　晨，伪军在山炮、重机枪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向红格尔图东北及正北阵地突击，连续数次，均被击退。18日，董其武率

部出敌不意，袭击红格尔图东北达拿村伪军指挥部，进行包围；彭毓斌率骑兵迂回敌后，截击增援之敌，激战三小时，于19日拂晓将敌彻底击溃。王英与田中隆吉仓皇逃走。

△　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绥高级将领徐永昌等十余人共商绥省军事。蒋介石亦自洛阳飞抵太原晤阎，嘱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继续扩大，由南京从外交方面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

△　韩复榘应宋哲元约到南宫晤商冀鲁联防。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援绥抗战分电国民政府及傅作义、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榘等。致国民政府电要求“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乘机收复失地”。致张电称：“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致傅电促“积极作战，乘机收复失地”。

△　据《申报》讯：日本乘路远缉私停顿之际，将大量私货运津，每批约150余载重汽车。各奸商因冬季河道结冰，来货不易，皆大量购趸，日本正金、朝鲜两银行特放款接济私商，总额达500余万元，故冀东日本纸币已直接行使市面。依伪冀东政府统计，自本年1月至10月底，经北宁路运津私货共漏税在4400万元左右。

△　中日合办惠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津开幕。18日，津连（天津至大连）、津锦（天津至锦州）两线通航。19日，津承（天津至承德）、津张（天津至张北）两线通航。20日，又辟专供日军官员使用之军用航线津青（天津至青岛）、津太（天津至太原）、津包（天津至包头）三线。

△　东北旅平二救国团体代表于毅夫等抵绥慰劳前线将士。同日，上海各团体决定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并募捐劳军。

△　胡宗南分兵三路向定边、盐池前进：左路第一师李铁军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右路丁德隆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中路廖昂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被红四方面军王宏坤第四军在萌城以西地区击溃，后由邹洪第四十三师接替中路。

11月18日　　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联合发出“决战动员令”。令称：“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

△　蒋介石由太原飞返洛阳，次日又飞往济南晤韩复榘，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其“剿匪”方针。

△　高宗武访川樾交涉绥远事件，日方否认有日军参与。同日，日外务省发言人天羽声称：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内政，与日无关，纵有日人参加蒙军作战，也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政府及日军无涉。继而又承认日政府对伪蒙“因反共而起之任何防御行动”表示同情。

△　汉口各业工会代表致电傅作义及前方将士，谓武汉30万工人誓作后盾，并议决全市工界以一日所得劳军。

11月19日　　国民政府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及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均着撤销；特派刘湘为川康“绥靖”主任。

△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部署战斗，以左权第一军团、徐海东第十五军团和王宏坤第四军、萧克第三十一军集结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出击；贺龙红二方面军和贺晋年第八十一师等部集结于洪德城、环县及其以西地区，担任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的任务；宋时轮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左路李铁军第一旅。同日，胡宗南第一军侵占惠安堡，其丁德隆第七十八师经预旺堡、古城于20日占

领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妄图从两翼合围红军于盐池以南地区。

△　陈立夫与潘汉年在南京继续会谈。陈坚持蒋介石原提各点无可让步，潘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交陈，供国共两党合作参考。晚，张冲看望潘汉年，望双方继续努力，并转达陈立夫意见，希望潘把蒋的意见电告陕北，如果周恩来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　伪军以包悦卿部骑兵为左翼，王英部步兵任正面，李守信部任右翼，共3000余众向兴和陶林猛袭，被赵承绶部及援军击退。德王、卓世海遂分别就蒙军司令、副司令职，率军开百灵庙。

△　日本关东军参谋原田大佐、航空大队长饭岛由长春飞抵天津，与田代、桥本等交换应付绥东办法。20日，据《申报》讯：绥、并日特务机关工作人员均增加。天津日军部已先后派出军官数批前往。

△　南京妇女界李德全、何香凝募捐慰劳绥远前方将士。何对南京妇女界称："本人系一画家，唯有将书画换来的钱，汇至前方聊表慰劳。希望文官多出钱，武官多出力。"同日，上海市文化界成立绥远剿匪后援会，议决电慰傅作义及前方将士，并通过文化界募捐慰劳办法。又太原山西陆军监狱全体监犯绝食一日，节省囚粮捐献绥东抗敌将士。

△　是日至23日，青岛日商内外棉、大康、隆兴、同兴、丰田、宝来、上海、青山等纱厂及瑞丰染织厂工人共2.4万余人要求厂方延长休息时间、增加工资及改善待遇等，先后罢工。25日，大康纱厂4000余罢工工人包围公安局第五分局，并捣毁日人汽车。同日，驻青日领事为日纱厂工人罢工事数次至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限时平息，否则即派驱逐舰水兵武装登陆。27日，市政府与日领交涉结果：一、工资增加5%；二、面贴照旧；三、嗣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四、不

得虐待工人；五、恢复吃饭休息时间；六、被开除者酌予复工，不能复工者资助回里。罢工工人基本接受以上条件。

11月20日　　傅作义在绥远新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复百灵庙，以孙长胜为前敌总指挥，孙兰峰为副总指挥。兵力配备为：孙长胜骑二师三团骑兵，孙兰峰步二一一旅二团步兵，王靖国部一团步兵，周玳部一营炮兵并装甲车一辆。

△　李守信、王英等匪首以犯绥未逞，与日军官八人在商都开紧急会议，决改变策略，转扰绥北，以百灵庙为中心，进窥归化、包头、河套。同日，傅作义由平地泉返归绥，下达以迅捷手段袭占百灵庙命令。

△　是日至23日，蒋鼎文在建瓯开闽浙边境“剿匪”会议，两省师长、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出席，张发奎亦派员出席，商分配防务，加紧“剿共”。

△　昌黎伪冀东保安队第三总队第四大队韩则信部400余人哗变，将日宪兵队长樱井、顾问平井囚于货仓中后，逃往丰润县。23日，一部抵玉田、遵化交界处之燕山口，后经榆关被日军伪保安队第二总队围击，200余人被迫缴械。韩则信下落不明。

△　交通部邮政总局与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在南京签订《互换包裹协定》。

11月21日　　红军西征军主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进行环县山城堡战役。下午，左权红一军团、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发起总攻，红四方面军之王宏坤第四军、萧克第三十一军配合作战，与胡宗南部激战一昼夜，将丁德隆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及第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全部歼灭。同时，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之胡宗南部李铁军第一旅，也被宋时轮红二十八军击溃。山城堡战斗胜利结束。胡宗南部主力西撤。

△　绥北吃紧，匪伪大军退集百灵庙，欲南犯武川。晚，曾延毅率第三十五军一部进驻武川。同日，阿王到归绥，与傅作义商剿匪事。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书》，希望政府立即断绝对日亲交，剿灭察、绥伪匪，并号召全国各界立即召开临时紧急国民救亡代表大会，讨论全盘抗日作战之方针，发动四万万同胞一致奋起抗日。

△　青岛各界成立慰劳前方将士会，参加者数十团体，规定募捐办法。上海各界推行“国民一日所得运动”。张学良与东北军各官佐，共捐一日所得款一万元，慰劳绥军。

△　唐山华新纺织厂与日商大阪吴羽纺绩会社签订合办契约。该厂拥有2.68万纱锭，500台织布机。

△　日设满洲兴业银行，统制伪满洲国金融。

11月22日　　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杨爱源、徐永昌、孙楚、杨效欧开军事会议。同日，汤恩伯第十三军、门炳岳骑兵第七师与驻宁夏阿拉善之关麟徵第二十五师开抵大同。

△　李守信在南壕堑指挥匪伪军再犯兴和，并以飞机、坦克助战，被傅作义部击退。

△　察哈尔省旅京同乡开会呼吁收回察北，决议：一、向中央政府请愿收复失地；二、通电慰劳绥远将士；三、通电冀察政委会及察哈尔省政府迅速出兵收复失地；四、通电全国各地一致援绥；五、组织察哈尔省抗敌义勇军，并推定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同日，石家庄各界成立慰劳前方将士联合会，参加团体80余个。

△　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决议，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团结一致，抗日救亡。

△　关东军首脑部在长春连日讨论绥东情势，是日决定策略如下：一、要求东京停止中日交涉，采取有效方法；二、增派日伪正规军三师协助侵绥；三、华北日驻屯军严密监视冀、察华军行动，俟华军出动援绥，华北日驻屯军应即攻击。23日，田代召集桥本、松室等讨论绥事。24日，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抵津，与华北日驻屯军协商时局，华北驻屯军部主张对绥事应取“适可而止”方针。

△　本年丰收，粮价竟至高涨，是日财政部、实业部、军政部协议，主张全国粮食自由流通。24日，行政院通过粮食调节暂行办法，规定：一、粮食在国内应听其自由流通，以达到供求相济，各省、市应一律停止禁运；二、目前不禁止输出，嗣后由海关按月调查粮食输出入种类及数量，遇有禁止出口必要时，再由财政部报行政院行之；三、本年粮食不足之省，由实业部农本局与当地官厅协商后，自农作区域输入调节；四、农本局调节粮食时，交通、铁道两部应减低水陆运费。

△　四川省合作金库在成都开业，基金1000万元，由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任理事长。

△　惠通航空公司中日双方因军用线问题产生矛盾，中方要求取消军用线，日方坚决不允，理事长张允荣拒赴公司办公，一切事务归日方副理事长儿玉常雄处理。28日，陈中孚访和知等，请停止日军用航线，日方诡称此线以前即有，非开航后增辟。

△　日轮“盛京丸”由基隆到福州，海关一队登轮缉私，即遭痛击，数人重伤。

△　北方作家协会成立，选举曹靖华、杨丙辰、李何林、孙席珍等11人为执委，杨刚等五人为候补执委。成立后，在《北平新报》上编印《文学周刊》，宣传抗日救亡。

11月23日　　清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

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以所谓“鼓动工潮”、“反动嫌疑”等罪名，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分别解送江苏高二分院及高三分院审讯。沈钧儒等在法庭上驳斥了上海市公安局代表对他们的诬陷，重申“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主张。法院被迫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又被拘捕。次日，李公朴亦自投法院，史良因故躲避未到案。上海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发出通缉史良令。此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 百灵庙伪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3000人分两路向武川、固阳出动。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指挥之孙兰峰旅、王靖国之第七十师补充团以及赵承绶部孙长胜骑兵师，一面迎击，一面派骑兵绕袭百灵庙，激战10小时，次晨9时占领百灵庙，敌伤亡七八百人，俘虏300余名。

△ 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红十字会合组的绥远剿匪慰劳救护会派代表黄炎培、王晓籁等七人飞绥慰劳将士。次日，该会以10万元汇绥前线。上海各界援绥捐款已达50万元，上海市民发起赶制战士御寒皮、棉、绒衣及药品运动。25日，黄、王等抵绥见傅作义，并将5000元现金分赠受伤士兵800余人。

△ 香港广东银行总行在董事长宋子文主持下复业。

11月24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沈钧儒等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声明救国会的宗旨，“只在抗日救国”，是全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所组织的，不是受什么人利用成立的。现在领袖虽被无辜逮捕，但救国会的会员决不因而放弃抗敌救亡主张。郑重宣言：如果政府还愿与人民合作抗敌，团结一致对外，就应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并要求：一、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二、公开保护救国运动；三、打倒汉奸；四、立即抗战。

△ 北平文教界李达、许寿裳、许德珩等109人联名致电国民政

府，要求即日开释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勿再拘传。同日，北平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议决，自25日起罢课两日，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

△　行政院会议通过京赣铁路建设公债案，总额1400万元，年息六厘，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还清。

△　中日实业借款整理案由孔祥熙、江藤签字成立。该借款原为中日实业会社在民国八年时贷与汉口造纸厂者，款额为72.5万元，至今本利皆未偿付。这次整理，规定中国今后偿还一本一利，即145万元，八年偿清，月偿1.5万元。

△　日飞机四架轰炸百灵庙，被绥军击落三架。日关东军特务机关向傅作义抗议。

△　司法院秘书宋述樵从贵州省视察司法返南京，称贵州省本年遭受各种灾患之受灾县份共56县，约占全省三分之二，灾民约200余万人，农作物及财产损失达3000万元，现虽新谷登场，但粮价已涨至20元之外，灾民嗷嗷待哺，为状极惨，如不预筹赈济，将蹈1934年大荒之惨状。

11月25日　　上海市政府发表沈钧儒等被捕经过，诬称沈钧儒等七领袖之罪状为“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等。

△　国民政府发言人否认日方所传中英同盟说。

△　国民政府任命陈可忠为国立编译馆馆长。

△　《德日反共协定》由德代表里宾特罗甫与日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在柏林签字。同日，沪德国新闻社发表声明，谓该《协定》并不危害中国主权及其他权益，德国对华维持亲善，中国对此不必具任何疑

问。26日，国民政府宣布：“今后防共工作，政府深信可恃自力应付裕如，且纯属内政问题，无待与任何第三者协商之必要。”27日，驻华德大使陶德曼访张群，说明《德日反共协定》性质，张提醒德国政府注意中国自力“剿共”之一贯政策。29日，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纪念周讲话，宣称“中国剿共为中国内政，决不受国际任何影响或牵制”。

△　外交部长张群电询驻法大使顾维钧，在目前情况下应采何种外交政策。次日，顾复电称：“我国处境危急，地位孤立。”“前此我与德、意接近，凡军事上之一切人才、器械，大都取之于彼。……现德、意与日结合，实际上同以侵略、主战、反对国联为政策。是不特与我国策国情相背，恐于我国前途有害。日本或将借口我国不肯与日订立防共专约，逼我加入柏林协定，以绝中苏合作之途径，而遂其侵略之计，是宜一并拒绝之。”顾主张“改弦易辙”，速谋与英、法、苏、美四国接近。

△　北平各校以绥远抗战关系民族国家存亡，救国已至最后关头，应集中国力奋起杀敌，决定停课，并推代表六人与津、保、京、沪等地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同日，南京各界开慰劳守土将士及贡献一日所得运动成立大会，并以大会名义电慰傅作义及前方将士，通电全国一致行动。

△　《读书生活》出至第五卷第二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查禁。

11月26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宋庆龄为沈钧儒等七救国领袖被捕在沪发表声明，提出抗议。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毫无根据的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所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完全是促进政府与人民的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恰巧与日帝国主义的挑拨武断的言词相反，救国会既不袒护共产党，也不反对政府”。最后庄严宣告：“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

△　李宗仁、白崇禧为营救沈钧儒等致电冯玉祥、孙科、居正、程潜等，称：“公等主持中枢，党国柱石，务恳迅予援救，以顺舆情。”

△　德王在西苏尼特旗卧病，有日员三人往探，力唆德王再征集蒙军反攻。

△　宋哲元加委齐燮元、张维藩等为龙烟铁矿研究会委员，着对资本募集、矿坑采掘，慎重研究进行。

△　据上海《时事新报》讯：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医学毕业生，自民国元年至现在共有4517人。

11月27日　　国民政府令准免宋哲元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任命冯治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严重抗议当局逮捕救国会七领袖，驳斥上海市当局诬陷救国会的罪名，吁请全国人民营救。声称：“此次敝会七领袖于一无罪证之情形下，即为市公安局会同英、法租界捕房所逮捕，于法律上言之实为非法，就领袖本身言之实为无辜。”

△　广西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反对逮捕沈钧儒等七位爱国人士，称沈等七位先生“为救国被拘，凡我国人，亟应竭力营救”。

△　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请缨抗日书，称：“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

△　日陆军省军事参议官佐藤中将由长春飞津，向田代、桥本传达日中央首脑部对绥东、华北意见。同日，伪满外交部与日关东军司令部在长春共同发表公告，谬称：如绥远局势危及“满洲国”之安宁秩序，则日本与“满洲国”当局不得不取适当办法，以防患于未然。

△　曾养甫代表粤省当局与英商马尔康公司签订改进广州自来水工厂合同，约需华币225万元。同日，并与英商通用电气公司签订购买价值英金20万镑之李兰德牌公共汽车62辆之合同。

△　据《申报》蚌埠讯：皖北入秋以来，旱象惨重，三月未雨，田畦龟裂，灾区广达20余里，尤以太和、阜阳、临泉、霍丘、涡阳、亳县、蒙城、宿县、灵璧等县灾情最重。

11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具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而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

△　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安抚傅作义，并指示傅和汤恩伯、门炳岳准备"剿共"。

△　纽约华侨抗日会和中华公所致电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称："养日全侨大会公决本会加入贵会一致抗日救国。倾闻七领袖被捕，甚愤，已电宁请释。盼奋斗到底，本会誓为后盾。"同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领袖，并惩办陷害主犯。

△　上海26家日商纱厂四万余工人在上海工人联合会领导下爆发反日大罢工，得到社会各界支持。12月15日，沪东、沪西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代表朱永康等20人及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朱学范，与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公安局代表在法租界谈判。经杜月笙调解决定：一、工资增加5%；二、将月赏工制改为奖励制；三、不准无故开除工人；四、不准打骂工人；五、每日工作12小时，礼拜天工作14小时，多做之二小时另给工资；六、12月16日晨复工。日本纱厂工人总罢工胜利结束。

△　绥境蒙政会正副委员长沙王、巴王、阿王、潘王等通电拥护

中央，争取民族独立。称，蒙族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同舟同命，愿在中央领导与地方当局之协力下奋斗，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　伪军李守信之一部在嘉卜寺反正。王英部旅长苏雨田亦反正。

△　日关东军司令部举行绥事重要会议，第一、四、七师团长均参加，听取板垣报告在津会谈结果，赤峰、承德日军已作紧急出动准备。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由长春抵津，田代即召集会议，由石原传达参谋本部对绥事命令及长春关东军部议决案。

△　《意日协定》正式成立，规定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承认阿比西尼亚为意大利属地。30日，驻华意大使齐亚诺由上海到南京访外交部长张群，声明中意友好毫无变更，张当即就意日协定提出质询，意使允电本国请示后答复。

△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以所谓“赤匪嫌疑，危害民国”罪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

△　西安各界举行纪念杨虎城率部守城十周年纪念大会。到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及各界民众五万人，由杨报告十年前坚守西安八个月的意义与经过。张讲话对杨坚守西安策应北伐备加赞扬，嘉勉第十七路军以更坚定的意志与牺牲精神，和东北军一起对日军作战。

11月29日　　上午，第三路军总司令，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抵归绥会晤傅作义、王靖国、汤恩伯、赵承绶、门炳岳等将领，商绥远剿匪军事。下午，陈对记者谈称，“国军入绥各部，除已到达者外，今后当就事实上之需要，陆续增调前来。今后剿匪任务，自一惟中央之命是从。”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经常委会议决，特派张语还参加西北救

亡工作，张是日由沪抵陕。

△　李济深、翁照垣因绥战决定中止出洋。第四路军退伍军官500名准备北上，自愿协助绥军作战。

△　南京华侨组织绥远剿匪将士慰劳团，通电海外华侨积极援助前线将士。同日，北平清华大学学生战地服务团一行18人赴绥。

△　据《申报》浙江慈溪讯：该县南乡富孀陈氏，其夫原在东北从事矿业，前年被日军惨杀，近见绥战又起，痛心往事，复感国事日急，乃倾其家产输助绥军，遗书家人，服毒自杀。

△　《独立评论》第二百二十九期刊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所撰时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揭露日本大搞“华北特殊化”的最终目的是使华北脱离中国，并入日本；指出华北特殊化的局面不是日本一方所能单独造成的，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造成“华北特殊化”的重要原因，要求政府“明令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速令二十九军出兵援助绥远，尽政府守土卫国之责”。该文因触怒日本当局和国民政府，12月初《独立评论》被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　日关东军部第二课长武藤、参谋小野及第七师团高级参谋吉冈等在嘉卜寺召开伪匪首领会议，企图再犯兴和、陶林及反攻百灵庙。

△　驻津日军萱岛第二联队在津郊大毕庄、宜兴埠演习夜战，攻守队伍各800名，以天津为争夺目标。

△　据《申报》讯，日方统计，全华现有日纱厂共纱锭52.46万余锭，布机8786架，占全中国纺织业80％强。工厂多设在津、青、沪。

11月30日　　财政部以晋绥军事需款，孔祥熙先拨临时费50万元汇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除前已向太原商会借款100万外，现复向

太谷等县借221万元，充作战费。

是月　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和西安学联发起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会后并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　张学良派应德田到上海慰问沈钧儒等七君子，转告张反对内战、联共抗日决心已定。

△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王昆仑、冯玉祥等支持下，推动国民政府中上层人士如覃振、居正、孙科等发起援绥军民抗日运动，并成立“南京各界援绥后援会”，柳亚子、经亨颐等均参加成立大会。会后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运动，一直深入到政府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医院病房中。

△　德、日签定反共协定，日外相有田对驻日大使许世英表示欢迎中国参加。许奉南京之命谢绝。

△　天津振远机制酒精公司成立，资本50万元。

△　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宝马顶子正式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陈荣久任军长。下辖三个师，700余人。

△　抗联第十军正式建立，军长汪雅臣，约千余人。

12月

12月1日　国民政府特派何成濬为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陈诚为副主任，任命郭忏为武汉警备司令，撤销驻鄂绥靖主任公署。

△　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声称：“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掠战争即将爆发”，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调集

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声明“全中国主力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和职业，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团结抗战。

△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联名致书蒋介石，略谓：“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北平市市政公债条例》，定额300万元，用于完成公路，举办卫生救济及其他建设事业，扩充义务教育，发展市银行业务，并整理财政。

△　日本驻华北海陆军积极备战。是日，第十四驱逐舰队司令官久宗等抵津，与海军武官久保商渤海湾“警戒”与“保侨”事。4日，旅顺、秦皇岛、塘沽、平、津等地日海军武官、舰长在津商议华北要港“警戒”与“保侨”办法及渤海湾沿岸紧急出动法。同日，田代召集驻张家口及绥远日武官具体讨论侵华军事。6日，驻锦州日军第九师团一部移驻滦、榆等地。日海军除自旅顺港增调驱逐舰多艘到津外，并积极组织陆战队，一切布置，均依战时编制。

△　热河伪军张海鹏部3000余人，由日军官指挥集中于滂江。伪军于芷山部2000名，携重武器由辽宁西移。绥东商都、绥北大庙子匪伪军8000余人，以大庙子为根据地，一部抵察绥边境大靖沟，定日内分两路扰绥：一路由滂江再犯百灵庙，一路由大靖沟进扰陶林、兴和。

△　冀察当局为加强河北省各边区地方防务，决定增编两个保安

旅，以前天津市公安局长程希贤和高树勋分别任旅长。

△　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救国会七领袖，并致电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呼吁更加努力救国。

△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受抗联委托发表关于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最近活动状况的谈话，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　清华大学绥远前线服务团19人，携棉衣730件及医药用品等物到绥远前线慰问受伤将士。2日，北京大学化学系师生抵绥从事支前工作。4日，燕京大学新闻系战地调查团及清华前线服务团，在绥慰劳伤兵，其他平、津各大学学生代表群集归绥，分赴各医院慰问。

△　中国出席太平洋学会首席代表胡适返国抵上海，盛赞美国对华舆论。3日晚，胡在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会等五团体招待会上演讲《演变中的太平洋》，称“日本对华侵略将酿成世界战争”。

△　国民政府任命陆军中将黄显声为陆军第一一九师师长。

△　伪冀东自治政府强行接收冀东各县司法机关，是日在通县、唐山、玉田、迁安各设一地方法院，另于通县设置伪最高法院。

△　青岛日商纱厂开除工人，大康、隆兴、内外棉等纱厂相继罢工。各日商纱厂联合决定，将其余未罢工之六家纱厂悉数停闭，致使2.7万名工人顿陷失业。2日深夜，日海军陆战队760人借口青岛纱厂工潮登陆。3日晨，派队搜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胶济路党部及平民报社等，逮捕国术馆秘书向禹九等九人，并在九个纱厂各驻兵40余人。同日，日方提出苛刻复工办法，迫使市政府接受并开除大量工人，计丰田40人，内外棉100人，隆兴116人，同兴20人，大康220人，公大115人，共500余人。市政府屈服于日方压迫，于12日令四方、沧口等乡镇办事处胁迫工人复工。14日，日商纱厂大部分工人复

工。

12月2日　国民政府任命朱家骅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黄绍竑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任命黄绍竑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卢铸着毋庸代该省政府主席职务。

△　绥赵承绶部骑、炮兵向商都附近增防。日军约2000名，飞机30余架驻商都。绥东伪蒙军抵三道沟、黑山子一带，兴和、陶林边境不断有小接触。日机三五架一组不时飞平地泉侦察。

△　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共中央会合。

△　广东省退伍军官一部到绥抗日。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遗产税原则。

△　上海市妇女界成立绥远剿匪慰劳会，议决募集手套10万双、丝棉背心五万件，以慰劳绥远抗日前线战士。同日，北平各界援绥联合会成立。

△　汉口杂粮油饼业公会以余汉谋、黄慕松电请国民政府取消洋米进口税，足以动摇平衡国际汇兑，扰乱全国商业，残害农村经济，特电请行政院及财政部、实业部不予批准，以安定人心。3日，上海市豆米业及杂粮油饼业两同业公会，亦分电行政院、实业部，请勿予照准，以维持农村。25日，财政部电复广东省政府洋米税碍难免征，并请实业部督促湘、赣、皖等省将产米源源运粤，以济民食。

12月3日　拂晓，匪伪军5000余人，由日方百灵庙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指挥，自大庙、商都到达百灵庙东南、西南及正西三个方面。晨6时，王英部副司令雷中田率伪军千余人向百灵庙发起反攻，激战三小时，被孙兰峰旅击退，雷中田被击毙，并俘匪200余人。晚，绥军发动总攻击，匪向北溃退。

△　张学良乘军用机飞洛阳见蒋介石，请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前线抗日，蒋坚决主张“剿共”，仍令即日回陕。张央求释放救国会负责人，蒋亦拒不采纳。

△　晚，西北回军马步青部进攻永昌以西水泉子、宋家堡一带红军阵地。4日晨，与西路军红军步、骑兵遭遇，激战竟日，红军退出宋家堡。同日，马军进犯永昌三十里铺红军阵地，红军自动转移，敌又进犯十里铺一带。10日，红三十军占领永昌和山丹。11日，马步芳第一〇〇师旅长马元海率部进犯永昌十里铺之红九军。战事甚烈。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至西宁杀害。12日，马军进犯山丹，22日陷永昌东关，28日陷永昌。

△　外交部就日本海军登陆青岛事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同日晚，外交部长张群会见川樾大使，提出要求三点：一、撤退日本陆战队；二、释放违法逮捕之人民；三、返还日陆战队违法强取之各种文件。川樾允转达日本政府，并要求继续中日关系之讨论。川樾遂诵读一预拟的历述过去谈判情形的备忘录，并将此备忘录留置。张以内叙各节与实际出入甚多，不能接受，退还日使馆。4日，外交部声明，该件既非谈判之正确记载，不能作参证根据。

△　驻华德使陶德曼赴外交部晤张群，根据该国政府训令，答复张群前次所提关于《德日协定》的质询，谓：“《德日协定》绝不致妨碍中国利益，中德友好关系也决不因是发生任何不利影响，德政府将继续设法增进中德间的敦睦邦交。”

△　法国殖民部长莫泰与驻法大使顾维钧会谈，要求中国辞退德国顾问，并称已向法国外交部建议与中国订立合作条约。顾称已向政府建议争取和法、英、美、苏合作。8日，张群电顾表示同意。

△　美国纽约中国学生会抗日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释放救国会七领袖。

12月4日　蒋介石由张学良等陪同，自洛阳抵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亦先后到达。中央军纷开潼关，最新式战斗机分批在西安机场降落。6日起，蒋在华清池排次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听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杨提出：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大军在后接应督战；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陕、甘两省让出，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10日，蒋严令“在三个月内对红军进行扫荡，12日开始总攻击”。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重申各省对外交涉应由中央办理前令，凡各省、市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条款，非经中央核准者一概无效。

△　武川境内红房子、北号村发现伪骑兵千余人，欲遮断晋绥军与百灵庙联系，同时以步兵1000余人包围关帝庙晋绥军。孙长胜师分路迎击，战况激烈。

△　上海市公安局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六人移送至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侦讯。当日即由该处开庭个别侦查，然后送横街看守分所监押。史良于30日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投案，被羁押于司前街女看守所。

△　日外务、海军、陆军三省代表协商对华方针，决定：一、日本将要求中国政府切实答复川樾3日下午致张群外长的照会；二、如中日谈判决裂，日本当取适当自卫法，无论中国何处，凡日侨生命财产有危险之虞时，立即派陆、海军实行警戒。

△　国货联营公司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家庭工业社等50余工厂推代表李新甫等向实业部请求扩大国货联营公司组织，以资普及。

△　赛金花在北平病故，葬于陶然亭鹦鹉冢旁。

12月5日　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国民政府令往访日外相有田，抗议青岛日海军陆战队非法登陆事，要求：一、立即撤退登陆日军；二、恢复纱厂原状；三、释放非法逮捕之华人；四、归还被抄收之华人财产，并声明保留提出其他要求权利。有田答称：此系偶发性行动，俟局势和缓，自当撤退。有田态度强硬，反提出解决工人罢工要求。

△　晨，晋绥军骑兵肃清达尔罕旗残匪。午刻，日伪派飞机八架，先后至百灵庙轰炸，掷弹100余枚。匪伪军败退至大庙子。伪满军三个师分三路向察北集中，混入伪匪军内者，均着蒙古装。同日，王英部残匪围攻武川，经孙长胜部出击，不支溃退，孙部克红房子、北号村一带，并占领大庙附近之五囫囵。武川县迤北三眼囫囵等地伪军四五百人派代表接洽投诚，被第三十五军收编。

△　冀察政委会经委会主席李思浩访天津日驻屯军部第三课长池田，商华北“经济提携”。关于华北经济开发，日方仍主张抛开中日外交关系，视作局部问题，按彼此口头约定各项依次进行。6日，李访田代，就开发华北经济事交换意见。10日，李称：“开发华北经济，目前正在筹备资金中。”

△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以“提携文化”为名，在平、沪两市设立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于是日下午正式开幕；上海馆已觅定四川路福州路口为馆址，24日起先将报纸杂志部分开放。

△　国民政府任命盘珠祁、戴夏、张西曼、温源宁、刘廷芳、凌冰、缑克敬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军委会调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张发奎为苏浙边区主任，遗缺调豫鄂陕边区主任刘建绪继任，递遗之缺以陈继承充任。准予备案。

△　交通部电政司与法国无线电公司驻华代理人法商长途电话公司在南京签订报务合同。

12月6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中日两国调整邦交交涉始末，指出“终以日方并未准备为彻底之调整而未见效果”；并称：“吾人所切望者，现时障碍外交进行之状态早日消灭；深信一切问题，于中国不感威胁之空气中，可由正当途径，进行合理之解决。”

△　实业部为统制偏远省区土铁事业，特对陕、甘、川、晋、滇、黔六省规定：各省铁矿经主管厅查明，实系合于《矿业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各款规定之一者，得由当地炉户或窑主，就现时采掘之部分，划为小矿区，依法呈领，惟每一申请人，只准呈领一区，且所采出之铁矿，亦只准售于当地土炉化炼，不得运往他处贩卖出口，否则撤销该小矿业权。

△　陈诚奉命赴绥、晋与傅作义、阎锡山晤谈前方军事后，是日返西安谒蒋介石报告一切。

△　国民政府委员、前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长黄郛在上海病逝。

12月7日　　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局势严重，要求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共产党，团结抗日，被蒋拒绝。晚，张、杨密议捉蒋，实行“兵谏”。

△　据《申报》讯：中日交涉各问题，已有五项双方原则上同意，中国方面之态度约略如下：一、中日航空问题，在日方自由起飞的事态未终止以前，甚难进行；二、改订入口关税问题，中国政府首先考虑停止走私与海关缉私之自由；三、关于取缔朝鲜人之非法行动，朝鲜、台湾及其他日本国籍人民在日本势力庇护下为非法行为者，日本当局亦应取缔；四、关于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得自动聘用外籍技术人员，此非外国政府要求之事；五、关于取缔排日运动，如日方能改变对华政策，真正与中国携手，则一切所谓反日行动，自可完全消灭。

△　国民政府任命吴南如为驻丹麦特命全权公使。

△　国民政府派郭泰祺为互换《中拉友好条约》全权代表。12月30日，《中拉友好条约》在伦敦中国使馆互换批准书。

△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即扩大组织，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二、任命林彪为中国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三、刘伯承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四、任命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　山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发行民国二十六年（1937）公债1000万元，以偿还山西省银行垫款，年息七厘，13年还清，以该省田赋附加税全部收入为基金，不敷时再由田赋正税拨补。是日，赵丕廉到上海访孔祥熙商洽。21日，国民政府公布该项公债条例。

△　驻德大使程天放访德外长牛赖特，就《德日反共协定》有所叩询。牛赖特将陶德曼最近在南京所发宣言加以证实，谓："德日两国反共协定，并非针对中国而发，也非助长日本在中国北方行使压迫的一种工具。至于协定中所规定设立的常设委员会，其活动范围，也仅以德日两国境内为限。"

12月8日　是日及次日，伪军王英部旅长石玉山、金宪章先后率领10个团6000余人反正，先将驻大庙之穆克登宝师全部解决，并将派在该两部之日指导官小滨大佐等20余人全部处死。10日，王英部金宪章、石玉山、曹凯、张子敬、王奉钧、葛子厚、赵奎阁、王惠民通

电反正，傅作义即下令围攻大庙，伪军残部败退草地，上午10时傅部克复大庙。

△　冀察政委会改组，为检察行政效率，特组织检察委员会，聘齐燮元、邓哲熙、贾德耀、张维藩、刘治洲等为委员，并将该会所属各委员会缩小，外交委员会改组后，仅设主席一人，委员由10人改为二人。各委员会改组后，被裁人数约达半数以上。被裁职员均免职待命，月薪照发。

△　国民政府特派刘湘为第六路军总指挥。

△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朝天宫古物保存库竣工，是日存沪故宫古物一部计3151箱运南京，其中有历代书画、铜器、瓷器、古书、玉器、景泰蓝、漆器、银器、犀牛角器、缂丝等类。铜器中多三代古物，余大部为唐、宋、元、明、清各代珍品。存沪古物共2.4万余箱，分五批运南京，最后一批21日运出。31日，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撤销。

△　中央庚款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临时常务董事会议，讨论并通过铁道部京赣铁路借款案，借款总数为料款45万镑，现款1777万元。

△　日本五大电力公司在天津设立华北电力兴业会社，资本500万元，以小林一三等为董事，河西丰太郎等为监事。

12月9日　　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1.5万余名学生和市民游行请愿，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宪兵二团及武装警察开枪击伤一名小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决定徒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令张学良武力阻止，“格杀勿论”。张驱车至浐桥，答应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将学生劝回。

△　蒋介石宣布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

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方指挥“督剿”，樊崧甫、万耀煌分别为总预备队司令、副司令，准备对红军发动全面进攻。

△　中国与越南交界之布敏泉发生界务争执，经中法洽商合组委员会进行解决。外交部以布敏泉在广西境内，特电广西省政府办理。是日，广西省当局派覃连芳任中法布敏泉勘界委员。

△　菲律宾总统奎松等一行15人抵香港，10日赴九龙，与宋子文谈中菲国交及发展两国经济事宜，奎松并详询开发琼崖事。12日，奎松抵广州。外交部通知广东省政府以友邦元首礼欢迎。13日奎松返港。

△　伪军王英部特务团因受石玉山、金宪章部反正影响，在商都、康保间被李守信、张俊哲两部包围缴械，一部突围向嘉卜寺、滂江逃逸。

12月10日　蒋介石在西安向东北军、西北军将士训话称：“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同日，蒋召集全体参谋人员会议，决定在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令，如张、杨两部不服从命令，即解除其武装。

△　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向蒋介石再次进谏，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张向蒋指出，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蒋拍桌斥张为“犯上作乱”。

△　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蒋介石还没有抗日救亡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前提，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辱红军之态度”，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历时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　据《救国时报》讯：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运动，以示民意依归，促南京最高当局觉悟。

△　日外务省发表中日交涉之声明，略谓：“日政府仍希望与中国由外交途径解决各项问题，此种希望可以从日政府尚未召川樾茂大使返国之事实证明之。”又谓：“日本将注意中国如何取缔排日运动。”

△　华北日驻屯军司令田代到北平与宋哲元续商“开发华北经济问题”。

12月11日　　下午，张学良、杨虎城商定捉蒋军事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第十七路军逮捕在西安城内的“督剿”大员，接管城防，完成后对临潼山以南警戒。晚，张仍到华清池对蒋再次苦谏无效，并获悉蒋将要解除张、杨武装和按预定名单逮捕共产党的同情者的消息，遂决心按原计划实行兵谏捉蒋、逼蒋抗日。午夜，张、杨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领，宣布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

△　深夜，杨虎城命令冯钦哉师连夜由陕西大荔渡过渭河，移驻潼关，阻止中央军西进。

△　中央军樊崧甫部第二十八师占领潼关。冯钦哉派密使和樊联系，并将杨虎城所派传达命令之张处长处死，率部背杨投中央。

△　日关东军派副参谋长今村和第二科科长武藤飞嘉卜寺，召集德王、李守信、王静修、卓什海等会商大庙惨败后之军事行动。12日，关东军认为“战线已波及察哈尔省，不能不行使武力”，但为中央部制止。同日，因“西安事变”爆发，田中参谋和德王等“为使国民政府无北顾之忧，得以专心讨逆”，决定停止军事行动。

△　外交部负责人对记者解答日外务省10日发表之中日交涉之声

明，略谓：日方声称“中国已答应日本根绝一切排日运动并改订排日教科书”云云，我方曾一再说明，我政府已竭尽其力敦睦邦交，此为我一贯方针，惟人民情绪发于自然，恢复人民情感之道，首在铲除足以引起恶感之原因。我国本无所谓排日教科书，但教科书中包含历史的记述，自极正当，不能加以干涉。川樾大使留置之觉书，所载与过去交涉情形不符之处甚多，已向日方声明，难作参证之根据。任何外国以任何借口，在中国领土内采取任何非法行动，断不容许，而必设法排除之。

△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六年京赣铁路建设公债条例》，总额1400万元，用于展筑自宣城至贵溪段铁路，年息六厘，偿还期限定为10年，由交通银行承销40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300万元，四行储蓄会250万元，中南、大陆、金城、盐业等行各100万元，浙江兴业银行50万元。12日，该公债签订抵借合同，上海各承借银行合组银团，指定金城银行为代表，并规定借款办法。22日，国民政府公布该项公债条例。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凌晨，临潼东北军包围华清池，捉蒋行动计划由驻临潼之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总负责，东北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及所辖团长刘桂五指挥守护华清池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守护张公馆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迅速解除华清池蒋介石卫队武装，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侍从室副官蒋孝先被击毙。蒋介石闻枪声，出卧室越墙逃至骊山半腰虎畔石洞躲藏，被搜出，孙铭九命士兵挟架蒋下山，旋即送往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按计划解除宪兵第二团、省公安纵队、交通纵队和西安中央军各零散部队武装，逮捕省主席邵力子和“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接管西安机场，囚禁住西安招待所之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继承、卫立煌、万耀煌、陈调元、马占山、蒋作宾、曾扩情、毛炳文、张冲、蒋百里等几十名军政要员。邵元冲于逃跑时被枪击重伤，不治毙命。7时左右，战斗结束。

△ 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宣称："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派代表去新疆、山西、山东、广西、四川等省说明对蒋实行"兵谏"，是为了促其反省，改变其内战政策，实现抗日救国。

△ 南京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即举行中央常委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由丁惟汾主席，通过如下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二、军委常委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朱培德、李烈钧、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委。三、军委会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委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会直接指挥。同日，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随即下令陕、甘、宁、绥、豫之中央军作战略性移动，对西安取包围态势。

△ 张学良致电宋美龄，保证蒋介石生命安全。

△ 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炳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盼红军全部速集中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县，十七路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切须严防

其收买署员，尤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　张学良、杨虎城致电冯玉祥、李烈钧，说明西安事变起因和情况，称蒋坚持“剿共”主张，拘捕爱国领袖，“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13日，冯电张要求释蒋。

△　晚7时，驻兰州于学忠部奉张学良命，将驻兰胡宗南部、甘肃绥署特务营及兰州警察总局、兰州军警督察处解除武装，并扣押警察总局局长史铭及绥署高级官员，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次日，兰州公布张、杨八项政治主张。

△　凌晨，张学良密电洛阳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令率所部占领洛阳机场、军械库、中央银行，并控制铁路和通讯。黄持电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祝即调樊崧甫部向潼关集中，阻止张、杨部出关，并令万耀煌部由咸阳回军西安，协同樊军候命。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代表团等团体通电全国，拥护张、杨抗日救亡主张。同日，西安人民结队游行，直至夜晚。

△　宋子文、宋美龄和孔祥熙在上海孔宅开会，研究张、杨八项主张内容，认为西安事变是政治问题，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先把蒋营救出来。

△　国民党中央致电在欧养病之汪精卫，报告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并促其回国。14日，汪复电称：“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启程。”18日，汪在法兰克福城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晤后，经

法国马赛转赴意大利热那亚。

△　陇海路火车西行至潼关为止，西安与南京之间电报中断。上午11时，国民政府派飞机30多架在西安上空侦察。

△　张学良致电宋哲元，说明西安事变扣蒋的原因，希望宋本人或派遣全权代表，前往西安，“共商国是”。13日，宋复电要求两项先决条件：“（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请务与共产党绝缘；（二）蒋委员长之安全，关系民族存亡，请负责维护。”

△　北平举行援绥抗日大会，会后学生示威游行，高呼“庆祝收复大庙”、“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反对青岛屈服协定”、“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口号，并提出要求冀察当局出兵冀东，收复察北。

△　日本东洋造纸会社决定在天津设造纸厂，资本1000万元，设办事处开始筹备。

12月13日　　宋美龄、孔祥熙和蒋介石之顾问端纳由上海飞抵南京，宋子文、宋美龄等反对何应钦“讨伐”张、杨，炸平西安主张。宋美龄亲自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嘱勿听何的命令，并央请端纳赴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停。同日，端纳偕黄仁霖飞洛转陕。

△　中央军沿陇海路入陕，占华县。

△　张学良部队由渭南向临潼集中，洛川、庆阳均放弃。中国工农红军即由陕北南下，配合张部抗击中央军。

△　张学良、杨虎城电请孙科入西安。17日，孙科复电，要求张、杨送蒋介石回南京。

△　张学良致阎锡山电称：“西安十二日之变，数电报告，谅已均悉。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14日，阎复电质问张、杨：“第一，兄

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所办《西京日报》被接管，改出《解放日报》，由张学良派其秘书郭维城任主编，是日创刊。发刊词指出：中华民族正当生死存续的关头，“我们唯一的愿望，是要解放，是要抗战杀敌。我们将振臂兴起，集合一切救亡力量冲上前去”。

△　第十七路军成立抗日同志会，以杨虎城为会长，南汉宸、孙蔚如、赵寿山、王炳南等人参加领导。

△　孔祥熙致电张学良称：“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待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讯，而免延迟。”

△　何应钦邀黄绍竑去南京晤谈赴晋与阎锡山商救蒋事。14日，黄抵太原，除传达中央决议外，并请阎电西安解救蒋介石。

△　阎锡山接到何应钦12日电告西安事变后，在太原召开紧急会议，是日复电南京，决定“共维大局”，并同意先营救蒋介石出西安。20日，阎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清乡督办徐永昌到西安，以居间调停为名，要求把蒋介石送到太原，无结果。

△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南京寓所召见苏联驻京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告以如蒋安全发生危险，势必迫使中国与日本共同抗苏，望速告苏联政府，并转告第三国际注意。同日，驻苏大使蒋廷黻访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苏联出面协助释放蒋介石。

△　晚，日本外务省召集堀内次官、桑岛东亚局长、东乡欧亚局长及天羽情报部长等讨论西安事变，决定如下：“关于张学良之叛变，日政府不仅须等待正确之消息，且亦不应采取中国乱事而为日本图谋或易滋误解之任何行动，故日本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

避免积极行为。”

△　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成立。

△　西北各救亡团体联席会议发表《对于救亡的共同主张》：一、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和西北各将领的抗日救国主张；二、立即开放政权，集合全国各党各派人才，组织救国的政府；三、急速召开全国救国会议；四、组织抗日救国最高军政机关；五、立即组织援绥联军；六、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七、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抗日；八、立即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等。

△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杨明轩等负责。同日，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第六次代表会议决定到各县去动员民众，组织救国会。

12月14日　晚8时，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说明西安事变真相，要点为：一、整个中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蒋胶执“剿共”主张，逮捕大批爱国分子，查禁救国刊物，主张以武力弹压爱国青年，几次苦谏被申斥，不得不实行兵谏，望蒋能有最大反省；二、不是反对蒋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三、这次举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四、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共同抗日救亡。

△　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晤张学良，携有宋美龄致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致蒋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一语。当晚，张偕端纳探视蒋。端纳对蒋称：“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在端纳劝说下，蒋由新城大楼搬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　黄埔系青年将领胡宗南、黄杰、邓文仪等275人电张学良，表示绝对忠于蒋介石，“早已将整个生命，交付于领袖”，要求张、杨即刻恢复蒋之自由，否则他们将“不顾一切，悉力以赴”，与张、杨“不共

戴天”。同日，刘峙、顾祝同、樊崧甫、关麟徵等在“讨伐”前线的将领亦电张，要求他即刻释放蒋介石，如释蒋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以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

△　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并以临时军委会的命令改组陕西省政府，以杨的总参议王一山为民政厅长代理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长，建设厅长雷葆华仍旧。

△　张、杨调动军队，准备抗日援绥和迎击中央军进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和第一〇五师到渭南一带；第五十一军和第六十七军警戒兰州、平凉到咸阳一带；第十七路军警戒蓝田、商县和蒲城、大荔一带。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潘自力、方仲如、宋黎、张性初等人为委员。

△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拥护西安事变，要求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

△　西安学生联合会决议：一、组成西北学生联合会；二、督促各校学生一致参加救亡工作；三、深入农村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

△　第二十九军各将领应宋哲元召到平商时局。同日，张学良电宋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宋复电劝张以“国事为重，俯顺民情，速护送蒋返南京，一切要求均可从长计议”。

△　宋哲元派外委会委员赴各使馆表明：一、维持平、津治安；二、继续采取反共政策；三、服从中央命令。

△　刘湘电何应钦，表示：“川事湘当绝对负责，尽力防护，共维

大局。”

△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西安事变发表社论，称张学良之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这次事变“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针对日方及中国亲日派大肆宣传西安事变为苏联与中共“阴谋发动”的结果，正式声明西安事变与苏联无关。

△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著文主张和平解决中国政局，强硬对日，谓：“照我们的看法，南京在解决西南事件的时候，已采取新的坚决的立场……开始对于日本所提要求加以拒绝。”29日，该报发表社论，公开赞同国共合作，谓：“只要南京能够充分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他便不妨在政策上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　日本军部驻沪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对张学良“非力加讨伐不可，倘南京政府趋向妥协，日本断难漠视”。

△　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对西安事变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得关于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其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

12月15日　　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建议“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　端纳飞洛阳，电宋美龄告蒋平安并张、杨主张，称张学良希望孔祥熙与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　中央军由洛阳陆续开进潼关，一部进至华县以东地区。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地轰炸，一架飞西安上空侦察。

△　杨虎城在西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说明西安事变的意义，并指出：我们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对日抗战外，实在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蒋介石的“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　张学良、杨虎城致电阎锡山、傅作义及绥远抗日将士，称：“此间文日谏请蒋公积极抗日，未蒙采纳，因请暂留西安，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战力量。”

△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令释放政治犯，规定办法七项，除汉奸卖国贼外，其余政治犯一律释放，限10日办理完竣，以便集中一切人材，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同日，军委会军法处释出106人，陕西省第一监狱释出45人。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当前时局发表紧急宣言，宣称：“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尤其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面恢复蒋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领东北和陕中健儿驰赴绥远，援助我晋绥将士，用事实来表示收复失地的主张。”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　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立报》、《大晚报》、《大陆报》、申时电讯社、

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新声通讯社等全国200余家报社和通讯社就西安事变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支持南京政府“讨伐”张、杨，声称：“对任何主义或思想，亦应绝对以民族国家生存为最高基点。”

△ 德王以察境蒙政会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责张、杨容共抗日，劫持最高领袖，紊乱国家纪纲，并称：“目前正值蒋委员长蒙难之际，蒙方情愿停火，以待中央裁决。”21日，德王据日方指示，与卓什海等协商，决乘机收束军事，停止攻绥及反攻百灵庙，发出停战通电，称：“愿中止进攻绥远，与南京合作反共。”

△ 驻南京日总领事须磨到外交部访张群，代表川樾探问西安事变情况，声言如南京政府执行所谓八项主张，则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

△ 行政院决议改组浙江省政府，任命程远帆、许绍棣、王徵、罗霞天、蒋锡侯、朱孔阳为浙江省政府委员；以该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兼民政厅长，程、许、王分任财政、教育、建设三厅厅长。18日，国民政府发表任命令。

12月16日 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并特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令称：“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

△ 中央军在华县附近与张学良部刘多荃第一〇五师发生冲突，并派飞机十余架开始轰炸陇海铁路沿渭南、华县之线，毁房千余间，死伤居民数百人。

△ 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在西安发表广播讲

话，说明西安事变的原因，事变后的情况，蒋介石的现状，希望南京方面不要用谩骂和武力来解决问题。次日，西安《解放日报》发表曾扩情致胡宗南等30余将领电，要求勿以武力进攻西安。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称："当前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消耗国力，授敌以可乘之机"，要求郑重处理陕事，避免内战。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申明："救国阵线唯一的目的只在促成全国人民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政治主张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救国阵线绝不反对政府，恰恰相反，它是督促和支持政府抗日。"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七领袖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被捕的同胞。

△　西安市各界民众十余万人，举行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大会通过《立即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权》等提案10项。张、杨出席讲话，对西安事变发生原因作了说明，要求全国同胞团结抗日。会后示威游行。

△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16人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确实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通电要点为：一、西安事件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　驻甘肃静远附近打拉池地方之胡宗南军骑兵团1000余人，拥护张、杨救亡主张，全部反正，击杀团长，由团附王心元率领，投入抗日联军。

△　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绥署主任刘峙之代表魏树鸿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营救蒋介石办法。

△　傅作义、汤恩伯、李服膺、王靖国、赵承绶、门炳岳、曾延毅、陈长捷、孙长胜等自绥远致电张学良，要求释蒋。

△　红军进驻延安城。

△　中共领导之《中国人》杂志在北平创刊。共出五期，于1937年2月16日停刊。

△　中国建设银公司代表川黔铁路公司与法银团代表中法工商银行签订成渝铁路借款合同，总额3450万元，分15年还清，由铁道部无条件担保。据中国建设银公司执行董事宋子文谈，该路共长523公里，预计两年半完成，建筑费共约需5450万元，其中2000万元由川黔铁路公司担任，3450万元为法国银团承借，内2750万元为材料价及运至重庆之运费，其余700万元则为现款。

12月17日　　周恩来偕罗瑞卿等九人抵达西安（博古、叶剑英24日到达）。当晚周恩来、张学良会谈，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今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表明中共主张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并和张学良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18日，周恩来往西安九府街会见杨虎城，耐心解释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　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在主战派压力下，在南京发表广播演说，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劫持领袖，以下犯上，其罪已无可恕”，声称：“国民政府为迅速弭平事件起见，不得不出以断然的处置，已于昨日俯顺舆情，下令讨伐”，以“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

△　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

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同日，中央军第二十八、第三十六、第五十七等师及教导总队进入潼关，并派飞机轰炸三原、富平。

△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命令组成抗日援绥第一军团，任命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郭希鹏为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炮兵指挥官，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总指挥。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出通电，称援绥军队即日北上。

△　于右任离南京西上，“宣慰”西北军民。行前曾访孔祥熙、何应钦、张继等，并发表书面谈话，宣称：“中央派我前往西北宣慰，我自当以中央之心为心，希望军民一致的觉悟与努力，挽救艰厄。”18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明，反对于“来陕宣慰”。

△　上午11时，上海市各学校学生数千人在北站开会，准备游行示威，响应西安事变。上海市长吴铁城派大批军警弹压，学生受伤十余人，失踪数人。

△　日本首相、外相、海相举行会议，认为对西安事变有必要采取“注视等待的态度”。为支持何应钦“讨逆”，通电关东军停止对绥军事行动。是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同日，日外相召见驻日大使许世英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不能坐视。21日，驻华日使川樾奉命向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上述同样警告，并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张群答称：中国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变。

△　山西、绥远旅陕同胞在西安组织晋绥抗日救国同志会，推景梅九、续范亭等为委员。

△　晨，商都近郊炮火连天，至夜未止，传系张海鹏部到达商都，与李守信发生冲突。夜，归绥迤北乌兰花发生激战，李守信、张

复堂部约千余名被李服膺部击退。

12月18日　　蒋鼎文携蒋介石停战手令飞抵南京。16日夜，张学良偕蒋百里见蒋介石，经蒋百里再三劝说，蒋介石答应手令何应钦对西安停战三日。17日，张学良偕蒋鼎文再见蒋介石，蒋介石当即写给何应钦手令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是日，蒋鼎文飞抵南京，向何应钦面交蒋介石手令。

△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应实行：一、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通电对西安事变提出补救办法四项：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要求"立谋具体办法，以救目前之急"。19日，刘湘电张学良请释蒋。

△　贵州全省救国联合会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响应八项救亡主张。

△　绥远南壕堑驻防之伪军张万庆部旅长安华亭、王子修率所部三个团2000余人通电反正，开赴兴和县榆树乡集结候编。19日晨，张万庆部另一团也相继随安、王两部反正。张向张北逃逸。王英率残匪200余人逃往商都西之八台附近。后王被田中隆吉送回天津。

12月19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毛泽

东作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通过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通电》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讨论国策。电称："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并向南京及西安提出以下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指示》提出中共应坚持的方针是：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　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召开会议，何应钦、孙科、居正、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出席，经过激烈辩论，决定："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

△　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急电前方，20日仍照常进攻，并令飞机继续轰炸。20日，中央军董钊第二十八师包围华县，将东北军两营缴械，占华县城，进抵赤水；冯钦哉部第四十二师沿渭河北岸西进；飞机复往西安城郊撒下大批传单及各省电报、报纸等。企图分化西北

军民。

△　驻华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在南京会见外交部长张群，郑重说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与中国共产党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内称："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结，无以挽救危亡。"郑重希望全国各方"用各种调解的方法来谋解决，消弭内战的发生"，"立即召集全国救亡大会，由人民公决国家全盘的国策"。

△　抗日联军临时军委会组成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接管国民党西北各省、县党部，负责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工作，领导和协调各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

△　中共中央电示潘汉年立即与南京当局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能性及最低限度条件。21日又指示潘与陈立夫进行谈判。

△　伪满在哈尔滨出版的《大北新报》公布伪满第二军区11月份"讨伐"抗日联军统计：日伪军同抗日联军作战共99次，共遇到抗日联军1600多人，伪满军死九名，伤三名。

12月20日　　宋子文应张学良电邀与端纳同机自洛阳飞抵西安。张晤宋称，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共同商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三方面将一致同意释蒋。同日，宋、蒋密谈，蒋授意一面和平谈判，一面不放松武力威胁，以达到他早日离开西安的目的。宋旋同周恩来长谈，周耐心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望宋说服蒋真正改变政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1日，宋与端纳飞回南京，报告与张、杨、周晤谈情况。

△　周恩来在长安县政府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杨明轩等20余人谈话，称西安事变的发动虽然主要是由于张、杨的爱国抗日决心，同时

也是在不断高涨的抗日爱国群众运动有力推动下发生的，必须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支持事变朝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何应钦，责其“妄动干戈，酿造内战”；并警告何“如能放弃野心，翻然憬悟，调西来内战之旅，先北上救绥抗战，将来抗日功成，民族解放，或可以保晚节而盖前愆。非然者，执迷不悟，自弃国人，不特负内战全责，且民意所在，顺逆昭然，一意孤行，必致身败名裂而后已”。

△　西安各界抗日救国会纷纷成立。是日，西安起卸工人救国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团、西安市妇女救国后援会成立。次日，西北妇女救国会、解放日报社职工救国会、陕南旅省各界救国会、长安小车业救国会宣告成立。23日，西安印刷工人救国会成立。24日，西安市各机关公务员救国会成立。26日，长安县各界民众救国会成立。28日，西安市运粮工人救国会成立。

△　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北平成立，由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妇女抗日救国会、东北人民抗日会等团体组成；个人参加的有外交月报社编辑李华春、东方快报社编辑张庆泰、张东之等。汪之力、董学礼、赵濯华、于毅夫、陈大凡等参加该会筹备工作。

△　李宗仁电劝张学良送蒋回南京。

12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电示周恩来：“（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二）依上述条件

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派等谈判。（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士来西安谈判。（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钊等进行接洽。（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谈判调停双方。”周接电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同张、杨进行具体磋商。

△　何应钦派其弟何辑五由南京北上，22日抵济南晤韩复榘。韩称：“本人一切当惟中央是从。”当晚，何转赴北平访宋哲元。

△　刘峙指挥东路军近10个师从东面进逼西安，顾祝同指挥西路军10个师拟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从西面进攻西安。是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顾祝同军东进。26日至27日，红军主力进到庆阳、宁县、合水、正宁地区。

△　青岛市各纱厂工人联合会派代表携带致张学良、杨虎城函，绕道到达西安。函内表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

△　旅津山东同乡会靳云鹏等数十人电兰州于学忠，声称：“西安之变，危及国家”，“深望联合将士，力挽危局。”同日，吴佩孚电责于学忠附张。

△　国民政府令驻波兰特命全权公使张歆海免职。

△　国民政府派陆军中将邓锡侯为第六路军副总指挥。

△　铁道部为筹筑湘黔铁路，并修理平汉路黄河铁桥，向德国奥

脱华尔夫等五公司借款4000万元华币，其中3000万用于修筑湘黔铁路，1000万用于修理黄河铁桥，双方在南京签订合同，年息三厘，分10年至12年偿还，以湘黔铁路之财产及收入为担保。两项工程决于明春同时开工。

△　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电张学良，谓："阁下为吾挚友，倘参加共产，即为吾敌。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

12月22日　　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飞抵西安与张、杨谈判。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负责谈判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同意联俄容共等。张、杨与周恩来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的基础。蒋提出两个条件：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张、杨、周为尽快达成协议，答应蒋的要求。

△　宋美龄同张学良商谈，张说：兵谏只是要求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并要宋转告蒋介石，"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

△　毛泽东致函阎锡山，称："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

△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同南京谈判的六项基本条件：一、立即停止内战之挑衅，中央军退出潼关；二、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一切亲日分子及不抵抗主义者；三、南京政府即刻动员军队赴绥援战，尤须积极拨空军参加；四、改组南京军事委员会，另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五、民众须享受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并

即刻释放上海被捕爱国七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六、召集全国救国会议，首先于西安召集预备会议。

△　平、津各救亡团体代表邹大鹏到西安谒见张学良、杨虎城，报告平、津各救国团体的工作情形，及对西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殷切期望。

△　冯钦哉就渭北“讨逆军”司令职，率部向渭南推进，中央军抵固市镇，与渭南东北军、西北军隔河对峙，发生炮战。

△　宁夏七营、固原与平凉间东北军已南下，红军由预旺堡向陕西省西北部转移。

△　汪精卫自意大利热那亚乘德船“波资丹号”启程返沪。临行前发表谈话，谓：“中央有电催促，故即首途，西安事变而言御侮，直所谓南辕而北辙。”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六年京赣铁路建设公债条例》，该项公债定额国币1400万元，用以展筑京赣铁路自宣城至贵溪段工程，年息六厘，20年还清。

12月23日　　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开始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首由周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并声明：以上六项只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　宋美龄会晤周恩来，周一再申明：在中国目前阶段，除了蒋

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并表示：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行动不够迅速。

△　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首先提出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以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及财政、外交、内政、军政、海部、铁道、交通、实业、教育各部部长人选，张、杨、周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讨论后改杜、沈、章为次长）；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放爱国七领袖，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次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　万耀煌部集中咸阳，与冯钦哉军取得联络，大举向西安进迫，是晨与张学良东北军激战于渭南东之孝义附近。次日，东路“讨逆军”一部自赤水向南绕道抵渭南西部联络冯钦哉部，包围渭南。

△　宋哲元、韩复榘通电主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称：“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提议“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　日本首相广田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对西安事变决采不干涉方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电令西路军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东进，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是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已无问

题，不同意东进。24日，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陈仍未认真考虑。30日，西路军占领临泽。

△　国民政府公布《最低工资法》，规定“成年工以维持其本身及足以供给无工作能力亲属二人之必要生活为准”。

△　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在南京接见英、意、日各国驻华大使，说明西安事变情况。

△　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一、中政会主席、副主席未回京以前，推林森委员代理；二、推居正委员为中央常务委员；三、推居正代理中常会副主席。

△　国民政府任命朱家骅兼浙江全省保安司令，原任黄绍竑免职。

△　保定河北省第四监狱囚犯越狱，万福麟及冯治安两部协力镇压，逃走十余名，未逃出之人犯16名于24日在保定北关枪决。

12月24日　　上午，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达成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西安协定》：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抗战发动，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

△　下午，宋子文同周恩来谈判。宋要求中共作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专派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之办法待回

后同孙夫人商量。答应南京政府每月拨给红军、苏区50万元经费。

△ 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向蒋说明中共抗日救国的政策以及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目前形势是民族危机极端严重，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只有加速灭亡，要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 晚，张学良邀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东北军将领到公馆，宣布他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向中央请罪，以恢复蒋介石的威信，然后回西安共商抗日大计，并嘱咐王等：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

△ 蒋鼎文携蒋介石撤兵手谕飞返洛阳，一面电话报告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一面即由蒋坚忍偕蒋鼎文飞赴华县前线以蒋之手谕传示各将领，双方各部均撤退1000米，以免冲突。

△ 驻华日使川樾访何应钦，对蒋在西安之安全近况表示关切，并探询讨张军事。何告：“本人唯知遵循中央既定方针办理。”

△ 顾祝同由洛阳抵太原转宁夏指挥西路“讨逆”军事。

12月25日 下午5时半，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离开西安飞抵洛阳。下午2时半，张学良、杨虎城见蒋介石。蒋于榻前对张、杨训示，谓：“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并谓：“此次事变之造因，即自我自己疏忽而起……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

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

△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联名致函宋子文，表示商定条件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首先撤至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张、杨答应，也誓死反对。蒋、宋大惊，要求张学良尽早放蒋。宋并到新城见杨虎城及诸将领，反复说明蒋不回南京，任何一条皆难实行。下午，张、杨释蒋，张亲自陪蒋飞洛阳。临行，张写手令交杨，令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归杨虎城指挥。蒋在飞机起飞前对杨表示具体意见：“（一）明令中央入（潼）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　全国民众庆祝蒋介石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将此消息向全国及海外播放，首都及各地报社发放“号外”，京、沪、苏、浙、闽、赣、武汉、平、津、青岛、芜湖、粤、港、山西、川、滇、黔等地民众闻讯，欢声雷动，燃放鞭炮，上街游行，热烈庆祝。

△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张、杨同蒋谈判情形及张送蒋去洛经过，称蒋已“完全容纳”张、杨以及西北大众“关于抗日的一切要求”。

△　杨虎城、马占山、何柱国、王以哲等通电声明蒋介石已“由副座恭谨陪送洛阳”，蒋“对于副司令及虎城等救国主张已表完全容纳”。

△　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和见蒋介石情况，略称：“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

是转好的。”“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　刘湘致电蒋介石表示慰问，并派代表傅常、刘航琛去南京谒蒋。

△　国民政府公布《劳动契约法》，凡五章34条；公布修正《公务员考绩法施行细则》，凡20条。

12月26日　　午，蒋介石由洛阳飞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到机场迎接。随后，张学良与宋子文陪同由洛阳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晚蒋介石发表书面谈话，声称：“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余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

△　宋子文、张学良由洛阳乘机于下午2时10分抵南京。张一下车，即被送至宋子文私邸加以软禁。蒋并派人示意张写“请罪书”。张遂函蒋表示来京待罪，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蒋将此函交国民政府军委会。

△　中央军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和张学良部第五十七军长缪澂流在陕西赤水会见，分别下令撤军。

12月27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各机关在南京举行庆祝蒋介石回京大会。林森任主席并致词，谓：“吾人于此西安事变解决后所得之教训，深觉国家无论遭遇任何危难，只须国民万众一心，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一切危难，均可迎刃而解。”

△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为此，必须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抗日，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所允诺的停止内战，团结对日等条件。"

△　蒋介石电慰傅作义及绥远前线将士。谓：此次西安事变起，正值前方战事酣烈之际，全体将士不懈不摇，却敌卫国，"特电劳问，益望为国努力，贯彻始终"。

△　李宗仁、白崇禧电知所属明年元旦成立第五路军，同时取消第四集团军原名。第五路军编制悉照中央规定，设两军、六师、36个团，团长以上军官均派定。国民政府自明年1月份起，每月补助桂省军费40万元。桂军复员、编遣事已竣。

12月28日　　蒋介石为西安事变具呈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29日，国民政府指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慰留。同日，蒋再请辞职。30日，中常会决议碍难允准，并给假一月"以资调摄"。

△　孔祥熙通电卸除代理行政院长职。

△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侨商协会、巴黎中国学生会及陈铭枢、方振武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望速释放沈钧儒等七人，以示政府救国之诚意。

△　阎锡山电南京报告伪匪密集商都，将继续大举侵犯。

△　清华、燕京、协和、南开、金陵五大学与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委员会，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会所暂设山东济宁，旨在使大

学课程面向农村，训练高级技术人才，改良农村建设。于定县、济宁分设实验区，各职员已由理事会聘定，会长晏阳初，副会长梅贻琦、林可胜，书记翟菊农，代理研究主任林可胜，定县、济宁实验区主任分别为孙伏园、张鸿钧，是日开始工作。

12月2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一、张学良亲来都门，束身谢罪，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二、张学良已悔罪来京，愿受惩处，“讨逆”军事应即停止，“讨逆”总司令及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结束事宜，交军政部办理。晚，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即日停止军事行动，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

△　周恩来、博古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指出：“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电文分析了事变和平解决后的阶级力量的分化情况，并提出了“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的方针。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定于二十六年2月15日举行第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训令甘、陕两省政府，指示救亡工作四点：一、认真组织民众；二、军民切实合作；三、严肃整饬吏治；四、加紧训练团队。

△　汉奸程国瑞、王虎臣受日关东军命由长春秘密潜返天津日租界，主持在河北各县招募伪军三师，秘运察北，供日方编入伪蒙军。程谋独成一军，称“防共救国军”，其参谋长王虎臣已由通州返津。是日，程赴张北，与日特务机关长接洽，所募伪军集结商都一带听候点验。

△　华北水利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一、拟于河北省各大河源处建坝蓄水，借缓涌急，以资灌溉案，决函察、冀、晋三省府会商；

二、官厅水库工程计划，请经委会核定施行。

12月30日　　成都事件以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惩凶而告解决。是日，外交部照会日驻华使馆称："省会警备司令蒋尚朴及公安局长范崇实究属疏于防卫，中国政府已将该二员免职；又警备司令部营长曹午堃、公安局科长郑介雄等也分别予以处分，本事件之首犯刘成先、苏得胜业已处死刑，其他凶犯岑群、王述清、彭定宅、刘子云等也分别处以徒刑。"中国政府给予日方死者遗族及伤者恤金98.8871万元。

△　北海事件解决。外交部照会日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深致歉意，并称本事件之凶犯业已视情节之轻重分别予以处分，中国政府对该日商中野顺三之遗族给与抚恤金三万元。同日，日使馆复照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本事件已经解决。

12月31日　　国民政府令：行政院仍由蒋介石院长继续执行职权，主持大计；同日，又令终止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案。

△　下午，蒋介石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学良"戴罪图功，努力自赎"。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10时开庭审判，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五年。次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颁布。

△　国民政府令李烈钧为陆军上将。

△　刺汪精卫案经一年余侦察审理，是日在南京地方法院宣判：主犯张玉华、贺坡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各处有期徒刑七年，褫夺公权七年，四本违禁刊物没收；张玉华、贺坡光、刘书容、

李怀成、项中霖、卢庆麟等关于杀人部分，移送地方法院。

是月　陆费逵、舒新城主编《辞海》由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单字1.3万余个，词目十万余条。

△　国民政府以“拥护张、杨主张罪”查禁各地进步刊物二十七八种。

是年　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和苏联签订《聘请苏联专家待遇合同》，于是大批苏联顾问、专家来到新疆。与此同时，盛为了取得苏联援助，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标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依据，“发展新经济，创造新政治，发展新文化”，并悬挂自制的六星旗。

△　春，抗联第一军由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改编，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该军下辖两个直属教导团和三个师，活动于盘石、双阳、伊通、永吉等地。

△　1929年至是年，国民政府查禁文艺书籍309种。是年1月至3月查禁报刊92种。

△　四川饥民十余万人，以树皮为食。安徽六安县饿死数千人。苏北淮阴、泗阳等县瘟疫流行，黑热病患者甚多。浙、豫蝗灾，皖、鄂亢旱，灾情均重。

△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306.12亿元，其中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约106.89亿元，近代工业（包括全部矿业）总产值33.1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手工业总产值约73.7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5％。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其中属于近代企业经营的约占51％，属于个体经营的占49％。

△　本年度国库收入总额为19.8695553964亿元；支出总额为

18.9397650049亿元。国家普通岁入、岁出预算及追加数各为13.3487329063亿元。

△　据海关统计，本年度全国输出为7.05741403亿元。输入为9.41544738亿元。入超2.35803335亿元。

△　据海关统计，本年度输入我国之农产品价值计为2.61814396亿元；矿产品2.02533574亿元；工业品4.77196768亿元。我国输出之农产品价值为5.32720810亿元；矿产品6975.6735万元；工业品1.03263858亿元。

△　本年黄金进口数量为246.6959万元，出口为4308.6563万元。白银进口为471.3482万元，出口为2.54336763亿元。

△　从1927年至是年，国民政府发行国内公债22.68余亿元，比北洋军阀15年间发行公债6.2亿元，多出将近四倍。

△　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吸收存款26.7亿元。四行在全国164家中国资本银行中的比重已经达到：实收资本占42％；资本总额占59％；发行兑换券占78％；纯益占44％。

△　全国棉花种植面积5621.0472万亩（旧亩），皮棉产量1446.8288万担（旧担）。全国经委会所属棉业统制委员会在苏、鄂、豫、陕、青等各省推广美棉267.6025万亩，亩产皮棉25斤，该新种皮棉一担较国产棉价格高出四元。

△　据全国纱厂联合会调查，全国纱厂纺锭总数华商为282.492万枚，日商为248.7943万枚。华商纱厂纱锭54％集中在上海、天津、无锡、青岛四地，上海一地占40％。

△　据《中国经济统计年报》统计，是年全国华商纺织厂92家，其中倒闭13家，减工者14家，停工者24家。全国火柴厂由142家减为88家。

△　全国棉纺机达510万锭，织机5.8万台，其中日本资本拥有的纺锭占41.8%，织机占49.5%。农民纺制土纱130万担。土布和改良土布年产3.7亿匹。

△　据东亚研究所统计：至是年底，日本向华北地区的各种直接间接投资4.32604亿元，占日本对华投资总额9.93478亿元的43.5%。其中：工矿业1.95778亿元，金融业1.2608亿元，商业6412.3万元，交通通讯业3241.9万元，仓库、不动产及建筑业1988.9万元，公共事业632.8万元，农牧水产业366.8万元，其他为779.2万元。

△　外国在华设立的各种类型工厂820余家（不含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中日本在关内的工厂为543家。

△　据估计，是年全国省地税收5.34亿元，大部分是田赋正额及其附加。关、盐、统三税合计占国民政府岁入总额的64%。

△　上海英商耶松船厂与英商瑞熔船厂合并成立英联船厂，资本扩充到1400万元，成为上海最大的船厂。

△　六合硫酸铵厂全部竣工，包括硫酸厂、合成铵厂及永利煤气厂等。出品硫酸铵年产量约五万吨。

△　陕西酒精厂建成，内分酒精厂、榨油厂、洋铁筒厂等四厂，全部资本150万元。

△　大成纺织染公司经理刘国钧与汉口震寰纱厂股东商定合作办法：由大成出资36万元，震寰以机器折价24万元，工厂交与大成公司经营，改为汉口大成三厂，定期六年。年底，大成公司增加资本至400万元，订购了最负盛誉的瑞士里特纱锭3.2万枚，布机1008台，并将汉口大成三厂改名为大成四厂，另在常州东门外筹建大成三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八卷
(1937—1939)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八卷

(1937—1939)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返回总目录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1月

1月1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会商，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并令顾祝同驻节潼关，指挥陕、甘军事。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同胞、同志书称，经过西安事变，“实足以证明吾国家之统一基础，确已稳固；全民族之集体力量，确已形成；吾全国同胞对于国事之关怀及对于本党领袖之拥护，亦已为世界所共认”。

△　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称，速与陈立夫接洽，中共愿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并告知红军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

△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指示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军之进攻，并请国民党军亦勿再有攻击行动。

△　西安各界10余万人举行庆祝大会，杨虎城主持阅兵式，声言决与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

1月2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往奉化休养，陈布雷等同行。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张学良被扣留后的形势，决定主要方针是力求和平。毛泽东称，现在“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张闻天阐明中共在目前的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

△　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以全权代表身份与蒋介石、陈立夫继续交涉；并指示其了解蒋介石与何应钦对西安问题的意见是否一致；中共在当前仍应保持调人的地位。

△　张闻天、毛泽东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

△　中共中央军委令红军各部在驻地集合待命，随时配合友军抵御对方进攻。野战军从明日起秘密向栒邑、淳化二县集中。

△　日本军用飞机在青岛散发五色旗帜与荒谬传单，青岛市政府向日本驻青岛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6日，外交部亦就此事向日使馆提出抗议。

△　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梁宇皋、张祖荫、革乐思、陶乐尔在老厂开第二届首次会议。中立委员长为伊思林。

△　归绥伪军李守信部300余人在察哈尔商都（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哗变。

1月3日　军事委员会发布对陕、甘作战计划及战斗序列令：顾祝同第一集团军下辖10个师，据东线潼关正面；蒋鼎文第二集团军下辖五个师又一个旅，据西线甘肃、宁夏一带；朱绍良第三集团军下辖九个师，据西线陕南、陇南及兰州附近；陈诚第四集团军下辖10个师，据东线左翼潼关以南至商洛地区。刘峙前敌总司令部直辖部队及

预备军共10余师，分布潼关、新乡、川鄂边境及宁夏一带。空军部队指挥官为毛邦初。作战计划旨在“乘陕、甘叛军未与共匪合股以前，先图迅速击灭叛军”。以东路为主，西路对兰州、平凉均为牵制。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在未得到命令前，不许攻击。

△　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密电国民政府，请特赦张学良。

1月4日　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　深夜，周恩来、秦邦宪将所拟防御中央军进攻作战纲领电中共中央。纲领分东线、西线、北线三个作战方面，主要作战方面在东线。纲领决定组织三人团，以张学良（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杨虎城、周恩来领导作战，由杨虎城统一指挥。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陈诚率第四集团军，主持陕西东路军事宜。

△　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速开赴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的联合作战计划。

△　莫德惠、刘哲、戢翼翘自北平应邀至南京，劝慰张学良。

△　铁道部派员勘测武汉铁桥。

△　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例行阅兵式，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与川樾茂大使等3000余人参加。

1月5日　国民政府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应即一并撤职，仍留原任。国民政府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着即裁撤。国民政府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国民政府令免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本职。国民政府

令驻甘绥靖公署着即裁撤。国民政府特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国民政府令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　中共中央批准防御中央军进攻作战纲领方案，命红军第十五军团集结西安西南地区待命。

△　张闻天与毛泽东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要其与宋子文接洽，促使宋子文履行蒋介石在西安应允的“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

△　毛泽东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应向国民党谈判代表表明：（甲）“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同日，又电周恩来、秦邦宪称，应“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

△　军政部发表整理陕、甘军事办法，中央军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各军分驻潼关、渭南、西安、咸阳、宝鸡、天水；胡宗南、关麟徵、孔令恂各军驻甘肃东部各地；杨虎城部移驻陕西中部及西北部；张学良部恢复12月1日前之位置。

△　国民党中央决定《陕甘军事善后方案》。“陕甘军事之善后，主用政治方式解决之”；东北军与西北军各部，入驻划分之一定区域，“由中央严加整理充实”。人事方面，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担任甘肃绥靖事宜；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驻地区分：由潼关沿铁道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

水、秦安之线，归中央军驻防。第十七路军直属各警旅移驻正宁等11县，第十七师移住甘泉等四县。冯钦哉部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仍驻原地。东北军一律恢复12月1日以前位置。“以上方案，为促张、杨部队能切实遵行，我前方军事仍应积极准备，向西安压迫”。

△　杨虎城、于学忠等九将领通电全国称，中央军西进，“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表示“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此即有名的“歌电”。

△　杨虎城致蒋介石电称，张学良虽蒙特赦，但“尚未恢复公权”，“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　军事委员会电令第四路军总指挥刘建绪、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立即向中国工农红军闽赣浙边区游击队进攻，“务于短期内完全廓清”。

△　日浪人志贺秀二、山口勇男、田中教夫在郑州大同路通商巷百华银楼后院设立秘密机关，雇用汉奸赵龙田制造毒品，密谋勾结禹县山中土匪刘桂堂部千余人，破坏交通，抢劫快车，为当地军警拘捕。6日，三名日本浪人由日驻郑州领事馆引渡。外交部向日使馆提出抗议。

△　由昌黎南大寺等地运至天津之私货达3000万元之巨，致天津私货山积。

1月6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飞洛阳转陕西，办理陕、甘善后事宜。

△　宋子文电杨虎城称，“弟为汉兄事声嘶力竭，负疚实深，嗣后吾兄关于军情电文，请遥呈委座（蒋介石）”。杨虎城复电，要求宋子文对“汉公出处，及全国抗日问题”应“排除万难，继续周旋”。

△　何应钦据蒋介石电令，密电刘峙、顾祝同，补充《陕甘军事

善后方案》中驻地区分办法，“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第十七路军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外，余照方案办理。

△　第四路军总指挥刘建绪在浙江衢县主持开闽、浙、皖、赣边区绥靖会议，讨论进攻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部队办法；会期两天，到会者70余人。

△　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电周恩来、秦邦宪称，“（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顾祝同）迎张（张学良）。（乙）顾来则张（张学良）、杨（杨虎城）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　罗马教皇颁给中国天主教领袖陆伯鸿教廷剑袍爵士勋位。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代表教皇举行授勋礼。陆伯鸿为远东获得此项勋位的第一人。

1月7日　　蒋介石致书张学良，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要旨为：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由张学良推荐一人率领前往；二、杨虎城或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行使绥靖职权；嘱其与顾祝同切商办法，余应照已发电令办理；并谓“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

△　张学良致函蒋介石，提出解决陕、甘问题意见书，同意派人持其信函前往西安商谈。其意见书略谓：“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二、调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三、余（张学良）陪同墨三（顾祝同）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商震）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乙、匪不剿”：“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何成濬）或刘经扶（刘峙）为西北行营主任。……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张学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

△　杨虎城、于学忠等七将领密电何应钦称："委座（蒋介石）在陕确称密纳积极抗日主张。抗日主张即日不实现，虎城等一日不能放弃其要求。军委会所指人事办法与部队部署，远非委座再三容纳抗日主张之本意。以此言抗日，不啻南辕北辙。此间全体官兵，以汉公（汉卿，张学良字）被扣，军队进迫，均已愤极万分，中央始终不能开诚，则此间亦难为中央维持威信。"

△　国民政府任魏宸组为驻波兰特命全权公使。

△　国民政府公布《提存法》。

△　由北平来南京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往见张学良。张氏认为西北战端将起，有违其"兵谏"的初衷；称中央军进入潼关系何应钦主谋，促莫、刘二人往见何应钦劝阻用兵。张学良并致函杨虎城称，"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

△　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率红军二万余人抵达三原、泾阳、富平一带。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称，为了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南京政府应令张学良回陕，率东北军与西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张共同救国的主张。如南京政府企图以武力解决，内战应由其负完全责任。《指示》再次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要求野战军全部10日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12日以前完成扩红、筹款等各项工作。

△　中、德人士在南京集会，追悼新近去世的前国民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将军。蒋介石代表何应钦与翁文灏、陈绍宽及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等参加。

△　天津海关查获日浪人走私汽车数辆，青岛海关查获大批白糖、人造丝、毛巾等私货。日货物走私风较前愈烈。

1月8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北省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员卢铸、范熙绩、李书城、吴国桢均免本职；湖北省政府委员孟广澎（兼民政厅长）、贾士毅（兼财政厅长）、刘寿朋（兼建设厅长）、程其保（兼教育厅长）均准免本兼各职；任命孟广澎、贾士毅、伍廷飏、周天放、范熙绩、杨揆一、卢铸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孟、贾、伍、周四人分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厅长。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诉愿法》及《行政诉愿法》。

△　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要求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　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偕王化一、吴瀚涛往见何应钦。何氏向王、吴二人表示，中央决意谋求和平，对西北绝不用兵。

△　戴笠送王化一、吴瀚涛至张学良处，与张氏单独谈话。张学良称，“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受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言毕失声痛哭，以遗嘱两份交王化一，一给其家属，一给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内称如“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将自杀以谢天下”。

△　行政院电令陕西省主席孙蔚如速就职，主持陕西省政。

△　陈铭枢自欧洲回国，抵香港。

△　宋子文再电杨虎城称：“弟为国为友，有一分力量必尽一分力量，决不畏难，决不推诿，以自坠人格，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　云南十三大寺总管圣露呼图克图，由立法委员彭养光陪同觐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中央纪念周讲《统一与救国》。

△　招商局在上海设海洋航运处。行政院决定，以后全国各军政机关向外国订购货物、材料及装运，均委托海洋航运处办理。

△　日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在天津惠通机场举行检阅式，萱岛联队长任指挥官，田代皖一郎、桥本群及和知鹰二到场检阅。驻北平日军第一联队千余人，在北平东单日军操场举行检阅式，河边正三旅团长检阅并训话，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等参加。驻丰台日军亦举行检阅。

△　日飞机连续在保定、石家庄、沧县、大名、永清等地散发传单及报刊；我国各界人士要求冀察当局据理与日本交涉。

1月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履行在西安的诺言，停止进攻西安。

△　周恩来电张闻天、毛泽东称，我们应力主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张、毛二人同日回电表示："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

△　蒋介石电复杨虎城，并抄致顾祝同、刘峙二人，强调和平解决军事、政治善后。

△　戴笠以蒋介石、张学良二人函件交王化一、吴瀚涛。王、吴二人经洛阳去西安，抵洛阳时，顾祝同、刘峙表示，希望二人此行能打破僵局，和平解决事变。王、吴二人请顾、刘二人严加制止前方接触。

△　下午，王化一、吴瀚涛抵西安，往见杨虎城、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高级军政人员及中共代表秦邦宪。王化一转达张学良的谈话，强调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吴瀚涛

作了补充。晚，设计委员会及东北军将领分别集会，赞同张学良不愿局势破裂的愿望，希望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同意派代表去南京和谈。东北军总部直属炮兵团长刘佩苇拔出手枪“拍”往桌上说：“不放副司令，一切谈不到。”

△ 阎锡山、宋哲元等致电杨虎城，劝杨服从命令。

△ 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

△ 西安各界民众475团体15万余人举行武装示威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撤退入陕各军，惩办挑拨内战分子，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救国大计。

△ 日驻华大使川樾访外交部长张群。

△ 日资本家下诚一等在天津设立华北满蒙运输公司，资本50万元，专事私货运输至热河、内蒙各地。

1月10日 蒋介石派顾祝同为西安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方面代表，后又增派张冲与贺衷寒二人。

△ 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至潼关；中共代表周恩来、刘伯承亦至潼关与顾氏会晤。

△ 周恩来致函张学良称：“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

△ 彭德怀率红军进入三原。

△ 王化一、吴瀚涛再次往见杨虎城。杨氏称，蒋介石来函要其与各将领息兵听命；张学良来函望其维持事变之初衷，双方和解，以免损失抗日力量。杨虎城表示，如果需要，其个人也可以出国考察。

△　顾祝同派祝绍周去西安谈恢复交通事，并传达蒋介石准备采取的善后措施：由王以哲任江苏省主席，何柱国任安徽省主席。祝绍周与西安方面商谈，双方同意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交通；触发战争的可能性遂被制止。

△　南昌市连接赣江东、西两岸的中正桥，经过两年的建造，是日通车。自此，浙、赣、粤、鄂各省公路皆可联运。

△　上海市博物馆试行开放，暂先成立历史、艺术两部；馆长胡肇椿。

△　唯生学会在上海成立。陈果夫、吴铁城为名誉理事长，潘公展为理事长。

△　北平西单商场发生大火，损失达160万元。此为北平市30年来未有之大火灾。

1月11日　　于学忠致电韩复榘称“中央如欲息事宁人，（一）即日恢复张副司令之自由，可促其返陕。（二）潼关、华县一带之中央军即日东撤。（三）陕、甘驻军照现在位置，暂时不动”；要求韩复榘从中斡旋。

△　豫皖绥靖主任刘峙分电于学忠、王以哲，劝其遵令息兵。

△　蒋介石电顾祝同称：“东北军不难分化，汉卿表示愿调全部来豫、鄂，而不愿回陇。”“只要东北军能离陕，则我军计划已完成。”

△　蒋介石致杨虎城长函一件，交李志刚带回陕西（李氏于12日返陕）。蒋介石在信中要求西安方面表示不割据独立与不破坏统一，“（一）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二）12月12日以后之组织公布撤销”。

△　宋美龄电杨虎城称，“中央非由一人负责”，要杨虎城接受蒋

介石要求，使蒋介石有说话余地，才能“徐图补救，一切主张方能实现，汉卿前途更不成问题”。

△　杨虎城、于学忠电复李宗仁称，“此间军事部署已定，绝无可虑，请释注念”。

△　孔祥熙密电杨虎城，劝其委曲求全，晓谕部属，一体服从中央处理陕事善后办法。

△　周恩来致函蒋介石称，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否则，红军义难坐视；坚决要蒋氏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张学良）回西北。如此，“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并重申中共将本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实践西安协定。周恩来在信中并称，“来（周恩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

△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电何应钦，主张对西北问题以政治解决。

△　高桂滋、高双成电军事委员会与军政部称：“陕方通电内列职名，不胜骇异，职只知拥护中央，服从钧座命令，其他概不与闻。”

△　杨虎城率部离西安移驻临潼；东北军与中央军冯钦哉部发生冲突。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法》与《保险业法施行法》。

△　上海银行业173同业公会，绍兴等地63旅沪同乡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各团体，联合电杨虎城、于学忠，“以国家民族为重，听从中央”。

△　江苏省政府通过《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实施大纲及规程》，

拟将全省乡镇保甲长分批集训。

△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辞职，由贾德耀继任；陈中孚被聘为顾问。

△　东北大学迁至北平，教育部改该校为国立，并派臧启芳为代理校长。是日，臧氏至北平接任，被拒。

△　英、美、法、德各国大使馆拟撤退驻陕、甘侨民。

△　英国出口信用担保局代表巴特里克由香港抵上海，称将继续李滋·罗斯工作，代表英国出口商与中国合作。按：英国李滋·罗斯爵士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应邀来华，帮助中国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被国民政府聘为首席财政金融顾问；币制改革实现后，于次年夏回国。

△　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召开重要会议，决定强化华北特务机关。

1月12日　行政院颁令褒奖热心教育并捐资创设上海震旦学校的耆儒马相伯。

△　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电蒋介石，报告王化一、吴瀚涛自西安归来实情。

△　周恩来、杨虎城、王以哲研究国民党提出的甲案与乙案以及李志刚自南京带回的蒋介石10日信函，决定派人至南京往见张学良及宋子文、蒋介石，要求西安行营主任由张学良出任，杨虎城、顾祝同副之；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东北军驻咸阳、平凉、固原、兰州、武威、天水；第十七路军驻韩城、华县、西安、泾阳地区；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西。

△　行政院议决，照谭延闿成例国葬邵元冲。2月9日，国民政府

明令邵元冲国葬。

△　周恩来与王化一、吴瀚涛谈话，望王、吴二人回南京后，和平有望时再回西安。

△　戴笠陪同王化一、吴瀚涛往见张学良，报告西安之行结果。张氏听到前线已停止军事行动，说“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机，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并对戴笠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　国民政府公布《蒙藏边区人员任用条例》。

△　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回国，抵香港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善后，杨虎城自应听命中央。”

△　前西安“剿匪”副司令部办公厅主任米春霖由西安抵南京，连日晤中央当局后，表示拥护中央处置陕局善后办法。

△　国民政府派李松山为赣浙闽边区指挥，陈志中为赣浙边区指挥，黄觉为闽浙边区指挥，分率所部进攻该地区红军游击队。

△　杨虎城分电蒋介石、张学良、何应钦，表示拟派鲍文樾偕李志刚前往奉化商谈。

△　伪满洲国与朝鲜当局签订鸭绿江协定备忘录。

1月13日　张学良在贺耀组、戴笠陪同下，偕米春霖由南京至奉化溪口，住武岭学校内；蒋介石以修订的善后方案送张学良征求意见。

△　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

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

△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补选马相伯、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

△　周恩来和彭德怀、贺龙同杨虎城会谈。次日，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

△　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保安动身迁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机关自保安（今志丹县）迁延安。

△　苏州发生抗租风潮。

△　上海《大公报》报道，去年日人在沪犯罪总计为917件，较前年增加214件，其中以贩运毒品者为最多，计有173件。

△　远东气象会议在香港开幕，到会代表20余人，我国派竺可桢出席，会期七天。

1月14日　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乘德轮抵上海。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陆军在乡士兵管理暂行规则》。

△　军政部次长陈诚至太原与阎锡山商谈陕事。

△　李济深电杨虎城及西北将领，坚决反对中央军围逼陕、甘。

△　蒋介石致杨虎城函称，张学良“此时如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

△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英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贺武等，就撤退陕、甘外侨一事，拜访外交部次长徐谟磋商办法。

△　川黔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股本2000万元。曾养甫、李石曾、宋子文、卢作孚、刘竹君为常务理事，曾养甫兼任理事

长及总经理。

1月15日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与白崇禧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军事进攻西北，主张对陕和平解决；认为西安事变为提挈全国一切力量，团结对外的千载一时之良机，恳请中央本政治解决之途径，急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

△　米春霖由奉化回陕，携蒋介石修订的陕甘善后方案、蒋氏给杨虎城的信函、张学良给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主要军政人员信函。善后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一、东北军全部调甘肃。二、第十七路军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军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驻军（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第十七路军部队驻扎）。乙案：一、东北军全部调往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阳、信阳一带。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皖之东北军。四、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　周恩来会见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一、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须杨虎城、于学忠通电就职；二、杨虎城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三、中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面行动一致。

△　杨虎城向去奉化的鲍文樾、米春霖和李志刚交待任务及解决陕事方案，另有致蒋介石函由三人携往，并分别函复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贺耀组、于右任等人。

△　冀察绥靖公署重新配置河北省防务，平汉路及其沿线由第五十三军担任；平汉线以东由第二十九军担任。

△　川湘公路（自四川重庆至湖南沅陵）川境各段完成，在綦江

举行通车典礼。该路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1月全线开工；全长698公里，耗资500万余元，为川省近年一大工程。

△　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天津开会，研讨并确定对西安事变及对华北外交办法。

△　伪满洲国民政部在奉天、安东、吉林、间岛（延吉）、三江、滨江、锦州、龙江、热河、黑河等地，设立864个“集团部落”。

1月16日　　杨虎城电蒋介石及行政院并通电全国，表示与于学忠“恭领政府革职留任处分”，取消“双十二”时一切临时组织，并派鲍文樾、米春霖、李志刚晋谒蒋介石。

△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接杨虎城、于学忠来电后，立即电告蒋介石，并复电杨虎城，表示慰勉。

△　鲍文樾、米春霖与李志刚三人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由西安飞抵南京，面见何应钦，递交杨虎城致何应钦函及善后方案。

△　周恩来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三方会议，决定坚持和平方针，联络川、桂、粤、晋、绥及南京抗日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共同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

△　湖北省主席黄绍竑宣誓就职，并宣布治鄂方针：一、注意国防教育；二、整理保安队，巩固治安；三、整理土地财政；四、讲求水利，修筑堤防。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法》。

△　广东米荒严重，余汉谋、黄慕松电蒋介石，请求免征洋米税。

△　广九铁路北行快车在广州附近起火，烧死27人，烧伤35人，损失计约10万余元。

△　美大使馆参赞裴克由西安返抵南京，称西安外侨均甚平安，实无迁移之必要。

△　日驻沪海军陆战队300余人，在上海北四川路、东熙华德路一带举行武装游行。

1月17日　　西安方面代表鲍文樾、米春霖、阎宝航（代表东北军）及李志刚（代表第十七路军）自西安抵奉化溪口谒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并面呈杨虎城信函及解决陕事善后方案。方案中要求设陕甘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陕、甘两省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驻防，停止中央各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此方案遭蒋介石拒绝。

△　下午，李志刚单独见蒋介石。李志刚称“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学良）若不回去，他们要打仗”，并称“红军也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氏称“回去你告诉（杨）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并亲自写信要李氏带回西安。

△　严庄由南京密电杨虎城称，改组政府与开放言论自由有困难，蒋介石仍受亲日派包围。杨氏遂增加疑虑。

△　南京各界慰劳前方将士暨贡献一日所得运动委员会，发起“贡献一日所得”运动，规定首都各机关、学校、团体、报社、公司、商店等，于是日起实施，至本月底止，以一日所得贡献国家。

△　上海市佛学界名流发起护国和平会。

1月18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称，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得有两种政府与军队。

△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与西安绥靖公署举行联合纪念周，到会600余人。杨虎城讲演称，对内绝对主张和平，但抗日救国的主张与决心绝不放弃。

△　西安外侨75人乘车东返，21日又有八名外侨飞离西安。尚有六名外侨留在西安，其中五人为英籍教师，一人为美籍女记者史密德。

△　金陵大学联合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协和医学院等院校，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会，内设卫生、工程、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农村五个研究部。

△　上海法租界国药业举行罢市，抗议租界当局征收中国药剂门市发售章程捐。

△　云南省富州县更名为富宁县。

△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称“蒙古政治委员会主席”，令各旗限期遣壮丁入伍。

△　华北各地日领馆武官在天津举行会议，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主持，各地领馆武官报告地方情形，并研讨时局问题。会议于次日结束。

△　驻北平日军在八宝山、卢沟桥等地演习。

△　伪满洲国民政部、军政部、蒙政部共同发布《青年训练规定》；伪协和会建立48个青年训练所，对6000名青年进行训练。

1月19日　　蒋介石致杨虎城长函，认为陕军善后方案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释放张学良为“不可能之要求”；并告诫“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蒋介石自称）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若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该信交李志刚带交杨虎城。蒋氏还

称红军名义可暂不变，驻防地点由杨虎城决定，在国军未确定以前，可酌予接济。

△　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交李志刚带回，嘱勿以个人出处问题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目下最要者”是照蒋介石“甲案”立即行之。

△　宋子文自上海赶至奉化，向西安代表解释张学良暂时不能回西安，并问李志刚：“你们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没有？”

△　王芸生发表《三寄北方青年》一文，谓“应该把‘联合战线’的口号改为‘团结建国’，以国民党为中心，共产党和最大多数无党无派的国民，共同督促并培植这个中心走向民主建国的大路”；并称“我们不必另起炉灶的主张召开救亡会议或和平会议”；应该监督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因为“它确是和平递嬗走向民主政治的一条大路”。

△　世界红十字会中国分会会长熊希龄，赴爪哇出席远东禁贩妇孺会议。

△　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教育部任命皮宗石为校长。

△　中央军与杨虎城部队在赤水发生前哨战。

△　宋哲元由北平至天津晤田代皖一郎，谈判华北问题。

1月20日　　鲍文樾、米春霖、李志刚三人由奉化经洛阳飞抵西安，带来蒋介石不释放张学良消息后，东北军中主战派活动益加频繁，集中攻讦主和派将领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　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宣读蒋介石信件，李志刚报告晤见蒋介石经过。东北军将领指斥蒋介石背信弃义，表示对分化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企图决不上当。散会时，杨虎城留李志刚详谈见蒋介石经过；杨氏听后称：“现在应该了解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究竟有转变内战为抗战的准备没有？……你准备再去南京

多找几个人谈谈。经过这次举动，把‘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转变过来，就是牺牲个人，也是值得的。”

△ 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

△ 外交部长张群接见日本大使馆秘书须磨，谈中日调整邦交问题。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取缔棉花搀水杂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 宋哲元发表《告冀察同志书》，表示：一、不参加内战；二、保卫主权；三、“剿匪”、“剿共”。

△ 宋哲元针对日本驻华北各地领馆武官会议，在天津发表政策声明称：“国家三大要素，即主权、土地、人民，誓尽军人天职，尽力保卫之。”

△ 宁夏、青海将领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等通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称“剿匪不是内战，戡定内乱系中央大权；政治不能解决者，自当以武力解决之”。

△ 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筹划整理我国音乐，建议设立国乐研究机构。

△ 东北义勇军各路领袖组成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联合会。

△ 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发表宣言，要求召集国民救亡大会，实行和平协议救国主张，反对内战。

△ 佛教界名流发起成立黄十字会，推王一亭（王震）为名誉会长。

△ 甘肃军马步青师攻下高台，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阵亡；徐向前、陈昌浩率部3000余人西入祁连山。

1月21日　杨虎城电蒋介石，并另备一函交李志刚带呈蒋介石，陈述执行甲案困难各点。

△　李志刚飞抵南京，往见于右任、冯玉祥、陈立夫、何应钦等人。何应钦在宴请李志刚时，闭口不谈西安事变；陈立夫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于右任也不谈实质性问题；冯玉祥估计当前形势称："蒋介石今后还要打内战吗？我看再也打不下去了。"

△　杨虎城召集第十七路军、东北军、中共三方面人士开会，周恩来等出席会议。杨氏谈西安代表见到蒋介石的详情经过及其对此行的看法，并提出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奉化与蒋介石谈三事：一、要求张学良回陕；二、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看蒋介石有无转变准备，特别注意于第三点。出席会议者一致同意杨虎城的三点意见。

△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内称如确能停止战争，可保证让步；如要出现"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或战，应由杨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中共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

△　周恩来、秦邦宪电毛泽东、张闻天称，今日阎锡山电杨虎城，主张应接受甲案，并愿代向蒋介石斡旋。杨虎城回电称，甘肃境内胡宗南部全部退出，南京发600万三个月预收军饷，并派人来陕宣抚。

△　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称："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电报要求蒋介石同意：一、保证和平解决，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容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要求蒋介石亲笔复周恩来一信。

△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与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是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

△　国际联盟行政院第九十六届会议开幕，中国代表顾维钧任主席。

△　郑天锡就任国际法官。

1月22日　蒋介石电何应钦转顾祝同、刘峙，提出与杨虎城代表洽商六项意见：一、中央军于本月28日以前暂驻原防地；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于本月28日以前撤至洛阳、咸阳、鄠县以西地区，陕南徐海东、陈先瑞部同时撤至陕北；2月5日前中央军进驻咸阳至宝鸡一线；三、中央军定本月29日进驻西安至咸阳之线；四、东北军可酌留三团兵力暂驻西兰公路咸阳至兰州段；五、第十七路军酌留一两团兵力驻西安附近；六、张副司令之出处与名义，须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时另定。

△　蒋介石电杨虎城，要其直接与顾祝同商量善后问题。

△　顾祝同派刘震东自潼关至西安，与东北军将领洽谈。

△　驻三原之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向西安开拔，该地防务交中国工农红军接替。

△　汪精卫广播讲演《怎样救亡图存》，谓“不特中国目前实行共产可以亡国，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纵，也足以引起大乱，而至于亡”。

△　冯玉祥发表《复兴民族的基本方策》一文，指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方策，第一是抗战，第二是抗战，第三还是抗战。

△　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电复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

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陕南柞水等八县。毛、周两人再电潘汉年，要求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中共“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　红军徐海东部在陕西商县龙驹寨与中央军冲突。

△　日军开始运送大量汽油、煤油、武器等军用品至伪蒙古军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驻地嘉卜寺。

1月23日　李志刚在戴笠陪同下，由南京乘汽车至溪口晤见蒋介石。蒋氏问西安方面意见，李志刚递交杨虎城的信说：“虎城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负责人开过两次会，他们一致要求张先生回去。”蒋介石摇着头说，张学良“到南京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拒绝西安要求张学良回陕。李志刚又问中央军为什么西进，蒋介石重申顾祝同部西进是为了恢复秩序，并称：“如果他们不听国家的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蒋介石要李志刚立即把这话电告杨虎城，劝其不要自误，并对李志刚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蒋氏并要李志刚留下等候杨虎城复电。

△　经蒋介石同意后，戴笠陪同李志刚至雪窦寺中国旅行社往见张学良与赵庵。李志刚将西安要求张氏回陕及与蒋介石所谈情况告知张学良，张氏慨叹说：“蒋先生是不会让我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

△　宋子文由上海至奉化晤李志刚称：“目前情况，张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要质问他（指蒋介石）。我已经问过蒋先生，这个要求是决不能办到的了。”

△　国民政府明令国葬辛亥滦州殉难诸先烈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14人。

△　滇缅勘察委员会在云南沧源设治局护卫营遭蛮海卡民袭击，经还击后，蛮海卡民求降。

△　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29日，林铣十郎内阁组成。

△　江海关发表统计，上年度入超激增2.3亿元。

1月24日　汪精卫赴奉化溪口对李志刚称，杨虎城须服从国家命令，以免地方涂炭。李志刚问汪精卫："当前国家政策将怎样转变？"汪氏答称："怎样变，必须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

△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溪口商谈外交与内政方针，议定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如期举行。

△　杨虎城电复蒋介石，同意派代表直接与顾祝同商谈；另电嘱李志刚即回陕汇报，并赴潼关参加与顾祝同商谈。

△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就陕、甘问题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谓陕、甘情势最近当能完全明了。

△　西安代表何柱国、米春霖、谢珂至潼关晤顾祝同，首先要求张学良的名义在东北军移防时即予发表，关于各部队驻地、接防、移防费用及接济红军等问题亦相应提出。

△　徐恩曾、朱文中、骆美奂发起组织中国农工生活改进会，在南京开成立会。

△　心理学者陆志韦、樊际昌、周先庚、蔡乐生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心理学会。

△　中国哲学会在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要求教育部在大学设国

学系，开哲学课程，编译哲学大辞典，在中央研究院设哲学研究所。会议选出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胡适等为理事。

1月25日　李志刚飞回西安，杨虎城立即召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开会，听取李志刚第二次赴奉化见蒋介石汇报后，与会者认为蒋介石有变内战为抗战的准备。杨虎城认为只要实现抗日，西安事变就取得了最重要的成果。与会者同意杨氏的意见，并推选米春霖、谢珂为谈判代表，加派李志刚为杨虎城私人代表，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谈判。

△　何应钦以顾祝同两次与米春霖等会谈情形电话报告蒋介石，蒋氏指示七项要点，其要旨为："第一步，各部撤至西安、咸阳以西时期，最迟不得超过本月三十日；第二步，移防完毕不得超过下月十日。但东北军入甘路程较长，准予酌量展申，然亦不得过下月十五日也。惟中央军接防至宝鸡陇海全线，必须于下月五日以前完毕。""张汉卿名义必须待其部队移防完毕后方能请。"

△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同意周氏24日所拟与国民党谈判方针：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对放弃共产主义，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国民党如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共产党可以加入，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三、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应为六七万人。

△　张闻天动身往西安行前，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指示北方局"要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

△　日华北驻屯军军部与满洲铁道会社在天津召开开发华北经济会议。会议由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主席，"满铁"产业部长阪谷、次长奥村、东亚科长宫本等出席。会议对一、东北产业五年计划；二、农村技术合作；三、石炭液体事业；四、华北铁路运输问题；五、植棉事业等案，均有详密计划。

1月26日　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共同商讨派李志刚赴潼关谈判要点，决定必要时邀请周恩来共同商讨。米春霖、谢珂、李志刚三人至潼关与顾祝同谈判，谢珂质问顾祝同：中央军西进是否又要打内战？顾祝同指责第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在华县与华阴增兵。双方各执一词，谈判历三小时毫无进展，最后商定两天之后继续谈判。

△　东北军将领与杨虎城会议，向顾祝同提出三项要求：一、部队撤退展期两周；二、张学良到部队讲话，部队即移动；三、五届三中全会前给张学良名义，并使之出席该会议。此三项要求遭顾祝同拒绝。

△　蒋介石接顾祝同报告，内称："商谈情形不能迅速开展，杨（虎城）之态度并不如何坚持，第三者（按指红军）亦未出面捣乱，问题全在东北军。"蒋介石即指示顾祝同、刘峙，若27日下午西安方面不撤军，即宣告和平破裂，"先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其前方司令部开始轰炸，对于西安新城各目标，暂缓轰炸，以示区别"。顾祝同将谈判展期至28日。

△　张学良闻潼关谈判因其出处问题陷于僵局时，急电东北军前方将领，勿以其个人出处为接受甲案的先决条件。电文称："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张学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　蒋介石电东北军各将领，称"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蒋介石）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劝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服从中央。

△　行政院议决救济广东省米荒办法：一、粤购洋米数额增至100万市担，关税半数记帐；二、铁道部即日起备专车一列，运湘米赴

粤；三、粮食运销局商同招商局，专备一船运皖米入粤；四、由财政、实业两部派员赴粤调查，详拟救济办法。

△　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邓文仪报告，全国有省新运会20个，市新运会四个，县新运会1222个，铁路新运会11个，侨胞新运会15个；各地劳动服务团2471个，服务队7887个，共有39.5263万人，各地妇女生活改进会组织12个。

△　宋哲元访田代皖一郎，交换开发华北经济意见。

1月27日　　张学良于奉化溪口致书东北军将领称，“万勿斤斤于良（张学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陕事“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同日，张学良电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将领，要求“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

△　杨虎城听潼关谈判代表报告后说，“只要国家政策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打仗的”；因恐东北军坚持释放张学良为谈判先决条件，特加派第十七路军参议王宗山为谈判代表。

△　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50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王以哲等和平解决方针，主张待张学良返陕后撤兵，要求红军给予支持。周恩来对应德田等说服无效。深夜，南汉宸报告周恩来称，孙铭九等已拟就一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与共产党员。

△　外交部长张群告日本大使馆武官雨宫巽，调整中日邦交，应取消过去非法造成之事实，避免今后引起纠纷之行动。

△　阎锡山电杨虎城，劝其服从中央。

△　毛泽东电潘汉年称，经周恩来全力斡旋，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始行撤兵；否则要打。毛泽东意，蒋

介石不妨让张学良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风波，和平解决此问题。

△　张闻天秘密到达西安，住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副官家中，与周恩来、秦邦宪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　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第十四军军长陈嘉祐在香港逝世。

△　全国各省、县农民与土地调查结果，农民占总人口78.54%。

△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与日华北驻屯军商定开发华北经济五年计划。

1月28日　东北军代表与顾祝同达成协议：东北军在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对西安方面的上述要求“酌允办理”，同意部队撤到渭北后，办理张学良复权手续。

△　刘湘恐陕局扩大，影响全局，本月11日曾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和平主张；是日又电请蒋介石返南京主持大计。

△　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称，其个人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相见，决不先撤兵；请蒋介石书告东北将领，保证撤兵后予张学良恢复公职。

△　秦邦宪以发生东北军青年军官50余人至周恩来处请愿，促张闻天速离开西安，前往云阳红军总部。张闻天临行前电毛泽东转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中共的方针应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并称“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行为”。

△　张闻天至三原云阳镇红军总部，与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

紧急商议，并以个人名义电毛泽东及周恩来，建议红军主力从陕南“向渭北方面撤退”，以“表示我们的和平诚意”；并请朱德、毛泽东对红军北撤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并“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

△　杨虎城表示服从中央命令，令刘多荃部撤离赤水一带防御，令西安部队向三原撤退。中央军樊崧甫部连夜推进至西安附近接防。

△　周恩来电蒋介石，提出恢复张学良公权、发表名义等要求，并“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各界代表百余人，在庙行无名英雄墓前举行阵亡将士公祭，纪念“一二八”五周年。南京、杭州、广州、北平、天津、汉口、重庆、西安等地均集会纪念。

△　宜宾饥民抢劫米船，死伤多人；四川其他各县同时发生抢米风潮。

△　山西防共保卫团改编为陆军保卫团，杨爱源任陆军总指挥。

△　菲律宾总统奎松抵沪，次日离去。

△　日机飞兴和、集宁、原阳一带侦察；伪蒙军德王移至化德，李守信部移至尚义，王英部移至商都。

1月29日　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电复潘汉年称，为坚决赞助蒋介石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坚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将徐海东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我们可以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

△　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与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出席会议共40余人，王以哲因病未出席，委托董英斌代为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主张撤兵；应德田等人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到会40余军官全部签名。

△　杨虎城所部开始向渭北三原一带转移。

△　是日与30日，张闻天电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称，在一般情况下，红军不参加内战；只有在实行甲案后，南京仍进攻中共时，才实行自卫。

△　洪深、傅东华、邵洵美、叶灵凤、胡仲持、顾仲彝六人，邀集上海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发表上海文艺界对统一救国运动宣言。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

△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偕顾问山本晤孔祥熙，谓日方希望孔氏出任行政院长。

1月30日　豫皖绥靖主任刘峙由洛阳至潼关，先后与顾祝同及米春霖、谢珂商谈，决定采用甲案。

△　周恩来经由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

△　毛泽东电周恩来、秦邦宪称，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

△　国民党西北临时党部筹备委员会在西安正式成立，推举景梅

九、李经武、杨鹤庆、续范亭、阎玉青、师子敬、尚卫民为筹委，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实践诺言。

△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自西安乘汽车至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均参加会议，一致认为应坚持和平奋斗方针。但目前主战者得势，一旦开战，只有与友军一同打。如打得好，和平仍有希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会后，周恩来与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电毛泽东、朱德、张浩、张国焘、凯丰等称，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会后，张闻天返延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晚自三原赶回西安，以会议讨论意见告知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

△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复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称，“我们的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和平”。

△　驻沪日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在杨树浦、北四川路与曹家渡一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由司令官大川指挥，历时三小时。

1月31日　　毛泽东、张闻天电周恩来、秦邦宪称：“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

△　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在王以哲寓所召开三方最高级会议，决定坚持三位一体，争取和平，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并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顾祝同签订停战协议。

△　蒋介石电顾祝同称，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红军20万元至30万元经费。

△　红军代表李克农与顾祝同谈判，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

△　邓宝珊自兰州飞抵西安，即与杨虎城下令撤兵。

△　东北军代表米春霖、谢珂在潼关与顾祝同、陈诚等商谈。

△　行政院长蒋介石提倡公墓，“应设法将此意编入公民课本”。

1月下旬　　彭德怀、任弼时至西安会晤杨虎城、王以哲等人，邀请两军主和与主战主要人员举行座谈会，说明：一、日本决心灭亡中国，我国面临亡国之祸，必须全国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共同抗日；二、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是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依据，亦为当前的基本政策；三、蒋介石是可以抗日的，只要大家团结好；四、目前形势不宜用战争去解决问题，打仗可能引起更混乱局面，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彭、任二人征询与会者意见，但无人发言。

△　东北军少壮派军官60余人，痛哭流涕围坐于杨虎城客厅中，要求杨虎城率部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是月　　桂系驻西安代表刘仲容应邀至延安访问。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刘仲容深入讨论双方联合抗日问题。毛泽东详询广西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后，希望各种抗日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并指出“中国的局势已起重要变化，抗日局面就要实现，希望李（李宗仁）、白（白崇禧）两位先生作好准备”。

△　西藏出兵金沙江，先后占据白玉、德格、邓柯、石渠等四县。中央派员前往劝说，西藏热振方面接受中央劝告，退出四县。

2月

2月1日　　蒋介石指示刘峙、顾祝同率中央军入驻西安注意事项："一、入西安后，对杨（杨虎城）先以诚意待之；二、部队应慎选其军纪优良与防御力较强者为要；三、立即以国府命令名义由行营发表西安卫戍司令一员。"

△　于学忠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传达王宅（王以哲家）"三位一体"会议结果，决定采取政治和平方针营救张学良，引起少壮派强烈不满。

△　周恩来与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分别代表红军、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开最高军事会议；应德田亦参加。会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亦表同意；应德田等人亦无异议。周恩来再次阐述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动。

△　张学良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

△　于学忠在西安新城大楼向东北军干部传达三方面潼关谈判和平解决事变的协议。传达毕，于学忠放声大哭，听众亦多痛哭流泪。

△　是日晚，杨虎城派李志刚去潼关准备签署和平协议。王劲哉即以此消息告知孙铭九；孙铭九下令封锁城门，阻止李志刚去潼关。

△　朱德接见《新中华报》报社记者，重申"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朱德表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如蒋介石能实现其在西安的诺言，则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共上抗日战场。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

△　蒙藏委员会制定《汉藏僧侣游学办法》，凡12条，以沟通汉藏文化；并派员视察各地蒙藏学校。

△　川黔铁路成渝段工程开工。

△　中美两国在南京签订《无线电通话合同》。

△　上海与香港无线电通话。同日，上海与南昌及洛阳间电话通话。

2月2日　蒋介石等由溪口至杭州。

△　西安城内东北军特务团长孙铭九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反对撤兵，枪杀第六十九军军长、主和派将领王以哲与参谋长徐方等四人，史称“二二事件”。何柱国躲入杨虎城公馆，始免遇难。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枪杀王以哲行动，并与刘鼎等中共人员至王以哲家中吊唁，王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随后，到新城和杨虎城商议。杨虎城派李志刚到潼关继续谈判。

△　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渭南部队全部撤出渭南前线。

△　驻陕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与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称“捍国之武力，非自残之工具，以爱国之美名，作害国之事实，克等不忍闻，亦不忍见。是以双十二事变之后，即本中央宽大之处置，始终拥护，以期精诚团结，群策群力，复我大仇”。

△　下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邀集马占山、米春霖、鲍文樾、刘伟等商量如何稳定东西两线部队，决定推派马占山、鲍文樾等四人前往平凉说服刘多荃与缪澂流，派陈昶新（旭东）前往说服吴克仁。

△　国府主席林森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慰问该国水灾灾情。

△　天津警察局破获日本人冒充“共产党机关”，捕获汉奸郭秀

山、杨源等。

2月3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蒋介石续假两星期。

△　何应钦电唁王以哲家属，称王以哲“力持正义，服从中央命令，尤为国人所钦佩”。

△　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害，自动撤出渭南，立即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欲为王以哲报仇。周恩来、叶剑英派刘澜波至渭南，劝刘多荃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　晚，马占山一行与刘澜波均到达渭南刘多荃指挥部，刘多荃表示对南京输诚，与高崇民同去高陵与缪澂流会合，让开陇海线正面阵地，并派副师长高鹏云电话通知在潼关的中央军樊崧甫提前进军。

△　为避免东北军内讧，周恩来派刘鼎将孙铭九等人送至泾阳、云阳红军驻地。

△　宋哲元代表戈定远至杭州谒蒋介石。

△　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张自忠、济南市长闻承烈至天津谒宋哲元，向冀察政委会报告天津、济南及北平政务。

△　西安局势紧张，周恩来与秦邦宪商定，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中共人员撤至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个人仍留西安。

△　周恩来与秦邦宪将西安情况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建议“请毛（毛泽东）下令彭、任，从4日起，各军团即向预定地点转移，十五军团由周（周恩来）令其经咸阳在叱干镇集结”。

△　自是日起，杨虎城先后电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何应钦等人，并准备请邓宝珊向蒋介石面陈一切，希望经二二事变后能释放张学良，至少许其回陕训话一次，以安定东北军。

△ 美总统罗斯福电谢林森慰问该国灾情。

2月4日 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七将领联名发表《和平宣言》，提出：一、恢复张学良公权；二、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三、军队移防待张学良回陕后开始；四、陕、甘民众团体仍旧维持。

△ 李克农回至西安，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人员迁至西安七贤庄，设立红军联络处，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 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陆续后撤。

△ 西安市戒严司令部撤销，城市治安由军警督察处维持。

△ 毛泽东电潘汉年称，“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望你同张冲兄在5至7日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 周恩来电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分析目前形势称，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可能。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周恩来并提出中共方针为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西路军问题拟与顾祝同面商，送钱接济。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拨款五万元修理黄花岗烈士墓。

2月5日 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预定三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四、加强军队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人才。蒋介石的内政、外交政策开始有重要转变。

△ 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四军长在高陵共议，决定

接受乙案，东北军开出潼关。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与士兵要求保持“三位一体”，主张执行甲案。因东北军内部意见不一致，决定派何柱国前往溪口向张学良报告西安情况。

△　东北军撤出西安。

△　教育部制订《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五项，“对志愿从事职业者，授以知识技能，使得服务社会，提高工作效率”。

△　行政院命令禁止发售《清史稿》，以该书“内容纰谬百出”。

△　国货联营公司在上海成立，黄炎培等到会。

△　宋哲元访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交换对“开发”华北经济意见。

△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任伪蒙军总司令，日本促其进攻绥东兴和、红格尔等地。日特务机关长田中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攻绥计划。

△　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开济南、太原、张家口三地日本领事馆武官会议。

2月6日　　杨虎城回到三原。第十七路军开抵三原一带，指挥部设三原；红军彭德怀部北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自西安撤向邠县。

△　周恩来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毛泽东称，二二事变后，少壮派溃乱，特务团、抗先队开往邠县，沈克等师投降南京，于学忠无力统一东北军。如再批评东北军的两派，则便利南京政府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第十七路军暂难立足，我们应鼓足勇气给予支持。我们除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外，派叶剑英到三原、泾阳建立办事处，并连接淳化、延安。

△　周恩来等中共人员退出张学良公馆，搬进七贤庄红军招待所，留机要科长童小鹏主持红军联络处。

△　中央军进抵西安接防；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暂住临潼。

△　国民政府颁布《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

△　康藏纠纷解决。藏方已愿将白玉等四县归还西康；入康藏军撤回。刘文辉派员在昌都与藏方取得联络。

2月7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间通车。

△　邓宝珊自西安飞抵南京，报告陕、甘状况与善后办法，陕局得以圆满解决。

△　日驻华大使川樾茂由上海抵南京，称此行系为探听西安事变解决办法，并“观察”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　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昭和十二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

△　汉口总商会请湖南省政府制止修筑洞庭湖天佑垸。天佑垸将占面积40余万亩，约当洞庭湖湖面13%。

2月8日　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部和平进入西安。同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入西安。

△　蒋介石电顾祝同，谓“安置东北军办法，总以调驻豫、鄂、皖省区为唯一方针”。

△　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关于处理陕甘经过》称：“西安问题，截至现在，只能说是告了一个段落；须俟张部完全

遵照中央命令开驻新指定之防地，才能说完完全全告一结束。”

△　毛泽东电周恩来，请其与顾祝同面商红军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清涧、宜川等处。

△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修正通过《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目图表》，并决议设立海外支会，通过《海外支会组织须知》。

△　国民政府令：撤销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河务局，另设黄河水利委员会驻各省黄河修防处。

△　云南十三大寺总管圣露呼图克图抵南京，谒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2月9日　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

△　国共谈判代表张冲、潘汉年分别于是日到达西安；潘汉年介绍张冲与周恩来会见。

△　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谈判历时一月。

△　周恩来听取潘汉年汇报，判断蒋介石能否停止“剿共”方针，须看情势发展，并以此电告中共中央，建议蒋介石如要中共派员至南京参加会议，中共只应答应出席国民大会与国防会议。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内称：“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

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

△　毛泽东、张闻天电周恩来称，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内容，以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立场为准则。军事方面，红军初步编为12个师，组成四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指挥，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每月为80万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共产党员，不破坏中共党组织，红军中的中共领导不变。

△　周恩来会见顾祝同。顾祝同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等；并称蒋介石原定约周恩来10日赴杭州谈判，因故推迟，命顾祝同先与周恩来会谈。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抚慰旅陕东北军民，并拨款派员调查抚慰。

△　国民政府中央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通过《地方自治组织纲领》。

△　上海英商电车工人3000人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同盟罢工一天。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访外交部长张群。

△　延安欢宴自日本归国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毛泽东在会上称，为了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

名义。

2月10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五届三中全会本月15日举行。

△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深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本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决议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七十寿辰，特颁林森“七秩”奖学基金20万元；同时并在全国各地举行庆祝活动。

△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以谈判的补充内容，中共应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国防会议及国民大会；抗日开始后，参加政府。

△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杨明轩称：“此次和平告成，实为国家民族之大幸。”

2月11日　张冲会晤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问题的两种解决办法：（甲）先按指定区域调防，派驻联络人员并予接济。（乙）然后改苏区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红军改编为国防军，维持原有领导，但加派政训工作联络员；各边区武装编为地方团队。张冲表示，红军改编后军饷至多只能为60万元。周恩来称，与顾祝同所谈只是交换意见，改变制度、名称须尊重蒋介石意见，故须与蒋氏见面方能解决问题。对于红军改编，周恩来提出应编为12个师，组成四个军，编为一路军，照中央军待遇，每月军饷至少需百万元；并须增清涧、宜川、中宁、豫旺四处为防地。

△　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会谈。张冲表示，国民党提出甲、乙两方案。甲案是临时的，乙案是基本的；并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中央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

员，其他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要求以甲案为基础交换意见，并提出：一、释放被捕中共党员，国民党保证不再逮捕，不再破坏中共党组织；二、中共不再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纲领；三、改苏区为特区，实行民主制度，受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但军官不变，政治领导不变；四、中共代表可以苏区和红军名义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目前不参加政府。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称："今日张冲见顾（顾祝同）询究竟，顾云，蒋（蒋介石）电彼先与我商大概，然后再去见蒋。张（张冲）因此提出两案，甲案系临时的，乙案是基本的。张提出取消苏维埃，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政训工作派联络人，其他边区地方部队改为团队等四条。"

△　蒋介石在上海会见杜月笙、张啸林等。

2月12日　周恩来、叶剑英继续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会谈结果如下：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战线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与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与破坏，允许中共党组织适当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苏区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与团结御侮，以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表示。

△　邓宝珊在南京向中央当局报告陕、甘实际情形，并提出处理陕、甘善后意见；是日飞返西安，谒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并会晤杨虎城、于学忠等人，传达中央意旨。

△　于学忠遵军政部电令枪决第一〇五师旅长高福源，查办西安

事变重要成员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及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第一〇九师团长万毅等均扣留禁押。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复周恩来，提出与张冲、顾祝同谈判应注意事项：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调走时，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为民团或保安队，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们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

△　立法院批准国际《禁奴公约》。按：该项公约于1936年9月在日内瓦签订，已有42个国家批准。

2月13日　宋希濂就任西安警备司令。

△　顾祝同电蒋介石，报告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彼所提出之意见，分为比较具体的与临时的办法两种。（甲）比较具体的：一、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坚决实行御侮救亡统一战线纲领；国民政府允许分期释放在狱共党党员，不再逮捕和破坏，并容许共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二、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或西安行营管辖，实施普选制，特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人员编制、饷额补充，照国军待遇；其领导人员，中央及军委会任命，其政训工作，由其自做，但中央派少数人员任联络；其他各地区赤色游击队，编为地方团队。四、共党得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讨论。五、该军得派代表参加国防机关。六、希望三中全会关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容许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能有进一步的主张和表示。（乙）如比较具体的办法一

时不便施行，拟请定一临时办法，即暂划一地区俾其驻扎，每月酌予接济。（丙）据出现在该方现有全数人员，因驻地粮食昂贵，官兵每人每月最低伙食费非七元以上不敷维持。故如具体的解决，在地方上完全不取他款，每月全数至少非七十万元不能生存等语，究应如何办理，敬乞钧裁示遵。”

△　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要求西安方面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略谓“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16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森林法》及《实业部直辖育种场组织条例》。

△　外交部长张群宴日本大使川樾茂。

2月14日　蒋介石由上海返抵南京，出席五届三中全会。

△　毛泽东电周恩来向国民政府要求增加防地称，“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灵武、中宁、豫旺、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今安西县），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高台）。

△　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劝杨氏加紧巩固和训练部队及地方团队，加紧团以下的工作。

△　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携杨虎城等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案飞抵南京谒蒋介石，并报告西安事变解决经过及东北军驻防问题。

△　秦德纯代表宋哲元，重申冀察一切政务悉秉承中央命令处

理。

△　浙江省政府通令所属严禁私刑逼供。

△　招商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度总收入8000余万元，纯收益95万元。

△　上海租界自来水问题委员会呈请行政院将公共租界自来水收回自营。

△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测出民国三十年（1941）日全食线。

△　上海中华海员请求政府收回引水权运动委员会（由中华海员工会与上海海员分会等团体组成）派李剑白、胡琦、冯福丞等10人去南京请愿。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推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王法勤、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九人为主席团，汪精卫为大会主席。汪精卫主持开幕典礼并致开幕词称："我们应当怎样竭尽心力挽救危亡，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分党务、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五组。

△　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紧急提议《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案》，称，"十六年以后，'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　杨虎城、于学忠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八项实行全国统一办法："一、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材，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

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此即西安事变时向全国提出之八项主张。

△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并散发《西安半月记》，复向全会提出“引咎辞职”。全会“一致议决慰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向全会作工作报告。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本年1月15日止，全国共有国民党正式党员95.8444万人，预备党员69.198万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指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均为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纲》解释中共的四项保证称：“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

△　毛泽东电周恩来称：“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　周恩来与原黄埔军校学生宋希濂、关麟徵交谈；宋、关二人均表示“愿和平，准备抗战”。

△　周恩来会见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颇得其同情”。

△　西安行营令于学忠代理甘肃绥靖主任。

△　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至南京。

△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等团体组成上海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推

王云五、胡政之（胡霖）、杜月笙、王晓籁、骆清华、柯干臣、周邦俊、金润庠等100人为执委。

△　中国与英国无线电话通话。

△　伪蒙军张世英部三个团1500余人反正。

△　日驻华大使川樾茂首次访问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谈三中全会情形。

△　日台湾总督府第二号《府令》宣布，全台公立学校一律废除中文，改习日文。

2月16日　　蒋介石就改编红军方针电顾祝同称："不可与之说款项多少，只可与之商准留编部队人数之几何为准，当西安事变前只允编3000人，后拟加为5000人，但5000人之数尚未与之言明也。今以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个团兵力已在1.5万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至于其他关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谈可也。"

△　周恩来电张闻天、毛泽东等，告知史沫特莱将至苏区访问，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　中国与美国、德国无线电话通话。

2月17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孙科主席。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外交部长张群作外交报告。会议推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为宣言起草委员。

△　国民政府令准蒋介石所请，张学良着予恢复公权。

△　何柱国等三人将西安情况报告蒋介石后，往溪口见张学良，告知与何应钦所谈各点，并详述西北已再不能维持“三位一体”。张学良写两封信交何柱国带回西安，一交于学忠转东北军，一交杨虎城。在给于学忠的信中，张学良要求维护东北军，维护大局，“维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　西安军警联合办事处成立，宋希濂为司令。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上将病逝。

2月18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戴季陶主席，财政部长孔祥熙作财政报告。会议通过李宗仁等九人提出的《迅予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总动员之基础案》等决议案。

△　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说，强烈要求“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并称“只有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救国必须停止内争，和平统一必须实现”。

△　蒋介石呈请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辞去本兼各职。全会决议：一、陕变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二、恳切慰留蒋介石。

△　毛泽东电周恩来称：“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周恩来派程子华至宁夏与马鸿逵联系。

△　海外侨胞捐款献机200余万元，购机28架，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补行命名典礼。

2月19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冯玉祥主席，通过

11项议案。冯玉祥等16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拟定重要办法：一、努力收复失地。二、采取积极外交。三、集中全国人才，严惩失职。四、筹划开办基本工业。五、厉行议而必决，决而必行之精神。《关于国防经济议案建设案》要点：一、确定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二、增筹建设经费及发行建设公债。三、调整建设行政机构。四、注意建设人才。五、奖励及保护民营事业。

△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提出之《设置总理纪念奖金案》，决定拨款300万元为基金，每年提用利息20万元充作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社会服务五类奖金。每类首名每年奖国币二万元，第二名奖8000元，第三名奖5000元，第四名（二人）各奖2000元，第五名（三人）奖1000元，以上共计每类4万元，五类同发则为20万元。

△　何柱国飞返西安，向东北军传达张学良意见。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称，中共所提四项保证已为外间所知，同情者甚多，蒋介石既不能封锁，亦不能再“剿共”。因此，蒋介石对国共两党谈判采取拖延政策，对东北军、西北军实行分化政策。中共应采取的对策：一、团结东北军，促其全部开入甘肃境内，避免被蒋介石分化；二、巩固和训练第十七路军现有部队；三、要顾祝同迅速解决红军防地和接济粮食；四、努力宣传新政策，欢迎各方到苏区参观，以扩大影响，同时加紧训练红军；五、积极做黄埔系和南京各派的工作。21日，中央复电同意。

△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五届留英公费生，名额29名。

△　国民政府明令修正《总理纪念周条例》。

△　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会长蒋介石向全国广播《新生活运动的意义》称，“欲复兴民族，非有一划时代之新生活运动不足以转移社会风气”。

△　湖北省党部电请制止湖南堵松滋、太平、调弦、藕池四口。“四口”在洞庭湖与长江间具有水旱调节功用，不应加以堵筑。

△　河北、山东两省实行武装缉私，特设津浦路内河稽查处，并恢复大沽口与金钢桥两处船运货物检验处。

2月20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决议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致张闻天信，谈对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看法。谓：“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指出：“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

△　中国地质学会在北平举行年会。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宴宋哲元，商谈有关沧石铁路（沧州至石家庄）与龙烟铁矿事宜。

△　日本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称：“处理华北的要点，在于将该地区造成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一切为了建立日、满、华三国实现合作互助的基础。”

2月21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六次大会，决议事项：关于根绝“赤祸”案；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周佛海辞职，由陈公博继任；中央宣传部长刘芦隐久未到职，由邵力子任中央宣传部长；取消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制，恢复常务委员制。《根绝赤祸决议案》列举军队统一、政权统一、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四点。

△　毛泽东与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电周恩来，并转告

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称："桂（广西）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南京）、沪两方小开（潘汉年）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河北省）、鲁（山东）暂时无办法。……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

△ 沈克、檀自新率部开至豫南。

△ 铁道部与湖南、广西两省商定修建湘桂铁路办法。

△ 成都至西安电话通话。

△ 天津日、韩走私浪人殴伤关员，捣毁海关仓库。法租界工部局警捕扣留浪人六名，引渡日租界警察署讯办。

△ 意大利水兵捣毁上海虬江路苏联侨商上海戏院。该戏院放映《阿比西尼亚》影片时，意大利水兵及侨民数十人至戏院持木棒乱打，并乱投硝酸水瓶，观众大乱，状至凄惨。之后，意水兵等乘车扬长而去。

2月22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发表宣言称：对外维护主权，对内和平统一，根绝"赤祸"，努力经济建设，消灭阶级斗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自15日开幕，历时八日，共开大会六次，预备会一次，各组审查会四次，主席团会议八次，参加大会的中央委员共170余人。是日上午举行闭幕式，由于右任宣读三中全会宣言。

△ 蒋介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谈开放言论、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认为"（一）宣传赤化与危害国家，扰乱地方治安之言论与记载，（二）泄漏军事、外交之机密，（三）有意颠倒是非，捏造毫无事实根据之谣言"应予禁止。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表明蒋介石在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中共应在不失立场，不放

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对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

△　何柱国在高陵向东北军将领说明时局形势。

△　王树常、莫德惠过杭州赴溪口访张学良。

△　朱学范为出席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劳工代表，姚定尘为出席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劳工方面代表顾问。

△　西南民航公司“长庚号”在广东三水失事，坠落河中。

2月23日　南京举行“追悼西安殉难诸烈士大会”，蒋介石主祭并读祭文。

△　周恩来得知东北军即将东调安徽，其主要军官中发生分化情形后，电毛泽东并转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东北军中新的中心不易树起，目前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原则是保存党的秘密组织。

△　天津海关向日本领事抗议浪人劫掠仓库。

2月24日　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明确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四、“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仍为秘密，但拒绝国民党组织”。五、“苏区改为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并补充：“关于阶级斗争，本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斗争。”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秦邦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

长，郭洪涛任副部长；何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长；李见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会议决议，特区政府名义暂时不变动，工作由林伯渠负责，暂时不成立苏区工作委员会。

△　国民党原中委与宣传部长刘芦隐因与唐有壬、杨永泰被刺案有关，未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在上海被捕。

△　国民政府晋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旗广慈寺堪布诺门罕班第达喇嘛噶拉藏伊希呼图克图名号。

△　驻日大使许世英因参加近期段祺瑞葬礼，请假回国。

△　日人创设塘沽运输公司，扩大对华走私及运载芦盐。

2月25日　孙蔚如由陕飞南京，赴沪与孔祥熙、宋子文商谈陕西财政建设问题。东北军将领吴克仁、李振唐、霍守义、周福成、唐君尧与孙蔚如同机到南京，经上海乘轮赴宁波，转奉化谒见蒋介石，并往见张学良。张氏对其部下称："陕事已成过去……我人应以赤诚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使东北军成为劲旅，蔚为国用，勿负蒋委员长厚望。"3月1日，吴克仁等四人由奉化返南京。

△　全国第二次公路交通会议在湖南长沙开幕，南京、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15省、市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内政部、铁道部均派代表出席。大会由经委会公路处长赵祖康主持。

△　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周恩来称，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提出与国民党谈判方针的补充意见称，如国民党不承认中共的独立地位及

最低限度的红军人数，则表示无法继续谈判；同时指出，中共必须加快向非苏区布置党和群众工作，加强对宁、沪地区的工作和对黄埔系的上层活动。

△　周恩来电潘汉年，命与邓文仪恢复联系；并告知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工作。

2月26日　国民政府特派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二级上将白崇禧兼第五路军总、副总指挥，陆军中将李品仙兼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陆军中将张任民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

△　张冲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返回西安，向周恩来介绍三中全会经过，并说明国民党容共基础已定。周恩来对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措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权利；并表示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张冲邀周恩来等同赴南京。

△　行政院议决改组陕西省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省府委员兼主席；任命彭昭贤（兼民政厅长）、续式甫（兼财政厅长）、周伯敏（兼教育厅长）、雷宝华（兼建设厅长）、杜斌丞（兼秘书长）等八人为省政府委员。

△　西兰（西安至兰州）公路恢复通车。

2月27日　财政部批准中国实业、通商、四明三银行加入官股，将商股资本减作一成五计算。经核减后，中国实业银行商股为52.611万元，增加官股34.7389万元；通商银行商股为52.5万元，增加官股3.475万元；四明商股为33.75万元，增加官股66.25万元，均凑足为400万元。

△　周恩来与张冲继续会谈。张冲传达蒋介石的新提议：一、中共服从三民主义；二、政治犯分批释放，中共现时秘密，宪法公布后

公开；三、特区与中央法令不合，可称“行政区”；四、中共的国民代表大会人数，俟周恩来至南京后商定；五、周恩来往南京时，可带来加入政府工作的中共党员名单；六、俟国防会议组成后，中共即可参加；七、政治问题已相距不远，待周恩来与顾祝同对问题商定后即去南京。军队改编人数，可由两个师八个团改为三个师九个团。周恩来表示，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与宣言之措辞，中共保留日后声明权；对于红军改编问题，番号可改军为师，但总人数不得相差太远；并请张从速解决临时接济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与张冲谈判情况，并称如顾祝同无法停止甘肃、青海回族军马步青、马步芳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红军只有自己增援。

△　孙科在上海谈话称，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已通过，共产党“如有遵依四项办法之决心，而以事实表现于全体国民之前，当可不剿而抚矣”。

△　李济深决定出洋考察，李宗仁电国民党中央请发给护照。

△　北平市长秦德纯称，冀察外交今后完全与中央一致。同日，秦德纯抵天津谒宋哲元，报告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

△　日内阁首相兼外务大臣林铣十郎、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举行四相会议，检讨对华政策。

2月28日　周恩来与张冲继续会谈。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为六个师，每师三个团，除总指挥部外，至少为六七万人。张冲称，蒋介石与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恐其壮大，认为红军改编后最多只能编四个师，共四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此议。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中共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一、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环境下偶然

仓促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二、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三、15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是相信共产党的；四、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五、尽量废除苛捐杂税；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毛泽东称西安事变是暴风雨的突变。会上，中共组织参观团赴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

△　杨虎城部开抵延安附近。

△　国民党留俄同学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到130余人，推选鹿钟麟、王陆一、林柏生等九人为监事，谷正鼎、傅学文、徐浩等27人为理事。

△　日驻郑州特务机关雇用汉奸赵龙田，勾结土匪刘桂堂，企图暴动，河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逮捕赵犯，就地枪决。

2月下旬　中央军东开，撤出潼关。

是月　宋哲元不顾日本激烈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

△　中国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　全国对外贸易是月份入超30余万，美国居首，次为日本。

3月

3月**1**日　国民政府颁布之《征兵令》开始施行。

△　国民政府准予行政院公布：关于规定雇佣妇女工作于一切矿场地下、海上雇佣儿童最低年龄、海上雇佣儿童及青年强制体格检查、雇佣火伕或扒炭工之最低年龄、遣送海员回国、海员雇佣契约条件等六项国际劳工公约。

△　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邮政互换包裹协定》，是日起实行。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演讲《地方行政为国家政治的基础》，认为“中央机关的工作侧重在决策，地方机关的工作侧重在实行”。

△　行政院训令陕、甘两省政府，现已恢复常态，两省各县区行政应仍分别秉承省政府办理。

△　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谈判。顾祝同同意先给红军接济30万元，并允为河西走廊及陕南红军送款。张冲提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八个团，共六万人；并建议中共经由在苏联的蒋经国向蒋介石做工作。周恩来当即将商谈情况电达中共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商量，如何让蒋经国向蒋介石做工作。张冲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张闻天与毛泽东电周恩来称，中共在谈判成功后，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展。因此，“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16个团及二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是可接受，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　毛泽东、张闻天就与国民党谈判方针及对付反蒋派方针问题电周恩来，并转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称：“（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为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之善后费。（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方针，

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称：“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他们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

△　教育部组织全国医院考察团视察各地医院设备。该代表团从南京出发，经济南、德州至北平，再转抵汉口、九江至上海，然后回南京。

△　渔业银行团在上海成立。王志华等12人为银行私方理事，王志华兼任经理。官方派杜月笙、钱新之、王晓籁等七人为理事。

△　伪冀东银行开始发行钞票，面值有百元、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五种，总额500万元。另有硬质镍币二角、一角、五分、一分四种，共20万元。其他钞票禁止在该地区流通，由日本正金、朝鲜、天津三银行的天津支行代为兑换兼办发行。4月22日，又在大连制造大量铜辅币。

△　日华北驻屯军换防，瓜代部队1800人自秦皇岛乘火车两列分抵平、津。

△　日华贸易协会日本理事会在东京集会，出席会议者有会长儿玉谦次等人。

△　日陆军省任命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参谋长。

3月2日　　司法部通令，西班牙在我国已无使领，西侨诉讼案件应由我法院受理。

△　四川盛传刘湘将有军事行动，驻渝中央军纷纷构筑工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此辟谣，下令拆除重庆城外工事。

△　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何绍南与陕西省政府视察员常黎夫，由西安到延安了解灾情。

△　孙蔚如等回西安。

△　汉奸殷汝耕飞长春面见板垣征四郎，商谈扩大伪组织事宜。

3月3日　　国民政府下令废止《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施行细则》、《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征收地税办法》、《农村复兴委员会管理存放各项收入章程》、《逾额田租所得税管理存放章程》五种法规。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张群辞去外交部长，王宠惠任外交部长；张群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仲鸣任副秘书长；顾孟馀辞去交通部长，俞飞鹏任交通部长；国葬、公葬另行指定墓地，不得在中山陵园内造坟。

△　国民政府令东北军除骑兵军仍留陕、甘外，全部东调，分驻于豫南、皖北、苏北地区，不相统属。蒋介石派陈诚改编东北军，各军由四个师改为两个师制；每师两旅四团。

△　最高法院通令厉行民事和解。

△　山西实行“人民监政”（与当兵、纳税、受教育合称人民四大义务），成立山西人民监政同志会。

△　山西省实行村制改革，阎锡山指示编村户数、编村距离、村公所所在地、村长选用、村长薪俸等改革要点七条。

△　臧启芳去西安接收东北大学工学院；该校文、法两学院由北平迁至开封。

△　上海英商电车公司300余工人、司机、售票员，为抗议资方开

除工友举行联合罢工。

△　日林铣十郎内阁任佐藤尚武为外相。

3月4日　　蒋介石以禁烟总会总监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切实推行禁政，务期如限肃清烟毒。

△　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继续商谈。张冲转告周恩来，南京只允许中共部队改编为三个师，合为九个团。经周恩来与张冲谈判达成如下协议：一、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四万人，置某路军总指挥部；二、现有红军中之精壮者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二万余人；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某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队；四、原有的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以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五、原有的红军学校仍予保留，办完目前一期后结束；六、原有红军的医院、工厂保留；七、编余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遣散；八、以上各项经费由中央统筹。周恩来请张冲催促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止进攻红军西路军问题。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陈布雷、谷正纲继邵元冲、朱培德为中政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任命马步荣为青海省政府委员，马步芳兼青海省建设厅厅长。

3月5日　　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面促铁道部长张嘉璈从速进行铁路五年计划。同日，蒋介石批准五年内湘、粤、赣、川、滇、黔铁路建筑计划。

△　重庆行营令驻渝各部队停止夜间演习，以平息谣言。

△　蒙藏委员会奖励边疆青年来内地求学，本年补助蒙、藏、回学生50余名。

△　甘肃洮河南岸少数民族疊族48旗土司杨积庆，代表该族五万人拥护国民政府。

△　冯玉祥自南京返回安徽巢县原籍。

△　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自上海返粤。

△　立法院会议通过《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例》，并决议《财政收支系统法》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1月1日施行。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议决，中执委刘芦隐因涉嫌杨永泰被刺案，停止党权三个月。

△　南京给顾祝同、张冲复电称，仍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顾、张二人联名再电请。

△　张闻天、秦邦宪、毛泽东就赴南京谈判事电周恩来称："（甲）总部直属队，即由以前的后方两特务团编成，人数约1500人，其余均为机关。旅长人选及部队编后，俟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意见再复，其余均同意。（乙）与我们发宣言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宣言形式之公开文件，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丙）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经费（包括地方保安队在内）每月30万，又（收）回苏票200万。（丁）党员数告以尚待清查，但总数估计10万，苏区、白区（各）半；暂以周（恩来）、叶（剑英）二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也参加经委。"

△　日外相佐藤尚武在众院答复质问时称，日外交对中日关系，"仍维持天羽声明之精神"，"要将华北变为独立区域，不管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决定如何，日本必仍继续此政策"。

3月6日　　国民政府特任陆军二级上将徐永昌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　南京电复顾祝同、张冲，同意红军改编为12个团，但仍坚持只编为三个师。张冲向周恩来提议，按国防师编制，红军编为三个师六个旅12个团，每师可编炮兵、交通、特务各一营；国防师每师1.2万人，加上三个师之上的总指挥部4000人。照此改编，三个师已达四万人。周恩来电中共中央，建议接受此项改编条件。

△　天津《大公报》与《益世报》、《北平晨报》等近日陆续发表评论，讨论统一救国问题。同日，周恩来电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等："为争取全国统一，我们应参加这些讨论。"

△　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物产展览会在广州开幕。

△　湖南衡阳等17县反对粤盐销湘合作办法。

△　日驻华大使川樾茂谒蒋介石，探询南京政府与中共之间是否将会出现妥协，蒋氏称"政府对中共政策没有改变"。

3月7日　　军委会电令陕、甘两省驻军不得擅自任免地方官吏，干涉地方行政。

△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整饬人事行政，以各省、市"一、组织法规未经呈准备案，而遽请任命人员者。二、员额为组织法规所无，而请任命者。三、不先将去职人员呈请免职，而遽呈请任命者。四、去职人员去职已久，甚至事隔数年，始请免职者。五、对于去职人员并不叙明去职原因，含混称为已经离职，或业经御任者。六、未经明令任命之人员去职后，呈请明令免职者。七、请简呈荐不依规定手续办理者"，特规定整饬办法六条。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谓"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至此，西安谈判大体就绪。

△　行政院令湖南省政府停堵洞庭湖藕池、调弦、松滋、太平四口。

△ 察哈尔伪县署奉日军命令，通令农民广种鸦片。

△ 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罢工工人忍痛复工。

3月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到部视事，发表演说称："国家之领土与主权必须保其完整，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原则下"，对日"循和平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

△ 张冲电蒋介石，报告在西安与周恩来谈判红军改编情况。

△ 蒋介石乘军舰由南京至上海。

△ 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一致，由周恩来写成提案，送蒋介石最后决定。主要内容为：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狱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制度，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及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由民选产生，经国民政府任命；行政区经费由行政院与陕西省政府拨款。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委员长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中央军同等待遇；其各级官员自行推选，呈报军事委员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派员联络；红军中之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12个团，另有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上设置某路军总指挥部；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在河西走廊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 上海至大阪间无线电话正式开放。

△ 日外相佐藤尚武在贵族院演说，发表外交方针，主张以平等地位对华进行外交。

3月9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川黔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理事监察人员名单；理事长曾养甫兼任总经理。

△　行政院决议，嘉奖绥远抗战将领，阎锡山、傅作义叙一等宝鼎勋章，骑兵司令赵承绶叙二等宝鼎勋章。

△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必须警觉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说：目前的新环境与新的政策的转变，是十年来所未有的。请中共中央在最短期内准备讨论党的基础、党的组织、党员的思想、党内生活、党的领导诸问题。

△　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后抵上海，发表谈话称："外交应居于主动，以发扬正义为目的。"

△　司法行政部通令慎重审判刑事案件："对于刑事案件之审判，务期缜密慎重办理；程序苟有错误，即须依法改正；事实稍欠明瞭，尤应详切调查，不得稍涉含糊。"

△　杨虎城在西安新城招待西安报界称："三十八军业经遵令编为两个师，同时撤销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并对于西安绥署按照规定编制，汰除冗繁加以整顿。"

△　蒙古沙王率子鄂王及葛活佛由包头抵归绥，主持蒙政会周年纪念典礼及蒙政会第三次委员大会。大会提案有三：一、蒙政会会址应在何处建筑案；二、各盟旗设立小学校应如何进行案；三、建立成吉思汗陵寝案。

3月10日　　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通令全国各学校，将蒋介石的《对张杨训词》作为教材。

△　蒋介石令贺国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在行营主任顾祝同未返四川前，暂代主任。

△　宋哲元自天津返北平对记者称，在津与田代皖一郎会晤数次，咸以中日经济合作应自矿、路入手，先修筑沧石路，开采龙烟煤矿，但均尚未决定；并郑重声明，奉行中央政府命令为其神圣职责。

△　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自西安返回兰州，指示第五十一军开赴苏、皖。

△　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各国使节，计到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美国大使詹森、日本大使川樾茂、法国大使那齐雅、捷克公使费哲尔、丹麦公使欧斯浩。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农仓业法施行条例》，凡20条。

△　周恩来会见张冲，得知顾祝同约张冲、贺衷寒对3月8日提案作重大修改："承认改为服从，要求改为请求"，"陕甘宁行政区"改为"陕甘宁地方行政区"，取消"民选制度"，裁减红军定员为一师一万人，共三万人，改"服从统一指挥"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西路军等。周恩来当即将修改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认为这"不是同顾、贺能够解决的"。

△　中国国联同志会在南京开理事会，朱家骅主席。会议决议：一、推王景春、杨荫溥、刘锴三人赴捷克参加总会年会；二、推罗家伦、程锡庚、谢寿康、傅斯年、郭有守、钱端升为会员委员会委员；三、推何炳松、胡适、周鲠生分别为会员委员会驻沪、平、武昌等处委员。

△　长芦盐输日合同草案签字，第一批先签10万吨。

△　伪满洲国文教部训令在学校教育中彻底普及日语。

3月11日　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赴绥远致祭抗敌阵亡军民。

△　蒋介石电令孙蔚如、顾祝同等妥筹陕西灾情急赈办法。

△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拉脱维亚友好条约》。

△　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发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学月刊》等13种刊物，并限两日内将所有存书销毁。

△　国民党中常会会议决议，以5月12日为胡汉民逝世纪念日。

△　周恩来会见贺衷寒、张冲，并收到贺衷寒交来对3月8日提案之书面修正案。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称，不论拖延或接受修改案意见，中共均宜在政治上争取主动，率先实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争取在全国进一步的公开和影响，造成国民党重新“剿共”的困难。

△　毛泽东、张闻天为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电周恩来称，现在的问题非与蒋谈判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衷寒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

3月12日　全国举行孙中山逝世12周年纪念会，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谒中山陵默哀。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合并举行典礼，由吴敬恒致词。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称：“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

△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谓“顾（祝同）、贺（衷寒）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可能；要求张冲以原提案条文电蒋介石，否则请其回南京见蒋氏。周恩来表示，中共只

是不承认贺衷寒案，对于两党团结与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

△　全国经济委员会改进全国蚕丝业，提倡蚕丝生产各部门均衡发展；民国二十六年（1937）生丝产量已较往年增加。

△　庚子武昌首义烈士唐才常、傅慈祥、林圭等公墓落成，汪精卫撰写碑文，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代蒋介石主祭。按：庚子（1900年）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长江一带起事，设总机关于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侦知，勾结驻汉英领，查封自立军总机关，唐才常等人被捕遇害，自立军失败。

△　日外相佐藤尚武宣称，对华政策“仍遵守广田三原则”。

3月13日　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知照各关系部称，五届三中全会决议重设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国防委员会正、副主席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由下列各员组成，中执委与中监委常委，中常委，中政会秘书长，五院院长，行政院秘书长，以及内政、外交、财政、交通、铁道、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军委会正、副委员长及该会办公厅主任，参谋总长，军政部长，海军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会同经济委员会常委。国防委员会职权如下：一、国防、外交政策之决定。二、国防作战方针之决定。三、国防费用之编制与筹备。四、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五、国防紧急事变之审议。六、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问题之决定。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培德，特予国葬。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周恩来称，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叶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　周恩来会见张冲，与张约定致函顾祝同，说明修改原方案使一切有根本动摇之虞，要求将3月8日提案报蒋介石。次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不承认顾、贺方案，谈判须重新作起的电报转给张冲。

△　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向国民政府提出走私问题报告，谓华北有组织走私，严重影响中国海关收入，并减少偿付外债之基金；指出欲谋根本解决，在恢复冀北主权。

△　日在天津、济南、青岛积极扩充纱厂。日本在天津、济南、青岛三地纱厂，共约60万锭，拟在天津成立“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华北支部”。

3月14日　蒋介石返抵南京。

△　汪精卫在太原各界欢迎会上演讲，称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是一切工作的重心，与安内攘外是一件事。

△　毛泽东、张闻天电周恩来称，“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衷寒）案，而对15条（3月8日周恩来归纳的15条）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并称“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　伊克昭盟乌审、鄂套两旗因地界纠纷发生战争，经调解双方息兵，签订停战协定，划定地界。

△　山西省主张公道总团部举行除汉奸运动大会，阎锡山编《救亡复兴歌》，号召挽救危亡，守土抗战。

△　日正金银行总经理儿玉谦次率日本经济考察团至上海，次日至南京。

3月15日　归绥举行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亲临主祭，傅作义致悼词，蒋介石代表熊斌，另有赵丕廉、褚民谊、王懋功、汤恩伯、王靖国、赵承绶、李服膺等参加。毛泽东、朱德致电哀悼。全国一律下半旗志哀。

△　周恩来与张冲谈判。张冲申明贺衷寒案作废，改以3月8日提案为谈判基础。张冲提出，政训工作派员联络改为派人参加，改红军学校办完当时一期即准备结束；红军改编后，国民党派副佐人员到任。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

△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称，“国内正在酝酿分裂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敌人而不利于团结救国”，为顾全大局，请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15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并要求迅速会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顾祝同等人赞同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西安谈判至此结束。

△　留德学生组织旅德救国联合会，散发西安事变真相传单，遭国民党驻德党部追查；行政院撤销该会会员留学生公费。

3月16日　蒋介石暨外交部长王宠惠举行茶会招待日本经济考察团，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并以“仁亲以为宝”一语为勖，勉中日两国人民都在“亲仁善邻”上共同努力。

△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接见日本经济考察团团员、大日本制糖会社社长藤山爱一郎，谈调整中日邦交、日本政情及走私等问题。

△　绥远举行阅兵典礼，汪精卫发表讲演称：“我们只有两个归宿，其一，是人人为守土抗战而死，使中华民国为四万万人的公共坟墓；其二，是使中华民国走上了自由平等的大路，我们的子孙共有共享天堂一般的快乐！”

△　毛泽东、张闻天电复周恩来称：“（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唯要顾立电两马（马步青、马步芳）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　周恩来自西安返回延安。19日，周恩来携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返西安。

△　内政部公布全国人口及面积统计。全国总面积为1160.88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4.66785856亿人。

△　四川旱灾严重，沱江断流，受灾区域达120余县，灾民3000多万人。

3月17日　东北军调驻豫、皖，全体将士发表西北同胞告别词。

△　绥境蒙政会（绥远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召开成立周年纪念大会，沙王主席，汪精卫、阎锡山、傅作义、赵丕廉、褚民谊及宋哲元代表邓哲熙与各王公等千余人出席；通过在包头以西200余里处公庙子建筑会址，各盟旗一律通行法币，植树节为该会纪念日，建成吉思汗陵墓工程与建会址并案办理等议案，并讨论守土御侮方案。

△　汪精卫自绥远至太原对记者称，三中全会决议“绝非容共”。同日，汪精卫自太原返抵南京。

△　中日贸易会在上海举行首次会议。同日，中日贸易协会在上海欢宴日本经济考察团，会长周作民致词，谓发展中日两国经济，须先解决政治上之障碍。

△　日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至开封访商震、刘峙。

3月18日　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第一一三师、第十一师、第一一八师奉令东调后，已全部开拔；甘肃省政府各厅、处也在移交

中。中央军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由陇东开抵兰州接防。

△　蒋介石指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检查各地国防工事。

△　重庆行营代理主任贺国光、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建设厅长卢作孚由重庆飞抵南京，与中央当局商谈四川问题，表示川省拥护中央。

△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决议，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二十五周年，建议合力捐购飞机72架。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集各界代表纪念三一八惨案十一周年，发表《告同胞书》。

3月19日　中央军开入兰州。

△　两湖水利纠纷解决。湘省停止修筑天佑垸，所受损失由湘省府呈请中央补助，洞庭湖水田界线进行勘划。

3月20日　国民政府特派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海军部长陈绍宽为副特使；3月27日，加派驻英大使郭泰祺为副使。

△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拟就谈判条件在西安出示张冲。此项谈判条件共15项，主要内容与8日提案相同，增加以下各条款：要求国民党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现民主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及中共党员；中共在适当时期公开；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准备对日抗战工作。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民国二十五年（1936）捐资兴学在三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者，计有程栋丞、李宗仁、黄旭初、白崇禧、胡文虎、马鸿逵等16人。

△　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病逝。2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4月12日，追赠为陆军上将。

△　江海关奉财政部令发出通告：“凡外国发行之彩票、香槟票等，未经中国政府核准，一律禁止入口。”

△　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共8200册。

△　日浪人在上海私运大批铜元出口，被海关查获；日人行凶，我国关员七人被殴伤。

3月21日　禁烟总监蒋介石委派14省、市禁烟特派员。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吴铁城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23日，行政院决议任命吴铁城为广东省政府主席。4月2日，国民政府令：吴铁城兼广东省保安司令。4月16日，吴铁城视事。

△　豫鄂陕三省边区绥靖主任陈继承偕师长李默庵抵南京，代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陕、甘现状。

△　四川金融界组织兴业银公司，资本500万元，推刘航琛为董事长。

△　中暹协会成立，周啓刚等15人为理事，何廉等五人为监事，周啓刚为理事长；聘蒋介石等31人为名誉理事。

3月22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报告在晋、绥所得观感称，“共产党人如果不接受三中全会的决议，那么只有趋于消灭”；并称“根本防共须致力经济建设”。

△　周恩来由张冲陪同，自西安飞往上海，会同潘汉年，共同会见宋美龄与宋子文，并递交中共书面意见。

△　陕西省府主席孙蔚如及各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　上海律师张志让、江一平、江庸、陆鼎揆等17人，联名要求国民政府废除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

△　西藏大格西喜饶嘉措（西丹加索）应聘经印度至上海讲学。

△　日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在天津晤田代皖一郎后，至济南访韩复榘。

3月2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陆军第二十四军军长。

△　行政院决议俞鸿钧代理上海市市长；陈庆云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　蒋介石至杭州。

△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讨论议程：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是日至26日，会议讨论第一项议程。毛泽东发言指出：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地位。二、三民主义的革命方面，与我们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三、阶级斗争应以照顾大局为原则，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27日至31日，会议讨论第二项议程。31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4日　周恩来在潘汉年、张冲及杜桐荪陪同下，由上海至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以中共对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之意见致函蒋介石，请其表示意见。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卷烟加税。

△　西藏哲蚌寺大格西喜饶嘉措大师及黎丹、观色已呼图克图等20余人由上海抵南京。

△　国防会议审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合组惠通航空公司协定，指示必须限于商业性质，协定上不能有“满洲国”字样，航线以平、津与关外及大连间的联络为范围。日本拒绝接受此等条件。

△　日军舰70艘来华，拟以中国为假想敌在青岛作大规模演习。

△　日驻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海军中将，由上海抵南京访问。

△　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杨树浦举行铁甲车演习野战。

3月25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中央准备银行法（原则）草案》，规定该行（简称中央银行）立于超然地位；总裁系专任，不得兼任中央或地方官吏，或金融业职务；其职责在调整金融与稳定货币，以尽“银行之银行”的职务。资金由原定一亿元改为5000万元。该行股份官、商四六分，享有发行法币及关金券之惟一特权。总行设南京，但该法施行后五年内移设上海。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介石辞国府委员职，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国府委员。

△　周恩来就中共15条意见与蒋介石开始谈判。周恩来表示，中共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谋求与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并说明拥护蒋委员长的立场，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重申中共中央提出的15项谈判条件，并提出数点具体要求。蒋介石在谈话中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但要中共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其个人合作，拥护其为领袖；并称具体问题好解决。

△　国民政府派翁文灏为参加英王加冕使团秘书长，曾镕　浦、郭秉文、储昌年为参赞。

△　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兼陕西保安司令。

△　蒋经国得到斯大林同意后，是日离开莫斯科回国。27日，周恩来前往祝贺宋美龄生日时，告知蒋介石称："潘汉年同志刚刚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你的公子蒋经国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　河南旅京同乡会指出河南旱灾严重，被灾90余县，以豫西禹县、宜阳、登封、嵩县等20多县为重，灾民达900万人。

△　日东京商工会议所邀请中国问题专家，讨论调整中日关系方针及如何解决华北问题，建议政府制定对华借款保证法，对华外交系统法令一元化，对华北问题暂抱静观态度。

3月26日　周恩来继续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周恩来重申中共的条件，并声明中共愿意"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党，A、领导全民族的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B、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为成功；C、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周恩来并表示：A、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B、中共这种大的改变，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中共须声明和解决的有：一、苏区改为边区（18县）；二、红军改三个师后，容许人数在四万人以上；三、设立总指挥部；四、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五、学校办完本期；六、增加红军防地。周恩来以书面提出中共承诺的六条：一、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主制度。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准备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参加作战；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军政人员，由其部队长（官）推荐，呈请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

计六个旅12个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国民党方面承诺的五条保证：一、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二、实行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产党亦能参加；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蒋介石说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提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促周恩来“赶快回延安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并表示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成为一整体；其行政长官，南京方面派员任行政区正职，中共派员任副职；红军改编为三个师，计四万余人，在三个师之上，可设总指挥部。

△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发表谈话，谓川中所传谣言不足凭信。

△　金城银行总经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周作民与日本商务考查团团长儿玉谦次分别发表声明，决定双方各推派代表研究金融业及改进棉产事。

△　南京至广州与南京至太原长途电话通话。

△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嘉卜寺（化德）成立“察哈尔锡林郭勒盟军政委员会”，自兼委员长。

△　日本华北驻屯军以中国军为假想敌，在北平、天津进行演习。

3月27日　司法行政部通令所属严惩渎职人员。

△　东北抗日联军袭击松花江三姓镇，全歼日军282人。

△　日经济考察团陆续离沪，分赴青岛、汉口，转平、津返国。

△　儿玉谦次离沪回国。上海海关在儿玉所乘之“上海丸”查获日浪人走私铜元50多万枚。

3月28日　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召开周年大会，推选孙科连任总会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为副会长，蔡元培、于右任、冯玉祥、鲍格莫洛夫、颜惠庆为名誉会长。

△　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程潜自南京飞抵汉口，转赴桂林。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飞抵广州。

3月29日　杨虎城、于学忠至杭州谒蒋介石请示军政要务。次日，蒋介石单独召见杨虎城，劝其往欧美参观。

△　全国扩大公祭黄花岗烈士，国府主席林森亲临黄花岗致祭。

△　刘湘电邀何应钦、张群赴四川，并在省府礼堂召集旅长以上军官及绥署各处长训话称，“今后中央、地方关系，益臻密切”，勉所属完成建设四川及复兴民族的重要使命。

△　前意大利财政部长史丹法尼至上海，应聘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

3月30日　行政院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冯治安、邓哲熙、章士钊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准冀察政务委员李廷玉、王克敏、冷家骥辞职。

△　上海工潮达到高潮，130多家绸厂15万多工人宣布同盟罢工。

△　于学忠赴奉化往见张学良。

△　司法院长居正至北平视察。

△　周恩来携带与蒋介石联系的电报密码由南京飞抵西安，在西安与顾祝同谈判接济红军给养事项。

△　驻北平美军500人举行阅兵典礼，邀请宋哲元及各国武官参观。

△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率舰支70余艘抵青岛会操。

3月31日　　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在杭州对记者称，新闻检查“从4月1日起改由中央宣传部管理，本人主张将从宽办理，唯对新闻原则应重质而免除繁碎，以增新闻之价值”。

△　实业部长吴鼎昌抵成都，参加经济建设委员会四川分会成立典礼。

△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峙，分别至杭州晋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　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向欧美等国商洽借款及购买军火，以备抗日之用。孔祥熙赴欧之行，即负有此项任务。

△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派江子铎为驻“满洲国”特派员。

△　上海日正金、朝鲜、台湾、三菱、三井、住友六银行存银，陆续解缴中央银行，总计920万元，有金条3445条。

是月　　周恩来在上海期间，听取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党员李延禄关于1935年共产国际之行的汇报后，说：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

△　上旬，日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三人应召回东京汇报华北形势。三人主张“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备战”，应“走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　日方面就华北“经济提携”问题再次向冀察当局提出要求，宋哲元明确表示，“我无权与日方谈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应当向中央政府外交部门去交涉”。

4月

4月1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介石续假两月，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

△　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为祝贺英王加冕特使团孔祥熙等赴英送行。

△　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职务。

△　中国气象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开幕，出席代表40余人，竺可桢主席。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气象局，由气象研究所等筹备。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东分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政部次长陈诚主持，国府主席林森出席并讲话。

△　广东第四路军缩编，每旅缩减一团，共裁21个团。

△　毛泽东电彭雪枫，提出与南京谈判的条件称：“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

承认。”

△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学，校长林彪。该校宗旨是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培养干部。

△　广东黄埔辟港与疏浚珠江后河工程，发行公债200万美元。

△　国民政府批准广东省4至8月免税进口洋米及米谷各200万担。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米商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抗议批准广东免税进口洋米。

△　我国与瑞士邮政开办互换汇票及代收货价业务。

△　沪西英商公益纱厂工人为改善工人待遇一致罢工，英国捕探对罢工工人进行野蛮镇压，受伤者达19人。

△　据国际劳工中国分局统计，1至3月中国工人罢工共106次，其中23件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势力；41件是反对解雇、开除工人和资本家停工或关厂；30件是要求改善待遇。

△　日驻上海海军陆战队1200余人，分在沪东、沪西、北四川路三处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又赴虹口公园操演。

△　日兴中公司在天津汉沽购买废盐滩，成立建设华北盐业公司，资本900万元，年产化学盐1600万吨；除当地销售外，其中27万吨运回日本。

4月2日　　立法院举行会议，通过黄河、长江及华北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

△　国民政府参加英皇加冕典礼特使孔祥熙、副特使陈绍宽、秘书长翁文灏等一行30余人出国赴英。孔祥熙行前发表谈话称：“加冕礼毕后，拟顺便往游欧洲各国，考察其目前之经济状况。”

△　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召开省防会议，讨论防务、训练等问题，徐永昌、傅作义及在绥远的各将领出席会议。

△　杨虎城自上海返抵西安。

△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返华（去年11月返苏），带来执行建立中、美、苏、日四国集体安全体系的苏联新政策，并向国民政府提议防制日本的三步骤：第一步，以中国政府名义邀请太平洋各关系国开一国际会议，商订互助协定；第二步，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步，中苏订立互助协定。鲍大使表示，苏联愿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以供中国购买军械及军用品。是日，鲍大使与陈立夫会面。

△　长城煤矿改为中日合办，改名为东拓矿业铁道会社，定于5月初正式成立，计划每年出煤50万吨。

△　日使馆海军武官齐集天津会商，议决先兴筑塘沽港，以备开战后运送军火与弹药。

4月3日　　蒋介石亲自会见鲍格莫洛夫，请鲍大使与代理行政院工作的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但只谈外交问题；至于技术合作事宜，则由蒋氏自己考虑。是日，蒋介石返奉化原籍休养。

△　国民政府令免刘崇杰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大使本职。

△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主要矛盾，争取民主权利是巩固和平与准备抗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目前党的基本任务是：一、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救国方针；二、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三、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工作；四、教育干部使之了解新的策略与新的工作方式；五、发展党内民主；六、加强党内思想斗争，反对“左倾”。

△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四川分会成立，实业部长吴鼎昌报

告政府建设计划；分会长刘湘致词称，完成建设四川，即“可达到民族复兴根据地之目的”。

△　中国地政学会在青岛举行第四届年会，讨论“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如何规定地价”两问题，并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三项原则。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举行第十三次年会，由董事长蔡元培主席，董事孟禄、周诒春、胡适、贝诺德、金绍基、司徒雷登、任鸿隽、卜克、顾临、李石曾、徐新六等参加。

△　招商局欠汇丰银行债款，商定减低利息，分期偿还。

△　日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乘军舰来华，检阅驻华舰队，自5日起分别在青岛、上海、汉口及华南等处检阅。

4月4日　　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七人，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提出诉讼；并以“同样罪嫌”通缉陶行知、罗青、顾留馨、张仲勉、陈道涵、陈卓等七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抗战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称：“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推动蒋介石逐渐走向南京政权的民主化，以准备全国性的对日抗战。”

△　周恩来自西安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报告，对杭州谈判表示满意。会议认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工作已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今后应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所动摇。

△　周恩来得知红军西路军约6000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后，致电顾祝同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甘肃平凉转至红军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余部，允其转赴新疆。随即和毛泽东派张文彬赴平凉开展营救工作。

△　广东省政府以亚士湾系译自外国名称，既为我国领土，特宣布改名为“大亚湾”。

△　各省、市米商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并会同上海市商会，继续向国民政府交涉广东省免税进口洋米事。

△　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开第四届年会，大会由竺可桢主持。会上宣读论文25篇。

△　中英庚款第五届留英考试在南京、北平两地举行，应考者500余人。

△　陕西渭惠渠举行放水典礼。

△　天津汉奸在河北、山东等地代日本招募劳工，截至是日，已有4000余人出关，在东北沿边修筑工事。

△　日浪人迭次在上海私运铜元出口，近日日轮“秩父丸”又装有大批铜元出口。是日，外交部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

4月5日　王宠惠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宣布外交方针称：“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我们诚意的希望与各国增进国际关系。”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称：“我们现时在各方面活动的策略中心，是为着彻底的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加紧从各方面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

△　是日清明，国民政府派张继、孙蔚如等至陕西中部县黄帝陵致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派林伯渠参加祭奠黄帝陵民族扫墓节典礼。祭奠完，国共两党代表进行友好交谈。

△　蒋介石发起组织京滇公路周览团，由团长褚民谊率领，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考察公路交通。周览是日开始。

△　上海市50个同业公会为反对公共租界增加市政总捐发表宣言，号召市民团结一致，用实际的积极行动与租界当局抗争。

△　中国银行新董事会成立，孔祥熙、宋子文、宋汉章、叶琢堂、钱新之、冯耿光、陈光甫为常务理事；宋子文为董事长。

△　贺国光由南京返重庆称，何应钦为谋中央与地方间进一步团结及军事、政治改善，曾提出六项办法，由卢作孚携至成都对刘湘当面解说，并得刘湘复电接受。

△　西藏安钦呼图克图普济法师应南京、上海、北平各界人士邀请传法，到达上海。

△　日浪人50多人在上海偷运铜元10万余枚，被江海关查抄没收。外交部向日本提出抗议。

4月6日　　绥远境内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率伊克昭盟扎族扎萨克鄂齐呼雅克图（沙王长子）与其妻、伊盟葛拉僧义喜呼图克图（沙王次子）与其妻、实业处长康王等一行30余人到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示今后施政方针。

△　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视事。在秘书长翁文灏出国期间，魏道明暂代行政院秘书长。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辞职照准，校长蒋介石派陈继承接任。

△　今年留美学生达1700余人，选读工科者为最多，计377人，其中研究航空工程者58人，尤以研究飞机设计与构造者为多；其余选读经济、商业与教育。

△　美商务部发表中国经济周年报告称，1936年底中国经济状况，为民国成立以来最良好景象。棉花产量为370万担，烟叶为1700万磅，皆打破向来记录。

△　日藏相结城丰太郎在大阪经济协会发表演说称："日本之经济发展不论为民生之开拓或商务之护展，均根本需要中、日间友好关系之维持。迄今另方面虽有不合理之行动，然我方亦有错误之处。"

4月7日　傅作义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抵北平，认为"抗敌御侮在最后一战"。

△　山西省政府会议讨论改进村制案，决定村长职责、扩大编村、厉行建设、训练民众、合理负担与财政公开五要点。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修改问题，周恩来提出修改选举法原则，应为容纳各党派意见，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均为20岁，不分差别，不受宣誓限制。

4月8日　上海、汉口、常州、芜湖等地纱业代表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暂缓增加棉纺统税。

△　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对西康县政训练班学员讲话称，巩固边防，保全领土，改善边民生活，消除语言隔阂，为治理西康的要点。

△　全国基督教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在沪举行第一届讨论会，会期三天，讨论总题为基督教学校的特殊贡献，共到各省、市、县校长代表200余人。

△　德政府以红十字"明星"勋章授与何应钦，称其对促进德中邦交有重要贡献。

△　儿玉谦次在东京访日外相佐藤，报告考察中国经过称："中国

现在尽力向统一国家迈进，国民也以慎重态度努力援助政府，日本应正确认识这一事实，而实行各种政策，调整中日关系，促进经济提携。”佐藤表示尊重儿玉的意见。

4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出席国联特别大会代表。

△　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张群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日本在实行对华外交一元化的同时，“必须顾及我国外交之一元化”。

△　驻古巴公使张惠长辞职，朱世全暂代。

△　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应四川省政府电邀飞渝，筹商以工代赈建造成渝铁路计划。

△　财政部命令天津海关，凡有勾串外人，合谋走私在一万元以上者，一律处死刑。

△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南京励志社宴请安钦呼图克图、沙王等边疆要员。

△　周恩来电蒋介石称，“归肤施（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中共）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并称会后即将南下晤蒋。

4月10日　上海4800余人向国民政府上书请愿，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七君子自由。

△　国民政府特派胡士泽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二十二届禁烟会议代表。

△　由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主办之国货联营公司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实业部长吴鼎昌为董事长。5月17日，国货联营公司总办事处成立。

△　财政部统计，中国本年上半年度全国所受走私损失，约1300万元，其中华北一区即达800万元左右。

△　驻日大使许世英在南京接见日本记者称，改善中日关系须具互惠、互信、互助精神。

△　天津日副领事访长芦盐务局，拟续购芦盐三万吨。

△　伪蒙古军政会议在嘉卜寺举行，日本军官、顾问、指导等多人及伪军将领等出席。会议决议，决不放弃察北六县；并拟切断晋、绥的联系。

4月11日　　毛泽东电潘汉年，认为法院起诉沈钧儒与通缉陶行知，系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潘汉年至南京向陈立夫、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　周恩来为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提起公诉案电张冲，指出国民党此种作法“大失国人之望”，希望张冲“进言当局，断然改变此对内苛求政策”。

△　行政院颁布《整理行政纲领》，凡10条。

△　芬兰在华设公使馆，驻华公使魏尔万尼抵沪。

△　意大利新任驻华大使柯赉抵沪；次日，在沪对记者谈称，“意大利对远东外交政策并无变更，只是对经济方面极谋有以发展。”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指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诸先生，为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领袖；要求立即释放沈、章诸位先生及全体爱国政治犯，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　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会谈，鲍大使建议中国政府先提

议太平洋国家参加太平洋区域性互助公约谈判，并立即从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谈判。

△　傅作义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我们的人绝不作亡国奴。我们要作能自由、独立、平等的国民！”

△　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完成；现在进入第二个步骤，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

△　周恩来电叶剑英称，毛泽东已电潘汉年赴南京谈判，准备发动援救沈钧儒、陶行知等人的运动。

△　国民政府颁布《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凡15条，规定对于制造各种原动力机器、电机、工作机器、金属材料、液体燃料、运输器材以及其他工业，政府给予保息补助。

△　行政院公布《公葬及公葬园墓暂行条例》，凡八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有功勋于国家，身故后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呈请国民政府明令举行公葬。

△　第一军胡宗南部由陕西调往徐州，负责徐州、蚌埠一带治安。

△　上海闸北美亚十厂罢工工人集会请愿，与警察发生冲突，工人伤10多人，六人被捕。

△　湖南、广西两省为接壤的龙头大地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双方谈判无结果，湖南省建议中央重新划定界线。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举行本届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王晓籁等35人为执行委员。

△　海关统计，3月份华货输日为2900万元，日货进口为3200万元；日对华入超300万元。

△　上海开往日本之“上海丸”，藏有九万余枚走私铜元及其他物品，被关员查获没收，合国币300余万元。

△　津浦路警在德州站查获六名日本浪人在平沪301次列车偷运大批海洛因南下，当即将人货一并扣留。

4月13日　冯玉祥自南京赴奉化访蒋介石。

△　财政部加征建设事业专款食盐专税，每市担增加一元。工业盐、渔盐及出口盐均可免征。

△　四川万县大火，烧3000余家，损失200多万元。重庆、泸县、丹棱、龙泉驿等地相继发生大火。

△　上海越界筑路捐税问题，经上海市代市长俞鸿钧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惇交涉后，双方签订非正式草约。

△　上海开往厦门之日轮“唐山丸”装有鸦片数千两，被我海关人员查获。

△　陕北地区匪患严重各县，发现有“黑军”组织，多为散兵游勇，四出抢劫。

4月14日　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至成都与刘湘会谈川事六方案，要求川军让出重庆，停筑防御工事，撤退数处川军。

△　周恩来电叶剑英，嘱其向顾祝同交涉，红军李先念、李卓然余部900余人18日可至甘肃敦煌，马步青、马步芳不得与之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陕北。

△　津浦铁路蚌埠站铁路工人宣布总罢工；罢工工人遭到军警镇

压，工人领袖被捕。

△ 重庆附近大火，焚毁千余家；万县大火再起。

△ 济南设市，历城县移治王舍人庄。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而“今年2月10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为完成目前阶段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 周恩来致电蒋介石，指出沈钧儒等七人“其心纯在救国”，“锒铛入狱已极冤”，苏州法院的作法“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要求释放，并取消对陶行知等五人的通缉。

△ 新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向蒋介石请示工作，自陕西飞抵上海。

△ 财政部中央造币厂厂长陈行辞职，席德炳继任。

△ 湘西永绥县苗民进行反对屯租，主张改屯升科，消除苗、汉界限，改良苗民生活，提高苗民文化水平。次日，为解决湘西苗民暴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出巡湘西，并印发《告湘西民众书》。

△ 日本与伪满洲国在东北各大城市及滨绥、滨北铁路沿线进行大逮捕，发生“四一五”事件。中共哈尔滨特委、哈东特委、哈尔滨市

委、大连市委、盘石中心县委、都河县委、海伦县委、抚松特别支部等党组织遭严重破坏。

4月16日　　何应钦在上海对记者称："中央对四川省，唯有希望川军国军化。刘（湘）主席已表示矢诚拥护领袖。云南龙（云）主席亦表示绝对拥护中央。桂省李（宗仁）、白（崇禧）二司令，在最短期内决定入京一行。此乃国家统一现象。"

△　立法院修正《国葬法》，葬费定为一万元。

△　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称："我国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实有充分理由，各国不致横生异议。"

△　周恩来电叶剑英，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并请其将此意转蒋介石、陈立夫，请国民党中常会讨论。

△　中国国际图书馆等单位在上海主办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展出图书400余种，共2000多册，分为中、日、英、德、法、俄诸文种，其中有《图书集成》、《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与各种大辞典等。

△　察北伪军向绥东推进。德王部抵尚义，穆克登宝部抵商都，包悦卿部抵张北。

△　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决定新《对支实行策》和《北支指导方案》。《对支实行策》系1936年9月23日川樾茂以"严酷要求七项"向外交部长张群口头提出的条件，即"（一）创立缓冲地区，包括晋、冀、鲁、察、绥五省；（二）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合作；（三）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四）建立中日之间航空交通线；（五）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七）完全压制排日宣传"。

《北支指导方案》共四条：“（一）对国民政府促使抛弃容共和依靠欧美政策，和日本接近，尽快解决对日悬案；（二）对华北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防共、亲日满地带，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三）对其他地方政权取得实质性合作，扩大日方权益；（四）对内蒙加强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的内蒙政权，收揽蒙古人心。”《北支指导方案》使华北“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实质上确认华北的特殊地位”。

△　美太平洋学会干事费尔特，在美国政治学院年会发表演说称：“中日开战很有可能。日本退出中国，或者自己约束自己的行动都不可能，则中国的排日运动很可能达到武力抵抗的道路。”

△　新加坡两饼干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开除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参与资本家分化欺骗工人。21日，罢工工人捣毁领事馆。

4月17日　贺国光在成都电蒋介石，报告与刘湘谈判情况称，解决四川问题的六项办法及“川军国有化”与“政治中央化”方针，刘湘已遵照办理。

△　刘湘电蒋介石，称川灾严重，要求在100万元赈款之外，再续拨1500万元。按：四川旱灾严重，受灾各县面积占全省五分之四，受灾县份达126县，受灾人口达3000多万。

△　上海市商会再电财政、实业两部，请制止粤省免征洋米税。

△　上海海关缉私人员，在日轮“御影丸”搜出铜元八万多枚，全部没收。

△　伪满洲国决定葫芦岛开港。

△　本年首批芦盐3900吨由“富和丸”装运赴日。

4月18日　国民政府举行建都南京十周年纪念，叶楚伧、张继、陈立夫等1000余人出席。林森在会上讲演《十年来之民生建设》，称："截至二十五年年底，中国的航空线增至十五条，路线总长一万七千八百多公里……飞机有二十四架。"

△　蒋介石由奉化抵杭州。

△　周恩来电叶剑英速向顾祝同接洽送还兰州河西红军，并派张文彬前往接收。

△　铁道部与中央信托局及上海商业储蓄、金城、浙江兴业、中南等银行组银行团，发行购料本票，由各银行担保付款，办理现贴总额900万元，签订合同。

△　葛光庭由青岛赴南京，与交通部商讨关于赎回胶济铁路的问题，决定本年底由该路局拨付赎路基金1000万元，其余3000万元由国民政府设法筹措。

△　中法文化教育基金会在北平举办第一届甲科留法公费生考试，由李书华主考，应试者15人。5月19日，考试揭晓，录取流体力学一名吴新谋（中央大学），镭学一名钱三强（清华大学），微生物学一名王冠儒（中法大学）。

△　南京金城银行副经理许宝骅、天津交通银行经理徐柏园在京杭国道余杭、武康间被绑架。

△　英商上海电车有限公司工人为改善待遇，全体罢工。公共租界各路有轨、无轨电车完全停驶。

△　日兴中公司在河北省汉沽营村购置废盐滩地10万多亩，开始兴建大规模盐场和化学工厂，预计年产盐可达30多万吨。

4月19日　刘湘在成都召集军、政、商、学各界人士开会，商讨

救济四川灾区办法。邓汉祥在会上报告四川灾情称，灾区已达134县，灾民达3500余万人。

△　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报告贵州旱灾灾情严重，受灾地区达61县，灾民有270多万人。

△　蒋经国自苏联返国，是日由上海抵杭州。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市政府联合发布通告，禁止工人罢工。

△　南京地方法院判处行刺汪精卫的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三人死刑，对其他四人判处有期徒刑。

△　福建省南部鼠疫流行，省政府令各县将鼠疫区交通孔道封锁。

△　张道藩等组织的中华全国美术会在南京成立。

△　察北、绥东一带德王伪军积极备战。傅作义电前方部队，严密戒备。

△　日驻华大使川樾茂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王外长托川樾转告日本佐藤外相称："本人热望调整中日国交，并对于佐藤外务大臣之外交演词，至为敬佩，但愿在事实上努力，促其具体化。中国方面亦须在互惠平等之立场上，设法尽力，以图打开目前中日间的局面。"

△　日外务省发言人对记者称："冀东组织的设立，根本上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至于殷汝耕所说日本有人现在正从事调解撤废该组织的问题，全非事实。"

△　日陆相杉山元公开指责中国采取"轻侮日本"的态度为"过于自信"。

4月20日　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就医、疗养。

△　行政院免去刘镇华安徽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刘尚清、魏鉴、杨绵仲、刘贻燕、杨廉、金毓绂、戴戟、陈冶青、邵华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刘尚清兼省政府主席，魏鉴兼民政厅长，杨绵仲兼财政厅长，杨廉兼教育厅长，刘贻燕兼建设厅长。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草案》包括对外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实行宪政，保障民权自由，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民生幸福，彻底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使中国复兴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是，第一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的准则，第二建立联合组织，第三在蒋（介石）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承认其为领袖；关于联盟的组织原则，凡各党、各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的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

△　朱家骅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

△　冀察当局发布命令："凡盗卖国土者处死刑。"

△　宋子文、孙科、吴铁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华南米业公司，联合上海、广东、香港金融界，股本1000万元。宋子文为董事长。

△　风陵渡黄河铁桥开工，工款8000多万元。

△　日外相佐藤、陆相杉山、海相米内举行三相会议，讨论对华、对苏政策。

△　日各报近日多次发表对华挑衅消息，我国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馆对此有所表示。

4月21日　国民党中政会召开例会，修正土地法原则，通过：

一、统一土地名称；二、设立土地银行；三、扶助自耕农；四、土地测量与土地登记；五、土地权利争议的解决；六、公有地登记；七、市、县司法机关设立土地裁判法庭；八、房屋之经营；九、土地承租人依法请求征收等。

△　驻陕、甘东北军东调防地确定，第四十九军刘多荃部、第五十七军缪澂流部驻河南南阳、周家口；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驻皖北阜阳等地。

△　交通部负责人对记者称，沧石线应由铁道部主持办理，地方当局不得有所主张。

△　中国农民银行总行由汉口迁至上海。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湖南朱剑凡及其妻魏湘若捐资11万余元，创办私立周南女子中学。

△　美泛美航空公司由美国至中国第一次航班开航。自上海经香港至旧金山航班，由中国航空公司负责。

△　北平使馆区日驻军在东单牌楼操场举行实弹演习。

△　日驻华大使川樾在南京称："关于打开中日国交，中国方面没有表示任何具体意见，因此，不能认为去年以来当时开始交涉的困难情形业已除去。"

4月22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正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国民大会缩短任期并缩小其职权，规定国民大会为制宪机关；增加政府指派代表。4月30日，立法院修正通过。5月2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

△　宋哲元在北平对日本记者称："中日乃东亚之两大国，对东亚大局应共同维持，两国负责人应详察两国情势而处之，两国民众更应

自觉，互相努力，以实现东亚和平。津石路、龙烟矿事，在可能范围内当合作进行，但必以中央意旨及民众利益为限度。”

△　天津市长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一行17人赴日本考察。

△　冀、鲁、豫三省关于统一治理黄河问题，经李协（李仪祉）与韩复榘、宋哲元等商讨决定：一、三省河务局经常费仍由三省府照支；二、工款由黄河水利费拨发；三、河务局人员归三省委派，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加委，并报行政院。

△　毛泽东电周小舟，命其在数日后至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与阎锡山谈话时，应指出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民主原则进行修改；苏州七爱国领袖必须立即释放；征求《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张季鸾可否至延安一行。

△　行政院公布《船舶起御工人灾害防护规则》，凡23条。

△　本年第二批芦盐4000吨由“广和”轮装运出口。

△　天津市工商业拒私会在英租界召开筹备委员会，通过决议：一、发表告奸商书；二、函请海关武装遏止私货来源；三、推定常委，定下月1日开成立大会。

△　美进出口银行经理皮尔森到达南京，调查中国金融和实业情形，为美国商品寻找市场。皮尔森准备到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等地考察六个星期。

4月23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葬法》，凡九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有特殊勋劳或伟大贡献，足以增进国家地位、民族光荣或人类福利者，身故后，得依本法之规定举行国葬。”

△　于学忠率部第五十一军抵皖。

△　陕西安定县以原县治遭土匪焚毁，移治望瑶堡。

△　海关人员在上海汇山码头日轮“长崎丸”查出大批走私货物，日本浪人当场持械行凶，殴伤我国稽查员多人。

△　京滇公路周览团至贵阳。

△　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由四川视察灾情后返沪称，川省灾情最重者为东北部，重庆现有灾民18万人，每日饿死者不下百余人。

△　日派遣海、空军人员潜入福建金门岛测绘地图。

4月24日　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委员魏宗瀚就职，表示仍禀承中央意旨，并顾及地方环境，办理一切外交事务。

△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组织问题的报告大纲。

△　武训百周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在济南召开发起人会议，出席者有韩复榘代表何思源、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李文斋、济南市长任居建等60余人。会议决定拍摄武训行乞兴学电影，在南京筹建武训中学，扩建武训林墓和武训办的三所学校等事项。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

△　中英会勘滇缅界务委员会工作全部结束，最后报告书在缅甸桑格郎地方签字。会勘自二十五年（1936）开始，先后开会116次，中立委员长为瑞士人伊斯兰。这次勘界推翻了旧约所划临时界线（所谓斯高脱红线）。双方争执中的边境领土，由中立委员长伊斯兰仲裁，划归中国者约有五分之三，班洪、猛梭等处均在内。

△　驻日大使馆向日外务省发出照会，抗议日本在名古屋举行“冀东日”反华活动。

4月25日　司法院统计全国司法官员，计苏、浙、皖、赣、鄂、湘、闽、川、黔、粤、冀、豫、鲁、晋、陕、甘、宁、察、绥等省，院长160人，庭长156人，首席检察官155人，推事156人，检察官263人，候补推事424人，候补检察官225人，学习推事46人，学习检察33人，共计2023人；以江苏省法官最多，共279人；贵州省最少，仅11人。

△　马步芳特派代表郭学礼飞抵西安，谒顾祝同并报告青海军政近况。

△　周恩来与张云逸由延安乘卡车前往西安，准备南下与蒋介石继续会谈。车行60里至崂山附近，遇土匪一二百人在途中伏击，随从人员数人及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牺牲。周恩来与张云逸脱险返回延安。

△　江西《商报》、《健报》因刊载攻击省教育厅文字案，记者被捕送警局收押。汉口记者公会电赣省府要求速予释放。

△　日军唆使伪蒙军进犯绥远。

△　日华北驻屯军在平、津等地连日演习，参加部队达3000余人。下午，共有三批日军分乘专车由通县开至北平，旋即转赴天津。首批500余名，携带钢炮、机枪；第二批190余名，携带钢炮，并配有坦克六辆；第三批500余名。天津日军七八百人开往通县一带演习行军。

4月26日　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营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人运动，致书国民党中央，并上书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称："有罪同受处罚，无罪同复自由。"

△　吴铁城在广东省府总理纪念周上宣布治粤方针，旨在整饬吏治，发展工业，扫除文盲，救济农村。

△　傅作义在太原参观各项建设，乘汽车赴河边村谒阎锡山后径赴大同转绥远。

△　西藏大格西喜饶嘉措，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陪同，赴国府觐见林森主席。

△　顾祝同派飞机由延安接周恩来与张云逸来西安。周恩来将与蒋介石会谈内容先与顾祝同、张冲交换意见，并商谈发放红军本月份经费与寒衣，河西红军西路军，派人至鄂豫皖苏区等问题。

△　实业部公布，日本在中国走私已由华北深入腹地。日本浪人、汉奸凭其特殊势力，私运贩卖，破坏关政，税收损失甚重，产业界所受的损失尤为显著。二十五年（1936）全年私货进口价值，即依最低估计，亦在一万万金单位以上。

△　四川东北疫病流行，各县日死百人以上。

△　四川省政府以川省旱象已成，特函各县县长勉以解足验换契费、正供新旧粮税、清剿防卫、救济灾荒四事，共渡难关。

4月27日　蒋介石在上海接见绥境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等一行。

△　蒋介石电告孙蔚如等，称杨虎城出洋于公于私两利。杨虎城电蒋介石称，“退思补过，攻苦绩学，来日方长，报国未已”。

△　杨虎城电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

△　周恩来分别与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挽留杨虎城办法，并电中共中央建议蒋介石留杨虎城不出国，对裁撤西安绥靖公署亦表示不满。

△　行政院决议，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贺耀组代理甘肃

省政府主席，何柱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副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主任；派刘峙、王树常、于学忠、商震、陈诚、孙连仲、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刘茂恩、沈克、檀自新、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董英斌、米春霖、胡宗南、曾万钟为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以刘峙为主任委员，负责整理10万东北军，会址设开封。

△　司法院任命邓哲熙为河北高等法院院长，王敬简为察哈尔高等法院院长，马师融为青海高等法院院长。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预算法》，凡89条。

△　宋哲元由北平赴察哈尔视察，并主持察省孔庙落成典礼。

△　朱庆澜电南京报告四川灾情称："急赈只济一时，且灾广所救有限，根本之计，端在农桑实业。"

△　贵州全省300万灾民待救济，灾区达五六十县，遍及全省。最重灾区，亦有10余县之多。

△　上海海关缉私人员再度呼吁武装缉私，并发表《告同胞书》，希望给予切实援助。

△　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主张督促武装缉私。

△　日博览会将中国陈列馆列入殖民地区，外交部对此提出抗议。

△　意驻华大使柯赉向国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日驻华大使川樾茂返国述职，张群设宴为川樾饯行。

4月28日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对记者称："东北军各部，此次奉命东开，更由中央分配以新的任务，从此人事、经理、教育诸大端，均改为直隶中央。"

△　周恩来在西安与顾祝同、张冲会谈。顾祝同希望红军改编在5月10日以前解决。周恩来表示，红军改编至少须至6月才可开始，人数必须4.5万人；同时表示，和平基础虽然已确定，但须将纲领确定。此事往返时间较长，还应见到蒋介石以后才能解决。周恩来并将中共《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顾祝同。顾祝同即将会谈情形与中共纲领草案电告蒋介石；同时，周恩来亦电蒋介石征询两人会见时间。

△　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峙在开封对记者称："本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咨询机关，负整理上之建议责任，关于驻军之教育、经理、卫生各项，仍由中央主管各部及豫皖绥靖公署直接办理。"

△　上海军、政、警当局宣布，从5月1日起，全市实施全日戒备，制止罢工、怠工及非法集会、游行。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市保安队和各租界警务当局，实行联合戒备。

△　韩复榘电行政院与财政部，要求山东省境内食盐加价"暂缓执行"。

4月29日　湘鄂赣边区主任刘兴将江西、湖北交界的九宫山，湖南黄金洞、天岳关，江西武功山，划为四个特别区，设立政治区，加紧对红军游击部队的进攻。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空军军旗条例》，凡九条。

△　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在河南南阳军部遇刺受伤，赴沪就医；凶手当场被击毙。

△　行政院卫生署署长刘瑞恒至福建视察后，回南京报告称，闽西鼠疫已蔓延达10余县，死亡已有三四千人，实际恐已近万人。

△　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谈四川视查灾区经过称，"灾区

达130余县，死亡日多……最重灾区26县，次重灾46县”。

△　财政部令芦盐总局，限本年输日总数为10万吨，该局前与日本兴中公司口头约定13万吨将中止签约。

△　京滇公路周览团至昆明。

△　芦盐第四批3300吨由“大连丸”载运赴日。

△　英、日在伦敦开始谈判对华合作问题。

4月30日　蒋介石由上海抵杭州。

△　蒋介石准杨虎城辞职，并派杨氏出洋考查。

△　立法院修正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删除第146条。

△　蒋介石电参谋总长程潜，设计青岛及济南国防工事。

△　蒋介石手辑《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著《西安事变回忆录》交中正书局印成合订本，定于5月15日出售。经蒋介石核准于6月3日发行。

△　上海文化编译馆出版《蒋介石全集》，搜集自民国十三年——二十六年（1924—1937）蒋介石言论汇编成册。全书约400余篇，100余万字。

△　财政部与铁道部发行粤汉铁路建设公债270万英镑，以粤盐附加税担保，30年还清，年息六厘。

△　立法院通过外交官、领事官等官俸表，分为特任一级，简任二级，荐任五级，委任三级。特任大使官俸800元；简任官分为八级，430—680元不等；荐任官分为10级，220—400元不等；委任主

事160—200元不等。

△　中共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成立，开始向国内发布国际、国内新闻，向仲华任社长。

△　天津市政府为彻查海河浮尸来源，特定三项办法：一、清查津市户口；二、拍照尸像公布招认；三、限制苦工流落津市。

△　日新任驻华大使馆参赞兼驻南京总领事日高信六郎，由上海至南京任事。

△　英、日对远东问题已作非正式协商。英国坚持主张由美国参加会谈，否则不缔结任何协定。

△　墨西哥新任驻华公使埃琪拉向国府主席林森递呈国书。

△　上海纺织业罢工工人要求基本实现，是日复工。

是月　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刘建绪奉命加紧进攻红军南方游击部队，在闽西、赣东、浙西、皖南四省交界的仙霞岭、武夷山、天目山、黄山山脉的庆元、开化、松溪、崇安、邵武、建宁、宁化、光泽、婺源、浮梁、德兴、休宁、歙县、宁国各地与红军游击队展开激战。刘建绪命令当地各机关“全力以赴”，“限期完成清剿任务”。

△　东北抗日联军李延禄、周保中部联合作战，进攻林佳线和林密线总车站林口，焚毁该地；有三条路线交通历时半月不得通车。

△　第二十九军研究制定对日抗战具体作战方案，另拟就以攻为守作战方案：分二十九军为数集团军，划为天津、北平、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为总预备队集结地带。

△　中共中央电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陈云速赴新疆，建立中共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合作关系，并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进入新

疆。陈云（化名施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偕滕代远（化名李广）、冯铉、段子俊、李春田等由苏联急赴迪化，直接与盛世才会谈，商洽双方建立正式合作与接应红军西路军进入新疆事宜。

△　本年4月份全国对外贸易额增加，入超为2900余万元，较上月份少600余万元。

△　日再度提出兴建津石铁路（天津至石家庄）与开采龙烟铁矿，宋哲元则提出反要求称："要谈中日华北经济合作，必须先撤销冀东伪组织。"

△　日法西斯团体大日本生产党、大化会、国策社、鹤鸣社、新俱乐部等召开代表会议，对于日本的"软弱"外交表示愤慨，决定一致拥护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存在。会议决定：一、使华北与日"满"成为一体的经济组织，树立远东各国提携的基础；二、发动日本全国拥护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发展；三、对华的"败北"外交应该放弃，而树立对华的独立外交。

5月

5月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及第十七路军番号；另电熊式辉有关庐山暑期训练县政与乡村建设以及保甲组织事宜，以星子县与九江县为实地考察地区。

△　军事委员会任命徐海警备司令黄杰兼任陇海东段警备司令；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兼津浦南段警备司令。

△　周恩来在《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撰文《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确认男女平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发动抗战。

△　毛泽东、张闻天电复潘汉年，提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同时，“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　何应钦、王伯群、谷正伦、张道藩等36人请赈贵州省灾荒。

△　实业部与皖、赣、鄂、湘、闽、浙六省及部分商股合组之中国茶叶公司在南京正式成立，实业部常务次长周诒春任董事长，寿景伟为总经理。

△　绥远隆重举行成吉思汗诞辰祭礼，阿王主祭，傅作义致词。

△　驻防青岛的税警团换防，我国在胶澳盐区增派两营兵力，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竟无理提出“抗议”，要求我军撤退。日本报纸造谣，企图离间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

△　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华尔槐纳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伪满洲国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规定对任何视为备战极关重要的生产事业，均完全加以统制。

5月2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是日至14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60人，列席代表74人，毛泽东等19人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张闻天以《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为题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这次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做了重要准备。

△　察北伪蒙军李守信部在商都、南壕堑间增兵南犯。

△　伪满洲国颁布新学制，小学改为五年，中学改为四年，大学改为五年。

5月3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讲演称，我国对日是“抗而不排”，指出“今日一切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加强国家的抵抗力”。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讲演《对修正〈国大关系法规〉应有的认识》，系酌采各方意见，采取自由选举与集中人才之原则。

△　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孔祥熙一行抵英。

△　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全国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

△　熊式辉赴赣东督促各保安团队遵限“肃清残匪”。

△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

△　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向甘肃拨救赈款32万元。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以甘肃灾区辽阔，拟续向京、沪、平、津呼吁大批赈款。

△　新任驻美大使王正廷离上海赴美莅任。

△　美国与日本决定在伦敦谈判中国问题。

△　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伪东亚协会、伪普安协会、伪人类爱善会、伪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协会、伪河北省人民防共自治促进会、伪天津市各界防共自治后援会、伪华北五族防共委员会、伪天津市各界防共委员会等。

△　日外相佐藤强调以互助精神打开中日局势，并指出英、日妥协极感困难。

5月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上官云相为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

△　蒋介石电顾祝同称：“共党近日对实行草案等之宣传及其对国民大会选举修正意见，仍以反对本党为唯一对象，毫无异于过去之行动”，“如其果故（有）诚意合作，应嘱其彻底改，从速停止此项宣言”。

△　行政院改组甘肃省政府，罗贡华任民政厅长，代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兼建设厅长。

△　行政院会议通过财政、实业两部拟具的《食粮调节办法》，定8月1日起实行。《调节法》共有六项，规定食粮在国内自由流通，对出口和进口都要严格限制等。民国二十五年（1936）11月之《粮食调节暂行办法》同日废止。

△　北平文化界救亡团体号召开展新启蒙运动，成立启蒙学会，发表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纲领，称“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并提出10项工作。

△　北平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广场举行五四运动十八周年纪念大会，北师大校长李蒸与北大教授陶希圣等讲演。因争夺对学联的领导，会上发生新旧学联间冲突。

△　天津各界鉴于日本浪人走私猖獗，组织拒私会。

△　汕头日轮偷运大批铜丝和废钢铁赴台湾；日本在华南走私人造丝，已在10万元以上。

△　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一、巩固伪满国防；二、实施满蒙一体化；三、实行满蒙军事同盟；四、扩编内蒙军师团，军用机械与教官由日军供给；五、加强绥、宁、甘三省特务工作；六、关东军在热河边境增兵一旅团，并策划进攻绥远。

△　著名骨科医生牛惠生逝世。

5月5日　　国民党中政会会议通过《修正土地法原则》。主要内容为：一、发行土地债务；二、扶植自耕农；三、土地登记；四、规定地租最高额为地价80％；五、“不在地主”的土地承租人继续耕作五年以上者，得请求征收其耕地；六、开垦荒地；七、重划土地。

△　国民政府通令胡汉民逝世纪念日提前于5月10日举行。

△　蒋介石电湖南省主席何键，令速完成桃花坪至芷江公路；另电徐永昌询河南清化通往山西晋城公路修筑情形。

△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特任徐永昌、陈调元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电复周恩来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称：“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向张（冲）、顾（祝同）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　《四川省生产建设三年计划纲领》颁布，确定初步原则为：一、辅助中央完成国防建设；二、整饬治安，肃清全川盗匪；三、禁毒防病，增进人类健康；四、整理财政，改革征收制度；五、特立预算，推进生产建设；六、发展交通，辅助生产建设；七、调节金融，补助农工商业；八、改革教育，适应建设需要；九、化兵移民，开发边地计划；十、防御天灾，兴办水利仓储。

△　是日为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十六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除开会纪念外，并以勋章颁赠在华外宾。按：民国十年（1921）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　广东各界人士捐款130余万元购飞机18架，在广州天河机场

举行献机命名典礼。

△　上海鸿昌造纸厂工人500余人在工厂门前请愿，要求资方改善待遇，取消包工制。资方勾结外国捕探打死工人二人，打伤200余人，重伤30余人。

△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各省、市地方教会代表约500余人参加。大会讨论题为《时代转变中的教会》。

△　英外相艾登在下院宣称，英政府不欲与在华有关各国重提所谓“势力范围”。

5月6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处置破旧党旗国旗办法》四条及党旗、国旗升降办法。

△　周恩来与张冲谈判，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

△　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

△　南京川灾救济协会茶会招待各界，张群任会议主席并报告灾情，提出救济川灾办法六项。

△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在上海举行第十七届年会及第十五届职业教育讨论会。

△　南京、济南间长途电话通话。

△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续任国书。

△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飞嘉卜寺，与伪蒙德王及吴鹤龄、李守信等会晤，策划绥蒙边境军事；决训练伪蒙旗保安两大队，合计两万余人，由德王任总队长，卓什海、包悦卿两人任大队

长。

△　日本东洋制纸会社社长内田至天津，准备在天津开设分厂，资本1000万元。

5月7日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绥靖公署。

△　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视事。

△　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训令各县县长，在向红军游击队进攻期间，各县长必须亲自办理善后工作。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公务员任用法施行细则》，凡25条。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教育部通知各大学添设新闻科，并令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办理新闻训练班。

△　京滇公路周览团离昆明东返。

△　天津海河出现浮尸，宋哲元悬赏举发。次日，查出浮尸系由日本租界运出。

△　日本第六次向伪满洲国移民3770户，共1.3899万人。

5月8日　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工业组在南京召开会议，决议《关于发展樟脑工业计划》、《利用工业分散方式或小工业手工业方式，辅助大工业之生产并减低工业品成本问题》、《改良各个工厂之组织管理，促进各种工业同业之组织以及各个工业联合之组织问题》、《酒精代替汽油应设法施行》等案。

△　国民政府明令允许政府主办的电矿事业招收商股。

△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南京宴请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颜尔露。

△　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　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就华北救国联合会提出召开各种力量代表会议称，今天的民主运动已不仅是宣传而是实际运动，必须引导他们集中注意力到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讨论共同纲领方面较有实效。

△　日军在天津东南各乡演习，任意践踏田苗，农民推代表向有关当局请愿，要求制止。

△　关东军增加一旅团驻防热、察边境。

5月9日　　全国各地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日”活动，下半旗并停止娱乐、宴会一日。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巡视广东军政。

△　毛泽东与张闻天、秦邦宪电复在西安的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为：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红军实行改编，南京释放政治犯。

△　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发表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建设计划称，政治方面首谋建设廉洁政府；军事方面实行“三寓”政策；经济方面扶植农村经济；文化方面发展教育扫盲。李宗仁并谓，中国目前要抗日救亡，非团结全力，巩固国基，在中央领导之下一切对外不可。

△　陈果夫至淮河入海口处视察导淮工程。

△　天津大沽又发现浮尸三具，并抓获两名运尸犯。市政府以此事在与日租界交界处发现，令警察局会同日租界警察署会商防止之

策。

△　德航空部长戈林电邀孔祥熙特使游德。

△　汉奸李宝章受日伪资助，在冀东招兵3000人开入察北，与绥东匪伪军联络并从事扩编。

△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总裁安川由大连飞抵天津，与中、日经济、金融界人士交换“华北经济提携”的意见。

△　天津日军2000余人举行检阅和演习；在榆关有400余日军演习野战。10日与11日，日军又在天津进行大规模野战演习。

△　日军步、骑兵3000余人开至多伦。多伦至沽源、张北一带，日军军运繁忙异常。

5月10日　上海市长俞鸿钧就上海越界筑路问题发表谈话，指责日方“枝节横生”，“漠视我主权”，并称“市府方针决不变更”。

△　江苏绥靖主任于学忠通电就职；6月13日，抵淮阴上任。郑州警备司令曾万钟就职。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华北日军配合问题。同日，天津日领事馆开会讨论华北经济问题。

△　日本举行外务、陆相、海相三相会议，外相佐藤任主席。出席会议者计有外务次官堀内、前外务省东亚局长森岛、新任东亚局长石射、外务省东亚第一课长上村、陆军军务局长后宫、军务局军事课长柴山、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长保科、日驻华大使川樾等。会议决定对华侵略方针，继续扩大走私，坚持支持冀东伪组织，并谋侵入华北；反对孔祥熙在欧洲所称“太平洋集体安全制”。

△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英日举行会谈旨在调整对华关系，“担

保中国土地与行政完整的《九国公约》，必须仍为与太平洋区域有关系的列强间合作的巩固基础”。《上海中日停战协定》“仍应继续有效”。

5月11日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包华国为出席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并指定李平衡为第一代表；聂光堉为雇主方面代表；派田和卿、谢嘉为雇主方面顾问。

△　国民政府颁布《航空委员会飞机站场借用规则》。

△　宋哲元以对日问题难以解决，回山东乐陵原籍暂避。

△　何应钦在上海举行茶会招待各界，商议急赈贵州省旱灾。

△　天津县政府捕获盗卖国土犯张华轩（天津县府钱粮课主任）等人。张犯等以贱价收买荒地转售于日本人，已售出一万余亩。宋哲元要求对张犯等“严刑惩处”。

5月12日　国民政府令：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因公赴陕，未回任以前，派薛岳为该省政府委员兼代省政府主席。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民国二十六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概算为10.649478亿元；通过修正县、市自治法及施行法原则七项，修正县长任用法等。

△　财政部与英商安利洋行商定整理欠债办法，规定免除所欠该行利息，原欠额折为法币191万元，自本年4月底起，每月还一万元，不另计息，限191个月还清。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

△　广西各国税机关由中央统一整理，完全隶属中央税务机关。桂钞一再暴跌，李宗仁、白崇禧请中央银行在桂设分行，负责整理。

△　傅作义至百灵庙视察，14日至锡拉穆楞召（大庙）视察。

△　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自安徽移防江苏。

△　京滇公路周览团在贵阳分为两队，一入四川，一入广西。

△　行政院决定，东北大学自本年暑期集中至西安办理，进行“彻底整理”。

△　哈尔滨美商抵沪谈，自前年秋迄本年4月止，日本莲沼联队与义勇军发生战斗765次，日军自称死伤达千余名。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召集“市民僚属会议”，宣称日本在华北的立场，仍以冀察政权为对象，要求筑路与开矿等权利。

△　日本浪人四五十人，深夜持刀、棒强行占领天津海关小西门分卡，将分卡关员二人及警察局队长一律禁闭，不准自由行动，并绑去分卡稽查员及警察局队长，夺去警察枪支两支后，进入日租界，藏匿日商义泰洋行。经我国当局交涉，被绑二员虽放回，但抢去警察枪支拒不交还。

5月13日　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刘峙、于学忠、陈诚、何柱国、缪澂流、吴克仁、高鹏云等，开始商谈东北军整理问题，商讨东北军调防后之隶属、编制、防地、军饷等四项办法实施事宜。

△　蒋介石电周至柔指示防空设备计划；另电商震查询黄河船舶及河南公路修筑情形。

△　冯玉祥赴奉化谒蒋介石。

△　毛泽东电复李宗仁称：“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促成全国之政治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5月14日　蒋介石指示陈诚筹备庐山暑期训练事宜。暑期训练每期以半月为准，7、8两月分为三期召集。受训人员应加入中央政治学校训导班与中央军事机关各厅长、各军校教育长、机械化部队各部队长等。课程以学科占十分之六，术科占十分之四。

△　刘峙宴请陈诚、于学忠、何柱国、王树常、缪澂流、吴克仁等，再次交换整军意见，决定：一、对整理后之东北军的编制、饷械、教育三项，悉归军政部直接统一办理；二、各特种师与独立师酌予改编为军，由中央直辖；三、各部队防地，由中央拨配调遣。

△　何应钦由南京至上海出席黔灾义赈会议，称“东北军整理问题，‘国军化’三字足以包括之”。

△　毛泽东与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联名电周恩来称，同意国民党派考察团至陕北，力争考察团由张冲率领；考察目的为增进团结；坚决反对康泽及其他任何叛徒至陕北；非叛徒而蓄意破坏分子，亦坚决拒绝。

△　建设委员会改南京下关与常州戚墅堰两电厂为扬子电气公司，又改淮南煤矿与淮南铁路为淮南矿路公司，各定资本1000万元。除该会保留二成外，其余添招商股，委托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募足。两公司发起人有宋子文、孙科、李石曾、曾养甫、胡笔江、杜月笙、周作民、宋子良等40多人参加。

△　驻波兰公使魏宸组谒波兰总统莫锡基呈递国书。

△　天津海河浮尸已查明，系日在华北冀东秘密雇用挖掘工事之工人，遭日人杀害灭口，将尸体抛入河中。

△　天津100余日浪人，以汽车九部载大宗砂糖、麻纱向冀东偷运，天津海关派关员协同保安队追缉，日本浪人聚众殴伤缉私队警及关员六人，夺去缉私队警步枪两支。

5月15日　军事委员会对东北军整理办法全部商定，东北军五个军军制仍旧，限7月1日前改编完毕，由中央直接发给薪饷；防地仍照中央原指地点，暂无变更；原西北“剿匪”总部人员与编余军官尽量安插，不使一人失业。

△　内政部长蒋作宾至山东、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北平、天津等省、市视察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

△　驻渝川军移防，由中央军进驻。

△　云南省府命令：自即日起，省内一切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准。

△　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谈判，对国民党提出视察边区事须遵守两项原则：一、不能称为视察团，应称为考察团；二、不能让康泽与中共叛徒参加考察团。谈判中要求交还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

△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

△　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及北平《晨报》均著文反对一党专政，呼吁实行民主，要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　英驻华大使许阁森访外交部长王宠惠，告知英日会谈情形。

△　铁道部向导淮委员会在英庚款拨余项下借13万英镑，建筑京赣铁路（南京至江西贵溪），定二十八年（1939）1月起还本付息，分三年还清。

△　川陕公路客货联运通车。由陕西宝鸡至四川成都，全线长800余公里，行程四日。宁羌设有联络站，办理客货接运。

△　郑州捕获汉奸刘英博、杜长德、阎得海三人，并查获万余元

存款收据与军装、护照等物。

△　孔祥熙、陈绍宽觐见英王辞行。

5月16日　何应钦由上海返南京，约刘峙、陈诚、于学忠、何柱国、王树常等，商讨东北军整理实施办法，并决定5月20日前各将领聚集开封，参加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首次会议，会商具体实施步骤。

△　东北军东调后，改编淘汰三分之一。周恩来为此电潘汉年称，目前对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应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　智利商业考察团抵沪。

5月1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德国人法肯豪森为该会军事总顾问。

△　蒋介石健康恢复，自上海返南京。

△　前黑龙江第四军军长才鸿猷由东北抵南京，称“东北已如朝鲜之续，同胞备受敌方压迫，深愿国内同胞加以注意”。

△　铁道部与中国建设银公司为修筑成渝铁路，向法国中法工商银行借款2450万元。

△　监察院河北监察使周利生弹劾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不遵守缉私命令，拒绝关员行使职权，致华北走私之风特甚于各地，业经缜密调查属实。该弹劾陈觉生案，已交监察院审查成立，即日移送惩戒。

△　西康恢复义敦县建制，治大朔。按：义敦县于民国四年（1915）撤销。

△　京滇周览团北路抵成都，南路抵桂林。

△　重庆绅商吴受彤等赴重庆行营，往见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就四川局势事交换意见。

△　日本外相佐藤在全国地方长官会议上发表演说，诡称日本没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与计划，中国的抗日情绪高涨是由于“华方的误解”。

5月18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凡八章147条。

△　行政院决议改组广东省政府，吴铁城兼民政厅长，徐景唐兼建设厅长。

△　蒋介石召见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等。

△　东北大学学生数百人赴南京请愿，要求释放张学良。

△　重庆士绅往谒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询问有关川省政局谣言。刘湘谓四川绝对拥护中央，努力救灾。

△　云南腾冲紧邻缅甸，南甸、陇川、遮放等五土司至昆明观光并请训称，伊等世袭土司，服务边疆，因交通不便，下情不能上达，甚望改善边政。

5月19日　　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命令所部及地方团队与国民党地方人员，加紧进攻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限5月底“一律彻底肃清”。

△　东北军东调皖、苏整理方案在南京决定，刘峙、王树常返开封。

△　中美无线电通话。

△　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自云南至成都访晤刘湘

称：“这次游历所至，大多是抗日论调。”

△　日本决定向察北增兵，在嘉卜寺设立内蒙驻屯军司令部，以武藤为司令官。

△　天津日走私浪人抢夺中国海关关员枪支，海关向日方交涉无结果。

△　日本政府决定，从6月1日起，禁止台湾出版汉文报纸，厉行日语运动，取缔使用台湾语言。

5月20日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香港巨商何东爵士。

△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发布布告：“民产有白契者，限期登记税契外，凡盗卖国土与外人者，无论市民或公务员，一经查实，一律处以死刑。”

△　刘湘发表谈话解释川事，谓“外间不察真相，遂以为部队移动，妄谓川省有军事行动”，并称四川拥护中央。

△　孔祥熙在伦敦与英外相艾登晤谈，艾登保证尊重中国利益。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十周年，该校在大礼堂举行纪念会。按：该校自民国十六年（1927）设立，已历十载，设大学部、地政学院、计政学院、合作学院及蒙藏学校。

△　新疆南疆发生麻木提·阿不都尼牙孜率回军攻打疏勒事件，和阗马虎山应之，史称“南疆回乱”。

△　张君劢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出版，宣扬以思想自主与文化自主为民族自救基础。

△　全国手工艺展览会在南京开幕，到吴鼎昌、周诒春等200余人，6月20日闭幕。

△　驻日大使馆电告外交部，言及日本陆相杉山元对日本地方长官训话极具煽动之言论称：“论及中国动向……因基于标榜抗日之中央集权与军备充实强化及国防工事修筑等等……将由抗日而侮日，有不惜尽各种手段以根本排除日之和平发动之虞。”

△　日本华北驻屯军300余人在天津举行实弹野战演习。

5月21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农会法》、《农会法施行法》。

△　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携刘湘亲笔函谒中央当局表示，刘湘愿意接受川军国军化办法，并于二十六年度预算中划清国、省界线，以明系统。

△　孔祥熙与英财政大臣张伯伦、枢密大臣麦唐纳晤谈。

△　绥远省政府奉中央令，封锁百灵庙、大庙、乌兰花、土牧尔台、红格尔图等五个边防军事要区。

△　青岛市长沈鸿烈电外交部，报告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抗议我方税警团增兵。

△　华北日本领事会议在天津召开，对青岛税警团事件、华北外交事件和经济开发事件进行讨论。

△　日本驻华大使馆代办日高、参赞森岛、驻汉口总领事三浦及陆军武官、驻上海领事冈本、总务吉冈、情报田尻、经济调查宗像及武官喜多、海军武官齐聚上海礼查饭店日商寓所，听取森岛所携新训令，并讨论对华措施。

△　日本外相、陆相、海相举行三相会议，佐藤外相提出调整中日关系；陆相坚持大陆政策，反对重新调整对华外交。

5月22日　宋哲元为避开日本人无理要求，与韩复榘在山东省商

河县毛家寺会晤后，返原籍乐陵休养，决定暂不返回北平；所有冀察军政事务，交由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分别处理。

△　孔祥熙特使应伦敦中国协会与英国工业联合会邀请发表演说，请各国与中国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

△　刘航琛为四川灾款及田赋、禁烟等事项辟谣，谓“外间谣传，川省府强令县各推销（每人每日吸七分五厘烟配销），从中渔利，未免误会太甚”。“此分销办法，系四川禁烟局照各县烟民登记人数，以每人每日吸七分五厘配销”，并非强令各县推销。

△　湖北省立各完全小学全体教职员召集各校代表举行复薪运动，要求恢复民国二十年（1931）前薪给标准。

△　绥远伪军李守信部犯大青沟、南壕堑一带。

△　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巡查青山清偕四人迁入汕头永平路神州洋行居住，拒报户口，并殴伤中国警察，遭我方拘捕。日舰开赴汕头进行威吓，称“汕头事件”。

5月23日　　蒋介石以“中央人员在川气焰万丈，令人难堪，（有）种种不法行为”，电告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中央在川人员约束行为，不得生事犯法。

△　冯玉祥抵泰安，参加辛亥滦州烈士祠落成典礼。

△　周恩来电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提议边区政府委员会人选，中共方面由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高岗、郭洪涛（或马明方）组成；国民党方面由张冲、杜斌丞组成；红军编为四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任师长。

△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携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至洛阳会见蒋介石，但因故未得会谈；双方约

定至庐山继续谈判。

△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准备赴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商议共同纲领、联盟或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停止全国“剿共”、派人至南方苏区联络、发表边区政府委员名单、改编红军、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七君子”等问题。

△　国民党派赴陕北的中央考察团18人，由团长涂思宗、副团长邵华与萧致平率领离开西安，乘车前往陕甘宁边区，是日到达三原云阳镇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参观机关、部队，出席军民欢迎会。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热情接待考察团，并介绍情况，回答考察团所提问题。

△　导淮入海初步工程完工。此项工程自二十三年（1934）11月1日动工，历时两年余，动员20余万工伕，花费1000余万元。

△　京滇周览团南路在衡阳解散。

△　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森岛飞抵天津，参与华北日本领事会议，并传达外务省训令称，华北为日本的生命线，今后必努力在军事上加强对华北的控制，并把绥远包括在“内蒙古国”的版图。

5月24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讲演关于召集国民大会称，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信仰是国民大会的三个基础。

△　蒋介石抵九江。

△　周恩来致电蒋介石，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三项原则是：使此次国民大会真正民主化，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及各武装部队均能有代表参加；过去的选举一律作废；选举前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并提出10项具体意见。

△　周恩来连日与顾祝同谈判，商定政府再拨给红军经费五万

元，红军夏季服装在6月中旬发放；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到兰州者，可送西安。周恩来提出与南方各苏区联络一事，首先派员至鄂豫皖与湘鄂赣两苏区联系。顾祝同答称已电蒋介石请示。

△　张闻天、秦邦宪、毛泽东就与蒋介石谈判方针电周恩来称："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共产党政治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　外交部因西班牙战争发生，令旅西班牙华侨返国。

△　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召开理事会，王世杰、周鲠生、杭立武、吴颂皋、梅思平、钱端升等出席，决议于本年寒假举行第三次年会，征集论文；并决定讨论纲要为法学教育（包括课程标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等问题；通过段锡朋、蒋廷黻等为会员。

△　上海各团体为杜塞漏卮、维护国民经济起见，联合组织上海市各界不买卖私货运动委员会，推王晓籁、林康侯等21人为委员。

△　日本军事参议官、海军大将高桥奉命来华，视察日驻华海军情形。

△　日本外相佐藤在东京自由通商协会发表讲话称："如果我国的名誉权感受损害，当存亡危急的时候，就非断然出战不可。"

5月25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发行四川省赈灾公债1200万元、《修正军政部组织法》、《修正合作法草案》等。

△　刘湘电刘航琛，表示接受中央奠定川局的方案——整理川省财政与川康军事；同时电何应钦，请中央派大员入川指导。

△　孔祥熙离英国赴日内瓦。

△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分两组在庄里镇考察红军部队，认为“共党合作具诚意”，“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考察团全体成员至中部县祭扫黄帝陵。

△　周恩来电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提出同蒋介石谈判内容还包括外交问题，本年内第一步外交方针是：促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协定，以中苏协定为基础，坚决反对日英勾结，要求收回冀东、察北及领事裁判权，取缔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双方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等，严禁日机在华北飞行，解雇日本顾问，严禁同日本订立任何丧失主权的条约、协定和契约。电文还提出当前最中心的是要求召开各党各派联席会议与国防会议。

△　日本驻华大使馆及广州领事馆为青山清在汕头逞凶事件，向我国外交部及广东省政府提出抗议。

5月26日　行政院通令各省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监督，依照期限办理国大代表选举，以免延误大会之召开。

△　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为与国民党谈判事电复周恩来称：“除同意来电所提者外，应增加下列各点：（甲）向蒋提出并询问之方针者，（一）保卫绥远、青岛，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英日伦敦谈判等对日问题；（二）联俄问题；（三）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四）国防军事、财政之准备；（五）汉奸亲日派退出政府问题。（乙）须力争办到者，（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其余待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取缔北平、西安、上海等地破坏两党合作的行为；（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的

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

△　外交部说明青岛税警团撤防及日人青山清在汕头逞凶被捕真相称，山东胶澳盐区，向有税警一营驻防。本月2日，财政部调该营回海州，另派税警第五团接防；因食盐加税，为防止走私，故增加两营兵力，增强缉私力量。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竟为此向青岛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我国撤退驻军；青岛市日本报纸竟捏造税警压迫居住该地朝鲜人之事实。

△　孔祥熙特使抵日内瓦参加国联年会闭幕式。

△　国葬滦州起义烈士于北平，冯玉祥、鹿钟麟、石敬亭、宋哲元、秦德纯等主祭。

△　上海文化界谢六逸、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欧阳予倩等400余人，联名呈请国民政府恢复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自由，并请撤销对陶行知等人的通缉令。

△　日本内阁讨论汕头事件。东京方面对华空气突趋紧张，各报纷纷以汕头事件作煽动宣传。日驻台湾海军军舰奉命开抵汕头。

5月27日　蒋介石至庐山指示今年暑期训练团筹备工作。

△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等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由西安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数日，与各方人士会谈，争取中共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秘密党员；冯雪峰虽非代表团成员，但参与其事。

△　杨虎城离开西安飞抵上海；临行前，西安各界人士二万余人到机场欢送。杨氏发表书面谈话称：“现值全国和平统一，然外患凭陵，隐忧未已，吾人允宜戮力同心，精诚团结，拥护我唯一领袖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同胞，积极抗敌御侮。”

△　国民政府令：刘尚清兼安徽省保安司令。

△　外交部发言人就“汕头事件”发表谈话，说明日人拒不登记户口，且行凶殴伤我国警员之事实真相。

△　财政部对棉纱旧税率过低、分级过简进行改革，将过去两级制改为四级制，并提高税率。新税制于6月1日施行；增收税款将充经济建设之需。

△　建设委员会颁布《灌溉管理局组织条例》。

△　上海亚美织绸厂与总厂工人，因资方无故停发工资，经交涉无效，全体罢工。

△　驻欧洲各国使节在中国出席国联大会全权代表办事处举行首次会议，孔祥熙、陈绍宽、顾维钧、郭泰祺、程天放等出席。

△　日本政府训令驻华使馆日高代办，第二次向中国提出汕头案抗议。

△　驻榆关英军与日军发生冲突。

5月28日　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派秘书凌士芬飞汕头调查日人殴警案，日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竹吉贞治同行。29日，中日双方人员在汕头调查日人青山清殴击警察，证实为日人先行凶。

△　杨虎城以腿伤未愈留沪，并欲晋见蒋介石。蒋氏电宋子文，请杨虎城不必谒见，促其早日出国。

△　于学忠、何柱国抵开封，出席豫皖苏三省军事整理会议。

△　伪军王英手枪团团长常子仪反正，枪杀日本指导官，率部开至热河边境。

5月29日　冯玉祥为纪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誓师四周年，在泰山发表谈话称，“必须是全国的枪口一致对向敌人”。同日，南京亦举行此纪念会。

△　蒋介石函陈诚，指示庐山暑期训练预约讲演教师及课目，请杨绰庵讲管理与办事效率，胡适讲颜习斋哲学与程朱陆王哲学；另有授课项目逻辑学、统计学、地方财务行政、田赋土地制度、林垦矿务之重要与筹备司法与监狱之改良、蒸汽与电气动力之运用与管理、储蓄、合作、地方自治之实行与省县议会之设立与性质、地方卫生行政、公墓、乡村公产公款之调查统计等，每课授两小时为限。

△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邵华、萧致平一行18人到达延安，中共派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延安各界举行欢迎考察团晚会，毛泽东出席并在会上讲话，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来的”，“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涂思宗致词称，希望“举国上下努力，为民族生存打算”。邵华致词称，“希望国共两党紧握着手，长期的握着手，向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前进”。

△　天津市长张自忠偕冀察国外旅行团自日本返抵北平。

△　孔祥熙等由日内瓦抵罗马。

△　江、浙丝织业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增加人造丝织成品进口税。

5月30日　南京、太原等地举行五卅纪念会。南京举行国耻展览会，展出自鸦片战争迄于最近之国耻材料。冯玉祥、梁寒操在京作国耻纪念演讲。

△　上海复旦大学千余名学生集会纪念五卅纪念日，校长李登辉到场讲话。下午，2000余人在商会大楼集会，举行反日演讲。

△　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与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东门外大操

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大会主席团为冯文彬、刘长胜、林彪等五人。首由毛泽东报告，朱德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均致辞欢迎中央考察团。考察团副团长萧致平应邀讲话，称“希望大家在民族抗战的决心上，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一致奋斗，把我们的敌人驱逐出中国”。考察团在延安考察抗日军政大学和红二方面军部队，并会见刚由河西走廊至延安的原西路军负责人徐向前。

△　中英勘界委员会委员梁宇皋等述勘界经过。

△　汕案已查明，日方表示愿就地和平解决，驻汕头日舰已撤退三艘。

△　天津日本浪人横行不法，强占分卡走私；我国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第三次提出抗议。

△　孔祥熙特使、陈绍宽副特使觐见意大利国王。

5月31日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离开延安南返，林伯渠前往送行，陈赓陪考察团至西峰、泾川、镇原等地考察。

△　东北抗日联军200余人，攻袭长城北大川湖镇，与日伪军激战，至6月1日晨始撤退。

△　英外相声明，英、日谈判无损于中国利益。

△　日本林铣十郎内阁总辞职。

是月　周恩来派张文彬、彭加伦等至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并查找与营救红军西路军被俘与失散的指战员。

△　江苏铜山、东海各县遭受严重蝗灾，并有蔓延之势。宿迁、涟水、泗阳等县皆发现蝗灾。

△　日人在天津设立农业公司圣农团，强租中国土地50多亩，经

中国有关当局查明后，逮捕私自出租国土给外国人的汉奸谷恩富。6月2日，日本领事为此向中国提出抗议。

6月

6月1日　　豫皖苏三省军事整理委员会在开封举行第一次会议，到刘峙、于学忠、王树常、商震、何柱国、孙连仲、庞炳勋、缪澂流、吴克仁、董英斌、米春霖、檀新、曾万钟等20余人，讨论东北军调驻苏、皖后的整训事宜。

△　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蓝色大绶采玉勋章。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作的《党与群众工作》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3日，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认为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于4日结束。

△　上海四川同乡会等四团体，联合呈请免除川省滥征田赋、勒派烟款、强行验契及重征地方税四大苛政。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召开校务整理会议，到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军政部长何应钦、训练总监部副总监张华辅、该校教育长陈继承、政训处长滕杰、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武汉分校主任刘绍先、成都分校主任刘明灏代表李亚芬、广东分校副主任陈芝联等。

△　孔祥熙由罗马飞抵巴黎，会见法外长台尔博斯，午后又谒见法总统白伦。

△　行政院决议，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　铁道部向中英银公司借款80万镑，作为改进京沪铁路各项设

备费用。

△　实业部温溪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在沪开成立大会，实业部长吴鼎昌任大会主席，选王云五、汪伯奇等九人为商股董事。

△　中国棉业贸易公司改为中国棉业公司，资本由200万增至1000万元，宋子文为董事长，王克敏、周作民等任董事。

△　察哈尔张北、陶庙、崇礼、南壕堑等地民众数百人揭旗起义，组织人民自卫军，武装抗日。热河一带武装民众达三四千人。

△　日人在天津、青岛走私大批铜元，为我国警察查获。日人持刀行凶，刺伤我国警察。

△　惠通公司与日航空会社办理天津与东京直达飞机通航，国民政府致电天津制止，但无效。

△　第二次华北各地日本领事会议在青岛召开，北平公使馆书记加藤，天津总领事堀内、副领事永井，济南领事有野，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副领事道明，日外务省事务官别府等出席，讨论察、冀、鲁三省各地变更情况及开发华北经济问题。

6月2日　贵州省政府代主席薛岳宣誓就职。

△　王树常任豫皖绥靖副主任。

△　朱庆澜访河南省府主席商震，商谈救济豫灾办法。商震允再由豫省筹拨20万元急赈；朱庆澜允再请国民政府续拨10万元，并允协助豫省向中央请发豫灾公债500万元，以工赈方法兴办水利。

△　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离英赴巴黎、柏林访问；曾氏在英期间会同孔祥熙与英财政当局有所接洽。

△　广西省银行行长黄蓟与甘介侯由上海至南京，与财政部要员

商谈整理广西金融问题。

△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举行干事会，推胡适等17人为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中国代表。

△　湖南第一纺织厂全体工人总罢工，抗议厂方私订《职工待遇暂行章程》。

△　察北伪军一部被人民自卫军包围缴械。崇礼托拉盖庙伪警察局长为自卫军击毙。

△　日本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与日驻华北各地领事馆人员访青岛税警团第五团丘之纪团长，询问胶澳盐区兵力若干、是否需再增加、是否开入市区等问题。

△　日人在天津强租我国土地设立农业公司圣农团，因失火酿成交涉，日本驻天津副领事西田竟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盗卖国土的汉奸谷恩富，并以日人在天津租地为合法等。

6月3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以国民党党歌为中华民国国歌。

△　蒋介石命令南方各省，限6月底以前“一律肃清”各省红军游击队。

△　禁烟总会举行“六三”禁烟纪念会，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九十八周年，兼禁烟总监蒋介石特颁训词。各地并举行盛大禁烟宣传。

△　天津市政府派员访日本领事，商谈圣农团事件。

△　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决定，表彰民族英雄秦始皇、蒙恬、汉武帝、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窦宪、班超、诸葛亮、谢玄、唐太宗、李靖、李勣、刘仁轨、王玄策、郭子仪、李光弼、宗泽、韩世忠、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元太祖、耶律大石、拔都、明

太祖、郑和、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宋应昌、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史可法、秦良玉、郑成功、左宗棠、冯子才40人，征求传记。

6月4日　　行政院长蒋介石对《大公报》记者发表庐山谈话之意义称，“国内战事已结束，本人健康已恢复，此际正集思广益迈进建设之时，国家前途，惟赖自强”。蒋介石与汪精卫特联名邀请各地的各界领袖及大学教授等赴庐山谈话。谈话于7月15日开始，分三期举行。

△　中共代表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13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到达庐山，与蒋介石开始谈判。

△　杨虎城抵庐山谒见蒋介石，请示出国事宜；宋子文及刘湘代表刘航琛亦抵庐山。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凡91条。

△　立法院会议通过《修正警察官任用条例》。

△　缅甸与云南勘界问题告一段落。此后将由英驻华大使许阁森与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解决未了诸事。在新约未签订前，仍保留现有地位。

△　中国政府要求撤除天津日本军用无线电台。

△　察哈尔张北、保康各地义勇军声势浩大，断绝张北、化德交通，乡区伪军多被缴械。

△　近卫文麿组成日本内阁。近卫与日本皇室有姻戚关系，受军部支持。

△　日本兴中公司社长十河抵北平，访李思浩、陆宗舆等，商谈“开发”华北经济。

△　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约两个中队，由天通庵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出发，全副武装，配有坦克七辆、轻机枪四挺、机器脚踏车三辆，在宝山路、同济路上演习。不久，该队又分三路在上海虹口地区武装演习。一路由宝山路至横浜路青云桥演习；一路向同济路、八字桥演习；一路由天通庵向江湾花园街演习，后至东洋啤酒厂；坦克车七辆，由同济路向八字桥驰去。下午，日军始返回陆战队司令部。

6月5日　　汪精卫在杭州发表谈话称，对日本仍本三中全会决议进行，并不因其内阁改组而改变。

△　刘湘电呈蒋介石，表示完全接受整理川康军及安川方案。中央将派何应钦等入川与刘湘协商川省军政大事。

△　刺杨永泰案宣判，刘芦隐被处徒刑10年。

△　江苏、浙江、上海人造丝业发起联合设厂自制。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外交谈话，谓“对华三原则”（即“广田三原则”）已不适用，需要另开途径；并表示将力使外交脱离政争。

△　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向日本内阁与参谋本部报告称：“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

△　中、苏两国间上海与伯力直达无线电路开放通报。

6月6日　　财政部与广西省政府商酌整理广西金融步骤，在桂林设中央银行分行。

△　孔祥熙由法国抵比利时。8日，谒比利时国王。

△　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与邵力子等商谈，建议庐山谈话扩大范围至抗日领袖、左倾教授以及各民众团体，邀请平、津、沪、港各党派、各救国团体、各学生会代表及文化界、教育界、左倾人士参加。

△　卫立煌自安徽六安至太湖、潜山督促所部，加紧进攻红军南方游击队。

△　开明书店印行的《二十五史》全九册，并附人名索引一册、《二十五史补编》全六册，全部出齐。

△　中华聋哑协会于上海举行成立大会。

6月7日　孔祥熙在比利时就中日关系问题答记者称："中国真诚希望日本改变态度，共同为远东和平而协力工作，并在互惠与平等的基础上与日本及任何他国进行经济合作。"

△　国民政府明令公葬程家柽。按：程家柽为同盟会成员，民国三年（1914）秘密组织铁血团谋暗杀袁世凯，事泄被捕遇害。

△　湘黔铁路开工兴筑。

△　内政部长蒋作宾自华北返回南京。

△　察北各盟旗组织联防自卫军。

△　教育部为改进中等教育，决定在庐山举办全国中学校长暑期训练班，受训人员包括各省、市立中学校长、训育主任及各教育局局长、科长等共约1000人，训练期半个月。

△　日本外相广田表示，中日一切悬案应予解决，两国关系应予改善。

6月8日　是日至15日，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进行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张冲亦参加会谈。周恩来向蒋提交中共中央关于

《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会谈内容分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共细则53条。蒋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4.5万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的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等。并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双方推出同等数目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与行动，统由同盟会讨论执行；同盟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合组的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组织关系以代替与中共的关系。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等意见，坚持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未获解决。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周恩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　蒋介石电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令防空学校设计全国防空协会的组织与宣传计划。

△　行政院例会，通过《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施行期间延长一年，修正通过《全国糖业监理委员会组织大纲》，通过聘任吴鼎昌、翁文灏等为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吴鼎昌为主任委员。

△　中国童子军总会开会，选举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童子军第五届大露营代表，选定严家麟、徐观余担任正、副领队。

△　刘航琛代表刘湘赴南京，迎接何应钦入川。

△　广东外交特派员公署将汕头案报告书寄呈外交部；日高代办

谒王宠惠外长。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与中村会谈汕头案件；离汕日舰复折回示威，日舰驶至汕头者增至七艘。

△ 川康军事整理方案在庐山商妥。

△ 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报告中国形势时称："蒋介石领导之新生活运动，已转变为国家军事总动员运动。"

6月9日 国立中央大学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按：中央大学肇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三江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改称两江师范学堂，辛亥时停办数年。民国四年（1915），教育部在原两江师范旧址设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十年（1921）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为我国最早创建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明令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医科大学、江苏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中央大学，设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系科最为完备的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时为罗家伦。

△ 军事委员会在陕西临潼骊山蒋介石躲藏处建"蒙难亭"。

△ 财政部令食盐加征建设专款，每担一元。

△ 孔祥熙抵柏林，访问德国经济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沙赫德。

△ 新任驻美大使王正廷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国书。罗斯福保证美国全力合作，培养两国传统友谊。

△ 南京与贵阳间电话通话。

△ 厦门学生与商会合作，发起肃私运动。

△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将今井清《关于对苏对华战略

意见书》呈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与参谋部次长称：“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如日本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以除去日本背后的威胁，相信此为最上策”。

△　日本在长春召开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两军部联席会议，决定冀东伪组织划归华北驻屯军军部；关东军驻通州特务机关长调回长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命殷汝耕至天津，对其就长春会议作出指示。

△　日本电力同盟决议扩充中日合营的天津电力公司，由2.5万千瓦增至3.75万千瓦。日五大电力公司共同经营的华北电力兴业会社资金，由400万日元增至600万日元。

6月10日　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四省市加紧进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国民政府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四省市代表选举指导员。

△　代行政院长王宠惠慰劳京滇周览团。

△　上海市民4800余人上书请愿，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七君子自由；全国各界亦组织援救“救国会”领袖后援会，开展广泛援救运动。

△　上海花纱布交易所发生风潮。上海标纱交易因纱荒及多头操纵，致纱价飞涨，市场极为混乱，交易无法进行。

△　广东省政府前财政厅长邹敏初，以操纵金融，解南京讯办。

△　经济委员会以长江、黄河水位频涨，特令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沿岸省、市政府注意防汛。

△　察北人民自卫军一部4000余人占领沽源县南各村，日本派大批伪军前往围攻。

△　惠通公司擅自开办东京—天津间航线，又私运航空信件；我

国外交部交涉制止，并正式向日本提出抗议。

△　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订立互惠商约。

△　孔祥熙访德国外交部，与德国外交部次长麦根森就经济合作交换意见。

6月11日　蒋介石确定川康军事整理方案。四川、西康各军长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孙震、李家钰、王缵绪、唐式遵等电蒋介石，拥护川康军事整理方案。

△　四川省预算及军事整理事宜商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代表关吉玉离开庐山赴南京。

△　陈诚赴庐山谒蒋介石。

△　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君子案”，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开审，不许旁听。各报刊要求释放“七君子”。

△　实业部次长程天固至上海查办纱布交易所风潮，上海纱布交易所风潮平息。

△　教育部召集苏、浙、皖、赣、闽、南京、上海七省、市公私之初级中学劳作教员，举办初中劳作科教员讲习班，改进劳作教育之知识与技能。

△　察北伪军发生内讧，民众纷起抗敌；日方在张北实行戒严。

6月12日　孔祥熙与德航空部长戈林晤谈；并就中国借款政策问题在柏林对记者称，“欢迎其他民族用友好竞争之方式，前来合作”，“中国现已准备接受低利外债，以掉换高利内债”。同日，参观德

国容克飞机工厂，并与伊格颜料公司经理伊尔格纳斯就中德贸易交换意见。

△　刘湘代表卢作孚至庐山，商洽川政及整军事宜。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朱德、林彪、萧劲光和李德五人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

△　中共代表张云逸至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首次会谈。李宗仁、白崇禧表示赞成中共对形势的看法，同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　毛泽东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告知已与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彭泽湘在延安谈妥两党合作问题；又电告潘汉年，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将经北平赴上海，届时在沪“找你”。

△　察北伪军一律改称蒙古军，伪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

△　日本对解决“汕头事件”，又复提出新要求。

△　日本近卫首相就对华北问题发表谈话，诡称对华北没有武力侵略的意思，惟致力于经济发展。

△　日本在天津收容流亡在华白俄200余人，加以训练后，派遣在北平、天津与北宁、平汉两铁路沿线进行破坏活动。

6月13日　实业部制定《稻米检验规程》。

△　中国特种教育协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

△　德总理希特勒接见孔祥熙等，谓德政府极愿赞助中国经济技术之发展；孔氏对记者表示，中国可供各国投资市场。

△　热察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李庭芳，令第一路总指挥李英率武装民兵2000人由黑河川取沽源；第二路总指挥张仲英率民兵500余人趋南壕堑；第四路总指挥拉王松爷率蒙民2000余人与张仲英联合，直捣嘉卜寺伪德王老巢。蒙、汉人民纷起响应，总数已近万人，声势浩大。

6月14日　蒋介石电铁道部长张嘉璈，促赶筑京贵铁路（南京至江西贵溪）与川陕路；限川陕路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6月前完成。

△　四川省政府委员关吉玉携蒋介石亲笔函回成都，向刘湘报告。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告各省灾情，呼吁全国各界人士协助政府救灾。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与学人王树枏。

△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举办第二期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活动，蒋介石发表题为《暑期对于救国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的讲话。

△　清华、燕京、南开、协和、金陵五大学，与定县平民教育会及山东第一专区等七团体，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推晏阳初为会长，在河北定县与山东济宁分设两实验区。

△　国民政府明令修正纸烟进口税率。

△　孔祥熙离欧赴美。

△　外交部为驻沪日海军陆战队任意进入上海特区及越界筑路以外之中国辖境，已达26次之多，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

△　伪德王、李守信与日本驻蒙特务机关长召开紧急会议，商定

对付人民自卫军的办法，令伪炮兵总队配置于商都一带，准备与民军交战，防备晋绥军出击。

△　天津日租界内大举搜查毒品。

6月15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警察官任用条例》。

△　行政院通过《各省灾荒根本救济办法》。

△　行政院决定各部、会所管辖专科以上学校，除军警学校外，一律移交教育部管辖。

△　刘航琛返回成都，向刘湘报告川、康整军问题。

△　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辞职，由教育部派张颐为该校代理校长。

△　外交部向日大使馆抗议惠通公司私运邮件。

△　审计部为推广审计制度，召开全国审计联席会议。

△　察北人民自卫军一个团，在嘉卜寺南朝阳村与伪蒙军两个师激战。

△　中华民国拒毒会公布，日本在天津开设白面馆258家，烟馆土庄137家。

△　财政部续拨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四省赈款各10万元。

△　在汕头日人逞凶案交涉中，日舰违例驶回汕头，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向日本领事抗议。

△　驻美大使施肇基卸任归国。

△　日本内阁通过《日满一体化经济计划》，使伪满成为其统制

经济的一部分。

6月16日　内政部长蒋作宾向中央社记者谈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称："7月20日至23日复选，各地定能如期完成。指定代表的名单等选举完毕以后，由政府发表。"

△　蒋介石电约陈立夫为庐山暑期训练讲《总理实业计划》。

△　国民政府令：《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施行时间，自本年7月15日起，延展两年。

△　经济委员会预发防汛费五万元，交扬子江水委会具领。

△　军事委员会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

△　汉奸殷汝耕所属教导队在冀东玉田县城北强缴民间自卫枪械，激起人民反抗，参加反抗者共21村。

6月17日　蒋介石邀请全国各大学著名教授及各界社会名流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互相交换政治、经济、教育及地方情形之意见。

△　蒋介石电贵州省政府代主席薛岳，查询贵州省毕节至威宁公路是否已着手修筑。按：贵州省毕节至威宁公路，系四川省通往云南省之川滇公路重要路段。

△　国民政府颁布《社会军训政训大纲》。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各县市党部举办社会事业办法大纲》、《中央戏曲事业指导委员组织章程》；扩充中央广播电台设备案。

△　军事委员会任贺耀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副主任。

△　刘湘电蒋介石，表示"诚意接受一切训示"，并盼军事整理委

员会早日成立。

△　宋子文偕陈行、贝祖贻、戴铭礼等一行10余人抵香港，拟整理粤、桂金融及计划开发琼崖。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全体党员与各民众团体会员，对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一书“一体购读”，各级学校“一律指定为课外的读书”。

△　日本《日日新闻》揭载中国对日方针称：“决根据三中全会决议，本平等互惠之立场，出以强硬态度；具体的将动员全国机关，努力使华北恢复原状。……今后国（民政）府将以华北中央化为统一之焦点，以华南为经济建设中心。”

6月18日　　周恩来回至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谈判问题的讨论，并于25日起草关于谈判的新提案。新提案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承认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同时对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陕甘宁边区官长等具体问题提出中共的主张。周恩来称，与蒋介石谈判关于两党合作，蒋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其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与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干部合组之，蒋氏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关于红军，蒋氏答应编三个师12个团，人数可容至4.5万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中央方面派正职官长，边区推举副职。对这些问题，中共均不同意。周恩来与蒋氏争论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未能解决。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告各地党部，各地书局编印之蒋介石言论集与传记，必须经蒋氏核准后方得发行。

△　立法院通过《警察逃亡惩治条例》，修正通过《商业登记

法》。

△　外交部长王宠惠答日大阪朝日社记者桥本及山本、大阪每日社及东京日日社志村、读卖新闻社嬉野、同盟社奥宫等五人称，中日关系应基于互惠平等原则，第一步须先取消冀东伪组织；冀东走私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任何政治、经济措施恐不易生效。

△　王宠惠发表声明称，关于英日谈判之“任何谅解，如涉及中国问题时，第一，须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第二，须征询中国意见，并取得中国之同意”。

△　驻日大使许世英在庐山对记者称，今后对日外交方针，“仍本以往之主张，即依正义诚意四字做去”。

△　山西牺盟会制定反汉奸纲领九条，通饬所属会员及军警宪各方严缉汉奸。

6月19日　许世英谒见蒋介石，商谈对日外交。

△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驻华大使馆代办日高商谈税警团开赴青岛事宜。

△　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派队护送班禅回藏。

△　沪、皖、湘、赣四省、市米商组织国米运销考察团由沪出发，前往华南与安南西贡等处考察。

△　外交部调整驻外使领。驻奥地利代办童德乾调任驻土耳其代办，驻土耳其公使馆参赞萧继荣调任西班牙代办，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葛祖炱调任驻荷印巴达维亚总领事，驻吉隆坡领事吕子勤调升驻芝加哥总领事，驻新加坡领事施绍曾调任驻吉隆坡领事。

△　四川省政府“为办理移垦水利等工赈事项”，发行公债1500万

元，第一期发行600万元。

△　上海市商会召开第八届会员大会，通过《维护民族工业宣言》。

△　日本派遣汉奸潜赴河南省灾区招收壮丁，运至关外做苦工；有关当局命令所属，对此严加防范。

6月20日　中央公布四项改革广东币制实施办法，确定毫券与法币比例为1比14.4（即法币一元兑14.4毫券）。自本年6月21日起，至二十七年（1938）1月1日止，所有粤券发行事务，即由广东省银行移交中央银行。全国货币统一完成。

△　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至庐山，任庐山训练团总队长。

△　中国各教育学术团体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代表在南京召开首次会议；到会有胡适等八人。会上决议推定胡适为团长，程其保为秘书长，刘湛恩为干事长。

△　察北民军向沽源、崇礼推进。

△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长上村申一，在青岛召集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驻济南日领有野、驻华大使馆书记官田尻、驻青岛日领大鹰、驻济南武官石桥、华北驻屯军铃木少佐等开重要会议，讨论华北时局问题。据青岛市长沈鸿烈报告外交部称，日本“拟避免与我（国）中央正式交涉，而以各地方当局及人民为对象，分别利诱威胁实行经济、文化上之侵略，但亦不遽牺牲武力，轻启衅端。至于冀东、察北及冀察等处所得权益，决不交还（中国）”。

△　日本内阁训令驻华大使川樾茂，“仍以广田三则为对华政策之起点”。

6月21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关于华北问题重要会议，命令冀察

当局：一、华北国防计划按中央既定方针积极进行；二、关于撤销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的特殊状态与及时解决走私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三、华北日华经济合作问题，在前项问题未解决前，绝对不要进行；如任意进行，中央一概不承认；并要求第二十九军国军化。河北省银行发行的银券应停止发行，该券必须兑换成法币。

△　国府主席林森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年作《如何培养民族气节》演讲。

△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从日本的废藩说到我国的整军》讲演，阐明整理军队的必要，并对中央军、东北军、川康军的整理作详细说明。

△　刘峙以豫、皖、苏三省军事整理完竣，发表《告豫皖苏将士》。

△　孔祥熙由欧洲抵美访问，是日抵美国纽约。

△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丁惟汾辞职，由陈立夫代理。

△　教育部公布《各省市选派留学生办法》。

△　蒙藏委员会在该会礼堂举行甘肃辅教普觉禅师丹珠呼图克图册封典礼。

△　中国木业公司成立，总资本200万元，由铁道部、实业部、四川省政府、中国建设公司、川黔铁路公司、四川兴业银行合股组成；总公司设上海，重庆设办事处。

△　汉奸殷汝耕由通县至天津，往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议定扩充伪保安队实力，并重新分配防区。

△　日本外务次官崛内称，中日谈判不准备匆促开始。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

6月22日　蒋介石兼任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长，陈诚任教育长。

△　行政院例会，教育部长王世杰报告，拟暂划全国各省、市为15个视导区，每区设视员一人。例会并通过《各县市政府办理兵役暂行办法草案》；修正通过《国产品检验暂行条例》及《国产品检验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草案》等。

△　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川康整军方案10条电达川康绥靖主任刘湘，刘湘所属军队直隶中央统一整理。

△　是日至次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如何发展中国前途诸问题。

△　周恩来电告蒋介石，中共中央认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上边无指挥机关实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亦不能离去。

△　实业部长吴鼎昌至上海，彻查纱布交易所纱布风潮。

△　教育部为推进边境教育，特在绥远筹设模范小学。

△　北平新学生团体联合会开会决议，接受蒋介石倡导的全国大中学生暑期农村服务活动，组织暑期农村服务团，并以秦德纯、蒋梦麟、胡适、陶希圣为指导员。

△　沈钧儒等“七君子”向苏州高等法院提出第二次答辩状，补充说明其政治见解与主张。

△　上海市商会要求国民政府维持原订进口税则，并加紧缉私。

△　西安学术界举行西北史地学会成立大会，到会50余人，推定张扶万等九人为理事。

△　中国当选为国际劳工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　川樾茂在东京对中国记者谈话表示，一、日方无从速进行中日谈判之意，宁愿等待中国方面空气的好转；二、在目前情况下，将中国方面所希望解决之政治问题提出讨论，诚属困难；三、外交折冲纵然重开，其性质亦仅在重新讨论前此业已谈的问题而已。

6月23日　汪精卫、蒋介石发出请柬，邀请大学教授、地方政府县长以上官员380多人参加庐山谈话会，于7月15日在牯岭开始。谈话会分七组进行，每组谈话时间约为两个星期，由陈诚、雷震、何廉负责招待。

△　蒋介石电令刘建绪，加紧进攻红军南方游击部队，“早完任务为要”。

△　孔祥熙在纽约商洽借款，备国内“防灾”。

△　行政院制订《整理中央暨地方行政纲领》及《建设事业审议原则》。

△　周恩来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向其介绍国共两党会谈情况；指出两党合作只能逐步实现，先准备抗战，然后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运动。

△　外交部为驻沪日军擅自在上海市区演习，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　察北民军进攻商都，伪军关闭城门顽抗，并在城内大肆搜查。

△　河南省破获日本策划组织的长毛道反动组织。该组织总机关在天津，主要活动地区在豫北，分派党羽刺探中国军政情报。

△　日本华北驻军司令部决定6月25日至27日举行全军大演习，以北平、天津、丰台为争夺要塞，参加部队达四五千人，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任演习总监。

△　日本从通县陆续派遣便衣特务、汉奸、浪人二三百人潜入北平，准备制造暴乱，被我查获。

△　日本海军“出云”舰驶赴青岛，刺探山东省沿海中国驻军人数及装备。

6月24日　蒋介石在庐山宴请史丹法尼及前驻美大使施肇基，由蒋百里、高格利尼、薛光前等作陪。施肇基详细汇报国际形势。

△　庐山暑期训练团预定调训1.4万余人，分三期举行；每期受训者约4500人，包括军官、警官、县长、军训教官、政训教官、党务人员、中学校长、新生活运动会职员及童子军干部。

△　冀察政务委员会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四省、市从速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各省工作与红军改编问题。毛泽东指出，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周恩来提出上海是政治舆论中心，中共应派员加强指导上海工作。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张云逸，告其与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联系时，应“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不可“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并告张云逸推动广东、广西、香港方面政界人士应邀参加庐山谈话会。

△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六年度预算草案、《中央储备银行法》、《军事征用法》。

△　交通部拟增资一亿元扩展招商局业务。

△　实业部取消山东招远县玲珑山中外合办金矿的登记注册，将该矿中的“满铁”资产收归国有。

△　日本陆军省提出扩充军备五年计划，计划1938至1943年国防经费110亿日元，其中军火费一项即达50亿日元。

6月25日　为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联名向江苏高等法院呈文具状称，“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同日，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公审沈钧儒等七君子案。

△　孔祥熙与纽约银行界讨论中国金融问题，成立初步协定。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孔祥熙法学博士学位。

△　毛泽东致函何香凝称，“时事渐有好转……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　立法院通过《二十六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修正土地法原则》等文件。

△　中国统计学社第七届年会举行开幕典礼，研究中国人口统计问题。

△　自是日开始，日军在卢沟桥以北与以西地区连续举行演习。驻丰台日军平时以演习为名，常在卢沟桥附近活动，并侦查地形。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中的少壮派，近来叫嚣“准备第二个‘九一八’”，“现在处于第二个‘九一八’的前夕”。日本军部队为，充实华北驻屯军力量，强化组织，为准战时预备，乃当前的要务。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召开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各县日本顾问会议，讨论加强冀东伪组织。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谈话称，中国须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权利，“满洲国”之生存与华北间之必然联系。

△　英下院辩论远东外交政治，外相艾登声明，英日谈判决不至损及中国利益。

△　伦敦万国记者协会选举《中央日报》驻英记者储安平为会员。该会于1888年成立，中国记者被选为会员，尚属第一次。

6月26日　蒋介石电促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迅速修筑马当至东流公路，以该路对国防、交通均极重要。

△　蒋介石通令各省、市当局，对于工人罢工，“务应尽力镇息，随时防止”。

△　毛泽东与周恩来电潘汉年，告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往庐山谈判。中共中央电复蒋介石，待中共对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就之后，周恩来即前往。

△　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告知中共拟定的国民革命同盟组织原则四项。

△　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与广西财政厅长黄钟岳由桂林抵广州，与宋子文商谈广西财政、金融问题。

△　冀察政委会因日军频繁演习，宣布北平市夜间特别戒严，由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维持治安。

△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至日本。

△　驻丰台日军700余人在宛平县境永定河河曲一带实弹演习；旅

团长河边正三前往检阅。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谈称："（一）华北系为适应'满洲国'生存与发展之必然的命运而存在；（二）华北经济合作问题，日本仍与地方合作而使之实现；（三）华北驻军问题系据《辛丑条约》，当然不能废除；（四）华北日军之飞行业已实现，南京政府无论如何争辩，于事无济。"

△　国联满洲调查团主席李顿在伦敦对记者称："任何建议主张英国应该承认'满洲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借以换取日本的友谊，必须尽快明白而否认之。"

6月27日　北平、天津提前实施夏防，由第二十九军协助警察，严加戒备，以确保治安。

△　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表示，川康军事整理方案，可使中央与地方打成一片。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与抗日军政大学作《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报告称："和平基本上取得了……。南京政府有被迫抗战的准备，但尚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

△　教育部公布1912至1935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数。1912年为490人，1913年为976人，1914年为1048人，1915年为2364人，1916年为1470人，1917年为1155人，1918年为900人，1919年为1137人，1920年为1446人，1921年为428人，1922年为1742人，1923年为2005人，1924年为2397人，1925年为2272人，1926年为2841人，1927年为2714人，1928年为3253人，1929年为4164人，1930年为4583人，1931年为7014人，1932年为7311人，1933年为8665人，1934年为9622人，1935年为8672人。

6月28日　行政院长蒋介石电财政部与实业部，要求对民生有关

日用物品制定最高与最低标准价格，以防止投机操纵，破坏市场。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庐山。同日，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各省军官、县长、中学校长等相继到达庐山。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商业登记法》，凡29条；《警察逃亡惩治条例》，凡六条。

△　孔祥熙至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财长摩根索讨论财政、商务问题，与摩根银行拉门特等在华盛顿订立协定，由该银行贷给太平洋建设银行美金500万元。

△　毛泽东与朱德电叶剑英，商请何柱国电告顾祝同，中共派郑位三等15人赴鄂豫皖，派方方等10人赴闽西南，请西安行营发给护照，并介绍两地最高长官接洽。

△　毛泽东、周恩来电叶剑英，请何柱国电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兰州收容之西路军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溃散。

△　全国律师协会在南京举行本届第十次常委会议，到平、津、济、汴、沪、汉、杭等地律师代表，讨论组织撤废领事裁判权促进委员会问题，并通过该促进会大纲五条，推举平、津、沪、杭、宁、粤、汉、济、汴、青、怀宁、江都、苏州、镇江各公会为常任委员，决定近期内在上海开首次会议。

△　南京至北平、天津、青岛、保定长途电话通话，交通部举行开放通话仪式。

△　华北水利委员会本年度夏季大会在天津开幕。

△　实业部惩处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吴瑞元等。

△　日军270余人在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

△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满铁株式会社、兴中公司、东拓公司在大连举行“帝国经济”会议，策动侵华行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会上声称，“三个月可以解决中国”。

6月29日　军事委员会颁布《川康军事整理组织委员会大纲》，派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孙震、李家钰、夏斗寅等19人为委员。

△　中共中央接南京政府来电称，红军改编后，只得设政训处。中共中央决定，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与职能。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闽西南、鄂豫皖的工作问题和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闽西南、鄂豫皖的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并说，关于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

△　孔祥熙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并对美国记者谈中国财政及预算情形。

△　宋子文应李宗仁邀请飞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桂省财政、金融问题。

△　前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与其妻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随员等乘“胡佛总统号”轮船，由上海出国考察。

△　甘肃绥靖公署裁撤。

△　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苏浙皖统税局局长盛昇颐投机操纵纱布交易，被免职扣押。

△　中国留日学生屡受日本捕禁，或受拷问侮辱，或被逐回国，年来已有四五起之多。我留日学生推代表叶文津回国请愿，要求政府据理交涉。

6月30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讲，呼吁美国注视远东危机将导源于中国之被侵略，希望美国主持国际公道，关切世界和平。

△　驻日大使许世英在上海访日本大使川樾茂。

△　各地学生暑期由西安至陕北参观，红军总政治部设招待处接待，指定专人与学生谈话，讨论问题，发给刊物、文件供阅读，亦可参加训练或至延安参观。

是月　6月中旬，中共代表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举行第二次会谈。张云逸说明中共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项任务，李宗仁等表示同意此“三位一体”任务。四川省府主席刘湘派代表张斯可至桂林，经李宗仁介绍，与张云逸会见。三方商谈至6月下旬，张斯可代表刘湘，张云逸代表中共，与桂系代表李宗仁，共同签订《川桂红协定》七条。

△　6月以来，驻丰台日军演习渐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后竟实弹射击；初为昼间演习，后来竟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宛平城而过。日本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盛传，“7月7日深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　日驻上海海军陆战队重行分配。本年春，日本在上海的兵力共3500余人。5月初，调往华北、华南两地约800人。至6月初，只有2600—2700人。6月15日以后陆续增加。至7月15日，在上海的日本陆战队兵力约3100—3200人。

△　日本正金、台湾、三菱等银行企图在上海推行伪满钞票。财

政部通令各海关，严禁伪钞入口，要求上海市政府严厉取缔收兑伪钞的行号，全市商会转知各同业公会一律拒绝使用。钱兑业除宣誓拒兑外，并组织稽查队分区稽查，发现背誓收兑者，严予制裁。

△　入夏以来，绥远、浙江、四川、江苏、福建等省水灾严重。绥远境内连日阴雨，黄河水位突涨2—8尺，临河、包头等处沿河农田尽被淹没。四川重庆于23日大雨，城墙倒塌，死伤百余人。浙江东部连日大雨，海宁、玉环、嘉善、诸暨、新昌、临海、建德、黄岩、嵊县等20多县被灾，浙赣路被水冲毁。江苏镇江对岸汽车码头于28日夜被水冲塌，候车室被冲走。福建水灾最重，泉州的晋江和漳州的九龙江均暴涨，福州水位破历年最高纪录，20天内被灾六次。

7月

7月1日　　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十二周年纪念。按：国民政府于民国十四年（1925）7月1日在广州成立。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本日为中共诞生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周恩来作《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没有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而是承袭中国农民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受有欧战后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影响。号召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　何香凝发表《妇女与国民大会》，要求国民党“恢复孙先生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并要求此次国民大会选举，“实行男女平等”；指出“全国妇女起来，力争出席代表的妇女额数，是极其正当的”。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二十六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

△　宋子文自桂林飞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整理粤、桂金融经过。

△　山西省兵役研究会成立，阎锡山任会长，宣布实行征兵制度。

△　川、康各军将领欢迎何应钦、顾祝同入川主持整军事宜。

△　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已全部运至南京，计有古物馆箱件2631箱，图书馆箱件1415箱，文献馆箱件3766箱，前秘书处箱件1845箱又64包。点收工作，历时两年半，至此全部告竣。

△　厦门大学改为国立。7月6日，行政院通过决议，萨本栋任厦门大学校长。为纪念陈嘉庚创校功绩，特设立厦大咨询委员会，陈嘉庚、林文庆（原兼厦大校长）为终身当然委员。

△　东北大学全部迁陕西，计到教职员和学生200余人，仍由臧启芳任校长。

△　暑假西北考察团全体团员百余人，离北平赴西北，考察绥远、宁夏的农业、牧垦、水利、森林、土壤、矿产、地理、卫生、社会、民族10项科目，往返为期一月。

△　铁道部召开全国铁路局长谈话会，张嘉璈主持，讨论各路人事调整、统计集中、沪粤直通车之准备及京赣铁路等问题。

△　驻日大使许世英向外交部长王宠惠报告会晤日驻华大使川樾茂的经过。

△　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300余人，配备坦克车五辆、钢炮七尊、机枪七挺，在野牛城演习野战。

△　本年度第二批输日长芦盐10万吨，经财政部核准，由芦丰商

店与（日）兴中公司签订正式合同。盐价以每吨二元三角六分二厘计算。

7月2日　　立法院召开会议，决定延长《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实行期一年；通过《陆军兵役惩罚条例》、《违反兵役治罪条例》，并修正通过《保甲条例》、《国民工役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7月14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7月24日，财政部公布）等；规定私运银币、铜币或银类出口者，处死刑或七年以上徒刑。

△　国民政府公布《警察制服条例》，凡39条。

△　行政院及所属各部、会长官先后抵庐山，成立行政院庐山办事处，即日开始办公。

△　汪精卫、王宠惠、吴忠信等人赴庐山参加谈话会，并谒蒋介石。

△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在240名指定国大代表中，指定一部分女代表，并于各省、市中另增加女代表名额。

△　京赣铁路（亦称京贵铁路）开始铺轨。

△　国民政府决定实行麦粉限价，规定不得超过上月24日市价。

△　上海闸北九丰、源顺、金城等14家丝厂万余工人要求改良待遇，举行罢工。

△　上海杨树浦路中国肥皂公司制造厂工人300余人举行罢工，反对公司变更分红办法。该区捕房派大批中、西探捕驰往镇压，重伤工人四名，并将九名轻伤工人送到上海特一区法院“讯办”。

△　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在虹口一带举行演习。

△　日本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50余架由长春飞抵承德。

△　日本派遣大批汉奸在山西沿边和铁路沿线活动，拍摄娘子关、雁门关等地国防工事照片；阎锡山电令查禁。

△　日本在平、津、冀东收买大批汉奸组织伪服务团，潜赴豫、陕各地刺探我军政情况，并勾结匪类，企图扰乱地方治安。

7月3日　　国民政府训令执行《各县市政府办理兵役暂行办法草案》。

△　国大代表特种选举候选人，经国民政府指定名单已检发公布。

△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闭幕，请中央设法增补国大女代表竞选，确定妇运方针以复兴民族为中心。

△　川康整军委员会主委何应钦在南京说明川康整军方案后，即偕顾祝同至庐山谒蒋介石，请示入川整军事宜；贺国光在重庆欢迎川康整军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委员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相继抵渝。

△　苏北高邮、宝应两湖水位暴涨，运河以西已成泽国，淹没将熟稻田万亩。沿湖各县代表向导淮委员会呼吁救济。

△　云南省政府整饬边境各县官员。

△　上海纱布交易所风潮案移交法院审理。

△　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命其与“七君子”家属及律师商磋，并听取“七君子”意见，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

△　上海公共租界沟工、路工因换取新牌发生纠纷，路工被开除27人，特派代表向工部局请恢复工作，工务处将代表拘押。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由上海至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目

下情势，中日双方均不宜开始交涉。

△　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办理的中、小学校教职员奉命赴我国各地考察，从事各项调查工作，尤着重于对华北各地的调查。

7月4日　　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学员训练开始，孙连仲任团附兼第一总队总队长，黄绍竑任第二总队总队长，薛岳、吴奇伟、胡宗南、万耀煌、朱怀冰、刘茂恩、冯治安、李服膺、罗卓英九人分任大队长。

△　中国农民银行决定在兰州筹设分行。

△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自延安抵西安。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召开幕僚会议，对在中国境内设特务机关作详细规划，积极在河南、陕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设置特务机关。华北特务机关以天津为中心，由安达兴助少佐指挥；在北平、太原、天津、通县等地均设副机关长；上海、郑州、西安则有特务秘密组织，和知鹰二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

7月5日　　行政院各部、会在庐山联合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发表《教育救国》演讲。各部、会今起在庐山办公。

△　何应钦、顾祝同抵重庆出席川康整军会议并发表书面谈话称，川康整军全系为解除四川地方的困难，实在是帮助刘（湘）主席并完成建设四川的志愿，决无丝毫成见搀杂其间。

△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彭德怀、任弼时商谈红军改编问题。

△　财政部、实业部鉴于今年小麦歉收，价格飞涨，商定自即日起禁止小麦出口，至明年6月小麦登场再行解禁；并决定恢复征收杂粮出口税。

△　苏州信孚银行因周转不灵宣告停业。

△　河南安阳驻军破获一心道组织。大批汉奸利用此反动组织扰乱社会。

△　察北民军首领李庭芳攻张北，不克。

△　日军约2000余人在津浦路独流、静海一带演习。

△　日本访英实业考察团抵伦敦。团长门野重九郎对记者称："对华问题，日本和英国有充分合作的准备。日本承认英国在华利益。"

7月6日　　行政院在牯岭举行会议，决议：一、四川省建设厅长卢作孚辞职，派何北衡代理；二、江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龚学遂辞职，由该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代。

△　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何应钦主席，顾祝同、刘湘等300余人出席。何应钦称，会议主要目的在谋川康军之彻底国军化，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军队，一律由中央指挥调遣，以应国防的需要。

△　实业部公布《取缔市场投机办法》。

△　张元济致函《大公报》，主张由立法院严究上海纱布风潮操纵案；胡适亦致函该报响应。

△　上海中国银行等11家银行，在银行公会召集银行代表及国货厂商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国货贷款银团，以资金300万元办理押汇、承兑汇票及国货工厂贷款。

△　北平教育界罗隆基、梁实秋、张东荪等10余人，集议赴庐山参加谈话会意见，决定：一、尽量向蒋、汪二人贡献坦切意见；二、所贡意见，注重原则；三、请早施宪政。胡适、曾琦、潘光旦、张君劢等亦参与此项决议。

△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提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16条，内有准备抗日战争、加强人民抗日武装组织、实行国难教育、严厉镇压汉奸活动等。

△　截至是日，国民政府国债总额达45亿元。

△　截至是日，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为14.49亿元。

△　上海钱兑业一致拒兑伪满洲国钞票。

△　驻日大使许世英会见中国留学生代表。留日学生代表就受日本政府迫害事提出：一、中国驻日官吏切实保护留学生安全；二、希望转达日本政府，能给留日学生法律以内的自由。许世英决定日内至南京，向外交部妥商援助办法。

△　德驻伪满洲国商务代表诺尔与伪满当局谈判，德国以私人资本家名义向伪满提供12亿日元信用贷款，作为购买德国机械之用。

△　日本“九一八”前向哈尔滨移民3760余人，“九一八”后六年中增至四万人，平均每月增加500人。

△　第二十九军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要求第二一九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命令全体官兵“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营长金振中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要各连按何基沣旅长命令作好战斗准备，规定在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才准射击。

△　是日大雨滂沱，驻丰台日军不顾道路泥泞，在卢沟桥铁路桥东北龙王庙演习场地，以卢沟桥为攻击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日军至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我国驻军拒绝。中日双方交涉至晚间，日军退回丰台。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卢沟桥西北龙

王庙附近举行军事演习。10时40分，我宛平守军突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处响起枪声。少顷，数名日军来至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守城官兵拒绝。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县城，并开枪示威。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时值旅团长河边正三赴秦皇岛南大寺检阅步兵第二联队，不在北平）据清水节郎报告，即令丰台一木清直大队长带领第三大队前往卢沟桥指挥战斗。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话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称，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外交委员会报告后，当即答复称，“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丢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松井再次电话冀察外交委员会称，如中方不允许，日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日军亦以我拒绝其要求，遂对宛平城取包围态势。冀察当局为免事态扩大，于8日凌晨2时，派宛平县长王冷斋至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部与松井久太郎特务机关长交涉。此时失落的日兵业已归队，日方仍要求双方派员调查。4时，双方各派代表前往宛平城作实地调查。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内我守军从东门撤至西门，由日军占据东门再行调查，为我方所拒绝。正在谈判期间，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开炮轰击，我第二十九军吉星文第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开枪还击。抗日战争揭幕。

△　上海市面近日来发现伪满洲国纸币，严重紊乱金融。财政当局一、通饬各海关严禁伪满钞票入口；二、函沪市府严厉取缔代销伪满钞票的钱庄；三、令饬沪商会转知各同业公会，拒绝使用伪满钞票。

△　驻唐山日军沿北宁铁路演习争夺战。

△　上海特别市政府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按：民国十七年（1928）7月7日，国民政府设上海特别市。

△　周恩来与秦邦宪、林伯渠自西安飞抵上海。周恩来在沪期间，与潘汉年及中共上海地下负责人刘晓等面谈，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上海地下党工作，指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　中国儿童教育学会年会与中国教育学会在清华大学举行联合大会开幕式。儿童教育学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教育学会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

△　上海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电请蒋介石彻底查清纱布交易所风潮案。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赴青岛，旋转赴北平。

△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宴请孔祥熙。

7月8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卢沟桥事变爆发，电令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待援”；令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军事；令何应钦速由四川返南京组编部队；令孙连仲部两个师及庞炳勋部第三十八师开往石家庄、保定一带增援。

△　蒋介石指示宋哲元：一、不得签定任何条约；二、不得后退一步；三、准备牺牲。并称“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要求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

△　下午4时，日军华北驻屯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函约王冷斋与守军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出城会商，王冷斋等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下午6时5分，日军炮击宛平专署，金振中负伤。我军步兵两连，手持大刀、手枪突袭卢沟桥附近日军阵地，斩获甚众。

△　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秦、冯二人决心反攻，宋哲元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张自忠对反攻无意见。当晚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下反攻令，并发表声明称，“和平固所愿，

但日方如一再进攻，为自卫计，唯有与之周旋”。日方获悉后，即多方派人疏通，允无条件撤兵。秦、冯二人乃收回反攻令。至10日，日军未撤，冯治安等又下反攻令，日方派人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

△　冯治安、张自忠与秦德纯致电中央称：“刻下彼方要求我军须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可免事态扩大。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　秦德纯向记者宣称，今日向卢沟桥官兵发出命令，“卢沟桥可为尔等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

△　北平市区及四郊临时戒严司令部成立，冯治安任司令，宣布每晚8时起城门全闭，11时后全市断绝交通，禁止行人通行，并封锁至通州交通。

△　我军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相持。日军代表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等谈判。日方要求我军自卢沟桥方面撤退至永定河西岸，被我军拒绝。战事复起，日军向龙王庙附近等处进攻，占据龙王庙、铁路桥及丰台等地。晚，日军进攻宛平城，我军奋勇反击。

△　冯玉祥电第二十九军将士称：“诸君乃革命军人，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以保千万年之光荣历史也。予深信二十九军及华北民众，正准备为捍卫国家而继作更勇敢之奋斗，更伟大之牺牲也。”

△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联名致电蒋介石，恳请严令第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实

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并电宋哲元等，希望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和华北而战。

△　中共中央就卢沟桥事变指示北方局在华北工作方针："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和准备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

△　毛泽东电南汉宸，以红军及毛泽东的代表名义，与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具体办法。

△　外交部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称："此次事件之责任不在我方，显系日军挑衅，中日关系已至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日方应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之扩大。"

△　驻日大使馆就卢沟桥事件向日外务省口头抗议，要求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

△　上海市总工会电宋哲元称："严拒日无理要求，望令宛平驻军沉着应变，愿率全沪工友，誓为后盾。"

△　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罗莫夫，数度密商中苏共同预防外患问题。苏联向中国提议共同预防外患之步骤三点：一、以中国政府名义邀请太平洋各关系国开一国际会议，商订集体互助协定。苏联方面允许于接到邀请后，即正式通知愿意参加，如有第三国之一国赞成，即可进行；否则，二、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三、中苏订立互助协定。王宠惠将会谈要点呈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

△　孔祥熙在美国电蒋介石，报告已与美国政府协定以售银所得买进赤金，为发行法币准备。

△　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大会。会上，主任委

员何应钦宣布日军在卢沟桥挑衅经过，谓中日大战已不可避免。与会人员闻之愤慨异常，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当场请缨，愿率所部出川，参加抗战。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出版法》，凡七章54条，规定出版品不得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破坏公共秩序”。违者，发行人、编辑人、著作人及印刷人受刑事、拘役、罚金等处分。

△　穆藕初、杜月笙抵庐山晋见蒋介石，报告上海纱布交易所风潮案真相。蒋介石电令财政、实业两部：纱布交易所一律停止进行，听候司法解决，免涉干预司法之嫌。同日，与该案牵涉之税务署长吴启鼎及苏浙皖区统税局长盛昇颐，由财政部护送赴沪。

△　著名诗人陈衍（字石遗）在福州病逝。

△　下午6时，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电令日本华北驻屯军，“防止事件扩大，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华北日军在天津举行幕僚会议，决定“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日本关东军、日参谋本部第三课及陆军省军事课对此方针坚决反对。

△　凌晨，日华北驻屯军在天津海光寺举行会议。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及高级幕僚均出席，旅团长河边正三亦自北平至天津参加。会后，驻屯军军部命令日军确保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步兵旅团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下午，河边旅团长命令牟田口联队主力集结于永定河右岸，从明天拂晓开始攻击宛平城。华北驻屯军两次向日本陆军省报告战斗情况，并要求关东军提供弹药、燃料及铁路员工和铁路材料等援助。

△　午后，日本海军部电令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带队归航，准备应急。

△　日本关东军获悉卢沟桥事件消息后，司令官植田谦吉与参谋长东条英机等于是晨召开幕僚会议，决定立即准备出动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及第一一旅团主力推进至承德与古北口之间，一部集结于山海关，航空队主力集结于锦州、山海关，并报告日本参谋本部。下午7时10分，关东军发表声明称，“起因于第二十九军之挑衅，今已发生事端于华北，关东军当保持极大之关心与坚定决心，严重注视事件的发展”。

△　日本驻朝鲜军向参谋本部报告，“已以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要求“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当晚，日本陆相杉山元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原定应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延期二年复员。

△　晚，日本外相广田为卢沟桥事件训令日驻华使馆参赞日高，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令川樾大使返回南京，从事交涉。

7月9日　　蒋介石电宋哲元，“已派孙仿鲁（孙连仲）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及庞炳勋部与高桂滋部先向石家庄集中”，命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复电蒋介石称，决遵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

△　何应钦电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称，“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　外交部次长陈介约见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对卢沟桥事件再次提出抗议，并郑重声明，此次事件责任不在我方，日方所提保留意见未便接受。

△　外交部次长徐谟在庐山发表谈话称，日军此次在卢沟桥演习，原已超出《辛丑条约》之范围，外部曾向日方提出抗议，今复袭击我国军队，轰击我国城垣，此种责任当然由日方负责。

△　日本驻华大使馆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与秦德纯于凌晨2时达成口头停战协议，各自立即停止射击；双方军队撤回原防。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宛平防务，人数限300人。松井承认“失踪”士兵已归队。按照协议，中方自卢沟桥撤兵，宛平由北平保安队接防。但日军并未撤兵，并于傍晚炮轰宛平城。

△　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由武装机器脚踏车、坦克及兵车组成游行队，在吴淞路、北四川路等处示威。

△　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为日军进攻华北，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称：“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　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电宋哲元等称：“暴敌无厌，得寸进尺，卢沟桥之役，用心叵测，令人发指！诸公奋勇抗战，捍卫国土，全国感佩。……尚望坚持到底，勿中敌计，不作城下之盟，不答任何条约，全国国民愿为后盾。”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上海、太原、广西、西安中共负责人，请其根据中共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的对外阵容，以应付大事变。

△　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卢沟桥事件》称，此次事件“纯系日方放肆要挟，有意寻衅”。中国对日本，“退避当有限度，屈让应合界限”。“全国国民愿于中央、地方团结协力之下，根据国策，拥护赞助，惟力是视”。

△　平汉铁路工会致电宋哲元，表示：“凡我国民，同深愤慨，望本守土卫国之旨，鼓励士气，沉着应付，勿令再失寸土。本会誓率两万会员，以为后盾。”

△　平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与办事处，购置慰问品，赴前线慰问抗敌受伤将士。

△　卢沟桥日军挑衅行动，举世瞩目，各国政府先后电各该国驻华使馆，饬将事态发展情况随时详细报告。

△　外交部长王宠惠自庐山返南京。

△　庐山暑期训练团补行开学典礼，蒋介石出席训话。

△　川康整军会议闭幕，何应钦返南京。

△　日本内阁会议，陆相杉山元要求日本“国内派三个师团增援”，并请将此建议呈日本天皇裁示。

△　东京世界教育会议邀伪满洲国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

7月10日　外交部就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要求：一、日本方面须正式谢罪与处罚负责人员；二、对于死伤之军民及轰毁之建筑物，须赔偿损失；三、为防止再发生不祥事件，日本方面须提出今后保障；并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表示，日方不愿以中国外交部为对手，而愿就地商谈。

△　凌晨2时30分，卢沟桥日军复行进攻，包围宛平县城，拆毁平汉线丰台至北平路轨。

△　日军一中队下午2时推进至宛平西南崇王村，与我军接战。日军增至一大队及坦克四辆，山炮27门。宛平四周六里内均有日军布哨，占据军事要点，借作交涉要挟。

△　日军200余人在卢沟桥附近五里店迄未撤退，秦德纯、冯治

安、王冷斋与日方樱井在张允荣宅讨论达数小时，因日方坚持我军不得再驻宛平城，交涉因之停顿。

△　日军由辽宁开出兵车10列，两列车已抵山海关。关东军2000余人由锦州开抵山海关，驻车站待发。山海关、秦皇岛、南大寺一带华北驻屯军已奉令集结待命。天津日军于上午6时乘汽车数十辆开赴丰台，增援卢沟桥。关东军支持华北驻屯军扩大事态。

△　秦德纯密电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称："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结集待命。"

△　蒋介石密电宋哲元称："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复电宋哲元称："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　蒋介石密电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称，中、日双方据报已撤兵，"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

△　蒋介石电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冯安邦、池峰城两师，庞炳勋部一师一旅，刘戡第八十三师，速开保定、石家庄一带，以备应援；另令第二十一师李仙洲，第二十五师陈耀明继续开拔；又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向前推进，第十师李默庵部开拔，第十七师赵寿山，第八十四师高桂滋，第三军曾万钟等部队准备动员。

△　川康绥靖主任刘湘请缨抗战，通电全国一致抗日。

△　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电话通知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日高，告以"平郊日军违约扩大事态，日方应付一切责任"，并请其电告日本外务省及华北驻屯军，立即下令制止一切军事行动。

△　下午5时，日军又向我宛平驻军进攻，战事复起。

△　北平当局深夜召开重要会议，将日军违约挑衅经过情形，电中央及各省、市。

△　北平仍在严密戒备中。昨晚8时后，市上行人绝迹。今日各城门依然紧闭，防止不良分子潜入，普通民众身经检验后始准通行。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使冀察成为东北第二，如果日本此次阴谋得逞，中部和南方又将成为华北第二；要求中央政府除迅即动员全国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外，应给予国民以各种御侮活动的自由，并迅速完成国防上的准备，集中一切人才，以保障民族复兴大业之完成。

△　上海文化界人士洪深、郑振铎、胡愈之、诸青来、顾执中、萨空了等140余人集会，决议组织一救国团体，公推诸青来、王芸生、洪深等19人为筹备委员，并致电蒋介石、汪精卫、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石友三诸将领，请力保国土，努力民族复兴运动。

△　北平各大专院校派代表赴医院及战地，对抗战官兵进行慰问，并联合发起成立战地救护队。

△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向新闻界宣布川康整军各案均通过，结果极圆满。

△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推陈立夫等15人为主席团，成立分会23处，个人会员1.3267万人，团体会员285个单位，出版刊物有《文化建设月刊》及各项小丛书，并发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统一救国运动及文化界援绥运动。

△　日本参谋本部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元帅主持下，召开首脑会议。会议讨论结果，判定欧美各国及苏联不可能介入中日战争，即决定增兵华北，扩大对华战争。

7月11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日军不遵照双方约定停止军事行动办法，拒绝全部撤至指定地点，并连续向卢沟桥我军猛烈进攻，同时调集国内大军，络绎向平、津进发，意图作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贯彻其最初目的。至是，卢沟桥事件遂又趋于严重，其责任自应由日方负之。深盼日本立即制止军事行动，遵照前约，即日撤兵，并为避免将来冲突起见，切实制止非法之驻军与演习，庶使事态好转，收拾较易。

△　外交部次长陈介会见日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列举日本最近向平、津增兵事实，显与日本当局不愿事态扩大之声言完全相反，要求迅电日政府，制止日方军事行动，俾卢沟桥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并谓中国军队并无向日军挑衅之意，但对于任何外国任意增兵来华，侵略中国之领土主权，殊难容忍，自不得不作正当之防卫；深望日本当局翻然反省，勿陷中日国交于危险之状态。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会，会议主席为军政部长何应钦，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军政部次长曹浩森、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军政部军需署署长周骏彦、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总务厅厅长项雄霄、军务司司长王文宣、军械司代司长陈东生、行政院参事端木恺、军政部参事佘念慈、军政部科长罗泽阊、谭道平等出席会议。罗泽阊报告军事情报称，蒋介石命在熊斌与曹浩森二人中择一人赴北平，何应钦决定派熊斌前往。会议就已到的新兵器三七战车炮，限15日以前分发给指定部队；八八高射炮决定装于江阴，限星夜赶筑。俞大维报告弹药储存情况称，江北各地存储约6000万发，武昌4000万发，南京约1.25亿发；步机枪弹共有五亿发，步炮弹药50万发，三七战车炮弹约30万发，山炮炮弹与卜福式山炮炮弹约12万发，克式野炮炮弹约10万发。合计以20个师计算，可供作战三个月之用。周至柔报告，现在可使用于第一线飞机约200架，航空根据地拟设在太原。粮秣情状，现有50万人、10万匹马，粮秣可供应一个月

份，应再速购两个月份，并将一部粮秣推进至黄河北岸储存。燃料情形，现存汽油300万加仑，飞机汽油250万加仑。各部队国防位置，第十六师调至芜湖、宣城一带，并换发其枪支。陕西孙蔚如部可调一师，第五十七师应调回嘉兴原防，刘建绪部调一个师。有三个师随时可抵北平接国防防务。通信兵团调一营至新乡，一营徐州待命。防空兵器统属军政部。医院应调一部过黄河准备。

△　自是日起至本月31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遵照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指示，为准备动员抗战，召集各有关主管部门举行会报，使一切军事准备由平时进入战时状态，并详细拟定作战方略。战斗序列草案规定，全国军队悉数编入抗战序列，计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约80个师；使用于河北省约50个师，陆续向沧县、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限令第一线兵团于7月底以前到达预定位置；拟定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之编制，定于7月底秘密成立；并拟定弹药整理与准备，粮秣购备，防空器材及新兵器之分配，交通通信之整理与准备，兵站之设置，海军作战计划之拟定，南京与上海间江岸工事之设施，兵员补充及民众组织训练；呈准设立总动员委员会，办理全国动员事宜。

△　国民政府电北平市长秦德纯，对卢沟桥事变指示三点：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

△　立法院长孙科在上海对新闻记者称，卢沟桥事件有扩大可能，中央决不容再失寸土。

△　宋哲元由山东乐陵返天津。

△　北平各城门今仍紧闭，并在各要冲堆置障碍物，防汉奸与日本浪人蠢动。

△　秦德纯与松井达成停战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在卢沟桥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各抗日团体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 日军于凌晨向卢沟桥一带猛烈攻击，我国守军奋勇抵抗。上午11时，日军又向卢沟桥一带炮击，双方肉搏冲锋。当晚，日军复向卢沟桥、南苑等处我国守军猛攻。

△ 我国各文化团体宣布，拒绝参加8月4日在日本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并表示下届会议如再有伪满代表列席，我国永不参加。

△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至庐山。

△ 宪政协会在上海成立。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军事征用法》。

△ 下午4时，日天皇裁可首相近卫所呈增兵华北及对华北政策所需经费案。6时，日政府发表增兵华北声明，并改称卢沟桥事变为“北支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日本策定侵华计划，以重兵分三路进攻华北：第一路由关东军派遣军铃木、酒井两混战旅团，由热河向北平以北地区攻击；第二路由朝鲜派遣第二十师团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攻击；第三路以华北驻屯军河边混成旅团为基干，向北平以东地区攻击。三路日军对北平采分进合击态势；另由日本国内派遣四个师团，经朝鲜入山海关，与经海运前来部队会合，围攻天津、塘沽。海军省令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驶往上海警备，外务省令旅华日侨作撤退准备。

△ 日本首相近卫邀集政界、财政界、报界代表解释政府对华政策，阁员全体出席。会后，政、民两党以及贵族院、内阁各省、金融界、各报纸纷纷表示支持政府乘此机会出兵华北，根本解决中国问题。

△ 日本参谋本部策定《对支作战计划》，决定“以打击中国第二

十九军为目的，战事须局限于平、津地区”，“本乎局限方针，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以达膺惩第二十九军的目的”。

△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连续下令，派遣第二十师团，关东军所属独立混成第一与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集团之一部，以及铁道、电信、汽车、防疫部队之一部去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参谋本部和海军司令部之间，作出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协定，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

△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关于华北用兵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宣称通过“全面战争，求得对华问题的彻底解决”，要求日军速战速决。

△　日本各报闻天皇批准内阁出兵计划，立刻刊出报道：“日本决定出兵华北！”“四个师团将立即开拔！”

△　日本陆相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并限当日到达驻地天津。香月行前分别晋见陆相、参谋总长等接受指示。

△　由关外开来日本兵车10列，其中二列已由秦皇岛开丰台，三列已抵津，另五列也将到山海关转天津。大批日机也由关外调来，已有轰炸机12架飞抵天津。

△　晨4时许，日海军陆战队400余人自上海江湾路司令部出营，在越界筑路施高塔路一带演习。

△　日本外务省令在华日侨作撤退准备；日本各报号外满街，皆称中日危机一触即发。

△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恐台民响应抗日举动，提出强硬声明，不许台民轻举妄动，并发出战时警告。

△　日本首相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晋见日本天皇后，召集陆、海、外务、大藏四相紧急会议，议决："一、发动自卫权；二、向中外声明；三、支出必要经费，并期举国一致担任该事态之处理"等原则。

△　日本驻华海军第三舰队由台湾驶返上海，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在"出云"旗舰召开特别会议，决议分组三特务舰队，每队配炮舰一艘、轻巡洋舰或浅水舰二艘、运输舰一艘。上海方面由长谷川指挥，汉口方面由第一舰队司令谷木指挥，青岛方面由第十一舰队负责，厦门、汕头方面由第三舰队"夕张"舰负责。各队担任警备保侨责任，必要时得由特别舰队长指挥，并由特别陆战队协力警戒。

△　世界各国注视中国华北局势。是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玩火》的社论称，日本在华北向中国寻衅，这种"玩火"究为危险之举动，而在火药库附近，危险为尤甚。苏联《真理报》评论称，日本在卢沟桥之挑衅，在强迫华北当局接受日本之要求，俾以既成事实窘困南京政府，此显为近卫对华新政策之实现。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华北战事消息当然引起各国之忧虑。德国各报皆于显著地位登载华北战事消息。

7月12日　　蒋介石复电秦德纯等称："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方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唯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当使全体官兵明了，一致遵守。谈判之时，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北平城使其不能任意出入为要。"

△　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密电蒋介石、冯玉祥称："卢沟桥战事复经磋商解决办法，规定双方会同派员监视前方部队于现状下各撤原防，刻下正在进行。惟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信。宛平城及铁路桥仍为我军驻守。"

△　北平市长秦德纯电军委会称，日军在北平四郊活动，市民极

感不安，甚盼中央军北上。

△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密电秦德纯称：“此刻如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决无疑义，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

△　何应钦密电抵达天津的宋哲元称：“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宋哲元电阻中央军止于河北南境，谓“中央大军北上，必致激怒日人”。

△　宋哲元在天津召集第二十九军高级军官会议，向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指示机宜；声明其和平愿望称：“余向主张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

△　蒋介石电复阎锡山称，“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

△　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陆军武官大城户、海军武官中原，商讨北方时局。王外长提议，双方即时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军队撤回原地。日方拒不表态。

△　外交部发表声明，任何地方性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政府核准者，自属无效。外交部并呈请行政院，严防日方借口保侨向我滋扰。

△　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日军在卢沟桥挑衅事件真相，揭露日军以和谈为掩护，蓄意扩大战争阴谋；声明中国“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方式谋和平之解决”，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遵照前约，即日撤兵”，并“切实制止非法之驻军演习”。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遵照国民党当局意见，对西安红军代表叶剑英称：“据南京方面的绝密消息，南京拟将红军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使用于平绥线方面，与傅作义共同作

战，但不知红军能否听从调动？”叶剑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郑重表示：“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国人皆知；华北事件发生，共产党及红军即通电表示抗日救国。”叶剑英一面请侯成如将此意转致南京当局，一面报告中共中央。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由部长何应钦主持；出席会议人员何应钦、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铨叙厅厅长林蔚，以及曹浩森、熊斌、刘光、周至柔、周骏彦、俞大维、项雄霄、王文宣、王景禄、陈东生、佘念慈、端木恺、罗泽闿、谭道平等。会议决定派军政部部附赵巽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保定，交冯治安转送前方应用。熊斌先乘飞机至郑州，再换火车赴保定，派高参一人径赴天津，促宋哲元即日至保定与熊斌会面。熊斌任务为宣达中央意旨，即蒋介石所示“不挑战，必抗战”。如宋哲元因环境关系需忍耐以求和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日本）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如第二十九军需要子弹与军实，中央可以源源补充。部队的准备：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先令开汉待命；第一次使用于第一线部队，不可全用调整师，应将稍差部队夹用。各边区绥靖主任就目前情势，迅速具报可抽调部队若干。各省保安团队，演习维护后方交通勤务。津浦路北上开行列车应不露痕迹，将车辆逐渐南移。粤、桂、川部队，准备必要时抽调部队北上。其正在整编者，迅速整编。必要时发动绥东战事及察北伪军反正。必要时令第三者（按：指红军）出绥东，进入内蒙，以扰敌（日本）之侧背。

△ 国民党中央决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17日召开，第二期25日召开，第三期8月5日召开。谈话会不规定议题，侧重复兴民族和今后施政的具体方针。谈话会期间，蒋介石、汪精卫轮流出席。正式被邀请者，可以发表意见，进行讨论。被约作陪的国民党各级官员，分成若干组从事研究。谈话会不采取议决形式。必要时，蒋介石、汪精卫

将单独约见一部分正式被邀请者作个别谈话。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联合致电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称：“日寇此次进攻，志在整个华北，局部屈服，适增寇焰，不但贵军生命线不保，亦华北存亡之所系，务望继续抗战。……唯领土主权之完整，全国人民，决督促中央，共为后盾。”

△　卢沟桥事变发生次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吴开先访晤杜月笙，希杜氏出面重组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支援前线将士。9日，抗敌后援会于汇中饭店会议室举行筹备会，推潘公展、钱新之、杜月笙、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本日，举行成立大会，到各界代表数百人，选出委员120人，常务委员35人，由“一二八”抗敌后援会秘书长陶百川任秘书长。

△　国民政府训令驻美大使馆参赞转达美国政府，希望美国以关系国身份进行调处中日纠纷。此一建议遭美国国务卿赫尔拒绝。赫尔称：“对我们而言，非常明显，进行调处只有迁怒日本政府；而且给他们机会，告诉日本人民，指责西方列强正在设法干涉他们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

△　江西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致电蒋介石称：“请令守土将士，抗战到底，并请调大军增援。”

△　北平教育、银行、农、工、商、律师、妇女等成立各界联合会。同日，北平新闻界慰劳抗战守土将士会成立。

△　平、津交通今晨恢复。

△　天津中等学校学生成立劳军团进行募捐，慰劳守土抗战官兵。

△　交通、同济、复旦、重庆、大夏、云南、协和、中华等大

学，致电第二十九军抗敌将士，望“坚持到底，保我河山”。

△　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致电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和全体将士，望“本伟大牺牲之精神，拒敌到底”。

△　东北大学师生电慰第二十九军将士，并将节省所得百元，汇北平慰劳。

△　金陵大学致电第二十九军将士，望“再接再厉，驱日寇于冀察境外，歼彼丑类，还我河山”。

△　保定教育界发起募捐，慰劳第二十九军守土将士。

△　辽、吉、黑、热四省旅京同乡会慰劳抗日将士；南京回教青年会电慰第二十九军将士，愿誓为后盾。

△　杭州青年励志社组织募款，慰劳第二十九军，并电告全国青年，拥护奋勇抗敌之第二十九军将士。

△　绥远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及农、工、商、妇女等团体电慰宋哲元暨第二十九军将士称：“我首都民众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一息尚存，誓为诸将士后盾。”

△　日军不履行撤兵协议，复在原阵地布置工事，继续向北平增兵。凌晨，日军进犯财神庙，被我军击退。晚，日军又在宛平一带开展范围更大的进攻，我军与日军激战。日机飞长辛店、保定侦察；天津日军占领东沧。

△　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兵员约9045人，利用冀东伪组织由北宁路及长城各口运兵增援。

△　主张对华强硬派之香月清司至天津任职，午前下令华北驻屯

军要“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增加丰台、通县的兵力。关东军部队主力集结于密云，航空队集结于天津。香月清司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部署。

△ 日本海军军令部确定对华作战计划秘密方案，陆海军协同作战。第一阶段，海军除运送和护卫陆军在天津方面协助陆军外，准备全力对华作战。第二阶段，陆海军配合占领青岛、上海为作战基地，扫荡华中中国空军力量，封锁长江下游、浙江沿岸及其他日军兵力所在地附近。第二舰队担任华北作战，第三舰队担任华中、华南作战。海军军令部当日将此方案传达给各部队首席参谋。

△ 中美订立稳定货币协定。

△ 驻英大使馆发表公报称，华北局势严重，日本此种行为，乃欲化华北为满洲第二之预定计划；中国不愿事态扩大，但必要时决不惜任何代价，抗拒敌人侵略。

△ 英国外相艾登告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称，“英政府对远东和平仍为关怀，希望华北事件勿扩大”，并将此意告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另照会美国。

△ 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照会中、日两国驻美国大使，劝告双方停止冲突。

7月13日 蒋介石电宋哲元称：“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

△ 蒋介石以日本五相会议决议大举出兵华北，令整装待发之第二十六路军两师迅赴保定，第四十军赴石家庄，第八十四师赴大同集中，作为第二十九军之支援。

△ 蒋介石以时局日趋严重，令驻庐山各部、会长官及办公人员

即日返南京，处理要务。

△　北平市长秦德纯电第二十九军驻南京代表李世军称："日方退兵毫无诚意，事态必扩大，卢沟桥方面仍由我军驻守，日方所提无理要求均经拒绝，誓死未有只字承认，转陈中央释念。"秦德纯并对报界发表谈话称："此间军政、外交，宋（哲元）均秉中央命令应付一切。"

△　宋哲元以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名义，电谢上海各团体慰问电称："日军之宗旨在战斗，凡我官兵，慷慨赴义，分所当然。"各界闻悉此语，均甚感奋。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三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昨日第二次会报会人员外，出席人员增交通部长俞飞鹏与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会商事项：一、部队调动，第九十五师罗奇部已调至郑（州）、汴（开封）集结待命，将来拟调津浦南段守备。二、外交谋略，日武官大神户请见何应钦，先由次长代见，探其意向；如确有诚意，亦可与之谈判。三、情况通报，由军政部办公厅名义，每日汇集情报发表一次，重要者随时通报。

△　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杨云竹奉政府训令，向日外务省提出抗议，要求撤退卢沟桥一带日军，并立即停止派遣军队前往华北。

△　毛泽东电叶剑英，指示积极与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钦哉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拟先派4000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毛泽东在电报中并称，正在向蒋介石提出此项要求，红军大学增设抗日课程。

△　毛泽东出席延安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中共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 延安《新中华报》发表《卢沟桥事件》一文，“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积极准备出动。民族危亡已达最后的紧急关头，任何迟疑就会造成莫大的罪过，只有迅速抗战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途”。

△ 周恩来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

△ 周恩来与秦邦宪、林伯渠至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准备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第三次庐山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国民党代表为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的主要内容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与苏区改制等问题。

△ 湖南省民众纷纷致电第二十九军，声援并慰问守土将士。

△ 上海、天津间海运，因时局紧张暂停航运。

△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及工、农、商、妇女各团体致电宋哲元等，表示各民众团体誓为后盾。

△ 云南省指委会致电宋哲元，并汇滇币一万元，慰劳抗敌将士。

△ 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致电国民政府称，“和平绝望，请即出兵抗敌”。

△ 上海市大学联合会召开临时大会，决议各校教职员一律捐薪一元，慰劳抗敌将士。

△ 基督教联合会捐款1000元，慰问华北抗敌将士和被灾人民。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六年国家普通岁入岁出第一次追加预

算书。

△　刘湘召集绥署主要人员会议，说明整军会议经过及今后如何实施方案：川、康部队一律编为整编师，共130个团。计刘湘部60个团，编为11个师，七个独立旅；孙震部13个团，编为三个师；刘文辉部九个团，编为二个师与一个独立团；杨森部八个团，编为二个师；李家钰部七个团，编为二个师；邓锡侯部16个团，编为四个师。

△　经教育部核准，中央大学决增设航空工程学系，暑假后即正式招收新生。

△　日军400余名乘汽车65辆，配有坦克四辆及迫击炮五门，进犯北平永定门，意欲入城，我军奋勇抵抗，击退日军。另一部日军拟进攻南苑第二十九军军部，遭我军痛击后退去，日机数架袭击南苑区。约有2000名日军分三批由通县开往丰台，日机在平、津、保地区侦察。日海军第十三与第十六分队由台湾开赴华南厦门、汕头、福州等口岸。

△　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天津设统监部，香月清司任统监。

△　由山海关开抵平、津日军已达万人。由古北口开抵通县日军达2000余人。

△　自12日起至13日午止，日军兵车12列陆续到津，人数在3000人以上。日军飞机抵津计34架。

△　晚间，日本陆军首脑会议决定，将国内航空部队各机种共18个中队派往中国；经天皇批准后，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派往满洲，在承德与锦州附近、山海关与绥中之间及大连近郊周水子集中待命。

△　日本关东军发言人宣称，若再遇挑衅行动，日本准备采取最剧烈手段，关东军已作完全部署，以援助华北驻屯军。

△　日本海军舰队纷纷驶往华南，企图封锁我国沿海口岸。是日，日舰两艘驶至厦门，驶至汕头、福州各一艘。

△　日本空中运输会社原定自本年8月1日起实施东京—天津与东京—长春航运，因华北军运紧迫，提前于是日实行开航。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在青岛答记者称，“华北战事将扩大”，并称“卢沟桥事件是由中国军队挑起的”，“地方问题应由地方解决”，“日本将撤退在华侨民”。

△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要求作为谈判基础：一、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二、罢黜排日之要人；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关应从冀、察撤退；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应撤离冀、察；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六、取缔学校与军队中之排日教育；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　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300余人进行巷战演习。

△　驻法大使顾维钧拜访法外长，说明日本在华北挑衅，援引《盟约》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与《九国公约》第七条诉诸国联，以解决中日冲突，并电告外交部。同日，驻英大使郭泰祺拟请英国政府注意中日争端，谋解决中日冲突，并电告外交部。

△　孔祥熙在美接见美国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已被迫采取防御方案，掀起冲突之日军，应负此种后果之责任”，并称“日军所造成之华北异状，不仅为中日两国政府之烦恼问题，且亦为世界和平之危机，又不只损害两国之关系，且亦将破坏各关系国之利益”。“在敝国方面，如和平与敝国主权不相违背时，仍极愿与日本保持和平；但若惟有自卫始能保障敝国领土之完整时，吾人决自卫也”。

△　外交部电告驻法大使顾维钧，日本将于15日发动总攻，设法“争取各方协助或调停，盼能立即防止这一重大冲突”。

△　驻美大使王正廷访美国务卿赫尔称：“中国现仍力谋和平，如日本继续其侵略行为，则中国除自卫外，别无他策。”

△　王心源发明海绵蓄墨自来水笔，获专利五年。

7月14日　蒋介石电令何应钦：一、即抽调二公分高射炮六个连运往保定，以备分发各部阵地；二、速运子弹300万发交宋哲元领用；三、准备在石家庄设行营；四、即派员到石家庄设仓库与防空。军事委员会设置委员长石家庄行营，派徐永昌为主任。

△　宋哲元密电何应钦称：“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

△　中央政府以宋哲元不依令前往保定，仍滞留天津，致平、津形势愈形紧张，特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北上保定。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出席人员同第三次会报会。会商事项：一、曹浩森次长报告，保定无防空设备，希望中央军缓开保定。现天津日本飞机甚多，如中央军仓卒开到保定，恐被日机出其不意之轰炸。津浦路北端甚空虚，甚望中央军能由津浦路北上到沧州。二、何应钦报告，蒋介石有电到外交部，嘱发表申明书。外交界确实消息，11日晚，宋（哲元）已签字，承认日方条件。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三、关于战斗序列，设陆海空军大元帅，其下为各方面军总司令，再下为各集团军司令官，以下为军长。大元帅幕僚长仍称参谋总长。各预备军与集团军同等。空军以直属大元帅为原则，必要时可分属各方面军。四、关于封锁长江，撤除长江灯塔航标，江阴新炮台限期完成。五、关于谋

略与外交方针，徐永昌表示，现在我们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宋哲元）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参谋总长程潜表示，现在我们希望缓兵，以完成我方准备。所谓完成准备，即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之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但目下之准备与军队之动员，仍不可忽。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现在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宋明轩之妥协运动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以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　阎锡山派张荫梧去天津并致函宋哲元称："接受中央军的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挑拨。"

△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特电中央请缨，愿率部为国效命，出川抗战。

△　行政院在京各部长开谈话会讨论北方时局问题，决定自15日起恢复全日办公，遇必要时延长办公时间。

△　中日双方开始和平谈判。中方代表陈觉生、邓哲熙，日方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参谋和知、专田等，就日方七项要求进行谈判。

△　卢沟桥案交涉由北平移至天津，由宋哲元亲自处理；齐燮元赴天津，协助宋哲元进行和平谈判。天津市长张自忠自北平返天津。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专田盛寿又向宋哲元提出北平城内不得驻军、取缔排日宣传和运动、罢免排日要人、彻底镇压共产党等七项要求。

△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各省区商会联合会，迅速联合当地各界，组织全市或全县、全镇抗战将士后援会，劝告各界自由捐输，并转知各商店、工厂先捐一日营业额十分之二，汇往慰劳前方将士。

△　北平、南京、上海、汉口、昆明、开封、长沙、福州、安庆、芜湖等地各团体，纽约、檀香山华侨联合会等团体，致电国府或第二十九军，要求对日抵抗，以保国土，支持第二十九军抗战，并募捐慰劳前线抗敌将士。

△　北平、天津各大学教授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等称，“敌寇深入，华北垂危，民族危机，已到最后关头”，要求国民政府“迅即发动全力，抗敌图存”。

△　陕西省成立西安各界抗敌后援会。

△　财政部发表整理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通告。

△　孔祥熙离纽约赴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声明。

△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命令称：“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令到后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士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现状。”

△　毛泽东与朱德发布命令，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　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命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　毛泽东电张云逸，就广西、四川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

之方针指示称，“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诚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之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　周恩来在庐山会晤张冲。张冲称，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　毛泽东电王稼祥称：“8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　日本骑兵200余人向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军部进攻，为我国守军击退。日军在右安门、团河等处挑衅，继续由关外向平、津运兵及坦克、重炮和军用品。开入关内日军除驻丰台外，其余分驻天津海光寺兵营及东车站等处。

△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中国提出之日军撤离卢沟桥及停止派遣援军来华。日外务省发言人称，“日本不欢迎任何调解”。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自青岛至天津，晤香月清司。

△　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招待与中国事务有关之东洋协会、同仁会、日华学会、东亚同文会、日本实业协会、日本外交协会等团体代表，外务大臣广田以下阁僚均出席，由广田及内阁官房长官风见说明卢沟桥事变经过及政府方针。各团体代表表示愿对政府方针予以全力支持。

△　日军600余人自天津开抵廊坊、落垡，与我守军发生冲突。

△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在总督府召开部、局长紧急会议，决定设立情报委员会，会同军司令部，禁止台湾民众参加抗日活动，开始管制言论与出版物。

△　德外交部长牛赖特分别接见中国大使程天放与日本大使武者小路，表示德国政府“对于中日争端现守中立态度”。程天放向牛赖特说明卢沟桥事变真相，牛赖特表示将抱平允态度。

7月15日　　国民政府驳斥日陆军省为卢沟桥事件所发之谰言称：“日本陆军当局所谓国府假日军之手，以淘汰中央军直系以外之军队，尤为毫无根据，挑拨离间之词，不值识者一笑。”

△　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指斥日方违反事实之来文，意在力图免除其一切应负之责任；同时还提出日军强扣北宁铁路车辆运兵输械，“显系有意扩大事态，分割中国主权，兹特一并严重抗议”。

△　驻日大使馆杨竹云代办访日本外务省，希望川樾至南京谈判。

△　何应钦密电宋哲元称，日本重开谈判，实为等待增援完竣，然后发动，以驱第二十九军于河北省境外。“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我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切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次日，宋哲元复电何应钦称：“电示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

△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派戈定远抵南京，转赴庐山晋谒蒋介石，代宋哲元报告华北情况，并请示机宜。

△　秦德纯、冯治安电复第二十九军驻南京代表李世军称：“我方提出此后日方不得夜间演习。经商定后，双方即从事撤退。但迄今我

方已将部队撤退原地，而彼尚未撤退。天津方面先后开到兵车15列，今日由天津沿平津大道有日步、炮兵约2000余名西来，又平郊不时有其小部队出发，以上是最近情形。至京、沪所传种种，不足置信。”

△　齐燮元、张自忠、陈觉生、张允荣仍在天津与日军进行谈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晤宋哲元。

△　驻日大使许世英返任。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五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第四次会报出席人员外，有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宪兵司令谷正伦、航空学校教育长黄镇球与张治中。会议讨论防空计划，各地防空处及监视所，应速令成立；首都防空司令部秘密成立，谷正伦兼任防空司令；阎锡山同意在太原设航空根据地。

△　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兵役惩罚条例》，凡八条，《违反兵役法治罪条例》，凡11条。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凡八条。

△　立法院修正通过《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凡八条，修正要点：一、凡私运或私毁铜币出口者，分别情节，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科罚金；二、凡伪造币券者，分别情节，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科罚金。

△　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与全国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表示实现国共合作的诚

意，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向全国宣布：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　参加庐山谈话会之王云五、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劢、曾琦等32人，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秦德纯等称："报载公训将士'华北即吾军坟墓'，壮哉此言，闻者激奋。燕赵几千里河山，旧都七百年文物，平津四百万人民，共亡共存，千钧一发，夙钦大勇，宁建奇功，凡我同仁，愿为后盾。"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切实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每一抗战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对各界中的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

△　毛泽东致函阎锡山称："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

△　周恩来就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事，致函蒋介石称："此与来（周恩来）上次在庐（庐山）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　宋哲元电复全国各报馆、各界同胞、海外侨胞称，卢沟桥事件后，"各方盛意，虽甚殷感，而捐款概不敢受，倘将来国际大战发生，全国动员，牺牲巨大之时，再由国家统筹，同胞捐助，未为晚也"。

△　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称，希其"砥柱中流，力排浮

议，勿失寸土，勿求苟安，为民族求正气，为我公保令名”。

△　平、津各高等院校校长对外间谣传有所疑虑，特询问宋哲元；宋氏答称：“绝未与日方签订任何协定。”

△　暑假留南京各校学生通电全国称：“我们忍辱负重已经六年了，现在不能再失去寸土寸地，我们要做政府坚强后盾。”

△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出《紧急动员通告》，号召全体会员：“紧急的动员起来，为保卫平津、华北，驱逐日寇而流最后的一滴血！”又通电全国青年，呼吁“立即实现全国抗日青年的救国大联合”。

△　汉口市商会致电全国各省、市商会，表示“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愿“作弦高之犒劳，效卜式之输财，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

△　北平各大学教授李书华等赴天津谒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探询时局真相。宋哲元称：“和平谈判尚在进行，但绝不丧权辱国，本人不久即返北平。”

△　中、英商订无线电通话合同，每日通话展为三小时。

△　驻法大使顾维钧拜会法国外长，寻求解决中日冲突门径。法国外长答以希由英、法、美联合向中、日劝告，以援引《九国公约》与美国一致进行为宜；至于诉诸国联，法国外长以为不易见效。

△　驻苏大使蒋廷黻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探询苏联在中日冲突中所持态度。李维诺夫称，中国“对鲍格罗莫夫建议淡然处之，已铸成大错；使中、苏关系密切，则日本将有所顾忌”。

△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电世界教育会议会长孟禄博士称，以本届世界教育会议已允准伪满洲国代表参加，“我国决不参加

本届会议”。

△　英驻华大使许阁森抵南京，邀请日本临时代理大使（代办）日高，询问中日两军在华北冲突原因及其后情形，以探询日方意见，英国准备进行调停。同日，许阁森晤王宠惠，询问华北近况。

△　日本华北驻屯军制定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部的第三十七师，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根据情况对在南苑的第三十八师一并攻击之。在此期间，可由第二十师团作好准备，随时将第一三二师击溃。会战前，先以航空主力集中轰炸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南苑。第二期作战，预期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在增加兵力以后进入石家庄—德县一线，同中央军决战。

△　日军在平、津地区已逾二万，有飞机百架。天津东局子惠通机场，共停日机40架。

△　日军强占北宁路天津总站及东车站、车厂、货场，并构筑防御工事。

△　日本政府召集地方长官会议，首相、外相、藏相致训词，要求地方长官了解出兵华北之意义，“使帝国之立场贯彻于国民间，官民协力，努力收真正举国一致之实”。

△　日军部下令派遣七个野战高射炮队及大量通讯兵、运输兵、兵工、医疗等部队至华北，作为华北驻屯军直辖部队及兵站部队。

△　是日至17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形势判断》，制订《对华作战纲要》与《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扬言“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的中央政权。

△　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称，“鉴于华北情势严重，决定从日本内

地派遣一部分部队前往华北”。是日晚，日陆军省决定自日本国内派遣五个师团约10万人至华北，预定先占领永定河以东的平、津地区，然后推进到保定、任丘一线，最后与我军决战于石家庄、德州之间。

△　日本政府近扣留商轮31艘，装运大批军队、军火前来中国；已奉令开拔者有第五、六、十、十二、十六共五个师团，约10万人。其中除两个师团已指定开至平、津外，其余三个师团暂开朝鲜待命。

△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强迫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禁止台湾民众进行政治活动。

7月16日　　庐山谈话会于上午9时在牯岭图书馆举行，到会人员为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居正、戴传贤、冯玉祥、张群、曾仲鸣、丁燮林、王星拱、王云五、王立明、王世颖、方东美、方鹓先、尹任先、皮宗石、江恒源、朱庆澜、朱经农、杜重远、汪周典、何炳松、何鸿基、吴贻芳、吴经熊、李建勋、李剑农、李璜、李协、李文范、邵鹤亭、竺可桢、邱椿、林志钧、林维英、俞凤韶、茅祖权、胡适、胡建中、胡定安、胡次威、凌冰、浦薛凤、穆湘玥、徐诵明、徐永祚、徐恩曾、马洗繁、马君武、马寅初、刘秉麟、章之汶、陶希圣、齐国樑、梅贻琦、崔敬伯、崔唯吾、盛俊、梁士纯、陈之迈、曹惠群、黄国璋、高君珊、高秉坊、张寿镛、张伯苓、陈公博、周佛海、彭学沛、陈其采、邵力子、顾树森、顾毓琇、谭熙鸿、萧铮、萧纯锦、谢寿庸、裘开明、蒋方震、蒋梦麟、卫挺生、骆美奂、欧元怀、马朔鸾、龚学遂、刘大钧、刘振东、郑通和、范寿康、刘湛恩、廖世承、赵迺搏、赵棣华、赵正平、赵兰坪、杨公达、楼桐荪、程中行、陈布雷、梅思平、梁颖文、宋兆萃、李超英、张彝鼎、徐庆誉、高傅珠、李毓九、罗虎强、陈方、梁敬錞、郎醒石、吴炼才、吴颂皋、李唯果、刘健群、甘乃光、谢冠生、潘公展、刘瑞恒、吴尚鹰、陶履谦、钱昌照、周览、贾士毅、傅斯年、陆费伯鸿、秦汾、曾仰丰、曾琦、陈春圃、陈次溥、陈大齐、陈剑修、陈锦涛、陈长蘅、陈源、斐复恒、张西曼、张寿森、张肖梅、张纯明、张心一、张素民、

张奚若、张愿、张志让、陈立夫、段锡朋、邹琳、经亨颐、叶楚伧，共150余人。谈话会邀集人汪精卫、蒋介石同时莅临，汪精卫任主席并致词。张君劢、张志让、王云五、张寿镛、江恒源相继发言。会场严肃和协，与会者精神大为振奋。谈话会11时结束。

△　国民政府向美、英、法、意、比、荷、葡《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德两国政府发出备忘录，说明中日纠纷之情势，指出日本的侵略行为“实属破坏《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后果”，并表示“中国方面现仍准备谈判任何荣誉之协定，惟中国国民政府对于谈判解决之基本条件，不得不加以密切控制”，以防止日本分裂华北。

△　外交部以中日自17日起停止调动军队，中日卷入冲突的军队各回原防为条件，请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日本试探和平。日外务省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实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加以拒绝。

△　蒋介石电宋哲元、秦德纯称：“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谓毫无意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其严酷将恐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项。现日本外次崛内告我杨代办，‘已签订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今次事件决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蒋介石）愿独负责也。”

△　国民党中央电令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切实注意计划应付，拒敌无理要求，凡有损主权及任何领土者，拒绝承认，为保障领土完整，抵抗到底。

△　宋哲元在香月清司要求和谈条款最后期限下，派天津市长张自忠与桥本群商谈。宋哲元声称，这次在天津和日方交涉，是作为侧面折冲，正式商洽，尚无确期。

△　宋哲元电请中央政府准备待变，表示愿有限度接受日方所提道歉及撤兵要求。

△　何应钦前电宋哲元赴保定指挥，但宋氏仍滞留天津。是日，何应钦再电宋哲元称，日本已大举出兵，准备进攻北平，望勿为谈判所误，早作军事部署。

△　行政院召开会议，讨论对日作战是全部化还是局部化，以及绝交或宣战的手续与步骤等问题，确定17日在外交部会商其利害得失。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第六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除第五次会报会出席人员外，增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龚浩、第二厅厅长徐祖诒。会议决定电北平绥署及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告以日军动员及输送情形，第二十九军在平之危险态势，请速拟日军奇袭时之应付计划见复。会报会着重讨论战争全部化或局部化问题。陈调元称，按实际一经开战，则侨民下旗归国，未有所谓局部化。程潜表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唐生智表示，绝交，则长江腹地到处开炮，我甚不利；但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何应钦表示，如局部化，日军对第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敌如在青岛上陆，则我拒止之，又发生战争，惟此时是否仍仅限于北平与青岛，其他各处仍如九一八时官民照常往还，照常通商，或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何氏又谓如全部化，则绝交宣战，对敌之租界、兵舰、商船、居留民等，如何处理？现我须全部准备，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

△　顾祝同电蒋介石，报告川军刘湘、潘文华等表示出兵参战称："接刘甫澄（刘湘）来电及潘仲三（潘文华）至成都，共称'在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保（报）效领袖之时。'"

△　驻德大使程天放，将德国对卢沟桥事件的舆论反应电告外交部，称："德报对中日事件评论均尚持平，大都暗示日方在华北驻军太多，引起中国恶感。"

△　驻法大使顾维钧向哈瓦斯社记者发表长篇谈话称，"中国政府已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概不加承认"。

△　毛泽东、朱德就红军准备参战与改编电彭德怀、任弼时等，在国民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

△　何香凝为激励第二十九军抗战，特以书画笔润，定购大批手巾、扇子及救急药品，送二十九军驻沪办事处收转前方将士；并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

△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名通电，天津学生亦联名宣言，反对屈辱和平。宣言称：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二、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三、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　南京市地方自治研究会致电宋哲元等，称希望奋扬威命，为国宣勤。

△　北平各界联合会决定向各团体征集每日所得捐款，交中国、中国农民、交通三银行保管，并赶制慰问袋。

△　绥远各界抗敌后援会派员携款赴北平慰劳抗日将士。

△　河北省保定院校联合会致电宋哲元，请宋氏回北平主持工

作。保定育德学校学生组织慰劳队，购买大批食品及线袜等慰劳守土将士。

△ 粤汉铁路员工慰劳守土将士办事处成立，决定全路员工捐薪一日，慰劳前方将士，并电宋哲元慰勉。

△ 成都市妇女成立华北抗战后援会。

△ 新加坡华侨致电中央政府，请坚决抗日，海外华侨定为后援。

△ 教育部公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办法。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限宋哲元19日以前承诺日方要求（即本月11日协定）。

△ 日本陆军省训令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压迫宋哲元向日方道歉，撤换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要求彻底实行7月11日协定条款。

△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答外国记者关于华北事件质问，谓“日政府从内地派兵赴华，乃原定计划，昨今两天情势未见好，亦未见更坏；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谈判，仍在进行中”。

△ 上海日海军陆战队继续举行演习。

△ 日军在丰台强筑飞机场。

△ 日本驱逐舰“菊号”、“葵号”、“荻号”三艘，开抵大沽。

△ 日本华北驻屯军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天津病故。

△ 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称，“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

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的最要着”，力主日本海军在上海发动战争。

△　日本五相会议通过陆相杉山元提议，对华北事件的谈判以19日为履行最后期限，不容许迁延；若谈判不能圆满达到目的，即大举进攻中国。会议完毕后，日本政府即派陆军省中国班长柴山、参谋本部中国课永津于当日下午飞抵天津，向香月清司与川樾茂传达上述命令。

△　日本政府邀集金融界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巨头，文化界中央公论社、改造社、日本评论社、文艺春秋社，新闻界的各大报纸代表，以及交易所、卸卖组合进行多次谈话，各方面一致拥护政府的政策。各地方的官员，也邀集各地方的有力人士谈话，要求一致行动。

△　英、美两国分别对日本发出照会，劝告日本勿扩大华北纠纷。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并照会各国，申明美国主张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的国际局势态度。

△　法国、意大利使馆人员向我国外交部探询近日局势。

△　英驻华大使许阁森致函日本外务省，建议中日双方停止调动军队，寻求和平途径，但遭日方拒绝。

7月17日　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并称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一）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得受任何约束。”蒋介石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明了时局，效忠国家。”蒋介石郑重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　庐山谈话会继续讨论华北形势，发言者均表示对政府方针充分了解。

△　蒋介石密电宋哲元：“调商震部原驻黄河以北之四个团，开赴石家庄集中待命。”

△　蒋介石电告宋哲元等，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统归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指挥，并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驻保定联络。

△　何应钦密电宋哲元，日方正调大军到华北，与我谈判，在牵制我方，使我不作军事准备。“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

△　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一个师进驻琉璃河，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向石家庄集中。

△　外交部长王宠惠照会日本大使馆，驳斥日方强词夺理、歪曲事实的照会，表示愿意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或斡旋、调解、公断。

△　海军部长陈绍宽自柏林发出通电，表示“率海军人员回国枕戈待命”，并于次日返国。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七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出席会议人员与第六次会报会议相同，讨论有关中日谈判及卢沟桥事变之交涉事宜。何应钦报告，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见王宠惠，谓日方对卢沟桥事件不愿扩大，只要中国政府将外交权交与冀察自行交涉；而冀察当局能忠实履行11日晚签定之条约，即可和平解决；其目的在使冀察特殊化。日本大诚户武官到军政部，由曹浩森次长代见。大诚户提出书面意见，谓如中央派兵北上及飞机北上，则日本将有适当处置，因此引起之事端，应由中国负其责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诒报告，今日上午与外交部陈介次长等商讨开战后之绝交、宣战等手续及利害，所得结论如下：正式冲突后，外交部即发表一正式宣言，叙明日本对我压迫，我不能不自卫之理由；宣言稿已准备。关于断绝国交，如断绝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在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如“九一八”时之状态为宜。

△　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第四次庐山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允许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与委任官吏；但坚持在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之上不设总司令部或指挥部，三个师的经费、教育直属行营，参谋长由南京派员充任。对于中共中央提交的宣言，蒋介石表示待中日全面开战后再发表。周恩来等对蒋介石上述意见表示拒绝。双方均不让步，致谈判陷于僵局。

△　张闻天、毛泽东电叶剑英转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称，红

军改编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以资统率的军事指挥部。

△　毛泽东致函阎锡山称，“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请给予方便；并令彭雨峰（彭雪峰）速返太原。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工役法》，凡26条。

△　铁道部重新核定《铁路管理组织大纲》。

△　南京文化界代表100余人举行座谈会，决定成立南京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迅速派遣大军抗敌。

△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召集各界筹组河南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要求下令全国总动员，准备抗战；电请宋哲元立即回保定。

△　陕西省各机关、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进行募捐及宣传活动。

△　太原市各救亡团体及受军政训练之男女青年，组织志愿军及看护队，定18日赴前线参战服务。

△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电慰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

△　今井武夫访秦德纯，提出三项要求：一、撤销北平城内戒严设备，二、搜查失踪日人，三、停止第二十九军兵士在北宁路列车内之越轨行动。此要求遭秦德纯拒绝。

△　拂晓，日军三次向北平大教场我军挑衅，我国守军予以还击。日军活动区域已达北平西北郊，与其在东南活动之大部队相呼应，对北平隐成包围态势。

△　日本兵车18列由榆关开进天津。日本国内正陆续征集预备役

兵员入伍，听候派遣。

△　日军占据天津西站。

△　日军占据北宁路沿路各站、“满铁”路员强占北宁路沿路各站，辟办公室。

△　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向外交部递交照会，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和行动，不得阻碍现地两国继续进行解决事变的交涉”，并限19日答复。

△　日本大使馆武官大诚户代表日陆军省向军政部面致文书，责中国政府违反中、日华北各项协定，派兵北上；日军当采取认为适宜之处置，一切事态应由中国政府负责。

△　日本陆军省电令华北驻屯军，要求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部队；7月11日协定改由宋哲元签字。以上要求如中国方面不在19日履行，即停止现地交涉。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同意上述决定。

7月18日　午后，宋哲元参加日本华北驻屯军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葬礼，并偕张自忠、张允荣、陈觉生、陈中孚、邓哲熙等五人前往天津日租界明石街日军偕行社拜访香月清司；日方除香月清司外，另有桥本群、和知鹰二、大木、池田、塚田均在场。双方约定，谈判由中方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桥本、和知进行。下午2时，宋哲元等辞出。此为自香月清司到任后，宋哲元由乐陵返天津后双方首次晤谈。自经宋哲元与香月清司晤谈后，和平声浪转高，然此实为日方缓兵之计。

△　冯治安、秦德纯电南京，陈述日本军队继续增兵及布置情形，称“吾人固祈祷和平，但果至不能保持和平时，只有为自卫而备战。外传种种及挑拨离间之宣传，请勿置信”。

△　行政院各部、会长官上、下午俱在外交部长王宠惠官舍连续会谈，商讨应付时局办法，并与庐山最高当局通话联系。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变第八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程潜、唐生智、俞飞鹏三人未出席，余同出席第七次会报会人员。罗泽闿报告提出，目下最重要者，为部队迅速集中与配置妥当。

△　庐山暑训团第一期学员在海会寺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主持并讲演《建国运动》。

△　延安举行盛大援助平、津抗战将士民众大会，到会数千人。毛泽东出席大会，报告卢沟桥事件的经过及最近情况。大会通过致第二十九军将士电。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　周恩来拟就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经由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为：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所辖之18县，其疆界由行政院与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进行联络，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同日，周恩来离庐山赴上海。

△　朱德自延安出发，前往三原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　陇海铁路工会、南开大学学生会、广西教育会、广西省学生抗敌救国联合会、安徽记者公会、河北省保定院校馆联会、昆明市商会、江苏省合作社、甘肃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芝加哥华侨抗敌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分别发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速决大计，对于日军大举侵华，即派大军作自卫抗战。

△　河南各界机关、团体、学校纷纷致电前敌将士进行慰问，勉励宋哲元保卫疆土，努力抗敌。

△　宛平城外日军炮轰城内，并在北平至卢沟桥大道南北两侧构筑工事。天津日军源源开往丰台。日机六架在天津高空侦察。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师团全部向我国开拔，师团长川岸率先头部队到达天津。

△　日军在天津邮务管理局检查邮件；交通部获知后，即请外交部向日方抗议，并电令天津邮务管理局严加拒绝。

△　日本同盟社称，日本不能对宋哲元的形式道歉表示满足，此事的解决须待中国政府立即改变其抗日态度；否则，日军将采取断然手段。

△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确定，为解决事变的外交交涉，要遵循确保适应现状的既得利益，坚持《塘沽》、《何梅》、《秦土》三协定，建立华北特别防共地区的方针。

△　日机在河北顺德与河南安阳数次扫射平汉路列车，伤亡数十人。外交部即日向日本使馆提出严重书面抗议，指责日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蓄意挑衅。

△　日军在塘沽圈占盐滩修筑机场，并停机10余架。

△　日本在察北增集兵力，由热河调伪军一旅进入察北，并派30架飞机至多伦，意在援助匪伪，威胁晋、绥。

△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召集地方长官会议，阐明时局方针，防止台湾民众抗日活动。

△　日人在台湾苗栗、锦水一带所开油井，深达8418公尺，为当时世界钻探最深记录。在此发现大量石油。

△　浙赣铁路南昌至萍乡段全线完工，工程车已顺利通过；7月26日，全线即可通车。

7月19日　蒋介石告何应钦等，对日抗战之意已定，对共产党军队之处置及战斗序列，应早作安排。

△　外交部派遣科长董道宁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备忘录，指责日本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卫之适当准备，然仍努力于和平之维持。现愿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次提议两方约定确定之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

△　宋哲元电何应钦称："在天津与香月彼此会晤……彼此希望早日恢复本月8日以前状态。哲元决本中央之意旨处理一切，并请钧座千忍万忍。"

△　何应钦电秦德纯称："国危至此，实惟有举国一致，内外相维，有牺牲之准备，作折冲之后盾，然后可谋挽救。刻下全国意志，极为齐一，整个抗战计划，此间亦正积极统筹进行中；还望兄等本既定之方针，坚苦撑持，则最后胜利，当能属我也。"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九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程潜、唐生智均出席，其他出席会议人员同第八次会报会。程潜报告称，我意现即决意作战，但应掩蔽我之企图；故我对喜多诚一仍表示极端和平。现最可顾虑者为我军之质量与训练，尚不够现有武器之地位。何应钦作结论称，明日上午11时，在军委会长官会报研究具体办法后，请程潜与徐永昌赴牯岭谒蒋介石。

△　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朱家骅及全体理事胡适等，特电国联同志会总会称，日军夜袭宛平县城，派重兵包围北平，中国政府及人民

因绝对之必要，将一心誓作合法之抵御，贵会速将日本破坏世界和平之侵略事实，向本会各团体及世界舆论机关申告，希奋起为正义之声讨，并各促其政府与代表民意机关迅为实力有效之制裁，以维正义，藉保和平。

△ 陈立夫受蒋介石委托，协助外交部长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大使进行谈判。鲍大使表示正等候中国政府对苏联建议的回音，并称苏联政府尚无新的指示。陈立夫认为太平洋公约的意义在于回击日本的侵略，在这方面，中苏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是日本进攻的首要目标，而苏联则是第二目标，陈氏主张中苏马上开始谈判互助条约。鲍大使说明，苏联的政策不同于中国的考虑，认为日本不可能对苏联单独开战；只有当苏联在西方也将卷入战争时，日本才会制定进攻苏联的计划。陈立夫声明，应谅解苏联的政策，也理解鲍大使提议从太平洋公约开始谈判的方法符合苏联的利益。陈立夫正式向鲍大使说明，中国政府愿随时签署互助条约，并请鲍大使将此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陈立夫并传达蒋介石对苏联订购军火的建议。

△ 宋哲元由天津返抵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本人决本国家立场、人民立场及中央意志三原则，以期卢沟桥事件早日解决”；并下令打开封锁的城门，拆除市内防御设施；驻西苑的第三十七师南撤保定，改由第一三二师担任原防；又电请中央，令北上应援之孙连仲部停止前进。

△ 张自忠、张允荣与桥木群依据11日协定，代表第二十九军与日方签订解决华北冲突《细目协定》，内容为：一、排除妨害中日两国之人物；二、彻底弹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之机关、团体及各种排日运动与教育。

△ 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刑法》第二条、第一一六条至一二二条。

△　庐山谈话会举行分组谈话。上午举行政治组谈话，提出宪法草案为讨论主题，张君劢等10余人相继发言。下午举行经济组谈话，对统制经济、非常时期财政等俱曾议及。会议均由汪精卫主持。

△　驻日大使许世英抵日本神户，对记者发表谈话，申述我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两大方针为：一、不扩大事件；二、以外交交涉解决事件。

△　日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喜多诚一访军政部长何应钦，谓中日局势已到最后阶段，希望撤退军队，否则局势有扩大之虞。何应钦答称，目前紧张局势全系日方所造成，我方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而不在中国。

△　日《朝日新闻》称，19日夜协定细目如全部实行，则问题范围自可缩小，为中日计，可喜无过于此；所余者仅南京不承认协定及中央军北上。

△　日军占高丽营，并在该地构筑机场。

△　日军便衣队企图袭击清华大学，为我军击退。

△　华北日军已形成对平、津的包围态势。

△　日军劫持中国在塘沽码头设施，天津形势紧张，市民纷纷避入租界。

△　日本拒绝我国所提撤兵建议，通过“动员计划”，部署对中国武力攻击。

△　日本主力舰队与第二舰队集中于军港吴港，作战争准备。

△　晚10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表声明称，“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　南京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执委会，决定统一全市民众救国运动。

△　南京华侨抗敌后援会致电海外同胞，希“一致奋起，踊跃输财，作实力上之援助，以励士气，而救危亡”。

△　江苏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并电军事委员会，要求“调遣大军，北上抗敌”。

△　北平市妇女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共鸣社、女子文化月刊社、基督教女青年联合致电宋哲元，请其力抗强敌，二万万女同胞决劝夫训子，毁家纾难，誓为后盾。

△　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电国民政府，望“下最大决心作全力抗战，并严饬华北当局积极准备应战，不得接受任何屈辱条件”。

△　洛阳各界民众组织抗敌后援会，致电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将士表示慰劳。

△　清华大学成立守土将士慰劳团，并派代表由北平赴保定慰问伤兵。

△　上海日商中山钢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

△　国民政府颁令推进美术事业计划。

△　截至是日，我国政府陆续收到加拿大域多利中华民国抗日救国会、模里斯全体华侨救国委员会、贵阳商会率绸缎等业20余同业公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安庆各界抗敌后援会、纽约中华公所、河南教育学社年会、广东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檀香山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伊朗全体华侨、许昌县各法团暨全县50万民众、福建建瓯县兵役扩大宣传大会、全欧救国联合会、湖北沙市商会、广西文化界救国会、安徽当涂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河南清丰县

各界抗日守土后援会、中国童子军总会各方来电，请政府发动全力抗敌图存，并慰劳前方将士。

△　孔祥熙由美国抵伦敦，对卢沟桥事件发表谈话，谓“迄至此日，吾仍希望出以更大的忍耐，即可觅获友好解决办法，其他途径，实属危险”。

△　英外交次官克兰波声称，对中日争端，“英国政府诚挚希望可得和平解决。如果任何解决中需要英国政府帮助，英政府可以随时贡献其服务。英国政府准备与美国共同行动，现已与美国接洽”。

7月20日　蒋介石自庐山返抵南京。

△　宋哲元对报界发表书面谈话称：“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均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程潜、唐生智、俞飞鹏均出席，其余出席人员同第九次会报会。何应钦以蒋介石已返南京，指示先将飞机场、兵工厂、军委会三处高射炮进入待机阵地。刘光报告，欧亚中航机，自明日起停飞平、津两处；谭参谋宣读第二十九军7月16日正午发布之作战命令；张治中请任欧阳格为江防司令。

△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通电全国，拥护蒋介石17日谈话，“欣聆国策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并希全国一致奋起，共为政府后盾”。

△　周恩来、林伯渠在上海收到张闻天、毛泽东来电称，日军进

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来电要求周、林二人留在上海观察形势。

△　湖北省各界援助华北抗敌将士后援会发出通电，拥护蒋介石庐山谈话所称固守最低限度之立场，拥护此项主张贯彻到底。并称奉行征兵令，彻底肃清汉奸，统一意志，服从政府指挥，从事防护工作，维持社会秩序，为拥护此项主张之有效办法。

△　汉口市商会致电宋哲元，望“力排异议，坚决主持，能平则和，不平则抗，万不可委曲求全，被万世唾骂”。

△　庐山谈话会举行教育组谈话，汪精卫主持。陶希圣、胡适、傅斯年等先后发言，提出教育净化、国防教育、教育独立等问题。

△　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结束，第二、三期按原计划继续举行。

△　国民政府特派贺国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

△　国民政府设立国防参政会，会员75人，张群任秘书长。

△　铁道部代表在伦敦与中英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签订借款修筑广州至梅县铁路合约。

△　驻日大使许世英在东京晤日外相广田，说明我国政府坚持不扩大方针，盼日方从速实行撤兵。广田答称：“现只盼中国承认及实行《协定》，其余以后再说。”

△　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访王宠惠外长，谓北方问题向由冀察政委会接洽，此次何妨授权该会折冲。王外长答复，交涉须由中央办理。谈及撤兵问题，王外长郑重声明，须两方同时撤兵。日高询蒋介石17日演词真意，王外长答称，蒋氏演词实际乃外交部迭次对日方所明言者，其最可注意者，为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二语。日高称，惟恐日本政府尚未能认为满意。日高要求我

国政府承认华北的一切地方协定，停止中央军北上，为王外长所拒绝。

△　日本陆军省对我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对蒋介石公开发表的《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极为不满，一致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断然处置，以武力“膺惩”第二十九军，并由国内增派三个师团来华作战。

△　上午，日军突然开炮轰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

△　日军千余人，配合坦克40辆及满载军实的载重汽车队增援卢沟桥。下午，日军第二次开炮猛轰宛平城，并数度向卢沟桥冲锋；我军沉着应战，日军未得逞。我守宛平城团长吉星文不幸又负伤。是日，北平西郊、南郊均有战事发生。

△　香月清司下令日军完成对卢沟桥地带的攻击准备。

△　日本政府召开紧急阁议，首相近卫出席，陆相杉山报告华北情势；外相广田报告与许大使会见情形及外交交涉经过，主张采取适当行动断然处置。

△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现地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并威胁说：“当此时机，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决时局将全然无望。”

△　各国驻天津领事在比利时总领事馆开会，讨论租界内的防卫方法及日方擅行检查邮件事。

△　美国务卿赫尔分别接见中、日两国驻美大使。事后，美国务院称，当继续向中、日两国政府努力斡旋，以期维持和平。

7月中旬　蒋介石在南京策定：“将日本人从长江上赶走，没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战舰”，打一场非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战争。

7月21日　蒋介石会见英驻华大使许阁森，望英国调解卢沟桥事件。英国仅表示停止原计划进行的英日谈判。

△　宋哲元致电中央，报告中日双方约定前线军队撤退。我国在卢沟桥前方部队，下午撤退二里，地方治安由石友三保安队维持。日军限22日午前撤退。如我国军队撤退后，日军仍不撤退，则我国军队仍得自由行动，开回前防。北平城内治安调赵登禹师负责。

△　宋哲元电呈天津交涉经过及协定内容：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遗憾，处分责任者；二、中国不驻军卢沟桥城郊及龙王庙；三、彻底取消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一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程潜、俞飞鹏、谷正伦未出席，余均同第十次会报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出席此次会报会，研究战法时，熊式辉主张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移民移物，坚壁清野；避实击虚，昼伏夜动。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重申立刻开放党禁，实现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实行全国陆、海、空军总动员，采取攻势防御方针，大规模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立即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追认特派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修正中央民众训练部、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现任军用文职人员登记条例》，凡12条，《军用文职人员转任普通公务员条例》，凡21条，《军用技术人员任用暂行条例》，凡19条，《军法及监狱人员任用暂行条例》，凡

23条。

△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告朱德、毛泽东称，我们在庐山力争无效，遂来沪、宁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电文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1.5万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　第五路军总指挥李宗仁、副总指挥白崇禧及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联名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庐山谈话。

△　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关部、会负责人举行“实施总动员谈话会”。

△　冯玉祥对中央社记者谈话称，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偶然，乃日方假借其非法演习之名，完成其进攻准备。我国固望和平，但断不能容忍侵略事态之存续与扩大。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不畏不骄，忠诚勇敢，就各人之地位，贡献一切力量，在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来坚决奋斗。

△　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联名致电蒋介石，拥护蒋氏庐山谈话，略谓：“深信在此伟大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共赴空前之国难。”

△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20日公开发表后，湖北各界援助华北抗敌将士后援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商会、北平市学生团体、香港同胞等，纷纷致电蒋介石或发表谈话，表示拥护、赞同解决卢事变的四项原则。

△　北平学术教育界李书华、袁同礼、潘光旦等20余人致电蒋介石称：“日军破坏我国主权之行动，不一而足，请于坚持日方撤兵为

谈判先决条件外，立即作有力之制止，以维主权。”

△　北平各大学及高中二年级以上学生2000余人集中军事训练，是日解散。宋哲元、冯治安均前往训话。

△　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为日军袭击侵占目标，唐山交通大学已为日军强占，教育部特令各校校长及留校人员力持镇定。

△　许世英再访日外相广田。广田催促中国政府重行考虑对目前事变之态度，中止“干涉”地方协定签订。

△　日军控制北宁路，截断第二十九军联络，并截断我国由津浦路开赴的援军。日军在天津海河南岸修筑军用码头。

△　日军继续向平、津大举增兵，已有42列运兵车到天津，并不断由天津向丰台、杨村等地增兵，增派铁甲列车及装甲汽车。日机17架在北平上空及南苑、卢沟桥等地盘旋侦察。

△　日军又复违约，不履行撤兵，并炮击我后撤部队。我卢沟桥守军团长吉星文表示，宛平即其取义之地，决共存亡。

△　日军在塘沽设运输部。

△　日军山下第四十旅团由天津全部开赴丰台，共六个联队。

△　日军约有四个师团到达天津、丰台、通县一带；天津、丰台各站皆堆置日军军用品。

△　英外相艾登在下院称，华北目前局势若继续不变，英国政府即认为不宜和日本进行双方合作的谈话。

△　德驻美大使狄高甫与美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韦尔士讨论远东时局，表示愿与美采取不干涉政策。

△　是日至29日，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我国出席大会代表翁文灏（首席代表）、黄汲清、裴文中、朱森。翁文灏被推举为大会副主席，并任煤田地质组主席。此为我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地质学大会组织领导工作。

7月22日　　蒋介石电宋哲元称，“闻三十八师阵地又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北平城”。

△　宋哲元在北平先后会晤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及第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等。经熊斌等人详述蒋介石命宋哲元移驻保定用意后，宋氏始对中央政策完全了解，表示决遵照蒋介石命令行事，并中止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积极备战，下抗日守土的最后决断。

△　宋哲元密电何应钦，报告11日与日方达成的三条协议，谓“查该条件内容，均甚空洞，本拟早日电呈请示。因双方屡次冲突，故未即报告”。

△　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成立，何应钦任主任委员，筹划对粮食、资源、交通、金融、财政等实施统制，指定资源统制由资源委员会、实业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会同筹办，由资源委员会召集。资源委员会等七部、会决定成立财务、矿冶、燃料、机器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等八小组。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二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参加人员有陈调元、熊式辉及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其余人员同于第十一次会报会。刘光报告，鹰屋总顾问称，连日用英语广播，将此次中日冲突完全诿过于中国，使世界各国均深信责任在中国，而不在日本。此种国际宣传战，中国不可忽略。何应钦指定由徐祖贻与国民党中宣部洽商，每晚增加对国际广播，与日对抗。刘光报告军队调

动，蒋介石指示，第十师、第三十八师开石家庄转往武强、献县集中，第二十五师、第十七师开石家庄。

△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致电国民政府，表示“请缨之志，素怀杀敌之心，如有驱策，甘愿牺牲”。

△　国民政府令派郭泰祺为议定中国——爱沙尼亚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国民大会代表初选办竣，所有候选人亦经审核公告，国选总所于本月16日电令各省、市选举监督，一律于20日至22日举行复选。是日，多数省、市已复选完毕，月内将当选代表呈报南京。

△　上海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农会、市教育会、市妇女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第一特区市联会、第二特区市联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各大学联合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沪南区市联会15团体，发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是日开成立大会，通告全市动员抗敌救国，严厉制裁汉奸，征募抗敌救国捐，拥护蒋介石17日谈话；推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等121人为执委。

△　日军向华北秘密运送机械化部队，并运送大量部队秘密向华北集中。

△　青岛、张家口、重庆、广州等地日侨纷纷返国。

△　澳洲工党理事会作出决议：一、日本侵略中国，应严词诘责；二、对中国自卫行动深表同情；三、建议澳洲政府转请国联，依照《盟约》裁制侵略国。

7月23日　蒋介石召集军政首脑讨论本月11日冀察当局与日方所订协定。会后，即电复宋哲元称：“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

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　我国获得确切情报称，日军八个师团约16万人，已抵达平、津地区，或正在乘船驶华途中。

△　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三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张群、陈调元、熊式辉未出席外，出席人员均同于第十二次会报会。项雄霄报告，拟具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与人选。罗泽闿报告，韩复榘电告，截获日方关东军侵华五十计划。刘光提出军法处所拟《惩治汉奸条例》；中央应派大员赴石家庄主持工事构筑。

△　王宠惠鉴于华北外交形势严重，今晨召集徐谟、陈介两次长在官邸研究应付办法。

△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大会代表。

△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发动全面抗战八点办法，“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来贯彻7月17日蒋介石先生所宣布的抗日方针”；强调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　朱德在陕西三原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

△　宋哲元停止与日方谈判，开始作应战的必要准备，中止第三十七师的南调，命令石友三的保安队即行在西苑布防，并秘密调遣赵登禹部一个团进驻北平。

△　天津市长张自忠发表谈话称：“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民族，如属国家整个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仅系

地方事件，当唯冀察委员会委员长之命是从，予分属军人，兼管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向不后人。”

△　宋哲元接见外交部特派员杨开甲与孙丹林时表示，卢案和平已有七成希望，今后的交涉中心端在中日两国政府。

△　实业部长吴鼎昌发表谈话称，卢沟桥事变不影响粮食供应，目前中国粮食供给绝对不成问题。

△　刘湘在绥靖公署召集所属军、师长及绥署高级职员20余人训话，宣布实施整军具体办法，饬令各军、师迅即遵照整编，编余官佐，决照整军会决议案办理。

△　广东省政府在东江一带发现日机，饬令当地驻军严加防守，并通知各外国驻广州领事，凡外舰在三艘以上者，不得擅自进口。

△　何香凝等发起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发表告全国妇女书。

△　广西省永淳救国会、百色县救国会、苍梧学生救国会、广西大学附属高中、山东省泰安县民众援助卢沟桥抗敌将士后援会、浙江省景宁县各界援助抗敌将士联会、天津市各界联合会筹备会、湖南省平江县教育会等纷电国民政府，为日军侵入华北，请即动员抗战。广东省南海等数十县党、政、军、民等机关、团体纷纷电请中央，立即下动员令。北平学生团体电全国同胞，望举国同胞一致奋起，共为政府后盾，表示“危城青年，愿作前驱”。

△　行政院公布《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凡14条；《邮局自备运邮汽车通行各省市公路办法》，凡13条。

△　平汉铁路恢复通车。

△　日本拒绝遵约从前线撤军。日本继续由国内向中国华北增派

空军，大量运送军事物资。华北日军继续在宛平与卢沟桥方面增加兵力，积极修筑工事，并在北平城南继续扩大占据中国农民耕地，修筑飞机场。日机在北平上空作侦察飞行。

△　日本海军进泊大沽口。

△　日机飞临北平、保定、卢沟桥、郑州、开封等地，并侦察黄河铁桥。

△　日本在汕头组织华南特务总机关，厦门、香港、琼崖等处特务，皆归其指挥。日本浪人200余名，分赴汕头、南澳活动。

△　察北伪军在日方指使下积极准备犯绥，阎锡山令前方各部队严防。

△　美国务卿赫尔接见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与日本驻美大使斋藤，盼两国维持和平。

△　英外相艾登告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盼卢沟桥事件和平解决。

7月24日　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准备北平防务；并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说明日本的和平谈判为其再生事端之准备。

△　宋哲元以和平为不可能之事，召集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秦德纯、刘汝明、赵登禹等人会商对策，决定重新部署，准备作战。

△　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致何应钦快邮代电，表示守土有责，“在此未获圆满解决以前，星文等只有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荷枪实弹以待，誓与卢城共存亡，决不以寸土让人”。

△　孙连仲部抵保定方顺桥、望都；庞炳勋部在沧县集中；第三

十二军商震，第十师李默庵部抵石家庄。

△　外交部以大批日军开入河北境内，强占车站、码头，监视我各地电报局，强迫检查邮件，是日，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四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张群、陈调元未出席，其余出席人员同于第十三次会报会，增加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等。徐永昌报告，综合连日情报，可作两种相反之判断，即敌不愿事态扩大，或敌将大举进攻。究竟实情如何，颇难断定，已饬在日本内地的情报员就日本动员详为侦察。何应钦作会议结论称，军队集中照战斗序列，第一线兵团限本月底到达；兵站于本月底开始设置；铁道运输司令部，本月底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编制，迅速拟定，本月底秘密成立；海军部派一人在大本营任幕僚。熊式辉意见，须先决定采用持久战抑歼灭战；如采持久战，则空军不宜全部投入。凡我军退出一地，即将房屋建筑完全毁灭，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均逃荒转移于内地。何应钦发言，16岁以上均须编队，随军行动，通知兵役司注意研究。

△　新疆哈密警备司令尧伯抵南京，向蒋介石及军政要人报告新疆近况，并请示有关事宜。

△　驻德大使程天放电外交部称，德国对远东无政治企图，但有经济利益，希望东亚和平，保障国际贸易。

△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院理事。

△　北京大学全体教授为卢沟桥事件发表宣言，严正谴责日本侵略我国称："我们的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自所不惜"；"举国上下，惟有牺牲一切，抗战到底。"青年学生亦自动组织，协助第二十九军作抗敌准备工作。

△　新疆、广西、湖南、山东、江苏、江西、安徽、甘肃、河南、湖北等省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即出大兵抗敌，并誓为中央后盾。

△　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员检查天津各银行存款。

△　北平市当局恢复夜间各娱乐场所的营业。市内各处所有沙袋等防御物连夜撤除。

△　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称："日军是否继续撤退，须视华军之撤退是否有诚意。故日军此际再向后撤，尚非其时。日军撤至丰台后，是否即驻扎丰台，抑再调往他处，或回本国，全视中国方面能否履行一切条约而定。由关外增援之日军是否即行复员，或仍驻在关内，俟奉到陆军省命令而定。"

△　日军在大阪扣留商船17艘，以备运输军用品来华。

△　日军用飞机50架、重轰炸机一中队出发来华。

△　日军在卢沟桥车站检查平汉铁路客车。

△　今晚，上海日本领事馆称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水兵宫崎贞夫失踪。日本海军陆战队约300余名在江湾路、北四川路及青云路与八字桥一带布岗，断绝交通，检查行人，阻止我警探调查，并捕去我巡官、警长各一名。

△　江海关公布上半年全国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为6.0601496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47014721亿元；输出总额为4.8285925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0144782亿元；入超额为1.23155714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03.3061万元。

7月25日　　蒋介石电饬宋哲元注意日军调动称："据确报，日本自22日起，其机械化部队及大量汽车，皆极秘密向华北输送。预料一

星期内，必有大规模之行动，务望时刻防备，并积极部署，勿为所欺。”

△　蒋介石接见自北平归来的美驻华大使詹森，希望美国以《九国公约》发起国地位，出面阻止日本侵华行为。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五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钱昌照未到外，出席人员同第十四次会报会。徐永昌报告敌情判断，卢沟桥、丰台附近为第二十师团（川岸师团）之一部，约一个旅团及原驻平、津的牟田口联队。通州及北平，为河边旅团之主力，约两个联队（即原华北驻屯军，欠牟田口联队）。天津、杨村为第五师团一部，不及一旅团。以唐山为中心之平榆路，为第十师团之大部或一部。热河南部为第四师团之部及佐藤部队之一部，其另一部进入古北口，在密云、顺义、昌平等地。榆关、锦州间约有一个师团，番号不明。刘光报告，孙连仲来电，构筑沧保线工事，最少需五个师兵力，该部单独担任不可。何应钦报告，宋哲元电徐永昌与冯玉祥称，中央积极准备，似有把握，究竟此战如何打法，似系探询中央内情之意。何应钦又谓：“委座对于我军集中及作战处置，每日必有数次手令查询”，指示情报组每日将敌军之行动及位置，作战组将我军集中及到达位置，并对敌我情况作一判断，呈报“委座”。

△　熊斌离开北平，刘健群、戈定远仍留北平数日。

△　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由津抵平。

△　日军仍拒不撤兵。午前，日军铁甲车一列开到丰台。下午，通县日军步炮兵500余人举行演习，威胁我驻通县部队。晚7时，日军200余人由天津开到廊房车站，借口修理电线，占据车站，切断平、津交通。我守军奋起还击。双方遂起冲突，发生廊房事件。

△　日军便衣队及30余辆坦克车强占团河及西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尽行驱逐两校留校师生，并将师生衣物抢劫一空。

△　津、沽两地招商码头及各公司及铁路码头均为日军占据。大批日军集中塘沽，入晚宣布戒严，检查行人及船舶。每日并有日机在上空盘旋。

△　日本第一支运输船队在塘沽卸下军用品达10万吨。

△　因日军违约不撤，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仍驻防宛平城与卢沟桥一带。吉星文表示在日军未撤退前，决死守原防。

△　何香凝等率妇女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护蒋介石17日庐山谈话，“愿听从指挥，共赴国难”。

△　蒋介石允准撤销对郭沫若的通缉令。是日，流亡在日的郭沫若，化装乘“日本皇后号”头等舱回国；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知照行政院、司法院、军事委员会，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按：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1927年5月21日），经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请政府严令通缉郭沫若。

△　毛泽东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称：“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

△　北平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希望“坚持抗战国策，动员全国，一致御侮”。

△　庐山谈话会第二期开始，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召集。参加谈话会者为燕树棠、任启珊、洪深、刘彦、范琦、戴修瓒、王芸生、马荫良、胡庶华、张伟泉、王录勋、谷春帆、吴康、吴颂皋、林济青、周北峰、周炳琳、许仕廉、梁宇皋、黄元彬、张凌高、张知本、张其昀、陈布雷、程中行、彭学沛、经亨颐、杨立奎、邓植仪、萨孟武、郑亦同等32人。同日，第二期庐山暑期训练团正式开始，学员千余人。

△　中央航空委员会接收川康绥署飞机，移交事宜定下月内办

竣，职员以考试定去留。

△　内政部因华北局势紧张，故宫古物存留尚多，特派科长孙毅诚到平，与秦德纯及故宫博物院当局商议古物南迁事，未得圆满结果。内政部拟将存北平档案南运，亦未成事实。

△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晤王宠惠，谓日本不愿第三国干涉，德不能调解。

7月26日　　蒋介石电宋哲元称，此刻“应下决心如下：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二、宛平城内，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退；三、你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在北平片刻停留；四、决心大战，照中央昨电对沧保、沧石各线从速部署”。蒋介石再密电宋哲元称，“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也”。

△　蒋介石接见德大使陶德曼及法驻华大使那齐雅；两大使均认为日政府已为军人控制。

△　朱德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发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提出“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出席第十五次会报会人员外，俞飞鹏、钱大钧、周至柔、张发奎、钱昌照均出席此次会议。熊斌报告北行所得实情。首先述及事变中第二十九军将领之内情，计有7月8日及10日两次下反攻令及两次收回反攻令之经过。7月21日，宋哲元派张自忠、张允荣同日方签定三条之内容。熊斌次述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官兵态度，略谓：“宋到平后，表示和战均听命中央。如主战，则因二十九军尚未集结，须有相当时间之拖延，以便集结兵力，并请中央亦作相当准备，宋于23日

将和平三条件电呈委座后，曾两次询问委座复电，可知宋对和议不敢自由。”“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再抗战。且宋主张攻势作战，不主张守势作战，故对沧保线工事不主张构筑，主张四师兵力由天津冲山海关……。至河北，则主攻不守。”“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一）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二）因日本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二十九军将领一致主张（抗战），则张亦不敢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归依。”“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拼，士气大为可用。”熊斌末述日军情形及我军位置，谓日军入关者共已45列车，每列车最多者五六百人，少者一二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汽车、装甲汽车及其他军用品不少。现在统计平、津一带，共约（日军）1.5万人，重炮20余门，已到丰台。此次作战日军士气不旺，皆切望和平早日实现。（现在）第二十九军赵登禹师已调至平郊，一旅驻南苑。张自忠师在天津、廊房、马厂一带。冯治安师在西苑、卢沟桥一带。石友三保安队（有）×团，现石友三无意亲日。孙连仲部已到保定。徐祖诒判断敌情称，日军关内第一线不过两个师团，第二线不过三个师团，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在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日本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军政部参事佘念慈报告，我军除第二十九军在平、津外，现已集中在沧保线者五个师，已下命令正向德石线输送五个师。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作情况判断称，第二十九军与敌之混战已开始，可知敌有先击灭第二十九军之企图。现我军以德石线为主力集中地域，以沧保线为集中掩护线，距平、津过远，增援第二十九军不易。现在可采者有下列二方案：（甲）将沧保线部队推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而将主力之集中，推进于沧保线；（乙）我中央军仍在沧保及德石线上集中，而指导第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以保实力，免被各个击破。出席会议者均主张采用第一方案。

△　宋哲元密电何应钦称，廊坊“我军四面受敌，现已撤出阵地，天津交通已被切断，战事恐不可免。将来北平南可支持，天津方面兵力单薄，危险万分。拟请速饬庞（炳勋）军集结沧县，以作总援”。

△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令日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于下午3时半向宋哲元送交最后通牒：一、八宝山、卢沟桥附近第三十七师，须于27日中午前撤至长辛店；二、北平市内及西苑的第三十七师，须于28日中午前，经平汉线北面撤至永定河右岸，以后继续移住保定地区；三、如不按上述实行，即认为贵军无诚意，我军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

△　日本参谋本部令香月清司在华北行使武力权力。参谋本部同时下令将临时航空兵团编入华北驻屯军属下，受该军司令官领导，以便密切配合地面作战。

△　日本华北驻屯军于22时20分下达于7月27日正午开始攻击的命令，并规定各进攻部队的方向。因北平城内日侨未撤完，于27日4时30分发出变更命令。

△　日军3000余人自唐山、榆关等地开赴天津，当晚在天津日租界演习巷战。天津日军连日调动频繁，全市异常紧张。

△　日军中午占领廊坊，下午即由丰台派兵一中队分乘军车数十辆，冒充北平城内日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进入北平城内。日军行抵广安门时，为我守城部队独立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九团刘汝珍所阻。日军坚欲入城并作攻城状。宋哲元闻报后，即令刘团备战。刘团即启开城门，诱日军入城，及其进至一半时，刘团士兵开始射击。日军陷入混乱之中，损失甚重。此即所谓“广安门事件”。

△　廊坊、广安门事件相继发生后，蒋介石致电在美国伦敦的孔祥熙特使称，“倭寇今晨攻陷廊坊后，继续向南苑轰炸进攻。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又复电孔氏称，“倭之军权，全在前方少年军官

之手，其政府无力阻止，虽欲不战而不可得”。蒋介石认为，“廊坊、广安门之挑战，是倭必欲根据解决冀、察与宋哲元部也……遭（此）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 日机25、26两日飞洛阳侦察；是日复沿平汉线各地侦察。

△ 廊房陷落，我国守军退驻黄村。

△ 广州市举行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由各校通知离校学生限期返校，出发宣传抗日救国。各界工人也筹议捐薪一日，输财助军。妇女界则筹组救护队，北上担负救护工作。

△ 教育部编订汉、蒙、藏合璧国语课本八册，前四册已脱稿付印。

△ 中英无线电话通话合同正式签字。

7月27日 行政院长蒋介石分别接见德、意、法三国驻华大使，探询各该国对日本侵华态度与意见。德国大使陶德曼称，“德日防共协定实与现在中日形势无关”。意大使柯赉称，意大利“颇以第三者地位出任斡旋或调停”。法国大使那齐雅称，对中日形势，“法方异常关怀，早经联络英、美出任周旋，惟美方似不愿采取联合行动”。

△ 外交部为日军袭击廊坊发表重要声明称，中国极度容忍，维护和平，但日军继续派大量军队向平、津出动，进攻廊坊，复提出无理要求，蓄意扩大事态。我方已尽和平最大之努力，嗣后一切事态之责任自应完全由日方负之。

△ 蒋介石令第二十九军及北上支援部队积极部署应战，并电宋哲元固守北平。

△ 蒋介石派刘斐（刘为章）赴广西，敦促白崇禧至南京。

△　宋哲元于昨日接到日军最后通牒，得知日军已向通县、团河等地发动攻击，是日下午3时严拒日军通牒，并饬所部第二十九军准备应战；同时，报告中央请示机宜，并通电全国，表示对于日军进攻，我军为自卫守土计，当尽力防卫。宋哲元晚间与中央政府直接通话，表示已决心拒绝日人的最后通牒。

△　宋哲元下令设北平城防司令部，任张维藩为城防司令，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前线指挥官；同时，将第二十九军军部由南苑移至北平城内怀仁堂，派戈定远驰往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配合第二十九军作战。

△　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上，以解北平之围。蒋介石复电，要宋哲元“镇静谨守，稳打三日”，“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七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第十六次会报会出席人员外，张群、熊式辉、张发奎及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江苏绥靖主任于学忠等均出席会议。项雄霄报告，军委会委员长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限三日内具报。第一步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在城内或城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委员长手令，军政部所属兵工厂、仓库疏散。何应钦称，速派员乘飞机赴重庆接收火药厂，以便整理制造。兵工署制造司长杨继曾报告，汉口厂欲行迁移，非停工三年不可，则弹药制造停工，无法补充。兵工署长俞大维报告，现有弹药如节约使用，勉强可维持六至七个月。战争一开，我制造厂必被敌机炸毁，故现计划与比、法接洽，购买欧洲成品及包购比、法之子弹制造，每月约一二千万元，以后子弹可以源源接济。国际交通线，现取香港；如香港不通，只有由海防入口，经安南入广西之一路，请交通部协助。

△　第二期庐山谈话会举行第二次分组谈话，汪精卫主持，报告与讨论外交及华北情势。

△　周恩来抵达西安与蒋鼎文会谈。周恩来告蒋鼎文称，中共中央表示，红军“（一）8月15日编好，29日出动抗战。（二）三个师之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正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4.5万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中共令红军主力迅速集中于三原，进行改编，并决定设立总指挥部。“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周恩来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鼎文告周恩来称，蒋介石电催中共按照庐山所谈，红军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便南京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并提出以康泽任政治副主任。

△　国民政府任命俞鸿钧为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称，抱镇定沉着精神，应付一切事变。

△　国民政府公布《参谋本部陆海空军驻外武官条例》，凡13条。

△　财政部长孔祥熙对报界宣称，中国向英方借1000万镑之铁路借款谈判业已完竣。其中300万镑建筑广梅（广州至梅县）铁路，700万镑建筑浦信（浦口至信阳）铁路。

△　北平教育界、学术界人士李书华、李蒸等20余人致电蒋介石称：“近日敌机轰炸廊坊，又炮击广安门，并对我提出最后通牒，危机一发，万不能坐以待毙，务请发动全国兵力，即日明令应战，以保国家民族生存。”

△　国立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师大女院，私立中法大学、中国学院等五校学生，推代表13人携带意见书，赴北平市府见秦德纯，探询时局真相，并请示服务工作方针。

△　兰封、郑州、孝义、洛阳、阳武、开封等处上空均发现日机。

△　日军围攻我通县驻军傅鸿恩营，傅部冲出重围，撤抵南苑。下午，日军步、骑兵约400人，附坦克数辆，猛攻团河。另有日军400余名，在空军配合下，进攻小汤山之商镇。日机多架次屡在北平上空侦察，并在城外投弹数十枚。

△　上海失踪日本水兵宫崎贞雄，在靖江附近为中国船夫所救出。次日，中方将该水兵移交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该水兵签字招认，前在上海出入一未经驻沪日军司令部认可之妓馆时，为一日兵所见，遂畏罪潜逃。

△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污蔑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击廊坊和广安门之自卫行动，并声称要消除华军反抗的根源。

△　日本海军省与海军军令部达成《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要点》，正式提出“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战争，因此，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

△　日本参谋本部向华北驻屯军正式下达作战命令称，“华北驻屯军除现有任务外，应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安定平、津地区各重要地方”；并命令将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增派至华北，编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

△　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第七十一届特别议会演说称：“中国事件前途之发展如何，不能逆料，但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之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之目的。纵令中国计划作长期之抵抗，日本军部于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议会一致拥护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动。

△　日本侨民2356人自北平市内撤离。日军在城内仍驻有步兵三

个中队及两个机枪小队。

△　英国首相艾登劝告日本勿对中国用兵。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谈话称，关于华北局势，希望“中日两国政府态度趋于和缓，使纠纷成为地方化，以谋和平解决”。

7月28日　　晨，宋哲元下令全线总攻，我军一度收复丰台、廊坊。

△　晨，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电话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限第二十九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宋哲元对此严予拒绝。

△　蒋介石密电宋哲元：“孙（连仲）部应即前进勿延；庞（炳勋）部现尚未集中，依令在沧州待后方部队到后向前推进。先要固守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

△　下午，宋哲元与秦德纯、张自忠开紧急会议。为使北平文化古城免受战火摧残，宋哲元决定偕冯治安、秦德纯率部撤离北平，退守保定；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以此名义在北平维持治安，李文田为天津市长兼保安部队司令，并将第一三二师两个团改编为保安队。冯治安第三十七师撤退永定河南岸布防。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八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张群未到外，出席人员同于第十七次会议，增加俞飞鹏。徐祖贻报告，今日日本海军武官见参谋本部杨处长，询问杨处长赴保定是否策划作战事宜。杨氏答以到保定系赞助和平交涉，本人系海军出身，谈不到策划和战；到保定后，因和平之路不通，故返京。邵力子称，路透社记者问我，中国外交当局称，中国将对日绝交，不知确否？我当答以现在中国不致如此。但日本若强占平、津，中国将发动全部自卫战争时，或将考虑行之。熊式辉报告，徐永昌明日赴石家

庄，熊斌赴保定。

△　8时，日军第二十师团及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向驻守南苑的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发动进攻，我军英勇抗击，与日军激战。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时，牺牲殉国，我军伤亡2000余人，北苑、黄寺为日军占领。清河镇、沙河镇亦分别被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攻占。

△　北平城郊战事异常激烈，日军由古北口各处陆续增援，平郊我军兵力单薄。宋哲元电中央饬大军迅速向津浦线开动，并令平汉线部队推进以资策应。

△　晨，塘沽日军攻击我大沽口驻军，双方激战。

△　日本政府令长江沿岸日侨2.923万人于8月9日前撤至上海虹口地区。

△　庐山举行第二期第三次谈话会，到60余人，由汪精卫报告近年外交经过及目前国际对我之态度，旋由与会者发言，议论均集中于北方时局。

△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发表谈话，拥护蒋介石17日庐山谈话，表示“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务须无远无近，无老无幼，应以最大之决心，准备为国牺牲，以求延续我国家民族五千年之历史”。

△　毛泽东、张闻天就红军改编事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甲）请你们去云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萧（劲光）、刘（伯承）、张（浩）、徐（向前）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

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　周恩来与秦邦宪、林伯渠返抵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4.5万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　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就战时军需供给，建议“迅速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应军工急需”。资源委员会即派林继庸等三人至上海与厂家洽商，约请厂家代表至南京共商迁厂办法。

△　南京各界抗敌后援会勉前方守土将士，表示首都百万民众誓为后盾，并请中央施行全国总动员应战。

△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蔡元培等为理事，通过收复失地等案，并发表宣言。

△　美总统罗斯福召见国务卿赫尔，商讨中日两国冲突事件。同日，罗斯福召见副国务卿韦尔士，商讨在中日事件中美国的立场。

△　英外相艾登接见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及美驻英大使讨论中日问题。英国以北平形势紧张，特饬其驻日大使照会日本政府，反对在北平开战；美国仍反对各国联合行动。

7月29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政府应变方针，并宣布庐山谈话会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绝无可变更”，表示将“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

△　蒋介石对新闻界发表中英文谈话称，“平津之役，不过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开始”。“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

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　蒋介石饬令兴筑沧州、保定第一期防御工事，决定自满城往漕河至安新一段，由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负责构筑；安新、任丘、郑州（为任丘附近一镇，非河南郑州）、吕公堡一段，由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构筑；惟吕公堡至沧州一段尚无部队负责（因第二十九军各部现在永定河沿岸、长辛店西北一带，第三十八师在马厂、独流镇、杨柳青、天津一带，未能前来做工），此段除庞炳勋部外，尚须增加两个师兵力，始能兴筑。

△　汪精卫就“最后关头”发表演说，指出：“日本的侵略是无底止的，今日已至‘最后关头’，强调国人‘一齐的牺牲，不留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虽不能拦住敌人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　宋哲元与冯治安是晨由北平抵保定，就华北战局发表谈话，表示今后听从国家命令行事。

△　驻守卢沟桥、宛平、长辛店第二十九军撤往涿州、良乡一带布防。北平失守。

△　通州伪河北省特种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率部约二万人反正，歼日军200余人，俘汉奸殷汝耕。日军派空军和步兵进行攻击。反正部队撤往门头沟一带及西陵山区。途中，殷汝耕逃逸。

△　凌晨，第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队自南开大学、八里台、铁路局等地进攻海光寺、东局子及各车站日军，一度占领东、西车站。日军以50余架飞机及许多战车增援，双方激烈混战，后第二十九军当局

下令停战。我军逐渐退往马厂集结。天津失守。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九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程潜、于学忠、唐生智、陈调元、熊式辉、邵力子、俞飞鹏等人未出席外，余均同于第十八次会报会。何应钦令办理民食问题及沿江各重镇居民的疏散。军政部兵役司长朱为珍报告兵员补充问题，先成立30营。何应钦指示，现有失业黄埔学生800余人，可分派充任训练补充兵之干部。钱昌照报告，现在资源委员会已统计取得联系之技术人员，共四万余人，分为矿业、化学、土木、机械、电气五部分，皆愿为国服务。何应钦指示，兵工署、交通司、城塞组各就需要拟定延揽。

△ 第二期庐山谈话会举行第二次共同谈话后结束，到汪精卫、陈立夫、曾仲鸣、张群等，并以第二期谈话会名义电勉宋哲元。第三期谈话会决定延期举行。

△ 立法院长孙科对新声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日本所取策略为分化中国，逐步吞并。日本进行其各个击破之阴谋，吾人必须以全面抗战答复之。今日华北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全国人民固应信任政府，沉着应付，但必须使全国抗敌民气能充分发扬，庶国力充实牢固，争得最后之胜利。"

△ 宋子文由广州飞往桂林。

△ 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陈毅电大庾县长彭育英，提出有关谈判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

△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对华作战计划大纲》，规定日军作战方针为："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设法使该地区安定下来。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保定、独流镇之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并规定"以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大约四个师团为基干，击溃平、津地区之中国军队"。

△　日本海军武官本田由上海至南京，先后访晤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当面对曹、陈二人横加威胁称："日本第三舰队颇以平、津中日两军冲突事件为憾，现虽竭力设法防止该事件波及各地，然万一各地发生事故，以致当局无法收拾，则日本第三舰队只有采必要之手段，甚盼中国当局在华中、华南努力防止不祥事件之发生。"

△　孔祥熙在伦敦与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苏大使蒋廷黻举行会谈，听取各驻在国对卢沟桥事件之态度，交换对外交意见，并与驻美大使王正廷通电话，交换意见。

7月30日　蒋介石电令驻守平地泉的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及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迅速向张家口挺进，置有力部队于平绥线，以威胁日军侧背。

△　宋哲元由保定赴任丘，整编撤退部队。

△　宋哲元密电蒋介石、何应钦称，第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已委冯治安代理，请中央明令发表。

△　日军占领永定河右岸大灰厂、长辛店、卢沟桥等重要据点。

△　天津我军退守静海、唐官屯等地。日军占领天津。日军飞机、大炮继续轰击天津市区，并到处纵火；南开大学被焚烧为一片瓦砾。日军横施暴行持续三日之久，数十万中国难民无家可归。

△　外交部长王宠惠对美国发表广播演说，请注意远东危机将导源于中国之被侵略。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二十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出席人员同第十八次会报会，于学忠未出席。何应钦报告，委员长手谕各战区、各集团军编制及经费从速规定。参谋本部第一厅长龚浩称，编制已拟就。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报告，委员长手令，

军委会设总动员处，各部设动员科。前日决定设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不另设动员处。汤恩伯部已调张家口，平地泉空虚，是否将何柱国骑兵军开往接防，令朱（德）、毛（泽东）部队出动赴绥东。平汉路无负责指挥官，拟请派卫立煌前往。郭忏司令报告，为增强武汉兵力，请调第七十七师到汉。李宗仁复程潜长电，说明南宁通安南交通情形。同日晚，各军事长官商定之事项：一、对应付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计划；二、对扫荡汉口日租界计划（汉口日租界日本人共2000余人。汉口以上日侨集中汉口；九江以下日侨集中上海）；三、阻塞长江上下游各要塞及对日舰的扫荡计划；四、黄河铁桥被破坏后，渡河办法；五、大本营之秘密组织；六、南京防空统一办法之实施；七、各地日本居留民之处置；八、南宁——安南的道路、桂邕公路及湘黔公路与江西各公路、桥梁之加强。

△　周恩来与秦邦宪赴云阳，出席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　毛泽东、周恩来电朱德、彭德怀等前方红军高级将领，对红军东进抗日后留在后方的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军及陕甘宁地方部队驻防问题作出安排。

△　国民政府全部接收重庆南岸王家沱日本租界。

△　云南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昆明成立。

△　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约胡适等会谈；胡适认为对日外交路线不能断绝。

△　伪北平治安维持会成立，汉奸江朝宗任委员长，冷家骥、潘毓桂等八人为常务委员，社会、金融、交通、文化、公安各界代表35人为委员，日本宪兵队长赤藤、冀察军事顾问笠井等为顾问。

7月31日　　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勉励全军“驱逐日寇、复兴民族”。

△　外交部长发表声明，绝不承认日军在平、津所制造的一切傀儡组织。

△　第二十九军代军长冯治安自保定电呈蒋介石，报告华北军事部署；蒋介石电勉“再接再厉，期达雪耻报仇之目的”。

△　宋哲元以“平津陷落，咎无可逭，电请辞本兼各职，并予以应得处分”。中央致电慰留。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佟麟阁、赵登禹，追赠二人为陆军上将。

△　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后三个师的番号，同意中共所提之人数及编制。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二十一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出席人员同第十八次会报会，于学忠未出席。何应钦报告，韩复榘来电，主张抗战到底。刘光报告，徐永昌、熊斌等商定沧保线新部署。第三军与第二十三师开顺德（河北省）、彰德间防守既设阵地。刘茂恩部两师开顺德集结。

△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上海组成银行联合办事处，蒋介石兼理事会主席，宋子文为副主席。

△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保释出狱。

△　西安行营向中共代表叶剑英洽询关于八路军开赴前线的问题。叶剑英请示中共中央后答复如下：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唯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

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

△　周恩来接叶剑英自西安来电，得知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准备赴南京出席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国防会议的消息后，即与秦邦宪、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告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亦应派人参加此会议，争取中共公开合法地位。并建议由周恩来与叶剑英出席。

△　日机轰炸保定，并侦察平汉路黄河铁桥。

△　汉奸边守靖任伪天津市长，汉奸李景阳任伪天津市警察局代局长。

△　汕头日本领事馆中村领事寻衅，要求我国撤退汕头驻军。

△　日军萱岛部强占通县，反正之保安队击毙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

△　上海纱布交易所风潮案，地方法院对吴启鼎、盛昇颐予以不起诉处分。

是月　　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与安徽省政府、与河南有关单位达成协议，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

△　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不断向国内陈述意见，说明开辟侵华南战场，攻占上海、南京的重要性，要求秘密派兵上海，占领机场，对中国突然袭击。

8月

8月1日　　蒋介石令傅作义、汤恩伯、刘汝明部署平绥线防务。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兼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前敌总指挥，率部自绥远、山西增援察哈尔，固守南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

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担任察境守备。

△　蒋介石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纪念周发表讲演，称中国已至最后关头，勉励军人“尽忠卫国，效法古之忠烈”。

△　蒋介石宴请平、津教育与学术界领袖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说明我国对日抗战方针。

△　张发奎密电蒋介石、何应钦与参谋总长程潜称，日机飞川沙低空侦察。日侨在杭仅有二人，余均离去。日舰五艘在金山海面探照，旋向乍浦移动。平湖全公亭到日舰一艘，因在深夜移动，方向不明。该电并称“总（综）合三点，敌侨离杭，敌舰、敌机活动情形，似于杭州湾有所企图”。

△　宋美龄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励志社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宋美龄、李德全、吴贻芳等为执委。宋美龄在会上讲演，号召中国妇女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大团体，挽救国家的生命。

△　毛泽东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大会上讲演，指出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　周恩来接毛泽东转来张冲急电，称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与张闻天电复周恩来称：“拟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赴京。”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称，红军出动抗日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颁发，应由中共提出与之商定。

△　张闻天与毛泽东就红军抗日作战方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

林伯渠，认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原则：一、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二、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并指示以上述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抗战开始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都作了原则说明；强调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改变是必要的。

△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中共山西公开工委书记薄一波全力负责武装工作。

△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至南京，谒冯玉祥、蒋介石，报告省情并请示机宜。

△　日军一部午后进占良乡。我军第二十七师在琉璃河与日军对峙。宛平日军约5000人转向平绥线进犯。

△　由日本关东军第一师团一部组成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本多政材少将）到达天津，担任天津以南地区警备。

△　日机轰炸平绥线南口，飞保定、石家庄、郑州、洛阳等地侦察。

△　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出通电，要求全国各界一致奋起，积极从事抗敌后援工作。上海纸业公会、铅业公会、煤业公会等团体征募得巨款，作为支援抗敌经费；打铁业公会赶制大刀，送往前方。

△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致电国联文化工作人员委员会，抨击日军轰炸平、津，屠杀居民、焚毁南开大学等暴行。

△　汕头日本领事再次无理要求我国驻军自汕头撤退。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表示誓死守土，并饬所部严防。

△　日军在津浦线陷大沽，日机袭德州。津浦路客运止于沧州，平、沪通车止于济南。

△　日舰三艘开到海宁，海军陆战队登陆示威。

△　天津苏联领事馆遭日本浪人及白俄抢劫捣毁，苏大使向日代办日高提出抗议。

△　汉奸高凌霨等在天津国民饭店成立伪天津治安维持会；8月6日，宣布就职，香月清司派桥本监誓，并派山田、愿田等为该会顾问。

△　为纪念欧战爆发二十二周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方振武出席大会并演说，称中国有现代陆军200万，日本如进攻，将遭受到打击。

△　晨4时50分，南京发生地震，房屋轻微摇动；晚6时35分，震动甚巨。天津、开封、蚌埠、徐州等地同时地震。

8月2日　　国民党中央午后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对日绝交问题，对时局作出重要决定。

△　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讲话，谓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此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决与敌誓不两立。

△　蒋介石亲自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讨论苏联对华军事供货问题。蒋介石希望苏联再增加贷款数额，飞机数目增加至500架。14日，蒋介石派国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代表，向鲍大使递交关于军火供应协议草案，要求苏联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在协定签订一个月内，苏联向中国提供。同时，中国要求苏联派

遣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蒋介石即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与张冲以“苏联实业考察团”名义前往莫斯科接洽军援事宜。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总理纪念周作《对当前时局应有之认识》演讲，指出目前时局已到最后关头，希望国人信赖政府，保持镇定。

△　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乘机飞南京。

△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二十三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出席人员与第二十二次会报会同。会商事项：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由教育部拟定；通知中央社及新闻检查所，以后旅长以上军事长官行动及所属部队番号与行动，均不得在报端发表。

△　蒋鼎文将蒋介石邀周恩来“约同朱、毛诸先生即来京面商大计”电，转交中共中央。

△　周恩来电复张冲称，如开国防会议，即与朱德、叶剑英同往；如系谈话，则与秦邦宪、林伯渠、叶剑英同往。

△　日军在平汉线对保定第二十九军攻击，并派飞机掩护。

△　日机多次飞南口轰炸。琉璃河铁桥被日机炸毁，高碑店、涿州均遭轰炸。日机袭山东平原，飞滦口侦察。

△　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修正取缔棉花搀水搀杂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凡19条。

△　宝成铁路（宝鸡至成都）工程已测量完竣，工程局移设宝鸡，开始征收路基，准备开工。

△　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在河北造币厂开始办公，并发布“安民”布

告。

△　法外长台尔博斯接见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讨论远东时局问题。

8月3日　　蒋介石再电周恩来，要求红军立即向绥德、榆林、延安等地集中，以便出发抗日。

△　张闻天、毛泽东电周恩来、秦邦宪并转叶剑英称："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　毛泽东收到朱德、周恩来草拟之中共准备向国防会议提出议案，国防会议组织机构、重新确定战时编制等共19条。

△　周恩来与秦邦宪就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地区的统战工作问题，电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要求派人至北平、天津组织情报机关。

△　宋哲元通电全国，概述第二十九军天津作战经过，谓"平、津失守，为哲元之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刻下二十九军军事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

△　我援军刘戡、曾万钟、关麟徵、万福麟等部约八个师，陆续到达石家庄、保定、沧县。

△　行政院举行第三二三次例会，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报告南京及沿江重镇防务。

△　外交部邀集财政、外交、教育等部及参谋本部、侨务委员会代表开会，决定由外交部即日向驻日大使馆转令散居各地华侨集中横滨、神户、长崎等海岸，由交通部派轮前往载运回国；并分函各部、

会保护旅日华侨及慎重处理日侨遗留财产事项。

△　广东省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至南京谒蒋介石，请示抗战机宜。

△　张自忠乘太古洋行汽车离开北平。

△　日军沿津浦线占领杨柳青，在独流、静海、马厂一带与我军发生激战。

△　日军由北平及古北口开往南口达4000余人；日机飞临南口上空投弹。南口形势紧张。

△　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紧急加税案，全部收入约计可得1.02亿日元，悉充侵华军费。

△　江西、江苏、浙江、湖北、河南、福建六省省银行，在庐山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一、设立各省物产联合运销总处于镇江；二、组织省银行联合会，由江苏省农民银行主持筹备；三、共同捐款一万元贡献国家；四、协助政府储运日用必需品，以利抗战；五、人民贡献国家捐款，一律免费汇寄。

△　湖北高等法院将刘芦隐等行刺杨永泰案全部卷宗，即日移送最高法院审核。

△　沈钧儒等七人出狱后由上海抵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后仍本救国初衷，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不惜牺牲一切，从事救国工作。"

△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迎接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社论，称"中华民族最后解放在此一举"。

△　苏联政府为驻天津领事馆被搜劫事，向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

提出抗议。

△　台风袭南京，风力达八级以上。

8月4日　　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发表广播演说，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开会，通过非常时期党员信约，包括“严格遵守非常时期及平时一切国法党纲”等七条。

△　国民党中政会对时局交换重要意见，通过：一、防空法原则八项；二、追认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代表；三、特派谢冠生为司法行政部部长等议案。

△　白崇禧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进行长时间谈话。白氏表示赞同中央抗战决心。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邀请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至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　周恩来接张冲回电，称系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至南京参加会议。

△　周恩来、朱德、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与《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认为抗日战争的方针是，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布置；中共争取参加和领导；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5日，周恩来等收到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开拔主力。

△　毛泽东与张闻天讨论对国防问题意见后，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与蒋介石谈判时，提出中共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总

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击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卫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　第二十九军代表秦德纯、石敬亭至南京报告平津战役经过称：“我军以防线太长，集中未毕，增援部队以运输关系，一时未能赶到，致南苑被敌击破。”

△　孔祥熙与英国签订广梅铁路贷款300万镑、浦信铁路贷款400万镑款合同，并于是日离英赴美。

△　上海妇女团体组成上海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由何香凝等主持。

△　日军要求在青岛登陆被拒。青岛当局表示誓与青岛共存亡。日机轰炸平绥线下花园车站。

△　察北伪军近日复形活跃，在商都及南壕堑一带赶筑防御工事，并增运军需品。我军调部队开赴绥远戒备，以防不测。

8月5日　　军事委员会召开国防会议，出席者为各重要军事将领、各省军政长官、中共代表等，讨论制定抗战方针为：日军“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方针为持久消耗战略”。会议决定在华北方面防御，以保定——沧州一线为主要防御；以彰德——济南一线为第二线；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一线为第三线；在全局上避免大兵团作战，始终采取消耗作战，以期使各部门继续充实战备。

△　蒋介石发表《告空军将士书》，勉以及时奋发，完成任务。

△　孔祥熙在巴黎向报界发表谈话称：“中国为保全主权及自主起见，已决定以武力抵抗武力。苟远东发生较大之冲突，日本自必负侵略者之责。”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陆海空军留学条例》第二条与《农本局组织规程》。

△　汤恩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抵达居庸关、南口一线布防。

△　军事委员会决议，命后方勤务部赶筑华北有关军事紧急公路3600余公里。

△　顾祝同电令川康各军、师长在8月15日期限以前整编完竣。

△　毛泽东电复彭德怀、任弼时称，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　朱德、周恩来在云阳收到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参战问题的复电称，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只宜于侧面作战，不宜于作正面战。又电称，“我们以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

△　中共抗日军政大学全体学员提前举行毕业典礼，学员多被分至军队中领导抗日工作。

△　日机沿平绥线轰炸，破坏交通，并沿平汉线、津浦线飞行侦察。日机30架轰炸张家口车站。

△　津浦路改在济南与浦口之间行驶。

△　日本陆军省公布，自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日起，至8月4日止，华北日军共死亡364人，伤869人。

△　日本参谋本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企图“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

△　重庆、武汉、长沙等地日侨120余人，由汉口乘“洛阳丸”至上海。

△　广州民船船工一致拒绝为日轮卸货。

8月6日　　军事委员会令：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汉铁路北段作战；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淞沪战场作战；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途反攻天津；蒋介石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　午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访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对各军、政当局商定之应付时局方针，复作详尽研讨。

△　胡适劝说蒋介石，在大战以前，对日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　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由重庆飞抵南京，谒蒋介石报告川康整军进行现状。

△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由汉口抵南京。

△　国民党中央连日迭有重要会商，对目前整个时局策划已有具体决定；各省政府主席将齐集南京，接受传达抗日方针。

△　张自忠离开北平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废止委员制度，以常务委员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等五人负责处理一切事务。

△　冯玉祥发表《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讲演，主张“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坚强持久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　周恩来、朱德自云阳急赴西安，与在该地的叶剑英同赴南

京，代表中共参加国防会议。

△　日军向平绥铁路沿线集中，企图西犯南口，进窥察哈尔省。

△　廊坊日军续向永定河岸推进，并搜捕沿岸民众赶筑工事。

△　驻汉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登岸，在日租界堆置沙袋，装设铁丝网，作战斗准备，并宣布戒严，致汉口局势突然紧张。同日，汉口日侨及海军陆战队突奉日本政府训令一律撤退。7日，国民政府接收汉口日租界，汉口日军及侨民完全撤退。

△　日军拟接收天津海关，并派员监视电报局。该两机关均在法租界，日军派人前往接洽，因领事团不允，不得要领而去。

△　华北日军总计已达4.5万人。次日，日军再增兵三个师团至天津等地。

△　日本外相广田在国会宣称："华北时局，难以找到圆满解决的一线希望。日军现在正前进中，以期成就华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如果中国参加德日反共协定，而使赤化主义绝迹于东方，则东亚和平方可确定。"

△　中国教育学会等团体电世界教育会议会长孟禄及全体会员，请主持正义，制裁日军暴行。

△　北平、天津各国立大学及学院在南京成贤街设立平、津国立院校通讯处。

△　上海市总工会组织战时服务团，开始登记。

8月7日　　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商讨抗战大计。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成濬、顾祝同、何键、张治中、黄绍竑等。蒋介石在开幕辞中，报告

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军事形势、国共两党在庐山谈判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经过及处置情况。各有关方面报告空军建设、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

△ 晚，国防联席会议开会，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蒋介石致词称，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参谋总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国防会议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情况，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报告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最后，蒋介石阐述抗战的意义和决心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与会者经过讨论，一致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决定未宣战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各军事将领热烈讨论抗战的战略问题。冯玉祥力主抗战，白崇禧建议设立大本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 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发表谈话称："现在局势虽极度紧张，然中日外交当局，在两国国交依然存续之际，本可随时商谈。唯两国关系刻已至最险恶时期，和战之分，瞬息间事，倘彼方果以最大之决心与努力，挽回危局，尚未为晚。否则，和平前途殊难见有曙光。"

△ 川康绥靖主任刘湘由成都飞抵南京。

△ 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总参议萧振瀛今晚入京，谒蒋介石后赴保定会晤宋哲元。

△ 第五路军副总指挥白崇禧视察南京空防。

△ 救国会七领袖沈钧儒等在南京谒蒋介石，会商抗敌救国大计。

△ 沈钧儒等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拥护蒋介石的庐山谈

话；关于民众工作，“应该统一领导，应该格外具体，格外沉着”，“但必须在全国动员之下，在积极行动当中，表现其统一，表现其具体，表现其沉着”。

△　汤恩伯第十三军于是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并进入阵地。

△　张庆余率反正保安队二万集中怀来。

△　青岛市政府向日本领事馆抗议日方侵越我国警权，擅自派遣武装队伍巡逻青岛市。

△　周恩来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在西安行营监守所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当日，有30名西路军干部获释。8日，有210余人获释。此后，周恩来会见出狱人员，表示安慰和鼓励。

△　红军第四方面军（援西军）奉命由甘肃镇原县屯子镇地区，向三原以西石桥镇地区集结待命。

△　日本华北驻屯军调整部署，确定：一、待国内援军到齐后，与中国军队在河北保定——沧县之线决战，主决战方向为平汉铁路沿线；决战时间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二、第五师团第十一混成旅沿平绥铁路作战，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三、保定、沧县会战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之线攻击。

△　日军袭击津浦路静海前线我军，并进攻平绥路南口要地；绥远日人悉数撤离返日。

△　日本在华舰队集中长江下游，上海形势益形紧张。汉口日军及侨民完全撤退，分两批由日舰载往上海。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抵上海称：“对华交涉问题，未奉训令，但对中日邦交之调整，拟作最后之努力，以目前华北之情势观察，所谓

和平殆不可能。”

△ 日本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华北事变的经费为9680.9万日元，后又追加经费3.13306亿日元。

△ 英国路透社东京电讯预言称“大战将于本星期再起”。

△ 成都举行市民大会，参加市民达10万余人，决议请中央即刻发动全民抗战。

△ 上海市总工会组成工界救亡协会。

8月8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庄严宣告：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号召全体将士：“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勉励全军：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 蒋介石宴请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何成濬、顾祝同、何键，由冯玉祥、何应钦、程潜作陪，对时局交换重要意见。

△ 蔡廷锴由香港抵上海，万余群众到码头迎接，高呼：“欢迎蔡将军北上杀敌！”蔡氏即去南京。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邹鲁以及各地将领孙殿英、谭启秀等抵南京。

△ 陈毅与项英等以中共赣粤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八八宣言》，要求实行全国抗战，红军游击队愿与政府合作；后又派代表二人至南雄县与当地驻军联系谈判事宜。

△　日本华北驻屯军2000余人占领北平市区，并发表布告称：“如有妨害日军行动者，不论其为个人或团体，即严予处置。其政治事项，另由特务机关负责。”

△　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遵照日本政府指令，“迅速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并重新部署兵力。

△　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下达兵力部署命令。

△　日本铃木重康独立第十一旅团攻平绥线我得胜口第十三军汤恩伯军左翼阵地，旋被击退。

△　川樾在私邸召集日本在沪外交、海军、陆军重要人员举行非正式会议，商讨机宜。由南京赶来上海之日高及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等均参加。

△　山西、浙江、江苏及安徽芜湖等地日侨，连日先后悉数撤退。

△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集会欢迎郭沫若、沈钧儒等。

△　上海市总工会、商会开会商讨战时生产管制问题，决定五点意见。

△　孔祥熙在巴黎发表谈话称：“日对华侵略日亟，然中国之通货仍能稳定，可见不独中国政府财力巩固，即友邦对中国前途亦非常信任。”“中国之财力，足与日本抗衡，故中国对华北事件之前途并不悲观。”

8月9日　下午5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士兵斋藤要藏驾驶军车，肆意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为我国守卫机场的保安队开枪击毙，是为“虹桥机场事件”。

△ 晚10时，上海市长俞鸿钧至日本总领事馆交涉虹桥机场事件。俞鸿钧表示，对虹桥不幸事件殊深遗憾，盼日方力持镇静，尽力勿使扩大，循外交途径以谋圆满解决。日方同意将该案交由外交途径解决。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纪念周会讲演《自存与共存》。

△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由昆明抵南京。12日，蒋介石接见龙云。

△ 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南京期间，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商谈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河南、安徽八省十三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周恩来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商定双方互派人员建立联络关系，并与朱德、叶剑英会晤冯玉祥、白崇禧及云南省主席龙云等人，商谈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由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与朱德探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请其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周恩来至上海指示夏衍，协助刚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纸；并会见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工作的张爱萍等，指示其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做统战工作。周恩来会见由国外归来的叶挺，请其出面改编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

△ 南口方面战事渐趋激烈，日军炮兵滥施轰击，第十三军英勇抵抗。

△ 东北抗日联军攻入伪三江省汤原县城，城内日本移民区全被焚毁。联军占领该城六小时后退走。

△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关于华北危机谈话称：“接替宋哲元的

人，如果能履行7月11日和19日地方协定中各条件，则华北事件可望‘就地解决’。”

△　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向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提出《日支国交全般调整案》，划永定河以北为非武装区，因虹桥事件发生，交涉停顿。

△　长江沿岸日侨已全部撤至上海。

△　外交部命令旅日华侨返国。

△　上海各区市民联合会电请财政部长孔祥熙，限制资财外汇。

△　国民政府特任王用宾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　资源委员会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

△　孔祥熙与法国银行团签订金融协定，借款四亿法郎，用为法币外汇准备，利息7.25厘，用关税担保。

△　新西兰华侨联合会捐汇2.5万元；南洋英属华侨与霹坜福建公会各捐汇一万元。

8月10日　军事委员会以形势紧急，批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分军事、政治、经济、精神、兵役五方面。

△　中日双方就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开始调查事实真相。上海市长俞鸿钧除派人调查、搜集证据外，详电中央报告与日方商谈经过。外交部训令以外交方式解决，避免扩大。日方也派员调查，海军武官并将肇事经过电海军省报告，请求善后办法。同日，日本海军省与军令部开联席会议，协议对策。

△　国民党中央委员吴敬恒对新闻记者称：“此次抗战，能支持六

个月，我国之胜利已有把握；如能支持一年，则日本不堪设想矣。”

△　毛泽东电彭雪枫，与阎锡山交涉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县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太原公开设立办事处。

△　刘湘所部已整顿完毕，共编为三个军、两个独立师、七个独立旅。

△　石友三在保定发表告同胞书，详述抗战经过。

△　日军5000余人在飞机、重炮和坦克掩护下，强攻我南口阵地；日军占领南口车站，我军第八十九师顽强抵抗后退守南口镇。

△　日本陆军与海军中央紧急会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确认。

△　外交部奉行政院指令，函知招商局拨专轮六艘前往日本，接运中国侨民回国。

△　日舰“保津”、“鸟羽”、“比良”、“势多”、“梅”、“栗”、“八重沙”、“二见”八艘驶抵上海。

△　全国各海关奉财政部命令，即日起暂行禁止米粮出口运往外洋，以维持民食而防资敌；同时布告米商，如查获偷运奸商，即以军法处以极刑。

△　行政院通过拆迁上海工厂计划，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林继庸任主任委员。迁移工厂分面粉厂、纱厂、火柴厂、制酸厂、制碱厂等。七七事变发生后，政府即开始拟具拆迁东南及各大都市工厂于西南和西北大后方计划。

△　教育部令危险地区各学校迁移，责令危险地区各学校预为安

全措置，重要图书仪器应早准备迁移。川康绥靖公署责令安全地区各学校预定收容战区学生计划。

△　香港怡和公司“阜生号”轮船由大沽口驶往大连，为日本运输军用品，船上中国海员自动离船。

△　江苏常熟胡剑心捐献祖遗稻田101亩，拍卖得款供应抗日军需。

△　河北省各县伪地方维持联合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

△　圣巴柏罗华侨、吉隆坡侨务委员会、麻坡永春会馆越南华侨踊跃捐款抗日。

△　马尼拉华侨举行大会，决议以捐款40万元作抗战之用。

△　财政部长孔祥熙由巴黎抵柏林，探询德国在中日战争中所持态度。

8月11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撤销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组织之“国防会议”及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组织之“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凡11条九款，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由下列成员组织之，并由主席指定常务委员九人：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各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五院院长、副院长。三、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教育部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五、全国经济委员

会常务委员。其他各关系人员遇有必要时，由主席通知列席。国防最高会议之职权，为国防方针、国防经费及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条例》第六条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之。

△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在国防会议上分别作长篇发言，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指导方针，详细阐述意见。周恩来指出，首先，抗战必需有坚强的决心，进行整个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其次，作战方针必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采用游击战术，交通大道要坚壁清野，组织敌后民众，进行山地、农田地的游击战、运动战。第三，军事动员时，应将一切部队编入战斗序列；军区划分不必根据历史关系，应以每一军区可独立作战为原则，同时要运用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强调指出：“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叶剑英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的政策与战略的发言。中共代表的意见，对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对出席会议将领的作战指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第五路军副总指挥兼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确定留在南京中央工作。

△　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密电蒋介石称：“发现杭州湾出口洋面停泊敌舰约念（20）艘，阵容甚整。昨夜9时以后，并有敌舰三艘先后驰泊金山卫，用探照灯向乍浦一带探视。……判断敌有以海空军

扰乱我沿海及杭州湾企图。”

△　绥远境内蒙政会全体委员电国民政府，代表绥属各盟旗竭诚拥护中央，誓作抗战后盾。

△　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张治中立即作出部署：一、第八十七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前进至市中心；二、第八十八师前进至北站与江湾间；三、炮十团第一营及炮八团进至真如、大场；四、独立第二十旅及驻松江的一团进至南翔；五、炮三团第二营及第五十六师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六、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五十六师及江苏保安第二、第四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

△　周恩来、朱德与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内容，双方议定发表中共宣言的同时，蒋介石须发表谈话，发表边区政府组织，发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部，红军改编后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国民党方面同意中共派人到南方改编各地游击队，并开始释放部分在狱的中共党员。

△　军事委员会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经易县向南口挺进，支援汤恩伯军作战。

△　日舰20艘护送运输舰五艘向上海运兵。日本动员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与日侨义勇军团等共一万余人；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

△　日本为扩大虹桥事件，驻上海总领事冈本提出无理要求：一、将上海保安队撤退；二、将上海保安队已设立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中国政府必将此事照外交方式解决，但日方尚在交涉之际即大举增兵上海，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　上海领事团鉴于虹桥机场事件后局势严重，向中日双方提出

备忘录，要求避免足以破坏上海治安与和平的一切军事行动。

△　汉口日领事署接到东京最后训令后，日领松平即通知我方，彼等已定于11日下午4时下旗归国，所有留汉日人一并退走。日领事离汉后，日租界即由我方正式接管。市警察局对日租界内行使警权，决定设立一直辖派出所。

△　日本将察哈尔、绥远、山西三省北部划成一个地方区域，隶属伪“蒙疆自治联盟”。

△　汉口、重庆、长沙、宜昌等地日本领事，今日一律下旗赴上海。

△　日本宣布台湾高雄港为要塞，并公布《事变特别法令》，对台湾民间横征债券。

△　日本首相及外、陆、海三相举行四相会议，决定派两个师团至上海。日本海军军令部首脑会议主张抓住时机，“在近期里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避免“留下祸根，贻误将来”。当夜11时55分，日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指示。

△　实业部电令各省严防奸商操纵物价。

△　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由上海抵南京，访白崇禧、刘湘、龙云等。

△　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在上海创设伤兵医院。

△　交通部令各轮船公司迅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停在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

△　上海日商印刷业工人200余人全体罢工，请求到前线杀敌。

△　汉奸池宗墨在唐山组织伪政府。香月清司派小林原田充伪北

平维持会顾问。

8月12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议决，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

△　蒋介石以上海虹桥事件谈判中日方态度强硬，为防日军在上海发动挑衅行为，积极部署上海军事。是日，蒋介石电令驻汉口之第八十九师乘轮向上海集中，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旅由嘉兴向龙华镇集中，驻宜兴之炮兵第十团第二营向吴县集中。各师均归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第九集团军所辖之第八十七师开抵上海近郊大场镇，第八十八师开抵真如车站。

△　蒋介石下令分配上海我军战斗序列，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担任上海右翼（沪西）防务；张发奎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担任上海左翼（沪东）防务。

△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致电蒋介石请示：本军各部队在本日黄昏前可以输送完毕，可否于明日拂晓前开始攻击？空军明晨能否同时行动？蒋介石复电："希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

△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由庐山飞抵南京，并与蔡廷锴同谒蒋介石。

△　外交部发表声明："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日方口头上屡次宣称，不欲扩大事态，但事实上之行为，则恰与此相反……种种行为，均属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与违反各种国际条约。我国处此环境之下，忍无可忍，除抵抗暴力实行自卫外，实无其他途径。今后事态之演变，其一切责任，应完全由日方负之。"

△　外交部次长陈介会晤日使馆参赞日高，商讨虹桥事件解决办法。

△　外交部、侨务委员会呈请行政院，拨款接运我国旅日、旅朝侨民；愿回国之台湾同胞，集中基隆、高雄二处待运。

△　立法院与军事委员会着手起草《总动员法》。

△　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所部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炮八团、炮十团、独立第二十旅的一个团等部，自苏、常、锡一带奉命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入上海市。

△　平、津陷落后，蒋介石电令有关各集团军为迎战来犯日军，积极部署津浦、平汉、沧石三线军事。

△　我国封锁长江、吴淞口及黄浦江，并分别照会各国驻华使节。

△　为制止金融投机，财政部令上海银钱业休假两日。

△　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阎锡山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由同蒲铁路运送。

△　军政部决定派参谋三人前往延安，暂称为联络参谋。

△　平汉线我军向良乡反攻，战事异常激烈。同日，津浦线我军先后克复独流镇、良王庄。

△　日军增加步兵5000余人、野炮60余门、坦克车30余辆、飞机30余架向我南口一带猛扑，连续五六次均被我军击退。

△　日军欲强占天津市英租界与法租界电报局，遭两租界当局拒绝。

△　广东日侨撤尽。

△　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提出向上海增兵方案，计划动员30万

兵力及8.5万马匹，并向上海与青岛各派遣两个师团。

△　日本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达成陆海军协同作战协定及陆海军在华中作战的航空协定。

△　上海内迁工厂推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叶友才、严裕棠、余名钰、吕时新、王佐才、赵孝林、项康元、钱祥标11人，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工厂“迁移地点以武昌徐家棚为集中地点，再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南下岳阳、长沙”。

△　淞沪停战协定委员会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召开会议。我国代表俞鸿钧、日本代表冈本以及英、法、美、意四国代表，对虹桥机场事件再作论讨。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指责中国违反该项协定；俞鸿钧严词驳斥，指出日军的背信弃义行为，已将停战协定破坏无余。俞鸿钧与冈本两人进行激烈辩论。由于日方代表蛮横无理，会议无结果而散。

△　国民政府明令恢复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复兴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及董事长于右任呈请拨基金10万元。

△　教育部对各级学校本学期开学招生以及学生借读缴费等事，特制定《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发至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遵照办理。

△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次会议通过《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图书杂志原稿审查程序》等件。

△　中国共产党抗议广东当局对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区游击队何鸣部的包围缴械，要求国民党当局恢复闽粤边区何鸣部队原状，发还枪支武器，释放一切人员；国共双方另派专员在开诚布公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谈判。

△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从何鸣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当继续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同时应当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

8月13日　　淞沪抗战爆发。上午9时15分，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水兵一小队冲入横浜路、东宝兴路地段，向我保安队射击；我军沉着应战。八字桥我第八十八师遭日军射击，被迫反击。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我国守军发动全线进攻，以坦克与步兵向军工路、虹口第八十八师攻击；黄浦江中日舰亦同时向市中心区发炮射击。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

△　空军发布第一号作战令，迎击进犯上海日军。我国出击空军根据地如下：第九大队：曹娥机场；第四大队：笕桥；第二大队：广德、长兴；暂编大队：嘉兴；第五大队：扬州；第六大队第三、五中队：苏州；第四中队：淮阴；第七大队第十六中队：滁州；第八大队（欠第十九中队）：南京大校场；第十七中队：句容。

△　晚，军事委员会决定向上海日军发动总攻击，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明拂晓攻击”，“令空军明日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

△　军事委员会命令封锁镇江以下长江下游江面，并以此分别照会各国驻华使节。此事事先为汉奸（时任行政院秘书）黄濬泄于日方，长江日舰得以悉数撤退。

△　平汉线我军夺回独流镇后，向前推进至良王庄一带与日军激战。

△　日军突破南口，我军退守居庸关两侧高地。

△　上海市长俞鸿钧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提出书面抗议，谴责日军向中国军队进攻，并将抗议书抄送各国驻沪总领事。

△　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驻华大使馆参赞日高。日高要求我方撤退上海保安队及撤除防御工事；王宠惠指出日方破坏《上海停战协定》，赶运军舰、军队来沪，飞机侵入宁波、杭州。

△　驻日大使许世英将日本海陆军协议大举侵华情形电告外交部，称日本“海、陆两省正协议派陆军至沪，惟因华北牵制，或不能过两个师团；海军则增派二等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尚在佐世保待机。其战略除以海、陆军混合兵力袭击上海外，并利用海军飞机轰炸沿江炮台、兵营及南京、杭州、南昌、洛阳等处飞行场，对南京更肆意炸毁，另以驱逐炮艇巡游长江，阻止我军渡江；并闻其希望我布告宣战，俾彼得实行封锁海口”。

△　川康绥靖主任刘湘在南京向蒋介石建议中央政府迁川，坚持长期抗战。蒋介石甚表嘉许。

△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就与国民党谈判事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发表红军改编后的正、副总指挥。

△　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交韦尔斯一份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为直接保护侨民，决定向上海方向派遣陆军部队；但有关陆军部队的兵数及下令动员的时机，由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协议决定之”。

△　英、法、美三国驻沪军事当局会商，决定成立租界防御委员会，并分别自香港、西贡调派军队来沪。

△　驻香港英军千名，奉令乘轮赴沪驻防。

△　上海成立国际救济会及大学生救国服务团。

△　财政部令全国国家及商业银行10月16日以前一律暂停营业。

△　军事机关征用招商局轮船“嘉禾”、“新铭”、“同华”、“遇顺”、“广利”、“泰顺”、“公平”七艘，民营轮船16艘，海运舰艇及各埠趸船28艘，一并沉江阴下游江中，成为第一道长江封锁线，阻日舰上驶。

△　中国航空公司以上海龙华机场受日军威胁，宣告京沪、沪平、沪粤各线停航，公司由上海迁汉口。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书》，宣布“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　国民政府明令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戒严，镇江下游江面实行封闭。

△　张治中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并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达保我完整领土主权之目的，抗战誓不休止”。

△　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奉令兼任上海戒严司令。

△　上海市长俞鸿钧为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攻击中国军队事，照会各国驻上海总领事，请迅予制止。

△　何应钦电俞鸿钧，决定“对敌根据地实施扫荡”，“外交谈判及与各国领事之周旋，仍请相机应付”。

△　国防最高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对日抗战不采宣战绝交方式，政府仍在首都南京，不迁都，指派张群为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

△　军事委员会改石家庄行营为保定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石家庄设办事处。

△　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党部速即恢复河北省县党部。

△　第八十八师旅长黄梅兴在上海持志大学阵地牺牲殉国，此为我军在淞沪战场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　我国守军在南口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战况惨烈。

△　宋哲元在保定发表《告二十九军官兵书》，指出国家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大家应振作起来，不屈不挠，战斗到底。

△　下午，我国飞机误落炸弹于上海南京路外滩与大世界，伤亡近2000人。

△　日轰炸机群13架自台湾起飞，袭我空军基地杭州笕桥；我空军起飞应战，第四驱逐大队长高志航等击落日机六架。此为首次中日空战。下午，我空军往炸黄浦江日舰，驾驶员任云阁空军上尉牺牲殉国。

△　日本军部通知各国领事并转告侨民，谓将发生空战，凡居住中国军事机关附近者速避开；又通知工部局，谓将有空战，警告居民速避。

△　日本参谋本部对第三十五、第十一两师团下达第三次动员令。

△　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研究是否宣布战时体制，讨论是否对华宣战问题。首相近卫认为，战局发展至目前规模，应考虑正式对华宣战。但海、陆军方面均不赞成，认为若宣战，“从国外输入军需物资将立即变得不自由”，“国防力量会出现大窟窿”，建议由政府发表一项声明，以代表宣战布告，只在“事变”的名义下，以自卫与讨伐中

国急速派兵。

△ 日本制定向上海及青岛方面派遣兵力的《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协定》。

△ 毛泽东、张闻天电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修改建议的来电称，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出的“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的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的修改。

△ 毛泽东电彭德怀，因南京对《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未解决，尚需朱德、周恩来在南京谈判结束后，才得确定红军出动日期。

△ 行政院公布非常时期难民服务规则和难民服务纲要，规定凡政府收容所的难民，除老弱病残外，均须服从救济机关指导作一些工作，任服工役或兵役。

△ 行政院颁布《发放赈款规程》。

△ 故宫博物院参加伦敦艺术节展览展的文物以及其他重要珍品共80箱，在南京装船运汉口转长沙，暂藏湖南大学图书馆。

△ 瑞典公使培光飞利思向林森主席呈递国书。

△ 美驻沪总领事非正式对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各国或许决定放弃苏州河以北地段，各国防军及义勇队撤至苏州河南岸，定苏州河南岸为避难区，严守中立。

△ 美国务卿赫尔对上海空战波及租界事发表谈话称，已向中日两国政府提出交涉，请其勿使上海10万外侨遭受危险，并训令美使馆劝导侨民，接受政府保护，迁离危险地带。

8月15日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发表抗战到底通电，决率所部“保卫先祖列宗筚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

△　蒋介石电何应钦：第三十六师由张治中指挥；第十八军的一个师开苏州附近，一个师分驻南京、镇江，一个师分驻滁州、浦口。

△　第六十一师、第十一师、第一军等陆续到沪，参加淞沪抗战。

△　我军占领上海日军俱乐部；日军大部集结提篮桥一带。我吴淞炮台轰击日舰。

△　日军在江湾路、杨树浦前线及后方根据地，悉为我军包围。东宝兴路以南、淞沪车站以东日军，亦被压退入租界区。

△　日军轰击沪江大学。

△　日机两次空袭南京，被击落六架；日机并两次空袭杭州，被击落四架。

△　驻沪各国领事向俞鸿钧声明，如中日任何一方损及租界外侨生命财产时，有关方面应负其责；并抗议中国飞机在租界上空飞行。俞鸿钧当予驳斥，严责各国任纵日人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强调租界为我领土，租界上空为我领空。

△　我国政府对于我国飞机误投租界内炸弹及所造成之损害，表示十分遗憾，并加以解释。

△　英军及美舰相继到上海担任租界内防卫事宜。同日，上海租界当局宣布今夜起戒严。

△　南口日军经我军反击撤退后，在昌平县一带整理待援，企图

再犯。

△　察北日军1400余人向我神威台、灰柴岭进犯三次，均被我军击溃。

△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为：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成立国防政府；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教育政策；九、肃清亲日派；十、抗日民族团结。《纲领》号召："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成立。

△　女作家丁玲、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组成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是日从延安出发。

△　侨务委员会发表《告海外侨胞书》，号召旅外华侨尽力贡献国家，救民族于危亡。

△　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对于银行存款的提取规定限额提取办法。

△　日本政府发表《膺征华军》声明，声称为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将采取断然措施；封闭驻华大使馆，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

△　日本共产党发表《给在华日本士兵诸君的号召》，揭露日本政府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

△　上海英、美、法、意等国领署，是日起赶办侨民撤退事宜。

8月16日　　国防最高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陆、

海、空三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空三军对日作战。蒋介石以中日尚未宣战，不宜组织大本营，只扩充军事委员会编制，设第一至第六六个部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第一部掌军令，部长黄绍竑，副部长张定璠；第二部掌政略，部长熊式辉；第三部掌国防工业，部长翁文灏；第四部掌国防经济，部长吴鼎昌；第五部掌国际宣传，部长陈公博，副部长谷正纲、董显光；第六部掌民众训练，部长陈立夫，副部长刘健群、张厉生。除此六部外，另有管理部。

△　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宣布："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中央纪念周讲演《保卫国土为军民天职》。

△　我空军轰炸日旗舰"出云号"。日飞机飞往浦东轰炸我国守军阵地。黄昏后，我军用鱼雷袭击停泊在日本领事馆旁之"出云"舰。

△　上海地区战事剧烈，我军收复天通庵，并向江湾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逼。

△　日军久留米师团一部抵上海。

△　日机轰炸南京、杭州、广德等处，先后被我空军击落16架。

△　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人员全部撤退。日外务省发言人称，这种撤退"并非断绝外交关系"。

△　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大将任司令官，下辖第三师团，师团长为长藤田进中将；第十一师团，师团长为山室宗武中将。

△　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南口右翼之横岭城。次日，我第七集团军

总司令傅作义率部从大同赴怀来增援，20日回援张家口。

△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警告台湾民众，勿趁机抗日。

△　行政院批准实业部与国民党民众训练部共同拟定的《关于消弭工潮办法》，凡五条。

△　上海外商各银行举行会议，决一律暂行停止营业。

△　孔祥熙自欧洲来电，建议将日本侵略我国事实诉诸国联，并依据《九国公约》，请美国召开太平洋会议。

△　孔祥熙与捷克著名的斯戈达军备工厂订立1000万镑长期借款协定。

△　美驻沪海军司令与驻沪总领事决定，先将侨居上海的美国妇孺撤退。

△　希特勒对部下宣称，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后，希特勒更为坚定“同日本合作”的决心，但却命令按合步楼（公司）协定已同意供给的武器和物资应尽快运往中国，并将“此事必须尽最大可能瞒住”日本人。

8月17日　晨，我第九集团军在上海发动总攻。第八十八师以主力向日本坟山、八字桥、上海法学院、虹口公园攻击，与日军往返争夺，伤亡甚重。第八十七师先对日本俱乐部、日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占领日本俱乐部和日海军操场。傍晚，日军由海军操场两次激烈反击，均被我击退。

△　察北我军收复张北、化德、尚义及南壕堑、崇礼等地。

△　军政部正式公布，三日以来，轰炸南京及杭州等处日机，先后被我击落30架以上。

△　立法院通过《总动员法》。

△　谷正伦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及沿线各市、县戒严司令。

△　下午，周佛海约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谈外交进行方式，即派员赴沪，与川樾接洽；或由在野名流赴东京；且可电伦敦，由郭复初（郭泰祺）由［与］驻英日使谈”。

△　国民政府派俞鸿钧为国民大会上海市代表选举监督。

△　毛泽东电彭德怀、任弼时，红军“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同蒲路火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

△　毛泽东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阎锡山）节制”。第一批出动的红军，应使用于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

△　西藏各界在拉萨成立抗敌后援会。

△　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及其他银行设上海临时办事处，今日开始办公，唯缩小营业范围。

△　铁道部公布《战时铁路员工奖惩法》，规定战时各铁路内外员工一律不得托故请假或辞职；在危险区域工作者，亦不得请假或辞职。

△　云南个旧矿商李恒昇将家财100万元捐献国家，支持抗战。

△　同蒲铁路北段铺轨工程已至怀仁，距大同仅60公里。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取的各种准备对策”。

△　留存故宫与颐和园文物，除一部随第二十九军仓促移保定外，大部均被日军掠去，各国领事团虽加劝阻，但日军置若罔闻。

△　驻济南日领事及日侨全部撤走。

8月18日　　蒋介石接见是日由庐山至南京的陈诚并嘱以三事：一、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决心与应战的准备”；二、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速厘定战斗序列。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勉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及淞沪战场全体抗战将士，并派员慰劳前方将士。

△　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一文，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就要持久战、消耗战，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

△　淞沪战场我军进抵汇山码头，切断日军东西两翼之联系，取得淞沪战场作战以来最大胜利。

△　第八集团军所辖第五十五师、第五十七师、第六十二师在浦东至杭州湾金山之间布防。

△　吴淞、浏河一带日舰聚集达50余艘，计驱逐舰25艘，大巡洋舰五艘，航空母舰二艘，余为炮舰及小巡洋舰等。日舰移至美国旗舰附近，向我浦东阵地发炮。

△　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上海我军阵地反攻。我第八十八师左翼爱国女校方面阵地，与日军激战甚烈。日军出击数次，均被击退。

△　日军连日源源开到大沽，与我军发生冲突。平绥线之日军再犯南口，遭我守军坚决抵抗。

△　青岛形势紧张，日侨妇孺约1000人离青岛返国。20日，青岛

日侨5000人返国。

△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宣布青岛及胶济路戒严。

△　中共与国民党就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设立总指挥部、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分批释放在狱的中共党员等项达成协议。

△　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蒋介石与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作战，不作正面作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　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前往首都反省院，看望在押的中共党员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等。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及随后陶铸、方毅、王鹤寿、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等相继出狱。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战时粮食管理条例》，凡五条。

△　财政部通电各省、市政府、各商会、银钱业公会，责成在设有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分行的重要城市，各设联合办事处。

△　云南个旧商人张正堂捐款20万元补助军费及救济战区难民。宋美龄捐款一万元。外交部收到侨胞侨汇17.6万余元。

△　《益世报》经理牛宝堂在天津市特三区被日军逮捕。日军在平、津禁收中央广播电台消息，收音机多被抄没。

△　美商务部长发表谈话，称美国对中日战争不施行中立法。

△　英驻沪代总领事提出在上海设立中立区方案，中、日军队退出上海四周地带，各国向日本担保上海日侨安全，并向中国担保日方

不利用公共租界为根据地。法国对此表示接受，美国则态度冷淡。

8月19日　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　上海虹口地区终日激战，我军压迫日军阵地甚烈，且曾一度占据熙华德路及汇山码头。

△　淞沪战场第八十七师一个团攻进杨树浦地区，一个团占领昆明路。

△　日军第十一、十二两师团对南口全线发动攻击，居庸关、永宁、黄老院等地战斗激烈。

△　日本关东军察北兵团今日攻陷外长城神威台及汉诺坝，张家口告急。

△　日机两次袭南京，为我空军击落三架。

△　外交部声明，日军如利用租界作为根据地或退避处所，我军将采取一切必要办法。

△　蒋介石嘱驻苏大使蒋廷黻介绍沈德燮与苏联政府洽购飞机。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行政专员以下各级政府组织的重新规定》，凡11条。

△　朱德自南京返抵陕西云阳镇红军总部。

△　国民政府公布《防空法》，凡15条。

△　国民政府训令，撤销对李济深、陈铭枢两人的通缉令。

△　外交部及军事当局照会各国使领，凡各国停泊黄浦江之兵舰

及商轮，须远离日舰，否则发生事故，中国不负任何责任。

△ 日本拒绝英国关于设立上海中立区的建议，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住在中国的许多侨民自有保护的重大责任，不便将此责任委诸外国”；要求英、美等国“以积极的处置”使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

△ 邹韬奋主编的《抵抗》（后名《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创刊。

△ 缅甸华侨妇女成立中国战灾妇孺救济会。该地华侨新组成之中国国难后援会已开始收集捐款。

△ 冀察政务委员会自行解散，22日，日本正式宣布。

8月20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颁发大本营第一号训令《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第一期作战计划预计10月至10月下旬为止，以一部兵力使用于华北，在平汉、平绥、津浦铁路沿线各要地，采取重叠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以求争取时间；以主力集中华东，用于南京、长江、上海方面，诱日军陷于大江南北湖沼、山岳地带，使其优势装备无法发挥效能，达到逐次消灭日军之目的，粉碎日军速战速决之企图；以最小限度的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

△ 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军战斗序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蒋介石），参谋总长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中正（兼），作战区域：河北及山东北部平汉、津浦两铁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战区域：山西、绥远、察哈尔。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作战区域：江苏南部及浙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作战区域：福建、广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中正（兼），作战区域：山东南部及苏北。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濬。海军总司令陈绍

宽，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兼）。

△　陈诚与熊式辉由南京赴上海视察张治中率部作战，是日返京。蒋介石接见陈、熊二人，询问视察情形。熊式辉表示上海之战“不能打”。陈诚认为“非能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并谓南口之线，敌必攻，我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牵制之”。蒋介石表示“一定打”；并增派部队赴沪参战。

△　军事委员会成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统一平汉线与津浦线作战指挥。

△　军事委员会以日本已派陆军进犯上海，为应付来犯日军作全盘部署，遂颁发第三战区作战计划，以巩固首都及保护经济中心上海为目的。

△　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　张治中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已发动全面抗战，作战时间愈长，则于我愈有利，故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何日结束，殊难预料。然我人深信，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

△　我军事当局公布，自开战迄今，日机被击落或被迫降落者共40架。我国飞机仅有七架受损。

△　中、日两军炮兵在浦东、虹口进行激烈炮战。

△　上海空战激烈，日机被击落三架；我空军击中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同日，日机在广德被击落七架，在怀来被击落一架。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签署《司令部布告》，

号召东北全体同胞在全国抗日总动员之下，亲密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伪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

△　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由张北向张家口进攻；日军突破长城线。

△　日机首次空袭武汉。

△　日本侨民撤离威海卫。

△　财政部公布《救国公债募集法》，凡14条。

△　驻法大使顾维钧电告外交部，国联对日制裁不易；我国在法国购买军火务须保密，藉免日本对法抗议。

△　日本首相近卫宣称，决以武力解决中日冲突，不容任何第三国干涉。

△　日本参谋本部派南次郎大将继香月清司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派板垣征四郎任指挥官，并增派国内两个师团进犯南口。

△　日本浪人在厦门到处挑衅，日舰两艘驶抵该地，形势紧张。驻厦日领已命日侨妇孺离境。

8月21日　淞沪战场我军第八十八师向虹口日军攻击，焚毁日本啤酒厂和日本玻璃厂。第三十六师配属第九十八师（欠一旅），由岳州路、天德路进攻，已占领梧州路、唐山路，继续向横浜及百老汇路日军攻击，冲至汇山码头，与日军在水深及腰中进行巷战。第八十七师（配属第九十八师一旅）右翼已进占东西华德路。第一〇八旅第二一五团第二营官兵300余人攻入华德路十字街口，日军以战车阻塞路口，并纵火烧屋；我官兵300余人竟全部葬身火海，牺牲殉国，至为壮烈。我军左翼正向引翔港镇、沪江大学之敌攻击。

△　日军大举进犯吴淞，并以飞机滥炸上海——南京难民列车，死伤1000余人。

△　我军沿平汉、津浦两线向北反攻挺进。平汉路我军进攻长辛店，将日军包围于丰台；日军前往援救，发生剧战。津浦线我军已迫近杨柳青。

△　日军绕过南口右侧，进犯居庸关。同日，日关东军两个师团向张家口进攻，对南口实行迂回，以牵制南口方面的我国守军。

△　卫立煌奉命率第十四集团军北上增援，进至门头沟西北30公里处的傅家台、千军台一线，以前进受日军所阻，转取守势。

△　孙连仲率第二十六路军向良乡进攻，在良乡城内及房山北方高地与日军发生争夺战。

△　我军在津浦线独流镇、良王庄间与日军发生激战，双方死伤甚重。

△　宋哲元由河间抵南京，向中央报告并请示机宜。

△　周恩来离开南京返回陕西；国共两党间谈判未了事宜，由叶剑英在南京继续进行商谈。

△　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凡四条。

△　行政院为接运旅日侨胞返国，特拨款9.5万元费用。

△　上海市商会致函租界工部局，请求对于商店复业妥为保护。工部局答复，在可能范围内自应保护各种商店及其贸易。

△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发表《告朝鲜民众书》，宣布朝鲜进入战时状态。

△　英国政府分别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称，英国政府将保留因中、日军事行动而造成在沪英侨之生命财产损失的一切要求赔偿的权利。

△　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保卫和平宣言》。

8月22日　军事委员会颁发委任令，委任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该路军辖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三个师。

△　上海汇山码头我军继续向两翼进展，日军在杨树浦一带纵火，阻止我军前进。第三十六师因遭日军炮火猛烈射击，退回百老汇路北侧。第九十八师一部对日本俱乐部进行攻击。第八十七师攻占精版印刷厂及康泰厂。

△　上海第一艘内迁工厂民船驶出上海，取道苏州河转赴镇江、武汉。

△　日军松井石根大将率第三、十一师团及第十三、十六师团各一部，在吴淞、川沙同时登陆，向吴淞、宝山、月浦、罗店、浏河之线进攻。陈诚指挥第十五集团军之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等师，向登陆日军实行全线反攻。战争焦点逐渐北移，转至张华浜、吴淞一带。

△　晚，日机三架空袭南京。

△　辽宁绥中一带的义勇军约2000人，拆毁北宁路路轨。

△　汉阳兵工厂全体员工捐献三日薪给1.071万元。

△　是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

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与国共关系报告，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其基本任务为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周恩来在会上作南京谈判、上海抗战、我国经济形势及国民政府的国防与外交等方面的报告。与会人员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指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是“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林彪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8月23日　　淞沪战场，我中央作战军总指挥张治中，左翼（江防）作战军总指挥陈诚，右翼（浦东）作战军总指挥张发奎，同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淞沪战场我军改取守势。

△　我国空军分批出动，轰炸吴淞口、浏河、狮子林、宝山等处日舰。

△　日军为解除江湾路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被我军重重包围形势，进行反攻。

△　日机在上海南京路投弹，落先施公司楼上，死伤数百人。

△　南口右翼阵地镇边城失守。日本关东军进犯张家口。我军第一四三师退守张家口。

△　日机猛烈轰炸南口；南口、怀来等地交通均被破坏。

△　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　监察院明令厉行审计制度。

△　苏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通知鲍格莫洛夫对华军事供货协定：一、中国政府收到货物后延迟一年开始偿还货款，贷款总期限为接货后六年；二、飞机最多提供150—200架；三、另以锡、钨、锑偿还货款总额的四分之三，余四分之一以茶叶及中国其他货物偿还。27日，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军事供货在南京达成协议：一、贷款总额为一亿中国元；二、用英镑结算；三、贷款在货到后六年还清；四、苏联同意供给飞机200架，坦克200辆，由杨杰在莫斯科商定；五、中国以金属偿还贷款四分之三，以茶叶及其他货物偿还贷款四分之一；六、详目在莫斯科签定；七、杨杰为中国惟一的全权代表。

△　上海各外国银行今日起复业。

△　上海抗敌后援会成立战时设计委员会，沈钧儒任主任委员，郭沫若任副主任委员。

△　粤汉铁路黄埔支线赶筑完工，并与广九铁路接轨通车。从海外运来的抗战物资，得直接由九龙运入内地。

△　陈独秀由其第三子陈松年与其妻潘兰珍在南京接出模范监狱，暂住傅斯年家中。

△　作家苏雪林将历年积蓄之黄金价值6000元，捐献作抗战及救护伤兵之用。

△　福建泉州驻军第八十师破获汉奸组织“中日防共恳亲会”。该会总会设厦门，泉州等县设分会；魁首吴维萱。吴犯及部下20余名已被捕，首要人犯四名被执行枪决。

△　美国务卿赫尔向中、日两国呼吁停战，声称两国应依国际关系之原则解决其争执。

△　法国步兵一队从香港开赴上海。

8月24日　　上海我军数度对日军发动攻势，但日海空军协同作战，海军舰炮火力过猛，日军后续部队不断增援，我军阵线遂被突破。日军主力向罗店进攻，一部向狮子林进迫。

△　上海左翼作战军陈诚率所部对由宝山南犯之日军猛攻。罗店日军被我第十一师击退。我第九十八师集结于刘行、杨行间，一部对吴淞、上海间沿江警戒，一部由吴淞向宝山攻击。第六十七师主力集结于嘉定、罗店间，一部向川沙镇攻击前进。

△　下午，我便衣队在上海曹家渡破获日本间谍机关一处，当场击毙日人两名，并获汽车一辆，手枪、地图数件。英国领事向我提出抗议，要求撤退我武装警察。

△　大批日军在吴淞登陆，前锋已抵罗店。我空军往袭登陆日军。

△　我军攻克独流镇。

△　日军占领张家口西南高地及孔家店，切断平绥路交通。

△　日机继续轰炸太仓、嘉定、昆山、宁波、安庆等地。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凡10条；《中华民国战时军律施行条例》，凡五条。

△　国民政府设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总会，宋子文任委员长。

△　川康绥靖主任刘湘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抗战问题。

△　青岛市长沈鸿烈表示，日方任何无理要求一概拒绝，日军如登陆，决尽保卫疆土之责任。

△　我国首任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钱泰向比王呈递国书。

△　教育部令各级学校预置防空、防毒设备。

△　自“八一三”起至是日，外人自沪撤退者，前后已达1600余人。

△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成立。

△　我国商界向日本所订的4.7亿元贸易合同，全部取消。

△　行政院决议，云南大学自本年度起改为国立，由教育部派员接办。

△　行政院通过中德无线电报务合同。

△　外侨500人（多为德籍）离沪赴港，德国对华贸易全部停顿。

△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动员第十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八、第一〇九等师团向华北增兵。

△　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华北方面军编制方案。

△　美总统罗斯福决定对中国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并令副国务卿韦尔士前往欧洲通告各关系国政府。

△　英党全国执委会发表宣言，抨击日本侵华，要求英国会与国联各会员国及曾与中国订有条约的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使日本尊重国际法。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朱德、周恩来下达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第八路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

〇师、第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共4.6万人。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以及陕南第七十四师等部组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与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及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与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军、独立第一、第二、第四与第十五团的骑兵团等部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　周恩来电张冲、康泽转蒋介石，告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已于22日由陕西三原出发，向指定地区开进，并希望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　洛川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由毛泽东起草）发表。

△　军事委员会任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　何应钦电饬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严禁我警察、保安队、便衣队等在英、美、法军防区，或苏州河以南地域内与各该国军发生误会”。

△　日军向浦东登陆未逞。

△　陈诚率部攻克罗店镇。

△　日军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我军与日军展开激战。

△　我空军12架飞机分批飞沪，轰炸停泊黄浦江中的日舰及杨树浦一带日军根据地。

△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宣布封锁长江口至汕头中国海岸，所有中国船只一律没收，惟第三国船只在相对条件下可自由

出入。

△　日军在上海伤兵达万余，军舰被击沉七艘，伤11艘；飞机在上海及各地被击落70架。

△　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上海公共租界中立问题，如日方赞成，则中国政府在原则上亦拟予以接受。

△　上海市政府发出保护日侨布告。

△　陈毅与项英以中共赣粤边区特委名义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民众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及其他地方团队的袭击，团结抗日。

△　欧亚航空公司移西安，决定扩展西北航线。

△　英首相与外相暨枢密大臣决定，维护在华利益，保护英侨生命财产，欢迎美国的停战呼吁。

8月26日　　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于凌晨1时30分下令南口守军各部突围，向桑乾河南岸撤退。南口战役结束。

△　日机轰炸上海南站难民，炸死炸伤我同胞700余人。

△　吴淞、浏河前线战事激烈。

△　张治中电南京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及黄绍竑部长，提出我军应先击灭罗店方面日军。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茅祖权、朱霁青、甘乃光等分路赴上海、南口、察哈尔前线劳军。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解雇海关日籍职员，取消日本在华治外法权。

△　我空军夜袭吴淞口外日舰，并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日军阵地投弹多枚。

△　上海德国侨商会主席普尔兴及全体德商捐助我国抗战1.751万元。

△　财政部令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于汉口等地设联合办事处。

△　我军与日军仍在津浦线正面独流镇与静海间激战。

△　怀来、张家口失守。

△　松井石根在上海召集日本陆、海、空军首领会议，布置日军在沪、甬登陆，以海军封锁我国沿海各口岸，空军开始轰炸我内地各处。

△　英驻华大使许阁森由南京乘悬有英国国旗之汽车驶往上海，车抵无锡附近被日机扫射，许大使受伤甚重。

△　日机猛烈轰炸南京中央大学、中大附中、革命遗族学校及志成医院。同日，日机袭南昌，在农学院等地投弹。

△　南京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处决汉奸黄濬、罗致远、莫树英等18人。黄濬等向日本报告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地日军舰逃走一空。其子汉奸黄晟参与同谋，亦一并处决。

△　国民政府宣布自9月1日起发行五亿救国公债，年息四厘，30年付还。

△　美国反战及反法西斯主义同盟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号召该国人民抵制日货。

8月27日　日军由吴淞登陆，为我军击退。我第六十一师至吴淞

防守，其余在江湾附近集结。我第八十七师一部围攻张华浜日军，双方激战；我军阵地在南泗路华家宅、丁家巷一线。在罗店争夺战中，我军蔡丙炎旅长牺牲殉国。

△ 张家口失陷，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向洋河右岸撤退；傅作义部反攻张家口失利，退守柴沟堡。

△ 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占领延庆。

△ 房山县失陷。

△ 日军数万人攻占静海县城。

△ 孙连仲部转入马头镇、琉璃河主阵线与日军对抗。

△ 日机连袭南京四次。

△ 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向海、陆两省报告上海战争中损失情形称，该舰队所指挥之第十、第十一战队、第五驱逐舰队，受伤兵士已达7600余人，已死兵士达5800余人；巡洋舰二艘、驱逐舰三艘、炮舰四艘均受伤，运输舰已有二艘沉没；飞机被炸毁及失踪42架，受重创16架，轻创22架；坦克车毁四辆，受创12辆。日本侨民死亡达600余人。

△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座谈会，讨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中的国共关系问题。

△ 上海民族工业厂家开始内迁。

△ 全国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

△ 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华北人民自治会，并准备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

△ “满铁”在天津设立华北事务局。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重申美国不放弃远东利益。

8月28日 日军援军在上海杨树浦、虹口一带接防。杨树浦方面我军开始后撤。罗店为日军攻占，双方死伤甚重。

△ 吴淞与宝山间海底电线为日军破坏，上海与外洋电讯受阻。

△ 广东第四路军开紧急会议，总指挥余汉谋严令一切下属海陆军，警备自厦门、汕头以南至广东省之海岸；并委李汉魂任广东省东部防卫指挥全权。余汉谋亲至虎门任防备指挥。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于本月成立，祁致中任军长。

△ 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对记者称：“美国国务卿赫尔7月16日所发表之谈话，列举维持和平各项原则，中国政府现仍准备将各原则付诸实施，以冀解决中日争端。”

△ 财政部公布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委员会贴放办法，并规定汉口、重庆、南京、南昌、广州、济南、郑州、长沙、杭州、宁波、无锡、芜湖为贴放地点。

△ 日本首相近卫宣称，日本无法与南京谈判；日本要使中国屈服而无力抵抗；中日之战将延长到明春或明秋；日本决定增兵华北，并令退休大将20员复职。

△ 日本外务省训令厦门日侨撤退，厦门日领事高桥茂于是日晚下旗回国。

△ 华南各地日侨约1.165万人于是日撤退完毕。

△ 英国政府为日机射伤许阁森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要求道歉、惩罚肇事者，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类事发生。

8月29日　我军与日军在罗店镇进行拉锯战，击毙日军旅团长仓永。

△　张治中谈上海一周战况称，经一周之苦战，日军盘踞之区域仅及最初登陆时1%。

△　留居厦门、鼓浪屿等处之台湾青年3000余人不愿回台，是日向厦门当局请求予以自新，准其恢复国籍，并筹组青年抗日总同盟。

△　川康各军整编完毕，重庆行营组织点验委员会，派夏斗寅为主任。

△　铁道部为协助留日学生返回原籍，准予凭证免费乘车。

△　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熊式辉，收到项英与陈毅等有关合作抗日函件。

△　周恩来抵西安。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前方设军委分会及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分别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

△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表《战时乡村服务团工作纲要》。

△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与南京同时正式宣布。外交部就《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发表谈话称："此举不独以中、苏两国间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受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矢。"

8月30日　我军与日军在杨树浦及吴淞方面互以大炮轰击。杨树

浦及吴淞、狮子林附近区域，受日机轰炸及大炮轰炸，致酿成大火。日舰群集吴淞，续图在吴淞口、浏河等处登陆。

△　日机袭南京、徐州、大同、保定等地。

△　攻占南口及张家口之日军，以主力附伪蒙军一部，沿平绥路越柴沟堡向大同攻击。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由陕北韩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　我国飞机在吴淞口外误炸美轮“胡佛号”，外交部向美表示歉意，并愿赔偿损失。8月31日，驻美大使王正廷，向美国政府深表遗憾。

△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由延安抵太原。

△　周恩来在西安与蒋鼎文会谈。蒋鼎文答应通知各方，自即日起不得称共产党为“伪党”，不得称红军为“匪军”。双方商定，以后有关陕北行政、民运、党务等事务，均与林伯渠商量解决。

△　毛泽东由洛川回延安，电复叶剑英，拒绝康泽所提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

△　毛泽东电周恩来，命其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洽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给养补充等事项。

△　国民政府明令征集国民兵，凡属兵役适龄男子，均有入营服役义务。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军用运输护照规则》及《军用运输规则施行细则》。

△　川康绥靖公署决定，出川抗战部队限于9月5日前开赴前线。

△ 武汉商界领袖黄文植等捐献15万元，作政府抗战经费。

△ 平津流亡学生同学会在上海成立。

△ 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递交中日争端的第一次声明书。

△ 驻瑞士公使胡世泽以照会一件送达国联秘书处，详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日军横暴经过。

8月31日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路透社记者称，“目前中日不宣而战之战争，国际间确应有制裁之必要”；并称“此种国际干涉非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间整个的安全”。

△ 日本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82号》下达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军战斗序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为寺内寿一大将，参谋长为冈部直三郎少将，副参谋长为河边正三少将，司令部设北平；下辖第一军与第二军及方面军直辖师团。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辖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参谋长铃木率道少将，辖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一〇八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方面军直辖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山冈重厚中将；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少将；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中将；华北方面军直属防空部队，华北方面军通信队，华北驻屯军宪兵队。华北地区日军总兵力约37万人。华北方面军组成后，即以北平、天津为进攻出发地，以平汉路为突击方向，一部沿津浦路进攻。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路攻击，采取两翼迂回战术。各路日军同时展开战略进攻。

△ 日军占领吴淞。

△ 日机七架首次袭广州，向军用机场附近沙河炮兵阵地掷炸弹

二枚，我空军在虎门炮台附近击落日机2架。

△　自8月14日至是日，日机共被击落61架，被俘机师11人，死伤机师150余人。台北日军海军航空联队几悉数被毁，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日舰被毁10余艘。

△　毛泽东电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规定八路军军饷为100万元，现仅领得50万元；并无枪炮补充，弹药及衣物之补充亦甚少。

△　国民政府令：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9月1日起，施行《军用文官任用暂行条例》、《军用技术人员任用暂行条例》及《军法及监狱人员任用暂行条例》。

△　国民政府颁布《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凡10条。

△　据国民政府棉业编制委员会与中央棉产改进所统计，全国棉田6242.3934万亩，棉产量1966.1755万担。

△　国民政府公布《各省市田赋征收通则》与《各省市地土税征收通则》。

△　教育部决定，平、津、沪各学校分别集中在西安、长沙各办一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决定迁校长沙。

△　行政院决议，任命张冲为甘肃省建设厅长。

△　行政院通过特种工业保息补助标准及中菲无线电通话合同准备案。

是月　中共驻广西代表张云逸与广州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余汉谋谈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事。余汉谋同意中共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　中共中央派张署时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至四川，李一氓同行。

△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在西安设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任中共中央代表，伍云甫任办事处主任；在太原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峰兼任办事处主任；在南京设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秦邦宪为中共中央代表，叶剑英为八路军代表，李克农为办事处主任；在迪化设八路军驻新办事处，陈云任中共中央代表兼办事处负责人；在上海设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潘汉年任办事处主任。

△　陈独秀出狱后，派罗汉在南京会见叶剑英，表示愿回到中共领导下工作。经叶剑英介绍，罗汉至西安会见林伯渠。林伯渠介绍罗汉去延安商谈。

△　项英、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先后至赣州、南昌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及第六十四师代表谈判，达成协议，江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原红军游击区各处部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普遍进行谈判。

△　8月间，华北大雨，冀中河水泛滥，津浦与平汉两铁路北段交通受阻。

△　月底，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团员张冲、王叔铭）乘专机经迪化、阿拉木图赴莫斯科。

9月

9月1日　　清晨，日军2000人再度在吴淞登陆，由张华浜上岸，以密集炮火向我扼守吴淞部队猛攻；激战数小时，我军后撤。日军续向宝山推进，我守军姚子青营长率部出城迎战，日军退回吴淞。

△　日军下达第五次动员令，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野战高射炮等部队往上海增援。

△　日第十一师团浅间支队在炮火配合下，猛攻狮子林炮台，我守军第九十八师一部与日军激战四小时，全部牺牲殉国。日军占领狮子林炮台，旋向杨家桥、月浦前进。

△　罗店日军为我军三面包围。次日，由青岛调来之日军第十一师团天谷支队，沿吴淞——月浦——罗店公路进攻罗店以北我军，以解围被困日军。

△　日本援军久留米第十二师团自福冈，第十一师团一个旅团自截岛，第三师团一个旅团自静冈，第九师团一个旅团自敦贺，第六师团自鹿儿岛，合约三个师团的兵力开抵上海。

△　上午，沪杭路铁桥被日机炸毁，受损奇重。同日，日机轰炸上海中山路，炸毁中山桥。

△　蒋介石电张发奎，指示吴福线工事由第一军负责；沪杭各线工事由张发奎指派该区现有部队，分别负责构筑，均限于9月20日前完成。

△　津浦线战事激烈，进攻唐官屯日军败退。

△　毛泽东电周恩来等称，陕甘宁边区设长官，不设主任，任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长官；委任任弼时、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

△　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家彦与朱霁青抵大同劳军。

△　广州市商会决定是日起改用法币流通。

△　实业部奖励工业技术委员会吴诗铭发明染制草黄色毛织品化学方法，准予专利五年；吴纪发明青铅粉加热制成黄色氧化铝方法，准予专利五年。

△ 重庆防空司令部成立，指挥区域包括南岸、江北、瓷器口、广阳坝等地。

△ 四川部队第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三个军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沿川陕大道向西安徒步行军；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三个军编成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川江东下，向宜昌集中，准备增援平汉线。

△ 绥远境内蒙政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绥境蒙边第二区防司令潘德恭察布通电全国，主张对日抗战。

△ 各轮船公司在南京合组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办理供应军运及维持民运事宜。招商局联合三北、大达、大通等航业公司，将上海工厂紧急迁至后方。

△ 财政部《修正救国公债条例》通过后，定今日起开始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

△ 实业部颁布《制止工潮办法》。

△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指出少作政治号召，多作积极建议，集中人力，取消派别之见；人民应该了解国策的轮廓和大政方针，但无须知道国策的详情和大政的步骤；政府应充分考虑人民的建议。

△ 上海编辑人协会主办的《文化战线》出版。

△ 汉奸在张家口组织伪地方治安维持会。

△ “满铁”应日本军工需要，在抚顺建立制铁试验工厂。

△ 日本政友会要求内阁宣布对华用兵目的；日本社会党反对增加侵华军费。

△　日本外相广田与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谈话，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表示极大不满。

9月2日　　蒋介石电张发奎，谓“浦东方面登陆之敌务必极力拒止，即或不能拒止其登陆，亦须设法围困，扼制其发展”。

△　蒋介石电何应钦，谓“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陕西富平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会上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命令。

△　周恩来在西安电康泽转蒋介石，不同意丁惟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推林伯渠与张国焘为边区政府正、副长官；《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应依庐山谈定方案即时签字发表；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由中共推荐的任弼时为正，邓小平为副。

△　日军分别由浏河、吴淞镇及虹口、江湾等地进犯宝山，被我守军击退。

△　日机轰炸上海北站、中山路、真如、宝山及张华浜等处。

△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以第六十一军占领天镇、阳高一带，阻日军西进，第十九军布防大同城郊，另以第三十四军及第三十五军各一部，分别置于沽源及兴和一带，骑兵第一军则在尚义、商都各地掩护我军北翼。

△　日本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改称“华北事变”为“中国事变”。

△　国民政府任黄绍竑、黄旭初、陈仪、熊式辉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　内政部与军政部制定《国民义勇壮丁队管理规则》。

△　新生活运动总会制定非常时期工作项目，计有发动民众武力、统制粮食、安定金融、献身运动、平定物价、增加生产、没收仇货、肃清汉奸、输款救国、战地救济难民等项。

△　教育部令沿海各省公私立学校，迁往比较安全之内地县区或乡村，布置开学上课，并赶制防空避难设备。

△　上海市商会通电各省、市、县商会，积极募集救国公债。

△　美国表示其商船决不退出中国领海。

9月3日　　蒋介石电张发奎立即指派部队征集民夫，在浦东、松江、沪西等地构筑据点工事，并挖掘战壕及预备防御日军战车之阻塞工程，限于半个月内完成。

△　蒋介石电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令江苏各县长、专员聘请当地士绅出而抗日自卫，并请其督率乡民，指定重要地点挖掘战壕，构筑工事，协助军队防护地方；由省府颁定赏罚令，并颁发自卫新知书籍及防空、工事掩护、伪装等式样。

△　行政院公布《食粮资敌案件没收食粮及罚金处理规则》，凡四条。

△　毛泽东电周恩来等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第一二〇师约于25日前后可开抵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请至太原与阎锡山交涉，明确规定八路军活动区域。

△　晚，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偕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乘火车自西安出发赴山西。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庄里镇出发，随第一一五

师之后北上抗日。

△　津浦线我军与日军仍相持于唐官屯、阴学屯间。

△　日军援军两个师团，由运输舰49艘载抵吴淞口外登陆。

△　日军夹击月浦镇，打通与罗店联络线。吴淞发生激战。狮子林炮台遭日机及舰炮猛轰，石洞口有日军数百向狮子林、杨宅前进。

△　黄浦江面我军与日军争夺剧烈，日舰炮击浦东。

△　日机在闸北轰炸，流弹飞入非战区，护送难民轮船为日机枪扫射。我军击落日机两架。

△　上午，日机及日舰向陆家嘴附近猛烈轰炸；日军在三井码头登陆，与我第五十五师激战，并向北泗塘桥攻击。

△　日军在天镇附近向傅作义部第六十一军攻击。

△　察哈尔伪军第二师参谋长朱振华与团长井得泉率部通电反正。

△　闽江为日军封锁，日机12架进袭厦门，日舰一艘发炮向我守军进攻；日水兵企图登陆。

△　为加强闽江口防御，我军征调商船六艘，码头船、帆船60艘等，装满砂石沉塞长门外粗芦岛附近。

△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占领东沙群岛，在岛上设水上飞机场基地。

△　南京试行联保办法，严密组织民众。

△　侨胞郑玉书认购救国公债二万元，并慨捐自备汽车及按月捐

助房租3000元。

△　日本外相广田对记者称，日本不能漠不关心于共产党侵入东亚，日本决心向既定的方针迈进，一直到中日事件能得到根本解决。希望中国考虑对日政策，并请其他国家与日本合作。

△　美、英、法三国驻上海总领事因租界内落弹甚多，分别向中、日双方致函，要求中日双方炮兵及舰队移动。

△　美国务卿赫尔称，美国不赞成英国外交政策。美国对英国关于由英、美、法三国联合保卫在沪租界外侨生命财产，对中、日军队离沪之建议，不准备表示态度。

△　美政府就美国一些银行最近贷款给日本一事称，只要中立法一日不实施，国务院不能阻止各银行贷款给日本。

9月4日　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称："中国抗战非仅为本身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凡11条，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

△　国防会议开会，蒋方震详细谈德国与苏联情况。

△　李济深由桂林抵广州对记者称，应促使政府和民众打成一片，共赴国难。

△　毛泽东电彭雪枫转周恩来，指出"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请周恩来与华北军政人物会面后，详细交谈。

△　周恩来与彭德怀等抵潼关，搭乘阎锡山派来的专列火车开往太原。

△　日军两个师团在吴淞口外登陆后，分驻杨树浦、张华浜、吴淞等处，一部分集中狮子林方面。日援兵到后猛攻我宝山城。

△　吴淞日军向我第六师阵地炮击，并向我军发动进攻。

△　松井石根续调增援部队，声称将于下星期一向我军全线进犯。

△　日机在上海北新泾一带大肆轰炸，无辜平民死伤约千人。

△　日机狂炸闸北、浦东。

△　日机六架上午在平汉线宝店附近为我军击落三架。

△　日天皇下达敕谕："朕之军人现正排除万难，致其忠勇，是不外敦促中华民国之反省，以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由日抵津，司令部移驻北平。

△　行政院公布《特种工业保息补助审查委员会规程》、《特种工业指导委员会规程》、《特种工业保息补助审查标准》。

△　行政院拨款100万元分五路救济难民。

△　财政部制定奖励认购救国公债办法。

△　汉口商人李锐认购救国公债5.5万元。

△　四川省政府准内政、军政两部会咨，饬各县、市从速成立兵役股，专办兵役事宜。

△　汉奸杜运宇、于品卿在张家口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日人金井次章任最高顾问，辖察哈尔南部10县，人口约200万。

△　美国务院发言人称，美国政府不因国内各种情绪而动，在远东政策上，将仍守中国主权与土地完整的《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

△　美国从事和平六团体，联合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在华特权。

9月5日　　蒋介石派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赴美，派军事学家蒋方震赴德、意，表达中国抗日决心。

△　四川省各界民众在成都举行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大会，情况至为热烈。

△　淞沪战场日军向我三官堂附近阵地猛攻。从沙龙口登陆日军，也从宝山、三官堂进攻，经我第六师增援，日军因腹背受敌，伤亡甚巨，遂撤退。

△　空军轰炸机一队飞往小川沙口外，炸毁日舰两艘。

△　日军舰30余艘、飞机20架、步兵辅以坦克20余辆，对宝山实行海、陆、空三面围攻。我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第五八三团第三营姚子青所部陷入重围，仍坚守城池，奋勇抵抗。

△　日机在上海轰炸北新泾及周家宅，居民死伤百余人。

△　日本海军第二舰队与第三舰队司令宣布，封锁北起秦皇岛，南迄北海之中国海岸，所有中国船只不许通航；唯青岛及属于第三国租借地领海除外。

△　日本飞机、军舰轰击广东虎门，日军企图登陆失败。

△　日本近卫首相在议会作施政方针报告称：“日本对华根本方针是使中国政府放弃排日政策，从根本上调整日华邦交；若中国政府今后诚心诚意与日本合作，则日本将不再追究。今后日本所采取的手段，是尽速给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使其丧失战斗意志”；并扬

言“战局扩大到华中、华南的今天，消极的局部解决已成不可能，已经到了不得不断然积极而且全面给予中国军队以一大打击的时候”。

△　日本第七十二届临时会议决定采用《军需工业动员法》，批准追加临时军费20亿日元。

△　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中称，要求中国“从速反省，以适应日本的要求”；要中国正规军及保安队从上海撤走。

△　日本陆相杉山元在议会中称，即使中国未取长期抗战的政策，日本也要在中国消灭抗日意识和战斗意识。

△　周恩来与彭德怀等抵太原，与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及梁化之初步交谈。

△　林伯渠自西安电张闻天称，陈独秀派罗汉及李侠公拟会见张闻天，要求恢复其中共的组织关系。

△　察哈尔省政府移蔚县办公。

△　上海市商会致电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请求增发法币或代用券，收集各地新收农产品；实行中央储备银行法，采用实物准备，统制外汇，管理对外贸易以堵漏洞；对日停付庚款。

△　全民通讯社在太原成立，李公朴任社长。

△　美总统罗斯福对记者称，美国政府对中日冲突现仍取期待态度；美国人民现仍留华者，应自负一切责任。

△　美海员联合会、纽约海员公会、国际码头工会，一致主张禁止战争用品运往日本，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美国应出面干涉日本侵华。

9月6日　　军事委员会颁布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为保

持经济重心，巩固首都安全”，“有利于全局之持久作战”，对上海及各处登陆日军，“运用优势兵力断绝其联系，限制其发展”，并努力围攻狮子林及川沙口方面登陆日军，打破其企图。兵力部署分二步：一、限止日军发展，击破各个登陆日军，由张发奎、张治中、陈诚三集团军分别担任；二、限制日军发展，并利用地形、工事，与日军作有利之决战。

△　空军一队飞沪轰炸停泊罗店口外日舰，日驱逐舰两艘中弹起火。

△　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进攻上海宝山县城，我国守军姚子青营长率官兵600余人，与优势日军血战两昼夜，全部牺牲殉国。宝山城陷落。

△　日本军用舰炮及飞机轰击上海虬江码头，我守军伤亡惨重；日军强行登陆，占领该码头。我守军在北王家宅、史家宅、陆家宅三线和日军相持。沪江大学日军也多次向我阵地攻击。

△　我军在津浦线马厂以北猛攻日军，克复唐官屯。

△　国民政府明令军事委员会设置军法执行总监部，命各军恪守军律，“自兹通令以后，无论文、武各级官佐，倘有未奉命令放弃土地，擅离职守，或奉令出发，托故延迟者，概以军律处以死刑，不稍宽假”。

△　国民政府公布《军政部组织法》，凡40条，以军政部管理全国陆军行政事宜。

△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中共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更名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23县，边区政府设延安，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

△　朱德与任弼时、左权率八路军总部自云阳镇出发，经陕西蒲

城、澄城、郃阳，在韩城兰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侯马镇乘同蒲铁路火车北上。

△　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奏报天皇称，“上海的陆上作战迟迟未有进展，需要增加陆军兵力”。日军中央统帅部决定再次增兵，增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

△　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向我天镇守军发动全线攻击，占领城东南之盘山，并向蔚县方向发起进攻。

△　香港界外东河岛电台及瞭望台（属我国政府），均被日海军陆战队强行登岸侵占。

△　珠江口与香港邻近各地，今晨被日舰炮击，我军以重炮还击。日机于清晨飞往汕头投弹。我国海关巡舰在香港附近海面被日舰扣留。

△　日本外相广田在众议院称，中苏条约是消极的，既无密约，也不会赤化；苏联对中日关系无意干涉。

△　牛兰夫妇恢复自由。

△　美、英非正式研究共同封锁日本计划。

9月7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陆海空军奖励条例》，凡25条。

△　教育部颁布战区学生借读办法及容许借读学校。

△　代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在兰州与苏联大使馆参赞斯库林谈话后，认为中苏有进一步签订互助协定之可能，以此电告蒋介石。

△　毛泽东电周恩来称，现时对八路军的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丘两县之南部地区，望周恩来向阎锡山力争，规定上述地区为八路军

活动区域。

△　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赶赴代县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等会商，随后至大同，会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周恩来与阎锡山、傅作义商定：一、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二、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下，成立中共与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组织游击战争，由中共拟出工作纲领；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群众，不干预县政；四、八路军军需补给品，由第二战区兵站帮助运输。

△　行政院公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

△　财政部公布《修正救国公债募集办法》，凡10条；《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组织章程》，凡10条。

△　上海蕴藻浜、张华浜日军同时出击，先向我军炮击，后分乘小筏强度南泗塘河。我军乘日军渡河之际猛烈反攻，消灭日军千余人。

△　日舰彻夜对宝山沙龙港附近我第九十八师周家宅阵地猛攻。我第八十七师在南泗塘反击，毙日军数百人。

△　日本海军飞机轰炸江湾及上海市中心区。

△　空军飞机飞吴淞口外轰炸日舰。

△　我军与日军在北平西郊发生战斗，日军在门头沟伤亡甚重。

△　马厂北激战，我空军前往轰炸日军阵地，日军损失甚重。

△　日军续攻天镇，我军除一部在天镇城内固守外，余部后撤。

△　日军航空母舰一艘抵厦门，载飞机30余架。

△　日舰在珠江口伶仃洋逡巡，日军强占伶仃岛。

△　日本参谋本部自华北方面军转调后备部队10个大队、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两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十联队的一个大队、高射炮队五队赴上海作战。

△　日本对英驻华大使许阁森受伤事件提出复文，对于英国要求道歉及保证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避不答复。英国政府对此深为愤慨，拟撤回驻日大使。

△　英国为增强远东驻军兵力，派军官197人，兵士1150人由英国开来中国。

△　美国政府表示，将仍以赫尔7月16日所提的远东政策作为外交原则，力避引起战争。

△　外交部致国联《补充声明书》，共五点：一、军事及政治状况；二、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海岸；三、日本飞机轰炸红十字会；四、日军恣意攻击非战斗人员；五、日军恣意摧毁文化教育机关。

9月8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第二期作战计划，命各部队停止对日军攻击，转赴各预备阵地严加防守。

△　晨，日军以飞机、大炮猛轰我观音堂路一带阵地。在战车掩护下，日军从沪江大学沿军工路两侧进攻，与我军在杨家宅激战。午后，日军以坦克掩护突破我军第一师阵地。

△　空军夜飞临上海，三次袭击日舰“出云号”。

△　自8月13日至是日止，日军在上海伤亡海陆军官佐及士兵共1.4万余人；内伤混成旅旅团长片山理一郎少将一人，毙大佐三人，伤大佐三人。

△　日运输舰四艘，载援军约4500人（大部为机械化部队）驶入黄浦江。

△　日机轰炸沪杭甬铁路松江车站，我国难民死伤数百人。

△　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由于日舰封锁中国海岸，中国决以空军和其他武力对日舰有所行动。为保护第三国的生命财产，希望各国军舰和商轮航行于中国海岸时，应竭力避免与日舰接近，以免发生意外。

△　绥远境内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致电傅作义称："我蒙境虽小，甚愿竭尽绵薄，用听驱策，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　周恩来电蒋介石，要求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陕甘宁边区官员名义；又电何应钦称，八路军正开赴抗日前线。

△　张闻天、毛泽东电复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赴延安一谈。后因大雨受阻，罗、李二人未赴延安。

△　晚，胡适离开南京前，劝汪精卫、高宗武对抗日勿太性急，勿太悲观。

△　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为基干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派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为基干，设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派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修、周伯敏、辛树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英庚款会应教育部之请，拨款50万元作为两临时大学开办费。

△　菲律宾侨胞认购救国公债达500万元。侨胞首领李清泉、杨启泰二人各认购10万元，詹孟彬、李文秀二人各认购五万元。

△　台湾革命党宣告与祖国一起努力抗战。

9月9日　　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议决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防参议会，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张群任秘书长。

△　国防参议会成立，人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秦邦宪；青年党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国社党张君劢、张东荪；国民党陈布雷、周佛海、陶希圣；无党派人士张伯苓、傅斯年、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罗文幹、蒋方震（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沈钧儒等。

△　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呈请辞职，魏道明继任行政院秘书长。

△　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会晤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商定援华事项，执行细节由杨杰、张冲、王叔铭与苏方代表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先后四次会议商定。苏联同意中国承购军用品及派遣军事技术人员，包括：一、飞机225架，机上用炸弹、机枪子弹及空军教练与技术人员89人；二、战车82辆，外加修理车五辆；三、高射炮20门、45公厘战防炮50门，相关教练及技术人员32人。9月15日，苏联战斗机起运阿拉木图，经数日装配完成后，即行东飞。自10月下旬以后，苏联供应中国的军火、飞机、战车、火炮及军事技术人员相继先后到达中国；飞机后增至232架。苏联援华全部军火价值美金3000余万元，合法币一亿余元。

△　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等26人发起建立陕北公学，由成仿吾任校长。该校设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系，每系招收200人。

△　周恩来与彭德怀自山西北部前线返抵太原，电告朱德、任弼时转毛泽东：关于在河北13县发动群众的工作，阎锡山答应与八路军合作。

△　宋庆龄、蔡元培及胡适等联名向西方各文化领袖及研究院呼吁，声讨日军屠杀贫苦难民罪责。

△　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名誉主席方振武，由新加坡启程回国。

△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由桂林赴南京。

△　陈独秀由南京乘轮船去武汉。

△　罗汉与李侠公电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与要求，请中共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回党工作。按：陈、彭、郑三人均于民国十八年（1929）被中共开除出党。

△　日军在淞沪战场继续总攻，西自罗店，东至市中心等处展开主力战。上午，日舰炮轰我虬江码头第五十七师阵地，我军伤亡惨重。月浦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向我第九十八师阵地进攻，我军伤亡甚重，日军被迫退去。浏河以南日军企图对我偷袭，为我军击退。

△　日本参谋本部下第六号动员令，增派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牛岛贞雄）、台湾守备队（编成重藤支队，台湾守备队司令官重藤任支队长）、野战重炮第五旅团、独立野战重炮第十五旅团等部队开赴上海。

△　日本海、空军夹攻汕头，战事激烈。

△　北平门头沟伪军刘桂堂率部反正，焚毁日机七架。

△　是日至10月9日，日军在山西连续血洗天镇、阳高、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原平等地，屠杀无辜平民1.6万余人。

△　西南川、湘、黔、滇、桂五省公路联运，于长沙开首次会

议，并成立办事处。

△　中央银行设昆明支行。

△　长江各埠美侨约1000余人集中汉口，准备撤至马尼拉或返美国。

△　在沪日商联名致电首相近卫，陈述上海战事发生后，日商损失以及破产情形；要求将长谷川、大川内等撤职查办。

9月10日　浙赣铁路全线通车。该路东起浙江省会杭州，中经江西省会南昌，西迄湖南株洲，全长1004公里，对抗战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　晨5时，吴淞日舰炮轰月浦及杨行附近第九十八师及第一师阵地，继以坦克掩护步兵2000余人向我阵地攻击前进，我军击毁日军坦克三辆。下午，第一师右翼张家村阵地被日军突破，张家村、吴家宅失陷，我军与日军双方于庙村附近激战。浦东方面，下午，日军企图于春江码头登陆，被我第五十五师击退。拂晓，日军对南海塘第八十七师攻击甚烈，经我军两翼包抄，毙日军甚多，日军不支而退。

△　津浦线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突破马厂，宋哲元部南撤。

△　日机猛烈轰炸青县、沧县。

△　平绥线阳高失陷。

△　平绥线第六十一军李服膺部自天镇撤退。日军逼近大同。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福建省主席陈仪，兼代驻闽绥靖主任。

△　军事委员会任孙连仲为第一军团军团长。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通电全国敬悼抗战诸烈士称，我军各路将士，“莫不以血肉搏敌，争为先登，其忠勇奋发为国牺牲之精神，实为从古以来所仅见……。南口之役，罗芳珪全团与壕堑同毁；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士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泣鬼神。……愿我全国军民益加淬砺，群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而后国家之永久生存可保，后死责任可完，壮士之英灵可安。含血蘸泪，布此至诚，愿我邦人，咸凛斯意”。

△　朱德、彭德怀遵令改编，发就职通电称：“8月22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委任令开，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即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复林伯渠称：“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陈独秀始终拒绝回答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三项条件。

△　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代理书记、红军三团团长何鸣，率部开赴漳浦县城中时，被第一七五师包围缴械，人员失散。活动于赣东北弋阳地区的红军杨文翰游击队，活动于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红军刘维泗游击队，因坚持“左”倾关门主义，拒不下山，遭国民党部队消灭。毛泽东电林伯渠转董必武，在湘鄂赣区的谈判中，红军游击队不许轻易移驻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游击队中任职。

△　云南省澜沧县属另设沧凉设治局。

△　广东省认购救国公债3000万元。

△　教育部颁发各级学校劝募公债办法，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按月薪认购50％；中小学教职员按月薪认购30％；专科以上学生认购或劝购至少10元；中学生五元。

△　上海办巡回文库供抗日将士阅读。

△　日本参谋本部第三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至上海实地视察后，返回日本报告称："华军之抵抗非常坚强，即使受到炮击，或受到包围，也绝不后退；华军第一线兵力约19万人，第二线在停战区内，推定尚约27万至28万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之心极强；日本派遣军因由军舰应急输送，后方不继，第三、第十两师团陷于苦战。"

△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为防台湾民众抗日，设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

△　第九十八届国联行政院常会开幕，我国代表顾维钧出席会议，奉令将日本封锁中国海岸、轰炸非战斗人员、破坏教育文化机关等暴行作成补充声明。

9月1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电贺朱德、彭德怀就职。

△　军事委员会按各战区战斗序列，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　军事委员会以第一战区所辖津浦、平汉两铁路线部队过于庞杂，指挥困难，特划津浦铁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任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一集团军、骑兵第三军及第六十七军等部队。

△　八路军（习惯上称第十八集团军为八路军，下同）在南京组织办事处，由叶剑英负责。

△　空军飞机两度飞临上海，炸伤日舰五艘。

△　日军第十一师团陷月浦，第三师团陷杨行，我军转进至浏河、罗店、蕴藻浜至江湾一线预备阵地，重新部署。

△　日本参谋本部调华北方面军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及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到上海作战，编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

△　我天镇守军弹尽粮绝，突围南退，天镇陷落。日军沿铁路线西向进攻，大同告急。

△　平绥线日军酒井旅团犯怀来、涿鹿，铃木旅团向宣化前进，本间旅团趋大同，期会师于涞源、广灵、大同之线。

△　察哈尔境内日军第五师团陷蔚县，察哈尔全省沦陷。

△　日军第十六师团先头部队在塘沽登陆。

△　日本参谋本部调第十八师团至“满洲”待命。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命令第二军迅速侵入沧县以南，后以主力准备向保定南侧推进。日军第二军占领马厂、青县；第一军遵照方面军作战计划和命令，下达攻击命令。

△　四川省认购救国公债1700万元，河南省认购700万元，陕西省认购100万元。

△　台湾革命大同盟总部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共起抗敌，回归祖国。

△　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法大使顾维钧赴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

△　英国工会大会通过决议案，对于中国人民抗战表示同情，谴责日本侵略暴行。

△　美国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声明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为非法。

9月12日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成立，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副总监谷正伦、王懋功。

△　宋美龄在南京对美国发表广播演说，指出日本毁灭人类文明，各国不应熟视无睹。

△　毛泽东就“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致电彭德怀解释称，必须坚持依靠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　军事委员会令各省、市限期完成民间防空设备。

△　晨，日机与日舰炮火猛击我南泗塘一带阵地，飞机与大炮轰击我第五十一师曹王庙、浦家苗阵地。午前，日军对永定桥以南我第七十八师阵地攻击，并向前推进至新宅、张宅、秦家塘附近，经我军出击，恢复原阵地。同日，日机狂轰闸北。

△　日本答复英国所提将上海划为中立区称，此问题最好由上海军事当局与各国外交代表就地磋商。

△　日军在上海杨树浦执行海关事务。

△　十七省、市在上海成立救国公债劝募会，认购公债总额近9000万元。

△　云南炼锡公司认购救国公债375万元。

△　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就日本侵华事件向国联秘书长提送申诉书，请求援用国联会章条款，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处理中日问题。

9月13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通令各战区全体将士，沉着应战，抗战到底，摧毁日本侵华野心，以壮烈牺牲达成复兴民族之使命。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第五军团军团长。

△　上海我守军自11日退守沿江第一道防线后，今日晨全部进入第二道防线。新阵线自闸北至江湾以迄浏河。

△　日军以主力攻我上海永安桥第一军阵地，双方反复冲锋，伤亡甚重。桥南一处被日军占领。日军以炮火掩护，从月浦新镇向陆福桥北朱店、关家桥阵地攻击；另有一队向顾家角、张宅等阵地攻击，战斗激烈。

△　日军在上海向我军顾家阁、徐家阁、永安桥一线发动第一次进攻。

△　平汉线我军克复长辛店车站。

△　大同失陷。我军于平型关外广灵、炭堡、乱石关一线占领阵地，由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统一指挥。

△　日舰猛烈轰击广东大鹏湾附近数处设防阵地后，海军陆战队在大鹏湾登陆。

△　周恩来派南汉宸至太和岭口见阎锡山，建议迅速运送八路军至涞源、灵丘一带，以巩固恒山山区；对日军作战应采取侧击和扰击方式；并提交动员委员会纲领。

△　周恩来电告张闻天、毛泽东与阎锡山谈判情况，提出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区，依据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一俟情况有利时，可沿太行山西侧向南发展；建议调游击干部至绥远发展游击战争，并拟议由聂荣臻或邓小平代表八路军方面主持动

员委员会工作。

△　军事委员会制定非常时期处理军事犯办法。

△　湖北省认购救国公债1200万元，安徽省认购600万元，南京市认购100万元，汕头市认购100万元。

△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呈请国民政府大赦政治犯。

△　英驻华使馆参赞访晤日驻华大使川樾，交涉上海划中立区问题。

△　世界国联同志会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临时会议，比利时代表罗林主席，讨论中国所提关于日军暴行案。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请国联向日本作最后呼吁，促其遵守盟约。该国若拒不接受，国联各会员当即发表宣言，声明在金融及其他方面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对于任何集体行动，凡制止日本对华侵略，亦均愿合作。

9月14日　第五十一师攻击罗店以北日军，午后进抵张家堰、洪家宅、丁家桥以西之线。日军以炮及战车掩护优势兵力，向顾家角、吴家桥阵地猛冲，与我守军激战，伤亡甚重。入夜，此处阵地为日军所陷。日军对我爱国女校及八字桥一带阵地猛烈轰击。

△　陈诚以杨行于本月11日失守，向蒋介石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但蒋介石为要取得国际的同情与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下令“死守刘行”。

△　连云港外有日舰三艘、航空母舰一艘，并附小艇30余艘，我国特将港口封锁。

△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与第二军分别沿平汉线与津浦线向南发起进攻。第一军自北平附近出发，分三路向涿县、保定地区大举进犯。

△ 日军自攻占察哈尔省后，即向山西北部进攻，图据山西北部以控制华北。日军第五师团向平型关推进；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向应县、山阴推进，以一部由丰镇向集宁推进，一部向左云、岱岳镇推进。

△ 广灵失守，我守军一部在广灵南各要口扼守。

△ 我军一度攻入张家口，日军猛烈反攻，我军被迫退出。

△ 日机轰炸石家庄、高碑店。

△ 日舰犯广东虎门和福建厦门，均被击退。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电告中共中央，已将一旅及师直属部队集中大营，准备待日军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相机袭击日军后左侧，歼其一部，以扩大战果。

△ 张闻天、毛泽东电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称，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 毛泽东电林伯渠等称：“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并称“关系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德）、周（恩来）在京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决定之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

△ 周恩来电张闻天、毛泽东称，八路军在第二战区驻地即成为政权力量，八路军代表应参加与领导战区动员委员会。

△ 行政院所属职员，限以一个月薪额购救国公债。

△ 谢冰莹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一行18人，自长沙出发赴上海。

△　英驻华大使馆代办贺武至南京，会晤王宠惠外长。

△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报告已向苏联购飞机225架，坦克车82辆及其他武器。

△　由章乃器、艾思奇、夏征农等编辑之《前线》五日刊出版。

△　美国禁止用政府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前往中、日两国。

△　美、英、法、意、荷等国驻沪海军司令，通知上海市长俞鸿钧与日方长谷川，要求中、日双方飞机勿飞越租界上空，高射炮勿向租界射击。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电国联大会，揭露日军在华暴行。

△　顾维钧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会议宣布将中国的申诉列入大会议程。

9月15日　上海罗店失陷。同日，军事委员会调黄杰第八军所属税警总团，自海州径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　淞沪战场日军对我爱国女校及八字桥一带阵地猛轰。日机在江湾、庙行上空盘旋。日军以步兵、炮兵、飞机相结合，攻击我刘行第一军阵地，我军奋力抵抗，伤亡甚重。我军守备陆福桥北朱店、侯家宅及南北塘口之部队，与日军激战竟日。

△　日军抵达淞沪者计有第一、第三、第十一师团及第六、第八、第十六师团之一部，炮300门，战车200余辆，飞机200架。我军为第九、第十九、第十五集团军所属各部队，与日军双方相峙于北站、杨行、浏河之线进行激烈争夺战。

△　平汉线日军以板垣征四郎为指挥官，率第五、第二十师团，其一部由固安渡永定河。

△　平汉线日军向长辛店我军阵地猛烈炮攻。我军正向琉璃河方面开进中，战斗空前剧烈。日机迭次飞涿县、保定等地轰炸。

△　陷广灵日军继向我七十三师松林山阵地侧击。我军奉命向右线转移阵地。

△　日机轰炸洛阳，我国驱逐机腾空迎战。此为华北首次空战。

△　日机袭广州。

△　军事委员会制定《惩治汉奸条例》，通令施行。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电吊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

△　成渝铁路分段修筑，先修筑重庆至永川段。

△　美海军部宣布，禁止废铜铁出口。

△　顾维钧在国联大会演说，要求国联对日本采取措施，至少要将中国的提案提交由美国参加的咨询委员会处理。

9月16日　我军收复罗店。同日，日军在浏河及小川沙港两处登陆。日军炮击浦东，但登陆企图未得逞。

△　日军陷大同后，千田兵团5000余人沿铁道线北进，迫近丰镇车站。

△　日军攻占河北永清，万福麟军与冯占海军损失惨重。

△　平汉线日军迫近涿县，以一部攻城，一部陷松林店，并向高碑店进攻。我军孙连仲部坚守阵地待援。

△　日军由广灵西进，陷浑源县城；另部由蔚县南下。

△　由蔚县经石门峪南进之日军，向灵丘东北80里我军刀泉阵地

攻击。我军与日军激战终日，双方伤亡甚重。

△　日机狂炸保定，为我军击落二架。

△　蒋介石电嘱杨杰、张冲与苏联洽商，提前运送所购驱逐机来华。

△　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贻误战机，迭失要地，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命令将其扣获送执法总监部法办。10月3日，阎锡山亲加审讯后，深夜予以处决。

△　是日至19日，周恩来、彭德怀赴河北保定、石家庄，与第一战区将领徐永昌、程潜、刘峙、冯治安等会晤，商谈八路军一部进入河北阜平地区作战计划。第一战区将领对八路军出师抗战一致支持。

△　毛泽东电复朱德、任弼时称："拟以一一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一二〇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一二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　江西省承购救国公债1000万元，贵州省承购350万元，河南省承购1000万元。

△　日本政府发言人称，国联若对中国之申诉采取积极行动，则日本将与国联完全断绝关系。

△　国联行政院决定，指派远东顾问委员会调查"中日冲突在远东引起的局势"。

△　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委员会决议援助中国抗战。

9月17日　日军在上海杨行一带向我军发动第三次进攻。罗店再度陷落。同日，我军调整部署，全线退守上海北站、江湾、庙行、朝

王庙、罗店西南及双草墩之间。

△　蒋介石电驻苏大使蒋廷黻等，询苏联飞机到兰州事宜。

△　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第一二九师适时进到吕梁山区；第一二〇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区；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酌情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山脉中。

△　毛泽东电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称，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计划已不适用，应改变原来的部署，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和扩大自身；如部署得当，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毛泽东电报提出，将八路军三个师分散布置在山西东北、山西西北和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脉。经周恩来交涉后，第一一五师继续开赴以恒山为依托的山西东北地区；第一二九师随第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后，开往以管涔山为依托的山西西北部地区。

△　日机在琉璃河、松林店、高碑店、定兴、保定各地猛烈轰炸。

△　日军突破永定河、琉璃河、房山阵地，孙连仲部南退满城、完县。

△　陕西省承购救国公债400万元，甘肃省承购300万元，西康省承购100万元。

△　实业部提出战区工厂内迁，对后方工厂加强管理，推行手工业生产以补工业不足的办法大纲。

△　驻美大使王正廷因美国禁止军火运华，向美国务卿赫尔提出抗议。

△ 诗人陈三立病逝北平。

△ 国联行政院讨论中日争端问题。

9月18日 我军再克罗店，团长李友梅殉国。我国空军六次飞沪，袭击杨树浦日军阵地。

△ 涿州、固安相继失守。

△ 日军全力猛攻灵丘，我军转移至新阵地。

△ 日伪军攻陷商都。

△ 日军向正定、德县之线进击。第五师团协助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作战，进攻保定。

△ 日军第二十师团进至涿县以南地区，第六师团进至拒马河左岸辛桥地区，第十四师团迂回至涿县以南松林店地区。我军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团在高碑店以北，第三军在清河右岸，阻止日军前进。我军与日军双方进入混战状态。

△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令关麟徵率部加强新安、漕河镇至满城阵地，拒日军南下。

△ 陆军中将刘文辉、杨森特加陆军上将衔。

△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认为八路军取消政治委员，改各师政治部为政训处，有损部队政治工作，建议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

△ 上海各界民众纪念“九一八”六周年，全市一律下半旗，并素食一天，节款慰劳将士。正午，全市民众就地起立，宣誓效忠国家。

△ 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工作人员于“九一八”六周年，举行抗敌

自卫宣誓。

△　延安召开各界纪念“九一八”六周年抗战动员大会，通过《告边区同胞书》、《致全国抗敌将士电》。

△　教育部于南京、上海、广州、汉口、济南、太原六处，筹设留日同学战时工作特别研究班。

△　山西省总工会在太原成立。

△　驻美大使王正廷谒美总统罗斯福，罗氏告以对华禁运军火命令乃避重就轻办法，军火由美可先运至香港、安南等处，再行转运至中国。

9月19日　毛泽东电彭德怀：“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开始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日军以有效的钳制作用。”“因此，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

△　津浦线我军反攻，日军向青县溃退。

△　日机30架轰炸南京，我空军出动飞机23架与日机展开猛烈空战，击落日机三架；我机被日机击毁四架。

△　日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通知驻上海各国领事，自21日正午起，日机将对南京作大规模轰炸，各国居住南京及附近之官员和侨民应采取妥善步骤，自动撤入较为安全地带。

△　上海编辑人协会、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召开编辑人及著作人会议，讨论战时出版界动员计划。

9月20日　蒋介石接见外国记者称，日本有一兵一卒仍在中国领

土之前，决不放弃奋斗。

△　蒋介石电嘱杨杰等，再向苏联增购驱逐机150架、重轰炸机30架。杨杰复电，16架驱逐机已运送回国。

△　张冲奉蒋介石命与苏联驻华大使奥立斯基商谈有关托派、动员及军务诸问题。是日，张冲将谈话情形呈报蒋介石。

△　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动员委员会在晋西北、晋东北、雁北和察哈尔、绥远等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起重大作用。

△　张闻天、毛泽东电告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伯渠等，拒绝国民党派人至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中任职。

△　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被撤职留任。

△　上海市长俞鸿钧复英、美、法、意、荷五国驻沪领事所送照会节略称："欲求租界安全，勿令日方依之为侵略工具。"

△　我军与日军在罗店西相持。罗店、刘行线战斗激烈，罗店东村落发生激战。浦东亦有激战。

△　日机50架袭击南京与苏州车站。

△　平汉线日军突破我军徐水阵地，直逼保定。

△　山西日军分两路向我军猛攻，我炮兵在右玉城对日军猛击。至晚7时，我军退威远、威平两堡。此役我骑兵伤亡甚重。

△　晋北灵丘失守，我军退守平型关。

△　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大批飞机掩护，企图在连云港登陆，被我击退。

△　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大学于江西贵溪设联合大学。

△　福建省政府职员举行抗日自卫宣誓。

△　中华台湾革命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　孔祥熙在日内瓦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谈话，李维诺夫建议太平洋各国召开会议以支持国联行动。

△　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谒天皇上奏作战计划，拟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上海发动攻击，使中国屈服；以上目的不能达到，即停止陆上兵力的积极作战，并节约直接对华作战兵力，将必要部队调到“满洲”与华北，作对苏联作战的准备，以备战争长期化。

△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漫画》出版。

△　法国声明，不承认日海军在中国海面检查商轮。

9月21日　　蒋介石电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陈诚、张发奎等，调整第三战区军队部署：“（一）司令长官由本委员长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二）左翼军司令陈诚，右翼军司令张发奎。（三）左翼军以第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组成之。（四）右翼军以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组成之。（五）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副总司令黄琪翔。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吴奇伟。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兼，副总司令罗卓英。（六）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　晨6时，上海刘行日军向我第六十六军陆福桥阵地进攻，我军猛烈冲锋，将日军击退。罗店方面，上午8时，日机20余架向我第四

军尤梅宅、苏陈宅、张家宅、金村之线攻击，经剧烈战斗，我军工事被日机、炮毁坏殆尽，金村、张家宅为日军所占。

△　日军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一艘载海军陆战队在崇明岛登陆。

△　津浦线日军第十师团与庞炳勋部激战于姚官屯。经11昼夜激战，日军突破我姚官屯防线。

△　我国宣布封锁常熟福山港。

△　蒋介石对法国《巴黎晚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希望各国对日本之侵略作有效的制裁。

△　蒋介石电孔祥熙与法国交涉，允许我国所购苏联军用品运安南起货。

△　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开会，我国代表顾维钧照会该委员会，要求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中国不设防城市及平民的狂轰滥炸；我国代表团虽作多方努力，而英、法代表不同意宣布日本为侵略者。

△　毛泽东再电彭德怀称："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　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至晋东北地区活动，第一二〇师挺进至晋西北抗日前线，第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地区。

△　周恩来陪同朱德自太原抵代县太和岭口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的游击地区、部队驻扎地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朱德与周恩来应允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

△　河南省政府颁布《优待军人暂行办法》。

△　四川省政府制订公布《四川省各县市民力统制实施办法》。

△　青海省认购救国公债50万元，宁夏省认购100万元。

△　日本宣布大举轰炸南京后，英、法分别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称，两国军舰决不驶离下关江面，英、法大使馆也决不离开南京。两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境内有向英、法官方提出此种要求或劝告的权利；两国人民生命如有不测，财产如有损害，均当保留要求赔偿之权。

△　美驻日大使格鲁向美国政府报告称："日本军部对于美国政府对待中国事件的严格中立态度，深表感谢。"

△　顾维钧、孔祥熙在日内瓦会见法国外长台尔博斯，谈论国联的情况和法国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法外长对中国表示同情。

9月22日　　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7月提交国民党方面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称："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困难了。"《宣言》提出的奋斗总目标，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并"向全国宣告：（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　张闻天、毛泽东电秦邦宪、叶剑英称：“宣言既已发表，目前谈判须解决者，应着重下列三事：（一）发布共同纲领。（二）解决边区问题。（三）解放报（按：指《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

△　国民政府命令：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改隶行政院，仍由蒋介石任禁烟总监。

△　蒋介石电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我军须固守保定、满城各重要据点。”

△　河北方面日军向漕河阵地攻击，于晚8时占领满城。

△　日军步、炮联合5000人由灵丘南进，向我第七十三师平型关阵地攻击。

△　日机两次分批袭南京。

△　日本大批飞机袭击江阴封锁线舰艇，我海军击落日机五架，我“平海”、“应瑞”两舰受轻伤。

△　广州遭日机四度空袭，市民死伤甚多。广九铁路暂时中断交通。

△　日本政府对英驻华大使被炸伤案提出正式复文，英国表示满意，本案结束。

△　日本政府拒绝参加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中日问题会议。

△　日军第十六师团攻陷大城，沿子牙河南进；第十师团攻占沧县后继续南进。我第一集团军在泊头、冯家口、东光等地逐次抵抗。

△　美、法两国为日军轰炸南京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9月23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并称国共两党“皆已深刻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感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蒋氏并称，在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蒋介石在最后结语中称：“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政，挽救危亡。”《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确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奠定了两党团结抗战救国的基础。

△　毛泽东电复彭雪枫并转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出在山西开展游击战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指出：“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从太原进抵五台县南茹村。

△　日军主力向刘行方向猛攻，我第一五九师、第五十九师伤亡甚重。

△　日军大举侵犯平型关，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即令第八十四师出击，战况激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令傅作义率预备队加入右翼阵地作战。

△　日机72架集中轰炸我“宁海”、“平海”两巡洋舰。两舰官兵英勇发炮抗击，击落日机四架；两舰亦被日机炸伤后沉没，我伤亡官兵60余员。我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自“平海”舰移至轻巡洋舰“逸仙号”继续指挥作战。

△　日机空袭武汉三镇，死伤800余人。

△　日机两袭广州，市民死伤数十人。我击落日机一架。

△　阎锡山电朱德：“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明（24日）拂晓可到，希电林师（按：指林彪第一一五师）夹击敌之侧背。”同日，朱德、彭德怀电令林彪，第一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

△　教育部批复中央大学由南京迁校重庆。10月上旬，中央大学开始迁校；11月下旬，承民生公司大力协助，全校师生1500余人及图书仪器全部到达重庆沙坪坝松林坡新校址；12月下旬，在新校址开学上课。该大学为我国抗战时期西迁高等学校中，最为迅速完整西迁之学校。

△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条例》，凡17条。

△　英国共产党书记波立特主张援华抗日，提出由国联制裁日本，组织救护队来华等。

9月24日　　蒋介石为日军封锁我国海岸答外国记者称：“海岸封锁，打击他国实大，影响中国甚微，愿各友邦均守条约义务。”

△　毛泽东电周恩来、朱德等称，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的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应在该处设置类似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机关。

△　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将第一二九师速开赴正太铁路南

北地区，组织游击战争，以后逐步向西南山区转移。中共中央军委接受此一建议。

△　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率部出川抗战。

△　上海日军从罗店、刘行、江湾到八字桥一线展开全线总攻，以炮兵及坦克掩护步兵，向我刘行及罗店南阵地猛攻，战斗激烈。我军左翼吴奇伟、叶肇军正面被日军突破，后退至第二线预备阵地。

△　平汉线保定与津浦线沧县相继失守。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南移，宋哲元、庞炳勋部全线撤退。我保定守军全部退至滹沱河南岸。日本华北方面军将战线推至石家庄——德县一线。

△　我军平型关战役指挥官傅作义及杨爱源与第一一五师联络参谋商定，25日拂晓对日军展开反击行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平型关经两昼夜苦战，天雨骤凉，缺衣缺粮，旅团长三浦下令乘天雨之际，于25日拂晓发动夜袭，企图突破内长城一线。我军与日军不约而同下达于25日晨攻击命令。

△　日军攻陷集宁。

△　项英至南昌，与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等会谈，就解决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问题交换意见。项英与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项英派员前往各游击区传达意旨。省政府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有报复行为。

△　实业部通令全国工厂加紧生产。

△　美国政府训令亚洲舰队，“留驻现在地区，无论中日战争至何地步，皆不得撤退”。

△　瑞士万国红十字会代表华脱维尔大佐来上海，协助我红十字

会战地救护工作。

△　英国总工会致函我国驻英大使馆慰问被炸市民。

△　中英庚款公费留英学生24人抵伦敦。

9月25日　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与我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及第七十三师孙楚部连日激战后，继续向平型关方向进攻。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之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是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马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日军进入第一一五师预伏地区。第一一五师立即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并趁日军陷于混乱之际，一面封闭日军南窜之路，又复切断日军退路，一面适时对日发动冲击，压缩日军于狭谷之中，使之陷入四面包围形势。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与第六八五团遂全歼该部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俘获日军士兵一人。平型关战役，为我国抗战开始以来所获得的一大胜利。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责令战区县长守土抗战称："战区县长责任重大……如遇敌人侵犯，尤须死守城池，尽力抵御；倘有放弃失守城池者，决按军法以退缩论，定予枪决。"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抗日战争的形势，急需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

△　毛泽东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转告林彪，待日军在华北相当深入后，以第一一五师收复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在此四县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大同、张家口、北平一线，向大同、太原一线，向北平、石家庄一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

△　朱德、彭德怀暨全体八路军指战员，发出《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宣传八路军宽待俘虏政策。

△　阎锡山应允八路军独立负责驻区内之群众工作，实行减租减息；组织游击队发给枪支；不好的县长可以撤换。

△　日机96架五次轰炸南京，中央通讯社、中央大学大礼堂、下关电厂、市政府卫生所被炸。同日，日机三次轰炸广州。

△　日军集中大批飞机至江阴攻击我“逸仙号”军舰，全舰官兵奋勇抗击，击落日机二架。“逸仙号”与驱逐舰“建康号”均被炸沉。

△　我国旅日侨胞2.9962万人，七七事变后，已返国1.6903万人，内留学生约5000人；现待船归回者尚有500余人。

△　桂林至贵阳长途电话通话。

△　伦敦英国全国和平会及妇女国际同盟，通过对日抗议决议案：一、向伦敦日本使馆提出抗议；二、主张英国政府对日本应施加压力，以阻止其在中国屠杀。

△　我国代表杨虎城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上发言，指出中国现在正一致抗日，中国抗击日本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最好的保障。法航空部长谷特亦出席大会，请杨氏转告中国同胞，日本现既出于侵略行为，自应为法国人所唾弃。

9月26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平型关大捷特电朱德、彭德怀称：“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

△　毛泽东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　宋庆龄在《救亡日报》上发表《国共合作的感言》一文，欢

呼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命赴美抵旧金山，开始在美国、加拿大各地演讲，说明中国抗战决心。

△　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顾维钧在日内瓦对美国广播，希望美国给予中国精神与物质援助，以抵抗日本侵略。

△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指挥第六集团军等部迅速击破平型关日军，并命第六十一军速援平型关。

△　财政部通电军警机关，保护人民以硬币兑换法币及购买救国公债。

△　钱塘江铁桥修筑完成通车。按：钱塘江铁桥工程处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5月25日成立；11月7日，茅以升任工程处长；11月11日正式开工，历时三年完成。桥长1387公尺，在杭州横跨钱塘江上。

△　我军在上海罗店大举反攻，克复刘行与杨行间之军事要点永安桥阵地。

△　日伪军猛犯陶林，我守军退守包头。陶林失守。

△　日机冒用我国国徽标志飞广德轰炸。我国以日军此行为易引起国际误会，通知沪租界当局各国军舰切实注意。

△　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中将于日军占领保定后，飞往济南访晤韩复榘，劝其加入将于北平成立之华北五省傀儡政府。29日，韩复榘发表声明，否认土肥原来济南商讨山东加入“华北五省自治”事。

△　苏驻日大使抗议日本空军轰炸南京。

△　全印民众代表大会在印度全国发动举行“中国日”，谴责日本侵略中国。

9月27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要塞堡垒地带法》，凡17条，规定“国防上所设各种要塞堡垒之区域，称为要塞堡垒地带”。

△　日本关东军第十五混成旅团猛攻晋北茹越口，我守军第二〇三旅第二二七团顽强抵抗，损失甚重。茹越口失守，我军退守铁角岭继续抵抗。

△　日舰再犯虎门，向沙角炮台开炮；我军迎击，日舰受伤逃遁。

△　日机袭南京、广州、杭州、宁波、德州、徐州等地。南京硫酸铔厂被炸毁。

△　军事委员会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拟定迁厂方针。翁文灏主持工矿调整委员会会议，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军委会第三部、第四部及资源委员会均派代表参加，专门讨论工厂内迁问题。规定应迁移的工厂，一类指定军需厂矿，一类为普通厂矿。

△　实业部长吴鼎昌与铁道部长张嘉璈致电蒋介石，要求通令全国各产业机构延长成年工人工作时间。

△　军政部长何应钦电项英、陈毅称：“顷接赣省政府电告，两兄敌忾同仇，情殷抗日，殊为钦佩……嗣后借重之处必多。目前改编贵部一切手续，请就赣省政府接洽办理。”

△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林伯渠，为迅速解决陕甘宁特区问题，应向国民党方面提六项最低限度条件：一、承认特区的民选制度，特区政府经人民选出后，可由国民政府加委；二、加委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九人为特区政府委员，林伯渠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三、设民

政、建设、教育、农工、财政五厅及保安司令部；四、特区范围包括宜川、鄜县、洛川、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西峰镇、镇原、预旺、环县、盐池、定边、安定、靖边、横山南中部、安塞（包括瓦窑堡）、米脂、绥德、清涧、葭县、吴堡、神府苏区、延川、延长在内；五、特区经费每月15万元，善后遣散费60万元；六、保安师编制9500人。

△　周恩来出席山西省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鼓励牺盟会担当与组织山西民众抗日的责任，完成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大业。

△　我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会议，顾维钧在会上发言。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轰炸中国不设防城镇。

9月28日　上海日军发动第四次总攻击。进攻八字桥、复旦大学一带阵地的日军，被我第三十六师守军击溃。上午，日军攻击我刘行阵地，双方发生激战。

△　我空军30架飞平型关助战。

△　保定失陷后，我军平汉路战线改由程潜任指挥官。

△　平汉线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陷定县。

△　日机空袭南京、芜湖、杭州、嘉兴、徐州、淮阴、广州、句容等地。

△　朔县陷落，守军何柱国部600余人全部牺牲殉国。

△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请批准病假一个月，所任职务由冯治安暂代。

△　毛泽东电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转朱德、彭德怀、贺龙

称，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守，第一二九师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至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服装弹药，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　朱德与彭德怀电张闻天、毛泽东、任弼时等，河北涞源、山西灵丘和广灵地区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可以向山西浑源、繁峙、五台、盂县及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互相呼应。

△　周恩来获悉项英、陈毅在南昌与国民党当局接洽改编红军游击队后，分电项英、陈毅、傅秋涛、叶挺等，嘱其立即相互取得联系。

△　行政院公布《金类兑换法币办法》。

△　国民政府撤销陶行知通缉令。

9月29日　蒋介石电嘱杨杰、张冲等向苏联购买轻机枪一万挺，并配足子弹。

△　周恩来会见第一战区高级参议何遂，分析河北战局，认为华北的抗战必须开展游击战争。

△　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称，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的游击战争。根本的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如实行这一计划，在一个时期内开展一新局面，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　毛泽东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指出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

产党在8月25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朱德在豆村参加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会议，与阎锡山、卫立煌商谈布防问题。

△　上海全线炮战激烈。日军猛犯罗店、刘行，遭受重创。

△　“楚有”舰在江阴为日机炸沉；“肇和”舰在黄浦江下游为日机炸沉。

△　长谷川清分别访英、美、法等六国驻沪海军司令，要求各国军舰移泊黄浦江下游。

△　津浦线日军陷泊头、东光、连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鹿钟麟自南皮进袭日军。

△　平汉线日军陷新乐。

△　晋北铁角岭陷落，日军急向繁峙南进，夜陷繁峙；梁鉴堂旅长牺牲殉国。阎锡山令各部队向神堂堡、雁门关、阳方口线阵地转移。我军放弃平型关，朱德与高桂滋率部转进五台山。

△　日机空袭芜湖、嘉兴、常熟、徐州、淮阴、广州等地，被我空军击落九架。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召开扩大干部会议，通过《政治及工作决议案》。

△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五、七、八、十军合组为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散处于吉林省东部各地。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凡15条。

△　李济深宣告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拥护政府抗战。

△　胡适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认为美国卷入中日战争漩涡，目前似不可能。

△　英国劳工运动全国执委会决议，经济制裁日本，援助中国，并邀美国参加国际行动。

△　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通过法国代表建立小组委员会建议，以推进和加快顾问委员会工作。顾维钧在会上发言，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国，但未获成功。

9月30日　　日军步、炮、空协同作战，在淞沪战场发起全线攻击。第七十七师正面在严宅、万桥，第五十七师在陆桥等处阵地，同时被突破。左翼作战军为巩固阵地，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之线转进。

△　黄杰率第八军（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之第一、二、三团，第二支队之第四、五团及炮兵、工兵、辎重、通信、特务等营，自海州抵达南翔，归属中央作战军第九集团军指挥，参加淞沪会战。

△　由同蒲路南下之日军突破阳方口。至此，我军内长城防线被突破。同日，阎锡山召开前方高级将领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下令全线撤退；移内长城防线各军，向五台山、云中山、芦芽山一线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县与忻口间组织防御，保卫太原。

△　八路军刘伯承第一二九师由陕西富平县出师抗日，赴山西太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

△　八路军收复朔县。

△　国民政府令：兼代贵州省政府主席薛岳另有任用，着暂由该省民政厅长孙希文代行。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

编原则为：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集中五分之三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

△　朱德与彭德怀电告毛泽东，现在应争取山西战局持久，有利于在山西创造根据地。

△　美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汇寄我国救护病人。

△　国民政府公布《购募救国公债奖励条例》。

△　日驻瑞士使馆发言人称，日空军如有必要，当继续轰炸中国城市，一国或多国干预中日冲突，只能使形势恶化或旷日持久，因为日中关系是关系到日本生存的根本问题。

是月　军事委员会成立工矿、农产、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

△　朱德在五台县台怀镇会见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的薄一波称，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现在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三个战略要地。

△　日军由保定、沧州南犯石家庄、德州时，周恩来电蒋介石，要求迅速武装民众，组织河北游击战争，并派边章五、李锡九前往河北驻军赵寿山、孙殿英部作游击战争准备。

△　周恩来电阎锡山，请其令由平汉线撤退下来的晋军进行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争。

△　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赴五台山，动员同蒲路以东与正太线以北各县民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　高双成所部第二十二军张云衢团开赴绥远抗日，该团所遗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安定防务交八路军接管。

△　周恩来与阎锡山商定，在第二战区所辖晋、察、绥三省范围

内，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阎锡山批准周恩来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

△　周恩来与中共华北局负责人讨论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拟分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晋察冀（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直（冀）南、直（冀）中、冀东（包括平、津）、山东九个战略区。

△　日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作战。日军在淞沪战场总兵力达20万人。

10月

10月1日　　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津浦、平汉、陇海、京沪、沪杭各铁路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传。

△　空军飞机11架今晚四度飞临上海，袭击黄浦江日舰及杨树浦日军阵地。日机亦全日在闸北及大场一带轰炸。

△　日军在淞沪战场实行中央突破，我左翼作战军王东原第十五师、罗霖第七十七师自阵地撤退；刘行失守。

△　昨夜，第六战区鹿钟麟部袭击日军占领下的冯家口等地；是日上午，占领冯家口、北霞口、代庄等处，但袭击泊头镇未奏效。

△　八路军组织四个支队挺进敌后，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截至是日，八路军共击毙日军千余人，毁日军汽车80余辆，缴获九二野炮一门、七三、七五山炮弹3000余发、步枪300余支、机关枪20余挺及许多其他军用品。

△　中央社宣布，我军9月份击落日机48架，击伤日机16架。

△　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会衔布告，禁止市民“侈谈国事”，“如敢故违，即将严于惩处不贷”。

△　军事委员会在广州设立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称兴运公司；11月12日改称西南运输公司，主办国际运输，曾养甫兼任处长。

△　全国经济委员会派员至兰州组织西北公路运输处，洽运由苏联入境物资。

△　四川省政府拟定《出征将士及义勇壮丁优待条例》。

△　财政部颁布《出口及转口税暂行章程》，自是日起实行征收转口税，规定凡民船、铁路、公路运输之货物，除已征过统税及烟酒税的货物外，如经过海关及其分卡时，一律再征转口税一次。

△　汉口复兴沙厂捐款五万元，裕华纱厂捐款三万元，申新纱厂捐款二万元，大成纱厂捐款1.5万元，民生纱厂捐款1.5万元，福新面粉厂捐款一万元，商民徐荣廷捐款一万元，黄安商民程芷涛捐款一万元。军事委员会各给予陆海空军奖状。

△　上海市商会举行执监联席会议，决议发表《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宣言》，并通告各业公会严厉执行。宣言称我国与日本已处于势不两立之敌对地位，“国人为自卫计，为协助政府长期应战，消耗敌人实力计，实有速行国民对日经济绝交之必要”。宣言发表后，上海全市一百数十个同业公会一致响应。

△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

△　湘黔公路开始客货联运。

△　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一般方针“在于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和容共政策，在日、华之间建立真正明朗而永久的邦交，以期实现日、满、华的和睦与共荣”。《纲要》以10月战果为战局终结，预定与国民政府和平解决。

△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声明，反对英国代表召集会议调停中日战争，宣称日本认为在现状下，仲裁显无必要；在中国改变态度，根本抛弃反日政策之前，日本有彻底战至最后之决心。

△　日军中央统帅部发布第五五二号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并指出“在山西省方面的作战地区，大概定为太原以北”；同时命令关东军“以一部列入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应“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当晚，华北方面军命关东军转知属下内长城线以南各部队，列入第五师团长指挥下，同时命令该师团长攻占太原。

△　日军第二十、第六、第十四师团与新加入的第一〇一师团向石家庄方向进攻，先后占领望都、定县、曲阳等县城。

△　日军头篠部5000人与伪蒙军2000人，飞机30架，坦克和装甲车数十辆，攻占代县。日军向崞县急进。日机10余架不断轰炸崞县城。上午，日骑兵200余攻城，被守军第十九军主力击退。

△　日机袭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地，在南昌为我击伤一架。

△　日机与日舰连日窥伺粤海，广东当局自是日起暂行封锁虎门，粤、港间轮船均暂告停航。

△　顾维钧代表向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报告日本侵华经过，并递交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决议草案，主要内容为日本派兵侵略中国，封锁中国沿海，轰炸中国城市，破坏《九国公约》与《巴黎非战公约》。顾问委员会谴责日本破坏国际法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并根据国际联盟《联盟》第十条规定，宣布日本的行为是对国联会员国的侵略。

△　海外侨胞继续不断捐款，支援抗日战争。行政院收到侨胞捐款69起，共计17.35万元。侨务委员会收到侨胞捐款140起，总计约

60万元。

△　英国“大中华运动”召开大会，杨虎城到会致词，讲述中国抗战情形；与会者演说，号召抵制日货。

△　英国红十字会、中国协会与英国各教会等联名发起募捐，用以救济中国受伤平民及因战争而无家可归者。

△　美国反战反法西斯主义联合会与中国之友协会举行大规模集会，提倡抵制日货。

10月2日　上海日军第九师团攻击蕴藻浜、陈家行至唐桥站一线我军阵地，企图由大场以西南侵，切断京沪铁路。第八军黄杰部、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于唐桥站、陈家桥与日军激战。

△　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南方八省13区红军游击队编为一个军，在长江南北及闽、浙两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　军事委员会命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由石家庄经正太铁路至太原。

△　胡适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往晤美总统罗斯福，告以中国战局，盼罗氏放弃妥协思想。

△　毛泽东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至陕北中共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

△　朱德、彭德怀电毛泽东、张闻天，告知已委任聂荣臻兼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兼第一二六师政治委员，张浩兼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　周恩来在太原会见阎锡山与卫立煌，提出应改变战略战术，我军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在正面防御中应采取积极

的“反突击”；并说明八路军在决战中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在日军进攻太原时，八路军不能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

△　韩复榘部第八十一师第四八一团猛攻桑园，歼日军千余，一度收复桑园。日军旋即增援反扑，我军仍退回德县。

△　八路军宋时轮支队收复朔县西北井坪镇，击溃日军千余人，毙日军200余名，缴获坦克车八辆、装甲车15辆、汽车15辆、步枪36支、轻机枪2挺、机枪子弹八箱。

△　晋北日军攻陷雁门关。

△　上海市长俞鸿钧向外国记者声明，否认中日双方曾在国际饭店举行和平谈判。

△　全国各界已认购救国公债2.52亿元。

△　青海省军界领袖马步芳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

△　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卢沟桥事件以后中日冲突事实及有关中日问题之国际条约等问题。苏联代表李维诺夫指出，现有事实已足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之罪状。

△　英国工党领袖克兰在上海发表谈话称，英国工党与工会全体，将团结辅助中国人民，商定有效计划，实行对日之经济抵制。

△　英国工党苏格兰区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吁请该党各支部暨各工会，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深恶痛绝，并要求英国政府立即与日本断绝外交与经济等关系，禁止各项货物与原料售于日本。

△　英国自由党主席梅斯顿勋爵发表文章，请全国各自由党机关出全力严斥日本暴行。

△　加拿大和平民治协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书英联邦首相，要求制裁日本，抵制日货。

10月3日　　忻口战役开始。我军以第十八集团军（即原第八路军）等部为右翼军，由朱德指挥；以第十四集团军等部为中央军，由卫立煌指挥；以第六十八师等部为左翼军，由杨爱源指挥；以第三十四军等部为总预备队，由傅作义总司令指挥，策应各方。繁峙日军混成第二旅团千余人向阳明堡进攻，与我第十九军激战。

△　日军千余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晋北崞县西关，与我军激战，终未得逞。

△　淞沪战场我军撤至罗店公路以西新阵地，是晨向日军猛烈反攻。

△　上午，日军以步兵、炮兵及飞机13架联合猛攻德州，被我军击毙四五百人，击毁坦克车一辆。下午，日军以飞机、大炮击毁城西北角，我军以麻袋垒堵，凭城扼守。

△　日军分别在广东中山荷花岛及台山广海登陆，被我守军击退。

△　浙江余姚洋面发现日舰八艘；我国盐船一艘为日舰击沉，三艘被劫，船上护运队均被缴械。

△　日机袭击广州、嘉兴、苏州、杭州、安庆、南翔等地。日机在嘉兴为我军击伤三架。日机袭粤汉路，我国空军出动截击，在清远上空激战一小时，日机数架被击伤。

△　陈立夫与毛邦初电告蒋介石称，已运汽油10吨至新疆机场，备所购苏联飞机运来之用。

△　朱德、彭德怀电蒋介石、阎锡山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程潜

称，八路军除以主力位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一线之两翼外，另组四个支队进入晋、冀两省敌后地区活动。

△　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粤、浙、皖、闽边区游击部队领导人项英发表宣言，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决定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停止土地革命；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将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各队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改编。

△　宋庆龄致函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代表团，呼吁对中国抗战予以了解和积极的支持，指出“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希望英国工党尽一切力量并采取一切步骤，支持中国的英勇抗战。

△　我国侨日商民207人返国抵沪。

△　难民救济总会在南京成立，并将于各地设立分会，经费在救灾准备金总额内拨付。

10月4日　国民政府令：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之国民大会，因抗日战争爆发，应予延期开会；一俟代表完全选出，时机适宜，再行定期召集。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严令前线官兵禁饮生凉之水，以防霍乱与疾病。

△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报告，川省抽调14个师出川抗战，东路由重庆、万县乘轮出川，北路已达宝鸡。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察、绥、晋一个月来作战经过发表谈话称，察、绥、晋作战分为察哈尔战役，晋北、绥东战役，恒山战役三个阶段。此三阶段战役之战斗情形虽各有所异，但其共同之

点，即日军为主动，我为被动，致日军每占优势。由于三阶段战役之失利，我迫不得已，始决定在五台、崞县、宁武等县布置弧形阵地，与日军决战。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连仲代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　陈调元赴华北视察战况后电何应钦称：“晋绥军大部现正在宁武、崞县、五台间布防，惟士气颓丧，中央若无生力军参加，晋省自力恐难持久。”

△　周恩来与阎锡山等分析敌情，针对日军主力进攻崞县，直逼忻口的战局形势，制定作战计划。周恩来提出，令卫立煌部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小部守备崞县当面日军，大部星夜回击攻原平镇日军并消灭之，以稳住中路；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左翼；请南京另派三师主力北上出击；立即组织武装正太路、同蒲路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破坏铁路与煤矿。

△　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会议，英国代表提出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我国代表立即发言支持英国代表的建议。

△　日军千余侵入阳明堡后，由飞机掩护，向崞县围攻，为我守军第十九军击退；日军复以步、骑兵400余、装甲车数辆，向小南关桥我军阵地西侧攻击，亦未得逞。

△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制定攻占大场镇计划，方针是：“主攻保持在第三师团右翼方面，即在顾家宅——大场镇公路西面地区；10月8日或12日前后开始攻击，击败大场镇附近敌人，从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面地区的敌人，接着大概以一个师团封锁上海西南，以主力攻击南翔。”

△　日军以大炮为掩护，向闸北我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击。我军在猛烈炮火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将日军击退。罗店、刘行间也有

猛烈冲突。同日清晨，我上海市保安队在浦东其昌楼日商新三井码头敷设水雷，炸沉趸船数座，声震全沪。

△　日机24架袭太原，投弹百余枚；日机袭韩庄、临城、济宁等地。

△　厦门守备司令部枪决日本间谍许江项、苏必隗、苏柴陆、吴锡贞四人。

△　国民政府为调整战时食盐，派员会同财政部盐务机关人员秤交领运，各地政府协助办理。

△　财政部规定统一粤、桂、滇纸币兑换比率。广东毫券按144折兑法币一元；广东大洋券按12折兑法币一元；桂币按每元折兑法币五角；新滇币二元兑法币一元，旧滇币10元合法币一元。

△　中山大学被敌炸，校长邹鲁发表书面谈话，斥责日军破坏我文化机关罪行。

△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汉口召开临时大学筹委常委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出席；除商讨课程编制外，决定12月25日在湖南长沙开学。

△　美国务卿赫尔会见我驻美大使王正廷，就远东时局进行交谈。

△　国联预算委员会议决拨款10万英镑，作为中国医药救济之用。

△　英国工党年会一致通过决议，主张抵制日货，要求政府禁止贷款日本，禁止以军火接济日本；并谴责日本对华作战行为。

10月5日　上海战事重心移蕴藻浜两岸。固守蕴藻浜南岸第五十

一师组成六个突击连，向日军进行夜袭，毙日军甚多，缴获机枪两挺、步枪3000余支。

△　德州失陷，第二四三旅旅长率部与日军激战，第四八五团官兵全部牺牲殉国。我军退至老黄河右岸布防。

△　八路军收复晋西北平鲁县。

△　日舰六艘占澳门附近横琴岛，数百名日海军陆战队登陆开辟机场。

△　周恩来与卫立煌、傅作义等商谈忻口会战作战计划。周恩来提出固守忻口周围山地，诱日军至代县、忻口，我军自侧面出击消灭之；八路军主力向宁武南北、代县以东侧击日军。我军力争在忻口以北取得胜利。卫、傅二人对此表示同意。

△　行政院会议决议修改现行转口税则，民船、铁路及陆运货物概行征收转口税，征价课税之货物仍照现行附税，合并为值100抽7.5，以切实值百抽为标准。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财政部报告，提高蚕茧出口税率，每公担征税28元。

△　全国海关职员认购救国公债500万元。

△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由汉口到长沙，筹商临时大学开学上课事宜。

△　杨虎城在英国工党年会上演说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希望列强用其伟大的军力以保障和平。

△　美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认为“战争之为物，无论其已经宣战与否，均有蔓延可能”，要求把侵略国“隔离”起

来，主张美国应积极参预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

△　英国自由党《新闻纪事报》在伦敦举行民众大会，参加者万余人。大会对日机炸死炸伤中国人民之暴行表示愤慨，要求英国发动各国，在经济上及其他方面，采取共同行动，制止日本暴行。

10月6日　日军强渡蕴藻浜，我第八师在南岸石驳岸墙门头阵地被日军突破，蒋介石电令第八军军长黄杰："速亲往西塘桥附近，尽量援助第八师之作战。"黄军长奉命即率税警总团第四、五两团在日机轰炸与炮兵轰击下前进，于8时将突入之日军消灭；蕴藻浜南岸遂无日军踪迹。

△　晋北日军攻陷阳方口与宁武后，对崞县进行猛烈攻击。日军猛攻原平，守军姜玉贞部第一九六旅与日军浴血苦战。

△　日军由保定南下。我军为保卫晋东门户，第一军团、第十四军团、第三军及第十七师向娘子关南北之线转移，平汉线只留第三十三军正面抵抗。

△　日机30余架三次袭南京，为我击落二架；66架三次袭广州、韶关。苏州、芜湖、安庆、济南、扬州、镇江、无锡等地均遭日机轰炸。

△　毛泽东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提出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指出："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必须：一、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二、要求卫立煌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三、八路军第一一五、第一二〇两师主力，担任

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主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 日本参谋本部上奏天皇，认为攻占上海，“预料还需要相当时日和付出相当的代价”。

△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猛烈攻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芝加哥“防疫隔离”演说，诡称：“日本五十年间，人口倍增，必须在狭小岛外求发展。”“日本对大陆求和平发展，对中国谋和平提携，但中国以武力拒绝，以致发生今日事变。”

△ 外交部公布《防止私贩麻醉药品公约》。

△ 英人所办《青岛时报》歧视华工，激起工人愤怒，于日前一致罢工。该报负责人奇威（英人）认识错误，并书面向工人道歉；工人胜利复工。

△ 刘湛恩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国际友谊社。英、法、苏、德、意、比、葡、瑞典、瑞士、挪威各国领事，各国商会会长，欧美各大报驻沪记者，上海各大报总主笔、总经理，各银行、各大公司总经理等100余人出席成立大会。

△ 国联大会通过远东顾问委员会提出之两报告：第一个报告认定，日本以陆海军对中国实行军事行动，“系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第二个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之局势不只冲突中、日两国，且对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非仅由中、日两国政府采用直接方法所可解决”。为此，大会提议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从速讨论问题，并邀请苏联、德国等与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寻求以协定方式结束冲突之方法”。

△ 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违背《九国公约》与《巴黎非战公约》。

△　据美商务部发表统计，本年1月至8月份，美国输往各国之废铁，已超过历史最高额；其中以输往日本为最多，共达73.7万吨。

10月7日　　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赞扬罗斯福“防疫隔离”演说，并表示中国抗日决心始终一致，“虽战至最后一人，领土最后一寸，亦不稍变更初志，非俟正义确立，条约重申其尊严，吾人之抵抗决不停止”。

△　上海前线发现日人反战传单《告出征中国士兵书》及《致华北将士书》，内称中国人不是敌人，“蹂躏大众生活的军部，才是国民的敌人，国家的蟊贼”，并称此次日华战争“完全是军阀的私战”。

△　晋北日第五师团长板垣指挥汤浅部队五六千人，在20余架飞机、10余门野炮与四门重炮配合下，猛攻崞县。该县城垣被摧毁，全城几成焦土，我军伤亡殆尽。日军侵占崞县。

△　日军第三、第九两师团借战车及优势炮火的掩护，由蕴藻浜北岸向我第八十七师正面黑黄大宅及第一军正面西六房强行渡河；我军顽强阻击日军，激战竟日。

△　日驻美大使斋藤访晤美国务卿赫尔后对记者称，日美战争之说，已涣然冰释。日本深知美国不致卷入远东漩涡。

△　美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愿意参加九国公约会议讨论远东事件。

△　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华德门发表宣言，要求各国共对日实行经济制裁。

10月8日　　第三战区兼司令长官蒋介石电令蕴藻浜南岸划为三个作战区：小南翔、陈家行至刘家行相连之线为右翼作战地区；方泰镇、石岗门、张家、朱北宅至太平桥相连之线为左翼作战地区；左翼与右翼地区之间为中央作战地区。薛岳为中央作战地区总指挥，叶肇

副之；胡宗南为右翼地区总指挥，黄杰副之；罗卓英为左翼作战地区总指挥，刘和鼎副之；总预备队指挥吴奇伟，王东原副之。

△　川军第二十军杨森部自贵州开来上海，投入淞沪战场。

△　天津市长兼陆军第三八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陆军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是日，国民政府令：张自忠着撤职查办；刘汝明着撤职留任，戴罪图功。

△　张自忠在南京谒见蒋介石，请求给予处分。蒋介石对张自忠策励有加，许以自赎，嘱其暂留南京，听候后命。

△　国民政府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因公离职，在未回任以前，所有主席职务，派该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体乾暂行兼代；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因公离职，在未回任以前，所有主席职务，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暂行兼代。

△　中共中央华北军政分会发布《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称，山西已成为华北战局中最后争夺的主要目标，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与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创造太行、恒山山脉及晋西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　外交部长王宠惠对记者发表谈话，要求爱好和平各国采取积极办法，恢复国际条约尊严。

△　我军发表正式统计，9月份在南京、上海、广州三地，共击落日机48架，击伤16架。自8月14日以来，日军在华损失飞机，共达109架。

△　日军配合飞机、大炮，在多处强渡蕴藻浜，建立桥头阵地；经第八军与之浴血苦战，日军进展迟缓。下午3时，日军主攻部队绕过第八军阵地，向右侧进犯第三十六师阵地，该师第一〇八旅奋力抵

抗，第八军给以大力支援。日军受重创，未得逞。

△　正定、灵寿失陷。日军分三路渡滹沱河，主力由正定沿平汉线进逼我军正面；一部由灵寿向正太线威胁我军左翼，另一部由藁城侧击我军右翼。

△　连云港外停有日巨型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及补助舰12艘、航空母舰一艘，并有日机70余架，连日飞鲁、苏各地骚扰。

△　江苏省政府通令各县政府收容难民。

△　禁烟总会由隶属行政院仍改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禁烟总监仍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

△　国民政府明令，土地登记期限缩短为三个月。

△　行政院公布《人民捐金银物品收容及保管办法》。

△　国民政府制定《救国储金章程》。

△　英国全国铁路工人协会西方区委员会通过决议，抗议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并要求英国对日实行经济抵制。

△　劳工国际秘书长阿德勒电复中国国联同志会称，本国际早经通令所属组织，注意日本侵略行动，并赞助英国劳工关于对日经济抵制宣言。

10月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国庆日发起募集劳金及棉衣运动告国人书》，要求人献一金，“集四百兆巨款；妇女人操一针，成二百兆寒衣”。

△　军事委员会任命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并改隶于第一战区。同日，任命第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为第七十九军军长。

△　毛泽东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称，在敌人后方地区及迫近敌人地区，因大地主多属汉奸，故执行没收大地主土地政策。

△　立法院召开院会，追认二十六年救国公债条例及还本付息表。

△　内政部制定《国民工役法施行细则》。

△　国民党中央电召上海银行、实业及教育界闻人杜月笙、陈光甫、唐寿民、邹秉文、范旭东、李圣五等20余人到南京，报告上海各界情形，并对非常时期之各业改进事宜，作切实商洽。

△　上海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主持全市国民对日金融、贸易、雇佣关系等方面的经济绝交事宜。大会选举朱学范、梅龚彬、邹韬奋等27人为执行委员，黄炎培、郭沫若、章乃器、钱俊瑞、史良等为监察委员。

△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召回驻日大使，禁止与日本通商。

△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致全国工友书》，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　日机28架袭粤汉路韶关、英德等地，为我空军击伤10余架。

△　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决议，邀请13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九国公约会议，以寻求解决中日争端办法。

10月10日　　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举行国庆纪念会，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于右任等出席。南京、上海、汉口、广州、杭州、成都、安庆、贵阳、开封、西安、青岛、洛阳、重庆等地，均举行国庆纪念会。蒋介石在南京向全国作广播演说称：“今年的国庆日，是我们国家忧患困苦最严重的时期，但也是我们民族复兴唯一重

要时期”，“这一次抗战是死中求生的一战，必须经过非常的危险艰难，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　国民政府明令奖勉前方将士，谓：“政府不得已而为全面抗战，赖我前方将士为国先驱，苦战累月，前仆后继。并值开国纪念之辰，着军事委员会传谕前方，优加奖勉。”

△　外交部照会国际联盟，声明接受《九国公约》签字国邀请，并吁请各国从速阻止中日冲突。

△　第五路军总指挥李宗仁过湘晋京，在长沙对记者称，广西目前可出师20万人，后备者有110余万人，将来可征至300万人。

△　中共陕西省委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公开信，要求国民党改变过去对民众运动的错误政策，立刻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民主自由；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彻底实现陕西民众救亡统一战线。

△　石家庄失陷。我军右翼沿滹沱河南岸相继后撤。日军为配合进攻太原，调第二十师团、第六师团一部及河边旅团一个联队，西向进攻晋东门户娘子关。日军先头部队约两个联队，到达井陉附近。

△　日机20余架分批袭广州及粤汉路桥梁，为我军击落二架。日机袭津浦路三堡、符离集、宿县，又袭陇海路大庙。津浦、陇海两路客车改在夜间行驶。

△　上海全浙公会电蒋介石等称，我为被日本侵略国，不可沿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应召回大使，毅然宣布断绝国交，以示破釜沉舟抗战到底之决心。

△　财政部公布《金类兑换法币办法施行细则》。

10月11日　　罗店我军猛烈反攻。闸北我军逐日军至北四川路。黄浦江中，日舰与浦东我军炮队互相轰击甚烈。日机肆行轰炸，在大

场与真如之间公路上掷弹颇多，欲阻止我军弹药输往前线。

△　日军继续向我军蕴藻浜南岸阵地发动猛烈攻势，我军乘日军半渡击之。日军背水为阵，被截成数段。

△　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猛攻原平，我守军第三十四军姜玉贞第一九六旅击毁日军坦克二辆。姜旅伤亡甚重，仅余官兵二三百人，与日军肉搏巷战。在与日军激战中，姜玉贞旅长以身殉国，余部亦伤亡殆尽，原平遂陷。

△　日机30余架袭广州，并炸黄埔支线。日机35架五袭苏州，为我军击落一架。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攻入涞源。

△　财政部公布施行《非常时期印花税暂行办法》，一律按原税率加倍征收。

△　财政部公布《海关现行出口及转口税则暂行章程》。

△　英国南威尔士码头工人召开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决议不替日船装卸，并抵制由英国运日本的一切原料与货物。

△　英国牛津、剑桥等18所大学90位著名科学家与教授，要求英国政府设法制止日本侵略中国。

10月12日　　李宗仁偕黄季陆自汉口乘轮抵南京，中央统帅部发表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保卫津浦路防御战，辖区为山东全省与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及豫东一部。

△　广西军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驰援抵上海，在淞沪战场积极展开反攻。

△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正式转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

令：湘、鄂、赣、豫、闽、粤、浙、皖八省13地区红军游击队，鄂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归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以皖南泾县及繁昌一带为该军游击根据地，对日实施游击战。新四军辖四个支队，共一万余人。

△　周恩来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敌逼近娘子关，以太原为中心的内线作战缺少回旋余地，必须转向外线，因此，游击战的配合更加重要。并建议八路军派一部截击敌近后方，配合中路作战。

△　板垣征四郎率日第五师团与察哈尔军团向晋北崞县、原平、宁武进犯；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由保定向正定推进。我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由石家庄驰往太原以北增援，于忻口附近与第二战区各部会合；以刘茂恩指挥的第三十三、十五、十七军三个军为右翼兵团；以王靖国指挥的第九、三十五、六十一军三个军为中央兵团；以李默庵指挥的第十四、八十五、六十六、七十一四个师为左翼兵团，在忻口以北龙王堂、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一线，与来犯日军展开激战。

△　正太线上井陉失守，日军进犯娘子关。同日，阎锡山急令增援晋北之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回援娘子关。孙连仲奉令于是晚8时由太原东返阳泉，即命第二十七师及第四十四旅向娘子关推进，以第二十七师主力集中娘子关。

△　日机18架轰炸上海北站与宝兴路。

△　日机40余架三次袭南京，南京上空发生激烈空战，我军击落日机五架。日机五袭苏州，又袭嘉兴、常州、芜湖、常熟、杭州、虎门及粤汉路。

△　空军驾驶员孙桐岗率机六架轰炸塘沽，炸毁日军军械粮秣无

算。

△　空军轰炸塘沽日运输舰、军需品码头、塘沽火车站，伤日舰多艘，致日军军需品损失甚巨。同日，我空军轰炸连云港外日本航空母舰。

△　最近一月中，日舰焚烧及击沉我渔船200余艘，渔民死亡在5000人以上。现停泊香港海面不能出海作业渔船有6000艘，失业人口达四万之多。

△　国民政府令：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擅自撤退，贻误戎机，着即褫职，由军事委员会依法讯明严办。

△　胡适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往谒美罗斯福总统，望各国主持公道。王正廷并向罗氏表示中国能持久抗战。

△　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表示决心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加强合作，以求找到解决远东冲突的办法。

10月13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意见，请他们考虑向国民党提出。略谓："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电报并提出，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而应实行的具体部署。

△　毛泽东电贺龙、萧克、林彪、聂荣臻，为配合正面忻口作战，令所部断绝日军后方交通，并自侧面攻击日军。

△　淞沪战场我军全线反攻。各阵线均有激战，日机肆意轰炸。夜间，我国飞机轰炸杨树浦日军阵地。同日，杨森率第二十军接防上海盛宅至顿悟寺第三十二师阵地，保卫大场战斗开始。

△　日军以飞机及战车五六十辆、炮四五十门，掩护步兵约5000人，向我忻县南怀化、阎庄第五十四师及第十师阵地猛攻，我军阵地被突破。卫立煌令第十师及傅作义部，先歼灭突破口日军，再向平地泉、小原平日军攻击，并以第八十三及第八十五两师，由左翼向永兴村以北亘马家山一带之日军猛力围攻。我军与日军激战终日，毙伤日军300以上，击毁日军战车22辆。

△　日军装甲车300余辆，步、骑兵3000余名，山野炮20多门，飞机四架，向大里河我军防线猛攻。我军弹尽援绝，日军逼近归绥城下，由东、南、西三面冲入城内。守备归绥的马占山部东北挺进军，向绥西退却。

△　板垣征四郎以混成第十五旅团及堤支队等部编为右翼队，以第五师团为左翼队，集中日军5000余人，在飞机20余架，坦克50余辆、炮50余门掩护下，对平地泉我军阵地采取中央突破战法，向我军中央兵团及左翼兵团猛烈攻击。双方激战终日，我军毙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日军增兵3000余人，突破我守军前沿阵地。入夜，卫立煌组织部队向日军实施反击，图围歼突入之敌。

△　日机袭苏州、镇江、杭州、嘉兴、常州、阳泉等地；我军在阳泉击落日机一架。

△　上海市社会局公布，全市计有商店8.6639万家，工厂5525家，作坊1.6851万家，总计工商业厂号为10.915万家，其中工艺商店及作坊，约3.5615万家。

△　苏联红军吉尔斯团以骑兵、飞机、坦克、装甲车进入新疆，协助盛世才击溃南疆马虎山部，马虎山败走和阗。15日，苏联出动飞机轰炸和阗，马虎山部死伤甚重。

△　朝鲜民族革命党发表抗日宣言称：“东方弱小民族加紧团结，实行一致动员抗日；拥护中国当局发动全面抗战。”

△　美国总工会决议，请求全世界工人群起抵制日货，借以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0月14日　　上海日军猛攻我西塘桥、陈行阵线，并以飞机、重炮向我阵地大肆轰击；广福以南我第一师阵地，曾一度被突破，经我军反攻，终将日军击退，恢复原阵地。同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命令："本军应先行巩固现阵地，再图扑灭蕴藻浜南岸敌军，恢复刘行、罗店之阵地。"

△　娘子关战役开始。孙连仲率部向西转移至井陉、娘子关时，日军一部由井陉北贾庄、小枣、井陉正面进攻，一部约千余名绕攻长生口，直抵旧关，进迫娘子关侧后。我第十七师奉命固守雪花山，以一部向长生口出击，阻滞日军前进。日军反攻，雪花山失守，我第十七师损失奇重，退守乏驴岭。贾庄日军1400余向我第三十师侯旅桃林垛东北高地进攻。

△　卫立煌亲至忻口督战，以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率部负责防守南怀化日军，郝梦龄率部担任忻口正面守备，并向当面日军进行反攻。

△　我军在忻口战场转取攻势，将突入南怀化日军800余包围歼灭，并俘日军数十名。我左翼军进攻永兴村附近日军主力，遇日军顽强抵抗，战况甚烈。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已将原平西北大牛店占领，向北三泉夹击。右翼日军攻我灵山阵地，战斗激烈。我第一一五师一个团在平型关东小寨村附近，截获日军援军汽车数十辆，伤毙日军200余人。

△　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三八八旅第六九一团，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北上攻克高阳，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师，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高阳、安新、任丘、蠡县、博野、安国、深泽等九县的抗日政权，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

△　黄浦江日舰水兵企图在浦东登陆达10余次，经我军痛击后，始行退去。

△　空军于13日夜分赴原平及崞县轰炸日军阵地，炸毁日军军事工程及坦克车24辆。

△　绥远我军退出萨拉齐、包头。

△　宋庆龄电美国总工会，请其推行抵制日货运动，并防止美国军火运往日本。

△　上海日军炮击美国旗舰“奥古斯塔号”，舰上一人受伤，美军司令向日方提出抗议。

△　孔祥熙在香港对记者称：“日本人所谓亚洲之亚洲，实为日本人的亚洲，其目的在统治中国，而称霸世界。中国人人均具牺牲之决心，对长期抗战，有绝对把握。”

△　我驻国联常任代表照会国联秘书长，揭发日军在上海战场使用毒瓦斯和达姆弹。

△　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全美民主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于中国一向采取保持中国土地完整之政策”，中国希望“美国政府遵守其对华之传统的一贯政策，毋再因循，从速采取恢复远东和平之适当步骤”。

10月15日　　军事委员会任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吴县发表作战命令：一、右翼作战军为第八集团军与第十集团军；二、中央作战军为第九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与直属第二十六师；三、左翼作战军为第十九集团军与第十五集团军；四、江防总司令辖第一〇二师、一〇三师、第一一一师、

第一一二师、第五十三师及海军司令、江防司令江阴与镇江两要塞司令、江苏保安第二团、炮兵第八团第一营、炮兵第十团之一营；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淞沪战场，加入大场方面作战。我军以第四十八军为第一路，向蕴藻浜南岸日军攻击，以第六十六军为第二路，向赵家宅以东攻击；以第九十八师为第三路，由广福南侧地区发起攻击。

△　国民政府令：陆军中将杨杰特加上将衔。

△　第六战区撤销，津浦路北段作战改由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指挥。

△　在忻口战场，突入南怀化之日军2000余，经傅作义军及第五十四师与第二十一师等部数次围攻，已被消灭。李默庵军攻占原平新旧练庄、阎庄、卫家一线；傅作义军攻占板市、下王庄、弓家庄一线，与日军成对峙状态。右翼日军1000余猛攻刘茂恩军灵山阵地；我军阵地失而复得。日军在永兴村、安家庄一带主力七八千人，与我军激战一昼夜，双方伤亡甚重。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个旅向永兴村夹击。日军伤亡五六千人，我军伤亡5000余人。

△　第一二〇师及骑兵第二师各一部，先后进占阳方口。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在灵丘、广灵间击溃日军步、骑兵200余并汽车30余辆，进占广灵，向蔚县追击；该集团军另一支队克复涞源后，进占紫荆关。

△　日军一部约五六百名侵入旧关，另一部约600余名侵入关沟。第二十七师及第三军敢死队出击，将关沟、旧关日军消灭。日军由大小龙窝增援五六百名，被我军消灭300余名。

△　邢台失陷。

△　日机袭广九路，港、粤交通被阻，我击落敌机一架；日机袭

桂林、梧州、南京、苏州、蚌埠等地。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陆海空军奖励条例》，自10月16日施行。

△　军事委员会训令各省政府及各军称："前方自应奋勇应战，如有擅自退却者，当于依法连坐。其余战地文武官佐，亦应各本天良，一致抵御，如有擅退或抗御不力等情事，亦当依法严惩。"

△　国民政府颁布《救国公债条例》，规定公债总额为五亿元，年息四厘，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起，每年8月底一次付给；自民国三十年（1941）起还本，分30年还清。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矿业法》之第二、五、二十、四十一、四十八、五十、六十一、七十七条。

△　中共中央军委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由毛泽东代理），谭政任副主任。

△　外交部长王宠惠向美国民众广播称，暴日蛮横，危及世界和平；希望美国人民全力赞助中国抗战，避免任何足使侵略者直接或间接受益之行动。

△　伪晋北自治政府成立，汉奸夏恭为最高委员。该伪政府以大同为中心，由晋北13县组成，人口约150万。

△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暨理事屈映光、大悲等函内政部称："目下抗战开始，各地救护工作极为需要……。本会已会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组织僧侣救护队150人，分赴前方服务……各地僧侣已受救护训练者尚多。"该会理事长圆瑛赴南洋各地筹募捐款。

△　英国18所大学117位教授致电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日军在华

轰炸平民及学校表示愤慨，并称：“决竭其能力，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步骤，以制止日本侵略。”

10月16日　我军在娘子关方面发动总攻，肃清关沟残余日军，并将大小龙窝日军联系切断；但未能收复王家岭高地及旧关。日军向我第二十七路军工兵营反攻，我增派援兵，维持前方阵地。

△　忻口方面激战，双方均无进展。我军共获日军步枪500余支、轻重机枪40余挺、炮20余门，并击落日重轰炸机一架。攻克板市、弓家庄之第三十五军，撤回本阵地；第一一五师一部占领团城口。

△　晨2时，忻口战场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开始，中日双方伤亡均达数千人。我第九军中将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少将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少将旅长郑廷珍均壮烈牺牲。

△　日第十一师团突破我军刘行以西阵线，向大场阵地右侧后实行包抄，我军奋力还击，战斗异常激烈。

△　比利时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政府发出邀请柬，我国表示接受邀请。

△　日机三次袭击太原，被我军击落一架；日机袭南京、杭州、开封、嘉兴等地。

△　江湾、闸北、虹口、浦东等处中外工厂全部闭停，失业工人达30万人以上。

△　上海市社会局调查，上海各大学因战争损失约662.3159万元，各中学损失219.9954万元，各小学损失25.9129万元，社会机关如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万元，总计1094.2242万元。

10月17日　蒋介石电朱德、彭德怀称：“贵部林彪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　娘子关、旧关附近日军大举反攻，我军与日军肉搏战十余次，双方伤亡甚重。我第三军唐师逼近旧关，该师吕团攻夺旧关西侧高地，尹团等部向旧关以东高地猛攻。第十二师马旅及第七师第三十七团攻至核桃园附近，旧关至核桃园通路被我军封锁。第二十七师黄旅亦同时向核桃园进攻，截断日军归路。

△　忻口方面日军分三路猛攻我军，右翼日军千余，被我军击退；攻我中央阵地日军约四五千人，下午冲入官村、南怀化等我军阵地，经反复冲击仍成对峙状态。另一路日军步兵3000余人，在30余辆战车掩护下，向我左翼军进攻。双方伤亡甚重。

△　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是日自上海获悉日方情报称："日本陆军省现以《九国公约》签字国于本月3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已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开会前攻占闸北、南翔、嘉定一带，并驱出浦东华军，俾可在大会席上挽回国际信誉。"

△　邯郸失陷，汤恩伯部积极部署漳河防线。

△　日机四次袭太原，五次袭苏州，并轰炸嘉兴等地；平定县我军击落日机一架。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

△　毛泽东电朱德、彭德怀并告周恩来，同意彭德怀意见，由周电蒋介石调主力军入晋，以川军为宜。

△　孔祥熙返国抵上海。

△　陈济棠自香港抵南京，表示愿意参加抗战。

△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开始报到。因学生多来自战区，临时大学筹委会决议，自学校经费中拨5000元作为贷金，救济贫苦学生。此项救济贫苦学生之贷金办法，为抗战时期流亡学生实行公费制度的

开端。

△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大会通过中日战争期间停止罢工，支持侵华战争决议。

△　英国总工会干事部宣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洲、印度、墨西哥、荷兰、法国、瑞士、瑞典、挪威、丹麦、捷克、奥国、爱尔兰等国工会，均发来回电，一致表示响应该工会抵制日货号召，决心实行抵制日货政策，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　英国工党伦敦党部与总工会伦敦市执行委员会在伦敦举行集会，与会者一万余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要求英政府禁止本国人民以军火售予日本，或以款项贷于日本。

10月18日　　晋北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八团袭击雁门关日军汽车队，克复繁峙；该师独立团于广灵冯家沟设伏，击毙日军步、骑兵1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大车120余辆、骡马300余匹，收复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曲阳等县。

△　第一二〇师第七一五团在黑石头沟公路两侧进行伏击，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

△　日军向大场猛攻，企图一举侵占大场、罗店间公路。我军组编攻击军三万人，由陈诚指挥，与日军展开激战。战事空前激烈，为“八一三”开战以来所仅见。

△　娘子关方面日军，在大小龙窝通旧关道路以南山地突然增加七八百人，分向我教导团及第二十七师阵地突进，经我军四处堵击，日军未得逞。

△　忻口方面日军以炮火掩护，向我第三十一师第六十三旅阵地数度猛攻，该旅阵地几全被击毁，经我军奋勇抵抗，卒将日军击退。

△　平汉线日军第六师团陷磁县。汤恩伯军团于漳河南岸布防阻击日军，吴克仁军至汤阴。

△　日舰炮轰北海，并派水兵登岸，被我守军击退。

△　日机九袭苏州，二袭南京，被我军击落一架。日机袭汉口、镇江、福州、嘉兴及港粤间铁路、公路。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改原会计年度之跨年制为历年制，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1日起实行。

△　上海战时文艺协会举行纪念鲁迅讲演会，郑振铎、郭沫若、许广平、冯雪峰、田汉等相继演讲，详细阐述鲁迅学术思想，到会听众千余人。

△　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组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确定11月1日开课。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先队工作的决定》，要求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为青年抗日的群众团体。

△　张闻天、毛泽东电潘汉年、刘晓，指出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取消，是为了开展工作；中共上海党组织目前工作中心，是加强各种救亡协会与群众团体的工作。

△　周恩来与杨尚昆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报毛泽东，在晋中，凡在八路军驻地及附近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应与之密切合作。

△　周恩来与阎锡山、黄绍竑研究太原失守后的分区防卫问题。

△　中国茶叶公司在汉口设立分公司。

△　巴西人民发起大规模排斥日货运动，全国舆论对我国抗战表

示同情。

10月19日　　蒋介石命军委会第一部决定，第六战区归并于第一战区，仍以程潜代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回南京。

△　淞沪战场我军韦云淞（广西军）部与叶肇（广东军）部向蕴藻浜南岸反攻；日军亦同时向我军进攻，战事激烈。我军伤亡甚重。

△　大场附近终日有激战，我军不顾日军猛烈炮火、飞机轰炸及机械化部队猛攻，浴血抵抗。双方死伤甚重。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第三营，突袭崞县北阳明堡日军机场，炸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180余名。

△　忻口方面日军猛攻我军右翼，战事激烈。我军与日军争夺官村以南高地，成对峙状态。我左翼阵地稍向后移；我军击落日机两架。

△　娘子关方面，日增兵一个联队，攻陷我军乏驴岭阵地。我第三十七师一部星夜赶至北峪东北高地，击退西进日军。

△　日机在苏州至南京途中，袭击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武官利比森。

△　毛泽东、张闻天电周恩来、朱德，在山西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

△　周恩来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指出中国战局已转入新的危机，提出反对和平妥协、开放党禁、制定抗战紧急方案、组织民众及统战工作等建议。

△　教育部编印日军摧残我文化事业实录，统计被日军炮火或飞

机炸毁学校：在天津有南开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工学院；在保定有河北医学院、河北农学院；在上海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法学院、持志大学、正风文学院、东南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在南京有中央大学、牙科专科学校；在南昌有医学专科学校；广州有中山大学等23校。北平各大学虽未被炸，但均为日军盘踞。各地中小学尚未统计在内。

△　财政部向中央信托局拨款千万元，办理保运输兵险。

△　外交部呈行政院，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我国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代表。10月22日，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三人为我国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

△　海关公布，9月份上海市对外贸易，进口仅值700余万，出口值2700余万，出口值较进口值超出四倍，为近年对外贸易之特殊现象。

△　上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纪念鲁迅逝世周年，郭沫若、巴金、郑振铎、沈钧儒、陈望道等为主席团；决定成立文艺界救亡协会，并通过慰劳前方将士，宣布对日经济绝交等议案。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

△　广东外交交涉员与港英当局商定，解除虎门封锁，恢复省、港、澳间水路交通。次日，省、港、澳三地复航，英舰在虎门外护航。

△　日本计划成立满洲重工业公司。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成立满洲国重工业公司纲要》，旨在使“日满应成为一体，以重工业为中心，迅速扩大生产力，以适应当前时局的迫切需要”。《纲要》规定公司“由满洲国政府及日、满民间资本家各投资一半”。该公司对钢铁

业、轻金属工业、重工业（汽车、飞机制造业等）、煤炭矿业进行占支配地位投资，并担任经营指导。

△　居留上海之日新闻记者出版中文《新申报》，刊登种种捏造消息。

10月20日　　日军在上海大场攻势受我军遏阻，调大批援军向我军总攻。我军亦大批增援，添筑防御工事。

△　日军分三路沿平汉线进犯，正面为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主力由武安观台犯我军左翼；第十师团一部沿肥乡、武安、临漳企图攻我军右翼。日军占据东、西保漳一带高地。我关麟徵军进行反击，夺回该高地，与日军成对峙状态。日军撤至邯郸、武安附近。汤恩伯军团遂于24日推进至漳河沿岸一带与日军对峙。

△　忻口方面，日军猛攻我官村一带阵地，并施放催泪瓦斯。我军与日军争夺高地战斗剧烈，双方伤亡均惨重。我军三位团长牺牲殉国，两位团长重伤。第一二〇师一部占领雁门关，破坏公路桥梁多处。

△　娘子关方面，旧关、核桃园一带日军川岸师团两个联队，经我近日围攻，伤亡甚多；日军1000余退守旧关附近高山与我对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欠一个团）到达阳泉，进驻马山村、七亘村一带。

△　毛泽东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告知拟定的太原失守后八路军部署意见：留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移至汾河以西吕梁山脉；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的现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二〇师坚持在晋西北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移至孝义、灵石地区。

10月21日　　为击破蕴藻浜南岸日军阵地，恢复刘行，缓和大场战线所受威胁，陈诚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决定由左翼集团军和中央集

团军分成三路攻击兵团，开始全线反攻。次日晨，日军亦倾其陆、海、空全力大举反攻。我军逐步后退转移阵地。

△ 忻口方面，日军继续猛攻官村西南一带，突入我军阵地。我增兵反击，至午后将日军击退。右翼日军炮兵轰击灵山一带我军阵地。

△ 日军抽调第二十师团及第一〇九师团各一部增援娘子关一线，以步、炮、空联合向我守军全线进攻。我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日军侧后挺进，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

△ 津浦线日军约400名进犯山东陵县，为我游击队击退。

△ 日机20余架袭南京，炸毁光华门外机场及津浦路轮渡码头。日机袭济南、嘉兴、常州、苏州及广九路沿线等地。我军在济南击毁日机一架。

△ 军法执行总监部在各战区设立军法执行监或分监，执行一切军法案件。

△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对八路军作如下部署：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绥远东部，首先在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与和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区组织游击队；第一一五师活动于灵丘、涞源、阜平，相机袭击由灵丘、平型关西进日军，或袭击由涞源向平汉线南进日军；第一二九师至正太路以南，进入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在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活动。

△ 教育部派专员查良钊等赴各省视察教育经费使用，战区迁往内地各级学校的进行及新设立的临时大学，内地各校收容战区学生借读办法，战时所需中等技术人才之职业学校，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之推进等情。

△ 财政部宣布免收救护药品进口税。

△　东京发表日海军部报告称，自作战以来，击毁中国飞机365架，日机毁46架。

△　日本外相、陆相、海相一致同意由德国出面斡旋中日和谈。外相广田通知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日本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欢迎德国也同样拒绝参加，并称已与意大利大使商谈，希望意大利在会上代表说明日本的立场。广田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亦表欢迎。同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德国股马奈木敬中佐，通过德国驻日陆军武官奥特，策动德驻日大使狄克逊调停中日冲突。马奈木敬与奥特同至上海，直接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说明日方意图。狄克逊了解广田说明日方意旨后，即电达德国外交部。德国元首希特勒决定先调停中日战争；若不获成功，则公开支持日本。

10月22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等并转全体将士称："当此比京九国公约国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敌必倾其全力，以期获得军事上之胜利，而转移国际之形势；我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使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不能侥幸以逞。且当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长捷为陆军第六十一军军长。

△　陆军中将刘兴特加陆军上将衔。

△　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由茹南村南移，抵达盂县柏竺镇。

△　忻口方面，官村一带战斗激烈，双方伤亡奇重。我第八十五师增援反攻，缴获日军机枪、步枪甚多。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在周庄附近设伏，将由大同南驶日军

汽车32辆全部击毁，将岱岳增援日军击溃，毙敌230余名。

△　井陉日军增加七八个联队，另有伪满军第三十七师团及其他部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炮火猛烈，并使用燃烧弹，向第二十七师阵地猛攻，阵地被突破。北峪以北泉家村阵地亦被突破。该两处我军官兵全数牺牲殉国。当面日军进至地都附近，旧关日军一部到苇泽关附近，第三十师正面受敌压迫，全线被突破。

△　娘子关战事惨烈。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请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速调生力军增援。

△　平汉线我军漳河右岸阵地失守，退守安阳。日军于侵占漳河右岸后，第六师团转调于淞沪战场，第十六师团转调于山西；平汉线仅第十四师团一部及伪蒙军数千人，未敢继续南犯。

△　日机13次袭苏州，六次袭杭州，五次袭太原，三次袭嘉兴，二次袭广九路。广州至香港交通中断。安庆、常州、无锡、滋阳（兖州）、泰安等地亦被日机轰炸。

△　毛泽东、张闻天电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转周恩来，同意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

△　周恩来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史沫特莱。

△　军政部拟定《县（市）兵役科组织规程》，令饬湘、鄂、赣、皖、陕、豫、苏、浙等八省政府遵办。

△　德国外交部电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称中日直接谈判，德愿斡旋。

△　上海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第一次执委会决议，函中日贸易协会会长周作民、副会长徐新六，要求即日撤销该会，以示对日经济绝交之决心。周、徐二人称已自行解职，会所亦即取消。

△　汉奸江朝宗等发表通电，要求停战，在平、津呼吁“和平”。日本指使江朝宗等改北平为北京。

10月2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

△　日本海、陆、空军向我蕴藻浜南岸反攻，炮火猛烈，并施放毒气掩护进攻。我军退至小石桥、大场、走马塘、新泾桥、唐家桥一线，第五一〇旅旅长庞汉祯与第五一一旅旅长秦霖，均于掩护主力转进时牺牲殉国。我军全线停止攻击。

△　津浦线日军步、骑、炮及坦克车混合部队千余人，在陵县东30里与我军激战。我军仍正面扼守徒骇河。

△　忻口方面日军猛攻我官村以东阵地及红沟西北方阵地，被我军击退。右翼我军被日炮兵剧烈轰击，南郭下附近阵地多被击毁。第一二〇师王震旅刘团一部在王董村伏击，毁日军汽车24辆、枪支等数十件。

△　娘子关方面，日军步、骑、炮联合约3000余人，由横口车站渡河向西南前进，到达南漳城。为阻止日军前进并掩护我军右翼安全，我第七师一部驰往增援。

△　驻法大使顾维钧电告外交部，法国已许我国货物秘密假道越南。

△　绥远伪自卫军苏玉龙率部百余于归绥东白塔反正。伪西北边防军第三师某旅旅长武毛率部2200余人，突破日军包围，举行反正。

△　北平日军以北平维持会“顾问”名义，自北平邮政管理局劫去中国邮票五万元后，又将保存各种邮票印版的中国邮政总局驻平印票监视员劫去，追寻印版。

10月24日　　外交部电示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其要旨为：一、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二、上海问题应与中日整个问题同时解决，切不可承认仅谋上海问题之解决；三、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四、我方同时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

△　忻口方面，我军阵地各以一部出击。右翼部队肃清滹沱河东岸日军；正面部队遇日军进攻，双方均无进展；左翼出击部队亦未得手。日军猛攻官村迤南阵地，以飞机、炮火猛轰我军左翼之南峪、盟滕间阵地，我军伤亡甚重。

△　娘子关方面，日军约四个联队由横口渡河，自南漳城、侧鱼镇迂回至我军右翼。另有日军一个联队附二三百骑兵，由营庄村北向西迂回前进。我军第三六四旅进驻马山村，为日军击溃。第三军自马山村后缩短正面，进攻固驿镇右侧背。

△　津浦线方面，我游击队在平原、张庄、东光一带袭击日军后方，破坏交通，焚烧辎重，游击队一部克复吴桥，一部袭击凤凰店日军。

△　日舰三艘在北海附近国洲岛登陆。

△　郝梦龄及刘家麒遗体运抵武汉，武汉三镇下半旗致哀，军、警、宪及各界民众约4000人赴车站公祭，何成濬代表蒋介石主祭。

△　朱德会见史沫特莱，谈八路军对日作战经过称：“我们的计划是要在全华北和西北山区建立许多敌后根据地。”

△　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理事会，决议组织战时特别委员会，推潘公展、郭沫若、茅盾等21人为委员，出版士兵战时读物。

△　颜惠庆、施肇基等为救护伤兵、收容难民，组织中国红十字

会国际委员会，财政部拨100万元交该会使用。

△　空军全体将士认购救国公债20万元。

10月25日　　最高国防会议密议停战问题，认为停战除于士气不利外，在现役部队补充、后勤补充、外交形势方面均对我有利。停战后再续战，在调整部队、整理补充、增筑工事以及整理后方等方面，于我亦较有利。故停战或短期停战，“在有利之条件下，自可接受；又为顾虑士气、精神上之影响，则外交上不妨避去停战口吻，而以‘敌如撤退或退至某某之线则我不进’之方式出之”。

△　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集团军直属于第一战区，归程潜代司令长官指挥；以大名为根据，以一部活动于津浦、平汉两路中间地区，牵制日军；以主力协同正面友军，击破由平汉线南下日军，进击于石家庄方面，以利于我晋东方面作战。

△　日军猛攻我军大场、新泾桥阵地。日军大批战车掩护步兵冲锋，日机群整日轰炸，我守军第八十八师敢死队苦战竟日，阵地终被突破。我江湾方面守军，遭日军自吴淞与上海两面夹击，退至苏州河南岸。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第三营在山西平定七亘村设伏，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　国防参议会提出《工商业因战争所得之利益应分别加以限制或保护案》，建议凡制造或经管供军用或民用之必需品，全用土产为原料之手工业等，其利润受国家保护；凡贩卖军用或民用食米，或其经营方法有垄断居奇之弊者，政府限制其利润。受国家保护之工商业利润，免除一般税法以外之负担。

△　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与之进行长时间谈话，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

任”。

△　周恩来电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提出发展绥远游击战争的战略建议。

△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山西寿阳宗艾镇，次日抵寿阳景尚村。

△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毛泽东，建议晋、察、冀、绥四省八路军部署如下：平绥路以南，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北，平汉线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西北、察西、绥东，为晋绥察军区；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平汉线以西，黄河以北，为晋冀豫军区；在晋西南成立军分区。

△　朱德与彭德怀发布对待日军俘虏政策四条：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自动到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　国防参议会委员蒋百里访罗马，拜晤墨索里尼。

△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上海访问日大使川樾，晤谈甚久。

10月26日　　军事委员会令韩复榘以主力向德县、沧县进攻，与第一战区进攻石家庄方面的第一集团军相呼应，以牵制日军兵力。但韩复榘行动迟缓，日军得沿津浦线方面节节南下。

△　周恩来与阎锡山、傅作义、黄绍竑共商作战部署及山西持久战问题。

△　日军以出动150余架飞机狂炸为掩护，攻占大场镇，切断京沪铁路。我军撤至苏州河南岸。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第五二四团谢晋元中校团附与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率兵一营800人守大陆、盐业、中南、金城四行仓库。

△　娘子关方面，日军侵入我第三军右翼十字路、乱安村及固驿镇南端高地；我第一二二师在西回村遭遇众多日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同意第二十六路军留少量部队守娘子关，主力转至巨城镇、移穰镇，以第一二四师一个旅推进石门口。是日，娘子关失陷，娘子关战役结束。

△　忻口日军猛攻我军左翼，突破我八十三师盟腾村阵地。中央阵地日军攻势未得逞。右翼日军攻灵山及南部下以南阵地，亦未得逞。

△　日军占福建金门县。

△　平汉路高邑车站伪军100余人，与我游击队取得联络后，举行反正。

△　财政部长孔祥熙出席行政院例会，报告国际情况。

△　监察院监察委员张华澜、朱雷章、郑螺生提出对豫皖绥靖主任刘峙弹劾案，谓刘峙“恇怯畏死”，未经激战，下令由琉璃河溃退至石家庄，又由石家庄退至彰德，“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请将刘峙移付军事长官惩戒会，按战时军律速正典刑”。

△　北平伪治安维持会派定汉奸朱深等六人为伪河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该伪组织于11月初成立，统治河北省，另于平、津两地设伪特别市区。

△　日本宣布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

△　印度诗人泰戈尔函蔡元培，预祝我抗战胜利。

10月27日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着第一一五师（欠一旅）及第一二〇师速开赴阳泉，归黄绍竑副司令长官指挥。日军步、炮联合3000余人，分进至移穰镇附近。

△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和顺县马坊镇。

△　忻口方面，日军由右翼阵地东、西荣花村向我西南贾村猛攻。日军在中央阵地采用坑道攻击法，逐渐近逼我军阵地。左翼阵地，我军与日军双方激战甚烈。八路军骑兵一部攻克广武，毙日军七八十名，毁汽车八九辆。

△　我军在淞沪战场扼守真如、南翔、嘉定一线。

△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占领闸北一带。

△　李宗仁在南京对记者发表抗战意见称，组织民众与训练民众实为当务之急。

△　周恩来与刘少奇电聂荣臻、罗荣桓转中共晋察冀党委及八路军各师政治部，阐明中共在敌占区、敌后游击区开展党的工作原则，努力争取公开地位，发动群众参军扩军。

△　国民政府任命萨本栋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　日军指使平、津伪组织谋夺取河北省银行。财政部电饬豫、鲁、晋、陕、甘、宁、青各省，对河北省所发钞票流出冀、察省区以外者，一律停止使用，并责成原发钞银行，设法负责整理收兑。

△　伪德王在归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定改伪蒙古军政府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改归绥为厚和浩特（呼和浩特）市，为伪联盟自治政府驻地；伪主席为云端旺楚克，副主席为德穆楚克栋鲁普，最高顾问为日人金井章次。按：伪蒙古军政府民国二十五年5月12日成立于嘉卜寺，云端旺楚克任伪主席。

△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访晤上海市长俞鸿钧，并在国际饭店举行茶会，招待旅沪德侨，俞鸿钧、潘公展、王晓籁、刘湛恩等出席。

10月28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往昆山前线巡视，召集第三战区师长以上将领训示对日作战注意事项。

△　日军大举向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孤守之四行仓库进攻，我八百壮士予以迎头痛击，毙日军80余名。下午6时30分，第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宣布："誓与敌拼死一周，永无遗憾。"上海各界市民前来慰问并输送食品。晚，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受"八百壮士"精神感召，冒险送国旗于四行仓库，守军高悬于四行仓库楼顶。沿苏州河围观之中外人士，睹此莫不感奋。

△　驻守大场以西阵地之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以阵地为日军突破，影响上海战局，举枪自戕殉国。

△　晋东方面，日军陷东小麻、会礼村阵地，日军七八百人陷我右翼巨城。我军圪套村阵地亦被日军攻破。另股日军攻陷我上庄附近阵地，我军伤亡奇重。日军1000余人攻破我石门阵地。攻移穰镇日军，已向我左翼乱流一带猛攻。至此，我军正面已成被包围之势。

△　忻口方面，日军炮击我军两翼阵地甚烈。左翼部队出击，斩获甚多。日军1000余向我中央阵地强袭，我毙日军200余，获步枪10余支。日军向我第十五师猛烈攻击，激战剧烈。

△　磁县县长杜某临战逃逸。游击队肃清残敌及汉奸后，召集各乡父老开会，商讨动员民众及安定地方事宜，公推田裕民暂行代理磁县县长，于彭城镇设立磁县办公处，组织民众，协助抗日部队。

△　日军占领金门西烈屿岛，在金门建海军根据地及飞机场；日机连日袭厦门。

△　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召开全市农工商学各界及文化妇女救亡各团体联席会议，通过对九国会议宣言、文电，并发表告市民书，号召一致抗战到底。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上海各妇女团体，浙江、同

济、交通及暨南等大学校校长，均发表通电、宣言，要求九国公约会议主持公理与正义，制裁日本。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访晤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希望德国说服中国政府，寻求中日和平解决争端。狄克逊即将广田意旨电达德外交部。

10月29日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指出淞沪战事处境艰难，北战场亦形势不利。“但就全局来观，我并未失败”。“军事上最要之点，不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在于主动地位”。“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大体上说来是不足虑的”。

△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访晤外交部次长陈介，对中国方面进行谋和试探，表示“中国和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陈介表示，在中国答复之前，须先知道日本谋求妥协的条件。

△　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致书闸北四行仓库守军称：“余奉命经营闸北国防轴心，保我疆土，诸同志奋勇却敌，固守二月有半，倭敌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所以保国，幸不后人。近以一发之动，全线西移，本军亦奉命转移阵地，而以最后守卫闸北之责，付托我忠勇之诸将士。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坚毅不拔、临危受命精神，余与全军将士同致无上之敬意……（诸同志）不吝牺牲，早抱成仁之决心。此役杀敌致果，实开震天动地之史页。诸同志固守闸北已三日矣，敌之畏葸与我之勇敢，已为举世所共见，沪上中外人士交口钦佩，民众奔走援助，咸负如可赎也，人百其身之愿。此诚我中华民族之光荣，我中华民国之光荣，亦我国民革命军之光荣。”

△　苏州河以北日军企图渡河，为我军击退。沪西我军与日军激战，双方隔河用大炮互轰。

△　忻口方面，日军猛攻我军右翼阵地。中央阵地遭日空军与炮联合猛烈轰击。左翼日军向我盟腾村附近高地猛攻数次。经剧烈战斗，我军歼灭日军约200人。日军在南怀化、下王庄用野炮20余门猛轰，与我军激战终日。

△　晋东方面，日军约1000余人向我第四十二军阵地猛攻，另一部向阳泉方面前进。我王家庄附近守军与后方联系断绝。

△　军事委员会宣布，废止《剿匪区内文武官佐士兵惩奖条例》，但《陆海空军剿匪惩奖章给予规则》仍暂行适用，删去该项规则第二条及第十二条。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发表谈话称，中共陕西省委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公开信，与中共中央9月22日宣言精神不符。

△　《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为西安警备司令部与公安局查封，《解放》周刊7000余份被没收，店员一人被带走。

△　天津日军图劫夺海关及长芦盐务管理局机关财产。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制定报纸及会社等登记规则，规定报纸、刊物等非先行登记，不得在租界内印刷或发行。

△　苏联决定参加九国公约会议。

10月3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发奎代朱绍良为淞沪战场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刘建绪继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

△　日军续向苏州河南岸攻击，我军在新泾镇以南阻击日军。我四行仓库800守军已成孤军，退入公共租界。至此，我苏州河北岸阵地全部弃守。

△　日舰五艘、扫雷艇四艘驶抵江阴封锁线，遭我巫山炮台猛烈

攻击，舰艇被击沉二艘，余舰艇逃窜。

△　晋东日军全线总攻，我军右翼伤亡重大，平定失守。

△　日军陷阳泉。

△　新四军军长叶挺飞西安。

△　国民政府宣布，本年度各机关人事考绩暂停举行。

△　财政部通令禁用日本军用币。

△　复旦及大夏两大学一部移贵阳设分校，贵州省政府补助开办费1000元。11月4日，两校在贵阳成立第二联合大学，定于12月1日开学，5日招考新生，15日上课。教育部拨款三万元作开办费。

△　毛泽东电告八路军，应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

△　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作检讨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逃避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　德国外交部电驻华大使陶德曼称，对于中日之间的调处，“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并不想超出一个递信员的地位”。

10月31日　　蒋介石采纳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及军事委员会作战组长刘斐的建议，下令淞沪前线我各部队向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既设阵地转移。同日，蒋介石嘉奖坚守闸北之第五二四团官兵，通令将该团各官兵晋升一级，并呈请政府给与荣誉奖章；命令该团放弃闸北最后阵地，撤离四行仓库，进入公共租界。

△　日军继续强渡苏州河，占领据点数处。我军迭次反攻，日军

凭借其优势炮火掩护，顽强抵抗；反复争夺近10日，双方死伤惨重。

△　军事委员会调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在平汉线进行部署。第一线兵团由内黄、楚旺、肥乡方面，第二线兵团由南乐、大名、广平方面，分别开始攻击前进。

△　朱德与任弼时在寿阳会见黄绍竑、孙连仲等，在寿阳马村会见邓锡侯、孙震；黄、邓等人均表示对日军的进攻只能节节抵抗，望八路军能攻其侧背。

△　国防参议会委员蒋百里抵柏林转比京，列席九国公约会议。

△　日本通知英、美、法等国驻沪领事并转告南京各教堂、学校、机关，将于31日午轰炸南京，限令侨居该处各国侨民，即日迁移。

△　陶德曼大使电德国外交部，谓已在上海晤德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奥特，得悉日本参谋本部和平条件，将设法由其本人或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此条件转达蒋介石。

是月　至本月底，行政院、侨务委员会等处收到海外侨胞救济难民和认购公债汇款，共1990万元。

11月

11月1日　蒋介石率白崇禧、顾祝同至南翔前线，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表示要收回10月31日成命，命令各军凡已撤退者，必须返回原阵地；未撤退者不得移动；并谓：“我要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上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有利的同情和支持。”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电令忻口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

煌撤出忻口，率所部在莱水坞、青龙镇、天门关之线占领阵地，准备歼灭进攻太原日军；并协助傅作义军，依城野战，防守太原。至是，忻口会战结束。

△　军事委员会令防守平汉线安阳的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往晋东南，阻击沿同蒲线南下日军，策应太原作战。

△　淞沪战场，日军突破我军苏州河防线，进据吴家库一带。

△　日机袭徐州，为我军击落一架。

△　日舰七艘、汽船30余艘，炮轰浙东青珠镇，掩护陆战队向健跳所登陆。青珠镇及三门近江墩各乡壮丁奋勇应战，将日军击退。

△　晋东方面，我军在桑掌村与日军千余苦战，伤亡甚重。进占昔阳东冶头镇日军，与我第十八集团军对峙中。

△　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团抵达布鲁塞尔，驻法大使顾维钧任首席代表，驻英大使郭泰祺与驻比大使钱泰任副代表。我国外交部发表宣言，驳斥日本10月28日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宣言，列举日本侵略者暴行；并声明日本如不撤退军队，无和平可言。

△　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电蒋介石，报告在莫斯科承伏罗希洛夫元帅招谈，称在九国公约会议上，苏联决援助中国。

△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提议，立即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决定具体国防纲领，通过民主宪法，选举政府机关。

△　国民政府特使蒋百里（蒋方震）在柏林会见德国纳粹党要人戈林，说明中国的抗战立场。

△　资源委员会与英商华英商业银公司订立75万元借款合同，以

开发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借款年息六厘半，15年还清；除以湘潭煤矿公司机器材料作抵押品外，并将该矿全部股票，交与英商作抵押品。

△　赣、闽、苏、浙、豫、鄂、皖七省省银行，在皖举行联席会议，商讨调节内地物产，增强抗战力量等问题。会议决定，即日成立省际内地物产联运处，并设办事机构于镇江。

△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理、法、工三学院开始上课；文学院设衡山，定15日开学。到学生计1250人，另有他校转来借读生220名。

△　中苏签订第一次信用借款5000万美元，五年还本。

11月2日　蒋介石电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程潜，转阎锡山东（即11月1日）电，希第一线各部队早日北上，断日军归路。

△　忻口方面，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于本晚全线撤退，向太原以北地区青龙镇东、西线既设阵地转进。

△　晋东方面，日军4000余人猛攻平定西南马道岭阵地，受我第一一五师陈光旅英勇抗击。我第一二九师主力与进犯昔阳日军苦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一部袭击昔阳以东黄崖头日军，激战终日，毙日军470余名、战马200余匹，缴获枪支250余支及军用品一车。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林伯渠转周恩来、秦邦宪等称，中共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至轻易退至黄河以南。

△　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太原防守问题，周恩来应邀参加。周恩来对傅作义接受太原守城任务，坚持抗战精神表示敬意。

△　行政院为了解各省战时政情，特派员赴皖、赣、湘、鄂、粤、桂等省视察。

△　中央银行停止日汇挂牌交易，日商银行钞票、支票一律拒收。

△　行政院决议：在广西省转收盐税项下，每年提120万元为基金，发行整理广西金融公债1700万元；并拟定自本年12月1日起，桂钞一元折合法币五角。

△　四川省政府制订《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要求尽量开发动力、金属、化学、粮食等资源，创立或扩充钢铁、炼铜、兵工、机器、基本化学、水泥、纺织、伐木和造纸工业，修筑宝成、成渝两铁路等。

△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及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阻止日本侵华，膺惩日本摧毁各大学及其他文化中心罪行。

△　蒋百里在柏林对德国记者称，日本将崩溃于政治与道德。

△　行政院决议，派陈公博为赴欧洲专使。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和武官奥特少将提出对华和平条件，其要点为：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三、上海停战区域须再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广田并称如果中国政府现在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决心继续战争，直至中国最后崩溃，届时再提更苛刻条件。

11月3日　太原会战开始。是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呈请最高统帅部，特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所有第二战区各军均听该总司令指挥。同日，卫立煌部署太原防御计划并电呈阎锡

山，其要旨为：以第十五军、第十七军（欠第二十一师）等为右翼兵团，以主力占领莱水墙、川套里亘前披迄窑子上南端之线；以第三十五军一部、第二十一师、第四十七师、第四十二师王旅、第五十四师、第七十二师、第七十三师、第一〇一师、第六十六师之第二〇六旅、第二〇三旅、独立第二、第三旅各部队原配属之炮兵、装甲车队为中央兵团，以主力于窑子上西北端亘青龙镇迄周家山之线；以第十四军、第六十一军一部、第七十一师、第九十四师、独立第七旅等部为左翼兵团，以主力占领观象坡、东青善、西青善及东墙村亘栏 岗村迄天门关之线。各兵团统限于4日占领阵地完毕。

△　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我应协助各友邦力促九国公约会议成功，并使公约发生实效。蒋介石并对我国出席代表指示：一、对与会代表力持合作；二、破坏会议之责任应由日方负之。

△　德国外交部令驻华大使陶德曼将日本和平条件转达蒋介石。蒋氏虽表示“决无遽尔接受斡旋之可能”，但仍同意陶德曼进行联络。

△　蒋百里会见德国防部长白伦堡。

△　中华文艺协会、剧本作者协会、中华作曲者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等50余团体，组成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日开成立大会，选举郑振铎、傅东华、田汉、欧阳予倩、陈大悲、赵景深、蔡楚生等45人为执行委员，郑振铎、傅东华、田汉、赵景深等21人为常务委员。

△　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正式开幕。参加者原签字国中、英、美、法、比、意、荷、葡八国，事后签字加入者有瑞典、挪威、丹麦、玻利维亚、墨西哥，非签字国苏联以及英属自治领与属地加拿大、澳洲联邦、新西兰、南非联邦、印度，共19国。我国代表顾维钧在大会发表演说，说明日本侵略我国事实。意大利充当日本代言人。英、美等国态度暧昧，互相推诿，不愿开罪日本。苏联代表团建议采取集体行动制裁侵略者。我国代表建议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亦未得

到反应。

11月4日　国民政府明令修正公布《省警务处组织法》及《首都警察厅组织法》。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第二次追加预算，岁入总计为1213.3659万元，岁出总计为1213.3657万元。

△　周恩来电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东线八路军应以一支队向山西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侧翼的运输和收容散兵。

△　晋东日军进至寿阳，与我守城部队激战；我军于晚间突围出城，寿阳失陷。

△　日军第五师团由忻县向太原进攻，是日陷太原外围关城镇。山西省政府迁临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被任命为太原守备司令，防守太原。

△　日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率第六师团主力与第十八师团，于是日晚乘船进入杭州湾停泊地。

△　日机10余架袭漳河一带，为我军击落三架。日机六架袭嘉定，为我军击落二架。

△　津浦线陵县凤凰店方面，日军400余名向郑家寨方面进犯，与我军在葛家堡一带发生激战。

△　平汉线日军陷安阳，第二十集团军商震部退守七里店至东尚庄一线，阻止日军南犯。

△　南京各界八万余人举行抗敌自卫暨拥护《九国公约》市民大会，通电九国公约会议，请采取有效办法制裁暴日，维持东亚之和

平；并通电全国，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　青海农、工、商、教、妇女、青年等10余团体，联衔电请国联对日实行有效制裁。

△　上海教授与作家协会、中外文化协会、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律师公会和会计师公会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推选黄炎培等八人为理、监事。

△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向中、日双方建议，在上海南市设难民区，收容被灾难民。上海市政府准其申请。

11月5日　蒋介石派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黄仁霖赴首都医院犒赏负伤将士，将官每名100元，校官每名50元，尉官每名10元，士兵每名五元。

△　陶德曼访蒋介石与孔祥熙，传达日本所提和平条件。蒋介石表示须先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方可进行谈判；并称日本如继续作战，中国亦不投降。

△　周恩来和彭雪峰等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　日军第六师团与第十八师团由军舰多艘掩护，在杭州湾北岸漕泾镇、全公亭及金丝娘桥三处登陆。日舰向海盐、乍浦开炮轰击。我军在全公亭、金山咀之线，仅有第六十二师一部担任守备。日军登陆时，我军兵力单薄，无法阻止。日军登陆后，一路由全公亭攻新仓，一路由漕泾镇及金丝娘桥攻张堰镇。我淞沪战场右翼作战军阵地为日军突破。日军即迅速逼攻松江城。

△　越过苏州河南犯的日军第三师团与第九师团，继续向淞沪战场我左翼作战军逼攻，至使我国守军在淞沪战场陷于两面作战困境。

△　第一集团军骑兵占领南和、任县及邢台以北之官庄车站，步兵向邢台攻击。

△　由忻口南移之我军一部到达青龙镇，未能完成掩护集中任务。卫立煌下令阵地移至太原北郊，第十四集团军各部队渡汾河西撤。

△　日军陷阳曲，逼攻太原。

△　晋东日军一部进至寿阳与太原间之大安、坪头，即由大安犯榆次，进迫东阳。

△　教育部派员到河南调查，统筹救济战区流亡学生及教职员办法，在开封、许昌设招待处，收容平、津、冀、察、晋、绥流亡教职员与学生。

△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中山大学校校长邹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等102人联名发表英文声明，历述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文化机关，毁坏大学已达23所，中、小学更不可数计，呼吁世界各国正义人士对日予以制裁。

△　伪北平、天津联合维持会成立，汉奸雷寿荣充秘书长，划静海、独流镇等40村改设会川县。

△　九国公约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我国代表团发表公报，驳斥日本声明，指出日本声明不仅对中国有极多颠倒是非之处，且证明日本对国联与美国努力恢复和平工作，颇抱反感。

11月6日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二十六年山东省整理土地公债条例》，定额为250万元。

△　周恩来至交城，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请其电促卫立煌鼓励与督促傅作义积极防守太原，并请调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至雁门关方面阻击日军增援。

△　毛泽东电秦邦宪称，叶挺已至延安，拟以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军部“暂住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　广东各界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以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王宠惠、邹鲁等30人为常务委员。

△　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市总工会、工界救亡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和上海印刷工人救亡协会等各业工会，以及汉口、无锡、苏州、宁波等地代表，举行中国劳动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并选举陆京士、朱学范等81人为委员，选陆京士、朱学范等15人为常务委员。

△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举办抗战教育讲习会举行始业式。讲习会共有学员百余人，均具大学程度，经短期抗战教育课程训练后，即分派到各县进行民众训练工作。该会干事长为晏阳初。

△　第一集团军收复河北成安。

△　日军向太原城郊进攻，第五师团主力附伪蒙骑兵及坦克、装甲车100余辆，从东、北、西三面猛烈攻城，日机轮番轰炸城内。卫立煌令第七十一师及独立第七、第八旅增援，仅独立第八旅渡河进入西城，其余部队南撤。

△　日舰云集闽海，广东绥靖公署宣告再度封锁虎门，并修正封锁条例。

△　欧亚航空公司在昆明建总修理厂与机场。

△　国民政府派赴欧洲专使陈公博，13日抵罗马，15日会见意大利外长齐亚诺。

△　九国公约会议第二次对日发出邀请书。

△　德、意、日在罗马签定反共协定，三国轴心侵略集团正式成立。日本对华侵略更加猖狂。

11月7日　　蒋介石对外国记者谈话称："主张中日直接交涉，无异于增加中国之危机，且与九国公约会议之精神完全相反……如由两国直接交涉，毫无其他保证，无论条件如何，其结果必使中国国家生命陷于随时随地可被消灭之危境，永无独立自由之机会。此不独中国所不能忍受，亦且为《九国公约》会员国所无法接受。"

△　蒋百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宣称，外传中国请第三方面调停中日战争消息，实属不确。

△　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于五台山地区成立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该师杨成武独立团一个骑兵营与两步兵连为该军区的基本武力。

△　八路军总部抵达和顺县石拐镇。

△　平汉线正面，我军仍固守宝莲寺阵地，并收复顺德以北官庄车站及南和、巨鹿两县城。

△　山西省政府及省属80多个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移临汾办公。

△　晋东日军川岸师团先头部队约1500余人，进至太原城南狄村附近，一部进抵双塔寺，与城东之晋北日军会合。太原已陷入日军包围之中。日军从东、北两面以密集炮火对太原轰击，步兵则乘势向城垣猛冲，日机竟日轰炸城内。我城外部队伤亡殆尽，城垣炮位多被轰毁。入夜，日军炮击更烈，城内潜伏的汉奸四处活动；电话随修随断，消息不通。

△　日军分兵一部由店镇渡汾河，沿太原至汾阳公路南犯。

△　淞沪战场，日军渡苏州河，后续部队增加，攻势愈猛，苏州河南岸我军陷入苦战。

△　由杭州湾登陆之日军攻占金山。

△　苏州河方面日军突破姚家宅、北新泾等处我军阵地。

△　日机袭苏州，为我军击落一架；日机袭洛阳、广九路等地。

△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下达编成华中方面军命令，松井石根大将任方面军司令官，塚田攻少将任参谋长，下辖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第三飞行团；司令部设上海。方面军的目标，是“以挫伤敌之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并规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　德驻日大使狄克逊与广田谈与中国政府的和议条件，认为依日本提案议和，希望甚微。

△　比国驻日大使再请日本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又遭日本拒绝。

△　北平伪华北开发公司成立。

11月8日　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率部驰援松江，与日军激战三日后，在松江指挥部队渡河时中弹牺牲殉国；此为我军在淞沪会战中牺牲之军阶最高将领。

△　淞沪战场我军腹背受敌，放弃上海阵地，向苏州转进。

△　太原巷战激烈。太原城被日军炮火摧毁数处，日军第五师团由豁口冲入，与傅作义部守军巷战竟日。因众寡悬殊，当夜傅作义率部突围，向南撤退。

△　日军陷河北任县。

△　日舰五艘炮轰厦门禾山及同安、澳头；又以小汽艇分载水兵百余人，企图在澳头、五通、何厝社三口登陆，为我守军击退。

△　日机袭津浦路客车，毁车厢七节，乘客死伤200余人；又炸松江、济南、苏州等地。

△　毛泽东电告八路军各将领，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

△　周恩来建议八路军各部迅速派部队收集溃兵、散枪及一切资材，准备发动游击战争。

△　汤恩伯与刘伯承会晤于晋东榆社。

△　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特区的选举与财政，毛泽东不主张实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制。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陆海空军勋赏条例》，凡24条。

△　山东大学决定迁皖，定于12月5日在安庆安徽大学校址开学。

△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称，明年将继续考送25名留英学生；除注重理科基本课程外，将特别注重国防工业及经济建设各项需要。

△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

△　西南运输处开始由镇南关运输进口物资。

△　日军在绥远成立傀儡组织时，公乌审、鄂托、克乌喇特等旗坚不屈服；杭锦旗在伪组织成立后，通电表明拥护中央。

△　顾维钧在布鲁塞尔对美广播演讲称，意大利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实属蔑视各国共同利益。

△　蒋百里等在布鲁塞尔与意大利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阿杜鲁文迪会谈。

△　狄克逊电德国外交部，建议由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迫蒋介石接受对日和谈。

△　美总工会与工业组织委员会24分会，会同华侨工会，组成抵制日货大会，并推定常务委员会，致电国务院与内政部，要求禁止军用品及附属军用品运往日本；并拟劝告美国各商家拒绝买卖日货。

11月9日　太原失陷，太原会战结束。

△　松江失陷，我淞沪阵地侧面受重大威胁，实行全线撤退。中央作战军兵团开始向青浦、白鹤港一线转移，撤退秩序极形混乱。左翼作战军兵团被迫与中央作战军兵团同时向吴福线撤退，秩序亦极混乱。吴福线又告不守，左翼作战军兵团即向锡澄线撤退，经无锡、宜兴、广德，趋铜陵、大通、荻港，任江防守备。

△　日军进占虹桥机场及龙华镇。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占领黄浦江东岸浦东地区。

△　空军数队飞杭州湾轰炸，日舰一艘中弹。

△　日骑兵攻陷平遥。

△　“肇和”军舰舰长方念祖，玩忽职守，致该舰遭日机轰炸受损。军事委员会电令扣押方念祖，明令褫职查办。

△　应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请求，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孔祥熙与白崇禧等指出战局的严重性，称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

国的经济将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　行政院通过平、津、冀、察教育救济办法。由教育部与财政部补助经费，办理各该省、市教育救济事业，在豫、陕等省酌设中等职业学校、师范学校，收留流亡学生，安抚教职员。

△　毛泽东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在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移主力向内地要点进攻。八路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

△　朱德、彭德怀令第一一五师一部开始南进，转移至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令第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山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　英国首相张伯伦发表演说，称英美合作方能解决中日问题。

11月10日　　驻美大使王正廷在波士顿演说称，中国以国联会员国地位，对中日争端准备用和平方式，并依照公理加以解决。

△　侨务委员会收到侨胞捐款56万余元。暹罗华侨募集衣服数万件，救济药品20箱，已运抵香港。

△　军事委员会解释及补充8月发布之《非常时期处理军事犯办法》，凡12项。

△　陕西棉花因时局关系滞销，棉业总办事处在陕设棉业办事分处，咸阳、泾县、渭南设支处。

△　日军对上海南市发动总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上海守军向吴福国防线撤退，因保管国防线碉堡钥匙之保长逃亡，部队不得进入防线，遂极形混乱，纷纷退至锡澄线。枫泾镇失陷。

△　日军陷河北庆云。

△　日舰五艘、飞机一架袭击厦门，发炮150余发。我军击伤日舰两艘。

△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的第二梯队第一一四师团在金山卫登陆后，向嘉兴方向进攻。

△　英国红十字会主席宣布，伦敦市救济中国难民、伤兵基金捐款已达七万镑。

11月1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决定迁都重庆。

△　蒋介石电九国公约会议称，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是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打算；中国主权若一日受有威胁，则中国军队即当继续抗战一日。

△　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指出："沪市抗战三月，予敌人以巨大之损耗，博友邦诚挚之赞扬，今后当记取沪战之精神与经验，使全国数万万民众同守此信念而不渝"；并告诫民众称："今者为增强抗拒之战略起见，前线已离开市境"，"切望吾沪民众不可因战略转移而误滋沮丧，更当因环境较异而益矢忠诚。"

△　我国守军4000余人在撤退时，被隔绝于上海市内而撤至租界。日军即向上海市西方与南方推进。

△　周恩来至临汾，会见《伦敦先驱日报》记者贝特兰，指出组织华北民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八路军身上。八路军总部决定：第一一五师除聂荣臻副师长仍留晋察冀坚持外，主力转移汾河流域与晋南，阻止日军前进；第一二〇师仍留太原附近，并担负开辟晋西北的任务；第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

△　空军一队飞往大戢洋面轰炸日航空母舰。

△　日军第十一师团陷南翔。同日，青浦、白鹤港失守，我守军第一七四旅旅长吴继光督战阻击日军，以身殉国。

△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先后搜查我救亡团体上海救亡协会和抗敌后援会，逼令解散。

△　日机10余架轰炸南京，为被我军击落两架。

△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发表谈话称，日本愿成为上海主人翁，必要时可对租界采取任何行动。1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否认日本有占据上海公共租界之意。

△　平汉线方面日军陷大名，刘汝明部转进临漳。

△　日军陷山东惠民，继攻鹊山。

11月12日　　上海沦陷。自8月13日至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先后编成上海派遣军与华中方面军，下辖近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大举进犯上海。我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部队，总兵力约70余师，海军舰艇40余艘、飞机250余架投入战斗。我军毙伤日军四万余人，坚守上海达三个月之久。淞沪会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深刻的影响。

△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演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中共的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在两者的过渡期中。

△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秦邦宪、潘汉年等，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与中共在上海的秘密工作。

△　杨杰与张冲电蒋介石，报告与斯大林晤谈情形。斯大林表示，若中国抗战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　杨杰晤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探询苏联对九国公约会议及会议后对我国态度。

△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抵南京；16日，谒蒋介石陈述抗战大计，拟以川军大部进行游击作战，少部牵制日军，一方面扰敌后方；并建议焦土抗战。

△　四川省颁订《救济战区来川借读大学生办法》。

△　招商局与美商卫利韩公司订约，将全部企业在名义上移转该公司经营。

△　上海南市我国守军向法租界撤退。日军占领上海南市。

△　西南进出口货运贸易运输处在粤成立，办理全国对外贸易，曾养甫兼任处长。该处系统制性质，凡国营、民营农、工、矿产品，概归其统制经营。

△　日舰和日机连日窜扰连云港和日照等地海面；日舰三艘驶连云港，炮轰圩沟；又以飞机13架掩护水兵登陆，为我军击退。

△　日舰两艘突来潮阳海面，派小轮载水兵数十人，企图在广澳登陆。日舰六艘进犯虎门，向我要塞轰击500余炮，我虎门炮台还击，击中日舰两艘，迫日舰仓皇逃去。

△　日机22架袭洛阳，我空军起飞迎击。日机28架轮流炸宁波。日机复炸济南、徐州等地。

△　日本再次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竟称日本目前在华行为，乃针对中国挑衅行为而采取之自卫行为，故不在《九国公约》范

围之内。

11月13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筹定，“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铁路以西”。

△　顾维钧在九国公约会议演说，请各国停止对日本供给军火原料。

△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应积极参加特区大会选举。

△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正规战结束后，八路军应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原则，与日军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　周恩来与卫立煌、黄绍竑谈部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政权和民运的开放、后方的补给、黄河北岸分区指挥、黄河南岸成立预备军区等问题。

△　商震电国民政府，请实业部会同财政部令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银行，继续贴放农村贷款，并指定专行承办棉花储押，以活动农村经济。

△　军事委员会委任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十八军军长庞炳勋为徐海警备司令，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为副司令。

△　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汉口支会成立，并制定救济办法。汉口支会办理该市及各地直接来汉或转道来汉之难民救济事宜。

△　沪杭线方面日军第六师团，由青浦越淀山湖西进，陷平望。同日，日军陷嘉定。

△　河北广平、南和失陷，日军继续东向广宗、威县进犯。

△　山东济阳沦陷。

△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切断我军主力退路，并策应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将华北调来的第十六师团在白茆口、浒浦附近登陆，向常熟进攻，企图切断我国上海守军退路。日军更集中七个师团兵力，沿京沪铁路南北两侧地区向吴福线进攻。

△　汉奸白坚武于上月在河北肥乡被擒，押往后方审讯后，在清丰县东门外伏法。

△　日驻意大利大使堀田与意外长齐亚诺进行长时间谈话，意政府愿意出面作中日交涉的调解人。

11月14日　　上海沦陷后，财政部令设在租界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分行照常执行业务，办理汇兑。

△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武乡县段村并电毛泽东称，太原已失，山西东、西两线友军溃乱不堪；山西正规战争已告结束，游击战争新阶段开始。

△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陈绍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康生等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迪化，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会见陈、康，请中共中央派干部至新疆。

△　军委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委会第三部及第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代表组成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以孙拯为主任委员，林继庸为执行组长，全面接管厂矿内迁事宜。翁文灏派林继庸、顾毓瑔往苏州、无锡、常州，金开英、朱谦等往浙江，陈世桢等往山东各处抢运物资，联系厂矿内迁。

△　建设委员会接办武昌水电厂，改为武昌水电公司，扩充股本为400万元。

△　非常时期难民救济总会令各分会，将难民中少壮男子施以训练，使之担任修筑各省公路工作。

△　我军袭击邯郸机场，炸毁日机六架。

△　常熟、太仓、嘉善失陷。

11月15日　　毛泽东电告朱德等，目前在山西的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

△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沁源县开村，次日抵沁源官军村。

△　归绥失守后，绥远形势混乱，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加强陕北防务，并派员至绥远发展游击战争。

△　冯玉祥函劝韩复榘及时反攻。韩复榘复电谓“努力自效”。

△　我军与日军在福山、常熟及沿江一带激战。

△　平汉线我军右翼克复沙河，并将附近桥梁、道路全部破坏。

△　财政部宣布，云南、西康、青海、新疆等省为统税区域。

△　日军发言人正式宣布，日陆军自8月23日至本日止，在淞沪战场作战死伤3.962万人，其中死9700人，伤2.992万人；杭州湾与扬子江区作战死亡者尚不在内。又海军死伤1200人；华北战区死伤人数约及淞沪区十分之八。日军在淞沪战场及华北战场共死伤达八万人。

△　日军陷山东鹊山后，韩复榘炸毁黄河铁桥，退守济南。

△　日机大举袭苏州，掷炸弹700余枚，该市遭极大破坏；苏州与南京电话、电报皆告中断。日机又袭南京、镇江、常州。

△　日本陆军省宣称，第三国之调停如能使中国停止抗战，日本

亦愿从事和解；日军现在山西、上海已得胜利，如中国仍继续抗战，则军事上将旷日持久。

△　日本派往欧美游说使节伍堂卓雄等一行到达柏林。

△　九国公约会议通过宣言书，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并为各签字国共同决定应付办法一层保留权利；但仍望日本改变态度，参加会议。

11月16日　　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晚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迁移重庆，财政、外交两部及卫生署迁往汉口，交通部迁往长沙，各军事机关仍设南京。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国防最高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职权。

△　周恩来与刘少奇联名电聂荣臻，提出抗日政权的建设问题：立即颁布临时分区组织法，向国民政府提议颁布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准备公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　周恩来在临汾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讲演，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坚持华北战争，将以游击战为主体，华北游击战争将有胜利的前途；并强调八路军留在华北，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

△　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电高岗，为联合内蒙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命高岗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与蒙汉支队向内蒙出动，北出乌审旗、鄂托旗，活动于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保卫绥远”等口号，发动伊克昭盟各旗上层抗日。

△　广东省政训战时工作队到达各县，发动全民抗战。18岁至45

岁男子，均编入各队工作。

△　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设立大本营。大本营组成包括陆相、海相、陆军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总长，由日天皇直接管辖。

11月17日　　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派蒋鼎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　国民政府令：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派陈仪兼驻闽绥靖主任。

△　国民政府令：谢晋元、杨瑞符各给予青天白日勋章。

△　毛泽东电叶剑英转告林伯渠，八路军仍在长城南北及同蒲路以东至平汉线作战，前锋迫近北平、保定、张家口，并未退回陕北。

△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沁源县城。

△　中共中央军委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部署黄河河防。

△　淞沪战场日军右翼在白茆口登陆后占支塘；左翼日军自平望沿苏嘉公路进窥苏州。我军在昆山、苏州间阻击日军。日军占乍浦并陷平湖。

△　日军陷太原后，一路由和顺进犯榆社，一路趋汾阳。攻向临汾日军，沿铁道越祁县抵平遥；攻向汾阳日军占清源（今清徐）后，西犯交城、文水。

△　广西省政府会议通过《征收房屋税暂行章程》。

△　上海市商会电实业部报告，从8月至10月，上海资本10万元以上的工厂被毁15家，损失651.8914亿元。

△　中国航空公司派机试航重庆至香港航线。

△　日本天皇批准设立大本营为日军侵华最高统帅部。20日，日本大本营正式成立。

11月18日　　张冲自苏联回国，行抵阿拉木图电蒋介石报告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表示愿助中国抗战；并告称，伏罗希洛夫答应："如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时，苏当出兵，决不坐视。"

△　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国家银行总管理处移设南京。沪行营业照旧，并照常办理国内外汇兑。

△　蒙旗宣化使章嘉呼克图离南京抵汉口，候轮赴重庆。蒙旗宣化使署将设重庆。

△　日军第十军主力攻占嘉兴。

△　日军陷山东烟台。

△　日机炸广九路天塘围及平湖两车站，为我军击伤一架。

△　日军占河北威县，宋哲元部转进卫河南岸。

△　北平燕京大学在日军压迫下暂时停课。

△　前清皇室载涛在北平组织"满洲协会"；汉奸何海鸣在天津组织伪记者协会。

△　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布留赫尔（加伦）将军在莫斯科发表重要宣言，表示："苏联一到相当时期，非挺身而出公然援助中国不可。"

△　国联大会决定以瑞士法郎200万组成三个流动医药队，帮助我国防疫，定月末到中国。

11月19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密电日人山本称："此次战起，使中国民气日益激烈，沪战及太原之战，双方损失皆巨，而现在日本已获相当面子，倘再事续进，则胜负无常。"

△　实业部派次长程天固等视察川、黔、滇、桂、粤、湘、鄂七省实业。

△　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团抵汤阴，慰问前方战士，并召集各界谈话。

△　军政部电示，豫北的民众组织划一收编，黄河以南严禁借名组织民军。

△　受雇于荷商轮船的中国海员，不愿随轮赴日，先后已有三批共计210余人自动辞职回国。

△　临漳县长张志熙、武安县长吴明龙、涉县县长刘炎光，于日军进逼县境时，未奉命令，即先离职。河南省政府责令上述三人着先予停职，听候查办。

△　陈公博会晤意首相墨索里尼。

△　乍浦——平望——嘉兴国防线为日军突破，沪杭线日军由嘉善西侵。日军第六师团占据平望后，与嘉兴附近日军会合，沿太湖南侧地区西进。

△　日军攻占常熟、莫城镇、苏州，第三战区命令各部队撤向锡澄线，吴福线国防工事为日军占领。

△　南京英、美、苏及各国驻华大使馆决定迁往汉口，南京仅留少数人员办理善后事宜。

△　法外长台尔博斯在议会发表演说，表示信守法国所担负的约

束，顾及法国在远东的利益，保持英、美、法之间恒久的联系。

11月20日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暴日举兵西进，逼我首都，挟其暴力，邀我为城下之盟，并郑重宣告："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　四川省政府电林森主席，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　国民政府令：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何成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蒋作宾为安徽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调任内政部长，特任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实业部长吴鼎昌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派实业部次长程天固兼代。

△　山东省政府移驻泰安。

△　实业部棉产统制委员会发表本年全国产棉第二次估计报告，计棉田面积6216.697万市亩，皮棉产额1336.6942万市担。

△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安泽县白素。次日，抵洪洞县苏村。11月25日，抵高功村。

△　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联合招收新生。凡志愿参加抗战，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青年，不拘文化程度，均可投考就学。两校训练时间为两个月，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运工作、抗日游击战争三门课程，训练后即上前线参加抗战。

△　厦门大学迁尤溪开课。同日，暨南大学及附中迁赣，择定南昌西山万寿宫为校址。

△　日军攻占浙江吴兴南浔镇。我军廖磊先头部队据升山阵地。

刘湘部五个师集结于广德、泗安、安吉间。

△　日军第二舰队与第三舰队合并组成中国海舰队，长谷川清任司令官，禁止中国政府与私人所有船只在中国领海航行。

△　吴江及福山炮台陷落。日舰119艘驶入南通江面。

△　日军向平汉线大名与清丰间增兵万人，向濮县进犯。

△　日机七架袭南京，被我空军击落一架。无锡我军击落日机一架。

△　日本当局要求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当局，允许日军自由通过两租界，取消上海国民党部，允许日本控制租界内的中国银行，排斥租界内行政机关中之中国人，镇压抗日分子。若上列各点得不到满意解决，日本保留自行处理的一切权利。

11月2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迁都重庆，电勉全国各将领作更坚决与更勇敢之奋斗，称："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奋斗；就整个抗战大计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

△　蒋介石电顾祝同、陈诚、薛岳等，指出："我前方将士浴血抗战，三月以来，挫敌凶锋，中外莫不称道。此次阵线转移，系由杭州湾方面影响为战略之运用之"；"希望我忠勇将士，各奋神威，继续努力，无论如何困难，必须保现有阵地，及适时予敌以打击，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　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自兰州接飞机返航，过周家口机场加油，遭日机偷袭，遇难殉国。

△　津浦线方面，黄河北岸我游击部队在茌平、聊城、蒲台各地向日军袭击。

△　日军一路由常熟沿锡常公路西犯，一路循京沪铁路前进。

△　上海市社会局统计，上海有5255家工厂被日军炮火摧毁，损失达八亿元。

△　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宣称，日本拟接管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中国政府机关，如江海关、邮政局、电报局、法院等。同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派陆军武官原田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向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一、取缔一切反日机关，包括国民党各支部在内；禁止反日招贴、传单及一切反日文字；禁止无线电、戏剧、电影反日宣传；制止华方间谍活动及一切惩治汉奸之举；二、驱逐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及其代表；有效地监视中国党政领袖之活动；三、禁止华方邮电检查；四、禁止华方新闻检查；五、禁止未经许可的中国无线电通讯机关。

△　日特使大仓喜七郎谒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面交近卫文麿函。

△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中国共产党称，你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东京、罗马、柏林掀起的野蛮战争，将被中国与西班牙两国的民众力量加以扫荡。

△　英国各大学及神学院、工学院学生，募集英金1500镑，资助中国战区外籍大学维持会。

11月22日　　蒋介石接见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访员称，中国愿与日本谈判和议，惟需根据《九国公约》。

△　顾维钧在九国公约会议发表沉痛演说，对日本侵略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宣称中国“可向各国宣示者，即中国将继续竭力奋斗，非但尽其《九国公约》及《凯洛格公约》签字国家之一之义务，并将尽

其为国际间爱好和平国家之一之天职”。

△　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移汉口。该会有医生80人，连同看护共300余人。

△　中央银行于桂林设分行，代理国库收支，发行钞票，办理汇兑，并协调地方财政金融。

△　吴兴失陷。日军两路会攻无锡。日机猛炸江阴及狼山炮台。

△　日机袭南京、丹阳、溧水、镇江、淮阴、周家口等地。南京我军击落日机一架，周家口我军击落日机二架。

△　日机在南京上空投函，劝蒋介石共同反共。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言人向《大陆报》称，局方拟于可能范围内，允许日方所提要求；租界内华方有关系人等，将请其离境。

△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召开代表会议，成立协商性机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最高顾问日人金井章次任总务委员会代委员长。

11月23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常州召集守御锡澄线将领讲话，勉稳定锡澄线。蒋氏于当夜返回南京。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由南京抵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国民政府之移驻重庆，主要意义，“一为不受敌人威胁，二能发动全民扩大抗战力量”。汪精卫称，中央党部必须属于国民政府所在地，故中央党部亦决移重庆。

△　日舰猛攻江阴封锁线，并在狼山江面向刘海沙发炮；我空军飞临江阴江面，轰炸日军。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非正式通知中央通讯社及《时事新

报》、《立报》、《民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等停止发行。当晚，上海日报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中央通讯社定24日停止发稿，《时事新报》、《立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民报》定25日停止在沪发行，并发表联合宣言。《申报》、《大公报》、《时报》则未定；仅《新闻报》拟继续发行。

△　日禁止中国政府和私人所有船只在中国领海航行。

11月24日　　国民政府特派唐生智兼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指挥守备南京之责。

△　中国共产党陕甘宁特区党委，提出在民主普选运动中的《特区政府施政纲领》。《纲领》共15条，主要内容为“动员特区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实行抗日战争”，“实行民主普选制度”，“保证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民主自由”，“保证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废苛捐杂税，减租减息，采用统一累进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实行国防教育”，“帮助蒙、回民实行民族自决”，“严厉镇压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的活动”等。

△　青岛戒严司令部成立，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任戒严司令，即日起实行戒严。

△　冯玉祥手谕韩复榘称：“今日全国之舆论，即千百年后之历史根据，明轩（宋哲元）弟于平、津之殷鉴不远，万勿蹈其复轨。”

△　空军飞机15架轰炸毛竹港口日舰，齐向日“长门”、“陆奥”两巨舰冲击，炸沉长门舰，另击沉大小日舰六艘。

△　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3000余人由保定、易县出动，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

△　日机袭广州，炸死炸伤400余人，毁民房100余家。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惇，否认工部局曾命令任何人非正式通知中央通讯社及五种中国报纸停止发行。

△　华南公司向暹罗购进大米数万包，运抵上海。

△　九国公约会议通过第二次宣言，向中、日双方恳切建议停止战事，并改取和平程序；同时宣告无定期延会。

△　近卫内阁参议官宇垣对东京报界称，倘中国方面战事延长，而致日方蒙受重大损失，则日本政策势将改变。

11月25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变更第三、第七战区的战斗序列，并规定两个战区的作战地域和任务：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由蒋氏兼任，副司令长官顾祝同，辖第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与第十一军团、第十七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十八军团。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陈诚，辖第十五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二十三集团军与第十六军团、第二十三军团、第二十四军团、第二十五军团。二、第七、第三两战区之作战地境，以遂安、淳安、昌化、广德、蜀山镇之线为公界。三、第七战区以一部确保许村、张鹿、洛金镇、埭溪镇阵地，以川军攻击吴兴方面日军，并各以一部确保广德、孝丰各据点；应加整理之部队，着向兰溪及其西南地区转进。四、第三战区应以有力部队扼守锡澄线，保持重点于无锡方面，并各以一部确保南渡镇、溧阳、宜兴各据点，须与南京卫戍部队联系；应加整理之部队，着向徽州及其以西地区转进。

△　蒋介石命令南京卫戍部队迅速构筑工事，固守南京，并与第三战区密切取得连络。

△　蒋介石接见留京欧、美记者，谈及日机空投函件称，此函不载寄者姓氏，其内容希望早日停战，并声明日本不欲提出严厉条件，仅欲得中国防共之合作。此种言论，殊与事实相反。各记者询蒋氏感想如何及作何处置？蒋氏答称，本人对此类事件向置不理；并宣称，

中国拟维持决心抗战之政策。谈及停战之可能性时，蒋氏称此事决于日方。蒋介石对外国记者重申中国抗战决心，并深信公理必将战胜强权，并称："抗战到底，至最后一寸土地与最后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

△ 重庆市政府奉令将曾家岩重庆高级工科中学改建为国民政府新址。

△ 海外华侨归国服务团已有10余批到南京。越南华侨成立越南归国服务团，分为救护、交通、消防及慰劳四组，共有男女青年团员240人，分四批归国。第一批已于25日抵南京，听候派赴前方工作，其余将陆续归国。

△ 无锡失陷。我军放弃锡澄线，一部沿京沪线撤向常州，主力向浙、皖、赣边境退却。

△ 山东我军收复聊城与堂邑。

△ 周恩来和彭德怀回到延安。

△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对外报记者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抵抗，日军将继续进攻南京、汉口，甚至重庆。

△ 焦作工学院呈准教育部迁移陕西，在西安设立临时校址，正式开学。

△ 上海租界出版首家"洋旗报"《华美晚报晨刊》。创办人为上海工商界人士蔡晓堤，编辑为石招泰等，发行人与《华美晚报》同为美国人密尔士。该报凭借美国发行人身份，不受日伪管制，遂揭露侵华日军种种罪行，颂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与沪上日伪报纸相对抗。该报后以经济困难，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派人秘密接办。自《华美晚报晨刊》创办后，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国共两党在上海租界出版"洋旗"报刊20余种，成为"孤岛"上海宣传抗日的主力军。

按："洋旗"报刊挂名的外国人老板（发行人），不拥有报刊的任何股权，对报刊的经营管理不负任何责任，亦无权对报刊的言论作任何干预，实际仅是报刊雇来对付日伪的"守门神"。

△　日军派赤谷田助任上海江海关副税务司，加藤桂一任税收主任；28日，更派日人多人任海关职员。

△　居住南京的丹麦、法国、英国、美国侨民组织国际委员会，正式向中、日两国军事当局建议，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收容难民。

11月26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三处职员一行800余人抵重庆。重庆市民10余万人夹道欢迎。

△　军事委员会颁布首都保卫军战斗序列：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第七十二军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八军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宪兵部队约两个团，其他特种部队。唐生智策定南京城防御计划。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苏、浙江两省政府，免去陈果夫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免去朱家骅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任命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　立法院长孙科自汉口飞香港。

△　毛泽东与彭德怀电朱德、任弼时，为防止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与晋西北地区，应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军事与游击动作的训练，动员地方民众。

△　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对伪满军工作指示》，加强对伪满军的宣传和争取。

△　湖北省难民垦殖团250余人，由西安赴青海都兰、共和两县，从事垦殖工作。

△　陶德曼在汉口访孔祥熙，转达德国政府调停中日战争之意。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屈服日军要求，迫《时事新报》停刊。

△　日军陷长兴，刘湘部已到泗安。安吉我军三个师向突入日军攻击。日军以一部向泗安、广德、宣城、芜湖西犯，主力由郎溪会攻南京。

△　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一部约1400余人，由应县沿同蒲路南犯，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在浑源、广灵间设伏，歼灭日军200余人。

11月27日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对新闻记者表示："本人奉令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与莫大之代价。"

△　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韩德勤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江苏省政府移驻扬州。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电奖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撤销处分前案。12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对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的撤职留任处分。

△　军政部令严禁征兵中贿买冒名顶替，倘有借端敲诈，受贿舞弊情形，一经查出实据，依照军律治罪。

△　我游击队克复山东乐陵。

△　日本近卫首相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南京政府与蒋委员长如改变其对日政策，与日政府谈判，则日政府准备响应之。但若南京政府

决计长期抗日，则日本亦准备接受其挑战。华北以及其他各地，将有独立的组织出现的可能，在明年1月必有一新的组织成立。日本现在不对中国宣战，但是如果局势有变化，或者有宣战的必要。近卫又称，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或将有使用武力的必要。《九国公约》为欧美借以干涉远东的工具，到适当时机，日本将提议修改或废弃之。

△ 日机38架，有系统地轰炸粤汉路，毁路轨颇长，毁桥梁一座。日机袭镇江、西安、洛阳、宣城、金坛及广九路等地，在镇江投弹140枚。金坛我军击落日机三架。

△ 伪河南省自治政府在安阳成立，汉奸萧瑞宣任伪自治政府主席。

△ 英、美、法国政府令其驻日大使通知日本政府，关于中国海关之任何办法，事先必须与该各国政府商议。英国政府对日本企图管辖上海邮政及无线电，极表关切。

11月28日 成都各界数万人举行欢迎林森主席莅渝大会，并表示拥戴政府长期抗战。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指示，希望南京防守能坚持两周以上。

△ 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接见各国使馆、教会、报馆及商界代表，表示决与南京共存亡，并劝外侨撤离南京。

△ 蒋介石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征募员兵及摊派公债中之敲诈官员予以严办。

△ 军事委员会颁布《汉奸自首条例》。

△ 军事委员会特派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兼东北抚慰使。

△　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先后抵长沙，设教育部办事处。

△　翁文灏派人分赴九江、芜湖、郑州、开封等处，劝导厂矿内迁。

△　日军占广东台山县南之上川岛，又续占凌溪岛及中山县属三灶岛。

△　日军陷宜兴，继向溧阳、广德进犯。

△　日本强行接收我设于租界内之交通部上海电报局及交通部广播电台、上海各无线电报房、上海新闻检查所。上海与各地之公众电讯交通，已完全断绝。

11月29日　　陶德曼访孔祥熙、王宠惠，转达日本议和条件。蒋介石电孔祥熙约陶德曼面谈；并电知孔祥熙，此“为缓兵计，不得不如此耳”。

△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因胃病加剧，奉命由南京飞抵汉口治疗。

△　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战时服务团100余人赴郑州、新乡一带，进行组织、训练、宣传、救护等项工作。

△　赈济委员会于郑州设办事处，派员分赴豫、晋、鲁三省，视察难民救济事宜。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在汉口新闻记者公会欢迎会上称：“今日之报纸当从有闻必录时代进而加以判断。予自服务中宣部后，即决定不用可扣则扣之方针，而改用可不扣即不扣之方针”。

△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

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陈绍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康生，自苏联飞回延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也同机到达延安。

△　犯江阴之日军，一路由锡澄公路侵入南闸镇，一路自常州——江阴公路进至周庄镇，迫近江阴。日舰一艘率炮舰20余艘驶至张黄港外，向江阴要塞猛攻。日机反复轰炸江阴城。

△　日军攻占常州，继向丹阳进犯。

△　英、美、法、苏、德、意、比等国大使馆及馆员，陆续到达汉口。

△　美国务院命驻日大使口头通知日本外务省，勿变更中国海关制度。

△　意大利违背国联会员国一致之决议，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并在长春设立公使馆。我驻意大使即向意政府提出抗议。

11月30日　蒋介石巡视南京四周防御工事。

△　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颁布《抗战二十信条》。

△　陶德曼访铁道部长张嘉璈，请其转劝蒋介石与日本议和。

△　杨虎城在戴笠系统特务监视下，离港飞往武汉，转赴南昌，即遭囚禁。

△　成都国际电台支台建成，开始与伦敦、柏林、巴黎、莫斯科电台通报。

△　由长兴西犯日军，主力进攻广德，在飞机场一带与我军激战。我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将军经两昼夜苦战后，弹尽援绝，亲书遗书后自戕殉国。其遗书称："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

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余死无恨矣！”我旅长与团长三人亦受伤。广德遂陷。日军进据溧阳。

△ 日机狂炸浙江萧山，城内死伤民众500余人。

△ 日本内阁批准1938年至1939年战费预算28.68亿日元。

△ 英、法两国外长发表谈话，维护远东原有利益。

是月　宋庆龄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称：“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奠定了正式合作的基础”；“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

△ 由北平故宫博物院移至南京文物，正陆续运往内地。

12月

12月1日　行政院长蒋介石令各省地方官吏及保甲长，不得怠忽紧要工作，并犒赏各铁路员工10万元。

△ 国民政府在重庆办公；行政院电告各省、市政府，已移渝办公。

△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二十六年整理广西金融公债条例》；公债定额为1700万元，22年偿清。

△ 日大本营大陆令第七号，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由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组成，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同日，下达大陆第八号“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中国首都南京。”

△ 日华中方面军下达攻占南京作战令：一、上海派遣军主力于12月5日开始行动，重点保持在丹阳、句容公路方面，击败当面之敌

进入磨盘山山脉，以一部从扬子江左岸攻击敌之背后，同时切断津浦铁路及江北大运河。二、第十军主力于12月3日开始行动，以一部从芜湖方面进入南京背后，以主力击败当面之敌，进入溧水附近，特别须对杭州方面进行警戒。

△　日军步兵一个旅团，重炮10余门，战车30余辆，沿常澄公路向江阴要塞推进。日舰60余艘泊段山以东，配合陆军进攻。

△　日机袭诸暨，炸死平民700余人。

△　西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由青海回藏途中，是晨圆寂于青海玉树；遗嘱全藏官民僧俗，努力汉藏和好。

△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汉口招待德、美大使及苏联临时代办，各使馆参赞、秘书，各国驻汉口领事；吴鼎昌、张嘉璈、张群、吴国桢等出席。

△　陈公博访法国总理旭丹及副总理勃鲁姆。

△　蒋百里访晤德国航空部长戈林。

△　日驻香港总领事胁迫香港政府制止在港华人抗日活动，谓“如再容忍此种活动，则恐香港终将陷入中日争端之漩涡”。

△　墨索里尼与日本访罗马使节接触以后，在报端发表文章，劝中国向日本求和。

△　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晤我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希望中国接受日本和平条件。

12月2日　　陶德曼由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到达南京，会见蒋介石。下午5时，蒋介石召集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商谈，一致同意日本所提条件。蒋介石表示：一、日本所提尚不算是亡国条

件，德国调停不应拒绝；二、华北政权要保存。5时，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陶德曼重述日本11月5日议和条件后，蒋介石表示如下意见：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的主权和完整及行政独立不得侵犯，但将派一个不反日的人担任最高首长。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此外，蒋介石还表示，蒙古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要求日本政府保守秘密。蒋介石同意德方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

△　江阴要塞我军与日军激战五日后，因弹尽援绝，于昨夜撤守。是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陷江阴要塞。

△　空军一队飞临江阴要塞，炸毁日舰两艘；飞临上海，炸毁黄浦江中两艘日舰；我空军飞机六架炸福山港。

△　徐源泉第十军自湖北开抵南京。

△　日军第九师团沿沪宁公路西犯，攻陷金坛；同日，第十六师团攻陷丹阳。

△　日大本营免去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兼职，任命朝香宫鸠彦亲王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饭沼守少将任参谋长，辖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重藤支队，野战重炮第三旅团及通信队、直属兵站等。

△　日机袭广州、南京等地；南京我军击落日机四架。

△　军政部颁布军民收缴械弹器材给奖办法，规定凡军民拾获各种枪炮弹械器材战利品及枪炮弹壳上缴等给奖，不得隐匿或私售。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阎锡山继续留在山西，八路军仍须巩固统一战线，注意与阎锡山之间处好关系。

△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由沪迁汉。

△　蒋百里至汉堡。同日，陈公博赴英国。

△　英国外相艾登在国会声明，国际无力制裁日本。

12月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

△　财政部电各省、市救国公债劝募分会称，救国公债业经认募足额，劝募总会并经由部接管；此后经收款项、换发债票事宜，委托中、中、交、农四行办理。国内各劝募分会本月底一律结束，国外分会自明年1月起，改由中、中、交、农四行委托办理。同日，财政部电令各省政府，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发行之钞券，只得在该省境内流通。

△　国民政府公布《特授空军将士复兴荣誉勋章条例》，凡12条。

△　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上发言称，如愿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

△　行政院电各省、市速组救济难民分会，并注重疏散。

△　津浦线我游击队刘光廷部收复庆云、盐山。

△　平汉线我军向北进攻，左翼游击部队向南夹攻，日军溃退漳河北，我军克安阳。

△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紧急指示》，号召各级党委抓紧征收工作。

△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移驻云阳，并决定正式成立边区青年救国会。

△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赴菲律宾宣慰华侨，事毕返国。

△　欧亚航空公司设西安至河内邮运及载客航线。

△　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停止发行，共计发行40期。

△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接日本方面通知，不同意该委员会保障难民安全的要求。

△　日军在上海公共租界游行，有人在南京路向游行日军投手榴弹一枚，伤日军四名；一外国人对日军表示义愤，当场撕毁日本国旗。

△　日本外相广田宣称，日本决心扫除国民政府之抗战根基，并加速各地伪政权的产生。

△　陶德曼与狄克逊电德国外交部，认为德国应把握时机，促进中日和谈。

△　斯大林及苏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电蒋介石称，时机未至，不便即对日出兵，决以技术援中国；对于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事，应以撤回日军，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为条件。

12月4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巡视南京周围阵地，部署首都保卫战。

△　南京保卫战开始。军事委员会组成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辖第二军团，第六十六、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八、八十三各军及教导总队、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炮兵部队等，约15个师。作战地点为南京东南正面阵地（江宁镇、牛首山、淳化镇、汤山、龙潭之线）和南京复廓阵地（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第一线、第二线兵团已占领阵地完毕，努力赶筑工事。

△　蒋介石电行政院及各省军政长官，对所有文武各级官佐，倘有贪污不法，舞弊营私或侵渔公款，或克扣军饷，或借端剥削索诈民财者，一经查出，悉以军法从事，无论职位高低，皆必严加惩处。

△　军事委员会电令苏、浙、皖、豫、鲁、晋、陕、鄂、湘、闽、赣、粤、桂、宁夏各省政府称，为肃清奸宄，维持治安，特由本会加委各县县长兼任军法官，遇有奸人、敌探以及敲诈勒索各项情事，应即依照现行陆海空军刑法暨战时军律，及惩治汉奸各项法令规定负责处理。

△　贵州省主席、前实业部长吴鼎昌对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为一农业国，粮食已足自给，足衣问题亦可解决。中国在外国银行之存款，用以支付两年内之军火购买费，犹且有多。中国决心奋斗下去，除非得到最后胜利，或者日本提出可接受条件，从事和议，始肯与东京谈判。关于第三国调停是否接受问题，吴氏声称，如日本条件容许考虑，中国亦不拒绝为此。总之，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必须获得保证，中国经济地位之平等，必须予以尊重。

△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及《抗日军人优待条例》。

△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为上海南京路炸弹案照会公共租界工部局：一、日军有随时开入公共租界之权；二、英捕应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三、如工部局所采之办法不能满意，日军得采取必要之行动；四、如租界不取缔抗日行动，日军将保留检查行人及住宅之权。

△　日机袭兰州飞机场，炸毁营房及大型飞机四架，小型飞机10余架；日机轰炸南京及粤汉路等地。

△　陈济棠先后向财政部汇捐港币700万元，充作国防抗战之用。国民政府特令褒奖陈氏爱国热忱。

△　国民政府与法国政府就开辟昆明至河内航线达成协议，正式开航。

△　国立浙江大学迁江西吉安、泰和，开始上课。

△　驻国联代表胡世泽向国联秘书处递送照会，内附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致意大利大使抗议书，请求转知各会员国。抗议书指出，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违反《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与国联历次所通过关于中、日争端之决议案，亦互相抵触。

△　德国外长牛赖特电示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将日方议和条件及陶德曼与蒋介石会谈情况、蒋介石的意见，写成记录性的照会交给日本政府；并了解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停战协定的直接谈判，以及此后的和平谈判。如果取得中、日双方的此类意见的承诺，将由希特勒提出停止中、日双方敌对行动的郑重建议。

△　德国外交部将调停中日和谈经过备忘录送达日本，探询日本态度。

12月5日　　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抗战，虽遇挫折，但在此挫折中，吾人已获得伟大教训。全国久已普遍认识致败之弱点。今后极应实施战略的反攻，改革军队素质，提高政治自觉性，进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战以歼灭敌人。敌在华北仅20万，愈深入后方愈空虚，予吾人歼灭之机会正多。"毛泽东并称，"此次抗战为革命战争，吾人誓死抗战到底，加强巩固全国团结，以争取民族解放最后胜利"。

△　汪精卫在汉口对海通社代表发表谈话称，"中日之间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中国只有继续战争，以觅取胜利，或至于败亡"。"但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予以考虑从事停战"。

△　日军到达南京外围阵地。我军在句容与日军接触。土桥镇、牧马场等地发现日军。湖熟镇方面，日军骑兵与我前进部队有接触。索墅镇及禄口镇亦有日军骑兵出没。日机10余架，轮流轰炸南京大校场及明故宫机场。

△　我军克复广德。

△　粤海日舰于2日派兵在台山属之赤溪登陆；占据三象岛。

△　日机袭芜湖，居民死伤千余人；英国“德和”、“大通”二轮被炸毁。

△　行政院难民救济委员会拨给江苏、浙江难民救济分会各五万元，救济江、浙难民。

△　国立武汉大学停课，准备迁校四川乐山；该校珞珈山校址移作我国抗战最高统帅部之用。

△　内政部制定迁移妇孺办法，规定在抗战时期，沿海、沿江、沿铁路、公路接近战区地域，重要城市或邻近要塞易受敌机空袭地带之居民，所有妇孺，应一律迁移疏散至乡村。

△　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在浦东警察局旧址成立；汉奸苏锡文任伪市长。

12月6日　国民政府令：任命顾祝同兼江苏全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浙江全省保安司令，蒋作宾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何成濬兼湖北全省保安司令，张治中兼湖南全省保安司令，吴鼎昌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原兼江苏省保安司令陈果夫，兼浙江省保安司令朱家骅，兼安徽省保安司令刘尚清，兼湖北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湖南省保安司令何键，兼贵州省保安司令顾祝同均免兼职。

△　蒋介石电令战区内各省之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守土抗战。凡

战区各省、各县地方，如遇县城沦陷，则县政府应即迁至所属之乡区继续工作；或此乡再陷，则更迁至另一乡区；或竟全境皆有敌踪，仍应迁入邻县接境之地，但期工作决不中断。推而至于行政督察专员及省政府，亦复如是。驻县如有失陷，则应移至所属之他县；省会如受敌迫，即应另移适中之地点，继续督理所属办理一切善后，收容民众组训事宜，以为作战部队有力之协助。其在必须移动之前，所有当地壮丁及积存物资足为敌用者，尤应尽力设法一并迁移，不可仓皇委弃，任其资敌。

△　蒋介石电李宗仁、阎锡山及韩复榘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按：蒋介石所指"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即指杨杰来电所称"苏联最高苏维埃将在一个半月以后开会，届时可能会改变态度，立即出兵"。

△　国民政府迁渝后，举行首次扩大纪念周，中央及地方各机关长官并各学校校长等500余人出席；纪念周由林森主席主持。

△　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渝后，本日上午举行执、监委会常务委员联席会议，决议通告各级党部及各机关，即日起在重庆开始办公。

△　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举行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详情。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为抗战捐躯殉国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四五师师长刘家麒，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郝梦龄追赠陆军上将，刘家麒、姜玉贞、郑廷珍各追赠陆军中将。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日寇正在进攻我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子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

△　朱德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讨论华北抗战形势与部署敌后游击战争。

△　句容方面日军约三个联队，以一部向我前沿阵地正面攻击，主力分两路向土桥镇、牧马场进攻，并由土桥向新塘市迂回，截断我句容部队归路，句容遂陷。向牧马场进攻日军，一部由九华山北麓侵入孟塘，随后又进据大胡山。由土桥镇进攻日军，进至索墅镇，向我淳化镇阵地进行威力搜索，并有大批日机竟日轮流轰炸该镇。由天王寺经上葛村前进日军约一个联队，进占湖熟镇；另有日军步炮纵队由溧水向南京进攻，其先头部队向秣陵关进攻；时日军骑兵绕道向江宁镇方向前进。

△　日机整日轰炸南京，淳化镇被炸为一片瓦砾。日机炸绍兴、杭州、广州等地。

△　冠县人民武装5000余人袭击县城，缴获日军机枪四挺、炮一门。

△　上海大夏、光华等大学教授郭佩弦、郭守经、彭绍青等抵新加坡，将去美国和欧洲各国，进行揭露日军在华一切罪行的宣传工作，使各国人士明了我国正在为自卫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

12月7日　蒋介石于凌晨飞离南京，移驻庐山。

△　进攻南京日军突入汤水镇我军第一线阵地，傍晚我军撤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水镇。龙潭、拜经台、保国山之线，亦到处发现日军，与我第四十一师发生混战。淳化镇日军以步、炮、飞机协同向我阵地猛攻，我部队伤亡甚大。秣陵关日军分两路向我进攻，已进至杜桥、杨山之线。日机八次轰炸我守军阵地。

△　广东省银行发表广州市工商业受日机轰炸损失初步估计，共调查86行业9625家，平时全年营业额约5.44458亿元，店员人数约

10.7432万人；因日机空袭而停业者共1507家，失业人数1.3039万人，损失总值达106万元。未歇业者以每日营业约三成半计，每日损失约98.7万元。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电唁班禅逝世。

△　中国航空公司湘鄂线开航。

△　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将德国调停中日和谈备忘录面交日外相广田弘毅，广田认为情况已变，日本要求比以前更苛刻。

△　英国外相艾登声明，中英条约仍当继续有效，绝不能因中日争端有所变动；如欲修改该条约，只能由中英两国直接谈判。

12月8日　汤水镇、汤山、栖霞山、淳化镇、秣陵关、牛首山均失守；右侧我军退至板桥镇。我军东南正面阵地已失，退守复廓阵地。

△　镇江、靖江、宣城失陷。

△　日驻上海总领事致上海领事团备忘录，警告南京外侨立即离城。日本大使馆声明，日军不负南京国际安全区之安全责任。

△　南京国际安全区开始悬挂特殊标志旗帜，首都卫戍司令部队离开安全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已接受区内各处公共建筑，现进入安全区人民已达八万，将由红十字会设粥厂供应难民。

△　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在比利时鲁文城，散发名为《关于远东战事，敬向全世界善良虔信人士发出呼吁》之小册子。

△　教育部制定特种教育实施办法，规定志愿参加前方工作者，须加入军事学校训练，受军事机关之指挥、派遣工作；留校学生除修习课业外，一律加紧实施特种教育，预备从事后方服务。

12月9日　日军向南京东南郊攻击，占领高桥门、七囊桥及中和桥，于拂晓进至光华门外，将大校场、通光营房占领；随后攻破光华门，小部日军突入城内。牛首山方面日军进占大胜关，我军退守双涧镇至宋家凹一线。日军围攻栖霞山，我军将日军击退；双方伤亡达4000余人。日机六七十架在南京城内反复轰炸，投弹数百枚。

△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以飞机投下致唐生智之最后通牒，劝唐生智投降，限10日中午答复；并称“否则一切战争之恐怖，均将见于南京”。

△　外交部发言人对海通社代表声明：蒋介石无论现在或将来，均无放弃领导全国责任之意。

△　芜湖失陷，该专区专员与县长事前弃城逃走。日军进芜湖城后，在江边屠杀市民2000余人。

△　徐特立与王凌波在长沙设立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徐特立任八路军驻湖南代表，王凌波任八路军驻湖南通讯处主任与新四军驻湖南办事处主任。

△　是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陈绍禹（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报告，反对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强调游击战，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11与12两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两次发言，对陈绍禹的报告提出批评，一再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模范与领导作用，并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会议决定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连同以前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五名书记，共八名书记。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　晚，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第三十六号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晚9时，南郊将军山阵地守军击退日军多次进攻。

△　八路军配合山西盂县义勇军，围攻盂县日军，收复该城。八路军进攻堂邑日军，收复县城，歼日军200余名。

△　日机袭南昌，死伤居民79人，毁房屋66栋，炸损我飞机20余架。在空战中，日机击落我机16架；我击落日机一架。日机袭粤汉路、广九路。

△　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对路透社记者称，如南京一旦陷落，华南拟加倍努力拥护中央政府。广州市长曾养甫亦谓，“吾人为中央政府之一部分，准备追随中央，抗战到底”。

△　阎锡山在临汾设立“民族革命青年训练学校”，分大学、初中、高中三部，男女兼收，按其程度，随时指派担任抗战工作。

△　湘、黔边境苗族人民组织抗敌先锋队，参加抗战。

△　我国撤天津、秦皇岛两海关监督；日伪接管津、秦两海关。大批日本面粉入口不纳税，走私规模扩大，废铁出口绝无限制。

△　伪满洲国公布《贸易统制法》。

12月10日　　日军向南京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及紫金山同时展开攻击。进攻通济门和光华门日军被我军击退，我军失去雨花台阵地前要点三数处，紫金山第三峰失守。日本大本营宣布，进攻南京司令官为天皇姻亲朝香宫鸠彦亲王中将。

△　日军在进攻南京途中进行疯狂野蛮大屠杀。东京《日日新闻》刊载随军记者报导《紫金山》一文，称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片桐部队所属向井敏明与野田岩两少尉，在无锡约定砍杀中国人100

名比赛。是日，两人在紫金山相见，野田杀105人，向井杀106人；因不能确定谁先到100之数，两人决定不分胜负，重新再赌杀满150名中国人比赛。

△　日本举行五相会议，近卫首相、广田外相、贺屋藏相、米内海相、杉山陆相均出席。会议决定日军侵占南京，逼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　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论《置之死地而后生》称，“全国同胞！日本现在确切要把中国置之死地了，我们除非愿作朝鲜，就必须死里求生……。大家都要和南京守城将士一样坚决，一样勇敢！独立的中国只有死里求生的一条路了”。

△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对《法兰克福报》特约通讯员发表谈话称，关于目前议和之说，乃纯粹决定于日方之事。

△　蒋介石电告杨杰，苏联运华第一艘船在香港起货，并嘱向苏加购双翼驱逐机等项武器。

△　周恩来与秦邦宪就浙江地区游击战争问题电任弼时转叶剑英称，必须注意与国民党方面合作，一切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力求依靠山地为根据地。

△　青岛市长沈鸿烈与军事当局宣布，如日军攻击青岛，决抗战至死。沈氏语路透社记者称，吾人决保卫青岛至最后一息，日军如图攻青岛，必令费绝大之代价。

△　行政院为协助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办理救护伤兵、疏散难民、指导民众事项，设非常时期服务团。其委员会由政府各部、会、署派员组织，团员则选择所属各机关疏散在外之人员中派充。

△　德外长牛赖特电令狄克逊，如日本向中国提出屈辱和谈条件，“不能把日本自己在很短期间就说需要扩大的条件转递给中国”。

△　巴达维亚（雅加达）华侨慈善事业委员会，先后募集捐款国币75万元，奎宁丸2213公斤，救伤药品27箱，旧衣28箱，运寄回国。该会复组织华侨救护队，内有医生四人，救护员14人，救护车九辆，是日起程返国，转赴战区服务。

△　伪山西自治政府在太原成立。

12月11日　　蒋介石两次电南京守军，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　日军以主力继续向紫金山、雨花台攻击。日军攻陷紫金山后，即向和平门、太平门及中山门进犯，并由紫金山发炮轰击城内。雨花台我军右翼阵地为日军突破，中华门城门亦为日军炮火轰毁。一部日军攻占杨坊山及银孔山；一部日军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我第七十四军攻击。

△　行政院通令所各属机关，今后星期日及例假，仍须照常办公，并应延长办公时间。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在广德牺牲殉国的第一四五师饶国华师长。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在汉口对海通社代表发表谈话称，即使南京失陷，中国政府亦决心继续抗战；中国能够支持数年之战争。在回答中国人民是否将武装从事游击战问题时，张氏答称："此即最近第八路军总指挥所提议者，即使实行武装民众，亦必出以严格限制之办法。"

△　为开辟桂越交通线事，我驻越南河内总领事电外交部，略谓："为发展越桂交通起见，除原有龙川同白（百）色间公路外，拟再造一副路。由靖西经化洞、岳圩，以达越边之上廓。而高平公路接通内越段，须由越方建筑，现越方派国联工程师冒克斯踏勘……惟须

我中央同意……请接电宋委员（宋子文）接洽。”

△　朱德、彭德怀与任弼时电徐海东、黄克诚转聂荣臻、罗荣桓，为避免与晋绥军摩擦，徐海东与黄克诚部不向晋西南活动，改向晋东南活动。

△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在武汉创刊。

△　《全民周刊》在汉口创刊，沈钧儒任社长。

△　日机袭粤汉路，为我军击落两架。

△　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五相会议的决定，其要旨为：一、不承认蒋介石政府；二、进行扩大战事；三、辅助“新中国”建立。

△　日军海军大将末次信正谈话称，为中国问题不惜与英国一战。

12月12日　　蒋介石手令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称，今日西北实为中国存亡惟一之关键。其次，外交应特别注重。无论货物交代，行人来往，皆应用正式手续，不可漫无限制，致陷于无国界状态，造成东北第二。以后无论飞机、汽车或货物到兰后，必须由战区司令部接收经管；向各地运出，必须请示于中正（蒋介石）许可后，方得放行。如其有欲飞向陕北或运往陕北之物品，更非得中正之许可与中央之护照，切勿擅自放行。

△　蒋介石电湖北省政府称，征兵制度和摊派公债的做法，致使各级官员假借名义，从中勒索敲诈，致使人民不堪其苦。

△　孔祥熙对国民社记者谈话称，凡能尊重中国领土行政完整之荣誉的和平，无论何时，中国皆准备接受。南京陷落之后，能否休战，此为日本方面之事。日本若能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则和平立可告成。关于中央政府能否接受以华北自治为基础之和议，孔祥熙

答称，设华北脱离中国版图，则中国版图当然受其破坏。孔祥熙称，蒋介石在目前环境下，决不至放弃其责任，动摇中国抗战将士之军心。记者问中国政府究竟那一部分可以代表接受和议，孔祥熙答称，唯有整个政府始能考虑此点。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以《我辈信心》为题发表广播讲话称，首都被日军围攻，实在是我们莫大的耻辱。但我们应格外坚定抗战的决心，千万不可稍有悲观失望，我们不怕失败，只怕气馁。我们对日抗战，本是从极端的困苦中求生存，求复兴。

△　南京日军攻占雨花台主阵地及紫金山第一峰据点，并攻进中华门。中山门城垣被日军炮火击毁数处。我城外守军退入城内，秩序异常混乱。日军在水西门攻击入城。下午5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召集各高级将领会议，决定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撤退，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各部队于当晚11时开始突围。

△　日机30余架袭广九路与粤汉路；并轰炸洛阳、南昌等地。

△　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第四十一军开抵潼关，奉命集中徐州。

△　海军总司令部下令青岛第三舰队所属“定海”、“永翔”、“楚豫”、“江利”、“镇海”、“同安”、“海鹤”、“海燕”八舰艇及“宏利”商船沉于青岛小港，封锁青岛港口；以“海鸥”、“海清”、“海骏”、“海蓬”四艇沉于威海卫刘公岛港。

△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民众运动会之青年干部训练班在徐州开学，学员共300名，均为大、中学生。

△　日机轰炸南京，并对芜湖英炮舰“蜜蜂号”、“瓢虫号”及商轮“瑞和号”投弹。

△　美军舰“巴纳号”在安徽和县长江水域中被日机炸沉，死26

人；美孚石油公司油船“美平”、“美夏”、“美安”三艘亦被炸沉。

△　日本亲善专使石井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访员谈话称，列强若能长此维持严格之中立态度，日本拟继续尊重列强在华之权益，以海关税收抵付外债，上海租界工部局权力所依据之地皮章程，仍将受日本尊重。

12月13日　　日军攻陷南京。上午，日军第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从中华门首先入城，第九师团攻入光华门，第十六师团攻入中山门、和平门。下午2时，日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下午4时，国崎支队沿长江北岸攻至浦口。同日，日军各师团按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发布《攻占南京要领》规定，分别窜至各区，进行“扫荡”，开始进行疯狂野蛮的南京大屠杀。当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师团长下令，将南京俘虏守军1.5万人，在太平门、仙鹤门等地进行集体屠杀。在南京城内，中山码头、下关火车站等处，日军对聚集江边的难民进行疯狂射击，枪杀我无辜同胞达数万人。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南京沦陷发表通电，重申继续抗战决心，谓我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

△　日舰占北海口外围洲岛，日舰多艘泊广州、香港间圣约翰岛。上下川岛及三灶岛等地，日军连日增兵数千人。

△　日本大本营与日本内阁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关于同中国正式开始和平谈判的决定。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迁长沙，陈果夫兼代教育长。

△　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实施战时教育，对4000多高中和大学生及400名教职员，进行两周特种技术训练。

△　美总统罗斯福直接致函日本天皇，为“巴纳号”被炸沉案向日本提出抗议。

△　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联名发表宣言，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勿与日本合作，藉免助长日本侵略政策，并以全力援助中国，直至日军完全退出中国。

12月14日　　蒋介石自江西星子抵武昌；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办公。

△　首都警卫军副司令萧山令少将，12日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之命，兼任首都警察厅长暨南京市长，率宪兵两团掩护我大部队由城内撤出。萧山令率部在南京城内与日军反复冲杀，血战竟日，最后兵败，壮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萧山令为陆军中将。

△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设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汉奸汤尔和为伪立法委员会委员长，汉奸王克敏、齐燮元、朱琛、王揖唐、董康、江朝宗、高凌霨为伪行政委员会委员，王克敏为委员长；汉奸董康为伪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采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王克敏与日本密约，伪政府行政、经济、军事、教育等大权均由日人控制；日本派出由平生剑三郎率领的顾问团任伪政府最高顾问团；伪政府一切行政事务，均需要事先征得该顾问团同意方得施行。伪政府成立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平、津及河北各伪维持会均解散，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省伪组织均属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　日军渡过长江北岸，占浦口、浦镇、江浦、扬州。

△　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移驻南京。

△　日本在上海实施新闻检查，上海《大公报》、《申报》停刊。

△　日本举行内阁及大本营联席会议，由近卫首相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多田骏参谋次长，有贺军令部次长，杉山元陆相，广田弘毅外相，米内光政海相，末次内相，贺屋藏相，决定提出加重对华新条件。

△　意大利召回供职我国之军事顾问团及航空专家。我国驻意大使刘文岛亦奉召回国。

12月15日　　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我徒手军民万余人，其中押往海军鱼雷营用机枪集体扫射9000余人；在挹江门外姜家园南首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居民300余人。在司法院难民所内外军民2000余人，被日军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并对已死或受伤者复用木柴、汽油焚烧。

△　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攫取天津及秦皇岛海关。

△　英国政府为“瓢虫”、“蜜蜂”两舰及商船“瑞和号”被日军击沉事，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

△　日本外相广田照复美国，对“巴纳号”被击沉案表示道歉，并允赔偿。

12月16日　　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南京沦陷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和广大强固之民心。”

△　日军从南京安全区搜捕数万人绑赴煤炭港枪杀，将尸体抛入江中。同日，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下关中山码头枪杀。

△　日军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少佐部员太田寿男供称，是日到18日奉命处理尸体。太田寿男直接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少佐处

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入江中尸体有五万具；总数为15万具。

△　日军分三路犯苏、皖。日军由采石犯和县，拟经含山西犯合肥，在乌江一带与我军激战；由浦口沿津浦线北犯，在乌衣与我军接触。长江北岸登陆日军，陷靖江、泰兴、瓜洲、仪征，并协同海军陆战队分乘小艇猛烈北犯，企图沿运河北犯淮阴。

△　平汉线日军增援一个师团，分驻安阳、邯郸、磁县一带，拟联合鲁西日军分四路南犯。一路取道武安、涉县犯我左翼林县；一路由安阳犯汤阴；一路由大名犯我右翼内黄；一路由鲁西犯我右翼濮县。我左翼在武安，右翼在卫河东岸，与日军激战。

△　第五战区正、副司令长官李宗仁、韩复榘发表告战区全体将士及民众书，要求本战区全体将士、党政公务人员暨各界民众，都必须激发忠忱，为国效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

△　周恩来至西安，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协商国共两党合作及参加民运事宜。

△　毛泽东与彭德怀电朱德、任弼时，趁日军在华北空虚之际，中共派两个支队至平汉路以东地区组织游击战争；一支由第一二九师一部组成，一支由聂荣臻军一部组成。其主要任务为侦察敌情，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破坏伪组织，收集遗散武器，用以扩大抗日力量。

△　中航公司新辟重庆至香港航线。

△　汉奸高凌霨任伪天津市长，汉奸江朝宗任伪北平市长。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延长对华战争，并承认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2月17日　　蒋介石在武昌召集军政首长谈话，谓南京失守，日军此后深入内地，其困难将更多。蒋氏勉众首长今后要多负责任，准备过艰苦生活。同日，蒋介石筹定在日军占领区域，发动游击战，使日军进退维谷，疲于奔命。

△　国民政府令：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现已到任，兼代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免代。

△　国民政府令：铨叙部长石瑛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钮永建为铨叙部长。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凡五条。

△　全国抗日大同盟成立，在汉口设立总部。

△　南京日军昨日在街头强奸数百名寻找避难所的妇女，旋又进入安全区带走100余名妇女进行强奸。至是日，南京安全区1000名左右的妇女遭日军强奸，其中一名妇女被轮奸37次，另一名孕妇对日军进行反抗，被日军刺死。

△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日本中国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分别由中山门与下关举行侵占南京入城式。日天皇发布诏书表示“欣悦”。

△　国际委员会致日本使馆公函称：“受敝处指挥的红十字会，在难民区收拾尸体时，卡车或被劫去……昨晚更有红十字会的工役14人被绑。难民区内的警察屡遭干涉。昨天驻在司法院内的警察50人被绑去，当时据（日）军官云，‘拖去枪毙’；午后又有志愿警察46人被捕去……奸淫掳掠种种暴行的报告，如雪片飞来……若干难民住宅，一夜遭日本兵闯入五次，或劫掠财物，或凌辱妇女。”

△　日本中国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对外国记者团发表谈话称，日军虽已占领南京，但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今日之成功，因距总局的前途

尚远。日军基于帝国之总意，希望到达彻底的目的。

△　苏联飞机50余架及驾驶员多人抵汉口。

△　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电令各、省市党部，会同该部所派视察员指定人员，分区普遍登记战区失学、失业青年，予以短期训练，组织服务团，分别派送战地或农村服务，或至军事学校受训。

△　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总管理处已迁往成都；原在沙逊大厦国际无线电台，由美国无线电交通公司接管，继续营业。

△　日军接管上海全部海关行政，英国雇员表示放弃海关管理权。上海海关总务科行政税务司、税饷房主任、监察长等职务由日人担任。

12月18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军事会报会，决定封锁马当要塞。

△　日军将南京城郊难民及俘虏5.7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将尸体浇煤油焚烧。日军在下关南通路以北，将被俘军人及难民约300余人，集合至该处麦田中用机枪扫射，无一人幸免。在城内大方巷难民区，日军将青年单辉亭等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扫射，无一人生还。

△　由南京沿津浦线北犯日军抵滁县。由芜湖渡江北犯日军占领裕溪口，在巢县以南与我军对峙。

△　湘桂铁路公司理事会在汉口成立，侯家源任总经理。

△　财政部通令，浙江兴业、中南、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农工商及湖北省银行各行钞票照常行使，对拒收者予以严惩。

△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邓颖超等抵达武汉。

△　湖北省举办乡镇干部训练班，招收初中毕业以上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力之青年，经两周训练后，分派至各县担任联保以下壮丁训练及宣传工作。

△　日本海军部宣布，日机已在中国中部各城市投炸弹900余吨。

△　日本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集合师团长训话称，日军在南京暴行，使日皇颜面扫地。

12月19日　　平汉线我军由内黄反攻，各县民众亦纷起自卫。冀南清丰民军收复县城。鲁西濮阳亦收复。

△　武汉文化界成立抗敌协会。

△　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迁至重庆；职员及书籍200余箱同时抵达重庆。

△　日军由吴兴、崇德及沪杭路与钱塘江四路进犯杭州；主力集中于沪杭路及钱塘江两路。吴兴日军一部向德清进犯，一部图袭取新市，与崇德、石门湾日军联合犯塘栖。日军第九、第一〇一师团由青山市向我退守杭州附近刘建绪部进攻。

△　扬州日军2000余人分两路进袭邵伯，并推进至扬州甘泉山。日军增援机械化部队继续进犯，我军由仙女庙北退。津浦路日军攻占乌衣，我军退至嘉山以南。滁县失陷。

△　日军第十军下达分三路进攻杭州命令。在广德、泗安集结之第十八师团由安吉沿杭泗公路南犯；在吴兴（湖州）集结之第一〇一师团，由武康、德清沿杭湖万路南下；在嘉兴之第一后备步兵团则沿沪杭铁路向杭州进犯。

△　世界红十字会救济专员自南通、如皋、泰兴、宝应、靖江等处发函上报，苏州、常州、镇江一带战区难民聚集于江北各县者不下百余万。

12月20日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否认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称此“为日本之傀儡，其参加此伪组织人等，应以国法惩处”；并郑重声明：“在日本军队占领之北平或其他地方，发现任何伪政治组织，皆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汉奸汤尔和、王克敏、董康、齐燮元、王揖唐、朱琛等人。

△　国民政府明令凡在日军非法占领区域，甘心附敌参加伪组织者，着军事委员会按照汉奸治罪条例，查明通缉，严行惩办。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江西省建设公债条例》，公债定额为国币2000万元，年息六厘，偿还期限为15年半。

△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与陈立夫就国共关系进行商谈。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方面关于进一步调整两党关系和制定共同纲领的主张。陈绍禹与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共同纲领，对时局宣言以及边区问题的协议条款。中共提出关于边区的意见：一、边区范围定为延安、甘泉、鄜县、洛川、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宁县、正宁、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盐池、环县、庆阳、合水23县。二、边区政府设边区行政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工各厅及保安司令部。三、边区行政长官人选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丁惟汾因公不能到任，由林伯渠代理；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为丁惟汾、林伯渠、张国焘、徐特立、高自立、马明芳、高岗、成仿吾八人，各厅厅长由委员分别担任。四、保安队依边区各县之大小而设一中队至一大队，另设八路军补充师。五、中央每月补助边区经费10万元。六、边区善后遣散费30万元。

△　军政部命令，除征募常备兵外，开始征集国民兵役。

△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正式颁发动员令，该省陆、空军均整装待命出发。马仲英部万余人，愿参加抗战。

△　上海市金融、工商、慈善、教育、文化及工界人士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发表宣言，“吾人为中华民国而生，亦愿为中华民国而死，在国军暂时撤退期内，誓当为国族增加光辉，为人间保存正气，断不靦 颜事敌，苟且偷生”，并表示誓不承认一切傀儡组织。

△　陇海铁路通车至陕西宝鸡。

△　上午，在南京下关龙江桥口，日军将被俘中国军民500余人绑扎后以机枪射杀，并纵火焚烧尸体，凡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刺死。

△　日军是日起在南京城内实行有计划的纵火暴行，市中心区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　日第一军参谋部第二课发表《关于全般的敌情判断》一文称，“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军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合各地残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

△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伪中央银行，以日人儿玉谦次与汉奸王克敏任正、副行长。该伪行总行设于天津，并在北平、通州、唐山、张家口、保定、归绥设分行。

△　英命原驻伊拉克大使卡尔，继许阁森为驻华大使。

△　英外相艾登在下院声明，英国决不承认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

12月21日　　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等与蒋介石会谈。周恩来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与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作出说明。陈绍禹就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及合作任务，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提议作出说明；并向蒋介石转达苏联愿帮助中国政府组织30万机械化部队，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秦邦宪谈陕甘宁边区，八路军设联络参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蒋介石表示，三人所谈极好，照此做法，前途定见好转；并告知今后两党关系与陈立夫共商一切。参加谈话者，在中共方面为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这次国共两党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

△　军事委员会组设工厂迁移委员会，协助沪、汉等地工厂迁往四川等省。迁移工厂分为军需厂矿与普通厂矿。军需厂矿由政府命令迁移，给予迁移费、奖励金，介绍低利借款，拨给建厂地亩，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等便利。普通厂矿如自愿迁移，经主管机关核准后，给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之便利。

△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电令川省各县对沪、汉迁川工厂尽量予以便利。

△　工矿调整委员会为增加抗战实力，设法扶植民营工业，规定："（一）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二）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三）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四）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须取于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五）手工业上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

△　张闻天发表《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一文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在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八路军收复涞源、紫荆关。日军为应付八路军及游击队，以大同为根据地组织蒙古游击军四队。

△　冀南、鲁西民军收复朝城、阳谷、观城等地。

△　天津电话局长张子奇率全体员工宣称，全体员工为保国家利益，国民立场，决不承认伪政权；倘遭武力压迫，不惜将价值百万元之公众交通利器忍痛毁坏。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更苛刻的条件为日中和平谈判的基础：“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三、在日、德、中三国间缔结经济合作协定。四、中国应对帝国赔款”；并称：“如中国接受上述条件，必须表现出实行防共的诚意，并在一定限期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

△　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招待法国记者，请中共人士吴玉章报告《目前中国抗战形势及其前途》。

△　日本首相近卫宣言承认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2月22日　　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授予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以如下权力：一、对各省、市、县农、矿、工、商主管官署处理战时农、矿、工、商事务，有指导监督之权。二、对各地农会、商会、工商同业工会、渔会及其他农、矿、工、商各业团体，得发布关于战时管理上必要之命令。三、对于生产或经营业经指定物品之各企业，在经济、材料、设备、动力及产品销售等方

面予以协助；并对上述企业之生产或经营方法，原料之种类及存量，生产费用、运输及销售之方式，售价及利润等方面，规定适当之标准，同时有权命令上述企业增资或合并。四、对于业经指定之物品，得令其售出或储存，或定价收买，或规定办法支配之。

△　我军在津浦线南段青流关等地与日军激战，我左翼阵地被日军突破。嘉山失陷。

△　进攻杭州日军一部占莫干山，逼近武康；一部逼近余杭；另部日军向长安镇进攻。张发奎与刘建绪率部退守钱塘江南岸阵地。

△　驻太原日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集步骑兵5000余人，附平射炮、曲射炮10门，在飞机三架掩护下，向平定、昔阳、榆次、太谷地区八路军实行分进合击。八路军陈赓部接战后，发现日军不断增兵，主力即南移至独堆山进行侧击。日军尾追至南军城、马岩一带，遭陈赓部阻击后，伤亡惨重。

△　日军800人在大鹏湾登陆，为我国海防部队击退。

△　日机袭南昌，为我军击落二架。

△　南京日宪兵司令部发布布告，谓："自12月24日起，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

△　自是日起，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开始从事收埋尸体工作，收埋尸体人员共160人，分两班收尸。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送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掩埋。在所收埋尸体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和年轻妇女。

12月23日　　蒋介石对德国记者谈话称，为了避免大量牺牲，今后对日作战战略，当着重游击战争。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班禅，给治丧费一万元，特派戴季陶前往康定致祭。

△　周恩来在汉口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自中国农民六万人参加作战后，在山西方面之日军，已陷入进退维谷区域。”“日军现在之目的，显为：一、占领津浦路及陇海路；二、占领扬子江流域一带；三、窥伺杭州、南昌及长沙，俾能切断粤汉路；四、占领广州。”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秦邦宪、周恩来、叶剑英、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陈绍禹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任部长；组织部，秦邦宪任部长。会议认为，南方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地区，划浙赣铁路以北为第一作战区域；以南为第二作战区域。

△　陕西省政府划定黄龙山、马兰镇容纳战区难民垦殖。

△　北平故宫博物院大批文物及珍宝移存汉口。

△　《中央日报》自南京移长沙，定民国二十八年（1939）元旦在该地继续出版。

△　欧亚航空公司开辟昆明至河内航线，与法国航空公司至欧洲航线联接；汉口经昆明与欧洲联接。

△　进犯杭州日军东路已越过长安镇，西路由余杭占长桥。我军与日军在杭州近郊激战。我军为阻止日军越过钱塘江南犯，派工兵团炸毁钱塘江大桥。

△　河北游击队克复大名。

△ 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汉奸陶锡山为委员长。

△ 日本外相广田将日本和平四条件以书面声明形式交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并作口头说明：一、蒋介石政府必须以反共行动来表示接受这些基本条件的诚意。二、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地点。三、日本希望在本年底左右获得答复。四、当蒋介石已经声明愿意接受这些基本条件时，希望德国不要劝告日中停战，而建议双方直接谈判。

12月24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电各战区司令长官："凡在战区内之党政各级人员须受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省）主席、专员、县长及各级党务工作人员不得擅离所属境地；如违，以军法论处。"

△ 宋庆龄离上海赴香港。

△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晚离开济南赴泰安，留第二十五师守济南。

△ 中共山东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文登县天福山发动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蓬莱、掖县、黄县亦相继起义。

△ 杭州失陷。我军向钱塘江南岸转进。

△ 日军第十军司令部驻杭州。

△ 绥远日军退集大同，以便东、西策应张家口与归绥，并图控制我国雁北一带游击队与义勇军。绥远各盟旗王公组织伪游击队，接替撤防日军。由达密凌苏龙任防绥东；僧格林沁任防绥西南；潘德忝察布任防绥北；色楞布任防西山咀一带。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宣布"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处理华北的方针，"政治的目标是建立防

共、亲日满的政权，经济的目标是建立日、满、华不可分割的关系……。逐步扩大和加强这个政权，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处理上海方面的方针，“军事的占领区域内，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与华北新政权有联系的新政权，但目前由治安维持会以及因需要而组成的联合会，负责维持治安”。经济方面，“目标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纲要》规定，以上海租界周围地区为特别市。

△　日本派谷正之为驻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高外交官。

△　《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揭露南京日军暴行称，“日军入（南京）城后，恣意奸淫掳掠，实乃日本国家之国耻。美国炮舰‘巴纳’横遭击沉，与美国军舰、商船遭轰炸，实桥本上校直接命令所致”。

△　伪新民会在北平成立，汉奸王克敏为会长；在北平中央指导部下设总务、教化、厚生各部；并于各省、道、县设指导部，由省长、道尹、县长任指导部长。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政区建制，为省、道、县三级，道行政长官称道尹。

△　德国外长牛赖特电令陶德曼将日本提出的和谈四条件通知中国政府。

12月25日　　国民政府明令已故陆军上将唐继尧于洪宪叛变之际，首义滇疆，声讨帝制，保障民国。当此起义纪念之日，唐继尧应特予国葬。

△　项英自延安带来的干部与叶挺在汉口组织动员的医务、后勤人员，在汉口举行新四军干部大会。此为新四军军部机关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实际是新四军军部的成立会议。

△　国民政府派赴欧专使陈公博约集我国驻欧使节在巴黎集议，商讨如何运用外交支持抗战。集会由陈公博主席，到会有驻法大使顾

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德大使程天放、驻比大使钱泰、原驻意大使馆参事沈祖同（驻意大使刘文岛奉召返回）、李石曾、蒋百里、张彭春（南开大学教授），共九人；并邀请杨光泩、谢寿康、郭秉文、吴玉章四人参加。

△　军事委员会颁《抗战负伤奖励规则》。

△　前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于冬赴香港为抗战募捐，日夜操劳，是日病逝于香港。

△　日军占领周村，分兵进逼潍县、博山。日本中国海军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宣布，自即日起封锁青岛海上交通。

△　日军在上海成立新闻检查所，强迫各报接受检查。上海日报公会所属各报，除《新闻报》和《时报》外，陆续自动停刊，拒绝送验。

△　日伪筹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计划资本5000万元，日伪出资各半。该行将发行不兑换之“新法币”；其汇兑营业，与日、“满”通货同价进出。

12月26日　　中共方面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国民党方面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每五天会商两次，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两党共同纲领。

△　陶德曼以12月2日的日本议和条件递交孔祥熙与宋美龄。

△　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武汉办事处电告全国，要求在元旦日联合各界举行“尊敬伤兵”及“慰问难民”运动。

△　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召集所属各军军长举行保卫广东军事会议，将所属防务重加配置。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发布命令，禁止战区党、政、军各机关向民众强征劳役，强派捐款及物品；用强力逮捕办法征兵；干涉人民抗日救国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的自由；向自耕农及佃农强征粮、款等。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设民族革命大学于临汾，开始招生。

△ 实业部重新颁发合作贷款办法，令各地合作机关及银行照办。

△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奥莱尔斯基经兰州至汉口，次日会见外交部长王宠惠。

△ 江西省政府决定由江西裕民、建设、市立三银行，联合发行辅币券，总额400万元。

△ 上海暨南、同济、复旦、大夏等大学学生到南昌，是日作联合宣传，在街头演出话剧，唤起市民保卫国家。

△ 国立厦门大学迁长汀。

△ 日军由泺口、齐河、济阳等处陆续渡过黄河，对济南采取大包围形势。济南以西长清等地已发生战事。济南除军事机关以外，已分别移至泰安、单县、兖州各地。

△ 南京日军宪兵司令部发布的平民登记，是日开始分别在金陵大学、宁海路、上海路、金陵神学院、金大附中等处进行。日军在金大网球场上集中3000多难民，欺骗说："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夫役的，都去到后面去……"有两三百人走出了队伍。日军将这两三百人押解出去予以屠杀。

△ 南京崇善堂自是日开始掩埋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尸体，截至28

日，共收集与掩埋尸体如下：崇字掩埋队第一队在汉西门至估衣廊，收尸124具，内男尸96具，女尸22具，儿童尸体六具，掩埋于五台山。崇字掩埋队第二队在挹江门以东，收尸392具，内男尸342具，女尸38具，儿童尸体12具，掩埋于城墙根下。崇字掩埋队第三队在新街口以南，收尸91具，内男尸83具，女尸七具，儿童尸体一具，掩埋于五台山。崇字掩埋队第四队在中华门以东，收尸404具，内男尸352具，女尸34具，儿童尸体18具，掩埋于城墙根下。总计南京崇善堂崇字掩埋队四个队在三日之内共掩埋尸体1011具。

△　美总统罗斯福宣告延长之白银协定，将于明年1月1日前开始实行。

△　“巴纳号”事件结束。美国接受日方道歉及对政府与私人两方赔偿损失的办法。

12月27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会上有人主张接受日本苛刻条件，与日本和谈。蒋介石当即表明，“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

△　孔祥熙访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谈和新条件。

△　陶德曼以12月2日的日本议和条件副本交外交部长王宠惠。

△　蒋介石电各省维持民食和军粮。

△　广东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各县、市联乡自卫，推举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负责领导民众自卫，将沿海划为七个联防区；其余各县则划为12个普通区，统限于明年1月1日成立。

△　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武汉办事处发表《吾人应有的主张和努力的途径》，凡21条，包括“拥护中央，拥护统一，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抗战到底”；“健全保甲组织”；“整饬国家纪纲，制裁分散国力、破坏法纪之行动”，分送各新闻出版机关、文化宣传团体，作为今后宣

传及实际工作之准备。

△　军事委员会特派孙绳武在青海省政府宴请蒙、藏各王公，宣达中央抗战决心。

△　国共两党双方协商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隶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四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

△　周恩来在汉口接见《抗战》三日刊记者，分析当前的抗战形势，批驳所谓“我们打败固然是日本的，就是打胜也是苏联的”等谬论。

△　我军扼守桐庐、分水、昌化各县，与皖南宁国我军联成一线。日军一路由富阳犯桐庐，一路自孝丰犯於潜，图渡新安江后再进犯衢州。日军前锋部队有五个联队，并附有机械化部队。

△　济南失陷。我军与日军在胶济路潍县激战。韩复榘部第二十五师由城厢退至长清、白马山、千佛山、淄川一带。日军续向泰安进犯。

△　中共党员姚仲明等在山东清河、长山发动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中共鲁东工委在昌邑、潍县、寿光发动起义，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

△　财政部拨款15万元救济上海灾民。

△　“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成立，综合开发东北铁、煤和轻金属等重工业资源，为从原料工业一直到制造飞机、汽车等高级机械工业的大规模的重工业公司。“满业”资本共4.5亿日元，“日产”和“伪满”各投资一半。“满业”建立后，把昭和制钢、满洲煤矿、满洲轻金属、同和汽车、满洲采金五个重工业公司，划入“满业”系统，作为子公司。

△　诺贝尔继任英国驻华舰队司令。

12月28日　　汪精卫、孔祥熙就陶德曼转来日本议和条件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日方所提条件，妨碍国家生存，无从谈起；决定暂不正式答复，可将日方备忘录密知英、美、法、苏各国探其态度。蒋介石并称："国民革命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决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致我国家、民族永远受其束缚。只要我国民政府不签字于任何不平等条约之上，则我随时有收回国土、恢复主权之权也。"

△　蒋介石令铁道部长张嘉璈非正式告知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对于日本所提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同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奥莱尔斯基。

△　外交部奉命将日本议和备忘录电知各驻外使节转告各国政府，探其态度。

△　行政院决议故宫文物运各地保存。

△　毛泽东电复项英，同意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

△　交通大学准备迁校桂林，后迁入上海法租界上课。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迁校成都华西坝。

△　我国巴达维亚侨胞组织救护队回国服务，内有医生四人，救护员14人，救护车九辆。

△　日本水兵200名在澳门南横琴岛登陆。

△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发表谈话称，如国民政府继续支持反日态度，日军将否认国民政府，攻取武汉、重庆。

△　日伪组织天宝山矿业公司与安波矿业公司。天宝山矿业公司

总公司设北平，资本700万元，专门开采天宝山之锌、铝、铜矿；安波矿业公司总公司设沈阳，专门开采安东之锌矿，资本100万元。

△　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潜至香港进行间谍活动。

△　日本外相广田答复英国抗议军舰被炸案，称系无意所致，英国对此不满。

12月29日　　行政院长蒋介石邀集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等谈抗战方略称，“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们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至于国际形势，一时变化无望，仍当坚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

△　国民政府特派孙科为特使，率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吴尚鹰，立法委员夏晋麟等赴苏联访问，寻求外援。

△　山东省政府再移至兖州。

△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汇报湘赣、鄂豫皖等边区红军游击战争及中共党组织情况。

△　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视察黔北各县后返抵贵阳称，贵州为国防后方要地，此后对各公路交通，首须整理完善。现中央再拨300万元，为本省增购车辆与建设桥梁、涵洞、路站之用。

△　卫生署、中国红十字会及华中万国红十字会日前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军医署负责全国陆军医院工作，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救护队工作。教会医院及陆军医院以外的各医院，由卫生署津贴华中万国红十字会20万元，交由该会负责。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现已积极扩充其工作范围，在豫、湘等省设办事处，并在广州及成都设立广东与四川

万国红十字会，以便就地推行设立伤兵医院与救护难民等工作。鉴于该会武汉难民救济工作日益繁重，故特设立一难民救济委员会，与武汉其他难民救济团体合作，共同办理救济难民工作。

△　我军克复广德，分向长兴、泗安推进，进袭余杭，克复富阳。

△　日军最近在山西南部散发传单，劝阎锡山与日方合作，“中国临时政府（按：即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在北京成立，进行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建设，吾人希望阁下脱离党军羁绊，复归太原，合作建设事业，兹提条件三项：（一）日军保障阁下与贵军将士之安全；（二）阁下应停止一切抵抗行为，将所有军队撤退至武乡、灵石、石楼以南地方；（三）驱逐蒋介石军队至山西省外，并与日军合作扫共”。

△　上海市民协会成立，会员百余人，多为商业界闻人。发起人为陆伯鸿、荣宗敬、姚慕莲、顾馨一等。

△　伪济南治安维持会成立。

△　比利时政府捐10万法郎，救济我国伤兵、难民。

12月30日　　蒋介石电赴苏联采购军火的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商请苏联政府大量供给我国所需飞机及武器称：“刻与俄大使谈话结果，关于武器及技术方面之供给：甲、三个月内，准备20师之全部武器数量，步枪及轻、重机枪与步兵战车防御炮亦皆甚重要，如其允许，应商量运输方法。乙、每月需飞机总数百五十架，如其最近无此数量，可否于一个月内供给驱逐机三个大队、轰炸机二个大队，请切商速复为盼。”

△　各战区设党政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副主席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下设秘书长一人，分党务、政务及国民军训

三处。

△　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开会，国民党方面在会上请中共帮助达成苏联出兵援助中国抗日，未能讨论两党共同纲领草案。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临时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国共两党共同纲领》）草案；草案分为《争取抗战胜利纲领》与《初期建国纲领》两部。

△　八路军总部移驻洪洞县马牧村。

△　八路军规定聂荣臻部负责保定、石家庄一线；徐海东、黄克诚部负责石家庄、娘子关一线；第一二九师负责正太路全线；张宗逊、李井泉部负责阳曲、忻县一线；王震部负责忻县、雁门关一线；宋时轮部负责雁门关、大同一线。

△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表示，四川出产丰富，人口众多，确为最理想之抗战后方。希望全国各方领袖以及全国同胞，共同巩固充实此重要后方。但要开发四川建设四川，必须中央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在长期抗战国策之下，在政府整个经济计划之下，才能把四川建设成为长期抗战的经济根据地。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呈准军事委员会，派丁惟汾、于洪起、钮永建、黄炎培、高一涵、吴忠信、梁漱溟、麦焕章为该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潘宜之为秘书长。

△　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武汉办事处制定《非常时期指导武汉文化工作暂行办法》，规定自即日起至明年1月6日止，各文化宣传团体、剧社，应各携带证明文件及名册、章程，前往该处第五组履行登记手续，逾期即停止其活动。以后新成立之文化宣传团体，亦须呈报该处检定；并规定今后凡集会、游行，播音或流通演讲、演剧，应于5日前将举行日期、地点、主持人姓名及工作大纲连同演词大意或剧本，

呈送办事处备校。凡发行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应以两份送办事处审查。凡散发或张贴宣传品，应事先呈办事处核准后发布。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第三次追加预算经常门，岁出岁入之经济总计均为11.51880506亿元。

△　沿胶济路西犯日军过潍县，绕越高密。劳山、福岛、麦岛及灵山卫等处，日舰所载日军曾强行登陆。我军将青沪及烟台、佐世保间之海底电线缆头、船坞、修理厂、电报局、无线电台、自来水库、电灯厂及各机关电话等炸毁。

△　苏北日军攻陷邵伯。

△　荣宗敬告《大陆报》记者，上海市民协会纯为慈善机关。市民协会发起人之一陆伯鸿遇刺身亡。

△　德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告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如中国军事部署正确，士气恢复，弹药充足，可再进行六个月战事。

12月31日　国防参议议员名额由原来的20人扩充为75人。

△　周恩来至武汉大学讲演《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称，中国青年今天努力的方向是到军队中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的胜利。

△　财政部宣布，民国二十六年（1937）度我海关各项税收总数为3.429亿元，较上年增加18.27万元。

△　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统计股发表民国二十六年12月份检验商业统计，本月汉口输出之合格商品总值为1.15155008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4.41665204亿元。

△　民国二十六年度我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91亿元，较上年增加

1.44亿元。

△　资源委员会接办之陕西酒精厂开工，每日可出无水酒精4500公升；另有棉籽榨油厂，每日可制油二吨；并有以太锅二座，每小时可出以太80公升。

△　长沙临时炼铜厂开工，每月可熔铜150吨左右。

△　交通部开辟汉口至长沙间水运。

△　教育部在河南、甘肃、四川、贵州设立国立中学，学生全部实行公费；并在四川、贵州设立中小学教师服务团。

△　全国戏剧界抗敌总会在汉口成立，张道藩为主任常务理事。

△　韩复榘弃守泰安，退驻济宁。泰安失陷。

△　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离莫斯科返国。

△　日本外相广田发表谈话："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1938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

△　英国接受日本道歉，英国"瓢虫"、"蜜蜂"两炮舰及"瑞和号"商轮遭日军炮击一案告一段落。

是月　毛泽东会见李先念、李卓然等中共西路抵延安将领称，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

△　本年国库收入（债款收入不在内）为5.58885955亿元，支出为21.03398216亿元，亏短15.44512216亿元。支出总额中，军战费为13.87556618亿元，占65.97％。

△　国民政府本年关税收入为3.4289739亿元；盐税收入为

2.17705212亿元；直接税收入为211.6761万元；货物税收入为1.47742438亿元。国税收入总计为7.2846415亿元。

△　国民政府本年发行公债10亿元，关金、外币公债1.3亿美元。

△　国民政府本年发行法币额为16亿元。

△　国民政府本年举借外债计有：一、中苏易货借款，总额5000万美元，用于购买苏联货物，以中国茶叶等售价偿还，利息三厘；二、中英借款，总额2000万英镑，用于整理中国内债，年息五厘，抵押品为关税收入；三、中英广梅铁路借款，总额300万英镑，用于建筑广州至梅县铁路，年息五厘，抵押品为本路收入及盐税；四、中捷商业仅用借款，总额1000万英镑，用于购买工业用品。

△　经济部工厂登记统计，本年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家，资本总数3.77亿元，工人总数45万多人；主要分布于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北和上海、天津、青岛、威海卫等地，占工厂总数76％。上海、江苏、浙江地区工厂数，占总工厂数56％。上海市一地工厂数，即达总数的三分之一。西南和西北地区仅有工厂300多家。

△　我国本年生产生铁和铁合金79.7万公吨，钢34万公吨（两项均包括敌占区），煤3194万吨，石油20.022万公吨（其中敌占区20万公吨），钨砂1.1927万公吨，纸2.43764亿磅（其中东北4376.4万磅），发电159.923万千度（其中官营153.3万度，民营5.8389万度），皮棉156万市担。

△　蔡元培等688人签名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学的意见》，主张废除方块汉字，推广拼音的新文字。

△　东北抗日第一路军取得庙岭、老岭、本溪、长岗等战斗胜利，阻滞了日伪在此地区的资源开发。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北抗日第三军与第十一军，先后取得土龙山、青龙山、聚宝山以及通北、德

都等战斗胜利。

△　月底，据内政部工作报告，本年底全国各省辖市、设治局如下：江苏省会镇江县，61县，一连云市；浙江省会杭州市，75县，一杭州市；安徽省会怀宁县，62县；江西省会南昌市，83县，一南昌市；湖北省会武昌市，70县，汉口市、武昌市；湖南省会长沙市，75县，一长沙市；四川省会成都市，135县，成都市、重庆市、自贡市；西康省会巴安县（巴塘），46县、二设治局（按：西康正式建省为民国二十八年）；河北省会清苑县，130县、二设治局；山东省会济南市，107县，一济南市；山西省会阳曲县（太原），105县；河南省会开封县，111县；陕西省会长安县（西安），92县；甘肃省会兰州市，66县，一兰州市、二设治局；青海省会西宁县，17县；福建省会闽侯县，62县，一厦门市；广东省会广州市，97县，广州市、汕头市；广西省会桂林县，99县；云南省会昆明市，112县，一昆明市、15设治局；贵州省会贵阳市，84县，一贵阳市；辽宁省会沈阳县，59县；吉林省会永吉县，41县、一设治局；黑龙江省会龙江县，43县、10设治局；热河省会承德县，16县、二设治局；察哈尔省会万全县（张家口），16县、三设治局；绥远省会归绥县（呼和浩特），16县，一包头市、一设治局；宁夏省会宁夏县（银川），10县、三设治局；新疆省会迪化县（乌鲁木齐），59县、11设治局。按：我国行政区划，此时另有蒙古、西藏两地方及东省特别行政区与威海卫特别行政区。特别市为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此时全国行政区为28省、二地方、二特别行政区、五特别市、1949县、17省辖市、52设治局。

△　至本年底为止，日本出动空军主力，海军第二、三舰队；死伤官兵七万余名，损失各种战车1.8万辆。

△　日本内阁制定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合500万人移民计划。第一个五年移民10万户，第二个五年移民20万户，第三个五年移民30万户，第四个五年移民40万户。随日军所到关内之处，均有

大量日本移民。

是年　日本拟定加紧掠夺中国东北金矿的计划，本年内计划开采值1500万元；五年计划采金矿值二亿元。

1937年△　截至本年为止，外国在我国领土内有租借地三处：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日本辽东半岛租借地，英国九龙租借地；外国租界17处与北平外国使馆区一处：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厦门日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广州沙面英租界、法租界；天津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意租界；汉口法租界、日租界；杭州日租界；苏州日租界；沙市日租界；重庆日租界；福州日租界；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处。此外，英据香港，葡据澳门，日据台湾省。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1月

1月1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兼行政院长蒋中正辞职照准，选任孔祥熙为行政院长，所遗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选任张群继任。

△　国民政府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一、改实业部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与军事委员会之第三部、第四部均并入该部；前军事委员会之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二、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亦并入交通部；三、卫生部改隶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卫生部分，并入卫生署；四、海军部暂行裁撤，其所辖事务，并入海军总司令部办理。

△　国民政府令：免教育部长王世杰、交通部长俞飞鹏、铁道部长张嘉璈本职；特任陈立夫为教育部长，张嘉璈为交通部长，翁文灏为经济部长。

△　国民政府为推进军事、经济、行政及组织民众工作，决定扩大国防参议会，委员名额由原30名增至75名。

△　国民政府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下令裁撤反省院，在反省院受反省处分者准予取保释放。

△　蒋介石命令组织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负保卫武汉之全责。

△　全国庆祝开国二十七周年大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中枢庆祝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最后的胜利，必须要长时间的抗战。在这长期抗战中，军事上的一时退却，仅是一个战场的得失，不足以影响战局的全部……我们要拖延敌人的战争时间，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使敌人的经济机构，军事形势，一齐崩溃。"勖勉国人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完成复兴中华民族大业。

△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奉柏林训令访晤外交部长王宠惠，将德"与日方要人历次谈话所得的印象"，转告王宠惠，其要点为："关于第一条，承认满洲国，中国以积极证据表示反共诚意，但不要求加入反共协定。第二条，非武装区，日方意欲有三处：一为内蒙，一为华北，一为上海附近。关于特殊政权，（甲）内蒙自治，（乙）华北须有权力甚为广大之组织，但非自治，且仍属中国主权。惟关于此点，驻东京德大使尚未十分明了日方之意。（丙）上海两租界外，于不十分广大之地域内设立特殊政权。第三条，经济合作，指关税商约。第四条，赔款一部分为战费，一部分为日本财产损失，又占领费亦须中国负担。"

△　驻苏大使蒋廷黻奉召回国。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周恩来作关于战略问题和共同纲领的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应动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民众。并建议中共中央加强西北工作和巩固西北交通。

△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侵入山东泰安，第三十九联队陷肥城。守军韩复榘第三集团军退守大汶口。次

日，大汶口又陷。

△　日军第二军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主力进入济南，担任警备。

△　日机47架空袭粤汉、广九两铁路，投弹数十枚，路轨多处被毁，平民死伤数十人。

△　截至是日止，日军伤亡人数计：一、海、陆、空军伤亡官兵共19.8301万人；二、军舰共伤13艘；三、飞机损伤387架；四、阵亡中少将五人，大佐13人。中国军队伤亡共约50万人。

△　江西省政府发行民国二十七年度江西省建设公债，定额2000万元，年息六厘，15年还清，以省营钨砂盈余担保。

△　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经费依七五折发给；在田赋项下附征三成国难费；商人营业税率减少20‰，并核定七项免税办法，即日起施行。

△　湖北省政府规定：各机关经费是日起按七折发给。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汉口成立，方振武等21人为执行委员。

△　《中央日报》迁长沙出版。

△　郭沫若创办之《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夏衍任总编辑。

△　上海女子大学创立，校长吴志骞。

△　上海爱国志士在汉奸顾馨一法租界住宅门前，置手榴弹并附抗日救国大同盟传单。同日，上海公共租界亦发生炸弹爆炸案，日军三人受伤。4日，日本陆海军及外务省代表就此事件向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提出抗议，并要求取缔反日活动，增加日籍巡捕，增聘日本职员担任要职，共同扑灭“恐怖分子”。

△　《中美白银协定》展期至是年7月1日。

△　驻朝鲜釜山领事馆遭日军搜查，领事及馆员被迫即日离境。

△　北平伪临时政府官员在外交大楼举行就职典礼，王克敏、汤尔和、董康分别就任行政、议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　北平伪临时政府以高凌霨充任河北省伪省长。

△　山西省伪省政府在阳曲成立，曾继纲充任伪省长，日军第一〇九师团长山冈控制一切。

△　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陶锡山充任会长，程朗波、孙叔荣为副会长，马锡侯等八人为委员，并发表宣言。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深井亦同时发表宣言，否认国民政府，并嗾使各地组织联合亲日团体。

△　北平伪新民会主办之《新民报》创刊。该报系强行接收世界日报社而建立，由日人武田南阳充常任董事兼主笔，并代行社长。

△　伪满洲兴业银行成立。该行由朝鲜银行各支行、满洲银行、正隆银行本支各行50余家合并而成，资金3000万元，富田勇太郎任总裁，松原纯一为副总裁。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布《维持治安办法》，凡五项，规定：“凡任何人对于公共租界如有犯罪行为者，逮捕后当即移送武装队伍，听其处分。”5日，外交部照会英、法、美等国驻华使馆不承认上述办法，并声明：“工部局倘将中国法院有权管辖之人民，移送任何武装部队，中国政府将认为违法之举动，并保留一切应有之权利。”

△　第三国际中国执行部机关报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社论《1938年的抗战任务》，提出发展充实的和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改

善军事工作、广泛动员民众、反对亲日派汉奸、实行抗日外交等项任务。

1月2日　　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与当地游击队配合反攻杭州，一度进至六和塔。

△　日军第十师团自泰安分两股南犯：一路沿津浦路犯兖州；一路图犯东平，南犯陇海线。同日，日海军陷山东大公岛。

△　日机23架入侵南昌上空，我空军迎战，击落日机一架。同日，我空军炸南京日机场，毁敌机两架。

△　外交部长王宠惠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续查日方所提和议基本条件之详情，“在政府未决定最后办法之前，执事可常与驻东京德大使联络谈话，听取其所述，勿表示具体意见。同时日方如有要人求见，勿予拒绝，而以同样态度应付”。

△　广东省党政军会议，通过《民团组织章程》。

1月3日　　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重庆分别举行纪念周，林森在国府纪念周上报告，要求各位以四川民众之勤劳作榜样，尽忠职守，以报国家。张继作《开发四川》之专题报告，力主协助四川的发展，促进“复兴中华民族根据地”之稳固，并将四川民众勤劳的精神普及全国，迅速实现我们国家的复兴。

△　蒋介石核定《统一兵员征募及补充方案》，并令豫、皖、赣、闽、粤、湘、鄂、川、陕九省先设军管区司令部。

△　晨，日军第十师团5000余人，炮30余门，坦克50余辆，侵至兖州北15里处，曲阜车站失陷。韩复榘部炸毁兖州北之铁路桥并将军队南撤。次日，兖州、曲阜失陷。

△　空军在芜湖江面炸沉日舰两艘。

△　驻绥东丰镇、集宁一带伪蒙军骑兵补充第七师达密陵苏龙部第八团团长侯镇国、第九团团长于年运率部反正。

△　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成立，宣布组织简章及各组长人选：教育组长周天放，新闻组长彭革陈，出版组长张九如，文艺组长陈西滢，电影组长罗刚，戏剧组长阳翰笙，音乐组长冼星海，图画组长梁鼎铭。

△　全民通讯社开始发稿，社长李公朴，社址设武昌。

△　台湾工党领袖高斐为反对日本当局抽调台胞对华作战，是日组织矿砂工数千人在宜兰举事，进攻日军司令部，焚毁火药库，缴夺大量军火，激战四小时后，退往阿里山地，与高山族人结合，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7日，高斐率领游击队炸毁台湾久留米储油池，死伤日军70余人，可供六年需用之煤油全部烧毁。

△　日方强行接管上海公共租界内国民政府国际无线电台。5日，国际无线电台华籍职工为反对日方接管，全体撤退。

1月4日　　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副院长张群及各部长通电就职。同日，行政院举行例会，决议豁免抗战被灾区域内二十五年度以前田赋旧欠暨二十六年度田赋附加，并重申前令，责成各级政府“救济难民，抚辑流亡”。

△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丘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因日军逼近曲阜，奉蒋介石令移居重庆，是日抵汉口。5日，孔在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愿随国人之后，尽我国民天职，以期于最短期内收复失地，重返故里。”并对所传日方建议其称帝一事，表示“不值一笑”。

△　日机炸武汉，平民死伤数十人。6日，日机再炸武汉，死伤百余人。

△　日军第一〇九师团本川旅团自山东新泰南犯，是日陷蒙阴。

1月5日　　韩复榘部放弃山东重镇济宁，撤至运河西岸，以一部沿河扼守，主力退集于曹县、城武、单县一带。

△　第十一集团军开抵安徽寿县。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下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　参谋次长杨杰自莫斯科电蒋介石，胪陈与苏联商洽军援情形，称苏同意供给20个师的装备：11.5公分重炮80门，炮弹八万发；76公厘野炮160门，炮弹16万发；37公厘防战车炮80门，炮弹12万发；重机关枪300挺，轻机关枪600挺，共附枪弹1000万发。双翼驱逐机62架并附武器弹药。并谓："全副飞机及轻武器弹药之一部已下令即日开始陆运，余仍租轮由海道运华。"

△　周恩来在汉口举行之全国救国会聚餐会演讲，驳斥"中国必亡"的汉奸理论，指出："抗战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光荣。"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　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强调保卫湖北"不能单靠正规军的作战，或某一阵地的防守；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最短期间，发动湖北乡村的救亡运动，完成湖北乡村之适应战时需要的建设，从速把民众组织起来，尤其是武装起来，以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力量，才能措湖北于磐石之安，奠武汉于金汤之固"。

△　和成钱庄改组为和成银行，总资本60万元，稽祖为董事长，吴晋航为总经理。

△　伦敦中华运动委员会发表世界著名科学家、作家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杜威等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并以种

种可能援助中国。

1月6日　蒋介石命令韩复榘率部反攻兖州，不得擅退。

△　第五战区所部自行炸毁连云港港口，并将海州存盐运出，以防落入日军之手。

△　新四军军部由汉口移驻南昌，宣告新四军建制的确立。随后，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湖北、河南、安徽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相继统一集结，整编为新四军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共1.03万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同时成立，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委分会副书记。

△　日军第十师团一部陷山东邹县。

1月7日　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奉最高统帅部令，开赴山东临城以北津浦线正面，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指挥。该集团军总司令为邓锡侯，指挥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下辖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四师（师长孙震兼，副师长税梯青代）；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下辖第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病，副师长王士俊代）、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是日先头部队抵滕县，即在铁路正面布防，以第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防守香城、界河一带，由陈离任该军前方总指挥；第四十一军为第二线，驻守滕县，以王铭章为该军前方总指挥。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分析河南、湖南的政治形势，讨论党在这些地区的任务，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党的总任务是实行武装保卫；湖南已成为抗战的近后方或不久将成为前线，党的总任务是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和发展党的力量。

△　晋北原平、崞县日军1600人，附装甲车、坦克车10余辆，向神山、大牛堡、施家庄地带进攻。八路军王震部第三五九旅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与敌激战竟日，收复大牛堡。随后，敌又续攻大牛堡等地，至11日该地被敌屠杀及炮弹炸死炸伤者500余人，民房被毁1100余户。

△　国立东北大学自开封迁往川北绵阳。

△　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前北平警察总监余晋龢继江朝宗为北平市长，前河北省警察厅长潘毓桂为天津市长。

△　苏红十字会捐款33万余元，充中国难民医药费用，由苏驻华使馆送交外交部。

1月8日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白崇禧、阎锡山、何应钦、陈诚、宋哲元等人出席，会后各携新计划分赴前线。

△　周恩来在《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提出争取持久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办法。

△　日军南北两路会攻徐州，北路逼近临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召集安徽省政府主席蒋作宾及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之代表何思源到徐州开会，决以大军死守徐州。

△　青岛市长沈鸿烈奉命弃守青岛，退守诸城。

△　日军驻蒙古兵团编成，莲沼蕃中将任司令官，石本寅三少将任参谋长，直属天皇，辖第二十六师团及五个后备大队（至3月12日又将新编独立混成旅团编入属下），其任务是监视外蒙、宁夏、绥远，填补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间之空隙。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陈锡联第七六九团在晋东娘子关南设伏，击毁日军汽车25辆，毙日军40余人。次日，又在平定柏木井设伏，击毁日军汽车16辆。

△　冀南威县伪警备旅高希伯部向八路军投诚，改编为抗日独立第二师。

△　《东方杂志》迁长沙出版。

1月9日　　上午，日机15架两度空袭南宁；下午，又五架第三度空袭，遭我空军迎击逸去。同日中午，日机36架空袭南昌，我空军及防空部队奋勇截击，击落其重轰炸机一架，机员七人毙命。

△　日内阁会议决定对华取强硬政策，“延长中日战争，继续进行推翻反日的中国政府”，并决定召回川樾大使。

△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第二次讲演会通过决议，慰问前方抗敌将士和殉国将士家属；请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绝交，肃清汉奸，武装民众，呼吁全欧华侨彻底抵制仇货，踊跃认购救国公债。

△　印国民会议主席尼赫鲁及领袖多人举行“中国日”，援助中国抗战，在各地召开抗日会议并劝募赈济中国战区难民。著名诗人泰戈尔发表宣言声援中国。

1月10日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特任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长，何应钦兼任军政部长，白崇禧兼任军训部长，陈诚任政治部长。

△　军委会特派联络参谋刘移山视察第一战区部队后，向军令部长徐永昌报告，列举该战区部队种种弊端：一、官兵畏敌，不肯为国效命；二、捏造情报，夸大敌情；三、虚报损失，以减轻作战任务；四、军队溃乱，骚扰地方；五、缺少侦察，不知敌情；六、通讯断绝，失去联系；七、指挥不统一，乱成一窝蜂；八、义勇军、游击

队，抗敌无济，扰民有余，后方秩序无法维持。建议以重赏、严罚、私查、克饷、治罪等办法加以整饬。

△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出席大会的140多名代表,代表着边区部队和39个县的1200万人民,代表中有“动委会”、“救委会”、“自卫会”等群众团体和工、农、商、青、妇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大会历时六天，代表们通过有关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文教、民运等决议案，并经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宋邵文、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等九人为委员。

△　毛泽东、陈云等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前方部队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应依靠民众的自愿援助来求得解决。

△　青岛失陷。日海军陆战队配以飞机50余架在青岛东之沙子口登陆，开入市区，并枪杀警察600余人。

△　日军第五师团鲤城支队入侵山东潍县。

△　空军两次轰炸安徽广德日军机场，第一次炸毁日机10余架，第二次炸毁新建汽油库。

△　日机袭广西南宁、柳州，江西吉安、南城、玉山及粤汉路之琶江、横石等站，在江西投重磅炸弹百余枚。在柳州被击落一架。

△　《战时青年》在武汉创刊。创刊号刊载周恩来所撰《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一文。

△　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拜访德外交部长牛拉特。德外长向东乡指出：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也会有危险。东乡表示：日政府决心战事坚持到底。战事越延长，和平条件也就愈苛刻。

△　伪北平“新民会”创办之新民学院开学。王克敏任院长，日人

佐藤三郎为教务长。

1月11日　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第一、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报告《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承认过去几个月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高级将领缺乏攻击精神，望风退却，步步后撤；提出当前的策略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会间，蒋介石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遵命令，擅弃国土，下令将其撤职逮捕，次日解押汉口。

△　军事委员会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成立，陈诚为总司令，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兼参谋长，军长刘绍先兼总参议。下辖第二军（军长李延年）、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第六十军（军长卢汉）、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第十三师（师长吴良琛）、第一八五师（师长郭忏）、第七十七师（师长彭位仁）、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江防总司令（刘兴）、海军陆战队、第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第十四师之一旅，共14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不含其他特种部队及江防守备部队）。

△　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蒋介石认为目前作战重心应移黄河西岸，正在重新部署兵力。建议将刘伯承师及徐海东旅逐渐移太行、太岳山脉。

△　日军第十师团攻入济宁，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与日军巷战，至晚退出，济宁遂陷。

△　日机34架袭武汉，在飞机场附近投弹百余枚。六架袭南宁，在柳州上空被击落两架。

△　日舰四艘由芜湖经鲁港上驶荻港，我空军闻报即派飞机数架前往荻港上空轰炸，命中日舰一艘。下午4时，复向鲁港江面日舰投弹，日舰一艘中弹下沉。

△　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社长潘梓年。

△　武汉工界战时服务团成立，田亚丹等九人为主席团。

△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要点为：决定对华继续用兵，对中国政府不再与之谈判，“如果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委员班禅逝世，遗缺选任陈济棠充任。

△　军令部长徐永昌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汪谓日人催我答复所提四项议和条件，“恐三五日无确复，即将大举西来，且微闻英将与日进行妥协，前途愈不乐观”。徐谓：“今日之事寻求延宕途径如何？”汪谓：“蒋先生（介石）果用其行，此途径并不难求。”

△　日机42架炸南昌，投弹百枚。同日，海南岛海口及粤汉路军田、源潭、琶江、英德等站和广九路南岗站亦遭日机轰炸，共死伤平民50余人。

△　八路军总部号召全军“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　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在重庆病逝。2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

△　教育部决定筹设国立贵阳医学院，派李宗恩、朱章赓、杭立武为筹备委员。

△　山西侯马工人武装自卫队先后捕获汉奸21人，是日在侯马举行民众大会，处决其中张云池等七名。

1月13日　蒋介石电令各战区、各绥靖区、各省政府严禁奸民假借游击队名义扰民，略谓：“近闻各地奸民，假借游击队名义，恃众横行，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种种弊害，不胜枚举，是未见困敌，先以自扰，殊失全民抗战之本意。应由各司令长官及各主任、主席等一律勒令取消，不得稍涉瞻徇，并严饬地方军警，禁止组织类似游击队名目，以杜祸乱。”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进攻安徽广德日军，安徽宁国及浙江三市岭游击队亦分路围攻，日军外援断绝，旋即退走，广德遂告收复。

△　军事委员会任命徐源泉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　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略谓：“中国虽军事迫切，政府财政亦感困难，但已迅速履行应付内外公债之义务，今后仍拟履行之。”

△　中午12时，外交部长王宠惠访晤德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日本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本月15日以前答复和议条件，否则“日本政府须保留自由行动”。下午，王宠惠再晤德使陶德曼，宣读一项声明答复日本所提和平基本条件，略谓：“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商会法》，凡九章44条；《商业同业公会法》，凡11章59条；《工业同业公会法》，凡11章60条；《输出业同业公会法》，凡11章62条。

△　方振武、沈钧儒、郭沫若等百余人在武汉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

1月14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行政院组织法》第一条条文，规

定行政院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七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公布《经济部组织法》，规定该部设立农林、矿业、工业、商业、水利各司；修正公布《交通部组织法》，规定该部“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国有铁道、公路、电政、邮政、航政并监督公有及民营交通事业”。

△　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二人通电就职，表示决率所部，抗战到底。

△　津浦线北段正面邓锡侯部第二十二集团军克复山东邹县。同日，津浦线南段日军攻陷安徽巢县。

△　陈诚电告蒋介石，晋中各军“气势极坏，转移一月有余，多属涣散颓唐，不能作战。高级将领不振作，不负责任，是为主因”，要求派员视察整理。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鄂豫边工作，决定河南省委须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发展工作。

1月15日　蒋介石自洛阳电令经济部长翁文灏，从速拟定以川、黔、湘西为主之战时军需工业方案，及西南、西北战时经济建设方案。

△　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孔祥熙接见德使陶德曼，声明：中国仍然抱着与日本达成真正谅解的愿望，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出的基本条件的性质和内容。

△　南京《新民报》在重庆复刊。

△　国民党CC派机关刊物《血路》创刊，陶百川任主编。

△　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赵琪为青岛市长；张化南为烟台市长。马良自任济南维持会长。

△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以中国政府“不求和”，通过政府方面“否认蒋政权”之主张。

1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内称：“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而至今日，国民政府依然不解日本真意，策动抗战”，“因此，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　蒋介石令各省组织动员委员会，以各绥靖主任或省府主席兼任主席。

△　孔祥熙发表《论中日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谈话，指出：“在财政上，中国支持长期战争的能力，并不次于日本。”

△　菲律宾华侨组织青年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并组织回国服务队参加抗日工作。

1月17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凡15条，其中规定：“国民政府为战时统辖全国军民作战便利起见，特设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并授权委员长，执行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条所规定之职权。”“本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七人至九人，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选定，由国民政府特任之。此外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四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为当然委员。”

△　蒋介石在洛阳第二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讲演《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指出：“我们这几个月来，在战阵上、形式上虽然失利，但在战略上与精神上实在是成功！可以说，我们最后胜利

和革命最后成功的基础，已完全在这初期抗战中建立起来了！没有这初期的苦战，就不能打破敌人侵略的野心；没有这初期的挫失，也就得不到伟大成功的教训！”

△　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在洛阳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八路军出师以来积极支持正面战场，屡创日军的行动表示慰勉，并称赞朱、彭、林、刘、贺五将领，说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

△　孔祥熙在武汉就日本政府16日声明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从未欲有战事，故无论何时，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中国可准备议和。”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对于四川的感想与希望》，就四川的地形、人民与物产，来说明四川“的确具备了做复兴中华民族根据地的种种条件”，并指出，广东自从做了革命根据地，做了政务、党务的重心，经总理领导同志，努力整饬以后，终以此为根据地，完成了统一的大业。“现在四川既成为国民政府驻在地，在各方面经过一番整饬刷新后，其发展是不可限量的。我们既有这样好的根据地，只要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则打倒强暴日本，复兴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成功的”。

△　立法院长孙科抵莫斯科，开始与苏政府会谈中苏合作问题。

△　广东人民自卫团统率会成立，并在下午开会，议决于短期内将60万民众组织起来，保卫广州。

△　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节食运动实施规则》，凡11条，其中规定各专员及各市、县长应以身作则，并督励所属各级公务人员、保甲人员及学校学生，实行一日两餐，期以节省粮食，支持长期抗战。

△　全国歌咏协会在汉口成立，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35人为执行委员。会后，举行盛大音乐会，以全部收入捐助冀北人民抗日游击队。

△　武汉新华日报社营业部被便衣暴徒二三十人捣毁。该报社社长潘梓年为此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彻查严办。

△　日本外务省声明：日本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但并未对华宣战。

△　德国外交部致电陶德曼大使称：调解中日战争的工作已难进行，“我们的递信员身份目前已经终止了”。21日，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拜会德外长牛拉特，说明日本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已不再存在，日本准备应付一切事变，并且知道怎样承担一个为时颇久的战争。

△　日本前文相平生釟三郎任北平伪临时政府顾问；平、津、冀伪政权组织之日本顾问分别为粟屋秀次、高桥东雄、难波精一。

△　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明光，刘士毅第三十一军扼守池河西岸梁家山、马家岗至三河集一线及池河东岸的池河镇、藕塘，与铁路西侧珠龙桥的日军对峙。

1月18日　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指出：“中国抗战目的为求国家之生存，为维持国际条约之尊严。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而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既为我独立国家应有之要素，又经有关系各国以神圣之条约允予尊重，自不能容许任何国家之侵犯。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　蒋介石电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各战区联合作战之整个计划，

应制成各式方案，以备练习实施，计：一、以确保武汉为中心，豫南、鄂东、鄂南、湘东、皖北、赣西各驻军之部署与协同动作；二、以牵制津浦路南北段之敌军，确保徐州、蚌埠之计划，即联合鲁、皖、苏、豫各部队作战协同动作之部署；三、为确保郑州交通之枢纽，使豫北、豫西、皖北、鲁南、苏北各部队作战协同动作之部署；四、为确保南昌与长沙各据点，使浙东、皖南、闽北、湘东、赣南各部队作战协同动作之部署。

△　行政院颁布《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办法》，凡17条，规定出征抗敌军人家属“除担负法定赋税外，得酌量减免其摊派各项临时捐款”；“应准免服劳役，并准尽先享受一切公益设施”；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计“（一）家庭赤贫不能维持生活者，（二）患病无力治疗者，（三）死亡不能埋葬者，（四）生产子女无力抚养者，（五）遭遇意外灾害者”得由保甲长或径向优待委员会请求救济，经查明属实后，“应酌量予以金钱或物品予以扶助及权利之保障”。抗敌军人因作战阵亡或重伤致残者，“其家属并得继续享受本办法所规定之权利，至其子女成年为止，无子女者，至其配偶死亡为止，无配偶及子女者，至其父母死亡为止”。同日，又颁布《维持各级学校学生服务训练办法》。

△　孔祥熙对海通社记者谈话称：对日本声明惟一的答复是增强应战力；同时又表示，只要日本有和平诚意，中国愿以友谊态度与之合作。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彭德怀报告前方情况及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情况和罗世文关于四川工作的报告。建议中共中央派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

△　守备合肥、定远、明光等地之韦云淞第三十一军，自1月以来与日军在张八岭、岱山铺、珠龙桥、藕池一带对峙。日军屡次增援，

是日，明光失陷。

△　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以该省吏治不修，地方行政人员违法舞弊之案层出叠见一事，诰所属专员："嗣后各专员、县长对于所属务须随时认真考核，勿稍放任，关于本府饬查案件尤应彻查明确，切实具复，本府当详为钩稽，或派员复查，如发觉有敷衍徇庇情事，定予从严惩处，不稍宽贷。"

△　山东省政府由河南太康迁返山东曹县办公。

△　上海浦东一带近日游击队活动甚烈。是日，日军发言人称："浦东全区正进行军事行动，期扫除该区游击队3000余人，故不得不杜绝交通，外商堆存浦东货物，暂不准前往搬运。"

△　天津市122个民众团体上书国民政府，并发表致驻津各国领事宣言，声明北平伪临时政府"纯系日本军阀侵略行动之附庸机关，凡我中国国民俱无条件地坚决予以否认"。

△　中华公教进行会在汉口天主教堂举行大弥撒，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平民并祈祷和平。会前散发传单，号召天主教友积极支持抗日战争。

△　日本首相近卫发表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

△　日本政府令驻华大使川樾回国。31日，川樾返抵东京。

△　意大利与伪满洲国互派公使，伪长春市长徐兆祥为首任公使。

1月19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正式宣布韩复榘之罪状：一、不遵长官命令，擅自撤退；二、强迫鲁西人民购买鸦片；三、强征捐税；四、侵吞公款；五、没收人民武器。

△　交通部长张嘉璈抵河内，与法国银行团代表沙第、中法银行代表刘符诚、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刘景山等，商议中法合作建设南宁至镇南关铁路事宜。

△　教育部制定《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及学生登记办法》，并分令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河南、陕西等省教育厅办理登记；同时决定在天水设临时中学一所，派吕志伊筹办，在兰州及陕西招收学生1000人。

1月20日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主任、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武汉病逝。弥留之际，曾口述遗嘱，略谓："今后惟希我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和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发给治丧费一万元，并派内政部长何键致祭。2月14日明令国葬。

△　军事委员会公布抗战以来受奖惩将领名单。明令嘉奖者六人，其中有上海孤军团附谢晋元及已殉职之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等。受惩办者41人，其中处死刑者八人，受其他处分者33人，其中主要者为：第九集团军副司令香翰屏，指挥失当，记大过；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贻误战机，放弃守土，处死刑；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作战不力，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第一四八师师长陈万仞，畏缩不前，撤职查办；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不遵命令，影响战事，撤职查办；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不尽职责，撤职；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松山、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第一四七师师长杨国桢，作战不力，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第三十三师师长冯兴贤，作战不力，撤职；第一五六师师长邓龙光，指挥失当，记大过；旅长高仰如，临阵退缩，处死刑。

△　驻日大使许世英偕驻横滨总领事及旅日华侨数百人，乘“亚洲皇后号”邮船离日返国。

△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临汾开学，校长由阎锡山兼任。

△　日本陆相杉山元对全军发出长期持久战之准备的训令：“当需要有关有形无形各种长期持久战的准备与对策时，全军官兵应一致团结，以坚忍持久的精神，对任务集中其最佳的努力。”

1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2条。规定：“西康在省政府成立前设西康建省委员会，筹备建省事宜并执行政务”；“西康建省委员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部会之指导监督。”

△　行政院公布《特许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该公司股本总额为国币200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00元，由铁道部认10万股，云南、四川两省政府各认五万股，用以修筑昆明至叙府铁路干线及其他支线，营业期限为30年。

△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关于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政府组织等情况：国民党方面坚持管理县份限于18县，不允许增加。周恩来等坚持要求增加西线各地直达黄河右岸。关于边区政府组织，国民党提出派丁惟汾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并代理正职，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不允许设农工厅，并要派两人来做事。23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陕甘宁边区问题请设法争取下列各点：一、增款；二、增地；三、给陕北部队以名义；四、边区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须派人。

△　中国电影制片厂成立，总厂设昆明，成都、武汉设办事处，郑用之任厂长。

△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周刊在西安创刊，李初梨主编。

△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天津移北平。总司令寺内寿一声明，决以全力消灭中国军队。

1月22日　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夜，刘湘部属钟体乾、彭焕章等，以刘湘新故，中央即命张群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四川，即在成都全城张贴标语，组织游行示威，表示反对。留川将领由彭焕章领衔，率同朱果、刘哲雄、周成虎、唐华等17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收回成命。

△　川军将领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师长廖诚孚、汪杰、严啸虎、郭昌明、廖震、陈兰丹、许绍宗等35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愿继刘湘遗志，“誓竭忠诚，在中枢暨钧座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鄂豫皖特委的工作。决定鄂豫皖特委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在晋东伏击井陉开出之日军千余人，毙伤200余人，团长陈锦秀牺牲。同日，八路军东进支队将驻冀中高阳日军板垣师团第四十联队第三中队诱出城外，击毙中队长日川丹志，毙伤日军60余人，俘10余人。

△　财政部在成都设造币厂，并令川、鄂造币厂加紧制造辅币，每日20万枚，以应社会急需。

△　北平伪临时政府公布华北新税则，宣布23日起实施。新税则对日本进出口货税率均行减低，并规定伪满洲国及关东州租借地按外国待遇，其海关附加税予以取消。23日，财政部发表声明，宣布北平

伪临时政府擅定之关税税则无效，并令总税务司转饬华北各海关拒绝执行。

△　叶青在《血路》第二期发表《关于政治党派》一文，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称“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　日本首相近卫及外相广田在七十三届国会上宣布对华政策。近卫声称：中日战事离结束之期尚远，中日事件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故今后须准备忍受更大之牺牲。广田说明德国调解中日战争之经过，第一次透露日本通过德国向蒋介石提出的四项议和条件：一、中国政府须放弃联共以抵抗日本及“满洲国”之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反对共产主义；二、在某些必要区域内，建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中国对日赔款。

△　日本海相米内向贵族院报告称：从去年8月13日到今年1月3日止，日本飞机曾向中国军队、交通线、军事建筑轰炸1.3万次，仅淞沪区域即轰炸6000次，轰炸南京1200次，轰炸广州500次，粤汉、广九两路900次，津浦、陇海660次，其余为湖南、湖北、河南、广西等处。

1月23日　　蒋介石令前线长官“不得闻警先逃，否则即以军法从事”。

△　国民政府以韩复榘违反战时军律，明令褫夺陆军二级上将原官及一切荣誉勋典，交军事委员会提付军法审判。

△　蒋介石令组高等军法会审韩复榘，派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濬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臣为军法官。

△　国民政府令免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本兼各职，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　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召开会议，康泽等诬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次日，陈绍禹、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用争取八路军新胜利等办法给以回击。

△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通过《章程》、《宣言》、《告世界人民书》，推选朱家骅、陈立夫、张冲、周恩来、郭沫若、潘梓年、陶行知、邓颖超、张仲实、方治、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决定派宋庆龄、蔡元培、陶行知、吴玉章、胡适等19人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

△　苏新任驻华大使奥尔斯基在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25日返回武汉。

△　日本首相近卫在众议院答复议员质询，阐明日本对华方针四点：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火输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政府处于监护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　美国旧金山海员工会七万余人集会，要求政府禁止军火运往德、日、意三国。

1月24日　　韩复榘被判处死刑，宣判书谓：“该被告并不尽守职责任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移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敌军等五点之命令均不遵奉；后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续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节节退往鲁西济宁，致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据该管长官等先后分别检举，并以被告尚有借势勒派烟税，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各情事，一并检报到会，经委员长饬将该被告拿获讯办。经审理终结，判处死刑。”晚7时在武昌执行枪决。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府纪念周报告，驳斥近卫16日之声明，指出：此声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示，除了因此使我们政府与

人民的抗战决心更加坚定和在国际上暴露敌人野心及引起严重的反响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效用”。

△　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军长潘文华、师长郭勋祺等自皖南前线通电表示在最高领袖领导下，“苟一息尚存，倭寇一日未去，拼将热血，溅我河山，抗战到底誓不生还，以副甫公（刘湘）殷拳之训，而报国家食养之恩”。

△　军令部特派员袁德性视察第一战区宋哲元部和南战场后，自汉口向军令部长徐永昌报告称：宋哲元自弃守大名“赴京领训后，对于过去之错误觉悟甚速”。考其失败原因，乃该部将领缺乏“自我牺牲精神”，为“保存实力，逃避责任”，相互之间“不能联合作战”以及“暗派侦探，互相监视”等。又谓：南战场第一〇五师军纪败坏，“溃伤兵士，抢掠奸杀，无处无之”，“凡经过之城镇，未有不为之抢掠一空者”。

△　津浦线南段日第十三师团冒雪分三路强渡池河，一路在明光对岸的梁家山、马家岗；一路在三河集；另一路由珠龙桥攻池河镇，第三十一军奋勇还击，开展池河阻击战。

1月25日　津浦线战局吃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前线视察，部署防务。

△　池河前线战事日趋激烈，日军后援部队增至2000人，终日向我梁家山一带阵地猛烈炮击，并以机枪掩护步兵于黄昏渡河，我第三十一军第八〇九团官兵奋起还击，将渡河之敌百余人悉数歼灭。

△　日机袭厦门、广州等地，于厦门炸沉民船及海关巡逻艇各一艘，广州东山意大利领事馆被震毁。

△　八路军杨成武支队在冀北王安镇设伏，击溃由紫荆关西犯之日军800余人。

△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政界官员，拟定欢迎张群主川电文，保安处长王陵基拒绝签字，并于是日发出通电，公开提出异议，由张群主川引起之纠纷继续扩大。

△　成都市商会暨105个同业公会，致电张群欢迎其来川主政。

△　重庆士绅朱叔痴、伍非白、陈长蘅等八人联名发表《改造四川刍议》一文，批评四川军事、政治之不良，提出：一、“彻底修明政治”；二、“实行统一军事”；三、“厉行财政公开”；四、“加紧经济建设”；五、“普及全民教育”；六、“保障言论自由”六项急要措施。

△　英商办中文《文汇报》在上海创刊。3月5日，该报由一大张改为两大张，7月14日改为四大张，12月1日开始发行《文汇报》晚刊。

1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蒋作宾应免本兼各职。

△　新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宣布治皖方针。略称：“皖省为抗敌前线，武汉屏障，关系重大，不言而喻，今后工作之艰苦，自在意中。”“至于施政方针，总求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并提出在民政方面，使吏治清明，贪污绝迹，迅速清剿盗匪；教育方面，厉行普及教育，组织民众，训练民兵；财政方面，公平负担，量出为入，金融周转，商货流通；建设方面，改良农产，提倡副业，开发军用资源，建设防御工事。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品仙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　空军数队轰炸南京日军机场，毁日机20余架。据日方宣布：袭南京之华机，被击落三架，其中一架有苏联机师遗骸。

△　池河前线日军机炮联合作战，先是飞机10余架对我军池河两

岸阵地狂轰滥炸，继以重炮密集射击，使我军阵地工事遭受严重毁坏，日军随之在明光、汤郢铁桥、西街等处同时渡河，一度攻入我河西阵地。我守军第三十一军第八二四团与渡河日军肉搏10余次，卒于次日在第八〇九团协助下，收复阵地。与此同时，三河集至池河镇一带战事激烈展开。

△　经济部派员接收汉冶萍公司所办之萍乡煤矿。该矿原归江西省政府经营，现移与资源委员会合办。接收改组后，日产煤增至800吨。

1月27日　蒋介石出席在汉口召开之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讲述《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勖勉与会军官整饬幕僚，改进司令部并提高修养以完成抗日大业。要求参谋人员：一、要不避劳怨，不计功过；二、要恩威并用，宽猛相济；三、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

△　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会同前临沂专员张里元，在当地民团配合下，进攻蒙阴，激战三日，敌不支后退，是日攻克蒙阴城。

△　国民政府特派沙克都尔札布为蒙旗宣慰使，并在榆林组设蒙旗宣慰使公署。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森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举行全体理事会，推选邵力子、杭立武、周鲠生、邓飞黄、钱俊瑞、邓颖超等23人为常务理事，邵力子为主席。次日，召开首次常务理事会，推邓飞黄、杭立武为副主席，并确定总务、组织、宣传、财务等各部人选。

△　日机24架袭宜昌，击毁我机六架。

1月28日　蒋介石电勉四川各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安心服务，努

力工作，勿信谣言而懈其素志，并表示“甫澄（刘湘）之部属，即中正之部属，爱护之诚，罔间始终”。

△　国民政府派刘文辉、段班级、向传义、李万华、任乃强、叶秀峰、周学昌、王靖宇、韩孟钧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以刘文辉为委员长。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贺国光偕留守川军将领赴成都，宣达国民党中央处理四川政局善后意旨，并与王陵基、邓汉祥等作进一步之会商。

△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山西临汾成立，武亭任团长。

△　《反攻》半月刊在汉口创刊，东北救亡总会主编。

1月29日　行政院决议：新任四川省府主席张群未到任前，省政暂由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代理，川康绥靖主任暂由绥署总参议钟体乾代理。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收复六合，越二日复陷。

△　池河前线日军由西街强行渡河，第三十一军第四〇五旅阵地受敌人机炮联合猛击毁坏殆尽，官兵伤亡甚重，遂由梁家山向五里墩阵地撤退。日军千余人渡河，占领梁家山，续向五里墩进攻。同日，池河镇方面日军增至二三千人，并以飞机10余架、坦克10余辆掩护进攻，第三十一军第四一二旅与敌血战半日，因伤亡过大，向池河镇西岸转移。

△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张道藩、方治、史东山、田汉、蔡楚生等72人为理事。

1月30日　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在经济与物质上予以有效援助。略谓：“中国鉴于中美间之非常友谊，在此并力奋斗、

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时，其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中正用敢重向阁下要请，尽力设法务使日本之侵略，能得从速终了，俾贵、我两国所确信之主义得以实现。吾人迫切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抵抗。”

△　日机30架袭洛阳，被击落三架。

△　华北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签订合并协定。次日正式合并。冀东22县编入河北省。

△　菲律宾马尼拉市各界5000余人集会，支持中国抗战。

1月3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承认并批准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及委员人选，委任宋邵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　夜，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为阻止日军北犯，自动炸毁蚌埠淮河铁桥。

△　日军第十三师团占领池河镇，第三十一军向西撤退至定远、凤阳一带。津浦线南段池河阻击战结束。是役，我第三十一军伤亡过半，歼敌近2000人，其中在池河镇歼敌三四百人，在三河集、马家岗两处歼敌二三百人，在明光方面歼敌约千余人。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向伦敦大会提出四项议案：一、全世界各国公民宣布日本军阀为人类公敌；二、各国公民及团体实行抵制日货，停止对日供给及援助；三、各国公民及团体给中国抗战以物质供给与援助；四、请求国际实施制裁侵略国之条约，否认日本占领区之伪政权。

是月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召开讨论内蒙古抗日工作会议，确定内蒙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各阶层人民与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决定组成内蒙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毛泽东两次会见梁漱溟，就抗战前途、中国政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

△　周恩来多次会见史沫特莱，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会见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感谢他们援助中国革命。

△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对外称“粤华公司”，由廖承志负责。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汉口国货日报社、大光报社、中国新闻通讯社、大声通讯社等16家报纸和通讯社停刊甚久，决定注销登记。

△　由彭一湖、孙伏园、晏阳初、瞿菊农、雷震等人主持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长沙总办事处成立。该会倡导“乡村建设”、“政教合一”主义，曾受湖南省政府之委托，主办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三期，培训县长、县督导长及保、甲长万余人。

△　日本组织“华中电气公司”接收上海电力公司，统制华中电业，资金4500万元。

△　日本指使伪晋北自治政府没收西北实业公司在大同所设兴农酒精厂（资本100万元）和西北洋灰厂（资本200万元），并设蒙疆木材公司（资本100万元）、蒙疆制粉厂（资本200万元）。伪蒙疆自治政府与日本三井、大仓共集资20万元，设立出口公司，垄断平、绥驼毛、羊毛、皮革、蛋粉、油脂等原料，向欧美出口。

2月

2月1日　蒋介石通电全国，以韩复榘为例，警告各级将领：“今后如再有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守土，不尽抗战为能事者，法无二例，决不宽贷。”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令：凡现任县、市党务以上委员职员，在任职期间予以停役。

△　毛泽东为武汉《自由中国》创刊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　日军2000余人配以侦察机数架，自山西忻县向县西三交镇进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一部与敌激战竟日，毙敌200余人，迫敌当晚退回忻县，三交以东村庄尽被敌焚毁。

△　日军在冀中高邑东大营强奸妇女，被民众击毙二人。日军派兵报复，打死民众百余人，烧房千余户，妇女被迫投河者百余人。同日，日军在藁城梅花镇肆行淫掠，被民众击毙数十人。日军报复，打死民众千余人，全家被杀绝者30余户，村舍被焚毁。

△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机关刊物《团结》在延安创刊。

△　马来亚东马岸日人所办铁矿的华工，发动大规模反日罢工。5月14日，该矿全体华工退出矿场。

2月2日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召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前往徐州接受任务，增援津浦线南段，令其开往淮河北岸，接替第三十一军防务，阻敌前进。

△　津浦线南段日军二万余人由明光、池河向淮河前进，是日起一路犯凤阳、定远，一路犯临淮关，对蚌埠取包围态势。我官兵奋力拼搏，终因工事尽毁，无险可守，蚌埠、临淮关及凤阳均告失陷，我军退守淮河以北。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商震，委员兼民政厅长李培基，委员兼建设厅长张静愚均免本兼各职，任命程潜兼河南省政府主席，龚浩兼建设厅长，方策兼民政厅长。

△　蒋介石令税警总团改编为陆军第四十师，以黄杰为师长。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再克六合。

△　国际联盟行政院讨论远东形势，通过决议鼓励各会员国单独向中国提供援助。

2月3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3月29日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制订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　第五战区下达作战第三号命令："战区决对津浦南段之敌，拒止于淮水以南地区，由其侧方连续予以打击，渐次驱除肃清之。同时巩固鲁南山地。对津浦北段及陇海东段，取侧击之势，牵制敌之南下或西上，以拱卫徐州。"命令又将战区兵力划分为四个兵团及四个游击区，分别在淮河南北两岸安庆、合肥等地布防及担任津浦、陇海、江岸、东海、鲁南、鲁西游击。第五十九军集结宿县待命。徐州会战揭幕。

△　国民政府明令重申公务员不得支领兼薪。

△　内政部于青海省增设称多县，5日经行政院呈奉国民政府指令准予备案。

△　周恩来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群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

△　日军第五师团自青岛侵占烟台。

△　日军第五师团攻陷蒙阴后，并有会同津浦路方面日军进攻徐州之势，是日，第五战区为增强鲁南兵力，令第四十军庞炳勋部迅速出临沂协同由青岛退至诸城、沂水之沈鸿烈部，于鲁南积极进行阻击。

△　北平日使馆通知各国使馆，要求居留长江以北、中国海岸线以西及自青岛经兖州至太原之线以南区域内之各国侨民，即日撤退。上海日使馆亦通知外侨撤退，对仍居留上海之外国人员住所，要求悬明标帜，并将所在地点通知日方。

△　日本外相广田在众议院宣称："中国国内现并无日本所承认之中央政府，中日两国现已入于战争状态。"

2月4日　　蒋介石通令指示各军，对使用新式武器日军的取胜之道，不仅斗力，必须斗智。"故我各级将领，只要能精研学术，锻炼技能，则智勇兼全，抗战未有不能得最后之胜利也"。

△　蒋介石电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规定武汉附近阵线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

△　军政部长何应钦通令各师管区及各部队实现兵役法制精神，停止募兵，所需新兵概由各县、市义务壮丁常备队征调，入营编练；若再有募兵情事，即由地方制止。

△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率部开抵淮河前线，军部驻固镇，该军下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烈）、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

△　津浦线北段日军陷山东诸城。

△　津浦线南段日军第十三师团陷安徽怀远。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一部，在晋北崞县、原平间之定风庄伏击日军汽车队及增援兵车两列，毙敌百余，击毁汽车16辆，当夜袭占原平，残敌溃退忻县。

△　驻日大使许世英抵武汉，次日分别向蒋介石及外长王宠惠述职。

△　同蒲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曲沃侯马镇开幕，除各站工人代表外，并有牺盟总会、各救亡团体代表多人参加。7日闭幕，通过拥护蒋、阎抗战到底电、慰问抗战将士电及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等。

△　北平伪临时政府公布：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治安、教育、司法、赈济五部，各部总长分别为王克敏、齐燮元、汤尔和、朱深、王揖唐。

2月5日　军事委员会公布蒋介石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所作《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演稿，长达三四万言，自是日起在各报发表，并由电台陆续播发。

△　孔祥熙偕陈光甫等赴香港，召集中国、中央及交通银行经理洽商应付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之对策。

2月6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任副部长，张厉生任秘书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第三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欠第五十一军）由孙桐萱代行总司令职权，率所部第十二军及第五十五军，以主力约三个师驱逐运河西岸之敌，向济宁正面攻击，以两个师由开河镇方面迂回，占领汶上，向济宁、滋阳（兖州）间侧击，策应主力之战斗。"

△　第二十一集团军开抵合肥。该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指挥第七军（军长周祖晃），下辖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一七一师（师长杨复昌）、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芳）；第四十八军（军长廖磊），下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同日，该集团军第七军由定远攻津浦线，遮断日军后方联络线。第四十八军协同第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攻击刘府、考城、蚌埠之敌。

△　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取缔共产党“非法”活动。

△　《扫荡报》刊载茹春浦《一个主义，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统帅》一文，谬称“在共同信仰三民主义之下，就不应该有‘国共合作’的名词”；“游击队只能受正规军节制而动作，绝对不能独立自由的动作”，否则，就“破坏信仰统一、军令统一”，“危害到战争本身”。

△　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分宗教、妇女、青年、儿童等项，逐日在武汉举行宣传大会。是日为宗教日，武汉基督教徒为国难举行祈祷。王宠惠、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吴国桢及各界代表、外领、外侨等千余人参加。大会通电吁请“全世界同道，本基督舍身救世之精神”，“继续与我密切合作，以期正义伸张，和平实现”。

△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统一战线。

△　中国回教青年会以济南伪维持会长马良背叛国家，为贼作伥，电请全国同胞、全体教亲一致加以声讨，并表示“吾人愿本回教徒决不与日本人妥协之精神，拥护中央，抗战到底”。

△　上海《社会晚报》被日方禁止发行，经理蔡钧徒被害，人头在法租界发现，附条上书“对抗日分子之警告”。

△　日本内阁决议组织华北发展公司，接管津浦、平汉、平绥、胶济、同蒲、正太六铁路及各海港，并控制华北公路交通。

2月7日　　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阐述“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略谓：“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败，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并谓：“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取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

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　第三军团长庞炳勋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由海州移防临沂。该军团下辖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兼）第三十九师（师长马法五）第一一五旅、一一六旅，共五个团的兵力，兵员1.3万人。

△　日军第十四师团2000余人，自河北大名犯南乐，至晚占领该城。8日，继续南犯，陷清丰。

△　《扫荡报》发表题为《强固统一》的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封建割据”，“必须一律将其取消”。并谓：“欲使国家趋于绝对统一之途，必须一党专政”，“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反对统一，即无异于破坏抗日。”

△　是日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妇女日，武汉3000名妇女举行宣传大会，推举宋庆龄、李德全等35人为主席团，会后游行。同日，西安、厦门、兰州、长沙、贵阳等地亦分别举行反侵略大会。

△　孙科自莫斯科电蒋介石，告以苏联不拟单独对日争战，但愿以器材、技术援助中国，“一面促进英、法、美对我行动一致”。并谓：斯大林并言明苏对外蒙、新疆绝无领土野心。

△　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

2月8日　　蒋介石以八路军在晋东南连战皆捷，特电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叶剑英转朱德、彭德怀总、副指挥嘉奖。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陈漫远第三支队夜袭河北定县，占领县城，歼敌300余。

△　下午，日机24架在淮河北岸小蚌埠上空狂轰滥炸。入夜，日军在炮火掩护下连续三次强行渡河，小蚌埠阵地守军第一一三师第三

三七旅第六七三团奋起还击，淮河阻击战开始。

△　是日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青年日，在武汉举行宣传大会，到各青年学生等50余团体代表二万余人。主席彭文凯致词，强调全国青年应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会后举行游行。

△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合办天河煤矿投产，日产煤700吨。

2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鹿钟麟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原任唐生智免职；特任陆军中将张钫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　许世英在汉口招待新闻记者，否认自东京带回和平条件，略谓自去年年底至本年1月17日以前，德国驻华、驻日大使曾出面调解，而日方当时则一面希望结束战争，一面希望吾国接受投降条件，本人当即拒绝谈判，于是日本16日发表宣言宣称不以中国政府为交涉对手。

△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

△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强调指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民众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以及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　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分七路夜袭平汉线日军，占领定县、望都、新乐等地及清风店车站，破坏铁路20余里，击毁火车两列。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孙继先津浦支队及秦基伟游击支队成立。10日，张贤约先遣支队成立。15日，津浦支队开赴津浦路沿线活动。

△　日机首次袭长沙，并袭六安、南阳、樊城及广东三水、增城

等地。

△　《大众报》在汉口创刊，江凌主编。

△　日本政府派前驻奥公使谷正之到上海主持外交事务；前驻瑞士大使白鸟敏夫任外务省中国事务局局长。

2月10日　　蒋介石密电孔令侃转其父孔祥熙，调解孔、宋（子文）间之派系斗争，要求孔、宋“均当委曲求全，以利大局”。

△　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表示与各党派愿意融成一体，以试探中共方面的态度。周恩来明确表明：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

△　原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被撤销查办，恢复军长职，是日自商丘率部参加淮北作战，接替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防务，归于学忠指挥。第五十九军下辖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兵员2.1万人。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陈漫远第三支队在正定伏击日军汽车20余辆、装甲车10余辆，毙敌百余人。

△　拂晓，日军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小蚌埠，我军阵地尽成焦土。日军千余名遂强渡淮河。上午10时，我军同登岸日军展开白刃战，第五十一军第三三七旅第六七三团几全部牺牲。第三三七旅第六七四团奉命前来增援，在小蚌埠街市进行巷战，敌我几进几出，反复争夺。旋第三三七旅第六七八团赶来增援；白刃战持续达四小时。小蚌埠失而复得。

△　实业家荣宗敬在香港逝世。1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北平日陆军司令部宣称：现有外籍人员651名协助中国作战，内英籍57人，美籍152人，法籍124人，苏籍315人，其中大半为航空

队员。

△　巴黎《救国时报》因全体办报人员回国参加抗战，宣布停刊。该报共出刊152期。

△　伪满洲国公布《总动员法》。

2月11日　国民政府任命张群兼四川全省保安司令，沈鸿烈兼山东全省保安司令，李宗仁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内政部组织法》，凡26条。规定“内政部管理全国内务行政事务”；“内政部对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执行本部主管事务，有指示监督之责”。

△　平汉线第五十三军新六师高树勋部与日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激战四昼夜，我汤阴阵地被冲破，是日退至淇河以西，濮阳、内黄、清丰一带均陷敌手。

△　淮河战场日军再陷小蚌埠，第一一三师第六七四团守军伤亡殆尽，最后之殉国官兵均高唱《救亡进行曲》慷慨赴难。

△　第五战区令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速向怀远、涡河北岸推进；第一八〇师即向宿县、固镇间推进，并速在固镇附近占领阵地，阻敌北进。

△　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自津浦线南段西侧渡过高塘湖，将上窑日军五六百人包围，数度冲入圩内与敌白刃相拼，歼敌百余人。

△　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演说，指出：“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新中国的创设是必然的。”

△　教育部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朱家骅、李书华等24人，陈立夫主持，顾毓琇报告教育部最近

主张：一、三育并重；二、文武合一；三、农工并进；四、政教沟通；五、尊师重道；六、重视母教；七、培养师资；八、注重女子教育。并决定成立教育计划组，委员为朱家骅等七人；师资组，委员为李书华等八人；教材组，委员为陶希圣等七人；训练组，委员为张厉生等八人。

△　北平伪临时政府所设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成立，汪时璟任总裁，3月10日正式开业，资金一亿日元，由日本银行团供给，发行纸币与日币同价，并宣布一年后废止法币。

2月12日　国民政府调整行政院所属部、会机构：一、农产、工矿两调整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农产调整委员会归并于经济部之农本局，但农产输出国外之贸易事宜则划归贸易调整委员会办理；二、原属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归并于经济部农本局；三、贸易调整委员会、对外易货委员会及重庆行营所辖之禁烟督察处改隶财政部；四、原属经济部之国际贸易局归并于贸易调整委员会；五、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所设之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交通部；六、禁烟委员会改隶内政部，解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兼禁烟总监职务，原派各省之禁烟特派员一律撤销，其职务交由各省民政厅办理。

△　国民政府特派陆军中将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

△　上午8时，第五十九军开抵小蚌埠津浦线两侧，抢先占领阵地。9时40分，我空军飞机12架飞临津浦线南段上空助战，轰炸敌军占领之临淮关、蚌埠车站及淮河南岸敌军驻地。

△　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自考城同上窑逃窜之敌三四百人接仗，敌大部被歼。旋日军从凤阳、怀远派兵2000余人增援高塘湖，第一三一师与当地红枪会联合，集合6000余人，在凤阳一带与敌展开游击战，曾攻入怀远古西门。

△　第三集团军于上午10时自曹县下达攻击令，各部开始进攻，

同日晚，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四旅由大长沟向济宁攻击，次日晚占领济宁北关，逼进城垣，第五十五军第四三九、一七一两团亦迫近南围子门，游击队刘耀庭部一度攻入车站。

△　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山冈重厚部自太原及清源附近西犯。13日，在交城县遭第二战区阎锡山部袭击，百余人被歼。15日，该敌三路犯文水，与阎锡山部第十九军第四〇五团第三营激战，第三营损失过半，文水失陷。

△　全国战时教育学会在汉口成立，选举张申府等19人为理事，通过宣言及会章，决议设重庆、西安、长沙、广州等分会，并通过《全国战时教育实施要则》，凡19条，提供政府采纳。

△　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开幕，到22个国家的代表800余人。中国派顾维钧（代表宋庆龄）、蔡元培等19人出席。顾维钧演说吁请各国以集体行动抵制日货。次日大会闭幕，通过斥责日本侵略的决议，号召各团体尽力援助中国，要求各国政府停止对日借款、供应军火及物资。

△　蒋介石致电伦敦国际反侵略大会，呼吁各国伸张正义，采取具体步骤，促使日本结束侵华战争。

△　原南京市长马超俊为日军蹂躏南京难民区事，致函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艾拉培，略称："日军于入据南京之后，竟在难民区内，屠杀非武装之民众二万余人，其士兵以杀人多寡为竞争，并奸淫11岁至60岁之妇女"，"近更闻难民区内20万人之粮食、菜蔬及医药品均已告罄，贵会吁请各方输出接济，而日方拒绝不允，立欲将我20万无辜难民陷于饿毙绝境"，请求该会"向日军严重交涉"。

2月13日　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一旅第四八一团攻汶上，由城西北攀登，一度攻占北门，旋即入城同日军展开巷战，第四八二团由城东攀登，在东门附近同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第

二四三旅第四八六团由城南门攀登，与敌在城内激烈巷战，我军营长沈岐山阵亡。

△　第三十一军克复安徽凤阳。

△　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犯淇县，万福麟第五十三军以工事全毁，弃守淇县。第十四师团另一部进占长垣，至15日占封丘，即急转西犯，图与沿平汉线南犯之主力相会合。宋哲元部与日军相持数日，于15日向新乡转移。

△　日军第十三师团分由临淮关及蚌埠渡淮北侵，于学忠亲赴前线率部反攻，激战四小时，部属伤亡约两千，迫使日军不得前进。

2月14日　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七师在曲阜、邹县山区开展游击战，是日，日第十师团少将中岛荣吉偕卫队40余人乘车途经曲阜九龙山下小雪村，被我游击队伏击，激战半小时，毙敌15人，中岛少将受伤被俘，在押送路上拔枪自毙。

△　第二十二集团军开展滕县外围战，是日该集团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五师在地方红枪会数百人配合下，夜袭两下店，逼近日军主阵地，因敌火力过猛，工事坚固，攻击未能奏效。

△　津浦线南段定远日军以飞机、坦克为掩护西进，第五战区凤（阳）定（远）别动队司令方昭舟部在能仁寺与敌激战。方部下辖六个大队，共2000余人，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抵抗，入夜对敌实行夜袭，毙敌数百人，缴获军用品甚多。

△　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第二十师以第一二七、一二八两团攻入济宁城内，同日军激烈巷战，南关之敌千余人增援；反复攻击，我军伤亡甚重，遂撤回原阵地。第五十五军趁敌大部入城之际，续攻南关，刘耀庭游击队再攻车站，均无进展。

△　平遥失陷。11日，日军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自山西太谷附

近沿同蒲路南犯，是日陷平遥。

△　日机12架袭郑州，投弹68枚，民众死伤百余人。

△　周恩来会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主张。

△　中共领导之胶东抗日救国军，冲入牟平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枪决伪县长宋健吾。下午，在城郊雷神庙与日军激战，毙敌50余人，击毁汽车三辆，击落日机一架。

△　伊斯兰教徒在汉口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到全国各地教徒代表千余人，白崇禧讲话，号召全国5000万回教徒，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

△　日本解散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三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鸠彦王、柳川平助均返国；另在南京建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以畑俊六陆军大将为司令官，辖藤田进第三师团、稻叶四郎第六师团、吉住良辅第九师团、荻洲立兵第十三师团、牛岛贞雄第十八师团、伊东政喜第一〇一师团、天谷直次郎步兵第十旅团和值贺忠治第三飞行团。波田支队（支队长波田重一）、步兵第十旅团先后于22日、26日从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中解除，归还第十一师团。

△　世界国联同志联合总会在伦敦开会，出席者有14个国家代表，中国亦派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扩大抵制日货运动；二、请求国联会员国自动采取一切外交上、财政上及经济上之有效方法，制止日本之侵略行动，并使此种共同行动“发生效力”。

2月15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由彭雪枫负责新设军区的军事工作。

△　两下店日军700余名在坦克、大炮配合下，夜袭第二十二集团

军第一二五师滕县外围峄山、郭山阵地，被击退。

△　教育部颁布《处理战区退出各级学校教职员及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办法大纲》，规定各战区因受战事影响，不得继续服务者，可向教育部或各省、市教育厅登记，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得依照志愿、专长介绍于有关机关，中小学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人员则介绍于军事机关。

2月16日　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二二四团攻占涡河对岸之小街。次日，日军炮火向小街阵地射击，掩护日军300人强渡涡河，被击退。

△　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五师派三个连组成敢死队续攻滕县外围两下店之敌，入夜进入集镇，同日军巷战。旋该师再派760余人增援，我军占据镇中两座楼房，敌军轮番攻击，激战至次日凌晨3时，我军360余人突围出镇，其余400人壮烈牺牲。

△　淮北我军三路反攻：东路攻临淮关，中路沿津浦正面攻曹老集，西路攻怀远、凤阳。另一部攻淮河南岸左翼的考城、上窑一线，切断淮河沿岸与定远日军的联络线。日军自淮河北岸南撤，敌我双方隔河对峙。

△　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陷豫北辉县，守军宋哲元第一集团军万福麟部第五十三军西撤。

△　外交部以兰州当中苏交通要冲，为便于处理两国间外交事务，决定在兰州设特派员办事处。

△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指导纲要》，规定至本年夏季的对华方针是："确保"占领区，不扩大战区，不进行新战区作战。

2月17日　蒋介石令驻防河南的蒋在珍部新八师炸毁郑州黄河铁

桥，以阻日军进攻。

△　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　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犯新乡，万福麟部第五十三军弃城西撤至获嘉、修武、焦作、沁阳一带防守。

△　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先遣队3000余人由山西文水攻陷汾阳。同日，日军第二十师团犯孝义，第十九军四〇五团邱营坚守抗敌，营长负伤，突围至兑九峪，是日孝义失陷。

△　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经豫北武安、涉县犯东阳关，与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激战，李部腹背受敌，是日东阳关失陷。

2月18日　日机38架空袭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武汉上空与日机激战，击落日机11架，创武汉空战纪录。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清正、王怡之、李鹏翔五人殉国。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抗日阵亡之陆军第十七师副师长兼旅长夏国璋、第一七三师旅长庞汉祯、第一七一师旅长秦霖，各追赠陆军中将。

△　第五十九军第一八〇师第六七八团夜袭小蚌埠，与日军巷战，毙伤日军甚重，我军收复小蚌埠。

△　为配合第二战区各部友军反攻太原，八路军前总决定：晋察冀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第一二九师破击正太路，第一二〇师破击同蒲路。是日至27日，第一二〇师共破坏桥梁八座，破路10余公里，攻击平社、豆罗车站和麻会、石岭关、关城镇等日军据点，控制麻会到高村间铁路20余公里，炸毁日军火车三列。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部第三四三旅在山西蒲县伏击日军800

余，激战至次日晨，毙日军600余，俘60余，击毁战车六辆。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决定，陈伯钧、王震第三五九旅北上，阻止日军向岢岚、兴县进犯；彭绍辉、罗贵波第三五八旅主力侧击由离石西犯之日军。

2月19日　　蒋介石为纪念新生活运动四周年发表广播讲演，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振作国民的道德精神"，"越是在这非常时期，越要实践礼义廉耻，越要注意日常的生活，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守纪律、重秩序，保持我们良好的道德，以宏毅坚决的气概来担当御侮救国的事业。"

△　周恩来约见冯玉祥商谈抗战问题。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河南现处重要地带，应发动民众保卫河南。

△　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二二四团小街阵地终日被敌机轰炸，日军百余名渡过涡河，敌我双方激战，小街失陷。我军第三营乘夜逆袭，次日拂晓攻入小街，与敌激战，伤亡惨重，遂退出小街，在朱家岗占领阵地，与敌对峙。

△　日军第二十师团续犯晋西，迫近川口（隰县北）。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在石口指挥对敌作战。20日，第七十师第二一五旅旅长赵锡章奉命率部增援川口，在隰县杨村堡与日军激战，赵锡章七处负伤，英勇殉国，官兵120余名壮烈牺牲。3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赵锡章，追赠陆军中将。

△　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陷豫北修武。同日，封丘、延津、原武间激战，日军300余人企图于竹林乘皮筏强渡黄河，被击退。

2月20日　　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公祭李桂丹、吕基淳等殉国空军将士，蒋介石主祭。次日，武汉三镇举行盛大空战祝捷及追悼殉国空军将士大会，孔祥熙、于右任、冯玉祥及中共中央、八路军代表陈

绍禹、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出席致祭，会后两万余群众执绋送葬并举行盛大游行。

△　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　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将国防永久工事分为10个区，由各连队分别负责兴建，同时对整个阵地编成与兵力部署、大炮配置等，亦均有所决定。

△　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奉到李宗仁司令长官皓（19日）电令，停止攻击当前之敌，所有防务交第五十一军接替后，全部由固镇向鲁南临城一带集结待命。

△　日军第一〇八师团自东阳关经黎城、潞城直犯长治，守城部队李家钰第四十七军一个团与日军巷战，全团将士殉国，团长自戕，居民被屠杀者达千余人，长治遂陷。

△　日军第五师团片野支队主力陷日照、莒县，庞炳勋部第四十军退守临沂。

△　日机18架分别空袭兰州和宁夏省中卫县，与我兰州空军第十七队发生激烈空战。

△　希特勒在国会宣布德国承认伪满洲国，撤退驻中国军事顾问团，放弃援华政策。

2月21日　蒋介石以各路日军攻势已馁，令各军全线反攻。

△　空军一队飞杭州笕桥机场，投弹30余枚，毁日机10架。

△　日机61架袭广东，于韶关被击落一架。同日，宜昌、衡阳、绍兴、黄河各渡口及巩县车站亦分别遭日机轰炸，毁巩县车站火车七节。

△　孙科离莫斯科赴法国访问。

△　《少年先锋》半月刊在武汉创刊，茅盾、叶圣陶等主编。

2月22日　国民政府令准免监察院监察委员吴瀚涛、李嗣璁、杨亮功、刘莪青本职，任命苗培成、戴愧生、李培基、黄少谷、燕树棠、张其昀、杜重远、谢树英为监察院监察委员。

△　陈长捷部第六十一军1.6万余人，奉命驰援隰县第十九军，与日第二十师团激战三日，损失8000余人。26日，隰县失陷。

△　第五战区第一游击司令刘震东少将在山东莒县与日军作战中阵亡。3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中将。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部第三八六旅在冀西井陉长生口设伏，消灭日军井陉警备队一部，击毙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五辆。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第三四三旅在同蒲路以西之石口、川口附近与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激战，毙敌200余人。

△　日军第十四师团2000余人，沿道清路西犯，突破沁河，占领沁阳，旋即以一部陷孟县。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布解散西安文化协会等13个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后因遭各方激烈反对，未能实行。

2月23日　最高统帅部电令第三集团军："此后该集团军应避攻坚战，改取监视并游击，牵制敌军沿津浦线南下之行动。"25日，第三集团军以主力向相里集、孟家屯、大义集、羊山集、独山集、巨野之线转进，即在该线占领阵地，继续抵抗，并以一部向城武附近集结。

△　空军远征台湾告捷。晨，我空军数队集合飞往台湾，在台北及台湾西部各投弹10余枚，炸毁台北日军机场飞机数架及机场油库，午后安全返航。

△　日机36架自山西运城机场起飞，进袭兰州，我兰州空军第十五队、第十七队共13架飞机迎战，两天共击落日机18架。

△　日军驻蒙兵团一部进攻晋西北，占宁武、神池；26日占偏关；28日占保德、河曲。何柱国骑兵第二军退河西。

△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到北平，旋又经张家口、长春、龙山等地，分别向华北方面军、驻蒙兵团、关东军、朝鲜军传达《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不满中央意图，向河边提出进行徐州作战要求。

△　英新任驻华大使卡尔抵上海。

△　英驻华大使馆以郑州及黄河南岸其他城市中国军事目标，“危害附近外国人之财产”，是日致函外交部，要求“迅速设法去除”。3月2日，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除。

△　第三国际发表《告红军书》，号召苏联工人阶级与国际工人阶段尽速一致行动，援助中国和西班牙，打击法西斯侵略，维护世界和平。

2月24日　国民政府任命程潜兼河南全省保安司令，原兼河南全省保安司令商震应免兼职。同日又令豫皖绥靖主任公署裁撤。

△　国民政府令：林伟俦给予青天白日勋章。

△　国民政府公布《赈济委员会组织法》，凡15条。

△　外交部照会驻华德使馆，抗议德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

△　周恩来、陈绍禹回到延安。

△　日军第二十师团向晋西灵石发动总攻，自是日至27日，敌我双方反复争夺，肉搏血战，至为激烈。28日，灵石守军总指挥卫立煌以临汾失陷，下令主力部队撤离同蒲线。

△　空军一队轰炸新乡日军机场，毁日机四架。

△　日机10余架轰炸广东南雄，被我击落两架，一架落始兴，一架落增城。下午3时，日机两架在增城附近之沙塘乡低飞，被我击落一架，当场焚毁，另一架受伤迫降，被我拿获，毙机师四人，生擒一人。

△　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占领绥远清水河，并与偏关日军会合。

2月25日　毛泽东复电朱德并告彭德怀：必须使用全力歼灭由府城西进之日军。

△　日军第十师团长濑武支队，突破济宁前线重围，以主力渡过运河，向嘉祥、金乡进攻。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曹福林部与敌苦战三昼夜，嘉祥失陷。

△　日军第十四师团自沁阳分南、北两路进犯。南路酒井支队西犯济源，是日济源失陷。北路黑石支队于陷天井关后续犯晋城，次日晋城失陷；守军宋哲元第一集团军石友三第一八一师及万福麟第五十三军西撤。

△　日军第一〇九师团自汾阳分两路西犯，陷中阳、离石。27日，该敌占黄河东岸军渡、碛口，并炮击西岸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文年生第七一八团阵地。

△　日机59架袭南昌，我空军机队起飞迎战，击落日机八架。

△　日本天皇批准日本非常战费预算48.5亿日元。

2月26日　军政部长何应钦告诫办理兵役人员务宜各尽心力，唤起国民壮丁，乐于应征，“如有怠忽职务，乘机舞弊者，务须随时切实检举，从严究办”。

△　刘汝明第六十八军一部攻克豫东长垣。

2月27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是日，陈绍禹作政治报告。28日，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发言。周恩来就抗战形势等问题作发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

△　临汾失陷。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犯山西省政府临时驻地临汾，在曲亭与决死八纵队激战，八纵奉命转移到翼城一带，是夜临汾失陷。

△　德驻沈阳领事诺尔，奉本国政府令通知伪满总理张景惠，德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2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4条。规定该会职掌如下：一、“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二、“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三、“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四、“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

△　蒋介石以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曹福林部在嘉祥奋勇抗敌，鲁西转危为安，特电嘉奖。

△　日军第十四师团继续西犯，南路酒井支队陷垣曲，北路黑石支队陷阳城。宋哲元第一集团军万福麟部第五十三军向西撤退。

△　日机50余架分10批轮番轰炸广州、黄埔、军田、惠州等地。我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机一架，坠于黄埔石榴乡。同日，襄樊、宜

昌亦遭日机袭击。

是月　第五战区拟定保卫武汉右翼兵团作战计划：判定皖北集结于黄梅、宿松间之日军第三师团，集结于潜山、太湖间之主力第二师团及第三师团一联队，由二套口登陆向黄梅移动之第五、第十一师团，有续行西犯以策应其长江南岸作战之企图；集结于合肥之荻洲立兵师团，其一部有向霍山、六安山地威胁之可能。拟于长江北岸宿松县黄泥湖至二郎河一线阻止日军西进，以机动转取攻势，将日军压迫于长江方面而歼灭之。

△　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各地实行联保连坐注意要点》，规定凡已办保甲之市县“应依原有联保切结方式，加紧工作，并于原定联保切结文内加列‘同保各户绝不作汉奸、间谍、盗匪及扰乱地方等情事，并随时共负防范搜查之责’等字样”，“以期运用保甲机构，防止汉奸，消弭匪患”。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派高宗武到香港建立情报机关。高在香港太子行以宋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实际上负责对日联络与收集情报。

△　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说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是乐观的。

△　日商在包头设中纺毛织厂，资本200万日元。

△　国联为协助中国防疫，特派卫生专家穆塞教授、劳勃生博士、兰斯特将军等多人来华，组成三支防疫队，分赴西北、华中、华南工作，所需经费由国联及中国分担。

3月

3月1日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三项提议：

一、建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共同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仍保持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二、建立真正代表公意的全国民意机关；三、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共同抗日。

△　蒋介石通令各师长，训练下级干部应严格注重精神教育与品格修养。

△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时期政治主张，选举章伯钧、彭泽民、朱蕴山、方振武、陈启修等25人为委员。

△　日军第十四师团黑石支队陷山西沁水。20日晚，青年抗战决死队袭击沁水县城，毙日军89人，伤20人。

3月2日　国民政府令：特派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

△　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使用5000万美元贷款之协定》，规定：贷款用于购买苏联工业品及设备，年息三厘，自1938年10月31日起，分五年用茶叶、皮革、兽毛、锡、锑、锌、钨、桐油等13种商品作价偿还。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熊希龄，并予公葬。

△　国民政府派许世英、张伯苓等23人为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委员，并指定甘乃光、李仲公、吕苾筹等为常务委员。

△　航空委员会主席宋美龄辞职，由宋子文继任。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广东省国防公债条例》，债额1500万元，3月1日发行，年息四厘，自1941年2月起分19年偿清。

△　朱德、彭德怀致电《新华日报》，揭露日军在华北的暴行，

略称："最近日寇在平津线屡经挫折，恐慌之余，继以烧杀，完县、唐县、曲阳三县城及沿平汉线东西五万余民房商店，悉成焦土，20万以上人口痛遭荼毒，割耳穿心，奸淫掳掠，少壮被戮，骨肉成灰，哀声遍野，惨不忍睹。"

△ 日军驻蒙兵团自山西保德炮击陕北府谷，并有二三百日伪军自河曲、保德间渡过黄河侵入府谷县城。次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告民众书》，指出日军已经进攻到边区的边境，号召边区军民誓死抵抗。

△ 日军驻蒙兵团陷晋西北五寨，次日又陷岢岚。

△ 为纪念朝鲜独立运动十九周年，流寓中国的朝鲜革命党人发表宣言，决心参加中国抗战，完成朝鲜民族解放。

△ 暹罗华侨义勇队119人回国参加抗战，是日乘"中美号"轮抵香港。

△ 《申报》出刊香港版。

3月3日 行政院通令各地工商企业"加紧生产，调节物品，以期充实后方，增加抗战力量"。

△ 重庆市丝业同业公会具呈经济部，要求疏销川北滞留蚕丝约2200担。

△ 教育部公布《战区内专科以上学校处理办法》，规定凡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未经部核准者，不予承认；业经核准者，用特种办法加以考核；办理不合格者，得随时撤销。

△ 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八路军主力留在山西攻击日军后路，必须是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袭占代县，活捉伪山西省府委员、雁门关以南七县维持会长王维堂。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第三四三旅收复晋西柳林、军渡、大宁、蒲县。

△　晋察冀边区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及妇女救国会同时成立。

△　日机轰炸海南岛海口，海面并有日舰一艘游弋；同时，日水兵侵入台山县属之高澜岛，渔民被洗劫一空。

△　日军驱逐舰一艘进犯广东虎门，炮击要塞，遭还击后退去。同日，日军占据距香港口外35浬之山樵岛，并在岛上建筑飞机场。

3月4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议决陈立夫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照准，选任马麟为国民政府委员。

△　蒋介石电奖川军邓锡侯部，略称："该部战士，忠勇奋发，转战数月，屡挫凶锋，颇著勋劳，良用嘉慰，并望随时激励所属，以竟全功。"

△　江西省政府设立参议会，聘请王又庸、罗隆基、王造时等七人为参议，是日召开首次会议，研究"革新"计划。

△　日军第二十师团河津支队自临汾进陷汾城，随即沿汾河西犯，6日陷禹门口，抵黄河东岸。

3月5日　　国民政府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原任马麟免职。

△　刘汝明第六十八军骑兵一部夜袭河南汲县，激战四小时，日军500余退入城内，刘军占领城关及车站。次晚，日军增兵千余人，

战车九辆，配合飞机四架反攻，激战数小时，刘部撤回防地。

△　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与第二战区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配合，击退自晋西北渡河之日伪军，收复府谷县城。

△　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攻陷汤头镇，企图进犯临沂，遭庞炳勋军团马法五第三十九师及沈鸿烈海军陆战队反击，未获进展。

△　日军第十四师团南路酒井支队经闻喜犯运城，是日，运城失陷。同日，第十四师团北路黑石支队陷翼城。

△　日机11架袭郑州，投弹10枚；七架炸禹县，于飞机场投弹10余枚。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解析汉字拉丁化问题通令》，宣布改变取缔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之方针，但只允许“在纯学术之立场加以研究”，“不宜任其流行”，防止“有反动分子用此为宣传工具”。

△　日方派邮件检查人员22人进驻上海邮政管理局，检查各国邮件。次日，英、美驻沪总领事分向日方提出书面抗议，否认日方有检查英、美邮件之任何权利。

3月6日　　毛泽东电令八路军贺龙第一二〇师集中主力打击日军一路，以打破日军进攻晋西北根据地迫使八路军西渡黄河的企图，保卫晋西北根据地。同日，致电朱瑞并告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晋豫边很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　川省军政界官员钟体乾、邓汉祥、王缵绪、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蒋介石，拥护任命邓（锡侯）、贺（国光）主川，并表示：“谨率所部，翊戴钧座，服从命令，抗战到底。”

△　日军第十四师团黑石支队陷晋南曲沃。

△　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成立，选举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冯玉祥为会长，钟可托、张伯苓等九人为副会长。

△　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马良为伪山东省政府省长。

3月7日　日军陷山东威海卫。

△　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陷晋西南永济，直抵黄河北岸。

△　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汉奸周凤歧，在上海遇刺毙命。

△　金陵大学自南京迁成都正式开课。

3月8日　八路军贺龙第一二〇师主力包围晋西北岢岚日军。10日，击溃企图由河曲西渡黄河之日军，收复岢岚县城。11日，乘胜前进，追至三井镇，歼敌300多人，敌退五寨。

△　日军第十四师团南路酒井支队陷晋西南芮城。

△　国民政府在重庆公祭班禅大师，考试院长戴季陶主祭，到各机关团体代表二万余人。

△　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办事处通令各省党部：各抗日团体一切集会讲演，应先期呈核，否则予以取缔。

△　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

△　陕西省政府水利局局长、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在西安逝世。2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3月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峙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　军令部通令改善士兵生活，务期“乐于从军，杀敌致果”。

△　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日军根本隔断条件下，应配合友军坚决作战。为了保障将来转移时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的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工作。

△　日本驻沪外交代表谷正之发表谈话，声称："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仍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垮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

3月10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青海省政府，原任省府委员姚钧、魏敷滋、杨希尧、马步荣、谭伯敏、马步青均免本职；兼青海省民政厅长姚钧、兼财政厅长魏敷滋、兼教育厅长杨希尧、兼建设厅长马步荣、兼秘书长谭伯敏均免兼职；任命罗经猷、谭伯敏、马绍武、马骥、谢刚佣、马步勋、郭学礼、陈显荣为青海省府委员；任命罗经猷兼青海省民政厅长，谭伯敏兼财政厅长，马绍武兼教育厅长，马骥兼建设厅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毛秉文为第十一军团军团长。

△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筹设之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史良、李德全、邓颖超、宋美龄、刘清扬等51人为理事，邓颖超任常务理事，宋美龄任理事长。

△　空军袭南京，炸毁日机10余架。

△　伪蒙军游击司令奇凤鸣部刘盛五、贾海岸两团600余人，在绥远托克托县南向马占山部投诚，旋共同反攻托县。

△　北平伪临时政府颁布《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以判处一万元罚金、无期徒刑等重罚严行禁止民众使用法币。

3月上旬　周恩来、陈绍禹回到武汉。

△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向大本营申请增加兵力，以“驱逐眼前之敌”，旋经统帅部批准。至此，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乃无形废弃。

3月11日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发布维护治安布告，宣称嗣后各部队如有“强拉民夫，私宰耕牛，奸淫掠夺，扰乱地方”及“抢劫民财，绑架勒赎”等项情事，定以军法从事。

△　日机30架四次分袭西安，我空军起飞迎击，日机在郊外投弹10余枚后，向东逃逸。

△　中央广播电台迁重庆播音。

3月12日　军令部在武汉行营开军事会议，研究山西作战问题。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出作战方案，要旨为：“甲、任务。一、政方面：推行行政令，组织民众；二、军方面：子、对于一个师之敌人，我有四师即应取硬性作战（如我一师对敌一个联队亦然）；丑、消灭其一切物质；寅、牵制敌人渡河。乙、范围。为军食问题战区东方可推至平汉线。丙、编组。指导其派出挺进军等。丁、补给。”周恩来、叶剑英亦出席会议，对于政治方面发表了意见。

△　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并说：我们真诚地追悼抗日阵亡将士，表示永远纪念他们。

△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指出要学习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所具有的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诚挚和亲密的态度。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电促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即日视事。同日，川军将领刘文辉、孙震、李家钰亦联名电促邓早日视事，共主川

政。

△　国民政府明令实行外汇编制，规定请核办法三条及购买外汇请核规则六条，并指定中央银行从3月14日起负责办理，以限制外汇流入日伪之手。

△　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在临沂以东之杨公庄（沐河、沂河间）迂回奇袭，拟夺取临沂。是日，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奉命开抵临沂附近，与临沂守军庞炳勋部协力反攻。

△　上海日军中发现反战传单，上书“要求回国”，“变对华战争为对内战争”等。日本政府密令严查。

△　香港学生赈济会发起三日节食节用运动慰劳抗日将士，至是日得款4700余元。

△　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举行反日援华特别大会，并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军阀侵华暴行，敦促各团体尽其所能帮助中国，要求各国政府停止对日合作，并吁请日本人民反对本国军阀侵华行径。

3月13日　蒋介石在武汉对党、政、军官员训话，动员各级官员保卫武汉，巩固后方。

△　蒋介石电临沂第三军团长庞炳勋：“此次鲁南莒、沂诸役，该集团军作战以来，艰苦奋斗，至堪嘉尚。今后希与张军长自忠确切协同，捕捉突进之敌而歼灭之为要。”

△　军政部长何应钦电饬各省、军、师管区司令切实实行征兵宣传，扫除征募兵役积弊，严禁借故求贿及苛待壮丁，并切实遵照法令实行抽签。

3月14日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两个师团向鲁南进攻。左路为板垣第五师团，自青岛直趋临沂；右路为矶谷第

十师团，从两翼南下图夺取台儿庄。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台儿庄战役在津浦线北段临沂、滕县同时揭开序幕。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第二十军团派第八十五军一个师增援滕县。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指挥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徵），下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下辖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兼），下辖第一一〇师（师长张轸）、独立骑兵团（团长李之山）。共7.2万人。

△　晚，第二十军团奉蒋介石电话："为策应津浦北正面作战，该军团所属第八十五军即晚准备商丘乘车，经徐州向临城输送，务于17日拂晓前到达临城前集中完毕。第五十二军即开商丘集结待命，该军团长先到徐州指挥。"

△　临沂战斗开始。13日，日军板垣师团主力5000余人自余村（距临沂12里）向庞炳勋第四十军进攻。是日拂晓，张自忠、庞炳勋两军协力反攻，张率11个步兵团强渡沂水至东岸，占领徐太平、小太平、郭家太平、李家太平、沙岭、大太平等村，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庞炳勋率部沿沂水东向北全线反攻，占杨公庄。

△　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出骑兵3600余人，配合飞机、战车，于是日拂晓分四路进犯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普阳山、黄山、界河、石墙等阵地，重点指向黄山，实行两面包围，我各路守军奋起反击，滕县之役开始。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第三四三旅在晋西大宁县午城、井沟一带与日军第二十师团作战。18日，在井沟设伏，围歼日援军第一〇八师团一部。

△　新四军北上抗日，第四支队到达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集中，第一、三支队到达皖南徽州（今歙县）岩寺集中。

3月15日　蒋介石及李宗仁电令第二十二集团军：滕县为津浦北段要点，关系全局，务应竭力死守，支持时间，以待增援。

△　日军续攻界河，另以3000余人向我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线右后方的龙山、普阳迂回包围，与我第一二七师展开激烈争夺，未能得手。当晚，日军由东沙河进攻滕县东门，被我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六旅严翊营一一击退。

△　晨，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偕军团参谋长万建蕃由亳县抵徐州，接受李宗仁的指示。上午8时，汤恩伯向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徵、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第十三军副军长鲍刚、第一一〇师师长张轸下达命令："八十五军着即日由归德乘车开临城集中，相机策应第二十二集团军作战；五十二军着于15日由亳州出发，限16日到达归德，乘车开徐州集结待命；一一〇师仍在蒙城集结警戒待命；鲍副军长率两骑兵团于剿匪任务完成后速开亳州集结待命。"

△　日军偷渡沂水到达西岸，进攻第五十九军左翼阵地茶叶山，张自忠急调第三十八师迅速撤回河西，阻击过河日军。

△　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兼代山西省府主席，原省府主席赵戴文请假就医照准。

△　军事委员会通令陆、海、空军各部队，于各军事学校设署政治部主任及团、连指导员，各军医院派遣监理员。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举行抗敌动员日。第一日为新生活运动日，第二日为抗敌日，第三日为建国日。陈诚发表广播讲话，论新生活运动与精神动员。

△　财政部令中央银行设香港办事处。

△　天津各中外银行停办外汇。

△　中共中央“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

△　《华侨动员》杂志在汉口创刊。

3月16日　八路军刘伯承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黎城神头岭设伏，歼灭日军1500余人，并破坏长（治）邯（郸）公路。

△　河北濮阳专员丁树本率众3000余克濮阳。20日，行政院明令褒奖，并颁发犒赏及抚恤费5000元。

△　莒县日军千余人增援临沂，在敌炮火猛攻下，茶叶山失守。该山东南之刘家湖，经一天争夺，日军突入村内占据东半村，我第五十九军据守村西半部。同日，第四十军展开全面攻击，占领沂水东岸之张家寨子东、西水湖崖等地。

△　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向滕县城东关猛烈攻击，炮火将城墙轰开一个缺口，城内落弹万余发。敌机30余架分批凌空轰炸，城内四处燃烧。敌步兵冲入城内，敌我双方展开肉搏战，我守军先后打退敌军11次冲锋，城东门失而复得。

△　日军分两路沿津浦线及其以东南犯，第八十五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旅在官桥、南沙河间与一路日军激战，该军第四师与另一路日军恶战于虎山、龙山、党山、三山、落风山一带。

△　开滦煤矿赵各庄工人，为反对矿方实行井下记工制举行罢工，旋即扩大为开滦五矿三万多工人的同盟大罢工。4月16日，罢工获胜，资方答应提高工人工资。

3月17日　滕县失陷，王铭章殉国。晨，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向滕县城关东、南、北三面猛攻，敌机轮番轰炸，炮弹、炸弹如倾盆大雨，全城一片火海，遍地皆成焦土。日军先头部队由坦克掩护，从东南角缺口冲入城内。守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参谋长赵渭宾、

团长王麟、县长周同等登城应战，指挥3000余守城军警与敌肉搏，多次击退日军。城内居民亦拿起武器同军警并肩作战。下午3时，王铭章电告孙震军长，“决以死拼，以报国家”。旋日军窜入西城，赵参谋长和王团长战死，王铭章腹部中弹。至5时，王知大势已去，危城难守，即以手枪自戕，城内300名重伤兵亦互以手榴弹爆炸殉城。敌入城后，余部五六百人仍集合与敌巷战，且战且退。至晚，滕县失守。此役，我军自王铭章师长以下官兵死伤7000余人，连同城外第一线之第四十五军之伤亡人数，总计在万人以上。日军官兵死亡2000余人。

△　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第六十三联队陷临城，直逼韩庄至台儿庄运河一线。同日，日军向官桥进攻，被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旅击退，旋又迭次增兵，激战至晚，官桥失陷。

△　日军续攻临沂崖头、茶叶山、刘家湖，第三十八师与敌激战，双方展开肉搏，刘家湖失而复得者四，崖头失而复得者三，茶叶山一度被占，旋又夺回。刘家湖之战，毙日军旅团长长野及第三大队长牟田，全歼第三大队。张自忠派第一八〇师增援第三十八师，发起攻击，歼敌大部，残部分向汤头、白塔方向逃窜。同日，第四十军向敌侧背攻击，夺取敌军后方兵站尤庄。

△　夜，蒋介石电李宗仁、庞炳勋、张自忠，谓：“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脱逸须跟迹追击，开作战以来之歼敌新纪录，借振国军之士气，有厚望焉。”

△　行政院明令嘉奖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率领团队坚守所辖区域，并颁给犒赏抚恤费3000元。

△　日军第二十师团分路围攻晋南乡宁、吉县，19日吉县失守，22日乡宁失守。

△　日机38架袭韶关、军田，炸毁番禺糖厂；56架袭南昌，投弹

百余枚；八架炸吉安，投弹20余枚；15架袭漳州，投弹百余枚；八架炸铜陵、大通，被击落一架。

3月18日　临沂大捷。临沂战场，我军乘胜追击，以第三十八师为左翼，占领袁家庄，绕至前湖崖，从北侧包围汤头；以第一八〇师为右翼，攻取汤佛崖，占领李家五湖，从南面包围汤头。同时，第四十军从东、西水湖崖一带向北进至书家庄一线，并以一部向贾家庄一带迂回，从东侧包抄汤头。日军残部突围，分向莒县、泗水败退。临沂之役，共毙伤日军4000人以上，相继收复蒙阴、莒县。自此，右翼阵地得以巩固，与台儿庄正面孙连仲集团军互为犄角。

△　滕县陷敌后，日军濑谷支队长令第六十三联队第一大队为右追击队向韩庄追击，第二大队为左追击队向峄县追击，主力集结于临城。同日，第二十军团第五十二军抵韩庄、利国驿，沿运河布防，以阻止日军直下台儿庄与徐州。

△　蒋介石急调第二集团军自河南巩（县）、洛（阳）迅开归德待命，归李宗仁指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两个军：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辖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辖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独立第四十四旅（旅长吴鹏举）。总计兵员2.4万人。

△　日军陷江苏南通及崇明岛，次日陷如皋。

△　北平伪临时政府第二次减低出口税率，以利日本独吞华北资源。

△　日本内阁通过在华设立“华北开发公司”案，乡城之助任委员长。

3月19日　第八十五军第四师与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在峄县激战，第四师第十二旅第二十三团团长陈纯一率队坚守峄县城，因寡不

敌众，以身殉职，峄县失守。

△　晨，第五十二军第二师第六旅在沙沟，第二师第四旅在利国驿车站，分别与日第十师团濑谷支队激战。旋日军千余人由10辆战车掩护自韩庄向我军猛攻，企图强渡运河，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命令第四旅冒着日军炮火跑步沿运河南岸布防，与敌隔河激战。敌援军源源而至，向我军猛攻，我战防炮营立即发炮猛烈还击，敌前进受阻，不敢贸然渡河。双方隔河炮击，至晚方息。

△　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奉命由信阳开抵徐州。师长池峰城至第五战区长官部晋见李宗仁接受任务。李宗仁命令："第三十一师开台儿庄驻守韩庄至运河防线，坚决在台儿庄堵住南下之敌，迨第二十军团迂回敌侧背时，聚而歼之。"

△　当晚，汤恩伯军团长到第二师师部视察，并转达了第五战区长官部的作战命令，其要旨为："（一）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及第二十军团第一一〇师接第五十二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二）第二十军团主力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在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进攻台儿庄，企图一举夺取徐州时，即行南下，积极向临枣地区日军之侧背攻击，断敌退路，会同第二集团军将敌压至微山湖畔歼灭之。"

△　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发表谈话，表示"川、康继续出兵抗日"。至是因刘湘之死及张群主川所引起之川局纠纷暂告平息。

△　八路军贺龙第一二〇师连日袭击宁武阳方口日军，是晨，日军退朔县，阳方口收复。同日，保德日军全部肃清。

△　何柱国骑兵第二军克河曲，旋追至三岔、井坪以东，相继收复偏关、老营、水泉堡、清水河各地。

3月20日　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右追击队攻陷韩庄。

△　《战地》文艺半月刊在武汉创刊，丁玲、舒群主编。

△　天津美孚油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华北公司及德士古洋行，因受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新币之影响，均于是日停业。

3月21日　孙科在法国对记者声明：中国决心抗战到底，无中途妥协之余地，为生存而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

△　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在台儿庄以南车幅山下车，集结完毕。入夜，池峰城师长率部进驻台儿庄构筑工事，该集团军独立第四十四混成旅到达台儿庄以南大运河一线，接替第五十二军防务。

△　日军濑谷支队长令第六十三联队长福荣真平进入峄县，指挥左追击队，搜索台儿庄及兰陵镇方面敌情。次日，福荣率联队主力抵峄县。

△　张自忠奉李宗仁令停止攻击日军第五师团，着留一旅归庞炳勋指挥，拒止临沂以北之敌，余即开赴费县，攻击第五师团左侧背，策应台儿庄正面作战。是日下午，张率第五十九军向费县前进。

△　卫立煌部由河南陕县渡过黄河，以炮火掩护，将北岸日军包围，日军逃窜，平陆收复。

3月22日　蒋介石抵郑州视察军事。

△　军事委员会以临沂告捷，通令勖勉前线各军将领努力作战。令曰："津浦北段，临沂之役，为开战以来不可多得之胜利，正面之敌受我主力军团反击，敌已顿挫，即可歼灭。望各励所部努力。"

△　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于台儿庄发布作战命令："（一）本军团以歼灭峄县、临城、枣庄敌人之目的，拟于敬（24）日开始攻

击。（二）五十二军由台儿庄以东渡河向兰陵镇、洪山镇一带集结，限明漾（23）日集结完毕，敬日拂晓以前展开于王山、马山、车庄、鹅山头之线，开始向峄县附近之敌攻击前进，务于有（25）日拂晓前完全解决，如敌退据峄县城固守时，即以三十一师监视该敌，相机歼灭之。该军即进出凤凰山、黑山，向临城之敌侧背攻击，规复临城。（三）八十五军明（漾）晚移至台儿庄以北及山口一带山地，以一部对临城、滕县方面严密警戒，主力于敬日拂晓前解决枣庄附近之敌，并确实占领之，俟我五十二军攻略峄县后，该军即派一部向龙山、虎山一带前进，牵制滕县附近之敌，掩护我五十二军进出凤凰山、黑山、青山头之线，攻取临城，该军主力同时向谷山、东集、马头一带移动，为军团预备队。”

△　濑谷支队以右追击队为韩庄守备队；以左追击队和野炮一个大队为基干组成台儿庄派遣队，确保台儿庄附近运河一线；支队主力集结于峄县附近。

△　皖南宣城日军第六师团一部与长兴日军千余人，分东、西两路攻陷广德。25日，第三战区部队反攻，激战竟日，26日收复广德。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在晋西北义井东凤凰山设伏，歼灭日军300余，残敌逃向神池。23日，收复神池县城，日军逃向朔县。

△　河北伪省政府召开县长会议，伪省长高凌霨及北平伪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出席，仅到县长11人，决议：“一、与皇军妥实联络；二、爱护铁路交通；三、查验商民自备枪支；四、催交赋税；五、禁种高杆稼禾，实行治安联防。”

3月23日　拂晓，第三十一师乜子彬第九十三旅王郁彬第一八五团及骑兵连自台儿庄北上峄县诱敌，与自峄县出发沿台枣支线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台儿庄派遣队骑兵200余人，步兵600余人，

坦克六辆、炮四门，在康庄（峄县南三公里）发生遭遇战。台儿庄保卫战爆发。

△　上午10时，日军自康庄继续南下，与我军激战数小时，至下午5时半，敌相继占领赵庄、獐山、泥沟、北洛。我军退守南洛、贾家口。

△　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长于当夜发布命令："（一）支队以一部派往沂州方向策应坂本支队，主力确保韩庄及台儿庄附近的大运河一线。（二）沂州支队（步兵第十联队第二大队为基干）24日从临城出发，向沂州方向前进，策应坂本支队作战。"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第二集团军，要旨为：一、孙连仲总司令即赴台儿庄指挥；二、驻贾汪之第二十七师星夜徒步向台儿庄附近集结；三、附属汤军团之第三十一师归还建制。

△　夜，第五十二军自台儿庄开抵向城，第八十五军向抱犊崮（峄县以北30公里、枣庄以东15公里）山区集结。次日，第五十二军到达洪山镇、兰陵镇后，于当夜亦转向抱犊崮山区。

△　李宗仁以庞炳勋临沂告急，是日急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全部开赴临沂，协力庞军肃清临沂以北之敌。"24日，张率部自费县开抵临沂。

△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抵汉口，对记者谈话指出：中国抗战，乃为东亚之和平，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3月24日　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军事，决定抽调武汉附近兵团北上增援徐州，以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于豫东归德、兰封一带，巩固第五战区后方；一、五战区应更大地消耗敌人，争取更多之时间，以利全局；并令随行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组织临时参谋团，留驻徐州，协助李宗仁策划作战。

△　晨，日军台儿庄派遣队由北洛向南洛和台儿庄以北的园上村进攻，中午占领园上。下午，第三十一师第一八五团自南洛反击日军，占领刘家湖（距台儿庄北三公里）、邵庄，傍晚，日军2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突破台儿庄城墙东北角，从突破口冲入200人，遭到庄内守军第一八六团反击，团长王震受重伤，后入城日军被歼灭。

△　第二战区东路军总、副指挥朱德、彭德怀召集东路军将领会议，着重指出：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并对于俘虏政策及汉奸政策作了详细说明。

△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等，指出：必须立即组织八路军游击兵团。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并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当前冀晋豫全区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

△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第一任主席云王去世。

△　孙科到伦敦，28日访英国外相哈立法克斯。

△　日本议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该法于4月1日公布，5月5日起实行。此次议会并通过总额超过80亿日元的预算（其中临时军费48亿日元）。

△　日本内阁通过“华北经济发展会社”及“华中经济复兴发展会社”组织草案。前者定资本为3.5亿日元，总社设于东京，将投资资助统制华北之运输与交通事业、建筑船港、经营电力、矿务、制造业；后者定资本为一亿日元，总社设于上海，将在运输与交通事业及公用事业（包括电力、煤气、自来水在内）、开矿等方面投资。

3月25日　关麟徵部与日军大战于郭里集。24日晚，日军临沂支队主力3000余人到达枣庄以东郭里集。同晚，汤恩伯部第五十二军军

长关麟徵率部向枣庄、峄县一带前进，配合池峰城师迂回攻击日军。是日拂晓，关部到达郭里集，即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据守碉楼村寨顽强抵抗。关军将敌包围，一面肉搏，一面火攻，恶战一日，全歼该敌第二大队。同日，王仲廉第八十五军陈大庆第四师攻击枣庄，经六小时激战，是日攻占中兴煤矿公司的水塔及附近的三座碉楼，与敌对峙。经郭里集、枣庄之役，牵制濑谷支队主力于峄、枣一带五六天不敢南下。30日，濑谷支队主力始由郭里集出发，向台儿庄前进。

△　日军向台儿庄以北的南洛进攻，第三十一师主动出击，该师第三营同日军在刘家湖激战，营长高鸿立率领500健儿，誓夺敌坦克20辆，敌步兵千余从正面扑来，敌我双方拼死搏斗，王郁彬团长率部增援，掩护高营脱离战场，经数小时鏖战，王郁彬、高鸿立均负伤，官兵牺牲过半。南洛、刘家湖、邵庄失陷。

△　第二十军团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于3月18日奉命自河南临汝出发，是日到许昌乘火车抵徐州。师长张轸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晋见李宗仁后，即拨该师归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指挥，接替第五十二军担任至韩庄以南大运河的河防任务。

△　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猛攻临沂三官庙、胡家庄一带，板垣师团自汤头镇方面增援，白塔、沙子岭、尤家头、桃源相继失陷。庞炳勋部在桃源损失甚大，临沂危急。张自忠率部自临沂反攻，经彻夜激战，次晨敌自桃源退去，张军进至沂水西岸。坂本支队第二十一联队陷义堂集，警戒费县方面。

△　空军分三路轰炸封丘、焦作、临城日军。同日，归德上空空战，击落日机四架。

△　日军陷河南长垣。

△　国民政府公布《战地守土奖励条例》，规定对于抵御外侮、尽力守土有功将士，给予晋级、授职、建造纪念坊塔、颁赠奖章匾

额、发抚恤金、免遗族学费等项奖励办法。

△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指出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目前急需建立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

△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代表大会。各地学联73个单位123名代表出席，陈诚、邵力子到会讲话，周恩来为大会题词。

3月26日　日军台儿庄派遣队仍处于我军优势兵力包围中，第十师团长矶谷要求濑谷对台儿庄采取果敢攻势。上午7时，敌机六架轰炸台儿庄及南、北站；园上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继续攻台儿庄，被我军击退。台儿庄右翼，我第二十七师向上村、张楼附近集结，该师一部向刘桥日军攻击，并派主力向高家庄西邵里前进，准备协同攻敌侧背，断敌归路。杜聿明第二〇〇师战车防御炮第五十二团第八连（炮四门）开抵台儿庄南站，配属于第二十七师及三十一师。

△　日机11架袭徐州，投弹34枚；五架袭开封，投弹12枚；三架袭郑州，投弹三枚。

△　第一战区程潜部在空军配合下进攻封丘日军，敌势不支，退守长垣，封丘收复。

△　第二战区第六十一军陈长捷师连日反攻，日军东退，是日收复吉县。

△　日军陷江苏东台。

△　国民政府特派何键为国民大会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自由职业团体代表选举总监督，准免原任蒋作宾本职。

△　财政部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第二十八次检查公告：四行发行总额为16.79187771亿元。其中：中国银行为6.5亿余元，中央银行为4.4亿余元，交通银行为3.1亿余元，中国农民银行为2.6亿余元。

△　财政部为防止法币无限制流入战区，明令九龙、厦门、温州等处海关，限制现钞由各该处运往上海、香港数额，并制定限制办法三项。

△　“日华经济协议会”在北平成立，王克敏为会长，平生釟三郎为副会长。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与北平伪临时政府发表共同声明，谓该协议会依经济产业部门而设立各部、会，并起草各部、会之计划，一切事项悉经协议会审核后实施。

3月27日　蒋介石再莅台儿庄视察，李宗仁、钱大钧陪同前往。

△　台儿庄西北门被日军炮火击毁，突入300人，我守军将敌歼灭大半，残敌退入城内东南碉楼及大庙。上午9时，敌图再举，台儿庄城内敌我双方展开了犬牙交错的拉锯战，战斗异常激烈。连日来第三十一师牺牲官兵2800人。下午，敌坦克11辆由刘家湖直趋台儿庄西北角，被我军战车防御炮击毁六辆，余即仓皇逃窜。

△　汤恩伯军团下令关麟徵、王仲廉两军长指示作战部署，授第五十二军与孙连仲集团军协同夹击歼灭台儿庄日军之任务；令第八十五军拊枣峄之敌背，掩护第五十二军之攻击行动。当夜，各军、师奉命后，从抱犊崮山区出发，向指定地点前进。

△　蒋介石派陈调元赴徐州前线劳军，庞炳勋、张自忠各记大功一次。

△　孙桐萱第十二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与地方游击队配合，猛攻大汶口，日军不支，退守附近飞机场。曹部旋派敢死队百名夜袭机场，毁日机五架，并焚毁其油库、弹药库，大汶口至兖州间路轨全部被破坏，敌增援部队被阻于泰安，无法南进。是夜，另一部攻入济宁。

△　日机40架袭武昌南湖及汉口机场，投弹40余枚，死伤平民

200余人。同日，日机54架分袭广州及粤汉路军田、英德等地。

△　日军一部在广东小琳岛登陆。

△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在香港与日方代表西义显、松本会谈后返汉口，向蒋介石报告日本对华政策之真意。蒋表示："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后再进行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并再次派高宗武等赴香港与日方继续进行协商。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张道藩到会致词。周恩来在致词中祝贺文艺界的大团结，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战场和内地，更多接近群众，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世界文艺作出贡献。会议选举郭沫若、老舍、茅盾、邵力子、成仿吾、巴金、张天翼、郑振铎、朱自清等45人为理事。大会通过《宣言》、《告世界文艺作家书》及《告日本文艺作家书》。

△　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日军操纵与监视下在南京成立，举行典礼后仍返沪办公。该伪政权设行政、立法、司法三院，行政院下设七部及议政委员会。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许修直任司法院长。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陈锦涛；外交部长陈箓（后被刺，由梁鸿志兼任）；绥靖部长任援道；教育部长陈则民；实业部长王子惠；交通部长梁鸿志（兼）；司法部长胡礽泰。

△　伪满洲国政府拒付中东路最后一次欠款600万元，苏联政府分别向日、"满"提出抗议。

3月28日　　蒋介石视察台儿庄前线后返抵汉口，下令晋、豫、鲁、皖、苏、浙各省同时实行反攻，并颁令嘉勉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拨款二万元抚恤师长王铭章遗族，五万元抚恤其余殉国官兵家属。

△　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第三十师于3月19日奉命自河南汜水开赴徐州，师长张金照晋见李宗仁司令长官，受命在台儿庄阻击敌人。26日，李宗仁电话命令该师以一团兵力车运台儿庄，在车辐山下车，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其余即开茅村镇附近集结。是日该师进驻台儿庄两侧的顿庄闸，第四十四旅附属于该师，驻龚庄，与三里庄之敌对峙。

△　日军第十师团台儿庄派遣队步、炮兵猛攻台儿庄，日机整日狂炸，围墙、车站、煤厂和附近村落被炸成一片瓦砾。台儿庄城内我守备队在炮火掩护下，向碉楼及大庙展开猛攻，与日军激烈巷战，演成同室而战，隔墙而战的“室战壁战”，敌我双方一墙一室争夺惨烈。入夜，台儿庄西北角被摧毁，日军一部从缺口处冲入城内。

△　第五战区游击队司令李明扬率部攻入临城，与日军巷战数小时，歼其大部，焚敌辎重、弹药、粮秣后，至上午6时乃退出。

△　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围攻豫北浚县，久攻不下，乃由安阳调援军千余附重炮12门，再度猛攻，城内已成一片焦土。30日晚，第一战区守军弃城向内黄、濮阳方面撤退，浚县失陷。

△　日机12架袭徐州，59架分九批狂炸粤北、增城、从化及粤汉路河头、韶关等地。

△　外交部对报界声明：南京伪维新政府完全系日本之傀儡，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武训。

△　军事委员会任命万福麟为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

△　伪满洲国前总理郑孝胥病死于长春。

3月29日　上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国民政府

礼堂举行开幕典礼，林森主席，丁惟汾宣读蒋介石之开幕词。下午8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预备会议及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255人，中央执监委员98人，列席候补中央执监委员50人，大会推选蒋介石、汪精卫、居正、于右任、李宗仁、冯玉祥、陈果夫、孔祥熙、周恩来等17人为主席团。蒋介石致词，略谓：这次大会“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关于抗战大计，以及政治、军事与战时经济、教育种种方面，当然要根据检查过去的结果，定出精详的方案，来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但最根本而首要的，还在于恢复本党的健全”，“开辟新的生机，重振我们的革命精神，奋勇无前的向着革命救国之大道而前进”。

△　蒋介石电令孙仲连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卫台儿庄：“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全体官兵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

△　第二集团军奉蒋介石电令后，下令全力猛攻台儿庄当面之敌，派冯安邦、田镇南两军长，分赴台儿庄右翼第二十七师、左翼第三十师、第四十四旅督战。

△　晨5时，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康法如率第三十师第一七六团向台儿庄城西北角进攻，王冠五督率第一八六团攻击台儿庄内大庙及东南之敌，进行激烈巷战，6时，敌被驱入大庙及东、南、西、北各碉楼内，边退边纵火燃烧，阻我前进。夜11时，台儿庄城西北角之敌企图夺我西门，遂又展开巷战，各部队均固守原巷战线，顽强抵抗，敌未得逞。

△　台儿庄左、右两翼向日军分别发起猛烈进攻。右翼，凌晨3时，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攻占裴庄，并向邵庄、园上之敌进攻。日军使用燃烧弹烧毁房屋抵抗。4时，该师第八十旅向刘家湖日军进攻，与日军激战于岔路口、秦庄一线。同时，日军以坦克六辆、装甲

车10余辆向邵庄我第七十九旅阵地攻击，我军还击，毁敌坦克二辆，装甲车数辆，牵引车一辆，我战防炮被敌炮火击毁。左翼，第四十四旅于拂晓向三里庄之敌进攻，日军以坦克为先导反击，我攻击受挫。当夜，第四十四旅由板桥向三里庄、鱼林日军攻击，因刘家湖日军增援，退回原阵地。是役毙敌约二三百人，我军伤亡200余人。同时，第三十师第一七五团夜袭南洛日军，占领该村。

△　关麟徵军长率第五十二军由女峰山经兰陵镇向台儿庄东北沙江凹转进，展开于腰里徐、柿树园之线猛烈攻击，自峄县南下之敌在马庄、大庄、张楼、贾家埠一带顽抗。王仲廉第八十五军占领平山、傅山、石城岗、女峰山一带高地，一面对临沂方面搜索警戒，一面佯攻峄县，以掩护第五十二军两侧。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对外国记者谈津浦线战况，指出："目前我在津浦线两端，已由被动地位改为主动地位，昔则我据守一村一寨一城以防敌，今则敌据守一村一寨一城以防我"，"敌已成强弩之末，我已获得战局之控制权。"

△　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令濑谷支队长，应以主力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之敌。次日，矶谷率师团主力自峄县附近南下，于晚间到达台儿庄西范口附近。

△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因濑谷支队在台儿庄方面战况吃紧，命令板垣第五师团前往救援。是日晚，坂本支队奉板垣师团长命令中止攻击临沂，撤兵南下。

△　缪澂流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骑兵团分别开抵临沂。同日，张自忠发布第五十九军全线出击令，并令前来增援之缪军第三三三旅沿祊河、汤军骑兵团向艾山、义堂集追击。当夜，日军第五师团因主力增援台儿庄，余部退走汤头。

△　张自忠率部自费县返临沂后，连日来同日军在桃园、小岭激

战，损失惨重。是日电告李宗仁：“职军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

△　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总、副指挥通电全国，揭露日军施放毒菌弹屠杀边区军民的罪行，吁请全国各界以防毒器材援助边区军民。

△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瑞士巴登卜郎比公司签订技术协作合同，协助机器制造厂生产发电机等各种机器，有效期10年，报酬不少于75.5万瑞士法郎。

△　中山学社所编《中山周刊》第七期登载《国民党往何处去》一文，认为其他政党的存在乃是既成事实，当此非常时期应允许“党外有党”，“国民党可以联合各党，统帅各党，借以增厚实力，共挽危局”，同时“可使民众得到发挥政见的机会，减少他们对本党的误会”，并“缓和一般国民急不能耐的心理”。

3月30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第二次会议，居正主席，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孔祥熙作财政报告，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等要案。

△　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令曰：“张自忠前经明令撤职查办，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此次临沂之役，该员奋勇歼敌，树立奇勋，拟请撤销前令，以资鼓励等情。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应准撤销。”

△　蒋介石接见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称：“有充分理由可信中国经长时期最惨烈之牺牲后，已能找到出路，击败其不讲公道专务侵略之邻人。”

△　蒋介石为王铭章殉国电李宗仁，准给特恤1.2万元，转请国府特予褒扬，追赠陆军上将。

△　上午9时，台儿庄内日军分两路经北大街、东大街向我第一七六团攻击。11时，日机12架空袭台儿庄，城内房屋几全部被毁，康法如副师长负重伤，我官兵伤亡300余人，城北大庙日军乘机向城东南攻击。傍晚，日军攻占台儿庄东南部，抵达大运河。当晚，王冠五组织第二十七师增援部队第八连由连长王范堂率领57人的敢死队，向城西北角袭击日军，与敌短兵相接，肉搏一个多小时，夺得掩蔽体五座，房屋数间。敌一部被歼，另一部向北逃窜，战斗胜利结束，敢死队仅13人生还。

△　拂晓，第二十军团各部先后到达兰陵镇、青山、石城岗附近集结。上午11时，第五十二军向官庄、河湾、大庄、马庄之敌攻击，至下午4时，完全占领上述各村，敌退据郝庄、贾家埠、小集、张楼一带。我第二十军团另一部由獐山、天柱山附近向敌背后突袭，主力亦由右翼续行猛攻，激战至日暮，即攻至贾家埠附近，敌退守兰成店、小集一带与我军对峙。

△　关麟徵军长向台儿庄第三十一师发出通报："军以防务关系，不克及时南来，殊引为憾，现奉命以全部攻击台儿庄敌之侧背，卅（30日）午后即可与敌接触，我辈铁血男儿，决当与敌一拼也。"

△　晚8时，李宗仁电令第二十军团迅速南下："敌主力似南下，其一部绕出台儿庄东侧二十七师背后，另一部企图由万里闸方面渡河包围孙军后方。着贵军团长以一部监视峄县，亲率主力前进，协同孙军肃清台儿庄方面之敌。并限世（31）日拂晓前到达，勿得延误为要。"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由冀南威县西进，占领广宗县城。

△　上海各民众团体通电声讨南京伪政权，表示："汉奸梁鸿志等甘心附敌，丧心病狂，卖国求荣，既自绝于国人，亦不齿于人类，全上海市民誓不承认此种傀儡僭窃之组织。"

△　中英庚款董事会设科学事业临时协助委员会，由李四光、周鲠生、傅斯年等七人组成，决定以10万元协助自然科学，三万元协助人文科学，五万元协助其他科学，另以50万元补助西安、长沙两临时大学，五万元补助贵阳医学院。

△　日军华北方面军变更战斗序列：仍以寺内寿一陆军大将为司令官，辖第一军（香月清司陆军中将为司令官）、第二军（西尾寿造陆军中将为司令官）及方面军直辖兵团。第一军辖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下元熊弥第一〇八师团、山冈重厚第一〇九师团；第二军辖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方面军直辖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末松茂治第一一四师团、山下奉文中国驻屯兵团（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改编）、新编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五旅团；重新编成德川好敏临时航空兵团。

3月31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第三次会议，戴季陶、丁惟汾主席，通过《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及《改进党务案》。《改进党务案》中决定改建总裁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

△　李宗仁电蒋介石，台儿庄告急。电称："昨午后6时，孙（连仲）部告急。台儿庄东西被敌包围，且街市敌人又突破第二道防御线，有不支之势。"又据一一〇师师长张轸报称，"午后3时，敌于运河万里闸以坦克车数辆侦察渡河点"。"敌飞机，下午以来在万里闸、顿庄闸间之沿河村落大施轰炸，似有由此袭入，向西截断台儿庄或直南下徐州之企图"。

△　李宗仁以台儿庄战事告急，电请军令部将第六师、第十三师、第九十三师次第开徐州。

△　李宗仁电令第二十军团："汤军团以关军与孙连仲联系，向峄县前进。王军主力向枣庄、峄县压迫，并适时进出于枣庄北方山地，

断敌北窜。一部歼灭向城之敌后跟进。”

△　上午9时，台儿庄我守备队向板桥附近出击。日军以野炮20余门向台儿庄轰击，城内守备队第一七六团伤亡惨重，由第一七五团入城接替第一七六团。晚，日军500人冲入台儿庄北门，沿大街与我军肉搏，城东北部日军突入第一七六团防线，城西北角日军向西关进攻。城北门塌10余丈，我军各部建制陷入混乱，台儿庄保卫战面临严重时刻。

△　凌晨，第五十二军发起总攻，经12小时激战，至下午3时先后攻占马庄、大庄张楼、贾家埠、小集、兰成店、三佛楼等地，战线前进四公里，收复村庄10余座。同日，第八十五军由水湖、王庄一带向峄县佯攻，至下午2时该军第八十九师大部越过峄县东北之马山、九山，迫近峄县东郊。

△　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自临沂进抵向城附近爱曲一带，攻击第五十二军侧背。下午3时，汤恩伯军团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变更作战部署：第五十二军主力依洪山镇为轴，向向城、爱曲、秋湖进攻，第八十五军向南桥、鲁坊一带之敌扫荡，掩护第五十二军向右旋回。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副师长徐向前指挥下，在晋东南黎城、豫北涉县间响堂铺设伏，毙伤日军第一〇八师团森本少佐以下400余人，击毁汽车180余辆。

△　日机28架分七批袭扰粤北。

△　驻朝鲜汉城总领事范汉生，随习领事张义信通敌叛国，国民政府明令撤职查办。

△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汉口成立。次日，该会会刊《新闻记者》在汉口创刊。

是月　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撤销，另设三路司令部：第一路司令部

驻南昌（11月移驻衡阳），协同第三、第五战区作战；第二路司令部驻广州（后移柳州），指挥驻粤、湘、黔空军部队，协同第四战区作战；第三路司令部驻西安（先后转移南阳、襄阳、老河口、荆门、沙市、南郑），指挥驻豫、鄂等省空军作战。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昌召开政工会议，决定：抽调整训之师政治部，一律派设连指导员；前方作战部队，充实政治工作队；留驻敌后部队，增设政治工作队。并决定于各战区及行营政治部出刊《阵中日报》，各师出版不定期的油印《阵中日报》。蒋介石到会作《改进军队政训工作的基本任务》的讲话。

△　军政部兵工署将原重庆钢铁厂定名为二四二厂，年产钢锭2300吨、钢品500吨。

△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军政部兵工署合组四川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并合资将四川綦江民营铁矿收归官营，资本100万元。同月，合办南桐煤矿（该矿因位于南川、桐梓交界处而得名）。

△　经济部探勘四川漳腊县金矿。

△　孔祥熙等发起筹建中央制药厂，孔自任董事长，颜福庆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汉口创办独立出版社，由叶楚伧、陈立夫等发起，叶楚伧任董事长，潘公展任经理，卢逮曾任副经理，陈立夫、陈布雷、吴铁城、陈诚、叶溯中等为董事。每月出书约二万余册，由正中、文化、青年三书局包销。

△　毛泽东会见白求恩，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

4月

4月1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第四次会议，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主席，决议：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二、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成立国民参政会；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宣言，蒋介石作题为《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的闭幕词，旋即闭幕。

△　蒋介石电令李宗仁等："对于台儿庄之敌务须歼灭。倘兵力不足可用援军，并须注意步炮协同。"

△　蒋介石于汉口召见王缵绪、王陵基，听取对川事意见。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　日军濑谷支队长令赤柴步兵第十联队自北洛出发攻击关麟徵部第五十二军，关军逐步退却，该联队进抵石桥。次日，日军步兵第六十三联队长福荣大佐以台儿庄战事无进展命令进入台儿庄西北角之日军撤退，集中攻击台儿庄东部。

△　下午3时，孙连仲总司令命令第二十七师："着该师挑选奋勇队二百五十人，继以得力步兵一营，跟随冲进台儿庄寨内，该奋勇队如能爬进城垣，冲杀该敌，准赏洋五千元。如能助三十一师肃清城内之敌，准赏洋两万元。"

△　午夜12时，第二十七师奋勇队200人由台儿庄东北角爬城向城内之敌猛攻，至次日凌晨4时，将城内之敌击溃，占领东北隅、东门，下午2时，占领台儿庄南门，与第三十一师取得联系。

△　周碞第七十五军黄光华第一三九师自河南开赴台儿庄战场，是日抵岔河镇掩护炮四团开邳县。

△　马占山部挺进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桂五率部挺进绥北，在武川附近与日军千余人及伪骑兵一师附装甲车70余辆遭遇，激战数小时。

旋又在大青山一带，被日军步、骑、炮联合部队包围，激战五昼夜，方突出重围。

△　广东省政府财政厅以防止敌方吸收内地资金为由，自是日起开始征收沦陷区特产入口税，如津梨、汾酒、东北大豆等一律课税。

△　福建省政府发行短期库券90万元。

△　武汉各界11个团体举行茶会，欢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郭沫若等出席。

△　《自由中国》杂志在武汉创刊，臧云远主编，周扬、夏衍等为编委。

△　北平伪临时政府增设实业部，王荫泰为总长。

△　通（县）古（北口）铁路通车，全长135公里，南与北宁、平汉、平绥路相连，北接承古路。此为日本对苏、对华之重要军事交通线。

△　日本在天津筹设华北盐业公司，资本2000万元。

4月2日　　蒋介石致电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临、峄、台、韩间之敌，经我军连续猛攻歼灭过半，其退路断绝，增援无望，尚作最后之挣扎。临沂方面之敌，苦战之余，放弃战场，竟分兵向台儿庄转进；淮南之敌，不顾侧背危险，向蚌、淮集结；晋南、豫北之敌，不惜放弃既得地区，抽出兵力，以图策应，均足证明敌人对于鲁南会战之重视，及其危殆之程度。仰我英勇战士，其各认清本会战之重要性，并我军将获全胜之现状，严令所属作最大之努力，为战略上适切之协同，促成绝对的胜利，以利全局。"

△　蒋介石电令："第五十九军一面阻止莒县、沂水方面之敌前进，一面确实封锁台儿庄、临沂及台儿庄、费县间交通，保障台、峄

方面我军之胜利。”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命令，其要旨为：“本战区以迅速合围歼灭敌人之目的，决于明（3）日开始全线总攻击，保持重点于第二十军团之右翼，将敌包围于台儿庄北侧地区而歼灭之。”并对所属各部队之任务部署如下：一、第二十军团（含第七十五军）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以主力于3日保持东南正面，向台儿庄附近之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敌捕捉歼灭之。因战况之进展，须随时遮断敌自峄县之退路，并对向城方面增援之敌严密警戒；二、第二集团军右翼与第二十军团联系，于3日全线攻击，消灭台儿庄之敌；第一一〇师准备以一旅由万里闸附近渡河，向北洛附近敌之右侧佯攻；三、第三集团军前敌总司令曹福林指挥张测民支队五个团及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为堵击兵团，迅速南下向枣庄、临城合围。

△　台儿庄左翼，我军炮火猛击城西北角，第二十七师吴明林团第三营冲入城内展开室战、壁战与敌死拼，敌所据碉楼多被我炮火摧毁，第三营第七连张连长率先登城，敌越城逃遁，我军收复西北角。

△　台儿庄右翼，日军三四百人由刘家湖向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彭村、上庄等阵地猛攻，其主力骑兵千余人由三河口向萧汪迂回第二十七师后方，敌我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且战且增，炮火更为猛烈，我潘坠、雷草爝、燕子景、彭村、石佛寺一带阵地尽成灰烬。孟庄、裴庄、陶沟桥、五圣堂、王窑路、辛庄等处发生激战，我官兵伤亡甚重。下午6时，日军步、骑3000余人，战车20余辆围攻五路窑、陶沟桥、小庄等地，且攻入园上、孟庄、五圣堂与我军肉搏，我军逐次退至边庄、赵庄、纪庄、丁家桥、五路窑、火石埠一线顽强抵抗。是役，日军伤亡66人，我军官兵250人壮烈牺牲。

△　财政部核准设立上海外汇通讯处，银钱业兑外币、现金买卖不受限制。12日，开始办理中外银行申请外汇事宜。

△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文、法两院设蒙自，理、工两院设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杨尚昆，部署第一一五师建立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

△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捐款一万元慰劳八路军，朱德致函表示感谢。

4月3日 日军猛攻台儿庄：赤柴第十联队陷南门外的黄庄，妄图偷渡运河。边庄、孟庄被炮火炸平。福荣第六十三联队攻占东南门，进入庄内约百米，同时投掷催泪瓦斯弹，守军死伤十之七八，仅剩西关一角，形势危急，几不能保。

△ 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向孙连仲总司令请求转移阵地，退至运河南岸防守。孙连仲报告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指示，已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援军不日可到，严令该部死守，不许后撤。李宗仁悬赏10万元，令孙连仲组织敢死队，实行夜袭台儿庄之敌。孙连仲表示：服从长官命令，绝对照办。旋命令池峰城死守台儿庄：“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线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 第二十军团向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发起总攻击。第五十二军主力向向城附近迂回包围秋湖、作字沟之敌，再经兰陵镇一带向西南席卷，占领凤落、作字沟及敌军司令部所在地刘庄，刘庄步骑千余，大部被歼。第八十五军夺回小洪山、前烟头，乘胜自四户镇向南扫荡。至此，汤军团胜利结束了爱曲、兰陵间的扫荡，同时也肃清了向城至秋湖路上的残敌，取得了截击坂本支队的胜利。

△ 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绥靖部长任援道，赴北平会见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并与王克敏会谈两伪政权合流条

件，无结果。此后，两伪政权分别在东京设立办事处。

4月4日　　李宗仁司令长官、白崇禧副参谋总长赴台儿庄前线督战。最高军事当局令李仙洲第九十二军吴良琛第十三师用一团作运河预备队，三团到台儿庄作第二集团军总部预备队，又令李仙洲第二十一师由郑州开徐州，周碞第七十五军甘丽初第九十三师到时开兰封。

△　汤恩伯军团对台枣支线发起攻击，敌我双方在底阁、杨楼及大顾珊激战。第五十二军占领甘露寺至杨楼、陶墩之线，当晚占领兰陵镇。第八十五军占领蔡庄，大顾珊之敌死守不退，经我军三面夹攻，敌始不支，旋即逃窜，我军遂占大顾珊。

△　孙连仲连颁两道手令，晓谕全军："（一）今日我们创造光荣之良机，也是生死最后关头，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本总司令将以成仁之决心，与台儿庄阵地共存亡，亦必执行连坐法，以肃军纪。死为光荣而死，生为光荣而生，希我官兵共此努力。（二）训令本集团军：慎保本军守无不固之精神，发挥娘子关歼灭敌七十七联队之伟绩，今只有前进，绝无后退之途，过河者死，誓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深信必操必胜之信念。"

△　汤恩伯电令关麟徵、王仲廉及周碞三军长并全体将士，要旨为："全体将士再接再励，奋勇猛攻，务在战场内将敌捕捉歼灭，毋使生还。万一敌突围逃逸，各军可不待命令断行猛烈果敢之追击，绝对不容其在鲁南立足。本战役为国家民族生死关头，本长官亲临前线督战，决按军律明罚，望共勉之。"

△　日军重炮30门猛轰台儿庄，投掷燃烧弹，房屋付之一炬。日军乘大火向城内东南部我军进攻，北门日军亦发动进攻，均被击退。下午，日军攻台儿庄西北角，又被击退。晚上，台儿庄守备队（第一七五团余部），中央守备队（第一八一团、第一七六团余部）选奋勇队200人，在重炮掩护下，夜袭日军，攻占了大庙。

△　日军攻我台儿庄右翼禹王城，企图强渡运河，我军坚守阵地，予以截击，敌数次强渡，均被击退。台儿庄左翼第一一〇师，自运河南岸渡河向北洛、泥沟进攻，右翼我第七十五军张琪第六师及第四十二军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分别向火石埠日军进攻。第七十五军黄光华第一三九师由岔河镇、马甸向贺庄、耿庄进攻，占领戴山、胡山。

△　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在萧汪附近受我第七十五军包围攻击，陷入苦战。同日，板垣师团长令坂本支队向临沂转进。

△　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以第一〇八师团为主力，并有第十六、二十、一〇九师团等部共10余个联队，西面自洪洞；西北面一自太谷，一自榆次；北面两路自平定、昔阳经和顺、皋落分向辽县；东北面自河北元氏、赞皇；东面自豫北涉县；南面一自长治、襄垣，一自屯留，向晋东南进行大围攻。朱德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在高桂滋第十七军及朱怀冰第九十四师等部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

△　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克复吉县，日军退乡宁。

△　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率部收复鲁西北范县。

△　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进驻皖南徽州（今歙县）岩寺。

△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汉口成立，郭沫若、张季鸾、沈钧儒、杜重远、邹韬奋、潘梓年、阎宝航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出席，范长江致开会词。

△　重庆市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12日，“中国儿童号”飞机全国筹备会在重庆成立。

△　北平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旧址改设师范学院，王汉为院长，是日开学。

△　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往访苏人民外交委员李维诺夫，抗议苏以飞机援华。李维诺夫严予驳斥，指出："苏联政府对出售军火以及飞机与中国问题之见解，完全依照一般公认之国际法标准。"

4月5日　　蒋介石电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究竟有无把握，仰即具报为要。"次日，汤恩伯奉电后立即电复蒋介石，立下军令状："本军团今（6日）12时若到不了台儿庄，恩伯愿受军法处分。"

△　汤恩伯军团长电第三十一师："明日（6日）决将台儿庄之敌击溃，与贵师会合，如不成功甘当军令。"池峰城奉电谕后，当即激励官兵奋起报国精神，协力友军，誓歼当面之敌，令各部准备明日全力反攻拼此一战。

△　拂晓，日军炮轰台儿庄城内我军守备队，向大庙发起攻击，被击退。城外右翼第二十七师夜袭占领黄林庄、头沟，向边庄、沧浪庙进攻，日军在火石埠一带发起反击，双方混战至黄昏，日军退去。同日，该师占领孟庄、裴庄、邵庄、彭村、沧浪庙一线，日军向西北和东北方向退却。

△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奉命抵徐州督战。当日，程潜命令："（一）本长官奉命特来徐州督战。（二）台儿庄之敌限自鱼（6日）起至齐（8日）止，三日内务捕捉歼灭。（三）树立首功者奖洋10万元，否者师长以上定予重惩。"

△　上午8时，汤恩伯军团长向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第七十五军、第五十七军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全军官兵"继续向泥沟、北洛、台儿庄之线攻击前进，迫敌于运河北岸一带而歼灭之"。

△　李仙洲第九十二军由韩庄向峄县进攻；第一一〇师占领獐

山。同日，孙桐萱部占领官桥。

△　第五十二军在台儿庄以东底阁、杨楼与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及濑谷支队作战。该军由兰陵镇、洪山镇进入底阁、杨楼边缘，造成合围阵势。敌以坦克掩护突围，我军以猛烈火网封锁出口，几经肉搏，将突围日军消灭。敌突围不成，遂增固村寨阵地死守，我军组织敢死队分批攻击，摧毁敌阵，嗣后进入村寨巷战，敌我双方展开激烈争夺。同日上午，日军增调步骑千余人，炮四门，猛攻大顾珊，我军力不能支，大顾珊陷入敌手。当晚，我军反攻大顾珊，数度冲入寨内，牺牲綦重，仍未能攻下。

△　日军第五师团进攻临沂西南重镇朱陈，临沂城告急。张自忠、庞炳勋派兵迎击，包围朱陈日军。次日，朱陈日军欲突破包围，遂向湖南崖、湖西崖、王庄进击，激战竟日，我军收复上述各村，日军退回朱陈。

△　姚景川骑兵第十三旅由晋南开抵临沂增援第五十九军，张自忠令该旅主力加入攻击朱陈日军，余部向后方搜索，破坏交通，扰敌运输。

△　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派中央委员蒋鼎文、陕西省府主席孙蔚如在黄帝陵举行扫墓典礼，500余人参加。

△　张国焘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加祭黄帝陵后逃至西安。7日，在胡宗南保护下，到武汉投靠国民党。17日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　据行政院工作报告称：截至是日止，后方各地战区内迁厂矿，复工者66家，其中承造军需用品者44家。

△　孙科在英国下院演说，呼吁列强援助中国抗战，供给中国军火，并表示：日军一日不离开中国，中国决不议和。

4月6日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察觉日军已全线动摇，是日中午12时下达总攻击令，其要旨为：一、敌受包围消耗极大，我汤军团定于本（6）日下午8时至12时由岔路口、刘庄一带总攻敌人；二、着第二十七师派队于本（6）日晚8时向孟庄、裴庄、园上地区进击，协同汤军之作战；三、第三十师应集结有力部队，同时向南洛进击，协同作战；四、第三十一师应同时向三里庄以南之敌出击，并将台儿庄寨内之敌包围而肃清之；五、第四十四旅除担任河防、防敌窜渡外，应相机协助第二十七师战斗。

△　下午3时30分，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长下令于当晚从台儿庄向北撤退。晚8时，我军开始全线总反攻，汤恩伯军担任台儿庄外围，孙连仲集团负责正面清扫。当晚，园上日军弹药库被我重炮击中爆炸，敌兵纷乱四窜。台儿庄城内日军一部自西北门增援园上，我军乘机收复西北门，旋即沿城上直趋北门，夜11时收复北门。同时，我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三旅入台儿庄，协同第九十一旅占领东门。深夜台儿庄内之敌被我全部肃清。

△　第五十二军击败坂本支队，收复底阁、杨楼。同日，第八十五军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督率第五二九团进攻大顾珊，下午5时，该团团长罗芳珪殉国，次日上午收复大顾珊，敌2000余人，大部被歼。

△　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汉口举行，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及《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等案。7日，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8日，蒋介石讲述《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选举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为：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伧、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各部部长为：组织部长张厉生，宣传部长顾孟馀，社会部长陈立夫，海外部长陈树人，秘书长朱家骅。旋即闭幕。

△　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为策应台儿庄战役，经汶上、宁阳反攻济南，8日，至党家庄被日军阻击退回。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在滕县抗战殉国之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追赠陆军上将。

4月7日　　台儿庄大捷。凌晨，我军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刘家庄、三里庄日军大部被歼，残敌向峄县、枣庄退走。我军毙伤敌军万余人，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枪931挺，炮77门，战车40辆，大炮50门。我军伤亡三万余人。

△　蒋介石电全国军民祝贺台儿庄大捷，略谓："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之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阅月来全国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凡我全体同胞与全体袍泽，处此时机，更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务当兢兢业业，再接再厉，从战局之久远上着眼，坚毅沉着，竭尽责任，忍劳耐苦，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之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幸体此旨，共相黾勉为盼。"

△　蒋介石、李宗仁、程潜拨款30万元，犒赏台儿庄前线将士。蒋介石特派俞飞鹏赴台儿庄前线劳军。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祝贺台儿庄大捷。

△　武汉三镇热烈庆祝台儿庄大捷，户户悬旗，各报馆散发号外。晚，10余万人集会祝捷，通过电蒋介石致敬、电慰李宗仁及全体抗战将士等提案，旋开始火炬大游行。武昌黄鹤楼下，人群水泄不通，轮渡乘客无法下船，歌声、口号声、鞭炮声彻夜不绝。

△　下午6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下令追击自台儿庄撤退之日

军，其要旨为：一、台庄附近经我孙、汤两军击溃之敌，现向峄县方面逃窜中；二、汤军以一部肃清战场，以主力由台枣支路（不含）以东，沿夏庄、马山、九山、潭山以南地区向峄县追击前进；三、孙军指挥张轸师由台枣支路（含）向峄县追击前进；四、曹福林应于峄县以北地区截击敌人，勿使窜逸；五、敌如退据峄县城，孙、汤两军各以一部占领峄县东、西方高地。主力协同击灭城外敌之野战军后，围攻峄城；六、敌如以峄县城为后卫阵地，孙、汤两军各以一部监视之。主力尾敌穷追；七、孙震军应由新闸子渡运河，追击韩庄方面之敌；八、李仙洲师应继续经作城向东，扫荡临沂以西之残敌，向临沂前进，到达后归张军长自忠指挥。

△　日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令：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有力部队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华中派遣军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作战，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并占据徐州及徐州以南的津浦线及合肥附近地区。同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将徐州作战开始时间预定为4月下旬。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在武汉成立，总队长李昌，组织部长于光远，宣传部长丁浩川。

△　蒙汉回族联合慰劳团在武汉献旗劳军，并通电全国，决心团结抗日，保卫国土。

△　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拒绝担任南京伪维新政府教育部长，是日在沪被刺殒命。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副总董包德尔失踪多日，是日在黄浦江发现尸体。

△　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致书中国人民，祝贺中国抗战取得的胜利，表示支援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4月8日　　台儿庄我军向峄县溃退之敌全面追击。第二十军团以第五十二军为右翼、第八十五军为左翼，分别向傅山口、九山方向和低石桥、兰成店方向追击。第九十二军转为总预备队，第七十五军在底阁、甘露寺一带待命。第二集团军以第三十师为追击队向南北洛进攻。第二十七师占金陵寺一带堵击退却之敌。第三十一师及第四十四旅在台儿庄附近整顿。

△　李宗仁通电全国军民对台儿庄祝捷致谢。略谓：此次台儿庄之役，“小获胜利，迭承各方纷电贺捷，殊感愧交并……惟有秉承委座‘闻胜不骄，遇挫不馁’之训，临渊履深，戒慎恐惧，以期完成抗战之使命”。

△　第九十二军吴良琛第十三师开抵临沂，归张自忠指挥。旋张令该部加入围攻朱陈日军战斗。

△　空军飞临沂、诸城、济南、泰安、兖州等地散发传单和通行证，敦促日军弃战归国。

△　湖南长沙各界五万余人举行“湖南各界庆祝前方抗战胜利大会”，会后冒雨游行。

△　伪华中复兴公司成立华中铁矿公司，开采苏、浙、皖等省铁矿。

4月9日　　蒋介石电汤恩伯令再接再厉，克竟全功。谓：“台儿庄胜利，寇敌就歼，军心丕振，为我最后胜利之开始，我将士奋勇牺牲，致此战役堪为我民族战史上留光荣一页，披翻捷报，殊深感慰，惟有再接再厉，勿以初步胜利而骄矜，务当倍矢勤劳，益加惕励，努力继续追击，克竟全功。”

△　第二十军团第五十二军攻占马山、土山和九山，夜间攻击双山受阻。第八十五军攻占苏家埠、潘家巷一带，迫进峄县城。因受左

翼日军盘据的制高点獐山、天柱山的轰击，攻势无进展。第九十二军第十三师与第七十五军第一三九师抵傅山、青山、石城岗一线掩护第二十军团侧翼，并以一部围攻向城日军。

△　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师、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第七十五军第六师分三路夜袭獐山、天柱山，无进展。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李济深、陈铭枢、方振武、谭平山、陈启修、徐谦、刘震寰七人党籍。

△　上午，飞机一架轰炸峄县城东南潭山敌炮兵阵地。下午，我飞机19架到达峄县城上空，发现城西南敌军逃匿，当即投弹，并以机枪扫射。

△　冀中吕正操部华北人民自卫军击败板垣师团第四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占领高阳、安国县城。11日，收复大城、献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攻占冀南平乡县城。

△　宁夏省豫旺县更名同心县，是日行政院呈奉国民政府指令准予备案。

△　行政院颁布《难民服役纲要》，分兵役、工役两项，工役为筑路、治水、垦荒、运输等。

4月10日　广州市30余万人举行台儿庄祝捷大游行。

△　临沂前线，张自忠指挥第十三师一团向朱陈进攻，未能奏效。艾山方向日军前来增援，与第十三师另一团在黄土堰、庙山激战。后日军退入朱陈。

△　台儿庄追击战，第七十五军第六师攻占赵庄、郭庄、李庄，第三十师被阻于泥沟，第一一〇师仍在白山西一带与日军对峙。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孙继先津浦支队攻占鲁西北恩县城。

△　日机炸广州，缝纫厂死伤女工百余人。同日，日机27架炸长沙，岳麓山下湖南大学师生及附近农民被炸死30余人，伤70余人。湖南大学图书馆被炸毁，损失200余万元。

△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

4月11日　军事委员会电令各省军政机关维护后方生产，无论过往与驻守，不得妨碍农民耕作，不可占用工厂。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加强团结，争取抗战更大的新胜利。

△　第五十九军第一八〇师与第九十二军第十三师各一部续攻临沂朱陈，我军攀登入寨，旋以中断联络撤出。

△　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师向獐山、北山猛攻，占领北山、草山。该师第八十九旅第一七八团攻占天柱山，旋敌乘我立足未稳，多次反攻，该山陷入敌手。第一七八团二营攻獐山，伤亡过半，未能奏效。

4月12日　蒋介石电李宗仁，限令一二日内将残敌全歼："台庄之捷已逾五日，峄、枣、韩、临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援绝溃惫之寇，不急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隳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万望激励将士，努力进攻，一面分途堵击，务于一二日内将残寇全数歼除。庶敌兵再至，我更有以待之。如何盼速报。"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凡15条，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性机关，"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参政员由国民党遴选产生；现任官吏不得

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正、副议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

△　英新任驻华大使卡尔在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北平伪临时政府在东京设驻日办事处，处长孙蔔。

4月13日　　李宗仁、白崇禧以台儿庄追击战阵线过广，甚难成效，是日致电军令部提出改变作战方法，“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越二日，蒋介石电复李、白：“所拟机动攻势案甚妥，应速实施。”

△　李宗仁电令所属各军：“现当决战紧要关头，各部应不顾一切损害，奋勇猛攻，以使主力决战有利。”

△　蒋介石电孙连仲、汤恩伯：“仍盼督部迅歼残敌，限两日内攻下峄、枣。”

△　商震第三十二军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围攻山东向城，毙敌200余名，敌据寨顽守。15日，又以火攻，遂克向城。

△　徐州各界举行台儿庄祝捷大会。入夜举行提灯会，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次日，举行台儿庄战果展览。

△　日机22架袭粤，我空军19架起飞迎击，经激烈空战，敌机被击落七架，我机亦被毁三架。

△　日本华中派遣军为进行徐州会战，令第九师团在凤阳附近集结，第十三师团在蚌埠、怀远间集结；21日，令第一〇一师团江北部队抽出兵力向阜宁方面前进；23日，令第六师团沿和县、巢县、合肥一线作战。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自忠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任命桂永清

为第二十七军军长。

△ 国家社会党（即民社党）张君劢致函蒋介石、汪精卫，申述该党主张与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表示愿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5日，蒋、汪复函慰勉。

△ 美国务院政治顾问贺伯克就英国提议调解中日战争事，复函英外务部次官贾德干，称：中国在目前绝不会同意有利于日本的任何安排，美国或英国，或者英、美两国的联合，或是任何集体行动来谋解中日纠纷的时机还没有来临。

△ 美官方宣布：自中日战争开始至今，美国所购中国白银共值523.2万美元，中国换取外汇多系向美购买军火及各种商品之用。

4月14日 蒋介石电程潜、阎锡山、薛岳、蒋鼎文等，略谓："敌自鲁南惨败后，自晋绥、冀豫、江淮各方抽调兵力增援鲁南，以图挽救，仰各战区本前颁游击计划，严督所属积极行动牵制敌人，使鲁南作战容易，用期彻底歼灭该方面敌军，以收最后胜利为要。"

△ 第九十二军第十三师派一团协攻朱陈，余开向城。

△ 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攻占八里屯（峄县城西四公里）、老虎寨。次日，日军发起三次反攻，均被击退。

△ 蒋介石电令第六十军调归德、兰封一带集结，18日，复命径向台、徐输送，归第五战区长官指挥。该军军长卢汉，下辖第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第一八三师（师长高荫槐）、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

△ 第二战区部队和八路军配合，与进犯晋东南之日军连日激战，是日，高桂滋第十七军克沁源，赵世铃师收复屯留、壶关。日军苫米地旅团一部陷辽县，其主力陷沁县、武乡，进取榆社，遭八路军

秦基伟支队及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截击，又退回武乡。

△　成都市各界通电声讨汉奸梁鸿志组织南京伪政权。

4月15日　　李宗仁电令右翼兵团（第二十军团）：“即行停止围攻计划”，台儿庄战役结束。

△　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提出重振党纪，实行民权，停止党派斗争，贯彻抗战建国目的，严惩汉奸及改善庶政等主张。

△　日军第一军令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准备在兰封、范县间渡黄河，协助第二军参加徐州作战。

△　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在武汉成立，许世英为理事长。

△　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址移设陕西南郑。

4月16日　　八路军刘伯承第一二九师主力，在武乡长乐村截击由榆社退回之日军苫米地旅团主力3000余人，将敌分割为数段，各个击破，并击退从辽县、蟠龙来援之敌2000余人。经一昼夜激战，毙伤日军2200余人，取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决定性胜利。是役，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叶成焕团长殉国。

△　日军第五师团国崎支队进犯临沂，与张自忠、庞炳勋部激战，逐次占领城外阵地。至18日，临沂被敌三面包围，形势危急。

△　行政院设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秦汾任主任委员。

△　皖南游击队进袭当涂，炸毁汽油库一座。

△　《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茅盾主编。

△　高宗武、董道宁自汉口到香港，向日方代表西义显、伊藤芳

男转达蒋介石对中日和谈的条件："蒋委员长认为：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如获日方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商谈细则。"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调整要纲》，规定以北平伪临时政府作为伪中央政府，尽快使南京伪维新政府与之合并统一。

4月17日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赴洛阳开会道经延安访问。当晚，延安各界代表数百人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致欢迎词，卫立煌等发表讲话。次日，卫立煌离开延安。

△　李宗仁电令第十三师、第二十一师合编为第九十二军，以李仙洲为军长，克日经寨子开往马厂湖，归张自忠军团长指挥。

△　周恩来同张国焘谈话，向张提出回党脱党问题。当晚，张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

△　第一八〇师、第十三师两度攻袭朱陈之敌，均未得手，仍在原线监视日军。

△　北平伪临时政府决定：池宗墨改任河北伪省长，高凌霨改任天津伪市长，改北平为北京，增设警察总监。

△　日军各部在济南开碰头会讨论徐州作战。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大佐主持，到大本营派遣班桥本群少将、第一军参谋友近美晴中佐、第二军参谋长铃木少将、华北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大佐、临时航空兵团参谋田中友道大佐等人，会期两天。与会者对于徐州作战以歼灭敌人为目的抑以占领要地为目的，以及攻击时间问题有不同意见，未趋一致。

4月18日　　日军向徐州进攻。10日，日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自兖

州抵枣庄，指挥作战，15日决定师团转入攻势，下达作战令。是日拂晓，坂本、长濑两支队自郭里集附近，濑谷支队自峄县附近，分别发起进攻。19日，坂本支队攻入向城，长濑支队向兰陵镇方向进犯，濑谷支队被阻于獐山以东，与周碞第七十五军第六师激战。

△ 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十一周年纪念会，林森号召一定要“在最短期间，把敌人逐出中国，恢复我们的首都，恢复我们全国土地”。

△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 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及川军孙震第四十一军一度攻克韩庄。

△ 福建省政府以不堪敌舰威胁，是日经行政院批准迁永安。

△ 上海闸北四行仓库价值1000万元以上的存货，被日军劫运回国。

4月19日 临沂失陷。晨，日军国崎支队猛攻临沂，至9时城西门及西北角城墙被攻陷。张自忠、庞炳勋部与日军激战终日，于晚间撤离该城，在临沂西南继续抵抗。是役张、庞部伤亡官兵1300余人，国崎支队遗尸2180具。

△ 蒋介石致电慰问第五十九军及第四十军：“两军苦战逾月，迭奏肤功，以战机切迫，未能调回休养补充，至为轸念，仰即转谕慰劳，并体念时艰，以最后之努力，完成两军光荣之战绩为要。”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收复冀南曲周县城。

△ 前外交部长陈友仁自欧返国抵香港，表示拥护抗战建国。

4月20日 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奉第五战区长官部电令，以台（儿庄）潍（县）公路为中心，分别对敌游击、截击。

△　济南日军司令部组织伪山东省长公署，马良任省长，下设总务、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市政、警察七厅，置鲁东、鲁西、鲁南、鲁北四道。

△　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会正式成立。补选王卓然、范文澜、黎锦熙、顾颉刚等人为理事。决议：发动全国战时教育运动，并通电世界教育界，发起反侵略运动。

△　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吴承洛宣称：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地兴建之七处电厂建成。

4月21日　蒋介石到徐州指示作战方略，次日视察台儿庄战场。

△　蒋介石电令第四十六军："着樊崧甫所编野战军团开赴徐州，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参加鲁南作战，限23日前到达。"该军军长为樊崧甫，下辖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第四十九师（师长周士晃）、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樑）。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国防公债条例》，定额国币五亿元。同日公布《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条例》，该公债为收换金类外币、外汇、国外有价证券而发行，定额关金一亿元，英金1000万镑，美金5000万元。

△　国民政府聘请颜惠庆、施肇基、冯炳南、刘瑞恒、徐采丞、朱恒碧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理事，周诒春、汤飞凡、李规庸、汤志雄为监事。

△　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抵车辐山，第一八四师抵台儿庄，同日奉李宗仁电令暂归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指挥。次日，李宗仁复令第六十军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23至24日，第六十军于萧汪、辛庄、东庄、丁家桥、马家窑之线布防。

△　日军第十三师团自蚌埠、怀远渡淮河、涡河北犯。22日，渡

河日军达千余人，与廖磊部血战两日，24日晨退回淮河南岸。

△　日军坂本支队自向城南犯，向岔河镇、四户镇攻击，22日进入泥沟，受到我军反击，陷于苦战，未获进展。

△　第五战区令庞炳勋第四十军开赴郯城整顿，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即转峄对口、黄店一带对敌游击。

△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　左舜生代表中国青年党致函蒋介石、汪精卫，申述该党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同，表示拥护国民党之纲领。24日，蒋、汪复函慰勉。

4月22日　蒋介石通令前方将士，务当再创鲁南来犯之敌。

△　第五十九军复奉第五战区长官部电令，转向长城、四户镇方面，保持重点于右翼，夹击第二十军团当面之敌。

△　卢汉第六十军在台儿庄东北之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与敌遭遇，发生激战，陈瓦房失陷，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守军一个营营长以下500余官兵阵亡。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武乡长乐村获胜后，奋起追击，是日至27日，相继收复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长治等18座县城，将日军逐出晋东南。

△　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桂五率部撤退绥远固阳，日军板垣混合部队附装甲车60辆，配合飞机三架，分途来袭，刘率部迎击。29日，刘桂五在作战时中弹殉职。

△　国民政府转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为达成长期抗战之目的必须一致努力推行兵役制度案》，训令各机关一体遵照。

该案主要内容有：统一健全区乡（镇）保甲组织；迅速确实调查户口，限期举办户籍；公务员、党员应劝勉子弟服任兵役，各级党政机关、学校、法团均应协同兵役宣传，唤起民众乐尽兵役义务；防止办理兵役人员舞弊；除失陷省区及战地外，不得组织游击队及类似组织，以免妨碍役政。

△　国民政府派刘瑞恒、陈其采、宋子良、马锡尔、戴乐仁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　为修筑湘桂铁路南宁至镇南关段，交通部长张嘉璈在河内与法国银行团代表及中国建设银公司正式签定南（宁）镇（南关）铁路借款草约。由法国银行团提供材料款1.2亿法郎及现款3000万法郎。另由法国银行团及中国建设银公司合组中法建筑公司承包该筑路工程，规定二年内完工。

△　财政部公布《商人运货出口及售结外汇办法》，凡五条。

△　伪上海大道市政府改组为上海市政府督办公署，苏锡文任督办。

△　北平伪临时政府在清河设陆军军官学校，齐燮元任校长。

4月23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徐州会战令：第二军尽快开始攻势，在徐州以西作为决战地，并占领徐州；第一军应以有力一部渡过黄河，迅速切断兰封、归德间的陇海线并向归德挺进，与华中派遣军密切配合，使第二军作战顺利进行，另以一部在兰封以西黄河沿岸佯攻牵制敌人；临时航空兵团应以主力协助陇海线地区作战。

△　日军国崎支队主力于攻占临沂后续犯郯城，22日抵大埠，与关麟徵第五十二军一部激战，是日陷大埠并猛攻郯城。

△　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自芜湖北犯，24日渡长江占和县，26日占含山，30日占巢县。

△　马占山部东北挺进军攻入绥远凉城，与日军展开激战后复退出城外。

△　国民政府特任孔祥熙兼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杜月笙、王晓籁、曾镕浦、陈访先、黄伯度为常务委员。

△　国民政府转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于经济部下设立合作事业管理局》、《遴选本党青年同志充任各省县长》、《抗战烈士遗族免费入大中小学求学》各案，训令行政院转饬各部遵照。

△　财政部特准进口大米75万担，以济广东民食，是日首批进口大米运抵广州。

4月24日　　日军濑谷支队自兰陵镇南犯台儿庄东萧汪、后堡地区。卢汉第六十军与敌激战，旅长陈钟书在邢楼殉职。此后，日军逐次进入胡山、禹王山地区，与卢部胶着混战，至26日，日军伤亡达1500余人。直至5月12日，双方仍处于激战中。

△　日本华中派遣军制定徐州作战计划，其要旨为："（一）方针：军与华北方面军相策应，将徐州附近之敌捕捉消灭在徐州以西地区，决战时间大概定为5月中旬；（二）指导要领：军预定于5月5日左右开始前进，根据情况，预期在4月底以后有可能开始进行。"

△　日军第五师团国崎支队沿临沂、郯城大道进犯马头镇，是晨陷郯城，是晚复陷马头镇，关麟徵第五十二军退郯城以南继续抵抗。

△　日军以飞机六架协同步兵向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之碾官庄、连防山、米步、店子、虎皮山一带阵地猛攻，该师奋勇迎击。连防山发生巷战，该师高团全部牺牲，团长高鹏殉国。

△　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自苏北东台北犯，26日陷盐城。

△　四川省70余县民众代表到重庆，向行政院吁请废除苛捐杂税。

4月25日　陈诚电蒋介石报告鲁南战场情况，略称：鲁南会战指挥混乱，第七十五军第十三师吴良琛部“参战未及兼旬，八易指挥”，“建制过于分割，征调实觉频繁”，以致牺牲甚重。第六师张琪部，自4月22日至25日晨，日军对该师正面红家庄、前城之线昼夜猛攻，官兵牺牲殆尽，每连只剩战斗兵20余名，上尉以上军官只余六名，全师共存残部二营余，中级以下干部伤亡殆尽。“若非加以整理，恐难达成任务”。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收复晋北山阴，另一部在绥南凉城县厂汉营，随后又在该县香火地争取伪军及保安队共千余人反正。

4月26日　国民政府训令各机关及学校于抗战期间每日工作时间增为10小时以上。

△　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员“冒充伤兵入川”。

△　樊崧甫率第四十六军军部自潼关抵达鲁南侯家集（陇海线东段炮车车站西15公里）。次日，白崇禧以庞炳勋所部第三十九师败退红花埠，电令樊指挥该军第九十二师沿运河布防。

△　章伯钧代表第三党撰文《我们对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一文，希望“将抗战建国纲领变成指导全国人民意志和行动的活的纲领”，而不能“长期的停留在原则的宣传阶段”。

△　军事委员会通电各战区，详列本月18日至20日日军在芜湖、溧阳、宜兴、繁昌、荻港等地大量施放毒物、毒气及军民受害情况，令各战区注意防范。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所部第三八五旅陈锡联第

六七九团、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韩先楚第六八九团及曾国华第五支队开赴冀南，5月2日到达。

△　赈济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原行政院难民救济会及内政部所属各救济机构均合并于该会，孔祥熙所兼委员长旋经行政院令派许世英代理。该会委员除原任命九人外，另又聘任委员70余人。

△　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电告林森，捐助国币200万元，作为创设抗战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育费用。

4月27日　蒋介石为防止鲁南战场各军久战之后精神弛缓贻误战局，电李宗仁并转所属各总司令、各军团长、各军长、师长，严令所属“以最后五分钟坚忍之精神”，“不得稍堕志气放弃任务，致干罪戾”。并谓：“本委员长决本信赏必罚用达民族复兴之目的，望各勉之。”

△　国民政府特派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副主任，王缵绪为四川省府代理主席；胡世泽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二十三届禁烟会议代表。

△　《时事新报》自上海迁重庆复刊。

△　日本政府与北平伪临时政府订立《政治技术指导协定》，规定由日本派顾问辅佐官掌握政治指导权。

△　日军在长江口枪击英商怡和公司“通和号”轮，重伤中国水手一人，并将该轮扣留36小时。

4月28日　蒋介石对国际反侵略大会代表、法国《巴黎晚报》记者色斯谈话指出：中国“党派之争，现已不复存在，国民政府在孙总理各项原则不受破坏下，愿与各党派携手合作，以对付共同敌人”。又谓：“日军业已变更战略，足证中国军队抗战之烈，实非日本始料所及，长此以往，日本已无获胜把握，至就吾方而言，则天然资源与人力接济，均极充足，当可抵抗到底。”

△　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陆军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统率第一五五师陈公侠部、第一八七师彭林生部北上增援，与第六十六军叶肇所率粤军第一五九师谭邃部、第一六〇师华振中部，一同参加中原会议、武汉会战。

△　白崇禧电樊崧甫，告以日军侧攻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现抽出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归还第四十六军建制，着速率第二十八、九十二两师向郯城马头镇前进驰援。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陵基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

△　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因濑谷支队在台儿庄北被孙连仲部所阻，乃令配属该师团之第十九旅团长草场辰已少将组成草场支队，在濑谷支队右侧向台儿庄以西推进。30日，草场支队向峄县西南白山地区进攻，为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优势兵力所阻，至5月3日无法进展。9日，草场支队解除第十师团之配属，仍归第十六师团长指挥，向济宁方向撤退。

△　日机炸徐州，投弹百余枚，平民死伤百余人。

△　新四军军部为向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于下旬成立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是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自岩寺西北潜口出发，6月上旬进入苏南战场。

△　国立武汉大学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

4月29日　武汉空战告捷。日机36架空袭武汉，苏联志愿空军与我国空军机队起飞迎战，击落日机21架，我损失飞机二架。空军飞行员陈怀民以负伤之坐机猛撞日机，与日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此次空战同时牺牲的飞行员还有张效贤、杨慎贤、孙金鉴。5月4日，蒋介石致电武汉市国民党党部祝贺空战告捷。

△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取消党内派别小组织。略谓：“方今寇

患方殷，内忧未已，而本党适已改制，领导有人，时势既殊，步伐宜齐，嗣后本党内再不得有所谓派别小组织，举凡以前种种小组织，应一律取消”，“如有阳奉阴违或固执不改，定予从严制裁，以肃党纪。”

△　日军第二方面军下达徐州作战之准备命令，其要旨为：“（一）军企图早日击败徐州方面之敌军，占领徐州。（二）第五、第十师团要确保现在进入线附近的要地，随时粉碎敌之反击，并准备进攻。（三）第十六师团集结于曲阜、济宁附近准备前进。（四）第一一四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继续执行现在军后方地区的警备任务，同时计划和准备随第一线兵团的前进而推进警备地区。”

△　日军国崎支队于陷郯城后西犯北劳沟地区，被关麟徵部包围，粮弹缺乏，伤亡惨重。是日，第五师团长板垣进入郯城，调片桐支队、大槻　部队及留守胶济路之四个中队增援国崎支队，直至5月11日仍与关部胶着混战，日军以伤亡太大，放弃北劳沟地区。是役，日军仅第四十一、四十二两联队伤亡即达1411人。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克冀西涞水，另一部克涿县，歼灭日军3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第三八六旅在邢台西歼灭汉奸申国栋、曹桂芝部百余人。

△　国民政府训令直属各机关：嗣后各机关团体，非经行政院核准，不得擅自派员向海外侨胞募集捐款或征集物品。

4月30日　蒋介石函勉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与当地官民合作抗敌，略谓：“本党各县地方之党委党员，奉行主义，许身党国，处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冒险犯难，应以牺牲为天下倡；务当格外奋发，勇往直前，一切动员抗敌事宜，必须与当地官民通力合作”；“对于地方公正贤明负有声望之绅耆，尤应倾诚推重，敦请主持，号召民众，共同抗敌。”

△　日机六架袭福建长汀，投弹10余枚，炸毁迁至该地之厦门大学。

△　经济部农本局在川、黔、湘、桂增设合作金库，资金约200万元。

△　东久迩宫稔彦王接替西尾寿造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5月5日抵济南就任。

△　侵华日军舰队总司令长谷川调任横须贺海军基地司令官，东京海军航空署长及川甲子郎继任侵华日本舰队总司令。

是月　　军事委员会制定《非常时期各省军管区组织大纲》，规定：军管区司令以省主席兼任为原则，必要时得以驻省之绥靖主任兼司令，省主席兼副司令；军管区直隶军政部，并增设兵役及国民军训二处。

△　行政院公布：自“七七”抗战至是月底，侨民献金总额计国币1370万余元，港币1.5万余元，英币4000余镑，美金1.5万余元，荷币800盾，暹币180余铢。

△　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成立。该公司为国家资本垄断国货市场之独占机构，下设各地分公司及新加坡中国国货商行。

△　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萧瑞臣为河南省伪省长。

△　日本创设中支蚕丝组合，资本300万元，垄断中国沦陷区蚕丝业。后因收益不大，又在江苏无锡组织惠民公司，以低价强收丝茧。

5月

5月1日　　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成立，陈诚、陈立夫、贺衷寒、万耀煌等为委员，筹设中央训练团。

△　樊崧甫第四十六军黄国梁第九十二师上月28日在郯城狼子湖与自临沂南下之日军第五师团激战，敌我双方各占狼子湖之半。至是日，敌军共发动三次攻击，我军阻击，卒将敌击退。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震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为副总司令。

△　战时临时儿童保育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到会讲话。

△　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在聊城创刊。

△　北平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抵日本，次日与日首相近卫商谈南北伪政权合并事。近卫表示：日本决不与蒋介石谈判和平。

5月2日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实施《出口贸易外汇集中办法》，所有出口贸易外汇，一律归中国、交通两行购进，转中央银行承受。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对中央社记者谈国民党宣传方针四项原则：一、以民族精神对抗强敌；二、以民主制度集中国力；三、以国防计划建设经济；四、以科学原理健全思想。

△　日本首相近卫在地方长官会议上演说，宣称："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反共政权。"

5月3日　　行政院举行第三六一次会议，议决："台儿庄一役，孙总司令连仲指挥所部，固守该地各村落，沉着应战，予敌重创，使友军达成包围任务。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军队，迂回枣、峄等处，侧击敌军，获取胜利之基础。该总司令、军团长忠勇奋发，指挥恰当，应呈请国府，明令颁给青天白日勋章，以昭懋赏，而资鼓励。"

△　国民政府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嗣后后方报纸凡登

载沦陷区同胞附逆消息，“务须力求翔实，自非参加伪组织及附逆有据者，勿得率加伪逆之名。其有靦颜事仇、自残同气者，是自绝于国人，除尽法严捕以惩奸顽外，尤当暴其罪状，勿使清议为之混淆，庶几是非明而邪慝不作”。是日训令直属各机关遵照。

△　国民政府颁布《审计法》，凡五章56条，规定“中华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依本法之规定”。审计职权为：“一、监督预算之执行；二、核定收支命令；三、审核预算、决算；四、稽察财政上之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文田为第二十七军团副军团长。

△　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克当涂。

△　日、英在东京签订《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规定将中国日占区海关所有税收悉存日本横滨正金银行。6日，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牒英外交部，声明中国绝不受英国与日寇所定办法之束缚，保留中国在海关事件上行动之完全权利与自由。

5月4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发布《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新四军主力在苏南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以茅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致电广东省军政机关，略谓：奉蒋介石手谕，对于当前时局，应作如下认识：一、台儿庄之役，仅为第二期抗战中初步胜利，切戒闻胜而骄，方能遇挫不馁；二、长期抗战，端在消耗敌人力量，以争取最后胜利，勿因一城一市之得失，而影响持久抗战之心理；三、本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具有重大意义。务须尽力阐扬；四、宣传宜重实际，勿作过分夸张；五、责难敌人，应限于日本军阀，对于日本皇室及民众，勿擅加攻击。

△　国民政府任命李宏锟为重庆市市长；派李平衡为出席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国民政府第一代表，林康侯为雇主代表，朱学范为劳工代表。

△　四川省北川、天府、中福三公司联合开发川北煤矿，资本220万元。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报《抗战文艺》（三日刊）在汉口创刊，由孔罗荪、姚蓬子、楼适夷、冯乃超等主编。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为攫取华北资源，拟定《华北开发方案》，设立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交北平伪临时政府遵照采行。

△　法国52个团体为援助中国抗战，发起组织中国人民之友联合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为此致函表示感谢。

5月5日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办法。30日，斯大林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军火交换中国之茶叶、羊毛、生皮、锡、锑等货物。

△　毛泽东会见卡尔逊。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

△　日本华中派遣军徐州作战部队主力开始北犯，第九师团沿北淝河南岸向板桥集前进。10日进入板桥。第十三师团沿涡河西岸北犯，6日陷龙亢，8日在飞机配合下猛攻蒙城，与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一部血战。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第三四三旅与第一二〇师一部，在山西汾阳、离石间截击日军，毙敌百余，击毁汽车40余辆，并击溃汾阳援军300余名。

△　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千余人攻陷濮县、范县。山东第六区

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率部在范县痛击敌人，将其逐出范县，旋又包围濮县日军。

△　伪冀察保安司令杨振兰率部2000余人通电反正。

△　德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汉口，赠送中国药品400余箱。

5月6日　　日本华中派遣军令担任南京周围警备任务之第三师团迅速向蚌埠、怀远地区集结，参加徐州会战。

△　南京伪维新政府所派江海关监督李建南通知税务司，接管上海海关。全体华籍关员一致反对，于7日举行罢工，并组织上海海关华籍职工保卫海关协会，决心为保卫海关奋斗到底，并派员赴汉口向财政部报告。

5月7日　　日军第二军下达徐州会战令：其要旨如下："（一）第十六师团5月9日从济宁附近出发，击败当面之敌，首先迅速进入砀山、唐寨方面。（二）第十师团扣住当面之敌，随着作战的进展，准备逐步向临城附近转进。（三）第五师团扣住当面之敌，随着作战的进展，准备向徐州东面地区前进。（四）随着第十六师团的前进，变更警备地区。"

△　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自盐城北犯，是日陷阜宁。9日，蒋介石电斥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略称："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

△　行政院拨款15万元，派战区赈济专员曹仲植救济台儿庄战区难民。曹仲植称：中央为纪念台儿庄大捷，准备改建台儿庄为模范市。据曹统计，台儿庄原有居民二万，战后仅余六人，其中五人为妇女，一人为85岁之老翁。

△　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李福和为皇协军第一路总司令。

5月8日　徐向前率领东进的八路军袭威县，毙敌伪500余人。同日，另一部攻克南和县。

△　王铭章师长灵柩运抵武汉。武汉各界6000余人在汉口大智门车站隆重举行公祭，蒋介石派铨叙厅厅长吴思豫代为宣读祭文，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市长吴国桢及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等均往参加迎灵和公祭仪式。公祭后，全体群众送王铭章遗像至汉口市总商会大礼堂，送灵队伍延长数里。11日至14日，由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学校分别公祭，15日，灵柩运川。

△　毛泽东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讲话，希望工农迅速组织起来，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　凌晨，重庆临江门码头大火，延烧沿江一带房屋达七小时之久，被焚7000余家，无家可归者三万人，死伤百人以上，损失不下200万元。

5月9日　蒙城失陷，日第十三师团自涡河西岸地区向蒙城进犯，突破第四十八军第一七三师数道防线，进入蒙城。该师副师长周元及以下官兵2000人壮烈牺牲，日军亦伤亡千余人。旋敌继续向北前进，廖磊率部西撤。第五战区调冯治安第七十七军自徐州到宿县阻敌北上。

△　国民政府令：对于逃亡士兵，无论前方后方，一律以敌前逃亡论罪，并从重科刑。

5月10日　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飞抵汉口。蒋介石、陈诚以陇海线战局紧张，面命该军即调开封、归德，星夜驰援。12日，蒋介石以前方军情紧急，又面谕李即晚率队向商丘输送。

△　日本大本营下令抽调关东军混成第三旅团（旅长田村原一少

将）、混成第十三旅团（旅团长森田正范少将）编入华北方面军，参加徐州作战。

△　国民政府以孙连仲、汤恩伯在台儿庄作战有功，明令颁给青天白日勋章。

△　第一、五战区变更作战地境，所有原属第五战区之鲁西、豫东部队均改归第一战区指挥。

△　日机五次袭徐州，投弹200余枚，毁房4000余间，死伤民众300余人。

△　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行政院第一〇一届大会发言，要求国联将盟约第十七条付诸实施，并向国联提出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之姓名。14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案，敦促各会员国尽最大之努力，实行大会及行政院各决议案，并对日本使用毒气作战方法提出警告。

△　王克敏与日各界首脑会谈完毕，是日自东京回国。

△　南京伪维新政府江苏省长公署在苏州成立，日人鹰亭为高等顾问。

△　北平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恢复北京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及艺术学院，鲍鉴清、庞敦敏、王石之分任院长。

5月11日　　蒋介石以日军于陷蒙城后向徐州作包围运动，电程潜、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作如下部署：第五战区应对鲁南之敌暂取守势，以优势兵力先行击灭超越淮河之敌；第一战区应集中精锐兵团击灭侵入鲁西之敌；刘汝明军应转向津浦南段，以期迅速击破敌人；调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指挥黄杰第八军、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宋希濂第七十一军，以消灭鲁西日军主力；其原在鲁西各部均交孙桐萱、商震指挥，

担任迟滞敌人及固守沛县、鱼台、金乡、巨野、菏泽各点掩护攻势兵团之集中与展开。

△　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奉调北上，是日由安徽屯溪抵汉口，次日谒蒋介石，旋经郑州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请示方略后，于12日夜至商丘，开始指挥作战。

△　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说抗战的必胜是有把握的。12日，为施方白题写赠言。

△　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酒井支队为掩护该团主力渡黄河，于上月28日由新乡出发，是月8日在济宁集结，是日攻陷郓城，李必蕃第二十三师撤守菏泽。

△　日机七批轰炸徐州，投弹200枚，毁房千余间，死伤民众百余人。

△　厦门失陷。10日晨4时，日机18架配合舰艇11艘猛炸厦门附近何厝一带，日军随即乘汽艇30余艘在五通登陆，何厝、江头、禾山相继失陷。是晨，日军、日舰配合猛攻白石、胡里山、盘石三炮台，守军伤亡惨重，下午4时，厦门失陷。

△　武汉警备司令部枪决日特汉奸周华山。

5月12日　蒋介石自汉口赴郑州部署军事。

△　蒋介石电令李宗仁调整作战部署："（一）国军决先击灭淮北及鲁西之敌。（二）鲁南方面在敌抽调兵力转用鲁西之情况下，除应以有力部队增强右翼防敌包围外，须即刻设法抽出三四师兵力位置徐州，为该战区预备队，必要时用于蒙城方面之攻势。（三）鲁南方面即决心取守势，于必要时依运河逐次抵抗，至不得已时则固守徐州国防工事线，以获得攻势方面决胜之时间。（四）总之五战区第一任务在击灭蒙城方面之敌，使全盘态势有利，否则保有鲁南阵地亦属无

益。希当机立断，速决实行具报。”

△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等，指出：我们首先应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我们的目的是，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

△　日军第九、第十三师团陷永城。第十三师团岩仲机械化挺进队炸毁陇海路李庄铁桥，次日占领黄口车站。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铁军为第一军军长。

△　郓城陷后，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奉李宗仁命驰赴曹县指挥鲁西各军还击南下之敌，是日到达曹县，尚未部署停当，永城即陷于敌手，徐州顿受威胁。李宗仁复命李品仙即日赶赴皖西指挥皖中各军防敌西进，并掩护第五战区各军向平汉线撤退。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各专门委员会经过调整，归并为法制、财政、经济、教育、外交五个专门委员会，王世杰、徐堪、陈公博、邵力子、王宠惠分任主任委员；甘乃光、彭学沛、萧铮、段锡朋、周鲠生分任副主任委员。

△　国民政府特任杨杰为驻苏大使，原任蒋廷黻免职。

△　吕正操所部华北人民自卫军收复青县。

△　日机54架炸徐州，18架炸郑州，郑州34条街巷被毁，死伤百余人。

△　绥远凉城伪军团长慕新亚率部1200余人通电反正。16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复电慰勉。

△　德与伪满洲国修好条约在柏林正式签字，决定建立外交关

系，互派领事，并继续商订通商条约。

5月13日　第五战区长官部在台儿庄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团长及有关各军长开会，军令部次长林蔚、该部第一厅厅长刘斐传达了蒋介石调整作战部署的命令，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李宗仁发表孙连仲、于学忠为鲁南兵团总、副指挥官，汤恩伯、刘汝明为陇海兵团总、副指挥官，韩德勤为苏北兵团总指挥官，廖磊为淮北兵团总指挥官，李品仙为淮南兵团总指挥官。并指示如陇海路被截断时，鲁南兵团在陇海兵团与淮北兵团掩护下由永城、蒙城间向太和、亳州转进。

△　合肥失陷。月初，徐源泉第二十六集团军由合肥向东侧击津浦线之日军，日军第六师团反攻，是日陷合肥。29日，陈诚电蒋介石陈述合肥失陷经过，略称：攻城日军不过两千，守城之宋世科第一九九师出现叛军，一触即溃，军长徐源泉、师长徐继武害怕牺牲，仓促逃命，参谋长张恩全指挥无方，为合肥失陷之主因。

△　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上官云相，抗议该军余宗陈部阻止新四军先遣支队北上抗日。

△　八路军一部袭占北平、昌平间之橐桥镇，俘伪军百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晋北崞县田家庄与日军激战，毙敌百余，烧毁火车三辆。

△　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关税、盐税、统税协定。

△　德国政府下令其在华军事顾问回国。是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告法肯豪森等：“迅速准备回国，一切旅费均由政府负担。”

5月14日　蒋介石以日军逼近陇海线，但兵力不足而深入重地，为我歼敌良机，是日电李宗仁、白崇禧指示陇海线防卫，略谓：“刻

已另调两军向东，如鲁南汤部亦能如计抽调三四师由东向西，则必操胜算。而我淮北各部不顾一切，努力向北压迫，更为急要，务望兄等督励所部完成使命，中必在此主持一切，为兄等解除一切顾虑，中决不负我袍泽，请为我转达于全体将士为幸。”

△　李品仙率第十一集团军总部经归德、亳县、阜阳，是日返抵六安，当即接获统帅部电报，谓据报徐源泉军已放弃合肥，令查明情况着速回报。旋又接获第七军军长张淦电报，称合肥已为日军占领，徐军去向不明，无法联络，请示行动办法。李乃令第七军主力速取道向合肥以西之大蜀山附近占领阵地，阻敌西进，另留置田家庵之一师即退至寿县附近防守，同时将徐军擅自退避情形回报统帅部。

△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总部、北方局等，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等在集合更多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对八路军的谣言。

△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平绥路以北，沿绥远省境内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南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

△　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自岩寺出发，挺进江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是日抵安徽泾县茂林镇，6月14日到达茅山。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攻占晋北定襄县高城村，毙敌百余。另一部袭北场村，击毁汽车10辆，获汽车三辆。

△　日军第十四师团在濮县城南董口强渡黄河，进袭兰封，企图阻断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西撤后路，是日陷菏泽，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殉职。

△　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自济宁西犯，是日陷金乡、鱼台，孙桐萱部无险可守，节节撤退。

△　日军第二军令第十师团将台儿庄附近兵力交第五、第一一四师团指挥，主力迅速集中于夏镇（今微山县城），西渡微山湖。15日夜开始渡湖，次晨在对岸登陆。

△　日机70余架狂炸徐州，交通银行、花园饭店、伤兵医院、电灯厂、邮政局中弹，火药库、动员日报馆化为灰烬，东北北关一带几成平地，民众死伤700余人。

△　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抵归德，即晤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讨论陇海线形势。

△　国际反侵略大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加紧援助中国，呼吁各国加紧抵制日货，停止对日供应军火。该会并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日表示支持。

5月15日　徐州前线各部奉命突围。为摆脱徐州会战不利态势，最高统帅部决定：除留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苏北，第六十九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鲁中坚持外，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是日起向西南转移，以刘汝明第六十八军为掩护，其余各部分五路突围：一、李宗仁长官司令部及廖磊集团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县折向西南，于界沟过涡河封锁线；二、汤恩伯部及机械化兵团由陇海路运河车站向西推进，于符离集北越过津浦路，突破宿县、永城封锁线，在涡阳突破涡河封锁线；三、孙连仲部及张自忠部由台儿庄向西南退却，自徐州南越过萧县以西封锁线，在永城附近突破封锁线；四、关麟徵部及川军一部由徐州越陇海路，向西北退却，突破黄口、李庄封锁线；五、孙震部由津浦路柳泉向东南退却，越陇海路，经泗县折西南行，在固镇、蚌埠间过津浦路，于怀远以西突破涡河封锁线。下旬，各军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

△　关麟徵第五十二军及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自徐州向西突围，于夜11时许行抵李庄附近宿营。其时，日军进攻徐州之先头部队香月部3000余人，附装甲汽车50余辆、坦克30余辆，已进犯至李庄，准备向东进击。次日凌晨，与关军发生遭遇战，双方激战至天明，敌不支溃退，关军遂突破封锁线继续向西撤退。是役共毙伤敌千余人，内有联队长仓田一人，中队长一人，击毁战车14辆。

△　日军第五师团自郯城西向徐州东南面追击，17日在运河附近遭到阻击，至19日主力进入宿县境，向宿县东北地区追击。

△　日机百架狂炸徐州市区。同日，广州、福州、开封、兰封、民权等地亦被炸。

△　上海《时报》载：自抗战以来，上海内迁工厂达152家。日军已宣布将华中盘踞区内之我国公私工厂一律没收。现被敌接收之工厂计有江南造船厂、龙华水泥厂、龙潭水泥厂、上海五大面粉厂、浦口化工厂等。

5月16日　　陈诚在汉口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使用毒气、毒物残害中国军民的罪行。

△　张淦第七军主力到达合肥附近大蜀山，与日军接战，歼灭敌之一部，占领大蜀山。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所部在冀南南宫东南张马、甘狼冢一带粉碎六离会万余人的进攻。

△　军令部长徐永昌电聂荣臻嘉奖晋察冀军区八路军。

△　新四军高敬亭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江北首战告捷。

5月17日　　日军炮击徐州城，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弹。晚7

时，李宗仁率司令部自徐州突围。21日，经宿县安抵涡阳。

△　汤恩伯部掩护机械化重炮队自运河东撤，担任中路突围任务，18日夜，横穿津浦铁路，秘密通过宿县、永城封锁线，至20日晨，安全突过浍河，到达指定地点。

△　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

△　孙科自巴黎返抵莫斯科，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部委员莫洛托夫，次日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接见，29日返回巴黎。

△　前北京政府总统曹锟在天津病故，6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　重庆市人力车夫数千人罢工，反对车行增加车租。

5月18日　蒋介石在郑州令第二十七军、七十一军由兰封向东扫荡仪封一带之敌；令薛岳率豫东兵团主力由归德向西夹击日军第十四师团，留置一部于砀山、归德一带迟滞敌主力之西进；另令第二十集团军商震向东侧击敌人。

△　日军迫近徐州，掩护部队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在陇海线两侧与日军不断发生激战，徐州城内及归德、徐州间车站、桥梁尽被日军炸毁，第一、五战区各部队均按计划先后撤离。

△　日军第九师团陷萧县城，县长王雪琴殉职。守军第九十三军第一三九师突围。

△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任期届满，行政院改聘蔡元培等27人为该院理事。

△　四川省政府决定成渝铁路续征股本200万元。

5月19日　　徐州会战结束。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于是日放弃徐州。徐州会战结束。旋蒋介石以刘汝明部掩护撤退有功，特电嘉奖，并对最后撤离战区、沿途与日军作战迭获胜利并掩护各军之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奖洋三万元。

△　日军第十三师团自永城向徐州突进，17日占霸王山，是日进入徐州。

△　沛县失陷。日军第十师团渡微山湖后，以一部攻沛县。是晨第四十军与敌遭遇，军长庞炳勋与师长马法五被围，旅长朱家麟自戕，沛县失陷。25日，该军突围至商丘县境，伤亡惨重，余枪不及2000，4000新兵逃亡过半。

△　薛岳以确保陇海、徐郑间交通，策应第五战区作战，是日在商丘部署兰封会战。其要旨为：一、令李汉魂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领第六十四军及第七十四军向旧考城、民权一线前进；二、宋希濂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领第七十一军及王敬久第二十七军确保民权、兰封交通；三、关麟徵第五十二军置于柳河附近为总预备队；四、预定于21日拂晓开始总攻击，夹击敌于旧考城、民权、兰封、考城间而歼灭之。同时并电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确保单县、城武、定陶、曹县诸要点，掩护攻击军之安全。并令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及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截断敌归路。

△　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昇、副队长佟彦博各驾飞机一架，自宁波夜飞日本长崎、佐世保散发《告日本国民书》等六种共120万份传单。次日上午11时返回汉口，武汉各界千余人举行大会，欢迎徐、佟胜利归来。

△　日军第十四师团在兰封东南方遭受从考城及内黄西南面宋希濂第七十八军攻击，自晨至午激战数小时。

△　日军第三师团自南坪镇北渡浍河犯宿县，与廖磊部激战，是

日陷宿县，廖磊部向阜阳一带撤退。

△　日军森田支队沿津浦路北上，是日攻陷固镇。

△　上海复社所编《鲁迅全集》开始预约发售。全集由蔡元培、茅盾、许广平、许寿裳等编辑，蔡元培作序，许寿裳撰年谱。全书计500万字，插图200余幅，32开本，精装20册。6月开始出书，8月出齐。

5月20日　徐州会战各参战部队已全部撤至安全地区，并以一部沿陇海路阻击日军。东京、南京、北平、天津各地日军先后大肆庆祝攻占徐州，并宣称：中国政府今后必归屈服。

△　第十军团谭道源部自徐州突围后，经两日行军，是日转战尹集，与向宿县推进之日军第五师团国崎支队铃木大队遭遇，军团司令部被袭击，军团长谭道源化装脱险，其副官被俘后死亡，因其貌似谭，日人误为谭道源阵亡。

△　日海军在连云港登陆，进入市内。

△　宋美龄邀集全国各党派妇女领袖50余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会期五日，25日结束。决定成立全国妇女团体总机构，制定《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纲》，号召全国妇女奋起救国。会议期间，邓颖超、孟庆树联名作《我们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

5月21日　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联名密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转呈蒋介石（时在郑州），部署皖北、鲁南撤退、阻敌西侵作战计划，其要点为：“一、应迅速结束鲁西作战，免为敌算。二、以皖北、鲁南、鲁西作战军，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一面以寿县、董家集、涡阳、亳县、归德、考城为游击据点，并定计划在此线以东地方扩大积极游击战，迟滞敌之前进及掩护尔后之作战。第五战

区应积极规复合肥、蒙城，至少亦须阻止该方面之敌不得西进，一面以主力军向固始、新蔡、确山、罗山三角地域，以有力兵团向扶沟、开封、许昌三角地域撤退。以一部向周家口撤退，准备尔后之作战。三、令陈诚卫戍总司令速布长江、大别山脉之防，布防重点置于武胜关方面。四、令第三战区除牵制当面之敌不得他移外，尽量抽转兵力协助江防并北渡作战。五、如敌打通津浦线后向西方豕突冒进，应开放确山、许昌间平汉线，以上记之一部向豫西撤退，吸引多数敌兵于同方面由南北夹击之。若敌专向信阳、郑州一方突进时则由南北互相策应以击其背，用符长期作战方针。”

△　兰封会战开始。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由菏泽进入内黄地区，准备进攻兰封。薛岳部于野鸡岗、内黄一带布置歼敌。是日，第六十四、七十四两军合击该敌，克内黄。日军一部袭铁道北毛姑砦，主力转犯西南马道府，与第二十七军一部激战，陷罗王车站。第二十、二十二、三十九师各一部夜袭考城西土山集日军司令部。

△　蒋介石派西南行营参谋长程泽润赴广州，会晤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副总司令香翰屏、广东省府主席吴铁城，商讨保卫华南计划。

△　驻华德使陶德曼通知外交部长王宠惠，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5月22日　陈诚在武汉接见外国记者，略谓：徐州为敌占据，并非我方失败，乃纯系我军战略上自动之撤退；徐州一战，非为决战，仅为持久战中之一阶段；失陷一城，并不能解决中日问题，而益将增强我抗战之信心。

△　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慰问在19日驾机前往日本长崎、佐世保散发传单胜利归来的中国空军一队。

△　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电蒋介石，报告徐州会战及突围情况，略称：该军在临、郯战役死伤逾6000人，所余战斗兵不满3000人，后在沛县被敌包围，在突围时朱家麟旅长阵亡，电台被炸毁，九万元经费全部被敌劫去，请先借若干，以应急需。

△　日军一部由陈留口渡河与第十四师团会合，控制该口为日军补给线。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对记者宣称："徐州被我攻陷，但战争并未因此停止"，并表示下一步将进攻汉口，然后进击重庆或昆明。

5月23日　兰封失陷。薛岳兵团各部连日在兰封附近追逐堵截日军第十四师团。是夜，该敌一部乘兰封守军沈克第一〇六师之不备，攻占兰封。

△　福建省政府发行民国二十七年短期库券90万元。

5月24日　李宗仁率部抵皖北阜阳，设总司令部，收集徐州突围各部队。

△　蒋介石派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指挥在归德地区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庞炳勋第四十军、黄杰第八军、李延年第二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及罗奇、李英各师。

△　李汉魂奉薛岳令受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当即将所属各部部署为三路：一、中央军为桂永清第二十七军统李良荣第四十六师、沈克第一〇六师，宋希濂第七十一军辖蒋伏生第三十六师、钟松第六十一师；二、右翼军为俞济时第七十四军率沈友藻第八十七师、龙慕韩第八十八师；三、左翼军由李汉魂自兼，领陈公侠第一五五师、冯圣法第五十八师，统一指挥，负责陇海线内黄、仪封、兰封一带军事。

△　日军第十六师团自徐州进陷砀山，黄杰部西撤。

△　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由汉口抵广州，与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商谈稳定金融办法。

△　福建安漳各县旅厦同乡会鼓浪屿分会电呈蒋介石，控告厦门市官吏通敌及弃城逃匿罪行，略称：日特侦悉第七十五师与第八十师调防，乘机策划在押汉奸300余人反监及台湾籍壮丁叛变。水上警察大队长邱铮通敌，自焚警艇与敌联络。公安局长沈觐康临阵退缩，市长高秋弃城逃匿，致使厦门失陷。要求枪毙邱、沈、高等人并尽快收复厦门。

△　王克敏抵济南，同寺内寿一商讨南北两伪政权合并问题。

5月25日　薛岳兵团拟以优势兵力全歼聚集兰封及周围地区之日军第十四师团，晨4时开始总攻，第七十一军主攻兰封，第一军、六十四军、七十四军、新三十五师各部围歼兰封周围之敌。第一五五师、五十八师在罗王砦及罗王车站与日军激战。同日，蒋介石严令限本晚9时攻克各要点，每师赏银5000元；攻击不力者严办。

△　蒋介石由郑州回汉口，在车上分析全盘战局，决定“敌如大举攻武汉，或并粤汉，吾皆应有准备。有利则固守进攻，否则暂时避战，与敌作持久战，盖敌惟求速战速决，我能与之持久周旋，彼即失败，我即胜利”。

△　安藤利吉中将继板垣征四郎任日第五师团长。

△　潘公展在《民意》周刊发表《拥护领袖有绝对性》一文，称：“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是一句有“阴谋”的口号，“仿佛是说，如果领袖抗战到底，就拥护他；反之就不拥护”。认为拥护领袖“要像德国人之拥护希特勒，意人之拥护墨索里尼”。

△　《战时文化》半月刊在武汉创刊，张申府主编。

5月26日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至6月3日结束。讲演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得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及“战争是持久的”正确结论；预见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即：一、战略防御阶段；二、战略相持阶段；三、战略反攻阶段；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　国民党中央革命勋绩审查委员会在重庆开始办公，推选林森为主任委员。

△　第一、五战区遵蒋介石令，以归德、亳县、阜阳、颍上为据点，构成第一道防线，以开封、扶沟、周口、潢州为据点，构成第二道防线，阻止西犯日军。

△　国民政府任命屈映光为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派王缵绪兼代四川省保安司令。

△　军令部何成璞向军事委员会建议在河南考城以西决黄河堤，以阻止日军进攻。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韩先楚第六八九团、曾国华第五支队、第一二九师东纵二团在临清附近消灭伪军张殿卿、冯午桥部千余人。

△　周恩来致信《大公报》采访主任范长江，对战地记者表示关切。后于6月7日、11日又两次致信范长江表示关切。

△　日军第十六师团混成第三旅团自鱼台南犯，是日陷虞城。

△　国际反侵略大会代表毛那抵汉口，次日发表广播讲话，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主张“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杉山陆相和广田外相退出内阁。任命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为外相，前日本银行总裁池田成彬为藏相兼工商相，法西斯皇道派军人、前陆相荒木贞夫为文相，主张不扩大中日事变的板垣征四郎为陆相，完成了恢复和谈的体制。

5月27日　宋希濂军克兰封，李汉魂军克罗王车站，陇海铁路恢复交通，火车42列安全西撤至郑州。至此，日军主力被薛岳兵团迟滞在豫东之归德、兰封一带，以便第五战区主力乘隙安全撤退至皖西和豫南地区。

△　蒋介石委薛岳为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仍指挥李汉魂、俞济时、宋希濂各军及桂永清第二十七军、李铁军第一军。

△　俞济时军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以陇海线作战调动10余师之众，竟未能歼灭敌第十四师团一事，电蒋介石陈述原因，指出陇海线战事存在谍报夸大敌情；互相推诿，不肯向前；纵横联络太差；秩序异常紊乱；视敌如虎，致机会常失；未分追击与堵截，常失重要据点等项缺点。并谓：“以上各点，如不亟予改正，终归失败。”

△　军事委员会密令颁布《后方勤务部组织条例》，规定该部承军事委员长之命，并受参谋总长之指挥，综理全国作战部队兵站攸关之一切事宜。该部设参谋、秘书、副官、运输、汽车管理、经理、军械、卫生各处，并随战争之推移设立各地兵站。

△　国民政府令免吴鼎昌、蒋作宾、俞飞鹏、徐廷瑚农本局理事职，派翁文灏、何键、谢家声、邹琳、何廉继任。

△　东北抗日联军猛攻伪三江省宝庆、同江，日军指挥官久保安三郎被击毙。

△　中国代表王海镜在世界和平大会上提出报告书，揭露日军侵

华罪行，要求世界各国抵制日货，禁止各种原料运日。

5月28日　蒋介石电令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等开展游击战："着樊军长指挥所部、周暑指挥吴良琛、王文彦及其他零星部队依情况以游击之目的分途向铁路以西转进，否则断然分向大江以南并苏鲁边区及津浦南段游击，牵制并吸引敌人。"着韩德勤副总司令仍指挥缪瀛流军，实行分区游击。

△　日机71架分三批狂炸广州市区，共投弹50余枚，毁房600余间，炸死民众600余，伤近千人。次日，日机36架分两批袭广州，炸毁学校、民房300余间，死伤民众500余人。30日，日机再袭广州，炸死民众400余人，伤700余人。

△　财政部禁止铜币出口，违者以汉奸论处。

△　广州丝业研究所主席吴谷五暨全体丝商致电财政部，称：自财政部统制生丝出口外汇后，广东丝商亏损不下20万元，现行价格不敷成本，如不改变，势必生产减缩，影响全局。吁请政府对于粤省出口生丝每担补助国币100元，出口废丝每担补助20元。

5月29日　归德失陷。27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混成第三旅团自虞城进入归德北面，第十六师团主力向归德以南之柳林集附近移动，与第三旅团相呼应，合力攻击归德城，是日归德陷落。

△　薛岳接程潜转发蒋介石俭（28）日手令要旨："东路敌军，必于二三日内向西急进，由周口直出许昌、郑州，后方堪虞。望速抽调六师以上兵力，在侧后方作总预备队，指定李铁军、李汉魂、俞济时三军负责扫荡兰封附近残敌。"薛岳即令骑兵第二旅、孙桐萱军一部、第一〇二师、一八七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进入宁陵、睢县、民权、淮阳、太康一线阻敌西犯。

△　日军第十六师团自归德西犯，是日陷宁陵，31日陷睢县，一

部沿陇海路，主力沿陇海路南侧西进，与第八军、第五十五军在柳河、睢县间激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占领河北永年县城。31日，克复肥乡县城。

5月30日　蒋介石委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汤恩伯、商震、孙桐萱、胡宗南、曹福林各部。同日，蒋介石又令程潜回郑州策划，薛岳负责指挥豫东作战。

△　日军第十师团自徐州进入永城，配属该师团之混成第十三旅团自丰县南下，22日晚与师团主力会合。是日，师团以第十三旅团攻陷涡阳，主力犯亳县，31日亳县陷敌。

△　孔祥熙在汉口答美国记者霍华德称："现实尚无和平可言。中国为防卫而战，战争之终结，只有待日本停止其侵略战争。"

△　川军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两部奉命出川对日作战，重庆各界举行欢送会并献旗。

△　日本陆军部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继香月清司中将任第一军司令官。

5月31日　武汉第三次空战，击落日机15架，空军分队长张效贤、杨慎贤及队长陈怀民、孙金鉴壮烈殉国。

△　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程潜部主力奉命向平汉路以西转移，以商震指挥第三十二军与第三十九军在开封、中牟一带阻击敌军，掩护大军转移。

△　行政院第三六五次会议决议褒扬台儿庄、临沂两战役有功将领。台儿庄一役为：军长田镇南、冯安邦，师长黄樵松、张金照、池峰城，旅长吴鹏举，团长张广厚，参谋长王范廷；临沂一役为：参谋

长李正舆，师长刘振三，旅长朱春芳，团长马福荣，营长常惠考、宿之杰、邓之霖、金文生，均分别颁给各种勋章和奖章。

△　日机三架炸安徽颍上，投弹40余枚，毁民房800余间，死伤民众70余人，另有日机多架炸阜阳，投弹70余枚，烧民房万余间，死伤民众百余人。同日，日机24架炸河南驻马店，烧毁民房5000余间，死伤民众500余人。

5月下旬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白崇禧为理事长，时子周、唐柯三为副理事长，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艾沙等32人为事理，达浦生等八人为监事。通过建立全回民反日统一战线，武装回民参加抗战等八项纲领。

是月　　周恩来同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工作。并陆续介绍青年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6月

6月**1**日　　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黄河堤，以阻日军西进，并指定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督工实施。

△　薛岳抵开封，按程潜电令部署兵团各军，其中以孙桐萱、商震等部分任郑州、开封之守备，薛亲自指挥；张自忠、李延年、陈大年、冯治安、刘汝明、罗奇、梁凯各部分任许昌、郾城、驻马店、周家口、淮阳、沈丘、商水各地之守备，受汤恩伯指挥。平汉线以东野战部队为罗奇、刘汝明、冯治安、黄杰、张占魁（以上为汤指挥）、沈克、马彪等部（薛自指挥）。游击部队石友三、曹福林两部依情况分别转移于鲁西、鲁东。转用部队为宋希濂（向禹、郏两县）、胡宗南（向汜水、巩县等地）、李汉魂（向密县）、桂永清（向洛阳）、黄杰（向襄城、叶县）、俞济时（向泌县）等部。商震、万福麟、彭

进之等部守备河防。

△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部自徐州突围抵泗县。同日，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抵鲁中泰安、青州、潍县等地游击。

△　日本华中派遣军命令第六师团从合肥附近南下进攻安庆，并由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沿长江溯江会攻。

△　日机空袭粤汉路，广州整天处于警报之中。2日续袭粤汉路。至3日复入广州市区空袭，炸毁船只10余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击退向彭城进攻之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

△　财政部第一次金融会议在武汉召开，讨论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之实施办法，孔祥熙到会讲话。3日，闭会。有关政策之重要决定为：一、继续推行贴放事宜；二、扶助内地必需品生产事业，并推广农村贷款；三、限制敌占区汇款，但应设法畅通内地汇兑；四、提倡节约，奖励储蓄；五、增设内地金融机关，完成金融网；六、奖助出口事业，便利侨胞汇款回国；七、继续努力收集生金银；八、训练金融人才。

△　云南耀龙电力公司成立（由原耀龙电灯公司与纺织公司电力厂合并而成），资金100万元，卢汉、缪云台、陆崇仁为董事，有职工340人。

△　北平、南京两伪政权同时宣布开始实施新税则，日货进口税大减，对日出口矿石、棉花等免税。次日，国民政府发言人声明，为应付日本继续侵犯我国主权，将考虑必要之措施。

△　驻国联代表胡世泽就日机连续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残杀和平居民事，致牒国联秘书长艾文诺，要求制止日军暴行。

△　美国政府令驻日大使格鲁照会日本政府，抗议日军劫夺美国在华利益，强占美国教会在上海所办之沪江大学及在校内设军用机场，并要求准许美侨返回日占区。12月29日，日海军发言人对记者发表谈话，拒绝美国要求。

6月2日　　国民政府任命鹿钟麟、谷钟秀、陈国梁、王承曾、李炘、张荫梧、王德乾、丁树本、李杏村为河北省府委员；任命鹿兼省府主席，谷兼民政厅长，陈兼财政厅长，王兼教育厅长，李兼建设厅长；免冯治安、张吉墉、贾玉璋、李金藻、王景儒、谷钟秀、魏书香、李炘河北省府委员本职；免冯省府主席兼职，张民政厅长兼职，贾财政厅长兼职，李教育厅长兼职，王建设厅长兼职。

△　日本华北方面军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第二军并令第二军向兰封以西进犯，第二军即令第十四师团犯中牟，第十六师团犯尉氏，第十师团犯柘城。同日，第十四师团自三义砦突围，向开封进犯。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收复河北广平县城。

△　美芝加哥华侨5000余人游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支持祖国人民抗战到底。

6月3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恢复陈其瑗、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史鹏展、郭寿华、周恩来、刘清扬、于国桢、查人伟、包惠僧、罗贡华、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高语罕、彭泽民、叶剑英、郭沫若、陈友仁、陈耀盘、林植夫、黄琬26人国民党党籍。同日，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以“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且事前更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郑重声明不予承认，并要国民党中央于次日公开登报。几经交涉，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声明撤销此案。

△　日军再陷兰封。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犯兰封，激战两日，是

日晚新三十五师弃城，西移临汝待命，兰封再陷。同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攻占杞县，第十三混成旅团攻占通许，第三混成旅团经杞县东北西犯，第十师团攻占柘城。陈留亦告失守。

△　傅作义部反攻绥远失败，被日军追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炳炎第七一六团为掩护傅部撤退，在平鲁西坪口设伏，毙伤日军200余名。

△　国民党中宣部及政治部为“六三”禁烟九十九周年发表《禁烟纪念告国人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种植、生产、贩卖烟毒，存心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禁绝烟毒，肃清烟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中苏文化协会俄文专修学校在武汉成立，校长张冲，并决定以后迁重庆，在桂林、贵阳、昆明成立分校。

△　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在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代表大会发表演说，要求制止日军侵略。大会决议谴责日、德、意三侵略国轰炸中国和西班牙和平居民的暴行。

△　台湾革命党发表宣言，表示：台湾500万同胞，不愿以中华神胄沦于异族，决心复仇雪耻，抗战到底，收复故土，争取自由。

△　板垣征四郎中将接替杉山就任日本陆相。

6月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汝明为第二十八军团军团长。

△　日军第十三师团自蒙城南犯，是日陷凤台，第四十八军退守淠河西岸。

△　日军第十四师团总攻开封，与宋肯堂第一四一师激战；第十六师团主力侵入尉氏。商震部在中牟、尉氏、扶沟、周口一线阻敌西犯，以保平汉线之安全。

△　日军第六师团一部3000余人自合肥附近大蜀山猛攻第十军阵地，该军于晚间退守六安。同日，敌陷正阳关。

△　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奉命派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在河南中牟县境赵口决黄河堤，并限当夜12时放水，未获成功。

△　日军三路围攻晋西北偏关，傅作义部败退。5日，偏关失陷。6日，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等部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协同反攻，激战甚烈，敌不支溃退，偏关收复。

△　日机61架分两批冲入广州市区狂炸，投弹百余枚，毁民房200余间，死伤民众2000余人。

△　《民主》半月刊在武汉创刊，彭文应主编。

△　中国代表胡世泽在日内瓦国际禁烟委员会上，揭露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的罪行。会议决定讨论日本贩毒问题。

6月5日　　第一战区拟定《作战指导纲要》，拟乘日军沿平汉线南犯之机，在许昌、确山间将敌包围歼灭。同日，战区前敌司令部发布作战令：以汤恩伯、俞济时、王仲廉、张轸、李延年、刘汝明、庞炳勋、黄杰、关麟徵、张自忠、李仙洲各部为右地区兵团，在二郎庙、郏县、鄢陵、太康、柘城一线（线上属右）以南占领既设阵地待敌；以胡宗南、宋希濂、李汉魂、李铁军、桂永清、宋肯堂、李英、商震、刘和鼎、万福麟、彭进之、石友三、孙桐萱、曹福林各部为左地区兵团，相机阻敌，适时转入攻势，与右地区兵团协同，南北聚歼日军。

△　蒋介石电令李汉魂为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15日，该部由河南调守江西。

△　日军第十四师团3000余人，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猛攻开封，先后多次爬城。至夜12时，日军一部由西北角爬上城墙，与宋肯堂第一

四一师展开激战，宋部团长以下官兵伤亡甚重。

△　日军第三师团于上月30日自怀远附近西犯，3日占淮南煤矿，是日攻占寿县。

△　武汉各界二万人开会追悼张效贤、杨慎贤、陈怀民、孙金鉴空军四烈士。蒋介石主祭，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大钧至悼词，于右任、孔祥熙、何应钦、陈诚、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彭德怀等送了挽联。

△　黄河赵口决堤工程未能如期完成，商震奉蒋介石令严厉督促，加派第三十九军一个团协助，并悬赏千元，要求迅速放水。

△　日机34架炸广州，死伤民众600余人，中山大学文、理、法学院均被炸毁。一周来，广州民众被炸死炸伤5000人。

6月6日　　开封失陷。凌晨，日军第十四师团以重炮轰毁开封北城，旋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入城内，开封遂陷。宋肯堂师退向中牟，日军随即向中牟急进。

△　蒋介石“麻（6日）电”颁布武汉卫戍区战斗序列，任命薛岳为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自10日起，解除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职，今后战局转趋长江两岸，兰封会战结束。

△　日本华北方面军令第二军结束兰封会战，逐次将兵力集结于开封、杞县、亳县、宿县一带，准备下期作战，第三、第十三混成旅团准备返回原建制。15日，两旅团在野鸡岗附近乘火车运返东北。

△　第二十集团军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以赵口决堤工程失败，建议在该师防区内郑县花园口另行决口，被采纳，并得赏金2000元。当晚，蒋在珍即布置所部准备在花园口决堤。

△　日机40余架狂炸广州，投弹100余枚，灾区遍及全市，房屋

被毁700余栋，死伤民众2000余人。广东省府主席吴铁城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谓：抗战以来，日机袭广东达2000次以上，袭广州市亦逾800次，死伤民众5000人以上，此仇此债，惟有报以血战。同日，蒋介石致电余汉谋、吴铁城，对广州市民表示慰问。

△　陈诚接见各国记者，告以日机轰炸广州惨状，并谓：中国政府已书面提请国联立即加以制止。

△　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自山西前线致电蒋介石，请示作战机宜，并称：退入山西之各军，麇集于晋东南及晋西南各山地中，窃窥过半首长南渡之心似箭，徒以未奉明令，畏怯而止，似此数十万大军徘徊于不战不退之歧途，拖延日久，将呈瓦解之势。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查封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总队部、新文字研究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该三团体负责人何志诚、于志元、蔺克义。西安各界民情激愤，纷纷探狱慰问，强烈要求释放。该三团体通电全国，请求援助。陕甘宁边区及山西、成都等地民众团体通电声援，并对陕西省党部表示抗议。

△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同时举办抗敌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冯玉祥、郭沫若、何香凝等为名誉理事，张善子、徐悲鸿、吴作人等43人为理事。

△　法驻日大使亨利就日机轰炸广州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6月7日　　黄河花园口决堤开工。蒋在珍移驻花园口，监督决堤工程。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桐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为副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　日军第十四师团步骑兵千余猛攻中牟，守军第一一九师第七二三团与日军激战，第一四一师自开封增援，激战至晚，中牟失陷。

△　国民政府决定将四川省改划为10个区，各区专署分别设绵阳、乐山、江北、泸县、南充、万县、阆中、茂县、雅安、西昌。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将查封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总队部、新文字研究会等13抗日救亡团体一案呈报国民党中央党部。26日，社会部复文批准。

6月8日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其中规定第五战区：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第九战区：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第十三师）推进准备使用于五战区，（第五十五师）使用于第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各战区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计划并规定第九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苏北兵团应以有力部队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第九战区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

△　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驻日使馆已无法执行职务，决定自本月11日起停止办公，全体馆员启程返国。11日，驻日使馆参事杨云竹等离东京至横滨乘轮回国。

△　军事委员会任命汤恩伯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　周恩来同陈诚交涉，要求释放在国民党查封汉阳兵工厂抗敌工作团事件中被拘留的陈公朴，并将情况函告沈钧儒。不久，陈公朴获释。

△　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2000余人突破我第一四五师孟庆云旅舒城桃溪镇阵地，是日陷舒城，该旅退七里河。

△　自开封西犯日军一股侵至白沙，郑州告急。

△　国民政府派郭泰祺为互换中爱（爱沙尼亚）友好条约全权代表，顾维钧为互换中利（利比亚）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日机50余架分批昼夜狂炸广州，岭南大学、美华中学及西村电厂被炸，全市停电。9日，美国政府抗议日机炸毁岭南大学。

△　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奉命由平西挺进冀东，途中连克昌平、延庆、永宁县城，歼敌数百人。21日到达蓟县。

△　东北抗日联军4000人在牡丹江奎山与日军及伪警察激战获胜。

6月9日　　蒋在珍部在花园口决堤成功，是日放水。随后又连日扩大决口，水势愈来愈猛，决口逐渐扩至370余公尺。郑县、中牟、尉氏、扶沟、太康、睢县、商丘、开封等17县一片汪洋，水头冲越陇海路并泛滥至安徽境内，沿贾鲁河夺淮河而下。140万灾民无家可归。日军约四个师团陷于泛区，损失达两个师团以上。尔后敌我即沿贾鲁河黄泛对峙，达六年之久。

△　蒋介石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势，略谓："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长期抗战，此为最大要着。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域。"希望各友邦尽其对华援助义务，制裁日军暴行。

△　驻武汉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开始撤退，党政机关移重庆，军事机关移湖南。

△　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凡来不及拆迁之工厂皆予炸毁。

△　山东省第六区行政专员范筑先部两个支队会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及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九团进攻高唐县李俊兰部伪军，范部从西、南两面进攻，八路军在城外截击，是日克高唐，消灭伪军300余人。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函行政院，请转饬禁止延安各界民众自动制作、悬挂共产党党旗。11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密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及陕西省府主席孙蔚如，令其严饬查禁。

△　经济部长翁文灏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时讲话表示：日本资源贫乏，抵制日货为制止侵略的有效方法。

△　四川政府决定：自7月1日起，实行每年两次征收田赋，国难捐不含在内。

△　日拒绝英、美开放长江之要求，英、日在上海举行的开放长江谈判失败。

6月10日　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督率所部川军确保安庆。

△　日军第十四师团骑兵联队一部在郑州南破坏平汉铁路。12日，第十六师团挺进队在新郑东南炸毁平汉铁路桥。

△　王新亭、许世友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由太行进抵冀南永年、肥乡、成安一带。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设立五相会议，首相近卫、外相宇垣、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大藏相池田参加，为决定内阁方针之机构。

△　法各党派众议员188人组织同情中国委员会，公推急进社会党亚波香为主席，决议抗议日本轰炸广州，呼吁各国政府干涉，要求世界各大城市市政当局赞助。

6月11日　　日舰40余艘、商轮13艘、汽艇80余只、木船数百只，载波田支队在空军掩护下大举进攻安庆，图在枞阳镇（安庆以东）、大王庙登陆，被击退。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一部占领冀南成安县城；另一部袭入津浦路山东平原车站。

△　国际反侵略大会通过援华议案，各国分会请政府予中国贷款，供应中国医药、食品，加强抵制日货并禁止军火汽油及工业原料运日。

△　美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称：自日机大肆轰炸广州后，美政府已设法制止美制飞机售日。同日，国务卿赫尔亦表示：美国政府决以劝请方法阻止美制飞机售日作为轰炸中国平民之用。

6月12日　　安庆失陷，武汉会战开始。晨3时，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南北两岸分别登陆，6时占领安庆机场，旋冲入城内。守军第一四六师第八七二团及保安队伤亡过重，第二十七集团军受无为方面敌军牵制，无法应援，安庆弃守。

△　日本海军当局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宣称即将进攻武汉，要求撤退芜湖至湖口间各国兵舰及商轮。

6月13日　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步兵第四十七联队陷桐城。

△　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在中牟为洪水所困，第二军调工兵一个联队六个中队前往救援。

△　新编第五师师长檀自新经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以“抗命谋叛，违犯军律”罪判处死刑，经蒋介石批准，是日在武汉执行枪决。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褫夺檀自新官位及勋章。

△　《前卫文化》旬刊在武汉创刊，嵇文甫主编。

6月14日　蒋介石命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仍兼辖武汉卫戍司令部。该战区防守长江以南皖、赣、鄂、湘四省，下辖26个军70个师，总兵力38万人。

△　国民政府任命何成濬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原任鹿钟麟免职。

△　军事委员会任命卢汉为第三十军团军团长，万耀煌为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

△　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总队长李连璧，并勒令《救亡》杂志停刊。

6月15日　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湖北省府主席，原任何成濬免职；任命蒋鼎文为陕西省府主席，原任孙蔚如免职；任命王郁骏代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原任孔祥榕免职；特任陈介为驻德国大使，原任程天放辞职照准。

△　中共中央代表团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联名在《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阐述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方法。

△　豫东杞县猪皮岗守军粤军彭林生第一八七师所部团长张鼎光擅自撤退；师参谋长张淑民屡次煽动退却并弃职潜逃；旅长谢锡珍首先退出阵地，乘车南逃；旅长叶赓常临阵失踪，化装逃武汉。蒋介石电令何应钦分别予以惩处。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二团攻占彰德（今安阳）水冶镇，毙、伤、俘日伪军200余人。17日，攻占彰德观台镇，毙、伤、俘伪军百余人。

△　粟裕所部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南京与镇江间的下蜀街破击沪、

宁铁路，使敌一列火车越轨，沪、宁交通中断数小时。

△　乌盟东公旗女王巴云英（已故额王之福晋）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及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等请缨杀敌，略谓："云英虽属女流，深知日寇毒计"，"绥包事变后，即率旗兵潜伏武（川）固（阳），伺机杀敌，响应国军"，请求予以弹、装接济，并告已派代表到五原联系。

△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瑞士温脱多机车厂签订技术合作合同，制造各种柴油机、煤气机、水上柴油机之油齿轮具，有效期10年，报酬不少于45.5万瑞士法郎。

△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武汉，以企控制中国，迫蒋介石屈服，结束侵华战争。

△　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尉氏附近被洪水围困，第二军调工兵一个联队、二个中队及船只前往救援，并派飞机投送食品。

6月16日　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名义，发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略谓："中正受命于党国艰危之际，负责于民族存亡之交，视本团之组织，为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之唯一大事。"并谓：三青团的任务是：第一、积极参加战时动员；第二、实施军事训练；第三、实施政治训练；第四、促进文化建设；第五、推行劳动服务；第六、培养生产技术。同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凡15章71条。

△　程潜电告蒋介石，黄河决口后，日军仍继续进攻。

△　空军在广东仁化击落日机六架。

△　财政部划定川滇、黔桂、陕甘宁青、湘鄂、浙赣、苏皖豫鲁、闽粤七个督察区，每区设税务督察专员一人，督征国税。

6月17日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谈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认为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的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黄山、天目山一带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阻击日军西侵，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抽出一部分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造成战略夹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建立新的军队，以便战略上实施反攻。

△　潜山失陷。安庆陷落后，日军坂井支队奉命南下攻潜山，与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部激战，是日上午陷潜山城，杨森部撤退至潜水（潜山西面）对岸设防继续抵抗。

△　蒋介石以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在守备兰封任务中，两次不遵命令，致误战机，令组高等军法会审，判处死刑，是日在武汉执行枪决。

△　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议决设立中央训练团，以现有之军官训练团改组而成，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

△　军事委员会任命关麟徵为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

△　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30里之卫岗伏击日军车队，激战半小时，击毁汽车五辆，刀斩日军少佐土井，毙伤敌大尉梅津武四郎以下30余人。

△　日本新任外相宇垣向外国记者声明："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动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同日，递信大臣永井发表谈话称："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久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第二期谋略计划》，企图通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建立强有力政权的趋势；使蒋政权

统治下的杂牌军瓦解归顺，削弱其威力；利用李宗仁、白崇禧使桂系军队回避参加抗战，并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地方政府；依靠各地银行的周转，使法币崩溃等谋略；导致国民政府倒台和蒋介石下野，早日解决中日战争。

△　日本政府新任外相宇垣首次对外国记者谈话，暗示中日将有议和可能，大局根本变动时也可重行考虑态度。并声称日本同英国今后将尽力重建“传统友谊的特殊关系”，甚至“更为接近密切”。

6月18日　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分别发表“和平”通电，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焦土抗战政策”，蒋介石“自行下野”，北方抗日将领“回返其梓里”，两伪政权即可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次日，国民政府发言人称：该两伪政权无人承认，所发表之和平拟议，系由日方所授意，不值驳斥。

△　日本大本营发出准备进攻武汉令：海军舰队准备攻占武汉；华中派遣军在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次前进，与海军配合，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一线；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郑州方面推进，牵制第一战区程潜部，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武汉进攻。

△　日本大本营海军部令日海军舰队攻占九江。同日，华中派遣军令波田支队配合海军攻占湖口及九江地区。

△　筱原义男中将继矶谷廉介中将任日军第十师团长；第十四师团长土肥原中将调日军参谋本部专事对中国的谋略（策反），其遗缺由井关隆昌中将继任。

△　经济部制定《奖励输出物品办法》，并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促进对外贸易。

△　教育部、财政部为压缩外汇，制定《限制留学生办法》，规定选派留学生一律暂以有关军事国防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

6月19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交涉的十条意见交蒋介石。

△　伪浙江省及杭州市政府成立，伪省长何瑞闿，伪市长何瓒。

△　上海江海关华员护关会具呈蒋介石，要求发挥自主外交，否认英日海关协定，维护主权完整。

6月2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　为推动蒙旗抗战，蒙旗总动员委员会在陕西榆林成立，荣祥为委员长。

△　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苏体仁为山西省伪省长。

6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党中央常会选任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定于7月1日召开国民参政会。同时公布《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四条，将参政员名额由150名增加为200名，并公布参政员名单：计各省、市88名，蒙古、西藏地方六名，海外侨胞六名，其他各方面人士100名，其中有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七人。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李默庵为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

△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潮汕前卫南澳岛登陆。

△　孔祥熙、戴季陶、丁惟汾被聘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之导师。

△　南京伪维新政府各机关自上海迁南京办公。

6月22日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黄河泛滥后，敌我情势之

变化，提出作战对策，略谓“此时对策，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区，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将敌各个击破”。提出于宿、松、英、广间使用五个整师，选择有利阵地，拒止敌人，另以五至七个整师兵力，控置于潜山、英山间地区而侧击之。

△　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彭学沛为国民参政会正、副秘书长。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表《对全国民众宣传大纲》及《实施宣传办法》，以拥护蒋介石及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为宣传中心内容。

△　日军汽艇10余艘在日舰掩护下进迫马当防线，遭海军炮击，沉其三艘，旋遁去。25日，日以巡洋舰率驱逐舰多艘，复迫马当，巡洋舰被击中起火。

△　开封农民散发传单发起联庄自卫团奋起抗战，提出：“凡我乡亲，各备武器，保卫桑梓，阻止敌军前进，以待国军布防。”定于是日在辛庄大庙集会，共筹办法。

△　谷口元治郎中将继下元熊弥中将任日军第一〇八师团长。次日，牛岛实常中将继川岸文三郎中将任第二十师团长。

△　教育部制定《民国二十七年度全国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郑、福州等21个城市举行招生考试。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汉口复兴公司捐款10万元赈济难民及新加坡华侨李俊承捐款10万元购买救国公债。

△　中国侨港渔民协会及全国渔会致电军事委员会称：日军侵占广东，渔民垂危待毙。自去年9月12日到今年5月31日，香港渔船被击沉与焚毁412艘，死亡8490人，财产损失达500万港币。现停港渔船3000余只，生活无计，请求救济。

6月23日　日军波田支队乘舰艇九艘在日机掩护下自安徽东流驶近马当要塞窥察，被击退。同日，我空军三次飞东流轰炸，日舰三艘中弹。

△　日军步、骑兵千余名由安徽凤台向田家庵撤退，次日下午凤台城南10余里山区残部日军百余名，被我当地民兵发现后，予以全歼。

△　孔祥熙密令其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面。乔代表孔祥熙向中村表示："孔祥熙和汪精卫、何应钦都是好朋友，和各党派也亲密，至今毫无改变地是个和平主义者。不用说，蒋介石本人内心也希望和平，可是在他的立场上不能说出口。"并谓，孔祥熙表示希望英、美两国居中"斡旋"。

6月24日　日军波田支队先头部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及潜艇队一部，在飞机掩护下在马当下游香口强行登陆，占香山、黄山，守军周启铎第五十三师及薛蔚英第一六七师激战后撤退。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裁撤。

△　军事委员会任命上官云相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　日舰18艘抵海南岛之海口，企图登陆。法舰10艘前往监视。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法、日1907年条约有关于海南岛之规定，若日本违约侵占，法定干涉。

△　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进入冀东蓟县一带后，当地共产党发动伪自卫团300余人哗变，参加八路军。

△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日事变，本年度以内达到战争目的；对第三国友好的调停，不妨根据条件予以接受。

△　国际红十字会通过议案，要求各国制止日机轰炸，并望迅速

成立协定，保护平民。

6月25日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长江北岸广济电蒋介石，谓“以目下形势论，南岸危迫万状”，恳速令马当东北之第三战区部队星夜驰往增援，“且督罗（卓英）总司令迅速前往指挥，俾可挽救危机于万一”。

△　陈沛第六十师奉命增援马当，发起反攻，一度克香口、黄山。

6月26日　马当要塞失陷。23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巡洋舰、驱逐舰多艘支援下，续向长江天险之马当要塞进攻。冷欣第五十二师、薛蔚英第一六七师配合要塞部队第十六军李韫珩部在香山、黄山一带与敌反复争夺，终以敌占优势，旋得旋失。是日马当失守。

△　白崇禧经与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会商后，是日自广济电蒋介石，提出武汉会战部署：“（一）以宿松之汪之斌师向宿松、太湖间地区推进，以策应望江、太湖，同时以七十军李觉部防于宿松、太湖，以阻敌西进。（二）以八十四军控置于广济附近，三十一军控置于太湖西北高地，作为攻击兵团，俟机攻击敌人。（三）以杨（森）集团控置于岳西，徐（源泉）集团控置于潜山西北高地线，一面从事整理。”仍请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速赴长江南岸指挥。

△　第一战区程潜部于25日晚开始反攻河南尉氏县城之敌，与日第十六师团4000余人激战一昼夜，是晚克尉氏县城。

△　绥蒙临时会决定组织蒙古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抗日军队。

△　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受外相宇垣电令，于是日及28日两次与孔祥熙私人代表乔辅三密谈，安排孔祥熙赴日议和事。宇垣拟

向孔提出六项条件：一、承认“满洲国”；二、中日在华北与内蒙古共同防共；三、中日“满”文化、经济合作；四、日本驻兵于若干地区；五、中国聘请日本顾问；六、中国赔偿日本之损失。

6月27日　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自湖口电蒋介石，已着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督率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及第十师、十六师等部迅速恢复香山、马当要塞阵地而确保之，并规定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赏洋五万元。如有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

△　国民党中宣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颁发《抗战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保卫大武汉”口号。

△　国民政府公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凡11条，规定对于克扣军饷，从购办军工军用品中舞弊，盗卖军用品，强占强募财物，以军舟、军马、航空机装运违禁漏税物品，有意图利扰乱金融，违令收募税捐公债，擅提截留公款者，判处死刑、无期或10年以上徒刑。

△　军事委员会任命彭进之为第十七军团副军团长。

△　日机炸郑州，死伤民众百余人。

△　伪山西省公署在太原成立。

△　伪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成立大会，太谷尊为总裁。资本3.5亿元，下有子公司13个，拥有资本4.122亿元，华北地区矿山、煤炭、制铁、发电、交通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部门均归其垄断。

△　英国外务次官巴特勒在下院声称：“如果中日两国同意，英国乐于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为实现和平担任调停工作。”

△　英法两国政府令两国驻日大使通知日本政府，日军侵占海南岛，必将引起纠纷，英法决合作应付一切。

6月28日　　陈诚以香山已由我军克复，为继续扫荡马当要塞之敌，是日电蒋介石报告已下达作战命令，其要旨为：一、“第四十九军即防守香山、香口并确保之，以掩护我军对马当之攻击”。二、“着第五十三师周师长待四十九军防妥当后，即指挥现在香山之第五十三师、第一六七师之部队，继续由东向西夹击马当要塞之敌”。三、“着第一六七师薛师长指挥在青山坝方面之第五十三师、第一六七师之部队，继续由西向东夹击马当要塞之敌”。四、“夹击马当之部队务密取联络”。

△　凌晨，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第三一三旅向马当下游之香山攻击，战至上午8时，敌不支而退，我军收复香山。当晚，该旅自香山西攻香口残敌，反复肉搏至次日凌晨，敌增兵2000人，敌机、敌舰助战，致未奏功。香山、香口两役，我军伤亡600余人。

△　第二战区第一六六师收复济源，日军进入王屋镇。

△　日军在苏北决运河大堤，以图阻止韩德勤、缪瀚流部反攻其后方，致使苏北数县尽成泽国。次日，日方广播诡称系中国自己所为。

△　国民政府为厦门大学被日机炸毁，明令褒扬该校捐资创建人陈嘉庚、陈敬贤、林文庆。

△　伪厦门市政府成立，南京伪维新政府派张铭任市长。

△　意大利更换驻华大使，柯赉奉调回国，马其欧继任。

6月29日　　彭泽失陷。日军波田支队主力乘装甲汽艇40艘自安庆上驶，是日越过封锁线在彭泽下游将军庙强行登陆。周启铎第五十三师与敌激战数小时，阻击无效，退守娘娘庙，彭泽遂陷。

△　蒋介石电潢川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示“各派一部进入正（阳关）寿（县）方面，威胁安庆及蚌埠，并任编组民众武力，扫

荡伪组织，破坏交通线，袭敌辎重及小部队，扩大游击战”。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东原为第三十四军团军团长。

△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电呈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称：第五战区之游击部队“士兵饷只有六元，不足一饱”，“现存弹药不足”，“每一移动，必结队逃走”，要求增加经费。8月19日，何应钦代蒋介石复电不准，谓：“第五战区游击队经费每月约50万元，如能善为支配，已足敷用。”

△　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电蒋介石，陈述徐州溃退中，“官长不明任务，擅离职守，单独行动，士兵脱离队伍，抛弃装械，甚或携械潜逃”。30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迅速彻查清理，明定赏罚，以别是非”。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萧华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曾国华第五支队和第一二九师孔继先津浦支队开赴津浦路东，协助当地共产党组织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

△　日军第二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会，该军共战死7452名。

△　范筑先在聊城隆重欢迎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省府即移驻寿张县张秋镇。

6月30日　　蒋介石在武昌对英国《每日快报》记者谈话，宣称：“中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反之，日军之人数方面及经济方面，均将因之更感困难。我必坚守武汉，即由武汉撤退，此亦无关重要。外传英、法、意、瑞典、瑞士等驻华外交代表均将来汉口，企图斡旋和平，但苟非将主权完全恢复，绝不欢迎任何国家调停。中国在政治上已全部统一，中国人民抗日之决心，亦与日俱增”，“抱勇往直前之精神，共赴国难，中国绝不能为日本所战败。”

△　海军在鄱阳湖口之兔子山、鲸鱼山、姑塘等处布雷，防日舰

自鄱阳湖西渡匡庐，直取南昌。

△　韩德勤第八十九军一部克苏北阜宁。

△　行政院设农村促进委员会，聘请前实业部次长穆藕初主持，以翁文灏、叶琢堂、何廉等15人为委员。

△　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发表日机轰炸中国统计资料：自1936年7月至1938年6月底，日机对中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河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甘肃、广西、河南、四川、陕西16个省、257个城市、18条交通线共275处，出动飞机1.671万架次，进行2472次轰炸，投弹3.3192万枚，炸死居民1.6532万人，炸伤2.1752万人。破坏外国在华机关17次，炸死外国人77人，伤25人。

△　南京伪临时政府驻北平伪维新政府代表鲍观澄，会见伪维新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　日本政府声明实行官民一体确立长期持久的战时体制，以集中国力进行战争。

是月　周恩来会见艾黎，告之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

△　中共伊盟蒙古工作委员会迁至伊盟中心桃力民，八路军陕北留守兵团骑兵第一团随同前往，开展抗日运动。

△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电军令部，转发张允荣所拟定之《今后关于华北共产党之对策》一件，要点为：一、搜罗华北反共人才，成立专门机关，充实第一战区司令部，指导与中共的斗争；二、在山西及晋东建立华北军事根据地，充实晋省交通，大量囤积粮秣弹药，以备反共之用；三、收买、安抚华北失败将领，如石友三、丁树本、孙良诚及所存军队，作为反共主力；四、派专门人员进行筹划，网罗民

间反共人才及反共组织。

△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电令浙江省党部取缔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并禁止群众集会。

△ 长沙士绅宁坤等以何键主湘九年，横征暴敛，“额外诛求人民至数千万元”，先后于4月、6月两次具呈行政院，要求严令何键将“帐目迅速交出清算，以肃纪纲，而崇法治”。

△ 日本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提出《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的报告，主张对国民政府“以击溃为根本方针”。为此，必须攻下汉口、广州，实行海上封锁。在占领区，要“确立长期占领的阵势”，首先要“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加紧在中国各地建立伪政权，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满华的政治体制”，向形成“日满华的经济集团、通货集团”的目标推进。

△ 日本组织“华中水电公司”，资本2500万元，华中沦陷区各地水电公司财产悉被攫夺。

7月

7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赈济公债条例》，定额国币一亿元，年息四厘，自公布日施行。同日公布《民国二十七年湖南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1800万元，年息六厘，自公布日施行。

△ 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使用5000万美元贷款协定》，规定该款用于购买苏联工业品及设备，年息三厘，自1940年7月1日起，五年内以茶叶、皮革、兽毛、锡、锑、钨、桐油、棉花等13种商品折价偿付。

△ 国民党中宣部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通告全国各省、市于

抗战周年纪念日设置献金台。

△　中共中央召集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

△　第九战区陈诚部向彭泽日军进攻，占领该城南尖山、双尖峰之高地线，逼进彭泽东门，毙敌中队长井上正吾一名。

△　海军“咸宁”舰击落日机两架，后在搬运伤亡、抢救舰体时，被炸沉于武穴。

△　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泾县云岭。

△　夜，新四军陈毅支队袭击镇江、丹阳间之新丰车站，火烧车站日军营房，歼灭日军一中队百余人。10日，又在南京、句容间伏击日军，毙敌40余人，击毁汽车四辆。

△　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就英、法、意领事馆强行接收该局事，向三国领事馆提出书面抗议。

△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厚和（呼和浩特）举行第三次蒙古大会，蒙古各旗王公、日本代表及伪满洲国、察南、晋北等伪政权代表到会，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被推为伪蒙政府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同日，德王发表就任宣言，声称力行“强化防共”、“民族协和”。

7月2日　　国民政府令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令曰：“本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为集中意志、统一行动起见，特制订《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经大会议决公布在案，今后政治上一切措施，自应以纲领为最高准绳，各主管机关应就职掌范围以内悉心研究，以求贯彻。”《纲领》凡七章32条。总则规定“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在各章中还规定了“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制止日本侵略”，“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推行战时税制”，“发动全国民众”以及“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等有关抗战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的具体纲领。

△　蒋介石电各省府主席及各战区司令长官，重申：“凡战区内或邻近战区地方之县长、专员及其他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形同潜逃，如有未奉附近高级军事长官之命令而擅自先退者，一经查明，即按军法惩处。”

△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等，指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

△　军事委员会任命曾万钟为第三十五军团军团长。

△　日机六架轰炸广东汕头，历三小时，民众死伤300余人。同日，日机炸广州、福州、九江各地，福州美办协和医院被炸。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山西蒲县日军发动攻击，破日军数道防线，毙下元第一〇五师团第一一七联队700余人。

△　第五战区韩德勤第二十四集团军第八十九军，分兵两路包围盐城，袭击数次，毙敌百余人，是日克盐城。

△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各党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整顿民众团体，凡“名不符实”、“企图不明”之“不正当之组织”，一律解散。

7月3日　　第九战区江防军刘兴部由黄土岭进攻彭泽，在流澌桥（彭泽西10里）一带同日军激战，是日克流澌桥。

△　空军出动四次，炸芜湖、马当、东流、香口日军阵地、机场及敌舰，炸沉舰五艘，伤二艘。在马当、香口与日机发生空战，均将

敌机击退，安全返防。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同蒲线安邑、运城。同日，日军陷山西阳城。

△　日军下元第一〇五师团于晋城与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所部激战四日，是日撤至河南博爱县。

△　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开湖北浠水时，沿路鸣枪拉夫，征发给养，间有强奸掳掠，所至民众逃避一空，惶恐万分。是日，军令部电第九战区令饬刘汝明整军。

△　广东省政府兼财政厅长曾养甫向财政部呈称：自5月9日奉部令实行《运货出口售结外汇办法》以来，广东丝业群情惶惶，不可终日。各丝厂有闭歇之势，百万蚕桑农民，无可谋生。望赐予维持，于管理外汇之中，妥筹救济办法，迅速施行。

△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自沪经港到汉口，对记者谈话，否认英国调解中日战争事。10日，蒋介石在汉口接见卡尔，表示：中国和日本一样希望和平，可以接受调停；但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中国政府不会做任何事。

7月4日　　湖口失陷。日军波田支队乘装甲汽艇自彭泽西犯，2日在湖口附近强行登陆，与刘雨卿部第二十六师激战竟日，并施放毒气，湖口炮台多被轰毁。守军凭危城坚守，又用火力逆袭，予敌重创，彭城以东日军被迫后退。3日，敌复水陆并进，犯湖口东之影桥，终以敌海、陆、空占优势，至是日湖口失守。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在武汉招宴外国记者，发表谈话称，目前保卫大武汉之战，将成为对敌决战的开始，要愈加消耗敌人的力量，击破敌人的主力。并向记者说明保卫大武汉之阵容：在军事方面，已在武汉四周配置大量精锐部队，并不断派遣空军轰炸长江中

之敌舰，加强沿江要塞和封锁线的防务；在民众运动方面，已组成宣传、慰劳、征募、工程、运输、侦察、技术、救护、消防、向导10种工作队及各种民众团体，正在武装民众，“在军民合作的严密阵容下，准备给予敌人以彻底的歼灭”。

△　国民政府明令规定每年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　国民党中央决议拨款10万元赈济黄泛区灾民，同时决定举行全国捐款一日，扩大募捐救灾运动，并发表告党员、民众书，号召全国各地同志、同胞推衣解食，踊跃输将。

△　范筑先部同日军在黄河南沿河展开激战，范军由濮县、范县、寿张出击，在东阿、黄庄附近设伏，击毁敌辎重车20余辆，敌自毁15辆，其余八辆皆被范军缴获，并毙敌30余人。克复东阿城。

△　日机11架炸洛阳，投弹130余枚，住宅及商业区惨遭破坏，民众死伤200余人。同日，南昌遭日机空袭，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轰炸机一架。

△　日本首相近卫与陆相板垣会谈，板垣认为帝国政府应按照今年1月16日声明之根本方策，向彻底消灭蒋政权的道路迈进；当蒋政权尚存在之时，中日间无和平之可能。

△　日本大本营发布命令，变更华中派遣军及第二军战斗序列，编组新的第十一军。华中派遣军辖第二军和第十一军。派遣军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第二军司令官为稔彦王中将，第十一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第二军辖第十、第十三、第十六三个师团，第十一军以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三个师团及波田支队为基干。至此，日军进攻汉口的作战态势业已完备。

△　朝鲜青年战时服务团在汉口成立，团长李健宇，有男女团员68名。该团以演剧、歌咏、壁报、演讲等方式，深入民间，从事抗日

宣传工作。

△　伪上海总工会副会长周柳五被刺毙命。

7月5日　　行政院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参政会全体参政员，到汪精卫、张伯苓等150余人。孔祥熙代表政府致词表示诚挚欢迎，希望各位参政员“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旨，随时匡助政府之不逮”。张伯苓致答词，表示此次参政会将以开诚布公、团结一致之态度，帮助政府，推动一切。

△　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其中包括动员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保卫大武汉，改革征兵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普遍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等项内容。

△　毛泽东电贺即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电报说：寇深祸极，“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　蒋介石电程潜、阎锡山、顾祝同、李宗仁，指示第一、二、三、五战区开展游击战，谓：“查敌现倾注全力进攻武汉，并以大部出关防俄，一部救援晋南，东抽西调，不敷分配，故在京沪杭、津浦、平汉北段沿线及鲁、苏、皖北、豫东、晋、绥等处，兵力极为薄弱，现值青纱帐起，正游击最好时期，各该战区指定担任游击部队应积极行动，努力袭击敌人，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若认为游击实力不足时，须酌量增派，务使彻底遮断敌交通线为要。盼速拟定部署，确切实施具报。”

△　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致电九江江防总司令刘兴、第八军军长李玉堂、星子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瑞昌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第七十军军长李觉、德安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南昌

副总司令叶肇、赣省府主席熊式辉两电：一、南昌、长沙、武汉三地安危，即国家安危，敌第三期作战，必以主力先犯南昌、九江，次犯长沙、武汉，“凡我军人务共下必死决心，必胜之信念，与此三地共存亡，宁为战死鬼，勿作亡国奴”；二、江南山地作战，利于我，不利于敌，令各部运用打蛇之法，以守备兵团钳制敌首，以野战兵团击敌之腰，以游击兵团击敌之尾。

△　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率彭善第十一师、何平第十六师由彭泽及湖口以东反攻湖口，至8日将波田支队2000余人压迫于沿江地区，终以武器不足，未能将敌一鼓歼灭，功败垂成。

△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派作战主任参谋公平中佐赴大本营联系汉口作战问题，是日返回南京司令部，带回大本营关于汉口作战要点：一、作战目标主要是攻占要地；二、主攻部队为第十一军；三、主攻方向为长江沿岸；四、作战开始日期为9月上旬；五、航空兵团（德川兵团）主力归华中派遣军指挥；六、汉口作战结束后，进行广东作战。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订《省党部组织条例》，规定各省党部设主任委员，各省党部主任委员得参加省政府会议。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转知各省政府遵行。

△　行政院令各省政府拟具发展农业、工业、手工业、矿业等项增加生产的详细实施方案，呈院核夺。

△　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制定《难民输送纲领》，指定湘南、湘西、广西、鄂西、川东北、赣南、陕中、陕南等地暂时安顿难民，并办理小手工业及流动性生产事业。俟垦殖事业决定后，再分别移往各垦区。

△　日机12架袭信阳，被击落二架。

△　汪精卫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辞职并派其密赴日本。是日，高抵横滨，旋会见陆相板垣及首相近卫。高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把中国看成对等的国家，以利于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进行议和活动，并要求近卫首相保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9日，高宗武返香港，向周佛海报告并转报汪精卫。

△　谭平山于汉口《大公报》刊登启事，声明与第三党无关系，略谓：民十六年曾集合同人组织中华革命党，揭橥三民主义为党纲，此即当时社会所称为第三党；至民十九年春，由同人议决自动解散。至现在之第三党当属另一组织，与本人更无关系。

△　伪满洲国与意大利《修好通商航海条约》及日、“满”、意三国《通商协定》同时在东京签字。

△　德国军事顾问团26人，由团长法肯豪森率领离汉口回国。

△　法国派兵占领西沙群岛。次日，法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称：法国派军警到西沙群岛系为保护灯塔及气象台，便利国际航行及渔业。11日，法国海军在西沙群岛海岸布雷，禁止往来商船停泊。

△　国际反侵略大会抗议日本空军轰炸中国广州及不设防城市，呼吁世界各国舆论一致奋起谴责，并要求各国政府一致向日本提出抗议。

△　曾任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团长之英人李顿爵士致函《泰晤士报》，呼吁英国政府为本国利益计，应援助中国，安定中国之通货，并主张英国人士与中国合作开发西南各省资源。

△　美国务院制成《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其中指出：自卢沟桥事变以来，自各国运入中国的军火中有75％经过香港，其他路径是越南、缅甸、澳门、广州湾、中俄边境等地；供应军火的国家有美

国、英国、德国、苏俄、荷兰、丹麦、挪威、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诸国。从步枪至重炮、飞机、高射炮、战车防御炮、坦克车、载重汽车、探照灯、防空武器等无所不包，其中以德国制品占大宗。中国人自己说已有的军火武器可用一年以上，美国人估计至少也可以维持四个月的用途。

7月6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议长汪精卫、副议长张伯苓、秘书长王世杰及参政员张一麐等136人出席，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居正、于右任等各院、部、会长官到会。汪精卫致开幕词。副秘书长彭学沛宣读林森贺词。蒋介石致词指出："此次参政会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为达此目的，必须完成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及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两项基本任务。

△　蒋介石电慰为国殉难同胞家属，同日并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各省、市政府，调查抗战殉职壮烈牺牲事迹，呈报军事委员会，以备抚恤。

△　汪精卫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发表广播演说，诡称："牺牲是极惨痛的事，但比牺牲更惨痛的是什么？是屈服。屈服之后，做人奴隶，做人牛马，任人鞭策，任人宰割，仍然不免于牺牲。""起先舍不得自己，所以忍心害理，将国家民族断送了去。谁知到了后来，自己仍然不免随之断送，卖身之后，仍然不免杀身之祸。这种牺牲，真可谓毫无代价。"

△　武汉三镇民众12万余人举行抗战周年纪念大会并举行火炬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心保卫大武汉。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电令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负责

九江防务，指挥第八军李玉堂部，着即先赴浔部署，同日，李抵浔并往访江防总司令刘兴及李玉堂筹商一切。

△　薛岳以九江三角地带驻兵九师之众，恐遭敌困，是日致电蒋介石、陈诚，建议王敬久部控制一师于江村、王家涧间山地，李玉堂部控制一师于朱公桥、马宿岭间山地，李汉魂部控制一师于十里铺、妙智铺间山地，均以牯岭为依托，对星子、九江强行登陆之敌，可举强有力之逆袭，击敌于江湖之中。

△　驻法大使顾维钧晤法国外长庞莱，声明中国将保持在西沙群岛之主权。

△　冀东丰润、滦县、迁安、遵化、蓟县、乐亭、通县等21县和开滦矿工共有20多万人，举行抗日大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由滦县民团负责人高志远任司令，国民党员洪麟阁和共产党员李运昌任副司令。经过10余天战斗，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大量破坏了敌人的铁路、桥梁、汽车、电线以及矿山，给日本掠夺冀东的计划以沉重打击。

7月7日　　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忍受牺牲，积极奋斗，团结一致，各竭其能，各尽其职，以求自存”。“一切的奋斗，要以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同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世界友邦书》和《告日本国民书》。

△　蒋介石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吾人若未将日军全体逐出，誓不停止战争。”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纪念七七，要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的广播讲演。

△　国民党为“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发表《告国民书》及《告本党

同志书》，号召战区民众对于日寇及傀儡组织予以反攻和打击；要求党员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救国建国之工作，庶由吾辈及身而成”。

△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内政部长何键、外交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陈立夫、财政部长孔祥熙分别作内政、外交、教育、财政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参政员于七七纪念日一律献金；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吴玉章、黄炎培、陶希圣等九人为委员，张季鸾为召集人。

△　武汉各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举行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追悼大会，居正主祭，汪精卫、孔祥熙及国民党党政各机关长官及学校、团体代表莅会公祭。同日，广州、南昌、福州、洛阳等地均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

△　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大会献金运动举行开幕典礼，武汉三镇分别设置献金台。上午9时起，各献金台前不断有人讲演、唱歌，各阶层市民纷纷来到献金台踊跃捐献。蒋介石、宋美龄两次献金共1.9451万元，行政院暨所属各部、会全体公务人员献金10万，参政会全体参政员献金共三万，综计全天共献16万元。同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献金鼎一座（重17.44两）、金戒子四枚（重1.35两）。

△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出席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

△　绛县、闻喜失陷。7月初，日军第三次扫荡晋东南，一路犯邵源，一路犯沁水，与自曲沃、侯马向垣曲方面及自运城、安邑向闻喜方面突围之日军相呼应。是日，沁水方面日军先头部队陷绛县、闻喜。

△　甘肃洮惠渠完工放水，可灌溉临洮县农田3.5万亩。

△　邹韬奋、柳湜编辑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创刊。前出《全民》、《抗战》两刊停办。

△　《前进日报》在汉口创刊。

△　日本外务次官照会驻日法使亨利，要求尊重日本在西沙群岛之开采利益。13日，亨利复照外务省声明法国已占领西沙群岛，但不干涉日本在西沙捕鱼、采磷。

7月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广播演讲，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切实步骤制止日本侵略，勿以物资助日，指出："道义上之援华与物质上之助日，绝不相容。"

△　空军五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机20余架，重创日舰10余艘。

△　军令部派苏籍顾问余罗夫抵九江视察第二十九军团李汉魂部防务，并协助规划作战方略。

△　卢沟桥事变英勇抗日之团长吉星文，升任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　日军第一〇八师团2000余人，自河南沁阳犯济源，经多次激战，是晚陷济源城。

△　日本五相会议作出《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的对策》和《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的对策》：当国民政府屈服时，"帝国将其作为一个政权……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屈服的条件：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二、"改称及改组旧国民政府"。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当国民政府不屈服时，"帝国须更加集中国力，即以作战、内

政、外交、经济、策略、宣传等一切努力，都集中于击溃中国现中央政府或使其屈服”。

7月9日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同时，成立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介石指定陈诚等31人为临时干事，以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九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为书记长（由朱家骅代）。

△　蒋介石举行茶话会招待参政员，席间演说称，战事有绝对把握。茶毕，参政员黄炎培将所拟揭发政府与社会间积弊之提案面交蒋介石。

△　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重庆联合举行北伐十二周年纪念日。林森致词，谓：十二年前誓师北伐与今日之长期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先后一环，革命一日不成功，我辈之奋斗一日不能终止。

△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热烈参加武汉民众献金运动。中共中央拨出党费1000元，八路军总部将八路军指战员节食所得1000元，分别委托中共驻武汉代表团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代献作救助受伤将士、抗敌军人家属及难民同胞之用。同日周恩来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当月薪金全部献出，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各献月薪350元。

△　薛岳致电南昌熊式辉、叶肇，委曾戛初为鄱阳湖警备司令，李白澄为副司令，指挥湖防部队及水上警察，任湖防之守备；南昌警备司令赖伟英指挥城防部队，任南昌市守备，统归叶肇指挥。

△　英伦敦、曼彻斯特等13个城市的市长联名通电，抗议日本空军轰炸中国，并呼吁英国各城市及各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暴行。

7月10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通过胡景伊等所提《拥护政府

长期抗战国策案》及邹韬奋、沈钧儒等所提《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修正通过邹韬奋等所提《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

△　薛岳致电阳新孙桐萱，瑞昌李觉，九江李汉魂、李玉堂，星子王敬久，南昌叶肇，以作战三事相告，其中第三点为："战胜要诀：必死则胜，必生则败。我各级长官应严督所部，与敌决死，则战胜之功，定操左券。"

△　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结束，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100万元。

△　空军三次轰炸东流、彭泽、湖口一带日舰，击沉二艘，伤四艘。

△　日机16架炸潼关，投弹200余枚，死伤民众50余人。

△　冀东游击队克乐亭。

7月11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经济部书面答复参政员关于经济部之询问九件；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答复参政员对财政部之询问七件；政治部长陈诚报告关于民众组织训练事项；行政院副院长张群说明国民政府交议之《节约运动大纲》，并获通过。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及南澳县长洪之政率领之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九区第四大队渡海突破敌舰防线，分向隆澳等处袭击，居民亦纷持刀械冲杀，卒将敌击溃，遂克南澳县城。次日撤出南澳。

7月12日　国民参政会会议讨论郑震宇等28人所提《精诚团结，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陈绍禹等67人所提《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王家桢等21人所提《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一致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

△　日机68架狂炸武汉，投弹百枚，学校、医院及美国传教士住宅被炸，死伤民众650余人。同日，日机炸广州，死伤民众300余人。

△　11日，马当附近香口之日军增援部队向香山攻击，一度占领，是晨第九战区一部反攻获胜，收复香山。

△　空军在安庆、贵池、东流一带江面炸沉日舰三艘，并与日机空战，各损失飞机一架。

△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全国各大学校长联名通电全世界，呼吁制止日机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屠杀和平居民的暴行。

△　伪冀东保安队长周维新在滦县率队反正，次日通电宣布脱离日伪，组成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二路第九总队，表示“在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下，誓为援助国军收复失地而奋斗”。

△　浙江省以新《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已将旧法规定之“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罪一项删去，今后宣传共产主义是否法无明文，不加处罚，于6月12日呈请行政院核示。是日，行政院指令称：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取缔，不必函中央核示。

△　日本五相会议制定武汉作战期间的《对华谋略》，其要旨为：“（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和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六）为了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

7月13日　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口头答复参政员张申府等关于抗战建国具体计划之询问案，通过审查报告案，其中计有钟荣光等请派飞机制止广州轰炸案及李圣五注意德、意邦交案，对李案争执激烈。

△　蒋介石电令第三、九两战区作战地境改为湖口、都昌、鄱阳、管枥市、东乡、金溪、南城、黎川之线，线上属第三战区。

△　蒋介石下令拿办马当作战贻误战机之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8月15日，军法执行总监部判处薛蔚英死刑，在武汉执行枪决。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鲁西巨野、菏泽、定陶，日军向济宁撤退。

△　第五区战李宗仁部克安徽涡阳，16日克蒙城。

△　冀东游击队克宁河县，次日克宝坻。

△　国联同志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大会，决议吁请各国予中国以财政、经济补助，实行抵制日货，并致电中国总商会等团体，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表示同情与赞扬。

7月14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通过《设立省、县参议会》及《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等议案，并决定在国民参政会闭会期间设置驻会委员的选举办法。

△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分别向第二、第十一军发出汉口作战之准备命令，令第二军将部队集结于合肥附近，伺机占领六安、霍山，准备沿大别山北麓作战；第十一军攻占黄梅及九江，接着占领瑞昌—德安一线，准备以后的作战。

△　日机向守卫鄱阳湖口雷区之“海宁”炮艇袭击，该艇猛烈迎击，日机受创遁去，旋再来袭，“海宁”炮艇被炸沉。

△　日机狂炸广州，14层之新亚酒楼被炸，民众死伤近千人。

△　空军在东流江面炸沉日舰四艘，并击落日机一架。同日，日舰进窥鄱阳湖，被击沉二艘。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河南太康。

△　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主力自济源陷垣曲。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秦基伟支队在井（陉）平（定）公路石门口设伏，毙伤伪军百余人，击毁汽车三辆。

△　中国出席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代表团一行15人，由团长杨福攸、副团长徐佩君率领，离武汉经香港赴美国。

△　伪满洲国外务局就所谓苏联士兵30余人侵入“满领”张鼓峰“构筑阵地”之事，训令北满外交技术员向苏联代理总领事库茨莱索夫提出严重抗议。次日，日驻苏代办照会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要求从张鼓峰迅速撤回苏军。

7月15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闭幕。选举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等25人为驻会委员。通过宣言，略称：参政会一致决议，“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施政方针”，“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呼吁世界各国“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孤立日本”。郑重声明：中国是“独立自由之国家”，南北傀儡组织“乃敌阀之俘囚”，“在国际法上且远逊于丧失独立后之被保护国之地位”。并指出：“中国今日全国一致，各党各派在抗战建国纲领基本方针之下，共同奋斗”，“以统一与团结为一切行动准绳”，“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厉行节约运动”，“集中一切智力、资财，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生之保障”，“尽一切努力，忍一

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　军事委员会任命许绍宗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　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自瑞昌抵九江视察，同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第七十军军长李觉、第八军军长李玉堂筹商九江防务。

△　《中美白银协定》再次延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对记者宣布：《中美白银协定》原定本月15日为有效之终止期，现双方同意继续延长。按：该协定为1937年7月8日签订，为期半年，上年12月已延长一次，此为第二次延长。

△　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定：为在中国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权，必须尽快使“临时”及“维新”两政权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使内蒙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逐渐吸收各种势力，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央政府。新中央政府建立的时机，要依据占领武汉后蒋政权的情况而定，如国民政府改组或蒋介石下野，就不建立，否则就建立；如国民政府分裂或改组，就把它作为组成新中央政府的一个成员。

△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卸任，遗缺由中村孝太郎大将继任。

△　上海伪“大民会”在四川路新亚酒楼成立，每月由日本特务机关拨经费二万元。该会前身为“兴亚会”，由日人北原雄龙主持，当腋少佐及大西为顾问，三浦为指导。南京伪维新政府立法委员高朔、张韬，实业部司长叶鼎新及其他一些重要官员均为该会之成员，其势力遍及江、浙沦陷区。

7月16日　军事委员会制定《难民移置办法》，规定凡长江北岸之难民，应沿汉水向陕南、陇南移置；其在江南各地者，应沿湘黔公

路向贵州移置；如交通工具缺乏，则由救济机关统率步行，沿途设站供应茶水食宿并保护安全。是日，分电有关各省遵照。

△　薛岳以杭、吴方面之敌已抽出二万余人向长江中部转移，电陈诚商请抽调第三战区数师兵力转用于鄱阳湖东岸作战。

△　薛岳电南昌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叶肇："请派约一连兵力之游击队，位置于乐化东北之金塘桥，以此为据点，发动该方民众武力，专任盘龙岗、金盘架、顾村、河头铺地区之湖防；一为拒止敌军登陆，一为将来袭击敌军侧后，请饬办具报。"

△　日机30架袭武汉，我空军起飞迎击，战于汉阳上空，日机被击落一架。

△　山东汶上日军向济南退去。是日，汶上县长率保安队收复县城。

△　陕西安边县保安队于是夜袭击八路军驻安边警备第二团。22日，朱德、彭德怀电蒋介石提出抗议，指出："大敌当前，一切力量应集中抗日，该县此种行动，实属有意破坏团结，自损国力。"要求速电制止，并"严禁此等事件继续发生"。

7月17日　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召集各军、师长至九江开会，到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兼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第一五五师师长陈公侠、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传、第八军军长李玉堂、第三师师长赵锡田、预备第二师师长陈明仁、预备第十一师师长赵定昌、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第一九〇师师长梁华盛、第七十军军长兼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第一二八师师长顾家齐、第十五师师长汪之斌、炮十团团长彭孟缉。张发奎以各部军纪甚坏，精神尤欠紧张，重致训诫。

△　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是日白于

商城城北之岳家祠堂就职。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在八路军协同下反攻日军，收复垣曲，日军退皋落镇。

7月18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巴黎法国《人道报》转国际和平大会，请求大会号召和组织各国人民，给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有力的援助。

△　日机27架袭南昌，我空军起飞迎战，激战于洪都上空，击落日机四架，日空军航空大尉南乡（日空军飞行员“四大天王”之一）被击毙。

△　开滦马家沟、林西、唐庄子7000矿工，在冀东七县大起义影响下，由共产党员周文彬、节振国领导，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攻占赵各庄矿区警察局，攻入唐庄子矿区。后遭日军镇压，一部分人转入山区，参加冀东抗日联军。

7月19日　日机39架狂炸武汉三镇，投弹200余枚，并投烧夷弹。徐家棚车站及居民区被炸惨重，毁房400余栋，死伤民众1000余人。

△　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奉召赴武汉向蒋介石报告滇政，并请示抗战大计及后方建设事宜。28返回昆明。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袭击浙江武康，与日军渡边部600余人激战数小时，于是晚收复武康城。次晨，敌大批增援部队开到，步、骑、炮各兵联合反扑，顾祝同部旋即退出县城。是役毙敌400余人。

△　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大纲》，提出对中国抗战力量进行分化瓦解，以达到“确立日满两国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促进日华两民族合作”统治中国的方针。在军事上，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反蒋反共，支持“新政府”；在政治上，控制华北、华中、蒙

疆伪政权，摧毁抗日容共政权；在经济上，抓住铁路、水运、航空、通讯等交通事业，开发中国资源；在文化上，排斥、打击共产党，而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

△　美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沙里司伯从北平报告美国国务院：唐绍仪已成为日本选中的人物，并已和日人约定：一、保证汉口落入日本手中；二、在南京建立一个融合各方的新政权；三、这个新政权有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自由。

7月20日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由南昌抵九江，嗣后由星子转观音桥赴莲花洞，设行营于莲花洞。

△　日机终日在九江一带上空盘旋，向沿江李汉魂部阵地投弹200余枚，李部死伤10余人；敌舰七艘，由杨家湾上驶，并以三舰开炮掩护，炮战二时许，被击退。下午又由湖口炮击狮子山及灰山，李部部分工事被毁，人员无大损失。

△　日机空袭岳阳，创“民生”、“江贞”二舰。

△　美波士顿大学学生500余人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中国抗战，并将日货投入海中。

7月中旬　日军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二、三师团各一部、台湾佐滕旅团主力并配合机械化部队共约七万余人，向大别山南麓潜山、太湖、黄梅、广济、田家镇一线大举进犯。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以王缵绪集团军第四十四军四个师、李品仙第四兵团12个师占领黄梅西北一带山地侧击西进之敌，以李延年第二军四个师守备田家镇要塞，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守备黄梅、宿松沿长江各据点，兵力共约七万余人。武汉会战大别山南麓战役开始。

7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河南省六厘公债条例》，定额国币500万元，32年还清，自公布日施行。同日公布《民

国二十七年甘肃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200万元，16年还清，自公布日施行。

△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第八十六次会议议决改组湖北省党部，派陈诚为主任委员，喻育之等11人为执行委员。陈诚未到任期间，由喻育之代理职务。

△　财政部以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私吞军费45万元，电请军委会派员详查追回。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莲花洞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并讨论作战问题。

△　第五战区克舒城。自皖北涡阳、蒙城等地克复后，日军4000余人困守舒城，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会同游击队两师于是日猛攻舒城，敌不支溃逃，舒城克复。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袭入河南辉县，歼灭伪军百余人。

△　日舰20余艘在飞机掩护下再陷广东南澳，该县县长洪之政率部退入山中继续抵抗，终以寡众不敌，被迫坠崖。

△　日驻苏大使重光葵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从满洲境内撤退苏联边防军，否则日本当诉诸武力。李维诺夫依据1869年《中俄珲春条约》所附之地图，指出张鼓峰属苏联领土，苏联政府决不以重光葵毫无根据之要求而变更苏联部队之驻扎地点。

7月22日　蒋介石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子文、副会长邵力子致电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

△　行政院长孔祥熙对军官训练团讲演《敌我财政现状之比较观》，着重指出，“我们可以断定，在长期作战之下，日本的财政经济必趋于崩溃，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目前阶段中，我们绝不能把日本的力量估计的过低，加以忽视，松懈了我们的奋斗”。并谓：“现在我们已切实作到全民抗战了，但还有许多宝藏无法运用，许多人力均被浪费……我们如果要应付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毅力，刻苦耐劳，忍辱负重。对于人力物力，务须极力节省，以达长期支持之目的。”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矿业法》，规定“矿业权设定后得准许外国人入股合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矿业”；对“以诈欺取得矿业权或违法私自采矿者，判处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科以三千元以下之罚款”。

△　内政部核准将四川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宝兴、越隽、冕宁、西昌、会理、昭觉、盐边、盐源、宁南、金汤、宁东16县改隶西康省。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豫北涉县，日军退邯郸。

△　韩德勤电呈蒋介石、孔祥熙，报告第八游击司令曾锡珪“庇纵部下为非”，“收纳土匪”，“擅撤国防前线部队”，“意图叛变”，请即派员接替该司令之职务。

△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指示侵华各军：土肥原被派往中国执行《适应时局实施第二期谋略计划》，现地各军应予以必要的配合和援助。

7月23日　日军在姑塘登陆。凌晨，日军波田支队七八百人分乘汽艇70余只，在日舰10余艘掩护下，由湖口驶入鄱阳湖鞋山附近，分两路向西岸姑塘以北地方强行登陆，遭李汉魂部各要隘守军强烈抵抗，日汽艇被击沉10余只。至天明，敌机20余架凌空轰炸，投弹400余枚，敌舰复以排炮轰击，李部沿湖阵地悉遭破坏，预备第十一师崩

溃，乃调第十五师一团由左翼增援，调第七十军第一二八师会攻姑塘，均遭敌阻。由星子北进之第一九〇师，在吴障顶止步不前。反攻未能奏效，姑塘终陷敌手。

△　代理四川省府主席王缵绪奉召飞汉，向蒋介石报告省政。

△　薛岳以日军在姑塘登陆，电南昌叶肇特别注意湖防，并指示保安团及第六十六军应严密守备之要点，请即配备赶筑坚固工事。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山东曹县。

△　南京伪维新政府任命倪道烺为安徽省伪省长。

7月24日　日军进攻九江。姑塘陷后，波田支队与一〇六师团会同进攻九江。是日拂晓，一〇六师团在海军炮舰及第三飞行团海空掩护下，以一部在胡家、马家附近湖岸，主力在殷家庄登陆，经塔顶山南侧地区，向九江西南攻击前进。同日，李汉魂下令撤退三角地带之第三师、第十五师、第一五五师沿湖部队，分三路向南转击，敌以突受腰击，其势顿挫，九江形势暂趋和缓。

△　副参谋总长兼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电蒋介石，报告皖北民众抗日自卫武装情形。谓："皖北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自卫武力，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10万。兹欲向合、巢、淮、蚌一带，发动广大正面攻击，拟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壮丁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

△　冀东游击队克清河，旋日军由北平增援，反攻甚烈，游击队遂退出该城。28日，冀东游击队再克丰润县。同日，夜袭唐山，捣毁伪冀东银行。

△　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通过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之决

议，呼吁各国加以制止，并主张按国际公约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停止以军火供日，反对任何与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相抵触之解决中日战争之办法。

7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福建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800万元，年息六厘，15年还清，自公布日施行。

△　蒋介石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　河北省府主席鹿钟麟自洛阳发出《告河北民众书》，提出四项施政方针，其中对于民众方面，则表示“一面普遍发动河北省广大民众之抗敌组织，一面对河北省现有之各民众组织及武装力量予以适当之整理”；并称：“尤注意系统之指挥及相互之联系，务使其行动一致，配合适当，而消灭一切无意识之磨擦，总期团结整个民族力量以一致打击共同之敌人。”

7月26日　九江失陷。25日晨，日舰开始炮击九江，11时直驶九江江面，飞机猛烈轰炸并投燃烧弹焚毁市区，旋由马厂湖及洋油厂分途登陆，且抄至上八里坡。第八军左翼极受压迫，九江侧背更属危险，第四军赶到，未能立即投入战斗。25日夜，日军冲进九江城内，同李汉魂部守军展开激烈巷战。至是日晚7时半，九江完全失陷，守军奉命向牛头山、金官桥、钻林山亘成湖之线转进。

△　小池口失陷。25日，日舰28艘炮击九江对岸小池口刘汝明第六十八军阵地，并以飞机70余架掩护海军陆战队四次登陆，均被刘部击退。是日，日军继续猛攻，守军伤亡过半，小池口失陷。

△　太湖失陷。日第十一军第六师团冈本联队及台湾军佐滕旅团主力沿潜（山）太（湖）公路犯太湖，与第五战区李品仙第四兵团韦云淞第三十一军激战，韦部向太湖以西之高地转移，日军遂陷太湖。

△　蒋介石电令国民党各级党部及中央各院、部、会，要求赴内

地各省之中央党政人员，厉行节约，一切衣食住行之生活，务循简单朴素之原则。同日，并电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严禁公务人员兼职并兼薪。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浙江省六厘公债条例》，定额国币1000万元，25年还清，自公布日施行。

△　薛岳以九江失陷致电张发奎及瑞昌霍揆彰、孙桐萱，请速令瑞昌、九江部队将九江、瑞昌间之余庄、阎家渡、官湖港、张家渡、老渡口、项家铺江堤、湖堤彻底破坏，引江水、湖水灌成泛滥，阻敌机械化部队西犯。

△　战时日本研究会会刊《战时日本》在武汉创刊，宋斐如主编。

△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北京政府总理张绍曾在汉口病逝。

△　南京伪维新政府任命江洪杰为交通部长，原任行政院长梁鸿志免交通部长兼职；任命交通部次长胡祁太为地方行政部长。

△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设立“对华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华重大谋略（按：指政治、经济谋略，不包括直接作战）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受五相会议领导；该委员会由土肥原（陆军部代表）、津田静枝（海军部代表）、坂西利八郎（外务省代表）组成。后因受土肥原具体控制，又称为“土肥原机关”。

7月27日　蒋百里自欧洲回国，由香港飞抵汉口，是日，向蒋介石报告赴欧考察经过，并对记者谈话谓：世界各国热切同情中国，抗战前途殊可乐观，切盼全国人士咸抱必胜之信心，抗战到底，雪耻复仇。

△　薛岳致电湘省主席张治中，请其速令各专员、县长发动当地民众，于9月底以前完成蒲圻——长沙线、通城——朱溪厂——长沙

线、万载——长沙线、萍乡——长沙线、莲花——遂川——衡阳——耒阳线等公路、铁路线上之城市圩站，择要构筑一旅或一团兵力守备之据点工事，以备将来作战之用。

△　军事委员会任命石友三为第十军团军团长。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豫北济源，日军向沁阳退去。

△　《大众报》（豫东版）在河南扶沟创刊。

△　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上院宣称：政府决定保护在华利益，克莱琪大使已奉命向日方严重交涉；关于对华信用贷款各项建议，决予分别考虑。

7月28日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河南柘城。次日进逼安徽亳县，与日军竟日激战。

△　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汉口对记者谈该军概况，称：现河北民军总指挥部辖16个干部大队，10个民军团并划为六个民军区，共有1.2万余人，有组织之民众四万余人，有抗日机关之县份计有54个，不脱离生产之广大群众10万人，分布于各铁路沿线与八路军协同，打击敌人。

△　北平日伪当局因近日游击队活跃，出动全部警察在全城挨户搜查，并出动坦克六辆及机关枪队沿西城各街来往巡逻。警察局并发出传单称，大量日军及坦克、飞机已开到北平，要求居民对日军采取“友好态度”。

△　日商上海内河轮船公司成立，8月6日开始营业。黄浦江及苏州河等内地航业均由该公司垄断经营，华商各轮船公司被迫完全停业，所有船只多被日方没收。

7月29日　第五战区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部克江苏东台。

△　空军在湖口炸沉日舰一艘，在鄱阳湖内鞋山炸沉日舰三艘、汽艇二艘。

7月30日　第二战区卫立煌部克晋城、沁水。山西日军自阳城、河头东窜，卫部在川底附近截击，是日收复晋城。同日，沁水之日军将城厢附近村庄焚毁后，倾巢西窜，卫部占领该县城。

△　外交部秘书周珏、驻日本神户总领事王守善叛国降日，外交部予以撤职查办。

△　日本驻朝鲜军第十九师团向张鼓峰苏军阵地发起猛攻，战争突然爆发。次日占领张鼓峰、沙草峰（张鼓峰北二公里）。据日方统计，张鼓峰之战，苏军伤亡估计为200至300名，炸毁坦克10辆；沙草峰之战，苏军伤亡200至300名，毁坦克七辆。日军两个大队共死45名，伤135名。

△　波兰驻日大使罗梅尔正式通知日本政府，波兰承认伪满洲国，互派外交代表。

7月31日　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奉命调回瑞昌方面，南浔军事概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负责。

△　蒋介石对保卫武汉之各部队长官讲演《发扬革命历史的光荣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武汉》，强调保卫武汉的重要意义，指出："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要求各部队长官：第一、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第二、各级主官应始终不离部队，誓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第三、高级将领应有坚决的企图心，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誓死求其贯彻。

△　蒋介石电令李汉魂固守南浔线之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鸡公岭亘城门湖之线，如有退却者就地枪决；某部溃退，即惟某部长

官是问。

△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为提前进行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提出《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制定“统一加强总动员和军需总动员”和“抓住结束战争时机”的方针，规定：夺取汉口，以“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攻占广东，以“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充线”，并“迫使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提出议和”，“及时结束这次事变”的战略目标。同时规定“下一时期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

△　伪华北电报电话会社成立，资本3500万元，由日、“满”、伪三方承担，主要经营有线、无线电报电话，控制天津、北平、山东、上海等地电讯事业。同日，伪“华中电气交通公司”在上海成立。

7月下旬　　周恩来、林伯渠先后会见蒋介石、何应钦，讨论扩大八路军编制事。蒋、何以200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

是月　　程潜在徐州会战的总结中指出：“此次徐州会战，我军虽四倍于敌，但主动地位已失，终于失败。”其原因为：一、指挥官视敌如虎，精神衰颓；二、士兵为强迫，极易潜逃；三、缺乏训练，战斗毫无韧性；四、情报不良，甚至伪造敌情；五、指挥官图避损失，不服从命令，阳奉阴违；六、缺乏协同，即使有利亦按兵不动；七、新式武器不会用、滥用、妄用，造成无谓的牺牲。

△　新四军张鼎丞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第三支队进入皖南前线抗敌。

△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浙江省建设厅合办浙东电厂成立。该厂系将浙江原碧湖、丽水两厂改组并吞并若干小厂而成，资金总额120万元，共七个分厂，发电容量500瓩，总经理赵曾珏。

△　资源委员会与湖北大冶源华煤矿公司合办湖南辰溪煤矿公司成立。贺衡夫为董事，孙守五为经理，资本40万元。

△　资源委员会将湖南湘潭、湘乡、邵阳三煤田划为国营，成立湘乡恩口煤矿局，并强行收买瑞丰公司斜井两口。该局共有资金17.4万余元，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钱昌照兼任董事长，黎重光任总经理。后因战局影响，于1939年结束，将设备转让于云南明良煤矿局。

△　经济部与四川省合办四川酒精厂，设于内江，资本20万元，月产酒精三万加仑。

△　《共产国际》7月号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的党籍，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民，用一切方法加紧援华运动，制止日本侵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月

8月1日　　蒋介石带领中央临时干事会及三青团中央团部全体人员182人，在武昌举行第一入团宣誓礼。随后，三青团全体干部在团长监视下，集体宣誓。同日，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期学员4000人，举行毕业典礼，并由蒋介石监视宣誓，集体入团。

△　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移重庆。并谓：武汉已成卫戍区域，一切以军事为重。

△　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是日奉命指挥南浔线作战，乃重新部署：第二十五军守备盛家咀亘星子一带湖防；第七十军占领牛头山、金官桥之线；第八军占领十里山、钻林山之线；第四军构筑车轮北端山、鸡公岭、皇天脑线预备阵地；第六十四军控制中岩、大岩、茶子山、胡罗婆尖一带山地；第七十四军控制德安附近；第六十六军控制乐化附近，旋转进至金官桥阵地。

△　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下属的抗战演出队和抗战宣传队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讲话要队员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方向。

△　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在西安自八路军办事处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晚即惨遭杀害。

△　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在日人金井章二操纵下改组。原总务、产业、交通、金融等专门委员会改组扩大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各部均由日人担任顾问，掌握实权。改组后，蒙疆联合委员会由协商性机构变为高于蒙古、察南、晋北三伪政权之上的指导机关。该伪政权地域北接外蒙，南达陕西、宁夏，人口270余万，其中蒙古族约25万。

△　日伪成立上海公产会社，以控制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计划。

△　苏联发表张鼓峰事件公告，略谓日军炮队协同步兵攻入苏联领土四公里之内。数小时后，苏联军队援兵开到，将日军驱退。日军死伤400余人，苏军死13人，伤55人。

△　英国从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所调警卫部队陆续到沪，至是日，驻沪英军由2000增至1.5万人。同日，英驻沪总领事为日军屡次侮辱英侨事，向日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

8月2日　国民政府令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本兼各职，特派张群继任，并免去其原任四川省府委员兼主席张群本兼各职；任命王缵绪兼四川省府主席。

△　宿松失陷。7月30日，日军第六师团由望江、宿松公路向宿松大举进犯，8月1日同第五战区第六十八军刘汝明所部守军发生激战，日军两个联队被歼。是日，日军陷宿松，守军退至黄梅防线。

△　九江方面日军在沙河车站受阻，不得南进，乃于是日绕向南浔线以西之赛湖（沙河西北）南岸冲入瑞昌县境，经第九战区第三十

集团军王陵基所部守军迎头痛击，被歼过半。

△　第二战区卫立煌所部自上月29日起，在晋南沁水县王寨、固镇杨家山及东、西邬岭间截击由沁水西犯之日军第一〇五师团藤勇及加岛部2000余人，激战五昼夜，至是日，毙敌1500余人，生俘40余人，夺汽车200余辆、装甲车四辆，残敌400余西窜。3日，又于上李家坝、上吴村间毙敌50余人，并克翼城。

△　山西沁水之徐济部伪军六个大队，携轻机枪七挺、步枪5000余支全部反正。

△　日军4000余人附汽艇64艘，分由高桥、海宁、宁桥沿江边公路犯浙东海盐，是晚海盐失陷。

△　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武汉成立，通过该会组织规程，推定贺衷寒为秘书长。

△　海关巡逻舰“江星号”在汉口下游被日机炸沉，舰长英国人克罗莱及华籍职工二人被机枪射死。

8月3日　　南浔会战开始。九江陷后，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率30余万人溯江窥武汉；而以第一〇一师团、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近卫师团一部，配合波田支队，兵舰80余艘，飞机数十架，水陆呼应，自湖口、九江南下，图先略德安、南昌，再西趋长沙，歼灭长江南岸第九战区军队，截断粤汉路，对武汉形成大包围。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率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军、第八军、第四军、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担任星子一带湖防亘南浔正面金官桥、德安等地之守备。是日，盘踞九江之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向金官桥一带攻击，薛岳所部第七十军、第八军、第四军迎击来犯之敌，发生激战。

△　蒋介石会见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就国共两党团结、保

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蒋答应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

△　日机68架袭武汉，在机场附近投弹数十枚。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起飞迎战，在武昌及黄石港上空激战，击落日轰炸机一架、驱逐机11架。同日，日机28架炸汉口机场，弹落人口稠密之居民区，居民死伤颇多。

△　空军炸安庆日军机场并炸毁江面日舰一艘。日机19架起飞迎战，被击落二架。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晋西离石，日军退守中阳。

△　经济部长翁文灏在重庆对新闻界人士谈战时经济政策，要点为：首应顾及抗战建国之需要，实行门户开放，中外合作，以加速发展各种事业为前提，而不造成某一国势力范围；以自给对封锁，以公开合作对一国专利，既为我国自主之要计，亦为远东和平之基础。当前，以开发西南、西北各省最为重要。

△　武汉战时节约运动宣传周举行开幕式，社会部长陈立夫任总主席并作报告，大会通过电请全国各界厉行节约运动等三项要案。各宣传队深入街道进行宣传，李德全、郭沫若等分别在电台演说。7日，蒋介石以宣传成绩良好，致电嘉勉。

△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积极疏散，避免无谓之牺牲。次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

△　国民政府任命蒋志澄为重庆市长，原任李宏锟免职。

8月4日　黄梅失陷。2日，日第六师团先头部队3000人沿宿松、黄梅公路，向黄梅进犯，与第五战区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第一三五师苏祖馨部在潘家铺、徐家桥、凉亭河、二郎河等地激战，另一部约

4000人与刘汝明部主力在双河口、掂林铺渡河桥及独山镇激战。刘部伤亡过半，撤守苦竹桥之线，日军进迫黄梅城郊，向下河桥、鲍家山之线猛攻。至是日午后，敌由北门突入，与刘汝明守城部队进行激烈巷战，因敌陆续增加，守城部队除少数突围外，余皆壮烈牺牲，黄梅失守。

△　拂晓，九江方面日军3000余人，由纱帽山、南昌铺、沙河之线进攻，被击退。次日上午日军再度来攻，配有坦克，来势凶猛，与薛岳兵团所部守军激战于牛头山、马鞍山、沙河一带，日军死亡在2000人以上。午后，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全部加入火线，战斗愈益激烈，薛部生力军增援反攻，敌卒未能得逞。

△　国民政府驻汉口各行政机关全部迁移重庆。

△　国民党中宣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湖北省暨武汉市党部、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联合成立“武汉各界纪念‘八一三’保卫大武汉宣传运动委员会”，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动员和组织民众积极参加保卫大武汉之各种工作。

△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联络委员会在武汉召集妇女团体座谈会，商讨保卫大武汉工作，武汉30余个妇女团体代表42人出席。联络委员会主任史良主席并致词，刘清扬、邓颖超、孟庆树分别在会上发言。会议决定成立武汉各界妇女团体联合办事处。

△　日机两批共27架侵入南昌上空，投弹百余枚，死伤民众260余人。南昌市民为避日机轰炸，连日纷纷迁出，城内居民已由30余万减至8.5万人。

△　八路军在南宫县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袭击晋北同蒲路榆林车站，毙日军150

余名，毁火车一列。

△　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于莫斯科举行正式会谈。重光葵表示，日政府愿意和平解决张鼓峰事件，以外交谈判结束纷争。李维诺夫提出以停止进攻苏联领土，撤退日军为谈判条件；并声明：如日军一日不撤退，则苏联当保留行动之自由。重光葵允将苏联政府之意见报告本国政府。

△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外相宇垣会商长江及内河航务以及实业、铁路诸案。17日，双方再度接洽，日方希望英国不予中国任何协助，并与日合作，防止中国共产党活动。19日，驻英大使郭泰祺以日方拟向英提出允许日在华北有自由行动权，则日愿将长江提供英经营一事访晤英外交部，声明中国决不接受。

8月5日　　第九战区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拟以一部配置于沿江各要地及南浔线，尤须固守田家镇，以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并歼灭深入西犯之敌，务立于外线地位，确保机动之自由；万不得已时，则以卫戍部队固守武汉，以有力部队于沿长江各点随时侧击敌人，阻其西进，其主力应转移于武汉外围，夹击聚歼敌人。计划将整个战役分为三个作战时期：以敌犯瑞昌或德安为第一时期；以敌占瑞昌或德安后为第二时期；以敌占田家镇要塞后以主力进犯武汉为第三时期。各兵团任务及行动，则依三时期之变化随时部署。

△　汪精卫自武汉抵重庆，当日接见记者发表时局谈话，略称：倭寇对于我国因深入而益陷于困势，对国际因树敌而益陷于不能自拔之境，惟望同志、同胞益自策励，前方、后方联成一气，以努力争取最后之胜利。

△　军事委员会任命吴奇伟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为第十一军团军团长，樊崧甫为第十二军团军团长，俞济时为第三十六军团

军团长，王敬久为第三十七军团军团长。

△　湖南省政府发行建设公债1800万元，年息六厘，期限20年。

△　吕正操部攻克保定东北之容城，全歼守敌200余人，俘敌百余人。

△　香港英文《孖剌西报》首载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五项议和条件，下午各晚报均转载。五项条件为：一、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二、承认“满洲国”；三、上海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四、赔偿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

8月6日　　蒋介石电第九战区陈诚、万耀煌总、副司令，略谓：“武汉附近各部队在其阵地附近须储积二个月之粮弹，必须作固守二个月半以上之准备，待野战军增援时反攻，以期在武汉附近内外夹击，歼灭敌军。”

△　蒋介石以日军主力沿长江两岸西犯急攻武汉，电军令部长徐永昌，指示：“我应调集各处兵力，集结主力于田家镇南北两岸，拒敌西进，相机歼敌，以一部固守鄱阳（湖）两岸延缓至相当时日，敌必自溃。”“发动各地游击队，扰敌后方，并设法封锁长江马当下游，断敌运输归路。”

△　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等，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

△　薛岳兵团李觉第七十军同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南浔线之金官桥鏖战，连续两日，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毙日军第一一三联队队长田中贞造，毙伤日军1200百余名，开姑塘退守以来未有之例。

△　日机63架袭炸武汉，投弹百余枚，被武汉防空部队击落一架。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召集武汉地方全体队员大会，总队长李昌报告当前时局，号召队员一致动员保卫大武汉，并布置工作。会议选举毛雍如、顾文华等七人为负责人，成立民先武汉三镇地方队部。

△　《抗敌新闻》在武汉创刊，张申府、陈北鸥主编。

△　南京天主教主教于斌奉蒋介石电召自欧洲返国，是日抵武汉。

△　苏联步兵第四十师和机械化第二旅所属一个坦克营、步兵第三十二师和机械化所属一个坦克营，在重炮及重型轰炸机200余架次配合下，从南、北方向对张鼓峰及沙草峰发动猛烈进攻，经五天激战，至10日苏联获胜，日军被逐出张鼓峰及沙草峰。

8月7日　　蒋介石下令疏散武汉人口，限是月15日前撤出居民50万人。

△　蒋介石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饬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准备将所属最坚强的三个师第一师李正先、第七十八师李文等，随时听调，准备增援武汉。

△　立法院长孙科在巴黎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抗战，亦即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抗战之获胜，仅系时间问题，他国若能在必要时加以援助，则获胜之期自必因之提前。

△　日机18架袭南昌，投弹60余枚，死伤平民150人，毁房290余栋。

△　朱德、彭德怀电蒋介石，抗议暂编第五十九师、十五师、预备三师袭击陕西淳化八路军保安队并大举进犯边区，侵占爷台山野猪咀八路军防地及村庄40余座。

△　伪皇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徐靖远率部7000余人在河南彰德水冶镇反正。该部原为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于3月30日在河南林县投敌，改编为皇协第一军，任军长。该部副军长徐靖远、第二师师长吴朝汉、第三师师长黄宇宙三人，不甘附逆，密谋反正。是日，乘李福和与日军寺内部长川少将参谋自彰德来该军驻地水冶镇之机，以列队欢迎为名，当场击毙李福和、长川少将、彰德日特务机关长洛合大佐、伪皇协军军事高等顾问植田大佐及尉官16名、士兵32名，率部反正。嗣后，军事委员会拨款五万元嘉奖。

△　北平伪临时政府公布旧币贬值令，自8日起，所有在华北流通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纸币，按其票面金额九折流通。

8月8日　　南浔线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自金官桥向南转攻河洲上西北高地，同薛岳兵团第八军第三师赵锡田部反复争夺，得失四次，至次日晚7时，卒为赵部占领。是役第三师伤团长一，营长二，连、排长伤亡51人，士兵伤亡1163人。毙日军大队长二人，日第一四五联队全部被歼。

△　空军炸香口、彭泽一带日舰，炸沉汽艇10艘，伤大型舰六艘。

△　国民党中央改组江西省党部，派熊式辉为执行委员会主任，范争波为书记长，是日，熊、范等人到省党部视事。并举行首次全体委员会。

△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公布《民众团体高级组织法》，规定各民众团体均须联合为高级组织，由卫戍司令部指定负责人并派员指导；各负责人均须宣誓服从政府命令，如有违背，予以严厉制裁。

△　日机狂炸广州，死伤民众700余人。法国天主教堂亦被炸毁，避难妇孺死伤百余人。11日，法国驻日大使亨利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索赔款20万法郎。

8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张群、李国钦为中央银行理事，原常务理事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陈行、叶琢堂、唐寿民、徐堪，理事叶楚伧、王宝仑、钱永铭、陈光甫、周宗良，监事李铭、虞洽卿、林康侯、贝祖诒、徐陈冕、秦润卿、谢铭勋任期届满，均着连任。

△　武汉各救亡团体及民众1.5万余人举行火炬游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决心保卫大武汉。

△　日机48架轰炸广州市区，死伤平民160余人，毁民房200余间。

△　冀南临漳伪军李正修部600余人反正。

△　国立江苏医学院由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南通学院医科于四川北碚合并成立。

8月10日　　日军波田支队由飞机、舰炮掩护，在港口（瑞昌东北）强行登陆，向平顶山、望夫山（瑞昌以北）进攻，与第九战区第二兵团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激战至晚，陷平顶、望夫两山。次日拂晓，第九战区援军赶到，联合守兵猛烈反攻，收复两山头。其后，该二山复陷敌手。

△　日本为统制中国沦陷区丝业，在上海成立华中蚕丝株式会社。

△　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莫斯科再次会谈，双方于午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规定：苏日两军自11日中午（张鼓峰时间）起，停止攻击。13日，苏日双方交换遗尸，日军死亡600人，伤2500人；苏军死亡236人，伤611人。日方公布：苏军伤亡4500人，毁坦克66辆，击落飞机三架；日军伤亡1440人。

8月上旬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发布《武汉民众团体战时行动规约》，凡八条，规定一切民众团体如召开大会，须于三日前呈请核准

派员指导，并禁止民众团体开办训练班及讲演会。

△　上旬至中旬，日军第十三师团、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第十六师团之第三十旅团及第十四师团一部共约10万余人，集结于合肥、舒城一带，图犯六安、霍山，取道豫南，占据信阳，包围武汉。第五战区令第三兵团（辖六个军，共13个师另一个独立旅，计10万人）总司令孙连仲进驻商城督战。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役开始。

8月11日　被困于上海胶州公园之“四行仓库孤军”第八十八师八百壮士，为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悬挂国旗，与公共租界白俄商团发生冲突，被商团击毙二人，伤94人，团附谢晋元等16人被扣留。

△　日机70余架分三批狂炸武昌、汉阳，投弹200余枚，死伤民众800余人，华中大学被炸。次日，日机72架炸武昌、汉口，投弹350余枚，死伤民众700余人。

△　空军炸九江日舰，炸沉三艘，重创五艘。

△　青海省举行祭海大典，到各蒙、藏王公等2000余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主祭并讲话，号召各民族精诚团结，一致抗战。

8月12日　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及范筑先游击队奉命反攻济南，爬入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双方死亡达300余人，日军退往洛口。入夜，石、范两部占领济南，后安全撤退。旋蒋介石特令嘉奖。

△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际联盟第十九届大会代表。

△　晚，新四军陈毅支队袭击苏南句容县城，毙日伪军40余人，摧毁该伪县政府。

△　上海“四行孤军”绝食抗议白俄商团之暴行，同时将上海各界捐助之钱款281元转捐作保卫武汉之用。

8月13日　蒋介石发表《告沦陷区同胞书》，指出：抗战13个月来，已取得战略上、政略上、精神上和外交上四个方面的胜利，要求沦陷区同胞坚守信念，不动摇，不畏怯，奋斗到最后一息。

△　蒋介石电令行政院交涉保护“四行孤军”爱国官兵，同时派员请英国代办葛凌蔚转电在沪之英大使卡尔主持正义。同日，“四行孤军”继续进行绝食斗争，团附谢晋元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质问。

△　武汉各界在武昌、汉口分别举行代表大会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一周年，大会通过呈蒋介石致敬及电慰前方将士等三项提案。同日，重庆、成都、西安、南昌、长沙、广州等地均举行纪念“八一三”大会或游行。

△　晚，第九战区第二兵团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自瑞昌分三路反攻港口登陆之敌，一路攻丁家山，二路攻马鞍山、望夫山，三路攻平顶山，战斗异常激烈。次日凌晨克丁家山、马鞍山。旋日军施放毒气，孙部中毒者甚多，乃被迫分三路撤退，固守蜈蚣山、周家垄之线。

△　日机百架三次炸湖北阳新，每次投弹800枚以上，图炸毁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该司令部及党政机关均迁往城外。阳新城被炸后大火延烧达一日之久，民众死伤1300余人。

△　第三战区游击队300余人，夜袭上海虹桥飞机场，机场内日军全部被歼，机场被占，旋于次日凌晨撤退。

△　钱塘江沿岸浙西游击部队收复富阳。

△　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胶东大众报》创刊。

△　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国讯》在重庆复刊，编辑委员会及发行人为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叶圣陶、孙起孟、孙凡伊等。

△　前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在柏林发表谈话，认为：中国绝不会为日本所败，“中日两国若交战至五年之久，日本当局即当被迫而撤回在华军队，并听任中国军队规复前此所放弃之区域”，日军将复蹈拿破仑一世所统大军进攻俄国之覆辙。

8月14日　薛岳兵团所部分由庐山、金官桥两路袭击南浔线正面之敌，是晚金官桥一部冲入敌阵地，拼力厮杀，毙敌千余人，日军向九江方面撤退。

△　上海纳税华人会、市商会及上海地方协会等七团体代表到“四行孤军”住地劝慰，八百壮士即日起复食。

8月15日　国民政府颁布《修正惩治汉奸条例》，凡19条；废止《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

△　国民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谭道源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瑞昌战事重心转向赤湖以西之大树下。是日，港口方面日军4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沿江堤进犯大树下，双方炮火猛烈，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守军不支，转移至大树下西侧朱庄附近。17日，孙军向朱庄进攻，将敌逐至唐家坡。18日，日舰10余艘向朱庄反扑，未得逞。

△　第五战区第三兵团孙连仲部向黄梅进攻，在城北商河桥、柘林铺之线与日军发生激战，敌势不支，乃由宿松调千余人应援，陷柘林铺，旋被击退。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皖北蒙城，日军退往宿县。

△　北平伪临时政府在北平设邮政总局。

8月16日　第三战区游击队一部收复浦东川沙县城，伪军弃城逃遁。

△　日军第九师团自镇江进入江西九江，受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是日，第十一军下达命令：“第九师团在登陆后，陆续将兵力集结在九江以南地区，应向瑞昌附近前进。”

△　日机81架分两批袭武汉三镇，投弹260余枚，毁房300余栋，死伤平民300余人。

△　保定伪军刘大林、杨子威部500余人反正，是日抵达满城与八路军聂荣臻部会合。

△　丁福保等人发起创办之中国流通图书馆在上海正式开幕，藏书10万余册。

△　伪满洲国任命吕宜文为首任驻德国公使。

8月17日　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自渝抵蓉，联合发表讲话，表示拥护中央，抗战到底。

△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并告朱德、彭德怀，就边区货币的稳定、数目、准备金、比价等提出政策原则。

△　永济失陷。16日上午，日军第二十师团千余人猛攻晋南永济，并以飞机轮番轰炸。晚7时，日军自东北面攻入城内，守军张希文奉命堵截，与日军反复肉搏五次，营长张希文及全营官兵全部战死，永济陷落。

△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下令解散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旋各该团体分别发表宣言和启事，向当局提出抗议，并表示将继续努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呼吁各界给予援助。20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对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此举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恢复三团体活动的自由。

△　日机18架袭长沙，投弹百余枚，毁民房300余栋，炸死民众

200余人，伤500余人。

8月18日　上海“四行孤军”被辱事件，经上海各界抗争，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赞同恢复8月11日以前状态，严惩肇事者，抚恤被难士兵，“四行孤军”今后自由悬挂国旗，不得干涉。

△　日机27架袭衡阳、宝庆，我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日机四架。同日，空军与日机六架在黄冈、鄂城上空激战，击落日机二架，俘敌飞行员一名。

8月19日　日机轰炸星子城。日军进攻金官桥受挫以后，乃以第一〇一师团配合海军，图由鄱阳湖畔重镇星子沿德星公路再犯德安，包围第九战区右侧背，切断南浔路，是日开始进犯，以飞机20余架轮番轰炸星子城。第五十二师小有损失，薛岳兵团乃以第六十六军仍守德安，移第八军至箬溪柘林构筑预备阵地。

△　武汉警备司令部布告实施军事征用法，于市区及四郊构筑防御工事。

△　国民政府据内政部呈请国葬已故上将唐继尧，是日指令照准。

△　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科学考察团，由袁复礼、刘国钧等人主持，对西康自然地理以及宗教、民俗、婚礼、人口、社会组织、土地和土司制度等项进行综合考察。

8月20日　星子失陷。拂晓，日舰数艘、艇20余只炮击星子城，续以飞机六架轰炸，旋第一〇一师团千余人陷大、小定山，复炮毁星子城工事。入晚突破城东南，同薛岳兵团第五十二师冷欣部守兵混战。至10时城陷，冷师退扼樟树桥、玉筋山。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巡视长江两岸防线后发表谈话，称：“日军困难，十倍于华军”，“日军除为疫症所苦外，且于地理上亦

处于不利地位，每日进攻辄多损折。华军士气，今已复振。”

△　监察院长于右任由汉抵渝，对记者谈话，强调战时行使监察权之必要，并谓已令各监察使、监察委员巡回视察，严防贪污，辅导地方行政设施。

△　中共冀热边区委员会致电朱德、彭德怀总、副指挥并转呈蒋介石，报告7月9日冀东七县抗日大起义及7月18日唐山7000矿工抗日大起义之经过，并说明两次起义均为国共两党党员共同领导，祝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新胜利。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黄克诚第三四四旅消灭豫北修武伪军高永之部300余人。

△　国民党下令解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三个团体。次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抗议，因而被勒令停刊两日。后经周恩来严厉交涉才得以照常出版。

8月21日　蒋介石接见伦敦《每日捷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保卫武汉必将获得成功；日军之对华战争，并非对付共产主义，而纯为侵略中国；并谓：“战争愈展开，流动之游击队将愈占重要地位，在未来保卫武汉之决战中，游击队必将有巨大之贡献。”

△　日军1700人，附炮20门，向星子北面玉筋山大举进犯。薛岳兵团第五十二师冷欣部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失而复得，伤亡一营以上。同日，鄱阳湖内敌舰艇分别强登星子西南牛屎墩及流星子，均未得逞。次日，敌突破玉筋山同冷师激战，23日玉筋山失陷，冷部退守东孤岭。

△　晨，由九江方面开来之日第九师团，向赤湖东、北两岸发动猛烈进攻。东岸方面，日军主力2000人在飞机20余架掩护下，自胡家荡（距瑞昌18里）向周家垄、蜈蚣山一带进犯，与孙桐萱部第三集

团军展开激战，敌军施放毒气，孙部伤亡甚众，下午2时，孙部撤退至曹家山、钻天山、戴家垄之线。北岸方面，日军接连进攻朱庄，双方激战四小时，敌舰以猛烈炮火将朱庄守兵阵地摧毁殆尽，午后朱庄失陷。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支队伏击由大名开往邯郸的日军汽车50辆，毙敌百余人，毁汽车11辆。

△　宋庆龄在广州对在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说，指责美国将军火供给日本进攻中国，并指出美国政府抗议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只是一种伪善。

△　行政院特设贸易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陈光甫、翁文灏、穆藕初分任主任委员。

△　中苏文化协会广州分会成立，余汉谋、吴铁城等七人为名誉会长，钟天心等15人为理事，廖承志等七人为候补理事。

8月22日　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在香港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只有将中国政府及国民党内一切与北平“临时政府”及南京“维新政府”声气相投之分子全部肃清，而后中国抗战力量在物质上、精神上始能突飞猛进，始能运用中国无尽之人力、物力，驱逐日人于境外，而争取最后之胜利。

△　日本大本营发出攻占汉口命令：华中派遣军协同海军攻陷并占据汉口附近要地；华北方面军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努力牵制敌人”。

△　日机46架袭广九路新塘，被击落一架。另18架袭粤汉路株洲。

△　日军4000余人，第一次“扫荡”皖南当涂县小丹阳地区，26日被新四军第二支队粉碎，毙伤敌50余人。

△　伪满洲国国务会议通过《暂行资金统治法》及米谷管理制度。

8月23日　新四军与友军配合，在苏南丹阳夹击日军汽艇六艘，毙敌50余人。同日，新四军一部在金坛、丹阳间珥陵镇截击日军运兵汽艇七艘、拖船10余只，全歼所载敌兵数百人。

△　八路军一部攻占冀西满城县，伪军石振声部400余名反正。

△　《救中国》周刊在武汉创刊，胡绳主编。

△　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以祖国抗战，是日举行该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典暨游艺筹赈大会，筹款国币30余万元，救难赈灾。

8月24日　瑞昌失陷。19日，日波田支队主力从九江出发往攻瑞昌，23日进入瑞昌北面及东北面约四公里地方。是日，配合波田支队同攻瑞昌之第九师团丸山支队亦自九江抵瑞昌附近。当晚，日军陷瑞昌，第二兵团张发奎部退守瑞昌西北地区。

△　日军在鄱阳湖畔牛屎墩登陆，图与星子之敌成犄角之势，夹击东孤岭。25日，薛岳兵团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亲率该师一部及华振中第一六〇师一个团自星子西面烂泥塘猛攻牛屎墩，与敌激战数小时，是日拂晓克牛屎墩。

△　日军自瑞昌方面向马回岭方面进犯，刘若弼新十三师及范南煊新十四师节节后退，连失新塘铺、岷山大屋等阵地。

△　立法院长孙科结束对英、法、苏、荷、比、瑞士等国之考察，是日返抵武汉，对记者谈话，略谓：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我国人民须痛切认识，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关头，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独立，为世界和平，必须忍受长期痛苦，始能达到长期抗战之目的。

△　财政部在重庆召开第二次金融会议，讨论制止伪政权增发伪钞、投资西南国营事业、开发西南宝藏、发展边省经济、救济农村、提高农产品价格及巩固国币地位等问题。

△　外交部发言人否认英国所传意大利调解中日战争已与汪精卫达成初步谅解事，重申："我国此次抗战乃为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非至敌人放弃其侵略政策，绝无和平可言。"次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亦作同样之声明。

△　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桂林号"自港飞渝，途中被日机截击，坠毁于广东中山县海面，乘客12人遇难，内有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及美籍乘客一人。

△　陕鄂边区警备司令部在汉中成立，祝绍周任司令。

△　广东省顺德县龙江镇7000余户蚕农具呈广东省政府建设厅蚕丝改良局，略谓：自本年3月财政部实行生丝出口外汇统制，丝价每担782元，政府只发510元，实亏272元，致使蚕农破产，丝业凋残，请求政府统筹兼顾，迅予救济。

8月25日　朱德为纪念八路军成立一周年发表《告国民书》，指出：一年来，八路军与日军交战600余次，毙伤日军3.4万余人，俘日军2000人，对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领饷不作战"的诬蔑之词，予以有力的驳斥。

△　外交部发言人向中外记者说明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飞机遭日机袭击之真相，愤怒谴责敌军有意蔑视国际公法，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残暴行径，吁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群起制止敌寇暴行。

△　日机40架袭南昌，投弹50余枚，死伤民众40余人。同日，日机18架炸长沙，在市区投弹60余枚，死伤民众60余人。

8月26日　瑞昌日军第一〇六师团3000人，附炮八门，向笔架

山、鲤鱼山（均瑞昌西南）进犯，与第二兵团第七十二军王陵基部新编第十三师守兵激战，是日陷笔架山，次日陷鲤鱼山。

△　关麟徵第五十二军驰援瑞昌，与日军在桃村、郎君山一带发生遭遇战，日军伤亡六七百人，关军将大路口一带山地夺回。31日晨，关军乘敌阵地未稳，向大尖山（瑞昌以西七公里）一线之敌大举反攻，血战竟日，歼敌3000余人，日军攻势顿挫。

△　日本汽艇数十艘载日军5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从浙东乍浦、海盐附近强行登陆，乍浦、海盐失陷。31日，第三战区游击队克复乍浦、海盐。

△　日机炸长沙、广州、梧州等地，梧州广西大学被炸。

8月27日　蒋介石接见路透社记者称：所传意大利调解中日战争事，纯系谣言，决不能破坏中国的团结及与英、美、法、苏之合作。29日，汪精卫亦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讲演，否认此事。

△　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祀孔典礼。林森主祭，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五院院长、内、教二部部长、行营主任及孔奉祀官陪祭。此为国民政府迁渝后之首次祀孔大典。

△　八路军第四纵队、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的主要负责人在遵化县铁厂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辽军区，推选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副司令员，下设五个军分区，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

△　日军第六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在其先头部队掩护下，沿潜山、黄梅大道西进。26日，李品仙兵团第四十八军乘敌主力通过之后自侧面发起攻击，经一昼夜之战斗，是日收复潜山、太湖。

△　星子日军佐藤支队及伪皖保安团一部，附炮20门，连日协同日海、空军迫东孤岭东麓，附近鄱阳湖湖面敌舰11艘，汽艇百余只，不断炮击沿岸，图登陆，薛岳兵团第一〇六师钵盂山、桃花尖工事悉

毁，继以机炮护步兵分犯各军阵地，终未得逞。

8月28日　蒋介石电第一、二、三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阎锡山、顾祝同、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河北省府主席鹿钟麟及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等人，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略谓："敌溯江西犯，决战之期已迫。我主力军各方面战况良好，各游击部队亦迭奏奇功，殊堪嘉慰。所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各尽最大之努力，督饬所属各游击部队积极游击，其在北部队特应向津浦南段不断袭击，策应第五、九战区之作战为要。"

△　李品仙兵团自潜（山）、太（湖）乘胜前进，是日再克宿松，日军向望江、安庆溃退。

△　风陵渡失陷。23日，日军3000人进犯风陵渡，26日起，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与日军在赵村、田村、凤凰山激战，团附一人及营长二人殉职。是日，风陵渡陷落。

△　刘汝明第六十八军与覃连芳第八十四军攻黄梅，日军据城顽抗，双方伤亡甚重。29日晚，刘、覃两军向广济西北高地转移。

△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在汉口成立。到团员百余人，发起人马占山。该团任务为进行抗战宣传及救护伤病官兵与被炸之平民。

8月29日　六安失陷。26日，日第十师团犯皖西六安，被第五战区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牟中珩第一一四师击退。28日，日第十师团3000人，附炮10门，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自东南城角攻入城内，与第五十一军周光烈第一一三师守兵激战。是日，六安陷落，守兵撤至淠河西岸。

△　霍山失陷。27日，日第十三师团2000人，沿舒（城）霍

（山）公路犯霍山，与第五战区宋希濂第七十一军激战。28日晨，日第十三师团增至3000人，冯治安第七十七军所部张凌云第三十七师、王长海第一三二师奉命增援宋军，至午后日军续增1000余人，并以飞机协同进攻。是日，日军2800余人复自舒城增援，日机数架狂炸霍山城，日第十三师团攻入城内，与守兵激烈巷战，入夜，霍山陷落。

△　第七军、第十一军自黄梅以北对被包围于黄梅一带之日军发起猛烈攻击，经两日激战，歼敌甚多。日军不断增援，并以海、空军助战。次日，敌军展开反扑，复经两昼夜之激战，该两军因缺乏空军掩护，死伤累累，被迫后撤。

△　日机48架分两批狂炸湖北京山县，投弹200余枚，并投燃烧弹，毁房700余栋，死伤民众1000余人。

△　孙科在武汉报告访欧经过，略谓：全世界除德、意外都同情中国，“只要我们全国上下一致，抗战到底，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　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徐特立等离武汉返延安。

△　湖北战地服务团在汉口行宣誓礼，即日出发沿江战区分担运输、交通、救护、特务、宣传等项工作。

△　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为纪念国耻二十八周年在武汉发表宣言，强调与中华民族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回祖国的独立自由。

8月30日　第九战区张发奎第二兵团向瑞昌以西之大尖山全线反攻，同日军血战竟日，击溃两个联队，击毙敌联队长一人，克复大尖山，敌残部退向瑞昌。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

△　日军一部在霍山淠河以西独山镇一带与张凌云第三十七师、王长海第一三二师激战，以掩护其主力向豫鄂边界叶家集进犯。

△　日机11架袭广东南雄，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一架。

△　伪“东亚文化协议会”在北平成立，到王克敏、汤尔和、日人酒井忠正及各机关、学校代表共千余人。推汤尔和为会长，通过该会宣言。

△　上海南市伪维持会长陈沄遇刺毙命。

8月31日　第一战区程潜部分头进攻豫北济源、沁阳，日军向济源以东撤退，我军收复济源、沁阳。

△　星子日军与薛岳兵团冷欣部在东孤岭、桃花尖一带激战，敌因屡攻不下，乃施放大量毒瓦斯，并以飞机与机械化部队配合猛攻。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六八九团、新一团及东进纵队一部，分四路进袭河南临漳以南贾河口、秤钩湾，消灭伪军苏启明、郭清部2000余人，生俘苏启明。

△　国民党中宣部设立党报社论委员会，由叶楚伧、周佛海任正、副主任，陈公博、潘公展、彭学沛、陶希圣、程沧波被聘为委员。

△　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在武汉发表《致中国前线将士书》，表示愿留武汉从事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希望前线将士无情打击侵略者。

是月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孔祥熙任董事长，蒋廷黻、俞鸿钧、杭立武为常务董事。

9月

9月1日　　拂晓，星子日军向桃花尖、钵盂山进犯，华振中第一六〇师与敌争夺五次，毙敌四五百名，旋敌施放毒瓦斯弹，并以飞机10架狂炸，守兵多中毒倒毙，阵地尽被摧毁，团长梁佐勋阵亡，伤亡700人，桃花尖、钵盂山失陷，梁部退守东孤岭。

△　日军第九师团一部沿瑞（昌）德（安）公路窜扰南浔线之马回岭，冯圣法第五十八师奉令于马回岭以西阻击日军。

△　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在冀东迁安消灭伪军一个营，俘营长以下军官七名、士兵80余名。

△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武汉纪念记者节，沈钧儒、胡愈之、田汉等百余人出席，范长江主席，郭沫若、王芸生、吴克坚、蒋百里、鹿地亘等演讲。大会致电世界新闻界，吁请以舆论援助中国抗战。

△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为动员妇女保卫武汉，于武汉市党部招待各妇女团体，史良等200余人出席，宋美龄致词。

△　中国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拥护政府抗战；促进民主政治；厉行全国总动员；在不妨碍国家独立、统一原则下，联合各党派共同奋斗；策动友邦，实行制裁暴日等六项政治主张。

△　南京伪维新政府为调查战区物产需求状况，组织商货输出及转运，是日正式成立通济局。

△　德国政府撤销驻伪满新京（长春）商务代表处，改为驻“满洲国”公使馆。

9月2日　　皖西边境叶家集失陷。大别山北麓日军自六（安）叶（家集）公路西犯，1日，其先头部队进迫叶家集。是日，与第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守军激战，中午叶家集失陷。同日，另一股日军往叶家

集以南开顺街向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守军进攻，午后于部弃守开顺街。当晚，两股日军强渡史河进犯豫境。

△　日军进攻广济，是日突破刘汝明部青石桥（黄梅城西二里）防地，并陷第一七六师区寿年部防地魏家凉亭。3日，陷刘部防地笔架寨、莲花塘及覃连芳第一三一师防地普天寺、李家塘，王缵绪部防地双城驿。4日，陷何绍周第一〇三师防地笔架山，牟廷芳第一二一师防地石门山。

△　日军增兵一个联队续犯马回岭，王耀武第五十一师与第五十八师夹击日军，黄维第十八军亦奉命自瑞（昌）武（宁）路增援。

△　周恩来、叶剑英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豫皖苏鲁边界抗日新局面。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李井泉支队与杨植霖部袭击绥远陶林城，歼灭伪军700余人。10日，攻克绥北乌兰花，全歼守敌。

△　新四军在皖中棋盘岭伏击开往桐城之日军汽车80余辆，击毁30余辆，毙敌40余人。

△　豫北济源伪军王兴焕杀死日军官兵60余名，率部千余人反正。

△　日机炸南昌，民众死伤百余人。

△　上海美商会致电美政府，要求采取坚决态度和有效措施，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9月3日　　日军第九师团陷南浔线马回岭。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改守德安以北各线。

△　生活、商务、中华等20余家书店联名具呈蒋介石，要求撤销

对战时图书杂志的审查。

△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主办《反侵略》周刊，在武汉创刊。

9月4日　　大别山北麓日军犯固始、潢川、光山。敌在富金山受挫后，乃以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北趋固始，并抽调寿（县）、凤（阳）一带日军3000余人，配以汽艇百艘，由正阳关溯淮西上，直趋乌龙集（息县境）乃至踅子集（潢川境）一带水陆并进，遥与进攻固始日军呼应。第五战区饬第七十一军分兵守固始，并令张自忠军团长派骑兵一旅由潢川星夜驰援，复令该军两师布防于固潢公路拒敌西进。3日，日军到达石佛店。是日，日军犯固始，固、潢、光之战由此开始。

△　国民政府通令将行政年度改用“历年制”，即从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年度，以与会计年度相一致。

△　新任驻苏大使杨杰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呈递国书。

9月5日　　东孤岭失陷。4日，星子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在飞机军舰配合下，由牛屎墩、樟树桥两路攻击东孤岭（隘口以东），占领二五〇九高地。梁华盛第一九〇师会同冷欣第五十二师反攻无效，是日午夜，东孤岭完全失陷。

△　军事委员会任命高荫槐为第三十军团副军团长。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王震第三五九旅在察南桑乾河与日军600余人、汽车16辆遭遇，发生激战，毙敌300余人。

△　浙江国民抗敌自卫第五支队司令郑器光率队自绍兴渡过钱塘江，进入杭嘉湖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

△　欧亚航空公司17号飞机由香港飞昆明，在广东英德县佛岗上空遭日机三架追击，机身中弹，被迫降落柳州。6日，日机又在湖北嘉鱼上空击落欧亚公司17号飞机。

△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致函谴责国联未能采取措施，制止日、德、意侵略，要求国联号召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发动全世界规模的反侵略运动，实施《国联盟约》及决议案，以制止侵略，实现集体安全，保卫世界和平。

△　出席国联代表顾维钧、郭泰祺根据外交部训令，照会国联秘书长艾文诺，请即对日实施《盟约》第十七条。

△　日本政府照会英、美、法、德、意五国驻华大使，声明日方愿尊重汉口之“特别区域”，但又无端要求该区域不得作为中国军事行动据点，不得有中国军队及军火通过。

9月6日　广济失陷。5日，防守广济之第八十四军及第三十一军反击来犯之敌，夺回郑公塔、彭家湾、双城驿。旋敌对广济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猛扑大佛寨、后湖寨、五峰山，守军伤亡甚重，防地相继失守，于是夜向广济西北一带高地撤退，李品仙兵团总部则转移至西河驿。

△　固始失陷。4日，日第十师团一部自石佛店附近强渡史河，当日即占南大桥。5日，敌陷王小桥、罗台子，是日拂晓突破华祖庙阵地，宋希濂部改守固始南门外一带高地。下午，敌自击关（固始城东门外街市）向城内发炮。入夜，敌军爬城同守军激战，随即攻陷固始。

△　大别山北麓富金山战斗激烈。叶家集日第十三师团欲直趋商城、潢川，进据信阳，以达包围武汉之目的，3日起即进攻富金山。4日，日第十三师团治德田重旅团长于富金山战场负伤。是日，日军三面猛攻，宋希濂第七十一军顽强抵抗，富金山第三峰一度失陷，当经

第三十六师师长陈瑞河率部猛烈反攻，将敌击退，陈师伤亡七八百人。次日，日军向富金山施放催泪瓦斯，并增兵5000余人，仍被击退。

△　日军自豫北孟县分三股以坦克掩护攻陷温县。10日，第一战区程潜部反攻，克温县，毙日军400余人。

△　日机18架袭南昌，被击落二架。

△　国民政府通令各军政机关“切实保障人民合法权利”，并随令附发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之沈钧儒等人所提《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

△　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朱家骅致电国联秘书长艾文诺及国联同志会总会长波烈尔，要求国联实施《盟约》第十七条，有效制裁日本侵略者。次日，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致电国际反侵略大会，提出同样要求。

9月7日　　日军自广济西犯，与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在四顾坪、白凤山激战。是晨，日军800余人，以飞机10余架掩护，向曹部猛攻。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旅旅长陈德馨率部冲杀，中弹负伤，至12日在汉口医院逝世。

△　南浔线马回岭附近日军千余人，向东侧击蜘蛛山，与薛岳兵团第一五九师谭邃部激战两小时，敌不支北退，死伤180余人，谭部伤亡七八百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九团及冀南新一团攻占冀南临漳以南回隆、楚旺、吕村集，消灭伪军王自全一部及郭青残部300余人。

△　日军千余人分由石家庄、正定犯灵寿，至13日，被八路军一部在曲阳集伏击，毙敌300余人，余敌退走。

△　黄河防汛新堤落成典礼在郑州举行。新堤长70余里，可屏卫600万亩土地，160万人口，为83年来黄河史上之新绩。

△　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牒文，揭露侵华日军四个月来使用毒气11次之实据，请求制止日军暴行。是日，国联秘书处将牒文公布并分送各会员国。

9月8日　　李品仙兵团第八十四军及第三十一军自黄婆凹方面向敌侧背攻击，盘据广济之敌仓惶败走，广济克复。

△　海军漂雷队在新洲击沉日舰二艘。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制定《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规定各报社将所发全部稿件，于发行之前一律送新闻检查所检查；违者罚以停刊一日、三日、一周，以至永久性停刊，是日通令施行。

△　全国102家报纸联合发表《全国报界共同宣言》，要求政府对七年来的外交政策速作彻底检查；呼吁国联赶速援助中国，制裁日本。

9月9日　　国联行政院会议开幕。武汉、重庆、长沙、南昌、昆明、成都、贵阳、西安、兰州、宁夏、迪化等城市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国联制裁日本，援助中国。

△　日军第九师团自瑞昌沿瑞昌——马头镇及瑞昌——阳新公路向西北进犯，图北取马头镇，西窥阳新，是晚陷尖山坡阵地。10日，续向磨刀山猛攻，与汤恩伯集团军所部守军激战，陷狮子山、磨刀山、大风山，守军退马鞍山、和尚脑之线。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出师察南桑乾河，击溃自大同来犯之日军600余人及援军500余人，毙伤敌500余人。同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王震第三五九旅在广灵附近与日军激战，毙敌百余人，俘敌五

人。

△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同日，侵华日军召集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代表王克敏、朱深、温宗尧、王揖唐、梁鸿志、陈群及德王在大连开会，筹商建立“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具体办法。

9月10日　星子日军第一〇一师团攻陷华振中第一六〇师烂泥塘防守阵地，华师退守鸡笼山、袁家坂。

△　八路军冀南部队第六八九团、新一团、青年纵队等攻占临漳以南崔家桥、大韩集、豆公集，消灭伪军李台部及王自全残部1300余人。伪团长王自全在临漳率部投诚。

△　上海恒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伪合办，资本日金2000万元，经营都市及港湾建筑事业、不动产之买卖、租赁、信托、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

△　南京伪维新政府在上海复旦大学旧址成立维新学院，日人原田熊吉少将任院长。

△　暹罗逮捕华侨4700余人。外交部电驻暹商务委员查明原因，设法营救。

9月11日　富金山失陷。凌晨，日军续攻富金山，第三十六师守军仅余850人。下午，敌以大炮、飞机及窒息性瓦斯掩护，发动猛攻，富金山除最高峰外皆陷敌手，第三十六师伤亡殆尽，黄昏时富金山陷敌手。综计富金山之战，宋希濂部守军阵亡军官137员，士兵2481名，负伤军官238员，士兵1.2163万名。日第十三师团伤亡千数百名。

△　八路军一部在豫北许良镇西伏击由沁阳向博爱撤退之日军，毙敌200余人。

△　日军陷晋西柳林。14日，第二战区阎锡山部袭柳林，击毙敌联队长石田。

△　军令部长徐永昌以晋南各县地方团队勒派苛索，官吏压榨至深，电阎锡山拟具彻底整顿吏治及团队办法，呈候核准实施。

△　《国民公论》半月刊在武汉创刊，张仲实主编。

9月12日　西孤岭失陷。5日，星子日军陆、海、空联合猛攻西孤岭（星子西10公里），梁华盛第一九〇师与敌激战八日，敌进犯20余次，施放毒气六次，梁部三面被围，阵地屡得屡失，是晚西孤岭陷于敌手。

△　日舰犯田家镇炮台，被击伤二艘。21日，日汽艇14艘上驶扫雷，被击沉八艘。

△　新四军一部在舒（城）合（肥）公路花子岗伏击日军汽车150余辆，击毁51辆，毙敌80余人。

9月13日　蒋介石在汉口接见英国代办葛凌蔚。葛向蒋探询中国在原则上可否同意在汉口设安全区，并面陈日本所提之苛刻条款。蒋介石答称："凡有中国军队驻守的地方就是安全区"，断然拒绝日方无理要求，并强调指出：中国抗战是自卫，也为保卫国联盟约，英、法既同为会员国，应彻底同中国合作，驱逐此人类公敌；此种无理条款，英国根本不应转递。

△　新四军一部在安庆高河铺伏击日军汽车80辆，击毁汽车七辆，毙敌20余人，俘敌三人。另一部消灭安庆西洪家铺一带伪维持会数处，枪决汉奸10余人。同日，新四军一部在合肥至六安公路伏击日军汽车，击毁汽车二辆，毙敌50余人。

9月14日　长江要塞马头镇失陷。是日，日波田支队主力进入马头镇西南五公里附近地区，自九江进攻马头镇之该支队永井大队亦抵

该镇附近。在海、空军协同下，波田大队大举进攻马头镇，该镇附近已成一片焦土，第四十九师李精一部退守西侧高地，马头镇失守。

△　国民政府军事发言人为日方污蔑中国军队放毒一事郑重辟谣，指出：敌军冒天下之大不韪，施放毒气，经我一再暴露，自知将受全世界之谴责，惶惑之余，造此谣传，企图蒙蔽世界，不啻自画供状，欲盖弥彰。

△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从莫斯科离任回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　八路军一部在山西汾西伏击日军汽车28辆，毙敌百余人，俘敌三人；另一部在介休、离石间击毁日军火车一列。

△　伪满洲国与德国政府签定通商协定。

9月15日　晨，日军第六师团自广济进攻田家镇要塞，在铁石墩击败李延年第二军，于当晚进入要塞前沿阵地松山口附近。

△　军事委员会任命蒋百里为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　范筑先率部进攻济南，其次子、抗日青年挺进队队长范树民在齐河坡赵庄作战中英勇牺牲。

△　《中央日报》自长沙迁重庆出版，原长沙版仍旧。

△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机关刊《青年战线》周刊（新一号）在西安出版。

9月16日　商城失陷。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自樟柏岭、方家集

分头进犯商城，迭次猛扑第五战区左翼兵团孙连仲部守军阵地，均被击退。是日敌进迫商城城郊，以机炮猛轰城垣，守军弃城向西南方向转移。

△　日军数百人在广济龙坪镇至武穴一线登陆，李延年第二军守兵一营与敌激战，全部殉国，武穴失陷。

△　日军波田支队进攻鄂东南长江要塞富池口，萧文铎第十八师在东富湾被围，孤军奋战。次日，要塞东南高地刘家山、邓家山、竹林塘、鸡笼山各据点相继失陷。18日，该师主阵地移至大岭、朱婆山、鲤鱼山一线固守待援。

△　瑞昌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在第三航空兵团配合下沿瑞（昌）武（宁）公路南犯，谋攻武宁、箬溪；次日，进入冯家铺（瑞昌西南20公里）。18日，陷茶园铺、白石崖，旋与黄维第十八军接战。

△　八路军青年纵队、第六八八团、第六八九团及新一团奉命组成漳南兵团，由杨得志、王新亭指挥，执行肃清豫北濬县、滑县、汲县地区伪军的作战任务。

△　新四军伏击由合肥开出之日军汽车40辆，炸毁七辆，毙敌30余人。

△　郭沫若率领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敌将士委员会代表团赴前线劳军。17、18两日，分别到第九战区司令部及第二兵团司令部驻地，向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及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献旗。

△　顾维钧在国联发表演说，提出三项要求：一、实施《盟约》第十七条以制裁日本；二、实施国联禁运军火往侵略国及在财政、物资上援助中国之决议案；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日军使用毒气及轰炸普通人民。

9月17日　　蒋介石命令田家镇要塞改属第五战区，以便就近指

挥。

△　日军进犯大别山。15日，日华中派遣军第二军命令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突破大别山，是日该两师团派出先遣队，自商城出发，分头向新店（商城南20公里）、沙窝（商城西南25公里）一带窜犯。

△　广济日军3000余人向曹福林部防地松杨桥进攻，因萧之楚军一部增援，日军失利；后日军继续增援，猛攻界山岭阵地，曹福林部与敌激战后撤守高山铺。18日，曹部在萧之楚部协同下反攻界山岭成功，敌退往广济。同日，日军复由广济向松杨桥反攻，并施放毒气，陷松杨桥。

△　日机30架炸广州、柳州、梧州。梧州死伤民众300余人，广西大学校舍被炸毁。

△　国民政府特任胡适为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前任王正廷准免本职。

△　陈诚在第九战区司令部对武汉各界慰劳代表谈话，介绍该战区军事概况与民众动员，最后谈及保卫武汉的前途，指出：如果我们持久消耗的对策，打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预定计划，“那末一时一地之得失，于我们的抗战前途可谓不发生严重的影响”。

△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通告全国文化团体，每半年须向当地国民党党部报告会务，否则即以停止活动论。

9月18日　　蒋介石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三千万同胞，为国家、民族、为自身积极奋勇，殊死奋斗，拼我们的血肉，来争取光明的前途”。

△　武汉、重庆、广州、贵阳等地举行集会游行纪念“九一八”七周年。同日，旅汉东北同胞举行纪念大会，阎宝航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代表杨公达、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董必武、朝鲜民族战线

代表等发表演说。大会通过提案，要求政府恢复东北政权机构及致电东北前线将士，最后在“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的口号声中闭会。

△　潢川失陷。17日，日军第十师团2000余人，附炮六门，进迫潢川城西关，施放烟幕，守军多失自由，北城及西、北两方为敌炮火轰塌。第五十九军张自忠所部守军与冲入之敌巷战，争夺数小时，敌后续部队大增，潢川全城陷于敌手。据日方报道，商、潢两战，中国军队死亡1.2万人，被俘450人；日军死亡550人，负伤2000人。

△　进犯田家镇之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及第三师团一部共8000余人，附炮30门，由松山口攻击沙子脑，与何绍周、郑作民两师战于松子口附近。同日，日军千余人由老鹳巢附近登陆向湖北湾以东进攻，被击溃后又转犯乌龟山、沙子脑、鸭掌庙，与李德生部守军激战。

△　日机分袭柳州、梧州及粤汉路、广九路。广九路南岗站被炸，省港火车停开。

△　西藏哲蚌寺大格西喜饶嘉错大师发表《告蒙藏人士书》，揭露日本法西斯军阀标榜信奉佛教，却完全违背佛教教义，烧杀抢掠，放火放毒，危害众生之罪行。

△　河南省赈务会主席张钫向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呈报黄河决堤被灾情况称，河南受灾达18县，据15个县统计，被淹面积2.61万平方里，财产损失6390余万元，待赈灾民137.7万余口，灾区人民无以为生，坐以待毙。

9月19日　第九战区以连日瑞武路西犯之敌第二十七师团与黄维军激战于冯家铺、白石岩附近，是日移唐永良第一四一师至武宁增援，直隶于司令长官陈诚。

△　新四军在合肥、舒城间伏击日军汽车10余辆，毙敌数十人。同日，伏击六安开出之日伪军千余人，毙敌200余。

△　国联行政院会议决议接受中国之申请，援用《盟约》第十七条，电请日本政府接受国联裁判。

9月20日　蒋介石令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以罗卓英为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全力指挥江南战事。

△　鄂东田家镇剧战。蒋介石以该处为武汉之门户，保卫武汉之决战要地，下令死守。

△　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黄维纲部防地光山县失守。

△　商城日军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沿商（城）麻（城）公路南犯，进攻武汉。是日起，在沙窝（光山县境）一带同宋希濂、孙连仲等部鏖战月余，至10月23日守军奉令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时为止，战事方告结束。

△　第八十六军何知重部克松山口阵地，毙敌700余人，击溃四个联队，田家镇形势暂趋稳定。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在晋西汾阳、离石间吴城镇伏击日军600余人及增援骑兵300余人，毙敌500余人，保卫了晋西抗日根据地。

△　武汉民众战时工作队总队部成立，聘请郭忏为总队长，康泽为副总队长，下辖五个分队，凡适龄壮丁一律编组，全力保卫武汉。22日，该部发表告民众书，呼吁武汉同胞一致起来踊跃参加保卫大武汉。

△　国民参政会推定李璜、黄宇人为代表，赴第九战区劳军。

△　国民政府以驻日大使馆二等秘书兼理领事事务孙湜叛国投敌，接受伪命，下令褫职听候查办。

9月21日　罗山失陷。日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一部自潢川西犯罗山，连日来经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左翼兵团孙连仲部夹击，激战甚烈。潢川日军以主力向罗山附近第一二五师守军阵地猛攻。19日，该师退守罗山东十里墩附近，第一二四师则固守七里井。20日晚，敌进迫罗山东南，守军反击无效，是日凌晨，罗山失陷。

△　日军千余人由黄泥湖攻陷乌龟山郑作民师防地。次日，铁石墩、四重山萧之楚部防地相继失守。22日，田家镇北面之敌数千，亦向黄泥湖、马口湖阵地猛攻，陷马口湖、沙子脑。

△　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第二十六师团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五万余人，从平汉、正太、同蒲各线及北面阳原、广灵对晋察冀边区开始大举进犯。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于17日再次围攻柳林敌军，敌溃窜离石，是日克复柳林城。

△　国民政府委员、前中山大学校长经亨颐在上海病逝。2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治丧费5000元。

9月22日　第一战区程潜部夜袭济宁，自南门缺口冲入市内，与日军彻夜巷战，日军退去，济宁克复。

△　第九战区以瑞武路之敌续南犯，第十八军陈沛第六十师退扼横坑脑亘杨扶尖之线，彭善第十一师退扼乌沙岭，令饬柏辉章、陈荣机、张德能、冯占海、傅立平各师严阵以待，护卫左侧，移何平第十六师至武宁，直隶司令长官陈诚。

△　石家庄伪军岳鹏部3000人反正，并击毙日军340余人，俘日军军官34人，占领石家庄及正定、元氏等县。

△　香港妇女慰劳会派代表16人至江西德安前线劳军，次日，武汉文化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沈钧儒、邹韬奋等亦抵德安向第二十九军

团献旗。

△　行政院通过《积极充实后方交通案》，内容有整修西北、西南公路，修浚河川，增辟航线，增加车辆船舶设备，统一经营管理等项计划。

△　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在日本特务机关主宰下实行合流，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委员南北各三，北为王克敏、王揖唐、朱深，南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由王克敏任主席委员，下设事务部，由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为部长。

△　日本外相宇垣致电国联秘书长艾文诺，日政府拒绝国联援引《盟约》第十七条之邀请。

9月23日　日军沿瑞（昌）阳（新）公路西犯阳新，19日起开始攻朱婆山，李宗鉴第一九三师奉命增援。21日，朱婆山阵地半陷敌手，是日完全陷落，守军退向半壁山。

△　军事委员会任命叶肇为第三十八军团军团长。

△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日本拒绝国联邀请事发表声明，要求国联立即实施《盟约》第十六条制裁日本。同日，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朱家骅电国联提出同样要求。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军律补充条文两条，规定：部队长擅离部属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发生事变或贻误战机者死刑；冒领、浮报军实者死刑或无期徒刑。

9月24日　汤恩伯集团军第一九三师师长李宗鉴弃职潜逃，富池口要塞失陷。

△　由瑞武路南下之敌第二十七师团由冯家铺、白石崖进逼杨坊街、白水街，威胁武宁、德安。薛岳决由南浔线抽调第九十师、第一

四二师、预六师、第六十师、第一四一师、第十六师六个师，由第二十九军团长李汉魂指挥，于是晚出发，分别进占坐牌山、乌纱岭、马塞山、风雨岭及大洼山、白水街、麒麟峰、昆仑山、覆血山等地，举行反击，薛岳、李汉魂分别进至白槎、山下王（虬津西五里）督战。

9月25日　　麒麟峰、覆血山（阳武路东西两侧）发生剧战。是日，日第二十七师团进犯麒麟峰，同薛岳兵团预六师吉章简部发生剧烈争夺，第六十师陈沛部增援，战至次晨，敌铃木联队全部覆没，守军伤亡团长杨家骝以下700余人。同日，瑞昌——武宁路上，日军德川联队长被我军击毙。

△　八路军漳南兵团占领滑县县城及道口镇。次日，在汤阴西南歼灭伪军扈全禄部，俘旅长以下1400余人，漳南战役胜利结束。27日，第三四四旅旅长杨得志率第六八八团、第六八九团返平汉路西归还建制。

△　日军自广灵出动步、骑兵4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灵丘进攻。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奉命阻击，在广灵、灵丘间与日军激战六昼夜，毙日军联队长正亚以下800余人。

△　经济部与西康省合作筹备开发西康金矿，叶秀峰、林霁青等为筹备委员会理事，林并兼西康金矿局局长。

△　黄河水利委员会拟定“治本工作计划”，共分测验、测勘土壤、冲刷实验、荒山造林、草籽繁殖诸项。

△　《青年生活》月刊在重庆创刊，许晓轩主编。

9月26日　　国民政府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及《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省、市参议会均为咨询性机构，其决议案对同级政府均无约束力；参议员由国民政府遴选产生，正、副议长由行政院提请国防最高会议决定。

△　浙东富阳告捷，歼敌千余人。19日起，日军自杭州增兵富阳，20日在富阳境内与刘建绪第十集团军所属陶广第二十八军激战。23日，日机配合陆军作战，战斗激烈，刘建绪、陶广亲赴前线指挥。26日，全线反攻，日军退往杭州、富阳。是役毙敌1000余人，刘部伤亡营长二人及官兵600余人。

△　日军进犯万家岭。日军第十一军以薛岳兵团抽调德安有力部队加强瑞武方面作战，遂命第一〇六师团进入德安以西地区，乘虚从侧背攻德安，进窥南昌。是日，第一〇六师团自马回岭向西实行秘密大迂回，向万家岭（德安以西50里）攻击前进。

△　日军以陆、海、空联合由田家镇东、北两面进攻要塞，北面之敌突破第五十七师黄马湖阵地，进占黑家山、八峰山，南面之敌以飞机炮火掩护，由阮家湾向周家山、芦家咀、兔山、苍谷老猛攻。同日，另一部日军自上洲头猛攻，被击退，守军团长龙子育殉职。

△　日军第一〇一师自星子沿庐山南麓向德安进攻，是日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胡思咀、招贤观、隘口一带总攻，并施放毒气，第七十九师陈安宝部守军奋力苦战，胡思咀、招贤观失陷，五个连守军伤亡殆尽。28日，敌师团长伊东中将中弹负伤，佐藤少将指挥该师团，续攻至隘口以北。

9月27日　　瑞武路方面日第二十七师团陷麒麟峰，是役日军广部、上田、高木三联队队长被我军击毙。新十三师刘若弼协同第六十师陈沛部乘夜反攻，敌施放毒气，刘部损失颇大，未能得手。

△　进犯万家岭之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先头部队1000余人，窜抵面前山、竹坊桂，薛岳兵团第四军截击来犯之敌，首挫其锋。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五年度岁入岁出第五次追加追减预算书》，计追加数为1.4669亿余元。

△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设立对华中央机关。10月2日，该机关正式成立，定名“对华院”，由首相任总裁，外、藏、陆、海相任副总裁，另设总务长官一人，下设经济、总务、文化三部。

9月28日　进犯田家镇之日军数百人于上洲头登陆，猛攻上公、陈家咀之线，第五十七师守军一连伤亡殆尽。下午，田家镇要塞最高峰玉屏山失陷，同时，日军数百复由盘塘登陆，血战逾时，盘塘沦陷。晚7时，日军乘夜暗各面同时猛冲，与第五十七师守军发生混战。至夜半，守军被压迫至冯家山以西地区扼守待援。

△　沿瑞（昌）阳（新）公路西犯阳新之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强渡富水河，与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霍揆彰第五十四军、王仲廉第八十五军、卢汉第六十军、周碞第七十五军各部在阳新湖及富水河一带激战。次日及30日，日军两次企图在半壁山前登陆，均被击退，敌舰一艘被击伤。

△　军事委员会以日舰增开海南，饬余汉谋增强国防，并召广州行营参谋长程泽润北上面授机宜。

△　日机九架袭昆明，被击落三架。同日日机炸吉安，毁房30余栋。

△　财政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一年以来，日本虽将占领区之所有盐税全部截留，但国民政府对于以盐税为担保之借款，均应按时偿还；在日本暂时占领区中之税款未能收到以前，本月份到期之克利斯浦借款及英法借款还本部分，将暂行缓付。

9月29日　国民政府令免李宗仁安徽省府主席职，以廖磊继任。

△　国民党中央改组四川省党部，以陈公博为主任委员，黄仲翔为书记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龙光为第二十九军团副军团长。

△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2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名中央委员、40名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张闻天致开幕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陈绍禹）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进行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于11月6日闭幕。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夜袭皖南宣城，日军仓促应战，肉搏达一小时，次日拂晓，日军不支，向芜湖撤退，宣城克复。

△　日军陷田家镇要塞。旋蒋介石下令依法惩办要塞司令杨宗鼎。

△　傅立平第一四二师、冯圣法第五十八师反攻麒麟峰，同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激烈争夺，歼敌数百，残敌二三百窜朱家塘，麒麟峰于是日下午6时克复。

△　缅甸华侨救护队一行35人，由陈雅云率领回国参加抗战，是日经香港赴汉口。

△　日本外相宇垣一成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合辞职，首相近卫兼任外相。

9月30日　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于10月28日召开。

△　国民党中央改组贵州省党部，以王漱芳为主任委员。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豫北武陟，毙敌350余人，俘三名，残敌撤回修武、新乡。

△　日军4000余人由晋北盂县经柏兰镇犯五台，在耿家庄山谷被

八路军赵尔陆、熊伯涛两支队包围，激战三昼夜，至10月2日，日军残部在毒气掩护下向五台突围。是役击毙日军联队长清水，毙伤日军120余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负伤，800余官兵伤亡。

△　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前北京政府总理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10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拨给治丧费5000元。

△　浙江省铁工厂成立，资金300万元，专生产工作母机，由省府主席黄绍竑为董事长。

△　交通部于重庆化龙桥筹建汽车配件制造厂，钱大钧为理事长。

△　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八二厂筹建，设重庆磁器口，生产合金钢，周志宏为厂长。

△　阿泰尔率领印度医疗队来华，是日抵汉口。

△　国联行政院通过报告书，呼吁会员国勿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能力之行动，并应实行“个别援华”；认为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已拒绝国联邀请，各会员国应“个别决定”应否援引《盟约》第十六条。

是月　周恩来致电彭雪枫，要他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彭接电后即率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新四军的第四、第五师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10月

10月1日　蒋介石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在江西瑞昌、武宁及鄂东南阳新湖一带阻击日军有功，传令嘉奖。同日，第一兵团总司

令薛岳以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在南浔线以西麒麟峰作战有功，令记大功一次并赏洋5000元。

△　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告以政府对美方针，其要旨为：一、英美对于远东合作素为我国所期待。我应与美成立谅解，请美严促英国勿与日本妥协；二、促美总统实行其隔离侵略者之政策，对日采行远距离的封锁；三、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四、日本实行战时封锁前，仍望美国避免施用中立法；五、日本断绝中国交通时，应请美实施对日禁止军火及军用品之输出及财政援助；六、努力促美于最短期间助成对华现金或信用之借款；七、商请美扩大劝商民勿以军用品售日，除不以飞机售日外，美油、钢铁亦不售给日本。

△　军事委员会任命龙云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　新疆省第三次民族代表大会在迪化开幕，到全疆14个民族669人，林森、蒋介石、毛泽东等16人被选为名誉主席团。5日，新疆督办盛世才作政治报告。6日，新疆省府主席李榕作行政报告。9日，通过《组织民众运动委员会》等七项提案。

△　周恩来返抵武汉。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豫东民权，并围日军于睢县附近。是役毙伤敌近500人，俘敌24人。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夜袭察南广灵南日军300余人，毙敌50余人，残敌逃向山崖，遭八路军追击，百余敌坠岩毙命。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晋南皋落镇西北击溃日军600余人，毙敌百余人。

△　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在河南确山竹沟成立，向豫东敌后挺进。27日，在淮阳窦楼击退日军骑兵队的进攻，首战告捷。

△　浙江国民抗敌自卫第五支队收复海盐，毙伤日军数百名。

△　资源委员会与贵州省政府合办贵州矿务局，决定出资60万元开办汞矿，其中40万元充勘采选炼费，由资源委员会承担。杨公兆为理事长。

△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开始办公。该委员会由宣传部、社会部、教育部、内政部、政治部派员组成。云南、贵州、兰州、浙江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亦于本月上旬陆续成立。

△　《扫荡报》重庆版发刊。

△　北平中法大学因不堪日人压迫，宣告停办。

△　伪维新政府在沪各院、部长，是日均已抵达南京。至此，该伪政权各院、部在沪部分已全部迁宁。17日，伪外交部将该维新政府全部迁宁事，通知日、美、英、法、德、意、苏、比、荷、丹、葡、古、波、挪、智、秘、捷、瑞士、瑞典等22国大使、公使和代办。

10月2日　日军自皖西调兵增援豫南战场，第五战区第三兵团孙连仲部乘虚克潜山。

△　第五战区第四兵团李品仙部，为截阻日军沿罗（山）信（阳）公路进窥平汉铁路，向罗山东南之日军左翼进攻，是日克光山，毙敌500余人。

△　日军3000余人自田家镇北犯蕲春，于该地东南之梁湖同第三兵团孙连仲部守军接战。

△　薛岳兵团部署万家岭歼灭战。是日，日第一〇六师团全部窜至万家岭、哔唭街、老虎尖、石堡山一带山地，薛岳兵团决定包围聚歼敌于万家岭地区，抽调德星、南浔、武瑞三方面兵力，计：第六十

六军、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一八七师、第一三九师之一旅、第九十一师、新十三师、新十五师之一旅、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六师、第十九师等部队，断行围歼，至6日部署始定。

△　陕甘宁边区青年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讲话，号召边区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农村中去。

10月3日　　张发奎兵团克复木石港。2日，日军波田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以一部自长江北岸渡江至富池口，增援在木石港（阳新南）及排市塘（阳新西南）附近之第一〇六师团两个联队。是日拂晓，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敌势已疲，令长江南岸各部队开始总攻，第二兵团张发奎部当即派兵绕袭，一举克木石港。

△　沿滹沱河两岸东犯之日军，是日陷山西五台。同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彭绍辉第三五八旅，在五台高洪口间滑石峪设伏，日第一〇九师团蚋野大队700余人，除数十人突围外，余皆被歼。

△　进攻晋察冀边区西路日军占灵丘。5日，东路日军占阜平。

△　山西抗日决死队在晋东寿阳破坏石太路一段，日军火车一列出轨，毙敌50余人。另一部在太原北炸铁桥一座。

△　云南商民李茂兴先后捐助抗日军费滇币150万元（折合法币15万元），是日行政院明令嘉奖，颁给金质奖章。

△　日本首相近卫接任外相兼职后，对记者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外交对手”之对华根本方针，“毫不变更”。

10月4日　　赣北半壁山失陷。3日，田家镇、富池口日军以海、陆、空联合，掩护舰艇，图在陆家墩、半壁山强行登陆，经第九十八军反击，卒未得逞。是晨，日军复大举进犯，以日舰20余艘，掩护汽艇六七十只，载兵五六千，在上下口、陆家墩登陆，同时以机炮猛烈轰击，第九十八军两营守军与阵地俱殉，半壁山失守。是役日军中

武、满雄两联队长被击毙。次日，日军陷马鞍山。8日，煤山复陷。

△　薛岳在白槎与李汉魂、叶肇、俞济时等彻夜商讨万家岭作战事宜。次日，李汉魂指挥各军奉命转移到杨家山、洼山、排楼下、河浒之线。

△　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转交了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

△　日机九架首次袭重庆，在牛角沱、广阳坝投弹后，又飞梁山及湖北老河口等地轰炸。

△　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于晚间攻占察哈尔省赤城，消灭守敌200余人。

10月5日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于10月1日自天桥河向箬溪进攻，是日陷箬溪，德安、修水间交通被切断。

△　日军由排市老虎洞，向第三十军团所部守军猛攻，仰天窝阵地被突破，守军退往李家湾、大王尖之线。

△　周恩来在武汉记者学会举行的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十五个月的抗战使中国有了空前的巨变和绝大的进步，这些进步给我们抗战以有力的保证，使我们相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英勇战斗的事实，粉碎了妥协投降的空气。"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正为着保证长期抗战及建国工作而努力，不怕一切挑拨、离间、破坏的谣言；我们必须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国内团结。

△　经上海纳税华人会等团体交涉结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致函纳税华人会向"四行孤军"道歉。7日午后，谢晋元团附及其14名被扣壮士由白俄商团护送回营，并由工部局拨款3000元抚恤死难士兵家属。

△　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准免任援道南京督办兼职，以高冠吾继任。

△　日方公布：7、8、9三个月，日伪军与东北抗日联军作战321次，参加之联军达1.6653万人。

10月6日　国民政府任命察哈尔省建设厅长张厉生为代理察哈尔省府主席。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选任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为国民政府委员。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可以对各类企业实行“代管”、“投资合办”及“收归政府办理”，并规定“各企业之员工，不得罢市、罢工或怠工”，违者课以千元以上的罚金或判处徒刑。同日，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对遗产5000元以上者，除依法免除者外，征税1％以上。

△　日军汽艇百余艘载日兵于率洲（阳新县境）附近强行渡过富水，突破卢汉第六十军第一八二师守军阵地，10日陷老虎头、白石岩、太白顶一带。1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令周碞第七十五军反击渡河之敌，于富水左岸歼敌于排市、率洲间，终因日军势大，未能实现。

△　日军第十师团自罗山西犯，是日陷信阳南柳林车站，切断平汉铁路，信阳、武汉间联络中断。

△　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在冀西华法附近伏击进犯阜平日军4000余人，毙敌300余人。同日，在察南涿鹿石门附近击溃进犯日军700余人，毙敌500余人。

△　美驻日大使格鲁以日侵害美在华之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向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1月18日，日外相复牒美使，否认日本

有妨碍中国门户开放原则及侵害美在华权益之情事。

10月7日　薛岳兵团向万家岭总攻，与日第一〇六师团在长岭、张古山一带高地激战，卒将该敌击溃，克复张古山、长岭。

△　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击溃由正定犯灵寿之日军2000余人，毙敌200余人。同日，进犯晋察冀边区日军骑兵联队，在寿阳遭截击，毙联队长清小喜代美大佐，该敌溃退。

△　国民政府依据国民党中央之决定，是日明令全国党政机关人员按工薪扣交寒衣捐，以一个月为限。

△　经济部制定《内移各厂矿限期复工办法》，规定：凡逾期不能复工而又未经呈报准予展期者，给予各种不同处分。

△　《新华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周恩来撰写的《论目前抗战形势》，文章连载至9日。文章指出：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

△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对土肥原发出指示：一、树立新政府：联络吴佩孚、靳云鹏、旧东北军、沟通唐绍仪的余党。二、分化蒋政权：沟通萧振瀛和高振武，联络李宗仁、白崇禧。

10月8日　蕲春失陷。日第一一六师团志摩支队进犯蕲春，第三兵团第一九九师罗树甲所部营长谭灿华率全营守兵奋起抵抗，终以寡不敌众，全部殉国，蕲春陷落。

△　万家岭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反攻张古山，与薛岳兵团守军争夺激烈，双方死伤极重，张古山复陷。同日，薛兵团右翼由杨眉尖、公母岭进攻王家山、老虎尖，左翼由马鞍山进攻雷鸣鼓刘村（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司令部驻此村）。

△　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反攻豫南柳林，歼灭伪军刘桂堂部千余

人。9日晚克柳林东南之新集，10日克柳林车站。

△　台湾爆发反战运动。是日及11日，台湾六甲、高雄等处先后发生袭击日警之反战运动，击毙员警数十名，全台日警悉数出动，进行镇压，岛民被杀者200余人，被捕者四五百人。

10月9日　　德星路方面隘口失陷。2日，日军第一〇一师团攻击隘口第七十九师陈安宝守军阵地。7日，日军除正面续攻隘口外，并以一部攻隘口右侧背，第七十九师以兵力过少，苦战多日，无力支持，是日隘口失守。

△　蒋介石令：限薛岳兵团于是日肃清万家岭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否则总司令以下，俱受处分。

△　薛岳电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于下午6时再行攻击万家岭日军。当晚，将万家岭、墩上郭、雷鸣鼓刘村完全占领，合围圈逐渐缩小，敌凭借田步苏、箭炉苏据点工事死守待援。同日，敌机狂炸第一八七师阵地，旅长李明伤足，旅部人员死伤甚多，阵地官兵损失更大。

△　政治部长陈诚撰文谈第三期抗战中敌军的兵员损失，指出，自6月始，日军向武汉进攻，共使用22个师团以上，兵力60万以上。自6月12日至9月30日，敌军在各战场死伤在27万人以上。其中在各战场伤亡较大者为：南浔线马回岭三万；东西孤岭二万；隘口25万；瑞昌以西山地三万；麒麟峰、覆血山二万；广济、田家镇二万；豫南叶家集、富金山三万。

△　晚，第一战区程潜部进攻山东兖州，日军300余人据城顽抗，城内伪军反正，开西门接应，遂克该城，俘敌军官三人。

10月10日　　全国各地庆祝国庆节。武汉各界召开庆祝大会，蒋介石检阅武汉三镇防护团、战时工作队及民众10万余人。空中并有飞

机散发万家岭捷报之传单，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在重庆联合举行纪念典礼，林森、汪精卫、孔祥熙等300余人参加。林森发表广播讲话。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国民政府发表《勖勉前方将士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

△　万家岭方面之敌复陷长岭、张古山。9日，敌机狂炸张古山，继以猛犯，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师作战不力，是日长岭、张古山不守。

△　第一战区程潜部袭泰安，是晨敢死队自西门攻入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毙敌90余人，遂克泰安。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在山西省皋落、垣曲间毙日军300余人，获汽车300余辆，击毙敌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长野间六郎，并收复垣曲县城。

△　晚，新四军一部在舒（城）合（肥）公路椿树岗附近伏击日军汽车300辆，击毁汽车60余辆，毙敌200余人，俘队长一名。另一部在六（安）合（肥）公路之刘家圩附近伏击日伪军200余人，激战三小时，毙敌98人，俘敌30余人。

△　晋察冀军区杨成武支队在冀西王家镇伏击涞源日军步兵500人、骑兵200人及大车300余辆，歼敌500余人，俘敌30余人。

△　叶剑英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晋察冀边区粉碎敌军进攻的初步胜利》一文。

△　新疆迪化二万余民众举行提灯大会，决议捐购飞机10架，并发起募捐百万件皮衣运动。

△　国民政府设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从事建设新西南，开发矿业，并与金融界合作筹法币3000万元。11日，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张嘉璈、何墨林、何北衡等出席。

△　中苏文化协会兰州分会成立，会长为曾扩情。

△　《申报》在上海复刊。其《复刊辞》中声明：“今兹复刊，自当仍以正义为依归，作中国人民之喉舌，并一本已往不屈之主张，与艰苦环境相奋斗。”按：《申报》自去年12月15日起被迫停刊，至是日复刊，中辍298天。

△　天津《益世报》在昆明出版周刊。同日，《译报》在上海创刊。

△　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并发表宣言，宣布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并在抗战过程中争取祖国独立。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正式成立，出席四五十埠代表168人，陈嘉庚被选为总会主席。陈在致词中指出，自抗战以来，华侨汇款回祖国近一亿元，平均每月700余万元，家信汇款每月平均1800万元，合计每月汇回2500万元。大会发表宣言，并通过决议“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该会分支机构共有85个。

10月11日　　南浔线正面马回岭发生激战，是日，薛岳兵团克马回岭。

△　重庆各界民众开万家岭祝捷大会，到300余个团体，2.5万余人，胡文澜主席，重庆行营郭一予报告歼敌经过，通过呈蒋介石致敬电及慰劳前方将士电等案，会后火炬游行。

△　新疆省第三次民族代表大会闭幕。上午，大会通过宣言及决议案；下午，盛世才致闭幕词，表示决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疆400万民众上前线。大会通电向蒋介石、毛泽东、陈诚等致敬。

△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抵广济第六师团司令部视察，决定该师团自16日起向汉口发动攻击。

△　日机18架分四批夜袭衡阳，投弹120余枚，死伤民众百余人，日机被击落四架。

△　晋西北农救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岢岚召开，通过《晋西北农救会工作纲领》及减租减息等项提案，18日闭会。

10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指出："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于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在于力求进步以发动全民族的生动力量，在于依靠民众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同时提出："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

△　周恩来向国民党军事当局提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

△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海上国际联络，在台湾集结兵力四万余人，拟犯广州。是日凌晨2时，日军第十一、十八及一〇四师团编成第二十一军，乘军舰数十艘，以飞机百余架掩护，在南海大亚湾平海、稔山、澳头、下桶等处强行登陆，当晚攻陷淡水，第八十三军第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部守军退往惠阳。同日晚，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自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保卫广州。

△　信阳失陷。2日，日军第三师团自潢川向罗山以西推进，进犯信阳，第十师团负责策应。6日，第十师团抵柳林（信阳南20公里）附近，切断平汉路，旋即进入信阳南面。9日，第三师团进入大洋河镇（信阳东北15公里），续向西进，将平汉路切断，11日进入信阳东面。第三、第十师团在攻击途中与胡宗南军多次激战，是日第三师团

在炮兵支援下，首先攻陷信阳。据日方统计，信阳之役，日军战死约550名，负伤约1560名，中国军队遗尸1.3万具。

△　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以南浔会战以来各军苦战三月，援敌大至，箬溪日危，乃调整战线，以第四军，扼烟包山亘狮子岩线及老黄娇铺亘大金山各据点；拨第一一八师王严部暂隶第六十六军，扼郭背山亘乌龟山线及孤山亘红山各据点；第六十六军移乌龟山亘柘林线及叶家垅亘田家坳各据点；第十九师扼柘林及对岸沙田巷亘罗埚线拒敌渡河；第七十四军及第六十师、第一四二师、预六师、新十三师、又第一八七师及第一三九师各一旅扼狮子崖亘河浒线，仍进击长岭、张古山、杨家山、丰桂尖，并搜索白阳堆敌情；置冯占海第九十一师于徐家坳、牛车盘线待机使用，炮兵第一团之两连及第二团之一营以全力封锁大鳌、上棋、曹家坳各隘路，支援李汉魂军团西、北两面之战斗。

△　黄颡口、沣　源口失陷。8日起，日第一一六师团高品支队，在海军配合下，自半壁山溯江而上，向石灰窑下游之黄颡口、沣源口进犯，与第二兵团守军激战后，是日攻陷。

△　青海抗敌后援会捐募羊皮10万张，价值25万元，以供前线将士御寒。是日，蒋介石电青海省府主席马步芳予以嘉奖。

△　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照会驻日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助华行动，勿于自汕头至北海区域中调动其军队军舰与飞机；如有调动，请于10日前通知日本当局。

△　驻日英使克莱琪以日本侵犯华南，危及英国经济及政治利益，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

10月13日　　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同日，第四战区副令长官余汉谋亦发表《告广东同胞书》，呼吁保卫广东。次日，蒋介石致电海外侨胞，吁

请援助广东。

△　蒋介石令张治中部预备兵团增援广东。次日，又令长沙警备司令丁炳权赴粤作战，以酆悌接任长沙警备司令职。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自忠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　浙江国民抗敌自卫第五支队收复吴兴县新丰镇，旋于11月中旬在崇德县马家桥之役中毙伤日军100余名。

△　日军自淡水、澳头、稔山等处三路北犯惠阳。莫希德部守军及佛子坳炮兵指挥部均先行撤退。当晚，日军进抵惠阳城外。

△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宣布封锁珠江口，并限令广州市民老弱及公务员眷属于两日内疏散。

△　日机百余架分19批炸广州、军田、连江口、曲江等地。

△　国立重庆儿童教养院成立，行政院派屈映光为主任委员。

10月14日　　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说关于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蒋还说武汉作战方针已改为消极防御，新的注意力在西南、西北。

△　日军进攻广东惠阳城，守军第一五一师何联芳旅及师直属队撤往博罗，惠阳失陷。

△　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决定移粤北翁源。19日，省府主席吴铁城及市长曾养甫赴翁源。29日，省府再移连县。

△　外交部以日军开始攻击华南，直接威胁英、法、美在远东之地位与商务利益，是日电令驻美大使馆速商美政府，深望有关系国采取联合积极步骤，以制止侵略。

△　葡萄牙新任驻华公使李玛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

△　行政院颁布《人民守土伤亡抚恤实施办法》，凡15条，规定凡因参加抗敌战斗、扰乱敌人后方及侦察敌人行动、协助军队工作或执行军队命令、保卫村镇抗拒敌人而伤亡者，应予以抚恤。

△　邢台伪皇协军2000余人由王子猷率领反正，俘日军40余人。

△　南京伪维新政府发表上海特别市制令，任命傅宗耀（筱庵）为市长。

10月15日　　广东博罗失陷。13日，日机狂炸博罗。14日，日机复炸，城内数处起火，守军第一五一师补充团团长林君勣率部弃城先遁，县长黄仲榆亦于晚间率职员逃象山。是日，博罗失陷。20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作战不力，丧师失地，予以撤职查办。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严令各部利用山地节节抵抗，务必于10月底以前确保德安、武宁及通山、金牛、保安、鄂城一线。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难民移殖规则》，规定由经济部会同内政部、财政部、赈济委员会成立中央垦务主管机关，各省设垦务委员会；以国营、省营、民营三种方式举办垦殖事业，安置全国难民；并规定难民登记、移送、垦殖各项具体办法，计37条。19日，行政院废除《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

△　马来亚华侨汽车工人服务队抵汉口，旋赴八路军前线参加抗战工作。

10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广东全省党员书》，号召负起责任，率先奋斗，殊死战斗，保卫疆圉。

△　日机18架袭岳阳，被击落三架。

10月17日　　广州市各界民众七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决心保卫广州。

△　第四战区以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增防东江，保卫广州。李以钟芳峻第一五三师等部在福田、罗浮山一线击溃向增城进犯之日军。钟芳峻奋勇作战，使日军攻势受挫，但因与后方联络中断，官兵伤亡甚重，各友军不能配合作战，悲愤自杀。日军受挫后退往博罗，李振球亦退往增城整理部队。

△　石灰窑失陷。12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高品支队在海军协助下，于沔　源口登陆，开始向石灰窑前进。是日，敌机数十架凌空轰炸，敌舰猛烈轰击，甘丽初第六军守兵伤亡奇重，石灰窑遂告失守。

△　阳新日军分两路犯三溪口（阳新东北面），第五十三军守军与敌激战竟日，因日军炮火过猛，卒告失陷。

△　道士袱失陷。15日，沔　源口日军溯江至石灰窑下游道士袱，与第二兵团守军战于沅家湖一带，是日道士袱陷落。

△　日军第六师团牛岛支队沿松阳桥（广济西五公里）、西河泽、浠水大道进攻汉口。广济西面及西北面李品仙兵团一部，向浠水方面退却。

△　日机150架轰炸湖南株洲、岳阳等地。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收复山西平定、昔阳两县城。

△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鹿钟麟致电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告以河北民众运动早已为共产党所领导，各县区民众战地动员委员会及各救国会等民众团体，“皆为共产党分子把持”，请示民运工作办法。12月5日，陈立夫复电，指示以“联络上层友谊，建立下层基础”为其工作方针，“于工作绝不可稍事退让”。

△　武汉《大公报》迁重庆出版。

10月18日　　阳新失陷。17日，日军波田支队主力进入盐埠头，是日陷阳新。

△　辛潭铺失陷。7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自箬溪向鄂东南辛潭铺前进，13日先遣部队进入辛潭铺对岸。是日，会合师团主力渡过富水攻陷辛潭铺。

10月19日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高品支队配合海军于黄石港强行登陆，第六军甘丽初部守军与之激战，卒不支而退，黄石港失陷。

△　日机45架三次袭长沙，市民死伤3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平定南设伏，毙日军80余人，击毁汽车一辆。同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击溃由涞源犯插箭岭日军900余人，毙敌百余人。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鲁迅纪念委员会在重庆举行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郭沫若主席并致词，周恩来发表讲演，号召学习鲁迅的精神和作风，为实现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10月20日　　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猛攻广东增城，李振第一八六师、陈崇范炮兵团向钟落潭撤退，增城失陷。日军第十八师团另一部攻陷正果圩，击溃陈勉吾独立第二十旅，并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图截断广州至韶关之联络。同时，增城方面日军沿增（城）广（州）公路直下广州。是晚，余汉谋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广增公路两侧福和、石桥和石滩以北之线布防。次晨2时接蒋介石电令，将部队撤至粤北重新部署，以阻日军北上。

△　日军波田支队自阳新向西进犯大冶，并以飞机掩护猛攻，大冶已成一片焦土，是日大冶失陷。同日，第六军吕国铨第九十三师被围，军长甘丽初亲率队援救，苦战突围，退往保安以东收容整理。

△　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在冀西党城王村击溃日军600余人及后续部队200余人。同日，另一部在察南冯家沟伏击开往灵丘日军汽车队，俘汽车25辆，毙敌10余人。

△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各师范学院院长及主任导师等出席，研讨关于师范学院之一切问题。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任主席，宣读蒋介石贺词后，各院长相继报告各师院筹备概况，22日会议闭幕。会议期间议决要案20余件。行政院长孔祥熙出席闭幕式，并指示教育原则四项：一、学以事人；二、学以致用；三、学以造示；四、学以识时。

△　侨务委员会为日本侵犯华南发表《告侨胞书》，指出："侨胞在华南抗战中所负之责任，最重要者仍为输财输力……侨胞过去接济物资与筹赈伤兵难民，确曾尽其最善之努力，抗战一年五个月之支持，侨胞实有不可磨灭之功绩。今后仍本与国内之同胞作同样牺牲之决心，踊跃捐输，以厚军实，以救乡救国。"

10月21日　广州弃守。晨4时，余汉谋奉蒋介石之命，下令总司令部沿广（州）花（县）公路向清远撤退。余本人亦离广州往清远。市内各公署、工厂及公共建筑均已破坏，市民扶老携幼向四乡疏散。广（州）增（城）公路线上，第一五二师师长陈章率邓其昌旅在太平场同日军激战。梁世骥师卜汉池旅在莲塘同敌小有接触，后陈师、梁师各向北撤；曾友仁第一五八师师部与张浩东旅在龙眼洞附近溃散；张简荪独立第九旅退走太和，旋即溃散；第一五三师师长张瑞贵率钟芳峻旅越广增路北撤。至此，惠（阳）广（州）战役（自10月12日开始至是日止）结束。日军第十八师团未遇抵抗，沿广增公路向广州推进。下午2时，日军机械化部队3000人侵入广州。23日，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全部进入广州市。

△　广东省府主席吴铁城发表《告同胞书》，宣布日寇逼近省垣，省府迁地办公，望全省同胞有枪者加入自卫团，无枪者投身兵

役，有钱者踊跃输将，驱敌出境，共保家乡。

△　浠水失陷。18日，日军第六师团牛岛支队主力自广济附近出发，突破西河驿附近李品仙兵团防守阵地，当夜进入界岭（浠水东南20公里）。同日，佐野支队进入漕河镇以南地区，并编入牛岛少将指挥下。19日晚，牛岛支队突破界岭，是日上午渡过浠水后，攻陷浠水城。

△　日军第十一军石原支队攻陷兰镇溪（浠水西南），24日陷黄冈，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守兵退往巴河沿线。

△　第九战区鄂南部队奉命撤向湖南沅陵、常德一带，第五战区江北各部奉命撤向鄂西。同日，湖北省政府向宜昌迁移完毕。

△　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自鄂南通山西撤。同日，日军一部沿富水犯通山，进抵通山东石马铺、韩家铺一带。

△　日军陷广东龙门。同日，日机狂炸珠江沿岸，毁船数百艘，死伤船户逾千人。

△　中共党员曾生在广东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海员游击大队（后发展为广东东江抗日游击纵队），以淡水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王震第三五九旅，在察南觉水泉伏击日军300余人，毙敌80余人，残敌退往灵丘，灵丘日军500余向广灵撤退，在义泉岭遭八路军伏击，被击毙200余人。

△　国民政府任命王景岐为驻波兰特命全权公使，谢维麟为驻瑞典兼驻挪威特命全权公使；免魏宸组驻波兰公使职及王景岐驻瑞典兼驻挪威公使职。

△　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再次鼓吹与日议和，略谓："如日本提出之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

论之基础。”并谓：“就中国方面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

△　行政院第三四八次会议决定将重庆市改为直属市。

10月22日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高品支队在海军陆战队配合下攻陷鄂城。同日，第六师团牛岛支队攻陷上巴河。

△　日军突破大别山。是日，日第十三师团突破大别山，24日，第十六师团亦越过大别山，25日、26日该二师团先后抵麻城地区。据日方统计，在突破大别山战斗中，第十三、十六两师团战死约1000人，负伤约3400人；中国军队遗尸约1.5万具。

△　朱德在周恩来陪同下，于汉口会见蒋介石，报告八路军一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战绩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情况，提出扩大八路军编制，增发经费与补给弹药等要求。

△　国民党中央派吴铁城为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曾养甫为广州市特别党部主任委员。

△　国民政府公布《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修正公布《抗战功勋子女就学免费条例》。

△　国民政府任命白鹏飞为省立广西大学校长。

△　梅思平由香港到重庆，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密商降日条件与办法。汪派高宗武、梅思平和日方举行秘密谈判。

10月23日　　新洲失陷。22日，日军牛岛支队自上巴河向林山河急进，是日到新洲东侧，同李品仙兵团万余名守军激战后，攻陷新洲。

△　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规定：凡散布谣言危害民国，为敌利用破坏民众运动，代敌宣传不利抗战前途，聚众鼓噪不服军

制，破金坏融，以物资敌，为敌间谍，乘机抢劫，伤害外侨者，处死刑。

△　日机在长江城陵矶江面炸沉“襄阳”轮及铁壳大煤船，乘客及难民千人遇难。

△　广东珠江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弃守虎门。

△　绥远伪自卫军苏元龙于归绥（今呼和浩特）东白塔山率百余人反正。伪西北边防自治军第三师旅长武毛率部2200余人反正。

△　驻美大使胡适致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转呈蒋介石称：“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据最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事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盼望我能坚持一两个月。”

△　广东旅渝同乡会召开救国救乡大会，到邹鲁、罗文幹等400余人。马超俊倡组敢死队回乡杀敌。会议致电余汉谋、吴铁城，责问余、吴准备年余，何以不及十天广州遽陷。

△　《新华日报》留汉人员乘船撤向宜昌，在嘉鱼附近江面遭日机轰炸，记者李密林、潘美年等16人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张海清等八人遇难。

10月24日　　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并令撤退武汉外围部队：长江以南各军撤至湘北及鄂西一带；长江北岸部队，第三十三集团军撤至荆门、宜城一带，第三十二集团军撤至襄阳、樊城、钟祥一带，第十一集团军撤至随县、唐县镇、枣阳一带布防；汤恩伯第十三军进入桐柏山，刘和鼎第三十九军进入大洪山担任游击。第二十一集团军及徐源泉第十军统由廖磊指挥进入大别山担任敌后游击。第五战区长官部移往樊城。

△　黄陂失陷。日军第六师团陷黄陂，沿汉（口）黄（陂）公路

图攻汉口。当日下午，日军先头部队陷横店，向汉口城郊戴家山前进。

△　日军第十师团冈田支队攻陷湖北应山。

△　日机轮番炸长江金口以上、城陵矶以下全港道，“楚同”舰在嘉鱼受伤，“中山”舰在金口沉没，“中山”舰长萨师俊以下官兵20余人牺牲。

△　全国救济会秘书处宣布：自抗战以来至是日，日机空袭中国城市3318次，计有19省314个城市被炸，共炸伤平民3.7222万人，炸死2.9868万人。

△　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克复涞源。

△　上海美商有利银行受中央银行委托，将价值900万元之白银装入“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拟于是日由沪运美，被日方指使南京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截留，后经日美双方交涉，乃将白银卸下，重新装入银库。

△　美国务卿赫尔向美报界发表谈话，声称：关于调解中日战争一事，“美国态度未变”，“即在当事双方表示赞成调处之前，不拟讨论调处问题，或自动出而斡旋”。

10月25日　　汉口弃守，武汉会战结束。上午，日第六师团佐野支队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汉口市郊之戴家山进攻，武汉卫戍区郭忏部第一八五师守军阵地多被炮火摧毁。下午6时，日军强行渡河，攻陷戴家山，守兵后撤，日军连夜进入汉口市街，次日全部进入汉口市内。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使用12个师团，死伤达10万以上；中国交战部队计133个师又13个团，遗尸14.3493万具，被俘官兵9581人。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接见中外记者，说明自动放弃武汉原因，

略谓：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半年以来，消耗敌人之目的已达，掩护后方之任务已毕，武汉已失其重要性，决定转移兵力，另作部署，与日军周旋。

△　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总部奉第五战区长官部之命自上巴河西撤，26日退至荆门，旋移驻枣阳。该集团直辖各军亦依次向西越过平汉路转进至指定地点。

△　日军石原支队以巨舰10艘，掩护其陆军4000余人，于湖北阳逻下游登陆，与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守军激战后，陷阳逻。

△　进犯德安之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强渡德安河，与第一九〇师梁华盛部激战于心佛寺、巫家山附近，心佛寺、尖嘴壁、烟包山相继失陷。

△　日舰20艘侵入珠江虎门。同日，陷中山县城。

△　国民政府任命熊庆来为国立云南大学校长。

△　《新华日报》自武汉迁重庆出版。

△　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下令查禁宋庆龄著《中国不亡论》。

△　日本法西斯组织东方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在华组织全国性傀儡政权，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产生，并令其收回租界，收回海关税收，统治盐税，镇压反日活动与助蒋活动。

10月26日　　武昌失陷。24日，日军波田支队自鄂城进犯葛店，25日陷葛店，是晨陷武昌。

△　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奉统帅部之命扼守平靖关，掩护大军通过平汉路向西转移。该部在花园、应山间与越平靖关南进之敌激战一昼

夜，将敌击退，使各军得以安全西撤，是日始通过应山，到达随县一带整理。同时田镇南第三十一军亦奉命在汉掩护全军安全西撤。

△　日军第九师团陷鄂东南金牛镇，次日陷贺胜桥，粤汉铁路被切断。

△　日军第一〇一师团陷德安城西南之仪封山北端，炮毁该城西、北两门及各工事，并施放毒气及烟幕，第一九〇师梁华盛部损失奇重，李兆锠师一部来援，与敌相持于仪封山南。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弃守佛山（南海）、三水。

△　阜平日军400余人出城北犯，被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击退。是夜，八路军袭入城内，与日军激战。27日，日军弃城东撤，遭八路军截击，被击毙百余人，日机八架投大量毒气弹掩护日军向王快逃窜，八路军收复阜平。

△　英国援华委员会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参政会，以英国人民之名义，对于中国抗战表示加倍援助之意，并深信中国必胜。

10月27日　　外交部告外国记者，武汉之放弃，广州之沦陷，在六个月以前，业已料及。并谓：中国国策决不改变，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亦不讨论国策问题。

△　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罗翼群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护抗战到底，反对汪精卫主和言论，建议施行加强中枢政治机构、遵守总理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发动全国民众力量、迅速起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等四项抗战方针。

△　周恩来经澧县抵长沙。

△　国民政府颁布《查禁敌货条例》及《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高品支队及第六师团牛岛支队，相继攻陷汉阳。

△　日机八架炸鄂北应城，平民死伤400余人。

△　新任驻美大使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

△　上海金融界和各界团体分别致电参政会二次大会，切望坚持抗战国策，誓死反对妥协议和。

△　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全体台湾同胞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10月28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汪精卫、张伯苓及参政员128人出席。林森、孔祥熙、孙科、居正、于右任等到会。林森、汪精卫致词。蒋介石未出席，致电大会望参政会研讨大计，冲破难关。大会通过致蒋介石及前方将士两电。

△　德安弃守。27日晨4时，日军炮击德安城垣并大量施放毒气及烟幕，梁华盛第一九〇师伤亡过重。下午3时，日军攻入城内，奉命前来增援之李兆锠第一三九师与敌军激烈巷战，城内大火。是日，日军增兵猛攻，团长王启明率部死守，德安城已成一片焦土，四周高地亦为日军所占，守军伤亡过重，卒弃守德安。南浔会战结束。

△　日军第十师团冈田支队攻陷鄂北德安县（今安陆）。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王震第三五九旅在广灵以南邵家庄、张家湾地区设伏，毙日军第二混成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360余人，烧毁汽车五辆。

△　四川省党、政、军界要人邓锡侯、潘文华、陈公博、王缵绪、刘文辉、杨森、唐式遵、王陵基、孙震等联名电呈蒋介石，表示拥护抗战国策，集中全川人力物力，坚持抗战到底。

△　参政员孔庚、秦邦宪、罗隆基、梁漱溟、沈钧儒、史良等发表谈话，一致要求政府抗战到底。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规定对资本在2000元以上之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其利得超过资本额15％者及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其财产价额12％者，除依照《所得税暂行条例》征税外，加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同日，公布《非常时期特种考试暂行条例》。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陕西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为800万元，年息六厘，15年还清。

△　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召见驻日法使亨利，要求法国禁止军火经越南输华，否则日将采取必要手段。

10月29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孔祥熙、王宠惠、张群、何键分别作施政、外交、军事、内政报告。

△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攻陷咸宁，张发奎兵团所部守兵退往汀泗桥。

△　广东江防司令部派“执信”、“坚如”、“仲恺”等六舰，驶往三水河口、思贤滘一带阻止日军前进，驶至思贤滘附近，即与岸上日军激战，击毁日炮台四座，“执信”舰中弹沉没，副舰长以下23人阵亡，15人受伤，舰长李锡熙重伤不治身亡。其余各舰退回肇庆峡。

△　日本首相近卫辞所兼外相及拓相职，有田八郎任外相，前“满铁”副局长八田嘉明任拓相。

10月30日　　蒋介石抵南昌，批准薛岳兵团撤至修水南岸之计划，饬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统一执行。

△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孔祥熙作财政报告。会议

通过设全体审查委员会，审查重要议案。

△　国民政府召开西南各省公路、水路交通会议，决定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江汉工程局、珠江水利局、华北水利委员会等机关，分别办理西南各省水道的疏浚工程；并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运输，以弥补机械运输的不足。

△　四川省党、政、军界张群、贺国光、邓锡侯、潘文华、陈公博、王缵绪、刘文辉、杨森、唐式遵、王陵基、孙震等人，电请蒋介石驻节四川，统筹全局。

△　应城、孝感失陷。28日，日军冈田支队从湖北德安南下，是日陷应城。同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陷孝感。

△　日军攻陷汀泗桥。

10月31日　　蒋介石发表《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号召全国同胞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更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

△　张嘉璈、陈立夫分别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作交通、教育报告。同日，60余参政员联合提出《目前兵役问题之解决办法案》。

△　国民政府明令省、市参议会两《组织条例》自11月1日起施行。

△　陈诚在江西桂口张发奎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今后行动方针：迅速培养第二期作战力量，在修水、武宁、通山、小岭、官塘驿以南地区作持久战，消耗敌人。

△　日机炸南昌，投弹数百枚，民众死伤300余人。

△　日军在福清登陆，福州开始疏散人口。

△　云南各界10万人举行大会，追悼滇省第六十军参加台儿庄战役阵亡将士，龙云亲临致祭。

△　兰州烟酒局局长李国安贪污达万元之巨，被处死刑。

是月　蒋介石密令朱绍良、胡宗南调集军队驻守各险关隘口，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朱、胡在天水、双石铺各设预备指挥所。

△　朱德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八路军一年来的抗日经过，略谓：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华北的活动，牵制了日军，使华北日军无法渡过黄河，向南进攻。日军损失已达3.4万余人，八路军伤亡2.5万人。

△　绥远伪西北自治军旅长康德胜、团长左文玉、张福义及伪蒙军连长袁海才、苗福才等部1600余人先后反正，已抵固阳一带待命整理。

△　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组石油调查队，往四川威远、荣县、资中、屏山、宜宾等地调查石油资源。

△　陕西黑惠渠动工，计划引黑河水灌溉周至县约10万亩农田。

△　资源委员会成立湖南祁零煤矿局，将商民所办煤矿收为官办，以供湘桂铁路用煤。

△　菲律宾华侨组成四批服务团回国：第一批为汽车司机和修理工15人；第二批为侨生童子军22人；第三批为华侨救护队27人；第四批为华侨飞行员。

11月

11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经济部长翁文灏报告经济建设及三个月来之工作。会议将参政员张一麐、胡景伊、王明、陈嘉庚、王造时所提五案合并讨论。通过决议："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今后全国国民应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在讨论陈嘉庚等22人所提"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概以汉奸国贼论"一案时，汪精卫反对，竟说："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参政员对此群起驳斥，唯有余家菊、梁实秋为汪辩护。

△　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于长江南岸掩护武汉大军撤退。是日，罗部以两师兵力与自汉犯湘之敌前锋两联队战于小界岭（咸宁至通山公路间一峻岭），毙敌甚重。

△　南浔线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于31日自德安南犯，是日攻陷永修及虬津市，与修水河对岸之薛岳兵团隔河对峙。

△　日军冈田支队自应城出发，以一部攻陷长江埠，4日另一部攻陷皂市。

△　湖南警备司令部查封《长沙晚报》。

△　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联合委员会，梁鸿志、王克敏、朱深、王揖唐等参加，日军顾问原田、喜多少将到会。3日闭会，决定诱劝伪蒙疆政权加入该联合会，并发表《反共救国宣言》，谬称："非反共讨蒋不能恢复和平，和平不能实现，则无由救全国人民于死亡。"

△　日本大藏省向在华各日本银行发出通告，在华中、华南实行"军用券"，用以代替日本银行纸币流通。13日，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在上海与浙江伪省长汪瑞闿、江苏伪省长陈则民、安徽伪省

长倪道烺磋商“军用券”流通及使用办法，决定在各处遍设收兑机关，贬值吸收法币，以法币一元换“军用券”六角、七角不等。

11月2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胡景伊等21人所提《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案》，送请政府采择施行。另通过《职业教育实施案》、《调整农业金融机构案》、《重建战时经济政策案》，并根据钱端升提议，决定设置特种审查委员会，审查管理外汇及对外贸易。

△　参政员喜饶嘉措、麦斯武德在重庆分别对记者谈话，希望各民族精诚团结，一致抗敌，并望国人对边疆予以深切注意和帮助，使边疆成为强有力的抗日根据地。

△　军令部以八路军“忠实奋发，迭予敌重创”，致电朱德、彭德怀对所有出力部队“传谕嘉奖”。

△　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联名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解放区的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　日军抽调由鲁南下之百川部队，配以连云港方面之五个陆战队谋犯苏北，是日，蒋介石电令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着加注意。

△　日军石原支队自汉阳出发，是日分别以一部攻陷蔡甸、汉川、黄陵矶。

△　财政部颁布《黄金买卖条例》，禁止银楼购买土产黄金。同日，四川省下令禁止白银外运。

△　汉口伪维持会组织之“公共协会”成立，前商会长石兰洲充任会长，由日本特务机关操纵。

11月3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决消灭国民

政府，建设“东亚新秩序”。其要点为：一、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在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二、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满”、华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相连环之关系；三、“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有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加拒绝”。

△　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在湖北襄阳遇日机空袭殉难。旋国民政府令发治丧费一万元，按上将阵亡例给恤。

△　八路军五台告捷。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黄新廷第七一六团，夜袭五台山东虎阳河日军。次日，聂荣臻部赵尔陆支队全歼该敌500余人。五台日军200余增援，被击溃。

△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特种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外汇管理及对外贸易案，财政、经济、交通三部及贸易委员会均派代表列席说明。

11月4日　国民政府发言人驳斥日本近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指出：日本之声明“实欲中国牺牲其自由独立国家之神圣权利，中华人民对此决抗拒到底”。

△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邹韬奋所提《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连署者达74人，占出席人数半数以上，获通过。同日，大会还通过《请团结边民，增强抗战力量案》、《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案》、《请政府迅速制定并实施充实县政府组织法规案》、《请政府招致沦陷区技术人员案》、《请办工业生产合作机关，救济失业民众，调和供需案》等。

△　军事委员会顾问兼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在广西宜山逝世。

△　鄂南蒲圻、嘉鱼失陷。日第九师团自攻陷贺胜桥后，先后于10月31日及11月1日派出两股部队进犯蒲圻、嘉鱼。11月2日，第九师团一部进入蒲圻东侧的陆水河（蒲圻河）一线，同第九战区守军激战。是日，蒲圻、嘉鱼相继失陷。同日，日军陷通山。

△　凌晨，余汉谋所部粤军反攻三水，自卫团四出包抄，日军闻风先遁，县城收复，广三路之日军纷向佛山以东溃退。

△　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进犯广东清远，第四战区余汉谋部选敢死队千余人，将日军击退。

△　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向柏林《金融报》记者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军队善于作战，并宣称日军将追击至重庆、昆明。又谓：长江为军运之主要路线，暂不开放。

△　日军汽艇在上海码头扫射英商太古、怡和公司之“瑞和”、“棠乔”轮，死伤乘客40余人，货物损失甚重。

△　日机炸粤北英德、连平、翁源。同日，日机18架袭汉中，投弹200余枚。

△　资源委员会组织嘉阳煤矿公司，开发川西煤矿。

△　上海浦东川沙县伪维持会委员瞿木香献媚日军，残害百姓，是日被当地游击队捕获处决。

11月5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林祖涵等所提《严惩汉奸傀儡案》、吴玉章等所提《加强国民外交案》、陈绍禹等所提《关于持久抗战争取胜利案》、梁漱溟等所提《改善兵役实施办法案》、史良等所提《从速发展农村事业，以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等14项提案。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共讲五个问

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形势；第三、统一战线的长期性；第四、战争与战略问题；第五、其他问题。同日，全会通过呈蒋介石致敬电，并致八路军、新四军慰问电。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重庆市党部改由中央直辖。12月26日，洪兰友被任命为重庆市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　经济部通令严禁水银出口，并规定违禁处罚办法四条。

△　上午，侵粤日军500余人自太平犯怀德，东莞团队司令即以参议邓赋棠、邓迈千及大队长麦定唐各率一部团队分头防守，并饬佛子坳集训大队及赤龙、白博、石马等乡集结团队分头出击，困敌于黄田山附近。至中午日军增援500余人，附钢炮10余门轰击。团队腹背受敌，激战竟日，杨西、建平、金桔等乡团队闻讯前往增援，下午6时将敌击退。此役参议“二邓”及队员60余人牺牲，日军伤亡甚重。

△　东江民团袁华兴围攻石龙，茶山自卫团助攻日军之背，与日军激战半日，毙敌270余人。

11月6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闭幕。大会选举周炳琳、黄炎培、董必武、吴玉章等25人为驻会委员。汪精卫致闭幕词。

△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

△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攻陷鄂南崇阳。

△　浙西太湖沿岸游击队女英雄蔡一飞率游击队道经长兴被日军围攻，激战一昼夜，终以寡不敌众，以身殉国。

△　国民政府颁行《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　日伪合办华中渔业公司在上海成立，资金500万日元，以统制上海及华中渔业。

11月7日　林森在国民政府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就征收过份利得税事发表讲话，略谓：现时抗战期间，工商业中一部分人，抬高时价，大发横财，使人民负担倍增；这种过份利得，应当缴交国库去做抗战经费一部分的财源才合理，也是调剂贫富、抑平物价的一种好方法。

△　重庆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到行政院长孔祥熙、苏驻华大使奥莱尔斯基及各界群众2000人。孙科主席并发表演说，指出目前中国抗战环境远胜于昔日之苏联，唯有艰苦奋斗求达建国目的。

△　日军坦克四辆、装甲车53辆、步、炮兵五六百人猛犯苏北睢宁，被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击退。同日，固镇日军小川部队三四百人自灵璧攻陷泗县。

△　河北鹿钟麟部骑兵团胡和道部，指使封建会道门白极会包围冀南枣强县城，扬言“驱逐八路军”。

△　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合并，于溧阳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

△　兰州造币厂开工铸币。

△　英、美、法三国致牒日本政府，要求重行开放长江，以供各国船只自由航行。

△　日本政府与日商合股开设“华中发展会社”于上海，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任总裁，资本日金一亿元，以垄断铁路、水电、航矿、电报、电话、无线电等事业。

△　日本政府统制华北棉业，青岛禁运原棉出口。

11月8日　周恩来在湖南衡山会见蒋介石，谈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蒋介石对周的意见表示原则同意，要求拟订具体方案，并答应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收复佛山、博罗。

△　日机18架首次袭成都，投弹百余枚，空军20余架起飞追击，击落敌机一架。

△　日机自鄂、赣、粤三省分六批袭湘，出动109架次，空军起飞迎击，发生猛烈空战，击落日机二架。

△　冀东游击队进抵杨柳青车站，与日军接战三小时始退，拆毁津浦路杨柳青至静海路轨，火车停开达五小时。

△　日外相有田通知各国驻日使节，日本在华战区扩大，自陕西至广西，自徐州至甘肃，湖北之巴东、云南之大理，皆将受日机之轰炸。该地区之外国人须将房屋标明国籍，禁止中国军队使用，并将地点通知日本当局。

11月9日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自东江、西江及粤汉线分三路反攻广州。是日，北路部队自银盏坳长驱南下，进抵广州北郊之江村。

△　成都各界五万人举行大会，纪念川军出师抗战一周年。邓锡侯主席并报告川康军出师抗战经过。大会通过呈林森、蒋介石致敬电及致川康军前线将士慰问电。

△　日军第十一师团两个联队自崇阳沿湘鄂公路猛烈南犯，在通城北郊经一昼夜激战，是日陷通城。同日，鄂南羊楼洞亦告不守。

△　湖南临湘失陷。6日，日第六师团今村大队从汉口出发，是日攻陷临湘。

△　财政部电广东省府主席吴铁城，请严令各地驻军保护国税机关，不得强占或接收关税机关及攫取国税税款。

△　国民政府颁给担任江防出力人员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陈万仞等10员华胄荣誉奖章。

△　日军陷豫北滑县城及道口镇。

△　英国外务次官白特勒在下院宣称，英决与美取共同立场，不承认以片面行动改变国际条约所规定之在华地位，并谓英政府愿以经济援华。

11月10日　　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通电誓死雪耻，宣布现已部署就绪，即行大举反攻，决心恢复广东精神而慰国民。

△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洞庭湖口城陵矶登陆，第九战区陈诚部退往岳阳。

△　日机狂炸湖南浏阳，全城大火，民众死伤千人。常德、桃源、平江等地亦遭轰炸。

△　孔祥熙派樊光、褚民谊等人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秘密会见，讨论“和平”问题。樊光极力说明日本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是错误的。

△　司法行政部以“反省院”取消，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凡合乎《反省院条例》规定之送“反省院”者，不论刑期已否届满，一律准予取保释放。是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不准，仍须一律送回监狱，依原判执行。

△　国民党中山学社所办《中山周刊》，改为半月刊在重庆出版，梁寒操为发行人。

△　华北23个民众团体致电蒋介石拥护抗战到底，表示决以热血头颅捍卫祖国，完成复兴大业。

△　德国驻伪满洲国大使华格纳到任。

11月上旬　　月初，汪精卫电召陈公博自成都到重庆，与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在汪寓所秘密策划叛国降日出逃行动计划。

△　日军2000余人围攻绥中区，被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李井泉大青山支队击退。

11月**11**日　　日军第六师团今村支队自城陵矶向岳阳进犯，是日深夜陷岳阳。

△　国民党中央改组青海省党部，以马步芳、马绍武、郭学礼、谭克敏、翟玉航等六人为执行委员，马步芳任主任委员，李晓钟为书记长。

△　蒙古乌盟西公旗召开楚格拉大会，13日闭会。16日，该旗女王奇俊峰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表示拥护抗战建国。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合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典礼。汪精卫、林森、孔祥熙、于右任、孙科、居正及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部、院、会长官共300余人出席。林森讲述“总理伟大人格和精神”，指出：解救当前国难，应效法总理为榜样。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连日分三路猛攻从化，是晨克复该县县城。

11月**13**日　长沙大火。12日上午9时，蒋介石密令湖南省府主席张治中，在长沙临近战区时焚毁市区，实行“焦土抗战”，以阻止日军之行动。旋张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密议，决以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为总指挥，纵火焚毁长沙。午夜时分，即派出300

余人，组成24个纵火队在全城各处点火。是日凌晨1时后，市内二三处起火。2时半，全城数千处同时纵火，长沙顿时成为一片火海，熊熊大火延烧三天三夜，全城被烧十分之九，烧毁房屋五万余栋，烧死二万余人。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移设重庆。

△　新四军在苏南丹阳袭击修路日军，毙敌40余人，并破坏桥梁三座。

△　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办滇北矿务局，开采滇北铜矿，资本200万元。

△　中国自然科学社第十一届年会在四川巴中举行，宣读论文35篇，决议组织西北及西南科学考察团。

11月14日　　第九战区陈诚部克复咸宁。日军北溃，遗尸百余具。

△　赈济委员会为发展难民垦殖事业，组织滇西考察团，共23人，由团长林崇墉带领，自昆明出发前往边地进行考察。

△　日本政府复照英、美、法三国驻日大使，以商轮航行长江，妨碍日本军事行动，且沿江满布中国游击队，时对日舰攻击，并常置水雷于江中，于航行诸多危险为理由，拒绝开放长江。

11月15日　　蒋介石以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在广（州）惠（阳）一带作战，“指挥失当，失守广州”，明令予以革职留任处分；第八十三军军长兼第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革职查办；第一八六师师长李振、第一五四师师长梁世骥各记过一次；广东宪兵司令李江未见日军踪影先行撤退，又复畏罪潜逃，通缉归案究办；旅长叶植南、李如枫扣留；旅长陈勉吾、何联芳撤职留任；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工兵指挥郭汝津通缉归案究办。

△　聊城失陷，范筑先殉国。先是阳谷、平阴、茌平等地封建会道门“忠义团”、“黄沙会”暴动，配合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千叶联队300余人自东阿突袭聊城，范筑先率部与日军血战竟日，日军迂回包围县城。是日拂晓，日军以飞机二架掩护，向范部猛攻，范部奋勇抵抗，毙敌百余人。旋因寡不敌众，日军攻破城门，聊城县长郑佐衡、秘书长赵玉坡、总参议（中共党员）张郁光、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营长林金堂等守城军民700余人壮烈牺牲。时范筑先在东城门督战负伤，见日军入城，举枪自戕，英勇殉国，聊城遂陷。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围攻盘踞六安日军，敌势不支，向东北溃退，六安收复。

△　日军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及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3700余人，对冀南进行第一次全面扫荡。日军占隆平、故城、武城、恩县等县城。16日，占夏津、高唐、永年县城。17日，占南宫、临清县城。

△　日军4000余陷皖南宣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退往孙家埠。

△　日机17架再袭成都，投弹百余枚。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六年度普通岁出第一次追加预算》，追加数为551万余元。

11月16日　　蒋介石自南岳到长沙。18日，蒋介石为平息民怨，下令逮捕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交军法会审。

△　行政院官员宣布，日军侵及中国大陆九省，占领59县，仅占全数7%。另有248县处于日军半占领中。

△　全国救济委员会秘书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抗战以迄本年10月24日，日机空袭中国城市3318次，被炸城市314处，平民死伤6.6万余人（其中炸死2.9968万人）。

△　日机21架狂炸柳州，投弹百余枚，全城大火，死伤甚重。

11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改组河南省党部，程潜为主任委员，袁守谦为书记长。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围攻合肥，敌势不支，向东退去，合肥收复。

△　军事委员会在湘西设立绥靖公署，任命陈渠珍为主任。

△　周恩来指派洪深等政治部第三厅人员和抗敌演出队、抗敌宣传队，进行长沙善后救灾工作。

△　第三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再克皖南宣城。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河北大名，歼灭日军500余人。

△　日军陷湖北罗田。

11月18日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反攻广州主力部队于粤汉线东攻克白云山（距广州10公里），分向广九路及广州东北面挺进，粤汉路正面克黄沙车站（广州西南郊）。

△　沪杭铁路日军慑于中国游击队之活动，组“铁路防护团”，是日在杭州成立，万良钦、高宗英分任伪正、副团长，顾问为宫岛等六人。

△　华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古庄干郎调参谋部，由第五师团长安藤继任。

△　日机袭宜昌，法国天主教堂内中弹，院内难民被炸，死伤50余人。

△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决定指导战争的一般

方针：“尽力处理当前的中国事变，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特别是军备，准备对苏中两国作战。”

△　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要求修改《九国公约》。

△　意大利与“满洲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所订友好条约亦在罗马换文。

11月19日　国民政府明令废止《反省院条例》。

△　国民党中宣部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表长沙大火经过真相，声称：“12日夜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围攻三水，日军突围，三水收复。

△　第九战区陈诚部克湖南平江、麻塘及鄂南云溪车站。

△　日军陷湖北英山。

△　陆军第一九〇师师长梁华盛在南浔线右翼屡挫敌势，国民政府颁给华胄荣誉奖章。

△　鹿钟麟冀察游击总司令部指挥的津浦游击纵队赵云祥部在新河城东之仁让里，将八路军工作队、战委会、基干队包围缴械。同日，濮阳专员丁树本在濮阳南中寨将八路军黄河支队200余人包围缴械。

△　日本政府设立中央东亚事务处，主办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近卫首相任总裁。在华设北平、大同、上海三个支部，分由陆、外、海省负责。

△　法国驻华大使那齐亚调任驻苏大使，驻希腊公使戈默升任驻华大使。

11月20日　　湖南省政府于长沙召开临时会议，议决：一、设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推尹任先为主任委员，田汉、席楚霖为副主委。二、发放救济费50万元。三、长沙市长席楚霖对于火灾疏于防范，应予免职。同日，湖南省府奉行政院令移沅陵办公。

△　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分别以渎职殃民及放弃职守罪判处死刑，是日于长沙执行枪决。

△　湖南省府主席张治中发表《为长沙大火敬告全湘同胞书》，检讨其“用人失察”之过，表示愿待罪补过，望全湘同胞“督责赞助”。

△　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秘密会谈，签署《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规定：日、华共同反共，缔结防共协议，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人在华有居住、营业自由及治外法权，日、华经济提携，汪精卫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俟机成立新政府。汪精卫叛国行动计划亦秘密拟定。

△　广东东莞失陷。日军自石龙犯东莞，何煜坤部人民自卫团奋勇抵抗，激战四日，何部寡不敌众，东莞失守。

△　日军沿广九铁路南犯，24日晚抵樟木头，与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发生激战。

△　潮汕市民宣誓卫国。潮汕抗敌后援会鉴于广、惠陷落，为加紧民众团结，于是日正午召集各机关团体负责人、保甲长、联保主任等举行市民总宣誓，开会以鸣炮为号，由该会派出之工作队员引导民众，分赴指定地点，举手宣读誓词，签名于誓书上。下午，后援会将全市查封之日货，一律纵火焚毁。

△　日机七架炸延安，死伤民众30余人。次日，日机再炸延安。

12月12日，第三次炸延安。

△　日机炸宜昌，江面英国轮船中弹起火。

△　甘肃夏阿拉卜楞一〇八寺及所属藏族各部落僧民慰劳团抵重庆，26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旗，旋赴前线劳军。

△　日军第一〇一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及台湾波田支队、山下兵团，在华久战疲惫，是日奉命返国。

11月21日　　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并转呈林森，详述长沙大火原因及处理经过，声称：长沙地方当局误信谣言，一部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不如先行自焚其室，遂至一处起火，到处发动波及，不可收拾”。并称已亲临灾区视察，一面彻查肇事祸首，一面遴员派队，救济灾民，恢复交通。

△　重庆行营分令各军政机关，严禁文武官员避居香港、上海。

△　第五战区别动队克湖北皂市，日军退回应城。

△　武汉警备司令、第九十四军军长郭忏向蒋介石报告：第五十五师团长贺纪绪谎报遇敌，擅将部队渡江逃避，请将该团长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11月22日　　行政院举行第三〇九次会议，孔祥熙报告拨款救济长沙灾民情形，通过张治中革职留任处分及西康省府元旦成立等议案。

△　汪精卫就长沙大火事，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

△　第四战区师长黄涛率所部克福和墟，日军向广州方面退守。

△　虎门失陷。日军以飞机、军舰同时进犯虎门，先占大角炮

台，再向虎门推进，并将威远炮台包围，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守军寡不众敌众，虎门陷落。

△　日军自东莞分兵进袭石龙，与第四战区游击队激战竟日，是日再陷石龙。

△　日本海军在广东宝安县大鹏湾和南头登陆，是日攻陷大鹏城。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猛攻商城，与日军500余人激战数小时，敌不支溃退，商城收复。

△　日军陷宿迁。自19日起，苏北日军接连进犯宿迁，是日拂晓，日军1500余人以飞机六架配合，再度猛攻北门，城内四处起火，日军乘虚冲入，与守军发生巷战，经八小时鏖战，宿迁失陷。

11月23日　　国民政府为长沙大火明令张治中革职留任，略谓："此次长沙大火，灾情惨重，公私损失，不可胜计。……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乃以用人不当，酿此巨变，事前既漫无防范，临时又不能制止，祸及闾阎，苦我湘民，自应即予革职，并着暂行留任，责成办理灾区善后事宜，以观后效。一面由行政院转饬赈济委员会从速派员前往施放急赈，妥筹救济。"

△　日机猛炸西安回民区，毁民房150余间，死伤民众200余人。

11月24日　　张治中就长沙大火及善后问题发出通电，宣布设立长沙市火灾善后建设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在二十七年湖南省建设公债项下，指拨1000万元以充基金。并表示：本抗战建国之方针，"一面加强推行省政，继续支持抗战，一面筹划省会之善后建设……俾得赎罪于万一"。

△　《申报》刊载：华侨及国内要人陈嘉庚、陈立夫、陈果夫、贺国光、缪云台、潘公展等人，发起组织华西垦殖公司，规定该公司

资本定为500万元，在四川设总筹备处，开发滇、甘、川、康、青、新等省农矿业。

△　驻日英使克莱琪访晤日外相有田，告以英政府不能承认日本所称不开放长江之理由为有效。

11月25日　　军令部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到第三、九战区总司令、军团长、军、师长共百余人。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略谓：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和政略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退、岳阳沦陷为第一时期，从今以后是第二期。第一期的战略，是消耗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于我军决战的阵地，第二期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战争的教训证明，敌人的力量决不能消灭我们，我们的力量足以打破敌人的侵略。希望各将领“将以往抗战所得的经验和意见，尽量贡献出来，殚精竭虑，研究讨论，制成具体方案，会后切实执行”。周恩来、叶剑英与会，并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由周恩来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开会，汪精卫报告政府对于长沙大火处理经过，并称：“此次政府及各界民众，对于长沙事件均极痛心，惩前毖后，对于焦土名词误解及滥用，应加倍注意。”

△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迅速进入山东、淮北。

△　深圳失陷。日关东军4800人、坦克120辆、骑兵600人、飞机80架自大鹏分三面猛犯深圳，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守军不敌，是晚，深圳失守。

△　深圳居民为躲避日军，自22日起连续四日纷纷涌向深圳新界（属香港），至是日人数达10万以上。27日，赈委会委员长许世英前往新界难民区视察。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湖北罗田。

△　重庆市钱价上涨，中央银行发行局为补救钱荒，发行大批铜、镍辅币。

△　厦门日军搜查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没收书籍数万册，悉予焚毁。

△　上海英、美、法、比、加拿大等八国侨商发表共同宣言，抗议日本侵害外侨在华权益，并向日方提出保护外侨权益等八项要求。

11月26日　　南岳军事会议继续举行，蒋介石在听取新编各师师长报告后，指示应特别注意之事项11条，其要者为：注重学习，提倡研究；整理各指挥部与司令部；注重通讯联络；整顿军纪军风；发扬官兵的企图心；建立彻底统一的国军。

△　日军自深圳分兵进犯深圳墟和沙头角，炮火蔓延至香港边境，炮弹纷落英界，日军一度冲入英界，是晚陷深圳墟。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湖北英山，毙日军百余人。

11月27日　　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注重分析日军优点，注意效法；提出“废人利用”、“废物利用”、“废时利用”、“废地利用”四句口号，要求贯彻到底。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自英山沿英罗公路追击日军，是日克复濛山，日军伤亡数百人。

△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豫北延津，毙敌200余人。

△　鹿钟麟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　上海民众慰劳团九人抵达皖南，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献旗致敬。

11月28日　　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报告整军建军。指出：这次会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拟分三期轮流整训全国军队，限期完成，以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蒋介石认为，抗战以来最大的挫失是：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南京的失败、马当要塞的失守及日军从大鹏湾登陆，“我统帅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辞其责”。是日，闭会。会议期间，蒋介石主持制订《抗战四要实施纲领》、《第二期抗战工作、整军作战应特别注意各点》、《第二期抗战之要旨》、《学校机关与部队的教育之重点》以及《第一期第三阶段抗战过程中所得血的教训与今后的改进》等文件。会议决定调整战区：第一战区，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辖苏南、皖南及浙、闽；第四战区，以张发奎为司令长官，辖两广；第五战区，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辖皖西、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以朱绍良为司令长官，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代），辖鄂南及湘、赣；第十战区，以蒋鼎文为司令长官，辖陕西省；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冀察战区，以鹿钟麟为总司令；取消西安、广西、重庆各行营，另设天水、桂林两行营，以程潜、白崇禧分任主任，统一指挥南北战场。

△　日军陷广东沙头角，并从台湾调后备队来粤，于澳头登陆。

△　南京伪维新政府召开“促进树立中央统一政权”代表大会，到苏、浙、皖各伪政权代表480余人，30日闭会，发表宣言，主张设联邦政府，以统辖地方政权。

△　北平伪临时政府公布《棉花输出许可暂行条例》。

△　日本“华中开发公司”总裁儿玉谦次、副总裁平泽抵沪，图谋引诱中国金融、实业各界加入开发公司。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驻苏日使东乡表示，所谓“满洲国”独立事件，系日军占领满洲之结果，完全违背《朴茨茅斯条约》，苏联政府不予承认。

11月29日　　行政院第三九一次会议议决通过财政部《节约建国储金条例》；福建省参议会限元旦成立；聊城专员范筑先父子殉国，呈请国府明令褒扬。

△　日陆、海军当局发表公报，宣称日方非至华中战争结束，第三国船只决不准在长江内航行。

△　日、英两国代表就日军攻占深圳事在深圳香港交界处举行会谈。英方代表为香港陆军总部李夫中校、米杜息第一营司令官纽咸中校，日方代表为深圳日军司令长及驻港日总领中村，英代表提出英方主权问题，请日方注意。

11月30日　　蒋介石下令中等以上学校组织学生军，蒋自兼总司令，教育部长及军委会军训部长为副总司令，各省主席为各区司令，各校校长为分队长。

△　第四战区第一五三师张瑞贵部攻入深圳，日军沿广九路北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反扫荡作战结束，16天作战28次，毙伤日军600余人。除宁晋、隆平、恩县、永年、高唐、故城外，冀南中心区均已收复。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收复豫南商城、潢川。

△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内容是：一、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合作的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原则；二、在华北和蒙疆划定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

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三、在长江下游地带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紧密结合地区；四、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取得特殊地位。并根据上述原则规定了对华交涉的具体事项及实行经济提携的具体方案。

△ 日机51架狂炸桂林，伤亡百余人。

是月 蒋介石再次重申要“以四川作为最后的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 中共中央军委将中共山东地方党于山东沦陷后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正式八路军。任命张经武为山东纵队总指挥，黎玉为政委，下辖刘涌第二支队，马耀南第三支队，廖容标第四支队，高锦纯第五支队，张北华第六支队，王培汉第七支队，马保三第八支队，王林肯第九支队，董穆仲第十二支队，苗培诚挺进支队，钟辉陇海支队，郭子化第四团等，共三万余人。

△ 教育部颁布《青年守则》，凡12条，规定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训”，令全国各级公私立学校一律遵行。

12月

12月1日 国民政府以西康建省事宜筹备告竣，颁令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1日成立西康省政府。

△ 蒋介石由衡阳抵桂林。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自从化南攻，越神冈墟，是晚克太平场。

△ 新四军总部在安徽泾县云岭举行群众大会，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发表演说，民众代表向新四军献旗。

△　《大公报》由汉口迁重庆，是日出版。

△　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同意的复信，回到香港，会见西义显，面告：一、汪精卫已同意《日华协议记录》；二、汪预定12月8日离重庆，经成都，于10到昆明，希望近卫于12日左右发表声明。

△　北平伪临时政府颁发之《棉花输出许可暂行条例》是日起实施。

△　伪山东省“官民满洲帝国视察团”由团长、伪省财政厅长唐仰杜率领，自济南启程，7日抵伪满洲国新京（长春），8日受伪满总理张景惠接见，15日返回济南，发表《满洲国视察报告书》。

△　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东京返抵北平，图谋拼凑中国“新政府”傀儡政权。

△　伪“东亚文化协会”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会议，仍推汤尔和为会长，加推日本人为副会长及各部长或副部长，并通过提案多种，推行奴化教育。

△　国联决议拨款150万瑞士法郎协助中国进行防疫。

△　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再次抗议日军封锁长江。

12月2日　　日机轰炸桂林，投弹70余枚，延烧半日，死伤千余人。柳、邕、梧、龙、色、浔、贺各县亦遭袭炸。旋国民党桂省党部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　《申报》2日电称：李宗仁、白崇禧为侵粤日军图犯桂省事，发表《告广西民众书》，要求全省人民沉着应战，对日军侵略作最后之抵抗，全省男子一律应投效正规军或加入游击队。

△　经济部令中国茶叶公司开辟川、滇、黔、桂诸省新茶区，并

与云南省府合作设茶叶实验区及实验茶厂，由卓宣谋、寿景伟主持。

△　曾琦、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为纪念中国青年党成立十五周年，在重庆宴请各界人士，重申该党8月12日第九次大会所发表的六项主张。董必武在宴会上致词，希望各党派更加团结一致。

△　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方法。

△　日军参谋总长戴仁亲王发布第二四一号大陆命令，声称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地区，扑灭抗日势力。

12月3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主任。

△　晚，第四战区便衣队80余人，自观音庙附近潜入广州市内，在花塔附近与日军巷战三小时始退。同时，进入市内之游击队向省府及教育厅等处投弹。日军大起恐慌，晚7时起戒严。

△　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八路军“前在晋所获敌机一架，昨已修理完毕，飞往西安”。

△　宁波防守司令王皞南，因铺张结婚，玩视法令，积罪甚多，蒋介石饬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查明严办，是日在金华执行枪决。

△　中国经济学社在重庆举行第十四届年会，马寅初任主席，集中讨论外汇管理与经济建设问题。

△　香港崇正总会以日军南侵，广州陷落，是日召集会董叙会，议决组织崇正总会救济难民会，发动海内外募捐，响应捐赈者为数甚众。计先后分拨港、九、新界各施赈、救伤、医疗、服务等机构款项，并组崇正救护队赴东江一带工作，又分拨惠阳、博罗、番禺、新会、鹤山、潮汕、增城、梅县、西江六邑、东安港等地救济会、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游击指挥部等款项，共数万元。

△　日本首相近卫宣称："中日冲突有解决之望，只须蒋介石将军向国民政府辞职，而参加行将成立之中国新中央政府。"

12月4日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离湘赴桂，巡视桂林（7日）、柳州（14日）、南宁（25日）、贵县（30日）一带防务，指示增强民众抗日力量。

△　广东宝安县长兼游击队指挥官梁宝仁率官兵千余，于2日晚分三路反攻，将宝安县失地收复，是日电余汉谋报捷。

△　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成立，吴鼎昌为名誉会长，王伯群为会长，王漱芳等10人为理事。

12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令称：范筑先"自客岁暴日侵鲁，留驻河北孤军抗战，卓著功勋。前于反攻济南时，命其幼子亲率挺进队直扑敌营，致罹于难。此次聊城之役，又复躬领卫士，以寡御众，血战竟日，慷慨捐躯。聊城县县长郑佐衡，警察局长林金堂，亦各尽忠职守，以身殉城。范筑先、郑佐衡、林金堂临难不苟，志节堪嘉，应予特令褒扬"。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名义逃出重庆飞抵昆明。7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电周立即返任。周以视察工作尚未结束为由，拒绝返渝。

△　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在兰州市各机关举行之扩大纪念周报告称，西北具有天时地利之优长，日军如若来犯，实为歼敌最合理想之地。

△　四川省中江县农民因不满政府征粮及乱抓壮丁，聚众围城。邓锡侯派兵前往镇压。

12月6日　蒋介石同周恩来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会谈。蒋表示：

一、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二、如果此点可谈，拟约毛泽东面谈；三、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答：一、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时机未到；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国家有害无益。

△　安徽亳县县长熊公烈督率团队苦战三月，收复县城，是日行政院颁褒扬令，并给奖金千元。

△　日军千余人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由广东平潭向惠阳撤退，并将桥梁破坏。

△　南京伪维新政府顾问常玉清所组织的“中国安清同盟会”在上海成立。该会系反动帮会组织，以“反共倒蒋”为宗旨。

△　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决定《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规定“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和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并且“必须在各方面减少驻屯的兵力和驻地兵力的消耗”，以应付“下次国际形势的转变”。

12月7日　　蒋介石视察西江，并向该地各指挥官面授机宜。次日，在桂林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复广州及防卫西南策略。

△　军令部以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迭挫顽寇”有功，致电朱德、彭德怀传令嘉奖。

12月8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拟定《中国国民党党员特许登记办法》，规定凡自同盟会时期加入国民党者，只要有证件或二人以上证明者，皆可重新登记。同时决定，在陆军中设党务特派员，以政治部主任兼任；在宪兵、海军、空军、保安队、军校内，设特别党部。

△　国民政府特任宋哲元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财政部发言人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称：抗战以来共举国债15亿元，合美金4.5亿元，英金9100万镑。

△　日军为解除广州之威胁，自5日起接连北攻，与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在从化附近激战，是日陷太平场。

△　日本外相有田分别会见英、美驻日大使，谈建立“东亚新秩序”问题，并要求修改《九国公约》。英、美大使向有田提出开放长江的要求，无结果。

12月9日　　蒋介石飞返重庆，同日并邀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等讨论今后抗战要计。蒋介石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汪精卫称：“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可无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　粤军克惠阳。8日，第四战区张瑞贵第一五三师温淑海旅三面围攻惠阳，同日军激战二小时，敌不支，率骑兵400人、坦克32辆、装甲车15辆、步兵1500人，弃城撤向博罗，是晨张师温旅进入惠阳城。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在鲁西北冠县成立，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委。

△　广州陷落时，人民因仓猝避难，携带大宗钞券、金饰出口，致被海关查扣。财政部以此事实属情形特殊，不能视为违法，是日电令两广各关税务司即予发还。

△　重庆青年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政府以一二九为全国学生节。

△　国立西北农学院在陕西武功正式上课。

△　日本大本营宣布：任命杉山元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原任寺内寿一调回本国。次日，派前参谋本部次官多田为在华作战日军指挥官。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致电英国国会及外交部，请坚持《九国公约》，切实联合各国援华制日。

12月10日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克广东博罗、宝安。

△　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与河北省府主席鹿钟麟会谈。同日，河北民军张荫梧部解散八路军新河县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另行组织动员委员会，并在藁城杀害五名共产党员。

△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日本外相有田对英、美大使之谈话发表声明，表示：《九国公约》不容废止。

△　广东伪“治安维持会”在广州成立，彭东原为会长，吕春荣为副会长。

△　国社党头目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扬言要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行政权交还国民政府，将八路军、新四军的训练与指挥权交给蒋介石，并“请共产党人暂时忘却马克思主义，而致其全力于全国抗战”。

△　天津电话局总工程师朱彭寿因拒绝为日人服务，被敌杀害。1939年1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恤金5000元。

△　上海金融界人士杜月笙、钱新之等七人抵重庆，计划设立造

纸厂、纺织厂，发展西南实业。

△　武昌中华大学迁重庆复课。同日，浙江大学迁广西庆远复课。

12月上旬　　西安回教同胞四万余人发表《告全世界伊斯兰弟兄书》，揭露日军暴行，呼吁全世界伊斯兰弟兄携手团结，消灭共同的敌人。

12月11日　　财政部公布《限制私运黄金出口办法》，规定限制黄金及金类禁止携运出洋或运往沦陷区域。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再道东进纵队第五支队一团袭占冀中晋县，毙敌50余名，缴获步枪30余支，毁汽车四辆。

△　《新华日报》桂林版出刊。

△　旅渝归国华侨协会成立，通过组织章程，发表宣言，选举胡万里等九人为理事，郭威白等五人为监事。

12月12日　　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讲，指出："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总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

△　蒋介石会见中共代表陈绍禹、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谈国共两党合作关系问题，中共代表提出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蒋不同意，并谓：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代表拒绝了合并的主张。

△　重庆《大公报》发表该报主编张季鸾手撰《灭亡的平和与奴隶的平和》社评，针对"中国要荣誉的平和，反对屈辱的平和"的议论，指出："今天敌人是以消灭中国主权为其作战目标，简单说：敌

人期待于中国者，是灭亡的平和，奴隶的平和。这‘平和’二字的解释就是征服，是亡国。换句话说：中国即使求屈辱的平和亦不可得，何况荣誉的平和。”强调现时必须先以坚强善战，打倒侵略，才能不灭亡，不做奴隶，然后始有平和之望。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在云南国民党省党部扩大纪念周演讲抗战形势，声称，中国抗战之目的，始终为和平，合乎正义、光荣的和平，吾人不应反对。

△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离渝返国，报告远东时局。

△　万国红十字会中国分会在贵阳成立筹备委员会，聘请吴鼎昌为名誉会长，周诒春为会长，何辑五及英牧师吉净生为副会长。该会分布于中国各省，有红十字会医院70处。

△　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会同日本华北及上海两特务机关在沪召集紧急联席会议，土肥原主席，讨论促成伪政权之发展及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等案。14日结束。

12月13日　　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成立，公布义卖献金办法。

△　上海南市、浦东日军3000余人进犯南汇县，在浦南闸港强行登陆冲入新场、鲁家汇等处，鲁家汇、张江栅、召家楼三处已成一片焦土，民众死伤数百人。

12月14日　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抵南昌，与薛岳换防。

△　财政部发言人在重庆招待外报记者，阐述财政设施。略称：为调整国内经济开发事宜，设贸易、农产、工矿三调整委员会，分别主办其事，于战后复兴建设亦予以注意。

△　陈赓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田守尧、刘震之第六八

八团进抵鲁西北朝城之张鲁集，并指挥先遣纵队协助鲁西北地方党恢复与开展抗日工作。

△　英国外务次官白特勒在下院声明，不能承认片面修改《九国公约》之行动。

12月15日　　中美成立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协定，由美联邦进出口银行贷款，用以购买美农工产品，并由中国输入桐油，作为偿付贷款。该借款由中国中央银行担保，定期五年偿还。

△　中英1000万英镑信用借款协定原则上成立，用以建设自湘、桂两省通往缅甸边界之铁路，其中600万镑为建造费，400万镑向英国购买器材。借款由英国私人方面垫付，并由商务部出口信用局予以担保。

△　中国财政代表团团长陈光甫在华盛顿对记者称：中美间之信用贷款完全为商业性质，用于购买美之汽车、汽油、食粮，毫无军事目的。

12月16日　　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扶病同汪单独晤面，谈约半小时。汪以彼此政见不合，提出“联袂辞职，以谢天下”逼蒋，遭拒，谈话不欢而散。

△　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全国各省之县党部均改为书记长制。各县党部书记长对于全县党务负完全责任，并为县党部委员会议主席，对会议之决议有提出复议之权。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克广东淡水、平山。

△　新任驻德大使陈介向希特勒递交国书。

△　广东江防司令部改编为广东舰务处，黄文田任处长，隶属于广东绥靖主任行署。

△　日本对华中央机构“兴亚院”（前称“对华院”）正式成立。日首相近卫称：以后日本政府整个对华政策，将以该院为枢轴。“兴亚院”设总裁、副总裁和四部：总裁由内阁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兼任；政务部长为铃木贞一；文化部长为柳川；经济部长为日高；技术部长为官本武之辅。

12月17日　　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段班级、李万华、叶秀峰、韩孟钧、王靖宇、格聪呼图克图、杨永濬、黄述为西康省府委员；任命刘文辉兼西康省府主席，段班级兼民政厅长，李万华兼财政厅长，韩孟钧兼教育厅长，叶秀峰兼建设厅长，王靖宇兼保安处长。

△　国民政府派许世英为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　程潜电蒋介石报告，土肥原拟迫使吴佩孚出任伪职，已遭吴氏拒绝，故此事已不进行。

△　日军陷江苏南汇县，县长于陶生率队不战而逃，城内大火，精华区域尽毁。

△　日本与北平、南京、蒙疆三伪政权合组之“中华航空公司”成立，资金600万元。

12月18日　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自重庆出逃昆明。

△　蒋介石电胡适并转陈光甫祝贺中美“桐油借款”成立，略谓：“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　立法院长孙科在重庆对美联社记者谈话，指出：中日开战以来，在华日军死亡已达50万人，应付苏联军力业已在华消耗殆尽，各线日军疲惫已极，南、北两线均已失却继续攻势能力，此后国军将采取攻势。

△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义卖献金日撰写的代论《论今后敌人的动向》。文章说：我军今后要加紧布置，到处打击敌人，以增加敌之困难，争取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到来。

△　胶东伪军赵保原率部3000余人反正。旋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复电照准，并赏洋5000元。

△　经济部筹组川南煤矿公司，由翁文灏任理事长，唐子章任经理。

12月19日　　汪精卫叛逃河内，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同往。旋国民政府派正在河内的外交部长王宠惠见汪，又派陈布雷前往河内劝汪改弦易辙，被汪拒绝。

△　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指导方针。21日及22日蒋介石在会上讲评各次作战之缺点及以后应注意改正之处。各战区主官报告此次战斗经过。23日闭幕。

△　林森在国府总理纪念周演讲《个人光荣的牺牲》，介绍范筑先父子殉职事实，号召全国军政人员效法他们，“抱定与国土共存亡、临难不苟的精神”，博得最后的胜利。

△　日本外相有田对外国记者声明：美、英对华贷款“不合时宜”，日本将巩固所谓“东亚新秩序”，以对付美、英之经济压力。并称：《九国公约》若干规定因时局改变，“已不适用”。

△　美财政部长摩根索宣布：《中美货币协定》决予延长。按：该协定于12月31日期满。

12月20日　　蒋介石飞往西安视察军事，在西安接到云南省府主席龙云电报，报告汪精卫忽飞昆明，欲与日本谈判和平，询蒋曾否预闻其事。蒋复电称：此事事先并未预闻，目前绝无谈判和平之余地。

△　行政院第三九四次会议议决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李汉魂为省府主席兼民政厅长；通过广西省二十七年度地方概算；准陕、甘、粤三省临时参议会展期至明年3月1日成立。

△　陈诚抵渝对记者谈话，谓：抗战第二期战略为在山区进行主要决战，同时在敌军后方增强游击战术活动。

△　外交部发言人接见中央社记者驳斥“有田声明”，指出：美、英对华贷款无论纯系商业或者含有政治作用，“日本均无权反对”；《九国公约》不能因任何一国宣言废止而失效。并谓：所谓“东亚新秩序”，“其手段在于以武力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其目的在于独霸东亚，垄断中国利益，此与第三国在东亚利益，根本不能相容”。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陈光部第三四三旅杨勇部第六八六团由晋西到达晋东南。

△　东北义勇军王德林将军在原籍山东沂水病逝。

△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自成都飞昆明，即转飞河内，追随汪精卫叛国。

△　苏北游击司令张英士密赴徐州向日方特务员松本雄奇及伪绥靖部副处长李紫东投敌。

12月21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率该师师直及第三八六旅补充团到达冀南南宫。

△　日军指使汉奸成立伪“广东省政府”，伪省府正、副主席彭东原、吕春荣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

12月22日　　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日本政府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总方针，重申“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

其要点为：一、中、日、“满”三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二、中国与“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四、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及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五、中国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事分担部分责任，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率该师主力第三五八旅从山西岢岚县向冀中挺进。

△　北平、南京两伪政权在北平召开第三次“联合委员会”会议。

12月23日　　国民政府令免广东省府委员兼主席吴铁城本兼各职，宋子良、许崇清、徐景唐、欧阳驹、李照寰、胡继贤、陈耀祖广东省府委员本职，财政厅长宋子良、教育厅长许崇清、建设厅长徐景唐兼职；任命李汉魂、顾翊群、许崇清、王应榆、胡铭藻、曾养甫、朱晖日、何彬为广东省府委员，李汉魂兼主席并兼民政厅长，顾翊群兼财政厅长，许崇清兼教育厅长，王应榆兼建设厅长。

△　国民政府令免立法院立法委员周纬、补英、达赖、李登辉本职，任命冯兆异、黄金涛、张肇元为立法委员。

△　外交部发言人驳斥近卫内阁22日对华声明，指出：此次声明与以前日方历次声明无异，破坏中国独立完整之基本政策未变。

△　重庆各界600余人举行范筑先追悼会，孔祥熙、丁惟汾参加，林森、蒋介石、朱德、彭德怀、吴玉章、董必武等送挽联。

△　军委会别动队总司令熊剑东率游击队袭击京沪路沿线昆山、太仓、常熟、嘉定四县日军，连续三日战斗，毙敌300余，内有联队长一人。

12月24日　　蒋介石自西安飞返重庆，请顾问端纳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并谓：“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之抵抗。”

△　国民政府特派驻智利国公使张谦为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邮政会议全权代表。

△　陈诚在招待国民党中央各部、院及重庆市各界代表席上讲话，略谓：目前日军不积极进攻，绝非停止侵略，我辈必须加倍努力，实行兵役动员、参战动员、物资动员，以图对付敌人新的进攻。

△　军委会将第四路军各师及在粤新编各师合并为第十二集团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余汉谋、叶肇为副总司令。

△　陈赓指挥八路军第六八八团及范筑先原属张维翰第十支队，在山东馆陶西北东目寨歼灭顽军王来贤部5000余人。

△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周刊被国民党西安当局迫令停刊。

12月2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发奎为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　重庆五万民众集会纪念云南护国起义二十三周年，抗敌后援会委员郭一予主席，通过建议以“一二二五”为民族复兴节等三项提案。会后火炬游行。

△　中国文化服务社成立。该社由国民党中宣部发起创办，王世杰任董事长，刘百闵任社长，程希孟任总编辑，总社设重庆，各地分支社共616个。

△　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修正通过会章，推定孙科为会长，邵力子、陈立夫为副会长，蔡元培、于右任、冯玉祥、颜惠庆、潘友新（苏联大使）为名誉会长。

△　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盛家伦、贺绿汀等当选为理事。

△　汪精卫自河内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宣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

12月26日　蒋介石在重庆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发表长篇演说驳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并对汪精卫离渝有所解释，略谓：汪精卫"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系"。

△　国民政府分布《建筑法》，凡五章47条，规定该法适用于市、已辟之商埠、省会、聚居人口在10万以上者及其他经国民政府定为应施行该法之区域。上述地区外之有公有建筑造价逾3000元者亦适用。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冀南南宫与河北省府主席鹿钟麟会谈，争取其团结抗日。

△　英、美驻日大使分别访问日外务大臣有田。英大使克莱琪就日本歧视在华外侨一事提出交涉；美大使格鲁抗议日本摧残美侨在华财产。

12月27日　陈诚在渝发表广播演说，批驳近卫22日声明，并告全国国民，时至今日，"根本谈不上和战，更不必计较成败利钝"，当加强抗战力量，提前完成最后的胜利。

△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对记者谈话，略谓：目前武汉、九

江日军无进犯之力，士气颓丧；我军将士精神奋发，抱必胜信念，如敌来犯，“某当躬率百万雄师与敌决死，誓以血肉保卫国土”。

△　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潞城县北村。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彭明治第六八五团到达山东微山湖西地区，改称苏鲁豫支队。29日，在苏北丰县崔庄、韩庄一带消灭伪军王献臣部800余人。

12月28日　　王世杰致电胡适，转达蒋介石嘱托，请按下列三点恳劝汪精卫：一、请汪先生勿作反乎国策公开表示；二、请其勿与中央断绝关系；三、请其勿住港，但不妨暂赴欧。

△　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

△　财政、经济两部电令全国各海关严禁日货输入，如经查获，立予没收。

△　日本华中派遣军派该军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少将充任南京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谷川幸造大佐担任首席绥靖顾问，五十岚翠中佐担任内政顾问。日本共派27名顾问控制该伪政权的一切事务。

△　伪天津商会会长兼华北盐运使王行林被刺毙命。

△　汪精卫从河内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接受近卫声明三原则，与日本恢复“和平”。

△　缅甸政府声明，不干涉军火取道缅甸输入中国。

12月29日　　汪精卫在河内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叛国“艳（29日）电”，诡称日本首相近卫22日对华第三次声明，“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

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要求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按：“艳电”由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通过林柏生发表于31日的香港《南华日报》。

△　日军千余自冀南邢台及其以西山区扫荡，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张贤约部先遣支队击退。

△　日机27架狂炸桂林，投弹百余枚，全城大火，毁房1500余栋，难民万余人无家可归。

△　伪满洲国致牒苏联政府，要求从速移交中东铁路。

△　日本在上海组织“华中水产株式会社”，资本30万元。

12月30日　　中国复兴公司董事陈光甫、世界贸易公司总经理席德懋在纽约与美方代表签订中美购售桐油合同，规定五年内售给美国桐油22万吨。

△　八路军总部任命倪志亮为晋冀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副司令员。

△　中苏文化协会召开理事会，加推宋庆龄为名誉会长，推定梁寒操、吴玉章等25人为常务理事，并议决筹办中苏文化学院。

△　新任驻瑞典公使兼任驻挪威公使谢维麟向瑞典国王巨斯达夫五世呈递国书。

△　美国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声明《九国公约》不可废止，要求日本政府遵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并谓：美国在华利益如遭妨害，决不予同意。

12月31日　　周恩来接受张群邀请，同张群、黄炎培、张君劢、

梁漱溟等共同讨论抗战动员问题。提出动员组织的原则是：统一领导，统一计划，联合组织，分工合作。

△　何香凝在香港著文驳斥汪精卫“艳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之党籍。在香港之参政员张一麐、胡景伊、陶行知等联名电蒋介石、林森，请除汪精卫各职。

△　陶百川在《血路》第十四期发表《日本极欲罢战媾和》一文，提出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为条件的议和主张。

△　上海海关报告：1938年对外贸易，进口8.8619亿余元，出口7.6264亿余元。入超1.1355亿元。

△　日本大本营公布：自战事开始至是日，日本陆、海军飞机损失710架，不堪使用者300架。

是月　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经衡阳、桂林到达重庆，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

△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谭震林任政委。

△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拟定《推进陕甘宁边境党务办法》，将陕甘宁边区诬为“恶势力盘踞”，划分为四个“督导区”，由国民党中央派人进行“秘密调查分化”工作，以“根绝恶势之存在”，并规定各反共组织的组成及经费等事项。

△　资源委员会令设甘肃油矿筹备处，以严爽为处长，选定玉门县老君庙进行探勘。次年4月开始钻井出油。

△　伪满洲国加入德、意、日三国所订立之《防共协定》。

1938年是年　　本年度国家普通岁出入总预算及追加数各为

12.93588753亿元。

△　本年度国库收入（因改历年制仅以7月至12月为一年度）总计11.8056085785亿元；支出总额为11.6895231404亿元。

△　国民政府设立之移垦区计有：陕西黄龙垦区移民一万余人，垦地200万余亩，经费11.1万元；江西吉安垦区移民1300人，垦地4000余亩，经费7.35万元；福建崇安、泰宁、建宁三垦区，移民3000余人；河南邓县垦区，计划移黄河灾民5000余人，经费10万元；湖南沅陵垦区移民1000人，经费8.6万元；四川平武北川垦区移民2000人，经费9.8万元；西康西昌垦区正筹办中。

△　广东省惠阳、宝安、琼崖抗日游击纵队相继成立，分别由曾生、冯白驹等任队长。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1月

1月1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1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国民政府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对民族叛徒、厕身傀儡、潜作汉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为国人所共弃者，责成军事委员会切实查明，按照《惩治汉奸条例》严缉惩办。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就汪精卫“艳电”发表联合声明及对内指示，指出：“艳电”只代表极少数意志薄弱、甘心为敌利用者之怯懦卑劣心理，对整个抗战前途决无任何影响。汪“虽未必甘心媚日，附和汉奸，而客观上显属投降敌人，出卖祖国，在吾党革命历史上，将永为最大之污点”。

△　国民政府颁布授勋令，授予陈辉德、陈行、叶琢堂、钱永铭、周寿臣、宋子良等10余人及部分友邦人士各种采玉勋章。

△　国民政府公布《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军属条例》。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南行营主任白崇禧在桂林发表《元旦告军民书》，指出：要由军事抗战到政治抗战，由军事动员到全民动员，以最大努力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运用民众。

△　西康省政府成立，省府主席刘文辉宣誓就职。

△　鄂东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湖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程汝怀兼总指挥，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兼副总指挥。

△　皖南我军游击队攻克繁昌。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实施破击，共破毁铁路三公里、桥梁二座，颠覆火车四列、装甲车二辆。

△　日军攻占黄河沿岸之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等地，随后准备渡过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一部以猛烈火力阻击，给渡河日军以杀伤，迫敌于4日、5日向原防撤退。

△　日机七架空袭延安，投弹20余枚。

△　汉奸周作人在北平遇刺。

△　日方因汉奸王竹林在天津法租界遇刺，宣布自本日起封锁天津法租界。

1月2日　　蒋介石致电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告知中央对汪精卫案处置之经过，希勉所部洞察奸人阴谋，坚守国策。

△　周恩来在重庆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汪精卫在其政治生涯中，时常改变趋向，于时势辣手时辄叛卖其友。“汪第一次对日媾和运动，见于去年十月广州失守后，汉口沦陷前。当时汪已表示准备对日媾和”。“其实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力量”。

△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社论批判汪精卫之流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

△　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胡愈之、史良、张仲实、王炳

南、沈兹九、沙千里等20人发表声讨汪精卫通电，并指出今后凡属言论妥协动摇倾向之分子，均应随时揭发，严加制裁，以巩固革命阵营。

△ 东北救亡总会通电声讨汪精卫，指出汪精卫叛党叛国，党纪之外，应绳之以法。其他妥协动摇分子，亦应予以有效制裁。

△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发表讨汪声明。

△ 香港群众愤怒声讨汪精卫，汪之机关报《南华日报》几被示威者捣毁。香港救亡团体等联名通电讨汪。

△ 鲁南保安团队克复蒙阴县城。

△ 康、藏间数十年久悬未决之大金寺案获得解决。西康省代表章镇中、范昌元，藏方代表汪清代本、汪廷选是日在德格县签订和解条约。

△ 美国照会日本政府，不承认其所谓“东亚新秩序”。

1月3日 行政院长孔祥熙发表谈话，指斥日本近卫声明之阴谋，为遂其吞噬我国之祸心。

△ 陈诚、顾祝同、薛岳、商震、罗卓英、龙云、杨森等将领联名通电，拥护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 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叶楚伧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凌云为第六十七军军长。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改组，蒋鼎文为主任委员，郭紫峻兼书记长。

△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派津浦纵队赵云祥部进占河北枣强，

将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战委会赶出县城。

△ 日方组织扬子江轮船公司，备轮16艘专驶长江，独占沦陷区长江航业。

△ 加拿大、菲律宾两国政府密令商人停止向日本运送军火。

△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毕德门宣称：美国要求保持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如日本拒绝，则美国政府应完全禁止日货输入。

1月4日 国民政府宣布：因战事关系，闽、皖、豫、甘、粤等15省临时参议会展缓两月成立，川省展缓至4月成立，康省本月成立，苏、察二省展缓。

△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等致电中央，应通令全国严缉汪精卫。

△ 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在重庆联名发表声讨汪精卫宣言，并呼吁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同心协力，增强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 全国文艺界在重庆集会，欢迎郭沫若、胡风等，并发起开展讨汪肃奸运动。

△ 杜重远自重庆飞往迪化，就任新疆大学校长。

△ 江南抗日义勇军克复江苏扬中县城。

△ 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组织新阁。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宣称：“敌阁改组显示其政府侵华政策愈趋急进，平沼将坚持反华政策，加紧军事行动，企图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事。中国已充分准备应付新发展之任何结果。”

△ 美国总统罗斯福斥责日本侵略行为，宣称将修改《中立

法》。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

△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党对目前整体的方针是拥蒋反汪。会议还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定名为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

△　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电请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张发奎、余汉谋等亦在前线通电拥护开除汪精卫，要求国民政府将汪通缉归案，并提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

△　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命令各级党政机关长官，率先送子弟参加兵役，踊跃从戎。

△　军事委员会密电通令，严禁各地文化团体举行拥护国策示威游行。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代第八十五军副军长。

△　日本平沼骐一郎新阁组成，板垣征四郎留任陆相，有田八郎留任外相，木户幸一任内相，石渡庄太郎任藏相，米内光政任海相，近卫改任枢密院议长兼内阁无任所大臣。

1月6日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暨省府全体委员通电，指斥汪精卫媚敌求和，罪迹昭著，请下令通缉。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陕北设榆林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并决定在陕北设榆林、绥德两党务工作督导团。

△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攻克广东增城，续攻石龙、东莞、新塘等

地。

△　豫东鹿邑县长魏某率部收复县城。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在河北定县东十里处伏击日军汽车13辆、坦克两辆，毙敌50余人。

△　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在安徽当涂博望镇附近袭击“扫荡”日军，毙敌20余人。

△　日本平沼骐一郎新内阁发表声明，承认日本前途荆棘满布，表示继续执行侵华政策。

△　英国当局商讨对日经济报复，英报主张联美制日。

1月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卢汉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　孙科在重庆招待文化界人士，发表中苏关系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称：“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非常公开，就是英、美、法、苏的路线，是和平国家的路线。”

△　第二战区一部在晋西反击日军第二十、第一〇八师团“扫荡”获胜，本日攻克大宁，次日克吉县。至10日，相继攻克蒲县、乡宁，日军退据河津。

△　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伏击由苏南水阳折返宣城之日军，收复水阳。

△　日军第十师团主力与第二十七、第一一〇、第一二四师团及伪军共三万余人，开始对冀南地区进行“扫荡”。是日，侵占平乡县城。

△　日机24架空袭宜昌，旋复分两批轰炸重庆。

△　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发言人高岛在东京对记者谈话称：“中国事件已进入长期战争阶段，日本现正开始于百年战争。”

△　法国政府允在越境代我运货，并帮助订购军火。

1月8日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攻克广东三水东北之杨梅墟。

△　第二战区一部克复晋西吉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第二支队一部袭击邢台以西皇寺镇，毙伤敌7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为争取第十军石友三部团结抗战，派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到河北南宫与石会谈。

△　新四军第二支队在苏南江宁县横山地区，粉碎日军500余人的进攻，毙伤敌50余人，并乘胜解除了陶吴伪绥靖队70余人的武装。

△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第二次声明，同时发表其1938年12月29日《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信》，再次鼓吹与日本直接讲和。

1月9日　国民政府令各省组织垦荒委员会办理规划垦区、确定开垦计划、招徕垦民、保卫垦区等各项工作。

△　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为副司令长官，商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为前敌总司令。

△　广东省第四区游击司令蒋光鼐辞职，遗缺由李章达继任。

△　第四战区所部袭入广州市郊，攻克石牌车站。

△　江苏省崇明县县长陈庚尧率部与日军作战三昼夜，本日晨攻克启东。

△　苏南我军攻克溧阳，并破坏溧阳、句容公路。

△　日军侵占河北晋县。

1月1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沛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　第二战区一部克复晋西蒲县、乡宁。

△　空军轰炸广东虎门要塞，毁日军高射炮阵地及停泊珠江口日舰二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许世友率徐深吉第七七一团，袭击日军在鲁西北据点高唐县城，毙日伪军100多人。

△　日机11架轰炸重庆。

△　日军公布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司令官陆军大将杉山下辖驻蒙军、第一军、第十二军、直辖部队及飞行第六十四、二十七、九十战队等。

△　冀南行政公署在河北广宗县召开冀南行政座谈会，讨论建立民意机关，通过《冀南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大纲》。

△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

△　《中爱（爱沙尼亚）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

△　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斯默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谈话，透露其使命称：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地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

1月11日　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分部分战区：河南及皖北为第一战区，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浙江、福建及苏南、皖南、赣东为第三战

区，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皖西、鄂北、豫南为第五战区，李宗仁为司令长官；山东及苏北一部分为鲁苏战区，于学忠为总司令，韩德勤为副总司令。同日，命令八路军第一一五、第一二九师归第二战区建制；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

△　军事委员会任命叶肇为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董宋珩为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郭勋祺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郭忏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关麟徵兼第三十七军军长，宋肯堂为第三十二军军长、傅立平为副军长，安恩溥为第六十军副军长。

△　我军经激战力克豫东柳林集，歼敌300多人。

△　日机18架空袭桂林，投弹100余枚，居民死八人，伤50余人。

△　盘据湖北新洲城日军至潘河乡搜索一抗日游击队长，未获，杀害村民21人，烧民房20余间。

△　汉口法租界当局逮捕中国居民27名，据称与汉口反日运动有关。经讯问后，17人被释，其余10人被拘押。日方要求法方将该10人引渡，法方表示若日方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确有反日行为，则不予引渡。日方为此宣布继续封锁法租界。

△　中、菲当局成立协定，允许中国难民在中日战争期间前往菲境居住。

1月12日　粤境我军攻克石龙，围攻东莞。

△　第二战区所部续克山西离石、中阳等地。

△　我军马德五部于苏北淮阴以西之大于集大捷，歼敌900余人。

△　国民党中央党部密函重庆市党部派员打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

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控制和破坏。

△　日机27架轰炸衡阳、株洲。其中以衡阳遭受轰炸最惨，居民死伤200人以上，生命财产之损失为该市历次受空袭时所未有。

△　中国向美国贝伦飞机公司定购新式轰炸机200架。

1月13日　毛泽东、王稼祥复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并告朱德、彭德怀，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　第二战区所部攻克山西稷山，进迫新绛。

△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海南岛。

1月14日　国民政府任命石友三为察哈尔省府主席，原任刘汝明免职。

△　军事委员会任命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副司令长官，蒋鼎文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兼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杜聿明代新编第十一军军长，彭杰如为第十四军副军长，田温其为第六十八军副军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再次与鹿钟麟会谈。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袭击河南武安伯延镇，毙伤敌200余人。

△　南洋华侨270余人乘一艘英轮回国，在汕头口外遭二艘日军潜艇拦截，乘客200余人被杀害，仅20余人生还。轮船主亦受重伤，所载货物被劫一空。

△　美、英、法三国政府共同发表对日声明，否认所谓“东亚新秩序”。

△　英国政府照会日本政府，要求解释关于取消各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租界等远东新政策，并重申英仍主张中国“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

△　国民党中委陶百川在CC刊物《血路》第四十期发表文章攻击讨汪运动，指责某些人阴谋乘机扩大反汪运动“来打击中国国民党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的同志”。

1月15日　财政部发表通告，宣称因日军扣留关税，不能按期偿付以关税担保之债务。同日，财政部发言人就上述通告招待外籍记者，透露关税担保之债务总额等于国币25亿元，其中外币借款约六亿元，庚子赔款约一亿元，国币借款约18亿元。3月26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宣布：以盐税担保之债务亦不能按期偿付。

△　沙克都尔札布、荣祥、白海凤等蒙古王公，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斥汪为党国罪人，全民公敌，要求从严惩处。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重庆招待记者谈第二期抗战战略，指出今后战事用正规军固守要点，巩固国家政权根据地；在敌人后方以游击战为主，着重摧毁伪组织，肃清汉奸，以及动摇伪军为其任务。

△　张治中致电行政院，请辞湖南省府主席职。

△　行政院拨款500万元设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并于西北、西南、东南及华中四区各设办事处，办理工业恢复与发展事宜。

△　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在延安出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指出：八路军在一年半抗战中，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

创建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

△　日机27架空袭重庆，投弹58枚，毁房20余栋，居民死伤200余人。

1月16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布反“扫荡”命令。同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与石友三会谈。

△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另设办事处于桂林，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工作。

△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任命宋任穷为冀南军区司令员，王宏坤为副司令员。

△　鄂赣边游击队攻克崇阳。

△　我军克复绥西萨拉齐县。

△　日伪军千余侵占山东省掖县，至下旬分批屠杀城内居民和军政人员440余人。

△　国联行政院常会在日内瓦开幕，讨论中日争端等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郭泰祺出席。17日，顾维钧在大会发言，吁请各国对日禁运并从经济上援助中国。19日，国联决议，由远东局势直接有关之会员国协商个别援华。

△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发表声明，宣布伪满参加德、意、日三国所谓《防共协定》。

1月17日　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幕词，指出：“参议会的任务是：（一）发扬抗日民主精神；（二）推动抗战动员工作；（三）负起责任，坚定信心，为独

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开辟一条康庄大道。”毛泽东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2月4日，选举高岗任边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即宣告闭幕。

△ 湖南省政府改组，薛岳代张治中任省府主席。

△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改组，龙云为主任委员，陇体要为书记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薛岳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职务），关麟徵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财政部核定《收兑金银通则》，凡26条。

△ 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玄同在北平病逝。7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新四军第一支队在江苏丹阳东南昌城附近，击溃日军100余人，击毙30余人。

△ 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汉奸林柏生在香港被刺受伤。

△ 日本首相平沼对重庆进行诱降演说，称：“国民党政府方面，若有巨眼人士要与帝国合作，而成为更生中国之基石，则将欢迎之，共同从事东亚新秩序之建设。”

1月18日 山东省夏津县县长李桂岭于敌犯县城时，率队警抗战，以身殉国，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八路军晋察冀部队一部袭击易县塘湖之敌，毙伤敌100余人。

△ 日机30余架轰炸西安，死伤居民200余人，毁民房300余间。

△ 侵占湖北新洲的两名日军追逐一妇女至乡下，被群众打死。

日军百余人分三路直扑林家大湾，抓捕160多名百姓，加以杀害。

△　伪满设立产业开发委员会。

1月19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要求各地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尽力协助推行兵役，开发地方资源。

△　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公布抗战以来侨胞捐款情况：捐款总额逾1亿元，其中以马来半岛最多，个人以胡文虎最多。

△　军事委员会任命香翰屏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一部袭击河北磁县彭城镇，毙伤敌100余人。

△　日机11架轰炸陕西宝鸡，投弹58枚，死伤147人。同日，日机三架轰炸广东和平县城，死伤45人，毁房159间。

△　日本大本营发出进攻海南岛指令。决定作战兵力，分别以陆军饭田支队及海军第五舰队为基干部队，行动时间为2月中旬。

△　法国照会日本，不容片面废除《九国公约》。

1月20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汪精卫业经撤职，决议推蒋介石任国民参政会议长。

△　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关于统一国共两党的意见。周恩来表示“不可能”，并要蒋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摩擦反共捕人事。蒋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事再电延安。

△　国民政府特派驻英大使郭泰祺为出席航空燃料及油类免税事项国际会议全权代表。同日，明令嘉奖巴黎华侨古玩商卢静斋，表彰卢以其在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展出之六朝石佛赠与政府。

△　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撰写序言，阐述了中国抗战的性质、抗战的必然规律、抗战与外援的辩证关系。

△　军事委员会任命庞炳勋、刘汝明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沈克为第四十军副军长。

△　第二战区所部攻克山西翼城。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袭入河北巨鹿县城，毙伤敌100余人。

△　日军陆战队300余人在海南岛乐会登陆被击退。

△　汪精卫派高宗武自河内到香港，策划卖国活动。

△　日本内阁会议提出本年度预算总额90亿日元，其中55亿日元为侵华战费。

△　国联行政院通过对华决议，但内容空疏。

△　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等组织“不助日为虐之美国委员会”。

△　美国加州海港货轮二艘拟载废铁运日，华侨群众3000余人结队游行抗议，码头工人亦拒绝装运。

1月中旬　　日军包围山西省乡宁县仅有七户51人的柏木村，用毒气等杀害44人，四户绝门。

1月**21**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到中央执监委员155人。推举王法勤、丁惟汾、居正、于右任、冯玉祥等11人为主席团。朱家骅为秘书长。蒋介石致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表示“一定要持久抗战到底”。确定了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内外方针。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南省政府，任薛岳、陶履谦、杨绵仲、

朱经农、余籍传、李扬敬、谭道源、仇鳌、刘兴为省府委员，薛岳兼省府主席，陶、杨、朱、余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陕西省政府，任王德溥、朱镜宙、王捷三、孙绍宗、杜斌丞、周伯敏、刘治洲、张炯为省府委员，王、朱、王、孙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

△　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转报苏籍顾问关于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对华政策情报称：莫斯科所得日军对华方案：一、停止进攻，以准备对俄战争；二、继续进攻，消耗中国兵力，使之不能反攻；三、准备长期作战，占领全中国。

△　董必武、黄炎培、曾琦等出席在渝参政会茶话会，并被推举起草欢迎蒋介石兼任参政会议长电文。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兴中为第九十六军军长、王根僧为副军长，赵寿山为第三十八军军长，陈公侠为第六十四军副军长。

△　蒋介石令各省政府，严禁适龄壮丁假借公务员名义规避兵役。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于本日至26日，在河北东光县灯明寺连续袭击、伏击日伪军，共歼敌4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等部，于和顺、辽县地区抗击日军“扫荡”。26日，在辽县寒王阻击战中，毙敌200余人。28至29日，在辽县林业粟城地区，歼敌200余人。至2月1日，共歼敌1000余人，并收复辽县县城。

△　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奇袭日军芜湖机场外围官陡门伪军据点，全歼伪军300余人。

△　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在国会演说，表示日本“无意在经济或文化上排斥第三国，希望彼能理解日本真意，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外相有田八郎要求英、美承认日本在东亚优越地位，并抨击法、苏援华。

1月2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碞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浙江富阳、余杭。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于盐山县韩家集伏击日军，歼敌100余人。

△　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等部集中约三个步兵大队，配以伪军3000人，向山西和顺、辽县地区“扫荡”，企图占领和辽公路。次日，陷和顺。29日，陷辽县。

△　伪蒙古自治军于志谦部第四团反正，击毙日军指挥官一名后，退向绥远固阳县东。

1月23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秘密报告，指出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智、仁、勇，党基就是党魂、党德、党史、党纪四要素。宣称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

△　交通部设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派宋子良为主任委员。同日，部令公布《交通部监理木船运输章程》，凡11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汉域为第二十军军长。

△　第二战区所部越汾河，攻克同蒲路中段赵城。

△　我军收复苏北窑湾、曹家庙等地，俘敌200余人，击毙百七八十人。

△　空军袭击涠洲岛，炸伤日军舰三艘。

△　美国运9000吨小麦到上海，救济中国难民。

1月24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严整抗战阵容，密切军民联系，刷新政治，发展民运，以巩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基础。

△　第二战区所部攻克山西绛县。同日，苏鲁战区所部攻克苏北宿迁。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东进纵队各一部袭击由河北宁晋出犯大杨庄日军，毙敌60余人。同日，第一二九师另一部在河北永年县战斗中毙日军队长一人，士兵60余人。

△　晋南中条山我军击退犯黄龙岭之日军，歼敌六七百人。

△　新四军一部袭击京沪铁路下蜀车站，歼敌数十人，破坏铁道数十处。

△　日机九架空袭洛阳，一架被击落。

△　中英两国就开辟中缅新航线达成协议，是日在重庆换文。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并指出摩擦现象最近尤甚，不应任其发展，致陷国家民族于不利。

△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发表《告广东各界同胞书》，呼吁各界同胞参加抗战，以保持独立主权，收复既失领土，湔雪奇耻大辱。

△　经济部公布《川康铜业管理规则》，并由资源委员会成立川康铜业管理处，管理及收购铜。同日，公布《经济部汞业管理规

则》。

△　国民政府令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本职。

△　军事委员会任命俞济时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刘尚志为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参观胡厥文等开办的合作五金厂。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到达河北省河间县惠伯口地区，与冀中军区部队会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向黄敬、吕正操等冀中领导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商谈部队行动问题。

△　第五战区所部攻克湖北京山，并绕攻皂市。

△　日机18架空袭洛阳，投弹数十枚，商店平民遭炸者不可数计，为洛遭空袭以来最惨重之情况。

1月26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外交方针与国策。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魁元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夏威兼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为副军长。

△　日军犯中条山西玉泉寺等地，守军团长李家骥负伤，自戕殉职。

△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2所大学校长，联名电谢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并希望美继续采取行动使侵略者屈膝。

△　杭州伪市长何瓒遇刺毙命。

1月27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这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

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公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

△　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汤化平组织的广州区游击别动队，狙击伪广州市公安局长练演生，将练当场击毙。

△　山西吉县西郑圯村民众，在山顶以砖、石击伤进犯该村之日军数人，日军冲上山顶，将民众20余人杀害。青年妇女为敌所掳后不甘受辱，亦惨遭杀害。

△　伪西北边防自治军骑兵第二师师长萧进堂等，率部2000余人在绥远固阳县西反正。

△　法国、瑞士、荷兰、英国、美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和地区共产党发出号召，呼吁援助中国、西班牙等国，反抗德、意、日侵略势力。

1月28日　　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宜昌、长沙、南昌、桂林、西安、兰州、上海等地，分别集会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周年。

△　行政院核准施行《取缔敌伪钞票办法》。

△　财政部分电施行《吸收侨汇合作原则》、《银行在国外设立分行吸收侨汇统一办法》。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陶广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伏击由河北献县开往大城日军，毙敌百余，毁汽车20余辆。

△　大青山游击队一部在绥远陶林附近进击伪军萧顺义、夏军川部，俘百余人，解救被掳妇女200余人。

△　日机五架空袭河南陕县会兴镇，被当地驻军以机枪击中一

架，坠落山西平陆，日空军上尉山田清野、驾驶员大森清藏被俘。

△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伦敦举行。27日，蒋介石致电祝贺，并谢支持抗日。

1月29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整顿党务要点，提出在最近半年中必须“增加有组织有训练的党员，至少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五分之一”。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一部在粟城镇与日军交战，毙伤敌百余人，敌被迫退回辽县。

1月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推叶楚伧为中宣部部长。此外，又秘密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基本方针。会后秘密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陆续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秘密文件。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订《各地战时服务团体管理取缔办法》，规定凡限期未立案者一律停止活动；凡有宣传违反“国策”之言论行为者应即予取缔或惩处。

△　社会部拟订《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决定限期举行文化团体登记。

△　吴佩孚在北平会见记者，坚拒日本威胁利诱为傀儡。

△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华盛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

△　日军陷湖北天门、豫北阳武。

△　汉奸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温宗尧、朱深、陈群等，在北平发起组织伪和平救国会。

△ 伪满公布《劳动统制法施行规则》。

1月31日 大青山骑兵支队一部在绥远武川县土城子消灭土匪康德胜部，俘80余人，解救被掳妇女百余人。

△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就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向社会部密报，需切实防范。

△ 日机“天皇号”在湖北沙洋镇被当地驻军击落，乘员陆航空兵大佐渡边广太郎、少佐藤田雄藏等六人毙命。

△ “满铁”将兴中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华北开发公司。

是月 国民政府确定军务费预算，自本月起每月约3000余万元，国防建设费每月约2000余万元，战务费每月约5000余万元，共计一亿元以上。

△ 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访问阿拉伯、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九国后，返抵重庆。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彭真为书记。

△ 周恩来领导建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 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向豫鄂边之四望山、应山、京山地区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 中央社本月起发行英文《中国半月刊》，任玲逊主编。

△ 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推行《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分三期施行“肃正作战”。

2月

2月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结束，另设委员长成都行营和西昌行营。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工会议召开，讨论执行五中全会及南岳军事会议政训工作决议，于13日结束。

△　中国边事协进会在成都成立，白瑞等为理事。

△　我军克复晋东辽县。

△　广州区游击别动队在广州市郊袭击日军，救出被掳妇女多人。别动队员50多人潜入白云山麓，图炸日军天河机场未遂，刺死卫兵二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各一部在反“扫荡”中，于曲周县古城营、后旧店、燕张葛等地抗击日军进犯，毙伤敌100余人，毁汽车两辆。

△　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攻克苏北邳县以西宿羊山伪军据点，全歼伪军一个中队。

△　八路军前方总部编辑的《前线》半月刊在延安复刊。

△　成都市8000多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车主增加车租全体罢工，并派代表向市政府请愿。

△　日方通告各国领事，限江西牯岭外侨于本月10日前撤退。牯岭外侨计有英籍37人，美籍12人，德籍九人，其他国九人。

△　汪精卫私人代表高宗武从香港抵河内，向汪报告在港活动情况，并密商组织伪中央政府办法。汪精卫提出：一、如果日本和蒋介石妥协，他将努力协助；二、如果由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等组织中央政府，他将以在野地位加以协助；三、如果由他收拾时局，则要

求：（一）由他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重新建军，组编12个师的军队；（二）在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昌时，他将再次发表声明，宣布由他组织政府，担当与日本实现和平的负责人，并号召西南将领通电响应；（三）以10月10日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并取消“临时”、“维新”两政权；（四）与日本协商借款二亿元；在此之前，日本每月供给活动费300万元。4日，高宗武携带汪致近卫函件赴日，21日抵长崎，旋即赴东京与平沼、有田会谈。

2月2日　　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讲话指出：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的大会。

△　陈诚在重庆招待记者谈扩大兵役动员称：兵役动员重在宣传，而宣传重在下乡。

△　冀南我军收复威县。

△　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于宛平县东、西斋堂和上、下清水地区，抗击日伪军2000余人五路合击。经一周作战，毙伤敌2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一部在反敌第三次围攻中，于河间县曹家庄附近袭击日伪军。战至3日，共歼敌150余人。

△　八路军独立第二支队收复河北任丘县城。

2月3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并转项英：叶挺抵渝已见蒋，表示回新四军工作。我准备和叶挺同往新四军。

△　四川资阳县3000多农民为反对拉丁抽税举行武装示威，全县18个联保主任被杀死17个。县长派保安队镇压，死伤700多人。

△　伪满发行第二次华兴债券1000万元。

2月4日　蒋介石以新四军袭击敌军“成果甚大”，致电嘉奖。

△　财政部规定取缔日伪钞票办法八条，通行全国军政各机关依照办理。

△　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因公离省，由省民政厅长严立三代行职务。

△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辞职，由黄季陆继任。

△　中华工商协进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孔祥熙、翁文灏、张道藩、黄中及会员400多人出席。孔祥熙讲话指出，该会任务是：一、谋工商业的改进及健全各机构；二、调整工商、技术、金融各界意见；三、协助工商团体训练干部和人员；四、联络海外华侨协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大会选举温少鹤、蒋志澄、胡子昂、王延松等13人为理事，何北衡、康心如、洪兰友等六人为监事。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万仞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宣铁吾为副军长。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一部在反敌第三次围攻中，于河间县大曹村抗击日军进犯，歼敌300余人。至此，第一二〇师主力和冀中军区部队经旬日作战，共歼敌900余人，打破敌人这次围攻。

△　日机18架轰炸贵阳，投弹100余枚，死伤500余人。文化机关如商务、中华、世界、北新等大书局均被炸毁。难民数万露宿山区。同日，四川万县、浙江诸暨等地亦遭轰炸。

△　日军宣布封锁珠江，并限制广州汇兑。

△　天津市民致书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呼吁英政府援华抗日。

△　南京、北平伪组织所派驻日人员强占我东京使馆。

△　日本驻台湾总督府决定开辟厦门为自由港，以夺取英国在远

东以香港为中心之商业利益；并在厦门设拓殖会社，移民垦殖开矿。

2月5日　　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沂水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中共方面派代表张经武参加。沈指出：一、统一划分防线，八路军防线划在津浦路东侧之滕（县）泗（水）宁（阳）地区；二、“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统一行政，军不干政”；三、经济粮秣统筹统支。

△　中苏空军轰炸山西运城日军机场，毁日机40架。同日，又在湖北钟祥以东迫降日轰炸机一架，机师被活捉。

△　日机空袭广西宜山，迁至该地之国立浙江大学校舍被炸毁。

△　日军侵占皖南繁昌。

△　日本伪造法币，在各沦陷区内使用。

2月6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家钰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王靖国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　国民政府派戴笠为中央警校校务主任委员。

△　教育部拨款500万元救济战区各校师生。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确定政府副主席及各厅、处长人选：副主席高自立，财政厅长张慕尧（代），建设厅长刘景范，保安处长周兴，粮食局长曹胜祥，审计室主任曹力如。于8日结束。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主力于昔阳桃躯村歼日军150余人。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在豫南永城县双桥歼伪军王福来部，俘伪军参谋长以下100余人。

△　空军袭武昌，炸毁大批日军用物资。

△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作出《对南昌作战要领》，指示第十一军作好作战准备，于3月上旬开始进攻南昌。

△　日军陷河北威县。

2月7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常委为五院院长、外长、正副参谋总长及中常委三人共11人，秘书长张群。

△　行政院例会通过《非常时期保甲长待遇及奖励办法》和《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并决定方策代理河南省府主席。

△　程潜电蒋介石报告华北驻军贪污勒索、积压粮秣、浮领奖金以及谎报军情、捏构战绩等流弊，请明令改正。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为副总司令，孙楚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冯钦哉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周祥初兼第八十七军军长。

△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冀中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随后又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吕正操分任正、副总指挥，关向应任政委。

△　川、陕实业界人士在川、陕两省设立战时物产运输调整处，总处设西安，重庆设办事处，办理川省糖、盐运陕及陕省药材、棉花运川事宜。

△　延安《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改五日刊为三日刊。

△　空军轰炸粤海涠洲岛，炸伤日舰二艘。

△　日伪军分三路自徐州东犯，图扰淮海。

2月8日　　国民政府派贺国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

△　军事委员会宣布除刘文辉第五军团外，其余各军团番号一律撤销。同日，任命李默庵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飞抵重庆述职，并就任国民政府委员。15日，在国际宣传处招待中外记者，揭露日本分裂蒙旗阴谋。17日，宣誓就任国民政府委员。

△　重庆妇女团体联席会议举行妇女参政问题讨论会，邓颖超、史良、胡子婴等先后发言，一致认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妇女参政极为重要。

△　第四战区所部攻克广东宝安。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夜袭宁杭公路东湾镇日军据点，击毙日军大尉中队长以下79人，伤日军32人。

△　日军陷河北阜城、武邑、束鹿等县城。

△　日军台湾混成旅团由第五舰队护卫，从万山港启航，准备进犯海南岛。

△　印度医生安德华率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到达西安，12日抵延安。

△　中美桐油借款合同在华盛顿签字，总额为2800万美元。

2月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壮怀为第九十四军军长。

△　空军轰炸芜湖日舰，一机负伤后俯冲日舰，舰、机同归于尽。

△　甘地、尼赫鲁、泰戈尔在印度马德拉斯举行的世界教会会议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中国抗战，愿以物资援华。

2月10日　日军登陆海南岛，陷海口。随后，又占领定安、清澜港。守军退守五指山。

△　军事委员会任命夏守勋为第七十八军军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各一部，于曲周县香城固地区伏击日军，歼敌200余人，毁汽车八辆。同日，第一二〇师一部在河北武强县唐旺地区，歼敌150余人。

△　广东省政府发行省短期金库券，定额国币480万元。

2月上旬　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

△　丹阳游击纵队进驻扬中县，控制了向北发展的“跳板”。

2月11日　蒋介石就日军登陆海南岛对外籍记者发表谈话称：“日军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烈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

△　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因公离省，由民政厅长方策代行职务。

△　国民党情报人员韩振声向中央党部密报“八路军在河北民运方面活动情形”称：八路军到达河北后即在各县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其中之组织部、武装部最为重要，各县此种部长几全为共产党员所担任，掌实际民运权”。该组织“任务：（一）积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二）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

活”。“实际八路军借此领导群众，发挥力量，代替政权，现该会俨如太上政府”。

△　我军克复皖南繁昌。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袭击满城县城之日伪军，毙敌300余人。另一部击溃驻绥远凉城厂汉营敌200余人，毙50余人。

2月12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秘书长王世杰代读林森训词，胡元倓代表全体参政员向新任议长蒋介石致欢迎词。

△　日机29架空袭兰州，中苏空军与之展开激战，日机被击落七架。

2月13日　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孔祥熙、何应钦分别作的政治、军事、外交报告。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克复河北省饶阳、肃宁。

△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就日军登陆海南岛电总会，指出日本控制世界之野心将难以遏止，有关各国必须共同起来制裁。

△　英、法驻日大使克莱琪、安利各奉本国政府命令，就日军侵占海南岛后英、法在华利益问题，向日外务省提出交涉。

△　我驻日使馆产业，被北平、南京两伪组织非法占据。

2月14日　第三次国民参政会继续举行全体会议，是日至次日听取何键、翁文灏、顾毓琇、孔祥熙、张嘉璈分别作内政、经济、教育、财政、交通报告。

△　国民政府派张笃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

△　军事委员会任命焦其凤为第二十六军副军长。

△　豫南我军反攻，先后克复潢川、商城、固始、光山、罗山、经扶等县。

△　日军在三亚港登陆，三亚、榆林、崖县均被侵占。尔后，日军南北对进，侵占海南全岛。

△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举行招待会，副会长邵力子及陈诚、周恩来等先后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日寇已为全世界之公敌，号召加强团结，一致御侮。

△　延安举行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晚会，毛泽东等出席。

△　伪满洲国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签订五年产业计划之《劳动力调整协定》。

△　美国国会通过《太平洋设防案》。

2月15日　　国共两党有关方面共同筹办之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训练班”）在南岳开学。至1940年3月共举办三期，参加受训军官达3000余人。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为第十三军副军长。

△　周恩来离渝赴江南各地视察工作，叶挺同行。16日，在桂林出席白崇禧主持的军训部成立周年会。

△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萧劲光就陕西栒邑保安队殴辱八路军3000余伤病员事致电蒋介石，要求查办。

△　日军在河北隆尧县北阎庄杀害民众128人，其中10户被杀绝。

△　日机袭长沙，被击落八架。

2月16日　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始讨论提案，由褚辅成等24人、王卓然等25人、林祖涵等21人分别提出之拥护政府抗战国策案于19日议决合并讨论。

△　毛泽东应苏联《真理报》之约，为苏联红军建立二十一周年纪念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一文。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山东平阴县东南与日军激战获胜，毙日宪兵司令山吉等官兵百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收复河北枣强县城。

2月17日　国民政府发布重申严禁贪污令。

△　军事委员会任命田镇南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代第五军军长。

△　新四军第一支队夜袭延陵镇日军据点，全歼日军川野中队一个小队和伪军百余人。

△　新四军第二支队在苏南句容县郭庄庙镇伏击日伪军，击毙日军18人，全歼伪军一个中队。

△　日军侵占广东花县。

△　山东掖县伪军赵保元部2000余人反正。

△　顾维钧在国联理事会演说，吁请制裁日本；我代表团并提草案，请组织委员会以施行制裁。

△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向美使提出保证，日本对海南岛无领土野心。

2月18日　蒋介石于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日发表广播讲话，勉国人策进战时生活。

△　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发出《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

△　周恩来、叶挺离开桂林赴赣北。19日，在江西吉安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日，秘密会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对江西地下党工作做指示。接着，去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新四军游击努力，致电奖励，并奖洋1000元。

△　我军克复粤南宝安、南头。

△　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在苏北邳县官湖地区粉碎日伪军1400余人的进攻，毙伤敌数十人。

△　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开幕，19日大会通过援华决议。

2月1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第五军副军长。

△　我军克复湘北羊楼洞，毙敌3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一部在河北巨鹿李河头，毙伤敌90余人。

△　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在安徽巢县柘皋镇和合肥县店埠镇（今肥东县）之间的东山口，毙伤日军150余人。

△　驻山西汾阳日军反战士兵以“东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师团及满洲军政部内派遣士兵反战同盟会”名义散发传单，号召中止战斗。

△　驻山西浮山县日军捕杀抗日分子和平民，仅北门内一水井

中，即被投入杀害40余人。

△　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上海愚园路住宅遇刺毙命。

△　纽约华侨为募集百辆救护车捐助祖国抗战，是日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参加者达万余人，会后四小时即募得美金二万余元。

2月20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次选出驻会委员25名：孔庚、喜饶嘉错、张君劢、黄炎培、陶百川、王家桢、张澜、董必武、李璜、江庸、傅斯年、沈钧儒、许德珩、秦邦宪等。

△　行政院公布《非常时期专门人才服务条例施行细则》，凡12条。

△　经济部公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凡15条。

△　第一战区所部连日在豫东太康附近毙敌1700余人，俘20余人。

△　日军在湖北中部随枣一线发动进攻，是日陷天门，后即在京山、皂市一带集结兵力，企图进犯荆（门）沙（市），切断南北交通。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等部奉命在襄河东岸部署迎敌。日军主力为第十六、第十九师团，第二十三旅团及陆续增加之各联队，总兵力约1.5万余人。张自忠指挥部队为第十九集团军三个团、第三十八师全部及第一三二师三团，会战激烈时期又陆续增加第一八〇师全部及第三十七师之第一一一旅，总兵力2.2万余人。双方经10余日激烈战斗，至3月6日因敌进迫钟祥，形势不利，张自忠部奉命撤退至洋梓镇以北高地。

△　兰州激烈空战，空军击落日机九架。23日，日机再袭兰州，被我军击落六架。3月1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兰州举行慰劳

大会，祝贺兰州两次空战胜利。

△　张荫梧策动八路军冀中独立第二支队柴恩波在河北雄县新镇叛变，接受鹿钟麟指挥。

2月21日　　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闭幕，通过《确立民主法治制度案》等提案90余件。蒋介石致闭幕词，许诺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实行彻底民主政治，但又强调“断不能忽略程序与步骤”，在抗战未结束以前，“要以军政时期的工作为主，一面积极进行训政工作”。

△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就陇东摩擦事件致电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及第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称：“庆阳、合水、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划归八路军防区。不意去年12月贵军一部忽而开入庆阳县属之白马铺、亦城镇一带，进逼敝军驻防部队，压抑当地民众运动，道路传闻指日攻击消灭八路，占领庆阳一带，群情惶惑，不可终日。近且增兵一团对敝部三八五旅取包围形式，步步进逼，如临大敌。又散发传单，并于西峰镇出版之报纸上，对敝军横加污蔑，肆意谩骂，种种行动，骇人听闻”,要求第一六五师迅速退回原防，恢复友好关系，以免酿成重大纠纷。

△　河北房山、良乡伪自卫团陈东来、白秀亭等部一万余人反正，与日军在附马庄一带激战。

△　日机轰炸湖北宜昌，毁房600余栋，死市民600余人。3月9日，日机27架再炸宜昌，毁房200余间，民众死伤多人。

△　日机轰炸香港新界等地。23日，日驻香港总领事为日机轰炸新界向香港当局道歉。

2月22日　　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孔祥熙任会长，陈立夫任副会长，宋美龄、史汀生任名誉会长。

△　日机轰炸广东金利地区，民众死伤70余人。

△　河北磁县光禄镇伪皇协军宗聚臣部500余人反正。

2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选任宋美龄为国民政府委员。

△　周恩来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向敌后发展方针；同时确定新四军战略任务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　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攻克苏北邳县城，击毙伪军30余人，俘70余人。

△　日军发出攻占修水南岸作战计划，旨在向南昌方面进攻。

2月24日　军令部第一厅刘斐、张秉钧致军令部长徐永昌等签呈，报称：现已判明日军有先行攻占南昌之企图，拟请对第三、第九战区下达要旨训令，俾其有所遵循。并提出有关作战方针的意见。何应钦阅后批“意见甚是”。25日，蒋介石批示“即指定部队制定整个部署方案为要”。

△　日军陷湖北岳口、海南岛文昌县城。同日，日第二十师团一部约4000人再犯晋南垣曲。

△　伪满洲国参加日、德、意《防共协定》，在长春签字。

2月25日　经济部公布《经济部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凡17条。规定凡民营资本总额在五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上，其实收额达50%以上者，得依本办法向经济部呈请贷款。同日，又公布《经济部管理嘉陵江、綦江、岷江、沱江各沿岸煤矿所产煤斤暂行办法》，凡16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于河北南宫西南伏击日军，毙伤敌200

余人。

△　日军命令井上支队（后改为村井支队）以一部协助第一一六师团“扫荡”鄱阳湖东岸地区要地，在打通鄱阳湖水路后，以主力协助海军打通吴城—南昌之间的水路作战。

△　日军第六师团分三个纵队向汉水一线开始进攻。

△　日机九架轰炸广东罗城，炸死100余人，伤200余人，毁房100余间。

△　瑞典援华委员会派霍尔曼医师，携带大批医疗器材启程来华。

2月26日　第一战区所部攻克豫东杞县。

△　重庆各界展开抗日献金竞赛。

△　豫北新乡日军强令汲、淇、辉等县征壮丁1.2万人，限三日内交齐。

△　国民党中宣部秘密传达《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及取缔新知、互助及生活等书店办法》，决定凡应秘密取缔之书刊，除由审委会随时呈报中央特检处转饬查扣外，所有中央图书杂志审委会原定暂不处置者以及新知、互助、生活等书店所出未经原稿审查、刊载审查证号码的图书，以及无出版时间、地点或无发行人之书刊，均属查扣范围。

△　北平伪临时政府绥靖部长齐燮元派许铁峰等密赴四川，图谋勾引川军将领投敌。

2月27日　国民政府任命高宪申为海军学校校长，原任李孟斌免职。

△　行政院公布《管理营造业规则》，凡25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膺古为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　日机五架轰炸泗阳县城，配合日军向苏北沭阳、淮阴等地进攻。

2月2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鸿逵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高荫槐为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将进犯江苏沛县之伪苏北反共军第一支队籍兴利部3000余人歼灭一部，并争取大部反正。

△　上海伪军陈安有部800余人，于调往青浦之际乘机反正。

△　日舰一艘在广东海丰附近搜劫中国渔船，将渔民投入海中，并焚毁渔船多只。

△　国民政府指令照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改名国立西北农学院。

△　驻英大使郭泰祺在利物浦谈远东局势称："中国决为国家之自由独立而抗战到底"，吁请各国给中国以物资援助。

△　高宗武等在东京与影佐祯昭会谈，决定成立以汪精卫为首之新中央政府，具体办法是：一、由汪精卫改组国民党，修改三民主义，以反共亲日为主要内容；二、汪精卫再次发表声明，断绝和国民政府之一切关系；三、日、汪发表共同声明，并签订临时秘密协定；四、预定于8月由汪成立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

2月下旬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于江苏沛县二郎、郝寨等地，连续袭击伪军，毙伤伪军1000余人，并争取1000余人反正。

是月　蒋介石密派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精卫进行游说。

△　军政部兵役司扩充为兵役署，程泽润任署长。

△　中共湖南省委成立，高文华为书记。

△　日军在江西德安，使用毒剂并发射毒气炮弹3000发，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当地军民死伤惨重。

3月

3月1日　　顾祝同电蒋介石报告江南游击区作战计划，定4月1日开始行动。江岸游动炮兵同时破坏由安徽铜陵至江西湖口间日舰运输。

△　第二战区所部攻克晋南古城。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一部，抗击日军4000余人对静乐、岚县、方山地区的围攻，于本日至2日，在阳曲县邢家社地区设伏，歼敌100余人；8日至9日，又在岚县明家庄等地歼敌300余人；10日，收复岚县、方山县城，打退了敌人围攻。同日，第三五八旅另一部，于河间县黑马张庄伏击日军，歼敌100余人。

△　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开始对山西北部实施所谓“治安肃正计划”。是日，第一〇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同时行动。5日，第一〇九师团攻占静乐。9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攻占神池。随后，又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配合下，“扫荡”盂县以北及以西地区。

△　天津小站伪军李耀华部1000余人反正，日军急调部队“追剿”，发生激战。

△　伪蒙军色登诺永布率部在绥远杭锦旗反正。

△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开幕，教育部、各省教育厅负责

人及各大学校、院长等200余人出席。4日，蒋介石到会致词，要求全国学校以“礼、义、廉、耻”四字为共同校训。会议通过高、初、中等教育改进案多项，并决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设训导处，推行训导制。于9日闭幕。

△　国民政府批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重庆市社会局为防止敌机轰炸，于3日发表《告民众书》，敦促公务人员眷属、老弱妇孺、一切不必留市区之团体、住户、商店、工厂、堆栈仓库，立即自动疏散。宣布定10日前为自动疏散期，11日后强迫疏散。

△　中共中央致电印度国民大会，感谢该会及全印人民对中国抗战之同情和援助，并告该会所派援华救护队已安抵八路军辖区，热心服务，具见印度人民对第八路军之爱护和关怀。

△　渝昆长途电话正式通话。

△　天津日军围阻英、法租界对外联络，英、法两国驻津领事向日本提出抗议。

△　“满铁”与伪满洲国共同设立满洲特殊制纸会社。

3月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澄源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刘若弼为第七十八军副军长。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于山东鱼台县谷亭镇以南与敌遭遇，毙伤敌200余人。

△　日军第二十一师团占领苏北淮阴，3日陷淮安，5日陷宝应。

△　盘据山西和顺、辽县日军在八路军和新军连日打击下，是日弃辽县，和顺日军亦于6日西撤。

△　财政部颁行《结汇货物转口出洋免征转口税通行办法》。

△　晨8时40分，英皇家航空公司中缅试航机自腊戍起飞，11时40分抵昆明。

3月3日　林森电贺巴采利红衣主教当选梵蒂冈新教皇。

△　军事委员会任命蔡廷锴为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　四川彝族代表20余人赴成都晤省主席王缵绪请缨杀敌。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一部，于河北武邑县徐沙村附近毙伤敌100余人。

△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派员搜查重庆生活书店，以未经搜查合格为由，搜去库存书籍7000余册。

△　华北伪政权宣布废用法币，并管理外汇。

△　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周隆庠在东京与日方商定《收拾时局具体办法》，要点为："复兴中华民国"，"根本消灭共产主义思想、行动及其一切组织宣传"，"建立东亚和平"；发起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及"救国反共同盟军"，协助日军管理占领区；时机成熟时，"南北组织自动宣告解散"，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高宗武等并与日方签订《中日关系调整协定》。

△　上海工部局与日方妥协，允增添日籍巡捕，以防恐怖事件。

△　香港当局发表公报称：日机轰炸香港边境所造成之损失，日方已允赔偿二万元，一切已圆满解决。

△　澳大利亚堪培拉港码头工人为援助中国抗战，拒运废铁输出日本。

3月4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审计法》，凡五章56条；《审计部组织法》，凡21条。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袭击山东郓城县樊坝伪军据点，歼敌500余人。

△　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侵占苏北海州（今连云港）。7日，占领阜宁。日军陷海州后，实行全城大搜查，把6000多居民押到南城小学广场，当即砍死17人。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允与日本共同镇压租界内之恐怖活动。

△　驻国联常任代表胡世泽照会国联秘书处，再度抗议日本空军轰炸罪行。

3月5日　　蒋介石宴请全国教育会议出席人员，并讲《军事化教育》。

△　程潜向蒋介石转报阎锡山部第二战区作战部署："（一）卫副长官指挥第四、五、十四各集团军以一部向济源前进，并截断同蒲路南段交通，以便向临汾以南同蒲路之敌攻击，并协同陈长捷部之南区军扫荡晋南三角地带之敌；（二）第十八集团军确实遮断正太路之交通，阻敌转移，并发动广大之游击战，处处与敌威胁而牵制之；（三）以上各部队务于9日以前准备完毕，其攻击开始日期定为10日。"

△　白崇禧密电蒋介石报告第三、四、九战区作战要领：第三战区方面，确实夺取一二要点（以马当为妙，次则东流、贵池亦可），阻绝沿江交通，杭、嘉、京、苏方面亦当分别进击。第四战区方面，广州外围敌工事构筑坚固，难于正面进攻，拟发动大范围活动，加强出击部队力量，对石龙方面推进攻击；对广州方面作佯攻，牵制敌兵力并窥其弱点，予以打击。第九战区方面，除牵制佯攻外，以六师编成挺进军向崇通方面侧击粤汉路北段之敌。

△　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石板丁家，阻

击伪军刘桂堂部300余人的进犯，激战竟日，歼敌大部。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队一部于高唐县琉璃寺地区抗击日军进攻，毙伤敌150余人，毁汽车六辆。

△　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击豫东商丘县坞墙伪军据点，毙伤伪军200余人，俘10余人。

△　日军第十六、第十九师团等部进犯湖北钟祥，本日晨迫近钟祥城关附近。张自忠部第三十八师、冯治安部第一三二师等部与日军激战，伤亡甚重，至次日撤出钟祥。

△　日军陷山西静乐县城。

△　山西浮山日军增至4000人，一部入侵大河口，余续东犯沁水。

△　日军“扫荡”湖北通城北港仙姑山，用机枪射杀居民50多人，烧房数百间。

△　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斯默抵重庆。10日，向林森递交国书。

3月6日　　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在重庆开幕，孔祥熙致开幕词，要求地方金融机关负起战地服务责任，中央与地方应密切合作。

△　国民政府任命程天放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　日机15架轰炸宁夏银川市区，投弹103枚，平民死伤300余人，毁房屋数百间。

3月7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驳斥日本“东亚新秩序”，指出“东亚新秩序”实是破坏中国之独立完整、打破太平洋区域之安宁秩序，和扫除欧美在远东利益的代名词。

△　鲁东我军克复招远等地。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在苏南镇江县上会、下会地区，粉碎日军的八路围攻，击毙日军56人，伤43人。

△　日机14架轰炸西安市区，投弹100余枚，死伤600余人，东大街约一公里的商业区被烧毁。

△　中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劳方代表朱学范由日内瓦抵华盛顿，向美国劳工联合会及工业组织委员会提出援华问题。

△　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发表演说，要蒋介石重新考虑反日态度，与日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如是则日本准备与之谈判中止敌对行为。

△　日本内阁决定兴亚院华北、蒙疆、华中、厦门联络部及华北联络部青岛派出所，分别负责伪临时政府、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厦门岛、伪青岛特别市公署管辖地区。

3月8日　　军事委员会部署南昌会战。是日，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毁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日期为3月15日”。并部署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12个师固守现阵地，樊崧甫指挥第八军、第七十三军四个师由武宁方面指向德安、瑞昌间，攻击敌之右侧；王陵基部两个师向武陵东北地区集结，接替第七十三军防务；杨森部两个师向武宁西北地区集结，接替第八军防务；卢汉部四个师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作战；周碞、关麟徵指挥各部不断向鄂南、湘北之敌袭击，牵制敌兵力；孔荷庞游击队破坏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庐山及各县游击队不断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第九战区接到电令后，以整补尚未完备，补给困难，请求展期。军事委员会指令攻击日期不得迟于本月24日。

△　军事委员会颁行《国民兵组织管理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以县市为单位编组国民兵团。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仪为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与重庆各妇女团体联合会发起，在重庆、成都、桂林及香港、上海等地，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　日机四度狂炸宜昌，投弹百余枚，被炸面积约占全市十分之七，房屋被毁在三分之一以上。次日，再度轰炸宜昌，又毁房屋200余间，死平民甚众。

△　英国财相西门宣布：对华借款1000万镑，作为外汇平准基金。

3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李济深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长捷为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向何应钦报告日军在河南侵占区内强抓壮丁、征款及破坏金融情形，列举邯郸、博爱、淮安、安阳等地拘押商民，掳劫幼女，毒打、枪杀民众，限令兑换伪钞，禁用法币等情。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团在山东濮阳、曹县地区成立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兼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

△　山西静乐日军1000余人进占岚县，遭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七一四团不断袭击，迫使日军于次日又撤回静乐。

△　日军第十一军决定本月20日对南昌发起攻击。作战目的在“割

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掩护其长江中下游交通，以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具体部署是：以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并集中重炮兵四个团、坦克一个团攻占南昌；以第六师团主力从修水两岸地区向武宁、三都附近攻击，阻止中国军队增援；另以第一〇一师团村井支队从鄱阳湖西北岸星子南下，在吴城登陆，打通赣江及修水之道，切断浙赣铁路。海空军协同作战。

△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侵占晋西神池。

△　日机27架轰炸宜昌，毁民房200余间，死伤多人。

△　川康建设期成会及川康建设视察团成立，李璜为团长，黄炎培为副团长。

△　郑州各界救济难民委员会具呈经济部，恳请将失业员工运至后方安排工作。

△　日本众议院通过追加侵华军费46.05亿日元。

3月10日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庆贺罗马新教皇加冕典礼专使。

△　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闭幕，通过发展经济力量、维持币制信用、便利收购物资、平衡物价涨落等决议案。

△　叶挺、项英呈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关于新四军进入江南第一年的作战报告称：新四军自去年6月进入京、镇、当、芜地区后，至今年1月底，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99次，缴获步马枪1924支，短枪95支，轻重机枪52挺，俘虏日伪军823人，毙伤日伪军3651人。

△　甘肃省政府民政厅长施奎龄为陇东事件向省府主席朱绍良签

呈称：“本厅认为对于陇东纠纷，应力使其地方化，严重化，即中央御责于本府，本府诿之于三区专署，由三区专员会同地方驻军同保安队予以抵抗。迨事态扩大，则声请中央制止。似此办理，胜则可驱逐其势力出陇东，败则有中央出头制止。”其结果必“将八路军调开陇东，共党必当俯首听命。如不服从，则中央即有词可依据制裁。可否密电军委会、行政院采纳……伏恳钧座当机立断，核定施行”。

△　浙西我军克复海盐、乍浦。

△　英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伦敦签订《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确定设立平准基金1000万英镑，“以期遏制中国法币与英镑比值之过度变动”。15日，中英平衡外汇基金委员会成立。30日，英上院通过上项外汇平准基金法案。

3月11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反对违反三民主义，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和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

△　国民政府公布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补充修正的《国民公约》（凡12条）及《国民公约》誓词。

△　国民政府将《欧亚航空邮运合同》有效期延长一年。

△　我军克复晋南浮山、晋西岚县、大武。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队一部，奔袭山东陵县刘鸭子村，毙伤日军50余人，歼伪军1000余人。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部，攻克桦甸县木箕河木场，击毙日军10人，俘伪军120人。

△　北平伪临时政府颁布《币制统制规程》，并开始在北平、天

津、青岛、烟台、威海卫等日军控制城市实施，以禁止法币流通，强迫民众使用伪联合准备银行纸币。

3月12日　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为“建军建国、克敌制胜之基本”，“务当表里贯彻，切勿视同寻常”。

△　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承绶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13日，任命杨爱源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　新运会五周年纪念会举办之节约献金竞赛结束，献金总额达246万余元（金银饰物未计在内）。

△　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在重庆成立，负责人为沙克都尔札布、喜饶嘉错等。

△　政治建设学会在重庆成立，田雨时为总干事。

△　日机16架分两批轰炸洛阳，投弹89枚，死40余人，伤10余人，毁房400余栋。

△　日军侵豫北，济源城失而复得。

3月13日　国民政府公布浙江、福建两省临时参议会名单：浙江省议长徐青甫、副议长陈屺怀；福建省议长郑祖荫、副议长陈培锟。21日，公布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名单：平刚、商文立为正、副议长。

△　蒋介石指定张群兼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

△　财政部公布《战区各地洋土布缉私稽征实施办法》。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于曲阳县庞家洼围歼日伪军150余人。

△　日军在湖北钟祥官庄杀死村民26人，又在附近朱家湾、曾家湾一带枪杀村民24人。

△　台湾高雄1000余农民因日军强抽壮丁发生骚动，与日军冲突，互有伤亡。14日，台北又有同样事件发生。

3月14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在桂林邀集新闻文化界马君武、李四光等座谈，称：文化人的工作不亚于前方流血壮士；并称华北敌人虽扬言攻兰州、取西安，然以山西我全局战术之成功，则敌志难逞，可以预卜。

△　周恩来离皖南云岭赴浙江视察。

△　陕北安定县长田杰生以设宴为名，将陕甘宁边区政府安定县长薛兰斌非法扣留。15日，萧劲光电蒋介石、阎锡山等提出抗议。田被迫于15日将薛释放。

△　日机21架空袭西安，投弹60余枚，死伤百余人，毁房屋数百间。

3月1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　日军围袭山西运城上段村，烧杀抢掠，屠杀民众108人。又在另一个103户的小村，杀害民众94人。

△　盘据湖北汉阳日军“扫荡”兴隆集附近村庄，烧毁民房380余栋，受害群众达3000余人。

△　日机空袭湖南平江，英国在平江所设普爱医院遭日机炸毁，英籍传教士李协邦被炸死。22日，英国政府饬令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　中英正式签订贷款合同，英国同意给中国信用贷款50万英

镑，用以购买卡车行驶滇缅公路。

3月16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指派徐玉桂、张莫茂为榆林分区特派员；荆宪生、张守约为洛川分区特派员。26日，复指示该省党部，建立或恢复各县党部组织。

△　空军轰炸南浔线日军阵地及广州白云机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一部夜袭磁县彭城镇，至次日，歼伪军200余人。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在豫东通许县练成集，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四军1000余人，俘该军参谋长刘士学。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部，在桦甸县木箕河一带与日军中川部队激战，予敌重创。

△　鄂中日军图渡襄河，被我军击退，歼敌百余人。

3月17日　日军由湖口进攻吴城镇，南昌会战开始。第一〇六师团进攻吴城守军预五师及第一四一师阵地。同时，永修方面第一〇一师团向涂家埠守军第一四二师阵地猛烈攻击。入夜，更以步兵400余人向马村、观音阁、陈村附近渡河。第三十二军及鄱阳湖守备队协力固守阵地，双方展开血战。卒以战士中毒者多，观音阁阵地被突破。

△　第二战区所部与盘据晋南浮山城日军激战，攻克浮山。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围攻完县县城。至18日，毙伤敌200余人，收复该县县城。

△　防守河北西部我军，日前袭击塘湖日军，歼敌数十人，敌向塘湖庙溃窜。经我跟踪追击，又歼敌百余人，塘湖即被我克复。

△　日机11架空袭襄樊，七架袭郑州，17架袭吉安。吉安死伤民

众300余人。

△　周恩来应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之邀，抵达浙江金华，停留数日，期间与黄绍竑同赴天目山商谈团结抗战等有关问题。

△　上海日军搜查公共租界各书店，没收抗日书籍。

3月18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组织大纲》，决定该会会长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副会长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并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社会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政治部部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为该会当然委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牟中珩为第五十一军军长，周毓英为副军长。

△　我军一部进击晋西郑家庄（阳曲西）之敌，另一部袭击要子庄，激战竟日，歼敌百余人，遂克复郑家庄。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和冀中部队，于肃宁、河间、任丘、大城地区，抗击日伪军对冀中的第五次围攻。至4月1日，歼敌900余人。

△　延安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委会决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建议全国是日举行纪念活动。此项建议后为国民党当局接受。

△　上海日侨组织工农商学反战大同盟，团结南京、上海、沪杭沿线及沿江各地侨民，联络各占领区日军，从事反战宣传，并秘密组织反战团体，以消极方法阻止和破坏军事运输。

△　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通知高宗武，日本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国新中央政权。

3月1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立柱为第八军副军长，李守维为第

八十九军军长。

△　南昌前线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等部完成渡河准备，并隔河炮击修水南岸阵地。时修水河宽约300米，因雨水位上涨三米，河岸阵地被淹，水上障碍物被冲走。

△　日军第二十七、一一〇师团等部发动对冀中八路军领导机关驻地的围攻。

△　我军克复晋西离石。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九军在佳木斯山地伏击日军，毙敌百余人，缴获装甲车两辆。

△　鄂省襄、樊两城自17日起遭遇日机轰炸三日，并以今日为烈。今日三次投弹总共在200枚以上，幸居民早经疏散，死伤仅20余人。

△　伪西北边防自治军于志谦部团长赵贵荷，于绥远固阳率部反正。

△　中国行政学会在重庆成立，谭熙鸿等35人为理事。

3月20日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在200余门炮急袭下，分别于晚8时左右渡过修水，与守军夏楚中等部激战，至次日拂晓，突破纵深约二公里的前沿阵地，然后向安义及奉新进攻。

△　日军第六师团及伪军一部为策应南浔线主力南犯，在炮兵、飞机掩护下，向江西武宁东南发动猛攻，与第八军及第七十三军所部发生激战。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与冀中部队在贺龙率领下与日军战于河北肃宁、任丘、高安间，毙伤敌200余人。至月底，突围至河间太

平庄等地整编。

△　湖北荆门县沙洋民众发现空袭日机散发“日本反战大同盟”传单，内有“我们的敌人不是中国人，是国内的军阀、资本家”等语。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桦甸东南岭地区包围日伪军山区司令部，毙、伤、俘多人。

△　蒋介石就陇东庆阳摩擦事件复电萧劲光，谓已饬王治岐第一六五师退回原防整训。

3月21日　　国民政府派甘乃光、何键、翁文灏、陈立夫、徐永昌、周恩来、蒋作宾等13人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

△　蒋介石密电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查敌企图攻略南昌之行动已趋积极，应严饬该方面部队极力固守阵地，以待有力之部队出击制胜为要。又时届春泛，对湖防部队亦应严饬特加戒备。”

△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令夏楚中部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第一一八两师及刘多荃部第四十九军预九师分向南昌右翼驰援。同日，薛岳复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派两师赴南昌，一师至进贤、东乡策应作战，并严令罗部各师限期歼灭修水南岸之敌。时敌由修水、虬津间渡河者约6000人，第九十八、第一一八两师因雨阻赴援不及，第七十六师以众寡悬殊，第一〇五师以腹背受敌，馒头岭、五毂岭南北等阵地相继失守。

△　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司品烈中校抵延安，停留10日后转赴晋察冀边区。

△　日机20余架，拂晓轮流轰炸修水南岸阵地，步、炮兵利用毒气、烟幕继续强渡，全线展开血战。日军主力第六师团侧重武宁一线，第一〇六、第一〇一师团一路由永修窜安义，一路由南浔线南下

迫攻牛行。

△　汪精卫在河内遇刺幸免，其秘书曾仲鸣毙命。

3月22日　薛岳以赣北战况益紧，严电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以下各将领，务亲率所部于滩溪以北地区固守7日，任何牺牲在所不顾，擅自撤退者决按军法议处。卒以滩溪失陷，通讯联络中断，刘多荃部及夏楚中部顿失联系，刘军节节向安义以西撤退，夏军向潦河东岸撤退。

△　空军轰炸广州白云机场，毁日机10余架。

△　日军自徐公强渡修水，向南昌进攻，是日陷安义、奉新。

△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八混成旅团一部，“围剿”河北冀、衡、深、束四县交界的路家庄，屠杀民众237人，毁房700余间。

△　盘据山东聊城、阳谷的日军血洗阿城镇，212人遭到屠杀，困在镇内的抗日官兵40余人被施放燃烧弹烧死。

△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以曾仲鸣遇刺，就汪精卫安全问题作出决定，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策划使汪逃离河内。

3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军队党务整理办法》，凡19条。

△　蒋介石就南昌会战密电薛岳、罗卓英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为要。”同日，蒋又分别密电白崇禧、薛岳等，并就第九战区“情况处置意见”致函徐永昌进行作战部署。

△　豫北我军报捷，肃清花园口东北之日军。

△　敌倾陆海军全力向吴城三面进犯，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剂弹，第十九集团军商震部第三十二军战况不利，伤亡极大，敌遂由望湖亭以左突入，吴城失陷。

△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以滩溪为据点，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公路犯万家埠及安义，一路沿古大道向安义、靖安间猛扑，并以坦克掩护轻便部队越滩溪南扰，沿公路向南昌迂回。南浔线战况益紧。

△　赣北日军突破我虬津阵地，安义失守。

△　日机空袭兰州，炸毁唐代著名建筑普照寺（又名大佛寺）。4月14日，甘肃省佛教会为此通电全国及驻华各领事馆转各国教会，予以谴责。

3月24日　日本陆海军全力进犯武宁、修水北岸之望人脑、棺材山、加白老，南岸之洞口、罗坪等重要据点，经反复争夺后上述各地相继失守。

△　中日两军在万家埠激战。今日，日军由鄱阳湖西岸登陆向我进犯，曾在狮子山被我歼灭300余人，并被我击破沉舰三艘，毁八艘。

△　中国女青年飞行员颜雅清、李霞卿，在美为祖国难胞募捐举行环美飞行，是日由纽约起飞。

△　经济部公布《非常时期采金暂行办法》。

3月25日　林森率国民政府官员在重庆国府大礼堂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赵承绶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池峰城为第三十军军长。

△　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又称秋林会议），到山西新四军师长、独立旅长以上部队军官、公道团县团长、牺盟会特派员等共100余人，至4月22日结束。阎锡山等在会议期间提出取消山西新四军中政治委员、缩小进步专员职权、以“同志会”代替牺盟会、限制群众运动等议案，并诱劝新四军领导人退出部队。虽遭牺盟会及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续范亭、牛荫冠、韩均等坚决反对，会后阎锡山仍坚持实施其计划。

△　日军侵占赣北安义，进至南昌附近之万寿宫。

△　日军在河北安新县关城村，屠杀村民300人，毁房2000间。

△　日军在山西安邑县北乡上段村，屠杀村民和抗日战士108人，焚房87间。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一部攻入河南虞城，该城伪军500余人反正。

△　伪满公布《原棉、棉制品统制法》。

3月26日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渡过赣江。次日，在南昌南面切断浙赣铁路，以配合第一〇一师团对南昌的攻击。

△　南昌外围各据点展开激战，牛行车站落入敌手。

△　修水前线缴获日军文件中，发现有屠杀中国人民之指令：一、当地居民不得接近日军驻地，违者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二、粮秣、器具，实行就地征发；三、滩溪附近村庄须完全烧毁；四、形迹可疑之居民须彻底屠杀。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山西盂县上、下鹤山与日军激战，毙伤敌石环定雄中队长以下280余名。

△　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在苏南江宁县云台山地区粉碎日伪军的五路围攻，毙敌50余人。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在豫东杞县瓦岗地区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的进攻，毙敌数十人。

△　开封日军袭击杞南瓦南，杀害民众100余人。

△　日军100余人包围江苏响水县六套镇，杀害民众108人。

△　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吴敬恒为会长，王宠惠、邹鲁、周恩来、吴玉章、叶楚伧、邵力子等40人为名誉理事，毛庆祥等25人为理事。

△　叙昆铁路及滇缅铁路在昆明联合举行开工典礼。

3月27日　　南昌失陷，南昌会战结束。南昌守卫战自3月17日至是日，历时10日，日军伤亡1.3万人，中国军队死伤10.6523万人。另据日方公布：中国军队死亡约2.4万人,被俘约8600人,日方死亡约500人,负伤约1700人。

△　日军第二十一军开始对珠江三角洲地带进行“扫荡”。

△　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举一个例》一文，内称对日主和系国民党最高机关之共同主张，并举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调停之纪录为证，为其对日主和辩护。

3月28日　第四战区所部攻克海南岛文昌县城。

△　我军再克晋南浮山、安泽。

△　日军第六师团主力部队击退王陵基第七十二军，赣北武宁失陷。

△　日军第十一军部署占领南昌后行动要领：命令第一〇一师团确保南昌地区并准备以后的作战；第一〇六师团以主力进占奉新、赤田张一带，准备向高安或奉新以西进攻。同日，制订打击第五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纲领》。

3月29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发言人谈话称：日军进攻南昌兵力约四个师团，经猛烈反击，消耗战之目的已达，南昌已无死守价值，放弃南昌，纯属循我持久战之一贯方针，与全面战局毫无影响。

△　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以第一〇一及第一四九两联队，由南昌向南逐次扩展至沙埠潭、剑霞圩之线；以第一〇三联队由西山万寿宫向高邮市以东锦江北岸地区压迫，使与赣江东岸市汊街连成一线。同时，第一〇六师团之第一四七、第一二三联队，沿湘赣公路两侧地区向高安西犯。

△　我军收复赣北奉新，粤南江门、容奇、桂洲。

△　日军陷晋西南芮城。

△　日伪军一部自山东临朐分三路出动，主力沿益都、临朐公路进犯，渡弥河时为苏鲁战区部队伏击。次日，经两次激战，敌占蒋峪。

△　日机六架轰炸河南方城，炸死平民44人，伤38人，毁房100余间。

△　香港《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谈话，声称南昌失陷“是日军的大胜利”，催请平沼尽快进攻南宁和西安。

3月30日　日军三路围攻高安，并施放毒气。守军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王耀武师力战不利，旅长张灵甫重伤，于4月1日退守白石岭、赶车垄之线。

△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宣部报告修改检查书店办法及印刷所取缔办法，要点为：一、确定对书店及印刷所之最后处分为封闭；二、对蓄意印售反动书刊之印刷所、书店，查有实据者，径予封闭处分。

△　广东江门地区空战，日机被击落两架。

△　亲日组织伪大民会主席、苏州汉奸冯心支，在香港遇刺毙命。

△　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作出《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要求在华现地兵团实行长久自给，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为长期计划制定各种措施”。同日，日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整顿纲要》。

△　日本政府将中国南海的新南群岛（即南沙群岛），宣布归日本领有。

3月31日　日军陷粤南江门。同日，中山、顺德两县30万民众集会，决定全县男女参加自卫团抗战。

△　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程潜、阎锡山等，告以“鹿钟麟在河北专事反共，一二月份河北境内八路军部队及工作人员，被鹿钟麟杀害者已达20余人”。

△　国民党中宣部致函中央党部，密报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政治部工作人员联合设立一三民主义书报社，“竟出售大批由延安运来共党书籍”，“用心实为可虑，请设法予以制止”。

△　战地党政委员会致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以该会委员王葆真等50人组织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请准予立案。4月12日，社会部以该组织与现行人民团体法规规定不合，函复不予立案。

△　湖北天门县伪维持会长屠占廷率部1700余人反正。

△　日方公布本月份中国军队袭击华北方面铁路次数，计京汉线62次，津浦线21次，正太线13次，合计96次，比上月减少32次。

是月　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战区行政督察专员及保安司令兼任军法总监部督察官服务规则》，规定督察官得执行下列任务：一、发觉有违犯战时军律及其他有关军事法令之罪嫌者，应立予检举，密报军法执行总监部核办。如认为情事迫切有紧急处置之必要时，得立予逮捕；二、发觉有违犯军风纪者，如情节轻微，得立予纠正，事后呈报军法执行总监部备查；其情节重大者，须呈报军法总监部核办；三、对于执行公务工作不力，有影响抗战效能之虞者，随时详列事实，密报军法执行总监部核办。

△　海军在宜昌、巴东间成立宜巴区要塞第一、二两总台，下辖四台机九分台。10月间又在巴东至万县间成立巴万区要塞第三、四两总台，分驻于宜昌、巴东、万县、重庆各地，并派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驻万县指挥。

△　国民参政会组织川康建设视察团，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五组分途出发。该团在各地视察100多天，于7月返回重庆。

△　军事委员会通饬施行《游击区棉烟之减种与禁运办法》，凡八条。

△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定《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工作纲要》，凡87条，规定审查目标“在防止庞杂言论，齐一国民意志”，“树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之文化”。该《纲要》详列审查标准、处理方法、检查范围等项规定，其中有检查人员要与当地特务机关取得联络，“俾能明了各书店印刷所负责人之背景与活动”等项。

△　中共绥远省委员会（前绥蒙工委）从伊克昭盟迁到大青山，

并在绥中、绥西、绥南三个地区建立地委及基层组织。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在冀南的部队，经两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　日军在河南信阳浙河南岸抓走民众600余人，全部惨杀在柳林堤“万人坑”。又在淮阳县活埋民众22人，打伤31人。

△　日军在华北及沿海占领区破坏我金融制度，主要有：一、在沪破坏法币及外汇；二、将河北省银行改为伪河北省银行；三、在华北增发伪币；四、在鲁强搜法币并禁止使用。

△　湘黔铁路东段由湘潭已铺轨170余公里到达蓝田，因战事停止。铁道部令将已铺钢轨、钢桥拆除，移作湘桂铁路之用。此路已耗工款1500余万元，材料费约360余万元。

4月

4月1日　　蒋介石就南昌弃守后作战方针致电薛岳：“此后战略应以避实击虚为主旨，长岳路前线主力应赶速撤退到湘阴、平江之线，且以长沙、湘阴、平江三据点，形成犄角之势。”新墙河之线，只作为前进阵地，准备一有力部队，以牵制敌军。湖东应以浏阳、萍乡、醴陵三据点造成三角形，敌如进来必可予以最大之打击。

△　军事委员会令第五路军（广西军）总部撤销，悉照中央军队编制。

△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令将接收之广东舰务处改为江防处，徐祖善、黄文田分任正、副处长。

△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扩编第十八集团军，指出：“今

日坚持华北抗战，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为争取胜利重要关键。倘按职部实有人数给以编制补充，不仅于作战指挥发挥更大效能，而全体将士亦将更高发扬忠勇之忱。”

△　日军向南昌西南祥符观一带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阵地猛攻，战至2日夜，俞军不支，逐次向绵河南岸及高安以西高地撤退。

△　我军收复河北宁津、庆云，歼敌200余人。

△　苏鲁战区于学忠部向鲁东临朐南日军据点蒋峪发动进攻，激战六小时，毙敌500余人。

△　雁北伪保安总队长乔日成，率部1300余人于应县反正。

△　国民政府令免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本职；遗缺于5月5日以叶元龙继任。

△　国民政府派胡世泽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二十四届禁烟会议代表。

△　保卫中国同盟机关报《新闻通讯》（英文半月刊）在香港创刊，创办人宋庆龄，主持人廖承志，编辑先后有爱泼斯坦、贝特兰等。

△　晋冀豫边区《抗战生活》半月刊创刊。

△　日本兴亚院会议决定给予汪精卫组织伪反共救国同盟会活动经费，自4月至9月每月300万元，共计1800万元，由中国海关关余项下支付。

△　“满铁”解散哈尔滨航业联合会，收买全部民股，设立北满江运局，垄断北满航运。

△　日本陆军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在新年度各军参谋长恳谈会上，

就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充实军备及处理中国事变问题发表讲话，略称：“处理空前的中国事变和适应今后国际形势转变的战争准备，是国家当前的两大任务，不能就此舍彼。”提出对华战争的指导一定要考虑到它的长期性，同时加强作战以外的诱降工作，以“瓦解重庆政府”，使之屈服乃至崩溃。

4月2日　　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副主任李济深在讲话中指出：“本会的重要工作是与敌人争取战区内的人力、物资及整顿战区内的一切党政机构，以确立我国抗战胜利的基础。”最后李济深宣布：“各战区分会负责人是该站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并以有关军政长官为委员”；“本会聘请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部门专家为委员，此外并设指导员及视察员，负责指导视察战区内一切党政工作。”

△　军政部决定今后办理兵役采取征训合一办法，并以重庆为试行区。

△　蒋介石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与日军苦战，屡建奇勋，特电嘉奖。

△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弃守南昌电蒋介石自劾，请从严处分。

△　第四战区一部乘夜冲入广东江门范罗岗、羊桥市，俘敌300余人，克江门。次日，日军复陷江门。6日，第四战区一部总反攻，再克江门，歼敌200余人。

△　日机七架轰炸西安，投弹50余枚，毁房10余间。次日，日机17架再炸西安，死伤30余人，毁房百余间。

4月3日　　国民政府以安徽凤阳县长戴九峰“组织团队，艰苦抗战，迭著劳绩”，传令嘉奖，并予以晋级。

△　朱德、刘伯承在山西黎城上赵栈检阅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直属队、第三八六旅、独立支队等部队。刘伯承并作反摩擦、整军等问题报告。

△　中条山战役大捷，我军再克晋南安泽。是役歼敌1500人以上，击落日机一架。

△　第五战区张自忠部渡襄河围攻钟祥；5日在城西与日军激战，毙敌300余人。

△　我军克复粤南江门。

△　日军陷广东新会、再陷江西高安。

△　日军在华北、华中积极攫取资源，并扰乱我之金融，其较著者有：一、攫取资源及原料并掠夺我产业；二、掠夺关税；三、组建商业组合并筑仓库；四、积极谋占领区人口增加；五、扰乱金融；六、收买赤金并抑低金价。

4月4日　　顾祝同调整江西前线部署：令第二十三集团军上官云相率所属六个师自广德驰抵临川，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率段朗如、刘雨卿、曾戛初三师及江西保安第十二团，任鄱阳湖东、南两岸及抚河东岸迄李家渡线之守备，何平、蒋昭雄两师由何平指挥任抚河与赣江间守备。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组织条例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　第二战区一部攻入正太路阳泉车站。

△　日军第一〇四、第十八师团分别向花县以北地区和增城以北及东北地区发动进攻，至4月中旬，第四战区部队败退。

△　日机轰炸河南方城独树、保安等地，炸死民众90人，伤88人。

4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号召全国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斗。

△　白崇禧密电蒋介石报告日军近期战略企图："似先向我中央地区之南昌、长沙、宜昌三点依次攻取，一面将晋绥及平汉、粤汉以西地区之游击队肃清，树立伪政权，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进而图我西北、西南，断我国际交通，使我早日屈服。"提出拟以"钧座最高持久的战略，侧重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指导所属各战区的作战"。并提出"经济的使用兵力，非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不轻于决战"。同日，薛岳电蒋报告湘北赣西反攻作战部署。

△　国民政府公布江西、河南、广西三省临时参议会名单：江西省议长彭程万，副议长王有兰；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副议长张广舆；广西省议长李任仁，副议长陈树勋。

△　国府委员马相伯百岁寿辰，国民政府明令褒奖。次日，重庆各界300余人举行庆典，林森致词，蒋介石出席并送寿联。桂林、成都等地党、政、军各界亦分别集会并致电祝贺。中共中央曾于3月19日致电祝贺马相伯百龄大庆。

△　我军克复广东新会。

△　我军下令封锁宁波镇海海口。

△　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袭击招远县盛家、冯家、拉格庄等地伪军，俘敌210余人。

△　《大公报》揭露汪精卫准备成立一伪政府，为日本军阀作伥，并亲拟所谓《汪精卫平沼协定》，企图颠覆国民政府。

△　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在师团长会议上宣称：华南进攻到南宁，华北进攻到兰州，方可结束日中战争。

4月6日　　国民政府派张继、蒋鼎文到陕西黄陵县祭黄帝陵。同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及边区各界代表亦前往致祭。

△　周恩来偕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等离浙赴江西。上旬，代表陈诚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

△　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站总办公处迁渝办公。截至3月底，该处共计运配难民72万余人。

△　日机18架袭衡阳，民众死伤甚多，全城大火，精华地区均付之一炬。

△　日本在侵占区积极开矿，图建军需工业，主要有：一、开采金矿；二、开采煤矿；三、开采铁矿；四、建立军需工业；五、日本兴亚工业视察团来华；六、日本调查煤、铁、金等矿产。

△　影佐祯昭等自日本赴河内，策划汪精卫转移住地。

△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到上海，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商远东问题。

4月7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向国民政府转呈该会常务会议关于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建议加强民权主义之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一案的决议。

△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在重庆招待记者，报告国民政府改进绥境军事、教育、经济情况，称：此次绥境军队及保安队由中央指派大员点验，统一整训；在伊盟设一盟旗中学，完全免费；经

济部组织皮毛公司，统筹购销；决定创办一汉、蒙文合刊之民众日报。

△　白崇禧密电蒋介石，分析南昌失败原因为：“（一）公路未能于事前彻底破坏；（二）战略预备队使用过早；（三）河川防御配备未能形成纵深，致修江水涨，即无法补救；我方部队素质欠佳，且未能形成重点。”24日，军令部对第九战区屡次变更进攻南昌时间作了说明，并提出意见说，该战区“如能遵令于3月15日实施，先敌发动攻势，南昌之陷落，必不如是之速。因战区无坚决反攻之意志，往返商量，致失战机，殊感遗憾”。

△　第五十八军新十师反攻高安，经两昼夜激战，一度夺回西城。后因应援部队未及时赶到，退回原阵地。

△　空军轰炸南昌日军，日军损失奇重。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部，袭击桦甸县大蒲柴河镇，与日军发生激战。

△　日机10余架袭广东花县近郊黄岐山，配合地面部队进犯，投弹数十枚，村民死伤100余人。

△　行政院核准浙东大盘山设置安县。

△　国民政府令免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本职。7月6日，任命王广庆为河南大学校长。

△　英国政府训令驻沪领事馆，对蒋介石此后态度之推移采静观态度，但仍继续援助蒋介石；如探明蒋介石对抗战前途有悲观时，英国政府拟着手与日方折冲。

4月8日　　日机25架空袭昆明，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机两架。同日，日机两次轰炸金华，向城区闹市投弹40余枚，平民死53人、伤

190多人，毁房190多间。

△　我军克复江西高安、湖南君山、江苏宜兴。

△　陇东镇原发生摩擦事件。晚，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在镇原屯子镇召集民众开会，被西峰专属保安队捕去数名。次日，第三八五旅亦捕去该县太平镇区长及区丁数名，双方摩擦继续发展。镇原县长邹介民电专员钟竟成调王治岐部第一六五师进驻太平镇，第三八五旅乃在城内实行戒严，邹介民等化装潜逃，准备调部队攻城，形势进一步恶化。24日，第十战区下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处置。嗣后，经双方多次电商同意谈判。

△　行政院公布《禁运资敌物品运沪审查办法》。

△　新疆省文化协会成立，茅盾为委员长，张仲实、李佩柯、阿不都拉为副委员长。

△　伪满洲国宣布“三大国策”：产业五年计划、开拓移民、北边振兴，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　美国总统罗斯福复函蒋介石，对拥护正义重建和平理想表示赞同。

4月9日　粤北我军连克花县、定安等城。

△　第二战区一部攻克晋西南芮城。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首次年会，选郭沫若、老舍、田汉、茅盾、邵力子等45人为理事。

△　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戏院遇刺毙命。

△　汪精卫为重庆《大公报》等各报揭露其卖国通敌阴谋发表声

明称：他之所以“主和”，并坚持投降主张“到底”，是从“反共”立场出发，表示他“决不恤膺反共之名，而谋中日和平之实现”。

4月10日　第十二军第二十师师长周遵时率第一一九团渡过黄河夜袭开封，破坏汴新铁路，毁敌弹药库及三里堡东闸口等处房屋70余间，毙伤日军30余人，俘伪警卫120余人；又在开封护城堤诱敌出城，伏击敌人，双方死伤各百余人。

△　第四战区一部克复广东花县。日军占领花县期间，杀害民众达500多人。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在皖南宣城县狸头桥地区，粉碎日军三路进攻，击毙日军40余人，伤30余人。

△　日军在绥远地区发动攻势，是日侵占安北，并进行“扫荡”。第八战区何柱国及门炳岳部与日军战斗100余次，因伤亡较大，攻势受挫。

△　日军在广东新会县大泽一带，枪杀村民200余人。

△　日机10架轰炸浙江安吉县城，投弹百余枚，死伤116人，毁房200余栋。

4月1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鲁崇义为第三十三军副军长，谭邃为第六十六军军长。

△　苏北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泰县六县游击队联军冲入海门县城，毙敌特务主任答尼、警备队长久留等40人。

△　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发表《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一文，痛斥汪氏卖国行为。

△　甘肃省海（原）固（原）地区回民暴动，几天内暴动民众增

加到七八千人。

4月12日　　广东增城激战。晨4时，第十二集团军一部攻克增城四郊日军据点，并分兵断敌广州、石滩间联络。次日，击退广州、石滩增援之敌，并组成数百人敢死队，于14日晨由南、北门进攻，遂克全城。是役歼敌逾千。

△　日本政府要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樊克，令取缔租界内抗日刊物。

4月13日　　第二战区一部克复山西浮山，第三战区一部克复皖南青阳城。

△　日军在山西寿阳县秦家山村屠杀抗日军民30余人。

△　欧亚航空公司重庆、河内班机第19号，在途中受日机袭击，机师受伤，乘客无恙。

△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二十八年建设公债条例》，总额六亿元，年息六厘，27年还清。

△　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为汪精卫出逃事电蒋介石称："汪与党羽暗中通敌，因中央宽假，得脱身离渝"，"委座容汪逆及党羽逍遥法外，实为南洋八百万侨胞所莫解。"

4月14日　　第一战区一部攻克豫东通许，毙伤敌300余人。同日，第四战区一部克复粤东增城。

△　第十战区一部在炮兵掩护下北渡黄河，反攻风陵渡。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伏击进犯山西浮山日军2000余人，再度克浮山、翼城。

△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二十八年军需公债条例》，总额六亿

元，年息六厘，27年还清。

4月15日　蒋介石致电薛岳、陈诚，就守卫湘北基本方针指示如下，略称：“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附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以代电致各省、市党部、政府称：“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露于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至发生摩擦。”

△　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改组，黄旭初为主任委员，万民一为书记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缪培南为第六十五军军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歼灭山西运城北郊日军骑兵联队，毙伤200多人。

△　绥西伪蒙军团长刘福善率部500余人反正。

△　日军在山西运城县北上殷村惨杀民众108人，焚房80余间。

△　日本大本营海军部作出“情况判断”，首先向参谋本部提出攻占南宁，以切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

△　新四军机关刊《抗敌》月刊在皖南泾县创刊。

△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二十八年江苏省整理地方财政公债条例》，总额800万元，年息六厘，10年还清。

△　香港政府颁布紧急令，授权当局拘禁可疑外侨，并征召一切船舶供英军支配。

4月16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谢持在成都病逝。5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派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前往致祭，并举行国葬。

△　《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

△　日军派遣汉奸冒充难民，携带大批毒菌自海南岛、厦门、温州、汉口分四路出发，前往重庆、桂林、西安、金华、韶关等地，散布毒菌毒害人民。6月1日，军事委员会特电各地“严密查察”。

△　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和影佐祯昭秘密到达河内。18日，会见汪精卫，策划汪逃离河内前往上海。汪表示愿按“日方的希望行动”，并表示拟建立“中央政权”作为今后的“根本工作”。

4月17日　　军事委员会制定南昌失守后攻略计划。是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陈诚、薛岳、顾祝同，密令执行反攻南昌计划，“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时机预定4月24日”。

△　蒋介石在重庆就中日战争答记者问，指出：要想中日间恢复和平，那就除非日本军阀有彻底觉悟，自动放弃侵略，将他们传统政策根本改变不可。至于汪精卫之主张，“是无耻之极的笑话”；汪响应近卫声明，“是甘作日本奴隶”。我既抗战，就必须贯彻到底。

△　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演说，宣布自5月1日起，全国各地全部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

△　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重申对内对外政策，粉碎日寇、汉奸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伪造传单妄图破坏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阴谋。声明指出中共“对内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对外联合一切同情中华民族的国家，尤以英、美、法、苏为要”。

△　全国基督教教育会议在香港举行，燕京、沪江、圣约翰等11所大学校长出席。会议通过培训基督教人格、实行基督高等教育、成立农村建设会等决议案33件。于22日闭幕。

△　日军图犯随（县）枣（阳）地区，制定《会战指导策略》，计划在5月初以前，秘密将江北各兵团及第十一军集结应山及安陆附近，随即在枣阳附近歼灭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等重点兵团。次日，日本大本营批准第十一军越境作战（即可以超过1938年12月2日指定的作战地区），在汉口西北（即随枣地区）作战。

△　日机四架轰炸安徽铜陵凤凰山，村民死伤21人。

△　日军在各侵占区搜刮物资，并筹组伪银行，扰我金融。主要有：一、伪上海市政府开征田赋；二、日假名外商密收钨、锰等矿物；三、在皖收买米、粮、麻、茶等物；四、在各占领区搜刮铜、铁；五、筹组伪银行。

△　“满铁”与华北开发会社共同投资设立华北交通会社。从七七事变至今，“满铁”已向华北派遣工作人员1.8万人。

4月18日　　军事委员会制定南昌弃守后的战局形势称：“我军此次毅然放弃南昌，对于今后抗战形势，不独无丝毫影响，毋宁谓于我反为有利。”

△　军令部以随（县）枣（阳）吃紧，调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五个师增援第五战区。汤率部自江南开拔，于沙市渡江，是日开始向枣阳以南地区集结。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部第三四三旅杨勇部第六八六团在山东宁阳东北葛石店歼伪军百余人。

△　国民政府公布广东、湖南二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和参议员名单：广东省议长吴鼎新、副议长黄枯桐，湖南省议长赵恒惕、副议长陈润霖。

△　伪满增设北安省与安东省。

△　周恩来在湖南衡山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次日续讲。同时，视察训练班。

△　日本政府向国内外发出公告，宣布我国南沙群岛归日本领有，改名新南群岛。美、英、法、荷等国因威胁各国利益，陆续对日提出抗议。

4月19日　第四战区一部攻克广东从化。另一部反攻新会，克复县城。21日，敌千余人在战车、飞机掩护下反攻，新会复陷。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南通、海门。

△　我军击溃进犯中牟之日军，毙敌100余人。

△　日军在湖北通山焦夏村，屠杀老弱妇孺23人。

△　上海法租界警察干涉市民悬挂国旗，并拘捕商民，引起罢市。25日，法租界被迫退还国旗。

△　国联在昆明设驻华办事处，暂由国联驻华业务主任梁振声主持。

4月20日　日军下达襄东作战（即随枣会战）“准备命令”。为阻止日军进攻，第五战区亦作相应部署。

△　第四战区围攻广州部队前锋迫近广州市郊。

△　日军“扫荡”江苏丹阳县延陵镇，屠杀民众108人，烧房172

间。

△　经济部设立煤矿管理处，统制煤炭生产运销。

△　重庆市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有46个行业代表参加。通过讨汪声明，并通过组织工人福利委员会等八项议案。

△　美国抗议日本阻美商在我沦陷区内通行；上海各公团电请美国禁止军品输日。

△　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否认斡旋中日战争。

4月21日　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利用湖北有利地形及既设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进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亘汨罗江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遂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

△　为反攻南昌，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主力由高安以西，另一部（两团）由高邮市、石头岗间渡过锦河，分攻高安、大城、万寿宫一带日军。刘多荃部第四十九军以一部袭击锦河以北及生米街附近日军，主力控制于南岸机动，次日开始攻击。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牧农为第九十三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　我军在绥远固阳以北两度与日军接战，毙敌1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与日军激战于邯郸西大北庄、西庄，毙敌200多人，缴获重炮两门、山炮三门、步枪30余支。

△　日机21架轰炸湖南芷江县城，死伤约400人，毁房数百栋。

△　日本陆、海、外三相就海南岛政务处理问题作出决定，并通知有关部队，略称：海南岛政务处理“首先应置重点于完成作战和确保治安”，同时“尽力调查和获取重要资源”。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会同第十战区政治部及省警察局查封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并以该店“设立共党交通”为由，将经理周名寰拘捕。

△　覃振、吕振羽为正、副院长的湖南战时讲学院被当局强令解散。

4月2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俊为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马鸿宾为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　南昌反攻作战开始。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完成反攻南昌准备工作。同日，第九战区第一集团军以主力向江西奉新、靖安之敌开始攻击，另一支队向靖安滩溪挺进。

△　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及彭位仁部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第七十七师各一部，为策应南昌作战，向鄂南楠林桥、白霓桥、崇阳一带日军攻击。24日，曾一度攻占楠林桥。旋因敌有增援，又于翌日退出。

△　第二战区邓宝珊部高双成第八十六师进击绥远托克托双龙镇，与日军激战，毙敌大尉两名。次日克双龙镇。

△　空军轰炸侵入九江日军，敌死伤甚重。

△　日机首次空袭河南内乡县城，投弹100余枚，平民伤亡及房屋损毁颇巨。

△　重庆大学增设商学院，聘马寅初为院长。

△　加拿大温哥华援华委员会等召开太平洋西北会议，决定开展

禁止运输军需品至日本的运动。

4月23日　上官云相指挥所部向南昌攻击前进。师长何平率第十六师及预十师以一部沿赣江东岸，主力沿铁道两侧向北攻击。师长段朗如率第七十九师及预五师一部由武阳、谢埠市间渡抚河向西攻击。午，第十六师击溃市汊街之敌，继续北进。次日，占领新村圩。

△　傍晚，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攻克高安。次日，敌增援反攻，高安复陷。26日，又为第五十一师夺回，并相继克复祥符观。第五十七师占领大城、鼓楼铺。新九师攻占石头岗、生米街。第一〇五师攻占高邮市。

△　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所部攻占鄂南通山。同日，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九十二军亦各派一师兵力向崇阳、通城、临湘、岳阳一带日军袭击，威胁敌各重要据点。

△　第一战区一部联合游击队进攻豫北温县，敌据险顽抗，血战竟日。次日，克复温县全城。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将进犯河间县齐会之日军包围，激战至25日将敌围歼，共毙、伤、俘日军700余人，创平原歼敌战的范例。

△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攻击广东江门，与第四战区第一五五师等部激战，至27日战斗结束。据日方公布，中国军队死亡2336人，日军死14人、伤39人。

△　日机本日起，连续两日轰炸湖南湘阴县城，共计遇难民众1700多人。

△　陇东宁县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汪营与当地保安队因征兵征粮发生冲突。宁县县长方振武调来第一六五师三个骑兵连，至冲突扩大。29日，保安队向汪营袭击，汪营起而自卫，保安队被击溃。5月1日，

第一六五师派员要求停火，7日起，经会商汪营解围，骑兵连亦于中旬撤退。

△　中国地政学会第五届年会在重庆开幕，陈立夫、邵力子及各省地政机关代表与地政会员100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五项决议：一、建议政府积极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二、非常时期地政垦殖应由地政机关主办；三、从速成立地政机关；四、划陕北第二区为平均地权实验区；五、通过战区减免土地租税及补救耕地荒废暂时办法草案。

4月24日　国民政府特派白崇禧兼广西绥靖副主任。

△　军事委员会任命邢肇棠为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　我军克复赣北大城。

△　第一集团军第一八四师、新十师占领奉新西南及南之凤凰山、鸦鸠岭、桃仙岭一带高地，一部则在奉新以西及以北地区与敌激战，形成三面包围奉新之势。

△　上官云相部段朗如第七十九师在谢埠市与日军激战。同日，预十师攻克梁家渡西之西梁山。25日，续由奉新附近之璜溪市向塘攻击。

△　日机经越南袭击云南蒙自，外交部向法国政府抗议。

4月2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姚北辰为第十五军副军长。

△　第一战区一部与日伪军在豫东鹿邑、太康、淮阳等地展开激战，毙敌30余人，俘伪军450余人。

△　第二战区刘戡部第九十三军第一六六师一部反攻晋南浮山。陈长捷第六十一军一部与日军清水等部激战于汾西。同时，晋南阳城、解县、翼城等地均发生激战。

△　齐会歼灭战获胜。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800余人、伪军200余人由冀中河间出发，攻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七一六团第三营驻地——河间东北16公里之齐会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率领下，以一团在齐会构筑坚固据点，另以主力集结齐会以西地区。23日晨，与日军接触，激战三昼夜，毙伤敌800多人，生俘日兵五人，缴获大车50余辆，首创八路军平原歼敌一个大队的战绩。战斗中日军施放毒气，贺龙中毒，仍继续督部猛击，卒于是日将敌完全击溃。蒋介石为是役获胜传令嘉奖，并发给贺龙治疗费3000元。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冀南任县击溃进犯该师青年纵队的河北民兵独立旅王子耀部500余人。

△　日军血洗河南永城县龙岗集，杀死村民100余人，伤100余人。当地抗日官兵500人，除40余人突围外，余均牺牲。

△　日军前往蒲圻神山“扫荡”，途经龟山石家村，纵火烧房48间，杀死村民48人。

△　汪精卫等秘密逃离河内，前往上海。

4月26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本届参政员任期延期一年。

△　中共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布《告全党同志书》。

△　上官云相部第七十九师主力迫近南昌附近的冈下、吴村，其一部进攻莲塘之敌，前锋已超越公路、铁路。预五师一部已达南昌机场附近，并一度攻入新飞机场。是日晨至傍晚，南昌城内数处起火，全市骚动，守敌殆有不保之势。

△　日本昭和天皇表弟、宪兵司令赤本大佐及其随行六人，在河北省遵化、兴隆间被八路军冀东游击队包森支队活捉。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电甘肃省政府，指示对边区政府的对策称："共党在边区一切非法组织，现时殊非一纸命令所能取消，宜先加强边区周围各县党政工作，阻其蔓延，并使本党逐渐向边区推进。"

△ 我军克江西高安之白石岭，歼敌800余人。

△ 日军陷安徽亳县。

△ 抚顺龙凤竖井瓦斯爆炸，损失惨重。

4月27日 蒋介石以函稿电嘱龙云劝汪精卫，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断绝与日本往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指出要"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号召全党"在宣传鼓动中明白的显示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实质，以我们的立场给精神总动员的条文以正确的解释，以防止和打击顽固分子利用作为防共武器的企图"。

△ 中共中央决定山东分局扩大为苏鲁豫皖分局。

△ 第五十七、五十八两师扫荡高安、大城间之残敌，向奉新虬岭、赤土街前进。因左翼高荫槐集团军之进攻无大进展，未能如期向南浔线挺进。

△ 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在南昌周围狂炸，并滥放毒气、毒弹，同时增派海军陆战队接任南昌守备，而以第一〇一师团主力反攻。一周内敌我在南昌东南及以南近郊约10公里以内地区演成激烈争夺战。旋因敌援军陆续到达，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畏缩不前，且因赣江以西部队未能进击南浔线，断敌后路，以致南昌日军得以全力死守。

△　日机轰炸闽南厦门大学，校舍损失惨重。

△　伪满以推行“北边振兴建设事业”为名，发行公债二亿元。

4月28日　蒋介石电令嘉奖南昌作战有功人员，电称：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第一四一师师长唐勇良，在涂家埠、吴城之役，均能奋勇击敌，达成任务，即着传令嘉奖。该师团长张尊光守备吴城作战得力，记功一次。该军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守备涂家埠、吴城、狗子岭阵地作战，达成拒敌南犯任务，记功一次。

△　八路军山东陇海南进支队袭击江苏邳县县城之敌。战至次日，毙伤伪军64人，俘93人，收复该县城。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旅于河间县卧佛堂、任村毙伤日军160余人。

△　日机轰炸宁波，据不完全统计，死120余人、伤270余人，损失约在五六百万元，全市精华毁损殆尽。

△　江西瑞昌日军包围华山坳背田家、瓦荡余家两村，杀害村民38人，最老的88岁，小的仅三岁。

△　全伪满240家企业代表签署关于劳动者募集和使用的协定。

4月29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

△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历戎为第一军副军长，汪之斌为第七十三军副军长，王文彦为第七十六军副军长，张坤生为新编第一军副军长。

△　上官云相电令何平部第十六师主力会合柏辉章师一部，限5月

2日前攻克沙埠潭、向塘，否则各师、旅、团长一律严予处分。何、柏两师于是协同作战，30日午后克向塘以西诸据点，并转攻沙埠潭，5月1日占领抚河北岸，日军溃退南岸。

△　第九战区杨森部攻克鄂南咸宁、汀泗桥两车站。

△　陕西南郑空战，击落日机两架，击毙外村义雄中尉。日方称击落中国飞机11架。

△　我机轰炸晋南运城日军设施；返程在汉中与日机空战，击落日机一架。

△　伪维新政府在上海创设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纸币5000万元。

△　天津伪币贬值，4月23日至29日法币千元，所换伪联银券之数额由1172.5元涨为1350元。

4月30日　鄂北日军向随县地区发动进攻，随枣会战开始。

△　鄂东我军攻克麻城。

△　山东泰安专员秦启荣部在山东博山以东的泰和地区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指战员400多人，内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及营、连、排干部70多人。同日，山东省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鸿烈提出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无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是月　　中共中央就山东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多方面争取友党友军之进步，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肃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地取得必胜）。"

△　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　月底，周恩来到桂林。在桂林期间，会见《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指出我们纪念“五四”，应该继承它的积极优良传统，为民族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运动，发扬它的光荣历史，以利抗战建国。5月4日，《救亡日报》发表姚潜修写的“五四”二十周年访周恩来的报道。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一部，于陵县大宗家抗击日军进攻，歼敌500余人。

△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创建了以江苏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抗日根据地。

△　山东日军6000余人，分11路围攻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

△　黔桂铁路由柳州开始修筑。交通部派侯家源为黔桂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设工程局于宜山，以湘桂铁路柳州南站为路线起点。

△　第三届全国抗敌木刻展览在重庆举行，参展作者102位，871幅作品。

△　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复华侨某君书》，鼓吹降日反共，说“如今抗战实实在在一天比一天艰难了”，抗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凡是丢不了烧不了的地方，有了共产党，人民也无法生活。

5月

5月1日　　全国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各地同时举行国民月会。是日，重庆市3000余人举行第一次国民月会。蒋介石、孔祥熙等出席，林森致训词。晚，举行火炬游行，参加者10万余人。

△　蒋介石在重庆播讲实施精神总动员，勉全国同胞力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信条。希望全国人民以共同团结精神，粉碎敌人侵略政策，实现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大业。

△　延安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指出其意义是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国从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

△　国民政府公布安徽、四川、陕西、青海等省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名单：安徽省议长江炜，副议长刘真如；四川省议长李伯申，副议长向传义；陕西省议长宋联奎，副议长宗山；青海省议长魏敷泽，副议长马步瀛。

△　蒋介石电令南昌参战部队各总司令亲赴前线督战，限5日以前攻占南昌，并令将“决心不坚，畏缩不前，坐失战机”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军前正法，以昭炯戒。

△　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下令对南昌再兴总攻。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及第七十四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全力投入南昌作战。当日，第十六师攻占沙埠潭。次日，第一〇二师攻占向塘。

△　随枣前线日军主力第十三、第十六两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向襄河东岸张公庙、楼子庙一线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第三十七及第一八〇师攻击，张部不支，于4日被迫后退。同时，钟祥之敌一部北窜至流水沟附近，与张自忠部第三十八师激战。5日，长寿店阵地被突破，敌主力向枣阳方面挺进。

△　日军部署“扫荡”山西五台山地区。预定第一期作战自5月8日起，以约五天时间“扫荡”台怀镇一带；第二期自5月13日起，以约24天时间“扫荡”五台山西部；第三期自6月7日起，以约八天时间“扫

荡”龙泉阁一带；第四期以约12天时间“扫荡”洪家寨附近。使用兵力主要为第一〇九师团、第九师团、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等各一部。

△　日机两次轰炸福州，市内部分精华化为灰烬。

△　驻安徽怀远县伪军司令荀家云，率部千余人反正。

△　财政部颁行《非常时期后方各省进口钢铁等金属制品及机器纳税办法》。

△　日伪在沪成立伪华中铁路公司，垄断交通。

△　日伪在沪创立伪华兴银行，以陈锦涛为总裁。

△　上海工人联合会致电英国纺织工人联合会、法国工人联合会、美国总工会、荷兰运输总工会等团体，呼吁联合全世界工友一致制裁日本侵略者。

△　美国50万工人在华盛顿集会庆祝国际劳动节。中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代表朱学范在会上讲话，指出：日本现在屠杀中国人的武器54％都是美国供给的，希望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供给日本武器并抵制日货。

5月2日　　国民政府令：陆军中将陈诚、卫立煌晋任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张自忠、孙震特加陆军上将衔。

△　国民政府任命何键兼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黄为副主任委员。

△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命令罗卓英、王陵基、樊崧甫、杨森、关麟徵等各进攻部队，务于3日午后4时继续总攻，限5日击破南昌、奉新之敌，占领之。

△　我军收复山东费县。

△　冈村宁次拟定进犯襄樊战略。左翼由钟祥沿汉水向北猛攻，另以两联队编成迂回兵团，由信阳进逼桐柏，一举歼灭该战区中国军主力。日军总部对此计划迭电嘉许。

△　随县外围展开激战。日军第三师团步、炮3000余人借飞机掩护，向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张轸部守备之随县东北高城猛攻。张部奋勇抵抗，敌未得逞。同时日军第三师团另股3000余人续向第八十四军覃连芳阵地塔儿湾进犯。该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七次，敌我伤亡均重。旋敌施放毒气，官兵中毒甚多。4日，塔儿湾陷落。6日，高城亦被迫放弃，张轸部撤至溧河西岸。

△　日军千余人，汽车68辆，扫荡河北南宫东南垂杨地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一个营在郝家屯伏击，毁日军汽车六辆，毙60余人。

△　日机轰炸福州，死伤平民近1000人。同日，又轰炸河南桐柏县城及平氏镇，平民死伤120余人，平氏镇房屋十之七八被毁。

△　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所办阿訇政治训练班开学，主讲人杜重远、孟一鸣。

△　朱绍良就陇东摩擦事件指示第三区专员应持方针，并电军委会、行政院指出：一、各县驻军应处于监视地位；二、一切纠纷应视为地方事件相机应付；三、以八路军为对象，不涉党派问题。31日，蒋介石复电予以肯定。

△　伪满洲国在长春召开纪念宣诏兴亚国民总动员大会。

5月3日　　日机45架以密集队形狂炸重庆，空军起飞迎战，击落其两架。日机投弹百余枚，其中燃烧弹占一半。

△　薛岳电令第二十九军陈安宝指挥第二十六师、预五师及第七十九师一部向南昌挺进，以预十师、第十六师及第三〇四团围攻沙埠潭以南日军，以使南昌攻击容易奏效。同日，空军配合轰炸南昌日军阵地。

△　日军陷豫北济源。

△　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报告安徽保甲组织积弊严重，指出保甲长责重事繁，无薪无地位；主张应以最低生活待遇，以资补救。10日，白崇禧将该电转报蒋介石，请迅予拨款补救。

△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蒋介石，抗议陇东摩擦事件，要求严令制止。

5月4日　　日机27架再度狂炸重庆。都邮街、柴家巷等繁华市区尽毁，火头达14处，电话、电信、电灯、自来水均被炸毁，全市陷于烟火中。总计3、4两日，市区房屋被毁1200余栋，市民死亡4400余人，伤3100余人。

△　为策应南昌作战，第九战区王陵基部第三十集团军除主力继续监视并牵制武宁之敌外，另以一支队（两团）兵力沿修水南北两岸向张公渡、永修地区挺进。是日，该支队将张公渡之敌驱逐，并破坏该处附近公路桥梁。

△　随枣前线第五战区第八十四军覃连芳部第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在鄂北塔儿湾与日军血战两昼夜，敌施放毒气6—7次，覃部伤亡惨重，塔儿湾失而复得者多次，卒于是日陷于敌手。高城亦被迫放弃，覃部转进蒋家河西岸。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部袭击长白县半截沟，歼敌数十人。

△　延安各界青年一万余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及首届青年节大会，毛泽东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员被逼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我党秘密党员，凡被迫加入时，一律加入，并报上级批准。

△　国民党中常会修正通过《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

△　龙云函汪精卫，略谓："云为公计，务望立下英断，绝对与日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而公亦可无损其历史之令誉。"

5月5日　　白崇禧密电蒋介石、何应钦，提出：对敌之攻击，应"善用声东击西之法，使敌疲于奔命，则我能确保主动地位"。

△　第十六师、第二十六师、预五师等部会攻南昌。是日至次日，一路袭入南昌东侧新机场，一路冲至汽车总站，另一路进至南昌东门外之金盘路附近。第二十六师主力及第七十九师一部，在莲塘附近与日军激战。

△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安徽庐江县东汤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

△　新四军第六团由常州附近越京沪铁路，在戴溪桥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成立"江抗"指挥部，梅光迪、叶飞任正、副指挥。

△　国民政府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

△　重庆各机关设立空袭联合办事处。赈济委员会拨款100万元，急赈被难同胞。是日至7日三日内，重庆市区居民疏散至各县乡村者约25万人。

△　重庆《时事新报》、《大公报》、《新蜀报》、《新华日

报》、《国民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十大报纸因日机轰炸，水电、交通及印刷发生障碍，奉军事委员会令是日起一律停刊，暂由各报发行联合版，组织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公推程沧波为主任委员，黄天鹏任经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芸生任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崔健吾任迁移委员会主任委员。办事处设时事新报社。

△　财政部公布《修正财政部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大纲》。

△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在昆明举行华侨机工返国服务慰劳会，到机工数千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回民连在出击河北馆（陶）大（名）公路沿线一部日军时，在馆陶县善乐镇突遭濮阳专员丁树本部民军袭击，指战员60余人被解除武装。

△　5月初，日军对冀东进行第五次围攻。八路军冀东抗日游击支队采取避免与敌决战，分散坚持，相机打击敌人的方针，经过47天战斗，敌被迫于6月中旬结束围攻。

5月6日　　重庆十大报纸因日机轰炸停刊，暂出联合版，今日联合版开始发行，至同年8月12日结束。

△　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由西安到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联欢晚会。邓在晚会上讲话表示，全国应加紧团结，“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摩擦”。

△　日军飞机轰炸南昌城郊莲塘附近第二十九军阵地，并发动猛烈反攻。军长陈安宝力战阵亡，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重伤，部队损失极重，向莲塘东北撤退。次日，薛岳电蒋介石报告称：“查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凶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至深，敬请重恤。雨卿重

伤，敬请优奖。职指挥无能，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

△　日军自长寿店北犯，与襄花公路正面突入之第一骑兵旅团会合于枣阳县七房岗。9日，遇地方游击队抵抗，即以一部窜新野，主力则犯唐河。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随后，行政院公布《中央补助各省难民移垦经费办法》。

△　汪精卫乘日轮“北光丸”驶近扬子江口。8日，进入吴淞口，今井武夫等上船与汪会谈，汪提出：一、由他建立和平政府，实现中日合作；二、访问日本，就成立政府问题与日本当局谈判；三、新政府应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称之国民政府；并以还都作为建立政府之形式；采用三民主义；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7日　　预五师及第二十六师第七十八旅在南昌市东遭敌猛烈反攻，伤亡约三分之一，当夜撤退至瑶湖附近。

△　湖北枣阳、随县失陷，随枣会战结束。日军一部包围咸宁大屋万，杀害居民108人，焚房420余间。

△　晚，俞济时部新九师一度攻入南昌附近牛行，因兵力单薄，俞部主力未到，且因南昌方面上官云相部攻势遭受顿挫，敌得以自由抽调兵力增援。

△　空军袭广州天河机场，日军损失甚大。

△　日机轰炸河南泌阳县城，投弹40余枚，死伤100余人，毁房2160间。同日，又轰炸福建南靖县，炸死28人，伤30多人。

5月8日　第五战区一部攻入湖北蒲圻，毙日军80余人。

△　第五战区第八十四军第二线阵地被日军第三师团突破，次日

开始向唐河、白河两岸转移。14日到达方城。

△ 国民政府任命李迪俊为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

△ 伪满决定“北边振兴计划”，预算10亿元。

5月9日 白崇禧转达蒋介石停止对南昌之攻击令。南昌会战结束。各部队奉命回复原有态势，在赣江、抚河间及沿抚河东岸之线暂取守势。8月21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蒋介石报告南昌会战该部伤亡损失称：南昌会战自4月22日起至5月9日止，我方参战官兵五万余人，阵亡官144人，兵3330人，马31匹；伤官223人，兵3186人；生死不明官33人，兵1251人；而俘获日军仅“官一、兵六、马五”。

△ 新四军第一团在皖南铜陵、顺安镇之间谢家垄伏击日军运输队，毙伤日军62人。

△ 日机于本日及次日，轰炸福建泉州，毁商店民房数百间。

△ 蒋介石通令西南各省严禁种烟，限本年内各省辖境以及边区地带一律绝对禁种，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容留片苗寸蘖。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密电社会部，报告已将南郑新、旧两生活书店查封，经理贺承先拘捕。

△ 伪满组成“建设勤劳奉仕队”，驱使青年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

△ 汪精卫到达上海。

△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抗议日机轰炸重庆英国领事馆。

5月10日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电蒋介石报告南昌攻击停止后作战指导要领：“（一）第三战区围攻南昌之各部队应以主力

扼守抚河东岸与梁家渡、市汊街之线，同时从速整理，一部仍在抚河、赣江间不断扰袭敌人……（二）第九战区：（甲）罗总司令所指挥部队，其派出敌军后方者仍继续尽量活动，其正面部队之一部以消耗敌人之目的相机出击，但不可强攻据点。（乙）第三十一集团军应窥破有利时机，可另派出有力一二师配合轻装炮工兵，进出于蒲圻方面，袭击并截断各交通线。（丙）湘西方面应注意湖防、江防并加紧该处工事。（三）各战区对敌情之搜索，均须加紧实施，尤须注意积极捕捉俘虏，俾明敌情。”

△　顾祝同电蒋介石报告南昌会战溃败原因，主要为：一、未能用奇袭出敌不意；二、限于地形，复受敌纵深据点扼制，无迂回钻隙余地，不能避免攻坚；三、炮、工兵太少，步兵准备不全，攻坚无力；四、敌飞机活跃，并用毒气，因地形关系，我损伤过大；五、各师奉命限点攻击，准备多不周到，致动作不能协同一致。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于肥城县陆房地区抗击日军围攻，战至12日胜利突围，歼敌8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在山西繁峙县盘道村、土川里、口泉村、龙泉关等地痛击日军独立第三混成旅团。14日，敌一部逃至上、下细腰间，被该旅陈宗尧第七一七团、陈外欧第七一八团南北夹击，激战至15日，全歼该敌。

△　日军陷豫南继阳、新野等地。

△　外交部向英、法、美三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要求转饬各该国在华租界当局，不得干涉上海租界内中国居民自由悬旗。

△　财政部修正公布《土制雪茄烟征税暂行办法》。

5月1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薛岳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为副总司令。

△　国民政府任命贺国光为重庆市长，原任蒋志澄免职。

△　蒋介石电谢英国国会议员关怀我国抗战。

△　我军收复豫南新野，并再克广东江门、新会。

△　八路军陆房突围获胜。日军第一一四师团等部主力约5000余人，在第十二军司令官高寿造指挥下，于月初分由泰安、大汶口、宁阳、汶上等地出动，向八路军泰（山）西根据地举行九路围攻。9日，开始合围泰（安）肥（城）山区陆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勇第六八六团、孙继先津浦支队等部，依托陆房周围山冈构成环形阵地，是日，在陆房歼敌1300余人后，从日军包围缝隙中悄然突围。

△　八路军晋冀豫、冀南军区部队对正太、平汉铁路进行破击，毁火车三列，汽车四辆。

△　国联水利专家荷兰人蒲德利奉派来华帮助水利建设，是日与经济部技士张炯、西南运输总处委员胡运洲在金沙江勘测水利试航途中，在云南巧家县老君滩覆舟遇难。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派代表向国联驻华办事处表示哀悼。6月1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特给蒲德利抚恤费一万元，给张、胡抚恤费各5000元。

△　日军侵占鼓浪屿。日借口鼓浪屿岛屡次发生反日事件，派陆战队在该岛登陆。因该岛系公共租界，6.5万人口中外侨400多人，日军登陆后，美、英、法等国均表不满。

△　孔祥熙特使樊光及中央银行秘书姚瑛，在上海与日方代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密商“和议”问题。

△　日、苏两军在诺门坎发生冲突。

5月12日　　军令部拟定第五战区作战指导方案。方针：“以消耗敌人战力之目的，对由钟祥向北突进之敌，先予以严重打击，务求保

持汉水以东地区。如状况万不得已时，则以一部留置大洪、桐柏两山脉牵制敌人主力，转进南阳及襄樊西北迄南漳、保康一带地区，阻敌深入，屏障西安、汉中，并掩护江防军之左翼。”同日，蒋介石分别密电程潜、李宗仁及张自忠、郭忏等，督促随枣作战。

△　日军侵占河南桐柏、唐河、南阳。旋遭牟廷芳部第一二一师反击，退出南阳，集结于枣阳以北地区。

△　日机27架空袭重庆，在江北等地投弹数十枚，被高射炮部队击落三架。

△　日军“扫荡”山东狼山一带，杀害民众88人。

△　厦门汉奸洪立勋被刺，日军陆战队在鼓浪屿扰乱。

△　经济部修正公布《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事业奖励办法》，凡11条。规定凡经济事业华侨资金占资本总额60％以上者得给予下列奖励：一、经营技术上之指导与协助；二、捐税之减免；三、运输之便利及运费之减低；四、公有土地之使用；五、资本及债票之保息；六、补助金之给予；七、安全之保障。另如遇特殊困难可呈请经济部救济。

△　经济部公布《经济部管理煤炭办法大纲》，凡11条。

△　伪满产业部公布设置粮谷管理区，制定配给计划和输出入方针。

5月13日　随枣前线日军开始沿进攻路线向钟祥、京山、安陆、应山撤退。第五战区部队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遂行尾随追击。

△　国民政府令：程潜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卢汉加陆军上将衔。

△　军事委员会发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凡34条，目的是“为使

全国游击队统一化、军队化、纪律化，俾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指导之下辅助正规军作战，争取最后胜利”。条文中有“应注重特务工作，对内侦察各官兵之言行，严防奸细及肃清内部不稳分子”等项规定。

△　空军飞江西奉新助战，并于南昌、安义之线轰炸日军阵地。

△　美国政府令驻日大使格鲁，抗议日本空军滥炸重庆、汕头、福州等地无辜市民。

△　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大佐从上海回东京，向日本参谋本部报告和汪精卫会谈情况。23日，影佐亦向东京作筹组汪伪政权的报告。

5月1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缪培南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　汤恩伯、孙连仲两军自豫西南下，攻克新野、唐河。

△　我军收复豫南岳口，日军溃窜天门。

△　日机狂炸汕头、翁源。

△　外交部长王宠惠为日军在鼓浪屿登陆发表谈话，略称：日本轻蔑第三国利益已非一日，今在鼓浪屿登陆，说明列强欲维护其在远东利益，必须对日本侵略者立即采取强硬措施。

5月15日　国民政府特任徐源泉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对随枣全线反攻。22日，随枣会战以日军全线总退却告以结束。

△　豫南我军克复唐河。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于灵石县吕家庄、中庄等地抗击日

军，毙伤敌200余人。

△　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在《抗敌》杂志发表《关于铜（陵）南（陵）繁（昌）地区如何与敌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一文，提出：揭破敌人的政治欺骗与怀柔政策；反对汉奸政权及户口登记；禁止粮食出口资敌；抵制仇货；组织民众武装自卫队，平时防奸锄匪，巩固后方，战时配合作战。

△　南昌沙潭据点日军借口搜索中国士兵，火烧困在沙潭龙南天仙庙的370余名难民，320余人被烧死。

△　《中央日报》昆明版出版发行。

△　英国驻远东舰队司令诺贝尔为日军侵占鼓浪屿向日军当局提出抗议，声称日军如不全部撤退，各国军队亦将登陆。16日，英、法、美三国海军陆战队共150人在鼓浪屿登陆。17日，该岛日军被迫撤走，仅余42人。

5月16日　蒋介石以日机狂炸各地平民，是日在重庆发表《告各省市政府与全国同胞书》，指示加强防制，号召全国同胞积极疏散，加强组织，以强固抗战精神之堡垒；各省、市地方政府应遵照中央规定，指导民众，切实执行，竭尽救抚职责。

△　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赣北方面改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

△　第二集团军一部攻克豫南桐柏及淮河店。

△　我军攻入徐州，焚毁日伪机关，城内一片混乱。

△　东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唐聚五于河北平台山殉职。

△　南京伪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开始营业，并发行伪钞华兴券。

5月17日　班禅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重庆向蒋介石献旗，表示要为国家民族尽忠尽孝，尽藏族一分子天职。

△　我军攻入济南千佛山八里凹，歼敌数百名。

△　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于本日及31日，先后攻克栖霞、莱阳县城，重创伪军刘桂堂部。

△　日机三架对参加河南舞阳县王店乡寺门古刹大会的群众进行轰炸，死伤民众达500余人。

△　日本海军舰艇猛犯浙江镇海广远炮台，日本海军航空队同时空袭汕头及马尾。

5月18日　国民政府委员兼蒙旗宣抚使沙克都尔札布偕国府委员赵允义、蒙旗宣抚使秘书长荣祥、绥远各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严等10余人，乘车经延安返蒙，是日到延安。中共中央统战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及各界群众代表1000余人前往延安城外欢迎。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报天津民先队活动情况，要求各省、市党部及教育部参照《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政策。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于博野县刘村、宋家庄抗击日军，毙伤敌近100人，毁装甲车一辆。

△　日军秋本部炮击潼关，日本陆军航空队亦飞往助战。次日，日机两次轰炸潼关。

△　日机27架轰炸湖北随县城关镇，投弹150枚，民众死亡近800人。

△　日本投诚见习参谋中山觉在长沙历数日本军阀罪行，指出日本军阀利用70年来忠君教育之深固基础，驱日本大众参加侵华战争。

5月19日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枣阳，随枣线日军主力向大别山以南原阵地撤退。

△　粤境我军连克增城、从化及花县要点。

△　赣省我军收复大同圩，歼敌数十人。

△　日军分两路入侵山西阴县下立泉村，杀害民众22人，重伤四人。

△　国民政府令免钮永建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兼职，特任李培基为铨叙部部长。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反顽斗争方针和政策界限。

△　国际反侵略大会会长薛西尔致电中国分会，谴责日机轰炸重庆。

△　台湾总督小林宣称，治台重点为：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

5月20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奉蒋介石令将陕北23县划为五区，陇东八县划为二区。陕北各区辖县分别为：榆林区辖榆林、神木、府谷、横山；绥德区辖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定安；肤施（延安）区辖肤施、甘泉、延川、宜川；保安区辖保安、安塞、定边、靖边；洛川区辖洛川、中部（黄陵）、鄜县、宜君。陇东各区辖县分别为：庆阳区辖庆阳、合水、镇原、环线；泾川区辖泾川、灵台、宁县、正宁。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制订《推进陕甘宁边境党务办法大纲》，

决定对于陕甘宁边境党务实行长期分区督导制，采取秘密方式活动。

△　国民政府任命贺国光兼重庆卫戍总司令。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对侵占易县之敌发起进攻，歼敌400余人。

△　皖南荻港、顺安日军分数路进攻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第三支队一部激战四天，毙伤敌300余人。

△　财政部公布《财政部委托战区各省政府暂行代征统矿烟酒各税办法》。

△　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要求即将召开之国联行政院会议实施历年决议制裁日寇，采取集体行动援助中国，断绝对日金融及贸易关系。

△　胡世泽在国联禁烟顾问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上，斥责日本利用鸦片毒害我国同胞之罪行。

△　伪满宣布设立宪兵总团。

5月21日　　李宗仁密电徐永昌报告第五战区反攻情况："（一）我军全线总反攻，击破敌军之总作战计划，不惟进攻长沙之计划受打击，而且到处反攻，牵制敌之兵力甚大，遂使手忙脚乱，到处无兵可调。现华南、华北、华中之敌军最高指挥官正在急电敌军部请援兵，敌军深感全线受制，百孔千疮，顾此则失彼，实感难于应付，现正重新调整总作战方针。（二）敌称我军此次总反攻，分散敌方兵力，确收伟大效果。"

△　第八十三师进袭晋南翼城之南城村、白马村等地。

△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常年大会，林

森、蒋介石呼吁和平国家一致遏制日本侵略野心。

5月22日　冀南我军克清河，歼日伪七八十人。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与日伪军激战于江苏无锡梅李镇，毙敌400余人，俘300余人。

△　日军一部窜入湖北通山县城，屠杀民众70余人，毁房195间。

△　国联行政院常会在日内瓦开幕，中国政府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发言，要求会员国进一步于财政上、物质上援华，并禁止以军用品运往日本。

5月23日　第五战区一部克复鄂北随县及大畈镇。

△　日伪军包围河南延津县野厂，并施放毒气，杀害民众100多人，毁房500余间。

△　行政院决议设立垦务总局。

△　日本驻厦门总领事内田向英、法两国领事及鼓浪屿租界当局要求改组租界行政，并以厦门伪维持会为地方政权主体。

5月24日　毛泽东致函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和印度国民大会给予的医疗和物质援助，并告知印度医疗队已在此开始工作，受到八路军全体指战员非常热烈的欢迎。

△　鄂中、鄂北我军连克重镇；通城及新墙河北岸仍有激战。

△　冀西我军攻克完县。

△　日军封锁鼓浪屿，禁止我船只往返。

△　日军“扫荡”上海南汇潘家泓，杀害渔民26人。

△　栒邑事件。陕西省栒邑县八路军残废院采购员陈通出外购物，被栒邑保安队杀害。次日，该院代表20余人赴县交涉，要求惩办凶手。该县县长不作答复，反指令保安队开枪射击，伤亡九人，嗣又增兵千余，围攻八路军独立营。30日，冲突继续扩大，双方互有伤亡。31日，八路军被迫由栒邑撤防，栒邑被占。

△　财政部颁行《出口货物免税品目表》。

△　英国驻华武官司品烈上校往华北八路军晋绥根据地旅行，在张家口被日军扣留。

5月2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林岳生为第四十九军副军长。

△　蒋介石密电李宗仁：“随、枣一带敌大部均已南撤，我为牵制敌兵力，使其不能进窥荆、宜，或转移其他战区，并疲惫敌人计，着孙震集团以主力（至少两师）推进随县附近地区，与张轸、刘和鼎军相协力，扰袭敌人。”“所有第一线部队应不断以小部袭击敌人，与敌保持接触。”

△　日机26架袭重庆，被击落两架。日机投弹100多枚，死伤各百数十人。

△　日军自本日下午6时起封锁鼓浪屿，禁止一切船只往来于鼓浪屿与大陆间。

5月26日　国民政府令派李平衡、杨荫溥为出席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副代表，林良桐为顾问兼秘书，徐传保为雇主方面代表，杨和庆为雇主方面顾问，朱学范为劳工方面代表，张天开为劳工方面顾问。

△　国民政府特任周钟岳为内政部部长，免去原任何键本职；特

派何键为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沈发藻为第二军副军长，彭兰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曾友仁为第六十五军副军长。

△　日机五架轰炸福州，毁房屋甚多。

△　日本海军发言人宣布封锁中国大陆海域。英、法随即对此表示抗议，美国亦表示予以密切注意。

△　经济部公布《经济部管理水泥通则》。

5月27日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二十八年广西省六厘公债条例》，定额800万元，16年还清。

△　日军再犯湘北新墙河北岸，被击毙400余人。

△　上海《华美晚报》发表社论，痛斥汪精卫卖国投敌。

△　国联行政院通过援华决议，呼吁“各会员国采取一切可能及有效办法援助中国之抗战”。

5月28日　　随枣会战结束。襄东日军第三、十三、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分路转移，日军未能达到作战目的，遗尸5000余具，仓皇东窜。第五战区先后收复唐河、新野、枣阳、随县，恢复原有态势。另据日方公布，中国军队遗尸约1.5万具，被俘约1600名；日军死亡约650名，负伤约1800名。此次战役后，蒋介石对第一、第五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变更如下：一、主力退至汉水以西地区；二、湖北、河南作为游击区。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同意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表示的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反汪运动的意见。并指示南方局注意两点：一、利用反汪运动机会广泛地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运动，

以达到巩固国共合作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二、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坚决主战的军政人员公开说明，汪在国民党内及政府中还有不少同情分子，因此，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实际上要采取必要的办法，防止他们的一切阴谋。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于本日至6月2日在易县塘湖、白堡等地抗击日军，共毙敌200余人。

△　日军包围江西南昌荷埠周村，1000余人被杀。

△　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主要内容为：一、由他主持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并授权由他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实行改组国民政府；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北两政府宣布取消。

5月29日　　蒋介石电令外交部处理敌伪派奸商用伪币收购丝茧事。

△　冯玉祥在重庆发表讲演，痛斥汪精卫。指出："我们应毫无顾惜的挖掉"汪精卫这块"腐烂的肉"，"同时还要肃清汪精卫的思想"，"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更早的到来"。

△　晋西中阳、离石剧战，歼敌数十人。

△　日伪军在山东沾化县城（今古城镇）"扫荡"，杀害义和庄、蒲台、小河村民众200余人。

△　日军包围徐州基督教堂，捕去中外教士、教友300余人，其中70余人惨遭酷刑。

△　英、美、法三国驻华大使及海陆军司令集会上海，讨论对日一般问题及加强三国之合作。

5月30日　国民政府公布云南省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名单：议长李鸿祥、副议长赵钟奇。

△　国民政府令派李书华、叶恭绰、李四光、曾镕浦、施乐诗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沛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张寿（李兆麟）为总指挥。

△　日军2000余人自湖北钟祥南犯多宝湾罗汉市，一股渡襄河窜抵潜江。

△　晋西大武、临汾日军分股西犯，被歼200多人。

△　日军在广东汕头澄海各乡屠杀民众300余人。另从金沙乡抓走青壮年700多人，送菲律宾等地充当劳工。

5月31日　蒋介石以推行政令要领训示党、政、军各主管机关，大讲十年内战期间的“剿共”经验，强调对命令“要绝对服从”，“视令如命”。

△　周恩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讲《二期抗战的重心》，指出二期抗战重心在敌人后方，任务是建立游击根据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　国民政府特派孔祥榕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　日机九架轰炸河南镇平韩营村，炸死34人，毁房200间。同日，日机七架轰炸福建惠安县城，死伤几十人。

△　鄂境襄河沿岸血战；沙港克复。

△　厦门日舰上军机今日及次日，轰炸闽南各地。

△　日军岩松中将赴扬州，在瓜洲下轮时遇刺重伤。

△　日军部在上海设立负责扶植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之特务机关，因地址设在日人之梅花堂，故对外称梅机关，由影佐祯昭负责。

△　汪精卫、周佛海等11人离开上海，于6月1日抵东京，洽商成立伪政府事。

△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致牒英方，限6月7日午前将刺杀程锡庚的四华人嫌疑犯引渡给日方。6月1日，天津日军司令部再次向英租界当局提出最后通牒。

△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演说外交政策，表示将积极援华。

是月　　军事委员会训令颁行《坚壁清野实施办法纲要》，凡11条。

△　蒋介石电令各战区发扬攻击精神，消耗日军战力。

△　天水行营向蒋介石呈报华北现状，略称：游击战争由于“缺乏领袖，无准备，无政治宣传，缺乏军火”而“崩溃”。提出“今夏必须收复河北中部”，办法是“省界似可废除，藉以建立战略上之游击根据地”；“政府官吏须严格奉行游击战略”；“派遣技术人员，供给大量炸药”。蒋介石批交军令处参考。

△　新四军鄂东第六游击大队奔袭黄陂县伪军司令部，俘伪旅长以下300余人。

△　经济部设立采金局，经办自采金矿、协助民营金矿及代取生金。

6月

6月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薛岳兼新编第六军军长、沈久成为副军长，彭毓敏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　军令部编《南昌会战所得之教训》一文，检讨南昌会战军队十大过失为：一、阵地未能纵深配备；二、敌情侦察判断不确实；三、指挥官位置不适当；四、不能彻底破坏交通线；五、预备队使用过早；六、出击时间、空间计算不正确；七、缺乏协同一致精神；八、掌握联系不确实；九、奉行命令不彻底；十、必胜信念不坚决。

△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皖东北萧县张山集、前杨庄一带，粉碎日军的六路进攻，歼敌300余人。

△　新四军一部伏击由江苏金坛开溧水的日军，毙100余人，毁汽车七辆。

△　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分散游击战，向敌之侧后薄弱点和交通线出击。至7月中旬，共作战20多次，歼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巩固了鲁中抗日根据地。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局组织大纲》和《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准予备案施行。

△　国民党中央党部函行政院称：据中央委员邓青阳视察广东区党务报告，“各县办理兵役多有不根据壮丁名册抽签，而以乡村人口摊派名额。姑无论其抽签或摊派，其以钱买人替代者60％以上。且其抽签亦非公平，常有乡长从中渔利及强族欺压弱族之弊”，原因是“乡镇保甲责重事繁，权轻费少”；认为继续推行自治制，要提高乡镇保甲长待遇。

△　教育部公布《私人讲学机关设立办法》，规定：“私人讲学机关设立后，本部将随时派员视察。其有违反规定者，即予取缔。”

△　国民政府委员萧佛成病逝泰国曼谷。24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给治丧费5000元。

△　经济部在浙江金华召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六省交通会议，决定六省实行联运，以使农产品畅销内地，活跃战时经济。

△　《中国妇女》月刊在延安出版。

△　天津日军司令部再次向英租界当局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引渡程案四华人事在一星期内予以满意答复。

△　汪精卫、周佛海等飞抵东京。

△　伪满实行大米配给制，禁止一般人民食用大米。

△　日本驻美大使堀内演说，盼强化美日关系。

6月2日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组成，南、北慰问团分赴前方慰问。

△　周恩来将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著《一月来华北战局概况》一文及总统计表函送国民政府联络人员刘维京。6月，刘维京复函称："备悉十八集团军在华北英勇作战事迹，读之兴奋异常。"

△　上海全市市民通电声讨汪精卫密赴日本向敌屈膝。同日，上海青年联合会及大、中、小学全体教职员亦通电讨汪。

△　英国驻华使馆派秘书兰莱纳及天津英国驻军长官特拉明赴张家口，调查司品烈上校被捕事，日方拒绝兰、特两人与司品烈会见。

6月3日　　蒋介石为林则徐禁烟百年纪念发表训词，限全国一二年内禁绝鸦片。同日，重庆市举行禁烟纪念大会，限令各土膏行、店于6月15日前停闭，烟民于6月30日前一律自行戒绝。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于灵丘作新村、大作村一带伏击日伪军，歼敌300余人，毁汽车五辆。

△　日军包围湖北咸宁朱桥，杀害民众51人，毁房屋40余间。

△　日机七架轰炸宁波，炸死八人，毁房130余间。

6月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俞济时为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霍揆彰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津浦路曹村车站附近粉碎日军的进攻，歼敌300余人，毁汽车三辆。

△　日军第五师团及第二十一、三十二、一一四师团、独立第五旅团各一部和伪军二万余人，“扫荡”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始反“扫荡”作战。

△　日机两批轰炸福建上杭县城区，炸死15人，伤30人，毁房93间。

△　日本工商省决定日本中小工商业者向伪满迁移的方针。

6月5日　　晋西柳林激战。日军分三路大举西犯柳林，夺取军渡。第二战区第十九军等部与敌激战十余日，伤亡惨重，柳林、军渡失而复得。同时，陕甘宁边区河防部队以猛烈炮火封锁河西，粉碎日军自宋家渡河的企图。

△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在皖东北宿县符离集以东小时村粉碎日军进攻，毙伤日军100余人。

△　空军炸广州西村及新会西陲日军阵地。

△　萧劲光电告蒋介石，陇东镇原、宁县八路军被围，形势紧迫；栒邑方面除杀害八路军伤病员27人外，又复大举增兵，要求制

止。

△　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会议，对汪精卫提出之《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出决定：一、汪精卫在建立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应与吴佩孚及“临时”、“维新”两政权合作。中央政府之组成及地方自治之程度，不得违反日本既定方针；二、国民党代表大会应避免在南京举行；三、允许采用国民政府名称及青天白日旗，但需在旗帜上方附加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攻救国”四字；四、其政府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最高指导方针。中央政府成立后，应与日本正式调整邦交；五、汪政权成立时间，预定在本年内。

6月6日　　中条山血战，第一七七师防线被冲破，1000余官兵大部壮烈殉国。血战期间，黄河沿岸民众被杀300余人。

△　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于邹平县刘家井子抗击日军合击，战至次日，歼敌400余人，突围转移。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江南部队作战部署，拟调第六十三师和钱塘江南岸守备队等向杭州、上柏、武康一带日军袭击。

△　国民政府派梁龙为议定中罗（罗马尼亚）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国民党“剿共”别动总队在四川浮图关开会，由康泽主持，参加者有总队长刘伯龙、副总队长马维骥等33人。决议结束该别动总队，改编为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师正规部队。

△　前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病卒天津。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给治丧费一万元。

△　天津英租界当局复牒日方，以刺程案四华人嫌疑犯证据不足，拒绝引渡。8日，日方第三次提出通牒，限48小时答复。

△　日本大本营下令攻占汕头。作战部队为第二十一军和第五舰队，分别由安藤利吉和近藤信竹指挥。

△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和“临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之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二、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事先接受上述原则；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础力量，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原则下，可允许存在。五相会议还具体制定对汪《工作指导草案》，确定五相及前首相近卫与汪会谈。

6月7日　　美籍航空顾问陈纳德上校，向蒋介石呈复霍克机训练责任及建议报告。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以书面提议形式向国民党方面提交关于“合理与公正”解决两党冲突的建议。要求明确划定18县（延安、甘泉、鄜县、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定边、保安、安塞、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盐池）为边区所辖地区，五个整县（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及两个县（神木、府谷）的一部分为八路军补给区，撤退陕、甘两省派往上述地区的县长及驻军、保安队；承认八路军为河北作战主力，担负晋察冀边区作战之责；准予八路军扩编为三军九师并增加军饷；允许八路军及中共党员代表参加河北各级政府和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

△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通电声讨汪精卫，要求通缉归案，明正典刑。

△　日机六架空袭浙江镇海，被击落一架。同日，日机七架轰炸湖北恩施，引起全城大火。

△　日机于是日至10日，轰炸山东沂水东里店村一带，村民死伤300余人。

6月8日　　国民政府明令严缉汪精卫。令称，汪逆通敌祸国，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缉拿，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　国民政府为防止日本盗取成吉思汗陵寝决定移陵，并派沙克都尔札布为起陵主祭官，图布升济尔葛勒、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七人为起陵致祭官，贡布扎布、楚明善、唐井然等三人为护送专员。是日，邓、高、楚、唐等汉、蒙官员分别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及苏定霍洛等地致祭成吉思汗陵寝及遗剑。10日，开始由伊金霍洛移陵。15日，陵寝抵达榆林。16日，继续奉移南下。

△　日军陷晋南平陆。

△　国民政府公布《都市计划法》，凡32条。

△　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开会，决议拥护罗斯福总统和平倡议，并向中国抗战工农致敬。

6月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宋英仲为第七十军副军长。

△　日机27架袭重庆，炸死炸伤居民九人，空战中日机被击落三架，炸死平民九人。

△　是日至7月1日，生活书店湖南沅陵分店，湖北宜昌分店，浙江金华分店、丽水分店，江西赣州分店、吉安分店，安徽屯溪支店等，先后被当地政府封闭或停业。

△　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决议将日本毒化中国暴行列入报告书中。

6月10日　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叶剑英，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

△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报告，指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其反共活动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　我驻法大使馆电呈外交部：英、美、法三国希望中国继续抗战。

△　日军侵陷山东莒县及沂水。

△　日本首相平沼在东京接见汪精卫，表示充分支持汪建立中央政府。

△　国联禁止鸦片委员会在日内瓦发表声明，指斥日军在其侵占区强迫群众种植鸦片，毒害中国人民。

6月11日　晋南我军收复平陆、茅津渡。

△　晋西由中阳、离石西犯日军受挫，我军连克军渡、柳林等处。

△　日机27架夜袭成都，华西大学中弹三枚，炸死女学生一人。另27架空袭重庆，使领馆多被炸。蓉、渝两地，我军击落日机五架。

△　进攻汕头日军在庵埠杀害民众100多人。

△　河北省保安司令、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400多人，造成“深县惨案”。

△　张荫梧电蒋介石称：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

6月12日　陈立夫密电陕西省党部派女特务打入延安女子大学，借以探明女大训练妇女干部情报。

△　平江惨案。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部派特务营一部到平江嘉义镇包围新四军通讯处，将参谋涂正坤及秘书吴贤众杀害。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秘书吴渊、新四军少校秘书曾金声及家属赵录等六人活埋于黄金洞。

△　教育部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

△　南京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病卒上海。

△　天津日军宣布，于48小时内封锁英、法租界。

△　汪精卫与日本海相米内光政会谈，米内表示支持汪建立中央政权。

△　日本“满洲勤劳奉仕队”到长春。

6月13日　国民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孙科与苏联特派全权代表米高扬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贷于中国1.5亿美元协定。

△　国民政府公布湖北省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名单：议长石瑛、副议长李四光。

△　军事委员会公布《优待俘虏须知》，凡25条。

△　第四战区驻翁源部队遵照余汉谋命令，向汕头方向移动，以阻止日军进攻。

△　日机轰炸常德、桃源、赣州、福州、南宁。

△　中苏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贷于中国1.5亿美元协定》。

△　汪精卫与日本藏相石渡庄太郎会谈，石渡表示支持汪建立中央政权，但要汪实行新的财经政策，与日本经济提携，共同开发中国地下资源。

6月14日　　经济部公布《植物油掺合及替代柴油暂行规则》、《经济部管理锡业规则》。

△　我军克复豫北内黄。

△　日机六架轰炸湖南益阳，市民死伤97人。江西吉安、樟树、新淦、峡江等地亦遭空袭。

△　汪精卫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会谈，有田表示日本一致支持汪建立中央政府。

△　汪精卫与日本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会谈，近卫告诉汪：应为收拾时局作出最大努力。

△　天津日军在英、法两国租界入口处设置障碍物，对租界实行封锁。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日军封锁事发表谈话，望列强采取集体行动制裁日本。

△　英国内阁讨论日本在天津制造紧张局势，拟定在经济上对日本报复手段：一、对停泊英港口日船须征特种捐税；二、限制日货输入英属各殖民地，并加征进口税。

6月15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拥护通缉汪精卫。

△　国民政府派朱绶光为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副指导官。

△　中共中央任命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兼新四军第四

支队司令员。

△　空军轰炸南昌日军阵地。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一部在山西灵丘附近击溃日军500余人，缴获机枪19挺。

△　日军围袭山西夏县文德村，杀害民众128人，毁房600余间。

△　日军封锁鼓浪屿。

△　教育部密颁《对民先队基本救济办法》，分为对民先队员进行“特种训练”和“感化”为主的“积极办法”与“给予开除、留校活动，由党部给予严厉制裁”的消极办法两种。

△　汪精卫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第二次会谈，板垣要求：一、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要在旗帜上面缝一块表示“反共和平”的三角黄布；二、同意取消“维新”和“临时”两政府名称，但须尊重其内容与事实，并在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用分治合作的原则，其成立时间要与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四、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地点避免在南京。

△　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对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之希望》：一、日本在各级政权中应不设置政治顾问或具有类似名义之职位，不占有或操纵各种或各个税收机关；二、确定最高军权的独立性，在最高军事机关设立顾问团，招聘日、德、意三国之军事专家组织之。中央政府建交后，日军应进行局部撤退；三、迅速交还中国公私营工矿企业，对合办事业应重新进行合理估价，与“临时”和“维新”两政府所订契约，给予再次审查的余地。

△　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作出关于处理第三国在华活动及权益的措施要领，决定以使第三国放弃援蒋态度，顺应日方处理事变之步

调为方针；关于租界问题，可采取封锁、直接搜捕以至军事占领等措施；关于长江、珠江等内河航行权及商权问题，可“实行加强封锁程度和扩大封锁范围”，但“当第三国有转向日本的具体表现时，只要不影响战争进行，可以逐步恢复其活动及权益”。

6月16日　国民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孙科与苏联特派全权代表米高扬在莫斯科签署《中苏通商条约》。

△　空军炸风陵渡日军炮兵阵地，炸毁炮十余门。

△　日军在马公集结，准备进攻汕头。

△　《新华日报》宜昌分销部被当地政府查封，负责人被捕。25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宣部，要求纠正谬误处置。

△　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提出之《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出决定：一、中央政府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二、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旗帜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三、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须理解只取消其名称，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之协定及其他决定，中央政府必须继承；四、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具有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五、对于国民政府与外国签订之条约和协定，中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或修改。

6月17日　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促美国政府对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事作严正表示。

△　国民政府加派张继参加前线战士慰劳代表团。该团南、北两团公推张继为总团长。

△　陕西省政府决定整修黄帝陵，并设陵园管理处。

△　日伪军围袭河北冀县东兴村，杀害村民148人，重伤53人，

烧毁民房500余间。

△　日伪成立“华中棉产改进会”。

△　美国民意大多数同情我国，并赞成对日本军用品禁运及拒买日货。

6月18日　周恩来离重庆返回延安。在路经西安时，会见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研究调解各地摩擦的具体办法。

△　我军在中条山击败日军。

△　日机三架空袭江西修水梁口，投弹10余枚，炸死72人，毁房30多间。

△　汪精卫结束在日本的活动，由影佐祯昭等陪同离日。

△　日本关东军及伪满军再次进攻外蒙古。

△　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在迫使英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盼日重新考虑，否则将采取步骤保护其在华权益。

6月19日　国民政府公布《经济部合作事业管理局组织条例》及民国二十六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第二次追加预算书。

△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抗击日军对平西根据地的“扫荡”。经七天作战，毙伤敌300余人。

△　日机是日起连续三日，轰炸江苏宜兴县徐舍等地，投弹80余枚，死伤居民100余人，毁房200余间。

△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谈日军封锁天津英、法两租界事，表示望纠纷能就地解决。并称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现在亦正与日本政府

交涉，以冀现行局势趋于澄清。英国政府仍与美、法两国政府密切保持联络。

6月20日　　日机10架空袭汕头，日舰30余艘向汕头外围岛屿进犯。

△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会商天津事件，日本要求英国放弃亲蒋反日政策。

△　英、法在新加坡开军事联防会议，决议双方协力保护在华租界与财产。

△　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演说，指责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及轰炸中国各地。

6月中旬　　蒋介石会见周恩来、叶剑英，会谈河北冲突问题。蒋说：八路军不停止进攻就不能谈判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最后双方同意派人调查。

6月21日　　蒋介石电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速派得力部队保护滇越铁路桥梁。

△　成吉思汗灵榇途经延安，延安各界人士隆重举行祭典。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及政府代表高仲谦等与群众万余人参加祭典。25日，成吉思汗灵榇抵西安，蒋鼎文等迎接致祭。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杜聿明代第五军军长，周士冕为第二十七军副军长。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于平山县小觉、清水口之间抗击日伪军进犯，毙伤敌200余人。

△　日军在汕头附近新港、梅溪登陆，次日陷汕头。

△　日机轰炸山东胶南县六汪集，炸死20余人，伤10余人，毁房30余间。

△　张荫梧率河北民军三个旅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第三纵队吕正操部，吕部驻刘家庄官兵伤亡过半。22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二团、第七一五团各一部，在深县张寨寺地区将张荫梧所部全歼。是役共毙伤张部500余人，俘旅长以下2000人。

△　香港学生举行反日大示威。

6月22日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为弃守汕头在重庆对记者谈话称："敌军攻占汕头，就军事上之意义而言已无价值。"又称：日占汕头之主要目的，为"侵夺各国在太平洋沿岸之权益，驱逐欧美在中国之势力"。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是巩固自己，准备自己，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联络友军，巩固统一战线，反对投降，以坚持抗战。而华中方面，中心任务则是发展。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于平山县柏岭附近之南北姚清截击日伪军，毙敌400余人。

△　日军陷晋南垣曲。

△　日机六架轰炸福建长汀，炸死150余人，毁房100余间。同日，日机又轰炸浙江象山县丹城墙头，死伤14人，毁房20余间。

△　上海外汇猛缩，存户纷纷向银行提取存款换外汇。财政部下令限制提款，规定存款数目超过500元以上者，每周提取数目不得超过500元。

△　日、“满”机120架与苏机90架，在中苏边界地区空战，日、“满”机被击落31架，苏机被击落12架。

△　首批美援物资卡车510辆、军用布300吨到达海防，开始内运。

6月2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俞济时兼第八十六军军长。

△　江南抗日义勇军夜袭京沪铁路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50余人和伪军一个中队，炸毁铁桥一座，使京沪路停运三天。

△　日军陷浙东定海，枪杀抗日分子29人。

△　日机39架轰炸湖南常德，投弹500余枚，城内外六处起火。

△　经济部核准《经济部燃料管理处维持岷江流域各矿生产办法》，凡九条。

△　北平伪临时政府向英总领事提出四项要求：一、移交“恐怖分子”及“共产党”；二、与日货币政策合作；三、检查华商银行；四、禁止一切攻击伪政府言论及印刷品。

△　日兴亚院会议决定，从6月份起，每月由中国海关关余金额内拨200万元作吴佩孚工作费用，连续付五个月，以收买吴佩孚。

△　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再度抗议日军在天津之野蛮行动。

6月2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耀武为第七十四军军长。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与日军激战于山东曹县玉堤圈。毙敌150人。

△　新四军游击支队袭击皖北怀远县城，击毙日军数十人。次日，再袭怀远县城，歼日军一部。

△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表龙厂被新四军军部错杀。

△　河北民军第四团团长朱程率部脱离张荫梧，接受八路军领导。

△　国民政府明令《公库法》施行日期及区域，规定国库除新疆、云南、青海、宁夏四省暂缓施行及游击区或接近战区地方确有特殊障碍者外，均自本年10月1日起施行。各省、市、县库自翌年1月1日起施行。

6月25日　晋南我军攻克垣曲。

△　日军后藤支队自汕头开始进攻潮州。次日，击败枫溪附近余汉谋部独立第九旅主力。日军进攻期间，在梅溪一带杀害洪厝乡村民170余人。

△　日机轰炸福建武平县城，投弹30余枚，炸死32人，伤37人。

△　延安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汉奸李省三。八路军后方军事法厅主审官胡耀邦宣判李死刑，立即执行。

△　汪精卫抵北平，会见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并和王克敏晤商组织伪联合政府。汪曾约吴佩孚在杉山元官舍会面，遭吴拒绝。

△　美国通知日本废止《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6月26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奉蒋介石令，密订《共产问题处置办法》，凡五章63条。同日，陈诚将所拟办法函送徐永昌核签意见。28日，徐永昌函复陈诚同意。该办法于月底秘密颁布。

△　晋东南根据地游击支队一部在蚌埠以西常家坟设伏，击毁日

军汽艇一艘，歼敌数十人。

△　教育部决定本年度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考新生。聘罗家伦、王星拱等19人组成招生委员会，设重庆、成都、南郑、昆明、贵阳、辰溪、桂林、延平、上海、兰州、恩施、泰和、永康、曲江、镇平15处为招生区。

△　驻英大使郭泰祺会见英外交大臣，表示希望召开太平洋会议。

6月27日　行政院公布《公库法施行细则》，凡40条。

△　日军大举进犯闽、浙，川石岛陷落；我军封锁闽东江口。

△　日军侵占潮州，次日陷三水。

△　日军进犯温州、福州两港，限第三国船舶于29日中午12时前离去，并知照两城外侨撤退。英、美两国已予拒绝。

6月28日　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作《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之讲演。嗣后即以此讲稿交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整理，草拟《县各级组织纲要》及《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

△　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自重庆出发，赴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慰问。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于蠡县莲子口附近抗击日伪军进攻，歼敌200余人。

△　汪精卫返上海。

△　日本政府应英国政府要求，同意举行英日会谈，驻天津日军和外务负责人被召回东京。

6月29日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代表谭季纯、李志东、王致云、任冠军与八路军代表王观澜、王维舟、张才千、谢扶民在甘肃庆阳签订解决陇东事件办法三项，决议恢复两县纠纷前之原状，并定出恢复原状办法七条。议定陇东专署特务大队及各县在镇、宁两县附近保安队于7月1日撤退，镇、宁两县原状的恢复及第一六五师的撤退，在双方代表派员监督下于7月3日实行。至此，陇东镇宁摩擦事件暂告平息。

△　军事委员会任命莫树杰为第八十四军军长。

△　我军克复粤省从化神冈圩，歼敌百余名。

△　日军侵占澄海。

△　招商局3300吨江轮首次上驶长江，安抵重庆。

△　日机分袭四川梁山、浙江镇海、河南南阳及内乡。

△　汪精卫在上海与伪维新政府梁鸿志、陈群、任援道会谈建立中央政府问题，无结果；下午与温宗尧单独会谈，温表示赞成，并准备参加。

△　天津日军宣布，自7月份起，将加紧封锁租界。

6月30日　毛泽东发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深刻揭露投降派的投降活动和分裂阴谋。

△　军令部批准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调派暂编骑兵第二师进驻陕北，已排挤八路军河防驻军。同日，程潜电蒋介石报告，调派暂骑二师接替陕北河防事，已征得阎锡山同意，划归邓宝珊指挥。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与山东纵队在皖东北创建抗日根据地。

△　占领汕头日军在赐茶附近抓获逃难民众300多人，除几十人逃生外，全部被屠杀。

△　山东定陶县县长姚崇礼率部1200余人，袭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得志部冀鲁豫支队，结果姚部被全歼。

是月　　中共阿城县委25人在哈尔滨香坟附近开会，被日宪兵队逮捕交给石井部队，作试验杀害。

△　日机15架轰炸鲁南东里店，炸死居民300多人，毁房4000余间。

△　河南宁陵日军骚扰西张坡楼，烧毁全村房屋300余间。

7月

7月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吴瑞英为第六十一军军长。

△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在成都成立。

△　成吉思汗灵榇运抵甘肃榆中兴隆山，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等举行安陵祭典。

△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整编。决定徐海东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徐在延安，由戴季英代理），下辖第七团、第十四团。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下辖第八团、第十团、第十五团。

△　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扫荡”和反“扫荡”激烈展开。是役持续约两个月。

△　日机轰炸江苏高邮，炸死居民50多人，毁房数十间。

△　川康科学考察团成立，邵逸国任团长，团员41人。考察计划分三期进行，每期一个半月至两个半月不等。

△　天津日军加强封锁英租界。并将北宁、津浦等路英籍职员全部解雇。

△　日舰麇集闽江，宣布展期封锁福州。

△　伪厦门市政府成立，李思贤任市长。

7月2日　周恩来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军队制造平江惨案。

△　第一一七师一部攻入江苏淮安，与日军在城区巷战。

△　日军在福建连江县定海，杀害村民32人，伤30多人，毁房128间，焚掠民船77艘。

7月3日　国民政府任命周钟岳兼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任何键免职。

△　国民党中央党部以《组织民众肃奸网及办理联保连坐切结办法》，凡10条，通告各党务机关知照。

△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向社会部报告广东海陆丰发现“长发党”活动。海丰、陆丰两县政府决定会同防军派队围剿。14日，社会部签呈处理办法三项，强调“注意政治运用，笼络该党首要，俾能顺利招抚”。

△　日军第二十、第一〇九师团等部五万余人，开始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进行大“扫荡”。同日，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及第十、第三十五等师团各一部，联合“扫荡”鲁西，至9日先后攻陷城武、定陶等地。

△　日军进攻绥远大青山。

△　汪精卫由上海到南京，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会谈，要求支持他建立中央政府。当日返沪。

△　北平伪临时政府就天津租界事，向英国大使馆提出五点“合作”要求。

7月4日　　财政部公布《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凡六条。8日，外汇审核委员会成立，规定各业申请购买外汇，必须经该会核准后，再由中国、交通两银行售给外汇。

△　日军陷晋东南辽县。

△　日机轮番轰炸江苏高邮东坝、下坝、周城等镇，死伤50多人，毁房50多间。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在重庆约见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要求将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遭邹拒绝。

△　汪精卫与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及川古郎等会谈，汪向日方献策说：“为推翻重庆抗日政权，北方须切断与苏联之联系，南方须使英国停止援助。”及川对汪说：“现在正是到了成立新中央政府之时期，今后希望阁下进一步努力。”

7月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华盛为第十军军长，杨德亮为第四十二军军长，陈烈为第五十四军军长。

△　周恩来致电程潜：河北深县、冀县间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据朱德从前方来电称，确由于张荫梧部包围在深县刘家庄八路军吕正操部而起，致发生激战。现朱德已致电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会同派员彻查真相以便处理，请电鹿速即派员，并令部属勿再故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

△　日军陷山西武乡、沁县。次日，陷河南涉县。

△　汪精卫到南京与伪维新政府梁鸿志等再次会谈。梁表示欢迎汪精卫出马“完成统一，收拾时局；维新政府人员要维持原状”。汪要梁“必须站在反蒋之立场”。

△　英国援华委员会在伦敦召开援华民众大会，发起举行“中国日”，并决定发行日刊《中国新闻》，以策动英国舆论共起援华。

△　国际劳工大会在瑞士苏黎世举行，通过谴责日本侵略、积极援华等决议案。

7月6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老黄河以北之鲁西北地区军事斗争归第一二九师领导。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主力袭击辽县石匣村之日军，毙伤敌3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一部攻克山西辽县县城，毙伤日军100余人。

△　日军陷福建平潭。

△　日机30架夜袭重庆，投弹百余枚。同日，日机11架轰炸山西陵川，炸死数十人，毁房数十间。又轰炸江西上饶水南街，炸死30多人，毁房数十间。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

△　苏、蒙军与日、“满”军在苏蒙边境诺边门坎发生激战。至12日，日、“满”军伤亡达5000人，空战中日机被击落61架。此后双方冲突直延续至8月底。

△　日本首相平沼在内阁情报会议上阐述日本外交政策，宣称：即将举行之英日东京谈判，仅限于天津事件，日本决不能与阻挠或摧

毁“新秩序”之国家谋得合作。

7月7日　　蒋介石为抗战两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日本民众书》、《告友邦人士书》、《致慰抗战阵亡家属书》及《对战地民众之广播讲演》等文告，重申抗战到底国策不变。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之总方针，号召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　重庆市集会纪念抗战两周年，并公祭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何应钦报告称：抗战以来敌军伤亡总数为91.78万余人，俘日伪军8555人，毁敌机716架，击沉、击伤敌军舰644艘。

△　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表公告：两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作战3129次，毙伤伪军10万人，毙伤日军6.509万人，俘敌3855人。

△　八路军全体将士为纪念抗战两周年通电全国称：“全军将士深知华北敌情日益严重，新的困难正在增加。感责任之艰巨，痛投降分子之无耻，敢不益加奋勉。”

△　中共南满省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政治部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同胞与关内同胞一起，在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下，联合起来推翻伪满洲国，驱逐日本强盗。

△　孔祥熙著《中国抗战财政与友邦在华利益》一文，称中国财政稳定并竭力维持债信。

△　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电蒋介石献金百万，即日呈解中央，为犒赏各战场将士之用。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主力，夜袭榆社县云簇镇之

敌，战至次日，毙伤日军300余人。

△　西安俘虏收容所日俘成立大同学园反战同盟会。押切五郎任会长。

△　汪精卫在上海和陈群等再次会谈建立伪中央政府事，陈群要求“不要变动维新政府的人事”，汪表示“人事原则是：（一）以政策上一致之人组织之；（二）应适才适用”。

△　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接见记者称：日本当实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使命时，就会有排斥第三国不当干涉之必要。

7月8日　财政部核准施行《便利内汇暂行办法》。

△　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团长郭登依据教育部所发《对民先队基本救济办法》，制定实施要领。通知所属中小学班主任遵照严密办理。

△　日军陷山西沁水县。

△　日机27架袭柳州，投弹百余枚。

△　汪精卫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声明，要点为：“（一）宣布与蒋介石绝缘，进行和平救国运动；（二）共同防共；（三）亲日，中日提携。”

△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及驻日大使因日机轰炸重庆，美侨生命财产屡受威胁，分别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7月9日　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十三周年纪念，蒋介石主持，吴敬恒报告《总理三十年完成国民革命之意义》。

△　军事委员会任命冯圣法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

△　三青团在青海筹设支团部，派马步芳为指导员，王文俊为筹备主任，原春晖为书记。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在易县、满城、徐水抗击日军“扫荡”，至30日，共歼敌1000余人。

△　日军包围河南罗山县朱堂店，进行烧、杀、淫、掠，杀害居民87人，轮奸妇女数人。

△　汪精卫在上海发表广播讲话，公开主张卖国降日，声称：“中国应与日本实现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进而谋求经济合作，求得共存繁荣。”“应根据日本提出之对华三原则，商定各种具体条件，期于彼此交受其益，确定东亚永久之基础。”

7月1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

△　第一战区一部炸毁焦作至李封公路石桥，进攻焦作日军，并破坏煤矿公司锅炉、矿井。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收复山西榆社县城。

△　八路军山东纵队从6月4日开始的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结束，共歼敌1000余人。

△　香港印刷工会排字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举行罢工。12日，工会代表罗文锦见英总督请求仲裁。14日，英总督订立仲裁办法，请各报酌加饭贴。16日，工人要求获得解决，次日各报恢复出版。

△　汪精卫由上海飞青岛，续与梁鸿志、王克敏会商组织新伪政权事。

△　汪精卫在上海创刊《中华日报》，林柏生任社长。

△　日伪拼凑之东亚经济恳谈会第一次会议在东京举行，会长乡诚之助。

7月上旬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部，在孝感地区展开游击作战，在杨家河、沙子岗地区歼伪军200余人。

7月11日　鄂东游击队总指挥陈汝怀部攻克黄梅，毙日伪军14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于郓城县肖皮截击敌人，毙伤敌15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收复山西武乡县城。

△　日军陷山西屯留。

△　孔祥熙电谢泰国侨胞筹款70万元捐献祖国难民委员会。

△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函复毛泽东，表示祝愿，并向八路军致敬。说他来中国访问时，希望能和毛泽东相见。

7月12日　第三战区一部在沂东象山港外与日军接战受挫，退守佛渡山。

△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收复山西襄垣县城。

△　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破袭河北栾（城）赵（县）、束（鹿）衡（水）、宁（晋）束（鹿）等公路，共破毁公路70余公里。

△　日军陷山西长治、潞城。

7月13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周佛海、陈璧君党籍。

△　西藏达赖十三世“转生后身”（即行将继位之达赖十四世）在

青海塔尔寺附近寻获，系五岁幼童拉木旦柱。是日，由护送员马元海及藏方寻觅大员护送回藏，国民党中央拨款10万元作护送费用。

△　军事委员会任命鲁道源为第五十八军副军长，安恩溥为第六十军军长。

△　八路军一部攻入河北献县樊属镇，与日军相持六日之久，全歼该敌。献县援敌亦被击溃。

△　日军陷山西壶关。

△　川滇公路落成。该路自四川隆昌起至贵州达沾益之天生桥。

△　日本紧急阁议，核准日英“天津事件”谈判应采取之根本政策，其要点为：一、要求英国放弃亲蒋反日政策；二、要求英国就天津英租界内之政治、经济及其他各方面实行与日方合作。

7月14日　第四战区一部攻克广东潮州，17日复失。

△　日军陷山西长子县。

△　日军2000余进犯晋察冀边区冉庄，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激战，战至17日，敌不支退灵丘。是役毙伤敌浅川联队森大队长以下300余人。

△　山东第六区专员王金祥部，在冠县化庄袭击筑先纵队，杀害地委书记张炳元。

△　豫东伪军刘怀锦部400人于商丘反正。

△　东京举行大规模反英示威，并冲入英国使馆。同日，日本新闻界发表《反英宣言》。

7月15日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罗文幹、陶孟和、张奚若、傅斯

年、罗隆基、钱端升等通电讨汪。

△　周恩来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悉镇原、宁县两县纠纷已得初步解决，至为欣慰。一切仍乞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便团结，是为至幸。”

△　国民政府任命梁龙为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公使。

△　重庆《国民公报》报道：重庆市实业家集资创办中国兴业公司，资本总额1200万元。孔祥熙任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

△　日军陷山西阳城。

△　日机18架空袭柳州，投弹20余枚。

△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就天津英租界案在东京开始谈判。

△　西班牙国际义勇军中国战团于法国南部之集中地，致函重庆《新华日报》，附寄致蒋介石及朱德信件一封，呼吁援助。

7月16日　全国慰劳代表团总团团长张继率北路慰劳团抵洛阳。19日，南路慰劳团抵鄂南。

△　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安办事处成立，彭士馨等五人组成干事会，彭任总干事。

△　日军攻陷广东海澄，屠杀民众700余人。

7月17日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就陇东镇宁事件电蒋介石，称初步解决办法签订后，“彼方部队缺乏诚意，延不遵约撤退”，已“电萧劲光转发饬照约履行”。

△　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皖南泾县云岭召开，传达并研

究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于26日闭幕。

△　英国首相张伯伦就英日谈判在下院发表声明谓：英国外交政策自有权衡，不拟接受他国之要求而有所改变。

7月18日　　行政院决议战区各省设行署，并公布《设置行署通则》，凡九条。

△　何应钦批准陕北行政专员何绍南所拟《防止异党在陕北活动办法》及《陕北工作大纲》，规定采取积极与消极两种办法，瓦解中国共产党，围攻与缩小陕北根据地。

△　湖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程汝怀向军政部报告武汉沦陷后鄂东（湖北第二区）军政概况称：该区贪污之风甚遭民怨，而疮痍、疟疾流行，军民几无幸免，财政竭蹶，学校停办，党务陷于停顿状态。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特务团袭击涉县河南店之日军，毙伤敌120余人。

△　日军陷山西晋城天井关。次日，陷泽州。

△　日军进攻河南永城山城集，因民众已逃避，遂纵火焚烧民房6340间，并把个别未及逃避的老人推入火中烧死。

△　日机九架袭湖南益阳城区，炸死210多人，毁房100余栋。

△　日军发出通告：21日封锁闽省三都澳及罗源；22日封锁闽省东北端之沙埕，要求当地外轮、外侨一律撤退。

△　上海法币外汇黑市波动。外汇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限制供应外汇。

△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向参议院建议废止《美日商约》；主张再开九国公约国会议，以确定日本侵略中国行为是否违反《九国

公约》。

7月19日　蒋介石召集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会，发表干事会及监察会人选名单。

△　财政部发言人就近日上海外汇风潮发表谈话，指出这风潮是日本破坏法币造成的；并说政府为便利各方向国外购取最需要之物品起见，仍将继续保持大批外汇。

△　陈诚电复周恩来，掩饰平江惨案真相，称第二十七集团军派队前往剿办，维持地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　日机七架袭山西河曲，死伤300多人，毁房200余间。

△　国民政府任命臧启芳为国立东北大学校长。

△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制定《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呈宣传部核定施行。该正误表列入“谬误名词不用者”有“制造摩擦”、“边区政府”、“抗日政权”、“争取民主”、“抗日的八路军”、“抗日联军”、“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亲日派”、“民族失败主义”等20余个共产党常用名词。列入“谬误名词应改者”共40余个，如“拥护抗战到底”，改为“拥护抗战国策”，“拥护抗日的政府”改为“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抗日的领袖”、“拥护革命的领袖”改为“拥护领袖”，“共同领导”改为“服从最高领袖领导”，“国共合作”、“联合各党各派”改为“全国精诚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战线”改为“集中抗战力量”，“边区”、“特区”、“抗日根据地”、“陕北圣地”一律改为省名或地名。

△　英、日大使在东京举行第二次会谈，讨论天津事件背景问题。

△　《纽约时报》以《日本要求另一“慕尼黑”》为题，发表长篇评论称：“此次远东局势则我政府已明告日本，吾人在华拥有巨大直

接利益”，日本“若忽视此警告之一切含义，殊为不智”。

7月2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高荫槐兼新编第三军军长。

△　周恩来致电程潜，对调派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部移驻鄜县表示“不胜惊讶”。22日，程潜复电称：马师开鄜，系遵蒋命，“事关军令，未便骤改”。

△　四川松潘地区30万藏、羌等民族代表，至重庆“请缨杀敌”。

△　日军到湖北随县金屯“清乡”，杀害民众及抗日战士54人。

△　财政部规定桐油、猪鬃、茶叶、矿砂四类物资，由该部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

△　生活教育社筹设之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开学，校长陶行知。

△　延安女子大学开学，毛泽东、周恩来、陈绍禹等出席开学典礼。

7月21日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联第二十届大会代表。

△　军事委员会任命唐淮源为第三军军长，柏辉章为第四军副军长。

△　东京发表日方对英日谈判提出的无条件移交凶手等强硬要求。

△　英、日大使举行第二次谈判。事后，日本外务省发表公报称：“谈判略有进展。”英国外交界人士称：此次谈判当可商定正式谈判日程。

7月22日　蒋介石电香港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并转钱新之、

叶琢堂赴重庆共商金融问题。

△　国民外交协会在重庆宴请泰国华侨总会主席蚁光炎。黄少谷致欢迎词，赞扬蚁光炎以60余高龄不辞跋涉，努力抗日之热忱。

△　中国工业合作社在重庆召开总结工作会。报告称：该社自去年8月成立以来，先后在陕西、湖南、江西、川康及云南等处成立办事处，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事务所39处，组织工业合作社600余，社员8000余人，贷款总额90余万元。又在后方及沦陷区各地设立小型工作工厂约1200余所，社员达数万人。

△　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的真相。

△　周恩来再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当局掩饰平江惨案真相，指出该案“纯为阴谋惨杀”，要求派员会同查明，“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

△　第二战区一部攻克晋南长治。

△　日机五架轰炸安徽屯溪，投弹25枚，死47人，伤百余人。

△　汪精卫党羽在上海指使暴徒袭击《中美时报》、《华美晚报》及《大晚报》报社。

△　周佛海在伪《中华日报》发表长文《回顾与前瞻》，宣扬投降卖国论调，次日续刊。

△　南京日侨4000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同日，日军通知英、美各国驻闽南侨民即日撤退。

7月23日　　何应钦就平江惨案复电周恩来，仍称该案起因系“查清逃兵”；至双方战斗互有伤亡，该连长处置殊未免失当，“令饬将该连长撤职以儆效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破袭白晋公路，至24日，共破毁公路25公里，桥梁五座。

△　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击毁敌机四架。

△　日军第十师团、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各一部共2000余人，“扫荡”河北井陉以南、元氏以西地区。

△　日军陷河南明港。

△　日本大本营决定华南方面军从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中解除，直属大本营。并对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方面军的任务作重新规定。规定中国派遣军确保已占领地区的治安；与海军协同，截断敌的补给及联络线；为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应作好对第三国的必要准备。

△　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在重庆成立，张西曼等九人为理事。

△　汪精卫到广州，与日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及当地汉奸会谈，策划在广州建立伪政权。

7月24日　蒋介石在重庆纪念周讲话称：抗战国策决不受东京谈判影响；现在外国舆论说敌人希望造成“远东慕尼黑”，这是新闻界揣测敌人心理的说法，事实上决不致有远东慕尼黑发生，国民不要为汉奸摇惑而有所顾虑。

△　晋冀鲁豫根据地太南军政委员会成立。

△　日机27架夜袭重庆，投弹百余枚，毁房屋数十间。

△　日、英东京谈判达成初步协议，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要点是：英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安全维持其占领区内公安目的应有特殊之

需要”。

△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宣读英日初步协定原文后声称，英之让步不能认为已变更对华政策。

△　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英外相哈里法克斯，以英日协定违反英在《九国公约》所负之义务及国联历次决议案精神，提出强硬抗议。

7月25日　外交部就英日会谈发表声明，表示对英国之态度，不能不引为失望。

△　第九战区一部攻克鄂南崇阳。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晋东南阳城。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海外分会，聘请蚁光炎、胡文虎、林文庆等百余人分别担任欧洲、中南北美、南洋等处分会筹备委员。

△　国民政府指令《审计法施行细则》，凡47条，准予备案。

△　日军在湖北占领区搜括法币，送往香港台湾银行套购我国外汇。

△　驻法大使顾维钧发表文告，抗议英日协定，谓“英国在远东屈就侵略之所为，将在欧洲方面自食其报”。

△　英国援华委员会就英日协定发表声明，抨击英国对日妥协。27日，英援华会在下院议员会议室前举行抗议示威，并在伦敦西区举行游行。

7月26日　国民政府公布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名单：议长康必如，副议长文化成。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骥为第六十六军军长，傅立平为第九十九

军副军长。

△　社会部批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制定之《各党派言论研究办法》备案施行。

△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29日，选出白崇禧等77人为理事，达浦生等33人为监事。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晋东南沁水县。

△　豫南日军出犯泌阳、确山、桐柏。

△　日机18架空袭梧州，投弹数十枚，城西数次大火。

△　上海中美日报报社接到署名为“铲共特务指挥部”的恐吓信，限全体职员于三日内辞职。次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中美日报大厦破获大规模袭击该报社阴谋案，策划者为汉奸丁默邨。

△　美国国务院宣布：美日两国1911年所订《商务通航条约》，将于1940年1月26日失效。次日，美政府就废约事正式通告日政府。

7月27日　　蒋介石为八路军在鲁西一带歼敌迭获胜利，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慰。

△　蒋介石致函罗斯福，要求他出面召开九国公约会议。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钿为第六十八军副军长。

△　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致电赈济委员会报告黄河决口后豫东各县被灾情形，略称：“豫东十五县尽成泽国，面积达二万六千一百余方里……奔走异乡，号呼求救者凡一百三十七万余人，灾民麇集周口、漯河、许、郑各处者，每日不下一万余人。”

△　粤东沦陷区潮安大火，毁房2000余栋。

△　全港进行防空大演习。

△　日本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制定《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其总方针是："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具体规定："处理中国事变，设法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尤其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发展的良机，积极促其实现。"

△　伪满公布《防卫令》。

△　日英代表在东京举行圆桌会议。日代表要求英国应根据《有田——克莱琪协定》精神，禁止法币在天津租界流通。英代表表示英国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拒绝日方要求。

7月2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美国政府宣布废除美日商约事发表谈话称："该约之宣告废止，实可视为美国愿意维持其太平洋区域之地位与威望之一种表现。美国政府如能由此进行而采取更确实更积极之态度，于其权力范围内尽其能事，以遏制国际间之凌乱无法，以恢复国际间之和平、互信及好感，则尤为吾人所馨香祷祝者也。"

△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熹文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

△　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外相有田报告美国通告废止美日商约事，各阁僚相顾茫然，外务省官员认为在英、日谈判天津问题之际，美国出此处置，实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　日兴亚院会议决定，合并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和伪蒙古、伪察北、伪晋北三个自治政府，建立统一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　香港颁布《战斗人员义务法令》，规定凡年龄在18至41岁之间的男性（含英籍人士）必须服兵役。

7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指

示》，提出从舆论和行动上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方针政策。

△　国民党中央为了解党员“最近从业情形”，通告举行全国党员总调查。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夜袭晋东南壶关。

△　冀中八路军收复安次县城，全歼驻城日军，伪军一中队被缴械。

△　英、日东京谈判继续进行，日方提出禁止法币流通，并交出天津中国各银行存银约1400万元要求后，双方意见分歧，未达成协议。

7月30日　蒋介石电驻美大使胡适，促请美政府积极增援中国外汇平准基金。

△　昆明市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召开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对美国废止美日商约表示赞佩，对英日协议表示失望。

7月31日　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致电赈济委员会报告皖北水灾，略称：“今年伏汛盛涨，讵料黄河决口未堵，淮、颍又遭横决，波涛万顷，庐舍荡然，本年水位实超出去年一公尺有奇。”“计阜阳被灾区域占全县十分之八，被淹田亩三百五十六万余亩，灾民七十余万。太和被灾区域占全县十分之七，待赈灾民四十余万。”“皖北各县既屡遭兵燹，复两受黄灾，非赈不活之难民当在二百万以上。”

△　日机36架轰炸四川铜梁县城，投弹100枚，炸死27人，伤58人。

△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伦敦英下院发表演说称：“各方对英日初步协定所作不正确之解释，实足在中国引起焦虑与苦闷，是宜加以驳斥，实则协定仅指陈事实，并非吾国对华变更政策之谓。”

△　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朱瑞兼书记。8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复同意。

△　英下院开会讨论远东问题，议员数人质询政府有无废止英日商约之意，张伯伦答称尚在慎密考虑中。议员培克问：中国沦陷区内有无合法法庭存在，未知政府能否提供保证，不将程锡庚案四华人嫌疑犯引渡日方？外交次官白勒特答：此事正在谈判中，以法庭一项而论，津市只有日本领事法庭，只能审讯日人案件。保守党议员卡尔问：中国沿海一带均有反英宣传，不知政府曾向日方提出交涉否？白勒特答：驻日大使克莱琪已向日本提出强硬交涉。

是月　　国民政府颁行《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定每半年统计一次。

△　国民政府公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决定由中央研究院负责授时，由中国广播电台以长短两种波音广播。全国划分五个时区。抗战期间全国各地一律暂定以陇蜀区时间为标准。

△　程潜向蒋介石转报第十八集团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报告：日军趁雨季决堤，安平、河间等七县成泽国，情状极惨，请向国外广事宣传，并拨款赈灾救济难民。27日，军令部答呈请“速拨巨款，以资救济”。

△　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抗议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　晋察冀边区淫雨成灾，河川泛滥，日军乘机决堤，造成边区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

△　日军第二十一军编组海南岛派遣部队接替台湾混成旅团负责警备。台湾混成旅团调回广州，担任佛山附近警备。

△　日军“七三一部队”为进行细菌战，本月至8月，生产伤寒、霍

乱、副伤寒、赤痢等菌种2.25公斤。

△　龙烟铁矿股份公司成立，资本2000万元，年产铁矿石约70—80吨，供石景山制铁所等处使用。

△　司徒雷登应多田骏请求，前往重庆试探“和平”条件。

8月

8月1日　　军事委员会调集40个军进行第二期整训，由军训部派员督练，至11月结业。

△　国民政府发行民国二十八年湖北省金融公债，定额800万元，年息六厘，12年还清。

△　蒋介石电令四川、西康、贵州三省务于两年内禁绝烟毒。

△　延安各界万余人集会追悼平江惨案烈士，毛泽东及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讲话。大会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凶犯。

△　八路军第一纵队在山东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冀鲁边东进抗日纵队等八路军武装。10月1日，原山东纵队与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合建，山东纵队建制仍存。

△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袭击由福山开往招远的日军车队，毙敌指挥官一人，士兵50余人。

△　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袭击太康开杞县日军，毙敌百余人，内联队长一名。11日，该支队又消灭盘据杞县与榆厢铺间伪军。经此两次战斗，打开豫东局面。

△　日军自徐州分犯铜山、萧县、砀山等地，与鲁苏战区所部激战三日，退回原防。

8月2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于山东昆山县（今梁山县）梁山地区伏击日军，战至次日，歼敌300余人。11日，蒋介石为八路军在鲁西一带歼敌迭获胜利，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慰。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一部，于江苏睢宁县桃园艺附近抗击日军，歼敌100余人，毁汽车七辆。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晋东南长治。

△　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决议对英政府签订英日协定表示遗憾，要求政府废止英日商约，予中国以有援助。

8月3日　　国民政府颁布《私运法币及其它禁运物品出口检查办法》，规定公私机关或旅客随身行李均须受检查机关检查。

△　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于招远黄山铺间伏击日军汽车一辆，毙敌30余人，生俘伪警察局长杨明义等军官多名。

△　日机两批空袭重庆，被击落二架。

△　伪满设立协和矿山公司。

8月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胡宗南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　是日至15日，周恩来连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对两年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分析，提出："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根据两年来国共合作的实践，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全面阐述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在谈到新四军的问题时，提出其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　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部奉命开往陕甘宁边区属地鄜县，途中为八路军所阻。程潜为此密电蒋介石："职为慎重计，已令该师在界

子河亘洛川附近停止待命，并电周恩来、萧劲光说明原委，并告以情况必要时仍需令马师继续北开。”

△　豫北、晋东我军先后攻克林县、高平。

△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鄂中安陆县赵家棚地区粉碎日军进攻，歼敌100余人。

△　日军于河南武陟决开沁河堤，沁阳被淹。

△　伪西北边防自治军高振兴、朱兆褒部2000余人，在包头附近反正。

△　经济部公布《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审查标准》，规定奖助之主要工矿业为电气、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制造、采矿、冶炼等。

8月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德亮为第四十三军军长。

△　八路军一部夜袭白晋路屯留常村镇，毙敌80余人，内有电台队长及中级指挥官10余名。

△　华中沦陷区英侨受日人反英风潮影响，多被迫撤退。开封美侨亦被迫离境。

8月6日　英国抗议日机炸毁宜昌英轮两艘。7日，日本当局否认此事。18日，英海军发表声明驳斥，并要求日方赔偿损失。

△　日本发动反美运动。日伪在石家庄举行反美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废除美日商约。

8月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代第十三军军长，马励武为副军长。

△　中共中央军委电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令第三五九旅即由恒山

地区开赴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地区巩固绥德警备区，第一二〇师在冀中的部队移至现在第三五九旅位置，并视情况再移至晋西北地区，以巩固陕甘宁边区与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　日军第一〇九、三十六、一〇八师团开始对太岳地区进行“扫荡”。

△　日军自涉县西犯，次日陷黎县。21日，打通邯郸——潞安公路。

△　江苏灌云县日军“扫荡”小兴庄，杀死26人，伤五人。

△　上海日军通知第三国，定8日起封锁浙江海门港口，促外船撤离。

△　国民政府公布《防止水陆空私运特种物品进出口办法》，凡10条。

△　教育部举办全国统一高考，10日试毕。参加高考人数2.2万人左右，超过上年度统一招生应考人数一倍。

△　由沪迁港的中华书局分厂工人1400余人被厂方以“印钞部全部工作终止”为借口解雇，并派武装警探包围工人宿舍，限期回沪。全体工人向厂方交涉要求收回成命，并绝食一日，以示决心。

8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余泽箋为第二十八军副军长。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一部，于江苏铜山县冯集、马坡一带抗击日伪军进攻，毙伤敌500余人，毁坦克四辆、汽车七辆。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主力杨勇部，在鲁西梁山、寿张一带与日军激战，毙伤敌500余人，毁坦克、汽车10余辆。残敌溃退徐州。

△　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该校原有之医学院与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分别改称为国立西北医学院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　董必武、沈钧儒、李璜借张澜家宴请邹韬奋、林虎、章伯钧、黄炎培、江恒源等人，讨论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提案问题。15日，董必武、张澜、李璜、邹韬奋、江恒源、曾琦、黄炎培再次会商，决定分别起草重要提案，董必武负责起草民众问题提案，李璜负责起草党派问题提案，邹韬奋负责起草文化问题提案，江问渔负责起草地方行政问题提案，曾琦负责起草财政金融问题提案，黄炎培负责起草游击队问题提案。

△　日军封锁浙江海门港口，不准外船出入。

△　香港印刷业工会代表至香港华民政务司就中华书局香港分厂解雇工人事提出严重抗议。各界亦纷起声援，成立“香港各界救济中华书局被解雇工友联合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援助。但厂方依仗香港最高法庭支持，仍限工人于本月31日前离港回沪。

8月9日　　陕北行政专员何绍南致函何应钦，提出下列请求：一、撤销第十八集团军所委之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部及河防司令，另以高双成、马禄两部分任河防；二、陕北绥榆区治安由保安司令负责，并成立保安两个团；三、陕北所驻第十八集团军警备团应饬开河东。何应钦批交军委会办公厅核办。

△　冀南我军攻克清丰县城。

△　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怎样实现和平？》广播讲话，对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邓龙光等提出“局部和平”办法，公开煽动中国军队放下武器，参加所谓“和平运动”。

8月10日　长江江防游动炮兵击沉日军运输舰一艘，击伤一艘。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在扬中县老郎街击落日机一架。

△　中国出席渥太华太平洋学会首席代表颜惠庆，由上海抵香港，19日离港赴美。

8月11日　蒋介石发表《再告各界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要求各地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实行精神总动员，实践国民公约，协助地方整理财政，剔除各种积弊，帮助政府实行“管、教、养、卫”。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晋东南沁源，残敌窜回沁县。长治、壶关之敌亦于13日西退。

△　第九战区通令邵阳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立即停止办公。办事处被迫关闭，人员撤到桂林、重庆。

△　香港报贩工商联合会召开各区报贩代表大会，商讨改善同业生活，并一致决议拒售汉奸报纸。

△　烟台工人发生反英运动，一部冲入英领馆。

△　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日、汪双方对在广州开展和平运动，意见已完全一致，日军不仅支持汪精卫广播讲话，且愿尽量给予援助。

△　英国政府决定将天津租界刺程案四华人嫌疑犯移交给日方。决定作出后，英国各界立即一致抨击。

8月12日　考试院公布《公务员高等考试分为初试再试并加以训练办法》，定9月20日（后延期为10月11日）分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城固、兰州、永康（后改为丽水）七地举行初试。

△　军政部西安俘虏收容所日俘组织之大同学园反战同盟会举行成立典礼，会后演出反战剧《侵略战争之罪恶》。此剧自次日起，在

西安公演三日，收入捐作慰劳抗战将士之用。

△　驻英大使郭泰祺照会英外交部，要求英方就交出程案四华人事项重予考虑。25日，英国外交部复照称此举系保护“中立地位”，并非承认北平“临时政府”。

△　英国银行家、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罗杰士与上海中外金融界会商后抵香港，与财政部次长徐堪会谈。

△　汪伪上海《中华日报》发表《和议之实现与国民政府之重组》社论，声称实现和平之最好办法，是在重庆政府之外来改造国民政府，以负起实现和平之历史任务。

8月13日　　蒋介石为纪念“八一三”两周年，发表《告上海同胞书》，要上海同胞以“田横五百壮士的精神，光大抗御倭寇的功绩”。

△　日军为切断中国补给线，令第十八师团集结虎门，准备进攻深圳，并通知英国当局勿妨碍日军行动。当日晚，第十八师团从虎门启航，14日在宝安登陆。守军第一五三、一五九师退守，日军占领深圳。15日，占领沙头角一带。

△　湘北伪军胡安烈部反正，击毙日军140余人。

△　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次日闭幕，通过学联工作纲领。

△　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召开平江惨案烈士追悼会。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代表萧正岗及重庆卫戍总司令代表田霖、警备司令部董其昌等各机关、团体代表200余人出席。

△　重庆各报联合版停止发行，各报先后复刊。重庆《新华日报》是日复刊，发表纪念“八一三”两周年社论。

△　香港《南华日报》、《天演日报》全体工人60余人，以该两报传播汉奸言论，危害祖国，宣布自即日起一致停工脱离该报。

△　台湾革命同盟致函《大公报》称，台湾500万民众44年来呻吟于倭寇铁蹄之下，饱受压迫之苦，决心参加祖国抗战。

△　旅越华侨成立越南华侨归国服务动员会，通电全国拥护国共合作，并表示今后要尽量扩大归国服务运动，组织华侨义勇军、救护队、战地服务团等回国杀敌。

△　华北伪币贬值，天津物价飞涨。是日，华界麦粉每袋8.5元，粗面每袋8.2元，大米每包35—38元。四郊各区粮价尤昂，玉米每斤2.5角，民生困苦为30年所未有。

△　日本指使华北各反英团体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以统一华北各反英团体，鼓励各校教授反英课程，发行反英报刊，扩大反英运动于亚洲各国，并在中国全境加紧示威。次日，天津分两处举行反英示威运动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8月14日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发表广播讲演，号召广东民众“捕杀汪精卫”。

△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豫南罗山县朱堂店地区粉碎日军进攻，毙伤敌80余人。

△　日机39架分袭广西信都、宁明、桂平、柳州、南宁。

△　汪精卫由广东返上海。汪在广州期间曾与日本华南派遣军代表秘密达成在广州建立伪政府协定。

△　参加英、日东京谈判之天津日军代表，因双方续谈经济问题意见分歧陷于破裂，是日由东京返回天津。19日，日本陆军省指示华北方面军今后谈判“仍按既定方针进行，但不求短期内解决，不要明

言现在会谈破裂。要使英国没有提出恢复会谈的余地，更不要表示我方有促其复会的意思”。

△　加拿大温哥华华工数千人反对装运碎铁往日本，在码头举行静坐罢工，码头主人被迫停止装运。

8月15日　国民政府特派陈大齐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

△　朱德、彭德怀以张荫梧继续制造摩擦，大肆宣传“曲线救国”等，特电蒋介石要求迅予制止。

△　武汉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制定《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定9月下旬进攻长沙。次日，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裁决执行此大纲。

△　日机10架空袭延安，投弹10余枚。

△　豫东伪军李宣德率部4600余人反正，军委会委李为游击司令。

△　浙江省政府在31个县设置稽征办事处，是日开始征收战时特种货物捐。

△　重庆、香港间无线电话开通，孔祥熙与港督罗富国互致祝贺。

△　世界学生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在巴黎召开，国民政府派驻法大使顾维钧为首席代表，主题为“学生对保障民主政治及民族任务”。16日，该会电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反对将天津刺程案四华人移交给日方。

8月16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十五军军长，冯圣法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

△　张发奎、余汉谋、蒋光鼐、黄旭初、李汉魂、香翰屏、蔡廷

锴等通电声讨汪精卫，驳斥其在广州的劝降广播。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夏令营在重庆南温泉举行开营礼。

△　南京汉奸组织黄道会会长常玉清遇刺毙命。

△　汪精卫发表《再论撤兵问题》一文，对重庆方面进行劝降。

△　日本大本营参谋寺岛抵广州，谋将广东伪军编为伪“复兴军”，统归汪精卫指挥。

8月17日　张君劢代表国社党通电声讨汪精卫。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于郓城县红船以北与日军激战，歼敌200余人，毁汽车八辆、战车三辆、装甲车二辆。

△　日机19架分批轰炸洛阳，死20余人，伤40余人。

△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杉山发表谈话称：英国若不将英租界中白银移交“临时政府”，并禁止法币流通，则天津问题即无从解决。又称：英国若拒绝与日方合作，则日军在必要时准备增强对华北英侨之限制；华北局势若趋恶化，责任由英国负之。

8月18日　参政员黄炎培、张澜、林虎、梁漱溟等通电声讨汪精卫。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部，于高平县伏击日军，歼敌160余人。

△　晋北日军陷岚县。26日，又为第二战区所部克复。

△　中英达成信用贷款。

8月19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继续保护

四行仓库“孤军”，不得听任日方要求妄事引渡。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赴冀西与鹿钟麟会谈。

△　军事委员会公布《战时船舶军运暂行条例》，凡25条。

△　沪西越界筑路区伪警与英籍警官发生冲突，英警官金罗德被击伤，伪警死伤四人。沪租界工部局向日方提出抗议。21日，伪市府又向工部局提出抗议，并在日方支持下要求接收特区法院。22日，工部局予以驳斥。此后双方争执不休，枪击事件续有发生。

8月20日　冯玉祥在重庆作《怎样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广播讲演。

△　新疆省14个民族400万同胞捐款购机10架，本日举行献机命名典礼。

△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电蒋介石报告处理陇东回民暴动及所拟《清乡善后方案》，称：计划以安抚、自首、没收财产、查缴枪支、从新整理保甲等办法进行平叛。

△　日机六架轰炸江西上饶，投弹21枚，死伤数十人。

△　上海发生抢米风潮，500余人冲入昌平路米店，抢去机粉100袋。此后，上海米价大涨，抢米风潮愈演愈烈。

△　日本嗾使北平、广州等地反英。北平市民反英会是日成立。广州伪维持会宣布广州将发生强烈反英运动，受雇于英人之华人均被迫去职。

△　诺门坎苏军全线对日、“满”军发动围攻，日、“满”军遭到歼灭性打击，伤亡1.222万人，被迫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　英国外交部就日、英东京谈判顿挫发表声明称：日方所提移

交天津租界白银及禁止法币流通问题涉及各国利益，难由英、日单独成立协定，最好再度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共谋解决。

8月中旬　经济部饬令四川省各地于半月内成立日用必需品评价委员会，办理评价事宜，以杜绝不肖汉奸操纵物价。

8月21日　国民政府据教育部呈请，明令禁用苗、蛮、夷、猓、獐等名词，以示民族平等。

△　日军“扫荡”山西大同大王村，至28日，杀死村民156人。

△　日机27架轰炸湖南沅陵。

△　北平日军发言人声称：日军在占领区内之责任，仅在军事行动所必要之范围内维持治安，嗣后对于英、美侨民生命安全不能负责。

8月22日　蒋介石以本年四川农产丰收，电令行政院妥筹收购，适当收囤。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守维为第八十九军军长。

△　林虎、冷遹假张澜寓所召集午餐聚会，黄炎培等人到会，商议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实行保障人权案。

△　日机九架轰炸广西龙州上金荷村，炸死13人，伤三人。

△　日本政府在上海设立“梅机关”（设在上海虹口区日侨聚居区一所名为“梅花堂”的三层楼房），专门处理和汪精卫间的一切联系。总负责人影佐祯昭。

8月23日　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访华抵重庆。重庆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吴敬恒致欢迎词。

△　第二战区一部攻克晋东南高平。

△　日军在福建东山岛登陆。

△　日军集结宝安威胁香港。香港当局由新加坡调飞机充实防务。

△　伪满公布《动员法》修正案。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字。

8月24日　国民党中常会议议决开除汉奸梅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李圣五五人党籍。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五八旅一部在邢台牛峪、土岭歼“皇协军”600余人，缴枪480余支。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五八旅和青纵三团及冀西游击队，在赞皇、元氏地区反击张荫梧部，歼灭其主力大部，俘2000余人，缴枪1200余支。张荫梧残部向赵县一带脱逃。

△　虞洽卿、李馥孙等上海工商、金融人士联名电孔祥熙，以沪市民食发生严重恐慌，申请以英金一万英镑订购西贡米二万石运沪。27日，孔祥熙复电准予照办，并特予免税进口。

△　四川乐山遭日机轰炸，国民政府拨款三万元赈灾。

8月25日　周恩来从延安经兰州抵重庆。

△　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列举泸县、资中等地国民党当局勒令代销书店停售《新华日报》等，要求彻底纠正。

△　泰国华侨留滇会在昆明开筹备会，由归国华侨报告泰排华情

况称：泰政变后，为帮助日寇侵略中国，大举排华，现已非法逮捕侨胞3000余人，并封闭所有华侨学校及报馆。

△　侨务委员会驻滇专员与龙云商洽，在云南组设华侨招待所，并以芒市、车里两地为垦殖区，安置泰国归国华侨。

△　山东省兵力最大之伪军张步云部一万余人，于诸城反正。

8月26日　蒋介石在渝宴尼赫鲁。28日，蒋介石与尼赫鲁会谈中印合作问题。30日，尼赫鲁抵成都访问。

△　教育部根据行政院定8月27日孔子诞生日为教师节制定纪念办法，规定孔诞与教师节分别举行仪式。

△　国民党中宣部因未能阻止《新华日报》刊出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特刊，规定今后所有新闻应一律送检。

△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周佛海、陈璧君。

△　南洋群岛返国华侨汽车技师与司机358人抵昆明。抗战以来，南洋机械工人返国服务者至此已达2000余人。

△　英国政府关于移交程案四华人致国民政府外交部复文称，该四嫌疑犯经日方提出充分证据，英国政府认为彼等犯罪形迹上之根据已告成立，除移交外别无他法。

8月27日　毛泽东致电欢迎尼赫鲁访问延安，并感谢印度援华医疗团在八路军服务。

△　国民党党政当局在重庆联合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孔祥熙作《孔子遗教与民族前途》讲演。晚，陈立夫播讲《阐明春秋大义以纪念孔子》。

△　周恩来飞抵兰州，邓颖超、王稼祥、陈昌浩、李德等同行。

8月28日　蒋介石就国际形势对记者谈话称：《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后，国际变化迅速，但中国抗战则仍不变，全体军民“应以一定不变方针应付瞬息万变时局”。

△　原国民党粤系在野军政官员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等通电声讨汪精卫。

△　日军在浙东象山六横岛登陆。

△　日军血洗河北河间大曹村，本日至31日，杀害民众73人，毁房2300余间。

△　日机三批日夜袭重庆，被击落一架。

△　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推汪为伪中央委员会主席。

△　港府发布紧急命令，推行《紧急防御权法案》，规定凡向港府登记之英轮，未经商务部许可，不得转让或抵押他人。同日，德领事劝告德侨即行离港。

△　日本平沼内阁倒台，阿部信行组阁。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表通告，声讨汪精卫卖国罪行。

△　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向驻英大使郭泰祺保证，英远东政策不因欧洲纠纷或苏德协定而改变。

8月29日　财政部拟定《取缔收售金类办法》，凡11条。《办法》规定金类收购概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收兑金银办事处及其代理机构办理。9月15日，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执行。

△　行政院例会通过《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条例施行细则》，决

定招商试办川、康盐运。

△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驻昆明办事处登记第一批回国升学侨生截止，共计大中学生155人，大多来自南洋群岛及印度支那半岛。

△　安徽第六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带领中共地下党员、皖东北特支书记江上青等到灵璧县，与县长许志远谈判，以求改善关系。返回途中，许志远策划地主武装袭击，江上青中弹牺牲。

△　中华书局香港分厂被解雇工人向海内外同胞发出紧急呼吁书，吁请各界同胞站在拥护祖国抗战到底，争取民族自由的立场上，援助被解雇工人的斗争。

△　日机六架在江西高安县吴珠岭投下大批细菌弹，2100多人全身腐烂，被夺去生命。

8月30日　川、康党、政、军官员邓锡侯、王缵绪等通电声讨汪精卫。

△　上海《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被敌伪特务暗杀。

△　日本阿部内阁组成，首相阿部兼外相，陆相畑俊六，海相吉田善吾。次日，阿部发表新内阁外交方针，宣称：处理中国事变，建设“东亚新秩序”乃日本基本国策。

8月31日　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机构筹建就绪。

△　国民政府发行民国二十八年四川省建设公债，定额750万元，年息六厘，15年还清。

△　宁夏阿拉善旗王达理札布等五人由兰州抵重庆述职。

△　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熊斌呈报军委会称，《新华日报》近来

迭有违检稿件，拟予停刊三日处分。9月9日蒋介石指示：《新华日报》违检原应处分，惟积延过久，有失时效，嗣后各报如有违检应予停刊处分者，应迅速函卫戍总司令部执行。

△　苏鲁战区一部攻克掖县、蓬莱。

△　驻英大使郭泰祺照会英外交部，要求在两方继续谈判前不得以程案四华人送交日方。

8月下旬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第一一五师一部等，7月初开始在太行山区的反“扫荡”作战结束，共歼敌2000余人。

△　日军更换驻蒙军司令官莲沼蕃中将，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大将兼任。

是月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各地党、政、军机关加强对民众团体的指挥与监督，规定：民众团体整理后须严格管理统制；各团体行动必须取得管理机关之命令，按命令中所赋之使命活动；过境团体须向当地机关呈验许可证，如负有临时活动使命须呈验管理机关之命令或介绍文件。

△　周恩来听取阳翰笙等关于蒋介石准备把不愿加入国民党的三厅人员逐出三厅的汇报。后周约见张治中，张说这事再商量。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三厅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等，说打算另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三厅的人参加，请郭沫若主持。后来周听取汇报后，表示可以同意这个意见。

△　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成立，张爱萍任主任，统一领导皖东北各抗日武装和开展对安徽第六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等人的统战工作。

△　社会部决定成立“中统局陇东调统室”，甘肃省党部委员韩达兼任室主任。该组织专门破坏陇东革命事业，派遣特务分子打入边

区，搜集陇东解放区各项情报，作为包围、封锁、破坏边区的资料。

△　全国高等教育遭受敌寇破坏：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受敌寇轰炸破坏者92所，因战事停顿或合并者18所，迁移后方开学者70所，仍在原地开课者仅20所。

△　日军在华北“扫荡”失败后，掘堤放水进行报复。安国以南之潴龙河、安平以北之滹沱河、河北中部之永定河、南部之安阳河等次第被掘，各地汪洋一片，尽成泽国。水中漂流之难民复遭日军机枪扫射，不死于水，即死于弹，惨绝人寰。

△　日宪兵见习队平野中佐率队接收自河北押解来的90名中国人，“特殊输送”至“七三一”石井部队进行细菌试验。

△　伪华北盐业股份公司成立。

△　司徒雷登将从重庆获得的有关“和平”条件的答复，转告王克敏。

△　香港颁布《战时征集条例》，征召适龄壮男加入义勇军或入香港海军防卫队作后备兵。

△　天津大雨，水势猛涨，市区水深1至9尺不等。14日，英租界大街为水淹没，22日，全市商业完全停顿。23日，平、津火车中断，大批灾民逃往北平。据估计被灾人数达200万以上。河北省30余县亦遭到水灾，面积约六万方里。

9月

9月1日　法西斯德国大举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　国民党宣布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原三青团临时机关改

为长期性之中央干事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陈诚任中央干事委员会书记长，朱家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下设六处一室：总务处长庄明远、组织处长康泽、训导二处长王东原、宣传处长叶溯中、经济处长何廉、社会服务处长卢作孚，书记长办公室主任柳克述。是日，陈诚招待教育、文化、新闻界说明成立意义称，三青团“不但要严密组织团结青年志士，而且要施以必需训练，造成真正力行三民主义的信徒和战士”。

△　毛泽东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打破了英、法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

△　尼赫鲁因国际形势变化，由成都提前返重庆，次日向蒋介石辞行，准备回国。

△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国书。

△　日军第十一军下达进攻长沙的临时准备命令。

△　日军分两路对广东前线发动进攻，激战数日，至6日，进至龙潭附近，守军败退。

△　全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校长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

△　重庆百余文化团体举行国民月会，通过声讨汪精卫宣言。

△　贵阳各界举行讨汪锄奸运动周。6日，万余民众举行讨汪锄奸大会并通电讨汪。

△　全国征募寒衣运动总会发布本年征募计划，定是日起至10月底征募棉背心300万件。

△　中央信托局奉令统销猪鬃，宣布嗣后猪鬃购销统归该局办理。

△　《挺进报》在平西根据地创刊。

△　第一七二师及鄂东程汝怀部，围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驻夏家山部队，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良卿等百余人被杀，50余人被俘。

△　上海汉奸报纸《时报》停刊。

△　汪精卫发表《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劝诱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日本“协力反共”。

△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

△　大批日本人强占上海海关，原有人员被迫离职。

△　香港英国当局下令检查电报，并规定电文只准用英、法文字，不准再用中文。上海工商业界提出严重抗议。8日，香港恢复收发中文电报。

9月2日　　蒋介石就欧战爆发问题，特约见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参谋总长何应钦等，研究今后外交方针。

△　尼赫鲁致电毛泽东，对未能应邀访延表示遗憾，并向八路军致敬，祝中国解放事业成功，4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举行欢送尼赫鲁大会。

△　国民党中央通告：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李圣五、陈群、缪斌叛党附逆，一律永远开除党籍。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攻克豫东永城、夏邑间小马牧集伪军据点，全歼伪军200余人。

△　日军在湖北黄陂王家河两岸，屠杀平民，并施放毒气，有480余人遇难。

△　海关施行新进口税率，规定日用品进口税一律照现行税率三分之一征收，有效期间至战争终了为止。

△　上海《大美晚报》英、中文版同时刊登致汪精卫公开信，要求汪对该报编辑朱惺公被暗杀事表明态度。

9月3日　　新四军第五支队伏击进犯皖东来安之敌，歼敌数十人。

△　日机36架分批夜袭重庆，发生激烈空战，被我军击落两架。

△　日军在江苏昆山陈家浜枪杀村民18人。

△　苏联、美国分别宣布对欧战中立。

9月4日　　青海省军民通电声讨汪精卫，请中央从速讨灭逆贼，以遏乱源。

△　日本大本营令在南京设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华北、华中、华南侵华军，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同时撤销。23日，下达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统辖华北方面军及第十一、十三、二十一军，总计24个师团，约80余万人。25日，西尾、板垣启程来华。29日，原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奉调回国。

△　日军进占军渡，再次炮击黄河水上通道宋家川，经10余日战斗，为陕甘宁河防部队击退。

△　上海女子中学校长吴志骞被汪伪特工部匪徒暗杀。10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恤金5000元。

△　天津英军一部500余人撤防离津。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对记者称：日不卷入欧战漩涡，决守不干涉政策，以集中全力解决“中国事件”。

9月5日　　行政院任命张嘉璈兼水陆运输联合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子良、钱宗泽等为常务委员。

△　教育部决定在豫、陕、甘、川、湘、黔六省，设立国立中学12所，分别收容各战区中等学校退出之员生。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在豫东太康县西歼来犯日伪军200余人之大部。

△　尼赫鲁离渝返印。

△　汪伪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伪中央党部。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璧君、顾忠深、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褚民谊为秘书长。各部部长分别为：组织梅思平，宣传陶希圣，社会丁默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

△　英国政府将天津程案四同胞引渡天津伪地方法院。该院即将四人交日军当局。

△　日本政府向英、法、德、波、意、美六国提出备忘录，声明：日本政府正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决定对欧洲战事采取不干涉态度。

△ 意大利宣布对欧战暂取中立。

9月6日 孔祥熙对记者谈欧战爆发后形势，认为对抗战前途并无不利影响，今后当以从容谨慎态度应对财政金融上一切演变。

△ 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地党部发起募捐，赈济河北水灾。

△ 日军进犯河南修武县秦庄，杀害村民86人，其中有20多名幼童被用刺刀挑死或扔进火海烧死。

△ 日军第三舰队参谋长草鹿访英、法舰队司令，促请接受日政府关于撤退英、法在华驻军之要求。

△ 汪伪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改组江苏省党部和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派奚则文、茅子明、李志云为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蔡洪田为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

△ 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远东政策不变。

9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凡参加汪伪代表大会者，有党籍者开除党籍；褚民谊、何世桢永远开除党籍，并交政府通缉法办。

△ 汪精卫在上海招待外报记者，宣读“中日和平”声明书，鼓吹卖国投敌。

△ 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遗缺由第十师团长筱义男中将担任。

△ 香港英政府宣布限制购买外汇。17日，又公布补充条例。

9月8日 国民政府令设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蒋介石为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为常务理事；同时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集一切金融大权于四联总处。

△　共产党七参政员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吴玉章发表对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提出反对投降妥协，肃清汪派汉奸，实行战时民主，发展游击战争，努力增进外援等主张。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坤生为第十五军军长。

△　驻美大使胡适访美总统罗斯福，商谈美对华第二次贷款；26日，访财长摩根索。此后，又经多次会谈，至翌年4月始达成借款协定。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在苏南武进县陈巷桥地区伏击日军，歼敌180余人，毁汽车七辆。

△　日机46架空袭延安，投弹200余枚，死伤50余人，毁房百余间。

△　国民政府令：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王郁骏、郑肇经、万辟等均免本职；另派彭济群、鲁佩璋、茅以升、万辟、张含英等为委员。

△　国民政府发行华北水灾救济公债300万元。

△　贵州省凤冈县县长陈势涛抵重庆，代表该县士绅、教员、学生、苗民组织的志愿兵团2000余人，向国民党中央“请缨杀敌”。

△　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就一部分党员参加汪精卫在上海召开的伪全代会事发表谈话称：参加伪会者固有不少真正附逆的人，但多数是迫于威胁，勉强附和，或出于利诱，一时糊涂从逆。中央对这些人要详细调查，分别处置，不绝他们自新之路，也不为国家养姑息之奸。

△　中、法、比、瑞文化协会通电声讨汪精卫，并请通缉严办汉奸褚民谊。

9月9日　　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于本日至18日在重庆开幕，出席参政员122人。议长蒋介石致开幕词，指出：当前最迫切的事是集中人才，建设后方；加强军事，争取胜利；注意国际形势，推进战时外交。通过定期实施宪政的决议。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监犯调服军役条例》。

△　民国二十五年度统一公债（乙种第八次）、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第12次）、二十四年电政公债（第16次）、二十五年整理粤金融公债（第六次）、二十六年辟浚粤河黄金公债（第五次）等五种公债在上海举行抽签还本。

△　本年度国立大学统一招生，首批录取学生发表，应考生1.2729万名，录取3747名，计大学新生3155名，先修班学生592名。

△　交通部与苏联民用航空总管理局在重庆签订《组织哈密、阿拉木图间定期飞航协定》。

△　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抵延安。10日晚，延安各界召开盛大欢迎会，毛泽东致词，针对摩擦事件强调“团结是总方针”。慰劳团负责人张继、团长贺衷寒、作家老舍相继讲话。11日，慰劳团北上赴绥德、榆林慰问。

△　美国通知日本，对片面改变在华租界地位事，表示绝不承认。

9月10日　　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继续举行。是日至18日共开会九次。第一至四次会议由驻会委员会川康视察团及行政院所属各部、会主管官员分别报告半年来政治、军事、经济财政、交通、外交、内政、教育概况并进行讨论。第五至九次会议集中讨论各项提案。

△　重庆市磁器口、两路口大火成灾，被焚500余户，灾民2000余人。

△　《美术界》在上海创刊，以反映抗日战争为主要内容。1940年3月停刊。

9月上旬　第九战区制定“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

△　周恩来在新疆迪化听取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同时，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的新兵营看望在那里学习装甲车、坦克专业技术的原红四军人员，作关于抗战形势报告。在迪化期间，四次同盛世才谈判，争取盛继续同中共合作。中旬，到莫斯科，住克里姆林宫医院。

△　日本陆海军准备进攻长沙，各作战部队向指定地点移动。

9月11日　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作秘密财政报告称：数月以来国库收入益见短绌，支出增加益巨，亏短之数亦继长增高，弥补更感困难。报告透露本年度收支不敷之数不下25亿元，抗战后25个月增加内外债计34.6490亿元，人民负担不为不重，但与敌方公债两年间增加140亿元相比，仍不过一与四之比，由此可见敌方财政困难较我更甚。

△　日机九架轰炸广西玉林，死30多人，伤80多人，毁房160多间。

△　经济部修正公布《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9月12日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陈群、缪斌、褚民谊、何世桢、梅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李圣五等汉奸。

△　国民政府公布《节约建国储蓄条例》，凡12条。

△　东北抗日联军李延禄部，在吉林密山东部地区与日伪“讨伐

队”遭遇，毙敌57人。

△　日军调多田骏中将接替杉山大将作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任驻蒙军司令官。

△　上海中法学院学生罢课，驱逐该院院长、汉奸褚民谊。

△　上海持志学院学生以该院院长何世桢附逆，宣布罢课退学。1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持志学院停办。

9月13日　军政部长何应钦对重庆报界报告最近战况称：现在日军侵占之12省内共有933县，日军仅占有521县。

△　蒋介石约见陈绍禹、秦邦宪等，再三表示《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他并未最后批准。陈绍禹当面向蒋介石递交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下发之消灭八路军密令，蒋声明并不知情，表示愿指定专人与中共代表继续洽谈政治解决一切问题。

△　第四战区一部攻克广东花县。同日，第一战区一部连克豫北温县、崇义。

△　日本第十一军为进攻长沙，将前方司令部移到湖北咸宁。

△　日军围袭山西闻喜县裴社村，杀害民众93人，毁房300余间。

△　日机27架空袭四川万县，被击落10架。

△　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分电国民政府各部、会，报告河北水灾惨重，请求赈济。

△　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发表施政方针，要点为处理中国事变，扶植汪伪中央政府，整备和强化国家总动员体制。

9月14日　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开始。日军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主力，在赣北发动钳制性进攻，企图夺取修水、铜鼓，直下平江、浏阳，与湘北日军相呼应。同日，鄂南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亦自崇阳南下进攻湘北。

△　国民政府派钱泰为出席第八届国际统一刑法会议代表。

△　山西旅陕同乡会以山西灾情严重，通电呼吁救济。电称：山西1700余万无辜人民呻吟于敌寇屠刀之下，死伤在50余万。最近敌寇七次扫荡中条山，九路围攻晋东南后，食粮已被焚一空。今夏又因缺雨，棉花全未下种，待哺哀鸿，盈山满谷。如欲争取抗战胜利，保持西北堡垒，须先救济晋省灾黎。

△　上海日军当局邀请美、英、法、意四国驻沪陆军司令举行会议，主张变更现行上海各国防区，俾予日方以较大统制区域。

9月15日　何应钦在重庆播讲《驳斥汪逆投降谬论》。

△　第十四世达赖“转世灵儿”拉木旦柱护送抵拉萨。

△　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徐海东等40多人离开延安，再赴华中敌后中原局所在地竹沟。

△　广东中山县人民自动武装，猛攻日军驻所，毙伤敌数百人。

△　日机33架空袭宁夏。

△　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欢迎苏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邵力子致欢迎词，中苏文协理事冯玉祥讲话。

△　行政院公布《汽车管理规则》，对除军用汽车外，全国所有汽车之登记、检验、领照、纳费等作详细规定。

△　成都华西、金陵等大学中外教授创办之《成都日报》出版。

△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起草“以树立汪新政府为中心的战争解决最高指导方针”，认为在进行汪政权拥立工作的同时，必须向重庆展开停战或汪蒋合流运动。

9月16日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央社刘尊棋、《扫荡报》耿坚白、《新民报》张西洛三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抗日战争已处于相持阶段，必须改革政治和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才能作好反攻准备。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摩擦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美国公路运输技术顾问团薛恒、鲍西、范百德三人应孔祥熙邀请来华视察公路建设，是日到达重庆。20日，蒋介石会见薛恒等三人，表示希望美国对中国公路运输技术问题及其他建设事业多予协助。

△　日本海军当局通告各国驻沪领事馆：17日起封锁浙江温州港口，各国船只务于晨8时前离去，各国在温州侨民亦应一律撤退。

△　汪伪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改组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和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会，派陈耀祖为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节兼书记长；黄恩澧、周兆民等为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许锡庆兼书记长；邝启东为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杨昔川兼书记长。成立北方党务办事处，焦莹为办事处主任。

△　日本大使东乡与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日、“满”及苏、蒙，在莫斯科签订《诺门坎停战协定》。

9月1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碞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　宋美龄以全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主席名义电各省府主席夫人、各地妇女工作委员会、慰劳分会、各妇女团体及海外侨胞，发起征募棉衣50万件运动。

△　日军宪兵队纠集伪军100余人，包围山西定襄县碳窑沟村，杀死村民54人，毁房77间。

△　湖北日军由汉水乘汽艇30余艘占领仙桃镇，当晚在镇内烧杀抢掠，截至翌日中午，共毁房1140余栋，强奸妇女10余人，杀害居民20余人。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中美日报》在街头出售，为期三周。

△　缅甸华侨救亡联合会成立。

9月18日　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许诺“支持长期抗战，粉碎汉奸阴谋，切实提高民权，促进实施宪政”。大会通过决议82件，选举孔庚、张澜、喜饶嘉错、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许德珩、史良、董必武、秦邦宪等25人为第四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并由蒋介石指定张君劢、张澜、史良、陶孟和、周览、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董必武、罗隆基、傅斯年、褚辅成等19人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委员会委员，黄炎培、张君劢、周览为召集人。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兆锠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陈炳谦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黄涛为第六十二军军长。

△　第一战区一部攻克豫东兰封。

△　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部在吉、黑边境通河城南与日军激战，毙敌170余人。

△　日本第六师团及第十三师团一部、海军陆战队二联队自湘北新墙河北岸发动进攻，一部由岳阳攻大桥头、姚梅州，一部由桃林攻黎家湾。来势凶猛，全线发生猛烈炮战。

△　日军在江西高安芦桐村“扫荡”，放火烧死100余人，毁房210余间。

△　日机轰炸湖南平江县城，死伤民众300余人。

△　日机是日起，连续三日轰炸福建德化，投弹六枚，炸死民众47人，伤83人。

△　多田骏抵南京接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原司令官杉山元返国转任军事参议官。

9月19日　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一、省政府主席王缵绪请缨出川辞职，由蒋介石监理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二、任命贺国光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原秘书长陈筑山免职。

△　四川政府前主席刘湘国葬典礼在成都举行。蒋介石、林森及中央与各省军政官员均派代表或亲往参加。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一能为第九十九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即新县制），凡16条，强化保甲制度与县以下各级统治机构，加强对县以下各级政权控制，其目的在“使异党无活动余地”。10月9日，又颁《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

△　湘北日军向新墙河北岸推进。同日，赣北日军陷高安。

△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桶口季一郎、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喜多诚一、书记官太田一郎，及南京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在南京集会，协商汪、王、梁三方合作问题。

△　汪精卫向重庆发出劝降电，妄称“最近共产主义流毒，尤迅而

且烈”，中日两国若于此时结束战争，“中国尤可因此休养生息”。

△　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会谈，就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伪中央政府问题进行谈判。

9月20日　国民政府改组河南省政府：免去主席程潜、代理主席方策及委员龚浩等本兼各职。任卫立煌、方策、曹仲植、张广舆、鲁荡平、齐真如、罗震、李鸣钟为河南省府委员；以卫立煌兼主席，方策兼民政厅长，曹仲植兼财政厅长，张广舆兼建设厅长，鲁荡平兼教育厅长，蒋炎为省府秘书长。

△　日机46架空袭江西宜丰城，投弹22枚，炸死18人，伤19人，毁房185间。

△　日机36架空袭西安，投弹数十枚，死伤30余人。

△　教育部颁布《文化团体组织大纲》，社会部颁布《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规定凡有违反三民主义言论或行动者不得为会员，文化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外进行政治活动。

△　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会谈结束。达成下列协议：一、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建立伪中央政府；二、伪中央政治会议主要讨论伪政府名称、首都和国旗及其他必须商谈之重要事项；三、伪中央政府建立后，设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四、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人员分配为：汪伪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伪临时和伪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一；五、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分别在上海、北平和南京发表声明，汪表示欢迎王、梁参加伪中央政府，王、梁声明支持成立伪中央政府。

△　香港当局通知各中文报馆，只许称德国为敌人，不得称日本为敌人。亦不得用“某国”或“X国”暗指日本。

9月中旬　泰国归国华侨服务团团员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五十四队，由队长崔辉生率领到达延安，旋即赴八路军河防部队担任救护工作。

9月2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庞炳勋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施中诚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

△　《新华日报》刊载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布的七大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改善民生，实行民主，巩固统一战线，开展生产事业，发动游击战争，加强抗战教育，巩固部队，厉行锄奸。

△　湘北前线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在绵江击退日军，次日收复高安。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以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

△　第三十二集团军下令，苏南新四军各支队非有本部命令，不得推进金（坛）、丹（阳）、（无）锡以东地区活动。

△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呈报军委会政治部，以《八路军军政杂志》未经正式机关批准，应予取缔。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指出：山西形势自秋林会议后起了很大变化，逆流继续发展，而反逆流斗争成效不大，进步力量屡遭打击。要求在山西掀起一个有声有色的反投降反分裂的运动，以巩固山西的抗战。

△　孔祥熙驻沪代表为密邀日本官员喜多来沪“和谈”事电孔请示。次日，孔祥熙复电“俟喜来沪后，可先与非正式洽谈”。

△　伪临时和伪维新两政府委员会在南京发表声明，表示愿全力协助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

△　汪精卫由南京回到上海，发表声明，对伪临时和伪维新两政府之活动表示赞许。

9月22日　蒋介石致电莫斯科斯大林，告以特派贺耀组将军搭乘中苏通航首班飞机赴苏致敬，并谈抵抗日本侵华事。

△　蒋介石电令驻法大使顾维钧拒斥法国转达日寇所提使中央与其伪组织合流之过渡办法，指其为对我国之侮辱。

△　军委会、行政院会衔公布《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芜救济办法》。

△　国民政府颁行《日人伪造法币对付办法》。

△　湘北日军陷草鞋岭。夜，原在通城、岳阳间之日军第六师团进至新墙河北岸并试行登陆。

△　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出席并讲话。

9月23日　日军渡过新墙河向长沙大举进攻，29日占领长沙外围各重要据点。

△　日本大本营下达《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作战指导纲要》。要领是：确保占领区治安及长江下游交通，占领广州、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要地，切断中国军队南方补给线。

△　日本“特使”加藤在北平接见记者表示：新“中央政府”成立后，重庆政府官员连同蒋介石在内，若根本改变其见解，尤其是对于共产党之观念，则加入新“中央政府”均所欢迎。

△　社会部密令河南省第十区指导专员办公处，查抄洛阳抗日进步组织河南青年救亡协会。

9月24日　军事委员会就日军进攻长沙召开最高幕僚会议，拟定两个方案：一、袭击侧后；二、敌深入时予以打击。蒋介石决定采取第一方案，并于次日发布命令：一、万一长沙不守，薛岳应到萍乡指挥；二、在株洲、浏阳、醴陵各重要地区应布置兵力阻敌深入；三、衡阳地位重要，应讲求间接掩护。

△　日军陷晋南芮城。

△　日军在江西高安马鞍岭抓捕民众330多人，用刺刀捅死。

△　河南焦作煤矿矿警队队长靳思和等率部500余人反正。

△　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电谢毛泽东为绥榆旱灾捐款一万元，并代购赈粮三万元。

△　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通讯处致函声援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罢工工人，办事处全体人员争先捐款。路过桂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亦捐款援助。

△　菲律宾中国学生全国协会集会声讨汪精卫。

9月25日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电令第九战区："（一）目下守备汨罗江、湘阴之部队应以一部极力迟滞敌人前进，主力即向醴陵、株洲方面预定地区转移，准备尔后作战。（二）为予长沙附近敌以有力打击计，应以有力兵团（二或三师）于高桥、金井附近占领侧面阵地，乘敌南进之际，与守备长沙之部队互相策应，加以侧击。此际对平江方面之安全须加顾虑。（三）第七十九军之游击地区可指定于麦市、通城、朱公桥、平江一带。（四）已令第五军主力推进衡阳，一师推进衡山。"第九战区据此决定派一部分军队在新墙河南、汨罗江以北对日军作运动战；派一部分军队埋伏在福临铺、桥头驿及以北地区；派有力部队控制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域时予以痛击。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灵寿县陈庄地区抗击日伪军，战至30日，歼敌1000余人。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夜袭苏南镇江东南渣泽站，歼敌100余人。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方面军在吉林敦化县寒葱岭地区设伏，全歼日140余人，毁汽车11辆。

△　湘北日军第六师团进入汨水左岸。第三十三师团进入桃树港以南地区，对福石岭发动进攻。27日，陷福石岭，经长寿街向平江突进。

△　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调第一七二师围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五六百人。

△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举行第二届理事会首次会议，研讨反侵略运动工作方针，通过会同有关机构组织中国抗战国际宣传团，赴欧美各国访问宣传等项提案。

9月26日　　蒋介石致电薛岳："准备以六个师的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并亲自指挥。乘敌人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

△　拂晓，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进犯幕阜山主峰，傍晚该峰失守。同时，新墙河以南日军强渡汨罗河。午后1时在洞庭湖登陆之第三师团横田、吉川各大队及石桥陆战队进至汨罗江南岸13公里处，沿粤汉路旧线继续南犯。

△　第三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宋文彬致电陈诚，请决长江水淹湘、鄂、赣及武汉等地日军。陈诚转报何应钦后，次日何应钦复电称："现入枯水时期，难于实施。此项意见可存备参考。"

9月27日　　冀西陈庄大捷。八路军聂荣臻、贺龙所部杨成武第一

支队为主力，在河北西部阜平、灵寿间陈庄，与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激战三昼夜，至29日全歼该敌，同时并击退由石家庄、井陉、娘子关来援日军1600余人。是役共毙伤日军2000余人，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于是役丧命，并生俘多名，缴获大炮、轻重机枪、无线电台等大量军用品。八路军伤亡584人。事后，蒋介石、程潜、卫立煌、阎锡山等均来电庆贺，并传令嘉奖。

△　日军突破汨罗江后分路南犯，薛岳移驻株洲指挥各路伏击制敌，湘北战场展开血战。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新三五八旅一部，于阳曲县杨兴镇、庞家庄抗击日军进攻，歼敌100余人。

△　外交部电经济部，告以法国禁止我方物资假道越南，显系法政府态度变更，现正分向法政府及越南政府力争，并请美、英政府转劝法仍予我假道越南之便。

△　英驻津总领事访日领事称：倘英租界生命财产获得保证，则英当局准备接受日方条件，在东京继续举行圆桌会议。

9月2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对美合众社远东部经理毛勒士发表谈话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只要“光荣和平的条件，中国无不乐于接受，尤其希望爱好和平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此后不久，张群、魏道明等政府官员纷纷赴香港作“和平试探”。

△　第三战区将领顾祝同、黄绍竑、陈仪、唐式遵、刘建绪、上官云相等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和鼎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日军上午攻占湖南平江。晚，日军进至上杉市，遭覃异之部第一九五师伏击，被歼1000余人，覃师伤亡亦重。

△　日军在天津英租界内大捕“反日分子”，租界内美合众社分社亦遭检查。

9月29日　延安盛会欢迎中外朋友第二战区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名记者斯诺、苏联朋友白列斯托夫、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安德华大夫。毛泽东致欢迎词，何柱国、斯诺、白列斯托夫等相继讲话。

△　桂林行营颁布《防止仇货办法》，凡八条。

△　空军袭广州白云机场，炸毁日军仓库10座、日机10架。

△　日军第三师团主力进至长沙北之桥头驿。同时，长沙外围上杉市、永安市等据点悉为日军占领，但其主力不断遭到第九战区部队伏击、侧击和夹击。

△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萱岛旅团进至武宁西南的长岭山，半夜渡过修水在武宁附近集结兵力，准备向三都方面进犯。

△　日军在江西高安大屋场放火烧村，烧死群众280人，烧毁房屋700余间。

9月30日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湘北会战发表谈话称：“敌军此次进攻之目标，显在长沙、常德与宜昌之线。我军战略早已决定为全面战争，而以消耗敌军打击其主力为目的，绝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并指出“自去冬放弃武汉以后，长沙已非我战略上之要点”。

△　第四战区独立第二十旅向深圳日军发动进攻。

△　长沙外围日军攻势稍挫。进犯上杉市、永安市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为第五十二军张汉初第二十五师击溃。三姐桥、福临铺、金井一线亦为关麟徵、张耀明、欧震等部所阻。开始处于不利态势。

△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汉奸杨揆一，并撤销其军事参议院参议、陆军中将职务。

△　汪精卫向日本提出《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和《希望日本方面考虑之种种事项》，内容为：一、关于财政问题：（一）在中央政府成立前，于日本正金银行保管之中国关税收入中借支4000万元；（二）在中央政府成立后，正金银行保管之关税全部交与中央政府，以后关税收入统归中央政府；（三）苏、浙、皖地区统税交财政部，盐税等恢复事变前办法。二、为获得第三国对国民政府之承认，希望开放长江。三、沪宁铁路通行证、南京火车站及城门检查，应由中国方面发给和施行。四、日军在南京城内捕人时，应会同中国宪兵、警察共同进行。

是月　　八路军冀中军区国民教导总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　日关东军在河北省抚宁、迁安、蓟县、平谷、密云、永宁与热河临界地区，成立西南防卫委员会，由陆军少将安藤忠一郎主持，负责对该地区实施“三光”政策。

△　由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出版社编印的华文《民族抗战》创刊。

10月

10月1日　　蒋介石就汪精卫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事，在重庆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声明：“无论汪逆将来借何种政府名义，或如何假借本党名义，吾人只认其为日本之奴隶，无论其对内对外，绝不发生丝毫效用。”

△　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第九战区划分为第六、第九两个战区。次

日，任命陈诚、商震为第六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薛岳、王陵基为第九战区正、副司令长官。5日，加任杨森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　参政员褚辅成、张澜、沈钧儒、江恒源、莫惠德、章伯钧、胡石青、李璜、左舜生、张君劢、张申府、王造时等12人，在重庆举行宪政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及潘梓年等应邀参加。座谈会决定组织宪政促进团体。

△　日军由永安市开始向捞刀河以北撤退。

△　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午夜从黄埔启航，次日在宝安登陆，6日到达深圳。

△　日机46架空袭浙江黄岩县城，死伤30余人，毁房234间。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抵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

△　国民政府规定自是日起各省开始施行1938年6月9日公布之《公库法》（新疆、云南、青海、宁夏四省暂缓）。嗣又将财政部国库司扩大改组为国库署。

△　经济部采金局设立南部区采金处，办理四川南部、南充、蓬安、阆中、苍溪、广元、昭化等金矿开采事宜。

△　汪精卫为筹组伪中央事再度赴日。

△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就英、日谈判，重申日政府意见。

10月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为副总司令，关麟徵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日伪军工作的训令》。一是对日军工作，其方针是应用各种方法削弱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二

是对伪军工作，应以消灭与争取并举，反正与瓦解并进，对伪军除联络其上层外，应在其下层进行工作。

△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湘北全面反攻。当日，长沙外围山谷地区日军被切成数段，桥头驿、上杉市、王公桥、李家段等日军据点均被夺回。福临铺以北日军后路被断绝。

△　空军空袭汉口日军机场，毁日机50架。

△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副司令沈鸿烈、韩德勤率各将领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攻克豫东永城县孔庄、袁楼伪军据点，歼伪军100余人。

△　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实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组织大纲》及四联总处《组织章程》。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章程，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夏衍、林林、邵荃麟、司马文森、周钢鸣、林山、聂绀弩、黄药眠、刘季平、华嘉、黄新波、田汉、欧阳予倩、胡愈之、孟秋江、陈芦狄等曾先后当选为该会历届理事、候补理事和常务理事。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日本地方长官会议上讲话，声称：当前最大问题在于处理“中国事变”，内阁根据既定方针，支持汪精卫建立新中央政府，以期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设。

△　英国海军司令部宣布将从停泊长江的10艘炮艇中抽调五艘他用。

10月3日　蒋介石自重庆飞成都理川政，17日飞返重庆。

△　苏空军志愿队为策应第九战区湘北作战，出动轰炸机九架，袭击汉口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4架及修理中日机10余架，并炸毁油库及部分材料库。

△　进攻长沙日军分三路溃退，长沙东北金井等日军据点已克复。

△　江西日军第一〇九师团萱岛旅团从武宁沿修水向三都进犯，次日陷三都。

△　日军驻华舰队司令宣布封锁温州海面，第三国停泊海面之军舰、船只，须于6日晨8时前驶出。

10月4日　第九战区薛岳所部克复湘阴，即向汨罗江北推进。

△　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在沪宁铁路龙潭、仓头之间炸毁日军军车一列，歼敌118人，迫使沪宁铁路交通中断三天。

△　广东日军陷石岐。7日晚，当地地方团队乘日军立足未稳，包围猛攻，复克该城。

△　鹿钟麟电行政院续报河北灾情称：冀中35县无县无灾，总计淹田15.382万顷，被灾村庄6700余，损失约1.6亿元。现无衣无食之民众190余万，前拨赈款10万元不敷尚巨，要求再拨巨款救济。

10月5日　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就职视事，决定将省府由洛阳移至南阳。25日，卫立煌发表施政方针，提出澄清吏治、推进教育、打破经济难关、努力维持社会治安等项方针。

△　第九战区各军连克营田、汨罗、平江等地。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全线退却，守军乘势追击。

△　山西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及全体官兵发表声明，揭露

山西顽固分子阴谋破坏抗日部队，唆使该师第四十四团脱离暂一师；坚决要求上级长官秉公处理，迅速解决。

△　汪伪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筹设中华通讯社，改组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海员特别党部及沪宁、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派沈尔乔、王敏中、丁济美为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李凯臣、罗广来、吴垂滢为海员特别党部常委，陈伯华、张泉林、马啸天为沪宁、沪杭甬特别党部常委。

10月6日　蒋介石电薛岳等将领祝贺湘北大捷，并向参战部队颁发赏金15万元。

△　第九战区各军在民众帮助下击退围攻长沙日军，恢复原有阵地，先头部队迫近新墙河。

△　日军车一列在沪杭路临平附近触雷，我军乘机出击，毙伤敌300余人。

△　豫北日军向沁阳西南进犯，并施放毒气。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俊青、曾宪栋为第十一军副军长。

10月7日　蒋介石在成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上午召集省府职员训话，下午接见专程来川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

△　进攻长沙之日军第十一军前方指挥所从咸宁撤走，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此役日军死伤1.3万人，第九战区部队伤亡2.5833万人。另据日方公布：中国军队死4.4万，被俘约4000人，日方战死850人，伤2700人。

△　江西日军第一〇九师团萱岛旅团从三都撤至武宁。

△　台湾华侨中华总会馆主席陈黎，因宣传抗日于1937年12月25

日被日军逮捕，是日被害。

△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由香港飞抵重庆。9日，访王宠惠。11日，赴成都与蒋介石密谈，19日再晤蒋介石。

10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汉魂为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为副司令。

△　程潜、李宗仁、李品仙、蒋鼎文、刘峙、黄绍竑、余汉谋、李汉魂等军政官员电贺湘北大捷。

△　新四军陈毅第一支队一部，于镇江延陵伏击日军，并截击增援之日军，共毙敌200余人，伤50余人。

△　日军牛岛师团二万余人在飞机20余架掩护下，分由长治、长子、壶关、苏店、屯留等地再次大举进犯晋东南。同日，日伪军6000余人开始“扫荡”冀中大清河地区，至22日被粉碎。

10月9日　第九战区一部攻克湘北新墙河及赣北修水。

△　黄炎培、梁漱溟、梁仲华、李璜在重庆黄炎培寓所谈论国内时局问题，黄炎培提出除国共两党以外的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七君子派、大学教授派、乡村建设派，于适当时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各党派倾诚团结，戒绝国内斗争，任何意见参商须在法律常轨上求解决。劝政府登用贤才，不分派别。

△　上海《中美日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停刊三周期满，是日复刊，又被汪伪党徒在街上将该报全数劫走。

△　汪精卫函邀吴佩孚参加伪政权。吴在汪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日方知吴不愿与汪合作，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七省归吴统治，请其于翌年元旦就职。吴均不允。

△　苏联决定关闭北平、天津、上海领事馆，驻上海领事馆事务委托挪威驻上海领事馆代办。

10月10日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重申主权完整不容破坏。

△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要“誓驱敌寇，尽除奸伪”。同日，蒋介石在成都主持国庆日阅兵式，川、康军政官员邓锡侯、贺国光、刘文辉、王缵绪等出席。

△　中共中央发表《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

△　军事委员会及航委会、军政部等339个特别党部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

△　绥境蒙政会全体大会在扎萨克旗开幕，次日闭幕，通过有关会议决议及声讨汪精卫通电。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一部，于灵璧县冯庙抗击日伪军进犯，歼敌300余人。

△　驻河北涞源日军独立混成旅下达第三期肃正计划，确定“扫荡”重点为涞源南部山岳地带即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北岳根据地。下旬，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旅团机动兵力进驻涞源，开始第三期肃正计划重点作战。

△　日机80余架分批轰炸西安市郊。

△　中共山西省委发布《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对危险倾向必须深加警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战进行到底。

△　邮政储金汇业局奉命在全国1000多所邮局同时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

△　第二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15日，各剧团分赴四郊演出。参加公演剧目中有日俘表演的《中国魂》。

10月11日　　蒋介石传电嘉奖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及第九战区正、副司令陈诚、薛岳，略谓："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详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

△　薛岳偕同陈诚抵湘、鄂边境，督率所部围攻岳阳。

△　山西牺盟会、决死队发表加强团结进步坚持抗战到底宣言。

10月1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步荣为骑兵第五军副军长，詹志忠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明令宣布：汉奸集团签发文告无效。

△　第二十七集团军围攻鄂南通城，毙伤日军逾千。

△　胶东伪军刘桂堂部千余人哗变，与日军激战数小时，双方死伤甚重。

10月13日　　国民政府任命韩德勤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原任顾祝同免本兼各职。

△　湘北羊楼司激战，日军伤亡逾500人。

△　鄂中日军与伪军偷袭京山县新街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支队在司令李先念指挥下反击，歼敌100余人，日伪军施放毒气，仓皇撤退。

△　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在山西省第三督察专员公署第六次行政会议上，揭露顽固分子对日投降分裂，对内分裂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的活动。

10月14日　苏空军志愿队再袭汉口日军机场，炸毁日机50余架及油库和弹药库。返航途中与日机九架遭遇，击落日机三架，自损一架。

△　晚，第三战区一部冲入杭州市区，巷战竟夜。城内伪机关及艮山门、拱宸桥一带多处起火。

△　日本大本营下达攻占南宁的作战命令：为彻底切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要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迅速切断沿南宁——龙舟的公路补给线。预计作战时间为11月中旬。

△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在重庆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范长江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救国会负责人褚辅成、江恒源、沈钧儒、邹韬奋、李中襄、张申府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吴克坚和各报记者30余人参加。

△　周佛海到东京，代表汪精卫祝贺阿部信行内阁成立，并与日军政当局会谈，要求支持与允许汪早日建立中央政府。

10月15日　蒋介石发表《告川省同胞书》，宣称："解除人民疾苦为百举之先，彻底肃清烟毒是治川要务。"

△　新四军军长叶挺由防地抵重庆。21日，向报界报告新四军作战情况，称：新四军三万余人现驻防于沪宁路之南京、镇江、句容一带及芜湖区域，长江北岸之浦口及滁州一带，平汉路之南信阳、武胜关区域。过去18个月间，日军在南京、镇江、句容、芜湖等地进行"肃清"游击队运动20余次，每次接战均遭重创。

△　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主力及第一一〇师团一部兵力约两万人，

附炮数十门，飞机十余架，坦克50余辆，汽车、装甲车300余辆，向冀中大举“扫荡”。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部与敌激战16昼夜，至31日将敌全部击溃。是役共毙伤敌2000余，毁车30余辆，八路军官兵亦伤亡千余。

△　日机71架分两批空袭延安，投弹225枚，炸毁窑洞30余间，死伤23人。

△　司法行政部令在四川、贵州、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西康、青海九省高等法院所在地设置新监狱。

△　桂林《国民公论》、《中学生》、《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具呈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取消所谓《抗战时期名词正误表》。

△　周佛海在东京对记者发表谈话，要求日本允许汪精卫早日建立中央政府。周说：“中央政府将网罗国民党外之已成各政权，各党各派及社会知名人士，以及重庆政府人员参加，组成举国一致的政府，并以中日协力维持东亚和平为根本方针。中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与日本一致，在经济上与日本合作。”

10月16日　　蒋介石出席成都党政军联合扩大纪念周，宣布治川要旨10条。

△　孔祥熙对美联社记者谈话称：中日和平“问题之中心不在中日能否媾和，而在日本能否放弃对华之侵略”。

△　八路军晋冀豫军区一部于昔阳县安丰镇击落日机一架，机上人员全部毙命。

△　经济部长翁文灏就物价上涨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自抗战以来，食物与衣料之价格并未有显著升涨，因近年各地丰收，粮食无缺，此实为我国一种幸运。”

△　经济部采金局设立南溪采金处，开采南溪金矿。

△　日轮“新太古号”在吴淞口外沉没，华人300余人遇难。该轮仅能载180人，却载四五百人。

△　上海市工商、教育团体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崇尚廉耻运动会，推严省三、王志诚等11人为委员。

△　伪满发布《特产品专管办法》。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东京就汪伪“新中央政权”问题答复新闻记者称：“一切尚未决定，新中央政权必须为一强有力而足以负起与日本合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政权。”

10月17日　第四战区一部进击广东江门日军。晚，在江门近郊与日军激战之际，江门伪挺进军何平之部，突在敌后反正，第四战区所部冲入江门，纵火焚烧敌军营房及仓库。

△　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在赣北三路出击，断靖安、奉新日军联络。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袭击白晋铁路武乡县南关车站之敌，烧毁车站及敌军衣一万余套，炸铁桥一座。

△　《新华日报》发表西班牙国际义勇军中国战团《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外交当局向法政府交涉，迅速释放中国战团战士，帮助他们回国参加抗战。

10月1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播讲《我们的外交方针》，概括外交方针为“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指出，对于危害我国家民族的敌人，必须竭尽全力抗战。在目前敌人侵略状态下接受敌人条件来呼吁和平的，便是甘心卖国、靦颜事仇的汉奸。

△　罗卓英部第十九集团军与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在鄂赣边界九宫山地区夹击日军，毙伤敌千余人，俘虏八人。

△　参政员褚辅成、沈钧儒、秦邦宪等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宪政座谈会，到会七八十人，张澜、董必武等五人为主席团，讨论宪政与抗战建国问题，发言者强调只有民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

△　经济部公布《战区及接近战区合作社组织暂行办法》，凡10条。

10月19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五届六中全会。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邢台县皇寺镇接受伪皇协军一个大队300余人反正。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攻占南宁作战命令。

△　日军在江苏射阳县通洋镇放火烧房，从鹿塘南头至通洋镇南头连绵2.5公里，众多房屋、10万余斤粮食及各种财物统统化为灰烬。

△　国民党中央党部训令：公务人员非经特许，不得对外发表评判国际情势之文字或谈话。

△　国民党中央党部训令：出版物取缔依法定程序，军事、政训机关“不得径予查扣”。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颁发《中央训练团各期受训人员调训办法》，规定调训人员为“民、教两厅厅长、市长、专员及县长，各省、市党部委员、书记长，青年团各支团部筹备主任、书记、干事，各省国民军训处处长及主要公私立高中以上学校训导官”。

△　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举行，各党派、各文化

艺术团体及工人、学生、市民代表千余人参加。

△　中国佛教总会会长圆瑛法师在上海被日方拘捕，次日解赴南京。据各报传闻，系因圆瑛在沪募集10万元作抗战费用。11月14日，圆瑛被解回沪，22日释放。

△　上海华东印刷公司工人为拒印汪伪汉奸刊物罢工。上海印刷工会号召全上海印业工人一致行动，拒印汉奸刊物。

△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东京美日协会发表演说，驳斥所谓“东亚新秩序”，对日本屡次威胁美在华利益提出警告，表示美将坚决维护在华利益的决心；并称：“日本军队在中国之行动方法及日本飞机所认为轰炸之目标，更引起美国人民之愤怒，而对于日机在华之肆意轰炸，尤为震惊。”25日，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邵力子等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及格鲁，对格鲁演说表示谢意。

10月20日　　蒋介石电陕西省政府拨款10万元救济西安被炸灾民。

△　第二战区一部克复山西静乐，生俘日伪军80余人，毁汽车多辆。

△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通电声讨汪精卫。

△　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重庆开幕。该会为全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设立。主席李德全报告会务称，该会设有保育院46所，收容儿童二万。

△　《大公报》向天津读者募集捐献的德制“大公号”滑翔机一架运抵成都。11月9日，运抵重庆。

△　战时新闻检查局因《新华日报》19日刊登《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文，迫令是日停刊一天，并派宪警搜查报社，检

扣当日报纸，市区张贴之报尽被撕毁。新华日报社当即向战时新闻检查局提出抗议，并要求刊登启事向读者说明原因。21日，该局函复“奉谕”不准刊登。22日，新华日报社再次提出抗议。

△　日本唆使暴徒捣毁河南陈留美教会，并强迫与该教会有关华人退出陈留。

△　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在南京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会谈，讨论尽快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伪中央政府问题。

△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对华方针将依照日本政府历次确定之政策进行，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决心，并不因第三者干涉而有所改变。要求英、法充分认识“东亚新秩序”之重要性，与日本协力合作。

10月中旬　　日本兴亚院在东京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对华纲领12条，主要内容为：没收侵占区华方重要企业，禁止法币流通，掠夺各种资源；成立傀儡政府，加强敌占区特务工作，以巨款资助伪政权，收买汉奸伪军；收买战区人心，利用毒化政策和奴化教育，消灭战区人民抗敌活动。

10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战时军律》，规定：除通敌叛国、临阵退却等罪处死刑外，对于“主谋要挟或指示不利于军事上之叛乱行为者”，“意图妨害抗战扰乱后方者”，“意图妨害抗战而造谣惑众摇动军心者”，均处死刑。

△　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一部，于白晋铁路祁县来远、盘陀之间袭击日军，歼敌140余人，毁火车一列，汽车一辆。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军

事、政治相辅而行，晋省军事扩大为面的占领，并重点开发山西资源，以供日军需要。

△　财政部电令各海关，所有金银饰物非经部特许领有执照及非持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收兑金银办事处所发运金银证明书者，一概不准报运；应结外汇货物，如不照章结汇者即作私货论。

△　第二战区第十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白志沂，派兵200余人开往八路军晋察冀边区所辖灵丘县张家湾，武装接管灵丘县抗日政府，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　日本利用各国注意欧战之际，在沪西越界筑路，企图吞并上海租界，排斥各国在华势力。

△　日伪统计，满洲铁路总长超过一万公里，是日举行庆祝活动。

△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宣布：《诺门坎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现地谈判，改由日、“满”、苏外交当局继续谈判。

10月22日　　国民政府发言人否认外传日方派人在重庆作和平谈判，指出今天中国胜利频传，且国际形势愈加有利于我，毫无理由会屈辱言和。

△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等三团体代表云南省300万回族同胞通电声讨汪精卫。

△　军事委员会任命柳彦彪为第九十八军副军长。

△　第四战区一部攻克广东澄海，击溃日伪军2000余人。另一部冲入三水，焚敌营一所。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与自浑源来犯日军2000余人在金福店

附近激战数小时，将敌击退。次日，日军500余人又来进犯，复被击退。两役共毙敌百余人，八路军亦伤亡80余人。

△　新四军一部袭击徐州附近永城伪军，毙敌数十名，并生俘营长以下官兵150余名。

△　美国国务院就日本在沪西越界筑路事件发表声明，授权其驻上海代表与工部局联系处理。

△　香港进行防空演习。

10月23日　　孔祥熙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最近内政外交演变》，称：欧洲战事“并无不利于我之影响，各国关怀远东问题一如往昔，友邦对我同情援助，有增无减”。“现在敌人、汉奸鉴于我国上下精诚团结，国力日强，乃于图穷匕首见之余，散布种种流言，企图挑拨离间，达到汉奸自私自利目的，然此种阴谋伎俩徒见其心劳日拙，凡我国民，绝不致受其愚惑”。

△　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在立煌县病故。11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

△　军事委员会任命温剑鸣为第八十军副军长，武士敏为第九十八军军长。

△　八路军一部破坏开封附近铁道，炸毁日军火车两列，毙伪军日顾问以下110余人，破坏铁桥三座，路轨120余节。

△　项英报告中共中央，第三战区在苏浙皖边地区设第一、第二游击区。浙江第一、第二行政区及镇江南为第一游击区，陶广为总指挥；江南第一、第二及皖南第一行政区为第二游击区，由顾祝同兼总指挥，冷欣任副总指挥。划定新四军活动区域为镇江、句容、溧水、高淳、江宁、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一带。

△　欧亚航空公司港渝线复航。

10月2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茂恩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　日军侵占晋西隰县。

△　日机空袭四川巫山，所投概系空中爆炸弹，以致民众伤亡甚重。

△　日军在河南焦作麻掌村惨杀民众43人，重伤28人，全村54间房屋被烧光。

△　行政院通过《华北水灾救济实施办法》及《抗战军人家属保障办法》。

△　国民政府公布《调整出版品查禁手续令》。

△　中国、交通两银行总管理处函财政部报告维持外汇情形称：为维持外汇黑市设置之中英外汇基金，办理未及数月，售出数目已达1000万镑以上，而外汇黑市仍一再剧烈波动，有续予维持之必要。31日，财政部密令详查“售出之款是否必要”。

△　新华日报社致函宋庆龄，委托代转各界援助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反汪罢工工人第一批捐款3300元。11月7日，宋庆龄函复已收妥代转。

△　美国国务卿赫尔否认日本同盟社所传中国政府已托美驻华大使詹森代向日本政府提出和议一说。

10月25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称：外传英国正劝告中国与日本及苏联向国民政府提和平条件，非特无丝毫根据，且为极无常识之可鄙宣传。又称：除非日本军阀彻底

悔悟，扫数自动撤退我国境内之军队，则断无考虑之余地。

△　四川省政府成立动员委员会，黄季陆代理主任委员。

△　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〇师团共两万余人，向晋察冀边区一分区之阳家庄、三分区之军城及中心区之阜平合击，实行冬季大“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一二〇师主力，是日至12月8日，历时40余天，与敌作战108次，毙伤敌3600余人，粉碎了日军“扫荡”。

△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于临朐县五井抗击日伪军进攻，歼敌160余人。

△　日军侵占晋西乡宁，续犯吉昌。

△　重庆卫戍总部发布布告称：无论何人有贩运或囤积铜元及一分辅币，意在图利者，一律以扰乱金融危害治安论罪，从严惩处。26日，重庆市破获熔贩铜元奸商两起。重庆各报报道：近来重庆因铜元荒，市面零星找补多以邮票代替。

△　晋冀鲁豫根据地鲁西行政委员会成立。

10月26日　　上海“孤军”团长谢晋元举行奋斗二周年纪念日。谢对记者发表谈话，痛斥公共租界工部局及外国军事当局之失信行为，谓：工部局及外国军事当局请求孤军自四行仓库撤退时，曾保证我等仅须停留租界内十日左右。现已非法扣留达二年之久，违反国际法。要求恢复武装，继续参加抗战。

△　军事委员会任命武庭麟为第十五军军长。

△　日军600余人进犯北平妙峰山，被八路军击溃，毙伤敌中、小队长以下50余人。

△　国民参政会决定在四川省成都、万县、阆中、宜宾及西康省雅安各设一办事处，各办事处主任为成都李璜，万县褚辅成，阆中张澜，宜宾黄炎培，雅安林虎。

△　国民政府公布《紧急命令拨款办法》。

△　上海市邮差因要求平等增加生活津贴，反对对各级员工待遇歧异，实行怠工，全体齐集总局，向局长乍配林（法国人）提出抗议。次日，信差以下职工组成代表团，由工会代表率同与乍配林交涉，乍表示答应工人要求，后复工。

10月27日　国民政府指令批准定“八一四”为空军日。前定“九二〇”为空军节、“三二九”为航空先烈纪念节一并废止。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品仙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访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商谈重开英日谈判问题。

△　东京宣布：在华日侨为26.2万人，较1937年增加三倍余。

△　美国参议院通过《中立法修正案》,要点为废止现行中立法中禁运军火条款；外国购买美国军火应以“现购自运”为原则，不得赊欠。

10月28日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王震部第三五九旅在晋察冀边区广灵县南张家湾，伏击日独立第二旅团一部获胜，毙日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及少佐两名，大、中尉以下官兵300余人，毁汽车25辆，并缴获大量军用品。

△　鄂北日军进犯大洪山，焚烧浦河店。

△　国民政府公布宁夏省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名单：议长刘佩

黻，副议长徐宗孺。

△　社会部密函教育部及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拟定破坏贵州学运对策六条，其主要内容为“限期完成各该校内党团组织”；“广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策动党员在青年中组织各种小型团体”；“对反动分子则策动党员从事必要之斗争”；“调查共党在乡村青年、苗族青年、妇女儿童、邮工店员中之各种活动并摧毁其组织”；“消灭共党及其他党派不正确之宣传，禁止书店书摊发售违禁书刊”。

△　纽约华昌公司总经理李国钦捐款10万美元慰劳湘北前线将士，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10月29日　　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策定后期抗战战略。蒋介石讲话称：今后要开始反守为攻，积极采取攻势。11月5日闭幕。

△　豫东八路军一个营配合游击支队，夜袭豫东商丘马头寺伪军据点，毙伤伪军300余人，俘数人。

△　全国慰劳总会南路慰劳团返重庆。团长马超俊谈此行经过黔、桂、湘、赣、闽、浙、皖、粤八省，观察所及，深觉抗战前途极可乐观。

△　孔祥熙、戴季陶、于右任、张群等在重庆组织孔学总会。

△　阎锡山在宜川秋林召开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拟借整顿决死队为名，消灭和削弱牺盟会及共产党势力。薄一波、续范亭等抵制出席，韩钧、廖鲁言等坚决反对，未获结果。

10月30日　　胡适在美国中国协会演讲《我们还要作战下去》，称：“目前世界尚无任何国家能令日本军阀觉悟前非，并接受公正平等之条件”，故“中日战争仍将继续至数月或竟至数年，直至中国能获取一公正荣誉之和平始已”。

△　新任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华德接事。

△　重庆至仰光航线通航。

△　汪精卫在南京拜会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感谢”日政府对其“和平建国之援助”。西尾对汪卖国投降活动表示“全面的支持与援助”，希望伪中央政权早日成立，以便与日本实现“真正提携”。

△　华兴商业银行副总裁日本人鹫尾矶一在大阪发表谈话称：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对华兴银行可采取办法改组。

△　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通过对汪精卫所提希望之《答复要旨》、《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及《谅解事项》。《答复要旨》规定：一、日本必须在中央政府及省、市、县各级政府机构中派遣顾问、专家、职员、教官等人员，在军队中派遣顾问，并不得使第三国介入；二、日军管理工厂在交还后，以中日合办方式经营，“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有关法令，中央政府应加以承认；三、同意借款4000万元。中央政府成立后，上海关税收入作为中央政府收入，但仍由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保管；四、关于长江开放问题，目前尚非其时。沪宁铁路通行证及南京车站检查事项，可由当地中日双方协商。《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规定：中央政治会议是成立中央政府的准备，待日方要求事项取得谅解后，再指导召开。中央政府的人员组成及成立时间，应与日本协商后确定。

10月31日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召开第二届常务理事会，通过促进太平洋各主要国家反侵略大纲及致电反侵略大会与美驻日大使格鲁，促请美政府实施对日制裁等决议案。

△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一部，在襄（阳）花（园）公路之同兴店，伏击由陆安开往花园的伪骑兵队300余人，毙伤敌200余人，第二团伤亡50余人。

△　日军血洗河北望都薛家村，杀害民众299人，烧房100余间。

△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以3000万元组设贸易复兴公司。

△　中华自然科学社主办之西康科学考察团返回重庆。该团7月底自重庆出发，8月底到康定，往返历时三月。

是月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主力，在皖东北灵璧、睢宁交界的九顶山张山口与日军遭遇，激战一天，毙伤日军100余人。

△　新四军第一团一部在皖南繁昌、铜陵之间伏击“扫荡”之敌，全歼日军一个分队。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鲁南的滕县、峄县、费县边区地区，与山东纵队之苏鲁支队会合，开始创建以抱犊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

△　日军部将“七三一部队”编制由1000人扩充到3000人，并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孙吴、林口、海拉尔、牡丹江建立四个支队。

△　日军调集驻上海之细菌、化学专家30多人，分赴晋、鄂等省，指导陆军施用毒气事宜。

△　日军在江西奉新县赤岸乡全家村，放火烧村，烧死村民130多人。

11月

11月1日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启程赴西藏，主持达赖十四世即位典礼。吴对记者称：此行兼负视察边疆使命，预定行期八个月。

△　军事委员会任命蔡廷锴为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韦云淞为副

总司令，夏威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　日军包围山西沁县靳庄，杀害民众45人，抓走20余人，毁房300余间。

△　阎锡山部王靖国、陈长捷、崔道修等派人赴临汾，经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勾通，与日军进行“和平谈判”。

△　台湾全面统制米谷输出。

△　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代表汪精卫与日方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谷荻那华雄、矢野征记、清水董三在上海梅机关秘密谈判，商讨日方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　日兴亚院临时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之具体方案。

11月2日　国民政府任命李品仙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　蒋介石令四川省政府创办川康建设学院，蒋自兼院长，派四川大学教授魏时珍为筹备主任。

△　印度援华医疗队自延安赴华北前线，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欢送。

△　伪满洲国发布《主要粮谷统制法》。

△　天津美商会致电美国国务院，主张在日本未停止压迫华北商业前，拒绝与日成立新商约。

11月3日　川康建设期成会在成都成立。蒋介石指定邵从恩、莫德惠、褚辅成、黄炎培、李璜、张澜、林虎七参政员为常委。是日，召开首次常委会，由邵从恩主持，王世杰宣读蒋介石《告川康同胞书》。会后各参政员分赴各地视察。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在反敌冬季“扫荡”中，于涞源县雁宿崖地区设伏，歼敌500余人，缴获炮六门及一批枪支。此后，敌继续增兵，双方激战至7日。

△　东北抗日联军一部破坏北宁铁路10余处，毙日军30余人。次日，另一部攻入黑龙江德都地区，将伪警缴械。

△　日炮兵连续炮击潼关等地，晋南战事又趋紧张。

△　汪伪中华通讯社在上海成立，林伯生任社长。

△　美国国会通过新中立法，取消关于禁止把武器和战略物资运往交战国的决定。次日，罗斯福总统正式签字。国务卿赫尔发表谈话称：“吾人最神圣之任务应为保持美国之安全与和平。”

11月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　第九战区一部攻克湖北沔阳。

△　东北抗日联军冯志刚部百余人，在黑龙江德都北与日军田中部激战三小时，毙敌50余人。

△　日机54架空袭成都，被击落三架，日本海军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随机丧命。

△　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于越南谅山逝世，终年百岁。蒋介石、林森、于右任、孔祥熙等先后电唁。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5000元。

△　川滇公路叙永至泸县段通车。

△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会见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重申美对日态度，表示如两国关系继续恶化，美国国会将可能通过封锁日本议案；并称日本应即停止反美运动，并对改善美日关系有具体表现。

11月5日　第三次宪政座谈会在重庆举行，讨论“五五宪草”如何征求民意，发言者30余人。发言要点为：一、请政府开放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二、由召集座谈会之25位参政员指定负责人筹备一具体组织；三、将三届座谈会中之意见，尤其是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之意见转达政府。

△　江南第二挺进队指挥冷欣自江苏溧阳致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与日方商讨成立伪中央事，称：汪精卫于2日赴南京晤日军驻华总司令，商讨成立伪中央政府，议定伪中央政府暂定12月1日成立，伪中央自治会定于11月12日成立，待伪政府成立后即与日本议和。内定汪任伪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以开放长江等诱导国际承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第三八六旅一部袭击白晋路南关车站，歼敌百余人。

△　阎锡山代表梁培璜、吕瑞英等出席日方召开的临汾会议，商讨山西停战问题，未达成协议。

△　日机18架轰炸江西上高县城，死伤700余人。

△　全国慰劳总团团长张继自兰州飞返重庆。

△　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成立，盛世才、李溶及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为名誉会长，王宝乾为会长，沈雁冰、张仲实等为理事。

△　南京伪维新政府任命何佩瑢为伪湖北省政府省长。

11月6日　广东三水空战，日机三架被击落。

△　鲁苏战区一部克复江苏仙女庙（今江都县），并一度攻入高邮北门。

△　冯白驹琼崖独立总队在民众配合下，转攻海南日军重要据点

那大，自上月21日持续至本月5日夜，那大日军向儋县县城新州逃去。是日，克复那大。

11月7日　黄土岭战斗告捷。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团及杨成武支队主力，于涞源县黄土岭伏击日军，战至次日，歼敌500余人，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20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宣称阿部规秀“壮烈殉国”。

△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水西村成立，陈毅任指挥。统一指挥苏南的第一、二团，新编第三、六团及第三支队、江抗、苏皖支队。

△　东北抗日联军一部攻入黑龙江通北县城北15公里地区，缴伪警步枪50余支，德都、通北之敌均逃避北安县城。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颁布《七大纲领》，主要内容为改善民生，实现民主，发动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合作事业，加强抗战教育，厉行锄奸运动，巩固抗日部队。

△　周恩来撰写《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

△　日军运输舰三艘在虎门触水雷沉没。

△　伪满发布《米谷管理法》。

△　共产国际为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发表宣言，表示支持中国抗战。

11月8日　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潘友新大使、邵力子、冯玉祥、张治中及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秦邦宪、何凯丰，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出席。邵力子、冯玉祥讲话，强调中苏友好。

△　新四军第三支队击退日军对繁昌城的进攻，歼敌50余人。

△　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于苏南丹阳县以南九里镇、贺甲村一带围歼日军，击毙日军168人，俘三人。

△　美国援华“一碗饭运动”开幕。10日，胡适在“一碗饭运动”聚餐会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远东局势备见关切，殊堪钦佩。中国如继续抗战28个月或至五年，则将来交涉时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日本军阀将来可有乐于接受公正和平之一日。

11月9日　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报告“忠义救国军”淞沪副指挥何行健率部投敌，并拟将所部改为“和平救国军”。

△　日军步、骑600余由白晋公路太谷南之来远镇东犯榆社。11日，复增兵500，攻陷榆社。

11月10日　第九战区一部攻入江西奉新，焚敌仓库数所。

△　八路军一部与由山东博山、徒庄等处分途东犯的日军鏖战三昼夜，至13日将敌击溃，毙敌百余人。

△　日机30余架空袭河南，在洛阳附近投毒气弹。

△　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本部于辽县成立。随后，在华北根据地建立五个支部。

△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由重庆抵香港，发表声明称：此次赴渝，从未涉及和平条件问题。

△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与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会谈。

11月上旬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于泰山地区抗击日伪军的“扫荡”，经一周战斗，共歼敌260余人。

△　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淮北涡阳县新兴集，听取彭雪枫汇报，决定成立豫皖苏边联防办事处。

11月11日　　确山惨案。河南确山县县长许公超采取突袭方式，率确山、信阳、汝南、沁阳等县常备队及第一战区游击队围攻驻该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留守部队被迫自卫，激战两天一夜，终以寡不敌众撤出竹沟。许部占竹沟后，惨杀新四军伤病员、家属及民众200余人，并将财物抢劫一空。

△　山东菏泽日军攻占东明县北五里铺村，杀害被俘抗日官兵及村民38人，毁房328间。

△　国民政府公布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名单：议长张维，副议长范振绪。

△　重庆卫戍区总动员委员会颁布《民众团体登记办法》，迫令各县市民众团体总登记。

△　马尼拉华文《福建时报》刊登宋庆龄纪念孙中山诞辰文章，揭露汪精卫叛徒面目。

△　旅华日人反战同盟发表宣言，痛斥日军暴行，宣布将尽力协助中国抗战。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东京对记者发表谈话，宣布侵华方针：一、完全承认近卫声明原则；二、汪精卫新中央政权成立后，日本即当承认；三、新中央政权与重庆政府关系，以新政权为主，竭力向重庆政府活动；四、日本可以指导新政权，并使新政权协助日本；五、华北为特殊区域。

11月12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称："九一八"以来所定国策的四条原则是：一、反对日本侵略；二、遵守国际公约；三、不参加防共协定；四、外交自主自立，

今后仍要本此方针奋斗，遵守不渝。

△　参政员黄炎培由成都赴重庆转泸州，筹备成立川康建设期成会泸县办事处。黄对记者谈话提出“三土政策”，即“肃清土匪，禁绝烟土，以建成川康将来之乐土”。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于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于泰山以西地区抗击日军的“扫荡”，至19日，毙伤敌2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于榆社县石盘、高庄一带抗击日军，毙伤敌250余人。

△　日机九架空袭江西宜春杨家山、北门岭下等地，死伤40余人，毁房10余间。

△　重庆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反侵略分会、回民救国协会、天主教妇女服务会、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难民服务团、渝市妇女会、东北救亡总会等27个妇女团体代表百余人举行宪政座谈会。史良主持，史良、刘清扬、曹孟君、廖似光、张玉琴等就宪政问题作了发言。

△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成静怡在上海病逝。

△　汪精卫发表讲话，声称日本没有亡中国之意，因此，中国应该准备收拾战局，回复和平。

11月13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扩大纪念周，蒋介石宣讲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下午举行第一次大会，于右任主持，中央常委居正作党务报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作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　重庆市组织肃清敌货委员会，市长贺国光兼主任委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瑞河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

△　英、法两国政府分别通知日本外务省，决定撤退部分在华驻军。同日，美国国务院声明，华北美驻军不因英、法撤军而改变地位。

11月14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居正主持，行政院长孔祥熙作行政报告，外交部长王宠惠作外交报告，中组部长张厉生作组织工作报告。

△　第二战区一部在晋西分路包围乡宁日伪军，经三昼夜激战，本日攻克乡宁，毙伤敌约500人。

△　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繁昌城西汤口坝附近，粉碎日军的进攻，毙伤日军300余人。

△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宴孔祥熙，讨论改进中苏贸易事。

△　中国佛教访问团由昆明启程经滇缅公路到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半岛、泰国等国访问。

11月15日　　桂南会战开始。日军第五、第二十八师团、近卫师团及台湾混成旅团、海军第四舰队、海军航空队等部约10万余，在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下，向广东北海大举进犯。是日午后，第五师团及台湾混成旅团主力在钦州湾之企沙、龙门强行登陆。途中在企沙港对海上200多艘渔船发动攻击，100多艘渔船被毁，80余人死亡。第四战区守备部队被迫退守钦县、防城一带。

△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第三次大会，蒋介石主持，由张继、马超俊报告慰劳团慰劳前方将士经过，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财政，经济部长翁文灏报告经济。孔祥熙在财政报告中透露国民政府岁

出预算总额，1937年度为10亿余元，1938年度（半年）为九亿元，1939年度为17亿余元。军费支出1937年度为13亿余元，1938年度（半年）为八亿余元，1939年度为19亿余元，共约40亿元。所发公债计37亿元，连战前共负债65亿元。发行钞票总额战前为14亿元，至本年6月增至23亿元，至10月又增至25亿元。孔祥熙并称兼管财部以来对战事发生后各项重要支给“尚未贻误”，惟历时愈久，困难愈多。今后理财方针，除依据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具体方案督促进行外，并拟注重以下各点：一、整理地方财政必须从整理县财政入手；二、厉行新税制，以收有钱者出钱之效果；三、注重调节物资供需；四、加强金融机构组织与其控制力量。

△　军事委员会任命何宣为第四十六军军长，黄国梁为第六十五军军长。

△　国民党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党部在安徽省立煌县集会，制定《豫鄂皖三省党部防遏共党活动办法》，其要点为：设立边区党务办事处指导边区党务；举行党务人员训练班，组织流动工作队，专司宣传、组训、调查工作；并在鄂东、豫南增设临时中学招收青年；由国民党中央拨给活动经费，并决定由当地党部统一处理“共党案件”。

△　曾任第一军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在广东澄海县率部向日军投降。汪伪国民党中央任命黄为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1月16日　钦州湾登陆日军占领防城。次日，占领钦县。

△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第四次大会，蒋介石主持，由派往各地视察之中委报告视察经过。

△　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等在四望山召集中共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问题。至19日闭会，决定撤销豫鄂边、豫鄂皖、豫中三个区党委，成立新的鄂豫

边区党委，郑位三、陈少敏分任正、副书记。三个地区的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

△　冀察游击第二纵队夏维礼部及别动第四纵队侯如墉部3000余人，进到河北沙河以西之渡口、册井一带加紧反共活动。23日，侯如墉部之于衍支队打死打伤沙河请愿群众百余人。

△　晨，第二战区一部克晋西大宁，晚克蒲县。

△　日机36架次轰炸山西河曲城关，炸死40余人，毁房3000余间。

△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致函军委会政治部称：山东省职工抗日联合会代表张光中、张天民，“以山东八路军根据地王庄为活动中心，蒙阴、沂水等县及淄博矿区为活动区域。此次鲁南事变八路军乘机作乱，该张光中等已揭开面目公然参加”，要求政治部“转饬鲁省驻军政治部协同省党部严加取缔”。

11月17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蒋介石主持，由交通部长张嘉璈、教育部长陈立夫、中宣部长叶楚伧、社会部长陈立夫、海外部长陈树人分别报告各部工作，中委张继报告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中委段锡朋报告中央训练委员会工作。讨论通过缩小省区、整理县地方财政等政治、经济、教育、党务方面决议案多项，决议国民大会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

△　空军轰炸广东佛山日军阵地，投弹50余枚。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合作社法》，凡九章77条。

△　广州日军令伪妇女会将拘在王德光医院之妇女2000余人，组成“姑娘慰劳团”，送各线充军妓，拒往者多被杀害。

11月18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第六次大会，蒋介石主

持，通过《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等，蒋介石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

△　第四十六军新十九师经桂南连日激战，伤亡甚大，分向上思、板城山区撤退。驻武利迄北海一带之第一七五师乃急向西移，企图截击北进敌之侧背，未获战果。时灵山、横县间之第一七〇师，陆川、博白之韦云淞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桂平之第一三五师，罗定附近之第一八八师均准备向西移动，旋奉命回师参加南宁战斗。此外，湖南等地军队亦均在南调中，但以兵力分散，集中不易，21日后日军已迫近邕江南岸附近。

△　冀鲁边区八路军与由济南、济阳出犯之日军1000余人激战终日，毙伤敌220余人后，胜利突围。

△　朝鲜青年工作队队长罗月焕率队员28人，自重庆启程赴华北工作。

△　经济部公布《战区及接近战区合作事业推进办法》。

△　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向汪精卫提交《维新政府有关事项由新中央政府接办的既成事实，以及有待新中央政府成立后实施事项》，要求汪承认日本在上海及苏、浙、皖占领区已夺取之经济权益。

11月1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区寿年为第四十八军军长。

△　重庆各界举行第四次宪政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84人为筹备委员。

△　第二战区一部克复吕梁山东隘佛耳崖。

△　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分四川为六区，限两个月内“清剿匪患”。

△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刘少奇、彭德怀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快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

△　莫洛托夫与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议定成立蒙"满"划界工作混合委员会。12月7日，双方举行会议于赤塔，定后半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11月20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七次大会，蒋介石主持通过各项议案后闭幕。大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限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召集国民大会，以期早日制定宪法。大会确定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通过以五院院长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当然委员，并定王法勤、丁惟汾、邹鲁、孔祥熙、冯玉祥、阎锡山、陈果夫、李文范、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陈树人、张厉生、王泉笙、邓家彦1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叶楚伧；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海外部部长吴铁城。

△　白崇禧特电广西省政府召集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事力量，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痛击桂南进犯日军。

△　军事委员会任命叶肇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张义纯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日军二万人以阜平为目标，分七路合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及第一二〇师领导机关和部队，八路军适时转移。26日，日军占领阜平。八路军不断袭击日后方点线，迫使日军主力于12月3日放弃阜平，8日撤回原据点。

△　驻河南武安、涉县之冀察游击第二路第二师范子侠部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接受八路军领导，改称平汉抗日游击纵队。

11月中旬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于掖县郭家店、莱阳县姚沟等地抗击日伪军“扫荡”，歼敌500余人。

11月**21**日　　社会部筹组之战时社会事业人才调剂会在重庆成立。许世英、陈立夫、张群、何应钦、李济深等29人为理事，屈映光、徐堪、黄炎培等17人为监事。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一部，于灵丘县祁家庄、傅家湾、大地、道八等地抗击日军进犯，战至次日，共歼敌150余人。

△　新四军第五支队围攻侵占来安之敌，激战两昼夜，毙伤敌200余人，再度收复来安城。

△　日军入侵繁昌，新四军第三支队顽强反击，激战三天，毙伤敌100余人，收复繁昌城。

△　日军进攻军田、银盏坳，粤北会战开始。

△　日机30余架轰炸南宁，并散发传单。

△　山西新军暂编第一师第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率部叛变，宣称脱离暂一师。先是，7月间冀即拘捕该团政治部主任及共产党员多人，经师部多方营救始行释放。冀近期表示愿请假引退，师部准其所请，派第三十七团前往接防。不愿冀即率部叛离而去。23日，师部复派第三十六团前往剿抚，冀竟构筑工事，开枪射击。经宣传争取，除冀率两营长逃跑外，大部官兵于25日回归师部。28日，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为第四十四团事件已告解决，发表《敬告社会人士书》，指出：“暂一师是相当进步的统一战线武装。分裂或取消暂一师是日寇汉奸的阴谋和愿望，是根本于我国家民族不利的。”

△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在曼谷遇刺逝世（行刺犯王亚彬、王亚祥、陈炳星、陈锡麟等于12月就捕，各犯供认系日、汪主谋）。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谈中日战争称，日本为“中国事变”业已耗费100亿元，欲求彻底解决“中国事变”，则至少需时五年至10年之久。

11月2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希濂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段珩为第七十军副军长。

△　蒋介石密电白崇禧等：令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副总司令韦云淞“负责指定部队，固守南宁据点，待我部队集中后，断然予以打击。如无命令而使南宁不守，即以军法从事，希转饬凛遵”。

△　日机低空猛烈轰炸南宁南北地区，守军阵地被毁，增援受阻。当晚，日军第五师团进抵邕江南岸，从东南、正西夹击南宁。刚调至南宁的第四十六军、第三十一军所部六个团与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一起仓促应战。

△　广西各界在桂林成立保卫大西南工作委员会，并组织慰劳团赴前线。

△　内政部部长周钟岳发出《关于调整出版品查禁训令》，称：“自抗战军兴……各军事政训机关往往不明出版取缔程序，对于依法核准注册及放行之著作辄有径行查扣，引起纷争情事，本部据情转行纠正，亦感应付困难”，“嗣后关于出版取缔应依法定程序转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转请中央宣传部核转本部办理，不得径予查扣，庶办理有所依据，事权得资统一。”

△　日伪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部在北平成立，曹汝霖为部长。

△　第七届太平洋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开幕，会期两周，讨论中

心为中日问题。

11月2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郑作民为第二军副军长，邹洪为新编第二军军长，王本甲为第七十九军副军长。

△　南宁告急。拂晓前日军一部由剪刀圩及上下洲附近奇袭渡江，占领四塘，随即会合由蒲津圩、良庆圩等处渡江日军主力猛攻南宁。守军以指挥联络均感困难，徐启明第一七〇师、苏祖馨第一三五师及杜聿明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各一小部沿邕武路向北撤退，其余沿邕宾路向八塘山地撤退。

△　晋西离石、柳林日军联合兵种千余人进占孟石门，企图进攻陕北，碛口等地一度失陷。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于吴堡县河防阵地阻击日军，将敌击退。次日，该团一部东渡黄河侧击敌人，毙伤敌100余人，收复碛口。

△　国民党方面代表张冲受命约秦邦宪谈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回陕事，表示蒋介石对此十分关注，要求部队撤回。同时，张冲提出解决两党军事摩擦问题的设想，主张“划定一定区域，使部队不致犬牙交错，引起双方之疑忌，酿成冲突”。张冲认为“政治上实行宪政，地区有适当划分，为最好巩固团结方法”，希望中共考虑。25日，双方继续谈判。

△　三青团中央召开常务干事会与常务监事会联席会议。两会名单均由团长蒋介石派定，计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常务干事：陈诚、陈立夫、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贺衷寒、黄季陆、郑彦棻、李惟果，干事：常务干事陈诚等九人加梁寒操、邓飞黄、甘乃光、张道藩、胡宗南、谷正纲、康泽、戴笠等26人，共35人。候补干事程思远等15人。中央监察会书记长：王世杰，常务监察：王世杰、朱家骅、邵力子、陈布雷、罗家伦，监察：常务监察王世杰等五人加叶楚伧等，共35人。候补监察袁守谦、陶百川等19人。

△　国民参政会部分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发起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前身）在重庆成立。参加者为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幹、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会上订有信约12条，宣布组会宗旨在于“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国事探讨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

11月24日　　南宁失守。日军第五师团先头部队侵入南宁城，守军第一三五、二〇〇师等部退至邕宁以北之高峰隘。日军占南宁后，在市郊金鸡乡一带，数日间，杀害民众近千人。

△　国民政府任命朱怀冰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原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张荫梧免本兼各职。

△　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为供给德国合步楼公司钨砂事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称：“此有关我国整个方针，不可不慎重考虑。”12月3日，蒋介石复电称：“自以暂缓为宜，但亦不必拒绝，只言筹划可也。”

△　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是日召开发起人会议。

11月25日　　蒋介石电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加强守备滇越铁路。

△　国民政府特派叶楚伧为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副主任。

△　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发起“献债救国”运动，要求将救国公债本息一起捐献。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大阪各界招待会上发表演说，略称：“一

部分国人认为解决中国事件的意义，即系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推翻国民政府及撤退日本在华军队三事，此种思想至为错误。解决中国事件并非如此简单。国民政府现在拥有军队240师，此外尚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军队，如何应付国内经济问题，及如何应付第三国之态度，均为棘手之问题。因此欲求彻底解决中国事件，至少需时五年或十年之久。”

△　伪满公布在18个城市实行78种生活必需品零售最高价格。

11月26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连仲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为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　蒋介石密电白崇禧，指示南宁失守后作战要旨：“我军作战不可急求速胜，应以慎重出之。”一、第十六集团军之第一七〇、第一三五两师，在武鸣、宾阳间，以运动战方式阻敌北进，而以主力在邕钦公路两侧，滞迟敌后续部队之行动，尽力妨碍其后方交通。二、第五军主力应集结于大塘附近，掩护后续部队集中，而以其一部约一师兵力，在宾阳附近，策应前方部队之作战。三、邕宁公路应速作破坏准备。

△　白崇禧到迁江指挥作战，并征汽车将第五军急调宾阳，以期确保昆仑关附近山地。同日，南宁日军第五师团山本部队在飞机、炮火掩护下猛攻高峰隘阵地；另一部犯石埠圩，企图迂回高峰隘侧背。其余日军分路围攻南宁外围各据点。

△　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在重庆聚会，商定乡村建设学会理事为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梁仲华等11人，常务理事为晏阳初（主席）、黄炎培、梁漱溟。书记为梁仲华。

△　南京金陵大学副校长贝德士发表南京毒物调查报告称：毒品充斥南京，城内三分之一人口已吸食鸦片，幼童亦多吸海洛因。伪政

府如无300万元毒物税即无法维持。

11月27日　　日机70余架夜袭陕、甘，并于靖远、秦安、兰州三地滥施轰炸。

△　《新华日报》发表《江南游击区的医药建设》一文，介绍新四军在江南游击区，得到上海、香港、南洋的民众、侨胞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支持，建成具有卫生医疗科学化的后方医院的情况。

11月28日　　白崇禧密电蒋介石，告以遵指示部署情况：作战目的在于“迟滞敌之北进，掩护主力集中，确保有利地形与有利地区，待主力到达转为攻势，一举击破敌人”。并告以西、北、东、南四路兵团具体部署及水上阻塞、交通破坏准备情况。

△　日军2000余人于广东澄（海）属南湾登陆。

△　日机轰炸广东揭阳城，投弹数十枚，炸死民众48人，伤80余人。

△　行政院例会通过设立中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国民政府任命胡庶华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11月29日　　蒋介石致电泰国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銮披文，请保护华侨。12月7日，銮披文复电蒋介石谓：泰国政府必恒久注意保护在泰华侨生命财产，并许其在泰国全境从事合法事业。

△　梁漱溟在重庆往见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　日军向昆仑关阵地猛烈炮击，第一八八师派队增援。同日，日机轮番轰炸高峰隘方面阵地，其进犯部队因公路破坏无法前进，加紧抢修小董以南公路。

△　日军包围江苏东海县苘庄湖，枪杀居民79人，烧死10余人。

△　日机夜袭陕、甘，西安、兰州被炸。

△　伪闽粤区总司令黄大伟率伪军三团自澄海向饶平黄冈及诏安进犯，至12月初为地方自卫队击退。

△　阎锡山密令所部分三路进攻山西新军。南路纵队为陈长捷第六十一军、第二〇一旅、警备军第七十三师、第二〇六旅等，陈长捷兼司令，进攻隰县之义泉、黄土（韩钧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纵队为王靖国第十九军及孙楚第三十三军之一部，司令梁培璜，进攻隰县、孝义间之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士榘、林枫部晋西独立支队所在地）；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司令崔道修，进攻隰县之泉子坪一带。同时，日军亦调动临汾至平遥间驻防兵力5000余人集中于韩信岭一带，配合阎军进攻。

11月30日　　宪政促进会在重庆组成。推定常委为孔庚、张申府、董必武、秦邦宪、刘清扬、章乃器、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李中襄、史良、曹孟君、张友渔、许宝驹、许孝炎、黄炎培、莫德惠、章伯钧、沙千里、梅龚彬、康心之、于毅夫、韩幽桐、李璜等25人。下设秘书处及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

△　日机八架轰炸高峰隘，日军一部向高峰隘发动猛烈攻击。昆仑关方面，日机50架分批轰炸八塘阵地，下午5时八塘失陷。

△　经济部采金局设立松潘区采金处，办理松潘、懋功等县金矿开采事宜。

△　石友三部独四旅进至晋冀鲁豫根据地河北束鹿、宁晋地区。同日，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出为巩固冀南抗日民主阵地调整军事部署的命令。

△　日本财阀组织之华中产业视察团，由团长安藤贞五郎率领自

神户抵上海。该团任务是系统调查华中全部财物，加紧进行搜括。

△　日本政府禁止在上海及苏、浙、皖等占领区使用日元，以减少日元外流和加强对中国沦陷区之经济掠夺。

11月下旬　　琼崖独立总队围困那大日军据点，俘伪军一个中队。

是月　　军事委员会部署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命令第二、三、五、九战区担任主攻，其余第一、四、八、鲁苏、冀察各战区对敌实行佯攻牵制。主攻方面，第二战区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交通线；第三战区截断长江交通；第五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间日军；第九战区向粤汉路北段、南浔西线进袭。攻击开始日期除第五、九战区限本月26日前完成作战准备实施外，其余助攻方面概限于11月底，主攻方面概限于12月上旬分别实施。

△　国民党方面代表何应钦、贺耀组等与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先后多次进行谈判，试图解决八路军人事经理及其经济制度等问题。何等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在华北擅发纸币，并提出中央应有权派人到八路军中去，有权统一经理制度和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叶剑英答复说明钞票并非八路军所发，此为河北地方政府问题。至人事任免，事实上早已统一，八路军团以上干部都已呈请过中央委任，惟政治部及军需署派人办不到。对于经费问题，叶表示八路军全都用在军队身上，并未移作他用。但何应钦仍坚持己见，双方继续谈判。当月，因华北及西北军事摩擦加剧，中共中央决定调第三五九旅回援边区，双方遂为第三五九旅回援事反复商谈，中共中央坚持不让第三五九旅再回黄河以东。

△　日军袭击晋察冀边区一所医院，杀害几十名伤员。

△　军事委员会指令核准《战时公路军事运输条例》，凡10条；《战时公路军事运输实施规则》，凡29条。

△　财政部公布《增加生金办法》，凡10条及《收购生金办法》，凡九条。规定“凡各地生金，应悉数由四行收兑金银办事处或其委托收金机关，按照规定价格以法币收购”。各省立银行、私立银行、各种银楼、各典当业均不得收购。

△　湖北省汉阳、汉川、沔阳三县民众散发《请看一二八师官兵之横暴，汉阳、汉川、沔阳三县老百姓之劫运》传单，揭露王劲哉第一二八师勒款逼粮、擅杀无辜、强奸妇女的种种罪行。

△　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调查员刘守光向行政院报告马鸿逵、马步青部队勒索甘、陕两省人民情况，略称：“据武威专署报告，民乐一小县，驻军一营，每年给养14万元，而实际民众负担则在70万元以上。民勤一县，每年正常田赋不及10万，而驻军征发之数则在百数十万元以上。故河西民众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亦不足供应此种无穷需索。民众生路既绝，则黠者去为盗匪，驯者相率逃亡，孑遗之民则食秕糠，衣衫褴褛，甚至十五六岁男女少年无衣无裤，裸立于公路道旁。保甲经费尤使一般民众痛苦不堪，不聊其生。”

12月

12月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谷正伦兼任第六战区副司长官。

△　第五军代军长杜聿明自桂南前线密电蒋介石，建议反攻南宁。电称：“查目前侵占桂南之敌，有兵力尚不及两师，此次乘我兵力分散，侥幸成功。但以交通阻塞，除少数山炮外，其他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均无从使用，而补给尤为困难。”“故此时我军正宜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12月10日前），以击破该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并提出具体作战部署意见。

△　第一战区冬季攻势开始。孙桐萱部第三集团军先以游击队遮

断陇海铁路罗王至兰封、兰封至内黄段，并遮断通许、淮阳、鹿邑间公路，然后以第八十一师一部向兰封袭击，主力向开封进袭。郭寄峤第九军主力协同李家钰第四十七军遮断沁阳至博爱交通线，攻击沁阳城外及武陟各日军据点。

△　第四战区第四游击区挺进纵队曾生、王作尧部，收复广东宝安县城。

△　阎锡山令山西新军韩钧决死第二纵队立即集结，迅速向同蒲路推进，执行冬季攻势，准时于5日前向同蒲路的灵石、霍县段内大举破击。韩钧以阎令旨在与日军南北夹击新军，拒绝接受。

△　宪政促进会筹委会举行首次常委会，决议推张申府为秘书处主任，沈钧儒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左舜生为研究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为联络委员会主任。另推张申府、章乃器、于毅夫三人负责起草宪政促进会章程、宣言及工作纲领，孔庚、李中襄等五人负责办理立案手续。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基本方针“是更加认真地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

△　延安各界召开追悼白求恩大会，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王稼祥、陈云及晋察冀边区各界代表讲话。八路军军医处决定将八路军军医院改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纪念白求恩。

△　浙江金华、兰溪、永康三县举行不买日货宣誓大会。晚，10余万人火炬游行，高呼：“肃清仇货，开展对敌经济战”等口号。

△　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在寓所遇刺，翌日毙命。

12月2日　昆仑关形势吃紧。广西10万民团动员，进行破坏敌军工作。

△　日机21架轰炸桂林，投弹140枚，死伤70余人，毁房600余栋。

△　全国青年会总干事会在重庆乐山举行，16省青年会总干事出席，议题为抗战建国期间青年会之机会与贡献。冯玉祥、孔祥熙等到会讲话，蒋介石派员宣读训词。

△　经济部公布《经济部矿产品运输出口管理规则》，凡八条。

△　美、日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大使格鲁声明：调整日美关系不能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根据。

△　秘鲁反华，禁止中国移民入境。

12月3日　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发动对昆仑关强大攻势，杜聿明第五军与敌展开激战。

△　八路军一部夜袭河南商丘伪和平救国军裴天柱部，激战四小时，毙伤伪军连长以下官兵300余人，俘36人，缴获步枪600余支。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攻克豫东商丘县济阳集伪军据点，毙伤伪军300余人，俘60余人。

△　日军1500余人“扫荡”平汉路、沙河、滹沱河之间的三角地区，至7日被粉碎。

△　王靖国部第十九军、陈长捷部第六十一军在山西永和地区围攻新军韩钧决死第二纵队，将该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包围解决。同时，晋西大宁、永和、隰县抗日政权及抗日救亡团体悉遭摧残，牺盟会干部10余人被杀。

△　日军万余分路进犯中条山。晨，一部在闻喜县东南猛烈炮击，并有飞机10余架掩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各部分途

迎击，战况激烈，方山庙一地失而复得者三。

△　川康建设期成会开首次理事会，推吕超、胡文澜、张澜、黄炎培、莫德惠等19人为常务理事，戴季陶、张群、陈立夫、翁文灏为名誉理事，吴人初、李仲平为秘书处正、副主任，决定着手起草工作纲领。

△　驻华北英军应日本要求开始撤退，是日由秦皇岛乘船他移。

12月4日　日军占昆仑关，随即构筑工事企图固守。第四战区所部分别退至昆仑关以北及武鸣附近集结整顿，准备尔后会战。桂南战事处于对峙状态。

△　吴佩孚在北平病逝。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王宠惠等致电吊唁。9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特给治丧费一万元。

△　中共晋西南党委决定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在康城、石口一带集中，并成立晋西南“拥阎讨逆总指挥部”，韩钧、张文昂分任正、副指挥。同日，阎军捣毁晋南阳城牺盟会之《新生报》，编辑王良被害。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金戈（陈祖辰）亦在临汾遭惨杀。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于五台县高洪口设伏，毙伤日军300余人。

△　新四军游击支队一部袭击商丘县桂集伪军据点，毙伤伪军300余人。

12月5日　白崇禧密电蒋介石，告以南宁方面“目下转移攻势，胜利公算极大”。6日，蒋介石复电称：“对于南宁方面之敌，决于亥月删日（按：12月15日）以前开始攻击，即以第五军全部加入，并命空军主力参加该方面作战，待命出动。”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袭击武安县康宿镇之伪军，歼敌150余人。

△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机关在鄂中京山县马家冲地区，遭日伪军袭击，经终日激战，歼敌70余人，胜利突出重围。

△　四川省务会议颁布蒋介石手订《川省施政纲要》，其中“治安与剿匪”一项规定：一县之匪由县长在三个月内负责肃清，县与县间之匪由专员负责清剿，限六个月内完成。仅有零星散匪之县，应使搜剿与缉捕并重。同时严密保甲组织，省政府应随时派员分赴各县抽查督导。

△　经济部公布《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凡18条。

△　中苏正式通航。重庆至莫斯科四日可达。

△　伪满决定将满洲生活必需品公司改为特殊公司，增资500万元。

12月6日　国民政府派张道藩为国民大会代表总事务所总干事，张维翰为副总干事；原任叶楚伧、张道藩免职。

△　军事委员会任命古鼎新为暂编第二军副军长。

△　新编第五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军等部，攻至安阳附近，尔后在汤阴、濬县、沁阳、博爱等地破坏交通，切断日军豫北交通。

△　晋南战局经四日激战，日军死伤2000人以上，敌犯中条山计划失败。

△　第一战区朱怀冰部第九十七军主力侵入冀鲁豫根据地邢台、内丘以西地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出命令，迎击顽军进攻。同日，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二团、东进纵队一团由冀南开抵内丘以西地区，

准备参加反顽作战。

△　广西省制定《战时县政办法》、《战区中等学校处理办法》，规定各区县长不得退出县境办公，各级学校应计划疏散，但不得离开省县。

12月7日　　国民政府任命吴国桢为重庆市市长，原任贺国光免职。

△　军事委员会决定建立经济游击队，拟定《经济游击队组织及实施办法》，凡29条。

△　晋西事变。阎锡山以韩钧拒绝接受命令为由，宣布韩钧、张文昂决死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韩钧着即撤职拿办。所有独二旅、一九六旅部队着艾（子谦）、白（英杰）两旅长妥为收抚。其不甘附逆率部来归者，准予免究。如有甘心附逆之徒，即明令剿除”。随即以重兵围歼韩部，韩部起而自卫，双方发生激战。

△　晋西临汾、洪洞、赵城三县抗日政权及各抗日救亡团体为阎军摧毁。阎军崔道修部一营复开往赵城河东，企图摧毁霍县抗日政权。

△　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成立，蒋介石兼督办，胡次威任处长。

12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佟毅为第五十军军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发起邯（郸）长（治）路破袭战。初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向邯长路展开全面破袭。22日起，主力投入战斗，23日收复黎城县城，25日收复涉县县城，26日胜利结束，共歼日伪军7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奇袭由徐州北犯日军，毙伤敌500余人，击毁战车、汽车10余辆，残敌溃退徐州。

△　伪满洲国加强贸易统制，追加统制品，输出为70种，输入为54种。

12月9日　国民政府发表国民党五届六中关于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决议案，通饬所属“查照办理”。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士为第六十七军副军长。

△　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返重庆。该团自6月28日由重庆出发，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程9250公里。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晋西南事件和我们的方针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　延安各青年团体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毛泽东、陈绍禹、王稼祥等出席讲话。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号召青年发扬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反对黑暗势力的压迫，坚决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　江南第二挺进队指挥冷欣自江苏溧阳致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与日方签订经济密约。

△　周佛海发表《关于组织中央政府》一文，内称：“组织中央政府是为负担和平的使命。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时间问题，乃是条件问题。现在正在和日本谈判条件，只要全部条件谈判完成，就可立即组织起来。”

△　美国外交协会举行聚餐会，讨论中国与西欧关系问题，驻美国大使胡适出席发表演说称：中国深信苏、英、法三国将继续援华，英、法在华北驻军略加减少乃被迫对日作不重要之让步，相信不致出卖或遗弃为独立生存战争之中国。

12月10日　　蒋介石密电白崇禧，指示反攻南宁前应准备之重要事项。

△　第十四集团军向晋南翼城、绛县一带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及第一〇八师团主力发动攻击，经九昼夜激战，敌向西退却，据守曲沃、新绛，与卫部相持。

△　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香港分会主席宋庆龄在港播讲《中国之工业合作》。

△　重庆举行青年宪政问题讨论会。到会有潘公展、方采芹、邹韬奋及各界青年500余人。会议决定筹组中国青年宪政促进会。同日，重庆各界妇女召集的宪政促进会举行第三次座谈会，刘清扬主持，到会200余人。

△　中苏文化协会云南省分会在昆明成立，龙云任名誉会长，刘震寰任会长，张西林等15人为理事。

△　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在吉林长白山东南额穆县附近与日伪军激战，毙敌100余人。

△　宁县事变。晚，陇东宁县保安队配合第九十七师之一团向驻当地八路军罗营突然袭击，并用事先秘密挖好之地道埋藏地雷，猛烈爆炸，罗营伤亡过半，营长亦受重伤，仅一小部于12日突围退出城外。至翌年1月，宁县全部被占。

△　辛亥革命时期鄂军军务部长孙武在北平逝世。

△　进犯闽南之日伪前敌指挥林知渊，在福建前线为地方团队活捉。福建旅桂同乡电蒋介石，要求将林知渊就地正法，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　上海先施公司全体职工800余人，要求资方增加米贴，实行静

坐罢工。

12月11日　　蒋介石、孔祥熙在重庆宣誓就任行政院正、副院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徐庭瑶为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为副总司令。

△　日伪军血洗江苏金湖县白马湖大杨庄，使140余人的村庄从此不再有人烟。

△　日机10架分批轰炸湖南安化县烟溪镇，炸死平民115人，财产损失在50万元以上。此后两日，日机再袭，烟溪兵工厂被炸毁，死伤惨重。

△　中英庚款董事会分别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桂林、兰州、上海等处办理科学工作人员申请协助登记，每月80元至200元。

12月12日　　第五战区冬季攻势开始。以江北兵团牵制天门、皂市之敌主力，准备由随县、钟祥间向武汉攻击；另以鄂北兵团、豫南兵团进攻信阳以南；以豫南游击队袭信阳以东；以鄂东游击队袭击汉口及其以北。

△　第九战区冬季攻势开始。以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攻击南昌、武宁间日军第二十四师团、第三十三师团，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攻击武宁、通山间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第十四旅团等，关麟徵第十五集团军攻击通城、岳阳间日军第六师团，上述各路牵制日军兵力；而以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攻击通城、蒲圻、咸宁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以进击武昌。攻势发动后，当日晨攻克崇阳，后续克蒲圻、咸宁附近日军据点，并在岳阳一带围困日军第六师团。

△　第九战区炮兵击沉九江附近日兵舰一艘，毙敌100余人。

△　叶剑英致电蒋介石称：日军在华北部署更番“扫荡”，为确保华北抗战根据地粉碎敌人更番“扫荡”企图，并相机收复上党，近已发动全华北大规模截击敌交通线，以策应全国各方作战。

△　晋西离石、柳林日军再次侵占军渡，炮击宋家川。至16日，为陕甘宁边区河防部队击退，收复军渡。

△　甘肃合水县县长翟大勋为配合宁县事变，率县保安队袭击驻该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直属队。同日，第三八五旅摧毁庆阳县政府旧城办事处等机关，并拘押办事处主任以下人员10余人。随后，第三八五旅驻西峰办事处又遭第九十七师及保安队袭击。

△　作家访问团宋之的、罗峰、方殷、陈炳南、杨骚五人返回重庆。按：该团访问河南、山西等五省，历时半年，行程万余里。其间团长王礼锡病故，一部分团员因病已先返回。

△　宇巴伦率缅甸访华团一行九人抵达重庆。

△　华盛顿中国经济研究协会发表调查报告称：本年美国输往日本军需品占全部对日贸易的71％，占日本军火进口贸易的第三位。

12月13日　　白崇禧密电蒋介石、何应钦，报告反攻南宁作战计划：第一步攻略昆仑关、高峰坳。第二步攻略南宁。预定12月18日开始反攻。20日占领昆仑关、高峰坳，同时邕河南岸占领蒲庙、吴村，截断大塘附近敌后方联络线。22日前完成攻略南宁之准备。23日开始对南宁之攻击，25日占领南宁。

△　李家钰第四十军开始扫荡太行山南、道清路北山口日军据点，东阻新乡之敌西援，西攻博爱之敌后背。

△　晚，刘建绪第十集团军分别以一部攻入杭州、富阳、余杭各城内，纵火焚烧日军仓库。当敌分头追击时，又于萧山、绍兴间设伏袭击，小获胜利。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袭击山东莘县魏二庄之日军，歼敌200余人。

△　前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率兵出川抗战。

△　山西新军为粉碎阎军进攻，加紧清理内部。雷任民决死第四纵队是日逮捕密谋发动武装叛变的第二〇三旅旅长刘武铭为首的全部军官，并搜出刻好的“忠义抗日义勇军”图章及委任状等文件。

△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3500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静坐罢工。

△　上海法租界发生抢米风潮，200余人拥入米店抢去米32袋。法巡捕驰至，扣留抢米者一人，因无证据旋即释放。

12月14日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渡湖北襄河，出击洋梓镇、黄家集日军，毙伤敌2000余人。

△　第二战区范汉杰部第二十七军先后攻占晋东长子、屯留外围各据点，包围长子、屯留。第四十军亦将潞城包围。

△　日军在河南武陟县傅村包围袭击修筑河堤民工，杀害997人，毁房880余间。

△　甘肃镇原第九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及步兵一营、炮兵一连，配合保安队共2000余人向驻当地八路军王营猛袭。该营伤亡惨重，于16日突围退出城外，镇原被占。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干部与政府恳谈会上发表谈话称：关于“中国事变”，成立新政权问题，由于日、汪双方对具体内容尚未获得一致意见，成立时间需要推迟。

12月15日　　白崇禧发布反攻南宁作战命令，令各部队于18日拂

晓开始攻击，乘敌后部队未到以前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兵力部署：北路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部第五军、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以主力从宾阳方面攻击昆仑关，一部切断南宁至昆仑关敌之联系，歼灭昆仑关之敌，尔后协同其他部队攻击南宁。东路军（第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部第四十六军、第六十六军共四个师）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破坏郁江以南之敌后交通，阻敌增援昆仑关。西路军（第十六集团军夏威部四个师及地方武装）以两个师攻击高峰隘之敌，吸引敌主力，一部袭扰郁江以南敌后交通，一路进到邕宾路之四塘，阻止南宁日军增援昆仑关。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第一一八师为总预备队，于宾阳古辣附近待机。

△　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开始抗击日伪军对冀中的分区“扫荡”。27日、28日，八路军于雄县、固安两地毙伤日伪军600余人，31日反“扫荡”结束，共毙伤日伪军1200余人。

△　日军烧毁扬州八宿著名古建筑物之一——金寿公所。该公所位于泰兴口岸镇西北福星桥东侧，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共有各类建筑房屋114间，雕梁画栋，耗资甚巨。

△　日伪军分五路进犯繁昌，新四军第三支队等在繁昌城郊峨山头、三梁山、白马山、马家坝等地顽强抗击，激战一天半，歼敌300余人，第四次保卫了繁昌城。

△　豫南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师师长彭子文率部3000余人反正，毙日军200多人。

△　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在北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以南方之米交换北方煤、棉，及规定伪联银券与伪华兴券汇率，修正两伪政府发行之教科书等。

12月16日　　李济深、陈诚奉蒋介石命自重庆飞广西，协助白崇禧作战。

△　第三战区冬季攻势开始。以第三十二集团军进攻南昌；第五十、二十一、八十六、二十五、十八军共14个师为长江攻击军；第十集团军与天目山各游击支队进攻杭州，以牵制敌兵力。长江攻击军各兵团攻击开始后皆有进展。19日后因日军大举增援，行动受阻。

△　晋东南第三行署主任孙楚配合刘戡第九十三军、陈铁第十四军等五个军各一部向戎伍胜、董天知决死第三纵队、第五专署所属各县抗日政权进攻。是日阳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遭摧残，县府科长、区、村干部200余人被捕，20余人被杀害。

△　立法院长孙科访欧归国抵重庆。孙在昆明对记者谈话称：此次在欧历访各国朝野领袖，英、法、苏对我同情日增，而苏更以实力援我，今后且将有加无已。暴日妄图与苏妥协，单相思难成事实。且据欧洲一般观察，美日商约届期绝难续订，暴日处境日窘，咸认为我国团结抗战必胜无疑。

△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主编《抗敌报》（江北版）创刊。

△　上海市30余团体发起筹备成立上海市民食调节协会，商请银钱业垫款订购洋米，办理平粜。越两日，协会正式成立。

△　在华日本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招待记者，称该部已组织工作队对敌宣传，并将在盟友增加后成立义勇队参战。

12月17日　　粤北战役开始。日军为策应桂南作战，调动第十八师团、近卫师团之混成旅团及第三十八师团、第一六〇师团、第十一师团各一部约6至7万人，统由安藤利吉指挥，分三路出扰广东各线。其右翼兵力约1.5万人，沿增城、龙门、白沙之线进攻翁源。中路兵力约三万人，一由从化、良口越牛背脊攻击佛冈；一由花县北攻佛冈，会合后进攻翁源。左翼兵力约1.5万人，由军田向银盏坳、源潭沿粤汉铁路进窥湞江、连江口，犯英德、曲江等地。

△　第一战区第八十一师在豫东突入开封，焚毁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一部的指挥所及仓库。21日，骑兵第二军一度攻入商丘，击溃由安徽砀山增援的日骑兵部队。

△　重庆卫戍司令部枪决在重庆刺探军情之汉奸王金廷、余金山。

△　山西各地牺盟会代表500余人，于太岳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挽救山西时局办法。

△　国民政府向美国洛杉矶莱安飞机制造厂订购军用飞机50架，价值美金150万元，定八个月内交货。

12月18日　桂南各部队约15万人调整就绪，依照白崇禧部署开始反攻。杜聿明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荣誉第一师任主攻，首先反攻昆仑关；另以第九十二师于邕宾公路阻截敌援军。当日，第九十二师占领七塘南北阵地，断绝日军增援昆仑关道路，致此后几日日军不得不用飞机输送弹药给养。

△　我游击队在无锡、苏州间炸毁敌军车11辆，敌死伤300余人。

△　新四军苏皖支队在仪征县月塘集地区粉碎日伪军进攻，毙伤日军30余人、伪军70余人。

△　晋东南晋城、沁水、浮山等县抗日民主政权续遭摧残。是日，第四集团军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围攻晋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捕走工作干部百余人，枪杀干部10余人。孙楚所部配合刘戡第九十三军，是日及21日分别进攻沁水、浮山两县抗日民主政府，打死第三、第五两区区长，并将第三区群众武装缴械。

△　八路军晋绥军区布置应付突然事变，决定由新军各部及八路军代表组织最高指挥部，续范亭、雷任民分别担任军、政总指挥。

△　国民政府任命寿勉成为经济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对记者谈该局拟举办合作人员训练所，并在四川、云南等省设置实验区。先设置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资本500万元，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投资。

△　军事委员会颁布《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凡九条，规定各通讯社稿件未经检查先行发表者，不遵照删改刊载者，或对删免稿件之地位不设法补足，于稿件文字内故留空白或另作标记易致猜疑者，均属违检。违检惩罚为“忠告、警告、严重警告、定期停刊、永久停刊”五种。

△　各国新闻社驻重庆记者宴请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美联社特派员司徒致欢迎词。王世杰致答词称，甚望外国驻华记者向本国传送中国抗战建国消息，俾各国人士对远东大局有充分认识，不致为日方虚伪宣传所淆惑。

△　日本“驻华专使”加藤视察华北竣事，由津返沪。

△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接见美大使格鲁，会谈后宣布开放长江下游京沪间交通，并称对珠江亦将考虑采取同样措施。

12月19日　　第八战区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等部夜袭包头，次日攻入城内，摧毁敌司令部及据点数处。另一部在包头、安北间阻击来援之敌，毁敌汽车八辆，毙敌百余。连长薛明德率官兵在猛烈炮火下独守阵地，与敌肉搏，山头失而复得者四次，不惜牺牲，支持战局完成任务。战后，军事委员会下令奖励是役有功人员。

△　孙楚所部进攻晋东南壶关县抗日民主政府，杀害县长洛洪章。同时，范汉杰部第二十七军逮捕该县第二区区长及牺盟会干部16人。

△　教育部筹划在海外各领事馆附设侨民教育专家，分为香港、

菲律宾、新加坡、西贡、巴达维亚五个区管理侨胞教育事宜。20日，又颁布小学《特种教育纲要》，强调对儿童“精神训练”。

12月20日　杜聿明部第五军第五师增强对昆仑关的攻击，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次日，割裂九塘与昆仑关日军联络，同时，空军配合地面部队攻击，向当面日军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邕武路方面，西路军继攻克香炉岭、高峰隘后，是日又克新圩，日军完全陷入包围。

△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赶赴秋林，面见阎锡山，就晋西事件进行调解。

△　粤北日军占领左潭，后分兵一路与龙华敌合攻龙门，一路北循公路攻新丰。

△　中缅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罗家伦任会长，朱家骅、邵力子等任名誉会长，缅甸访华团出席大会。

△　北平米荒。伪临时政府下令实行计口粮。

△　驻美大使胡适访罗斯福总统，告以中国目前情形并不如想象之窘迫，日军侵略华南致南宁与法属越南边境公路交通中断一事，并不如何严重。胡并与罗斯福再度商谈向美借款事。

△　中国船员360余人服务于德国轮船，因轮运业停顿，乘意大利邮轮返国。

12月中旬　日军集中兵力1.2万人对冀中进行第三次分区“扫荡”，重点为大清河北、阳河东南和子牙河西，以及阳河以西、以北和滹沱河两岸等三个地域。至月底，冀中八路军作战13次，伤亡450余人，毙伤敌1200余人。

△　上海抢米风潮愈趋激烈，公共租界内米店30家、法租界内米店数家，先后被抢一空。

12月21日　　国民政府特派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

△　日军再度进犯繁昌，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积谷、大行冲、白马山等地抗击，血战两昼夜，毙伤日军100余人，第五次保卫了繁昌城。

△　日伪军由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出动，合击津浦路西周家、复兴集地区。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与日军激战三天，收复全椒县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和古河镇等地。其中周家岗战斗，毙伤日军160余人，生俘日军少佐一名。

△　日军进攻粤北源潭墟，经三日激战后攻陷该城。

△　日军侵占广西龙州、镇南关，大肆烧杀。

△　冀察战区庞炳勋部第四十军进攻山西陵川县抗日民主政府，并配合孙楚派出之长治县县长聂士庆部进攻长治县公安局。

△　国民政府为修筑叙（宜宾）昆（明）铁路向法国银行团借款4.8亿法郎。合约迟至1940年3月始批准生效，7月后因越南形势变化又终止。

△　土耳其首任驻华大使席拔希抵重庆。27日，向林森呈递国书。

△　汉奸丁默邨在上海遇刺受伤。

12月22日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林森、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陈诚等，就陇东军队连续制造摩擦、大举进攻边区提出抗议。电称：抗战以来八路军艰苦抗战，“我留守部队对于保卫河防边防、巩固抗战后方并无过犯，对于原定23县地区并未越出雷池一步。现敌我相距一河之隔，抗战袍泽应如何精诚团结，共御敌寇，

岂宜萁豆相煎，至于此极。陇东友军此次突然进攻，并公开声称系奉上级命令，听闻之下，不胜骇异”，要求当局“制止异动，恢复团结，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

△　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道经延安，中共中央设宴招待并举行欢迎会。马占山发表讲话称：“目睹此间艰苦奋斗之精神，实足钦佩。”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于河北景县龙华镇歼伪军300余人。

△　行政院转令执行《战地内禁运资敌物品收购救济办法》，凡九条。

△　军事委员会修正公布《战时铁道军事运输条例》，凡14条。

△　军事委员会为停止苏联飞机入境代电通知各有关部门称：查自抗战军兴，苏联政府对我空军方面多所协助，情至可感。但对我油料困难及领空主权似欠顾及。现欧亚渝哈线与中苏公司哈阿线已正式通航。为尊重我国领空主权，促进民航业务，并节省军用油料，增强抗战力量及免除外籍人员任意出入国境起见，苏方各机似可一律不必开行于我国境内。遇有特殊原因，应事先通知航委会核准施行。

△　伪满洲国拟定《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

12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时局的指示》，指出：中共的任务是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力争中间阶层；深入群众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准备对付局部突然事变；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易退让。

△　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克复湖北汉宜路之杨家洚，一度冲进雁门口。另一部向瓦庙集疾进，将汉宜路截成数段，击溃日荻洲师团。

△　日军命令第九旅团主力，由龙州“排除万难，日夜兼程，向南宁急进”，以图解除昆仑关被围日军困境。次日，该旅团主力开始行动。27日，行抵山墟附近，为西路军夏威部第一八八师所包围截击，直至29日才进至南宁。

△　日军近卫混成旅团占粤北牛背脊，第四战区所部组成两个纵队迂回包围日军，在梅坑、吕田、牛背脊、良口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同日，日军陷粤北龙门。

△　日军2000余人“扫荡”淮南津浦路西全椒县周家岗，历两日，被新四军第四支队粉碎。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招待会，欢迎参加南、北两路慰劳团及作家访问团的作家。郭沫若致欢迎词，老舍报告参加北路慰问团经过，畅谈战地观感，呼吁设法解决西北文化恐慌问题。作家访问团副团长宋之的盛赞晋东南军民抗战精神。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晋绥军区：阎锡山已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向决死第四纵队进攻，晋西北武装冲突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但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　山西新军戎伍胜、董天知部第三纵队三个多团及纵队直属队一部被胁迫投入阎军，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120余人被害。游击第十团及游击第十一、十二团、纵队直属队各一部，突破阎军围攻，与决死第一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等部靠拢。

△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正式成立，日反战作家鹿地亘任主席。28日，鹿地亘率领该部成员到达昆仑关前线，以巨型播音机对日军宣传。

12月24日　　第五军副军长郑洞国密电蒋介石：自18日该部围攻

敌第五师团于昆仑关，激战已七昼夜，迭克仙女山、老毛岭等各据点，敌死伤惨重。是日19时，经两小时肉搏，攻克昆仑关附近敌之最坚固堡垒——罗塘南端高地，毙敌官长10余人，士兵200余人。29日，蒋介石复电郑洞国："昆仑关之得失，影响于南宁作战极巨。该师激战七昼夜，卒克要点，具见该师长指导有方，将士用命，深用嘉奖。"

△　粤北日军侵占英德。敌占英德约一星期，民众被杀240余人，房屋被毁3000余间。

△　萧劲光再电程潜、朱绍良，驳斥当局歪曲陇东事件，指出："近闻一六五师亦已开动，将欲会同九十七师大举向庆、合进攻，并闻陕西保安第九团团长及邠县县长亲率团队，有向边区挺进模样。""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处理共党实施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甘陕居民睹此情形，极为惊疑，一若大祸将至"，要求"严令制止武装行动，退返原防，恢复原状，以利团结抗战"。

△　缅甸访华团在成都访问后飞抵重庆，在机场出席中缅文化协会第一次理事会，旋乘机经云南回国。

12月25日　　粤北日军倾巢北犯，余汉谋部第十二集团军节节败退，韶关震动。晚，李汉魂急电陈诚请援，陈允派第五十四军陈烈部来援。当夜，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又自三华撤退。

△　日军第二十一旅团中村正雄少将在增援昆仑关途中中弹负伤，是日在九塘毙命。

△　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指出：《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调兵遣将，攻栒邑，夺宁县，占镇原。近闻正计划夺取淳化、鄜县，准备进攻延安。通电呼吁各界人士主持公道，

要求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

△ 印度诗人泰戈尔致函蒋介石，颂扬中国抗战。

12月26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一部于滕县兑头沟设伏，全歼日军运输队100余人。

△ 日军陷粤北湞江口及新丰。

△ 山西和顺、昔阳、东冶头日伪军1400余人合击皋落地区。

△ 河北遵化日伪军800余人向遵化北山地八路军根据地进犯。经两昼夜激战，至28日敌溃至遵化城郊。是役八路军歼敌300余人。

△ 日机90架分三批空袭兰州，被我击落三架。兰州市民被炸死120人。

△ 日本海军省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

△ 威海卫专员郑维屏密电何应钦，要求派兵“围剿”文登地区八路军。

△ 行政院决议通过新勘定的重庆新市区地界。

△ 智利驻华代办马琳到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递交到任书。

12月27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一部袭击昔阳皋落地区之日伪军，战至29日，歼敌200余人。

△ 空军轰炸南宁附近日军阵地，与敌发生空战，击落敌机三架。

△ 日伪军2000多人向大清河北“扫荡”。八路军与敌激战八小

时，毙敌4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毁坦克一辆。

12月28日　　桂林行营下令反攻昆仑关。杜聿明部新二十二师及余汉谋部第一五九师等部对昆仑关以东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展开猛烈进攻。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部收复山西潞城县城，进击长治。

△　粤北日军向南雄、曲江进攻。

△　山西新军韩钧决死第二纵队突破日军、阎军包围及离石——军渡公路日军封锁线，全部抵达晋西北临县招贤镇附近地区。

△　日本外、陆、海三相联合发表《对外政策方针纲要》，鼓吹利用欧战局势促进处理“中国事变”，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之有利形势。规定对华政治策略以建立中国中央政府为中心。其对外经济政策大纲是：“促进日、满、华经济圈内的自给自足，并建立适应目前形势和战后状况的帝国新经济政策。”

12月29日　　第五军以步、炮、坦克协同对昆仑关再次发动猛烈攻击。昆仑关两侧高地被围日军在万炮齐轰中几无余生。

△　第四战区所部粤北牛背脊战斗获胜，日军自从化方面撤退。

△　军事委员会任命冯圣法为第八十六军军长。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电全国各报，对于各地粮食、燃料缺乏及物价高涨消息，嗣后一律禁止登载。

△　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5.5万字。

12月30日　　昆仑关日军开始总退却。

△　日机空袭柳州，被击落八架。

△　粤北日军左翼进至河头，右翼陷翁源。次日，先头部队窜至新江，韶关再度告急，广东省府连夜迁连县。省府主席李汉魂及随从数人留韶办公。但此后日军即停止进攻，并开始回窜。

△　河北赞皇与高邑日军500余人分三路西犯。八路军及赞皇独立营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敌50余人。高邑县长殉难。

△　国民政府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施行条例》，凡39条，定次年7月1日施行。

△　萧劲光电陈诚提出公平解决陇东事件办法，应以撤出侵占镇（原）宁（县）之兵及严惩历次肇祸主谋钟竟成为先。

△　战地党政委员会函军事委员会报告王劲哉部第一二八师及第七游击队在鄂中抢劫及敲诈勒索情形称：鄂中日军为数不上千人，我中央大军及鄂中游击队与民众武力超过敌军30至40倍，然未能毫末进展，实鄂中两大隐患。函举第一二八师四处抢劫、目无国纪，第七游击队游击所到，甚于洪水猛兽，提出应予严加整饬或切电训诫。

△　汪精卫与日本签订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上海签字。

12月31日　　昆仑关大捷。杜聿明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及余汉谋部第一五九师各一部，激战四昼夜后，是日发起强攻，卒于11时许攻入昆仑关，并完全收复昆仑关东西两侧高地。是役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以下4000余人。我因采取攻势，损伤较大，伤亡约1.67万人。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闻界谈称：日方自开战以来至本日止，陆军除原有常备军17个师团外，已再动员32个师团又14个混成旅团，合计168万人。即开战第一年（1937）敌补充新编师团14个；第二年（1938）加编师团八个，混成旅团四个；第三年（1939）又

加编师团及混成旅团各10个。

△　日军一部途经广东英德县石脚下时，突然包围第四战区正在熟睡的一个连队官兵，将之全部杀害，之后闯进望埠墟大肆杀戮。

△　阎锡山电令继续围攻汾军公路以南山西新军："着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第三十四军（附薄毓相旅段勇杰团）及王思田师崔道修旅妥为部署，肃清汾军公路以南叛逆。"

△　中共中央、中共军委发出指示，指出阎军在山西对中共及新军发动的进攻，是牵动华北全局的重大斗争。命令罗贵波、彭绍辉第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占领有利地形，接应决死第二纵队。同时命令第一二〇师速派部队加强晋西北，贺龙、关向应立即回晋西北指挥作战。同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西北地区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

△　国民政府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发表对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12月份检查公告如下：（甲）中央银行发行总额13.46979745亿元，准备金额相同，内现金准备6.58058986亿零4.7角，余为保证准备。（乙）中国银行发行总额7.71997105亿元，准备金额相同，内有现金准备3.92648460亿元零三分。（丙）交通银行发行总额5.93550448亿元零6.2角。（丁）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总额3.65432160亿元，准备金额相同，内现金准备2.11901243亿元。合计发行总额30.81787295亿元，与准备金额完全相符。

△　苏日签订《苏日协议》。日本允诺向苏联付清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日苏渔业协定》延长一年。翌日，《真理报》著文欢迎苏日关系正常化。

是月　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叶琢堂、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等会集重庆，"擘划四行总处方针"。

△　国民党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及《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　经济部颁布《矿产品运输出口管理规则》。

△　民族文化书院成立，董事长陈布雷，院长张君劢，院址设云南大理。

△　日军向冀察、冀中根据地河北雄县进行“扫荡”。八路军第三纵队在雄县东北的神堂村地区展开防御作战，歼敌450余人，击落日机一架，击毁坦克一辆。

△　日军“扫荡”河北曲阳，烧死村民101人。

△　伪鄂西保安支队副司令郭仁泰率部1000余人，在鄂中应城地区反正，参加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　湘桂铁路桂柳段竣工通车。

△　交通部与法国银行在重庆签订《叙昆铁路矿业合作合同》，规定由资源委员会设立沿线探矿工程处，由经济部出资200万元，所需材料由法方材料借款内供给800万法郎。

△　伪维新政府由满洲购入罂粟种子100麻袋（6500满洲斤），由铁路运至山海关。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具函沿途关卡，免验免税。

△　日本参谋本部派铃木卓尔中佐前往香港，谋求打开与重庆联络线。铃木经香港一大学教授牵线，会见自称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公司总经理处主任的“宋子良”（实为戴笠部属曾广），宋初以“未得其兄同意”拒绝为日方牵线。后却主动求见铃木，表示国民政府对日继续抗战的决心，同时又表示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意向，是为日本对华开展所谓“桐工作”的起始。

是年　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至本年年底，日机炸死中国公民5.1601万人，炸伤6.5846万人，毁房屋21.6546万间，约合法币14.4829万元。

△　本年度国库收入总额为30.62451985亿元，支出29.95370276亿元。

△　本年度国家普通岁出岁入总预算及追加数各为21.1808412亿元。

△　上海海关发表本年度1—11月份全国对外贸易，计进口值12.45416359亿元，出口值9.05118659亿元，入超3.402977亿元。

△　国家银行向私营工商业贷款的数额，由1937年的14.71亿元增至本年25.78亿元。

△　本年度全国专科以上高等学校101所，在校学生4.4422万人，毕业学生5622人，教师数6514人，职员数4170人，岁出教育经费373.887万元。

△　河南省赈济委员会统计：本年度河南全省遭受水、旱、蝗灾者85县，其中受灾村庄3.0565万座；受灾土地2.6253454亿亩；淹坍房屋131.1006万间；伤亡1.2272万人，灾民681.4353万人；财产损失1.89546219亿元；待赈人数454.866万人。

△　陇海铁路宝（鸡）天（水）段工程开工。因材料缺乏，时断时续，迟至1945年底始铺轨。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3月初在山东郓城西北樊坝与日军作战，首战告捷，初步打开了鲁西的抗战局面。8月后，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接连粉碎日伪军在鲁西地区的两次大“扫荡”，进一步开辟了鄄城、巨野、菏泽、嘉祥、宁阳、东阿、东平等地区。冬季，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一部进入鲁西，加强了鲁西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开辟了范

县、观城、濮县等地区。至此，鲁西抗日根据地形成。

△　宋庆龄与何宝芳（伍朝枢夫人）、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在香港组织妇女慰劳会，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支援国内抗日战争。

△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捐款计6536.8147万元。

△　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协助在重庆的一批科学家组成“自然科学座谈会”，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等20余人参加。

△　日军在华北抓捕壮丁95.4882万人，多被编入伪军或强送关外当劳工。

△　关内各伪政权银行发行伪钞，由1937年的5000万元增至本年度的5.5亿元。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请司徒雷登前往重庆，试探以蒋介石为对手洽谈“和平”条件。日方称此为“司徒雷登工作”。

△　日本颁布所谓“国民征用令”，驱使台湾同胞为其侵略战争卖命，千余名被征壮丁领到枪械后，在高雄“哗变”，600余人被日军杀害。台北和基隆亦发生同类事件。

△　由国民党员邓景芬，共产党员客希文、张培道发起创办的《曼德勒指南》在缅甸创刊，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

△　墨西哥华侨成立救国后援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九卷
(1940—1942)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九卷
(1940—1942)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1941年（民国三十年）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返回总目录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1月

1月1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元旦庆典，中央委员、国府各院部、会长官及党、政、军各机关高级职员千余人参加。林森主席主持并作《向同胞们的新年献词》的报告，勉励国民：一、信行本党五全大会之10项要目，即崇道德、兴实学、宏教育、裕经济、慎考铨、尊司法、重监察、重廉政、开宪治、遵总理遗教。二、实践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条款和国民公约，建立三民主义建国信仰和三个共同目标，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遵守政府法令，服从兵役，加紧受训，建立强大国军。四、完成地方自治，奠定县政基础。

△　蒋介石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长之名义，向全国国民广播策勉，指出“我们举国奋斗的目的，在抗战胜利建国成功，大家所一致策勉的，应该是如何贡献个人所有的力量，使抗战早日胜利，建国顺利完成”，并强调实行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发挥我们民族忠孝的伟大力量，“以必死的决心，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把各人的全部时间、精力、一切智能乃至生命，无保留的贡献给国家”。

△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实行去年9月公布的《新县制各级组织纲要》。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对记者称：实行新县制，其意义有三：一、建设人民政治教育，完成地方自治工作；二、力谋人民公共福利事业，增进人民健康；三、增加县的生产与切实办理国民基础教育。

△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发表《川政之回顾与前瞻》，指陈兼理川省主席蒋介石所定治川方案：第一，厉行禁烟；第二，安定地方；第三，慎选贤能；第四，肃正风气；第五，生产建设；第六，实行地方自治。并称此六项为“使四川克成为中华民国复兴根据地之起码办法”。

△　军事委员会公布，抗战以来，日军在中国伤亡达146.44万余人，每月平均死伤约五万人。

△　桂林改市，原桂林县改称临桂县。

△　行政院在重庆设立中国汽车运输公司，以陈延炯为总经理。

△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在伊盟发表《告蒙古同胞书》，提出普及蒙旗教育、增加卫生设施、调查户口、增强保甲、改良畜牧、禁烟等18项措施，望蒙胞淬励奋斗，群策群力，共勉期成。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鄂北兵团自高城向应山、广水、平靖关等地日军第十三师团发动攻势。6日，萧之楚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三师进至武胜关、广水。7日，王仲廉第八十五军第四师克复花山。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克豫北沁阳。

△　增援桂南昆仑关之日军及由昆仑关退却之日军在九塘、八塘附近占领阵地继续抵抗。2日，第五军杜聿明部及第一五九师、新二十二师、荣誉一师等部对八塘、九塘日军攻击。杜部因力战10余日，官兵疲惫不堪，兼以日军施放毒气，致该部伤亡较大，进展甚微。

△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该报创刊一周年的题词：“动员报纸……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　中共冀东区委在遵化县阁老湾召开会议，决定进行肃匪、建政、开辟新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等工作。并按挺进军司令部命令，将冀东部队统编为第十二、第十三两个主力团，陈群任第十二团团长，刘诚光任政委，包森任第十三团团长兼政委。

△　日军第十八师团自粤北翁源大镇河头之线南犯，3日主力窜至沙田。第五十四军霍揆彰部迎击，4日克复翁源、官渡。

△　日军为增援桂南作战，停止对粤北攻势，是日抽调该方面作战之近卫旅团及第十八师团主力向桂南方面转进。9日，近卫旅团在钦州湾登陆，沿邕钦路北进，22日在七塘附近集结。13日，第十八师团在钦州湾登陆，19日集结于南宁南郁江南岸。

△　晋东南长子、屯留、潞城各据点日军万余，以空军助战，向长子范汉杰第二十七军及长子南仙翁庙、杨鲁村、尽义村一带之第四十六师突击。第四十六师、预八师向日军反击，战至4日，敌腹背受攻溃逃。5日，第四十六师等克复黎城、东阳关、潞城及河南涉县（今属河北省）。

△　是日至18日，日军第二派遣支舰队、第三联合航空队出动飞机数千架，对滇越铁路中国段进行轮番轰炸。5日、8日，法国政府两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损失。12日，日外相野村吉三郎向法驻日大使安利表示：日军切断南宁路线后，通过滇越路的运输量增长一倍，而且中国军队因此得以进行反攻；至于轰炸，完全是现地的日军为自卫而采取的当然措施，对于轰炸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　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共同前进》一文和题为《和平运动之前途》的广播讲话，宣称："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是中日的"共同目标"，因此"在外交上、在国防上与日本采取同一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有无相通，短长相补"。并称：1940年"无疑的是和平运动

由开始而到达于成功”。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中国事变解决之极秘指导》，提出“以三个月为期限，努力完成汪工作及重庆工作的双重计划”，即建立汪精卫伪政权及实现“汪蒋合流”。

△ 伪满禁烟总局在各省、市设立名为烟政科的所谓“禁烟”机构，在铁岭、绥化设烟膏制造厂，并将原有的1800个管烟所改为官管。

1月2日 监察院公布新视察工作方针，共分一般视察、特别视察、机关视察、分区视察四类：一、一般视察以行政、财政、军政、教育、司法为对象；二、特别视察以某项事业为对象；三、机关视察以中央各机关为对象；四、分区视察以各省、市、县为对象。所需经费由中央核准，视察工作将在2月进行。

△ 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对美广播演讲，指出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在远东之发展将无限量，美国之物资与道义已对于远东之命运发生巨大之影响，切望中美关系愈益增进，粉碎日本之所谓“东亚新秩序”。

△ 行政院令准湖北省政府设立鄂东行政公署，驻黄冈县。

△ 第九战区薛岳部攻克赣北滩溪，进击永修。

△ 中国艺术展览会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

△ 香港当局宣布封锁港口，一切船舰不准驶入。

1月3日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西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日抵拉萨。

△ 新四军豫鄂边区挺进支队与鄂中游击队在京山县八字门会

合，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团三个总队。之后又建立了第六团。

△　第九战区薛岳部攻入南昌城区，焚毁日军仓库一座。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部攻克豫北汤阴县之五陵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俘虏100余人。

△　日机21架侵入湖南宝庆机场，连续投弹六次，毁机三架，伤四架。次日，中国空军自桂南秧塘机场起飞，轰炸南宁机场，炸毁日机四架。

△　日军陆海军为配合桂南会战订立航空协定，以陆军航空部队飞机30架直接协同地面作战，海军航空部队飞机75架负责距战场远处的攻击，并以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继续攻击桂林、柳州中国机场。

△　陶希圣、高宗武宣布脱离汪精卫集团，是日秘密离上海赴香港。

1月4日　　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重庆与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举行谈判。何应钦要求中共取消“违令扩充”的部队及“非法”设立的军区。叶剑英答称：这些军队和军区都是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肩负着沉重的抗敌任务，不能取消，要求国民政府允许八路军将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所辖地区及敌后解放区。双方争执激烈，谈判无结果，商定日后继续进行。

△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以桂南、粤北前线屡战告捷，特致电祝贺，并汇二万元表示慰劳。

△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宗旨为：开展边区文化运动，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张闻天、毛泽东先后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和《新民主

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大会通过加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成立鲁迅研究会等决议及宣言。12日闭幕。

△　新编第二十二师邱清泉部克复桂南九塘，5日拂晓继续攻击八塘，战至11日，攻抵大潭至六落之线。

△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密电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速派劲旅前往文登以南一带，“剿办”在该地征兵之八路军。

△　第一战区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第五二三团围攻八路军驻山西晋城土岭之晋城、阳城、沁水三县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宋乃德等20余人伤亡，70余人被捕。后经晋豫边抗日游击司令唐天际等向第四十七军交涉，释放全部被捕人员。

△　英驻华大使卡尔抵达重庆。

1月5日　　国民政府公布《各省市政绩考成暂行条例》，凡五条。

△　驻英大使郭泰祺会晤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商谈接受英国信贷及英、美、法三国共同发展中国西南运输业等问题。

△　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受蒋介石之命，与叶剑英进行谈判。张冲提出要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回到河东去。叶剑英提出如下条件：一、把边区周围的军队调赴前线，陕甘驻军恢复骑二师进军前之状态；二、绝对不增调任何军队赴绥德、吴堡、清涧，陕北行政专员何绍南撤职；三、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四、承认扩军，则第三五九旅过河当可商量。

△　赈济委员会以粤北战事“民众备遭荼毒”，是日派该会处长钟可托携款30万元，前往赈济。

△　经济部采金局设立云南省金矿勘探处，办理云南宾川、祥云、凤仪、姚安、丽江、永胜、剑川等20余县金矿勘探、开采事宜。

△　缅中文化协会在仰光成立，会长宇巴伦，副会长缅、中各一人，中国为李文珍。

△　第四战区第六十四军邓龙光部及暂编第二军向广东英德方面日军进攻，敌在连江口、黎洞、高田、清远等处抵抗后南逃，是日该部克复英德。至10日，先后克复连江口、高田、黎洞、清远及银盏坳。

△　中共中央电令贺龙、关向应由冀中返回晋西北。2月2日至8日，贺、关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五个团分批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该地区八路军和新军。

△　日本“梅机关”为汪伪青岛会谈拟定《中央政治会议要纲》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要纲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设主席一人，每届任期一年。下设法制、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各委员会及秘书厅。《条例》规定：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范围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任的政务，并监督各省、市，特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实业、建设，有任免下属官员、成立绥靖部队、处理华北资源开发、对外贸易及管理华北的国有财产等权。

1月6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龙光为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　豫南昌平关告捷。第五战区一部克复豫南昌平关、东鲁寨、陈家店等日军据点，旋向母猪河一带进击，7日晚攻克花山及附近四据点，并围攻大庙坂、平靖关、庙儿岭等地。

△　张冲与叶剑英再谈，转达何应钦对叶剑英5日意见的答复：

一、已下令陇东停止军事行动，着朱绍良派人调查解决，中央军可后撤；二、何绍南决不再去，高桂滋军亦不调；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解决困难甚多，尤其陕、甘、宁三省当局反对，可否找一折衷的办法？四、扩军事于事态平息后，由何应钦负责向蒋提出实行。叶剑英表示：调查应由双方派人去；对边区问题的解决须按原决定发表，绝无折衷的余地。

△　杨靖宇率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在吉林省濛江县西岗地区，与日军小滨部队和伪警察大队作战失利。月末，杨靖宇率部在濛江、辉南两县交界的马屁股山遭敌袭击，杨靖宇同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失掉联系。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一部袭击黑龙江省铁力县日军守备队及伪军，毙伤70余人。

△　驻英大使郭泰祺晤英外相哈里法克斯，继续商谈英国援华问题。郭谈及英信贷案，我方所需之货仅得十分之一，而首要之钢材毫无所得，英外相表示当催促以应中国之急需。继谈汽油问题，郭称：我方正与信贷局及油商接洽，每年供我方50万磅汽油，五年为限，请予赞助。英外相亦表同情。

△　西藏女子刘曼卿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自拉萨抵重庆。

△　冀南广宗、威县日伪军千余人在炮兵、骑兵配合下，分途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进攻，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击溃，毙伤200余人。

△　日本兴亚院会议决定关于汪伪中央政权成立的《纲要》，凡七条，要点为：以汪精卫“新中央政府为对手，开始正式调整邦交”。谈判日期及调整邦交条件，“等看清该政府的发展及内外形势后再决定”；为了确立日本的战时经济，在与“新中央政府正式缔结调整邦交之前，根据既定方针应积极促进必要的经济建设”。对于战时经济的

薄弱环节及违反《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施策，“更宜尽力调整”，“使汪极力协助日本，以加速重庆的屈服”。该《纲要》另有附件及备考。

△　日本“梅机关”为青岛会谈拟定《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和所谓《国民政府政纲》。前者规定：一、中央政府由国民党、既成政府、在野合法政党及社会上其他有力分子构成，如果重庆国民政府实行改组，也可作为中央政府的组成分子。二、中央政府根据日中关系调整纲要，正式调整日中国交。后者规定：一、实行和平外交，“分担东亚永久和平及建设新秩序的责任”。二、与各友邦共同防共和实行经济技术合作。三、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四、建立中央银行，确立币制，整理税制，复兴农村。五、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

1月7日　　蒋介石飞抵桂林，亲自指导南宁作战。10日飞抵柳州，视察驻迁江之夏威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策勉官兵加紧作战，收复失地。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陈锡联部在平辽公路昔阳至关帝庙间展开破袭战，战至8日，歼灭日军70余人。

△　河南信阳伪警备旅长陈彬斋率部700余人反正。

△　日本“梅机关”拟定《青岛会谈要领》，规定：一、青岛会谈为中央政治会议作准备。二、会期三天。三、内容：通过及决定中央政府建立大纲、政府机构、名称、首都、国旗、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等。四、由汪精卫向王克敏、梁鸿志说明《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部分内容及中日关系近况。参加会谈的各方成员拟为：汪精卫及幕僚五名；王克敏及幕僚三名；梁鸿志及幕僚三名。

1月8日　　蒋介石通令四川各专员、县长限期完成禁烟，2月以前

自动戒绝，2月后半月举行调验，逾期不戒者，即以私吸论罪，处以徒刑或枪决，承办人员奉行不力定予严惩。

△　蒋介石通令全国学生在寒假期间宣传兵役。所需经费由所属机关、学校筹款支报，不得借口推诿。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入湖北潜江，毁日军仓库一座。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欢迎1月5日自新疆归来的300多名八路军指战员（原西路军的一部）举行晚会，毛泽东出席。

△　伪华北临时政府发表声明称：一、中央政府成立后，华北将与日本保持现有关系；二、华北关税上缴后，中央须支付华北建设费用；三、保留与日、满处理地方问题的权力；四、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后，须保有现有行政区域。

△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官邸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听取兴亚院关于成立汪精卫政府问题和《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主要内容的说明。阿部宣称：全力支持汪精卫政府的成立，“贯彻近卫声明，以期达到最终目的”。

△　日本内阁通过《树立中央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规定：对汪精卫工作之进展，不规定缓急，听其自然，政权之树立亦根据实力酌量进行，当前按临时政权处理。政权树立前，努力促使进行汪蒋合流工作，大致继续到3月前后。政权树立后，预定于其后半年仍继续进行此项工作。如仍不能奏效时，即向长期持久战转移。至于对重庆工作，决定与重庆政府保持接触，通过巨头会谈求得解决。

1月9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湖北省政府设置宜昌行署，派省府委员林逸圣兼行署主任。

△　张冲与叶剑英谈判，称蒋介石、何应钦已内定以下解决国共军事问题的方案：一、撤换何绍南；二、骑二师撤回洛川以南；三、

解决边区问题，以免再发生冲突；四、高桂滋不调；五、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六个师；六、第三五九旅过河东，冀南纸币停止发行。

△　何应钦再与叶剑英谈判。何提出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之方案仍是改边区为专员区，并划给14个县，即从原定的18个县中划去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四县。并称：该四县接近公路和西安，常生摩擦。叶剑英表示反对，并提出扩军非九个师不可。

△　第四战区陈公侠第六十四军收复广东增城以北地区，并向增城进击。11日，击溃良田方面之敌，克复从化。

△　粤北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攻克昌田，旋分途追击残敌，一路直趋温泉，一路抄从化迫增城，日军向广九路退却，11日溃走军田。

△　第九战区薛岳部攻克赣北马回岭。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皮定均特务团袭击晋东南潞城微子镇，毙伤日军70余人。

△　豫南平昌关日军2000余人，附战车16辆，飞机10架，西犯桐柏，第五战区李宗仁部阻击日军，日军不支，溃退至吴家店附近。

1月10日　立法院长孙科发表《论实施宪政》的演讲，称实施宪政之功有三端：一、完成训政，巩固民权基础。二、建设人民政治教育，培植标准的民主政治精神。三、集中人民意志，完成建国工作。又称：实施宪政还应注意组织良好的地方民意代表机关及完成地方自治。

△　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董必武、叶剑英，就陕甘宁边区、山西新旧军冲突、河北摩擦、八路军扩军、新四军、竹沟惨案等问题同国民党交涉，提出陕甘宁边区应为23县，少一县不行，八路军有在23县境内动员民众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之权；河北问题，

委任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撤销鹿钟麟、石友三，拒绝庞炳勋；调停山西新旧军冲突；八路军扩至三军九师，22万人，月饷440万元；新四军编三个师，五万人，月饷100万元，并补充1000万发子弹。次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局，目前先解决边区和扩军问题。

△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等联名致电美国参众两院，恳请美国政府予日本以经济制裁，指出：美国继续供给日本汽油及飞机零件，将“使美国民众之良心受重大之震动”，“予日本以继续侵略之鼓励”，“实与美国政府及人民之远见不能相容”。

△　驻美大使胡适在纽约演说，呼吁全世界信仰民主及爱好和平之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并督促各国实行有效之对日禁运办法，借使日本在华之军事行动早日停止。12日，又在美国各学院联合会演说，称中国反侵略战争为“新的世界大战”之一部，中国决为求自存独立而战。

△　新四军管文蔚部在江苏扬中歼灭日军100余人。12日，日军陷扬中。

△　中国渔船70只在汕尾附近遭日驱逐舰袭击，千余名渔民遇难，损失百万元以上。

△　日本与伪蒙疆政府、华北开发公司、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大同煤矿公司，资本4000万元，对永定庄、裕丰（旧煤峪口）、保晋、同家梁、白洞、宝藏和昭和七个坑口进行开发。

1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如下要案：一、设立中央文化驿站；二、中央组织部增设党员训练处；三、修正中央政治学校校章。

△　军事委员会任命樊崧甫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中共中央再次提出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的方案，主要为：一、坚持23县，少一县不行；二、23县境内实行民主制度，彼方原有行政机关、地方武装等，一律撤销；三、撤销以破坏边区为目的之一的特务机关，但党部不在内；四、边区名称为“陕甘宁边区”；五、边区政府委员会由边区参议会选举，国府加委，不得委派别人；六、主席林伯渠；七、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20万元；八、撤销咸榆公路及陇海铁路上一切阻拦制度，以后不得扣留阻拦来往人员；九、马师（即骑二师）撤退洛川以南。

△　日本兴亚院在南京召开各地联络部长会议，统一对建立汪政权的方针。政务长官柳川说明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并对此进行协商。会议决定支持政府的方针，努力协助建立汪政权。

1月12日　　蒋介石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示在南宁作战中“不可以侥幸求成”，“必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未稳当以前，切不可遽求变化”。

△　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奉令执行《取缔囤积居奇办法》，对于囤积棉花、毛线、皮革、纸张、五金等日用必需品者，分别按“劝导、警告、征用”等步骤予以取缔。

△　第三十六军姚纯部接替第五军杜聿明部防地，向昆仑关日军发动进攻，因日军抵抗顽强，姚部补给困难，虽力战数日，无法进展，形成对峙状态，昆仑关战役结束。

△　冀察战区侯如墉、乔明礼部6000余人向八路军驻河北赞皇地区之平汉纵队范子侠部进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李达、王宏坤等部予以反击，将其大部歼灭。同日，八路军冀南、冀中部队各一部将踞束鹿、宁晋地区之乔明礼部主力歼灭。15日，日军为增援侯如墉部，出

动日伪军2500余人，合击赞皇以西地区，被八路军击退，侯残部700余人窜至赞皇投降日军。

△　晋东南长治、壶关日军5000余人南犯，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与敌在周村镇、互河头、韩店一带激战。13日，日军一部由长治增援，并以大炮、飞机助战，双方在流泽、小池岭、大峪、黄岭一带激战。

△　日本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两星期内停止滇越铁路之军火运输，否则将炸毁该路之每一座桥梁。

1月13日　桂林行营在迁江召开桂南会战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宾阳附近作战方针：以攻克南宁为目的，先确保现态势，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后，对郁江两岸之敌同时开始攻击而歼灭之。作战区分郁江南、北两岸，南路由夏威指挥，北路由吴奇伟指挥。

△　蒋介石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发动侨胞回国慰劳致电嘉勉，并告已电外交、海外部及各党部力予协助。

△　粤北日军分沿粤汉、禅灰二路溃退，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猛袭军田，一路直迫官遥，与日军滨未、近卫两师团发生激战。

△　周佛海与日本驻上海公使加藤会谈关于日本对汪中央政府的承认问题。加藤表示汪政权成立后，日本只派遣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不递国书。周则表示，如此成立新中央政府实无意义，如日本不承认，宁可不组织。

1月14日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与山西新军在临县会师，并召开庆祝胜利大会，续范亭报告战斗经过及其意义，同时宣布新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续范亭任总指挥，下辖决死第二、第四纵队，暂一师及工卫旅。

△　日军在豫北武陟县吴村屠杀修河堤民工300余人，并掳去民工70余人，毁房屋900余间。

△　日本阿部内阁辞职，天皇裕仁任命米内光政继任首相。

1月15日　　国民政府派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河北、河南、察哈尔、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康16省民政厅长为各该省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总监督。

△　资源委员会在云南宣威设立宣明煤矿公司，与云南省政府合办，由谭锡畴主持，有员工54人。抗战胜利后结束，由明良煤矿局接管。

△　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全体将领致电蒋介石，严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韶关演说中所称“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等语，要求派遣陈诚亲临前线考察职军情形，“以雪冤诬，杜摩擦，固团结，而利抗战”。

△　《中国文化》杂志在延安创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入鄂南大冶县城，焚敌仓库三所，并乘夜袭击通城、关王庙等处，歼敌一个中队。

△　甘肃海原县回民马国瑞等聚众暴动，次日响应者达1000余人，18日达3000余人。

△　日伪军2500余人从石家庄、元氏、获鹿等地九路合击赞皇以西之八路军，被击溃，毙伤300余人。

△　日本驻蒙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决定纠集第二十六师团黑田重德、骑兵集团长小岛吉藏、伪蒙军三个师、伪军王英部三个师，向绥西地区进犯，企图摧毁第八战区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绥西根据地。24日，日军大本营批准此作战计划。

1月16日　蒋介石手令各省及社会人士充裕教育经费，尊重小学教师，切实改善小学教师待遇，希望诸教师“勿以一时之困穷而动其志，勿以功绩之无闻而轻弃其职务”。

△　交通部长张嘉璈飞抵昆明，处理滇越铁路桥梁被炸事件。2月1日抵海防市，视察存料仓库。

△　延安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出席并讲话。

△　第四战区第六十四军陈公侠部克复广东花县。

△　第九战区薛岳部克复鄂南贺胜桥，进击咸宁。

△　桂林至柳州铁路通车。

△　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劝降，略谓：唯先生若能以国命民生为重，“与日本休战言和，根据近卫声明的原则，以求具体的实现，则兆铭及诸同志必能与诸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国和平早日实现”。

△　日本“梅机关”为青岛会谈拟定所谓《国民政府机构预定表》，规定“国民政府”下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国防委员会。行政院下辖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军政部、海军部、教育部、司法行政部、实业部、交通部、社会部、宣传部、警政部、赈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司法院下辖最高法院。监察院下辖审计部。考试院下辖铨叙部、考选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下辖参谋本部、军训部、军事参议院。

△　日本米内光政新阁组成。外相有田八郎，陆相畑俊六，海相吉田善吾，内相儿玉秀雄，藏相樱内幸雄。同日，米内发表就职声明，表示新阁将以坚定不移之意志迈进，建立“东亚新秩序”。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基本政策为协助“新中央政府”之产生。

1月17日　国民政府令免鹿钟麟河北省政府主席职，任命庞炳勋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　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炮兵部队团长级军官，并发表《炮兵训练的基本要务》的讲演，宣称注重抬炮运炮的能力，注重教养马匹，注重管理炮及其器材乃是炮兵训练的基本要务，要求各团长切实做到，练成新式精锐的革命炮兵。

△　财政部公布《出口货物注销外汇办法》。

△　蒋介石命令太南、太岳地区之八路军部队一律撤至白晋公路以东、邯长公路以北。同日，又命令第九十三军刘戡部、第二十七军范汉杰一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挺进，进攻八路军和决死一纵队驻地；命令阳城、晋城地区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第十四军陈铁部向晋豫边八路军进攻；命令高平、陵川、长子、壶关地区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第二十七军一部等进攻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徐海东部及决死三纵队。21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提出抗议，表示八路军决不离开上述地区，并反对进攻决死队。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大青山李井泉支队在绥远武川附近歼灭日军、伪蒙军200余人。

1月18日　第一二九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派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进入太岳区与决死一纵队会合，并与薄一波统一指挥该地区八路军和决死纵队，以应付阎锡山之突然进攻。

△　美国《纽约时报》撰文驳米内16日就职声明，表示如日本不变更侵华政策，美日关系无法改善。

1月19日　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自抗战军兴以来，率部转战苏、浙、皖、赣、湘、鄂等省，“屡摧强寇，迭著殊勋”，国民政府近特晋授三等宝鼎勋章，蒋介石是日致电嘉勉。

△　17日至是日，何应钦及张冲等接连与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谈判，提出国民党关于两党军事问题及陕甘宁边区问题的条件：一、边区名称为陕北行政区；二、暂时隶属行政院；三、县数15县；四、第十八集团军扩军三军六师；五、第三五九旅至少要有一部分过河东，以给中央面子。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致函宣传部长王世杰，建议增加党报之发行数额，并称“扩大宣传，应付共产党实属当务之急”。

△　朱德、彭德怀等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今年扩大八路军20万人。30日，毛泽东等复电：今年扩军30万，主要分配在有枪的区域。

△　刘伯承赴冀西同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会谈，劝其停止摩擦，一致对外，并表明严正自卫之立场。鹿表示中立，朱则反对。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再次指示新四军向北发展，指出：在现在的抗日反共局面继续发展的形势下面，“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在发展中，给摩擦者以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服投降危险”。

△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与日影佐、须贺、清水、矢野等在上海会谈，讨论青岛会谈的各项事宜。后汪精卫接见日本记者，谈其“中央政府”成立后之对内对外政策，对内实行“反共建国”，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对日“局部和平”。对外则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并根据近卫声明的原则，调整“中日国交”。

1月20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法驻华大使高思默，对法国拒绝日本假道越南运输军火物资一事表示感谢，并称对于滇越铁路，只须两国迅速修复，保护周密，使日本轰炸破坏之阴谋无所施展。

△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谓：英国政府愿知中国政府供给英国钨砂及生丝、桐油、茶叶、猪鬃之数量，“如上述任何货物可供采购，则英国政府或能以无线电及电话材料供给中国，以为交换”；并称：英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歉难以各种机器工具、特制钢铁及测量器材等供给中国”。

△　何应钦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告西北地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较全国任何一地为甚，“最显著者为八路军与晋绥集团，均各有主张与作风”，建议“培植、充实中央在西北之部队，以形成坚强之核心力量”。26日，徐永昌复电称：目前西北虽有第一、十六、九十、四十二、八十军，似仍有兵力不足之虞，“应再充实中央在陕甘之兵力”；“宁、青四马部队除前已整理并增经费外，似应特须加强其精神教育及一般训练”；“晋绥军以阎长官整理为宜”。

△　苏阿拉木图至新疆迪化市航线开通。

△　汪伪中央秘书长褚民谊在上海对伪中华社记者称：“现在和平基础已备，唯和平之实现，必须全国一致，乃能迅速而普遍。故盼蒋（介石）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言和。”

1月中旬　　傅作义在绥西五原召集团长军事会议，商讨反击日军进攻绥西的对策，商定：在战略上首先用软顶硬打的战法，节节阻止，打退日军进攻；尔后化整为零，分区游击，使敌人找不到我军主力；俟敌人疲惫之时，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不备，一举歼敌，收复绥西。

△　第十六集团军夏威部第三十一军及第一三四师、第一七〇师，第三十七集团军叶肇部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五集团军第六十四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部第二、五、六、三十六、九十九军，第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部第四十六军及第一、二、三、四独立团，第四十三师，新编三十三师等部，为增援宾阳方面作战，到达前线。

△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七军一部在黑龙江虎林县七里沁沟、五里洞、外七里等地歼灭日军50人。

1月21日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自白晋路两端夹击由壶关南犯日军，至夜将敌击溃，克复高平。24日，克复荫城镇。

△　国民党中央要员发起之追悼吴佩孚大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孔祥熙、叶楚伧、朱家骅、何应钦、陈立夫、邵力子、吴敬恒等及各机关、团体200余人出席，丁惟汾主祭，孔祥熙致词称：吴佩孚是一个爱国者，“其晚节忠亮，不受敌人所威胁利诱”，“已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继宣读国民党中央执委蒋介石之祭文。24日，吴佩孚灵柩厝北平拈花寺，沿途观殡者数万人。

△　中共中央决定，由于过去历届国民参政会均决而不行；国民党对国民大会、宪法及宪政重大问题，对中共和全国人民均采取忽视和不理态度；故意指定制造摩擦的人组织华北视察团以增加两党摩擦；对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及共产党员实行进攻与压迫政策等原因，中共参政员均不出席第五次参政会，以示抗议。

△　陶希圣、高宗武致书香港《大公报》，揭露汪精卫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并详述汪日密约签订之经过，劝告汪精卫等“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

△　伪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王揖唐、朱琛、齐燮元及日顾问喜多诚一到达青岛。22日，伪华中维新政府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及日顾问原田熊吉，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李守信到达青岛，参加青岛会谈。

△　日军土桥师团一部乘汽艇80余艘自杭州偷渡钱塘江，向浙南进犯，是日陷萧山。

△　民生公司“建兴”轮于长江广阳坝附近撞沉“隆义”轮，乘客100余人遇难。

1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就高宗武、陶希圣披露汪日密约事，致电驻美大使胡适，请其“就近指导在美宣传人员，充分利用此文件，以打击日政府对英、美之假妥协”。

△　陶希圣、高宗武致电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等，切望为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放弃无益于国之有害运动。

△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到达青岛，参加青岛会谈。下午汪精卫拜访华北日海军最高指挥官野村中将，并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称他所进行的“和平运动”，是从东亚大局着想，并非以战败之故，避难苟安。

△　日本驻香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与自称“宋子良”的国民党代表在香港会谈日中和平问题，宋称目前蒋介石不愿同汪精卫合作，并尽力破坏这种合作，建议日本方面坦率地向蒋介石提出简明的避免战争的要求，促使蒋介石转变。2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电令铃木卓尔，迅速了解重庆方面的动向。

1月23日　蒋介石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称日汪密约“把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骨子里暗藏着机械利刃”，“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号召中华国民“光复山河，荡涤汉奸腥膻，报复先烈仇恨”。同日，又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友邦人士书》，切盼友邦勿供给日本军火“助寇侵华”，并希望友邦援助中国抗战，“共谋中国及远东之正义、和平与安定”。

△　国民政府决定行政院设立农林部，管理全国农林行政事宜。下设总务、农事、农村经济、林业、渔牧等处及垦务总局。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卖国密约》，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生路；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死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　孔祥熙发表《今后财政之展望》，认为"我国抗战已历二年零七个月，经长期之艰苦奋斗，抗战已进入有利阶段。以战时财政而言，不但仍富有弹性，可以继续支持抗战，且更有余力，可以从事建设，以副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之国策"。

△　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委托致信斯大林，说目前中国抗战正进入艰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摩擦，投降与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

△　第八战区傅作义部克复绥西新民堡，日军退守旧城。

△　甘肃海原回民马国瑞率众攻克海原县城，被当地驻军第五八二团镇压。29日，暴动失败。5月，暴动复起，旋亦被镇压，终致失败。

△　豫南长台关伪军余歧成率部200余人反正。

△　日军以第五师团在桂南失利，调广东之近卫混成旅团及第十八师团第二十三旅团增援南宁，是日到达前线，并将在桂南之各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二军，以久纳诚一为司令官，隶属华南方面军。

△　青岛会谈开始。汪精卫之代表周佛海与伪蒙疆政府代表李守信会谈，达成如下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疆政府"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力。会谈结束后，李守信发表谈话称：蒙疆新地位的确立，"将有助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及新中央政府的发展"。

△　汪精卫集团为掩盖日汪密约真相，由陈春圃以汪精卫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称：“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之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中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同日，周佛海亦发表谈话，称高、陶所公布之日汪密约“为日本的最初提案”。

1月24日　行政院会议决定组织政务巡视团，督察各省行政及建设设施，指导新县制之实施，促进地方自治之推行；并通过《中苏通商条约》及设立农林部等案。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及兰为第九十四军军长。

△　驻美大使胡适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在华盛顿拜访美国联邦贷款主任琼斯，说明中国政府决不讲和，决不投降，一定坚持长期抗战。陈光甫并将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再借7500万美元意向书面交琼斯。

△　经济部公布《钢铁管理规则》。

△　经济部设立豫陕鄂边采金处，办理河南淅川、嵩县，陕西洛南、白河、洵阳、安康及湖北郧县金矿开采事宜。

△　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院校248名教授联名通电讨汪，呼吁全国文教同人“共谋有效办法，铲除此辈害群之马，毋使玷污文教，贻羞人民”。

△　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省代表在周保中主持下，于苏联伯力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会议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东北抗日联军今后的斗争方针和策略。通过《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等文件。

△　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关于进攻后套（即绥西五原）作战命

令：驻蒙军可暂时在后套地区作战，消灭当面之敌。作战完毕，应迅速将全部部队撤回至原来作战控制线以内，进行整备。撤退时对可被敌利用之军事设施及军需物资，应尽量予以破坏或烧毁。

△　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举行第一次会谈。出席者汪精卫方面为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王克敏方面为王揖唐、齐燮元；梁鸿志方面为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本方面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荻那华雄、清水董等。会议通过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政纲、政府名称、首都、国旗和成立日期等案。会后，汪精卫就法统问题发表谈话称：中央政府将继承国民政府之法统，取消一党独占，凡各合法政党及全国贤能之士，均能依法参加，协力商议政治。

△　汪精卫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承认卖国密约是“去年11月5日与日方在华一部分人士试拟之方案”。

1月25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暨所部将领通电讨汪，誓率北线及中原数千万忠义同胞，与倭寇搏战到底。同日，重庆工、农、商、学、妇各界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国军民一致讨汪，共除奸逆，以维国法。

△　陆军大学举行第十七期开学典礼，蒋介石到会作《陆大学员之责任与基本的修养》的讲演，称建军的先决条件在于建立军人的精神与人格，而修养精神与锻炼人格，应从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做起。勉励学员自省，学术与精神均有不逮，从此奋发努力，精益求精。

△　军事委员会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长陈荣楫在第四十军军部报告，以其在华北耳闻目睹之现实，承认“八路军抗日积极，设施英明”，国民党“华北党务、行政人员均非共产党对手”，并断言两年后华北政权均将为共产党操纵。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不能让步问题的指

示》，指出：“我们须考虑增加扩军数与经费数，并以晋、察、冀、鲁四省及豫东、皖北、苏北全部划为我军防地，方于抗日有利”；陕甘宁边区问题，“不仅二十三县不能少，而且须考虑增至二十八县，方能巩固后方”。

△　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工作的意见：巩固晋西北，建立新政权；在晋东南方面，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

△　上海英商信和纱厂1800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及发给四个月的奖金。经过斗争获得部分胜利，30日罢工结束。

△　日军第二十八师团主力协同第十八师团主力，向广西七塘西春虎山之守军甘丽初第六军、傅仲芳第九十九军阵地进攻，以一小部由五塘、六塘东犯六景，北经那河迂回武陵；以近卫混成旅团沿邕永公路渡邕江东岸北犯甘棠，并以空军配合作战。第六十四军陈公侠部主力因日机空袭，运动困难，无补战局。第二军李延年部之第七十六师、第六军之第四十九师仓促驰援，情况不明，兵力逐次投入，消耗颇多。

△　山西昔阳日军700余人进攻皋落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一部予以阻击，毙伤敌80余名。日军施放毒气，八路军将士中毒400余人。

△　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举行第二次会谈。首由汪精卫对《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部分内容作了说明，协商结果将条约及附件交汪精卫处理，并在发表前严守秘密。关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秘密谅解事项》、《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央政府的组成》、《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及实行宪政之件》等，或按原件通过，或由汪精卫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协商内定。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于3月初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于3月中旬成立。

1月26日　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及河北省政府由太行山北部地区撤至邯长路以南之武安、涉县、磁县、林县地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攻克山东郯城。

△　财政部公布《推进银行承兑贴现业务暂行办法》，凡六章11条。

△　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为河南竹沟事件再次致电卫立煌，要求“惩凶雪冤，以遏乱萌”，并保障新四军人员“生命财产之安全”。

△　日军第十八师团击退第四战区第三挺进纵队一部，攻陷南宁附近之良庆，27日陷刘墟。

△　汪精卫分别会见王克敏、梁鸿志，就“临时”、“维新”两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会议议员分配、决议办法、开会地点、时间、议题等达成协议，青岛会谈结束。旋汪精卫发表谈话，称此次青岛会谈，实际为“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与发展。同日，日军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表谈话，宣称青岛会谈使汪精卫中央政府之组成及调整中日关系之前途，更具有浓厚之希望。

△　伪华北临时、华中维新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称：今经青岛会谈，进而将见中央政治会议之召集，“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

1月27日　国民政府明令督办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公署改为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派蒋介石兼四川省禁烟督办，贺国光、徐孝刚为会办；派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

△　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改组，黄宇人、杨治晏、黄国桢、赵昉等11人为执行委员，黄宇人兼主任委员，赵昉兼书记长。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动“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以改善作家的经济困境，动员广大文艺家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新蜀报》是日召开座谈会，老舍、阳翰笙、胡风、光未然等出席，与会者就提高稿酬、保障版权、版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后，《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纷纷撰文，积极支持这一运动。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入开封车站，毁日军第四堆栈。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攻入浙江萧山县城。

△　傅作义密电蒋介石，告绥西日军大事增加，乘冰期西犯，请求严令绥西各部“彻底执行命令，打破保全实力、躲避任务心理，以期协力歼敌，确保后套”。

△　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公布冬季反“扫荡”战绩。从1939年12月12日起至1940年1月3日止，八路军同日伪军先后作战400余次，毙伤日伪军1.04万余人，俘日军23人、伪军1150人。

△　朱德、彭德怀致电徐向前、朱瑞、陈光等，指出对山东专搞反共摩擦的沈鸿烈等，须在有理有利的原则下，在军事上打击之，在政治上孤立之，并推翻其危害抗日的反动政权。并指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寇，不要放过一切有利时机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　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山西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

△　汪精卫等回到上海，是日成立“还都筹备委员会”，褚民谊任秘书长。

△　周佛海与日本犬养健在青岛举行会谈，商讨汪日密约披露后的不利形势及挽救办法。周佛海提出：日本应以事实证明密约之不确，其办法可考虑：第一，日军总司令部从南京移驻他处；第二，取消国旗上拟加之三角形布片；第三，早日承认新中央政权。

△　日伪共同统制经营的华北电业公司在北平成立。

1月28日　冯玉祥在重庆发表广播讲演，呼吁国共两党真正团结起来，用积极抗战的行动去彻底粉碎汪逆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胜利。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暨陈仪、黄绍竑、熊式辉、唐式遵、刘建绪、上官云相、韩德勤、王敬久、俞济时、冷欣等率所部通电讨汪。同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发表谈话，愿追随国人之后，本自身职责，力求抗战国策之彻底完成。

△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日军大举进攻，战况剧烈，命令桂南参战各部：以收复南宁之目的，迅速向葛墟、富兴村等地集结兵力，积极准备尔后之攻势。29日，因情况突变，令甫到宾阳之第七十六师王凌云部及第六十四军邓龙光部向甘棠前进，第四十六军何宣部向永淳方向前进。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党内指示，指出党目前的任务是："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抗日根据地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并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　山东八路军一部攻克济阳东北之仁凤镇，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　第二战区第九十三军刘戡部、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向山西安泽、屯留间之府城、英寨、张店等地八路军进攻。冀察战区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及第二战区独八旅等部在晋东南高平地区包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部队。

△　日军罔直与小岛率日伪军1.5万余人，乘汽车300余辆，由包头出发分两路向绥西进犯，一路沿包头—五原公路向西进犯；一路由包头南渡黄河，由南岸西犯。同日，黑田率日军二万余人，分乘汽车1000余辆，附飞机多架，坦克100余辆，由包头取道后山向绥西进犯。

1月29日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报告《实施宪政应具有的确切认识》，宣称实施宪政“是要为国家确立百年久远的规模”。

△　军事委员会任命詹忠言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

△　蒋介石电请泰国总理兼外交部长銮披汶，对侨居泰国之中国人民给予充分之保护，并“仍如昔日之允许，从事合法事业，而不受干扰”。

△　石友三第三十九集团军一部围攻驻冀鲁边之八路军东进纵队，并将该军第三团第十一、十三两连及骑兵班在南宫北仓庄包围缴械。30日，石部暂三师、独四旅围攻冀南清河西北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三团及清河、清江两县大队，八路军伤亡55人。

△　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及台湾混成旅团，对桂南邕宾路北方高地实施步、战、炮联合攻击，突破第九十九军傅仲芳部第九十二师马鞍山阵地。桂林行营急令傅仲芳固守四、五、六塘北方高地。同日，郁江两岸日军分别向伶俐及小黎墟附近集结，第四十六军一部及独一团协同向小黎墟日军侧击。

△　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在桂南八塘附近，一部在五塘附近协同向北攻击。第十八师团一部分别迂回攻击，攻占鹿颈、永淳，并渡郁江北犯，30日进抵甘棠附近，第七十六师王凌云部在甘棠西南予以阻击，伤亡甚众。31日，日军陷甘棠。至邕宾路与三庄岭间之日军，亦分途北犯。

△　绥西日军罔直部在西公旗附近遭第八战区傅作义部骑六军门炳岳一部阻击，入夜进至宿亥滩。黄河南岸日军进至二圪旦湾，遭门炳岳另一部阻击，略有伤亡。门部乘夜转移，日军继续西犯。

△　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发表施政演说，宣称在处理“中国事变”上，“继承已商定之方针，坚决地解决中国事变，完全支持与援助中国新中央政府的诞生与成长”。

△　美国长江舰队司令格斯福特、美驻华大使詹森及大使馆陆海军武官，乘美舰“吕宋号”由上海抵汉口，调查日本继续封锁长江之实况。

1月30日　军事委员会命令，自2月1日起，桂南作战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政治部长陈诚协助。

△　军令部制定《防止异党部队越轨行动方案》，要点为：“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坚固国军壁垒，积极抵制日寇之侵略，对于妨碍此方针的一切恶势力，当极力铲除或消弭，并促其觉悟”；军事上“在北方尤其晋、冀两省增强部队，巩固现有地位，防止异党继续扩大”，“第三、第四、第五及第九战区对异党应严密制裁，相机铲除”；政治上“以舆论制裁，使其觉悟，改变前非”；外交上“向苏联当局说明异党之越轨行动，望其对于中共错谬行动加以纠正”。

△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成立，参政员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梁实秋、于明洲、余家菊、卢前为团员，是日自重庆出发赴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省进行慰劳视察。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指出：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军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暂编第二旅1500余人进犯山西榆次东南黄彩地区，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及独立支队各一部全歼，击毙旅长薛文教、副旅长赵武才。

△　日军黑田部在乌布浪口和乌镇地区遭傅作义部马腾蛟步兵师阻击，日军以大炮轰击、飞机轰炸、坦克掩护向马部冲锋，马部官兵奋勇抵抗，击退日军进攻。同日，马彦骑兵旅两路南北夹击日军，双方伤亡较大。31日，第一〇一师董其武部驰援，战至日暮，向折桂乡转移，第八十一军马鸿宾部亦向狼山转移。21日，日军陷乌布浪口及乌镇。

△　汪伪以高宗武、陶希圣披露其卖国密约，解除高、陶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职务，并任命周佛海为伪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

1月31日　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萧克致电蒋介石，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密约，略称："汪等诸逆，丧心病狂，狼狈为奸，普天同愤，以此益坚信生存唯有抗日，妥协即是灭亡"；并指出：自国民党"《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摩擦纷起冲突，有生力量抵消，莫此为甚"，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增强抗战力量"。

△　军事委员会任命夏威、吴奇伟为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缪培南为第九集团军代总司令。

△　朱怀冰部在河北罗川地区袭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营，该营230余人死伤过半，被俘100人，损失枪190余支。2月3日，朱德致电朱怀冰，要求立即释放被俘人员，停止此倒退行为。

△　新四军一部袭击安徽当涂煤矿公司，歼灭日伪军100余人。

△　桂南日军第十八师团一部会同近卫旅团，在炮、空协力下向甘棠第七十六师右翼攻击，该师不支，被迫向北撤退。邕宾路两侧之日军亦同时向思陇第三十六军右翼及第九十九军正面攻击。

1月下旬　国共两党谈判继续进行。何应钦先提出边区划12县，两个专员区，军队三军六师，后又让步到边区16县，军队仍三军六师。中共中央提出增加六个补充旅后，遂又同意增加三个补充团，并建议划河南、河北给中共，以换取陕甘宁边区。最后，张冲再三表示，陕甘宁边区军队问题已尽了最大努力，至多只能争到边区18县，且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四县须与绥德等四县调换，军队实不能再加。

是月　国民政府制定《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要点为："尽量在保甲组织内发展本党组织"，"特殊地带保甲长（如陕北），必须由党员充任，并负责侦察异党活动，随时分报上级党政机关核办"。"中央统计局各地之情报网或特工人员应与当地保甲长中忠实同志设法取得联系"；"上级党政机关对于保甲长之思想行动应注意考察，如发现有错误者，应予纠正或惩办"。

△　三民主义青年团通令施行《本团工作纲领》，分为总则、组织、训练、宣传、社会服务、附则等六项。

△　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与江苏丹阳县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向苏北泰州、扬州地区挺进。

2月

2月**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鸿远为第十四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提出目前的十

大任务：扩大反汪宣传；猛力发展全国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政治民主；抵制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　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讨汪大会，向国民党提出10项要求：一、全国讨汪；二、加强团结；三、厉行宪政；四、制止摩擦；五、保护青年；六、援助前线；七、取缔特务机关；八、取缔贪官污吏；九、实行总理遗嘱；十、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出席并发表讲话。

△　晋西北第一次行政会议在兴县召开，会议宣布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推举续范亭为主任，并通过《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实施大纲》，凡六条：实行紧急政治动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彻底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抗日经济政策；扩大抗日民众运动；普及社会文化教育。3日会议结束。

△　新四军游击支队奉命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个总队和三个主力团。

△　经济部为开发航运，组设查勘金沙江试航队。

△　桂南甘棠方面日军以陆、空军联合向第三十八集团军所部发动攻击，一部突至第七十六师右翼石塘附近，与第四十九师遭遇。第七十六、四十九师仓促应战，激战两日，伤亡甚重。同时，宾阳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被炸，与各部联络中断，且后方缺乏控制部队，未能阻止日军。各部遂向大桥、黎塘、陶墟方面转进。

△　日本海军第九十战队第一中队出动飞机七架，对宾阳重要军事建筑物轮番轰炸，致五处起火。同日，日本第二十一独立飞行中队全体出动，对宾阳第四战区后方部队轰炸，炸毁桥梁一座。

△　日本海军第十五航空队出动飞机27架，对正在修复的滇越铁路大桥进行轰炸，炸毁火车一列，乘客死101人、伤121人。3日，法国政府驻日大使安利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20日，日方说明此为误炸，表示将给予抚恤。

△　日本第七十五届议会复会，米内首相发表演说，宣称日本处理“中国事变”之既定方针，是牢不可破的，对于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权，帝国政府不惜一切予以支持与援助”。有田外相重申外交方针，“以处理中国事件为中心，谋国际关系之调整，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目标下，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实现”。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汪与重庆关系调整施策》，提出向汪精卫透露日本诱和的消息，使汪方面有心理准备，并要求其为“实现和平”而献策或响应。

2月2日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及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等120家报社、通讯社通电讨汪。

△　东北抗日联军通电讨汪，决心“以赤诚拥护国策，在最高统帅领导之下，杀敌锄奸，愿效前驱，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

△　下午6时，桂南日军第十八师团经甘棠、武陵攻陷宾阳，并续向武鸣、上林进犯。昆仑关以西之第六、第九十九军遭日军攻击，伤亡较多。昆仑关、九塘之第二、第三十六军因宾阳失陷，后方断绝，被迫向都安、忻城方面作离心转移，进至宾阳县之中大村，第二军第九师与日军遭遇，师长郑作民指挥作战中中弹阵亡。沿邕宾路北窜之敌，进至清水河南岸，为新三十三师所阻。

△　下午，日军黑田部先头部队进至绥西折桂乡，以飞机、大炮掩护，以坦克为前导，分途向董其武第一〇一师一部攻击，董部官兵伤亡400余人，乘夜沿狼山向西转进。

△　乌镇、乌布浪口日军进至黑石虎、三女店地区，孙兰峰新三十一师一部予以侧击，日军仓促应战，伤亡甚重。入夜，敌避不应战，将汽车横列狼山南麓，步兵下车与孙部对峙。孙部另一部沿狼山迂回至黑石虎、三女店间敌之侧背，袭击汽车。战至次日晨3时，破坏汽车数十辆，毙伤敌百余名，旋撤入狼山，占领万和长侧地。

△　日本国会议员斋藤隆夫在议会质询首相米内，批评政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方针，旋受到各方之压力。陆军当局认为斋藤此举“侮辱圣战之目的”，政友会议员要求众议院惩戒委员会劝斋藤辞职。27日，日本青年同盟主席田泽义铺声援斋藤，并促政府对斋藤事件公开说明其政策。3月6日，众议院惩戒委员会通过开除斋藤议员案。7日，众议员多数通过，驱除斋藤出国会。

2月3日　　毛泽东、陈绍禹、林祖涵、吴玉章为华北视察团事，以参政员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略称：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员参政员参加，且连第四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素以志诚硕望、公正无私者张一麐、黄炎培、江恒源、张表方等先生，亦无一参加。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搜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揭露视察团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共产党、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材料，妄图将摩擦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共产党。

△　军事委员会任命商震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　张发奎以宾阳失守、后方补给线被截断，急令第九十九、三十六、二军及第六十六军等部向上林方面撤退；第六军向大览方面撤退。日军台湾旅团亦乘势向思陇并转向陆平方向前进，且占据宾阳之近卫旅团向上林突进。同日，北渡郁江之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克复甘棠，由青桐西进之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克复古辣，4日克复永淳。

△　日军陷五原。日军黑田部、罔直部等全部进入河套地区后，分兵三路向五原城围攻，一路侵占百川堡，一路进占五原城。4日陷临河、陕坝。5日陷盛公等地。傅作义副长官部及第三十五军军部移驻临河县东南亚马来，伺机反攻。

△　日机轰炸桂南迁江，被中国军队击落一架。同日，日机30余架袭击桂省雷平，中国军队击落轰炸机二架，俘虏驾驶员五名。

△　日本铃木卓尔与“宋子良”在香港会谈，铃木代表日本政府答复“宋子良”对日本对华政策所持疑问，指出：汪精卫处理同重庆政府的关系是内政问题，日本无意干涉，望中国政府妥善处理；日本绝对不赞同重庆政府打算利用第三国调节日中关系的意见，并要求重庆国民政府迅速派遣代表商谈停战和平问题。5日，“宋子良”离港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并商讨对策。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代表参加会谈。

2月4日　　桂林行营鉴于所部连日伤亡重大且昆仑关失守，不宜在宾阳平地与日军决战，决定待后续兵团到达，再相机转取攻势。同日，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王德全部于克复古辣后向黎塘前进。6日，日军一部向黎塘攻击，激战二日不克，退回大桥、宾阳。7日，日军与第一三五师苏祖馨部、第一七〇师黎行恕部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

△　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抵桂林，广西总工会等43个团体举行欢迎大会。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龙北指挥部指挥冯治纲率部在阿荣旗三岔河上游任家窝堡与日伪军激战中不幸牺牲。

△　安徽东流江面日舰六艘满载军火分批上驶，中国炮兵部队猛烈轰击，军火中弹爆发，四艘受创甚巨，敌兵死伤甚多。

△　旅古巴全体华侨举行讨汪大会，通电否认卖国伪组织，并呈请国民政府迅速缉捕奸逆，明正典刑。

2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　鲁苏战区将领于学忠、沈鸿烈、韩德勤等，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等，于是日及13日、17日分别通电讨汪。

△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　傅作义在亚马来副长官部召集高级将领会议，部署绥西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要旨：各部仍以机动游击战的战术打击消耗敌人，将其主力牵制至河套地区，以利其他战场作战，同时派出战斗小组，袭扰敌人。会后，傅作义将副长官部移至黄河以南什纳格尔庙。

△　第六十四军陈公侠部由桂南贵县方面向宾阳日军侧击，在贵宾路之五灵、黎塘间与敌激战三昼夜，将敌击溃。

△　第五战区所部出击豫南信阳东五里店日军据点，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余不支西溃，五里店收复。

△　福建金门岛抗日民众夜袭金门，攻入伪机关，击毙伪维持会长孟寿臣。

△　东北抗联一部在吉林宾县南对店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毙敌200余人，日机三架助战，被击落一架。

△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函告石友三，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已奉命入冀”，“今后之工作应为限共与抗日并重”，“对八路军可酌以武力

制止”。

△　第二战区新编第二师金宪章部越过正太路，向八路军晋中地区进犯，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新一团独立支队在榆庄以北歼灭大半。金宪章率残部北逃。

△　日机12架空袭陕北府谷县，投弹40余枚。

2月6日　　八路军总部为统一太南、豫北的作战指挥，决定将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队三纵队和民军第四团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16日，主力进至冀鲁豫地区。5月，由黄克诚率领南下苏北地区支援新四军。

△　晋南伪军一部1700余人携大炮八门、机枪40余挺、步枪1000余支反正。

2月7日　　蒋介石倡导春祀劳军运动，是日派员携巨款交春祀劳军筹委会，用以嘉勉抗日将士。

△　原新加坡华侨筹赈会总会委员兼该会福建募捐主任侯西反抵重庆。

△　《中国工人》月刊在延安创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

△　八路军一部分途进攻河北遵化、丰润伪军据点，毙俘伪军150余人。

△　河南兰封伪军刘景林率部500余人反正，并毙日军军官、顾问多人，焚敌营舍、仓库数处。刘景林在战斗中阵亡。

△　日军袭击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驻地江苏常熟阳澄湖畔洋沟

楼，该部奋起反击，毙日军警备队长斋藤以下20余人。

△ 日本议会预算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废除《九国公约》问题，首相米内和外相有田出席。会议认为：《九国公约》是英、美为牵制日本大陆政策所想出的策略，是实现日本“新秩序”的重大障碍，在树立“汪政权”后，这对于解决“中国事变”会引起极大困难。陆军大臣畑俊六表示：处理《九国公约》问题，陆军将遵从内阁的方针。

2月8日 国民党中央以去年底日军犯粤北，前方将士予敌重创，通告褒奖各参战有功部队。

△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腾蛟为第八十一军军长。

△ 军令部致函军政部，建议“再充实中央军在陕甘之兵力”，并“加强对宁、青四马部队的精神教育及一般训练”。21日，军政部复函称：对于西北方面的军事力量，“今后将在经费、武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充实，以固边防”。

△ 中国青年党通电讨汪，表示拥护抗战国策，不变初衷，并声明将来汪党果有盗用本党名义之处，“此仅汪逆个人作伪企图之扩大，对于本党向来一贯之立场，决不足以动撼分毫”。

△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定《各地党部指导民运小组实施办法》，规定各地党部民运小组直接与中央社会部通讯，加强对民运之指导。

△ 桂南宾阳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向武鸣突进，武鸣失陷，守军被迫向武鸣西北山地撤退。

△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以2000万美元贷予中国政府，并表示今后将在财政上继续援华。

2月9日 国民政府明令缉捕汉奸鲍文樾、叶蓬，并褫夺前授鲍

文樾之陆军中将、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职务及叶蓬之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等。

△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制定华北战区慰劳视察团组织规则，规定该团之任务，“为宣达中央意旨，慰问军民，并视察各战区军民实际状况及其他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物价等事项”。慰劳及视察的区域，暂定冀、豫、晋、陕四省。时间定为三个月。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关于共党外围组织之接收训练领导案》，要点为：“从统一全国民众组织入手，按照民众之职业、身份组织各种抗敌后援会”，加强“各地动员委员会之领导力量”。

△　教育部通令各院校为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应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广搜中国通史、断代史、专史材料，充实教学内容；与海外友邦有联系的学校应密切合作，整理中国材料，研究中国问题，翻译中国典籍。

△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全国摩擦问题，指出目前国共问题的中心已不是九师23县问题，而是全国摩擦问题。要求国民党：一、下令全国停止摩擦；二、停止向山东、河北两省增兵；三、讨伐通敌的石友三；四、令阎锡山制止旧军进攻新军，恢复八路军之兵站；五、撤退马禄侵入鄜县南之部队；六、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彭德怀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七、撤销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之检查站，取消西安之劳动营；八、撤销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之书报禁令。

△　桂南各路日军开始南撤。黎塘、邹墟、上林各处日军近卫旅团及第十八师团向宾阳撤退，10日在宾阳会合，沿邕宾路南撤，除以一部留置四塘附近外，主力于13日退抵南宁；陆干、马头之日军台湾混成旅团向黄墟撤退，经林墟于11日退抵高峰隘附近；武鸣之日军第五师团经双桥退抵高峰隘，与黄墟撤退之日军会合，除以一部固守高

峰隘外，主力于11日向南宁撤退。

△　日本大本营下令解除第二十一军战斗序列，组成华南方面军及第二十二军战斗序列，编入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华南方面军司令官为安藤利吉中将，第二十二军司令官为久纳诚一中将。

△　冀南八路军反击石友三军的战役开始。11日，八路军冀南、冀中部队在清河以西歼灭石部两个团，将其全部包围在下堡寺、窑安堡地区。

2月10日　重庆各界举行春祀劳军大会，到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暨各界代表2000余人，社会部长谷正纲主持。送礼者数额逾100万元。

△　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八路军、新四军要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及山西新军一部在兴县魏家滩全歼进攻之阎锡山部游击第三师。

△　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在河北武安、磁县袭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第一队及青年工作团。12日，刘伯承致电朱怀冰，痛斥其制造摩擦、造谣生非的行径。

△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访问褚民谊，询问伪府成立后国内外各方面之趋势。褚答称："中央政府成立还都后乃继承国民党之法统"，"至于现在之重庆政府，已沦为一地方政权"。"新中央政府对于日本以外之第三国家极愿调整其关系"，"对于日本则采取共同步骤，以期建立新东亚"。

2月11日　第三战区一部攻克安徽合肥，毙伤日伪军800余人，并击落日机一架。淮南伪军王古林率部1000余人反正。

△　守备桂南清水河之新编第三十三师张世希部乘日军南撤之际，沿邕宾路跟踪南进，是日进抵思陇，14日抵昆仑关，17日抵五塘。18日，武鸣北之第一纵队第一三五师亦沿邕武路南进，进抵高峰隘东西高地。在大览之第六军向陆干、林墟前进，17日进抵林墟。

△　第八战区傅作义部攻克绥西临河。

△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对沈鸿烈、于学忠部应采取不同方针，指出："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般摩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之下坚决消灭之"；于学忠部与沈部则不同，他们"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

2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发布《国民大会与宪政的指示》，指出国民大会的任务为"制定宪法，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并根据建国大纲及训政时期之施政成绩起草宪法大纲"；并规定：研究宪政的团体只能由各省、市党部发起组织；宪政集会、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等由省、市党部和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召集；凡反对宪政及违反三民主义而曲解宪政之言论，均在取缔之列；国民大会职权在于制宪，不能行宪，"五五宪草仍然有效"。

△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总理纪念周作《中央干部目前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的讲演，认为抗战建国大业能否成功，全视中央机关能否建成现代国家机构而定。

△　广东省主席李汉魂报告出巡粤北翁源四县经过，略称：粤北战事日军屠杀民众1300余人，焚民房1.1万余所，财物被洗劫，每县损失达800万元。

△　青海省西宁市各界民众3000余人举行讨汪锄奸大会，决议电请中央讨伐汪精卫，表示青海民众誓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

△　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在上海邀请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头目诸青来、陆鼎揆、张英华、赵毓松等及赵正平、岑德广、杨毓珣等举行会议，报告青岛会谈经过及其商定的政纲、法统、组织条例等项，并宣布伪中央政治会议筹备完竣，将定期召开。国家社会党及中国青年党表示将发表宣言，响应汪精卫之“和平运动”，并派代表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

2月13日　蒋介石召集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研究国民党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及国共军事问题的方案，决定同意给陕北行政区14县，至多16县，或者以察、绥二省及晋省之三分之一来交换陕北行政区；至于军队，只同意第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并加若干补充团，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担任归德、绥远之防务。

△　军事委员会任命韩全朴为第七十二军军长，陈良基为副军长。

△　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黄在中央电台播讲《新县制之实施》，提出实施新县制的工作要点为编查户口、规定地价、开荒垦地、整理财政、健全机构、训练民众、开辟交通、厉行新生活等。

△　重庆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团长蒋作宾、副团长洪兰友及团员李文范、刘纪文等携慰劳金30万元、锦旗70面飞抵桂林，转赴韶关、衡阳、耒阳前线劳军。24日，返抵重庆。

△　第四战区各部收复桂南宾阳、武鸣、武陵、上林。至24日，又收复五塘以北之六塘、七塘、八塘、九塘等处，日军退守高峰坳及邕宁城。

△　八路军冀西游击队一部在内丘县西丘村阻击由临城出犯之日伪军，毙伤180余人。

△　退至南宁之日军第十八师团继续沿邕钦路南撤，于16日至21

日先后分由钦县及龙门港乘舰返粤。

2月14日　蒋介石发布关于桂南方面作战要旨：以消耗敌兵力并确保西南新国际线路安全为目的，以有力部队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并切断邕钦交通，主力分别控制于后方整顿，迅速恢复战力，相机收复南宁。

△　桂南甘棠方面第四十六军何宣部向香那、旧州、灵山前进，18日其独立第一、二、三团及新十九师分别到达上述各地。左河北之第三十一军韦云淞部亦于是日前进，17日抵大塘附近。

△　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制定《修建建国神庙和宫廷府的勤劳奉仕运动要纲》。根据该《要纲》设置“建国神庙及宫廷府御造勤劳奉仕联络协议会”，并编成协和勤劳奉仕队，队员总共约15万人，从4月15日至10月末为奉仕的时间。

△　汪精卫召集幕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大厅开会，声称“对前途不必因无军队而消极”。同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宴请汪精卫。汪精卫致答谢词称：“中国为日本，日本为中国，实为和平运动之根本精神。中日两国互相依赖，和平运动方可胜利。”

△　今井武夫抵香港，与铃木卓尔会见“宋子良”及张治平。“宋子良”宣称：参加会谈的中国代表将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具有和日本代表同等的身份和地位；宋美龄已到达香港，对此次会见抱有很大希望，并将从侧面予以援助。会谈中双方达成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议的协议。17日，今井回南京，20日铃木也回南京，分别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会谈经过，指出：日中双方代表均希望就和平问题进行商谈，宋美龄来香港从侧面发表谈话支持商谈。最后商定，本月内在香港探明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尔后结合对汪精卫工作再决定当前的工作方针。

△　美国商务部发表去年对中国、日本贸易统计，中国对美国贸

易出超约600万美元，日本对美国贸易入超在700万美元以上；中国输美货物6170万美元，美国对华出口贸易5580.9196万美元，日本输美货物总值16119.6万美元，美国对日出口贸易23140.5万美元。

2月15日　　国民政府以前广西都督陆荣廷护国战争时“声誉甚著，讨袁之役，率先响应义师，尤彰勋绩”，是日特予明令褒扬。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以前任陕西第二区（绥德）专员何绍南制造摩擦、贪污枉法之事，致电林森、蒋介石、程潜等，略谓：何“任职两年余，抗战国策未见奉行，摩擦事件积案盈尺，贪污枉法，怨声载道”，请将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加以审判。

△　第六十四军陈公侠部克复广西思陇。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闽南东山岛。

△　绥西日军陆续撤退，傅作义部乘机派出一部主力部队袭击陕坝之敌，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残敌逃回五原。临河日军闻讯，弃城逃向五原集中。

2月16日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入湖北钟祥、岳口。

2月17日　经济部长翁文灏在迁川工厂春节同乐会上演说，称迁川工厂资本约值二亿元，对内地工业已树坚固基础，勖勉各厂应帮助政府共同发展新兴事业，政府当从各方面予以便利。

△　日军千余乘舰数艘，驶抵福建海澄县属江面，在白塘、清洋两处强行登陆。

△　日机再次轰炸滇越路。19日，法驻日大使再度抗议。

△　日本在华北最大的通讯机关中华通讯社在北平成立，替代原

同盟社华北总局华文部。

△ 日本兴亚院总务长官柳川在参议院答辩处理“中国事变”之质询时称：日本政府“虽然已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然若“重庆政府能与中央政府采取同样方针，则自然两者将会合流”；并称：只有等重庆政府提议媾和，或自行解体归于汪政权之下，或汪蒋合流之后，日本无须留驻部队于战线之必要时，即是“中国事变”之终结。

△ 日本拓相小矶在众议院报告称：日本政府为了确保资源之开发及市场之开拓，极注意南方各地，“拟以台湾、南洋为根据地，和平地向南方进行经济活动，其南进之目标为华南、暹罗及荷属东印度”，并称：“拓务省拟促台湾总督协同陆、海、外三省进行海南岛的工作。”

2月18日 蒋介石为纪念新生活运动六周年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对新生活运动的基准礼、义、廉、耻的意义作了新的解释：“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切切实实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提出新生活运动第七年的五项工作：一、厉行精神动员，策进战时生活；二、协助兵役建设，尊敬受伤战士；三、协助肃清烟毒，增进国民健康；四、促进国民经济，增加战时生产；五、唤起妇女同胞，推进妇女运动。

△ 全国县政学会成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戴传贤、孔祥熙、陈立夫等为名誉副会长，孙慕迦等17人为理事，旨在“研究新县制”。

△ 蒋介石致函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徐堪、副秘书长徐柏元，命令银行发放农贷必须与地方政府及各级党部合作；关于党方的联系，可约陈果夫、朱家骅、谷正纲、康泽等参加。

△ 湖南省各界举行讨汪锄奸大会，通过提议：一、开除周佛海省籍；二、建议政府通令各省、市、县在抗战阵亡将士祠墓前铸汪精卫夫妇长跪像。

△　石友三部在八路军反击下逃至漳河南之清丰、濮阳地区，冀南反击石部战役结束。是役八路军毙、伤、俘石部2800余人。

2月19日　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六期毕业典礼上作《建国之非常精神与基本要务》的讲演，要求学员养成法治精神，绝对遵行上级命令；实行业务竞赛，充分发挥人、时、地、财、物的效用；注重实际的基本工作等。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梦笔为第二十六军副军长。

△　白崇禧向桂林各界发表演说，称坚持持久战，胜利之时机有三：一为自力更生，坚韧奋斗；二为消耗敌人之物力、财力，促其崩溃；三为静候国际间更有利之形势，以世界力量共同解决倭寇。

△　萧劲光致电程潜，要求撤离陕西省府派驻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指出：国共合作三年以来，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之内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专以制造摩擦，扰我后方为能事。故请将所有陕省府驻边区之县长立即完全撤离，否则即实行护送出境。

△　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

△　闽南海澄伪军特务团长陈竞锐、警卫团长胡赖圃率所部1800余人，携步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20挺及全部辎重反正。

△　福建厦门伪军团长陈先锐率部2000余人反正，并与日军一部在太武山、港尾激战。

2月20日　蒋介石密示国民党中央：关于中共纠纷案件着由中央党部、军委会及政治部各派一员专门负责处理，政治方面之宣传由政治部负责执行。

△　行政院会议通过设置专科以上学校“中正奖学金”，计名额400名，每年奖金各400元，由教育部统一执行。

△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并发表宣言，指出：“（一）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帝国主义。（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三）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四）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的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大会提出对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的修正案和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的修正案。毛泽东出席并讲话，指出：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大会推选毛泽东、王明、王稼祥、林伯渠、康生、吴玉章、李富春、谢觉哉、艾思奇等47人为理事。吴玉章任理事长。

△　鲁南解放区军民召开讨汪大会，徐向前等出席并讲话，号召军民一致锄奸除逆。

△　周佛海得悉日方进行“桐工作”的消息后，即向汪派人士表示：东京与重庆直接谈判的关键，“不在东京，而在重庆。东京有和之意，而重庆反以东京欲和为日军将崩溃，其气焰更甚，此和平之不可期也”。

△　伪满洲国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将校案》，以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同日，又宣布《兵役法》改称《国兵法》，8月开始征兵。

2月21日　　蒋介石以寒假届满，学期更始，特通电全国各大、中、小学校长，申述去年教育会议演讲之旨趣，劝勉各级学校校长、教职员切实“负责指导学生思想品性，增进学生体格精神，俾造成有志气有作为之青年，为国家开拓新命运”。

△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卓英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处长彭革陈报告全国新闻事业状况：抗战前全国报纸有873家，通讯社375家。抗战以来，全国有报纸410余家，通讯社29家。分别统计，浙江最多，有43家，湖南次之，有42家，四川又次之，有35家。全国广播电台较战前增加，计有30余家。

△　日本中央部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名义指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展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内容为：一、日中双方的会谈由中国派遣军指导进行；二、会谈要在建立汪精卫的新中央政权后进行，特别注意照既定方针，不能动摇建立新中央政权的根本工作；三、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微妙，应绝对避免急于举行全面谈判或盼望谈判成功的态度，从而不丧失随时停止交涉的思想准备。“桐工作”的条件为：一、重庆政府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二、重庆政府和汪精卫进行适当合作，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或是与中央政府合流；三、重庆政府保证按照新中央政府和日本商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原则正式调整日华邦交。同日，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向天皇上奏“桐工作”。

2月22日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计到中央及西藏官员500余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照料坐床。拉萨市内举行赛马跳神表演，以示祝贺。同日，重庆各界在长安寺举行庆祝大会，市区悬旗结彩，遥示庆贺。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农林水利部改为农林部，直隶行政院。

△　蒋介石密令程潜、卫立煌驱逐太行山区之八路军，略称：“陵川至树掌间驻有中共军六个团，若不驱逐，则我必陷于窘境，令庞炳勋、李家钰两军速将陵川占领，并将该地共军驱逐。……亦可先抽调两个团至林县以西堵截。”28日，卫立煌复电蒋介石，要求“速拨有力部队增援晋东南，俾易达成任务”。

△　山东各界宪政促进会在鲁南成立，徐向前、朱瑞、黎玉、方

养斋等60人为执行委员，推方养斋为会长。

2月23日　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诚、商震、薛岳、余汉谋、李汉魂等参加。会议检讨桂南会战之得失，并决定今后之战术与对策。蒋介石训示各部：一、对于敌军精神应有深切反省与警惕。二、认识敌军战术之优、劣点（敌军之优点为快、硬、锐、密；劣点为小、短、浅、虚）。三、我之克敌制胜战术与对策——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伏兵”破敌之“锐利”；以“严明”对敌之“秘密”。四、各高级司令官应决心负责，牺牲一切，培养部属独断专行、自动作战的精神与能力。五、各将领要遇事细心，注意研究，精诚团结，互助合作。六、现阶段之作战要旨：全力争取主动，积极进攻。

△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在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附近遭日伪军包围，交战中不幸阵亡。

△　八路军吕正操部在冀中地区歼灭日伪军150余人。

△　民生公司“民望”轮在四川宜宾下游30里处国公山江面倾覆，乘客200余人，遇救者仅95人。

△　日军1.2万余人对晋西北岢岚、临县、方山、兴县地区进行春季大“扫荡”。至4月1日，被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及山西抗日新军粉碎。

2月24日　国民政府派王宠惠为互换《中苏通商条约》全权代表。

△　李宗仁密电蒋介石，告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与我军争取洪泽湖地区，近又由邳县增调一部”，“我军已派一三八旅前往剿办”。同日，李宗仁再电蒋介石，请求派队“协剿”。

△　行政院公布《游击区域及接近战区地方各机关收支处理暂行办法》，凡七条。

△　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同日，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亦成立，贺龙为主任。

△　上海永安第三纱厂3000余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加米贴和反对开除九名工人。资方勾结捕房，调遣马队鞭打、驱逐工人出厂，致工人多人受伤。3月1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声援工人斗争。3月5日，资方以改组为名，解散全体工人，招收新工。工人斗争失败。

△　缅甸华侨在仰光举行献车典礼，捐运输汽车60辆，支援国内抗日。

△　桂南日军2000余附炮10余门、坦克12辆，在飞机掩护下向五塘地区进犯，白崇禧部迎击，激战竟日，将敌击溃，获战车二辆，野炮二门。

2月25日　柳州军事会议发表桂南会战奖惩名单：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降级；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降级；第二十七集团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法会审；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第六十六军军长陈骥、第九十九军军长傅仲芳、第三十六军参谋长郭肃、第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第三〇三师师长宋士台撤职查办；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已阵亡免究，该师番号取消，改称无名师；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是日会议结束。

△　是日至28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萧劲光携毛泽东亲笔信赴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进行谈判。26日，王、萧向阎提出六条和平建议：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停止政治攻击；三、新军表示拥护阎锡山，但不受其改编；四、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五、经济统一，实行阎提出的十大纲领；六、阎锡山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系及派员来往。阎锡山自称他是国共两党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

于团结抗战有利的，表示今后当注意进步团结，并答应恢复中共在晋西的兵站，但不同意沿线驻兵。4月24日，双方商定如下协议：一、在晋西以汾阳至离石公路为界，公路以南的地区停止游击战争；二、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和新军不向路南发展；三、停止政治攻击，不骂旧军领袖，号召在阎锡山领导下坚持第二战区的抗战；四、新军、牺盟会派员到秋林会见阎锡山，恢复往来关系。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复晋西北岚县。

△　国民党抗战建国英雄墓及汪精卫夫妇长跪铁像建墓铸逆委员会筹备会成立，冯玉祥为主任委员，张继为副主任委员。

△　井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日本军警将矿井口堵死，致井下1200名矿工遇害。

2月26日　傅作义在绥西亚马来召集军事会议，会商反攻五原之作战方案。傅作义痛感“绥西战役我军伤亡甚大，丢失了五原全境”，决心誓与河套地区共存亡，剩下一兵一卒，也要与日军周旋到底。决定利用“春分”前黄河解冻时机，攻克五原，收复失地。

△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克复广东澄海，27日克复新会。

△　朱德、彭德怀等致电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指出天津以南形势严重，该区应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以营为单位注意培养地方性的小游击队。基本是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　新四军一部在苏南金坛击溃出犯日军一部，毙敌5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次日，又袭延陵，毙敌20余人。29日，再攻孝河，毙敌50余人。

△　经济部采金局设立江西省金矿勘探队，办理江西省南康、赣县、会昌、瑞金等县金矿勘探开采事宜。

△　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喜多诚一返国，是日向陆相畑俊六报告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和平工作的情况，称司徒雷登已赴重庆，蒋介石提出缔结和平原则八项：一、首先日本要以蒋介石为对手；二、以近卫三原则作为和平的基本条件；三、华北、蒙疆的防共有必要（但不意味驻兵）；四、调整经济合作范围；五、可搞文化提携，努力改革教科书；六、原则上日本须撤兵，但在华北、蒙疆暂留亦可；七、为经济提携，希望成立委员会；八、必须和欧美维持友好关系。此外，满洲问题在和平后处理。

2月27日　何应钦在行政院报告国共谈判中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要求及国民党中央的原则：一、服从中央命令；二、人事经理饷项，照中央章则；三、饷项不得移充宣传之用；四、一切杂色队伍包括编制之内。

△　行政院会议决议通过《高中以上学生参加抗战奖励办法》及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改为官商合办案等。

△　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声明不承认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汪伪政府。

2月28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第三四四旅全歼来犯之阎锡山部独八旅第十三团，俘团长陈树华以下200余人。

△　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披露梁鸿志等1938年、1939年与日本政府签订的各种密约八件，其内容要点为：由日本华中矿产股份公司统制开发中国锡、铁、铜、铅、钠等矿产资源，设立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统制开发中国铁矿；设立华中铁路股份公司，经营统制华中铁道、汽车交通；设立中华航空股份公司，统制全国航空事业；设立华中电气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从速合并、收买中国新设电气事业；设立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由日本方面独占并统制华中之电力和自来水事业；特设上海恒产股份有限公司，将上海之土地、房屋及其他各种

附带事业交由该公司经营。以上设立之机构，以华中振兴公司为核心，由该公司投资各种企业，日本对该公司有指导与监督权。

△　王克敏、梁鸿志抵上海，与汪精卫会商建立伪政府之意见。汪以伪中央政治会议名额30人，不敷支配，将另组织“和平救国大同盟”，包罗伪新民会、大民会等组织，由汪精卫任盟长，聘日本人为顾问。王、梁表示不赞同。

△　日本议会预算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树立“汪政权”问题。陆相畑俊六发言称：陆军将尽力援助“汪政权”并继续与中国政府军队作战；重申中日战争的目的是彻底消灭中国的抗战军队，因此，“汪政权”的树立不过是处理中日战争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2月29日　　国民党中央通告各级党部，永远开除樊仲云、陈中孚、梅哲之、汤良礼、罗君强、金雄白、傅式说、朱朴、陈春圃、顾忠琛、汪曼云、章正范、叶蓬、黄大伟、蔡洪田、张载伯、林知渊、刘云、黄香谷、周裴成、张子孝、张一尘、张克昌、黄敬斋、汤澄波、张德钦、卢英27名汉奸之党籍。

△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各省市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

△　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昆明报告云南将从越南购进大量米粮济饥，并称云南米价高涨的原因，一是“产量减少”，二是“外汇高涨”。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收复晋西北方山县，歼灭日军300余人。

△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司机、售票员1800余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英租界公共汽车全部停驶。午后，义防兵在公司门前用刺刀驱逐工人，并投掷催泪弹，致工人多名受伤。

△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结束对华北、华中商务视察，是日抵达重庆。按：此时美、英、法、苏四国大使均在重庆，是为抗战以来四大

使同时集会重庆的第一次。

2月下旬　　朱德在八路军总部会见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指出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从日寇手中夺回来的地方，你们要占领，人民不会同意。你们要地盘，去把日寇占领的地方夺回来。如果你朱怀冰不明大义，胆敢进攻，我们一定坚决自卫。

是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　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制定向国民党进行政治、军事进攻的计划，要点为：与汪伪政权合作“分化重庆军政要员”，鼓动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发生摩擦”；“以金钱收买华军倒戈”，“以军事力量防止国际外交人员与国民党中央接近”，“以威胁方法阻止各国以军火援华，并实施对重庆经济封锁”。

3月

3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九年军需公债条例》，定额国币12亿元，年息六厘，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开始还本，自公布之日施行。同日，公布《民国二十九年建设金公债条例》，定额英金1000万镑，美金5000万元，年息五厘，民国三十一年开始还本，自公布之日施行。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九年江苏省整理地方财政公债条例》，定额国币1000万元，年息6厘，民国三十一年12月31日还清，自公布之日施行。

△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第一期开学典礼，并作《现代公务人员之要件》的讲演，提出有实际的知识和技能；有正

确的人生目标和热诚的责任心；有健全的体格和振奋的精神乃为现代公务人员的三大要件。

△　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泸县成立泸县酒精厂，由陆宝愈主持，有员工313人。抗战胜利后结束。

△　第四战区下达桂南灵山战役作战命令：以主力使用于邕钦路以东地区，有力一部使用于邕钦路以西地区，邕钦路以东部队编为东路兵团，辖第十六集团军之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六集团军之独立第一、二、三团，第三十五集团军之第六十四军，统归吴奇伟指挥。以第四十六军主力推进于小董东北地区，第六十四军控制于灵山西北地区。

△　第九战区薛岳部在江西奉新北花庙前袭击日军，毁敌汽车五辆，毙敌少将佐藤金治等10余人，毙伤士兵100余人。薛部少尉排长温维新在战斗中阵亡。

△　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出巡桂南前线事毕返桂林，对记者称：敌扰宾阳，民房民食被焚掠一空，食宿无着，为状至惨。省府已定积极救济灾民，帮助恢复战区生产。4日，省府决定办理贷款及建造棚屋。

△　晋东南解放区各界民众举行反汪大会，朱德致开会词，指出：我们反对汪精卫，反对一切实际走上汪精卫道路，还在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反对分裂倒退，反对妥协投降。

△　山东八路军将领徐向前、罗荣桓等通电讨汪，表示愿作前驱，“置国家于抗战团结之坦途，拯民族于独立自由解放之大道”。

△　四川青、红帮等秘密帮会合组为国民自强社，是日在重庆成立，石孝先任主任干事。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签发日本方面参加香港会谈

代表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臼井茂树的身份证明。3日，国民政府秘密确定参加会谈的人员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及自称“宋子良”的特工人员。预备人员为侍从次长、香港特使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

△　日本藏相樱内幸雄在议会答辩关于解决增加侵华军费之质询时称：日本将来通过与汪精卫新政权的经济合作，可得到莫大的经济利益，不仅可以解决增加的战争费用，而且还会有余。

3月2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重庆召开政工会议，历时三日，决议健全各军政治部，取消师政治部。

△　蒋介石电复卫立煌，“围击陵川一带八路军事宜仍照原计划实施”，至请增加晋东南兵力一事，“暂从缓议”。

△　新四军一部夜袭湖北天门，歼灭日伪军200余人，俘200余人。

△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一部袭击吉林省临江珍珠门、太阳岔一带的伪警防队和森林警察队。5日，又在临江三岔子东南袭击伪军三团和伪森林警察队。6日，其主力部队100余人在濛江县湾沟痛击敌长岛工作班，毙伤敌人11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9支，匣枪三支，粮食400斤。

3月3日　日军陷苏北淮阴、宿迁、涟水、泗阳。

△　伪大民会发表《更新宣言》，略称：与日本“促进善邻提携，确立互助互惠关系”，“协助建立东亚新秩序，建立世界和平”。并拥护响应汪精卫之“和平运动”，支持“新中央政府”的成立。

3月4日　　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蒋介石到会发表训词，要者为：总结各战区冬季攻势的战术原则，目前亟应研究的对策：一、对于敌人坚守据点及交通线之对策；二、对于少数敌

人防守广大地区之对策；三、对于敌军凑集小部队临时编成增援队之对策；四、对于敌人威胁我军侧背之对策；五、克复据点防敌反攻之对策；六、敌军坚守不出时诱敌就歼之对策；七、打击敌人混成营兵力之对策；八、对敌集中运输之对策。11日闭会。

△　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人事行政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关于实行“行政三联制”的讲话。10日闭会。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九年福建省生产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2000万元，年息五厘，满20年还清，自公布之日施行。

△　蒋介石电令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对于县行政，应特别注重清查户口，清丈土地，并令各县与乡、保互相比赛，以明功过优劣”。

△　中苏文化协会改选，孙科继任会长，邵力子、陈立夫任副会长，梁寒操、张冲、戈宝权、米克拉舍夫斯基、米海耶夫、巴库林、郭沫若、侯外庐等39人为理事。

△　朱德为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诬蔑，向华北同胞陈述八路军战绩及一贯主张：一、本军在华北抗战已历三年，作战5000次以上，收复失地数十县，消灭敌寇20余万，缴获之多，冠于全国，事实昭彰，人人共知。二、本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发起者与坚持者，必抗战到底，驱逐日寇出中国。本军内部实行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经济公开，士兵开会自由，官兵人人受教育，上下级亲爱团结。本军实行军民一致，不拉兵，不拉伕，不拉牲口，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民众春耕秋收，保护抗日政权及抗日民众团体。三、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抗战到底，公开揭发一切汉奸。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冀南地区第二次反击石友三部的战役开始，历时七日。石军被击退至河南民权以东、陇海铁路两侧地区。是役共毙、伤、俘石军3600余人。

△　日陆相畑俊六在东京演说称：“开放长江系出于日方之自愿，并不负任何义务，此事由驻华日军当局处理。”

3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凡16条，规定该会隶属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及中央指导大员之指导。设委员19人至24人，人选由国民政府派充，并于委员中指定委员长一人，常务委员三人。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享年74岁。

△　国民政府以樊仲云、陈中孚、梅哲之、汤良礼、罗君强、金雄白、傅式说、朱朴、陈春圃、顾忠琛、汪曼云、章正范、黄大伟、蔡洪田、张载伯、刘云、黄香谷、周斐成、张子孝、张一尘、张克昌、黄敬斋、汤澄波、张德钦、卢英25人，“均属附逆有据”，是日发出通缉令，着“全国军政机关一体严缉务获，归案惩办”。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晋西事变后我之基本政策的指示》，指出：阎锡山在与我方谈判中，表示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因此，我们应“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

△　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规定新四军在苏南的第一、二支队统归第一支队司令陈毅指挥。并规定苏南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在高资、码庙、东昌街、行香街、上马场之线以西，溧（水）武（进）公路及码西湖以北，长江以南地区；陈毅部之司令部位置在瓦屋山以北、南镇街以南的山岳地带，非有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的命令不得越过指定地境。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反击朱怀冰部的磁、武、涉、林战役开

始，战至8日，歼灭朱部万余人，俘虏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的参谋长王斌、蓝衣社雷鸣远、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并控制了武涉公路以南，西平罗、临淇以北地区。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300余名工友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7日复工，并出版壁报，揭露国民党“腐化”、“专制”及在“陕西、河北各地开始剿共”之倒退行径。

△　鄂中京山地区日军1000余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驻地丁家冲、石板河进犯，该军第六团与敌激战竟日，将其击退。

△　日本华南方面军参谋长根木博访问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部建议：以南宁为根据地，进而攻打柳州，再以三个追击队构成向重庆追击的形势；同时，在华中进攻长沙，沿扬子江向重庆插入一支挺进队；在华北则进行西安作战。中国派遣军以“即便把现在的战线加以扩大，也很难用武力使重庆屈服”为由，未予采纳。

△　日本兴亚院会议决定，在汪精卫中央新政府建立时，日本派遣专使参加“还都”典礼，并派遣特派大使与新中央政府谈判缔结调整“国交”条约。

3月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电唁蔡元培家属，并派吴铁城代表致唁。同日，孙科、孔祥熙、戴传贤、王世杰、潘公展、朱家骅等分别电蔡元培家属表示哀悼。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由国民政府褒扬蔡元培，发治丧费一万元，未成年子女教育费二万元，生平事迹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由中央秘书处及中央宣传部主持筹备追悼会。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民主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

党的左派和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特别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保证党的领导权”。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克濮县、观城、仙庄、六塔集、卫城集、柳格集、东北庄、双庙集等石友三部据点，歼灭高树勋部、石友三部1000余人。

△　日军步、骑兵1000余，附炮数门，自广东新会经大小梅山向麻塘进犯，7日陷中山县。

3月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琼为第二军副军长。

△　蒋介石手拟对八路军的“训令”五条：一、不应认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与袭击友军；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五、不应擅发私钞。

△　司法院院长居正在重庆发表广播讲演，勖勉国民当前努力的目标：“第一，不要忘记总裁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第二，不要忘记厉行节约运动；第三，希望大家服行兵役，踊跃从军。”

△　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彭德怀，在山西反摩擦斗争取胜的形势下，应对卫立煌有所让步；在汾离公路以南则与阎锡山休战，维护阎的地位。

△　毛泽东电唁蔡元培家属，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9日，中共中央电唁蔡元培家属称：孑民先生“为革命奋斗40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及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并告以特派廖承志代表致唁。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晋东南壶关附近歼灭日伪军百余人。

△　日军2800余人进攻鲁南山区之白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特务团、第六八六团、苏鲁支队等部奋起反击，战至22日，歼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350余支，并收复费县以西广大地区。

△　日军1500余人进犯山东滕县。13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将敌击溃，歼灭500余人。

△　日海军陆战队一部由苏北射阳河进犯阜宁，是日阜宁失陷。

△　日、中双方代表今井武夫、铃木卓尔、臼井茂树和陈超霖、章友三及“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会谈，10日结束。会谈主要议题为：对日政策、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等问题。日方代表要求重庆政府放弃抗日政策。中方代表表示，实现和平后中国自然停止抗日活动，并称“满洲国”已成既定事实，事到如今中国并不反对，蒋介石对于承认“满洲国”并无异议，因此对“满洲国”采取沉默态度而事实上承认。关于日、中两国缔结共同防共协定，中方代表表示同意，并允许将内蒙作为共同防共的特殊地区。日方代表提出在华驻军防共，在满洲驻军加强对苏战备。对此，中方代表表示日军可相当长地推迟在重要地区撤军的时间。此外，双方还就经济合作、蒋汪合作问题进行商谈，中方代表完全赞同日方提出的合作内容，要求明确以日本为主、中国为辅的合作关系。以上会谈内容，由日方写成“备忘录”。中国方面由于尚需请示蒋介石，故未签字。

3月8日　　西藏热振呼图克图暨噶厦致电林森、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特派吴忠信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大典“感戴无暨”。“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祈祷中央胜利”。

△　国民政府任命马君武为国立广西大学校长。

△　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黄向中央社记者称：该会已成立法制、人事、警政、教育、土地、合作、农业、交通、卫生、慈善事业等15个专门委员会，人员121人，从事拟订新县制有关法规，研

究每一专门问题。

△　重庆各界妇女举行“三八节”大会，李德全主持。大会通过宣言、讨汪通电、慰问前方将士电等，并通过如下决议：要求国民政府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和社会上一律平等，确实保障妇女地位；请求国民政府普遍建立妇女组织；要求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工厂，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

△　第五战区游击部队潜入汉口租界“力”字第一码头附近，乘夜将守备日军10余人尽行歼灭，并火烧敌军需品。

△　汪伪中央公布日本国会对华政策12条，要点为：对于汪伪中央政府，“予以全面的支持”，“期待新中央政府成立，迅速具有统一国家之实力，日本将先作国际法上合法之承认”；“近卫声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中国人民应予充分彻底理解”；希望“重庆赞成和平运动，分解而加入新中央政府旗帜之下”。

△　伪新民会改组仪式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并发表《新民会纲领》，宣称：该会“为新中国建设之精神团体，与临时政府表里一体，同为国家机构的民众实践组织”。纲领要点为：一、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二、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立和平；三、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四、睦邻结盟，以建设东亚新秩序。3月30日，制定《民国二十九年度工作实施要纲》，内容一为确立新民会的指导理论，二为谋求各个组织的扩大与加强。8月17日，推举王揖唐为会长，安藤、缪斌为副会长。

△　美国进出口银行宣布，该行董事会已批准对中国政府贷款2000万美元。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报界发表谈话，称美国医药援华委员会已收得捐款55万美元，将悉数购买药品捐助中国。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对美援华表示衷心感谢。

3月9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请求八路军停止对朱怀冰部

的进攻，表示愿意同八路军谈判。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九师接受卫的请求，并作如下让步：唐天际部撤至陵川；临屯公路以南，长乐、高平公路以西之八路军撤至公路以东、以北；并请卫立煌保证八路军高、阳、垣、曲兵站一线来往人员之安全。14日，八路军总部同第一战区谈判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分界线，八路军撤至该线以南，第一战区部队由河南濮阳、南乐撤退至封丘以北地区。

△　日军1000余分九路进犯山东东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将敌击溃，歼灭300余人。

△　日军9000余人分十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扫荡”，八路军萧克部在民众配合下，展开反“扫荡”，激战三日，歼敌800余人，击落日机一架，击毁火车一列。

△　察南、北平郊区各据点日伪军9000余人，分十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扫荡”。平西军民展开反“扫荡”斗争，历时14天，毙、伤、俘日伪军900余人，敌于22日溃走。

△　日军1500余、飞机三架进犯晋西北静乐县。

△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奉调回国任军事参议官。17日回国，临行告别各师团长，称其最大之憾事为未能摧毁中国之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战死在中国。

△　日本首相米内在参议院发表谈话，申述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变”之方针，在于“建设新秩序，以保持东亚永久安定，更进而贡献于世界之和平”，并称：“以汪精卫为中心之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面之援助。”他要求日本国民应“依据既定方针，举国一致，遭遇任何困难，誓向事变解决一途迈进”。

3月10日　第六十四军邓龙光部、第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部对桂

南日军发动春季攻势。13日，敌第五师团及台湾混成旅团主力受邓、蔡两部攻击，分由郁江右岸及钦（县）灵（山）路反攻，图迂回包抄邓、蔡部。

△　鹿钟麟密电程潜，告朱怀冰部在晋东南“被共军夹击，四十、二十七军既令北开，按目前之形势，应饬庞（炳勋）军由陵川以南地区绕至林县，范（汉杰）军进至树掌。若悉由陵川绕树掌前进，则共军扼守，恐旷日持久，朱军将消耗尽净，豫北、冀南将沦于共手”。

△　蔡元培灵柩由香港道福寺暂厝于东华义庄殡舍，香港各界扶柩、执绋者5000余人。同年安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　“宋子良”与章友三、陈超霖根据7日中日双方会谈“备忘录”的条款，提出《和平意见对案》八条，要点为：“原则上同意”考虑承认“满洲国问题”；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聘请日本军事及经济专家为顾问；适当处理汪精卫问题；日本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军队从速全部撤退等。

△　板垣征四郎在南京发表《陆军纪念日感言》之广播讲话，声称全力支持汪精卫新中央政府的建立，并愿将日本占领之中国广大区域，交给“行将诞生之新中央政权统辖之下”。

3月上旬　　日军进犯广东中山县，肆意焚烧残杀，难民纷纷逃避，连日达二万人以上，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特电拨款五万元施行急赈。

3月**11**日　　毛泽东发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　蒋介石严令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孙良诚、丁树本等部不准退过黄河，受庞炳勋统一指挥，继续对八路军进攻。

△　卫立煌令第九军郭寄峤部、第十四军陈铁部、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第九十三军刘戡部集结晋东南高平、陵川地区；第四十一、第七十一军渡黄河北进；第四十军由陵川向豫北林县开进，联合进攻八路军。

△　日机九架袭击赣北浮梁，被第九战区薛岳部击落一架，坠贵池，飞行员三人毙命。

3月12日　国民党中央举行孙中山逝世十五周年及国民精神总动员一周年联合纪念会，勉励国人“贯彻精神总动员纲领，排除一切障碍，完成国家统一，走向民族复兴大道”。同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一年来各方面之成效与收获为中外所赞赏，指出精神总动员的功用在造成蓬勃奋发、精神向上的风气，一切工作要求“切实”，努力依照纲要三要点，做到“持久”、“彻底”与“坚忍”，提出今后精神总动员的方针为：具体实行纲领，加强经济斗争，提倡工作竞赛，充实国民月会。

△　香港华侨工商教育界140余团体通电讨汪，并盼国府再颁明令，悬重赏缉捕巨奸，用申法纪。

△　陕甘宁边区学生联合救国会致书国民参政会，要求给予青年以参政权，并以如下意见交国民参政会：一、明令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确定年满18岁以上的青年，均有同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各省、市、区及战地青年学生救国联合会每万人会员，选举代表一人，各大学选举代表一人，参加国民大会。

△　桂南灵山战役开始。第四十六军一部攻击大塘、小董间之日军，占领岽匡附近之高地及大路岭。同日，第一八八师占领十二垓，截断邕钦路。

△　新四军陈毅所部袭击江苏扬中一带日军，毙敌200余人。

△　新四军李先念部在湖北应山杨家岗、张扬店击溃伪军刘光部300余人。

△　汪精卫发表所谓《和平宣言》，声称“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在即，“中央政府”成立有期，今后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实现和平；切望“重庆方面抛弃成见，立即停战，共谋和平，俾和平方案之实现”。同日，米内响应汪精卫之宣言，表示全力支持与援助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并准备从速承认。

△　《苏芬停战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同日，驻苏大使杨杰发表谈话称：“苏芬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加强援助中国，日苏不可能接近。”

3月13日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国民教育会议，讨论推进国民教育问题。蒋介石出席并讲话，称“国民教育为一切之根本”，希望各省、市教育行政人员“以勇锐之精神，贯彻国民教育之计划”；“策动地方贤达士绅，一致协成此举”；“注重师资培养，实行就地督导”；“酌用竞赛方法，厉行实施考核”。会议16日闭会，通过议案27项。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会部及新生活运动总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赈济委员会等召开会议，商定加强行都力量办法三项：一、救济服务机关一元化。二、充实及集中服务队之组织，并统一其指挥。三、扩大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之组织及职权。

△　朱德、彭德怀致电卫立煌，表示愿将驻晋东南陵川、高平之八路军第三八五、第三四四旅主力一律撤至树掌以北地区。

△　山西新军、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等致电阎锡山，表示不咎既往，愿对山西新、旧军关系谋合理解决，停止冲突，继续团结抗战。

△　日军700余进袭晋西北静乐县西北之马坊镇。20日，静乐日军800余、飞机三架攻陷岚县。23日，岚县日军700余人陷普明镇，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与敌激战一夜，敌不支向静乐溃退，岚县收复。

△　陈公博由香港返上海会见汪精卫，汪称：“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陈称：“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之条件，但务必通知重庆，全国一致，然后乃和。”

△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发表声明，表示伪满洲国对汪伪政府之成立，予“不惜一切之援助”，并希望中、日、“满”“一致实现东亚永久之和平”。

3月14日　　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开会，议定实行新县制之要项三点：一、分期实行新县制，各县不得逾规定三年内期限；二、整理保甲；三、统一地方武力，实行警保联系。

△　林伯渠致电程潜，指出，陕甘宁边区“虽然取消了陕省政府所派12县县长，摩擦纠纷仍不能根本消除”，要求国民政府“明令承认边区政府，确定边区范围”。

△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彭德怀等，目前的反摩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同时指出目前山西、河北的反摩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

△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在江苏睢宁县北歼灭伪军王宣梁部一个支队。20日，在睢宁、宿迁边境歼灭伪和平救国军第三独立团一部，毙伪队长刘厚仁以下80余人，俘30余人。

△　成都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康泽命令二三百名特务化装为贫民闯入成都潘文华之重庆银行，抢劫米库，捣毁银行，后反诬共产党所为。晚，国民党特务在成都进行大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及车耀先、洪希宗等10余人先后被捕。15日，成

都各报登出“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的特大新闻，以此称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旋中共成都市委发表《为抢米事件告成都市民书》，揭露反共分子的阴谋。

△　上海邮电、水电、码头、印刷、棉纺等100余工会以汪精卫窃用工会名义，捏造响应“和平运动”，联名致函中央日报社予以否认，表示拥护抗战国策，声讨汪逆。

△　桂南钦州日军第二十八师团一部附骑、炮兵，由牛冈经平吉向第六十四军阵地进犯。南宁附近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由良庆沿蒲津路东窜南阳乡，是日陷永淳。

△　日军发言人在上海对记者称：南京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确有保障外人在华合法利益之能力，第三国之利益将不被干涉，其范围包括在华贸易权、投资权及发展文化事业权。

△　中国国家社会党特别委员会、中国青年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分别发表宣言，响应汪精卫之所谓《和平宣言》，表示将以全力支持汪精卫新中央政权成立。

△　英、美两国政府分别通知日本政府，表示两国决维护《九国公约》之规定，并不因中国汪伪政权的成立而改变对华之态度。

3月15日　中国复兴商业公司与美国世界贸易公司签订《中美售购华锡合同》，双方洽商中国应交华锡总额为四万吨（每吨3000磅），分七年分批交付。华锡装运地点为海防、仰光、香港或其他中国境内境外之海口或铁路终点，每磅售价美金一分。

△　国民政府特任陈济棠为农林部部长。

△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愿将驻晋东南高平、陵川境内之八路军除留小部分维护兵站外，一律撤至平顺线附近，豫北辉县、林县各部一律撤至漳河沿岸。1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命令以上

地区之部队撤退。

△　周佛海发表谈话，对重庆国民政府诱降，声称中央新政府的成立对全面和平不会有妨碍，假使重庆政府愿意与日本停战议和，准备以全力促成；中央政府成立后，对重庆政府“不仅没有丝毫敌对的心理，而且是抱着无限的期待”。

3月16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蔡元培，令称：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方期辅翊中枢，裁成后进，高年硕学，永为党国仪型”。发给治丧费5000元，并派许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蒋介石在陆军大学讲演《今日高级军官之急务》，指出指挥官与幕僚长作战的惟一要务“为激发全军官兵的敌忾心”；军事胜利的第一个要诀为“准备”二字；军事最后胜利之最大秘诀在“决心坚定，始终不撼”之中；今日幕僚长与指挥官的急务为监督命令之贯彻。

△　鲁中沂水、莒县、铜井等地日伪军500余人，窜至沂蒙山八路军驻地抢粮，行至沂水西南之孙祖，被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击退，毙伤敌120余人，八路军收复铜井。

△　桂南日军第二十八师团陷陆屋、旧州。永淳方面日军窜抵沙洋东南一带，与第六十四军一部展开激战。

△　日军2000余人开始对豫皖苏边萧（县）、宿（县）、永（城）、砀（山）地区进行分区“扫荡”。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展开反“扫荡”，连克李石林、王白楼、张大屯、黄口车站等日伪军据点。4月1日又发起山城集战斗，迫使敌人撤回原防，粉碎了日伪军“扫荡”。

3月17日　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发表谈话，认为英国需要中国友谊，“但若对于日本过于采取‘绥靖’政策，则此项友谊必受严重之打击”；并称：“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推行之计划，乃系针对英、法、美、苏、荷各国而发，与其对付中国毫无二致。”

△　桂南日军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攻陷灵山，守军第六十四军邓龙光部、第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部主力向灵山西北方向撤退。22日，邓、蔡两部反攻，克复灵山。

△　汪精卫、陈公博等抵南京。18日，汪精卫会见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报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及“中央政府”成立之筹备事宜。西尾表示全力支持，并声明拟交还日军管理的矿山和工厂。

△　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向西尾寿造发布《关于“桐工作”的指令》，要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全力展开停战交涉，条件为：日中两国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调整邦交的基本原则。中国方面应承认“满洲国”，“放弃容共抗日政策”；日中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在蒙疆及华北重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蒙疆为防共特殊地区；日中两国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实行经济合作。在华南沿海特定岛屿（包括海南岛）实行海军军事方面的密切合作。“中国从日本招聘军事、经济顾问”，并保证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居住和经商自由。《指令》还提出《关于处理“桐工作”和建立新中央政府工作关系的要领》，规定停战协定若在汪精卫政府建立之前签定，应促进其“对重庆的合作”，若在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后，“应尽最大努力使重庆加以承认”，“并促使蒋汪合作，努力在蒋汪合作的基础上开始正式和平谈判”。

3月18日　傅作义下达反攻五原的作战命令，令新三十一、三十二师及第一〇一师、新六旅、新五旅、新骑四师以及游击军等部在3月20日夜12时同时向五原新、旧两城及外围据点发动总攻击，各部须

于19日夜进入攻击准备位置。

△　行政院公布《田赋推收通则》，凡19条。

△　中国国家社会党在重庆发表宣言，斥责汪伪政府假借该党名义发表附逆谬论，申明该党“坚决抗日”，决不与汪伪“同流合污”，当与国人共起而诛之。

△　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在淮北成立，彭雪枫任校长，吴芝圃、张震任副校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　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日汪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一文，披露汪精卫等与日本订立关于树立新中央政府之步骤，“第一步以汪为中心，召集‘国民党代表大会’，第二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三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旗”。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修订《“桐工作”指导行事预定表》，决定3月27日、28日、30日、31日举行日本、重庆正式会谈；4月5日发表《和平宣言》；4月10日停战；4月11日、12日汪、蒋合作通电；4月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举行讲和会议。最后于4月20日树立中央政府。

△　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发表布告，声称愿将历来代管的各矿山及工厂，速行移让于临时政府；遇有必要时，拟依据中日经济合作之原则，分别妥为处理。同日，伪临时政府布告称：所有日军管理的各矿山、工厂的业主，应即克日前赴主管官署，提出归还原业之声明，一俟政府接收之后，即当分别次第发还。

3月19日　驻苏大使杨杰返抵重庆述职。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公侠为第六十四军军长，张弛为副军长。

△　日军一部向桂南佛子坪、丰塘之线发动攻击，第四战区东路

兵团（第十六、二十六、三十五集团军各一部）御敌受重创，至20日退至灵山东北之罗逢、乐民、苏村、石塘之线，与敌对峙。

△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天津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部署“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要求各兵团继续执行“高度分散部署”的办法，“讨伐肃正”。“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以第二〇七、一〇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十二军等部具体执行。

△　汪精卫公布《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中央政治会议组织要纲》及出席“中央政治会议”30人名单：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刘郁芬、叶蓬、李圣五、曾醒；伪临时政府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琛、殷同；伪维新政府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卓特巴札布、陈玉铭；国家社会党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赵毓松、张英华；无党无派人士赵正平、杨毓珣、岑德广、赵尊岳。列席二人：彭东原（广东）、何佩瑢（湖北）。

3月20日　蒋介石在重庆对中央训练团役政人员讲述目前役政改进之要点，称地方自治为兵役制度之基础，应协力推行新县制。指出前方部队补充后不能维持原有战斗力；补充部队组训不良，教育不合前方需要；补充部队不能按时到达，乃为目前役政之缺点。

△　五原反攻战开始。晚12时，孙兰峰第三十一师主力及五临警备旅一部附炮兵一营向五原新城西关及黑头圪旦之日军发起猛攻。日军凭借坚固工事掩护，以猛烈火力向孙部进攻。21日，孙部主力全歼西关之敌，进入城内扫荡义和渠之敌。五临警备旅亦攻占白桓及黑头圪旦，另一部攻占白桓以东地区。日军据守城内两处据点，孙部屡攻不克。

△　夜12时，彭庆荣部第三十一师附炮兵二营向五原旧城及广盛

西发起进攻。战至21日晨，将前后补红地区伪蒙军击溃，残敌逃回旧城内。第九十四团乘机向旧城进攻，第九十五团向广盛西进攻，敌不支向东溃逃，广盛西及五原旧城克复。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入安徽安庆日军机场，焚汽油800余桶。

△　“宋子良”向日方和谈代表铃木卓尔透露：困扰蒋介石的最大问题是承认“满洲国”，因而重庆方面迟迟不决定。21日，“宋子良”乞求铃木对重庆迟迟延期答复予以谅解。

△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汪精卫主持并致词。会议决议：一、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二、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案。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三、政府成立日期为3月30日。下午，汪精卫接见中日记者团，称中央政治会议有两大重要方针：一、实现和平；二、实施宪政，并称：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和平运动”已确立稳固基础。

3月21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无法完成之补救办法案》、《关于国民大会辽、吉、黑、热四省代表之产生方法案》及《推进边远省区民运工作的原则》。

△　国民政府公布《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凡11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莫与硕为第八十六军军长，冯圣法为第九十一军军长。

△　蒋介石接见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科毕业学生，称新闻记者应为“国家意志所由表现之喉舌”和“社会民众启迪之导师”，并勖勉他们“善尽普及宣传之责任”；“善尽宣扬国策之责任”；“善尽推进建设之责任”；“善尽发扬民气之责任”。

△　国民参政会华北战区视察团结束对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等地的视察，是日返抵重庆。团长李元鼎对记者称“前线军民合作实为水乳交融”，“各地建设亦有进步”。

△　宪政座谈会与宪政促进会筹备会在重庆举行茶会，讨论对宪政问题的意见，张澜、章伯钧、董必武、黄炎培等40余人参加。张澜、沈钧儒发言称：实施宪政已成为全国一致的要求，不发动人民参加讨论，则宪政是空架的。要求国民政府公布第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全国人民都有政治自由”的实施宪政议案。

△　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在迪化病逝。4月4日，国民政府以李溶“筹维省治，安定边陲，六载以还，勋勤懋著”，予以明令褒扬。

△　经济部采金局设立四川省安平区金矿勘探队，办理四川绵阳、江油等县金矿勘探开采事宜。

△　军令部制定《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拟调集李品仙、韩德勤、李明扬等部兵力万余进攻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南附近之八路军、新四军。并“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蒋介石批示：“开始动作，最多不得过半个月，必须用最迅速之行动将其一网打尽。”

△　蒋介石密电卫立煌，令其必须限定时日令八路军撤至长治、邯郸之线以北地区，“我军应在长治、邯郸之线从速筑构防线，不得任其自由南犯”。

△　第四战区东路兵团一部由横县附近南渡邕江，向大塘方面推进，灵山之日军先后由北南乡、江口、平南、平山等处向西南方向撤退，在武利圩、百劳圩固守。22日，克复灵山。

△　董其武第一〇一师及王子修新六旅击溃乌拉壕和乌加河之日伪军，破坏桥梁两座。22日，日军乘汽车80余辆向王子修部进攻，王部不支向山麓撤退。乌加河北岸日军强修浮桥，被第三〇二团全力阻

击，未能得逞，该团伤亡20余人。午后董其武率援军将敌击溃，占领桥头堡阵地。至此，五原新、旧城外围各据点收复。

△　门炳岳部骑六军一部向伪蒙军第八师发动攻击，敌不支向五原新城溃逃，复遭新三十一师孙兰峰部痛击，向北山逃窜，又被预伏在灶火渠之第一〇一师及民众截击，消灭殆尽。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的指示》，指出：在汪精卫积极组织傀儡政府，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局势之下，“共产党有与国民党及各界人民进一步团结抗日的必要与可能”；“在一切地方，如果国民党军愿意接受我们的提议，停止向我进攻，我应立即停止反摩擦行为”；“订立和平，以影响顽固派，争取同盟者”。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西游击队及倪志亮晋冀豫边区纵队一部在河北元氏黑水河战斗中，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俘日军一人，缴获山炮一门。

△　日军舰三艘炮击广东赤湾，并派兵千余登陆，窜至南山与第四战区一部在南头附近激战。

△　日军陷澳门，并向澳门当局提出如下要求：一、澳门受日本保护，每月担负日方费用40万元港币；二、将反日分子驱逐出境；三、准许日方派员会同岛上警察挨户搜索；四、准许本军用票在岛上流通。31日，葡萄牙外交部发言人称：日本占领澳门附近中国之若干海岛后所引起的有关问题，正由日政府与澳门当局接洽中。

△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伪《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5条》、废止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名称及善后方法等案。决定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临时政府”已办政务由“国民政府”令“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并遵照“中央”法令从速调整。“维新政府”已办政务由“国民政府”直接接收，并从速调整。“临时政府”公

务人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尽量任用，“维新政府”公务人员由“中央政府”尽量任用。

3月22日　　蒋介石密电程潜、卫立煌，令其从速将晋东南八路军“如期撤至长、邯路以北地区”，“将在高平以东陵川境部队除少数维护兵站线外，一律撤至平顺”，“将在辉县、林县之部队一律撤至漳河沿线”，“将白晋路以东、长治东阳关、邯郸线以北地区部队撤退，并严密监视其是否按指定路线撤退”。

△　下午3时，第十一战区傅作义部孙兰峰新三十一师副师长王雷率第九十一团在炮兵协同下，攻占五原新城内日军特务机关和屯垦办事处日军司令部，全歼守敌，五原新城遂告收复。

△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决议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实施宪政》、《重庆政府处置方法》等案，并颁“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绥靖主任人选。《重庆政府处置方法》规定：“国民政府”成立后，重庆政府对内、对外各种法令及条约、协定、契约等一概无效，所有军队应即停战，等待命令，所有公务人员应于最近期间到南京报到。“国民政府”人员名单：主席林森（汪精卫代理）；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立法院长陈公博，副院长（待定）；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海军部长汪精卫（兼），军政部长鲍文樾，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工商部长梅思平，农矿部长赵毓松，铁道部长傅式说，交通部长诸青来，社会部长丁默邨，宣传部长林柏生，警政部长周佛海（兼），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审计部长夏奇峰，铨叙部长江亢虎（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军训部长萧叔萱，政治训练部长陈公博（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

克敏。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蓬，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

3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会议决定秦邦宪、林伯渠、邓颖超、董必武四人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

△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举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为院长候补人选，选举姜立夫、吴有训、茅以升、吕炯、陈寅恪、陈垣、赵元任等为第二届评议员。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彭绍辉第三五八旅配合民众武装歼灭岚县日军130余人。24日，克复岚县县城。

△　“宋子良”与铃木卓尔在香港会谈。“宋子良”出示蒋介石转告板垣的急电，内容为：蒋介石本人对于非正式代表提出的“备忘录”基本上无异议，但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遭到东北将领等反对，现在正努力说服，最后不得已时亦有施以镇压手段的考虑；现在距离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时间已迫在眼前，因此可否将正式的最高代表的会谈延期到4月中旬；新中央政府成立日期问题也请一并重新加以考虑。随后铃木请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部答复同意按蒋的意见处理，并指示会谈即使延期到4月，也不要使对方失去希望。

△　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的广播讲话，宣称“国民政府还都”，就是要统一起来做和平运动，完成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使命；中央新政府的成立和还都，标志着“和平运动”已到了一个新阶段；希望“重庆方面破除成见，加入到和平运动中来”，“盼林（森）主席早一点回到南京来”。

3月24日　重庆各界举行追悼蔡元培大会，蒋介石、吴敬恒、王宠惠、孔祥熙、戴传贤、于右任、张继等参加致祭，张继、吴敬恒先后报告蔡元培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最后宣读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

央祭文。同日，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浙江等省及香港均举行追悼大会，吊祭蔡元培。

△　《益世报》在重庆复刊，主任委员病休，职务由牛若望兼代。按：该报已有25年历史，七七事变后，平、津两馆被迫停刊，迁往云南。

△　日本水川伊夫中将率残兵逃出五原，图渡乌加河逃往大佘太，是日被傅作义部游击部队击毙，残兵大部被歼灭，一部分落入乌梁素海淹死，20余人落荒逃遁。

△　日军反攻五原。日军小岛骑兵集团主力和黑田第二十六师团一部，附炮30余门，密集乌加河畔，向董其武部第三〇一团阵地猛攻，并以飞机10余架扫射轰炸，掩护步兵乘船渡河。董部奋勇阻击，团长宋海潮身中七弹，随从人员大部阵亡，黄昏后奉命后撤。

△　汪精卫公布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当然委员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列席委员褚民谊、朱履和、江亢虎、顾忠琛；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叶蓬、陈耀祖、李圣五、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萱、李士群；聘请委员齐燮元、朱琛、卓特巴札布、殷同、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尊岳、岑德广。

3月25日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在吉林和龙县红旗河伏击日军“讨伐队”，毙敌官兵100余人，俘虏30余人。26日，又在花脸砬子毙伤日军40余人。

△　陕西省府主席蒋鼎文发表反共演说，称：中国共产党“不拥护三民主义，不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既未履行其诺言，且更趋于封建势力的造成，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云云。

△　河北赞皇、元氏日军500余，在飞机掩护下出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元氏西南之东西台城地区予以阻击，并击落日机一架。

△　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阿部信行为“驻华全权大使”，派遣松平、小山两议长为“庆祝使节”，参加汪伪政府“还都”典礼。

△　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在议会上声称：日本政府准备向汪伪政府“放弃租界权利，期望第三国亦采取同样行动”，并称：日本政府“准备采取步骤对付拒绝交还租界的国家”。

△　河北井陉煤矿红庄矿井因年久失修起火，日军恐烧坏煤井，下毒手封井，井下矿工数百人全部烧死。

3月26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遗产税暂行条例》。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财政部组织法》，规定财政部设关务、税务、国库三署和总务、盐政、赋税、公债、钱币五司，以及直接税、会计二处。

△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及庄西言、李铁民等率南洋华侨归国慰劳团部分团员自仰光飞抵重庆，重庆各界代表3000余人前往机场欢迎。陈嘉庚在机场临时茶会上对记者阐明归国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华侨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助祖国抗战；并称：“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亦拟前往视察。”

△　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琮英、陈郁等九人自苏联经迪化、兰州、西安，是日回到延安，并带回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一批薪饷。毛泽东、陈云等前往迎接。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讲话指出：从报刊上看到国内许多人准备妥协投降，搞摩擦分裂及倒退的现象，实令人痛心。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投降

派必定失败，中国抗战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按：周恩来因臂伤于1939年夏赴苏治疗。

△　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张云逸致电蒋介石等，请其制止进攻新四军皖东部队之行为，并严惩为首指使之徒，抚恤伤亡。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与日军在豫南信阳城郊激战。27日，李部攻入信阳，日军南溃。

△　白崇禧部克复桂南灵山之陆屋、旧州。

△　日伪军2000余人向新四军豫皖边永城、萧县地区“扫荡”。新四军第六支队队长彭雪枫率部反击，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残敌溃逃。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公布该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法制梅思平、内政陈群、外交徐良、军事鲍文樾、财政陈之硕、经济陈君慧、交通李祖虞、教育焦郇，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27日，又增设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蔡洪田任主任委员。

3月27日　监察院派员视察贵州、湖北、四川等省政务，视察事项为：精神总动员、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军事、禁政、救济、司法。

△　五原战役结束。董其武部第一〇一师一部扒开乌加河南堤，引水淹没乌加河至五临公路，日军陷入泥淖之中，董部乘势向敌猛攻，城内日军在飞机导引下，逃出城区，向乌加河北逸去，五原失而复得。是役共歼日伪军300余人，俘虏50余人，缴获汽车40余辆。

△　香港《自由》、《天演》、《南华》三报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到达重庆。

△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月前抵达重庆，是日在嘉陵宾馆讲演

华北现状，孔祥熙、陈立夫、吴铁城及燕京大学旅渝学生200余人参加。

3月28日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乘夜攻入日军占领区河南淮阳。

△　蒋介石密电李品仙，令其“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涡、宿、永等附近之异党组织”，“将其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同日密电韩德勤，令其“先肃清江都边境及涟水、宿迁、沭阳边境附近地区之异党，尔后与二十一集团军协力相机进剿洪泽湖南北地区之异军”。

△　程潜密电蒋介石，报告第二、八、十战区对八路军的作战部署：第二战区“晋东南方面十八集团军应遵照规定作战地境迅速于长白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地区服从作战任务，所有经晋城、陵川通林县之交通着由卫（立煌）副长官统筹部署，以两个师以上兵力占领”。第八战区之陇东“密派有力部队严密监视中共势力，绝不准其对平凉进扰”。第十战区“对陕北中共部队应配备有力部队于洛川附近，绝不准其南犯”。

△　军政部、军令部制定《剿办苏皖边区非法活动之异军指导方针》，拟以李品仙部及韩德勤部“预为充分之准备，迅速进出于淮河南北附近地区，将盘踞该地之异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歼灭之”。

△　日军2000余，飞机五架攻陷晋西北临县，次日又退出该县。

△　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日英协会发表演说称：英日两国系“为共同目标而努力，此目标即为永久之和平，抗拒外来之压力”。4月3日，驻英大使郭泰祺驳斥克莱琪之演说，称英国“与日本之和平，即为中国之灭亡”。

3月29日　林森在革命先烈纪念日对全国将士和同胞以及友邦人

士发表广播讲演，痛斥汪伪汉奸组织之叛国罪行，表示与蒋委员长同心同德，督率全国文武官吏和人民，护卫国家民族整个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目的一日不达到，奋斗一日不终止，希望各友邦自今以往，始终给我们一贯之同情与更多之援助。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声讨汪伪组织，自是日至4月1日，邀请林森、吴铁城、陈立夫、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翁文灏、何应钦、王世杰、邵力子、李德全等党政要人向国内外作广播讲演。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赵基梅独立支队袭占山西寿阳冀家坳日军据点，歼灭伪军80余人。

△　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等抗日团体合组成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该会的基本任务为：一、促进成立革命政党；二、建立祖国与台湾的正常关系；三、发展台湾内部革命斗争；四、开展前方及沦陷区台胞的革命工作。

3月30日　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严缉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赵正平、赵毓松、诸青来、岑广德、陈济成、杨寿楣、林彪、夏奇峰、江亢虎、任援道、刘郁芬、齐燮元、王克敏、汪时璟、朱履和、江履谦、李文滨、徐良、严家炽、陈维达、卓特巴札布、夏肃肇、潘毓桂、傅侗、曾醒、陈玉铭、杨毓珣、何佩瑢、许继祥、戴英夫、汪瀚章、蔡培、何庭流、赵叔雍、周化人、李祖虞、彭年、胡兰成、孔宪鉴、李士群、邓祖禹、沈尔侨、王修、刘培绪、郑大章、李欧一、富双英、汤尔和、王荫泰、殷同、朱琛、董康、苏高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徐苏中、唐蟒、张永福、张英华、张显之、凌霄、陈之硕、陈君慧、何炳贤、陈伯藩、唐惠民、陈辉祖、焦莹、萧叔萱、高冠吾、张韬77名汉奸。

△　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宣读《国民政府还都宣言》，声

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使向于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之大道勇猛前进”，并希望重庆方面“破除成见，亟谋收拾，共济艰难”。会后，发表对日广播演说，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深切之谢意”，并愿为中日关系“因调整而得到共存共荣，东亚之和平与秩序得到永久坚固之基础”而继续努力。

△　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并训令中国驻外使节照会各驻在国政府，郑重声明：南京汪伪政府或中国他处存在之其他伪组织，其任何行为当然完全无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深信世界自尊之国家，对中国境内之日本傀儡组织决不予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承认。

△　上海学生举行总罢课，反对汪精卫傀儡政权成立。学生冲破巡捕房的干涉，高呼口号，到租界各马路散发讨汪传单。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不承认南京之汪精卫伪政府，继续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

△　全国慰劳总会举行会议，决议聘请陈诚为会长，谷正纲、马超俊、郭沫若为副会长。

△　桂林行营命令桂南各部在坚守已占据之阵地的同时，组织各种出击队，袭击并破坏敌之交通、通信及敌伪政治、经济，并将主力置于适当地区集结整训，为尔后反攻南宁做好准备。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250余人，连续袭击嫩江东北四站和二十里河屯。两次战斗中缴获步枪21支，手枪一支，子弹1300余发。

△　日军千余、飞机三架攻陷晋西北方山县，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及山西新军第二纵队与敌战至次日，收复该县。

△　河北武安日伪军1000余分三路向八路军边区纵队进攻，遭八

路军一部反击，歼敌130余人。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各院、部、会组织法，中央机关经费支配和官俸等级等提案，并公布立法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立法委员为杭锦寿等50人，军委会委员为陈公博等26人，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萧叔萱。

△　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华中维新政府发表宣言，宣布自即日起解散。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王克敏任委员长，常务委员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委员为朱琛、王揖唐、董康、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该会为汪伪政府的直属机构，受其委托处理华北辖区内一切政务，下设内务、财务、绥靖、教育、实业、建设等署和政务厅。

△　周佛海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岸浪义质签订《政治借款契约书》，总金额法币4000万元。

△　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发表广播演说，表示对汪政权“不惜予以全般的援助”，希望各国迅速“认识此新事态而予以协力”。

△　日本陆军省召开会议，研讨参谋本部关于撤退在华军队的提案，参谋总长闲院宫、陆相畑俊六等出席。决定：“如本年内中国事变仍不能解决，则自1941年初开始自动撤兵，到1942年底，将兵力缩小至以防守上海的三角地带及华北察、绥一隅为限。”

3月31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作出《关于国大代表产生问题的决议》，规定：国民大会代表之区域选举及职业选举，如确有变动或事实上之窒碍，不得依法完成时，应由国民政府遴选另定。

△　监察院长于右任在重庆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的广播

演讲，呼吁各界同胞切实认识中华民族的总危机，以中山主义对明治遗策，收复既失领土，造成独立自由之中华民国。

△　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苏大使杨杰、驻美大使胡适等联名通电讨汪，表示誓遵国策，以维友邦同情，而正国际视听。

△　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抵重庆。4月3日，重庆各界妇女举行盛大欢迎会。午后，宋氏三姐妹至新生活指导委员会视察，并参观重庆孤儿院，宋庆龄称赞孤儿院工作成绩优异，称“将来必不致产生汪精卫一类之人物”。

△　延安成立蒙古文化宪政促进会，参加者有蒙、回、藏、汉等族人员，吴玉章、李富春、林伯渠等为理事。

△　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电告蒋介石，安徽第五区专员兼第十纵队司令李本一部1000余人，皖东行署莫、甘支队2000余人，定远县吴子约部五六百人，近日袭击新四军驻大桥之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令部，要求制止此种破坏抗日的倒退行为。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铃木卓尔提出今后对“桐工作”的方针，指出：“桐工作”重新进行时，应向重庆说明“汪政权的成立不妨碍汪蒋事后合流的可能性，日方保留对汪政权的承认即有此意”。并提出汪蒋事后合流的工作期限订于今秋，而今夏为整体工作成败的关键。

△　日军第三十六、四十一师团及独立第九混成旅团6000余人围攻晋东南沁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与敌战至4月2日，歼敌500余人。

是月　国民政府决定四川、西康、贵州、陕西、甘肃、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各县、市自卫总队一律改

编为国民兵团，团队以下各级部队和后备队6月以后次第成立。

△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培璜为第十九军军长。

△　何应钦检讨对日作战溃败原因：一、部队作战缺乏协同动作；二、无死守阵地之决心与必胜的信念；三、构筑防御阵地忽略纵深配备；四、谎报军情，过度夸大敌情，用意在减轻自己之责任；五、破坏交通线不得要领，或迟或早或不彻底；六、指挥机关臃肿重迭；七、对上级命令不研究，奉行不力；八、鱼肉百姓，扰民作恶。

△　山西牺盟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沁源召开，提出继续团结阎锡山共同抗日，并决定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进行整军，加强战斗力。会后，牺盟会即宣告结束。

△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重庆政府的处置方案："一、重庆政府如放弃抗战容共政策，并接受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则可加入中央政府。二、国民政府还都后重庆方面对内及对外各种政令及条约、协定、契约等一概无效。三、在重庆政府指挥下之军队如自愿停战来归中央者，中央政府一概容纳，并予以种种便利。四、重庆政府所有公务人员如能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半年内回京者，中央政府应以原级原俸令其继续任职。"

△　河北旱灾，灾民大饥，有食树皮、泥土为生者，致死甚众；有食麦草充饥者，致夏收无望，尤以保定、天津地区为甚。受灾村镇1.5万余处，灾民达300万。山东省灾区亦达5000村镇，灾民近百万。日军乘机强迫逃津灾民在津特三区伪劳工协会领取出关证，出关者日约3000人。

4月

4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国民参政

员145人出席。议长蒋介石报告半年来全国政治、军事、外交设施及日、汪伪之目前状况，指出汪伪政府的成立，不能影响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必须恢复国家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力求抗战建国纲领的实现”，“确立宪政之基础”。林森致训词，副议长张伯苓、参政员代表梁上栋分别致词。

△　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　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严缉吕景颜、吕哲夫、鲍巽之、陈骅、徐剑萍、朱光普、丁健娱、王寿彭、唐少泉、张佩绅、潘同麐、解吉文、马典如、凌西磻、陈庆渔、黄砚山、陈武扬、杨敦谦、刘月浦、卢新三、杨敦纯、董志瑚、张建时、陈平、田庆霓、周郑璜、朱张林、程学卿、陈阮、朱月、徐元新、李恺良32名汉奸。

△　第八战区傅作义部克复绥西五原东北之乌镇及乌石浪口，毙日、伪蒙军300余人，俘50余人。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华北八路军应抽调足够力量（四五万人）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　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及各军区，指出敌人近日强化交通，修筑道路，并增筑据点，这不仅妨碍我军的军事行动，而且有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流通。令各部队于10日开始破路，对于敌人新修的公路、铁路，加以彻底的破坏。

△　天津122个民众团体，以全市140万市民之名义联名通电讨汪。

△　资源委员会在云南开元成立开元酒精厂，后改名云南酒精厂，与云南省政府合办，由黄人杰主持，有员工92人。抗战胜利后结束，让予云南省政府。

△　日伪军3000余人、汽车30余辆，由皖北永城、砀山、黄口、王白楼等地，四路向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扫荡”。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三总队等部与敌激战于山城集附近之磨山、僖山一带，反复冲杀，歼敌300余人。新四军第一总队队长鲁雨亭殉国。

△　日本政府特任阿部信行为对华交涉特命全权大使，其任务为：一、同新中央政府合作（根据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行事）。二、签订中国、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及日中新关系的条约（根据外务大臣的指示行事）。有关重要政策的处理及有关治安问题，与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力进行。

4月2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继续举行。何应钦报告半年来抗战军事状况，王宠惠报告外交状况，孔祥熙报告财政状况。参政员胡景伊等105人提出“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临时动议”，经讨论后推参政员陈豹隐等作文字修正。会议主席张伯苓提出“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之修正案，一致通过。

△　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新编第十一军军长。

△　是日及次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西南联合大学校长蒋梦麟、西康省政府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介石暨省府委员，山东、河南、湖南、浙江、江苏省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商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刘建绪等分别通电讨汪。

△　行政院公布《统一检查办法》。

△　顾祝同电告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的措施，准备用一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5日，蒋介石复电顾祝同：“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

△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攻入广东江门城垣，毁日伪设施数处。

△　延安大众化问题研究会成立，宗旨是研究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负责人周文。

△　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军民粉碎日伪军五路围攻，歼敌500余人。

△　法国政府总理雷诺接见驻法大使顾维钧，声明不承认汪伪政府。

4月3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继续举行。翁文灏报告半年来经济建设情况，张嘉璈报告全国交通设施情况，并通过各组审查委员会名单，计分军事国防、外交国际、内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五组。大会通电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及战区同胞。

△　孔祥熙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汪逆伪组织与日阀末路》的广播讲演；5日，冯玉祥作题为《全国民众都应努力铲除卖国汉奸汪兆铭》的广播讲演，号召全国各界同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粉碎伪组织，赶走日寇”。

△　蒋介石为在长江上游和襄河上游实施决堤，阻止日军进攻沙市、宜昌，密电李宗仁和长江江防司令郭忏，略称：如在长江上游决堤，泛滥及于监（利）、潜（江）、沔（阳）、汉（川）一带，且属湖沼纵横之地，运动不易，敌之主力置于该方面甚小，似无实施之必要。如于襄河上游决堤，泛滥区为荆（门）、沙（市）、天（门）、潜（江）、沔（阳）、汉（川）一带，此方面为江防之侧背，亦即我

军最感痛苦方面。如判明敌之主力在汉宜路方面，我在襄河东岸上游决堤，确能予敌以严重打击，亦可施行。

△　国民政府令准英国借用刘公岛期限展期。

△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新华日报馆联合举行晚会，欢迎香港《南华》、《自由》、《天演》三报反汪工友服务团。《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致欢迎词称：这些工友的行动证明，“他们是英勇的，坚决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始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战士”。

△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返抵饶河后方基地，主持召开中共第七军代表大会，贯彻伯力会议精神，将抗战坚持到底。会议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刘雁来任支队副、王效明任支队政委。会议历时七天。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王效明、崔石泉等38人。

△　苏联空军志愿队协同中国空军，出动飞机23架，分头轰炸日军汉口机场与岳阳日军司令部，炸毁日军舰一艘，伤亡200余人。同日，又袭击山西运城日军机场，毁伤日机30架。

△　日机20架轰炸西安，投弹百余枚，炸毁房屋50余栋，死伤居民10余人。

△　英国外交次官白特勒在下院声明，重申英国政府不承认“汪组织”之态度并未改变。外相哈里法克斯在上院亦重申继续承认重庆之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

4月4日　国民政府任命盛世才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继续举行。周钟岳报告内政工作状态，陈立夫报告国民教育设施及最近国民教育会议通过的五年普及教育计划。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由西安抵渝，即

日参加会议。

△　藏籍国民党中央委员安钦呼图克图致电蒋介石，反对汪伪政府成立，拥护国民政府，效忠抗战。

△　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发表演说，称中国与日本作战，“原系被迫而应战”，并称：中国政府“深信美国政府必将停止以五金及油类输往日本；日本如缺乏此种供给，势必无力作战”。

△　伪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任援道任总司令。设南京、湖州、杭州、庐州、蚌埠、苏州、芜湖七个绥靖区。

4月5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立法院长孙科作“宪草”起草经过及内容说明的报告。会议宣读议长交宪政期成会草拟之《中华民国宪法修改草案》，并由张君劢说明宪政期成会组成之经过。蒋介石发表关于“宪草”的意见：一、治权与政权必须分别清楚；二、宪法应富有弹性，越谨严越不能实行。

△　蒋介石致电嘉勉傅作义及克复五原将士，称：五原大捷“不仅保障了西北，而且奠定收复失地，驱逐敌寇之基础，在抗战全局上，关系尤为重要”。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前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1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宋哲元，发给治丧费5000元，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军事委员会制定《兵役奖励办法》，对自动投军者、免役人员自动请缨者、党国人员自动服役者，分别给予嘉奖、记功、奖金、褒状等，以资鼓励。

△　国民参政员梁漱溟等向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提交解决国共两党摩擦等议案五项，议长蒋介石即席表示此事当属重要，并组织特

种委员会负责解决。9日，特种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一、一切军队，无论何种番号，一律服从最高统帅之命令，绝对不得自由行动。二、如有军队怀疑邻近军队之行动者，应将事实报告上级长官，听候最高统帅之处置，在未奉命前，不得自由行动。

△　广东省各界在韶关举行讨汪锄奸大会，省主席李汉魂宣布汪精卫叛党卖国罪行，大会发表讨汪通电二则，并决议自是日起在全省举行扩大讨汪锄奸宣传周两周。晚，举行火炬游行。

△　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通电讨汪，祈全国同胞奋起，共灭此獠。

△　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各界人士分别举行公祭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慰问阵亡将士、殉难同胞家属。

△　全国慰劳总会以空军将士轰炸运城、岳阳日机场，战果重大，特致电慰问，并汇寄5000元以表敬意。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再度攻克豫东淮阳，在南关与日军巷战，并焚毁南关大桥。

△　墨西哥政府声明不承认汪伪政府。

4月6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继续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参政员罗隆基、邹韬奋、董必武、左舜生等相继发言。川康建设期成会与华北慰劳视察团分别提出书面报告，交大会审议。

△　国民政府特聘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志、林可胜、陈桢、戴芳澜、陈焕镛、胡先骕、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张云、吕炯、唐钺、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寅恪、陈垣、赵元任、李济、吴定良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评议员。

△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吴庆甫、吴履湘、吴履宣、洪光华、张士衡、顾庆飏六名汉奸。

△　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王家峪成立，朱德任名誉会长，彭德怀任会长。

△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程潜等，告汪伪政府成立后华北敌占区之情形：一、各地一律改换汪伪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旗角上织有五角星，上书“和平反共”字样。二、各地新民会有改组为国民党党部之说，到处召开伪政府成立大会，宣传反共，宣传国共分裂，伪称“汪蒋合流，共同反共”。三、所有伪军改着灰布军装，并宣传打八路军不打中央军，且愿帮助中央军“剿共”，以施其挑拨离间之诡计，请动员各种宣传力量，揭穿汪逆之阴谋。

△　军令部密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相机肃清洪泽湖以南之新四军，并与李宗仁密切联系，打通苏、皖“补给线”。

△　罗马教廷宣布不承认汪伪政府，继续支持重庆国民政府。

4月7日　　蒋介石、宋美龄在重庆举行宋庆龄、宋蔼龄由港来渝欢迎大会，重庆妇女界知名人士百余人出席，宋美龄、宋蔼龄、宋庆龄、蒋介石相继讲话。宋庆龄讲话要求妇女们参加国民大会，号召妇女们坚持抗战到底。

△　云南、四川、甘肃、河南省临时参议会及第八十二军军长马步芳通电讨汪。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悬赏70万元，缉拿汪精卫。

△　第三战区一部攻克浙江海盐、吴兴县城，毁日伪军仓库、电厂及伪机关多处。

△　日军第十一军制定关于宜昌作战计划，拟于雨季前在汉水两岸击破第五战区主力，“以进一步削弱蒋军，并利于推动对华政治谋略之进展”。作战自5月上旬开始发动，“首先将第五战区兵团主力歼

灭于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随后将汉水右岸之敌压至宜昌附近，予以歼灭”。作战拟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作战区域为襄河东岸；第二期作战区域在襄河西岸，攻占目标为宜昌；第三期作战预定第三师团于安陆渡汉水，第三十九、第十三师团在其以南渡河。参战部队为该部第三师团、石本支队、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池田支队等。

4月8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通过参政员胡石清等55人提出的《请政府明确宣释“领土完整”之意义，以励民心而利抗战案》。同日，大会决议致电傅作义祝捷，并通过《改善出口统制》、《加紧禁烟》、《加强推行新县制》、《指定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应多指定妇女代表》等案。

△　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因病辞职。19日，代理校长许崇清赴粤接事。

△　军令部拟定对鲁西南八路军作战办法：一、拟俟晋东南第十八集团军就范后，严令其将鲁西（津浦路西、黄河南）及鲁西南部队开赴黄河以北，执行作战任务。二、密令于学忠、沈鸿烈、石友三等确实布置，严格防范，以注视其行动。三、该部若不奉命即予制裁，进行剿办。

△　汪精卫偕林柏生、李士群、周隆庠、萧叔萱等到北平巡视。到平后，即拜访日本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多田骏和联络部长森冈。下午，汪对“华北政务委员会”厅、局、处、署长以上人员训话。会后接见记者，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必能与中央政府一心一德，共同肩任和平反共建国大计。9日，汪一行抵张家口，会见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日军最高司令官。下午返北平。

△　汪伪政府任命胡毓坤为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

△　古巴政府宣布不承认汪伪政府，继续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之合法政府。

4月9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政府报告及参政员提案多项，并选举孔庚、陈博生、李中襄、邓飞黄、许孝炎、林虎、杭立武、陶玄、高惜冰、范予遂、董必武、左舜生、张君劢、刘叔模、黄炎培、莫德惠、卢前、胡石青、张澜、秦邦宪、章伯钧、许德珩、李璜、褚辅成、王造时为本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任命石友三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　晋西北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兴县成立，贺龙、关向应、林枫等65人为理事。该会通过临时动议案两项：一、请求国民政府修正“五五宪草”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务求适合抗战需要。二、要求阎锡山取消1937年选举之国大代表，另由人民民主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

△　第九战区薛岳部克复江西靖安、奉新县城，并围攻南昌。10日，日军决抚河堤，阻薛部前进。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克湖北麻城。

△　晚，汪精卫在北平发表《和平反共》的广播讲演，声称：“和平在思想方面是一种坚定信仰和正确之主张，行动方面是经济提携，使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反共在思想方面排斥共产主义，实行三民主义，行动方面参用过去剿共办法，迅速促其灭绝。”

△　林柏生在张家口对中外记者团发表谈话，声称若使重庆政府瓦解，办法有二：“一为以宣传方法，使其了解过去之谬误，脱离共党关系，并使明瞭依存欧美无益；二为使重庆方面及全国民众明瞭国府还都的俨然事实。”

4月10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通过平抑物价案、对于

教育报告之决议案及参政员张申府等21人提出的《保障讲学自由，以便学术开展，而促进社会进步案》。下午，举行休会式，蒋介石致休会词，称本会成立两年来最大的贡献有三：一、实现精诚团结；二、支持抗战国策；三、确立民治楷模。副议长张伯苓、参政员代表庄西言分别致词。

△　蒋介石电令李宗仁、张自忠、汤恩伯等，对于日军进攻宜昌、沙市应迅速预行部署，准备先发制敌。第五战区应乘敌进犯沙、宜企图渐趋明显之前，行先发制敌攻击。以汤恩伯、王缵绪两部主力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钟、汉宜路之敌攻击，并由襄花路、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策应作战，打破敌西犯企图。诸准备须于4月中旬完成。

△　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去年夏在平台山之役力歼日军，身负重伤，犹复浴血苦斗，卒致捐躯，国民政府是日明令褒扬，追赠陆军少将。

△　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426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于五六月间在华中、华南方面“进行暂时超越既定作战地区的作战”。要求战役结束后仍返回原驻地，不允许固守新占领区，即不准占领和保持宜昌。

4月11日　蒋介石在重庆对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干事监察联席会议讲青年团工作的方针与要务，指出团员社会服务的三项基本工作：救济贫病老幼、协助政府禁烟、慰问并扶助出征军人家属。

△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与第三战区参谋处处长岳星明谈判新四军问题。岳提出：江北新四军部队必须南调；新四军皖南兵力过多，宜向苏南增移；苏南地区可酌量扩大。袁国平提出五点：一、扩大作战区域；二、扩大兵员；三、改变包围新四军的状况，取消进攻命令；四、保护新四军家属；五、皖北部队不能调。岳星明强

调说明：扩大作战区域可以商量，扩大兵员可由战区代办，包围不是事实，家属自当保护，唯皖北部队仍应逐渐南调。

△　孙科接见报界人士，说明国民大会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集，全国代表选举事宜亦定于本年6月底前办理完竣；旋就中央社记者叩询之国民大会职权、宪法草案内容、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以及实行宪政程序等问题作了答复。

△　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

△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根据地建设与政权问题，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及太行军政委员会。

△　冀察战区鹿钟麟部向河北新城出击，在大清河左岸龙湾河头一带与日军激战，另一部在安国西南庄与敌激战。

△　日军第一一四、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第八混成旅团3.7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冀中军民经过历时50天的作战，将敌击溃。此役共毙伤日军4300余人，伪军350余人，俘日军12人，伪军2250人。

△　“宋子良”由重庆返香港，向日本香港机关讲述重庆方面对待“桐工作”的情况，略谓：重庆内部对和平问题“存在着障碍，特别是有共产党的反对”，重庆政府今后将对其进行压制，以期促进和平。一般说来，中央系军队是赞成和平的。在条件方面，成为问题的是满洲及驻兵问题，日方若不重新考虑这些要求，交涉将难以进行。

△　伪满公布《国兵法》和《国兵法施行令》，从4月15日开始实施。6月20日，又公布《国兵法施行规则》。从此，伪满军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强制青年为其充当炮灰。

4月12日　晚，英驻华大使卡尔、法驻华大使高思默、美驻华大

使詹森一同晋见蒋介石和王宠惠，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卡尔称：“目前，英、法要以全部力量挫败德国的野心，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高思默称：“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詹森称：“如果很快达成停战协定，中国因有英、美、法的帮助，日本绝对不会提出过苛的或极不合理的条件及要求。愿中国政府对此再三考虑。”蒋介石答称：英、法、美三国的和平劝告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和平日本必须先撤兵，否则中国就不停止抗战，不惜任何牺牲。

△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向鄂中地区日军展开破袭战，是日一度收复黄陂县城、随县马坪镇、孝感小河市、应山张杨店等地。13日与日军在京山八字门、孝感南新街、应城黄家滩激战三次，毙敌300余人。新四军伤亡数十人。

△　苏联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出动飞机40架，再次轰炸日军汉口机场、岳阳日军司令部及附近仓库，炸沉汽艇二艘、仓库一座，毙敌百余。

△　四川灌县都江堰举行放水典礼，林森亲临主持。

△　汪精卫偕林柏生、周隆庠、陈耀祖、林汝珩等到广州巡视，并拜访日本华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13日，召见伪广东省及广州市维持会人员训话，表示要加强对广东地区和平运动的组织、训练和宣传，使广东成为和平运动的模范。14日，汪一行返宁。

4月13日　第五战区召开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研究襄河东岸对日作战方针。会议认为：敌似将以主力由襄花路方面攻击，企图歼我襄河以东地区野战部队，并相机攻沙（市）宜（昌）。据此制定如下作战指导方针：以一部正面分途挺进敌后，扰袭敌主力，相机先发制敌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敌决战。

△　蒋介石致电白崇禧、张发奎，令桂南方面应加强邕钦路两侧

游击及新国际路线之掩护，主力控制整训，以备尔后反攻。

△　新疆迪化市举行市民大会，代表全疆14个民族400万同胞通电全国，力主坚持抗战，实行宪政，改善民生；反对摩擦，加强团结；开放言论自由，肃清汪逆余党。

△　晚8时，法驻华大使高思默设宴招待重庆国民政府要人，英、美、苏三国大使及其他国家的驻华大使。重庆方面蒋介石、王宠惠、孔祥熙、陈立夫、于右任等出席。蒋介石发表演说，对友邦竭力支持中国抗战，得以维持数年之久，深致谢忱，并称日军若不全部从中国领土撤退，断不能进行和平谈判，英、法两国因为欧洲战争，对中国的援助受到种种阻碍，希望英、法两国致力于欧洲战争，不要顾虑中国。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克豫东罗王车站，并向开封进击。

△　日军对河北易县进行春季“扫荡”，该县常峪沟一带群众800余人遭敌杀害。

4月14日　国民参政会特种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国共问题，决议：一、对于地方政治制度及其职权，必须经中央正式订定公布，以举统一之实，此事希望中央从速解决。二、民众运动应绝对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服从国家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应予一律撤销，以收团结之效。三、关于货币，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当数量之供给，同时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货，以免紊乱币制。四、经济抗战，应命令各方严切执行，绝对不使敌货流通。

△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大会，周恩来送挽联。

△　第三战区一部攻入苏北阜宁，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敌仓库尽毁。

△　第五战区鄂东部队一部攻克六神港，进迫武穴、田家镇。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汪乃贵第八支队、陈锡联第三八五旅，在晋东南长城镇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　据重庆《大公报》载：槟榔屿华侨胶业公司代表王振相等与中国茶叶贸易公司，在重庆设立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资金100万元。7月，在重庆等地开始建厂。

△　美旧金山华侨举行声讨汪精卫巡游大会。大会以全侨名义发电两封：一致国民政府，请加紧通缉汪精卫；一致全国公团及海外各侨团，共同讨汪。

4月15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率八路军、新四军全军将士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反对妥协投降，指出："国内少数不明大义之徒，或策动投降，或实行反共，而以反共为投降之准备步骤。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倡言反共，汪精卫之覆辙可证。故居今日而言，抗战之危机，实不在敌伪之猖狂，而在我抗战阵营内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

△　宋庆龄发表《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呼吁各国朋友继续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不减少一分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胜利——也即是你们的胜利为止"。

△　八路军鲁西军区成立，杨勇兼军区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下辖泰西、运西、鲁西北、运东四个军分区。

△　《台湾先锋》（月刊）在浙江金华创刊，由台湾义勇队出版，主要用以锻炼队员和对外宣传。

△　冀东日军大举扫荡平谷以北之雾灵山区，八路军开展反"扫荡"，一度占领平谷县城，歼敌500余人。

4月16日　国民政府明令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八条条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任期一年，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延长

之。”

△　行政院会议决议：任命邵力子为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原任杨杰免职。

△　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于适当地带，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之区域，同时令新四军编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一律集结于此区域内，授以攻敌任务，指定攻击目标”。白提议的方法为：一、在漳河以北之地带，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区域，并明确规定中共活动之范围，只限于此区域不得有所逾越；二、将黄河以南之豫、鲁、苏等省之新四军或与该军有关之游击队，一并集中于指定区域以内，彼此既有明确之界限，可免相互摩擦，减少祸端；三、严格限制其军队人数与编制；四、第十八集团军在指定区域内之行政官吏，由第十八集团军荐请中央委派。

△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团长潘国渠率团员44人抵达重庆。次日，晋谒林森、蒋介石。

△　晋南日军分四路进犯中条山：第一路3000余人于安邑、夏县东向张店公路进犯；第二路2000余人于闻喜、绛县南窜横岭关；第三路1000余人于翼城一带东窜五子关庄；第四路于府城镇、鲍店镇向中条山进犯。17日，敌陷平陆、茅津渡等地。

△　日本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共同筹组的华北经济对策协议会在北平中南海开会，参加者有日本兴亚院负责人、伪满洲国、伪蒙政府及伪华北当局的负责人，研讨对华北的经济控制。

△　日本在上海组织纳税日本人会，作为对租界交涉之常设机关，林雄吉为会长。

4月17日　蒋介石致电徐永昌，告以日军进犯鄂西之计划：其主攻重点为“桐柏山与大洪山之中间地带，对第五战区右翼张自忠部取

守势，必要时亦取攻势”，主攻对象为第五战区前线川军第一二一、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等师及桂军第三师。同日，蒋介石又密电李宗仁、汤恩伯，认为日军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即使其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因之，“我军应于敌军尚未进犯之前先发制敌”。

△　国民政府以绥西五原大捷明令褒扬傅作义，授予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并犒赏所部官兵30万元。

△　蒋介石下令禁止四川盐市投机垄断，对于煽制盐运、妨碍盐产之赶运或操纵盐卤及其他制盐所需器材之价格者，严行惩治。

△　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召开年会，主席颜耀秋报告称：该会成立二年来现有会员150余单位，工厂种类有重工业、制造业、交通等，工厂发展区域向在沿江沿海一带，总数达五万余家。

△　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在重庆举行割让台湾四十六周年纪念会，发表宣言称：“决领导台湾同胞反对异族统治，配合祖国抗战，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为台湾同胞独立自主而牺牲奋斗。”

△　上海英商煤气公司工人举行罢工。20日，资方被迫和工人代表签订协议，答应增加工资津贴三成和米贴等，工人复工。

△　日军竹田重松等部自晋南平陆、茅津渡等地南犯，第二战区晋南部队与敌鏖战一日，18日晨克复茅津渡。

△　汪精卫偕林柏生、李士群、周隆庠等到汉口巡视，旋拜访汉口日军最高指挥官，并对伪湖北省政府、伪武汉市政府及伪武汉参议会等人员训话。18日，伪武汉市政府举行拥汪大会，汪出席并讲话，会后接见记者称：如果武汉、广州、北平、南京各地的“和平运动”统一起来，就可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下午返宁。

4月18日　　蒋介石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人员“积习相沿，泰

侈相尚，酒食征逐，日有所闻”，通令《取缔党政军机关宴会办法》，训令由行政院执行。并责成重庆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市政府、市警察局随时严密查禁，有犯必惩，勿稍宽殆。

△　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应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之请，对美国发表讲演。宋庆龄断言：中国抗战必胜，太平洋和全世界将来的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必将更加光明灿烂。宋蔼龄指出：汪逆成立伪政权，完全是一幕丑剧，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各国在华的利益加以毁损，给日本独霸一切。宋美龄要求美国对日禁运汽油、煤油以及其他战争物资，并称：如果美国继续帮助日本，使日本在东方逞其野心，那么“事态的发展就不堪闻问了”。

△　军事委员会决定，撤销军事运输总监部及运输总司令部，另设运输统制局，统辖西南运输处、运输总司令部及交通部等运输机构，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主任，交通部长张嘉璈、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兼副主任。

△　国民政府明令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其工作侧重为推进民众组织、社会福利及合作事业。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免洪兰友重庆市党部主任兼职，遗缺由陈访先继任。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萧华挺进纵队在山东陵县歼灭日军百余人。

△　晋南中条山日军七八千人，飞机20架，向东邢、大郎庙一带进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迎击，激战两日，毙敌500余。旋日军4000余增援，被击溃，毙伤近千人。

4月19日　军令部为缩小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区域，制定第一次方案，要点为：一、八路军、新四军应在“确定之战斗地区内作战”，

其在第一、第五及鲁苏战区内之部队限期撤出。二、令于学忠、沈鸿烈、石友三、卫立煌等严密部署，防范该部越境。三、未奉明令，擅自越境者，“即以叛逆论惩，进行挞伐”。21日，制定第二次方案，内容与第一次方案略异。

△ 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映光向报界人士报告该会成立三年来工作概况：成立省赈济委员会者23省，县、市成立赈济委员会者532县及二市，成立义民总站18个，登记义民总计2.00713718亿人。

△ 日本新任驻华舰队司令岛田繁太郎抵南京。

4月20日 蒋介石在成都对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高级职员讲《运输统制与运输运动》，要求军运和商运互相协助，兼筹并顾；并提出运输运动的要求为：一、规划实行驿站制；二、利用旧有工具与方法，发动人力与兽力之运输。

△ 中美双方正式签订《华锡借款合约》，贷予中国2000万美元，中国以四万吨滇锡为抵押，年息四厘，七年偿清，由中国银行担保。

△ 国民外交协会通告欧美及各国和平团体，无论汪伪政府及其主子如何欺骗世界，全中国人民决与其势不两立。

△ 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参加者46个团体，通过讨汪及工人生活福利等议案八项。

△ 民生实业公司“民用”轮由重庆驶北碚，因超载乘客，在嘉陵江飞揽子滩沉没，淹死者89人，多系公务人员。

△ 日军陷晋东南陵川。21日，陷高平。

△ 日本开放珠江航务。21日，日总领事声明，每周准英轮一艘通行。

4月中旬　第五战区为阻止日军进攻襄东地区，奉命制定作战部署如下：一、江防军郭忏部利用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拒敌渡河，不得已时退至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二、右集团军张自忠部守备襄河河防及大洪山地区，以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区，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主力配于长寿店以北地区，迎击敌人进攻。三、中央集团军黄琪翔部负责随（县）枣（阳）地区正面防务和大洪、桐柏两山的游击战。四、左集团军孙连仲部负责迎战信阳方面之敌。五、机动兵团汤恩伯部担任侧击西犯之敌任务，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六、大别山游击军李品仙部负责对沿江敌军据点和平汉路南段的游击战。

△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就新四军问题与第三战区达成初步协议：一、对新四军第四、五支队问题不作决定，呈蒋请示办法；二、管文蔚部南调，决定自5月起增加经费三万元；三、皖南留一团并留指挥机关一部；四、军部先率两个团移苏南，直属队陆续转移，开拔费二万元；五、作战区域为镇江、丁庄铺、延陵至郎溪及溧水至南漪湖之大茅山两侧地区。

△　日军第二十一、三十二师团、独立第十旅团及伪军万余人，由邹县、枣庄、临沂等据点分十路出动，向抱犊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合围“扫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及各地方部队、游击队在民众支援下，经月余苦战，与敌作战30多次，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

4月21日　国民政府决定，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任期自本年7月1日起再延长四个月。

△　中国社会改进研究会在重庆成立，朱家骅、谷正纲、洪兰友、杭立武、李中襄等为理事，邵力子、马超俊、康泽为监事。该会主旨为：研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事业之病态，探求其解决之方案。

△　第九战区薛岳部克复赣北安义县城，日军溃走修水北岸。

△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等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总部举行欢迎会，晋东南十余群众团体参加。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徐深吉青年纵队将冀南观台西南西艾沟伪军400余人全部歼灭。

△　安徽保安第四、八团配合第二十一集团军一部共4000余人，分三路向驻无为县之新四军游击队发动突然袭击，激战数小时，新四军伤亡百余人。

△　江苏第三游击区第一游击分区指挥官翁达所部五个团及盱眙支队、仪征、六合等县常备队数千人，向驻竹镇、井集、半塔等处之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部进攻。新四军被迫退出以上各处，翁部即将竹镇抢劫、焚烧一空，捕去新四军工作人员20余人，悉遭用菜刀残杀、剥皮、活埋、悬首街头，惨绝人寰。25日，罗炳辉致电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要求“将祸首翁达绳以国法，以弭后祸”。

△　广东中山婆罗岛伪军李吉治部不满葡萄牙警察驻防湾仔，下令封锁水陆交通，24日向湾仔移动，双方发生冲突，葡警退回澳门，伪军乃占湾仔。

4月22日　军令部拟就缩小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区域的第三次方案，呈交蒋介石核定。此方案要点为：一、变更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新四军划为一个战区（冀察），委朱德、彭德怀为总、副司令。二、不变更战斗序列，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之作战区域。三、按八路军、新四军目前态势，以兵力大小划分数个战区。四、按八路军、新四军目前分布情况，于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划分两个作战区域。

△　教育部制定奖励学生参战实施办法，凡参战有功学生除军事

机关给予奖励外，并由教育部发给奖章、奖状；殉职者除予抚恤外并由学校立碑纪念。

△　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离重庆飞抵成都，25日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27日出席成都励志社举行的欢迎茶会。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浙江泗安，进击林城桥。

△　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万余人，对皖南新四军历时11天的大“扫荡”结束。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一、三团经过10余次反“扫荡”作战，毙伤日军900余人。

4月23日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乘夜攻入开封城垣，焚日军营房及仓库数处，占领日军司令部，毙敌少佐津下等以下官兵97人。同日，卫立煌部马彪暂编骑兵第一师克复豫东淮阳。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对冀南永年、曲周一带“扫荡”冀南第三分区之2000余日军实施反击，歼敌500余人。

△　晋东南日军陷阳城。皖中日军陷含山。

△　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及日本国民庆祝伪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抵南京。使节团成员为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松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永田秀次郎及经济、新闻界代表等。使节团发表声明，希望“汪政权在和平反共的旗帜下，与日本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

4月24日　何应钦密电卫立煌，不准八路军要求担任邯长路以南平顺、潞城、壶关一带之攻击任务，仍令照原规定之区域，不得变更。

△　汪伪政府决定成立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任命陈公博兼省长，陈耀祖代理省长兼省保安司令，彭东原兼广州市长。

△　日机30架分批袭重庆近郊白市驿等地。

4月25日　教育部召开第二届高等师范教育会议，历时三日，通过大学师范学院逐步独立设置、充实师范学校附校等案。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新编第二军军长。

△　晋东南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克复陵川、阳城。

△　军令部饬韩德勤对所部“严加整训，并加强党政军一元化之机构”，驱逐新四军，恢复洪泽湖以南地区。

△　驻河北保定、安国、博野、高阳等地日伪军2000余人，合围八路军驻博野白塔村一部，双方激战竟日，各伤亡300余人。战斗结束后，日伪军对当地群众进行报复，杀害男女老幼达650多人。

△　上海市数万商民集会反对伪上海市政府设立中央市场，统制食物，剥削商民，并要求予以撤销。

4月26日　延安各界召开讨汪群众大会，通过决议号召全国各机关及群众团体掀起讨汪群众运动，严禁各级人员和汪派联系，把残余的汪派分子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清除出去；并通电全国，服从蒋委员长的最高领导，坚持抗战到底。

△　军事委员会制定《防止异党兵运方案》，拟定考验、侦察、密告、查禁、联系、检举、分化、吸收、说服、制裁10项措施。

△　何应钦密令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饬其与韩德勤商洽，共同驱除洪泽湖南北之新四军部队。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九支队袭击驻吉林通化县小南河（今属北安县）木业公司之日伪军护林队，毙伤敌60余人。

△　日军对皖南沿江地区进行大“扫荡”。芜湖日军5000余人，在

空军掩护下，向新四军第一团父子岭阵地猛犯，经一天激战，第一团毙伤日军370余人，将其击退。另一路日军3000余人，向新四军第三团何家湾阵地进攻，经一天激战，第三团毙伤日军300余人，日军不支而退。5月6日，反“扫荡”结束，共毙伤日军900余人。

△　晋南闻喜、夏县、安邑、运城等地日军会合南犯，一股3000余在芮城东南遭第二战区阎锡山部迎击，敌向上下曹一带溃退，芮城收复。

△　芜湖日军5000余进占南陵，并分两路向父子岭及南（陵）青（阳）公路侧之何家湾新四军防地进攻。新四军第一、三团奋起抗击，激战终日，将敌击退，歼敌670余人。

△　赣北日军2000余附炮20余门，向靖安以南猛犯，发炮千余发。

△　铃木卓尔赴南京，向板垣征四郎报告与“宋子良”、张治平会谈的情形，称：重庆已表示对日和谈的积极意愿。板垣乐观地表示：中日战争“可望在本年内解决”。

△　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汪精卫、陈公博及各院、部、会首脑，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及日本使节团成员，日顾问影佐、须贺等出席。褚民谊致开会词。阿部信行、汪精卫先后讲话。

4月27日　　行政院组成政务巡视团，各路负责人为：陕、甘、宁、青陈立夫，滇、黔蒋作宾，湘、赣、粤桂蒋廷黻。5月10日，蒋廷黻谈巡视团之任务：一、抗战与人民生活；二、战时各省财政；三、各省实施县政纲要之经过及困难；四、兵役问题。

△　国民政府派胡世泽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禁烟会议代表；派李平衡为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代表。

△　第九战区薛岳部与日军在赣北奉新激战，敌以大炮猛击，并

施放大量瓦斯，奉新不守。守军再攻，于30日克复。

4月28日　蒋介石在成都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总理纪念周演讲，宣示抗战处于紧要关头，策勉每一学生要确立有志竟成的自信，磨砺艰苦奋斗的精神，达成改造军队、改造环境的目的。

△　中国经济学社举行年会，陈嘉庚、马寅初等出席。陈嘉庚发言称："大家平时注意资本家，结果事实相反，真正的力量是在那些平日为人看不起的劳动者。"又称：南洋侨眷"劳动大众要占90%，真正出钱的是他们"。马寅初发言痛斥国民党财阀靠买卖外汇营生的"强盗行为"。

△　晋察冀北线灵丘日军千余人向上寨、下寨地区八路军驻地"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与日军激战竟日，毙伤200余人。日军溃逃中两次施放毒气弹，八路军官兵中毒百余人。

△　日军小艇一艘驶至澳门码头强行登陆，日军至市中心，中国商店、银行纷纷关闭。葡警、葡军旋将日军包围，日军见状返舰驶去。

△　汪精卫与阿部信行及日军驻华总司令西尾寿造等在武汉举行军事会议，制定如下作战方案：一、以占领老河口、宜城之线为目的，发动豫南、鄂北战役；二、鄂北以主力沿襄花路西进，另一部由京钟路北进，会师枣阳，再以信阳之兵力会师襄樊；三、进攻之兵力由各据点抽调。

△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发表演说，强调禁烟与剿匪的重要，并称在三年之内，要使四川全省"没有一个人没有饭吃，没有一个人没有衣穿，也没有一个没有屋住，更没有一个人没有事做"。

4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九年西康省地方金融公债条

例》，定额国币500万元，年息六厘，15年后还清，自公布之日施行。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广东工作。毛泽东指出：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周恩来指出：省委的工作中心，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森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　中国空军大编队轰炸河南信阳、武胜关日军及其运输干线，投弹百余枚。

△　第九战区薛岳部克复赣北靖安。

4月30日　宋子文密电孔祥熙，要求平衡基金委员会设法拨出美金300万元、英镑200万元，以维持目前外汇市场上的金融危机。

△　新四军全军将领通电浙江、福建、江西、江苏、安徽各省国民党军政人员，重申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决心，呼吁加强团结，粉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挑拨离间阴谋。

△　浙东第三战区部队攻克定海县城，焚日伪司令部及电厂。

△　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设立上海大学。

△　日本政府制定《中小工业的转业对策》，拟将国内19个工厂迁移至中国东北。

△　美国调查委员会致电国务卿赫尔，建议美国政府对华借款，认为此时系援助中国币制之“最适宜时机”，同时亦可防止日方利用汪精卫傀儡政权歧视美国在华利益，操纵上海汇兑。

4月下旬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完成美国贷款2000万

美元洽谈，离美返国。行前致电蒋介石，称：“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

是月　　军事委员会撤销桂林行营，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为副主任。

△　经济部拨款269万元改进川丝生产。

△　资源委员会将四川龙溪河水力发电厂长寿分厂改建为长寿电厂，由黄育贤主持。抗战胜利后，改由胡道济主持。

△　第八战区成立战地复兴委员会和土地整理委员会，宣布停止放垦，对已放垦的土地进行清理整顿，将清理出地主执照外的耕地，按谁种谁耕的原则永租，并创建军耕农场，安置随军烈士家属和作战伤残官兵。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要点为：启发并提高全回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保护清真寺；实施抗战教育，培植抗战建国的回族人才；改善回、汉、蒙等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帮助回族改善人民生活，激发回族人民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指出目前“最适当可能的形式是游击战争”，并指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今后的任务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绥远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势力共同抗日；加强民联团结工作；组织群众，进行宣传；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阶级教育，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

△　美国调查委员会调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旷世罕闻。自战争爆发后，中国损失书籍达1500万册，其中若干为稀有之古版及手

抄的古书。中国高等教育机关108所中，被迫停办的有25所。

5月

5月1日　　枣宜会战开始。信阳、随县、钟祥三地之日军各以战车引导，飞机及炮兵火力支援，突破第五战区临时阵地线，向枣阳方面进行包围。其前进态势计分六路：第一路由长台关经明港转向泌阳、唐河，以向枣阳；第二路由信阳至桐柏而西向枣阳；第三路由随县北攻至高城，经唐县镇、随阳店向枣阳；第四路由随县经安居镇、环潭镇、吴家店，以向枣阳；第五路由钟祥北攻长寿店、张家集、汪家店、田家集以向枣阳；第六路由钟祥北攻洋梓，沿汉江以东，直向枣阳。此六路，北二路为右翼，南二路为左翼。日军先以两翼向枣阳行包围攻击，尔后中央的两路再攻击前进，以会师枣阳。

△　晨，信阳方面日军第三、第四十师团一部六七万人，在飞机、炮火支援下，向枣阳方面发动进攻。第四十师团梨刚联队由信阳向桐柏以东小林店进犯，第三师团一部由长台关沿邢集、毛集，主力由信阳以北迂回明港，经任店、竹沟向泌阳以西进攻。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池峰城第三十军在小林店，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在查山、明港，李仙洲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在任店与日军激战。午后，日军攻占小林店、明港、任店等地。

△　钟祥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第十五师团及装甲兵团一部、飞行大队、骑、炮兵各一部约三万人，由洋梓、黄家集一带向第五十九军黄维纲部第一八〇师、骑兵第九师阵地进攻。2日，突破长寿店阵地，向普门冲、马家集一带进攻。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第一七九、一三二师撤退至垭口以东地区，向田家集之敌侧击。

△　国民政府决定自是日至1941年4月30日为兵役改进年，命令各地于每次国民月会中讲解兵役法令，进行兵役宣传，开展防止逃兵运动。

△　国民政府任命钱昌照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欢迎宋庆龄茶会，林森、吴敬恒、于右任、何应钦、邵力子、陈立夫、孙科等出席，林森致词盛赞宋庆龄在港筹款救济难民，成效卓著，此次入川，为抗战增加力量不少。宋庆龄致词，切望精诚团结，共救危亡。

△　蒋介石在成都对四川省训练团干部演讲《推进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务》，称地方自治以经济为基础，应注意调剂物资、加强运输、协助农贷、清丈土地、开辟公荒；并提出目前亟应完成的工作为健全兵役、协助清乡、查编民枪、禁绝烟毒。

△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祖晃为第四十六军军长。

△　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彭雪枫在《新华日报》发表《新四军全体将领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表示“竭诚拥护政府，拥护委座，拥护国策，信守不渝，必不使逆贼得遂其离间挑拨之奸巧”。“日寇国仇，汪逆国贼，抗敌讨逆，分属军人”。

△　南洋华侨归国慰劳团离重庆分赴各地进行慰劳活动。第一团由潘国渠率领，前往川、陕、豫、鄂、皖五省；第二团由陈忠赣率领，前往湘、浙、赣、闽、粤、桂六省；第三团由陈肇基率领，前往甘、青、宁、绥、川等省，并约定事毕各自解散返南洋。

△　日机八架轰炸贵阳，投弹多枚，中央医院中二弹。死医生、护士四人，伤数人。

△　汪伪政府决定成立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任命梅思平为委员长。同日，汪伪中央通讯社在南京成立，林柏生为理事长（原中华通讯社于4月30日解散）。

5月2日　　经济部发布通令：对于战区或接近战区的渔业、矿

业、林业及特种营业权之更名，或其权益之转移抵押变更，不动产之移用或抵押，各公司股东之更名，股份之转移或抵押等，一律须经本部核准，否则概属无效。

△　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对同蒲路南段各要冲发动进攻，是日克复西侯马，并占领侯马车站，切断同蒲路。

△　信阳方面日军万余附炮30门、战车60余辆进至小林店以西及毛集、竹沟一带，继续向泌阳方面进犯。第三十军池峰城部第二十七师在李新集，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第一四三师在邢集，第一一九师在毛集、黄冈一带与日军激战，敌不支向西急退。5日，泌阳陷落。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由确山西移，协同池峰城第三十军围歼信阳日军，第十三军张雪中部第一一〇师在泌阳西大河屯伏击歼敌。

△　第三战区皖南部队克复南陵，皖中部队克复含山。

△　苏联空军志愿队飞机13架，分别轰炸湖北钟祥日军机场和山西运城日军机场。

△　山西昔阳日军以“清政”为名，抓捕进步知识分子和伪机关人员，是日活埋100多人。

5月3日　　国民政府任命万福麟为辽宁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邹作华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缪澂流为热河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国民政府拟定甘肃省为西北粮仓中心，发放农贷2000万元。

△　蒋介石为中原作战电示卫立煌，令对洛阳、南阳、临汝、登封、许昌各要点，“应派定相当部队速作严密固守之准备，以为抑制敌军前进，而使我各方部队得以从容进击”。

△　随枣方面第五十九军军长黄维纲指挥第一八〇、第三十八

师、骑兵第九师在新集一带与日军激战，后向双沟方面日军进击。廖震第四十四军、许绍宗第六十七军在茅茨畈东南山地向长寿店日军侧击。5日，第三十八师在田家集击溃日军3000余名。

△　随枣方面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一部10万余人，由第十一军总司令官团部和一郎指挥，向随县西北陈鼎勋第四十五军、莫树杰第八十四军阵地进犯。守军各部以有力部队坚守阵地，主力逐次后撤。5日，日军进至环潭镇、唐县镇、高城镇。

△　桂南邕钦路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克复平乐，歼灭日军百余人。

△　八路军吕正操部在河北霸县歼灭进犯日伪军2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山东聊城东南歼灭日伪军150余人。

△　香港工商界12个团体联名通电讨汪。

△　伪满公布《开拓团法》，进一步从法律上为日本大规模向东北移民给予承认和保护，企图使日本开拓团真正成为其实行殖民统治的据点。

△　日军宣布：自5月15日起开放黄浦江。

△　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在日本国际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宣称日本外交的首要目的是解决“中国事变”；为此，一方面对汪政权将支持到底，同时要加强对重庆政府的军事压力，使其尽快崩溃或投降。

△　日本大本营制定《昭和十五年（1940）度在华兵力调整要领》：一、着手调整的时间：6月上旬。二、在华兵力总数：昭和十五年10月底75万；昭和十五年11月底72万，以后维持在72万。三、新增加的两个精锐师团，包括在上述兵力数内。6月6日，参谋本部作出中国派遣军编制定员数的决定：华北地区人员25.3万人，马匹4.05

万匹；华中地区人员33.2万人，马匹7.45万匹；华南地区人员14.9万人，马匹3.3万匹。合计人员73.4万人，马匹14.8万匹。

5月4日　国民政府任命张彭春为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

△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汉奸宋启秀、苏体仁。

△　随枣方面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及第六师团一部，向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发动进攻。5日，先后攻占黄部高城、安居等阵地，守军退守环潭、唐县及高城以北之线。

△　中共中央发出对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的限制和压迫，在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的地区内，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部在晋西北岚县城郊歼灭日伪军700余人。

△　上海全市学生总会成立，参加者有大学27所，中学63所，并通电全国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声讨汪逆伪政权。

△　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筹备组织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任唐蟒为总司令。

△　伪满洲国发行日货公债5000万元。

5月5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发动白晋战役，该部第三八五旅及地方民众分五路向白晋路沿线沁源、固亦、漳源、权店、南关及来远各日伪军据点进攻，战至7日，歼敌350余人，破坏铁路、公路200余里，击毁火车一列。

△　军事委员会任命萧之楚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第九战区薛岳部攻克湘北羊楼司，焚毁仓库两座，破坏铁路七八处。

△　第八十四军莫树杰部与日军在枣阳东之环潭镇、唐县镇、高城镇一带交战，第一七四师于唐县镇北侧击北窜之敌，主力向敌外翼邓县附近后撤。陈鼎勋第四十五军向安居附近转移，协同大洪山第六十七军许绍宗部侧击日军之后路。唐县镇日军继续向西北进犯，7日攻陷随阳店、吴家店。

△　信阳方面日军突破第三十军池峰城部防地，进陷桐柏，该军逐次后撤。

△　据《中央日报》称：桂南宾阳为日军烧杀，灾情极重，县政府调查共死亡1891人，失踪490人，毁房屋3960间，计2077户。省府特拨款10万元赈济。

5月6日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攻克晋南曲沃。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玉堂为第十军军长。

△　唐河失陷。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师各部分别在西新集、固县、沙河铺与日军激战，日军越桐柏、泌阳西犯，守军各部亦向唐、泌间转进，与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夹击西犯之敌。午后，日军先头部队3000余攻陷唐河，守军刘光汉部向唐河西转移。

△　汪伪政府成立军事训练部，任援道任部长。

5月7日　经济部长翁文灏由渝抵蓉，是日对川省经济界人士谈话称：“川省农产丰富，唯农村金融尚待继续协助，故四行及农本局更当增加农贷资金至万万元以上，俾多数农民得以实沾其益”，对于工业、矿业，“政府当努力提倡，甚盼有资本有能力之国民，奋起开

发”。

△　随枣方面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第三十八、第七十四师在枣阳西南方家集与日军激战，歼敌千余，继向枣阳、双沟方面日军压迫。11日，在土桥铺、兴隆寺一带激战。12日，第七十五军周碞部东渡襄河增援，进至吕堰镇附近，向刘家集、小申、高家田等处日军压迫，使日军陷于包围之中。

△　唐河日军一部向南阳进犯，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主力协同第十八军彭善部、第十三军张雪中部在源潭镇一带堵击，日军不支窜回唐河。其时，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由源潭镇向唐河包围，第九十二军主力绕至唐河以东，第三十军主力由唐（河）南（阳）大道以南袭击唐河。日军三面压迫，主力向唐河西南急窜，与由随县、钟祥北上之日军第六、三十九、十三师团会合，在枣阳以北驻守。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皖南青阳。

5月8日　　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一部与日军在唐河附近激战，日军溃败，唐河克复。

△　陈鼎勋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收复鄂北关门山、向资山。11日，又克吴家店，残敌北窜枣阳，与桐柏、唐河西犯日军会合。

△　枣阳失陷。日军向唐县镇发起进攻，并以战车从两翼包围，守备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钟毅部受敌四面压迫放弃枣阳。日军得以逐次攻占随阳店、吴家店，是日占领枣阳。钟部主力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师长钟毅在突围中壮烈殉国，部下官兵伤亡惨重。

△　李及兰第九十四军、王缵斌第七军、陈鼎勋第四十五军等部以日军陷枣阳，乘机向敌后攻击。第九十四军自宜昌、江陵方面东进至汉宜公路，攻击应城、京山、皂市、云梦地区。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向信阳方面进攻，是日收复明港。第七军与鄂东游击队攻占平汉铁

路沿线之鸡公山、李家寨、柳林东站等据点。第四十五军一部攻克随县附近安居、均川等据点，断敌后路。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雨卿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免邓宝珊新编第一军军长职。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马路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工资待遇。清洁工、粪车工起而响应。14日，4000余名罢工工人推派代表向纳税华人会、特区市民联合会等公团请愿，提出五项条件，要求转达工部局。经工人推派代表与工部局工务处数次谈判，罢工获胜，工人于17日复工。

△　汪伪政府任命邵文凯为伪宪兵总司令。

5月9日　　兼四川省主席蒋介石核定《四川省经济建设纲要》，以土地、农林、工矿、交通、贸易、金融、垦殖、卫生八项为建设之主干。10日，国民政府定四川省为“抗战建国根据地”。

△　宋蔼龄、宋庆龄由重庆返抵香港。20日，宋庆龄发表重庆之行观感，指出：人民对抗战信念极坚，内地生产建设与日俱进，人民团结，抗战必胜。并称：各方均深明抗战大义，情绪高昂，敌伪造谣徒见心劳日拙。

△　周恩来会见协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实现通邮事宜的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林卓午，赞许和勉励他致力于国共通邮事业，并为之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　周恩来致函阎锡山，建议山西新、旧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略称：“临汾失守后，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恢复失邑，成绩昭然，而全国亦咸以敌后模范归功先生。乃奸人见忌，故抨新军于外，以毁先生之长城。来实为我山西之模范抗日阵线痛惜不置。”并称：“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解决，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

以利抗战。……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

△　随枣方面自唐河溃败之日军窜新野、邓县以南地区，第三十军池峰城部第三十、三十一师，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第三十二师及第十三军张雪中部第一一〇师协同夹击，将邓县之敌击溃。

△　驻法大使顾维钧在巴黎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演说，指出：中国向来崇尚思想自由，远东方面若有人妄冀树立霸权，为不可想象之事；并称：“中国之存在，足以保障太平洋之和平。”

5月10日　蒋介石电令李宗仁等：鄂北之敌经我多日围攻，粮弹殆尽，必向原阵地退却，第五战区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时机，以全力围攻捕捉。

△　国民党中央指定叶楚伧、张群、王世杰、许孝炎、李中襄等八人为宪草研究人员，俟其研究之成果，与各参政员之意见趋于一致时，再行召开宪政期成会，制定最后一次之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讨论，以产生完整而切合需要之中华民国宪法。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宏光为新编第三军代军长。

△　周恩来离延安前往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并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于31日到达重庆。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皖南繁昌，日军溃退芜湖。

△　张雪中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围攻新野方面日军，敌伤亡惨重向枣阳南窜，新野遂告克复。同日，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一部及池峰城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攻克泌阳。12日，攻克桐柏。

△　日军进犯晋西，是日陷乡宁、吉县。17日，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复乡宁，残敌经林山庙、天神庙南窜河津。

△　伪广东省政府成立，陈公博兼省主席。14日，汪伪政府派招桂章为广东省江防司令。

△　英国战时内阁成立，丘吉尔任首相。11日，英外交部次官白特勒宣布：继续遵守《九国公约》之原则，不承认中国之汪伪组织。12日，蒋介石电贺丘吉尔任首相。

5月上旬　　朱德在洛阳与卫立煌会晤，在欢迎会上，强调只有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随后，与卫就两军防区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卫立煌部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5月11日　　拉萨市民众通电讨汪，表示“坚决抗战到底之决心，誓不与国贼共立”。

△　第四十五军陈鼎勋部第一二七师克复随县西北吴家店。钟祥方面日军与李宗仁部守军在土桥铺、兴隆集一带激战。同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豫南武胜关。

△　国民政府以前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吴承仕“前岁敌陷北平，以其鼓吹抗日，指名搜捕，几遭不测，嗣走津门，仍努力撰文，激发民族思想，未因处境艰危，稍渝初志，卒于去秋被捕，不屈不挠，殉义捐躯”，是日明令褒扬，并特给恤金3000元。

△　教育部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是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聘任吴敬恒、朱家骅、张君劢、陈大齐、陈布雷、马寅初、蒋梦麟、吴有训等25人为委员，该会任务为：审议全国各大学之学术研究事项；专科以上学校教员资格之审查事项；审议国际文化之合作事项等八项。

△　赈济委员会总干事孙亚夫向中央社记者谈河北灾情与救济：据报告，河北灾区达100县市，灾民达700余万人，受灾面积3590余万亩。除水灾外，又重以兵、旱、虫灾。中央已拨款200万元以上，

派员前往河北赈济。

△　复旦大学校董会开会决议，准前代理校长钱新之辞职，由吴南轩继任校长。

5月12日　第五战区各部向枣阳日军展开反攻，日军被迫向枣阳以南收缩，唐河、泌阳收复。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赵锡光为第三十六军代军长。

△　重庆各界人士开会，欢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团长鹿地亘及团员坂本秀等17人。郭沫若主持并致词，对该团以热血参加中国抗战工作，不惜牺牲生命劝告敌军反战同志来归深表谢意。

△　军事委员会扣发新四军军饷后，新四军供应困难，保卫中国大同盟上海分会筹集10万元两次慰劳新四军。是日，第二次慰劳团团长吴大琨离开新四军军部返沪途经安徽太平，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押送上饶集中营。1942年11月12日吴大琨经人保释出狱。

△　上海公共租界筑路工人、清洁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未遂，举行罢工。16日，工部局工程修理部工人全体怠工。下午，工部局被迫答应工人所提条件，各部工人遂于17日晨复工。

△　周佛海等在汉口与日军联络部长柴山及浅见会谈汪伪政府之财政统一问题。柴山同意将武汉税收权交与汪政府，但对起始日期及上缴数额意见不一，谈判无结果。14日，继续会谈成立财政整理委员会和向中央解交款项问题，仍未谈妥。15日，周佛海等返宁。

5月13日　蒋介石电令李宗仁等，“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眼，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

△　随枣方面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克复明港，第八十四军莫树杰

部克复唐县镇。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在黄家垱、万家集、据家湾堵敌南退，毙伤日军700多人。

△　蒋介石通令严禁盐业商人等不得借故捣乱妨碍增加盐产及扰乱盐市。

△　社会部长谷正纲对记者谈话称：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后的工作重点为：派员参加各社会团体，并加强指导；厉行干部训练；普遍推行社会服务；普及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　中统局致函社会部，请转饬各级党部“在每一地区各组织一个或二个外围团体，专事打击某党活动”，并拟定对共产党实行“取缔与制裁”办法三项。

△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诬指《新华日报》（华北版）近月来肆意破坏抗战，削弱抗战力量，请求转呈中央及国民政府明令查封该报，“并查办该报主办人及毛泽东、王稼祥等，以弭乱源”。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部在晋东南辽县、和顺方面与进犯日军展开激战，至24日，先后将辽县、榆社间之营头、杨克店攻克，全歼伪救国军第二师一团。

△　“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与日本今井武夫在香港会谈，报告重庆方面的意见。“宋子良”强调承认“满洲国”和华北驻兵是重庆方面最困难的问题。“宋子良”希望日方放宽谈判条件，日方表示决不让步，至17日未取得一致意见，宣告休会。2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决定仍坚持日方的谈判条件。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联合行动轰炸中国内地的协定，其轰炸行动代号称“101号作战”。作战时间预定自5月中旬起约三个月，第一期作战主要为重庆方面，

第二期作战为成都方面。投入的航空部队有陆军第三飞行集团和海军联合空袭部队，以武汉、孝感、运城为起飞基地。

△ 日军犯粤北，是日由神冈进至从化街口，花县得而复失。17日，日军再陷从化。

5月14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聘孔祥熙、周钟岳、陈立夫、李石曾、张静江、叶楚伧、张伯苓、吴敬恒、张继、蒋梦麟、邵力子、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朱家骅、顾颉刚、李济、李书华、傅斯年、陈垣、马超俊、蒋廷黻等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并通过《小学教员待遇规程》。

△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仲江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 周恩来在西安会见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就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事向蒋提出抗议。

△ 抗战救国教育团李公朴等一行10余人，结束对晋察冀边区15县、500余村镇的考察，是日到达晋东南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鄂南通山，残敌北窜。

△ 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克复枣阳北湖河镇。池峰城第三十军一部进抵苍台镇东北，向郭滩镇进击。第十三军张雪中部新编第一师由苍台镇东南侧击北犯之敌。日军陷重围，以一部突围沿襄河东岸南窜，主力在枣阳一带筑构工事固守。同日，汤恩伯部及第三十军攻占枣阳以北湖阳镇。

△ 张自忠率特务营及第七十四师主力驰往瓜店堵击日军。15日，日军一部由峪南窜至方家集，张自忠及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人员围歼该敌，敌不支突围南逃。

△ 八路军吕正操部在河北深县歼灭进犯之日伪军120余人。

△　晋东南辽县日军第四混成旅团1000余人西犯长城、管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锡联第三八五旅予以阻击，毙伤敌约500人，毙伤骡马300头，残敌逃回辽县。

△　汪伪政府官制改革，军政部改为陆军部，与海军部一并隶属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裁参谋本部与政治训练部；军事训练部与兵监合建为三厅；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改称总务厅；成立广东江防司令部。

5月15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国际形势发表谈话，表示无论国际情势最近之发展如何，中国之外交政策并无变更，“吾人抵抗日本侵略之坚强决心始终不渝，非至日本军阀偿赎其破坏东亚和平与秩序之罪恶，吾人决不停止抗战”。并称：“吾人对日本任何干涉荷印之行动，不能不表示关切，因中国在荷印之华侨约百万以上，对荷印经济之发展颇有贡献，且拥有巨额之投资。”

△　新任农林部部长陈济棠对记者谈该部之设施，略称：农林部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为罗致全国科技专家，将科学知识、人工技术普及于农村，加强农林生产，增加国富。并称将赴各地考察战时农业生产。

△　赈济委员会为赈济粤、桂战区灾民，先后拨款共200万元，并派员于是日飞桂、粤两省，妥定善后办法。

△　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第六战区，其作战地域并入第九战区。

△　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在张家集、马家集，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第一三二师在长寿店与日军激战。同日，日军一部由枣阳东南溃窜，陈鼎勋第四十五军、莫树杰第八十四军在唐县镇附近夹击该敌。

△　第五战区鄂南游击队攻入蒲圻，毁日伪军仓库数处，日军派

兵施救，被毙伤甚多。

△　第七十五军周碞部克复襄阳北吕堰驿，并协同第五十六师向双沟方面日军进击。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第三四四旅、第一二九师新三旅及吕正操部冀中军区南下支队共七个团，向山东东明以东之东明集等处石友三部发起攻击，歼其第一八一师等部800余人。同日，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鲁西、冀鲁边、冀南、冀鲁豫等部队，在鲁西及冀南地区讨伐石友三，石部被歼及逃散的约1.5万人，八路军直捣石部基地濮阳、濮县，控制了冀南、鲁西10个县。

△　日军大本营为加强对重庆航空进攻作战，决定增加陆海军对华航空力量，华北由98架增至101架，华中由141架增至180架，华南由83架增至127架，总计由322架增至408架，重点指向华中、华南。

5月16日　　张自忠殉国。15日晨，日军一部三四千人附炮20余门、飞机30余架助战，向枣阳南之南瓜店发起进攻，图夺路南逃，张自忠率第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敌激战六七次，伤亡较重。是日，日军复以大部向张部包围，张自忠登山督战，指挥所部与敌肉搏，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张部官兵亦大部阵亡。战至下午1时，日军冲至山上，张自忠已身中数弹，右胸穿洞，左右劝其转移，张坚决不肯，为防落入敌手，乃拔枪自戕，壮烈殉国。临终对随从官兵嘱称："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

△　枣阳克复。枣阳附近第五战区各部向枣阳发起进攻，池峰城第三十军、舒荣第八十九师一部攻克七房岗、土桥铺；张雪中第十三军一部克复枣阳。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在重庆向报界人士谈豫鄂大捷之意义，称豫鄂大捷"确证倭寇在军事上已至开始崩溃之时期，此后必无力再行大规模之进攻，使我最后胜利之信念愈益坚强，其意义较湘北

为尤大，收获为尤多”。

△　何应钦致电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石友三“暗通敌伪”曲意辩护，诬称朱德、彭德怀来电是对石“妄加诬蔑”，并命八路军退出鲁西地区。

△　资源委员会在四川犍为成立犍为焦油厂，由陈梓庆主持，有员工217人。抗战胜利后结束，让予四川省乐山职业学校。

△　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制定关于举行蒋介石、板垣长沙会谈商定局部停战的计划，拟将第九战区之蒲圻、萍乡、监利、湘乡一带作为局部停战地区。若薛岳响应局部停战，便可看出中国方面的诚意，并有由局部停战扩大为全国停战的趋向。

△　汪伪政府答礼使节团赴日本，陈公博为专使。21日抵东京，陈发表讲话表示“以最大诚意，努力于和平方案之实现”。21日晚，米内首相设宴招待，并称日本决加倍克服一切障碍，完成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大业。

5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安徽合肥县长张敬文，令称：张敬文在敌陷皖北“迫任伪职，乃勖勉诸子杀贼报国，并自从容仰药，以死明志”，“教忠取义，洵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

△　中国茶叶公司改为国营茶叶专业公司，办理全国茶叶生产、制造、收购、运销及对外贸易等一切业务，由国库拨资1000万元，并由财政部派潘宜之为董事长，寿景伟为总经理。

△　日军由枣阳东南增兵5000余人，战车数辆，向枣阳反攻，第十三军猝不及防，枣阳陷敌，守军被迫退至枣阳附近。20日，枣阳附近各部除以小部队迟滞日军北进外，主力向唐河西南、新野西北、白河以西转移。

5月18日　何应钦招待驻重庆各国武官及记者，说明豫鄂大捷之

经过与意义，称此次大捷之意义概有两端：第一，敌谋包围歼灭我野战军之毒计，已为我完全粉碎。第二，敌初企图包围我军，施行一大规模歼灭战，结果反为我军重重包围，遭受最奇重之损失。

△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树田为第十八军军长。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致电李宗仁，祝贺豫鄂大捷，称此捷“仰百炼之储威，集空前之肤绩，破倭寇之迷梦，扬炎汉之天声”，“抗战全功，指顾可期”。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继攻克豫南平靖关后，是日又攻入信阳，将信阳机场日机12架击毁。信阳西南贤山日军驰援，与刘汝明第六十八军一部遭遇。

△　国民政府派驻古公使李迪俊为议订《中多（多米尼加）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于右任为会长，参加者有西藏、云南、蒙古、新疆等边疆省代表。

△　日本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对重庆和成都实施攻击，是日袭击重庆附近之白市驿和梁山两机场。

△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作出《以昭和十五、十六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其方针为：“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使重庆政权屈服”，时机不迟于1940年底。如此时重庆政权尚未屈服，“不问形势如何，断然实行长期解决方针，以对付各种形势的变化”。当前对华谋略工作的重点措施在于：一、进行各种努力，促进对重庆直接停战的和平交涉。二、加强使新中央政府容纳重庆政权的措施。三、如有可能，尽力利用第三国对重庆政权进行搭桥工作。四、促进国共分离。另外，在此期间，随着形势的发展，应特别加强对华北的领导力量。

5月19日　　白崇禧电李宗仁，祝贺豫鄂大捷，称“此次日寇西犯，深赖我公德威，诸兄指挥得力，歼除残寇，碎彼企图，逖德好音，欢腾无比，特电致贺”。

△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指出石友三投敌叛国，袭击八路军，近日更形猖獗，我方获得西北行营致石友三密电称：划定曹县、定陶、菏泽、东明、考城、巨野、成武、单县为该石部所辖，负责消灭小股共军及切断华北共军与华中共军联络之任务，要求将石部“调至洛阳加以整训，以免危害华北抗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桂干生支队，在山西昔阳东歼灭出扰之日伪军150余名。

△　粤北日军陷鸡笼冈，20日陷良口。24日，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反攻良口，毙敌2000余名。

△　日机40架五批轰炸成都市，被中国军队击落一架，坠于三台。

5月20日　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报告《对于豫鄂会战我们应有的认识》，指出“倭寇必然崩溃”、“汪逆必然覆灭”、“抗战胜利的信心益坚，胜利的时间益近”，是应当加强的三点认识。

△　中苏文化协会致书苏联人民：“你们是世界上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我们被压迫人类最真诚的朋友。”

△　日军在四五十架飞机及战车200余辆掩护下，分向枣阳北湖阳镇、湖河镇、杨家垱、七房岗等地进攻。21日，陷湖阳镇、湖河镇，并向新野、下屯镇等地窜扰。22日，新野日军窜向枣阳，下屯镇日军向西南进犯。

△　日机24架再次空袭四川梁山机场，中国空军起飞迎战，击落

日机七架。同日，日机炸陕西南郑西北医学院，死伤师生10余人。

5月21日　经济部长翁文灏告戒部属“持躬必须清廉，治事务求公正”，切不可贪图私利，袒护亲友，如有凭借地位营私舞弊者，一经查出，定必重惩。

△　全国妇女慰劳总会主任委员宋美龄以日机屡袭重庆，空军将士奋勇作战，特组慰劳团是日赴前方劳军。

△　豫北第一战区卫立煌部炸毁漳河铁桥，歼灭守备日伪军百余名，获枪百余支。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突袭黑龙江嫩江县四站（塔溪）伪警察署及驻守伪军，俘敌30余人。同日，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一部在饶河县大代河伏击伪军，毙伤敌20余人。第二支队长王汝起不幸阵亡。

△　日机50余架两次袭击重庆，被中国空军击落一架，坠于长寿附近。

5月22日　山西阳城日军以“开会”为名，将四乡群众220余人集中城内，进行集体屠杀，被杀害者近200人。

5月23日　信阳伪皇协团团长吕西周、傅雨挥，伪和平军团长袁兴国乘夜率部重创日军，后全部反正。同日，信阳伪军第三旅旅长陈维汉、第四旅旅长王祥斋闻讯，率部人枪千余反正。

△　陈公博等拜见日本天皇，又会见首相米内、海相吉田、前首相近卫等，并与米内会谈。陈公博报告了汪伪政权成立后之状况，希望日本朝野对其大力协助，并尽快调整邦交。

△　日本陆军部田川大吉郎曾与司徒雷登在上海会谈中日和平事宜，是日田川向畑俊六报告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会晤情况，略称：蒋介

石希望达成和平协定，并相信早日和睦地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是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的。司徒雷登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双方都站在平等的地位，谋求东亚的永久和平与亲善，即可实现和平。

5月24日　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请明令褒扬故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故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捐躯报国”事迹，“以资激劝，而慰英灵”。

△　军事委员会任命冯治安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徐景唐为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攻克皖南铜陵。

△　湖北省36县已成战区，备受战争涂炭，灾民总数达100余万人，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是日拨款100余万元，予紧急赈济。

5月25日　国民政府明令陆军中将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特加陆军上将衔。

△　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严饬所属各机关切实组织服务队，参加反空袭服务。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天民为第十五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罗瑞卿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王若飞为八路军副参谋长，驻军委办事。

△　第四战区所部克复粤北良口西南风火岭，毙日军联队长山本二郎以下500余人，俘军官荒木松子等三人。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猛攻道清路沿线，攻入滑县县城，激战两日，毙伤日伪军500余人。

△　日军第十一军下达强渡襄河、攻占襄樊的命令，要求于5月31

日子夜第三师团从襄阳东南方奇袭渡过汉水，并攻占襄阳，第三十九师团从王家集一带奇袭过汉水，配合第三师团作战。

5月26日　南洋华侨归国慰劳团团长陈嘉庚偕侯西反、李铁民等自兰州抵达西安，西安各界千余人前往城郊欢迎。

△　据中央社讯：四行总处为资源委员会借款5000万元，以助其发展国营工业，收购大量矿产。

△　豫北伪先导军司令张雪青率部反正。

△　日机72架两批轰炸重庆，被击落两架。同日日机136架四批轰炸合川、綦江、永川一带。

5月27日　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为日机迭炸重庆各大学、中学、医院、住宅区，呼吁美国政府从速禁止钢铁及石油输日，以制止日军暴行。

△　铨叙部颁布《公务员晋级办法》。

△　据中央社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小学教师对地方自治助力极大，特通令全国各级党部，今后务须注意征收小学教师入党。

△　上海日商华生烟草公司1900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五成及改善待遇。31日，资方答应自6月1日起增加工资三成，罢工结束。

△　第四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冯家邦向军委会政治部揭发该军腐败不法之状：经济财务混乱，各级军官私吞军饷，中饱私囊；吃喝嫖赌，战事不参，固步自封；军风败坏，强占民物，拉伕拉差，奸淫妇女；军民之间，视若仇敌；抗日救护工作十分落后，每次战役之后，伤亡官兵流离载道，惨痛不可言状；每遇部队移动，强取民间骡马，到达一地，视为己有；官兵皆吸食毒品。

△　山西昔阳日军700余人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阻敌，毙伤日军300余人。

△　日伪军2000余人由安徽滁县出发“扫荡”，侵占来安县城。新四军第五支队于31日分三路夜袭来安城，歼灭日伪军200余名。同日，定远日伪军400余人进攻藕塘地区，被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击退。

△　日机160余架轰炸重庆，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多处被炸。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等遭炸遇难。

5月28日　蒋介石致电军事委员会各办公厅主任、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绥靖主任、各集团军司令、各军长、师长，追述张自忠英勇抗战及殉国的事迹，并称：“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张自忠字）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光荣，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

△　张自忠灵柩运抵重庆。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及重庆各界人士数百人前往朝天门码头迎灵，蒋介石亲为执绋。下午3时，举行盛大葬礼，旋运灵柩至北碚双柏树暂厝，俟抗战胜利后举行国葬。6月，军事委员会通报并呈准国民政府颁抚恤金10万元。

△　行政院决定在重庆建立“忠烈祠”一所，采录抗日殉难烈士诸人姓名，为位以祀，以彰中央褒忠之典，而励来者响义之心。

△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在大专学校发展党务一事函告中央组织部称：云南大专学校林立，教授甚多，学生几万人，其中人才不少，若能趁此发展党务，则既可利用在校学生做训练民众工作，又可使知识分子和本党发生密切联系，使之监察异党活动，尤为方便。此事党部不宜直接出面。如由中央指派以地方党部为主体，加入各校中本党的领导分子，共同组织一文化运动委员会进行此项工作，运用似较灵

活。

△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府主席黄旭初，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等发起组织的广西宪政协进会在桂林成立，并发表宣言：主张实行孙中山遗教；五五宪章应予修改；中央地方均权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国有。

△　中国空军袭击湖北安陆，炸毁日军汽车数十辆。

△　日军千余人进攻新四军驻江苏江都东南大桥附近之部队，激战竟日。时第三战区一部五个团亦向新四军侧背进攻，与日军遥相呼应。新四军腹背受敌，放弃大桥阵地，毙日军400余人，其中旅团长一人。

△　日军7000余人分途向山东临沂、蒙阴抗日根据地进犯；德县、平原、陵县等地日军4000余人三路向陵县八路军一部进犯，被八路军全部击溃。

△　日机98架三批轰炸重庆，在近郊投掷爆炸弹、燃烧弹160余枚，数处起火，市民死伤250余人。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日中《预备会谈指导要领》，要旨为："诱使重庆同意停战条件，基本形成停战议定书。关于合流问题以及和议开始问题，随谈判的进展，一旦意见一致，便继续努力，以导致要人的会见和在协议上签字。"关于蒋、汪合流问题，"使汪与重庆双方理解停战与合流的相互关系，首先实行停战，尔后诱其合流"。其方案为："（一）依靠日本方面居间调解；（二）由汪拿出提案；（三）由重庆方面拿出方案；（四）依靠第三国居间调解。"

5月29日　国民政府明令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一律改称孙中山为国父；在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维纲为第五十九军军长。

△　驻苏大使邵力子启程赴任。6月7日，抵达莫斯科。11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递交国书。

△　河南省赈济委员会函告社会部，河南待赈灾民除黄、沁两泛区约210余万人外，其他灾区亦在260余万人，请求赈济。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自苏北宫河东向兴化进击，攻入城垣，歼敌600余人，克复兴化。

△　晋察冀边区军民经10余日作战，于是日克复耿村、台怀、上社等地，歼灭日伪军700余人，粉碎日军对五台东北山区的“扫荡”。日军溃退时，沿途烧杀抢掠，村庄、庙宇多被烧毁。

△　日机63架轰炸重庆平民区及文化区，在重庆大学投弹50余枚，市民伤亡二三十人。中国军队击落日机一架。

△　日本兴亚院专门委员会草成《日汪基本条约》初稿。30日，提交陆军省审核，得出如下结论：一、如果承认汪政权，必然形成长期持久战。二、关于长期持久战的决心与处置，另行研究。三、即使承认汪政权，该政权也无发展前途。

△　美国传教士梅福林等以日机连日狂炸重庆市平民区及文化区，电请总统罗斯福立即对日禁运煤油、废铁。

5月30日　驻美大使胡适拜会美总统罗斯福，递交孔祥熙乞美襄助维持中国金融密函一件，并告外传中日代表在港议和之说完全为无稽之谈。

△　国民党中央派孙左齐为湖北省党部书记长。

△　国民外交协会以敌机肆虐，残杀平民，特电美国朝野，呼吁

对日禁运。

△　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在衡水县城和安家村之间康庄设伏，歼灭日伪军170余人，俘伪军60余人。

△　汪伪政府特派任援道兼海军部代部长。

5月31日　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归国慰劳团第一团抵延安慰问，延安各界5000余人举行欢迎仪式。陈嘉庚即席讲演，激励人民坚持抗战，打倒汪精卫派妥协分子。6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宴请陈嘉庚一行。后陈嘉庚等参观访问第四军校、安塞县等。8日离延安经鄜县赴宜川，前往山西考察。

△　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致书何应钦，报告张自忠殉国之经过，并称：据报张自忠殉国后，日军将其尸体抬至30里外之陈家集附近，洗净用布包裹，备棺埋葬，立木牌为标志，并向陵墓敬礼。要求将张将军殉难经过发交军令部参考，备作史料。

△　据《中央日报》讯称：湖北、江苏、湖南、浙江、山西、安徽、江西、西康、四川、西京（今西安市）、贵州、南京、陕西、福建、广西、河南、绥远、甘肃、青海、宁夏、青岛等22省、市已办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宜，名册已呈国民政府备案。

△　成都五大学美籍教职员及旅蓉美侨40余人，愤日机不断袭渝，滥炸文化区或大中学校，师生惨罹不幸，电请罗斯福总统禁以汽油、钢铁输日。

△　豫北伪军许存礼、张实励率部700余人反正。

△　晚，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等约万人，以毒气为掩护，分由襄樊、宜城间欧家庙、王家集、小河、明正铺强渡襄河，企图占领襄樊、南漳，攻略沙市、宜昌。枣宜会战第二期作战开始。

5月下旬　宋庆龄对香港记者发表谈话，痛斥汪精卫“国内分裂在即”的谣言，指出：这只是“他们的梦想，值此大敌当前，困难未除，我信贤明当局均不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为日寇所乘。只有少数不明大势之人，故作恶化之宣传，实妄人也”。

△　重庆全国报界记者协会主席范长江就国内抗战问题拜访陈嘉庚，陈提出三项政治主张：第一，加强祖国内部的团结；第二，反对依赖英美西方列强，“抗战胜利的因素，主要地靠自己”；第三，“待胜论”必将使“国家陷于偏安”，应予反对。

是月　军事委员会撤销第十战区。

△　资源委员会将公路总局移交的炼油厂改建为四川巴县炼油厂，由罗宗实主持，有员工81人。抗战胜利后结束。

△　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在江苏常熟县徐家浜成立，谭震林为司令员。

△　新四军一部袭击上海附近安亭车站，俘伪军百余人，缴枪80余支。

△　伪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在北平成立，缪斌任会长。出版《东亚联盟》月刊。

6月

6月1日　蒋介石密令李宗仁、孙连仲、汤恩伯等，指示宜昌战役的作战要旨应以确保宜昌、襄樊为目的，以襄河两岸部队从西北向东南对渡河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第五战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辖孙连仲、孙震、汤恩伯、刘汝明各部，兵团长由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冯治安、王缵绪及江防军各部，兵团长由陈诚兼任。

△　军事委员会拟定襄河西岸作战紧急部署方案，凡10条，要点为：令第七十五军迅开南漳、保康间控置，阻敌西犯，掩护右集团及江防军之左侧背；孙连仲并率第三十军由襄阳南下，与右集团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夹击宜（城）、襄（阳）间渡河之敌，而歼于水际；江防军主决战方面，应保持在左，特应注意敌从右集团钟祥方面渡河；汤恩伯督率所部及第九十二军，继续向襄阳、随县间之敌猛攻，断敌后方联络，以行牵制；王缵绪集团及第四十五军应以大洪山为根据地，分向京陆路、襄花路攻击敌之后方，断其补给。蒋介石手批：第九十二军严令其向襄花路出击；第九十四军与汤恩伯集团军限期集结于新野附近，准备向襄、樊方面出击。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要点为：一切人民团体均须经政府许可，职业团体会员及下级团体加入上级团体，以强制为原则，退会则有限制；全国人民除受法令限制外，都要分别参加人民团体组织；各种职业团体负责人以曾经受过“特种训练”合格人员担任。

△　财政部成立直接财税处，由赋税司司长高秉坊兼任处长。该处主办所得税、利得税、遗产税，兼办印花税。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菲律宾支会，令称：菲律宾支会成立以来“推进会务，劝募飞机，捐款不遗余力，前后缴解逾400万元，裨益航空建设，洵非浅鲜”，应予明令嘉奖。

△　资源委员会将军政部移交的酒精厂改建为贵州遵义酒精厂，由汤元吉主持，有员工329人。抗战胜利后让予国防部，迁往新疆。

△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克复广东花县。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一部夜袭驻黑龙江铁力县东北之日军守备队，毙敌70余人。

△　苏南日军南浦旅团冈本联队一部从江宁县湖熟据点出发，侵犯句容三岔地区。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在廖海涛指挥下出击，在赤山毙日军中队长吉田以下130余人。4日，日军数千又犯，被新四军于虬山一带又毙伤40余人。

△　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向襄樊发动攻势。军事委员会急令第四十一军应“死守襄樊”，以待第三十军到达。第四十一军虽奋力应战，终寡不敌众，弃守襄阳。日军主力乘势渡襄河，攻占襄阳，并分途沿襄阳至远安道、宜城至当阳道南犯。

6月2日　　宜昌战役右兵团长陈诚奉命由重庆东下，是日晚抵万县，致电蒋介石报告该兵团作战方案：“以确保宜昌、击破渡河西犯敌人之目的，应以沿襄河各守备兵团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消耗敌军，另以有力兵团于襄河东岸攻击敌侧背，同时于当阳及其迤北地区控置至少一个军之兵力，相机击破过河之敌。”

△　第九战区薛岳部自赣北武宁袭瑞昌，日军少将、兼九江警备司令藤堂高英率部驰援，激战竟日，毙敌藤堂高英以下400余人。

△　东北抗联第三方面军和第二路军第五军一部袭击吉林舒兰县水曲柳森林采伐事务所，击毙日军13人、伪警察14人。5日，袭击五常县拉林河森警队香水河子分驻所，击毙日军10人，伪警察四人。

6月3日　　全国禁烟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发表训词，称“倭寇与鸦片均为我民族最大之仇敌，抗战禁烟同一重要，不可忽视”。并提出禁烟纲要六端：一、禁种严铲，认真检阅，倘有发现，枪决种户；二、运售烟毒，开设烟馆者，依照法律执行枪决；三、偷吸瘾民，罚以劳役，屡戒不悛者，处以极刑；四、施禁工作，寄于保甲，奖励检举，处罚隐匿；五、收复地区，务须彻底根除敌人遗留之毒物；六、禁绝期满，继续严禁办法，尚须加倍努力。会议5日闭会，通过《民国三十年度禁烟行政计划》等。

△　蒋介石致函四川省士绅贤达，切望他们积极参加地方自治之乡镇保甲事业，“或则参加训练，出任乡镇保甲各级首长之实职，或则就地匡襄协助各项事业之实施”。

△　国民党中央举行总理纪念周，孔祥熙报告《贸易委员会工作概况》，称贸易委员会成立三年多来，办事处、收货处、运输站布满全国，直属有富华、复兴、中荣三大国营贸易公司，职员有2000余人；两年多来，该会的主要贡献有四：奠定了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改变了我们对外贸易的性质，维护了外销物资的生产事业，圆满执行对外贸易合约。

△　行政院颁布《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凡12条，规定该会以促进川、康两省经济建设及其合理发展为宗旨，由行政院在委员中指定一人为委员长，八至10人为常务委员，主持会务。

△　陈诚自万县到达宜昌，指挥宜昌方面战事，命令第二十九、第九十四军于当阳以东构筑工事，作为宜昌屏障；急调第十八军参加宜昌防守。

△　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攻入襄阳城垣，至晚歼敌500余人，敌不支，纵火焚房夺路向南溃逃，襄阳克复。

△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再克粤中良口，日军败溃增城、福利。

△　军事委员会下令禁止运销日货，如有违犯，从重惩处。

△　由宜城渡河之日军分三路沿襄（阳）沙（市）公路及其以西地区南犯，是日陷宜城。其先头部队攻陷孔家湾、雷家河一带；一部进至刘侯集附近，遭第五十九军黄维纲部堵击，另一部陷南漳。

△　日本首相米内发表谈话称：日本对汪伪中央政权的承认问题，大致以日华基本条约签字之日，即为承认新中央政府之时。

6月4日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吉隆坡华侨陈永捐献飞机支援抗战。

△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事宜后，是日假道仰光抵昆明。11日抵重庆。

△　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第二军李延年部、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猛攻南漳日军，南漳克复，日军大部南犯。

△　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各一部由荆门之旧口、沙洋附近强渡汉江，与自宜城南下之部队会合，向第五战区江防兵团郭忏部发动攻击。

△　日、中代表今井武夫、铃木卓尔、臼井茂树和“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在澳门举行会谈。中方代表指出蒋介石已坚定了实现和平的决心，并向日方表示，目前双方的交涉是最实在、最直接、最具信赖的惟一途径，双方应努力缩小感情距离；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国民党要人趋于一致反共，并由蒋介石采取有力手段派要人赴西北防共；在蒋汪合作问题上，中方代表建议在中立地区由蒋介石派大员和汪精卫本人商谈，并同意日方要求，保证不把汪作为汉奸对待。此外，中方代表还同意缔结防共协定的原则，驻军问题待和平恢复后缔结防共协定时再予解决。双方同意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进行会谈，解决全部问题。会谈于6日结束。

△　陈公博、林柏生等结束在日本的活动，是日返抵南京。5日，陈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赴日答礼经过。

△　美国务院通知日本驻美大使，美国对于国防上之各种重要物品准备禁止出口，包括飞机及零件、摩托等。

6月5日　　蒋介石密电李宗仁、陈诚、汤恩伯，令汤恩伯部三个军“应全部通过襄花公路向宜城、钟祥与旧口方向分别急进，一面相

机占领襄河东岸各重要据点，以堵截敌军后方交通线；一面将其各军主力积极渡过襄河西岸，与我荆、宜部队夹击襄河西岸之敌”，并限各军于本月10日前确实占领襄河东岸各据点。

△　日军第四师团在沙洋、旧口南北强渡汉江，分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西进，图南、北两路围击第五战区襄西部队于宜昌以东地区。襄西部队与敌遭遇后向西撤退。

△　日军福盛、镰浦联队攻陷沙洋，旋进占后港、和尚桥等地，守军第三十二师王修身部兵力薄弱，无力反攻，相持至8日，敌以轻骑迂回万城、马山、荆州城一带，下午由宝塔河窜入沙市市区，王修身部沿江退至江口。

△　鄂北应山县伪军熊源泉率部500余人毙日军200余人，获步枪百余支后全部反正。

△　平古、北宁两线日伪军1.3万余人，开始对燕山、盘山、五龙山地区分区反复“扫荡”。冀东军区在当地民众配合下，开展反“扫荡”战斗，战至10日，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

6月6日　　蒋介石密电汤恩伯，令其以两师兵力截断京钟路、汉宜路敌后交通，应以主力改由宜城以北地区渡河西进，夹击敌军。

△　军事委员会任命裴昌会为第九军军长。

△　荆门失陷。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及王长海第一三二师、何基沣第一七九师等部在荆门附近、黄家集、观音寺阻击由东、北进犯荆门之日军，战至夜9时，敌重兵增援，第五十五军不支，向荆门西南转移，其余各部逐次后撤，敌陷荆门，并占领观音寺。7日，继续向毛家山、毛家店、石板滩李延年第二军阵地进攻，图攻略远安。

△　山东寿张县城内日军500余人向城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勇部驻地黑虎庙进犯，被八路军毙伤百余人，残部向城内逃窜。

△　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飞机34架轰炸梁山机场，第二联合航空队飞机53架攻击遂宁机场。中国空军迎战，损失三架，日机一架自行爆炸。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准王克敏辞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等职，改推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特派王揖唐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

6月7日　　蒋介石密电孙连仲，告以“敌已全力南下进攻荆、宜”，令其应不顾一切，以主力南下拊敌之背，不可为敌后卫所牵制，使宜昌友军单独作战。

△　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晚会，欢送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等南洋华侨慰劳代表团，毛泽东、朱德、吴玉章、萧劲光、王明等出席。朱德致词希望陈嘉庚等先生把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介绍给千百万侨胞。陈嘉庚讲话，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摩擦，加强团结，一致对外。8日，陈嘉庚一行离延。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进行整编。整编后全师辖九个旅，28个团。新成立三个军区：太行军区，由第一二九师兼，边区机构取消；太岳军区，由陈赓任司令员，王新亭任政委，下辖三个分区；冀南军区，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

△　日本中国方面舰队就加强对中国内地轰炸，与中国派遣军进行联络，希望在6月至8月加强这一攻击，并提议在此期间集中200架轰炸机对重庆方面进行3000架次、对成都方面进行2000架次的集中轰炸；6月至7月实施15次，8月实施10次。

△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九、十六旅团，日驻蒙军谏山、石丸两支队共二万余人，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扫荡”。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及山西新军展开反“扫荡”，战至7月6日，进行大小战斗251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余人。

6月8日　　蒋介石手令：自7月1日起，前方作战部队无论官佐士兵，严禁携带眷属，倘敢违犯，即以军法从事。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萧克部陈先瑞团在河北滦县西司营子歼灭该据点日军30余人，击落日机一架。

△　日军5000余向河北密云地区“扫荡”，被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萧克部击退，歼日军300余人。

△　日军第四师团一部攻陷江陵。守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一部转移至沮水、漳河两岸江口、向安寺、马家店、董市，拒敌西犯。李及兰第九十四军、李延年第二军、周碞第七十五军在河溶、慈化、当阳之线及沮漳河沿岸与敌激战。

△　日军攻陷沙市，屠城三日。赶马台街废墟一片，克成路被焚四五十家，李公桥、梅台巷、兴盛街、花家湾以及其他大街小巷均被烧被炸，惨不忍睹，火焰熏天，数日未息，民众死亡者不可数计。

6月9日　　故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灵榇运抵重庆，蒋介石率各级军政长官及机关代表亲临江岸迎灵，尔后灵榇运往广西，安葬于桂林郊外。28日，国民政府明令追赠钟毅为陆军中将。

△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特别党部制定《防止异党兵运实施办法》，其目的在使地方原有之武力组织信仰坚定、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其办法为：“以理论克服理论，以组织对付组织，以行动制裁行动，以工作领导工作为原则。”

△　重庆文艺界举行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座谈会，出席者有以群、姚蓬子、戈宝权、胡绳、梅林、潘梓年、艾青等。潘梓年发言驳“通俗性与艺术性不能统一在一个作品内”的观点。

△　荆门、十里铺、江陵之线日军陆空军联合向董市、当阳、远安进攻。午后，突破方靖第十一师右翼阵地，守军不支，乘夜转移至

古老背、双莲寺、当阳之线。10日，古老背、当阳陷敌。方师转守宜昌外围之鸦雀岭、玉泉寺等地。

△　伪中国教育建设协会在南京成立，戴英夫为会长。出版《教育建设》月刊。

6月10日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攻克浙江萧山县城，焚毁日伪军军事机关。

△　八路军徐向前部马耀南、廖容标两支队在山东新泰、莱芜一带歼灭日伪军500余人。

△　日军第十一军下达攻占宜昌的命令：第三、第三十九师团消灭敌人北面集团后，在当阳一带及当阳以西地区整理阵容，准备尔后的行动。第十三师团击败安福市（宜昌东南30公里）之敌后向宜昌突进，迅速攻占宜昌。突入宜昌之各部，对第三国的各种权益，要防止发生无益的纠纷。

△　日军第六十战队飞机36架轰炸四川梁山，市区军事设施破坏甚多。同日，海军第二联合舰队飞机袭击重庆，中国空军飞机34架迎战，被击落16架，日机二架被毁。

6月上旬　蒋介石与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周对蒋表示：中共诚意抗战，拥蒋反汪，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这只能帮助敌伪。指出：说中共要暴动，推翻国民党，全是造谣。中共的发展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伪争取群众。蒋介石称：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

6月11日　蒋介石密电薛岳，告以：“一、敌由第三、第九两战区各抽转一部兵力于第五战区方面，刻渡过襄河之敌，已进至宜昌外围阵地，向我猛攻中。二、贵战区应努力向所指示之目标积极进攻，

牵制敌人，以解友军之危。希速令关麟徵、杨森两集团所部进攻蒲圻，王陵基集团进攻武宁，着即时行动，不得稽延。”

△　国民政府以前河北省南乐县长魏汉彬“因坚决抗战，为敌伪所忌，致父母被捕，田庐被毁，其眷属流离”，是日明令嘉奖，并给予奖金3000元。

△　行政院决议设立贵州农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

△　日军向宜昌城郊守军第十八师阵地发动全面进攻，10时冲破城郊至镇镜山段，并向城西北之飞机场发展。守城部队与镇镜山部队联络隔绝，师长罗广文对城内部队失去掌握，各自为战。

△　日机117架分四批轰炸重庆，先后投炸弹、燃烧弹200余枚，市民死伤60余人，苏驻华大使馆被炸，德国海通社及苏联塔斯社中国总社中弹全毁。中苏文化协会理事王昆仑、侯外庐即日持函往苏联大使馆表示慰问。同日，蒋介石、许世英、谷正纲、洪兰友等赴灾区视察灾情，抚慰难胞。

△　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通过对阿部信行大使的训令案，《训令》要旨为：一、日本对汪政府的承认，要在签订条约的形式下施行；二、汪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或在签订条约前或至迟与此同时必须实行；三、日汪条约是作为战争的善后处理，并作为今后长期的关系准则。

6月12日　蒋介石以宜昌告急密电李宗仁、孙连仲、汤恩伯，令第三十军池峰城部在远安、观音寺之线，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第九十四军李及兰部在观音寺、荆门之线，归汤恩伯指挥，准备攻击进犯宜昌之敌。

△　日军攻陷宜昌。日军自宜昌机场向城区猛攻，10时敌骑一部

突入城区，守城部队第十八师一部予敌以袭击，另一部皮宣猷第五十四团乘机退至宜昌南岸，溺毙者甚多。至黄昏，敌集中火力，猛攻镇镜山，守军张涤瑕第五十三团撤至黄柏河西岸，宜昌陷落。

△　粤北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攻入从化城垣，激战数时，日军不支，夺路向广州溃逃。13日，克复从化。

△　日机157架分批对重庆进行轰炸，先后进入市区及江北地区，投弹480余枚，市民死伤达1400余人，炸毁房屋300余幢，佛教古刹长安寺、罗汉寺被炸毁。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七架。次日，蒋介石以二万元嘉奖作战有功空军将士。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兰峰为暂编第三军军长，董其武为暂编第四军军长。

△　丹麦新任驻华公使高霖抵重庆，18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　日本兴亚院会议通过《关于中日交涉开始之条件》案，并决定此案经内阁同意后，由影佐带给阿部信行。18日，影佐和犬养健由东京到南京，向阿部传达日内阁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训令》及《关于中日交涉开始之条件》。阿部即召集使馆人员讨论。

6月13日　蒋介石密电李宗仁等，命令第五战区右兵团迅速收容各部，掌握有力部队反攻宜昌，以一部攻占荆门，以主力由远安、观音寺之间攻击宜昌方面之敌，要求各部不顾一切，猛力进攻，不可失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指示》，指出：东北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较可靠的友军，“我们对东北军的关系好坏，对于我们争取广大友军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对其关系能长期维持友好，则使我党我军在其他友军中信誉增加，反之则使许多友军对我发

生畏惧”。因此，争取东北军工作是“争取全国友军工作的重要环节”。

△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伪考试院副院长江亢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其要点为：一、每年发行新纸币；二、全数趸买农、工、商所有出口品；三、一方在国内批发，一方对国外贸易。

△　汪伪政府外交部就意大利向英、法宣战发表声明，要求各交战国驻华军队和军舰，采取自动退出中国的措施，并禁止私相授受在中国所得各项权益。

△　美国务卿赫尔就日机轰炸重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称此种暴行无论在何时何处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

6月14日　第五战区彭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反攻宜昌，日军一度退出宜昌。守军未及持续进攻，日军复返宜昌，宜昌得而复失。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劝告第三国驻重庆外交机关全部移至重庆市东南面长江南岸安全地带，以免误炸。7月初，第三国外交机关全部转移至该安全地带。

△　日本外相有田劝告英、美等国大使撤退重庆侨民。

△　美驻日大使格鲁访日外务大臣有田，就日机迭炸重庆，美国大使馆有波及之虞提出严正抗议。

6月15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谈话，抗议日机迭炸重庆，称日军之暴行，适不过使吾人抗日之决心为之增强。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陶峙岳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为第一军军长。

△　重庆市厉行疏散人口，除必需留渝之一部分机关职员及工商厂号职员眷属外，其他无治安勤务与交通通信责任之公务人员及其眷

属即日疏散出境，以避日机滥炸。

△　冀察热边八路军粉碎日伪军对蓟县、密云地区的“扫荡”，激战七昼夜，毙敌300余人，俘日伪军40余人。

△　美驻日大使格鲁照会日外相有田，拒绝日本所提第三国撤出重庆的要求。

6月16日　彭善第十八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郑洞国新编第十二军第五师、王仲廉第八十五军第三十二师反攻宜昌、当阳。17日，彭善部攻入市区，克复宜昌城及附近阵地，日军不支，乘夜东退。冯治安部猛攻当阳之敌，遮断荆门、当阳间交通线，毙敌旅团长池田直三，并向荆门日军攻击。第五、第二十二师北渡长江进攻沙洋、十里铺。

△　日机117架分四批轰炸重庆，投弹400余枚，炸沉木船200余只，毁房屋200余幢，六处起火，伤亡20余人，被中国空军击落六架。

△　“宋子良”自重庆回香港，告日方代表铃木称：重庆方面准备接受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但蒋介石认为有关三人会谈及和平条件等，需事先取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意，目前尚不能作出确切回答。20日，“宋子良”转达重庆方面的意见：一、可以接受板垣、蒋、汪会谈；二、准备提前于7月上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待后再定会谈准确时间；三、会谈地点定为长沙。并称：如日方同意，中方对水路或机场的使用决无阻碍，准备在会谈前进行清扫或清理。

△　英国大使馆发言人称：英国对华政策一如往昔，毫无变更，决继续维持在华权益，绝不放弃。并称：香港“防务极坚固，当局已准备一切，足以抵抗外来袭击”。

6月17日　蒋介石就日机迭炸重庆发表演说，表示日机“只能炸

毁我们的房屋砖瓦，决不能动摇我们的抗战精神”；并称：如果对日讲和，“其结果必致完全受日本的宰割”。

△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就日机迭炸重庆对中央社记者谈话称：“敌人的此种暴行，只能充分表现其卑鄙与违背人道主义之奇耻，对于我全面抗战之坚决意志，并无丝毫影响。”

△　陈诚电告蒋介石：“宜昌于本日午前3时完全克复。”右兵团即向襄河西岸追击敌人。

△　经济部公布并施行《非常时期重要商业同业公会工作纲要》，凡13条。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皖南贵池。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彭绍辉部在静乐米峪镇歼灭由静乐进犯文水、交城之日军500余人。

△　南宁日军以近卫师团与台湾旅团固守南宁，另以第五师团沿邕龙公路向西突围，晚进至绥渌城。23日，在空军配合下，西进至板利、雷时墟。24日，陷北江墟。26日，陷明江。

△　日机75架分三批轰炸重庆。

△　太古轮船公司“岳州号”船工举行罢工，“盛京”、“湖南”、“海口”等船船工起而响应，举行同盟罢工。经英、法领事馆出面调解，20日下午相继复工。

6月18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设立国立中正大学案；并决定拨款50万元，赈济重庆市被炸灾民。

△　空军驻渝部队将领对中央社记者谈称：最近空军驻渝部队反空袭出击12次，击落日机寻获残骸29架，击伤者40架以上，总计损

失1000万美元以上；而我方被炸之损失为40.8万美元以上。

△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北村、立花、村井、柴田联队分路向宜昌进攻，与守军第十八军彭善部在镇镜山、将军岩阵地激战，双方伤亡甚重。

△　日本政府向法驻日大使安里提出抗议，不准军用物资经越南输入中国，并要求派出监视团实地监督。20日，法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封锁滇越铁路，同时中断由同登经南宁转中国内地的公路运输。日本派出以西原一策为团长的监视团40人到达，进行监督。

△　戴高乐将军在英国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号召法国民众抵抗法西斯德军对法国的占领。

6月19日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请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甲）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乙）请即释放一切在监狱之共产党员；（丙）请停止查禁各地抗日之书籍杂志；对《新华日报》之出版发行请予以法律之保障；（丁）请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禁止非法骚扰和残害。二、请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对各该地区之地方政权，请予开放，实行民主，对当地民众组织，力予扶植，使各党各界人才，均充分发挥反对敌伪斗争之能力与效果。三、关于陕甘宁边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甲）请明令划定延安、延长、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定边、靖边、淳化、栒邑、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及防守黄河之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共23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并委托林祖涵同志为边区政府主席；（乙）请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其所属游击部队按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丙）请增编新四军为七个支队；（丁）请规定第十八

集团军、新四军与友军作战的分界线；（戊）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以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信、交通等器材。

△　郑洞国新十二军第五师、王仲廉第八十五军第三十二师各一部克复湖北沙市。20日，攻入江陵城垣，并向北进攻，克复襄（阳）沙（市）路之最大据点建阳驿，毁敌汽车50余辆，继向荆门、当阳进攻。

△　日军第十三师团再陷宜昌。

△　英、日《天津协定》在东京签字，要点为：一、英、日双方取得更密切之合作，以取缔租界内有碍治安秩序及有碍日军安全之一切活动；二、租界内所存之中国白银，以约十分之一为华北赈济之用，其余则由双方共同封存，以待将来双方商得处理办法；三、英方不得禁止联银券在租界内通行。

△　国民政府就英、日《天津协定》签订发表声明，天津租界内白银问题之处理，是英、日无视中国的所有权，中国政府表示抗议。

△　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陈光、罗荣桓等：陈（士榘）、黄（骅）支队月底可到堂邑、聊城，先配合杨勇、萧华两部消灭鲁西伪军，然后开至鲁南，一部至胶东，为山东纵队主力。

△　汪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对重庆广播，向蒋介石劝降，宣称："蒋介石如肯为国家打算，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我们不但可走开，并且可以死，愿以死来换取国家的生存独立。"

△　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土桥勇逸向英驻日武官提出：关闭滇缅路、封锁香港与广东边界、撤退上海英军是避免日本对英宣战的惟一办法。

6月20日　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华北抗战的总结》报告，指

出华北抗战，在全国战略有决定的意义，掩护了整个大西北，保卫了最重要的国际交通，同时牵制了日寇半数的兵力，巩固了华中和华南的阵地。报告提出今后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实行三民主义，坚持抗战到底。

△　全国慰劳总会举行慰劳重庆市防护人员大会，并向空袭殉难防护人员致哀；将另行择期慰劳空军将士。

△　浙江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攻克嘉善，毁敌营数处。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得志部第二纵队（辖第三四四旅和新二旅）越陇海线南下，是日与新四军彭雪枫部第六支队在安徽涡阳新兴集会合。

△　冀南各路日军3000余人、汽车10余辆、坦克三辆分途向冀鲁豫地区的威县、曲周、肥乡、广平、大名、冠县、馆陶一带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各路部队分别在魏县、平固、庵年、打虎寨等地侧击该敌，至27日，将各路日军击退，毙敌500余人。

△　汪伪政府任命高冠吾为伪江苏省政府主席。

6月21日　国民政府就天津英租界白银事发表声明，略谓：该项白银系交通银行所有，且为法币准备金之一部分。中国政府在提出等于英金十万镑之数额充作华北救济经费后，英国政府对于其余全部白银，为交通银行及中国政府之信托人，故现在所议定之封存该项白银办法，对于该项白银之原来状况并无变更。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元塘为新编第十二军军长。

6月22日　国民政府令准福建省增设三元县、水吉县。25日，令准贵州省增设望谟县。

△　据《中央日报》载：自本年度1月1日起，全国有四川、河

南、广东、广西、陕西、福建、浙江、青海等省实施新县制，湖南、江西定于7月1日起实施，甘肃、西康亦在核定之中。

△　八路军杨得志部在冀南馆陶地区歼灭进犯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其中指挥官二名。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4000余人分三路“扫荡”晋东南榆社、武乡、辽县以南地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所部分头截击，并袭击潞城、壶关、榆次、襄垣等地日军，破击白晋、平（定）昔（阳）两公路，迫使日军主力撤回辽县、沁县。

△　日军原支队在广东宝安南奇袭登陆，击溃第四战区一部，攻占深圳。23日，攻占宝安、沙头角等地，封锁中英边境。28日，英国香港总督发布命令，强令妇女儿童及与保卫香港无关人员一律离港。7月1日晨，第一艘轮船载4500多人撤退者出港，开往马尼拉。

△　“宋子良”通知香港的铃木卓尔：原则上同意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三人会谈，但会场必须设在长沙。

△　影佐昭桢、今井武夫会见周佛海，商谈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举行会谈问题。周佛海称：汪精卫必可前往，惟事前须严密布置。旋周约梅思平、陈公博见汪精卫，汪表示同意，但重庆方面须派张群等高级代表，先到上海进行谈判。

△　法国政府向法西斯德国投降。

6月23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日本胁迫法国政府停止中越间一般货运事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称日本如取道越南攻华，或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略行为，中国政府被迫而采取此种局势下一切必要之自卫措施。

△　周佛海会见影佐、今井，讨论蒋、汪、板垣会谈问题。今井称：蒋介石虽同意举行会谈，但要求暂不告诉汪精卫，告诉前应与重

庆商量；并称日方已通知重庆方面，即使汪不参加，板垣也必定前往。周佛海提议此次会谈在洞庭湖举行，影佐、今井表示同意。

6月24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抗议法国禁止中越货运，指出：法国此举不仅违背国际公法、中法条约及国联决议案，而且助长侵略者，要求迅即恢复运输，并拒绝日方所派监视人员。

△　蒋介石密令李宗仁、陈诚、薛岳、顾祝同等停止对宜昌日军的反攻，称："为应付国际变化，保持国军战力，俾利整训之目的，第五战区应即停止对宜昌攻击，第三、第九战区亦应即停止大规模攻击，而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牵制敌人。"

△　日机117架分四批轰炸重庆，在江北、北碚及市区投弹400余枚，炸毁房屋50余幢，英总领事馆全部房屋被炸毁，英大使馆及法总领事馆院内均中弹。中国空军击伤敌机多架。

△　比籍神甫雷鸣远在重庆病逝。次日，灵柩暂厝重庆歌乐山，冯玉祥亲临吊唁。7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雷鸣远。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访问汪精卫，敦促参加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方会谈，汪极表示赞成。

△　日本陆军中央参谋次长泽田飞抵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部传达处理"桐工作"的意见：一、承认"满洲国"问题，不一定作为此时的条件，可改在缔结和平后协商。二、驻兵问题，也不一定作为此时的停战条件，可提出如缔结日华互助条约这样的条件，必要时亦可从收回租界等问题发展到日华军事同盟。

△　日伪军以沪西法租界已无难民，要求法方撤退防军及捕房。是日法方将防军、捕房撤至租界内，25日将徐家汇移交日伪军驻防。

△　日军在江苏丹阳访仙桥镇近月轩茶馆屠杀喝茶者108名。

△　汪伪政府参谋本部代总参谋长杨揆一与板垣征四郎签订《日本军与中国方面治安机关（军队、宪兵、警察之总称）关于治安肃清的相互关系之协定》，规定：一、日本军事机关与中国军警各机关应保持紧密联系，共同负责所辖区域内的治安警卫；二、日本各军司令官、各兵团长、各地区警备队长及各地宪兵队长，有权指挥所辖区域内中国军警指挥官及其下属指挥官。

△　伪满洲国增设四平省。

△　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向英驻日本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禁止通过滇缅路向重庆政府运送军火及汽油、卡车等可能增加其抗战能力的物资。

6月25日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邝启东、汪希文、朱则、许锡庆、黄锐钟、李仲猷、许力求、朱赤子、林汝珩、金覃、萧汉中、汪道源、顾仕谋、卢宝永、周应湘、林中原、商隽明、黄折冲、郭雅雄、卢宗缙、何人魂21名汉奸。

△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认为现在是有力的人大家都出力了，有钱的人却没有出钱。不但没有出钱，而且在拼命地趁火打劫，拼命地发国难财，这样下去是危险到了极点的；主张除了有钱人拿出过多的钱来而外，发国难财的所得应该全部贡献给国家，商人的利润也应该出50%。

△　中国空军再次袭击宜昌，日军炮兵阵地及支撑点数处被炸。

△　冀中八路军部队发起青纱帐战役。战役重点是肃宁、博野、高阳、清苑、安新、蠡县、河间、献县、青县等地区。到8月10日结束战斗，共作战146次，毙伤日伪军2600多人，俘伪军500多人。

△　汪精卫发表《蒋介石的磁铁战》一文，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对日战争只能激起日本人的怒气，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日本人侵占中国更

多的国土，使中国遭受更大更多的损失。并鼓吹中日战争若继续下去，国富兵强的日本则会不免于伤，而中国就不同了，国穷兵弱，其结果只有死而已。

△　日机125架分四批轰炸重庆，被中国空军击落二架。

△　日本外相有田宣布实行东亚门罗主义，宣称日本“推行中国事变之目的，系立足于建立东亚共存共荣圈”。

6月26日　国民政府令准改江西省立中正大学为国立中正大学。

△　彭德怀撰《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宣布八路军三年来在华北敌后先后建立14个抗日根据地，收复和占领150多个县城，牵制敌人15个师团，占敌在华总兵力的38.4%。

△　萧劲光致电胡宗南，要求制止所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八旅第二十二团政委史钦深率两个连在冀南大名以北地区遭日伪军合击，全体指战员奋起突围，英勇抵抗，毙敌500余人后，全部壮烈牺牲。

△　日机130余架分三批轰炸重庆，浮图关及苏驻华大使馆一部被炸，死伤市民30余人。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三架。

△　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等讨论举行蒋、汪、板垣会谈的具体办法，决定先由板垣与蒋介石会谈。

6月27日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电痛斥日机两月以来空袭重庆达19次之多，致无辜市民惨遭牺牲，文化机关及学校、报馆、教堂备受蹂躏。外国使馆、领事馆、通讯社及外侨之生命财产均被有计划的摧毁。“尚望全国同胞努力以赴，并望国际人士迅采有效之行动援助吾国，以击溃此人类公敌”。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湖北黄陂。

△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一部于延庆县佛峪口附近歼灭日军步、骑兵140余人，俘敌八人。

△　日机95架分三批轰炸重庆，在沙坪坝学校区投炸弹数百枚，国立中央大学试验室及教职员住宅被炸，幸师生度假，无一人伤亡。

△　周佛海与影佐、今井及堀场等会商蒋、汪、板垣谈判问题。关于会见办法，双方同意：第一步，重庆方面派要员到香港接洽；第二步，板垣与蒋介石会见；第三步，汪、蒋及汪、蒋、板垣会见。会见地点或长沙或宜昌。

△　日本外相有田向天皇启奏对华方针时宣称：欲解决中日事变，“必先根绝重庆之一切活动力”。

6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西康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参议员名单，议长谭其茳，副议长胡恭先。

△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绍轩为第十二军副军长。

△　日机90架分三批轰炸重庆，新市区、江北岸及玉带街、兴隆街等处均遭滥炸，数处起火，炸毁房屋甚多。中国空军与敌在长寿上空激战，击落敌机一架。

△　日军宣布封锁香港，香港总督奉命疏散妇孺。是日起香港与内地水陆交通均告断绝。

△　驻江苏泰州地区的鲁苏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出动13个团的兵力，向泰州西北郭村地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叶飞部进攻。新四军一面呼吁李明扬、李长江停止进攻，一面急调由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三个团驰援。

△　石友三部趁日军“扫荡”冀鲁豫边区，指挥所部第一八一、第三、第八师及孙良诚、李树春等部三万余人，向濮阳、濮县一带猛犯，沿途捕杀抗日人员。同时，大名、聊城、濮阳、濮县一带日军亦出动策应石军，对八路军取包围合击态势。

△　汪伪中央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上海国民新闻社社长穆时英遇刺毙命。

6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九年广东省六厘公债条例》，定额国币1500万元，年息六厘，15年后还清，自公布之日施行。

△　国民政府颁布《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凡24条。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克豫东商丘。

△　新四军挺进纵队与苏皖支队在当地群众支持下，对进攻郭村的李明扬、李长江部组织自卫反攻，歼其三个团。

△　宜昌日军2000余由美孚油栈附近渡长江南犯，陈诚部在五龙口迄磨难山一带与日军激战。

△　日机99架分四批轰炸重庆，投弹200余枚，炸毁房屋200余间，中央大学校舍被炸毁；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二架，坠于市郊北。

△　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广播演说，重申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使命和“尽一切手段以期根绝援蒋行为”的决心；并称：东亚各国和南洋各地具有密切关系，有必要“把所有这些地区统一在一个独立范围内”。

6月30日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克河南开封，同日又克亳县、鹿县。

△　李长江部第三纵队陈玉生部、第二纵队王澄部等分率一个团、一个营在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团的接应下，举行起义。新四军各部乘势向李军全力出击，李军向泰州溃退。

△　豫东伪军周岚易部反正，并全歼柘城日军联队长以下数百人。

△　日机37架轰炸西安，民众死伤200余人，炸毁房屋500余间。

是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将中共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

△　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柯棣华、巴苏华大夫到达晋察冀边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

△　英国三军参谋总长就香港形势发表谈话，认为“日本正伺机把英国势力从中国和香港赶出去”，并对保卫香港作出如下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能作为一个前进海军基地使用。“对于既不能援救，又不能长期抗战的香港，只能作尽可能长期保持的前哨阵地。对于主张加强守备部队的压力，应当坚决顶住”。

△　5月至是月，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远征队在石井四郎中将率领下，赴华东宁波，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五公斤鼠疫菌跳蚤散布在宁波地区，造成瘟疫流行。

7月

7月1日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者中央执行委员89人，列席者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蒋介石任主席，并致开会词。会议着重讨论抗战期间的经济问题，并对党务、行政机构重新进行设施。是日，通过组织审查委员会、组织主席团等案。

△　蒋介石会见黄炎培、左舜生，接受黄炎培递交的关于外交方针的意见书，听取左舜生对于内政方面的意见。蒋介石表示希望他们以公正人资格参与商讨中共问题。

△　军事委员会决定重设第六战区，8日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

△　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为滇越边防总指挥，总指挥部设于滇越线要冲蒙自。

△　军事委员会任命苏祖馨为第四十八军军长，杨光钰为第九十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实施《遗产税暂行条例》，凡24条。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克复河南濮县。

△　资源委员会与盐务总局联合在四川威远成立威远煤矿公司，由孙越崎主持，有员工2548人。抗战胜利后改由史维新主持。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高金波率两个团、崔道修第三游击纵队、薄相毓第六游击纵队东渡汾河，在洪洞东进攻山西新军。3日，在广胜寺一带与新军一部2000余人激战，6日占领该地，新军向沁源、霍县方面撤退。

△　苏北郭村新四军向鲁苏战区第二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四纵队发动攻击，战至4日，将其全部击溃，歼灭李部180余人。

△　河北易县姚村镇日伪军400余人西犯，是日陷樊村镇。2日，八路军一部反攻。至3日晨，该敌又向八路军进犯，被击溃。此役先后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　伪河北省燕京道署在北平成立，商崇禄为道尹，辖通县、大兴、宛平、良乡、房山、昌平、蓟县、平谷、密云、顺义、怀柔、香

河、固安、三河、涿县15县。

△ 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被汉奸暗刺殒命。

△ 伪满洲国决定，本年度对日本输出价值17亿元的物资。

△ 滇越路货运告停。

7月2日 国民党中央五届七次全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常委会报告党务及政治，并决定分交各该组审查委员会审查。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听取外交、军事两项报告，并交各该组审查委员会审查。会议并决定宣言起草委员会人选及设立物价审查会。

△ 国民党中央针对周恩来6月19日所提方案，提出复案，主要内容是：（甲）关于党的问题，俟宪法颁布后再谈。（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决定区域为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延安、延长、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及定边、靖边两县之各一部，以上15县，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为陕北行政区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省政府指导，并直接管辖该区内所属各县。第十八集团军在陕甘宁留守部队一律撤至该区内。（丙）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问题，决定两种方案：第一案：将第十八集团军全部与新四军调赴河北省境内，并将新四军加入冀察战区之战斗序列，扫数调赴该战区；第二案：将第十八集团军之大部分及新四军之全部调赴河北省境内，其第十八集团军之一部留置晋北作战，但所留部队应编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但山西之政治、党务、军事，驻军不得干涉，绝对服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委任朱德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免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丁）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问题，决定：第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增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新四军编为两个师（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绝对服从军令，所有纵队、支队、其他一切

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

△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称，石友三部与鲁西伪军约200人，向濮阳、濮县一带进攻，沿途摧毁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同时与盘据大名、聊城、濮县、濮阳一带之日军策应，共同对付该地区之八路军部队；并将八路军杨得志部缴获的石部与日军联络密函转蒋介石，要求严惩石友三。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一旅韦杰部在晋东南潞（城）屯（留）公路一段，配合地方武装歼灭日军200余人。

△　新四军第二团在江苏丹阳县袁庵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　桂南凭祥日军第五师团高桥部以陆、空军北攻龙州，激战竟日，守军韦云淞第三十一军不支，龙州失守。

△　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师师长曹大忠、第二师师长李忠毅、第三师师长宋克宾率部在豫东反正，并反攻鹿邑、亳县之日军，是日克复柘城、虞县，进攻马牧集，隔断马牧集至朱集陇海路交通。

7月3日　　国民党五届七次全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推进侨民教育》、《十万空军建设》、《吸收华侨资金，开发西南沿边以固国防》等14项议案及组织议案整理委员会。

△　海外部长吴铁城发表声明，斥责日本外相有田6月29日广播演说，指出：有田倡导所谓东亚门罗主义，不过希图利用国际一时不安之局，遂其独霸太平洋之野心，蹂躏友邦之权利。

△　军事委员会颁布《陕鄂湘川康滇黔后方七省总清查实施方案》，清查范围包括：肃清残匪、清查户口、整顿保甲、办理联保连坐、登记在乡军人、登记民枪、完成地方自卫组织、组训壮丁、推行民众教育、扫除兵役流弊、指导国民月会、实行新生活运动、举行合

作贷款、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　经济部平价购销处明令取缔囤积居奇，所有批发商及公私仓库所存货物，经本处历次劝导而尚封囤待价者，应于一个月内从速提销上市，倘仍迁延不遵者，一经查出，定为依法处理。

△　陈毅从江南兼程赶到郭村，派朱克靖去泰州，向李明扬、李长江说明新四军假道东进，东进后即将郭村归还。同时，遣返在郭村作战中全部俘虏700余人，与李明扬、李长江重归于好。

△　山西日本特务主任大本清致函第三十三军军长于振河，以下列条件进行诱降：一、晋绥军如能与日军合作“剿匪”，则原有防地已为日军占领者，一律归还；二、保障晋绥军官之名誉地位；三、晋绥军之军需品及粮秣等负责补充完足，并另厚赏，军费按时支给；四、山西军用票准予更换联合票，以资通行；五、华北广大地区均由晋绥军统治，并付予警备权。

△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在世界形势发展下的处理时局纲要》，其方针为：力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应特别改善国内外的形势，继续寻求良机，努力解决南方问题。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特别应杜绝第三国的援蒋活动，迫使重庆政府迅速屈服。为此，在外交上，加强与德、意的团结，谋求迅速调整对苏外交。对香港要结合滇缅公路的彻底封锁，首先消除其敌对性，同时应大力推进各项有关工作。关于对南方行使武力问题，目前应尽力将目标限于英国，只攻占香港及英属马来半岛。

7月4日　　军事委员会派遣白崇禧在鄂北老河口召开枣宜会战检讨会议，与会者有李宗仁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以上人员。首由白崇禧训话，继由各总司令及军、师长报告作战经过、经验教训和各部队现状。会议宣布第五战区关于枣宜会战功过奖惩的命令：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作战有功，晋升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九集

团军刘和鼎部多数主官记功。江防军司令郭忏、第四十一军第一一二师师长王志远、第二军新三十三师师长张世希等作战不力，押解重庆交军法审判。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作战不力，免军长职。

△ 日机80架分四批轰炸重庆、遂宁，在国立中央大学、省立重庆大学校园投弹200余枚，炸毁校舍百余间，20余人伤亡。中国空军击落敌机一架，坠于长寿东。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特任江亢虎为代理考试院院长，特派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徐良、周隆庠为出席与日本“调整国交”谈判代表，杨揆一、陈春圃、陈君慧为谈判辅佐官。

7月5日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蒋介石主席并讲述最近抗战形势及外交形势，继听取经济、交通报告。下午，听取内政、教育报告，并通过对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恢复设置中央妇女部等要案共31项。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文田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空前投降危险和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认真实践其允许过人民允许过我党的一切政治上与具体问题上的条件，以利团结与抗战”。

△ 朱德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指出：由于一部分上层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进步，就形成了今日新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危险。发扬民主运动，实行民主政治，是我们克服投降妥协的危险和克服困难的最中心的一环。同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林森，指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粉碎日伪及帝国主义逼降、诱降之阴谋，实为当前之急务。

△　汪伪政府与日本“调整国交”谈判在南京举行。汪方为汪精卫等七人，日方为阿部信行及日高、影佐、犬养、安藤、松平、须贺七人。汪精卫和阿部信行先后发言。阿部称：调整中日国交应以近卫声明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标准，但因战事尚未结束，条约中或有与平时不同的“特殊条款”。继由日高和褚民谊说明会谈之方式。

7月6日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并通过对于党务、政治、财政、经济、交通报告之决议案及关于物价审查委会审查报告等要案24项。继由蒋介石报告五届六中全会以来改进党务、政治、经济之要点，及今后党、政、军工作之急务，并以“负责任，任劳怨，立己与立人，健全人事组织，祛除迟滞诿卸之弊端”，共资策励。

△　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告以越南运输全停，缅甸运输线亦为我生死关头，请希速探询美方对于英方之态度。同日，郭泰祺亦电请胡适，“即竭力向美国国务院陈说缅甸危机，设法挽救”。

△　汪日调整“国交”谈判开始讨论和审议中日调整“国交”的基本事项条款及附属事项的具体条文，于31日闭会。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致函汪精卫，要求教育部门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汪精卫批准在初中以上学校开设日语课。

7月7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策勉全国军民实行精神总动员，履行国民公约，拥护国民政府。同日，又发表《告友邦人士书》，表示日军“倘在越南或其他亚洲地域有任何武力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必不惜以武力与之周旋”。

△　国民党中央举行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会，全体中央委员参加，林森领导行礼，中央委员吴敬恒作报告。是日全国公祭抗战阵亡将士，并慰劳荣誉军人及抗战将士家属。

△　外交部长王宠惠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声明，对友邦支援中国抗战表示感谢，并称中国决维护《九国公约》及其他国际条约之尊严，协力维持远东之均势，无论今后国际情势有若何变化，吾人必继续抗战到底。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陆军上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令称：张自忠“久膺军寄，夙著忠贞，卢沟桥事变后，转战前方，屡建奇勋，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复兴大业，乃以鄂中战役，亲当前锋，抱成仁取义之决心，奋勇截敌，重创喋血，犹复猛进不已，并谆谆以效忠国家民族雪耻复仇勖勉部众，终因伤重殉职，全军感痛，政府追怀壮烈，轸悼良深”。

△　蒋介石通电全国，追述张自忠将军抗战功绩，称张自忠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愿“吾辈后来者皆当志其所志，剪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

△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碞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　八路军总部宣布：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由抗战初期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40万人，占整个侵华日军的58％，并抗击了全部伪军。

△　八路军总部发布《对日俘政策的命令》，凡六条，要点为：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投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愿归国或归队之日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战死或病死之日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

△　由在延安的日本反战同志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天发起组织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正式成立。

△　日本首相米内发表演说，声称日本“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东亚

永久之太平，将不辞任何困难予以最大努力。日本现正与新中央政府调整国交，中国事变可告一段落”。

7月8日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以全会名义致电慰劳抗战将士及海外侨胞，并通过教育报告之决议案及设立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经济作战部、战时经济会议等要案。会议通过本次全体会议宣言，其要旨为：一、暴日野心无止境，为世界各国之公敌；二、加强奋斗，纠正缺点，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三、同胞同志积极奋起，完成抗战大业。蒋介石致闭会词，策勉党员“抱定党亡与亡，党存与存之决心，把个人的安危、生死、荣辱、祸福，一切托付于党”。

△　军事委员会重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陈诚，统辖湘、鄂、川、黔边地区战事，辖第二十、二十六集团军与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振三为第五十九军副军长。

△　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主力部队自镇江、丹徒间北渡长江，是日到达江都县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部、苏皖支队陶勇部会合，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7月下旬，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粟裕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纵队，叶飞、王必成、陶勇分任第一、二、三纵队司令，共7000余人。

△　日机88架分三批轰炸重庆，英驻华大使卡尔公馆遭炸。

7月9日　　蒋介石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指出今日青年最迫切之急务为：“一、认识时代；二、坚定主义信仰；三、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勖勉青年“认清基本工作，处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贯彻到底，完成革命建国、实行三民主义之使命”。

△　延安各界集会纪念抗战三周年。朱德讲话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近一半的兵力，建立了许多根据地，这对于争取整个抗战胜利是分不开的。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受到少数不明大义的顽固分子的污蔑和摧毁，这是与抗战前途极端不利的，急应加以制止，全国人民应坚决反对。

△　第三战区拟定《对于新四军防止活动及剿办办法》，要点为：一、秘密处置；二、实行连坐法；三、武力消灭；四、“向民众宣传共军之罪恶”。

△　“宋子良”对铃木提出重庆方面关于蒋、汪、板垣谈判的答复：7月下旬在长沙举行板垣、蒋会谈，汪蒋会谈在后，另行举行。因为“汪问题是内政问题，由中国自行处理”。铃木表示满意。

△　日机54架轰炸重庆，炸毁房屋300余栋；中国军队击落日机四架。

△　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扫荡”山西沁水县西山村，毒死、刺死、烧死民众80余人。

△　汪伪政府决定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任命梅思平为主任委员。同日，决定成立中日文化协会，由汪精卫和阿部信行任名誉理事长，并通过《中日文化协会组织条例》。

7月10日　苏联总顾问福尔根致书蒋介石，陈述其对宜昌失陷基本原因的意见：一、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二、对于部队作战，缺乏坚强与连续一贯的领导，尤其以军委会方面为然。三、极端迟缓，一切处理照例，延误时机。四、缺乏监督及贯彻目的之严格要求，尤其军委会方面如此。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福尔根认为“军队作战指挥问题，乃我军最落后的问题之一”，“军事委员会对大军统帅与指挥，须按时化、具体化、坚决化、连续化，成为全军之表率”。

△　桂南龙州日军进犯上金，次日陷上金。

△　鲁南伪军赵益增部5000余人分驻益都、临淄、昌乐、沂水等10余县及20余处据点，是日反正，各该地亦告克复。

△　日机90架轰炸重庆西郊，并窜扰南川。

7月上旬　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堀场飞抵香港，与中日双方代表洽谈举行要人会谈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关于停战条件，中国方面加深理解“备忘录”内容，领会日本方面的“从大局着眼的真意”。关于要人会谈的地点，协定为长沙北侧飞机场。会谈步骤为，首先由板垣、蒋介石协商停战，然后由汪精卫、蒋介石会谈，协商合流之事。

7月11日　军令部拟定目前各战区作战部署，要点为：目前应以一部维持现在态势，以主力巩固行动，并确保长沙、西安要点。另抽调适宜控制部队，充分利用游击战术，在敌后扩大扰袭，不断消耗敌人。第三战区应为巩固行都，截断敌后长江航运，另与第九战区配合，反攻南昌。第四战区重点置于粤桂边，威胁钦（县）防（城）。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配合，负责洞庭湖之警备。第一战区陕境内应于潼关、华县间控置一个军严加整备。第八战区应重点置临河、五原附近。第五战区应于南漳、保康间完成游击根据地之设施。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王宠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　四川省政府为平抑全省米价，制订紧急处置办法六项，决定全川以7月9日市价减低25％为最高标准，并严禁黑市。

△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方面军和警卫旅各一部，攻入吉林和龙县卧龙屯，击毙日军丰田中尉以下20余人。

7月12日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会谈，英方接受6月24日日本提出封锁滇缅路之要求。同日，外交部照会英国政府，

重申滇缅路国际运输线，请勿循日本之要求，并称该路线对中英两国友好关系之维持极为重要。

△　新四军张鼎丞第二支队在安徽芜湖东南水阳、黄池间歼灭日军130余名。

△　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欠一团）正式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黄克诚，共八个团，约1.7万余人。

△　石友三部在山东范县攻击八路军杨勇、萧华部，伤害该部官兵500余人，掳去162人。次日，杨、萧部反攻，毙伤石军千余人。

△　上海煤气公司工人千余名及虹口区一日营公司工人200余人实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及米贴。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关于“桐工作”巨头会谈的计划》，会谈地点：长沙。会谈时间：7月下旬（第一日预定为7月28日）。会谈的准备工作，应以日、华二巨头会谈开始，然后进行“白字”（即停战）正式谈判。参加会谈人员：陆军派遣机关，板垣中将、今井大佐、堀场中佐、片山少佐、畠山大尉（副官）、内之宫中尉（翻译）、臼井大佐。海军方面：预定二至三人。会谈内容另定。

7月13日　财政部设立战区货运稽查处，查缉敌货及走私。

△　军事委员会任命关麟徵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　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应长期确保宜昌，尔后武汉方面作战的地域，大致为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超越上述指定地区进行地面作战时，另行命令。

△　日本宣布自7月15日起，封锁宁波、温州、三都澳港口。

△　香港当局宣布，将增加警察后备队员额，俾应付任何非常事变，同时呼吁中国居民志愿加入警察后备队服务。

7月14日　豫东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克虞城，伪军旅长李万兴率部3000余反正。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杨成武部在河北易县歼灭日伪军250余名。

△　汪伪政府行政院训令上海市长傅耀宗与工部局交涉，限令上海《申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的外交编辑阿尔满·鲍惠尔、高尔德等七人出境。

7月15日　国民党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陈立夫兼会长，甘乃光、方治为副会长。

△　山西省新绛县县长李凯明迭次亲率警队艰苦抗战，卒能击溃强敌，屡战奏功，国民政府是日明令褒奖，并予晋级，以资鼓励。

△　国民政府特派陈大齐为民国二十九年度高等考试再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

△　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中国、世界和你》一文，赞扬国外朋友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援助，指出：从抗战开始到现在，各国支援中国的机构，给予全国范围的医药、孤儿和工业等方面的救济工作，证明了外国朋友对中国作了自我牺牲的努力。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在黑龙江克山县杜保董村击溃日伪军200余人，击毙日军参事官以下20余人。

△　日军2700余人向晋西北根据地“扫荡”，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张宗逊旅予以抗击，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战马120余匹。

△　汪精卫下令驱逐寓居上海公共租界之美国记者高尔德等六人

出境。17日，高尔德等发表联合声明，称：“同人俱属美侨，受美国法律之保护。同人等过去并未触犯美国法律，以后亦然，故傀儡组织之出境令，仅属纸上文章而已。”

△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和《恩赦诏书》，拟在长春建立“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塔”；公布特别减刑者15.1万人，一般减刑者11万余人，复权者14万余人。

7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主要内容为：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区域为陕省之绥德等18县，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省政府指导”。“除此一区外，其他任何地方，一律不得援例”。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阎锡山仍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长官”。“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由朱副长官负责”。“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全部应扫数调赴朱副长官负责之区域内，并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朱副长官指挥。”“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须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之规定地区内”。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问题，“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二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绝对服从军令；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21日此案送达周恩来转朱德遵行。

△　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警告英国：“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帮助日本，迫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并称：在英国如有此种行为，“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祸害”；如英国视停止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其

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扩大远东之战局”。

△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对英国封锁滇缅路“表示最严重的关切”，认为此举“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同日，驻英大使郭泰祺访英国外次白特勒，抗议英国政府封锁滇缅路，并指出：英国提议滇缅路停运三个月，以求中日成立和平，实为对华之“侮辱与损害”。

△　军令部调制陆军部分战斗序列：任命冯钦哉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奇伟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　第九战区炮兵部队于九江、芜湖间击沉日舰一艘，汽艇10艘。

△　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及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等为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部属与日伪军配合进攻八路军，致电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及林森、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明令制止。

△　日机54架分二批轰炸重庆，中国空军奋力出击，击落日机三架，飞行员丁寿康殉国。

△　日军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是日，日军一部在福建晋江之永宁登陆。17日，一部陷浙江镇海。23日，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反攻，克复镇海。

△　日本米内光政内阁总辞职，近卫文麿奉命组阁。

7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定11月21日为防空节，要求各地每年于是日举行防空部队与防空设备总检阅，扩大防空宣传与训练；同时宣布至1939年底，日机炸死中国军民5.1601万人，炸伤6.5846万人，毁房屋21.6546万间，损失约合国币14.4829万余元（战区内被炸人、财损失，尚未计算在内）。

△　蒋介石为英日封锁滇缅路致电宋子文和胡适，询问：“美国为何不能与英国积极合作，此中原因究竟何在？”请其向美国陈明只有“美国在远东多负责任，而后英国对日态度才能坚强。此为远东安危最大关键”。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曾国华运河支队、陈士榘晋西独立支队、第一二九师徐深吉新四旅等部，在山东范县以南之龙王庙、吴庙、王油房击溃石友三之暂编第一师等部，歼其1500余人。

△　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反对英国封锁滇缅路，认为此举“与最近滇越铁路案件相同，对于世界贸易造成不正当之阻碍”。

7月1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鉴为第八十五军副军长，佘念慈为第六十七军副军长。

△　英国、日本关于封锁滇缅路运输的协定在东京签字，协定规定：自即日起，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运入中国。同时，“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至同年10月18日宣告废止。

△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报告，宣称英国封锁滇缅路，是觅致“公允的解决办法”，既“希望中国确保其地位，维持其完整”，也“希望日本国家繁荣，使每一日本公民所愿望之社会福利、经济稳定，均能获得保证”。并表示“吾人准备对中日两国‘竭尽绵薄’”，“以和平及和解步骤求其成功”。

△　缅甸国防部发布布告：奉命禁止摩托、汽油、铁路材料、汽车及军火等物资经缅甸运往中国。

7月19日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刘和性、江美璜、龙绍基、何世乔、周锡恩、宋国涛、宋英、丁雨辰、陈西林、杨艺再、程自修、王好问、徐畅懋、孙益堂、江斗山、罗光群、胡羽、森格鄂沁18名汉

奸。

△　军事委员会任命霍揆彰为第二十集团军代总司令。

△　豫南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克信阳，俘日军队长一名。

△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乘夜袭击图佳铁路虎山站，炸毁桥梁一座，毙伤日伪军21人。

△　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发行人张似旭在上海静安寺路遇刺殒命。8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近卫文麿接受组阁命令后，是日邀部分内定阁僚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及原海相吉田善吾举行会谈，商讨世界政策。关于处理“中国事变”，把重点放在将战争进行到底与切断各种援蒋势力方面，同时对中国内部进行各种政治策略。重庆方面如要求讲和，必须接受以下条件：一、实现东亚的共同防卫；二、建立东亚经济圈；三、禁止排日及保证不重新对日作战；四、反对共产主义。在停战后建立新政府方面，重庆政府必须尊重南京政府的意见，两者之间“作为内政问题”进行适当的妥协。

△　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通过有秩序地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其他一切所谓特权”。

7月20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同时举行俘虏解放式。33名日盟员推举鹿地亘为会长，大会发表宣言，并提出“反战同盟”的四项工作方针：一、协力于中华民族之自卫解放抗战，灭绝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大陆上一切代理人；二、拯救受压迫而牺牲于战争之人民，根据人民素志以建设民主之日本；三、努力中日两民族之亲善提携，根据自由、平等、友爱之原则，以奠定东亚和

平；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联合世界爱好和平之民族，以绝灭人类之任何不幸。

△　日反战人士伊藤进、井村芳子在鄂北抗日前线成立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第五战区支部。

△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和警卫旅攻克吉林安图县日军新兴“集团部落”，击毙日军福田中佐以下20余人。

△　日伪军一部偷袭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部驻地朝阳山，守军突围，击毙伪警察大队长以下10余人。第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在突围中阵亡。

△　香港英当局禁止中国茶叶由港出口。

7月中旬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宣布：抗战三年来，晋察冀部队共与敌作战3327次，毙伤日伪军5.3622万人，俘日军246人，日军投诚二人，伪军反正6101人，缴获各种炮63门，长短枪1.6643万支。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在吉林通化县与日军武装移民团激战，毙敌20余人。

7月21日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凡中央、地方公务人员，如有兼任私营商业管理人，或兼营与其主管业务有关之商业，及利用地位、权力经营投机事业囤积居奇者，应分别情节轻重依法惩戒，或其触犯刑法者，并依法从重处罚，不得稍涉宽假。该主管长官知情不举，同予处分。

△　陈嘉庚、侯西反等结束对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考察，是日抵重庆。同日，受到周恩来的会见。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攻克浙江萧山。

△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卫立煌及西安行营等，揭露石友三所部纠集杂军二万余人，公开在敌军掩护与帮助之下，向冀鲁豫边区猛攻驻在该地之职军，并呈交八路军缴获的石友三部反共《军事会议决议案》及石部与日军联络之密函一件，请求明令讨石。

△　闽海日军进犯三都澳。

△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向华南派遣攻城重炮兵的命令，由如下部队组成：第一炮兵队，队长北岛骥子雄少将；第一炮兵司令部之重炮兵第一联队及独立重炮兵第二大队，大队长金丸清俊少佐；独立重炮兵第三大队，大队长樋口良彦中佐，后为贯名人见中佐；炮兵情报第五联队，联队长竹村滋中佐；第三牵引汽车队，队长小池利助中尉。同时，以上部队编入华南方面军。8月10日，第一炮兵队由日本国内港口出发，18日在粤南宝安地区登陆。

7月22日　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计划在华北发动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指出：日军依据几条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企图封锁与隔绝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为打击敌人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之目的为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之工作，以至基本上截断该线交通。基本破坏区为井径、寿阳段，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战役。战役兵力组成为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共22至24个步兵团，另有总部炮兵团大部及工兵一部。此次作战即后来之“百团大战”。

△　行政院政务视察团结束对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视察，是日返抵重庆。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攻克安徽无为县城，巢县日军增援。23日，顾部反攻，克复巢县城。

△　八路军冀南军区以第一二九师新七、新九旅及民众万余人，对德石路进行破击战。27日，战斗结束。

△　日机120余架袭击四川合川、綦江等地，投弹数枚，被中国空军击落侦察机一架。

△　日本新内阁组成：首相近卫文麿，陆相东条英机，外相松冈洋右，海相吉田善吾等。23日，近卫文麿发表施政方针，外交上依照日本独立之立场，采行独立外交，积极建造世界秩序；经济上从速摆脱依存外国之弱点，重视中、日、“满”之经济提携及对南洋方面的发展；刷新国民教育。

7月23日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浙江镇海、招宝山。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韦杰新一旅袭入河南安阳之观台镇，并炸毁漳河大铁桥。

△　日军步、骑兵千余人向河北邯郸地区“扫荡”，八路军刘伯承部徐深吉旅配合地方武装粉碎敌人的进攻。

△　日、中停战谈判代表铃木卓尔、“宋子良”遵照板垣及蒋介石之意旨交换《备忘录》，约定如下事项：一、会谈时间：8月初旬；二、地点：长沙；三、方法：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商谈日中停战问题。

△　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南方面军从7月25日零时开始由大本营直辖。华南方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占据广州、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的各重要地区和沿南宁——龙州公路地区，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二、超越前面各号令所提到的地区进行地区作战，应根据另外命令进行。三、在华南方面实施航空进攻作战时，中国派

遣军和中国方面舰队应给以密切配合。四、加强对华谋略。五、为了处理事变，应对第三国进行必要的作战准备。

7月24日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法》，规定对于违犯《惩治汉奸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战时军律》、《陆海空军刑法》、《惩治盗匪暂行办法》等若干条款者，“军警应严密注意，侦察逮捕，于必要时并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之”。

△　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邀请，作《西北之观感》的讲演，称赞共产党“上下刻苦耐劳，努力求进”，“在如此艰苦抗战中，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精神才对”；呼吁中国各党派“应该加紧团结”，此不仅“关系国家一时的安危，而且关系民族永久的存亡”。

△　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公祭大会。同时，建成成吉思汗纪念堂，堂内塑有成吉思汗像及蒙古文化陈列馆。

△　桂南龙州日军陷渠黎。

△　日机36架轰炸成都，在市区投弹130余枚，炸毁民房638间，死伤居民近200人。中国空军击毁日机一架，坠于南部县境，击伤10余架。

7月25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推孔祥熙、孙科、何应钦、张群、陈济棠为战时经济会议委员，孔祥熙为召集人。

△　外交部发表声明，严重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前上海市政府土地局交托保管之档案交于汪伪政府。

△　顾祝同电告蒋介石该部“制裁”皖南新四军的原则：“一、以实力制裁其实力，以组织制裁其组织；二、公开不法行为以公开办法对付之；三、秘密活动以秘密活动手段对付之；四、党、政、军切实联系。一切制裁办法力戒张扬暴露。”

△　新四军陈毅部由苏北扬州、泰州地区出发，向黄桥挺进。26日，韩德勤急令所部保四旅由黄桥向北出击，令陈泰运率税警总团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陈毅部。

△　阎锡山电告蒋介石“剿办”山西新军之情形，内称：中离柳公路以西以南盘据之叛军，连日被我于（振河）军扫荡，已告肃清。现汾、中大道以南地区共有叛逆3000余人，我温怀光军正进剿中。汾阳、灵石边境之叛逆，连日分段窜扰，均被我击退。

△　台湾青年革命家、台湾国民革命党发表宣言宣告参加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誓为台湾人民之自由解放而努力，永矢不渝。

△　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拜会丘吉尔，讨论远东局势，丘吉尔宣称英国封锁滇缅路，在于“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

△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禁止石油、废铁出口，由美输日之石油、废铁须先获得国务院批准。

7月26日　蒋介石在重庆对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学员演讲，称改良中国新闻事业必须注重传递迅速、报道确实、定价低廉、发行普遍。

△　驻法大使顾维钧在法国维琪对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英国对日本让步，宣称英国封锁滇缅路，“对中国不失为一大打击，但中国决不因此而屈服”。

△　沈鸿烈部王福成团在山东惠民南之萧家、冯家、赵家一带截击八路军，伤害官兵150余人。

△　桂南邕宁路日军陷四塘。

△　日本大本营和内阁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基本国策纲要》，要点为：“为了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动，改善国际国内的形势，必须迅

速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同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在国际上，“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迅速调整对苏外交”；在国内，“强化战时体制，充实各项战备工作”。27日，会议通过《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提出“为了处理中国事变问题，应集中运用政治、军事的综合力量，特别要彻底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采取一切手段，务使重庆政权早日屈服”。“对外施策在加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应以解决南方问题为目标”。

7月27日　　周恩来携带国民党中央7月16日《提示案》飞返延安，请示中共中央。

△　鲁苏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李明扬电告蒋介石称：该部将采取快速之手段，一举歼灭新四军陈毅部及其苏北部队。30日，蒋介石电示：八路军、新四军“中央正谋调整之，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静候解决”。

△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自8月1日起，美国禁止飞机发动机所用燃料、飞机所用润油、废钢铁等物资出口。

7月28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陈嘉庚，陈嘉庚谈及赴兰州、西安、延安、山西、洛阳、汉中考察之观感，对抗战胜利之信念益加坚定。旋蒋介石谈国共关系问题，声称“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陈答称：“华侨心理，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29日，蒋设午宴招待陈嘉庚，何应钦、白崇禧、卫立煌、张治中、陈布雷、吴铁城等作陪。30日，陈离重庆抵昆明，考察西南各省。

△　外交部发表声明：日本如派兵入越，对中国领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我国决派遣武装部队入越自卫。

△　日军陷晋东南陵川县城。

△　日机63架袭击四川，在万县城郊投弹，数处起火。

7月29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蒋介石演讲《党政军主官目前之急务》，要求各主官对部属的生活状况应确实调查，确实研究；要效法前方官兵，坚忍奋斗。在经济方面，一是以创办合作社为改善经济生活的有效办法；二是发动平价运动与运输运动，以期调剂物资，安定社会。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瑞河为第七十一军军长。

△　蒋介石对全国政工会议人员演讲《政工人员负责尽职之要道》。8月1日，蒋介石又以同一题目再次作演讲。

△　国民政府以河南睢县士绅陈继修、山西中阳县士绅李树荣、河南信阳县士绅紫连复随军协助杀敌，效忠国家，忠贞不贰，慷慨捐躯，是日明令褒扬。

△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所部攻占泰兴县黄桥镇及蒋垛、古溪、加力市等地，歼灭江苏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两个团及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一个营，共2000余人。并争取何部特务团陈宗保部起义。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令战时新闻检查局称，桂林出版之《救亡日报》“现为共党分子所操纵”，“仍应取缔”。

△　汪伪宪政实施委员会成立，汪精卫为委员长，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为常务委员。

△　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在华盛顿向记者宣称：美国愿于适当时机，用谈判方式放弃在中国之特权。

7月30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以统筹全国粮食之产、销、储、运，调节供求，特派卢作孚为局长，何廉、熊仲韬、何北衡为副局长。8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下设行政管制、业务管

制、财务三处和秘书、研究二室。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建绪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　国防最高委员会电四川省政府令饬专员、县长应注意粮政，“对于有关事项，务遵照命令，负责切实遵行，并应视为本身最大责任，不得视为协助性质”。

△　阎锡山电告蒋介石所部近日“剿办”山西新军之情形，内称：由洪桐西渡叛逆约一个团，现驻东西龙马、赤荆村、洪桐城西一带，已饬侦剿；王思田师一部进剿苏达村、孝渠城西南叛逆，毙逆数十。盘据大石头，中、孝大道间叛逆约2000人，经我师宋团击退北窜。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8月1日、4日、7日、8日连续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提出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统归周恩来来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将来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党团也在周恩来领导下；并指出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7月31日　　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复选于学忠、徐向前、朱瑞、郭洪涛、黎玉、范铭枢、元养斋、陈光、罗荣桓、张经武、李澄之等61人为国民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铭枢、元养斋、马保三、孙鸣岗、李澄之等81人为参议会议员，范铭枢为会长。成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张经武、李澄之、黎玉、罗舜初等23人为委员，黎玉为主任委员。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在黑龙江望奎县高贤村击溃伪海伦警察大队，毙伤敌80余人，俘敌大队长以下三人。第六支队副队长高继贤在战斗中阵亡。

△　日机116架轰炸重庆北碚、铜梁，被中国空军击落五架。

△ “宋子良”向铃木卓尔提出重庆方面关于“桐工作”的两点意见：一、由于近卫首相再次上台，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以前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二、在板垣、蒋会谈时不要触及蒋、汪合作问题，并废除日、汪条约。

是月　国民政府制定《拱卫行都的作战计划》，其方针为：以拒敌入川为目的，应始终确保三峡以为作战轴心，并凭依三峡及其南北山地，破路清野，加强地形之险固，并用正面韧强抵抗，节节侧击，遮断敌人补给线，歼灭进犯之敌于三峡南北连山地带，预期在常德、石门、五峰、青岩沟、庙河、兴山、歇马河、南漳、襄樊各附近之线，万不得已时，亦须依托三峡，在沅陵、恩施、建始、奉节、白河之线以东与敌决战。决战时期当在秋季以后。第九战区在赣北、鄂南及湘北行持久战；第六战区守备三峡及其南北连山地带；第五战区驻守鄂北地区。第十、二、十八、六、三十九、七十一、三十、五十五军，分别置于沅陵、彭水、万县、贵阳、白河、汉中、南阳、邓县整训待命。

△ 财政部公布《取缔禁止进口物品商销办法》，凡九条。

△ 驻波兰、挪威、荷兰三国公使及驻比利时大使奉命回国，各该馆馆务亦同时结束。

△ 中共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分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工作。

△ 新四军苏南部队在茅山地区重组江南指挥部，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指挥。

△ 冀东八路军李运昌部连克玉田县鸦洪桥，丰润县三女河、任各庄等13处日伪军据点，毙、俘日伪军500余人。冀东八路军第十二团一部在盘山地区全歼驻冀东的日本关东军骑兵中队。

△　蒙古抗日游击队成立，高凤英任队长。

△　日军在江苏崇明岛大肆烧杀，数百名无辜平民惨遭杀害。其中一次用机枪集体屠杀男子100余人，未死者用刺刀挑死。

△　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在广州市内营建工事，将所雇用民工900余人秘密枪杀。

8月

8月1日　　国民政府申令禁止以机关长官私人名义对下级机关滥荐人员，“以革瞻徇迁就之弊，杜奔竞请托之风”。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正富为第六十军副军长。

△　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国民参政员、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桂林逝世。1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克湖北应山。

△　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薄一波、戎伍胜。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张光中支队在山东崖庄歼灭日伪军200余人，俘伪县府主任一名、伪军20余人。

△　唐山矿工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节振国在率领工人游击队一部夜袭日军弹药库后，撤至滦县下尤各庄遭敌围攻，在战斗中节振国壮烈牺牲。

△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重申日本的外交政策以解决“中国事变”为目的，并将建立强有力之政治机构，对华厉行经济提携，进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同日，外相松冈洋右亦发表声明，宣称日

本外交政策的当前任务，是以日、“满”、华为核心，确立大东亚共荣的连锁。

8月2日　　新四军罗炳辉第五支队北渡苏北三河，与八路军黄克诚部第五纵队一部配合开辟淮（安）宝（应）地区。

△　日机100架袭击四川广安、隆昌、璧山等地。

△　汪、日调整“国交”谈判是日续会，至28日闭会，继续讨论和审议中日调整“国交”的基本事项、细目事项条文及处理其他事项等。28日，审议全部基本事项，并通过全部条约。

8月3日　　中国农民银行将其存放在香港的白银10箱计4.65万元，通过中央银行广州分行委托汇丰银行美轮“亚当士号”转运纽约大通银行收存。

8月4日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陈述重庆《新华日报》出刊以来，各地任意扣留禁止，致使发行遇到莫大之阻碍，请饬令各地党部及地方政府纠正此非法之扣留行为，予该报发行以合法保障。

△　日本陆军省就“桐工作”电令铃木卓尔，向重庆方面说明：一、第二次近卫声明中的对象为重庆；二、日汪条约仅属内约层次；三、汪、蒋合流不是停战条件，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又称：“如果对方缺乏诚意，谈判可中止”。

△　日本与法属越南当局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方要求在越南设立海陆军根据地，以利早日结束对华战争。6日，双方签订《日军假道实施限制条件》，允日军在海防市登陆。

8月5日　　桂南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克复上金，日军溃走龙州、宁明。

△　徐永昌呈请蒋介石加强陕、甘、绥、宁之反共兵力，拟将在山西乡宁的第九十军李文部调驻黄河西岸陕境宜川、韩城附近。10日，蒋介石密电阎锡山，令李部“作西调宜川、韩城之准备”。

△　据中央社讯：美国商务部公布，1938年、1939年两年中，美国汇往中国的基督教费最巨，现金及货物总额达1000万元。

8月6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河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员名单，以刘积学为议长，陈士凯副之。

△　行政院会议通过《各县保甲编整办法》。

△　洞庭湖日军进犯湘北君山。

△　新任香港代总督诺尔顿中将宣誓就职。

△　缅甸政府发布公报称：经滇缅公路之非禁运货物之运输，业已恢复。但驶往中国满载货物之卡车，仅可带足敷往来行驶一次之汽油，而汽车主人亦需签字保证汽车仍将开回。

8月7日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日前抵渝。是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五团体举行欢迎大会，关报告湘北大捷经过，并称湘北大捷的原因在于：将士抱必死之决心，充分发挥攻击精神；军纪严明，进退有据；军民合作，我军作战精神与技术之进步。

△　军事委员会重设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余汉谋为司令长官，设于广东曲江，负责广东、江西一部战事，辖第六十三、六十五军。

△　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　皖北新四军一部攻入常家坟日军据点，歼敌200余人。

△　美国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致电蒋介石、林森，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并悬赏70万元奖励诛杀汪逆。

8月8日　　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对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在正太战役中的任务作出具体规定：晋察冀军区主力以10个团破袭平定（不含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破袭重点应在娘子关至平定段。第一二〇师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线及汾离路，应以重点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对晋西北管地内各敌之据点与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第一二九师以主力八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袭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之破坏重点为阳泉张净镇。各部限20日开始战斗。同日，朱、彭、左再电聂、贺、关、刘、邓，指示正太线战役的破坏对象主要是桥梁、隧道、车站、铁路，应首先选择其要者破坏之。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复晋南夏县。

△　日军将河南沁阳东北沁河掘口，河水南泻，尽成泽国，所有稻米尽被淹没，人民受灾甚巨。

△　旧金山华侨统一义捐救国会捐献航空救国金100万美元，支援国内抗日。

△　法国政府照会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表示如越南遭受任何侵害，法国必予抵抗。9日，法越南总督德古下令远东法舰分别驻守越南各处，加强防务。

△　英国陆军部发布公告，决定撤退驻北平、天津、上海之英国军队（其中上海约1500人，天津约150人）。

8月9日　　周恩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策略和工作》的演讲，强调指出：要将一切抗战力量的成败视同自己的成败，与之休戚相关；对主张抗战却又反共的分子和集团，必须打击其反共行动而争取其抗战；统战要与群众工作联系起来并以之为基础。至次日讲毕。

△　鲁苏战区于学忠部攻克山东齐东县城，毁日伪军机关及仓库数处。

△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新二旅、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个支队，彭明治、田守尧、张爱萍分任司令员，共约二万人。

△　日机90余架分二批轰炸重庆，在大梁子、朝天门、曾家岩、海棠溪、龙门浩等地投弹10余枚。被中国空军击伤三架。

8月10日　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将到达伊盟的高双成部调回陕北，增强防务；将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以北地区划归第八战区，以高双成为陕北警备司令。

△　日舰13艘自广东潮阳袭击海门。

△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对记者宣称："日本政府在建设大东亚范围之共同繁荣中，将尽力与赞同日本意见之各国合作，对于一切障碍将全力克服。"并称：日本"将设法早日解决中国事变"。

△　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就英国撤退在华驻军事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英国此举颇表遗憾，但英国撤兵在各方面皆不影响美国政策，美国政策仍坚定不变。

8月11日　蒋介石接见中央社记者，说明中国为采取正当防卫措施，将破坏滇越铁路，以消除日寇假道攻击云南之口实。

△　粤北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攻克增城，残敌向官塘营西北高地溃逃，张部尾追，与敌战于凤池、大池岭之线。

△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攻入山西屯留东之常村镇，歼灭日伪军百余人。

△　日机90架分三批轰炸重庆，浮图关、瓷器街、中华路、民权路、曾家岩、罗家坝等10余处遭炸，苏联大使馆落弹数枚，炸毁房屋四间，伤一人。中国空军击落六架，俘机士四名。

8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通报，内容为：一、边区承认18县（绥德五县在内），我方主张以现状为界。二、八路军三军六师加六团，新四军两师，我方要求八路军三军九师，新四军三师。三、国方要求划区，以八路军、新四军开旧黄河北岸与友军分处，我方原则同意划区。并指出：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200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仍为推动时局好转的中心一环。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人杰为新编第七军军长，李忠毅为副军长。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攻入晋南绛县城，与敌巷战竟日，焚敌机关、仓库多处，至31日，毙伤200余人。

△　日机90架轰炸四川泸县、自流井。重庆市内发警报，大隧道内因容纳避难市民过多，加之天气酷热，致九人窒息死亡，伤40余人。此为重庆第一次大隧道案。15日蒋介石视察大隧道，面谕改进防空设施。

8月13日　　蒋介石为“八一三”三周年发表《告沦陷区民众书》，称敌人屠杀我同胞，妄图灭我民族，“我们唯有坚决抵抗，死中求生，才能打破敌人侵略的野心，粉碎它奴华的妄念”。昭告沦陷区同胞“自爱自救，用孤臣孽子复国雪耻的精神，来作杀敌自卫，救亡复兴的努力”。

△　行政院会议通过《统一缉私办法》、《关于取缔囤积居奇办法》，对所有粮食及日常用品均规定限量，逾量即为囤积居奇，以妨害抗战论罪。

△　龙云对由昆明至重庆的外籍旅客谈话，表示决承中央旨意应付越南局势，将以强大之兵力抵抗日方之任何攻击。

△　陈嘉庚等抵贵阳。17日前往柳州。21日抵桂林。29日，离桂林抵长沙。9月2日抵韶关。9月6日，经大庾岭抵赣州，专员蒋经国与各界人士数百人在郊外欢迎。

△　湖北汉阳地区伪军黄仁杰、袁杰等部1500余人反正，参加新四军李先念部，改编为第十团和第十一团队。同日，鄂中伪军杨经曲率部反正，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

△　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对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应当深切认识越南之地位不仅对中国有重大关系，即对英、美之利益亦属至关重要，并称：日本侵略越南，有损英国在远东之利益。

△　驻北平英军撤退。

8月14日　航空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三年来中国空军击落日机848架，击毙日空军人员1148人，炸伤敌舰154艘，击毙日空军少将、中将各一人，并吁请国民政府扩大空军建军工作。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张啸林被刺身亡。

8月15日　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追悼张自忠、陈安宝、郑作民、钟毅将军大会，朱德、萧劲光、王若飞、王稼祥、王明等到会，毛泽东送“尽忠报国”挽词。大会发表悼张自忠祭文，朱德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学习张自忠、陈安宝、郑作民、钟毅诸将军不怕牺牲、抗战到底的精神。

△　日军在广东台山县上川岛之南澳大湾及潮阳以南之海门强行登陆。

△　日军华南舰队袭击厦门东北之兴化湾，其陆战队一部在南日

岛、红日岛、野马岛、鹿耳岛等岛屿登陆。

8月16日　最高国防会议决议通过考试院呈递的《中央及地方各机关设置人事管理人员暂行条例》。

△　日机近日三次轰炸四川泸县，灾情甚重，赈济委员会是日派委员黄炎培携款二万元及药品等前往该县急赈。

△　上海各国驻军司令部谈判英军防区分配办法，商定：日军接管沪西之英防区，美海军陆战队接管公共租界中区之英防区与两虹口区之防区，即苏州河以北英方所驻区域。日军表示反对，声称要求将英防区全部交与日方接管。

8月17日　蒋介石以各高级军事长官久战怠生，形成种种弊习，而以战斗意志之低落、革命精神之消沉与军队纪律之废弛为尤甚，特手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及所属各部总司令、参谋长：一、加强精神之修养与指挥能力之提高，使意志益形坚定，使决心益形坚强。二、切实根除对友军敷衍、对部下讨好、对上级虚伪、对命令轻忽、对报告夸妄、对公务因循之恶习。三、所部官兵尤其直属官长，更应示以恪守纪律，崇尚道德，戒除奢侈，共同甘苦，切戒怕怨循情之恶习，扫除怕死畏敌之劣性。

△　蒋介石、白崇禧、杨杰等赴云南视察防务，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商定：如越南当局对日屈服，则驻于滇越边境之华军必要时采取攻势。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攻入濮阳县城，旋退出。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桐工作”处理纲要》四条，主要内容为：“以前的决心不变，通过稳步而顺利地处理近卫声明问题、停战问题以及张群出迎等问题，而逐步促进之。”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如果确悉对方无诚意，或不能迅速收到实际的效果时，本工作

可暂时中止。关于蒋、汪合作问题，“不把它作为停战条件来对待”。关于局部停战问题，努力会同双方军事参谋长正式签字，“在不得已时，达成君子协定”。

△　日本中央银行与伪满洲国签定特别资金契约，金额为一亿元。同日，伪满公布本年度上半年国际贸易入超突破五亿元。

△　缅甸《文理笃日报》撰文，深切盼望英国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并大量援助中国，使其在越南对日作战。

8月18日　国民政府节约建国储蓄劝蓄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为主任委员，宋子文、孔祥熙、钱新之为常务委员，翁文灏、张嘉璈、徐堪、陈行等为委员，并分设重庆、成都、昆明、兰州、贵阳、西安、桂林、沅陵、韶关、赣州、永康等分会。

△　外交部接获驻法大使顾维钧电称，日已向法提出多项条件，要求允许日军假道越南攻华，及占据越南各海口与要求各种经济特权。19日，顾维钧再电告外交部，法已训令其驻日大使允以东京湾为日之海军根据地，北圻为军事根据地。

△　天津英军撤往香港，自是日起，天津英军防区由美海军陆战队接替。

8月19日　日机190架分两批轰炸重庆，两路口、两浮口、中二路、通远门等10余处遭炸，30余处起火，死伤民众百余人，无家可归者2000余人。美国之社交会堂中燃烧弹全部焚毁。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宣称：美军对于最近上海各国驻军司令联席会所通过的妥协办法暂不实行，在美、日两国对此事之谈判未获结果之前，16日会议议决之美军占领区，经英、美双方同意，暂交由万国商团接防。20日，万国商团正式接防。

8月20日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晚8时，八路军晋察冀军

区、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向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日军交通线实行总破袭。晋察冀军区以15个团兵力破击正太路阳泉至石家庄段，另以30余团兵力分头破击北宁线、津浦线（德州以北）、沧石线、平古线、平大公路北段。第一二九师以15个团和一个炮兵团的兵力破击正太路阳泉至榆次段，另以31个团的兵力分头破击平汉线（元氏至安阳段）、德石线、平大线（北平至大名南段）、邯济路、白晋路（平遥至壶关段）。第一二〇师及决死纵队一部20余团兵力破击同蒲路（大同至阳曲段）、汾离公路全线。

△　八路军聂荣臻部郭天明支队一部进攻正太线之娘子关，克附近日军碉堡数处，炸毁火车二列，车厢40余节，并击溃娘子关西磨河滩之援敌，残敌300余退守堡垒、地道内。郭部火力强攻，战至21日，全歼守敌，占领娘子关，炸毁磨河滩铁桥。是役毙敌400余人，俘虏10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死三纵队在潞城王家庄与日军激战，第三纵队政委董天知在战斗中殉国。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张宗逊旅攻击静乐东之日军据点康家会，战至21日晨，全歼守敌，旋静乐日军千余人，汽车20余辆来援，被击溃。此役共毙伤日军200余人，俘虏1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正洪团乘雨攻击沁县北之漳源，歼灭守敌过半。21日晨，沁县日军百余来援，激战竟日，将敌击溃。是役毙伤日军400余人，陈团副团长吴隆阵亡，伤亡官兵200余人。

△　日机170架分五批轰炸重庆，向平民区和商业区投弹，全城大火，市民死伤数百人，无家可归者约万人。英美会、十字堂、英年会、美国公谊会等10余处中弹。中国空军击落日机四架，俘驾驶员三人。同日，蒋介石特令加拨赈款100万元，交由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妥为发放。

△　日军围袭山西寿阳县王村，杀害群众143人，绝户19家。

△　江苏省政府制定《防止异党非法活动办法》，指示各县、市、镇、保、甲长“以清除伪奸，防止异党非法活动两项为中心”；“保甲长应随时检查保甲内居户及要道，遇有奸伪或异党潜入，立刻密报”，“如有知情不报或放纵勾结情事，应依法惩办，并予以连坐处分”。

△　杂文月刊《野草》在桂林创刊，由夏衍、孟超、秦似、聂绀弩、宋云彬主编。

△　驻上海英军300余人自沪西公共租界撤退，调往新加坡、香港增防。21日日军进驻该区。

8月21日　行政院公布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及委员名单：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贺国光、张笃伦、陈筑山、刘贻燕、甘绩镛、秦汾、卢作孚、徐堪等15人为委员，邓汉祥为秘书长。

△　陈诚对报界人士报告宜昌失守之经过，称其三年来亲临战阵于淞沪及武汉之役，皆无遗憾，独于宜昌会战言之滋愧，“宜昌之失，在于无备，此后再不能蹈其覆辙矣”。并称，已经蒋介石令准，将辞去政治部部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一切后方兼职，今后将专负战区责任，从事拱卫行都工作。

△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袭入同蒲路霍县车站。同日，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克平汉路临城、冯村和磁县渔阳镇日军据点，袭入安阳北之丰乐车站。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旅攻克寿阳西南芦庄，克碉堡四处，歼灭守敌70余人，芦家庄以西10里内铁路、桥梁均被破坏。22日，又克沾尚镇、马道岭，并击毁行驶太谷之火车一列，毙伤日军百余

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锡联旅郑国心团进攻阳泉，进至狮脑山附近，与由阳泉出犯之日军400余人遭遇，将敌击溃。陈旅政治部主任灵仁在战斗中阵亡，伤亡官兵30余人。同日该师陈赓旅一部攻击平定，敌凭工事抵抗，并施放毒气，陈部官兵40余人中毒。

△　八路军杨成武部向正太线井陉至娘子关段及井陉以北各日军据点发动进攻，克乏驴岭、北峪、地都等据点，歼敌200余人。乏驴岭至地都段铁路及桥梁、碉堡均被破坏，并完全占领井陉煤矿，歼灭日军100余人，解放矿工2.3万余人，炸毁全部矿井机器。

△　韩德勤于苏北东台下达向黄桥地区进攻的作战命令：特派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守维、李长江为副总指挥。进剿分左翼和右翼，左翼以郭心冬、刘漫天为正、副指挥，由第一一七师（欠一旅）、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二营）组成，于8月30日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完毕，9月2日起经古溪及以东地区，向黄桥地区攻击前进；右翼以李明扬兼任指挥，陈泰运为副指挥，由李明扬部三个支队和陈泰运部全部组成，于8月30日在姜堰附近集结完毕，9月2日起经蒋垛及以东地区向黄桥地区攻击前进。

△　豫东伪军第六路司令刘文正率部千余人反正。

△　甘肃省增设康乐县，县府驻地新集。

△　上海《大美晚报》编辑程振章被汉奸狙击殒命。

△　铃木卓尔返东京与东条英机拜访近卫，报告重庆方面关于“桐工作”的意见。22日，取得近卫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内称：“蒋介石阁下，顷悉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已半载有余，其结果是最近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调整邦交的基础。”另外，又取得板垣《关于蒋

汪合作问题的保证》信函一件，函称：“为了有助于日华尤其是中国内部取得圆满的和平，对于蒋汪合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但基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兹保证如上。”28日，铃木携以上信函赴香港向“宋子良”提示，“宋子良”满意地说：“这就不成问题了，重庆会满意的。”

8月22日　蒋介石在重庆对青年团和政治部各级干部发表训词，指出青年团和政治部工作效能低微的原因，是由于干部“不知事理，不守范围”，以致力量相消，事业迟滞；由于干部只能任劳，不肯任怨，遇事推诿，敷衍塞责。训示各级干部应严以自律，深切反省，明察国情，按部就班，逐渐改进。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戡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任命陈铁为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　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等135个民众团体，为日机迭炸重庆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宁以重庆为墟，誓当坚定奋发，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之来临。

△　国民政府拨款五万元交湖南省政府，救济衡阳灾民。

△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告百团大战战况：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余之准备，已于8月20日20时开始。参战部队为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及决死队等，计105个团，分为三个集团，分由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之。战斗序战胜利，已取得正太全线交通截断，正在发展之中。此战实为“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积极主动向敌进攻”。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杨家瑞团攻克阳曲北龙泉，守敌大部被歼，残敌向忻县西溃窜，复被该部预备部队截击，敌继向西营尾庄溃窜，又被该部刘彬团截击。此役计毙日军200余人。

△　经济部核准资源委员会施行《管理矿产品实施办法》，凡23条。

△　山西新军续范亭部进袭晋西北五寨县城，小河头日军200余人来援，被续部在城北之西石附近阻击，毙敌40余人。晚，续部在民众千余配合下，破坏五寨至三岔堡、五寨至宁武公路、电线约30余里。同日，决死第二纵队一部配合民众，将大武至离石公路彻底破坏。

△　寿阳日军300余人及伪军百余人被围攻数日，是日图向西突围，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锡联旅一部击溃，毙伤50余人，俘日军中尉小队长等21人、伪军50余人。

△　广东宝安县伪复兴军军长郎挚天率部1600余人反正。28日发表宣言，斥日军侵华暴行，表示为抗日誓效前驱。

△　日军对山西盂县活川口进行大“扫荡”，一天两夜在该村杀害民众108人，绝户三家。

8月23日　朱德、彭德怀通电全国，报告百团大战战况：八路军为粉碎日军新的进攻，集中大军，开始向正太、平汉、同蒲等路进攻以来，同蒲、平汉两路已不通车，正太路全线车站、桥梁、铁路、水塔、电信、工厂、矿场等均经我彻底破坏，并占领天险之娘子关，平汉路保定、石家庄、新乡各地全被截断，各处在激战中。

△　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致电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希望全体将士发挥最大之决心毅力、韧耐力、顽强性、机动性，以再接再厉之精神，在现有序战胜利的基础上，猛烈扩大战果，完成战役任务。

△　八路军聂荣臻部郭天明支队一部配合繁峙独立团攻占繁峙东之日军据点大营。24日，繁峙日军300余人来援，与郭团在蔡家庄以东激战。

△　正太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十旅攻克阳泉西狼峪镇，狼峪镇日军施放毒气，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以下官兵400余人中毒负伤，同日攻克寿阳车站及寿阳城。八路军与日军展开狮脑山争夺战，28日八路军放弃狮脑山。

△　张治中就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

△　驻法大使顾维钧就法国允许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向法国维希政府外长博杜安郑重声明：只要法国政府竟然允许日本武装部队通过或驻屯在印度支那，或者听任日方采取类似行为，那么，中国政府即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这种局势。

△　朱德、彭德怀就日机“八一九”、“八二〇”轰炸重庆，率八路军全军将士通电慰问重庆市同胞。

△　日机81架分两批轰炸重庆，在海棠溪等处投燃烧弹多枚，德国大使馆中弹。

△　桂南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再克上金，日军向西溃走。

△　汪伪政府成立党务训练团，汪精卫、陈公博任正、副团长。

△　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访英外次长官白特勒，要求英国政府无条件立即开放滇缅路。白特勒答应允许药品经滇缅路运华。

8月24日　蒋介石致电四川省政府，指示目前工作重心为：平抑物价，发展驿运。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彭绍辉旅攻克晋西北静乐南丰润村日军据点，歼灭守敌及增援日军2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大青山李井泉支队于绥远素齐北古城附近

伏击由察北开来之日伪军，毙日军60余人，俘伪蒙军11人。

△　正太路东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苇泽关车站，西段克阳泉东移穰镇车站。同日，太原日军东犯榆次，被毙伤3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炸毁平汉铁路漳河铁桥。

△　日机50架袭击桂林，四令街美国浸信教总会被全部炸毁，炸伤11人，损失约10余万元。

△　日机八架连续轰炸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榆次东建阵地，投弹200枚，死伤军民百余人。

8月25日　周恩来从延安经兰州飞抵重庆。

△　《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社论《庆祝百团大战在正太路上序战大捷》，历述正太路沿线各重要车站及据点均被我军占领，沿线铁桥、隧道大部被我破坏，井陉煤矿和东王舍新矿已在我军掌握之中，晋、冀交界的天险娘子关已为我克复等，深信八路军一定能在这个序战胜利的基础上去取得更大更新的胜利。

△　重庆市分由水陆疏散被炸灾民，陆路运至璧山、綦江，水路运至合川、长寿、江津。

8月26日　卫立煌致电朱德称：日军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予以当头迎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为佩慰”。并表示已饬各部迅速动作，配合贵部作战。

△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赴长江以北各战区巡视军事。10月6日，巡视完毕返渝。

△　八路军总部发布作战命令，要求各部在完成正太线战役任务的情况下，“应乘胜展开正太线两侧之战斗，去收复敌深入各该根据

地内之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沿线之游击战，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

△　日舰四艘在广东陆丰县碣石镇强行登陆。

△　据《中央日报》载：山东全省自5月以来屡遭蝗、水、雹三灾，灾民达120余万人。

8月27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部攻克山西昔阳以北之日军辽县石港口据点。同日，该师陈赓旅配合山西阳曲南平原武装便衣队，歼灭伪警察巡查队100余人。

△　驻上海公共租界英军250人撤退。

8月2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为越南问题再次发表声明，称：日本武装部队果侵入越南时，不论其用何种借口，并不论在何种情形下，中国政府将认为此举系对中国领土安全之直接与紧迫的威胁，当立即同样派遣武装队伍进入越南，俾得采取自卫措置以应付此种局势，所有因采取此种必要措置而发生之后果，中国政府自不负任何责任。

△　驻法大使顾维钧向法国政府声明，表示中国决尊重越南之边界，苟日军不在越南登陆，中国军队决不越出边界。

△　蒋介石、白崇禧会见周恩来，周谈及陕甘宁边区下属县份和八路军、新四军扩编等问题。蒋表示，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并称：游击队应受当地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周恩来予以拒绝，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说关于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但必须打破蒋、何、白及顽固分子归罪于我们的宣传。坚决以我们50万军队要抗战、开到黄河以北无法生活为理由，与之针锋相对作斗争。

△　周恩来与何应钦会谈。周提出国民党方案中所提八路军、新四军50万军队全部开入冀、察两省过于困难，且以新四军南调部队不

多、南方游击队很大为由，强调国民党方案之不可能。何要周再提具体方案。

△　行政院会议决定：任命雷沛鸿为广西大学校长；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与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对调。

△　卫立煌再电朱德，赞扬百团大战的胜利，并通报所部策应八路军在晋南、晋东南作战的情况，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我部已开始配合贵集团军向当地顽敌袭击，加紧动作，策应牵制。"

△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要求两部巩固和发展山东根据地，必要时再调一部分向苏北发展。指出：山东是基本根据地，华中是准备发展的方向。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日军迭炸重庆，发表《告全世界文艺作家书》，呼吁一致对日军予以谴责与制裁。

△　晋东南长治日军500余人，配合飞机22架向郁坪道八路军驻地进犯，被八路军击毙百余人后溃去。

8月29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部在山东费县西之纸房、良田庄一带击毙日伪军百余人。

△　寿阳狮脑山日军沿正太路西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与敌在辛庄激战，日军施放毒气，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中毒。

△　缅甸仰光华侨救灾总会筹款100万元缉拿汪精卫。同日，纽约华侨筹赈会电汇国币五万元，救济重庆难民。

△　日军从江南抽调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及伪苏浙皖绥靖军等一万余人，对津浦路东大举"扫荡"，历时12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等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作战65次，毙伤日伪军600

余人，粉碎敌人的“扫荡”。

8月30日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克复桂南江州。

△　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公布《目前施政纲领》，凡20条。强调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坚决保卫与发展边区，肃清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破坏边区的特务、奸细、托匪、妥协投降派，并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　日机24架分两批轰炸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投弹120余枚，毁校舍136间，殃及学院周围农村，炸死农民八人，伤15人。

8月31日　国民政府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朱怀冰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并代理省主席职务。

△　湘北第九战区薛岳部攻入临湘。

△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接见新华社记者，指出百团大战的意义有四：一、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严厉打击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二、在敌占区及在大后方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三、分化了敌人，加速了敌国人民反战运动的高涨；四、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士气。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部独二旅康团袭击同蒲路北段阳方口车站，是日占领该车站。朔县、宁武日军两度增援，均被击退，毙敌120余人，俘日军工务队长以下四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结束正太路破击战，开始反“扫荡”作战。该师第三八五旅在北脑山与由寿阳增援阳泉之日军激战，并派部进袭狮脑山、阳泉之日军。

△　汪日调整“国交”谈判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双方全体人员参加，通过全部条约并署名草签，会谈结束。汪精卫发表谈话，宣称中

日条约的草签在中日的新关系史上奠定了基石。阿部信行谈话称：国交调整条约是以中国事变以来日本政府屡次所发表的声明为基础，顾虑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将来之情形，以公正无私之态度而继续协议之结果。

△　日机轰炸陕西宝鸡，炸死工人一人，伤四人，炸毁申新纱厂织布机60台，焚棉花千余包。

是月　军令部制定《长江上游要塞守备计划》，要旨为：国军以拒敌入川为目的，应固守三峡沿江两岸要塞，始终确保三峡入川门户，以为我野战军作战轴心，歼灭敌人于三峡南北连山地带。宜巴要塞区守备部队为第九十四军，指挥官李及兰，副指挥官刘翼峰；巴万要塞区守备部队为第十八军（欠第十八师），指挥官彭善，副指挥官李端浩。

△　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中央7月2日、16日的提案，拟定新的复案，主要内容为：一、请依陕甘宁边区现在所辖之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请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其编制照甲种军及调整师办理；请改编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亦照甲种军及调整师办理；请改组冀、察两省政府，两省政府主席由中共方面保荐，省府委员应包括各抗日有关方面人员。二、关于划分作战区问题。同意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划定作战地区及与友军之作战分界线，但必须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全国合法权及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以及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

△　蒋介石派遣陈策率军事使节团赴港，建议由香港中国人组成义勇军，与华南的两个军协同作战。旋香港防卫司令官向重庆派出情报官，又在华南一带组成中国人的防空情报网。

△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二纵队新二旅第六八七团、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军淮海地

区。

△ 绥远蒙、汉人民及抗日团体在武川县召开绥察人民代表会议，各党派及各界人士600余人出席。会议通过了《绥察施政纲领》，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推姚哲、杨植霖为正副主任。

△ 日军袭击山东峄县朱沟，使用“窒息性”和“刺激性”毒气弹，致八路军及当地村民350人中毒身亡。

△ 伪新民会在北平设立劳工总署，统治华北劳工，并向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转售劳力。

9月

9月1日 蒋介石出席陆军大学学生毕业典礼，训示学生毕业后要讲求办事的方法，注意组织能力和统驭力的养成，努力做到“生活要严肃，态度要庄重，行动要敏捷”。

△ 张治中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职，以治事应公、严、勤、勇勖勉所属。

△ 军事委员会恢复铁道运输司令部，将公路与水道之军事运输划归后方勤务部管理。

△ 国民政府定重庆卫戍司令部为非常时期警备区，以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主之。

△ 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中国银行联合在昆明成立云南锡业公司，由缪嘉铭主持。

△ 周恩来在重庆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百团大战影响极大，估计到本年内重庆危殆，西南切断，国民党中央军将更加削弱，我更有大发展可能，故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以利我方主张在全国的实

现。

△　八路军第四纵队各部为配合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淮北津浦路西的萧县、永城、宿县、夏邑等地向日伪军据点展开攻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队炸毁平汉线邢台、汤阴间铁桥两座。

△　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李井泉部攻克绥远兴和县城。

△　新四军李先念部六团在湖北安陆平坝地区伏击由三阳店出犯之日军1000余人，毙敌数十人，马10余匹，李部伤亡20余人。

△　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第二十七师团等部万余人分11路向正太路南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进攻，至6日被击溃，八路军副旅长汪乃贵负伤。

9月2日　　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电告蒋介石，苏北八路军之一旅及罗炳辉部已攻占蒋家坝；陈毅部攻占黄桥、古溪后，逐步向南通、如皋东进，请速派大军增援，并携带大批弹药，以挽危局，并恳求调第五十七军缪澂流部由鲁南迅速南下，与第八十九军合力击破涟水、淮阴、泗阳以北运河两岸之新四军。

△　中德文化协会改选，朱家骅当选为会长。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袭击河北廊坊，截断平、津交通。

△　河南濮阳、清丰、滑县等处日伪军1700余人分六路向濮阳、内黄间进犯，被八路军击退，毙伤200余人。

△　周佛海与王揖唐、汪时璟在北平会谈，谈判华北关税上缴问题，决定华北关税收入每月向汪伪政府财政部上缴200万元，但此款须用于华北建设。

9月3日　桂南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攻入龙州北关。

△　中国空军袭击日军广州天河机场，投弹多枚。

△　八路军刘伯承部高团在河北广宗东北之定各庄歼灭进犯日军120余人。同日，韦杰旅在磁县西之观台毙伤日伪军100余人。

△　重庆文化界举行作曲家张曙追悼会。周恩来出席并讲话，赞扬张曙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上的猛将。

△　韩德勤调集所部向苏北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以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及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在姜堰集结；以第八十九军参谋长郭心冬指挥第一一七师（欠一个旅）、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两个营）为左路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计划分途经蒋垛、古溪向黄桥进攻。新四军苏北部队严守自卫立场，逐步后退。

△　日机126架分批轰炸川东广安、南充等地。

△　日机36架轰炸陕西安康，投弹200余枚，死伤民众850余人，毁房屋千余间。

△　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邵虚白遇刺殒命，是日国民政府以邵“领导工商运动，主持通讯社，与敌伪奋斗，始傲弗懈”，予以明令褒扬。

9月4日　　监察院长于右任以山西、陕西两省地当西北要冲，政治与吏治均对抗战前途关系甚大，建议设立晋陕监察使署，是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通过，27日任命茹欲立为监察使。

△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再克桂南上思。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第三八六旅第十七团攻克晋东南屯留北路村日军据点，占碉堡三座，歼敌100余人。

△　韩德勤坐镇苏北曲塘镇，指挥江苏保安第一、四、九及第一

一七师与独立六旅等部，由曲塘、古溪、黄桥之线推进，进攻苏北新四军陈毅部。5日，各路到达夏家庄、王业垛、刘家垛、分界桥、北溪河岸一线。6日，陈毅部在营溪以南向韩部反攻，全歼其保一旅两个团。至夜，韩部向海安、曲塘溃退。

△　韩德勤部向苏北新四军管文蔚部黄桥、蒋垛、瑁溪、花园桥防地进攻。5日，管部被迫应战，击退韩军。

△　陈毅、管文蔚、叶飞等发出由叶挺、项英转呈顾祝同、蒋介石的电报，要求制止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独立旅、税警团及保安第一、四、五、九旅共26个团的兵力，由姜堰、曲塘、海安分三路向黄桥地区新四军的进攻。

△　鄂西长江北岸董市、玉皇阁一带日军向江南炮击，掩护其步兵渡江南犯。第六战区陈诚部还击，日军溺毙者百余人。

△　日机袭击湖南沅陵，美国教会及美国复初员德女中均中弹，毁房屋二栋，死女生三人。

9月5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九年四川省兴业公债条例》，定额国币4000万元，年息六厘，15年后还清。同日，又公布《民国二十九年安徽省金融公债条例》，定额国币800万元，年息六厘，13年后还清，自公布之日施行。

△　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物价审查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翁文灏、张厉生、卢作孚、何浩若、吴国桢等为委员。

△　蒋介石通过张冲向美国非正式提出以下两项建议：一、“向美国租让或以其它方式让美国控制海南和福摩萨（即台湾）99年，中国在海南的部队由五个装备不良的师和没有装备的15万人的游击队组成，他们将协助美国海军取得对（海南）的控制，同时在福摩萨，可以煽动反日的民众行动起来帮助美国的控制”。二、“美国在华全面经

济垄断，排除其它国家，并把目前法国和英国的利益转给美国，由于英国的行为对日本过于友好，因此这样做是可能的”。

△　为配合百团大战，八路军山东纵队鲁南部队开始总破袭，连克日军大店、碑廓、沈疃等据点；胶东部队进攻招远；鲁南部队克复丰程。

△　八路军聂荣臻部在山西盂县歼灭日伪军360余人，俘日军22人。

△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由新加坡、爪哇、英国、法国、美国、印尼等国的华侨组成，李介夫为主任。该会宗旨为：一、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二、组织华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

△　铃木卓尔报告日本大本营，建议停止对蒋的“桐工作”，称：“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

△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责成东亚局官员太田一郎草定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试案”，条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日方还表示“宽大”：一、不要求蒋介石下野；二、承认“满洲国”可以秘密文书约定；三、撤兵，长江三角洲不驻兵，作为准武装地带，防共驻兵不包括山东。

9月6日　　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以成为战时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及战后西南建设之中心，并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

△　国民政府节约建国储蓄团成立。蒋介石为名誉总团长，孔祥熙为总团长，叶楚伧、何应钦、张群、陈诚、王世杰等为副总团长，

各省、市储蓄团团长由省主席或市长担任。同日，蒋介石为节约建国储蓄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是凭借我国优越天赋条件，集资开发丰富资源，发挥人力财力，争取抗战胜利与建国的成功。希望全国同胞本坚强之毅力，一致奋发，“为国家民族财力开辟活水巨源，以供长期伟大建设的需要”。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送审之原稿，其言论根本谬误者停止印行，部分谬误者应遵照指示之点删改后，方准出版。其有少数不妥字句，得由审查机关删改。凡未经审查机关许可出版之图书杂志不准发行。不遵照指示删改而擅自出版者，一律予以查禁处分，其言论反动者依法处罚其编辑人、印刷人与发行人。

△　宋子文自美电告蒋介石：据苏驻华大使接莫斯科复电，苏拒绝美国军火由海参崴转运入华。

△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电告蒋介石：苏北新四军最近有南北两路夹击盐城、兴化、东台之势，情况危急，要求“迅派大军增援”。10日，蒋介石复电，拟调李品仙部进出津浦路沿线，声援苏北。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晋东南榆社西北之双峰围歼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300余人，击毙大队长永野中佐。同日，第一二九师另一部在正太路沿线攻击日军据点，敌片山旅团德江、原田两个支队，斋藤、铃木两个大队被歼过半。

△　冀中回民支队破击德石路，民众万余人、妇女自卫队千余人参战，歼灭日军冈部长郎中队长以下260余人。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盂县以北，将由上社南进之日军200余人包围，歼其大部，残敌40余人逃回盂县。

△　苏北新四军陈毅、粟裕所部在营溪以南反击韩德勤部对黄桥

的进攻，争取了韩军李长江、陈泰运部，攻克营溪，歼灭韩军保安第一旅一个多团，韩余部退回姜堰、海安一线。

△　汪精卫召见周佛海，告以日西义显在香港与钱永铭接洽，钱表示愿促蒋、汪合作，周作民可作为钱的代表。7日，汪精卫、周佛海同日本影佐及西义显会谈，讨论与钱永铭谈判汪、蒋合作，实现中日和平条件问题。11日，周佛海往上海与周作民、张竟立、盛沛东接洽，谈判汪、蒋合作问题。

△　国民参政员左舜生等30余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在近期召开国民参政会，解决国是，应付艰局。10日，蒋介石复函称："事实上困难，将暂缓考虑。"

9月7日　　国民政府颁布《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组织大纲》，凡22条及《中央设计局组织大纲》，凡16条。

△　桂南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克复上思西南平福、福佛子等日军据点，残敌败走绥渌西之长墟。

9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预备集团军总司令（11月29日该集团军撤销）。

△　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财政部为减少非必需品之输入，节约国民不必要之消费，严禁进口、销售奢侈品，并限本月底止彻底肃清，逾期出售即没收充公。

△　日本外相松冈派遣旧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部属西义显赴香港，同与蒋介石有较深历史渊源的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联络，进行和平"试探"，并要钱派代表去东京了解日本的条件。钱表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日军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进行谈判。"

△　日军在苏北灌南新安镇集中约700余人和驻涟水日伪军200余人，是日至17日两次分进合击高沟、杨口地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三大队打击来犯之敌，敌被迫退回新安镇和涟水。战斗中，毙伤日伪军110余人。

△　伪东亚同盟军第三师师长董瑞、第四师师长耿协沭、第五师师长王德噶于绥东安北、固阳一带率部万余反正。

△　日军围袭山西寿阳县韩赠村，一天屠杀村民364人，39户被杀绝。

△　鲁南伪军团长鹿连茹率部反正，并炸毁津浦铁路泗水铁桥，日军列车七节坠河。

9月9日　　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向胶东昌乐朱刘店日军据点进攻，敌仓惶应战不支，死伤百余人。

△　汪伪政府宪政实施委员会建议伪政府明年1月1日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12日，汪伪政府予以采纳。

△　日本政府决定本年度派遣以第三部部长杉木俊为首的调查团至中国，调查东北及华北之物资资源。

9月10日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座谈会上报告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之要务：集中人才，建设后方；加强军事，争取胜利；注意国际局势，推进战时外交。

△　军事委员会任命何绍周为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同日，又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

变化的武器。

△　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加强团结时，应注意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日军，并在山东、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对于友军，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与之订立和解协定，就地解决原有争议。“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

△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正太路沿线路轨、车站、桥梁、涵洞、水塔全部破坏，沿途日伪军重要据点娘子关、阳泉被八路军攻克，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均被切断，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陷于瘫痪。

9月上旬　　周恩来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递交中共中央对国民党7月2日、16日《提示案》的复案，提出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这些意见被国民党搁置。

△　参加中日谈判的重庆方面代表提出对近卫首相致蒋介石亲笔信的意见，认为该信“对于纠正近卫首相不以重庆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宣言一点，意义含蓄，并未坦率讲明，有随时加以推翻的可能”。另外，该信内关于和谈问题“并未明确表示与板垣总参谋长的主张一致，仅以旁观者的地位加以赞成”。为此，向日方提出三项意见：一、近卫首相的亲笔信必须表明取消和更正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近卫首相应以当事人自居，而不应退居于客观地位，回避此次重大责任。三、近卫首相在亲笔信内必须主动表明对和平的诚意。日本方面如以缔结日汪条约对我方进行威胁，以求得迅速讲和，则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9月**11**日　　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传谕嘉奖八路军将士，

称：“贵部窥此时机，断然出击，切断华北交通，予敌甚大打击。”“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　蒋介石发表《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昭告川民“父诏兄勉，共明大义，踊跃输将”；尤希望全川各县各乡贤达士绅“一致起来，尽义务，负责任，努力协助，树立管理粮食的良规”。警告“如果有囤粮居奇，或藏粮待价而不遵法令出售的，一定以妨害民生，扰乱社会论罪”。

△　蒋介石电令于学忠即派一部南下稳定苏北局势，尔后再回师山东，以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共军之效。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和鼎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任命荣光兴为第五十九军代副军长。

△　中国自行炸毁滇越铁路河口大桥。

△　行政院决议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免职，缺职由余中英继任。12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以杨全宇不顾抗战大局与后方民食，操纵粮价，囤积小麦数百石，判处死刑，在成都市郊执行枪决。

△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二支队袭击黑龙江肇州县丰乐镇，攻占伪警察署、银行，毙伤日伪军六人，俘伪警察二人。

△　据中央社讯：美国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为响应祖国航空建设运动，特捐购机款50万美元。

9月12日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为阻止日军假道越南攻击我国领土，我国破坏河口铁桥和铁路，实为最正当之防范措施；并称“如日本武装队伍侵入越南，我方必在越采取自卫措施”。

△　军事委员会任命欧阳棻为新编第二军副军长。

△　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辞职，遗缺由李发暂代。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攻克山西晋城。

△　日机46架分两批袭击重庆，在市郊投弹，炸毁房屋30余栋，死伤数人。时事新报社中弹，职工宿舍被炸毁。

9月13日　军令部电令龙云、张发奎等，如日军侵越，应各以一部向老开河口以南沿铁路、公路远方进击，阻击敌人，并于金平、蛮耗、屏边、马关、麻粟坡、董干各附近地带节节抵抗。

△　龙云就法国允日本假道越南运兵事发表谈话，指出："法初不准运华军火通过越南铁路，已违国际条约，此种不良印象，将长存中国人民脑海之中。我方奉命破坏桥梁，系正当防卫之初步，若日军确已登陆，我方将全部破坏，以免资敌。"

△　重庆市长吴国桢在市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宣布：蒋介石已批准拨款200万元，作为恢复重庆市面之经费。

△　苏北新四军陈毅部第二、第三纵队攻占姜堰，歼灭韩德勤所部保九旅1000余人。30日，新四军又撤出姜堰，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接防。

△　日轰炸机36架，以驱逐机30架掩护袭击重庆。中国空军以34架战斗机迎敌，在璧山附近与敌遭遇，进行空战。此次空战中国空军被毁飞机13架，伤损11架，10名飞行员阵亡，八名受伤。日机复以44架袭击重庆，在南郊投弹，德国大使馆中弹，被炸毁大半。

△　日军800余人血洗山西平定县马家庄、小南庄、大南庄，一天一夜屠杀村民334人。其中马家庄民众被杀237人，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

9月14日　驻黑龙江宝清县七星镇伪军第三十团百余名官兵举行

起义，34人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二支队。

△　日机36架袭击重庆及江北、巴县边境。

△　英国援华委员会致书丘吉尔首相，要求无条件开放滇缅路。28日，英外交部表示：该路禁运期满，即行开放。

9月15日　成都市各界举行追悼张自忠大会，由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主席、陈筑山、李伯申等先后致词，对张自忠抗日爱国精神备加赞扬。

△　全国慰劳总会在重庆、洛阳、金华、柳州、恩施、兰州、长沙等地举行中秋节劳军大会，并赠送前方将士月饼代金100万元。

△　苏北盱眙日军700余人和伪军一部，向盱眙以南、天长以北地区“扫荡”，被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击溃。24日，日伪军又纠集4000余人反扑，与新四军第四支队激战，终被新四军击退。

△　汪伪绥靖部长任援道率部分六路向苏皖之六合、天长、来安阵地进犯，均被击退。

9月16日　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合发布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第二阶段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击日军交通，克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第一二〇师以截断同蒲路北段交通为目的，集结主力破袭宁武至轩岗段；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击涞源、灵丘公路及夺取该两城，并以有力部队在同蒲路东侧配合第一二〇师之作战，第一二九师以恢复榆社、辽县之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一部分不断破袭白晋路北段。另对冀中、冀南部队、挺进队等部作战任务作了具体规定。命令要求各部于9月20日开始战斗。

△　聂荣臻就百团大战的意义和影响，对《晋察冀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是一个战役的主动进攻，不是战略的进攻，八路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它粉碎了敌人对边区的分割政策和“囚笼”政策，

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削弱了伪政权的作用，捣毁了敌人的据点，扩大了边区的版图。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韦杰部新一旅一部攻克河南安阳北丰乐车站。

△　重庆各报刊登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令称：回民除其宗教上之仪式外，其他一切均与汉人无异，实与信仰耶稣教、天主教之教徒相同，故只可称为回教徒，不得称为回族。

△　上海法租界之越南士兵向被拘于租界之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华军死八人，伤22人。17日，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令调查真相，并命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18日，外交部向法方交涉，先行改善待遇，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保留一切要求权利。

△　伪东亚同盟军第九师师长王在春于绥东率部反正。

△　朝鲜光复军在重庆设立总司令部，李青天任总司令。

9月17日　　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九一八”第九周年告全国同胞》的广播讲演，称抗战三年来全国军民共消灭日军150万以上，“使敌国整个国家沦在万丈泥淖之中”；切望全国军民“不分关内关外，不论前方后方，奋勇向前，同心协力，战胜暴敌，湔雪国耻，来贯彻我们神圣抗战的目的，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

△　蒋介石在重庆出席中央政治学校高级科第一期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以日机狂炸重庆的教训说明军事化的重要，同时指出军事化的要义：要注重准备；要讲求实在；要力求迅速；要有独立处理事物的能力。

△　军事委员会任命唐俊德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任命沈克为第七十一军军长。

△　行政院会议通过《与多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条约》及《组织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案。

△　日军攻陷河南温县。

△　“宋子良”由重庆抵香港，向铃木卓尔谈及重庆方面首脑会议决定“目前不应马上召开长沙会谈”的情况，理由为：一、主要是和平条件问题。日本已有和平条件八条，板垣又提出承认“满洲国”和蒋、汪合作两条。提出如此不一致之提案，不能不使人怀疑。二、汪方人士称，已经把秘密会谈的情况和蒋介石的亲笔信件拍成了照片，不能不使人怀疑本工作的真正用意何在。三、日本所提蒋、汪合作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会议纷纷议论，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的和平。铃木一一作了解释，最后表示：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

△　钱永铭派前国民政府铁道部主计司司长张竞立作为其私人代表到东京，并带去钱的主张：实行停战，日本六个月到一年内将卢沟桥事变后派到中国的军队逐步撤走，个别驻兵以协定规定；中国经济权属于改组后的中国国民政府；中、日在平等互惠原则下实行经济合作；以秘密协定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方认为钱永铭的主张与9月5日的“太田试案”接近，决定派员与钱永铭等在香港谈判。

9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各项工作大体办竣，惟因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国民大会召集日期应俟另行决定。一切未完选举事宜，由政府责成选举事务所积极办理。特设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组织大会筹备事宜。

△　国民政府特派朱家骅代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　旅渝东北同胞300余人举行“九一八”九周年纪念会，通过的决议有：致电慰劳前方将士及东北义勇军；请国民政府提前充实东北四

省政府机构，并积极开始工作，通报东北各团体各同乡会，响应征募寒衣运动。大会发表宣言，强调“必须把抗战到底的‘底’定为东北四省”。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指出中央成立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周恩来负总责。

△　驻井陉、娘子关、阳泉、寿阳、定襄、盂县等地日军5000余人，分七路对盂县进行报复“扫荡”。七日内杀害民众205人，烧毁民房3700余间。同日，日军在崞县刘庄屠杀民众204人，烧房300余间。

△　上海白俄商团团丁数人与上海胶州路四行仓库孤军谢晋元部发生冲突，打死打伤谢部士兵各一人，至19日，伤26人。19日，外交部声明要求白俄商团赔偿损失，并请沪市市民收尸还之政府。同日，谢晋元致函新闻界，吁请主持正义。

9月19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日本要求越南准其以越南为军事根据地，“假道攻我，我方在军事上自不得不采取必要之措置”。并称：“轰炸河口铁桥，即纯系正当自卫。至于滇越路之昆河段，本完全在我国境内，在紧急必要时，我方有权自行调度。”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光钰为第十六军副军长，魏炳文为第三十六军副军长，李梦笔为第九十军副军长。

△　社会部成立消费合作社运动推行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

△　何应钦电告韩德勤：苏北黄桥、蒋垛、卢家庄、园桥等原属鲁苏战区作战地域，新四军无进出该地之任务及必要，应饬其即返回原防。

△　八路军总部颁布《争取伪军反正办法》：一、伪军反正后，保持其原有武装，不得缴械；二、伪军反正后，即为抗日部队，不得散编；三、伪军反正后，应帮助其开展扩大，充实抗日力量。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韦杰部新一旅配合民兵夜袭山西长治日军机场，击毁日机三架，伤一架，毁仓库、材料库各一所。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麦焕章在重庆逝世。

△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2000余名工人因生活困难举行罢工。持续一周后，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和法商水电公司工人起而响应，全市公交工人罢工。迫使英电资方接受工人提出的要求，增加工人工资和米贴。29日工人复工。

△　汪伪政府改组伪安徽省政府，任命倪道烺为省政府主席。

△　日伪军袭击山西寿阳县羊头崖，集体屠杀村民216人，20户被杀绝。

△　铃木卓尔将“宋子良”17日报告重庆方面之情况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部决定在当前重庆方面缺乏和平热情和能力的状况之下，暂时停止“桐工作”。10月8日，日本大本营发布第758号命令：“原大陆指第676号所指示停战谈判应予停止。”

△　美联社电称：日军代表已奉命抵越，日、越两国正在初步协定基础上谈判。按：初步协定规定：准许日军1.2万人在越南三个海港登陆，开往中国边境。

△　美亚洲舰队颜露尔上将声明：美国决不退出远东，并将以一切可能之方法援助中国，停止以军需品输往日本。

9月20日　国民政府颁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凡11条，规定：凡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杀敌致果，

建立殊勋，守土尽力，忠勇特著，临难不屈，或临阵负伤不治之抗敌殉难忠烈官兵得入祀忠烈祠，并得建立纪念碑或纪念坊；凡侦获敌人重要情报，组织民众协助军队工作，或执行军队命令，刺杀敌人和汉奸，破坏敌人重要交通路线，焚毁敌人仓库，破坏敌伪间谍组织，被掳不屈之抗敌殉难忠烈人民得入忠烈祠，并得建立纪念碑。

△　军事委员会任命蒋光鼐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

△　延安各界万余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九一八”九周年大会，毛泽东、朱德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与国民政府军委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参加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指出百团大战是我们对付敌人“囚笼政策”的办法，这个办法还能拖住敌人，延缓他们进攻我大后方的计划。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河北涞源城及其附近十几个日军据点发起攻击，是日攻占三个城关和附近两个据点。23日集中力量进攻涞源外围据点，攻克王甲村、刘家咀、金家井等十几个据点，守敌大部被歼。28日张家口日军3000余人增援，八路军即放弃攻占涞源，改攻灵丘。攻克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据点后，大同日军千余人增援至浑源，并向灵丘进犯。东线易县、定县、保定等地日军增援，图合击八路军，八路军乃结束战斗。

△　国民政府公布《水利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该会下设总务、设计、工务三个处。

9月中旬　　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部筹备处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及全体将士，祝贺百团大战大捷，称贵部“破坏敌交通，收复敌据点，耀武扬威，攻坚折锐”，“战绩辉煌，威震华北”。

△　韩德勤致电军事委员会，拟先给新四军以打击，占领盐城、东台等。白崇禧复电称：已电令李品仙策应，冷欣、上官云相速率兵渡河，并令王懋功部先去。

△　由苏北名绅韩国钧主持，在海安邀请苏北绅、商、学各界知名人士座谈，协商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问题。会后向各方提出呼吁。韩德勤趁机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

9月21日　第三战区为“统一党、政、军指挥，加强防制”，决定由苏南、皖南各方面党、政、军主官共同组织党政军联合委员会，附设于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以上官云相为主任委员。并限本月底组织完毕，从10月1日起施行，时间暂定为三个月。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袭击江苏镇江，于南门外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韦杰部新一旅一部在河南安阳同治桥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大部，生俘日军10人。

△　晋西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山西新军各一部破击宁武、静乐线，是日攻克马头营。

△　英国援华委员会再次致函丘吉尔，称英国已有130万人通知委员会，要求无条件开放滇缅路，并称彼等拥护这一要求。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抗战史料，范围包括文献、照片、实物及战利品、宣传品等。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勇旅强袭山东寿光西南日军据点，歼灭日伪军130余人，俘伪区队长以下百余人。

△　华南日军分三路向越南进兵，一路由平面关进占七溪，一路由镇南关进占同登，一路由爱店进占支马。25日，同登日军约一个师兵力占领谅山，复以一部向河内挺进。26日，日军8000余人在海防市登陆，并占领保护海防之涂山炮台，旋向河内前进。

△　日本、越南在河内签订协定，规定：一、日方可使用越南空军根据地；二、日军得以6000人驻守各根据地；三、日军得自华南假道越南进入中国境内，其通过之地区必须划定界线；四、越南允许日军若干在海防市登陆。

△　江苏盐城、阜宁、兴化、东台沿海一带，中秋前海啸成灾，灾民达几万人。四县旅蓉同乡会是日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请予赈济。

9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议商讨修订《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决议三项：一、改进参政员产生办法，增加参政员名额，扩充参政会及驻会委员之职权，将议长制改为主席团制。二、推王宠惠、居正、于右任、孔祥熙、王世杰、叶楚伧等整理修正参政会组织条例条文后，送政府公布。三、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按照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于本年11月内完成一切产生手续，另候召集日期。

△　外交部就法属越南与日本签订河内协定事，对法方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将自由行使自卫权，并声明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及影响，法方应完全负责。

△　陈嘉庚等赴福建省参观访问，是日抵浦城，27日抵崇安，10月6日抵福州。10月11日前往闽南，访问泉州、安溪、集美等。11月9日，抵长汀厦门大学。14日抵大田，探望内迁的集美农林、水产、商业三校师生。

△　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叶肇等部会攻桂南防城，战至24日晨，日军不支向茅圩退却，叶部收复防城，另一部追踪残敌。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三八六旅等部对榆（社）辽（县）公路日军发动进攻，榆辽战役开始。25日，陈赓指挥第三八六旅收复榆社县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200余人和大部伪军。太行、太岳军区亦同时对白晋、同蒲线南段长治、壶关、潞城附近公路进行破击。

△　晋西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破击同蒲路北段宁武、原平段，攻克忻口镇、轩岗车站、狼窝、奇村，包围阳方口，一度攻入五寨城，先后歼灭日军700余人。

9月24日　行政院会议讨论越南局势问题，决定按外交部屡次声明予以应付，并告国人应密切注意。

△　八路军冀中部队为配合涞、灵地区作战，发起对任（丘）、河（间）、大（城）、肃（宁）地区的作战，自是日至10月20日，共攻克据点29个，破坏泊镇至东光一段津浦铁路，并破坏公路150余公里，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克山西榆（社）辽（县）线之小岭底、铺上两日军据点。榆社、管头等日军据点亦被突破。

9月25日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嗣后所有公私文件，对于信仰回教之人民因宗教而必须辨别时，应一律称之为回教徒，各省编纂地方志书，涉及回教事件，亦应改善其称谓，以正视听而利团结。

△　国民政府就法国政府与日本缔结的允许日军进驻印度支那的协定提出抗议，指出："法国政府与日本缔结上述协定之行为，不论中日间已否按国际法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均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及国际睦邻关系之基本准则，似此实系敌视中国之行为。"并声明：中国政府对日军出现于印支边境附近及利用印支作为对中国作战的军事基地一事，保留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的全部行动自由，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由法国政府负责。

△　蒋介石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称新四军陈毅部在江北"行动越轨，破坏抗战"，强令该军"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执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同日，蒋介石电告顾祝同，新四军陈毅部如不"遵令南移"，即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

△　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百团大战》的报告，指出百团大战在全国起的作用有三：首先，打击和推迟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阴谋；其次，振奋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同情分子，团结了中间分子，争取了动摇分子，孤立了顽固分子，打击了投降分子；第三，给了敌占区人民以莫大的振奋，推动了伪军与伪组织的瓦解。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攻克山西榆社县城，歼灭日军第四混成旅团两个中队。日军施放毒气，旅长陈赓、参谋长周希汉中毒。

△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与第九支队一部攻克黑龙江克山县城，占领伪县公署和伪军第十九团团部，重创日军守备队，击毙日军警正以下30余人、伪警察20余人，俘伪军100余人。

9月26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凡18条，将国民参政员名额增至240名，改进参政员产生办法，将议长制改为主席团制。同时公布各省、市应出参政员名额表：苏、浙、皖、赣、鄂、湘、川、冀、鲁、豫、粤省各出四人，晋、陕、闽、桂、滇、黔省各出三人，甘、察、绥、辽、吉、新、南京、上海、北平、重庆省、市各出二人，青、康、黑、热、天津、青岛、西京省、市各出一人。

△　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朱德《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指出百团大战“带有全国性的伟大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西北后方及西南的企图”。“同时，更加强了全国同胞的伟大胜利信心，促进了全国的团结，使敌人难于实现其威迫利诱之阴谋”。

△　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徐谦在香港病逝。

△　国民党湖南常澧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唐生明受命密投汪精卫，是日由上海到南京会见周佛海。30日，汪精卫接见唐生明，允委

唐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　美国复兴银行公司董事长琼斯宣布：美国进出口银行新近以2500万美元贷予中国，华方将以钨售予美国之金属物资准备公司，以为偿付。并称：该公司向华购买钨为美国国防计划之一部。

9月27日　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指定张群、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徐堪、卢作孚、何廉、陈筑山、刘贻燕、邓汉祥为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兼委员长。

△　晋中榆次、昔阳、太原各地日军6000余人向太北地区反击，晋东南武乡日军700余人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包围于榆社东红崖头，至10月1日，被歼300余人，残敌溃退。

△　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协定，主要内容为：一、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二、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三、签字国之一苟被目前尚未参加欧战或中日争议之国家所攻击时，彼此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以各种方法互相协助。四、三国立即组织联合技术委员会，委员由德、意、日三国政府各自指派之。五、三签字国之任何一国与苏联间现存之政治地位，并不发生任何之影响。此协定有效期为10年。

△　汪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表谈话，认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之签订，将“协力于新秩序之建设，使世界万邦各安其所，共存共荣”；并称：“吾人所急需努力者，唯在如何树立合于正义之永久和平之新基础。”

△　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自本年10月16日起禁止所有废钢铁输至西半球以外之各国，仅英国一国例外，日本亦在禁运范围之内。

9月28日　国民政府明令各党政机关严格执行下列七项：一、整饬纪纲；二、禁绝贪污；三、取缔营利；四、厉行工作计划；五、革除兼职兼薪之流弊；六、节用汽车；七、严禁奢侈赌博。

△　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团长谢晋元在营地招待新闻界，报告与万国商团冲突事件的经过，并导各记者参观营内士兵生活状况及生产情况。

△　八路军吕正操部马本斋支队在河北赵县高村截击、歼灭日伪军100余人。

△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部警卫队一部，在图佳线孟家岗附近炸毁日军特别列车一列，敌死伤400余人。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今后对重庆工作的处理要纲》，凡八条。关于解决“中国事变”，为适应长期持久战的方针，应加强对重庆的压力，“使重庆屈服乃至崩溃”，其工作主要通过汪精卫新政府进行，其他方面则与之呼应。关于“桐工作”，由于重庆方面“掌握了日本方面的意图，因此，对重庆要进行监视”。今后“只作为情报路线予以保留”，“目前不再提及”，或让德国从中斡旋，或让汪精卫政府处理对重庆和平提案。

△　日本政府制定《日本外交方针纲要》，提出：为了实现中日两国的全面和平，必须努力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其计划为：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海峡殖民地、英属马来亚、泰国、菲律宾、英属婆罗洲及缅甸地区内，以日、“满”、华为中心，组成一个独立圈，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结合起来。

△　英、法、意天津租界当局与日本、汪伪政府签订协定，将中国天津电话及英、法、意租界之电话管理权移交给伪天津市政府。10月2日，外交部就此向英、法、意三国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

9月29日　　蒋介石接受驻苏大使邵力子的建议，是日致电斯大林，征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希望中苏两国能采取共同的外交方针。10月16日，斯大林复电称："依余意见，中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及加强中国人民的军队……只须中国人民的军队坚固强壮，则中国必可克服任何困难。"斯大林希望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22日，蒋介石复信斯大林，表示"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

△　蒋介石为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签订致电国民党各将领，宣称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签订"于我抗战，则为绝对有利，此后英、美、苏与我之积极合作，为极自然之趋势，而我国则敌友分明，应付简单，更易收得道多助之效"，望全军将士"提高斗志，日夜整训，一致奋发，磨砺以须，歼除垂毙之暴敌，共竟革命之成功"。

△　周恩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在该社举办的讲演会上作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报告，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扩大，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利用日美矛盾，但不能使抗日战争性质变化，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报告强调加强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十三团攻克晋东南辽县管头之日军据点，全歼守敌百余人。辽县以西各据点日军被肃清。

△　日军约一个师团兵力自桂南进入越南。泰国军队是日亦深入越边境40英里。

9月30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发表谈话，指出：对于一切以"新秩序"为借口，而实行侵略破坏世界合法秩序之行为，我们予以坚决反对。我们决不承认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尤不能承认日本在所谓大东亚之领导地位。

△　驻英大使郭泰祺访问英国外次白特勒，谈判重开滇缅路问

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对晋东南辽县发动攻击，和顺、武乡之日军600余人增援，八路军乃停攻辽县，打击援敌。日军施放毒气，八路军先头部队一个营全部中毒。日军乘势抢占山头阵地，筑构野战工事，固守待援。10月1日，辽县日军500余人增援，八路军伤亡较大，撤出战斗。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及决死一纵队等部，在山西榆社、红崖头、关帝垴地区将由武乡东援之日军板井大队600余人包围，激战二日，歼敌300余人。

△　韩德勤指挥所部26个团3000余人进攻苏北黄桥地区新四军陈毅部，以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为主力，组成中路军，分经营溪、古溪、加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南地区；以李守维、李明扬及陈泰运部为右路军，以保安第一、五、六、九、十旅为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进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陈毅部主动撤出姜堰，由李明扬、陈泰运部接防。

△　驻苏北高邮、三垛之日军乘韩德勤部进攻黄桥等地新四军之际，出兵占领樊川、永安、丁沟一带。

△　日机45架轰炸昆明，东方汇理银行及外人住宅区、教堂、教会医院等均被炸毁。

△　中英双方同意将《中英威海卫专约》延长10年，至1950年9月30日为止。

△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1人联名致函《华盛顿明星报》，主张美国应立即设法阻止日本侵略中国，要求停止以原料供给日本，扩大对中国之援助。

是月　外交部训令河内中国领事馆迅即撤退越南华侨，并要求法

方赔偿中国因法日协定而遭受之一切损失。

△　国民参政员张伯苓、孔庚、傅斯年、罗隆基等30余人联名致电英国上、下议院议员薛西尔等，呼吁在英国战争趋缓和之局势下，勿作不必要之顾虑，能毅然决定无条件开放滇缅路。

△　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黄国璋任所长。

△　伪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在广州成立，由林汝珩任会长，主办《粤东日报》及《东联评论》、《东联周报》等。

△　日军对山西盂县长池以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所到20多个村庄，被杀群众达200多人，焚毁房屋3500余间。

10月

10月1日　行政院通过《重庆陪都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该会直隶行政院，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周钟岳、杨庶堪为副主任委员。同日，重庆各界三万余人举行庆祝陪都建立大会。晚，举行火把游行。

△　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孔祥熙、于右任任副委员长，张厉生任秘书长。党务组主任陈果夫、副主任张道藩，政治组主任蒋作宾、副主任蒋廷黻。

△　国民党中央设计局成立，蒋介石任总裁，张群任秘书长，甘乃光、顾翊群任副秘书长。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主任委员郭沫若，副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李俠公，专门委员沈雁冰等10人，兼任委员舒舍予等10人。下设国际问题研究组、文艺研究组、敌情研究组等，张铁生、田汉、冯乃超分任组长。

△　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等，称：百团大战

第二阶段已历旬日，第一二〇师破击同蒲路，晋察冀军区进击涞源地区，第一二九师进击榆（社）辽（县）地区，基本上都已取得胜利。决定第二阶段作战基本上结束。战役结束后，各兵团均应适当集结主力，进行战后整理，总结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

△　鲁苏战区于学忠部攻入山东高唐，毙伪县长李彩题。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山东平邑歼灭日伪军170余人，俘伪军团长以下官兵40余人。

△　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一部攻占苏北新四军营溪、加力市等驻地，另一部进至距黄桥30余里的卢家庄。

△　陈毅发出《为黄桥决战告指战员同志书》，指出新四军退出姜堰，“在尊重民意，顾全大局，促进苏北友军团结抗日，挽救时局危机”。“竟不料反共投降派分子韩德勤违背信义，毫不悔悟，始终不放弃反共、反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企图”。“他已动员了十几个团兵力向我进攻，使我一片赤诚促进内部和平的苦心失望了”。号召“为压倒反共投降势力而战，为保护苏北民众利益而战，为爱护光荣的新四军而战，为保护黄桥抗日根据地而战”。

△　今井武夫赴日本，向日本陆相报告“桐工作”状况，称：“重庆方面仍有和平特别委员会，今后日方极力扶植汪的中央政府，但保留‘桐工作’路线，以为侦察之用。”

△　成都连日米价上涨，是日涨至每石200元，成都行营召集成都党、政、军要员会商切实制止办法。

10月2日　　国民政府发言人接见国际社记者，表示如果越南决定“抵抗日本之侵略，则中国将毫不犹豫地予以最大的援助”。

△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免陈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职，遗缺由王东原充任。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陆军中将、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令称：冯安邦“抗战以来，于冀、晋、鲁、鄂等省，累建殊勋”，近殉职襄阳，殊深轸惜，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李明扬电请韩德勤停止对新四军的攻击，电称：“苏北情势日益严重，敌人正大举进攻，肆意扫荡，此时正宜团结抗战。新四军即已退出姜堰，并逐渐后退，表示真诚，现更进一步请求在韩主席领导之下在沿江一带担任重要抗敌任务，恳希迅速饬令所部停止进攻，退至海安、好家集一带，至于其它问题，在整个抗敌合作条件下极愿洽商遵照。”

△　晋南日军以安邑、运城为中心，沿张（店）茅（津渡）、解（州）陌（南）两线南犯，第二战区所部昼夜进击，攻克都龙窟、吉家坡日军据点，追歼两线之残敌。

△　日军一部在渤海刘公岛登陆，留驻该岛的英军水兵撤退。

△　日军侵越，越境华侨纷纷返国，至越、桂边境者为状甚惨，赈济委员会是日拨款60万元，并派员前往临时收容，设法输送后方安抚。

△　周佛海会见影佐、日高及犬养，对日本严格控制汪政权表示不满，要求转告日本政府：“为促进和平计，日本不宜拿得太紧，须任国民政府自由发展，且援助之。”

10月3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天津各租界工部局特别委员会将中国电话局管理权移交伪天津市政府，声明上述电话局之移交不发生法律效力，我政府仍保留本案之一切权利。

△　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丘吉尔提出重开滇缅路的要求，并要求就改善滇缅路运输状况、扩大运输量、修筑滇缅铁路等问题举行磋商。丘吉尔答称：滇缅路重开已无问题。至于其他问题，英方亦愿与

中国协商解决。

△　陈毅电告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并请转呈国民政府当局，说明9月以来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围剿苏北新四军，该部为团结抗战计，主动撤出姜堰驻地之详情，要求制止韩部之行动，而顾大局，以利抗战。

△　黄桥战役开始。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欠一个旅）、第一一七旅、独立第六旅和李明扬、陈泰运部以及五个保安旅，总兵力25个团约三万余人向黄桥地区进攻。新四军陈毅部仅三个纵队九个团，约7000余人，兵力悬殊，决定集中力量在运动中各个歼灭，并力争速战速决。

△　苏北士绅李履初、吴云山、卢正安等245人联名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述韩德勤部东调进攻新四军，以至敌寇乘虚于9月20日袭占樊川、老阁，烧杀甚惨，兴、泰两邑，恐怖非常。请求蒋、何急电韩德勤，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对敌，勿任丧失领土，涂炭生灵。

△　汪伪政府决定改组伪湖北、浙江省政府，改汉口为直辖市，任命何佩瑢为伪湖北省政府主席，汪瑞闿为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仁蠡为伪汉口市市长。同日，又任命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日本陆军省发布布告：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去职，遗缺由杉山元继任，大本营之参谋总长亦由杉山元兼任。

10月4日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各省、市，限11月5日选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候选人。

△　黄克诚命令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三个团和第二支队一个团东进、南下，迅速突破韩德勤部盐河、废黄河防线。6日至8日，连克佃湖、东沟、八滩、益林、阜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凤谷村等城镇，直下盐城。接着，黄克诚亲率两个团进入车桥、平桥一

带，第五纵队机关进驻东沟。

△　韩德勤部继续向黄桥进攻。午后，第三十三师孙启人部一度攻入黄桥东门，翁达独立第六旅从高桥南下，进逼黄桥。新四军陈毅部第三纵队顶住了韩德勤部对黄桥的猛攻，当独立第六旅进至黄桥北时，即展开攻势，激战三小时，全歼该部3000余人，旅长翁达兵败自杀，团长韩振翼被击毙。

△　日军由苏南金坛调集第十五师团及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开至皖南，向铜陵、繁昌、南陵地区新四军“扫荡”。是日，日军两个联队5000余人在飞机群掩护下，由南陵西戴家会进至三里店。5日，进陷泾县汀潭，新四军予敌以猛烈攻击，毙敌数百人。7日，日军东转大岭、小岭，并向泾县县城窜犯，守军第五十二师弃城溃逃，泾县城陷敌。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部追至泾县，与敌激战于泾县南关。8日，日军继以飞机三四十架助战。新四军猛攻，敌不支，焚泾县城南门以阻新四军，经北门向南陵退去。9日，新四军克复泾县，旋向南陵进击。

△　日军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轰炸成都，由北较场炸至东门城墙以南菜地，投弹近百枚，炸毁西蜀小学及民房160余间，炸死居民百余人，伤220余人。

△　英国首相丘吉尔接见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英国政府决定开放滇缅路。郭要求英国“应仿美国之先例，予中国以财政及经济上之援助”。

△　华盛顿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和檀香山祖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分别捐赠八路军一万元和890元，慰劳八路军抗日将士。

10月5日　国民政府监察院决定成立战区视察团，第一团巡视江南各战区，第二团巡视江北各战区。

△　国民党中央通告各级党部，开除鲍文樾、陈公博、赵毓松、朱履和等17名汉奸之党籍。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在山西盂县兴道村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　新四军陈毅部第二纵队在第三纵队的配合下围歼一度攻入黄桥镇东的第三十三师，生俘师长孙启人。6日又歼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一一七师，军长李守维仓皇逃命，坠入八尺沟河中溺毙，生俘师参谋长张晤，黄桥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俘虏军官600余人、士兵3200余人，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69挺。新四军亦伤亡900余人。

△　上海全市40余家丝染厂3000余名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等19项条件。法捕房出面调解，几经谈判无结果。10日，资方被迫答应工人部分条件并签订协约。11日，全体工人复工。

△　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召开理事会，决定开展滇缅公路复运宣传周活动，并致电英国政府，请在滇缅公路协定期满之日，“准予复运”。

△　日本首相近卫就越南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日军开入越南，实因对中国作战有此必要，一旦对华战事结束，日本对越南关系即恢复和平。

10月6日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第一、四混成旅团万余人自正太、同蒲、白晋、平汉等线出动，并以飞机助战，向太北区浊漳河上游地区“扫荡”，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及决死队等部与敌展开激战。

△　日军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进行报复“扫荡”。敌第一混成旅团千余人由河北武安进犯阳邑、黄泽关一带。11日又窜至武安。

△　日军6700余人向太行北段地区“扫荡”，八路军陈赓部配合地

方武装与敌战至11日，将敌击溃，毙伤1500余人。

△　日机42架分二批轰炸重庆，先后在平民住宅区及外使领馆区滥投爆炸弹及燃烧弹多枚，毁民房300余间，市民死伤数十人。

10月7日　东北抗联第十二支队在黑龙江肇源县敖木台与日军激战，毙伤日伪军70余人。

△　日机35架分二批轰炸昆明。

10月8日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入宜昌城，日机施放毒气，李部伤亡颇多，旋退出。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已故军事委员会运输总司令钱宗泽，称钱氏“抗战军兴以后，办理军事运输，苦心擘划，艰辛备尝”。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向晋、察边境灵丘、涞源日军据点发动攻击，战至次日，攻克灵、涞间重要据点枪峰岭，守敌大部被歼。

△　浙西余杭日军千余人在飞机36架掩护下，进犯临安，次日陷临安。10日，顾祝同部第七十九师两路合击日军，临安克复。

△　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外相哈里法克斯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政府决定10月18日起重行开放滇缅路，并称：关于重开滇缅路，美国与英国之意见完全一致，英国政府亦随时将此事行动通知苏联。9日，郭泰祺对记者称：“英国开放滇缅路的决定，深可满意，但并无可惊异之处。”

△　美国务院训令美国驻远东各地领署，劝告所有在中国、日本（包括朝鲜）、香港、越南之美侨尽速撤退。

10月9日　蒋介石发表《双十节告全国军民书》，称中国是安定东亚的先锋，没有中国就没有东亚，东亚安危的重任落在我们的肩

上，希望全国军民在艰险危难中一致奋发，矢忠矢信，不馁不懈，表现民族伟力，完成我们对民族祖先与对东亚、对世界的尊严使命。

△　八路军一部在同蒲路西猗氏大关镇设伏，歼灭日军260余人，击毁汽车10余辆。

△　广东琼崖游击队一部配合地方武装三路向海南岛文昌县进攻，并派队在琼（山）、文（昌）交界处之大致坡破坏日军交通。10日，攻克文昌县城，敌残部向清澜港逃窜。

△　晋东北平型关日伪军600余人向大营地区进犯，八路军聂荣臻部与敌展开激战，歼敌200余人。

10月10日　　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国庆纪念联合纪念会，林森致词，称：我们当前的任务，“不但要争取领土主权的完整，并且要发挥我们民族潜在的伟大力量，在东亚做一个安全的重心，对世界的公理正谊与真正永久的和平尽我们应尽的维护责任”。

△　郭泰祺在英援华委员会中国国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重开滇缅路“应该为英国姑息政策之尾声，但英政府及商界人士方面仍有主张讨好日本者，此点不可不严加注意”。

△　湖南省临时参议会选出赵恒惕、彭国钧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部队与北上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在苏北东台县以北白驹、刘庄间的狮子口胜利会师。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袭击冀南曲周日军据点，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　新四军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又称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在海安县曲塘镇成立，黄

逸峰任司令员，共1000余人，驻海安、曲塘、白米以北一线，作为新四军与李明扬和陈泰运部之间的缓冲地带。

△　旅缅华侨献飞机五架，支援祖国抗战，计救济特委会二架，商业筹赈会一架，全缅华侨学校学生二架。

△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在石家庄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华北实行大规模“扫荡”的计划。同日，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第三十六师团二万人，分由正太、和辽、白晋各线，向晋东南辽县、榆社、武乡间进行“扫荡”；日军第二、第十五混成旅及第一一〇师团分十路向平西地区进行“扫荡”。八路军各部主力开始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

10月11日　　国民政府召开全国体育会议，历时五日，通过议案73项，主要有：设立体育卫生博物馆，经费2000万元，以马约翰、金宝善为筹备委员；定9月9日为国民体育节。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浙江新登，日军溃走富阳。

△　军令部总结黄桥战役韩德勤部失败的原因：一、意志不集中，精神不团结，李明扬始终阳奉阴违；二、新四军富有作战经验；三、我补给线早被截断，弹药缺乏；四、军心涣散，军力不强，民众力量毫无表现。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苏北名绅除韩国钧外，还有扬属领袖米干臣、淮属朱德轩、徐属韩圣谋，他们是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应当考虑争取他们长期合作，并经过他们去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

△　汪伪上海市长傅宗耀被其家仆砍毙。次日，汪伪政府任命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苏锡文代理市长。

10月12日　　第九战区薛岳部自11日分途向赣东北长江要塞马当

进攻，战至是日晨，克复马当，歼灭日军守备部队一部。旋向马当北日军进击，攻克炮台山及黄山。13日，进至彭泽城郊，克复城东之木盘山。

△　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反“扫荡”的命令，要求第一二九师应以不少于三个团之兵力逼近并破击正太路，第一二〇师以四个团之兵力破击雁门关南、北之同蒲路，冀中区应以有力部队破击平汉线，平西区应以有力部队向南配合作战。

△　日机27架轰炸成都，于城郊投弹百余枚，法国圣修医院及天主教堂被炸毁，毁民房数十间。

△　晋东南黎城微子镇、襄垣日军第三十六师团2000余人合击上遥镇。13日向平头、下庄地区“扫荡”，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及山西新军决死队一部将敌击溃。

10月13日　　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第十期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认为“六艺教育就是军事教育，亦即是现代化的教育。尤其是礼、乐、射、御，更是军事教育中最重要的科目，至于书、数，当然亦应注重”。“否则就不能做现代的军人，亦不能做现代的国民”。

△　第十六集团军夏威部第三十一军围攻桂南龙州日军，23日，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第六十四军在郁江北岸对日军实施攻击，日军分向越南及钦县方面撤退。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炮击宜昌日军机场，击毁飞机14架，装甲汽车五辆，毙伤驾驶员、机士等3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鲁南郯城南徐河口歼灭伪军250余人，俘敌150余人。

△　日机30余架袭击昆明，云南大学被炸，损失在170万元以

上，其中有历史价值之至公堂全部被炸。

10月14日　　蒋介石接见英驻华大使卡尔，略谓：英、美素以殖民地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之力量，倘不放弃此项成见界限，不必讨论合作办法。英、美应深切明了中国非殖民地国家及其陆军贡献之重要，倘英、美尚未有此觉悟，则中国不得不独立推进其国策。

△　胡适致电蒋介石称：中国“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并强调：“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予所以提议植之（施肇基字）即为此耳。”

△　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胡宗南、蒋鼎文、卫立煌等并转蒋介石、徐永昌、白崇禧，揭露陕甘宁边区周围已驻国民党军达20余万人之众，近更动员民伕，配备军队，筑万里长城，名曰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濒泾水，东迄河滨，要求明令禁止，以利团结抗战。

△　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实江、铃木、唱交等大队及第三十六师团一部约六七千人，向晋东南东田镇地区“扫荡”，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及山西新军决死队与敌展开激战，敌不支，千余人向襄垣、潞城逃窜，大部向洪水地区退去。

△　日本中央部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出：政府期望10月份和重庆进行直接交涉，若无成功之可能，继续由德国居中调解，以图促进和平；鉴于中国派遣军配合政府的和平意图影响军中工作，请放弃此种谋略，中止和平工作。至此，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结束。

10月15日　　重庆各界举行反轰炸大会，并发表宣言指出：日机滥炸平民，系违背道德原则，阻碍文明进化之暴行。并申明反轰炸必须加强防空实力，争取最大之国际援助。最后推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

会等11团体成立临时委员会，筹组“大空军建设运动促进会”。

△ 第四战区一部进袭广西龙州，并攻入西门与敌巷战至晚。

△ 日军田中部陷苏南溧阳。同日，野田部攻陷皖南郎溪。

10月16日 鲁南八路军一部在鲁南抗敌自卫军配合下，粉碎日伪军“扫荡”，至是日收复青驼寺、葛沟、海头等17处据点，毙、伤、俘日伪军800余人。

△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电令第一七六、第一三八、第一七二师攻击苏北新四军，其部署为：一、以策应苏北，巩固皖东，肃清异军为目的，以第一三八师配属皖保八团，游击第十纵队、皖东各县地方团队，组织扫荡队，肃清异军。二、扫荡分两期进行，11月中旬一次，年底一次。三、扫荡完毕即相机进出淮南执行作战任务。

10月17日 蒋介石分别召见英、美驻华大使卡尔、詹森，商谈三国合作问题。蒋对卡尔称：倘中国不能继续抗战，英国所受之影响若何？英国不援华，于英何益？卡尔答称：“中国抗战实际为英国而战。英国视中国为第一道防线，英国自应全力相助中国。”在与詹森谈话中，蒋介石切盼二三个月内，能得到美国装制齐备之飞机500架，以济眉急。如果美国空军志愿飞行人员来华助战则更佳。詹森答称：“美国定将尽力援华，当将此事电告华盛顿。”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克豫北原武城。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鲁南徂徕山阻击日军，毙伤日军独立第十旅团大队长渡边大佐以下百余人。

△ 日机18架轰炸重庆，在市区投弹，炸毁仅存之天主堂及民房10余幢，死伤市民10余人。

△ 日军“扫荡”太岳区根据地，历时13日，沿途屠杀平民达千

人。

△　日驻越南军事首领中山对记者称：滇缅路开放后，日机将对中国境内之一段予以破坏，以减少第三国对重庆的援助。21日，日机炸毁滇缅路中国境内怒江桥梁一座。

△　美国复兴银行董事长琼斯及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美国接见记者，琼斯称：中国可接受美国一亿美元之借款，美国拟再对中国借款若干，仍在考虑中。又称：彼极愿以一切可能之方法援助中国，现正考虑向中国购买各种货物。

10月18日　　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交通部次长曾养甫赴仰光主持通车事宜。是日，滇缅路上数百辆卡车满载货物由缅驶滇，其多数来自美国。同日，香港政府辅政司声明，恢复滇缅路封锁前香港、中国间的贸易关系，前禁运之汽油、铁路器材等，一律解禁。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称：滇缅路开放后，日本必将继续实施轰炸，且将变本加厉，吾人必须继续努力，并吁请各国对中国加以及时而有效的援助。

△　蒋介石接见美驻华大使詹森，声称“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虑者惟中共猖獗”。如能获得美国大批经济、军事援助，“则中共无所施其技矣”。

△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抵重庆述职，并向记者发表谈话，称宁夏抗战以来，“人民抗战情绪高涨，回胞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尤多贡献，人民不论宗教、职业之异同，感情均甚融洽”。

△　第九战区薛岳部克复赣北奉新。

△　日军陷浙江诸暨。

△　日军在山西晋阳西峪村屠杀村民386人，制造“西峪惨案”。

10月19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它各问题之命令”。并称：关于周恩来所提“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第一、第三两种，决难照办，其第二种应俟开到规定境内后，再行酌办”。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　国民政府颁布《宁夏省民国二十九年度地方普通总预算书》，核定国币335.5726万元；又颁布《河南省民国二十九年度地方普通总预算书》，核定国币1700.6603万元。

△　国民政府颁布《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2条，规定该会隶属于行政院，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二人，下置总务、财务、技术三组。

△　国民政府明令每月补给陕西省10万元，“俾加强‘陕北边区’各县之行政力量”。

△　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军事教育会议闭幕典礼，并演讲目前军事教育的要务在于力求“实在”，亦即“要使一般学生人人都具备管理一切人、事、物、地、时等知能”。同时要求军校充实学生农业的技能和运用机械的技能。

△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奇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皖南郎溪、浙江诸暨。同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皖中潜山。

△　重庆各界3000人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梁寒操、田汉、胡风、王昆仑、沈钧儒、郭沫若、周恩来、叶剑英、舒舍予等出席。冯玉祥任主席，并发表讲话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第一是“真”；第二是“硬”；第三是“韧”。“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三种精神，来争取我们抗战的胜利，来完成我们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周恩来讲话称：“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他一生“律己严”，“认敌清”，“交友厚”，“疾恶如仇”，是我们每个人值得效法的。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菲律宾华侨“木材大王”、华侨银行董事长李清泉在美国逝世。其家属以其遗产一部分10万美元捐助祖国，作救济难童之用。11月，马尼拉的一些侨团及李氏友人为纪念李氏，又筹集40万美元捐助祖国，救济难童。

△　日本陆军省任命后宫淳为华南军司令。

△　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官方人士表示，将对日扩大禁运范围，增加对中国之援助，美国已向中国运出飞机53架，在最近将予中国以新借款。同时，在缅甸方面有美制卡车数千辆，满载数月来囤积缅甸之货物，不久将运往中国。仰光湾四艘美轮上的货物亦是供给中国的。

10月20日　社会部拟定重庆市工运新方案，规定：“今后工人入会、退会，将改强制办法，对于各种重要产业工人得以军事方式管理之。”并派社会部副部长洪兰友兼任重庆市工会督导专员。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主持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处理皖南新四军问题。顾称：如果新四军不遵电令，向南或向西流窜，就须增加皖南方面的力量，作堵击的准备。顾祝同指示情报室主任卢旭要密切注意新四军接到北移命令后的行动。

△　周恩来电告叶挺和项英，蒋介石和何应钦逼新四军渡江的决

定“决不会取消”，因此应抢渡一部；并指出在安徽无为渡江有危险，“宜在无为以东地区渡江”。如蒋、何相逼太甚，新四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

△　平汉、正太、同蒲各线及襄垣、潞城等地日军万余人向清漳河两岸地区“扫荡”。

△　日机69架袭击云南昆明、蒙自等地。

10月中旬　　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重庆特务监视周恩来、叶剑英的行动。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康泽等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的办法。

△　驻山西五台县日军千余人进行“报复扫荡”，在化塔、河西等村杀害村民130余人，烧毁粮食2000余石。

10月21日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向桂南思乐发动进攻，夜半攻入城区，日军向南宁溃退，思乐克复。

△　陈毅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已下令前线停止进攻兴化韩德勤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一律就原地固守，同时派代表与国民党军商定彼此停战言和。请中央和军部速告周恩来、叶剑英，转告蒋介石、顾祝同，一律停止进攻，开诚言和。

△　胶东八路军猛攻文登附近日军据点，昨、今两晚连克王村、高村、石岛等据点10余处。

△　日伪军“扫荡”山西和顺县榆树坪，屠杀村民和驻村伤病员150余人，烧毁房屋300余间。

10月22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0条。31日，特派叶楚伧、张群、王世杰、魏怀、周钟岳、蒋作宾、陈立夫为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蒋作宾为主任委

员，叶楚伧为副主任委员，特派张道藩为秘书长。

△　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中国中央银行代表李干、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代表吴志翔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总经理皮尔生、金库副主任格利芬签订《中美钨砂借款合同》，双方洽商：中国资源委员会同意输运钨砂售给美国金属准备公司（即美国政府之代理机关），总售价达美金3000万元。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贷予中国中央银行美金2500万元之借款，将钨砂运销美国所得之“净收益”作为担保。进出口银行借予中央银行之2500万美元，时间在1940年12月31日以前。

△　日军“七三一”部队在石井四郎指挥下，在宁波上空投下鼠疫菌，致鼠疫流行，90余人染病，除二人外全部死亡。

△　华南日军当局宣布：由于香港继续以重要物资接济重庆，日军将在九龙英租界地区登陆，以期最后截断香港至重庆之路线。

10月23日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第六十四军分由邕武、邕宾、邕永三路，向南宁外围高峰坳、天邓村、三塘、四塘、剪刀圩各据点发动攻击，日军以飞机助战，死守据点。张部虽力战竟日，终未突破敌据点，双方相持至28日。

△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袭击黑龙江虎林、密山交界之日军武装“开拓团”，毙敌数十人。

△　日军侵占山西兴县城。数日间，日军在兴县城乡屠杀1300余人，烧毁房屋5700余间。

△　晋东南黎城日军千余人向西山地区“扫荡”，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与敌战至次日，将其击溃，毙伤200余人。

10月24日　国民政府任命谷正纲为社会部长。

△　经济部修正公布《放纱收布办法》，凡九条。

△　李明扬至苏北海安与苏北名绅韩国钧协商，决定30日在曲塘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拟定参加者有江苏省政府、新四军、江苏各保安旅、团及游击军代表与苏北八县代表等。

△　陈公博发表广播讲演劝降，希望“重庆政府加入全面和平运动”。

△　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阿部信行离上海返东京，与本国政府商讨“重新检讨南京政府问题”。

10月25日　　陈毅致电蒋介石，陈述新四军为团结抗战计，已停止对韩德勤部的军事行动，派人到泰州与韩军谈判，并提出五点意见转告韩德勤：一、我军不再进攻兴化；二、请韩主席向蒋委员长、顾司令长官要求停止对皖南、皖北新四军的包围；三、请韩主席放弃反共方针，划分地区，一致抗日；四、改善政治；五、召开各方合作会议，商决一切。

△　贺龙在《八路军军政杂志》撰文《一二〇师抗战三周年》，总结第一二〇师三年来的斗争经验：一是坚持了游击战争；二是发动群众；三是坚持统一战线，与友党友军和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

△　八路军鲁南军区成立，邝任农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和三个支队。归第一一五师指挥。

△　日机44架分两批轰炸重庆，在长江南岸美国大使馆附近及市郊投弹，美舰“杜伊拉号”及太古公司“万象”、“万流”两轮被炸伤，炸毁民房10余幢，死伤居民10余人，被中国空军击落一架，坠于涪陵。

△　日军对晋西北之静乐、岚县、文水、交城间进行“扫荡”，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与敌战至11月5日，将敌击溃，毙伤450余人。

△　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来中国视察，并携带《处理中国事变纲

要》（草案），征求中国派遣军各方意见。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反对中央的意见，极力主张集中力量打倒蒋政府，提出若给华南方面军增加三四个师团，可以占领昆明，断绝缅甸通道，接着与华北方面军作战配合，可以消灭蒋政权。26日，中国派遣军政务参谋堀场雄一则提出占领广大富饶地区，留给敌人贫瘠的地方，实行经济封锁，而后对内地进行毫无顾忌的蹂躏作战。对此，杉山元以中央鉴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不能埋头对中国进行十年战争，未予置理。

10月26日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电军事委员会，谓黄桥失利后，苏北20余团大军全部溃散，高级将领李守维、孙启人、翁达等生死不明，陈毅等乘机占领海安、东台、盐城等县，望乘陈毅部立足未稳之际，速派大军收拾苏北残局。

△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选举朱之洪、胡子昂、黄肃方、陈敬修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浙东萧山日军于24日向绍兴进犯，是日守军第十六师何干部、第六十七师莫与硕部弃守，绍兴失陷。28日，何、莫两部联合反攻，敌不支，乃向萧山逸去，绍兴失而复得。29日，克复漓渚、河桥等日军据点。

△　日机33架分两批轰炸重庆，投弹29枚，死伤民众20余人，炸毁房屋160余间。同日，日机九架袭昆明，与欧亚航机一架遭遇，中外乘客四人受伤，航机坠毁。

△　桂南日军总部发布撤退南宁的命令：一、钦（州）防（城）方面军队，应由钦宁地方向广东及海南岛方面转进；二、板田兵团（即近卫师团）即开始由南宁撤退，先集中于钦州附近，以备转进；三、中田兵团（即第五师团之一部）应于板田兵团南进之同时，逐次缩小其警备区域，在钦县附近阵地掩护其撤退。

△　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劝降，略称：“余深望足下坚决宣布中日议

和的主张，使全国人民努力协助政府实现和平及恢复治安工作。”

△　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发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问题谈话，称：“目前事变的处理正处于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速实行对中国内地的直接进攻既不可能，期望第三国的策应（外交上或武力上）又自有限度，现在为了这个目的而制订的主动的方案，必须以长期持久战术为主体。”关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根据长期持久战方略，建设“新中国”；第二种，根据战线的大调整，主动地永久占领重要地点；第三种，根据现在暂时维持的战线，迅速地进行外交处理。此三种方案，“以建设新国家的方针作为主干”。关于“建设新国家”的范围，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华北或新旧黄河以北；第二种，华北以及京汉线以东、长江以北；第三种，华北以及京汉、粤汉线以东的华中、华南。此三种方案，以第二种为“基本目标”，第三种为“争取目标”。关于“在最小范围内建立新国家，其后解决事变的办法”，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封锁江南和华南沿岸；第二种，切断并占领粤汉沿线；第三种，进攻并蹂躏中国内地。此三种方案，按“长期持久战的指导”，应以第二种为“基本目标”。

△　据合众社上海电讯称：德国现正怂恿日本政府向重庆方面建议，除华北外，愿将其他日军占领区及华中、华南若干军事根据地交回中国，并称：“放弃汪精卫政权，而以较宽大之和平条件饵蒋介石，如可能时要英作调停人，否则由德国人任调停人也可。”为此，日外相松冈要求暂时停止日本与汪精卫政权之谈判，并“作到直接与蒋介石谈判”。

△　日军千余人“扫荡”山西定襄县芳兰村，烧杀抢掠，屠杀村民200余人，烧毁房屋2000余间。该村被烧杀13次，被杀害村民达540人。

10月27日　　第一战区经济委员会致函行政院，报告第二战区走

私之风盛行，缉私机构太不健全，请求加强组织，增加经费，并选训优秀青年担任缉私工作。

△　平汉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敌破坏队代表抵渝，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重庆市总工会为他们举行招待大会。代表向重庆工人报告了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平汉铁路工人对敌斗争的情况：至本年8月底，先后破坏敌人交通305次，击毙日伪军4000余人，俘日伪军1000余人。

△　日军独立第三、第十六混成旅团3000余人“扫荡”晋西北。29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及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在平遥回回堡与日军激战，毙敌大队长佐木，俘大队副山田和治。

△　日军在冀中赵县郭家庄屠杀民众2200余人，地方政府公务员等800余人，制造“郭家庄惨案”。

△　日机36架分两批轰炸成都，在少城公园及皇城一带投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伤数十人。市立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纪念铜像基石被炸毁。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演说，称美国决继续援助中国和英国，此系美国和平政策之一部分，倘有人反对此举，则无异否认美国行使其不可分离之自卫权。

10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由张继、刘文岛、贺耀组等组成中央党务工作考核委员会，张继任主任委员。

△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各省、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如被选为参政员，只能自行决定择任一职，不能兼任参议员（包括议长、副议长）或参政员。

△　第十六集团军夏威部第一八八师向龙州出击，是日晨收复龙州。29日，向凭祥方面追击，日军由邕龙路转邕钦路，经钦县撤退，

乘舰出海。夏部乘势先后收复上金、宁明、明江、绥渌等县。31日，收复凭祥。

△　经济部通令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各省、市政府及各战区经济委员会：确立经济壁垒，加紧对敌经济封锁，妥速设法抢购战地物资，并积极发挥经济游击队之力量，对敌人之经济设施彻底予以摧毁。

△　日本外相松冈派外务省参事官田尻爱一同前驻沪领事船津辰一郎以及西义显赴香港，与钱永铭的代表周作民、张竞立会谈，田尻等提出9月5日的“太田试案”。11月1日钱看到提案，即同周作民亲拟致蒋介石的报告书，派员送往重庆。

10月29日　　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规定：集会召集人及演讲人姓名、职业、住址、开会目的及其地点，预计参加人数与其职业，演讲要旨，应详报当地警察机关；集会及演讲时，应由当地警察机关派员莅视，召集人及讲演人应接受其指导与纠正。此办法先在重庆市施行。

△　延安各界开会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决定成立鲁迅先生研究委员会，加强发展鲁迅先生基金委员会工作，定10月19日为“鲁迅节”。

△　日军近卫第一旅团及第二十二军各直属队自南宁南撤，是日渡过邕江。行前纵火焚烧城内主要建筑物及附近村庄，火势炽烈，三日未息，城垣为墟。第四战区第一五六师王德全部乘势向南宁推进，是日午到达三塘附近，第一五九师陈骥部进至高峰坳，第六十四军邓龙光各部收复四塘、剪刀圩等处，晚进至二塘、心圩之线。

10月30日　　南宁收复。第四战区第一五六、第一五九师分由邕武、邕宾两路同时向南宁进击，是日拂晓进入南宁城，并续向南推进。

△　湖北省临时参议会选出孔廷、沈肇年、李廉、李荐年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自晋东南左会水腰间窜抵武乡东之关家垴、柳树垴一带。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及山西新军各一部向日军展开猛攻，激战数小时，占领关家垴附近高地数处。次日，日军以飞机配合继续进犯，八路军与敌肉搏四次，将关家垴周围高地完全占领，冈崎大队400余人被歼殆尽。八路军新十一旅旅长范子侠负伤，山西新军决一纵队第二十五团政委凌刚之阵亡。

10月31日　　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在海安曲塘召开。因韩德勤临时变计，拒派代表参加，乃改开谈话会。会议由韩国钧、李明扬主持。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代表吴法宪，苏鲁边区游击指挥部总司令陈泰运、黄逸峰、季方；税警总团副司令林叙彝及各保安旅团的代表和八县代表，共3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解决苏北临时办法及基本改造苏局办法，由李明扬及韩国钧携往韩德勤面谈，再定期开会，地点在海安韩国钧家中。李明扬、韩国钧、陈毅在会上作了讲演。陈毅讲演表示："新四军对韩主席绝不采取报复手段，而以大局为重，只要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

△　韩国钧、李明扬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报告苏北曲塘会议之详情，并将会议各方所提意见交国民政府实施：一、实现在苏军、民、党、政抗敌合作，国共大团结；二、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为目前任务，立即组织民意机关；三、实施廉洁政治，肃清贪污，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四、实行严格整军，统一指挥，务必成为抗日爱民的军队；五、立即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之民主自由；六、实施对敌经济封锁，调剂金融，增加生产；七、实施抗日教育，肃清麻醉堕落教育与敌人奴化教育。

△　蒋介石手拟中国今后应采取的国际战略：中国与日本媾和

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独以日本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乃为目前惟一之“上策”。“如此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知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

△ 国立中正大学在重庆开学。蒋介石致训词，略称：“中正对于教育之主张为文武合一，术德兼备。”全校分三院一班，学生391人，校长为胡先骕。

△ 国民政府令：派内政部长周钟岳视察昆明被炸灾情，并拨款20万元赈济灾民。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复晋南芮城及晋西孝义县兑九峪、高阳镇等地。

10月下旬　　顾祝同派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前往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和叶挺、项英等谈判新四军北移等问题。叶等提出如下条件：一、给新四军预发五个月薪饷，并发给开拔费200万元。二、一律换发新式枪支，及子弹100万发。三、留一部武装部队于铜陵、繁昌一带。四、新四军抗属应予慰劳及优待，其所组织抗战团体，应加以保障。五、在江南的新四军只开至苏南为止。上官云相表示有关问题与顾祝同商量后再定。

△ 周恩来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同冯玉祥交谈。冯主张中共中央立即复电何、白，“软硬兼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要提出抗日条件，作积极表示，待电报到后，冯即约孙科见蒋调解，制止“剿共”战争的爆发。

△ 财政部公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凡15条。

△ 教育部设立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蒋介石任名誉会长，陈立夫为会长，计分民义、土地、经济建设、地方自治、行政机关等九个研究组。

是月　　蒙藏委员会60余人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呈改善边政意见，要点为：健全调查机构，增进工作效能；改善生活待遇。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新四军第三支队活动的区域繁昌一带，作好在国民党进攻时北渡长江的准备；二、如有可能，移至苏南；三、直接移至皖北。并指出，向南进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最为不利的。

△　日工农学校在延安成立，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任校长。该校的宗旨为“扫除俘虏们的日本‘圣战’观念”。学习课程有国内外形势、世界地理及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　伪满洲国实施第一次“国势调查”。据《满洲国现势》公布，1932年至1940年7月，日本向伪满洲国开拓移民日系5.9705万人，鲜系9.6518万人。另有青年义勇队3.7205万人，勤劳奉仕队2.1794万人。

11月

11月1日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浙东临浦，并向萧山挺进。8日，进至萧山城郊。

△　重庆卫戍区扩大辖区，由原九县一市扩大为14县一市。

△　陕西省临时参议会选出张凤翙、张守约、李芝亭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资源委员会与四川盐务管理局联合在四川自贡设立自流井电厂，由吴运宪主持，有员工264人，抗战胜利后改由王序观主持。

△　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政府联合在江西泰和成立江西车船厂，

由陈董主持。抗战胜利后结束。

△　资源委员会与青海省政府联合在青海西宁成立西宁电厂，由沙荫田主持，有员工146人，抗战胜利后改由宁志纯主持，并让予青海省政府。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攻克冀南隆平。

△　贵阳《中央日报》在湖南芷江出刊芷江版。

△　《武汉日报》宜昌版迁湖北恩施出版。

△　美国商务部发表本年九个月内中美贸易情况：华货输美价值7047.2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4％；美货输华价值6225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0％。

11月2日　　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成都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黄季陆、徐堪、卢作孚、何廉等为委员，是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整个经济建设计划》等，决定扩大资金组成川康兴业公司，作为推动经济建设业务之机构。

△　周恩来同苏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潘友新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并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将潘的意见告中共中央。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对他被印度当局逮捕入狱表示慰问。

△　日军2500余人进犯山西和顺县寒王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侧击日军，毙伤敌百余人。

11月3日　　广东、江西、甘宁临时参议会分别选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广东金曾澄、黄筑一、李仙根；江西王又庸、张国焘、王枕

心、刘家树；甘宁苏振甲、骆力学。

△　新四军一部在安徽巢县北宫村附近歼灭日军200余人，击毁汽车一辆。

△　鲁东胶县伪自卫军杨扶华率部2000余人反正。

△　日军自海南涠洲岛撤退，临行纵火屠城，该岛化为焦土。

11月4日　白崇禧在总理纪念周报告《敌人为什么撤退南宁》，称敌退南宁足证明其已是“能战不能守，能守不能久”，经受不起逐次消耗、长期消耗；重申：“我们必须充分运用‘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打击敌人，消耗敌人，进行全面持久战。”

△　蒋介石致电韩德勤，略称：苏北黄桥失利后，官兵全失斗志，军风军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异军却被苏北民众誉为救国军，实诚吾人之奇耻，务望严整所部，努力争取民众同情。9日，韩德勤电告蒋介石：该部在黄桥战役失利后，已无力再战，请求速派大军来援，实施反攻。

△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法五为第四十军副军长，刘嘉树为第五军副军长。

△　贵州省临时参议会选出黄宇人、吴道安、马宗荣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等，指出：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

11月5日　绥境蒙政会第六届大会开幕。参加者有沙王、鄂王、荣祥、奇文美、阿陵及新任蒙政会委员贺耆寿、白音仓等。绥蒙副指导长官朱绶光主持会议。傅作义发表《告伊盟官兵书》，称欲安定伊

盟，舍蒙、汉团结而外，别无他途，策勉蒙、汉合作御外侮，团结一致求进步。7日，大会闭幕。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仲廉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为第八十五军军长，冯圣法为新编第九军军长，陈式正为第九军副军长。

△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选出叶民伟、阳叔葆、蒋继伊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选出胡仲实、潘昌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中央日报》载：监察院战区巡视团第一团赴湘西各县视察，视察事项为精神总动员、公务人员贤否、新县制、兵役、粮食、食盐、伤兵、难民和难童、金融、司法、禁烟等。

△　日本政府颁布《日满华经济建设要纲》，提出："大约在今后十年间把三国（指日、"满"、华三方）结成一环，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并对日、"满"、华三方今后经济发展的不同目标和重点进行了新的调整和规定，提出：在工业方面日本主要"谋求高度的精密机械工业（指飞机、坦克、军舰、枪炮等军工制造业）划时期的振兴，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矿业等基础产业"；"满洲国"则重点发展矿产及发电业，也要发展必要的重、化工加工工业；中国占领区（指关内部分），主要发展矿产、制盐业等工业原材料。日本的轻工业特别是纤维及杂品工业考虑将向中国大陆转移。农业方面，日本要确保国民主食及水产品的发展，"满洲国"则是日、"满"、华的粮食、饲料补给地，是供给世界特殊农产物的主要来源，因此将大力促进其农业和全面增产，并考虑从日本移植大批农业开拓民入满，中国占领区的农业则主要确保国民主食及棉花等特殊农产物的增产。在劳务政策方面，日本将对满洲及中国占领区提供必要的技术人员和技能工人。"满洲国"则须有计划地大批组织华北劳工入满和定居，同时要加强对劳工的监理制度。

△　汪伪政府任命陈公博为伪上海市长，陈耀祖为伪广东省长。

11月6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须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

△　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1300余人向冀南武安地区"扫荡"，八路军一部阻击歼敌，毙伤200余人，残敌向阳邑一带溃窜。

△　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8日，罗发表对外讲话，表示"全力以赴援助中国、英国"。

11月7日　据《中央日报》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每日新闻》载德、意、法三国驻渝大使曾向中国政府建议与日本讲和事答记者称：此乃日人造谣惯伎，毫无根据。并指出：抗战以来，德、意大使迄未来渝，于此更见日人造谣之无稽。

△　行政院公布《战时土地权利处理暂行办法》。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豫南罗山县，残敌溃走信阳。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目前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德使陶德曼有电报致中国当局实行劝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　八路军晋绥军区在兴县李家湾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下设四个军分区，彭绍辉、张宗逊、王尚荣、韩钧分任第二、三、四、八军分区司令员。

△　晋察冀边区政府机关报《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改三日、二日刊为日刊，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

11月8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徐泽民部，联合当地义勇军、爱国士绅，攻克黑龙江肇源县城，将伪军全部缴械，击毙日军警务长以下日伪军九人，俘虏伪警察116人。

△　新四军一部夜袭安徽凤阳西北长淮街，歼灭日伪军200余人，俘伪军40余人。

△　伪苏浙皖绥靖军王有贵部300余人于安徽全椒反正。

△　上海法租界当局与汪伪政府订立协定，是日汪伪政府接收租界内之国民政府第一特区法院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9日，外交部发言人对此提出抗议，宣布：此后租界内自称为中国法院之任何机关，当然非法，其所有裁判及其他行为一律无效。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华经济紧急对策》，提出“中国经济措施应在我方指导下，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和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

△　新东亚建设恳谈会在东京举行，汪伪政府派代表赵毓松、何佩瑢、蔡培、傅式说参加。赵毓松在会上宣称：希望际此东亚建设新秩序开始，中日两国密切提携，谋奠定东亚复兴之大计。

11月9日　蒋介石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卡尔、詹森，面交《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方案首先提出合作的三原则：一、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原则。二、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三、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继之提出“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四点：一、合作宣言发表后，贷款二亿至三亿美元给中国。二、由美国海军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架至1000架，本年（1940）内运华200架至300架。此外其他武器的数量种类，另行商定。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

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代表团团员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四、英、美两国或英、美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　蒋介石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其感“中国民族痛苦日深，因而决定恢复滇缅路之一切运输”，“特布感佩之忱”。

△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10月19日电，申述八路军、新四军之行动、防地、编制、补给以及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对于国共摩擦事件要求派公正大员彻查；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编制数额要求酌予增加；对于补给款项要求一并核示；对于陕甘宁边区要求解决悬案和制止封锁，对于团结抗战要求不变国策；对于防地，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再克晋东南榆社县城。

△　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1.2万余兵力，分路向北岳区进行大“扫荡”。进入易县，烧毁民房2200多间；在五台县，摧毁大小村庄98个，烧毁民房2.0067万间，杀害群众数百人。自是日起，北岳区军民在聂荣臻率领下，开展反“扫荡”作战。

11月10日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反攻湖北沙市，克复沙市东南之窑湾。

△　新四军一部在江苏常熟歼灭伪军一部，俘伪团长冯玉堂以下百余人。12日袭击丹阳，歼灭日伪军180余人。

△　何应钦电令卫立煌，限第一战区内之新四军于本月底以前向

黄河以北地区撤退。

△　白崇禧电令第一七六、一三八、一七二师阻击江南新四军北移，“以主力控制于适当之机动位置，乘其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

△　晋东南日军连日窜扰黎城、长子，是日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攻击长子外围之敌，攻入岚水村、草坊镇，毙伤敌百余人。

11月11日　　叶挺在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谈判，提出两点意见：一、新四军北移路线及行军事项。为北渡安全计，请准由江苏长江南岸北渡（镇江岸、靖江岸）；皖南部队尽先驻苏南溧阳、溧水、宜兴、金坛等县，由此逐步进入敌后，在三四个月内完成北渡；在新四军移驻期间，第三战区一切军事部署保持10月份原状。二、军需补给事项。除请发薪饷、米贴费、医疗费等25万元外，另请加发抚恤款10万元、开拔北渡特别费50万元。请补给步枪500支，轻机枪100挺，枪弹100万发、手榴弹二万只。顾祝同表示可经苏南北渡，但不批准驻地，12月底以前长江以南部队全部渡过长江。关于军费补给事宜，转呈何应钦核准。对于北移安全，顾表示以政治人格担保。并要叶挺对北移的细则问题，就近请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办理。

△　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社论《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指出今天存在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反共内战危险，希望全国抗日的其他党派与无党无派的人士，共同起来反对。社论还向蒋介石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拥护蒋先生及蒋先生领导抗战到底的，恳切要求蒋先生坚决排除包围左右、挑拨内战、阴谋投降的亲日派。

△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维为第五十四军军长。

△　国民政府公布：本年1月1日至9月30日，全国对外贸易入超为一亿元，进口货共值3500万元。

△　国民政府派驻墨西哥公使谭绍华为墨新总统就职典礼庆贺专

使。

△　福建省临时参议会选出石磊、李黎洲、康绍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1月12日　　蒋介石对来渝参加粮食会议的各县、市长发表讲话，总结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以来，对粮食管理虽订有详细办法，但大多数县长阳奉阴违，以致粮食问题仍得不到解决，要求各县、市长“勿再因循敷衍，有亏职守”。

△　国民党中央原定是日召开国民大会，因受战事影响，交通不便，延期举行。

△　浙江省临时参议会选出陈希豪、褚辅成、方青儒、胡建中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晋东南辽县、榆社歼灭日伪军400余人。

△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下设四个大队，学员1800余人。

△　上海《正言报》载称：浙江、安徽沦陷区工业大部被日本占据，现有之棉纱厂77处，日本占有51处，华人仅有12处。

11月13日　　行政院会议决定，为救济军、民粮食，平均民众负担，拟准备各省自民国三十年起田赋酌征实物，其征率由财政部会同各省、市酌定。

△　第十六集团军夏威部、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克复龙州、南宁后，乘胜向钦县方面进击，日军坚守钦县外围抵抗，夏、邓两部以强火力攻击，是日克复钦县，日军残部乘舰撤退。

△　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由鲁南进至沭阳压迫黄克诚部，桂军第一三八师莫德宏部越过淮南路向皖东推进，情况甚为紧急。请与何应钦、白崇禧交涉，撤退霍、莫两师，并停止他部行动，否则我军将实行自卫，届时由彼负责。

△　豫东商丘、夏邑、永城、砀山日军会犯霓塚集、中天寺，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与敌激战竟日，毙敌200余人，毁敌汽车10余辆。

△　汪伪政府在山东威海卫建立海军基地。

△　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首相近卫文麿、参谋总长杉山元、外相松冈洋右、陆相东条英机等出席。会议决定《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一、除继续行使武力外，须严加杜绝英、美援蒋行为，并采取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战两略之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二、积极改善内外态势，恢复与增强完成长期持久战及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之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三、为此，尤须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其要领为：一、为促进重庆政权之屈服，应以在承认新中央政权前取得实效为目标。和平条件应以与新中央政府即将订立之基本条约为依据；和平交涉，应以汪、蒋合作为前提，以日、华直接交涉为原则。为易于进行，可使德国居中调停，以及利用对苏调整邦交。对目前进行的南京与重庆的合作工作，从侧面予以援助。二、如至1940年底与重庆政府之间仍不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为此：一、适时向长期武力战态势转移。二、对汪新中央政府，着重使之专心协助帝国加强综合战力所必须之各项措施，主要使之努力向我占领地进行政治渗透。三、在中国之建设，以彻底开发并取得国防资源及安定占领区之民心为根本方针。四、尽速改善国内体制。另有附件《日本方面要求的基本条件》，凡五条。

11月14日　　据防空部统计，自1938年9月28日至是日，日机袭滇共34次，除中国平民死伤外，外侨炸死者计法籍六人，越籍24人，

美籍一人，德侨二人受伤，东方汇理银行、法教会、美锡安圣堂等均遭炸。

△　军令部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以第三、第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其步骤为：第一，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四区，限1941年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

△　江苏扬州、邵伯日军千余人，向泰县西宜陵、塘头进犯。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反攻，将敌击溃，克复两地，残敌向仙女庙一带撤退。

△　豫北日军千余人自安阳、水冶西犯，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御敌，激战彻夜，毙敌200余人。

△　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大井川联队、伪治安军第二十四路军李英部6000余人附汽车150余辆，分由豫北之濮阳、滑县、内黄、长垣等地向八路军晋冀豫边区扫荡。八路军一部与敌战至18日，将敌击溃，歼灭600余人，俘虏70余人。

△　英国政府为防御日本南进，决定在新加坡设立远东英军总司令部，任空军上将波普翰为总司令，下置马来亚、缅甸、香港三地驻军指挥部。

11月15日　　国民政府令：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朱绍良免本兼各职，以谷正伦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请辞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派张群兼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免本职，宪兵司令谷正伦免本职，派张群为成都行辕主

任，贺国光为宪兵司令，仍兼重庆卫戍区副总司令。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九年四川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750万元，年息六厘，15年后还清，自公布之日施行。

△　苏北临时参议会在海安召开，出席代表388人，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县均派代表参加。会议通过施政纲领，成立参议会，选举韩国钧为苏北参议会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16日，苏北参议会决议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为主任，辖泰兴、靖江、如皋、泰县、海门、启东、南通等11县政府。

△　第八十九军韩德勤部及江苏省保安团等部二万余人，是日起向皖东、苏北新四军部队发动围攻。30日，陈毅、粟裕、管文蔚等致电国民政府当局，要求制止此种行为，以解危机，而固国本。

△　上海全市70家绸绫染坊3000余名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资方同意论码加倍计算工酬，12月11日工人复工。

△　日本兴建的沧（州）石（家庄）铁路通车。

11月16日　　国民政府明令宣告：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暂时停止行使职权，此后上海租界内自称为中国法院之任何伪组织，亦与敌军占领区域内设置之伪法院，同属非法组织，其所有裁判及其他任何行动，一律无效。

△　国民政府令将云南省分置13个行政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区保安司令部。

△　故陆军上将张自忠灵榇移厝重庆北碚新建墓地，是日举行移灵典礼，蒋介石亲临主祭，冯治安及重庆军政高级长官均前往致祭。

△　国民政府任命赵士卿署国立同济大学校长。

△　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华北“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野蛮暴行惨不忍睹，呼吁各界救济华北同胞。

△　山东八路军一部向日军展开破袭战，战至21日，克复青驼寺、葛沟、徐公店等46个日军据点。蒙阴、沂水、临沂之日军田中联队千余人五次向青驼寺增援，均被击溃。

△　晋南日军2000余人分由安邑、运城、闻喜、新绛、稷山、万泉连日分犯稷王山，至是日，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分别将敌击退。

11月17日　　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在江苏海安成立，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之新四军和八路军。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在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23日，华中总部迁盐城。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广济为第一〇〇军军长。

△　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在安徽蒙城北与日伪军激战，毙伤日伪军4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击落日轰炸机一架。

△　平汉路安阳、鹤壁、水冶等日军千余人西犯，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与敌战于朱窝桑场，至是日午，卫部攻入鹤壁城区。

△　黔桂铁路柳州至宜山段通车。

△　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在广州市府旧址修建地下防空工程及军火库，强雇广州工人200余人作工。工程完毕后，日军将全部工人解往广州市郊秘密杀害。

11月18日　　成都行营主任兼理四川省主席张群宣誓就职，并发表《告川民书》，称今后当切实施行川政纲要，解决当前紧要之治安、物资、禁烟、兵役、征工等问题。

△　教育部令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与国立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对调，暂由陈石珍代理西北大学校长职务。

△　日军一部强渡涡河，攻陷皖北蒙城。19日，第一战区卫立煌所部反攻，克复蒙城，日军溃走涡北。

△　外交部次长徐谟会见驻美大使詹森，告之日本散布谣言说，日本正努力同中国达成协议，并准备承认汪政权，“中国政府不理睬日本的宣传”；并称：美、英应给中国以“积极的援助”，否则中国抗战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只有美国人能力挽狂澜”。

△　日军7000余人分十路对太岳区进行“扫荡”，22日，陷沁源县城，烧毁房屋四万余间，残杀群众近5000人。太岳军民经数日反“扫荡”，29日日军被迫撤离沁源，县城遂告收复。

△　第五战区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奉何应钦令制定“进剿新四军作战计划”，拟将皖东新四军肃清，恢复政权，巩固皖东。作战于本月20日起，以一部向东南方面戒备，主力向津浦路以西地区行动。22日，莫部集结肥东县护城、杨家店子，向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进攻。

11月19日　　国民政府下令封锁滇、越交通，所有人、货、邮件概不准出入，入境与过境护照同时停止签发。

△　行政院会议决定增拨50万元，添凿重庆市公共防空洞。

△　军政部军需局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奉何应钦之命，自是日起停止发给八路军经费，10月份欠发之20万元亦一律停发。29日，朱德、彭德怀致电何应钦，质问扣发八路军军费用意何在？！要求“主持公论，仗意执言，取消此一惨无人道之乱命”。

△　蒋介石派张季鸾为使者，持张群代笔的致钱永铭书信，是日到达香港。张责成钱永铭告日本方面：日本方面确认以下两项条件：一、无限期延期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二、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全面

撤兵，我们就可以谈判。20日，田尻电告东京，首相近卫表示允诺重庆方面的两项条件。

11月20日　　国民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决继续作战，收复汉口及其他重镇，使日军不能作南进之举动。

△　赈济委员会以桂南善后救济至为重要，特划广西为第九救济区，委派杜月笙主持，杜是日派广西办事处主任杨扶青携款20万元赴邕急赈。

11月中旬　　叶挺到皖南宣城周王村与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等谈判，具体商定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等事项，无结果。不久，上官云相将行军路线定为由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溧阳竹篑桥进入沦陷区。但这只限非战斗人员，至于战斗人员仍坚持要从皖南驻地向北就近进入沦陷区。后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两次与顾祝同谈判，共同商定北移路线仍从镇江以东渡江。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对华持久战一般方略》，要点为：今后处理“中国事变”将转向“指导长期持久战争，以四年治乱，七年治民，十年治国为一般方略”，确保华北及华南、京汉路与粤汉路以东必要地区。同时“力图压缩、削弱敌后方之敌对政权及其机构，情况允许时，相机予以摧毁”。30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答复，认为需要考虑将在华兵力陆续递减，同时应视形势发展之好转，加强对华压力，以结束事变。

△　德外长里宾特罗甫会见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告之欧战将于年底结束，届时中国将得不到英、美的援助。现在是中国同日本妥协的“最后机会”。如果谈判失败，日本将承认汪政权，意、德也将予以承认，我们“希望中国与日本妥协”，并保证日本不逾越协议的条件。

11月21日　　重庆各界举行首届防空节纪念大会。重庆卫戍区司

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向大会致词，并向防空有功之部队献旗。同日，军事委员会宣布：抗战40个月来，中国军民击落及炸毁日机986架，计被空军击落者308架，炸毁者236架；高射炮击落者164架；陆军击落136架，炸毁者97架；日机自行坠毁者45架。

△　是日至次日，周恩来就新四军北移问题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面谈。23日，周致函张冲，请转达蒋介石，制止苏北、陕北、皖北、鄂北和山西正在调动并企图发难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向皖北涡阳日军发动攻击，激战一昼夜，是晨克复涡阳，残敌渡涡河向板桥方面逃窜。

△　晋东南辽县、武乡、沁县之日军3000余人会犯榆社，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分途阻敌，敌不支，旋北犯黎城，被击退。

△　美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声明：美国不拟撤退在上海之美国海军陆战队。

11月22日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严禁重利盘剥，今后借贷利息，无论缴纳现金，或折缴租谷，均应一律按照国民政府所定利率，年利不得超过二分；凡以钞币收谷利者，照订约时之谷价为标准，其利率不得超过20%。

△　国民政府任命张群兼四川全省保安司令。

△　教育部颁布《高中以上学校新生入学训练实施纲要》，规定：高中以上学校于新生入学时，举行训练两周，期满后应举行宣誓仪式，誓词为："余以至诚爱我中华民国，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

△　陈嘉庚由闽抵桂，发表《闽省政治现象》一文，对闽省政治极度不满，并电请国民政府当局调查。

△　赣皖边日军步骑兵3000余人，自东流向至德进犯，其一股进扰至德东南之洋湖陂、葛公镇一带；一股千余人进犯洞门口；另一股于23日进至尧渡街、乃潭一带。第九战区薛岳部将敌击溃。27日日军撤离至德。

11月23日　　安徽省临时参议会选出光昇、马景常、陈铁、梅光迪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克宾为新编第七军副军长。

△　周恩来致信张冲：请转蒋介石，制止陕北、苏北、皖北、鄂北和山西正在调动并企图发难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

△　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司机务工人要求当局改善待遇遭到拒绝，是日下午一致罢工，巡捕房派出大批警捕前往弹压。

△　日军四个师团兵力，协同空军向鄂北襄河两岸发动攻势，东路之敌由随县、马坪、淅河等地向厉山一带进犯。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分别迎击，敌不支，南溃金鸡岭、快活岭一带。27日，敌由随县反扑，李部于28日将其一股驱至唐家冲，一股驱至殷家湾。另一路由钟祥向大洪山西麓长寿店附近地区进犯，迭经李部痛击，伤亡甚众。

△　鲁南费县、铜石日军及伪军刘桂棠部1400余人，进犯费县八路军驻地，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一部在小板桥等处反击，激战三日，歼敌600余人。

△　日军第十三军参谋长樱井省三赴南京晋见西尾寿造，商定进袭新四军计划如下：一、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二、对散驻长江北岸皖、豫边境之新四军，决动员第十五、第一一六等师团之一部兵力进袭扫荡；三、由驻沪第十三军司令官藤田进负责指挥。

11月24日　　中国航业学会在重庆成立，孔祥熙、张嘉璈等为名

誉理事，魏文翰、王道之等15人为理事。

△　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新四军军部必须在本年12月底以前北移完毕，限其在20天内完成一切北移的准备工作与善后工作。并命令新四军军长叶挺可先率领一部分部队立即渡江。

△　汪伪政府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在南京成立，周学昌为书记长。汪精卫致训词指出：该会之目标为“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

11月25日　国民党中央任命陈布雷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　云南省临时参议会选出赵澍、胡若华、陇体要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第二战区经济委员会拟定封锁陕甘宁边区货币的报告，略谓：共产党在延安开设之光华商店，“擅发不兑换‘兑换券’，强迫人民使用”，拟“由陕西省银行视地方需要情形酌量发行辅币券，调剂市面以资抵制”，设法防范。

△　山西省保安第十四团团长王定国揭露第二战区游击支队杨振邦在芮城残害民众、抢劫民众资财的罪恶，电请阎锡山饬河防部队以武力制止。

△　东亚经济恳谈会第二次会议在东京召开。汪伪政府铁道部长傅式说参加，各代表发表业务报告，要点为：以中、日、“满”为轴心，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东亚共荣圈。在近卫新体制目标下，于东亚树立综合性经济建设体系。

11月26日　国民政府以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徐箴及鄞县县长俞济民守土抗战有功，是日明令嘉奖。

△　张治中离重庆，赴江南九省进行视察，旨在推动各省加速组

织三青团。

△　胡适、宋子文在华盛顿拜访美国务卿赫尔，洽商增加信用贷款、远东局势之发展及经济援华问题。

△　蒋介石密电莫德宏，令其以主力一部对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寻求“扫荡”，以一部于淮南路以南地区对江南新四军准备“堵剿”。

△　军令部密令第四十八军，凡非第三战区序列的部队应“相机剿办”。对于“异党暴动妨害秩序及纪律者，以政治力量及军事力量制裁之”。

△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与苏联政府秘密签订《租借新疆锡矿密约》，主要内容有：一、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二、苏联政府有权将其由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而得之制成品或半制品，由新疆无阻碍地运出，并免缴关税及他项捐税。三、苏联政府设置考察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物之托拉斯，简称“新锡”，其在新疆全境内享有无阻碍的开设分所、事务所及代办所之权，并在保卫房舍、建筑物、工厂、作坊、仓库以及保证转运安全所必须之范围内，有权设立武装守卫。四、新疆政府应协助“新锡”实现本条约所规定之目标，并不得干涉“新锡”之业务。该条约有效期限为50年。

△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会商决定：一、在汪日条约签字前再致电蒋介石，劝告和平。二、28日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推举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三、29日召开立法院会议，审议通过《中日国交调整条约》。

△　日本政府更换台湾总督，由长谷川清继任。

11月27日　　蒋介石就粮食管理问题向参加粮食会议的20余县长

发出训示，要点为：调查户口；凡拥粮囤积，规避征购者应予没收，并治以重罪；灵活运用管理原则，凡壮丁从事运输者，即可缓服兵役。

△　行政院派翁文灏、张嘉璈、魏道明、刘峙、卢作孚、刘纪文、潘文华、吴国桢等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

△　汪精卫电蒋介石劝降，称：中日调整国交谈判已全部完成，“现与友邦约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唯盼重庆方面勿再误时机，立下决心停战，“俾全国和平早日实现”。

△　日本枢密院会议通过《中日国交调整条约》。同日，日兴亚院总务长官柳川电告阿部信行，令汪精卫在日汪条约签字前就任“国府主席”。

11月28日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浙江仙居县城。

△　晋察冀边区八路军一部在唐河之歧潭庄歼灭日军指挥官以下180余人。29日，攻克王林口日军据点，歼敌40余人。30日，在黑关山附近歼敌120余人。

△　蒋介石致电顾祝同转饬李明扬、韩德勤等，望其“以大局为重，紧密合作，精诚团结，击破共军”，“恢复苏北一切”。

△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为苏北事件及停发军饷事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各路之军事行动，对于挑拨离间、巧言惑众之徒，则加以明察，予以摒斥；对于何部长停发经费之命令，则予以取消；对于办事处机关与人员予以保护，以维团结而利抗战”。

△　陈毅、粟裕、管文蔚、叶飞等率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李明扬、李长江等，呼吁停止对新四军的进攻，并望“电请当局停止汤恩伯、李品仙部东进及莫德宏部之进攻”，“共图时局之好转”。

△　襄河东、西岸日军会合由当阳、淯溪、荆门之线向北进犯，一股向黄家集北猛进，一股向庙前窜扰，一股图犯杨家寨。李宗仁部以敌兵力分散，四面围歼，战至次日，敌各路均告崩溃，东岸我军迭克尚市店、净明铺、快活岭、金鸡岭、安居、张家集等处，直迫钟祥、随县。西岸我军迭克快活铺、李家垱、曾家湾、盐池庙各地，挺进荆门近郊。鄂北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日军川坂联队长以下二万余人。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一、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删去主席“不负实际责任”和“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二条。同日，伪中政会会议批准《中日国交调整条约》。

△　日本大本营举行联席会议，陆军省认为“钱永铭工作”是重庆阻碍日本承认汪政权的谋略。松冈外相因重庆方面尚无反应，一言不发。会议决定按照预订计划签订日汪“基本条约”。“松冈外交”的“钱永铭工作”宣告结束。

△　美国财政复兴委员会主席琼斯发表谈话，认为中国之处境日趋艰难，表示美国政府将予以更多的援助。

11月29日　　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通电，称：中日条约为两国之百年大计，“惟重庆现在尚倡言继续抗战，言念前途，阻碍尚多。吾人惟有以不断之努力，蕲全面和平之早日实现”。

△　蒋介石在重庆对宪兵干部演讲《宪兵协助粮食管理之要务》，提出派宪兵到各县帮助县府管理粮食的步骤为：劝告自动出售；警告限期出售；没收囤粮，惩罚囤户。

△　财政部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接管中南、中国农工、农业、中国通商、中国实业、浙江兴业、中国垦殖等银行。

△　国民政府派潘公展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廖震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泽浚为第四十四军代军长，佘念慈为第六十七军军长，杜道周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

△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于鄂中大洪山西麓之马家集、张家集夹击北犯钟祥日军，战至30日午，毙敌逾千，克复长寿店。

△　顾祝同电令皖南行署黄绍耿，皖南新四军北移时应“一面侦察，一面陆续开拔，务须如限北渡完毕”。交通线准增改为二线：一线为泾县、杨柳铺、孙家铺、姚村、誓节渡、涛城镇、梅渚镇、南渡镇、竹篑桥道；一线为南陵、宣城、毕桥镇、飞鲤桥、郎溪、安兴、上沛埠。并准划竹篑桥、南渡镇、汤家桥、进寺里、安兴、上下芝山、藕塘、上兴埠为该军临时集结地区。

△　新四军陈毅部及黄克诚部在苏北曹甸向韩德勤部实施反攻，战至30日，韩部溃退至射阳。

△　日伪军围袭山西和顺县平松村，屠杀村民108人。

△　日本天皇特使、驻北平日华北方面军中佐参谋高月保、乘兼悦郎二人在司令部附近地安门东皇城根胡同遭枪击，一死一伤。日伪震惊，30日悬赏五万元缉拿“凶手”。日军及警特在全城戒严，挨户搜捕，全市恐怖。1941年1月16日，日伪抓获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区行动组长麻景贤等，方解除警戒。

△　京沪路列车一列在苏州附近被炸，74人当即炸死，炸伤200余人。

11月30日　　国民政府悬赏10万元通缉汪精卫。令称：汪逆兆铭，通敌祸国，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

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视听。同日，又明令通缉查办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赵正平、赵毓松、诸青来、岑德广、陈济成、杨寿楣、林彪、麦奇峰、任援道、刘郁芬、王克敏等77名汉奸。

△　第十六集团军夏威部、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收复镇南关，历时一年之久的桂南会战结束。

△　军令部次长刘斐与张冲约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式转达蒋介石关于新四军北移的意见，即在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军队北移可展缓，但到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至明年1月底，新四军亦须全部移至黄河以北。周、叶表示，江南新四军决定移动，其余有困难。

△　华北新闻界10团体呼吁全国同胞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对于甘心认贼作父，匍匐于日寇指挥刀下，共同防共之祸国蟊贼，人人得而诛之。

△　新四军陈毅部与江苏保二旅、保五旅在苏北临泽地区发生激战，保二、五旅不支，退至苏亭、院家枯一带防堵，后因射阳被陈部攻入，部署不及，又溃退至泾河、平桥一线。

△　汪精卫与日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在南京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共九条。要点为：两国政府为维持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两国政府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为此，“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两国“基本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政府”同意日本政府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对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

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两国对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质方面，尤应紧密合作”。根据“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条约》另有附件《附属议定书》、《日华两国全权委员会间关于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等。

△ 汪精卫与日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伪“满洲国”代表臧士毅在南京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要点为：“三国”“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三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同时，“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三国应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

△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日汪条约签订发表声明，指出：汪精卫为中国之罪魁，其伪组织全属非法机关，对于中国及外国完全无效，其签订之条约亦属非法。倘有任何国家承认伪组织者，我们政府与人民当认为是最不友谊之行为，不得不与该国断绝通常关系。

△ 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不承认《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南京汪伪政府。

△ 英国政府发布公告：继续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之政府。

△ 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 汪伪政府接管日本在华之勤兴袜衫厂、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南昶铜厂及宏大橡胶厂。

△　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其中5000万美元作为一般之用，另外5000万美元作为平准基金贷款。同时，罗斯福宣布将继续承认依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国民政府。同日，美国政府通告中国政府：凡美国所能为力者，均已尽力去做；其不能为力之处，皆因美国并未参战；“借款一万万元，为数甚巨，美国政府深盼此款于中国抗战前途有所补助”。

△　美国政府宣布：从1932年以来，美国所予中国各方面的援助，总数已达2.45亿美元。其中除1600万美元外，其余均系在过去两年内借与中国者。

△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赫尔、摩根索、琼斯等，对美国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表示感谢，称其“扶弱抑强，维持正义之精神”，“已辟太平洋上和平光明之大道”。

是月　浙江省设立三门县，废南田县。

△　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1941年5月，华中局正式成立。

△　朱德、彭德怀鉴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致电蒋介石，恳对“受灾民众予以抚恤”，并昭告全国揭露日军之兽行。

△　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在太行蟠龙镇成立，刘忠任校长，黄欧东任政治委员。

△　《戏剧春秋》（月刊）在桂林创刊，由田汉主编，南方出版社印行。

△　阎锡山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到山西孝义县白壁关按照阎所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汉奸苏体仁、梁上椿谈判。赵承绶提出：阎锡山要求日方先给他装备30个团，所有兵员、武器、

食粮、经费均由日方负责。楠山表示“须待回太原后，再商议决定”。

△ 日军关内总兵力为72.8万人。其中华北地区兵力为25万人，华中地区兵力为29.6万人，华南地区兵力为16.6万人，定员之外为1.6万人。

12月

12月1日 军事委员会通电嘉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祝贺鄂北大捷，略谓：日军向第五战区分路进犯，“贵司令长官指挥若定，诸将士忠勇直前，率摧顽寇，殊为嘉慰”。

△ 经济部合作管理局改隶社会部，局长寿勉成。

△ 西北建设促进会在西安成立，蒋鼎文、熊斌、朱庆澜、张继、谷正伦、马步芳、马鸿逵为名誉会长，张钫为会长，谷正鼎、韩光琦为副会长。该会宗旨为：以学术之立场，研究西北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运用各种力量，改进西北建设。

△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告以同国民党谈判的12个条件：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需延期。二、苏、鲁、皖部队不能开动。三、华北八路军无饷无弹，准备南下。四、国民党应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五、国民党释放罗世文，我方释放孙启人。六、停止在陇海线、咸榆公路捕人扣车。七、张国焘、叶青不应聘为参政员，否则我方将退出参政会。八、桂林办事处不能撤销。九、国民政府应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欠饷亦应补发。十、停止石友三部隔离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八路军各地办事处之安全。十二、拒绝同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解决问题。

△ 安徽寿县伪军张希尧率部千余人反正。

△　意大利、罗马尼亚两国政府分别宣布承认汪伪政府。

12月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蒋介石主持并发表题为《严斥敌阀承认伪组织》的讲演，称："敌阀于前天承认汪逆组织，并发表敌伪签订的伪约，这是敌人于最近和平谣言攻势失败之后，一种倒行逆施，荒谬绝伦的行动。……这种形同废纸的条约，及其对于毫无自由意志甘为日本奴隶的伪组织的承认，根本没有一顾的价值，但在中日两国仇恨史上，则将成为一种重要之资料。而且由于这一张伪约，要使中日两国延长无穷的战祸，并使中日两民族结成百世不解的仇恨，这是近卫内阁最大的罪恶。"

△　军事委员会任命许绍宗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新任兼理四川省主席张群对中央社记者谈治川施政纲领，约有四端：一、平抑物价，解除民生痛苦；二、改善兵役、工役，使其利国而不祸民；三、厉行禁烟剿匪，除大害，祛大毒；四、调整机构，统一事权，节省开支，平衡预算。

△　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报告日军自越、桂撤退之后之近况，略称："敌自越、桂撤退，以一部布于粤中山、东莞、石龙、宝安沿海及广州外围，图再作南进准备。"

△　第八战区司令长朱绍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新疆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等，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等，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辽宁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吉林省政府主席邹作华，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河北省政府主席庞炳勋，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等，分别于是日及4日、7日、8日、11日、12日、13日、16日、21日通电讨汪。

△　韩德勤致电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该部在苏北东台、盐城地

区与新四军作战屡败，请求派大军驰援，派机送款接济，以挽苏北危局。蒋介石批示：一、令汤（恩伯）部迅速行动，以资策应。二、对江南新四军即令北移，否则采取军事行动。

△　中共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在苏北盐城创刊。刘少奇兼任社长，王阑西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12月3日　教育部组成教育视导团，视导各省中等教育状况。

△　何应钦向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出“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部署：“可令汤恩伯部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对于江北新四军，“若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并请求将上述部署“速签呈委座核示”。徐永昌签呈蒋介石核示后，4日蒋介石批准照办。

△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经济自给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2000余人向太南地区“扫荡”，袭占平顺县城。6日，八路军一部反攻，收复平顺。

12月4日　孔祥熙邀章乃器、顾季高、陈伯庄等50人商讨经济问题，对当前之粮食生产、消费、运输问题进行讨论，一致认为目前粮价上涨为“一时心理及运输制度、组织情况等因素所促成”。

△　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勾结日军，恶迹昭彰，且有公开投敌之势，为所部多数官兵不满，石部新六十九军军长高树勋等于1日将石在河南濮阳柳下屯扣捕，是日处死。

△　陈嘉庚等自昆明启程视察滇缅路，8日离芒市，12日抵仰光，20日抵槟榔屿。31日回到新加坡和轩俱乐部，结束长达10个月的归国考察、访问活动。

△　郭泰祺访问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交涉英国援华问题，英表示愿予中国以出口新贷款。

12月5日　　八路军总部宣布百团大战结束。此役历时三个月之久，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和投诚的日伪军共4.64万余人（其中日军2.1万多人）；攻克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37支，轻重机枪224挺，各种炮53门，炸毁飞机六架，坦克和装甲汽车18辆，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公里，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建筑物260余处。八路军亦伤亡1.7万余人。

△　八路军黄克诚部主力及新四军陈毅部第二纵队向苏北安丰、泾河、平桥、曹甸地区韩德勤部发动反攻，击溃韩部保二旅，旅长邓卫久受伤失踪。霍守义师一团及姜师主力由车桥南下增援，向曹甸以西地区新四军进攻。

△　晋西赵城、霍县日军千余人西犯，长治、壶关日军1500余人以飞机掩护犯平顺，被第二战区一部击溃。

△　苏联驻日大使史梅丹宁照会日本外务次长，声明苏联对华政策不变。

12月6日　　国民党重庆宪兵第六团以派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赴第三战区考察经济为名，奉命将马从家中绑架，囚于卫戍总部。8日，马回家取物，并至重庆大学告别，师生千余人“群情大哗，宪兵无法制止，乃迅速押解起行”。10日，被囚于贵州息烽集中营。至次年8月，先后转至江西上饶、广西桂林和重庆歌乐山监禁。

△　阿部信行由南京抵汉口进行视察。16日由南京返抵东京。

12月7日　　蒋介石核准军令部于11月14日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密令各部执行。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郭

沫若等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晚会，周恩来出席，出席的还有重庆文化界、新闻界350余人。

△　晋冀豫边区文化界13个团体发表宣言，抗议日军残酷之“扫荡”暴行，号召同胞“参军参战，报仇雪恨”。

△　阿部信行辞驻汪伪政府大使职，日本政府任命本多熊太郎接替。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这个电报即“齐电”。

△　周恩来、叶剑英与刘斐就新四军北移问题进行谈判，周、叶表示，新四军北移问题已就地与顾祝同商洽，但因请求补发饷弹等项尚未得具体之解决，且长江交通被敌控制。渡江不易，而江北国民党军队又有围攻之势，以致新四军北移尚难实现，故拟由项英副军长来渝与中央进行交涉北移路线和军饷等问题。

△　中越文化工作会在重庆成立，李任仁等为理事。

△　八路军冀中军区赵承金、谭冠三支队攻克濮县东北之古云集，歼灭国民党军高树勋部之暂一师2000余人。

△　日伪军1000余人向黑龙江宁安县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沟村东北抗联一部进犯，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部被日军包围，陈部奋起突围，激战二小时，大部牺牲，陈翰章在战斗中阵亡。

12月9日　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报告鄂北大捷，称此捷“使突入宜昌、沙市之敌依然在我侧面钳制之下，毫无发展余地，不但不能威胁我军，而我军且可随时以有利之态势，进而歼灭敌人”。

△　蒋介石发布《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间。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　刘斐约见周恩来、叶剑英，告之蒋介石对于项英来渝表示拒绝，并称新四军北移问题已电顾祝同负全责就地解决，同时说明停发军饷系军政部下令。

△　河北么大、葛公日军千余人与唐县、固城日军会合，分三路向八路军驻地进犯，被击溃，毙伤200余人。

△　日机七架轰炸广东东兴滩民区，死伤百余人。

△　日本外相松冈对记者谈话称：“将来中日必能实现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尚未关闭与重庆和平之门，此问题将由南京政府任意决定。”

12月10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拨款100万元，救济战地迁川各私立大学及高中员生。

△　成都市各界民众举行讨汪锄奸大会，到会千余人通过致前方将士等电，并电请中央通缉汪逆，誓杀国贼。

△　卫立煌致电朱德、彭德怀，告以石友三被处决案详情，表示两党两军将“益固团结”，并请立予“恢复友好，协力对外”。朱、彭复电卫立煌，称卫能“洞烛其奸，明正法纪”，消息传来，敌后军民莫不欢欣鼓舞。表示愿与高树勋、孙良诚两先生“切取联络，携手对外”。

△　徐永昌呈蒋介石《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令第三战区届时彻底“扫荡”新四军，报请蒋介石签呈，略称：新四军北移“展缓期限为12月31日止，现已届12月中旬，如迟迟下达，恐各部队准

备不及”。为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一、江北新四军“不断进攻韩（德勤）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二、江南新四军“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　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其中500万英镑为中国之平准基金，另以500万英镑为信用借款，“俾中国可向使用英镑之任何区域购买物品”。

12月上旬　　教育部令各省、市教育厅及国立各中学，饬添授关于蒋介石言行之教材，以为训育方面之准的。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担任对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指挥，作战兵力除第三十二集团军所属各部外，增派原属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第七十九师和第六十二师等部。

△　刘斐向蒋介石、何应钦提交其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谈判的报告，主张“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

12月11日　　何应钦、白崇禧致电莫德宏，称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所有部队限本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所示作战地区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

12月12日　　新四军陈毅部再次向苏北曹甸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

反攻，是日攻占曹甸西南之碉堡两座。至16日，毙第八十九军团、营长以下官兵200余人，韩德勤率三团兵力北上支援，被击溃。17日战斗结束，第八十九军撤退至车桥西北地区及射阳、望直港、睢家村一带。

△　军事委员会任命方天为第十八军军长。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一、任命褚民谊为国府委员和驻日大使；二、推选周佛海为行政院副院长；三、任命徐良为外交部部长，并列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12月13日　　山东郓城、巨野、嘉祥、济宁、成武、定陶、曹县等地日伪军3000余人附炮30余门，坦克、汽车30余辆，向鲁苏边八路军防地“扫荡”，八路军一部与敌鏖战，毙敌350余人，俘敌60余人。

△　日机轰炸滇缅公路中国段，炸毁云南仙容机场飞机22架。

△　伪共和党首领、湖北省政府主席何佩瑢发表通电和宣言，宣布解散共和党，全体党员加入汪伪国民党。按：共和党是何佩瑢在日本支持下，于1940年5月在汉口成立的汉奸组织。

△　汪伪新任驻日本大使褚民谊接见伪中央社记者，谈使日使命为：“争取两国之协调，贯彻大东亚主义，树立友邦所倡导的东亚新秩序。”

12月14日　　李明扬致电蒋介石，报告出击苏北新四军部队的部署，拟“分散新四军之兵力，策应车桥、曹甸之友军，确保泰（县）防为方针”，以一部主力由姜堰经曲塘向海安进攻；一部由姜堰经姜坝向黄桥进攻；一部向安丰、东台进攻，占领海安、黄桥后，各以一部分向拼茶、马塘、掘港方面进攻，推进“清剿”。

△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全体将领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反

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日到底。

△ 日机20架袭击昆明，27架袭击衡阳。

12月15日 据重庆《大公报》载：福建省自本年8月1日起，在全省63县区先后实行田赋改征实物，“进行至为顺利，绝未发生窒碍”。闽东偏僻县区，按改制办法纳赋，反为原有应纳之正副赋及临附加赋全部为少。

△ 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反对“日汪条约”，开展反汪运动》，指出“日汪条约”内贯穿的就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其目的就是为着“造成奴隶的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日汪条约”全部内容证明，对日投降就是中华民族的死路。因此，中华民族为着取得民族的解放，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坚决粉碎“日汪条约”，展开反对投降的广大运动；坚决反对反共，巩固抗日的民族团结。

△ 交通部派沈昌接收云南境内之滇越铁路。

△ 汪伪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历时三日。会议决定成立党务、政治、军事、教育四委员会，指定徐苏中、陈群、鲍文樾、樊仲云分别为各委员会主任委员；增加缪斌、陈孚木、袁殊、夏奇峰、孔宪铿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发表宣言，称：对《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当以诚心毅力，期其实践”，今后对外当与日本、“满洲国”结成轴心，与德、意增进亲善关系，对内当以确立治安与改善经济生活为最重要的政策。

12月16日 王宠惠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称“敌人之鸵鸟政策，只促其本身早日崩溃”。“我之抗战将达到保持我民族生存独立、维护世界正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三个目的”。

△ 国民政府公布《县参议员及乡镇民代表候选人考试暂行条

例》，凡七条。

△　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选举凌鸿勋、恽震为正、副会长，陈立夫、曾养甫等为董事。

△　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二集团军准备对由江南北移之新四军实施攻击，电称：八路军“在黄河以南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前移黄河以北作战。如该军不遵限北移，或乘机向鲁、苏军队攻击，国军为贯彻军令，应为预备之处署”；各部“应派搜索队，密布谍报网，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尔后之行动”。

12月17日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猛袭鄂南阳新附近之日军，敌溃败，急由阳新增援，李部迎击，战至次日晨，毙伤敌400余人，残敌回窜。

△　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勋祺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正富为第五十八军副军长，鲁道源为第六十军副军长，李振为第六十五军副军长，张兴仁为新编第三军代副军长。

△　国民政府令将广西分置13个行政区，设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部。

△　上官云相电令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等，令俟新四军北移后，“再行肃清工作，以免其借口”。25日顾祝同致函黄，令新四军移防之后，“应彻底清查，以杜隐伏，对当地嫌疑分子尤须严密监视，恩威并用，促其自新”。

△　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案，派周佛海为总裁。同日，周佛海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签订《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规定：一、中央储备银行由日本斡旋向华兴商业银行借款5000万元；二、聘请日本顾问及职员；三、中央储备银

行保有的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由双方组成外汇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四、确认军票与华北联银券的现成事实，并维持其价值。

△　日军千余人围攻海南岛美合抗日根据地，琼崖公学内100多名伤员和华侨被惨杀。

12月18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转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斐，说明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其后方人员及医院资材将立即开始移动，正规部队正积极进行移动准备；但因敌伪封锁重重，加以补给的饷弹未全部领到，故请转陈蒋介石“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在2月15日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现地不留一兵一卒”。老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部队，由于种种原因，移动困难，其中主要者为求食问题，现华北灾情严重；另请求国民党中央通令霍守义、莫德宏、汤恩伯等部停止调动；请求国民政府继续发饷，勿使间断，以利作战。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契税暂行条例》，凡17条，并决议甘肃省保安司令朱绍良免兼职，任命谷正伦兼甘肃省保安司令。

△　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陈重庆《新华日报》数月来历遭非法扣留、禁阅，且对销售者、阅读者有停止营业，捕逮拘禁之威胁等情，恳请“严令制止，以维法纪”。

△　越南复兴军300余人窜入中国境内，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在凭祥附近将其全部缴械。

△　日机36架袭击昆明；同日，又19架袭击广东曲江，被中国空军击落一架，坠于邵章关。

12月19日　　于学忠致电蒋介石，申述苏北“辖　毂南北，一旦有失，不唯山东之危，亦华北全局之忧”，求派一军之兵力直接应援。24日，蒋介石复电：应尽全力巩固山东，可无须再抽兵增援苏北。

△　第八十六师制定进攻察绥八路军根据地的军事部署，要点为：为防止八路军“打通外蒙”，拟抽调马占山部、东北推进军进入雁北及准格尔旗，伊东五个游击支队驻扎伊盟，“以阻其北进”。

△　鄂南通山、阳新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支援下，自慈口出扰杨芳林，分途进犯德安、瑞昌附近地区。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通过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和中央储备银行案，特派汪精卫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特任李士群为警政部部长，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　汪伪政府组成访满修好答礼使节团，徐良为特使，鲍文樾为副使，赴“满洲国”修好答礼。23日，徐良等抵长春，向“满洲国”皇帝溥仪递交“国书”，并转交汪精卫致溥仪的亲笔信。24日，徐良等返宁。

12月20日　　国民政府令：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该省民政厅厅长毕泽宇暂行兼代；又公布《各机关人事管理暂行办法》，凡八条。

△　徐永昌为调整西北反共兵力部署电呈蒋介石：拟调第八十五师全部控制洛阳、陕州、灵宝附近，由第三十六军赵锡光部接替第一军潼关至合阳防线，第一军控制关中；并称：为顾虑八路军主力“向宁夏、兰州、西安突击，我军以六个师并借助工事之利，可以歼灭该军”。

12月中旬　　宋子文鉴于英汇市价跌落，以及汪伪中央银行即将成立，恐国民政府放弃上海外汇黑市，致电蒋介石请求不改变既定政策，称：“近日上海接到渝方谣传，政府将改变方针，此后不维持上海法币等语，故外汇市面着着见缩”，“似应嘱财部注意，勿令任何方面不负责空谈，影响人心。”

△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往江西上饶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商洽新四军北移渡江问题。经该部参谋处长岳星明答复，北移路线和渡江地段均依过去之计划执行。袁提出粮弹补给数目，要求尽快拨发，以便早日北移。顾祝同批示：粮食如数拨给，弹药不发。

12月21日　　周恩来致信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告以最近各地反共事件七起，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与江苏方面友军配合，造成对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之半包围的形势”，等等。要张冲呈报蒋介石予以制止。

△　朱德、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转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告“百团大战自8月20日起，至12月5日止，大战继续三个半月”，共计大小战斗1824次，攻克据点298个，攻入县城11个，市镇五个。毙伤敌共2.0636万人，毙伤伪军5153人，毙伤骡马1952匹，生俘日军218人，俘伪军1471人，俘骡马1051匹等。八路军阵亡官兵5390人，伤官兵1.179万人，中毒官兵2.1182万人。

△　教育部分别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太和、丽水、永安、洛阳、西安、兰州等处举行民国二十九年度高等考试。

△　宋美龄在华盛顿发表演说，称中国抗战三年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假如中国一朝败北，那是英国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自私自利，法国的畏虑恐惧所做成的圈套弄死了她”。

△　八路军鲁西军区部队袭击定陶附近日军据点，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12月22日　　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密电蒋介石，称该部在陕北布防之力量薄弱，请将驻灵宝之第三十六军赵锡光部及在晋东南之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调至关中控制，以应付非常事变。

△　据中央社报道，日本占领深圳历时六个月，中国游击队乘敌一部驻军撤退之机，向广九路深圳以北车站发动进攻，其他部队亦向南头方面袭击。

△　日机分批对广东鲨鱼涌、葵涌进行轰炸，投弹55枚，毁民房10余间，死伤平民二三十人。23日日机再犯葵涌，投弹百余枚，炸死平民五六人，基督教堂被炸毁，瑞士牧师夫妇被炸死。

△　日军在上海吴淞蕴藻浜强征民地，限令数万农民迁出，拆毁民房无数，老弱男女流落道途。

12月23日　蒋介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谓：第五战区“无有新四军或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如有上项部队或该战区内无案之游击队活动时，即系匪伪冒充潜入，仰自即日起由战区长官指定部队分区剿办，彻底肃清，以遏乱萌”。

△　周恩来同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黄炎培、邹韬奋在沈钧儒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

△　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张君劢寓所秘密集会，讨论时局问题，表示“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进两党团结对敌”。商定将1939年10月在重庆筹建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民主政团同盟。25日，黄等又约冷遹、江恒源等商谈组织政团同盟事，并取得一致意见。

△　钱永铭、宋汉章等自香港致电孔祥熙，请求即日宣布政府“并无停止在沪供给外汇之意，对于法币尤当贯彻既定方针”。25日，孔祥熙复电，告以“政府对于法币政策并无变更。最近友邦巨额借款成立，基金益加雄厚”，并希转告港、沪同人一体知照。

△　国民党将苏北、鲁南、豫东、皖中成立特区，并设立苏鲁豫皖党政委员会，以汤恩伯任主任。

△　日本海军宣布扩大对华海岸封锁，自粤省大连澳起，迄北海止，严禁一切船只出入。

△　山西静乐、宁武、岚县一带日军“扫荡”兴县，是日血洗兴县城，屠杀城乡民众1300余人。

12月24日　　国民政府公布经国民党中央遴选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共240人：计各省、市90人，蒙古、西藏地方六人，海外侨民六人，其他各方面人士138人，其中有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

△　国共两党代表就两党关系问题在重庆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代表刘斐、张冲，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指出皖南新四军必须限期北移，不能推迟。中共方面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佳电”提出新四军过江，已表示让步了。双方意见对立，谈判无结果。

△　行政院严令粮食主管机关及宪兵警察队取缔囤积居奇者，奖励民众告密，并拨购粮款5000万元以裕米源，拨2000万元购买日用品供给市面。

△　军令部密令第四十八军：一、派有力部队至长江沿岸堵截北移新四军。二、日军见新四军大批集合，由大通派来400余人驻扎兴洲寺等处，建筑工事，并于沿江停泊兵舰汽艇多只，令严密戒备。

△　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并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皖南新四军正整装待发，又受顽军包围，顾祝同忽令改道，直接从繁昌、铜陵间渡江，但这里既须穿越敌占区，江中又须避敌艇袭击，即使偷渡也有困难。

12月25日　蒋介石在重庆寓所约见周恩来，称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又称：中共军队开到黄河以北，是为中共着想，那里地域大，待中共去发展，去实现抱负；如果共军非留在江北不可，冲突决难避免，共军必失败。蒋提出新四军在皖北过江，并称：“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即申明中共之立场。26日电告毛泽东：“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他的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　云南起义纪念日。国民党中央举行联合纪念会，林森主持，白崇禧报告，指出：“不遵奉总理民族主义，不实行民族革命的便是民族复兴的罪人。”并称：“如果违抗中央命令，不服从最高统帅的指挥，也可以断定他必定是要为全国人民所共弃的。”

△　毛泽东、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速向蒋介石交涉：一、须分苏南，繁（昌）、铜（陵）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和开拔费从速发下。

△　蒋介石密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其剿办中共河南确山、信阳等四县联合处。

△　上海新闻报社、申报社工人1000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年奖等。27日资方大部分接受了工人条件，工人复工。

△　伪满洲国公布，全满总人口为4323万余人，其中奉天市（今沈阳市）113.5万余人；哈尔滨市为66.1万余人；“新京”特别市（长春市）为55.4万余人。

12月26日　中共中央致电新四军军部，指出：“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

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原定1941年1月1日召开国民大会，延期举行。

12月27日　冀鲁豫八路军一部在河南濮阳歼灭日伪军150余人。

△　《中英出口信用保证协定》延长有效期半年，并规定：尚未动用之款项，可由中国方面用以购买货物。

△　日军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官罔部直三郎秘密由张家口飞抵包头，召见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骑兵集团长小岛吉藏，策划侵袭绥西事宜。决定：黑田率部二万余人取道后山进犯绥西；小岛率部及伪蒙军李守信部三个师、伪绥西自治联军王英部三个师，共1.5万余人，取道前山及黄河南岸向绥西进犯。由三路分进合击，歼灭傅作义部主力于五原地区。

△　日本新任汪伪政府大使本多熊太郎抵南京。28日，向汪精卫递交国书，表示中日两国相依相扶，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

12月28日　新四军军分会召开会议，讨论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会议决定，皖南部队全部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麓经宁国、郎溪到达溧阳，待机北渡；并决定行动的日期为1941年1月4日。

△　据《中央日报》载：马来亚华侨陈锦生抗战以来向国家迭输巨款，近来一次捐款50万元。蒋介石特电嘉勉。

12月29日　蒋介石发布取缔囤积居奇的手令：“如存有各种粮食

及日用重要物品者，统限于民国三十年一月十六日以前尽量出售，供给市场需要；如限期不能售完，尚有余物积存者，应向粮食管理部门及平价购销处登记，继续供销。”“在此期间，不自动出售，又不遵令实报登记者，以囤积居奇论罪，粮食充公没收。”

△　东方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于右任为会长，覃振任副会长。大会发表宣言，略谓：“东方文化的发展和沟通，在各民族间固有其历史和特色，但其共同之最高目的，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东方文化是王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感化人’，所以东方文化不重功利强权，不是用枪炮来压迫人。”

△　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第三十二集团军“围剿”皖南新四军北移部队的部署：以第五十二、第一〇八师为右翼军，指挥官张文清，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汇、三里店、汀潭附近攻击，尔后向繁昌方面进剿；以第四十、第一四四师，新七师之第二旅等为左翼军，指挥官刘雨卿，展开于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攻击，尔后与右翼军协力向旧县、荻港、坝埂头江岸追击；以第七十九师于太平、石埭之间，第六十二师于榔桥、三溪之间，阻其南进；以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第三十三旅等部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新四军皖南与苏南的联系。限定各部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称：一、中、美、英三国命运有密切关系；二、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职务；三、以大批军需物资援助中国。

12月30日　　蒋介石电饬各级党、政、军机关，略谓：查中共目前任务为加紧对我后方进行军事进攻，并开始反抗中央。为应付突然事变之发生，“各级党、政、军机关应联合阵营，注意防范，随时侦报并严防为要”。

△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进行谈判，周恩来再次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等申明：此次我军移动，只是皖南新四军，其他不动；国民党必须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

△　据中央社讯：中国空军代表团领队毛邦初与美政府官员会谈，美国同意至少以400架新式驱逐机及轰炸机若干架，其中有六架“波音”式“空中堡垒”交与中国政府。

△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12月31日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总理纪念周报告一年来施政经过，并提出民国三十年（1941）经济、财政工作的九大要项：一、加强缉私组织，及非必需品的进口统制；二、调整进口税率，以保护国内生产事业；三、推广统税征收种类，以裕税收；四、实施新所得税法，并确实推进过分利得税；五、继续摊存关、盐两税担保债款，以维债信；六、整理地方财政，以适应新县制之需要；七、筹备县银行，并加强西南、西北金融网；八、充实法币准备，以巩固法币基础；九、提倡节约储蓄，奖励国民捐款。

△　国民政府令：六年戒烟期满，成效彰著，所有善后工作由行政院饬主管部门执行。同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如有种、运、售、吸鸦片者，皆服上刑”，并勉励全国“对于残余毒之铲除，应加紧努力，毋渎前功”。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四川省整理债务公债条例》，凡11条，定公债额为3500万元，年息四厘，28年后全数偿清，自公布之日施行。

△　国民政府以石友三“违抗命令，不服调遣，触犯战时军律，业已伏法”，褫夺所有前任陆军中将官位。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

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进攻……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速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军事指挥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

△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通电全国，抗议新二军在鄂北襄河西进攻新四军独立团；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在京山进攻新四军第九团；曾宪成部进攻新四军第六团，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任何内战之阴谋。

△　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任命廉隅为驻"满洲国"大使；撤销工商、农矿、交通、铁道四部联席会议，所办事务移交全国经济委员会。

是月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会议成立，直隶行政院，由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下设政务、粮食、物资、运输、金融、贸易、合作、调查、检察、军事10个组，并聘请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蒋介石任该会主任。

△　资源委员会将军政部移交的焦油厂改建为四川北碚焦油厂，由赵宗燠主持。抗战胜利后结束。

△　据经济部调查：自抗战以来，日军在上海摧毁工厂2300家，损失资金五亿元。上海以外在部注册的工厂，其中被毁者计1465家，损失资金2.37亿元。

△　东北抗联在日军残酷围攻下损失严重，补给十分困难，仅余千余人左右。根据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崔石泉等同苏联代表会谈达成的协议，抗日联军大部向苏联边界地带转移，并陆续越界入苏，在双城子、亚克斯农庄等地建营整训。

△　苏联政府派遣崔可夫等15名苏联顾问、专家来华，苏方还向中国运交了100架轰炸机，148架战斗机，300门大炮，500辆汽车及其他军火物资。

△　日本闲院宫在南京主持召开参谋长会议，驻华日军华中系参谋长岛田、华北系参谋长香月、华南系参谋长田中出席。会议决定："华军自采取攻势后，其质与量均有惊人改进，各区部队不得再存漠视一切之心，对华军轻加估计。"目前，"占领区域布满华军游击队，后方治安无法维持，交通运输尤为困难。为报复计，以后应从侧面向华军后方尽量采用急进步骤，截断其联络，但应审慎而行，以免孤军深入，遭受包围"。

△　日军在哈尔滨设立"治安工作指导部"，在肇州、肇东、肇源地区肆意逮捕民众，前后有千余名中国民众被杀害。

是年　　国民政府本年度国库收入为10.51529亿元，支出为52.87775亿元，赤字42.36246亿元，比例占80％。

△　国民政府本年度战时经济事业财产损失总数为国币21501.6305亿元。

△　行政院公布《各省办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业务办法纲要》，凡11条。

△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海外侨胞捐赠祖国抗战的款额为国币1.238亿余元。

△　全国粮食管理局公布《粮食管理纲要》、《粮食治本治标办法》及《粮食管理紧急实施纲要》。

△　中国银行主办之西北雍兴实业公司成立，资本2000万元。兴办18个工厂，包括纺织、面粉、机器、制药、皮革、印刷、火柴等部门，大部分设于陕、甘两省。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区域推进至16省区，设立合作社1738所，社员2.57万人，认缴股额122万元，贷款总额600.08万元，每月生产总值939万元。其中西北有524社、川康405社、滇黔97社、湘桂231社、赣闽粤481社。

△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高等院校共113所，教员7598人，职员5230人，学生5.2376万人，毕业人数7710人，年支经费5829.6680万元。

1941年（民国三十年）

1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表广播讲演，勖勉全国军民“提高民族精神，坚持抗战到底；完成宪政，实现民权平等；建设经济，改良民生”，“一致建设三民主义新国家”。同日，蒋介石发表题为《三十年告全国军民书》，强调今年是“历史上最艰辛最重大的时期”，要求“在社会要厉行精神总动员，在个人要实践新生活”，“每个人都应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三十年四川省整理债务公债条例》，定额为国币3500万元，年息四厘，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各付息一次，偿还期限为26年。

△　国民政府明令自是日起实施《决算法》，并颁布施行细则。

△　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概况》，称过去30年来，“虽事变纷乘，头绪万千”，但全国财政“由财权分裂趋于财权统一；由中央财政之整理而趋于地方财政之整理；由间接税为中心之税制而趋于直接税为中心之税制；由银两本位经银元本位而趋于法币政策”。

△　军政部长何应钦发表《元旦献词》，宣布自战事发生以来，日方伤亡逾160万人，消耗战费160亿元。

△　行政院会议决议，自今年起各省政府下设社会处，或于民政厅下设社会科，主管地方社会行政。

△　财政部设立川康直接税局，原川康所得税办事处撤销。原川康地区设置的18个区分处，一律改为分局。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乾元为第三十四军代理军长。

△　新四军军部致电毛泽东、朱德等：新四军皖南部队决定全部移苏南，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指出："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收复河北阜平县城，粉碎日军对北岳区的冬季"扫荡"。

△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捐献先人遗产值7000余万元，兴办教育。

△　汪精卫发表《所望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文，要求日本在新的一年里，允许汪伪政府建立军队，扩充兵力，并设法解决民食，使其有能力与日本协力，分担"复兴东亚"的责任。

1月2日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兴业公司董事长张群由蓉抵渝，向蒋介石述职，并告川康兴业公司资本已确定为7000万元，由国民政府出资3000万元，川省700万元，西康300万元，另招商股3000万元。公司业务以开放矿产、建立工厂为重，并兼顾农利。

△　驻英大使郭泰祺晤英外相艾登，讨论两国太平洋之利益问题。

△　《中苏贸易协定》第二部分签订，规定中国以羊毛换取苏联

机器及军用品。

△　第三战区江防流动炮队于安徽黄石碛击沉日中型运输舰一艘，毙敌约200人。

△　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奉命从苏南开赴皖南，主力部队于是日到达三溪镇附近。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令该部构筑工事，加强警戒，向北搜索。同日，第七十九师亦奉令从浙东诸暨调皖南，到达太平集结待命，并向北和西北严密警戒。

△　皖南新四军部队9000余人集中于云岭、北贡里、土塘地区，进行政治动员，组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辖老一团、新一团，由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二纵队辖老三团、新三团，由周桂生任司令员；第三纵队辖第五团、军特务团，由张正坤任司令员。军直属队随第二纵队行动。

△　日机12架轰炸昆明东南郊。4日又轰炸昆明飞机场、发电厂及滇缅路数处。

△　巴拿马新宪法成立，规定禁止中国人入境；对华侨商业限制綦严。后华商失业者甚众，纷纷返国。中国驻巴大使几经交涉无效。

1月3日　　蒋介石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一、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二、所请补给俟达到指定地点即行核发。

△　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队总指挥程汝怀密电何应钦，汇报袭击豫、鄂、皖、苏边区八路军、新四军计划，“以一部守备大别山根据地，另以有力一部扫荡皖中当面以东地区之障碍，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即出淮南路以东地区而廓清之”。

△　拂晓，从河北行唐县出动的日伪军300余人，袭击包围行唐县

以北之南龙岗村，并企图围歼该地之八路军冀中部队一部。八路军预有准备，将敌反包围，经三小时激战，共歼灭日军200余名，伪军70余名，俘日伪军23名。

△　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法教会所办孤儿院内工厂职工1000余人，要求改善待遇实行罢工。

△　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与美国财长摩根索在华盛顿会商平准中国外汇办法。

△　美国政府致电中国政府财政部称：以后勿再公布通货发行额及岁入报告书，以免在华盛顿及伦敦发生不良印象。

1月4日　　军事委员会发表公报，公布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日军伤亡为179.4402万人。同日，并宣布一年来长江炮兵击毁日舰200余艘。

△　据中央社讯：日军大本营称，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伤亡350万人，日军伤亡10.1899万人。

△　兵役署负责人对记者称，本年度兵役办法有所变更，征募由每月一次改为三月一次，分在3、6、9、12月举行。

△　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分三路自驻地泾县云岭遵令北移。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部队的行动路线是：先向南经茂林，再向东南经旌德县的榔桥、星潭、三溪镇，再转向东北经宁国、郎溪、广德进入苏南，至溧阳竹箦桥地区，再待机北渡长江。

△　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上官云相，密令新调防皖南的第四十师方日英部集结三溪附近，构筑工事，严密警戒。方多次派便探向茂林及其以北地区搜索，断绝交通，准备围歼北移新四军部队。

1月5日　　兼行政院长蒋介石为严行管理粮食及日常必需品，手令各主管机关限10日内登记陪都各商店、行号及民户之积存，其有积存违令不报或不销售者，以囤积居奇论罪，除没收其所积物外，并按军法惩治。

△　蒋介石对驻川部队及补训处长官发表《后方部队整训之要务》的演讲，提出如下要务：一、提高新兵教育，改造士兵心理，发扬当兵的光荣；二、管教新兵要如父兄之对子弟，宽猛兼施，恩威并济；三、改进兵役，必须革除役政积弊；四、部队主官对下级干部应注重平时训练，更应亲躬其事，负责实施，并希望刻苦奋励，加紧努力，充实革命的武力，发扬国家的光荣，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

△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社会部撤销后，其所属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委员会分别划归组织部、宣传部接管。

△　国民政府令：免赵士卿国立同济大学校长职。

△　新四军皖南部队抵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月6日　　拂晓，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东南铜山附近遭顾祝同部第四十师方日英部袭击，方师占据有利地形，新四军处于隘路之中，兵力不便展开，几番突击，均半途退回。黄昏，新四军分三路向丕岭进发。同日，第三十二集团军军部即电令左、右翼军总指挥刘雨卿、张文清等对日军暂取守势，以主力于7日拂晓开始迅速围剿茂林、铜山一带新四军。

△　黄昏，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从茂林以南驻地出发，继续转移。第一纵队出球岭，第二纵队出丕岭、薄岭，第三纵队出高岭，各部预定于7日在星潭、榔桥河一带会合。当晚，各纵队在行进途中分别遭到预先埋伏的第三十二集团军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的突然袭击。新四军皖南各纵队被迫实行自卫。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上官云相迅速部署所部进剿皖南新四军，“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同日，上官云相又命令所部于7日拂晓以主力开始围剿茂林、铜山一带新四军。

△　重庆市合作金库开业，暂定资本100万元。

△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兼任总裁。该行于上海设立分行，苏州、杭州、蚌埠设立支行，其实际业务仅限于南京伪组织势力范围之内，华北之伪联合准备银行、伪蒙疆银行仍独立存在。同日，周佛海发表声明，宣称“对于由香港流入上海的旧法币，将加入相当的限制”。

△　伪满洲国任命吕荣寰为驻汪伪政府大使。

△　美财长摩根索告记者：中国平准基金谈判即可签字，该协定之细则规定以5000万美元贷予中国，以平准中国法币。

1月7日　　第三十二集团军下达总攻命令，令第五十二、第四十师及第七十九师在正南面一部向皖南新四军正面发起攻击；第七十九师及第一四四师主力，星夜前进，对皖南新四军侧背发起攻击。

△　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分别通过球岭、丕岭、高岭，向星潭一线攻击前进。部队在前进中行军序列和部署被打乱。

△　毛泽东、朱德电令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这时，北移新四军先头部队在星潭附近又遭拦击。项英在百户坑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会议对攻下星潭后能否向苏南转移，认识不一致，争论达七小时之久。至晚12时，始决定部队改向西南方向行动，经廉岭和高岭转向太平，待机再向苏南转移。

△　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转来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被围的告急电，立即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　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于闻喜东南之六沟峪袭击开会之日伪军，毙敌近百，俘伪警备队长王云清等四人。

△　上海英商电车机务部工人因资方拖延答复工会提出的加薪、年赏等五项要求，举行罢工。8日，车务部也参加罢工。9日，工会为防止汪伪当局出面干涉，动员工人复工。双方举行谈判，资方同意每人发给全年底薪八分之一为年赏，另加15元的年终花红；罢工一天发给半数工资。关于增加工资的要求，交由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

△　日机袭击广东惠阳、河源。8日，再袭惠阳、惠州，意大利天主教堂及圣约瑟医院被炸，炸死五六百人。惠阳县监狱亦被炸，炸死犯人九人。

△　日众议院东亚联盟促进议员联盟中国视察团一行23人抵南京。8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招待视察团，称：如果两国朝野人士真诚觉悟，互相提携，当能共存共荣。

1月8日　　全美洲洪门致公党总监督司徒美堂、阮本万等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议召集各党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整国共关系，要求及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奠定民主基础，巩固抗战大局。3月14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敬佩，并望海外侨胞一致主张，“以期实现团结抗战之目的”。

△　第九战区薛岳部连日在湘鄂边通城与日军激战，是日克复黄岸市及通城县城。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在晋西文水南下曲镇附近，伏击由文水出动之日军，毙伤敌90余名。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克复河南内黄之西马上、阳邵店、店

集等日军据点，俘伪军300余人。9日一部袭入濮阳县城。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主力及鲁西第二分区部队在山东郓城潘溪渡设伏，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俘伪军30余人。

△　顾祝同密电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对新四军在各地设立之办事处、通讯处、后方留守处、修械处、仓库及一切机关，不论秘密的或公开的一律封闭，并将其武装解除，人员扣留。

△　顾祝同命令上官云相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12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上官云相即下达总攻命令，决于9日正午以前于现地区包围聚歼皖南新四军。

△　皖南北移新四军按副军长项英意见折回茂林，途中遭第七十九师拦阻，不能前进。同时，又遭第四十师、第一四四师两翼夹攻，云岭、茂林被新七师第二旅、第一四四师占领。新四军退路被切断，项英命部队向茂林突围，即晚到高坦时，遭第一四四师猛攻，叶挺指挥新四军将其击退。

△　汪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一、恢复和平区经济；二、合理调整物资编制；三、拟定中日经济合作方案；四、准备长期经济建设计划。

△　汪伪驻日大使徐良发表广播讲话《对于外交意见》，声称：中日战争是双方由误会酿成的，目前的紧要问题，是要遵从冤仇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及汪精卫的全面和平主张，停止对日抗战。

△　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致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转达该院首脑关于华北反共方针：“现在及将来，扰乱华北治安之最大敌人，乃共产党及共产军，故当实施华北政务时，有注重剿共工作之必要”，“对于共产党及共产军之后方扰乱工作而实施之对策，实有积极推进之必要，为达成此项目的，希望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各省、县等自动开始积

极活动，我方当倾注全力加以协助。”

1月9日　　顾祝同密令上官云相及皖南、江南两行署，在围剿皖南新四军中，“党、政、军务须切实联系”；地方防止共产党活动及一切善后事宜，“统由上官云相命令指挥”。

△　上官云相致黄绍耿急电，令饬所属各区、县党政负责人即率地方武力，切实严密查拿共产党秘密组织及成员。

△　新四军皖南部队经高坦向茂林方向突围未成。当晚，叶挺决定避开茂林，向东北方向突围，拟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在丁家渡和泾县间渡过清弋江，由繁昌、铜陵间渡长江。

△　延安《新中华报》报道：驻陕西赤水附近的国民党预三师一部，抢占陕甘宁边区地域，到处烧杀抢劫，民众遭惨杀者甚多。该师并明令凡逮捕边区县级人员者，奖洋300元；区级200元；乡级100元，并在赤水第三、第五区大兴土木，强迫民众修碉堡，摧毁学校20余所，民众怨声载道。

△　国民政府以河北省南乐县县长魏汉彬、东明县县长樊树华“守土抗战，著有功绩”，明令予以晋级。

△　汪伪政府驻伪满洲国大使廉隅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要尽最大努力，使中“满”关系紧密提携，俾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达到大东亚共荣之目的。

1月10日　　国民政府以辛亥武昌首义首领刘公、孙武效忠革命，“备历艰辛，武昌首义共谋发动，得力尤多”，是日明令褒扬。

△　蒋介石训令社会部并通令所属：八路军已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以后不得沿用八路军名义。

△　第三十二集团军给左右翼军下达分区清剿皖南新四军的命

令，限10日黄昏前清剿完毕。

△　叶挺领导新四军军部在石井坑收容整理部队，总共尚有5000人，并指挥战斗部队在石井坑附近构筑工事，掩护部队的整顿。同日，叶挺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部队经过“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请求中央与蒋介石交涉，停止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攻。

△　晋察冀边区《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由三日刊改为日刊。

△　日第六十九师团、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各一部5000余人，“扫荡”晋冀豫边区之榆社、辽县、和顺、昔阳地区。14日，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粉碎，毙伤日伪军600余人。

△　伪满洲国公布《关于1941年治安肃正的指示》，规定“讨伐”的方针为：避免使用大兵力的“讨伐”，改由军管区选派少数部队对固定目标进行连续追击，分割围攻抗日联军，并规定本年度“治安肃正”的重点为北安和三江地区。

1月上旬　　毛泽东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说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严重局势。指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

△　周恩来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斐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1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律师法》，凡40条。

△　重庆《新华日报》举行创刊三周年纪念晚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出席。会间，周恩来突接新四军被包围、袭击的急电，即在会上宣布皖南事变，谴责国民党的反共阴谋，遥祝新四军冲破重围和黑暗。并提醒大家要准备更严重的斗争。同日，周恩来要求国民党谈判

代表张冲急报蒋介石，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立即撤围、让路。

△　皖南新四军继续坚守石井坑，并打退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部队虽士气很高，但终因众寡悬殊，弹粮不济，无法持久。至晚，第三集团军第五十二师攻占球岭，第一〇八师占领鹿角山，第四十师占领东流山。新四军退守东流山以北高地。

△　叶挺、项英、饶漱石报告中共中央：国民党第四十、第一四四、第七十九、第五十二、第一〇八各师已于今日合围，预计明晨总攻。顾并已下生擒我等之命令。我们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兵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能突破当更好。现士气尚佳，惟粮弹不济，不能久持。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烈，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捐款65万元，支援祖国抗战之吉隆坡爱国华侨陈永。

△　南昌日军连日南犯莲塘，第九战区薛岳所部反攻，是日先后收复向塘、丁坊及沙潭埠等地。

△　日军7000余人“扫荡”鲁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及鲁西第二军分区部队，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毙伤日伪军700余人。

△　日军袭击江西鄱阳。

△　苏北抗日根据地《江淮杂志》创刊。

1月12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告以新四军在茂林已

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六天，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13日，周、叶复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代表交涉的情况及蒋介石的意见：一、茂林方面不要继续打，已不成问题，已要贺耀组下了命令；二、新四军今后可走苏北，但须执行两点：第一，部队过江后不得打韩德勤。第二，不得继续盘踞，要遵命到黄河以北去。请中共方面即电告前方。

△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是背信弃义，是违背孙中山的教导和遗嘱的，要求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持各种抗日党派”。

△　皖南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指挥下坚守石井坑，待机突围。黄昏，新四军石井坑周围阵地相继失守。晚上，叶挺决定分散突围。军部向石井坑东北方向大康王一带突围，其余分两路，一路从凤村向冬青树方向突围，一路向茂林方向突围。

△　东北抗联第十军一部遭日伪军300多人的袭击，在突围战斗中，军长汪亚臣、副军长张中喜中弹牺牲。至此，东北联军第十军基本瓦解。

△　第三战区沿江流动炮队于南京上游江面击毁日输送舰一艘，敌兵千余悉数溺毙，尸体蔽江而下。

△　盘踞山西盂县日军包围张家垴，用火烧、刀砍、刺刀捅刺等手段，杀害村民45人，烧毁房屋170余间。

△　《中苏贸易协定》（第三部矿产贸易协定）签字。至此，全部贸易协定成立。此项协定货品全部价格共计数亿元，苏联以同价军火、军用品及机械原料等易于中国政府。协定规定各货统限本年底以前全部交易清楚。

1月13日　　蒋介石出席四川省政府行政专员及县长会议，宣称“粮食、禁烟、兵役为当前要政”，党务、军队及行政工作人员应切实合作，戮力以赴。18日，蒋在会议闭幕时讲话，命令川省切实施行“新县制”，如有奉行不力，清查户口不实之处，该县长应即撤惩；如有巡查不力，经中央派员查出者，省主席及民政厅长一律治罪。

△　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庆澜在西安病逝。1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朱庆澜，并特给治丧费5000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通电全国，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要求国民党“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

△　新四军军部在突围中又遭国民党军包围，当时尚集中2000余人，几度冲锋，损失很大。下午，国民党军向大康王新四军阵地发起进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

△　叶挺和饶漱石商定，派人与国民党军谈判，并派军部参谋二人前往第五十二师师部联系。

△　盘踞鄂北随县之日军2000余12日出扰，陷高庙、均川店，第五战区一部夹击该敌，是日收复均川店，下午敌复增援来犯，被击溃。

△　伪满洲国驻汪伪政府大使吕荣寰到南京，随员有丁文蔚及日本顾问田原悦二和伊藤芳男。15日，吕荣寰向汪精卫递交国书。

△　中苏航空公司在苏联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董事会议，中国出席之董事为吴元超、刘唐领等，会议决定重庆至莫斯科五日到达，邮运合同亦已商妥，由国内寄欧航空邮件由此线运递。

1月14日　　叶挺为挽救危局，前往第五十二师师部谈判，被扣

押。随后，新四军各阵地被国民党军占领。

△　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最后分散突围，后陆续到达江北和苏南的有2000余人。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到茂林以南大山中隐蔽，3月14日被叛徒杀害。

△　周恩来一面致函蒋介石，要他速令包围新四军的部队立即停止攻击，撤围，让路；一面电责顾祝同。同日，周恩来与叶剑英同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商谈。崔可夫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二旅一部连克河南内黄之西野头、东永建等日军据点，俘敌150余人。

△　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一部袭击集宁南圩泉之日军据点，激战三小时，全歼守敌，克复据点，俘伪大队长赵银山以下40余人。

△　盘踞安徽定远之日军千余以炮火为掩护，东犯河池镇，第三战区游击部队一部迎击至晚，毙敌200余人。

△　日军以“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为口号，大举向安徽宣城、江苏金坛附近新四军进攻。汪伪南京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进攻新四军。

△　日机18架由鄂袭川，并在重庆上空扫射。

△　香港英国当局为限制华人入口，颁布《限制人口入境条例》，是日开始施行。

△　汪伪行政院会议决定成立感化院及教育部童子军事务委员会，并任命唐惠民为警政部常务次长，关东羲为广州市市长，彭东原为驻日本神户总领事。

△　美纽约华侨崇正会致电蒋介石、林森，要求领导全国人民抗

战到底，表示“侨等誓反对摩擦，拥护统一”。

△　星洲《南洋商报》发表皖南事变时评，指出：在日本强盗压境下，“团结则生，分裂则亡”。中国人只要不是汉奸汪派都应该团结起来，如果排除异己，互相歧视，鼓吹分裂，陷中国于灭亡的境地，便是民族的罪人。

△　旅港著名人士张一麐、许地山、端木蕻良、金仲华、范长江等400余人联合致电林森、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1月15日　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对新四军的处置办法，通过撤销新四军番号等决定。

△　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后之对策向周恩来、叶剑英发出指示。指出：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9日）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　周恩来接张冲电话：本日11时半何应钦同顾祝同通话，顾称自昨晚起前线战斗已停，也无叶挺、项英被擒事。周恩来要求对方保证叶、项安全。

△　上官云相致电黄绍耿，速饬各县严密搜查皖南新四军零星突围部队，如有发现，速予剿灭。

△　财政部缉私处成立，戴笠兼任处长。

△　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年会，选举朱学范、陆京士等为常务理事，通过致日内瓦国际工会联合电，提请扩大制止暴日侵略行动，共同消灭侵略者，并电伦敦英国总工会，声援英国工人抵抗侵略和促进中英合作。

△　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选举艾思奇等组成干事会，并决定汇集研究成果，出版丛书。

△　缅甸总督府参事考罗率缅甸政府代表团抵重庆，商洽中缅商务、交通、滇边禁烟、滇缅界务及缅甸护照新法等事宜。

1月16日　蒋介石出席四川东南行政专员行政会议，并发表对于川政之重要指示。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祁祺为第十七军副军长，张言传为第七十军副军长。

△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吴铁城率中国亲善使节团抵仰光，分访缅甸总督及总理。

△　经济部制定《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共二款。第一款共七条，规定：内地生产及制造为国防及民生所必需者，应尽量加强增多增量；燃料事业如煤、焦、油料、酒精等物品应加多出产，以资供应；生产事业所必需之电动力等应加速装设；国营矿业可招收民资者应依国营矿区管理规则，组织公司办理重大工矿事业；利导商业资金办理生产事业，由政府给予保障；维持对友邦货物来往之运输，并促进邻近区域物资之输入。第二款共10条，规定：国防及民生必需之重要物品，由政府支配用途，统制价格；兵工所需之钢、铁、铜、铅、锌、硝、磺等物应加紧生产，并由政府收购供应；民生必需之纱、布等物品，应由政府规定收购及销售办法，并鼓励商人采运，以资调节；煤、焦、油料、酒精等燃料及电力，应由政府就急要用途，尽先支配；政府规定工业制造必需的器材、原料尽先供应；外销物资除与本国及友邦国防所必需者，仍继续统销外，其他得允许并辅导人民自行经营。

△　国民政府设计局正、副秘书长张群、顾翊群辞职照准，遗缺由王世杰、陈伯庄兼任。

△　全国慰劳总会会长陈诚，副会长谷正纲、马超俊、郭沫若，公宴出钱劳军运动名誉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决定此次劝募运动分党政、金融、工商、侨胞、妇女、青年、交通、文化、农工等组进行。

△　“扫荡”鲁西之日军一部出动汽车、坦克百余辆，在飞机掩护下，向朝城苏庄围攻，八路军鲁西守军一部与敌血战竟日，弹尽粮绝，全体官兵壮烈牺牲。

△　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重庆拜会蒋介石，告以下列苏联援华军品已运华，计有СБ　飞机100架、И—6　飞机75架、153驱逐机75架、7.6cm野炮200门（炮弹20万发）、装甲炮拖200套、7.6cm高射炮20门（炮弹三万发）、3.7cm高射炮30门（炮弹三万发）、轻机关枪800挺、重机关枪500挺、三吨载重汽车300辆。

△　宜昌东日军以飞机10架助战，进犯龙泉铺、关庄场，第五战区江防部队予敌堵击，战至次日，将敌击退。

△　晋西北方山日军一部1200余人，分两路向东南退去，沿途烧杀淫掠，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主力于文水西北设伏，战至下午4时，毙伤敌大队长、中队长各一名及以下官兵300余名。18日日军另一路在麻峪口、王家社亦遭伏击，死伤150余人。

△　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纽约华侨群社等致电林森、蒋介石，恳请对皖南新四军撤围，并“严惩制造摩擦分子，撤销调防令，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以慰侨望”。

△　湖南衡阳《开明日报》编辑数人，深夜被国民党特务捕去，被迫停刊。

△　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要点为：一、到1941年秋，应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并发挥综合作战能力，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二、“作战目的是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

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三、设法加强陆地、海面及空中封锁，同时切断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骚扰滇缅公路，以海军封锁海面，以陆军封锁海港的作战，加强对华经济压力。

1月17日　　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并将“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是为“皖南事变”。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重庆对报界人士宣称，皖南事变“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实行叛变之结果”。

△　蒋介石命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率20万大军进攻江北之新四军，并命令江苏省府主席王敬久动员所部，如江北新四军不服从解散命令及移往黄河以北时，即刻围攻之。

△　新四军将领张云逸、邓子恢、陈毅、张鼎丞、粟裕、戴季英、罗炳辉等通电全国，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围歼皖南新四军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仗义执言，“以伸千古之奇冤，而利敌后之抗战”。

△　周恩来在重庆获悉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消息，星夜驰车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打给何应钦的电话中谴责何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次日，《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稿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周恩来立即为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并领导报社职工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把报纸发行出去。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宏光为新编第三军军长。

△　行政院会议通过《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通则》；批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何廉辞职，副局长何北衡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派曹仲植、程远帆为全国粮食管理局正、副局长。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猛攻河南内黄县城，激战彻夜，攻入城垣。次日，伏击由东庄集来援之日伪军400余人，其另一部复向内黄西之魏河逃窜，亦被歼。

△　驻山西五台、代县、繁峙等地日伪军600余人，分三路突袭五台铺上村，在铺上村、里西沟、大柏山、小柏沟四村杀害村民272人。

△　上海龙章造纸厂迁建猫儿石开工，日产六吨。

1月18日　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等为皖南事变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要求“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行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说明事变的真相，作出反对国民党进攻的四项决定，并指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无情揭露他们的反动方面外，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好作战的充分准备。

△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驳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并提出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挺等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停止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在全国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释放爱国

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等要求。

△ 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茂林事变的政治训令》，指出：江南新四军惨遭不幸，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阴谋所陷害，号召全党全军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以应付严重事变的到来。

△ 汪伪政府任命苏成德为首都警察厅长。

1月19日 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社论，呼吁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公正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为惩办阴谋祸首，解救皖南新四军部队，撤退华中剿共军，平毁西北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大屠杀惨变，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

△ 马尼拉《建国报》就皖南事变发表短评《枪口一致向外》，指出：国民党的亲日分子盘踞军政要津，迫令新四军离开防地，又加煎迫，直欲扩大事态，造成全面内战，弄到亡国灭种而后甘心，这只会使敌人高兴，表示要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

△ 宜昌附近第五战区所部反攻日军，连日克复分乡场、黄家场，是日又克郭家冲、珠宝山、常家岭、黑湾垴等地。

△ 鲁苏战区所部克复山东海阳县城，毙伤日军300余人。

△ 日机37架两批袭击云南，在个旧县境投弹数枚。

1月20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　18日至是日，中共中央连日发出指示：蒋介石似有与中共破裂决心，我们决定政治上全面揭露蒋的阴谋，惟仍取防御姿态；军事上先取防御战；组织上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恩来、剑英、必武、颖超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新华日报》应缩小版面，每日出半张，对办事处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

△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提出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25日，周恩来在重庆将上述12条办法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转送蒋介石。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出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延安军委已于20日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军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

△　中共中央决定：一、以刘少奇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二、以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三、中原局改为华中局。

△　周恩来和叶剑英联名致函张冲，附由迪化返延人员伍德民等32人名单一份，托张转交蒋介石下令发给由迪化经兰州、西安、延安

转赴前方的通行护照一份。

△　国民政府特派朱家骅为民国二十九年度高等考试初试典试委员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章为第六十三军副军长。

△　行政院会议议决派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　交通部设立西北公路管理处，管理陕、甘、宁、青四省主干公路行政及改善修养工程，以凌鸿勋兼任处长。

△　槟榔屿《星滨日报》为皖南事变发表社论《新四军被缴械问题》及短评《我们的期望》，驳斥所谓新四军“叛变”的谬论，指出：“海外两千万侨胞是拥护团结到底，而誓死反对枪口向内，中国人杀中国人的。”

△　豫南日军在信阳附近集结步兵七个半师团，独立骑兵一个旅团，独立战车三个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共约步兵15万，骑兵8000人，炮550门，战车300辆，并在安阳、新乡、淮阳、信阳等飞机场集结飞机百余架，准备从正阳和信阳出发，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打通平汉路南段，再转向西，攻击洛阳，以期与晋南日军会师潼关。

△　日军一部由岳阳潜渡湘江，于芦席湾登陆，第九战区所部俟敌陷入包围后，歼其大部。

△　日机四架轰炸广东从化、淡水；14架炸韶关；四架在清远县横石、灌江两地投弹数枚。

1月21日　菲律宾纳卯抗敌会发出代电，要求立即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军长。同日，该会联合中国商会、妇女劳动会、青年会、航空建设协会、教育会等侨团致电蒋介石称：中国抗战“总攻在即，不

宜自起分裂，请保存实力，共同对外”。

△　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希鹏、王天任为骑兵第三军军长、副军长。

△　贵阳警备司令部检查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捕去兵员八人，没收一切财物。

△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请即派兵东进援助该部袭击苏北新四军。

△　日第七十六届议会复会。首相近卫报告内政、外交实施方针，声称解决“中国事变”“仍为今后主要目标”。议会通过加强战时体制案。

1月22日　顾祝同命令各县政府、县党部在最短时间彻底肃清皖南新四军零散人员。

△　日军在信阳附近集结三个兵团：左翼兵团辖第三师团、第四师团第八联队、水野战车队等，由第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指挥，在信阳西北小林店附近集中；中央兵团辖第十七师团、第十五师团一部及吉松等战车队等，由第十七师团长平林盛人指挥，在明港附近集中；右翼兵团辖第四十师团主力，由师团长天谷正直郎指挥，在正阳以西附近集中。另豫南日军总指挥第十一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亲率抽调各部队约四个联队为总预备队，在信阳附近集中。皖北、豫东之日军为策应豫南作战，向我守军进犯。

△　日机19架由鄂两批袭击重庆，磁器口第二十五兵工厂遭炸，死伤八人。同日，日机21架分批轰炸昆明，死伤多人，内有法侨二人，越侨25人。

△　汪伪军事委员会将苏浙皖绥靖军改称第一方面军，任命任援道为总司令，徐朴成、徐风藻、龚国梁、熊育衡、程万军、沈席儒、

王占林分别担任第一至第七师师长。

△　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在苏州桃花坞遇刺毙命。

△　斯诺在美国《纽约论坛报》上发表有关中国皖南事变的通讯，指出国共分裂，对日伪有利，“汪精卫傀儡军队最近能够占领中国政府军队与新四军发生战事的地区”，就足以证明。

1月23日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发表就职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表示“当此妖气弥漫，秦桧横行之际，毅等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

△　国民党中宣部、军委政治部、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向各级组织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宣传要点：“（一）此事件纯出于皖南新四军不遵命令，攻击友军，在纪律上自应受相当之制裁，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或党派斗争的意义；（二）军纪之执行以行为为根据，此次违抗命令破坏军纪者只新四军，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

△　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纽约中美协会演说，宣称日军谋图夺取南洋，危害英、美利益，“惟吾三国合力摧败此敌，太平洋始有和平可言”。并称：中国所需者为财力与飞机，“此两者均有赖于美国之协助”。

△　晨，湖北襄河两岸之日第十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九师团等部向冯治安、王缵绪两集团军进犯，以牵制第五战区的兵力调动，掩护豫南作战。

△　上海纳税人开会讨论增税案，日侨商联合会会长林雄吉反对，提议修正原案，经大会否决，林乃对台上连开三枪，伤工部局总董斯威克等。经日籍副总巡袁木出面调停，事态方息，旋将林雄吉解

往长崎法院审理。25日，日驻上海总领事屈内干城向会议正式道歉，保证日后日籍纳税人遵守秩序。

△ 星洲《南洋商报》为皖南事变发表时评《重伸华侨无党无派的立场》，指出，新四军“是一支在敌后苦战三年的抗日部队，没有发现任何通敌的嫌疑，当不能视为‘叛军’”。“如果我们不提防敌寇汪派的政治进攻的阴谋，再度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国家前途就不堪设想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将永远不能原谅我们”。

△ 美白宫宣布派居里访华，考察中国经济及币制近况。

1月24日 新四军将领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管文蔚、叶飞、谭震林、罗炳辉、周骏鸣、戴季英、李先念、彭雪枫、张爱萍发出声讨亲日派通电，指出“夺去一叶挺，必有千百叶挺以继其后，覆灭一万新四军战士，必有数百万数千万忠于民族国家之新战士以继其后”，“一切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之徒，虽逞志一时，也难逃于覆没”。

△ 蒋介石向全国出钱劳军运动总会颁示训词，要求“高级官吏、富商巨室，应该自动参加，不待劝募”。同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出钱劳军是有钱人应尽之责任”。

△ 冀中区抗战建国联合会、武装自卫委员会、抗日救国会以及农、工、青、妇、回民、文化界等团体，代表冀中800万人民联合致电全国抗战报社，声讨亲日派何应钦，抗议制造皖南惨案。同日冀中新闻界也向全国发出抗议皖南事变的通电。

△ 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向，说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由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他们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第三党近因当局之

压迫，日渐左倾，提出联苏联共为中心，主张与我党更密切合作，还派出章伯钧、邱哲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

△　日第三十六师团、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各一部4000人，开始对太行分区进行“扫荡”。

△　伪浙江省主席汪瑞闿病死。28日，汪伪行政院任命沈尔乔代理浙江省主席。

△　古巴万山厘裕之华侨抗日后援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支会、华侨团体会、国民党分部、南平公所、台山自治所、救国大同盟支部七团体联合致电蒋介石，称：“近闻国内团结破裂，彼此摩擦，莫不痛恨，请迅速和平解决纠纷，永远团结抗战，驱逐日寇，肃清汉奸、贪污害国之徒，务达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大愿。”

1月25日　日军发动豫南会战。晨，豫南日军在园部和一郎指挥下分三路北进：以天谷师团长指挥的第四十师团为右翼兵团，向陡沟、槐角镇强渡淮河发动攻击；以平林师团长指挥的第十七师团主力附第十五师团一部及吉松等战车部队为中央兵团，向明港发动攻击；以丰岛师团长指挥的第三师团、第四师团之第八联队及水野战车部队为左翼兵团向小林店、固县、宝山发动攻击。同时日空军亦协同地面作战对各阵地及后方猛烈轰炸。正在重庆与何应钦、白崇禧商讨“剿共”计划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闻讯，临时变“剿共”部署为对敌部署，命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何柱国、孙连仲、王仲廉等由“剿共”阵地撤回对敌应战。

△　皖北、豫东日军为策应豫南会战，分路西犯，一路为第二十一师团之太田联队，由宿州向西进犯；另一路为骑兵第四旅团附平战车联队，由亳州分三路向涡阳、山河集双桥西犯，与骑兵何军之马师，在十字河、倪邱集各附近激战；另一路为第三十五师团之汤口联队，由通许朱仙镇向泛滥区进犯，另一路为小林联队，沿黄河郑州北

岸西犯。至31日皖北由宿州西进之敌，连陷蒙城、涡阳等地；豫东日军亦同时南陷周家口。

△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其所询皖南事变问题，声称处置新四军完全为整饬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　蒋介石电示汤恩伯，豫南作战应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两翼作主动的侧击；另以有力一部埋伏敌后，待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其交通。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豫南作战调整部署：孙连仲左集团以一部依托既设阵地阻敌，主力集结泌阳；汤恩伯集团集结象河关附近及汝南以东；莫树杰第八十四军一部监视罗山，主力集结息县附近；黄维纲第五十九军向枣阳以北推进；陈大庆第二十九军向桐柏集结。

△　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陈毅代军长发表就职演讲，称："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成立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坚持抗战的大旗，英勇奋斗下去，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

△　中共山东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集会，声讨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并通电全国召开追悼新四军江南被难将士大会。

△　八路军驻绥、米、葭、吴、清警备区河防将士及绥德民众为抗议皖南事变，声讨亲日派举行示威大会，并致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表示该警备区50万人民及军队，拥护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和谈

话，愿与新四军团结一致，为打破亲日派内战外和、投降卖国阴谋而奋斗。

△　檀香山中国宪政会致电朱德，声讨皖南惨案的祸首，并告该会已电请蒋介石停止围剿新四军及释放叶挺，望“俯念困难，尽量容忍，期求和平解决，一致对外”。

△　汪伪南京政府为皖南事变召开庆祝大会。汪精卫在大会上演说，称：“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一件好事，但此次消灭新四军事件，证明还不失为一好人”，并希望重庆政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本同盟社亦大肆赞扬“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　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唐山日军司令部调集丰润、遵化、玉田、迁安、卢龙、滦县等地日伪军3000余，由驻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高桑指挥，偷袭冀东地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潘家峪村，将全村男女老幼集中于一大院内，屠杀村民1230余人，全村幸存者无几，烧毁房屋1000余间。后日军封锁该村，严禁泄漏惨案真相。

△　伪满洲国在东北青年学生中开始推行“劳务新体制”，强迫学生勤劳奉仕，对青年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　中国航空公司重庆—昆明—腊戍—加尔各答线全线开通。

1月26日　　蒋介石以安徽省主席李品仙“除奸杀敌有功”，政绩攸彰，予以嘉奖。

△　豫南战场中路日军陷确山，右翼日军陷正阳，左翼日军陷泌阳。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电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就任新职，表示“愿为其后盾”。同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通电，请缨南下增援新四军。

△　日外相松冈在第七十六届议会上答辩时谈汪蒋合流，称："促使蒋介石反省之主要目的，在促使蒋介石能与汪精卫之南京政府合流。""当日本政府尚未正式承认汪政权之时，汪精卫曾邀请重庆政府要人与彼合流，进而与日本谈判全面的'和平'问题，当时汪精卫并有此种精神，即为顾全中日大局计，设彼有阻碍中日和平谈判处，彼愿出游国外，以促成中日间之绝大好事。日政府亦曾有此明白表示，即虽在我政府正式承认汪政府为中国中央政府后，而日政府实未放弃促使蒋介石反省而与汪政府合流之希望。"陆相东条亦称："欲使重庆政府反省，必须加以重大之压力。如再加以压力，或可转变蒋介石之想法。"

1月27日　国民政府派驻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李锦纶为互换《中国利比里亚国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报告皖南事变，宣称"制裁新四军是为了整饬军纪，加强抗战"，"与政治及党派无涉"。又称"处置新四军乃忍痛制裁"，"实为抗战史中一污点，我身为统帅最为伤心"。"凡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1月17日命令并实行12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日、蒋间矛盾尚可利用，日军如大举进攻，必是配合亲日派之行动，目的在威胁蒋介石妥协。

△　晋察冀边区各界举行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及追悼新四军死难烈士大会。大会通过拥护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向国民党提出的12条办法及慰问新四军电。

△　豫南日军攻陷驻马店，其一股西犯竹沟，一股东窜汝南，主力则北上进犯遂平。时第一战区一部主力向上蔡地区机动，另一部向象河关机动。孙连仲所部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尾击象河关以南之日军；第五十五军曹福林所部由唐河向泌阳前进；第七十七军冯治安所部向南阳前进，欲以两翼侧击日军。

△　日外相松冈在国会答辩时称：如果美国继续援助中国，则美日关系即无法改善。28日，美驻日大使格鲁电美国务院：美日一旦发生纠纷，日本将全面进攻珍珠港。

1月28日　国民政府令：免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职，任命吴尚鹰继任。

△　自去年9月18日蒋介石手令发动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至是日止共得2.09亿元，其中数额最多为重庆市，共3183万元。

△　豫南日军向舞阳、上蔡之线前进中，遭舞阳东南、西南之第十三军张轸部、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侧背伏击，在象河关及接官店等地发生战斗。伏击上蔡、汝南的第八十五军一部和汝南东南的游击队，在上蔡、汝南伏击日军，日军左右两翼均遭猛袭，伤亡较重。同日，日军陷遂平，一股北上犯西平，主力犯吴城，右翼由正阳北犯之敌陷汝南，与由驻马店东窜之敌会合。

△　日机轰炸广西龙州，法国领事馆及教堂被炸毁，领事甘懋履及教士等受伤。

△　仰光18华侨团体发出吁请祖国各党派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宣言，希望“始终团结，抗战到底，达到最后胜利，肃清贪污，实现民主政治”。

1月29日　豫南战场进犯西平之日军为第八十五军预备第十一师所拒，旋改从两翼抄袭，又被第八十五军第四师及第二十三师从仪封

及上蔡两面突击，日军围攻之企图被打破。同日，后翼日军陷上蔡。

△　卫立煌令一部推进至登封、临汝，策应豫南会战。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指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又指出：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

△　顾祝同密电蒋介石称，第六十二师刘熏培部、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一支队贾维禄及新编第一团谢昆锟攻击浙西新四军不力，伤亡损失严重，各记大过一次。

△　山东临沂日军一部附炮六七门，西南犯苍山，鲁苏战区所部截击，敌被击溃，退沂水，伤亡200余人。

△　日机17架两批袭击昆明，投弹多枚，西南联合大学及职业学校等处被炸。

△　槟榔屿各帮会与工商团体及文化机关35个侨团联名致电蒋介石称："新四军忠诚抗战，侨胞钦佩，此次事件，无论是军纪，抑或党派摩擦，均属不幸，望秉公善处，我同侨誓死拥护团结，反对枪口对内"，同时通电各战区将士，吁请反对内战，并函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请转达蒋介石保障叶挺将军生命，解除通缉项英命令等。

1月30日　　蒋介石接见美记者莫理斯称："建立远东永久和平，须中、苏、美合作"，中国需要美国更大的财政援助及军用品之供应"；并谓："美国若以助英国者之半援助中国，则中国可单独对日作战，美国将无被牵入远东旋涡之危险。"

△　国民政府任命李茇为最高法院院长。

△　浙西第三战区所部克复长兴。

△　豫南战场左翼日军攻陷保安砦，一部会合自吴城西犯之敌陷舞阳。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等电贺陈毅就新四军代军长职，并“勒马待命，誓作后盾”，“共除妖氛”。2月4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将领刘伯承、邓小平等亦电贺陈毅等就职。

△　伪满洲国决定对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的机构进行改组。2月17日，“满业”吉野副总裁辞职，由高崎达之助继任。1月31日，伪满设立火药工业株式会社，社址在沈阳，资本850万元。

1月31日　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伯申已就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经依法另选向传义为议长，唐昭义为副议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赵锡庆为第五十三军副军长，王育瑛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

△　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合众社记者，对美国援华表示感谢，并称：“中国如能获得供给中国所无之军用品，则中抗战决不犹豫。”

△　资源委员会与美国注册之金属准备公司签订合同，中国出售给美国价值6000万元的钨砂、纯锑、锡等。

△　豫南战场第三十一集团军以伏牛山为依托，侧击进犯之敌，第十三军击败由保安砦北犯叶县之敌，克复旧县镇。

△　豫南日军寻求主力决战未成，乃变更部署，以第十五师团一部由遂平经上蔡向右迂回，企图与由汝南北进日军会合以夹击第八十五军。第十七师团主力由遂平、西平分两路向舞阳方面迂回；第三师团主力及第四师团一部亦向舞阳方面前进，企图夹击接官厅、尚店、小史店之第十三军张雪中部。第八十五军及第十三军分别转移。

是月　蒋介石通过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并允许中共在江南部队集中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扩大其编制等为条件。周恩来等答复：不实行12条，无谈判可能。

△　蒋介石同上海英文《大美晚报》记者谈话，要点为：一、中国决不倾向于轴心国家，中国当与民主国家共命运；二、就国共关系言，中国内部必须团结抗战到底，决不分裂；三、抗战后中国实行自由的民主新宪法；四、赞成多党制而不赞成一党制，因为多党制是目前最大多数民主国家所采用的。

△　应英国之邀，国民政府组成印缅马军事考察团，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团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为副团长，率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及陆、海、空人员10人，赴印度、缅甸、马来亚进行军事考察。双方拟定了中英合作的防御计划，由中国方面预备10个军的兵力随时开往缅甸，策应印度和马来亚。

△　周恩来找张冲交涉释放叶挺。

△　上海各界民众团体致电国、共两党领袖，称：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卫国卫民之功绩昭著，“纵有误会，亦不致以政治手腕解决之，何至兵戎相见，而诒同室操戈之讥”。

△　国民政府作出对四川省粮食问题的指示：一、由中国农民银行出资3000万元，交川省合作金库，向农村投资，以增农产；二、驻川军队用粮另设机构，各地驻军不得自行征购；三、购湘米七万石运川，以平抑米价；四、粮管人员如有不法情事，由军法处置。

△　何应钦前往滇边各地视察军事防务，为时半月余，并对各军将领面授作战机宜。

2月

2月1日　　豫南战场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第五十九军黄维纲部、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向泌阳、唐河等地发起进攻，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克复正阳镇。同日，第十三军亦发起反攻，克复独树镇等处。

△　豫南战场左翼保安砦日军陷方城，右翼日军自上蔡陷项城。

△　蒋介石电令陈大庆第二十九军速向信阳以南挺进，断敌交通，相机占领信阳。

△　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兼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孙良诚为副总司令；任命王懋功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毕泽宇为第六十九军军长，冷欣为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为第八十九军代理副军长。

△　军事委员会通告全国，各地公路之稽查警卫事项，自是日起统归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办理。

△　关于日蒋矛盾等问题，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是有的，国共由1月17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目前政治上我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估计此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才能完全到我手中。"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国际条件今年夏秋必有一个变化，明春又会有一个条件"。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我党对时局的方针的指示：日军乘蒋介石注全力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以东，正与汤恩伯主力激战。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以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

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

△　中共中央发出对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华中战略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巩固苏鲁基本根据地，待机向鄂、豫、陕及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

△　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各界万余人，举行反投降、反内战动员大会，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制造皖南事变的祸首、亲日派何应钦，会后举行盛大的抗议火炬游行。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全体将领致电中共中央及朱德、彭德怀，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请求驰赴华中或调处适当位置，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击破亲日派之毒辣阴谋，克服投降内战之危险。

△　重庆《新华日报》因屡遭国民党当局迫害，删扣稿件过多，从是日起改为日出两版一中张，至1942年2月1日恢复出报四版一大张。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浙江兰溪成立浙皖区办事处；并在西北增设宜川、绥德、宁夏等事务所。

△　广东新会日军一部在大横坝附近强行登陆，经该地第四战区所部突击，击沉日舰七艘，俘敌多人。

△　日军轰炸河南邓县，炸死民众21人，毁房屋百余间。

△　汪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会长，陈公博、温宗尧、陈群、陈璧君、徐良、诸青来、赵毓松等为常务理事，

周佛海任秘书长。

△　日内阁核准下届财政年度对华作战特别军费为48.8亿元，并公布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日对华特别军费总额达223.35亿元。

2月2日　　关于日军进攻态势及中共在政治、军事上的方针问题，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董必武等，指出：我们方针是：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12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

△　豫南日军向南撤退。第三师团主力由方城向南阳西窜，第十三军张雪中部迎击，克复舞阳、保安砦，旋向方城之敌后尾击；第十七师团主力及第十五师团、第四师团一部由舞阳经象河关向泌阳、唐河南窜，企图与由南阳东窜之敌会合，夹击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该敌军窜至象河关附近，被刘汝明部击退；窜至泌阳附近，又遭陈大庆部第二十九军痛击。

△　第五战区所部猛攻由上蔡窜入项城之敌，战至是日晚将敌击溃，残敌向西南溃退，项城遂告克复。

△　云南省主席龙云发表谈话，表示“日寇如扰滇，必不容其得逞”。

△　山西河津、万泉、猗氏等地日军千余分扰袁家庄、史家堰等地，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分途截击该敌，至3日，敌窜回万泉，伤亡200余人。

△　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之兵站、仓库、汽车队，是日起连续两天被国民党特务、宪兵抢劫，捕去队长、士兵及司机等13人。

△　英国援华总会为皖南事变致电蒋介石，称“本会坚主给新四军

以正当之待遇，和平解决一切冲突，俾能克服种种困难，而恢复各党各派间之一致合作”。

△　中印间开辟直达航空线，由重庆经腊戍、加尔各答至新德里。

2月3日　　豫南战场张雪中第十三军向方城日军猛烈追击，自午迄夜，克复方城。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凡26条。

△　皖北日军陷太和。7日，第一战区所部反攻，收复太和及界首镇。

△　第七战区一部潜入广州市中心区，向敌军部袭击，毙伤敌官兵百余名。

△　日军一部强行在广东西部海岸之北海、电白各处登陆。

△　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为该报接连被禁阅、禁贩、报贩被殴辱，报纸被没收、烧毁事，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重庆卫戍司令部表示严正抗议，要求“明令制止，依法保护，以维法纪”。

△　国民参政员胡石青在重庆北碚病逝。3月11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2月4日　　豫南日军陷南阳。黄维纲第五十九军转移于南阳西侧燎河西岸防御。同日，张雪中第十三军主力进出于方城，即向唐河及其以东地区追击；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向南阳南侧前进。

△　日军华南方面军为占领淡水一带，以切断由香港通向韶州的运输线，在第二分遣支舰队一部的协同下，以川口支队在大亚湾登

陆，奔袭占领淡水。这次作战日军完全封锁了大鹏湾及大亚湾。

△　新疆督办盛世才致电陈毅等，称此次皖南事变“诚属抗战中之晴天霹雳，凡属爱国同胞莫不惊诧痛愤”，并提出反对投降分裂，制止内战等七条共同奋斗。

△　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四名报童亦被殴捕。周恩来闻讯即夜邀张冲进行交涉，报童被释放。次日，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此非法行为表示严重抗议，要求“彻查、严惩凶犯，并保障该报发行”。

△　第七战区所部收复闽东平潭、南日两岛。

2月5日　　第七战区所部游击队在广东中山县附近大赤坎击落日巨型海军飞机一架，机内日海军大将、南洋联合舰队司令大角岑生、少将须贺彦次郎等10余人全部毙命，并检获其重要机密文件及图表。

△　豫南战场日军第三师团一部陷唐河。

△　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孔祥熙为副主任委员，黄炎培为秘书长，全体国民参政员、各省主席、各省、市参议会议长为委员，定于下月开始劝募民国二十九年军需公债法币12亿元、建设公债1000万英镑又5000万美元。

△　国民参政员陈嘉庚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全体参政员并转国民党中央，痛陈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恳切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

△　东方文化协会在重庆召开常务理事会，由会长于右任主持，决定聘请郭沫若、王芸生、朱世明、郭春涛为该会研究、宣传、联络、组织等委员会主任委员。

△　晨，著名戏剧家洪深忧时愤世在重庆寓所服毒自杀，遗书

称：“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郭沫若闻讯偕医师驰往急救，幸得脱险。

△　宋子文在纽约对芝加哥通讯社记者称：蒋介石与共产党间的不幸摩擦，将不致美国一般所料，引起内战。

△　汪伪政府新任驻日大使褚民谊抵东京，对记者称中日两国“犹如家人昆弟”，“始能共存共荣”。8日，向日皇呈递国书。

2月6日　　豫南战场张雪中第十三军克复南阳、源潭、唐河。第八十五军克复遂平。

△　宝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碚夏溪口成立，资本1000万元，总经理兰文彬。

△　四川省万源县县长邹明光购办军粮舞弊，是日被处以死刑。

△　美国政府派高思继任驻华大使。

2月7日　　豫南第五战区所部越唐河追击桐柏、泌阳方面日军，敌纷向南溃，遂克复驻马店、汝南。

△　罗斯福私人代表、美总统府行政主任居里抵重庆。下午谒蒋介石，并面交罗斯福盼国共合作函，内称：“希望双方能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并谓：“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

△　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张道藩任主任委员。

△　豫北博爱伪军梁明星部三个大队官兵1000余人反正。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奥尔森等致电蒋介石，称中国阋墙之争“使美国赞助者纷纷离去，吾人深信必须维持统一，始能击败日本侵略者，并维持美国之友谊”。

2月8日　　行政院经济会议正式成立，旨在强化战时经济体制，调整物价，稳定金融等。蒋介石兼主席，孔祥熙为副主席，贺耀组为秘书长。下设秘书室、政务组、粮食组、物资组、工资组、运输组、金融组、调查组、检查组、军事组。

△　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各地在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应要求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12项条件，平反皖南冤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死难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后数日内开会，兹决定缓开，待时局明朗后再通知开会。”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大会停开。

△　行政院根据蒙藏委员会杜镇远新拟建筑中印（即康印）公路计划书，由蒋廷黻主持召开审查会。16日，行政院批示蒙藏委员会对该计划“原则决定，一面踏勘，一面交涉”。

△　海外部长吴铁城去年9月奉命南行，历经菲律宾、荷印、马来亚、缅甸等百余埠，是日返抵重庆。

△　四川省警察局明令查封成都生活书店、《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书刊部及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

△　粤南第七战区所部克复淡水。

△　据中央社讯：大批日军最近由日本本土开到台湾、海南岛两地，兵力达三万之多，均携带远征之配备。另有日舰五艘现泊金兰湾外待命，为南进作准备。

2月9日　　行政院指令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规定9月6日为重庆陪都建立纪念日。

△　第五战区所部克复豫南确山县城。

△　第一战区所部克复皖北涡阳县城。

△　周恩来将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对国共双方提出的意见电告延安毛泽东。崔的意见是，对国民党：一、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二、要团结抗战；三、武器不好不能取胜的观点不对。斯大林认为，目前华军作战主要目的不在攻守坚固据点，而在集结10倍于敌的力量，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以孤立敌据点，华军目前应积极行动，使敌分散。对中共，革命军队愈积极行动，愈能发展；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并加以宣传；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也可向国民党要求补给。

△　日机44架分批轰炸昆明。

△　中国围棋会在重庆成立，陈立夫任理事长。

2月10日　　豫南会战结束。自2月7日起，豫南战场日军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中，乃以一部沿唐河、泌阳大道，主力沿桐柏、信阳大道，向信阳退却。我第八十五军向泌阳东南追击，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向信阳追击。是日，日军退回信阳，恢复战前态势，历时17日之豫南会战结束。

△　蒋介石接见居里，告以抗战目的第一为抵抗日寇，求取最后胜利；第二为阻止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三十年甘肃省建设公债条例》，凡11条，定额800万元，年息六厘，还期30年。

△　国民政府命令：驻巴西特命全权公使熊崇志免职；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谭绍华调任驻巴西特命全权公使，遗缺以程天固继任。

△　周恩来与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等在重庆玉皇观商量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周恩来说明中共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方针。沈钧儒等表示谅解，并且建议中共以12条作为出席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

△　台湾革命同盟在重庆成立，谢南光任主席。该同盟1930年10月由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青年革命党、国民革命党等团体组成，后被日本强行解散，盟员分散各地，从事秘密工作。该同盟于闽、浙分设南方、北方执行部。

△　第七战区一部袭击广东新会大小梅山之日军，另一部袭击江门北木郎马山，毙伤敌百余名。

2月11日　　湖北当阳日军一部9日分股向安远附近进犯，第五战区李宗仁所部与敌战至是日晨，将其击溃，残敌南窜，是役毙伤敌600余人。

△　日军陷广东芦苞。12日第七战区所部反攻，克复芦苞。

△　日伪军一部包围河北省青龙县大屯村，逐户搜查、杀人，仅五小时内，杀害村民187人，烧毁房屋535间，抢劫粮食30万斤。

△　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会桂林分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体日本人民武装起来，举起革命反战的火焰，以血肉去争取日本的自由与解放，建立平等的真正的东亚和平”。

△　桂林国民党军政机关查封桂林生活书店，并拘捕职员四人。新知书店及读书、生活出版社亦被迫停业。15日，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函请蒋介石“迅予撤销非法查封成都、桂林两地生活书店命令，准予继续营业，以利抗战”。

△　伪华北省、市长会议决定：一、立即由中日合名会社进行经济统制；二、各省、市在防共委员会下设守备所及反省院，进行思想统制。

2月12日　国民政府任命雷沛鸿为国立广西大学校长。

△　驻皖北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所部第二十一军袭击新四军彭雪枫部，图夺取彭部驻地涡阳、蒙城。

△　伪绥西自治联军王英所部第三师师长常子义率部反正。

△　美进出口银行负责人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称美国与中国订立合同，自中国购买6000万美元锡、锑、钨等矿产原料，用以偿还最近之5000万美元信用贷款，一俟定货交清，美方再付1000万美元。

△　美驻日大使馆及驻上海领事馆发出通告，劝在沪侨民撤退。

△　日伪军10余人闯入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市商会，欲掠夺该会文案，因工部局巡捕来到未逞。后该会迁香港办公。25日，该会主席王晓籁电上海商界郑重声明：伪商会一切言论行动无效。

2月13日　国民政府公布《户口普查条例》，凡25条。

△　中国驻土耳其国公使张彭春抵保加利亚京城索菲亚，调查轴心国家在巴尔干半岛之实力与影响。

△　第七战区一部向广东淡水、深圳之线日军发动攻势，是日克复横冈、龙冈。

△　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发出“和平通电”，并率所部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第十纵队共三万余人在苏北泰县投降伪军。汪精卫将该部改编第一集团军，任命李长江为总司令。18日，李在泰县就职，后配合日伪军向兴化、高邮、宝应一带新四军发起进攻。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梅思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缪斌为立法院副院长。

△　美国务卿赫尔向驻美大使胡适表示愿意向中国“贡献适当与切实的助力”。

2月14日　周恩来会见罗斯福代表居里，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周向居里提供若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

△　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电周恩来，指出：各次报告均悉。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于蒋不利，是他自己造成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策略中心。但熬过目前这一关，就好办了。蒋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在内外）。目前国共关系上的僵局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我之攻势（12条）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在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会破裂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合作，不会妨蒋抗日，只会逼蒋抗日，我们提出12条的目的，不在蒋承认12条或其中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此攻势打退他的攻势，用我们的政治进攻之手来缝好由于蒋介石进攻撕破的裂口。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蒋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　国民政府令：免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国立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本职。任命胡庶华为国立湖南大学校长。

△　第八战区傅作义所部击溃日伪军千余人的进攻，克复绥远包头南之新民堡。

△　重庆市政府及重庆卫戍司令部奉命疏散市区人口，疏散区定为涪陵、长寿、江津、合川、永川、綦江、璧山、垫江，限三个月疏散完毕。

△　据《中央日报》载：四川省政府拨款350万元，经营生产合作事业，以收容抗战军人家属。

△　美国红十字会捐助中国之各种医药用品，分装50辆卡车，由滇缅路运至中国内地。

△　日中国派遣军在南京召开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会议，根据《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制定了以“封锁”、“加强治安”、“空中进攻作战”、“实行截击作战”，作为各军作战的指导方针。

2月15日　中共七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关于皖南事变之善后处理办法12条，请政府采纳。18日，周恩来将七参政员公函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并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日，又将中共七参政员公函抄送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和国民参政员20余人。

△　晋冀豫区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等68人发表通电，要求严惩皖南事变的反共罪犯，铲除亲日分子，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　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隶属社会部，由三青团主办，中央党部政治部、中统局、军统局协助。会议通过该团组织大纲14条、训练纲要10条。

△　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蒋介石致词，提出国民党党政工作必须贯彻“计划、执行、考核”三联制，并指出目前考核的重点为新县制与党务。

△　日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其内容是：“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扩大、加强民众组织”；“治安军、警备队……单独或与日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条约内容。”

△　中、英等国驻罗马尼亚使馆人员鉴于欧战局势恶化，是日撤离罗境。

2月16日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会议通过大专学校规则、部聘教授要点及著作、发明、美术作品奖励规则等项。

△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成立，谷正纲任总队长。

△　闽东日军复陷南日岛。

2月17日　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全川各县办理粮食登记限期届满，声称如有故意延玩，不报请登记者，一经查出，决没收充公；匿粮者交军法审判；登记不力人员，亦予从严惩处。

△　国民政府撤销通缉高宗武令。按：高系汪伪国民党中常委，是年1月脱离汪伪集团，旋赴美国，化名高其昌，挂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密厅参事职。

△　全国慰劳总会发起的出钱劳军运动在重庆展开，至19日结束，各界献金共399万余元。

△　毛泽东、朱德等发出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

△　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数人，由延返渝途经陕西三原，被当地军政机关扣留车辆，捕去副官、司机五人。

△　缅甸政府发表缅甸代表团在华之商务谈判公报，双方商定：由缅方采取适应步骤改良公路；统制交通问题，中国方面接受缅方实行的固定运费及分派车辆制度；过境税问题，缅方认为现行按单抽收，并非不合理。双方还讨论了铁路接轨、电报、交通、边界等问题。

△　美国驻华北陆战队开始撤退。

△　上海美商花旗、大通银行以远东局势影响，美元下跌，法币上涨，是日取消支票存户，并限制提存。

2月18日　蒋介石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名义，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七周年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以戒除赌博、肃清烟毒、普及节约储蓄及推进卫生体育四者勖勉国人。

△　周恩来会见张冲，责以近月来政治压迫事件频仍，如逮捕报贩、恐吓读者、扣压邮件、封闭报馆、撕毁广告等。同日，周恩来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提出处理皖南事变的12条善后办法的公函送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12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国民参政会。

△　第五战区所部克复豫南明港。

△　新四军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指出李长江“率部投敌，叛国殃民”，新四军将士为坚持抗战，保卫苏北，决予讨伐，特任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

△　皖南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一部攻克泗县东之青阳镇，全歼守敌，俘伪团长以下500余人。同日，另一部攻克青阳镇西之马公店。

△　苏北日军4000余人以飞机助战，向兴化进犯，新四军一部分头截击该军，至次日将其击溃。

△　是日至28日，驻大同日军黑田师团包围山西应县下社镇和小石口村，残杀当地群众及外地商人1650人，烧毁房屋850余间。

△　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聘请青木一男为最高经济顾问，犬养健为顾问。

2月19日　国民政府明令废止《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和《禁毒治罪暂行条例》，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

△　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继续会谈。张冲要求周恩来收回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所提出的12条，以免蒋介石翻脸，并称蒋将约周谈话，均遭周严词拒绝。周恩来指出：现在政治压迫严重，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见蒋不会有结果。

△　居里由渝赴成都，张群盛会招待，居里即席表示："回国后必尽最大努力，以加强对华援助。"

△　第六战区陈诚所部江防守备部队袭击宜昌日军飞机场，毁敌机三架。

△　新四军粟裕部开始向李长江部发起总攻，是日攻克泰州东之姜堰、苏陈庄，歼灭丁聚堂、王孝孔部1300余人。20日，攻克泰州城，俘虏李部官兵5000余人，并争取两个支队反正，李长江率残部数百人西逃。21日，日军为援助李长江，以5000余日伪军向苏中发动"扫荡"，粟裕指挥所部退出泰州，投入反"扫荡"。

△　新任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接见记者，告本局业务"今后只专营棉花、棉纱、棉布购销供应等"，农贷部分移归中国农民银行，粮食部分移归粮食管理局。

2月20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电报说：昨日将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12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之参政员20余人，王世杰得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黄炎培、左舜生等访王世杰，亦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张冲从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张冲认为12条虽已提出一个月，尚非正式公文，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张仍请求以他名义代电延安，缓期两日提出。

△　全国粮食会议在重庆召开，粮食管理局局长卢作孚主持，通过粮食行政、运输、增产等议案63件。25日闭会。

△　中国空军一部轰炸广州天河机场，毁日机五架。

△　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电告蒋介石，新四军李先念部在荆门、钟祥地区日益活跃，而荆门、江陵、潜江三县指挥官王伯高部“剿共不力，隐忧堪虞”，请派凌总指挥查明，并派部队专任搜剿。

△　国民党广东党团、军警机关会同查封曲江生活书店、岭南书店、光明书店等，并责令《新华南》、《青年知识》两刊停刊。

2月21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记者称：“余可向君保证，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之关系，绝未提出要求和抗议”，并称苏联援华之物资“依旧充量运入”。

△　蒋介石分别急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密令其彻底“清剿”闽赣边境抗日游击队。

△　豫南第五战区所部攻克跑马岭日军据点，毙敌300余人。22日攻克长台关，毙敌200余人。

△　经济部以上海工商业备受日伪压迫，处境日艰，特发表通告予以慰勉，并劝内移。

△　南洋华侨领袖胡文虎返国抵渝，称此行任务是向蒋介石报告南侨状况，考察祖国建设，以便策动侨胞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增强抗战力量。

△　国民党贵阳党团、军警联合查封贵阳生活书店、读新书店和自力书店，并拘捕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经理周积涵等全体职员。同日，昆明党团、军警联合查封昆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西安军警查封新华日报社西安分社，拘捕营业员王温溪等数人。

△　日机51架袭击云南，被击落一架，坠安宁县境内。

△　滇缅路昆明至腊戍间开办逐日邮政。

△　美国驻天津部队部分撤退。

2月22日　　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在重庆成立，是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以70％以上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用在经济建设方面，并着眼国防，兼顾民生，制定经济建设的总方案，为国家树立永远的规模。

△　毛泽东将所起草的叶剑英致张冲电，发给周恩来转张冲。请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并望答复。重申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场，指出："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

△　周恩来就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劢拟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下设立特别委员会一事向黄说明：一、此委员会附属于参政会绝对不能接受；二、此委员会必须成为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既不属于参政会，也不属于政府，成为各党派的一种协议机关；三、最

好各党派出一人或二人，国民党不能太多，并不要军人，因此不要何应钦、白崇禧参加。

△ 豫北第一战区卫立煌部克复沁阳。

△ 日机轰炸滇缅路，个旧锡矿亦遭破坏。

△ 汪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成立，林柏生任理事长。同日，汪伪中央宣传部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军将广播事业权交给广播事业建设协会，并在经济与技术上对广播事业建设协会予以协助。

2月23日 蒋介石宴请国民参政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并允诺增加委员的人数，同时要张群、宋美龄做好中间党派的工作。

△ 经济部规定粮食、棉、铁、水泥、石油、化工等14种商品，不论何国何地，一律准予进口。

△ 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转告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以下各点：一、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命令”是国民党表示破裂的开始行动，我党七参政员公函，是我党企图挽救此种破裂的行动，因为现时挽救破裂，除请求国民党及参政会实行12条外，无其他办法。二、自1月25日将12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三、如国民党方面认可12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四、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速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否则一切欺骗之词，我们不能置信。

△ 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重庆开会追悼抗战后在秘密工作中殉难的陆玄南、张小通、陈文彬、朱玉清、陈觉吾。据大会筹备处公布，抗战以来各地党务工作者被日伪军杀害者共185人。

△　第五战区所部秘密潜入武昌，焚毁伪湖北保安队、日军兵站仓库，库存军械、粮饷、被服约值100万元，均付之一炬。

△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成立，田中实任支部长，东忠任副支部长兼宣传部长，成员共16人。

△　汪伪政府财政部令上海租界各银行、钱庄一律不得拒用中央储备券。如有拒绝收受或其他不利于新法币情况，将以扰乱金融论罪。

2月24日　蒋介石在全国粮食会议发表讲演，认为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并指出目前粮食问题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今后应使粮食不分地区自由流通，盈虚相济。

△　中共中央就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条件指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其条件为：一、名为各党派委员会；二、在国民参政会之外；三、各党派有平等权利，每党派代表一人；四、为民主的讨论建议机关，非权力机关；五、讨论抗战建国的大政方针，向国家民意机关及政府建议；六、保证各党派独立性，不得干涉各党派内部事务；七、党派委员会应讨论调整各党派间争议问题，但非取得各该党同意不发生效力。并指示他们绝对不能同意蒋介石组织的特别委员会。

△　国民政府令改陕西省宁羌县为宁强县。

△　中央社讯：安徽省怀远县长李大昶，当敌进犯该县时擅离职守，省府以其违法失职交军法讯办。

△　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决议通过《调整物资统制一般原则》及《调整物资统制纲要（草案）》，规定日方将物资编制权全部移交汪伪，与军事上确有特殊关系者，另行协议处理，先以苏、浙、皖三省为试办区，渐次遍及全部管辖区。

2月25日　周恩来会见张冲，张冲再三要求周恩来将中共参政员

公函收回，以便蒋介石能见周恩来。周恩来说，在新四军事变后，国民党对中共继续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的可能。七参政员的公函不能撤回，目前见蒋无意，不会有结果。于是，张冲又提出了三点具体解决意见：一、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的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游击队全部留在华中，配合友军作战。另外还给一军，补新四军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边区及晋察冀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讨论党派问题，以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他请周恩来电告延安请示。周恩来答复说，不拒绝谈判，具体条件可以电告延安，但致参政会公函绝不能撤回，见蒋介石更无必要。张冲最后要求中共参政员考虑出席本届参政会，并望次日早上答复他。

△　救国会负责人邹韬奋愤于国民党查封其经营16年的生活书店及分店50余处，乘夜秘密离渝赴香港，并致函国民政府，决然辞去国民参政员。

△　国民政府以浙江省杭县县长陈纯白“守土抗战，著有功绩”，“尽忠职守，深堪嘉尚”，予以明令晋级嘉奖。

△　鲁苏战区韩德勤所部孙大尉率部500余人投敌。

△　汪伪政府首任驻伪满洲国大使廉隅向溥仪呈递国书。

2月26日　蒋介石接见居里话别，并提出中国在美购买飞机及补充器材办法之“备忘录”，请其转交罗斯福。次日，居里离渝返美。居里在渝期间，曾向蒋介石转达美国政府之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第二十九军军长，王廷瑛为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指示：一、非12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12条及一切悬案；（丙）派飞机送恩来回延安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　周恩来约见张冲，并把中共中央26日的电报和叶剑英23日致张冲的电报给张冲看。张冲看后说，电中所提等于破裂。周恩来当即指出："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故提出十二条。"随即周恩来与张冲围绕中国共产党所作的答复意见进行商谈。张冲又谈到具体条件问题。周恩来说："中央要我回去讨论。"张冲说："你如回去，他们（指国民党）又要说你们破裂了。"周恩来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张冲说："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可出席参政会？"周恩来说："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张冲说："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周恩来立刻回答："我本准备在此待捕的。"张冲又说："即使董（必武）、邓（颖超）只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说："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并再次坚决地告诉他："出席是不可能的。"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将领聂荣臻、杨成武等发表通电，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表示愿与一切抗日党派、友军合作，扩大抗日派。

△　重庆各界开会欢迎南侨领袖胡文虎、邝炳舜、李星卫，胡文虎即席宣布以200万元捐献国家，救济难民、难童、伤兵及抗战殉国者之遗族。

△　日机34架两批空袭云南，在昆明及郊县投弹，并散发传单。

△　日军大本营鉴于大量援华物资由沿海进入中国境内，下达封锁沿海的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应对福建省以南的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根据此令，日军从2月至5月调集七个师团的兵力，在华进行了香港、韶关公路的切断作战、雷州方面的切断作战和汕尾方面的切断作战。

2月27日　　蒋介石约黄炎培、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沈钧儒、张澜等六位中间党派人士参政员，晤谈关于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本届参政会问题。张澜等六人提出四点建议：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议之实行；四、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以上各项之执行。蒋介石原则表示同意。经商定：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本届参政会；中共要求各点由参政会组织特别委员会商讨解决办法。同日黄炎培等见周恩来，转达与蒋介石会谈经过情形及意见，希望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他们表示，只要中共出席，蒋介石若再失信哄骗，我们大家共进退。周恩来、董必武向他们说明了蒋的政策和共产党的立场，表示不能出席参政会，并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

△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为冻结中国在美私人之存款请予以协助。

△　行政院令各省、市政府设立省、市、县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处，并颁发《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组织通则》，凡10条和《县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组织通则》，凡六条。

△　周恩来会见在陈纳德航空队任职的巴尼特，向他揭露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等情况。

△　鲁苏战区第一游击区总指挥韩德勤乘日伪军"扫荡"新四军之

际，以三个团的兵力进占盐城以西之洪家桥、蒋营、凤谷村等地。

2月28日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三十年建设公债条例》和《民国三十年军需公债条例》，定额国币各12亿元，年息六厘，自民国三十二年（1943）起还本，27年还清。

△　国民党中央召集国民党方面参政员开会，提出主席团候选人为蒋介石、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周恩来五人，如中共不出席，改为吴贻芳。

△　张冲奉蒋介石之命，敦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国民参政会。董、邓表示：国民党方面未能接纳中共提出的12条办法之前，拒绝出席。

△　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向张冲提出临时办法12条，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先决条件，12条办法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周恩来及时向张冲提出上述12条临时解决办法，被国民党拒绝。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将领陈光、罗荣桓等发表通电，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誓为新四军后盾，以全力克服投降内战危机”。

△　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梁漱溟再见蒋介石，提出可否让中共参政员参加参政会主席团，蒋称：“假使中共参政员如期出席，

政府和参政会一定不会歧视。”黄等再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希望中共代表出席本届国民参政会。周等表示：只要国民党不接受中共提出的12条，就决不出席。

△　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中共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应以讨论各党派关系（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该委员会不隶属于参政会。我党参加该委员会，但在12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　据中央社讯：河南省泌阳县县长袁景闳抗敌殉职，国民政府除发给恤金3000元外，并于该县建坊入祠，以彰忠烈。

△　甘肃省临夏县马步青捐资140万元兴学，国民政府是日明令嘉奖。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委任令，委任新四军所属各师军政负责人：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萧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　第十八集团军驻桂办事处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撤销。

△　英国援华委员会开会，讨论远东紧张局势下中国所处之重要地位，“切望中国团结抗日，直至获得完全胜利及巩固的独立”。

2月下旬　　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制定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决定除对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尽量以大的兵力进行作战

外，“主要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为实现这一计划，将辖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要求各部巩固和扩大“治安区”，压缩“准治安区”，有计划地讨伐“未治安区”。

是月　　国民政府自民国二十八年9月推行新县制以来，迄是月全国实行者有四川、青海、浙江、广西、河南、云南、湖北、广东、福建、陕西、甘肃、湖南、江西、宁夏、贵州、西康、安徽、江苏、山东19省。

△　监察院以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已将届满，派监察委员分别到各地视察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教育、侨务等项要政。

△　居里在重庆公开讲演，认为“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民主，方能战胜日本”，并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

△　重庆新华日报社昆明、贵阳、遵义、柳州、南宁、思平、开平、都安、宜山、陆川、庆远、荣昌、内江、南充、北碚、邻水、广安、合川等十余处代销处被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查封。

△　国民党特务机关制定本年度党派行动工作计划，要点为：一、监视各地高级共产党员，秘密进行侦察与打击；二、如发现共产党之市委、省委、县委或团体中共产党党团等组织，均予取缔。同时，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密令各地对中共改称“奸党”，取消“异党”名称。

3月

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出席参政员张君劢、黄炎培、孔庚、张澜、褚辅成、沈钧儒、张奚若、梁漱溟

等193人。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均未出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训词，勖勉参政员“竭尽所知，贡献政府，宣达政府意旨于全国民众”。蒋介石致词，宣称“吾人今日努力之目标有二：抗战必须争取最后胜利，建国必须达到国防绝对安全”。

△　蒋介石派出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赴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敦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国民参政会，董、邓表示：延安无回电，不便自由行动。

△　周恩来同张冲谈判。周根据中共中央2月28日指示，向张冲提出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12条，并表示“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

△　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参政会，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告诉国民党及各爱国党派，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在有结果、有明确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

△　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选举结束，选出彭真、聂荣臻、萧克、李运昌、张明远等35人为参议员。

△　晋东南高平等地日军2000余人分途向四明山、西诗村进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分途迎敌，迄晚毙伤敌200余人。

△　郭沫若等人主办的桂林《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桂林党政机关强制停刊。

△　日政府任命前陆相畑俊六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原任西尾寿造调任军事参谋官。8日，畑俊六抵南京就职。

3月2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前举行预备会，选举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吴贻芳五人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推定张伯苓为主席。旋由外交部长王宠惠、经济

部长翁文灏报告外交、经济等政情。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国民参政会。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电文指出：我们不出席，完全是理直气壮的，而蒋介石亦无可奈何。因为：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们不出席表示抗议，并未错；二、我们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四、国际形势于彼不利之时；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们绝无办法，我方毫无所惧。

△ 周恩来致函张冲，托张将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12条转交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公函说，如果国民党接受12条，必武、颖超即可出席本届参政会。

△ 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上书蒋介石，陈述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称："现在共产党问题解决之棘手，大半由于若干同志不具远大的眼光，甚至缺乏体认此问题之常识，始终为一种错误之冲动所支配"，并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蒋介石未予采纳。

△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合致函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罗隆基、张澜等16人，说明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已交原定的12条善后办法改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只要实行这个12条有了明确保证，董必武、邓颖超必能出席参政会。

△ 国民参政员、南侨领袖胡文虎离渝赴港。

△ 日军一部在广西南部之北海市强行登陆，北海失陷。

△　美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发起在全国募款500万元，以协助中国境内救济事宜，定期五个月募毕，赞助者有罗斯福总统夫人、共和党要人威尔基、名作家赛珍珠等。

3月3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由教育部长陈立夫、社会部长谷正纲、交通部长张嘉璈、农林部长陈济棠、内政部长周钟岳分别报告各部政情。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以书面陈述。大会决议组织物价问题审查委员会审议物价，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及各组召集人名单，并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之指示。

△　国民政府绥蒙副指导长官朱绶光以“争取蒙胞内向”为由，组成绥蒙服务团，任赵曾祺为主任。

△　日军在海空军掩护下，分别在广东阳江、电白等处强行登陆，阳江、电白相继沦陷。同日，日军另一部由台山西南广海登陆，向台山进犯。8日，被迫撤退。

△　日第三十五师团一部及伪军共1000人“扫荡”冀鲁豫边区濮阳东南地区，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沙固堆毙伤敌伪60余人。

△　日机30架袭长沙。同日，又有54架两批轰炸江西上饶，九架轰炸浙江衢县、江山县。

△　日机27架轰炸江西弋阳，投弹百余枚，炸死炸伤300余人。同日，又有27架轰炸江西南城，炸死炸伤千余人，炸毁房屋百余间。

△　日华南方面军决定与海军协同组成六个支队，攻占雷州半岛方面各要地，掠取物资，彻底摧毁补给路线。

3月4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首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军事及皖南事变，宣称“军令一经颁布，即属绝对尊严，不容丝毫侵犯”。继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财政金融及施政方

针。大会通过慰劳前方将士暨各战区及东四省同胞电。

△　蒋介石向国民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训话称：一、国共总要分裂，不必惧怕；二、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唯政治上尚不许可；三、目前是政治防御。

△　蒋介石为战时公债劝募运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希全国各界同胞“按各人的经济情形，量力认购公债”，共同促成抗战建国的成功。同日，蒋介石、孔祥熙设宴招待国民参政员及全国劝募委员会全体委员，蒋介石即席表示购买公债一万元，美金公债1000元，英镑公债500镑。黄炎培报告称，胡文虎先生已认购公债50万元。

△　美联邦社会保安局长麦克纳特在华盛顿演说，称：日本如在远东获胜，美国所需之大批橡胶、钨、锡等则俱受威胁，如果中国继续抗战，美国之利益即可得以保障。因此，吾人自有援助中国与加强中国之义务。

3月5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各组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提案。本届大会共有提案149项。是日议决通过厉行优待从征军人家属、废止兵役纳金缓役办法、请中央严厉监督并限制地方发行公债钞票等案23项。

△　蒋介石设晚宴招待国民参政员，致词称中国力能自立，最艰危的去年业已过去。

△　沈钧儒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保障文化出版事业案》，指出：近年以来违法封闭书店，检扣书报等事层见迭出，甚至扣捕人员，没收财产，不仅违背国家根本大法，抑且逾越普通法律范围。提案要求通令全国重申保障文化出版机关，维护合法商业，不得非法查封书店或拘捕人员，如仍有不经法定手续滥施封闭、拘捕者，应予惩处；并要求令饬各地开释在押人员，启封已闭书店，发还没收财产。

△　伪绥西自治联军第二师邬青云部2000人反正。

△　日军陷广东台山县城。

△　日机分批空袭湖南，一架在长沙市区、九架在城北投弹，八架在常德投弹。

△　日本对满事务局发表公告，1940年度日本对“满”投资总额为10.1亿余日元。

3月6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经济部长翁文灏、全国粮食管理局长卢作孚报告平抑物价及管理粮食之政策，继讨论通过王云五等参政员提出的请大会促中共参政员出席大会临时动议案，并决议：一、参政会“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二、切盼中共参政员出席大会。同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致电中共七参政员，盼早日出席大会。

△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上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大会事，说明政府之意见与方针，称：中共先后两次提出的12条办法，与七七事变前“日本军阀对国民政府与当地驻军所提出的条件，在方式与名称上并无二致”；比日本提出的“三原则”“更令人悲痛伤心”。希中共服从军令，遵守《抗战建国纲领》，对抗命乱纪必加制裁。继称：今后“决不忍再见所谓‘铲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同日，大会根据何应钦4日之报告，通过《严厉整肃军纪决议案》。

△　蒋介石设午宴招待美国华侨参政员邝炳舜等，邝炳舜代表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向蒋介石呈献慰劳祖国将士国币10万元，医院解剖仪器10副，价值国币15万元，均请蒋介石分发。

△　立法院长孙科告合众社记者：在过去数月中，“苏联物资援华较前更为积极。中国最近一次所订购之军事用品，其数量已较中国以

前从美国获得者为多”。又称：如欲消灭日本海军，或使其中立化，“则有赖于美国参战”；“中国决意继续作战”。

△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培璜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刘奉滨为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　行政院令各省、市政府称：今后各省、市财力充裕，应竭力发展中小学，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置，须有充裕之经费，充实之设备，优良之教授，及健全之组织，并由教育部统筹办理。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居里要求中国与苏联疏远，但与中共维持关系，不要破裂到内战。居里来华的任务是调查经济状况，确定可否投资；调查政治是否民主和军事实力；要在中国建立空军根据地；要求战后割让海南岛。国民党原则同意以贷款交换。

△　宜昌日军欲取长阳、三斗坪两要点，切断川鄂交通，第十三师团新增三个联队，附骑兵、炮兵各一部，炮击西岸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防地，步兵在空军配合下向萧军阵地进攻，萧军后撤，以主力向敌之两外翼转进。

△　日军对山东沂蒙山区开始“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反击，于3月17日至25日摧毁了敌人在临（沂）、费（县）以北地区设的三道封锁线，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3月7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第七次会议，议决通过改善役政及慰勉海外侨胞等案，并推定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决定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及各办事处继续设置。

△　行政院拨款100万元，救济迁川之复旦、金陵、朝阳、南开等51所私立大、中学校。

△　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理事会，推选翁文灏为理事长。

△　日本在北平设立华北垦业公司，策划掠夺中国劳动力和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

3月8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厉行法治以奠国基，改善灾民救济事业，政府应注意法律教育等50余项议案。

△　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函复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全体参政员，重申不能出席会议之理由，指出："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的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重变，其对于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并指出在中共提出善后办法12条后，"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

△　第七战区所部克复广东电白、水燕，另一部克复阳江。

△　桂南第四战区张发奎所部7日向高坎头日军发动攻击，战至是日续克高德及合浦县城。9日克复北海市。

△　中国空军新式巨型轰炸机一队轰炸海南岛榆林港日舰。

△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康省政府为合力开发西康资源，特设立西康经济研究所，由周太玄任所长，所址设成都。

3月9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第九、第十次会议，通过政府交议的民国三十年度施政方针及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农林、教育各部报告之审查意见和物价、教育等问题议案。推定褚辅成、孔庚、喜饶嘉措、陈博生、黄炎培、林虎、李中襄、邓飞黄、许孝炎、范予遂、江一平、冷遹、杭立武、王启江、童冠贤、李璜、李仙根、刘哲、傅斯年、沈钧儒、梁漱溟、董必武、梁实秋、张澜、高

惜冰25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最后通过大会宣言。

△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通过参政员张守约等提出的《统一军令、政令，以利抗战》议案，要点为：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所属部队，应遵照政府规定编制，绝对服从军令，切实对敌作战。二、全国军队应在最高统帅指挥下层层节制，不得借故玩视命令及有越级行为。三、部队应严守规定之作战区域，不得自由行动。四、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边区等非法组织，应立即取消，以完成统一。五、军人非依法令不得干预政治，违者以军法从事。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七参政员事件》，指出：即使七参政员始终不出席参政会，“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至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这是我们可以安心的”。

△　宜昌西犯日军连日发动攻势，攻至韩家坝、红石坡、王胡子冲、平善坝附近之线。翌日，援军赶到，萧之楚第二十六军开始反攻，以主力南北夹击，又以两军断其后路。11日，敌伤亡惨重，开始溃退，萧军克复大桥边等地。13日，日军分别退回宜昌岸边原阵地据守。

△　日机12架分批袭滇，在安宁县城郊投弹10余枚。同日，日机四架轰炸江西鄱阳。

△　国民政府上海造币厂大、中宗铜模、铜块悉被日本人劫走，价值约4000万元。

△　陕北文化界主办之《陕北文化》创刊。

3月10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举行休会式。此次参政会共举行会议10余次，通过决议案150余项。蒋介石致休会词，强调“贯彻军令，整肃军纪”；呼吁国民参政员“与政府当局亲爱精诚，和衷共济”，“完成本会所负之历史使命”。大会主席张伯苓宣读大会宣言。

△　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增刊，全文刊登《毛泽东等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周恩来致张冲公函》、《周、董、邓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致中共七参政员急电》、《中共七参政员复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齐电》和《最近军事政治压迫事件》等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全部文献。

△　第七战区所部克复广东台山、海康县城。

△　第九战区薛岳所部克复赣北武宁县城。

△　罗斯福发表演说，宣布美已以军火援助反轴心国家，中国亦可获得援助。

△　据中央社讯：英国援华总会开办新中国研究班第一期，学员300人，研究内容为中国地理、历史、文化、外交；争取独立与抗战建国；中国将来在世界之地位。

3月上旬　交通部开放渝康、渝兰、渝桂无线电话。

△　行政院鉴于迁川各私立大中学校教员、学生生活艰苦，特饬拨发国币100万元，专充救济费用。

3月**11**日　国民政府以前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周天放“精研教育”，“劳绩卓著”，是日特予明令褒扬。

△　罗斯福签署《军火租借法案》，并咨请国会拨款70亿元，以加强援助民主国家。19日，国会通过此案。

△　居里返抵华盛顿，并向罗斯福递交蒋介石之亲笔信函及有关报告。是日罗斯福对记者称：居里携回之报告，“对于援华前途有重大影响，美拟依照《军火租借法案》规定援助中国”。14日又表示“援华计划圆满进行中”。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发布《关于实施强化治安的训令》，并制定《强化治安运动之实施及宣传计划》。

△　日本将在江、浙地区接管的苏纶纺纱厂、大隆制造机器公司、丽新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丽华机器染织股份有限公司、镇江贻成新记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水泥公司移交给汪伪工商部上海办事处。

3月12日　　蒋介石为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两周年，发表广播讲演，宣称“社会纪律化，就是要达到社会军事化”；“国防科学化，就是要达到国家生产化”；“国民生活现代化，就是要使国民生活艺术化”。

△　全国农林行政会议在重庆召开，18日闭会，通过农林部三年施政计划纲领、调整农林行政机构等提案百余件；定2月5日为农民节。

△　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克复晋东南陵川县城。

△　中山学社举行年会，到会孙科、陈立夫、梁寒操等百余人。会议致电中共七参政员，宣称抗战建国“必须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下，协力以赴，始能有成”，敦促中共悔过推诚，与中国国民党共赴抗战建国之大业。

△　国民党中央《中央周刊》改由陶百川主编，叶青、郑学稼、陈西滢、梁实秋等为编辑委员。

△　中英合作发展公司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该公司改名为中英发展公司，会上各英国董事保证赞助援华。

△　日中型运输舰一艘载士兵500余人，于长江东流江面触雷，旋即沉没，敌兵几全数溺毙。

3月13日　　滇缅公路督办曾养甫呈函蒋介石，报告与英大使馆贺

尔弼滋专家约谈建筑滇缅铁路问题，略谓：据贺尔弼滋表示，英国政府已决定拨款200万镑即日兴工，修筑缅境腊戍至边界一段，希望中国同时并进，早日筑通；我国修筑滇缅铁路国外材料用款约需美金1500万元，拟请向美国商借。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鄂南通城。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安徽无为。

△　第三战区江防流动炮队在安徽安庆东南新河口江面击沉日舰一艘。

△　是日至15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举行年会，院长朱家骅报告一年来工作及研究计划，通过设置数学研究所等决议案。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妨害新法币治罪条例》，凡八条，并决定将南京、上海、汉口三市改为行政院特别直辖市。

△　据重庆《大公报》载：赣北伪军第一清乡副司令许通率部700余人反正，第九战区业予收编。

3月14日　日军发动上高会战。日第十一军为打击第九战区薛岳部赣西方面主力，兵分三路向上高地区发动进攻。其北路为第三十三师团，由樱井指挥，自安义向奉新、棠浦进攻；其中路为第三十四师团，由大贺指挥，自南昌以西的万寿宫附近，沿锦江北岸向高安、上高进攻；其南路为第二十独立旅团，自锦江、赣江合流处的夏口南渡锦江，向灰埠方向进犯。

△　蒋介石约周恩来会谈，宋美龄也在座。蒋表示现在情形缓和了，可以谈谈，并要周恩来打电报给延安，问中共中央最近的意见。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事件和2月份各种压迫事件，要求按中共所提12条解决。蒋对新四军事件，置而不答，对压迫事件，则把责任推给下边。周恩来又提到防地、扩军问题时，蒋对防地不答，但也未再提开

往河北一事，只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办。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最后蒋介石约周恩来下星期再见，宋美龄还说要请吃饭。15日，周恩来将会见蒋介石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指出，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表面上采取和缓的姿态而实际上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解决时一起解决。毛泽东次日电复："（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　蒋介石手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即日开始疏散重庆市民，拨款100万元，分配无力疏散民众。该部是日开会，决定从15日起，全市及江北总动员，开展扩大疏散宣传，并组织访问队、劝导队，沿家劝导。

△　毛泽东电复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表示对美洲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并请司徒美堂对中共提出的"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予以赞助。

△　香港各界400余人为皖南事变联合致电林森、蒋介石，指出"国人鉴于十年阋墙之争，友邦有暂缓援华之议，危机四伏，间不容缓"，要求"明令凡属抗战部队，俱应加以保护"，毅然制止内战。

△　日机31架轰炸成都，中国空军出动飞机30架与敌在崇庆、双流上空激战，击落日机六架。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等四人殉国。

3月15日　上高战场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自安义沿潦河进攻第九战区第七十军李觉部防地；其另一股由左家、宋埠进抵赤田张、儒里温村，遭第九战区预九师一部迎击；终因敌大量增兵，奉新陷落。日军复强渡潦河，午夜突入东坪、棺材山地区。同日，日军独立第二十旅

团突破锦江南岸，进至奉新，直向猪头山进攻；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破祥符观阵地，向高安地区进犯。

△　第七战区所部克复广东广海。

△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川康建设期成会组成，会长蒋介石。会员有张伯苓、张澜、周道刚、吴玉章等34人。

△　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成立，推选萧同兹、陈博生、彭革陈、曹谷冰等19人为理事，潘公展、张季鸾、王芸生、董显光、程沧波等11人为监事，潘公展任主席。大会通过宣言及议案多项。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电蒋介石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区办事处在皖南泾县茂林村设立泾太事务所，主任蒋传源确系共党重要分子。另泾县、太平两县所设各种工业合作社10余所，均为共党分子所主持。请速饬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将皖南事务所及其以下各机构一律予以彻底改组，免滋隐患。

△　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呼吁奉行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加强国内团结，坚持抗战主张”。

△　罗斯福在白宫发表演说，称：“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民，在抗拒中国被敌人宰割中显示出同样伟大坚强的意志。中国通过蒋介石委员长要求我们提供帮助，美国已经答复，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得到我们的帮助。”18日，蒋介石电谢罗斯福重申援华，并“保证中国继续作战至胜利”。

3月16日　日第三十三师团突破第七十军李觉部阵地后西犯。一部在尧峰岭附近渡过锦江。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令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迅速占领第二线阵地，与敌决战。王耀武奉命后，令第五十一师李天霞部向高安独城推进；令李天霞师另一部主力向泰和圩待命；令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第五十八师廖龄奇部占领石头街、泗

溪、官桥、棠浦阵地，并以各一部占领杨公圩、村前街阵地，拒敌前进。

3月17日　上高会战战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得悉日军已分股进至南山河、村前街及高安城北火埭上附近后，令第七十军作离心退却，陷敌分离后对敌反击，并由抚河东岸抽调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王克俊部兼程西进，集中樟树镇，以侧击敌人。

△　关于日苏订立条约对国共关系的影响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急于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共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3月18日　蒋介石接见合众社记者，宣称中国如能获得美国充足之物质援助，“即能单独与日本相周旋”，亦可解除太平洋之国际紧张，甚至使欧洲早获和平。

△　行政院、内政部、县政计划委员会以新县制虽已令四川、云南等19省、市分区分期施行，但未能实际推进，特组织新县制视察团，以资促进，首由四川开始，再转各省。

△　上高会战战场日第三十三师团攻占赣西上官，后又开始后撤。第三十四师团攻占高安，并向官桥、泗溪进犯，另一部向樟树、泉港进攻，均遭到第九战区所部第七十军、第四十九军奋力抵抗。同日，日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占领灰埠，沿锦江南进，改编为赣江支队。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党内指示，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同时提醒“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绝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

△　夜，湖北沙市大火，至晨未息，日军重要军火、粮秣仓库多被焚毁。

3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员左舜生等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开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会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会议推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13人为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常务委员。推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不久，由张澜继任主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凡12条，主要有：贯彻抗日主张，争取国家之独立自由，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制，迈进于宪政之途程；反对一切暴力斗争与破坏行动；加紧经济建设；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反对一党垄断等。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良诚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　上高会战战场日军赣江支队先头部队一部偷渡赣江，企图进犯樟树镇，在新市街遭中国守军王克俊师痛击，被歼过半，残敌仓皇落水，退守江心沙滩。泉港敌人派部增援，轮船又被击沉，敌人尸体顺江东下，余敌向曲江镇方向退却。同日，日军赣江支队主力企图攻下清江，截断中国守军赣江两岸联络。王克俊师一部由樟树迅速渡过赣江，在张家山、崇祯观、蜀家埂附近猛击敌军，敌退守曲水桥以北，续向曲江方面转移。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第七十军李觉部初期作战不力，令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饬其“努力达成新任务，将功补过；倘仍畏缩不前，贻误战机，定按律论处”。同时又令罗卓英严令第二十六师、第七十、第七十四军将深入扰乱之敌，歼灭于高安间锦江南北地

区。

△　顾祝同密电何应钦，报告其部袭击江南新四军的反共办法：一、忠义军全部开入第一、二两游击区，分成四个挺进纵队分途清剿，并设法截断扬中交通线，该军仍旧归上官（云相）兼总指挥；二、苏嘉沪挺进纵队归陶总指挥指挥；三、有关党、政、军机关加紧联系防止共党活动，并堵截散匪窜扰；四、闽浙赣边区绥靖指挥官积极清剿，依限肃清；五、迅即充实改组战地各县党部下级机构并由军政方面协助之。

△　驻英大使郭泰祺在英费边社讲演，称军委会撤销新四军番号“乃军纪问题，不关政治及党派”，“深信中国共产党必能团结以御侮”，并称：中国决与友邦“合作抗拒暴力，直至最后胜利”。

△　邹韬奋主编之《全民抗战》被迫停刊。该刊共出版157期。

△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同日下午，工部局工业处出面调解，劳资双方各派代表进行谈判。结果，双方同意从4月份提高米贴，并于每月19日发给。当晚工人复工。同日，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工人，因资方四次拒绝改善待遇要求，举行罢工。20日，车务部工人全体响应，一律停工。23日，资方向工人保证：增加津贴；罢工期间工资照发；释放罢工被捕工人。26日，工人复工。

△　日陆相东条英机抵北平。20日，与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会谈后，飞往张家口、大同、太原。24日由青岛返日。

3月20日　　薛岳致电罗卓英，令第五十七、第五十八两师务遵照计划确保原阵地，积极向当面之敌猛烈攻击，确保上高、宜丰战略要地，其余各部队遵照既定计划，速向高安、上高间锦江南北岸地区彻底围歼向我扰乱之敌。

△　日第三十四师团以大炮10余门、飞机30余架集中轰击泗水两岸守军第七十四军阵地，并乘机分由埒口、港西罗强渡，被第五十八师廖龄奇部阻击，激战至夜，塘坎附近阵地被突破，廖部主力于21日夜转移于白茅山、樟树镇、荷舍之线，与第五十七师共同确保上高。

△　第八战区傅作义所部克复绥西新城。

△　日第十五师团一部由苏南溧阳上兴埠东犯，在溧西青龙山附近与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激战。22日陷溧阳，并南犯戴埠；23日顾部向敌后袭击，日军乃回向张渚、溧阳逃窜。25日，我军克复张渚、溧阳。

△　日第二十二师团一部附骑兵100余，野炮四门由浙江长兴西犯泗安，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在泗安东山地激战。22日，陷泗安。23日，顾部反攻，收复泗安，残敌北窜合溪。

△　叙昆铁路昆明至曲靖段通车。

△　据中央社讯：前鄂豫边区游击纵队指挥官兼枣阳县长郭雪萍贪污被控，畏罪潜逃，1月12日在蓉捕获，已在河南漯河枪决。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从3月30日起至4月3日止，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

△　伪满洲国建立经济顾问制。“满铁”总裁、日本人大村卓一兼任伪满洲国经济顾问。

3月中旬　　日军犯广东台山、开平、新会等县，灾民盈千万，赈济委员会特拨款100万元赈济，并派员会同粤省府施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省府主席李汉魂亦派员携款慰问台山等县抗日军民。

△　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路总指挥杨仲华率部投敌。6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绥靖司令。

3月21日　蒋介石召孔祥熙、卢作孚、陈伯庄、顾翊群讨论经济问题，蒋称："米粮如不出售，则限制供给食盐。人民获得食盐，遂不得不尽量抛售其食粮。"并称：对粮商"可采取引岸制，由政府发给商家执照，规定其向某特定之产粮区购运"，"如有囤积不售者，予以取缔"。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拟定本会规则12条，规定该会的任务为：听取政府各种报告；促进业经成立决议案之实施，并随时考核其实施之状况；在不违反大会议案之范围内，得随时执行本会建议权暨调查权。在实施工作任务中，分军事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内政及教育文化四组进行。

△　薛岳、罗卓英联名发出电令，变更战斗部署：锦江南岸采取攻势，北岸采取守势，以确保上高为主。同日，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即令所部第五十一师向猪头山、鸡公岭当面之敌攻击；第五十七师仍守索子山、云头山、原山庙阵地；第五十八师改守红家垅、荷舍之线。

△　据重庆《大公报》讯：中央设计局受命编制战时党政三年计划及战后五年建设计划，备提中央讨论决定。

△　日伪宪兵武装冲击上海中央、农民银行，打死行员四人，六人受伤，掳去多人。24日，日伪宪兵继续武装冲击上海中央、农民、交通三银行及其分行、支行，死伤行员60余人。中央、农民两银行宣布暂停营业。

3月22日　上高会战战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上高地区守军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阵地猛攻，中国军队"拼死力拒，虽然血肉纷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4000人以上。为增强第一线兵力，当日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特务营奉命开赴第七十四军阵地参战。

△　日军一部陷苏南溧阳县城。25日，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反攻，克复溧阳。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在山东纵队配合下，进行青口（苏北赣榆东南）战役。经四天战斗，攻克青口外围八个日伪据点，并一度攻入青口镇，歼日伪千余人，打通了滨海区从海上与华中及胶东等地的联系。

△　汪精卫接见记者，发表题为《今后施政方针》的谈话，强调履行条约，而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是今后努力之所在。

△　汪伪警政部软禁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128人，并宣布国民党如在上海停止暗杀活动，即可恢复被捕者的自由。

3月23日　上高会战战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主力约6000余再次进犯聂家、下陂桥、徐楼一线中国守军主阵地。日军师团长大贺坐镇毕家指挥，意在必得上高。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所部第五十七、第五十八两师集中迫击炮轰击，日军受创严重。敌复以飞机10余架低空轰击我方阵地，掩护其步兵猛冲。我守军奋力抗击，往返冲杀，下陂桥失而复得三次。入夜，日军倾全力再攻，我军死伤枕藉，仍死力固守。24日晨，一度被日军占领的聂家、白茅山又为我军克复。

△　为切断中国汕尾港重要补给基地，日华南方面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和近卫师团各一部与第二分遣舰队一部协同行动，在汕尾一带登陆，边“扫荡”边夺取物资，并在潮阳及汕尾一带驻军，以彻底切断该方面的补给路线。

△　据重庆《中央日报》讯：国民政府决定与美、英商定三国共筑滇缅铁路，中国方面在美发行该路建设公债1000万美元，并派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杜镇远赴美，与美方及有关厂商商洽技术事宜。

3月24日　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到中央执行委

员、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159人。蒋介石致训词，训勉“提高党的精神，担负抗战建国责任”。旋开预备会，推举王法勤、丁惟汾、居正、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戴季陶、邹鲁、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11人为主席团，吴铁城为秘书长。

△　国民政府为增强滇缅路运输效能，设立运输工程监察委员会，俞飞鹏任主席。

△　日师团长大贺亲自督阵，并纠集池田残部3000余人，以求在上高会战中作最后一逞。日军出动飞机百余架，反复狂炸第五十七师下陂桥阵地和第五十八师白茅山阵地，投弹1700余枚，守军阵地大部被毁，人马伤亡惨重。第七十四军预备队先后与敌肉搏七次，毙敌2000余。同日，第七十军李觉部南下至杨公圩、官桥一线，第七十二军王陵基部进至水口附近，与由锦江南岸北上的第四十九军刘多荃部对日军后侧形成包围之势。

△　日师团长大贺以日军被中国各军合围，急电汉口日军司令部求援。午，日军派出增援部队约2000余人，自九江沿湘赣公路南驰；第三十三师团一部亦自奉新再犯伍桥河、村前街，分向棠浦、官桥急进，以图救援被围之敌。被围之敌得此增援，于25日晨开始向中国左翼包围部队正面之坑口冷、介子坡、南茶罗一线猛扑，企图突围，双方血战，伤亡均重。

△　日军一部在广东汕尾、鲈门登陆，午后陷海丰县城，续向海丰东北公平进犯。

△　粤东日军一部陷潮阳县城。

△　日机10架袭赣，分在乐平、上高等地投弹。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一、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派徐良为委员长；二、特任杨揆一为参谋本部部长，萧叔萱为军事训

练部部长，鲍文樾为军政部部长；三、成立清乡委员会，特派汪精卫兼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李士群兼任秘书长。

△　美参议院通过援助民主国家70亿美元拨款案。25日，罗斯福签署此案。

3月25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第一、二次大会，分别由居正、朱家骅、王世杰、何应钦、王宠惠、孔祥熙、翁文灏、陈济棠、张嘉璈报告党务、组织、宣传、军事、外交、财政、经济、农林、交通。

△　周恩来、邓颖超应邀出席宋美龄举行之宴会，蒋介石、贺耀组、张冲同席。周恩来同蒋介石交谈了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等问题，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事后致电中共中央说："今天见面时蒋只是表面上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　上高会战战场日军救援军第二一五联队迫近棠浦、官桥，预九师张言传部陷于前后受敌之危境，乃东撤至土地庙附近，欲与第十九师唐伯寅部联系。旋日军又猛攻唐部凉山垴、桐子坑阵地，张、唐两部又分向凤凰圩、庄坊附近北撤，日救援军因此进入官桥，与被围日军会合。

△　全国粮食管理局制定重庆市食米统购统销办法，按合法利润统一规定价格：批发上等157元，中等152元，下等147元；零售上等165元，中等160元，下等155元，自是日起实施。

△　陪都防空总司令刘峙对记者称：自4月中旬起，本市实行强迫人口疏散，凡无居住证者均在疏散之列，人口近20万，疏散地点在沿长江与嘉陵江两岸交通方便而有余粮的乡村。

△　国民政府命令于四川省松潘县黄胜关外增设兴中、麦桑二设治局。

△　前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爵士撰文，承认过去袒护日本侵华之错误，呼吁世界民主国家援华。

3月26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大会，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嗣由谷正纲、陈立夫、周钟岳报告社会、教育、内政。熊式辉报告江西党务、政治情形。

△　是日雨雾濛濛，日机无法实施轰炸，我上高战场守军乘机展开攻击。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由东港推进至泗溪、良口之线，压迫敌之左翼；第五十八师廖龄奇部主力收复云头山、上下漆家一线，复克罗坑，包围敌之右翼；新十五师进击南坑、罗南坑。午夜，第一〇七师宋英仲部又克复胥家陵、亘离楼、谢西等地。日军被包围在南北直径不满五公里之圈内。

△　薛岳以上高会战中第十九师、预九师作战不力，且于围歼成功之际，忽向北撤，致敌逃逸而失歼灭之机，饬该两师经村前街、伍桥河向大城、奉新线追击败退之敌。

△　行政院会议决议通过并公布《田赋改征实物暂行通则》，凡七条。规定田赋改征或加征实物后所增加人民的负担不得超过物价增加数的60％；各省征得之粮食应尽先充足军粮，其处理办法应经全国粮食管理局核准；征收实物之种类，应兼顾地方出产及政府需要；田赋改征或加征实物后，省、县收入之划分，应不违背现行法；同时，所有未经中央核准之省、县地方税捐，应一律取消。要求各省改征或加征田赋，均应依本通则拟具实施办法，呈行政院核准后，方得施行。

△　国民政府任命胡先骕为国立中正大学校长。

△　瑞华（玻璃）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董事长李文彬，总经理蒋相臣，资本100万元。

△　粤东日军一部由碣石湾登陆，进陷陆丰县城。31日，第七战区所部反攻，克复陆丰，歼敌百余名。

△　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闻上高会战战场日军战事失利，是日飞高安前线视察。

△　据中央社讯：日军在河南沦陷区肆行毒化，日趋严重。敌每占一地，即推销海洛英、吗啡等毒品，迫我民众吸食，受毒者不计其数。豫北、豫南、豫东各县遍种鸦片。

△　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拟募捐500万美元赠予我国。是日，共和党要人威尔基、名女作家赛珍珠等名流在宴会上讲演，呼吁援华。驻美国大使胡适致词，力言美国应停止以供给品运日，并宣布中国政府以蓝采玉勋章赠予赛珍珠女士。

3月27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第四次大会，由康泽报告三青团工作，继由陕西、四川、湖北、浙江、河南等省报告该省党政情形。

△　拂晓，上高会战战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渡泗水克复泗溪。午，第五十八师克复傲古山、炉下、河埠一线。日军后退不及，乃集中炮火猛轰，飞机狂炸，并使用多量毒瓦斯弹。第七十四军第一线官兵中毒者甚多，仍奋勇猛进。午后攻占大贺指挥所毕家，然后乘胜追击，破坑口冷、港西罗日军阵地，距官桥仅四里。午夜，罗卓英下达攻击令，饬各部于28日午以官桥、南茶罗为目标，猛烈进攻，歼灭残敌。

△　薛岳电勉罗卓英“再接再厉，乘胜歼灭溃败之敌，以竟全功”。同日，又以王耀武第七十四军作战努力，奖赏将士二万元。

△　上高会战战场日军倾全力从我守军薄弱环节离谢楼附近突围。第一〇七师、新十五师仓促应战，伤亡较大，乃向后撤。日机10

余架低空助战，敌骑兵500余复由江家洲附近冲至西坑里新十五师指挥所，遂陷于混战状态。旋日军千余经此突入水口圩，南袭第一〇七师左翼，第一〇七师预备队据守东狗垴、江家堎、况家线堵击，激战至晚，敌势稍挫。

△　中共中央通过两项决定：一、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四人组成；二、新四军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五人组成。

△　周恩来将叶挺经黄琪翔转来的信所谈皖南事变的情况转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事变中新四军被俘人数不到4000人，伤亡约2000人，其余均突围。

△　上海服装、煤球工人及英美电报公司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降低米价。

△　晋南日军一部2000余人自汾城、新绛、稷山向吕梁山各口进犯，遭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阻击，纷向河津、稷山溃窜。

△　美红十字会在重庆捐建平民住宅，是日举行落成典礼。

3月28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朱家骅作特种问题报告，章嘉、麦斯武德、罗桑坚赞分别报告边疆情形。

△　上高会战战场第七十四军所部进迫官桥。第五十八师进至长岭亘、蛮眉高地一线，与日军后卫发生激战，日军为掩护其主力东遁，拼死顽抗。战至中午，第五十一师李天霞部先头部队赶到，于上罗家、山源李、方头垴一线袭击日军右侧；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一部亦进抵龙形山，包围官桥街南，日军不支，退守官桥市内。第五十八师廖龄奇部乘胜冲锋，与敌巷战，至晚，克复官桥，歼敌600余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毙命。

△　中央社记者为赣北上高等役获胜，特晋谒军政部长何应钦，

何称：上高会战影响之大，“全国军队将因此次战果而加强其自信心”，“可谓为开战以来最有精彩之作战”。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总结上高会战获胜原因有三：一、剪除敌军两翼，致敌中路形成孤军深入状态；二、阻滞敌人主力，敌无法进展，乃形成包围之势；三、指挥统一。

△　河南省固始县吴宗源拒任伪职，湖南省平江县艾余氏受逼敌寇，保贞守义，国民政府是日令行政院明令褒扬。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召棠为第十九军代理军长，梁春溥为第二十三军军长，于镇河为第三十三军军长，施北衡为第七十五军军长，柳际明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孙福麟为第八十三军代理军长，张兴仁为新编第三军副军长。

3月29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第六次大会。大会主席团发起为革命先烈邹容、张培爵建立纪念碑。继由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报告省政及党务。

△　上高会战战场罗卓英奉薛岳电令，饬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即督率王铁汉第一〇五师、王克俊第二十六师、陈良基新十四师为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大城道向牛行追击。第七十军军长李觉率张言传预九师、唐伯寅第十九师、宋英仲第一〇七师为左追击军，沿伍桥河、奉新道向安义追击，并限于31日前完成任务。

△　上高会战战场踞龙图圩、杨公圩之日军2000余人，以飞机十余架助战，拼命突围，第一〇五师、第二十六师堵击于东，预九师、第十九师堵击于西、北，三面围攻，敌伤亡惨重。

△　第九战区薛岳所部于粤汉铁路之溪站（岳阳西北）附近，炸毁日军南行火车一列，随车护路之敌全部被歼灭。

△　日军3000余人分由山西平遥、祁县、洪善镇合击八路军第一

二〇师驻平遥回回镇之部队，被决死第二纵队击退。

△　南洋侨胞筹赈会在新加坡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到会南洋46单位，156人，会期三天，选举陈嘉庚、庄西言为正、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呼吁侨胞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　厦门抗日爱国分子趁日伪庆祝汪伪政府组成周年纪念之机，分头纵火烧毁日商三井洋行大阪轮船公司仓库、台湾海南洋行堆栈等，敌囤大批军火、棉花、棉纱等均付之一炬，价值达千万元，并焚毙日人四名，伪警三名，台人一名。

3月30日　上高会战战场第一〇五师、第二十六师攻克龙图圩、杨公圩，残敌分股向东、北溃逃，北逃600余甫达村前街附近，被预九师主力痛击，大部被歼。旋各路追击军向高安、奉新追击。

△　重庆大学进步师生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的该校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日举行马寅初六十寿辰庆祝会，并在校内外募捐修建“寅初亭”。重庆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潘梓年、张西曼等出席了祝寿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　国民党平绥路特别党部报告，第十八集团军在绥远大青山仅有400余人，“实力单薄”，要求派军收复。是日，蒋介石令军令部立即核办。

△　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会和阅兵式。汪精卫在会上讲话，宣称实现全面和平的惟一办法，就是“根据和平反共建国的方针，聚其全力，来确立治安，改善社会人民经济生活。只要局部和平能做得好，全面和平自然到来”。

△　日军命令安徽庐江盛桥自治会开办“慰安所”，诱骗魏家坝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专供日军淫侮。

△　美国务院宣布：美国2月份运华之军火，价值631万美元。

3月31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第七、八次大会，首由重庆市、贵州、云南、绥远、安徽、西康等省报告党务及省政，继由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各委员报告各战区军事概况。

△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发表演讲，要求在实施全会决议和审查议案时应注意做到：第一，要确立战时经济体制；第二，要彻底实行新县制，切实完成地方自治；第三，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　晨，上高会战战场第九战区第二挺进总队主力由高安东北冲入城内，日军不支四处溃逃。陷敌半月之久的高安遂告克复。

△　日方盛传中国军队开入越南老街。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是日发表谈话，斥敌谣传，并称此为“敌将出兵老街之先声”。

△　全国慰劳总会在重庆开办之出钱劳军运动，至是日共募捐400万元。

是月　刘文辉、邓初民、马哲民、李相符等在成都成立唯民社，刘文辉任社长。其宗旨为：“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后在成渝地区出版《唯民周刊》、《大学月刊》、《华西晚报》等，并开办了文治出版社。

△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书报审查机关先后查封国统区《学习生活》、《新闻记者》、《国民公报》等数十种报刊及全民通讯社等。在桂林之国际新闻社被撤销营业证，工作人员被迫离桂去港。

△　周恩来三次接待两年前随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华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杨固医生等。周恩来建议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救护医疗工作。

△　据《益世报》讯：日驻北平大使馆公布：北平、青岛、天津、济南、太原等九城市一年来日侨增加一倍，每日增加221人，日侨职业大部分经营赌场、妓院、吗啡馆、娱乐场等，并称“皇军”所至之处，“用女人与毒品消灭中国人之抗日意识”。

△　延安国际通讯社成立，萧三任主任。

4月

4月1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第九、十次大会讨论党务、政治审查委员会提出之提案及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并通过议案79件，主要有：《恢复省县党部选举制度案》、《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并充实本党基础案》、《加强政府机关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严令党政军民各机关法团负责人必须忠诚遵循一切法令、一切议案，积极推进各种政务，以奠定国家建设之政治基础案》以及《改进财政系统统筹整理分配案》等。

△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国民月会发表《党员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责任》的讲演，认为国民精神之彻底改造，必须推而广之，首求国民精神之充实，次求国民精神之集中，而更求国民精神之革命化。

△　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中国中央银行代表李干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署《中美平准基金协定》，规定：美国依中央银行的请求，委由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购买法币，总数不超过5000万美元，用于平稳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格。

△　上高会战战场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王铁汉部收复祥符观；第七十军预九师张言传师主力逼近奉新西郊，与日军对峙。午后，王铁汉师又克复万寿宫。

△　日机九架轰炸湖南常德、桃源、辰溪。

△　日外务省宣布：至是日华北、华中、华南日侨总数为56.6万余人，较战前8.6万余人，增加5.9倍。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利浦发表声明，宣布工部局因形势不定，决定本届董事会不举行改选，由各关系方面成立协定，分配董事席位，其中中国二席。此决定“一俟中国政府及各关系领事表示同意后即施行”。

△　美国中国救济事业联合会决定：自是日起至7月31日，在美国发动“筹募援华救济费500万美元扩大运动”。并定5月18日至25日在美国各大城市发动“中国宣传周”。

△　旅美华侨邝炳舜接见记者，表示对于在美发行滇缅铁路建设公债1000万美元事，愿竭力协助。并称此事美政府交通、财政两部在商洽中，另将派员赴各地劝销。

4月2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第十一次大会，通过《党务三年计划之方针》、《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三年建设计划大纲》等案，并通过人事调整各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辞职，推吴铁城继任；推刘维炽为中央海外部长；周启刚专任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另有任用，推王宠惠继任；调原驻英大使郭泰祺任外交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柳亚子“诋毁国策，违反党纪”，开除党籍。国民政府增设贸易部、粮食部。下午闭会。

△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发表宣言，以驱逐敌寇出境，拥护建军、统一军政军令，促成宪政，建立战时经济四点昭告国人，共同努力。

△　第九战区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王铁汉部与援军第七十军第

一〇七师宋英仲部合力克复新奉。午后，王铁汉部又收复万寿宫。至是日军退回原阵地，上高会战结束，共歼日军1.5万余人，俘日军100余人。

△　蒋介石密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限期收复绥远大青山，驱除以大青山为根据地连接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交通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

△　第九十三军刘戡所部连日进犯晋冀豫边区太岳区屯留县之张店、七家、八家、秦家庄等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是日将其击退，歼灭120余人。

△　上海制鞋业工人部分罢工，要求增加津贴。因资主拒绝，至5日发展为全市500余家鞋店5000余名工人的全体罢工。后经劳资双方数次谈判，一律加薪三成，13日复工。

△　全国合作会议在重庆开幕，社会部长谷正纲主席。会议任务为：一、使合作单位取得联系；二、使合作事业有系统发展；三、研究指导及改进合作事业之办法；四、共商合作事业、人事及金融事务机构之困难，以便改进。9日闭幕，通过各项提案44件。

4月3日　　国民政府根据南洋闽籍华侨联名控诉闽省主席陈仪，促请政府免职事，是日决定组织闽政视察团，成员为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监察院监委梅公任及闽籍参政员萨孟武、王世颖、胡兆祥五人。

△　第三战区所部进袭安徽寿县日军据点，城中伪军500余人乘机冲出反正。

△　国民政府为追念吴佩孚，在四川南川县建成蓬莱阁一座，是日举行揭幕典礼，孔祥熙派员前往主持。

4月4日　　孔祥熙提议各地军政长官转令各县政府、各部队，对各地圣庙应妥为保存，并须拟具圣庙保管及修复办法。行政院会议是

日通过此案，通饬各地军队机关不得占用圣庙，令内政部拟具圣庙保护及修复办法。

△　军事委员会任命彭杰如为新编第七军军长。

△　中国滑翔总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兼任会长，陈立夫、张治中、周至柔任副会长。

△　粤东第七战区所部克复海丰县之汕尾、梅垅、鲈门等地。

△　日军1000余人对北岳区五台、盂县地区进行“扫荡”，经五天激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共毙伤日军大队长藏重以下官兵4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　占领山西辽县的日伪军偷袭和顺县羊蹄洼村，惨杀八路军军政人员、学生、村民100多人，其中30名学生被日军用刀砍杀。

△　罗斯福与居里在白宫谈中国局势，认为中国政府组织、人事变更是政权的加强，并“致力于实行民治政体，达到民治目标”，并表示将采取积极援华步骤。

4月5日　　中国共产党就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宣言及蒋介石的演说发表评论。评论指出，蒋介石虽公开承认其统治危机，但并不想到造成危机之真正症结为没有民主；宣言不仅未纠正袭击新四军之罪行，反强调“军令军纪”，实为大错误；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要真正有所改进，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12条善后办法，并认真执行之。评论指出，没有根本政策的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　第六战区陈诚所部出击宜昌南岸日军，歼敌200余人。同日，另一部袭击荆州、沙市一带，毁日军汽车18辆。

△　中共中央同意中原局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与军队之领导，

仍归还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陇海路以南则归中原局与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　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会成立，以杨秀峰为主任，开始筹备召开晋冀豫区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晋冀豫边区政府。

△　新四军第五师组编完竣，是日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率全体将领通电就职。全师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及两个游击纵队。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汪精卫报告该会第一届当然委员、延聘及指定委员任期已满，重新延聘王克敏、齐燮元、朱琛、殷同、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诸青来、赵毓松、赵尊岳、岑德广为委员。指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萱、李士群为委员。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为当然委员，朱履龢、顾忠琛、江亢虎、徐良为列席委员。

△　上海日伪军冲击上海报界，是日绑架《申报》协理王尧卿及《正言报》工人9人。6日，又绑架《申报》庶务科主任黄炎卿。

△　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政部长摩根索谒罗斯福，会商美国对华军火租借问题。

4月6日　　蒋介石致电薛岳，以上高会战各部将士“奋发忠勇，围歼顽敌，获巨大战果”，着发国币15万元，以资奖励。

△　何应钦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对美、英广播中国战况，宣称：中国抗战四年，实力日强，今前线有500万以上士兵，后方有1000万后备战斗员，沦陷区有60万以上正规军，80万游击队与敌搏斗，每日约毙敌2000人，战线自南至北，长9000余里。表示在敌军未退出我国土，及敌国不视我为独立自主国而尊重其权益时，“不屈服，不妥

协，也绝不考虑和平”。

△　辽宁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奉命改组后，在重庆组织省政研究会，是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抚慰本省民众，救济后方失业、失学青年等。

△　第七战区所部克复粤南坪山。

△　伪满洲国与北平伪政权签订《赴满苦力募集协定》，规定：河北应对伪满所需的劳动力予以全面协助；还规定伪满不得在河北开发地区和经济建设地区招募“苦力”。

4月7日　　是日至28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重庆召集全国各省、市妇女运动干部人员工作讨论会，朱家骅主席并致词。会议宗旨为检查妇女工作，健全妇女组织，统一妇女意志，奖励人口增殖等。会议通过各项议决案29件，主要有加强妇女运动领导、推行新生活运动、普及妇女教育等。

△　苏北新四军陈毅部袭击泰县李家、彭庄伪军，歼敌200余人，俘300余人。9日，日军500余人自泰兴出动扫荡泰、黄公路，至黄桥镇被陈毅所部截击，毙敌百余。11日，日军千余向新四军进犯，被击溃。

△　日机八架轰炸安徽桐城，投弹60余枚，毁房屋数十间，死伤四人。

4月8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其中一师系新编第三十四师马志超部已到宁夏，蒋派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剿匪’总司令，日内率直属队经陕、甘、宁夏，似赴榆林。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

△　重庆市政机关及卫戍总部召开重庆市人口疏散会议，讨论

《渝市区户口疏散计划实施纲要》，据调查，重庆市现有43万人，防空洞能容纳30万人，13万人须加以疏散，决定疏散工作自本月20日开始，30天内完成，逾期不愿疏散或无力疏散者，由警察局会同宪兵及稽查处指定地点，勒令出境，封闭其住所。10日，三青团重庆市团部、重庆市赈济会及卫戍总部联合组成八个指导队，15日分赴各疏散区执行任务。

△　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成立十周年，董事朱家骅报告十年来投资生产建设事业及办理教育文化事业概况。1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该会董事陈其采、刘瑞恒、宋子良、马锡尔、戴乐山任期届满，均着继任。

△　第七战区所部克复粤中潜江县城。

△　宁夏海固回民发动第三次起义，参加者有回、汉民众二万余人，消灭驻该地国民党军一个团和一个营，缴获枪支千余支。旋被国民党派军镇压，起义领袖之一马思义率部分群众投奔延安，后被扩编为八路军回民骑兵旅。

△　日机27架袭击昆明，多处投弹，英驻滇领事馆及英教会等处被炸，市内三处起火，民房烧毁多栋。

△　美国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美国务卿赫尔提出“日美谅解方案”试案。其中关于中国问题作了如下规定：由美国总统出面劝说中国同日本媾和，条件是：“一、中国独立。二、根据中日间成立之协定，日本军队自中国领土撤退。三、不并吞中国。四、不要求赔款。五、恢复门户开放方针。六、‘蒋政府’与‘汪政府’合并。七、日本自行限制向中国大量或集团移民。八、承认满洲国。”

△　日大本营报导部长马渊发表谈话称：日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事变》，否则不能实现南进政策。日本对中国作战，亦即对英、美作战，英、美在远东势力一日不铲除，则“中国事变”即

一日无法解决。

4月9日　　国民政府任命谭绍华兼驻哥伦比亚及驻委内瑞拉特命全权大使，沈觐鼎兼驻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特命全权大使。

△　薛岳电令罗卓英：上高会战已告结束，参战各部损耗甚重，除第七十四军应仍令继续整训外，其他各部亦应抽调整训，恢复战力。同日，罗卓英令前线各军“凭坚固守，调整部署，进行补训”。

△　日军劫夺吴淞口美商德士古火油公司汽油1400吨。

△　巴拿马新宪法限制华侨居留及入境，情形严重，旅巴华侨被迫返国过港者达数百人。旅美华侨、国大代表郑华秋是日电蒋介石提请交涉。

4月10日　国民政府特任郭泰祺为外交部部长。

△　国民政府追赠故空军驱逐司令兼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为空军上将。

△　何应钦在西安召集各高级将领，会商对陕北防务。

△　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当局制止殴打、拘捕该报人员，没收撕毁报纸，逮捕迫害读者的事件，切实执行“严加保护”的命令。

△　襄河东岸日军三路北犯大洪山，一路2000余人犯长寿店，第五战区一部与敌激战后，敌续窜丰乐河，一路至周家集，一路至王家岭、邵家店。

△　上海闸北区水木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12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两区1000余名水木业工人亦加入罢工，迫使租界当局出

面调解。最后达成协议，增加木工工资一元，水工九角。22日工人复工。

4月上旬　　滇缅铁路云南省段开始动工，英国宣布资助修筑缅境段。

4月11日　　财政部成立国家专卖事业委员会，孔祥熙兼主任委员，陈光甫、王正廷为副主任委员，俞鸿钧等25人为委员，徐堪等15人为兼任委员。该会设秘书处及盐、糖、烟、酒、茶叶、火柴六组分别担任设计事宜。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据悉，何应钦此次来西安是主持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已于10日在临潼开会，讨论中心问题为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部署，进攻边区总指挥已决定为胡宗南，在一个月后开始进攻。

△　军事委员会发表上高会战总检讨，认为此次会战前后完成两次包围计划，日军闪电战术遭到失败，此役毙伤敌官兵约1.5万人，我国军队伤亡比日军略重。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歼灭盘踞河南内黄豪城集伪军200余人。

△　日机九架轰炸浙江丽水，向城区投弹60枚，炸死10余人，毁民房20余间。同日，又有六架袭击湖南衡阳，投弹10余枚。

△　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告外交部长王宠惠，苏日谈判决不牺牲友邦利益，苏对松冈洋右接待乃例行接待。

△　近卫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称：如果重庆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则日本政府不惜与之提携，但根本方针仍为协助“国民政府”。并称今后迈进之目标为使“汪蒋合流”。

4月12日　周恩来质问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公函交张冲转送。张冲转告蒋的答复：绝无其事。

△　日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一旅团及伪军万余，附汽车百余辆，对河南濮阳、内黄地区的沙区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八路军第二纵队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的战术进行反“扫荡”作战，毙伤日伪军700余人。20日，日军全部撤退。

△　驻英大使郭泰祺回国履新，是日在伦敦发表告别广播演说，宣称：在战后大时代中，“当以A、B、C（即美、英、中）三国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之主要国家”。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虞洽卿由港抵渝，向国民党中枢报告三年来在沪办理难民救济工作，并乘便考察内地建设情况。

△　成都袍哥总会头目陈俊珊发起组织国民互助社，是日发起人开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亦派人参加。

△　鲁苏战区第八十九军副参谋长兼第一一七师长潘午丞、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湘图在苏北投敌后，是日抵南京，发表投敌通电，并受到汪精卫接见。

4月13日　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在延安致电柳亚子，对国民党开除柳亚子党籍，极表愤慨，并望本革命初衷，不屈不挠，继续奋斗。

△　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在重庆举行全体委员会议，陈果夫主席。会议确定三四八振动数为黄钟之标准音；指定各国立师范学院一律增设音乐系；规定4月5日黄帝诞辰日为音乐节。

△　粤南第七战区所部克复海丰县城。15日，克复汕尾。

△　《中央日报》讯：福建省垣米价高涨，影响民生，赈济委员

会拨款10万元办理急赈，50万元购进江西食粮，办理平粜。

△　苏日在莫斯科签订《中立友好协定》，凡五条，规定双方“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为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有效期五年。同日，双方又发表《宣言》，声称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日条约之签订，“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4月14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苏日《中立友好协定》发表声明，称：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　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和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对蒋进攻延安阴谋准备公开揭破，但还拟看一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局面。”

△　广东琼崖日军一部由文昌长坡窜至昌村附近，遭该地游击队伏击，伤亡颇重。旋日军将昌尾附近村庄田园纵火焚毁，计毙乡民800余人。

△　粤东潮阳日军在梅山登陆。

4月15日　国民党战地党政会议在重庆召开，由程潜主席，陈立夫讲话，强调战地党政一元化。会期五日，通过议案88件。19日，蒋

介石亲临训话，指出今后任务“重在安定金融，发展经济，健全战地社会组织”。

△　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政府，对于粮食管理不得征收款项；并规定政府经营粮食业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　行政院会议决议：设立贵阳市政府；通过《四川省三十年度地方行政计划及总概算》及《管理水利事业暂行办法》。

△　胡适偕宋子文同谒罗斯福，力陈远东形势之严重与中国望援之迫切，希望罗斯福能于最近期发表援华具体方案。下午，罗斯福在白宫向报界谈话，声言：今晨与中国大使及宋子文先生曾商及援华详细办法，中国所需军火之详单，已依照《军火租借法案》组织之机构，予以分析和考虑，已核准以若干现存军火转让中国。此外，政府将命令制造商定造新军火，供给中国。

△　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抗战四年来国统区党的工作。周恩来说，目前西南党的任务仍是使党真正成为秘密的巩固的党。

△　第七战区所部收复闽东福清县城。

△　苏北新四军一部伏击由仪征北开之日军50余人，将其全部歼灭。

4月16日　　中共中央就《苏日中立条约》发表声明，认为“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滕代远、陆定一六人组成军委华北分会，以朱德、彭德怀分任分会正、副主席。

△　中国警察学术研究社在重庆召开首次年会，定9月1日为警察节，推陈诚为社长。

△　杭州日第二十二师团主力，第十五师团及第十一混成旅团之一部，分三路进攻诸暨，其一路自杭州乘舰在绍兴北之三江城登陆，续向南犯。

4月17日　重庆国民政府所属上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宣布停止营业。18日，周佛海就此发表谈话，称：无意强迫四行撤退，四行人员是否安全，责任在重庆政府。

△　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行第四届大会，商讨“增加生产力量”。该会有会员工厂178家，共计44类企业。

△　周恩来、董必武到黄炎培寓所，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一贯的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中共的态度决不因此而变更。

△　新四军第二师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苏北仪征、扬州、天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中，是日取得谢家集、金牛山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270余人。

△　由杭州渡江之日军一部由萧山南犯，20日至枫桥镇，与日军另一部会合陷诸暨。同日，其右路日军由富阳渡江经大源向诸暨前进。23日至诸暨。

△　苏北黄桥、泰兴之日伪军千余人向古溪进犯，并一度陷至扶，新四军陈毅部反攻，将其击溃，逃窜沿途又遭新四军截击，伤亡极重。

△　日军陷绍兴县城，续向西南进犯。19日，陷枫桥镇。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因进行改组，是日召开外籍纳税人会，

决议设立临时董事会代替原董事会。原董事会中国方面董事为虞洽卿、奚玉书、陈霆锐、袁履登、郭顺五人，而临时董事会中国方面董事减为四人，其中三人为汪伪分子。19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临时董事会之设置及地皮章程任何条款之变更，均未经中国政府予以同意。"对华董人选，其他方面所提名单决不承认。22日，工部局因中国政府反对，宣布一切行政仍暂由原董事会负责。

△　罗斯福批准第一批价值4500万美元之援华军用器材。18日，罗斯福对记者称：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已经批准扩大援华计划。

4月18日　何应钦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晋南中条山三角地带作战方案。第五战区、第一、二战区李宗仁、冯钦哉、孙蔚如、赵寿山、何柱国等参加会议。20日，继续开会，何应钦指示：为确保中条山，首先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与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其次，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

△　新四军陈毅所部进攻苏北泰县东南阳村，歼灭守敌200余人，俘伪军80余名。

△　日机三架袭击长沙。19日，又有七架袭击零陵。

△　日军一部自浙东沿海坎门登陆，第三战区所部将其击退。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香港召开第十七届年会，通过本年度补助案21项，选举孙科、颜惠庆、司徒雷登、任鸿隽等任董事。

4月19日　军事委员会鉴于日苏签订"中立协定"，战局变化，制定今后战争指导方针，略为："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定内部，争取外援，尤须振刷军政，自力更生，伺机南进，再转攻势"，并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洛、潼工事，积极训练"，"确保现有游击根据地，整饬敌后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等指导要领。

△　蒋介石在全国战地党政会议上发表讲演，指出党政委员会的责任，在集中战地党政力量，协助军事进展。目前的工作对象，主要在于健全组织，发展经济，推进建设，来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

△　国民政府在重庆建“国民大会堂”，经费220万元尚感不足，是日追加为270万元。8月建筑甫城，即被日机炸毁。

△　重庆《大公报》发表特讯，认为关于苏日条约，苏联政府“业已向我方正式说明，谓此约完全与中国无关，而苏对华政策，并无变更”；并称：“就两国一般直接关系而论，实际上确亦无所变动，西北商务亦正在畅通。”

△　冀鲁豫八路军及抗日民众历八日激战，粉碎日伪军对沙区根据地之“扫荡”，毙、伤、俘敌600余人。日伪军在“扫荡”中烧毁140余村，杀害群众3400余人。

△　日军在浙东沿海岸分三路登陆。第一路第五师团之一部，于晨在沙园城登陆，陷瑞安后又陷温州、平阳。第二路为海军陆战队，于晨在海门登陆后，陷黄岩。第三路为第五师团之主力，于晨由甬江奇袭镇海，陷镇海。

△　闽日第四十八师团主力、第十八师团一部及海军陆战队，在空、海军协力下，于拂晓前分由松下、漳港、长门、大澳、小澳、百胜、东岱等处登陆，连陷闽江北岸之连江、南岸之长乐。

4月20日　国民政府以重庆雾季将过，日机必来空袭滥炸，是日饬重庆市府严厉执行疏散，凡发疏散证者五日内自动疏散，逾期者即强制执行，封闭其住宅。

△　延安经济界学者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的“专卖”制度，认为此制度将很多重要日用品由政府专卖，“对民族资产阶级、全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中、小地主，都是绝大打击。经济窒息之危

机，势必日益加甚。经济如此，财政状态自无改善之望。由此将发生两方面结果：一方面，全国财富大量集中在几十个投机巨头手里；另一方面，全国人民的生活陷入贫困化，各业生产陷于停滞，因此，必然造成抗战财政、经济之更大危机”。

△　宜昌对岸磨鸡山激战，第六战区陈诚所部歼敌100余，残敌回窜黄土坡、董家冲。

△　新四军苏中军区成立，粟裕兼任司令员，刘炎兼政委，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区和“联抗”。

△　闽日军再陷福清。25日，第七战区所部一度攻克福清。

△　浙东日军陷台州。25日，第三战区所部反攻，收复台州。

△　浙东日军第五师团一部攻陷宁波。

4月21日　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主席黄炎培，在该会大队干事劝募成绩检讨报告会上宣布：劝募战时公债历时五旬，共计劝募公债1.008亿余元。

△　重庆《新华日报》讯：日军陷粤南陆丰县城，烧杀掠淫，惨无人道。刑逼民众母子、翁媳、姑侄相对奸淫，如有不从，枪杀随之。并诱驱群孩以手榴弹相互炸杀取乐。当中国军队反攻迫近城垣时，民众争相冒死与敌搏斗，数小时内光复陆丰城。

△　第七战区一部于福建长门梅洋阻击自连江西犯之日军，旋敌五六千人增援，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是日晚陷闽侯县城，次日，守军撤至城郊。

△　是日至次日，日机遍扰福建各地，先后轰炸水口、闽清等地。

4月22日　第一战区卫立煌所部于豫北武陟东南伏击日军一部，毙伤100余人，击毁汽车四辆。

△　日军陷福州。

△　日军自宁波续向西北进犯，是日陷慈溪县城。

△　据中央社讯：日军连日在闽、浙沿海登陆，战区灾民亟待救济，赈济委员会拨款22万元予以赈济。

△　日机三架轰炸长沙，投弹多枚，死伤平民90余人，炸毁房屋60余栋。

4月23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有区别地对待各类国民党军队的指示，指出，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总方针是：联合同情者，争取中立者，削弱顽固者，消灭隐藏的汉奸队伍，以求得争取多数军队，坚持抗战到底。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发出《粉碎敌寇治安强化运动和打破敌分割封锁政策的指示》，指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分割、封锁、“蚕食”，迫使敌人困守据点，决定除地方武装积极地采取游击动作以外，应经常抽出主力一部，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小股出犯和掩护挖沟修路的敌人，给以歼灭性打击。

△　晚，第三战区所部分头冲入萧山、武康两城，巷战竟夜，毁敌机关及仓库数处。

△　日舰数艘至杭州湾以炮火掩护强行登陆，晚陷余姚县城。

△　日机18架两批袭击湖南益阳、长沙、常德。同日，又有九架袭击浙江金华，被击落一架，坠兰溪北。

△　据中央社讯：江西各地迭遭日机轰炸，难民待赈甚急，蒋介

石饬赈济委员会拨款10万元予以赈济。

△　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因物价飞涨，四次函电香港公司当局，要求加薪，均未获得答复，乃于是日举行罢工。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几次调解，均无结果。5月初，资方通知解雇工人500余人。被解雇职工绝食抗议。6月8日，印刷厂和发行所职工组织“商务印书馆同人临时委员会”，提出六项条件。工部局再次调解，双方于6月19日签订协议，补足工人薪水，为时两个月的罢工结束。

4月24日　兼四川省主席张群以重庆粮米恐慌，除派员赴各县督查米源外，是日又订厉行粮食管理五项办法，对粮商、粮运、粮户存粮登记、粮食市场、限卖余粮等均有严格规定。

△　叶剑英、吴玉章、陈绍禹与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谈判，叶等提出国民政府如仍不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经费，“拟将即速发起国际国内捐款运动，以维生存”。25日，陈密电军令部长徐永昌，请求蒋介石、何应钦拟具对策。

△　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自英返国途中抵纽约，对记者宣称：中、英两国争取自由如此勇毅，其旨在保卫中国三民主义、英国《大宪章》和美国《独立宣言》三大经典不遭毁灭。

△　坚守上海闸北公共租界金城、中南、盐业、大陆四行仓库的孤军营第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在给士兵训话后，被其部下之不肖士兵郝鼎诚、张文清、龙耀亮等用匕首、铁镐猛击殒命。

4月25日　《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签字，中方代表为宋子文，英方代表为英财政部代表费立浦。规定：英国除于1939年所拨付之防止中国货币跌落之500万英镑外，另拨500万英镑。

△　蒋介石通令全国悼念谢晋元，发特恤国币五万元，并请由政府明令褒扬，所遗子女由国家抚养。

△　谢晋元遗体大殓仪式在孤军营礼堂举行，凭吊者约3000人，林森、蒋介石、何应钦、孔祥熙、朱家骅、顾祝同等题词致哀。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何浩若辞职获准，遗缺由该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少谷兼任。

△　第三战区所部克复浙东临海、黄岩县城，一度攻入永嘉县城，旋失。

4月26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示会见蒋介石时，可表示我党愿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军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　第七战区所部克复闽东长乐县城。

△　日机九架轰炸昆明，在西南郊投弹多枚，毁民房多栋。

4月27日　中共中央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发出《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示》，凡21条。

△　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为资助改修滇缅路西段，于募得之赈款中提出200万元捐献国民政府，作修筑购料之费用。

△　上海市10万民众瞻仰谢晋元遗容，次日盖棺。

△　日军陷福州后烧杀抢掠，旅港闽侨极为愤慨，是日香港闽侨联合会召集在港各福建商团开会，决定筹组旅港闽侨救济联合会，并电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军守卫闽疆，收复失地，呼吁海外闽侨一致进行筹款，救济难民。

△　美国前驻法大使蒲立德在华盛顿向全国民众播讲，谓“中国之战线，以战略意义而言，实为吾人之西线”，呼吁政府“保证军火、飞机能确实交付中国”。宋子文、胡适、郭泰祺出席听讲。

4月28日　行政院批准财政部设立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

△　第三战区所部分途袭击浙西余杭、富阳，一部袭入余杭县城，毁敌伪军事机关及仓库多所。

△　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之上海分行，自上月被日伪袭击后停业，是日正式复业，租界当局允予切实保护。

4月29日　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偕驻美大使胡适访谒罗斯福、华莱士及赫尔等美国最高官员，事后郭对记者称：访谒总统之结果，获得美国增加援华之保证，本人大受鼓励。

△　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华盛顿宣布成立中国国防用品公司，旨在依据美国之军火租借计划，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当局间之联络事宜，由宋子文任理事长，美国国家资源局主任委员第拉诺等任理事。

△　罗斯福之子杰姆士·罗斯福抵重庆，在机场对记者称其此次来华预备在军事方面有所考察，绝非外间传有何顾问使命。下午晋谒蒋介石，面交罗斯福亲笔函件。

△　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等与朱德、叶剑英、萧金明等会谈。朱、叶等称国共关系要好转，国民党方面目前至少应有下列办法：一、停止逮捕共产党人员及反共军事和交通封锁；二、继续发给第十八集团军各月份经费及弹药补充；三、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整编，至移防一节，如政治上确实保障，自可商谈，否则，于情于理，碍难遵命。30日，陈密电军令部，请核议意见报何应钦。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彬为第七十一军副军长。

△　第三战区所部反攻浙江永嘉县城，占据附近高地数处，俘日军中队长一名，毙敌百余名。

△　日机轰炸昆明，投弹百余枚，炸毁屋数百栋。同日，日机七架袭击湖南祁阳。

4月30日　蒋介石手令孔祥熙：四川田赋征收改收实物后，速筹备仓库与运输等实施办法，并照粮户田亩册每亩必须售出平价米一市石，其在十亩以上之户应照累进率计售，务筹划粮食公卖制度定期实施；立即筹备军用票，并以全国田赋收入为基金。

△　驻纽约总领事于焌吉代表中国政府以采玉勋章授予捐款援华抗战的美国作家费丝等六人。

△　日机五架轰炸浙江金华，在市区投弹40余枚，并以机枪猛烈扫射。

△　日外务省机关报《广知时报》发表所谓“世界和平计划”，宣称“太平洋上各岛屿应由日本建立共荣圈”。

是月　国民政府为实行对滇缅公路统一管理，特设特种运输管理委员会，由何应钦兼任主任委员，交通部、财政部、经济部、贸易委员会等机关均派代表参加。

△　国防最高委员会鉴于重庆物价高涨，政府机关公务员薪饷低微，难以养家，奉蒋介石指令，拟对公务员及其家属施行计口授粮。

△　阎锡山派其骑兵军军长兼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赴太原，与日军商定：一、山西各将领住宅由赵承绶向日军收回；二、日军在中条山发动战事取胜后，阎即可向太原前进。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华北反共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长，下设九局18科。同时，伪新民会规定每月11日为灭共日，每星期一为防共日。

△　绥察行政办事处改组为绥察行政公署，杨植霖任主任，辖绥

西、绥中、绥南、绥东四个专员公署。

△　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命防役给水部队第二部部长太田登大佐带第二批“远征队”百余人，在湖南常德上空抛撒带有疫菌的跳蚤，在浙江新登县上空投下鼠疫菌。12月又在浙江诸暨等县大量抛撒带有鼠疫菌的物品，致使上述地区鼠疫蔓延，大批人员死亡。

△　日军陷福州后，在市区南街、中亭街、观音井等处设立“慰安所”。

5月

5月1日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中央社记者称：日军进犯闽、浙沿海之举，“是无法结束侵华战争，而在军事上是一种极度苦闷行为”。

△　财政部组织视察室视察各税务、盐务、缉私机关、各官营事业机关、代理国库银行事务机关、各公私金融机关及各省市财政状况等，并分全国为川康、滇黔桂、湘鄂、闽粤、浙赣皖苏、冀鲁豫、晋陕、甘宁青新八区进行视察。

△　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在纽约发表演说，主张中、美、英三国组成A、B、C集团，此集团“非仅于精神上构成联合阵线，且应集中彼此的经济与自然资源”。

△　行政院经济会议以重庆市粮食供应紧张，抢购严重，人心恐慌，制定《渝市粮食紧急措施办法》，决定“疏导来源，由粮食部门派员分赴各县督察”；“统制消费，发粮食购买证，防止人口内流，粮食外流”。

△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四次大会在重庆开会。会期13天，孔祥熙出席讲话，称：物价提高，并非通货膨胀，“政府拥有现金40亿，

如现金准备定为五成，则可发行80亿，但现在法币发行额尚未达到此数”。9日，该会拟具重庆市粮食供应办法四项，送政府采纳，其要点：一、储存粮食40万石；二、奖励商人购粮运输；三、切实考核平价米之分配；四、吃两餐，限吃糙米并搀杂粮，禁止粮食酿酒。会上通过平抑米潮、调整捐税、公私防空洞在紧急警报后，不得拒绝行人入内等重要议案多件。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公布，凡21条，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均有规定。

△　八路军冀东第十二、第十三团各一部，在玉田渠梁河伏击战中，击毙日军南木铁雄大队长以下日伪军150余名，伤200余名。

△　戴笠、杜月笙在上海邀各帮会首领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

△　旅美华侨工业合作推动委员会成立，推李国钦、林语堂、杨天孚、司徒美堂等11人为委员。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受日伪董事，是日召开首次临时董事会。5日，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王晓籁等自香港通电声明绝不承认。

△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兼绥靖总司令齐燮元分别发表布告，称：日军为履行基本关系条约，实现共同防共，将冀东一部分地区让与治安军驻扎。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一、择期在东京举行“日本同志援助中国革命追念大会”，为侵华死亡的日军建立纪念碑，并为此项活动拨款中储券四万元，日金五万元。二、任命汤良礼为外交部政务次长，推陈中孚为国府委员。

5月2日　　国民政府令行政院筹设贸易部、粮食部，原隶属财政部之贸易委员会、全国粮食管理局应予撤销。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就陈长捷至西安事质国民党，指出：“如陈至榆及向榆林增兵势必引起重大纠纷，如保持榆林现状，我可保证不向榆林、宁夏、内蒙作任何行动，否则引起纠纷责在彼方。”

△　蒋介石在全国政工会议上发表演讲，宣示部队政训工作之要点：一、明了敌我实际情况，熟察时势需要；二、保持军队精神与物质之补充，尤以补充精神为主要职责；三、坚定抗战必胜之信心，增强部队主官之信仰；四、完成无线电通讯设备，实行每日通讯；五、训练官兵能打进敌伪匪军之中，确收瓦解分化与利用之效。

△　军令部判断晋南日军有由沁阳、济源及横岭关、皋落镇公路进攻垣曲之企图，命令第一战区以一部向高平、博爱，另一部向闻喜、侯马、夏县采取攻势，以击破敌之攻势。同时命令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对同蒲路，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对陇海路当面之敌分别进行牵制。

△　国民政府以山东乐昌县县长张天佐、蒙阴县县长郑小隐“抗战守土，克尽厥职”，是日明令嘉奖，并予晋级。

△　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对浙东沿海登陆之日海军陆战队反攻，克温州，3日克瑞安、平阳，从沙园城登陆之残敌落舰北去。同日对海门登陆之日军反攻，克黄岩，3日收复海门。

△　鲁苏战区所部攻克鲁西菏泽之要地高庄集，毙伪治安局长以下百余人，俘日伪军120名。

△　汤恩伯指挥皖北骑兵第八师马彪部向涡河以北新四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新四军一部及抗大分校学员伤亡数十人，被俘百余人。

△　日机27架袭击重庆，在市区投弹200余枚，死伤居民50余人，毁房屋百栋，英、法使馆亦被炸。

△　英驻华大使卡尔由昆抵渝。

5月3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发布关于中条山作战的方针：为打破敌进攻企图，应制敌要先，积极实施游击，以粉碎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并规定各部队的作战任务：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应以一部向新乡、博爱一带游击，主力向陵川以南移动，并对晋城方面积极游击，可能时则力求打破日军对白（圭）晋（城）公路之封锁。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以有力一部向安阳、淇县及壶关一带游击。第九军裴昌会部应以有力部队出温县东之敌后，进行游击。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部应以有力一部对高平及翼城、沁水方面实施游击。第八十军孔令恂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应以主力进出同蒲路以西，积极实施游击。第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部应酌以一部加强中条山西段，积极游击。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前广东省长李耀汉，并给恤金2000元。

△　郭泰祺在纽约对全美发表广播讲演，吁请美国政府“停止以军需、大炮、飞机供给日本”，应以物资援华，抵抗暴日。

△　日机63架轰炸重庆，在市区投弹200余枚，炸毁房屋50余栋，炸死五人，伤11人。

△　日政府举行第三次统帅联络会议，讨论美日谅解方案修正案，明确表示日本对于德、意、日三国条约上之义务，插入“由美日两国调停英德战争”，删除了“日本保证不武力南进”等句，并主张暂时不发表中日战事的和平条件。会后，外相松冈洋右训令驻美大使野村以自己意见试向美国提议缔结简单明了的日美中立条约。

5月4日　　蒋介石致电卫立煌、阎锡山、朱绍良，以晋南、豫北日军增加甚多，似有渡犯企图，令各战区应速征集民夫，积极加强各该方面阵地及河防工事，各军、师长亦须亲至前方视察。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向重庆文化界400余人发表演说，指斥皖南事变后离开重庆的人为背叛抗战队伍，吁请全国文化领导者

应在抗战建国旗帜下，一致团结，希望离重庆去海外的人士重返重庆。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继淹为第五十九军副军长。

△　八路军总部发动民众七万余人，组织冀南破击战，至9日破日军据点八处，破路190余里，破封锁沟墙127里，毙、伤、俘日伪军320余人。

△　日军向冀中滹沱河安平西部地区展开报复“扫荡”，与八路军迭有激战，7日被粉碎。日军此次“扫荡”烧毁房屋1588间，焚毁粮食51.3万余斤。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盟员宣誓决联合在华日人及士兵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月5日　　新加坡华侨领袖胡文虎领导国内外实业界集资1000万元，创设华侨企业公司，经营农、工、矿各科实业。是日在重庆举行创立会，通过章程，并选胡文虎为董事长，胡文豹、胡好、杜月笙、钱新之等为董事，李祖坤为总经理，胡好为协理。

△　建国银行在重庆开业，由上海及华侨金融巨子创办，旨在集中游资，开发生产。

△　鄂北应山、马坪、随县一带日军第三师团主力分股向岩子河、白马寺、高城之线进犯，与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激战于白庙一带。

△　第三战区钱塘江北岸部队反攻富阳县城，一度攻入城垣，毁敌仓库、营房数处，俘日军10名。

△　日机九架袭击广东肇庆，向市区投弹，毁商户10余。同日又袭击四会县境。

△　英香港当局宣布免除华人入港签证手续。

△　莫斯科至重庆之航空线复航。中苏航空董事会在阿拉木图开会商定：莫斯科至阿拉木图一段由苏联飞机负责；阿拉木图至哈密一段由中苏两国飞机共同负责；哈密至重庆一段由中国飞机负责。

5月6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何柱国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为副总司令；高树勋兼任新编第八军军长；李绳武为新编第十二军副军长；温怀光代理骑兵第一军军长；徐梁为骑兵第二军军长。

△　四川省府以广元县幅员广大，推行政令不便，是日省务会议决定增设旺苍县。

△　宋庆龄在香港筹款救伤济难，发起一碗饭运动，是日成立特种委员会。

△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称：自汪伪登场后，华北敌占区各地表现如下：一、各地一律改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旗之上角织有五角星，上书“和平反共”四字；二、各地新民会有改组为伪国民党党部说，到处开庆祝伪政府成立大会，宣传反共、国共分裂，伪称：“汪蒋合作，共同反共”；三、积极建立伪军，所有伪军改着灰布军装，并宣传打八路军，不打中央军；四、愿帮助中央军剿共，以肆其挑拨离间之诡计。敌华北扫荡计划即编伪军、积极修筑铁路、公路，建立支据点，组织抢粮队，抢掠民食。

△　鄂北日军第三师团一部窜达天河口附近，经孙震所部堵截，遂南窜刘家河。翌日，复以一部西窜占太山庙，大部南窜江家河，企图经楼子湾攻孙军侧背，被孙军阻击于高城、江家河、莺子山，西窜之敌亦被阻击于太山庙附近。

△　日机28架分批袭扰陕境，并在西安、咸阳、临潼、大荔、澄城、朝邑等地狂炸，西安死伤平民20余人。

△　是日零时，以黑龙江绥化县为中心发生地震，波及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绥化死亡124人，房屋损坏1028处。

5月7日　　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日军调集六个师团又二个独立混成旅共10余万兵力，在日航空兵的支援下，分东、北、西三方面向晋南中条山进犯。第一、第二战区所部七个军共16个师守卫中条山地区，以第八十、第三、第十七军守卫中条山西部，以第四十三、第九十八、第十五军守卫中条山北侧，以第九军守卫中条山东侧。

△　第三战区所部攻入浙东石浦，克复象山县城。

△　日机25架分批袭击湖南沅陵、辰溪，投弹数十枚。同日，28架轰炸云南蒙自、建水；32架分两批袭击重庆，在市区投弹100余枚，毁房屋100余间，死伤民众13人。

△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宫本哲治任支部长。

5月8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第八十八师团长谢晋元，并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令称：谢晋元率孤军八百守护四行仓库，“环境驱迫，异常艰困，卒能坚定不移，始终如一，洵足保持革命军人之人格，为长期抗战之矜式”，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

△　垣曲陷敌。中条山战场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分别从翼城、侯马、绛县采取中间突破法，向中条山北侧的第四十三军阵地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终日，至黄昏，日军攻陷垣曲。

△　中条山战场另一路日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在晋南张店镇附近突破第八十军、第三军、第十七军阵地，分别从闻喜、解县（今运城南之解州）及茅津渡附近向东发起进攻。

△　中条山战场第九军退守王屋镇以东封门口山区，一部于封门山以南大岭头阻击日军，以掩护黄河关阳渡口。

△　行政院发表川康兴业公司筹备委员会名单：主任张群，委员徐堪、卢作孚、黄季陆等19人。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　为配合中条山守军作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命令各部对同蒲路平遥以南、白晋铁路长治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以南诸段进行破击。

△　为策应鄂北作战，荆门、当阳、钟祥日军向仙居、远安以南阵地进犯。9日攻至仙居、安远附近，被第五战区一部击退。

△　日机34架分批袭扰粤境，在翁源、清远、英德等地投弹18枚。同日，又有18架轰炸昆明，在北郊投弹百余枚。

5月9日　　国民政府特任顾维钧为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特任魏道明为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原驻英大使郭泰祺另有任用，应免本职。

△　蒋介石出席陆军大学第十八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阐述“武德”的重要意义在于五个字，
即：“智”、“信”、“仁”、“勇”、“严”。而其中最重要者为“仁”，是为武德之本。

△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提出我军在日军进攻中的方针。指出：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

△　周恩来会见张冲，就蒋介石要求华北八路军配合对进犯中条山的敌人作战的问题，说明配合作战“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一、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二、速发军饷；三、停止反共；四、派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

△　中条山战场日军自垣曲分别向东、西两面扩张。董封东、西线之第九十八军守军抗击扩张之日军，并在董封东南之雪山围歼日军一部。

△　鄂北日军第三师团分三股向西南地窜犯，第五战区孙震所部跟踪追击，10日克复资山、唐县镇；12日攻占清潭，敌残部向环潭溃窜。

△　广州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第三十八师团一部及海军陆战队由证果向博罗进犯，11日陷博罗；稔山日军为策应博罗作战，向平山北犯，11日晚陷平山；博罗、平山之敌会合犯惠阳，12日陷惠阳。18日，第七战区余汉谋所属莫、容两部向敌反攻，19日克横沥、卒山，21日克惠阳、22日克博罗，恢复原势态。

△　日机80架分三批轰炸重庆，投弹300余枚，炸毁房屋200余栋，死伤100余人。重庆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峙、服务总队长谷正纲等分赴灾区抚慰灾胞。

△　英驻华大使卡尔在重庆接见中外记者，郑重宣布英国将封锁滇缅路纯系谣言，强调英对华政策不变。

5月10日　蒋介石暨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王宠惠等40余人宴别即将调任驻澳大使之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蒋介石致词，宣称中美两大柱石应该共同努力奋斗，以完成维护世界和平之使命，并盛赞美国积极协助中国之抗战，接济中国武器与经济，实为中国抗战之后盾。

△　重庆各界700余人开会追悼谢晋元，蒋介石派贺耀组代表致祭。

△　周恩来在张冲寓所同刘为章谈话。刘指责八路军在西北集结重兵，而面对日军向中条山的进攻不预打击，不配合友军行动。周恩来当即反驳：我军在华北及各地配合友军打击敌人，从未停止过。所获战绩，妇孺皆知，并为国际人士所称颂，何能叫不打击敌人？至于与日妥协、移兵西北、打通国际等等，纯属谣言。反之，半年来，尤其是近四个月来，反共成为高潮，辱我党为奸党、我军为匪军，到处打人、骂人、杀人，在西北更是彰明较著。当晚，刘向蒋介石报告了会见情况。谈话后周恩来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当日周恩来接毛泽东复电：已由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　中条山战场日军对封门口守军第九军之一部所属阵地实行强烈毒攻，守军中毒较多，官兵与敌苦战竟日。

△　日机54架分两批轰炸重庆，在市区投弹200余枚，毁房屋百余间，死伤10余人。

△　是日至17日，日机16架五次轰炸河南渑池县城和火车站，投弹140余枚，死23人，伤30余人。

5月11日　　蒋介石邀周恩来谈话，对周恩来表示：“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并一再要求周恩来请示延安，答复配合中条山作战问题。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配合作战计划，并要蒋介石通知卫立煌、阎锡山，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系。蒋表示应允。谈话后周恩来将情况报中共中央。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已迭电前方配合作战”，朱总已电卫立煌等表示团结对敌。“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

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

△　自7日起至是日，日机数百架逐日出动，对中条山地区我守军阵地之交通线、渡河场、通讯线路皆进行破坏。守军阵地无时不遭其轰炸与威胁，阵地摧毁，人马伤亡，补给断绝。

△　中条山战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电告蒋介石，该部补给线被敌截断，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请求急筹办法予以救援。13日蒋介石复电称：范汉杰军主力刻正分向晋（城）博（爱）及道清西段攻击，刘戡军主力已抵沁水东、西地区，希速与之切取联络。

△　中条山战场日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先攻占五福涧，后与日第三十五师团在邵源会师。至此，控制黄河北岸各渡口。

△　汪精卫宣布成立清乡委员会，并公布委员名单：委员长汪精卫，副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秘书长李士群。汪称清乡之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经济。清乡的方针是以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相辅而行。清乡的步骤是分期分区进行。16日，汪伪政府公布《清乡委员会组织大纲》。

5月12日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凡16条，规定：战时非经营粮食业之商人屯粮谋利者，或粮商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者，或粮户及农户余粮不按粮食主管机关出售者，均以囤积居奇论罪。凡囤积谷5000市石以上、小麦3000市石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凡囤积谷3000市石以上5000市石未满，小麦1800市石以上3000市石未满者，处以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下者递减有差。

△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以中条山区各军腹背受敌，补给中

断，电令各军以一部留置中条山继续抵抗，以主力突围，转向敌后攻击。

△　中条山战场由垣曲东犯的日军占领邵原、封门口一线，与从东面突入的日军会合；由垣曲西犯的日军进占黄河北岸各渡口。同日，日军得到增援后，攻占董封一线。

△　日军陷广东惠阳县城，13日陷花县。14日，第七战区所部反攻，旋克复。

△　日机15架轰炸昆明，云南大学损失严重。17日，云南省府主席龙云拨款四万元，救济修复云南大学。

△　日驻美大使野村向美国正式提出日美谈判的建议，主要内容有：德、意、日三国公约系防卫性的；中国拒绝谈判时美国应停止援华；“满洲国独立”；日本在华有驻兵权；美国对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开发应予合作等。

5月13日　　国民政府发布训令，重申严禁官吏利用权位私营商业，操纵物价，一经查获，加重惩处。

△　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14日，又致函张冲呈报蒋介石和刘为章。

△　中条山地区我军各部分头突围，第九十八军武士敏部、第十五军武庭麟部退往东北山区；第三军唐淮源部、第十七军高桂滋部突围至汾水西北火焰山区，突围中唐淮源被日军包围，自戕殉职。其余各部大部被围困在中条山中。

△　据中央社讯：江西广丰县耆绅徐浩、季桃华捐款130万元，蒋介石赠与“毁家纾难”匾额各一方，以示嘉许。

△　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为书记。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配合中条山作战，在白晋路东观镇与子洪口设伏，歼灭日军中队长以下50余名，毁汽车八辆。

△　英外相艾登在下院演说声称，英国政府“决尽力之所能及援助中国，以维护其国家之独立”。英中之间的关系“为充分合作之关系”。

△　外交部发表公告，经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商洽后，决定互换外交使节。

△　美国举行“中国周”，为中国难民募捐。

△　日外相松冈致电美国务卿赫尔，郑重声明日美会谈前提有二：一、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二、美应迅速劝告蒋介石开始对日和平交涉。赫尔对日使野村表示：日美并非是某种基础上进行协议，而是非正式的自由谈话，希望坦白表示意见，并对日方所提之修正案中删除“保证不武力南进”深表疑惑。并说据他观察，目前美国国内情势，日美会谈之进行决非容易。

5月14日　　日军封锁黄河各渡口后，是日开始向山区反复“扫荡”。中条山地区守军向黄河南岸突围，一部分突围后转向吕梁山区。第九十八军武士敏部向北突围，到达沁河以东地区。

△　毛泽东就与国民党配合作战问题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　鄂北日第三师团以数千兵力窜至兴隆集、槐树岗、随阳店一带，15日合力猛攻枣阳，16日陷枣阳。17日，第五战区孙震部反攻，克复枣阳，日军突围，向白沙河左岸溃退。

△　美大使詹森离渝抵港，新任大使高思抵沪。

△　匈牙利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5月15日　全国慰劳总会在重庆举行各界出钱劳军大会，副会长谷正纲报告，宣称此次出钱劳军共获国币368万余元，各省、市共获78万余元，总计为446万余元。此次捐款用途已定为：一、拨款200万元组织四大慰劳团，于“七七”纪念日出发，分赴各地慰劳抗战将士；二、继续举办各地伤兵招待所；三、在重庆及出钱劳军各地各设抗战将士子弟学校一所。

△　周恩来将崔可夫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崔可夫建议：速将八路军配合作战的行动计划报蒋介石；打击日军后即广为宣传，并要蒋速发饷弹。

△　美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重庆《大公报》1940年度“全世界最优秀报纸”荣誉奖章及奖状，由中央社驻美记者卢祺新接受。是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庆祝大会，王世杰致词表示对《大公报》“必尊重其自由与独立”。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大青山支队一部在陶林附近歼灭伪东亚同盟军一部，俘获人马各40余，缴获枪50余支。

5月16日　国民政府颁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案实施督导办法八条，并推定督导委员八人：党务组为邓家彦、邹鲁；政治经济组为陈果夫、白崇禧、蒋作宾、张厉生；军事教育组为丁惟汾、冯玉祥。

△　军政部长何应钦令城塞局在兰州设立仓库，储备苏联援华物

资。

△　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川中有无故阻拦食米运销营私舞弊情事，特严令禁止，“如有故违，即处死刑，军政官员如有违法，亦执法以绳”。

△　周恩来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　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出《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秦邦宪任社长。

△　日机63架分三批袭击重庆，在市区投弹200余枚，炸毁房屋百余间，死二人，伤五人。同日，又轰炸湘桂铁路沿线各地，湖南祁阳车站几成灰烬。

△　据中央社讯：山东莒县伪军莫正民部千余不堪日军压迫，全部反正；又临朐县伪军一部200余亦向鲁苏战区所部投诚。

5月17日　　国民政府令准行政院设立全国水利委员会，并颁布《管理水利事业暂行办法》，凡10条。

△　救国会主办的《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邹韬奋仍任主编，千家驹、金仲华、茅盾、夏衍、乔木、胡绳等为编委。复刊词称：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迫问题，就是根本消灭分裂的危机，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而使抗战达到最后胜利。

△　天津地毯业40余工厂约1500余人，联合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待遇。21日，罢工工人在伪政权及日军的镇压下被迫复工。

△　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中英文化协会欢宴英大使卡尔。《大公报》王芸生提议为艾登外相继续援华声明干杯。卡尔大使问：君尚疑英乎？王称：不再疑，相信英不再负中国。卡尔说：我们订一君子

协定，中不疑英，英不负中。

5月18日　美国举行第一次全国性援华运动“中国周”，14州州长及重要城市市长200余人发表宣言，吁请美国人民赞助中国救济事业联合会主办之500万元募款，以救济中国及谋中国经济之恢复。

△　据《中央日报》载：山西太原、清源等地日军一部约600余，向清源西屠东村进犯，经第二战区一部在该村附近迎击，将敌击溃，毙伤200余名，俘获30余人。

△　西藏文化促进会成立，主席罗桑坚赞报告意义。

△　日机37架轰炸陕西西安、渭南等地，在西安投弹多枚，数处起火，死伤民众10余人。

5月19日　据重庆《中央日报》载：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去年返福建原籍视察后，迭向国民党中央建言省政利弊，民情苦乐。日方闻知，以伪福建省主席相诱，陈嘉庚为此发表谈话称：此系敌方宣传之惯技，企图在华侨中播种分裂及摩擦的种子，表示决心支持国民政府，坚持团结，对日作战到底。

△　何应钦就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所拟进犯盐池袭击三边的反共计划复电表示，所拟调整该军部署甚妥，希请示朱绍良长官施行。

△　湖南省蓝山县雷尚哲热心教育，慷慨捐资约11.5万元兴学，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　川、黔间惟一之水道乌江今日开辟航线，涪陵至彭水段试航成功。

5月20日　行政院增设粮食部，国民政府是日明令特任徐堪为粮食部部长。

△　浙东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克复诸暨。

△　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同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成立，刘少奇兼任书记。

△　绥境蒙政委员会第二届全体委员大会在伊盟扎萨克旗开幕，沙王、鄂王、荣祥等出席，国民政府所派副指导长官朱绶光出席并致词，勖勉各委员应具责任心，依照八中全会边疆施政纲领努力不懈，达到自治目的。22日会议闭幕，通过议案多项。

△　上海《正言报》因刊登谢晋元及孤军营的消息，被工部局停刊两周，是日复刊。

△　日机60余架分批袭击成都、宜宾、梁山，其中21架侵入成都上空，被成都防空部队击落一架，坠于华阳县境内。

△　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任命伪上海特别市长陈公博兼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任命伪广东省主席陈耀祖兼伪广东省保安司令。

5月中旬　　八路军为配合中条山战役，向晋东南日军展开攻击。正太、白晋交通被切断；同蒲路北段之崞县、原平间铁路被破坏数段，并向忻县以北日军各据点攻击，毙敌200余。其他平绥、平汉路沿线亦遭破击。日军为防游击队袭击，大量增援垣曲、济源、阳城、晋城及晋南其他城市。

△　周恩来先后会晤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和鲁斯夫妇。他们对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民主、经济、外交等政策表示关切。

5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滇缅路基金公债条例》，凡10条，定额为美金1000万元，年息五厘，自民国三十三年起开始还本，分25年还清。

△　行政院会议通过《抗战期间现役军人子女无力求学者救济办法》。

△　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再次发布布告，强令市民疏散：一、凭居住证进入防空洞，无居住证者，得阻止其入洞；二、凡无居住证者，得拒绝购买粮米；三、不听劝导疏散，得封闭其住所；四、扩大疏散区之小本借贷，予被疏散人员自谋生计之便利。

△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称："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当晚，周恩来致函《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指出《大公报》对八路军的指责全非事实，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并要求将此信公诸读者。《大公报》在23日将此信全文发表后，轰动了重庆。

△　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克复浙江余姚。同日，第七战区张发奎所部克复粤东惠阳。

△　日机27架自鄂袭川，在梁山上空投弹多枚。同日，又有12架轰炸安徽桐城，投弹50余枚，毁民房40余间。

△　美国政府核定借予中国政府修筑滇缅铁路建筑材料价款美金1500万元，又运费美金300万元。

5月22日　第七战区张发奎所部克复广东博罗。

△　美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飞抵重庆。

△　日轰炸机25架、驱逐机13架先后经陕袭甘，苏联空军志愿队及中国空军在兰州上空迎击，击落日机一架。

△　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通过该会各处组织规程草案及工作费用支配预算等。该会设立驻苏州办事处，李士群任处长，唐生明任副处长。

△　日外务省通过《关于强化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权，下同）的紧急施策》案：一、为强化汪精卫国民政府，积极考虑第三国特别是德、意等盟国对国民政府的承认；二、日实施对重庆和平工作时，要适时和国民政府联络；三、强化国民政府的实力。

5月23日　国民政府任命罗发仁、赵巨旭、赵佩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在成都举行常务会议，议定四项方案，建议国民政府实施：一、田赋征收实物或征收军粮宜一次征毕；二、兵役宜求公平及改善；三、新县制中乡镇长与小学校长不宜合一；四、各县临参会于7月前成立。

△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商谈两国物物交换协定及其实施细则。

△　重庆《大公报》发表周恩来致张季鸾、王芸生的信，同时发表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以为答复。社评提出“国家中心论”，称“正当此时，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的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要求中共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并要求毛泽东来重庆与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

△　留港参政员张一麐、颜惠庆、李星衢、胡文虎、王云五等致电周恩来并转朱德、毛泽东，以日军大举进犯中条山，关系抗战前途甚大，关系国共合作尤大，敦促八路军在中央指定之区域内全力与敌作战。

△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捐资3.2万元，甘肃临夏县马步康捐资一万元兴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是日明令奖嘉。

△　上海全市250余家南北货号3000名职工举行联合罢工，要求资方每月发给津贴米五斗。资方派代表出面调解，同意增加工人米贴。全体工人于24日复工。

△　据《中央日报》讯：近来日军滋扰闽、浙，并狂炸后方都市，赈济委员会特加拨50万元办理浙江赈务，并拨成都五万元、洛阳10万元，救济受空袭灾民。

△　日伪军5000余人从安徽来安、滁县、六合、盱眙等地出发，扫荡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二师第四、第五旅和地方抗日武装奋起反“扫荡”，历10日结束。在盱眙车棚毙日伪军100余名；在来安地区毙伤日伪军300余名；在马坝、木店地毙日军司令铃木以下日伪军50余名。

△　山东平原县第三区伪军自卫团团长谢化武，杀死敌队长齐藤助三、翻译武占鳌及敌兵小仓等10名，率120余人反正。

5月24日　行政院召集粮食会议，制定《征收实物纲领》。

△　军事委员会任命韩锡侯为第一军军长，余锦源为第一军副军长，丁德隆为第五十七军军长。26日，任命王泽浚为第四十四军军长。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猛袭河北平山县城东南之西进村日军据点，毙伤日伪军100余名，俘日军20余人。

5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强调必须揭穿日、美、蒋之间酝酿着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指出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另立中央政府”等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

败，以利投降。

△　行政院发布命令：各机关之从业人员，如欲以私人资格兴办学校，应一律依照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筹措基金，组织校董会，经依法向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方得进行办理。

△　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克复浙江上虞。

△　美政府批准第二批对华军贷武器，价值5000万美元。

△　日军在越南海防市强行搬走栈内价值1000万美元的美国援华物资。是日法方向日方提出抗议。

5月26日　郭泰祺在旧金山致书美国务卿赫尔，希望在中国抗战胜利后，撤废美国在华特权。27日，赫尔复函称：美国对贵国之福利与进步素抱关切，贵国希望修正国际间之原则，我国业已逐渐进行。并表示愿意于和平后与中国协议而废除之。31日，美国政府公布郭泰祺、赫尔的交换函件。

△　毛泽东同朱德致电卫立煌，指出："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美国是靠不住的，日、美、华妥协阴谋必须拒绝。""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电报还称："赞同卫长官与胡宗南先生会见，时间约定后，我们即派南汉宸来洛，共商团结对敌大计。"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采取必要的办法，严格督促所属各地党组织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坚决执

行党关于隐蔽、撤退干部的一系列指示，认真的敏捷的把党的骨干力量撤退和隐蔽起来。

△　美新任驻华大使高思向林森呈递国书，28日晋见蒋介石，并递交罗斯福私函一件。

5月27日　行政院会议议决以四川为《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实施区域之一，由蒋介石亲自主持。

△　行政院会议决定，原财政部次长徐堪已改任粮食部长，遗缺以俞鸿钧继任。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中第八军分区部队袭击献县境内之陈庄日军据点，毙俘日伪军200余名。

△　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长上坂胜指挥第一大队日军500余人，包围河北定县北疃村，残杀村民800余人。

△　日机39架三批袭击兰州，在东郊投弹、扫射，被中国高射炮击落一架；同日又轰炸陕西咸阳。

△　美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讲演，宣称战争的烽火业已逼近西半球，美国必须及时起而遏止，否则坐待其来，无异自杀，并称中国与英国已全力与之搏战，吾人须加紧援助。海上自由须绝对保持。同日，下令美国已进入全面紧急状态中，全国上下应准备随时保卫国家。

△　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评论，认为英、美援华与苏联援华一个根本的不同处是：所有英、美对华贷款的抵押品是以比市价平均减低四分之一成交的，而苏联除了赠送以外，收回的那些茶砖及矿产是以市价高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高价成交的。此外还有一点根本的差异：苏联的贷款是全部用以折算军火的，而军火价目又是按低于市价八折以下核算的；而英、美的信用借款，主要是放在平衡贸易

上，不仅奢侈品大量入超，而且贷款都有它的政治目的。

△　据中央社讯：日军与汪伪组织强迫河南省境各沦陷区农民种植鸦片，公卖毒品，实行毒化，内政部特电河南省政府严切防范。

5月28日　铨叙部以物价奇昂，生计艰难，又兼以新设机关薪津优厚，公务员见异思迁，不能安心服务，而影响政务事务者殊巨，特制定限制办法三项：一、各机关不得任用其他机关现任人员；二、现任人员未经辞职照准擅离职守者以交代不清论，应即停用；三、原长官可声请任用机关停用，或声请铨叙部转饬停止使用。

△　蒋介石派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李默庵陪同英国武官戴尼斯少将等前往广西、湖南、江西视察。

△　周恩来通知郭沫若称：国民党已开始清查共产党员及左翼文化人姓名住址，准备一网打尽，请关照各同志注意。郭闻讯即分别通知在渝左翼文化人侯外庐、邓初民、张申府、王亚平、方殷、葛一虹、应云卫及乡居之夏衍、郑伯奇、阳翰笙等赴北碚开会，商讨对策。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兼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法勤在成都病逝，享年72岁。7月3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着给治丧费5000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教育部长陈立夫针对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四年级学生反对教育部改订之毕业考试制度，在重庆接见中央社记者，阐释该制度之意义，强调本年务须普遍实行，“不参加此项考试者，应以未完成毕业考试论，其有滋事或煽动风潮者，并应依法严办”。

5月29日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成立，王昆仑、王炳南、刘仲容、许宝驹、许宝骙、阳翰笙、闵刚侯、吴茂荪、侯外庐、屈武、阎宝航、高崇民等出席。会议推举王昆仑、许宝驹为主要负责人。

△　邹韬奋、茅盾、范长江、于毅夫、金仲华、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等在香港联名发表《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指出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全国“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提出主张：第一，坚持抗战国策，求其更须彻底，肃清抗战阵营中的妥协分子；第二，团结更须诚意，必须取缔一切助长分裂的宣传与行动，谋求抗日各党派间精诚团结；第三，民主政治须即实施。

△　日军调集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主力和伪军一部共四万余人，向冀东根据地围攻，东起三屯营，北沿长城喜峰口、马兰峪、兴隆等地，南至北宁线的唐山、东坨子头，形成包围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部队经过艰苦作战，毙伤日伪军800余人，军分区机关及所属部队大部突出重围，转移至丰润、滦县、迁安和平北地区。

5月30日　　蒋介石手令“中央党部内各区分部每周应切实举行小组会议，自秘书长、部长起，每一职员均须出席，并自6月份起按期举行”。

△　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检讨中条山会战失败之原因在于所部一般干部能力、士兵技能稍差，装备器材不充实，今后拟充实装备，补足器材，施行短期严格训练；增强官兵应有之技能及奇袭、突击等战法；养成自动负责、彻行命令之精神。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指出：“美国已向日本提议，叫他取消1938年1月间近卫宣言中所称‘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一项声明，假如日本遵办了，你们究作如何打算呢？这是已经轰动了全世界的问题，何以你们还一声不响呢？全国人民在等待你们的答复呵！”

△　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指示第三八六旅第十七团护送总部炮兵团去延安，在山西省清源县大凹村战斗中，毙伤日军100余人，俘虏11人。

△　日机16架由湘入桂，在桂林西南郊投弹四次，市南门外亦遭轰炸。

△　河南部分日军机场空军人员厌战，是日驾驶员德小五郎驾机坠毁，停留该机场的50余架飞机大部被炸毁，飞行员及卫兵死伤20余人。

5月31日　　美国务卿赫尔与中国特使郭泰祺发表换文。赫尔称："一俟中国境内和平恢复后，美国愿与中国政府协商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

△　何应钦接见美合众社记者称：中国已将其命运与英、美之命运联系，无论欧洲情况如何，中国将坚持其政策不变；又称，过去美对华援助尚可满意，此后希获得重炮、飞机、军火原料等。还说，"如美国与日本作战，则在战争存续中，中国愿意任美国尽量使用中国所有之航空场及其他一切航空设备"。

△　国民政府代表商震与缅甸首席参议克罗讨论滇缅公路问题。克罗提出：滇缅路滇境路面太坏，使汽车损坏增多；仰光港口内堆存中国货物颇多，希望保山有相当设备供缅印司机适当膳宿；缅车开至保山之后皆空车而返，希望中国对这些问题引起注意。

△　国民政府派程沧波为南洋《星岛日报》总编辑，潘公弼为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编辑。

△　《星岛日报》记者金仲华等四人是日联名发表《告读者书》，表示因工作受种种限制，提出辞职。香港《大公报》晚刊亦因故停刊。

△　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举行文化界联合晚会，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及重庆文化界沈钧儒等800余人出席，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致词，称苏日中立协定无碍于中苏邦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一旅于河南安阳、汤阴间破击铁路，炸毁铁桥一座，攻克日军安南村据点，毙日军80余名。

△　上海邮政局发生空前巨劫案。日本人野村及中国人梁振光将由香港中国邮局运至上海的250万元劫去，公共租界巡捕房追寻至日军军事机关后，遂得破案。

△　美华盛顿高级权威人士宣称：美国陆军现已准许陆军飞行队之专家驾驶员及机械员辞职，以便彼等来华投效，其国籍与官阶均予保留。第一批驾驶员及机械员已在赴华途中，一个月或六周内可抵重庆。

是月　上海各界响应重庆发起的出钱劳军运动，至是月前后由中国农民银行汇至重庆的捐款达41万余元。

△　周恩来、董必武会见朱蕴山，告以蒋介石还在加紧反共投降活动，国内局势仍然严重，希望他为挽救国内危局、推动抗日出力。朱遂即离渝去桂林等地推动广西及西南地方势力团结抗日，防止蒋介石向日本投降，贯彻联共抗日政策。同时，周恩来致函蒋介石驳斥“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质问蒋此举是何居心。当蒋派刘为章解释说“只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无其他用意”时，周恩来立即将刚收到的八件战报交刘转蒋介石，要中央社发表。

△　晋察冀边区青年救国会及边区学联，决议发动边区全体学生及青年，积极援助大后方学生，并号召边区一切抗日同胞响应，其具体办法是：一、发起援助大后方同学募捐运动；二、发起与大后方学生寄信运动，报导敌后青年学生、民众生活实况；三、电请当局改进国民教育，改善学生生活，保障学生青年的民主自由；四、编印关于大后方学生生活的读物等。

6月

6月1日　　何应钦接见合众社重庆特派员，宣称国共间不致公开分裂，因共产党不敢公然反对政府，并称：中条山一带仍有剧战，卫立煌已获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代表之保证，共军将扰日方之交通线，并将参加中条山之战事。何还向记者表白，称其在1933年至1935年间，“在华北本有极好的亲日机会，日本当时欲与中国签订反共公约，曾以优厚之条件诱余，谓中国参加华北反共防线，日本将取消中国之一切日本租界，取消庚子条约之规定，余拒绝考虑此项条件。因日本欲以反共为干涉中国内政，并使中国攻击友邦”。

△　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为中央社报道八路军“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之事访问周恩来，周发表声明称：八路军有战报，有战果，敢于接受敌人挑战，并告同胞“勿为敌人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全国军民应团结成一个铁拳，好击碎敌人的进攻，击碎敌人的挑拨性流言。周恩来还指出《中央日报》、《大公报》有关八路军在晋南、晋北和大洪山等地与日军作战的战报。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和第十三团在玉田县南杨家套、杨家板桥一带与日军交战，毙伤日军200余名，毁汽车四辆。八路军旋转移至蓟县南部十棵树、六道封、大小扈家庄一带，又遭日军3000余名包围，激战竟日，毙伤300余名。

△　黑龙江省政府在重庆成立，马占山宣誓就任省主席。

△　南昌附近日军千余西窜，陷西山、万寿宫。第九战区薛岳所部反击，至晚，克复西山、万寿宫。

△　汪伪中央宣传部在南京召开宣传会议，讨论今后宣传方针，宣传部长林柏生讲话称要强化和平基础，开展和平领域，实施强化治安，实现对日全面和平。汪精卫手订《宣传工作人员信条》，凡12条，强调认识所谓“和平反共建国主张为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南针”。

△　上海日总领事馆警察部统计，截至是日居留华中日侨共为

13.8万余人，较去年增加2.7327万人，其中多系浪人及毒品贩卖者。

6月2日　日机27架轰炸重庆，投弹200余枚，毁房屋百余栋，死伤民众数十人，外侨房屋、英大使馆、法国领事馆及教堂均遭炸，损失达数十万元。

△　绥西第八战区一部猛攻安北县台梁之敌，包头、固阳日军来援，乃避去。4日，日军乘20余辆汽车回窜安北，在绥包滩东店附近遭伏击，一部被歼，残敌窜逃。5日，击败台梁之敌，续在浇兔儿沟对战。7日，敌增援反扑，遭我迎击。

△　日军一部在粤东海丰、梅陇沿海强行登陆，被第七战区所部击退。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四旅于河南濮阳东南白岗集地区反击第六十九军新六师高树勋部，歼其一个营。

6月3日　重庆各界举行林则徐虎门焚毒一百零二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出席并颁发训词称："务使庄严禺城永无毒苗恶卉之存在。"

△　国民政府特任吴尚鹰为立法院秘书长，任命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　行政院会议通过《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凡10条。

△　第六十五师在晋南垣曲同善镇以东山地与日军五六千连日展开血战。第九十八军在屯高公路两侧连日与日军激战，是日续向安泽东良马镇附近及高平以北地区之日军猛攻。

△　河北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张国基去年11月率属驻防吴桥县梁集，突破日伪军围攻，父子同遭杀害，行政院是日明令褒扬，并特给恤金5000元。

△　中英、中美两平准基金委员会决定设于重庆，委员人选：中国为陈光甫、席德懋、贝淞荪；英国为罗杰士；美国为福克斯，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该会任务为稳定汇率，维持法币价值与安定金融。

6月4日　　国民政府特任张知本为司法院秘书长；调立法院立法委员程中行为监察院秘书长，任命曾彦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鲁苏战区一部袭击苏北淮安日伪军，是日攻入新城、夹城，摧毁日伪机关，俘伪军五名。

△　绥西退水渠日军在机炮掩护下，企图强渡，第八战区所部俟其半渡突予猛击，毙敌百余，残敌回窜，仍隔河对战。旋日军以20余辆汽车载兵由台梁回窜安北，在脑包滩、东店附近遭伏击，死伤惨重。

△　冀察战区第六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毕泽宇率特务团及骑兵一连约1200余人投降日军。20日，高树勋电孔祥熙称：毕投敌原因“以其思想不正，重用石逆（即石友三）余孽，群小包围，倒行逆施所致”。另外，毕曾侵吞公款190余万元，事泄不得已乃走此极端。

△　上海英商自来水公司200余名工人罢工，反对资方停发米贴，并提出六项条件，经工部局调解，资方答应工人要求，18日工人复工。

6月5日　　日机轰炸重庆，制造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案。晚，日机20余架三批轰炸重庆，历五小时，较场口隧道防空洞发生窒息惨案，死伤千余人。是日，该洞仅可容4300余人，却拥进6500余众，人、物拥塞，秩序混乱，践踏凌藉，妇孺啼号，少壮呼叫，凄惨欲绝。警报既除，洞内死尸堆积如山。当晚以26辆卡车运尸，竟日不绝，消毒除尸，臭气熏天，经旬不消。

△　《中英500万镑出口信用借款协定》在伦敦签字，规定英国贷予中国500万英镑，供中国在英镑区域内购买货物。

△　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西五省为《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实施区域。

△　军事委员会任命荣光兴为第五十五军军长。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说应同卫立煌搞好关系，这是分化顽方、争取中间势力和发展进步势力政策的中心。

△　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克复浙江象山。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一部在丰润县新军屯附近的于前庄遭日军“扫荡”部队2000余人围攻，经激烈战斗，毙伤日军300余人。

△　重庆新闻界曹谷冰、谢爽秋提议新闻界团体赴晋南视察，以了解第十八集团军在晋南的战绩。同日，《新民报》提出一面慰劳，一面视察，各界民主职业团体亦可派代表参加。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时评表示赞同。

6月6日　　蒋介石视察“六五大隧道窒息案”现场，指示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今后采取凭证入洞办法，避免死伤。

△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由市长吴国桢报告“六五大隧道窒息案”死伤状况，议长康心如提出临时紧急动议：一、请市府迅速查明肇事原因及真相，报告本会；二、查明肇事责任者，请市府严加惩办；三、请政府密切注意，勿使此类事件发生；四、请政府从优办理善后及死伤者抚恤。通过后，全体与会者前往肇事处视察，并慰问死伤者家属。

△　第六十九军新六师高树勋部等以万余犯晋冀豫边区濮阳以南温店、陈庄地区，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击溃，毙伤高部600余人，俘

副旅长以下170余人。

△　伪湖北保安队千余人不堪日军压迫，在团长陈树民等率领下，于天门县永隆河反正，被编入第五战区。

6月7日　　蒋介石为重庆“六五大隧道窒息案”下令惩办主管防空人员，令称：“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内某隧道发生窒息惨案，以致避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及兼副司令胡后翰、重庆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仍责成各该员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负责改善防护设备，以观后效。”同日，又令重庆市抚济机关对空袭被灾难民加倍发放急赈，死亡者120元，重伤80元，轻伤40元。

△　蒋介石电令军令部长徐永昌查实第一四二师、骑八师在皖怀远河溜集围击新四军第四师战绩。12日再电令李宗仁迅速查报。15日，骑八师马彪电蒋介石报告在河溜集三次围击新四军第四师战役俘获、损械情况。

△　日机32架两批袭击重庆，投弹百余枚，《新民报》社经理处、远东新闻社均被炸毁，死伤13人，毁房屋百余间。同日又袭击安徽贵池、湖南常德。

△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议决定，于9月21日分别在甘肃、陕西、福建、江西等处测摄日食。

6月8日　　蒋介石以群情要求彻查“六五大隧道窒息案”肇事原因，以明责任，令组织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指派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张伯苓、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行政院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监察院秘书长程中行七人为委员，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为主席团。又令组织防空洞管理委员会，派谷正纲为主任委员，刘峙、贺国光、吴国桢等七人为委员；组织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

会，派陈立夫为主任委员，曾养甫、徐恩曾、孙越崎等八人为委员。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彭德怀、左权等：在当前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军仍将继续进攻的形势下，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予以种种援助。

△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日寇两面政策》，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的抗战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要击破敌人这种两面政策，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协同我们的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力量，加紧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慕尼黑阴谋。

△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筹设中国文化银行，资本定额1000万元，教育部投资200万元。

△　苏嘉路日军车一列触雷，炸毁车箱五节，死伤甚重。9日苏州附近日汽艇一艘被击沉，日官兵几全部溺毙。

6月9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出席并讲话，说明重庆大隧道发生窒息一案为最严重之不幸事件，实由党、政、军同志怠忽职务所致，并称已对防空主要负责人明令处罚，要求对于重庆和后方各地现有之防空设备，加以彻底的研究检查，拟定具体改进的办法切实执行。

△　毛泽东、朱德关于晋南配合作战问题致电卫立煌，内称：“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

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其证明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指出：击破敌人“蚕食”之中心环节，在于有一套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为主。在被分割控制的地区，应善于隐蔽自己，保存自己。

△　绥西安北、固阳之日军分三路出击，被第八战区一部阻击。10日晨，日军复增援四五十辆汽车，进犯阿路胡洞及佘太召等地，被击溃，残敌向固阳窜去。

6月10日　　行政院举行会议，重庆市长吴国桢列席报告“六五大隧道窒息案”情形及善后处理经过。副院长孔祥熙提议，由重庆市政府及防空司令部分别查明救济得力人员、团体及部队，由卫生署查明得力医护人员，报院核奖。

△　国民政府以原金陵女子大学副校长、美籍女教士华群在1937年12月日军犯南京时“不辞艰险，出任救济工作，避难妇孺赖以保全者甚多”，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国联同志会、中苏文化协会等11团体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对日禁运汽油，以制止日军之轰炸暴行。

△　晋南风陵渡北赵村附近日军附炮三门，经小里镇东犯，11日，被第二战区一部阻击于芮城西永乐镇、右仁村一带。12日，窜抵芮城附近，与由陌南镇西犯之敌会合。经第一〇四师围击，大部分途回窜。

△　广东东莞日长濑大队400余人及伪军200人奔袭大岭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组织各乡自卫队占领百花洞周围高地，将日军一部包围于百花洞村内，战至12日，日军从广州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三大队主动撤出战斗。此役歼灭日伪军50余人，击毙日军长濑大队长。侵粤日军惊呼："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　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程天固向墨总统呈递国书。

△　汪伪政府在南京召开清乡地区行政会议，伪江苏省府主席高冠吾及警政、内政部次长等出席。会议决定在清乡地区实行各县联防，组织义勇警察，并调整各县警察队。

6月上旬　　在周恩来领导下作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获悉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即电告斯大林。

△　香港各界发起"人权运动"，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杂志出刊《人权运动》专号，要求释放张学良等。

△　日军在晋西北四处强拉壮丁，计在阳曲、文水已拉二三千人，宁武500余人，神池300余人，偏关200余人，集中在太原的已达三万余人。民众恐怖异常，麦熟无人收割，纷纷逃亡。

6月11日　英外交次长白特勒在下院开会时宣称：英国愿于战后放弃在华特权，并解决领事裁判权、租界等问题。

△　日机72架分三批袭击重庆，在市区投弹，死亡市民数人。

6月12日　日军一部犯晋南芮城，并与10日由陌南镇西犯之敌会合，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在永乐镇阻敌，毙敌百余人。

△　伊克昭盟郡王旗扎萨克图布陛吉尔格勒晋谒林森、蒋介石，并分访国民政府各要员，事后发表书面谈话，详叙该旗抗战以来之教育、禁政、赈济等项。14日，在重庆发表广播演讲，呼吁团结抗战，防范日寇分化阴谋。

6月1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　晋南平陆上张村日军一部窜扰平陆县城及东北之常乐镇，被第二战区第四十七军一部击溃，毙伤敌百余名。

△　日军一部犯晋南芮城，并与10日由陌南镇西犯之敌会合，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在永乐镇阻敌，毙敌百余名。

6月14日　新任粮食部长徐堪招待新闻界，称该部成立后的粮政方针为：一、田赋征实；二、定价订购，俾法币减发。又称，今后粮政之实施，不外增加生产、节制消费，在节制消费方面，今后则将禁止酿酒，配食杂粮。

△　张治中致函何应钦，指出浙东战场军政人员“腐败溺职，一击即溃”，“战区官吏上下走私，相习成风，防范既懈，绍兴城被敌便衣队占领，皆由于此。不顾国家之危亡，惟图个人之富贵，此则可痛哭流涕者也”。

△　日机34架分两批袭击重庆，在市区、郊区投弹，毁房屋百余间，“安全区”南岸亦被炸，美国大使馆武官办公厅被炸毁。美国红十

字会募款筹建的平民住宅亦中弹，毁房多间。

△　汪精卫离上海去日本，随行的有周佛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行前，汪精卫发表演说，称“欲建设东亚新秩序，必须加强信赖日本，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祖宗和后代子孙”。同日，汪伪中央宣传部发表公报称：汪精卫此行的目的，“除答谢友邦自国民政府还都以来对我之友好诚意，更谋两国亲善关系之增进外，并就两国间各种协力问题，与友邦当局交换意见”。

6月15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发表，22日续刊。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观点。

△　日机27架袭击重庆，在市区投弹百余枚，毁房屋120余间，死市民九人，伤20余人，美大使馆几全被炸毁。

△　美驻日大使格鲁赴日外务省，为日机袭击重庆殃及美国在渝财产事向日外相松冈提出抗议。同日，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亦访日外次大桥，提交日机轰炸重庆英国大使馆之抗议书。

△　据中央社讯：江西省广丰耆绅徐浩、李桃华倾其全部财产，共计130万元，捐献政府，支援抗战。

6月16日　第三届全国财政会议在重庆开幕，根据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改革财政收支系统、田赋暂归中央接管、平衡粮价、奠定专卖制度基础、实行消费品专卖等案，讨论具体实施办法。

△　蒋介石出席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及全川绥靖会议开幕典礼，并发表讲话，指出抗战时期建国工作必须完成的基本政策：一、实行新县制与推进地方自治；二、平衡国家收支，平均国民负担；三、实行总理土地政策与粮食政策。

△　四川省在重庆举行清乡会议，会期三天，会议通过改划川省

清乡区，限期完成清乡工作、整肃军纪、惩办渎职官吏及土劣贪污、严禁收编土匪、边区协剿、厉行保甲等议案40余件。18日闭幕。

△　湖北潜江周家矶日军一股窜扰莲花寺、新杨家坊等地，遭阻击，在莲花寺与第五战区李宗仁所部激战竟日。翌日，日军焚莲花寺后，退潜江城。23日，窜直路河、何老新街口进犯，遭夹击，循原路回窜。另一部日军由莲花寺犯熊口。

△　汪精卫等一行抵日本神户，17日抵东京，18日觐见天皇，并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行目的是要和日本政府讨论关于两国间各种合作的根本问题，表示深信日本朝野人士一定会执行《中日国交调整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

6月17日　监察院河南、山东监察区监察使李嗣璁提出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弹劾案，弹劾蒋克扣给养，扣发弹药，勒索贿赂，经商牟利，废弛防务，贻误戎机，以致敌人来犯，异常惶乱，战事发生仅一月，失地40县。战败后对撤退官兵又不予收容，到处搔扰，秩序紊乱，战区物资亦损失严重。

△　中英、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开始工作。18日会议决定中国委员赴后方各重要城市，考察研究一般经济情形；英美方委员赴沪、港作其他方面的考察研究。

△　驻巴西公使谭绍华向巴西政府呈递国书。

△　日军向汪伪政府工商部驻沪办事处第四次移交劫管之上海仁德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中一纱厂、上海鼎鑫纱厂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厂，至此四次共移交49厂。

6月18日　国民政府明令免立法院立法委员吴尚鹰本职，命袁世斌继任。

△　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委员福克斯在重庆接

见中国、交通、中南、大陆、浙江、中国国货、重庆、川盐、美丰、金城等银行代表20余人，商谈平准基金运用问题。

△　中英滇缅划界条约在重庆换文。文件规定滇缅边境界线，历年争持之班洪区域，猛角与猛董西部之猛卡、拱弄、拱勇、蛮回各乡，以及永广、猛梭、西盟等区划归中国，炉房归中国，其矿产由中英合营。

△　晋南日军窜扰芮城西南曹家村、南张村，被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第一〇四师阻击。翌日，阎部第一二四师便衣队将永济城日军粮弹库纵火焚烧，同时郊外阎军袭城，猛攻城东张留庄车站。

△　国民党平绥路特别党部密电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报告中共派南汉宸至榆林争取晋绥陕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共同抗日，谓：南表示两点：一、请马占山、邓宝珊、高双成诸人出面斡旋和平，此点已为邓、高所拒绝；二、榆林与共产党接壤地界维持局部和平，此点邓、高彼此委蛇，亦无结果。

△　日机10架轰炸西安，投弹数十枚，毁房屋300余间，死伤民众40余人。

△　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与日军第十三军参谋长签订《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九支队一部在黑龙江海伦县陈家店以北与日伪军发生激战。23日，该部第三支队王明贵部夜袭瑷珲县罕达气金矿，俘守敌数十名。29日，王部又袭击嫩江县伪警察队，俘敌20名。

6月19日　　国民政府令免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蒋鼎文本兼各职；任命熊斌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第一战区第十游击支队一部袭击豫北安阳西水冶镇日军，毙

伤敌百余，并将附近敌交通破坏。

△　山东地方武装部队刘景良率该部一团及海军陆战队约3000余人，向利津以东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进攻，20日，更率部南渡黄河继续猛攻山东纵队。山东纵队被迫还击，刘部多数官部不愿摩擦，纷纷反正，投至山东纵队。

△　日首相近卫设宴招待汪精卫。汪在宴会上讲话，哀叹全面和平不仅尚未实现，并且局面愈临不易。他保证克服任何困难，完成全面和平使命，并声称他来日本就是要与日本政府讨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具体办法。

6月20日　第三届全国财政会议举行大会，平准基金会美方代表福克斯及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潘文华等出席。福克斯表示该会将协助中国贸易，制止投机，维持币制，呼吁“中国各党派相忍为国”。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召开会议，就重庆“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提请政府公布真相，并依法迅速处理。

△　晋南日军出扰平陆附近村镇，被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击退，毙敌小队长宫本以下30余人。

△　山西大学师生为反对迁校陕西韩城及争取国立发生学潮。学生自治会是日发出宣言，并派代表向社会各界接洽呼吁。

△　日陆相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设宴招待汪精卫一行。东条讲话表示，日本对汪政权愿倾全力协助，要汪充分谅解各种情势及日本真意，信赖日本政府，一心向强化实力之途迈进。汪讲话表示，不问国际情势如何变化，他都要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基本条约，根据中日、“满”共同宣言的基本精神，与日本一道从速建设新秩序，以图共存共荣。

6月中旬　行政院经济会议专门委员会聘请朱偰、厉得寅、祝世

康等10余经济专家为委员，专门研究战时经济，提供具体解决方案，以备政府采纳。

△　江苏涟水县耆绅罗鸿慈年逾七旬，被日伪劫持，迫令就任伪县长遭拒，受尽凌辱，终不屈节，绝食殉难。

6月21日　　第三届全国财政会议通过接受田赋征实案。该案规定：一、自民国三十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二、田赋征收实物，以民国三十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为标准，其赋额较重之省份，得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三、征收实物，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

△　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奉命改组，原主任委员刘峙辞职，改派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社会部长谷正纲为正、副委员长。

△　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暂编第四十八师之一部向晋南赵城汾河西岸日军袭击，击毁敌碉堡二座，歼敌百余人。

△　江苏吴兴伪军王尧才痛恨日伪军蹂躏同胞，率部400余人反正。

△　汪精卫、周佛海与日首相近卫会谈，外相松冈亦在座。会后，汪精卫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日、“满”都应坚守东亚轴心，巩固东亚轴心，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

6月22日　　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同日，斯大林授权莫洛托夫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联人民进行反侵略的卫国战争。

△　冀东迁安县爪村据点之伪“治安军”一个连，在杀死连长后，携机枪二挺、步枪53支反正。

6月2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任务是：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　蒋介石在重庆约见苏联总顾问崔可夫，对苏联进行抵抗德国之战争表示关切。

△　华侨生产建设协会在香港成立，选举钱新之、杜月笙、陈光甫等11人为理事。

△　日机52架次由鄂分五批袭川。午后，宜昌南岸第一师炮兵部队乘其返回降落后，猛烈炮击宜昌机场，场内19架日机击中13架，余六架在漫天烟火中仓皇飞遁。敌我发生激烈炮战。同日，日机66架次由鄂袭陕、甘等地，在兰州市上空被击落二架。

△　日机27架自山西运城机场飞往青海西宁，在市区投弹260余枚，炸死民众43人，重伤28人，毁民房520间。

△　汪精卫与日首相近卫发表《中日协力共同声明》，宣称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向共存共荣、东亚复兴的目标前进，日本政府将进一步予以援助，使之能发挥独立自由之权能，以努力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

△　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董事长白莱恩向董事会报告称：一月来，美人援华捐款已逾100万余美元。同日，美国红十字会宣布：不久将以价值100万美元的医药用品运往中国。

△　上海《大美晚报》经理李骏英在法租界外滩被汉奸狙击殉难。7月31日，国民政府予以明令褒扬。

6月24日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闭幕，蒋介石到会致训词。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树立国家财政系统”、“树立自治财政系统”、“改进税政税制”、“实行粮食政策与土地政策”等。

△　行政院举行会议，各部、会长官到会，由王宠惠报告苏德战争及国际局势。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弥川为新编第八军副军长。26日，任命刘广济为第一〇〇军军长。

△　晋南张茅大道八政村日军一部附炮三门，西犯平陆西南张峪镇第二战区防地，第二战区一部与敌激战二日，27日，敌不支，逃往解县。

△　日机自15日起至是日连续轰炸安徽潜山、庐江、太湖等县城，共投弹47枚，毁房屋150余间，死伤民众10余人。

△　汪精卫、近卫分别发表广播讲话。近卫表示希望重庆国民政府反省觉悟，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接受日汪条约，实现全面和平。汪精卫希望日本在可能的范围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以更大的帮助，以便使中国民众对和平运动产生信任。

△　美总统罗斯福宣布援助苏联，并宣称：美人自愿赴中国、英国服务者，乃合法行动，不违背《中立法》。

6月25日　鲁苏战区所部配合地方武装袭击鲁西成武附近之日伪军，毙敌百余名，俘伪军25名。

△　晋冀豫边区长清第十区区队在反“清剿”斗争中，毙日军独立第六混成旅团长土屋马兵少将，荣获八路军总部嘉奖。

△　汪精卫、林柏生、褚民谊、徐良离东京到大阪。汪精卫在大阪对记者发表谈话称：通过与日本政府的会谈，关于中日两国的根本问题，已达到极满意的结论，他将努力实现共同声明的精神。

△　日大本营、日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关于推行南方政策的事项”，确定“推进对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的政策”，决定在“法属印度支那之特定地区，设置并使用航空基地及港湾设施，并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驻屯所需部队”。并决定如果法国政府或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不答应要求，即以武力解决。

6月26日　中国国民党驻菲律宾支部委员吴起顺遗嘱将其节丧费10万元，捐建伤兵医院，惠济军人，国民政府是日予明令褒扬。

△　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期陪都劝募成绩报告会，宣布今年3月至今募得总数为1.2亿余元，较原定额6000万元超过一倍。

△　平准基金委员会美方委员福克斯、候补委员戴乐赴沪，分别会见汇丰、麦加利花旗银行经理及中央、中国、交通各银行负责人，详细探询上海金融与币制状况。28日继续商讨金融方案。

△　汪伪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成立，将在丹阳、常州、无锡、吴县、昆山、太仓、吴江、常熟、镇江九县地区进行清乡，以建立“和平模范区域”。

6月27日　郭泰祺由英经美返国抵重庆，28日晋谒蒋介石，29日晋谒林森。

△　为粉碎日伪“治安强化运动”，晋冀豫边区邢台县调集独立营及民兵数百人，分六路出动，搜捕各村汉奸及特务分子，摧毁各村秘密维持会及敌特组织，捕获维持会汉奸、敌特分子70余名。

△　上海特一法院宣判谢晋元被害案，凶犯郝俊星等四人判处死

刑。

△　粤南第四战区一部夜袭江门一带日军，克复江门外围之大江山、凤山、鸡山、马山等据点。翌日，一度冲入江门市内，毁仓库数座。

△　汪精卫自日本回到南京，发表谈话称：这次与近卫发表的共同宣言，声明日本增强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力量，以图早日解决事变，促成全面和平的决心，表示他将竭全力，“以期共同宣言之实践”。

6月28日　　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电告刘少奇，指出：在抗日过程中，不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抗日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目的。

△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指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应运用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前线的地位，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

△　美国公布：罗斯福推荐拉铁摩尔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6月29日　　上海《申报》载：新绥汽车公司捐献飞机一中队（共九架）支援抗战，以每架按15万元计算，共献135万元。

△　日机63架分两批轰炸重庆，死伤约百余人。英使馆被炸毁，英籍馆员四人炸伤，中文参事包克本及秘书艾伦夫妇等多人受伤。30日，英驻日大使克莱琪访问日外次大桥提出抗议。

6月30日　　河南安阳伪军王自全部3000余人全部反正，并捣毁伪新民会，杀死日军及汉奸多人。

△　日机48架分两批轰炸重庆，炸毁房屋百余间，死伤10余人，被我空军击落四架。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成立，会长大西正，并发表《工作纲领》、《宣言》及《告日本士兵书》等。

△　汪精卫密电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称：此次访日，关于加强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府）的具体办法已获得日本方面同意，并已由日本借款三亿元。明日起德、意等八国即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府），盼同心协办，以贯彻和平反共建国的重大使命。

是月　　绥远省托克托县伪骑兵保安大队任殿邦率部400余人，击溃河口镇日军反正。

△　行政院会议决议筹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改私立成达师范学校为国立。

7月

7月1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并实施《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凡16条，规定：一、各省田赋征收实物，依1941年度省县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产小麦区、产杂粮区得征等价小麦、杂粮）为标准。其赋额较重的省份，得请财政部酌量减轻；二、征收之实物以稻谷为主，其不产稻谷的地方，以其收获之小麦、杂粮等缴纳；三、征收实物的单位概以市石计算，其尾数以合为止；四、征得之稻、麦、杂粮由主管粮食机关统筹支配；五、各省征收实物，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经征事项由经征机关负责；经收事项由粮食机关办理；六、征收实物应于稻、麦收获后两个月内征齐。逾期不缴纳者应予以滞纳处分。业户如有短匿粮额情事，经查属实后，即按其短匿粮额科二倍之处罚；七、如省田赋征收实物后，其积谷一

项仍照旧征收。其他一切以土地为对象所摊筹派募之款项，悉予额免。

△　全国公路由交通部移转于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接管，以何应钦兼督办，俞飞鹏、张嘉璈为会办。

△　德、意宣布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同日，外交部向中外记者宣读与德、意绝交宣言，并电令驻德大使及驻意代办撤退回国。

△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体仁为第三军军长，李世龙为副军长。

△　财政部会同交通部发行民国三十年滇缅铁路金公债1000万美元，年息五厘。自1944年起开始还本，分25年还清。

△　香港“一碗饭运动”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讲话，指出：香港的一碗饭运动含有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

△　日伪对晋绥边区开始实行第二期“治安强化运动”。派伪警备队搜捕八路军及抗日工作人员，实行并村政策和保甲连坐法，强迫群众在各村修筑碉堡和护村沟。

△　伪满洲国设立四平省，辖双辽、梨树、昌图、开原、西丰、东丰、海龙、长岭等县。省会设四平市。至此，日伪将东北沦陷区划为19个省和一个特别市。

7月2日　　外交部长郭泰祺就德国、意大利承认汪伪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南京伪组织乃为日本军阀一手造成”，德、意“乃竟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且不惜自弃其所享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一切友谊”，特正式宣告中国与德、意二国断绝外交关系。

△　美副国务卿威尔斯宣布：美国政府仍继续承认并支持合法之重庆中国国民政府，绝不承认南京伪政府。

△　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要求他们立即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就缓和两党关系进行商谈，并具体指出谈话内容应为：一、要求国民党联络参谋返回延安；二、询问释放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可能性；三、询问日苏间如发生战争国民党将采取何种方针；四、表明中共中央要求在目前及战后加强两党合作，建立三民主义国家的坚定态度，询问国民党方面的意见；五、要求见蒋。

△　重庆大隧道窒息案审查委员会经近月调查，是日发表《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书》，计死亡992人，重伤151人，儿童死亡146人。肇祸原因乃在工程之草率，管理之欠妥善。同日，军事委员会发表有关责任人员处分命令：一、免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兼职。二、任命重庆卫戍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司令。三、撤销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职务。

△　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抵达伦敦。10日，顾维钧向英王呈递国书。

△　据《大公报》载：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中西委员分头出发，考察后方及沿海经济财政实况，以为改善财政金融之准备。

△　英宣布任马尔璧少将为驻华英军司令，以继格拉塞特之职。

△　日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采取北守南进的政策，宣称：“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将坚持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依然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迈进。同时为确定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不辞对英美一战”。“如果苏德战争进展对帝国极为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南进也是为了“促进蒋介石政权的屈服，进一步从南方区域施加压力”，“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适当的时候对重庆政权行使交战权”。

△　匈牙利、保加利亚、西班牙、克洛地亚、斯洛伐克等国政府

发表声明，宣布承认汪伪国民政府。

7月3日　国民政府任命叶秋原、陈紫枫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

△　美财长摩根索与中国银行总裁宋子文商定：原定6月30日期满之中美平准基金协定，有效期延长一年，是日正式签字。

△　法国政府发言人宣布：法国对于现在重庆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抱态度并不变更。

△　上海美商电话公司所属电气部职工700余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实行罢工。14日，电话部约1000名工人集合在该公司管理处怠工援助，遭到探捕阻拦，被捕10人。后经工部局调解，释放被捕工人，16日复工。

7月4日　英大使卡尔照会中国政府，正式表示俟远东之和平恢复时，英国政府愿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

△　国民政府以香港《工商日报》社经募救国捐款达50万元，成绩卓著，予以明令嘉奖，并颁给金质奖章一枚。

△　日军一部强行在闽南诏安登陆，被第七战区一部阻击未遂。

△　日机24架袭击重庆，在市区投弹，被毁房屋数十间，死伤30余人，江北木船被炸毁20余只。

7月5日　军令部以八路军一部和山西决死队一部越过洪屯路以

南活动，与武士敏部发生摩擦，电令朱德即予查明制止，并即令撤回原防，俾互相协助，一致对外。

△　据《中央日报》讯：中国政府命令驻德、意领事馆人员与使馆人员一同撤退，并选择适当路线回国。中国在德、意之侨胞如有撤退必要，先撤至土耳其境内。

△　日机21架袭击重庆，在市区和郊外投弹百余枚，毁房屋数十间，死伤民众20余人。

7月6日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称：抗战四年来在华日军伤亡为199.4269万人，俘虏2.4082万人，缴获战车1.2322万辆，大炮1838门，轻重机枪7888挺，步枪16.5588万支，弹药1226.0466万箱，被击落、炸毁与被迫降落的飞机共为2054架，日空军飞行员死亡及被俘者共为2650人。

△　中国航空建设委员会为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手擎一元钱，向攻势空军建设的途上大进军”，“用血与铁的反攻来完成我们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7月7日　　蒋介石为七七抗战四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称“四年奋斗已开拓民族光明大道”，提出要精诚团结，提高战斗力量；发扬民族精神，树立复兴基础；把握建国重点，完成革命大业，并重申今年将是我们历史上最艰辛最重大的时期，要求今后要“以十倍艰苦积极的精神，来完成我们抗战建国的革命使命”。同日，又发表《告友邦人士书》。

△　何应钦发表《第四年抗战经过》，认为在抗战的第一期，国军几乎没有对敌人攻击，敌人使用兵力小而成功大，击退了我们许多军队，占据了我们许多地方；抗战第二期重要的战斗有南昌、随枣、湘北、粤北、桂南、南昌、豫南、中条山九次，敌人使用的兵力大，而所收的成功小。文中仍诬指“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蓄意破

坏抗战局面，破坏抗日战线，故下令解散”。

△　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发表宣言》，指出伟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不独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侵略的奋斗。提出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加强各党抗日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等10条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并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　八路军总部公布抗战四年来战绩：毙伤日军17.9702万人，毙伤伪军6.0486万人，俘虏日军官兵140人，俘虏伪军官兵4.0308万人。

△　延安各界万余人纪念七七抗战四周年，朱德、叶剑英及国民政府军委会联络参谋周励武出席并讲话。大会通过致前方将士及全国人民，致八路军、新四军，致抗日阵亡死难将士家属，致苏联人民及斯大林等电。

△　朱德发表《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能够坚持四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四年抗战的坚持，是克服了无数困难，经过了艰苦奋斗换来的。我伟大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其本身就是反法西斯战争。

△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题为《七七四周年》的社论发表。文章说，四年抗战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民族，是永不可侮的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团结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大

保障。

△　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纪念抗战四周年签名运动，各界签名者达15万人，强调抗战民主，团结一致，不能自起分裂。

△　根据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命令，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和晋冀豫行政主任公署合并为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为行署主任。冀鲁豫军区、鲁西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

△　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开幕。大会决定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申伯纯为议长。

△　日机35架分三批袭击重庆，外籍驻渝记者住宅多处中弹被毁，死伤民众六人。

△　日伪在华北开始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为期两个月，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其间，将华北所有保安警防队集中编制，华北各伪宣传机关成立“华北宣传联盟”，并在河北伪省府成立“强化治安运动河北本部”，各县设立“灭共委员会”，下设“强化治安运动奖惩委员会”。

△　汪精卫为七七事变四周年发表通电，宣称：“深信今后和平领域必能逐步发展，以及于全面，共存共荣的东亚新秩序，定可成功。”

△　英援华委员会在伦敦纪念中国抗战四周年，并欢迎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顾发表演说，强调中、英、苏应步调一致，构成坚强之反侵略阵线。

7月8日　　日机52架分两批袭击重庆，英大使馆及卡尔大使私寓中弹被毁。10日，郭泰祺特前往访问卡尔并致慰问。

△　日伪在华北成立办理劳工输出事宜的“协社”，以大量征发劳工运往日本。

7月9日　　英外相艾登就中英关系问题发表谈话，宣称：英国承认现在重庆之中国国民政府为合法之中国国民政府，表示英国政府当继续竭力之所能给以援助中国，维护其独立。

△　《大公报》载：国民政府拨款5000万元救济战区贫苦学生生活，另拨100万元、240万元救济迁川私立大、中学校学生和上海省、市私立大、中学校学生。

△　中华书局创办人、国民参政员陆费逵在九龙逝世。11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陆费逵。

△　广西省政府奉命查封桂林三户图书社及《新华日报》桂林营业所。

7月10日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各省市直接税局组织条例》，凡21条。

△　四川省献粮会自去年秋季发动捐献草粮运动以来，截至是日已捐献稻谷9.438万石，杂粮1786石，代金196万余元。

△　日机在重庆复兴关、海棠溪、相国寺等处投掷炸弹，死伤民众80余人，毁房屋105间。

7月11日　　郭沫若、茅盾、老舍等240人致书苏联科学院，响应该院向全世界文化界发出的“反对文化与科学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强盗”的号召。

△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撰文介绍《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文称：中国共产党“遵守作战政策，团结各阶级各党派以抗侵略，而外间传相反之谣言，不攻自破”。12日，上海《申报》、《新闻报》

皆加以转译。

△　据中央社讯：山东高密伪军王书斋部人枪百余反正。又高唐伪国民抗敌自卫团团长张兆坤率部人枪40余反正。

7月12日　外交部长郭泰祺复照英国大使馆，对英国政府关于俟远东恢复和平后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表示感谢。

△　《中央日报》载：中国驻英购料委员会主席王景春致函英国报界，指出：抗战四年来英、美两大友邦以充足的石油供给日本，使其用以屠杀中国人民，这是对日本推行姑息政策之结果，呼吁英、美两国再勿以石油输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战争性质问题的指示。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帝国主义国家或是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利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

△　新四军一部在苏北盐城上空击落日机一架，机师及乘客各一名毙命。据检获文件证明：该乘客系日大藏省派遣来华之要员，其任务专为调查苏北天然资源，以作日军有计划掠夺苏北之用。

7月13日　美国红十字会宣布：该会将以价值百万元之药品运华，以应急需；该会已运往中国之药品，共达350万美元。

7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中英两国关于撤销不平等条约之换文。中方文称："本月4日贵大使照会以英国政府拟俟远东和平恢复时，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根据互惠平等原则修改条约等由，业经阅悉，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此种友谊，表示深为欣慰。"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指出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和苏联保卫祖国的反德战争，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的枢纽，国际形势已发生

根本的变化。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发表抗战第四年战绩：1940年6月至1941年5月，计大小战斗2802次，毙、伤、俘日伪军官兵2.4742万人。

△　八路军冀热辽挺进军一部用计将驻白马关日军128人诱至热河省丰、滦、密地带，除八人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　苏皖边新四军一部袭击盘踞宝应西北之伪苏北国际军暂编第一集团军曹子固团，激战四小时，歼灭其大部，缴获长短枪30余支，轻机枪二挺，生俘伪团长以下130余人。

△　澳大利亚派艾格斯顿为驻华大使。

7月15日　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出任驻法大使，特派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代理行政院秘书长。

△　行政院例会修正通过《改善公务员生活细则》；批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罗家伦辞职，遗缺由顾孟馀继任。

△　军令部以李宗仁与陈诚互争鄂东游击队指挥权，呈报何应钦处理。19日，何批示："本案内情复杂，尚待研究处理办法，第一步分电双方各饬所属避免冲突，静候中央处理。"直至12月6日经蒋介石着最高幕僚会议核议提出调解办法，并以蒋介石名义分电李、陈方得解决。

△　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座谈会，座谈"苏德战争与中国外交"问题，到会300余人，并有数位苏联友人列席。会上认为苏德战争为世界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及弱小民族联合反法西斯之战争，我国应趁日寇举棋未定之时，加紧反攻，使之侵略阵线最弱之一环崩溃。

△　日新任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到达北平华北军

司令部接任视事。16日，原任日军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多田骏离北平返日。

△　日伪因宁沪沿线中国游击队活跃，到处撤毁路轨，埋设地雷，以致炸车事件屡有发生，决定自今起在该路两旁从昆山至南京之间，架设大批铁丝网架，通以电流，借以防止破坏。

7月16日　英国政府正式声明，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之政府，并重申援华政策不变。

△　日机六架轰炸湖北老河口，投弹40余枚，炸死群众123人，炸毁房屋百余间。

△　日本近卫内阁第二次提出总辞职。

7月17日　国民外交协会再电美国务卿赫尔、内长伊克斯，呼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禁油输日，以制暴日。

△　据中央社讯：缅甸华侨曾允明将自己珍藏之孙中山遗墨及先烈手札335件捐赠给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颁给特别奖状，以资鼓励。

△　日军以大小兵舰30余艘，驶达镇海洋面向镇海炮台炮击，一部日军于镇海以东地区登陆，分两路向镇海进犯，晚，陷镇海，续攻宁波。18日，第三战区守军发起反攻，克复镇海炮台及老窜山等据点，22日收复镇海，残敌登舰逃逸。

△　苏北如皋日伪军4000余人，分五路向如皋以西地区“扫荡”，企图打通如皋、泰县公路，以分割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一部与敌激战三昼夜，将敌“扫荡”粉碎。

7月18日　日机27架袭击重庆，在市区李家花园、英使馆住宅一带投弹数十枚，炸毁房屋20余栋。

△　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第一〇四师一部在晋南芮城东北地区歼灭进犯日军200余名，并缴获军用品一部。

△　近卫奉昭和天皇裕仁之命三度组成新阁，阁僚14人，半数为军人。

△　芬兰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以驻日公使伊托曼兼驻伪满洲国公使。

7月19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时宣称：英、美对日全面禁运，此实为制止日本进一步行动之最迫切而最有效之方法。

△　周恩来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身份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谈话》，驳斥中央社诬陷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军息”，指出：本日各报公布的消息不仅朱德总司令不及呈报，本人在重庆昨今两日亦未奉到军委会任何命令，所云真实程度如何，当可想见。

△　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之政治顾问拉铁摩尔飞抵重庆，20日晋谒蒋介石，并面交罗斯福及美财长摩根索函件。

△　雁北日军一部分三路“扫荡”晋西北第五分区根据地之山阴、朔县地区。同日，晋西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乘敌“扫荡”之机，攻入五寨、朔县县城，摧毁伪政权。

△　近卫致电汪精卫称：日本政府将坚持既定国策，不会动摇与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府）的关系。汪精卫复电称：“鄙人获与阁下提携反共”，“决当悉力从事。”

7月20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商谈美国空军志愿兵援华事宜。

△　蒋介石电贺斯大林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铁木辛哥

为副委员长。

△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团结起来打敌人》，指出：不管日寇内阁现作如何改组，也不管其侵略计划是先北进后南进，还是南北并进，但其灭华之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而且还有可能先实行西进。我们应该从敌人先西进作准备，才是万全之策。

△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重庆纪念成立一周年，并发表宣言，呼吁日本人民奋起，打倒远东各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

△　日机三架袭击江苏阜宁凤谷村驻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师部，炸死21人，炸伤20余人。

△　日军一部在粤东海门对岸强行登陆。

△　美华盛顿行政官员称：美国正图使蒋介石之中央军与共产党军趋于和平，俾美国助华之军备不致用于中国内战；又称：新任蒋介石之政治顾问拉铁摩尔赴华，其重要使命之一，即为使中国国内和平。

7月中旬　美国政府当局不断将石油输日，日本用以屠杀中国人民，美各界人士对此大为抨击，要求今后应多输至中、英两国，以为抵抗侵略之用。

7月21日　晋南第二战区所部克复永济、芮城、虞乡及解县。

△　第五战区所部克复鄂东广济。

△　蒋介石密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朱绍良，拟派新二十六师分驻伊盟乌审旗，以防止共党活动，并饬乌旗奇玉山司令协助。

△　河南温县伪豫北绥靖军第二旅特务团长侯志良率部1000余人

反正。

△　法国政府接受日本军事控制越南的要求。22日，越南官方通讯社称，此为日、越关系已至最后关头，吁请人民准备应付之步骤。

7月22日　行政院决定成立全国水利委员会，任命薛笃弼为主任委员，各有关部、会长官为委员，将原有之黄河、长江、珠江、导淮各水利机关均归并于该委员会。

△　《新华日报》刊登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第二次谈话。谈话列举大量事实，对中央社连续三天发表的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消息，严加驳斥。

△　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从北平出发，飞往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视察第一线之部队。

7月23日　据《中央日报》载：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自去年7月23日成立至今，共劝储总额超出四亿元。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八旅第二十二团一部袭入河北肥乡县城，毙伤日军30余人，俘伪军114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战马80余匹。

△　日军一部“扫荡”北岳区平山地区，在温塘镇西北的孤山“驴山”中，制造惨案，屠杀800余人。

△　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孔祥榕在西安病逝。

△　据《大公报》载：缅华侨救灾总会为加强祖国战时运输，特发起侨胞献车运动，已获缅币30余万盾，购得最新式卡车150辆，不日即献给政府。

△　美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在洛杉矶发表演说，呼吁救济

中国难民，并称此为“美国保持自由之前哨”。

7月24日　行政院鉴于近月来物价高涨，中小学教职员所得薪给难以维持生计，多呈不安现象，是日特令各省提高中小学教职员待遇。

△　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第四十三军一部进犯晋冀鲁豫边区安泽县境，25日杀害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二一二旅派往联络之参谋张子盛。冀鲁豫军区遂起而讨伐，歼其1000余人。

△　据中央社讯：陪都突袭救济委员会决定对“六五隧道窒息案”死伤难胞家属加倍发给赈恤费，并对于死伤难胞家属中鳏寡孤独，无人抚养者特规定特别救济办法及捐款分配原则。

△　日中国派遣军新任总参谋长后宫淳由上海飞抵南京。

△　罗斯福因国内外强烈反对美油输日发表声明称：“美国过去之准许日本在美购得油类，系一种姑息手段，以防止世界战争延及南洋。美国苟不出售油类与日本，则日本在一年前即已对荷属东印度采取行动。”

7月25日　外交部长郭泰祺为日本攫取越南南部之海、陆、空根据地，扩大对越南之侵略发表严正宣言，指出：日本此举不仅继续威胁中国西南边境，而且危及西太平洋其他国家之权益与领土，表示我国必尽责反抗日之侵略，并促请各国共同注意。

△　驻美大使胡适访美副国务卿威尔斯讨论远东局势，胡指出：“日本将利用霸占越南根据地进攻中国西南边境、缅甸及滇缅路，希望美国及其他友邦采取最强硬之经济压力，制裁日本。”并称：中国现正竭力增强可能遭受日本攻击之各种防务。

△　中、英、美分别发表声明，谴责日军侵犯越南主权。

△　冀鲁豫军区发起讨伐山东地方游杂部队齐子修部的战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茌平小马庄歼齐部两个团大部共1000余人。

7月26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宣称：越南全境既已成为日军之占领地域，中国为自卫计，自当采取必要措置以应付此种局势。并称：罗斯福总统已宣布封存日本资金，此实为美国之贤明政策。

△　驻英大使顾维钧与英外相艾登进行秘密会谈，商谈日占越南后对于中国、缅甸、马来亚及荷印之影响，以及如何采取最强有力之办法以防患于未然。

△　国民政府任命徐谟为驻澳大利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陕西省政府：原陕西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孙绍宗，原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王德溥，委员张炯辞职照准；委员杜斌丞、周伯敏另候任用，应予免职。任命凌勉之、辜仁发、寇遐、刘楚材、马凌甫、李元鼎为陕西省府委员，凌勉之兼建设厅厅长，彭昭贤兼民政厅厅长，并免去彭昭贤原省政府秘书长职务。

△　美总统罗斯福下令封存日本在美资金，并循中国政府要求，封存中国在美资金，以免日本夺取。同日，英国亦封存日本在英资金，并宣布废弃英日商约。

△　美任命麦克阿瑟为远东总司令。

7月27日　据《中央日报》讯：国民政府以战时兵险业务关系补偿国家战时损失，保障后方生产安全，经由财政部拨发专款2000万元交中央信托局，专为办理战时运输兵险及战时陆地兵险业务之基金。

△　周恩来出席重庆文化界人士的聚餐会。会上，赞扬日本作家绿川英子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　日机80架分三批自鄂袭击成都，投弹数百枚，《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经理申同和罹难。

△　日军一部在山东日照东北登陆。

△　英国应中国政府之请求，封存中国在英资金。

△　德、意最后一批外交官撤离中国，德、意大使馆正式封闭。在其撤离前，何应钦、朱家骅等设宴欢送德代办及海通社驻渝社长等多人。

△　罗马尼亚驻日公使兼驻南京汪伪政府代理公使巴布列斯哥抵南京，30日向汪精卫递交“国书”。

7月28日　蒋介石以成都等地屡遭日机袭击，灾情严重，特电四川省主席张群查讯详情，并拨款10万元交张转发，以资救恤。

△　财政部当局为英、美封存中国资金事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友邦封存我资金意义极为重大，从此我可彻底管理外汇，停止游资非法活动，财政经济基础亦因而更加巩固。”

△　军事委员会任命程树芬为第七军副军长；任命莫德宏为第四十八军副军长。

△　日机90架分批袭川，分别在重庆、成都、自贡、泸州等地投弹，被我军在璧山击落二架，多架受伤。

7月29日　日机90余架分四批飞川袭扰，一批往自流井投弹，三批袭击重庆，市区警报达九小时。敌机在新市区一带投弹，苏联大使馆部分被炸，英国大使馆又遭震炸，市民伤亡共20余人。

△　行政院会议通过粮食部制定的《省粮食局组织大纲》，并任命刘航琛为四川省粮政局长。

△　第四战区一部与在粤南西营登陆之日军激战，在赤坎将日军击退。

△　新四军黄克诚部与日军在苏北东沟、益林激战终日。韩德勤第八十九军突以六个团之众猛攻黄部益林阵地，配合日军向新四军“扫荡”。30日，韩部另一部在刘家镇袭击新四军后方供给机关，同时袭击陈家集伤兵医院，惨杀新四军伤病员100余人。

△　日机六架轰炸安徽旌德县城，投弹12枚，炸死43人，炸伤74人。

△　日本将东北及沦陷区之英、美资金全部封存，以报复英、美之封存日本资金。

△　汪伪教育部中小学训育实施委员会制定《中学训育方针及实施办法大纲草案》，规定：对学生要进行反共睦邻思想和和平建国国策教育。

7月30日　日机130架轰炸重庆。美“图图拉号”炮舰、南岸美大使馆、美孚石油公司遭炸，拉铁摩尔住宅亦遭震毁。美驻日大使格鲁奉命向日外务省提出抗议，美国会议员要求立即报复。

△　据《中央日报》讯：日军为警戒苏联，原拟抽调在华军队40万人，但因事实之困难，仅抽调10万人，分批运赴榆关转往东北。

7月3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贺维珍为第三十一军军长，黎行恕为副军长。

△　日军1500余人对大青山根据地武川东北之五塔背、银矿山地区进行“扫荡”，烧毁银矿山周围之30多个村庄。8月7日日军撤退。

△　日机九架袭击鄂北老河口，投弹20余枚，伤亡民众10余人。

△　上海伪组织准备于8月1日举行德、意承认汪伪政府汽车游行和提灯会。主持者于是日晚在南市老北门被爱国者枪杀，流弹伤伪宪兵一名，游行亦告解体。8月1日，西区兆丰公园附近奸伪准备结队游行，突有爱国青年一人，胸缚炸弹，猛撞主席台，炸弹立刻爆炸，奸伪死伤甚众，该青年亦以身殉难。

△　日本强迫泰国建立军事合作，并加入其“东亚共荣圈”。8月1日，泰国宣布承认伪“满洲国”。报界称：此举乃表示泰国决心脱离英、美阵营，参加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计划。

△　美副国务卿威尔斯声称：日本业已正式向美国承认日机空袭重庆美国“图图拉”炮舰被炸案，并向美国政府道歉，赔偿损失，保证不再攻击美国在华资产，因此宣布此案已告结束。

是月　国民政府公布《粮食管理纲要》，规定粮食的价格应限于某种伸缩范围之内，其低价应以生产成本为准，其高价应在合理利润之下，而不使囤积者争先储存。

△　国民政府制定《管理粮食治本治标办法》，分为治本办法和治标办法。治本办法共八条，规定：各县粮食管理委员会应速算明白市场需要之最低粮额，向县中地亩较多的粮户及农户分别纳定售出，但仍为各户保留足以自给之相当粮额，收租愈多者应售出愈多，勿使富有者保留过多，无力者负担过重；县政府会同征收局速查明农户、粮户之地亩，并办完约定售量；凡经规定限期出售的粮食，逾期不售者，均应半价征购，其规避藏匿者应予没收或按应有粮价科以罚金；凡购粮囤积超过自用范围或粮商囤积未售者，限期全部陈报出售，逾限不售应予没收；凡反抗粮食管理者以扰害治安论罪，并由军法审判。治标办法共五条，规定：办竣军粮，与人民了清一切手续；劝令藏粮在300市石以上的粮户售出一部分，由县粮管会支配销售市场或零售；各县凡发给抗战军人家属优待谷一律自12月1日起改为发给现款，此项现款由省府确定原则，令各县筹集。

△　晋察冀边区冀中行署在日伪军事“扫荡”的炮火下，发动安平、武强等县28区7000军民坚持46天，完成修建滹沱河堤防工程。

△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取缔书刊一览》，计查禁书刊961种。

△　胡文虎等华侨为联合英、美，防止日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出资5000万元设立南洋企业公司，总公司设新加坡，分公司设西贡、曼谷、马尼拉、仰光、香港等地。该公司与英国战时经济部取得密切联系，以防日商在泰国、越南、荷印、马来亚等地获得橡胶、锡及其他军需资源，同时将这些资源供给英、美。

△　旅芝加哥华侨千余人积极赞助祖国工业合作运动，至是月共捐款达100万美元。

8月

8月1日　　蒋介石发布命令，将陈纳德指挥下的美国志愿空军正式组成中国武装部队（即飞虎队），由陈纳德任总指挥。

△　国民政府正式接管中德合组之欧亚航空公司，董事长为何墨林。

△　全国各省为筹备实施田赋改征实物，分别成立田赋管理处。

△　胡适在华盛顿对中央社记者称：罗斯福总统之禁油新命令，“实为一极有效之武器，对于民主国家为自由而战之全部目标，将有重大裨益”。

△　第七战区所部克复粤东潮阳。

△　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为粉碎日伪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发动对日伪闪击宣传的政治攻势，共出动武装宣传队95个，携

带传单、报纸等宣传品50余万份，深入敌占区散发。

△　新四军第三师一部收复苏北阜宁、东沟、益林等市镇，迫使“扫荡”的日伪军退胡垛。同日，该军另一部攻克日伪据点郑潭口，全歼伪支队长孙礼涛以下官兵800余人。

△　友森、松本、海田等21名日本人在延安发表声明，参加八路军，誓为打倒日本法西斯而奋斗到底。

△　汪伪首都宪兵司令部成立，申振纲任司令。同日，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成立，陈公博兼保安司令。

△　上海英联船厂3250余名工人因物价高涨，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三至五成等要求，因资方拖延不复，是日全体工人实行罢工。经过谈判，资方被迫答应增加工资二成，3日工人复工。

△　罗斯福颁布特别命令：除英国及其他抵抗侵略国家外，严禁马达燃料油及飞机用油出口，并宣布封存国内生丝存货。

8月2日　　外交部长郭泰祺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越、泰屈服日本及日军南进表示关切，主张英、美加强对日采取经济制裁，对昨日罗斯福宣布禁油输日表示钦佩。

△　驻河北安国、定县日伪军700余人在松尾大队长率领下，向安国县马阜才一带进犯，八路军冀中军区一部奋起迎击，毙敌192人，伤37人。八路军亦伤亡130余人。

△　“扫荡”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的日伪军开始向南总退却，转移至苏中区“扫荡”。新四军第一师连续收复姜堰、黄桥等地。同日，陈毅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师应作好苏中地区反“扫荡”工作的具体布置。

△　在华日军机关报《新申报》刊称：“越南问题解决后，日本之

政治闪电将转向泰国”，并称：“日本及‘中国’现准备对支持旧秩序者血战”，“摧毁一切建立新秩序途中之障碍。”

△　韩国光复军第五支队队长罗月焕奉韩国临时政府命来重庆述职，并报告该部前方工作情形。按：罗在中国北战场组织韩侨参加对日作战，并深入敌后从事破坏工作，二年以来成绩卓著。

8月3日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在山西忻县东南之杨家塔击落日机一架，驾驶员等三人毙命。

△　伪华北防共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任委员长，下设各级防共委员会。

△　上海虹口日商经营之东亚烟厂第一、第二厂工人2600余人要求改善待遇，遭厂方拒绝，实行怠工。

△　美大使馆留北平外交人员以日军在北平东站拒绝运输美籍人员行李，干涉邮务，监视青岛之美籍工厂等反美活动，向日大使馆提出抗议。

8月4日　　郭泰祺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近来国际形势，指出：“日本是侵略集团链锁中最弱的一环”，“只要民主国家坚持并加强对它的经济封锁，它就会走向崩溃之途”，“民主集团的胜利一定会从远东开始，毫无疑义。”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指出：对敌军展开瓦解工作，加深敌兵厌战怠战情绪与思家思乡情绪，以促进其觉悟。对于所有敌人俘虏，一经解除武装，无论官兵、特务、宪兵等，一律不准杀害。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强调对不同的伪军采取不同的政策，总的原则是争取同情分子，控制两面派，打击坚决作恶分子。

△　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车务部工人举行罢工，要求中外

职工加薪享受同等待遇。5日，资方强迫工人开出20多辆电车。6日，逮捕10多名工人，并扣留了谈判代表。经多方交涉，法捕房释放了谈判代表，资方同意加薪30％左右，并释放被捕工人。工人乃于8月7日复工。

△　著名作家、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在香港病逝。11月9日，新加坡中国商会举行许地山追悼会，各界代表300余人前往致祭。

△　日机九架沿长江西犯，在巴东更番一带投弹40余枚，毁民房数十间，死伤民众10余人。

△　东亚记者大会在广州举行，日本、汪伪政府和伪满洲国等方面的新闻记者参加。汪精卫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要新闻界加强拥护《中日条约》和中、日、“满”三国共同宣言的宣传，努力实现共存共荣的东亚新秩序。

8月5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任命高阳为国立广西大学校长，原任校长雷沛鸿免职。

△　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攻克长山城。

△　驻北平东部地区伪军三个中队200余人在第二中队长何贵有率领下，向八路军一部投诚。

△　日伪军为搜捕八路军回民支队长马本斋之母，包围其家乡河北河间县辛庄扑空，乃集中全村男女老幼威逼，马母见村民受难，挺身而出，被解往河间县城，敌迫其写信劝马本斋投降，马母严词拒绝，后绝食而死。

△　日军200余人于夜间包围河北曲阳县西野北村，6日拂晓强迫村民召集开会，日军以机枪扫射，当场死百余人，伤四五十人，对重伤者再用刺刀挑死，对逃入室内者用火烧死。

△　美保安部长麦克拉特谈远东局势，认为远东地区应由A、B、C、D（即美、英、中、荷）四国组成联合阵线，方可阻止日本之侵略。

△　泰国宣布承认伪满洲国。27日，丹麦亦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8月6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以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团组成南进支队，由周希汉、聂真率领南下岳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　日机袭击湖南长沙、湘乡、湘潭、宁乡、浏阳等地；同日袭击湖北、陕西宝鸡、凤翔，安徽立煌（今名金寨县）等地，在立煌县城投弹五枚，毁民房10余间，死伤民众数人。

△　汪精卫在广州发表广播演说，声称：中日提携，共兴东亚，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　美政府下令解封中、日、德、意人民在美国的资金。

8月7日　　美财长摩根索宣布，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售予中国政府灰色棉布1000万码，以供制造军服之用。同日，美国医药援华会宣称：将以美金22.8712万元供中国医药救济之需，其中一部分将用于建筑救护站，以救护重庆空袭中受伤之民众。

△　东亚记者大会结束，决定筹备成立东亚新闻协会。汪伪中央宣传部长、通讯社长林柏生在闭幕会上声称东亚各国“联合则存，相争则亡”，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共存共荣的东亚新秩序。

△　日方宣布是日起满洲与关东洲生产之玉米、大豆、铝、木炭、花生油等18项物品免税输入日本。

8月8日　　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十七团、第三十九团各一部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袭击湖北孝感县城，全歼孝感日军宣抚班，毙

伤日伪军40多人，俘日军八人，并烧毁伪县府及汽车站内10余辆汽车。

△　据中央社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三年来，除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及事务所，负责指导各地工业合作事业外，现受该会直接领导的工业合作社计1700余个，社员3.5万余人，贷款总额1500万元，每月生产总值2000余万元。

△　日机100余架轰炸重庆，“143”、“180”两防空洞被炸，死162人，伤87人。事后，蒋介石拨抚恤金10万元，并奖勉冒险工作的防护团队。

8月9日　　据《中央日报》讯：国民政府以馥记营造厂经理陶桂林承办国民大会堂建筑工程，将应得酬金16万元全部捐献国家，支援抗战，予以明令嘉奖，并颁给金质奖章一枚。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太岳决死第一纵队配合民兵攻克山西安泽县城。

△　日机63架分三批袭击重庆，在市区投弹多枚，毁民房数十间，炸死民众10余人。

△　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决定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在1941年度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专心集中注意南方。为此，作出如下部署：一、以在“满洲国”和朝鲜的16个师团严格执行对苏联的警戒。二、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三、对于南方，以11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

△　日外相丰田对意大利史蒂芬通讯社独家发表谈话，宣称：日本现正与轴心国家合作，在欧、亚两洲打破各国对日本之包围政策，并称：日本之南进政策完全为和平性质，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惟若在日本利益范围内发生任何事件，日本自不能漠视。

△　上海汪伪《中华日报》馆机器房被爱国者投硫磺弹三枚，燃烧达三小时，房屋机器全部焚毁，并炸伤工头及职员各一人。报纸因此改出半张。

△　奉命视察中国及远东各地的美外交界闻人吴德洛，在新加坡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呼吁美国政府援华，并称：中国抗战必胜，且将成为吾人建立世界新组织最好之与国。

8月10日　日机100余架乘夜袭击重庆，死伤20余人，外国记者招待所、监理会会堂、英大使住宅及安息会等处均中弹遭炸。同日，日机26架袭击昆明，投弹百余枚，毁房屋百余间，死伤10余人。

△　河北遵化伪警察大队300余人，被强迫开平北地区进攻八路军，其第二中队队长何有率部160余名反正，投奔八路军。

△　日军接管东北部分铁路，以运输东北境内40万日军之给养，并限令外侨于18日离境。

8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兼组织部代副部长、军委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在重庆病逝。翌日大殓，蒋介石派贺耀组主持葬礼。13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电唁张冲家属。10月9日，国民政府特予明令褒扬。

△　日机百余架袭川，先后在重庆、宜宾、成都、自贡、涪陵等地投弹。九架驱逐机袭成都时，驻成都空军部队起飞迎战，高射炮配合射击，日机数架受伤仓皇逃窜，一架坠毁广安太平场。

△　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以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后改为决一旅）及第二一二旅组成太岳纵队，以陈赓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

8月12日　国民政府设立外汇管理委员会，特派孔祥熙兼任委员长，派俞鸿钧等12人为委员，并指定俞鸿钧、陈辉德、陈行、贝祖

贻、席德懋为常务委员。

△ 应国民外交协会之请，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重庆作来华后之首次讲演。拉氏将中美两国之异同作了比较，认为中国不但要打败日本，而且在胜利后必能建立平等自由之民主国家，此将为东亚数千年来历史极伟大之现象，并称："中美两国将来永不能分手，必合作到底。"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复晋西孝义县城。

△ 苏北新四军第三师一部收复盐城。

8月13日 蒋介石为"八一三"四周年纪念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称：现在世界局势"侵略暴力与反侵略力量之分野已日益分明"；"太平洋上的形势亦益紧张，此即为日寇愈益接近其崩溃末日之征兆"，"我中国为直接受日寇侵略之当事国家，耻辱未雪，责任特重"。

△ 航空委员会为纪念第二届"空军节"，公布四年来空军战果，共击落日机1500余架，毙日空军1200人，俘69人。

△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南方部在香港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立即召集各党派、各人民职业团体、国内外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集中全国意见，共商国是等14项主张。

△ 日机一周来不分昼夜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失眠。是日，日机86架又轰炸重庆，在蒋介石曾家岩住处三度投弹，均未命中。

△ 日机25架袭击西安，在市区狂炸，死伤市民10余人。同日，日机27架又袭击昆明，在市中心区投重磅炸弹多枚，英国教会寺院、民教馆及女青年会等均被炸毁。

△　驻广东饶平县海山伪军黄大伟部连长朱贵安、萧景山不堪日伪军压迫，率部40余人反正。

△　日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调集日军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三十二、第一一〇等师团精锐部队和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等混成旅团，以及一部分伪军共10余万兵力，发动所谓“百万大战”，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攻。是日，集中平汉路北段宛平迄高碑店日军万余，分13路出动，开始向平西作大规模扫荡，沿途封锁交通，企图将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八路军主力合围于长城两侧而歼灭之。晋察冀军区开展反扫荡作战，将主力转移敌后，由游击队、民兵阻击困扰，致使日军经过半月到达中心区时，一无所得。

△　陈公博发表广播讲话，题为《和平的目的是分担东亚的大任》，要求中国人民停止抗日，参加和平运动，并希望日本以实力协助中国实现自由、独立和自强。

△　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华侨举行空军节纪念大会，并捐献100万元，支援祖国建设新空军。

8月14日　国民政府明令修正《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施行期间，着再予延展一年。

△　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王世英，指出王靖国即将东进中条山，显然是制造晋绥军与八路军摩擦的阴谋。指示王世英去见阎锡山，请阎保证王靖国东进后不反对八路军，保持八路军与晋绥军的良好关系。

△　日机27架袭击昆明，在市区投弹数百枚，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办事处等均中弹。同日又袭击湖北恩施，投弹10余枚，死伤三四人。

△　南昌以南日军一部由上谌店等地出犯，第九战区一部夹击该敌，毙伤敌200余名。

△　前广东省新会县县长李勉成因私收钨砂，图运出口，并勒索群众财物等，被判处死刑，是日执行枪决。

△　罗斯福、丘吉尔于8月9日至12日在大西洋美国巡洋舰上举行会议（又称大西洋会议），是日发表共同宣言（即《大西洋宪章》），提出“两国不求领土或其他方面之扩张”等八项原则，并提议在莫斯科举行美、英、苏三国会议。

△　英国政府下令禁止一切货物输日。

8月15日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日机本周来迭炸中国大后方城市，尤以轰炸重庆最为频繁发表谈话，认为日军此举之目的欲使我屈服，实属幻想，只不过锻炼了吾人体魄之敏捷化，加强了吾人之敌忾心，我方一切工作仍照常进行，未受丝毫影响。

△　蒋介石以日机连日轰炸重庆，空防人员奋勇出力，特拨款30余万元，交由防空司令部转发犒赏。

△　据中央社讯：罗斯福、丘吉尔发表共同宣言后，中国官方人士均表示欢迎，认为此宣言对于加强一切反侵略国家之合作，尤有绝大贡献；对于完成解除侵略国家武装之目的，乃为一种不可缺少之措施。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日军兵士宣传问题的指示，指出：德国进攻苏联，孤立了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国内国外形势更加恶化，应向日本兵士宣传：一、日本国势孤立，在中国的战争迅速结束无希望，胜利更不可能；二、如日本打苏联，日本一定会失败，日本士兵的前途只有死亡；三、日本士兵的出路是要求回乡，不与中国人民、苏联人民相屠杀，不作军阀的炮灰。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克河北广宗县城，歼敌80余人。

△　日机轰炸云南下关，福建南平、建瓯，四川万县等地，驻万县空军击落日机一架，敌领队长横田以下四人毙命。

8月16日　日机17架袭击湖北老河口，在市区投弹百余枚，死伤平民30余人，毁房屋多间。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特任梅思平为实业部长，丁默邨为交通部长，李圣五为教育部长，赵毓松为司法行政部长，诸青来为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傅式说、李士群、陈君慧、赵尊岳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周佛海兼任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李士群为军事委员会统计部长，邓祖禹为中央警官学校校长，赵正平兼国立上海大学校长。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粤办公处和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成立广州绥靖主任公署，特派陈耀祖为广州绥靖主任。

△　刺客六人因对汪伪政府借改组削弱周（佛海）系势力不满，乘夜袭击汪精卫寓所，击毙卫队四人。

8月17日　外交部为美、英《大西洋宪章》发表声明，称："中国确信世界侵略势力之最后消灭，其捷径厥为加强远东之包围，首先击破日本。"

△　中共中央就新四军行动方针问题电告陈毅、刘少奇：新四军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济深、白崇禧也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

△　行政院与军委会合组之青康考察团由重庆出发，团长王应榆，团员有各部门技术人员20余人。

△　日机连日袭击福建，是日先五架袭建瓯，美天主教堂中三弹，毁房屋10余间，又五架袭三元、南平，投弹10余枚，毁民房10

间，死伤10余人。

8月18日　　国民政府发言人蒋廷黻招待中外记者，谈国内外局势，称美、英《大西洋宪章》为战后世界改造之基本纲领；并称战后世界的改造，中国继续有所新贡献。

△　蒋介石以日机轰炸重庆，两处防空洞被炸有伤亡，特拨款10万元，交由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从优办理伤亡，抚恤家属。

△　国民政府令免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职，明令褒扬故陆军中将梅焯敏。

△　居正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筹组慰劳团经过，谓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配合军事动态，择期分赴各战区慰劳抗日将士。

△　延安《解放日报》评《大西洋宪章》，指出该宣言“是反对穷兵黩武的纳粹侵略的战斗纲领，是一切爱好自由民主的民族所应加以赞扬的”。同时批评宣言中美国对日政策“仍未关闭姑息政策之门”。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南下支队一部克复山东堂邑之吕集、杨庄、曹村、燕店、马厂、豆村等日伪军据点，共歼灭日伪军700余人。

△　上海华懋饭店、华懋公寓、成都饭店、汉弥尔登公寓等400余职工因物价高涨，要求加薪，而资方勾结法捕房逮捕20名职工，工人乃实行联合罢工，并向各方请愿，呼吁援助。31日，法捕房巡警至华懋饭店，以煽动工潮为名，又逮捕职工20余名，全体职工继续罢工抗议。9月3日，工部局派员调解，资方答应工人的增薪要求。4日，工人复工，全体被捕工人亦获释。

△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在悉尼中国商会发表演说，称中国乃世界上最伟大之长期战争支持者，澳洲具有种种信念，相信中国必能力撑危局，获得最后胜利。

△　上海汇丰银行依据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之训令，开始运用平准基金办理外汇，是日宣布法币新汇率，并宣布惟有美金及英镑区域运货入中国销售之商人，方能以新率购买外汇。

△　日外相丰田告美大使，盼两国首脑早日会晤，并称俟中国问题交涉解决，即自越南撤军。

△　丹麦承认汪伪政府及伪满洲国。20日，外交部宣布与丹麦断绝外交关系。

8月19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各省编制民国三十一年（1942）度岁出概算要点10项。同日通过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辞职，由梁颖文继任。

△　胡适访美国务卿赫尔，递交中国政府赞同罗、邱宣言的照会，并交换关于远东问题之各项意见。

△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指出：罗、邱宣言及提议召开莫斯科三国会议，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时指出宣言未提及日本，其中第四条暗示可与日本通商及供给原料，第七条表示愿与日本妥协的一面；号召中国各党派“应该善处此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团结一致，向好的进步的方向努力”。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重为大后方青年呼吁》，指出：目前大后方的学生仍受到生活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压迫，影响到许多著名的教授，如李达、千家驹为广西大学解聘，吕振羽为复旦大学解聘，沈志远、韩幽桐在国立西北大学被迫去职，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先后在朝阳大学被迫去职，甚至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去年12月6日在重大为宪兵捕去。

△　日机袭击四川忠县，被我空军击落一架，坠于奉节附近，驾驶员七人殒命。返航经万县时，又被我高射炮击落一架，驾驶员松本

等七人全部毙命。

△　川康兴业公司召开首次筹备会议，主任委员张群、副主任委员黄季陆均参加并主持会议，宣布公司官股4000万元已拨定，商股募集办法亦已商定。

△　汪伪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改组伪浙江省政府，任命傅式说为省府主席；改组粮食管理委员会，特派梅思平任主任委员。

8月2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潘文华为第五十六军军长。21日，任命詹忠言为第一〇〇军副军长。

△　日军用车一列在嘉兴附近触雷爆炸，毁机车及车辆二辆，毙伤日军200余名。

△　苏商时代出版社《时代》中文杂志在上海创刊。

8月21日　行政院公布《非常时期工会管制暂行办法》，凡15条，规定：限令具有工会会员资格之工人依法入会，并随时考查，违者依法处分；工会理、监事不称职者，得调整或变更其职务；依法派遣曾经训练合格人员充任工会书记，必要时得派遣指导员督导工会之会务；分期调集工会理、监事或会员实施思想、生活、业务等训练。

△　河南省南阳县人民宋子灵、宋杏甫、宋明卿等于日伪军犯境时集合志士，奋勇守土，死难及伤残近百人，遂将敌人击退。是日国民政府予以明令褒扬。

△　据《大公报》讯：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向广西、云南、甘肃、陕西、广东等省贷款1000万元，用于各该省发展农田水利。

△　上海码头工300余名要求增加工资宣布罢工。捕房派探捕一队前往镇压，工人以铁棍、石块抵抗，探捕开枪，双方均有所伤，工人

死一人，被捕数人，罢工工人增至1200余名。同日，上海450家印刷公司万名工人要求加薪举行罢工。

△　日第十一军命令所部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师团和早渊、荒木、江藤、平野等四个支队，以及工兵、炮兵、战车、海军、空军等约10万人，向岳阳以南地区秘密集结，准备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

△　日大藏省宣布：自明日起发行新的“中国事件公债”，定额为六亿日元。

8月22日　军事委员会公布一周来日机轰炸川中各地被中国方面击落的情况：共击落敌机三架，部队长横田等15人殒命。

△　日机135架分批袭川，81架在重庆市郊平民住宅区及文化区投弹，毁民房百余栋及学校教室、宿舍、膳厅数十栋，安息会中弹被毁，商务日报馆被震毁。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赈济委员会委员查秉钧，并发给治丧费3000元。

△　日情报局发言人石井招待记者时称：满洲国与外蒙在诺蒙坎地区之界线300公里已经和平划定，现正在讨论分清模糊界线。双方全权代表今日起在哈尔滨会晤，以便交换公文。

△　罗斯福向日驻美大使野村提出说帖，警告日本不得侵略泰国，并不许由越南进攻中国云南。

8月23日　日机100余架分上、下午袭川，有两批共54架在重庆市上空投弹，毁民房、商店百余栋，死伤数十人。另批50余架在乐山、合川、梁山等地投弹。

△　新四军第五师一部攻克鄂中孝感。

8月24日　财政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为奖励资金内移，凡国内中外人士之外汇资金，可由中央银行解封，并规定外币汇票由中央银行照市价收购；正当用途仍照市价供给外汇；旅华美侨携款照市价换法币。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觉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任命陈孔达为第七十军军长；任命康翔为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发出对晋西南工作的指示，指出：阎锡山基本上还是中间势力，他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起着缓冲的作用，他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对阎的方针，仍然是继续争取他，求得维持友好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他的存在给以某些支持，而不是削弱和破坏其力量。

△　冀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八旅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团各一部袭入广平县城，全歼守敌，俘伪县长及伪县公署人员，缴获长短枪160余支。

△　上海公共汽车公司全体华工数千名举行罢工，全市公共汽车停驶。

△　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称日本多年来名曰解决“中国事件”，实则彼等更伸张其贪婪之手至于南洋，此种行动必须制止。25日郭泰祺发表谈话，对丘警告日本在远东更进一步侵略甚表欢迎。

8月2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敬久为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　第三战区所部克复浙西余杭。

△　日机36架分六批袭击陕西临潼、渭南、潼关等地。同日又袭击宝鸡、兰州。

8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冯钦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派张含英

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　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承认由贝奈斯总统在伦敦组成之捷克政府，并派驻荷兰公使金问泗兼代捷克公使馆馆务，同意捷克政府派明诺夫斯基为驻华公使。

△　郭泰祺对合众社记者称：在美日谈判中，美国决不至出卖中国，中国已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中之活跃分子，对现时国际局势发展有重大贡献，太平洋问题非中国合作不能解决。

△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第十二军和第三十五师团向黄河南岸推进，策应长沙作战。

△　第三战区所部克复苏南高淳。

△　第四战区所部克复闽东福清。

△　罗斯福宣布，美将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以实现《军火租借法案》之目的，该团由马格鲁德为团长，在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导下执行任务。28日，中国政府发言人称：此项决定表示美国加强中美合作及使援华政策达到充分满意结果之诚挚愿望。

8月27日　《大公报》载：四联总处本年度向农业贷款已近达五亿元，为扩大农贷以来之最高纪录，放款区达17省区，其中四川省约占总额三分之一，次为甘肃、陕西、湖南，达3000万元。

△　中美文化协会举行孔子诞辰二千四百九十二周年纪念会，会长孔祥熙及郭泰祺、美大使高思、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及吴铁城、张伯苓、翁文灏、孔德成等200余人到会，孔祥熙主祭，高思、拉铁摩尔讲演。

△　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军区第二分区游击队及民兵100余攻克隆平县城。

△　驻广东安定日军袭扰富文市，焚毁法教堂一座，杀死教士20余人，法籍神父亦同时遇难。

8月28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福建省政府：原省府委员兼主席陈仪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任刘建绪为省府委员兼主席。原省府委员兼秘书长陈景烈辞职，应免本兼各职，任张开琏为省府秘书长。29日任命张开琏为省府委员。

△　中国政府访缅代表团由团长蒋梦麟、副团长曾养甫率领团员10余人由渝飞抵仰光，其目的为促进中缅友好关系，解释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之立场。

△　外交部情报司以本月4日驻越法军百余人，向广东岗中附近之上义袭击，毁房伤人甚多，上义、陵思一带道路亦遭破坏，并继续向模囤增兵，企图进扰岗中，向法方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保留要求赔偿损失之权。

△　周佛海与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土桥拟定《长江下游地带物资统制暂行调整要纲》。

△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独立党领袖金九在重庆招待记者，纪念亡国三十一周年，并报告复国运动近况，外长赵素昂向美、英提出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等六项要求。《益世报》董事于斌致答词。

8月29日　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互派使节。

△　第三战区一部在淮南路双堆集车站埋设炸药，日军列车一列驶过触雷爆炸，炸毁机车及车厢四辆，死伤官兵200余人。

△　朝鲜民族联盟及朝鲜义勇队在重庆联合举行朝鲜亡国三十一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韩国临时政府亦于今日发表宣言。

8月30日　蒋介石在重庆南郊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日机猛炸黄山，死卫士二人，伤四人。同日，日机200余架分10批袭川，在云阳、达县、万县及重庆市内投弹，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全部被炸毁。

△　日机分二批袭击重庆《益世报》、《商务日报》及《新民报》馆及南市区帝家岩等处，炸死市民53人。

8月31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冀南组织的邢（台）沙（河）永（年）战役开始。是日晚克复南河、沙河两县城及磁县之彭城镇。至9月3日，战役结束，共歼敌340余人，争取伪军300余人反正，攻克县城二座，据点八处，碉堡53座。

△　日机轰炸重庆，《益世报》编辑部及印刷厂全部炸毁。同日又轰炸四川成都、梁山、西昌，湖北樊城，陕西咸阳、乾县、宝鸡，甘肃兰州、武威、临洮等地。在兰州被中国空军击落一架，驾驶员六人殒命。

△　行政院康昌旅行团一行30余人在团长王家桢率领下，行程3300余公里，往返56日，最终点至西昌。是日返抵重庆。王对记者称："此行主要任务系考察乐西公路沿线一切状况，并促其经济开发。"

△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出刊至第一百三十四期，是日停刊。

△　日军在上海法租界华美公寓拘捕爱国青年14名，公共租界同时亦有两名爱国青年被捕。

是月　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调离山东，由第五十一军（原东北军）军长牟中珩继任。

△　行政院公布《中央接管各省市田赋实施办法》，凡六条，决定中央于本年内成立各省、市、县田赋管理处，接管田赋及土地陈

报，其经常事业费用由中央负担。已办土地陈报尚未完竣县份，暂保留其原组织。在各省收支未经划归中央统筹以前，其经费仍由地方负担。规定：自省、市、县田赋管理处成立之日起，所有省、市、县田赋收入概归中央。其原列省、市、县预算内田赋收入及其增筹之款，除已征起者外，余由国库拨付。各省、市、县民田及其他各种土地（如公学、屯营卫田等）之亩额、赋额，应由如该省、市财政厅、局分别查明造册，专案移交。

△　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

△　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制定“清剿”皖南新四军的计划：第一期三个月，从8月1日至10月底；第二期三个月，从11月1日起，并划铜陵、南陵、繁昌、泾县四县为绥靖区，设绥靖指挥部，专负清剿之责。

△　华北日军在石家庄设立石门俘虏训练所，对中国的战俘进行“职业训练”，之后将其交给伪满洲国的国策会社，至本年末累计收容1.2477万人。

△　日本关东军将设在哈尔滨平房的防疫给水部队改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将牡丹江支队改为“满洲第六四三部队”；林口支队改为“满洲第一六二支队”；孙吴支队改为“满洲第六三七部队”；海拉尔支队改为“满洲第五四三部队”。

9月

9月1日　　国民党第五届执委会第一八三次常会决议：为改善及充实党办出版事业，分设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及中宣部出版事业处。管理委员会专管党办出版事业（指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之扩充及出版机构调整、统制事宜；出版事业管委会管理战地书

刊之供应，分别在重庆、衡阳、上饶、西安、香港五处设立印刷所。

△　毛泽东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谈话四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在国共关系上均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毛泽东告诉他们：一、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此外，毛泽东还谈到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事。最后约定，视国民党方面同周恩来在重庆进一步商谈的情况，再定可能解决的具体事项。

△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电周恩来，告知同陈宏谟谈话内容，并说："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的交换条件，及你回延开会事。"

△　财政部明令公布修正《非常时期进口物品办法》、《取缔禁止进口物品商销办法》及《应结外汇出口货物结汇报运办法》。

△　财政部、粮食部发行粮食库券，定额谷173.3636万市石，麦206.6667万市石，利率为年息五厘。自1943年起分五年平均偿还，1947年全部还清。

△　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孔祥熙任委员长。该会工作与平准基金委员会取得联系，共谋管理外汇政策之实施。

△　粮食部明令公布《四川省购粮付款办法》，凡七条，规定购粮付款以三成付给法币，七成付给粮食库券。

△　贵州省政府决定将长寨、广顺两县合并为长顺县。

△　川康兴业公司筹备会秘书处在重庆开始办公，该公司筹备主任由张群兼任，副主任为黄季陆，股款共7000万元，其中官股4000万元，商股3000万元。该公司任务为改进农工矿业及产品之运销。

△　中国化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在成都召开，张群兼该会名誉会长，蒋介石为该会颁寄训词。陈裕光主席并报告该会成立经过，曾昭抡致开会词，会上宣读66篇科学论文，讨论有关化学建设提案10余件，并决定发起10万基金募集运动，发行化学建设专刊等。

△　茅盾主编的文艺性综合半月刊《笔谈》在香港创刊。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主席杨秀峰。下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和公安总局。同日，又成立总交通局。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正式公布实施，凡15条65款，要点为：本着抗战第一的民族精神保卫边区，坚持华北抗战；本着团结建国方针，密切团结一切抗日党派与阶层，坚决反对分裂投降；加强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建设。

△　冀南八路军一部攻克清河县城。

△　日军对绥蒙地区推行所谓“施政跃进运动”，企图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摧毁抗日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地区军民展开反“施政跃进运动”的斗争。

△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所谓和平运动先烈纪念会，汪精卫在会上讲话，鼓吹进行反共清乡。

9月2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代表人选：政府代表李平衡，劳工代表朱学范，资方代表寿景伟。9月26日以国民政府令公布之。

△　军事委员会任命练惕生为第六十二军副军长。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伦敦华侨协会发表演说，宣称：“中国除借抗战以阻碍日本实现南进北进之政策外，并准备于日本逼迫民主国家至最后阶段之时，负起保护民主主义之更重大任务。”

△　日军撤出福州，并出动飞机80余架轮番轰炸以掩护其撤退。4日后，又撤退马尾、连江、福清、海口、长乐及沿海地区。8日，福州市民举行盛大祝捷大会，千万民众齐集台江，欢声雷动。逃避四乡义民相率返城，骨肉重聚，恍如隔世，悲喜交加，热泪横流。

△　为增强中国空军，美、加飞行员200人经荷印飞渝。

△　美军事代表团团员奥斯兰少校由港飞渝，被派研究滇缅铁路工程。

△　江苏无锡日伪召开“清乡”会议，苏南游击队一壮士化装潜入，投掷手榴弹二枚，伤毙日伪军10余人。

△　日军对山西平定县路北三区东部发动大“扫荡”，在14个村庄杀害群众320人，烧毁房窑4000余间。

9月3日　　驻美代表宋子文电蒋介石，告以日本近卫致函美国总统，希望劝中国停战。

△　英大使通知中国政府外交部，经缅甸运华之美国租借物资，本日起免征一切转口税，由英政府给予缅甸政府每吨10卢比之补助金。4日，郭泰祺函英大使致谢。

△　粮食部与中央信托局联合筹组中国粮食工业公司，由江汉罗负责筹备，资本400万元，分设面粉厂、胚芽米厂、干粮厂、机械修造厂。

△　日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对美国的新提案，要点为：一、日本虽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但不以武力进攻附近地区；对于北方亦然，决不发动武力进攻；二、美国对欧战的态度，应依据防卫观念行事，当美国参加欧战时，日本将按照自己对三国条约的解释，采取行动；三、日本努力恢复日、中间各方面的正常关系，为期其实现，准备遵照日华协定尽速从中国撤兵；四、恢复同日本通商关系，撤销冻结日本资产的决定。

9月4日　　上海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办事处致函财政部，要求运用英、美平准基金开放港、沪商汇。30日，财政部颁布取消商汇牌价令，自10月1日起统按中央银行牌价供给外汇。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结束陕、甘、宁、青、豫五省党务视察工作返渝，15日，在国民党中枢联合纪念周上报告视察经过。

△　中国访缅代表团离仰光，经腊戍、昆明返渝。该团在缅甸曾四次会晤缅总理及各阁员，就中、缅各项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　蒋介石派俞飞鹏兼任运输总局局长。

△　日机袭陕，轰炸咸阳、潼关、华阴、渭南、韩城、朝邑、三原、泾阳等地。在泾阳上空被击伤二架，敌抛下机枪三挺、子弹数百发后，惊惶逃逸。

△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第一届年会，继续推选吴玉章为会长，通过成立化学、医学、数学等学会，出版科学杂志，设立科学教育训练班，帮助改进农业技术，创立延安气象站等提案。

△　美国务卿赫尔接见中国大使胡适，保证“美国继续实行援助中国之政策，绝不间断”，“美、日官方在华府进行探讨性谈话，中国不必顾虑”。胡辞出对记者称：“余相信美继续对中国表示同情，美远东政策将仍不变。”

△　美医生助华会派遣之女医师柯恩抵达香港，将转赴贵阳医所服务，此为美国女医师来华服务之第一人。

△　汪精卫下令成立物资统制委员会，指定实业部长梅思平任主任委员。

9月5日　　中国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美籍委员福克斯抵香港，对合众社记者称：对该委员会稳定中国法币之效果深感满意，并暗示上海之外汇黑市即将迅速消灭。8日，上海外国银行14家表示与财政部合作，停止经营外汇黑市。

△　冀南八路军一部在沙河御路村南北山地与日军激战四小时，敌不支退据工事顽抗，日机八架助战，在八路军阵地投降落伞部队，被全歼。

△　重庆大学发生学潮，殴逐新任校长梁颖文。是日，教育部下令将该校解散，严惩主使者及滋事学生，并派员监理该校。同日，教育部长陈立夫就此发表谈话，宣称教部决心对于风气不良之学校悉将予以彻底之整顿，更不容许学生反对师长、破坏教纪之学潮。

△　加拿大军需部长贺威宣布：加将以军需品供给中国。

△　国民政府令：外交部常务次长曾镕甫免职，特派为行政院驻缅代表。

△　国民政府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经募飞机捐款几达200万元，特明令嘉奖并颁给金质奖章一枚。

9月6日　　第二战区第七十师官兵在山西绛县东北之丁家洼与日军激战，师长石作衡殉国。

△　《大公报》总主笔、国民参政员张季鸾在重庆病逝。8日，周恩来等电唁张季鸾逝世。18日，毛泽东、王明等电唁张季鸾逝世。26

日，国民政府以张季鸾从事新闻事业历30年，淬厉奋发，宣扬正谊；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员中，于国计民生，多所贡献，特予明令褒扬。

△　《大公报》内部改组，以董事兼总经理胡政之为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主委。

△　越南华侨领袖陈肇基及越南《民报》社长王之五抵渝，向记者谈：在越华侨共50余万，其土生子女已入越南籍者约100万，越南人与华侨有血缘关系者几占全越人口二分之一，日军侵入越南后，法越政府仰敌人鼻息，解散华侨爱国组织，逮捕爱国分子，禁止捐款汇回祖国，控制越南进口贸易，整个越南已在日军控制下，华侨被迫多思回国。

△　汪精卫偕林柏生、周隆庠等前往苏州清乡地区视察，在苏州对清乡工作人员训话，要他们对和平反共建国运动树立信仰，把清乡地区作为“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

△　日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对南方的政策作出如下决定：一、帝国为了完成自存自卫，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二、帝国在进行前项的同时，对美、英尽量采取各种外交手段，努力贯彻帝国的要求。三、通过前项外交交涉，到10月上旬仍未达到我方要求时，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9月7日　　日第六师团主力在空军配合下，由湘北桃林、忠坊出发，自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企图围歼第九战区驻军第四军欧震部和第五十八军孙渡部。日军攻势猛烈，先后攻占洋田、甘田、詹家桥、孟城、南冲、茅田等地，8日到达长安桥。两日激战，双方伤亡约3000人，大云山区大部为日军占据。

9月8日　　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称：今年

行政院有一重大改革，即统一各省财政，概归中央直接征收，各县税收划归县，经过县参议会通过，可自由增减。

△　教育部为发展幼儿教育，遵照国民党八中全会注重女子教育之决议，创办国立女子师范学校，并派江学珠为校长，着手筹办设立。

△　四川省主席张群在省府纪念周报告重庆大学学潮事件，称：重大为刘湘创办，也是四川省惟一大学，近年来学风日下，行动越轨，政府为整饬学风，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解散，并指派梁颖文、相菊潭、吴泽湘为监理委员，负责管理。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孔祥榕。

9月9日　　蒋介石在重庆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望美国勿与日本妥协，在正义和平未获保证前中国决心继续喋血抗战，并期望美国及其他友邦在中国抗战中，对暴日实行经济制裁。

△　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第八军军长。

△　国民党党、政、军长官及高级职员500余人在重庆举行纪念孙中山第一次起义四十六周年，由林森主持，吴敬恒报告起义经过及纪念意义，表示只要我们本孙中山总理的革命精神，持久不屈，抗战建国大业必成无疑。

△　毛泽东、朱德等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争取时局好转问题发出指示，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州）、洛（阳），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筹备委员会，委任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委员。同日通令各县级、区级选举均于10月10日前办理完竣。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定于11月5日召开。

9月10日　蒋介石特拨恤金10万元，分发重庆神仙洞及菜园坝防空洞惨案家属。

△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准备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会，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于10月22日结束。

△　日机屡炸重庆，致美、英、苏等国驻渝使馆全部或局部被炸毁，国民政府是日决定由银行界投资重建大厦，以备各使节办公。

△　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正式成立，聘宋庆龄、李石曾为名誉会长，许世英、何香凝、张一麐、陈友仁等为名誉理事。推颜惠庆为会长，甘介侯、王云五等25人为理事。

△　江西南浔路日军车一列因路轨被破坏出轨，死伤百余人。12日，自牛行北开之日军车一列触雷爆炸，毁车头、车厢六节，死伤200余人。

△　缅甸政府为加强中缅商业关系，经中国政府允诺，是日特准粮食、纱布、五金、机器、汽油、化学原料及文化用品等16件商品进口，并通令运输机关遵行。

9月上旬　闽省主席刘建绪及内政部次长雷殷、战区政治部主任邓文仪抵福州视察，抚慰军民，指示善后，并成立闽海善后委员会，刘兼任主任委员，决定以整理保甲、精神消毒为中心工作，拟定收复县份善后方案，以三月为期，完成光复地区整肃事宜。

9月11日　阎锡山派代表赵承绶、温怀光、刘迪吉等在山西汾阳城内与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等签订《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基本协定》规

定：将阎锡山的部队纳入汪伪中央政府管辖之内，与汪伪政府合作，缔结条约，并要阎先任汪伪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适当时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伪华北国防军总司令。此外还提出待阎锡山“实业充实时，即行统一国家，实现东亚和平”。协定规定了阎、日合作的三个阶段，第一步，阎进驻隰县；第二步，阎进驻太谷；第三步，阎进驻北平。《停战协定》规定：“晋绥军与日本军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敌对之战斗行动”，并在交换必要之情报及宣传方面进行合作。此外，日本军协助晋绥军训练军队、征集粮秣。

△　日机轰炸陕西朝邑、蒲城、湖北老河口、山西汾城等地，在山西汾城祖师庙上空被击落一架。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一部袭击黑龙江木兰县大柜村伪警察分所，16日，又袭击甘南县宝山镇伪警察署，处决伪署长，俘伪警察20余人。

△　豫北沁水北岸伪暂二十二师谭松廷部将北山庄日军全歼后宣布反正，并续向沁阳进攻。12日，伪原武县特别区长张文海率部百余反正。

△　冀中日军一部捣毁献县张庄、云台等地天主教堂，捕去神父、学生、修女数百人，抢去财物数十大车。日军强奸修女，逼其嫁于汉奸，并毒打神父强迫叛教，致不少教民流离失所。事后，该县抗日民主政权及军民联合发起慰问被难教胞运动，并制定抚恤办法。

△　汪伪政府任命李圣五为驻德大使，张国元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并特任尹作乾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　据上海《申报》讯：美国以价值1500万美元之租借供应品及原料运华，以供中国建造铁路等用。

9月12日　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在华盛顿欢宴即将来华之美国军事

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少将及全体团员，宋子文称：“余深信未来之时代，必能目睹中美以极协调之方式企求和平，以共同保证太平洋区域之和平发展。”

△　豫北伪绥靖军总司令刘昌义等击毙日军顾问真野大佐、池峰少佐以下50余名官兵，并俘顾问村板、河口二人后，率部三万余人反正，旋进攻当地日军，一部克复温县，一部将大司马之敌击溃，两役共毙伤日军600余人。12日，沁阳日军反扑，刘部转移至城市与敌激战。

△　湖北沙市伪鄂西绥靖军直属第一大队长罗俊率部500余，携步枪300余反正。13日，该部第二大队长刘飞亦率部官兵200余反正。

△　晋察冀八路军一部夜袭河北阜平东南之王快日军，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　前新疆省督办兼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在兰州病逝。

△　日机21架分三批袭击西安，在市区投弹百余枚，炸毁民房百余间，死伤30余人。

△　“扫荡”北岳区的日军在平山县制造梨山惨案和温塘区惨案，残杀群众670余人，不少户被杀绝。

9月13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议案研究委员会提出关于议题的征询要项：一、党务改进问题；二、政治修明问题；三、经济管制问题；四、民众疾苦救济问题；五、中共违反军令政令统一问题。要求各级党部博访各方意见，拟成提案，以备采择。

△　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枞抵港，对记者称：中德绝交后，欧亚航空公司奉命收归自办，德籍人员已全部解雇，现该公司机务、电讯、飞行等职全由国人充任。

△　图扎萨克在蒙藏委员会调查员钟吕恩护送下由渝抵榆林，谒邓宝珊、朱绶光。图扎萨克在途中曾按蒙古王公仪式祭黄帝陵，并称：中央决定修理伊金霍洛之成吉思汗陵寝。

△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山东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的指示，决定以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第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决定将山东纵队及第一一五师的两个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为书记。

△　郑州黄河堤经黄河水利委员会主持施工修建，用款300万元，已大部完工。河南省建设厅长张广舆是日代表经济部及省府赴郑州验收。

△　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日华和平基本条件》，主要内容有：友好善邻；尊重主权及领土；日华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蒋政权与汪政府合并；承认“满洲国”等九条。

9月14日　中、英、美三国经济会议在香港开会。

△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密电蒋介石称：已在广东设立“临时特别监狱”及“感训院”，同日又向军事委员会报送《广东感训院组织规程》。

△　美国著名作家、诗人、小说家及编辑29人捐输版税500万美元，支援中国抗战。

9月15日　外交部长郭泰祺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就美日谈判发表谈话，称：美日间试探性谈话传说颇多，“吾人坚信不但美国无意牺牲中国以成立任何谅解，而且于任何有关中国局势或中国权益之谈判，事先必与中国充分协议”。

△　军事委员会密令各处，为防止共产党文化界活动分子多方诱

惑后方从事艺术宣传工作人员赴港，并以香港为其文化工作之根据地，须严格审核文化界人士赴港证明。

△　日第十一军在岳阳设立战斗指挥所，由阿南惟畿任总司令官，作为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指挥机关。

△　第五战区一部克复鄂南通山。

△　湖南临湘以北驻军击落日机一架，驾驶员四名全部毙命。

△　罗斯福向美国会报告扩大援华计划，称过去美国已向中国供应滇缅铁路及滇缅公路之器材设备，除军用品之外又向中国输以医药品，近又决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华，训练中国空军。

△　美大使高思奉国务卿赫尔电令，向中国政府转达美、日试行谈判时凡涉及中国问题者，必先与中国协商。

9月16日　四川田赋征实及随赋购粮开始。是日蒋介石以此项工作攸关军需民食，特电令张群切实督责各级主管人员加紧征购，务期于三个月征购足额（1200万石）。

△　外交部派代表团赴缅甸，以曾镕甫为首席代表，涂允檀、李铁铮、李炳瑞为代表，商讨中缅货运、护照及移民等问题。

△　国民政府特任许崇灏为考试院秘书长。

△　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汪精卫任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席。

9月17日　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日第三、第四、第三十九及第四十师团，并附军舰20余艘，飞机200余架，总兵力约12万人，由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畿指挥，沿第一次进攻长沙的路线，向长沙发动进攻。拂晓，日军主力分四路强渡新墙河，向南岸中国驻军发动攻

击。第四军欧震部以一部正面抵抗日军，主力会合第五十八军孙渡部、第二十军杨汉域部在杨林街、步仙桥、洪源洞之线占领侧面阵地，准备侧击及尾击日军。

△ 鲁西八路军一部攻克馆陶、临清。

△ 八路军太行军区决定在武（安）北、沙河、邢（台）东、邢（台）西四县增设第六军分区。

9月18日 蒋介石为纪念“九一八”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誓万死，排万难，要恢复我们东北的失地”，但希望英、美及太平洋国家加紧对日包围，并表示：中日战争之解决，须与欧洲之战事同时解决，决无单独解决之理。

△ 重庆各界举行“九一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二万余人，由刘峙主席，吴敬恒等发表演说，会后举行火炬游行。旅渝东北同乡在重庆举行“九一八”纪念会，由李杜将军主席，到会300余人，并发表收复失地宣言。

△ 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九一八十年》一文，指出：我们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我们誓愿与东北同胞“肩并肩的抗战下去，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国的版图”。

△ 国民政府令派顾维钧为伦敦购料委员会委员长；原任郭泰祺免职。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老同盟会员张知竞，并发给治丧费5000元。

△ 粮食部拟定六项办法，惩治田赋征实舞弊案件。

△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该报规定出版公约五项，表示“吾人以政治上实现民主为基本，而先以言论之民主精神自勉”。

△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14条意见，主要为：立刻召集各党派、各团体及地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确立民主的领导抗战方针；释放一切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并解决党派间的摩擦；扫除一切阴谋妥协分子；对于全国抗战部队应一律平等待遇及爱惜；加强中苏、中美、中英关系等。

△　八路军冀东军区一部袭击河北省兴隆县茅山伪警察署和花市矿警队，击毙伪署人员和日本人矿警队长，并有百余名伪矿警反正。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之日军一部进攻新墙河南岸，第四军欧震所部诱敌于步仙桥、双石洞、洪源洞、向家洞之线，协同第二十军杨汉域部、第五十八军孙渡部对敌侧击、尾击。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之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护卫下，在湘江口两侧的青山强行登陆，中国守军第一九七师万倚吾部奋力阻击，终因四面环水，联络断绝而失利。日军登陆成功后，以此为据点，策应主力正面攻击。

△　日军在坦克掩护下，进犯湖南湘阴青山岛。敌在青山岛肆虐18天，杀死民众524人、守军官兵300多人，其中有24户被杀绝，烧毁房屋281间。

△　日中央统帅部开始进行南方作战准备，除将满洲的第五十一师团编入第二十三军战斗序列外，命令约60个以通信、运输为主的马来亚作战部队和约40个菲律宾作战部队向华南、印度支那及台湾运动。

△　美共和党要人威尔基在纽约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演说，认为美国将大量军需品运日实为一严重之错误，并称中国在此种情形下，仍对美国保持友谊，实堪感谢，呼吁政府对日禁运，加紧援华。

9月19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场第九战区长官部急令第九十九军傅仲芳部、第三十七军陈沛部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设防；第四军欧震部、第二十军杨汉域部、第五十八军孙渡部对渡过新墙河南犯之敌攻击前进，迟滞其进军速度。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日军各师团均抵达汨罗江北岸各要点，开始强渡，其中第六师团一部在长乐街渡过汨罗江，先后占领颜家铺、浯口。

△　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保险业同业年会席上发表演说，称美国之对日禁运“已开始在日本国民生活及军事两方面发生重要之影响”，希望美国勿放弃对日禁运。

△　据《中央日报》讯：行刺孤军团长谢晋元之案经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审理完结，被告人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判处死刑，其余被告五人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九年有期徒刑。

△　中缅双方代表团在仰光开始移民谈判，曾镕甫与缅总理宇素均发表愿诚挚合作之演说。22日成立《中缅移民协定》，规定中国人可移居缅甸。

9月20日　蒋介石为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电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国军决确保长沙，并乘机打击消耗敌人，第九战区努力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保持主力于外翼，求敌侧背反包围而歼灭之，第三、第五、第六战区自23日起，乘虚对敌发动全面游击，予敌全面打击，并积极攻击荆宜及襄花、京钟、汉宜、荆当各路之敌，相机收复宜昌。”

△　军事委员会为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向第九、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下达命令：为使第九战区作战容易，第三、五、六战区应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并规定了各战区的具体任务：第三战区向当面日军发动游击，以一部佯攻南昌；第五战区向日军发动全面游击，相机袭击据点；第六战区向荆门、宜昌敌人积极袭扰，相机收复宜昌。

△　日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等部共二万余人分九路“扫荡”太岳南部地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南进支队以小部队与敌周旋，主力部队主动转移，相机击敌。29日，日军合击沁水县东西两峪地区，第八十九军一部被日军包围，军长武士敏亲率步兵向东南突围，不幸以身殉国。10月3日，日军在八路军的打击下，开始撤退。此役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日军由黄棠、浯口、长乐街、伍公市、新市、路公桥、归义等处分别强渡汨罗江而南。午夜，第三十七军陈沛所部第一〇四师、九十五师乘夜全线阻击。21日，日军全部强渡成功，后以一部向瓮江以东移动，主力即向福临铺、栗桥、三姐桥之线猛攻。

△　同蒲路东侧日第四十一师团及白晋线两侧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配合伪“大汉义军”共二万余人，并有飞机10余架轮流助战，分14路“扫荡”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一部袭敌后路，歼敌600余人。

△　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整顿学风，要求师生当懔时代之艰危，期副国家之厚望，立明礼义知廉耻之教，树负责任守纪律之风，俾政令借以推行，纲纪赖以维系。

△　上海《中美日报》被迫停刊。27日，该报编辑张若谷在法租界被日宪兵会同捕房人员逮捕，解往虹口。

△　日上海总领事以公共租界内最近屡次发生日人被刺案件，照

会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改组工部局行政系统。

9月21日　　蒋介石以渝市物价飞涨，手令主管当局重订合理价格，严禁商人擅行抬高。23日行政院经济会议根据手令开会讨论，决定通函有关部、会就其主管部分之物价拟具平抑办法送该会审议。

△　日军快速部队一部到达平江西北30余里之张家陂，旋由浯口渡河继续南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第四、第五十八、第二十军自平江以北向日军后方攻击；第二十六、第七十二、第七十四军自浏阳方面向日军侧背攻击；以第三十七、第十军、暂第二军、第七十九军自长沙以东迎击日军之正面。

△　中共中央邀请在延安的日本、朝鲜等东方民族友人座谈。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威胁着东方各弱小民族，东方各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提议在延安的各东方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与会的20个国际国内团体代表及其他中外人士共50余人一致表示赞同，并同意作为发起人。

△　贵阳《朝报》因刊登《独裁者的收入》一文，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查封，新闻检查员张芝田被撤职，主任谢绍雄记大过处分，副主任金刚鸣免职。

△　汪精卫由南京至杭州，其随从伪兵与驻杭之电影工作队发生冲突，枪声大作，城内秩序大乱，汪精卫惊骇异常。结果双方死伤百余人，民众死伤亦众。

9月22日　　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敌人有攻占长沙之企图，第六战区立即攻克宜昌。

△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汉奸张本政、许家泰、于永江、阎经九、梁毅廷等。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日军第三、第四师团渡过汨罗江后，是

日在飞机掩护下，攻击第三十七军陈沛部的主阵地下武昌、狮形山、兴隆山。战至24日，日军突破第三十七军防线，进至新开市、麻峰嘴，第三十七军被迫向上杉市、麻林、新桥之线转进。

△　第十军方先觉部奉命前来增援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六军，是日到达明月山、栗桥、福临铺、高仓堰、金井一线。日军乘方部立足未稳之际，向其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至26日，方部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重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全师向福临铺突围；预备第十师亦被日军击破，全师溃退。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日第六、第四十师团对汨罗江南岸守军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发动围攻。萧部虽奋力反击，无奈日军火力强盛，始终未能摆脱被围打的境地。25日夜，日军一部攻下何家坪、五台洞，逼近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薛岳令其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日军自张家陂、浯口南渡后，源源增加，并以第六师团向东，一部向南分途突进。晚，第六师团一部沿公路到达三角塘，迫近平江。其时坐镇平江之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一面发动万余民众将城区储藏之粮弹物资全部抢运至山地，一面亲率战斗指挥所进驻县南甲山，并派特务营向敌扰袭。敌不明虚实，未敢来犯。午，敌南进主力陷瓮江，并以迂回战术攻喻家关、风源洞、白源洞阵地。

△　湖南湘阴驻军于城郊击落日机一架，坠落青山以北湖面。

△　军事委员会任命唐云山为第二十五军军长；任命高卓东为第八十七军军长；任命安俊才为骑兵第二军副军长。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招待中外记者时宣称：美国政府不但积极协助中国，而且计划进一步加强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力量。

△　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吴玉章宣布教育方针，徐特立

作政治与技术并重的演讲，指出：旧的政治第一的口号应当废除，今后政治与技术都要把握。

△　日外相将对华和平九条件通知美驻日大使：一、中日亲善；二、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三、中日共同防共；四、撤退在华日军；五、中日经济合作；六、重庆与南京政权合并；七、不割让土地；八、无赔款；九、中国承认“满洲国”。

9月23日　军事委员会军事专家对中央社记者谈近日湘北会战，称：日军进攻湘北为我意料之中，我军前用磁铁战术将敌盘踞之“面”吸引，使之成为狭长之线，然后予以反击、侧击、截击或夹击，使之成为若干之点，再各个聚歼之，并称最近即有被我完全歼灭之可能。

△　全国慰劳总会拨款10万元慰劳湘北将士，电请湘省动员委员会派员携款赴前线策励三军，并电薛岳长官及士兵预祝胜利。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继续攻击喻家关、风源洞阵地，复以一股向右翼迂回，第二十六军为争取外翼，奋力将侧翼向右延伸至横洞，并对正面敌人以痛击。第十军第十师与敌在金井市争夺，三进三出，歼敌甚众。

△　苏北新四军一部在盐城生俘日伪军队长以下300余人，毙敌70余名。

9月24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第三十七军及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以日军第三师团主力突破右翼，情势变化，遂转移于官懋口、双江口、神鼎山之线，旋遭另一部日军攻击，又转移至福临铺。

△　面对汨罗江南岸的失利，薛岳是日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七旅第十九、第二十团在冀南南宫垂

阳、段芦头地区反“扫荡”作战中，毙伤日伪军120余人，俘日伪军220余人。

△　孙中山实业计划研究会在重庆召开讨论会，会长陈立夫主持，会上就数月来所研究之全部基本数字，包括铁路、公路、商船、民航、电讯、水利、衣、食、住、行等14种数字详加讨论补充，并将提交10月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讨论。

9月25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第二十军杨汉域部获悉日第三师团与兵站联络线被截断，粮弹断绝，遂攻占长乐街北之赤马江、三里牌，击毁汽车20余辆，并将由长乐街出击之坦克队击溃；第五十八军孙渡部在大荆街附近亦重创日军，击毁汽车10余辆。

△　国民政府任命连声海、朱学范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四川省主席张群对中央社记者谈川康兴业公司称：该公司总资本为7000万元，由国库拨官股3000万元，川、康两省合拨1000万元。其业务方针为：一切须以战时必需且以现在最缺乏者为限；对已办各种事业决竭力扶助；在各经济地区分别设立公司，提倡生产。

△　日伪军以3500余人分兵六路围攻晋察冀军区易县狼牙山区，企图消灭该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该团以第七连第六班扼守险要，掩护主力转移。日军先以数千发炮弹猛轰，继以数度猛扑，该班最后尚有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五人，他们英勇不屈，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一同跳下悬崖。三名战士壮烈牺牲，仅葛振林、宋学义挂在半崖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

△　日参谋本部召集中国派遣军参谋对《南方作战后的对华作战方案》征求意见，该方案提出：作战目的是摧毁美、英、荷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及确保南方要地；在中国确立长期战态势，迫使蒋政权屈服，同时消灭英、美等敌方在中国的各种势力；对苏联则严加

警惕，防止发生战争。

△　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被日军30人翻墙而入，捆绑工役，破门搜查，劫去收音机、打字机、铁箱、书报等物，并拘捕工役二人。同日，驻越日军擅捕中国侨民约百名。中国外交部向法维琪当局提出交涉。26日，日军又在海防、河内捕中国侨民50余人。

9月26日　蒋介石为第二次长沙会战各战区攻击时间电令第六、第五、第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李宗仁、顾祝同、薛岳：一、第三战区于俭（28）日始攻击；二、第五战区于感（27）日开始攻击；三、第六战区于卅日开始攻击。

△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场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我守军呈溃散之势，“不战而走者不在少数”，薛岳闻报，是日命令各军、师组织督战队，于重要路口收容离队士兵，使其归队或重新编组，“如有不服从收容者，就地枪决”。

△　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与奔袭长沙的日军第三师团不期而遇。第七十四各师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以攻为守，向日军发动进攻。27日，增援日军由北而南压来，有的绕至第七十四军侧背，致该军伤亡惨重，遂乘夜向南撤退。

△　日第四师团及早渊支队在枫林港附近击退第九战区一部，并沿白沙河河谷向长沙挺进。早渊支队渡过捞刀河后立即趁夜色攻占南岸阵地。

△　中央社讯：国民政府对于民营工矿业之协助贷款总数达二亿元，现沿海内迁之工厂已近400家，器材约七万吨，工人约近万人已在后方复工，颇有人才集中、资本集中之趋势。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部收复河北阜平。

9月27日　蒋介石派拉铁摩尔飞港与在港之宋庆龄、孙科等会

见，传达重庆方面之时局对策，拟借国际情势之变化，解决国民党内部团结问题。

△　日早渊支队受第九十八师王甲本部阻击，双方在三窑堂、白茅铺激战。日军在飞机配合支援下，突破第九十八师阵地，南渡浏阳河，攻击长沙。浏阳河岸仅有少数中国守军，日军在炮击对岸后，未经战斗即渡过浏阳河。下午，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东北角冲入，守住新开至武城门，掩护其他部队入城。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

△　平汉路日军列车一列由北驶南，行至河南淇县高村车站被炸毁，死伤日军百余。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一部在大兴安岭山区骆驼山与日军激战，次日在石场沟两次伏击追敌，歼灭日军30余人。

△　广东省府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宗骐，关伯平为协理，张导民等为董事。该公司股本定额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业务先从商工业入手，定10月正式成立。

9月28日　日军认为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对第九战区主力第七十四、第三十七、第十七、第二十六和第十军予以重大打击，达到了作战目的，且日军连日作战，弹粮消耗很大，决定停止大规模进攻，并逐步撤退。

△　《中央日报》载：美国红十字会首批援华药品、布匹、器材等1200吨已陆续运抵昆明，第二批1000吨亦起运，年内可全部抵达。该会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韦思礼定10月返国述职，并与美朝野商讨加紧援华办法及订购中国请求援助之卫生材料。

△　日机18架轰炸河南新郑，投弹100余枚，炸死平民百余人。

△　据重庆《新华日报》载：上海市学生举行讨汪大会，并发表《致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书》，请各师长“躬持忠节，辟易奸邪，秉

爱国爱民优育青年之素志，砥砺廉隅，为后学倡”。

△　应中国政府邀请，英国政府派遣财政代表团来华，借以增进两国间经济财政问题之合作，并参加香港金融会议。该团由英格兰银行董事倪米亚率领，同行者有缅甸财政顾问巴克士德、英财政专员柯尔朗等。

△　据内政部报称：日伪在蒙疆地区推行毒化政策，大种鸦片。仅绥远之包头、归绥、萨拉齐、托克托、清水五县就种植鸦片有数十万亩之多。日方在和厚市设收购烟土总清查处，各县城镇设经理处，所收烟土大部运往平、津，制造海洛英或交特设机关高价出售。内政部已电请外交部转达国联揭发，促起各友邦注意。

9月29日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长沙向中外记者报告长沙战局，称：长沙现完全在我手中，来犯之敌已被我重重包围，数日之内定可杀其片甲不留，敌所发表之占领长沙、株洲等消息完全为无稽之谈。

△　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在招待中外记者席上发表谈话，称：本年度我财政上之大改革及地方自治之推进，现已到县政府阶段。县政府为自治单位，为供给县政府推进自治之必需经费，行政院将增加田赋之收入及省政府补助县政府之款项。

△　第七战区一部收复粤北清远。

9月30日　长沙城郊之日军经第七十九军之第九十八师、暂六师在捞刀河南及城东郊内外夹击，势疲力竭，其求援之传讯鸽复被第九十八师所获，后援断绝。薛岳命令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追击，并令第十一、第十二两挺进支队，在杨林街、长乐街及新墙、新市断其归路。

△　以王应榆为团长的康青考察团由雅安抵康定。王谈康省交通

问题亟须解决，此行任务注重交通、经济两方面之技术问题，对边区文化、教育亦甚关切，除以蒋介石、孔祥熙名义捐赠万元给康省教育、文化机关外，对沿途各县学校均有捐赠，总计约四万元。

△　立法委员夏晋麟在美国创办中国新闻社，夏任社长兼董事长，驻美大使参事刘锴、纽约总领事于焌吉、中国学会会长孟治及林语堂为董事。该社将与中央通讯社美国分社联络，主要传播中国新闻。

△　四川省政府会议决议拨款10万元修复重庆大学校舍。校长梁颖文辞职获准。教育部重组重大整理委员会主持该校校务。

△　鲁南临沂日伪军600余人，附大炮四门袭击临沂西山前村。全村村民在敌人猛烈炮火下，坚守围墙与敌激战，打退敌人三次冲锋。该乡乡长张子纯父子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壮烈牺牲。旋敌人施放毒气，村民大部中毒，敌乘机攻入圩内，烧杀淫掠。10月1日，地方武装民众自卫团来援，将敌击溃。

△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分会、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越南革命同志会、台湾独立先锋社等团体代表向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内东方各民族兄弟发出宣言，发起召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

△　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改组粮食管理委员会，特任梅思平为委员长。

是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伪军工作问题的指示》，其总方针是“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对已组成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备将来必要时实行反正。同时，对不同伪军采取不同政策，总的原则是争取同情者，控制两面派，坚决打击作恶分子”，并提出对起义伪军“不缴械、不编散、帮助其抗日”的“三保证”。

△　毛泽东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

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

△　国民政府制定《田赋征实通则》，凡11条。规定：一、现任公务人员欠赋限期清完，逾限未清者应予撤职处分并传案追缴。二、富绅大户欠赋限期清完，逾限未清者应予传案追缴。三、公共团体欠赋限期清完，逾限未清者应将该团体首领或经管人传案追缴。四、行政机关欠赋限期清完，逾限未清者应由经征机关查明欠赋数额，函请发放经费机关，在其应领经费内扣除。五、各县（市）经征人员如有扶同隐匿或据报不实，查出一律从严议处。六、凡有恃势抗完，业经传追无效而其欠粮总额已达三年应完赋额以上者，除传追外得移请司法机关查封、拍卖其欠赋财产，如有余款仍应发还。

△　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创办安徽企业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

△　日军将晋东北平定自郝家庄至黄土岭之公路以北10个村庄划为“无人区”，并集结武装百余人，强迫民众组成拆房队、放火队、破坏队、运输队等逐村进行“毁灭”，10村庄被焚毁尽净，民众纷纷参加抗日游击队。

△　热河日宪兵司令部提出“国境地带无人区化”的政策，把长城内外的热河、河北大片土地划为“无人区”。并将在东边道“围剿”东北抗日联军的10多个“讨伐”大队调至热河，以青龙、兴隆、滦平为重点，“讨伐”八路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　美洲、欧洲与亚洲作家所创办的《自由世界》月刊在纽约创刊，并在重庆发刊中文版。

10月

10月1日　长沙附近日军各师团开始退却。第九十八师王甲本部在捞刀河岸伏击早渊支队，日军措手不及，两名大队长被狙击而死，士兵伤亡甚众。第九十九军也一路袭击后撤的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在路口番附近歼灭日军700余人。第二十七集团军所辖部队亦阻击北撤日军主力，歼敌、俘获颇多。

△　重庆市举行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一周年大会。大会发出《敬告陪都各界同胞书》，吁请：一、铲除一切投机取巧、侥幸依赖、得过且过、醉生梦死的不健全思想和生活；二、贡献所有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加紧建设新陪都；三、踊跃当兵，建设国防军队；四、绝对服从政府法令。

△　阎锡山派赵承绶等由孝义到太原，与日方代表楠山秀吉研究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或称《日阎合作条款》）。主要内容为：一、为双方部队避免冲突，分别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以资联络；二、阎以桐油、水银、生漆、桃仁等换取日方纸张、西药、布匹等；三、阎日双方驻当地军队，经办事处互相交换八路军活动情报；四、由伪省长苏体仁负责，令山西所属各县征募兵员；五、武器由日方分期筹划，为阎军急用，先拨给步枪1000支；六、粮食由伪省长苏体仁拨给，并先拨给500万石，事后运到孝义5000石；七、经费2000万元，由日方负责拨给；八、新装备的军队，营以上各级均设置日方教官。

△　财政部公告取消中央、交通两银行之商汇牌价，规定今后悉依外汇管理委员会规定办理。2日，外汇管理委员会公布《政府机关请购外汇须知》及《事业机关请购外汇须知》，一般民营工厂、商店及私人所需外汇，须向平准基金委员会申请，由该会核准后，通知指定银行结汇。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冀鲁豫、冀南、太行三行署，并委任晁哲甫为冀鲁豫行署主任；宋任穷为冀南行署主任；牛佩琮为太行行

署主任。

△　兴华冶金公司成立，由虞洽卿主持，资本200万元，由国民政府经济部承担40万元，并派技术人员协助。

△　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兰州召开，会期三天，选出高鲁、张钰哲为正、副会长。

△　长江中上游水上游击部队炸沉敌军两艘巡江汽艇，一艘在黄棚附近触雷，一艘在前江口新州附近触雷。

△　汪精卫发布《中日军事提携之使命》的命令，令军队要加紧反共清乡，并称中日军事合作的目的，“就切近而言，清除匪共，确立治安，由局部和平展拓至全面和平。就远大而言，结成东亚轴心，防遏共祸及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

△　日大本营决定将关东军司令部改升为关东军总司令部，梅津美治郎任总司令官。

10月2日　军事委员会得悉长沙日军撤退的消息后，是日命令薛岳：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牵制敌人向北转移，使第五、第六战区作战有利。薛岳奉命发布作战命令：夏楚中第七十九军以主力向新市长乐街追击；韩全朴第七十二军速经平江西北山地向杨林街截击；孙渡第五十八军速经浯口由长乐街、关王桥截击；欧震第四军、杨汉域第二十军及傅仲芳第九十九军两个师分别在金井、麻峰嘴、青山市、马鞍铺自东向西截击；萧之楚第二十六军、王耀武第七十四军、邹洪暂三军清扫浏阳、捞刀两河岸战场；王劲修亲率第四、五、八挺进纵队于咸宁、蒲圻间截击；第六、第七挺进纵队于新墙、杨林街及忠林街间截击。并申令各部编组便衣队注重超越、侧击、伏击，务使溃败之敌不得回巢。

△　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复长沙后对日寇之战略。

△　河南日军为牵制豫中部队，掩护长沙北撤，派机轰炸郑州后，以五万兵力配合化学兵种，由武源、开封、中牟分三路向郑州进犯。

△　全国慰劳总会以湘北长沙大捷发起慰劳湘北将士。重庆各界纷电薛岳祝捷，川省拨款500万劳军。

△　平北八路军一部挺进张家口、多伦以北，攻克大囫囵。10日，又攻克石窑子，该地蒙古族同胞获得解放，与八路军联合杀敌。

△　日机27架轰炸河南禹县，投弹百余枚，炸毁民房、商店2000余间，炸死、炸伤200余人。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特任徐良为驻日大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27日褚民谊由东京返抵南京就职。

△　日军在越南擅行搜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并拘捕馆役及华侨。法国驻华大使馆参事博德是日奉法政府之命，向外交部面达法政府对于日军暴行之歉意，并声述法方已分别在东京及河内向日政府、军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及防止同样情事发生。同日，法政府电令越南总督，切实保护中国领事馆及馆员与侨民。

△　美助理国务卿格拉弟及罗斯福特派远东经济调查专员抵昆明，对记者称其任务为调查远东经济并与中国当局会商矿产加速供美问题。3日抵渝，与中国方面订有若干矿产合同，并商妥交货办法。6日离渝飞港。

△　美举行援华广播大会，提出募款500万元救济中国难民，麦克纳克、威尔基、李普曼、爱迪生及我国大使胡适均出席大会并讲话。胡适最后表示谢意，谴责日本为“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祝贺湘北胜利。

△　韩国议政院议长金起元在重庆茶会招待新闻界，宣布本月15

日召开定期会议，望舆论界督促各友邦政府早日承认韩国，予以援助，使韩国恢复独立。

10月3日　第六战区所部奉陈诚命令，是日各军完成对宜昌的包围。6日，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九师乘日军防守间隙渗入宜昌东北，并发起攻势。

△　进攻郑州之日军进至郑州东南、祭城及广武县上河王一线。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和孙蔚如第四集团军奋勇还击，双方伤亡均重。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希程为第九十三军副军长。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何应钦报告视察滇边防务情形及湘北会战详情。

△　赈济委员会再次拨款50万元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办理湘北赈济。

△　菲律宾华侨以湘北大捷汇款20万元，慰劳前线将士。同日，广东各界组成慰劳代表团，并筹16万元慰劳湘北将士；贵州企业公司捐献一万元，旅美华侨汇款10万元，犒赏湘北前线将士。

△　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军区以长子、高平等七县地区组建第四军分区，“扫荡”岳南根据地之日军开始撤退。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南进支队及第二一二旅，在此次反“扫荡”中毙日伪军300余人。

△　国民政府派赴缅甸交涉中缅护照、移民等问题之代表团工作暂告一段落，除首席代表曾镕甫仍滞留仰光外，其他代表涂允檀、李铁铮、李炳瑞三人是日返渝，4日向外交部面陈交涉经过。

△　中国人事行政学会在重庆成立，推戴季陶为名誉会长，陈果夫、易培基、吴铁城为名誉副会长，并选出明仲祺等20人为理事。

10月4日　国民政府组织英、美武官及中外记者参观湘北战绩，一行12人乘专机飞桂林，6日抵衡阳赴长沙前线参观。

△　日军攻陷郑州。5日陷温县，6日陷荥阳，10日续陷须水、三官庙等地。

△　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选出徐向前、萧克、林彪等15人为理事，并通过会章及致蒋介石电。

10月5日　湘北日军残敌一部由营田、湘阴乘船北逸，一部由汨罗河向新墙河逃窜，第九战区薛岳部乘胜追击，日军渡过汨罗河。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死伤约八万人。

△　日军第三十六、四十一师团及伪军一部共三万余人，对晋冀鲁豫边区岳北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岳北根据地军民奋勇反击，至18日粉碎日伪军“扫荡”，毙伤日伪军916人，俘伪军13人。

△　湖北随县伪军李宜莲部杨子威队率领人枪400余反正。

10月6日　孙蔚如第四集团军连日在郑州、广武等地与日军激战。日军后续部队陆续参战，攻占韩垌、张定邦、孙庄、南王村、岭军峪、大胡村。

△　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在香港接见中央社记者，称该团来华之目的，在求取最有效之方式，以实现美国根据军火租借法所给予中国之援助，并称军火租借法本身为美国新的巨大国策。

△　日机四架轰炸宜昌，第六战区所部击伤一架，坠落狮子坪附近，驾驶员二人，一死一俘。

10月7日　全国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组织四个地方党政考察团分赴各省区进行考核：川康区团长为吴挹峰、滇黔区团长为罗家伦、甘宁青区团长为吴忠信、陕豫区团长为方觉慧，考察期为三个月。川康

区是日启程，其他各区亦相继成行。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如果国民党答应我们解决新四军事件最低限度条件，我们在重庆的参议员可以出席，反之，则不出席。对其他党派出席参政会，我们不必阻止。

△　四川省政府为彻底整顿重庆大学，特组织整理委员会，并派定张洪沅为主任委员。是日张偕委员何廉、冯简、段调元到校视事。

10月8日　第九战区追击日军部队渡过新墙河，即以第四、第二十、第五十八、第七十二军等主力，分别向羊楼司、临湘、岳阳各地日军进攻。

△　日军攻占郑州附近汉王城、霸王城和张沟。孙蔚如部与敌激战两日，歼敌一部并将其驱至霸王城以东。

△　延安《解放日报》就长沙告捷、郑州失守发表社论《兴奋和警惕》，指出长沙的胜利，使我们兴奋，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自满；郑州撤守，敌人有向西向南窜扰的可能，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丧志，应以十百倍的努力加强全民族的团结，不仅回击敌人的军事进攻，而且要粉碎它的政治阴谋。

△　国民政府派谢嘉为出席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政府代表顾问，黄宗勋为雇主方面代表顾问。

△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举行理事会，李石曾、马超俊、郭沫若、王昆仑、洪兰友等出席。会议讨论筹设国际研究所，召集常年大会与召集世界各国联合举行预祝民主胜利大会等案。

△　美陆军部米亚上校在众院支付委员会报告称：美拟依照租借法新拨款案，以价值1.33亿元之飞机供给中国。又陆军部次长柏德逊在会上称：陆军部拟要求拨款购买机器及设备，俾于中国内地设立兵

工厂。

10月9日　国民政府令：兼福建省保安司令陈仪另有任用，应免兼职；任命刘建绪兼福建省保安司令。

△　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北岸，转为守势。第九战区追击部队随即赶到，双方再次对峙于新墙河。

△　鲁南八路军一部克复蒙阴。

△　冀鲁豫边区日本、朝鲜及台湾籍人士发起组织觉醒同盟冀鲁豫边区支部，宣言拥护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协助八路军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求得中日人民的共同解放。

△　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率团员八人抵渝，对记者谈称：该团总办公处设重庆，在中国各地工作，以根据美军火租借法求得援华之最有效方式，美国租借物资经行路线（仰光、重庆间）亦为该团活动范围。

△　古巴总统定是日为救济中国日，为援华决定举行“一碗饭”运动。10日，李迪俊公使在古巴出席主持“一碗饭”运动开幕式。

10月10日　蒋介石为“双十节”纪念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称：“国父昔日有中国革命三十年可以成功之遗言，吾人于此，自愧未能克尽天职，适如所期，然深信我国民革命全功之基础，实已奠立于今兹，固无所置疑者也。”全国军民在胜利在望之时，“诚宜特别警惕，各竭所能，各尽其职，兢兢业业，以竟全功”。

△　重庆各界开会庆祝国庆。下午，外交部举行盛大茶会招待中外人士；晚，林森主席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拿出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为抗战建国，克服最后的难关，完成神圣的使命”。

△ 《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的最忠诚的继承者，对于辛亥革命未竟事业，我们共产党人誓与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一道，誓与全国人民一道，继续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

△ 第九师张琼部、新编第三十三师张世希部、第七十六师王凌云部向宜昌发动猛攻。至是日克复宜昌近郊之胡家大坡、大娘子冈、慈云寺等重要据点，并以炮火轰击宜昌城。第九师组成的三个突击营攻克东山寺、土城等据点，冲入宜昌。激战中，日军施放毒气，并配以飞机轰炸，第九师突击营伤亡惨重，被日军压迫出宜昌城。

△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正式公布成立，参加者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推张澜担任主席。同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提出贯彻抗日，加强团结，争取国家独立，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等主张。

△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议案研究委员会政治组宋述樵草拟《整饬纪纲修明政治方案》。该会同时提出关于力行蒋介石命令，整饬机构，考核人事，以提高行政效率议案；关于加强新县制之推行，以完成地方自治议案；关于改进党务方案（草案）；关于实施国民党小组管理，加强控制其党员的议案等。

△ 朱德、叶剑英致电八路军驻第二战区长官部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指出：八路军为策应友军在郑州作战，已向敌后各重要交通线进行有效的破袭，请阎锡山命令敌后有关部队与我军进击部队多取联系，共同对敌。

△ 国民政府公布核定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定之《中华新

韵》。

△　中、英、美金融会议在香港举行，中国代表为陈光甫、贝淞荪、席德懋；英方代表为倪米亚、巴克斯德；美方代表为福克斯、郝伯德、格拉弟。讨论内容为：一、增加英美对华援助；二、巩固法币，粉碎敌伪经济阴谋；三、有效地实施封存资金命令；四、计划发展中国经济资源。

△　财政部公布：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开展一年，储蓄总数已达5.6亿元，其中重庆市成绩最优，广东次之。

△　据《中央日报》载：旅美巨商李国钦捐款50万元，托孔祥熙转呈蒋介石颁发，以其中30万元犒赏湘北将士，20万元救济被难同胞。

△　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国讯》在香港出版。

△　汪精卫发表《三十年国庆致词》，鼓吹反共清乡是保障和平的方法，是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的最有效方法。

10月11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顾锡九为第八十九军代军长，12日任命史克勤为第四十九军副军长。

△　八路军冀南军区对日军发动秋季破击战，是日攻克武城县城，至13日结束，共歼日伪军310人。

10月12日　　会犯郑州之左路日军窜达张庄街，中路日军陷郑州后分两股，西犯须水镇一股被击退，南陷十八河一股亦被豫中队伍攻克，跟踪追至郑州。翌日晨，一度攻入郑州市。右路日军被阻于荥泽西南。

△　日军在山西境内沦陷区组织所谓“灭共青年团”，规定凡年龄在17至35岁以下的青年，每村至少有20人受训。中阳县属大城垣、

锈沟等村青年因拒绝受训而被残暴凌虐致死者甚多。

△　日首相近卫召开四相会议，陆相东条英机反对自华撤兵。

10月13日　　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反攻郑州。因日军使用毒气，被迫退出。此后孙部多次袭击城内日军，烧毁仓库、营房多处。

△　日机在宜昌投掷毒瓦斯弹，城区中国守军多中毒受伤，蒋介石是日下令守军暂退出城外，与日军野战。

10月14日　　蒋介石之政治顾问拉铁摩尔飞抵昆明，考察一般政情，15日参观各项建设及外县运输情形。11月1日返渝，对记者称："云南当局已准备保卫云南，以防日军由南方侵入"，并称他拟于六个月内完成其顾问任务后返美。

△　战地党政委员会组织战地党政工作视察团，计分三团，每团10余人。一团团长由党政工作考察团陕豫区团长方觉慧兼，负责视察豫鄂战区；二团团长黄维国，视察浙赣湘战区；三团团长廖和清，视察苏鲁战区。是日，各团由渝出发。

△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主任委员宋美龄亲率该会委员张蔼真、唐国桢、吴漱真等由渝启程赴湘北劳军，并拨款50万元犒赏将士。该会在长沙勘察修建湖南荣誉军人新村地址，于25日返渝。

10月15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称：为配合郑州作战，已令各部向当面敌人的交通据点进行攻击。

△　日军将劫自中国之军舰三艘移交汪伪政府。至此，日移交汪伪之军舰已达九艘。

△　伪满洲国与外蒙在哈尔滨签订"边界"议定书，勘定其界线长达300公里。

10月16日　　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开幕，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会词，会议主要内容是检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误。蒋介石的训词要旨为：一、希望各将领了解抗战必胜之根本要诀——乃在保持我们民族正气，发扬我们历史的精神；二、以曾国藩为例，说明高级将领成功立业之道；三、依照战斗方略与工事构筑要旨，说明此次长沙会战之缺点与今后应有之改进；四、今后各战区兵力配备与使用之要旨；五、目前我军战术方面应注意之要点；六、今后部队业务应注意之事项。会议21日结束。

△　中国政府与利比里亚政府在中国驻葡公使馆交换友好条约批准书。

△　《光明报》发表社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着重说明四点：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一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二、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它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三、这一联合，由来已久，早在民国二十八年11月已组织了的“统一同志建国会”是为前身；四、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之后盾，是联合内的构成员（各党派和个人）之共同点。

△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罗文幹在粤北乐昌县病逝。

△　中、英、美、荷四国代表在马尼拉举行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如何调整四国海、空防御问题。

△　英财政代表团倪米亚一行及美财政部代表柯克朗由香港飞抵重庆，次日由英大使卡尔陪同拜会孔祥熙、郭泰祺等。倪米亚对中央社记者表示：英、美将以全力援华，以解决经济上各种问题。

△　日近卫内阁因对国策方针意见不一致，是日宣布总辞职。此为近卫内阁第三次倒阁。17日，日皇裕仁命东条英机出组新阁。

△　日美谈判。日方提出条件为：一、美日合作开发中国经济；二、美日恢复通商，日本不南进；三、如美不包围日本，日本可退出越南。美方提出异议，谈判无结果。

10月17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国家最近财政收支、田赋征实及外汇管理情况，外交部亦提出最近国际形势之书面报告。

△　马当要塞第九战区流动炮兵部队击沉日军运输舰二艘。

△　荆沙日军6000余为打通荆岳水路，分由岑河口、砖桥、窑湾三路南犯。22日陷郝穴、蛇桥、白马寺等地。23日晚，第六战区一部反击，克复郝穴等地，恢复原态势。

△　据中央社讯：日军南渡汨罗河后，在长沙东北之麻峰咀设有转运站，并有日军200余守护，站内存有大宗枪支弹药及米谷等，曾任乡长之梁振球率团军一夕之间将该站日军全部消灭，并焚毁弹药仓库及装甲汽车10辆。

10月18日　　“扫荡”晋冀鲁豫边区岳北之日军撤退，岳北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共毙伤日伪军916人，俘伪军13人。

△　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在重庆招待新闻界，请中国政府即承认韩临时政府。

△　日东条英机组成新内阁。东条任首相并兼陆相及内相，东乡茂德任外相，岛田繁太郎任海相，贺屋兴宣任藏相，岸信介任工商相。20日，东条英机发表广播讲话，声称新内阁继续坚持政府关于处理“中国事变”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为此目的，将改革行政机构，绝对实行政军一体。

10月19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所写的代论《太平洋的新危机》，指出：“近卫下台，东条上台，都说明日本法西斯军人

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闷拖延的局面，而必须自己出马，采取冒险的行动了。”“这次日本军人内阁的出现，是日寇大冒险行动的信号”。“我们认为日阁的改组，应该警醒我们，使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国家，更加团结，更加联合行动起来，而不应该让东西法西斯国家联成一片，将侵略烽火烧遍世界，贻祸无穷。”号召全世界正义人士，“群起扑灭人类公敌——东西法西斯蒂”。

△　据《大公报》讯：蒋介石拨款五万元在中央军校建筑四行孤军团长谢晋元纪念碑。

△　运输统制局西南运输处改组为中缅运输总局，俞飞鹏任局长，陈体诚及美国公路运输专家威尔斯任副局长。

△　日海相岛田繁太郎发表广播演讲，声称日海军已完成一切准备，不仅拟解决“中国事变”，且拟应付当前局势之任何变化。

10月20日　　蒋介石主持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理纪念周，并发表训词，指出长沙会战中失误之一是由于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太大，而能力有所不胜，更由于自身不研究、不学习，对部下不训练、不考核所致，同时策勉所部将领以曾国藩为例，自觉自动，自强自立，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　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并发表谈话，认为日内阁改组，其侵略政策决不会变更，并指出东条内阁的组成具有两个意义：一、加强日本内部之统一；二、对英、美表示法西斯内阁之姿态。

△　财政部政务次长俞鸿钧在重庆招待新闻记者谈称：英国财政经济代表团倪米亚爵士及美国财政专家柯克朗抵渝后，曾与我财政当局晤谈多次，对有关问题彼此意见均能一致。平准基金委员会在港与该团各代表所讨论事项，已经政府获准。当局深信此次会谈结果，有关各国对敌经济作战，当可取得更密切之合作，将加强外汇政策之实

施。

△　中国银行拟在西南、西北地区大规模建设纺纱厂，由该行西北区经理束士方统筹办理。是日飞港购办机器。

△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抵重庆，28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10月中旬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粉碎日军发动的所谓“十万大战”，经两个多月作战，毙、伤、俘日伪军8000余人，破路800多里，击毁敌列车三列。冈村宁次自供失败，称“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10月**21**日　　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发表训词，指出目前中国军队战术改进之事项：一、应注意巷战之准备与实习；二、应研究敌人骑兵与伞兵之战术并讲求对策；三、各级指挥部应位置于总预备队所在地；四、副通讯与补助通讯之讲求；五、各部队应设置预备通讯所；六、迅速谍报人员与工兵部队应特别训练；七、应注重搜索部队之组织与运用。八、对敌人截取我军服装符号之防止。

△　郑州荥泽方面日军400余，附炮10余门，战车七辆，由黄河铁桥以南分三股攻陷广武。23日，第一战区卫立煌所部反攻，收复广武。

△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届年会暨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在贵阳举行，会期五天。由会长凌鸿勋主席，交通部长张嘉璈、教育部长陈立夫及罗家伦等出席并讲话。会议通过中国工程师信条八条，推选翁文灏为会长，茅以升为副会长。

△　美财政专家柯克朗由渝飞港。23日，财政部次长顾翊群、平准基金委员会美方委员福克斯、英方委员郝伯庄亦联袂飞港，参加在港举行的中、英、美三国金融会议。

△ 汪伪政府行政院任命周化人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市长，汤良礼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周隆庠为外交部政务次长，萨福畴为海军部常务次长。

10月22日 中英信用借款委员会在伦敦成立，由顾维钧主席，财政部代表郭秉文与英国代表马可文当选为执行委员。委员会并通过有关执行中英信用借款协定及委员会会务进行之若干议案。

△ 据中央社讯：台湾革命同盟会南方执行部在福州设立办事处，联络留居福州、泉州沿海一带台籍革命分子，从事复土运动。

△ 日政府决定发行“中国事件”公债票四亿元，其中一亿元由大藏省负责，三亿元由日本银行负责。

△ 东条批准日内阁参议九人辞职，并声称“将由有远见且能与政府就高度国防充分合作之人士中选任新参议”；政府之目的，“即在圆满结束中国事件与建立东亚共荣圈”。

10月23日 蒋介石指派康泽为主任，负责筹备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

△ 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病逝。

10月24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大后方工作的教训，指出：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的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

△ 教育部颁布《小学训育标准》。

△ 加拿大政府外交部宣布：将与中国互换全权公使。

10月25日 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一部袭击驻冈门日伪军，俘伪军营长以下66名，获步枪60支。

△　贵州省安南县改称晴隆县。

△　郑州日军5000余进犯王庄、十八里河、马庄、黄冈寺之线，第二战区一部阻击，将其击溃。26日，残敌退回郑州。

10月26日　　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来渝述职，是日作题为《抗战期间的山东》的报告，称山东全省共107县，完全沦于日伪宰割者只有三县，完全在我手中者四县，其余百县中日伪仅据县城，而乡镇依然为我之势力，并称全省目前有30县推行新县制。

△　山西汾离公路之日军1500余向晋西北第四分区出动，占领碛口、咀头、孟门等黄河渡口，作出进犯陕甘宁边区之姿态，以配合其晋西南之行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一旅第七一五团正调往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区执行任务，乃派第二团接替第七一五团之河防任务，并击退日军进犯。

△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和东方18个民族的代表130余人。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举朱德、林伯渠等37人为执委，朱德为主席。会上日本工农学校35名学员集体宣誓参加八路军。

10月27日　　财政部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在重庆举行首次会议，讨论战时田赋管理人员任用程序及田赋征实、田赋整理、征收制度等问题。孔祥熙谈整顿田赋要点，强调管赋人员之训练。

△　朱德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报告八路军配合湘北、郑州战役作战，向敌后各交通干线展开破击的情况，其中以冀、鲁、豫、苏、皖各线尤为激烈，先后重创津浦、平汉沿线之日伪军。晋察冀军区粉碎日军六万余人之长期“扫荡”；太岳区相继击溃日军三万余人之进攻；冀中吕正操部不断向霸县及津浦路上之唐官屯进袭；萧克部逼近天津市郊，摧毁敌碉堡、仓库等，使敌大为惊恐。

△　日机数架袭击晋西及陕北各地，并投弹多枚，被我军击伤一架，坠于山西吉县西北，机师三人被俘。

△　国际劳工大会在纽约开幕，参加者有34国代表。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出席，并当选为理事。

△　延安《解放日报》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称赞它“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行，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还强调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希望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对此亦特别加以注意。

10月29日　　行政院县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宗黄招待记者，宣布全部县政计划（包括新县制之计划）大体完成，定于本月31日结束。

△　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调何文鼎师进驻安边，则定边、盐池将不保，经济来源将断绝，我们决定用武力自卫，请向军委会交涉停止调动，否则引起冲突责在彼方。11月1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何文鼎师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介石、刘斐立即制止。如何师不停止南下，我们必须向边区增兵。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5000余人对太行区发动大“扫荡”，企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八路军的军工建设。31日，日第三十六师团3000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连夜袭击黎城、赤岸、西井等地。11月3日，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2000余人，分别由辽县、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溪、宋家庄等地。八路军太行军区加强游击集团，组成县、区、村指挥部，开展反“扫荡”作战。

△　据中央社讯：本年度全国全面劝募动员自3月初发动以来，已有粤、桂、湘、赣、闽、皖、鄂、康、豫、陕、甘、宁、晋、绥、黔等省陆续发动，共计劝募总额可达五亿元。

10月30日　　行政院成立审核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中央各部、会及各省、市之工作报告与工作计划，委员七人，主任委员由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担任。该会定11月1日开始工作。

△　据《申报》载：立法院长孙科在香港向复旦大学毕业生发表演讲，宣称“民主党联合会主张废止一党专政实属错误”，并以英、美、德、意为例，说明政府莫不在政党手中，国与党不可分离，认为“废止一党专政，将政府置于若干弱小政党手中，等于改组政府，殊不合法”。

△　美为协助中国扑灭滇缅铁路沿线疟疾病患，派抗疟团来华，该团团长哈斯、副团长雷脱等一行15人，循滇缅路抵昆明，与中国卫生署长金宝善及滇缅路当局商讨抗疟实施办法。该团总办事处设腊戍。

△　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指出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

△　英大使馆通告重申撤侨警告，望中国沦陷区内英侨妇孺早日离去。

10月31日　　第一战区孙桐萱部克复郑州，并向中牟、京水方向进击。

△　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宴美军事代表团马格鲁德及全体团员。马格鲁德在宴会上表示：美国将运用租借法尽量援助中国。

△　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在豫南信阳北击落日机一架，敌空军队长今井雄司等均毙命。

是月　　宋庆龄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指出：加强民主是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关键，缺乏民主

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是中国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对共同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关”。呼吁：“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不缺少的统一战线，海外的我国同胞们和外国朋友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要求——加强民主。”

△　中央银行发行藏文法币1000万元，由中央银行打箭炉分行发行，在西藏和西康流通。

△　日伪军在热河丰宁、滦平、宽城等地大肆镇压抗日运动。在丰宁、滦平逮捕达1500余人，处死200多人，处刑1000余人。在宽城的十几个村庄逮捕300多人，杀害无辜群众80多人。

△　日军“七三一部队”用飞机向浙江衢县投掷染有鼠疫的跳蚤、麦粒和粟子，致21人死亡，3000余人危及生命。

11月

11月1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民国三十年四川省整理债务公债条例》，凡11条，定额为国币3500万元，于是日起按票面十足发行，用以清偿民国二十七年5月31日以前债务。

△　滇、黔、桂、闽、康等省开始田赋征实。

△　豫南信阳日军一部北犯，4日向项城、上蔡进犯，被第五战区一部击败，当晚，我军克复汝南。

△　苏北海安日军山下等200余人，乘夜在前江苏省长韩国钧寓所架设铁丝网，严行监视，并强令韩赴海安出任伪职。韩坚不肯行，严词拒绝。双方相持达旦，敌乃挟韩之长、次两孙而去，押于泰州。

△　是日至12月25日，日伪军在华北实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

动”，其重点是配合对华北各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彻底进行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在敌占区内实行对食盐、火柴、石油、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经济手段配合政治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　日军第三师团为策应第三十五师团从郑州撤退，发起信（阳）北作战，2日陷正阳，3日占汝南并“扫荡”周围地区，8日退回信阳。

△　据《中央日报》载：台湾总督长谷川发表谈话称：在目下世界形势中，日本实行“南进”政策实属绝对必要。为达此目的，台湾军事任务之重要性亦将增加，全岛必须完全武装化，使成为一固定之“航空母舰”。

△　纽约华侨筹饷总会致电林森、蒋介石称：湘、粤胜利，全侨欢跃，共筹国币35万元，犒赏长沙将士15万元，广东将士10万元，及中央伤兵医药费10万元。

11月2日　　蒋介石以日军集结越南，将进攻云南，切断滇缅公路，是日电请罗斯福总统利用影响，使英国与中国通力合作。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安徽怀远。

△　晋西军渡、碛石日军炮轰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并在飞机掩护下以橡皮舟、筏子下水西渡，被八路军击退。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将北平男、女两师范学院合并成立北平师范大学，任黎世衡为校长。

△　日军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帝国国策实施要点》，规定要在12月初大举进攻东南亚各国，“决心对美、英、荷开战”。5日御前会议通过。

△　日军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全部，独立第五、第

六、第十旅团及伪军共二万余人，在战车联队、飞机大队掩护下，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历时52天。八路军和地方民兵配合，展开反“扫荡”作战，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11月3日　军令部制定《确保缅甸路作战计划》，其要旨为：以确保昆明、巩固滇缅国际通路为目的。先以第一、第九集团军凭依滇南山险及既设阵地与敌决战；如滇南决战不利，应以第一、第九集团军各一部在敌后游击，主力转移于南盘江阵地打击敌人，尔后以主力部队截断敌后，尾敌攻击。第四战区应凭借既设工事，掩护桂西、桂南，策应昆明行营作战。

△　晋东南八路军收复河北涉县县城。

△　重庆《新华日报》讯：内政部据某战区所送日俘少尉谷川口供，内称：日本施行毒化政策，东北已成鸦片世界，热河全省遍植罂粟。一、鸦片生产供给全为“国营”专卖制度，限定热河为培植鸦片地区，并设有“烟政局”管理贩卖供应事宜，允许开设烟馆；二、热河全省遍地种植，致使粮食极为缺乏；三、鸦片之制造，由烟政局统一管辖。

11月4日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主任委员宋美龄，以豫北克复郑州，将士忠勇赴命，不辞艰苦，特拨款10万元，犒劳该区参战将士。

△　豫南信阳日军一部陷确山，继续西犯瓦冈等地。第五战区驻驻马店一部向南出击确山之敌，敌不支，向新安店逃窜。5日克复正阳、新安店，残敌渡河南溃。

△　日机在湖南常德、桃源等地投播鼠疫杆菌。

△　日军分三路扫荡江苏建湖五区淳化乡，用割肉、开膛、活埋等手段杀害群众60多人，焚毁房屋705间。

△　日军将劫管之上海中华第一针织厂无限公司、恒兴泰榨油有限公司交汪伪工商部驻沪办事处接管，同日决定将1937年劫管之第三国财产权利交与汪伪组织接管。

11月5日　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各战区司令长官紧急会议，商讨保卫滇缅路计划及原料入口、与各国军事合作等问题。会后，商震及内政部长周钟岳飞昆明协助龙云计划保卫滇缅公路问题。

△　蒋介石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称："现在是我们联合奋斗的一极重要时机"，"最后胜利的机会，有赖于我们全世界被侵略各国的合作程度而定。"

△　国际劳工会议通过决议，呼吁所有自由国家以其所能生产之军火，供给中、英、苏及其同盟国，以获取战事之胜利。

△　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心对美、英、荷开战，进攻时间定为12月初；如12月1日零时前对美谈判取得成功，即中止发动武力；加强同德、意两国的合作；在发动武装进攻之前，同泰国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同日，御前会议又批准通过《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规定南方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并确保南方要地"；须占领的地区为菲律宾、关岛、香港、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帝汶等。

△　日政府派特使来栖三郎（前日驻德大使）赴美，协助驻美大使野村进行美日谈判。

11月6日　行政院经济会议召集有关部、会长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物价问题及平抑对策。

△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出席议员193名，候补议员16名。毛泽东致开幕词，林伯渠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五一施政纲领》为边区政府施政

纲领，通过各类提案380件。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8日，通过精兵简政决议。21日闭幕。

△　毛泽东与应邀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事。毛泽东表示：一、何来必打；二、放人、发饷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作别的表示，以示不与国民党为难。陈宏谟等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不要打响，他们担保何文鼎不来进攻，并认为共产党对参政会的上述态度是公允的。毛泽东还向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　重庆《新华日报》就物价飞涨发表社论《急速制止物价再涨》，提出六条办法：妥善处理通货问题；取缔囤积居奇；改善经济机构与管理方针；取消一切不必要的经费，减少政府支出；适当措理运输问题，积极发展工业生产；对下级公务员与教师生活应加以保障，对贫苦佃农应减轻其负担，对贫苦工人应改善其生活。

△　香港当局为协助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政策，协助平准基金委员会及财政部取缔法币外汇黑市，特公布《国防金融条例》，规定：凡有关中国法币之外汇交易，以法币计价之货物交易，收藏法币或以之作收受偿付之交易，以及输出输入法币者，均须经香港政府许可取得执照，否则即构成犯罪。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奖励资金内移兴办实业办法》，凡14条。规定：国币汇入内地投资者；将存款移存内地、供投资支用者；以外币、外汇或黄金交存指定之银行，供内地投资使用者；以外币、有价证券交由指定银行变价，或输入机器及必要物资作价或变价，以使内地投资者，均属资金内移。对于上述资金内移者，得由主

管部、会予以协助便利及保护；政府办理的工矿、交通、农林、畜牧等事业，除依法应归国营者外，特许资金内移者经营或合办。对于资金内移者投资的事业，在企业发生变化等原因招致亏损，政府酌予补偿；企业因周转需要现金时，政府予以借款。

△ “扫荡”晋冀鲁豫边区太行中心区之日军，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击退，南路退黎城，北路窜回武乡、辽县。

△ 日机六架袭击浙江兰溪，投弹34枚，死六人，伤九人，毁民房90余间。

△ 日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以第二十三军指挥的第三十八师团为基干部队，协同海军准备攻占香港，11月底完成作战准备。

△ 国际劳工大会闭幕。罗斯福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重申美国全力支持中、英、苏三国之决心。

11月7日 蒋介石在重庆私邸招待外籍记者，并发表谈话，说明反侵略国家的联合阵线，必须把握时机，争取主动，以打击敌人的新攻势。

△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广播演讲，指出：“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指示》，指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新的激烈的阶段，我之斗争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方式与敌周旋，保存实力，以待时机；要求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应包括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部分，要加强兵工生产等。

△ 新四军淮北苏皖边军区成立，赖毅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治

委员。

△　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开业，行长朱理治。

△　据《中央日报》载：加拿大华侨第八次代表大会捐款10万元，旅美斐市那华侨救国会捐款一万元，米哇地埠华侨救济委员会捐款二万元，慰劳湘北抗战将士。

11月8日　国民政府公布《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分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种。

△　美财政部专家柯克朗抵渝。柯于中英美金融会议后，在港、渝、沪之间频繁活动，上海汇市因金融会议引起的波动略见平定，然黑市交易迄未完全取消，此次来渝系与中国政府作最后会谈。11日飞港返美。

△　据中央社讯：国立中央图书馆奉令印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分送英国四部，美国七部，苏联三部。

11月9日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等举行张冲追悼会。吴铁城主祭，蒋介石亲临致词，并赠挽联："赴义至勇，秉节有方。"周恩来出席讲话，并赠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出版纪念专刊，发表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的挽词及周恩来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一文。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共5000余人分途袭击晋东南黎城之黄崖洞、水腰地区八路军兵工厂，受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及兵工厂员工阻击，经八昼夜激战，共歼敌800余人。16日特务团转移，兵工厂被敌破坏。

△　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及部分伪军共1800余人"扫荡"晋冀鲁豫边区冠县、堂邑以南莘县以北地区，并修筑冠（县）堂（邑）公路，增设据点；另有日军1200余人"扫荡"冀南新河、南宫、巨鹿之间地区。

△　广东新会伪军第三十六师旅长白拱宸、团长林华等率部300余人反正。

△　我国首次向美国赠送熊猫典礼在重庆举行，宋美龄、宋蔼龄亲自主持。

△　日军部代言人平井宣称：日海军攻华已准备妥当，要求与越南缔盟，并增兵至50万。

△　汪伪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商讨远东紧张情势下加强“日华合作”问题。

11月10日　　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招待记者并发表谈话，称：日军一面在越南增兵，一面又派来栖赴美谈判，其目的一为维持美日之间的和平；二为建设“东亚共荣圈”；并称：日本对美之和平攻势，亦想取得太平洋沿岸各国之控制权。所谓“东亚共荣圈”，实为“共苦圈”、“共死圈”。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地方军及县区游击队全部出动，在北岳区展开全面交通破击战。第二军分区重点破坏沿晋、冀边界修筑的公路；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重点破坏涞（源）易（县）线和由易县南下经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到娘子关的公路和封锁沟墙。到12月10日结束，共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平沟破路约400公里。

△　驻美大使胡适访罗斯福，交换远东时局的消息，并面交蒋介石的亲笔函件。胡建议美国以更多的飞机援助中国。11日，胡适再访罗斯福，罗表示保证美国决不背弃中国以取好日本。

△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延安青年联合会、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0余青年团体，发起于明年1月5日至10日在延安召开中国青年反法西斯运动大会，并邀请全国各

地各界青年团体派遣代表前来参加，共商推动中国青年反法西斯运动的方针。

11月上旬　　周恩来就何文鼎师南下两次质问刘为章，刘答说纯系调防，并转达蒋介石的话：“担保不进攻。”周恩来责以来安边是挑衅，声明边区要自卫，并要求释放叶挺、发饷。

11月11日　　白崇禧巡视桂南，是日检阅防守桂边军队，发表训话称：日军进攻昆明时，或将由越南重入桂省，广西军民应与云南军民协力合作，防守边界。

△　上海新加坡路日商公大第四纱厂发生火灾，所存棉花、羊毛全部焚毁，损失甚重。

11月12日　　重庆市各界举行庆祝孙中山诞辰代表大会，发表《告民众书》，提出当前最急切的几件事：第一，动员人力、物力一切力量，充实国防建设；第二，加紧努力文化建设，以促进物质建设；第三，树立中心信仰，纠正错杂纷歧的思想。

△　蒋介石会见周恩来，希望中共自动出席参政会，说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但现在不能放。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提议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并提出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六项，从1942年1月起实行。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伦敦牛津联合会发表演说称：为获得世界永久之和平，有赖于各国之合作，远东必须与西方同样获得胜利，推翻日本军事独裁，使全世界自军事独裁制中解放，否则即无法实现世界永久性之改善。

△　日机八架袭闽，两架失事。一架指挥机坠落德化境，一架坠

毁龙溪山中。

11月13日　蒋介石向英、美两国呼吁，“如日本进攻滇缅路，请予中国以军事援助”。英、美表示决定保持滇缅路，“竭尽所能以援华”。同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宣称：“若敌攻滇，誓与周旋。”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著名学者许地山、小麦育种专家沈骊英、绅耆王清穆。

△　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川北区负责人张澜向记者谈川北粮食征购情况，称：川北本非产米区域，且遭干旱，夏收作物一无收获，建议：一、小粮户免购，应以累进法取自大户；二、灾区免购减征。

△　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设宴招待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毛泽东出席。

△　美财政部修正《管理中国在美基金条例》，规定：此后对华汇款中之一切美金外汇，仅能汇交中国政府或平准基金委员会；凡从事中美间进出口贸易者，须向该委员会证明其已设法将该款项汇交中国政府，未经该委员会批准之物物交易，咸在拒禁之列。

△　山西高平伪协护队大队长崔凤朝率部300余反正。

△　日机40架先后侵入广西柳州、平乐、桂林及湖南零陵投弹，其中两架于归途中坠落。

11月14日　财政部次长顾翊群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美财政部之《修正管理中国在美基金条例》实为美国协助中国资金循正当途径流入中国之又一新的努力，并将加强中国之作战及经济力量。顾氏预料英国、荷印及菲律宾亦将采取同样步骤。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如张群、王世杰“担保放叶”，我们可否

出席国民参政会，或另取他法，或不理。毛泽东当即将中共七参政员因事请假致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函电告周恩来转递，并嘱：“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　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导师制纲要》及《导师服务规程》，凡五章18条。

△　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入河南中牟。

△　苏北黄桥日加藤大队长率50余人，配合伪军千余“扫荡”如皋以西、黄桥以东的高明庄地区，被新四军一部包围，战至子夜，将日伪军全部歼灭，加藤亦被击毙。

△　日机89架分13批袭击闽境各地，在南平市区投弹五枚，死三人，伤20人。同日，又有日机八架在浙江金华城郊投弹32枚，伤五人，死六人。

△　上海鸿章纱厂2000余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五成和生活津贴六成，因资方不允，举行罢工。公共租界派员调解，工人接受劝告，于22日先行复工，静待解决。24日，资方在谈判中无诚意，全体工人再度罢工，资方被迫答应要求，28日工人复工。

△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发表时局谈话，表示伪满不管日本发生何种事态，始终与日本一心一意，援助日本，万一日本与美国开战，伪满必尽力协助“友邦”。

△　罗斯福正式声明，美国撤退驻北平、天津、上海之海军陆战队970人，并严令在上海之美国侨民作最后一次之撤退。

11月15日　　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图伦大学发表演说，称：过去52个月来，中国如有大量武器，则战绩当必更佳，并分析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的五种条件：一、以空间争取时间；二、人口；三、历史的统一；四、国内建设；五、美国之援助。

△　周恩来接国民参政会开会通知后同董必武会见张群、王世杰。张、王反复说明由他们负责在参政会后努力设法释放叶挺，坚持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周恩来、董必武答应将意见转达延安，同时说明坚持请假的理由。

△　军事委员会任命丁友松为第八十军副军长；任命米文和为第六十九军代理军长。

△　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顽敌方强，南北增兵，西进之阴谋毕露。如何加强团结，促进民主，集中更大力量，准备与敌抗战到底，“正赖贵党与各党派以及全国人民之合作，共同奋斗，始克有济”。

△　八路军太岳军区一部及地方武装200余人，在晋东南潞城之神头村附近毙敌30余人，毁汽车三辆。

△　湖南省府以湘北战灾甚重，再拨款50万元赈济灾民。

△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的战争的内部方案》，决定：“迅速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根据地”，“同时以积极的措施促进蒋政权投降，与德、意合作”，“然后促使英国屈服，并使美国丧失其继续战争的意志”；“极力防止对方增加参战国，努力拉拢第三国。”

△　美芝加哥华侨领袖谭赞在香港演说称：自抗战以来，芝加哥3000侨胞或按月捐款或依薪水之百分率摊派，先后共已捐助美金140万元。

△　日特使来栖抵华盛顿，携有解决太平洋和平问题的五项程序：一、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二、日军撤离中国，但仍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及青岛或烟台驻军；三、日本允诺放弃向南扩张，但经济上的扩张除外；四、日本继续在经济上控制华北五省；五、日

本将摒弃侵略西伯利亚之意向。

△　教育部为奖励专科以上学校清寒优秀学生，增设“林（森）主席奖学金”，共400名。

11月16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以组织名义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参政员50余人，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正式成立，并就有关民主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以周励武、郭亚生本日从西安来电，说蒋鼎文、朱绍良已呈准蒋介石，何文鼎师缓调。电报指出：“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团结的工作，周、郭到渝时望接待之。”八路军“已切断何师到安边通路，这是彼方决定何师缓调的主因”。

△　军事委员会任命曹日晖为第九十军副军长。

△　重庆、延安、香港等文化界集会庆祝郭沫若5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香港《星岛》、《华商》、《光明》等报为郭沫若出祝寿特刊。重庆文化界为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筹设“沫若奖学金”，额定为三万至四万元，并将设立沫若研究所，出版文艺丛书12种。延安演出郭沫若《凤凰涅槃》大合唱。

△　日军3000余人开始对绥远大青山根据地武川以东、陶林以西及银矿山地区进行“扫荡”，烧毁村庄100多个，至12月5日结束。

△　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处长黄通对《大公报》记者称：政府当局已拨付1000万元，即将开办土地金融业务。该处已决定先自四川、湖南、广西、陕西四省开始，各选土地成问题之三县开始举办，由当地政府协助。

△　安徽省企业公司开始正式营业，资本1000万元，官股六成，商股四成，于皖南屯溪（今黄山市）设办事处，经营业务为：一、工、农、矿生产事业；二、经营特许之公用事业；三、购销有关民生

之必需品；四、改良和运销本省特产；五、受公私机关之委托购运地方物资；六、经营有关本省经济建设之必须事业。

11月17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出席国民参政员160人，列席者国民党中央委员及政府各部、局负责人，中外记者等300余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强调今天远东大势和世界全局上最重要的一着是“解决日本事件”，今冬明春就是最好的机会。参政员张一麐代表全体参政员致答词，强调“团结则存，涣散则亡”，希望“以参政会为民主政治的过渡，从速颁布宪法”。

△　郭泰祺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称：此次国民参政会各党派代表均有出席，证明中国团结日见增强；来栖访美，如日本不放弃在东亚及太平洋之侵略政策，即无谈判之共同基础；中国欢迎美国修正《中立法案》；滇缅路如受威胁，英、美两国甚为关切，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以防万一；目前有缔结A、B、C、D同盟趋向，侵略者既已同恶相济，缔结同盟，反侵略国家岂反不应团结一致，认为日本为轴心中最弱一环，应当首先解决日本，再集中全力应付欧洲。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毛泽东发言，提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精兵简政，调整人员；扩大收支，发展事业。这次会议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

△　美日谈判在白宫举行。据国际社讯：美方提出的条件为：一、撤退在华所有军队；二、日本对欧战严守中立；三、撤退在越南之军队。美方提出，如日本愿接受以上条件，愿与日本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并愿作调人，使中日战争获一公平解决。

△　东条英机在日贵族院发表演说，称日美谈判之目的有三：一、取消第三国阻碍“中国事件”处理计划之企图；二、取消敌意之行动，例如他国之对日经济封锁行动，并恢复国际间之经济关系；三、极力阻止欧战蔓延及于远东。同日，外相东乡在议会上作外交报告，

宣称：“苟有威胁帝国生存或危及帝国声威之情势发生时，则日本必须以坚决之态度应付之。”

11月18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分别由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交通部长张嘉璈、经济部长翁文灏报告财政、交通、经济等政情，参政员对于各报告提出询问案20余件。同日，国民党中央召集国民参政会中国民党参政员举行谈话会，检讨各地党政情况及中央法令实施状况。

△　国民政府令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师舜免职，特任刘为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育瑛为第八十七军副军长。20日，任命刘希程为第九十八军军长。

△　美芝加哥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谭赞抵渝，出席国民参政会。谭此次携有芝加哥侨胞春节献金国币50万元，“七七”献金16万元，及谭氏本人捐款15万元等，呈交蒋介石分配作慰劳、赈灾及保育儿童之用。

△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筹备会在延安成立，冯文彬为筹委会主任，胡耀邦等为委员。

△　日藏相贺屋在临时议会上发表演说称：自中日战争发生以来，国库支出约480亿元，内有军费260亿元。对华战争后推销公债241亿元。1940年的赋税较战前（1936年）增加四倍，并称当前局势下国家财政管理以“军费第一”为政策。

11月19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举行第四、第五次会议，分别由内政部长周钟岳、粮食部长徐堪、教育部长陈立夫、农林部次长林翼中报告社会、粮食、教育、农林等政情。会议通过电慰蒋介石、前方将士、东北四省同胞及海外侨胞等电文。并通过提案审查委

员会国防、外交国际、内政、财政经济、教育文化各组召集人名单。

△　驻美大使胡适访美国务卿赫尔，就远东局势交换意见。20日，胡将与赫尔谈话内容电告蒋介石，蒋以美国仍有牺牲中国，对日妥协之意，即令外交部复电坚决反对，并自拟长电警告美国政府。

△　粮食部拟定三年施政计划。部长徐堪是日手订八项要点：一、厉行积谷制度，三年必有一年余粮，防备灾害；二、统筹粮政，作合理之分配；三、改善加工及运输条件，以盈济虚，调节供应；四、管制粮商，以减除对市场之扰乱；五、节约粮食，提倡食杂粮，以广储备；六、建立粮情报告网，以为施政之准备；七、建立粮政机构；八、与有关机关努力增产，求农产之自给自足，并促土地政策之早日实现。

△　经济部根据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指示，以经济游击队“兵力不少，成效未见，弊端百出”，予以取消，并严令第一线正规军与沦陷区游击队等合力兼办。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及新一旅各一部在山西黎城北三十亩、曹庄与长畛背地区设伏，毙伤日军300余人。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开会讨论驻沪美海军陆战队撤退后接收问题。日本训令上海日方接受工部局决定，由工部局巡捕接管美军防区。

11月20日　　由参政员张君劢领衔，其他各党派参政员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交署名提案，促请政府尽早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期早日实行宪法。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向报界人士发表谈话，宣称：现集中于越南南部，包括泰国边境之日军约近10万人。

△　全国节约建国储蓄竞赛本年度预定目标为六亿元，是日提前

完成。

△ 美日谈判继续进行。日方向美方提出新方案：一、A、B、C、D阵线必须松弛，美国须减少对中国之援助；二、美国必须对日本在东亚建设“新秩序”之程序取消作政治压力，而日方表示愿意接受下列数点：一、愿意不与德国有直接之合作；二、愿意停止对荷印及西伯利亚作军事威胁；三、愿意尽早结束中国战事。美国要求日本实行下列数点：一、与轴心国断绝联盟；二、撤退中国驻军；三、停止一切侵略；四、同意在亚洲市场与一切其他各国有同样之经济机会。

11月21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开始审查各项提案。上届驻会委员会对上届大会决议案实施情形均作详尽检讨，并报告于大会，对尚未彻底实施各案则列举事实，希望国民政府予以参酌施行。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内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大体可分为反共分子、中间分子与进步分子三类。过去的反共分子与中间分子中，也有由于经验和思想的进步，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者。因此，不加区别一概接收入党，是错误的；一律拒绝入党也是错误的。对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必须考察他们在思想转变上，是否确实经过了一定的进步过程。国民党员已经加入共产党后，应与一般共产党员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得到同样的信任。

△ 国民政府令派尹明德为中英会划滇缅路南段界线委员会中国委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一部克复晋东南黎城县城。

△ 驻华美军将上海防区一部移交公共租界工部局。

11月22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继续审查提案。下午举行第六次会议，通过《组织滇缅路视察团案》及参政员张之江等提出的《关于整顿征兵练兵办法，以固国防基础》等11项议案。晚间，蒋介

石设宴招待全体参政员。

△　行政院经济会议为实施人力总动员，特拟定《战时国民劳动服役条例》，凡17条，自是日起施行。

△　经济部通知各省营贸易机构进行调整，依法将原有贸易机构改组为公司组织。

△　中、英、澳、荷驻美使节在华盛顿与美国务卿赫尔协商太平洋问题，同意支持赫尔所提出的解决远东问题的原则：一、日本退出轴心国；二、日本放弃侵略及扩张之野心；三、从中国、越南撤军；四、太平洋上各国商务机会均等。日方要求为：一、放弃对日经济封锁；二、减少援华；三、降低对日新秩序之压迫。

△　日宪兵在越南西贡非法拘捕华侨70余人，经设法营救后，至23日尚有30余人拘于宪兵司令部内。外交部对日军此种暴行向越督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制止此后同样事件之发生。

△　菲总统奎松在马尼拉中国总商会宴会上发表演说，保证予华侨以公正之待遇，并尊重及保护华侨之权益。

11月23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上午继续召开提案审查会，对于滇缅公路运输极为重视，决定由专家组织滇缅公路视察团。

△　据中央社讯：中、英、澳、荷四国会谈对日提出警告，其要点为：一、各国决心维护其在远东之权利；二、支持美国之领导地位；三、倘若日本不能采取更为协调之态度，则各国继续对日实行经济制裁。

△　西贡美领事馆被炸。翌日，日同盟社造谣诬为华人所唆使。25日，外交部发言人予以驳斥。

11月24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通

过《改善各级公务人员待遇案》等20余件。

△　蒋介石出席陪都卫戍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禁烟、禁娼、禁赌与清除匪盗四项工作是目前卫戍之要务。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招待中外记者称：A、B、C、D国家之意见完全一致，彼此之间并能充分的相互信赖，并称：日本并无放弃任何侵略之真意，徒欲凭借外交与军事之联合攻势，以求反侵略国家疏松其经济封锁而已。

△　行政院经济会议派出成都经济检查队，在成都及其附近郫县、新都等地破获囤积案17件，是日，该队会同官署、军警查封囤积米谷物资并逮捕人犯。

△　云南省主席龙云训勉僚属，敌若攻滇，誓与周旋到底；滇缅路为支持抗战大动脉，必须力保畅通，以供国用。为保乡卫国而战，虽战死亦无限光荣。

△　美海军部宣布：撤退在中国长江舰队之一部。

△　英国战时内阁驻远东代表特夫古柏宣称：滇缅路绝不致再行关闭，以断绝中国军需来源。

11月25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举行第八、第九次会议，选举驻会委员会，继续讨论通过了主席团所提《促进民治案》及政府交议的《三十一年度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案》和其他提案。

△　行政院会议通过《省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及《省参议员选举条例》，通过改复旦大学为国立等案。

△　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希濂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张轸为副总司令，吕瑞英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为第六十一军军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七旅一部袭入河北威县城，毙伤日军联队长以下50余人，俘伪军及伪县府人员100余人。

△　德、意、日、西班牙与伪满洲国签订协定，延长《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并邀请汪伪政府参加。同日，褚民谊照会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宣布汪伪政府即日起加入《国际防共协定》。26日，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发表声明，表示要“彻底扑灭共产主义”。

△　越南当局就日军在河内非法逮捕华侨事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日方违反《法日协定》，侵犯法国国土及越南主权。

11月26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举行第十次会议，由大会秘书处宣布驻会委员会选举结果，当选者为孔庚、褚辅成、李中襄、黄炎培、杭立武、高惜冰、邓飞黄、范予遂、董必武、陈博生、沈钧儒、许孝炎、冷遹、江一平、李璜、陶玄、林虎、童冠贤、刘哲、许德珩、张澜、李仙根、麦斯武德、王启江、梁实秋25人。会议在通过《收复失地及抗战目的案》等案后举行闭幕式。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凌云为第五十九军副军长；任命陈继淹为第七十七军副军长。

△　宋子文偕驻美大使胡适谒罗斯福总统，谈中美关系问题。

△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委会成立，推举续范亭为主任。

△　第七战区所部在广东吴川县境内击落日机二架，一架坠毁，一架受伤被迫降落，机师被俘。

△　汪精卫发表谈话，声称愿意与德、意、日国家一起，坚守东亚轴心和世界反共轴心精神，与日本在忧患之中共同奋斗，努力以求中日条约之实践。

△　美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等递交《美日关于远东政

治经济问题协议草案》。《草案》提出：日本政府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退所有陆、海、空军及警察武力；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不支持重庆以外之任何中国政府及政权；两国政府放弃在华所有治外法权，包括有关公共租界及专管租界的各种权益，以及1901年《辛丑条约》中的权利。

11月27日　　行政院因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上关于物价提案甚多，并揭发了许多不法情形，是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行政院经济会议，切实讨论严格执行平价办法及囤积居奇禁令，并公布原订之工作实施大纲，内容包括划分职权、调查物价、实施管理、调整业务等四部分，尤其要求严禁各银行买卖商品或利用商号名义从事此种活动。公务员如有此种行为，更将从严惩处。

△　美海军陆战队第二营及司令部360人乘“麦迪森号”邮船离沪返美，同轮离沪者尚有美侨100人。

△　罗斯福接见日使野村，明确表示美国的远东政策决不退却。

△　香港举行防卫大演习。

11月28日　　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薛笃弼对记者发表全国水利建设概况：全国已完成农田水利工程可灌田99.8万亩；正施工者完工后可灌103.8万亩；正勘测设计者可灌314.3万亩。全国共有40个水利测量队。除原设站外，复于川、康、黔、豫设水文总站五处，水文站32处，水位站102处。

△　日步、骑、炮兵联合部队3000多人，分三路“扫荡”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溧阳县塘马村。为掩护旅部和地方领导机关1000多人转移，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率部与敌奋战，不幸阵亡。该部经反复冲杀，终于突出日伪军重围。

△　日新委任铃木中将为伪新民会副会长，是日到北平，接替安

藤中将。安藤已调任日本翼赞会副总裁。

△　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二批400人撤离。驻华美军除领事馆及扬子江舰队炮舰上留有少数官兵外，几全数撤退。

△　美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宣称倘日本侵略泰国，威胁滇缅路，则美国将实行“陆上护送”，以确保军需品之援华。

11月29日　　孙科由港飞渝，离港前对记者发表谈话称：美国应放弃对日姑息政策，并希望美国勿在东北方面对日有任何让步，否则将造成极严重之局势。“东北问题乃远东和平问题之枢纽，东北一日为日本占据，则中苏两国之安全即一日遭受威胁”。

△　美驻华大使高思访外交部长郭泰祺，交换关于华盛顿谈话之最近发展情报。

△　日首相东条英机发表演说，重申“善邻”、“防共”、“经济提携”等原则，并以此抨击英、美的远东政策。

11月30日　　军令部以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军官多吸鸦片，并携带烟土高价出卖，及以军价购米市价出卖，烧杀扰民等，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查处。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多荃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任命钟彬为第十军军长。

△　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大学举行第十四届年会。蒋介石颁发训词，勉科学家在抗建大业中多做贡献。年会由胡焕庸、张洪沅、杜长明任主席团，到社员及机关代表百余人。教育部长陈立夫、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均出席讲话。

△　汪精卫就汪日《基本关系条约》签订一周年致电东条英机，并对日本发表广播讲话和声明，声明称：“条约”确立了中日两国共存

共荣的百年大计，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今后“国民政府”无论在外交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都将本着同忧患共安乐的精神，与日本安乐相共，还要用种种办法以促渝方觉悟，实现全面和平。

△　日机轰炸滇缅路，毁卡车50余辆。同日又袭击陕西宝鸡、武功、盩厔（今名周至）等地。

△　周恩来就英国要求同中共在琼崖合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两点建议：一、对英条件要高；二、在港设机关电台“以秘密为好”。毛复电同意，嘱廖承志照办。

是月　中英政府商定中缅划界明年元月开始，由中英双方合组委员，共同勘测滇缅路北段未定界。中方派尹德明为委员。

△　河南省中和渠工程竣工，全长180余里，灌溉受益面积约达24万余亩，为该省最大之灌溉工程。

12月

12月1日　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发表谈话，表示美国如与日本作战，中国亦将对日宣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与日本单独媾和。

△　宋美龄应美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之请对美广播，表示“我们跟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是存亡相共的”，“我们毅然担任民主国家的第一条阵线与强暴敌人相周旋”。

△　粮食部长徐堪对中央社记者谈话称：全国征购粮食均按程序开始办理，征购总数为6000万石，其中四川省征购总数为1200万石。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

指出：各地抓紧目前的时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号的办法，用在华日本爱国反战同盟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说明无论西进、南进、北进都是危害日本的。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省人力物力。

△　第七战区一部在广东惠阳境内击落日机一架，机内五人全部毙命。

△　香港军事当局称：香港驻军现已“局部的”派驻香港岛上及大陆之作战阵地，华籍居民数百人业已准备撤退，留港日侨约百人现均赶速离境前往广州。同日，香港市政使宣布紧急疏散令。

△　日举行御前会议，天皇作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2日，陆、海两统帅长再次上奏天皇，决定作战开始日为12月8日。

△　中央社讯：美方报纸以显著地位登载，日军苟侵滇或再轰炸滇缅路，则美国空军人员即将驾驶美机保护该路。

△　韩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令在中国国境以内所有光复军于中国抗战期内暂归中国统帅管辖，受其节制。

12月2日　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第三届常年大会及预祝民主国家胜利大会在重庆召开，因正、副会长宋子文、邵力子均在国外，会议由秘书长吴铁城主席，到会2000余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亦参加大会。蒋介石颁发训词，大会电国际劳工会，吁请世界劳工加紧援华。是日，并请潘公展、李石曾、马超俊、侯西反、吴铁城、尹葆宇等分别用沪语、国语、粤语、闽语、英语对国内外广播，作反侵略宣传。

△　据《大公报》讯：国民党中央为博采各方意见，特通告各地各级工作人员征求实地工作意见：一、关于政治修明问题，包括行政三联制之实施、役政之改善、田赋征实弊端之防止、走私之防治等；二、经济管制问题，如物价之稳定、统制之改善、游资之运用等；三、民众疾苦之救济等，以为施政参考。

△　国民政府改组察哈尔省政府，免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毕泽宇本兼各职，命白宝瑾兼任；免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王清翰、霍振铎、臧元骏、裴鸣宇本职；命王荣灿、戴曾锡、石友益、陈祥生、吕国桢继任。

△　社会部决定该部明年在川、滇、赣、湘、鄂、粤、桂、浙、黔、陕、甘11省政府下增设社会处，其他各省于民政厅内设社会科。

△　郭沫若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之请，发表对日广播演讲，呼吁日本人民振奋自救“民族切腹”之厄运。

△　日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攻占香港的命令，其要点为：一、帝国决定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开战；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以第二十三军司令官指挥之第三十八师团为基干部队，与海军协同攻占香港，实施军事统治。

△　罗斯福召集战时内阁会议，讨论远东局势。同日，又命副国务卿威尔斯接见来栖、野村，询问日本最近增兵越南之目的，并促日方即早答复美方上月26日所提基本原则之文牒。

12月3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行政院经济会议，讨论平价工作，决定限制设立银行、商号，并宣布该会成都经济检查队于上月破获囤积案17起，其中以银行、商号为最多。囤积物品有米、菜油、木材、布匹等，决定严厉制裁。

△　据中央社讯：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电呈国民党中央，捐助

劳军捐款国币25万元及伤兵医药费10万元，蒋介石以该会敌忾同仇，输款劳军，爱国殊深，特传谕嘉勉。

△　日大本营下达南洋开战后中国派遣军任务的命令，规定开战后中国派遣军的任务是：一、确保从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至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的稳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与山东两省各要地及上海、南京、杭州地带的治安；二、确保从岳州到长江下游的交通，依靠武汉三镇及九江，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区大概定为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三、占据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的各要地。广州附近的作战地区大概定为从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之间。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在远东的基本政策，谴责日本在远东建立军事专制政治的企图，并暗示美日之裂痕无法补救。

12月4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就晋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作战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晋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作战获胜的原因，一是采取广泛的群众游击战，消耗战；二是军民密切配合，发挥全面的对敌斗争，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法立足；三是普遍埋设地雷，予敌杀伤和威胁极大。

△　美国政府宣称：美国在租借法规定下所予中国之援助，已达极大之比例。美国所造卡车1.4万辆不久即将行驶滇缅路。军用飞机之零件，在美造成即将运重庆。

△　香港当局为应付非常局势，决定取消警察假期，并实行粮食统制。

12月5日　　第三次全国内政会议在重庆开幕，内政部长周钟岳指出目前应注意：一、新县政之实施；二、地方警卫力量之充实与调整；三、土地政策之实施；四、民族意识之提高；五、禁烟善后工作

等。

△　周恩来接刘为章来函。函称何文鼎新二十六师仍驻原地未动，要求延安撤兵，恢复原来态势。周恩来将刘信电转毛泽东后，毛泽东嘱周恩来答复刘：只要何师不再南下，我军当即退回原防。

△　胶东八路军一部向烟台、黄县一带的日伪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于是晚攻入烟台市。

△　晋东北山阴县日军10名携械投奔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是日抵该军总部，受到热烈欢迎。

△　日机袭击湖南衡阳，陕西西安、南郑，湖北郧西。在郧西市区投弹20余枚，死伤数人，毁房屋10余间。

12月6日　蒋介石令拉铁摩尔电告罗斯福，中国决不放弃东北，否则世界战争将循环不已，表示欲求长期和平，唯有助中国独立不被他国侵略。

△　中国航空协会秘书长陈庆云宣布：全国“一元航空献金运动”结束，将可募集6000万元，以供购机作中国空军之用。海外华侨踊跃捐助，计巴达维亚华侨捐款100万元，香港中国居民亦募集港币100万元，广州湾华商二人合捐飞机一架。国内湘省捐款2000万元，陕西500万元，贵州350万元，重庆150万元，浙西捐机三架，陕南五架。

△　军事委员会特别会议决议，将最近逮捕之囤积牟利者20人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日，成都市商会暨各同业公会电呈行政院，要求严厉惩治囤积居奇人犯。

12月7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一旅一个连于神头伏击战中毙日军中队长以下50余人，毁汽车四辆。

△　冀东八路军一部袭击丰润县蒙家庄，俘日伪军百余名，缴获轻机枪10余挺。

△　上海小花园、大新街及法租界等处百余家鞋店4000余名职工，要求增加工资及生活津贴未有结果，全体罢工。结果资方答应按照原工资增加50％，其余问题俟职工全体复工后，再签订协约。职工于8日复工。

△　香港当局为应付紧急状态，加强戒备，发布通告：一、所有志愿兵一律实行军法三个月；二、召集志愿兵入伍，以待后命。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下午1时20分（夏威夷当地时间为12月7日上午7时55分），日军由六艘航空母舰（舰载飞机382架）、二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三艘潜水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和以27艘潜水舰为主力的先遣舰队，向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日军偷袭珍珠港，共炸沉、炸伤美军各种舰船40余艘，其中包括八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击毁、击伤飞机230多架，美军伤亡4500余人，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打击。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采取之政策，蒋介石主持会议，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中国的地位特别重要。我国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有左右战局之势，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后对日态度能否一致，我国实可操决定性之影响。"提议：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部；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

△　下午，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并提交书面建议，强调指出协调作战的必要性，敦促中、英、

美、苏、荷、澳等国结成军事同盟，在美国领导下指挥作战；并表示中国决不避任何牺牲，竭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友邦对侵略者共同作战。是日晚，蒋又召见英、美两国驻华武官，提议要迅速组织一个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机构，以协调共同作战的行动，避免被各个击败。

△ 外交部长郭泰祺接见中外记者，宣布中国政府决将对日、德、意宣战，并称：中国不顾一切更大牺牲，准备用其全部力量及资源，与友邦合作，击败日本及其他轴心国家。

△ 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等，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对英、美的政策，应当是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因此，应当努力做到：一、同意瑞典人来延安，贝特兰亦可直来延安；二、在广东、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我们可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由英、美供给武器，我们派人帮助组织；三、设法在新加坡、仰光、菲律宾、印度或澳洲成立秘密的中共代表机关。

△ 日政府向全国发表由日皇裕仁核准之对美、英宣战宣言，宣称日本为“摧毁美、英之暴政，恢复东亚和平，以享受国家生存及共荣之福，帝国之兴亡以及东亚之盛衰，悉系于今日之战”。

△ 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对日宣战决议，罗斯福以海陆空军大元帅资格下令各地应战。同日，丘吉尔在英下院宣布对日宣战。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法国、新西兰等国也对日宣战。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支持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授权汪精卫发表声明。汪精卫声明称：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难局。

△ 伪满洲国发表《日美英开战满洲帝国政府声明》，表示“盟邦

之胜败即我国之胜败，盟邦之兴废即我国之兴废，我国官民宜辨清我国与盟邦为命运共同体，举总力协助盟邦之圣战，务期实现东亚诸民族共同理想”。

△　凌晨4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及宪兵冲入上海公共租界，并占领外滩之英国汇丰银行，其他外商银行亦由日军驻守。同时劫收中国、交通两银行，封闭中央、农民两银行。同日，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英、美侨民被俘。

△　日军事当局派兵占领鼓浪屿，鼓浪屿所有美、英等国籍民全部被俘。14日，日军事当局宣布改组工部局董事会，派台湾银行行长加藤正午为董事长。

△　日伪军1000余人分三路向苏北南通丰利进扰，同时伪军千余人由丰利侧击。新四军一部转入敌后夹击，毙伪团长一名、营长三名及以下官兵200余名，俘伪团长以下200余名，俘日军分队长四名。10日，新四军另一部克复丰利。

△　日军3000余人分九路合击鲁南费县以西天宝山地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直部队与鲁南军区安全转移。山东纵队第一旅一部坚守苏家崮，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后，全部壮烈牺牲。

△　重庆防空部公布：在此以前，日机袭渝数百次，共炸死9218人，伤1.3908万人，分别占全省轰炸中死伤人数的41％和53％。

△　日机23架袭击陕西眉县、合阳、朝邑，在西安市区投弹30余枚，毁民房80余间。9日又袭击潼关、华阴、咸阳。

12月9日　　国民政府发布布告，明确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同日，又宣告对德国、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　蒋介石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致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及各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告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之际，我前方将领对于训练、经理、卫生、政工以及作战精神与爱护物力等重要业务，皆应彻底检讨缺点，及时改正，以充实我实际抗战之力量。并申勉下列要点：一、特别注重时间，宝贵光阴，立即增加训练时间，充实作战实力。二、严格整饬军纪，杜绝贪情恶风。三、核实部队名额，根绝浮滥流弊。

△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提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日，又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应当包括反日的一切民族、政府、党派、阶层及日本国内反战人民，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

△　罗斯福致电告蒋介石，美国已对日宣战，并申述加强美中友谊与共同奋斗，征服暴日，直至取得彻底胜利。10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对美国的援助与友谊永志不忘，并愿贡献其所能，与友邦美国共同奋斗到底。

△　罗斯福发表演讲，谴责日本背信弃义，进攻美国，并宣称：战争为长期、艰苦的战争，美国决不中途停止，决心作战到底。

△　丘吉尔致电蒋介石，称：英国与美国业被日本攻击，愿中英加强友谊，同对一敌，共同奋斗。10日，蒋介石复电丘吉尔，表示中英两国人民并肩作战，誓必扫除共同之仇敌。

△　国民政府以热河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缪澂流另有任用，免本兼

各职，命刘多荃继任。

△　财政部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规定“取缔银行经营商业与囤货，限制抵押放款”；“未经财政部特准，一概不得设立银行”。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护友党、友军、友区党、政、军人员家属、财产的指示，规定以下政策：一、一视同仁，对其眷属财产，妥为保护；二、对有声望的军政长官之家属，应酌量吸收他们参加民意或行政机关；三、对其家属除依法缴纳赋税外，不得滥行征发，妄事勒索。即使在反共高潮中，也要依法保障他们的人权、政权与财权，努力进行争取工作。

△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工作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提出对部分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去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要求尽速争取与英参谋部谈判合作事宜。

△　香港中国航空公司美籍及华籍驾驶员在炸弹威胁下之机场载客离港，计被抢救出者有275人，有平准基金委员会中方委员陈光甫、美方委员福克斯、英方委员霍柏枢以及宋庆龄、宋蔼龄等。

△　据《大公报》载：美国军事代表团马格鲁德表示：他暂时不回美国，准备与中国参谋本部作最密切的联系，以实践对于中国军事上的种种计划与建议。

△　日机21架分四批轰炸湖南常德城郊及德山等处，投轻重炸弹及烧夷弹多枚，六处起火，毁民房多栋，居民死伤10余人。

△　旅渝韩国独立党人以韩国临时政府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愿领导3000万韩人与中、英、美、荷、加、澳等国共同抗日。

△ 伪满洲国对美、英宣战。

12月10日 蒋介石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号召与英、美、苏等友邦并肩作战，“内以恢复领土主权，完成我抗战最初之目的；外以昌明国际正义，求得我中华民族振古未有之光荣”。

△ 是日至11日，蒋介石在重庆两次邀集英、美驻华大使及武官，商讨中、美、英、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会间，蒋介石请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向罗斯福转达四点意见：一、同盟国举行首脑会议，商讨全球反法西斯作战战略和共同宣言；二、同盟国间设立联合军事参谋机构，协调全球作战计划；三、成立亚太地区五国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四、中英组织联军共同防守缅甸。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社党的策略的指示。指出我们对于国社党应严加警惕，不应与他们签订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国社党。

△ 驻英大使顾维钧就太平洋战事向英国报界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乃首先抵抗侵略之国家，且将与英、美两友邦继续合作抗战。

△ 中英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缅文化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国际文化团体共同发表反侵略宣言，欢迎所有反侵略国家加入共同阵线，并肩作战到底，决不单独言和。

△ 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晋察冀支会及朝鲜青年义勇队在晋察冀边区成立。12日，朝鲜义勇队华北队孙仪峰、朴东、王宪等在冀西元氏胡家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致电汪精卫，建议在英、美

对日宣战后，要确立全国精神总动员、全国物资总动员、全国一致加强防共力量等三原则。

△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把太平洋战争，包括中日战争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

12月上旬　　周恩来同刘为章、贺耀组谈话，交换对阎锡山的看法。周恩来认为，如日、美妥协或日攻西安，阎锡山有可能投敌。刘表示同意。安边问题，刘担保何文鼎师决不开动。周恩来要求释放叶挺，贺答应查明后办。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日军包围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解除美军武装，并将北平的英国兵营占领。许多医院的“敌国籍”医生和职员一律更换，由日本人代替。燕京大学被查封，师生多人被捕入狱。

12月11日　　蒋介石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发表《告海外侨胞书》，务望海外侨胞“奋其义勇，协助友邦，贡献一切人力物力，为消灭共同敌人，达成最后胜利而作英勇坚毅之奋斗”。

△　蒋介石对太平洋战局发表谈话，称：“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又称：“今日日本闪电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也！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

△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反轴心国各国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并请美国驻重庆军事代表团团长给罗斯福转告如下意见：一、请华盛顿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的中心；二、在苏联尚未对日宣战以前，请华盛顿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三、五国初步谈判的地点应为

重庆，其永久讨论地点待讨论决定之；四、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相协定的方案。对于蒋的提议，罗斯福表示赞同，12日复电蒋介石，称："依余之判断，最要的举措在采取立时的步骤，以准备抵御敌人的共同行动。因此，我谨建议贵国于12月17日以前，在重庆召集一次联合军事会议，藉以交换情报，并考虑在东南亚最有效的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

△　新四军彭雪枫师一部配合皖东北地方武装，袭击苏北宿迁东南洋河镇日军，全歼守敌，俘中队长以下120余名。

△　美国对德国、意大利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　丘吉尔在英下院报告称：蒋介石"已向余保证了英、美可尽量利用中国之资源，今后中国之抗战，亦即吾人之抗战"，并称："吾人宁可全部沦亡，而不受他人征服。"

△　德、意、日三国缔结《新互助协定》（亦即《共同作战条约》），规定若非三国相互完全谅解，三国决不单独对英、美休战或媾和。

△　伪蒙疆自治政府宣布对英、美宣战。

12月12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外交部长郭泰祺的外交报告，并通过对日、德宣战及反侵略国家合作互助案，一致主张中、英、美、荷必须患难相共，获取最后之胜利。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重庆发表声明，希望反侵略国家订立军事同盟，并成立统一指挥机构；并称：中国政府与中国领袖对于此点已在严重考虑。

△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委会在延安开会，讨论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的工作，并发表宣言，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并拟用各种民族语言向南洋广播。会议推选朱德为“东盟”主席。

△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发表宣言，号召同胞一致抗日。

△　香港当局宣布放弃九龙半岛，决守香港。同日，日军占领九龙半岛。

△　斯大林致电蒋介石，指出：以苏俄现负担抗德之主要任务，不宜分散力量于远东地区，表示不能即刻对日宣战。

12月13日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于财经问题的几点建议：一、管理物资与禁止出口，以免上海法币外流；二、紧缩预算，逐渐实行实物薪饷制；三、彻底管理银行，国家银行也在内，停止增设县银行。

△　据中央社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恩克巴图，候补监察委员溥侗叛党附逆，参加汪伪四中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函国民政府通缉。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指出：英大使等既要我们派人去新加坡，正宜利用此机会派人去，请你考虑派必武或其他适当人去的问题。

△　美远东军总司令部公布麦克阿瑟总司令致蒋介石之电文，表示愿以武装同志最诚挚之热情密切联系，以达到共同目的。

△　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纵队为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是日沿东江向西，对广九线、深圳一带日军侧击；15日续向广九布吉方面集结之日军袭击。20日进抵横冈，并向西南方向攻击。

△　香港《大公报》、《华商报》晚刊因九龙失陷而暂告停刊。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召开盟员大会，反对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发动的新的侵略战争。通过反对日本侵略者侵略太平洋的宣言。

△　日军司令部下令停止轰炸香港，同时派军使向港督提出“投降要求”，遭到港督的拒绝。英军表示决心为保卫香港流尽最后一滴血。

12月14日　　重庆国际文化团体联合举行扩大反侵略大会，美、英、苏驻华大使及国民党中枢党政要员出席大会，宋庆龄、吴铁城、孙科任总主席，参加者10万人。大会悬挂蒋介石书巨幅标语：“友邦之敌人即吾人之敌人，友邦之成败即吾人之成败。”

△　据《大公报》讯：国民政府为了适应世界战局要求，最近将加紧统筹一切非战时所需，实行新的经济措施：一、四联方面将对民国三十一年度之农业金融放款予以紧缩；二、受世界大战影响者如贸易委员会等机关决予调整；三、战时新政所必需推行者，亦有设立新机构之考虑。

△　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撰文《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长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主从性六个特点，阐述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号召反侵略国家联成一体，休戚相关，共同战胜法西斯。

△　蒋介石校长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学校公务人员训练部高等科、普通科毕业典礼及大学部、专修部人事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并即席训话，阐述政治与行政之关系，用人、用权之道，希望学生应立志作政治家，作中国历史上的人物。

12月15日　　中国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到执委150余人，推居正、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戴季陶、邹鲁、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叶楚伧、顾孟馀组成主席团。蒋介石致开幕词，指出太

平洋战争爆发“此诚我中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重要时机”。吾人为了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目前应注意做到三点：一、切实努力于训练人民，行使四权，确立民权始基；二、对于党外之人才，凡忠于国家者，服膺三民主义者，必须尽力吸收，多方延揽；三、动员全国所有之人力、物力与地力，使其效果得以充分发挥。

△　中国政府与伊拉克政府商定同意互派使节。外交部拟于近期内派员赴伊，筹备设馆事宜。

△　据中央社讯：东北民军司令赵凯日前由苏联来渝，向蒋介石报告六年来在东北抗战的实况，并请示今后工作方针。据赵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民军更增加了打击暴日的决心，俟奉指示后即返东北，不久将在东北另辟一新战场。

△　上海申新九厂3000余名工人罢工，要求发米。资方勾结日军宪兵拘捕罢工工人。经过反复交涉，资方答应要求，被捕工人获释。18日，全体工人复工。

△　晋察冀八路军一部攻克河北涞源县城。

△　据中央社讯：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广播机关，又迫使美商英文《大陆报》、英商《字林西报》等报纸自动停刊。华文《正言报》、《福州日报》、《中美日报》、《申报》、《大美晚报》等均亦停刊。

△　日机袭击九龙，中国航空公司及欧亚航空公司停在九龙机场之巨型机多架被毁。

△　日机10架袭击广西桂林、柳州和南宁，在南宁投弹，死伤平民30余人，毁房屋10余座。

△　日政府为筹军费，发行临时公债，勒令台湾承销250万元。

12月16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继续开会，听取组织、宣传、海外、内政、外交、三青团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报告，并发表各组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党务组召集人为邓家彦、陈立夫、朱家骅；政治组召集人为王宠惠、张群、黄旭初；军事组召集人为何应钦、程潜、商震；经济组召集人为王伯群、贺耀组、徐堪；教育组召集人为王正廷、陈继承、张道藩。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招待中外记者，讲述太平洋战争与中国等问题，表示中国决加强与反侵略国家的联合与统一。

△　国民政府成立给勋委员会，委员由五院副院长，内政、外交、铨叙三部长，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党政考核委员会政务组长等15人组成。规定国府以后颁发之勋章为采玉章、中山章、卿云章、景星章四种。

△　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讨论东亚战局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寇。同日，蒋介石向各盟国提议统一指挥，实行军事联盟。

△　英政府任命驻华大使馆武官丹尼斯为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其职权与美军事代表团长马格鲁德相同。

△　第四集团军一部北渡黄河，一夜间炸毁沁河大桥及平汉、道清铁路数段，歼敌千余，克据点30余处，策反伪军万余反正。

△　晚，豫北武陟等地伪兴亚巡抚军依藤（即左剑龙）部第一二三旅之大部在刘子英率领下，伪游击队全部在王占胜率领下共万余人，不堪日军压迫，在武陟、木栾店等驻地同时宣布反正，并向日军攻击。翌日晨，攻克武陟县城及木栾店等据点30余处，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指挥官神户西泽、平则等以下10余名，炸毁新乡以南道清西段铁路数十段，各该地段公路桥梁、电线悉予破坏。18日晚，伪兴亚巡抚军第四旅旅长王子莲全部在原武以西盐店庄一带宣布反正，并

向日军突击。19日，驻姚旗营一带伪军及伪兴亚巡抚军第二旅第四团范士勋部宣布反正，俘敌指挥官三名，击毁汽船20艘。

△　冀西、冀南日军对晋冀鲁豫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成立经济封锁委员会，封锁重心为粮食、食盐、棉布等各种生活必需品。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晋西北日军被迫从苛岚、五寨、神池、岚县、偏关五县自动撤退。该五县伪警备队全部反正。

12月17日　　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有中、美、英、苏四国军事代表参加的联合军事会议，商定在重庆设立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作战机构，由美国总代表主持，以协调共同保卫新加坡、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的具体计划，以及对越南、泰国的军事外交方针。蒋介石希望盟国集中主要兵力于东亚，在明年（1942）内击败日本。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仍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同时应当加强对敌的政治攻势。

△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继续开会。上午由财政、经济、教育、交通各部报告工作。下午，各审查委员会分别审查议案。

△　王世杰、张群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举行午宴，周恩来、董必武及张澜、黄炎培、张君劢、王造时、左舜生等出席，并商谈参政会决议案四条实施办法。19日，继续商谈。

△　国民政府公布并实施《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条例》，凡22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赵世铃为第四十三军代军长；任命王铁汉为第四十九军军长。

△　菲律宾内湖省华侨捐款10万元，购献飞机，国民政府是日予以明令嘉奖，并准颁给金质奖章。

△　台湾南部发生大地震，死伤354人，毁房屋2000多所，铁路断绝，水管破裂。

12月18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继续开会。上午听取何应钦军事报告。下午各组继续审查提案。大会决议组织议案整理委员会，由吴铁城负责召集；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由孙科、叶楚伧、郭泰祺负责召集。

△　深夜，日第三十八师团在香港登陆。中共东江游击纵队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先后营救陷港国际友人及同胞数千人，其中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英国官员、香港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伦敦接见《明星晚报》记者称：中国可以派兵保卫缅甸及吾人盟友在远东之任何属地。又称：中国公民业已参加香港保卫战，中国政府已下令海外华侨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参加保卫工作。

△　第七战区一部一度攻入广东深圳，捣毁仓库，焚烧车站。20日，九龙、广州日军增援反扑，被第七战区另一部击溃，并攻克龙冈。

△　冀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克巨鹿县城。

△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冀南等地开展冬季平汉铁路沿线破击战役，23日结束，共摧毁封锁沟218里，攻克碉堡52座，毙、伤、俘日伪军880余人。

△　中英滇缅路划界立桩工作即将开始。中国政府派外交部专员尹明德为划界委员，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办事处秘书李国清为顾问，

是日由渝启程赴滇。

△　日机六架袭击福州，一架失事坠落，五架意图救援，降落沙州，当地军民分途围捕，五名驾驶员自杀身亡。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改组江苏、安徽两省政府，特任李士群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高冠吾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12月19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继续开会。上午听取粮食部长徐堪施政报告，并讨论战时土地政策纲领，决议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下午由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讲话，提出调整政治机构之要点：一、政治机构不宜多事纷更，而要求其充实；二、应延揽全国人才，俾共同参与政治；三、人事、会计、考核与设计各种机构，须力加充实，发挥功效；四、充实机构必先健全人事，要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五、要认识中央与地方之关系，破除地方观念；六、法令规章应力求简单明确，合乎时与地的需要；七、高级官长要养成法治的精神，树立建国的规范。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由何应钦作中、英、美、苏军事合作的报告，并解答询问。

△　财政部发表公告，鉴于该部上海总税务司公署被日军占领，总税务司梅乐和已不能行使职权，特在重庆设立总税务司公署，并派腾越关税务司周骊继任总税务司。

△　上海日军宪兵部会同工部局分别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企业，检查他们认为有宣传抗日或共产嫌疑的图书，并宣布下列图书予以没收：一、重庆发行的教科书；二、英、美出版的关于反日反满等图书；三、其他涉及反日及宣传共产等图书，仅商务印书馆一次没收图书即达462万册。

△　日军占领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

12月20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继续开会。分别由广西、浙江、山东、云南、安徽、江苏、西康等省党部主任委员作党政报告，并通过《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确定本党今后党务推进之方针》等案。

△　中央社讯：国民政府为严密管理物资，决定成立物资管理局筹备处，并派何浩若负责筹备。经济部、农本局、平价购销处、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等机关之业务均划归该筹备处统一计划实施。

△　日机10架图袭昆明，中国空军及美飞虎队立即升空迎击，击落敌机四架。23日，昆明各界举行盛大慰劳空军大会。

△　桂林各界举行反侵略运动大会，到会群众10万余人，李济深及在华日本人反侵略同盟代表、朝鲜革命党人代表相继演说，会后游行示威。同日，西安亦举行反侵略大会，英、美、苏等国代表参加并讲话，一致主张加强团结，迅速成立军事同盟与统一指挥。

△　在华反法西斯主义日本人代表青山和夫、绿川英子、池田幸子、鹿地亘等发表宣言，表示日本人民愿与中、苏、美、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奋斗，消灭共同敌人日本暴阀。

△　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克复晋东南陵川。

△　美国海军部任命金氏为全美舰队总司令，陆军上将麦克阿瑟为远东同盟军总司令。

12月中旬　　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后，各工厂停工，商业活动亦停止，除日本银行外，金融界均停止营业。公共租界董事会议长利得尔（英人）、委员麦克马莲（美人）、波洛克（英人）、谢晋（荷兰人）等均辞职。

12月21日　　英驻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及美陆军航空司令勃勒特抵渝，当晚晋谒蒋介石商讨有关民主国家间共同作战行动及远东战略

等问题。翌日，举行军事会议，中国军政部长、英、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及中国统帅部高级军官皆参加，讨论结果取得完全一致。24日，魏菲尔、勃勒特同机赴仰光，各返原防。

△　周恩来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张澜，在特园商谈关于国民政府设国事协议机关的意见。

△　日军第十五军为占领缅甸，切断英、美援助国民政府的路线，制定作战要领，其作战方针为：尽速开进毛淡棉附近萨尔温江一线，完成作战后，以主力沿毛淡棉——勃固——仰光地区，一举占领仰光，同时命南机关的谋略工作与本作战紧密配合。

△　日机袭击长沙、桂林，被我空军击落一架。

△　国民党三民主义教研会与该会会员进行通讯联系，指出该会的目的与责任，称："值兹抗战时期，邪说横行，各级学校学生思想难免庞杂，异党分子专事煽惑，今后如何能使青年服膺主义，并进而领导青年作思想之斗争。"

△　重庆《大公报》载：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同盟、韩国独立党统一同志会致函中、英、美、苏四国元首，表示朝鲜民众愿与反侵略国家并肩作战，消灭日寇。

12月22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继续开会。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作施政报告，并通过《授予总裁大权，以期迅速完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任务案》，以及军事、经济、教育等52件议案。

△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举行扩大纪念周，蒋介石讲《政治的道理》，称：《大学》、《中庸》等均为中国政治哲学宝典，而《中庸》的《哀公问政》一章尤为政治之原理。

△　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总支部发表《战时工作纲领》七项，激励侨胞尽力协助本地政府抵抗轴心国之侵略。同日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

发表《告侨胞书》，号召侨胞建筑防空洞，实行节约，遵守秩序，协助当地政府而期于早日获得最后胜利。

△　重庆《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所撰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批评国民党政治现状和政治机构、人事制度，并揭露郭泰祺用公款65万元购置公馆等内幕。

△　伪满洲国召开战时紧急经济方策协议会，制定《战时紧急经济方策纲要》，提出实施有效的经济统制，以适应日本战时的紧急需要。

△　罗斯福、丘吉尔在华盛顿会谈，重申“先欧后亚”的方针，并议定联合国家宣言草案，加盟者共26国，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

12月23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重要议案如下：一、设置地政署，直隶行政院；二、推选叶楚伧、顾孟馀继任中央常务委员；三、推钮永建为国民政府委员，朱家骅为考试院副院长，刘尚清为监察院副院长；四、蒋介石报告提出外交部长郭泰祺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农林部长陈济棠辞职，以沈鸿烈继任；以贾景德为铨叙部长，原任部长李培基调任考试院秘书长；以陈仪为行政院秘书长。全会通过《宣言》，提出当前要政为：一、厉行基层建设；二、加强经济管制；三、实施土地政策；四、加强精神动员。27日，发表各项任免令。

△　蒋介石设宴招待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中央委员，并发表讲演，阐述干部同志革命建国之要道，希望大家发扬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恢复中国固有的政治道德，同时要注重青年同志的领导与培植，来发挥本党的力量，完成建国的使命。

△　中、英、美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国方面出席的代表有何应钦、商震等，英国有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与邓尼恩少将，美国有勃里特少将与马格鲁德少将。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达成五

项协议：一、在重庆设立由何应钦主持的中、美、英联合参谋会议；二、在缅甸设立中英联军统帅部；三、建立中国远征军；四、美国向中国境内及入缅作战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等；五、美国派遣空军入缅作战。

△　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自鄂南岳阳地区向湘北新墙河岸推进，突破第九战区守军第一三四师一部在河北岸的前沿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

△　蒋介石致电新加坡英总督汤姆斯，请利用马来亚华方之一切人力物力。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陶广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　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招待外国记者称：中国朝野集中于一个问题，即如何加强对侵略者之打击，九中全会讨论中心议决案，皆与此有关。

△　《中央日报》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华侨陷于困境，政府为了救济侨胞，特决定成立紧急救济侨胞联合委员会，并由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海外部长刘维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外交部长郭泰祺等议定紧急救济侨胞办法，送行政院核准施行。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苏南溧阳，另一部克复皖南郎溪。

△　汪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对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向蒋介石劝降，宣称双方应联合一致，打倒英、美势力，齐向和平反共建国的大路勇猛前进，复兴中国，解放东亚。

12月24日　　蒋介石对英驻华大使卡尔表示，希望英国对华贷款一亿英镑。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国内军

事形势》，指出："我们不应憧憬于不战而胜，幻想速胜的到来，而应更积极为实行各战场的出击，以负起配合友邦作战，争取太平洋抗日胜利的艰巨任务。"

△　日军第六师团乘夜向新墙河地区之第九战区第一三三师阵地发起攻击，从新墙附近强渡新墙河。守军第一三三师主力向东南侧山区的十步桥、观德冲一线阵地撤退，少量部队坚守阵地，逐次消耗敌人。

△　中国航空公司新辟中印航线，从重庆经腊戍至加尔各答，是日正式开航。

△　荷兰新任驻华公使范明汉抵渝。

△　汪精卫令伪政府各部、会及伪上海市政府、广东省政府加强与日本合作，对上海租界及香港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他专门人才应"广为延揽，尽量使用"。

△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决定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为此，首先对重庆设立谍报机关，侦查重庆方面的动向。其次，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

△　日第七十九届议会开幕，东条宣称："重庆政府倘改变态度，则其提任何和解战争之提议，日本政府俱愿意接受。"

△　日机连日轰炸仰光，中国存仰光待运物资是日开始向加尔各答疏运。

12月25日　　据中央社讯：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加强精神总动员实施纲领》，其基本要求为：一、全国人力、物力充分发挥，合理使用；二、士兵之粮秣械弹供应无缺；三、土地之使用竭尽其

利；四、一切人力物力之补充继续不匮；五、全国人民之生活能维持健康之水准。

△　孔祥熙以太平洋战争爆发，通知平准基金委员会将上海平准基金全数转移至后方应用。

△　进攻长沙之日军一部向第一三三、第一三四师阵地发动攻击，双方发生激战。26日，日第六、第四十师团主力沿汨罗江向我守军第三十七、第九十九军阵地发动攻击，守军逐次抵抗。

△　日军为策应长沙作战，向赣北武宁、奉新、高安等地发动攻击。31日又轰炸广东韶关。

△　英正式宣布放弃香港，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同日，在香港协助英军作战的中国军队陈策等军官率英军72人自香港突围抵粤。

△　马来亚侨胞各界代表在陈嘉庚领导下，为动员侨胞人力物力共抗暴敌，在新加坡集议讨论组织义勇警察队和宣传动员事宜。星岛总督汤姆斯于是日午接见侨胞代表百余人，即席发表演说，称：今日之战，非仅保卫马来亚，且为保卫中国及远东和平，应捐弃嫌隙，同心同德，共济时艰，决心与华侨合作。陈嘉庚代表侨胞表示马来亚华侨愿以全力支持英政府。

12月26日　　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根据蒋介石关于党政机关推行分级考核制的训示，是日召开会议，拟订《考核实施细则》。

△　进攻长沙之日军第三师团主力到达汨罗江岸，在空军、炮兵的掩护下，分别向河夹塘、归义进攻，与我国守军第九十九军在汨罗江北发生激战。27日中午，日军渡过汨罗江，第九十九军主力后撤至牌楼峰、栗桥一线。

△　汤恩伯致电何应钦，报告鲁西驻军孙良诚、高树勋、朱世勤

等部因指挥系统不同，对地方一切措施各持私见，明争暗斗，影响该地区党政重建，要求将孙、高、朱等部统划归鲁西边区指挥，以利党、政、军互相配合，齐头并进。28日何应钦批示："暂不变更。"

△　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陈立夫主席并讲话，提出要设法解决师资缺乏、教科书少等问题。会议通过加强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及教材编撰等52项提案。27日会议结束。

△　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移至重庆办公，英人周骧代梅乐和为总税务司。

△　八路军冀东军区一部强攻遵化城东双城子据点，毙、俘伪治安军200余人。

△　汪精卫令各省、市政府为日军占领香港举行庆祝会，并派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赵尊岳等去香港、九龙等处，对滞留在当地的国民党重要人员进行招降活动。

12月27日　　国民政府特任宋子文为外交部长，未到任以前，由蒋中正兼任；特任沈鸿烈为农林部长，贾景德为铨叙部长，陈仪为行政院秘书长。

△　中国国联同志会举行国际问题讲座，请拉铁摩尔主讲《中国、美国与日本》，称：美国向以民主国领袖自夸，然过去仍不免有一面援华抗战，一面助日侵略之讥，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与反侵略国家并肩作战，此种矛盾始告消除。今后美国必与其他民主国共安危，协力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中、美两大民主国家不仅在战时合作，即战后必将继续协同建设。

△　教育部以儿童教育为国民基本教育，特制定《儿童教育计划与办法》，规定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度起实施军事管理，并加授有关军事及国民总动员之课程等。

△　美军志愿空军队在仰光与日军发生空战，击落日机12架。

△　北平郊区昌（平）宛（平）民兵进行总动员大破击，摧毁日伪组织据点19处，破坏桥梁、铁路、电线杆多处，日伪各据点联络中断。

△　新加坡华侨反侵略总动员委员会在陈嘉庚领导下，在新加坡召开成立大会，370多个侨团1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选举了有65人组成的总会，由陈嘉庚任主席，下设总务处、宣传处、义勇警察队、劳动队等机构。

△　伪满洲国公布《治安维持法》及其施行令，规定对所谓变革国体为目的的团体的组织者、参与者、指导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对从事可能有损建国神庙及帝室尊严事情为目的的团体的组织者、谋划者、指导者，处以死刑、无期或六年以上之徒刑。

12月2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

△　绥远伊盟准噶尔旗札萨克兼军管区司令奇文英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拥护政府对日宣战国策，誓率全旗蒙古旗兵及10余万蒙汉人民负弩前驱，歼灭倭寇。

△　进攻长沙之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在新市、磨石滩等处渡过汨罗江，在汨罗江两岸遭到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的顽强阻击，加之连日雨雪，河水上涨，渡河不易，日军伤亡较多。29日，渡河日军从正面压迫第三十七军，双方相持至30日，第三十七军被迫向东侧山地转移。

△　第九战区薛岳部克复江西奉新。

△　晋冀鲁豫边区各界举行追悼武士敏将军及中条山阵亡将士大会。大会号召各级政府广泛宣传武士敏将军的抗日功绩，褒奖武将军崇高的爱国抗日行为，发扬武将军的坚持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

△　南洋归国旅渝侨胞互助会筹备处开会，会商救济南洋战地侨胞问题，决议：恳请中央迅速抢汇华侨资金、救济侨胞眷属、救济被迫归侨、救济侨生等。

12月29日　　蒋介石兼理外交部长职，并对外交部全体职员训话，强调革命精神，厉行新生活运动。

△　日军下达“以主力向长沙方面追击”的作战命令，要求第三师团攻击长沙，第六师团一部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的槼黎市，第四十师团向金井挺进，保护主力的侧后翼。

△　日机轰炸长沙近郊，并有一部窜至新开市。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在河南濮阳西北之顺河集反“扫荡”战斗中，毙伤日伪军170余人。

△　中国政府与多米尼加在中国驻古巴公使馆举行缔结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条约自是日起生效。

△　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利物浦发表演说，宣称中国业已加入英国在欧洲方面之战事，故中国自将分担英国之苦乐，并称中英人民坚强共同之努力，必能成功。

△　汪精卫对华侨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各地华侨与日本合作，分担建设大东亚的责任。同日，又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称：在日军取得太平洋战争胜利和占领香港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最迫切

的任务，就是要唤醒西南人民和海外侨胞，不要为抗日白白牺牲。

12月30日　　蒋介石电令中国驻美、英大使，要求两国分别给予中国五亿美元、一亿英镑的贷款。同日，蒋介石约见美驻华大使高思，要求美国对华提供五亿美元财政援助，“支持中国抗日的意志”。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提出由蒋“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越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部队”。罗斯福还提议：在蒋介石指挥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尽可能邀请苏联参加；同时希望在中国战区统帅、印度英军司令及西南太平洋司令三个总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互派联络官员。

△　罗斯福约在美访问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代表宋子文和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共同商定《联合国家宣言》，并率先签字。31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22国亦签字。

△　外交部次长傅秉常对外籍记者发表谈话称：同盟国军事会议已在重庆成立，并宣布：由外交部起草的《处理敌国人民财产条例》及《敌产处理条例》已经立法院通过，不日即将公布。同时将设立特种机关，管理敌侨财产。

△　行政院会议通过《物资管理局组织规程》，凡16条。规定该局统辖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燃料管理处等。

△　由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四单位联合在重庆都邮街广场建筑的“精神堡垒”竣工，该堡垒高七丈七尺（约25.67米），象征七七抗战。

△　全国慰劳总会组织前线将士慰问团，总团长为居正，下分五团，居正兼第四团团长，第一、二、三、五团分别由王用宾、程天放、刘文岛、洪兰友担任团长。除携带慰劳金3000万元外，尚有荣誉

纪念章、慰劳书等。翌日，重庆举行出发典礼。

12月31日　国民政府以“日寇南侵，弥天烽火，念我侨民，同遭祸变”，着由行政院分饬主管部、会及有关各省政府迅速妥筹救济。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以提高中国的地位，提出：“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之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余今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建立麾下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联合国家军队之责。余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达到之安南及泰国国境。余并相信：欲使此统帅部发生效力，应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倘麾下认为可能而苏联表示同意时，苏联代表亦应参加。此参谋部应在麾下指挥下服务。”罗斯福还表示，他将“命印度军司令及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与麾下取得最密切之联系”。

△　国防最高委员会修正公布《取缔党政军各机关公务人员宴会办法》，凡10条，自明年元旦起实行。

△　据中央社讯：国民政府为贯彻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持久推行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案》，特拟定推行办法七条，要者为：发动全国党团员、学生努力推行，并列为中心宣传工作之一；由行政院通令定为各省、市、县重要行政之一，迅速推及民间，并列入行政考绩；由外交部与各友邦交涉，在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华侨中公开劝储。

△　日军第三师团渡过汨罗江后，奉令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是日其主力移师至长沙附近的槊黎市和东山附近，准备攻击长沙。

△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浙江余杭。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新国民运动实施纲要》，提出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会议还决定任命蔡培为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长，陈君慧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周学昌为南京市长。

是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指示，指出英、美、日战争爆发，我党与英、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对英、美外交开展之可能与必要日益增加，因此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并经过我区退走。

△　中国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确定解决中共的基本方式：在军事上，八路军完全国军化，按1940年7月《中央揭示案》办，新四军余部重新建制，划归就近战区指挥，所有地方武装一律取消。在政治上，取消陕甘宁、晋察冀、苏鲁豫等边区政府；中共取消“割据式”政府，交回“部落式”部队，政府则承认中共党员的合法存在及其活动。

△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将困留在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即刻派人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告在柳州的左洪涛，要他们接待；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社，戈宝权等来重庆；对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转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　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两面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议最后发言指出：为了贯彻中央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必须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于1月结束。

△　山西日军在五台山组织伪五台佛教维持会，强占山上庙宇，干涉庙政，霸占庙产。各庙供奉之金罗汉悉被运往东京展览，庙中松柏大部被砍伐，庙房亦被恣意拆毁，以作修建碉堡之用。

△　华北日军司令部决定今后伪钞发行统一由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办理。过去发行之“满洲中央银行”、“河北省银行”、“冀东银行”、“河北官钱局”等钞票，一律停止流通。

是年　战债劝募委员会公布本年度各省、市战债劝募情况：重庆1.2亿元；广东0.32亿元；云南0.45亿元；贵州0.1亿元；湖南0.3亿元；江西0.3亿元，浙江0.3亿元；安徽0.01亿元；西康0.1亿元；河南0.03亿元；陕西0.15亿元；甘肃0.027亿元；青海0.01亿元；宁夏0.015亿元；绥远20万元；上海0.61亿元。

△　本年度中央岁出入总预算及追加数各为10732583783.64元。

△　本年度国库收入总额为108.8554137583亿元；支出103.8771756981亿元。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1月

1月1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开国纪念”庆典，并遥拜国父陵墓。国府主席林森，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传贤，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暨中央委员，政府各院、部、会长官均出席。林森致词称：“我们在抗战之始，即曾表明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存我们一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且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并指出：“我们相信制止侵略，是一切文明国应尽的义务，惟有侵略消灭以后，我们才能够‘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这是我们立国的原则，四年半以来我们单独地对暴日抗战，就是为了实行这个立国的原则。今天我们同各友邦向侵略集团并肩作战，还是为了实行这个立国的原则。”

△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对全国国民及海外侨胞广播，指出：“抗战以来，我每次对全国播讲，屡次提到敌人的必败之道，到了上月八日，他在太平洋上对英美无端的挑起了战祸以后，日本的失败更是最后的决定了。”并谓抗战已入新阶段，勖勉国人加强动员，贯彻胜利。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迎接黎明来临的新年》，指出：“我们在过去四年半抗战中，已经尽了最大的任务，受了最重的牺牲，可是，自从中日战争变成世界战争的一个战场之后，我们的环

境更加艰苦，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我们的牺牲更要深巨，我们的努力更要强韧。”并提出今年的四项努力目标：第一，我们要了解昨年12月9日我国对日、德、意的宣战布告，与蒋委员长于同月10日告全国军民书的真义；第二，我们深刻认识了我们的使命和任务之后，必须研究如何才能达到这使命和任务；第三，我们于认识了我们的责任与如何完成这责任的方法之后，必须更进一步而研究如何力行这方法的问题；第四，我们必须坚强必胜的信念。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元旦献词》，指出：1942年将是侵略阵营与反侵略阵营空前激战的一年，法西斯侵略者将遭受严重的挫败，反侵略阵线的雄伟力量将日益发挥作用，这将有利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应配合民主集团，积极努力，在反侵略战争中奠定民主政治的新中国的基础。

△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致书全体指战员，在总结过去一年成绩、经验，分析当时形势之后，提出1942年的中心任务：一、加紧训练，准备战略反攻；二、厉行节约，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三、严正部队纪律，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四、积极开展对敌伪军工作，切实执行俘虏政策。号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以坚毅的意志去迎接1942年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从前方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八路军全体指战员愿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敌后抗战，为配合全国大规模战略反攻而斗争。

△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中央和国际广播电台播讲，号召加强总动员，积极节约和扩大生产。

△　粮食部长徐堪向中央社记者谈本年粮政方针：一、完成土地

陈报，改善一次征粮办法，政府掌握更多的粮食；二、扩充储运事宜，厉行地方建仓积谷；三、对于军粮、公粮必使完全无缺；四、加强粮户、粮商及市场交易之管理，控制大户余粮以调节市场稳定粮价；五、充实各县粮政机关及业务机关，组织训练各级干部人员；六、川省施行督导考核制度，推行各省。

△　中、美、英、苏、荷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即《二十六国公约》，后称为《联合国家宣言》）。《宣言》宣布，各签字国政府对罗斯福、丘吉尔于1941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予以赞同。规定：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军事协定或和约。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截至1945年5月1日，陆续在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墨西哥、菲律宾等21国。

△　蒋介石为缅甸英国当局强扣我到仰光各轮所载美国《租借法案》器材及物资事，向英国提出抗议，并电告出访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美负责者严重交涉。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令缅督将所扣中国军械等物资一律放行。

△　国民政府公布本年度行政计划，要点为：一、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参事机关；二、在行政院下设地政处；三、增收实物并强制征收谷物；四、改善兵役法。

△　国民政府公布《敌国人民处理条例》及《敌产处理条例》。

△　财政部决定实行食盐专卖。5月16日，立法院例会通过该项专卖条例。

△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陈光甫辞职，邹琳继任。

△　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行产品展览会，101个工厂参加，主

要展出生活日用品、各种机器和钢铁产品等。14日闭幕。参观者逾几万人。

△　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举行之第一届陪都建设展览会，在重庆市中央图书馆揭幕，陈列品千余件，分置五室。其中以统计图表为多，模型次之，另有矿产样品、厂房彩画及照片等。于重庆市现况及将来发展计划，均以图片或统计数字展示，使观众获得具体之印象。

△　私立复旦大学奉令改为国立，全校师生及来宾1000余人，在重庆北碚校舍集会庆祝。

△　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政治学会及美国行政学会联合大会上发表演说，略谓：远东问题之解决办法，必须能满足中国独立、统一之合理要求，必须能巩固太平洋上之国际秩序。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政府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　延安军事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朱德、叶剑英分任正、副院长。

△　廖承志、连贯冒险由香港偷渡到九龙，与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研究营救在港、九人士的工作部署。经三个多月的努力，共抢救出700余人，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梁漱溟、邓文钊、沈志远、张友渔、胡绳、羊枣、千家驹、胡风等人。

△　赣北第九战区一部克复祥符观。同日，浙西第三战区一部攻入武康、余杭。

△　下午，我国空军在粤汉线湖南境内三门车站击落日军重轰炸机一架，飞行员二名毙命，另二名被俘。

△　晨，日军开始进攻长沙。第四十师团占据金井并掩护侧背；第三师团向长沙东南郊发动袭击。守军第十军李玉堂部预备第十师抵

抗，激战一昼夜，日军突入白沙岭阵地。夜，第二十七、第三十、第十九各集团军杨森、王陵基、罗卓英部及第九十九军傅仲芳部主力，奉令向长沙包围，索敌攻击。

△　华北日军又开始强化治安，训练“自卫团”，编“东方灭共队”、“灭共少先队”等，每到一地烧杀抢掠一空。赞皇县城有120余商户被迫停业，开业的只剩20余户。

△　汪伪政府颁布《新国民运动纲要》，要求沦陷区人民“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培植适应于“大东亚战争”所需要的“国民新精神”。

△　汪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求上海市民改变对日本的心理，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　吕宋岛上的美军部队撤至巴丹省和科雷希多岛（位于马尼拉湾入口处），分别坚守至4月9日和5月6日。

1月2日　　军事委员会公布，中国军队已开入缅甸，协同盟军履行防守任务。

△　国民政府成立工作竞赛推行委员会，隶属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谷正纲、李中襄分任正、副主任。

△　蒋介石电复美总统罗斯福，允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　教育部颁发《学生服兵役及限制入学资格办法》，规定：年满18岁、毕业尚未超过一年的学生，可以报考升学，如已超过一年则不准报考。

△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在成都举行，省主席张群对大会提出三点愿望：一、努力宣导全川同胞完成自救并救世界人

类之两重使命；二、指正政府施政中的缺点及今后计划；三、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战时化原则的实施提出建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府1942年度施政计划及预算，并通过提案180件，最后选陈斯孝、曾用修、石体元、余富庠、陈紫舆等11人为驻会委员，于16日闭会。

△ 凌晨，日军继续向长沙黄土岭各处猛攻。我军阵地数度被突破，经逆袭恢复。预备第十师一部将困守在民房内的日军焚毙百余人。16时，日军向守军第一九〇师阵地攻击，被击退。是日，第四军欧震部奉令进占跳马涧东西线；第七十九军夏楚中部抵浏阳河右岸；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到达万家桥、洞阳市一带；第二十军杨汉域部及第五十八军孙渡部到长江源附近；第七十八军夏守勋部在金井、脱甲桥一带与日军增援之第四十师团激战；第九十九军向捞刀河前进。第九战区围歼日军的态势已形成，遂通令各军限4日夜进至第二次到达线。

△ 山西平遥县伪警备队200余人向八路军投诚。

△ 日军第四十八师团一部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

1月3日 同盟国宣布，推蒋介石任盟军中国战区（包括泰、越及将来可能为盟军控制区域）最高统帅。5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陆空联合总司令。

△ 八路军冀东部队在遵化南毙日军150余人，缴机枪三挺，步枪120余支。

△ 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在临蒙公路及环蒙公路一带展开反“扫荡”，至月底攻克垛庄等24处据点，歼敌近千人，打破敌人的环蒙封锁线，使沂山区与蒙山区打通联系。

△ 新四军一部攻克苏北海门王阳镇，并收复久隆镇等地，伪旅长徐宝富率部200余人投诚。

△　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向长沙守军第一九〇师杜家山、陈家山阵地攻击，日机九架轮番轰炸，陈家山工事全毁。城南乌龟冲、太乙寺附近日军第三师团与预备第十师激战，守军阵地失而复得四次。午，日机轰炸，并空投粮弹。城北陈家山附近日军攻击南华女校被击退。城东南老龙街一带整日激战。晚，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接薛岳电令：除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仍执行原任务外，其余于3日黄昏进入长沙。

△　伪闽粤边区绥靖第一支队第一大队长刘达平、大队附王剑俞，率领全体官兵由汕头开抵闽省诏安，是日宣布反正。

△　太原、古交伪军300余人偷袭古交区小娄峰村，中共清太徐中心县委书记萧靖等60余人负伤，30人被俘，32人牺牲。

△　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经过协商，决定于是日设立美、英、荷、澳四国联合司令部，任命英军上将阿齐博尔德·韦维尔为总司令、美空军中将乔治·布雷特为副总司令、英空军中将理查德·皮尔斯为空军司令、荷兰中将海因·特尔普尔滕为陆军司令、美海军上将托马斯·哈特为海军司令。联合司令部设在爪哇岛万隆。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四国军队，名义上都受总司令指挥，但因四国联军缺乏共同的作战原则，未能形成联合打击力量，所以至2月25日联合司令部即宣告解散。

1月4日　　蒋介石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可资信赖的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9日，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史迪威担任此职。23日，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通知史汀生表示同意。

△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开幕，朱德出席并讲话。重庆、新疆各界青年和新疆青年反帝会全体会员致电祝贺。大会选出胡耀邦等19人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委员。6日闭幕。

△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开会，总结去年接待过往延安之友

党、友军及来延参观人士工作。会议宣布，在过去一年里，交际处接待人员达2900余人次，其中过往友军1672人次，来边区参观的1195人次，还有一些投奔边区参加革命的青年。

△　凌晨，日军向长沙城郊全线猛攻，激战至8时，城南修械所阵地失而复得五次。城北日军自拂晓开始攻击湘春路及南华女校阵地，攻势受挫。斯时，长沙外围守军向日军进行合围与攻击，第四军攻占林子冲等地；第七十九军到达浏阳河东岸；第七十八军迫近春华山；第三十七军攻占金井，并向日军第四十师团攻击；第二十、第五十八军到达伍家埠、汉家山一带；第九十九军到达龙头，各兵团继续向前推进，进行合围。下午，日军开始撤退。第三师团由长沙东南郊向东瓜山撤退，第六师团由长沙东北郊向梨黎市撤退。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令各部队发起追击。

△　日军第十五军（辖第三十三和第三十五师团，约3.5万人）向缅甸发起进攻。是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步兵第一二〇联队，从泰国北碧方面进入缅甸，于19日占领缅甸港口城市土瓦。

1月5日　　蒋介石调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扩大纪念周上指出：今年要实行全国总动员与增强行政三联制及党政考核工作，继续注意禁烟与缉私，党务方面要健全各地基层组织。

△　国民政府令：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自1941年12月8日起已不能行使职权，今后上海公共租界内任何非法组织之法院所作裁判及其他行动一律无效（该法院系根据1930年2月17日中国与上海公共租界有关各国签订之协定设置）。

△　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召开第六次大会，通过督促政府澄清吏治、改善粮政、平抑物价、调剂食盐等议案。20日闭会。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暂行规程》、《陕甘宁边区政府合署办公暂行办法》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处务暂行规程》等规程、办法。会议还决定下列事项：一、边区政府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对边区各文化团体的管理。二、批准延安华侨救国会成立华侨实业公司，帮助其开设华侨工厂。三、成立禁烟督察处，专司全边区禁烟工作。四、目前在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外出巡视期间，由秘书长周文代行政务管理。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赴苏联养病痊愈回国，是日抵兰州，即返延安。

△　驻重庆各同盟国大使馆武官及中外记者组织“湘北视察团”，由国际宣传处魏景蒙、军令部钮先铭率领，一行15人赴湘北视察，13日返渝。

△　延安《解放日报》载：日伪《华北评论》公布日本在华北抓捕壮丁运往东北的数目，1937年为32.3689万人，1938年为50.1656万人，1939年为95.4882万人，1940年为140万人。四年总计为318.0227万人（编入伪军的尚未计算在内）。

1月6日　　国民政府火柴专卖负责人刘鸿生对记者称：火柴专卖将先在川、康、滇、黔四省实行，随后推及全国。

△　“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在渝成立，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美、英、荷各国驻渝使馆派代表组成，其任务在增进同盟国间宣传工作之联系。次日，在华盛顿和伦敦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　教育部长陈立夫在电台发表《母教之重要》的讲演，略谓：母教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下一代民族命运以今日的母教来决定。全国妇女同胞应担当起母教的重大责任。

△　昆明掀起倒孔（祥熙）风潮。月初，重庆派飞机一架抵香港营救社会名流学者脱险，但仅载回孔祥熙二女儿、女仆及洋狗七只并家具无数。昆明《朝报》将此事报道后，引起学生愤慨。是日，同济、中法、西南联大等校数千人，高呼“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7日，西南联大各宿舍出《呐喊》、《呼声》、《正义》等壁报，提出修明政治、打倒孔祥熙等主张。

△　西安、昆明间无线电正式通话。

△　重庆国际电台与印度新德里直接通报。

△　新四军谭震林师一部进袭苏北泰兴苏桥，将守敌全歼，计毙日伪军营长以下100余人，俘伪连长三人，排长五人，士兵40余人，缴机枪五挺，步枪100余支。

△　进犯长沙之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分别由长桥、牌楼铺突围北退，沿途遭中国军队截击。

△　冀东日伪治安军一营袭击遵化西南毫子，被八路军截击，伪营长以下官兵400余人被俘、毙，缴机枪五挺，步枪350余支。八路军伤亡19人。

△　汪伪中央准备银行成立一周年。该行发行的伪币，截至1月3日计达2.4604亿元，辅币达2608万元。

△　日本和伪满洲国同时公布《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计划向东北移进日本“开拓民”22万户，青年义勇队13万人。

△　美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提交武器生产计划，要点为：1942年生

产飞机六万架，坦克4.5万辆，建造船舶总吨位800万吨；1943年生产飞机12.5万架，坦克7.5万辆，建造船舶总吨位1100万吨。为此，要求国会拨款590亿美元。

1月7日　　国民政府令免兼驻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特命全权公使谭绍华职务，任命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李迪俊兼任。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本党今年的党务方针》，要点为：一、充实本党干部；二、吸收社会贤才；三、救济民众疾苦；四、加强国家动员；五、计划今年吸收新党员至少50万，三青团员25万。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结束对甘泉县的视察后抵达鄜县视察。8日召集该县县参议员、党外民主人士及党政军机关、学校、团体负责人座谈，对县参议会常驻会的工作作指示，征询各界对边区政府的意见。

△　国民参政员、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在香港沦陷后因其妻遭日军殴打，挺身骂寇，于去年12月24日被日军打成重伤，是日在香港不治去世。4月13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长沙战场第二十六军跟踪日军向捞刀河以北追击；第七十九军追抵捞刀河北岸滨墈附近；第四、第七十三军过捞刀河北追击，河南已无日军。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师直属队及新编第一旅、第三八五旅干部动员大会上作《如何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指出要实行“精兵主义”，要提高部队的质量，积极准备反攻。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是：实行整编、紧缩领导机关、充实战斗连队。15日，第一二九师颁发《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

△　延安《解放日报》讯：日军强迫山西太谷县种植鸦片6000

亩，每年征烟税200万元。伪县长以下吸毒者占伪政权人员的80％。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冈峙胜男（日人）为会长，袁履登（华人）为副会长。

△　武汉英、美500余侨民被日军事机关拘捕。美国在武汉的花旗银行亦被封闭，其他教堂、洋行等被没收。10日，美驻北平、青岛水兵204人，被日军囚禁于天津新兵营。

1月8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经济部长翁文灏作报告，其要点为：一、关于经济重要设施；二、物资局之组织；三、滇缅路内运商货办法；四、工业设施情况；五、矿产品出口情况。

△　国民政府首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公使刘师舜赴任。

△　荷兰新任驻华公使白鲁格向林森主席呈递国书。

△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认为他对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分析甚好，并将分发各方面。并指出："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今年内德、意会向下，日本还会向上，英、美会削弱，国民党会分化。"

△　军政部长何应钦赴云南、广西、西康地区视察防务。

△　中国空军为配合第三次长沙会战，由第二大队长金雯率领九架飞机，轰炸湘北长乐街、新市、语市口一带退却之敌。中国飞机与日军驱逐机八架遭遇，击落其一架、伤二架，中国空军被击落二架，飞行员三人阵亡。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一部一举攻克冀中安平县城，毙、俘日伪军50人，俘伪职人员百余人，救出监狱被关押的犯人百余人，将伪政权完全摧毁。

△　新四军一部配合地方游击队强袭苏北兴化，将伪军第二十八师一个营全部消灭，俘伪连长以下150人，缴步枪80余支。晚，继续袭击临泽，俘伪队长以下官兵50人，缴步枪40余支。

△　长沙战场日军由捞刀河北岸退至栗桥、春华山以南，沿途遭第七十三、二十、五十八、三十七各军截击。第四、二十六、七十八各军将日军包围于栗桥、影珠山以南，展开激战。

△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到西南联大威胁学生不要扩大事端。晚，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明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并提议：一、请教授、参政员迅速将倒孔运动情况报告驻会参政员；二、倒孔目的是将孔祥熙撤职，没收财产。是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倒孔通电。

△　日军将晋南临汾集市包围，捕去民众500人运往东北充当苦力。

△　上海申新九厂7000余名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停工遣散工人需发遣散费。资方不接受工人要求，反而利用日本宪兵竹田部队的武力，强行遣散全厂工人。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任命郑大章为军政部政务次长，李讴一为“首都”警备司令兼警卫师师长，苏成德为副司令。

1月9日　　国民政府令免山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沈鸿烈本兼各职；任命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免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卫立煌本兼各职；任命李培基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国民政府公布《宣誓条例》，凡10条，规定：凡文官自委任职以上，军官自尉官以上，自治职员自保甲长以上，教职员自小学校教职员以上，须宣誓后始得任事，如因特殊情形先行任事者，须于两

月内补行宣誓。

△　毛泽东接见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绥德分区代表团，同20名代表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近况。在两小时的座谈中，回答他们提出的20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等。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手擎灯烛送代表出会客室。

△　华侨领袖侯西反、郭兆麟代表新加坡南洋筹赈总会，向前方将士捐赠阿司匹林药片350万颗，是日在军委会会议厅举行捐赠仪式，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代表接受。

△　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经滇缅路运医药品30吨，是日运抵昆明。

△　新四军一部在江苏泰县西设伏，袭击向宜陵前进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百余人，俘70余人。

△　长沙战场日军主力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策应，由福临铺北逃，至10日陆续从拦截线突围。日军第四十师团由古华山突围北窜，遭第九十九、第三十七军截击。

△　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伪军共4000余人，合击冀南大名城西仕望集、德政地区。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直属队及第二十六团奋战后突出重围。

△　日本新任驻汪伪政府大使重光葵在沪对记者称："大东亚战争实质上已进入世界战争，因此日华关系应重新调整，余即以此志愿而来。"12日抵南京上任，并向汪精卫递交国书。

1月10日　蒋介石以兼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首次接见各国驻华使节。

△　长沙战场第七十三、第四、第二十六军于青山市一带截击日军第六师团，日军在10余架飞机支援下苦战突围，向麻峰咀方向退却，11日遭到第七十三军追击。

1月上旬　　月初，国民党中宣部、社会部、中央政治学校、中国文化服务社及中央信托局合办的文化建设印刷公司在渝开工，资本90万元，董事长为许情初。

△　行政院通令严禁公务人员利用职位兼营商业。军委会亦通令军人不得兼营商业。

△　中国实业银行在渝成立分行。

1月**11**日　　四川省政府决定：松潘关外增设兴中、麦桑两设治局；乡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北碚管理局；涪陵分置武隆设治局；广元分置旺苍县；平武第三区及昭化县之一部分置青川县。至此，川省有136县、二市、三设治局、一管理局。

△　赣北第九战区一部克复马回岭、虬津。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旅一部，袭击泰安县草家庄日军据点，战至13日，毙伤日伪军500余人。

△　日军占领马来亚吉隆坡。同日，日军开始进攻荷属印度，在石油岛打拉根和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最北端的万鸦老登陆。

1月**12**日　　经济部全国度量衡局会议决议：一、大小数采用三位制；二、大数采用个、十、百、千、十千（万）、百千、兆、十兆、百兆（亿）（万万）、千兆、十千兆、百千兆、兆兆；三、小数暂不命名，小数点以下仅读数字。

△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富华两公司合并改组，仍称复兴公司。聘席德懋为总经理，余绍光为协理。该公司经营桐油、猪

鬃、羊毛等外销物资的统购统销，平价收进，高价卖出，获利自厚。

△　四川省出口桐油、茶叶、猪鬃，因太平洋战争发生，海运受阻，经行政院经济会议核定：一面维持出口统制，一面放松内销限制，桐油准许商民采购、存储、转运；原征之茶叶平衡税停征，准运销全国；取消对猪鬃存储时间及数量之限制；并协助各厂将桐油提炼为汽油、柴油。

△　广西桂林第六次临时参议会开幕，省主席黄旭初致词，主要讨论经济建设等问题，会期两周。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要求延安到各根据地建立两条主要秘密交通干线：一条由晋西北之交城、文水到晋西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条由原平到冀察晋转冀中、平西及冀。指示希望在两个月内将各区间之秘密交通线建立起来，并能使用。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七次政务会议，议决主要事项如下：一、讨论通过《自卫军工作计划大纲》。二、为加强对动员工作的统一领导，确定今后边区党、政、军、民的一切动员工作一律经民政厅动员委员会。三、秘书处收集材料编写名为《五一施政纲领》的通俗读物，发至区乡，以便学习。四、讨论通过民政厅、建设厅、高等法院、保安处等单位的负责人选。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入冀南馆陶，毙日军60余人，摧毁碉堡6座，伪警备队150余人投诚。是役共缴长短枪百余支，电线千余斤及其他军用品。

△　进犯长沙之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第二十、五十八、七十三、四、三十七、七十八各军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

△　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谈判美国对华贷款问题。美方

坚持将贷款方式改为向中国军队直接提供军饷，图谋以美援直接控制中国军队。

1月13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通过《敌国人民登记办法》、《敌国人民收容所管理章程》、《敌国人民移居办法》、《战时火柴专卖暂行条例》及《国民政府特许火柴专卖公司章程草案》、《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草案》；并任命吴南轩为国立复旦大学校长。

△　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自重庆赴桂，并转赴曲江、南雄、永安、长沙等处，与有关当局接洽侨胞救济事宜。政府并拨1000万元作救济费。

△　陕豫鄂皖党政考察团一行五人由团长方觉慧率领，是日由陕出发赴各地考察。2月5日返渝。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教育上的革命》，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是反对主观主义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革命。我们党负担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培养出大批的有专门技能的干部。因此全党同志应对各种专门性质的学校，给以一切必需的帮助。决定的基本精神，不仅适用于延安的学校，而且适用于一切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学习。

△　八路军总部命令太行、太岳两区所属部队努力生产，克服困难。规定旅以上机关每人生产收入为100元，团以下机关部队每人生产收入为60元。

△　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志愿义务兵役制实施暂行办法》，规定凡本边区男子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者，均有服兵役之义务，其志愿服兵役者应报名登记听候征召入伍；志愿服兵役者称为志愿入伍人。兵役期限定为三年。

△　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在遵化县果河沿岸战斗中全歼伪治安军

第二集团军第四团，毙伤敌100多人，俘副团长以下800多人。

△　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募捐救国总会致电蒋介石，并汇款10万元慰劳抗日将士。

1月14日　国民政府令第五军入缅支援英缅军作战。从此时起，由第五、六、六十六军共10余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筹划入缅甸同日军作战。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1942年战局展望”。

△　周恩来和冯玉祥等视察渝鑫钢铁厂，周恩来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为根绝烟毒，特决定设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任命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处长，并随令颁发《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贩卖纸烟惩治办法》，旨在禁止纸烟的输入及贩卖活动，规定从本月15日起停止进口纸烟，从3月1日起各商店停止出售纸烟，违者予以罚款。

△　据重庆《大公报》讯：重庆工商界人士温少鹤、李奎安、周懋植、萧万成等，发起成立中国工商服务社股份有限公司，设股20万，主要经营购销或承销工业品原料和工业制成品，并为工厂和公司推行业务。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代表大会第三次筹委会在延安举行，通过纲领草案，主张团结中日人民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唤醒日本士兵，打倒战争政府，建立和平自由的人民政府，并决议在4月举行代

表大会。

△　长沙外围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由汨罗江北岸继续向新墙河退却。

△　英首相丘吉尔和美总统罗斯福及两国参谋长参加的“阿卡迪亚会议”结束。其基本战略决断是：首先集中各盟国的力量于欧洲战场，以全力对付德国；尔后在太平洋发动进攻。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设在华盛顿）。该委员会至1945年解散前，一直负责制定英、美基本作战计划。

1月15日　长沙战场日军退过新墙河，至16日恢复原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是役日军投入12万余兵力，伤亡5.6944万人，我军俘松野荣吉中将以下官兵139人，缴获步枪138支、轻机枪115挺、山炮11门、无线电台九架。第九战区官兵伤亡2.9217万人。

△　重庆文化界举行国民月会，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洪兰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黄少谷、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访先及各界代表千余人出席。大会强调文化界加强精神总动员。

△　英国陆军委员会致电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表示感谢，并向在香港死难的中国同胞表示悼念。军委会复电重申抗战决心。

△　蒋介石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博士返美，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等到机场送行，一月后又返渝。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布《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规定：一、调整编制减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认真充实战斗连队。二、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装与各级武委会中去，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三、抽调一批

干部入学深造。四、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　是日至18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鲁南蒙阴一带攻克杨家庄等四据点，俘伪队长马殿武等以下伪军30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子弹5000余发，土枪500余支。

△　旅美华侨救国会致电蒋介石，祝贺长沙大捷，并汇款三万美元慰劳抗日将士。

△　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将苏北行政长官公署改为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

1月16日　宪兵司令部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在重庆举行，何应钦、白崇禧等1000余人出席。蒋介石在训词中称："宪兵之任务，在各兵种中居纠导地位，要绥靖地方，擿奸发伏，协助推行禁烟和粮食等要政。"

△　国民政府开始实行食糖专卖，分川康区、两广区、闽赣区进行。川康区专卖局是日在重庆成立。

△　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抵韶关晤战区司令余汉谋及粤省主席李汉魂，商洽救济难侨实施办法，决定由粤省垫拨300万元抢救由港逃出的难胞。23日许抵广东永安，决定拨款100万元筹办工厂和农场以安置归侨，另拨100万元急赈湘北难民。

△　行政院康青视察团携款3.7万余元，代表蒋介石、孔祥熙慰劳当地驻军，并分赠文化慈善机关，于是日视察完毕返渝。

△　吴忠信率领的甘宁青党政考察团，于去年10月12日出发赴西北考察数十县，历时两个月，是日返渝。

△　重庆《大公报》讯：战债劝募委员会决定实行购债兴学，由

各级学校校长、教师领导学生向亲属和社会有关人士劝募，所购之数捐赠学校充作基金。此决定先在四川试行。

△　重庆《大公报》讯：西南太平洋区总司令韦维尔上将、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分别致电蒋介石对长沙之捷表示祝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指出由于延安与华北、华中的联系更加困难，陕甘宁及晋西北两个边区更加重要，特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上述两个边区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委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撤销，并入联防军政治部。另以军委总政治部一部搬至杨家岭附近，组织很精小的总政治部，统管全军政治工作。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与中共太北区党委，在冀南漳河联合召开太行区文化界座谈会。有20个团体400多名代表出席，沦陷区文化界名流18人亦来参加。邓小平、李雪峰、杨献珍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邓小平希望文化工作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团结一切新老知识分子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深入农村，为广大群众服务。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收复晋西北岢岚县。

△　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会及其分会电蒋介石向中国银行捐汇50万元，作为抗日将士缝制棉衣之用，是日，蒋复电奖勉。

△　英国政府宣布调驻华大使卡尔赴苏，另派薛穆爵士继任。2月2日，蒋介石设宴为卡尔饯行。

△　日军第十六军开始由泰国向缅甸发动进攻。

1月17日　　国民政府令：一、国民政府委员刘守中早年致力革命，功劳卓著，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宣付史馆。二、侨务委员会委员方之桢于2日在渝病故，应予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5000

元。

△　延安《解放日报》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与侯西反、郭兆麟等在重庆创办中国药产提炼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内最大的提炼药厂，可出药品91种。

△　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举行茶会，该会理事长于斌致词谓：中国天主教徒有400万，若能团结起来反抗侵略战争，贡献必巨。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与群众2000余人，将正定、无极间公路破坏七里，平毁新乐平汉路沟10余里，栾城封锁沟七里，另一部八路军进袭定县南，毙敌30余人，缴机枪一挺，炸毁兵车一列。

1月18日　　教育部通令将有关注音汉字、各法令中之“汉字”一词，一律改称为“国字”，与国文、国语并称；从速修订全国方言注音符号总表；今后颁布法令规章和文告，一律用注音国字印刷或书写；各级师范及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均设国语教程。

△　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九届年会在重庆举行，讨论国民教育的教材、师资、机构以及儿童教育设施等问题。推马容谈等12人为理事。

△　中华教育基金非常时期委员会成立，翁文灏为主席，周诒春为名誉秘书，孙科、蒋梦麟为执行委员，杨亚德为副会计兼执行委员。6月初召开会议，通过下年度教育经费预算300余万元。

△　台湾独立革命党领袖、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赴渝途中抵桂，对记者谈称，台湾义勇队成立三年，现有队员200余人，分布在西南各省工作。本人此次赴渝任务，欲谒见当局长官，请设法编成台湾部队，俾加入同盟军队对日作战；并谓台湾本为中国领土，580万台湾同胞渴望早日重归祖国。

△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起组织的边区新教育学会成立，推举徐特立、吴玉章等七人为理事。该会任务是：一、研究教育理论；

二、帮助实施地方教育；三、广泛宣传教育工作的意义；四、团结边区内外的教育工作者，建立教育界的统一战线。

△　据延安《解放日报》讯：日军在华北沦陷区对商业开始实行严厉统制，规定：天津市凡资本在四万元以下的商业，每天营业收支均须详细登记，按日报告，以备随时抽查。如有隐瞒不报或出入数目不符者，除没收全部财产外，并处以极刑。在四万元以上的商业，一律派日籍“顾问”来店“理财”，资财出入，非经“顾问”允许，不得擅自动用。

△　日机30架分三批侵扰桂林，在南宁投弹多枚。

△　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召开政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讲话声称：为实现和平反共建国，肃清共产主义及英、美侵略主义势力，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军事力量。

△　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协定》，达成全球作战方案。日本分担从东经70度以东到美洲西岸地区作战，德国、意大利分担从东经70度以西到美洲东岸地区作战，妄图瓜分整个世界。

1月19日　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甘丽初部入缅，沿滇缅路南进。

△　日军突破泰、缅国境，占领土瓦城。

△　《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冀中区民兵五年成绩统计：参战人数143.4869万人，毙、伤、俘敌伪军60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机枪六挺、掷弹筒30个，割取敌人电线40万斤、电杆5.1452万根，破坏岗楼50座、铁木桥144座、铁路528里、公路三万余里、大道18万里、火车头92个、列车5099辆、铁甲车八辆、汽车396辆。我方伤亡：干部600人，民兵1000余人。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八次政务会议，讨论延安市政府本年度工作计划大纲。

△　延安《解放日报》讯：日军自“七七”抗战后，即实行文化掠夺，开始成立“华中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后改名为“华中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该会仅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即掠夺图书90余万册，地质矿物标本近五万件，鸟类标本4000余只。

△　日大本营陆甲第三号命令：成立香港占领区总督部，任命矶谷廉介中将为总督，总督接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指导。

△　日政府召开元老重臣会议，讨论当前时局，历届首相米内光政、冈田启介、广田弘毅、近卫文麿等出席。

1月20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决议：一、《国外战区侨胞紧急救济办法》；二、粮食部《关于调查大户存粮办法纲要》；三、广东省《关于韶关市政筹备处组织规程》及《韶关市警察局组织规程》。

△　云南曲靖县田润泉捐资24万余元兴学，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奖。

△　中国妇女战乱救济会主席宋美龄电复美国空军志愿队，对捐献儿童保育费5222卢比（印币）表示感谢。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渝举行茶会，欢迎从香港脱险的皇家海军司令楚泰格、皇家空军大队长澳格福特、皇家重炮队长麦克比兰等英国军官。

△　朱德、彭德怀、罗瑞卿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名义发布命令：凡从敌军中逃来我军阵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应以国际友人对待，尊重其民族生活习惯，给予生活上的保障；愿意参加我军工作者，与我抗日军享受同等的荣誉与权利；对敌军中之随军记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技术人员等，更应格外优待礼遇，予彼等以自由发展其才能之便利。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根据长沙战争胜利、英美在南太平洋战

争失利后，估计蒋的两面政策还会继续，国内困难将更严重，但不至崩溃。今后在大后方的首要任务是：分地区地促进民主进步；积极地准备民主人才和党的干部。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平西工作及领导问题》的指示，指出：一、解决平西问题的关键是实行精兵简政，使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超过平西区人口的3%，以减轻人民负担及财政粮食的困难。二、应将第十分区划归冀中区，平西划归北岳区管理，平西区党委及挺进军番号取消，另在冀热边成立一短小精干的区党委和地方性军区，以管理平北、冀东工作。三、萧克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远调任冀中区党委常委，马辉之调任北岳区党委常委。

△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山东军政委员会：一、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兵团。胶东、鲁中、鲁南战略区均成立军区。鲁南编一主力旅，拨归第一一五师指挥。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山东纵队（包括军区）。

△　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陈毅作《论军事建设》的报告，饶漱石作《关于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曾山作《关于政权建设》的报告，黄克诚作《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并把它作为会议的基本决议。会议至3月5日闭幕。

△　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及地方游击队在李运昌、曾克林率领下，强袭迁安县杨店子伪治安军据点，由凌晨3时起，与守敌1300余人展开游击战17个小时，该敌在日军增援和飞机掩护下逃往迁安城，杨店子据点被拔除。此役为后来开辟滦河东部地区打开了通道。共毙伤伪治安军第二十团官兵800余人（内毙日军顾问一名），缴机枪五挺、步枪200余支。

△　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猛攻胶东海阳西邢村镇，攻克敌据点。另一部攻入烟台，毙伤敌军数百人。

△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国与澳洲之关系益形密切，交通部为促进中澳间电讯之迅速便利，特电商澳洲无线电公司同意，成立成都与悉尼间直达电路，现已试验完成，是日正式开放通报。

△　伪满洲国兴农部拟定《康德九年（1942）度农产品增殖方案》，计划谷物（高粱、包米、谷子）生产量为1227万吨，水稻99万吨。

1月中旬　陈诚就释放叶挺事会晤周恩来，提出联合几个前方将领保叶挺。周恩来说，叶挺决不会写悔过书，我们也反对写。

△　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九师派部队南下，创建岳北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解放该地人民。是月中旬，第一二九师师部决定派王新亭、聂真率已进入岳南地区的太岳军区南进支队继续南下开进中条山地区。

1月21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贺龙、关向应，指示他们切实侦察日军动向并速报，还指出：日本在满洲放出北进空气，如新加坡不守，日军与希特勒配合进攻苏联的危险是存在的。

△　交通部为积极修筑宝鸡至天水段铁路，特设宝天铁路工程局，派凌鸿勋为局长兼总工程师。27日，宝天铁路工程局在天水成立。

△　中国空军飞越南侦察，击毁日军运输机二架。22日，中国轰炸机27架、驱逐机15架，美志愿队驱逐机15架，飞越南河内轰炸日军机场。

△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函教育部称：浙江大学发生倒孔运动，

学生集众游行，张贴标语，发表宣言，除会同军政机关作有效制止外，应与该校党部团体切取联络，勿使事态扩大。30日，教育部复函称，此案发生后当即电饬该校设法制止，严办首要，并另派本部督学钟道赞前往该校处理。

△ “日本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及“华北朝鲜青年联盟”负责人发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谈话，呼吁东方各民族以全力为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而斗争。

△ 日首相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叫嚷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新秩序”，声称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战略据点，另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日本管理和控制之下。

△ 宋子文致函摩根索，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认为美方贷款办法的弊端是：一、“此法可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及社会经济形成对立或脱离关系”，使我国经济、政治与法币“加速崩溃”；二、“我国今日军事与经济不能分离”，“必使经济与法币之信用提高与稳定，而后军事自能日起有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提案，要求美方无条件提供贷款。

1月22日 蒋介石电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对美国推荐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表示欢迎。

△ 蒋介石电令各地严禁各校学生及一般民众集会游行。

△ 刘哲、许崇灏、乐景涛增补为国民政府委员。

△ 四川省政府发动全川各乡镇中心学校全体师生，劝募战时公债2500万元。省主席张群是日发表告全省同胞书，勉踊跃输将，共成伟举。

△ 重庆《大公报》讯：重庆市“一元献机运动委员会”公布：自一元献机运动以来，共收到捐款50余万元。

△　18架中国轰炸机从昆明以北沾益机场起飞，轰炸河内日军机场。

△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主席朱德致电尼赫鲁，主张中、印两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联合。

△　汪伪政府与伪满洲国政府签订物资交流基本协定。

△　日伪在热河省兴隆县蓝旗营子村、半壁山、双庙村及承德县羊草沟地区进行大逮捕，中共承兴工作团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织遭破坏，被逮捕者423人。其中150人于本月31日、2月11日两次被立案解送判刑，余者先后获释。

1月23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四届会议在重庆举行，外交部次长傅秉常报告国际形势，主要讲述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和泛美会议情况。

△　财政部制订《田赋征实工作竞赛办法》。该法将各省田赋征收数额制成竞赛表，依征赋数额多少排列，四川、贵州最优，陕西、河南居末。

△　延安《解放日报》讯：虞洽卿、王晓籁、缪云台等创办三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资本500万元，总公司设昆明，马轶群任总经理，在重庆、泸州、毕节、贵阳、畹町、仰光设办事处。

△　冀南军区司令部公布1941年战绩：计大小战斗2928次，毙伤日伪军12.1881万人，俘虏日伪军军官387人、士兵7663人，伪军投诚1403人。

△　冀中军区军民10万余人发起破袭战，填平正定、无极公路南北之封锁沟、护路沟80余里，破毁公路20余里。

△　英缅军总司令胡敦要求中国派军入缅协助英军作战。2月3

日、16日，英缅军又先后两次提出同样要求。

1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教育宣传问题，毛泽东关于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指出：中宣部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熟悉宣传干部，这是宣传指导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导与编印课本。延安高级学习组约300人，认真地教育这300个高级干部，是政治局与中宣部的责任。国民教育，应研究和指导根据地的国民教育，包括4000万人，还要研究全国的国民教育。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相应的决议。其中关于中宣部工作的决议，指出中宣部三大工作任务中，宣传指导为第一位，应付以极大的注意力；干部教育为第二位；国民教育为第三位。

△　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前锋（一团）已到达缅甸孟养。

△　冀中第九军分区部队攻克博野县大营敌据点，毙敌80余人，俘170余人。

△　中国工程标准协进会在重庆成立，凌鸿勋、吴承洛为正、副会长。

△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出命令，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改善小学教师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

△　美海军四艘驱逐舰和数艘潜艇，在荷印巴厘巴板附近海域，对日军16艘运输船及为其护航的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发起攻击，一举击沉四艘运输舰和一艘护航舰只，死伤1000余人。美军一艘驱逐舰受创。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大海战。

△　日本中国派遣军后宫总参谋长应召赶赴东京，杉山参谋总长对后宫提下列要求：一、对香港实行军政管理，成立香港占领区总督部。使香港与占领中国的其他地区截然分开，在行政方面实施统制、监督。有关防卫、兵站、交通、政务等方面，应接受中国派遣军总司

令官的指导。二、香港占领区总督的任务正在研究中，与香港总督进行联系，以充分沟通思想。

1月25日　中国空军美志愿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是日，在缅甸和昆明等地共击落日机190架，志愿队损失飞机五架。

△　重庆《大公报》讯：军政部规定本年度国民兵组训办法八条，饬各军区司令部施行。规定以乡镇或保为召集单位，年龄从19岁至35岁，每年训练五期，每期两个月，训练时间为180小时。

△　新四军东江游击总队收复广东淡水。

1月26日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国民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视导会议，着重检讨过去工作情况及商定今后实施计划。教育部长陈立夫致词说：国民教育的目的在扫除文盲，故首应注意量的发展，同时不可忽视师资之培养，以求质的提高。今后高等教育由教育部负责办理，高级中学以省办为原则，初中以县办为原则。今后学校训导应注意礼乐的训练，社会教育即礼乐之教。通过《筹集国民教育经费案》、《统筹中等学校教科书案》、《实施师范学校新颁课程案》、《推行国语教育案》等50余件，2月3日闭幕。

△　重庆《大公报》讯：前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在香港陷落后率部突围脱险，国民政府颁给“干城”甲种一等奖章一枚。

△　教育部颁发《国立职业学校教职员支薪标准》，规定各校自本年1月起按以下标准施行：校长280至400元，主任240至320元，厂主任、院长、导师220至280元，专任教员职业科200至280元，普通科140至220元。教员中除资历特优者外，不得照高标准支薪。

△　毛泽东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

△　八路军总部向全军公布《精兵办法》，规定战斗部队团以上直属队人员与战斗人员之比应为1：7；团以下直属队人员与战斗人员应为1：5。

1月27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下列法案及任免事项：一、《敌产清理办法草案》；二、广东省政府委员罗翼群辞职，由方少云继任；三、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志远免职，任命该会委员吕渭生兼任；四、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免职，由该省政府委员张宗良兼任；五、任命宋秀峰为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六、派席尚谦为山西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

△　财政部命令裁撤四联总处金银收兑处，以后金银收兑事项完全归中央银行办理，金银收兑价格改按国际市场价格。

△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粮食局局长，常黎夫为副局长；曹承宗为边区税务局局长，李予昂为副局长。

△　缅甸总督特派参议员马杜格由缅飞抵重庆，商讨有关中、缅问题。

1月28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代理四川省粮政局局长刘航琛免职，任命康宝志继任。

△　全国慰劳总会前线慰劳团共组成五个团，总团长为居正，第一、二团团长王用宾，第三团团长刘文岛，第四团团长于斌，第五团团长洪兰友，携慰劳金300万元，第一、二、三团15日出发，第四、五团是日出发，分赴前线慰劳将士。

△　全国劝储总会发表第二届节约建国储蓄竞赛成绩，计共达7.254亿元，重庆市1.3046亿元为最优。

△　长沙各界为庆祝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自是日起庆贺三天。

△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减租减息三条基本原则：一、承认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二、承认大多数地主是要求抗日的，一部分开明士绅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应交租交息；三、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因此目前不是削弱而是鼓励。这些原则是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毛泽东在政治局通过决定时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命令，重申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与边币具有同样价值。

△　日大本营发布第1088号指示：一、香港占领地区总督继续执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香港占领地区总督管区内实行的军政业务。二、在有关防卫及交通事项中，香港占领地区总督应接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指导。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了对华实施谋略和搜集情报等工作的需要，得在总督管区内设置必要的机关。四、总督委托派遣军总司令官经营其管区内的广九铁路。五、以上两项规定的有关细节，可由总督与派遣军总司令官相互协商。同日，又发布第592号命令，规定香港总督的任务是：一、总督应担任香港占领地区总督管区（旧英领及租借地）的防卫及军政工作；二、总督有关防卫及交通等必要事项，应接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指导；三、香港俘虏收容所由第二十三军的战斗序列中除去，纳入香港占领地区总督属下；四、香港占领区总督属下，指挥及监督下的部队的兵站业务，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负责；五、参谋总长根据需要应将其属下的船舶部队的一部，纳入香港占领地区总督的指挥之下；六、有关细节由参谋总长指示。

1月29日　外交部长宋子文接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来函，称史迪威

来华任务是：一、监督美国援华物资的拨配与使用；二、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拨交的华军；三、参加在华召开的国际作战会议，并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四、控制在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　重庆《大公报》讯：经济部省营公司监理委员会发表省营工业概况：一、冶炼厂，分布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山西，计81家；二、机械厂，分布在江西、福建、贵州、山西、陕西等省，共10家；三、电机厂，分布在浙江、贵州，共三家；、四、化学厂，分布在安徽、湖北、广东、云南、贵州、山东、山西等省，共31家；五、纺织厂，分布在江西、湖北、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山东、山西，共24家；六、其他工厂66家。总计各省工厂141家。

△　四川省征购粮食1.2亿市石，已全部办理竣事，现正由储运局开始接收。

△　重庆文化界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钱亦石逝世四周年大会。周恩来、董必武、潘梓年、吴克坚、章汉夫及各方面人士孔庚、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张西曼、侯外庐、翦伯赞、阳翰笙、潘念之等百余人出席。沈钧儒、郭沫若、董必武、邓初民等先后在会上致词。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董必武撰写的《反侵略声中纪念钱亦石》一文。

△　皖北宿县伪和平救国军暂编第十五师参谋长张维相率部2000余人宣布反正。

△　东条英机在众议院预算大会上声称：日将继续进行反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战争，但同时期待国民政府“反省”。日众议院并讨论通过：一、《华北、华中株式会社法》中改正法律案；二、关于开发在华占领区的经济原则。

1月30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电祝贺美国总统罗斯福六十寿辰。宋子文在美代表蒋介石拜会罗斯福总统，并交换中国战区情报。

△　第七战区一部克复粤东博罗。

△　第六军第四十九师彭璧生部应英方要求开往缅甸景东，受英方指挥官各脱指挥。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令王新亭、聂真率领第三八六旅直属队一部及第十七、十八、五十七团南下中条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　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面谈对华提供无条件贷款的紧迫性。经罗斯福同意，美方放弃支付中国军饷的方案。

△　日纺织业联合会提出榨取中国沦陷区及南洋各地棉花办法：一、本年度在中国沦陷区产棉花300万至400万担，五年后增加到1000万担；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越南、泰国、菲律宾种植棉花500万町步（面积），收获300万担；三、设立南洋纤维资源开发会社作为综合统制机构，以便榨取南洋各地棉花。

1月31日　财政部发言人称：沦陷区四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一律停业，抗战胜利后再行清理。

△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平北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平北工作的方针是巩固与发展并重，发展方向应以崇礼、宝昌、沽源地区为主，同时注意向东发展，以求与冀东区相连接。在政策上应特别注重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避免过早的阶级分化；在政权中应参加一部分优秀的中共党员，以提高政权威信；并要求建立正规的财政制度，统一主力与地方军的供给。

△　日军万余人开始对晋西北进行“扫荡”。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山西新军及地方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80余次，歼日伪军570余人，至3月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　马来半岛整个沦陷，英军退至新加坡。日军进抵柔佛新山，隔海峡围攻狮城。

△　缅甸英军退出缅甸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撤守萨尔温江对岸地区。同日，日军占领毛淡棉。

1月下旬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抵达东江地区，在阳台山根据地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同时开始整编部队。

是月　　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边疆学校及大理分校，经教育部决定分别改为国立边疆学校、国立大理师范学校，派汪懋祖、钟志鹏分任两校校长。

△　救国会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盟遂成为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青年党、国社党在内的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

△　中共中央北方局作出关于普遍建立武工队的决定，其主要任务是：一、开展对日伪的宣传战；二、在地方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敌占区的群众工作，发展秘密武装；三、开展对日伪军和伪组织的下层工作；四、打击敌人，铲除汉奸；五、掩护交通与进行经济战。

△　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在志丹县城修建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先烈。

△　南京汪伪警备第四旅7000人反正，投奔新四军。

△　伪满洲国军队进入冀东地区参加伪华北治安军的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伪军第二二三、八八一、八八二、一七四、八〇四部队，分别在蓟县、迁安县、遵化县、密云县“扫荡”抗日武装。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十三团及第八总队等部，英勇抗击伪军。

2月

2月1日　　经济部物资局成立，下设农本局、燃料管理处和平价购销处。从6月份开始办理煤、油、布等定量分售业务。财政部拨平价基金4.5亿元，用以控制生产。

△　财政部公布《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　川康兴业公司创立会在重庆举行，官、商股代表130余人出席。四川省主席张群报告筹备经过。蒋介石、孔祥熙等训话。该公司以“经营协助川康各项事业，促进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计划之实现”为宗旨，资本7000万元，其中官股4000万元，商股3000万元。董事长张群，总经理陈介生，总稽核何北衡。官股理事顾翊群、卢作孚等14人，商股董事钱永铭、刘航琛等12人，另各有官、商股监察六人。3日，董事会与监察人员就职，并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3月3日正式开业。

△　中国农业协进社第四届年会在渝举行。经济部长翁文灏、次长钱天鹤等200余人出席。翁文灏致词说：“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今后更应亟谋农业方面之改进，达成以农立国，以上为建国宏旨”。

△　教育部在浙江设立东南联合大学，将上海所有公、私立大学并入该校。

△　湖南邵阳成立蔡松坡（蔡锷）遗著编印委员会，岳森为主任委员。

△　中共中央党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来宾及全体学员共千余人出席。校长邓发报告中央党校筹备经过、教育计划及学习方法。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学员代表张鼎丞致答词。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提出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任务，标志着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　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于是日及16日相继开始向缅甸进发，但因全靠步行，补给无着，结果第五军骑兵团和第二〇〇师迟至3月8日才赶到仰光北的东瓜，第六军于3月7日方行抵南曲依、兰河、孟板、孟唐附近。

△　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由金华来渝述职，是日对记者称：今日台湾之地位，与东北四省无异，他要求台湾民众起来斗争。

△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山西和顺以西地区“扫荡”。7日至20日，该旅团主力“扫荡”宜城附近。21日以后，该旅团又对榆社以北地区进行“扫荡”。

△　日本强迫移入华北的所谓“日本居留民”，截至是日已有13.4834万户，38.3857万人，多集中在平、津两市。

2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央各机关服务人员因公损失财物补偿暂行办法》，凡八条。

△　重庆市商会召开春季会员大会，各机关及同业公会代表130余人出席，周懋植主席。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捐款一万元慰劳湘北三次大捷的将士；二、向蒋介石及前方将士致敬；三、请求政府授权各公会代表举办商业登记；四、请求政府原则上采用信用贷款制度，而辅以连带保证办法，即今后由国家银行直接贷款，贷款商号须先经各该业公会审核贷款数量，负责保证等案。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十次政务会议，讨论边区政府机关整风学习问题，决定成立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李鼎铭、柳湜、周兴、周文五人为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林伯渠为主任；并责成教育厅拟出专署以下各级干部学习计划。会议还讨论《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修正案。

△　晋察冀军区发出精兵简政命令，主要内容是精简主力，紧缩

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武装部队编为主力军、地方军、自卫队（不脱产）三级，主力军又分甲、乙两种团，地方军分为地区队、县游击队、区游击队三种。取消冀热察挺进军番号，在平西、平北、冀东分别成立第十一、十二、十三军分区，北岳区部队划分为主力军与地方军建制。

△　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团各一部，乘黑夜对占领胡家台日伪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白刃格斗和火攻，歼灭大部分日伪军。其中，歼日军将近200人。4日拂晓，残敌逃窜。

△　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对华贷款五亿美元。4、5两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贷款案。21日，中美双方正式签订借款合同，规定最后偿还期延到战后。

△　英国外相艾登通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英国决定给中国5000万英镑借款；另以租借形式拨给中国军火和军用设备。

△　史迪威将军奉调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5日，美国统帅部又决定史兼任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史于3月4日来华就职。

△　英军司令托马斯·赫顿爵士飞往腊戍，同即赴印度访问的蒋介石会晤，敦促蒋加快派遣军队入缅。

2月3日　　同盟国发表公告，宣布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并任命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　外交部就中国参加南太平洋战事会议问题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并转达蒋介石命令："我国凡可参加者，皆应参加。"

△　毛泽东、朱德复电彭德怀，指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需外援。八路军前方拟支援边区的布匹、火柴等，可不必送

来。银行较去年为好，边币已稳定，二元二角合一元法币，此间不能禁止法币。

△　粤东激战，博罗再沦陷。

△　日军第四十一师团7000余人开始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敌从安泽、霍县、灵石、介休等地出动，奔袭驻唐城、郭道地区的八路军太岳军区领导机关。由于八路军不断地适时转移，敌一再扑空，遂转入“清剿”。在太岳北部地区军民严重打击下，敌于20日结束“扫荡”，以一部转向沁水地区，主力南下至临汾、屯留公路，开始对太岳南部地区“扫荡”。21日，日军分19路南北夹击唐村、孔滩、东峪地区，企图消灭第三八六旅主力，该旅主力及时跳出敌之合击圈，并于东峪以北关爷岭歼敌200余人，至25日敌结束“扫荡”。

△　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三个大队5000余人，是日由晋西北三岔、五寨、西马坊等地出发奔袭保德东南石佛河、范家塔地区八路军暂一师第三十六团、第二分区机关及独立第二旅主力。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村川、佐佐木、杉山三个大队4000余人，奔袭兴县八路军晋西北党政机关及第一二〇师主力。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四、第一、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由长沼、襄垣、武乡、辽县、和顺等地出动，采用“铁环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开始奔袭太行山北部的桐峪、洪水、王家峪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八路军即以主力一部在民兵配合下，袭扰和阻击敌人，领导机关及主力大部转移。敌奔袭扑空后即“辗转抉剔”，实行“三光”政策。日军曾三次合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桐峪等地，均遭八路军与地方武装的广泛袭击，迫敌于20日撤回黎城地区。此次反“扫荡”太行区军民共毙、伤、俘日伪军400余人。

△　日军“扫荡”沂山区一带的第五十一军及吴化文等部。八路军

第一一五师和地方武装为配合与策应第五十一军作战，粉碎敌人各个击破的阴谋，在沂蒙区、滨海区等地展开攻袭战，连克日伪据点六处，毙伤敌伪军千人。

2月4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与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及前英大使卡尔（已离华驻苏）由重庆飞印度访问，当晚抵腊戍。

△　童子军全国理事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纪念童子军创始之三十周年及第十五届童子军节纪念办法。

△　潞城之日军进攻黎城东阳关，奔袭八路军总部，总部特务团在麻田战斗中毙敌军百余人。次日，总部特务团又在武乡洪水白草坪战斗中毙敌100余人。

△　山西辽县日军在桐峪镇杀害群众120余人，其中百余人在村东河滩被集体屠杀，10余家绝户。

2月5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腊戍飞抵印度之加尔各答。

△　教育部在渝召开国民体育委员会及各省、市体育行政人员讨论会，通过设置与充实体育行政人员等10项措施，由郝更生等23人组成国民体育运动委员会。6日闭幕。

△　农林部规定是日为农民节。重庆市农会特转令各区农会分别举行庆祝大会。

△　冀东第十三团在遵化县贾庄子伏击日军，毙中佐大队长田口休助以下官兵70余人。至此冀东打伪治安军战役胜利结束。此役53天中，主要作战23次，共歼灭与瓦解伪治安军七个团，毙、伤、俘日伪军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68挺，各种炮八门，逼退丰润、玉田、遵化、滦县、迁安等县敌据点20余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由1941年初的4665人，发展到7455人。此役的胜利，彻底粉

碎敌以伪治安军代替日军防守冀东的计划，不仅恢复了基本区，而且给后来开辟滦东和北宁路南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　新四军黄克诚师一部在苏北阜宁一带击溃日伪军两部，消灭一部。粟裕师一部进攻泰县东南日伪据点，将敌全歼。粟裕师另一部配合谭震林师一部进攻五通河（靖江北）日伪据点，全歼守敌。活跃在淮南的张鼎丞师伏击陆家桥至永康镇的日运输队，缴获大量军用品。

△　伪满洲国经济部公布《关于日币第八次投资公债（第二次）发行规程》，决定发行日币公债3000万元。

2月6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五次驻会委员会议，由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报告侨胞在港、澳、越、缅及南洋各地抗日情况；研究侨务工作及救济侨胞事宜，最后通过致侨胞慰问电及救济款1000万元。

△　国民政府制定《非常时期国民劳动管制纲领》，凡11条。

△　西康《国民日报》创设藏文版，由前班禅大师秘书计宇结任主编，西康、西藏以及印度、尼泊尔国家青年数人分任编辑。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出：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在经济上，共产党的政策是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使地主和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划延安、甘泉、鄜县、志丹、靖边、华池、曲子七县为移民开垦区，并颁发《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

施办法》。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山西武乡蟠龙间伏击日伪军，毙敌100余人，毁汽车三辆。

△　粤境惠阳沦陷。次日，第七战区一部收复惠阳、博罗。

△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侵占兴县城、李家湾及罗峪口，并封锁裴家口、黑峪口等黄河渡口，随后分兵“清剿”。八路军晋绥军区主力在日伪的交通线上寻机袭击敌人，并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使入侵敌军难以久驻。日军的春季“扫荡”无法达到目的，被迫于3月初退回原据点。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共作战183次，歼日伪军570余人。

△　日军在北平逮捕燕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陆志韦、神学院长曹君、哲学教授张东荪、历史教授洪维廉、美籍教授威尔逊等12人。校务长司徒雷登亦被拘于前美国海军兵营。

△　美国空军志愿队在仰光上空击落日机20架。

△　据美国陆军部宣布：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其成员包括美国三军参谋长和英国驻华盛顿的海陆军官员。该委员会对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负责，其任务是制定和指导美英联盟大战略。

△　成都、新德里国际电台开始直接通报。

△　新西兰政府捐赠国民政府新币5000镑，为红十字会医药救济基金。

△　日外相东乡在贵族院预算总会称：对汪精卫政府的强化与协助，按既定方针进行，并提出控制长江下游物资不使流入重庆及“游匪”地区。

2月7日　　国家总动员文化界宣传周在渝举行开幕典礼。冯玉祥、陈立夫、谷正纲等500余人出席，由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公展致词，略谓：总动员目的在于鼓励士气，文化界未尽职责，追往思来，当知有所奋勉。宣传周日程：8日为文艺日，9日为电影戏剧日，10日为音乐日，11日为美术日，12日为新闻出版日，13日为国际文化日，14日为宗教日。每日均有讲演、展览和座谈会等内容。于15日结束。

△　重庆《大公报》讯：全国劝储总会举办第三届竞赛，在中央、省市及县市以下三级进行。储款目标每年为30亿元，优胜者发给奖状或奖章。

△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左权向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太北反“扫荡”的指示，指出：这次太行山北部反“扫荡”须坚持相当时日。因此，应以一部休整，保持机动，并派部队由得力干部指挥，轮番破击日军交通，袭扰与伏击敌人的小部队。并布署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新一旅和太岳地区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后方，破击敌人交通。

△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写《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一文，全面总结1941年下半年苏南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指出通过反“清乡”斗争，也取得了经验，使我们认识到“清乡”与一般“扫荡”不同，它带有长期性、战略性，只要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组织部署上周密准备，在战略战术上争取主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全民武装，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清乡”。

△　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工作，安定社会秩序，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检查行旅办法》，规定对于出入边区境内之车辆、驮兽、行人、物品等执行检查，并规定检查的组织、范围及查处办法。

△　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奉命声明，欢迎中国远征军入缅

作战。

2月8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加尔各答乘火车赴新德里。

△　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测验学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体育学会等13个单位，在渝举行第二届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主要研讨今后三年教育建设，提出学生要刻苦学习，减少教育的阶级性，注重国防教育等。9日，通过提案19件，即闭幕。

△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凯丰等，及党内外高级干部与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辑工作的干部800余人出席。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会上还分发题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毛泽东对《宣传指南》一书作详细的解说，并要求人人加以熟读。

△　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编辑的《妇女之路》在停刊一年之后于今日复刊。复刊词中提出该刊的任务是：一、提供中国妇女大众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应走的解放之路的意见；二、研究探讨妇女工作理论；三、反映妇女大众的生活与呼声；四、介绍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妇女运动的动态；五、为国际国内妇女的团结而努力。

△　设在温州的中共地下浙江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等10余名干部被捕。刘英于5月18日在永康就义。

△　是日至15日，日第三十六师团与由平汉线西进的第一一〇师团合击河北涉县、山西黎城以北，桐峪镇东南地区。第十八集团军的部分设施被摧毁。

△　伪东亚同盟军总司令白凤翔在绥远省五原被日军毒毙，所部于18日全部反正。

△　英国海军宣布：将泊驻长沙之“鹰”、“塘鹅”、“泥鸟”、“图图拉”四艘炮舰赠予我国。3月17日，海军司令陈绍宽代表蒋介石办理接受。

2月9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抵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

△　蒋介石将中国军队在缅甸配置情况电告史迪威，说明中国军队应守东瓜，英军守曼德勒，如果英军力量单薄，中方还可调第六十六军的一部分兵力保卫曼德勒；中国亦可调第五军到缅甸南。蒋强调缅甸境内的军令必须统一，中国军队不宜分散。

△　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联合纪念周，报告一年来军政重要设施，略谓：从1939年开始整训，至去年下半年止，经整训之部队已达全国军队的五分之二，并将地方兵役机构三级制改为两级制。

△　重庆《大公报》讯：经济部省营公司监理委员会发表各省矿业监理情况，称：其重要矿业如石油、钨、锑、锡、汞由该部资源委员会直接管理。省营矿业有云南锡矿公司、滇北矿物公司、宜明煤矿公司；桂省平桂矿务局；湘省江华矿务局；黔省贵州煤矿公司；赣省天河煤矿；甘省永登煤矿；川省四川矿业公司。以上矿业由资委会加入资本并主持管理，与各省合作经营，商人亦可入股。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下列决议事项：一、为夺取农业丰收，今年要掀起一个扎扎实实的春耕运动，于最近在延安市召开动员大会。二、成立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以统一文化团体的管理，委员由林伯渠、李鼎铭、吴玉章、徐特立、丁玲、贺连城、萧军、萧三、艾思奇、罗烽、欧阳山、柳湜、周扬、李卓然、何思敬、周文等27人组成，吴玉章为主任，罗烽为秘书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敌救亡决死先锋队第三纵队在山西武乡

大有镇设伏，毙日军40余名，决死第三纵队兼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牺牲。

△　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入冀中文安县，全歼伪军，并将监狱中被关的共产党员及抗日军民释放。另两路同时猛攻新镇、大城县，将新镇合作社、汽车公司及东关大桥分别捣毁，两地共毙伤日伪军60余名。

△　新四军张鼎丞师攻克安徽黄泥港日伪军据点，全歼守敌，俘日军20余名。13日，该师又进击安徽皋官集，歼灭一部，毙伤日伪军30余名，缴长短枪百余支。

△　伪满洲国政府民生部公布《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重要产业部门和军事工程，可使用强制摊派的劳工，为日伪大肆抓捕劳工提供依据。

2月10日　蒋介石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及印度军总司令哈特莱就印度政治问题，军事实力，及如何团结印度民众共同对抗侵略问题，先后交换意见。旋又会见前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谈印度问题。

△　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凡30条，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可，批准后主管官署应即派员指导；人民团体之发起人要将筹备经过、会员名册、职员简历、组织章程等报主管官署立案。

△　国民政府任命李培基兼河南省保安司令，牟中珩兼山东省保安司令。

△　美国红十字会捐给中国红十字会美金10万元，另赠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及战时儿童保育会美金五万元。

2月上旬　英驻华大使馆为英驻华大使卡尔，离任赴苏就任新职举行告别酒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卡尔将英军缴获的德军军刀一把赠

给周恩来。月初，周恩来为卡尔设宴饯别，将叶挺军长带到重庆的一把日军军刀赠给卡尔大使。

△　沂水日伪2000多人沿沂蒙公路分三路向西侵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对进犯之敌连续进行袭击，粉碎敌伪进攻，保卫了沂山山区抗日根据地。

2月11日　蒋介石会见尼赫鲁及现任印度国大党主席阿柴德，听取其陈述印度国民对于太平洋战争之态度；并劝以宜用政治方法，完成其志愿。

△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决定将桐油、茶叶、猪鬃，一面维持出口统制，一面放松内销限制。桐油准许商人在国内采购存储，不加限制；茶叶停征平衡费，放松原定存储数量；猪鬃将原定存储数量及时间限制取消。

△　国民政府任命谌小岑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今年第一次董事会，董事王正廷、朱家骅等出席，决议增聘戴季陶、陈立夫、谷正纲、张治中、黄仁霖为名誉董事。

△　华北记者战地服务团团员、山东及青岛新闻记者蒋化棠、张相时、张相秋、姜子正、苟云书、张子眩、王育民八人在山东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时壮烈殉职，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给抚恤费二万元。另颁给战地服务团团长何冰如荣誉奖状。

△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指示，强调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

△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是日至25日连续发出反“扫荡”作战的指示，指出：日军将对我各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

华北仍为敌“扫荡”的重点地区，必须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克服轻敌或消极等情绪；对作战指导、组织群众等方面均作了具体部署。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时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一旅一部在晋东南黎城马齿滩阻击日军，毙敌百余人。

△　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指示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按五分之三，地方部队按五分之二的原则进行缩减。根据这一原则，第四旅撤销第十二团，第五旅撤销第十五团，第六旅第十八团划归路西联防司令部建制。缩编后每团2000人，主力保持1.8万人。地方部队路东为1.2万人。

△　四川内江县商会主席李协邦以救济院名义，囤积1500余石黄谷及白糖等日用品。是日宪兵队将李拘捕，所囤物资查封。

△　汪伪政府在上海举行“新国民运动万众签誓日”，伪市长陈公博首先签誓，同时向每人颁发《新国民运动纲要》一册。

△　全印学生联合会是日宣布，定15日为“中国日”。14日，该会将一面锦旗赠给宋美龄转送中国学生团体。

2月12日　蒋介石在新德里会见尼泊尔国王子巴哈度，伊奉其父卓达王之命前来致敬，并贡献卓达王亲猎之虎皮一张，又以印币五万卢比为救护中国战时难胞之用，蒋欣然接受。

△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拜访蒋介石，讨论如何使英国给予印度国民以实权等问题。

△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革命史迹展览在重庆展出，内容有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等10大类。编纂委员会主任张继称：该会动员了546个单位，751位工作人员，收集史料计11.4万多件。

△　第五战区皖西部队克复涡阳。

△　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五人小部队袭击萝北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途中，被混入队内日伪特务刘德山自背后开枪击成重伤，赵尚志忍痛回身击毙刘德山后被俘。赵尚志在敌人审讯中，坚贞不屈，壮烈殉国。

△　日驻承德宪兵队实行“大检查”，仅有50余户的南双庙村，被抓村民110人，就地杀害五人，其余押往承德监狱，杀害和折磨致死72人。14日，日军又在上板城一带抓捕群众47人，全部杀害于承德水泉沟。

△　汪伪江苏省封锁管理处召开第一次封锁会议，讨论第三期清乡工作方针和修建封锁工事所需材料（竹篱）征集办法，决定构筑300公里竹篱封锁线，所需竹竿430万支由各县向民间征集；并通过实施连坐法案。

△　美总统罗斯福签署贷给中国五亿美元法案。

2月13日　蒋介石视察印度、阿富汗边境之开伯尔山隘要塞，并出席阿富里提等族之欢迎会。

△　经济部物资局长何浩若向新闻界宣布：接行政院命令，棉纱统筹并平价供应14日起开始实施。纱价提高为6900元，由农本局统购统销，按原价直接售与用户；同时登记存纱，由政府定价收购，并采川花易纱换布办法。

△　为完成今年在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60万亩、增加细粮20万石

的计划任务，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号召边区人民掀起春耕热潮，要求各级政府把领导春耕运动作为当前的一项中心任务。并附发《三十一年春耕运动工作办法》、《春耕运动宣传要点》等文件。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太行军区第三分区“抗敌救亡决死先锋队”第九团第二连追击退窜蟠龙之敌，毙伤日伪军40余名，击落日机一架。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一旅第二团一部在晋东南黎城设伏，毙伤日伪军百余名。

△　日第七十九届战时议会通过设立“大东亚建设审议会”。东条任总裁，以榨取南洋煤油、矿产物、农产品为方针。议会还通过军事追加案180亿元，一般和特别会计预算案88.3亿元。

2月14日　蒋介石赴拉合尔，即返新德里，接阅甘地函。同日，蒋介石与印度政府商定，两国互派常驻代表，后国民政府派叶公超驻新德里，骆傅华驻加尔各答。3月2日，印度政府宣布在加尔各答设立“对华事务司”，库克担任司长。

△　英国援华委员会、救济中国难民筹款委员会等在伦敦举行对华致敬民众大会，欢迎中国成为英盟国。英外相艾登、前首相劳合·乔治、尼赫鲁、戴高乐，以及希腊、挪威、南斯拉夫、荷兰等国总理和民众1500余人出席，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致答词。

△　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华侨对策纲要》，对东南亚各国的华侨施加压力，企图使他们背叛祖国，为日侵华效劳。

△　伪满铁道警护总队发布《铁道地内等进入取缔规则》，规定无故进入“国”有及“满铁”所有或属其经营之机关、仓库、工厂、车站或埠头境内者，处以拘留或罚款。

2月15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自是日

起，在四川、西康两省区域内施行。

△　中国滑翔总会在重庆北碚举行中国第一个滑翔机场落成典礼，由滑翔总会常务理事陈立夫主持。北碚民众捐献之“北碚号”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献之“中国电影号”滑翔机10架，亦同时举行命名典礼。

△　新加坡英军珀西瓦尔中将率所部七万余人向日本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山下奉文投降，日军占领新加坡。

2月16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新德里赴加尔各答。

△　国民党中常会例会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规定：一、所有戏剧剧本出版或演出审查在重庆统归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办理，各地方由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处办理。二、未经依法向主管机关立案之剧团一律不准公演，更不得假借任何机关名义演出。三、凡剧院公演戏剧未经社会部或省、市、县社会行政机关核准，均由各该地方政府分别予以停演或罚金处分。

△　粤省民政厅长兼救侨会常委何彤在省府纪念周称：港、澳归国难侨已达50万人，准备设立侨村，办小工厂、垦殖场等安置就业；对中学生一次救济100元，专科以上学生200元，另按月贷款以维持生活；对无劳动能力的老幼送救济院。

△　国民政府令：新闻工作者秦力山，早年参加革命，创立学会报社，功劳卓著，志事未竟，又亡身异域，特予明令褒扬。

△　广东各界为救济归侨举办的献金大会，是日在韶关开幕。省主席李汉魂、省党部书记长袁晴晖，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千余人出席，当日捐得51万余元。

△　全国慰劳总会前线将士慰劳团总团长居正，自上月28日率领第五分团前往云南一带劳军，是日返渝。3月1日又赴长沙慰问。

△　重庆《新华日报》发起签名慰问战斗在反法西斯前线的苏联红军。从即日起到23日苏联红军建军纪念日，平均每日签名者在3000人左右。23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代论《庆祝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和周恩来的纪念文章《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苏联红军胜利前进！》。

△　八路军晋西北军区部队收复保德。

△　由汾阳、文水各据点日军组成的轻装突击队，在交城县南沟村（今属文水）一带袭击晋西北第八分区司令部。第八分区副司令刘德明在率部反击中英勇牺牲。

△　日军在广东通明、雷州两港登陆，占海康，我军退守客路。

△　缅甸仰光情况危急，英方再次请求中国派军入缅，协助英军作战。军委会命令在滇缅路上的远征军向畹町、腊戍集中后陆续入缅，并由英方派车接运。第六、第五军均受英军胡敦总司令指挥。

2月17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抵加尔各答，再次会见尼赫鲁，并进行交谈。蒋氏指出，印度革命党利用今日世界大战的机会，参加民主战线作战，对印度将会有利。同日，会见印度回教同盟领袖真纳。

△　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发表声明，为感戴蒋介石之访印，并对中国军民表示敬佩起见，特定3月8日为“中国日”。

△　英王赠蒋介石爵位。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估计日本占领新加坡，完成第一步南进计划后三种可能的动向：攻印、攻苏、单独解决中国。分析这三种可能对日的利弊和蒋介石的态度。认为蒋明显地望日攻苏以趁机压我向北，并布置准备工作。毛泽东电复：“与我们估计略同”，应准备对付蒋的压力。

△　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一部在遵化县野瓠山同日军、伪满军交战，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包森被敌冷枪击中牺牲。

△　日军沿广东雷安公路陷客路，北向月城窜扰。

△　行政院会议通过，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整理完毕，准予明令复校，并任命张洪元为校长。

△　四川营业税局发表统计：1941年实收税款9502.1440万元。

△　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决定全部迁闽，继续开课。

2月18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与甘地会晤，谈话历时五小时。蒋氏“希望印度国民大会改变主张，作参战的决定”；并谓：“我相信印度参战，对本身有益而无损，且与推倒英国在印度统治权之目的并行不悖，殊途而同归。”

△　中印两国订立协定，中国在印境设立物资储运网，以雷多（今译利多）为内运出发点。

△　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凡九章58条。《条例》规定：供给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既要保持艰苦作风、实行经济公开制度，又要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尽可能改善部队的生活。供给工作的一般原则，是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各抗日根据地要统一领导，独立工作；要以长期打算，注意节省，特别是注意开源；一切开支，以保证军队生活和需要开支为准，反对贪污浪费，避免平均主义；必须遵守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条例》还对供给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任务，作了具体的规定。

△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向第十八集团军各兵团发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扫荡”特点的通报，指出：日军为了破坏八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除不放弃不断进行军事压迫外，还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切建设，一切社会财富，包括人力、物

力、财力，使八路军失去生存的条件，达到消灭八路军的目的。敌在作战指导上，还可能在“清剿”到一定阶段时，采用分组多支队，用梳篦队形，紧缩漏洞地带，横冲直闯，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　毛泽东撰写庆祝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纪念文章。文章指出：“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紧密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扬和学习这个真理，依照这个真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中的任务。”

△　是日至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化名张晋西）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晋绥边区进行农村调查。调查团先后在神府县贺家川、兴县任家湾等地进行调查，并由张闻天写成《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和《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两个调查研究报告。张闻天等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阶级关系、思想动态等情况进行十分详细的调查，并提出关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

△　苏州地区第三期清乡开始。清乡地区为昆山、吴县、无锡三县铁路以南全部地区及江阴、武进两县的部分地区。日军沿江阴、武进、无锡、吴县、昆山、太仓一线修筑长达300公里的封锁线。

△　日政府声明将广州、天津英租界的行政权移交汪伪政府管理，规定：一、将租界改为特别行政区。二、特区行政机构设置，要经当地日军兵团长同意。三、日军所接收的权益，除依日军之意移交管理者外，仍由日军管理。四、聘请日籍职员参加行政管理。五、治安警卫由日、汪军警合作，中国警察机关应聘请日本人为职员。

△　纽约华侨救国会宣布：至农历春节共募集美金7000元，又纽

约三民主义青年团亦募得国币2000元，以救济香港沦陷后归国华侨。

2月19日　是日为新生活运动八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新生活运动“实际就是明耻教战的运动，要使民族道德复活”，要国民从明礼、尚义、崇廉、知耻做起。

△　社会部设劳工局，负责实施国民劳动管制。

△　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拜会罗斯福总统，商谈军火供应问题。

△　全国慰劳总会前线慰劳团第五团洪兰友等一行，是日，抵缅甸腊戍慰问入缅远征军。

△　何香凝、柳亚子、茅盾、范长江、夏衍等知名人士离港抵粤，是日延安文化与新闻界致电慰问。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大后方的土地问题》，指出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土地问题是中国现时最基本与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大后方，土地问题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引起各方面及政府当局的注意，但至今尚未触及问题的真正症结。最近中共中央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可以作为大后方如何解决战时农民土地问题的借镜，使问题能得到切实和合理的解决。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八十二次会议，决定每月8日为“保卫东亚纪念日”，每逢该日要在各报及各种集会上宣传保卫东亚的意义，除电影外，停止各种娱乐、宴会等项活动。

2月20日　蒋介石与印度政府达成经滇缅路从印度运输援华物资的决定，并发表联合声明。同日，蒋介石告尼赫鲁，盼中、印共同奋斗。

△　国民政府公布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法机关的调整办法：一、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的立法原则，立法院如有意见，应尽速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述；二、法律案如无特殊情况，仍应交立法院审议；三、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的法令，应令知立法院及其他院、会查照办理。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六次驻会委员会，主要听取外交和粮政报告。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同日，毛泽东还将此电发给刘少奇、彭德怀。

△　延安《解放日报》公布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成绩：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一、二、三、五专区截至1940年6月，总计减息32.06万元，减租1.229万石，有1480余顷土地减了租。租率，减后一般都在总收获量的37.5‰以下；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榆社、辽县、襄垣、偏城、邢东、邢西、平南、赞皇、磁县、沙河、涉县等11县，共减租1.773万余石，平均每户佃农减租两石以上，减租额多者44%，少者22%。

△　八路军太岳区南进支队直属队和第十七、十八、五十七团，积极发展地方武装，打击敌伪，建立政权，开始恢复晋豫区抗日根据地。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一部在冀南涉县悬钟设伏，毙伤日军百余名。

△　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等一行四人，由平西抵晋察冀第一分区，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召开大会欢迎。

△　日军命令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筑从天津至石家庄连贯河北平原的运河，造价3000万元，预计15年完成。

△　日政府宣布香港为日本占领地，正式设立占领地总督部。任命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平野茂为副总督。

2月21日　　蒋介石结束对印度的访问，是日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吁请印度人民参加反法西斯阵线，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当晚，蒋介石一行自加尔各答飞抵昆明。

△　教育部颁发《省市国民体育委员会组织通则》，凡九条。规定各省、市民政、财政、社会、卫生等机关代表与教育厅、科及督学、专家等组成国民体育委员会，负责执行中央有关国民体育的法令、省市计划、经费、比赛等事项。

△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问题复电周恩来，指出：“政治局在去年10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　日伪军分19路开始“扫荡”太岳南部地区，南北夹击唐村、孔滩、东峪等地，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三八六旅主力。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时跳出合击圈，第十六团在东峪以北之关爷岭歼敌200余人。25日，敌被迫结束对岳南地区之“扫荡”。

△　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提出以日本、满洲、中国及西南太平洋地区为“资源圈”，澳洲、印度等地为“补给圈”，并制定在15年

内的资源掠夺计划。

2月22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任期于本月底届满后举行改选，并修改原有组织条例。第二届参政会之职权于下届参政员全部选定公布之日终止。

△　中美文化协会举行三周年纪念会，会长孔祥熙讲话，对美国给予中国的多方援助表示感谢。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特成立广播委员会，由曾虚白、彭乐善负责筹办。每周举行一次中美文化讲座，并决定在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成立中美文化分会。

△　延安《解放日报》讯：社会部设立中国社会服务事业协进会，许世英、黄仁霖为正、副会长。黄炎培、杜月笙、潘公展、洪兰友、康泽、康心如、刘伯闵等为理事。

△　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军事、政治和技术专门人材等各类干部学习的基本内容，应是军事、政治、文化和业务的学习；学习的基本原则是干什么就以学什么为主，要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干部以学习文化为主。另对军事、政治、文化和业务学习的具体内容、各占时间比例、轮训制度、教育方法和课程设置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2月23日　是日为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毛泽东、朱德分别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文章。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副武官罗申上校在渝举行茶会招待中外各界。

△　《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字。据此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和第六军进驻缅甸。

△　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冯钦哉、委员兼民政厅长白宝瑾、兼财政厅长姚大海、委员石友益、陈祥生、戴锡曾、王荣灿等在洛阳宣誓就职。

△　四川省第三次全省兵役行政会议开幕，省主席张群致词指出：兵役中借势磕索，买人顶替，虐待壮丁，贿纵强拉，流弊繁多，无可讳饰。此次兵役机构改组由三级制（军、师、团管区）变为两级制（撤销团管区），由征训合一变为征、训、用合一。军管区负责人在会上公布：全川共有甲、乙组壮丁388.5008万名，其中260余万名正在待整训。会议通过关于征募及组训国民兵团等议案，27日闭会。

△　中国护士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主要研讨抗战期间战地护士工作，决议在总会及各地分会成立护士总动员委员会；要求教育部与卫生署会同该会组织战时护士动员委员会，切实办理战时全国护士工作，28日闭会。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二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边区高等法院三十一年度工作计划大纲》，并作出两项决议：一、成立保健委员会；二、改组动员委员会。

△　冀中文新县大队长储国恩率领战士17人，化装成民工混入姜庄子敌据点，消灭25名日本兵，缴获火炮一门、轻机枪二挺、长短枪20余支。朱德总司令为此予以通令嘉奖。

2月24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一、免去曹浩森军政部政务次长职务；二、免去熊式辉江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三、任命曹浩森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四、批准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

△　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27日发表演说，谓同盟国应集中力量，阻止日寇继续进攻。

△　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致函财政部，提出：外商在中国设立银行业务，必须申请财政部批准，遵守中国现行法令，取缔在国境以内通行外币。

△　军事委员会驻昆明参谋团接该团驻英军代表侯腾自腊戍报

告，转述英军总司令胡敦对中英联军具体作战部署。

△　外交部宣布中国与波兰即复交，波兰取消承认伪满洲国。

△　彭德怀、左权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如果日军向阎锡山部继续压迫，则八路军欢迎阎锡山部转移到晋西北、太岳或太行抗日根据地。并将此建议通知第一二九、第一二〇师及晋察冀军区首长。

2月25日　蒋介石赴昆明指挥远征军入缅作战，下令第五、第六两军均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而杜聿明应受英缅军总司令胡敦的节制。

△　中国童子军创建三十周年纪念会在渝举行。全国童子军总会理事长陈立夫主持大会，副会长戴传贤宣读颁奖令，颁予童子军创始人严家麟“中国童子军创始人”荣誉称谓章一枚，荣誉服一套，荣誉奖章一枚。3月5日在渝举行童子军大检阅及滑翔机捐献典礼。

△　物资局长何浩若发表谈话称：目前布匹价格波动急剧，本月初阴丹布每匹售价660元，春节后涨至866元，现竟涨至900元，决定一面召集布商议价限价，一面饬平价购销处以平价布售给公务员，每人一丈五尺。

△　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向华北各战略区党委、各部队发出关于反“扫荡”的指示，指出自2月以来，整个华北已处于敌人的残酷“扫荡”之中，形势十分严重。为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坚持华北抗战，必须采取以下主要措施：一、改正大机关主义作风，力求轻装上阵。二、立即组织最得力的力量加强民兵工作。三、密切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四、加强群众工作。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各敌占区的伪币，因金价高涨而跌价，物价随之飞涨。天津1941年11月份物价高涨指数为21.6％，12月份更往上飞，市场已陷入混乱状态。豫北

新乡及冀西赞皇等地人民，已开始拒用伪钞，一般商人均囤积现货，抛出伪钞。又因敌人对市场及商人之严格统制，西洋货因战事爆发而绝迹，因此敌占区各地商业萧条已成普遍现象。

△　鲁南各地伪军在八路军的政治攻势下，掀起抗日反正热潮，至此已有伪军900余人举义抗日，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接待。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以求巩固占领区，使之担负起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会议于26日结束。

△　日政府议会通过在台湾实行特别“志愿兵”制度预算，经日皇批准。志愿兵先受训六个月，正式入伍，每年招收两次，各500名，4月1日起施行。

2月26日　　军委会参谋团驻腊戍代表侯腾由腊戍飞抵昆明，向蒋介石报告缅甸情况及胡敦对中国入缅军的部署意见。27日，蒋介石下达入缅作战命令，其要点为：一、第五、第六军应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二、中英两军之作战地区，协定为恩戛村、敏乌里、巴尼托特、密雅内特相联之线，线以东属中国军；三、第二〇〇师于3月1日开始输送。

△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薛穆抵渝，3月7日向林森递交国书。

△　新任驻加拿大公使刘师舜向加总督呈递国书。

△　行政院组成敌产处理委员会，张平群任主任委员。

△　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五周年纪念，同时庆贺建夏实业公司成立。杨卫玉报告称：职教学生已达二万人，为社会所重视。建夏公司主持人黄炎培称：本公司资金为125万元，以公司之生产哺育职教。

黄提出职教原则是："职业即教育，教育即职业。"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等部由晋东南黎城地区出动，对太行山南部平顺地区"扫荡"。八路军利用险要地形不断给敌以打击。敌军遭打击后，于3月2日由平顺地区撤退。八路军及时集结新编第一旅和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各一部，设伏于平顺以南地区，歼敌100余人，并挺进至长治、潞城、壶关间之敌占区，袭击敌据点，摧毁伪组织、伪政权。

△　日政府举行第二次元老会议，首相东条、海相岛田、外相东乡及前首相近卫文麿等出席，讨论占领新加坡后的战局问题。

2月27日　蒋介石在昆明会见英军联络参谋马丁，商谈中国远征军进驻缅甸同古办法。

△　昆明市各界妇女千余人集会，欢迎宋美龄访问印度归来。宋动员各界妇女献款，以救济抗属及香港、新加坡失陷后的归国妇女侨胞，当场认献25万元。

△　延安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陶行知在政治上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教育家；"五四"以后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在教育上是沿着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道路发展的。

△　爪哇海大海战。英、美海军在多尔曼海军少将指挥下，力图以五艘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阻止从望加锡海峡驶出、准备在爪哇登陆的日本舰队，失利。英、美舰队的两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被击沉，其余舰只在与占优势的日军作战后逃走。这样，日军便打开了在爪哇登陆的通路，并于3月1日在苏腊巴亚西部登陆。

2月28日　蒋介石在昆明宴请美国空军志愿队全体队员，慰劳该

志愿队在空战中的卓越贡献。

△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与《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并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他还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

是月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向刘分析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必须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道理，并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经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刘文辉加强了同共产党的联系。在刘的要求下，南方局于同年6月派王少春夫妇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并在刘的总部设立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

△　中共晋豫区党委在阳城成立，聂真为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哲人为宣传部长。区党委下辖四个地委。

△　淮南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改称淮南军区，杨梅生任司令员，刘顺元任政治委员，归新四军第二师建制。

△　新四军第五师通过侏儒山战斗开辟川汉沔（汉川、汉阳、沔阳）地区。

△　阎锡山部骑一军第一师师长赵瑞、第二师师长杨诚率部在晋西投降日军。赵瑞、杨诚被分别委任为山西防共军第一、第二师师长。

△　日军一万余人对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地辽县麻田地区进行铁壁合围，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警卫连抗击日军，掩护总部和群众转移。并指示警卫连连长，要开展麻雀战，打击日军，决不能让日军糟害老百姓。

△　2月至4月，日军多次调集几百人至几千人兵力，对冀中平原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和逐步“蚕食”，在敌占区强化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在游击区，增设点碉，修建公路，挖建封锁沟墙。至4月底，日军在冀中平原建点碉1125个，修公路4370里，封锁沟墙3530里，逐步“蚕食”了第六、七、九分区的西部及第八分区子牙河以东地区，占领、控制了第十分区全部地区。八路军能活动的根据地基本区只剩下沿滹沱河两岸从西到东的中间狭长地带，约3000多个村庄，280万人口，面积1.9万平方公里。与1940年比，一年多时间内，根据地缩小了三分之二。

△　日军从月初起对晋察冀、冀中、冀东、大青山、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地进行春季大“扫荡”。由于华北八路军军民作战英勇，敌人预期三个月的“扫荡”，在一个月零三天中即被粉碎，敌人于3月初退回原据点。在这次反“扫荡”中，晋西北根据地军民毙敌村川大佐以下4000人，晋东南军民毙敌3500人。

3月

3月1日　　蒋介石由昆明乘飞机至缅北腊戍，同时下令以林蔚为

首的中国参谋团指导入缅作战事宜。

△　川康区营业税自是日起划归财政部直接税处接收。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打击敌人在敌后》，分析日军今年“扫荡”的特点：一、在整个华北全面开始；二、大量使用伪治安团；三、无人区和并村办法普遍推行于太岳区和偏僻地区。敌后斗争将随着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更加残酷，敌后军民必须从精神上和实力上，准备与敌人作持久而艰苦的斗争。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召开第二次军事研究会，确定增强边沿区游击支队，对敌展开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颁布《志愿义务兵役条令》，规定从本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服役期限为三年。

△　晋察冀边区各界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从平、津敌占区脱险来到边区的国际友人——原燕京大学英籍教授班威廉、林迈克，美国花旗银行经理赫鲁，以及南斯拉夫、荷兰、法国和奥地利籍的几位专家、商人。他们都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通过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的关系，秘密从北平经平西到达晋察冀边区的。

△　伪满洲国举行“建国”十周年纪念，伪满“皇帝”溥仪发表《建国十周年诏书》，要求国民“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从此，伪满称日本为“亲邦”。

3月2日　　蒋介石视察缅甸，在腊戍会见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韦维尔、缅甸总督史密斯、美驻华空军“飞虎队”指挥陈纳德，商谈缅甸军事形势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事宜。次日，英国政府宣布，韦维尔调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

△　蒋介石手令：本年度地价税增至三亿元。

△　外交部长宋子文于上月26日抵加拿大参观访问，是日返华盛顿。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上，谈党的创立至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服务规则》，并批准两项决议：一、进一步调整边区政府秘书处组织机构；二、改进会议制度，今后边区政府政务会议专讨论大政方针等重要问题。

△　中国通商银行在渝举行开幕典礼，并开始营业，杜月笙为董事长。

△　山东纵队第五旅一部袭击烟台市郊石湖、洼子口日伪军据点，毙伤敌130余人。

△　日军第三十二、第五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5000余人，对菏泽地区巨南根据地（第八军分区）进行“扫荡”。第八分区机关、巨南工委、五县联办、成武县政府和独立营，在成武县苇子园村一带遭敌合击，冲出敌包围圈转移到巨菏公路以北地区。日伪军在章缝集、营里集等地安设据点，巨南变为游击区。

3月3日　　蒋介石在腊戍接见缅甸总督史密斯，对缅甸防务交换意见，又会晤韦维尔将军，商讨战略。下午，召集入缅作战部队高级军官训话，详示远征军入缅作战部署与注意事项，及我军之作战指导。

△　国民政府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0日，熊率徐培根、金链等人组成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同盟国联合军事会议。

△　重庆《大公报》讯：旅渝广东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南侨互助会、华侨协会、广东建设研究会、福建建设协会、泰国华侨互助社等七团体，为扩大救济华侨，曾开多次联席会议，决议：一、选张伯启、庄明理、宋渊源、周士观、梁大鹏、冯灿利、曾特为常务理事。二、定名为陪都团体救济归侨联合会。三、要求政府增拨救济款。四、向各戏院接洽定期随票附加一元，作救济款。五、定期举行救侨运动宣传周。

△　中华慈幼协会举行干事会议，决议：一、筹建重庆儿童疗养院；二、筹建重庆抗战军人子女教养院第二院。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军委会以“役政为县政中心”，“国民兵团为役政基础机构”，特确定将国民兵团隶属县政府，将《县各级组织纲要》中所规定的壮丁队修正为国民兵队，分别电令各省军管司令部转饬遵照施行。

△　中共中央向山东纵队和第一一五师下达指示，对山东的军队团结、军事指挥、政策执行等问题提出严肃批评。是日指示刘少奇来延安路过山东时，协同山东分局检查工作，解决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并决定朱瑞来延安参加“七大”，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担任。

△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举行执监委联席会议，李友邦、宋焦农等20余人出席，研究如何加强台湾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台湾岛内外革命工作的统一。该会曾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参政会，要求增加台湾参政员名额。

△　“扫荡”太行南部的日伪军从长治、壶关撤退，太行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八路军军民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名。

△　日军千余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包围冀鲁豫边区八路军一个排扼守的马城村。该排战士激战半天，摧毁敌人坦克数辆，杀伤大批敌人，最后弹尽无援，全部壮烈殉国。

3月4日　　蒋介石与“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在腊戍商谈空中侦察，与在缅甸使用空军计划。商谈结束后，蒋即由腊戍飞返昆明。

△　美军中将史迪威抵达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　行政院举行记者招待会，物资局长何浩若宣布物资管制情况，略谓：一、统筹棉纱今后由农本局出售，取缔中间商；二、布匹议价；三、公务人员每年可购一丈五尺布。

△　四川省银行再度增加资本，由2500万元增至5000万元。

△　沱江制糖酒精公司正式成立，资本1000万元，刘航琛任董事长，厂址设资中。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写信慰问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信中说：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绩的。现在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准备反攻，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加倍努力开展生产运动等。“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

△　新四军一部挺进南京近郊陇鸽镇，歼灭伪军百余名，俘伪团长以下60余名。缴机枪二挺，步枪百余支。

△　新四军一部在苏南攻克金坛县直溪桥，守备日伪军全部被歼，俘伪军20余名，缴长短枪百余支。

△　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布实施缅甸中部作战命令。7日，南方军司

令官寺内寿一令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准备消灭曼德勒方面的中国远征军，并命令该军捕捉战机，在5月底以前将中国军队击灭。追击之目标，断然深入中缅国境，占领仁安羌附近之油田地带及勃生，应以一部迅速占领若干机场。15日，第十五军根据南方军命令，制订具体作战计划。

3月5日　蒋介石由昆明飞返重庆。

△　是日为蔡元培逝世两周年，由中央研究院发起，北大同学会主持，在渝举行纪念会，吴敬恒讲述蔡的生平及学术思想演变过程。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确定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是解救目前经济困难所必须采取的政策，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打破日本侵略者的诱降阴谋。

△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吴玉章负责。该会以适应边区文化运动的需要，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宗旨；提出开展学术与创作自由；普及与提高同时并进；与全国文化界携手建设新文化，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　八路军总部指挥晋西部队粉碎日军“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252次，毙伤日伪1673人，俘42人。同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袭击晋东南沁县车站，毙敌130人，毁机车七台，火车两列。

3月6日　蒋介石接见史迪威。史迪威转达罗斯福总统对欧、亚战场同等看待及美国加强对华空援的意见，并报告其来华使命，共六项：一、指挥在中、缅、印之美军；二、监督及管理一切美国对华援助；三、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军事会议；四、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五、指挥美国在中、缅、印境内的空军活动；（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八次驻会委员会，秘书长王世杰代读外交部的书面报告；交通部长张嘉璈报告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中印公路之勘测及兴建。

△　中国入缅军先遣第五军第二〇〇师由师长戴安澜率领开抵仰光。

△　陕甘宁边区政府给边区各县参议会议长及各县县长发出指示信，要求各县二届（新区县为一届）二次参议会按条例规定按期召开，并于三四月份内开完。指示信特别强调，为保证“三三制”的推行，各县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充任或聘请有名望的党外人士。

△　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张浩（林育英）在延安病逝。9日，张浩追悼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朱德等出席。毛泽东送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　美驻华海军武官奉美总统命令，将“图图拉号”炮舰移交我国。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向美总统致谢。

△　英驻华大使馆向中央图书馆赠新书1000余册。中央图书馆将《四库全书》影印本分别赠给英国、加拿大、印度、缅甸图书馆。

△　日政府通过《华中通货暂行处理要纲》，规定：一、对国民党法币进行压迫，使其价值低落。二、立即废止中储券与旧法币的等价交换，限制旧法币存款，并向中储券存款转变。三、废除对旧法币的牌价基础。四、实行贸易和汇兑管理，剥夺旧法币为贸易通货的职能。强化中央储备银行，使其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五、使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

△　日伪军“扫荡”丰润县杨家屯等15个村，抓捕村民5000余人，将其中1500名青壮年押往伪“满洲国”充当劳工。

3月7日　　英新任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向林森呈递国书。下午，蒋介石接见薛穆。

△　周恩来致函郭沫若，对郭所写《屈原研究》一文的第三部分《屈原思想》提出意见。对郭沫若拿“德政”和“刑政”来作当时社会变革的两大思潮问题，认为不论是“德政”还是“刑政”都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种过渡时代的改革想法和做法，也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　豫北许县皂角树一带伪第二十一师所属特务营黄玉青部500余人，携步枪450余支、轻机枪一挺反正，并击毁汽车二辆，毙敌10名。

△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对重庆政策“依照1941年12月24日决定的《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案》施行”。对苏政策“依照1941年11月15日决定的《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的战争内部方案》及1942年1月10日决定的《在形势发展中的当前政策案》施行”。并制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

△　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饭田中将）占领仰光，英军向缅中退却。

3月8日　　中国远征军先遣第二〇〇师附骑兵团及工兵团的一部，作为先头部队到达缅甸同古（亦称东瓜）。9日，接收英军防务。11日，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个连推进到皮尤河南12公里处担任警戒，由骑兵团副团长黄行宪指挥。

△　重庆《大公报》讯：蒋介石亲自制订的工作竞赛内容是日公布：一、征粮购粮比赛；二、全国户籍调查；三、各省税收比较；四、土地清丈及陈报。并在交通、生产、机关团体、文化等部门都开展竞赛。

△　重庆各界妇女举行“三八”节纪念大会。中央组织部妇女运动委员会举行妇女问题广播讲座。宋美龄向世界发表广播讲话。

△　邓颖超为《新华日报》撰写纪念“三八”妇女节代论《动员太平洋上各国妇女积极参加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　中缅文化协会主办的“缅甸日”及援缅大会在重庆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大会。大会对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及缅甸侨胞表示慰问。

△　印度举行“中国日”，全印举行群众大会，募集捐款资助中国抗日。

△　汪伪政府为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南京开工修建“保卫东亚纪念塔”，宣布每月8日为“保卫东亚纪念日”。是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与宴会。

△　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决定两大原则：太平洋全部地域（包括中国在内）都应在美国指导下作战，大西洋地域由盟国共同担负责任。丘吉尔表示接受，并指出任何大规模的作战都必须先由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会议讨论。

△　英政府任命亚历山大上将为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改任参谋长。

△　驻爪哇的荷兰军队（司令波尔中将）投降，5月1日，整个荷属东印度落入日军之手。

3月9日　　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紧急建议：仰光陷落后，“缅甸作战不能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国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中国派往缅甸各军皆归史迪威指挥，其兵力总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则英军亦应归史君指挥方为合理”。

△　四川省主席张群及省保安处长刘兆藜联名电令理番、靖化、懋功等县县长及区保安司令：特别保安团队第二指挥部指挥官谢撑宇率保安第二、第四两团开赴该区，办理禁止及肃清匪患。

△　中印协议分工抢修通过缅北入滇之公路，用印方工人，并用象队、板车、木船为交通工具，15日开工。

△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一部及伪军共5000余人，分三路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南通地区进行“扫荡”。其中由东台出动的一路于三仓镇被新四军第一师一部包围，战至10日晨被歼大半。另两路日伪军由岔河和马塘出动合击丰利。第一师以一部兵力沿途阻击，另以优势兵力袭敌侧后，歼其一部，迫日伪军于12日撤退。此役共歼日伪军800余名，并乘胜收复南坎、双甸等镇。

△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规定：一、开户存款一律以中储券存入，如以旧法币开户存款，则另开户头，提取存款时，仍以旧法币付给。二、凡往和平区各地汇款者，一律接收中储券。三、兑换中储券以300元为限。四、凡缴纳税款，除以中储券付款外，可以中央储备银行的票据作中储券现款之用。即日起实行。

3月10日　蒋介石再次会见史迪威，并委派他担任中国入缅部队的指挥官，同时再三说明第五、第六两军是中国的精锐部队，这次入缅助战，只能胜不能败；如果日军乘中国军队调往缅甸时从越南来袭云南，中国入缅的部队或须调回，史一一允诺。次日，史从重庆飞缅甸。

△　行政院例会决议：河南大学改为国立；任命赖琏为西北大学校长，原任皮宗石辞职。

△　中央银行发行新辅币，计分廿分及半圆两种，是日开始通行全国。

△　粮食部长徐堪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粮政问题》，谓从民国三十年秋收起，各省征收实物，以四川成绩为最佳。四川征收实物与定价征购共为1200万市担，数字比各省都大。自去年9月16日开征，到去年底止，多数县份均已完成，预定的1200万市担，早已超过，现达到1300万市担以上。

△　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杨成志赴东江考察，在丰顺等处发掘石器古物15箱，此项发现对研究原始社会人类文化贡献极大。

△　江苏赣榆伪军不堪日军压迫，分三批共千余名向八路军投诚。25日，又有伪军一连在连长率领下全部反正。

△　日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二师团及第四混成旅团各一部共5000余人，“扫荡”冀鲁豫区中心区域濮阳、内黄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破坏，并在根据地基本区施放鼠疫细菌。

△　美海军航空母舰编队的舰载机104架对莱城和萨拉莫阿实施袭击，击沉日运输船四艘，重伤九艘，击伤巡洋舰二艘、驱逐舰一艘，击毁日机10架。

3月11日　蒋介石宴请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征求对下届参政会的意见，左舜生、邓飞黄、董必武、陈博生、沈钧儒、黄炎培、李中襄、许孝炎等出席。

△　蒋介石命令第五、第六军统受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并指示：“对史迪威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改造《解放日报》草案会议上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

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配合山东蒙阴地方游击队，夜袭曹范、小寨两日伪据点，俘伪军75名，缴长短枪百余支，电线1500余斤，炸毁炮楼30余座。

△　缅甸政府派福格德为首任驻华代表。

△　印度医务署长周立将军抵渝，与外交部商洽医药合作问题。

△　日军2000余在浙江东象山港登陆。同日，日军在山东方面进犯菏泽、曹县一带边境。

△　驻山西省灵寿县日军以开会为名，将东城南村800多名男女老幼集中起来，然后赶至封锁沟内全部枪杀。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江亢虎为考试院院长，王揖唐为国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罗君强为司法行政部长，陈济成为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赵毓松为铨叙部长。

△　伪满洲国派遣张景惠为所谓“谢恩大使”，率16人赴日本，带去大米40万吨，食盐100万担为礼物，对日本朝野“致谢”，并表示尽力支援“圣战”。4月4日返抵“新京”（今长春）。

3月12日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并发表告英、缅、印各邦人士暨侨胞书，指出：“中国军队入缅的目的，全在协助友邦，伸张正义，维护人道，争取民主国家最后胜利，建立世界和平。”

△　国民政府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纪念会，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发扬民族精神、发展国防科学、推广工作竞赛、厉行节约储蓄。

△　延安各界为孙中山逝世十七周年举行纪念会，号召学习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加强团结，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　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致电蒋介石，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七周年。美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名誉主席威尔基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纪念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复电马歇尔，表示愿与美国携手重建世界和平而努力。

△　毛泽东、朱德复电彭德怀，就阎锡山部梁培璜第六十一军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太岳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事件，指示彭德怀：“六十一军横行，势必还击，但目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战事，致招决裂，而应组织若干突击队坚决打击其个别出犯部队，以警戒其行动，以后再观其态度，决定对策。”次日，又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请向阎锡山交涉，要求阎令第六十一军撤回原防区，制止杀人掠地行动，以固团结。

△　周恩来、董必武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负责人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林可玑、张云川就苏德战局、日苏关系、太平洋战局的发展趋势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心理等问题交换意见。

△　中共晋西区党委和第一二〇师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敌斗争的指示》，要求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统一党、政、军、民的全部力量，实行一元化的方针。在组织措施上，成立党、政、军、民的专门组织——对敌斗争委员会，成立各级敌工科。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十旅旅长兼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范子侠，于冀南沙河高庄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3月13日　国民政府决定从是日至19日举行工作竞赛宣传周，提出口号是：倡导工作竞赛力行精神动员、推行农矿生产竞赛增加战时物资。

△　军政部举行军用器材展览。展品有军需器材、军粮、军医药、兵工器材、军用物资等。蒋介石亲临指导。17日闭幕。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及登记办法》，规定：凡边区民众在不违反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下，都可以组织各种团体，给人民以充分自由。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抵延安，对新华社记者讲述该军在晋西北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经过，略谓：日军集中两万兵力于2月5日开始“扫荡”，八路军采取分散活动，以袭击和伏击的方式打击敌人，还组织基干队、自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军民合作，使反“扫荡”取得胜利。

△　延安《解放日报》讯：日军在太行北地区之“扫荡”极为残酷，仅桐峪镇一地被杀老幼即有百人，暴尸街头10余日。石门村被杀者百余人，鸡犬不留。蟠龙一地被日军抢夺粮食千余石。

△　美纽约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中印日”。驻美大使胡适发表演讲，略谓：“二千多年来，中国始终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法律系统，一个文官制度。中国人民素有统一之习惯，是以国家每遇危难，中国人民可藉此排除万难，确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中国抗战成功最重要之因素为中国人民坚韧之美德，确信正义必可伸张，最后胜利必可实现。”著名作家林语堂、赛珍珠亦到会演讲。

3月14日　中航DC—2式飞机由昆明飞重庆途中失事焚毁。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兰斯尔特·邓尼斯陆军少将、美国军事代表团乔治中校、可拉尔中尉等17人遇难。蒋介石特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致悼。18日，在昆明举行安葬仪式。29日，重庆各界300余人集会追悼邓尼斯等死难者。

△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应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解放日报》已在讨论，使之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的

意见，《新华日报》也宜有所改进。18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报告《新华日报》改进的情况，并说目前正使这份报纸不仅成为反法西斯的论坛，也要成为民主的论坛。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行政干校与太行抗战学院正式合并，仍名太行抗战学院，杨秀峰、王振箕分别担任正、副院长。

△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西安塞里成立，王弼任校长，丁秋生任政委。该校于4月6日正式开课，以文化和航空理论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同年10月，该校撤销。

△　冀中第七军分区第二十二团，在共产党内线关系配合下，攻克晋县敌重要据点侯城，全歼日军一小队、伪军一中队，俘日军六人、伪军30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二个、长短枪60余支。

△　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出军事部署，决定：盟军在太平洋战区保持防御态势，同时美军继续向英国集结，以便在欧洲开辟与轴心国作战的第二战场。

3月15日　蒋介石调西安行营主任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遗缺派朱绍良兼任。

△　军委会参谋团驻腊戍代表侯腾报告在缅英军情况：英缅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英装甲车第七旅均在普罗美方面；英缅军第一师第十三旅在景东、毛奇方面；英空军飞机共45架，在马格威尔。

△　中国药物自给研究会召开第一届年会，卫生署长金宝善提出：一、今后用药减少100种左右，四分之三要自给。二、减少进口药，尽量研制代用品。

△　生活教育社在重庆举行十五周年纪念会，该社理事长陶行知报告生活教育的意义与特点。同日，延安新教育会正、副理事长徐特

立、范文澜写信给该社创始人陶行知表示慰问。17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与新教育学会在延安联合举行纪念会。

△　据延安《解放日报》讯：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捐款3250元，请周恩来转救济委员会救济归国难侨。

△　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冀东工作及冀东地委组成问题的指示》，指出：为适应今后游击环境，冀东主力部队应编为四个丙种团（小团），并在二三个县之间组织一个地区队，作为小团以外的地方主力部队。每县设基干地区队直属分区指挥。冀东目前应相机向东南发展，开拓新区域，开展小部队的游击战争，以分散敌之兵力。

△　美国陆军部根据3月8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决定指示史迪威：英国韦维尔是印度最高统帅，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已授权给韦维尔指挥缅甸战事，任何在印、缅的军队自应受其节制。

3月16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此次修正案要点，系将参政员名额240名重行分配，各省、市选出参政员名额原为90名，现增加为164名；蒙、藏名额原为六名，增加为八名；海外华侨名额原为六名，增加为八名；各文化、经济名额原为138名，减为60名。各省、市参政员，不以具有各该省、市籍贯者为限。

△　立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总动员法案》。

△　国民政府驻土耳其公使张彭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巴格达签订中伊（伊拉克）友好条约。20日，蒋介石致电伊拉克首相纽里安赛德表示祝贺。

△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及第十八届年会在渝举行。理事长翁文灏致开幕词，略谓：学会自成立以来会员由71人发展至今已有589人。地质工作者对古生物的分类、古代植物化石，以及中生

代、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林的采集与研究，均有重大贡献。特别是湖南的原始鱼、云南的禄丰龙、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是最有意义的科学发现。大会授予李四光、南进宗等纪念奖。最后选朱家骅、黄汲清为正、副理事长。是日，同时在渝举行地质展览，由中央和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尹赞勋、李春昱主持，18日结束。

△　至是日止，中国远征军部署如下：第五军直属骑兵团在彪关附近，归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指挥，掩护英缅第一师主力撤退，并担任东吁（同古）前方的警戒；第二〇〇师在黎达誓、东吁间地区，主力在东吁构筑工事；军直属工兵团及战车防御炮营在东吁；军部及直属部队在杂泽，其直属第一、第二补充团在瓢背；新编第二十二师及第九十六师，于23日后在曼德勒东北地区集结。第六军暂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团在垒固、保勒地区；第四十九师在孟畔地区；第九十三师在景东地区；刘观隆支队在孟勇、芒林、大其力等地，沿泰、越边国境线布防；军部及直属部队在雷列姆。

△　平西武委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总结一年来工作，议决成立平西人民武装部，蔡委心任专区人武部部长。

3月17日　重庆文化界举行“印度日”，宋美龄、王宠惠、吴铁城等在国际广播电台对印广播。下午，教育部举行促进中印文化合作座谈会，陈立夫、孙科、于右任等出席。

△　八路军总部公布太行山区年关反“扫荡”战果：共进行大小战斗319次，毙伤日伪3917名，俘日伪52名，击落日机一架，毁汽车42辆，炸火车两列，破公路135里、铁路25里，收回电线6000余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对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发表讲话，后来以第一二九师命令的形式下发部队。讲话对政治、组织、战斗等项工作作了明确要求，令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

△　罗斯福总统任命麦克阿瑟为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蒋

介石致电表示祝贺。

△　美魏斯里学院“费贝他卡巴”姐妹会聘请宋美龄为名誉会员，以表示钦敬宋美龄自该院毕业后在文化方面之贡献。

△　汪伪行政院决定派褚民谊赴天津，陈春圃赴广州，分别接收英租界行政权。

3月18日　　财政部次长顾翊群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财政措施：一、运用英、美贷款增强经济基础，稳定物价与战时生活。二、在全国各县设立税务局，征收国税，由中央直接管辖。三、举办田赋征实，在21省成立田赋管理处。四、在451县拟办土地陈报，需经费6900余万元，用人约4.5万人。五、举办消费品专卖。六、加强税收管理。七、废除海关转口税，改办战时消费税。八、推行节约和建国储蓄运动。九、加强银行管理，制定《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派查帐人员分赴重庆80余家银钱行号检查帐册，外地银行由中、中、交、农联合办事处派代表分赴各地检查。十、训练财务人员。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五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民政厅三十一年度工作计划大纲》，确定本年民政工作的重点是：一、继续抓好民主政治的建设，充实各级政权的“三三制”，健全参议会制度；二、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必要时在全边区实行第二次精简。

△　史迪威从缅甸飞重庆，19日会见蒋介石，建议使用西汤河域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目的在把仰光的日军截断。蒋指示：中国第五、第六军是中国精锐部队，不允受挫，惟目下应取守势。20日，史再次见蒋，蒋再次重申上述意见。史表示愿尽力去做。21日，史飞缅。

△　英缅第一师经中国远征军前哨阵地向北转移，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第一一二联队一部跟踪追击，到皮尤河南12公里处，远征军掩护

英军安全撤退。19日晨，日军继续追击，进入远征军埋伏阵地，日军汽车数辆开到桥北端时全桥陷落，汽车尽覆，后援不济，大部被歼。

△　是日至22日，中国远征军第二〇〇师与日军在缅北彪关河两岸进行遭遇战10多次，击毙日军尉官三名、士兵500余人，缴获了一批重要文件和军用地图，彪关河前哨战初战告捷。

△　晨，日机八架分两批侵入湖南零陵一带。同日，日机40余架分三次轰炸同古，全城终日大火，毁成一片瓦砾。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书记吴开先，在上海被日军宪兵司令部绑架。

3月1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党在过去三个时期中，大革命时期更生动活泼，十年内战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党内党外都是一切打倒，造成自己孤立，直到现在坏的传统仍然存在。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员只是百分之一，我们要听百分之九十九人士的意见。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

△　刘少奇奉调中共中央工作，是日离开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

3月20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九次会议，主要听取外交和教育报告。

△　土耳其新任驻华代办戴伯伦抵渝，27日晋见蒋介石。

△　中国粮食协进会在渝成立，关吉玉、吴景超、萧同兹、陈铭德等33人当选理事。

△　台湾各革命团体及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临时代表会在渝举行。会议讨论加强台湾岛革命工作、请求成立光复军、废除南北方执行部，改设各地方分会等提案50余件。选李建华等1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翁炳耀等为监察委员，宋蕉农、李友邦、谢南光为常务委员。

△　晋察冀边区政府二次修正公布《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施行细则》，同时宣布旧条例同时作废。

△　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指出地道斗争对于坚持平原根据地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联的四通八达的地道网。

△　驻守在江苏海门一带的伪斧头党领袖丁友宜因与伪军第九师发生冲突，率全部人枪300余向新四军投诚。

△　日军驻刘公岛的海军陆战队借口丢失枪支，包围文登县营南陈家村，焚烧民房，抢掠财物。翌日晨，从威海、青岛又开来大批日军，惨杀村民230多人，全村1015间房屋仅存七间，全村变成一片废墟。制造了“营南陈家村惨案”。

△　晨，日军向远征军第五军骑兵团掩护阵地攻击，该团还击，日军败退。16时，日军增兵猛攻，该团伤亡过重，向北转移；第二〇〇师又以步兵一营增援，将日军阻于巧背以南。21日拂晓，日军继续向骑兵团攻击，午后该部向鄂克春方向转移。

3月中旬　　国民党桂系顽固派军队第一七六、第一七八旅与安徽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配合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及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部保安第二旅共九个团兵力，向浠水、蕲春边境的新四军第

十四旅进攻。第十四旅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以旅主力向顽军的后方和麻城龟峰山程汝怀指挥部进击。4月下旬，第十四旅将国民党各路顽军击退。

3月21日　周恩来致电林彪，赞扬林在新疆、兰州、西安进行的统战活动“影响极好”。并告诉他大后方顽固派目前已决心肃清地方党，监视、孤立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他们对边区和游击区则采取封锁和破坏的办法。电文判断：外松内紧为目前蒋的中心政策。

△　驻美大使胡适接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　美国空运队成立。从泛美航空公司调拨25架运输机担任中、缅、印之间的空运工作。

△　史迪威由渝飞抵腊戍，带蒋介石手令三件，要点为：一、派一个师至东敦枝以南，作为卑谬方面英军的总预备队，作反攻增援之用；二、同古必须固守；三、对史迪威的命令应绝对遵守。是日22时，史下达具体作战命令。

△　是日至次日，日军出动飞机350架，袭击英军在缅甸空军基地。英机全毁28架，重创29架。至此，英制空权全部丧失。

△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电告各分行、支行、办事处，规定自3月23日起，停止中储券与法币的等价兑换。兑换比率为法币100元兑换中储券77元。每日兑换额上海不限，南京、苏州各为30万元，杭州、蚌埠各为15万元，无锡、芜湖各为10万元，其余各地为五万元。

3月22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举行晚会，欢迎从晋西北返延的贺龙师长、从绥德和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府副主席李鼎铭及由苏联治病归来的林彪师长等，毛泽东、朱德等出席欢迎大会。

△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就统一边区度量衡发布命令，规定从5月1

日起正式实行尺用二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16两制秤。

△　国民外交协会、东方文化协会、中国反侵略分会举办韩国问题讲演会。孙科讲韩国独立问题，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讲韩国革命与三民主义。

△　日军对晋西南发动进攻，阎锡山向八路军告急。28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复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愿与之携手抗战之决心。

△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及伪军各一部共一万余人，由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出动，对胶东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胶东军民奋起抗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　日军在缅甸战场再向鄂克温阵地进攻未逞，一部企图迂回被击退，全日炮战激烈。

3月2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违警罚金暂行条例》，关于主罚的种类分为拘留、罚金、训诫等三种。

△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强调技术建设的重要性，对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指出季会所提出的建议，是与目前中共中央号召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是一致的，并赞扬了专家们敢做敢讲的精神。

△　日军在鲁西开始由清丰、南乐、内黄、大名等地集中兵力4000余名“扫荡”冠县、朝城以西，清丰、南乐以东地区。此次“扫荡”日军采取星夜奔袭拂晓合围战术，并以快速部队向八路军追击。

△　晨，侵缅日军猛攻鄂克温阵地。午，日兵力增至近一个旅团，并有骑、炮、战等部队配合及飞机20余架支援下，实行正面攻击。远征军以步、骑配合反击，击毁敌战车、装甲车各二辆，汽车七

辆。晚，日复以步、骑混合部队向阵地攻击，彻夜对战。

3月24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下列各案：一、《盐专卖暂行条例草案》。二、《公库支票流通办法草案》。三、《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办法》，并修改《外币定期储蓄存款办法》。四、《各省田赋征实余粮调剂粮食办法大纲》。（五）《非常时期工业技工管理规则草案》。

△　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年度将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以五亿美元为准备金。每百元法币可购买美金六元，到还本时，可从纽约提取美金，也可按时价出售。同时决定发行本年度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亿元，每百元法币可购五元美金，期限分一、二、三年。

△　教育部拨款70万元救济迁川各大、中学教师。

△　四川新县制之实施，已达第二阶段，着重于组训民众及农业生产建设，一切规划已由省政府及新县制辅导委员会订定。省府为使工作顺利推进，特以彭县、华阳为示范县，并直接受辅导会之指导，除谋改良该两县之农业技术外，他如普查户口，以及筑路造产等项，均将逐步实施，俟其成绩显著，即推及全川。

△　重庆《大公报》发表《改进中学教育》的社论，指出中学教育质量低劣，以1941年广西中学统一招生考试情况为例，桂林地区史地科高中试卷915份，得65分的仅一人，得30至40分的不过百人，别字连篇。英文、数学两科，更不成样子。桂林地区报考915人，录取40人。其他各省也有同样情形。社论分析中学教育退步的原因有：教学方法欠佳，学生不感兴趣；课本分量过重，学生食而不化；学生课外活动分配不合理，学生过于劳累，影响学习精力；选择教师不慎重。

△　中国滑翔总会滑翔机劝募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主任委员

白崇禧、常务理事会主席陈立夫等19人出席。会议决议：一、刘航琛、康心如、杜月笙等负责商业银行及工商界的劝募工作，刘维炽、陈树人负责海外劝募工作。二、在各省会设立分会，各县设立支会。三、滑翔机总数定为500架，每架以三万元为准，并规定给捐献者以各种奖励，时间从4月4日开始至明年10月10日结束。

△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渝举行新闻招待会。该会常务委员李友邦、宋蕉农、林友鹏等出席。林报告称：台湾五个革命团体均团结于同盟会，今后急待进行的工作是：一、速设台湾省省党部、三青团支团部；二、设置台湾参政员；三、成立台湾光复军。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等："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六次政务会议，重点研究干部教育问题，确定从组织上加强干部学习指导委员会，并进一步修改干部教育实施大纲及办法。

△　7时许，美空军志愿队飞机六架由南桑机场起飞，抵清迈侦察，发现机场有日机40余架，当即轰炸。另四架袭击日军南邦机场。

△　晨，日军以陆空联合再向鄂克温阵地攻击。9时，日军另以步、骑、炮联合部队千余人，向阵地右侧迂回，攻克永冈机场，远征军第五军紧急增援不济，机场丢失。第二〇〇师派兵增援反击无效；至此，该师后方联络线被切断，遂转移同古阵地固守。25日，同古被日军三面包围，并以飞机30余架支援轰炸。

△　晨，日机11架分八批窜扰陕西境内，在西安近郊投弹。

△　日政府将厦门与鼓浪屿"移交"汪伪政府管理，伪行政院秘书陈春圃赴厦门"接收"。25日，陈又赴广州"接收"沙面英租界。该租界

今后将划为广东省政府特别行政区，由广州特别区公处管理，处长由广东省警察局长郭卫氏兼任。日派遣军酒井最高指挥官发表声明：一、暂定为特别行政区。二、行政机构与行政实施要与当地日兵团长联系。三、移交以外的权益仍由日军管理。四、聘请日籍职员与警察，由中、日军警协力维持治安。

3月25日　八路军总部发言人谈华北战局，指出日伪军自2月开始，在山东沂山区和泰山区、晋东南、晋西北，以及冀中、冀东等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经八路军和友军一个多月的奋战，上述地区的敌军“扫荡”已被全部粉碎。但是，敌军随后对冀鲁豫地区与沂蒙山区也开始“扫荡”，目前对晋察冀和平西地区又有大规模进犯之势。发言人强调：敌人“确保华北”的方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均不会改变，且其“扫荡”之残酷现已进入肆意毁灭之阶段，各区军民务必发挥重大力量，粉碎敌人进攻。

△　八路军冀南军政党委员会为统一党、政、军、民对敌斗争，决定县、区长一律兼县、区游击队长，县委书记兼县游击队教导员，分区委书记兼区游击队指导员。

△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率慰劳团赴昆明慰问归国侨胞。31日返渝。

△　日军3000余人，开始向胶东牙山区及大青山区为中心实行春季大扫荡。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两个连在冀南烟屯村遭日军合围，全部壮烈牺牲。

△　下午3时，侵缅日军第一一二及第一四三联队，并有特种兵配合，向同古北发起攻击，日机30架临空支援，阵地局部被突破。远征军第二〇〇师派部队袭扰敌后，日军攻势受挫。

3月26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债券面额分5000元、1000元、500元、50元，每年还息一次，利率低于中国

农民银行土地抵押放款利率。4月12日正式批准年内发行5000万元，先在川、桂两省经营。

△　蒋介石对缅作战下达电令：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及直属部队，在同古、彬马拉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步消耗敌人；同时，迅速将第六十六军及第九十六师与暂编第五十五师集中于曼德勒、杂泽间地区，准备第二次会战。第五军接蒋电令后即下达具体作战命令。

△　9时，侵缅日军猛攻同古，另一部占领南阳车站。是日，日机90架沿铁路轰炸，彬马拉车站被炸毁。远征军增援部队被阻，改用汽车及徒步南下。英方向美空军志愿队求援，经商定：同古经垒固至仰光归美志愿队负责，卑谬至仰光归英空军负责。同日，日军占领孟加拉湾之安达曼群岛，切断印、缅海上交通线。

△　日伪军千余人对河北平乡县进行“扫荡”，破坏村庄70余个，打死群众154人，抓走民伕2000余人。

△　法国海军上尉武东文氏由北平到达晋察冀边区。武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任法国驻沈阳副领事，后居住北平八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目睹日军暴行，毅然到边区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

3月27日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对记者称：盟军在缅甸遇有困难，盼能分担英方之负担，握取制空权，可有助于中国军队作战。

△　冀东南内丘县敌占区民众不堪日伪的压迫，秘密组织“三皇道”，举行武装暴动，杀死敌特人员数名。领导者李东为牺牲。

△　驻山东沂水伪剿共军大队长于蠖生率人枪百余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投诚，改编为沂蒙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

△　侵缅日陆、空军协同继续攻击同古阵地，15时竟施放催泪性

毒气，敌我短兵相接，伤亡较重。午后，日军与新编第二十二师在克永冈发生遭遇战，双方彻夜对峙。

△　上午10时，日机二架窜入浙江衢县，在城区投弹九枚，炸死儿童三人，伤14人。

△　日陆、海军当局公布，对于一切重要物资，凡在上海地区使用、制造及贩卖，概由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统制，统制物资达上百种。

3月28日　侵缅日军猛烈攻击同古，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〇〇师伤亡虽重，但阵地未动。午前，史迪威由瓢背回眉苗，于11时下达命令，要点是：第五军主力在黎达誓，于29日开始主力战；第六军暂编第五十五师主力于彬马拉附近集中，在该地迅速构筑工事。第九十六师迅速集中，归杜聿明军长指挥。

△　汪精卫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事变"扩大为大东亚战争后，和平运动所谋求的中日合作，共保东亚，已由信仰而发生力量，由理论而见诸实行。"国民政府"当前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支持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同日，褚民谊在天津接收英租界行政权。

3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凡32条，规定国家总动员物资为：兵器、粮食、药品、船和马车、土木建材、电力、通信，上述器材之生产修理及政府临时指定之物资等九种。国家总动员业务则包括动员物资之生产，民生日用品专卖、金融、运输通信、卫生、情报、迁移救济、工事构筑、教育训练、征购、维持秩序、保护交通，等等。并明文规定"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5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实施。

△　是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中枢纪念周举行纪念会，李文范报告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重庆各界集会举行纪念大会，于右任、杨公达、吴国桢、刘峙等出席。于右任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

△　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本年度起，每年3月29日起举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运动周期间分别办理以下事项：召开师范教育会议或讨论会；刊发师范教育专号；印发师范教育辅导小册；举行师范教育讲演；奖励师范学校教员及清寒优秀师范生等。

△　回教救国协会第二届全体代表大会在渝开幕。陈立夫、贺耀组等200余人出席。该会理事长白崇禧追述回教救国协会自1938年于武汉成立后的工作历程，选白为理事长，时子周等为副理事长，端木杰等28人为理事，马亮等五人为常务理事，冯庆鸿等三人为常务监事，31日闭幕。

△　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在渝召开，冯玉祥在会上致辞，说明粮价虽上涨，但农民未得到好处。

△　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罗瑞卿为粉碎敌人的毒化政策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八路军将士“应即在自己所属区域内，彻底揭发敌寇毒化政策之狠毒阴谋，打击敌寇之毒化政策，并协同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号召与组织民众，一律不许种植鸦片，违者严究”。

△　拂晓，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克南阳车站。在同古，日军陆空协同，施放毒气，猛烈攻击，第二〇〇师陷于苦战；第二十二师进展迟缓，彬马拉车站被日机炸毁，第九十六师运输受阻，致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决心放弃同古，向黎达誓以北萨加雅地区撤退。同古战斗历经13日，双方伤亡均重。

△　陈纳德奉召到渝，与蒋介石夫妇、史迪威、毕赛尔等会商美国空军志愿队归并美军问题。毕赛尔和史迪威表示：倘若志愿队不接受归并，就要断绝对其补给。最后同意陈纳德的意见，于7月4日解散。

△　中国留美第一期飞行员完成战斗飞行训练，是日在华盛顿举行毕业典礼。

△　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出击同蒲、正太铁路及汾离公路，牵制日军向晋西南国军的进攻。

△　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猛袭苏北淮阴县苗何庄日伪军据点，毙日军八名，伪军60余名，俘伪团长以下27名。

△　午，侵缅日机多架空袭腊戍，中国空军美志愿队第三驱逐队在曼允上空击落日机一架。

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提出“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　第八战区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师副师长朱宝夫积劳病逝，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华北日伪利用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开始推行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为期两个半月。此次强化治安运动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兴亚院联络部的指挥下，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领导，以新民会为实践运动的核心力量，提出以“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的口号，以期实现把华北广大地区变为日本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的目的。

△　美、英、荷、澳四国组成的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部解散后，美、英两国重新划分作战地区：英国负责印度和印度洋，包括苏门答腊；美国负责整个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根据这项协议，

美国又将太平洋地区划分为两个战区：一是太平洋战区，由海军上将尼米兹任总司令，包括东经160度以东的广大区域；一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由麦克阿瑟上将任总司令，包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及荷属东印度之大部。

3月31日　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订《中美五亿美元借款》。双方约定一切财政条件（即以财政援助给予中国及美国因而收回利益之条件）时间延至战后；双方确认该项援助可使中国："（1）增强其币制、货币及银行制度；（2）以资本供给生产事业并促进一切必要物品之生产、获得与分配；（3）阻止物价上涨，并促进经济关系之稳定，制止通货膨胀；（4）防止食粮与其他原料之囤积；（5）改良运输及交通工具；（6）实行促进中国人民生活之其他社会的及经济的措置；（7）适应《租借法案》以外之军事需要，并采取业经两国政府认可之其他一切作战力量之适当措置。"

△　太平洋作战会议在华盛顿成立，由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加拿大、英国、美国代表组成，定4月1日开首次大会。

△　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开幕。该公司系杜月笙联合渝、港、沪各地实业界及金融界创设。

△　毛泽东、博古在延安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略谓：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他还尖锐地批评王实味《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的错误观点，强调整顿"三风"要充分发挥报纸的作用。

△　伪满洲国政府宣布第一期开拓移民五年计划执行完毕。日本开拓移民第一期（1937—1941）计划移入10万户，50万人。实际移入4.1537万户，10.7万余人。

是月　根据1941年美国的租借法，中国空军学员在美国阿里桑

那州受训。自本月起，中国空军征得英国同意，又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等飞行大队分批调往印度，由美国代训，训毕接收新机回国。第十二至二十四期学员在印完成初级训练后，再去美国接受中、高级训练。受训学员每10人编为一组，30个组学驾驶B—24型轰炸机，24个组学驾驶C—46型运输机，训毕回国后分别编成空军第八重轰炸大队和第二十空运大队。

△　美国按租借法向中国提供飞机，从是月至年底，中国空军共获得B—25型轰炸机2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从此，中国空军战斗力大增，多数飞机的性能已较日机优越，中国战场上空中优势逐渐转到中国方面。

△　军事委员会拟订练兵30个师的编制及装备表。8月，中美双方参谋人员开会研究并作修订，11月定稿。

△　中共中央军委及八路军留守兵团组织考察团，以朱德、王稼祥为负责人。考察团任务是了解陕甘宁边区部队情况，解决部队实际问题，转变部队工作作风。其后，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议上，肯定留守兵团工作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其缺点错误，希望他们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参加生产，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还必须注意精兵简政和节省经费开支。

△　范长江由香港返回桂林后，蒋介石再次下逮捕令。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通知范立即离开。范后来到了苏北解放区。

△　八路军山东纵队清河军区成立。该军区由山东纵队第三旅改编组成，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军分区与一个直属团。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在反“扫荡”中，遭受严重损失，其建制被撤销。

△　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在小流东桥炸死日军一分队。18日，在流罗公路炸死日伪军20余名。19日，在邯郸东炸毁敌装甲车两辆，炸毁王家营日军碉堡两座。26日，在安国、博野路上炸毁敌汽车两辆。

△　第十三军第四师少将高参张荣冈在河南作战殉国。

△　日军对晋察冀边区采取“毒疫攻势”，强令“爱护村”送老鼠。在晋东盂县，日军大量收购蝗虫、苍蝇、蚊子等，以制造疟疾、伤寒、霍乱菌种，毒害边区军民。

△　日军在冀热辽区，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700余里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等县，开始实行残酷的“集体并村”办法。第一阶段先把分散户集中到村里，不去就烧。第二步开始“集家”，又叫“人圈”，群众在“人圈”里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严密的特务组织，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运输犯”等犯罪条款。“人圈”里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配给布三尺。“人圈”的妇女更是吃尽苦头。

4月

4月1日　　中、中、交、农四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联合公布《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办法》、《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说明》，规定每100元法币可折合五元美金，存期一年利息为三厘，存期二年为3.5厘，存期三年为四厘。

△　财政部函请中央银行将库存美金券提出发行，以流通市面，并改订海关金单位含金量，由60.1846公毫改定为88.8671公毫，规定关金券每元合法币20元，自是日起施行。

△　国民政府在陕西盩厔黑水渠大坝举行黑惠渠放水典礼。该工

程自1938年9月开工至是年3月完工，支出费用200万元，受益农田达2000万亩。

△　重庆市实行立约购米，至5月20日止，全市50镇已推行完毕。民食供应局预计每月照约发售七万余石。

△　史迪威返抵重庆，晋见蒋介石，汇报3月19日至月底在缅甸军事失利情况。抱怨在缅的中国军队不服从他的指挥。

△　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韦维尔和缅甸英军司令亚历山大飞抵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司令部所在地漂贝，会见杜聿明，“赞扬东吁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并对中国军队在东吁掩护英缅第一师安全撤退表示感谢”。

△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指出自中共中央发出整顿“三风”号召后，党报没有跟上。强调要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就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正。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薄一波、戎子和致电阎锡山，请求制止其第六十一军危害地方，阻挠抗日的行动。

△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伪军各一部共三万余人，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敌首先以重兵沿北宁铁路、长城和潮白河构成对冀东根据地的包围圈，然后又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进行连续合击和分区“清剿”。

△　日机49架分四批侵袭浙江丽水、衢县。

△　太平洋作战会议在美国白宫举行第一次会议。英、中、澳、新、加、荷、美七国代表出席，主要讨论战争的广泛性问题。

4月2日　　国民政府表彰长沙会战有功人员。原第三十集团军第

十军军长李玉堂升为第一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遗职由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接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颁给有关77人精忠奖状，并传令嘉奖协力作战有功人员69名。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消费税暂行条例》及《战时消费税则》，规定凡在国内运销的货物，除法令另有规定者外，概应征收战时消费税。税率分别是：普通日用品5%；非必须品10%；半奢侈品15%；奢侈品25%。并规定由海关于货物通过关卡时征收，没有海关的地方，由税务机关办理。自是月15日起开始征收。

△　蒋介石派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　中、英签订《中印航空协定》，规定英国政府同意中国航空公司开办重庆、加尔各答间航线，中国政府同意恢复昆明、仰光间航线。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布告，为了扩大边区的春耕运动，提高民众的生产热情，决定今年全边区只征收公粮60万石、公草1600万斤，公粮比去年减四万石、公草减1000万斤。另外为了发展畜牧业，边区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废除边区羊子税。

△　陕甘宁边区动员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副主任李鼎铭，秘书长刘景范）举行改组后第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今后各地一切动员须呈准本会后始能进行。

△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通知：现日军在华兵力有21个师团，19个独立旅团，二个骑兵旅团，全部人数为50.6万人。其中被八路军牵制的为30.8%强，被新四军牵制的为17.6%弱。总计为49%左右，被国民党军牵制的为51%左右。

△　日机38架分两批由浙省侵入赣东玉山县，投弹数十枚，民房被毁多间。

△　日军封闭滇缅路。

4月3日　　外交部奉蒋介石命令致电驻美大使馆称：巴西地位重要，日本在彼侨民遍布，我应加强驻使人选，提议升格为大使。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十次会议，由社会部长谷正纲报告社会事业设施及重庆附近社会问题处理情况。

△　国民政府派王陆一、熊斌等20余人赴陕西祭黄帝陵。

△　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名剧《屈原》由中国剧艺社在重庆公演。该剧给广大群众以爱国主义教育，鼓舞人们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而斗争。

△　中国外交学会在重庆成立，选王世杰、王宠惠等为名誉理事。11日，举行首次理监事联席会，推林东海、李惟果等为常务理事。

△　东方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台湾革命同盟会、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日本革命协议会及东方各民族文化团体，为响应台湾光复运动，在重庆举行宣传大会。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孙科等出席并讲话。

△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整风运动进入学习文件和对照检查阶段。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纲领》、《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及《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

△　冀东八路军第十二团在遵化县铁厂附近的夜明峪遭日伪军

3000多人包围，经过激战，毙伤日伪军数百名，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过大，除40余人乘夜突出重围外，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团政委刘诚光及指战员200多人壮烈牺牲。

△　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3000余人及伪军一部，分路对八路军南乐、清丰县以东及观城北之邵庄屯一带进行“扫荡”，企图围歼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在教导队青年队的掩护下，军分区机关和教导队突围，但军区后方医院、工厂及边区各救总会、南乐县抗日民主政府等单位遭受严重损失。

△　山东阳谷县七级镇伪军800余人反正。

△　晨5时许，日机19架窜入浙江衢县上空，向城郊投弹29枚，毁房四间，伤二人。6时半，日机九架侵入浙江丽水，向郊外投弹30枚，毁民房10余间，伤二人，死一人。

△　日机轰炸远征军后方各地，曼德勒损失最重，缅僧随轰炸后到处纵火，街道房屋被焚毁十之七八。

△　日军制订侵缅之曼德勒会战方针：以有力兵团截断腊戍方面远征军退路；以主力沿同古、曼德勒道及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前进，将远征军包围于曼德勒以西加以歼灭。尔后在腊戍、八莫、杰沙线以南将远征军残部追至怒江一带。

4月4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并废止1939年10月21日公布的《修正中华民国战时军律》。新律规定：“阵前反抗命令或不听指挥者”，“立谋要挟或指示为不利于军事上之叛敌行为者”，“意图妨害抗战扰乱后方者”，“意图妨害抗战而造谣惑众，摇动军心者”，均处以死刑。并规定本军律适用于军人、地方团队人员及文职公务员在战时犯罪者。

△　中国滑翔总会在重庆市两路口所建立之跳伞塔，于上月底完

工，是日举行落成典礼，此为我国第一个跳伞塔。典礼由滑翔总会常务理事陈立夫主持。

△　中国统计学社第十一届年会在渝举行，筹委会主任王仲武报告筹备经过及年会宗旨，宣读论文10余篇，并修改社章。

△　延安《解放日报》载：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实施“金属收回强化运动”，强令华北各敌占区工厂将所有的旧机器、破铜烂铁及民间的一切金属器皿全部收回，以供制造军火。

4月5日　　蒋介石偕罗卓英及史迪威由重庆乘飞机经昆明抵腊戍；并在梅苗召开第五、第六两军高级将领会议，指示集中主力在彬马拉与日军会战。

△　社会部宣布：全国性社会团体已登记者达250余单位。

△　重庆防空司令部设立防毒总队，警察局长唐毅任总队长，下设区队、分队，负责防毒、消毒及发布毒袭警报。

△　中华农学会发表本届理事会选举结果，推邹秉文、梁希为正、副理事长。

△　中国音乐学会在渝成立，潘公展、洪友兰、顾毓琇等30余人当选理、监事。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规定移住垦区的移民可享受下列优待：一、免征救国公粮三年；二、减轻义务劳动负担；三、其他负担三年内减半征收。

△　侵缅日军一部攻击新编第二十二师驻地南阳车站。傍晚该师放弃驻地，撤入黎达誓附近阵地。6日拂晓，日军又攻击黎达誓。8日晨，日军迫近斯瓦河该师主阵地前方，双方形成对峙。

4月6日　　蒋介石在梅苗约见缅甸英军司令亚历山大与史迪威两将军，商谈战务，指示作战目标。并直接听取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关于东吁保卫战的情况报告，对第二〇〇师的战绩再次予以嘉奖。

△　重庆空袭服务总队举行成立两周年纪念，吴铁城代表蒋介石宣读训词，略谓：见义勇为是我国人民之美德，守望相助为社会组织之中心，此为我中华民族最崇高之精神与坚强之毅力所在，望今后发扬光大。

△　财政部将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改为田赋管理委员会。

△　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就火柴专卖发表谈话，谓：火柴专卖先在滇、黔、川、康实行，再推及其他各省。

△　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华公使米诺夫斯基拜会外交部次长傅秉常，15日向林森呈递国书，17日拜会蒋介石。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第一次政府委员会以来的政府工作，确定今后的方针。会议重点讨论精兵简政和“三三制”等问题，通过《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的决议》及议案二件。同时，确定目前政府工作的中心是照顾和安排好人民的生活，加速经济建设，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会议历时四天，于9日闭幕。

△　侵缅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部向毛奇攻击，远征军放弃毛奇，向东退守克马俾附近。

△　日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制定进攻重庆的作战计划，要求1943年春季以10个师团的兵力自山西南部出击；另以约六个师团为基干的一个集团军自宜昌方向出击，占领成都、重庆等要地。

4月7日　　蒋介石令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到腊戍面授任务。当日

张飞回昆明，第六十六军开始入缅。10日，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抵曼德勒。

△　云南省政府转发《关于保护美国军事代表团人员的训令》，规定“对来华之美国军事代表团”，“往来各地视察，对其途行自应予以周密之维护，并予以一切便利，不必施行检查”。

△　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卖国降敌汉奸林玉冰、林镇南、刘德亲、潘珍、蔡东昇、谢汉良、徐特存、黄庆云、李家、郑孟熟、王作民、蔡岩、蔡子良、丘瑞廷、张友哲、王章兴、蔡良士、黄医中、黄凤诗、曾良、郑文、王竹亭、黄雷义、蔡真、林傅辉、庄文龙、彭振骈、张包、黄诗、柯兆熊、陈柳潜、吴利民、徐衍能、徐顺、张国材、林浩益、吕兆龙、林旌发、叶维文、郭凤藩、杨小舟、杨绳熙、陆安、林锦彬、蔡注45人。

△　行政院例会决议改组山东省政府，任命陈宝群、何思源、刘道元、陈秉炎、贾慕夷、阎复、斐鸣宇为山东省政府委员；陈宝群兼秘书长，何思源兼民政厅长，陈秉炎兼财政厅长，刘道元兼教育厅长。

△　彭德怀、左权等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华北各地部队情况，称目前华北处境亦开始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日军的“蚕食”使抗日根据地迅速缩小，各抗日根据地被割裂，八路军部队战略机动处于困难时期。

△　冀中第十八团奇袭安国县东石佛镇敌重要据点，俘伪“华北绥靖军”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旅长、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缴获大炮三门、步枪200余支、短枪30余支。第十八团仅伤亡22人。

△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到苏州视察“清乡”地区，声称：“清乡”工作若非中（指汪伪政权）日双方同心协力，则无达到目的之希望。

4月8日　　蒋介石在梅苗召集远征军高级将领训话，略谓：毛奇（6日已放弃）方面日军兵力如在一团以上，应抽调有力的机动部队先予击破，以使后方安全；彬马拉方面应集中第五军主力击破正面之敌。

△　敌产处理委员会举行常务会议，决定对各地敌产予以普遍清查，将所有动产、不动产、债权、债务、公司等一律填表上报。

△　物资局长何浩若在渝作“学术”演讲，略谓：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物价问题是一个癌。这个癌不是一个单独的机构或是任何人能加以割治，而是需要整个财政、金融、经济的协同努力；并指出经济上不是最可怕的事，在政治上才是最可怕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引起的财富再分配，暗中存在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剥削。政治癌比经济癌更危险。

△　根据中、英两国签订的《中印航空协定》，由美空军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开通驼峰航线。该航线成为中国获得外援的最重要的航线。

△　远征军第六军为掩护彬马拉会战左翼的安全，令暂编第五十五师第二团推进至垒固，第三团暂留杂泽、东枝构筑工事；又令第九十三师第二十九团速至和榜集结；另令第九十三、第九十四师袭击日军，予以牵制。

△　中国空军美志愿队发表第14号公报称：日机20架于5时15分侵入滇上空，我机迎击，当即击落10架，另六架失踪。

△　中国军事代表团熊式辉等一行飞抵美国。

△　自2月中旬起，沿吕梁山各地之日军，由乡宁至孝义600余里间，增加五六万众，企图大举进犯吕梁山根据地。阎锡山于是日在克难坡洪炉台领导干部举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集体宣誓大会”，

誓词曰：“我必以革命大义领导党、政、军、教全体同志，誓以革命牺牲的决心，求得革命的成功，愿共勉之。”宣誓后，派遣铁军委员至各部队中，部队主官如不得铁军委员副署，不得发布退却命令，全战区乃普遍发起牺牲奋斗保卫革命根据地运动，在浮山、宋家庄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

△　伪滦平县警察“讨伐”队包围臭水坑，丰滦密联合县长沈爽等率干部与“讨伐”队交战，沈爽等30多名干部牺牲，45人被俘，余部向南撤退。

4月9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腊戍乘飞机至昆明，并令陈纳德将军指挥空军飞虎队，在缅甸掩护远征军作战。次日，由昆明飞返重庆。

△　白崇禧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资格，在官邸宴请土耳其代办戴伯伦。

△　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拟定彬马拉会战计划，以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北岸，利用狭长森林地区，将日军包围于彬马拉附近加以歼灭。根据上述计划，第五军于10日在漂贝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

△　重庆《大公报》讯：40万华工正在赶修中印公路，中国段大部完成。该公路由成都经康定、巴安至印度的阿萨密，全长700公里，年底全部完成。

△　重庆《大公报》讯：中国政府拨款缅币五万盾，赈济缅甸难民。

△　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在渝设立办事处，文德敷任主任，太平洋关系学会研究部主任巴纳特担任驻华联络员。该办事处为顾问性质，在医药、卫生、教育、保育、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方面给以协助。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贯彻精兵简政》的社论，指出自中共中央去年12月初发出精兵简政指示以来，华北各根据地虽已开始执行，但还要普遍实施和认真贯彻。因此，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兵力，已是目前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　周恩来在重庆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还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查封《救亡日报》是亏了理的，要不亢不卑地同他们算算这笔帐，现在可以先去见潘公展，这样就争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不久，得知于伶、宋之的等从香港到达重庆，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使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有演出的机会，也可吸收一些到重庆的抗敌演剧队成员参加。

△　日伪军2000余人“围剿”冀东王官营以南10个村庄，将抓捕的各村群众2000余人押解到黑山沟，正当屠杀群众之际，中共丰润县党政领导率部队前来营救，群众逃散。战斗中，几十名八路军战士牺牲，60多名群众被杀害。

△　是日至次日，侵缅日军第五十五、第十八师团在飞机、战车、炮兵掩护下，继续攻击斯瓦。11日，日机整日轰炸，夜23时远征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按原计划留一部掩护外，主力开往沙加耶第二阵地，并向沙瓦地附近转移。

△　据日伪“华北劳工协会”公布：三月内华北各地青壮年运往东北的人数已达15.8459万人。

△　伪满洲国、朝鲜、华北、蒙疆等傀儡政权代表，在大连召开第一次“大连联络会议”。会上讨论政治、经济诸问题，就共同合作支援日本发动的“圣战”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今后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

4月10日　川省府主席张群为培养坚苦卓绝之学风起见，特发表致全川中等学校校长、教职员书，勉以下列三事：一、锻炼健康身体；二、养成恢宏度量；三、厉行规律生活。

△　重庆各界举行大会欢迎归侨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社会部副部长洪兰友等致欢迎词。

△　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由苏北到达山东临沭县朱樊村第一一五师师部。中旬，刘少奇召开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以下重大事项：一、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与山东分局合署办公，三个机关由万人减至3500人，第一一五师师部、山纵司令部、分局干部统一分配；三、山东纵队第一旅拨归第一一五师建制。

△　太行区武工队从是日至18日共进行战斗45次，毙伤日伪军210名，俘虏50名，摧毁伪组织“维持会”300余个，镇压汉奸400余名，开辟和恢复了有五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

△　下午3时半，日“零式”战斗机20架侵入滇境我空军基地，被“飞虎队”击落七架，重创四架。

△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三周年纪念会在渝举行，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外务部部长赵素昂举行茶会招待中外人士。

4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副部长潘公展、董显光，在渝举行欢迎茶会，招待由上海、香港等地抵渝的新闻和文化工作者。

△　经济部物资局在成都设专员办事处，限令成都市及成都、华阳两县所存棉纱，自4月1日起开始登记，逾期者以囤积居奇论罪。

△　重庆《大公报》报道：据主管方面统计，川省盐产量共约

1070万担，除本省年需600万担外，接济湘、黔、陕、鄂年约180万担，供需相抵，尚有余盐。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的发言。他说：关于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在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七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带领部队在冀南南宫县与日军作战，突围时牺牲。

△　日伪军数千人集中上百只船，合围微山湖中之微山岛抗日武装，抗日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五六百人与敌激战后分路突围。在战斗中，运河支队参谋长褚稚卿等牺牲。此次“扫荡”历时12天，敌占微山岛，中断东西交通。

△　日军攻占菲律宾巴丹半岛。从3日起，日军再次发动对巴丹半岛的进攻，至是日完全占领。在整个巴丹半岛战斗中，美菲守军7.8万人除2000人撤往科雷希多岛外，大部被俘。日军在押解被俘人员前往圣费尔南多途中，采取极其残暴手段，致使数千名战俘死于饥饿、暴晒和痢疾，300余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丹死亡行军”。

4月12日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背信弃义，诬陷中国共产党，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以保护”和“另有任用”为名，将南、北疆各区县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回迪化（今乌鲁木齐），先后集中在羊毛湖和八户梁等处，并命令航空队全体学员离开航空队，也集中在南梁招待所。实际是将共产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全部软禁起来。

△　远征军第六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司令部移至垒固，指挥作战。同时第六军工兵营及第三团主力亦驰赴垒固归建。13日，第六军指挥

所亦至垒固，并令第四十九师第一四六团向垒固以北坑皮克前进占领阵地。

△　是日至16日，侵缅日军向新编第二十二师阵地攻击，该师分别占领沙加耶北方之莫拉、叶尼、沙瓦地、挨劳各附近阵地，以阻击敌人。16日，该师在第九十六师掩护下，向彬马拉西面集结整顿。东西两侧之游击队亦随正面战况之转移，分别撤至托力安、叶尼仓各附近地区继续游击。

△　日军第三十二师团“扫荡”冀鲁豫边国军高树勋部防区，八路军一部援助高部，血战二旬。29日，八路军破袭鲁西冠城至甄城间的公路50余里，毙日军80余人，解救被围高军一部，并掩护其安全转移。

△　日伪军调遣五万余人，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并推行“施政跃进”运动，强迫群众并村，增设据点，步步压迫和包围根据地。日伪反复“扫荡”，进行到10月才告结束。

△　重庆《大公报》讯：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宣布，罗斯福总统与林森主席为发动700万元的援华募捐运动交换广播演说。美国15州州长发表公告，规定是日至19日为“中国周”。

4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年冬季国际形势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再一件就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日子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为了将来要加强教育，为了现在也必须加强教育。再就是精兵简

政，精兵简政是为了克服困难。

△　湖南长沙县长杨师箴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被日军俘虏，不屈被害，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驻守在鲁西阳谷县七级镇、刘庄、于庄等处伪军，由团长田庆凯率500余人、枪400余支向八路军投诚。

△　华北伪中央联合准备银行公布本年1至3月“联银券”发行额为9.13429796亿元，预计本年内发行额将达20.6526亿元。

4月14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一、财政部将赋税司改为地方财政司，并在部内增设督察专员；二、通过《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草案》。

△　邮政总局函请印度邮政开办新疆蒲犁与印度米斯嘎互换邮件事务，并邮饬新疆局从速筹备。

△　重庆《大公报》讯：台湾同盟会呈请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准予设立台湾省政府，略谓：台湾原为中国领土，台胞同系炎黄子孙，从《马关条约》至今，沦入敌手已有48载，凡中华儿女无不认为是奇耻大辱，600万台湾同胞切盼早日归依祖国。

△　朱德、彭德怀发出电文，号召敌占区人民不给日军种植棉花，以增加敌人之困难，配合中国军民的反攻。电文指出：“这是一种急切的救国工作，望我沦陷区同胞认真实行。”

△　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率领军部及直属部队一部到达腊戍，15日率领军部一部分到曼德勒。16日夜曼德勒大火，军队投入救火。

△　凌晨2时，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面告远征军代表侯腾，英军情况危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沿伊洛瓦底江两岸北进，将英缅军

包围于仁安羌以北，要求远征军救援。17时，远征军长官部令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赴乔克巴党解救英军。

△　八路军第二分区第四十二团罗志友营长和王万荣连长，率领80余名战士，在广胜寺力空和尚配合下，将广胜寺《赵城金藏》4700余卷抢运转移至太岳地区安泽县亢驿镇，保存了这部世界遗珍。1949年4月，这批经藏运抵北平，交北平图书馆珍藏。

△　赈济委员会委员汤漪在渝逝世。5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发给治丧费5000元。

4月15日　财政部公布：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要求，依照最近美金五亿元对华信用放款协定之规定，拨美金二亿元记入纽约联邦准备银行中国中央银行存折，作为发行美金公债之准备金。

△　教育部咨各省省政府：奉行政院转奉国民政府令：各地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校长务须使其专任。至此，实施“新县制”后，国民学校、中心学校校长兼任乡、镇、保长，因而削弱学校领导的问题，开始解决。

△　中国新闻学会及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举行茶会，欢迎来自新加坡、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的新闻界同行。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萧同兹、各报联合委员会总干事陈博生及中外记者200余人出席。萧致欢迎词，对冒险来到后方的记者表示敬意，次由《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报告香港沦陷经过及日寇暴行。

△　周恩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对那些想去根据地的民主党派人士应表示欢迎；并提出争取中间分子要靠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和执行得法，也要靠他们自己的体验。为了开展统一战线，为扩大民主运动，同时也为了养成我们自己在民主制度下同其他党派合作的作风，建议中央加以考虑。

△　八路军晋豫联防区成立，刘忠为司令员、聂真为政委，下辖三个军分区。至此，晋豫区初具规模。

△　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专员公署专员刘齐滨病故，由袁复荣继任专员。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分区部队在榆武公路白家庄设伏，歼日第三十六师团高木联队第三大队一部，毙日少佐以下100余名，俘六名，毁汽车16辆。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第三八六、决一、第二一二旅对侵占俘山、翼城等地的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发起自卫反击。战斗至次日拂晓结束，共俘顽军718人，毙伤392人，收复浮北大片土地。

△　日军第二一四联队攻战仁安羌。亚历山大以兵力不足，在梅苗与史迪威、罗卓英会晤，要求增派援军。远征军长官部决定续派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两个团增援。至17日，该两团到达指定地区。

△　侵缅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部迫近土冲河阵地。16至17日，双方在土冲河至保勒、南柏阵地间多次发生战斗。18日，日军一部突进垒固南高地。19日，该高地被日军突破。远征军师与军间失去联络。第六军令第四十九师第一四六团在垒固以北及昔胜间沿公路占领阵地，又令在保勒北高地的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速向垒固东北山地转移。午后，军司令部向昔胜转移。

△　是日至19日，日军在冀东玉田县城东之五里桥、彭桥两地集体屠杀当地基层抗日干部和村民100余人。

4月16日　蒋介石批准美国麦慕仑上校担任中国交通区和中国运输公司总顾问，并兼任中缅运输总局总顾问，以协助解决各种运输问题。

△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在渝举行第三次大会，张君劢、王世杰、茅以升、冯友兰、吴有训、竺可桢、张道藩等委员出席。教育部长陈立夫致词，谓高等学校由战前108所增至129所。大会奖励华罗庚《堆垒素数论》、冯友兰《新理学》，各得一等奖一万元；二等奖为金岳霖《论道》、杨公达《春秋大义述》、陈启天《韩非子校释》、胡焕庸《缩小省区方案》、涂长望《中国气象之研究》、刘开渠《雕塑》、沈福文《漆器》等，各得5000元；陈铨《野玫瑰》、曹禺《北京人》、常书鸿《油画》、雷圭元《工艺美术之理论与实际》等获三等奖，各得2500元。于17日闭会。

△　中央警官学校举行校长蒋介石铜像揭幕典礼，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第六届年会及考试院举办考课给奖典礼一并举行。蒋介石兼校长亲临致词。

△　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作出《山东抗战四年工作总结》，充分肯定四年来山东敌后抗战的成绩：一、建立了10万人的抗日武装（山纵与军区共六万，第一一五师四万）；二、建立了拥有800万人口、2.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抗日根据地；三、建立与发展了山东的党，党员发展到11万人；四、初步发动与组织了群众；五、部分地区协助了华中及其他地区的斗争。同时也指出了山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了今后八项具体任务。

△　《解放日报》讯：东南联大在浙江金华成立，设立文、理、法、工、商、农、师范七个学院。

△　重庆《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去秋去世，是日在渝举行公祭，遗体由渝启运陕西。上月29日灵柩抵西安，同日西安各界举行迎祭典礼，安葬于长安县南樊川少陵园。

△　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已转入彬马拉预定阵地，彬马拉会战准备就绪。17日，杜聿明、史迪威、罗卓英商讨会战事宜，决

定先击溃彬马拉进攻之敌，然后策应英军作战。13时，日军在戾委与第九十六师一营发生战斗。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先头部队已到达和榜；第六军第四十九师先头一营到达垒固以北。

△　史迪威派人将其对中国远征军整改计划送到重庆，提出缅甸北部至中国的陆、空军供应线很可能被日军切断，武器运不到中国军队手里，中国军队必须去印度取武器，建议“在美国空运公司尽可能帮助下，从密支那把军队经孟拱和信宾扬，越过缅甸北部，沿雷多公路运到阿萨姆境内”，在印度组建两个军的中国部队，进行训练。两周后，蒋介石批准了这次训练计划，接着美国政府也给予批准。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武（乡）榆（社）公路魏城附近伏击，毁敌汽车16辆，歼敌第三十六师团高木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全体及第十三中队大部，共230余名。

△　世界无线电公司自是日起开始旧金山与成都直接通报。

4月17日　是日为《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七周年，旅渝台胞集会纪念，并规定该日为“岛耻纪念日”。

△　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孔祥熙官邸举行游园茶会，同时举行献赠中国空军美志愿队“海鹰元”典礼。名誉会长宋美龄致词。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给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同志指示，指出有各种材料表明，蒋介石及国民党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适当地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极大困难。中共南方局收到指示后，立即向党的干部进行传达，并指示《新华日报》于5月15日发表《提高警觉克服困难》的社论，巧妙地把中共中央的精神传达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

△　外交部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淦等被日军杀害。

△　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奉英军第一军团长命令，到达宾河右（北）岸。18日拂晓，该团开始攻击，午刻将日军击溃，该团右翼渡河追击，被宾河左（南）岸日军所阻。

△　日军陷缅甸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共7000余人被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次日，缅境英军决将铁路、公路移交我方管理。

4月18日　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军政部组织法》。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对国内当前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又加紧，并举出了109条事实说明时局的危机，蒋介石、国民党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可能。21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示作好准备，对付国民党行将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为应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于必要时以晋察冀军区及第一二九师抽调若干部队到晋西北加强防务，以使第一二〇师在事变后能抽调大部渡过河西应付时局。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通令，颁发《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的决议》，指出当前的工作重心：照顾和安定人民生活，发动生产，今年除减征公粮、公草及废除羊子税外，应调整壮丁与牲口的动员，准备土地登记，确定地权；加强春耕工作；管理对外贸易；彻底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权利；整训地方武装；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要抓紧干部的教育。

△　晨，侵缅日军一部向彬马拉逼进，并向戾委攻击。3时，罗卓英接驻英军联络参谋杨业孔电称：英军已无战斗力，全军后撤，日军越过宾河向乔克巴党进攻。远征军决定放弃彬马拉会战，令第五军于19日拂晓前开始转移，改守密铁拉至敏建一带，准备曼德勒会战。20

日彬马拉失陷。

△　16架美“空中堡垒”巨型机由杜利特尔中校率领，自“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东京、横滨、神户、山崎等地，投炸弹及燃烧弹共16吨，于当晚飞达杭州湾着陆，另有一架飞往苏联海参崴。

△　日伪军4000余人包围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后方医院所在地鲁家峪，我军伤病员及工作人员190余人被敌施放毒气致死。

4月19日　蒋介石以极沉痛之电饬宋子文向美总统罗斯福呼吁，美国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待遇应相同。

△　中国财政学会在渝成立，通过学会章程、工作计划，推蒋介石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陈其来、俞鸿钧、钱新之等31人为理事。孔祥熙致词，略谓：要在世界财政学中确立中国财政学的地位，把本国的财政思想发扬光大，确立民生主义的财政政策等。

△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电：关于韩德勤的军力与地区，以能维持韩生存又对我无危害为原则。因此，地区可划给一个适当的立足地。

△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指示第一二九师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增大了日军北进的可能性，晋东南地区要迅速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军和平划界。

△　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致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表示愿意和谈。于是第六十一军与八路军进行停战谈判，划分两军的军事界限。

△　西康省政府与康、藏上层人士合组康藏贸易公司，资本600万元，垄断康藏进出口贸易。

△　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逼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前进中该团第三营营长张琦少校壮烈牺牲。至14时，攻克501高地，击溃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使敌遗尸1200具，全部收复仁安羌油田区，救出被围英军7000余人及被俘英、美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远征军的大捷，一时轰动了整个英国。为此，英国向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及团长孙继光等多人授勋。此后，英军退入印度，远征军自腊戍撤退，滇缅路于30日被日军阻断。

△　远征军第六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在垒固南32哩高地被日军突破。该军令第四十九师第一四六团分别在垒固以北及昔胜间沿公路占领阵地；又令保勒北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速向垒固东北山地转进，军司令部向昔胜转移。

△　夜，晋察冀边区八路军一部突袭冀中完县，将伪组织各机关全部捣毁，碉堡工事、城门岗楼大部烧毁，毙日伪军20余人，俘40余人。

△　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用长沙会战实例说明中国军人魂，并谴责在华治外法权，呼吁各有关国家尽早予以废除。

4月20日　　中国军事代表团熊式辉等在华盛顿晋见美总统罗斯福。

△　岭南大学决定在粤北复课，先开农、文、医科。

△　远征军第六军令第九十三师协同第二七九团设法突围，至卯克买附近集结；令第四十九师至雷列姆待命；另令第九十三师立即西进。

△　拂晓，侵缅日军一部进抵垒固南侧，与第六军接触。日军另一部迂回垒固西，向第四十九师阵地攻击，阵地被突破。日军又攻击

垒固北该师第一四六团阵地，激战至晚，日军陆续增加，守军不支。晚，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决定放弃战斗，令部队向卯克买转移；同时令一部破坏昔胜至和榜间公路。甘率部分人员，北上至和榜附近待援。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布反“蚕食”斗争命令，命令所属各部应着重与党、政、军、民“一元化”斗争相结后，各游击兵团除少数兵力在正面直接游击外，应以主力转至敌人侧背作战，特别要组成多数的便衣队，进入敌人背后开展游击，攻其心腹。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内部教育。为了迎接新的光明世界，也要加强教育。

△　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派张文澄、方文彬、杨才等组成调查研究组到云南开展工作。调研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搜集有关资料；二、联系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里的中共党员；三、在滇军建立电台。负责电台的杨才于1944年2月进入滇黔绥靖公署无线电总台第三机班，负责龙云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的电讯联络，直到1945年10月3日龙云被蒋介石逼到重庆为止。调研工作到1946年4月张文澄到重庆才告结束。

△　日机三批向山西吉县七郎窝军桥投弹300余枚。

△　汪精卫往上海、杭州视察，是日抵上海，林柏生、周隆庠随行。

△　伪满洲国政府决定外务局升格为外交部，任命韦焕章为外交部大臣、三浦武美为外交部次长。

△　莫斯科会战结束，苏军收复莫斯科州、加里宁州、图拉州和梁赞州等地。会战中，德军60余万人被歼，改变了苏德战场上的形势。

4月中旬　侨务委员会与教育部合办的南洋研究所在渝成立，陈树人与陈立夫分任正、副会长，下设政治、经济、教育、法制、译述、资料、总务七个组。

△　朱德视察屯田政策实行得好的南泥湾农场和工厂，称赞南泥湾建设得好，是“陕北的江南”。

△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全体党员作报告，阐释三个月来蒋介石发动一系列反动事件的背景条件，历数反动事件109起。估计反共即使达到高潮，蒋介石总有不能丢掉抗战与民主旗帜的困难，只要我们紧抓住这两面旗帜，“他们的一切进攻和压迫，便不能不受到限制”。指出斗争将是长期的，不平衡的，而光明的到来，必定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变以后。

4月21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以下决议：一、《统一募捐办法》；二、《田赋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三、《本年度推销公债计划纲要》及《财政部公债筹募委员会组织章程》等案，并任命凃允檀任中国驻巴拿马特命全权公使，原任沈觐鼎免职。

△　四川省政府公布《四川省各县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凡25条，规定在县地方自治尚未完成以前，为集思广益，促进县政兴革起见，特设各县临时参议会。各县临参会名额，一二等县20人，三四等县14人，五六等县10人。由各该县住民中遴选十分之七，由曾在本省依法成立之职业团体服务人员中遴选十分之三。其候选人由各县县政府依照规定标准提出加倍人数于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定。

△　中央研究院、中国地理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甘、宁、青地理、植物、史前文化、古代国防及艺术等，名誉团长为朱家骅。由团长辛树帜、历史组长向达、地理组长吴印禅率团员于是日赴兰州考察。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五一”节的指示，指出：“纪念‘五一’必须

与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及我国人民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应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改造各根据地工会工作，深入肃清职工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残余。”

△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称：“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日苏战争时机当在5月至8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　彭德怀电告毛泽东、朱德并告聂荣臻：阎锡山为和缓日军威胁，趁八路军反“扫荡”之疲劳，以第六十一军步步为营，不断向前推进，经15日至17日三天战斗，已将该军之第四十六师全部和第四十八师一个团消灭。现该军军长梁培璜已派来代表要求和平解决，阎锡山来电谓来日将并肩协同抗日。经过此次战斗，可能暂时稳定太岳局面。

△　远征军长官部对第五军下达作战命令：要点为：一、第九十六师在吉同冈、耶麦升（彬马拉北）占领阵地，与敌激战；二、杜聿明率第二〇〇师并指挥第六军，务求击破向东枝前进之日军。第五军奉命后即刻东进，先向克劳隘口进出，以七五榴炮一营及装甲车协助第二〇〇师攻击东枝日军；另令炮兵主力及战车全部向西保附近集结，相机策应雷列姆战斗。

△　拂晓，远征军第六军参谋长率步、炮兵在和榜占领阵地。10时，日军先头部队冲入和榜，当地守军被击破；午，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攻击和榜东侧阵地未逞。夜，日后续部队到达，并有多数车辆转向东枝。

△　远征军获悉日军分两路向北挺进，当即分兵阻击：一路由甘

丽初率领一部兵力在雷列姆附近，占领既设阵地；另一路由杜聿明率领第二〇〇师等部队，由密铁拉东进阻击日军。

△　是日至5月底，冀东军分区为开辟热河地区，以第十二、第十三团为主力共4000余兵力，对敌展开攻势，连克兴隆县北水泉，承德县榆树沟，平泉县桲椤树、宽城亮甲台、熊虎斗等敌伪据点13处，消灭日伪军3000余人，使承德、平泉、兴隆、青龙广大地区相接，并与冀东迁遵兴根据地连成一片。

△　重庆《大公报》讯：复兴面粉公司以国家银行贷款转贷获利息28万余元，经财政部、经济部查证属实并加严惩：一、一年内不准向国家银行贷款；二、所获28万余元充公；三、另行罚款28万余元；四、由经济部通令同业公会以儆效尤。

△　晨，日机36架分五次轰炸浙省衢县，投弹53枚。同时有日机五架窜丽水，投弹11枚。

△　日大本营授意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准备浙江作战”。其目的在于占领和破坏中国东南金华、衢州等地的机场，使其国内免受空中的威胁，并打通浙赣铁路，切断中国东南的交通运输。30日，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摧毁浙江航空基地，“粉碎敌利用该地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

△　美国斯特逊大学授予宋美龄名誉博士学位。

4月22日　教育部在重庆举行女子教育会议，教育部长陈立夫致词说：女子教育应注意家庭内外之分，意志情感陶铸之分，现在将来责任之分，无子女之女子对于教育事业应多负责任。

△　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开会，王世杰、吴国桢、该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副主任委员印维廉及各省、市审查处长等出席。去年经审准发售图书238种，查禁196种，停止发售120种，就地取缔32

种，不准再版的14种，准予备查的472种。今年予以奖励的图书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三民主义的科学研究法》、《总理遗教初稿》、《福建辛亥光复史料》、《敌情研究》。会议决定加强各地审查工作。25日闭会。

△　孔学会在重庆成立，中外来宾及会员500余人出席。孔祥熙报告成立意义："（一）崇道德，以期民族之复兴；（二）辨王道，以息敌人之邪说；（三）倡大同，以拯世界之人类。"吴敬恒、陈立夫先后讲话。推蒋介石、林森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吴敬恒、陈立夫、陈果夫等为理、监事。

△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指出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注意节约与积蓄民力；二是注意组织要精干，以提高工作效率。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八次政务会议，决定下列主要事项：一、在延安成立边区防疫委员会；二、改组边区政府系统的学习指导委员会；三、扩大边区政府系统的编整委员会；四、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工资标准；五、实施第二期运输公盐办法等。

△　侵缅日军续攻和榜阵地，激战竟日，守军阵地被摧毁，连夜向孟邦转移。23日午后，日军一面攻击孟邦，一面向丙隆转移。当远征军抵丙隆时，后路又被日军截断，该部向赖卡转移待援。24日，孟邦阵地被日军突破，余部向猛昆撤退，10时，雷列姆失陷。日军又分两路北进，一部经丙隆北进，一部经南桑东进。甘丽初率少数疲残兵力在赖卡阻击日军未果，旋令东退孟衷收容。25日，日军右纵队追至孟衷，该军向孟朽撤退，收容残部。是日，孟昆失陷。

△　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第三十三师、新编第十三旅及特务旅共2.5万人投敌。随同投敌的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

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长孙玉田。汪精卫命令将该部编为伪第二方面军，任命孙良诚为总司令。孙在开封宣誓就职。

△　美国军队进抵印度。

4月23日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从是日至26日在重庆中央训练团举办团员训练班，有760名团员参加。团长蒋介石亲临训话，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育，为青年成功立业之基本教育。

△　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枞辞职，交通部派陈卓林继任。

△　远征军驻腊戍参谋团奉军事委员会电令：立即破坏腊戍、雷列姆公路，电令新编第二十八师刘伯龙部派部队于24日到赖卡以北，一面掩护第六军，一面破坏公路；同时通知中国驻腊戍各机关速向国内撤退；另令后勤、交通部破坏来不及抢运的物资。

△　缅甸东枝陷落。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部署收复东枝，24日拂晓开始攻击，激战至午，东枝西、南、北三面高地均攻克，并有一营冲入东枝市，发生巷战。此时，第五军接远征军长官部命令：东枝克复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并饬第二〇〇师于25日攻克东枝。该师于是日进入市区，主力奉命西移。

△　冀东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书记石光，在丰润县未庄子遭日伪军包围，战斗中不幸牺牲。

△　上午，日机22架在江西境内侦察。另一批七架进袭浙江衢县，在郊外投弹多枚。

4月24日　蒋介石鉴于入缅作战不利，电令远征军长官部：万一腊戍不守，第五、第六十六军应以密支那、八莫为后方，第六军以景东为后方。

△　重庆《大公报》讯：立法院提出修正《土地法》，蒋介石提出战时土地政策实施纲要10点，规定：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税点为1％至2％，累进至5％。对于农地地价税折征实物，全归中央。私有土地其地价一部由国家发行土地债券偿付。土地使用应受国家限制政策限定。私有荒地由政府征收高价地价税，并限期使用，不使用者得由政府估定地价，以土地债券征收。

△　驻英大使顾维钧与英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海员协定》。5月31日，外交部就此事致电驻英大使馆称：按照规定，应设法使中国海员复工，英方同意改善我海员待遇，希通知各海员并转告辖区各使馆。

△　英大使薛穆爵士与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勃鲁斯少将晋谒蒋介石，面述奉英王之命，以英国陆军最高荣誉大十字勋章赠予蒋介石。

△　军政部照新组织法设总务厅、军务司、机械化司、马政司、交通司、军法司、兵役署、军需署、兵工署、军医署、会计处。该部令全国各部队从本年起实施军需独立制度。

△　中央劳军团团长程天放率劳军团抵山西克难城劳军。

△　中国音乐学会举行第一届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陈立夫、潘公展等出席，决议：一、半年内在桂林、昆明、贵阳、西安、成都等地成立分会20处；二、在今年孔子诞辰举行国乐大演奏；三、与孔学会、大同乐会合作，训练人才及制造乐器等。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中干部暂不实行军衔等级制度的指示，认为：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有限度，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过分强调正规化，有害而无益。

△　中共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作出指示。关于农村

劳资关系问题，指示说，我们必须从劳资双方均能获益为原则，去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照顾各阶层利益的观点出发，坚决克服狭隘的行会利益的思想。

△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对胶东驻石岛（荣成南）之日伪军展开攻击，毙伤敌100余名，俘日军二人、伪军180余人，残敌登船向海上逃窜。

△　中英两国在伦敦签订《关于英国航洋轮船雇用中国海员条件协定》（即《关于中国海员协定》）。

△　侵缅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自雷列姆分两路向北突进，远征军第六十六军仓促应战，节节失利。

△　日机22架分八批窜扰赣省。8时许，日机一架窜安福投弹，三架窜吉安，在郊外投弹。另五架袭浙江丽水，投弹19枚，一批七架袭衢县，投弹九枚。午后，一批六架再袭衢县，投弹七枚，燃烧弹二枚。

△　日大本营制定《浙江作战方案》，目的为摧毁浙江各机场，决定派78个大队执行这一任务。计划从浙赣路东西夹击，自5月中旬开始，从绍兴、诸暨、金华进击，以部分兵力从杭州、富阳、兰溪方面击溃中国军队，攻克金华，然后占领玉山和丽水等主要机场。并于当日派负责中国方面的作战参谋高山信武携该作战方案飞抵南京与中国派遣军磋商。

4月25日　　行政院长蒋介石电饬各省、市政府对各种职业团体应切实督促加紧组训，尤应注意各团体之运用与管理。

△　国民政府特任卫立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第三次全国参谋长会议及第四次军事教育会议均于是日在重庆召开，并于5月4日闭幕。

△　史迪威、亚历山大、罗卓英和杜聿明在曼德勒以南的皎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缅全部军队向中国边境和印度撤退。

△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规定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的组织系统及民兵的主要战略战术，要求各地广泛开展地道战、地雷战。

△　日军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共万余人，扫荡河南濮阳地区高树勋部，该部南撤。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高部作战，攻克濮阳城，毙日军120余人，毁汽车10辆。

△　是日至27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第一一〇师团各一部共4000余人分别对八路军北岳区易县和平山县等地进行“扫荡”，均被该地军民粉碎。

△　赣北九江伪军500余人，携步枪500余支、机枪五挺反正。

4月26日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是日由西康到成都，即到渝晋谒蒋介石，并与中央各关系当局商讨要政。

△　自是日起，刘少奇分期分批、有针对性地向山东党政干部作《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八个报告，在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率司令部人员及残部抵孟朽附近，继续指挥作战。其余各部向萨尔温江东岸转移。

△　第五军除第二〇〇师在东枝地区阻击日军外，其余全部向曼德勒转移。28日，叫栖阵地遭日军攻击。

△　夜，八路军冀中第九军分区一部分途攻克博野、蠡县，俘伪军、伪警备队及政工人员300余名，摧毁两城碉堡工事，打开两城监狱，解救抗日同胞50余名。

△　11时零5分，日机轰炸滇境空军基地，与空军美志愿队发生激烈空战，日机“零式”战斗机11架在腊戍南被击落。

△　重庆《大公报》讯：英国政府授予海军少将陈策英帝国爵士勋章，授予海军少校徐亨英帝国武官勋章，以表彰香港沦陷后率英方官员突围的功绩。

4月27日　教育部在渝召开医学教育第三届第一次会议，通过议案：一、大学理学院设置药学系；二、建议教育部设立药学院；三、将医学教育委员会改为医药教育委员会；四、药学专科课程草案；五、高级药剂职校课程草案；六、推吴正华、连瑞琦、陈璞、陈思义、葛克全等11人组成药学委员会。29日闭会。

△　农业促进会与金陵大学合作研究，选定产量高、成熟早的良种小麦60、129、302号三种，于去秋扩种1300余亩，预计可收1900余市石。章文才教授选定之无核广柑一种、少核鹅蛋广柑5种，在江津大量培植，已有母树1000余株。

△　晨，远征军第六军接参谋团26日（宥）电：“第六军此后应以景东为后方，掌握第九十三师及第四十九师各一部，重整战力，开拓战局。”该军按参谋团旨意，令第九十三师一部暂巩固昆兴，策划景东地区亘泰越边境之守备；令第四十九师主力至朗口集结，向雷列姆进击。是日，暂编第五十五师千余人，向景东转移。

△　是日至2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兵团长会议，贯彻本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基本方针是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尔后对太行山北部，展开肃正作战。

△　交河、泊镇等地日伪军1000余人，于拂晓奔袭冀中回民支队驻地交河陈庄村，回民支队凭街头工事阻击日伪，毙伤敌200余人，我伤亡70余人。黄昏后，回民支队胜利突围。战斗中，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不幸牺牲。

△　上午，日机三架侵入江西吉安上空窥察，并以机枪扫射，下午，又有两架在临川等地窥察。同日，日机12架分两批袭湖南衡阳，在郊外投弹多枚。

△　美总统罗斯福致函国会，提出将美国经济纳入战时轨道，概述包括控制收入、工资、价格和分配等七项严格措施的经济规划。28日，美国电台宣布这七项措施。

4月28日　中、美间开放无线电照相电报，蒋介石与罗斯福互致贺电。

△　行政院例会决议通过《中央党政机关公务员工及其家属生活必需品定量分售实施办法草案》，并任命曹浩森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原兼司令熊式辉免去兼职。

△　战时劝募公债委员会奉令月底结束。黄炎培主任委员向新闻界谈一年来募债成绩，谓：原计划募集三亿元，现募得5.0927亿多元。该会结束后，将成立新的机构，直属财政部。

△　财政部公债筹备委员会建立，孔祥熙任主任，顾翊群、张厉生任副主任。

△　綦江铁路开工兴建，先筑猫儿沱至五岔一段（计划于1947年8月全线竣工）。

△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共党旗样式的决议》，规定党旗长宽为3：2，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　刘少奇撰写《对山东工作意见的报告》，并报送中共中央。《报告》总结山东五年来工作的成绩、缺点及经验教训，提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今后在山东的五大任务，即粉碎敌伪扫荡，加强对敌政治攻势；争取友党友军共同抗战，改善关系；统一军事政治的指挥与领导，扩大加强地方军；普遍改善人民生活，减税减租；把政权改造成为真正抗日各阶层联合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

△　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下令部队逐步撤退。

△　远征军第六军令第九十三师一部扼守昆兴附近南盘河东岸，另各派一部向孟囊及南桑方面搜索，以防日军东进。暂编第五十五师于29日至龙东时与日军遭遇，当即给予攻击，日军纷纷撤退。

△　洛阳南庄（孟县东20里）伪第二十一师第六团第三营营长赵本温率部280余人，携步枪200余支，轻、重机枪数挺反正。

△　日伪军一万余人“扫荡”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在郓城、鄄城、濮县、观城一带驻地，威逼高部投降。八路军主动配合高部作战，攻克濮县城，毙敌120余人。

△　日机18架分批窜扰陕境各地，八架在渭南投弹，一架窜至甘肃灵台窥探。

△　美国社会科学荣誉学会将荣誉金钟授予宋美龄，由驻美武官朱世明的夫人代为接受。

4月29日　　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组织凉山实业公司，开发川、康、滇边疆物产。

△　据中央社纽约电：川边出产，由宋美龄赠与美国之熊猫两头，业已定名，雄者称班棣，雌者称班达。该二熊猫之命名，原由救济中国难民协会及纽约生物协会发起，由美全国儿童竞赛提名。而提议此名中奖者为一哥伦比亚人，年仅11岁，名南赛。奖金之中，有一

项为赴纽约旅行三天，届时将在勃龙生物园为此二熊猫举行命名典礼。

△　冀鲁豫第二军分区部队一部与鄄城县大队配合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对日作战，破袭鄄郓公路，毙伤敌人80余人。

△　日第十二军指挥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2万余人，对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之武（城）北、第四军分区之邢济路南两地突然展开大规模的合围“扫荡”。八路军激战突出重围。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编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牺牲。

△　日伪军在河北故城县霍庄一带发动“报复扫荡”，团团围住霍庄，杀害八路军战士、群众510人，其中集体烧杀而死者130余人，造成“四二九”霍庄惨案。

△　侵缅日军占领腊戍，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撤至畹町。

4月30日　《大公报》讯：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主任委员宋美龄曾带五万缅币赴云南慰劳国军，又拨55万元委托该会昆明分会制做单衣分发入缅国军。

△　邮政总局与美国邮政商妥，对美国由普通邮路寄中国后方之信函明信片，到达加尔各答后改由航空内运，由美国邮政担负航空运费。

△　蒋介石电令远征军将领，固守畹町。

△　远征军第五军根据长官部电令作如下部署：各派步兵一连协同机械化炮兵一连，至费屯与马打牙两地严密警戒；令新二十八师第八十三团赴摩谷阻击敌人，以战防炮兵一连掩护新二十二师撤退；第九十六师开赴南巴整理；电令第二〇〇师经帕来等地向杰沙附近集结。

△　15时，第六军接远征军长官部9时电令：腊戍失守，局势不利，该军应向景东转移。第六军决定速向景东附近亘缅、泰、越边境地区转移。从此，滇缅路被日军切断。

△　史迪威、罗卓英率司令部人员由瑞保转移甘布鲁，旋转至印度，5月5日晚至板卯西行，7日到曼西，除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追随其后外，与其余部队均失联系。史迪威于7日率中美少数人员单独西行，24日到印度汀苏基，随后飞抵新德里。罗卓英率司令部人员收容散兵、伤兵，继续西移。

△　夜间，英军撤出曼德勒，向印度方向退却。

△　新四军一部在苏中攻克南通重要城镇金沙，毙日伪军百余人，俘60余人，获枪60余支、国币10余万元。

△　日大本营下达打通浙赣线，摧毁浙赣地区美、中两国军用机场的命令。

4月下旬　　国民政府决定在内政部设总管全国警务部门，各省设立警务处，各县警佐室改为警察局，各区设立警察所，重要乡镇设立警察分驻所、乡镇警卫队，以加强全国警察机构。

△　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　我军识破日军企图，当令第三战区各部队作反击准备，浙西方面调第七十四军王耀武，第二十六军丁治磐（副职）及第五预备师到达指定地点。又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驻淳安，指挥钱

塘江北岸部队，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钱塘江南岸及金兰守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李觉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于5月中旬集中完毕。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队大部完成整编。太行、太岳两军区及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新一、决一旅共编成四个甲种团、七个乙种团、13个丙种团。为加强军分区，太岳区第二一二旅三个团并为第五十四团，与太岳区第四分区合并为分区基干团。决一旅第五十九团与洪赵支队编为太岳第一、第三军分区基干团。

△　日军在冀中轮番“扫荡”、“清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攻入定县李朽店，毙日军近百名，俘一部。另一部攻入安国县东石佛镇伪华北治安军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俘集团军参谋长以下200余人。

△　日军将驻在浙江鄞县、奉化、慈溪、余姚各地区第七十师团集中于奉化、溪口一带；令驻杭嘉湖地区第二十二师团主力及伪军第一、十三师集中于余绍地区；又令华北部分主力及特种部队集中于杭州西南等地，集兵力14万余，征集民伕万余，泽田茂为指挥，编为第十三军，直辖五个兵团、二个混成旅团，于5月14日前集中完毕，企图沿浙赣线西犯。

是月　　行政院决定自是月起增发公务员生活费80元；各省公务员生活津贴不得超过省总预算的5%，食米津贴不得超过15%。渝市政府决定各学校教职员生活补助费自是月起增为180元。

△　上饶集中营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部军官大队”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合并，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由第三战区中将高参卢旭兼任主任、少将专员张超任副主任，下辖二个大队、六个中队。队员均为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指战员和在东南各省被捕的共产党员、抗日志士，约700余人。

△　周恩来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红头村。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为加强昆山、张秋、寿张、东平、汶上等县的对敌斗争，决定建立新的第八军分区，吴机章任司令员。

△　晋察冀地区八路军与群众广泛开展地雷战，给日军以很大威胁。日军进村时不走大路走小路，行军大路不敢走，山顶不敢爬，在山腰排成一路队形前进，并强迫民伕、汉奸当向导。

△　新四军第七师第五十六、第五十七团各一部，进入安徽含山、和县地区与当地游击队会合，成立含和独立团。第五十七团另一部沿江西进，在贵池、东流地区开展游击战。至此，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皖中、皖南敌后游击根据地，打通与第二、第六师战略联系的任务初步完成。

△　湖北汉水北锋伪军陈斜卿部700人，豫北伪军刁培原部300人，信阳伪军张启黄部300人，九江伪保安队李云齐部60余人，九江另一部伪军500余人，湖北沙市附近曾万卿部60余人，共约1900余人反正。

△　日伪军在热河青龙（今赤城县境）进行大“检举”，抓捕村民422人，其中342人惨遭杀害。

△　我国去年向美国道奇厂订购卡车百辆，运到仰光，于缅境战争之际陆续抢运进口96辆，余四辆因短少零件未及运出。

5月

5月1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成立，吴铁城、陈仪、贺耀组为常务委员，秘书处长端木恺，人力组主任贺衷寒，财力组主任徐柏园，物

力组主任张果，粮盐组主任周一鹗，运输组主任陈体诚，军事组主任王文宣，检查组主任朱惠清，文化组主任叶秀峰。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二次驻会委员会，外交部次长傅秉常报告国际形势。

△　国民政府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计合法币17亿元。5日，财政部公布购买美金公债奖励办法，规定：凡团体购买满500万元者明令褒奖，并颁给匾额。凡个人购买满200万元者除明令褒奖外，颁给一等景星勋章，其余依次作了规定。

△　财政部以中、中、交、农四行发行100元、50元钞券后，不法商人乘机操纵搞贴水掉换，是日重申本年2月颁布的取缔办法，并重新公布：一、各地市面对中、中、交、农四行所发钞票，应按照面额十足通行，不得分别大小票或区别版式地名，贴水掉换。二、各地如设有钱摊或找换店从事兑换大小钞票者，应由该管地方政府按照各地情况，核定设立家数，规定兑换手续费为1％，不得多取。三、自本办法施行后，如有违反上述规定者将依法究办。

△　四川省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自是日起与区保安司令部实行合并，各县国民兵团亦一律改隶县政府。

△　蒙政委员会第九次大会在榆林开幕。绥蒙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委员鄂齐尔胡雅克金、经天禄、胡凤山、奇文英等出席。决议：一、推动蒙旗民运工作；二、改进蒙旗卫生；三、改良蒙旗畜产；四、筹备蒙旗小学课本。18日闭幕。

△　重庆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同时给工作竞赛优胜人员发奖。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吴国桢等出席。杨公达阐述国民党劳工政策，中国劳动协会代表水祥云勉励职工加紧生产，加强团结。

△　延安各界3000余人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朱德出席并

讲话，号召工人多做工，多造枪弹，多杀敌人。最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　烟类专卖局成立，刘振东、王宪分任正、副局长。定6月1日先在川、康区实施。凡土烟及后方各厂所制造的纸烟、进口烟等，均在专卖之列。

△　火柴专卖是日起在川、康、黔省实施。由财政部设立火柴专卖公司，陈光甫、宋子文分任正、副董事长。刘鸿生为总经理，梁敬錞、潘公展、马克强等为董事。财政部规定所有承销商与零售商均应依照公告价格销售。川、康两省火柴、安全大合及硫化磷头等土货，一律每合售价六角，安全小合及二三等土货，一律每合售价五角。

△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反对敌寇“治安强化运动”的指示》，指出这是目前对敌斗争的中心，必须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的火力。要用事实揭穿日军必胜的欺骗宣传。提高警惕性，反对敌之经济掠夺与破坏。要集中力量在接近敌区与敌进行斗争，并深入到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侧后方去工作，以求粉碎敌之分割“蚕食”政策。要做好对敌伪军的工作，以相机夺取敌纵深后之堡垒、据点，打击伪组织。

△　缅甸首任驻渝代表福格德上月乘中航机在昆明失事受伤，是日在昆逝世。4日，外交部特向缅督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致唁。

△　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向所属部队下达从曼德勒总突围的命令。

△　侵缅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陷维新，2日陷畹町、八莫，切断远征军第五军回国的退路。

△　冀中五一“扫荡”与反“扫荡”。是日至6月底，日军调集第四十一、第一一〇、第二十七、第二十六师团及独立第七、八、九混成旅

团等部，共五万余兵力，配备飞机、坦克，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扫荡”分为三个阶段：是日至10日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企图把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军区领导机关压缩、包围在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石德路以北之三角地带，即冀中根据地腹心地区。5月11日至15日为第二阶段，敌以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带继续合击，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5月16日至6月底为第三阶段，敌军分工划分地区，反复进行“扫荡”、“清剿”，妄图一面摧毁根据地县、区、村党、政、军、民组织，一面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对冀中平原实现“全面确保”。冀中军民在友邻根据地的大力支援配合下，以大部主力转移到外线，留一部主力高度分散，配合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在两个月斗争中，八路军作战272次，毙伤日伪军共1.1万余人，我方伤亡亦达二万余人，被捕、被杀害的群众达五万余人。整个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小块，形成“格子网”。在此极端险恶形势下，根据地军民继续顽强坚持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

△　日军在濮阳一带对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发动攻击，是日高部撤至鄄北冯胡同一带，日军一部尾追至此，并杀害村民。5日，日军在彭庙、冯胡同、南垓、刘庄、陈庄、徐垓等几个村庄又残杀村民87人，杀伤60余人。

△　日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由南京赴广州、香港等地巡视，与驻华南的陆海军头目策划军事部署。

△　日军报道部、海军武官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新民会、新闻广播协会等联合成立“华北宣传联盟”，下设报道、广播、电影、演艺等各种委员会，以开展欺骗宣传。

△　日大本营电告日第十五军司令部：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第十五军的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力争在国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冲和怒江周围扫

荡。同日，侵缅日军快速部队打到滇西边境。

5月2日　　中共中央于是日至23日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由毛泽东、凯丰主持。毛泽东在报告中讲明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以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会议开了三次，讨论热烈。23日，毛泽东作结论性发言，阐明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这个讲话，不仅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　监察院监察委员王斧在渝病故。本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治丧费3000元。

5月3日　　重庆《大公报》讯：经济部商标局长马克强对记者称：该局自1928年成立以来，已登记各种商标达4500多号。抗战以来本国工业发展较快，如1940年注册总数为1360号，其中本国产品占66％强，英国占12％，德国占11％。又如1941年注册总数为2743号，其中本国产品占75％，英、德各占10％。

△　中国人文科学社在渝举行本年度第一次社员大会，该社常务理事戴克光称：本社为各大学教员组成，总社在昆明，重庆分会出版《学术汇刊》。

△　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是日起在中央广播电台举行空中年会三日。总台与昆明、桂林、贵阳、成都、宁夏、兰州、曲江、遵义、息峰、麻江、沅陵等分会电台作空中交流，并展出无线电展品。

△　重庆卫戍司令部颁布《奖励汽车改作煤气车办法》，提倡改用煤气炉，并贷款改装。

△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晋西北分局，管理晋西北、晋西南和绥察三个地区党的工作，以关向应、林枫、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王达成、龚逢春、赵林、吴亮平等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晋西北区委以龚子荣为书记。分局与区党委暂行合署办公，直接受中央领导。并决定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

△　空军猛炸腊戍日军阵地。

△　侵缅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分别侵占滇西边境重镇南坎、八莫和畹町。接着日军又相继进占芒市、龙陵，于5月5日前出到怒江惠通桥西侧，守桥部队匆忙炸桥，隔在桥西的大批车辆和物资落入敌手。

5月4日　　陪都国家总动员宣传周举行宣传大会，总动员会常委吴铁城、贺耀组、陈仪，社会部长谷正纲，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政治部副部长梁寒操，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市长吴国桢，市党部主任杨公达，以及各界代表5000余人出席。蒋介石发表《为实施总动员法告全国同胞》的广播讲话。

△　国民党中央政治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联合举行文化晚会。该部副部长梁寒操致辞，略谓：我们应以“五四”精神收复失地，在国家总动员的旗帜下，同心同德，向共同目标而努力。青年团宣传处长洪瑞钊讲解五四运动的意义。

△　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劝募“中国青年号”飞机及“中国青年号”滑翔机队，下午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呈献命名典礼，由支团部筹备处主任包华国代表呈献，航空委员会代表陈庆云接收。此次劝募历时三月，共募飞机、滑翔机21架。

△　川康食糖专卖局向内江、资中、简阳、富顺等县蔗农发放贷款800万元。

△　军委会参谋团团长林蔚在缅甸龙陵下达命令：所有各部队一律归新编第二十八师刘伯龙师长统一收编，继续作战，赶赴龙陵西险要山地设伏，接应前方后撤部队，同时派员赴保山收容零星部队。是日下午，芒市北侧高地失守，日军向惠通桥推进。5日，日军进抵惠通桥附近，幸遇昆明增援工兵两连到达，当即阻敌，同时将惠通桥炸毁。旋第三十六师赶到，双方隔怒江对峙；第六十六军张轸部退至下关、凤仪一带收容整理。

△　缅甸侨胞领袖吴文举应赈济委员会邀请抵昆明，途经保山时遇日机轰炸，不幸殉难。是月25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前四川省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在成都逝世；军政部长何应钦特电其家属吊唁。

△　山东省第十一区专员兼鲁西游击司令朱世勤率部在潘庄遭日军袭击殉国，旋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指出：反“蚕食”的基本方式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要求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结合起来，灵活开展游击活动，充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

△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决定将挺进军划归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并任命挺进军军长萧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　八路军总部、晋察冀、晋冀鲁豫分别举行“五四”纪念大会暨第四届中国青年节。八路军全体青年，渴望携手奋斗，结束侵略战争。

△　由兴县士绅牛友兰发起的“晋西北士绅赴延安参观团”共13人，是日从兴县出发赴延安。8月5日，参观团返回兴县。

△　午，日军战斗机与轰炸机各27架自缅北窜入云南保山上空侦察，1时许在市区投弹。1时38分，与美空军志愿队于滇缅路西段上空遭遇。日机一架被击落，另有多架受伤。同日，日机九架窜入浙江衢县郊外，投弹47枚，另三架在丽水投弹14枚。又六架日机分批窜赣东，在玉山投弹。

△　日大本营调飞行第六十五联队与飞行第六十二、第九十战斗队增强中国派遣军的空军力量。旋中国派遣军抽调七个师团、三个混成旅团、五个支队及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组成浙赣作战兵团。

△　是日至8日，美国与日本海军在新几内亚东南、澳大利亚东北的珊瑚海大战，是为历史上首次航空母舰载飞机大战。日本小型航母“祥凤号”被击沉，“翔鹤号”航母遭重创后返回。美国损失“列克星敦号”大型航母、一艘加油船和一艘驱逐舰。日军虽在战术上取胜，但仍放弃计划于5月10日在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登陆的计划。日海军自太平洋战争以来首次受到重大挫折。

△　汪精卫离南京赴长春，访问伪满洲国，林柏生、褚民谊、周作人等随行。汪一行于7日抵长春，8日与溥仪会面，11日回南京。

5月5日　　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并开始实施。按：1940年12月成立的经济会议奉命结束，改组为国家总动员会议。

△　重庆青年举行劝募飞机活动。此次劝募活动历时三个月，重庆、璧山、江津、綦江、丰都、涪陵、广安等市、县合献“中国青年号”飞机一架、滑翔机20架；成都市献“四川青年号”滑翔机一架。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那素滴勒盖与吴玉章出席并主祭成吉思汗公祭大典，号召人民学习成吉思汗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精神，反对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　日军陷松山，进至惠通桥，由上游渡过怒江东犯，滇西告

急，昆明震惊。第三十六师由西昌驰援，与过江之日军激战。

△　日机118架从晨至午分批窜扰滇境，其中两批28架在保山市区投弹多枚。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中午与日机在保山附近作战，击落日机八架。同日，日机三架在浙西北地区低空侦察，被击落一架。另有日机九架侵入浙江丽水，向郊外投弹56枚。又有日机21架分四批窜扰赣东，在玉山投弹。

5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九次政务会议，讨论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编整工作，通过下列决议：一、以刘景范、柳湜、高自立等三人组成编整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各机关编整计划方案进行审查；二、编整结束后，审计处取消，将其工作归并到财政厅；三、编余人员由民政厅负责安置。

△　侨光汽车动力公司在渝成立，由旅美、旅荷属东印度侨胞投资组建，主要生产新式木炭车，日产量八部。

△　新四军领导的地方武装一部是日进攻天长、扬州公路间之甘泉山（扬州北），歼灭200余名日伪军，俘73名，缴长短枪70余支。

△　阎锡山应日军要求赴吉县安平村举行“安平会议”。阎方出席的有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梁延武、刘迪吉。日方出席的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中将、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中校参谋茂川、上尉参谋松井。会谈内容，在阎方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的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是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付中国的方针。在日方为：一、强调共荣圈的胜利促阎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政权，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支；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需分期交付。会谈中花谷正将拟好之宣言拿出交阎锡山签字，会谈气氛顿形紧张。阎锡

山默然审阅宣言达40分钟，决定拒绝。他估计情况不妙，怕把自己劫持，会谈休息时便不辞而别，谈判遂告破裂。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他曾通过杨杰和章伯钧的介绍，与左舜生、罗隆基同西南地方势力刘文辉和潘文华面谈两次，相约信守坚持抗战、尊重各方的武力、保证和配合人民有利于抗战民主的活动。刘等同意有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的必要，并答应在西康雅安（今属四川）设立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王少春夫妇到西康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并在刘的总部设立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直到1949年刘文辉起义。

△　日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全体盟员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向军区首长宣誓：今后粉身碎骨，亦与八路军全体同志保持亲密合作。该支部愿与八路军结成巩固同盟，为完成反战、反法西斯的光辉使命奋斗到底。

△　美国务卿赫尔电驻华代办范宣德，决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　英政府拨款4.15万镑给中国红十字会。

5月7日　　国民政府公布《限制公有建筑暂行办法》，规定：在抗战期间重庆市区内及迁建区内之公有建筑，除经行政院准许外，不得兴建。无特殊理由者必须在一个月内停建，违者予以征用或处罚。

△　财政部公布《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实收资本超过50万元者方得设立分、支行，每超过25万元者可增设一处，业已批准设立之分、支行应办理备案手续。

△　蒋介石电令远征军第五军立即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腊戍失陷与国内团结问题》的评论，指出：“日寇可能以新的进攻威胁着我们”，“加强团结，扫除一切

妨害团结的障碍，是今天我们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钥匙”。

△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是日抵兰州，将分赴敦煌一带工作。

△　八路军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发出指示，确定以发动全民武装自卫，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全面坚持根据地斗争为反“扫荡”方针，要求各部队既要灵活积极地打击敌人，又要避免与敌硬拼；要求主力部队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分散坚持内线斗争，大部迅速转向敌侧后，乘虚袭击敌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部队的反“扫荡”斗争。

△　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部队在易县、满城等地展开地雷战，5日至是日炸大桥一座，汽车一辆，在平山附近破坏日军为进行“蚕食”而修的轻便铁路。

△　午，日机12架分四批袭湘，九架窜衡阳投弹，其余三架分窜沅陵、芷江等地侦察。另日机20架分两批先后窜江西赣州投弹。

△　5日晚，日军第四师团一部在菲律宾科雷希多岛登陆，6日另一部随后登陆。美菲守军经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驻菲美军总司令温赖特被迫于是日上午宣布投降，1.5万名美菲军被俘。至此，菲律宾战役基本结束。

△　伪联合准备银行滥发空头纸币。据伪官方公布，总额已达26.5263亿元，使敌占区物价较事变前暴涨15倍至25倍。在今年前三个月内仅平、津两地因拒用伪钞、私藏边币和法币被日惨杀与囚禁者即达2000余名。

5月8日　　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奉蒋介石命布置该军撤退回国。杜自率该军直属部队及廖耀湘新二十二师自印道进入野人山，时值雨季，部队在原始森林中艰难穿行，沿途缺饮水，给养困难，以芭

蕉、野果、野菜及煮皮带、皮鞋充饥，加之蚂蟥吸血，蚊虫叮咬，回归热侵袭，瘴气夺人生命，官兵死亡枕藉，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杜聿明亦染重病，几乎殒命。旋又奉蒋介石命，于7月25日，杜率部撤至印度雷多。

△　行政院为维持民间交通计，决议拨款8000万元交运输编制局发展提炼桐油事业，并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供给大量桐油提炼代汽油。现主管当局正进行建厂工作，三五月后，川省将有25个炼油厂，出产大量代汽油，供给后方运输之用。

△　国际自由世界协会是日在纽约召开大会。32国代表140余人出席。中国学会会长李毓英发言，主张成立全球同盟国家总部，展开全球对抗轴心的宣传。

△　中央社报道：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前后在中缅境内共击落、炸毁日机300架，航空队损失飞机15架，死亡12人，伤四人，日空军人员伤亡200余人。

△　是日为国家总动员宣传周工商日，重庆工商界特通电拥护《国家总动员法》。晚，孔祥熙发表题为《工商业与国家总动员》的广播讲话，动员工商界人士处处以抗战建国为前提。

△　浙江平阳县潘寿年捐资兴学达13万元，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常驻会第六次会议报告1941年以来五个月的政府工作，提出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为：一是搞好第二次编整，二是加强农业建设，三是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四是整顿学校教育，五是加强自卫军的训练。

△　防守在惠通桥东岸高地的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在迫击炮火掩护下攻击部队发起冲锋，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日军除有20

多人泅逃回西岸外，其余200多人被消灭。惠通桥一战，打击了日军继续东进的企图，确保了保山这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　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

△　汪精卫在长春会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并出席溥仪举行的欢迎午宴。汪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他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两国”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

5月9日　　新四军为发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以第五师第十四旅一部渡长江南下，在咸宁地区的西冷、桂榜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另一部在黄石地区的龙角山、大王殿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

△　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奉命率部于18日抵孟拱，19日进入野人山，经17日艰苦行程到达麦通，与敌遭遇，副师长胡宾义战死。旋该师经葡萄，翻越高黎贡山回国。

△　日军在太原成立“四期强化治安实行委员会”，下设总务、宣传、治安、厚生四部，在各县也设同样组织。强化中心是巩固平川占领区和加强奴化教育。在占领区各村设密探一人，每五个密探组成一个“情报站”。

△　是日至次日，日军对冀中的“扫荡”兵力增至两万余人，并封锁了环绕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献县中心区的滹沱河、滏阳河、德石路、沧石路，构成“铁环阵”；在滹沱河与滏阳河沿岸的重要渡口建立据点，完成了对冀中中心区的包围圈。冀中各军分区未能突破敌之包围，陷于被动局面。

△　侵缅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攻占吉鲁车站。10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部抵杰沙与新三十八师一部激战。第五军军部在印道，第九十六师抵孟拱，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主力均向印道急进。

△　晨，日机16架分七批袭赣，8时在玉山投弹。同日，日机窜入滇境，一架侦察机被击落。

△　伪满洲国政府在长春召开大会欢迎汪精卫。汪在会上讲话称：中、日、“满”三国为担负东亚共荣的使命，要协力同心地干下去。11日，汪结束在伪满的活动，回到南京。

5月10日　中国政府通知各国将经由普通邮路寄中国后方各地之邮件，改由苏联及新疆转递，寄沦陷区各地者均由苏联及关外转递，航空邮件则经加尔各答由渝加线内运。

△　是日为国家总动员宣传周新闻宣传日，陪都记者联谊会举行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动员新闻界要奉行《总动员法》。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作题为《国家总动员的前锋》的广播讲话。

△　南洋华侨协会在渝成立，孔祥熙为名誉理事长，吴铁城任理事长。

△　粤北曲江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机关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南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被捕，张不久被杀害。

△　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是日到达米咱，得知密支那、八莫等地已被日军占领，经上述地带回国的路线已被切断。同时该师第一一三团正在卡萨苦战，后卫第一一二团在温佐陷入重围。师长孙立人果断决定回师温佐，歼灭尾追之敌，解救第一一二团，于是主力迅速南下，再返温佐外围，与包围第一一二团的日军发生激战，日军措手不及，新编第三十八师内外夹攻，战至一天一夜，打退了日军两个联队，毙敌800余人，第一一二团安全突围。

△　侵缅日、泰军混合步兵千余、骑兵百余在飞机掩护下，向远征军驻地红勒、孟戈间袭击，另一部向猛海攻击，战至11日晨，远征军刘观隆支队不支撤退。晚，第六军电饬暂编第五十五师由孟色特向

猛海急速前进。

5月上旬　社会部与经济部决定完善工商业基层组织，在全国推行同业公会编组法案，由社会部派书记一人，经济部派督导员协同整理。如当地有不同业三家以上者，必须加入当地商会。

△　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指出：华北敌后抗战形势极为严重，要克服悲观情绪，提高坚持敌后抗战信心；要积极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要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6月22日，中共中央向华北、华中各战略区转发北方局的上述指示。

△　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将加紧军事反共，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速调大军准备给胡宗南以迎头痛击，“只有打得痛，才能使他知难而退”；同民主势力、地方势力、国民党中的联共势力结成联盟，一旦内战扩大，他们即“有机可乘来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7日，收到毛泽东复电：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给进攻者以痛击，已组联防司令部。

△　日伪军“扫荡”南乐、清丰以东地区，安设据点16处，占去范（县）观（城）中心区西部大块地区。同月，郓城、鄄城敌人向北“蚕食”范（县）观（城）中心区，并修筑郓（城）鄄（城）公路和郓北大堤封锁线，构成对中心区南面的封锁。

5月11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战时管理进口出口物品条例》，并废止《查禁敌货条例》及《禁止资敌物品条例》，对进出口政策作了重大改变。新条例规定：凡属军需物品、日用必需品，均一律准予进口；关于出口物品亦作了调整，扩大出口种类。

△　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例会决议，派组织部副部长马超俊兼任党团指导委员会委员。

△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举行第六次大会，议长康心如、副议长文化成等出席。吴国桢作政府工作报告。19日，选出参政员龙文治、胡仲宝、潘昌猷等三人，选汪云松、李奎安、漆中权、周钦岳等为驻会委员，并通过议案多件。

△　重庆《大公报》讯：教育部宣布，本年大学招生将分区举行，全国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划分为10个区，各区指定一所大学为召集学校。关于考试录取及分发学校等事项，均由各区自行办理。

△　新四军彭雪枫师进攻苏北沭阳东伪军据点，毙伪军60名，缴枪百余支。

△　是日起，日军对冀中开始第二期“扫荡”。敌7000余人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地区；另一部8000余人合围深县以南地区。12日，敌又以万余兵力合围武强、饶阳、安平和深县地区。敌每次合围，都以五六架飞机配合侦察和轰炸扫射。日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亲临督战。13日，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陆续突围。坚持中心区斗争的部队，依靠群众，利用地道，坚持斗争。

△　日第十三军在杭州设立浙赣作战指挥所。

△　日军陷滇西腾冲。

5月12日　国民政府任命李铁铮为驻伊朗特命全权公使。

△　军委会参谋团接蒋介石11日电令：日企图截断第五军与国内的联络线，希将惠通桥西岸敌人击退，可将预备第二师的一团或二团开腾冲，以掩护第五军。军委会参谋团当即转饬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遵照执行。宋即调部队反击，以收复龙陵与腾冲。22日，第三十六师渡过怒江，23日开始攻击，因缺乏重武器，攻击未奏效，留置游击队于怒江西岸，主力改守怒江东岸。

△　军事委员会电令远征军第六军主力仍留景东地区，暂编第五

十五师撤回思茅、宁洱（车里北方）整理。

△　《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伪在华北不断增加税收，据敌伪公布的统计，本年度3月份征收统税一项即达148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62万元。其中卷烟税1044.9万元（比去年增加174.1万元），棉花税126.2万元（增加92万元），通行税67.3万元（去年没有）。

△　上午10时，日机四架窜入浙江衢县，在城郊投弹数枚。旋又窜建德县境，其中一架因发生故障，被迫降落，驾驶员一人自杀，二人被击毙。

5月13日　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战时火柴专卖暂行条例》。

△　财政部与四川省政府为使川省各县田赋负担公平起见，决定利用土地陈报成果，征收本年田赋。现全川除雷马屏等25县多属边瘠，产粮不丰暂行缓办外，其已办及正办土地陈报县份为111县，财政部孔（祥熙）部长特手谕主管机关从速赶办，限期8月底一律完成。省政府张（群）主席亦经令饬各该县长负责推进，以便如期开征。

△　国民政府通缉汉奸令：谢仲复、麦坚石、周学昌、刘仰山、吴应培、王志刚、吴天憾、顾惠公、陈伯华、燕玉堂、潘心如、夏郁华、张四维13人。

△　行政院举行记者招待会，由经济部次长潘宜之宣布该部要扶植东南工业，拟由沦陷区新撤回之人力、物力重建若干新工业据点；对现有工业予以资助、扩充；对于各地半机械工业及工业合作社则由地方当局扶助。

△　中英文化协会举行盛大游园茶会，招待外宾及中美文化协会会员。会长王世杰主持，到英国大使薛穆，美国大使高思，苏联大使

潘友新，澳大利亚公使奥格斯顿，土耳其代办戴伯伦，捷克公使米诺夫斯基，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布鲁斯，荷兰军事代表团团长泰门及各国驻华使馆馆员等。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敌后根据地实行义务兵役制问题的指示》，指出：今天在敌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必须慎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现在农民的政治觉悟，是否能够接受；二、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着想，是否会发生困难；三、是否会发生大批青壮年向敌区逃亡的危险。目前晋察冀所实行的自愿义务兵役制，主要精神着重于自愿原则，而不是着重在义务制度，其他地区暂不宜仿行。目前各地应着重认真实行精兵简政和努力发展不脱产的民兵。这是长期坚持根据地应当切实执行的方针。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任命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关因病休养，由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治委员。联防军直辖第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第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各兵团从5月21日起即与联防军司令部直接发生关系并接受其命令。

△　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一部到达密支那附近，主力向孟关转进，18日抵达孟关。同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曼西北的南利特，新编第三十八师抵曼西。

△　新四军皖中行政公署成立。

△　冀中第二十二团三个连、第十七团一个连和藁无县大队，由第二十二团团长左叶指挥，在无极县东北之小吕、王村、王先村，伏击日军加岛大队长率领的步、骑兵500余人及伪正定道尹率领的视察团，经40多分钟激战，共毙伤加岛及伪道尹以下180余人，八路军无一伤亡。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九团和祁县独立营各一部，在白晋铁路上子洪口设伏，毙日军中队长以下30余人，毁汽车五辆。

△　苏北淮阴日伪军500余人向三岔、南新集进犯，中新四军伏击，毙日伪军大尉以下250余人，活捉五人，缴获一批枪支。

5月14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交通部在港殉职员工：交通部专门委员兼购料审价委员会委员谢奋程、财务司帮办兼驻港代表汪仲良、技士邹越、港库运务股主任石寿颐、驻港材料司采购处技士毛文钟。

△　行政院决定拨款100万元，救济归国文化界人士。

△　重庆《大公报》讯：中国滑翔总会拟于是年“双十节”向全国各界劝募滑翔机500架，重庆捐300架，各省捐200架。该会主任委员白崇禧是日举行茶会，动员工商界和银行界积极捐购或认购。

△　自实行火柴专卖后，厂商因存货堆积，资金周转困难，核价过低，亏累甚巨，江北复兴、重庆重华等20余厂相继停产。

△　川省出口之生丝、猪鬃等因太平洋战争影响，销路断绝，川康兴业公司特向丝业公司投资1500万元，并将小型猪鬃经营厂家合组成立四川猪鬃公司。

△　日军第十六混成旅团军八十五大队700余人，在村川大佐率领下沿岚兴公路袭八路军晋西北兴县地区党政机关。贺龙指挥小部队沿途袭扰，诱敌深入。17日，敌进占兴县。

△　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先以7000余人“扫荡”太岳南部地区，继而集中2.5万人“扫荡”太行北部地区，最后又以1.2万余人“扫荡”太行南部地区。根据地军民奋起反“扫荡”，经38天奋战，歼灭日伪3000余人。

△　晨，日机两架窜入浙江兰溪，在郊外投弹10余枚。同日，日

机六架空袭江西玉山，在火车站附近投弹。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特派褚民谊为访日特使，杨揆一、任援道为副使，赴日本祝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6月8日结束在日活动回到南京。

5月15日　浙赣会战开始。日大本营决定发动以占据浙江各机场和打通浙赣路为目标的浙赣战役。是日，日军中国派遣军以二个军共七个师团约15万人，对中国第三战区实施东西夹击。同日，日第一飞行团开始攻击各中国机场，海军亦在温州湾及鄱阳湖行动。进攻浙赣线东段的日军为第十三军的第七十、第二十二、第十五、第一一六师团，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铁路及其西侧向西南实施攻击。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一部（共41个师约30万人），集中主力于浙赣线东段，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迟滞日军进攻，准备在衢州附近与日军决战。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听取外交和财政报告。

△　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在成都举行第五次全体常务委员大会，讨论中心以本年田赋征实、粮政、兵役、吏治等项为主，被邀出席者有川省主席张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粮食部长徐堪、次长刘航琛、川粮政局长康宝志、川康两省临参会议长等，于19日闭会。

△　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朱家骅举行茶会，欢迎迁川工厂及工商界人士加入该会，豫丰纱厂、上海机器厂等经理代表50余人出席。

△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电示配合冀中反“扫荡”的部署，指出：为有力配合冀中反“扫荡”，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扫荡”时间，决定以第一、第三、第四、第十一各军分区向石家庄至琉璃河段之平汉线展开有力破击。根据此指示，20日

至27日，北岳区和平西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地区全面出击，八天中共歼敌1200余人，攻克、摧毁碉堡39处，摧毁伪组织21处，俘伪组织人员370余人，平毁封锁沟100余公里。

△　山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公布《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前者规定：公、私租佃土地均须实行二五减租（即减原租额的25％）；已实行减租，但不及25％者，仍按未减租前之租额续减至25％。游击区及敌占区实行减租时，得低于25％。减租后，租佃者均须按约交租。本条例公布后，1941年1月30日公布的《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即行废止。后者规定：实行分半减息（即减年息一分五厘），债务人付息达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付息达原本二倍以上者，债务除销。同日，山东省战工会又公布《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凡21条。当天，中共山东分局给各级党委及组织部发出指示，指出开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群众运动，是今后山东全党的中心战斗任务。

△　远征军第六军综合各方情报，得悉各部队战况均告不利，该军三面受敌，乃向蒋介石、何应钦报告上述军情，当即批准放弃景东，退入滇南。第九十三师留后掩护，第四十九师撤至南峤，暂编第五十五师及刘观隆支队撤至车里，军部向车里转移，第九十三师最后撤至打洛，以担任中缅边境之防卫。第六军入缅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一部共7000余人，于是日开始对八路军（太）岳南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第三八六旅适时向北转移，使日军扑空。

△　日机19架分三批轰炸浙省金华城郊，投弹百余枚，死伤百余人，毁屋70余间。

△　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合并，统称韩国光复军，总司令为李青天，副司令为原朝鲜义勇队队长金若山，司令部暂设重庆。

△　英国援华救济会将募得救济中国难民、难童及伤兵款一万镑请驻华大使薛穆转交宋美龄。

△　伪满洲国与外蒙古签订《边境勘定议定书》，在哈尔滨正式换文，双方互相承认。

5月16日　川省本年度田赋征实及征购粮食事宜，川省府即与中央有关部门会商具体办法。粮食部长徐堪、财政部次长顾翊群、田赋管理委员会主任关吉玉是日由重庆赴成都，与川省主席会商一切。

△　张自忠上将殉国两周年祭及纪念碑落成典礼，在重庆北碚双柏树张上将墓地举行，冯玉祥主祭，贺耀组代表蒋介石致词，各界代表400余人参祭。

△　原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在渝病故。7月14日举行公祭，于右任、戴季陶主祭，朱家骅、陈立夫等数百人参加。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二十次政务会议，讨论政府各机关第二次编整方案，并决定编余干部以80％派往县、区为原则。还通过下列事项：一、米脂、葭县建立县务委员会；二、政府拨款10万元、粮800石救济退伍残废军人及各地灾民。

△　朝鲜独立革命党创始人之一、民族革命党负责人金白渊到晋察冀边区参观访问，彭德怀、罗瑞卿设宴招待。

△　日军对冀中第三期“扫荡”开始。是日至25日，对平汉、石德两铁路沿线地区进行突然包围袭击，由于八路军灵活转移，只发生一些遭遇战。从26日开始，日军又“扫荡”沧县、高阳、望都一带以南的冀中地区，摧毁由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三角地区根据地的设施。至6月20日止，日军对冀中的三期“扫荡”结束。总计“扫荡”地区约9000平方公里，杀死中国军民9098人。

△　日军进犯成武县小留集、黄楼一带，遭当地群众抗击受挫。

16日，金乡、成武日伪军在19辆汽车、二辆坦克配合下，分数路对黄楼、小留集、许庄、刘菜园一带村庄进行报复性“扫荡”，村民奋勇截击敌人。村民刘金端从楼上举起半个石磨扇将坦克砸坏，日军只好用另一辆坦克拖着被砸坏的坦克逃窜。

5月17日　西南联大伍启元、费孝通等九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一文，认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活动。后方经济社会的演变，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阶段，若不彻底解决，将失之过晚。

△　朱德、彭德怀致电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及全体指战员，勉励他们坚持斗争渡过难关，同时命令华北各战略区积极配合冀中军民坚持平原反“扫荡”战。

△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通告阎锡山，废除《基本协定》，采取自由行动。

△　浙赣战场日军中央队酒井兵团，于拂晓由萧山经临浦进犯，是日陷诸暨，23日陷义乌。其独立第一旅团沿浙赣路以西南犯，20日陷浦江，与守军第一〇〇军施中诚部第六十三师在高圣尖发生激战。

△　日军第六十九师团700余人占领兴县空城。18日，遭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七一六团及工卫旅迎头痛击。19日，我军将敌包围于兴县东南田家会，经两小时激战，除少数敌人溃逃外，共歼敌500余人，缴山炮一门，轻机枪六挺。

5月18日　行政院行政处长蒋廷黻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6月14日为“联合国日”，全国一律悬挂盟国国旗。

△　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双方就援华物资和缅甸局势交换意见。

△　国民政府派朱家骅为1942年第一次高等考试初试典试委员

长。

△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是日和20日先后发出关于冀中反“扫荡”指示，强调指出敌人此次“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对兵力部署、斗争方式等作了具体部署。

△　远征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奉命率部自棠吉北撤，经雷列姆西北温藻地区，进入野人山原始森林，旋抢渡南渡河，穿过曼德勒至腊戍的公路。是日，第二〇〇师通过细包至摩谷公路时，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两个大队遭遇，全师在密林中与敌激战，戴安澜身先士卒，指挥突围，腹部、胸部两处中弹，身负重伤。

△　驻防江苏常州机场的伪军一营300余名向新四军投诚。

△　浙赣战场第二十八、第八十八等军主力转移至金华、兰溪固守。日军迂回金兰坚固阵地，攻陷汤溪、龙游等地，并使用毒气作战。

△　日本人觉醒联盟山东支部及华北朝鲜青联山东分会，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驻地联合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宣言号召山东各地日本士兵和八路军共同抗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

△　日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从日本飞抵杭州了解战况，并指示第十三军：本作战结束后，须确保金华以东的占领地区；本作战最希望获得的物资是萤石和铁道器材。同日，第十三军指挥所由杭州移至诸暨。指挥所转移途中，其专用汽船溯钱塘江由闻堰左转进入到浦阳江的义桥一带时，被第三战区布放的水雷炸沉，炸死军官及卫兵11人。

5月19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一、财政部增设专卖事业司；二、河南省立水利工程专科学校改为国立；三、任命张廷休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四、任命林东海为驻埃及公使，免去其外交部参事职务。

△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举行茶会，欢迎归国侨领，刘维炽部长致欢迎词，司徒美堂等数十人出席。

△　重庆《大公报》讯：军委会政治部决定：各军政治部由该军副军长兼任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由该师副师长兼任政治部主任。

△　交通部与川省府议定，将建设厅主管之川江船舶总队划归交通部管理。

△　重庆临时参议会选举龙文治、胡仲实、潘昌猷三人为国民参政员。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电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揭露他正在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指出："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

△　日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于午后飞抵杭州，了解战况和视察战场。畑俊六特别提出两点：一是必须注意军纪，不能再出大事；二是在作战中要加强"宣抚"工作，努力造成和平气氛，以争取归顺者。日军第十三军参谋长报告中国部队有很大一部分由义乌、东阳南撤，越出了第七十师团和第二十二师团的迂回包围圈的情况。对此，畑俊六认为：此次作战已失去了围歼对方大兵团的机会。次日上午，畑俊六与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同乘运输机，飞至桐庐、义乌、东阳等地上空视察战场。下午返回南京。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一部共2.5万余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北部平定、昔阳等地开始"扫荡"。至24日夜，各路日军完成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

△　日军舰10余艘满载士兵，是日窜至闽江口外。20日晨，在炮火掩护下，向闽江北岸进犯，守军撤退。22日，日机数架袭击福州，

并在马尾、平潭等地上空轰炸。

△　晨，日机一架在桂林上空侦察。10时许，日机21架又侵入桂林，投弹20余枚。

5月20日　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在渝举行，校务委员陈果夫、余井塘、罗家伦、刘振东，教育长张道藩及师生1500余人出席。校长蒋介石致训词，略谓：要求国民党员推行主义不遗余力；对工作去虚伪求实在，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是日在成都举行，选出曹叔实、但懋辛、彭革陈、任觉五、陈志学、李琢仁、黄肃方、刘明扬为下届参政员；并讨论通过本年度四川省田赋征实数额为1600万市石，为抵补流滥不足之额，由省政府增加一成。于6月4日闭会。

△　重庆《大公报》讯：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邵毓麒就中国政府派遣林东海为首任驻埃及公使特发表谈话，称：我国遣使驻埃为中埃关系史上一创举，中埃两国同为文明古国，今后在宗教等方面可以交流，当今在反侵略战争中可互相支援。

△　邮政总局自昆明迁重庆办公。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及晋西北区党委，具体规定如下：一、该分局定名为晋绥分局，管理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工委、绥察工委三个地区党的工作，以关向应、林枫、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王达成、龚逢春、赵林、吴亮平等同志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关在病假期间由林代理书记；二、晋西北区党委以龚子荣为书记，除原有委员外，新增王德、谭政文、杨树义、武新宇、王逢原五同志为委员；三、分局与区党委暂行合署办公；四、晋绥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五、晋西北军政党委员会及晋西区党委名义取消。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北岳、平西部队，为配合冀中反“扫荡”，向平汉线及其西侧地区展开为期20天的全面出击。

△　浙赣战场日骑兵一部窜浙省天台，其主力陷新昌，经尖山、文安西犯，是日陷永康。23日陷乌义，向北进攻金华。

△　晨，日机四批共24架侵袭桂林，在西南郊投弹20余枚，毁房屋数间，在恭城县投弹三枚。

△　侵缅日军第十五军（辖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师团）结束夺占缅甸的战斗，转入防御。

△　汪伪财政部布告规定：即日起法币100元兑换中储券74元。至26日，100元法币只能兑换50元。

△　太平洋作战会议讨论中国战局。美方多主张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

5月中旬　　第三十七师师长史泽波为打破吕梁山南部日伪之封锁，向汾城之侯村、盘道、南西城、高庄等敌据点夜袭，激战彻夜，分别攻占各该据点。敌军增援，亦被其击溃，俘敌30余人。

5月**21**日　　远征军第五军连日冒雨北进，通过大森林，23日到达项巴。此时，蒋介石电令第五军：“未奉令不得入印。”杜聿明军长为安全通过国境返回国内，决定下令改道：以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一营在马兰监视敌人，掩护主力渡河，向清加林卡姆特方向前进，新编第三十八师渡过清得温河，向印境伊姆法尔前进。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整风学习、文艺座谈会等问题。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但我们应根据精兵简政、迁移多余资材、不误整风学习、不误农民生产等原则，进行必要的战

争准备工作。

△　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会议决议：一、拨款一万元援助由香港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并致电慰问。二、出版《边区文化》、《边区戏剧》、《民族音乐》等。三、设立“聂耳音乐奖金”及“美术创作奖金”，鼓励开展文化工作。

△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写《华中执行精兵简政指示的情况报告》，并向中共中央报告。《报告》回顾1941年冬季以来贯彻中央精兵简政的部署，并具体安排今后精兵简政的工作，同时指出在执行精兵简政指示中存在的各种倾向：片面强调裁减主力部队的错误；精兵主义只适用于华北，不适用于华中；许多机构仍未建立，如一切裁减势必影响工作等。

△　豫省鲁山县中和渠开始放水，渠长六公里，可灌溉农田8500亩。

△　浙赣战场日军大城户兵团与内田兵团，由上虞、汤浦镇和绍兴发起南犯，主力沿曹娥江两岸会攻嵊县，一部进犯东阳，遭第二十五集团军第八十八军何绍周部暂第三十二师的反击。是日陷东阳后，直扑金华，与守军第八十六军莫舆硕部第七十九师发生激战。

△　日机11架自晨至午分七批在江西玉山、进贤、临川、东乡等地窥察。

5月22日　重庆《大公报》讯：全国国库正在形成，除国家税收外，其余都纳入国库收支。全国各地已设立公库及由地方银行代理公库共达600余处。全国计划三年内设立1200个县库。

△　迁川工厂联合会设立工业经济研究所，由章乃器等主持，研究有关工业之法令、关税、劳工、保险、经济、金融诸问题，并出版定期会刊。

△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指出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使军事行动灵活便利。

△　陕甘宁边区医学会为纪念诺尔曼·白求恩，特设白求恩医学奖金条例，奖金额每年3000元。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太行军区第三分区部队在山西武乡张家沟北高地设伏，毙日军百余人，毁汽车10余辆。

△　晨，日机35架分批轰炸浙江永康、金华、衢县、江山及江西玉山。同日，日机11架分批侵袭江西吉安、南城（今建昌）、临川、东乡等地，并在新淦投弹。

△　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夫妇宴请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及常务理事，宋庆龄、于右任、孙科、郭沫若、陈立夫、王云五等出席。

△　美国威斯莱学院为纪念宋美龄毕业于该校二十五周年，与古轿学院、斯梯生大学同时授予她荣誉学位，由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代表接受。嗣后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大学、西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与但尼生学院亦授予荣誉学位。

5月23日　罗卓英经蒋介石批准到印度伊姆法尔与史迪威、亚历山大会晤，决定远征军向印度雷多附近输送，集结整训。

△　晋察冀军区颁发《实行新编制的命令》，指出新编制的基本精神是，明确划分主力军与地方军及其相互关系，紧缩机关部门，充实战斗部队，大量减少马匹以利于行动，使部队短小精干。是月底军区部队完成整编，新编为35个主力团、30个地区团，同时整顿和充实县、区游击队。

△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达延安，牛友兰任团长，刘少白、武润生任副团长。该团在延安访问55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党政领导多次亲切接见参观团。

△　冀中第六军分区指挥部和警第一团第二营，在深南王家堡、护驾地、陈二庄一带被敌“扫荡”部队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随军活动的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仁槐、警第一团政委陈德仁等不幸牺牲。

△　中国空军在金华上空击落日机一架。

△　从5月下旬开始，日军经过精心策划，集结重兵，对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进行疯狂的“铁壁合围”。是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向总部警卫连干部布置战斗任务，要他们率部配合第一二九师部队阻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

△　日军5000余“扫荡”河北衡水以北地区，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峻峰牺牲。

△　浙赣战场日军井出兵团在武内兵团掩护下，沿富春江西岸地区急进，攻陷建德。

5月2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社论，指出五个月来，华北敌后各战场上，展开了空前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华北日军现又调集数万兵力对冀中平原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以巩固其北进“兵站基地”。日军为配合军事进攻，积极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破坏县与县、村与村、根据地与沦陷区人民的关系，或实行怀柔政策，略施小惠，收买人心。社论号召人民必须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　“扫荡”太行区之敌对偏城西北十字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第一二九师在偏城东面西驼驼一带，同总部特务团在拐儿镇反击中毙

敌380余名。

△ “扫荡”南岳之日军于18日和是日两次奔袭合围沁水县东西峪地区，企图以“反转电击”战术捕歼太岳区主力部队第三八六旅。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一面指挥部队对敌作战，一面指示太岳区七专署组织三万人破击临屯公路张店（屯留）至良马村（安泽）段，切断进入根据地之敌交通干线。

△ 成都报纸报道：四川全省共有“七七”纺织机五万架，手摇单锭机20万架，多分布于嘉陵江流域及长江上游一带。

△ 甘肃湟惠渠举行放水典礼，渠口在永登县河嘴子，距兰州81公里，可灌溉农田三万亩。

5月25日 重庆市长吴国桢谈防空疏散，称市民疏散为目前市府要政之一，已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切实执行。据警察局报告，现已有四万余人疏散下乡。

△ 四川省上年度开展之捐献军粮运动已结束，共献黄谷5.4428万石，白米1163石，杂粮1509石，缴纳代金254.4775万元。

△ 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领该师开始撤退，于30日撤到印度境内。

△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青委，报告南方局青年组工作，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150人，已建立“据点”四个。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利用学生暑假开展调查，对留校同学进行启发教育。

△ 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等率领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继续从辽县麻田地区向东转移。转移中，被日军飞机发现，彭德怀、左权等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分路突围。左权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沿清漳河东侧向北突

围，令警卫部队掩护彭德怀等突出敌人包围圈后，继续冒着敌人炮火，指挥总部机关人员转移，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牺牲在山西辽县南艾铺附近十字岭上。6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悼念文章《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　新四军党务委员会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关于执行党的纪律的决定》，强调执行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接着全面深刻分析当时新四军党内在执行纪律方面的两种倾向：一是纵容错误的放任主义，二是滥用纪律的惩办主义。最后，对执行纪律的权限、手续与方法作了统一的具体的规定。

△　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的26位革命志士，赤手空拳，决死搏斗，夺了武器，冲出死牢，胜利地举行茅家岭暴动。

△　伪满洲国政府发布《关于国民优级学校毕业生募集斡旋之件》及《要纲》，决定从国民优级学校（高小）毕业生中募集矿工，使用十三四岁少年充当矿工。

5月26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令饬司法机关比照国家总动员法规定，严惩各级税务人员贪污以肃税政案》；任命马克强兼任商标局局长，原任程志颐免职。

△　国民政府公布《盐专卖条例》，对食盐的产、制、运、销，均严行统制。

△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会议选出参政员及候补参政员，计：曹叔实、彭革陈、陈志学、黄肃方、但懋辛、任觉五、李琢仁、刘明扬八名为参政员；朱之洪、邓和、王兆荣、谢伯诚、陈敬修、邓汉祥、廖学章、邱翥双八名候补参政员。

△　重庆《大公报》讯：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主编《四川工厂调查录》出版。该书披露：有确实资本之工厂计390余家。

△　远征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于是日，因伤重不治，在缅北茅邦村殉国。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29日，美国会授权美总统罗斯福，颁授戴安澜懋绩勋章。

△　浙赣战场日军大城户兵团陷汤溪后，主力沿铁路向南进犯，与守军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暂编第十三师及第二十五军张文清部第四十师先后激战。

△　日机30架轰炸浙江兰溪，又20架炸金华，投弹千余枚。同日，日机三架在新安江一带投掷毒瓦斯弹。

△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郭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晚叛变。次日，国民党特务逮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破坏粤北省委；30日，又在曲江逮捕廖承志。

5月27日　宋子文在美致电蒋介石称：是日晨，美国外交部面交关于租借器材案草约，名为《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条约除《大西洋约章》外，其余条款均与美、英2月23日所订协定相同，我方应予赞同，并授权签字。6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宋子文代表美、中双方在美国国务院签字。

△　行政院公布《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实施办法》。

△　经济部中央实验所所长顾毓琼在记者招待会上称：11年来中工实验所朝着三个目标前进：研究工业原料之自给自足；改进工业技术以求现代化；检验工业成品，以求标准化。现已建立17个试验室，10个实验工厂，四个工作推广站。

△　四川建设厅长胡子昂在省府纪念周报告称：省府决定拨款3000万元办理农田水利。

△　中美文化协会举行第三次演讲会，由郭沫若主讲《中国战时之文学与艺术》。认为中国的文艺，已改变了战前那种与现实脱节，

一味摹拟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的状况，“新的艺术到这时才生了根，旧的艺术到这时才恢复了它的气息，新旧的壁垒到这时也才逐渐地化除了”。

△　重庆《大公报》讯：上海沪江、之江、东吴三教会大学将迁福建邵武联合办学，教育部拨搬迁费30万元。

△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故。6月1日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

△　日军1000余人进攻河北定县东南的北疃村，进村后向地道施放毒瓦斯，800余名妇孺老弱全被毒死，造成“北疃惨案”。

△　日酒井兵团沿衢州以东两侧地区向衢州前进。日军各进攻兵团接近金华、兰溪一带。第三战区部队放弃金华、兰溪阵地。

△　周佛海发表声明，宣布禁止国民党法币流通。声明称：中储券定为统一通货，为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惟一法币，取消法币法定通货性质。法币以2：1之比兑换中储券。

5月28日　黔省临参会选出王亚明、马宗荣、黄宇人、张定华四人为出席第三届参政员。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三个问题：一、时局问题；二、整顿“三风问题”；三、延安文艺界问题。

△　周恩来通知郭沫若，政府近拟清查共产党员及左翼文化人士，请关照各同志注意。郭沫若当即邀集在渝的侯外庐、邓初民、张申府、王亚平、方殷、葛一虹、应云卫、郑伯奇、陈望道等人商议应付办法。

△　甘肃临洮县举行溥济渠放水典礼。该渠从1939年11月开工，工程费138万余元，能灌田3.5万亩。

△　防守金华城的第七十九师，从25日傍晚起在城内外与敌第六十一旅团激战三天三夜，给敌以很大的杀伤。但北路的敌第三十二师团28日已至寿昌西南的航头、志棠，第一一六师团已到达寿昌东南的唐村、诸葛；南路的第二十二师团已于27日进至龙游。金华正面、两翼及侧后均遭到迂回。为避免遭敌包围，第七十九师奉令于是日拂晓前与兰溪守军一齐撤离。敌即从金华城的东北角、西北角攻入城内，是日6时30分金华城被敌第七十师团第六十一旅团侵占。同日，日第十五师团占领兰溪。

△　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在兰溪城北约三华里的三叉路口处观察情况时，进入第六十三师的地雷区，猛然一声巨响，酒井被炸成重伤，随即死亡。

△　八路军向晋东南长治以北挺进，消灭日军200余，毁飞机三架，汽车34辆，烧毁汽车库一座及全部营房。

△　华北《新华日报》社长兼总编何云、理论部主任黄君珏、国际新闻社特派员乔秋运等，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于山西辽县大羊角附近牺牲。

△　日军以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共4000余人，由阳城、王屋、邵源镇、垣曲、同善镇、张马村（翼城东南）出动，向东川村（沁水南）合击。豫晋边区领导机关适时转移。敌扑空后，即在李疙瘩、煤坪（沁水南）一带“清剿”。八路军外线部队积极配合反“扫荡”斗争，先后在皋落镇附近及垣曲至东石村（垣曲北）间伏击日军，并袭击沁水之敌，歼日伪军38人，俘伪军24人。6月15日，敌退回原据点。

5月29日　冀中第八军分区第二十三团团长谭斌、政委姚国民率该团第三营，在饶阳县东西张岗村被敌“扫荡”部队合击，激战多半天，伤亡严重，谭斌牺牲，姚国民等从敌人火网中冲出。

△　是日至6月5日，浑源县民兵在寒风岭等敌据点附近，大摆地雷阵，一周内炸死炸伤敌伪军10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山西潞城微于镇、林旺之间伏击敌汽车六辆，毙敌80余人。

△　宋子文电告蒋介石：美国已向中国交货的租借物资计有：一、枪械、子弹、飞机、通信及医药器材等6500吨；二、兵工材料、卡车及零件14.3万吨，铁路材料五万吨。

△　重庆《大公报》讯：中华职教社在四川松、理、茂、懋、汶一带推行边疆教育，决定先在灌县建立一所山村职业教育学校，提倡“即工即学”。该社负责人黄炎培亲临视察，决定一切。

△　汪伪国民政府访日特使褚民谊，副使杨揆一、任援道抵东京。6月1日，褚一行觐见日天皇，呈递汪精卫亲笔信。2日，会见日首相东条英机，面交汪的亲笔信。8日，结束在日的活动，回到南京。

5月30日　国民政府任命张彭春为驻智利全权公使，免去其驻土耳其全权公使职；任命邹尚友为驻土耳其全权公使。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击破敌人的经济掠夺与封锁》的社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期侵略战争中，不仅为兵源枯竭的难题所困扰，而且痛感战时物资的缺乏。敌人在华北的经济掠夺，也实行了更毒辣的办法。社论分析了日本侵略者对各抗日根据地经济政策的破坏的特点，提出了击破敌人经济掠夺与经济封锁的办法。强调粉碎经济封锁最有力的办法是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力，使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

△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建设厅长高自立兼边区政府秘书长，原任周文免职；批准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离职学习，遗缺由李木庵

代理。

△　毛泽东在鲁艺文学院对学员讲话，指出：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及民兵一部，在山西辽县苏亭设伏，毙日军140余人，缴获骡马80余匹，解救被日军抓去的大批民伕。

△　冀中警备旅一个半连、第十七团第一营一个连及晋深极县大队，相继转移到深泽白庄村，拂晓被敌“扫荡”部队千余人包围。八路军战士与民兵在张子明副营长指挥下，依托工事和地道，与敌激战一天，接连打退敌人五次进攻，于夜间胜利突围转移。这次战斗以我方20余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指挥官营泽大队长以下400余名。

△　日军大贺兵团是日晚渡过抚河，向东进犯，与第一〇〇军施中诚部第七十五师接触。6月2日陷进贤，3日占将军庙，6日陷东乡，9日占邓家埠，13日犯鹰潭。第七十五师除留一部抵抗外，主力向鹰潭以西撤退，15日鹰潭不守，16日贵溪失陷。由于第一〇〇军指挥不当，致使弋阳、横峰陷于混乱状态。该军向信河南岸一带转移。

△　日军右翼柴田兵团向抚河西岸梁家渡、市汊街阵地进犯，遭赣保纵队一部迎击，激战至6月1日下午，该纵队转移至三贤湖一带，4日下午在大港口附近发生激战。6日，日军增援猛攻，守军退至秀才埠一带阻击日军。

△　日军第二十二、第十五师团及河野旅团进至龙游以西地区，

准备进攻衢州。

△　日机17架侵袭桂林，在北郊外投弹20余枚。

△　华南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宣布准许中储券在华南地区流通使用。

5月31日　　杜聿明接蒋介石电："该军既到清加林卡姆特，应即向西印境或利多转移，暂时休息，不必再赴葡萄，以免中途被围。"杜遂遵令改道，经大洛、新平洋向利多前进。第九十六师经由孟关出发，经孙布拉板、葡萄，向国内撤退。

△　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原有救国团体宣布解散。大会通过会章、宣言、告东北同胞书、慰问前方将士书。选莫德惠、刘尚清等59人为名誉理、监事。蒋介石颁训词勉东北同胞收复失地。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一旅副旅长黄新友率领突击营奇袭日军长治（山西）飞机场，烧毁日机三架、汽车14辆、汽油库二座，毙敌90余名。

△　驻武汉的阿南惟畿第十一军两个师团，于是日在南昌东南分别渡过抚河，沿浙赣路向东进攻，以配合日军第十三军在浙赣路的第二期作战。

△　晨，日机九架在梧州侦察，又飞柳州城郊投弹。

△　汪伪国民政府公布《整理旧法币条例》及《民国三十一年度安定金融公债条例》，公债总额为15亿元。伪中央储备银行公布《收回旧币办法》。周佛海发表谈话称：整理旧币自6月1日起施行。该行设立旧币整理委员会，总办事处设上海，在各地设分会。

5月下旬　　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加·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

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居里，并附给居里的信一件。信中表明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说明现在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牵制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半数。提出为了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

△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南调冀中地区参加“五一”大“扫荡”。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军分区乘敌兵力减少之机举行反击，在沙坡峪（遵化城北）、甘河草、太平庄（均滦县城西北）、赵店子等战斗中，击毙日军田蒲竹治少将等多名指挥官，攻克野鸡坨、樊各庄、油榨、石梯子（均在滦县城北）等10处据点，粉碎了日伪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这次反“扫荡”共作战160多次，歼敌5500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是月　　教育部呈准规定9月9日为体育节，并颁发《体育节举行办法要点》，凡六条。《要点》规定：体育节前一周为宣传周，在节日应因时因地因人开展各项体育活动。

△　四川省政府密令各校，对进步学生可按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取消其学籍，由当地警察局押送至战时青年训练团（1941年10月1日在巴县兴隆场五云山成立，实为劳动营），对学生家属诡称奉令调训。

△　国民政府在重庆磁器口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战略服务局远东协调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次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在磁器口军统局办事处正式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国家总动员宣传提纲》下达后，有500余种报刊被查封。

△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九分校在江苏南通海复镇建

立。该分校是以抗大苏中大队为基础扩建成立的，归新四军第一师领导，由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

△　太行太岳军区以主力军一部协同地方军和边沿区的游击队，实行正面坚持；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和被“蚕食”的地区，开展军事、政治攻势，从是月至7月间共摧垮伪组织“维持会”1064个。

△　太行、太岳基干武装对平汉、白晋、正太等铁路全面破击，是月反“扫荡”克敌据点29处，破铁路40余里，炸毁火车三列，汽车27辆，平封锁沟墙90余里，摧垮伪组织347处。

△　中共晋豫区条西地委将康支队和第五、第九、第十支队及县支队统一整编，定名为“中条山抗日挺进纵队”，柴泽民为纵队长兼政委。

△　河北省无极县赵户村民兵在八路军两个连的支援下，利用地面村沿、房屋工事与地道战、地雷战相结合，在24天内打退了日军1000余人的连续四次进攻，杀伤日军200余人。

△　湖北省北部灾情严重，随县、宜昌等地饿死4000余人，灾民有70多万。

△　中国空军美志愿队发表第31号公报称：日驱逐机被击落24架，在地面的被击毁35架，另被击落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等30架。此外摧毁日军卡车78辆，击毁装甲车一辆。是月，我方损失飞机六架，飞行员五名殉职，一名负伤。

6月

6月1日　　蒋介石与宋美龄应美国陆军部之请，对美发表广播讲话。蒋称：我们有把握消灭敌人，但须盟国供给重武器。

△　蒋介石以兼理外长身份，会见印度驻华总代表沙福莱。10日，沙拜会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

△　粮食部在重庆召开全国第一届粮政会议，党、政、军代表70余人出席。粮食部长徐堪主持，孔祥熙致词，略谓：足食足兵为立国最重条件，田赋为国家主要税收，征购工作应格外努力，悉心工作。6月2日，蒋介石到会训话，称今年的粮政政策，在“平均”的原则下，地主富户应按累进率纳税。

△　粮政局在渝举行节约粮食与营养改进展览，展出各种农作物病虫害及人体营养成分的统计；儿童营养及儿童食物；杂粮与人体营养的关系；农业机械等。6月3日闭幕。

△　财政部决定恢复1939年停办之渝市票据交易所。是日，中央银行设立票据交换科，主要办理票据交换及银行比期存款利率等业务，以增强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的控制。

△　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举行国民月会，银行界人士千余人出席，由孔祥熙总裁、陈果夫副总裁主持，宣读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对财政、金融、经济、交通各界人员的训词。

△　中国银行在印度新德里及喀喇蚩两地设立支行，并在加尔各答设立分行。

△　财政部田赋整理委员会从是日起改组为田赋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仍为关吉玉。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英代表叶公超抵伦敦，10日对记者称：中国益感中英两国对于彼此交换战局情报一事有实行合作联系之需要。

△　中央推行注音识字运动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教育部、中央宣传部、海外部、中央训练委员会等九部、会代表参加。通

过委员会组织章程及推行计划原则等项。后因师资缺乏，注音教材及读物、注音符号的应用等未能推广。

△　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发布《反对敌之蚕食政策的指示》，指出：目前敌人正在“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的口号下，以政治伪化、军事清剿和经济上的严格配给制度，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全面的蚕食。我应全力开展对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粉碎其蚕食阴谋。为此，各级党委及各部队必须做到：一、加强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争取与动员广大群众；二、游击区不要大张旗鼓而要分散、隐蔽地进行，以便长期坚持；三、在敌占区主要是建立党的秘密点线工作；四、反对敌人的经济配给制度与对我区的袭击破坏和封锁。

△　延安市举行参议会，同意李景林市长提出的加强战备动员，整顿自卫军，加强行政机构，实行精兵简政等意见。会议强调贯彻“三三制”政策，于3日闭会。

△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建立。核校系由抗大第五分校改建，陈毅兼任校长。

△　浙江敌后守军在日军主力进犯浙西时乘机发起攻击，自是日起，相继克复寿昌、永康、浦江，18日一度克武义。日军内出兵团于19日再陷永康、武义，分路进犯丽水，与浙保纵队及暂第九军冯圣法部主力激战，于24日晚占领丽水。

△　日军陷江西弋阳。

△　日军中央高桥兵团由温家圳渡过抚河，向临川、浒湾、金溪进犯，第九战区第七十九军夏楚中部奉命驰援。3日，暂第六师先头部队于同源、展平与日军激战，该师派兵一部进守临川。4日竟夜巷战。5日，日军增援，陷临川、浒湾，8日窜犯崇仁，9日陷宜黄，并经棠阴向南城进犯。第七十九军争取外线要点，固守南城，至11日日

军突破我阵地，三面猛攻。12日，南城陷落。该军转向硝石附近整理，14日以后转移至万年桥南与日军对峙。

△　日伪军万余人对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当地军民及冀中军区一个团、回民支队等部奋起展开反“扫荡”斗争，历时40余天，歼日伪军2000余人，抗日武装亦遭受严重损失，牺牲干部百余人。“扫荡”后冀鲁边区形势更加恶化，根据地各区之间的联系被隔断。

△　日伪以德州为中心成立冀渤特别行政公署，下辖23个县，并将同蒲路的第四十一师团调到德州地区，以加强对河北、山东两省结合部的控制。

△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满洲帝国协和会义勇奉公队大学（学院、养成所）队则准则》，规定大学教职员、学生皆编入义勇奉公队，“担任广泛之国民防卫，特别着重于警护和奉仕”。

6月2日　　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中美两国政府关于适用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法案所认可及规定之互相援助以执行抵抗侵略战争之原则协定》（简称《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或《租借协定》）。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将继续以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己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美国政府；并对战后归还租借物资及补偿美国政府的原则作了规定。此协定奠定合作互相原则，以为共同对敌作战之基础。从此美国对华援助更由经济而扩至军事，决定租借给中国政府价值8.7亿美元的军用物资。

△　行政院例会通过下列各案：改善各省级机关员役生活案；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组织规程草案；限制医务人员自由辞职办法；派中国驻巴西公使谭绍华为拟订中巴友好通商条约全权代表。

△　晚，蒋介石以兼理外交部长身份，宴请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米

诺夫斯基、土耳其代办戴伯伦，孔祥熙、王宠惠、吴铁城等作陪。

△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刘维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携款350万元抵昆明，主持云南归国侨胞安置事宜。另滇省主席龙云决定拨公地交南洋归侨何葆仁、白仰峰在昆明郊外筹建华侨新村。行政院拨款100万元补助建筑。

△　四川省临参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主要讨论田赋征实案，本年征额为900万石，购额为700万石。

△　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　太行区出现严重旱灾。八路军总部发出训令，号召所属部队帮助群众挑水抢种。

△　日军左侧竹原支队开始集中舰艇向鄱阳湖沿岸及信河北岸地区窜扰，是日陷都昌。6日，另一部陷余干。9日陷黄金埠，15日陷瑞洪，16日陷余江，28日陷鄱阳。至此，鄱阳湖及信河水上交通完全被日军控制。

△　日机36架分批袭赣省东乡、丰城、鄱阳、吉安等地，并在玉山、上饶两地投弹。

△　晨7时半，日机八架自缅窜滇，在祥云附近扫射。9时50分，日机第二批若干架窜景东，被陈纳德飞虎队截击，日机逃去。

△　汪伪行政院例会决定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汪精卫兼委员长；任命陈耀祖兼广州市市长。

6月3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蒋介石、孔祥熙、

何应钦等出席，通过《违反国家总动员法惩罚暂行条例草案》，送立法院审议；《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要草案》五条，报告国防最高委员会。

△　国民政府在渝举行“六三”禁烟纪念大会。蒋介石昭告全国，谓：“烟毒与倭寇均为我民族最大之仇敌，抗战与禁烟同样重要，不容轩轾。”会后，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在较场口公开焚毁烟具。

△　粮政会议继续举行大会，贺耀组以总动员会议常委立场，对当前粮政提出数点，略称：关于征实，应按各省粮食生产总量决定每元田赋之粮数；关于征购，决用累进制。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关吉玉发言，强调财政与粮政合作。川康粮政局长康宝志称：四川去年粮食征购超收140余万石，其中超额者11县，十成者14县，八成五者45县，不足八成者六县。征购虽已逾额，但农民极为痛苦。

△　四川省政府一年来验收各市、县解缴烟土膏灰二万余两，除优质烟土解部外，其余夹料烟土并同市警察局缉存烟具，于是日在成都少城公园焚毁。

△　山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发布《奖励粮食入境及严禁粮食出口资敌暂行办法》，规定凡从敌占区运粮到根据地者，不受任何限制，不交关税。凡从敌占区运粮之粮商，根据地各地贸易局等帮助其解决各种困难。

△　新四军第一师在江苏海门三阳镇伏击日伪军，歼日军70余人，伪军100余人，俘日军三人、伪军30余人。

△　日第十三军按计划开始浙赣战役的第二阶段，攻向衢州。其军指挥所位于龙游西南的高地，当日，攻击前进约10公里。

△　赣东日军为策应衢州作战，于5月30日起集中兵力三万余自南昌渡抚河向东进犯，由浙东西犯之日军向衢州进逼。第二十五、二十

六、四十九、八十六军准备给日军以包围歼灭，旋接蒋介石电令：“第三战区应避免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统帅部下令第八十六军在衢州牵制敌人，其余各部队均撤至两侧山地，实行分段截击。第八十六军陷于苦战，工事全毁，于6日拂晓前突出重围，衢州遂陷。

△　美日海军在中途岛大战。是日晨，日军中途岛进攻编队进至中途岛西南约700海里处，被美机发现，当日下午遭到美军九架轰炸机的攻击。4日凌晨，美巡逻机在距中途岛220海里处发现日军航空母舰编队及正在飞往中途岛的108架飞机。双方在目标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日机八架被击落，美机26架除二架外均被击落击伤。日军派出飞机对中途岛再次轰炸，这时美军由三艘航空母舰派出五个机群向日军航空母舰发起攻击。日军四艘航空母舰被击中，先后沉没。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受重创，于6日自行炸沉。5日凌晨，山本五十六下令停止中途岛作战并向西撤退。美军旋即发起追击。6日，美军舰载飞机连续发起三次攻击，日军二艘重型巡洋舰及二艘驱逐舰先后中弹，其中一艘重型巡洋舰被击沉。6日晚，美军停止追击，中途岛海战遂告结束。中途岛一战使日军丧失它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和战略主动权，从此被迫放弃战略上的全面攻势。美军则取得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决定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盟军的不利态势。太平洋战争出现了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6月4日　　国民政府特派孔祥熙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副主席；立法院立法委员刘振东辞职，免去本职，任命吴经熊、简又文、全增嘏、叶秋原、罗运炎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　粮政会议讨论通过议案22件，重要一案为《各省分区规定合理粮价以利民生案》，要点为：一、应用经济方法以粮控价；二、应用政治方法实施管制；三、与粮价有关方面切实配合，同时并进。会议于6日闭幕。

△　史迪威谒见蒋介石，检讨缅战失败之原因。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1940年晋西事变到现在两年来的工作概况）。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给予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　八路军第二纵队并入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番号撤销，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代政治委员（后为苏振华）。

△　中共冀中区委和八路军冀中军区除留部分地方武装就地坚持反“清剿”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迅速转向邻区。至7月初，冀中区委和军区及主力部队一部转移到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另一部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冀鲁边区。冀中军民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日伪军一万余人，打破了日军消灭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但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被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敌据点增至1635处，封锁沟增至3000多公里。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共有五万多人。从此，冀中地区的斗争进入更加困难的阶段。

△　日军500余向冀中无极地区围攻，八路军两个连毙伤日军两名小队长以下200余人。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特任命汪曼云为行政院政务委员。

△　汪精卫召开清乡工作会议，通过《清乡委员会进展清乡工作纲要》及《1942年下半年度清乡工作要领》，决定将清乡地区扩展至江苏全省及浙江和上海地区；7月1日在太湖东南地区实行第一期清乡，10月初进行第二期清乡；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特派陈公博为上海分会主任委员，李士群负责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

作，傅式说负责第二期。

△　伪满洲国为配合义务兵役制提出建立所谓“国民勤劳奉公制度”，强迫东北青年无偿服劳役。29日，伪满洲国民生部发布《关于勤劳奉公义务人选定要纲》、《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规定21岁至23岁未服兵役之男子，在此期间要参加12个月无偿劳役。并决定编成勤劳奉公队，设专门机构管理，“协和会”协助。

6月5日　　班禅活佛的继位人已在甲洼村寻得，名泽巴多杰，1938年生于康定县折多塘附近。

△　中国远征军集结于印度东北境整理补充，并掩护中印航运基地。

△　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和爱国志士，是日自上饶起程向闽北转移。

△　日军在北平成立“治安强化运动本部”，以统一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的领导。1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紧急物价对策”，并发布“推行物价政策”布告。

△　日军第三师团经与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一天一夜的激战后，于是日晨占领江西临川。

△　美总统罗斯福警告日本，如在中国或其他盟邦使用毒气，美将予报复。按：日军在浙赣战役中，进攻建德、金华时，皆施用毒气弹。

6月6日　　是日为工程师节。中国工程师学会、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及工程师学会重庆分会在渝举行纪念会。工程师学会重庆分会会长徐恩曾报告开会意义。经济部长翁文灏提出“工业建国”的口号。孔祥熙要求工程师响应国家总动员，担起工程动员的责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欧阳岑对记者称：自抗战以来工业发明与制品已达500余件。

△　美国援华委员会主席霍夫曼在纽约宣布：为援华已募到500万美元。是日，印度人民援华捐款2.53万卢比寄往重庆，印度王公亦捐5000卢比。

△　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奉调回国，新聘顾问松井太久郎8日抵南京。

△　伪湖北省主席何佩瑢被日军毒毙。

△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国民储蓄会法》，9日公布《国民储蓄会法施行规则》。规定机关、学校、企业、市街村组织国民储蓄会，强迫东北人民参加储蓄会，推行储蓄义务制。

△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关于为充一般会计岁出之财源发行公债之件》，决定“政府为充一般会计岁出之财源，得于预算所定范围内发行公债”。据此，伪满可用发行公债办法，任意搜刮民财，充其“岁出之财源”。

6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的社论，指出由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连续不断地“扫荡”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之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我们要有在敌后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又要对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去迎接困难，克服困难。

△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党委按照延安精神，暂行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和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整风文件和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开展到全党。

△　经济部全国度量衡局在渝成立机械工业标准起草委员会，推杨继曾等为常务委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攻克襄垣五阳、潞城黄碾，毙伤日伪300余人。

△　日军3000余人向晋西北方山、静乐、汾阳一带“扫荡”。八路军晋西北第八分区部队与敌激战31次，毙伤敌450余人，15日击退敌人“扫荡”。

△　日军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占领衢州。

△　晨，日机34架分批自缅窜扰滇境，其中战斗机六架在保山上空以机枪扫射，轰炸机27架在滇、越边境侦察。同日，日机13架分四批袭赣，一架窜扰新喻等地，六架窜丰城投弹，六架分两批窜樟树投弹。

6月8日　　国民政府派驻巴西公使谭绍华为议订《中巴友好通商条约》全权代表。

△　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常委会通过该会组织条例及工作方针等，16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叶楚伧为主任委员，另设“指导”、“编审”、“稽核”各科室。

△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学习运动。并根据延安的经验，提出了九条办法。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至五个月。

△　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陕甘宁与晋绥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财政经济委员会，林伯渠、贺龙分任正、副主任。

△　周恩来得悉廖承志为国民党特务逮捕，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方方，作出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等六点指示。方方因南委电台受到袭击未接到此电，但根据急剧恶化的形势采取了疏散隐蔽措施，使南委干部得以脱险。

△　新绛之华灵庙由第十九军连长彭永祥率部守御，是日敌以数

倍之众来攻，至濒临危急之际，彭永祥挑选30余人以“活炸弹”向敌逆袭，彭连长以下24壮士与敌同归于尽，关系第二战区运粮要道之华灵庙乃得确保。

△　冀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第三十团、第二十三团第二营和军分区机关一部，于拂晓转移至河（间）肃（宁）公路以南之薛村（肃宁县属），遇河间、肃宁、献县、饶阳等多路敌人合击。在向北突围时，机关和部队伤亡惨重；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第三十团团长萧志国、政委汪威牺牲；分区政委王远音负重伤，拔枪自戕殉国。

△　日机51架分批在赣省上饶、樟树及赣东各县窥察。又日机22架，分三批轰炸上饶，并投传单。

△　伪满洲国特派大使张景惠抵南京。9日，汪精卫接见，并设宴招待。

6月9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任命谢寿康为驻梵帝冈公使；任命驻巴拿马公使凃允檀兼任驻洪都拉斯公使，原兼驻洪都拉斯公使沈觐鼎免职。

△　孔祥熙宴请各党派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左舜生、张君劢、沈钧儒出席，孔报告财政状况。

△　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渝举行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推马亮、英焕章、田雨时、谭文彬、陈士瀛为常务理事，马愚忱为总干事，洪钫、程烈、赵宪文、武尚权为副总干事。毕泽宇、王化一分任敌后工作委员会正、副主任，于斌、石九龄分任救济委员会正、副主任。

△　宋子文荣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　“扫荡”太行北部地区的日军南下，合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直属队等部，该部乘夜跳出合围圈。日军扑空后，于19日撤退。至此，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夏季反“扫荡”结束，历时38天，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

△　拂晓，定县、安国、深泽等据点之敌5000余人，分路合击沙河岸之东西城、赵庄、马阜才、大定一带，冀中第七、第九军分区机关各一部及第十七团（欠一个营）、第十八团和第二十二团两个连奋起反击。经激战后军分区机关及第十七、第二十二团突出重围；第十八团突围失败，伤亡惨重，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第十八团政委钟洲、副团长焦玉礼等牺牲。

△　上午，“扫荡”冀中之敌坂本支队300余人，合围深泽县宋家庄。八路军第二十二团两个连、警备旅第一团及第四十地区队共800余人，在团长左叶统一指挥下，据守村落抗击，坂本支队长被击毙。当日下午，敌从安国、定县、无极、深泽、安平陆续增援到1800余人，并施放毒瓦斯，八路军沉着应战，血战16小时，击退敌38次冲锋，后分两路胜利突围。这次战斗共毙敌400余人。

△　日军以20路梳篦队形向山西平顺东北之石城第一二九师直属队和新一旅合击，八路军在刘伯承指挥下突出重围，日军“扫荡”又告失败。

△　日机22架分批袭扰湘、赣，六架在衡阳投弹，另12架在赣州投弹，51架日机在赣境南城、上饶投弹。三架窜零陵、芷江、桃源各地窥察。

△　日军成立“财团法人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由日华北开发会社研究局长升泽德雄主持，资金200万元，主要探测华北资源。

6月10日　社会部公布：经该部调整、考核后的直属社会团体有224个，全国分、支会有2007个，地方团体有1653个。经该部批准近期成立的有：金融研究社（由黄墨海主持），中国俄文学会（卜道明主持），中国留意大利同学会（石孝先主持），中国战时社会问题研

究社（罗敦伟主持），中国印刷学会，中国妇女实业协进会（廖文英主持）。该部曾规定人民团体总登记限本月底结束，凡不合乎人民团体组织规程之团体或人民团体，虽已成立而无实际工作成绩表现者，该部均将令其撤销。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美对苏关系已转好，反苏力量日减”，“美战略方针是先打败德国，再反攻日本”。

△　13日为鲁班诞辰纪念。中国滑翔总会滑翔机劝募委员会工业界劝募队是日举行茶会，动员工业界认购“鲁班号”滑翔机，陶桂林、高云集当场认购两架。

△　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召集昆明市治安人员与各区乡镇长自卫大队等数百人训话，宣布实施全市大检查，肃清无业流氓。

△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西北建设学会及社会部组织“西北慰问团”，赴绥、蒙、甘、宁、青慰问。

△　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率参谋人员离保山回昆明。次日，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等40人抵印度新德里。

△　第三战区一部收复浙江义乌。

△　山西河津、稷山之敌千余人，于是日围攻稷山之黄花峪，该地由第八十三军李如意营守备，敌六次冲锋均被击退，窜入堡内之敌60余悉数歼灭，激战至次日拂晓，毙伤敌300余，我官兵阵亡15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配合太岳部队破坏敌人白晋铁路60余里，将沁县、长子、屯留境内伪组织全部摧毁，毙敌伪300余名、俘敌百余名。

△　八路军第三八五旅一部收复山西黎城县城。

△　日伪军对冀东“扫荡”结束。同日，冀东军区发布命令，决定展开反“蚕食”武装斗争，调第十二、第十三团大部由热河返回冀东，夺取被“蚕食”地区。

△　周佛海与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岸浪义质签订《关于向日本购买武器、被服等军需资材活期透支借款契约书》，总额为3500万元。

△　日大使重光葵在南京召开总领事会议，讨论实施日本对汪伪政府政策及增加重要物资生产，保证军需物资供应问题。

△　香港总督杨格爵士被日军押送上海。

6月中旬　　周恩来向三次前来拜访的戴维斯表示中共抗战决心。在戴维斯表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时，周恩来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

6月**11**日　　外交部情报司致电在美之宋子文、熊式辉称：在缅日军约10万人，其中2000人侵入滇省。现敌我在怒江隔岸对峙，我派队包围腾冲，另向龙陵随时攻击，日军无渡江北上企图。入缅我军，一部仍留敌后作游击战；另一部退入印度，控制入印大门。浙江日军约十一二万人，6日占衢州，继续西进。南昌方面约五六万人，南下攻东乡。日军企图攻占飞机场并打击我第三战区野战军，打通浙赣路，但我早有准备，随时切断敌人后路，前途可乐观。再，包头日军渡河南下，企图扩大蒙古边境据点。我方似仍应促英、美迅速援我飞机和重武器等，一面支持目前战局，一面准备对日反攻。

△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谈蚕丝外销，称蚕丝为外销物资主要品之一，近因浙江某地沦陷，浙丝收购不易，故川丝之增产愈加必要。本年度川丝增产计划，预计可达5000余担，以增强外销。

△　冀东军分区第十一团政委耿玉华率一部分战士由平西到冀东，途经平北赤城县境时，在长嵯山遭敌包围，血战到最后，率19名战士跳崖壮烈牺牲。

△　浙东日军攻陷衢州后，分两路继续西犯。以大城户兵团为左路，沿铁路西犯，是日陷江山；另一部向广丰攻击，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暂十三师抵抗不力，13日广丰陷落。以井出兵团为右路，沿常山港进犯，9日陷常山，是日陷玉山，与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激战后，15日陷上饶。7月1日，与由赣东进犯之日军合陷横峰，浙赣线被日军打通。

△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攻占江西余江。

△　日军集中1.2万余人，在冀县、枣强地区，对八路军冀南军政机关实行“铁壁合围”，八路军及时分散突围，未遭损失。但由于敌人疯狂“蚕食”和进攻，冀南区敌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猛增，至6月底，敌据点、碉堡增到708处，公路、封锁沟、墙总长达4886公里，形成据点、碉堡林立，公路、封锁沟、墙为网，冀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　晨8时许，日机四架袭长沙，在市区投弹，毁民房数间。国民日报社中弹，毁房屋数间。

6月12日　江苏省江都县长陈中柱率队御敌，为国捐躯，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中缅文化协会为响应印度对缅宣传周及欢迎缅甸朝野人士来华，特请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等，对印度和缅甸发表广播讲话。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确定边区政府机构的合理原则

是“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从这一原则出发，重新确定各厅、处的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

6月13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华北、华中斗争极其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

△　据四川农改所统计：川省小麦种植面积1939年为1652.9万亩，今年增至2013.9万亩；1939年产量为2005.9万市石，今年增至3243.5万市石。

△　第三战区部队收复浙赣路北之常山。

△　吕正操、黄敬率冀中军区、党委、行署领导机关一部及第二十七团（两个营）从冀中区转移至冀南南宫、威县之间的掌史村，被日伪军1300多人包围。八路军依据临时构筑的工事与敌血战，当夜胜利突围转入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役共毙伤日伪军300多人，八路军伤亡90多人。这一胜利，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

△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一部及伪军共4000余人，对苏中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剿”，杀害抗日群众，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新四军第一师主力适时跳出敌之封锁区，转移至南通以西地区。6月24日，新四军军部统一部署第二、第三师及第十八、第二旅对当面的日伪军展开破袭战，策应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在一个月反“扫荡”斗争中，第一师共歼敌2000余人。

△　日军第三师团攻占江西南城。

△　晨，日机18架袭桂林，四架被我空军击落。

△　重光葵在南京召开兴亚院联络部长会议，讨论对汪伪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问题。

△　汪精卫抵广州视察，14日接见德国、意大利两国驻广州总领事。15日，伪广东省政府举行欢迎大会。汪在大会上讲话，声称要继续坚持和平反共建国的主张。21日回到南京。

△　韩国外务部长赵素昂在渝招待新闻界，要求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美劳工联合会主席葛林、美国工业团体代表大会会长莫雷、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白特勒、米歇尔大学校长鲁士文、哲学家杜威等，在联合国日之际向中国人民致电，祝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中国劳动协会、中华海员工会、全国邮务总工会、重庆市总工会复电美国劳工联合会致谢。另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向中国妇女界致意，宋美龄代表中国妇女复电致谢。

6月14日　是日为联合国日。重庆各界万余人举行庆祝大会。林森、宋美龄、于右任对国外广播。外交部举行茶会，蒋介石兼理外长招待外宾。晚，13个国际文化团体举行盛大晚会，欢宴外宾。

△　蒋介石与英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于联合国日互电志念，表示砥励之热忱及抗敌之决心。同日，中国远征军在印度新德里同英、美、荷军队参加联合国日阅兵典礼；印督林里资哥欢宴英王弟，罗卓英将军应邀赴宴。

△　财政部决定自今年7月1日起，法币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所有已印未发之法币亦移交中央银行发行。各省及地方银行所发小额纸币，按财政部7月14日颁布的《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由中央银行接收，不得继续发行。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干部训练班第四期学员举行毕业典

礼。蒋介石亲临主持并训话，训勉革命青年应确立奋斗服务的人生观，坚定对主义的信仰，领导全国青年，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　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表示愿为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　远征军第五军直属队及新二十二师向利多转移。7月3日到新平洋，官兵已断粮六日，仅新二十二师因饥饿死亡的即达2000人。7日，美机在新平洋空投大米及药品以救急。7月25日，抵印度东部阿萨密省的雷多附近。

△　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于5月下旬从孟关出发，进入野人山，人饥马困，又有毒蛇猛兽侵袭，沿途失踪者达800多人，是日抵葡萄，尚存3000余人。副师长胡义宾以身殉国。7月27日接蒋介石电令：“该师即由葡萄向维西东归。”该师由阿普塔翻越高黎贡山，经维西于8月23日到达滇西剑川休整。

△　印度国民大会领袖甘地致函蒋介石，对中国人民为求国家之自由与完整而英勇战斗与无穷牺牲，深表同情与钦佩；声言决不致以牺牲中国自由而换取印度自由，及保证愿以印度为抵抗日人侵略之基地。

△　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占领江西广丰、上饶。

6月15日　蒋介石在重庆黄山接见史迪威，史再次提出整改军队问题，称：“根据训练华军10万人之原议，美国实愿负完全责任以训练之，配备以在印度可得之大炮等武器，供给以营房及医药设备，并希望得升降黜陟之全权。”因此议涉及到军权，蒋未置可否。

△　孔祥熙在中枢纪念周讲述各种专卖条例要旨，主要是提高产品质量和标准。

△　重庆中央党政机关公务员生活必需品定量分售是日起开始实

施。物资局长何浩若发表谈话称：定量分售之物品有煤、油、盐、布四种，比一般售价低10％至20％，使公务员不致因物价波动生活受影响。如事实上物价仍上涨，可增加生活补助费。

△　重庆市居民登记处成立。规定凡市区儿童年满13岁均应登记，办理身份证；外侨居留市区者，办理身份登记手续；凡来往过客出入市区者，须由原居住地的警察机关或乡镇公所领取证件，方可出入。7月17日吴对记者谓：居民身份登记在世界各国早有先例，在我国则为创举，计划四个月内办完。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吴树勋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王瑞麟为副厂长。

△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报告敌后反“蚕食”斗争的严重形势，提出裁并领导机关，向延安输送、积蓄干部的建议。

△　是日至7月底，冀东军分区主力部队从长城外热河地区返回冀东，发动了以打日军为主的“青纱帐复仇战役”。具体部署是：第十二团两个营负责恢复迁滦丰地区；第十三团两个营恢复丰玉遵地区；两部主力会合后共同恢复丰玉宁地区，其他部队和各县基干队分别向滦河以东和北宁路以北广泛出击，破坏敌交通，袭击敌据点，配合、策应主力部队在中心区之作战。此次战役共作战50余次，毙伤日军大佐以下官兵696人，毙俘伪军团长和伪县长以下伪军975人。被敌“蚕食”的地区，除玉田、蓟县南部和迁滦丰第一区以外，全部恢复。还为开辟滦河以东、北宁路以南地区创造了前进阵地。成立以丁振军为书记的中共路南工作委员会，根据地人口发展到279万人，主力部队发展到5090人，地方武装达1920人。此役受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通报表扬。

△　浙赣铁路8000余名工人在奉命撤退时，将沿线所有桥梁、涵

洞200余处全部破坏，牵制了铁路沿线日军及伪军的调动。

△　日机二架轰炸广东海康、徐闻等县，死伤20余人。

△　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苏北行营调集伪军在南通、海门地区进行“清乡”。

6月16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本年度粮食库券条例草案》，规定自7月1日起分别省区发行，至1944年起分五年平均偿还，每年以面额五分之一抵缴各该省田赋应征之实物，1948年全部抵清。

△　中央军官学校举行成立十八周年纪念及阅兵典礼，蒋介石训话，略谓：本校教育方针要使学生能自治、自动、自强、自爱，学校宗旨为人人能够“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　国立中央研究院设有奖金四种：一、杨铨奖金，主要授予对社会科学有贡献者；二、丁文江奖金，主要授予对生物科学有贡献者；三、李俊承奖金，主要授予对工程学有贡献者；四、蚁光炎奖金，授予对泰国、越南、缅甸、马来亚等国历史、地理和文化有研究者。本年度获奖者，杨铨奖有全汉升、张子毅、严中平，各得1500元；李俊承奖为武鼐，得2000元；蚁光炎奖为许云樵，得2500元，姚柟，得1500元。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对军队整风作出具体原则规定：一、利用战斗空隙进行学习和整顿；二、力求在营以上干部中首先学习整顿并收到成效；三、集中时间学习整顿“三风”文件。

△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在华池、定边、清边、志丹四县交界地区划一新县，命名为吴旗县，归三边分区管辖。

△ “扫荡”太行南之日军转向山西陵川、河南辉县、林县地区“扫荡”国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命令新一旅及太行军区第四、第五分区策应友军作战。当天，驰援太南友军的第一二九师一部一度收复林县县城。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出训令，号召部队在战斗的空隙切实帮助群众春耕，并公布部队1942年的生产工作计划：生产标准按人数计，旅以上机关每人生产100元，团以下每人生产50元（包括节约在内）。

△ 日军一部窜江西丰城、樟树，是日陷丰城、樟树；另一部窜至永泰、石口附近，被第五十八军孙渡部阻击。同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占领鹰潭、贵溪等地。随后，中、日双方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等地进行反复争夺。

6月17日 国民政府特任万福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命谢寿康为驻罗马教廷公使、凃允檀兼驻洪都拉斯公使。

△ 全国银行、钱庄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至是日止，共375家，计缴款1.39亿元。

△ 是日为农历端午节，全国慰劳总会发起劳军运动。重庆各机关、团体及学校组织群众，携带礼品，前往医院慰劳伤病员及军属。

△ 农民银行在川省所放农贷，总额已达二亿元，今年农田水利贷款为2900万元。

△ 四川省政府公布征收房捐章程，规定全川各县、市凡居民超过100户的乡镇，一律征收房捐。

△ 第三十四军第四十五师师长王凤山在山西万泉县西张瓮村率部突围时中弹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进驻山西辽县麻田镇。

△　晋豫行政办事处成立，18日正式办公，管辖中条山地区。自1941年国军从中条山撤走后，八路军、决死队南下开始建立抗日政权。经各界积极筹备，于是日在阳城召开成立大会，太岳支队政委聂真出席会议。

△　是日至23日，晋察冀边区召开首次自然科学研究会，边区工农矿业、军事工业、医学界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和各界代表，以及国际友人、物理学家班威廉、原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印度医学家柯棣华、奥地利医学家傅来等100余人出席。会议决定成立“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选出陈凤桐、刘再生等五人为常务理事。

△　赤石暴动。16日，上饶集中营被囚人员抵达福建崇安县大安宿营。是日下午，被囚人员在崇安县赤石镇崇溪河畔等待过渡时，暴动领导核心决定发起暴动。先行过河的第一、二、三、五中队都已由特务、宪兵押走。当第六中队80多人过河后，在王羲亭率领下举行暴动。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除13人牺牲，多数人摆脱了特务的追击，冲上山岗，奔向武夷山。暴动战士由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接应，与茅家岭暴动出来的战友会合，在武夷山打游击。9月，战士们重返皖南，回到新四军。

6月18日　蒋介石密电在美国的宋子文和熊式辉（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说明对史迪威的看法，略谓：中国战区至今未有何组织，亦未筹备进行，史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

△　孔祥熙与其妻宋蔼龄欢宴空军美志愿队陈纳德少将、毕索尔准将及全体队员。宋蔼龄赠陈纳德指挥官刀一口。

△　冀中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王长江、政委旷伏兆率警备旅机关和警二团向冀鲁豫地区转移，行至冀南馆陶县北阳堡村时，遭日军一个联队包围。八路军依据村落坚守，击退敌数次进攻。战斗中，敌又从

馆陶、邯郸调来援兵，兵力达5000余人，10倍于我。八路军乘夜突出重围。此役毙伤敌380余名，包括毙日军联队长、大队长各一名，我方伤亡80余人。7月上旬，王长江率队到达冀鲁豫军区范县一带，与吕正操、黄敬所率之冀中领导机关会合。

6月19日　财政部曾通令严禁贪污，是日复通令严饬所属人员奉公守法，“如有违背，即予严惩”。20日，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指示所属不得利用职位，图谋私利。

△　教育部召开农业教育委员会，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推进计划，决定将全国划为16个农业区，分区设置农学院；并通过提案20余件，20日闭会。

△　重庆《大公报》讯：教育部为改进边疆教育，决定增加边教师资；边疆学校改国立，派王衍康接收；增设大学先修班、高中预备班、初中预备班，成立就业指导处，专办边疆青年升学、就业、训练、考核等事项。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三项议程：一、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政权工作）。二、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纪念“七七”五周年宣言的内容，应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明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战后建国的主张。三、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的学习运动，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

△　周恩来就国民党在西北布置反共军事行动、廖承志被捕和桂林《新华日报》分馆被封事，质问刘为章。刘否认西北的反共布置，对后二事答应转告何应钦查明。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称：一、蒋原拟于三四月反共，由于日本

的攻势和国际形势对苏有利而暂缓，加上联络参谋到延安发现我已有防御布置遂作罢。估计白崇禧将先从宁夏作局部挑衅，发生冲突后即造谣向我进攻，如国内外舆论没有反应，则有可能从南面进行冒险进攻。如我“应付得好，还可挽救”。二、根据蒋最近抗日消极和制造八路军南下的谣言，估计蒋的中心意图是挑动日本进攻苏联。蒋目前不敢投降，也不敢放手内战。我们应力争把抗战坚持下去，发生投降和内战都极不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方任何让步不能生效。蒋已企图消灭我大后方组织，因此对突然事变的发生，不能毫无警惕和防御。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讨论落实边区参议会扩大常驻委员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并对今后工作决定如下：一、军事第一，一切工作服从战争；二、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克服太平观念与忽视战争的思想；三、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人民的情绪与需要；四、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实现事权统一，行动简便，提高工作效率；五、改进司法工作。

△　宪兵队在福建崇安县对上饶集中营第三中队和其他中队的所谓“顽固分子”，以及暴动中被抓回的薛克凡、瞿淑、何永雄、蒋仁坚、骆其峰等50多人进行集体大屠杀。

6月20日　粤省主席李汉魂当政五年，推行庶政，甚为积极，蒋介石特致电嘉勉。

△　国立体育专科学校于去秋在江津奉令筹办，教育部为加紧培养体育师资起见，特拨经费30余万元，将该校改为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要求在纪念“七七”时庆祝苏、英、美协定的签订，加强全民族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并决定在延安举行追悼抗战死难将士大会。

△　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二十团一部，于涞源县沙河驷伏击日伪军，激战六小时，毙伤敌120余人，俘伪军10人，缴获机枪七挺，步枪60余支。

△　中共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司令部、新四军第一师师部联合向所属各单位发出《关于反“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们这次反“清剿”斗争的总方针，是立即全面动员，团结党、政、军、民，开展反“清剿”的群众运动，以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坚持苏中斗争，争取反“清剿”的胜利。

△　日军对太行区南、北部和太岳区南部的大规模“扫荡”，历时38天，死伤3000余人，是日开始由太南地区撤退。

△　驻山西武乡段村之日军北川中队包围伪警察所，600名伪警察当场被缴械、逮捕。武乡“维持会”会长郝泉春、伪警察所长张成武、伪警备队分队长董丰年等30余人被轮番拷打。郝受刑不过，愤然供称所有人员都与八路军有关。日军四出捉拿，伪组织人员与群众纷纷逃到八路军根据地。

△　8时许，日机二架窜福州，投弹七枚，中午又一架投弹四枚，两次毁民房数十间。

△　国际劳工局召集同盟国国家轮船公司、船员两方代表在英国伦敦开会，中华海员工会电请会议讨论改善中国海员在外轮上服务的待遇问题。

6月中旬　中缅运输暂停，运输局奉令结束。

△　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林一民用土产桐碱制成纯碱，纯度达99％以上，经济部准予专利。林集资在重庆北碚建厂制造。

6月**21**日　重庆《大公报》讯：运输统制局将中国运输公司改为西南运输局，局长仍由该公司经理陈延炯担任，将官商合办改为政府

经营。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保护根据地人力的斗争》的社论，指出：五年来，日军从华北已运走500万华工。因此，保护华北人力的斗争已成为敌后残酷斗争的重要部分。为达此目的，要广泛发动民兵，依靠群众的武装力量，尽量抢救敌战区人民；在敌人“扫荡”时，要掩护群众转移；对被捕去的同胞，要及时组织逃跑和开展其他种种活动，为抗战事业效劳。

△　平准基金委员会美方委员福克斯在渝病故。福克斯于去年春季来华工作。

6月22日　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通过国定纪念日：1月1日为中华民国开国纪念；10月10日为国庆日；8月27日为孔子诞辰；3月29日为革命先烈纪念；9月9日为孙中山第一次起义纪念；12月5日为“肇和”兵舰举行起义纪念；4月12日为清党纪念；7月9日为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5月5日为革命政府纪念；6月15日为孙中山广州蒙难纪念。

△　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罗斯福、丘吉尔在白宫会谈，商讨中国战区问题。

△　地政署在渝成立，郑震宇任署长，内政部地政司取消。

△　中山大学校长张云辞职，金曾澄就任代理校长职，该校决定迁往桂省。

△　是日为苏联抗德战争一周年，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茶会招待各国驻华使节，会长孙科致词赞扬苏联抗战。协会发行特刊，蒋介石题词“敌忾同仇”。参谋总长何应钦于晚7时设宴招待在渝苏联军官。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沈钧儒撰写《苏联所进行的“全民”“全面”战争一周年》一文，认为苏联的卫国战争实行了战争中真正的全民动员，是历史上空前的创举。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应该起示范作

用。

△　中共中央转发北方局关于坚持冀南工作给杨得志、苏振华的指示，要求冀南党的领导机关要向党内外宣传坚持抗战的有利形势，并要求冀南领导机关克服平均主义，抓住中心工作，与千万群众共存亡，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　日机12架窜衡阳上空，被我空军击落一架，击伤二架。

6月23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钞票统一发行办法》。

△　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由印度返抵重庆，晋谒蒋介石述职。

△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发将有关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情况电告周恩来。电称：晋西北边区有组织的工人共1.68万人，总工会下设六个中心区工会及22个煤矿磁窑业工会和五个产业工会。晋冀豫边区有组织的工人共12.4万人，总工会下设五个分工会及正太铁路总工会和同蒲铁路总工会。晋察冀边区有组织的工人约23.46万人。陕甘宁边区有组织的工人共5.69万人，总工会下设四个分工会。山东在抗战初期成立的第五战区总工会改为山东省总工会。

△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表示祝贺。大会向毛泽东发了致敬信。25日，毛泽东致信野坂参三，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　美陆军部通知史迪威，命其通知蒋介石："布里尔顿第十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一些阿萨姆——缅甸——中国航线的运输机，随同必要人员撤往中东。"25日，布里尔顿第十航空队奉令飞赴埃及，而一队飞往中国的B—24重型轰炸机也中途停在喀麦隆，改变航行飞往英国。

6月24日　　中国与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复交，波兰政府决定取消1938年承认“满洲国”之决定。是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与波兰两国政府同意将公使馆升为大使馆。

△　蒋介石会晤史迪威，再次商谈军队整改问题。蒋同意空运五万军队到印，并大部分接受了史提出的条件。并商定由罗卓英为副长官主管行政，而由史任指挥管、训、练。这次商谈决议因美国决定调走第十航空队而未执行。

△　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在行政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该会自成立已四年零两个月，共拨发各项赈款1.2468亿元，救济难民人数为2672万人，抚恤空袭伤亡人数17.436万人，移居侨民133万余人，救侨费用3440万元。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贵溪。

△　新四军第二、第三师等部根据军部指示，分别对当面的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策应苏中抗日根据地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至7月上旬，共歼日伪军2000余人。

△　日军占领浙江丽水。

6月25日　　四川本年度征购实物具体实施方案，前经省政府根据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大会决定之原则，详为拟订，由财政厅长石体元于是月1日携渝，与财、粮两部洽商。该项方案业经中央核准，饬照定额1600万市石（征900万市石、购700万市石）十足征购。并限9月1日开始，三个月内竣事。石体元于21日返成都，是日向张群主席面陈洽商经过。

△　全国慰劳总会举行欢迎归侨大会，谷正纲代会长致词，勉励归侨以过去在南洋创业之精神，为发展我国工商业而奋斗。新加坡侨领连瀛洲、吉隆坡侨领黄树芬等讲话。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召开中央党部女同志联谊会，讨论妇女如何参加国家总动员工作。

△　昆明防守司令部成立，黄维任司令。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下列主要决议事项：一、边区政府设立审判委员会，负责边区第三审案件的处理；二、成立边区民众武装动员委员会，以统一各级武装动员工作；三、西北制药厂与民政厅卫生处合并为中西合璧卫生处；四、为纪念抗战五周年，组成“七七”纪念大会筹备会；（五）通过《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

△　中共冀中临时区党委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提出冀中当前斗争的方针是：保存力量，隐忍待机，坚持分散的（小块的）游击战争，逐渐恢复阵地。

△　中国海员俱乐部在伦敦成立。该俱乐部是由伦敦码头福利委员会、英国劳工部及船主公会合资建立，由中国派员管理。中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国际劳工局联合航务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朱学范在会上称：中国海员平均每36小时伤亡一人。

△　太平洋作战会议在白宫举行特别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会前，罗斯福、丘吉尔会见宋子文商谈中国战区有关问题。

6月26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由秘书处报告国防最高委员会转复政府对于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建议案办理情况，另由外交部次长傅秉常报告外交和国际形势。

△　国民政府令：曾江水早年侨居南洋，效忠革命；抗战以来，领导侨群，厥功尤著，特明令褒扬。

△　史迪威谒见蒋介石，报告第十航空队轰炸机开往开罗事，蒋对此决定甚为不满。

△　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扎萨克奇治国在扎萨克旗承袭扎萨克职位，宣誓就职。准格尔旗扎萨克由协理护理已数十年，现始由奇治国正式承袭此职。

△　四川教育厅奉教育部令：凡每年高小毕业生达200人以上之县，均须设县立中学，并设20％至30％免费学额，10％至20％公费学额。

△　浙赣路局局长金士宣称：浙赣路全线已彻底破坏，所有桥梁、涵洞200余处一律自行炸毁，该路员工8000多人均已顺利撤退。

△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首届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决定在重庆、成都、雅安、云南、广西、遵义、巴安、嘉定等13处成立分会。按：该会于1938年成立，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西北联大、东北大学等校师生、校友组成。

△　毛泽东复周恩来19日电称："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势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和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

△　美国空军司令部宣布：中国空军美志愿队解散后，即将编入美国第二十三大队，由史各特任大队长。

△　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主办"中国夏令学校"，是日在伦敦举行开幕典礼，驻英大使顾维钧出席并讲话，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尔康宣读英外相艾登的贺词。

6月27日　蒋介石电询在美国的宋子文，美军第十航空队之轰炸机悉调北非作战，此事是否罗斯福总统之意。同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保证美国及其同盟国均确信中国为共同作战之重要分子，暨第十航空队轰炸机赴埃助战完毕后仍交中国使用。

△　美总统罗斯福与英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加强抑制德、日，援助中、苏之决心。

△　国民政府公布《1942年同盟胜利公债条例》，总额为10亿元，自7月1日起发行，年息六厘，1945年开始还本，10年还清。

△　浙东日军侵入丽水。

6月28日　　国民政府在兰州成陵大殿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举行大祭，派蒙藏委员会副主任赵丕廉前往主祭。

△　国民外交协会在渝举行第四届年会，决议：一、筹设外国语文专科学校；二、筹设国际招待所；三、组织访印、访澳团。选吴铁城、陈立夫、朱学范、胡秋原等31人为理事，甘乃光、洪兰友等九人为监事。

△　川省蔗农本年因得省政府、中国农民银行及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之贷款，甘蔗收成甚佳。食糖专卖局为推广川糖销路，在西安设立西北运销处，在湖北老河口设立鄂豫运销处，分别办理川糖对西北各省及豫、鄂二省之运销工作。

△　成都妇女界为响应宋美龄发起的“七七”百万献机运动，是日召开理监事会议，决定发动各界妇女扩大募捐。

△　新四军一部收复江苏海门，消灭守城日伪军200余名，摧毁伪政权。

△　汪伪国民政府特任杨揆一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叶蓬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6月29日　　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另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驻印军共8000余人，改编后在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加训练。

△　蒋介石向美国政府发出正式的最后通牒，提出三项要求：“一、三个美国师应于八九月间到达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以恢复通过缅甸的交通线。二、从8月开始，中国战区的空军应有500架飞机连续在前线作战。并应以必要的补充来维持其实力，不得中断。三、从8月开始，空中运输每月应为5000吨。”如不达到上述三点，“就勾销中国战场”。

△　国民政府公布《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对违者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死刑，无期、有期徒刑，或没收财产，或罚金十万、五万、三万元等处罚。

△　重庆《新华日报》载：沈钧儒律师代表鲁迅纪念委员会，为保障鲁迅著作及其家属继续享有合法收益，在《新华日报》刊登启事称：近来发现有将鲁迅原著篡改割裂，或改换名目，蒙混发行。此后如有欲翻印，或分别印单行本者，均应向沈律师商洽，否则即依《著作权法》第三章、第四章之规定依法诉追。

△　川、康食糖产量逐年下降，蔗农咸以粮价高涨，多改种粮食作物，总计今年蔗糖较上年减产25%。

△　山西长治城日伪军围袭壶关县神郊村，残酷屠杀村民137人，烧毁民房360余间。

6月30日　朱德撰写《胜利在望，团结向前——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一文，略谓：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军发动主动的攻势，卒使华北敌军不敢任意抽调，使其益感泥足深陷之苦痛。这不仅在我国抗战中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在太平洋盟国对敌作战中，也成为有力的一翼。

△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在将来更严重的形势中，根据地仍可坚持，要防止和克服仓皇失措、悲观失望情绪。并强调发动群众

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左权遗著《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阐述八路军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及现状，并着重论述八路军军事思想的特点。还语重心长地指出，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创造与发展我们的军事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以后要用更大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

△　暂编第三十八师第二团于襄陵县之石瓦庄、薛村一带掩护夏收。是日，襄陵敌1500余人，步、炮联合向其进攻，经浴血苦战，营长张夺魁负重伤，官兵伤亡甚重，毙敌亦甚多。

△　新四军第一师奇袭江苏东台日伪据点，毙伤日伪军300余名，俘伪军40余名，缴电台一部及其他军用品。

△　日机九架由鄂境侵入湖南常德市，投弹百余枚，毁房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

6月下旬　　日军对冀中发动的“五一大扫荡”结束。冀中共产党、八路军蒙受空前严重的损失，主力部队损失约35％，地方部队损失约46.8％，区以上干部牺牲三分之一，群众被杀害、抓捕达五万余人。

△　日伪军2000余人由团风、新洲出动，向（黄）陵（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经三天英勇作战，歼敌400余人，粉碎敌之“扫荡”。

是月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八十六次常务会议决议：各省、市、县动员委员会一律撤销，改设各省、市、县动员会议，其任务为办理推动国家总动员法令及业务，并颁布各省、市、县举行动员会议通则10条。

△　滇省组织民众自卫预备大队，将全省划分为34区，每区设一

支队部。

△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向敌人“挤”地盘，自是月至10月共收复218个自然村。又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自是月起，共组织了37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经过四个月的斗争，收复了200多个自然村，并在敌占区开展了工作。

△　新编第二十九师司令部少将高参黄祯泰在河南作战殉职。

△　成都附近各县米价飞涨，不到一个月米价小市每石由600余元涨至800余元，大市由700余元涨至900余元，上涨30％以上。

△　留美华侨在美开展募捐运动，纽约华侨筹饷总会已募得50余万美元，芝加哥华侨救国总会募得100余万美元，旧金山旅美华侨义捐救国总会募得70余万美元。

△　苏北涟水、灌南、阜宁、沭阳四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率部投敌，任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第三军军长。第三战区游击支队司令景顺扬在浙东率部投敌。

△　日军在平、津成立“回教总会”、“基督教总会”、“佛教总会”伪组织，以控制该地区的宗教活动。日在晋东北五台山抓捕各庙和尚500余人充当伪军。

△　汪伪特工总部由上海迁往杭州，改称军事委员会闽赣皖浙四省边区行营。

7月

7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条例》，自8月1日起，

在四川、西康及鄂西区域实施。

△　财政部正式实施《钞票统一发行办法》。

△　财政部设专卖司，朱偰为司长。该司成立后，除盐专卖仍由盐务司统筹办理外，其余各种专卖事业，概由其主管。

△　财政部决定将赋税司改为财政司，杨绵仲任司长。规定全国县、市自治财政除游击区外，一律自今年8月1日起分三期整理，每期六个月，设督导专员30人赴各地巡回督导。

△　经济部物资局会同国家总动员会议、四联总处等机关组织检查公司行号委员会，何浩若为主任。20日，物资局拟定《检查公司行号业务暂行办法》。截至月底，受检查之公司达122家，其中重庆有三家情节较重，予以停业查封处分。

△　特许进出口货审核委员会在渝成立，邹琳为主任。

△　本年度川省行政会议经省府决定，在成都、南充、泸县、剑阁与重庆五个中心地点分别召集，成都区会议定于是月8日召开，12日结束。讨论结果将作为其他各处会议之张本，重庆区会议则最后举行。会议参加人员，政府方面有各区专员、保安副司令、县市长、田赋管理处副处长、粮政科长、省田赋管理处督导员；党部方面有省党部各区督导员、各县党部书记长；参议会方面有各县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秘书。省主席张群表示：此为本省乃至各省行政会议树一创格，主旨在集中各方意见，检讨既往，策励将来，以促进本省的抗建工作。

△　中国入缅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等于6月底抵渝，是日国民外交协会、反侵略运动分会、国联同志会、慰劳总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及中缅文化协会集会欢迎。慰劳总会副会长谷正纲致欢迎词，政治部副部长梁寒操讲话，对罗勇于负责的精神表示赞许。晚，罗应

广播电台之请，对全国和南洋华侨广播，详述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经过。5日，旅渝归国华侨协会举行欢迎会。

△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举行成立四周年纪念会，指导长宋美龄致训，勉励妇女克服困难，牺牲一切，以求抗战最后胜利。

△　中国空军军官42人在美国空军训练学校毕业，美空军第三支队司令华斯将军在毕业典礼上颁发文凭。

△　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但我们还是有很严重的缺点的。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指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大正派的作风，还在党内残存着。必须深入目前党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工作，使全党走上完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　八路军胶东军区成立（原第五旅和第五支队取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为政治委员，王彬为副司令员。7日，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成立，王文任主任，林一山、曹漫之任副主任。

△　中共山东分局颁布《关于整理村镇财政的决定》，决定要求行政村和县直属镇设立财政委员会，由全体民众选举公正、忠实、负责、为民所信赖的三至五人为委员。

△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在横峰与第二十二师团一部会合，至此打通浙赣铁路。尔后，日军有计划地破坏机场和铁路，并大肆掠夺战略物资。第三战区以部分兵力在浙赣线两侧钳制日军。日军在进行数十天的破坏和掠夺后，按预定计划于8月中旬开始后撤，留第二十二师团驻金华、武义等地。

△　日伪4000余人突然占领山东徂徕山区外围30余村庄，并对徂徕山区实行“蚕食”，八路军与民众进行反“蚕食”斗争。

△　汪伪威海卫要港司令部成立，鲍一民为司令。

7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50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7、8、9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谁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只是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

△　毛泽东电复董必武，拟请董找王世杰一谈，要求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返延安，询问释放叶挺的可能性，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营业税法》，凡21条，规定：凡以营利为目的之专业，均应依本法征收营业税。以营业总收入额为标准者，征收1％至2％，以营业资本额为标准者，征收2％至4％。

△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捐资兴学”1000万元，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　中印医药技术会在渝成立。16日，印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兰安生应邀来华。

△　日伪军千余人“扫荡”冀南馆陶西南地区。

7月3日　　外交部致电胡适称：政府决定“七七”五周年扩大纪念，驻外各使馆应组织当地党部、侨团联合盟国援华团体举行纪念会及广播、展览、祈祷等节目，并向将士致敬，以鼓励士气。宣传纲要如下：一、强调我国为联合国反侵略先锋及抗战五年来对于世界反侵略之伟大贡献；二、说明联合国人力、物力、财力之强大，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三、分析远东战局之重要，要请美、英从速加强飞机及重武器援华，击溃日寇，提早共同胜利。

△　国民政府直接税处处长高秉坊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座谈会上称：直接税在国税中的地位，在1937年度仅占国税总额4％，到1941年底已占26％。

△　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馆称，关于海员问题，经研究决议如下：（甲）海员合同期满，应强令继续服务。但要以实行下列各项为条件：一、职业及损害、伤亡之赔偿及抚恤应有保障；二、待遇平等；三、准许登岸；四、准许组织海员工会；五、重要港埠设立海员俱乐部或招待所。（乙）由社会部派员宣慰海外中国海员，并指导及联系各项事宜。

△　中共中央就八路军总部移至晋西北及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问题致电彭德怀：总部有移晋西北之必要，不仅安全，而且还可来往延安，工作方便。总部移晋西北后，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现有机构成立太行分局，邓小平为书记。在冀鲁豫边区成立分局，罗瑞卿为书记。

△　晨，日机五架侵袭湖南衡阳，在郊外投弹数枚。午，又八架袭衡阳，我空军与日机在市近郊空战数分钟，日机溃散。

7月4日　　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在渝举行田赋征实业务检讨会，主任委员关吉玉等200余人出席。孔祥熙在会上称：自去年9月各省分别开征以来，截至本年6月底，全国征收总额已达2300余万市

石，达征数的103%。会议还通过：一、本年度田赋征实及征购粮食工作计划草案及地籍管理计划草案；二、各省开展平价米问题；三、土地陈报限年底一律完成等案。

△　是日为国际合作节纪念日。上午，渝市社会局举行纪念大会。下午，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举行茶会，招待各机关及各乡镇合作社负责人。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报告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成立一年半以来的进展情况。社会部宣布举办合作事业工作竞赛办法六条，定明年1月1日展开。拟本年度合作社达四万处，三年后达40万处。

△　是日为美国第一百六十六周年独立纪念日，林森致电罗斯福祝贺。晚，何应钦设宴款待美军事代表团及大使馆陆军参赞办事处全体人员。

△　中国空军美志愿队自是日起改组为驻华美空军第二十三驱逐机队，陈纳德少将改任美驻华空军总司令。美国飞行员33人及地面部队队长三人作战英勇，功绩卓著，中国政府特分别授予第四、五、六、七等云麾章，并以星翼徽章授予每个队员。另该队发表声明称：自去年8月1日成立至今，“飞虎队”在缅甸、泰国、越南及中国各地，共击落日机284架。

△　英国伯明翰大学赠予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法学博士学位。

△　毛泽东致电聂荣臻，指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教育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希望你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

余。

△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中工作的指示》，指出：八路军主力部队撤出冀中后，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冀中党的紧急任务是：甲、保存现有干部及武装，公开的干部与正规军继续向西、南转移。乙、点滴地恢复与整理党的组织，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转入地下，作长期隐蔽之计。丙、克服思想混乱，准备应付敌人的新的政治进攻。今后冀中总的方针，仍是坚持平原群众抗日游击战争不变。于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决定，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暂时撤出冀中，转向邻区。至本月初，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九团到达北岳区；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区党委、行署及第二十七团、警备第一团、抗大第三团、骑兵团、回民支队到达冀鲁豫区。

△　晨1时半，日机分批轰炸衡阳，第一批五架在衡阳投弹，第二批三架在冷水滩投弹，第三批12架于晨7时在衡阳发生空战，被我空军击落一架。5日，日机三架又在衡阳投弹。

△　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等，并决定成立青年团和童子军。

7月5日　　重庆《大公报》载：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主任委员宋美龄，在抗战五周年到来之际，特拨慰劳费五万元以慰劳三军将士。

△　中国药学会在渝成立（前身为中华药学会）。该会的任务是：研究中西药的合理配制利用；中药科学化；沟通与世界药学的联系。

△　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示可否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及我党参政员名额等问题。次日，毛泽东电复董必武说：为争取国共关系的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参政员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　冀中八路军一部在容城南蔡村与500多名日伪军遭遇，经一天作战，毙敌160多人。

△　日军开始在山西汾阳实行“村政配给制”，规定12岁以上每人每日配给粮六两，每户每月煤油半斤，火柴五盒，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配给土布一丈四尺。

7月6日　国民政府任命吴南轩为国立复旦大学校长。

△　《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在粤、桂两省实施。

△　中国盲人幸福促进委员会在渝成立，通过组织规章，推宋美龄为名誉会长，宋蔼龄为会长。

△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以最高大十字勋章赠蒋介石。

△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兴县开幕。行政公署及直属机关、中共晋西区党委、群众团体、各县代表及工作人员500余人出席。贺龙、续范亭、林枫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武新宇致开幕词，中共晋西区党委王达成讲话，号召共产党员认真执行“三三制”。大会选阎秀峰、屈健、赵玉如、王步青等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　赣境第九战区一部克宜黄，进迫崇仁。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冀东遵化北沙坡峁战斗中，击毙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四四联队长田蒲少将。

△　中国境内盟机大举出动，轰炸汉口、南昌、广州等地日军机场。

△　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森教授因在重庆大学兼课，兼领两校的平价米，被人告发，受到停职追米的处分。朱教授遭此打击，旧病复发，是日病故。16日，《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评《由朱森教授之死

说起》，称：朱教授之死是时代的悲剧，时代在折磨这群读书人。时代的幸运儿是投机商人、游击商人。

△　日外相东乡发表谈话，强调滇缅路切断后重庆之困难；并声言日本将“用各种手段使其屈服”。

7月7日　　是日为我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重庆及全国各地均举行纪念活动。上午8时，重庆各界在新运模范区广场举行兵役宣传，慰劳国军及国民兵检阅大会。9时，国民兵运动大会开幕，同时渝市各宗教团体均分别举行胜利祈祷会。下午4时举行慰劳同盟国战友大会。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晚会和火炬游行。

△　蒋介石为抗战第五周年纪念日，向全国军民广播，勖勉一致信奉国父三民主义革命建国最高原则之指导，发扬中华民族四维八德之传统精神，以保障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　军事委员会公布五年抗战战绩：毙伤日军250余万名，俘2.9924万名，获战利品约747万件，击落飞机2504架，大会战14次，游击战1.0375万次。

△　美国总统罗斯福、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总长马歇尔及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等，均致电蒋介石祝贺中国抗战五周年。

△　蒋介石为美总统罗斯福电贺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复电致谢，并表示自必策励奋斗，竭尽职责，战胜残暴之侵略者，从而达到我两国与其他联合国家之幸福。

△　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摆在我国抗战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二是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战后的中国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坚定胜利信心，克服悲观失望和消极等待情绪，“一致为着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各

派合作的战后新中国而奋斗”。同日，又发表《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指出在全国抗战配合之下，五年来，全体党员和将士创造了许多根据地，坚持了艰难的敌后游击战争，拖住了日军在华的一半兵力，并且组织了千百万群众，保护了华北、华中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没有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便没有五年的抗战局面。

△　延安各界万余人集会纪念抗战五周年，并追悼为抗战牺牲的先烈。朱德讲话指出：“中国战后亦将必定成为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派合作的新中国。”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日本在华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反战同盟代表大山、军事委员会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周励武先后讲话。最后通过致蒋介石及全国将士电，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电。

△　第十八集团军公布抗战第五年战绩。计共作战1.2221万次，毙伤日军5.0306万人、伪军3.3536万人，俘日军284人、伪军1.7914万人。日军投诚16人，伪军反正4306人。缴步、马枪1.5715万支，轻重机枪362挺，子弹11.3262万发。破坏敌铁路650里，公路6148里，桥梁408座。毁敌据点597个。敌伪伤亡与第十八集团军伤亡比例为1.5：1。

△　国民政府公布《水利法》。同日，任命高阳为国立广西大学校长。

△　行政院例会决议任命朱章赓为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

△　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向中央报告与苏联外交部次长迪卡诺索夫会谈情况。11日，盛世才向中央揭露苏联阴谋侵略新疆之经过。按迪卡诺索夫于本月3日到达迪化。

△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训令，指示从7月7日起在全华北地区对敌展开两个

月的全面政治攻势，以求在政治上沉重打击日军，粉碎其“确实掌握华北”，“使华北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以及利用伪军伪组织作为统治工具的阴谋，大大提高敌占区人民胜利的信心。

△　浙赣线守军于7月初发动局部攻势，是日第二十八军陶广部第一九二师收复新登，并截断富春江敌后交通线，该师于15日克桐庐。19日，第二十八军第六十二师克建德。第一军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五军张文清部第一〇八师、第二十一军刘雨卿部第一四七师，于18日至19日先后克横峰、弋阳。同时赣东守军围攻南城，16日克金溪。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退浒湾，第三十四师困守贵溪以西。

△　汪、日成立处理中国、交通两银行联合委员会，周佛海和日本驻上海公使堀内干城轮流担任主席。联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一、根据《处理中、交两行要纲》处理两行复业的一切事宜；二、在两个月内两行恢复营业。

△　泰外交部长华达刚致电汪伪政府外长褚民谊，宣布泰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

7月8日　　国民政府令派李迪俊为庆祝多米尼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专使。

△　四川省第三次行政会议成都区会议是日开幕，省主席张群主持并致训词，称此次会议除检讨过去施政，策划今后改进外，特别着重以下两点：一、为本年度本省征实办法的改进。二、为本省临时民意机关之提前成立，已于本年4月奉准施行。此为本省政治上一种重大成就，在各县、市临时参议会成立之初，有及时说明以正观感之必要。于12日闭会。

△　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一行30余人赴赣北慰劳军队，是日在新淦惨遭敌军杀害，团长姚名达教授等多人牺牲。

△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会见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谈他提出“精兵简政”建议的经过和从政半年来对共产党的认识。

△　八路军冀南区部队趁青纱帐期间发起夏季出击。经月余作战，给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的两个旅以歼灭性打击，恢复魏县、漳河、大名、平乡、广宗等地区，开辟邯郸、磁县边，丘县、邢台诸新区，发展了游击队，打开了冀南的抗战局面。

△　八路军一部攻占山西陵川，毙日伪军120余人，俘12人。八路军攻克陵川后，立即通知第二十七军将该城让与，仍转回原防。

△　日机从7日至是日轰炸闽省建瓯，第一批八架在市区投弹30余枚，第二批九架投弹28枚。

7月9日　　是日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四周年纪念日，各地团部均举行纪念活动。三青团中央团部在渝举行纪念会，书记长张治中报告纪念意义。指导员何应钦、张伯苓、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监察委员会书记长王世杰等140余人出席。团长蒋介石致词，要求在组织方面应着重质的提高与团员的严密考核；在训练方面应注重干部的培养及青年自发自动的精神；在宣传方面应注意三民主义思想之深入与普遍化。

△　国民党中央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十六周年纪念会，何应钦报告纪念意义。

△　监察院在渝举行第八十次院务会议，通过《监察委员巡察首都地方办法》等四案，规定每月派监察委员两人到首都各地巡察，每星期汇报一次。

△　毛泽东就国共关系和整风学习问题致电刘少奇，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需合作建国”。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

北去。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造成新四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考虑之必要。

△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晋西北士绅参观团，重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中坚持团结，在战后仍然坚持团结建国的方针。

△　据报载：渝市银钱业，除中、中、交、农国家银行外，共有各省、市银行14家，商业银行32家，银号14家，钱庄32家。

△　晨，我空军袭击南昌日军机场，炸毁日机10余架，并在江面炸毁运输舰一艘。同日，驻华美空军公报称：在衡阳上空击落日军侦察机一架。

△　是日至8月中旬，日军调集万余兵力，向平北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扫荡”。平北八路军以大胆向游击区挺进，往返调动敌人，疲惫敌人，抓住有利时机加以打击，迫使敌人于8月19日陆续撤出中心区而结束“扫荡”。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作战38次，毙伤敌伪军291名，俘30名（其中日军三人）。

△　浙江日军一部退向温州。同日攻陷浙江青田。

△　英国外相艾登重申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16日，英驻华大使薛穆以艾登的声明照会外交部。

7月10日　国民政府任命涂允檀兼驻哥斯达尼加公使。

△　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严令各省积极实行田赋推收，规定：凡土地产权的转移或典权之设立与变更，如买卖、继承、分析、合并、赠与、交换、典当、回赎等，依法取得产权之受权人及承典人或回赎人，均应在一定期限内向办理推收机关申请登记。此种登记手续称为推收。外国人在通商口岸或外国教会在内地取得永租权之土地时，亦应办理推收手续。

△　农林部召开农事农村经济及垦务工作会，通过全国农业农村经济及垦务施政方针；战后五年农业建设计划；垦殖法、农会法等修正案50余件，15日闭幕。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七次驻会委员会，主要听取外交部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并研讨关于召开第三次全国内政会议、促进新县制等案。

△　川康盐务管理局盐井河船闸通航典礼，是日在邓井关举行。该河为运输食盐之惟一河道，系自自流井之牛角沱至邓井关以下汇入沱江，全长73公里。自1939年底开工，至本年5月完成，工程费用达1300余万元。

△　朱德致电周恩来称：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

△　朱德关于南洋华侨及朝鲜人工作问题指示罗瑞卿等，指出：中央已设立海外工作委员会，由我负责。前方请政治部协助海委领导此项工作。应成立华侨救国联合会，团结他们参加抗战工作。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边区所辖之县，凡未经县参议会正式选举县政府委员者，均设立县务委员会；由县参议会选举主任一人及委员六至十人组成，并呈请边区政府委任；县务委员会受边区政府领导和分区专署之督察及县议会之监督；县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室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等五股和司法室、保安大队部。

△　日伪军6000人对苏中抗日根据地泰兴、靖江、泰县和如皋西地区进行“清剿”，修筑公路、据点，以封锁、分割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主力转移至“清剿”区外，留少数兵力分散坚持斗争。

敌在寻歼第一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遂于8月中旬转移兵力，结束“清剿”。

△　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国民实施训练训令，内称：“根据本年元旦所颁布之纲要，于精神物质两方面对于全体国民实施训练，并以全国青年团与童子军之普遍设立，用作训练之机构……国民全体应尽其最大之努力，肩负其对国家对东亚之使命，使此两运动积极推进，以底于成功。”

△　汪精卫发表《清乡一周年》一文，声称“清乡的意义，不只在清除匪共，使之必去，尤其要根绝匪共，使之不能复来”。

△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罗斯福报告，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这“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因此，美国必须“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

7月上旬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与董必武会面，董再次向王提出国民党当局应释放叶挺的要求，并向王介绍中共《“七七”宣言》的大意，表示参政会应是国内团结的标志，国共两党问题应从政治方面寻求解决。

△　印度发起“中国日”运动，先后募集印币100多万卢比转交宋美龄，并捐赠一批药品给中国红十字会。

△　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吴其玉教授等一行五人，由北平脱险抵贵阳，受到黔省燕大校友会欢迎。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与董必武会谈。董向张说明：一、中共对抗战胜利有坚强信心；二、在取得胜利之前必定遇到空前

的困难。克服困难，主要是依靠国共两党间的合作；两党之间的军事、政治问题，经过商谈总可求得解决办法。

7月11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拟定战时生活标准：一、取缔奢侈行为；二、限制奢侈品进口与销售范围；三、对许可营业者的规定；四、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标准均有规定。

△　川省酒精厂设置过多，原料不足，省政府令各县对不合规定者即予封闭。成都有10余家、自贡五家、资中五家、内江10家等，均在封闭之列。

△　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杨谌，于是日率第一、第四两团赴平遥西之净化、介休东北之中街一带征运食粮，突遭敌7000余人附炮60余门、坦克车百余辆重重包围，猛烈进攻，以飞机、大炮轰击，大量施放毒瓦斯及烧夷弹。我官兵经激战后，伤亡及中毒者甚众，除一部突围外，赵、杨两师长受伤被俘。

△　是日至14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山西漳河畔举行，决议：将联合会改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青年》机关报改为《民族解放》；“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大会修改同盟纲领及章程，明确提出建立朝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和斗争路线，并为在华北的20万朝鲜同胞的一切利益而斗争。

△　日军一旅团与暂第九军暂第三十三师激战，是日陷温州。

△　日舰10余艘、陆战队千余从温州湾登陆。13日，陷瑞安。17日我克复瑞安与温州。

△　日机九架侵袭闽省建瓯，投弹多枚，另一批八架窜扰建阳、永吉等地。

7月12日　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与边区银行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食盐专卖问题，确定食盐专卖任务是统一食盐对外销售，争取操纵盐价

的主动权；集中食盐统销所得外汇，并用其中的一部分帮助稳定金融和周转对外采买。明确专卖原则是边区内地自由贸易，对外统一推销。

△　第九军暂第三十三师再克浙江青田。后日军又陷青田，暂第三十三师于29日三度克复青田。

△　八路军太行区部队伏击由武乡向榆社转移的日军。上午9时，日军10余辆汽车进入伏击圈，八路军发起攻击，至中午将敌全部歼灭，汽车全部烧毁。榆社之敌增援，亦被击溃。此役缴获轻机枪五挺、掷弹筒六个、子弹万余发。

△　7时30分，日机九架由越南侵入滇省建水，我空军立即起飞警戒，日机逃跑。

7月13日　　内政部政务次长张维翰是日出发，赴陕、甘、宁、青、川、康、豫等省，了解新县制推行情况，以及民政、警政、户政、禁政等执行情况。

△　重庆《大公报》讯：全国今年征实征购数额核定近一亿市石，财政部拨款修建仓库。

△　毛泽东复电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指出："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深望彼此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　第三战区一部在闽江口渡海攻克福斗岛。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公布五年战绩：共进行战斗2976次（不含1938年），毙、伤、俘敌伪20余万，缴获长短枪6.4792万支，轻重机枪1024挺，各种炮133门。

7月14日　　国民政府两次接到盛世才关于苏联在新疆活动的报

告，是日蒋介石召集重要会议，商讨新疆问题。

△　行政院例会通过《非常时期地籍整理实施办法》及《乡镇财产保管委员会组织章程》。

△　1时许，日机六架由浙侵入闽北：一批三架袭建阳，投弹10余枚；另一批轰炸建瓯，在西郊投弹12枚。

△　周佛海抵东京，先后会见首相东条、外相东乡、藏相贺屋。15日，周拜见日本天皇、海相岛田、日本银行总裁结城、兴亚院总务长官及川等，并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称："来日目的是与日当局商谈今后两国在稳定发展金融上之合作问题，同时并进一步要求日本朝野予以更大之协助。"

7月15日　三青团中央团部决定主办夏令营，全国共分四区。四川区由张治中主持，西北区由胡宗南主持，西南区由康泽主持，东南区由蒋经国主持，邀集高中以上学生一万人参加。拨经费700万元，8月1日开营。

△　中国工矿银行成立，是日开始营业。该行系国内热心工矿事业的人士与华侨投资组建，以扶植工矿事业为营业方针。总经理翟温桥。

△　中国银行在西康省西昌县建立办事处，开始营业。

△　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对苏中伪军策略的决定，强调除应有充分反"扫荡"的准备外，争取与李长江、杨仲华两部的调解，是坚持苏北抗战的重要条件。

△　彭德怀发表《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某同志的答复》一文，指出平原地区敌我斗争已经进入一个空前紧张、尖锐的时期，我平原抗日根据地在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成为游击区，大块根据地被敌人逐渐分割成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在这种

形势下，一方面要正视现实，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针，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平原根据地会继续存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仍是主要的。

△　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发出《关于当前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提出新的规定：旅（分区）政委、主任应审核宣传科各种印刷品，应随时宣传干部各种情况，并给以具体指示。

△　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建军报告的第一部分《论军事建设》，是日在华中局出版的《真理》第八期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军的指挥员应学会善于指挥正规战，学会善于指挥游击战。两者要能正确地分别掌握，综合运用，这是我军战法的上乘。

△　进入印度的一部中国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军。

△　日军3000余附汽车300辆向冀南进犯，图谋消灭馆陶、丘县公路两侧之八路军，经激战，八路军毙日军千余，败敌溃退德州。

△　汪伪财政部宣布：禁止以法币买卖物品、处理资产、缴付旅费、车费、租金及其他费用、兑换其他通货、充作担保品、成立债权、或偿还债务、借贷、劳动报酬等。

7月16日　蒋介石接见苏驻华大使潘友新，重申今后有关新疆事件，苏联政府应与中央政府直接洽商，以免发生误会；并说对于新省经济事项与苏联之交涉，政府已派翁文灏部长前往迪化办理；对于政治调查与督察事项，派朱绍良赴新负责主持，希一并转达苏联政府。

△　周恩来鉴于各党派陆续有人去游击区，致电毛泽东：当前敌后小游击区的统战工作必须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建议中共中央进一步研究同许多友党合作的某些具体问题，如步骤、范围、方式、方法等，并通知各游击区的党组织，首先是华中的党组织，迎接这一新的局面。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二十七次政务会议，原则通过夏收征粮办法，及由秘书处筹办《边区政府公报》等项决议案。

△　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一文，认为："五年抗战是全面战或总力战，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成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在思想方面，即文化教育方面，其斗争的形势虽有种种，其实质只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教育与日寇和伪政权的奴化教育的战争。同时在民族解放运动共同的目标下，又有少数人包办的抗战与全民抗战或全面抗战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第一一五师、新四军及李先念，对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作如下指示：一、用广泛的游击战争支持敌后地区；二、向鄂南发展；三、派几个连到顽军后方，引退、扰乱顽军；四、要少树敌人，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五、抽调干部在湘鄂西及湘鄂赣老苏区地带建立秘密工作；六、最重要的是第五师及地方党政领导中的团结一致，巩固与群众的联系。

△　冀东第十二团一部于滦县、太平庄一带设伏，毙伤日军180余人，俘伪军200余人。制造潘家峪惨案的主犯、日军佐佐木二郎大佐被击毙。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例会，决定撤销武汉绥靖主任公署，设军事委员长驻武汉行营，任命杨揆一为行营参谋长。

7月17日　国民政府派马步青兼任柴达木屯垦督办，所部亦全部开入青海。

△　国民党中宣部召开政令宣传会议，决议：一、各主要机关设宣传机构，无机构仅设主管宣传者，亦须规定具体办法。二、由中宣部提供宣传资料。三、行政院每三个月编制之政令送中宣部备资宣传，并由中宣部函请行政院查照办理。

△　重庆市开始实行食糖专卖。

△　据统计，重庆市节约储蓄数额已达3.6亿元，内法币储蓄券为2.18亿余元，美金储蓄140万元，普通储蓄约一亿元。

△　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发布命令，要求各地部队帮助群众生产，并厉行节约，以克服困难。

△　延安《解放日报》讯：晋西北兴县开明士绅牛友棣将耕地154垧及其他土地282垧交由政府代管，一切收入充作教育经费。又兴县康氏宗祠家长将康家祠堂财产及5000元捐给政府，作为教育经费。

△　延安和晋西北音乐界集会，纪念人民音乐节和聂耳逝世七周年。昆明各歌咏团体举行纪念会，聂耳之兄序伦报告聂耳生平。李公朴号召推行歌咏工作以资纪念。

△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于是日由宁飞平，与冈村宁次磋商要事，旋赴张家口、包头、大同等地。22日抵济南。23日返宁。

7月18日　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一份备忘录。参照原先两路夹击日军的设想，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四点军事计划，要中国方面挑选20个师参加作战；并认为此计划不仅能打通滇缅公路，而且在仰光收复后美国能连续半年每月拨运给中国3000吨物资。8月1日，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接受了缅甸战役计划，但又提出两项条件：一是英军从陆路和海路参战；二是派遣充足的空军部队提供有效支援。

△　国民党中宣部在安徽屯溪设立东南战地宣传员办事处，并创办安徽《中央日报》，冯有真兼社长，是日发刊。

△　中共晋察冀分局再次发出对平北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平北应以巩固为主，巩固地向前发展，应注意向矾山堡发展，以求打通平西、平北两地的联系。要派必要干部开展平绥路南工作和发展伪满境内工作。分局决定建立平北地委，段苏权为第十二军分区政委兼平

北地委书记。

△　浙赣线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横峰、弋阳。次日，第三战区一部分克建德、温州、瑞安，并截断浙赣铁路。

△　9时15分，日机两架飞窜浙省龙泉，在城郊投弹八枚。

7月19日　中国药学会第一届理监事联席会议在渝举行，建议政府设置药务署，以加强对药物的制造、供应等问题。

△　川省动员委员会为供应前线川、康各部队医药需要，特发起募集医药运动，计募得药类24大箱寄前方备用。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冀东沙河驿太平庄设伏，袭击转移的日伪军800余名，毙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刘化南，击伤伪高级将官三名，毙日军大佐一名。是日，冀东八路军在滦县设伏，毙伤日伪军170余名，俘日军60余名；又北岳区八路军两个连夜袭平山黄壁庄，毙伤日伪军30余名，解放民伕百余名。八路军伤亡七人。

△　日机四架窜扰闽北，二架飞袭浦城，投弹10余枚。

7月20日　国民政府制定《人民团体集会须知》，规定：以后人民团体集会于会期两星期前呈报社会行政主管官署，并请求派员出席指导，开会时间以三小时为限。

△　美总统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由美经印度飞抵重庆。

△　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作《关于兵役弊端的报告》，略谓："一连新兵百余名关在一个房内……看逃兵如看囚犯一样"，"壮丁来源多由保甲长雇佣或贿买而来，均未经合法手续抽签，因此死亡后所有抚恤金均被中饱。""部队主管克扣壮丁军粮盗卖私肥，壮丁因此每餐不饱，均面现菜色，形同病夫。"

△　刘少奇在回延安的途中，就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致函陈毅，称目前关键问题是更多地教育、培养中下层干部，使他们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完全了解党的政策，作风严谨，不断成熟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任务。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七旅第十九、第二十团，在曹县西北杨集对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一个中队及伪军骑兵一部进行伏击，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缴战马20余匹。

7月中旬　教育部推行注音识字运动，中宣部、海外部训练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蒙藏委员会、三青团，各派一人至三人组成中央注音识字运动委员会。

△　四川省与川康兴业公司共同组成四川农业供应公司，由该省建设厅长胡子昂任董事长、董时进任总经理，主要经营农具、肥料等。

△　中央大学地质、地理、生物、森林等系师生组成“川西科学考察团”，分赴成都、峨眉、威远等地考察。

△　周恩来就目前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来电请示同广东国民党当局谈判原则问题，电示林平，必须坚持以下原则：政治独立，不混编，不派政工人员，不调训部队，专在游击区打敌人。

7月21日　蒋介石接见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居里向蒋递交罗斯福总统信件，内称：“居里先生前次访华之后，本人畀倚至深，随时咨询，几有关中美关系之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各问题，彼以沉默之态度，作忠实与正确之沟通，此实为尔我不能面谈不得已而求其次之最善办法。”居里向蒋介绍了美国的远东战略，并就反攻缅甸、飞机供应、改善中英邦交、史迪威之地位、空运紧急货品、战后政治、印度问题、改善中苏关系等，广泛交换了意见。

△　蒋介石接见周恩来，蒋称已指定张治中和刘为章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

△　行政院例会通过任命司徒龙为侨务委员会委员，严家淦兼福建田赋管理处处长。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孔祥熙聘周象贤为该会总干事。

△　重庆市居民身份登记开始办理，军委会政治部和调查统计局协助。中央特拨经费113万元，限四个月内办完。

△　新四军军部与第五师之间通讯联络经常中断，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建议，决定第五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建制仍属新四军。后成立湘鄂豫皖军区，第五师师长兼军区首长。

△　晋境第二战区一部克陵川。

△　日军一部从浙江平阳海面登陆，窜扰鳌江地区。

△　美总统罗斯福任命海军上将李海为美军总参谋长。

7月22日　中国驻埃及公使馆设立，一等秘书汤武代行馆务，是日谒埃及总理兼外长那哈斯，呈递到任函件。

△　印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兰安生抵成都，考察公共卫生推进工作。

7月23日　蒋介石电令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对办理土地陈报要“广为宣传，共襄厥成”。该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办理。

△　是日为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日，该会发言人对记者称：30亿元之目标，年底可望完成。

△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密令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香翰屏，将

借势走私的纵队副司令钟冠豪处决，并将其所部缴械整理。

△　长沙警备司令部特务组长孔松涛等六人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

7月24日　教育部在美国组织“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宋子文任主任，赵元任、郭任远、侯德榜、方显廷、李干、孟治为委员。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指出：“已令前方援助晋绥军之英勇抗战，请告阎长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在遵化西南赵店子猛袭日巡视工作团，毁汽车40余辆，毙日军宇高大佐以下多人。

7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的工作报告。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提出：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六万人，晋西北减至五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晋西北加上打仗一项。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军队不继续补充，按现有实际人数充实连队，可以实行小团制。至于敌后，要准备很大的缩小。搞一个统筹统支与自给自足相配合的很好的经济制度，以七分统筹、三分自给为主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

△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向县团级以上干部发出急电，指示各级坚决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对破坏边区金融之不法分子必须予以严惩。

△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发出训令称：目前在各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已有美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印度、朝鲜、葡萄牙等国的战友，各级军政机关要热情关怀国际友人，为他们解决

物质生活及语言不通等各方面的困难。

△　涪江水利设计处于去年3月间在三台北坝设立工程处，从事改善航道及农田水利工作，用款达400余万元，现已竣工。上水航船所耗人力较前节省三分之二，航程时间较前经济六分之五，而可避免触礁翻船之危险。

△　日驻蒙军以第二十六师团主力及骑兵集团一部共1.3万余人，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大青山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摧毁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主力和大青山区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转移至绥南，日军扑空。后日军主力转向绥南地区“扫荡”，并在大青山根据地内增设据点，使之变成两军交叉地带。

△　汪伪广东省政府主席陈耀祖与日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栗林忠道签订《关于接收英美财产与委托经营的基本协定》，规定：日军将所接管的英、美公私财产的一部分，仍旧在日军管理下贷与汪伪政府，或委托其经营。其贷与委托经营的有英、美公私有财产，有岭南大学、柔济医院及沙面地区建筑物的大部。

△　日本、伪满洲国与南京伪政权在东京召开交通恳谈会，讨论建设大东亚铁道干线问题，计划由东京经大阪直至新加坡，利用沪杭、浙赣、粤汉、湘桂及越南、泰国各铁道而相连接，全长7834公里，所需新筑的铁路700公里，预计五年完成。

7月26日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渝举行，各地分会报告会务。各分会会务重点为：重庆分会注重研究工作；成都分会注重实地考察；西北分会主要研究回汉问题；雷马屏峨分会注重当地调查；嘉定分会着重研究雷马屏峨建设问题及乐西公路一带情况；广西分会主要研究少数民族问题；云南分会着重云南资源的调查；坪石分会注重西南民族问题及边疆文物的调查。

△　驻美大使馆武官朱世明少将代表中国政府向轰炸东京的三名美国飞行员上尉华臻、上尉拉维区、中尉麦克罗分赠中国陆军勋章。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发出指示：冀鲁边区目前已成为分散游击的战争局面，公开的斗争形式已降为次要地位。分散的游击战争配合以合法隐蔽的地方工作，应成为当前主要的斗争形式。

△　八路军一部将冀东卢龙以西油榨、王营、炉村等七个日伪据点全部摧毁，是役毙伤日伪军百余人，俘人枪各120余，子弹数千发。

△　在5月反“扫荡”中，被日军抓捕的240名抗日干部，于是日和8月初，在太原赛马场，被驻太原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日军新兵当“教育检阅课目”的活靶刺杀惨死。

△　印度甘地以《警告日人》为题，撰文痛斥日本侵华。

7月27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共240名，计各省、市164名，蒙古、西藏地区八名，海外侨民八名，其他各方面人士60名。其中有中共参政员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六人，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张澜、黄炎培、谭平山、江恒源、褚辅成、冷遹、周士观、顾颉刚、许德珩、张奚若、晏阳初、谢冰心、左舜生、张难先、韩兆鄂、司徒美堂、李璜、曾琦、张君劢、吴贻芳、余家菊、陈启天、达浦生等人。二届参政员本届未被选者有中共的吴玉章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梁漱溟、罗隆基、杨庚陶、陈嘉庚、王卓然等43人。

△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驻会委员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沈钧儒所提请政府保护小工厂建议案。

△　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该会设置在行政院内，由行政院长指派各部部长或聘任中央党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等单位负责人为委员，并由院长从委员中指定三人为常务委员。该会对外不行文，一切决议由行政院施行。

△　据重庆《大公报》讯：1938年，国立北洋工学院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是日北洋工学院校友商议在渝成立私立北洋工学院，推曾养甫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孙越崎为副主任、李书田为总干事。决定本年10月2日该院四十七周年校庆日建校，设土木、矿冶、机电工程三个系，并暂推该院前院长李书田为院长、茅以升为副院长。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征收救国公粮条例》，确定本年的公粮征收采用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两种方式，即凡资产收入在边区而人在边区以外者，公粮征收采用属地主义；一家资产散布在边区各县者，则采用属人主义。同时对征收范围、标准、减征免征条件、奖惩等作了规定。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枣强南大队，夜袭南白塔伪军据点，毙、俘伪自卫团230余人。

7月28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中工作发出指示，强调目前的紧急任务是保存现有的干部及武装，公开的干部及正规军团应迅速继续向南转移。目前的工作方针是隐蔽地掌握乡村政权，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加强统一战线，以隐蔽的武装斗争为主。

△　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电示绥远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姚喆、政治部主任张达志：一、大青山的游击战争必须坚持，不能放弃；二、姚司令部或可转至右玉西山，由张达志带领二团与群众武装坚持那边，并与西边三团取得联系；三、分散的部队可设司令部以迷惑敌人。当时姚喆已去绥西。根据指示，张达志率领大青山支队司令部直属机关及骑兵第二团一部，苏谦益率领绥察行署、陶林、武川

县政府和游击队及一部分干部，越过平绥路到达绥南蛮汗山地区。绥中专署已先期抵达该地。

△　冀东伪治安军一个团与百余名日军押送150多辆满载面粉的大车由沙河驿前往上五岭。冀东八路军第十二团在乾河槽设伏，将日伪军全部歼灭，缴获全部物资。31日，冀东沙流河日伪军1800余人向八路军猛扑，经激战，毙伤日伪军190余名，八路军伤亡18人。

△　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与日本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签订《借款契约书》，总额为一亿日元。

△　波兰驻华代办特罗和斯基飞抵重庆。

7月29日　行政院例会通过本年度粮食库券领换凭证领换办法，规定本凭证之持有人应于规定限期内，凑成一市石以上各种粮食库券面额，向该县代理机关换取粮食库券，过期未领换者，准至1948年连同本息一次抵缴田赋。

△　新四军军部致电粟裕等，对坚持苏中长期斗争作如下指示：苏中斗争要准备苦斗一年至两年。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进行敌伪工作、组织领导两面政权、领导民兵为中心。其他任务均应围绕此一中心进行。部队不应再有主力与地方的区别，保持四个主力团，余均与地方武装合编。机关要大量裁减，以便利行动。

△　英国联合援华募款运动大会在伦敦举行，该市市长劳理主持。英王和王后及红十字会等共捐款3.3万镑。宋美龄致电感谢。

7月30日　国民政府公布《省税务管理局组织暂行条例》，各省税务管理局成立后，所有省内各项国税，均由该局征收，每省内设若干县、市税务征收局，受省局指挥与监督。过去之统帅局，直接税分处等均将取消。

△　中美文化协会在渝举行欢迎居里游园会，由该会会长孔祥熙

主持，蒋介石、宋美龄等400余人出席。居里发表演讲，谓罗斯福曾有言：“余欲对中国之英勇民众声言，无论日本能获得何种进展，均当设法以飞机及军火运交蒋委员长之军队。”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将被打败。只有美国恐怕是个大家伙，战后法西斯国家都要依靠它，它可能支配世界。今年打败希特勒的问题还要看一看，恐怕对冬季反攻、对德国的弱点估计过大了。战后中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我们在宣传上应以争取好转的前途为前提。争取同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而不是孤立自己。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土地征用法》，规定延安市可耕土地概不得随便征用，除军事建筑外，均须付代价与租金。

△　重庆、迪化间无线电话开通。

△　日本轰炸机九架，进袭湖南衡阳机场，被美机拦截，击落三架。

△　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部公布《整理公债（第八次）发行规则》，决定从本日起发行公债一亿元，称为第二十三次四厘公债，10年后偿还。

7月31日　　毛泽东复电刘少奇，对国共关系作出估计，指出：一、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个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二、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三、国共关系，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最近恩来见蒋介石谈得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斐与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　物资局厘定重庆市棉纱价格，新棉标准价格由540元增至800元，20支厂纱最高限价由6900元增至8580元。

△　财政部美籍顾问杨爱德博士应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广播讲话，略谓：中国的财政由于日本的侵略已相当困难，建议采用田赋征实、盐税增加税收、发展所得税、利得税、消费税等，以支付战费。

△　印度政府赠我国奎宁丸500万吨已运抵昆明。

7月下旬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就湖西工作，向中共湖西地委组织部长陈璞如作重要指示，指出湖西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斗争形势尖锐复杂，三角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有麻痹思想；要加强军队与地方的团结；要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能争取则争取之；要注重加强日、伪、顽占领区的工作。

△　冀中大雨，滹沱河、沙河、唐河、潴龙河、子牙河均暴涨。日军为淹毁冀中军民，密令沿岸各敌决堤，引水向低洼处横溢，千里平原变成茫茫大海，房屋田园多被淹没。总计日军共决堤128处，受灾村庄6752个，占全冀中总村数95%，被淹田园153.82万亩，被冲房屋1.689万间，损失财物值1.6亿元以上，灾民200万人，是历史空前巨灾。

是月　　国民政府重新拟订公务员生活津贴，规定：一、国民政府主席一万元；二、五院院长各5000元，副院长各3000元；三、各部部长及四委员会委员长各3000元；四、文官长兼军长各3000元；五、五院秘书长及行政院政务处长各3000元；六、特任人员各2000元；七、特派人员各1500元；八、各部次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立法委员、法院检察长各1500元，科级规定200元至300元不等。

△　军委会拟定《党政军各机关人事机构统一管理纲要》，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该《纲要》规定党、政、军各机关人事机构及其人员之统一管理，属于党者为中央党部秘书处；属于政者为考试院铨

叙部；属于军者为军委会铨叙厅。

△　教育部规定自是月起至明年6月止，为全国学生社会服务年，分别规定服务项目及中心活动表。

△　宋庆龄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指出：“中国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正在为她们的祖国而战。在目前有关整个国家前途的斗争中，她们已经证明自己是我国历史上女英雄们的好女儿了。”

△　重庆、成都商业资本家集资300万元，合组国华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为经营进出口贸易，及投资农、工、矿、垦等事业。

△　第二战区为打破敌之封锁企图，分兵为两部分，一部固守小船窝以北渡口，分区设险，以内核心区重在固守，以外核心区扼守要路，以歼敌区建筑据点阻敌通过。各据点星罗棋布，配以狙击队配合作战。另以独立之狙击队及各部队所隶之狙击队随时配合据点作战，或深入敌后，或绕于阵前，以达共同歼敌之目的。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秘密党的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指出：根据浙江、江西、广东三个省委被破坏的教训，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的组织，只保留县委或支部。支部及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

△　中共晋察冀分局决定由程子华负责组成冀中临时领导机构，由程兼任区党委书记。临时机构设于唐县张各庄、洪城一带。冀中军区政治部在白洋淀梁庄一带设立“冀中军区干部收容总站”和“分站”，冀中区党委在安平、定县一带建立秘密交通站，先后收容失散的干部1000人以上。

△　陈士榘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二团）由山西吕梁山区转移至鲁西。第二团后留鲁西，编入第三四三旅（教三

旅），陈士榘率第一团进入鲁南归建。

△　延安《解放日报》讯：本月日军在华北捕捉壮丁2.2185万人。其中1.7万人已运到关外，4000多运往内蒙等地。

△　日军在太原杏花岭秘密杀害八路军5月反“扫荡”中被俘干部张友清等200多人，赵基宪等四人死里逃生。

8月

8月1日　　蒋介石电四川省主席张群指示川省本年度田赋征购办法，称田赋征购为军粮民食之所需，关系抗建大计至深且巨。上年征购均能于最短期内底于有成，粮食供应于焉无缺。本年征购数额增加，征收及征购业务一律合并办理，各田管机关责任倍重。务望督饬各级行政长官，在田赋征收期间，一律出巡宣导，藉以提高粮户纳粮情绪，加强征收人员工作精神，以期振导全省力量，完成征购工作。16日，蒋又严令各省主席转谕人民踊跃纳粮。

△　《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于是日开始实施，凡违反总动员法或违反依总动员法所订的法令，均依该条例罚办。

△　中国卫生工程学会在渝成立，陈果夫为名誉理事长，通过建议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增设卫生工程研究组；建议中央政治学校开环境卫生课；确定全国卫生工作事业方针；组织专门委员会研究战后卫生工程建设事业等。

△　第十一届中国工程师联合年会在兰州举行，计16个分会600余会员出席。通过筹集李仪祉、陈子博奖学金、呈请政府将现行市度量衡制度改为公度量衡制度等案。推翁文灏（连任）为会长，胡博渊、杜镇远为副会长。6日，成立工程标准协进会。7日闭幕。

△　川、康、鄂西区烟类专卖，是日起全部实施。

△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彭德怀任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

△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委。以山东纵队机关为主成立鲁中军区，王建安兼任鲁中军区司令员，罗舜初任政治委员。山东纵队第一旅改编为教导第一旅，归第一一五师建制，仍留鲁中活动。山东军区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师部活动。

△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目前对敌斗争的指示》，称：目前山东许多地方逐渐被“蚕食”，根据地基本群众尚未认真发动起来，平原根据地一般不很巩固，山区根据地巩固程度也差。又由于敌人分割华中、华北与山东的形势已大体形成，造成我对敌斗争上的许多困难。在此形势下，我们提出全力对敌斗争，粉碎敌人对我根据地之“蚕食”政策，坚持我游击区，伸入敌占区，开辟边缘游击区为反敌“蚕食”政策的积极行动方针，克服过去对敌斗争中的保守、软弱、孤立的现象。

△　晋察冀军区召开各直属部队干部大会，庆祝建军十五周年。同日，《晋察冀日报》发表《八路军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纪念八路军诞生十五周年》社论，指出在今后不管何等残酷战争的年月里，八路军也永远不能离开华北和边区，永远不能离开我们亲爱的父老同胞！

△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组成，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政委）、崔石泉（即崔庸健）任参谋长（兼任旅党委书记）。旅下编四个步兵教导营，两个直属教导连，翌年又增编自动枪教导营。教导旅共有指战员1000余人，其中苏籍官兵300人，抗联指战员700余人。

△　中国航空公司重庆——兰州线开航。

△　成都——重庆间无线电话通话。

△　日武内兵团由龙游南犯，是日陷浙江遂昌，与奈良支队会合后，2日又陷松阳。

△　日伪军1.3万余人对冀东迁安、卢龙、滦县、丰润地区进行“扫荡”。冀东八路军部队内外线配合作战，共歼日伪军800余人，至月底迫敌撤退，打通了长城外锦州至承德铁路以南东西长达250公里的地区，使诸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　衡阳连日空战，空军击落日机17架。

△　上午9时，日机三架窜入浙省龙泉，在闹区投弹21枚，烧屋千余间，死伤数人。

△　伪山西省政府决定将全省伪警备队改编为正规军，直属伪省府。

△　日、汪处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联合委员会发表两行复业具体方针，规定两行在中央储备银行的管制下，作为一般商业性银行继续营业。

8月2日　重庆《大公报》讯：全国现有高等学校129所；国立中等学校23所；私立中学100余所，在校学生70余万人。

△　日机11架分两批轰炸浙省云和，投燃烧弹40余枚，毁民房多间，死伤30余人。

8月3日　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报告称：现已组成1200个国民兵团，训练了40余万国民兵干部，1000余万国民兵。今后应注意：一、征兵制度充分发挥人力，扩大兵役宣传；二、确定调查全国户

籍；三、健全各地基层政治机构完成新县制；四、普及国民教育及国民体育等。

△　史迪威、居里晋见蒋介石，面陈三路攻日计划。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彻底实行精兵政策》的社论，指出精兵政策是目前敌后建军的正确方向，是坚持敌后斗争和准备反攻力量的重要步骤，各根据地应集中一切力量彻底实行精兵政策，扩大民兵武装，渡过难关，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　江西省政府组织江西兴业公司，由文群、杨绰庵、张泽尧、胡家凤等任董、监事，资金3000万元，接收原有省辖各种工厂及电厂。

△　第三战区一部收复浙江遂昌。

△　远征军一部自缅甸撤至印度东境之利多，并转移至印度蓝姆伽训练。次日，蒋介石电勉涉险入印之远征军，称："兹派史迪威参谋长来印，对各该部巡视慰问，并加督训。"

△　鲁苏战区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一师（原属东北军）师长常恩多率所部2000余人宣布脱离国民党，转移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部队仍用原番号，配合八路军抗战。不久，常恩多病逝，万毅继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后该师改编为滨海支队，万毅任司令员。

△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与日本正金银行签订日元3000万元《借款契约书》，规定以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永礼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华中电气通信公司股票作抵押。

△　黄河泛汜，灾及平民（今大荔）、朝邑（今大荔）、华阴、合阳、韩城等县，为近数十年所未有，而以平民全县淹没为最惨重。是日下午2时许，黄河暴涨，水势急湍，韩城县之安澜、巍阳、芝秀

沿河地带当被浸没，5时许，合阳复兴乡全部被浸，9时随即奔腾于平民全境，除新民村地势较高，有林场分散水势，未被浸入外，全县大小40余村庄无一幸免，且波及朝邑之乌牛、仁和、中和、和衷四乡，沿河滩地直泻，及于潼关吊桥一带，水头高达丈余，澎湃四溢不可遏止。至4日晨5时左右水势渐退，迄6日午乃归入河床。据调查平民等六县灾民5.3420万人、死亡681人、受伤252人、下落不明350人。被淹地49.98万亩，农作物损失1.3227万元，冲毁房屋2140间，其他财产损失3.057万元。

8月4日　史迪威、居里赴印度视察蓝姆伽训练事宜。

△　行政院任命张洪沅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

△　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招待外国记者，谓："关于民主政治的训练，国民党的一贯政策是谨慎坚定。""四年以来，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和改组，可以说充分表现了这种谨慎坚决的态度。"

△　毛泽东复电陈毅，对精兵简政问题作指示：伴随着极端残酷的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到来。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部队。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四万地方军，扩大为10万主力、10万地方军，这个数目太大了。如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实有坐毙危险。请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之目的。

△　日驻汪伪政府大使重光葵对德国新闻社和海通社社长发表谈话，诡称："中日两国之全面协力，已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积极展开。中日民众在最近之将来，必能实现全面合作之体制。"

8月5日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重庆举行四周年纪念会。工合运动已普及18省，建立合作社2000多个，社员三万多人，每月产值增至7500万元。

△　民生公司建造浅水轮船10艘，供川江内河行驶。

△　浙东第三战区各线反攻，丽水、永康相继克复。

△　浙赣战场日河野旅团由空军配合猛犯第四十九军阵地，是日陷峡口，7日陷保安街，8日占领仙霞关及关帝庙。第一〇五师向日军反攻，9日克仙霞关、保安街，10日克峡口，复原阵地，并向八都、江山追击。

△　冀鲁豫军区第八团攻克阳谷县张秋镇西北徐楼敌据点，并痛击来援之敌，毙日军25人，毙俘伪军60余人。

8月6日　　四川丝业公司在重庆举行股东会议，改选董、监事，公推张群为董事长。公司增资3000万元亦已如数收足。

△　国民政府委员杨庶堪在重庆病故。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存入国史馆，发给治丧费5000元，抚恤10万元。11月22日，杨庶堪追悼会在渝举行。

8月7日　　教育部呈请行政院批准拨专款改善教授生活：一、奖助金，凡教授或副教授如有著作，可将稿件送教育部，先支付稿费，再行出版；二、补助金，凡教授家庭人口在五人以上者，持校方证明，每月可领200元至400元之补助金。

△　罗斯福秘书居里返美。居里此次来华，留渝16日，与蒋介石会谈14次，多次谈及史迪威地位问题，临别又请尽量优容共产党。

△　美海军陆战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从而拉开了为期六个月的争夺该岛的战幕。结果日军遭到惨败，被迫转入战略守势，直至投降；盟军则挫败日军继续南进的计划，为在太平洋上开始逐岛进攻创造良好条件，使太平洋战争形势为之转变。

8月8日　　国民政府令：《战时盐专卖暂行条例》在全国施行；

《战时火柴专卖暂行条例》在川、康、黔三省施行；《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在川、康两省施行。

△　军事委员会制定《关于核定在华美军犯罪行为处置办法》，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按照美国军法裁判”。

△　缅甸侨领李文珍参政员晋见林森主席，倡导归侨在后方从事生产。

△　地政局决定在川省各区择18县成立地籍整理处。现已在泸县等10县成立，办理土地测量、登记及规定地价，限四个月完成。

△　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专署、县府发出命令，重申不得随意挪用或强借乱支地方财政收入，要求各项地方财政收入按期完成任务，款项必须随时交金库。如有违者，将予以行政处分。

△　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冀南大名东南攻入伪军据点，歼伪新编兴亚同盟第一军王天祥部主力千余人。午后，日军赶来增援，遭八路军痛击，被歼百余人。八路军伤亡13人。11日，日伪军1500人对大名东南地区进行报复“扫荡”。

△　冀东第十二团第一营在迁安县彭家洼庄南龙子山（今名常胜山）上设伏，全歼日本关东军原田东雨中队，76名日军除一人逃跑外，均被击毙，缴获轻重机枪四挺，掷弹筒三个，长短枪70余支。八路军营长欧阳波平牺牲。

△　汪精卫接见朝日新闻社南京分社社长，发表谈话称：将尽其可能以物资协助日本，以表示国民政府协力大东亚战争，同甘共苦之精神。

△　美日进行萨沃岛海战。8日深夜，日军七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在瓜岛以北的萨沃岛海域与正在南区巡逻的盟军舰只遭遇，当即发起攻击。盟军由于猝不及防，二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日舰击伤。

随后，日军舰队又驶向盟军在北区的巡逻舰只，盟军三艘巡逻舰均遭重创。后来，日军在萨沃岛东北海域又击伤盟军驱逐舰一艘。日军在战斗中，有二艘巡洋舰被击伤，损失轻微，但由于未触及盟军运输船只，未能阻止盟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

8月9日　　四川省主席张群在成都四川省水上警察训练所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宣布：乐山、宜宾、泸县设水警分局，并在总局所在地成都设水警所。

△　国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奉教育部令改为总校，自下学期起暂设电机、机械、航空、土木、管理五系。

△　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两个团，经过周密的侦察，对日伪军南通重要据点石港发起攻击，全歼守敌，俘伪军第三十二师第六十四旅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六挺，长短枪345支。

△　浙赣战场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一部自常山北犯开化，是日占华埠；另一部自玉山西犯德兴，于珠川镇附近与第五十五军范子英部第一四五师激战。上饶日第二十二师团窜郑家坊与第二十一军刘雨卿部第一四六师战斗。赣东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与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各部激战，攻势顿挫。

△　日军第二十六师团主力及骑兵集团一部共1.3万余人，向绥南地区“扫荡”。该地区八路军大部及军政领导机关分别向外转移，大青山骑兵支队进入绥南的蛮汗山区，大青山行政公署及绥中专署机关经绥南转至晋西北的偏关地区。平绥铁路西段以北地区仅留少数部队与敌周旋。至11月中旬，大青山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变为游击区。

△　甘地、尼赫鲁等印度国大党领袖16人被英国当局逮捕，印境数次发生骚乱。10日，蒋介石打电报给甘地、尼赫鲁及奈杜夫人表示慰问。

8月10日　　国民政府公布《粮食库券条例》。库券面额分一市斗、二市斗、五市斗、一市石、五市石、10市石、100市石七种，从是年起每年以面额五分之一抵缴各该省田赋应征之实物，至1948年全数抵清。

△　财政部决定棉纱、麦粉一律改征实物，棉纱及棉纱直接制成品每285公斤折征一公斤，麦粉每40袋折征一袋。

△　中缅运输局撤销，另组滇缅公路运输局、川滇公路运输局及滇缅公路工务局接办业务，统隶于运输统制局。

△　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抵渝，陕西同乡会举行欢迎会，杜报告在缅甸作战经过。

△　浙赣战场第二十五集团军第八十八军何绍周部克石仓源，日军退松阳固守。

△　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武汉行营成立。

△　日正金银行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签订《军用票及中储券之互相存放款契约》，规定：当正金银行需要中储券资金时，就由正金银行收入中储行在该行一定数量军票存款，中储行则按军票数额以18元兑换100元之比率折成中储券，作为正金银行在中储行存款（1943年4月1日，改订契约，将军票改为日元）。

8月上旬　　月初，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分别撤至印度及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入缅时总人数为10.3万人，经四个月作战，仅剩四万余人。其中，第五军（下辖直属部队，第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4.2万人，作战死伤7300人，撤退死亡1.47万人，仅剩两万人。

8月11日　　蒋介石接见英驻华大使薛穆，提示个人对印度问题之地位与态度，及为同盟国设想之苦衷。并希望美国出面斡旋，对印度

保证，战后允其独立。

△　《中央社》讯：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修改组织条例，仍保持官商性质，官股加多。修改要点：一、资本完全由政府负担，不收私人股份；二、放款性质限于短期；三、发行最高限额由政府核定；四、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二人，由政府特派，另设理事若干人，组织理事会。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治保卫队第二一二旅编成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第五分区一部，夜袭杨庙日军据点，激战半小时，俘百余人，获枪80余支，子弹4000余发。

△　是日至9月中旬，日军对冀东根据地进行“冀东一号第二期作战”。参加“扫荡”的日军有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大江大队、驻蒙日军面高坦克联队、松井讨伐队，以及伪“治安军”10个团、伪满军2000余人，总兵力共四万余人，由铃木启久少将指挥，首先反复“扫荡”、“清剿”冀东东部地区。自8月17日至9月末，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在伪军配合下，大举“扫荡”冀东西部地区。在一个多月反“扫荡”中，冀东军民共作战20余次，毙伤日军300余名、伪军150余名，俘伪军4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13挺，掷弹筒九个，长短枪520余支。

8月12日　蒋介石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公使明诺夫斯基，接受捷总统贝奈斯总统赠的十字勋章。13日，蒋特致电捷总统表示感谢。

△　重庆《大公报》讯：国民政府决定国家银行专业化，中央银行为惟一发行银行，中国银行为专营国际汇兑及贸易事业，交通银行专营实业放款及股票债券抵押贴现业务，中国农民银行专营农贷及土地金融业务。四行股本各增至6000万元，分为公股与非公股，非公股

不得超过股本总额40％。各行设立董事会。

△　甘肃省洮沙县马玉堂捐资一万元，兴办该县灵石寺中心学校，教育部授予一等奖状。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并颁“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川省府据报，各县因秋收将届，近有预买青苗睹盘情事。省府对此种非法交易决予严禁，特提示惩处办法两项，通令各县、市认真执行。所有青苗一律不准买卖，已订有契约者应饬撤销。如违一经查出，或被人举发，即按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集居奇办法惩处。

△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晋察冀分局和军区主要人员配备的决定：以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萧克、杜理卿、赵振声、刘仁为分局委员，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聂来延安期间，程子华代理书记。军区由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治委员，聂来延安期间由肖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取消北岳、冀中两区委，两区工作集中于分局。

△　据天津《庸报》统计，今年七个月内，华北运往“满蒙”做苦工的壮丁，达70余万人。

△　是日至15日，斯大林、丘吉尔和哈里曼在莫斯科会谈。会谈中，英、美向苏联通报即将实施的“火炬”行动，即在法属北非登陆。

8月13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决定将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及新生活运动总会等机构合并。

△　国民政府派驻土耳其公使邹尚友为互换中伊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中印学会在渝举行年会，讨论修改会章、扩充组织等，推朱家骅、顾孟馀为正、副理事长，戴传贤、陈布雷为正、副监事长。郭泰祺、顾毓琇、王世杰为监事。

△　浙江金华地方法院院长陆宝铎、检察官陶亚东、书记官李聪谋等，于日军侵占金华后被执不屈，以身殉职，国民政府特明令褒扬。

△　宋希濂、李根源在云南大理创办《滇西日报》，聘顾建平等主持，是日发刊。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社论列举了“左”右倾的具体表现，批判了“左”比右好的错误观点；号召一切共产党员应该做坚持统一战线的模范，做坚持团结的模范，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过程中发生的个别的“左”右倾向；要求全党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以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　第三战区一部围歼浙境松阳以南残余日军，仙霞岭反攻告捷。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五分区部队攻入平乡城内，俘日伪军200余人，缴获枪百余支。

△　新四军第五师决定成立鄂皖兵团指挥部，刘少卿（化名江岳江）兼指挥长，杨学诚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第四军分区（黄冈及鄂南地区）、第五军分区（鄂皖边地区）。

△　华北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联合指示所属单位，在全华北展开对敌政治攻势，以争取华北数十万朝鲜侨民与瓦解敌军。

△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十一大队及伪军2000余人，对冀东迁

安县东西密坞11个村进行“扫荡”，屠杀村民100余人，捕走300余人。9月10日又将抓走的300余人集体屠杀于大杨官营村西大坑。

△　日军通令华北占领区的大米、小米、小麦、油、煤等物品实行“配给”。

8月14日　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希望在西安会晤毛泽东。周恩来随即电告毛泽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与蒋介石会见不会有好结果，建议让林彪代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见。9月14日，林彪偕伍云甫离开延安赴重庆。

△　国民政府特派叶楚伧为高考初试典试委员长，潘公展、罗家伦等25人为典试委员。

△　军事委员会致电军令部，并电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谓“遇有不法行为之美官兵必须采取看管或扣留时，应以和平及优待方式”，“责成当地机关部队采取必要措施随时予以先行保护”，“迅速通知美方移交办理”，“不得稍有粗野举动”。

△　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饬令解散本省“帮会组织”，“凡已加入者，一律须即日退出”。

△　重庆为庆祝第三届“空军节”，举行首届跳伞比赛。同日，成都亦举行首届模型飞机比赛。

△　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中将于中国空军节之际，向美国驻华空军司令陈纳德少将致电嘉奖。

△　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赴旧金山考察，将参观美国西岸军事工业，并出席国民党旧金山支部常务委员会。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三十次政务会议，通过下列主要决议事项：一、修正已颁之三十一年度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将原规定之起

征点五斗改为六斗，起征率5%改6%；二、完全接受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七次会议关于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的建议，责成秘书处拟出执行的具体办法；三、边区政府成立保健委员会，负责行政干部之保健工作；四、准陈永清辞去边区参议员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职务，遗缺由马豫章担任；五、以南汉宸、刘景范、高自立、霍子乐、丁仲文五人组成建筑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府办公厅的修建工作。

△　日伪军6000余人“扫荡”山东八路军利津、沾化以东之垦区，并企图隔绝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八路军清河军区部队发起反“扫荡”、反“蚕食”战役，歼敌伪军500余人，粉碎了敌人“蚕食”计划。

△　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新任师长孙焕彩纠集李延修、朱信斋等部共2000余人，乘八路军换防之机，南越日（照）莒（县）公路，占领甲子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山东军区第二旅与第四旅及地方武装等部，联合向其展开反击，经三皇山、陡山河、蒲汪、滩井等战斗，给顽军以惨重打击，至19日收复甲子山地区，共毙伤顽军500余人，俘650余人。

8月15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兰州处理新疆各项问题。

△　财政部批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一亿元。

△　外交协会聘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孙科、朱家骅、王世杰、王宠惠、王正廷、郭泰祺、张治中、贺耀组、谷正纲、张群、董显光等为名誉理事；决定在纽约成立分会。

△　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指出：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不妥。早几天《解放日报》社论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

△　《东南日报》经陈果夫核准，由社长胡健中率领全体员工从浙江退出，在湖北复刊。21日正式出版。

△　中国军队开始在浙赣线反攻。是日，第三战区部队收复浙江沿海重镇温州。18日，日军各兵团向原防地撤退。

△　华北日本士兵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18日闭会。朱德、吴玉章参加大会并讲话。朱德代表八路军声明："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号召他们把在华日本士兵，"都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底下，枪口对着你们和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军部"。日本士兵代表茂田江致答词。大会决定成立反战同盟统一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并通过纲领和会章，还通过宣言并决议严惩横暴长官。

△　汪伪政府粮食管理委员会与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签订《苏浙皖三省粮食采办搬运之谅解事项》，划定苏州区、无锡区、松江区、安徽江北区为日军采用军用米区域。

△　太原附近各县大雨不止，山洪暴发，河水暴涨。同蒲路太原至侯马段200余里被淹没，铁轨、车辆多被冲毁。

△　中央社费城合众电：星期六晚《邮报》载有讨论中国问题之论文一篇，内容系论空袭。略谓重庆今日深知无论来自何方之空袭，其坚固之石颚，均能受之而无恐，此乃全世界最英勇之城市。

8月1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边区贸易总局会同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管理局、联防军司令部等党、政、军机关联合成立食盐专卖委员会，联防军司令部张令彬为主席。该会为辅助边区政府推行食盐专卖政策之权力机关，具体工作由财政厅贸易局执行。下设食盐专卖总公司和估产估价委员会。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冀鲁豫军区各一部袭击大名以东南

李庄伪军王天祥部，毙、俘伪军团长以下280余人。

△　陈公博与日军小林部队长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规定：日本方面以担任军事事项为主，中国方面以担任政治工作为主。上海分会用于清乡的军队为保安队、警察队，其作战及警备事宜，受日军小林部队长指挥。

8月17日　军政部组设军官资格审查委员会，规定各市、县军事科长人选，须正式军官学校毕业，并经该会审查合格为准。

△　中央社讯：政府为鼓励警察安心服务，根据内政部第三次会议决议和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建议，特作如下规定：一、警察人员服务三年者可免其子女小学费用；二、满九年者，可免中学学宿费用；三、满15年者，可免专科以上学校学宿等费。

△　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第二营于蓟县洪水庄同由平谷出犯之日军遭遇，经激烈战斗，全歼日军前卫一个小队40余人，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20余支。

△　美参议院议员汤姆斯发表演说，主张联合国家放弃在华一切治外法权，以表示实施大西洋宪章的决心，并建议于8月29日签订废除治外法权协约。本月29日为《南京条约》订立一百周年，美国各报纸表示赞同废除治外法权。

8月18日　据中央社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全国各地之国民兵团与军事科并存，国民兵团直属于市、县政府，市、县长兼任团长，副团长由军事科长兼任。

△　粤省行政会议在韶关举行，粤北10余县县长、粮政科长、田赋处长等500余人出席。省长李汉魂报告粮政、兵役、卫生、保卫等要政。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报告征实、征购、治安等问题。通过调查存粮及登记粮仓等案，20日闭会。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在8月12日至15日进行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条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

△　中缅文化协会举行晚会，欢迎旅缅华侨领袖李文珍、许文顶等，该会副会长都弥亚辛女士致欢迎辞，李、许等相继发言。

△　日大本营命令任河边正三中将为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原任后宫淳大将调任中部军司令。是日，河边正三赴南京就任，并会见汪精卫。

8月19日　　蒋介石在昆明创办“战时干部训练团”，自任团长，龙云任副团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任教育长。该团招收初中以上男女生“受训”，并设立边区子弟“特别班”。

△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称：“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周恩来又致电毛泽东称：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本月29日、9月3日，毛泽东再复电周恩来称：根据目前局势，“我去见蒋有益无害”，已定先派林彪见蒋，然后确定我去西安的时间。同日，毛泽东致函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称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应以精兵简政为中心，开会前实行精简，开会后检查精简，这包括精少、效力、统一各个方面。总之，精兵简政要来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　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的浙东军政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是日，“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余姚、慈溪和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亦成立，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三、第四、第五支队，以坚持“三北”地区，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同时，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坚持斗争。

△　浙赣战场第三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师是日克上饶，21日克玉山。浙赣西段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陆续向南昌撤退。第一〇八、第一四七等师是日克贵溪，第七十五师于21日克鹰潭，第十九师于22日克邓家埠，24日克东乡。第一〇八师于29日克进贤。

△　晋西北岚县八路军与民兵合作，对日军展开六路大破击，摧毁桥梁四座，公路多段，捣毁普明镇等地“模范村”围墙。

△　日军在晋东北灵丘施放毒瓦斯，当场中毒而死民众30余人。

8月20日　蒋介石在兰州指示盛世才抗苏之方针：一、中央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控制在哈密的俄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中央收回外交权，使苏联在新疆的外交纳入正轨；三、肃清新疆共产党；四、令苏军撤离新疆；五、收回迪化飞机场。

△　财政部根据全国桐油调节管理暂行办法及其施行细则的规定，指定重庆市与川东、川中及陕南、鄂北、鄂西，凡158县、市为第一桐油管理区域。该区域的桐油如须运出，应向复兴公司领取转运证，凭证转运；该区域内的桐油业商户及桐油工厂，除应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外，并按月向复兴公司报告存油数量。

△　东南联合大学决定设文、理、法、商四个学院13个系以及艺术专修科，11月1日在福建建阳开学。

△　晋冀鲁豫军区发起为期40天的对敌政治攻势。同日，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华北《新华日报》发表《政治攻势与敌占区同胞的关系》的谈话，号召敌占区同胞与根据地人民密切结合，形成一个巨大的斗争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　浙赣战场广信第十集团军预备第五师是日克广丰，第一〇五师23日克江山，该师及游击队一部于28日克衢州，29日克龙游，30日克汤溪。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例会通过调整军事委员会机构案，将军政部及海军部改隶属军事委员会，将军政部改为陆军部，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及总务厅。任命刘郁芬为总参谋长，萧叔宣为军事参议院院长，鲍文樾为陆军部长，叶蓬为陆军编练总监，孙良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暂行兼任开封绥靖主任。总参谋长、陆军部长、陆军编练总监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常务委员；选陈君慧为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　日兴亚院派员赴中国占领区进行实地“考察”。第一批是日出发，视察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之一般政务及政情；第二批由近藤荣次郎等组成，视察汪精卫政府统治情况及华北日军进出情况；第三批由后藤一三等组成，视察华北、华中产业交通；第四批由田道之四郎等组成，视察华北、华南之财政经济等。要求到年底写出调查报告交兴亚院。

△　巴西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8月21日　社会部主办的人民团体总登记宣告基本结束，全国直辖224个社团，已登记者达百余单位。另据《中央日报》讯：凡不符合人民团体组织规程之团体，或虽已成立而无实际工作成绩者，该部均将令其撤销。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浙赣铁路之交通重心鹰潭镇与玉山城。同日，第三战区一部再克浙东青田、东乡。23日，第三、第九战区一部分别再克江山、余江。

△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任命陈春圃为组织部长。

△　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赴长春视察伪满军队，商谈军事问题。

8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问题，决定先派林彪去，看情况再定。毛泽东在会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

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

△ 美总统罗斯福邀请宋美龄访美。

△ 中国航空公司开辟重庆至兰州新航线。

△ 伪广东省政府与日签订《关于日本交还汕头市自来水厂及借款合约》，规定日方自开始经营汕头市自来水事业，直至交还于伪方前之投资额及其附带费用作为伪方的借款，借款额为日金29.9521万元，五年内分期支付日方。

8月23日 财政部拟定《中央银行组织法》，规定“中央银行资本完全为政府资本”；“中央银行总裁得参加国家预算之审议”；并规定中央银行随时协助政府制订关于金融财政之管理事项等。

△ 浙赣战场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一四五师是日克平山，鄱阳湖地区日军向康山、南昌退却。同日，鄱阳湖警备队克波阳，24日克都昌。同日，第十九师一部收复浒湾，暂第六师攻克临川。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的社论，指出全党应充分了解其意义，彻底执行，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整齐些，锻炼得更精干些，胜利与发展就会更有保证。

8月24日 国民政府为沟通侨汇，特作如下规定：一、由主管国际汇兑的中国银行与有关省银行订立代解侨汇合约；二、侨汇登记编号列帐，由旅美参政员邝炳舜将姓名、住址和款数送财政部转请中央银行指定在美银行立产收款；三、中国银行在国内侨眷中心区域增设支行与办事处；四、国外汇交沦陷区之款，可先由中国银行汇至邻近沦陷区之行、处，再由商业行庄转汇等。

△ 蒋介石由兰州飞西宁，并在西北各地视察。

△　教育部长陈立夫、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举行茶话会，招待归侨教育工作者，讨论有关侨民教育问题。

△　重庆《大公报》讯：国民政府经济部调整各省省营贸易机构，分别改为企业公司、贸易公司。

△　浙赣战场第九战区新第十师是日克三江口，新第十一师25日克李家渡，27日克梁家渡，恢复战前原态势。

△　日军从徐州、滕县、费县、济南、临沂、枣庄等地，集结4000余人，分八路“扫荡”鲁南抱犊崮山区。八路军鲁南部队当即开展广泛游击战，并深入敌后开展反“扫荡”斗争。

△　夜，延安大雨，山洪暴发，被水冲走80余人，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拨款五万元赈济灾民，并组成水灾善后委员会，负责善后处理工作。

△　日、美进行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是日，日军输送登陆兵的船只及护航的舰艇编队进至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200余海里处，日海军第二舰队在其以东40海里处航行。当日下午，美海军特混编队即抢先对日军发起攻击，一举击沉日轻型航空母舰。随后，美海军派出舰载机攻击日舰，只击中一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在美军发起攻击的同时，日舰载机也飞临美舰上空。经过六分钟的激战，美一艘航空母舰受创，15架飞机受损，日机90架被击落、击伤。25日拂晓，美军陆基航空兵又击沉日军一艘运输船和一艘驱逐舰，重伤一艘巡洋舰。经过此次海战，日军被迫停止利用大量船只输送登陆兵上岛的活动。

8月25日　毛泽东修改一份关于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的内容

有：“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通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党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的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滕代远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

△　据重庆《中央日报》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加强各地党务督导工作，特依各省地域之大小，划分为若干区，每一区设一党务督导员。督导员直接由国民党省党部指挥，由组织部指派。

△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王柏龄在成都病故。9月8日，中常会决议明令褒扬，并给抚恤金五万元。10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8月26日　　四川省水利建设已动工者有遂宁南北堰、洪雅花溪渠、三台北堰、峨眉熊公堰、雅安青衣渠等五处，由中、中、交、农四行和信托局贷款500万元。

8月27日　　是日为教师节和孔子诞辰纪念日，教育部与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孔子诞辰座谈会。同日，重庆孔学会举行纪念会，陈立夫、谷正纲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300余人出席。孔学会理事长孔祥熙致词称：纪念孔子应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集中外文化之大成。晚，中国音乐学会特举行国乐演奏会。

△　教育部公布部聘教授名单：苏步青（数学）、李四光（地质学）、吴有训（物理学）、饶毓泰（物理学）、张景钺（生物学）、艾伟（心理学）、胡焕庸（地理学）、胡元义（法律学）、杨端六（经济学）、孙本文（社会学）、梁希（林学）、茅以升（土木水利

工程）、庄前鼎（机械航空工程）、余谦六（电机工程）、洪式闾（医学）、蔡翘（生物解剖）、黎锦熙（中国文学）、陈寅恪（史学）、萧一山（史学）、汤用彤（哲学）、吴宓（英国文学）等30名。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各党务机关一律普设人事机构，按党务机关之大小，分为甲、乙、丙三等。

△　第九战区部队克复江西进贤、上饶、贵溪等地。同日，第三战区部队克复温州。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命令各部队利用青纱帐雨季加紧破坏敌之封锁沟、墙，并配合政治攻势，在封锁线内开展游击战。冀中八路军向日军展开破袭战役，自是日至9月10日，先后作战42次，毙伤日伪军70余人，破坏公路72里，平封锁沟60余里，毁敌炮楼八座，缴获军用品多件。

△　美军潜艇在闽江口外击沉日运输舰二艘。

△　美国务卿赫尔电令驻英大使，与英商洽共同取消在华治外法权。

8月28日　蒋介石在西宁召见马步芳、马步青，指示要发展柴达木东西交通，及对西藏之方针。同日转赴酒泉。30日飞抵张掖、武威视察。

△　四川省政府会同军管区司令部制定《四川省乡镇以下各兵役人员拉丁强服兵役惩罚办法》。但拉丁之风仍未因此制止。

△　重庆《大公报》讯：《中国论坛报》在江西省发行日刊，彭集新任总经理，章苍萍任总编辑，王乃昌任发行人。12月3日，该刊因承印工厂发生问题，被迫停刊。

△　浙赣战场第二十五集团军第八十八军暂三十二师克丽水；新三十一师于23日克缙云，9月1日克永康。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作出关于太行区反“蚕食”斗争的总结报告，指出：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首先肃清干部中的悲观失望情绪，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认清我们在政治上的优势，把握反“蚕食”政策武器；反“蚕食”斗争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参加反“蚕食”斗争；反“蚕食”斗争必须在领导上取得统一，使党、政、军、民相互配合。敌进行大“扫荡”，是我们积极展开反“蚕食”斗争的良机，也是配合反“扫荡”的有力武器，应该很好地抓住这一时机，取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　是日至9月10日，北岳区军民开展反“蚕食”斗争，摧毁日军岗楼三座，破坏公路620里，毙、伤、俘日伪军690余人。

△　皖省水灾惨重，为百年来所未有，灾区遍及阜阳、桐城、太和等21县。是日，旅渝同乡会召开紧急会议，推举刘立明等代表吁请孔祥熙、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拨款救济。

8月29日　第七十九师是日克松阳，30日克宣平。日军原田旅团退据武义。日军第十三军一部占领金华、兰溪，其余撤往杭州；第十一军撤回南昌。浙赣战役至此结束。是役共毙伤日军2.2413万名、马193匹，俘日军53名。

△　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队，于朝鲜亡国三十一周年之际发出文告，号召韩国同胞“协助中国抗战，贡献一切力量，争取韩族自由”。

8月30日　宋美龄携蒋介石致盛世才函飞往迪化，吴忠信、朱绍良、毛邦初等随行。宋与盛在迪化秘密谈判。31日，宋携盛致蒋介石复函飞抵西宁，函称遵照指示，切实奉行。至此，盛世才正式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旋，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

党部主任、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九要职。

△　四川省政府以各县凿塘蓄水，关系高原灌溉，预防灾害，至为重要，特通令各县一律遵照前颁标准办理，工料膳食由主佃分担。

△　川省建设厅长胡子昂谈川省建设动态：机械制造厂由原省立机器厂合并，资本1500万元，钱新之任董事长；水泥公司资本700万元，主办人徐宗涑；农业公司资本600万元，主办人刘伯量；丝亚公司资本3000万元，张群兼董事长。

△　粤北第七战区一部克复军田。

8月31日　　立法院长孙科在中枢纪念周报告15年来立法工作。谓：自1928年以来各项立法工作可分四大类：一、政治体系立法；二、司法体系立法；三、经济体系立法；四、国防体系立法。其中司法体系立法工作已全部完成，政治体系立法已基本完成，其他两项立法正在进行。

△　重庆13个国际文化团体负责人举行第十六次联席会，并欢宴罗马教皇驻渝代表费悦义，由天主教文化协会负责人潘明英主持，波兰、英国代表讲话。

△　驻英代表叶公超在英发行《中国新闻》，叶自任编辑，是日出版。

△　新四军第五师为保卫大小悟山后方机关，惩罚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集中第十三旅等部，向礼山以北顽固派保安第四旅进行反击，全歼保四旅旅部及两个团，活捉旅长蒋少瑗，取得礼北战斗胜利，缓和了鄂东的形势。

△　八路军冀南、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强袭大名东北金滩镇，歼

伪军一个团。

△　晨5时20分，日机三架分批由晋窜陕境窥视，一架飞川北通江、广元等县，至12时许始分途飞走。

△　日细菌部队又在浙江衢县、金华地区进行细菌战，仅义乌崇山村因传染鼠疫而死者即达320多人，30家绝户。

8月下旬　　冀东八路军击溃日军万余人对根据地的“报复扫荡”，并开辟了路南、河东400余村的工作；打通了锦热路以南东西长达500余里的地区，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联结起来，边区人口增至270万人，主力部队增至七万多，地方武装增至近200万。冀东是在困难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均大大缩小的情况下，惟一得到发展的一块根据地。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有效地制止了敌之“蚕食”。

是月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聂荣臻兼任书记，韩光为副书记。同时，决定在冀东地区和冀中地区也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

△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教育部队爱护国际战友的训令》，指出：各级政治机关应当教育自己的部队，以十分尊重与亲切的态度去帮助、爱护、关怀我们这些可贵的国际友人，替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工作中与生活中的困难，目前敌后战争更加频繁，因此更要求我们对他们加以照顾。在战斗情况下更关心他们的安全，这对我们部队本身也就是一种具体的国际主义教育。

△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政、军工作，原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中共晋西区党委撤销。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晋绥根据地实现了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晋绥分局辖第二、三、五、六、

八、绥西、绥南等八个地委40余个县。

△　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二旅机关改为滨海独立军分区，王叙坤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五、第六两团。1943年3月，改为滨海军区。

△　周恩来听取徐伯昕关于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指示说，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

△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起对敌政治攻势：1日，冀南军区发起为期三个月的对敌政治攻势；10日，太岳区发起为期二个月的对敌政治攻势；20日，晋冀鲁豫军区发起为期40天的对敌政治攻势；是月，晋察冀军区和北岳区党委组织发动第三期对敌政治攻势。

△　山东省保安第十七旅少将旅长窦来庚在山东殉职。

△　日军采取“蚕食”手段，占领北岳区千余个村庄，北岳区周围的碉堡由1941年的864个，增加到1876个。北岳区根据地缩小，北岳区斗争进入困难阶段。

△　日军侵占海南岛后，琼山县长泰村成为琼崖纵队抗日根据地，是月一天中午，日军突然包围长泰村，屠杀村民95人，烧毁全村房屋。

△　日军在山东、冀东等地强征民伕20多万人，在冀东挖封锁沟、筑堡垒。伪满洲国政府也沿长城各县继续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遏制八路军在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活动。

△　豫省灾情严重。春季无雨，入夏又遭风、雹、蝗患，庄稼枯萎，灾区达45里，灾民约300余万。国民政府拨100万元急赈，但灾情仍在发展。省主席李培基电请中央继续拨款并免赋。

9月

9月1日　　为纪念欧战三周年，蒋介石特电英国首相丘吉尔重申抗战决心。参谋总长何应钦分别致电英国海、陆、空三部大臣及魏菲尔将军，对英国全体将士及人民英勇作战的精神表示敬意。

△　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进行改组，原在理事会下之战时金融、战时经济两委员会并为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下设贴放、农贷、储蓄、汇兑四个小组。

△　社会部劳动局成立，局长贺衷寒，副局长史维焕。

△　民族健康运动委员会在全国发起民族健康运动，是日起在全国各省同时举行，历时一月。

△　是日为记者节。中国新闻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渝举行，国民党中委陈果夫、宣传部长王世杰等150余人出席。新闻学会理事长潘公展致词，要求新闻工作者以牺牲个人自由，去换取国家民族之自由平等。推萧同兹等21人为理事，潘公展等七人为监事。陪都记者联谊会举行晚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茶话会。

△　延安新闻界举行第九届记者节，并追悼《新华日报》华北分社社长、青年记者总会北方办事处主任何云等，杨尚昆报告何云生平事迹。博古讲述办好报纸的重要性。王若飞、凯丰、胡乔木、陶铸等300人出席。另新华社晋西北分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晋西北分会及《晋西北大众报》等单位，亦联合举行纪念活动。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密切配合。政治局确定：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中央代

表机关及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及民众团体，均须无条件执行。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中央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军分区政治委员，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要求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　毛泽东接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郭卫生、周励武。陈等表示，蒋介石、张治中、吴铁城均愿与中共改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彼方释放叶挺，我方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我方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彼方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可重新往来，但若何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　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由邓小平、李大章、刘伯承、李雪峰、蔡树藩五人组成。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中条山区）四个区党委。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列席并报告继续贯彻精兵简政方案。决定由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高自立、刘景范、柳湜、周兴等七人组成简政委员会，负责政府简政之全部工作。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保护边币命令，决定本区一切交易往来，收受公款，都以冀钞为本位币，不许行使法币。持有法币者，须由冀南银行或其委托之代办所兑换成冀钞，方得使用。是日，边区政府还发布修正后的《禁止敌伪钞票暂行办法》，决定禁止一切敌伪发行的钞票在本区内携带、保存与使用。8日，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

目前金融货币工作的几个问题给各专县工商局的指示》，进一步提出巩固本币（冀钞）、管理外汇等问题的具体办法。

△　延安举行9月运动会开幕式，朱德讲话强调举行这次运动会的目的，在于广泛地开展体育运动，健全体格。9日闭幕。

△　延安《解放日报》讯：日军从7月10日开始向晋察冀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是日结束。其特点：一、实行大乡制，组织自卫团；二、集中力量向一县突击，县集中力量向一区或一村突击；三、每二人抽丁一人，每一区抽丁400人，组织自卫军；四、每区建立据点实行清乡；五、在交通要道组织突击“扫荡”。

△　汪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在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开始“清乡”。在“清乡”地区设立三个特别区公署、19个分区公署、三个特区封锁管理所，开设保甲人员封锁训练班，实行调查户口，编组保甲。在“清乡”周围地区修筑167公里封锁线，建立大小检查所41个，对来往行人、车辆及物资实行检查。

△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二任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副主席于品卿、李守信在张家口举行就职典礼。

△　日外相东乡辞职，遗缺由首相东条兼任。17日，任命谷正之为外相。

△　第二十八届国际学生联合会在华盛顿开幕，中国学生代表27人出席会议。驻美大使胡适在会上讲话，主张建立“集体安全制度”。

9月2日　　蒋介石与宋美龄1日到宁夏。是日宁省政府举行欢迎会，蒋出席并讲话，对宁夏抗战的贡献与建设表示满意。宋出席妇女运动会欢迎大会，对宁夏妇运工作的成绩表示赞许，当即给法币五万元充作该会经费。3日，蒋、宋飞西安。

△　经济部长翁文灏饬令工矿调整处及迁川工厂联合会组成西北

工业考察团，由正、副团长林继庸、颜耀秋率领，21日出发赴陕、甘、宁、青考察。

△　驻美大使胡适拜会美总统罗斯福。

△　浙赣铁路沿线日军节节退却，第三战区一部克永康、义乌，赣东方面已恢复6月以前态势。

△　延安《解放日报》载：华北日伪在第四次“治安强化”失败后，又实行所谓“紧急物价对策”，将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立各级物价委员会，由日本兴亚院中央物价对策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设事物局整顿各地“配给业务”。在此政策下，华北各大城市日用必需品濒临绝迹。

△　美社会主义党国内执行委员、美国战后世界委员会主席理曼·汤姆斯，美国纺织工人协会会长意密尔理·何，于是日和5日分别致函中国人民和工人，表示主张废止美国政府一切治外法权和在华特权，并将函件托中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的代表朱学范带回。

9月3日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对沦陷区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希望再接再厉，完成神圣使命。

△　粮食部发表通告：本年全川丰收，川西收成十足，川南、川北亦均丰收，仅川东稍欠，但如将小麦收成及全川各县秋收平均计算，则本年粮食收获实较去年为优。各地粮价有普遍下降趋势。

△　八路军晋西北第三分区一部消灭修筑雁门镇据点日军60余人。

△　日参谋总长杉山元下达《五号作战准备纲要》，日军准备进攻四川。后因日军在各战场陷入困境而无力实施这一计划。

9月4日　　中国新闻学会召开第二届理事会，推曹谷冰、彭革

陈、张万里、周钦岳为常务理事，陈铭德为书记。萧同兹连任理事长。

△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目前游击区政权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在敌人不断分割封锁、突击“蚕食”之下，游击地区的村级抗日政权，可以利用敌伪政权的组织形式，或者把抗日政权加以伪装，作为暂时应变的必要措施。两面派的村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以能迷惑敌伪视线，掩护抗日工作为准，不必求其强同。此外，对游击地区县、区政权与工作，也作了若干规定。

△　山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制定对敌经济斗争新政策，决定以战略区为单位成立生产贸易管理委员会；对敌展开生产、贸易等全国的经济斗争，以粉碎敌人向根据地倾投法币、操纵贸易、掠夺资源的阴谋。

△　晨，日机三架飞福建长汀，投弹12枚。另日机一架轰炸建瓯，投弹四枚，死伤20余人。

9月5日　　四川省政府决定是月及10月分别开征田赋征购实物，计征谷900万市石，购谷700万市石。为弥补短收，酌加一成，共计1760万市石。摊派数较去年增加300余万市石，购粮价格增加为每市石150元，并按券七币三发给。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见蒋时机不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鉴于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蒋认为目前正是解决边区的好机会，甚至误以为我“七七”五周年宣言表明我已屈服。如会晤，蒋会利用以“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境地。估计同蒋会晤的可能前途：一、表面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泽东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此着万不能不防”。提议林彪出面“勿将话讲死，看

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意见。

△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东工作发出指示，重申3月15日指示精神，强调“今后应注意向北发展，坚持锦热路南游击战争，并利用社会关系开展锦热路北工作，建立秘密堡垒，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展路北游击战争”。

△　汪伪政府决定在江苏、上海地区改订田赋征收办法，改银为米，折合中储券征收。

△　英政府决定将福州仓前山英国副领事馆全部产业归还中国。驻福州英领事柴博与国民政府代表李世甲在英领馆办理移交手续。按：仓前山英领馆系同治五年（1866）签约租与英侨管理，1870年英侨捐献政府，本年6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大使致送备忘录要求将该馆归还中国，经英政府同意，并饬由驻福州领事柴博负责移交。

△　美就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事照会英国，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对外政治关系上采取主动”，“目前可能是采取确切行动的最好时机”，说明此时废除在华特权，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具体地协助中国，以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效能；二、洗刷中美关系上现存的所有不正常事项；三、正式规定美、英人民在中国所享的一般权利完全和他们在其他友邦一样。18日，英国复照表示同意。

9月6日　　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解决军容风纪、补充兵员、防止逃兵、教育训练、军需供给及卫生交通等问题。会议于10日结束。蒋14日飞返重庆。

△　财政部决定：自本月1日起，川省境内中国、交通两行所办农贷业务，均移交农民银行办理。农行已在各县、乡设合作金库90余所。

△　中国化学会第七届年会在渝举行，到翁文灏、孔祥熙及化学界代表300余人。讨论战时化学研究与化学教育问题。推吴承洛为会长，曾昭抡为副会长。7日闭幕。

△　是日至次日，王宠惠、孔祥熙、翁文灏分别致电欢迎胡适回国。孔的电文称："四载贤劳，功在邦国；载誉归来，公私同庆。"

△　重庆《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公葬仪式在西安城南蓉林寺墓地举行。该报总经理胡政之主持，全国新闻界代表及西安各界人士3000余人参祭。蒋介石亲颁祭文。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张道藩、潘公展、洪兰友、中宣部长王世杰致电吊唁。

△　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冯白驹作题为《一切为了反攻》的政治报告，林李明作统战工作报告，庄田作军事报告，会议于25日结束。

△　冀南八路军开始反"蚕食"斗争，至19日，进行大小战斗75次，毙、伤、俘日伪军400余人。

△　据《晋察冀日报》载：日本从国内及其殖民地台湾、朝鲜强迫移入华北的所谓"日本居留民"，数量上确有很大增加，但其"五年移民华北200万"的计划远未完成。据敌方公布的数字，五年来华北日侨的人口增加如下：1937年7月4.3108万人；1938年7月9.934万人；1939年4月14.7126万人；1940年4月26.9011万人；1940年10月31.493万人；1941年4月34.2112万人；1942年1月1日38.1986万人。到2月1日，增加到38.3857万人。

△　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载：浙、赣收复区哀鸿遍野、亟待救济，以临川、广丰、上饶、南城、金华、丽水、衢州灾情特重。第三战区长官部电请中央急赈，另组织两战地宣慰督导团是日出发视察。

△　旅渝同乡会集会要求政府拨急赈款500万元以解决河南灾情。10日，孔祥熙召见请赈代表，只允拨300万元。

△　上午，日机41架分八批袭击湘、粤各地，在衡阳扫射，并在龙门县境投弹。

9月7日　　教育部奉行政院训令：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应隶属于县（市）政府，不应隶属于乡（镇）之下。所有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校长均应由县政府遴选。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明精兵简政是克服当前极端困难的一个极重要的政策问题；指出：战争的机构要适应战争的情况，现在根据地缩小了，决然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向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报告冀鲁边区的形势：该区有17县，驻日军3600余人，伪军1.1万余人，敌据点380个，顽军近万人，敌、伪、顽超过我军五倍。边区共600万人口，我方能推行政令的不到一半，我区已完全陷入受敌封锁分割之局势。

△　日军在山西汾阳召集各村伪村长、书记、教员等800多人开会，先用酒席招待，接着强令互相检举抗日分子，最后将400多人杀害。

9月8日　　川省田赋征收实物暨随赋带购粮食，去岁成绩为全国之冠，国民政府特颁给奖金共1153.4万余元，以资鼓励。

△　国民政府授予欧震晋、张德能、陈侃、周庆祥、朱岳、方先觉、董煜、李棠三等宝鼎勋章；陈沛三等云麾勋章；罗奇四等云麾勋章。

△　四川省推行国民教育两年来，据统计全川4368乡，6.2483万

保，已设中心学校4401所，国民学校3.5094万所，民教班3.6544万班，学生总数475.8493万人，教师总数11.431万人。

△　四川省今年桐油产量约四万至五万吨，除少数供燃料及照明外，提炼汽油仅需1000吨，外运断绝，销路大成问题。

△　毛泽东就国共合作中之斗争方针问题致电周恩来，电称：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张文伯（即文白，张治中字）愿来延则先欢迎他来延一叙，如此较妥。二、我们与民主政团及地方军人的合作，应服从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三、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并请注意。四、我西安办事处已于3日接办公厅通知，4日接第三十四集团军通知邀林彪前往，现在交涉飞机，准备日内动身。

△　吕正操等率领冀中党、政、军机关一部分干部及第二十七团两个营，从冀鲁豫转移到太行山区之涉县，同时冀中警备旅旅长王长江亦率领所部转移到涉县地区，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及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欢迎。9月18日，彭德怀检阅冀中部队，9月28日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召开欢迎大会。

△　9时，日机一架由越南飞滇省罗平、师宗一带侦察，在宜良上空与中国驱逐机相遇，日机中弹起火，在弥勒附近坠落。

9月9日　　重庆各界举行孙中山首次起义纪念会，于右任报告广州起义史略与意义，中央委员张继、卫戍总司令刘峙讲话。同日，全国11个城市庆祝首届体育节，举行运动会，纪念孙中山首次起义。

△　行政院例会通过对低薪公务员补助办法，规定：除战时生活

补助费200元外，其薪金在90元以下者，加10成；在51元以上者加五成。

△　朱德、彭德怀电贺“日本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三周年。电报称：“你们在冀南前线协助八路军进行争取日本士兵的工作，成绩优良。当此反法西斯胜利前夜，希望百倍努力。”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向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报告称：鲁南山区与平原已被敌分割为分散游击的局面，泰山、泰西区亦如此。鲁中与其他各根据地的联系很困难，清河区原有地区已被敌据点所分割，我津浦路两侧的联络点也被敌摧毁。为适应此种形势，目前反“蚕食”斗争在游击区应采取麻痹敌人，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方法。

△　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叙昆铁路工程局长、兼滇越路线区司令沈昌在昆明逝世。

△　英国联合援华募捐运动会主席克利浦斯夫人称：各方已捐款10万镑，其中8.305万镑交宋美龄，拟募25万镑。

9月10日　外交部宣布，欢迎英国议会访问团来华。16日，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国分会会长朱家骅致电英国会访华团表示欢迎。

△　交通部调隆福均兼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以杜镇远代理粤汉铁路局长。

△　重庆裕华、豫丰、申新、沙市四大纱厂迭呈物资局呼吁提高纱价无效，是日又联呈物资局要求提高纱价。15日，该四厂招待渝市新闻界申诉迁厂损失约达300万元，今日物价上涨至速，物资局规定棉纱价格殊难使厂方维持。

△　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为揭露日军杀害我军俘虏发出通知，指出：今年7月日军在太原将被俘的200余名抗日志士杀害，要把

这一违反国际公法的罪行公布于世。

△　日伪军在冀东迁安县实行“集家并村”，唐山守备队长佐佐木把捕获的男女老幼319人挟持到大杨官营西北的老牛圈全部杀害，制造“大杨官营惨案”。

△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国势”调查结果，总人口为4320.288万人。

9月上旬　　由于“五一”反“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全部变成游击区，主力部队已撤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决定“冀中各军分区完全地方化”，规定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分区专员兼军分区副司令员，县长、区长分别兼任县大队、区小队队长，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分别兼任县大队政委和区小队指导员。

△　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军区各部队统一编组，各旅组成一个正规化、精干化的独立团，计有第一、四、七及第五十二团。这四个团作为苏中的机动兵团。各旅的其他部队归苏中地方军，充实地方兵团，作为地方军之骨干。

△　日军在北平成立“兴亚宗教同盟”分会，总会设在东京，其任务是：一、举行“大东亚战争建设宗教协力会议”；二、设置“大东亚宗教调查会”；三、结成“兴亚宗教记者联盟”。是月初在东京召开“宗教协力会议”。

9月**11**日　　国民政府明令胡适免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职，次日特任魏道明为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　西南实业协会举行星期五聚餐会，章乃器发表《涨价休战》论文，并讨论游资、运输及全面管制等问题，以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及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的名义向当局陈述意见。

△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及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平山县寨北村召

开，聂荣臻主持，着重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总结以往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主力部队忽视游击战而坐待良机打大仗的错误偏向，强调开展游击战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思想。会议确定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配合各种斗争向敌实行全面攻势，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根据会议精神，北岳区各部队展开了以军事斗争为核心的全面出击，冀中区部队展开了以建立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地区苇塘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斗争。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为视察华北、华中联结地区之军情，于是日赴开封、新乡、徐州等地活动。14日返回南京。

△　汪精卫往上海视察“清乡”。13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谬称：“上海是20余年来共产思想的策源地，须从思想清乡着手。”

△　美国建造供给中国之第一艘运输船，在美国西海岸某港下水。

9月12日　　四川省政府为督饬各县征收实物及普遍视察各县政务，特派视察员分组往各区视察。省主席张群以各区视察出发在即，特分电各区专员、县长，并会各视察员，严禁馈赠酬酢，否则以行贿贪污分别论罪。

△　教育部聘任马思聪为中华交响乐团团长。

△　日军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七、第八、第九旅团及伪军共万余人，以“铁壁合围”战术“扫荡”河北枣强以南地区。八路军冀南军区机关及第六分区部队适时转至外线。经八路军努力反击，日军21日大部撤回石德路。

9月13日　　据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中、中、交、农四联总处令四行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增设分、支行，完成西北金融网。

△　延安《解放日报》载：日军在山西忻县、崞县一带发展“一贯道”、“先天道”、“同义会”等迷信组织，入会时每人交白洋一元，并用“加入后，日本可以不杀”欺骗群众，入会后进行特务活动。

9月14日　教育部颁发《省市县立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待遇规程》，凡14条。规定省属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待遇为40至400元。县属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待遇为30至2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给。工作人员本人婚姻生育、父母或配偶的丧葬在规定时间仍支原薪。服务满15年得休假一年。子女入学享受免费待遇。

△　中国工业联合会在重庆召开筹备会，决议：推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该会名称定为中国全国工业联合会；第一步取得人民团体资格，进一步成为法定组织。

△　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渝招待各文化团体，该会常务理事史焕章讲话，黄炎培、尹葆宇、杨卫玉等出席并致词。

△　国民党中央派往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夏恩临等返渝述职。

△　湖南省政府饬省银行拨款百万元创办“忠爱社”，派刘顺慈为经理，总社设耒阳。并筹设长沙、衡阳、茶陵、洞口、南岳等分社，建立全省旅行网。

△　周恩来关于国共合作中斗争方针问题向毛泽东作请示报告，称：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主，地方实力派与中间党派为辅，是我党历来统战工作的方针。重庆时期，在你提出的斗争三原则和革命两面政策指导下，统战工作有新的发展。我们在国共关系充分注意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努力开展对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文化界和外交方面的统战工作，具体做法是：一、对国民党争取谈判机会，但有步骤。二、如国民党压迫我们，就与之说理，请求解除，压迫太过也要从正面批评，不能默然而息。三、对其他方面统战的中心在要求其与国民

党比进步，非比落后。

△　延安《解放日报》载：日军在太原封锁所有水井，出售挑水证，凭证挑水，每张挑水一担。日军从晋东南抢劫大批妇女运到太原，定价30、40元或100元公开出售。

△　上午11时，日机一架窜入陕境，在榆林、绥德投弹。12时，又日机一架窜晋省，在黄河两岸窥察。

9月15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一、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各增加官股一亿元。二、简派关吉玉为田赋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　教育部奉蒋介石手令，特拨专款救济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分甲、乙两种，凡专科以上教员有著作者，在校外无兼职的教授、副教授，直系亲属超过五口以上，或因病医药费超过500元者，均可申请补助或借贷。

△　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李宗黄奉令出发赴湘、桂、滇、黔等省考核党政工作。

△　《战时火柴专卖暂行条例》自是日起在云南施行。

△　重庆《大公报》讯：火柴自是日起开始涨价，一等每盒零售价1.2元；二等每盒1.1元；3等一元。

△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军委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为统一军事指挥，着令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但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联防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免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方强为政治部主任。林枫免去联防军副政治委员职务，任命为一二〇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　毛泽东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目前任务是促成两党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闻蒋介石已回渝，我们仍要林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　毛泽东向李先念下达指示：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的时期，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为要。

△　浙境第三战区一部再克武义城，金华仍在激战中。

△　日伪军300余人驱使民伕2000余人，企图在唐县老虎山构筑碉堡。八路军开展伏击战，经六昼夜战斗，共炸伤日伪军44人，俘伪军150余人，破坏了敌建碉计划。

9月16日　缅甸全境被日军占领，中国入缅远征军全部撤出。远征军入缅总数为10万人，撤回国内的仅四万余人，大部在撤退中伤亡。从3月初至是日，远征军转战3000里，历时六月余。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至此结束。

△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委员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工矿银行”开业。该行集民间资金，专为开发工矿企业。陈立夫为董事长，毛庆祥、邵毓麟、胡兆祥等八人为常务董事，翟温桥、于墨章分任正、副经理。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颁发团以下单位政工人员配备变化的指示，规定：营、连两级设立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仅保留二至三名政工人员，政治委员兼任政治处主任；连队建立五至七人的党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可兼任党小组长。应尽量抽调一些干部到山区受训，以达到保存干部与准备将来之目的。

△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山西漳河畔召开，到参议员61人，敌占区士绅参观团和工人参观团73人列席。选申伯纯、邢肇棠、王斌堂、李大章、李雪峰等13人为主席。大会通过参议员的六条权利和七条义务、《修正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累进负担条例》等。30日闭会。

△　《晋察冀日报》报道：石家庄日伪兴建所谓“欢乐街”，建筑工程历时三个月，计有一等妓馆八家、二等妓馆16家、三等妓馆31家，商户32家，妓女检验所一处，共建房屋1250间，占地2.2万平方米，耗资75万余元。

△　韩国光复军司令部在渝举行纪念会，纪念该军成立两周年及韩国独立战争三十五周年。该军总司令李青天向蒋介石、何应钦致敬，蒋复电致谢。

△　美总统罗斯福及夫人再邀请宋美龄访问美国。

9月17日　中午，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派全副武装军警包围软禁在新的共产党人的住地八户梁，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软禁在邱公馆。下午，盛世才又将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等共产党在新全部人员一百多人软禁起来。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西北边疆的“新疆事件”。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领导机关、特别是老干部必须忠实地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严格肃清排斥新知识分子的态度，反对夸大知识分子的弱点，要对知识分子采取耐心的、和蔼的说服教育。

△　是日至11月15日，日军进行“冀东一号终期作战”，调集第二十七师团、独十五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和第十二军各一个大队，关东军一个联队，伪治安军和伪满军24个团，以及地方伪军，约五万余人，对冀东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和“清剿”。两个月的“扫

荡”中，在冀东境内修筑起多条封锁沟，切割成若干小片。并与伪满相呼应，沿长城线南侧，东起卢龙县桃林口，经迁安、遵化、蓟县、三河、平谷、密云，进入平北地区怀柔至昌平桃峪口，距长城八公里至30公里宽窄不等地区，制造成一条长达700里、宽80里的带状“无人区”，与伪满辖区沿长城外侧制造的“无住禁作地带”相衔接，妄图割断长城内外之联系。在基本区内，又将盘山、鲁家峪、腰带山等七块游击根据地制造成“无人区”，2342户居民被迫迁往他乡。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关于“九一八”十一周年之声明，斥日本为大战祸首。同日，美情报局发表文告，说明11年来之美国远东政策，内称：“敌撕毁条约，侵占东北，美坚持原则，不予承认。”

9月18日　国民政府派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加公使衔。

△　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渝举行“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会，到500余人。遵义东北同乡会代表于震天向抗敌协会献旗，上书“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

△　驻英大使顾维钧为“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在伦敦举行记者招待会，英情报部情报处长布勒甫约等150余人出席。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就“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为《解放日报》撰写代论《勉东北同胞》，略谓：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今后东北同胞仍应采取各种方式，配合祖国抗战，以求获胜。是日，延安各界举行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

△　周恩来为重庆《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第十一年的“九一八”》发表，代表中共、八路军重述去年9月18日的誓言：誓愿与东北同胞并肩作战，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

△　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东北抗联第一、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周保

中等发表《“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告东北人民书》，号召“饥寒交迫、疾病、死亡、困苦的东北人民同胞起来吧！起来拯救自己和子孙后代”，“实现反攻，驱除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从即日起，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以纪念左权将军。

△　联合国艺术展览在重庆市中央图书馆揭幕，展出三日，展品共700余件。

9月19日　国民政府公布宁夏、广西参议员名单：宁夏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为徐宗孺，副议长为马震武，参议员有李斌、章文轩、张光普等19人；广西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为李任仁，副议长杨暄，参议员有唐民亚、张光辰、曾作忠等35人。同日，又公布《捐资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褒奖条例》，规定凡热心捐资社会救济、工农福利和其他儿童福利事业者均给予褒奖。奖状分五等，由省及院辖市政府授予；奖章分金质与银质两种，由社会部授予；匾额由国民政府授予。

△　教育部将湘南国立商业专科学校改为国立商学院。

△　重庆《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出版《团结》副刊，每周一期。周恩来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团结的旨趣》，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创办《团结》副刊，是为了推动南方局各级党组织的整风学习和帮助《新华日报》搞好改版工作。

△　美军部以反攻缅甸案告知我国。

9月20日　国民党新任黔省党部主任委员傅启学由渝抵筑视事。

△　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减租交租条例》，规定山地先以七成五折合，再减25％，平均水田只减20％。对游击区、敌占区则酌减15％至20％。照顾农民与地主双方利益。

△　延安《解放日报》刊朱德撰《为自由而死，生命永存》一文，称赞10位朝鲜革命同志为帮助中国抗战流尽了自己的鲜血。他希望“朝鲜革命同志与华北抗日军民更加紧密地站在一起，与华北的20万朝鲜人民，更广泛地团结起来，携手并进，奋勇杀敌”，“迎接破晓的曙光到来”。

9月中旬　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由山东返回延安途中，经湖西、鲁西南到达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在沿途边了解情况，边作指示。他指出，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山东地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是以后反攻的战略基地，应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并特别强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发动群众问题。

9月21日　蒋介石通电行政院各部、会各省政府，并转所属各专员各县长，以粮政问题为国家财用所关，抗战军需所托，切盼全国官民自动完粮，争取最后胜利。并勉励全国同胞、各级政府，应以去岁四川为模范，奋发自效。按：去岁各省征粮，四川一省征实征购实占全国之首位，且在数量上超过规定额达100余万石之多。

△　蒋介石在中枢纪念周讲述视察西北感想时称：数年来西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进步迅速，甘、青、宁各省均能照中央法令，切实执行。

△　经济部组成“西北工业考察团”，一行21人由林继庸任团长，是日离渝赴陕、甘、宁、青考察工业。考察期为三个月。10月11日，考察团抵西安。17日，赴咸阳、耀县等地考察。

9月22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一、本年度追加社会教育经费300万元；二、增拨本年度下半年侨教救济费200万元；三、学校教职员及中央公务员因经济困难子女无力求学者，可免费入学。

△　河南省沁阳县县长贾御五转战抗战前线，壮烈殉国，国民政

府明令褒扬。

△ “日本访华使团”平诏、有田、永井等11人到南京访问，汪精卫与使团密谈：一、海南岛长期租借日方；二、日方强迫汪承认华北、蒙疆两伪组织独立，一切不受汪指挥；三、汪伪供给日方人力物力，日方供给汪伪以武器装备。27日，访华使团回国。

△ 东北镜泊湖水力发电站开始送电。26日在镜泊湖畔举行水力发电式。

9月23日 蒋介石手谕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令第四十二军限期移驻肃州、玉门一带。

△ 国民政府令派关吉玉为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 晨，日机33架飞桂林上空盘旋，并在市郊用机枪扫射，我高射部队予以还击，仓皇逃去。又日侦察机一架飞湖南衡阳侦察。另日机11架、16架先后飞桂林侦察。

9月24日 故侨务委员会委员余荣抗战以来赴澳门等地劝销救国公债4000万元，功劳卓著，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由铨叙部依例议恤。

△ 中华慈幼协会重庆抗战军人子女教养院在渝举行落成典礼。

△ 重庆各机关女公务员百余人集会，要求修改《公务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第六条“夫妻同为公务员者，妻不得领平价米”之规定，认为此规定有违男女平等之原则。29日，行政院例会决议：夫妻同为公务员仍准一人领平价米。

△ 日伪军集结万余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向北岳区开始秋季“扫荡”。日军先头部队分三路向根据地腹心地区窥进：南路曲阳日军松尾大队600余人，经王快向西推进；西路龙泉关、石嘴敌400余人，

向东推进；西路灵丘敌千余，向南集中，于28日侵占阜平县城。八路军积极反击各路之敌，30日上午收复阜平，至10月上旬，敌之秋季“扫荡”被粉粹。

△　苏北如皋等地三万多农民举行暴动，手执菜刀、镰刀、木棍等与日伪军抢粮队搏斗，杀伤十几名日伪军，缴获部分军用品。次日，日伪军前来报复，新四军赶到，将日伪军全部击溃。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任援道为海军部部长。

9月25日　　下午4时，波兰驻华临时代办特罗和斯基拜会蒋介石。5时，印度驻华专员萨福莱亦晋见。

△　农林部长沈鸿烈等，是日由渝飞兰州，视察甘肃、青海两省农业。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纽约成立办事处，聘陈汝舟为该处主任；并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分会。

△　统制棉纱供应之福生蓉庄，因领纱手续繁苛，并克扣浆量，被纺织业群众捣毁。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批判旧的贤妻良母主义与夫权思想；提出为了人类的绵延，尤其目前强健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当尊重母权，提倡母权，以此新观念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

△　晋察冀第四军分区部队趁敌军“扫荡”根据地之际，一举攻入灵寿县城，毙伤日伪军60余名，俘日军指挥官二名、伪军及伪职人员228人。

△　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一个团，在师长粟裕指挥下举行谢家渡战斗，经过激战，歼灭日军南浦旅团第五十二大队长保田中佐以下

110余人，俘日军18人。

△　日伪军1500余人对新四军苏中根据地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十八旅主力先敌转移至外线，坚持原地斗争的部队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大部变为游击区。

9月26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为严禁公务员经商，特再训令军委会及五院通饬全国公务员不得经营任何商业或担任商业机关之董、监事等职务。如有违令故犯，一经查出，应予依法惩处。

△　经济部派遣专家赴新疆开发新疆油田。

△　美籍新闻记者、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遭日军殴打致残，蒋介石赠予美金一万元，借以酬答鲍在远东从事新闻工作25年及为中国主持正义之意。中国新闻学会亦捐赠鲍威尔六万元以示慰劳。

△　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休假，由梁宗岱暂代；梁聘著名剧作家曹禺到文学院任教。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敌后的秋收》的社论，要求敌后根据地每个村庄，所有男女老少都投入秋收运动中。机关、学校、部队的非战斗人员应一齐动员，帮助群众秋收。正规军与游击队武装保卫民众收割，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

△　晨7时17分日机六架窜河南，在广武投弹10余枚。

9月27日　蒋介石派董显光携函赴新疆迪化欢迎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一行。10月2日，威尔基抵渝。

△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会致电印度回教联盟，希望印度团结统一，先有国家民族之自由，才有宗教信仰自由。

△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

独立第五及第六混成旅团主力，和伪军共一万余人，分八路对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等地实行“铁壁合围”。八路军教导第三旅等部先敌转移至外线，根据地领导机关顺利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少数连队、机关、学校陷入包围，经英勇奋战，大部突围脱险。日军“清剿”三天后，即转向昆山、张秋地区“扫荡”。至10月5日结束。

9月28日　国民政府改组绥远省政府：秘书长阎伟免职，由于纯斋继任；民政厅厅长袁庆曾免职，由陈炳谦继任；建设厅厅长王国英免职，由曾厚载继任。

△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在中枢纪念周报告回教救国协会概况，及视察西北回教情况与世界回教发展趋势。

△　日、汪在南京举行移交武器仪式。日军将来福枪1000支、榴弹炮四门、轻机枪54挺、重机枪16挺及其他军器交给在上海和太湖东南地区进行“清乡”的伪军使用。

△　伪满洲国政府人事大调动：外交部大臣由驻日大使李绍庚充任，司法部大臣由吉林省长阎传绂充任，兴农部大臣由龙江省长黄富俊充任，经济部大臣由交通部大臣阮振铎充任，交通部大臣由民生部大臣谷次亨充任，奉天省长由邮政总局长徐绍卿充任，吉林省长由“新京”特别市长金名世充任，安北省长由兴安北省长额尔钦巴图充任，“新京”特别市长由禁烟总局长张联文充任，龙江省长由奉天省民生厅长申振先充任，安东省长由地政总局长曹承宗充任。次日，驻日大使由总务厅次长王允卿充任。总务厅次长由三江省长卢元善充任，三江省长由林野局副局长孙伯芳充任，林野局副局长由奉祀官袁庆清充任。

9月29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酌情减免河南征实、征购粮食数额，并拨款救济；《公务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依第四条领取食米，

即按夫或妻之年龄领一石或八斗或六斗。

△　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九期及特科警官班第二期毕业，校长蒋介石亲临致训称，警察的任务除铲盗窃乱贼外，还要特别注意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使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样社会秩序才不致混乱。

△　川西科学考察团在川南雷波境内发现巨大铁矿。

9月30日　教育部令中小学加授兵役课程，普及兵役常识。小学讲“兵役常识”，中学讲“兵役浅说”。

△　三民主义教育研究会向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发出公函，称三民主义为“立国大经”，完美性超乎一切思想主义之上，必须奉行；提出将有关党义书籍及有关重要理论书刊让学生按时阅读并作读书报告；举行党义论文讲演比赛。根据蒋介石训示，拟以《三民主义教程纲目》作为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教学统一教材。

△　重庆《大公报》讯：今年购粮搭发节约建国储蓄券五亿元，已陆续发出，其中将搭发一部分美金储蓄券，自1944年起分期还本，五年还清；搭发节约建国储蓄券三年还清。

△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对晋绥军区部队的精兵简政作出决定：主力军（包括第一二〇师及山西新军）以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主力部队由三万人减至2.5万人，地方武装由6500人减至5000人。

△　冀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乘日军外出“扫荡”之际，攻入成安县，俘伪县长以下700人，500余名伪军反正。

△　汪伪行政院发布训令称：为谋军警一体化，拟在国民政府内政部、各省及各特别市警察机关，派驻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负责辅助中日防共军事协力之设计，及中日间军事协力之联络。

9月下旬　　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亲率日伪军数万对鲁西范、濮、观中心地区实行“铁壁合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委曾思玉率四个连队在范县与敌激战，随后又率军民冲出敌之包围。

是月　教育部在苏南、皖南及闽北等地设立招待站，在建阳设立招待所，解决浙、赣战区青年救济和升学问题。

△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并转中央文委，报告大后方最近文化活动情况，称政治部文委会近被监视甚严，会内外之特务活动加紧，对外活动甚少。全国文协活动全部停顿，文艺界的活动极少，戏剧界因环境及剧场限制难以发展。出版界因印刷和检查之限制，日益萧条。桂林政治环境恶劣，文化统治加紧，文化人被监视，出版新书亦减少。

△　中共冀中党委和军队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关于“成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的决定，冀中第八、第十军分区在任丘、安新、文安、大城和永清等县苇塘水网地带，建立多块游击根据地，这对于在极端艰险困难关头，保存冀中平原的革命有生力量和坚持与发展抗日阵地起了重大作用。

△　英、美华侨组织的中华公所抗日后援会发起献金运动，共筹集国币105万元，将80万元交付广东急赈会，其余交中国银行作为救济伤兵及阵亡将士家属费用。

△　日军在晋西北从是月至明年9月分期训练伪自卫团。15至35岁的编为“战斗组”，36岁至50岁的编为“情报组”，在忻县成立“随军工作班”和“先锋队”，均为半武装的特务组织。在离石成立“治安工作队”，设立“流亡青年招待所”，捕捉过路青年强迫训练。

△　日伪军三万人对热河兴隆山地进行“大讨伐”，实行灭绝人性

的“三光”政策。在清水湖一带，仅被日军杀害的儿童就有48名。

10月

10月1日　教育部公布《国立学校教职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凡24条。规定：教职员每月根据年龄报领食米代金，代金数额由教育部核定。另外每人每月发给战时生活补助费，费额由行政院根据各地物价及生活状况核定基本数，依薪俸额加成发给。

△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中等以上学校训导会议，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讨论训育行政、导师制、党务团务、军训、学生团体组织及社会服务等。3日闭会。

△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会在渝举行临时会议，张伯苓主席。决议：一、将本会章程依照社会部颁发之《战时人民团体组织法》修正通过；二、将原任董事改为理事，并推原任名誉监事商震、张治中、金曾澄、沈鸿烈、陈时为监事，原任常务董事为常务理事，主席董事为理事长。

△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红十字周在渝举行，到会员200余人。许世英主席，副会长刘鸿生报告工作概况。该会共有五个大队及23个国防服务队分布全国。

△　驻美大使魏道明首次拜会美国务卿赫尔。

△　美总统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由兰州飞抵成都访问，在张群主席之欢迎茶会中称：此次赴渝将与蒋介石共同策商同盟国争取最后胜利及建立战后世界永保和平等问题。至于美国军火产量，现已大量增加，今后对各盟邦自必尽力协助。

△　美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理事长卡宾德博士应中国工合主席孔祥熙邀请抵渝。此行为视察中国大后方2400所工业合作社生产状况。

卡宾德于5日赴西北考察。

△　印度驻华专员沙福莱爵士返印度（回任印度联邦法院推事）。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减租减息布告，要求所属各地区全面彻底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广泛开展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

△　浙境第三战区一部克永康。

△　汪伪行政院发布《关于调派军事顾问赴警察机关加强反共的训令》，规定军委会派日本军事顾问前往内政部及首都与各省、市警察机关，担任“辅助中日防共军事协力之设计与中日间军事协力联络”。27日，公布军事顾问名单。

10月2日　美总统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由成都飞抵重庆，全市民众热烈欢迎。

△　农林部长沈鸿烈一行到天水参观，并商水土保持事。

△　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辞职，由石渡庄太郎继任。青木一男会见记者发表谈话，要求汪伪政府努力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

△　汪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一行抵东京，发表谈话要求日本加强汪伪政府力量，以便能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

△　山东茌平地区国民党军齐子修部投敌，被编为伪中央第五十七军。

10月3日　美总统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晋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晚，蒋介石及夫人设宴招待威尔基，并邀请各国使节暨国民党、政府、军队首长作陪。次日，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会长宋美龄举

行茶会，欢迎威尔基一行。晚，蒋介石与威尔基会谈。

△　蒋介石提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明令褒扬梁启超，称："梁氏毕生尽瘁于学问著作，对我国近代学术文化贡献甚大，国家为昌明文教，允宜追予褒崇。"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国民政府任命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　美国驻英大使奉命通知艾登：美国建议美、英两国在10月9日同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约见中国大使，用绝对机密的口头方式说明几个月以来美、英会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情形。艾登不赞成美国的机密方式，主张两国发布公开的联合文告，10月10日见报。美国国务院同意发布公开文告，但不赞成联合文告，主张由美、英分别发布。艾登表示同意。

△　教育部将蒋介石关于注意提高中学国文程度的手谕转发各省教育厅，训令各省各校遵办。蒋提出："现在中学国文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

10月4日　蒋介石会见威尔基，双方就有关战后问题进行商讨。

△　长沙《阵中日报》在敌人有效射程内照常出报，蒋介石特准为社长吴忠亚记功一次。

10月5日　蒋介石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事授意陈布雷撰拟新闻稿，敦促美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作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

△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召开首次会议，刘维炽部长主持。通过议案：一、华侨实业银行由广东省银行渝行经理阮励予筹备，发展后方工矿业，资本额为2000万元；二、华侨建设银行公司由缅侨李文珍、何葆仁等集资创立，开始向后方产业界投资；三、由曾纪华等筹设华

侨兴业银行；四、林云谷在桂林与各地侨领会商在韶关、衡阳等地筹设运输公司办理贸易。会议还讨论侨民救济等问题，9日闭幕。大会组织西北考察团赴川、陕、甘、青、宁、新疆等地考察。

△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威尔基。次日，周恩来、邓颖超应邀出席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欢迎威尔基举行的宴会。

△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致电美国劳工联合会，祝贺第六十二届年会召开。

△　重庆江庆钱庄160余万元用途不明，经查系私人挪用，财政部将总经理卢亭泰、经理彭炽光“押解军法机关严行究办，以彰法纪”。

10月6日　蒋介石面告威尔基，东北与台湾为中国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旅顺、大连军港可由中、美共同使用。

△　威尔基在重庆向全国广播演说，称全力反攻之时机亦已到临。

△　重庆《大公报》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威尔基，要求美国派空军驻在中国，并希望与美国合作。

△　驻美大使魏道明向美总统罗斯福呈递国书。

△　第四届全国兵役会议在重庆举行，参谋总长何应钦等500余人出席。蒋介石两度亲临训话，略谓：提倡公务员和士绅子弟率先当兵，以形成踊跃从军的风气。会议通过加强管区机构；各师区设军医院及收容所；充实各县新兵征集所；普遍推行国民兵制度；加强兵役宣传等提案，10日闭幕。

△　行政院例会任命傅作义兼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副官，原任朱绶光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特派中央监委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查勘灾情。

△　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复电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指出：“在顽军继续进攻时应坚决打击之，以求生存，在获得胜利后应表示愿与他们恢复和平，以求好转，望本此原则实施。”

△　冀中第十军分区一部在夜间以突然勇猛动作，一举攻入永清县城，占领伪县政府及警察所、新民会，打开监狱，救出被囚抗日干部和同胞200余人，俘伪县政府职员和伪军67人，缴长短枪51支。二小时后，八路军主动撤出。

△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产业统制法》及其施行规则，宣布废止1937年5月制订的《重要产业统制法》。据此法规定，将产业统制由以前只限重工业方面的21种，扩大到重工业、轻工业、建筑材料业、食品加工业等方面的86种。对产业实行全面统制。

△　中国艺术品展览会在英国伦敦联合援华专款运动总部展出。

10月7日　蒋介石招待威尔基早餐，继续商谈战后各项问题。

△　蒋介石电示在美国的宋子文“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即与之开始交涉”。9日，又电宋子文、魏道明，强调“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应务望同时取消，方得名实相符”。

△　威尔基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晚乘飞机赴西安。次日，威尔基一行由董显光、朱绍良陪同赴潼关前线参观。蒋纬国上尉在前线招待威尔基，并赠以日本军刀等战利品。同日，威尔基一行离陕经成都回国。

△　中共谈判代表林彪偕伍云甫、周励武到达重庆。

△　日军千余人“扫荡”太岳翼城地区，抢走公粮千余石。8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出反对敌人抢粮的政治训令。

10月8日　四川省主席张群以烟土禁种，各县大多早已出具肃清烟苗及罂粟种子切结，自不容许再有一茎烟苗发现。乃本年上季仍有少数县份，或以界连邻省地阔山荒，或因乡镇保甲人员疏于防范，致仍有偷种及野生烟苗情事发生，顷特厘订各县查禁烟种应行注意事项，通令全省遵行，以期彻底根绝。

△　是日至12月10日，华北敌伪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北平市、山西、山东、河南公署同时公布《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办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下，省长、道尹、县知事以及各伪团体领导人均率先带头“促使运动的发展”，以期摧毁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力量和收粮工作，以达到所谓“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协力体制，彻底剿灭共军，提高民众建设新华北的意志”之目的。

△　八路军在山西五寨进行反蚕食斗争，至25日共摧毁56个伪村政权，俘伪村长、闾长、特务、密探133人。

△　日军在雁北以“分进合击”、“挨村清剿”办法进行蚕食，凡抗日人员住过的房子一经查出，人即被捕，房屋被毁。

△　上午10时，日机25架轰炸洛阳，城关内外损伤惨重。中央社洛阳分社中弹多枚，毁房屋数间。

10月9日　军事委员会公布浙赣线战果：全战线573公里，已克复418公里，击毙敌官兵2.245万人，俘虏1050人，缴获骡马630匹、轻机枪88挺、步枪2150支、子弹380箱、迫击炮弹30箱、手榴弹100枚，毁汽车26辆，击沉运输船64艘、橡皮艇42艘，以及无线电台等。战役从5月15日起至9月30日止，历时四个半月。

△　驻美大使魏道明应邀访晤美国务卿赫尔。赫尔面交魏一份关于美国政府决定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草约。美国声明称：“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以完成上述目的

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过去数周内，美政府业与英政府就是项一般问题交换意见，美政府欣悉英政府与美政府具有同样之意见并正采取相似之行动。”10日，魏道明发表声明，谓美国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特权，表明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新时代。

△　驻英代办陈维城应邀访晤英外相艾登。艾登面交一份关于英国政府决定迅速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草约。21日，英外相宣布上海公共租界将在谈判之列。

△　东方文化协会在重庆举行座谈会，讨论太平洋战争中东方各民族之任务。覃振主持，胡秋原、金若山、赵素昂等先后发言，咸谓太平洋战争中中国地位重要，东方各民族须通力合作，共抗侵略，以求民族独立平等。同时欢迎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的朱学范一行。

△　国防科学运动周是日起在成都举行。四川省立科学馆与科学仪器制造所合办的科学展览会亦在蓉开幕。

△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召开辛亥革命纪念会，到700余人。朱德、吴玉章、林伯渠、李六如、徐特立、范文澜为主席团，吴玉章讲述辛亥革命的经过与意义。林伯渠讲述中华革命党的历史。朱德讲话，指出：“那时的云南起义是组织、军事、政治上的模范。”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辛亥革命》。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加写按语称：“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　汪伪政府主席汪精卫与日本特使平沼等签订长期租借海南岛及确认华北、蒙疆伪组织等条约。

△　美总统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离华返美。

10月10日　　重庆各界举行中华民国成立三十一周年纪念会，同时检阅渝市三青团员及全民国民兵团与义勇警察。蒋介石在会上宣布英、美放弃在华特权，并与中国另订新约，勉励全国同胞格外努力自强自立。蒋于9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要求以勤俭笃实争取最后胜利，以忠恕仁爱求得永久和平。是日林森向全国广播，略谓：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三民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世界大同。

△　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

△　美最高法院院长在费城独立厅扣鸣自由钟31响，庆祝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

△　英驻华大使薛穆面交宋美龄一张12万英镑的支票，系今年英联合援华首批募款。

△　加拿大政府宣布废除在华特权。驻加公使刘师舜应加政府邀请，前往晤谈。

△　教育部组织礼乐编订委员会，顾毓琇为主任委员。

△　中国印刷学会在渝成立，推陈立夫为名誉理事长，潘公展为名誉理事，周鼎新为理事。

△　朱德邀请林伯渠、吴玉章、范文澜、周健民、萧泽苍等曾参加过同盟会及辛亥革命的老人，在延安畅谈辛亥革命在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朱德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辛亥回忆》一文，对辛亥革命时期云南起义的情况和所起的作用作了论述，略谓：云南在民国初年能够大放异彩的原因，一是坚持统一战线，二是依靠民众。民国以来每次革命运动成功与否，都是要看能不能实行这两条原则。坚持上述两条原则，以求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是我们与全国贤达应当共

勉的。

△　刘少奇在太行北方局党校作《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分析。报告内容分绪论、中国党的战略、中国党的策略、战略的指导及策略的指导五个部分。

△　延安评剧院成立，毛泽东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　晋西北抗日军参选工作结束，选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罗贵波、张宗逊、韩钧、雷任民、高士毅为正式参议员。

△　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到会各界代表260余人。邓子恢、田丰、许志远等为主席团。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刘子久、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相继讲话。14日，彭雪枫作《四师战绩与边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16日，刘瑞龙作政府工作报告。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派人将山西省左权县十字岭的左权遗体移到河北省涉县石门村，并举行公葬。同时建立左权同志陵墓和纪念塔。彭德怀书写的《左权同志碑志》和罗瑞卿撰写的《纪念左权》一文，刻在左权纪念塔上。1950年10月21日，左权的灵柩由河北涉县石门村移葬于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并举行隆重祭典。陵园修建了左权陵墓、纪念馆和碑亭。周恩来亲自书写"左权将军之墓"墓碑。

△　太行区遭受严重旱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太行区旱灾救济委员会，杨秀峰主席兼任救济会主任。各分区也相应组织旱灾救济委员会，领导救灾工作。

10月11日　　蒋介石为英、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美国特于中国国庆日鸣自由钟，致电罗斯福与丘吉尔表示感谢，提出："深望最近续订新约之时，将包括一切不合于国家平等原则或国际公法一般原则

之现存特殊权益让与权特权等，一律加以废除。”另，国民外交协会亦去电致谢。

△　史迪威至重庆谒见蒋介石报告至印度视察情形，并带来罗斯福总统的信。罗斯福在信中表示：除100架飞越驼峰的飞机外，再为中国战区于1943年早期提供近500架飞机，但美国部队不能支援中缅印战区。

△　社会部在渝召开首次社会行政会议。社会部长谷正纲任主席，孔祥熙、吴铁城、陈立夫等300余人到会。讨论议案：一、收复地区之社会重建问题；二、战时社会政策；三、儿童劳工福利；四、地方慈善团体救济机构调整问题；五、国民劳动服务方法及技术等问题。18日闭幕。

△　中美新约在华盛顿开始谈判。

△　新西兰总理福来塞在惠灵顿发表演说，决放弃所有与中华民国主权完整不符合之一切在华特权。

△　中韩文化协会在渝成立。孙科、吴铁城、朱家骅、王世杰、马超俊、梁寒操、金若山等为理事。于右任、冯玉祥、周恩来、郭沫若、李青天（朝）、柳春郊（朝）等24人为名誉理事。

△　山东各界集会追悼国际友人德国名记者希伯。希伯于去年12月鲁中大扫荡在沂蒙山区采访时牺牲。

10月12日　　蒋介石电示宋子文：关于废除治外法权，应静待美政府提出其所谓简短的草约后，我方再表示意见，此时不必作任何交涉，惟我不妨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

△　杜月笙、杨虎等人倡导的一元献机运动，自去年9月至今已募得300万元，可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是日在渝举行呈献典礼。

△　罗斯福总统电复蒋介石，允诺将第10航空队增至15个中队。

△　美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称盟国决对德、日发动新攻势，以分散苏联与中国境内之敌人力量。

△　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社论，略谓：苏联红军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民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日本将一天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　日军奔袭山西沁水县槐树庄，将未及躲走的男女老少48人，全部驱赶到窑洞内烧死。

10月13日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中共中央代表林彪，张治中、周恩来在座。林彪即对蒋介石说明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他，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他一晤。蒋问林："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称："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一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接着，林谈了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并特别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林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并表示"无论就中国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蒋对林之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至听到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及新四军问题时，蒋立即拒绝提新四军之事，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勿再提新四军了，你是我的学生，我才告诉你。并约林走之前再谈。

△　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代理国务卿威尔斯晤谈，并拜会罗斯福。

△　大同日伪颁布“新税则”，其中50种捐税为古今罕有，如斗捐、秤捐、碾子捐、井捐、锅捐、婚姻换贴捐、入葬捐、衣服捐、被服捐等等。大同市伪县长饬令税务科各股及“宣抚班”，分赴各街市乡村，协同该地区伪行政人员逼迫人民交纳。

△　日、“满”、“华”兴亚团体首次会议在东京举行。林铣十郎代表日方“兴亚同盟”，张焕相代表伪满协和会，黄复生代表伪新民会，林柏生代表汪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议中心为加强此等团体间的联系。15日闭幕。

10月14日　　蒋介石交给史迪威一份中国作战计划《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实际上这份计划是史迪威制订的）。这份计划再次坚持要美国和英国派出足够的舰艇和航空母舰，在孟加拉海湾获得制海权和制空权，并在仰光实施两栖登陆，以此作为中国投入15至20个师的部队的先决条件。

△　国民党政治部与中宣部、三青团中央团部、社会部、内政部、军令部、战地党政委员会等10余机关成立“防谍肃奸宣传委员会”。上述各部分别通电各省市党部、青年团支部、各省市政府、各级政治部组织相应的机构，使防谍肃奸宣传深入全国各保甲。

△　驻英大使顾维钧返国述职，是日抵渝。15日，晋谒蒋介石。

△　四川省主席张群在四川省训练团讲《地方自治与抗战建国》，谓“在此抗战紧张阶段中，县政为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必须因应时代，适合需要，举凡推行役政粮政，组训民众，建设农村，安定后防，均须于地方政治制度中有确当的规定”。

△　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再度来华，携罗斯福致蒋介石的

信，并有一函致孔祥熙，表示一向密切注意中国财政。

△　英牛津大学授予蒋介石民法学名誉博士学位。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评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8月23日至10月9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整学委员会，负责整顿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青年剧院、评剧院及边区各中等学校。还决定将原拟设的西川办事处更名为绥西办事处。

△　英援华医疗队一行22人抵长沙，设后方医院一所。

△　日军对冀鲁豫区的大"扫荡"结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山、抗大分校训练处长孙厚甫等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　汪伪国民政府撤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杨仲华免职查办。

△　美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华盛顿宣布，美国陆军计划到1943年增至750万人。

10月15日　　广西省政府在桂林召开行政会议，李济深、李品仙、夏威等200余人出席。中心议题为：一、地方自治；二、田赋征实；三、军粮征购等问题。

△　史迪威离渝前往印度执行《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

纲》。

△　是日为新四军成立五周年纪念日，新四军直属队全体将士在苏北盐阜召开庆祝大会，并致电中共中央。

△　《抗战日报》刊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纪念新军建军五周年文章《新军五年战斗》，指出五年中，晋西北新军各部共作战1469次，总计毙敌伪官兵3031名，伤敌伪官兵6340名，俘伪军1554名，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五年来，新军在战斗中共伤5624名，亡1312名，失踪499名。

△　“扫荡”大青山地区之日伪军由绥中、绥南转兵“扫荡”绥西。经反复“扫荡”，日军在大青山地区增设据点24处，控制了整个绥中，使绥西和绥南成为游击区。

△　日第十二军一万余人对山东滨海、鲁南地区“扫荡”；又7000余敌军“扫荡”清河区之寿光地区，八路军清河独立团遭受损失。敌“扫荡”后封锁了小清河，形势恶化。是日，山东军区、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直机关及“抗大”一部先后转向沂蒙山区。

△　日伪军派大批特务潜入晋西北兴县一带活动，以配合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并将离石、离东、方山一带所有帮会教门统一于“万国道德会”，进行欺骗宣传。

△　日本前“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陆军中将森冈臬就任华北贸易组合总联合会会长。

10月16日　　蒋介石接见苏大使潘友新，提出独山子油矿与迪化飞机制造厂，盼与苏签订合同，以解决悬案。17日，外交部次长傅秉常设宴欢送潘友新回国述职。

△　张治中与林彪、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进行国共两党的会谈。林彪提出“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

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张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以后林彪和周恩来同刘为章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谈，但要林彪、周恩来同张治中谈。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指出：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惫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它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 豫西永济渠告成，是日在伊川鸣皋镇举行放水礼。

10月17日 周恩来为国民党即将召开国民参政会，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估计蒋对主席团人选的安排有三种可能：一、照旧；二、不同我们接洽，故意选我一人；三、接洽后选我们一人。提出：第一种可听之，第二种讨厌，如第三种，毛泽东可参加。请示中央意见。18日，毛泽东电复：在延安的参政员请假，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应采取“七七”宣言所持的态度。21日，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如国民党方面提周恩来入参政会主席团，可予同意。

△ 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常务次长。

△ 燕京大学迁成都后复校，是日代理校长梅贻宝招待新闻界报告复校经过，并呼吁各方予以协助。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强袭冀南之丘县，毙日伪军140余人（内伪大队长一名），缴枪80余支，子弹万余发。

△ 日军4000余人“扫荡”泰山区，八路军鲁中第一分区机关及主力一部在茶叶口被敌包围，损失严重，分区政委汪洋等以下百余人牺

牲。

10月18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各界同胞及海外侨胞书》，勉励竞购公债，以完成抗建大业。按：本年国民政府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暨同盟胜利国币公债10亿元。

10月19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陕甘宁边区县团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和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到会旁听。主要讨论整党整风、边区党的历史、边区党的领导、财政工作及边区今后任务等问题。毛泽东到会讲话，讲国际国内形势、整顿“三风”、边区的建设三个问题。指出：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会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错误；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定了方针政策。会议于1943年1月14日结束。

△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颁发《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其要点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贯彻“三三制”；保障抗日人民之人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改进司法机构，实行陪审制度；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保证交租交息；提高生产；实行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推行国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地位；团结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等。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纪念晚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因当局不允，中途被迫停开。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第六分区一部于枣强、大营间设伏，解救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脱险，并歼灭日伪军一部。

△　日本处死4月18日轰炸东京时被俘美国飞行员。

△　汪伪军事委员会改组，委员长汪精卫，总参谋长刘郁芬，参谋次长陆军黄自强、海军许建廷，总务厅厅长黄自强（兼），陆军部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航空署署长姚锡九，经理总监公署总监何炳贤，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叶蓬，参谋长富双英，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军事参议院院长萧叔宣。

10月20日　国民政府任命张廷休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

△　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指出：今后半年工作的重点首先应放在基本区，中心环节是发动群众，坚决改造区村政权，健全财经建设工作，健全与加强武装工作。决定黄敬任区党委书记。湖西地区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湖西地委改称为中共冀鲁豫第六地委，潘复生任书记；湖西军分区改称第六分区，王秉璋任司令员；湖西专署改称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李贞乾任专员。

△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发布通令，为贯彻精兵简政并统一指挥，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

△　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指出完县、唐县、易县的大部分地区，灾荒之重，为几年来所绝无。完县的几个区，易县、唐县的若干村，出外逃荒者达万余人。并强调指出救灾工作必须立即着手进行，救灾的办法应因地因人而不同。

△　日军第三十六、三十七、六十九师团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6万余人，对太行和太岳北部进行“扫荡”。八路军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相结合，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结合，展开广泛

的群众性游击战。至11月中旬，除二个大队盘踞沁源等据点外，其余均撤出根据地。

△　日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是日由北平出发赴归德、海州、连云港等地“视察”，25日返平。

△　是日至26日，日军在湖南岳阳、临湘“清乡”，屠杀2000多人，烧毁民房数千栋。

△　日机10架自越南侵入滇境，在蒙自东门外投弹一枚，并用机枪扫射，毁民房数间。

10月21日　国民政府任命赖琏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　教育部决定将师范生一律改为公费生，并决定在渝大量收容战区内迁中学生。

△　中共中央决定：晋豫区并入太岳区，薄一波任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为副书记。原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调延安工作。

△　苏北盐阜区临时参议会在阜宁召开，到国共两党及各界代表400余人。陈毅作政治报告。会议发表宣言，强调加强各党派、各阶层团结，改善国共关系，完成抗战大业。选举黄克诚为参议会议长，王泽夫、龚友兰为副议长，于10月31日闭会。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克复鲁中安东卫、岚山头、潘家店、朱家官庄等据点，数百日伪军除一部逃跑外，大部就歼，缴获军用品甚多。

△　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孔庆同，在河间县冯家坟战斗中不幸牺牲。李弗畏继任分区司令员。

△　美国空军轰炸日占区开滦煤矿公司林西矿，使开滦五矿无法

开工。

10月22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到政府官员、参政员及中外记者共300余人。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民主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拒绝出席。张伯苓主席，蒋介石致训词称：今天不只是“军事第一”，也是“经济第一”，希望参政会协助政府执行战时经济法令，克服经济难关。下午，何应钦报告军事，傅秉常报告外交。

△　国民政府在成都农本局设立“福生庄”，办理收购发放棉纱事宜，该庄职员串通奸商从事黑市买卖，收价1.2万元，卖价四五万元。经济部长翁文灏训令“严办”。蒋介石手令“认真查办”。

△　教育部发布审查从战区退出的学生训令，规定设立“鲁苏豫皖边区战地学生指导处”，在安徽临泉设立战区学生登记处，对来自敌后与沦陷区的学生均进行“严密考核”。并将情况向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副主任徐君佩报告。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太行军区第三分区“抗敌救亡决死先锋队”第九团一个连，结合县区武装破击白晋铁路南沟至漳沅段，毁桥两座。

△　冀中第十专区第三联县县长胡春航，在永清县西庞各村被敌包围，突围时负伤被俘，壮烈牺牲。

△　美联合援华委员会开会推威尔基为该会名誉主席，霍夫曼连任主席。自1月起至今，已募得美金528.4万元。

10月23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莫德惠任主席。孔祥熙报告财政；徐堪报告粮政；周钟岳报告内政；张嘉璈报告交通情况。

△　湖北省公安县李大林捐资13万余元作为本县中心学校建筑

费，该县许愍周捐资10万元救济难民，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各授予金质奖章一枚。

△　重庆文化劳军会成立，贺国光为名誉主席委员，谷正纲与吴国桢、杨公达、康心如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　日伪调集驻南口、泰陵、怀来、延庆、张家口之兵力1000余人，对平北中心区、昌延地区和丰滦地区进行“分区扫荡”。平北八路军主力部队相机转到外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迫使敌人于12月8日退回原地。

10月24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吴贻芳。翁文灏作经济报告，钱天鹤报告农林建设；下午，陈立夫报告教育工作。

△　杜月笙与新华银行经理王志华、华新电气公司经理唐继之等一行数人，是日自渝出发赴西北考察，时间月余。

△　湖南临参会议长赵恒惕组设南岳建设特种股份公司，资本百万元。国民政府认股50万元，湖南省政府30万元，其余为民股。

△　著名史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张荫麟在遵义病逝。

△　美国政府将《中美关系条约草案》面交魏道明大使，计八款，要点为：取消治外法权；废除《辛丑条约》及美国所享特权；放弃美国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享有的特权；彼此内地杂居及通商；重订友好通商口岸航海条约等。

△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致电贺龙、关向应、徐向前：晋绥分局决定绥远、雁北合并，成立塞北工委，大青山骑兵支队和第五分区合并为塞北军分区，党政军统一领导。以高克林为塞北工委书记，胡全为副书记；姚喆为司令员，郭鹏为副司令，高克林为政委，张达志为副政委；原骑兵支队及第五分区部队属于军分区。骑兵支队番号取消，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第五军分区部

队编为第四团。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偏关。原第五军分区部队编为雁北支队。

△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神府县胡家庄召开，到参议员145人。大会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减租交租条例》等文件。大会选林枫为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阎秀峰、程进、杨廉浦等六人为驻会委员。同时选举产生晋西北行政公署，续范亭、武新宇为行署正、副主任。11月11日闭会。

△　晋察冀军区骑兵团一部奇袭平汉铁路王京站，焚毁敌军用棉花20余万斤。

△　上午10时45分，日侦察机一架自越南窜入滇境，在蒙自窥察。11时15分，日轰炸机15架窜蒙自郊外投弹。11时20分，轰炸机18架窜至开远侦察。

△　美政府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交《中美新约草案》，转交中国政府。

10月25日　　蒋介石在官邸宴请20余名民间参政员，26日又宴请全体参政员。

△　国民参政会电慰蒋介石及前方将士、各战区以及东北和海外侨胞。

△　宋子文由美国返抵重庆，11月2日正式就任外交部长。

△　西南实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在百龄餐厅招待全体参政员。席间四团体代表申述工业界对于协助政府稳定物价及工业资金、原料、运输统制等意见，并提出完成工业团体立法，促开全国生产会议的建议。

△　延安《解放日报》以《坚持华北平原游击战的条件》为题发表社论，指出，平原抗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这首先是因为敌人方面兵力不足是一个先天性的根本弱点；其次是敌人的残暴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这种对敌人的血海深仇，这种尖锐的民族矛盾，是敌人无法压服的。虽然看来敌人在某个局部握有一时的军事优势，但政治上却处于绝对劣势，只要我军永远依靠平原地区的人民，则平原游击战争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直至最后胜利。

△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少敏电，对她请示在顽军不断进犯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问题指出："除对国民党中央目前不要批评外，对顽军破坏团结、进攻边区仍应号召民众予以抵抗，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

△　美陆军轰炸机进袭香港九龙区，投弹20余吨，击毁日机10架。另美机六架在蒙自以南击落日机二架。

△　日机11架分三批由广州飞桂林侵扰。又日机12架由越南飞滇境蒙自上空袭扰，其中一架坠毁。

△　日第三十六师团"扫荡"太行区时，在山西榆社县圪坨、岩良、偏良三地杀害民众162人，大部分为集体屠杀。

△　汪精卫赴华北巡视，飞抵北平。次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他这次来北平是为了出席新民会全体联合协议会，在华北推进新国民运动，完成大东亚战争。并接见山东省长唐仰杜，河南省长陈静斋，山西省长苏体仁，河北省长吴赞周，北平市长余晋和，天津市长温世珍，青岛市长赵琪。29日，汪结束在北平的活动返宁。

△　韩国临时议院在渝召开第三十四次议会，到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国务委员李始荣、曹成焕，临时议政院副议长崔东晔、金若山等40余人，推现任临时政府顾问洪震为议长，11月19日闭幕。

10月26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本年4月25日中国驻巴西公使谭绍华照会巴西外长，中国政府拟与巴西政府缔结新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替代1882年中国与巴西所签订之旧约，巴西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中国政府之提议”。

△　四川省主席张群以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先后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于地方政治之推进补助良多，迩来征实征购工作之顺利进行，尤有极大贡献，特通电勖勉。

△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记者谈浙赣会战，称浙省此次战役全部沦陷者27县，敌骑部分窜入者六县，灾情严重县有衢县、松阳、丽水、永嘉，郊外村镇无一完好。被杀害群众达1.5万人，伤5000人，失踪1.2万余人。公私财产损失达四亿元以上。

△　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驳斥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谓八路军“各自为政”以及国民党一些参政员要求“加强军事统一”的言论，介绍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坚持抗战的显著战绩，并指出第十八集团军不是天神，它的兵要吃饭，要穿衣，要作战，处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当局补充的情况下，怎能责怪八路军“各自为政”呢？

△　周恩来对当前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采取以下方针：一、先尽力缓和两党表面上的关系，在根本问题（军队、政权等）上只从原则上说服国民党加以改变，“至少使他们当面不能反驳”；二、再次见蒋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说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要求“停打接济”；三、对张治中除要求停打外，还谈防地，说明愿听调遣，但须解决困难，就此提出要求。认为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28日，毛泽东复电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

提。林彪在第二次见蒋后即回延安。

△　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对于威尔基访华结果表示满意，称："威尔基先生已以最热烈之语句，称述彼在中国人民中所见到之良好精神。福深信彼之访华，使吾等在美者对于协调吾人共同作战力量之各种重要问题，获得更明切之见解，而证明此行有莫大之补益。"

△　美陆军航空队轰炸香港北角发电厂、广州白云山机场。

△　日军第三十二、第五十九师团及独立第五、第六旅团各一部，共1.5万余兵力，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扫荡"。27日敌对沂蒙山区南墙峪进行合围，山东军区机关大部突出合围。11月2日，山东军区机关转移至对崮峪时，又遭敌合围，特务营大部壮烈牺牲。第一一五师指挥鲁中各部队有力地支援了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11月中旬，敌被迫撤出沂蒙山区。

△　日军在湖南岳阳、临湘自20日至是日，假"清乡"为名，四出屠杀焚掠，该两县境内被屠杀男女2000余人，烧毁民房数千栋，劫去谷米3000余石，猪、牛300余头，灾情惨重。

△　日军围袭河北三河县泗河村，三天屠杀村民48人，打伤致残者120余人。

10月27日　　国民参政会召开物价特别讨论会，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常委贺耀组，财政、经济、粮食、交通四部代表列席说明。

△　重庆《益世报》发表《提几个教育问题贡献于参政会诸公之前》一文，提出五个问题：一、教师待遇问题。"教师待遇落后，致不安于位而改业"；二、儿童保教问题。"儿童每多癞头、沙眼、夜盲。每天二饭或二粥一饭，或竟二粥"，"教具缺乏，课本不足"；三、中学生生活问题。"宿舍简陋，席地而卧，营养不良，面带菜色，油

灯自修”；四、大学生出路问题。“毕业后无事可作，女生出路更难”；五、学风问题。“师生如路人，遇公益事则多却步，视公费为应得，公私观念淡薄”。

△　阎锡山规定第二战区军人吃头等饭，其余人员吃二等饭。头等饭主食小米五两，山芋10两，副食猪肉二两半，山芋四两。二等饭主、副食均次之。

△　驻苏大使邵力子离苏返国。

△　周恩来答复毛泽东25日询问林彪在第一次见蒋时曾否谈到他见蒋的时间地点问题的来电，说林第一次见蒋时即提出毛甚愿见蒋，惟适患伤风，蒋即问毛好，未及其他。并报告同林彪见张治中的情况，鉴于林彪提出的要求被张治中打断，建议改变老一套的谈判办法，即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以缓和这次谈判的空气。

△　《晋察冀日报》报道：太行区第三、第六两专区及冀西、豫北各县发生严重灾荒。武安敌占区已有60元买一女孩之事，甚至有全家上吊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亲往武安等地灾区视察慰抚。边区政府决定：一、拨粮100石帮助无法生活之灾民；二、减轻太行第五、第六专区的粮食负担；三、暂定以公债折六万元作为救济贷款；四、以工代赈，组织纺织、运输、修渠等生产工作。

△　史迪威与英国驻印军司令韦维尔就《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进行会谈。韦维尔拒绝中国在印度的军队从英帕尔经过达武和加里瓦向缅甸推进，只同意由胡康河谷、猛拱河谷入缅。经协商同意史迪威的使命在于占领密支那——八莫，以便使用密支那机场，并与从云南进军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

△　日军万余人、汽车300辆、坦克一部，由多架飞机配合，向鲁西范县、濮阳地区进犯，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八路军转到外线，在

日军侧后积极进袭，内外夹击日军，于11月中旬击溃日军。此役毙伤日军500余名。

△　下午，日机12架自越南窜至滇境蒙自郊外轰炸，被击落二架。又日机五架袭保山地区。

△　汪伪行政院第一三四次会议，任命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周应湘兼任广州市市长。

△　伪满洲国经济部公布《第二次富国债券发行规程》，决定发行第二次富国债券500万元，从12月1日发行，1947年4月1日还清，每年3月1日抽签还2376张（每张债券额五元）债券。

△　挪威政府驻英大使照会中国驻英大使馆称，挪威愿与英、美采取同样步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与中国政府商订新约，代替1847年挪与我国所订之条约。

△　阿根廷外长奎纳素宣布：阿政府与中国政府拟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代替1881年订的旧约。同日，加拿大、荷兰亦相继表示放弃在华特权并愿与中国商谈新条约。

10月28日　　蒋介石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加强管制物价方案》，规定实施管制物价的重要方针为：一、实施限价；二、掌握物资；三、增进生产；四、节约消费；五、便利运输；六、严密组织；七、管制金融；八、调整税法；九、紧缩预算；十、宽筹费用。

△　据中央社讯：中国海员在英国服役者约万人，在战争中牺牲者约600人，将由英国恩给部对若干残废者授予英王忠勇章，对殉职和完全残废之海员将给现金。

△　英政府令驻华大使与中国政府开始谈判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

△　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冬季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抓好四项主要工作：一、大力发展群众武装与民兵训练；二、巩固各群众团结，开展冬耕运动；三、切实推行民主运动，改造各级政权机构；四、开展冬学运动，广泛教育群众与党员干部。

△　日机七架袭广东，一架被击落。另日机多架飞云南、湖南、广西等地侦察。

10月29日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通过行政院蒋兼院长手订并于28日提出之《加强管理物价方案》。同日，并通过设立经济动员策进会，其宗旨是辅助国家总动员法令及战时经济法令之实施，以期达到切实管制物价。

△　教育部公布《小学课程标准总纲》及《国民学校及中心小学小学部各科课程标准》，定于下年度第一学期起实施。《总纲》规定：小学以“注意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国民道德，民族意识及生活必须之基本知识技能，以期养成修已善群爱国之公民为目的”。

△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三十八团一个营于山西沁源西芦家庄伏击日军，毙伤日伪军350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一部，在山西襄垣以北东泉村毙伤日军百余人。

△　鲁中沂蒙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与友军第五十一军并肩杀敌，是役毙日伪军600余名。

△　晨，日机五架侵入桂林上空，在郊外投弹20余枚。又日机三架再袭桂林。

△　荷兰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愿意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另与中国订立平等条约，并表示自动修改过去在荷属东印度对于华侨待遇之差别规定。

10月30日　　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央大学教授致全国大学教授书，指出：报载美国拨款400万补助中国大学教授生活。据以下理由，未便接受。从国家教育立场，为尊重国家及政府地位，依靠友人怜恤，有贬我教育人员之尊严。建议将400万购置图书仪器，请政府另筹维持生活良策。

△　英驻华大使薛穆向外交部递交中英新约草案，计九款，内容与中美新约草案相同，仅多一款，规定新约适用之领土、人民及公司，包括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北爱尔兰、印度，英王之一切殖民地、海外领土、保护国，在英王保护或宗主权下之一切疆土及其英国的一切委托统治地，另在第四款中增加了交还天津、广州英租界的内容。

△　驻美大使魏道明夫妇在纽约中国驻美大使馆设宴招待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各界人士。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三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下列主要决议案：一、在教育厅内设立教育委员会；二、在秘书长之下设立研究室；三、划设延属分区，管辖延安等10县、市；四、划鄜县归关中分区管辖，靖边县归三边分区管辖。

△　日军在沁源城关、阎寨、中峪店、交口等地开始构筑据点，并加紧修筑临（汾）屯（留）公路和二沁大道、安（泽）沁（源）大道，企图以沁源为“山岳剿共实验区”。

△　日机分两批共八架向福建建瓯西郊投弹八枚。31日，又有两批共12架在建瓯市区投弹40枚，民众死20余人，毁房50余间。

10月31日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闭幕，蒋介石致词，勉各尽战时国民义务，以贯彻国策。本次参政会共召开十一次大会，通过《关于加强管制物价方案之决议》、《民国三十二年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审查意见和联合报告》等提案250余件；并选出驻会委员25名：孔庚、褚辅成、李中襄、王云五、邓飞黄、陈博生、许孝炎、

杭立武、陶百川、江一平、但懋辛、江庸、王启江、郭仲隗、林虎、阿旺坚赞、冷遹、黄炎培、于斌、罗衡、何葆仁、董必武、陈启天、许德珩、王普涵。

△　毛泽东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70万至100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士第）、甘（泗淇）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

△　伪满洲国实行第二次战时增税，并增加税种，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财。新设清凉饮料税（税率为价格之20％）、交易税（交易额之2‰）；改正勤劳所得税为按所得收入递增率征税；提高酒税和特别卖钱税，税率增加一倍。伪满洲国政府通过这次增税，在本年度即可多搜刮1.2779亿元。

10月下旬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陈宏谟。陈表示谈判中心在看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至于防地问题，可以不尽如1940年10月“皓电”的要求，但军队必须移动。

是月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学校、工厂、海员党部，颁发《党员守则研讨大纲》，凡12条：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事之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　中国滑翔总会滑翔机劝募委员会，主持滑翔机劝募运动，定“双十节”结束，原计划为500架，实已达751架。

△　冀东军分区直属队和丰玉遵联合县基干队，在青龙县青河口伏击关东军田中“讨伐队”，歼灭田中队长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轻

机枪三挺、小炮一门、长短枪百余支。

△　晋察冀军区炮兵营在河北省曲阳县武家湾成立。1943年3月，炮兵营奉命开赴延安，编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第二营。

△　邹韬奋在中共党组织派人护送下由敌占区上海乘船秘密经南通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

△　太行区旱情严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拨款10万元救济灾荒。

△　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重庆举行研讨对日作战的军事会议。

△　周佛海派军统特务程克祥去重庆，向蒋介石、戴笠面交亲笔信。周在信中表示希望沟通宁、渝之间的联系和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

△　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声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沟修成1.186万公里长，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强。"

△　海南岛日军调集第十五、第十八两个警备队，对琼山、文昌接壤的村庄发动大"扫荡"，屠杀民众数千人。

△　日军修建泰缅铁路，自泰国佛统起，沿奎诺伊河谷至缅甸丹彪西驿止，全长400公里。据统计从是月开工到1943年11月全线通车，日军共驱使七万余名战俘和30余万名民工拼死修路，共有1.3万名盟军战俘和九万民工丧生，平均每公里铁路有260人付出生命。这条铁路在历史上被称为"死亡铁路"。

△　日香港总督部宣布，港币四元兑换军用票一元。同时，强迫囚禁于战俘集中营里的汇丰银行经理海地签发存放在仓库内面额50元

以上港币，然后利用这批港币到澳门采购物资。迫签港币总数接近1.2亿元。

11月

11月1日　　三青团中央团部在蒋介石私邸开最高干部会，蒋介石、陈诚、张治中等出席。会议就非国民党系诸党派之反政府活动进行讨论，决定以对付共产党而制定的异党活动办法对付各民主党派；同时还通令西安、兰州、韶关、桂林、昆明等地三青团加重弹压。于2日闭会。

△　全国慰劳总会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举行茶会，孔祥熙致词，略谓：现以2000万元为捐募目标，此款不由国库负担，而发动人民捐款，望各界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由城市到乡村，由国内到国外，一致响应。

△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与美军代表同往云南视察空军基地。

△　湖北省政府在老河口成立鄂北行署，何绍南为主任。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谭震林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免去饶漱石兼主任之职。

△　日政府增设大东亚省，青木一男为大臣，山本熊一为次官，对满事务局次长竹内新平为总务局长，拓务省拓北局长今吉敏雄为满洲事务局长，兴亚院部长宇佐美珍彦为中国事务局长，外务省南洋局长永野伊太郎为南方事务局长。从此，凡日本在亚洲各占领地域之政务皆由大东亚省掌管，只属纯外交事务由外务省管理。

△　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左贺峰一调横须贺军港任镇守司令，遗缺由吉田善吾继任。

△　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勃鲁斯少将离任，由葛林斯达尔少将继任，并兼任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

△　中印公路在中、美、英三方面协力下，自印度利多开始修筑。

11月2日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在渝举行，主任委员张道藩，副主任委员潘公展、洪兰友，委员吴南轩、胡秋原、黄少谷、舒舍予、徐悲鸿、张恨水、易君左等100余人出席，通过拟请中央统一文化运动机构，以便加强指导，请中央设置三民主义研究院等案。

△　重庆《大公报》讯：蒋介石手令赈济委员会协同儿童保育机关，将二万名难童移往新疆保育。

△　国民政府公布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名单：议长陈屺怀、副议长余绍宗，议员吕公望、叶志超、邵裴子等37人。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对税收的监督，发出命令规定如下：一、凡设有税务局的地方，须组织税务委员会，协助税局工作；二、责成地方保安警卫部队及自卫军协助税务局、所，查禁仇货、毒品等违禁物品及检查偷漏税情况；三、严饬公营商店遵章纳税，当地政府和驻军须给予税务机关有效的帮助，查禁违章者；四、经常注意群众对税务机关的反映，帮助税务机关纠正与解决存在的问题；五、政府不得单靠命令税工人员执行。

△　鲁中沂水（今沂源城南）、东里店等日伪军800余人，在飞机和炮兵支援下，分11路向沂水、沂源、临朐三县交界对崮峪进行“拉网合围”“扫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转到沂水城东，摆脱敌人。山东军区机关、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直属团转移到对崮峪后，被日伪军包围。经一天激战，打退敌人八次猛烈进攻后，分路突围。这次战斗共毙伤敌600余人，八路军伤亡和失踪300余人，山东省战工

会秘书长李竹如、鲁中区第二地委书记潘维周等牺牲。

△　伪军第一军军长李英率3000余人“扫荡”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北部地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指挥民一团、基干团和军分区教导队，在内黄县将敌包围，毙俘伪旅长以下近千人。

△　日机54架自广东方面出动，其中36架分三批袭桂，盟机多架升空反击，发生激烈空战，日机四架被击落，盟机损失一架。

△　石渡庄太郎抵南京，就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5日，石渡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本如没有中国的协力如物资等，就不能完成大东亚经济建设。

11月3日　　蒋介石在私邸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商震、陈诚及英、美代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一、缅甸反攻作战计划；二、云南、越南作战计划；三、留印中国军队行动问题等。

△　行政院例会决议褒扬已故驻波兰公使王景岐，任命张含英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　外交部长宋子文在渝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明中国应收复一切失土，应恢复到“九一八”以前之状态。

△　外交部在研讨美国政府上月24日《中美关系条约草案》后，拟订《对于中美关系条约草案意见》、《中美关系条约修正草案》、《中美关于新约范围以外之特权应即废止之换文》三项文件，是日由魏道明送交美国政府，美方同意以此作为双方交涉的基础。

△　新都县银行经理兼川康银行新都办事处主任，并兼四川省银行第一民食供应处顾问吴肇章，利用职务私囤食米2000余石、菜籽1.2万余石，操纵市场，经国家总动员会议成都经济检察队破获，决处死刑，执行枪决。

△　中共中央军委制定《华北形势大纲》，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形势，提出八路军作战方针是继续坚持平原，以保障晋、冀山区物资供给及晋、冀山区的联系。作战内容是反“蚕食”，要以我之强对敌之弱；反“扫荡”则要以我之弱对付敌之强。把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对敌斗争结合为一体，构成反“扫荡”的正面。反“蚕食”、反“扫荡”两者有机结合，以反“扫荡”为主。

△　八路军冀南军区为打开漳河两岸地区的工作局面，以四个团的兵力发起成安临漳战役。首先一举攻克土匪程希孟部的老巢回龙镇，歼其9000余人。11日开始战役的第二阶段，奔袭成安、临漳两城，全歼临漳守城日伪军150余人，并肃清该地区的伪警备队及伪政权机构。从此，打开了漳河两岸成安、临漳地区的抗战局面。

△　驻山东滨海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二旅，为配合沂蒙区反“扫荡”，以“翻边战术”在海陵进行反“蚕食”战役，连战一周，克敌伪据点16个，毙伤日伪军170余人，俘日伪军450余人，粉碎敌对海陵的“蚕食”。

△　新四军奔袭安徽灵璧、固镇，俘伪大队长以下120名，毙伤日伪军400多名，缴获子弹3000发、步枪150余支。

△　日机13架空袭江西赣县，在郊外投弹30余枚，一人死亡。

11月4日　重庆《大公报》讯：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视察四川西南后称：资委会直属工矿企业96个，今年生产价值约20亿元。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重庆公开讲演，题为《战后和平问题》。

△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在兴县北坡村召开晋绥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参加的高干会议。决定主力部队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地方武装以二

分之一的兵力，普遍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分局成立敌区工作部，张稼夫兼任部长，并在各地敌人据点中建立内线，打入敌人内部，配合部队作战。

△　加总理金氏宣布，任命欧德伦少将为加拿大驻华公使。

11月5日　四川农业公司组成，负责人选即由川康兴业公司与四川省政府共同商定。

△　据重庆《大公报》讯：海军中将陈策、少校徐亨在去年港九战役中奋勇突围，对英国援助甚大，英驻华大使薛穆代表英王特将勋章分授陈、徐二氏。

△　中国驻美领事在华盛顿开会，由驻美大使魏道明主持，研究旅美华侨援助祖国抗战等问题。

△　美国援华委员会拨款400万元补助中国各大学教授生活。11日，蒋介石颁手谕：增拨教育经费200万元作为补助各专科以上学校教授生活，又拨400万元为明年教育经费。

△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公布五年来军区战绩：共作战1315次，毙伤日伪军16.9012万名，俘日军441名，俘伪军1.9603万名，伪军反正1.6992万名，缴获各种炮106门、掷弹筒225个、各种机枪1038挺、步马枪3.1098万支、短枪342支、马刀893把、战马3723匹。

△　冀东蓟宝三联合县基干队和中共县委干训班在三河县之泗河村，遭日伪军500余人围攻。在突围中，干部和战士牺牲27人。日伪军连续4天对该村村民进行拷打，有48人被杀害，120余人致残，400余间房屋被烧毁。

11月6日　中国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在渝举行，主要讨论重建世界和平及政治建设机构。王世杰任主席。蒋介石特颁训词，略谓：《大学》、《中庸》、《礼运》三篇为我国政治哲学之宝典。王宠惠

秘书长演讲《战后集体安全》。选王世杰、钱端升、杭立武、浦薛凤、张忠绂、肖公权为理事，选蒋廷黻、高一涵等为监事。8日闭幕。

△　新疆省政府发表公告：人民不得潜行加入外籍，并公布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国籍法》。

△　四川省银行增资为4000万元，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出资1000万元，四川省政府出资2000万元，余为商股。

△　教育部训令指定中央大学等21校，自11月20日起加紧实施军事管理，以树各校楷模。

△　驻英大使馆陆军武官康宝煌就英国第八军在埃及大捷，代表中国陆军向帝国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赖埃祝贺。

△　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指出：对敌人、汉奸及其他一切破坏分子，在被捕、被俘后，除坚决不愿悔改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对于坚决不愿悔改者，是镇压而不是宽大。

△　晋察冀第三军分区部队一部，袭击定县云虎村之敌，俘伪军390余人。

△　新四军夜袭安徽泗县东青阳集，毙日伪军28名，俘137名。

△　伪满洲国政府召开有省次长参加的日籍地方官吏首脑会议。16日，又召开伪省长会议。两会中心议题为粮食问题，确定1942年度收来之农产物，先供军需、特需，继之供应重要生产部门之劳需，然后再转向一般民需。

11月7日　是日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纪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致

电斯大林；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国际联盟同志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留俄同学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劳动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凯缅诺夫表示祝贺。军委会举行纪念会，招待在渝苏联军官和武官等。

△　延安各界代表2000余人集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朱德报告苏德战争与中国抗战。延安各机关、学校分别举行纪念活动。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指出：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灭亡”。“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了”。

△　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举行茶会，招待中国各界人士及盟国驻华使节，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

△　国民政府决定彻底管制棉花，其办法：一、陕棉除物资局收购者外，其余商人自行采购来川之棉花，一律由农本局在川、陕沿线宝鸡等地加以收购，由政府统筹分配；二、敌人在湘北、鄂西一带套购棉花，除下令禁止棉花输出外，并在沦陷区大量抢购。14日，国民政府以一亿元专款收购陕棉。是日，军需署开始统制棉纱。17日，国家总动员会议决定将陕西存棉20万担，每担定价600元全部收购。逾期未交者，一律没收存公，并规定除农本局外，各纱厂、各机关不得自行收购。

△　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董事会，黄炎培、钱新之、陈光甫、王云五等10余人出席，决议将中华职业学校改为职业专科学校。

△　中国影展在英国伦敦展出。展品共60幅，主要反映各界群众

抗日及建设的情况。

△　中共南方局文化组组织在渝进步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茅盾、舒舍予、胡风、夏衍、田汉、阳翰笙、史东山、曹靖华、戈宝权等百余人，联名给苏联文化界致贺电，称：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蒂的战争给予着无上的欢欣、鼓舞、力量”，“我们是深切相信人类的前途正是走向光明，纵使目前尚有莫大的障碍，但我们要不屈不挠，排除万难前进”。

△　日军纠集昌平、延庆、密云、滦平、丰宁等地敌伪4000余人，分10路对平北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平北军民奋起还击，一周后将敌击退，并乘胜攻克怀来西北安家堡据点。

△　日大本营派原陆军大学校长下村定中将接替泽田茂中将为第十三军司令官。

11月8日　“火炬”行动开始。凌晨，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大本营设在直布罗陀），美英联军开始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旨在夺取北非登陆场，进而与正在埃及和利比亚作战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协同，歼灭非洲大陆的德、意军队。

△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秘密由北平飞到烟台，布置对胶东根据地进行“扫荡”。

11月9日　教育部颁发《待遇边境学生暂行规则》，凡13条。规定：为鼓励蒙、藏及其他语言文化特殊性质地方学生升学内地，每年开学前，由旗盟地方官署、边地学校推荐学生参加升学考试，学校将予从宽录取或酌收旁听。对未能录取学生的不及格科目，教育部指定学校予以补习。

△　据重庆《大公报》讯：贵阳甘沟煤矿公司创办人赵清华去秋入川调查地矿，在灌县发现铁矿，已设厂开采。

△　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二团一部，在涟东县总队的配合下，于涟东佃湖地区阻击日伪军800多人的进攻，激战终日将敌击退，毙伤日伪军100余人。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满洲国政府、关东州及朝鲜等代表在北平召开“第二次大陆联络会议”。会议以“力求供应日本一切，借以充实日本战力”出发，讨论“扩大对日输出”、“彼此互相援助”等问题。

11月10日　国民政府任命苏兆祥为四川高等法院推事兼院长。

△　行政院例会决议为国立中学和各省临时中学追加教育经费600万元；授予航空委员会前秘书长宋美龄一等宝鼎勋章，以表彰她对航空事业的贡献。

△　驻苏大使邵力子回国述职，是日抵渝，12日晋谒蒋介石。

△　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对外籍记者称：“美军在北非登陆，我不仅完全同情，并盼法人不阻挠盟军行动。”

△　四川古物保管委员会及四川博物馆近在外西抚琴台侧发现古墓一座，当于9月中旬开始发掘，刻已掘出墓身，证明为前蜀帝王建墓址。墓中尚有铜器多件，弥足珍贵。按：王建为五代时前蜀开创之王，舞阳人，唐昭宗末年封蜀王。

△　川、康两省政府商定，将省营各生产事业全权委托川康兴业公司代办。该公司为求周转灵活，向四联总处洽妥低利贷款5000万元，并可随时支用。

△　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孙科在重庆招待韩国临时议院全体议员，周恩来、冯玉祥、宋庆龄等出席作陪。

△　英国议会访华团艾尔文等一行抵重庆。

△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指出：在战役战斗日益频繁，而在一定时期内部队的补充又属困难的情况下，巩固部队就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并强调在部队中应关心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战士的切身利益，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同时要利用各种生动具体事实，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

△　晋绥军区参谋长周士第报告晋绥军区部队五年来战绩：共作战5287次，毙伤日伪军8.685万人，俘日军312人、伪军8335人。毙伤马5843匹，俘马5563匹，缴获步枪1.3324万支、驳壳枪464支、手枪251支、轻重机枪538挺、各种炮42门、毒瓦斯1770筒，破坏火车头28个、车皮22辆、汽车866辆、飞机五架、坦克四辆、碉堡68个、公路9432里、铁路895里、桥梁530座。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五分区配合冬季政治攻势，与民兵发起对河南安阳营井段封锁沟、墙的破击作战，毙、俘日伪军百余人，收割电线万余斤。同日，八路军步、骑兵各一部强袭山西临漳，毙日军一部，俘敌150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战马50匹。

△　美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计划到1943年底扩军970万人。

11月上旬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王亢率队将窜到密云古石峪烧房、抢粮的石匣日军南岛中队包围，毙敌南岛中队长以下80余人，截回粮食70余驮。

11月**11**日　　英国议会访华团艾尔文等一行四人觐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呈英王亲笔信。同日，该团晋谒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将丘吉尔首相及英国上下两院致蒋信以及丘吉尔夫人致宋美龄信面呈蒋、宋。晚，蒋介石夫妇设宴款待艾尔文一行，蒋致欢迎词时指出：“中英不仅为求取胜利而协同努力，更为建立新世界而提携共进。”

△　财政部制定《新疆流通货币暂行办法》，决定中央银行在新省设行，发行关金券与新省币同时流通，并暂定关金券25分折合新省币一元。

△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宣布七项规定，凡党政军警机关部队官兵，均应集体宣誓不经商、不走私，违者撤职。

△　四川江津县邓鹤年捐助江津县私立聚奎初级中学校暨新本女子初级中学款项，前后达30万元以上，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以昭激励。

△　中央大学全体教授发出《致全国大学教授书》，表示不愿接受友邦给予的生活补助费，以顾全国家体面。

△　重庆《中央日报》特讯称：复旦大学学生近因生活关系，多在重庆北碚附近兼任其他职务，学校当局严加取缔，并令自即日起至12月1日止办理登记，由校方审核，如不登记或未经核准而仍在校外兼职者，一经查出，立即开除。

△　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检查一个月来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坚持内线与展开外线作战相结合”为新的作战方针，及建立以猛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展开外线斗争的策略。

△　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发出围困沁源之敌的命令。洪赵支队负责打击沁县至沁源大道之敌，围困王和镇，警戒韩洪、红窑上来犯之敌。洪赵支队在沁县至沁源大道上，伏击敌人，破袭道路，造成敌人物资补给的极大困难，有力地支援沁源围困战。

△　八路军雁北部队里应外合智取灵丘东张庄敌据点，俘伪军80余人，缴获轻机枪二挺、长短枪62支、子弹三万余发，全部焚毁敌伪住所、堡垒。八路军仅一名负伤。

△　日伪军千余人“扫荡”冀南大名西南地区，在泊儿村等处设据

点。

△　美潜水艇在上海吴淞附近击沉日轮船两艘。

11月12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任主席，到中央执监委员155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常务理、监事，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各院、部、会长官，各省政府主席均列席。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戴季陶、邹鲁、孔祥熙、陈果夫、叶楚伧、顾孟馀、李文范为主席团。会议研讨经济问题及党政工作，确定工作新方针。

△　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英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会晤，就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双方缔结平等新约等问题开始举行谈判。会谈中中国方面提出新界问题与租界性质相似，应予解决；英国则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谈判范围之内。中国政府不愿因新界问题而使谈判破裂，对此声明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之权。

△　驻古巴公使李迪俊代表中国政府与古巴外长马丁尼在哈瓦那签订《中古友好条约》。

△　重庆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七十七周年，刘峙、吴国桢等500余人出席。重庆市党部为此举行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学生讲演竞赛，讲题为《国父诞辰及于中华民族之影响》。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为此举行中学生讲演竞赛。

△　蒋介石饬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订的《政工典范》出版，是日明令颁布施行。

△　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团长林继庸率团员20余人于7日抵兰州，在兰参观工厂、企业，是日抵青海考察。12月3日赴新疆考察。初步决定：在宁夏将办水泥、毛纺、造纸三个厂；在甘肃开办纺织、面粉、炼铁三个厂；陕西主要扩充和改善现有企业；并决定将原设在

西安的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西安办事处改为西北办事处；明春在兰州设置专员办事处。

△　上午，英议会访华团与各报社负责人会晤，包括《大公报》王芸生、《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詹文浒、《时事新报》陈翰伯、路透社赵敏恒、中央社萧同兹、美国合众社王公达、美国国际新闻社李圣思及英国《每日快报》马丁茂等。10时，英议会访华团拜会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下午，宋子文在外交部举行茶会，欢迎英访华团。

△　日军二万余人分区“扫荡”八路军胶东地区。这次“扫荡”共分三期。第一期以烟青路东之牙山（栖霞县）、马石山（海阳县北）为中心，采用“拉网合围”；第二期向东海地区合击“清剿”；第三期向西海地区合击。“扫荡”至12月24日止。

△　8时，日机44架分路窜袭湘、桂，8时58分与我空军在零陵上空发生激烈空战，“零式”日机一架被击落。同日，日机11架在桂林与我空军发生空战。

11月13日　　英国议会访问团在渝参观大、中、小学。同日，中英文化协会举行茶会欢迎英国议会访问团，正、副会长王世杰、薛穆及会员200余人出席。晚，教育部长陈立夫设宴招待访问团，教育部次长余井塘、顾毓琇、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西北大学校长赖琏等出席作陪。同日，中英文化协会举行茶会欢迎英国议会访问团。

△　四川省教育学院20余名教授举行座谈，沉痛呼吁美国援助不便接受，改善生活端赖政府。

△　八路军冀东主力部队在承平宁地区打击日伪。第十二团第二营围歼三沟警察署、五道河子警察分驻所和上谷、永和铁路警护队。第十一团一个连攻击洼子店警察分驻所、黄土梁子、八里罕警察署和大营子警察分驻所。到17日，打下三沟、黄土梁子、八里罕三个警察署和六沟、七沟、洼子店等11个警察分驻所及上谷、榆树沟、永和三

个铁路警护队，缴获长枪140余支、手枪11支和一批物资。

△　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晋西北分盟及华北日本人反战同盟晋西北支部召开成立大会。朝鲜独立同盟分盟主任为金世光，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负责人为小林武夫。

11月14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首次大会。主席团宣布各组召集人名单：党务组丁惟汾、朱家骅、陈立夫；政治组王宠惠、王正廷、张厉生；军事组何应钦、程潜、陈济棠；经济组张群、贺耀组、徐堪；教育组邵力子、白崇禧、张道藩。旋即由中央常务委员居正报告党务。

△　教育部公布《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规程》，凡九条；《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规程》，凡15条。规定各地教育行政机关应指定或聘请人员组成检定委员会。教师检定每年举行一次，检定合格有效期为六年。各校均应聘请检定合格的教师。1944年7月7日，经行政院修正后，此《规程》改为《条例》。

△　英议会访问团参观中央政治学校。晚，蒋介石夫妇在官邸设宴招待英议会访问团。

△　日军第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6000余人，附以坦克、骑兵，在航空兵支援下，对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青阳、半塔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四师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该师主力大部跳出合围圈，向泗县、灵璧方向转移，袭击日军侧后据点及交通线。内外线配合作战，迫日军于12月17日撤出青阳等地。第四师在33天的反“扫荡”作战中，共歼日军800余人。在此期间，新四军第二师也粉碎日军混成第十三旅团及伪军2000余人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定远地区的“扫荡”。

11月15日　　军事委员会在桂林举行西南将领会议，协议在越南国境线反攻作战问题，并决定将西南行营移驻南宁，由白崇禧任总指

挥。

△　是日至月底，冀东军分区主力部队为配合恢复基本区的反“蚕食”斗争，在热河境内及长城南侧进行广泛出击，先后攻克锦热路的上谷、永合两车站及兴隆、承德、平泉、宁城、蓟县、抚宁等地21处敌伪据点，扩大热南根据地，开辟凌青绥地区，游击区已有11个抗日县政权，其中三个县跨长城南北，两个县完全在“伪满”国境之内，武装部队已发展到8100人。

△　日军第十七师团及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由淮阴、泗阳、新安、沭阳等地出动，从四面出击淮海区的小湖庄、陈圩、张圩地区，企图消灭该区中共党、政、领导机关及新四军主力部队。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第十旅主力大部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向灌云东北方向转移出去。日伪军扑空后，即向六塘河两岸进行“扫荡”，同时修公路、建据点，尔后又实行分区“清剿”，将淮海抗日根据地分割成数块。根据地军民经月余作战，共歼日伪军500余人。

△　日伪军5000人合击鲁中博山城东马鞍山地区。被围的八路军一个区中队和在此休养的八路军副团长王凤麟等伤员坚决抵抗，后大部牺牲。

△　暂编第五师少将师长彭士量在湖南石门殉职。

△　汪精卫于14日偕日顾问松井太久郎赴武汉视察，是日伪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设宴招待。汪在宴会上声称：为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第一、必须内部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第二、必须与日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

11月16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孔祥熙作政治报告，对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工作作扼要说明。英大使薛穆、澳大利亚公使艾格斯顿、印度专员

黎吉生、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孔士德、英议会访问团艾尔文等莅临参观。蒋介石以总裁身份致词欢迎。下午，宋子文报告国际形势。

△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渝举行茶会欢迎英议会访问团。各妇女团体负责人及妇女界知名人士300余人出席。

△　朱德在延安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作风，指出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有什么样的武装，有什么样的敌人和地理条件，就必须打什么样的仗，调皮是不行的。并指出：革命是群众干的，没有群众什么也干不成。因此，必须深入到群众中间，才能团结和领导群众前进。他还说，目前革命胜利的希望比以前更大了，我们政治上更要坚定，永远做一个革命者，使革命成功。

△　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边区物资局，取消财政厅所属的贸易局，将原贸易局所属之盐业、土产公司及光华商店划归该局领导。任命叶季壮为物资局局长。

△　日机四架窜入陕西境内，并在西安窥察。

11月17日　　国民党十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贺耀组作经济报告，四川省主席张群作川省施政情况报告。18日，举行第四次大会，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　蒋介石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题为《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灭任何帝国主义》的论文，以三民主义说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希望，主张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弭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

△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重庆官邸欢宴英议会访问团。同日，英议会访问团拜访宋庆龄。

△　宋美龄应美总统罗斯福夫妇邀请飞美。

△　教育部颁布《奖励中等学校教员休假进修办法》，凡11条。规定在一校连续服务满九年，成绩昭著、品格健全的专任教员得申请休假进修，进修期限为一年。进修期间仍支原薪及各项补助或津贴。

△　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及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谋周励武偕夫人抵延安，奉命携款救济边区水灾。叶剑英、林伯渠、李鼎铭等前往交际处访晤。12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八路军留守兵团联合举行晚会欢送郑一行。郑发表讲话，略谓：第十八集团军在晋察冀等地牵制了大量的敌人，留守兵团起了同样的作用，边区虽接近前方，社会秩序如此安静，在艰苦的环境得到如此的成果，令人钦佩。

△　八路军在山东全线出击，在沂蒙区歼日伪军300人，滨海区歼日伪600人，鲁南、清河区各歼敌数百。同日，鲁中滨海各界群众2000余人集会，庆祝八路军反蚕食连克16据点的胜利。

△　八路军晋察冀部队一部在灵丘县展开破击战，二小时内将蔡家峪至南坡头40余里的电讯设施全部破坏。

△　国际情报委员会公布：中国沦陷区内，有高等学校25所被迫停办，14所全部毁灭，另15所遭轰炸，损失极重。

△　8时至下午2时，日机10架分批窜入陕境，其中一架窜入甘肃成县一带窥察。

△　比利时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放弃在华特权。

11月18日　　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代表孙科、冯玉祥、马超俊等联名向全会提出《联苏容共扶助农工调整国共关系案》；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等广西派联名提出《抗战诸党派结成大同团体案》；陈立夫、陈果夫等联合提出《防止分散抗战建国势力案》；万福麟、于学忠等东北派一致要求释放张学良。

△　财政部与英国福公司签订《关于办理中国购英货物在印度接运的合同》，凡11条。

△　中华妇女职业协进社成立三周年。该社在渝创办青年女子农业学校和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收容战区流亡女青年，膳食免费。

△　武汉大学教授百余人召集紧急会议，并发表宣言赞同中央大学教授拒绝接受美援的号召，并请教育部要执行本届国民参政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以改善教授待遇。另通电全国教授，发起组织全国教授联合会。

△　周恩来以《新华日报》编者名义，发表该报首次刊出的《友声》专栏前言，称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中国人民的任务越来越重。在探讨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应当重视不同的意见，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提出真知灼见。

△　英议会访问团上午参观兵工厂。晚，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晚宴。

△　“扫荡”太岳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的日军撤离根据地，留下一个大队及伪军一部据守沁源县城及其附近据点，企图以此为基地分割和“蚕食”太岳根据地。太岳北部地区军民在中共太岳区委领导下，以麻雀战、阻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等对沁源县城日伪军实施长期围困。

△　下午2时，日机一架飞入湖北老河口，在河岸投弹数枚。

11月19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由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报告党政考核工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报告行政三联制与党政考核工作三十年度成绩总检讨。下午分别审查提案。

△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十次全体大会，监察委

员林森、张继、吴敬恒、杨虎、邵力子、王宠惠、黄绍竑、商震、王秉钧、王世杰等35人出席。王子壮秘书长宣读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讨论关于审查稽核等案件。

△　军事委员会颁布党员公务员及士绅子弟服兵役征集办法，规定由各县（市）长、市党部书记长、国民兵团副团长、军事科长、社会科长及师管区遴派一员组成特种壮丁调查委员会，办理全县征集事务。凡党员公务员及士绅子弟应征者，经验查后，即抽签公布，中签者准入模范队或特种兵部。

△　下午4时，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干部训练班举行茶会，欢迎英议会访问团。晚7时，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韩文化协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联合举行宴会欢迎英访问团。

△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正义报》发表《告沦陷区同胞书》，揭露日军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号召沦陷区人民坚持对敌斗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　监察委员熊育锡在宁都逝世。熊为当代宿儒，蒋介石电唁家属，赠三万元抚恤费。12月20日在渝开追悼会。

△　延安《解放日报》载：1941年6月至1942年6月一年间，华北日军抓捕壮丁运往关外者达74.2万人。截至1941年底，敌在华北修碉堡7700余座，铁路、公路两侧的壕沟已达37.2万里。

△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与日正金银行签订《关于购买广播电讯器材向日本正金银行活期透支借款600万元契约书》。

11月20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驻会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莫德惠任主席，林虎、王普涵、陈启天、黄炎培、许德珩、江一平、阿旺坚赞、王云五、董必武、杭立武、陈博生等参政员出席。由秘书处报告本届第一次大会决议案，处理经过及经济动员策进会筹备情况。外

交部次长傅秉常报告外交及国际形势，最后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　军事委员会派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兼任甘新公路督办，西北公路工务局长凌鸿勋兼任会办，接管甘新公路，并修护由甘肃河口至甘、新交界之星星峡公路干线。

△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第六次大会，听取各省、市党政报告。

△　国民政府命令陆军少将高树勋晋升中将。

△　国民外交协会在广播大厦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座谈会。莫德惠、于斌、江一平、陈炳章、程希孟、胡秋原、杨玉清等出席。主要意见有：一、废除不平等条约范围要广，应彻底；二、经济不平等条约应一概废除，华侨在侨居国所受不平等待遇应纠正；三、战后吸收外资必须以维护国家主权和自由贸易为原则，其他国家对我国应采取合理的保护政策；四、人民必须有信仰自由，订立新约后不限制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与政治分开等。

△　据重庆《大公报》讯：政府对兵役行政有新规定：男女均须服兵役，除因公在外三年不能回国，因病短期内不能恢复，独立维持一家生活及小学教师，或从事国防工业和矿业工作者可缓役外，其余一律不能免缓。蒋介石特作如下训示：一、党团员及政工人员应首先送子弟服役，如有规避，定予重惩；二、对规避兵役之壮丁，县政府均予严厉处分；三、各县遣送壮丁时对于生活均应妥为照料，不得苛虐。今后考核县政府政绩，兵役与粮政各占35%。

△　豫省当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联名通电全国，呼吁救灾。

△　天文学会东南区年会是日在福建永安举行，由总会长高鲁主

持，并报告《二十年来之气象学》。

△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与关中专署合办的边区炼铁厂正式开炉炼铁。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一部袭入山西沁县车站，歼日伪军70余人。

△　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等部万余人，对湖西单县以东地区进行大“扫荡”。

△　滦河西岸车河口据点敌伪140余人向南出动“讨伐”，在承德以南黄花川河口被冀东八路军全部歼灭。毙田中大队长以下官兵43人，俘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106支、手枪九支。八路军伤19人，亡三人。

△　日首相东条和海相青田、大东亚相青木、次官山本、前首相平沼、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等会谈，协商加强汪政权的政策，决定加强汪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促进占领区的经济复兴和增加军事物资生产，建立总力战体制。关于解决战争物资供应问题，决定以夺取中国占领区物资为主。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决定加强驻南京大使的权力。

11月中旬　　中共沁源县委员会组建围困作战指挥部，以太岳军区第三十八团和第二十五、第五十九团各一部为骨干，与县区武装和民兵相结合，组成13个游击集团，对日伪军广泛开展麻雀战、阻击战、地雷战、袭击战、伏击战和破袭战，昼夜袭扰。并动员沁源城、交口、阎寨等据点及附近居民全部撤走，进行填井塞河，空舍清野。经过连续的袭扰，日军人员伤亡不断增加，补给十分困难，不得不换防。

11月**21**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第七次大会，继续听取各省、市党政报告。下午，蒋介石作党政工作总检讨。

△　重庆女国民党员代表潘素、何群等10人向十中全会请愿，要求按照七中全会决议，尽早成立中央妇女部。

△　国民政府确定：1943年全国田赋实征额为一亿石。

△　是日为第三届防空节，全国各地均召开纪念大会，检阅防护部队，检查防空设施及慰劳遇难家属。重庆在夫子池广场举行检阅式与纪念大会。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战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最后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23日，继续讲《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　中国抗战艺术展览会在纽约艺术博物院举行，展出内容有玉塔、佛像、绘画和服装等。

△　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主力及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六、第七旅团各一部共1.5万余人，采取“拉网”战术，对胶东区栖（霞）牟（平）海（阳）莱（阳）边的牙山、马石山地区进行“扫荡”。胶东军区机关率部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分区坚持，进行反“扫荡”作战。

△　晨9时，日机一批六架，另一批12架，由赣窜至福建建瓯，在西郊投弹数十枚。

△　日政府召开御前会议，确定对华方针，其要点为：帝国以汪伪国民政府之参战作为打开日华局面之一大转机。以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为准则，专行加强汪伪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同时谋求击退重庆

所根据之抗日借口，真正向更新中国与完成整体战争迈进。在要领中提出加强汪伪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对重庆的政策中提出帝国不以重庆为对手，不以其进行一切和平工作，但在形势变化下拟进行和平工作时，另行决定之。在战略方策中提出“帝国对华战略方策根据既定方针”。

11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杨沧白于8月6日逝世，是日重庆举行追悼会，蒋介石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特给恤金10万元。

△　驻福州英领事署正式交还仓前山英国副领事馆全部产业。

△　陈毅率领新四军在洪泽湖畔与日军展开激战。17日，新四军在管庄、鲍家集与日军激战。18日，又在沈集及钱家集战斗。22至23日，日军复猛袭洪泽湖畔，并扑向新四军根据地萧石庙、顺山集。

△　日伪军把平谷前后北宫、翟各庄、杏园、北辛庄、井儿峪等村百姓300余人围在北上营大庙，三天三夜不给吃喝，第四天把16人带到北上营据点，有八人惨遭杀害。

11月23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致训词。旋即举行第九次大会，继续听取地方党政报告。24日，举行第十次大会，连续听取党政报告。

△　江西临川地方法院推事黄种新在浙赣战役中以身殉职，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会、重庆市总工会等工会团体，欢迎英议会访问团工党议员劳森。

△　延安《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松在延安病故。

△　晚，日中型轰炸机三架企图袭击中国西南美空军基地，被美空军战斗机拦截，击落二架。

11月24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积极建设西北，以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

△　财政部为平抑物价，经行政院核准，特将棉纱、麦粉两项统税试行改征实物。

△　交通部派杜镇远为粤汉铁路局长。

△　英议会访华团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谈英决摧毁德、日，先击溃德国，战至日本降服为止。

△　日大东亚省举行首次会议，决定曾任兴亚院之委员分担对中国占领区工作，曾任对满事务局之委员分担对“满洲”工作，曾任拓务省委员分担南洋占领区工作。

11月25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第十一次大会，通过《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政策，以裕国计而利抗战案》、《策进役政宏裕兵源案》、《政府应速制定工业法，以发展工厂增加生产案》等10项议案。下午举行第十二次大会，蒋介石作总结报告。

△　国民政府令：一、甘肃临夏县马驯捐资兴学3.9万余元，除由教育部授予一等奖状外，应予明令嘉奖；二、甘肃景泰县张钦武捐助景泰县小学校产1.5万元，除由教育部授予一等奖状外，应予明令嘉奖。

△　四川省政府为督导四川各县普遍设置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及彻底整理户政改进警政，特派督导员10余人分赴各区督导。

△　重庆市商会举行改组大会，各业公会220余人出席，推举周懋植、周荟柏、林尧放、陈德恕等15人为理事，温少鹤、陶桂林等七人为监事。

△　英议会访华团抵西安访问。29日到成都，12月6日飞赴昆

明，10日结束在中国的参观访问返回英国。

△　延安《解放日报》讯：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典地回赎办法：一、典地是地无租、钱无息、活买活卖的土地买卖关系；二、处理典地回赎纠纷，必须坚持保证地主土地所有权，保证农民使用权的原则；三、出典人赎回的土地，不能自耕再行出租、出佃、出典、出卖者，土地使用人有优先承租、承佃、承典、押买权。此外还规定了发生纠纷解决办法。

△　“扫荡”胶东的日军攻占海阳县北马石山，将未及转移出去的500多名群众全部杀害，制造了“马石山惨案”。

△　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党部，任命汪屺为主任委员，梁朝汇、冯澂、左汝良、李国梁、雷惠明为委员。

11月26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通过《1943年度党务工作方针案》、《实施义务劳力制度，促进地方生产，以利民生而裕国用案》、《确定义务劳动服务制度，颁布义务劳动法案》等。

△　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议核定《1943年度推行储蓄业务计划纲要》，呈报国家总动员会议，规定各行、局推行40亿元储蓄。

△　阎锡山在朝会上作节约消费讲话，要求今后生活需要上，除医药外，我们产什么用什么，不准购买外边物品。先从副官处着手，一切用品，减半发给。

△　中苏文化协会妇委发起举行同盟国妇女联欢会，邀请在渝的英、美、苏等国妇女参加。

△　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嘴召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整风学习中的若干问题。林彪在会上报告有关华北战场的情况。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一旅奉命西渡黄河到达绥德，担负绥德警备任务，独一旅旅部兼绥德警备区司令部。该旅第二团集结于米脂、葭县地区，第七一五团集结于绥德以西马蹄沟地区。

△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偕参谋一行飞冀东等地观察。27日，转滦县、迁安、沙河、遵化。29日，经通县返平。

△　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因刊登盟国胜利消息，被日军封闭，所有员工一律遣散。12月11日，国民党中宣部致电嘉慰。

11月27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闭幕。全会听取了中央各部门及部分省、市的报告；共收到提案82件，其中有关党务者18件、政治27件、经济25件、教育九件、军事三件。通过的重要议案有：《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政策以裕国计而利抗战案》、《策进役政宏裕兵源案》、《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党务改进案》、《加强地方监察制度案》、《调整省县机构，确定权责范围，简化业务程序，以增进效率案》、《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等。关于共产党问题，一面决定“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一面又诬蔑共产党“私自组织军队”，要求政府依法予以制裁。全会选举陈果夫、何应钦、孔祥熙、张厉生、白崇禧、宋子文、邹鲁、叶楚伧、丁惟汾、李文范、冯玉祥、陈济棠、吴忠信、潘公展、邓家彦等1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将中央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最后，由于右任宣读《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宣言》。《宣言》指出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即要确立国际政策，加强抗战力量，确定建国要务，集中建国意志；并强调精神与物质必须并重，号召从头努力，以完成建国之全功。

△　宋美龄赴美就医，是日抵纽约。霍浦金斯代表罗斯福总统在机场迎候，并陪赴医院。旋在美展开活动，宣传中国抗战。

△　盟机袭广州，在黄埔炸沉日军载重7000吨的运输舰一艘。

△　八路军一部在山东南部邳县、临县展开反“蚕食”斗争，解放民伕2000余名。

△　日内阁作出《关于中国劳工遣入日本国内的决定》，这是东条英机内阁为支持太平洋战争，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作出的一项决策。据统计，从1943年到1945年，先后有169批，4.1762万人被押运到日本，分别在135个企业中做苦役劳工，其中有7000人葬身日本。

11月28日　　财政部公债筹募委员会主任孔祥熙，在官邸宴请各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商讨本年度各地公债筹募推进事宜。

△　日伪军在牟平、海阳一线构筑断绝网，继向文登、荣成推进，并以5000余人严密封锁烟台至海阳的公路，以20余艘舰艇在渤海、黄海海面游弋封锁，企图围歼胶东军区机关和从马石山突围出来的部队。胶东军民以内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法，到处打击敌人。

△　新四军浙东三北游击队进行周家路、登州街、黄家埠等战斗，歼“忠义救国军”艾庆璋等部共3000人，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

△　日政府集结南洋协会、满洲协会、拓殖协会等80个组织，合组为“兴亚拓殖团体协议会”。

11月29日　　财政部直接税处召集第五届业务会议，部长孔祥熙主持，各省、市直接税分局局长等200多人出席，研究税收问题。12月5日闭幕。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要求我们不超过在国民党所设定的严格范围，则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是国共两党长期接洽和他们通过许多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

头的国共不良关系，作了一个总结。这个决议在某种意义上和1937年3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优待日本逃战避难军民规程》，规定逃战避难的日本人均享受国际友人的待遇，尊重其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负责其人身、财产安全，予以生活保障。愿参加抗日工作者，按我抗日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老弱病残失去工作能力者，政府予以救济。

△ 延安《解放日报》载：陕北南泥湾驻八路军一个团本年开荒千余亩，商业生产达150万元以上，自建房屋和窑洞173间，蔬菜、肉类达到完全自给。

△ 重庆《大公报》讯：重庆和西北实业界人士王正廷、钱新之等发起组织甘肃河西实业公司，以发展河西畜牧业。资金暂定1000万元。

△ 伊斯兰青年会在重庆举办讲座，由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主讲《中国伊斯兰教之发展》。

△ 英国议会访华团由宝鸡飞抵成都访问。

△ 四川耆老尹仲锡因病在成都逝世。

△ 汪精卫为《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签订二周年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诡称：“当前的任务就是加强国民政府的力量，使之能对和平的障碍和叛逆加以扫荡廓清，并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并表示对日本要有互相谅解、互相信赖的精诚，扫除误会，促进合作。

△ 英首相丘吉尔对世界演说，保证欧陆战事结束后，英全力对日作战。

△　29个反法西斯国家的青年代表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世界青年协会”。

11月30日　　国民政府举行扩大纪念周。蒋介石在纪念周勉励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努力实现十中全会目标。

△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声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一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凡合乎团结抗战之利益者，无不诚意实行，这是坚持不变的。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发出指示：鉴于国民党东北军对我军的态度比较友好，对日军斗争还有积极性，因此，目前主张扩大对东北军的军事行动是不对的，我沂蒙地区应对东北军实行疏通，求得缓和。对第一一一师趁敌向我“扫荡”再次占领的滨海甲子山区，决定进行收复。

△　史迪威将军总部发表第53号公报称：美国驻华空军从25日至27日共击落日机20余架。

△　汪精卫与日首相东条英机、“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举行交换广播讲话，庆祝汪、日条约和汪、日、“满”共同宣言签订两周年。汪讲话声称：《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内容，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奠定了中日共存共荣的基础。如今应根据条约的精神，“扫除一切症结，应付大东亚战争决胜之基础”。

是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从12月起，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先后开展了审查干部的工作。

△　周恩来同林彪在重庆会见美驻华使馆文职官员约翰·谢伟思和约翰·文森特。

△　边疆建设协进会川康滇边区分会理事长安登文将大凉山大河沟一带私有森林数十万株贡献给政府。

△　中国劳动协会致电美国工业团体协会，对在波士顿举行的第五届年会祝贺。

△　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成立，黄敬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代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朱光任政治部主任。

△　八路军晋豫军区成立。下辖三个联防军分区，以统一和加强中条山地区的军事领导。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二旅运用“翻边战术”，乘日军开赴沂蒙山区的机会，在赣榆、东海一带的海陵地区攻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敌人对这一地区的“蚕食”。

△　新四军军部发出《关于反“扫荡”的指示》，指出日伪军将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

△　山西洪洞、赵城敌占区农民，为反对日伪实行的配给制度举行暴动，杀死洪洞、赵城两县伪县长。

△　日军在晋西北雁北开始实行第三次“施政跃进运动”。内容有三：一、实行统制经济，在城内由日寇侵吞各商店，并在朔县设粮店九座，统制粮食；二、实行保甲制；三、加强反共活动，成立“青年灭共队”，强迫人民反共。

△　日伪军900余人围攻兴隆县南水峪，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第二区队和县大队战士奋起反击，在狗背岭、四座楼激战两日，毙伤敌近百名，旋即转移。不久，日伪军又调2000余人再次“扫荡”花石、狗背岭一带。小西天村共产党员掩护40多名八路军伤病员爬上峭壁“憋

死猫”，得以安全脱险。

△　日伪军在河北丰润县大官屯、马家峪、黄土岭、小河村、娘娘庄和小营六村，五天内屠杀民众144人。

△　美国务院捐款1.8万美元（折合国币36万元）给中美文化协会，由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转交该会会长孔祥熙，以促进中美文化工作之开展。

△　美魏斯里学院设立宋美龄基金，院长麦克阿非女士表示，院方将利用是项收入充实远东问题课程。

12月

12月1日　东南七省地方银行会议在韶关召开，主要讨论中央银行与东南各省银行的联系等内容，3日闭幕。

△　西北公路工务局长兼甘新公路会办凌鸿勋奉命接管甘新公路，计由河口至星星峡路长1178公里，对外用督办公署名义，一切事务均由西北公路工务局办理。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核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核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是完全矛盾的。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认真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中央的决定与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以下各项：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二、实行精兵简政。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

后年缩小一半，由57万准备缩至20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三、干部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消除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被分配到新的岗位去。

△　八路军在北岳区出动200名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举行为期一周的打击伪政权的政治攻势。此次活动共逮捕伪政权工作人员60余名。

△　伪军第十三师师长丁锡山及第二十五旅旅长王拂尘等，在浙江绍兴、嵊县一带率所部人枪7000余于是日及4日反正。

△　日中国派遣军和汪伪“清乡”工作委员会制定《1943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要领》，确定除在苏南继续进行“清乡”外，将“清乡”地区扩展到苏中南通和浙东余姚等地区，并以对其南京、上海及长江下游威胁最大的苏中区为重点。日军从江南调来有“清乡”经验的第六十师团四个大队以及伪军、警察、特务和行政人员共1.5万余人；并从苏南等地运来大批竹子，编制封锁篱笆；同时还在南通成立了“清乡”指挥机构。日计划第一步以两个月时间进行军事“清乡”，以四个月时间进行政治“清乡”。

△　日驻汪伪南京政府大使重光葵从日本抵上海，发表谈话称：在日期间与政府各有关当局洽商了强化“国民政府”的具体措施，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没有任何变更。为统一日本在华各机关，是日起将外务省、兴亚院在华各机关实行合并。

12月2日　中央党政机关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军事机关人事训练由中央训练团办理，吴思豫为班主任；党政机关人事训练由中央政治学校办理，吴铁城为班主任。

△　国民党中宣部举行宣传工作讨论会，部长王世杰、副部长潘公展主持，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等60余人出席。主要讨论国际国内宣传，新闻、出版和文化等问题。

△　全国医疗药品器材生产协会在渝举行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理、监事罗霞天、孟目的、连瑞琦等20余人出席，推常务理事张天溉兼任该会总干事，并决定设立技术和运输机构。

△　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邓公馆欢宴英国会访华团。

△　驻波兰特命全权公使王景岐在瑞士病逝，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周恩来同董必武、林彪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

△　美军工程部队6000余人赴缅北战场，担负筑路和埋设输油管任务。

12月3日　　据重庆《大公报》讯：本年度节约储蓄预定为30亿元，截至11月，已达27亿元，明年决定扩大总额为80亿元。

△　农本局总经理穆湘玥因推诿卸责贻误要公，行政院决定撤职查办。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李鼎铭副主席作八个月来政府工作及精兵简政方案的报告；财政厅长南汉宸作财政工作报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作整军报告。会议通过《简政实施纲要》及土地租佃、拥军优抗等方面的法规条例。确定政府今后的任务，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加强干部教育和军事教育，三是整饬政纪，四是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于9日闭幕。

△　豫省灾情严重，政府已拨款400万元赈济，现决定再拨100万元急赈，并允豫省向中国、农民两银行贷款100万元作为平籴基金。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给灾民捐款一万元。

12月4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听取外交及粮政实施情况的报告。

△　蒋介石致电美国制造厂商协会，对美国的民用工业很快转为制造军火表示钦佩。

△　驻美大使魏道明在纽约中美“协进社”讲演，建议全力进行太平洋战争，并表示中国为进攻日本最合理的战略根据地。

△　延安《解放日报》讯：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为协助政府稳定物价，特发表宣言，认为物价上涨原因，并不完全是通货增加和物资减少。宣言提出解决物价问题之原则有三：一、政府与社会应合力谋求解决；二、工商界应先平价以响应政府号召；三、一切经济设施应以物价为中心。

△　宋庆龄、李德全、刘王立明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华妇女节制会”，并决定创办同盟胜利托儿所。

△　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讲话，着重论述整党和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号召大家学好马列主义，善于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克服领袖欲。军队要加强纪律性，服从党的领导，遵守政府法令。

△　赣省灾情严重，政府曾拨款200万元，决定再拨100万元予以救济。

△　新西兰驻美公使奈士在纽约所举行之全球国际团体联合会发表演说，称战后之一切协议，中、美、英、苏四大国应平等参与。

12月5日　国民党中央在重庆举行“肇和”兵舰起义纪念会，在渝的中央委员及各部、会长官出席，由曾参加此役的中委杨虎报告《肇和起义纪念与抗战建国》。

△　八路军冀鲁豫区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一、四分区合并为一分区；教三旅与二分区合并为二分区；回民支队与三分区合并为三分区；南下支队与六分区合并改称四分区；教七旅与七分区合并改称五分区；教四旅与湖西分区合并改称六分区；水东区不变。并决定分区及县、区支队政委均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

△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发出《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组织武卫队，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为恢复绥中地区工作，中共塞北工委派绥中专员程仲一率武川县长李康、陶林县长宋克缵和部分干部战士重返绥中，开展工作。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奉令由苏北调回山东。

△　延安《解放日报》载：自上月下旬开始，八路军在鲁中反扫荡作战100余次，摧毁日据点50余处，毙伤日伪军2000余名，缴长短枪1000余支，俘日伪军官兵1500余名，伪团、营长多名。八路军伤亡800多人。

△　日驻冀东司令官、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指令驻滦县张各庄据点之日骑兵队长铃木信率队砍杀村民，被刀砍、火烧、活埋村民1100人，其中30名婴儿被摔死，60名孕妇被剖腹，全村27户被杀绝，烧毁房屋1030间，制造“潘家戴庄大惨案”，也是冀东的第二起大惨案。

△　日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以来，北平图书馆被日劫夺一空，除运走者不计外，仅被焚毁之文献书籍，就有4.5万余册。

△　浙江灾情严重，浙省旅渝同乡发动募捐，特组织筹赈会，公推戴传贤为理事长，陈布雷为监事，虞洽卿为劝募队总队长，决定募集赈款3000万元。

△　太平洋学会第八届大会在加拿大蒙德特莱勃兰开幕。中、苏、英、美等12国代表出席，主要讨论对日问题。加拿大戴尔当选下届主席，美国顾露尔、中国蒋梦麟当选副主席，中国李国钦当选财政委员会主席，美国卡特尔当选秘书长，14日闭幕。

12月6日　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之际，致电美总统罗斯福称："吾人在共同作战中，日益增进其相互之友谊与了解，以迄于胜利之到临，于达成吾人共同任务，以创造公理自由之新世界秩序，必大有裨益也。"同日，致电英首相丘吉尔致意。次日，亦致电澳洲总理寇丁及加拿大总理金氏，称盟国胜利之期不远。

△　重庆市物资局决定，自是日起市民买布须凭身份证，每人每年供应15尺。

△　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招待新闻界，由正、副主任谷正纲、黄少谷讲话，文化劳军旨在激励军心，鼓舞民气，并建立军中文化。

△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在重庆成立。

△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响应美国纪念日本侵略珍珠港一周年，是日举行特别宗教祈祷仪式。

△　重庆《大公报》载：《论大学教育之危机》一文，称：一年以来，大学教育每况愈下，实已有不忍不言之势。教师为饥寒所逼，难以言教，学生急功好利。文章最后呼吁政府当局，及早根治，务使"大学不办则已，办则必须像个大学，必须使教者能安心教书，学生能安心读书"。

△　驻苏大使邵力子在重庆沙磁区讲演《使苏观感》，到中大、重大、南开及市中各校师生2000余人。12日，又到北碚复旦大学讲演。邵对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战绩及必胜因素，叙述綦详。

△　日军"扫荡"山东荣城县崂山地区，屠杀民众和被俘官兵300余

人，掳走青壮年300余人，制造“崂山惨案”。

△　9时，日机11架侵入江西赣县，在该县郊外投弹多枚。下午2时，日机31架侵入桂林，在西南郊外投弹30余枚。

12月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分别召开常务会议，通过任免要案：一、派张道藩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二、国防最高委员会添设副秘书长一人，派甘乃光充任；三、派陈仪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四、派张厉生为行政院秘书长；五、交通部长张嘉璈辞职，由曾养甫继任；六、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常务次长钱泰辞职，任命吴国桢为外交部政务次长，胡世泽为常务次长；七、任命贺耀组为重庆市市长；八、张嘉璈被聘为行政院顾问，钱泰为外交部顾问；九、傅秉常任立法院外交宪法筹委会委员长。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原有东北党务办事处撤销，分别成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省党部。

△　全国地政会议在渝举行，主要讨论：一、如何实现蒋介石制订的战时土地政策实施纲要；二、研究在明年内测毕全国1300个县、市城区实施地价税等问题。12日闭会。

△　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在《文化前锋》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政策。“六不”：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五要”：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表述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

△　参谋总长何应钦就日军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一周年纪念日，特致电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参谋总长马歇尔、英国陆相克利格、海相亚历山大等，表示与盟军一起打败日军。

△　日伪军2000余人对冀南大名西南进行为时一周的“扫荡”。

△　晨，日机18架由湘北起飞，经平江等地分两批窜衡阳，于9时许先后在衡阳机场附近投弹。同日，日机12架侵袭福建省建瓯，在西郊投弹31枚。

12月8日　　国民政府特任曾养甫为交通部长、贺耀组为重庆市长、张厉生为行政院秘书长。

△　行政院例会决议授予喜饶嘉措禅师封号，任命任建鹏为内政部警察总队总队长。

△　战时新闻检查局将全国划分为中央、西北、东南三区。中央区是日在渝召开工作检讨会，中宣部长张道藩，该局局长商震均出席并讲话。

△　北平燕京大学是日在成都举行复校仪式，代理校长梅贻宝于是日晚在成都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报告复校经过。

△　日军在北平举行“华北青少年团”成立大会，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及德、意法西斯国家代表等300多人出席。

△　晨，日机两批共28架侵扰桂林，在西南郊投弹多枚。同日，日机七架侵扰建瓯，在西郊投弹40余枚。

△　伪满洲国政府发表《基本国策大纲》，重申“举国人尽国力以图完遂圣战”。强调“准备日满共同防卫”、“确定国防国家体制”、“政府和协和会合成一体”、“行警一致”、“勤劳奉公”、“贯彻计划的统制经济之原则”，加强农产品“集货工作”，实行生活必需品之配给制度。总之，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更加强化法西斯统治。

△　是日为美国参战一周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

互函表示，中、荷、英、美联合作战彻底击溃暴日。

12月9日　第四次全国地政业务会议在重庆开幕。

△　中国财政学会举行第一次财政问题座谈会，讨论如何推行蒋介石手订的加强管制物价方案。

△　全国工业联合会开始筹备，由全国60家工厂联合备文送主管机关核准，推胡西园、张剑鸣为代表晋谒当局陈述一切。

△　上海《新闻报》驻渝记者顾执中等为上月26日该报遭日军封闭一事发表告国人及同业书，称：《新闻报》虽遭摧残，生命不能告终。13日，该报在渝同人为该报复刊问题举行会议，决议：一、成立上海《新闻报》复刊委员会；二、通告各界如有人利用该报机器、厂房等设备出版，概不承认。

△　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上作《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的报告，阐明领导各解放区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是共产党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一项重大决策。

△　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国际主义战士、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柯棣华患癫痫症在晋察冀边区逝世。12月29日，毛泽东为柯棣华大夫写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　晋西北赵城、和顺、辽县（左权县）、洪洞四县农民为反对"配给制度"举行武装起义，杀死以上四县伪县长和60余名日伪军。

△　日伪军分三路合击安徽朱家岗，新四军第二十六团击退日军10余次冲锋，毙伤日军280余人，收复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地。

12月10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开会，讨论蒋介石制订的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实施细则，以及机构问题、管制地区、限价对象与限价标准等问题。11日会议决定先选日用必需品限价（包括专卖物品）。

△　蒋介石在地政会议上致训词，略谓：要实现孙中山提倡的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这是民生主义土地政策之纲领。会议决定将农民银行作为土地金融专业机关，为农业服务。

△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办文化讲座，由朱家骅讲《如何迎头赶上西洋文化》。

△　英议会访华团一行自昆明乘机返国，行前对中国人民发表告别书。称此次访华，“吾人带来吾人所代表之英国议会及人民之友谊，而携回对于一英勇不屈之民族……之热烈回忆”与“伟大见闻。中国必胜”。并表示“来自吾人之一切可能援助，即将来临”。

△　日伪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日伪在华北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终告完结。由于八路军的英勇作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这些运动“既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也未达到作战的目的”。

12月上旬　　日伪军再次由泗县出动，打通泗县至宿迁公路，控制青阳、马公店、归仁集、老韩圩、金锁镇等要点，企图分割淮北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之企图，新四军第四师决心以主力一部首先拔除青阳外围敌据点，孤立青阳；尔后集中主力，攻取青阳。不料敌于10日先我行动，以1000余人兵分三路合击第九旅第二十六团于朱家岗（今江苏泗洪县北）。该团奋战终日，击退敌10余次冲击，歼敌280余人，迫敌撤退。

12月11日　　蒋介石接斯大林函，称中苏两国之坚强友谊必在战后奠定两国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世界永久和平。

△　地政会议通过《战后迅速完成全国地籍整理计划》等案，决定在明年内将后方各省县城及重要镇市地方共800余处，地籍整理业务全部办完，以便开征地价税。

△　教育部公布《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组织大纲》，凡九条，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华教育制片厂。李清悚任厂长。该厂专制16毫米教育片、幻灯片，编制教学方案，并与国外电化教育机关联络合作。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专员、县长联席会议，林伯渠主席作《明年政府工作方针》的报告，对目前形势与任务以及精简、经济建设、教育、财政、司法、保安、乡政、干部、“三三制”及拥军等政策作原则性的说明，着重指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干部教育。强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两项中心任务来做。会议于1943年1月16日结束。

△　国际联谊会是日在伦敦举行年会，中、美、英、捷、比、波等国代表200余人出席。中国政府派财政部次长郭秉文参加会议。该会旨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与友谊。大会选克罗斯菲德连任理事长。

12月12日　　国民政府决定明年实施役税法，规定凡18岁至45岁之国民皆有缴纳役税之义务，凡服兵役或工役者，可免一部或全部。

△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并提出稿费、版税改善办法：一、著译发表费每千字暂定最低额为30元；二、著译经审查后即送给发表费；三、如物价上涨，发表费须按照生活指数递增；四、著译出让版权之稿费，已发表者暂定最低额为每千字50元，未发表者最低额每千字为70元；五、著者经签定出版权让与契约后，即送给全部稿费；六、如物价上涨按比例提高。另关于版税、再版等均有详细规定。

△　重庆《大公报》讯：中华自然科学社将在美国发行《中国科学》双月刊，在国内发行《科学纪新》双月刊，介绍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　中共中央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提纲》，提出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6年至1938年，国民党重在组织上解决，即企图融化共产党；第二阶段是1938年至1942年，重在军事上解决，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第三阶段从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开始，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坏转的一面已渐减弱。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方针应是：一、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二、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中共必须准备克服行将到来的空前困难，一方面努力于敌后，坚持边区的建设，大后方的埋头苦干，沦陷区的隐蔽待机；另方面努力向国民党及各党派、各地方、各中间分子多提积极的建议。既要防止过分乐观情绪，又要纠正不相信可以争取好转的右倾悲观情绪。

△　据延安《解放日报》特讯：积极推行朱德屯田政策的模范——第三五九旅，今年种地1.18万亩。决定明年全旅扩大耕地面积3.9万亩。并发表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号召陕甘宁边区各军在驻地建设自己的“南泥湾”，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　新四军第九旅一部袭击淮北金锁镇，另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袭击归仁集；同时，第十一旅一部在骑兵团一部配合下，夺取马公店，并准备协同第九旅一部进攻青阳。敌慑于被歼，遂于17日撤出青阳、金锁镇等地。

△　日军在晋西北开始推行“新国民运动”，由伪山西省新民会统一领导，以“保民”、“养民”、“教民”为中心内容，是治安强化运动中“剿共”、“肃正思想”等内容的发展。为了推行这一运动，敌占区各县相继成立“新国民运动实施委员会”。

△　平西斋堂日濑野中队50余人，突然包围斋堂北10里之王家山（昌宛县属），村中青壮年已事先逃避，留村中老弱及小孩40多人，被驱至一屋，全部烧死。

12月13日　　重庆《中央日报》讯：蒋介石手令省、县党部今后工作任务：一、完成地方自治；二、训练甲级壮丁限三年内完成；三、推行总动员法令；四、健全县以下各级党部及训练基层党部干部。

△　中华基督教节约献金运动重庆分会举行宣传会议，由会长冯玉祥作报告。会议决定在渝附近组织劝募献金分队30个，从是月15日开始举行节约献金运动。在重庆设总会，各地设分会，由基督教徒组成，每三个月献金一次。

△　滇西日军屡图强渡曲石江，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　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主力及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六、第七旅团各一部，共一万余人，自是日起向青岛、烟台公路以西进行“扫荡”，对平度、招远、掖县、莱阳边区的山东军区第五旅进行合围。第五旅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主力部队及时转至敌占区打击敌人。在我内、外线部队打击下，敌被迫于12月底撤回原据点。

12月14日　　周恩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中共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总结1936年以来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提出好转中仍须注意两个事实：双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大距离；“局部压迫未放松”。但各种因素将使国民党继续改变其对中共的方针，“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促使其变”。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的是“争取好转，不忘防御”；“争取合作，不忘斗争”；“争取发展，不忘巩固”。

△　军事委员会决定撤销运输局，该局所属工作仍由军委会负责。

△　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三科科长史宗沂、财政部陕西省洛川县田赋管理处副处长李培厚，奉专员余正东之命，赴延安参观。

△　中华妇女节制会在重庆创办胜利托儿所，李德全、刘王立明等被选为董事，基金为100万元，地址在大田湾。

△　印度孟加拉省遭风灾，蒋介石夫妇捐款3750镑。

12月15日　　四川省军管区司令张群、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联合举行茶话会，邀请省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及新闻界负责人，宣传实施新兵役法的重要意义。

△　中美无线电传真正式开放。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办公室举行简单仪式，并将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

△　成都市公共汽车经数月筹备，又装备木炭车四辆，是日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站至西门车站。

12月16日　　蒋介石会见林彪和周恩来，张治中作陪。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谈到两党关系时，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对统一团结问题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还说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希望问题很快解决。他答应发给药品，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会见后，林彪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建议加以研究后给以指示。

△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认为这次蒋向林彪谈的两点，一是显然对军队数目、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有若干不同意见，一是对于党及边区的所谓政治团体要集中领导，语意含混，显然还未定出具体办

法。并提出：为推动局势好转，拟主动找张治中解决中共的合法地位、军队扩编数、边区行政区人员不动和目前适当调整作战区战后再重新划分四个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18日电复提出：一、在允许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四军12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战后北移，目前只作准备，李先念部实在无法调动，但东江曾生部在适当条件下目前即可加以调整。

△　国民政府任命陶百川为《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新任社长。总经理仍由詹文浒副社长兼任。袁业裕、钱仲易分任总、副总编辑。陶仍兼《中央周刊》社社长。

△　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举行第三届大会，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等60余人出席。主要讨论设置边政学院、明年西北边疆教育设施等问题，17日闭幕。

△　财政部专卖司司长朱偰对记者称：明年专卖事业已确定：一、火柴已列入限价物品；二、食糖以供应酒精原料，增加蔗糖生产，暂不限价；三、烟类专卖将在全国推广。

△　云南昭通县李燮阳捐资兴学11万元，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教育部授予一等奖状。

△　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在延安联合举行晚会，欢迎途经延安的晋察冀边区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党晋察冀党部领导人胡仁奎，林伯渠主席致欢迎词。

△　八路军一部在鲁中临沂开展政治攻势，至26日已进入敌占区104个村，直接宣传群众二万人、伪军400人，包围据点10处，救出被捕群众600人，逮捕汉奸、特务16名，并组织若干处抗日工作点。

△　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任远（刘杰）到冀东工作，并决定

将原冀东情报站改为“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对外称“冀东军分区联络部”）。主要任务是搜集伪满的战略政治情报，向东北派遣情报人员，建立情报组织。相继在路南及滦东建立三个分站，至日本投降时，情报站秘密人员已发展到锦州、北票、沈阳、四平、佳木斯、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城市。

△　日第十一军以第三师团主力及伪军共万余人分四路向大、小悟山分进突击，企图围歼新四军第五师。第五师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主力掩护机关分路向外线转移。于次日晨跳出重围，继而袭击夏店及平汉铁路、河汉公路沿线的日军据点。日军合围扑空，后方受袭，被迫撤退。至18日，第五师重返大、小悟山。是役共歼日伪军200余人。

12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限制物价办法》。同日蒋介石通电在全国实施限价办法，电文称：“特手订加强管制物价方案，以图标本兼治之计”，实施办法计七条，规定各重要市场物价、运价、工资，一律自1943年1月15日起实施限价，并以本年11月30日各该市场价格作评定标准，违反法令，擅自抬价，按军法惩处。

△　重庆《大公报》讯：财政部公布明年财政预算，其中各项税收数字均较本年度增加一倍或数倍。列入收入预算的第一位是田赋，其次为直接税，第三位是专卖，第四位为消费税、关税、统税等收入。总计为180亿元。

△　兵役署长程泽润谈明年兵役，对记者称：一、学生服兵役原则已定，对沦陷区学生予以免役。曾受过军训者，中学生减为一年零六个月，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减为一年；二、严禁冒名顶替，如被发现，处以极刑；三、兵役之终极目的在兵农合一。

△　中国新闻学会举行第二次理事会，赵敏恒、成舍我、曹谷冰、张万里、彭革陈、陈铭德等出席，由理事长萧同兹主持。通过：

一、聘沈善镐　、浦熙修、高集、张仁仲为调查组干事；二、聘陈振纲、李景芳、朱经冶、张步云等九人为服务组干事；三、决定成立工作服务队。

12月18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主要议题为：一、国际形势；二、农林部部长兼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报告农林及物价管制情况；三、决议设置经济动员策进会，会长由蒋介石担任，在重庆设立总会及秘书处，并在昆明、衡阳、西安、成都、万县设立办事处。

△　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太行军区干部会议上批评华北各地对地方武装忽视和吞并的行为，指出这是把游击战估计过低，把运动战估计过高所犯的错误。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举行生产节约大会，全师从1月至11月生产节约达800万元，山东根据地平均每人可减轻负担四元。师政委罗荣桓指出：10个月中帮助群众劳动46万个人工，仅滨海区开荒3200余亩，帮助群众开荒2300余亩；号召师直机关及鲁中、鲁南、滨海各兵团明年达到生产节约1000万元的任务。22日闭幕。

△　日第十一军司令官塚　田攻及高级军官九人，乘机自南京飞汉口，在安徽太湖县上空被驻守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一三八师高炮部队击中坠落，机上人员全部毙命。

△　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为基础的具体策略》。《策略》规定：第一，利用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府，下同）参战的机会，为确保其对日本在战争中的合作，和该政府缔结基本协定。第二，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包括加强财政、调整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交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处理在华敌产等。第三，在经济措施上，在占领区要重点地谋取重要的战略物资，并积极地获得敌方物资。要促进中国官民积

极的经济活动及对日合作，并以此帮助国民政府加强政治力量。

12月19日　　立法院例会通过决议，规定公务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经商。

△　四川省三十二年度（1943）各县、市地方预算经审定，计岁入岁出总额各为9.141279亿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60％。

△　暂编第四十八师为开展政权，进出洪洞、赵城，为此必须攻击位于洪、赵间之石家庄日军据点。是日，师长娄福生遴选30人为“活炸弹”，夜袭石家庄，敌40余人悉数就歼，并击溃庄外碉堡之敌，毙敌56人，我伤亡三名。

△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六分区第十九团袭入枣强东关，歼伪军100余人。

△　日军企图以重兵围歼第五战区部队，从是日开始，连陷商城、罗田、英山、广济、黄梅、桐城、潜山、太湖、宿松等县城，使鄂、豫、皖广大地区相继沦陷。

△　日军秘密开始对湖西地区实行“扫荡”。第十七师团一部进抵砀山以北及丰县、沛县一线；第三十二师团一部窜抵金乡；菏泽之敌进到单县，对八路军教导第四旅及湖西军区活动中心单县东北曹马集形成四面包围。第四旅与当地军民奋起反“扫荡”。

△　平西李家堡据点（斋堂西）伪军40余人，在队长王英、副队长刘文正率领下反正，携步枪30支、短枪七支。

△　汪精卫应召离南京赴日本，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及日顾问石渡、松井、寺冈等随行，次日抵东京。

△　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部公布《投资事业公债（第十次）发行规程》和《水力电气事业公债（第二次）发行规程》，决定各发行4000

万元，称为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次四厘公债，1952年全部偿还。

12月20日　　四川省主席张群主持四川省警察训练所第十三期警官班毕业典礼，并讲《现代警察应负的使命》。张氏勉励毕业警官各就本身岗位，努力加紧工作，向着民族复兴大道迈进。

△　重庆市社会局令饬重庆盐业、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同业公会，以上民生重要必需品一律以当年11月30日的价格为标准，重新议定价格，一星期内呈核，以作正式颁布之依据。

△　中国物理学会第十届年会改为分区举行。是日重庆物理学界人士举行年会，由总会前任会长李书华致词，宣读论文，讨论会务，决定成立物理学会重庆分会。

△　是日为回教忠孝节（古尔邦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特通电全国教胞贺节。在渝500多回教同胞集会庆贺。

△　“抗大”代理政委张际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情况，称“抗大”总校现有学员2800余人，教职人员2700余人。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共有公营工厂62家，有职工3500人。

△　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等部共一万余人分路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湖西区“拉网”前进。该地区八路军部队节节抗击由南向北压缩之敌，迟滞、破坏日军合击计划。至黄昏时，以一部兵力袭扰进占鱼台西北张庄之敌，主力即乘机于鱼台东南方向突出包围圈。战斗中，八路军伤亡300余人。此后，日伪军在该地挖沟、修堡、筑点。至1943年1月，共筑路挖沟达80余公里，建据点30余处，使湖西抗日根据地陷入敌人分割的“格子网”内。

△　日军强渡南累河，向滇境进犯。

△　驻暖儿河、东河口一带田中“讨伐”队140多人，长途奔袭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军区直属队长带队在黄花川河口设伏，田中当场被击毙，其余敌军被俘，缴获轻机枪三挺、长短枪125支。

12月21日　　蒋介石在联合纪念周致训词：一、各党、政、军部门总结一年来工作得失；二、明年施政工作应以完成复员准备工作为标准；三、各机关紧缩机构、裁减人员，务于短期内完成。

△　邮政总局长郭心崧辞职，交通部派副局长徐继庄接充。

△　私立北泉图书馆正在积极整理四川先贤著作，决定辑编两大丛书，一名“四川先哲遗著”，一名“四川掌故丛编”。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纺织工业，到目前为止，有公营工厂21个，布机380台，毯机32台，工人1083人；纺织合作社30个，布机167台，毯机12台，工人385人。全边区推广家庭纺织，有土机纺车共八万架，从业者达九万人。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共有公营工厂62个，职工3500人。

△　日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规定：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府，下同）参战，是打破中日战争现状的一大转机，为促使其对英、美宣战，应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政府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汪精卫政权一起为完成战争而迈进。在美、英的反攻达到高潮前，要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

12月22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自1943年1月1日起，在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等省及皖南地区施行。

△　行政院例会，蒋介石作明年施政方针指示，并通过以下决议：一、裁撤物资局，成立农本局，定为国营事业，以消除平价之内

在矛盾；二、明令褒扬故川滇滇越铁路线区司令兼中国远征军随军铁路特派员沈昌；三、简派端木恺为国家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

△　中印缅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中将以“立功勋章”授予美驻华空军司令陈纳德少将。

△　法学博士陈耀东应中法比瑞文化协会邀请，讲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问题，称对华不平等条约如不彻底废除，则世界新秩序难达圆满境地。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第一一五师后勤生产节约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要求各部队在1943年克服更困难的一段艰苦路程，更多地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山东全军争取生产节约1000万元，同时要严格开展反贪污的斗争。

△　汪精卫拜见日天皇，并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关于协助日本完成战争问题，已与日本政府“披沥诚意，荷蒙同感，各种协力问题，意见一致”。

△　林柏生在东京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为与日本分担完成战争的责任，“国民政府”在政治上，首先是要把握民心，并予以严格的组织与训练；其次是加强政治机构，增进行政效率。在军事上，建军与整编军队并重，加强军队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在财政经济上，统一币制，加强物资调剂与管理，并力求生产力的增进。

12月23日　国民政府明令追赠故员王凤山为陆军中将。

△　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成立。蒋介石兼会长，常务会员有孔庚、褚辅成、李中襄、王云五、陈博生、黄炎培、董必武、许德珩、杭立武、陶百川等37人。驻会常务会员为：冷遹、黄炎培、邓飞黄。主要任务是考察物价、限价、工资，及各种生产情况，调查走私和运输情况等。

△　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对记者称：明年决定加强金融管制：一、明年在后方十四个大城市设立银行监理官；二、明年在成都实行票据交换业务，然后向各大城市推广。

△　交通银行举办特约实业存款，该项存款将投放国防及民生实业，无论盈亏，均由该行保本保息八厘，每年结算投资所得纯益，扣除保息，其余按60％分配给存户。

△　重庆《大公报》讯：中华农学会为鼓励优秀青年学习农业，经第二次理事会决议，自明年起设置下列奖学金：农业研究生奖助金12名，每人每月奖助200元至300元；专科以上学生100名，每人每年400元。

△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内称：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新时期的到来。

△　鄂东黄土岭、罗田战斗，第三十九军刘和鼎率第五十六师及第十六、第十七纵队与日第三师团激战。

△　汪精卫及其一行出席日本首相东条的欢迎宴会。东条致词，称赞汪精卫对日本的全面协力。汪致答词，表示今后要竭尽全部的心力和物力，替日本分担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责任。

△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的在校学生每年参加为期30天至45天的“勤劳奉公”，如有不服役者不予毕业。

12月24日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在重庆进行谈判。中共代表提出四点意见：一、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以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二、八路军扩编为四个军

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依现有区域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政府；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四、中共军队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目前只能作准备工作，如情况许可时（如反攻），可磋商移动。并声明，如此四项可以谈，林即留此继续谈，倘相距太远，就请蒋介石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答应将四点报蒋。30日，张电话通知周恩来，他们已开过会，认为条件相距甚远，未作决定。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作宾逝世。2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开幕，计有大小陈列室20余间，展示作品3000余件。其中书法33件，国画184件，西画57件，雕塑32件。除此之外，还有瓷器、刺绣、蜡染、摄影、图案、建筑制图等。参加陪展的，有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说文月刊社、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均有作品参展。展期半月，累计观众14万人次。这次展览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作品最多的一次美展。

△　鄂东麻城、黄土岗战斗，暂编第五十一师林茂华与日军第三师团激战。

△　皖南潜山、太湖战斗，第四十八军苏祖馨率第一三八师李英、第一七六师李本一等部与日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激战。潜山、太湖数度易手，至1943年1月11日，第四十八军收复上述两地，伤毙日军近3000人。

△　卢森堡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12月25日　　蒋介石举行茶会招待盟邦军官，庆祝耶稣圣诞节，并祝联合国家胜利。

△　重庆国民兵团举行大检阅，国民兵团团长唐毅任司令官。蒋介石特派参谋总长何应钦为总检阅官。全市3.3万人列队参加，市长贺耀组，卫戍司令贺国光，兵役署长程泽润参加检阅。

△　国民党中宣部举行茶会，招待中外记者，主要由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讲述英国议会访问团访华之意义，称此次英议会访问团来华，对于中英谅解及合作之促进，贡献极大。

△　中国滑翔总会在重庆举行百架滑翔机命名典礼，同时举行滑翔机展览。

△　中国社会服务事业协进会举行成立周年大会。各团体展览会亦在社会服务处开幕。

△　日机80余架分三批由缅甸侵入滇境。第一批17架于3时20分在云南驿投弹六枚。第二、三批共70余架窜入怒江沿线及蒙化一带盘旋，经我高射炮猛击，其中八架重轰炸机被击落。

△　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广播讲话《告日本国民》，表示决心与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

△　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部公布《第二十七次四厘公债发行规则》，决定发行公债1.5亿元，10年后全数偿还。

12月26日　　蒋介石谒见林森主席，报告废除不平等条约与缔结新约交涉经过。

△　重庆《大公报》讯：内政部长周钟岳谈明年工作要点：一、新县制实施要完成；二、户口调查与推行身份证；三、警政要扩大充实；四、禁政要严厉执行。

△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第三届理、监事改选，选出理事田汉、洪深、阳翰笙、熊佛西等31人，候补理事夏衍等15人，监事赵

丹、郑君里等10人，候补监事常任侠等五人。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命令，自1943年1月1日起，每人每天增发食油两钱，每月增发津贴费五角，每年发洗脸毛巾两条。

△　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太行文化界人士杨秀峰、邢肇棠、杨献珍、罗青、王振华、徐懋庸、陈克寒等16人发表的宣言，抗议日军杀害辅仁大学教授陈赓甫等三人的暴行，呼吁敌占区知识界、文化界人士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　据中央社讯：豫省政府决定在洛阳、灵宝、广武等五地设立粥厂，于明年元旦开始对灾民施粥。

△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军事会议，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上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任务"，今后"除对重庆国民党军队加大压力外"，要在伪军的配合下，剿灭华北的共产党军队。

△　日机犯滇，被空军击落多架。

12月27日　　蒋介石核准国民党中央拟订的《扶助朝鲜复国运动》，确定"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方针，并将援朝政策的重点从扶助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转移到强化朝鲜复国力量，争取实现战后朝鲜独立，并扶助韩国临时政府成为朝鲜独立后的正统政府。

△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曹力如为新划延属分区专署专员、李景林为副专员兼延安市市长。

△　汪精卫及其一行离日回国抵南京。汪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关于应付时局的办法，经过和日本政府多次会谈，双方意见融洽，对于加强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府）及协助大东亚战争有进一

步发展。

12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派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四川大学校长由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继任。

△　蒋介石以密电告美总统罗斯福，反攻全缅事中国应用之军队皆已就绪，惟英不能践其诺言。

△　国民政府派于峻吉兼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中国助理理事。

△　杜月笙创办之陕西冶铁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安成立，杜为董事长，唐继之为总经理。新华电冶公司、新华储蓄银行、陕西企业公司、雍兴公司、兴中公司、大华纱厂、申新纱厂参加。

△　四川省农会在成都成立。周遂初为主任委员。

△　晨5时，日机三架侵入鄂省老河口，在城内投弹，天主堂医院全被炸毁。

△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康德10年（1943）度岁出岁入总预算各为10.55亿元，比康德九年（1942）度预算增加2.316亿元，增加28%强。

12月29日　　行政院例会决议：一、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山西省立山西大学改为国立，并将国立东南联合大学归并国立英士大学；二、任命张洪沅为国立重庆大学校长。

△　“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成立。该社主要是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续由香港、上海撤到重庆的戏剧、电影工作者组成。主要负责人有于伶、金山、宋之的、司徒慧敏等。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凡六章37条。该条例根据团结抗日的原则，调整租佃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加强抗

日力量，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规定：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农民的私有土地制；在未经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债主的债权，政府对东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调整。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加强对工商合作事业的领导，决定由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兼任实业社经理。当月，边区工商局召开各县局长、商店经理联席会议，确定“开展合作运动，发展生产”为1943年工商业的总方针。

△　午，日机五架侵入广东肇庆，在市区投弹30余枚。

12月30日　　蒋介石接见外交部长宋子文，听取关于英国对九龙问题之意见。

△　《大公报》讯：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发行土地债券一亿元，分百元、五百元、千元、五千元四种，限期15年。

△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袁任远为绥德专署专员，杨和亭为副专员；张中良为关中专署专员；马锡五为陇东专署专员，朱敏为副专员。

△　第三战区部队克复皖西太湖。

12月31日　国民政府明令抗战殉职将领入祀全国忠烈祠。

△　四川省1943年度概算编竣，总数约五亿元以上，不足之数，将向中央请求补助。各县概算约较1942年度增加十分之六。

△　《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延期六个月。

△　鄂皖边境英山陷落。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殷同病死。

12月下旬　　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在九龙地区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决定立即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教育，提高对国民党顽固派本质的认识。从1943年开始，对日伪军展开广泛袭击。

是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　中共中央南方局电广东军政委员会，指示成立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亦称临委），以林平为书记，连贯、梁广为委员。林平负责全面兼军事工作，梁广负责城市工作，主要管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的工作；连贯负责国统区党组织联络和华侨统战工作。临委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广东全省城乡抗日斗争以及各项工作。

△　晋西北人民武装扩大到19万人，其中自卫队16万人，民兵三万余人。是年，地方武装配合主力军或单独作战387次，毙伤日伪军580余人，俘虏伪军政人员80余人，破坏桥梁三座，割电话线140余里，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　北岳区反“蚕食”斗争获得重大胜利，三个月来（9至12月）共作战593次，毙、伤、俘日伪军4290余人，攻克据点三处，摧毁碉堡113座，平沟破路118里，基本上阻止了敌之“蚕食”，冲破了敌之沟墙封锁。各地武工队还深入敌后开展工作，到年底共恢复或开辟了1650个村庄。

△　淮海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交通破袭战，使纵横全区的公路大部被破坏，无法通车，并拔除了宋圩、姜圩、钱圩、孟头圩、小金庄、永兴庄等伪军据点，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政策。

△　至是月底，晋察冀边区范围驻有九万余日军、11万伪军，共

修建据点、碉堡3358处，筑成公路2.6942万里，挖掘封锁沟7884里，砌封锁墙896里，冀中、冀东、平西、平北都变为游击根据地，北岳区的巩固根据地也缩小三分之一以上。边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缩减为8.3万余人，民兵仅有40余万人。

△　美空运总部印中联队（后改为师）成立，负责驼峰空运，直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据统计，在此期间共输运军援物资65万吨，总价值1.5亿美元。

是年　本年度国家总预算及追加数岁入岁出各为338.178067785亿元。

△　本年度国库收入总额为273.0073571156亿元；支出263.6298194113亿元。

△　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称：自抗战以来，物价逐渐上涨，就重庆趸售物价指数以1937年为基数，至是年涨至78倍。1942年4月以前物价较稳定，平均每月涨率为1％左右，6月份为20％。7月底为止，重庆趸售物价指数较战前为130倍，零售物价指数较战前为115倍。

△　国民政府是年发行粮食库券1278万石。

△　自本年起，川省预算编入国家预算（由原来的国、省、县三级财政改为国家财政、县自治财政两级），地方主要收入划归中央接管。

△　中、中、交、农四行在四川设立之总、分、支行，已增至153所，较战前增加三倍，资本总额占全川银行56％以上。

△　据经济部统计，国统区共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6万余人。与战前情况相比，工厂数增加16倍，工人人数增加六倍。重庆一地产业工人达九万余，非产业工人达10万，是国统区战时工业和工人

最集中的城市。

△　据经济部统计，迄至1942年底，全川合于工厂法标准的厂矿已由1937年的115家增至1654家（包括官办165家），占国统区厂家总数的44.01％。工业资本总额由战前214.5万元增至11.3012亿元（其中官营资本7.11337亿元，占63％），占国统区工业资本总额的52.28％。拥有动力设备达6.2208万匹马力，占国统区总数的43.22％。工人人数由战前的1.3万人增至15.44万人，增加10倍以上。

△　迄至今年12月，法币发行总额为344亿元，发行指数为2442％，较之上年增加126.9％；同期，重庆趸售物价指数为7776％，较战前增长184.1％，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1.28％。

△　陕甘宁边区开荒45万亩，完成计划90％，收获粮食168万余石。国营工厂发展到62个，食盐年产销达20余万驮，生产布10万尺。纸、肥皂、粉笔、精盐、牙粉均能自给。

△　晋察冀民兵开展地雷战，从4月至10月共1390余次，毙伤日伪官兵626人，俘147人，炸毁碉堡47座，毁汽车40辆，破路平沟330余里，割电线2.8万斤，缴枪29支。

△　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林平致电中共中央并周恩来，报告东江和珠江三角洲两区近两年内在粉碎日伪扫荡、击退顽军进攻、反对政治压迫、克服经济封锁、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发展人民武装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以及今后的工作部署。今后主要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改进领导方法；加强党务工作，组织“三风”（即党风、学风、文风）学习；加强主力部队建设，发展民众武装；克服“左”的指导思想，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多交朋友；加强对敌、伪、顽方面的工作布置，粉碎他们的阴谋进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经济上的困难。

△　山东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扫荡”和“蚕食”大部被分割，面积缩为2.5万平方公里，人口降为730万。但武装力量却得到保存，民兵达17万人，自卫团有82万人。

△　是年冬，日军集中一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步兵、坦克、空军联合行动，在海南岛由东到西，由北到南，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反复“扫荡”。琼崖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冯白驹领导下，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终于粉碎敌扑灭琼崖抗日武装的图谋。

△　日本在华北地区经营的工厂为653家，资本为114.3013万元。中日合办工厂为197家，资本为43.4582万元。

△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本年发行货币总额为17.28亿元，比1941年增加4.11亿元，相当于1932年至1938年七年的发行额。

△　山西大面积受灾。日伪占领区阳曲、汾阳、汾城、河津、静乐等45县遭水灾，岚县、介休、长治、浮山、神池等18县遭旱灾，中阳、五寨等八县遭雹灾，太谷、平遥等八县遭虫灾。国民党统治区也大面积受灾。太岳、太行两根据地大部地区久旱无雨，春旱夏旱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

第十卷
(1943—1944)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卷

(1943—1944)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返回总目录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1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举行元旦团拜会，林森致词称：“当务之急在彻底打击敌人，争取最后胜利。而加强管制物资，平定物价尤为重要，列为本年度中心工作。”

△　蒋介石拨款600余万元，派员慰勉荣誉军人，官佐每名100元，士兵每名50元。同日，并训示高中以上学校军训学生“恪守纪律、服从命令，诚恳听受管制”。

△　何应钦宴请在重庆的盟国军官，“期望加强合作，今年击溃公敌暴日”。

△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举行新年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毛泽东讲话，指出1943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和学习。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献词》，强调陕甘宁边区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　周恩来、董必武、林彪、邓颖超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沈钧儒、张申府、刘清扬等，并为沈钧儒祝寿。

△　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发表《告司法界同仁书》称：“由于英

美宣告撤废在华特权，我整个法权乃复完好如初”，“这是我司法史上近百年来的一个新纪元。”同日，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部长仍为谢冠生。

△ 《现代妇女》在重庆创刊，主编曹孟君，编委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 川康公路正式通车。

△ 日伪军集中苏中各地武装3000多人，对驻东台县西的江苏保安第三旅张星炳部、泰县以北的鲁苏皖边区总指挥李明扬部、税警团陈泰运部发动“扫荡”。五天之内，张星炳部被歼两个支队，陈泰运部被歼三个支队，数百人被俘。

△ 日机12架袭江西赣县，其中九架在市区滥掷燃烧弹，三架在儿童新村低飞扫射，市区多处起火，《正气日报》社全部被毁。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行支部为向日本广大士兵随时报道真实消息，将原出版之机关杂志《反战》改为日文《同胞新闻》。

△ 日方在上海严格限制米粮入口，居民凭证购米，米价昂贵，贫民饿死日有所闻。是日街头发现饿毙尸体达300余具。

△ 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今年新国民运动之要点》，声称要积极实行《新国民运动纲要》，并把努力的目标集中于协力大东亚战争，与友邦“同安共危”，“同生共死”。

1月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方靖为暂编第九军军长。

△ 国民政府派端木恺为国家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

△ 大别山战事吃紧，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失陷。日军进攻立煌城途中，在青山乡茅坪村抓到村民、旅客多人，用刺刀一一捅死。日军

进入立煌城后，亦大肆焚杀，民众死伤多人。4日，陷桐城。5日，陷商城、固市。

△　豫南西路口、新店、商城战斗，第八十四军张光伟率第一七四师牛秉鑫部、第一八九师张文鸿部与日军第三师团激战，战斗持续六日。

△　日机30架空袭福建，在永安城郊投弹150余枚，毁屋百余栋，死伤20余人。

△　罗斯福总统复电劝告蒋介石不要轻率退出缅甸作战，应收复缅北以开辟陆上交通，并不必依赖英国在缅甸南部的行动。8日，蒋介石再电罗斯福，坚持英国必须在南缅投入行动，否则中国在缅北将冒很大风险，万一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

1月3日　　中国科学总社在重庆召开社友会讨论社务，到竺可桢、曾昭抡、严济慈等30余人。

△　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在鄂南、赣北加紧“进剿”新四军李先念等部，是日密电部下以主力猛攻新四军，旋又于4日、7日、8日、11日、12日、13日、17日连续密电所部“以全力积极行动索匪主力攻剿”。

△　美国务院发表题为《和平与战争》的白皮书，记述1931年至1941年间美国的对外政策。该书多章涉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美国对日、对华政策。其中第14章详细披露1941年美日谈判情况，在首次谈判中，日方提出全面解决之提议有关中国部分：一、美国担任请求蒋介石政权与日本谈判和平；二、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政权；三、阐明日本对华态度，包括睦邻、不吞并土地、无赔款、“满洲国”独立及互相尊重彼此领土主权等原则；四、承允日方将依照中日所签订之协定自中国撤退其军队；五、规定联合防御共产主义，承认日本有权驻扎军队于中国之领土。

1月4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举行欢迎会，招待敌占区青年参观团。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伍胜参加。邓小平在回答参观团提出的问题时指出："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团结，国际和平和人民的意向将决定中国内部的和平，国共两党要互助互让，求得更亲密的团结。"

△　豫南潢川、光山战斗。第七军张淦率第一四三师黄樵松、第一七三师栗廷勋等部与日军第三师团在潢川、光山激战。第七军退守罗山、信阳。

△　日机空袭韶关，死19人，伤数十人。翌日中午，日机24架又来轰炸，韶关五里亭、十里亭、志锐中学以及市中心区，落弹似雨，四处起火燃烧，尤以黄田坝受害最巨，计炸死74人，炸伤300余人，毁房屋2000余间，市内精华损失及半，为抗战以来最大浩劫。李汉魂即日视察灾区并召开善后会议，电请中央拨给法币200万元以资赈济。

△　日机21架空袭广西，在桂林西南郊投弹百余枚。

△　美中国学会宣布：纽约中国留学生于是日、11日、18日及25日举行圆桌会议，研究战后太平洋秩序问题。会议由武汉大学教授周鲠生及中国新闻社社长夏晋麟主持。

1月5日　　南非联邦、美国、澳洲、比利时、加拿大、中国、捷克、英国、苏联、希腊、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18国在伦敦联合发表宣言，声明同盟国决心反对和打击轴心国掠夺暴行，对轴心国在占领区掠夺之资产，保留宣告无效之权，并负赔偿责任。

△　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在重庆招待外籍记者，列举中外领导人的新年讲话称：这些讲话可以归纳为两个重要点，一是加紧打击共同敌人使其早日溃败，一是着手战后之和平问题。

△　行政院抄发修正本年度推行储蓄业务计划纲要，规定本年度储蓄总额增至80亿元，其中“劝募方面”55亿元，“强制方面”25亿元。

△　重庆各学术团体举行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朱家骅以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身份发表讲话，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讲《从苹果到月亮》，英人瓦德逊讲《牛顿之生平》，严济慈教授讲《牛顿与光学》。

△　延安科学界集会纪念牛顿诞辰三百周年，徐特立演讲《我们对牛顿应有之认识》。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电令王陵基部进攻鄂南新四军，14日再电称：“查鄂南剿匪各部队作战不力，成绩毫无，希严厉令饬务必迅速索匪主力剿灭，以限肃清。”

△　日军对山东开始春季大“扫荡”，是日起，6000余日伪向莱芜、新太之间的新甫山区进行“蚕食”。

1月6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楚瀛为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侯镜如为第九十二军军长，杨勃为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李棠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视察员陈瀚致电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报告福建龙漳师管区卖放新兵、贩卖鸦片、枪杀壮丁、受贿换丁等情严重，要求严令制止。

△　安徽广德产销税所所长胡孟伯在任内侵吞税款九万余元，经皖南行署逮捕，是日执行枪决。

△　日军在安徽岳西柳畈等村杀害村民21人，伤残15人，奸污妇女六人，烧毁房屋150余间。

△　山西临汾、洪洞一带日军猛攻洪洞西北光棍岭不逞，忿而大

量施放毒气，适风向逆转，日军中毒者数百名。同日，日机五架轰炸我军阵地，炸弹误落日军阵内，炸死日军百余名。

△　鹤岗煤矿南岗三坑瓦斯爆炸，日方强行封闭坑口，致使96名矿工丧生。

△　美第七十八届国会开幕。7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将增加对华物资援助，称在滇缅路被切断的今天，我们决心克服一切不可克复的障碍，将作战装备运往中国，以增强粉碎我们共同敌人的力量。

1月7日　　《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国必须收复台湾》，指出："美国《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合草的《太平洋关系备忘录》的第四章，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列入台湾，划为国际共管，把台湾看作单纯的日本的殖民地，忘记它的历史。"24日，中央社电称：闽粤台湾归胞协会在福州致电国民政府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要求明令宣布台湾为中国沦陷区。

△　旅居重庆的台湾同胞集会商议台湾光复问题，讨论要点为：一、加强台湾国民党党务工作；二、台湾划省之筹备事宜；三、台湾义勇队改建正式军队等。

△　重庆市第三区火柴工业同业工会呈报财政部，揭露川康火柴专卖公司垄断火柴业、摧残厂商事称：自去年5月1日火柴施行专卖以来，各厂停工约计四个月，减产7000箱以上，专卖机关收购价格过低，造成各厂存货堆积，消化不良，借款维持亦已穷尽，纷纷停工坐待倒闭。吁请彻查改善，以救工业，而解厂商倒悬。

△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发表谈话，号召边区人民拥护边区政府新颁布的租佃条例，认真减租，尊重农民佃权；减租之后依法交租，尊重地主地权，以发展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　第一战区一部收复豫南固始。

△　日驻汪伪大使重光葵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要求汪政府提前对英、美宣战，汪表示定1月9日实行宣战。

△　美国务院派遣来华的会计、统计专家赖满抵重庆，受聘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顾问。

1月8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例会，听取外交部关于外交工作的书面报告，财政部长俞鸿钧关于财政设施状况及本年度施政方针与预算编制情形的报告。

△　第七军收复大别山区立煌、商城。

△　台湾总督府宣布本年度预算5.142亿日元。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发表声明，宣布华北即日起全面开展“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集中华北总力于完成大东亚战争，并特别注意实现治安强化，努力增产和革新生活。

△　抚顺老虎台矿瓦斯爆炸，死伤数十人。

1月9日　　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晤谈。张治中转达国民党方面意见，认为中共去年12月18日所提四项与国民党中央及何、白1940年10月“皓电”要求相距甚远，解决问题须根据“皓电”提示精神，正式谈判须由何、白主持；关于承认中共合法和边区政府无问题，第十八集团军人太多不行，并且必须遵照“皓电”限期开动。周恩来、林彪表示须请示延安。次日，周、林致电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办法，并提出具体谈判意见。

△　军事委员会任命盛世才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佟毅为第五十军军长、吴鹤云为副军长，岳新明为第二十一军副军长，赵恭为第三十四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龙纯曾经募忠义献机捐款100余万元、董澄农捐款20万元、杨文炳捐款10万元，并各颁给金质奖章一枚。

△　重庆中苏文化协会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祝贺苏联名作家托尔斯泰六十寿辰及绥拉菲莫维奇八十诞辰。

△　平西八路军在永定河北之大村，伏击由隍村出犯之小股日军，将其大部歼灭，俘日军四名、伪军二名，八路军伤亡六人。

△　日机再袭韶关，投弹32枚，志锐中学学生宿舍半数被毁。同日，梧州市亦遭空袭。

△　南京汪伪政府发布《宣战公告》，宣布“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同日，日、汪联合发表《日华共同宣言》，宣称日、汪“为完成对美国及英国的共同战争，将以坚定的决心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完全的合作”。

△　日、汪缔结《归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声明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公共租界，并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开始。

△　日政府、伪满政府发表声明，对汪伪与英、美“宣战”表示支持。10日，日本《东京每日新闻》称：“国府参战之实质”乃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其任务“完全在于加重经济的物质的方面”的负担。日同盟社称：“增强生产力，借以增大大东亚战争之战力，乃战斗国府之最大任务。”

△　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设立最高国防会议，“凡关于战事上一切事物，均由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施行”。

△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向美全国播讲战后远东问题，一致主张日本必须从中国撤退，东北必须归还中国。

1月10日　　军事委员会在赣北召开东南各省军需会议，19日结束。

△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杰为第六军军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布《关于1943年敌伪军工作的新方向》及《关于敌伪军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决定》的训令。

△　第八十四军克复豫南潢川。

△　中国空军袭击襄河以西日军荆门机场，毁日机八架，同时毁坏机场燃料库、弹药器材库及其他军事设施。

△　苏联大使潘友新返国述职后回到重庆。17日，蒋介石接见潘友新。19日，潘友新招待国民政府要员及驻渝外交使团等。

△　延安地质学会召开会议，由武衡、汪鹏报告绥德煤炭蕴藏及延长石油生产情形，继讨论本年度工作计划，决定组织两次考察团，研究延安煤炭分布及延安附近地质构造并赴神府调查煤矿。

△　日伪军到天津李庄骚扰，村中大刀队击毙日军二人，日军进行报复，屠杀大刀队员及群众近30人，并烧毁民房多间。

1月11日　　中英、中美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正式宣布英、美废除在华特权。

△　蒋介石分电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对中英、中美新约签订表示感谢。外交部长宋子文亦同时电美国务卿赫尔、英外相艾登致贺。

△　教育部长陈立夫在重庆国民政府中枢纪念周报告教育设施近况，说明全国现有中学生64万人，高中生11万余人；大学生五万余

人，教员最缺者为国文、数学两门。全国高等工程师仅二万余人，50岁以下的文盲约1.7亿人，占38％。他说：抗战以来“教育事业不仅维持旧观，且较前更多进展”。战区学生每年救济金8000万元，教职员及家属救济费去年达1.6亿余元，“国民教育之蓬勃发展为年来极大收获”。

△　军委会新闻检查局在江西泰和召开东南区新闻检查会议，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六省新检人员代表参加，13日结束，通过议案24件。

△　国民政府决定是日至16日为全国限价宣传周。主管当局责成各省、市、县组织宣传队，讲解管制物价之要义与方法。

△　江西省经济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15日起开始检查，凡囤积居奇以及违反工、商、矿管理规程者将予惩处。与此前后，浙江、甘肃、河南、贵州等省均讨论实施物价管制问题。

△　日本运粮船60艘在日舰七艘护送下，在吴淞口近百里之海面遇盟国潜艇袭击，运粮船及日舰五艘全部炸沉。

△　英、苏、中驻美大使与美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商谈战后建设及赈济等问题。

△　上海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公布限制粮食运输办法，规定：非经日军许可，所有市区内的食米、麦类、玉米、豆类、小米等粮食及其制成品，不论数量多寡，一律不准由清乡地区搬出，亦不得运入本市封锁线内。翌日，伪上海市政府发布布告，规定13日起，实行上述粮食统制新办法。

△　丘吉尔首相复函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略谓：“余信今日所签订之条约，将给予全世界一种楷模，使此基于大西洋宪章原则之国际关系，可以引用于一切有关系国家获得相互之利益。”

△　美国产业职工会与公共救济事业基金委员会援助中国16.6万美元，帮助沦陷区工人内迁。该计划由中国劳动协会实行。

1月12日　国民政府为中英、中美签订平等新约昭告全国“淬励奋发，自强不息，冀毋负友邦密切合作之期许”。晚，蒋介石对全国发表广播演说称：中英、中美新约的签订“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的最重要的一页，亦是英美各友邦为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是英、美政府“最光明最正大的举动”。

△　宋子文为中英、中美签订新约在重庆招待外籍记者，对美国务卿赫尔及英外相艾登备致推崇，“两友邦有如此之政治家主持外交，战后新世界之缔造，必非不可能之工作也”。

△　中国空军侦察长江一带，在宜昌东南击落日机一架。

△　甘肃省政府致电重庆赈济委员会，报告该省水、旱、风、雹灾情严重，去岁以来受灾达57个县，占全省80％以上，请求赈济。

△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工程处技术科科长为美军事代表团汽车撞伤，美军官“仗势行强”，不仅不予治伤，反以手枪威逼。14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工程处处长庞国钧呈文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要求依法交涉。

1月13日　蒋介石电复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批准其上年底针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武装呈报之惠（阳）淡（水）守备区第三期“清剿”计划。

△　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严禁粮食资敌》通令，规定紧急办法三项。

△　横贯东西两半球、飞越美、非、亚三洲、直航六万华里之中国空军健将衣复恩，由洛杉矶返华飞行成功，安抵成都。同来者有外

籍副驾驶员、通讯士、机械士各一人。

△　日军在浙江磐安烧毁县粮仓一座，毁粮三万余石，烧毁民房九间，烧死女孩一人。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改组行政机构，决定将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改隶政府，铨叙部改隶行政院，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为社会福利部，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食部；撤销边疆委员会，在内政部设边疆局；撤销侨务委员会，于外交部设侨务局；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改设建设部；行政院秘书处参事厅与法制局合并为秘书厅。每部改设次长一人，辅佐部长处理部务。增补陈济成、岑德广为国民政府委员，任陈君慧为建设部长，顾宝衡为粮食部长，丁默邨为社会福利部长。

1月14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就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发表谈话称：此乃平等第一步之实现，“吾人所不可须臾忘者，即争得国际平等地位而外，尚应竭尽吾人之力量促使国内政治及经济平等之早日实现”。又称：“吾人于兴奋之余，不能忘记苏联为自动放弃不平等条约之第一人，对于美、英、苏三大同盟国家，吾人应求深切之认识，彻底之了解，而不宜存有若何之误会。”

△　张治中约见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放弃军队，为周恩来拒绝。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和鼎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　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就实施限价问题对重庆市商会全体理、监事发表谈话称：“限价办法系国家当前经济最重要政策，既经照令施行，纵有吃亏，亦必须忍受。此犹如前线作战时，一部分任左翼，一部分任右翼，不论左翼或右翼，明知不利亦必遵令勇往向前，经济作战之情形亦具是。”

△　重庆市商会、工会及各业同业公会百余团体通电全国拥护限价政策。

△　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联总处理事会议通过《农贷准则》，规定贷款利率月息九厘至1.5分不等。2月4日，复修正通过《农贷办法纲要》，凡13条，规定“各省农贷由中国农民银行与各省订立农贷协议书为办理各省农贷之依据”。

△　白崇禧、冯玉祥、太虚、于斌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日在重庆中国佛学会举行发起人谈话会，商讨筹备事宜。

△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此次会议自上年10月19日起至是日结束，历时88天，参加会议县团级以上干部300余人。会议研究和解决边区党的历史教训、统一领导与当前任务等三个重大问题，并对近年来领导边区经济建设成绩卓著者王震等22人予以奖励。

△　史迪威出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着手重开陆上供应线。

△　日军攻占云南打洛地区。随后又于26日兵分三路进犯滇西边境：一路在蛮板、大猛之线，一路沿滇缅路，一路在腾冲之线。滇缅边战事激烈。

△　由名艺人唐槐秋、唐若青父女率领的有八年历史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平、津演出期间，为日宪兵扣押。是日，唐若青被毒打致死。

△　南京新亚舞场发生定时炸弹爆炸事件，死四人，日伪当局悬赏一万元缉捕置弹人。

△　伪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伪六届五中全会。汪精卫讲话称：此次决定参战是“自由的决定”；参战后日本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并非一种交换条件，而为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之精神”。次日闭幕，发表宣言称：“参加大东亚战争，实为当然之步骤，亦即最后之决心。”鼓吹“牺牲一切，以贡献于大东亚战争”。又称：“重庆之少数分子执迷不

悟，但其大多数处在徘徊观望之道路……将我们树立和平，东亚共荣的模范给他们看，使其更加信仰我们，这样其内部不久即可翻然悔悟。促进全面和平之希望亦在于此。”

△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23日结束。会议就中国抗战问题制定“安纳吉姆”计划（打破日本对中国封锁需采取的军事行动——收复缅甸作战计划的代号）。计划决定“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于1943年夏季作出进攻的决定，不得晚于7月”，行动日期定为11月15日。会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向蒋介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通报会议情况并谋求支持。

1月15日　国民政府宣布即日开始实行全面限价，要求全国各重要城市一律实施。限价以1942年11月30日各地原有之价格为标准，对于粮食、盐、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物品做到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同一物品只有一个价格。四川、云南、甘肃、河南、绥远等省主席纷电国民政府表示拥护。

△　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社论《物价从此稳定》。次日，该报报道：限价首日情形“异常良好”，“商人明大义遵限价售物”，“衡阳、昆明物价开始下跌”。

△　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部分团员由副团长顾耀秋率领返回重庆，团长林继庸等仍留西北考察。

△　国民政府特任傅秉常为驻苏大使，原驻苏大使邵力子辞职照准。

△　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与川西区办事处，分别在西安、成都成立。西北区办事处主任马毅，副主任刘景健、李芝亭，川西区办事处主任李璜。

△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联合发布《调整

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等四种法规。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

△　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开幕，历时七日，到会参议员288人，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地主士绅、科学技术专家及少数民族代表等。大会讨论并批准边区政府五年来工作报告，通过中共北方分局提出的施政纲领，以及边区政府组织法、参议会组织法、租佃债息条例、统一累进税则等法令多项。选举成仿吾、王力为参议会正、副议长；聂荣臻、宋劭文、吕正操、张苏、王承周、刘奠基、胡仁奎、刘皑风、王斐然为边区政府委员，组成边区政府，宋劭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是时，边区辖有13个专区，98个县，650个区，1.53万个行政村，共约2000万人。

△　上年12月中旬开始之大别山战斗结束，卫立煌部收复大别山区麻城、罗田、浠水、黄梅等县，完全恢复战前态势。是役，据何应钦报告称，日方伤亡达万人，但据日方公布数字，第十一军方面战果：中国军队遗尸3700具，俘虏820人，日军死50人，负伤160人。第十三军方面战果：中国军队遗尸450具，俘虏91人，日军死10人，负伤19人。

△　晋西北崞县县长率警卫化装工人袭击石滩日军据点，冲入敌兵营房，毙日军十人、伪军一人，俘伪军六人。

1月16日　国民党中央为庆祝中英、中美新约的签订，我国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完全解除，是日公布《本党五十年来外交奋斗史》。

△　财政部决定：将进口税则的从量征税部分全部改为从价征税。

△　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盛世才任主任委员、黄今如兼书记长。国民党中央派梁寒操为监誓人，参加宣誓就职典礼。

△　国民政府以贵州省贵阳县华高瑶涵及其子华仲麐捐助国立贵州大学田产约值60万元，特明令褒奖，颁给“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复电周恩来、林彪，略称：彼方提出以“皓电”为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是否有借以拖延之目的？你们向张提改组华北地方政府，实行中央法令，是何内容？我军驻地问题，似宜暂不移动。解决问题的时机是否成熟，可否再等一下更有利？2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明顾及蒋的面子，是为的更站在有理的地位，不使谈判弄僵，明了国民党方面的条件，好让林彪带回延安。并以事实证明不是我们弄僵，而是他们故意为难。提议采取以下两种办法结束这次谈判：一、说明我方四条与“皓电”精神相合，只军队数目和移动时间之差，如不同意，要他们提出对案，由林带回延安；二、向他们直接要方案。2月8日，收到毛泽东复电，同意周恩来所提的前一种办法，“可照来电所提办法进行”。随后，周恩来即会见张治中，逐条宣读最后意见，张治中逐字予以抄录、核对。

△　重庆中央图书馆是日举行敦煌艺术展览。

△　美国驻中印缅陆军总司令史迪威因1942年4月在缅作战有功，获美国陆军部高级立功勋章，是日在重庆举行受勋仪式。

△　美机在滇西与日机空战，击落日机七架。

△　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举办近代中国画展，展期两个月。

△　伊拉克对德、意、日宣战。

1月17日　　中央社报道各地限价实施情况：重庆、成都物价平稳，洛阳各界举行拥护管制物价宣传大会，广东各县、市物价均依正常状态下降。西安市平价商店15日开幕，16日起正式营业。安徽物

价“日趋平稳”。山西物价“连日渐趋回跌”。贵州商会致电拥护管制物价方案。

△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商谈战局及新疆独子山油矿等问题。

△　河南省平粜委员会在鲁山成立，李培基为主任委员，是日召开首次会议，决议将当局拨给河南平粜基金一亿元，以2000万元为各县救济费或办理平粜之用。同日，鲁山电称河南灾情奇重，民食困难，各地耕牛多被宰食。

△　日伪军1.2万人对冀鲁边区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八路军冀鲁边区平（原）禹（城）大队等高度分散隐蔽，利用抗日沟突出重围。

1月18日　　河南焦作伪军团长杨周文率部携步枪260支、轻机枪五挺，毙敌百余名反正。

△　驻防山东之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副师长于怀安率部投敌，旋被改编为“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同日，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苏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吕其赓亦率部投敌。

△　日机六架侵入皖南宣城，在城郊盲目投弹数枚后逸去。

1月19日　行政院通令各省，违反限价法令者，均按军法惩处。

△　财政部决定在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六省试办《大票行使奖励办法》，以解决接近沦陷区域小券缺乏，大小券发生差价问题。4月3日，四行总处致函财政部转报西安分处，以该办法行使困难，“拟请在陕境内暂缓试办”。4月13日，财政部复函称，该办法系蒋介石指示制订，指出解决途径为转催中央银行“在一定数额内就地印制五元、十元、二十元定额本票，发行以利流通”。

△　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收复东北问题座谈会，针对联合国人士中散布“战后国际共管东北”等谬论表示意见：一、根据《大西洋宪章》之精神及罗斯福总统所呼吁之四大自由，东北必须由中国收复；二、从历史及民族方面证实，东北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所谓满族乃系有满洲血统之中国人；三、东北人尤须努力于收复东北之武装准备。

△　周恩来告美大使馆秘书庄莱德称，三年半以来，中共军队未得国民政府军事或经济支持。

△　延安《解放日报》公布晋察冀边区军民1942年（缺12月）战绩：一、作战2745次，攻克与逼退敌据点94个；二、毙、伤、俘敌伪军2.71万名；三、动员群众9.7945万人，破坏铁路77里，汽车路354里，平沟569里，毁墙513里，炸毁火车八列，毁车头一个，车皮13节，汽车75辆；四、炸毁铁、石桥各一座，木桥74座，土石堡垒436个，岗楼535个。

△　晋察冀边区国民党党务联合办事处主任郭飞天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发言，盛赞“边区的各种政策法令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贯彻下去的。边区参议会的召开，是值得历史上大书特书的”，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三旅及山东地方武装进攻郯城，歼伪军200人，迫使日伪军撤出“蚕食”滨海区的全部兵力，粉碎日伪对该区的封锁计划。

1月20日　财政部通令棉纱、麦粉统税改征实物。

△　汪伪政府任命李士群为伪江苏省省长，傅式说为伪浙江省省长，高冠吾为伪安徽省省长，杨揆一为伪湖北省省长，陈耀祖为伪广东省省长，余晋龢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王揖唐、周作人为新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兼经济委员会委员

长，王揖唐、周佛海兼副委员长，陈君慧为秘书长。

△　智利宣布对德、意、日绝交。

1月21日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六分区部队攻入武城北之甲马营，歼伪军200余人。第二分区第二十五团第三连一部化装进入巨鹿县城，打死特务六人。

△　胶东区抗日根据地军民集会举行马石山惨案殉难军民公祭大会，并通电全国控诉日寇暴行，号召胶东军民为死难烈士报仇。按：马石山为牟海县山区高峰，去年12月24日，日军大“扫荡”时，以“拉网战术”包围该山，当时山中群众及八路军20余人扼守险要，与敌殊死拼战，先后击退敌人五次冲锋，掩护部分群众安然转移，直至弹尽援绝，20余战士全部牺牲。日军进山后疯狂屠杀，事后发现尸体500余具，惨不忍睹。

△　日军2000余人分三路对晋察冀边区行唐、曲阳一带实行“扫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敌展开激烈搏斗，至2月10日，战斗达百余次，毙伤日伪1305人，俘六人，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获胜。

1月22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应中美文化协会之请，在重庆中央大礼堂演讲中美新约。同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讲《中美、中英新约与新中国之前途》。

△　驻泊珠江内河日军千吨炮舰一艘，向广州方面开驶，行经顺德县属马宁附近被我布雷队击沉。

△　汪伪江苏省清乡区党务办事处为开展献金购机运动派定金额：吴县16万元，无锡13万元，武进10万元，常熟10万元，昆山、松江各八万元，太仓、江阴、吴江、青浦、嘉兴各七万元。

1月23日　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就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发表谈话称：以后涉及在华外人之民刑诉讼案件，概由普通法院按照依法制

定公布之法令或规章处理，违警案件亦同样由警察局处理。

△　上年度第二次高等考试初试放榜，建设、普通行政、外交、司法、经济行政、社会行政、土地行政、卫生行政、统计、会计、审计等各科及格人员共计155名。

△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举行成立五周年大会，并改选理、监事。到孔庚、黄炎培、邓初民、朱学范、董必武、邓颖超等200余人。副会长邵力子致开会词，通过宣言及致中、苏、英、美四国首脑致敬电。

△　画家赵望云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西北之行画展。先一日举行预展，冯玉祥、郭沫若、老舍、茅盾、王昆仑、关山月等前往观看。

△　日伪军偷袭山西省五台县大柏山、小柏沟，当场屠杀两村群众196人，40多户被杀绝；附近村庄还有24人被杀，死于这次惨案的共220人。

△　美使馆秘书、驻华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回国述职期间，于是日向美国务院建议派代表团访问中共根据地。

1月24日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公布北岳区人民武装参战斩获处理修正施行办法，规定活捉日军一名奖100元，活捉伪军或特务一名奖20元。

△　重庆中国人事行政学会举行首届年会，推戴季陶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陈果夫、吴铁城为副理事长。

△　进占沁源日军被迫换防，由第三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十九师团防务，并将安泽、绵上两县10余据点放弃。

1月25日　宋庆龄在重庆为中英、中美新约签订发表谈话，强

调：“英美历来所享受的不平等权利虽从此废除，但在实际上这种权利尚沦陷于敌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逐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给予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因此我们于庆祝签订新约之余，更应扫荡敌寇，拯救沦陷区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唯有如此，真实的自由平等才能实现。”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指出废约之意义，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

△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加强领导人民团体办法要点》，凡四项，训令各省、市党部对当地人民团体“切实控制”。

△　行政院公布施行《非常时期强制修筑塘坝水井暂行办法》，凡10条。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贵州省普定县伍效高、福建省南安县陈存履、陕西省富平县路建人、江西省兴国县周子实等一批“慷慨捐资，热心教育”人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朱鼎卿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

△　军事委员会颁发奖金7000元，奖赏去年12月18日俘获坠落福州日机驾驶员之当地宪警。

△　伪满公布《商工金融合作社法》，决定成立商工金融合作社，由伪满政府出资1000万元组成。30日，伪满经济部决定发行公债1000万元，作为伪政权向商工金融合作社出资的资金，公债年息四厘，1960年2月1日前还清。

△　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联名致电蒋介石，告知已派美国陆军空军总司令阿诺德及英国元帅迪尔来华，说明攻缅计划。

1月26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举行第一次金融专务会议，讨论加强吸收游资，紧缩生产放款，停止商业贷款及加强管制商业银行等有关问题。

△　交通部在重庆设立造船处，夏彦儒为处长，张乔啬为副处长，接收原西江、川江两造船处，开始办公。

△　国民政府任命张洪沅为国立重庆大学校长。

△　汪伪政府任命马长亮为台湾总领事。

1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知各直辖党部：党员“附逆降敌，经调查确实者，不必经过答辩手续径行处分”。

△　国民政府明令表彰1941年秋长沙会战中献身疆场的陆军第五十七师指挥官李翰卿。

△　邵力子在重庆中国新闻学会讲演《战时新闻的感想》。他说：“一般社会上都是隐恶而扬善，但在新闻记者则须以太史公的精神去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这种批评的动机必须是光明正大的，为国家社会利益的，在技巧上必须是有分寸，有限度的，必须虑及是否会发生反作用。”

△　重庆中国劳动协会举行劳动问题座谈会，讨论“物价与工资”问题。朱学范主持会议称，讨论目的在纠正一般社会人士认为“物价上涨就是由于工资上涨的影响”。讨论结果认为：物价上涨是工资上涨之因，而工资上涨是物价上涨之果。与会者举出抗战以来，物价上涨指数均在60倍以上，而熟练技工工资上涨不过40倍，职业工人不过30倍，工资上涨之速率远不及物价上涨之速率。提出限制工资必须以能维持工人及其家庭起码生活条件为原则，抗战以来工人生活已较前困苦，呼吁对工人福利事业应多举办。

△　涪江航道工程完工，是项工程系就三台县柳林坝部分之涪江

施工。自1940年11月兴工，历时二年余竣事，除将柳林滩夷平，使航运畅通外，尚可供灌溉三台北坝10余万亩土地，再行利用水力发电，可供三台、绵阳、射洪、阆中、盐亭五县之电力。

△　华侨兴业银行在重庆开业，董事司徒美堂，总经理邢有岩，副总经理孙云樵。

△　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李仙洲部来鲁后的统战工作指示》，指出对李部以疏通团结为主，鼓励、推动其与敌积极作战；并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以防突然袭击。

△　萨尔瓦多共和国宣布撤销对伪满洲国的承认。

1月2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杜聿明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黄杰为副总司令，邱清泉为第五军军长、余愷为副军长。

△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拟就在云南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并于当日呈报蒋介石。

△　拉萨500余人举行庆祝新约大会，由蒙藏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主席，会后献金万余元。

△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山东情况，内称：山东现有日军3.7万人，伪军18.8万人，国民党军由17万人降到九万人。敌据点达3300处（一年来增加1200处）。冀鲁边区、泰山区平均七八里一个据点，我各区联系较前困难。1942年国共摩擦较少，主要原因是敌人压迫更甚和我疏通推动的结果。

△　国民政府公布《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法》，凡21条。

△　行政院院令颁行《战时管制工资办法》，凡16条。

△　湖北咸丰县第二收粮所主任吉子贞、征收员罗敬甫，以16两

秤100斤折合一担收进，以95斤折合一担交出，共同舞弊，经湖北省政府查明，依照《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判处死刑，是日执行枪决。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撤销行政院政务委员会，改设政务参赞。

△　日本第八十一届议会复会，东条英机首相发言称：今年为“再行扩大过去一年间所获战果，并充实必胜条件”进行决战的一年，鼓吹继续对英、美采取攻势。

1月29日　国民政府为纪念中美、中英新约签订，通令各机关、学校2月5日至7日放假三天（工厂5日放假一天）。

△　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新编第一军军长，刘嘉树为第八十八军军长，何绍周为第八军副军长。

1月30日　国民政府立法院例会通过两项税法：一、改称《所得税暂行条例》为《所得税法》，“税率略为加重”；二、《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

△　重庆国际妇女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在重庆举行同盟国妇女联欢会。

△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关于对法措施问题》，要求“法国确认将日法关于共同防卫法属印支议定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广州湾，以必要的军队进驻广州湾”。同日，日以《大陆命第743号》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下达“应与海军协同作战，以一部攻占雷州半岛要地，并进驻广州湾法国租借地”的命令。

1月31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特设军法执行监理部开始办公。其任务为：一、关于妨害或违反总动员业务或法令惩罚案件之审判；二、关于国家总动员会议所属人员违反法纪之督察审判；三、关于徒刑五年以下罚金一万元以下之案件之核准实行。

△　社会部统计处《社会调查与统计》第三号，公布1942年至1943年1月，重庆市四个产业的工时调查：机器业，最高工时11.8小时，最低工时10小时；印刷业，最高工时11.4小时，最低工时八小时；面粉业，最高工时12.4小时，最低工时9.8小时；纺织业，最高工时11.4小时，最低工时7.4小时。

△　前第二十八补充兵训练处处长韩亮宇因盗卖军服罪，经军政部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判处死刑，是日执行。

△　日军袭击河南修武北睢村，屠杀该村及邻村的村民530人，北睢村20余户被杀绝。

是月　　教育部报请行政院批准，特拨专款200万元奖励久任教员，凡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任职20年以上者每人发给3000元，10年以上者每人发给1500元，春节前颁发完毕。

△　新四军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宣布，淞沪游击队改称“三北游击队”。

△　行政院修正通过《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凡16条。

△　周恩来、董必武等帮助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郭春涛等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通过经常性的时事讨论方式，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1943年9月，该会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　甘肃临洮千余回民暴动，反抗强迫征税、征粮、抓丁，提出口号“打倒谷正伦”（甘肃省府主席），首领为马步青一部下马富善。不久发展为八个支队，编成“富善救国军”，人数扩至10余万。

△　伪满向热河省青龙县大量增派日伪军警，推行“集家并村”，全县1686个村庄被拆毁1219个。16.6万人被赶入358个“人圈”，制

造“无人区”。

2月

2月1日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准备赴昆明组训新军。史迪威在昆明成立组训新军的办事处，负责训练及装备。

△　粮食部长徐堪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粮食施政概况，称：“三十一年度，除湖南歉收及云南少数地区情形特殊者外，全国各地粮价平稳，平均粮价涨率均低于物价。部订随赋征购办法，各省实行后均收预期效果，军、公、民粮得已充裕无虑。”并称“三十一年度全国征收征购截至昨天，已收足5000万余市石，前途大可乐观”，“目前渝市经常存储粮食（包括米麦等）一个半月以上，供应充裕，无可忧虑。”

△　教育部制订《高中毕业生服务办法》，通令自本年7月起施行。办法规定：高中毕业生须依法在农场、工厂担任技术员、管理员或地方自治基层辅佐员、保甲长或国民学教员半年后始得升学。

△　军事委员会将铁道运输司令部改为铁道运输处，隶属后方勤务部，并以陇海铁路局长陆福廷兼任处长。

△　军政部驻川军粮局结束，改在重庆设驻川粮秣处，另在成都设办事处。

△　长沙警备司令部发布禁止赌博布告，文武官员犯禁者依抗命论处死刑；普通人民犯禁者，壮丁即提充兵役一年，老弱妇孺罚苦役一年。

△　平价购销处奉命改组，下令裁减人员，700余名职工留用100余人，其余500余人均被限令解雇。被裁人员衣食无着，11日起连续在报端发表请求紧急救济启事称：“同人等或单身作客或家累綦重，

际此天寒更岁，万里流亡之时，报国有心，效劳无路，瞻念前途，不胜惶恐”，呼吁援助。

△　重庆《大公报》今起连续发表《豫灾实录》及《看重庆、念中原》等文，报道河南灾情惨状。称受灾县份并非官方所报80余县，实乃100余县，整个河南已“变成人间地狱”，尖锐抨击当局救灾及限价抬价失当，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3日，该报被罚停刊三日。

△　八路军北岳区一部袭击曲阳西小口头日军，全歼敌福井大队第四中队及机枪小队。

△　日伪军警在承德县14个村庄实行“一齐逮捕”，400至500人被捕，100余人被处死。

△　日军从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从此在太平洋战场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2月2日　　国民政府下令褫夺万毅、孙立基之陆海空军甲种一等、二等奖章。

△　经济部农本局经行政院批准移交财政部接管，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是日，财政部致函经济部，以该局组织成立尚需时日，决定先行接管，在花纱布管制局未成立前，所有花纱布管制事项即由农本局请示财部负责办理。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以该省“环境特殊，防奸工作重要”，呈请增拨活动经费。12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同意从“特别费项下”拨给50万元，报请国民党中央批拨。

△　第十五集团军李仙洲部先遣部队两个团，侵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所辖冀鲁豫边区丰县地区。

△　日机狂炸福建永安，死伤数十人，流离失所者四五百人。

△　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是役苏军全歼德军22个师，俘获德军9.1万余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此转入战略反攻。

2月3日　　日机四架两次空袭鄂北老河口，在城内外投弹40余枚，伤平民五人。9日再袭老河口，毁新建桥一座。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自本月9日起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禁止用五色旗。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议决，特派周佛海、陈群、李圣五、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陈春圃、罗君强、周学昌、赵尊岳、张仁蠡、何庭流、周隆庠、徐季敦、刘仰山、钱慰宗、陈昌祖、郝鹏举、戴英夫、黄自强、冯节、樊仲云、林汝珩、郭秀峰、袁殊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王揖唐、周佛海、陈群、李圣五、梅思平、林柏生、周作人、丁默邨、陈春圃为常务委员，林柏生为秘书长。

△　“中国——最初之十字军”展览会，在英国利物浦开幕，展期10天，展品为唐、宋等代文物。

2月4日　　国民政府批准《中美新约》及换文。11日，美参议院通过《中美新约》及换文。

△　延安各界二万余人集会庆祝“废约”大会，毛泽东、朱德、贺龙、叶剑英、徐特立等组成主席团。朱德在大会发表讲话称：“只有打倒全世界的法西斯，完全击溃日寇，才能达到废约的目的。”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并举行盛大游行。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指出：“在今日废约成功之时，中国共产党却并不以此自炫。它深知在这事业上政党倡导之力固然不可淹没，然而这个成功总的说来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民，唯有人民乃是这一光荣史诗的

作者。”废约“固然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一个重大成功，可是这还不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

△　四联总处理事会修正通过《农贷办法纲要》，凡13条。

△　八路军总政电影团摄制反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举行首次试映。

△　山东博山敌占区群众20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攻占博山第四区岱庄、黑山等三据点，杀死日军中队长等多人。事后博山日伪军增至1000余，大肆镇压，群众600余人自动武装奔赴鲁中抗日根据地。

△　日军乘春节夜袭山东清丰县张村，杀害群众108人，26家绝户，烧毁房屋500多间。

2月5日　　重庆各界为中英、中美新约成立举行有五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全市张灯结彩，一片欢腾，会后举行盛大游行。大会分电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申贺，电林森、蒋介石致敬。全国各大城市亦同时举行庆祝大会，并定是日起放假三日以示庆祝。

△　国民政府定是日为农民节，重庆市农会召集各区农民代表百余人举行纪念会。

△　中伊（拉克）友好条约批准书在土京安哥拉互换。

△　大同日军宪兵司令部以“皇军”敌对分子名义，逮捕当地知识分子397名，全部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　日满在兴隆县进行“大检举”，是日起五天内逮捕约5000人，仅半壁山伪警察署所辖各村即被捕2000人，10天之内惨杀400余人，其余除一部关进承德、锦州监狱外，大部分被送到东北当劳工。

△　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派遣以美空军总司令阿诺德和英元

帅迪尔为代表的高级军事代表团，由北非抵达重庆，向蒋介石传达卡萨布兰卡会议详情。蒋介石同意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的“安纳吉姆”计划，答应参加11月的缅甸战役，但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要在蒋的指挥下，由陈纳德率领一支驻华独立空军；二、每月飞越驼峰的空运援助物资从3000吨增加到一万吨；三、到11月，中国要有一支500架飞机的航空队。事后罗斯福基本同意了蒋的要求。

2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罗迈为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景林为副秘书长；免去李景林延属分区副专员兼延安市市长职务；任命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兼延安市市长，副专员马豫章兼副市长。

△　巴西接受《大西洋宪章》，宣布对日绝交。

2月7日　　何应钦由重庆启程赴印，视察中国驻印军、参观英陆空部队及商谈有关军事问题。美、英军事代表团阿诺德、迪尔等亦同机前往。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战略区发出对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

△　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召集纪念“二七”二十周年纪念会，到朱学范、张剑白等多人，由经历“二七”惨案之杨德甫报告“二七”经过。

△　延安工人2000余人集会纪念“二七”二十周年，会议号召以加紧生产、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的实际行动纪念“二七”。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代表冀东700万人民，通电控诉日军在长城内外（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制造无人区，普遍实行集家并村，烧毁房屋，人民惨遭屠杀与冻饿者不下数万人的大罪行。

△　日机30余架分批由湖北窜扰陕、豫边境，其中11架侵入陕西

安康、富平等地，在安康郊外投弹后逸去。

△　晨起重庆普降瑞雪，至晚雪量已达3.7厘米，为1930年以来之第二次。

2月8日　国民党中宣部密查重庆文化出版界活动情报称："查渝市与奸伪有关之书店计有生活书店、大陆图书公司、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四家，平日除出版少数书籍外，兼售奸伪理论丛书，此项丛书之来源均系第三国际驻华文化宣传机关之苏联粮食出口贸易协会所供给，各该书店彼此间均有联系"，并详列各书店职员姓名及有关情况，要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切实注意"。

△　社会部致函教育部称："山东淄博矿区学生前往延安求学者为数颇巨，应予阻止，设法招致送往阜阳或西安就业升学。"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朱深任委员长，汪时璟任常务委员兼财务总署、内务总署督办，齐燮元任常务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苏体仁任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王荫泰任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张仲直为政务厅长，刘玉书为北京特别市市长。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由齐燮元兼。

△　日机60架自晨8时至下午2时分三批空袭桂林，在西南郊投弹百余枚，第三批窜入市区，在贫民区投弹数十枚。同日，湖南衡阳、陕西南郑亦遭日机轰炸。

△　美副总统华莱士在太平洋学会发表演说强调以飞机援华，称："吾人希望更多之飞机尽速运往中国。"国务院政治顾问贺恩伯克说："中国获得足量之飞机，固需若干时日，但必须将飞机运抵中国。"

2月9日　中、美、英三国军政高级官员集会印度加尔各答，进一步研究"安纳吉姆"计划决定的缅甸攻势，并达成若干协议。参加会

议的中国方面代表有何应钦、宋子文，美国方面有阿诺德、萨黔维尔、比斯尔、史迪威，英国方面有迪尔、韦菲尔。

△　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略称：陕甘宁边区财政难关已经渡过，现在党、政、军蓄积的资产值边币五亿元以上（合法币2.5亿元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时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　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主力一部配合伪军约4000余人，为解除八路军对津浦铁路、临淄公路之威胁，并阻止第十五集团军李仙洲部北上、东来，发动对鲁南山区大“扫荡”。八路军鲁南军区各部队猛烈展开反“扫荡”作战，至22日，日伪军“扫荡”被粉碎。

△　美合作金融及供销专家斯蒂芬斯偕助理赖满，由重庆抵达兰州，考察工合事业。

△　日军在冀东兴隆的秋木林、大磨盘峪两个“人圈”，屠杀青壮年男子180多人。

△　晨，日机五架空袭歙县，投弹20余枚。同日，湖南芷江、零陵亦遭空袭，在零陵投弹多系燃烧弹，毁房200余间。

△　汪伪设“接收租界委员会”，主任褚民谊，委员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并设“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主任褚民谊，委员罗君强、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汤应煌。

2月1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鄂为第六十四军副军长。

△　财政部发表年来为救济各省难民及归国侨胞国库支出情况，截至是日共拨救济难民款5720万元，拨归国侨胞救济款4430万元，

两项共1.015亿元。难民救济款分配情况是；河南省1930万元（内旱灾赈款1900万元），陕西省850万元，浙江省500万元，广东省450万元，湖北省400万元，江西省300万元，山东省300万元，安徽省280万元，广西省150万元，湖南省150万元，青海省50万元，福建省20万元，贵州省30万元，云南省40万元，鲁皖豫边区100万元，山西省200万元。

△　财政部举行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甲种债票，二十七年美金公债、关金债票、英金债票、美金债票，二十九年军需公债第一期债票、第二期债票，二十九年建设金公债第一期英金债票、第二期英金债票暨第一期美金债票、第二期美金债票等十种及该部接收之省公债二种等12种债票，还本抽签。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致周恩来、林彪的指示信，提出通过与张治中谈话，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被盛世才诬加罪名扣留的徐杰（陈潭秋）、毛泽民等140余共方人员，并准许他们经由兰州、西安返回延安。

△　日军为歼灭以湖北峰口为中心的三角地带的中国军队，并占领长江南岸要地以改善和加强其战略态势，发动对守备该地的第五战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劲哉部第一二八师的春季攻势，是为湘鄂西战役的第一阶段（日军称之为江北歼灭战）。是日前后至14日，日军第十一军所属第四十、第十三、第三十四等部主力集结完毕。

2月上旬　　日军第十二军两个旅团“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逮捕我军政人员和群众800余名，就地杀害650余名，其余150余名被解至济南，其中有115人在“琵琶山万人坑”被杀。

2月**11**日　　何应钦抵新德里检阅中国远征军，并与韦菲尔商谈援华物资运输问题。

△　中央赈济委员会专员赵则诚视察豫、皖灾情，自立煌抵漯

河，在漯河发表谈话称：所经界首、周口、漯河等处，老弱饿毙，婴孩被弃，确为目见事实，已将情况电呈中央，并建议豫、皖当局，第一步扩大收容灾童，第二步移民去皖北就食。

△　延安《解放日报》载：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已向财政部登记领照之县银行28家，未领照而开业者51家，筹备中即将成立者80家，总计159家。以省别论（其中包括领照、开业而未领照及筹备中者）：四川65家，陕西40家，河南32家，广东12家。其余湖北、江西、甘肃、浙江、福建、贵州、山西、西康等省各一二家不等，已设立之各行以陕西长安县银行实收资本100万元为最多，四川蓬溪县银行实收资本4.25万元为最少，一般均以10万至50万间者居多。

△　日机24架袭桂，在桂林市西南郊投弹40余枚，并低飞扫射。又有18架日机空袭柳州。同日，日机袭击河南平顶市擂鼓台南一座小山，投掷炸弹、燃烧弹，居民275人遇难，五家绝户。

△　丘吉尔首相在英下院宣讲卡萨布兰卡会议精神，重申先击败德国后合力击败日本的主张，并称中、英、美三国对日作战计划已有一致意见，将以最大规模之动作援助苏联。同日，路透社发表快报，对卡萨布兰卡会议后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在重庆与蒋介石、在印度与韦菲尔会谈情况作了报道，并称在配合进攻日军方面，已获得完全一致之协议。

2月1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琼为第十五军副军长。

△　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周恩来，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可以你的名义提出李先念部与于学忠对调作为委曲求全的表示，并说此点回来商量。可以准备答应少编一二个师，只说回来商量。

△　重庆市举行一元献机集团命名典礼，参加命名飞机30架，价值合计450万元。孔祥熙任大会主席并致词谓：“一元献机运动于民国三十年七月七日开始，迄今已捐献飞机三百余架，除曾在各地分别命

名外，在重庆此为首次集团命名。”“一元献机之意义，在表示人民爱国之热忱，表示人民对协助空军建设运动之积极”，要求各界继续“努力捐献”。

△　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载：教育部决定近期内各大学或独立学院非经核准筹设有案，不得增加任何研究学部。同日，该报还就教育部核发专科以上久任教员奖金事发表社论《奖励久任教员》，表示：“政府对于久任教员所表示者，在物质方面虽不丰富，然在精神方面却甚优厚”，强调“眼前的教育困难不在物质，而仍在心理”，“安贫乐道是中国儒家固有的精神。教育界在全国困苦之中，必须拿精神来创造自己的环境”。

△　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返回重庆（按：该团系1942年9月27日出发，历时143日）。18日，该团团长林继庸呈报考察报告，略称：“陕、甘、宁、青、新五省均感有同一之困难：一、除陕西外均工业幼稚，地广人稀；二、除甘肃之天水外妇女界均不肯入工厂操作；三、各省均系盐碱地；四、能产极佳之甜菜、甜萝卜而尚未能利用制糖，故食糖均仰给于四川或苏联；五、水利农田草场均尚须再为扩充；六、畜牧兽医血清制造，优种等多需再加推进；七、尤感觉困难者，则为交通之不能畅达。”各省之优点为“可供水力发电之地区甚多”，石油及其他矿产蕴藏丰富等。

△　国民党中宣部密函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扣《谁革命，革谁的命》（封面为《忠孝贤》）等书称：“奸伪最近印行各种内容荒谬之宣传小册，书用《群英会》、《九更天》、《柜中缘》、《忠孝贤》等伪装名称邮寄各地，军委会特检处迭有检获，足见其为数甚多”，要求转饬各地“严密查扣”。

△　访问回教各国之中国回教联合会代表离巴格达赴安哥拉，并将续访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及埃及。

△　滇西日军分路进犯怒江。

△　日轮“三亚丸”华籍船员林玉奇等18人，乘该轮由香港装运军需物资赴海南岛，在开往海口途中智歼敌寇，开船回国。

△　日本众院续开大会，紧急通过昭和十八年度（1943）总预算及增税案12件。按：本年度日政府预算总额连同一般会计、47个特别会计及临时追加军费在内共达474.1亿日元，较上年度增加123.66亿日元。

△　美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指出决在此次战事中作战到底，直至联合国家之军队在柏林、罗马、东京之街头作胜利游行为止。

2月13日　何应钦在新德里发表演说，略称：目前主动地位确已转入联合国家之手，胜利之期已逐渐逼近，严重之时日确已过去，中国战场牵制日军近百万。

△　国民政府下令褫夺附逆有据通缉在案之田岫山华胄荣誉奖章，及张俊升之陆海空军甲种二等奖章。

△　日军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主力及第十七师团全部，配合伪军数千，并附骑兵一个联队共约三万人，在淮安、宝应地区集结完毕。次日，在飞机掩护下，向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发动进攻，激战一周，连陷东沟、益林、凤谷、车桥等地。随后又与转向阜阳、淮泗地区的于学忠部主力连战十余次，双方伤亡均重，至3月18日战斗结束。是役，据军委会公布战果，计毙敌5000以上，我军阵亡旅长二人、伤团长一人、官兵伤亡及失踪者约4000余人。

△　夜，日军第四十师团自临湘、白螺矶附近渡过长江，分左、右两个纵队，经米家、上车湾附近，于16日占领湖北监利。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明灏为第九十七军军长。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关于战时经济政策纲领，关于注重增产与保产并重农案、实施物资统制案。加派褚民谊、陈之硕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特派余晋龢兼任筹堵黄河中牟决口委员会主任委员。

2月14日　苏北淮阴战斗。第八十九军顾锡九、第一一二师王秉钺与日独立第十三混成旅团激战，日军欲消灭淮阴抗日根据地，战事持续一个月又两天，双方伤亡均在4000人以上。

△　鄂北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破奉新东南第五战区守军阵地，以后至20日，一面向高安方面进攻；一面佯作向长沙方面第九战区进攻的假象。

△　滇西腾冲日军约七八千人分路北犯。一路经马站街向顺江街攻击，17日在马面关与守军发生激战。另一路沿龙川江东岸北犯，15日占领江苴街；19日在双虹桥施放烟幕，强行渡江，被守军击退。21日窜抵蛮蚌。经月余激战，至3月中旬，日军退至腾冲附近，双方恢复原来态势。

△　日机一架在赣北一带上空低飞窥察，被击落于奉新东南之阳仙岭，人机俱毁。

2月15日　外交部宣布：中荷两国公使相互升格为大使，现任中国驻荷公使金问泗为首任驻荷大使，荷兰战时调整部秘书长罗芬克为首任驻华大使，原驻华公使白鲁格调任驻苏大使。

△　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在重庆中枢纪念周作一年来交通施政报告，称今年交通部中心工作为协助限价、便利军运、准备复员。

△　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以《我的过去，你的将来》为题，对重庆新闻界发表讲话称：报纸“不是利用来责难政府的工具，它应该与政府处于一致的立场”；强调“勿作破坏性的批评，多作建设性的

建议”，不可对政府法令打问号而减成效。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新闻记者法》，凡31条，规定凡“背叛中华民国证据确实者”等，“不得给予新闻记者证书，其已领有新闻记者证书者，撤销其证书”，并规定记者应加入其执行职务地之新闻记者公会或联合公会，强调发表言论要“于法律允许之范围内”，“不得有违反国策不利于国家或民族之言论”。

△　波兰首任驻华大使朴宁斯基抵达重庆。

△　鄂西沔阳、新口、监利战斗。第一二八师王劲哉部与日军第四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第三十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激战。日军欲铲除此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我军向后撤退。

△　汪伪召开第三次“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参战后各项军事问题，发表宣言，鼓吹“参战期间应积极强化‘国军’实力”，“加强训练，充实装备”，以期“自由平等之获得，共荣建设之实现”。于17日结束。

△　中央社讯：日本将其国内无法销售之剩余公债向各殖民地摊派，台湾摊派达28亿日元，平均每人被强派勒缴56日元。

2月16日　左舜生、章伯钧在重庆特园鲜英宅举行晚宴，鲜英、罗隆基、杨耿光、韩兆鹗、史良、刘清扬、张申府、陶行知、陈启天、沈钧儒、邓初民、冷遹、黄炎培、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应邀参加，谈论世界战局问题。

△　重庆《大公报》报道：海外中华海员待遇问题之外交交涉已获得两项成就：一、海外中华海员得在其服务口岸组织中华海员公会取得正式资格；二、海员组织及各项活动，由所在地中国领事馆指导，受合理之法律保证。

△　陕西山阳县农民为抗粮抗丁发生大规模暴动，并迅速蔓延至

湖北交界一带。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于2月26日、3月2日及3日连电行政院请示。3月11日，行政院电熊斌“仰责成地方主管人员限期妥为措置，毋使滋蔓”，并电令湖北省府主席陈诚协同防堵以免流窜。3月26日，熊斌电报行政院称：枪支已收缴，首要分子正在追捕，并督饬实施清乡，以靖地方。

△　安徽去年迭遭水、旱、寇灾，严重情景为百年所未有。旅渝皖籍人士发起组织救灾委员会，推冯玉祥、张治中、许世英、吴忠信、方治等20余人为常务委员。是日，在重庆招待新闻界，要求急拨赈款1000万至2000万元。

△　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4000余人在广东雷州半岛登陆，当日陷雷州县城，随后又陷遂溪、海康两城。21日，日、法两方在据称“极为友好的气氛中”签订占领广州湾的现地协定。25日，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州长官德麦克来到日军舰“桥立号”拜会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并举行签字仪式。至此，雷州半岛及附近岛屿尽陷敌手。

2月17日　宋美龄抵达华盛顿访问，次日，在美国会发表演说。19日，宋与美总统罗斯福联合招待记者，宋称：“美国可以运送更多武器之方法予中国以最佳之援助。”并称：“中国现已训练驾驶员，但既无飞机又乏汽油，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罗斯福表示美国将竭力为之。

△　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法》，凡六章22条，《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凡14条。税率最高达80%。

△　华中日伪军1.4万余人，采取拉网战术和梳篦式战术，开始对苏北盐阜地区进行“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内外线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坚持内线斗争，同时在外线攻袭日伪据点。新四军第一、第二、第四师也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策应第三师的反“扫荡”作战。日伪不但到处扑空挨打，且侧背也受到严重威胁，自27日起改为分

区“扫荡”，又遭打击破产。3月11日开始撤退。3月25日起，新四军全面反攻，至4月10日，历时50余天的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是役共歼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

△　日机80架，是日至20日，狂炸湖北洪湖百于桥、峰口、三官殿等地，投弹800多枚，死伤1300多人，毁房1520栋。

△　日本大本营报道部部长谷荻那华雄发表演说称：“以前对华处理方针均系大东亚战争发生前制定，故尽量考虑避免与美英冲突或诱导以利解决事变，那种方策有不彻底处。当大东亚战争之今日，帝国即须举全大东亚之民族，以所有之资源集中于贯彻战争一途。”“依日华提携之基本精神以加强国府之政治力，覆灭重庆抗日之根据地及军队，统一中国，以期贯彻圣战。”

2月18日　蒋介石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九周年发表广播讲演，称新生活运动是中国“自立自强的起点”，“新生活运动能够切实推行，然后建国事业才能如期成功”。

△　蒋介石电各地确立“行政三联制”基层制度，要求中央党政各机关至迟于本年3月底，省市党政各机关至迟于6月底，县市党政各机关至迟于9月底以前，一律成立设计考核委员会，以加强实施“行政三联制”，为此并颁发《党政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凡10条。

△　国民参政会在渝参政员张一麐等56人集会座谈中英、中美新约，蒋介石出席并致词称：新约之成立得力于参政会诸君之协助不少，惟不平等条约虽已废除，建国工作尚待完成，东北四省及其他沦陷区同胞之痛苦亟待解除，深望参政会同人继今以往益加奋发，以竣抗战建国之全功。

△　新四军为中英、中美新约签订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再接再厉，加强团结，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获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而奋斗。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马励武为第二十九军军长，赵公武为第五十二军军长，张华棠为第三十军副军长，傅翼为第七十二军军长，倪祖耀为第八十五军副军长。

△　山西辽县召开公审汉奸特务大会，判处近在该县桐峪一带进行破坏活动的汉奸特务机关新民会首要分子三人死刑。

2月19日　林森为新生活运动九周年发表广播讲演，略称：新生活运动虽然得到相当的成功，究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今后必须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　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九周年，定是日至24日在重庆举办新运讲座：19日，黄仁霖讲《一年来新运工作之检讨》；20日，张继讲《开发西北》；21日，谢冠生讲《新约与新运》；22日，李德全讲《妇女职业问题》；23日，邵力子讲《限价与节约》；24日，张治中讲《伤兵之友》。

△　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原校长顾孟馀辞职照准；任命吴南轩为国立英士大学校长，免去其原任复旦大学校长职；任命章益为国立复旦大学校长。

△　毛泽东邀请枣园村24位年过60岁的老人来做客，为他们集体祝寿。

△　日伪军进占苏北阜宁、东坎，并以舰艇封锁沿海港口。20日，又在飞机配合下，向八滩、六合庄地区合围。

2月20日　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主力及伪军一部共千余人，在空军掩护下由山东安丘、管师、沂水分别出动，对鲁中根据地八路军及鲁苏战区第一一三师发动“扫荡”战。

△　鲁苏战区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在山东潍县被俘投敌。

△　山西沦陷区不断发生饥民暴动。是日起，阳泉饥民300余将日驻军司令部包围三天，迫使日军不得不将其掠夺的粮食退出一小部分。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运粮集中地，各地灾民先后成群涌来者达17万余人，纷纷索粮，车站粮库被灾民捣毁数所。长治城内居民200余人，因敌抢粮，颗粒无存，齐集伪县公署要求发还。

2月21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庆祝苏联红军建立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全体红军将士称：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节。

△　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在安丘张家溜陡沟督率部属与日伪军搏战时，身中数弹，伤重殉职。蒋介石特给恤金五万元，通令全国将士及全体政工人员以周为楷模，称周“为国军中将级政工主官抗战阵亡之第一人”，由军委会转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军事委员会任命裴昌会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米文和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社在重庆成立，毛庆祥为理事长。

△　日军占领广州湾。

△　日军第十一军塘支队于薄暮时分从余家埠出发，隐蔽前进。22日黎明进入万福寺附近，遭到第六战区守军的猛烈反击，经过激烈战斗，占领北口街。至24日，与先后行动的第十三、第四十师团及各大队联合构成对峰口方面第一二八师的包围态势。

2月22日　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中英、中美新约签订后司法行政设施改进情况，透露全国现有各级审判机构、监狱、看守所3736个。

△　何应钦自孟买返抵新德里，英军司令部举行盛大欢迎酒会。

△　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凡15条，修正《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大纲》，凡24条。

△　宋子文外长为主持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事宜经印抵美。次日，会见罗斯福。25日，会见国务卿赫尔及副国务卿威尔斯。要求美国援助飞机，他说：只须美机数百架，即可使中国军队开始进攻，将日军驱逐出中国国境。

△　以熊式辉为团长的中国政府军事代表团抵达伦敦。24日，英政府宴请该代表团。

△　延安各界集会庆祝苏联红军节，叶剑英、吴玉章、徐向前等出席大会。大会通过延安各界致斯大林及全体红军将士贺电。次日，又分别举行各种庆祝集会、游艺会。

△　淮海区新四军进袭淮阴北日伪据点，并于中途伏击，共毙伤日伪224名，俘伪军600名，获步枪600支。

△　日军侵占山东曹县吕楼村，杀死、烧死村民138人，其中10岁以下儿童30人。全村130户中有108户罹难，31家绝户。

△　河北遵化南伪治安军第十七团一个营向南出扰，被八路军一部击溃，计毙敌伪少校副团长韩国斌以下40余名，生俘伪军28名。

2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陕、赣、渝、闽、湘等省、市参议会第二届议长、议员名单：计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元鼎、副议长王宗山；江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彭程万、副议长王有兰；重庆市临时参议

会议长康心如、副议长李奎安；福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邹祖荫、副议长林希谦；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副议长肖忠贞。

△　苏大使馆在重庆举行盛大茶会，庆祝苏联红军节。蒋介石特派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前往祝贺。同日，程潜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宴请苏联在重庆顾问、武官。

△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为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刘汝明代第二集团总司令、孔令恂为副总司令，区寿年为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　英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奉英王、王后命邀请宋美龄访英。

△　淮北新四军一度攻入淮阴县城，毙伤日伪军百余名。

△　日机10余架由鄂窜川，旋北飞陕，在安康投弹后逸去。

△　四川合川县石龙乡乡长文智因“借端勒索”和侵占军谷尾款6000元，被判处死刑，是日执行。

△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为法国维琪政府“放弃租界及治外法权”发表谈话称：这一行动是“法国贤明当局高瞻远望”，“中法之关系必更形友好，本人至深欣慰”。次日，褚民谊致电维琪政府驻汪伪大使戈思默表示感谢。

△　法国维琪政府发表公告称：“为增强中法邦交起见，法国决定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并废止其在北平使馆界暨在上海、鼓浪屿两公共租界，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法国租界内之各项行政权，法国政府对于上项决定，一俟时机许可即予实施。并对于其有关各项问题，亦将计及，兹特公布此项决定。”

2月24日　外交部向法政府提出照会，对法方同意日占领广州湾表示抗议。照会称：根据“1899年11月16日中法广州湾租借地条约第

一条中明白申明，保留中国对于该地之主权，故非得中国政府同意，法国不能片面允许由第三国占领或使用该租借地，尤不应将其交与中国之敌国”。照会说：法方同意日占领，即等于该条约“已失其效力”。“中国政府特向法国政府郑重声明，保留采取必要与适当之措置，以保留领土主权之行动自由及向法国政府要求赔偿损失之权”。

△　经济部制定开发新疆工业计划，拟开设棉纺织、毛纺织、代水泥、炼铁、轧钢、炼油等18类工厂。

△　国民政府明令给予钱泰景星勋章。

△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广中为第十八军副军长，王卓凡为第五十七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赴印教育文化访问团一行四人，由团长顾毓琇率领由重庆启程。

△　宋美龄在美发表谈话，称中国为同盟国之一员，有权要求美供给军火。

△　苏北新四军分三路强袭江苏宿迁县洋河镇日军据点，生擒日伪队长、翻译官以下50余名，毙伤伪军200余名，摧毁碉堡20余个。同日晚，新四军主力另一部直逼淮安城郊，全歼城郊伪保安大队。

△　上午，日机10余架由鄂袭川，分别在梁山、万县两处投弹后逸去。

△　汪伪政府财政部与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签订《借款契约书》，总额18.1838亿元，以1942年度华北各海关收入为抵押。

2月25日　蒋介石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身份出席该会三十一周年纪念大会，并主持荣誉裁判及褒奖礼。

△　三青团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中央团部派程思远代表参加。18日闭幕，李汉魂等当选为干事。

△　国民政府派遣第一任中国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在梵蒂冈向教皇呈递国书。

△　鄂西日军第十一军下令压缩对峰口的包围圈。凌晨，日第四十、第十三、第五十八师团及各支队同时发动进攻，第五战区守军第一二八师未作抵抗，仓皇撤退。中午，日军顺利占领峰口，师长王劲哉被俘投敌。据日方公布，峰口之役至26日，共击毙中国军队2200人，俘虏3750人；缴获迫击炮30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66挺，步枪1480支。

△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得奎为第五十八军副军长。

△　经济部核准《开采金矿使用土地补偿规则》备案施行。

△　曼谷华侨区大火，毁房500余栋。

△　冈村宁次秘密飞往山西长治，在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驻地召集师团长等会议，部署“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

△　汪精卫通令伪清乡委员会执行1940年6月24日与日本签订之《治安协定》。

△　日本政府发表自1939年至1943年岁出概况：1939年为168.06亿日元；1940年为188.31亿日元；1941年为331.10亿日元；1942年为436.08亿日元；1943年为474.10亿日元。

2月26日　蒋介石对泰国军民发表广播讲演，略称：中国只把泰国看做日本军队的占领地，并不看做中国的敌国，希望泰国军民以忠勇爱国的行动速起自救，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驱逐共同敌人。

△　外交部长宋子文晤美总统罗斯福，讨论亚洲战局。

△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公务员考绩条例》。

△　日军万余人为掩护伪军孙良诚部北上，对冀鲁豫边区东明、曹县、菏泽地区进行“扫荡”。

△　汪伪政府经济顾问石渡庄太郎返东京，接见“大东亚记者团”称，汪伪经济“颇多困难”，但“既已参战，无论如何亦必须实行统制经济”，又称，“由中国人实行而由日人予以协助之方法为最佳”。

△　汪伪政府召开教育行政会议，讨论战时教育方针，发表宣言称：“际此非常时期，唯有以精神克服物质”，“要求社会对教育力量加以重新估量，予以有力督促与扶持。”于28日闭幕。

△　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改组，阜新、鹤岗、西安、北票四大煤矿独立经营。

2月27日　全国公路总局商车指导委员会成立，主任龚学遂，委员虞洽卿、陈光甫等31人。

△　日军自是日起对苏北阜宁、滨海、淮安等县进行分区“扫荡”。

△　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757号，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努力粉碎中国“继续抗战企图”，扼制和严格监视“敌在华空军势力，及时将其歼灭，并努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同时要确保各占领要地，“实行对敌封锁”。

2月28日　经济部公布上年度国内工业技术发明之物品及方法，核准专利者共77案。

△　顾颉刚、徐炳昶、钱穆等100多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

是日在重庆举行筹备会议。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仙洲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出《1943年敌伪军工作方针》的指示，确定敌伪军工作由各级政治部统一领导。

△　国民党河南省扶沟县党部报告该县灾情严重，吁请速施救济。函称：该县去岁“麦秋未收，十室十空，一入冬季即闹春荒”，本岁更趋严重，全县“每日饿死约在350人以上，如再无法救济，则麦前百日内饿死当在35000人以上矣”。报告称：他如灾民焚烧死童，争食人肉，弃婴盈市，已进入人食人阶段，“若无救济良法则惨局演变，不知伊于胡底”。

△　中韩文化协会为纪念“三一”韩国革命二十四周年，在重庆新运礼堂举行演讲大会，该会名誉理事冯玉祥、韩籍常务理事金奎植、韩外务部长赵素昂等发表讲演，并展出韩国革命照片，高唱韩国歌曲。

是月　　国民党各工厂、矿场及各大学党部为庆祝中美、中英新约，发起铸铜鼎九座向蒋介石献礼。九鼎式样筹备会聘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设计，鼎铭请顾颉刚撰就，一切铸造事宜均由民生机器厂承办。

△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2月12日指示，同林彪见张治中，表示如国民党有具体办法，愿继续谈，或由蒋召见周、林谈，以便回延报告。张治中答，如承认“皓电”精神，尚可继续谈。3月3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于他有利时相机解决，否则是拖。要求我们更要机动策略谨慎地处理各事。

△　国家总动员会议通过《战时管制工资办法》，凡16条，公布施行。

△　财政部宣布采取人寿保险国家专业化政策，在民间普遍实施强制人寿保险。规定除前后方军人外，凡年龄在20岁至50岁间有职业之国民，一律强制为保险人，保险额最高为一万元，最低为2000元。

△　交通部拟定《西北交通建设方案》。10年内拟完成之具体方案为：一、赶筑铁路5840公里，最初一年完成天宝铁路，二年内将所计划之各线测量完竣并开始修筑；二、建立中心电信网；三、加强邮政设施；四、积极开辟新航线，增强国外物资之输入；五、利用原有大道辅助民间运输，并设法打通国际路线。

△　教育部制定《部聘教授服务细则》，凡九条，规定部聘教授“以讲学研究为主，并担任审议视察咨询事项”。

△　教育部通令研究可兰经，以回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暨三民主义思想共通点之研究极关重要，特电国立成达师范，约集该校回教师生及对该教义有研究兴趣之非回教师生共同研究，以期教义学说与立国主义融会贯通，并定可兰经为该校基本经典，组织专人着手译述。

△　黄炎培、冷遹到重庆曾家岩50号访周恩来、董必武、林彪，共同讨论世界局势的有关问题。

△　伪满北票煤矿台吉“报国寮”的特种工人100余人暴动逃跑。4月，又有40余人集体逃跑，个别被抓回者均遭杀害。

3月

3月1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设新疆省监察区监察使署，罗家伦、王籍田分任正、副监察使。次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国民政府特派刘建绪为福建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长兼试务处处长。

△　交通部公路总局成立，兼总局长曾养甫宣布工作方针。

△　中央训练团征募经购飞机九架、滑翔机20架，是日上午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献机命名典礼，礼毕各机升空散发标语并表演飞行技术。

△　宋美龄抵纽约访问。次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说，参加者1.7万余人。3日，美国纽约州、新泽西州等九个州州长代表访宋。5日，宋招待记者，促请美国派遣远征军赴华，宋谓对华援助必须考虑两种因素，一即军事，一即道义。以飞机、军火援华是军事上之援助，但若能派遣远征军赴华，甚至数目微小之远征军，亦可向世界表示美国系认真从事。

△　顾毓琇率领的中国文化教育访印团抵新德里。

△　行政院公布《植树节举行造林运动办法》，凡12条。

△　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与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决定》，决定成立晋察冀边区经济委员会，由程子华兼任主任。

△　鲁苏战区总司令韩德勤部为接应第十九集团军王仲廉部东进，乘日军向新四军大“扫荡”之际，侵占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双方发生严重磨擦。是日，韩德勤部在“南返原防收复失地”的口号下，突然向西侵占淮北根据地里仁集、陈家口地区。新四军规劝无效。中旬，韩德勤又亲率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等部偷渡运河，侵入淮北根据地中心区之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扣留根据地的区长，收缴区队的枪械，公然提出建立所谓洪泽湖畔新的反共根据地。

△　侵占江苏涟水日军在该县盐西区的十里、红窑、亚东、金圩等六个乡进行大屠杀，361人遇难。

△　拂晓，河北上北泉据点之日伪军100余人包围刘庄，以“开会”为名，将该村居民全部驱至一处，纵火焚烧，计烧死村民243名，灭门35家。次日，又将附近村庄前往慰问及收尸者打死七名，制造“刘庄惨案”。事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拨款2000元，进行救济。

△　日机六架轰炸湖南华容县梅田湖镇的扇子拐，投弹40余枚，并用机枪扫射一小时，炸死当地守军及居民30余人，毁房300余间。

△　在延安的朝鲜友人集会举行朝鲜独立运动二十四周年纪念大会。同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华北朝鲜义勇军及华北朝鲜革命学校各团体，亦在太行举行纪念会。

△　山东灾情严重。鲁灾筹赈会为此招待重庆新闻界报告称：山东“连年天灾兵祸，愈演愈烈。敌寇之扫荡固属变本加厉，三十年秋冬以来之旱灾，尤属不可言状，草根树皮均已食尽，因此瘟疫流行，人民逃亡，壮丁铤而走险，致资敌用者尤不可胜计”，呼吁募集100万元之款救灾。

△　日伪加紧统制上海金融市场，实行经济封锁。工部局布告，自本日起任何报刊广告均不得刊登任何商品的售价及关于物价与商业趋势的文字或消息。

△　伪满洲国建国节，汪精卫发表广播演说，称：“友邦满洲，自大东亚战争发动之始，即与友邦日本协力，‘中华民国’最近要由同甘共苦之声明进一步而参加战争”，“今后自更加紧密提携，并注意文化之交流，经济之联系，使彼此之受其益。”

△　日本大本营召集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及南方各军总参谋长会议，宣示《昭和十八年度帝国陆军综合作战计划》、《昭和十八年度兵备实施要领》等及本年度大本营意图，并就各方面的作战进行座谈，至3日闭会。

3月2日　　国民政府派马君武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原任高阳辞职照准。

△　日军第十一军“为彻底实现占领江南要域和确保对江北的安定”，部署第十三、第四十师团等部主力，自鄂北渡江发动对湘西的进攻。

3月3日　　国民政府宣布没收中德合组之欧亚航空公司德方股本，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派陈卓林任总经理。

△　何应钦访印后复在云南视察军事，是日偕史迪威返渝。

△　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徐诵明等一行三人，奉命视察各大学卫生设备及学生健康情形，是日由成都抵乐山，视察武汉大学。徐诵明称：在资金颇感困难情况下，教育部正考虑二点，一提倡学生生产（如养猪、养鸡、养兔、种菜等）以补益膳食；二通盘筹算膳食，“务使常人所需各种养分皆不缺乏，亦不致过多而浪费”。

△　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例会决定，本年度救国公粮18万石。

△　英国上院进行援华辩论，斯特拉鲍齐勋爵指出：如中印航线上有战斗机500架，运输机1000架，即可以将中国所需之装备完全运往中国；又称：日本之大工业都市与海军根据地均可由中国海岸加以轰炸。4日，继续辩论，艾丁敦勋爵敦促政府，予中国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3月4日　　蒋介石以中央大学兼校长身份赴校就职视事，邀集教职员50余人谈话，强调对学生“尤须注意于广义的教育”，“即不仅传授学识知能，而应切实指导学生之日常生活，整饬其仪容，严肃其纪律，振作其志气，培养其人格，期造成术德兼修之青年，堪任建国之干部，而后始克尽教育之责任”。随后参观校舍，并在食堂与师生共进餐。7日，复至该校对全体师生训话。14日，第三次至中大视察。

△　河北满城附近日伪600余人，押解民工1.5万余人，于满城以西之黑山至塘湖段挖沟修堡，企图分割与蚕食冀东抗日根据地。冀东八路军予以猛击，毙伤一部。7日晚，八路军又夜袭该敌，驱散民工8000余名，敌被迫停修。10日，日伪军千人，掩护民工二万余人再度在该地挖沟筑堡。八路军夜以继日，予以扰袭，解救民工1.5万人，并将所修沟壕全部平毁，碉堡公路悉予破坏，掩护修路的日伪军被击毙270余人。

△　青岛一群饥民高呼“宁愿打死，不愿饿死”等口号，将市内某处日伪所藏大米600包全部抢光。月中，烟台亦发生饥民抢粮事件，邮局、当铺均被抢，市内混乱达七日之久。

△　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与日方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规定：汪方应积极为分驻各地之日伪军搜集和提供各种情况，日军作战或“讨伐”时需征用劳力者，汪方应迅速提供之。

3月5日　宋美龄在纽约招待记者，促请美国派遣远征军赴华。

△　新任波兰驻华大使朴宁斯基向林森呈递国书。

△　重庆市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处长熊祖同谈重庆食油供应问题称：“本处掌握食油数量至巨，渝市食油供应绝无问题。”15日又称：食油供应“渝市每年约需7.2万担，现该处存底颇丰，每月以6000担供应市需，四月内当不虞缺乏”，“至以后来源问题，合川一带产量有限，恐不能完全解决本市之需要”。

△　湖北省监利县县长黄向荣，因“擅挪粮款”罪被处决。

△　抗联小分队在哈尔滨郊区滨洲线庙台子站西46公里处，拔掉道钉若干，使由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一列日本军用货车脱轨翻车。

3月6日　国民政府令外交部长宋子文出国期间派政务次长吴国桢代理部务。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简政实施纲要》。

△　伪满公布《矿业警察规则》，加强对煤矿工人的法西斯统治。

△　日本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454号指示发布《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事务指导纲要》，要求汪伪政府增强“独立担负维持肃正”及其辖区“治安的实力”，将其“直辖部队由11万人增加到25万人”，华北伪治安军保持10万人以内，伪蒙军一万人以内。“将原来以地方自卫安民为重点的武装力量，逐次加以统一整备”，使之大力“协助日本军作战”。

3月7日　国民政府派朱经农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长。

△　中央社报道各省、市实施限制工资情况称：“综观各省市自实施限制工资以来为期短暂，一般情形均甚良好，尤以工人团体深明大义，纷纷来电拥护。”“社会部为加强限制工资，以收全面管制之实效起见，复拟具第二步办法，经已分电各省市办理。”

△　中国地质学会在重庆举行第十九届年会，理事长朱家骅主持，到会200余人，收到论文105篇。9日闭幕。

△　日伪军3500余人开始“扫荡”冀南武邑、景县地区。

3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公亮为第十三军副军长。

△　军委会政治部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各军事学校政工会议，由张治中主持，至16日闭幕。决议统一各校政训教材，并经该部决定分为初、中、高、超四级。会议期间蒋介石曾前往“致训”。

△　重庆各界妇女4000余人集会庆祝“三八”节，英、美、苏驻华使馆妇女代表亦出席。大会发起举行献金捐购“妇女号”飞机，新疆妇女总会来电捐献50万元，重庆各界当天捐献收入达120万元。

△　宋庆龄为纪念“三八”节题词：“平等自由，声气相通，精诚奋斗，共建大同。”

△　绥远省三十二年度第一次行政会议开幕，省主席傅作义主持并致开幕词称：会议检讨去年工作得失，决定今年施政计划，安排各级工作进度，加强联系，促进效率。会期七日。

△　驻苏大使傅秉常抵莫斯科，当日与莫洛托夫会晤。次日，在克里姆林宫向加里宁呈递国书。

△　河南各界救灾会正式成立，呼吁抢救灾民。决议：一、电请中央及各省设法救济；二、电交通部及陇海路局协助运粮；三、电陕、鄂、皖三省接济食粮；四、电国内外各慈善团体、各地同乡会援助。

△　国民党便衣特务10余人，以逮捕“奸党”为名，闯入巴县人和镇重庆私立淳化高级商业学校，绑架学生二名，抢去现银八万余元。该校学生激于义愤派代表向镇公所请愿，复被指为“奸党”，并遭毒打，交押县府。

△　鄂北日军第十一军各主力部队发动渡江作战。晚，樱井支队分南北两队，分别从窑头铺、新关庙隐蔽渡江，于9日晚攻入布河、东岳观地区。

3月9日　　实业计划研究会组成之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委员会第一考察团，团长叶秀峰等一行，由重庆飞抵兰州，考察大西北。

△　美国大使馆秘书戴维斯致高思大使备忘录，称中国政府不愿采取攻击，意在保持实力，以备战后与中共作战，而依赖美国进攻日本。又称：国军士气低落，贪污腐败，政治派系纷争，史迪威处境困难。

△　日军攻占湖北公安县新口，杀死镇内200人，旋又侵入闸口，

杀死居民50人。

3月10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发行。该书宣扬“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国家中心论”，诬蔑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割据”，声言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是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社论《读〈中国之命运〉》，称：“这部大著中，已经指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要求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一律“通读”。11日，中央社报道：该书首批万卷“瞬息售罄”。

△　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

△　陈诚与史迪威在重庆晤商军队训练计划，初步决定在昆明陆军训练基地调集各部队干部8000至9000人，分批训练。另在印度蓝伽训练六个团。

△　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会通过《战时取缔奢侈行为办法》，凡15条。

△　驻英大使顾维钧、驻比大使钱泰，乘机启程分赴任所。美驻华大使高思奉召回国，亦同机离重庆。

△　一批中国空军留美生学成毕业，是日在美西部空军基地举行毕业典礼。罗斯福总统与宋美龄致电祝贺。

△　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一部进入鲁南，强占八路军滕（县）峄（县）边区，宣称：“剿共重于抗战”，制造国共摩擦。

△　湘鄂西日军占领华容、藕池口、江波渡等地。第六战区所部为夺回藕池口等地，12日起与日军展开激战，均遭失败。

△　日本银行对汪伪联合准备银行提供贷款二亿日元。周佛海对此发表谈话，表示“对友邦协助，敬致谢忱”。

△　英市长会议决定，自本月23日起，全英举行中国国旗日，募集捐款20万英镑，并通过邀请宋美龄访英。

3月11日　蒋介石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发表广播讲演，认为精神总动员“实在没有彻底做到，更没始终如一地做到”。他说：“战时的生活没有能厉行，新生活的信条还不能普及，国家总动员的法令还不能贯彻，经济管制的办法更没有普遍实施，这些都是我们无可讳言的事实。”要求“全国同胞从此统一建国的信仰”，“运用精神力量加强经济建设，纠正一切缺点，彻底革新生活”。

△　宋庆龄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张并呼吁“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予同等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家总动员会议组织条例》及《房捐条例》14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继援为第八十二军代军长，杨震南为第五十一军副军长。

△　美驻中缅印派遣军总司令部致函军事委员会称：根据蒋介石指示之方针，与陈诚司令长官面洽，拟即“在昆明设立训练班，以训练现在云南的部队，并在各部队中配置联络军官，以利工作进行”。

△　美驻华空军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该航空队在驻中缅印美国陆军总司令之下，由陈纳德指挥。同时，晋升陈纳德为少将。是日，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正式宣布该航空队成立。15日，国民政府设宴祝贺陈纳德就任新职。为支持陈纳德的空袭计划，罗斯福总统答应给该航

空队充实到500架飞机，并且让它每月从供应中国的4000吨物资中获得1500吨。

△　英皇接见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同日，国民政府驻英、荷使节分别宴请熊式辉。

△　成都国际电台与伊朗德黑兰电台开放直达通报。

3月12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例会，听取王世杰代读外交部报告及交通部部长曾养甫交通设施报告。

△　陈诚偕史迪威自重庆飞抵昆明，赴滇西、滇南一带视察。

△　四川省广汉县仓库仓储股长林约樵就四川省粮政机关贪污腐败的情况，密函粮食部，归纳弊端八项为：征购混淆，实物转移，量器差异，衡器各别，标色虚伪，包商狡诈，运商昧骗，同类尴尬。函称："上陈不过举其概略，如此为公服务，不啻为私造孽，国运艰迍，人心难挽，赡念前途，刻刻自危。"

△　重庆16名违反限价奸商，被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下令押解戴高帽游街示众。

△　为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江西、陕西等省奉令于是日在纪念大会会场当众焚毁"禁书"一批，计江西焚毁书籍有何干之著《转变期的中国》等36种160册，陕西焚毁书籍有李富春著《抗战与军队工作》、孙冶方著《全面抗战的理论基础》等41种322册。

△　日本宣布将去年轰炸日本所俘之美飞行员判处死刑。

△　英国外相艾登抵华盛顿会商战时、战后有关问题。13日，艾登在华盛顿宣称：美、英、中、苏四国之合作，实为稳定和平不可少之条件。15日，艾登与在美之中国外长宋子文会谈。26日，艾登在马利兰州议会发表演说，保证英将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

利。30日，艾登离美赴加。

3月13日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贵州省三都县胡嚣，表彰其捐赠该县民教馆图书价值30余万元。

△　波驻华大使朴宁斯基转交波兰政府赠予蒋介石之陆军最高勋章。

△　国民党河南鲁山县党部书记长赵广心报告该县灾荒严重，饿殍载道，烹杀灾童，煮食人肉，请求迅予设法救济。同月，河南郑县、太康、确山等县亦相继报告各县人食人肉，甚至食其死亡之亲生女儿的人间惨剧。

△　日机八架趁雨扰桂，在桂林市郊低飞扫射约半小时。

△　汪伪军委会发出关于扩充苏、浙、皖伪军的密令，扩充兵力总计为10.83万人。

△　日本首相东条抵南京访问，先听取畑俊六军事报告，继与汪精卫晤谈。翌日，又与汪晤谈一次，即赴上海与日驻华舰队司令吉田善吾等商谈军情，于15日返日。据日政府公报称：东条此行系回拜汪精卫去年之访日，并感谢汪伪对英、美宣战及商讨“共同贯彻战争之方案”。

3月14日　军事委员会调整战斗序列，撤销第三集团军建制（9月28日又宣布重建）。同日，任命曹福林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张雪中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任命张际鹏为第十四军军长，汪之斌为第七十三军军长，李用章为第一军副军长。

△　军委会发表公告：抗战六年来敌使用兵力116.8万人，为我方击毙、俘虏者达五分之一。

△　在安徽和县裕溪镇罚做运煤苦工的上海四行孤军一行88人，

是日工毕返队途中，由团附雷雄率领，乘机向敌兵猛扑，夺得轻机枪两挺，步枪九支，与敌肉搏血战，逃生者50余人，于6月3日徒步到达叶县，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　华侨教育协进会在重庆成立，主席余俊贤。

△　延安教育界集会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吴玉章、徐特立、罗迈、赵毅敏等出席。边区教育厅长柳湜讲话中说：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就是要接受过去全国教育工作中的一切优良经验，尤其是陶行知先生的经验，以继续改进边区教育。

△　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部乘新四军反“扫荡”作战之时，侵入淮北泗阳县西南山子头莫塘坝地区，图谋抢占新四军根据地。

△　鄂中渡江之日军因受我军打击全线崩溃，向北回窜。

△　驻山西省汾阳县日军宪兵队长土井纠集交城、文水、汾阳三县日伪军到各地大搜捕群众284人，在汾阳临时监狱用酷刑屠杀近200人。

3月15日　蒋介石赴贵州视察。22日，出席贵阳各界扩大总理纪念周讲话说：“现在的贵州是我们中国最快乐的神仙境地”，提出贵州建设的急务是“提倡教育以培植人才”，“广植森林以开发地利”，如此“不出十年，我们贵州一定是遍地黄金，成为人间福地”。27日，返回重庆。

△　航空委员会宴贺陈纳德晋升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白崇禧致词，请美增派飞机500架来华。他说：如是则敌之第一线空军必可完全击溃，而其第二线亦因打击过重无法补充，这样即可达成卡港会议后罗斯福总统“以空军击溃日本”之希望。

△　重庆至宝鸡公路联运通车。

△　中印双方达成开辟蒲犁至米斯嘎邮路协议，中方以蒲犁为互换局，印方以季尔吉脱为互换局，自本日起开始办理。

△　汪精卫为东条访问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如果重庆方面民心向我，则问题已解决大半，他们对我们的和平运动曾经半信半疑。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和平运动步步前进，中国能这样达到独立自主，他们即将衷心向我，此点我甚为乐观。”

△　伪满滨江省警务厅纠集哈尔滨等地日伪军警500余人，对巴彦、木兰、东兴实行“一齐大检举”、“大搜捕”。至5月25日，共进行两次大逮捕，破坏巴、木、东三县抗日救国会14处，青年义勇队13支，622人被捕。

△　英国议会访华团团员泰弗亚在伦敦英上院发表演说，要求英政府增加对华贷款并不附限制。

3月16日　周恩来再告美国大使馆秘书戴维斯，说明美国派员访问延安之必要，并盼在陕北建筑机场。戴维斯即书面向美国务院报告。

△　四联总处制定《战时各行局代购生产原料办法纲要》及《四联总处原料购办委员会代购生产原料实施办法》。

△　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之苏联版画展览开幕，展期一周，至22日闭幕，观众达五万余人。嗣后又在兰州、昆明、桂林等地分别展出。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德能为第四军军长。

△　重庆实行凭证购肉。市民须先参加各镇合作社为社员（至少认一股，股金50元），然后凭户口保结单、户口身份证及镇合作社社员证等，始能领得购肉证。

△　日机24架袭川，在万县上空分批投弹，并用机枪扫射，弹多

落郊外，损失甚微。

△　日本大本营将在东京由独立步兵联队为基础编成的第六十一师团调往南京，编入第十三军战斗序列。

△　汪伪行政院会议决定，派陈君慧为接收天津日本专管租界委员；吴颂皋为接收汉口日本专管租界委员；陈群为接收厦门日本专管租界委员；傅式说为接收杭州日本专管租界委员；李士群为接收苏州日本专管租界委员。

3月17日　国民政府特派驻美大使魏道明为互换中美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军事委员会任命彭位仁为第三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陶柳为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尚志为第三十九军军长，王甲本为第七十九军军长。

△　墨西哥首任驻华代办卡斯托瓦尔抵渝。31日，往外交部拜会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胡世泽。

△　聂荣臻、萧克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报告晋察冀军区北岳区（包括冀中军区转至平汉铁路以西之部队）重新改编后主要领导成员名单：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元发；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赵尔陆；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黄平；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寿发，政治委员刘道生。

△　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在第二、第三师一部配合下，对侵入淮北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部进行自卫还击。至18日上午，胜利结束战斗，计歼韩总部、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1000余人，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等。山子头战役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为顾全大局，发还人枪。31

日，韩德勤被礼送出境。

△　日伪6000余人“扫荡”皖中巢无地区。新四军第七师乘敌后空虚攻克无为以东日伪据点多处，歼敌300余人，迫其于30日撤回。

△　日军在山西平定大批逮捕知识分子，是日山西大学毕业生李炽亭、老教育家梁玉麟及平定中学毕业生多人被捕，押赴阳泉车站。

△　晨，日机24架由鄂袭川，中途一部分折返，余八架飞梁山，以机枪扫射后逸去。

3月18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凡15条。20日，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五年边区移民已达10余万。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合编为新的山东军区，对外仍保留第一一五师的名义。罗荣桓任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和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新的山东军区部队共九万余人。

△　华北中国人民反日大同盟就南京伪警卫第二师及独立第十四旅被日军强迫调赴南洋参战事，向华北伪治安军、伪警备队等发出紧急通报，说明日伪此举是日汪密约的具体实施，号召伪军“官兵相约，死不离开本地，不出外洋给日寇当炮灰；监视日籍顾问、指导官行动，事若紧迫，即枪杀他们然后反正；赶快找抗日政府、八路军商讨对付办法”。

△　日军3000余人从淮阴出发向北“扫荡”，企图一举扑灭驻六塘河沿岸的淮海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营第四连奉命在刘老庄英勇抵抗，激战终日，毙日军170余人，伤200余人。该连指战员82人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军民在刘老庄修建了“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墓”，八路军总部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

3月19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英如交还香港，我可自动宣布

香港及九龙区为关税自由港，但不能以此作为交还香港条件。

△　国防最高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委兼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视察东南各省经济及地政，自桂林抵耒阳。20日，与湖南建设厅、动员会议各方面谈湖南经济情况，当晚赴广东。23日抵江西。

△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卓英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甘肃靖远县段守福“慷慨捐资，兴办学校”，并准颁“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交通部次长徐恩，曾于视察粤汉路支线及杨梅山矿区后抵韶关，访余汉谋并约集党务人员晤谈。20日，离韶赴桂，25日公毕返渝。

△　军政部兵役署批准给予冀、察各县14支地方武装，包括独立活动以冀察区挺进纵队支队等名义之“潜伏武力”，并自2月份起月发“活动费”8000元，以“与敌奸争取各种武力，借以配合将来大军反攻，兼相机建立游击根据地”。

△　苏联雕刻艺术作品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展出；画家徐悲鸿亦于同日在重庆举行画展，展出作品200余幅。

△　中国、伊朗无线电直接通报。

△　鲁南峄县伪军李学明率部200余人反正。

△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接见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双方交换关于军事问题及战略问题的意见。

△　美布莱恩夫人捐赠美金10万元救济中国难童。

3月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华北党政军民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并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　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第一一四团，在卡拉卡、唐家卡救援被日军袭击的英印军1000人，并接替该线防务。随后，由利多东南方进入缅甸北部、中印缅边境人烟稀少、地形复杂的野人山，担任掩护修筑中印公路的任务。

△　顾祝同关于苏南新四军的情报称：截至是日，新四军“集结于丹阳西南延陵镇者约千余，集结于溧阳西北自马桥附近者万余”。同时，皖南新四军与之呼应，“大有由铜繁窜扰泾县、旌德，恢复二十九年（1940）前之趋势”。情报称，已奉蒋介石“特电意旨”命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陶广“负责统一剿办”。

△　波兰驻华大使朴宁斯基宴请重庆新闻界，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邵毓麟、中宣部秘书长吴士英等作陪。

△　广东伪潮阳县自卫大队长郑忠顺率部143人投诚。

△　日本陆军省任命松井太久郎中将为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柴山兼次郎继任最高军事顾问。

△　英国际青年大会电中国青年致敬，表示希望携手前进，“直至人类公敌轴心法西斯主义被完全毁灭”。

3月21日　宋美龄在芝加哥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回答有关中国

抗战与盟国作战目标等问题，强调中国需要“更多之飞机”。随后视察唐人街，受到侨胞及当地居民热烈欢迎，交通为之阻塞二小时。

△　冀东八路军在热南发起支持群众反“集家”斗争的战役，至5月底，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伪军500余名，缴炮二门、机枪17挺，毁汽车10辆。

△　驻天津近郊伪军齐燮元部发生内讧，日方派兵缴械，齐部与日军发生冲突。

3月22日　何应钦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国内各战场敌我态势及赴印视察观感。

△　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善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新任绥蒙副指导长官傅作义就职视事，原绥蒙副指导长官朱绶光卸职南下，向绥蒙指导长官阎锡山复命。

△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驻汪伪大使重光葵签订《北平公使馆区域收回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

3月23日　蒋介石核定云南练兵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按计划参加训练的军队共11个军31个师。随后，蒋介石与史迪威在指挥权限及提供人力、武器上发生分歧。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级党部，规定厉行新生活运动为本年度中心工作之一，要求各级党部“将办理情形列入工作报告中，按月具报，以资考核”。

△　行政院例会通过《保障出征抗敌军人婚姻暂行办法》，并决议将省立重庆大学、英士大学、山西大学改为国立及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

△　上海四行孤军施彪等九人脱险抵重庆。26日，三青团重庆团部举行欢迎会，由施彪等报告与日伪搏斗经过。

△　四川彭县民众因反抗国民党强拉壮丁发生暴动，与当地驻军发生武装冲突，直至28日，双方均有严重死伤。5月24日，四川军管区政治部主任骆德荣致军政部的报告称：此事“远因系过去失意乡镇保长、在乡军人纠集哥老欲攫取地方权位，借以发端。近因是驻县属之书经台警察中队奸淫掳掠，引起人民痛恨，致被共党利用”。报告称，此次“暴动前有组织有计划，暴动时指挥亦属得法”。“现匪患虽平，其他相机待动之分子，尚潜伏各乡镇，倘不严密清查，加强组织，难免重演事变”。

△　罗斯福总统宣称，将调查日军在华使用毒气情形。

△　美红十字会宣布，以美金五万元捐赠中国红十字会，“以协助应付其战时之责任”。

3月24日　内政部发表全国保甲统计：全国共计30余万保，400余万甲，其中四川计6.2843万保，72.3372万甲。

△　中国史学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顾颉刚、金毓黻、黎东方及浙江大学教授方豪、中山大学教授陈安仁、西南联大教授姚从吾、陈雪屏、西北大学教授黎锦熙、武汉大学教授吴其昌等百余人。顾颉刚任主席并致开会词，黎东方报告筹备经过，通过会章并选举顾颉刚、吴敬恒等28人为理、监事。

△　中央国术馆举行十五周年纪念会。馆长张长江昨日发表谈话称：国人体格素弱，抗战前教育部曾检验公私立41所大学1.2955万学生，完全无病者仅10％强。抗战军兴，同胞流离转徙，生活水准更行降低，发展国术实为健全国人体格所必需。

△　李仙洲部第一四二师主力侵入冀鲁豫边区丰县东北十字河地

区。

△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在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代表大会，山田松井、水野为主席团成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出席祝贺。会议就日本士兵如何开展有组织的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1943年度华北方面军作战警备纲要。提出重点指向共军，以期消灭中共势力。

△　日军决定自4月1日起，停止在华中、华南占领区发行新军票。日在华国库支出及其银行存款、借款、汇兑等项支付，不再使用军票。

3月25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飞桂林，视察粤、桂、湘、黔等省限价及经济建设。次日，召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等座谈限价实施方法，当晚离桂赴湘。28日，由衡阳抵耒阳，视察限价实施情形及农林建设。31日抵江西太和。

△　军事委员会电令制定《限价议价物品种类补充办法》五项及《各省市重要物品价格联系调整办法》六项。

△　国民政府任命任建鹏为内政部警察总队总队长、王广庆为国立河南大学校长。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学生吴昌达，因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江西新淦县（今新干县）被日伪包围，同时遇难。

△　行政院为中华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美籍干事兼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驻华总干事艾德敷来华工作届满36年，设宴祝贺，并由孔祥熙面授奖状。

△　伪满北安省明水县明水街居民500余人包围伪县公署，要求配

给粮食，遭县公署镇压。

△　日、“满”驱使大批中国劳工修建的松花江丰满水电站建成，是日发电。

△　美驻苏大使馆参事杜门向美国务院报告与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谈话：傅称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军队将进入新疆、蒙古及东北，必会支持中共部队反叛中央政府。一旦苏联军队占领东北，势将难以使其撤离。

3月26日　国民政府任命涂允檀兼驻萨尔瓦多特命全权公使，免去沈觐鼎原兼公使职。

△　国民政府公布《竹木皮毛瓷陶纸箔税条例》，凡12条。

△　财政部呈送行政院关于中美第四次借款修正合约，商定将原借款合约之借款动用期限，由1942年底延展至1943年12月31日。

△　国家总动员会议致电财政、经济、交通、农林等部及各省府主席，转发政府制定之《各省市重要物品价格联系调整办法》六项，要求“通力合作，切实遵行”。

△　农林部公布《强制造森林办法》，凡23条。

△　宋美龄抵旧金山访问。29日在旧金山招待记者，称其访美并非有所恳求，惟望美人增强了解。

△　彭德怀电告毛泽东、朱德：蒋鼎文令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之第十四、第二十七军、新五军，及由地方民团编成之游击队约10个团，准备向北推进，收复平顺、武安和涉县；向西收复中条山之所谓“丧奸区”（指八路军辖区）。蒋鼎文企图以反共和缓敌进行大进攻。根据目前情况，拟在自卫原则下给其一部以打击。翌日，毛泽东、朱德电示：“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

策”，仅在万不得已时，方可在严格自卫的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

△　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发表告全省殷商富户书称：河南灾情未减，“目前严冬虽过，粮食更属缺乏，粮价益复高涨，非特待救之户无力购买，即自足之户，亦将无以自济，辗转相因，灾民困苦，势将更趋严重”。呼吁富户“醵集粮款，贷予灾民”。并称：贷予之粮款，“灾民有不动产者，即以不动产作抵押品，无不动产者，应由县政府以散放急赈性质贷予灾民，并按贷借数目给以凭证，将来由县政府负责偿还”。27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发表赈济豫灾经过称：已先后拨发赈款7400万元。

△　绥远伊盟蒙胞因反对当局开垦伊金霍洛圣地，发动武装“都贵”（蒙语联合请愿之意），包围沙王府及绥境蒙政会，并有蒙兵1000余参加，双方冲突，蒙民死伤30多人。事后据处理该事件之绥蒙会参事任秉钧称：此次事件纯为蒙旗一种“都贵”事件，绝无其他背景，故绥蒙会同人希望和平解决。

△　汪伪行政院派日本顾问海口守三常川驻南京任财政经济咨询及联络工作，船津辰一郎等分别驻上海、杭州、蚌埠等地任财经咨询及联络工作。

△　日本第八十一届议会闭幕。此次议会已历时两月余，共通过法案89件，其中包括战时非常权力法案、修正战时特别刑法案、1943年至1944年之收支预算案以及360亿日元之非常军事支出预算案等。

△　英国外相艾登在美演说，保证英决对日作战到底，战后中、美、英、苏四强分担和平责任。

△　澳大利亚人士是日起在墨尔本举行援华募款运动三周。同日，路透社电称：驻澳公使徐谟接受墨尔本市赈济中国灾民捐款2.5

万镑。

3月27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第五届年会，主席邵力子致词，舒舍予报告会务，郭沫若、茅盾等演说。30日闭幕，通过致前方将士电及演剧募捐，严禁盗印，救济贫穷作家生活等提案，并改选理、监事。选出在渝理事舒舍予、茅盾、郭沫若、姚蓬子、张道藩、王平陵、邵力子、胡风、夏衍、孙伏园、宋之的、阳翰笙、徐霞村、姚雪垠、叶以群、曹禺、陈纪滢、冯乃超、马宗融、李辰冬、梅林21人；外埠理事巴金、张天翼、洪深、朱光潜、沙汀五名；候补理事臧克家、戈宝权、孙罗荪、徐盈、陈白尘、黄芝冈、陆晶清、王亚平、黎烈文、曹聚仁、张骏祥、葛一虹12名；监事冯玉祥、叶楚伧、华林、郑伯奇、曹靖华、潘梓年、谢冰心、张西曼、顾一樵九名；候补监事马彦祥、徐仲年、崔乃秋、张恨水四名。

△　中美举行供应会议，以滇西及西南方广大地域只靠滇缅公路为惟一供应路线，不敷应用，决定组织18个运输团、四个驮马大队（4000匹骡马），用人力、兽力补汽车之不足。

△　国民政府令追赠周名琳为陆军少将。

△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驻汪伪大使重光葵签定《关于交还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定30日由汪伪“实施收回”，但须“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在上述租界内”之一切特权。

3月28日　何应钦会见周恩来、林彪，周、林就韩德勤被新四军俘获一事作出解释，同时提出国民党军队在鄂东、苏北、皖东、广东等地的进攻问题。要求再见一次蒋介石，并给准备返回延安的百余人发护照。何同意由张治中答复。

△　陈诚自重庆飞抵云南楚雄（远征军司令部驻地），正式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已先期到任。

△　重庆市疏散督导委员会成立，市长贺耀组任主任，决定4月1日起实行疏散。4月1日至15日为劝导期，4月16日至30日为督促期，5月1日起为强迫期。

△　新西北建设协进会在重庆成立，主席于右任致词称：该会“旨在研究西北问题与协进西北建设事业”，以期“建设新西北”。

△　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重庆开幕，通过提案要求提高收购农矿产品价格，对农民、矿民平价配给生活必需品，以维持再生产。

△　中国县政学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在重庆召开。内政部部长周钟岳主持并讲话称：各省对于新县制之推行，有待努力者甚多，如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负担太重，而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以及征兵、征工之流弊与政教合一之困难等。会议推蒋介石为名誉理事长，戴季陶、孔祥熙、朱家骅、谷正纲、何成濬等为名誉副理事长，周钟岳为理事长。

△　四川郫县、彭县一带，“壮丁千余，聚资换帖，饮血酒反抗抽丁”。

△　日方“移交”上海申新等24厂，梅思平为此发表谈话，表示“不胜感激”。

△　汉奸王揖唐为华北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发表广播讲话，宣称：自3月30日开始实行华北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为期两个半月。

3月29日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到会代表400余人，蒋介石主持开幕式。会期两周，于4月12日闭幕。

△　重庆各界集会纪念黄花岗节，并赴遗爱祠先烈墓地举行公祭典礼，刘峙、邹鲁讲话。同日，于右任在重庆中枢纪念周讲话，号召以黄花岗烈士革命精神鼓励前进。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

员张继播讲《为抗战胜利应效法先烈精神》。

△　延安青年集会，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朱德、吴玉章、凯丰发表讲话，号召全国青年加强团结，不受任何利诱威胁，分辨是非，坚持真理，发扬先烈牺牲奋斗精神，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大会致电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称："我们始终希望贵团教育青年能以有利抗战，有利团结，有利青年自身为标准。我们更始终希望与贵团在为祖国生存的奋斗中亲密携手，盖如三民主义的青年，在此时此地犹不能与共产主义的青年携手，于理既不可解，於事尤不可通。"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抗战以来"或以倡率义旅奋斗牺牲，或以被执不屈从容就义，或经备受摧残抑郁以殁，或为执行任务惨遭狙击"之各省、市党部委员及县党部书记长朱坚白、刘承瑞等35人。

△　教育部定是日起至4月4日在全国举行第二届师范教育运动周，以推进师范教育。

△　旧金山华侨盛大集会欢迎蒋夫人宋美龄，并呈献35城华侨之捐款。

△　汪伪政府与意大利政府签订《交还北平使馆区域行政权协定》，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意大利驻汪伪大使戴良谊签字。

△　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社论《中国之旱灾》，呼吁与中国缔盟国家救济河南灾民，称此乃"当前迫切问题"。

3月30日　国民政府令定《水利法》4月1日起施行。

△　国民政府明令陆军少将马崇六晋任陆军中将。

△　中国劳动协会第四届年会在重庆开幕，朱学范致开幕词。会议三大任务为：号召工人增加生产，增强国际劳工团结，共谋改善工

人生活。4月1日闭幕，通过宣言及决议案20余项，并改选理、监事，朱学范等31人当选为理事，陶百川等九人为监事。

△　墨西哥首任驻华代办卡斯托瓦尔抵达重庆。次日，前往外交部拜谒代理部长吴国桢及常务次长胡世泽。

△　日机10架分四批轰炸浙江丽水，投弹60余枚，死伤20多人。

△　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三周年纪念，汪精卫发表《敬告全国国民》，称：当前任务是要集中全部心力物力，协力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

△　日、汪双方分别在汉口、天津、苏州、北平、杭州，举行交还接收日本专管租界及北平使馆区仪式。

△　伪满公布《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同日，伪满兴农部、治安部制定《饭用米谷配给要纲》，对食用米谷一律实行配给制，特别对家庭用米谷采取通帐、特配通帐及外食券等办法，严加控制。

3月31日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听取中央团部组织处、秘书处、视察室、编审室工作报告，并由戴季陶讲话。戴提出“立大志、发大愿、做大事、成大业，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至孝”等做人方法20条。

△　宋美龄抵洛杉矶访问，洛杉矶市政府宣布是日为“蒋夫人日”，市长以卷轴赠宋美龄。

△　国民政府公布《公证法》。

△　湘鄂西日军占领藕池口、米积台、石首、华容等地之后，停顿于上述一线，湘北鄂西作战第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日军动用兵力五万余，中国投入兵力约3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据日方公布数字：遗尸8604具，俘虏2.3214万人，缴获迫击炮118门，重机枪

54挺，轻机枪303挺，步枪7879支；日方自称损失，死254人，伤891人。

△　英艺术家援华展览会在伦敦开幕。

△　台湾总督府解散已历时48年的全台壮丁团。

是月　行政院核准教育部国立礼乐馆成立，馆长陈果夫。该馆任务为“掌礼制乐典之厘订及音乐教育事项”。

△　教育部中央民众教育馆在重庆正式成立，内分民范民俗及戏剧、教育三部，每年经费及事业费共百万元。

△　中华海员工会特派员办事处前在香港发行之《海员通讯》，因太平洋战事发生停刊，本月改名《中华海员季刊》重行出版。

△　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正式建立，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机关设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盱眙县大王庄。主要任务是领导上海、江苏敌占区中共党的工作，开展敌占区的地下斗争，恢复和整顿组织，审查和保护干部等。

△　苏联驻华大使馆以西安出版的《力行》杂志第七卷第三期《苏联外交政策之史的观察》一文，对苏外交政策进行歪曲和攻击，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　华北沦陷区发生严重粮荒，日军四出抢粮，平、津一带饿殍遍野，仅北平一市每月饿死者平均300人以上。

△　伪江苏省长李士群与侵华日军签订《关于苏州第三期清乡地区扩张工作之协定》，规定：自4月1日开始，在无锡县第八区许舍乡、王塔乡等未清乡地区开始“清乡”，预期两个月，5月后完成。该地区清乡负责者，日军为第六十师团长，汪伪方面为李士群。

4月

4月1日　　中国农民银行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仪式，兼董事长孔祥熙报告该行十年来业务开展情况，董事陈果夫、来宾徐堪等相继致词。是日起至3日，举办与该行有关之农田水利模型、农业产品等展览。

△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日起至3日举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听取中央团部监察会及各省、市地方团部工作报告。

△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战时组织条例》。

△　四川省物产竞赛会在成都青年宫开幕，设工业、手工业、农林、水利、矿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馆。各县参加者60个单位，迁川工厂、机关、学校参加者74个单位，竞赛品4730件，会期半月。省府主席张群致开幕词，叙述青年宫花会历史，及利用花会习俗举行此次竞赛会意义，谓一方面要从各个具体竞赛中来增加生产数量与改良产品品质，一方面要使与会各从业同胞了解限价法令之意义，更加努力，以期达到省府本年施政计划之重要要求。

△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开幕，13日闭幕。通过实施公开审判、施行职工福利金条例、改善新兵待遇、改善物价管制等多项提案。

△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举办本年度三民主义论文竞赛，定本年举办两次：第一次4月1日开始征求，7月底截止，8月评选，9月1日公布结果；第二次6月1日开始征求，11月评选，12月1日公布结果。第一次论文竞赛题目为：“一、我为什么信仰三民主义；二、三民主义与战后世界之建设；三、三民主义与新中国图案。”

△　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建立交通线问题的指示，要求北方局、华中局、山东分局及晋绥分局必须不惜人力财力选派强的、有组

织能力的、有交通经验的可靠干部立即建立交通局。今后各地派来延安的干部必须在交通路线有把握的条件下，按指定路线出发，不得自由行动，以保障安全。

△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号召全军节食助赈，即日起每人每天节约小米一两。

△　西北公路酒泉至敦煌线通车。

△　湖南空战。日战斗机12架，空袭衡阳、零陵，中美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机四架，亦被击毁四架。同日，日轰炸机在九架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建瓯机场，破坏了该机场飞行跑道。

△　日伪对苏中通如、海启地区开始“清乡”，新四军及苏中根据地人民进入艰苦的反“清乡”斗争。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该会第四届委员名单：当然委员：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江亢虎。延聘委员：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朱琛、汪时璟、赵正平、诸青来、赵敏松、岑德广、王荫泰。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越、肖叔宣、李士群、高冠五、缪斌、陈春圃、罗君强。

△　汪伪在南京举行中日文协第二届大会，发表宣言称：“今幸两国贤达幡然觉悟，此后共存共荣，尤须先谋中日文化之沟通与东亚文化之创造，各以所长，互匡所短，此则本届大会主席（指汪精卫）所训示之大旨。”于3日结束。

△　伪满民生部教育司改为文教部；撤销治安部，设军事部和警务总司。卢元善任文教部大臣，邢士廉任军事部大臣。

△　台湾总督府宣布全台实施义务教育。6月29日，宣布台籍学龄

儿童就学率达89%。

△　东条英机抵长春访问伪满。4日午后返日。

△　日本大本营第十五课长松谷城大佐就中国方面情况向大本营作专门报告，其中关于中共问题称：华北共产党实难对付。现正从事土地革命、社会革命。中原会战、浙赣作战以后，共产党新四军全部开来，虽经扫荡战，但治安紊乱状况正在恶化。共产问题严重，华北的现状可以看做变相的日苏战争。

4月2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王世杰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参政员黄炎培、陶百川、邓飞黄、许德珩、王云五等提出询问案数起。

△　中国劳动协会召开第四届第一次理监事会议，推朱学范、水祥云、易礼容、程壮、刘兆洋五人为常务理事。陆京士、王宜声、张剑白三人为常务监事。并决定增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劳动文化委员会、劳工福利委员会、生产技术研究委员会等组织。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代表冀东700万人民，通电全世界控诉日军暴行。电称：日军在“长城线内外30里，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普遍实行集家并村，房子尽行烧毁，人民遭惨杀与冻饿者，不下数万人，灾情之严重、情景之凄惨，人民之痛苦，形势之迫切，非笔墨所能尽言，非语言所能形容，种种罪恶令人发指”。通电列举大量事实，指出：“日寇不但是我冀东及全国人民之公敌，乃全世界人民之公敌，我等谨以敌寇在冀东一切罪行，向全世界人士控告并誓与全国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早日消灭此蟊贼，并迫切企望给我处在水深火热之冀东人民以有力声援。”

△　长江北岸日军由湖北江陵南渡，在涴市东强行登陆，次日晨侵入涴市。

△　汪伪军委会参谋总长、原国民党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府主席刘郁芬在北平病死。7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任命鲍文越为参谋部长，叶蓬为陆军部长，黄自强为陆军编练总监。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宣布成立“华北剿共委员会”，朱琛兼委员长。

4月3日　　四川省丰都县商会等团体反对摊派同盟胜利公债及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称：此次奉派两项公债合共301.3333万元。“下县逖听之余不胜惶悚，盖丰都原有人口40余万，年产租额仅30万石，每年民食尚感不敷，仰给于邻”。“而农村破产，城市奇窘，正不堪问，依据丰都直接税局之调查，全县营业资金不及千万，全年所收营业税款不过50万元……产业落后，商业萧条，随时均有捉襟见肘之虞”。丰都去岁被列为次重灾区，“至今购粮代金犹未收齐”，“实难以购公债”，呈请予以减免。

△　经济部抄发监察院战区第一巡察团关于湖南省限价弊端的报告称：“自平价命令发布以后，本来严重之湘省物价问题反发生下列诸种不良之严重现象。”主要为：市面物品缺乏，“暗盘实价仍高出平价数倍无法查禁”。驻军“假借武力常于乡间及城市附近强迫以平价购买民间物资”，“转售贸易，借图渔利”，“一切货物产销之税捐反日形加重”。报告称：“因上述诸种原因遂致湘省平价工作徒有其名，而实价反日趋飞涨，物资日形恐慌，人民倍增痛苦，农村日形穷困，半年而后，湘省物价恐将与重庆、昆明等地同一昂贵情况矣。”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自是日起至翌年4月3日，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

△　名画家徐悲鸿为助赈豫灾，特将其画马题为“哀鸣”，是日起在重庆义卖三日。

△　日本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报告在华美空军动向："自2月中旬积极实施作战准备的美空军，到3月31日下午，其战斗队主力（战斗机约40架）及部分轰炸机（七架B—25）进入桂林、零陵，同时要求提供4月1日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建省沿海一带气象通报等，有对中国沿海地带发动攻势以及空袭日本本土的明显征兆。""担负空袭日本本土的B—24仍在云南一带。判断有以该地为基地进攻之企图。"

4月4日　　蒋介石主持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总理纪念周，讲话强调："今后整个教育方针，应以《中国之命运》一书之内容为其依据，应以造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五种建国干部为重点。"

△　全国各地庆祝儿童节。重庆市庆新小学学生发起节省糖果费救济河南灾童，募得3000余元。桂林儿童慰问征属，兰州儿童集会通过造植儿童林，延安儿童举办儿童作物展览。

△　国民政府令定黄帝诞辰为音乐节，以资"纪念黄帝制礼作乐之意"。

△　由社会部发起组织之保护童婴运动委员会在重庆成立，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任主席。同日，筹备数月之胜利托儿所亦宣告正式成立，主任李德全、所长刘王立明，截至本月1日，该所已募得各方捐款49.2565万元。

△　中国滑翔总会为纪念该会成立四周年，特举行"空中列车"试航表演。该列车为飞机二架各拖曳滑翔机二架，升入3000英尺高空，然后脱离滑翔机，由滑翔机在渝市上空表演约一刻钟之久，然后徐徐降落。

△　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第九届理监事改选大会。新当选理事：黄炎培、江恒源、钱永铭、王正廷、张嘉璈、蒋梦麟、杨卫玉、张群、潘公展、黄旭初、陈辉德、顾树森、穆湘玥、张一麐、朱经农、

沈鸿烈、康心如、冷遹、沈恩孚、贝祖贻、王志莘。候补理事：顾翊群、程其保、郑通和、李任仁、刘王立明、郭有守、刘航琛、何北衡、欧元怀、刘攻芸。监事：王云五、潘序伦、贾观云、卢作孚、廖世承、胡庶华、陈鹤琴。候补监事：钟道赞、黄陆、章益。

4月5日　　恭祭黄帝陵大典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隆重举行。国民政府特派中委王陆一及陕西省主席熊斌代表主祭。同日，陕西省政府派员谒祭周陵、茂陵、昭陵。

△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大会，听取学校团部工作报告。6日，举行第七次大会，各分团部工作报告完毕，开始讨论各项提案。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及太行各界人民，在河南涉县石门村举行抗战以来殉国烈士公墓奠基礼。师长刘伯承讲话，号召“战胜日寇，为死者复仇”。

△　沦陷区山东泰安车站发生4000多饥民大规模抢粮事件。

△　日伪军三万余人分10路同时向太行区黎城、端城、榆社、武乡、襄垣等地“扫荡”。在八路军总部指挥下，根据地军民经10天激战，粉碎敌人的“扫荡”。是役共毙伤日伪大队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解放民伕1300余人，摧毁“维持会”300多个。

△　日伪强迫天津各校中国学生组织所谓“天津学生增产奉仕队”，进行“食粮增产运动”。规定是日起，每天至少一小时以上为“勤劳奉仕时间”，将一切生产所得供奉日军。

4月6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傅仲芳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　荷兰首任驻华大使罗芬克抵达重庆。

△　伪满制定《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重点》，提出加紧对日本战

时物资的供应，着重发展钢铁和粮食生产。

△　美援华救济联合会拨款91.3万美元，救济河南及其他省区灾荒，连同前汇重庆之救济豫灾款57.3万美元，共计收到救济款148.6万美元。

4月7日　蒋介石电豫、陕当局借拨军粮赈济豫灾。

△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八、第九次大会。8日，举行第十、第十一次大会，继续讨论提案。

△　西北工业资源展览会在重庆开幕，展出新、宁、青、甘、陕、川等省矿物、农产、工业产品、文物样品与资料约千数种。12日闭幕，参观者约三万人以上。

△　甘肃省府公布去年轰动兰州之大囤积案。主犯前中国银行兰州分行经理郑相丞及该行所属西北货栈经理尹慎之，二人囤积日用必需品及各种器材达千万元以上，经上级核准郑相丞撤职，尹慎之拘押法办。

△　英国政府派遣来华商讨农作物病害防治问题之真菌专家柏德威抵达重庆。

△　日军在安徽贵池县东门外三阳墩处，用刺刀戮胸、剖腹、砍头等残酷手段，杀害村民100多人。

△　陈公博赴日活动抵东京，会东条陆相、杉山参谋长及青本大东亚相。8日，拜会天皇，9日与日首相东条会谈。14日结束在日活动抵北平，18日返回南京。陈离东京前曾发表谈话表示决心："誓以举国一致尽力之所有，不惜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贡献，以完成大东亚战争。"

4月8日　蒋介石召见重庆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康心如、李奎

安，说明政府对限价政策之新决定。同日，重庆市参议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通过提案多项，其中针对屠业公司之统制制度及凭证购肉办法之流弊，建议：一、撤出屠业公司之官股；二、废止猪肉限量办法纲要；三、由主管机关督饬屠业公司供应猪肉及集中屠宰，实行卫生检查等。

△　军事委员会任命覃异之为第五十二军副军长。

△　国民党中执会海外部训令驻海外各总支部、直属支分部，扩大征求党员。规定本年6月1日至11月30日为第一期扩大征求党员期，并为此制定《战时海外党部征求党员实施办法》，对介绍满20人、50人、100人以上者，分别情况予以奖励。

△　伪江苏省长李士群与日方签订《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规定苏北“清乡”自4月10日开始，9月底完成。

△　汪伪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由日方经济顾问冈田岛次率领启程访问伪满，随员有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伪中储银行总务处长、副秘书长等。19日，结束在伪满活动返回北平。

△　伪满制定《金属献纳强调要领》，下令回收金属，以支援“大东亚圣战”。溥仪带头将伪宫中一部分金属制品拿出炼造。11日，全伪满展开金属类献纳运动。24日，伪满宣布废铁回收，强迫人民交出一铁一钉。7月20日，溥仪又将宫内60余件金属用具献出。8月23日，伪满公布《金属类回收法》，并设立金属回收本部。

△　法国维琪政府照会汪伪政府，宣布交还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

4月9日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十二、第十三次大会，通过《团章修订案》、《团务工作改进案》及《为增进党团联系本团应参加各级党政联合机构案》等。

△　傅作义、陈长捷为上月26日伊盟蒙胞武装请愿事件电邓宝珊、高双成，请派员营救沙克都尔札布。是日，邓派秘书彭玺、高派副官长王兆丰，偕同蒙政会参事任秉钧赴乌审旗慰问沙王，并请其去榆林暂住。

△　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茶会欢迎来华讲学之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陶德斯及剑桥大学教授尼德汉，翁文灏、黄炎培、杭立武、张西曼、张道藩、程沧波等出席。

△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向边区工人提出新的友谊生产竞赛书，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开始出现新高潮。

△　汪伪政府特使周佛海抵长春，就追随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所谓“大东亚战争”与伪满大臣李绍庚会谈，18日取道北平返回南京。

4月10日　蒋介石建议罗斯福总统召见陈纳德，听取陈纳德关于空中袭击的详细计划。4月底，陈纳德回到美国，向罗斯福陈述其计划。罗斯福当即批准第十四航空队的两个目标：第一，在中国击毁相当数量之日机，使其全部空军力量丧失战斗力。第二，袭击日方沿华南海岸上的海上航路，在夏、秋两季至少击沉敌人船舶50万吨。

△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十四、第十五次大会，通过《发动青年建设新中国案》、《增进青年福利案》、《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案》等。

△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华盛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曾甦云为第四十一军军长、陈宗井为副军长，刘翼峰为第八十七军副军长。

△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以密切联络为由派参谋胡公冕、副师长侯声抵延安，12日、13日分别拜谒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

△　全国慰劳总会在重庆举行慰劳上海四行孤军脱险九壮士大

会，九壮士代表萧益生报告脱险经过及沦陷区同胞受敌压迫情况。同日，全国慰劳总会决定是日起至6月底止，在全国开展鞋袜劳军运动。并定4月为鞋袜劳军宣传月，5月为鞋袜劳军竞赛月。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甘肃渭源县张文栋捐助平凉女子师范校址价值8.2万余元，并颁发“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国民政府令：吴化文着即免去陆军少将原官，前授之四等云麾勋章及五等宝鼎勋章一并予以褫夺。

△　重庆、昆明无线电传真开放。

△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通知盛世才，撤退1937年入新、现驻哈密之苏红军第八团与苏联在新之锡矿考察团，以及飞机制造厂等。28日，盛世才将此事正式电告蒋介石。

△　上海日本使馆事务所发表《华中华南与日本或华北间旅客携带货币办法》，规定伪储备券可直接与日本银行券或联银券交换，比率为伪储备券100元兑日银券18元。

4月11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在桂林主持湘、桂、粤、赣四省限价会议，四省主管厅长、委员及各该省中央机关代表40余人到会。

△　重庆市政府调整限价办法，米、煤等八种主要日用品，继续限价；其他各种日用品改为议价；非日用品暂缓议价。凡议价物品，经物价评议会议定后，再由社会局核定。物价评议会改组，由市商会、工会、参议会、市党部及重要之同业公会组成。

△　国产双座滑翔机在成都试飞成功。

△　晋西太行山、林县、临淇、陵川战斗，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率新五军孙魁元、第四十军马法五、第二十七军刘进等部与日第三

十五、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第四、第八混成旅团激战。日军由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指挥，企图摧毁我太行山根据地，战事非常激烈。新五军溃散，第二十四集团军伤亡4000人，日军伤亡约5000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处长邵恩三殉职。

4月12日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蒋介石主持并致训词称：同盟会为第一次全国青年大结合，创办黄埔为第二次大结合，这次三青团全代会为“第三次全国革命青年大团结”。大会通过宣言并宣布当选人名单：吴敬恒、戴季陶、孙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叶楚伧、张伯苓、蒋梦麟、陈果夫、顾孟馀11人为指导员。周鲠生、李任仁、严立三、陈豹隐、杨端六、卢作孚、傅斯年、顾颉刚、李蒸、陈策10人为评议员。张治中、陈诚、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胡宗南、谷正纲、王东原、汤恩伯、贺衷寒、康泽、蒋经国等72人为中央干事会干事。杭立武、李俊龙、杨尔瑛等24人为候补干事。王世杰、胡庶华、邵力子、吴铁城、罗家伦、薛岳、谭平山、李汉魂、翁文灏等49人为中央监察会监察。韦永成、吴南轩等19人为候补监察。大会还通过决定，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为中国青年节。会后全体代表入中央训练团受训。

△　国民政府公布《公务员叙级条例》。

△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兼外事局局长商震，因开辟中印定期航运事，呈报蒋介石、何应钦称：“查英方所请专为军用性质，以运输物品供给在华工作机关为主，倘任其以军用机名义自由飞行国境，我方势难探知其内容，更无法限制其数量，殊碍我方权益，为便利双方运输，并确定航线，限定时间，便于控制约束起见，似以组织中英航空公司为宜。”并拟具中英航空公司草约一份，作为与英方谈判之依据。提出在未决定前英机来华“暂以《外国航空器飞航国境统一办法及检查暂行办法》办理。4月27日，行政院致电蒋介石“拟请准如所议办理”。

△　数十年久悬未决的湘黔边境划界问题基本解决。内政部民政司科长王政诗奉命主持是项工作，是日，会同两省所派之委员屈开诚（黔）、黄元友（湘）及晃县县长刘惕王、玉屏县县长李世家等一行五人，同时出发，实地踏勘地形。约10日后，划界问题基本商定，双方均表示接受。

△　福建省税警第十一团第三营营长郭梦熊致福建缉私处，报告闽东盐务弊端情形称：盐局视察员与所属职员通同作弊，视察员“出巡一次妄报之旅费逾万”，“职员贪污，法纲废弛”至为严重。报告揭发闽东盐务视察张铭勋等勾结奸商，营私舞弊，仅过秤盖章一项“办理不及逾年，而若辈所获之赃款则不下数十万元”。此案虽经破获，复为盐局包庇，要求财政部派员彻查。同月，福建缉私处以此报告转报财政部缉私署。

△　语言学家黎锦熙等发起组织中国语言文字学会。是日，召开发起会议，推定吴敬恒、黎锦熙、罗常培等19人为筹备委员。

△　文学家万迪鹤患肺病三年，贫病交集，是日，病逝四川巴县。郭沫若、茅盾为之筹措安葬费，并拟募款抚育万迪鹤遗孤。

4月13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党政各机关工作计划及概算配合编造通则》。

△　国民政府以西康省西昌县郭仲西“慷慨捐资，嘉惠边疆学子”，特明令嘉奖，并准题颁“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召集全市各分局所长及承办户籍员生、保长等500人，举行户籍扩大会议，商讨举行居民身份证总检查及清理各镇保发证事宜。

△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宣传要点（第七号）》，指出：由于苏联对德反攻空前的胜利，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巨大发展，由于中国

人民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日寇现时的政策是，集中力量巩固太平洋的既得阵地，准备对美决战，同时对中国进一步压迫，并有发动新进攻的可能。在这一情形下，日寇对中国沦陷区的政策发生了很可注意的变化，即竭力帮助汪逆进行所谓“统一”华北，以朱深代王揖唐，以青天白日旗代五色旗，并开始撤退伪组织中的日本人员，停发军用票，玩弄所谓“交还财产”，“归还租界”等。指出这是日本欺骗沦陷区人民的新阴谋，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将敌伪的欺骗宣传加以针锋相对的揭穿和痛斥，号召沦陷区人民不受欺骗继续坚持斗争，帮助抗战；号召全国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粉碎敌伪阴谋。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指出：整风是一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

△　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陶广奉顾祝同令，指挥第五十二、第一九二师、挺进第二纵队、苏保第四纵队及忠义救国军主力，开始“围剿”江苏溧阳、溧水地区之上兴埠、上浦埠、白马桥、曹山一带新四军，至20日，共毙伤新四军约1300余名，俘100余名，是为国民党军本年度对苏南新四军第一次之“剿办”。5月以后，因当地新四军复又活动，6月6日，陶广又指挥进行第二次之“剿办”，历时两昼夜，毙伤新四军100余名。

△　日本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501号，指示日防卫总司令官东久迩大将：“迅速将飞行第54战队的一个中队派往台湾”，以防在华美军的空袭。同日，台湾总督长谷川赴华南视察日军占领区。

4月14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新疆省政府，原省政府委员马绍武（兼民政厅长）、胡寿康（兼财政厅长）等九人免职。新任命李溥霖、彭吉元、林继庸等10人为省府委员，李溥霖兼民政厅长、彭吉元兼财政厅长、林继庸兼建设厅长。

△　湖南、广西、广东、江西四省限价会议在桂林闭幕。通过以湘米25万石济桂等决议案多项。会后，广西省粮政局长严海峰即赴湖南接洽，望能由此使广西米价平抑。

△　宋美龄返抵纽约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张中、美、英、苏四国应首先成立一战后世界委员会。次日，美副国务卿威尔斯发表演说称："惟有成立国际组织，世界和平始能确保。"

△　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攻克馆陶以东门庄据点，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同日，冀鲁豫军区军民粉碎日伪军4000余人对冠县地区的"扫荡"。

4月15日　孔祥熙在重庆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十周年纪念仪式，蒋介石亲往致词称：十年来"中央银行业务之进行，均能配合军事政治之需要，举凡法币政策之推行、战时金融之稳定及一般经济之充实与发展，成绩昭昭，贡献甚大，此皆孔总裁苦心领导及各同人一致努力之所致，深堪嘉慰"。

△　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一行由英返国抵达重庆。朱家骅、张治中等前往机场欢迎。当日下午，熊式辉晋谒蒋介石述职。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多荃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梁恺为第五军副军长，柴济川为第九十二军副军长。

△　美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　经济部公布《奖励仿造工业原料器材及代用品办法》，凡11条。

△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

△　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电告中央海外部，自广播中得悉请赞助文化劳军运动，特向中国银行汇解国币50万元。

△　沦陷区太原铁工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许多工人逃离工厂，仅炼钢厂逃出者即达1400人。

4月16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例会，雷震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陈立夫讲解最近教育设施。参政员黄炎培、杭立武、许德珩、江一平等提出关于沦陷区青年、华侨教育、高中学生服务、膳食贷金、会考招生合并举行及采购外国书籍等询问案数项。

△　甘肃油矿局巨型羊皮筏三艘，满载煤油，由广元抵渝，为嘉陵江航业史开一新纪录。

△　日军三个师团五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分路进犯太行山区。17日，陷陵川，22日，陷林县、临淇。

4月17日　蒋介石在三青团全体代表聚餐会上致词称："今后学校团务应采感召与领导方式，务使学校青年咸能欣然入团，绝不可有强迫意味。"要求团员"重义气，有血性……充分认识中国伦理之基本精神，而身体力行，尤以五伦中之'兄弟'、'朋友'二伦实为团员所应具之德性"。

△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集会纪念《马关条约》签定四十八周年，并发表宣言及告中国同胞书说："本会领导台湾革命之方针素以归宗祖国为中心，今后尤为坚决本此方针而努力，无论任何异族统治台湾，均为吾人所反对，誓必反抗到底，虽再牺牲百万头颅，十年岁月亦必争取民族之自由解放，今当《马关条约》四十八周年纪念日，本会同志于悲惨痛恨之余，特此宣言。"

△　日军第十五、第一一六师团及伪军各一部共6000余人，分八路对安徽巢县南部新四军进行奔袭"扫荡"，新四军经过一周反"扫

荡”作战，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活动于巢县外围之新四军，乘敌“扫荡”巢南之际，积极配合内线部队发动进攻，至25日与日伪战斗23次之多，歼敌350余人。

△　军事委员会任命石觉为第十三军军长，黄祖壎为第七十六军副军长。

△　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抵香港，与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及驻华南海军司令晤谈。21日后，又飞西贡、曼谷、新加坡等地活动。

4月18日　夜，日本华北方面军以12个大队的兵力向冀西平山县回口地区八路军进行合击，20日构成以回口为中心的直径约50公里的包围圈，至21日夜将包围圈压缩到直径约16公里的范围，22日拂晓发起总攻。但该地八路军早已转移，日军扑空。

△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所罗门群岛上被美空军击落座机，坠海身亡。6月5日，日本为山本举行国葬。

4月19日　三青团召开新任干事、监察首次联席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训”。通过修订中央干事会、中央监察会组织条例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整理委员会报告案等多项。

△　国民政府公布《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法》，凡19条。

△　交通部电政司改为邮电司，是日成立。

△　公路总局联运汽车管理处与西北公路运输局商定，是日起举办渝、兰旅客联运，每星期对开一次，各在广元换车。

△　国立中央研究院呈文行政院，报告美军要求拍摄该院气象所绘制之1925年至1936年中国逐月天气图，以“事关军航机密”请示核办。5月21日，行政院函复：“似可准交美空军拍摄，惟须由美方负保守机密之责。”

△　西藏高僧东木格西应重庆汉藏教理院及成都佛学社之请，赴内地弘扬佛法，于1942年6月由拉萨启程，是日，与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联袂抵达康定。

△　日伪军集中1.2万余人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辗转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采取分散活动的方法，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扫荡”之敌。至5月17日，经29天作战，攻克敌人碉堡五座，毙、俘日伪军2700余人，粉碎日伪军“扫荡”。

△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主力、独二、独三、独四、独十五旅团及第二十六师团与太原守备队等部约万人，向冀西地区的平山、灵寿、房山、涞水和涿州进行“扫荡”，历时一个月，至5月18日“扫荡”被粉碎。是役八路军地雷战发挥巨大威力，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　河北行唐、灵寿、平山等据点日军4000余人，向冀中根据地滹沱河两岸“扫荡”，该区军民分头迎击，恶战旬日，至26日来犯敌军被各个击退。

△　伪满新京首都警察全部出动，昼夜两次在全市进行大搜捕，两次共抓捕3160人，最后将其中1287人强迫劳动。

△　周佛海由长春抵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希望华北能统一在汪政府下，以调整支离涣散的形态。

△　英援华会在伦敦举行“中国讨论会”，中央社驻伦敦特派员林成让等人在会上讲战时与战后中国建设及中国之社会与文化等问题。

4月20日　经济、教育两部在重庆联合召开工业建设计划会议，讨论从“技术眼光商定战后工业建设计划”，各重要厂矿、各大学工学院、各工业学校负责人共135人与会。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训词”。会议历时10日，至30日闭幕，通过《战后工业建设纲领》等决议案。

△　日军二万余自白晋、平汉、道清线分10余路向冀南、豫北地区发动大“扫荡”。此次进犯系由冈村宁次指挥，事前曾有秘密布置，一个月前即秘密集结，本月7日开始调动，是日出犯。日军进攻态势：白晋线第三十六师团万余人，自潞城、长治、壶关、高平、晋城向东包围前进，一部当日窜抵平顺城郊；另一部2000余人由壶关向东南进犯，入夜窜抵龙溪、阳威。平汉线日军独立第一、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各3000余人，其一部1000余人自安边观台西犯，另一部5000余人自安阳、汤阴以西以南地区西犯。道清线为第三十五师团，亦同时分道北犯。

△　驻山西省朔县日军继续在城内大肆屠杀，居民遇难者达160余人。

△　伪满调任于镜涛（原滨江省长）为奉天省长，任王子衡为滨江省长，原奉天省长徐绍卿辞职。

△　日本内阁局部改组：原任驻华大使重光葵任外相，原任国务相藤纪三郎任内相，东条原兼陆相复兼文相，天羽英二任情报局总裁，大麻唯男任国务相。

△　美国宣布去年4月炸日经过，称美机系自一航舰起飞，航员80人，其中64人降落中国，五人降落苏联被扣。同日又宣布：4月上半月西南太平洋盟机毁日机128架、日舰船19艘；盟机损失25架，与日机相较为1：5。

4月21日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举行，蒋介石主持并宣布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中央监委会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均为该团当然指导员，同时宣布该团常务干事、常务监察及各主管人员名单。中央常务干事：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段锡朋、梁寒操、谷正纲、王东原、贺衷寒、何浩若、张霭真、刘健群、倪文亚、袁守谦、黄宇人，书记长张治

中、副书记长胡庶华。中央常务监察：王世杰、邵力子、吴铁城、罗家伦、谭平山、朱经农、甘乃光、李士珍、李曼魂，书记长王世杰。会议还通过总决议案及专案多项，其中以统一全国青年组训纲领、发展团务十年计划、发动青年研读《中国之命运》等为“最重要者”。

△　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密电蒋介石，报告该省召开第九次党政军联合反共会议，称当地共产党力量“何静、连柏生等自组三北游击司令部，拟夺取四明山为据点”，“若不及时肃清将蔓延为患”。要求拨给经费，“提高官兵待遇”，“统一指挥集中权责”，并调配“精良部队”进行“痛剿”。5月3日，蒋介石批转何应钦核办。

△　鄂东新四军攻入长江北岸日军据点蕲春，毙、伤、俘日伪军400余名，新四军亦伤亡111名。

△　雁北灵丘县刘庄、雁翎、岸底、张家湾等村民兵密布地雷阵，是日炸死北泉据点出动之日伪军30余人。

△　以徐培根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一行抵土耳其首都安哥拉。

△　罗斯福总统为日方杀害去年空袭日本之美飞行员发表声明，斥责此种行为野蛮已极。同日，宋美龄在纽约亦就此事发表谈话，称此为日本违反人道之又一罪行。

4月22日　全国国民兵举行第二次献机典礼。军政部兵役署发起之国民兵一元献机运动，自去年“七七”捐献“国民兵第一号”飞机后，又收到各省捐款140余万元，共购“湖北号”、“湘南号”、“安徽号”、“河南号”、“陕西号”、“贵州号”、“江西号”、“重庆号”等驱逐机各一架，连同伊盟沙克都尔札布筹募之“蒙古号”一架，于是日同时举行献机典礼。据蒙旗代表、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参谋长褚大光谈：今日蒙古所献飞机，可以说是蒙古第一号，以后蒙古第二号、第三号将接踵而来。

△　宋子文抵加拿大访问，商讨对华军队援助问题。次日，返回华盛顿。

△　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成立。该会系由工业界庞赞臣、潘仰山、傅汝霖等发起。经济部长翁文灏在会上宣布政府已决定拨款一亿元，定做值洋二亿元之机器，以扶植后方工业。

△　红军将领刘志丹灵柩运抵延安，延安万人举行迎灵典礼。次日，延安1.5万人举行公祭大会。24日，移往志丹县。5月2日，在志丹县公葬。

△　豫北济源伪军薛玮堂率部1000余人，向太行区抗日人民武装部队投诚。

△　日军独立第五、第六、第七等混成旅团及伪军一部共约二万余人，配合兵舰一艘、汽艇300余只，以山东广饶、博兴、蒲台、利津为基点，南沿小清河，北依老黄河，西凭博（兴）蒲（台）公路，东临大海，由鲁北清河中部地区构成大规模之“拉网合围”。八路军转移外线，以游击战争予敌以打击后乃分散突围，多次使敌扑空。28日、29日敌分路撤回。

△　军事委员会免去罗卓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

4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发出关于普遍印行蒋介石著述训示办法，称蒋介石“著述及各种训词小册均为现代政治经典”，要求各省、市、县学校、党部“大量翻印”、“大量廉价发售”，各团体购买“除照定价廉售外，并可再酌予折扣，以示优待，借广宣传”。对翻印“成绩卓著者得呈请奖励之”。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汝珍为第七十八军军长。

△　荷兰驻华大使罗芬克向林森呈递国书。

△　新德里举行中国战时照片展览，展期一周。

4月24日　蒋介石主持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十期、警官班第三期毕业典礼，及特科外事警察讲习班开学与正科第十二期入伍升学典礼，并致训词。

△　国民政府特派陈立夫为三十二年度第一次高等考试初试典试委员长，派夏勤、叶秀峰、洪兰友、沈士远、吴大钧等19人为委员。

△　中国经济学社举行第十六届年会，讨论战后经济问题，次日闭幕。决定组织战时经济研究委员会，并成立重庆分会。

△　陪都妇女福利社举行成立典礼。该社常务理事张岫岚报告成立宗旨及现行工作，略谓：本社以解决职业妇女之困难及增进一般妇女之福利为宗旨，工作共分妇女福利、生产事业及辅导事业三项。

△　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任教湖南宁乡北平民国学院之著名文学家张天翼贫病交加，境遇惨淡，医疗中辍，病况转危，该院同学特发起募集医疗费，并向各界呼吁。此消息发表后各界读者纷纷响应，截至4月30日，新华日报社已收到读者捐款5720元，并建议发起成立“作家生活保障同盟会”。

△　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林县临淇地区作战中被俘投敌。

△　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首次袭缅。次日，日机一批空袭湖南，第十四航空队起飞迎战，击毁日机五架。

△　日战斗机44架空袭零陵美空军基地。29日，复以战斗机22架、轻轰炸机九架再次空袭，迫使桂林地区美空军向后方转移，截至30日晚，衡阳、零陵两地仅留战斗机七八架，轰炸机数架。

4月2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条例一批，计有《陕甘宁边区各

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10条）、《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28条）、《修正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件草案》（21条）、《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六条）、《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11条）。

△　拥有会员120余万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各民众团体，在阜平召开代表大会，历时7日，正式成立了北岳区抗日救国联合会，选出执委49名，常委九名，杨耕田当选为主任，岳志坚任组织部长，沙可夫任宣传部长，王文兴任工人部长，赵国屏任农民部长，李宝光任妇女部长，李开信任青年部长，顾德任秘书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耀明兼第五十四军军长，韩文英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唐子长为第四十九军副军长，唐冠英为第一〇〇军代副军长。

△　延安蒙族青年、民族学院各族学生及各机关代表百余人集会公祭成吉思汗，吴玉章宣读祭文并讲话。

△　虞洽卿由贵阳抵桂林，考察西南工商业。

4月26日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三、第四分区军民，在馆陶、临清地区粉碎日伪军1300余人的“扫荡”。次日，第六分区军民又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对枣南、故城地区的“扫荡”。

△　李仙洲部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师长刘长春率师部及第四二五团，由鲁西进入鲁南，向八路军驻地进犯。

△　日军包围太行山守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部，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被俘，胁往新乡。

△　日机空袭云南会驿机场，28日复袭该机场。5月1日，日大本营发表战报称：击落美机五架，地面击毁并焚毁41架。

△　汪伪政府赠送日本天皇裕仁“同光”勋章，派褚民谊为专使呈送。

4月27日　蒋介石邀集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全体会员聚餐，并发表《中国工业建设之途径》的讲演，要求“工业家都必须有热烈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认识，必须与政府发生密切的联系，必须以达成国家整个的工业建设引为自身的责任”。

△　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行政院，严令各级学校学生“除国家纪念日外”不得参加群众集会或游行，“以重学业”。

△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规程》，废止《农本局组织规程》。

△　行政院决议各省、市地方普遍设立田赋粮食管理处。

△　四川省政府发表该省国民教育概况称：川省国民教育之推行，始于二十九年8月，目前共有乡镇中心小学4401所，国民学校3.9399万所，小学部4.4416万所，民教部6.954万班。小学部入学儿童243.724万人，民教部入学成人571.0867万人，培养师资3.4281万人。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昆明市黄美之捐资兴学，达国币14.5万元。

△　江西省赈济会宣布，因广东难民来赣者突有增加，原划定新淦等19县不敷收容，特重新划定全省69县为收容区，预定收容难民10.95万名，饥民3.3159万名。

△　进犯太行山日军分路由陵川、晋城发动新的攻势。第二十四集团军第四十军副军长马法五率部，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指挥下，苦战多日，突破日军围截安全南撤。

△　汪伪军事委员会派军事视察团赴日，是日抵东京，团长叶蓬，副团长孙良诚、胡毓坤。

△　伪满司法部刑事司扩大为司法矫正总局，由原刑事司司长中井久二任局长。该局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伪满监狱行政外，主要指挥与监督“保安矫正制度”中的“预防拘禁”执行情况。当天，仅奉天一地即有3576人被捕，送往该地矫正辅导院。

4月28日　云南空战大捷。日机45架袭击美第十四航空队云南基地，双方发生激烈空战，盟机以少胜多，击毁日机18架。中缅印空军司令部在欢迎第十四航空队宴会上称：是日空战所表现之技术勇气及守职精神，殊堪嘉许，战果极为卓越。

△　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向记者报告救济豫灾情形，略称：河南省府已先后派各厅长委员驰赴灾区视察，并考核各区县救灾成绩之优劣。并称数月以来各方汇豫捐款为数甚巨，已分配各救济单位。

△　广西省举行救济饥荒紧急会议，民政厅长朱朝森报告说：截至20日止，已有邕宁、同正、扶南、绥渌、上思、迁江、果德、都安、隆山、横县、贵县、宾县、永淳等13县电报饥荒。

△　国民政府颁给张群、庞炳勋一等云麾勋章，孙魁元（殿英）三等云麾勋章。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根据各方情况和刘为章信，估计国民党有在报上公开反共可能。请即将最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配合友军的情况以及他们进攻我军情况电告，以便将前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向外国记者宣传我们的战绩。

△　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为第三十二集团军陶广部“围剿”两溧（溧阳、溧水）地区发表《为反对进攻新四军，残害江南人民，破坏团结抗战，向友军提出的严重抗议书》，希望该

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反共成见，改善苏南地区国共两党关系，互相合作，坚持共同抗战。

△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读者来信《从贫病魔掌中援救张天翼先生》及捐款情况报告，呼吁“集腋成裘”，不要让被贫病吞食文坛巨匠和前途无量的艺术家的悲剧的继续扮演。

△　史迪威、陈纳德抵华盛顿与马歇尔会商。史迪威、陈纳德离职期间，缅、印军事由惠莱中将负责，驻华空军由葛纳少将负责。

4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参议员、候补参议员名单：议长向传义，副议长唐昭明。

△　新任驻荷兰大使金问泗在伦敦向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呈递国书。

△　蒋介石手令查禁《新华日报》援救张天翼稿件称：“查本月28日《新华日报》第三版读者园地栏载有《援救张天翼先生》之函件及捐款报告等，此种记载应予取缔。又同版左下角有‘陕甘宁边区学生电英学生联合会’之大字标题新闻，殊属不合，以后不许有陕甘宁边区字样登载，希即切实注意为要。”

△　国民政府公布《印花税法》，凡四章24条。

△　日本天皇裕仁诞辰，东京举行阅兵式。同日，汪伪亦在上海等地举行庆祝式。

4月30日　以顾毓琇为团长的国民政府赴印教育文化访问团返国抵渝。该团访印期间，与印方交换互派教授、学生等文化合作事宜。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由熊式辉作访问英、美军事情形报告。

△　新任加拿大驻华公使欧德伦少将抵达重庆。

△　上海租界警务局及各伪警务机关，“以五月份纪念日甚多”，决定是日起至6月1日止，实行“特别戒严”。

4月下旬　　日军为打开长江上游航线，夺取中国船舶及洞庭湖谷仓，歼灭该地区中国军队主力，威胁重庆门户，抽集六个师团，分别集中于枝江、弥陀市、藕池口、华容、白螺矶、宜昌一带地区；同时于汉口、荆门、当阳等地集结飞机248架，准备向鄂西发动进攻。

是月　国民政府颁布《各省市重要物品价格联系调整办法》，凡六项。

△　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厂矿工人受雇解雇限制办法》，凡18条，原经济部《非常时期工业技工管理规则》即行废止。同日，又制定《非常时期奖助必需品商业同业公会办理共同购运办法》，凡12条。

△　经济部核准工业技术发明专利案数件，计有张选荣之合成胶制造电木粉及绝缘漆，陈厚封之陈氏微电器，杜春宴等之金沙铬提制棕色染料，陈宏伟之不锈弹簧皮鞋带等。

△　教育部通知各国立院校及全国性学术团体，本年度部聘教授拟再增聘15人，分由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哲学、教育、数学、物理、化学、农科、工科、医科、政治、法律、经济、艺术各遴选一人。

△　福建省拟定护林办法，规定放火烧毁他人山林者处死，放火烧毁自己山林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　福建行政区重新调整，福建省原为七区辖63县及周墩、柘洋两特种区，福州、厦门两直辖市。现改划八区，周墩、柘洋改设县治，共65县又两直辖市。

△　昆明市人口激增，据市府本月初整理户口复查结果：全市居民有籍者合计5.2714万户，20.2125万丁口，与1942年9月调查数目比较，半年间增加9564户，2.0124万丁口。

△　戴笠偕同美军马德斯少校等，抵达第三战区所属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指挥部视察，决定在安徽歙县雄村成立军委会特种干部训练班（后改称中美技术合作所第一训练班），训练忠义救国军干部。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明目前蒋的政策是向各方施行各种突然袭击和压迫，企图挽救其危机。所以，我们的对策，似宜非常灵活，以揭破其阴谋。

△　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珠江指挥部，坚持五桂山根据地抗日斗争，林锵云任指挥，罗范群任政委。

△　日伪在滦平县完成“大集家”，将4.3576万户、24.5万余人赶进543个“人圈”，并划出23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占全县总面积的8.7%。

△　苏联驻华大使为时与潮社出版《波兰沦亡恨》（贾午著）、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政治艺术论》（邓公玄著）等反苏反共书籍，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5月

5月1日　　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致送备忘录，称中国全力支持陈纳德空袭计划，为了集中所有战时资源作空中攻击之准备，中国拟以5月、6月、7月三个月空运吨位全数供应汽油及飞机器材。并称，“蒋委员长并嘱予声明：敌人如以地面部队攫我飞行基地，中国陆军力能应付”。2日，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应继续加强中国陆军的战斗力。称如果照蒋的建议，中断空运三个月，只向空军提供物资，那么1944年

1月以前中国军队就不可能参加缅甸作战，也守不住空军的基地。罗斯福表示他同意陈纳德的空袭计划，但也不能因此中断对云南受训部队的供应。在收复缅甸问题上，罗斯福同意在缅北采取行动，不必在南部及仰光采取行动。

△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内称：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1942年开辟第二条战线，提出当年打败德国的口号时，我党亦提出1943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1942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该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并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分局作长期抗战的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

△　全国各地工人分别纪念“五一”。重庆决定五一节加紧生产，概不放假，各厂派出女工代表2000人举行集会。谷正纲在会上讲话称：“工人应努力增加生产及拥护限价政策，彻底实行新生活。”朱学范讲话勉励工人应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世界和平基础而努力，并呼吁急速拯救沦陷区工人于水深火热之中。

△　中央信托局致函财政部报告投资事业情况：共计投资15处，金额4170余万元，已达其实收资本5000万元的四分之三以上。其中除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1800万元系中央银行资金，由该局出面代办外，其余均系运用该局资金。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曾言枢捐赠西康省理化小学建筑费二万元，并准题颁“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中央银行存款额达270余亿元。

△　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程海峰向重庆市新闻界报告国际劳工组织状况，及中国分局1934年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

△　中美文化协会定本月为“美国军人月”，拟在本月内由该会若干会员为东道主，指定日期在各人私宅举行招待美国军人小组联谊会，每组以外宾二人至八人为原则，“主人得自行另约友朋中仕女参加”。

△　进犯太行山日军再次发动对该地区守军的“扫荡”。5日，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投敌，庞部第四十军马法五部避开日军主力转移。日军进攻重点随即转向以涉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　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为基干编成第六十四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之中将。该师团定员1.3637万人，马1131匹，汽车75辆，驻江苏扬州地区。

△　日伪军1000余人开始“扫荡”岳南抗日根据地。5日，岳南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　汪伪在上海开始进行第二期“清乡”，清乡地区为崇明、宝山、嘉定三县，修筑封锁线长221公里。

△　日本陆军省宣布：航空总监土肥原调任东部军司令官，遗缺由安田继任。

5月2日　　湖南空战获胜。日机47架空袭湖南，盟机起飞迎战，在衡山、零陵上空与日机遭遇，当即击落日机两架，复尾追截击于长沙、营田及洞庭湖上空，共计击落日机七架，击伤七架，盟机损失一架。

△　河南省救灾运动委员会致电《中央日报》，感谢各方救济豫灾。电称：综合各处捐款，截至4月底，已收到300余万元，粮食300余万斤，已惠捐而未汇到者尚近300万元，值此春荒，灾情益重，望各方贤达继续解囊相助。

△　伪满中央银行总裁阚潮洗、副总裁大泽菊太郎任期届满退

职，由西山勉接任总裁，徐绍卿任副总裁。

5月3日　　张治中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概况，蒋介石讲述“五三”惨案对国家民族及抗战之关系。

△　宋美龄再度访问白宫，与美总统罗斯福就反攻缅甸及加强中国战区空军与中印空运等问题进行商谈。

△　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大会，次日闭幕。通过应予给奖作品，调整大学学系及大量派遣留学生等案。受奖者共48人，计一等奖四人（周培源、苏步青、吴大猷、吕凤子）各1.5万元，二等奖19人各8000元，三等奖25人各4000元，另请部酌予奖助者13人。

△　广东灾荒严重。是日，省主席李汉魂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联名电请蒋介石饬令湘、赣、桂急速拨粮救济粤灾。5日，电旅渝粤人孙科、邹鲁、吴铁城、林云陔、曾养甫、俞鸿钧等，“促请委座核准救济办法”。7日，又电桂、赣、闽、湘当局，从速拨粮，并允许粤民入境自由购粮。报载粤东各县粮价已涨至每石4000元。

△　教育界人士吴贻芳、晏阳初、桂质廷、陈源、吴景超、李卓敏等飞抵华盛顿，研究战后教育问题。20日，史密斯学院授予吴贻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　国民政府令追赠故员杨特为陆军少将。

△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以调查统计局特检处航检股中校股长俞浩兴“假借审核旅客申请飞行职权，间接图利及借端勒索中国工业服务社总经理钟元昭钱财”，判处死刑，是日执行。同日，冒充经济检察队人员勒索商民财物1.75万元之人犯何均池，亦被处决。

5月4日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说：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支流”，全国青年纪念“五

四”“惟当竭尽全力，服从领袖，贡献能力，就是爱国的最大表现，也就是发扬五四的精神”。

△　延安青年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边区青救会在各地举行给奖会，奖励青年劳动英雄、模范青年工作者及模范青年学生。

△　三青团重庆支团主任包峰国主持陪都青年“五四”纪念大会，段锡朋、郑彦棻主讲青年问题。晚，罗家伦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青年播讲《五四纪念与全国青年第三次大团结》。

△　重庆空袭服务总队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到会4000余人，总队长谷正纲致开会词，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等演说，吴铁城向该队队员颁赠纪念章。

△　中巴（巴西）公使馆互相升格为大使馆。

△　中央设计局组成以罗家伦为首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准备出发考察甘、新、青、宁四省水陆交通。

△　山东各界在鲁中根据地集会追悼1942年反“扫荡”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山东文化界先进、前大众日报社社长李竹如及青年领袖钟效培。

△　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约万人，侵入八路军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单县、砀山地区。

△　日伪在奉天开展所谓“抓浮浪”，当日326人被捕。

5月5日　　国民政府通令《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乡镇民代表选举条例》、《县参议员选举条例》等，即日起施行。

△　国民政府令给予张定璠二等云麾勋章，魏益三、郑冰如、孙立人各三等云麾勋章，孙蔚民七等云麾勋章。

△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师范教育讨论会，会期三日。据统计，全国现有在校师范生10.3985万人，与战前4.8793万人比较，已增加5.5192万人，但全国国民教育所需师资约30万人，相差甚巨。

△　荷兰首任驻华大使罗芬克晋谒蒋介石。同日，驻中印缅美军总参谋长赫恩中将与美代办范宣德拜见蒋介石，面交美国务院赠送之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学生照片。

△　陈诚拟定中国远征军作战计划，预计8月底完成整备后，以恢复中、印、缅水陆交通，及协助英、印盟军收复缅甸为目的，向缅甸日军发动攻势。

△　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向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信中对印共积极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谋求民族独立的工作表示关切和支持，对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医疗队来华表示感谢。

△　长沙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开幕，展期10日，展品达数千种。市民对在战区瓦砾场中的长沙举办展览，均甚为兴奋，是日赴会参观者即达二万余人。

△　全国慰劳总会拨款10万元，电汇前方慰劳太行山守土将士。

△　凌晨，日军以第三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及第四十、第三十四师团各一部，由藕池口、华容、白螺矶向洞庭湖北岸发动进攻，当日渡过藕池运河。驻该地之第六战区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等部，依照预定计划逐次抵抗，鄂西会战（日军称之为“江南歼灭战”或“宜南作战”）开始。

△　罗斯福总统通令：6月14日为联合国国旗日，要求美国人民于

是日向英国、苏联、中国、比利时、南斯拉夫等数十个国家人民致敬，并悬挂各该国国旗。

5月6日　　外交部为苏联准备撤回中苏共管之飞机制造厂及独子山油矿设备事，向苏驻华大使潘友新致备忘录表示诧异。

△　国民政府公布《防止私运及携带金银出口暂行办法》，凡八条。同时宣布废止《防止水陆空私运特种物品进口办法》。

△　经济部为加强管制棉、铁，封锁解放区事致电财政部称："查第二战区毗连奸伪，近据报奸伪有在该战区收购棉、铁情事，特电希以后对该战区在后方采购棉、铁须加限制，以免资敌。"

△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二十六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巴蜀礼堂举行，黄炎培报告社务，新当选理、监事宣誓并举行第一次理监会。同日，举办历年成果展览，周恩来亦来参观。

△　重庆职业指导所发表该所五年来职业介绍概况称：五年来求职人数共2.3542万人，介绍职业成功者共3000人，求职者多系青年，都在"应受教育的时期，但因经济困难，不得不离开校门，到社会上来挣扎，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现象"。

△　出席国际粮食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团，由团长、财政部次长郭秉文率领抵达纽约。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平北骑兵大队出袭日伪军，逼退敌据点四处，毁碉堡十多处，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　日伪军乘河北省永年县何营村庙会之机进行大烧杀，被杀群众169人，其中110人是看戏的群众，烧房770间。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设置江西省政府，任邓祖禹为省长，另任李讴一兼任南京警察总监。

△　美国援华委员会救灾捐款110万元，由重庆汇至河南，分配至郑州、漯河、洛阳、鲁山、南阳等教会救济区。按：此项捐款自上年9月开始，此为第八批，合计达千万元以上。

5月7日　　国民政府派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吴国桢为互换中英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李迪俊为互换中古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派李仲公为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黄为材为副主任。

△　重庆《大公报》报道：政府将创设博士学位，实施办法已经草定。博士学位由国民政府直接授予；博士学位评定会以行政院院长、考试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及国立大学校长二人为当然委员组织之，委员16人至22人，须为专门研究之学术界权威，或学术研究机关之主持人；博士学位分文学、理学、法学、教育学、农学、工学、医学七科。另对申请条件、申请程序、博士学位之考试（论文审查、笔试、口试）等，均有明确规定。

△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各报联合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在重庆举行第一次文化界联谊会，邀请最近归国之文化教育访印团顾毓琇、吴文藻、吴俊升报告印度文化教育事业现状。

△　财政部定三十二年度全国契税收入为七亿元，川省分配数额为1.977亿元。

△　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抵达重庆。朱家骅、潘公展、杜月笙等百余人前往机场欢迎。中央社发出消息谓：“吴氏本其革命信仰，坚贞不屈，近得乘间与上海统一会秘书长袁文彰相偕脱险返抵重庆。”三四日后，蒋介石亲予接见。

△　晚，鄂西日军进抵南县、安乡一线。第十集团军所部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以地形不利，向后转移。8日，南县、安乡沦陷。

△　驻保定、唐县一带日伪军合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完县，将该县野场村200余人赶到一起，用机枪扫射，未死者用刺刀捅死，计118人惨遭杀害，54人身受重伤。在野场惨案中，村长王三群领导群众坚决斗争，其妻张竹子、子王朴，在日军威胁下，坚贞不屈，同时遇难。23日，完县县政府发布《通令》，表彰王三群全家为“模范家庭”，王朴为“完县的民族小英雄”，张竹子为“完县模范母亲”。

△　日机八架侵袭江西赣县，在城区投弹30余枚，辅助医院被毁，市民略有死伤。

△　美总统罗斯福、陆军部长史汀生赠蒋介石以最高统帅勋章、证书和奖状。另赠何应钦、商震、俞大维、林卫生以司令及将官两种勋章。

△　盟军占领北非“轴心国”最后阵地突尼斯、比塞大两大港，取得重大胜利。12日，北非盟军总部宣布：“轴心军”已于当日晚8时15分在北非全境停止武力抵抗，北非战事至此结束，总计两年来盟军歼敌达37师，俘虏40.6万人。蒋介石于10日电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祝捷。14日、16日，丘吉尔、罗斯福先后电蒋致谢，表示将助华攻日。

5月8日　　蒋介石电令宋子文，要他在罗斯福、丘吉尔会谈期间，坚持力争收复全缅，否则只收复缅北，无英海空军配合，无异让中国白作牺牲。电称：“反攻缅甸计划，必须照卡港会议及重庆会议完全实施，倘仅占取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士兵，中国决不再蹈去岁覆辙，望以坚决反对之意，通知英美当局。”

△　重庆区专科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运动场开幕，参赛运动员共792人。比赛项目除田径赛外，并有各项器械运动。次日闭幕，蒋介石出席闭幕式并向优胜运动员颁奖。

△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凡10条。

△　湖南南县、安乡陷后，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主力退至西港、渡口等地，一部移至三仙湖、红庙继续抵抗，旋因伤亡甚重被迫分股突围，日军乘势进迫津市、澧县，虽经守军堵击，其主力仍逐渐西进。

△　日军占南县后于是日至12日，出动3000人大肆进行烧杀。在厂窖周围50华里的地区，共计惨杀撤退军人和当地民众及外地难民3.2万人，200多户被杀绝，摧残致伤者3000多人，被奸妇女2000多人，毁房3000多间，焚烧民船2500多艘，造成震惊全国的南县“厂窖大惨案”。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二分区部队袭入晋中太谷县城，歼灭伪警备队一个排。

△　八路军鲁南军区一部攻克临沂埠阳西南日伪据点。毙、伤、俘伪军百余名。

△　日机多架分六批袭湘，其中第五批七架窜入长沙，投燃烧弹数十枚，毁市区及岳麓山民房、商店百余栋、死伤平民20余人。同日，日机六架由浙江袭福建省建瓯县，在城郊投定时炸弹19枚。

△　汪伪外交部为日方强制收买申新第一、第八纺织厂及和兴铁厂、中国植物油厂事，呈报汪伪政府请示核办。汪精卫批示：“（一）申新厂如厂主愿意卖给日方，可听其自由；（二）和兴铁厂，惟此属国防物资，以参战之见地尊重日方要求；（三）植物油厂，允许日方收买。”

5月9日　　太行山反“扫荡”战猛烈进行之际，荫城（属长治）、陵川等地日伪军2000余，向壶关西南第二战区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

进行合击。八路军为策应第八师脱出包围圈，当即抽调主力一部协同作战。翌日，在郭家佗附近坚强阻击，恶战终日，掩护该师官兵脱险后撤出，是役计毙伤日伪军百余名，八路军伤亡20余名。战斗结束后复帮助友军掩埋尸体，急救伤员，友军官兵多感动流泪。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袭广州日军之天河及白云机场，炸毁地面所停飞机4架至6架，机场数处起火，其中一处大火，百英里之外犹清晰可观。同日，日大队战斗机与第十四航空队驱逐机发生空战，16架被击落，美空军损失中型战斗机一架。

△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西北建设考察团成员。

△　日军攻陷湖北公安县城南平，在城内放火烧三日三夜，杀死百姓58人，奸杀妇女35人。

△　苏州大戏院发生定时炸弹爆炸案，日军死伤多人，无辜青年被捕甚众，数旬后仍未破案。

5月10日　国民政府训令驻比大使钱泰、驻荷兰大使金问泗，向比利时、荷兰两国抗战三周年纪念表示祝贺。

△　中山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呼吁改善生活。略谓：节衣缩食于兹三年矣，所谓三十一年10月份增加薪俸与生活补助费者，率皆未能实现。

△　黔桂铁路铺轨到贵州独山。

△　汪伪财政部通令：自即日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武汉及华北、华南各地区，一律禁止以美金、英镑、港币及以上项货币为期票、支票之买卖交易或汇入。如有携带及持有或保存上项货币情事，从严取缔。

5月11日　宋子文在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三叉戟会议”前夕

访晤罗斯福，就中国军事形势提出详细报告。翌日，又访丘吉尔，力陈中国被困数年，处境艰难，迫切要求收复全缅，开通滇缅路，以解危局。丘吉尔表示滇缅路运量有限，攻缅对援华并无实际意义。

△　行政院例会决议颁给美国医药助华会代表贝克曼及郑宝南以人民荣誉奖章，通过任命王怀明为山西大学校长，杜佐周继吴南轩为英士大学校长等任免事项。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西康省西昌县马焕文、马纯卿“慷慨捐资，嘉惠边疆学子”，并准各颁“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中华医学会第六届年会在重庆开幕，到会各地代表400余人，并有来自沦陷区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讲话称：国家问题亦如请医生看病，中国病在贫、笨、病三字，治贫须工业化，治笨顺办教育，治病则宜多设卫生院。13日，大会闭幕，通过宣言及议案16件。

△　北岳区中心阜平县民兵队长李勇巧布地雷阵，是日阻击由沙河败退的日伪军，一次爆炸毙伤敌36名，创地雷战新纪录。

△　国民党军开始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是日，第九十军、第五十三师由河防前线韩城开抵陕北洛川。13日，第一军第六十七师亦撤离河防由大荔开到邠县，形成闪击边区之势。

△　日军万余分路进犯山东沂蒙山区，鲁中根据地反“扫荡”战展开。经过周余激战，各路敌人于19日分别退出，北沂蒙山反“扫荡”获胜。

△　天主教主教于斌在美众院外委会秘密会议，发表关于中国战时情况的长篇演说称：“余兹重申前言，中国富于人力，愿在疆场上与倭寇作殊死战，由中国进攻日本，实为胜利之捷径”，“故联合国家尤以美国为然，切应供给大批重军器接济中国，使其得以对日再取攻势，实为当务之急。”

5月12日　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准备接见外宾时，忽觉右肢屈伸不便，原定之外事活动取消。迨至26日，心脏渐呈衰竭。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3条，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当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粮食部部长徐堪接见记者，谈本年度各省粮食收成情形及今后军公民粮之配备问题。略称：四川省本年小春收获形势良好，即稍有歉收，其生产量比较上年为多。陪都方面所需之食米，95%以上为本部负责供应，现本部已控有足额之量，存底充裕，今后绝不至发生问题。其他各省，如豫省上年受灾固重，本年因雨水及时，麦秋可望丰收，鲁山等地粮价已大跌，严重时期已属过去。粤省因上年水旱为害，今春亦苦旱，近来间有数县发生缺粮情形。江西等省粮产情形，大致均属良好。

△　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举行三周年纪念会，副会长谷正纲报告该会三年来业务进展情形，并提出今后荣军职业运动要法律化、生产化、技术化，达到理想之最高境地。

△　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学生百余人，因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和《捷报》批评该校上演宣传法西斯思想之《野玫瑰》“成绩欠佳”，于是日及次日先后捣毁两报，两报改出联合版。正大学生复散发告社会人士书，双方互相指责，轰动泰和。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下令“严禁正大学生一切非法行动，如有违背，概以暴徒论罪”。并饬校方将此次参加暴动学生“全部查出交政府严惩”。正大代理校长以无法执行使命宣告辞职。至28日，该报登出“正大等学校党部，已决定改隶省党部”，风波暂告结束。

△　太行八路军收复河南林县。

△　鄂西日军分路进攻，其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向新安攻击；第

三师团向暖水街攻击；第十三师团一部约3000余人，由弥陀寺向新江口、班竹垱攻击。

△　驻河北曲阳日军14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突袭阜平县城。阜平县五丈湾村民兵中队长李勇率领游击组，将500余名日伪军诱入布雷区，用步枪同地雷相结合，三天内先后炸死炸伤日军130余人，迫使日军经东、西下关溃逃。21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通令嘉奖。6月6日，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发布《告同胞书》，号召“开展李勇爆炸运动”。

△　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研究西西里作战及反攻缅甸计划。会议拟缩小反攻缅甸的行动。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会议阐明中方立场，宋依据蒋指示，力请履行“安纳吉姆”计划，增加空军攻击收复全缅，并扬言否则将有可能迫使中国退出战争。18日，罗斯福会见宋子文，答应增加中国空运物资，并明确表示“反攻缅甸计划决定年底会同英国实行”。但丘吉尔却态度冷淡，仅表示他不反对进攻缅北并尽力向中国提供海空支援。会议历时10日，23日结束。

△　台湾总督府开始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

5月13日　国民政府任命胡世泽为外交部常务次长。

△　冀东八路军击溃由抚宁出袭的日伪军1500余人，乘胜攻克榆关镇。是役毙伤日伪中队长以下140余人。

△　凌晨1时，鄂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枝江口、洋溪间强渡长江，防守公安之第十集团军第八十七军放弃公安西移。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成立汪、日联合物资调查委员会，特任陈公博为委员长，袁愈佺、陈之硕、赵尊岳、陈允文、卢英、王志刚等为委员。日方委员为驻上海公使田尻、驻汪伪大使馆经济部长

石井等。

5月14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中华民国战时军律》第一条及第十条条文。第一条规定，本军律于军人、地方团队人员及文职公务员在战时犯罪者适用之。无前项身份之人，犯第六条至第八条、第十条第二项或第十六条之罪者，亦适用于本军律。第十条规定，军人或地方团队人员逃亡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携带枪弹粮饷或其他重要军用物品者，处死刑。煽惑他人犯前项之罪者亦同。

△　陕、甘、宁、晋四省训导会议在兰州开幕，由教育部训导委员会主任方治及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郑通主持。

△　重庆市电讯局招待新闻界参观重庆、昆明间无线电传真通报，称此在国内“尚属创举”。

△　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与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豫北联名通电，叛国投敌。庞投日后就任伪军委会委员、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等职。随同庞、孙先后投敌的还有第二十四集团军参谋长赵星彩、第一〇六师师长李震汾、冀察战区挺进第四纵队正、副司令侯如墉、于光辉，参谋长李志希，新编第五军副军长杨明卿，参谋长冯养田，暂编第三师正、副师长杨克友、王遂庆，暂编第四师正、副师长王廷瑛、王瑞亮等。

△　鄂西日军占领枝江城及洋溪南之高地，并继续向南猛攻，守军竭力抵抗，双方伤亡巨大。

△　日伪军3500余人分三路对河北易县狼牙山一带开始进行“扫荡”，至17日，无辜群众被惨杀者300余名，伤200余名，烧毁房屋7000余间，抢去牲口500余头，抢劫粮食财物不计其数。狼牙山纵横50余里，70余村尽成瓦砾焦土，尸体狼藉，惨不忍睹。八路军在抗击中，毙伤日伪军390余人。

△　日本新任驻汪伪大使谷正之抵南京。17日，向汪精卫递交“国书”。

5月15日　蒋介石对美使馆参事范宣德及艾哲逊表示，如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在华盛顿会议谈及中国及太平洋地区问题时，中国愿由宋美龄与宋子文代表参加。

△　太行八路军反“扫荡”大捷，黎城、涉县、偏城等重要城镇均告收复。自5日至是日10天内，大小战斗800余次，毙伤日伪大队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解放民工1300余人，攻克敌据点五处，摧毁伪维持会一二百处，敌被迫由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撤退。

△　昆明市临时参议会成立，议长陈铸。

△　国民政府公布《契税条例》，凡25条。

△　重庆经检队督察罗大纯奉令赴江津调查案件期间，利用机会勒取财物，实得2.5万余元，经军法执行总监部讯办，于是日执行枪决。

△　为河南特大灾荒，宋庆龄在重庆发起举办“赈灾足球义赛”，参赛者有中、英等国足球运动员。宋庆龄与英驻华大使等出席义赛开幕式与闭幕式。宋庆龄还亲自上场为球赛开球，并向参赛球队运动员赠送奖旗和纪念章。此次球赛盛况空前，轰动山城。

△　日本第三航空军75架空袭昆明中美空军基地，美机截击，烧毁大型飞机14架，击落六架。日机被击落15架。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内称：以各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业已成熟，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继续增长的需要，为集中全力尽速摧毁法西斯，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等原因，向各国共产党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16日　张自忠殉国三周年祭在重庆北碚墓地举行，蒋介石特派张治中主祭，冯玉祥、鹿钟麟致词，参加者500余人。同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

△　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元鼎等揭发陕西省政府重大舞弊案，致电行政院称："陕政黑暗，达于极点，上下交征，道同作弊，为数之大，实骇听闻。"电举该省建设厅"最近发生空前未有之盗卖大批卷宗及电讯材料、钢铁、筑路工具案"，以及大宗变卖黄金、贬价收买小麦、囤积居奇、损公肥私等大量事实。要求派员来陕查究，"以肃法纪，而儆贪顽"。18日，行政院批示："是否即构成违法或失职之罪状，必须依法撤查，方能确定。"并电陕西省主席熊斌："以正大坦白态度安慰各方，并负责彻查，依法办理，不可揣测。"

△　拂晓，石家庄等地日伪步兵1400余人，骑兵200余人，向行唐县羊观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个连合击，该连除一个排突出重围外，余均壮烈牺牲。

5月17日　国家总动员会秘书长沈鸿烈在中央纪念周报告限价问题，略谓抗战以来物价之变迁，就重庆趸售物价指数言，约可分为三期。第一期自二十六年下半年抗战起，至三十年止，上涨速度较缓，即二十七年较二十六年上涨1.5倍，二十八年较二十六年上涨2.9倍，二十九年较二十六年上涨9.3倍，三十年较二十六年上涨21.4倍。第二期为三十一年，较二十六年上涨82.5倍。自本年采取限价政策后，1至3月与去年同期比较，尚未到一倍，可见限价政策已收效果。

△　军事委员会任命石觉为第十三军军长。

△　国民政府卫生署第二次全国防疫会议在重庆开幕，探讨一般防疫设施及对细菌战之防御，21日闭幕。

△　国立中山大学全体贷金学生2000余人，向校方请愿要求增发

本月膳食贷金，并自下月起改为贷膳制度，径由校方供给学生膳食。

△　前华北伪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抵伪满访问，18日会见关东军司令梅津和伪满“皇帝”溥仪。

△　盟国联合参谋团开会，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及蒋介石之代表宋子文参加，此为中国第一次得到战略发言之机会。宋在大会上要求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有关中国事项的决议。

5月18日　国民政府公布《边疆从政人员奖励条例》，凡12条。

△　朱绍良密电蒋介石报告袭击晋绥边区乌旗八路军情况称：“经我节节进剿毙伤300余人，我收复乌旗府时，向西南昌汉脑包府蠡西亥庙退窜，灰（10）日经我包围扫荡击毙45人，残余逃窜，现已接近奸区。”

△　法国维琪政府与汪伪政府签订《关于交还天津、汉口、沙面专管租界实施细则及了解事项》（按：本年3月末，维琪政府已将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及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交与伪组织）。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吴国桢召见法驻华代办彭固尔，面交对法政府之严重抗议照会，指出法国此种行为显属违背国际公法，并声明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在华特权已因此完全无效归于消灭，“中国政府不再受其约束”。

△　国际粮食及农业问题会议在美国佛吉尼亚州正式开幕，44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15人，由郭秉文任首席代表，会期三周，主要研究世界粮食及农产品之需要及调剂等问题。

5月19日　中国轰炸机群在驱逐机掩护下，联合进袭枝江、洋溪日军渡河点及其补给基地，投下炸弹多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

△　林森致电古巴总统柏蒂斯达，祝贺古巴共和国独立纪念日。

△　英国援华会在伦敦举行中国展览会，展期至6月底，并将出售一部分展品作为援华基金。

△　丘吉尔首相在华盛顿美国会发表演说，称他与罗斯福总统久图与斯大林及蒋介石晤面，并希不久即可实现。表示盟国决于1943年中尽力分担苏联之重荷，并强调对日作战到底之决心。

5月20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举行十六周年校庆典礼，蒋介石主持并致训词，参加者计有该校校务委员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余井塘，教育长程天放及全体教职员学生千余人。纪念仪式后，蒋介石召见该校选派留印学生谈话，并参加全体教职员及学生聚餐，复对学生讲话称："党是一个大家庭，诸生即党之子弟，故必须负起责任，努力服务。"

△　中英、中美新约同时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互换批准约本，批准手续正式完成，新约开始生效。

△　中国兼驻哥伦比亚公使李迪俊向哥伦比亚政府呈递国书。

△　鄂西战事吃紧，常德开始强迫疏散。城防部队发布命令，每甲只留三人，其余无论男女老幼，概须当日离境，否则严办。常德百姓在一片混乱中逃亡一空。据事后调查常德民众损失，单是被窃货物，总数在五亿元以上。

△　由长治起飞的日机一架，在白晋路东侧，被八路军当地驻军以机枪击落，残骸在榆社地区寻获，机中驾驶员三人毙命。同日晨，日机20余架侵袭川境，分批在梁山投弹后东去。

△　伦敦成立中英议会委员会，旨在促进和密切中英间之友谊与合作，并邀请中国名流对英议院演讲。

5月中旬　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

5月21日　中美驻军审判法互换照会。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与美驻华代办艾其森就是项内容互换照会，规定对于驻华美军人员所犯刑事案件，由美军事法庭或军事当局单独裁判。美政府担保，将来如中国军队驻美辖区，亦享有美军在华之同等待遇。

△　国民政府明令废止《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　国民政府令特赦杀人犯杨维骞。杨因其父被范石生使人杀害，蓄志复仇，于行刺获遂后投案自首，经昆明地方法院依法减处有期徒刑九年五个月。行政院以“其杀人行为固干法纪，而年少志纯，激于孝思，奋身不顾，衡情殊属可原”，提请特赦获准，宣告将杨维骞原判之有期徒刑特予赦免。

△　四川省遂宁县民众因当地驻军枪杀壮丁家属一人，激起民愤。次日，群起包围驻军师管区，要求交出肇事祸首，又被毙伤十余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23日，该县民众再次包围驻军师管区，并捣毁直接税局、食糖专卖局，焚毁福生庄（商号），“演成暴动”。该区专员程厚之等诬以“显有奸党作用”，抽调大军进行镇压，当场捕获多人，并枪毙四人，为平民愤不得已又将肇事班长枪决，事态渐告平息。6月1日，蒋介石手令：“迅速妥为处理。”

△　中国空军轰炸机群冒雨穿过云层，向宜昌日军司令部及军事仓库等重要工事俯冲轰炸，完成任务后从容返航。

△　鄂西日第十三师团陷王家畈后，以3000余人于是日晚由聂家河、庙滩渡洋溪河，与枝江日军会合夹击江防军第六十七师。同时，日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宜都北红花套附近强渡，与江防军第十三师展开激战。22日，第十三师阵地被突破，日军继续猛攻。

△　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招待记者称：他与中国外长宋子文谈话之主题，乃系以各种军用材料运往中国，现此项工作进行甚佳。

5月22日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重庆成立，于斌、太虚、白崇禧、冯玉祥等为常务理事，陈铭枢、唐柯三、黄仁霖等为常务监事。

△　日机两架在安庆失事坠毁，飞行员四人均殒命。

5月23日　　鄂西日军占领渔洋关，第十集团军第八十七军退守川心店、龙潭圩一线。

△　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副经理夏实秋，因“图利扰乱金融”罪被判处死刑，是日执行。

5月24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青木关召开各省市教育行政工作检讨会议，28日闭幕。此次会议，一为检讨第二期国民教育推进问题；二为中等教育质量改进问题；三为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配合问题；四为社会教育扩大推行问题；五为战区学生招训问题；六为边疆教育问题。孔祥熙在会议闭幕式发表演说，强调“教育必须配合主义”。

△　四川省政府增列万县为国民教育示范区。

△　国民政府以四川大足县黄汉勋，捐助私立庆云中学基金及建筑设备等费达150余万元，陕西南郑县林春亭捐助私立兴国小学田产值12万元，特明令嘉奖。

△　鄂西日军集中第三十九师团与第三师团主力猛攻长阳，激战至午后，长阳失陷。江防军第八十六军退守长阳西北迄清江北岸一线。

△　伪满公布《物品贩卖业统制法》，规定对物品贩卖业进行整顿，由主管部大臣实行“统制”；实行物品贩卖许可证，适当设置配给机构，进行消费者登录以及商店的疏散等。

△　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核定攻缅计划，同意把“1943年雨季

结束时在缅甸北部发动的战役作为打通滇缅公路的基本措施”，并同意“在印度继续进行行政准备，以最终发动相当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规模的海外作战”。25日，美方将计划交由宋子文转蒋介石。

△　纽约举行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中国教育家晏阳初应邀出席大会，并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飞机发明人赖特、汽车大王福特、美哲学家杜威等10位名人，获纪念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之“现代改革家”奖。晏阳初的表扬状上书：“杰出的发明家：将中国几千年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5月25日　近日来渝之缅境果敢世袭土司杨文炳，呈函献金40万元，连同去年“七七”献金30万元，“双十节”献金10万元共献金80万元。是日，蒋介石特电嘉勉，电称：“台端一再捐献巨款，协助抗战军需，继卜式之风徽，过弦高之慷慨，眷怀忠忱，嘉慰良深。”

△　重庆各报发表国立中央研究院本年度杨铨奖金、丁文江奖金、蚁光炎奖金获奖人名单，计杨铨奖金：得奖人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傅乐焕、西南联大史学教员杨志玖。丁文江奖金（数、理、化学）：得奖人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陈省身。（生物科学）：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郑伟光、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助教薛廷耀等七人。蚁光炎奖金：得奖人南洋研究所研究员张礼千。

△　经济部公布：依照《奖励仿造工业原料器材及代用品办法》，第一批仿造成功呈请奖励之11件发明获准，主要有仿造新锉刀、仿造轮带革、仿造植物染料等。

△　财政部公布《全国羊毛统购统销办法》，凡10条。

△　行政院根据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电报该省今春缺雨，南路复遭大风，粮价上涨，请予救济，决定赈济办法如下：先拨难民急赈费

1000万元，并责令湖南、江西、广西三省协助购粮。

△　西康省民政厅长冷融一行五人，由成都乘包车赴大邑途中，在温江县属之公平村，突被暴徒五人枪击，冷融遇害，其随从曾仕明亦中弹死亡。省府闻报立派成都行辕总务处长驰往照料，并悬赏五万元限期缉凶。冷氏遗体，次晨运返蓉寓。省府主席张群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均亲往致唁。

△　周恩来同宗教界人士吴耀宗长谈，呼吁一切爱国党派和人士团结起来，为反对法西斯统治，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　李仙洲部第二十一师向晋冀鲁豫边区城武以北李庙、申楼地区进攻，被击退。

△　日军向湖北黄安、麻城地区发动进攻，当地第五战区第三十九军暂编第五十一师林茂华部奉命对日军消极防御，却以主力于是日进攻新四军。当局密电部署中称："各部队应于5月25日前准备完竣，开始剿匪，至敌据点之攻袭，应候另令实施"，以集中力量对新四军"乘机剿除之"。此次行动至6月7日结束。事后该军报告称：毙伤敌伪70名至80名，毙伤新四军"在5000以上（另一处又称为3000余），其重要分子之被击毙，经证实者计有参谋主任、作战科长、兵站医院院长各一员"，俘获300余人。

△　鄂西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空军掩护下大举进攻，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企图攻占石牌要塞，威胁川东。蒋介石特令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由昆明返回指挥作战，并电江防守备军诸将领：石牌为本次会战转移攻势之枢纽，乃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全体将士应抱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歼灭来犯之敌。第六战区奉命随即调整部署，预定决战时间为6月初，决战线为石牌、曹家畈、木溪桥、资坵之线。当即令第七十九军由石门向渔洋关前进，第七十四军

由桃源向石门集结，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向榔树东南地区前进。

△　罗斯福总统正式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将增加对华空运吨位，并准备本年雨季后陆、海、空军同时发动对缅甸日军之攻击行动。

5月26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重庆召开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训词”，强调要在十年内将其“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的五大建设准期完成，非有现代科学的行政不能尽到这个使命”。他说：“行政三联制的精神在一个‘联’字，设计、执行、考核三部分，不是三个分立的部门，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也是行政体制中的三个方面。”会期四日，29日闭幕。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回顾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指出：目前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解散共产国际较之存在更为有利，因此，表示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两个文件，任弼时主持会议，李富春宣读两个文件。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团结，指出党内团结及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公布冀西反“扫荡”胜利战果称：自4月19日开始，日军纠集第一一〇师团主力，独二、三、四、十五旅团及第二十六师团与太原守备队等约万人，陆空配合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重点为冀西地区，从平山、灵寿一直到房山、涞水、涿州，历时整一个月，截至5月18日“扫荡”被粉碎，计作战250次，毙伤日伪3000人，内击毙日军大佐二名、中佐一名。此次反“扫荡”战中地雷战发挥巨大威力，使日军蒙受严重打击。

△　鄂西江防军与日军展开激战。渔洋关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北攻鸭子口，为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所阻；日军另一部经木溪桥向石牌渗透。迄27日江防军虽仍固守石牌、稻草坪、曹家畈、易家坝一线，但日军已将停泊宜昌的大小船舶约二万吨全部夺走，驶往沙市。

△　常德守军奉命开赴鄂西宜都、长阳前线，余程万部第五十七师接替常德城防。

△　日伪军千余人合击河北大名西漳河地区，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一分区参谋长郑前学、第二十团团长徐绍恩、政委李汉英等牺牲。

5月27日　中国空军大编队机群轰炸湖北长阳日军司令部等军事目标，完成任务后安全返航。

△　中国空军少将林伟成参加盟机空袭西西里之役。

△　中国内河航运公司自制之煤气机浅水轮船“嘉陵十二号”，装载砖茶六吨及其他杂货二吨，自重庆启航，中途在南充、阆中、昭化停留四天，经15天航行于6月14日抵达广元，较普通木船快达五倍，创嘉陵江航运新纪录，自是嘉陵江全线通航。

△　日军五六万人分路由陵川、晋城进犯太行山，第四十军马法五部奉令迅速南撤。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颁发《民国三十二年广东省短期库券条例》，定额一亿元，7月1日起发行。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协同伪满在关内征募劳工，迫令回教徒前往服役，第一批于是日自天津押赴阜新开矿。

5月28日　鄂西守军在空军配合下开始反攻。同日，由资坵方面出击之第八十七军第一一八师攻克渔洋关，日第三十三师团等之后方联络线被切断，敌攻势受挫。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紧急处置公有物资奖惩条例》，凡12条。

△　交通部设电信总局，朱一成任总局长。

△　山东清河胶东地区八路军一部进攻广饶附近三里庄伪军，击伤伪团长成健基以下百余名，毙伪团附、伪副官以下官兵160余人，俘150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并将伪军碉堡城墙彻底破坏。

△　鲁南八路军一部连克泗水东南日伪据点多处，至次日，共毙伤伪军240余名，俘伪军连长以下375名，解放被敌抓去民众56名。

△　盟机出动轰炸湖南岳阳、临湘日军设施。

△　日机12架由新乡方面起飞，在河南孟津、巩县等地投弹多枚。次日，洛阳又遭日机投弹扫射。

△　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改“苏北行营”为“苏北绥靖公署”，汪精卫兼主任，张北生任参谋长。同时宣布今后“清乡”工作由伪行政院直接领导。

△　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电告美国务卿，称中国经济形势恶劣，士气逐渐低落，如能邀请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会谈，可予以重大鼓励；如能予以空中支援，发动反攻，收复宜昌等地，则可扭转中国之经济、军事情势。

5月29日　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闭幕，通过议案80余件。会议秘书长王世杰发表谈话称：“这次会议对于预算与计划的配合，对于计划的成立应如何争取时间，对于计划在物价不断波动的情形下，应如何继续实施或改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有缜密的决议。”

△　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称：暂编第四十五师师长王凤山“督战前线，弹中腹部为国捐躯”；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书记长官许家堃、

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推事何景岑等，“在金华遭敌惨杀”，“临难不苟”，“应予明令褒扬”。

△　国民政府任命宋润之兼最高法院庭长。

△　日军顾问高山率河北永年日伪军千余名，乘何营群众庙会之际包围何营，屠杀群众169人，毁房770余间。

△　日机36架由鄂袭川，途中在云阳投弹二枚，旋飞梁山投弹后逸去。

△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作出《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的决定，强调加紧推行侵略亚洲各国的各项“既定方针”，并拟定本年10月下旬在东京召开以日本“帝国为中心”的各国傀儡会议，“向中外宣布”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业已建立和完成战争的坚定决心”。

5月30日　鄂西守第军六战区所部全面转入攻势。迄31日，日军伤亡过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第六战区部队乘胜追击，日第十三师团主力被围困于宜都附近。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法》，凡六章43条。

△　中华政治经济学会举行第七届年会，陈果夫讲《义务劳动制与工业资本》，略谓：“资本之来源，实基于人力，我国人力广布，不虞匮乏，应实行有计划有组织之义务劳动制度，使人力变成机器，变成资本，则工业资本可以无虞”云。

△　四川自流井盐商代表来重庆请愿，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是日招待新闻界。

△　日机12架分两批袭豫，在卢氏、灵宝等地投弹。翌日晨至午，复有日机12架分批沿黄河渡口侦察，并在偃师境内投弹。

5月31日　中美空军联合轰炸日军荆（门）宜（昌）两机场，投下炸弹10余吨，返航时与日军战斗机数十架发生激烈空战，击落、击毁日机23架，击伤八架。

△　鄂西日军全线撤退，鄂西湘北战役大胜。次日，军事委员会发表战报称：是役日军伤亡在三万人以上。

△　第五战区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一师一个团，以策应湘鄂西战事为名，进抵鄂东长堰新四军第五师驻地，突袭该师医院，击毙伤病员一人，俘三人，医院药品抢劫一空。6月1日，新四军第五师为此发出抗议书，要求第五十一师："一、立即将被俘人员全部放回；二、对被害人员予以抚恤道歉；三、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四、如不杀敌请即撤回原防。"同日，新四军第五师又发出争取国民党军之公开信《敬告一七四师五二一团及曹支队全体将士传单》，要求共同抗日，"坚持南下杀敌之初志，勿为反共阴谋所利用"。

△　李仙洲部第一四二师向冀鲁豫区丰县东北十字河以西地区进攻，被该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击退。

△　南京青年胡本兰、慈荣海等人密置炸弹于伪中央军校大礼堂讲案下，拟候汪精卫到校训话时使之爆炸，事泄被捕，胡、慈两人是日被日伪枪杀。

△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冈野进（野坂参三）抵达延安。次日，函答《解放日报》记者："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并建议组织反对法西斯军部的人民战线。

是月　蒋介石电复财政部整理省地银行有关问题：一、省地银行收归国有问题，应与其他省营经济事业一并研究核定；二、为逐步整理各省地方银行计或先由财部分派一常驻监察人驻各地方银行；三、省地方银行之业务应予限制。

△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成立，戴笠任主任，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下设军事、情报、心理、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组和总办公室、总工程处。该所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设有庞大集中营，并在福建、安徽、湖南、贵州等地设有办事处、情报站和监狱。

△　军事委员会改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蒋介石兼团长，龙云、李根源任副团长。

△　苏北新四军以主力一部发动以塘沟（沭阳城东南）为中心的攻势作战，连克20个据点，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也攻克20余个据点，从而粉碎了“蚕食”，基本恢复苏北抗日根据地。

△　淮北新四军在被日军“蚕食”的淮阴、邳县等部分地区展开武装斗争，以主力一部发起反击，拔除日军据点26处，并派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从而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

△　八路军冀东分区第十一团团长赵文世带领五个连，在承德十一道河子与伪军一个营交战，打死伪军50余人，缴获枪30余支。

△　甘肃暴动的回民于上旬切断西兰公路。蒋介石以胡宗南为讨伐司令武力镇压，另以朱绍良进行“宣抚”。

△　四川省中江县烟业公会及卷烟生产合作社呈文国民政府社会局，报告卷烟业破产情况称：该县借卷烟业维持生计者“不下数万人，往昔尚可勉度难关，自专卖机关设置以后，所订专卖利益按级课税，遵奉财政部通案，全国一律无问销场售价之畅涩，而税额无伸缩之余地，致使一般贫苦工厂，因而倒闭停业者不知凡几，失业工人之呼寒者比目皆是，形成本县当前之最大危机，隐忧堪虑”。

△　河南省府为便利救灾，宣布普查户口结果：调查之68县250万户，食粮不足待救者220万户，其余充足户1.5116万户，自足户

20.5426万户。

△　行政院公布《全国生丝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凡七条。

△　日军以防止走私为名，拘禁平民多人，在海南岛劳动营集体屠杀。

△　日军在太行一带，自辽县的麻田至涉县的河南店约25公里的路上，向水井、水池投毒20多箱，并施放毒气，120多人中毒。

△　日本大本营调整侵华日军战斗序列：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和独立混成第六旅团一部编成第六十二师团；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独立混成第六旅团一部编成六十三师团；以独立第十二旅团为基干编成第六十四师团；以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为基干编成第六十五师团。同时，分别将第六十二师团编入第一军；第六十三师团编入华北方面军；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团编入第十三军战斗序列。

△　印度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印度医疗队一队到中国前线、敌后与后方军队中工作。又截至本月底，印度各邦援华捐款已达94.78万卢比。

6月

6月1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召集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代表为产业界企业家、主要负责人与有关部门负责人270余人，提案351件，主要研讨产、运、销等方面之有关问题。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训词。会期九日。

△　行政院例会通过《调整中央机关公务员生活补助办法》等决议案及免去河北省府委员兼主席庞炳勋本兼各职，任命马法五为河北省府委员并代理主席。

△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成都开幕，省主席张群报告一年来施政工作，大会着重讨论田赋征实、四川经济建设及建立乡镇民意机关等问题。会期17天，18日闭幕。会议决定本年度田赋征借总额不变，仍为1600万市石，计征额900万市石，借额700万市石，“各县征借实物后，除积谷外，其余一切以田赋或谷物为对象之摊筹派募，概须一切禁止”。同时决议购粮所发之三成现金改发粮食库券。

△　经济部公布1938年1月至1942年底，工业技术发明及核准专利之分类统计，合计五年中呈请专利之发明物品（或方法）共581案，核准专利者245案。各年核准专利情况：1938年16案，1939年21案，1940年49案，1941年90案，1942年69案。分类情况是：化学物品51案，机械工具49案，生活用具41案，印刷文具36案，电气器具25案，交通工具18案，矿冶四案，其他21案。

△　全国慰劳总会主办之鞋、袜劳军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劝募工作，规定每甲至少献赠布鞋、袜各一双或折合代金100元。

△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对国民党的现状和中共今后的工作方针作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与复兴社）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增。他们对东条扶蒋倒汪新政策毫无对策，国民党对日投降者增多，战斗力大损。目前英、美仍是集中力量对德，对蒋援助甚少。蒋对我党疑忌甚大，不愿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甘、黔、川、陕四省民变四起，蒋介石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国民党内部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敌后解放区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

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凡有日人干部，这些干部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为更好培养日本革命力量，确定今后原则上不释放日本俘虏。

△　中国空军中型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宜昌附近日军所积载之军需品与船舶，投下炸弹多吨，日机未能起飞应战。

△　日机连日袭豫。是日日机二架窥洛后在孝义投弹。2日晨，共五架在偃师周家山及孟津白鹤等地投弹。3日，由晨至午，又有14架分九批在巩县、荥阳、郑州等地盘旋侦察，并在孟津、偃师一带投弹。4日，复有16架分七批由新乡起飞，在偃师等地投弹，洛阳一日数惊，连发四次紧急警报。

△　云南省姚安县县长段商贤因“包庇种烟”罪被处死刑，是日执行。

△　汪伪行政院会议决定设“清乡”事务局，任汪曼云为局长。

△　日大陆铁路运输协议会事务局在伪满新京（长春）成立。

△　伪满决定发行第三次富国债券1000万元，每张500元，期限为四年四个月。

△　伪满国务院、民生部、兴农部、经济部公布《通帐票配给统制规则》，规定一切重要物资均按票证进行“配给”。

6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三十二年整理省债公债条例》，

定额1.75亿元。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青海省循化县陈杰捐资兴学，并准题颁“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宣布：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遗缺由尚在美国的李特尔代理。

△　全国慰劳总会奉令改组，举行改组后第一次全体委员会，推陈诚任会长，谷正纲任代会长，马俊超、郭沫若、黄少谷为副会长。决议组织鄂西慰劳团及成立战士之友社等。

△　周恩来、钱之光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途经重庆回国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员巴思。

△　第六战区收复鄂西长阳，一部迫近宜都。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决定，自4日起对鄂西将士举办慰劳讲座。4日晚，首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主讲。

6月3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三十二年度同盟胜利公债条例》，定额30亿元。

△　国民政府公布《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县长挑选条例》。

△　重庆各界举行“六三”禁烟纪念大会，并在较场口当众焚毁烟具。

△　川康绥靖公署为畅通省会附近粮运，特召集驻戍省会部队长官，指示护送办法，并按各部队驻戍情形，将省各重要粮道划分为八个区段，分别指派部队担任护运工作。

△　鄂西反攻顺利，第七十四军及第二十九军先后克复暖水街、三家厂、新安，进至公安附近。

△　伪满文教部召开大学校长会议，“协议大学时局的推进体制”。同日，伪满文教部制定《学校勤劳奉仕规程》，强令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勤劳奉仕”，按学校分编勤劳奉仕队，由校长任队长。省、市、县、旗设勤劳奉仕委员会，管辖学校的勤劳奉仕队。

△　国际粮食与农业会议历时16日于是日闭幕。大会主要决议事项为创立国际农业统制机关，以保障各国在促进粮食生产、分配、消费各方面之合作。会后，郭秉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访美国务卿赫尔，并开始在美各地参观农业设施。

6月4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对中共可能采取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同日，将讨论意见电告中共中央。

△　财政部宣布原颁取缔黄金买卖各项法令停止施行，准许人民自由采售。

△　全国慰劳总会鄂西将士慰劳团组成，团长张继，副团长孔庚，定于周内赴鄂西前线慰问。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级党部：“查近来各地每有敌伪奸伪潜伏，企图煽惑民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抗战建国”，通知“凡遇地方上有临时事故或重大事件发生，务须一面妥筹应付办法，一面详报本部以凭处理”。

△　日军乘鄂中新四军配合鄂西正面作战之际，进扰天门、汉川湖地区，被新四军全部击溃，毙伪警备队长以下50余人。新四军乘胜进攻，复于8日、9日两日，全歼该区伪军李炳坤旅，击毙旅长李炳坤，俘虏伪官兵千余人。

△　日伪军一万多人对山东渤海区进行抢粮大“扫荡”，渤海根据地以部分兵力与敌周旋，以另一部兵力深入敌后，袭扰和破坏敌交通

运输线，并相机发动攻势。经一个多月的300余次大小战斗，粉碎了“扫荡”，攻克或逼退据点132处，毙、伤、俘日伪军约3000人。

△　罗斯福总统建议举行中、美、英、苏四国首脑会议。6日，蒋婉拒罗斯福总统邀约。30日，罗斯福总统再邀蒋于今秋会谈。

6月5日　　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蒙藏教育司司长骆美奂飞新疆考察教育。

△　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教授蔡翘、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云南大学心理学教授费孝通等六人赴美讲学。

△　延安举行欢迎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野板参三）大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干部2000余人出席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央致欢迎词，冈野进讲话称日本党当前三大任务：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部、立即结束战争、建立民主政府。

△　陇西剿匪总司令范汉杰、总指挥盛文率部进攻陇南礼县西和回民暴动区。26日，暴动回民遭重大打击，7月中旬暴动平息。

△　伪满军事部发布伪军司令官更迭令：第三军管区司令官、陆军中将吕衡派充第七军管区司令官；禁卫队司令官、陆军中将赵秋航派充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军事部附、陆军中将杨镇凯补禁卫队司令官。

6月6日　　晋东南八路军一部为粉碎日军抢粮计划，配合民兵在和顺、辽县等地广泛开展“护藏出击”运动，包围日伪据点，攻击出犯抢粮之敌，是日至24日18天中作战120余次，毙伤日伪军492人，俘237人，夺回粮食五万余斤。

△　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驻湖北潜江地区的汪伪第十师第二旅朱秉坤部进行合击。战斗开始，朱部营

长王启瑞率部反正，新四军迅速进入熊口地区，全歼朱部第二旅，俘1000余人，朱秉坤带随从脱逃。

△　日轰炸机八架、战斗机12架袭梁山机场，毁伤我P—40型机15架，车辆10部，死亡官兵六人。第四大队第二十三中队队长周志开于弹落之际，冒险起飞，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创个人一次击落敌机之最高纪录。

△　日机八架分批轮番轰炸湖北江陵县长江大堤边的郝穴镇，炸死158人，毁房53间。

△　美第十四航空队分队长克拉克中尉，驾驶轰炸机与大队机群在袭击宜都、宜昌后，被多架日机拦击，众寡不敌，被迫降落荆门附近。克拉克于降落后将机身焚毁，携带手枪泅水脱逃，被当地中国驻军救起转送后方。12日抵巴东，15日抵恩施，16日陈诚接见并赠慰劳金5000元，当日湖北省各机关、团体向克拉克献旗致敬。

△　鲁苏战区鲁南指挥部总指挥、第一一二副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在鲁南率部投敌，任伪鲁南战区司令兼暂编第十军军长。9日，荣子恒赴北平访日伪当局，日报大登其照片，宣称荣率部二万参加“和平阵营”。

△　重庆工程学界集会庆祝工程师节，并分别在各处举办通俗科学及工程讲座。新疆工程师节纪念大会特电中国工程师学会转全国工程师，请“领导国人建设西北”。

6月7日　　陈诚在湖北战时省会恩施各界庆祝鄂西大捷暨端阳节劳军大会上，报告鄂西会战经过及胜利原因，称此次会战是“以寡敌众，以劣胜优”，“战争的胜败是整个的，决不能单纯归功或诿过于军队，今后必须力求政治、文化、经济与军事整个之配合，作更广泛之努力，乃能争取最后胜利”。

△　张治中告知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研究对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为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合法；一为同国民党合并。现只等中共的意见。周恩来答：两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主要是国民党政治不开放。

△　宜都被围日军借飞机掩护并施放毒气突围，与聂家河日军会合，向东逃窜。

△　西北建设考察团一行20余人，由罗家伦率领由成都出发赴西北各地考察。

△　汪伪江苏省盐城县民众汤义厚等上书汪精卫揭露苏北税务黑暗情形，内称：苏北统治区“税务名目繁多”，如大车税、民生税、扬子税、地方税、复兴税、附收行营军事补助税、县税、团税、枪杆税等等。

△　日本大本营第二课就“适应情况变化对中国方面作战的研究”，在课内进行审议。审议重点为遏制美机空袭日本本土及昆明作战、五号作战（进攻重庆）、纵贯大陆作战等实施问题。同日，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789号，分别从关东军抽调战斗机一个战队，从南方军调重轰炸机两个战队，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同时指示关东军及南方军于6月下旬派出部队。

△　美国医药援华会在纽约成立中国输血所，准备将所输之血制成血浆运往中国救济伤兵。该输血所职员均为中国人，其医务人员最后将被派回中国创办输血所。

6月8日　　鄂西日军大溃退。第一二一师于是日克复宜都，续与第一八五师联合作战，次日克复枝江。11日夜，暂编第六师克复洋溪。12日，第一九四师先后克复磨盘洲、新江口。17日，第七十四军克复车家咀、申家渡；第一九四师克复班竹垱、米积台等地。日军退守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一线。双方恢复5月5日前原态势，鄂

西会战至此结束。是役，据日方公布战果：中国军队遗尸3.0766万具，被俘4279人；日军死771人，负伤2746人。

△　齐齐哈尔伪满当局强迫市民缴纳金属，在齐齐哈尔神社举行献纳式，计收钢铁类19吨，铜一吨，钢合金类五吨，其他金属72吨。

△　美总统罗斯福再次警告德国、日本勿使用毒气。

6月9日　　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闭幕，孔祥熙致闭幕词，通过提案400多件。

△　全国慰劳总会通电全国各省、市，“七七”举行劳军大会，慰劳当地驻军、荣誉军人、在营壮丁及出征军人家属。

△　经济部公布《自用动力厂登记规则》，凡10条。

△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青海乐都县徐马氏捐资兴学，并准题颁“兴学育才”匾额一方。

△　加拿大驻华公使欧德伦访蒋介石。11日，访孔祥熙。

6月10日　　中、美、英、苏批准关于成立联合国家救济复兴协定草案，经美国国务院分别送交各盟国及其他联合国家审批。中央社报道：联合国救济复兴处将作为联合国家战后善后处置之第一个执行机构，总处设华盛顿，首任处长将为美国对外救济复兴局局长李门，区域性之委员会则分设于伦敦及重庆。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军民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对莘县地区的“扫荡”。

△　名译作家伍光健病逝。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战时文化宣传对策基本纲要》，规定方针要领为：“认定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为一切东亚理想实现之前

提，国家集团主义为东亚新秩序建设之准则，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之一环，应把握中日文化之实体，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11日，林柏生就汪伪公布此纲要，接见记者称：纲要基本内容在于“清理英美及共产主义之毒素思想”及“重建中国与东亚文化”。

△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获各国支部一致批准，是日宣布正式解散，并撤销执委会主席团、秘书处及国际管制委员会。另设一委员会，以季米特洛夫为委员长，负责清理共产国际结束事务及财产。

6月11日　蒋介石手令，全国各部队、机关、学校，一律实施军需独立制度。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战时火柴、烟、糖专卖暂行条例》。

△　农林部在重庆举行农林工作检讨会议，到会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12省代表及有关农林机关代表60余人，主要内容为确定下半年业务方案。

△　鄂西第六战区一部克松滋。

△　日机四架轰炸浙江镇海柴桥，死伤居民31人，毁房100余间。

△　重庆福华煤矿公司因矿坑通风不良，发生矿井爆炸事故，矿内工人及赶来营救之建川煤厂工人共50余人（内有工程师一人）全部焚毙。两矿工人“愤恨异常，准备聚众捣毁福华公司”。重庆卫戍司令部以孔祥熙“在该公司投有巨资关系”，派大批军警前往镇压，并饬宪兵团“严密查察注意工人行动”。

6月12日　中共苏中区党委出发《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要求凡未减租地区开展减租工作；在已减租而不彻底的地区，则要求发动

减租运动，以彻底解决减租问题。

△　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奉命召集西安30余“文化团体”开会（实际到会者九人），宣布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事打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假冒“各文化团体”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电文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为加强盟国团结第三国际解散；为加强中国团结，应“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

△　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及该部顾问楠本世隆中将视察福锦县东北五顶山伪军部队时，一名士兵突然冲出队伍向他们开枪行刺，然后脱逃。翌日，行刺士兵被追赶至江边，跳江身亡。

6月13日　蒋介石召集参加鄂西作战空军部队训话，褒奖有功人员，特别表彰救援盟机之驱逐机大队队员臧锡兰上尉及一人击毁日机多架之中队长周志开少校，并授予周志开以最高之青天白日勋章。

△　外报记者一行九人离重庆赴前线参观鄂西大捷战绩，历时两周，26日返回重庆。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赖汝雄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　川江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及船员工会联合会，在嘉陵江水上运动会之颁奖席上代表川江30万民众，向参加鄂西会战之盟军、中国空军、鄂西将士各献锦旗一面。

△　八路军鲁中军区主力一部深入敌占区开展武装保卫麦收运动，是日攻克南高平伪据点，歼伪大队长以下150余人。15日，攻克三官庙，生俘伪军90余人。

△　由豫北起飞之日机，少则一架，多则五架，连续袭击洛阳一带，投弹地点多为孟津县属之白鹤，洛市一日连发警报七次。

△　日机六架空袭肇庆，在市区盲目投弹30余枚，炸毁民房数间。14日，日机15架分两批袭赣县，投弹40余枚，中有九枚未爆。

6月14日　重庆各界五万余人集会庆祝联合国国旗日，蒋介石致电英、美、苏各国元首祝贺，孔祥熙向联合国各国发表广播演说。

△　经济部召开各省经济工作检讨会，翁文灏讲话说："各省所办省营事业，固各有其自身需要，惟自整个经济建设着想，殊不宜过以省界为主，自相分裂，亦不宜垄断商业与民争利。"

△　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员宣誓条例》，凡八条。7月14日，颁发各党部。规定誓词为："余誓以至诚，遵奉总理遗嘱，信仰本党主义，严遵本党党章，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

△　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邀集专家学者及各厂商、机关代表，在西安召开座谈会，研讨开发西北问题。

△　盟机八架与日机32架在江西樟树遭遇，盟机以少胜多，击落日机六架。

6月15日　蒋介石特电饬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分别通令各军政机关，整肃花纱布管制纪纲。电称："其有阳奉阴违，营私舞弊，或利用职务乘机牟利者，及一切机关团体套购渔利或冒领滥用者，一经查明，均以破坏管制论罪，交由军法机关从严惩办。"

△　国民政府明令免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庞炳勋本兼各职，任命马法五为河北省政府委员、代理河北省政府主席。

△　宋美龄抵加拿大访问。次日，在加拿大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略称：日本在中国长城以内各占领区掠夺运往其国内之物资，去年平均每月为280万吨，运往东北及亚洲各地者为230万吨，运往供应其在华军队者约一亿吨。她说："中国军民抗战之伟大意

志，仅凭不充足之作战物质得以实现，不应任其过度劳伤，致越出人类所能忍受之程度。”17日，返回纽约。

△　陕西长安斗门镇居民掘获古代铜器二件，经考古学家鉴定为周代中世礼壶酒器。

△　日伪分兵10余路，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文水、交城、阳曲等地进行“扫荡”。当地八路军协同民兵，与敌猛烈搏斗，至21日敌分股退回原防，“扫荡”即被粉碎。

△　沦陷区江苏省崇明区绅商陈佐时等“上书”汪伪政府要求制止苛捐杂税，文举该区捐税名目原有者五种：统税、所得税、屠宰税、印花税、烟酒牌照税。新增者九种：纸张税、箔类税、猪只税、筵席捐、取缔迷信事业物品捐、保甲捐、营业税、牙税、房捐。

6月16日　上月31日宜昌空战中，因汽油用尽被迫降落洞庭湖畔日军占领区之美第十四航空队驾驶员五人，在当地中国游击队的帮助救护下，跋涉16日，于是日脱险抵达第六战区中国军队驻地。

△　李仙洲部向冀鲁豫湖西地区发起全面进攻。21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反击李仙洲部之战役开始。27日，在丰县东歼灭李部一个营，至8月10日共歼李部5000余人。

△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致外交部节略，指责盛世才对苏措施为非法与仇视行为，并附1940年12月盛世才与苏联所订密约。

△　日本议员赤尾敏在议会对东条作战报告提出质问，被大政翼赞会除名。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伦敦向记者发表其返任后之首次谈话，希望盟国以更多飞机援华。

△　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在渥太华访问宋美龄。同日，宋美龄在加

拿大两院发表演说，翌日返回纽约。

△　日本第八十二届临时议会在东京开幕，会期三日，“讨论划时代之工业调整问题，俾集中国力，完成大东亚之战”。东条在施政演说中强调时局严重，吁请国人“节约物资，加紧生产，确立及整备决战体制”。19日，议会闭幕，通过所谓“打倒英美”案，决定“强化与德意各盟邦之联系，借使东西相互提携，期以完成旷古罕有之大战”。

6月17日　何应钦为第四十军马法五部自太行山突破日军围截安全渡过黄河，特电嘉奖。电称：“此次太行会战，庞总司令与孙军长因个人戒备疏虞，致身陷于敌。而兄等统率所属各部，保持完整建制，努力杀敌，此乃我将士忠勇为国报仇雪耻精神之至高表现。”

△　史迪威面谒蒋介石，报告“三叉戟会议”之决定。

△　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奉电召赴渝路经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贺龙分别设宴招待。邓宝珊和毛泽东会谈数次，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正在发动的新的反共高潮，阐述中共政策，决心争取民主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并希望邓宝珊给予合作。邓在延期间还会见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7月，邓宝珊行抵西安。

△　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沦陷四十八周年纪念日，在重庆举行扩大宣传，并由吴铁城在中央电台播讲《台湾归来》。

△　川康兴业公司与西康省政府商定合股设立西康毛革特种公司，各出资500万元，以西康产牛羊皮毛为原料。现已组设雅安毛织、制革两厂，康定洗毛厂亦在办理改革事宜。

△　日本大本营将第十五师团由第十三军调归南方军第十五军战斗序列；将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十七师团调归关东军战斗序列。

6月18日　蒋介石电何应钦转国民兵团称：国民兵团已先后捐献

飞机10架，“殊堪嘉慰”，“惟空军建设经纬万端，所望全国国民不断努力贡献其人力财力，协助政府始克有济”。要求扩大推行一元献机运动为一县一机运动。

△　重庆市府宣布调整管制物价，由限价改为议价。市长贺耀组在报告中说：“限价改为议价乃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由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因之望与政府同策协力。”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讲话说：“重庆1至4月物价较为稳定，5月迄今物价波动变化甚烈。5月份零售总指数竟涨至8%，物价零售总指数竟涨至12%。”次日，重庆市府正式公布《调整限价议价物品种类办法》。

△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陕西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第九十军和暂编第二十五师、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以上官佐，布置发动进攻陕甘宁边区。会后，河防军队纷纷西调。28日，第十六军炮兵团第一营由郃阳开抵耀县。30日，西安卫戍部队第五十七军第八师开抵同官（铜川）。同日，河东国民党游击纵队王裕民部渡河西撤开抵大荔，整装北上，包围陕甘宁边区。

△　绥西水利工程复兴渠竣工，举行放水典礼，全长90余里，可灌地20余万亩。

△　抵达加尔各答之孟买华侨小学师生约30人，赴中国驻印军区慰劳远征军将士。

△　日伪军在河北省永年县小北汪村屠杀279名无辜群众，800多间民房被烧毁，400多头牲口被抢走，制造“小北汪惨案”。

6月19日　四川省临参会第二届一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省府交议之田赋征借实物案，即今年粮食征购部分改为征借，政府发给全部粮食库卷，不再搭发三成现款。21日，粮食部长徐堪接见记者对此大加赞扬，谓“此系人民拥护政府热诚之表现”。

△　全国慰劳总会鄂西将士慰劳团出发赴鄂西劳军，携带慰劳金200万元、药品及各种慰劳品。

△　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强袭临清南小辛庄、三十里铺两伪军据点，俘伪军300余人。

△　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三分区主力一部，在泰兴、泰州等独立团地方武装配合下，对占领泰兴县北新街之伪军第三十七师独立第三团发起攻击，击毙伪营长以下52名，生俘正、副团长以下600余名。

6月20日　鄂西大捷，湘北平定，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命令开放所有城门，逃亡在外的常德民众开始大批返回。

△　中国经济学社重庆分社成立，孔祥熙致词说："我国战时财政之基本问题不在财政技术之选择，而在如何能在微薄之国民生产中额外提出一部分，作为战时之特别支出，换言之，即如何进一步地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除人民最低限度消费外，将其全部之富裕转入于政府之手，借以支持此长期之战争，要在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　中国童子军教育学会成立，戴季陶任名誉理事长，张治中、陈立夫、谷正纲任名誉理事。

△　山西离石穆村日宪兵队长驹泽邦男向中国方面投诚。

△　汪伪与日方签订《关于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凡五条，规定"日本军以担当关于作战警备事项为主"，汪伪"以担当关于政治工作事项为主"。汪伪"使用之军队、保安队、警察及其他武装团体"，必要时得"受日本军队指挥官之指挥"。

6月21日　全国慰劳总会在重庆举行庆祝鄂西大捷、慰劳中美空军大会，由慰劳总会代会长谷正纲主席，周至柔、陈纳德、吴铁城、张道藩、张治中、贺耀组等讲话。

△　新四军一部再次袭击苏中兴化东北日伪据点，全歼驻守伪军，毙60余人，俘伪支队长以下官兵百余人。

△　日机三架在赣南遂川低飞扫射，被当地驻军以机枪扫射击落一架，驾驶员一名被俘。

△　台湾第二批陆军“志愿兵”1030人入伍。

6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电各省、市党部协助办理“八一四”空军节，发动一县一机运动。

△　行政院会议决议，对四川省临参会通过该省本年度粮食征购部分，全部发给粮食库券，不另搭发现金。

△　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集会纪念苏联抵抗法西斯两周年，孙科代表该会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

△　日机轰炸江西光泽县西城，在西门外闹市区炸死居民33人，伤52人，毁民房、店铺170余栋，万寿宫一带繁华街道尽成焦土。

△　汪伪政府任命庞炳勋为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为副总司令。

6月2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宣传要点（第8号）》，指出：反法西斯战局日趋好转，英、美、苏团结更加巩固的国际有利形势，对于中国的抗战团结是有利的。中共的中心任务，仍是从反扫荡、反蚕食及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中坚持根据地，仍是从发展生产及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亲密军民关系中团结群众，仍是从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教育干部中巩固党。

△　西北建设考察团一行，由罗家伦率领到达西安。

△　胶东八路军一部攻克莱阳东蛇窝泊日军据点，毙伤敌中队长

以下48人，俘伪警长以下83人。

△　日伪军对河北省定南区大举“扫荡”，39个村庄遭敌血洗，村村变成屠场，约300村民被杀。

6月24日　湖北省各界欢迎全国慰劳团及慰劳鄂西将士大会在恩施举行，张继致慰劳词，陈诚致答词。

△　宋庆龄为募款赈济粤灾，在重庆举行国际音乐会。

△　宋美龄由纽约抵华盛顿，三度访问白宫，向罗斯福总统夫妇辞行，并就战后远东和平与善后处理诸问题，与罗斯福总统详加商讨。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指出：国民党特务政策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对共产党是采取肉体消灭政策；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采取自首政策；1935年一二九运动及抗战爆发后，采取有系统的内奸政策。今天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特务斗争。抗战以后的国民党（主要是CC、复兴），已经不是大革命或内战时期的国民党，而是有丰富反动统治经验、破坏革命与中共的方法非常精明、很有组织的国民党。因此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否则即无胜利之可能。

△　冀中定县日军黑田大队纠集附近10多个据点日军3000余人，包围定县43个村庄，实行为期七天的驻屯“清剿”。据32个村的统计，共抓捕群众3000余人，遭受毒打的1189人，被打伤致残的568人，被杀害的数十人。

△　驻潮安之伪第四十四师官兵一部携带武器反正。

△　美国大使馆秘书、驻华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建议美国政府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观察团。

6月25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冷融。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例会，到张伯苓、莫德惠、王世杰、董必武等20人，谷正纲作最近施政情形报告。

△　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制定战时经济施策具体方案。会议决定：增加工业品及农产品生产；贯彻物资统制，加强运输；强化国民储蓄，设置经济调查所。

6月26日　孔祥熙以中美文化协会会长身份，宴请史迪威及在重庆美国军官，宋庆龄、吴铁城、何应钦等百余人出席。

△　孔祥熙、杜月笙、宋子良等人在上海开设的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被伪中央储备银行强制管理。

△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代主任张宝树自太行山突围，绕道脱险归来抵陕。

△　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报告在苏南一带部署重兵袭击新四军的详细计划。7月1日，蒋介石复电："准予备案，并饬肃清残余，加强地方自卫，以杜后患。"

△　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三分区部队，在苏中一带歼伪军一个补充团，俘伪团长以下294人。

△　日军在张家口火车站，对2000多名围住运粮列车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70多人。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华北扰乱经济统制紧急治罪暂行条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囤积重要物资，或未经许可私行移动大量物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科以一万元以上

至五万元以下罚金，并没收其物资。查有“资敌”之实据者处死刑，未遂犯处无期徒刑。同时决定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南京设驻京办事处。

6月27日　重庆《大公报》报道：派遣留学生出国计划业经国民政府主管当局核定，全国计划定为五年，每年1000人，分配美国700人，英国300人，其派遣学生采取考试与遴选各半办法，出国期间定为二年。

△　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通过边府编送之《征收边区公粮预算》决议，决定本年度减轻公粮16.56％。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分区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对襄垣地区的“扫荡”。

△　汪精卫接见日本同盟社记者并发表谈话称：东亚民族应精诚团结，实践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四大纲领。并对东条改订日汪条约的谈话表示感谢。

6月28日　重庆市教育局召集全市中小学校长举行座谈会，讨论学生营养及学校经费问题。教育局负责人称：近日最高当局对学生营养问题颇为关切，但因此问题与学校经费问题密切相关，故合并讨论。决定下学期伙食费缴纳2000元至2400元，伙食团由学生组织，学杂费下学期改缴800元至1000元，教员之伙食由学生负担。并决定严格学生纪律，不准教师同时接受数校聘书或同时在两校任课。

△　军令部长徐永昌透露盛世才电称：苏方驻哈密之第八团仍留哈，其出动之一部及坦克车九辆中途停留。独子山石油厂及迪化飞机制造厂，其官兵重武器等迄未离境，重要机器亦未拆除。哈密驻军尚约余300人，飞机29架，航空人员144名未撤等。

△　国民政府派李品仙为安徽省县长考试试务处处长。

△　周恩来离重庆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同行有邓颖超、林彪、孔原、徐冰、高文华、伍云甫等共114人（包括家属），是日分乘五辆卡车从红岩出发。周恩来回延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交由董必武主持。

△　墨西哥驻华代办卡斯托瓦尔代墨总统赠蒋介石以神鹰勋章。

△　重庆市卫戍总部决定，今起实行居民身份证总检查，定期三日（后因雨延至7月2日）。与此同时，另组特检组配合实施治安检查。

6月29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通过重新调整重庆粮价，自下月1日起实行。规定：一、每市石原售240元之官价米，涨为380元；二、每市石原售380元之官价米，涨为570元；三、每市石原售520元之中等熟米，涨为780元。面粉价格：一、每袋原售190元之特种粉，涨为300元；二、每袋原售170元之统粉，涨为260元。

△　宋美龄离美回国，经巴西、南非、印度，于7月4日抵达重庆。按：宋自上年11月18日离渝赴美就医，本年2月康复，在美、加访问四个多月。

△　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内外勤工作检讨会在重庆举行，讨论土地税、契税等如何有效推行。有关方面宣称，本年度田赋征实征购总额为一亿石。

△　汪伪政府与日本正金银行及中央储备银行签订借款“变更契约书”，决定将1942年6月1日原借款额“日通货3500万元”改为“4500万元”。

6月30日　国民政府公布《惩治贪污条例》，凡14条。

△　中华基督教联合救国会及各界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会联合在重庆召开会议，决议扩大组织，更名为中华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推冯玉祥为会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蒋鼎文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文彦为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正先为第十六军军长，袁朴为第八十军军长，周志冕为第九十一军军长，张占魁为第三十六军副军长。

△　全国慰劳总会鄂西将士慰劳团由团长张继、副团长孔庚率领返回重庆。另一部分团员仍留前线劳军。

△　日伪军4000余人开始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聊城、莘县地区进行“扫荡”。

△　日本与汪伪签订关于所谓归还上海公共租界的条款及了解事项，规定归还日期为8月1日。同日，汪精卫为此发表谈话，表示“吾人诚不胜其感谢”，“吾人并深望其他关系各国追随友邦日本之后，对于上海公共租界之交还迅速予以仿行”。

6月下旬　空军总指挥部与美第十四航空队协议，在印度卡拉奇成立教练队，各部队轮流派往受训，以便接收美国之新飞机，并减少国内油料之消耗，而于完训后，由中美双方各派三个大队之对等人数，组成中美混合团，归陈纳德指挥。经奉批准后，即派第一、三、五大队前往印度。

△　日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新四军第五师一面以主力开展破击战，打击敌人的“蚕食”行动；同时组织武工队到敌据点附近，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从而遏止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

是月　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任会长，翁文灏、陈立夫、朱家骅、周至柔、俞大维等五人为常务理事，陈立夫兼总干事。

△　重庆市政府关于管制物价工作的报告称：各业市场交易“均有所波动”，“水上黑市充斥”，“渡船渡资各码头均已倍涨，职业工人工

资亦多因粮、盐、油、布等价格上涨而有显著波动”，“警察局临检队查获违反限价及其他管制法令案件之当事人……辄因讯问、拟签、核判层层手续而遭受无谓之羁押有达一二十日之久者，致常为社会所诟病”。

△　军委会派海军军官50名赴美国学习，由美海军翟瑞乐中校负责协助训练。

△　军委会军政部调整裁减卫生机关，截至是月，前后方之各种卫生机关为571个，收容伤病官兵6.5万余人。

△　西安警备司令部派出百余名军警，突然包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强行没收电台。自此，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联系改用西安情报处的秘密电台。

△　夏收将届，日伪加紧抢粮活动。太行、山东等北方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武装保卫夏收，开展“护藏出击”运动，坚决打击抢粮之敌，粉碎日伪抢粮计划。在山东、晋东南等地都取得保卫夏收、歼灭日伪的重大胜利。

△　日伪在热河兴隆县经过四个月来灭绝人性的“大集家”，计烧毁房屋七万余间，抢走牲畜三万余头，把11.1万余人赶进199个“人圈”，制造“无住禁作”地带1190余平方公里，占总面积43%。“人圈”内因病死亡达6000余人。

△　伪满警务总局统计：1943年1月至6月，各煤矿“特殊工人”死亡1154人。另外，兴安岭筑城工程中的四万名劳工，死亡3000余人。

△　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发行额截至本月底超过100亿元。

△　日本华北方面军公布：自本年1月至5月，与共产党军队交战次数为5524次，其兵力达56.7424万人之多。

7月

7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到会千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抗日战争六年和中国共产党22年的经验，指出：今后的一年，是欧洲战场决战的一年。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这就是大方向。

△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党、政、军、民各界举行“七一”庆祝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讲话，提出共产党员要“保卫党”、“把风整好”、“继承优良传统”，号召全体党团员团结在党中央和领袖毛泽东周围，为完成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而努力。

△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议、第二战区高级顾问、国民政府委员马君图在山西省晋城投降日军。

△　前运输统制局中缅运输总局下关总站少将总管薛文蔚，以贪污案被处死刑。

△　美水土保持专家罗德民暨中国农林水利专家一行九人，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李耕砚陪同抵陕西省泾阳，研究泾惠渠含沙问题。

△　伪广东省政府以“扩充生产经费”为名，发行“短期库券”，金额伪币一万元，年息六厘。

7月2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指出：在全国抗战的第七年，为了克服现有的困难和准备好将来反攻时的力量，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建议：一、应该加强作战；二、应该加强团结；三、应该改良政治；四、应该发展生产。宣言最后说：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22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奋

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　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陈毅等：近期形势极度紧张，国民党军似准备在我党中央讨论如何改进国共关系时发动闪击战式的军事行动，逼迫我党接受其交出军队、取消边区的条件。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部队进攻浚县、滑县地区伪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二十七军杜淑部，歼敌1800余人。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病死。4日，汪伪中央政府任命王克敏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　日军分别在华北四省（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和三特别市（北平、天津、青岛）召开“剿共”委员会成立大会。

7月3日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表《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一文，指出：“自39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绝，靠着自己生产和民众协助，解决了粮食、被服，依靠指战员的英勇攻袭敌之据点堡垒以及反扫荡之胜利，夺取了敌人无数弹药武器，补充了自己。正因为如此，才能屹立敌后，坚持六年。”

△　国民政府派图布陞吉尔格勒代理伊克昭盟盟长和保安长官，并指定其为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　重庆市社会局长包华国报告称：目前重庆市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在500所以上，社员25万人，股金700多万元。

△　美驻华空军总司令陈纳德在华南美空军基地主持美第十四航空队成立一周年纪念会，史迪威对该航空队有功人员授勋，中国空军上尉臧锡兰以在5月31日宜昌空战中保护美机并击落日机一架之功获银星勋章。

7月4日　　为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六十七周年，何应钦设宴招待在重庆的美国陆、空军人员，史迪威、张治中、白崇禧、商震、贺耀组、贺国光、吴国桢等一百多人出席。

△　美国总统罗斯福电约会晤蒋介石。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告以会晤时间以9月以后为最适宜。

△　毛泽东急电董必武：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就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　朱德致电胡宗南："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　第五十三师一部闪击陕甘宁边区鄜县峪口村，八路军留守部队一个班迎头痛击，毙该部副连长以下30余人。

△　汪精卫派伪军事参议院院长肖叔萱去山东"点验"吴化文降部，并代汪宣读"训词"称：中共坚持抗战到底是"离间中日感情"，鼓吹"吾人惟有并力一心铲共"，"复兴可期"。

△　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副师长关庸投降日军，该师改编为伪皇协军第一师，张步云任代师长，与日军相配合，向八路军进行"扫荡"。

7月5日　　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等，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

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　王稼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指出回顾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的道路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致电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各将领，揭露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重开内战的阴谋。呼吁团结，反对内战。

△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指出：“1938年，新四军奉令东征，与江淮、江汉各地之人民武装汇合，更加强了敌后抗日阵线，由零星游击武装变为集团的抗日部队，指挥统一，地区联系，各种战争建设次第兴办，蔚为大观。”

△　冀鲁豫军区司令杨得志指挥第二、三、四分区部队，向盘踞在鲁西北朝城地区之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部展开全面攻势，到11日，生俘伪第六十二旅参谋长郑文以下530余人，毙伤200余人。

△　中国儿童保健会在重庆成立，邵力子、谷正纲等31人为理事，洪兰友等九人为监事。

7月6日　　八路军总部公布去年7月至今一年来战绩：大小战斗2.2735万次，毙伤日军5.5637万人，毙伤伪军6.2405万人，俘日军296人，俘伪军3.1161万人，缴获步、马枪3.6608万支。

△　新四军军部发表一年来战绩：大小战斗4822次，毙伤日伪军3.9879万人，俘日伪军9923人，日伪军投诚反正7921人。缴获步、马枪2.6672万支，破坏碉堡691座，攻克日军据点179处。

△　重庆中央社首发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反共电，并以

其为重要新闻，在全国广为刊播。张电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接着报导各地反共通电：7日所谓“陇海路员工七七纪念大会”、19日“皖省临时参议会”、25日“屯溪各法团”、27日“长沙文化界”、28日“桂市记者公会”、30日“洛阳记者公会”、31日“洛阳文化界”及“鲁山新闻记者公会”等致电毛泽东，要求“即日解除共党组织”、“取消边区政府”。

△　第九十军王应尊第二十八师撤离河防，由陕西郃阳开抵陕甘宁边区之洛川县交口河桥子镇，该军邓钟梅第六十一师开抵洛川东南圪台镇；袁朴第八十军直属队由耀县进抵同官（今铜川），该军严映皋新编第二十七师由富平西开至边区庄里镇、口头镇之线，张卓第一军直属队及许良玉第七十八师由陕西华县开抵彬县。各军换上英、美援助的新武器。此外，在宜川、洛川开设野战医院，在咸（阳）榆（林）公路沿线开设兵站，粮弹运输昼夜不停，准备大规模闪击陕甘宁边区。

△　汪精卫以“七七”六周年发表“感想”，声称“彻底推翻”国民党的“丧心病狂的分子”、“叛逆分子”，“以扫除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之障碍”。

△　王克敏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7日，兼任新民学院院长。

△　丘吉尔首相致电蒋介石，谓：“中英合作必能发挥适当力量。”

7月7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称：“按照战时生活的标准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不能说是苦”，今天能过着这样的生活，“不能不认为出乎意外的奇迹”。同日，又发表《告联合国民众书》，称：“中国对于盟军完全胜利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最近一

年以来，这种信心尤其日趋强烈。”“现在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日寇在今天是力量最脆弱的时机。”

△　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会，何应钦作六年来抗战经过之报告。

△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为纪念“七七”通电称：“卢沟之血未干，破碎河山待复；袍泽之痛，军人之耻。”主张“提起精神，来打破难关，争取胜利”。

△　重庆各界代表及市民5000余人，在新运广场公祭抗战阵亡将士。成都、昆明、贵阳、洛阳、长沙、西安、上饶等地，均召开“七七”纪念会。

△　国民政府令：褒扬抗战以来“战区党部”死难人员296名，三民主义青年团员37名。

△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纪念中国抗战六周年致贺词称：保证实行诺言，正在组织军品运华。英国外相艾登在伦敦发表演说，称“英国始终希望强大而统一之中国之存在”。

△　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在重庆举行授勋典礼，授予蒋介石“最高统帅勋章”，何应钦、商震“司令勋章”，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民政府远征军卫生总视察林可胜“将官勋章”。

△　上海战后复员计划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虞洽卿等15人为委员，俞鸿钧为主任。该会另设上海市各项事业研究会，研究计划，建议实施。

△　晋察冀边区冀热边行署成立，李运昌任行署主任，朱其文为副主任。

△　第八十军何蕃第一六五师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发

射迫击炮10余发。中共洛川特委和店头办事处被迫撤离。

△　李仙洲部投敌将领刘桂堂率伪新编第三十六师，于是日向鲁南八路军进攻，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所不为，仅草皮坡、南篦子一带村庄即被焚毁房屋300余间。

△　日本经济使节团一行12人，在团长、东京经济恳谈会会长小仓正恒率领下到达上海。12日，小仓正恒一行抵南京，会见汪精卫。13日，小仓正恒与周佛海、梅思平、顾宝衡会谈，讨论增加生产，沟通物资，安定物价及中储券对策等经济金融问题。18日，小仓正恒一行返回东京，并发表谈话说：中日两国于大东亚战争下，具有一体不可分之关系，汪政权表示努力供给日本战时物资，对此实堪告慰。

△　印度援华会在加尔各答举办“中国周”活动，义卖中国国旗及举行体育比赛等节目。同日，印度各地为纪念“七七”，对华捐款总数达144.4万卢比，全部款项汇交宋美龄。

7月8日　　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致电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一、对于扩增阿萨姆机场设备及使用海空军策应作战，完全赞同；二、腊戍、保山、利多、英坊出发之陆军亦无异议，但希望美国陆军参加作战；三、使用战斗舰三艘、航空母舰八艘，为控制孟加拉湾之基础，以及使用海陆部队控制缅甸沿岸计划可予赞同。史迪威奉电后即集中精力于远征军之训练事务。其助手多恩准将指责中国军政部对远征军训练欠合作：一、未将所需火器移向昆明；二、对于兵员补充未即承办；三、补给制度未曾建立；四、军队编组未即办理；五、陈诚回鄂久未返昆明；六、学生翻译不得力。

△　国民政府令免谭绍华驻巴西国特命全权公使，特任陈介为驻巴西国特命公使。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进为太行山游击区总司令。

△　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关于向国民党发动宣传反击的指示，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势，以造成反共舆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地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

△　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揭露国民党第八十军第一六五师于7月7日下午2时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阵地的罪行，要求予以制止。

△　日舰一艘载800余名日军及大批弹药，在长江经安徽东流上驶，于马当附近触水雷沉没，日军全部溺死。

△　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向汪伪当局呈报南通特区拟定的《强化南通一、二、三、五、七区军事扫荡计划》和《工作方案》，规定运用全力“肃清新四军残余及不良分子，肃清新四军反清乡之各种宣传”，在新四军活动地区编查户口，设置密告箱，实行联保联坐和加强封锁线。

7月9日　　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隆重集会纪念抗战六周年，林伯渠致开会词，朱德、贺龙、高岗、李鼎铭、萧劲光、刘少奇等13人发表讲话，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通过《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要求：一、国民党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二、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三、讨伐33个投敌将领；四、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等。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部队进攻边区等14个口号。

△　中央大学举行成立二十八周年暨本届毕业典礼，蒋介石出席

并讲话，指责知识青年受“个人自由主义影响”，“不知遵守秩序与纪律，此实为近代教育与学术发展之最大障碍，亦为抗日建国前途莫大之隐忧”。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全国技术员工管制条例》，凡24条。

△　三青团中央团部在重庆举行该团成立五周年大会，到会有邵力子、王世杰、谷正纲、康泽和在重庆的干事、监察及各处、室负责人，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致开会词，指导员戴季陶发表讲话。决定从是日起，举行《中国之命运》一书研读征文竞赛。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决定，中央干部学校校长由团长自兼，派蒋经国为教育长。

△　四川省重庆区行政会议开幕，历时六日，15日闭幕。主要讨论重庆区田赋、粮食、兵役、保安等事项。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电向蒋介石报告，对浙东地区新四军进行围剿情形。7月19日，蒋介石复电：“准予备案。”

△　朱德等连续致电国民党蒋介石及各军事要员，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日，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速将“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秘密印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

△　滇西中国远征军一部收复孟定。

△　晚，日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两师团各一部约万余及伪军数千、飞机20余架向太行山游击区刘进部发起猛攻。10日晚，刘进率部突出重围，绕攻敌后。预八师师长陈孝强率部向西突进，13日转至固县附近，损兵过半。

△　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在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三个联队配合下，分别沿新乡至安阳间平汉路西侧进犯八路军太行区，并攻入河南林县县城。次日进犯冀鲁豫区之卫河以南地区。

△　汪伪军委会常务会讨论并修正通过陆军部拟定之《建立新军招募计划草案》，凡七项17条，计划本年12月末完成招募新兵1.4万名。

7月10日　蒋介石调集60万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是日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推进。第八十军第一六五师自耀县、第一军第一六七师自彬县、第八十军新编第三十七师由富平、庄里镇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之马拦镇推进，扬言要八路军交出边区。

△　朱德致电胡宗南：关中方面战机甚紧，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　陕甘宁边区陇东各界民众万余人召开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誓以全力捍卫乡土。大会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进攻边区，要求制止内战。

△　农林部公布《公私有林登记规则》，凡14条及《农林部农业研究奖助办法》，凡10条。

△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一周年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三周年，举行纪念大会。日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在会上发表讲话，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表示留延日人将一致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为反对日本军部走狗而战！

△　台湾总督府设立土地征用审查委员会。

△　美国、英国、加拿大军队在西西里东南海岸开始登陆，揭开进攻欧洲大陆德、意法西斯的序幕。

7月上旬　鄂东新四军一部与日伪军在黄冈地区激战三天，粉碎2000名日军的“扫荡”，毙伤日伪军430余人。

△　绥西因黄河泛滥，造成40年来未有之大水灾，淹没田禾千余顷，占绥西田禾四分之一。临河县城完全被水包围，狼山县几乎全部沉没。

7月11日　重庆84个民众团体举行大会，欢迎宋美龄访问美国归来。吴铁城、孔祥熙到会讲话，称宋美龄访美“为国家民族放出了光芒万丈的异彩，争取到永垂不朽的荣誉”。

△　西北建设考察团团员罗家伦一行九人抵兰州，17日，考察团与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及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长座谈建设西北意见。

△　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游行示威，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决心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7月12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历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警告国民党顽固派必须立即撤退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

△　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甘乃光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行政三联制实施概况。

△　国民政府任命李迪俊为兼驻多米尼加国特命全权公使。

△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全体民众致电胡宗南，要求立即撤退进攻边区之军队，重返河防抗日。呼吁制止内战，以挽救危亡。15日，又致电林森、蒋介石，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部队，枪口一致对外。

△　英中协会与格塔尔研究所联合主办孔子生平事迹展览会，在伦敦开幕，驻英大使顾维钧主持开幕典礼。

△　伪满公布《矿业统制法》和《布业统制法》。

7月13日　蒋介石在四川省重庆区行政会议致词，称：当前四川省中心工作是“兵役之改进，粮政之进行，社会治安之确保，户籍行政与地方自治之完成”。

△　毛泽东分别致电彭德怀、董必武，指出我党宣传闪击已收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被击退。不但7日记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质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而且英、美、苏各国大使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即将停止援助。史迪威并说，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等情。同时延安空气紧张，民众大会通电，10日已达蒋介石处，因此蒋在10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决心。11日胡复朱德总司令电，言词为从来未有之谦和。12日胡已下令部队调回。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通电已于9日用万万火急发蒋介石、胡宗南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　毛泽东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给彭德怀及各中央分局发出指示。六大政策是：一、整顿“三风”；二、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拥政爱民；五、发展生产；六、审查干部。在群众中提出经常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萧克与全体官兵致电蒋介石及各战区长官，呼吁制止内战。

△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制止挑动内战行径。

△　晋冀鲁豫边区文化界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挽救危亡。

△　国民政府公布云南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副议长、参议长名单，龙云、李一平为正、副议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胡琏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朱鼎卿为第八十六军军长。

△　暂编第五十六师一部劫掠镇原边境。次日，预七师第五七二团进攻陇东边境，八路军予以还击。

△　第一战区第二十七军预八师师长陈孝强率部在山西投降日军。

△　华籍海员潘麟于其所乘船只遭鱼雷击中后，改乘小船飘流133天后，卒得生还。英国政府是日在伦敦颁予英帝国奖章。11月4日，潘麟领受奖章，并向英王报告海上冒险经过。

△　旧金山对外贸易协会举行“向中国致敬”之午宴，由会员百人招待祖籍中国之美国公民50人。美国产业职工大会旧金山分会秘书史纽尔代表工界致词，对中国人民之英勇抗战致敬。

7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广东、甘肃、河南三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副议长、参议员名单：林翼中、吴鼎新为广东省正、副议长；张维、曹启文为甘肃省正、副议长；刘积学、张鸿烈为河南省正、副议长。

△　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大会，到会千余人。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痛斥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全区军民支援陕甘宁边区，用尽一切力量，制止内战，挽救民族危亡。

△　第一六七师炮击陕甘宁边区之陇东，驻陇东八路军为坚持团结未予还击。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英国下院向中英议会委员会发表演说，强调战后中英建立合作之重要，并报告中国最近之形势。

△　英国政府决议拨款三万镑，交驻华公谊救护队、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国医疗服务队，用以救护中国战区军民。

7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山东分局并华北局发出指示，指出对付国民党各派军队的原则是：对于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于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于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但一切摩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告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

△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二万军民举行反内战示威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讲话，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支援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中共太行分局代表李大章等10余人讲话，号召太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

△　新四军领导人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告华中根据地同胞书》，号召军民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而奋斗。

△　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各界举行万人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内战，誓死保卫边区。

△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举办户政法令宣传大会，重庆市市长贺耀组到会讲话，称：本市户政已经办理事项有：编练保甲、户口调查、举办身份证登记、身份证总检查等。

△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一部在河北喜峰口南，击溃日伪军200余名。

△　王克敏赴南京出席汪伪中央政府召开的政治会议，16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系属国府统治下之机构，今后一切庶政措施，自当秉承中枢意旨办理。"

7月16日　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总统罗斯福会商，事后双方告诉合众社记者称：“系为交换一般情报与见解。”

△　为纪念已故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杨沧白在重庆建立的沧白纪念堂是日举行落成典礼。张群在讲话中说：沧白纪念堂的建成“必能与丞相祠堂、工部草堂鼎足而三，相互辉映”。

△　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行100余人由重庆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人的欢迎。

7月17日　国民政府与挪威决定公使晋升大使，挪威首任驻华大使由现任公使赫赛尔升任。

△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举行本年度临时卫戍会议，总、副司令刘峙、郭寄峤主持会议，提出“一切组织军事化，建设国防化，心理战斗化”。会议通过“要案”30余件。

△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代表边区2000万人民，通电全国呼吁团结，制止内战，要求严惩特务匪徒。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太行区武乡地区马庄，伏击向蟠龙增援之伪军，毙伤130余人。

△　八路军山东军区鲁中第一分区一部攻克淄川、章丘边境的日军据点水龙堂，毙伤伪军30余名，生俘伪军170余名。

△　苏中新四军在泰兴地区夹击伪第一集团军独立第十一旅，毙日伪军500余名，击伤伪旅长孔端五，俘伪军105名。

△　苏北阜宁伪保安第三总队长熊励仁率官兵93人向新四军反正。

7月18日　晋绥边区晋西北各界民众万余人，在兴县举行坚持团

结抗战、制止内战大会，发表《告晋西北同胞书》和致蒋介石通电，呼吁团结抗战。

△　八路军总政治部根据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一周年与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的动议，决定冈野进任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校长。

△　八路军一部在山东诸城、莒县人民的配合下，全歼伪皇协军第一师第五旅，毙伪旅长以下50余人，俘700余人。

△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在伪军二个团的配合下，自白晋路东侧出击，向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分区“扫荡”，占领蟠龙镇一带。太行军区集中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部队和总部特务团，袭击蟠龙、武乡地区，经两昼夜激战，攻克碉堡10余处，歼灭日军二个小队、伪军500余人。同时，八路军一部向百村、武乡、蟠龙、辽县和平安之敌交通线展开全面大破袭，攻克碉堡八个，消灭伪军两个营。

△　日军纵火烧毁河南永城山集镇，该镇6340间民房全部被毁，一片断垣残壁。

△　中国科学社、中国植物学会等六团体年会在重庆召开，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一、增拨经费；二、增强现在科研机关；三、科研应与国家建设及各种设计相辅相成；四、遴选科学人才出国研究考察。20日会议闭幕。

△　上海《中国周报》发表社论《渝共火并与全面和平》，鼓动蒋介石对中共“用武力痛剿”，“以剿共为契机，而勇敢地坚决地走向全国和平的大道来”。

7月1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徐启明为第七军军长，张光玮为第八十军军长。

△　水利委员会公布施行《水权登记规则》，凡16条。

△　陕甘宁边区绥德市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提出加强生产，整顿自卫军，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北线防卫。

△　陕甘宁边区边防军函谢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单位的慰劳，宣布“我们一切作战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如果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敢于进攻，我们将以无限的英勇、果敢、不怕牺牲、奋不顾身的精神，予以歼灭性的打击”。

△　赴美军事代表团参谋长徐培根，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报告《美国经济动员概况》。

△　冀南八路军一部配合当地民兵，强袭临清以南小辛庄伪军据点，俘伪军官兵300余人。

7月20日　第六战区制定在湘、鄂地区采取守势作战的《第一号计划》，称：“战区以巩卫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石门、渔洋关、资兴山、歇马河、南漳各点及石牌、庙河两要塞。重点置于石牌、庙河要塞沿江南北两岸地区。”参战部队为第二十九、第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三集团军、江防军和战区直辖部队等。

△　军事委员会任命施北衡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宋肯堂为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一部在滦县西南毙伤日军397名，伪军460名。

△　昆明空战，美机击落日机12架。

△　美国《纽约时报》军事评论官鲍尔温发表论文，抨击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及发动内战阴谋，指出：“过去二年内，日军没有消耗多大兵力，即占领了很大地方，虽然受到重庆军队之反攻，但均被击退。”重庆的军事公报“常常一半是假的，并且报告没有战斗的战役或

将游击队的战斗大肆宣传”。

7月中旬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奉蒋介石命令，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20日开始“将西昌至祥云段公路彻底破坏”，“金沙江以南的公路照原计划破坏，限8月15日完成”，“金沙江以北暂缓实行但仍予作准备”。17日，何应钦电呈蒋介石，请示延期破坏，称：“保山所存军需品尚有6000余吨须7月底方可抢运完毕，在抢运期间西祥公路尚且需用，故如情况许可，可否请展缓至物资抢运后再开始破坏。”蒋介石批复：“应限8月底以前彻底完成破坏。”

△　教育部订定奖励师范学校师生办法，将于本年度暑假后一律实施。同时，并公布本年度游击区高中毕业生及海外侨生升学办法。依照该办法凡战区高中毕业生及海外侨生来内地升学，可携带证件在指定地区集中登记，听候举行甄别试验或参加新生入学试验。集中地点为：福建建阳暨南大学，浙江泰顺英士大学，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广西桂林广西大学，陕西城固西北大学，河南嵩山河南大学。

△　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生活指数与1942年12月30日物价比较，重庆物价上涨211％，成都406％，桂林325％，衡阳240％，西安392％。若与抗战前1937年相比，则生活费指数上涨更为严重，重庆为123倍，成都为193倍。

7月**21**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为彻底揭穿蒋介石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的阴谋，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是日公布陈伯达为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而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以便在中国人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同时指示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的反应。董必武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动员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及地下党组织秘密印发中共

中央“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评〈中国之命运〉》等文件和材料。董必武等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还利用各种场合，向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阴谋，说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22日，《新华日报》发表《希特勒墨索里尼怎么办》的短评。接着，又发表《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彻底消灭法西斯》等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社论和资料。

△　四川省遂宁遂武师管区司令部卫兵枪杀壮丁家属酿成事变，数千名民众包围团部，发生冲突，互有伤亡。并将师管区合作社、食糖专卖局、直接税局、农本局等捣毁。当局当场逮捕民众11人，其中四人被枪决。四川省政府令该署保安司令“督饬切实宣抚，严缉首要。一面责成乡镇保甲制度严制居民擅离本境，以免聚集”。28日，又致函军政部呈报民众暴动和镇压情形。

△　日军一万多人在山东南部分路向滕县和费县进犯，遭到八路军和当地民兵的还击，战斗激烈，双方都有伤亡。

△　日机100余架分四批袭击湖南境内美第十四航空队前方根据地二处，美机起飞迎战，击落日机16架，美机一架毁于地面，数架受损。

△　太平洋作战会议召开，美总统罗斯福检讨最近情势，并报告日军船舶损失情况。会议决定增强对缅甸的作战，在北、中和西南太平洋展开逐岛进攻。

△　英国伦敦市长宴驻英大使顾维钧。顾称：中国政府实现建国计划，急需友邦在资本、机器、技术各方面之合作。中国之市场具有无限之投资机会，对于财政、航运、贸易之世界，将大有裨益。

△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负责草拟战后的粮食计划，中国代表邹秉文被推为副主席。

7月2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雷震为暂编第三军副军长。

△　新任河北省主席马法五抵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为庞炳勋投降日军作辩护。

△　宋子文抵加拿大，要求参加英、美即将召开的魁北克会议，仅得于会议结束时表示意见之答复。

△　新四军一部渡江进袭芜湖，当即攻入市内，与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驻军及伪军展开激烈巷战，毁伪警察所一处。

△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大使馆参事鲍斯顿签订《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

7月23日　蒋介石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一、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期望中共能照其解散之要旨，真正成为忠于民族之国民，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之战争，而不再作破坏抗战、违犯国法之行动，如此方能达成中央对内和平统一之政策；二、中央对于中共，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外，应采取宽大为怀的一贯方针。苟非妨碍抗战计划与扰乱社会行动，尽可任其自由，如果假借国民革命军名义，而不接受军事委员会命令，擅自行动；或借国民政府名义，而与敌寇暗中勾结，企图消灭国民政府者，皆认为有助于敌有害于国之行动，皆当以伪组织与土匪军队视之；三、中共内部问题，无论其解散或保留，皆任其自决，中央决无干涉之意，更无强制之事。惟望其能彻底服从政府命令，不假借抗战名义以削弱抗战力量，破坏国家统一。"

△　中国与墨西哥使节相互升格为大使。

△　立法院派出考察团分赴东南和西南考察立法情况，东南团主任楼桐荪，西南团主任吴尚鹰，考察范围除一般立法情况外，并涉及经济、财政、税务、土地、行政及新县制实施概况。

△　国民政府通令施行《县市预算编审办法》，凡15条。

△　新四军一部在江苏如皋地区伏击下乡抢粮的伪军，毙伤20名，俘88名。

△　第五十三师突袭陕甘宁边区之郿县边境。朱德电胡宗南，请制止挑衅行动。

△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意大利大使戴良谊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30日正式实行。

7月24日　中华法学会在重庆举行第二届年会，蒋介石致函赞扬该会“导扬正论，昌明法治，中正实寄予无穷之期望”。

△　外交部长宋子文抵达伦敦。26日，同英外相艾登会晤，并访问副首相阿特里。27日，英国王接见宋子文。28日，英首相丘吉尔和外相艾登分别宴请宋子文，宋在宴会上致词：希望英国“重开对华陆上交通，源源输入物资，使我们发动大规模的反攻”。29日，宋子文访丘吉尔首相时，询问英方攻缅计划，丘吉尔答复含糊，反谓：攻击敌人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言，不愿宣露。

△　税务署长张静愚关于各省税务机构摩擦问题致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呈文称：此次税务机构改组“虽有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未收合并之效，而受合并之害，若不急事补救，恐在本年下半年度统税所受损失不下二亿元”。请求按“各省设立税务联合办事处之原则速拟定实施办法”。28日，孔祥熙批复：“此种办法原则早经决定并屡次指示，何以不能遵照办理，而且发生种种不合理之摩擦？殊不解。交主管署处切实查报。”

△　湘桂空战，盟机击落日机13架。

7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安徽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副议长、参议员名单：江炜、石德纯为正、副议长。

△　国民党顽固派第一六七师第五〇〇团第三营30人进犯陕甘宁

边区之旬邑。同日夜，便衣队在栒邑抢劫、绑击妇女。次日，复犯栒邑。

△　皖南驻军第一七六师第五二八团一部强占新四军庐江东北地区，杀死50余人，奸淫妇女多人。

△　日机40多架分批窜湖南邵阳、芷江、新化等地投弹，并用机枪扫射。

△　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倒台。意大利皇帝接受墨索里尼辞去意大利首相、政府首脑、总理及国务员等职，任命巴多格里奥为政府首脑、总理及国务员。意王自任三军统帅。

7月26日　新四军一部在江苏兴化地区配合民兵，伏击伪军夏铄武部之补充团，击毙伪军38名，俘伪团长以下297名，日军20名溺死。

△　经济部和四行联合办事处总处联合发出《监督工矿贷款办法》，凡八条。同日，四行联合办事处总处致函财政部称："中国机器铸造厂等10余家于借款后或转存其他行庄，或转贷其他厂商，或未照原定计划推进业务，或存料过多等情形。"

7月27日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军民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对林县、涉县之任村、达城地区的"扫荡"。

7月28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吉章简为第八十军副军长。

△　四川都江堰溃决，川西受重灾，两岸田房庐舍多被冲毁，所受损失仅灌县即达6000万元以上。四川省参议会举行驻会委员会议，批评当局对水涨"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多推诿，责无旁贷"。"水利机关贪污成风，只知聚敛民财，对水利工程莫不关心"。要求政府"查明责任，严为究办"。

△　盟机六架空袭香港日军。次日，轰炸机10架再次袭击香港日军。

△　汪伪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褚民谊、审计部长兼接收法租界委员会首席委员夏奇峰，前往上海监视接收公共租界。30日，汪伪国民政府接收上海法租界。租界区域改称第八区公署，陈公博兼公署主任。

△　王克敏在北平会见中日记者团，对华北问题发表谈话，称："华北当前唯一重要问题，厥为剿共问题。是以政府乃设置华北剿共委员会，倾全力以期肃灭匪共。"

△　美总统罗斯福广播演说，称盟军正向柏林、东京迈进，并谓对日消耗战已发生作用，对华决加强援助。

7月29日　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决定，德、日、意三国必须无条件投降。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陶景奎为暂编第九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公布《兴办水利事业奖励条例》，凡13条，同时废止《兴办水利奖励条例》。

△　安徽省宣芜师管区基干团黄孝笃报告称：皖省各县征兵中"拉替贿赂、包庇壮丁"等营私舞弊现象普遍。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于山东武城以南小范楼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山东保安第七旅700余人。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一、将山东方面军改为第三方面军，特任吴化文为总司令；二、通过国民政府政务参赞数额增为22人案，特任李宣倜、廖家楠兼任国民政府政务参赞。

△　汪精卫由南京抵上海，31日接见唐寿民、周作民、吴震修等人，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安定经济、平抑物价问题。

7月30日　　毛泽东就敌后的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指出：蒋介石、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充分准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以前党中央所述敌后解放区六项政策，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

△　蒙古革命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那素海勒盖病逝。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机关代表及汉、回、蒙、藏各族同胞1000余人为其举行追悼会。

△　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杜淑部8000余人，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卫（河）南（城）地区进犯。该军区第四分区发起卫南战役，至8月19日胜利结束，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在卫南新建卫南、滨河、滑县三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　新四军苏中部队在靖江、泰县、高邮一带与敌伪作战，毙伪副总队长以下500余名，俘伪副团长以下官兵400余名，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500余支。伪第十九师陈正才部几乎全部被歼灭。

7月31日　　国民政府令驻伊朗公使李铁铮兼驻伊拉克特命全权公使。

△　陕甘驻军第一六七师第五〇〇团第三营派出便衣队袭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新宁县第一区宋家坪地方工作人员，绑架群众。同日，第三营全部出动向八路军警戒部队进攻，激战至晚，败退时抢掠群众牲畜200多头，打死打伤群众五人。次日，第五〇〇团第二营全部出动，窜至新正县第一区四乡张村等地，抢劫牲畜200多头和其他

财物。

△　日机10余批先后由河南新乡起飞，沿黄河南岸各地投弹。

△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驻汪伪大使谷正之签订《关于对在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臣民课税之条约》及《了解事项》。《条约》规定：日本国臣民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如侨民有应依据司法手续者，在服从中国裁判管辖权以前，由日本国领事官行之。8月1日起实施。

7月下旬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刘真如辞职，由邓飞黄继任。

△　晋西北八路军一部向日军进击15次，在静乐、忻县、宁武等地区，毙伤日伪军500余人，攻克据点几处。

是月　三青团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兼组织处长康泽，宣传处长郑彦棻，常务干事倪文亚，视导室主任刘建群，国民党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先后去贵阳、成都、东江、桂林、西安、兰州等地“视察”团务，“督导”夏令营。

△　三青团直接举办之夏令营，计有重庆、南岳及上饶三处，训练专科以上学生。该团与教育部合办者，有兰州、贵阳、赣川等三处，训练高中学生。前者每营约计500人，后者每地约增1000人至1500人以上。

△　甘肃陇南地区民变蜂起，军事委员会派出五个师的兵力前去镇压。

△　据本月统计，至本月，国民党叛国投敌的文武官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旅长、参谋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投敌军队达50万人，占伪军80万的62%。

△　顾祝同部在袭击苏南、皖南地区新四军的工作报告中称：新

四军“煽惑力特强、潜滋力颇大”，提出应“加强军政力量，健全保甲”，“应不厌其烦，反复围剿”，“派遣有力挺进部队，进入其后与之斗争，以便为进剿之支撑”。

△　四川乐至县煮酒户倪和兴等为反对乱摊派呈文国民政府，称：“近年以来税率加重，每月2000余元，较资本已占三分之一，销市又疲，折本甚巨。迭次具呈请辞而收税机关又不允准。民等已无法可设。”兹又奉派关金公债每户30元，“实难担负”，请求“免除”。

△　粮食部通令颁行《粮食部粮食运输办法》，凡五章23条。

△　行政院指令饬遵《粮仓筹设及管理规则》，凡五章34条。

△　无锡、吴县、常熟沦陷区民众反抗粮管会采办军米。伪苏松常嘉区米粮采销办事处长胡政给汪伪粮食部长顾宝衡电称：“职处近日收购存米，益形紧张，无锡、吴县、常熟先后发生阻挠。各该地联营社及米商行号所存待拨军米，人民指为假名囤积，纷纷要求配给。”

△　苏州四郊乡民因伪组织苛征田赋，发生抗租暴动，手持农具示威游行，并与警察一队发生冲突。

△　水灾遍及西南六七省。每省受灾面积自数县至数十县不等，湖南洞庭湖滨堤防大多毁于日伪，湖田积水甚深，稻谷损失甚巨。广西西江、漓江流域亦有大水，仅桂林市东江镇损失财物即达5000余万元。粤北亦大水，曲江灾民成千上万。福建遭两次大风袭击，福州成为泽国。贵州、甘肃、四川等均大水成灾。

△　河南省西华、扶沟、尉氏、鲁山、南阳一带发生水灾。物价一日三涨。河南省灾民逃荒至陕西境内有40万人。

△　日本增派400余架飞机来华发动所谓“航空决战攻势”，分袭西南各地，经中美空军协同反击，敌损失惨重，未及10天，即全部溃

败。

△　日军在东北编成伪军80个旅，被迫往南太平洋作战的已有10个旅之多。其中我东北青年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　伪满“新京更生训练所”在长春成立。至1945年8月瓦解，约有7000余人被当作“俘浪”收容监管，由伪满首都警察厅分批押送到密山滴道炭坑、营城煤矿等处，组成“劳动报国队”服无酬之劳役。

8月

8月1日　　下午7时4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山洞双河街官邸逝世。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立即举行临时会议，决定蒋介石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日，中共中央致电悼唁。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汝明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马滕蛟为第八十一军副军长。

△　军事委员订定《抗战时期前线作战官兵寄交家书优待办法》，凡11条。

△　国民政府宣布与法国维琪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宣布收回滇越铁路中国段，派萨福均兼任该段管理处处长，陇体要为副处长。

△　是日至8日，重庆中央社连续发出反共电讯，刊载西安、立煌、泰和、洛阳、福建、永安、贵州、湖北、兰州等地所谓“民众团体”，致电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共与陕甘宁边区政府。

△　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调动河防大军，阴谋围攻陕甘宁边区表示愤慨，宣誓为保卫边区而战斗。

△　新四军在安徽泾县云岭举行大检阅，参加检阅的部队数千人。是日晚，召开全体军人大会，陈毅、张云逸到会讲话，号召全军

提高警惕，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而奋斗。

△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谁革命？革谁的命？》，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　伪上海市政府接收公共租界区，将租界区改为第一区，设立第一区公署，陈公博兼任署长。是日伪上海市政府召开收回租界庆祝会。同日，汪精卫发表文章《怎样建设新上海》，称：为了建设新上海，第一，要肃清英美有形与无形势力，实现新国民运动纲领；第二，增加生产，集中一切力量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

△　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武汉分会成立，委员长杨揆一，副委员长邓祖禹、张仁蠡。公布实施《长江上游地域物资收买及移动统制暂行规程》，规定：一、向敌区移动物资，除特定情形外，严行禁止。二、收买所规定的统制物资时，需经分会之许可。三、兵器弹药、火药及其原料、鸦片及麻药等，非经许可，严禁移动。其他物资移动，必须根据规定办理。

△　伪满设立兴农金库，资本5000万元，由伪政府全额出资。

△　日本大本营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对《庸报》记者发表诱降谈话，称："倘中国同意停止抗战，参加反英美之东亚统一战线，则日军将从中国撤退。倘重庆停止反抗，中国将恢复和平，并获得独立，日本将承认中国之独立。"

8月2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举行盛大的干部晚会，欢迎周恩来、邓颖超等由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其他高级干部共2000余人参加。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周恩来发表长篇演说，历述其离延安三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绩。

△　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仇文亚致电中央团部和教育部长

陈立夫，称：“洛阳招训战区青年不仅给养就业困难，即升学亦无出路”，“不少在洛阳沿街乞食或重返沦陷区。”

△　鲁北清河八路军一部包围伪军王文等据点，毙、伤、俘伪军520余人。

△　汪精卫在上海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称：“除争取大东亚战争胜利，中国没有第二条生活的信念。”4日，汪精卫回到南京。

△　德国新任驻汪伪国民政府大使韦尔曼抵南京，5日，向汪精卫递交“国书”。

8月3日　　《中央日报》发表林森1939年写的《第二遗嘱》，表示将其银行存款50万元“拨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并手订定办法24条，嘱由能表同情于斯举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同日，发表林森手订《资助留学生经费办法》，凡24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广文为第十八军军长，梁恺为第五十二军副军长，方天为第五十四军军长。

△　行政院公布《清查国有财产暂行办法》，凡11条。

△　苏北新四军一部袭击位于涟水县西部之老张集伪军据点。经四天围困战斗，该据点伪军动摇突围，新四军部队在运动中将其全部击溃，俘伪军200余人，伪自卫团团长率60余人投诚，老张集据点被攻克。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鲁豫军区部队于成武以南王花楼歼李仙洲部一个连。

8月4日　　宋子文在伦敦接见记者称：此次赴英系与英政府会商战时及战后关系。中国期望击败日寇后，收回东北及台湾，朝鲜应独

立。战后中国“对于轻重工业建设有极大计划，而此伟大之发展自需外来之技术与资金之协助”。

△　国民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和策进会西北区主任马曼卿，在西安召开陕、甘、宁、青、豫、晋、绥七省宪政会议，出席者82人，议决要案140件。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耀武为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蔡洪范为新编第七军副军长。

△　云南省邮政管理局局长西密斯飞往印度，商讨沟通中印邮路事宜。

△　经济部部令遵照施行《营业预算编审办法》，凡九条。

△　美国驻中缅印空军司令斯特拉特梅野抵重庆，先后与蒋介石、陈纳德、史迪威及英空军高级军官举行会议。

△　鲁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进攻蒙阴地区伪军，攻克全部据点，毙、俘230余名。同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另一部围攻费县地区伪警备队第三营，俘伪营长以下230余名。

△　太平洋作战会议在伦敦召开，丘吉尔首相任主席，宋子文、顾维钧参加。

8月5日　　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指出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晋察冀分局发出指示，认为晋察冀边区现在只有90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90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目前边区脱产人员仍有八万多人，

这是决不能持久的。因此，指示边区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才能克服困难。同日，毛泽东亦电示聂荣臻：你们要下决心减去三万人，否则民困兵废，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三万精兵，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　冀热边八路军发动两次恢复基本区的战役。战斗持续到30日，连克亮甲店、钱家沟、茨儿林、杨家套、珠树坞等据点，逼近唐山市郊，共毙、伤、俘日伪军近千人，恢复丰滦迁蓟平大片根据地。

8月6日　　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

△　山东省建设厅长兼省府鲁西办事处主任秦启荣率反共军进攻鲁中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被迫自卫还击，将秦启荣击毙。23日，山东省政府发表反共电，称秦部系受共军袭击，秦启荣“壮烈成仁”。

△　四川师管区副司令、少将李世果利用职权贩卖鸦片，克扣公款、谋害人命，是日被处决。

△　周佛海在上海主办的《国民新闻》被爱国分子潜入将转轮印机破坏，停刊三天。上海各伪报社极感恐慌。

△　汪精卫抵上海与周佛海商谈关于经济、金融、物价等问题。次日，汪精卫在新国民运动促进会暑期集训营继续讲解《新国民运动纲要》。

8月7日　　重庆各界公祭林森，参加公祭者有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及各国驻华使节和民众团体。桂林、成都、贵阳、长沙、兰州、洛阳等全国各地，亦同时举行公祭。

△　宋子文在全英广播公司演说，称：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民，战后可为工业先进国之投资与推销中国本身不能制造之消费品之

市场，呼吁世界盟友“重开援华路线”。

8月8日　　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号召全体学员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　冀鲁边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袭济阳等处出扰之日伪军，俘伪营长以下135人。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胡秋原文章《不合理者不存在》，把第三国际的解散和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之下台相提并论，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于中国都不合理，所以在中国必然不能存在，对世界都不合理，所以在世界也不能存在”。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召开省市长会议，讨论关于粮荒，实施粮食收买、运输、分配和物资物价及加强反共等事项。参加会议的有伪山西省长冯司直，河北省长杜锡钧，山东省长唐仰杜，河南省长田文炳，北平市长刘玉书及天津市长王绪高、青岛市长姚作宾。

△　日伪军调集6000多兵力突然向平北地区发起“扫荡”。平北军民在反“扫荡”中，以小部队和民兵坚持中心区的游击战和地雷战，分散打击搜山之敌，主力部队则利用日伪军纵深兵力单薄的弱点，转战敌占区和游击区，积极配合内线作战，并相机在外线恢复或开辟部分新区，使八路军的活动一直延伸到张家口附近。

△　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莫斯科《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一文，指责国民政府反共、破坏抗战、帮助日寇的错误。此文为英、美报纸所转载。14日，重庆《商务日报》发表社论，攻击罗果夫的文章是“恶意的宣传”。

8月9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曹县东南之刘庄集，歼灭李仙洲部300余人。

△　农林部公布《农林部农业问题特约研究办法》，凡14条。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收买棉纱棉布，并通过《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及《实施纲要》。《条例》规定：所有棉纱棉布由商业统制总会负责统买，其所有人或占有人拒绝或妨碍收买时，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五万元以下罚金，货物没收。还规定：收买价格，棉纱以20支纱每包一万元为准。应付款的半数，一年内分两期付给标准金，另半数以储备券分三年付清。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北平日本大使馆事务处决定是日起开展“华北新建设运动”，至10月31日为第一期，主要目的为“解决华北食粮问题，推进剿共工作”。

8月10日　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王世杰辞职，蒋介石派熊式辉继任。

△　国立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辞职照准，教育部任命李毓尧继任。

△　第二十七军预八师第二十二团团长易惠致函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感谢难中相助。函称：惠于上月16日，因作战负伤，辗转来到贵军第四分区疗养，承蒙热情招待，亲切逾恒，衷心感谢。

8月上旬　中国派遣军畑俊六总司令官鉴于东亚整个战局及国际形势，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采取攻势，杀出一条血路是能最迅速地解决“中国事变”的惟一重要方策。为此，特派作战课高级参谋田野正一去东京，向大本营提出关于消灭重庆政权的作战指导计划，并请求批准予以实行。

△　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工作报告将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作为“主剿目标”，决定“尽先清剿，务绝根株”，并成立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

部于浙江天台，拟委派浙江保安处长竺鸣涛任该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指挥部职权，与李默庵一起部署“剿共”。

△　日军在山西大同以“整顿市容”为名，活埋因饥饿沦为乞丐的我同胞500余人。

8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告以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正在步步加强，拟于八九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电报同意重庆、桂林的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并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应“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　重庆市政府社会局向社会部报告猪鬃制造业工人罢工及其处理情况，决定将领导罢工的陈少平等三位工人开除，送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按军法严办”。

△　中国飞机厂有限公司在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成立，厂长胡声求。

△　太平洋作战会议在白宫举行，驻美大使魏道明代表中国出席。

△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接到高级参谋田野正一电报，得悉日本大本营未批准进攻四川计划，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如此只能一直成为英美反攻对象，终将处于守势。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打算，重庆屈服的时机是不会到来的，实乃可叹！”8月13日，田野返任向畑总司令官等人汇报与大本营联络的结果。

8月12日　国民政府令：因河南去年大旱，民困甚深，将该省各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上期及以前各年田赋实欠在民者一律豁免。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召开例会，秘书长王世杰代读外交部

书面报告，何应钦报告最近国内外军事情形。

△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晋察冀分局及军政主要领导成员变动：以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萧克、杜里卿（即许建国）、赵振声（即李葆华）、刘仁为分局委员，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聂荣臻仍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治委员。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由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

△　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及中共晋察冀分局各同志，指出拥政爱民是红军以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你们必须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对付敌人。

△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举行首届第二次大会，到会议员49人。大会总结三年的工作，讨论通过中共山东分局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修正通过各级参议会暨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改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为山东省行政委员会。选举黎玉、罗荣桓等11人为行政委员，黎玉任主任。28日闭幕。

△　山东省胶东国民党员王一亭等105人，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反对内战，要求遵照孙中山遗教，整顿抗战阵容，严厉制裁汉奸吴开先、张涤非、赵保元等。

△　淮北新四军一部配合民兵，向睢宁西北之日军据点叶坊猛攻，经过七昼夜连续血战，毙伤日伪军400余人，其余全部投降。

△　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武东县万人集会，公审勾引日军侵占蟠龙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肃芳亭等四人，公审后将其中三名立即枪决。

8月13日　毛泽东电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打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　宋子文由英抵美国华盛顿，18日拜访美国务卿赫尔。

△　滇西惠通桥对岸日军偷渡怒江，被龙云所部击退。

△　重庆银楼业公会评定黄金价格：售出每两12.4万元，收进每两10.4万元。

△　交通部公布《战时国营公营公路机关代运邮件办法》，凡10条及《长途汽车代运邮件规则》，凡12条。

8月14日　重庆各界为纪念空军节，开展献机运动，并举办航空展览。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继一元献机运动后正式发出《为一县一机运动告全国同胞书》及经行政院通过之《一县一机推行办法》、《一县一机竞赛办法》，要求全国各地同时开展，最低限度募集1000架飞机。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金城为第三十六军副军长，李忠毅为第四十二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井勿幕。按：井勿幕陕西蒲城县人，同盟会员，先后任陕西同盟会支部长、国民党陕西支部长、关中道尹、陕西靖国军总指挥，颇多善政。1918年12月23日在兴平县南仁村遇害。

△　重庆市警察局发表户口统计：全市共15.5549万户，88.548万人，其中男性54.8153万人，女性33.7327万人。

△　英美最高参谋长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并就战争在1943年和1944年的未来战略问题，草拟一份详尽的战争进展报告。

△　尼加拉瓜下院通过移民法案，取消华人入境限制条例，予中国人与各联合国家人民以同等待遇。

8月15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电五院、军事委员会及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察委员会，称："中央派驻各地机关所有人员，往往有不尊重当地政府法令，如不报户口、拒绝检查等行动，且日常生活予地方以不良印象。"

△　国民政府任命黄季陆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李运华为国立广西大学校长。

△　延安各界千余人公祭林森，林伯渠讲话要求蒋介石实践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取缔封锁骚扰，解散特务机关。

△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为紧急救灾减轻人民负担，发出《准备明年部队生产计划》的指示，规定明年部队除种蔬菜外，每人至少种一亩到一亩半的粮食，每人要解决两个月的食粮。土地应以开垦荒地为主。

△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表书面谈话，否认陕甘宁边区回教救国会。

8月16日　周恩来在延安起草《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提纲阐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策略和组织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必

须“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　日机三批51架先后窜扰湖南浏阳、醴陵、湘潭等地及衡阳上空，在湘阴营田投弹。

△　第二次兴亚大会在长春召开，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秘书长、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参加。

8月1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振三为第五十九军代军长。

△　交通部任李吉辰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

△　淮南新四军一部在桂子山伏击日军，经过14小时激战，毙、伤、俘日伪军250余人，残敌狼狈窜回六合地区。

△　山西河曲巡镇对岸国民党特务30余人偷渡黄河，袭击晋西北第三区区公所及督察处，杀害马副处长，抢走白洋1000余元，并将工作人员12人虏往河西。

△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就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问题，正式举行会议（14日起两国参谋长即开始会商），24日结束。确定1944年5月1日开始实施在法国登陆的“霸王”作战计划。会议还签订美英共同研制原子武器的秘密协定，批准参谋长会议制定的西方盟国在亚洲对日作战的计划。

8月18日　八路军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共13个团，配合民兵及广大群众发起林（县）南（城）战役，至26日，歼灭庞炳勋、孙殿英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人口40余万，开辟林县以南、辉县以北大片新区。

△　外交部长宋子文访美国务卿赫尔，并对魁北克会议事提出书

面意见。

△　日本陆军报道部长谷荻再次发表诱降谈话，谓：“英美完全不承认重庆在这一战争中的努力”，“重庆被侮辱”，“重庆人士应重新认识今天的实际情形，无论任何时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骗，切勿一错再错”，“应觉悟到目前是在英美的桎梏之下，只有现在才真正是参加解放大东亚战争的时候。”

△　加拿大发起援华百万基金运动。

8月19日　日军自江西贵溪撤退。撤退时纵火焚毁贵溪城内房屋1900多栋，屠杀居民6658人，其中男3707人，女1928人，儿童1011人，尸体不明22人。重伤979人，轻伤1233人。

8月20日　国民政府与巴西合众共和国在里约热内卢签订《中巴友好条约》，凡六条。

△　四川川江民船商业同业公会船员工会联合会成立。据称拥有会员30万。次日，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章程议案，分组会要求政府制止军队非法封船。

△　第一七一师以一个营以上的兵力，向新四军合肥东西山驿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忍痛退让，无辜群众惨遭屠杀者200余人，房屋被焚百余间。

△　日军川岛师团一个联队和伪军四五千人向沭阳、涟水一带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同日，日军岩切旅团及伪军共8000余人，向苏中东台等地区之新四军第一师进攻，被粉碎。

△　日本大东亚相青木一男抵南京，随即会见汪精卫，讨论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和最近国际形势问题。会见后，青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他来南京的目的，除了要与“国府当局恳谈外，并考察大东亚省成立后日本在华机关之活动状况。此外，与现地日本陆海军当局交换

意见，并视察对华新政策实施后一般实情”。21日，青木与褚民谊、陈君慧、周佛海、梅思平、顾宝衡等会谈，讨论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问题。22日，青木抵上海，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称：在南京与汪精卫等人的会谈，结果均能深切理解日本之新方针。双方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决心日益巩固。同日，青木与陈公博会谈，讨论建设上海问题。23日，青木与唐寿民、吴震修、周作民等会谈，讨论复兴经济问题。24日，青木结束在上海的活动，前往北平。9月5日返回东京。

8月21日　宋子文就《改组中国战区方案原则》一件，与罗斯福总统初步交换意见。其改组之要点，即拟将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国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组织，至于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则中国必须参加。如委员长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委员长推荐中国军官担任，一切人选均如蒙巴顿之例，由中美当局互商同意，再付任命。谈话中，宋子文提出：“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斯福表示他亦有此顾虑，且已有召回史迪威或派斯特莱曼或韦洛接任之拟议。9月15日，宋子文又具一说帖，由霍泊金斯转呈罗斯福。略称：“目下此人（指史迪威）系中国战区参谋长，又系中印缅区美国空军总司令，兼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又兼蓝伽中国驻印军统带官，亦参与中国云南远征军之指挥，更握有美军部授予而未经中国同意之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以如此错杂之任务，施五花八门之区域，将于未来战事深感危险。”罗斯福总统在说帖上批令马歇尔与宋子文一谈，此际马歇尔已不坚持史迪威留任之意见。但美国防部长史汀生仍欲史迪威再为最后之一试。

△　国民政府令免张含英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特派赵守钰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　中国卫生教育社召开第三届社员大会，决定组织民族健康运动委员会，由陈果夫任主任。通过“提倡健康运动”、“注重合理营养”等12项工作目标。

△　日机50架分五批袭广东、湖南，遭美机痛击，被击落四架。次日，日机57架分批经湖北袭四川，其中一批侵入澧县投弹。

△　汪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军委会总参谋长鲍文越与日军登集团参谋长木下勇签订《关于扬子江下游地域清乡工作协定》及《附属谅解事项》，共同镇压扬子江下游地区人民的反日活动。

△　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规定对华新政策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政策，企图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促成蒋汪合流，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

8月22日　　宋子文由华盛顿抵加拿大魁北克，代表蒋介石参加罗、丘会谈，商讨太平洋战略及中国战区有关问题。

8月2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用具体事实说明：共产党抗击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国民党抗击42％。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牵制伪军不足10％。

△　国民政府公布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副议长、参议员名单，胡恭先、谭其蓁为正、副议长。

△　财政部公布《制糖厂商管理规则》，凡11条。

△　浙东余姚南乡3000民众配合当地自卫队，从日军手中夺回被抢去的粮食10余万斤，运回山区隐藏起来。

△　日机73架空袭四川，其中23架在万县投弹，47架进入重庆市区轰炸，投弹100余枚，死伤近50人。

△　伪满公布《金属类回收法》。旋又成立金属回收本部。

8月24日　军事委员会令免陈瑞河第九军军长。10月23日任命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韩锡侯兼第九军军长。

△　日军太田师团及伪军四五千人，向新四军的江宁地区龙都一带“扫荡”。

8月25日　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联衔电蒋介石：为缅甸军事行动活跃起见，决在印度统帅部之外，另设一统帅部，以海军中将路易·蒙巴顿勋爵为统帅，直接受C.C.S（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指挥，进行军事行动。

△　张道藩、吴国桢就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魁北克会谈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此次魁北克会谈对于远东战局之重视实较任何次会议为甚，对会议宣布“对暴日作战及予中国以有效之援助深感欣慰”。

△　农林部在陕西设立西北移民招集处，首批38人由西安出发，规定每日运送垦民一批，年终移至新疆哈密垦民可达5000人。

△　毛泽东给各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负责人发出指示，指出为彻底消除党内党外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各种错误思想，应根据《解放日报》发表的各种文章、文件，在党内及群众中专门进行两个月的学习、讨论，并争取各中间阶层。某些重要文章，应各印成单行本，向解放区、敌占区人民广为散发。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浙西临安。

△　美机再袭武汉，击毁日机19架。

△　是日起，日伪开始实施本年下半年的“新国民运动”，目标是“剿共建国”，“最重要施策”是抢劫中国人民的粮食和“蚕食”、“扫荡”抗日民主根据地。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展扩大“新国民运动”。王克敏为此发表声明，提出扩大“新国民运动”的四大目标：一、剿共建国；二、增产救民；三、肃正思想；四、革新生活。

△　磁渝航线“庆复”轮在磁器口沉没，死乘客约200人。

8月26日　英美总指挥部宣布，成立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由英联合作战部大臣蒙巴顿任总司令。

△　美机空袭广州、香港，击落日机10架。

△　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会同制定《调整战区缉私及经济封锁办法》，凡14条。

8月27日　教育部以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教授罗忠忱、武汉大学教授张廷在该校连续任教满30年以上，特颁给教育奖状并发奖金二万元。另对民国三十年度及三十一年度学术奖励中膺一等奖之华罗庚、冯友兰、周培源、苏步青、吴大猷、吕凤子六人分别补发学术奖状或艺术奖状。

△　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在北非之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　驻巴西大使陈介赴巴就职，9月1日抵巴京，9月6日向巴西总统递交国书。

△　国立礼乐馆在重庆北碚成立。

△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原冀中军区所属的第十七、十八、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七个主力团，调往

晋西北地区。同时，任命吕正操为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兼任政治委员，续范亭、周士第为副司令员。月底，吕正操率原冀中军区一部分军政干部开赴晋西北。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浙江永康。

△　太行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至9月3日连续攻克白晋铁路之洪水岭车站，榆社、武乡路之吴家脚炮台，辽县之文口塔等据点，全歼驻守日军。

△　胡宗南部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七团第二连以一个排兵力进扰陕甘宁边区鄜县之平泉抢劫财物，八路军一部自卫还击，将其击退。

△　安徽全椒、江苏江浦国民党特工人员200名袭击和县北塔山、洛山新四军部队。

△　江苏省宿迁县县长时亚武率部袭击运河特区之新四军，杀害干部二人，扣留运河区办事处联络部长刘植武等二人，9月1日将刘杀害。

△　日本陆军报道部长谷荻发表第三次诱降广播，称：重庆采取英明的决断，自己取消其存在，或是日本进兵消灭重庆的存在，这是现在大东亚剩下的最大课题。“中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对重庆不愿以进兵演成流血惨剧的手段来消除它”。希望重庆由迷梦中清醒，迅速脱离英、美而归还东亚，“至于归来后的问题，一于谈笑中解决之！我们期待重庆勇敢地下决断”。同日，汪伪经济顾问石渡发表谈话，称：日、汪将“坚定步伐”、“一步步使蒋屈服”，“或返大东亚或诛灭之”。

8月28日　中国派遣军总部制定《昭和十八年（1943）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提出：要确保在中国的占领区，在华北消灭中共的军队。在华中派第十一军和第十三军的主力进攻湖南的常

德和安徽的广德；然后打通平汉路。同时使第三飞行师团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击溃在华的美国空军。

8月2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甘登俊为第七十九军副军长。

△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辽县麻田镇军民召开公审特务汉奸大会，首犯刘三桂、王献林等因通敌叛国，破坏抗日根据地，危害人民罪，被判处死刑。

△　汪精卫到镇江视察“清乡”，并对“清乡”人员训话称：必须树立坚定之信念，认定“清乡”就是建国，就是参加大东亚战争。当晚，汪一行返南京。

8月30日　财政部为呈送《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具体实施办法》致电蒋介石，称：“物价剧涨”、“金融钞券发行已达饱和”、“预算赤字与年俱增，民国三十二年度支出预算已达262亿余元，较抗战以前增至30余倍。”

△　国民政府训令核准《田赋征实及征购粮食审计规则》10条备案施行。

△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在河北衡水东大江关战斗中牺牲。

△　朱德电复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呈报第二十七军预八师师长陈孝强投降日军实情；历数陈投敌前曾勾结日军，忘恩负义夹击八路军，要求明令讨伐。

8月31日　国民政府特派吴国桢为民国三十二年高等考试外交官领事官临时考试初试典试委员长。同日，免去谢维麟驻挪威国特命全权公使兼职，特任钱泰兼驻挪威特命全权公使。

△　第二战区暂三十七师史泽波部攻占晋西南汾城之南膏腴，9月

1日袭入北贾岗，并将南城楼之敌全部歼灭。

8月下旬　　粮食部起草对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五届十一中全会关于粮食征实征购困难等情况的工作报告，称粮食应急措施收效甚微，粮政困难日益加甚；粮价“上涨之速殊堪惊异”，“人民对于粮食之输纳感觉苛重”，各地要求减轻者纷至。

△　山西省“剿共”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并以榆次等五县作为“蚕食的模范县”，洪洞等四县作为“蚕食的建设县”。上党道日伪训练大批特务组织武装宣传班，向抗日民主根据地抢粮，宣传日军的“对华新政策”，叫嚣要抢粮70万斤。

△　顾祝同向何应钦、蒋介石呈报皖南、浙东分别组织反共机构，攻击新四军“割据政权”之计划。提出“今后诚宜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以武力打击武力，以组织瓦解组织”。在江苏、皖南和浙西已令饬第二十三集团军陶广副总司令就该总部所在地，组织党政军联席会报，陶为会报主席，并增设党政督导处。浙东已呈请李默庵成立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部，以浙江保安处长竺鸣清为副总司令主持其事。对共产党新四军“作有效之扫荡与清剿”。

△　第一战区司令部发布秘密文件，声称：“除奸至为迫切要务，应分别轻重，首先从事剿共，如影响抗战，万不得已，则可略走曲线。”

△　广东海南岛白沙县第一区汉、黎、苗各族人民数千人起事，中共组织派干部进入白沙开辟工作，建立白沙抗日民主根据地。

△　浙江开化县农民代表致函军委会军政部，控诉金衢师管区司令部及其部下的罪行：一、招致恶吏，强借民食。二、多用私人，残害民物。三、经营商业，滥征民力。四、私纳眷属，占住民房。五、演戏聚赌，陷害青年。六、吸食烟土，流毒地方。七、抽丁供奉，妨

碍农物。八、倚势劫抢，扰乱后方。九、擅用伪币，贻祸商民。十、吞殁借款，压迫良民。十一、占民妻女，污辱房东。十二、田地园物，被毁尽净。

是月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分主力，由贺龙率领调赴陕甘宁边区，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为司令员，高岗为政治委员。同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调往延安，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

△　第一一四师师长黄德兴、副师长王松元、少将张春炎在山东作战殉职；广西省自卫军第二旅黄福臣少将在滇殉职。

△　兴隆县朱家沟民兵杨长起、王玉祥等，在沟口峭壁的山洞里阻击前来“扫荡”的日伪军300余人，坚持两天一夜，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　日军田坂旅团在山东省陶尖冢镇决开卫河大堤，馆陶、临清、曲周、邱县、清河、威县、武城等七县受灾，二万人淹死，百万人无家可归。

△　日军在东北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将去年12月30日逮捕的2700余名教员和学生处死1000人，判处六年以上及无期徒刑的1000多人，其余600人继续扣押。

△　伪蒙各地日伪军在其占领区内，继续大举抢粮。大同一带，日伪军登记每户产粮，强行“收买”。大同收麦市价每斤15.6元，而日军定官价每斤0.8元。日军用刺刀威胁人民缴粮，藏粮一经发现，即被一抢而光，造成伪蒙遍地饥荒，饿死无数。口泉煤矿工人因过度疲劳和饥饿，一天之内就死去200多人。平绥路口泉一带铁轨上，每日都有十几人一同卧轨自杀。

△　日本外交杂志《世界周刊》8月号撰文称：重庆逐渐由“抗

战”向“观战”转移，可以看做是一个“深刻反省”；并称《中国之命运》“论述方向是没有错的”。

9月

9月1日　　延安《解放日报》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揭露国民党当局摧残进步新闻事业的情况，指出1937年“据国民党政府统计全国有报馆1031家。到1941年11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报馆获得核准者仅余273家”。1942年一年内，国统区报章杂志被封闭者达500种之多，被禁售之书籍达1400余种。同日，还刊载专文《国民党反动派十年来摧残新闻事业的罪行》。

△　中国政府接受英援华会赠款12.5万英镑，宋美龄与英大使会商分配办法。

△　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独三旅团及伪军一部共约万人，开始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扫荡”。

△　日机27架经江西袭福建建瓯，在城郊投弹。4日，日机约70余架分三批先后窜至柳州、梧州、桂林，在梧州市区投弹。

△　日本宣称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强调增产钢、煤和增强航空战斗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9月2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报告浙东新四军实力及其活动计划。19日，蒋介石电复顾祝同，称：“据报浙东奸军实力远在该长官所报之数以上，仰即切实查明，彻底肃清，切勿轻忽贻误为要。”

△　中国国际经济协会成立，冀朝鼎任主席，会员200余人。会议通过会章，选举了理、监事。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河南救灾工作检讨》，称河南被灾民众待救者约120多万人，其中非救不活的至少也在300万人以上。

9月3日　　蒋介石致电丘吉尔首相对英向德宣战四周年表示敬意。午后，何应钦宴请英方在渝人士。

△　国民政府公布《违警罚法》，凡78条，定10月1日起施行。

△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一分区一部配合安泽县大队，一度攻入安泽城，俘伪军70余人。

△　鲁中军区主力于沂水县陶沟一带伏击“扫荡”滨海抗日根据地之日伪军2500余人，激战3日，毙日军300余人、伪军旅长以下1000余人，俘日军31人、伪军367人，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　日军第五十九旅团出动1500人由山西汾阳等地兵分五路，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向晋西北八路军第八分区及第三分区米峪镇地区“扫荡”，被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迎头痛击，毙伤50余名。10日，日军分三路进占临县等地。12日、13日，日机三四架数次轰炸大会坪等地八路军河防工事及渡口船只。

△　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抵上海。7日，会见记者发表谈话称：棉纱棉布以外之重要必需物资，亦有必要采取同样措施，故现在“国府”当局正草拟具体方案。

△　伪满阜新煤矿400名辅导工人暴动逃跑。

△　美底特律工会致电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誓与中国兄弟携手战胜法西斯。

9月4日　　鲁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银厂、白山一带与日伪军5000余人激战五天，将其主力消灭。

△　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飞抵重庆述职，30日飞返迪化。

9月5日　　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署衔向蒋介石建议补足30师人数，速予调赴训练。9月27日蒋介石批示同意。

△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军区第五分区部队攻克安阳以西之公光、东庞佐两据点；第三分区部队攻克襄垣之五阳据点。

△　延安各界青年代表1000余人举行纪念国际青年节大会，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邓发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通过致世界青年电，呼吁全世界、全中国青年紧密团结起来，为消灭世界法西斯而斗争；并通过致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电，要求国民党放弃危害青年的特务政策，取消特务机关，恢复抗日团体和进步组织。

△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一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印发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反共文件《告边区父老书》和《陕北边区人民致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　驻准格尔旗之察绥挺进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张甲清、副司令张桂遂率200余人，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准备反“扫荡”时，在河曲以北之大口偷渡黄河，配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到处抢劫民财。次日，又派人与日军联络。7日，与日军200余人联合向八路军进攻，后投降日军编成伪军。

△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以预定使用于常德之战的兵力不足（30个大队），决定再令第十三军抽调兵力。是日派参谋宫崎到上海联络，第十三军参谋长木下少将表示：第十三军必须保护京、沪、杭三角地带，若再抽调四五个支队，实不可能，万不得已，至多只能勉强抽调一个大队，希尽可能向华北抽调兵力。

9月6日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重

庆召开，到会中执监委和候补中执监委154人。蒋介石致训词，称："民族危机确已渡过"，此次全会宜多注意战后建国工作之研讨。又谓：政治建设应以促进宪政实施为目标，而实施宪政时，国民党任务要比别党特别重大，实施宪政后"国民党还政于民"。经济建设应一面自力更生，一面与国际合作。居正在会上作党务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　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署衔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建议：使用中共军队在晋绥方面牵制日军，以减轻平汉路、陇海路日军对国军之压力。蒋介石对此提案未予理采。同日，史迪威通知蒋介石，云南练兵计划将有改变。16日，提出要求蒋介石补足兵员缺额，改善给养与后勤工作。此后，又提出整编中国全国军队的计划和扩大远征军的指挥权限。蒋介石和史迪威间的矛盾加深。

△　南非为募集中国战时难民救济基金，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在比勒陀利亚开幕。

9月7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孔祥熙作政治报告。

△　国民政府令免林东海驻埃及国特命全权公使、李锦纶驻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任命许念曾为驻埃及国特命全权公使、张谦为驻葡萄牙国特命全权公使。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10月6日结束。

△　军事委员会任命潘左为第二十一军副军长，田钟毅为第五十军军长。

△　中国劳动协会电贺英国工会大会与美国产业职工大会，表示

中国工人学习英、美工人的奋斗精神，共同协力打败德、日法西斯。

△　汪伪财政部发布布告，宣布9月10日起汉口至宜昌间长江两岸地区实施新旧法币兑换，10月1日起禁止使用旧法币。

△　美战时航运管理局宣布，以自由型货轮“中山号”及“中正号”二艘交给中国政府。

△　美国21州和哥伦比亚区35处战时救济机关的华侨代表74人，在纽约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侨胞支持抗日战争和战后回国就业、投资等问题。

9月8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关于实施宪政工作进程的总报告，通过《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和《文化运动纲领草案》及《战后社会救济政策》。《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主要内容为：一、加紧推行地方自治工作，确立宪政之基础，并以复员建国为中心工作。二、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实施日期。三、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因叛国或死亡等原因外，一律有效，未补者依法补选，至迟于大会召集之前三个月选出。四、由政府主管机关负责办理国民大会的筹备工作。

△　重庆市决定征用民伕4000人赴印度。

△　彭德怀从太行山区启程返回延安。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导华北敌后抗战。

△　台湾总督府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召开企业整备方策协议会。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第十三军下达关于进行广德作战的命令。该作战进行的时间由第十三军自行决定。

△　汉口日军与伪警冲突。是日，日军伍长与士兵三名，在清芬二马路借酒行凶，枪杀伪警三名，附近伪警驰援，亦将三名日军击毙，伍长重伤。日酋闻讯，立即紧急戒严，将全部伪警解除武装，并枪毙伪警10余名。一时伪警大起骚动，后被日军所压制。

△　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及武装部队宣布向英、美、苏无条件投降。

9月9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纪念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四十九周年。蒋介石讲话称："凡事都须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接着，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作关于简政工作报告。会议对简政和教育进行讨论并通过决议。

△　何应钦发表谈话，称：意大利的崩溃，实为德、日两国的丧钟。同日，孙科说：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同盟国提早获胜，当以此为重大关键，相信盟国必将动员陆、海、空军主力，予暴日本土以致命打击。

△　苏中新四军一部攻克如皋县东之丰利镇日伪军据点，将伪警察局、区公署全部摧毁，继攻下碉堡五个，毙、俘伪教导旅长以下官兵130余名。

△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省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被日军毒毙。李士群为汪伪集团内一大实力派，深为周佛海所忌恨，周乃同罗君强串通日本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长冈村，于9月6日以请李吃饭为名，在食物中投毒，李食后中毒，是日死于苏州。

9月10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举行第五、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和战后半年内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议案。

△　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布告全川粮民，要踊跃输粮，"倘有规

避、阻扰、舞弊，将以军法从事”。

△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杨立三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仍兼后勤部长），周文龙为后勤部副部长兼野战供给部政委，张际春为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太行会议开幕，大会一致通过边区政府主席及委员、参议员任期延长一年。

△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登广告，声明厂方出厂价格与市价相差甚远，本公司只有制造权而无营业权；并揭露烟类专卖局独获黑市利益。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举行临时会议，任命陈群为江苏省长兼保安司令，梅思平为内政部长，陈君慧为实业部长，陈春圃为建设部长，周隆庠为行政院秘书长，杨杰暂代调查统计部务。

△　汪精卫发表声明，对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无条件投降表示遗憾，并宣称：南京政府决心与日本同心协力，求得大东亚战争最后胜利。

9月11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对于经济报告之决议案》、《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确定战后奖励外资发展实业方针案》、《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案》等议决案。《确定战后奖励外资发展实业方针案》规定：今后中外合办实业，外国方面投资数额比例，不加固定之拘束，公司组织除董事长外，其总经理人选，亦不限定于本国，凡外人经中国政府核准，均可单独投资经营。

△　宋子文将魁北克会议中关于进攻缅甸的计划呈送蒋介石。计划中涉及中国军事部分是：“会战前先以突击队分三路出发：中国之云南、印度之曼尼坡、印度之利多。每路派一大队或两大队，越过敌

人阵线破坏其交通，并继续作游击战。数星期后，云南我军及伊姆法尔英印正规军，由大批飞机掩护，接踵前进。中路由蓝姆加进至利多之我军，稍后开始动作，云南及蓝姆加，我军出击兵力，均照预定计划实施。”

△　日本陆军报道部长谷荻为意大利投降盟国发表谈话，称：重庆在此国内外的情势下，纵使假定其停止抗战，当不是如巴多格里奥政权那样无条件的投降，应当和日军“光荣地合作，也可以说是荣誉地归返东亚”。

9月12日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宣读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通过关于省、县监察委员会编制经费的比例和实施党务机关工作与经费的配合考核等案。补选程天放、邵力子为常务委员。

△　蒋介石密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马鸿逵速派步兵两个师、骑兵两个旅布防宁夏灵武、平罗一带，准备袭击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

△　淮河中游之大沙洲，秋泛水涨到平堤，沿岸数百顷秋粮岌岌可危。驻堤两岸之新四军第四师与群众数千人前往抢修，不分昼夜加高围堤。

△　日军对河北平山县驴山周围10余个村庄进行“扫荡”，计杀死村民：恶石沟300人，庙沟200人，百龙池74人，苇票沟等村80多人。

9月13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中央秘书处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并作出反共决议。蒋介石在会上说：共产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又说：“中央对于共党亦别无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力割据，及停止其过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希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难之宣言。”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孙

科、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孔祥熙、叶楚伧、覃振、朱家骅、刘尚清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长、叶楚伧为立法院副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覃振为司法院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刘尚清为监察院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朱家骅为考试院副院长。选举后全会闭幕。同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拟定《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发表后注意事项》，提出："作全盘继续的宣传攻势"、"严密监视《新华日报》，切实注意其印刷机构，防止其发行小册子。"

△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反共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有六个附件，其中有《奸伪实力与战时战后影响之说明》、《奸伪实力以有装备者约八万人为标准》、《国军对陕北第十八集团军设立封锁线之原因》等。附件提出"打下延安"、"消灭共产党"，制定对共产党"暂时拖、将来打"的方针。

△　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各界人士2500多人举行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分区党、政、军领导习仲勋、袁任远在会上讲话，号召失足者向边区政府悔过自新。

△　福建省政府举行授奖典礼，对今年2月12日杀敌归来之"三亚丸"运输舰18名海员颁奖。

△　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密函承认：自新兵役法颁布施行后，各地"即感人人自危"，"骚然十室九惊"，造成盗匪丛生，社会纷乱。

△　日本为加强控制中国沦陷区，强化驻华外交机构，自是日起，将许多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许多分馆及办事处升格为领事馆。设总领事馆的有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张家口等19处，设领事馆的有包头、大同、汕头等12处，设领事分馆者有保定、扬州、安庆等七处。日本称此举是"适应对华新政策之开展及国府下层组织之

整备”。

△　日军火烧天津田辛庄，烧毁民房800多间。

△　日军在山西浮山县乔家垣南山上，屠杀村民73人，在棉花庄杀害22人。

△　日舰“大和号”在台湾海面被盟军潜艇击沉。

△　国际教育会议在美国开幕，讨论和平计划及战后教育计划，国民政府代表吴贻芳出席。

9月14日　宋子文在美国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中、苏保持着良好友谊关系，“希望朝鲜及泰国于战后独立”。

△　日伪军1000余人奔袭太湖马迹山，新四军第十六旅一部和中共太滆地委机关遭到较大损失。

9月15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八、十、十一、十三、十四及第十五条条文。《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记者询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处理共产党所用什么政治方法？答：“详为开导促其觉悟。”记者询以美国五亿元借款之用途？行政院参事张平群答称：一亿元作发行美金公债之基金，一亿元作发行美金储蓄之基金，二亿元在美国购黄金，余一亿元将作其他用途。

△　军事委员会任命何文鼎为第六十七军军长。

△　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建议：提前准备第二批30师，设立后勤业务，并代拟十道命令，请蒋核审施行。28日，蒋介石批示同意。

△　重庆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招待记者，该会理事长报告困难情形，称：近年来航业凋蔽，现有航线比战前缩短三分之二，公司收入少支出多，今民生公司就亏损100多万元，已经到了关门地步。轮船常出事故，码头秩序混乱，航行人才缺乏，船龄过长，公司年年亏本，没有修理更换的能力，一般船员生活困苦。要求政府资助和调整价格，希望社会谅解。

△　太行军区第八分区部队攻克陵川安阳村日伪据点。

△　河北承平宁第三区队在高桥、黄云指挥下，在平泉县平房东大楼设伏，击毙日军20余人。17日，在宁城山头下坡子，包围平泉县黄土梁子警察队，俘伪警97人。

△　日军第三、第五十九两旅团3000多人对晋绥边区兴县、保德地区进行反复“扫荡”。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自10月5日至11日，在甄家庄地区经过激战，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创造了模范的运动战例。同时，在“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指导下，全区挤掉敌人58个据点，把深入根据地的敌人赶了出去。

△　北平日军自是日起限六个月内，在北平收铜40万斤，每户平均约交二斤半。

△　日、德发表联合声明，称意大利投降，不影响三国公约。

9月16日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调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共同进攻日军，并要蒋介石把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拨一部分给共产党军队，被蒋介石拒绝。

△　军事委员会任命竺鸣涛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耿幼麟

为第三十军副军长，余程万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何基沣为第七十七军军长，萧冀勉为第八十八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董必武，“决定你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具体情况行之”。会前，董必武获悉国民参政会大会将通过反共决议，拟不出席，国民党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前往敦劝，声明决无利用会议反共之意，董必武始报到出席。

△　平汉、正太、同蒲、平绥之日军四万余人，采取奔袭、合击、“清剿”战术，并动员一切汉奸特务组织，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发动为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次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彻底粉碎敌寇对北岳区“扫荡”的指示》，指出敌军此次“扫荡”蓄谋已久，北岳区军民对此应有高度的警惕和准备，并向全区党、政、军、民提出五项要求。北岳区在三个月的反“扫荡”中，八路军主力部队共作战2083次，民兵作战2192次，歼灭日伪军一万余名，终于取得反“扫荡”的伟大胜利。

△　国民政府公布《屠宰税法》，凡八条。

9月1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佟毅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　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第五届年会在重庆开幕，会期二日，讨论国际贸易、外资、金融、财政、国营及民营事业等问题。

△　新任印度驻华专员梅农抵重庆。

△　夜，第二战区暂三十七师史泽波部袭占晋西南堡圪塔，22日夜，袭占峪口，先后将日伪军击溃。

△　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召开兵团长会议。军参谋长木下勇反对从该军抽出一个支队，又谓：实在迫不得已，也只能抽出一个大队。第十三军司令部未予采纳，于9月21日答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说："一个由三个中队扩编为三个大队组成的支队，可以转用到十一军。"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临时会议，通过《长江下游清乡地区米粮封锁暂行办法》，规定：凡将食米及其制品，由清乡区运往封锁线以外地区，必须持有汪日有关当局发给的特殊运出证，否则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7000元以下罚金。如供给敌方米粮则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　韩国光复军成立三周年在重庆举行纪念大会，司令李青天谓：三年中虽然没有伟大成就可资报告，然而我们打回老家光复国土的信念，却与日俱增。

9月18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到会参政员192人，党、政、军要员200多人列席。蒋介石在训词中提出要加强管制物价，稳定战时经济，战后发展建设，完成建国大业，推进地方自治，顺利实施宪政。接着，驻会委员会及主席团作报告，继之，翁文灏作经济报告，周钟岳作内政报告。

△　国民参政员张澜在成都发表《中国需要民主政治》一文，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　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在重庆举行广播周。

△　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集会，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朱德、林伯渠等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说。朱德指出，只有依靠共产党和民众才能收复东北，并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法西斯独裁。

△　国民政府公布《合作金库条例》，凡23条。中央合作金库资本定为6000万元，县（市）合作金库之资本定10万元至50万元。

△　重庆纪念节约建国储蓄三周年，宣布节储总额已由三亿元增至60亿元以上。

△　川军一个团及皖南铜陵县地方部队，共约2000余人，围攻该地区新四军一个中队。该地群众协助新四军激战三昼夜后，将反共军击溃。

△　张家口口里日军三个中队1000余人分三路，汇合口外七路伪军共5000余人，从东老岭东西向凌青绥工委驻地青龙县花厂峪分进合击，实行“三光”政策。敌“扫荡”17天，杀害民众20余人。同日，凌青绥第七区第二连攻克青龙县东部周杖子赤矿，歼日伪矿警40余人。

△　伪满公布《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手续令》、《思想矫正手续令》及《保安矫正护送规则》。

9月19日　国民参政会继续举行大会，听取驻会委员会对政府施政情形报告，俞鸿钧、吴国桢、顾毓琇、谢冠生分别作财政、外交、教育和司法行政报告。参政员黄炎培在谢冠生报告后，提出质询称：“地方基层政治人员，如保甲长之类，很多滥用职权，欺压平民贪污横行，应立案法办。”继之大会补选王宠惠、王世杰、江庸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　中国民族工业家、棉业巨子穆湘玥（藕初）病逝。

9月20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大会，听取曾养甫、沈鸿烈的交通、农林报告。交通报告谓：中国原有铁路1.2万公里，现在仅有3112公里。抗战前修筑一公里铁路成本15万元，现在要800万元。农林报告指出河南蝗灾、水灾严重，今年又是大荒年，全省的耕牛都杀尽了，饿死的人很多。

△　经济部工矿调查处在《关于重庆市民营工矿业概况调查报告》中称：本年1月至8月和去年同期比较，钢铁业、机器业呈减产趋

势，重庆市共有机器厂364家，停闭者达52家，占总数的14%。工业原料匮乏，资金短绌。出口生铁仅为去年同期的63%。

△　财政部公布《中央银行委托各分局办理黄金存款办法》，凡13条。

△　昆明空战，美机击落日机12架。

△　晋东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襄垣地区抗击突袭根据地之日伪军，经过约一周激战，将其全部击溃，毙伪“剿共”第一师参谋长以下百余人。

△　苏北盐城阜宁新四军第三师发起讨伐伪兴亚救国军第三军徐继泰部，激战四天，伪军主力被击溃，毙俘71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攻克据点21处，摧毁碉堡63个，收复滨海地区。

△　河北承平宁第三区队一部攻下驿马村日伪据点，毙日伪军20余人。同日，第三区队直属队等在宁城水泉梁被敌人包围。在敌人围攻下，五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　日军第六十四师团及伪军一部共万余人，开始对苏中军民进行“扫荡”。

△　日军在山西浮山县郭店乡柳树垣杀死、熏死村民68人，全村仅一人幸免。

△　汉奸江朝宗在北平病死。

9月21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大会，听取徐堪的粮食报告、谷正纲的社会报告和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何应钦在报告中诬蔑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何报告毕，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依会议规则，向何提出质问，据实驳斥其造谣诬蔑，何应钦无言以对。有人乘机破坏会议规则，叫嚷捣乱，使会议无法进行。董必武当即向大

会主席团声明退席，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并揭破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参政会进行反共之阴谋。会场内的非国民党参政员，亦表示极为不满。

△　国民政府令：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任期自本年10月1日起延长一年。

△　日伪军1.1万余人由新乡、开封、商丘、济宁、兖州等地出动，向（微山）湖西根据地中心区单县东南地区合围。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跳出合围圈，转入日军侧后的丰县、砀山及鱼台地区。

△　汪精卫、陈公博秘密访日抵东京。次日，会见日天皇，并与日首相东条及外相东乡、大东亚相青木、海相岛田等举行会谈，讨论国际形势及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实现中日全面和平的条件等问题。东条表示，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目前，将努力取消各地特殊化的情况，以加强国民政府的权力。23日，汪精卫、陈公博离日本回南京。

△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确定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指导国民政府（汪伪）对重庆（蒋介石政府）进行政治工作（劝降、诱降）》，降低与国民政府媾和条件。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回答记者提出的西北移垦问题，称：西北数省地广人稀，极应将东部、中部的过密人口，设法西移，从事垦殖。农林部年来积极进行西北移垦，已在陕西的黄龙山、甘肃的岷县和河西等处，设有垦区管理局五处，有垦民和荣誉军人600余人。

△　军事委员会任命方天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黄杰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马敦静代理第十一军军长。

△　美驻华大使高斯返回重庆。

△　日机40多架分三批袭昆明，在市东南郊投弹。美军飞机迎战，击落日机17架。

9月23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大会，听取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沈鸿烈限价经过的报告，透露重庆销售物价指数比战前上涨130倍，各地物价上涨比重庆更烈。

△　军事委员会任命曾戛初为第二十八军副军长。

△　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与中国农民银行合组的中国农村水力实业公司成立，孔祥熙为董事长。

△　汪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起草《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视察报告》，内称：该区第一期“清乡”范围为3600公里，编组保甲大部完成，会同日本全面封锁，设置封锁管理所四个，大检查所34个，配备封锁人员394名。保安队现有六个大队，官兵3377名。同时警察3871名。同时供认“本地区武力不足”、“工作进度未能如期完成”。

△　汪伪米粮统制委员会划分苏、浙、皖三省汪、日采办米粮地区。上海、南京四周为日军方面收买粮食的主要地区，内地或接近敌区之地域为汪方收买粮食的地区。

△　意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再次组织意大利政府，自任首相兼外长。29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打电报给墨索里尼，承认墨索里尼政府。

9月2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汤恩伯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为副总司令，孙元良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　新四军第五师一部攻克距武汉仅60里的日军据点阳罗，摧毁日军工事。武汉日伪震惊，即派飞机、军舰援救。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观》一文，介绍62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的简历，揭露国民党“叛将如毛，降官如潮”。

△　晋冀鲁豫边区晋中太谷县政府破获日本侵略者特务组织“州八道新民总会”，和榆（米）太（谷）“新民总会”，首犯赵元亮、郭福喜被捕获。

△　日本陆军报道部长谷荻对记者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实施宪政，但实施宪政须以恢复中国秩序为前提，“重庆应停止抗战，乃时势之要求”。28日，军委会发言人驳斥谷荻的谈话。

9月25日　国民参政会继续开审议会，审议各项提案，许多参政员批评前几次讨论议案的方式太草率。是日，蒋介石到会报告内政和外交方针及实施经过，表示要着重宪政实施和经济建设，希望由参政会设置宪政实施筹备的机构和经济建设策进会或期成会。

△　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蒋介石今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演内容及实质。电报说，蒋今日在参政会讲演中，表示愿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宪政促进会与党派协进会。还竭力拉拢张君劢、左舜生、李璜，允派杨杰赴美研究军事等等。董必武说，蒋的目的是对中间党派采取组织拉拢，分化我党与中间党派的关系。2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董必武，指出《解放日报》日内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当作我党表示。“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　河北承平宁第三区队与第七区队在宁城卧龙泉子汇合，奇袭

伪军一个连，缴获机枪2挺，步枪30余支。

△　日机一架由台湾飞赴广州途中，在番禺失事，坠落在北山乡，机中日高级军官多人毙命。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鉴于须从华北抽调第三十六师团转用到太平洋去，若再抽调兵力来增援武汉，困难也多，令第十三军迅速派遣第一一六师团主力（以六个大队为基干）到武汉地区。另外在11月上旬再派一个支队（以三个大队为基干）到武汉地区，并入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之下。后又从第六十五师团派遣柄田支队去武汉地区。

9月26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大会，通过慰劳前方将士、各战区和东北四省同胞、海外侨胞及抗战军人家属四电。讨论和通过国民政府交议的民国三十三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和政府各部门工作报告的决议案。

△　晋西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出击窜犯临县之日军，白文镇遂告收复，日军分途回窜。

△　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骑兵旅参谋长、陇东回民领袖之一马继先在延安逝世。30日，延安各界代表举行公祭。

△　汪伪海军部次长、广州要港司令、福州维持会委员兼公安局长萨福畴，伪“协力”舰舰长何典燧等人，于本年3月间触雷被捕，是日伏法。

9月27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大会，评议国民政府制定的《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案》和《确定战后奖励外资发展实业方针案》，选举本届驻会委员会委员林虎、褚辅成、王云五、董必武等25人。本届参政会通过了侮辱八路军的决议案。此外还通过关于促进实施宪政、组织宪政实施协进会以及组织经济建设策进会等决议案。是日会议闭幕。

△　参政员刘明扬等52人提出《请改进财政政策及经济统制办

法，以稳定战时公私经济，争取最后胜利，并为战后民生主义建设建立其基础案》，揭露由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造成财政经济上的恶果：大多数民众生计窘蹙日甚一日，物资缺乏，物价狂涨，商业利润及地主利益激增，财富逐渐集中少数人之手形成暴利阶级。国民政府筹款方法使有钱者不出钱，无钱者出钱，钱多者出钱少，钱少者出钱多。田赋税发生赋多田少，赋少田多，有赋无田，大地主负担极轻，财富集中，土地兼并，自耕农半自耕农负担极重，日趋没落，逐渐失掉地权。通货膨胀，普遍征收人头税，即穷如乞丐亦须负担。

△　国民政府令免王世杰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周炳琳副秘书长，特派邵力子为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为副秘书长。

△　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电台。董必武致函蒋介石，要求恢复改为中共代表设置使用，并在谈判中多次提出，当局坚持不予启封。

△　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迪化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　张光嗣写《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一文，称：此次豫灾惨重为数十年所未有，民众十室九空，震骇中外之人吃人到处发现，20余县死亡人口竟达148万多人，其中临汝县高达36万多人。小麦市价较战前高数百倍，地价则低七八十倍。灾重之原因有“军需繁重”、政府“逼迫灾民缴纳征实征购”，富户、军人、公务人员利用荒年“重利盘剥”。救灾中各县乡长、保长、甲长营私舞弊已成最普遍现象，各县县长虽明弊端百出，亦故作痴聋。省政府用人失当，办事迟缓，造成民怨沸腾。

△　驻华美空军猛袭东京湾，日油船一艘被炸。

△　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853号》，准予进行常德作战。命令说：“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执行现任务可在华中方面临时越

过作战地区进行作战。二、有关作战细则，由参谋总长指示之。”9月28日，派遣军总部下达了以下命令：“一、第十一军司令官于11月上旬发起此次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敌人的战力。二、第三飞行师团长担负侦察部队主力，配合前项作战。”关于作战方针：“进攻敌人政略、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人向缅甸方面调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关于作战要领：“一、第十一军主力（加上其他方面转用来的部队共35个步兵大队）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战常德附近。二、继而追索常德方面猬集反攻之敌，予以歼灭。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关于增加兵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一个支队由第十三军调来。”关于作战名称：“本作战称为‘ヨ’号作战。”

9月28日　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第三集团军，任命李铁军为总司令，郭希鹏、於达为副总司令，马步芳为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周士冕为第二十七军军长，廖昂为第七十六军军长，贺光谦为骑兵第三军军长。

△　美国务院远东司长项白克会见宋子文，宋提出史迪威必须调动。29日，宋子文晋谒罗斯福，重申撤换史迪威及太平洋联合参谋团中国必须参加之意见。罗斯福总统均予同意。10月1日，宋子文与蒙巴顿、索姆威尔联袂离美，飞印转渝。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分区司令牛程，团长桑玉山，政委魏明伦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　汪伪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联合召开高级军政长官会议。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最高经济顾问、最高军事顾问及陆海军专家等报告最近军政、外交形势及现阶段努力方针。汪精卫讲话称：抗战的意义早已失去存在，与会人员应与日本同心协力，坚定和平信念，促

成全面和平早日实现。并说：“兄弟终是兄弟，重庆终必和我们走一条路的，不过我所盼望的，是愈早愈好，不要徘徊观望。”会议30日结束。

△　汪伪实业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与日本陆海军管理工厂整理委员会，在南京签署《关于日本军移交江北十个工厂予中国政府约定书》。

9月29日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提出整编中国全国军队，分国防军与地方警备队，并谓：委员长宜颁发军令，将全国军队重加整训，以达到：一、手续简化。二、归并现有军队50％，达到建立正规军两大集团，每集团各30个师之目的。整训之后装备充实，实力将比原有部队转增三倍，而且调动且能迅速，可备各地之缓急，至其裁汰之官兵，则可移供第二线警备地方及缉私之用。中国军队必须经过最严格之整训，始可立于世界各国之前。蒋介石对于此项提案未予理采。

△　国民政府特派顾孟馀为民国三十二年第二次高等考试初试典试委员长。

△　国民政府公布《社会救济法》。

△　中央社在伦敦设立分社，分社主任任珍逊是日由重庆赴伦敦。

△　苏北盐城、阜宁各界民众举行抗战烈士塔落成典礼，并追悼牺牲的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及两千余指战员，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参加落成典礼仪式并致词。

△　汪伪浙江省长傅式说与日军内田孝行部队长签订《关于浙江省第二清乡区清乡工作之协定》及《实施要领》，规定第二清乡区于10月1日起实行“清乡”。

△　伪满政府宣化省划定松树岭、清安堡、松树洼、苏家河、五里坡、下河、关水沟、小庄科、降栅山、下栅、上栅、蒋口子、营盘沟、大融山、小融山等地区为集家并村区。

9月30日　日第十三军开始广德作战（即“二十一号作战”），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六十一、六十四、七十师团主力及堤支队。是日黄昏后，日第六十一师团在湾沚镇东面及东南地区第一线，第六十四师团在金坛及天王寺附近的第一线，堤支队在宜兴的第一线，第七十师团在长兴、埭溪镇、石濑镇附近的第一线，分别向安徽省的广德方面发起攻击。10月2日晚8时，日第七十师团占领广德。接着第六十一师团于3日晨也进驻广德。忠义救国军经过抵抗不支，向南方的天目山退却，日军各部队继续“扫荡”广德周围的地区，摧毁了忠义救国军的根据地。

△　国民政府公布《药剂师法》及《助产士法》。

△　日本天皇裕仁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提出对于重庆国民政府“继续不断地加强压力”，“特别要制止从中国大陆到我国本土来的空袭和对海上交通的骚扰”，“乘机迅速设法解决中国问题”。

9月下旬　盐阜区新四军和民众开始反击向潮河以南地区“蚕食”的日伪军，攻克据点20余处，扩大了根据地。淮北区新四军和民众于夏、秋两季，先后在泗宿公路沿线及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开展攻势作战，拔除日伪据点26处，稳定了边缘区，巩固了根据地。

△　日伪军以2000余人“扫荡”山西兴县、保德地区。27日扑空后，向西进占黄河东岸的斐家川口、黑峪口，受阻退到赵家川口。

是月　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等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驻地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赞扬广大指战员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请周恩来到昆明面晤，南方局即派华岗为代表到云南，与龙云建立直接联系，对龙云进行帮助。随后，并在龙云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与南方局、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1945年10月初。

△　日伪军1.5万余人，分十数路向苏中东台、盐城、淮安地区“扫荡”，新四军在汤家舍一役，毙日军350余名。

△　中印公路修至南荣河畔。新编第三十八、第二十二师先后开到利多附近。

△　宁夏省政府向国民政府报告：截至8月底，农田遭受七种灾害，“确为本省30年来之所未有”，“当前之民食军粮与来年之种料均成严重问题”。

△　上海小学教师迫于生活于教师节发起“教师金运动”，要求小学生将“平时节省下来的糖果费全部来作教师的安慰金”。

△　驻山西石楼、中阳地区的阎锡山第三十三军与日军勾结，派出400人侵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之第三分区离石县，到处烧杀抢掠。第三分区军民奋起自卫，毙阎军60余人。

△　日军调集2.5万人向山东根据地发起轮回“扫荡”，历时三个月。日军声称此次“扫荡”是“对华六大战役之一”。

△　美国气象学家海军中校贝耶莱东参加中美合作所工作，积极搜集中国近50年的气象情报。

10月

10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

民运动的重要性。指出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重要的有十项：即一、对敌斗争；二、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拥政爱民；五、发展生产；六、整顿“三风”；七、审查干部；八、时事教育；九、三三制；十、减租减息。只要全党认真地实行十大政策，就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

△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第三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九等师团的16个大队和伪军共二万余人，对太岳地区实行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的大“扫荡”，即厚集兵力，纵横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企图一举摧毁太岳区。八路军太岳军区以一部兵力对敌节节阻击，大部兵力转至外线，向日军运输线广泛出击。至11月22日，歼日伪军3500余人，迫使日伪军分路撤退。

△　皖南日军攻陷郎溪、泗安，犯新登。2日，皖南日军侵入宣城，复向东南进犯孙家铺，并侵入广德城。3日，皖南日军陷繁昌，宣城南犯之日军被阻于宁国。浙西日军犯北水。日军受阻后大部分窜犯孝丰，同时日军在占领区疯狂进行“清乡”。

△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轰炸海防，毁日机29架。

△　中美空军混合团在印度正式成立，中国空军有第一、第三、第五大队参加。中旬，各派往部队陆续接机返国，11月初进驻桂林基地开始作战。

△　川湘、川鄂公路通车。

△　汪伪浙江省第二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在杭州地区的崇德、桐乡、全县、海宁等县的大部分地区，嘉兴、嘉善、德清、杭县的一部分地区开始第一期“清乡”。参加“清乡”的伪军共3700余人。

△　伪满新设东满（牡丹江、间岛、安东）、兴安两总省。

10月2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姚黎天代理骑兵第三军副军长。

△　蒙巴顿、索姆威尔携英王介绍书及丘吉尔首相致蒋介石函由印飞渝，转交给蒋介石。函中要点为：一、扩大对华空运路线与物资供应，使陈纳德之空军与云南方面之中国军队，皆得到适当之补给与装备。二、采用温盖特旅长在缅作战之游击战术，深入缅甸内地，与远征军携手作战，以打通滇缅路。三、南缅军事行动，须视北缅军事行动进行情形再作决定。四、孟加拉湾及印度洋，拟于明年2月间集中有力舰队，以锡兰为根据地，佐以有力空军，以应水陆包抄之行动；其出击地区，须蒙巴顿到印后提供意见始可决定。

△　三青团四川省支团部于是日成立，青海、湖南省支团部分别于5日、6日成立，陕西、江西省支团部于31日成立。蒋经国当选为江西省三青团支团部第一届干事。

△　缅甸华侨战地服务团在广东梅县成立，李启我为团长。该团任务为随远征军从事抗战工作。

△　皖南日军侵入宣城，复向东南进犯孙家铺，被阻于宁国。浙西日军侵入安吉，续犯孝丰。

△　日机10多架两次由浙袭闽北，在建瓯投弹。4日，日机30多架分三批犯粤、桂、赣各地，在吉安和韶关投弹，伤市民数十人，烧毁民房多栋。6日，日机46架由广州分两批经粤窜赣，在遂川投弹并以机枪扫射。

10月3日　周佛海约见戴笠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刘百川，详细商谈沟通与重庆联系的办法，决定设立电台，以便与蒋介石侍从室直接通电。

△　日伪军向山东曹县西南地区合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机关及部队一部于王厂村陷入重围，遭到部分损失。但军分区部队一部却乘虚袭入东明、考城等日军城镇据点，予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10月4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选任张人杰、邹鲁、冯玉祥、阎锡山、宋庆龄、张继、熊克武、柏文蔚、李烈钧、李文范、章嘉、马麟、沙克都尔札布、王伯群、胡毅生、钮永建、刘哲、麦斯武德为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辞职照准，梁寒操继任；海外部长刘维炽另有任用，任命张道藩为海外部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方靖为第六十六军（由暂九军改编）军长，陈式正、宋瑞珂为副军长。

△　第三战区一部击退由皖南宣城、广德南犯之日军第十三军一部。6日，攻抵宣城近郊。

△　“扫荡”冀鲁豫地区之日军主力合击曹县、菏泽、定陶地区。

△　日伪军出动一万余人对冀东之迁安、卢龙、平泉等地进行报复性大“扫荡”，妄图在冀东制造“无人区”。同时，又出动1000余人“扫荡”西线兴隆以南地区，东西呼应，钳制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

△　日军第十三军按既定计划扩大占领地区，大致范围在安吉、广德、水东镇、宁国一线，划分各部队担当区域。5日，转入新占领态势，并且继续在地区内进行扫荡。

10月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指出：国民党人在十一中全会以后，可能有三种发展方向：一是投降日本人；二是照老路拖下去；三是改变政治方针。走第一个方向是死路，走第二个方向也不是活路，走第三个方向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各地报纸要登载这篇重要社论，并大量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解放日报》从次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便于观察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和缓和时局的行动。

△　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指出：延安对国民党已取缓和态度，并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时除表示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见王世杰或邵力子时，除申述上述意旨外，还应指明：内战必投降，这是死路，愿彼方善处。我党准备对付任何险恶局面，但首先愿意继续合作。着重指出国民党胡宗南令军长董钊率部开赴榆林对我威胁甚大，刺激最深，延安不能不准备自卫。11日，董必武会见王世杰、邵力子，申述了中共上述意见。王、邵对此解释说：“中央决无对边区用兵之意”，希望两党问题通过商谈作政治解决外，还提出了派人“到边区看一下”。

△　邵力子约见董必武说：“国共关系应当用政治方法解决，而且是可以解决的”，希望董必武能出席在10月15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董必武表示：“我党的基本态度，是希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民主，两党关系是可以好转的”，并提出改善两党关系的两条具体办法。6日，董必武电毛泽东，请示是否出席参政会驻会委员会15日的会议问题。10日，毛泽东电复董必武：“你应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15日，董必武出席了三届二次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梁为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石祖黄为第十八军副军长，黄百韬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孙黼为第四十四军副军长，曹颜式为第四十八军副军长，吴绍周为第八十五军军长，陈武为第九十七军副军长，廖运泽为骑兵第二军军长。

△　八路军晋绥军区第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六团奔袭驻兴县城内之日军第五十九旅团及伪军一部。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进行五次突围，均被击退。接着又在甄家庄、郑家岔一带伏击溃退之敌，战至11日，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俘敌13人。

△　行政院决议：派蒋廷黻为出席联合国救济会中国代表。

10月6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与八路军总部分别合并，撤销太行分局，保留第一二九师番号。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等区直属中共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领导。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同时，第一二九师与太行军区分开，李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兼政委，黄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袁子钦任政治部副主任。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任政委，苏振华任副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9日，晋冀豫区党委改名为太行区党委。

△　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举行欢送首批劳工出国服务仪式。劳协理事长朱学范，书记长水祥云先后讲话，说明此次劳工出国服务意义、任务、待遇以及该会在国内外设立出国劳工服务处之目的。随后又有第二批劳工出国，前后两次共约千余人。

△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在汉口召集参加作战部队的参谋长进行干部演习，研究“ヨ”号作战要领；同时下达发动常德作战的指示，命令各部队分别集中，准备作战。

10月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左世允为第二十二军副军长。

△　是日至10日，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赴南泥湾，参观考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况。

△　太岳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对同蒲路临汾、侯马间展开破击战，攻克临汾以南20里之鄢里车站，守备日伪军全部被俘。

△　鄂东国民党调统室主任尤建东密令该室专员夏南山、黄天觉与日方合作，在黄冈县阳逻刘集捕杀共产党。不久，鄂东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师师长鲁汉民委任夏南山为该师第一旅旅长。夏南山要求与日军及伪黄冈县政府“密切联络”，组织“红学会”，并指派黄天觉与伪黄

冈县长面商合作“剿共”问题。

△　日军在冀东迁西县长河川屠杀居民245人，毁房2800余间。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二八次会议，特任张岚峰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撤销苏豫边区绥靖司令部，设立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办事处。

10月8日　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重庆报告苏北情况，历述处境之苦、军力薄弱、政治无人、经费缺乏，致“局势江河日下”，省府撤至皖北阜阳。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急袭沂水青州准备抢粮的日伪军，一举毙伤68人，生俘15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

△　新四军淮海军分区第四支队进袭淮阴朱集之日伪军据点，毙伤200余人，生俘110余人，缴获步枪156支。

△　日军第五十九师团3000余人附汽车200辆，“扫荡”冀鲁豫边区第一分区茌平以东地区，越二日，被八路军军民击退。

△　日军第十三军一部侵占苏南溧阳城；另一部攻陷浙西孝丰城后，继续向龙河庙、流里庄、老石口进犯。该军还有一部分由皖南广德向柏垫进犯，由宣城沿江南铁路攻陷水东镇。

△　截至是日，河南省灾民1500人抵新疆迪化。

10月9日　国民政府授予陈诚、吴奇伟、罗广文、胡琏等青天白日勋章。10日，又授予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绍宽、俞飞鹏、阎锡山、李宗仁青天白日勋章。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善宝为第七十七军副军长。

△　宋子文由美国飞抵印度新德里，参加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

顿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驻中印缅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与美陆军后方勤务部长索姆威尔也参与会议。11日，宋子文返重庆。

△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取得兴县甄家庄战斗的胜利，共歼灭日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700余人。2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贺龙写的《论甄家庄的歼灭战》，说明八路军不但善于进行游击战，而且也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运动战。

△ 日军第三师团命令所属部队准备出动参加常德作战，并完成步、炮各联队（各以二个大队为基干）、工兵（三个中队）、辎重兵（二个中队）及其他等部队的编成装备。14日，第三师团以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基干（桥本部队）为先遣队开始行动，至24日首先到达郝穴附近，并对该地周围地区进行“扫荡”。15日，第三师团其他主力部队开始集中行动，经过铁路运输及徒步行军（分成四个梯团）前进。31日晨，步兵第三十四联队基干、步兵第六联队基干（中畑部队）以及桥本部队分别到达朱家嘴、吴运河、周家厂附近集结，与第十三师团的警备部队交换警备，准备攻击。

△ 财政部修正公布《熏烟叶管制办法》，凡16条。

10月10日 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主席典礼，并宴请各院、部、会长官、国民党中央党部、三青团中央团部各首脑、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与驻会委员和各界知名人士200多人。同日，蒋介石发表《国庆纪念词——告全国军民》，宣称今后方针为：对内要促进全国的地方自治，巩固国家的统一，确立法治规范，完成民主政治；对外则敦睦同盟友盟，争取反侵略战争光荣的胜利，共策战后世界永久的和平。

△ 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为纪念“双十节”发表《告沦陷区同胞书》，指出：“八路军是你们的军队，抗日根据地是你们的家乡，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是你们的亲兄弟亲骨肉，是为了你们的解放

而战斗着的。”还向沦陷区同胞致亲切的慰问，并提出四项要求：认清胜利的前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一切挑拨离间阴谋；反对敌人的“华北新建设运动”；保卫抗日根据地；用一切办法发展抗日的力量。最后号召准备在反攻时机到来时，配合反攻，夹击敌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　新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在驻地安徽泾县召开新四军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到会军民数千人。全军指战员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中抗战。

△　淮北苏皖边区新四军第四师和各界民众5000人举行大会庆祝国庆、新四军成立六周年、第四师东征五周年，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在会上发表演说。

△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和提高的阶段。

△　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总会在重庆举办国民党党史展览。

△　挪威驻华大使赫塞尔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八路军太行军区一部歼灭盘踞博爱县长坛庙之日伪军，毙、俘百余名。12日，复将盘踞道清路百间房、中原里之伪军一个中队全部歼灭，同时击溃陵川出犯之敌。

△　苏北盐阜区新四军地方武装一部克复日伪军据点蒋营，毙、俘、伤伪军80余人，缴获步枪60余支。

△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一二九师一部强袭冀南东南之上关据点，全歼伪军140余人。

△　苏联《莫斯科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以伟大孙中山精神向她的历史目标迈进》，指出：“不管反动势力怎么样把中国从她的真正

目标上转移过去，她还是继续沿着孙中山所规划的道路前进。”

△　汪精卫发表“国庆”文告，继续鼓吹“努力参加大东亚战争”，以“获得自由平等”。

10月上旬　　行政院政务处奉蒋介石手令负责编纂的《国民政府年鉴》出版，共100多万字，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大部。中央部分又分为五大篇，按五院排列，地方部分各省、市各占一章。定于“双十节”开始发行。

△　滇西腾冲、龙陵、拖角之日军万余，为防中国军队反攻，分六路先后蠢动，攻击腾北游击队。一路由镇安街沿怒江西岸北犯，一路由腾冲向龙川江进犯，一路由拖角向六库对岸进犯。另有三路分由腾冲、昔董、拖角会犯固东街。腾北游击队分别迎击，激战至18日，驻腾北远征军主力东渡怒江，与日军隔河对峙，仍留一部在高黎贡山一带继续游击该区之敌。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将皖南、赣北及武汉、随县、枣阳、信阳之军队陆续密向湘北、鄂西第六战区进发，计有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第十七旅团及伪军第五、十一、十二、十三、一二八师与日军第十一军部直属之田岛队、小山队等，共约10万余人（日方说是五万人）。

10月**11**日　　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政府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致训词，称要“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立民国千年万世之基”。宣誓者代表居正致答词，表示效忠国民党蒋介石。

△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永安为第九军副军长，沈澄年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

△　驻美大使魏道明拜访美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　全国医师公会联合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商讨推行

全国抗日军人家属义诊运动办法。次日闭幕。

△　新四军淮海分区攻克沭阳南日伪军据点沙坝，毙敌100名。

△　罗斯福总统致国会咨文，表示无条件拥护撤废限制华人入美限制，并称此法案极为重要。

10月12日　　国民政府特派蒋廷黻为中华民国签订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协定及出席总署评议会暨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

△　日伪军集中1.5万余人，由泰安、济南、聊城、滑县、郓城等地出动，采取多路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法，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地区实施“铁壁合围”和“拉网扫荡”。冀鲁豫军区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并以一部于18日夜突然袭入东平城内，尔后又乘胜东进，五天内连克夏谢、大井等据点11处，至10月24日迫使日伪军撤出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

10月13日　　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电交通部长曾养甫称：迭查粤汉、湘桂、黔桂各路用煤仍接济不上，一旦增加军运，则有中断之虞。现杨梅山每日仅出煤300吨，其原因：一、为主持人不得力；二、为工人太少；三、为工资太低。希迅速改善，以期每日能出煤800吨，则粤汉、湘桂、黔桂三路交通乃无中断之虞。

△　国民政府前交通部长张嘉璈抵华盛顿，研究美国经济及铁路情况。11月12日，张在美国中国协会称：中国可为美国过剩产品、机器及物资之一无限广大市场。

△　林伯渠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边区生产展览会是一年来生产斗争的缩影》，总结一年来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成绩：100万亩荒地变成良田，增产细粮16万石。池滩上打出60万驮的食盐，4000多个二流子转变为生产者，一万名移民劳动力开到生产线上来，出现许多劳动英雄。

△　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召集总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讨论上山开荒问题，强调各行政负责人要以身作则，领导生产与动员，以求所有干部战士积极参加。

△　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第一一五师一部截击台潍路沿线出动抢粮的日伪军300余名，全部击溃。

△　占驻山东聊城、东阿、阳谷、寿张、莘县日军联合大“扫荡”，打死打伤无辜群众近百人，强奸妇女三人、幼女一人。

△　滇边日军陷片马。

△　意大利首相巴多格里奥宣布意对德宣战。苏、英、美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交战国。

10月14日　　行政院呈报蒋介石《限期成立各省县参议会实施纲要》，凡七条，提出各省县参议会限期民国三十三年成立。“县参议员应为本党忠实同志，其未入党者应尽量介绍入党”，“县参议员及乡镇民代表人选，可由县党政秘密会议决定予以运用，并报省政府、省党部特别小组备案”。11月2日，蒋介石复电称：实施纲要“大体可行，准即召集有关机关商讨实施”，“如何运用党的基层组织力量指挥选举，以避免不良分子之操纵，应特别注意研究”。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当前各根据地最中心的任务：一是对敌斗争；二是发展生产；三是整顿“三风”；四是审查干部。

△　军事委员会任命阙汉骞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公布《公有营业及公有事业机关审计条例》，凡20条。

△　成都光华大学学生代表到重庆请愿，要求教育部减低学费和

将学校改为国立。教育部不作答复。

△　新四军淮海分区攻克大兴日伪军据点，俘敌70余名。

△　湖北省当阳伪保安队廖友三部200余人，携带各种枪支200支反正抗日。后编为鄂西抗战自卫纵队，廖友三任副司令员。

10月15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驻会委员会举行例会，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接着，主席团报告：一、经济建设策进会组织大纲；二、设立协助宪政机构的筹备情形；三、筹备组织战后国际问题研究会。会议决定设置经济建设策进会，将经济动员策进会并入，仍由蒋介石任会长；并通过经济建设策进会组织大纲。蒋介石指定王云五等47人为经济建设策进会常务委员，黄炎培等三人为经济动员组驻会常务委员，胡庶华等五人为经济建设组驻会常务委员。

△　军事委员会任命胡伯翰为新编第八军军长。

△　宋美龄主持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创办之北碚澄江村荣誉军人自治实验区成立。

△　太岳军区八路军一部及长子县地方武装，被“扫荡”岳南之敌包围于长子县团城村，与十倍于己之敌激战终日，歼敌160余人胜利突围。

△　八路军山东军区向各战略区发出反“扫荡”指示，山东全区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

△　日军第十三军广德作战结束。以后各兵团“扫荡”新占领地区内的中国军队。20日，中国派遣军畑俊六总司令官乘飞机到达广德，听取现地部队长有关广德作战经过及其他一般状况汇报。

△　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呈文汪精卫，要求行政院批准“在本年度开征田赋时，带征军警米每亩一升五合，以维军警食粮”。并

称市政“治安问题，殊属严重”，军警食米“常有缓不济急之虞”。

△　东南亚战区总部任命英国潘纳尔中将为总参谋长，美国陆军魏第梅亚少将为副总参谋长。

△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后方勤务部长索姆威尔由印度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魁北克会议经过情形及商谈中美有关事项。

10月16日　国民政府特派宋子文为议订中比条约全权代表。

△　重庆《中央日报》社长陶百川辞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胡健中继任。

△　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抵重庆。次日，访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及英大使薛穆、美大使高斯、美驻中印缅军总司令史迪威等。

△　晋西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在阳会崖伏击战中，毙伤日伪军150余人。

10月17日　晚，经宋美龄之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访蒋介石于官邸，矢言赤诚卫护中国，如有误会皆出无心，此后极愿合作。蒋介石告以统帅与参谋长间之主属关系。史迪威表示：此后决不使委员长失望。于是，史迪威撤换之事，即不再提。次日，史迪威、陈纳德、索姆威尔于蒋介石之官邸叙茶，宋美龄亦在座。

△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二分区部队克日伪军大堡头据点，歼伪军100余人。19日，该部在团村歼灭进行合击“扫荡”之日伪军460余人。

△　新四军淮海军分区一支队歼灭灌云县扬围子据点日伪军百余人。21日，该分区第四支队一部伏击由涧桥出扰日伪军400余人，将敌全部击溃。

△　日机35架分五批窜扰广东省各地，在肇庆等地投弹。

10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对中共应采用之宣传策略》，把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对中共之宣传策略分为“放任”、“公开反攻”和“暗中防患”三个时期。称：“放任策略为最失败之策略”，“公开反攻之策略，在国内虽可收相当效果，在国际上则殊起反感，抗战期间不无顾虑”，“暗中防患之策略，虽较前二种策略为优，终嫌过于消极。”提出“今后对中共之策略为‘开导’策略，今后之时期可称为开导时期”。“第一要多用事实开导而少用理论开导；第二应多用间接开导而少用直接开导”。并扬言“披露”“中共破坏抗战之事实”，“实为开导中共宣告中外最有力之武器”。

△　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段锡朋在中枢纪念周报告，自1939年迄今，四年半中，各级训练人数共140万，其中1942年及1943年上半年中，受训人数为75万。中训团中，自治人员占70％，军事兵役占15％，行政占10％，技术占2.5％，教育占2％，党务占1.55％。受训人员文化程度，其中专科以上毕业者占70％，年龄平均在30岁至40岁。

△　国民政府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凡七条。

△　中国劳动协会举行第二次劳工出国欢送大会。此次出国劳工约500人。

△　晋东南区八路军一部攻克邢台之羊范日军据点，歼全部守敌。20日，该部在河南林县以南歼伪军一个大队。

△　晋察冀雁北地区八路军一部袭入浑源城，捕汉奸10名。21日，袭击应城龙泉村日军据点。23日，伏击由繁峙城出扰之日伪军。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部队袭入东平县城。

△　日荒井大队500余人，对河北阜平县平阳地区进行残酷“清

剿”，用枪杀、火烧、刀刺、活埋等各种残忍手段，杀害民众1000多人，制造“平阳大惨案”。

△　日军在河北任邱县城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历时11天，群众被枪杀、挑死六人，因遭殴打、饥饿而死的200多人，致残的300多人。

10月19日　　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统帅名义在黄山官邸召集会议，出席者有蒙巴顿、史迪威、索姆威尔、何应钦、商震、刘斐、林蔚等。蒙巴顿在会上报告魁北克会议详情，史迪威报告30个师训练之计划。刘斐报告牵制敌人之战略及远征军出动时之部署，即拟在宜昌、汉口与黄河流域，同时发动攻势，以资牵制。会议决定：攻击日期照蒋介石提议于1944年1月15日开始。又驻印军在到达加迈以前，可由英将领指挥，并以蒙巴顿为反攻缅甸之总指挥。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一、对敌人军力之估计不宜过低。二、利多路方面之华军，须有预备队之配备。三、孟加拉湾必须有绝对优势之海空军，实行水陆夹击。四、中印空运，无论何时总应维持每月一万吨之运量。蒙巴顿谓大批英海军之增援不久可到。索姆威尔亦表示一万吨运量之维持大抵无问题。20日，蒙巴顿返印，史迪威与其同行。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

△　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组织“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

△　日军“扫荡”晋西北，将抓捕的临县、离石地区几十个村的108名群众，杀害于离石县坪头村，制造血腥的“坪头惨案”。

△　汪伪行政院举行第一八三次会议，决定：一、改汉口特别市为普通市，任命石星川为汉口市长。二、成立行政院合作事业委员会，任命陈君慧为委员长，钟仁寿兼秘书长。三、任命张仁蠡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市长。

△　台湾总督府公布《台湾战时强化案》，主要内容为提高决战意识，确保粮食生产及供应、整备防卫等。

△　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莫洛托夫、艾登、赫尔率代表团出席。次日，美国务卿赫尔会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会议于30日结束。会议发表的公报称：此次会议最重要者为缩短对德及其欧洲附庸的战争问题。现已确切规定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以便战后继续合作，建立普遍安全。

10月20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宪政实施协进会组织条例》及名单。宪政实施协进会隶属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自任会长，会员人选由蒋介石指定53人，除周恩来、董必武、张君劢、左舜生、王造时、梁漱溟、黄炎培、张志让外，均为国民党员。并指定孙科、王云五、吴铁城、王世杰、黄炎培、董必武等11人为常务委员。

△　黄炎培对中央社记者谈宪政实施协进会的任务凡五端，而沟通民间团体与政府间对宪政实施之意见尤为重要。实行宪政“最大之困难，在于土劣与不肖官吏之阻扰，盖凡利于民者，即有害于彼等也。故希望政府能采取相当严厉的方法，扫除一切障碍，俾宪政可顺利进行”。

△　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招待外国记者谓：“中国以武器不如敌人，故不得不利用地理与兵员两种优越条件与长期抗战之决心，将敌人拖死。此为中国战略。”

△　国民政府与比利时政府在重庆签订《中比新约》，规定比国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双方在战后六个月内，开始谈判另订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晋陕监察使王陆一在西安病故。

△　苏北新四军一部克复淮阴西日军据点林桥，毙日伪军80名。

△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三分区政委萧永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于清河县陈官营战斗中牺牲。

△　美众议院通过废止《限制华人入境法案》。

10月中旬　　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率第二师前往皖中地区加强第七师，并代理第七师师长职务。

10月**21**日　重庆临时参议会二届二次大会召开。11月1日，通过组织宪政实施及经济研究会、筹设市银行等案。11月2日，讨论警保分治，市警察局长徐中齐极力反对，遂决定采取渐进办法。11月3日闭会。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明扬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及专门工程学会联合年会在桂林开幕，26日闭会。推曾养甫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翁文灏、陈立夫等11人为董事长。

△　蒋廷黻赴美出席联合国救济善后会议，11月2日抵华盛顿。

△　经济部公布施行《经济部管理煤焦规则》，凡10条。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军事布置仍在积极准备中，决由冀鲁豫边区调三个大团保证每团2500人到达陕北，今年年底补充准备完毕，明年2月底到达陕北绥德待命。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此计划决不改变。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阶级教育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干部和群众中有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即十大政策中的时事教育），提出阶级教育应该达到的目的是：在事实方面暴露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特务机关之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在思想方面说明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之荒谬反动，严格区别蒋介石主

义与孙中山主义，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前途方面，说明世界前途与中国前途都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法西斯反共分子特务机关的。提高干部与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胜利信心。

△　新四军淮海军分区一部在淮阴北吴老庄伏击出扰之日伪军，毙敌70名。

10月22日　　汪伪江苏省物资调查委员会成立，陈群任委员长，陈蜀寿等为委员。

10月2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晋为第九十一军军长。

△　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新三十八师孙立人所部，在缅甸北部开始反攻，与日军第十五军牟田口廉也作战，胡康河谷战役开始。同时，美机轰炸缅北密支那日军。

△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报告。说“官僚资本与特务政治的结合，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中心”。在当今世界潮流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不可能有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10月24日　　宪政实施协进会召集人王世杰对重庆《大公报》记者谈话，称：该会任务为“如何协助政府于一年之内完成各级民意机关之组织”；“研究讨论因战时而产生之各种现行法令应如何调整，使其渐进于平时状态”。

△　国民参政员张一麐在重庆逝世。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吊唁。

△　中国驻印军以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由缅北野人山之唐家卡、卡拉卡之线，分三纵队向新平洋、于邦之线前进。当面之日军为第十八师团之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两联队之各一部。29日，第一一

二团击破日军第十八师团之一部，攻取新平洋。

△　八路军太岳军区一部在秋季反“扫荡”中，于临屯公路上的韩略村设伏，一举歼灭日华北方面军为推广“新战法”而组织的战地观战团军官120余人，打乱日军的“扫荡”计划。

△　新四军一部配合淮安总队攻克淮安东伪军据点李圩，俘敌70名，毙59名。

10月25日　　粮食部长徐堪在中枢纪念周报告粮政，称：本年粮食征收、征购、征借已于10月起开始，至明年9月底止，核定总额7700万市担。其中征收部分，田赋征实逐年增加；而征购则逐年减少，且多数省、市改为征借。现征购、征借结果，国库年可节支七亿余元。

△　财政部缉私署在中枢纪念周作工作报告，称：全国有17个省设立缉私处，各地设立查缉所129个，分所449个，共有职员3956人。1942年缉案2.4748万件，今年1月至8月统计为3.1589万件，所获货物私盐700余万斤，黄金2000余两，白银百万余两，铜钱百万余斤。案送主管机关经处以罚金者有365万余元，没收变价者162万余元。8月间在广东钦县缉获走私钨砂30余万斤，约值数千万元。总之，全国“私风炽盛”。

△　日机23架由缅境侵入云南，在下关投弹。28日，日机九架由浙境南窜福建建瓯投弹。

△　日本第八十三届临时议会开幕，29日闭幕。东条报告称：“政府面临严重的战局。”通过《加强国内战时体制》紧急法案14件及预算案三件；决定在台湾、朝鲜扩大征兵；议决本财政年度普通追加预算1.29亿日元，特别追加预算703万日元。会后，东条叫嚷“实行决战运营”。

10月26日　　国民政府以绥远省粮赋成绩卓著，明令嘉奖省主席傅作义。

△　日军第六十五师团主力配合伪军杜淑部共万余人，再度向八路军冀鲁豫第四分区濮阳、滑县地区猛攻，并大肆抢粮。30日，日伪军5000人再度向第一分区荏平地区合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民众于11月13日击退日伪军，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伪军2740余人。

△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部署由步兵旅团长野地嘉平少将指挥留守部队担任当阳的留守警备。27日黄昏后，该师团参加常德作战的部队主力开始行动，依次向李家埠（荆州西10公里）周边地区集结兵力，至11月1日集结完毕。师团战斗司令所27日从当阳出发，28日与驻在沙市的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建立联系，29日到李家埠，30日晚12时到达老厂，参加常德会战。

△　日本东方会领袖中野正刚忧时自杀。

10月27日　　顾维钧在伦敦帝国议会上发表题为《中国未来发展之若干趋势》的演说，称中国战后经济建设“将需输入各种机器极多”，“所需之消费品更多”，所需外国货物之种类“总额必定增加”。

△　中国农业科学访印团团长潘简良等一行飞印。

△　军事委员会为确实明了第六战区当面敌情，特电令航空委员会饬即侦察岳阳、沙市间江运与汉（口）宜（昌）公路陆运情形；宜昌、荆门间之日军动态；并轰炸岳阳、沙市一带集结之日军。航空委员会即函知史迪威将军转饬第十四航空队，并令空军第一、二、三路司令部转饬所属驱逐、轰炸部队，待命出发。

△　是日及次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在杨林子周围地区集结，并与作战地区内的警备部队（第四十师团步兵第二三四联队，即广田部队）交替警备，同时完成参加常德作战的准备。师团战斗司令

所于10月6日从安庆出发前进，15日从武昌乘火车抵岳州，并从岳州乘海军炮艇于19日到达石首，其间一度返回监利。24日推进到大马河，28日推进到藕池口。

△　日军第十三师团为参加常德作战，开始行动。主力部队——步兵第一〇四联队、第一一六联队为基干，在10月30日至31日间，利用船舶部队机航，从太平口对岸附近渡过长江，于弥陀寺附近集结。部分兵力——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为基干，在其警备区黄金口附近集结。至此，该师团完成参加常德作战的准备。

△　广东省境内日军反战事件日增，日警宪连日侦察镇压。是日，50余名反战士兵被捕押解广州。

10月28日　　军令部常德会战兵力部署如下：一、第六战区王敬久第十集团军第六十六、第七十九军，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第七十三军，以各军之一部于河沼地带阻击日军，各军之主力利用津澧河流及暖水街一带之山地，以侧击伏击方法击破进犯之日军。二、以王耀武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驻常德桃源（其中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军主力位置于太浮山附近准备机动。三、以驻浏阳之施中诚第一〇〇军第十九、第六十三师直接支援常德，准备挺进至益阳待命。以中美空军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之日军及沙市、岳阳间日舰轰炸。四、以第二十六、第三十三两集团军各以二三个师向当面日军之弱点深入攻击。第九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岳阳以东地区日军之弱点深入攻击，第五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京山皂市袭击。各策应部队应于11月4日以前移于第一线附近待命开始攻击。

△　军令部接蒋鼎文关于南京汪伪会议和庞炳勋、孙殿英投敌给蒋介石的电报后，由该部第一厅第一处提出研究意见拟办：一、对南京汪伪会议的政治诱降“亦呈报并抄中宣部注意防范”；二、拟电蒋鼎文对庞部伪军“应密取联系，暗中掌握，可否？”何应钦批示：“第一项

不必办，第二项如拟。”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浙江孝丰。

△　晋察冀边区五台民兵发明天雷阵，一次毙伤日军37人。

△　军政部学兵总队长李忍涛于印度定疆殉国。

△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下达命令：决定以主力歼灭王家厂附近的守军第七十九军，以另一部主力歼灭安乡附近的守军第四十四军。各部队于11月2日薄暮时分发起攻击，执行作战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

10月29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听取主席团报告、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和孔祥熙作最近财政设施的报告。

△　教育部公布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规定：自费留学生经部考试及格，送往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集中受训，受训完备后办理出国手续。自费留学生在国外一切思想行为，须绝对接受本部驻外留学生监督处及使馆之指导与管理。如有违背三民主义之言论及越轨行为，经查明属实报部后，立即取消其留学资格，并勒令返国。每年派遣最高额为600名。

△　北岳区八路军一部在唐县之南山伏击日伪军，毙伤百余人。

△　驻山西省阳城日军制造西南村惨案。其后11月2日又行屠杀，两天共杀害群众110余人。

△　土耳其驻重庆公使馆举行茶会庆祝土耳其共和国二十周年国庆。外交部发表公报宣称，两国使节决定升格为大使。

△　中国印度灾情筹赈会在重庆成立，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戴

季陶为理事长，朱家骅、许世英为副理事长。决定筹捐120万元，由银行、工商各界认捐，并先由四联总处垫汇20万卢比给印度。

△　日、汪调整合办公司：一、华中盐业公司日本所有股本让与汪方，并改组为中华盐业公司。二、解散华中蚕业公司，资本交还各股东。是日，汪伪商业统制总会在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实行麻类及其制品统制。凡麻类及其制成品，非经商业统制总会许可，不准移动。

10月30日　　中、美、英、苏四国协定《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由傅秉常、赫尔、艾登、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该宣言表示彻底击溃法西斯并“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同日，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在莫斯科发表，决定缩短对德战争。

△　汪精卫与日本大使谷正之在南京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条约故意提高汪逆地位，作为对重庆国民党蒋介石的钓饵。其第五条宣称：民国二十九年11月30日签订之日汪条约失效，并在《附属议定书》上称：“日本国约定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华民国领土内之日本国军队；日本国根据北清事变（即义和团事件）北京议定条款及有关之文书所有之驻兵权，予以放弃。”签约后，东条、重光及汪逆纷纷发表谈话，叫嚷什么“现在需要重庆反省，恢复和平”，“希望重庆方面的将士民众明确的认识事态，迅速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现在这样做还未过迟”。

10月31日　　国民政府为蒋介石举行祝寿活动，令各大城市张灯结彩，遍悬国旗、放爆竹，举行游艺大会，放映蒋介石之言行影片，组织庆祝游行。

△　新四军第一师围攻苏中丰利镇，激战两昼夜，全歼伪军徐容部第三团，攻克丰利镇，是役俘副旅长以下官兵400余名，缴获长短

枪300余支。

△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令第十一军先攻常德以北的驻军。是日，日军各部队都已到达指定地点集中。

10月下旬　　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以护卫陪都、歼灭敌军为任务，以第二十九集团军之第四十四军，任滥泥沟子、南县、甘家厂（不含）之线及津、澧守备；第十集团军之第七十九军主力、第六十六军一部，任甘家厂、公安、新江口（不含）、宜都线之守备；江防军之第三十军，任茶店子亘平善坝及石牌西塞之守备；第二十六集团军之第七十五军，任三游洞、毡帽山、阎王口之线守备；第三十三集团军之第七十七军主力、第五十九军一部，任大木岭、票溪、转斗湾之线守备，主力分别控制于石门、暖水街、聂家河、三斗坪、窑湾溪、兴山、报信坡、刘侯集、安家集、建始各附近，整备歼灭侵入之敌。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奉蒋介石命令，协助第六战区参加常德会战。薛岳令梁汉明第九十九军（并指挥暂编第五十四师）预守洞庭湖，击破进犯之日军；令方先觉第十军、鲁道源第五十八军、傅翼第七十二军和古鼎华暂编第二军赶赴沅江两岸作战；令鄂南新编第十六师、第三挺进纵队陈庚部、湘北杨汉域、第四十挺进纵队王剪波部，于会战全期，在岳阳、武汉铁路间寻隙牵扰惫敌，遥为策应。

△　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赴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况。

是月　　社会部在《关于限价后工人生活费与工资变动情形的报告》中承认，物价飞涨，工人生活困苦。是月同去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限价相比，米价各地平均上涨11倍，贵阳达37倍。各地盐上涨12倍，油11倍，煤10倍，柴10倍半，土布10倍半，房租13倍多。工人

生活费用总指数平均上涨9.8倍。工人实际收入总指数仅涨七倍，“在其为维持生活所需支出费用之下”。

△　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在《关于湘粤桂赣四省工矿业状况及发展困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承认“原料问题严重”，“资金困难者占绝对大多数”，“技工流动性太大”，“物价波动甚剧”，“售价不敷成本”。

△　国防最高委员会修正通过《封锁敌区交通办法》，凡八条。

△　国民党为加强对新闻的控制，从去年10月至今年10月，一年内增设直属新闻检查处、室七个。至是月，新闻检查处、室分布各省、市共37个单位，县（市）新闻检查室达113所，管制报社、通讯社达600余种。

△　成都光华大学学生因反对增收学费而罢课，斗争结果，副校长谢霖辞职。校董会派向育仁维持，谋求解决办法，经谈判于11月3日复课。

△　宋美龄赠款2.5万美金充魏斯里学院宋美龄奖学金。

△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一书出版。该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的文件集。《两条路线》包括了从中共成立到1943年22年内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

△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一次试用水雷封锁越南海防港的入口。

△　日军第十三军和伪军向苏浙皖边发动攻势，第三战区部队不战而逃。新四军第十六旅积极打击日伪军，开辟了郎溪、广德等广大敌后地区。

△　日军第十二军团首先以一万人兵力，对鲁中区进行冬季“扫荡”；尔后，又以2.6万余人兵力对清河区进行“扫荡”。八路军山东军区令鲁中、清河两区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令鲁南、渤海、胶东、冀鲁边等区对敌展开攻势作战，策应鲁中清河区反“扫荡”。在各区有力配合下，于11月间粉碎了日军的冬季大“扫荡”。

△　日军在晋察冀选择任丘、高阳、潴龙河北岸的地区建立“联庄组织”，实行所谓“淘水战术”。此战术以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要把水淘干了才好捉鱼”。

△　日军在香港、广东两地强拉壮丁5000余人，运往海南岛，实施军事劳工训练；又在海南岛强征劳工2000余人，共7000余人集中三亚港，等候轮船转押南洋。

△　日军“七三一”部队从海城、大石桥、锦州等地押送800名劳工到哈尔滨，全部拘押在平房正黄旗五屯的劳工棚里。不到两个月时间，竟有600人惨遭杀害，尸体全部被扔进该屯西门外的“万人坑”。

△　美国派陆军工程专家皮可少将为中印公路的美国工程队司令。

11月

11月1日　　蒋介石接罗斯福总统电，拟于11月20日至26日间，在开罗附近与彼及英首相丘吉尔会晤。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谓将如约前往开罗会晤。

△　行政院批准广东韶关市正式设立，任命萧冠英为市长。

△　国民政府任命王怀明为国立山西大学校长。

△　军事委员会任命姚北辰为第十五军副军长。

△　行政院指令试办《封锁线输出入商及货运登记办法》，凡12条。

△　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攻占拉加苏、新平洋等地。

△　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向湘北华容南沙口、鲢鱼须进犯，被第九战区一部击退。

△　中国发明协会在重庆成立。选出陈立夫、王云五、顾毓琇、茅以升等15人为理事，陈果夫等五人为监事。

△　汪精卫抵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次日，汪精卫、周佛海同日首相东条英机会谈。东条表示，日政府不直接同重庆接洽和平，希望南京对重庆劝和，并负责沟通日本与重庆的联系。

△　“满铁”将抚顺煤炭液化工厂移交给满洲人造石油株式会社。

△　日本另组防空总部代替防空事务局，并增设军需、运输通信、农商三省。

11月2日　　常德会战开始。日军第十一军在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下，开始向第六战区第十、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第一线阵地展开全面进攻：右路第三十九师团全部及第五十八师团一部（古贺支队）由江陵、沙市向松滋方向进攻；中路第三、第十三师团由阡湖堤、闸口向公安方向进攻；左路第一一六师团、第六十八师团附第四十师团一部（户田支队）及宫胁支队（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一部），由藕池口、石首、华容地区分别向澧县和南县进攻。第六战区守军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碍与工事，予日军以消耗。

△　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五战区派遣两个师，以主力向钟祥及汉（口）宜（昌）路敌后方袭击；电令第九战区派两个师兵力，向岳阳以东地区之敌弱点深入攻击，以策应第六战区的作战。

△　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向缅甸北部的新平洋推进，担任警戒。1月6日，日军第十八师团之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两联队主力增援到达新平洋。第一一二团进展受阻，陷于苦战。新三十八师调第一一三、第一一四团及炮兵一营前往增援。孙立人师长和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均临亲指挥与督战。

△　新四军李先念部为阻止日军增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纷纷向天门、应城、安陆及平汉线、河汉线各据点出击，日军迭受重挫。

△　美机十余架飞临监利、石首地区袭击日军仓库及其他建筑物，日军损毁甚重。

△　日机十多架袭闽北建瓯、赣东玉山。4日，日机18架自台湾飞袭闽北，在永安、建瓯投弹。5日，日机20余架窜至闽西长汀、连城投弹。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守锋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

△　国民政府公布《改进国库款项支拨办法》，凡19条。

△　中国农业科学访印团离加尔各答赴新德里，18日开始参观印度其他地区的农业，26日自巴罗达赴孟买。

11月3日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由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兼任队长。

△　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兼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奉令率部进入常德附近的既设阵地，加强工事，严整战备。旋召开军事会议，制定防御作战方案。

△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陷湖南南县，次日日军第三师团陷湖北公安。

△　中国远征军攻占缅北宁边。

△　上海大场机场日机五架被预置之定时炸弹炸毁。

△　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表广播讲话，称："全面和平早在重庆流行很广，而且很快，要求重庆立即停战，完成和平统一。"

△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同孙科会晤，抗议国民党书刊杂志发表反苏文章。29日，又致函孙科，并开列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的《国防》、《尖兵》等11种反苏书刊名单。12月13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电复中央宣传部长交办的查核潘友新所指之反苏书刊一案，根本否认国民党书刊登有反苏文章的事实。说：经查核没有发现"妨碍中苏友谊之文字"，请孙科"向苏联大使详加解释，以免误会"。

11月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战略区发布《关于目前时局宣传要点》，指出今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打败法西斯。日寇为了破坏我们的秋收正在整个华北进行他的秋季大"扫荡"，我八路军及华北人民正在作英勇的反"扫荡"战斗，一定要粉碎日寇的计划。各根据地目前的宣传应集中于鼓励人民配合军队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秋收，打击敌伪的"蚕食"政策，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　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副委员长李书田，率英国顾问巴特里及工作人员十余名，沿河南尉氏、扶沟、西华、周口等地勘查后，是日抵皖北界首，继续勘查。

△　重庆市党政联席会议决议筹建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前在中央公园奠基者为总碑，另拟分建邹容、张培爵纪念碑。

11月5日　毛泽东致电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

年，称“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召开纪念晚会。毛泽东发表讲话，高度评价莫斯科会议各项宣言的意义，表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将同全国爱国的军民一齐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告以冀南骑兵团拟抽调来延安。陕甘宁边区南、北、西三面皆国民党军队修筑的堡垒，我军仅有少数炮兵，作用不大。拟从太行抽调两个工兵连来延安，均望于明年2月底达到，愈早愈好。

△　鲁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发动讨伐汉奸惯匪刘桂堂（又名刘黑七）战役，在费县西南之柱子，击毙伪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刘桂堂以下官兵百余人，俘千余人，缴枪千余支。次日，攻击费县刘家庄伪第十军独立旅旅部驻地，予敌以大的杀伤，并攻克埠下等据点。

△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渡过松滋河，占领松滋并分头西犯。

△　财政部公布《火柴烟类食糖专卖销售商管理规则》，凡20条。

△　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开幕。汪精卫在会上讲话，声称与日本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同心协力，共存共荣。次日，会议闭幕。汪、日、“满”、泰、缅、菲等国共同签署《大东亚共同宣言》。《宣言》宣称：大东亚各国要互相敦睦，紧密提携，普行沟通文化，进而开发资源，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9日，汪精卫及其一行返回南京，汪发表谈话称：大东亚会议是纯为强者对弱者扶助的会议，是东亚各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深望“重庆方面极加反省，将毅然来归，共为东亚之同志”。

△　英国首相丘吉尔派陆军中将魏亚特为驻中国战区统帅部特任军事代表。

11月6日　蒋介石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祝贺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重庆各界人士集会，热烈纪念苏联国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大会，会长孙科发表演说，强调中苏加强合作。晚，何应钦宴请苏驻华武官及军事人员。苏驻华使馆茶会招待各界人士，蒋介石派魏怀、商震代表致贺。15日，宋子文宴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及使馆人员。

△　延安各界三万人集会纪念十月革命节，毛泽东、朱德等出席。毛泽东讲话，指出：在这一年之中，苏联红军的胜利转变了战争的全局，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朱德在讲话中赞扬苏、美、英三国会议所取得的成就。

△　蒋介石以宪兵学校兼校长身份主持该校学员队和军士大队毕业暨开学联合典礼，并讲话称："现时建国必先建军，建军尤必须先建立宪兵。""宪兵为民众之保，军伍之师，责任重大。"

△　国民政府公布《公务员抚恤法》，凡17条及《公务员退休法》，凡18条。

△　军事委员会任命唐星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　史迪威由印返渝，向蒋介石报告蒙巴顿提案中之缺点和远征军之缺额要求改善；蒋介石令何应钦刻日照办，并嘱史迪威代拟中国出席开罗会议之军事提案。史所拟中国提案主要内容为装备与训练90个师之战斗部队，以充实其作战力量。此部队分三批，每批30个师，照预定计划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三批军队所需武器装备应由美国援助。此草案在开罗会议上没有提出讨论。

△　交通部拟定《关于中美合作之意见》，提出战后铁路建设需11.94亿美元，"须举借长期外债"。水运五年内需资金10亿美元，"拟先借外债三亿美元"。空运资金三分之二即1.3151亿美元，"拟请美国借给"。公路"吸引外国厂家投资合办"。

△　农林部拟定《关于中美合作之意见》，规定美国如因作战需要中国之农牧产品或半制品，中国应尽量供给并努力增产改进品质，不计国内收购成本以期增加输出数量。希望在战后美国以大量新式农具贷予中国，欢迎美国著名厂商来华与中国合办各种农牧场。中国农业用款希望美国长期贷予，对美国农产品输入中国，由政府酌量减免进口税鼓励其输入。

△　粮食部拟定《关于中美经济合作之意见》，提出“希望美国在战时每月能供给我国乳粉10万磅至30万磅”，“战后关于乳类肉类等食品须由美国大量输入”。希望美国于战事结束之六个月内，每月能供给小麦10万公吨至15万公吨。中国对美输出之花生战后可大量供应。

△　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关于该省农村衰落，请缓建仓积谷致行政院呈文称：宁夏地气异常潮湿，粮食不易久储，建筑材料缺乏，费用无着。今年收成歉薄，田赋未能如额征足，“势不克再从事于兴建积谷之仓，筹积备荒之谷也”。

△　第十集团军第一线部队撤至王家厂、暖水街、刘家场、洋溪之线。日军南下攻取常德必须占领暖水街，方可保障右侧背之安全。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在暖水街与敌展开激战，终因不支而转守暖水街西南地区。

11月7日　湘境第六战区第九十九军第一九二师一部克复南县，第六战区另一部在鄂西长江南岸与日军激战。

△　日军偷袭河北崇礼县四台嘴乡芃菜坪村，自夜至翌日上午，共杀害村干部、村民11人，伤七人。

11月8日　军事委员会电令：“第十集团军即刻集中兵力，击破暖水街方向突进之敌。”

△　为驻印军准备向缅北发动进攻，军令部拟定《远征军反攻缅

甸计划》，凡29条。方针是：“国军以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以远征军一部攻略滚弄敌桥头堡，并固守车佛现阵地，掩护左侧；以主力强行渡过怒江，重点指向龙陵，攻略滕冲、龙陵一带敌阵地，进出蛮允、畹町之线。整顿态势，再与驻印军会师八莫，攻略腊戍。开始进攻之时期，兹定民国三十三年3月上旬。”

△　新四军第三师一部攻入苏北海州以南之日伪军据点响水口，围歼伪江苏省保安团第一大队，俘伪军220余名。

△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空袭厦门，击沉日舰五艘。

△　日军为统一强化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将其在华中地区的所有贸易机关，包括日军军部组织的联合运输配给联合组等，并入华中日本贸易联合会。

△　伦敦市商会举行向中国致敬聚餐会，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会上讲话，要求英开放滇缅路，以便重武器及其他必要供应品输入中国。

11月9日　中、美、苏等44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善后救济协定》。

△　第十集团军正准备向暖水街进逼时，日军先发制人，在第六十六军左翼及高岩、王家畈、邓家畈等地发起猛攻。第七十九军正面之日军也向斗陵坡进犯。当晚，日军除以一部与中国暂编第六师对峙于万福桥以东、斗陵坡以南等地外，其主力迂回于暖水街以南地区西进。至11日夜，第十集团军与日军阵地已呈交错混战状态。

△　日伪军近二万人对山东根据地鲁中北沂蒙地区进行冬季“扫荡”。坚守南岱崮、北岱崮阵地的八路军鲁中军区第十一团第八连93名指战员，抗击超过自己40倍之敌人。敌人用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团，一直疯狂地昼夜不断地进攻了14天，炸弹、炮弹花费了40万磅以上，还用了燃烧弹和瓦斯弹。八路

军指战员浴血奋斗，坚持20余天，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在伤亡上却造成了1与15之比，最后全部人员安全突围。这次南、北岱崮的保卫战，对粉碎敌人的“扫荡”起了决定作用。12月1日，八路军山东军区通令嘉奖，授予该部队“英雄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　日伪军向河北省井陉县老虎窝村“扫荡”，村中男女老少100余群众躲藏在附近山洞中，日军竟向洞内施放化学毒气弹，村民全部遇难。

11月10日　　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在重庆签订新约，规定挪威政府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在北平使馆界与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之一切特权，并放弃在中国通商口岸及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等一切特权。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同外国记者谈话时说：“有许多不明中国实情的人士，受了那些无知的或恶意的宣传，竟有发生中国现在是否民主，甚至将来是否民主之怀疑。”并谓“没有国民党的奋斗，则中国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必须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此为不可动摇之基本最高原则”。

△　外交部发表公报宣布成立访英团，由王世杰、王云五、胡霖、杭立武、温源宁五人组成，团长王世杰。11日，国民参政会举行茶会，欢送访英团即将出访。同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设宴饯行。18日，访英团由重庆启程赴英。

△　蒋介石急电第一〇〇军即日向常德附近之桃源前进，归王耀武指挥，参加常德西北地区之作战。

△　湘北津市、澧县、石门战斗，第七十三军汪之斌、第四十四军王泽浚部与日军第三、十三、六十八、一一六师团激战。日军得空中支援，猛攻三地，15日三地皆失陷。第七十三军损失惨重，死亡136人，被俘138人。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第八分区军民破击平汉路新乡、汲县段，战斗持续半个月。

△　晋察冀八路军一部击溃向太陵北石沟进犯之日伪军两个营，毙、伤、俘敌80余名。

△　晋察冀边区第三分区八路军一部猛袭完县陈侯日军据点，毙伤敌50余人。同日，完县太平区之日伪军进至筐子沟一带搜山时，遭八路军和民兵的地雷打击，死伤80多人。

△　中国空军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于是日至21日，先后出动百余架次轰炸机与战斗机，袭击澧县、津市、石门、王家厂、澧水、藕池口等地日军集结部队、日军仓库与江南运输船只，击沉日军木船40余艘。并与日机展开空战，配合地面部队战斗，击落日机四架。中国空军亦损失飞机四架。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临时常务会议，通过改组机构并调整人事案：一、撤销政务、秘书两厅，改设总务、内务、财务各厅。二、将原内务、治安、教育、财务、实业、建设六总署，改为绥靖、经济、农务、教育、工务五总署。三、任命王克敏、杜锡钧、汪时璟、王荫泰、王谟、苏体仁为常务委员，王克敏为委员长，王荫泰为总务厅长兼内务厅长，张仲直为总务厅副厅长兼财务厅厅长，杜锡钧为绥靖总署督办，汪时璟为经济总署督办，王荫泰为农务总署督办，王谟为教育总署督办，苏体仁为工务总署督办。

11月11日　　国民政府令免图布陞吉尔格勒代理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伊克昭盟盟长、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各职，派其为伊克昭盟副盟长。

△　日军数千人在飞机配合下，在广州至九龙铁路东西两端之深圳、东莞及石龙、虎门分路向当地驻军发起进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下令博罗、惠阳军民疏散。至13日，日军打通了广九路，并掠去大

批壮丁和粮食。

△　财政部公布《布业商人营业登记办法》，凡九条。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敌正在加紧对华诱降，蒋仍未放松对边区军事准备，我为推迟内战，坚持敌后抗战，尽可能屯兵陕北，是十分必要的”。望以六个团单位补足7500人，由杨得志率主力5000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动来延安。

11月12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推选孙科、王云五、莫德惠、黄炎培、吴铁城、褚辅成、张君劢、左舜生、董必武、傅斯年、王世杰为常务委员，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为召集人。蒋介石以会长身份出席致词，大会通过关于从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等七项决议案。

△　毛泽东、朱德参观延安市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繁荣、便利商品交易举行的为期一月的骡马大会。

△　军事委员会任命韩俊为第七十三军副军长。

△　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下令常德人口、物资开始疏散。15日为疏散的最后一天，余又令贴出布告，城里不留一个居民。

△　凌晨6时起，日机六架空袭长沙、常德、宜都、恩施等地。

△　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赴日本访问。

△　大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在东京召开，汪伪政府代表林柏生参加。

11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27日结束。

△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展览会展现中直机关一年来所取得的生产成绩：种地1.3万多亩，收粮1800多石、蔬菜539万多斤。生产与节约总值6.6亿多元，超过计划任务六倍。粮食自给二个月，其他已做到全部自给，减轻人民公粮负担4.441万石。展览会17日闭幕。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军民秋季反“扫荡”历时50余天，作战315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于是日胜利结束。

△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赫尔利将军来华晋谒蒋介石，解释开罗约会之用意。

△　台湾总督府勒令农民将米谷增产奖励金5100万元之半数存入银行。

11月14日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整澧水两岸兵团部署：以第四十四军坚守津市澧县。第七十三军以一部坚守石门，主力转移澧水南岸，逐次抵抗，最后确保太浮山、观国山之线阵地。第七十四军归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指挥，以第五十七师坚守常德，主力控制慈利、白鹤山、鸡公岩、燕子桥间地区，机动侧击敌人。又令第十集团军全线出击，先向曾家垭、河口、马踏溪、刘家场、茶元寺之线挺进，江防军即向宜昌两岸之敌相机攻击，并以小部攻击宜都。第二十六集团军即向龙泉铺、双莲寺之敌攻击，第三十三集团军即以一部向河溶突进，主力向荆门、当阳之敌围攻，施行牵制。

△　晚，蒋介石急电指令第六战区：“以一部确守常德，主力在慈利附近地区与敌决战”，“石门关系全盘战局之得失，望转告所部务须坚守。”15日，战区司令部电复蒋介石：阵地已被日军突破，继续坚守，势不可能。

△　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颁布守卫常德的作战命令：第一六九团第三营营长孟继东为德山守备队长，第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为右地

区队长，第一七〇团团长孙进贤为左地区队长，第一七一团团长杜鼎为河洑山守备队长，第一七一团和第一七〇团第三营为城垣守备队，归师部直接指挥，占领城垣的核心阵地河洑；第一七一团第一营为师预备队，位置常德城内。同时又令：炮兵团长金定洲指挥一个营主力进入常德南站附近，以一个连进入常德北门附近，工兵营协助左右两地区和德山、河洑两守备队地雷埋设，与城南北岸水面及城内障碍物的设置，一部担任船舶的监护；通信兵连担任各方面的通信联络。

△　夜，石门阵地正面逐渐缩小，终以全面被围，又复背水，态势不利，主力向西转移，仍留第七十三军第五师固守石门要点。该师师长彭士量率部自是日晚至15日黄昏，与日军激战一昼夜，彭师长以身殉职，全师官兵几乎全部牺牲。

△　东北大学学生29人在四川三台发动学生从军运动。从此学生从军运动在大后方各地开展。

△　豫北八路军一部在林县附近痛击抢粮之日伪军，毙敌100多人，活捉100多人。

△　苏中如皋县城五万民众，为反抗日伪军的横征暴敛，各携锄头、铁叉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晚间举火炬开会，高呼口号“去年要钱，今年要粮，明年要命，要命就要拼”，“送粮上街等于养虎成害”。还提出肃清奸细，禁止与日寇接触，不进如皋城。

△　是日至24日，日军对河北省井陉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老虎洞和黑水坪两天屠杀老百姓达千人。

11月15日　中国远征军进攻于邦，缅北会战开始。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昉为第四十七军军长。

△　史迪威偕政治顾问戴维斯离渝，20日抵开罗。

△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陷津市、澧县，并强渡澧水南窜。守军第四十四军主力遂转慈利以西地区，侧击南下之敌。蒋介石电令方先觉第十军由衡山北上；并令罗广文第十八军由北斗坪向津市、澧县进击，求敌决战。

11月16日　　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主持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制定常德防御计划："加强工事而固守之，待敌攻势顿挫，及我外线各路友军反包围态势形成时，以主力由常德城西北郊转移攻势与友军协力将敌压迫于洞庭西畔而歼灭之。"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三、四、五军分区部队，奇袭伪军孙良诚总部所在地濮阳东南八公桥。17日，激战12小时，将孙总部机关歼灭，俘伪军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兵百余人。后又乘胜扩大战果，在200余里的范围内，拔除敌伪据点百余个，歼伪军3000余人，至11月26日迫使伪军退守濮阳城内。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五分区一部攻克河北省磁县之峰峰煤矿，第七分区一部攻克河南辉县城北之高庄镇。

△　为救济印度灾害，中国民众踊跃捐输，第一批捐款国币120万元，兑换成印币20万盾，全数汇至印度。

11月17日　　重庆举行林森安葬典礼，国民政府规定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一日。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世和为第七十六军副军长。

△　出席联合国救济善后会议之中国代表蒋廷黻接见记者称：战后中国人民需要救济者预计将达8400万人之多；所需物资4000万吨，其中约有1200万吨需要国外供给，总值约四亿至五亿元。

△　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一〇〇军军长施中诚：常德已有第五十七师担任守备，第一〇〇军无一师开德山市之必

要，仰全部遵照前令，仍向桃源集结。同日，又电令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注意常德的防空，疏散居民，以便作战。

△　日军进抵慈利东北地区，与第七十四军进行激战，于18日攻陷慈利。慈利失陷后，常德西北已无险可守，从而揭开了常德保卫战的序幕。

△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轰炸香港日军事目标。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凡10条及《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凡14条。

11月18日　　蒋介石电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兵团司令王耀武，令王耀武指挥第七十四、第一〇〇军务于太浮山、慈利一带将敌击破，期收决战之胜利。令第四十四军以一部于津澧以南地区与敌周旋外，务集中主力协助第七十四军于太浮山以北地区作战。

△　日军分三路犯常德：第三、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为中路，经澧县南窜直趋城垣；第十三师团一部为右翼，经慈利进据桃源；第六十八、第四十师团各一部和独立第十七旅团扰汉寿、沧港、牛鼻滩侵陷德山。以左右翼的钳形攻势攻常德的侧背，企图以四面围攻占领常德。

△　日军为确保广（州）九（龙）路运输线，集中8000余人开始对东江抗日根据地东莞、宝安之大岭山、客家洞地区进行“扫荡”。广东抗日游击总队在莲花山、怀德等地给敌以杀伤后分路突围，使敌寻歼游击总队主力的计划落空。之后，敌转兵“扫荡”龙华、乌石岩地区，亦遭游击总队沉重打击。12月5日，敌全部撤退。

△　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部向赣榆城发起进攻。20日收复该城，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一旅及县伪警备队，攻克碉堡40

座，俘旅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粮食20万斤。

△　日军第十二军军长喜多诚一指挥第五十九师团及伪军共2.5万余人，配合骑兵2000余人、汽车近千辆、飞机10余架，向山东清河区实行大规模的拉网式的“扫荡”。清河区八路军在民兵配合下，破袭日伪后方交通。一周内作战20次，攻克据点四处，炸毁日军汽车九辆，火车一列，破袭公路200里。

△　作家王亚平、舒舍予、茅盾等53人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并呈行政院、蒋介石、孔祥熙，提出改进文化事业出版工作之意见14条。批评当局“对于文化出版事业之规定多沿训政时代及抗战初期之成法”，“吾国言论均受政府之指使”，“将限制范围任意扩张而失规定原意”。建议“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应简单化”，“不再加其他限制”，“期刊杂志之呈请登记，应放宽限制并减省手续”。26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逐条“答复”，拒不接受作家的合理意见。

△　美驻华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举行茶会招待新闻界，美空军少校白兰地报告中美联合航空队成立及最近作战经过；又称：美国正大力帮助训练空军飞行员、机械员。

△　印度伪政府主席鲍斯抵南京访问汪精卫。

11月19日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暨王宠惠、商震、林蔚、周至柔、董显光等，由渝启程赴开罗参加开罗会议，21日抵达开罗。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听取外交部书面报告和翁文灏作的最近工业生产情形和调整办法的报告。

△　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戈定邦等一行，考察新疆完毕返兰州。28日，戈定邦在甘肃省党部主持召开的学术讲演会发表题为《新疆各宗族生活》的演说，认为融洽各族间情感之途径有：一、通

婚；二、提倡教育文化；并谓“应提倡统一化，现代化”。

△　蒋介石电孙连仲、王缵绪、王耀武、王泽浚、余程万速转第一〇〇军军长施中诚：当面敌人补给之困难日增。我第十集团军正向敌之右侧背奋力压迫中。我第七十四、第四十四、第一〇〇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功过赏罚，绝不姑息。希饬属奋勉为要。

△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令第七十九军向石门、慈利间地区挺进，越过澧水南岸，攻击敌之侧背；并饬第十八军归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即日由聂家河、渔阳关间渡汉洋河，进出西斋、王家厂间地区，扰击敌之侧背，策应常德西北地区之作战。第九十四军即向长阳、木桥溪地区集结，归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巩固江防。另令第七十三军一部向东岳观、石门一带袭击敌人。

△　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为加强常德的外围和核心的守备力量，变更河洑山的布署：留第一七一团一个加强营防守河洑，其余两个营为城垣守备队；第一七〇团第三营改为师预备队。并严令各团、营、连、排长沉着应战。

△　延安南泥湾驻军举行首届生产展览会，一个连种地1722亩，收粮450石，蔬菜七万斤，存草23万斤，喂猪、牛、羊300只。

△　豫北滑县伪军第十八支队四个大队共350人全部反正，向当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投诚。

11月20日　　湘北慈利、桃园战斗，王耀武军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师，施中诚军第十九、第六十三师与日军第十三、第三师团激战。日军投入伞兵，战事惨烈。

△　日军对山西省河津县小停村发动“扫荡”，一天屠杀群众158人，其中妇女75人，儿童40人，河南逃难者43人。

△　中美空军联合奇袭攻击台湾新竹机场，炸毁日机20余架。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工会法》，凡13章65条。

11月21日　　薛岳电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第一〇〇军军长施中诚、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第七十三军军长汪之斌，令其“排除万难，同心协力，指向常德城西北方猛力速攻，必歼此敌，建立大功”，“对临澧、澧县、石门、慈利四据点之敌，应以一部钳击，主力则胆大猛进，勿为小敌所掣，而误歼敌之机”。

△　由澧水南渡直扑陬市、桃源之敌第三师团于太浮山西侧与守军第四十四军一部展开激战，猛向沅水进犯。下午5时，日机16架于桃源上空投弹扫射，并降落伞兵百余与地面之敌呼应袭击。守军西移，桃源城失陷。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率一部于陬市西北抵御，作战中许国璋殉职。敌陷桃源后，一部向西北急进，一部渡沅水东窜。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命令第十一军司令官一经摧毁常德附近守军军事根据地，即适时恢复原态势。

11月22日　　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第十三、第三师团主力，与守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四军在道水、黄石河、慈利以南地区展开激战。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古贺支队及宫胁支队，仍留置于枝江、宜都及其西南石门以北地区，阻扰中国第十八、第六十六、第七十九军等部南援常德。军事委员会为歼灭日军于常德附近地区，令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以常德为核心竭力抵抗日军进攻；另调集第六战区主力及第九战区一部，以第十八军为第二线兵团，于沅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三方面采取包围攻击。并令第九、第五战区对驻岳阳及其以东、荆门、大洪山地区及怀宁等地区日军加紧攻击，以策应常德决战。

△　日军冲到常德附近的岩垭后，岩垭阵地失陷。团长柴意新立

率预备队一连反攻，军炮兵团团长金定洲复指挥炮兵支援，晚9时，岩垭夺回，毙敌400余。

△　冀鲁豫区八路军一部截击由豫东考城北开的伪军600余人，生俘其全部，缴获步枪400余支，及满载粮食、军用品之大车69辆。

△　太岳区八路军粉碎日军“铁滚式”的新战法和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

△　苏南新四军围攻溧水南漆桥日伪军据点，次日全歼守敌200余名，生俘伪第三师副师长陈炎生。

△　日机八架袭湖南益阳，在市区狂炸，民房被毁者甚多。同日，日机九架轰炸宁乡县城，烧毁房20余栋，死伤军民30余人。

11月23日　　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蒋介石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代号为“六分仪”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同日，美、英、中军事首长在开罗举行联合参谋会议，讨论缅甸作战问题。

△　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代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　蒋介石电令：第五十七师应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第六十三师应即攻击桃源方面之敌；第七十四军应以主力转移左外翼，继续攻击当面之敌；第九战区应加强策应作战，并注意湖防。同日，军令部令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二师及第一五〇师除各以一部坚守太阳山、太俘山两据点外，该两师主力应南向河洑、黄土山间攻击敌之侧背，其第一一六师应位置于三阳港附近与第六十三师夹击玉皇殿、陆家庙附近之敌。令第七十九军排除万难，于石门以西强渡澧水，进至慈利东南地区。

△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为攻占常德，作如下部署：第一一六师团从北方及西方全力攻击。第三师团以一个联队基干从南方进

行攻击（军直辖）。第六十八师团以一个大队基干从东方进行攻击（军直辖）。攻击常德的起始时间预定在25日夜（细则待以后命令）。是日夜，日军第三师团长山本三男命令步兵第六联队主力参加攻击常德的作战，主要部署如下：由于常德守军（以第五十七师为基干，兵力约1.3万人）顽强抵抗，第一一六师团虽然全力强攻，但无进展。着中畑部队向常德南方地区前进，与户田部队交接任务，攻击常德之守军，分进后由军直辖。

△　拂晓，日军第十三师团炮兵集中对河洑地区的守军进行射击，飞机24架低飞轰炸，并施放毒气，同时出动密集部队猛扑。守军第五十七师第一七一团阮志芳营长率部冲出防线，实施逆袭，大部战死，仅剩下20余人，转移到黑家垱、南湖铺之线，逐次突至洛路口和长安桥附近。上午，西路河洑的日军700余在甲街市渡过沅江进到东岸的蔡码头。东路德山日军1000余人亦渡过沅江窜到乌峰岭。二路日军合流后同犯南站，常德城处在四面包围之中。日机20余架更番轰炸，储备仓库被焚烧。余程万师长偕同代参谋长皮宣猷指挥所部救火，击落日机一架。入夜，城郊日军增至万余人，炮30门，和守军在岩垭、指路碑、护国障、新堤、七星桥、沙港、羊铺市、白马庙、长安桥，迄洛路口的主阵地带，彻夜血战。

11月24日　晨，蒋介石命王宠惠访艾登，12时宴马歇尔，下午2时半遣商震等出席军事幕僚长联席会议，晚应丘吉尔首相晚宴。

△　蒋介石电令孙连仲、薛岳：无论常德状况如何变化，决以第六、第九两战区协力包围敌人于沅江畔而歼灭之；第九战区第十、第九十九军主力，暂五十四师归李玉堂副总司令指挥，速进攻洞庭湖南岸亘沅江右岸之敌。重点指向德山方面，支援常德第五十七师之作战；第六战区第七十四、第一〇〇军以一部扫荡桃源之敌，以主力进出陬市，攻击犯常德敌之右侧背；第十八军及第一八五师以一部扫荡子良坪、仁和坪一带残敌，另一部进出公安、津市、澧县，遮断敌后方，以主力渡过澧水向羊毛滩、临澧方向，求敌侧背而攻击之；第四

十四军应仍在太浮山、太阳山一带攻袭犯常德敌之后方；第七十三军速夺回慈利。中美空军继续轰炸洞庭湖内敌船，并控制常德制空。

△　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电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称：职师四面受敌，血战七昼夜，虽伤亡惨重，将所有杂兵均编入战斗，士气旺盛，咸抱决心愿与常德城共存亡。晚，第五十七师接第六战区代长官孙连仲电示："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发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努力战斗为要。"

△　日军第三、第一一六师团向常德全线猛攻，飞机16架狂炸，敌炮集中猛轰，并施放毒气，东西城郊搏斗惨烈。日军以密集部队向岩垭、指路碑阵地猛扑，遭守军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团一营抵抗。至中午，岩垭失而复得前后五次。入夜，阵地被毁，尽成焦土，旋转移到徒码头附近，继续和敌厮杀。第一六九团第三营和新堤、南坪岗、七星桥当面的日军自晨至暮竟日血战。敌由东、西、北三面向常德夹击，南坪岗阵地全毁，移守到七星桥。第一七〇团正面，沙港、羊铺市、白马庙、长安桥、洛路口争夺亦烈，团长孙进贤在长安桥指挥，敌以炮火和毒气掩护，配合向长安桥、洛路口猛冲，洛路口阵地全毁，守军伤亡殆尽，该地被日军占领。

△　湘北第六战区一部克复汉寿及石门县城。

△　中国空军轰炸湘西日军，击沉敌供应船多艘。

△　山东滨海沭河西岸赵家岭伪军50余人，携全付武装向当地八路军投诚。

△　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划河北省霸县、永清、安次、固安四县为第一直辖行政区，作为"剿共"的重点地区。

△　周佛海发表声明，宣称于12月1日起在苏淮特别区内，中储券和联银券并列行使，兑换比率为100元比18元。一切公用款项，均以

中储券收付。

11月25日　　蒋介石会晤丘吉尔首相、蒙巴顿，再商南、北缅水陆夹击方案；并晤罗斯福总统长谈，内容为国共合作及中缅战场作战计划等。

△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润昌为第八军副军长。

△　中国代表邹秉文在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上提出，中国农业复兴需要农业技术人员及棉籽、饲养之家畜、化学肥料、农业机具等，要求美国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棉籽6000吨、家畜17万多头、化肥100万吨、小型牵引机5000辆。

△　由桃源东窜及陬市南渡之日军第三师团进至常德南站。一部500余人钻入城中沅庆街附近，和第五十七师第一七一团第三营巷战通宵。师长余程万率部拦截，经白刃肉搏，歼敌大部，击落日机一架、缴获机枪九挺、步枪27支。

△　第七十七军吉星文第三十七师一部围攻湖北当阳，激战竟日，先后突入西关、祖师庙包围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及东关日空军指挥所，毙敌大佐以下150余人，并焚其仓库数所。第三十七师伤营长以下60余人。旋，敌500余人驰援反攻，第三十七师移至当阳城郊续战，另一部袭敌机场，焚毁日机一架。同日，第一七九师一度突入慈化寺、三星寺。

△　中国空军第四、第十一大队和美第十四航空队于7时至15时，先后出动飞机22架次，于常德外围扫射日军的增援部队。日第三师团第六联队长中畑护一大佐被炸死。并击沉江河水面敌汽艇五艘、木船40余艘，毙伤大量敌军。

△　拂晓，日军第三、第一一六师团陆续增至万余，在30门大炮、20架飞机掩护下，全线猛扑常德城垣东、西、北三门的附近地

区，往复搏斗极烈。三里港、七星桥南侧北门外附近地区拉锯搏杀往复冲锋八次。第五十七师代副师长陈嘘云亲临督战，迭挫敌之冲锋。驻守西门外的第一七〇团在船码头、兴隆桥、渔父中学附近地区战斗，敌冲锋10余次，均被击退。守军各种炮弹用完，迄至黄昏敌又反攻，守军沉着应战，阵地工事全毁，在工事外抵抗，第一六九、第一七〇团官兵争先赴难，营长郭嘉章、酆鸿钧牺牲。下午11时，敌乘机迫近城垣。余程万令各部队于26日晨2时前调整部署如下：第一六九团（欠第三营二个连）为东门城垣守备队；第一七一团为北门迄大西门间城垣守备队；第一七〇团为上下南门城垣守备队；迫击炮营、工兵营、示范队担任城内街巷堡垒的占领。

△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联合轰炸日军在台湾的新竹机场，毁日机47架。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地价申报条例》，凡16条，即日施行。原《非常时期地价申报条例》同日作废。

△　日军严令浙江钱塘江大桥停止通行，开始修筑江底铁路，同时赶修金华至武义的铁路，妄想久踞浙江。

△　伪军古鼎新部及潘尚炎部配合日军，由湖北天门增援湘、鄂前线。新四军闻讯将其包围全部击溃，毙俘敌200人左右。27日，日伪600余人由平汉线王家店出动进犯安陆、应城之大鹤山，当即被新四军击溃，敌伤亡50余人。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三课（谋略）课长辻政信大佐，奉命携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萧叔宣，往浙江奉化为蒋介石之母扫墓。辻政信对当地民众发表讲话，对蒋介石表示友好和善意之情。

11月26日　　蒋介石上午召集中美空运会议，下午向罗斯福总统话别，并谈及10亿美元借款案、90个师装备案及藏、蒙问题。至此，

开罗会议结束。次日，蒋介石在开罗接见北非联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上将。晚，偕宋美龄一行启程返国。

△　第六战区转移攻势，部署如下：第二十九集团军之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二、第一五〇师仍各留一部于太阳山、太浮山，主力应南向攻袭常德敌之侧背，第一六一师暂移于麦家河附近控置；王耀武指挥第七十四军及第一〇〇军，应以一部扫荡桃源之敌，主力进取陬市、河洑，攻击犯常德敌之右侧背，并先各以三四百人编成数支队，向常德附近挺进，以直接支援常德守军作战，第五十七师仍固守常德；第七十三军以全力迅速攻占慈利后，续向羊毛滩方向挺进。第十集团军之第七十九军应向羊毛滩、石板滩间地区挺进，在敌侧背攻击；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应以主力攻占石门而确保之，一部向临澧之敌攻袭，该军主力应继续扫荡子良坪、仁和坪一带残敌；第十八军应向津、澧、公安间进出，确实遮断敌之后方，依情况将主力转移于澧县方面。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十集团军之作战地境为慈利之黄家铺、寒渡桥、黄莲洞、白鹤山、青云桥、排头岗、北家山、石板滩线。当日，第七十九军已排除万难，渡越澧水，攻占明月山、菖蒲垭、五通市、羊毛滩、潘家铺各地要点。第七十三军亦收复慈利，予敌莫大威胁。

△　晚8时，薛岳电李玉堂、方先觉、朱岳，令第一九七师、暂五十四师必须夹歼向押东铺窜扰之敌，尔后进攻沧港、牛鼻滩，以确保汉寿。并谓常德危急，兄部必须于27日夜一二点急向德山猛进、解围，并以朱岳师经麻石桥、牛鹿滩急进。

△　方先觉第十军全部到达常德以南地区，开始与敌激战。该军第一九〇师经薛家铺、石门桥取苏家渡；第三师经赵家桥、八斗湾扑德山。预备第十师经兴隆街、下坡山、放羊坪取斗姆镇。

△　第五十七师参战人员由18日的8315名，至是日仅剩下战斗官兵500余名，弹药消耗已过大半。余程万下令：自即刻起，所有排、

连、营长均不得变更位置。一面又将师直属部队和输送兵编入战斗，一面由军炮兵团抽出300余名加入步兵战斗。并亲自出巡城防，动员官兵不分昼夜建筑坚固防线。

△　拂晓，常德东门外的日军增至7000余人，附炮40余门，向城内猛冲，第五十七师柴意新团长率部反复冲杀，下午五六时，敌复增援，施放毒气，柴团伤亡惨重，阵地已濒不保，幸得第一营副营长董庆霞和机枪连连长宋汝谦率部出敌不意冲杀，敌溃退，阵地稳定，董副营长、宋连长力战牺牲。同时，集结到常德西北城角外边的日军7000余人，炮40余门向城外猛轰，并抽调400余人扑向大西门，第一七一团第九连与其进行决死战斗，下午2时，敌再次发动攻击，一部500余人折向渔父中学附近向守军侧击，碉堡被毁。守军一个连除一人外全部战死。

△　进攻常德北门之日军以炮20余门频向城内贾家巷一带猛轰，并施放毒气13次，掩护步兵500余人用火牛阵冲锋，守军阵地被毁，一个排战死。

△　日机20余架更番轰炸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司令部——中央银行，被击落一架。中国空军出战，轰炸城垣四周的日军。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五分区一部攻克河北磁县日军据点马头镇。

△　行政院公布《战时医疗药品管理规则》，凡八条。

△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展览会在延安开幕，185位劳动英雄、三万余名群众参加。朱德、林伯渠等发表演说，称：一年来边区开荒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延安机关生产20亿元。军民做到丰衣足食。

△　重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欢迎基督教前锋队总编辑兼世界基督

教协会主席包森，并讨论战后世界和平问题。

△　皖中江浦苦工队260余人在江中英勇暴动，杀死日军六名，获步枪34支，安全到达含山、和县地区，参加新四军。

11月27日　拂晓，日机11架向常德城内猛炸，日军展开炮击。8时，日第三、第一一六师团全线猛扑，东门外的日军向城内猛扑三次，第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率部将敌击退。北门外的日军窜到正街，400余日军向守军阵地猛扑，第一七一团第一营营长吴鸿宾和第三连连长马宝珍率部击退日军四次冲锋，第一七一团团长杜鼎率部击退敌人第五次冲锋。大、小西门亦有恶战，日军借炮火、毒气掩护向守军反复冲杀，大西门、西南城角争夺激烈，守军从侧翼截击，敌势顿挫。北门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黑濑平一第一三三联队500余人转向大西门，血战迄至晚上10时，日军前后放毒、猛扑十余次，均被第一七一团和第七十四军炮兵团合力击溃。南门外的日军400余人三次用木梯爬城，均未获逞。

△　薛岳电告余程万：望死守成功。孙连仲以第五十七师迭挫敌锋大胜，奖洋10万元。余程万传令第五十七师的将士，坚守待援。

△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以常德守军坚强抵抗，下令用火烧毁城内房屋。

△　日军华中前线电讯谓：常德城内“敌人（指第五十七师）之抵抗极为顽强，欲为阻止我军（指日军）之夜袭，无片刻之休息，继续炮击。敌人依据铁丝网誓死抵抗，城壁到处都有手榴弹掷下，高八公尺之城壁，构成一大要塞。我军曾以飞机猛烈轰炸，然城中之敌始终顽强抵抗”。

△　八路军鲁中军区一部攻入安邱西南鼠山伪军据点，毙、俘伪军近百名。

11月28日　　蒋介石电令薛岳、孙连仲、方先觉、王耀武、王本甲，谓：常德如失陷，应由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九军负完全责任。29日晚，薛岳电李玉堂、方先觉谓：兹再限第十军30日晨确实攻占德山，以解常德之围，如再违误，常德失陷，应归该军负责。同日，又电转李玉堂兵团及第十军，令李兵团从速解常德围，将第十军主力保持重点于左翼，向德山及其以西地区突进，对于石门桥以东、以北、滨湖之敌，应另以一部攻击之。

△　薛岳在湘北前线接见记者谓：常德守将余程万师长及其所部全体官兵以寡敌众，以血肉之躯，阻挡敌陆空及化学兵器之连环猛攻，苦战已历八昼夜，尚能确保名城，达成任务，此实为发扬我祖宗五千年来民族传统精神之崇高表现，本人闻之，引为无上光荣。并感觉无限快慰。

△　至是日第五十七师坚守常德城11天，各级指挥官伤亡已达595人，杂兵编入战斗，亦相继牺牲将尽，重武器被敌击毁90％，余众非伤即病，形势极为恶劣。是日，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电呈蒋介石：“职师孤军血战11昼夜，官兵伤亡殆尽，人少弹罄，立恳驰援。”

△　日军久攻常德未下，天皇大怒，诏令第三师团主力于两天内进占常德。山本三勇师团长集合官兵及谍报人员训话，涕泪交流，下令猛攻常德。是日拂晓，常德周围的第三师团的炮火开始向城内攻击，日机20余架随之轰炸、火攻，施放毒气，导以步、骑兵全面猛攻。东门外的日军600余人，借炮火的掩护，逐次钻进城和第一六九团激战，守军大部战死，日军乘隙窜到海月庵附近，第一六九团副团长高子日率40余人将突入之敌歼灭。敌改由40门大炮猛轰，阵地被轰平，守军战死。敌拥进到东门，一股六七百人沿着南墙城外河街窜到水星楼底下，一股四五百人在东门再分若干小股，由居民房废墟砖瓦堆里四处乱窜。第五十七师代参谋长皮宣猷指挥示范队封锁城东南角。余程万师长指挥第一六九团士兵，利用民房墙壁分点坚守。北门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三三联队700余人在炮火、毒气掩护下向守军

逼近，第一七一团第一营营长吴鸿宾率部和敌肉搏七八次，剩下士兵不足一班。敌又反攻，团长杜鼎率机枪连连长张凤奎与敌肉搏，守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天主堂、玛瑙巷和体育场。小西门的日军300余人和北门的日军黑濑部队同时猛扑，被守军所击退。大西门日军大炮10多门，拂晓即向小西门正面和大南门城角连续轰击，继而飞机导以步、骑兵千余密集猛扑。营长张照普、何鲁佩率部抵抗，坚守阵地。南门的日军400余人下午又向守军猛扑，第一七〇团副团长冯继异督部死守，双方死伤均重。

△　八路军山东滨海第二分区一部包围海州西北的石文港伪军据点，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的影响下，伪军150余人反正抗日。

△　太行八路军一部攻克陵川的附城县镇，直逼陵川城郊，毙、伤、俘日伪军100余人。

△　日本大本营将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天野正一召回东京，向他说明整个战局情况，并传达大本营对于在中国进行积极作战，尤其是实行打通大陆作战的意图。

△　军事委员会训令：为联合英美反攻缅甸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应以英美由印发动攻势，同时先行攻占腾冲、龙陵整备态势，而后向密支那、八莫、腊戍、景东之线进击，保持主力于滇缅公路方面，与印度盟军协力歼灭缅北之敌，会师曼德勒。作战准备须于明年2月底以前完成。

△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历时八天，是日闭幕。决议改组机构，设建军、建政、文化运动委员会。大会发表宣言，宣誓台湾归回祖国的决心，战后要建立民主的台湾地方政府。

△　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重要会议，至12月1日结束。会议决定从东、西、南三面摧毁德寇，保证战后持久和平，并商议建立联合国的构想。斯大林在这

次会上表示：一旦打垮德国法西斯后，只要给苏联一定时间，苏联将立即参加对日作战。

11月29日　　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电蒋介石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称：第五十七师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七十四军万岁！

△　蒋介石电示孙连仲，令第七十九军以两个团于明日下午4时前，进入常德城，限第十军于明日拂晓攻击常德东南之敌，并令第六十三师以六个连星夜驰入常德解救第五十七师。

△　薛岳电李玉堂、方先觉，谓：敌与第六战区作战将一月，无论如何利害，已成强弩之末；我军援救常德，生不能救，死不能雪耻，将何以对先烈！本长官决心剩一兵一卒，誓歼此敌，望传令将士，坚决苦斗！

△　下午5时许，薛岳电方先觉，常德危殆，已到最后阶段，立令周（庆祥）、孙（明瑾）师限30日午夜确占德山，一部到常德城南面，支援友军，勿违误！夜11时许，薛岳再电方先觉，谓：常德巷战已到最后关头，着该军已占德山部队立派一团，带粮、弹，迅到常德城西南面，支援守军及入城协助。

△　拂晓，日军在常德东门外舞花洞、坐桡后街、箭道街、局北街、三板桥、罗祖庙与第一六九团展开激烈的巷战。副团长高子日指挥两个排新编的杂兵战斗，日机20余架又在城区上空轮流轰炸、扫射，晚11时，东门碉堡工事被敌炮击毁，守军全部战死。

△　晨，日军对常德城轰炸、炮击、放毒、火攻，城区大火蔽天，街巷民房碉堡工事俱毁，第五十七师残余官兵几无立足之地，凭城西南角与敌厮杀。

△　拂晓，第十军周庆祥第三师向德山奇袭，日军第三师团一部500人仓皇应战，反复争夺十数次，敌受创不支渡江北溃。下午6时，克复德山。未几，敌急由苏家渡、二里港增援800人反攻，激战五小时，不逞，即在外围筑堡固守。苏家渡双方激战，朱岳第一九〇师旋以主力经鹿角坪，绕扑石门桥以南七姑庙、姚家冲一带。敌分路迎袭，复由石门桥增援千余名反扑。该地区丘陵起伏，森林稠密，黑夜搏斗，难辨敌我，遂成混战状态。朱岳师被敌阻遏，未获进展。孙明瑾预十师于益家冲东西线与敌争夺激烈，陈团长受伤，杜副团长战死。

△　薛岳电令嘉奖第五十七师和第三师，谓：余程万师血战保常德，周庆祥师血战克德山，忠勇表天地。特奖余程万师20万元，周庆祥师10万元。

△　第一〇〇军军长施中诚致电蒋介石报告战况：本军赵锡田师一团已开始向桃源之敌猛攻，申刻突破三里阪、烈女观、金龙庙、刷尧桥坪线上敌阵地，一部攻抵南门口，我便衣队已入城中，敌正向城西小河北岸退窜中。

△　第六战区各部继续向日军攻击。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一度突入石门城内，与敌白刃拼杀，歼敌甚众。第七十七军第三十师一部攻占宜都。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与敌争夺漆家河，失而复得四五次。第五十八师续攻黄石市，血战至30日晨，占领该市。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迫河洑北高地与敌争夺。

△　八路军鲁中军区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在新泰东土门伏击日军，毙敌80余名。同日，另一部进袭蒙阴东北朱庄，毙、伤、俘伪军60余名。

△　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一部，今昨两日先后攻克诸城东南之万家庄、石坡头伪军据点，生俘伪军100余人。

△　苏中新四军一部在南通石港附近击毙日军山本大队长，毙伤日伪军30余名。

△　蒋介石在卡拉奇召见远征军空军李大队长，询问空军训练状况。当夜与蒙巴顿将军同赴蓝溪。次日，对中国驻印军万余人讲话。夜，启程回渝。

△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全体劳动英雄。毛泽东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使“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提出把群众组织在变工队、合作社里头，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　中共中央举行晚会欢迎途经延安返榆林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和由太行区来延安之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邢肇棠，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邓宝珊讲话称：深为边区没有闲人闲地、民生飞速进步、教育改造二流子三事所感动。

△　中国印度灾情筹赈会捐募的第二批赈款印币50万盾，是日由重庆汇到印度。

△　西康省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成立，电全国慰劳总会，急转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暨全体将士慰劳。

11月30日　　晨，日军飞机轰炸常德中央银行第五十七师师部，并投掷燃烧弹。日军步兵从东、北、西门分别向大、小高山巷、局北街、中山南路、体育场推进。各处守军士兵全部英勇战死在自己的散兵作战位置上。入夜，日军继续火攻常德城核心地区。火海一片，映红了茫茫苍穹。

△　湘北德山、常德车站战斗，第十军方先觉率第三师周祥庆、第一九〇师朱岳、预十师孙明瑾与日军第三、第六十八师团作战。第

十军为支援常德会战，奋勇攻占德山、常德车站。

△　史迪威将中国驻印军派出一部，由利多出发沿途掩护修筑利多公路。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自新背洋向太洛、于邦线推进，先后占领拉家苏、新背洋、宁边等地。此际敌我双方对垒之兵力，中国为新三十八、新三十二师与第三十师之第六十六团及战车队一营；英国为第十五军团；美军有突击志愿队3000人；日军则以第十八师团驻缅北，第十五、三十一、三十三师团驻缅中，第二、五十四、五十五师团驻缅西南。中国之新三十八师一部进至于邦附近时，日军抵抗甚力，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营一度被围经月。12月底，新三十八师渡大奈河、萨老铺河，进至敌后作战，克复于邦，造成缅北第一次大捷。是役新三十八师战死官兵300余人，伤400余人。

△　中美空军混合团开始作战，至年底共出动飞机215次，击落日机41架，炸沉日舰艇五艘。

△　日军侵占云南腾冲界头后，筹设维持会，派警察四出监视人民活动，勒令各乡保长运送粮食供其食用，并且召开民众代表大会，大量散发传单、画报。广大民众自动罢市，不以物资供给日军。

△　八路军鲁南军区一部配合乡东独立营急袭邹县附近日伪军据点将军营，毙、伤、俘敌200余人。

△　国民政府任命美国人李度出长海关总税务司，丁贵堂副之。财政部为增加战时税源，在新疆迪化设立海关分关，丁贵堂赴迪化筹设。

△　山东临沭农民周绍周兄弟二人，自动将他家在清宣统年间埋藏迄今已几十年的两箱子弹163排，献给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三分区部队。

11月下旬　　国民政府拟定《中美战时及战后经济合作方案草

案》，提出对美国所需农矿产品尽量供应。战后特别注重利用美国财力、物力、人力。对美国所需物品，当增多输出换取外汇。计划战后向美国借款40亿美元，并欢迎美国在华合股经营工商业。

△　全国慰劳总会代表全国同胞电慰余程万师长及全体将士，谓："本会除发动湘北各地民众积极慰劳外，谨代表全国同胞特申敬意，至希察照。天寒岁暮，为国加珍，续企捷音，不尽万一。"

△　晋察冀八路军一部在易县阜平山区和滹沱河一带，与日伪军战斗60余次，毙伤日伪军350余人，俘伪军190人。

是月　中共中央军委调整八路军晋绥军区领导：第一二〇师兼晋绥军区机关，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林枫任政委。

△　川北各地展开学生从军运动。兵役署长程泽润谈，对服役学生将予以特殊训练，使服务机械化部队，从事军事技术或充翻译。生活待遇尽量使其合理化，并设法酌予优待。

△　西南联大教授会决议，该校本年度四年级学生下学期起全部征调战地服务，以服务成绩为下学期学业成绩。服务地区以云南、缅甸、印度各战地为限，工作性质大部为随军翻译。

△　桂林保育院3000儿童因吃不饱、穿不暖，没书读，有病没药吃，还常遭毒打、罚跪罚站，甚至开除，给报社写信，呼吁当局和有关方面："可怜可怜我们吧！""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看看表面上所看不出的痛苦。"

△　日军在湖北荆门附近强征壮丁100余，开往武汉。

△　4月至是月，日本投资1.93亿元开发华北之石炭、铅、化学产品和铁等工矿业。

12月

12月1日　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签署的《开罗会议共同宣言》（简称《开罗宣言》），在德黑兰会议上征得了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同意，是日，在重庆、伦敦、华盛顿同时公开发表。《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使朝鲜自由独立。《开罗宣言》表示，三大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王宠惠一行返抵重庆。

△　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德黑兰会议结束，同时发表《德黑兰宣言》和《关于伊朗的宣言》。

△　蒋介石电孙连仲转第五十七师，谓：“此次守卫常德，与苏联斯大林格勒之保卫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各关系援军即到，务必苦撑到胜利为盼。”

△　上午9时许，薛岳电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谓：“常德巷战危急，该师无论如何牺牲，立占德山，立派一团速到常德城西南岸，支援守军及入城协助”。上午10时许，薛岳电方先觉、周庆祥，谓：“常德巷战万急，着周师立派敢死队1000名限下午5时左右冲至常德城西南岸，支持守军及入城协助，决重赏！”下午3时许，薛岳电令方先觉立率朱岳、孙明瑾两师“击破石门桥、放羊坪附近之敌，急到苏家渡、三里港作战”。下午5时许，薛岳电朱岳迅速击溃薛家铺、石门桥间地区之敌，进占苏家渡，协力周庆祥师作战。

△　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派代副师长陈嘘云率参谋一人、谍报

员六人，乘夜秘密前往常德城外长岭岗和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一团联络；同时派便衣偷渡南岸前往德山同第十军第三师联络。

△　拂晓，日军第十三、第一一六师团一部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由四面向常德中央银行第五十七师司令部进扑，20余门大炮对着民房猛轰，团长柴意新、孙进贤率余部向敌反击六次。常德城东、南、北三面均受敌人炮击、火烧，阵地俱毁，只有兴街口经中山西路和大西门这一片的城区归守军掌握。下午2时，日机盲目狂炸，被击落一架。下午4时，日军用平射炮推进到各巷口，步、骑兵猛扑，下南门警察局、关庙后街北端、法院正街、小西门内的碉堡和守军均同归于尽。敌占领下南门向兴街口中央银行第五十七师司令部猛扑，守军凭仅有的残破碉堡工事和民房据点同日军搏斗。日军彻夜放毒气。

△　晨，日军第三师团集步、炮兵千余人，二度反扑德山，并大放毒气助战。第十军第三师沉着固守，敌屡冲不逞。师长周庆祥根据薛岳的电令，以第九团（附第八团一营）固守德山，第七团急冲常德西南岸，支援第五十七师，相继入城助战。入暮，第七团钻隙夜行，突进常德汽车南站，准备渡江北上，遭敌急围猛袭，浴血奋战，伤亡过半，众寡悬殊，冲杀竟夜，仍未解围。

△　第十军左翼预十师进至益家冲，当面日军增至4000人，以飞机、大炮猛轰，继驱步兵全线猛扑，未几，敌主力直逼师战斗指挥所，师长孙明瑾率部冒弹雨冲杀，身中四弹，午后3时，于益家冲附近殉职，参谋主任陈飞龙亦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受伤，参谋长何竹本受重伤阵亡。卒伍失去统帅后，仍各自苦战入暮，移据齐公咀，战况稍缓，全师仅存600余人。

△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如此。

△　八路军太行军区一部攻克河南辉县白土岗据点，全歼伪军一个连。

△　伪浙东税警团第三营第八连62人击毙连、排长后，携带武器投诚新四军。

△　日机五架由浙江飞往福建建瓯投弹。2日，日机40架分三批窜江西吉安、遂川，仓皇投弹。同日，日机20架分两批窜粤北南雄，在郊外投弹。

△　上海市第三期“清乡”开始。“清乡”地区为川沙、浦南、浦北三县区域。成立第三期“清乡”指挥部，杜益谦为指挥官，姜西园为副指挥官，修筑封锁线长56公里。

△　日本海军省任命近藤信竹海军大将为中国海日本舰队总司令。

△　伪满决定实行第三次战时增税。同日，发布《矫正辅导院令》。

12月2日　拂晓，进攻常德日第十三、第一一六师团陆续增加，轰炸、毒攻，兴街口北头的守军被烟火熏死。日军在废墟上继续推进，距第五十七师师部门口约80米，营长孔溢虞率余部40多人同敌肉搏，全部战死。守卫在北门和文庙相接防地的第一六九团第一营营长杨维钧率10余名士兵实施反袭，全部战死。大西门的守军在日机火炮轰炸下也大部战死。保卫兴街口的第一六九团第三营从南到北，把守师司令部面前一端街道，敌猛攻师部后墙，双方相距几十米。此时，常德仅存五座完整房子，日军仍集中炮火射击。下午4时，大西门守军炮兵团长金定洲率余部30余人，向中山西路北侧杨家牌坊的日军作逆袭，给敌以杀伤，金团长负伤，其余全部战死。大西门乃由杜鼎团长固守。下午7时，师部无线电对外联络中断，师长余程万以下40人被敌200人包围，第一七〇团团长孙进贤率官兵20余人在街上与敌砍

杀，余程万守卫师部门口的机枪阵地，所部20余人在师部门前战死。晚，余程万令孙进贤团长守卫师部大门，自己率余部与敌进行巷战。

△　第五十七师守常德，从11月18日外围战开始，至是日，鏖战15昼夜，敌空炸、炮击、毒攻、火烧，屹不为动。枪不继，代以梭标、石头、徒手血肉搏；人马少，增以伙伕、马伕、卫生队、政工人员及城内警察一部。弹尽粮绝、碉堡毁、房屋烧、城墙破，常德夷为焦土。全师及配属部队共计8529人，仅存者321人。此役共伤、毙敌一万以上，虏获机枪50余挺、步枪370余支。

△　上午9时许，薛岳电余程万："我大军正力歼外围之敌，望兄等坚忍沉着，必死则必胜，岳救兄急于自救也。"上午11时许，薛岳电令周庆祥："兄与程万协力作战，望就近协定，应机而行，以求力保常德、德山两战略据点，则战局全胜。"

△　日军第三师团反攻德山。周庆祥师官兵坚守德山，死伤三分之一，处在兵单力薄、孤立无援、弹粮不继境地。半夜以后，日第三师团与第六十八师团清水旅团之一部（泽多大队）相配合，又对据守德山附近阵地的第三师1500人发起强攻。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七个大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8500余人。是日，东江纵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及领导人就职通电，宣布接受中共中央领导。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一分区一部在堂邑地区攻克伪军据点黄新庄，俘伪军35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

△　豫北八路军一部攻克淇县、辉县间白坡岗据点，歼伪军一个连。

△　韩国外交部长赵素昂在重庆发表声明，感谢开罗会议保证朝鲜独立。

△　台湾总督府设地下资源开发本部。

12月3日　蒋介石电令孙连仲、薛岳：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依既定计划围攻敌人。第九战区速肃清沅江南岸之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进出沅江北岸，策应第六战区之作战。第六战区之第七十四、一〇〇、七十九军应以必要一部肃清各当面之敌，以主力围攻常德附近之敌。以上各军暂由王耀武副总司令指挥。第十八军应继续南下截击敌人。

△　第五十七师突围转入常德城郊，常德失陷。晨2时许，余程万令第一七〇团团长孙进贤将防守南墙的士兵渡河在鲁家河集中，向德山一带策应迎接友军。又令第一七一团团长杜鼎率该团和炮兵团及师直属部队由南墙渡过沅江，绕到河洑附近迎接友军，并在南岸与孙团取得联系，互相策应。过江的部队和敌人遭遇，发生激战，孙团长负伤。余程万又决定以第一六九团余部附第一七一团的一部由柴意新团长统一指挥，留置城内，牵制敌人。渡江部队到南岸后，即迂回江边，在公路、沅江之间钻隙南进，到达鲁家河时只有240人，无武器者占三分之一。余程万即令孙、杜两团余部各编成一连，向李家湖前进，在长堤遇到敌人2000余，经过激战，第五十七师余部又死伤过半，仅存108人。下午4时，向罗家岗开拔，入夜到达。留城牵制敌人的柴意新团长守卫兴街口上一个堡垒，后遭敌炮击，碉堡被毁，柴团长率余部向敌猛冲，中弹殉国，高子日副团长以下仅余的一排人，分为数股继续牵制敌人。晨，日军陷常德，进城日军约1.5万人。

△　全国慰劳总会会长孔祥熙在重庆发表谈话，谓：最近的常德一役，第五十七师余程万师长率领全体官兵于敌人四面围攻之中，血战10余昼夜，不但予中国人民以无限的兴奋，亦为盟国人士所关切。本会亦定日内推派代表携带慰劳金驰往前线慰劳。

△　英伦敦《新闻纪事报》电称：“华军第五十七师保卫常德的事迹是战史上的一个最光荣、最惊险的插曲。”

△　日军占领常德后，急调2000余人渡江南扑，又由赵家桥、斗姆镇第一一六、第十三师团增调部队共8000余人合攻德山，与第十军激战竟日。

△　上午11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第十一军发表“完全占领常德”的电报。总参谋长松井根据命令急忙向第十一军参谋长小园江邦雄拍电：“关于从常德返还的时机，要暂时待命。”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一课高级参谋天野归任，向派遣军总部汇报：一、大本营最近考虑并耽心美国驻华空军对海上交通的破坏日趋严重，如果现在不研究对策，就会妨碍作战。二、中央方面对美国驻华空军给予极大关注，形势剧变，开始研究摧毁中国西南部空军基地和打通纵贯大陆铁路等问题。三、要求派遣军于12月15日前，就有关打通纵贯大陆铁路作战的计划提出意见。畑俊六总司令官指示总参谋长等：“这是一件大事，要进行充分的研究”，要慎重从事。畑俊六总司令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船舶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对此不采取对策，将有妨碍作战之虞。中央方面提议打通粤汉线，联结法属印度支那铁道，以确保南方交通，要求派遣军研究打通粤汉线和打通京汉线作战，但是这必须从满洲及日本内地抽调必要的兵力。

△　财政部核准抄发花纱布管制局《奖助商人抢购棉花内运办法》，凡五条。

△　立法院政务视察团第三分团团长吴尚鹰在桂林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今年广东灾害严重，台山县饿死灾民20余万人，开平县饿死灾民10余万人。”

△　中国访英团抵伦敦。5日，英议会上下两院及政府机关分别招待该团。7日，旁听英下院辩论战后经济计划。8日，访伦敦市长。13

日，艾登接见访英团。14日至23日，游历伯明翰、利物浦等地，参观工厂、学校、团体，与各界人士晤谈。24日，返伦敦。29日，英皇接见访英团。

12月4日　军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电令作如下部署：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一师应确保桃源，其太阳山、太浮山部队，除各留一部外，太阳山其余部队即向石板滩、临澧间及鳌山、渡口一带，太浮山其部队即向临澧、澧县间及青化驿一带，破坏公路交通截击敌人。暂六师应继续先围攻常德，在桃源之施中诚军长即率第六十三师向陬市附近推进。第七十三军肃清当面之敌，即在羊毛滩附近整理待命。第一八五师攻占石门后，应速以一部向津市、澧县截击敌人。第十八军应仍渡澧水进击临澧附近；第六十六军应速将当面之敌扫荡后，向东进击，恢复原阵地。

△　下午1时许，薛岳电周庆祥，谓："兄应血战，保守德山，战局已全胜，我各路大军均已猛进歼敌。"

△　第九战区援救常德的后续兵团第五十八军，从兴隆街直攻二星岗和德山，第七十二军压迫日军在沅江南岸。同时，两个军渡江会攻常德。

△　晨，进攻德山日军第十三、第一一六师团与守军第三师厮杀愈烈，敌以枪炮疯狂轰射，又施放毒气。第九团南面阵地悉炸坏，营长周至清以下官兵阵亡。团长张惠民率杂役兵冲杀，张团长英勇殉职，所部战士亦战死。敌后续部队不断增加，守军兵单且无预备队，益感危迫，师长周庆祥急令师部传令杂役兵悉入阵，血肉搏斗。黄昏后，卒以粮弹不继，军援未至，阵地被敌突破。次晨，守军伤亡几尽，余部遂突围转战德山南，德山失陷。

△　中共太岳区党委决定派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十七、第七七二团各一部，开辟中条山西部地区。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继续就打通纵贯大陆铁路作战要领及确保常德要领等问题进行研究。午后，通过确保常德及其他有关决定。为了了解第十一军的意见，高级参谋天野由南京出发去观音寺军战斗司令部。5日，天野到达军战斗司令部，与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高级参谋武居举行会谈。第十一军的意见是：关于确保常德，纵令把第三、第十三师团按原来由军隶属留下来（当是预定这两个师即将调往南方战场），由于兵力所限及其他原因，也是缺乏信心。因此，不希望确保常德。这次暂且回原驻地，等以后再出发，希望按预定于12月11日前后开始返还原驻地。天野按总司令部原来的指定原则暂时同意第十一军的意见，同时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部。6日，天野回到南京，又向总司令部汇报同第十一军会谈的情况。于是总司令部不得不决定放弃常德，并向第十一军拍电，命令在适当时机开始从常德返还。

△　鲁中军区八路军一部向北沂蒙之日伪军发起进攻，经四天激战，收复东里店等20余处，攻克石桥等地据点，共毙、俘、伤日伪军1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1挺、步枪800多支。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义务劳动法》，凡六章29条，《国民工役法》着即废止。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石瑛在重庆病逝。

△　日机五架轰炸扫射浙江定海东怼镇，死伤28人。

12月5日　　第二十七集团军副司令欧震指挥的后续兵团第五十八、第七十二、暂二军（欠暂八师）急抵沅水两岸战场。薛岳改变部署，以鲁道源第五十八军由兴隆街、放羊坪直扑二里岗、德山；傅翼第七十二军由发旺桥、兴旺桥、道林寺以取斗姆镇、裴家码头，压敌于沅水南岸，再渡江会攻常德。两军战斗地境为长茅岗、罗家冲、张

家湾、蒋家湾、黄石港、鲁家河之线。又以古鼎华暂编第二军为总预备队，集结兴隆附近。

△　晨6时，余程万率余部由毛家渡向西北迂回，下午5时到达毛湾附近，深夜2时与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员取得联系。6日拂晓，余部向毛湾前进。

△　晚9时许，薛岳电令王耀武、施中诚、汪之斌、王甲本四军长："排除万难，不顾一切，向常德急进，共歼此敌。"晚11时许，薛岳电令欧震："此番歼敌关系最大，望立传鲁道源、傅翼、王作华诸兄，督励将士，奋勇杀敌，立功报国！"

△　驻葡萄牙公使张谦向葡总统嘉慕那呈递国书。

12月6日　第五十八军二路并进，萧本元新编第十师占赤岗碑、高家港线，侯镇邦新编第十一师占太平桥、放羊坪线，嗣即会攻詹家湾、芭茅堤、蒋家坪一带，激战二小时，压敌第三师团至八斗湾、七斗冲、二里岗、毛湾诸地。侯师又乘胜追进德山，萧师逼苏家渡；第七十二军新编第十三师挺进兴旺桥、道林寺、胜家桥。日军第十三师团进逼黄石港、沙市港、裴家码头，奋战至7时。晚，日军北渡沅水溃走。江涛新编第十五师推进枫林口、徐家坪、凤凰山附近。

△　第五战区一部克复信阳。

△　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萧华签署命令：褒奖鲁南军区和滨海军区及费西、赣榆两战役有功将士。

△　国家总动员会议奉令组织经济检查队，自是日起检查国内各公私银行仓库堆栈。当日查获四川江北县银行仓库内及该行公文柜内，藏有价值约在200万元以上之囤积货物。

△　夜，日军包围河北省平山县第四区柏叶沟，毒打威胁群众，

要其说出八路军和粮食在何处，百余群众宁死不屈遭敌惨杀。

△　陈公博和日本公使田尻分别发表谈话，宣布上海市从12月8日起，开展回收废金属运动，第一期回收铁类三万公吨、铜类500公吨，以及铅、亚铝、钨等。

12月7日　　第五十七师余程万所部占领毛湾，下午8时与第二期增援的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李团长相见，商讨反攻常德城的计划。晚12时由毛湾出发，第五十七师的百名官兵引路，由平原直线上行，深夜1时，摸到乌峰岭的山脚下，第三十二团的迫击炮对准敌机枪阵地猛轰，第五十七师余部加紧抢渡，主力直扑德山市，第三十二团续后，向岸边猛扑，全部登陆后于9日晨1时占领了德山市大街口。第五十七师余部，沿沅江北岸直袭黄木关，后冲进岩垭。

△　日军在常德战场任和坪用山炮、迫击炮向第十三师傅家庙阵地发射毒弹500余发，我军100余人中毒。

△　晋察冀八路军一部在河北省抚宁县曹西庄，与抢粮之日军展开激战，毁其坦克、汽车各二辆，毙日军十余人。

△　浙东宁波、余姚之日伪军2500余人，向四明山区“扫荡”。新四军一部予敌以猛击后，迫使日伪军于12日溃窜原防。此役毙伤日伪军190余人。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敌国人民处理条例》，凡22条及《敌产处理条例》，凡14条。

△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关中分区成立友军工作核心领导小组，由张德生、汪锋、文年生三人组成。

△　日军在河北省曲阳县贾口村“扫荡”，屠杀群众120余人，烧毁

民房800间。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日本大本营电告打通大陆作战计划（又称《大陆纵横铁道作战指导大纲》）。计划分前言、作战指导大纲方案、说明要点等。“前言”中说：“此次作战能否实行，对派遣军尔后作战意图影响至大，如果可能，请在12月12日前予以指示。”“说明要点”最后部分是：“为打通湘桂、粤汉作战，大本营希望在“ヨ”号作战结束后确保常德。研究结果确定，由于兵力及其他原因，仍按原定计划将其放弃，恢复原态势，在打通作战需要时，再从现占领地出发。”

△　罗斯福总统在开罗致电蒋介石，谓：经过同斯大林元帅会商后，我们将于明年晚春在欧洲有一大战，可望能在明年夏末结束对德战事；但因是之故，遂使吾人不能供应足量登陆艇于孟加拉湾，实行两栖作战，以支持缅甸之战略（即以降落伞部队向印道进攻，以陆军自利多路取密支那，另以四团在更的宛河畔登陆）。在如此情形之下，阁下是否仍照原定缅甸计划进行作战，或将缅甸计划延至明年11月，庶大规模之两栖作战可以实现，至于越峰运输之陆空军供应，则在集中努力之中。17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总统，谓：“所拟变更作战方案，已与史迪威将军商讨……倘登陆部队所需之舰只，不能依照原定计划集中，则依阁下之建议，将海陆全面攻势展至明年11月，较为妥适。”

12月8日　第五十八军侯镇邦新编第十一师猛袭德山，中美空军协助作战。敌十三、第一一六师团凭险顽抗，以重机枪、迫击炮阻射。侯师则以空、炮交压，助工兵先破除障碍，杀开冲锋路，步兵匍匐跃进、俟近距离掷手榴弹，敌伤亡甚重。午后，克复德山市。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第十一军的电报，内称“鉴于常德南方已无敌人的冲击，决定返还”。同时又接到大本营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电报，斥责说：“本作战对全军作战影响极大，因而不能简

单决定。而且有关如此重大作战意图，绝不可用电报形式报告。”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电告参谋本部，表示接受上述批评。

△　盘踞浙江余姚日军窜扰大岚夏家岭，烧毁房屋474间，烧毁华山黄家庄民房59户，大岚蜻蜓岗村民房18户。此后，9日、10日、15日又继续在余姚各村庄杀人、放火、奸污妇女。

△　新四军粟裕师一部猛袭苏中泰州运粮河，歼伪军四个连。次日，乘胜出击，在美堰附近，毙、伤、俘伪军400多人，缴获步枪250余支。

△　日军决定从即日起至1944年1月9日，在日本、伪满及中国其他沦陷区开展所谓“大东亚青年总蹶起运动”，以榨取青年的劳动力，消除青年中的厌战反战情绪。

△　伪满实行所谓“协和必胜飞机献纳运动”。

12月9日　蒋介石电薛岳、孙连仲，下达追击令：常德之敌已动摇退却，仰捕捉好机截击猛追，以收歼敌之效。追击间，两战区作战地域为河洑、石板滩、长岭岗、鳌山、新洲之线。两战区之追击目标，为长江沿岸之线。

△　拂晓，第五十八、第七十二军急渡沅江会攻常德。侯镇邦新编第十一师郑团分击常德东北门，别部击南门。江涛新编第十五师一部击常德西门，三面围击日军。上午10时，侯师一部突入东门，一部攀城入西街，敌竭力顽抗，炮火炽盛。江、侯部官兵激烈巷战，死伤甚重。黄昏后，侯、江部占领东南街，日军仓皇突围北逃。常德城在陷落六天后，重新为中国军队收复。

△　日军第十一军按预定计划作出决定，从11日开始返还，并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此项计划，同时下达返还的命令，即令各部首先于12日到达石门、合口、澧县附近的澧水南岸一线。

△　陈立夫在重庆约集军政部次长张定璠、政治部副部长袁守谦、三青团副书记长胡庶华、军训部处长杜心如、兵役署署长程泽润、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以及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在中训团受训之负责人，共40余人，商讨学生从军及学校军训问题。陈立夫声称：曾因军事机关或部队之需要，征集在校大学生约8000余人，为倡导学生自动从军，将由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航空委员会、青年团及教育部共同组织机构，商洽办理。

△　毛泽东在延安邀请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　甘肃省南部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率拉卜楞寺所属108寺藏族僧民向元首致敬团抵兰州。28日，赴宝鸡转重庆。翌年1月9日向国民政府献飞机30架，向蒋介石献旗、致敬。

△　国民参政员马乘风致函孔祥熙，斥责国民政府推行的烟类“统筹配销”等办法之弊病。函称：统制之害已使物价高涨民怨沸腾。今日又宣布烟类统筹配销办法。请问在今日人力财力困难条件之下凭什么办到？除了扰乱商人视听，破坏正常营运以外，连一点好的结果也没有。眼看着一群世故不通的书呆子凭空想玩花样，把商人制死，税源打断，真是痛愤万分。

△　驻哥斯达黎加公使涂允檀到达圣约塞。17日，向哥总统递交国书。27日，哥国会通过废止限制华人移民律。

△　日机13架窜扰桂林，在广西梧州投弹。次日，日机九批60多架经湘阴、长沙等地窜衡阳、零陵投弹，并与中美空军发生空战，日机一架被击落，三架负伤。

△　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议、共产党员许权中和第三十八军垦区主任任耕三（中共党员），在陕西省郿县槐芽洪水沟，被胡宗南部的特务暗杀。

12月10日　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同意互将使节升格为大使。

△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法五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　重庆欢送首批参加赴英运输团的2000运输工人赴印度。

△　侵占湖北公安石门咀日军马队100余人，在公安县三省桥杀死、烧死村民73人。

12月上旬　蒋介石令童子军总会改隶三青团。

△　苏北新四军第三师一部猛攻日军第六十四师团第四十五大队，收复遭敌蹂躏将近10个月的阜宁城。

△　英国联合援华募款运动的第四批募款15.5万英镑汇交宋美龄。宋美龄设立以王宠惠为主席的顾问委员会，负责将捐款分配到各救济慈善机关。

12月11日　日军第十一军各部开始返还。第三师团向新安、合口附近撤退，第十三师团向石门附近撤退，第一一六师团向澧县附近撤退，第六十八师团向津市附近等澧水南岸一线撤退。

12月12日　中韩文化协会举行首次讲演会，邵力子主讲《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赞成开罗会议保证朝鲜独立自由的声明。

△　中午，日军第十一军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电告，从常德开始返还。各部队都在没有受到守军大的追击情况下，有秩序地进行返还。第十三师团开始渡过澧水。下午2时45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大本营发电，告知“十一军已于昨夜（11日夜）从常德开始返还”。晚10时20分，派遣军总司令部收到了大本营发来的有关确保常德的电令（“参电第279号”），其内容如下：关于打通作战问题，经研究结果认为，将来在进行该作战时，按“总参一电第678号”宗旨确保常德附近对我方是有利的。关于该项作战目前正在研究。至于第三、第十

三师团的延期调出问题，也正予以考虑。当前务必努力确保常德附近。晚11时30分，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打电报给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总参一电第720号”）：“中央的意图如参电第279号，派遣军目前准备确保常德附近，望将贵部之现状及根据上述意图的作战指导方案火速电告。”夜里，第十一军接到上述“参电第279号”的电报。接着，又在13日凌晨3时接到“总参一电第720号”电报，实感意外。被迫命令主力停止向澧水南岸前进，同时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拍电（“吕战参电第X号”）：“军已于11日夜全面开始返还，主力正向澧水南岸，第十三师团正向王家厂前进中，接到总部来电，乃于3时下令停止前进。军主力在澧水南岸整理态势，准备下一步的攻势。”

△　日黑田部队在河北省平山县东西岗南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天内杀我同胞138人，重伤12人。

12月13日　　王耀武致徐永昌电称：此次进犯常德之敌有日军七个师团，另伪军五个师，总共为十余万人。其目的在攻占常德，威胁长沙，规模浩大，不亚于历次长沙及前次鄂西会战。第七十四军以一师固守常德，以两师与敌搏战于常德外围，敌众我寡，实力为三与一之比。自11月16日即与敌发生激战，反复冲杀，争夺之烈，实所罕见。迄30日常德城内核心阵地，已悉数被敌之机炮炸毁，我官兵虽无立足之地，惟仍淬励忠愤，与敌继续肉搏。至12月3日因弹尽援绝，始移至城郊先占据有利地形，继续与敌冲击，血肉横飞。迄6日，敌以伤亡惨重，又因后方交通线绵长，且不时遭我截击，乃开始总崩溃，迄12日残敌已全部被我肃清。

△　第七十九军第六师克复盘林桥、羊毛滩、临澧，第一八五师克复石门。

△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步銮代理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谭何易为第八十四军副军长，顾锡九任第八十九军军长，王照堃为骑兵第二军副军长，马呈祥代理骑兵第五军军长。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分区一部向河南辉县以西薄壁镇进攻，至次日晨，共歼伪军200余人。

△　日军在广东揭阳官硕血腥屠杀，杀死400多人，伤300多人，毁民房1200多间、大祠堂三座。

12月14日　　三青团中央团部在重庆举办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讲演大会，是日起分别由陈立夫、梁寒操、邵力子、黄炎培等主讲。

△　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润昌为新编第八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组成政治工作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

△　西北建设考察团在甘肃武威、张掖、玉门、敦煌及新疆迪化、哈密、伊犁及南疆各地考察后，抵达甘肃天水整理资料，编制报告。

12月15日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川、康、滇、皖、陕、浙六省，努力完成粮食征借。

△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举行会议，陈立夫报告教育设施。次日，通过决定部聘教授人选，审议学生志愿服役办法暨修正审查学术奖励作品及给奖标准等决议案23项。胡光炜、冯友兰、刘仙洲、徐悲鸿等15人被定为部聘教授。

12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朱德、林伯渠、李鼎铭等参加大会并讲话。25名劳动英雄得到特等奖。大会通过宣言，指出一年来边区作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实现了丰衣足食，明年计划做到“耕三余一”；决心“组织起来，加紧生产，保卫边区”。会议期间，毛泽东请29个县的劳动英雄到杨家岭聚餐，交谈如何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

△　国民政府令：浙江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陈屺怀因病出缺，遗缺由朱献文继任。

△　第七十二军和新编第十五师追敌至新洲。至是日，第九战区援救常德之战结束。

12月17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邵力子报告访英团在英活动情况，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曾养甫报告最近交通设施情形并通过请行政院拨款救济湖北、湖南受灾人民的决议。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地籍整理条例》，凡18条。

△　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废除限制华人入境办法》。次日，签署《麦纽逊法案》，允许中国移民每年105人入美。

12月18日　　蒋介石授权美国将军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度军队。21日，史迪威到达胡康河谷的新平洋，视察中国驻印度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

△　中国政府与古巴政府《友好条约》在哈瓦那互换批准书。

△　军事委员会任命潘左为第五十军副军长，王光汉、孙启人为第八十九军副军长，刘鉴秋为第九十二军副军长。

△　退至澧水北之日军为掩护铜山山脉日军之北渡，复纠集三四千人由王家厂、暖水街分八路向第十八军迭施反扑，俱经挫败。第十八军乘势猛击。迄20日，将津市、澧县、合口、新安、王家厂、暖水街、任和坪、枝江、洋溪相继收复。日军遗尸东溃。其由赤溪河败退之敌，经卸家坪时遭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一部伏击，伤亡尤重。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上将、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病逝。12月31日，国民政府特派李济深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　日机40多架分两批窜入云南，在蒙自附近和昆明东南投弹射击。其中一批与美军发生空战，被击落四架。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命令：第十一军自今日起，选择适当时机从澧水附近的现在战线撤离，恢复原态势。

△　日军第十一军下令各部队再度开始返还行动。21日、22日各部队分别到达松滋河右岸地区。第十一军主力在第十三师团的掩护下，经过船舶部队的协助，于23日、24日渡过扬子江，1944年1月初分别返还原驻地，常德作战结束。

△　日本中国派遣军畑俊六总司令在日记中供认：此次常德作战中国军队防备坚固，日军损失甚大，参战总兵力五万余众，而伤亡、患病达一万人。需要恢复战斗力，而且前后方补给线也只有一条，再夺回常德是很难立即做到的事。

△　丘吉尔首相驻中国战区统帅部特任军事代表魏亚特中将抵重庆。23日，在招待报界会上，谈来华任务是：传递丘吉尔首相与蒋介石之意见。答复询问是否有派盟军在中国与日军进行坦克大战之必要时称："余以为中国适宜之地势甚多，中国军队可任意择地作战。"

△　印度教授杜鲁瓦拉应中央政治学校的聘请到该校讲学，是日飞抵重庆。

12月19日　　史迪威电马歇尔，请由罗斯福总统电蒋介石，迫中国云南出兵。21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余仍信在雨季开始以前，打通中缅陆路补给线之工作仍甚重要。蒙巴顿现在集其物力，发动大规模之空战"，"望贵国云南军，作战北缅，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度之前进。"

△　日机38架，自缅甸窜入云南空军基地，炸毁机场部分跑道。日机被击落九架。

△　汪伪政府周佛海系之税警总团第二大队百余人，与陈公博系在上海之税警团发生内讧。

△　汪精卫在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施行手术，取出八年前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被南京晨光社记者枪击的背部残留子弹。

△　伪满二龙山水库动工。

12月20日　晨9时，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报告国内外战局及湘鄂战事概况，谓：就军事方面情况言，中外各战场敌我形势均已改观，尤以此次常德大捷，益使吾人倍愈兴奋。

△　苏中新四军粟裕师一部长途奔袭兴化东南之高家荡，将驻守该地之伪军独立团全部歼灭。

△　太行八路军一部在河南辉县的山怀村，歼灭伪军一个中队。

△　中外记者暨美、英、法盟邦武官一行30余人观战团抵常德。沿途所经农村均被日军焚毁，人民被杀者与妇女被奸者数以千计，常德城郊皆毁于日军魔掌。县长戴九峰对记者称：常德县城及近郊，平时居民约16万人，现已回家而经安顿者方3000人，均宿临时搭造的棚内。

△　行政院颁发《新年及春节节约办法》，禁止印寄贺年片。

△　张奚若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讲演《中国宪政问题》，抨击国民党的所谓研讨宪法草案，指出："宪政的目的是法治与民治，而尤其是民治这方面。宪政是要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奴隶'，当牛马，当作政府的'工具'来看待的。""只有空洞的宪法而没有老老实实、货真价实的宪政，那怕是十个、百个宪法都没有一点用处的！我们所要的是宪政，而不是空洞的宪法！"

12月21日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贺苏联红军建军节，称：和

平“必先摧毁东西轴心之武力”，中苏两国“必本同舟共济之精神，作呼应合作之努力”。

△　军事委员会任命高倬之为第三十四军军长。

△　重庆文化界、妇女界、律师界与上海法学院、育才学校师生及各党派人士400余人举行茶会，庆祝沈钧儒七十寿辰。董必武、郭沫若、陶行知、左舜生等出席并讲话。

△　日军退据敖家嘴、西斋、刘家厂之线，续图顽抗；中国军分途猛追，至25日，进占汇口、清水港、于家台；进抵澧县、孟溪市、彭家厂等附近，先后攻占公安、杨林市、狮子口、申津渡、茶园寺、松滋、磨盘洲、新江口、米积台、沙道观、百里洲，续向藕池、黄金口、斗湖堤、弥陀寺挺进，完全恢复会战前之态势。

△　重庆中央社报道：常德争夺战中，仅就湖南第四行政区（包括九个县300万人口）统计，受灾民众达三四十万，常德一隅损失财物达47.5亿元以上，被害、被奸、被掳之男女及儿童达万余人。另据长沙《大公报》记载：常德被杀民众约3300名，被奸妇女5080名，被掳妇女180名，因奸致死妇女180名，被掳男子约3400名，被掳儿童320名，总计1.144万余名；被毁民房约万栋，商家7000余户；连同常德附近死难民众共达5.326万人，重伤1.0754万人，轻伤18.4907万人。

△　美《纽约日报》特约记者电称：常德已经从地面上毁灭了。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留的砖瓦与积灰堆而已。城外两间西班牙修道院在中立的西班牙国旗掩护下幸而保存了。除此以外，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口六万家的城里寻一有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是难乎其难。

△　伪满公布《国民身份证法》，15岁以上人员均领身份证。

12月22日　　自11月2日至是日，常德会战历时50余天，战斗非常激烈。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公布的数字，日军伤亡官兵四万余人。中美空军以恩施、芷江、衡阳、白市驿、梁山为基地，集结各种轰炸机及驱逐机约200架，先后出动261次，使用轰炸机280架次、驱逐机1467架次，以轰炸及扫射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处日军人马、物资、仓库、码头、船只。空战中击落日机25架。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克俊为第四十九军军长，万保邦代理第六十军军长。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

△　国民政府任命杜佐周为国立英士大学校长。

△　昆明空战，盟军飞机击落日机20余架。

△　伪满拟定《村建设纲要》。

12月23日　　蒋介石电复罗斯福总统："缅战为中国生死存亡问题，如无南缅大军登陆协助，则驻滇部队入缅作战，只是自取灭亡。此种计划，予实不能同意。"

△　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彭位仁兼第七十三军军长。

△　孙连仲致电蒋介石转报常德会战中第一〇〇军第六十三师第一八八团邓团长擅自携眷自德山撤逃，将该团化整为零向黄土店西南桃花溪一带活动，致使第五十七师陷于孤军苦战之不利态势，请将该团长"先行撤职解黔江军法执行监部依法审办"。1944年2月21日，孙连仲再电蒋介石请求"议处"。

△　第六战区一部收复松滋。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撤销第一集团军，特任李长江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何廷祯为国民政府政务参赞，特派项致庄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12月24日　　蒋介石对全国伤病官兵发表广播讲演，称：决定从明年元旦起，约请各地教会的教士来对你们讲解“做人的真理”，“安慰你们的精神”，“我祷告上帝和耶稣基督，使你们能早日解除痛苦，恢复健康”。

△　军事委员会任命谢辅三为暂编第四军军长，张信成为副军长。

△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是日起在重庆沙坪坝举行党史展览三天。

△　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第一一四团及炮兵队攻击于邦日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联队的阵地，黄昏时占领于邦，为缅北反攻战开创胜利的记录。日方供认“损伤惨重”。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总结检查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确定明年工作方针。到会有政府委员林伯渠、李鼎铭、萧劲光、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柳湜、贺连城、毕光斗、霍子乐、高崇珊、白文焕等，谢觉哉、崔田夫及各厅、处、院、行负责人26名亦列席参加。

△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出动飞机袭击广州附近日军机场，炸毁跑道设备。空战中击落日机20余架，美机损失一架。

12月2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颐鼎为第七十军副军长，张言传为第八十六副军长。

△　国民政府授予宋美龄青天白日勋章。

△　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总处向国家总动员会议检送《民国三十三年度（1944）推行储蓄业务计划纲要》及《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三十三年度竞赛及核奖办法》，希望随时惠予协助俾利进行。计划纲要提出推行目标，三十三年度储蓄总额应增至130亿元。

△　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在成都报告赴各地劝导节约献金情形，谓：自11月8日至是日献金总额已达1400余万元，“各界莫不热烈响应”。

△　行政院公布《战时保险业管理办法》，凡25条。

△　中国童子军总会在重庆举行创始三十一年纪念大会，蒋介石检阅并讲话。据称全国童子军已达60万人，约4000余团。

△　第六战区一部收复公安县。

△　四川革命先烈张培爵纪念碑在重庆市炮台街沧白堂外举行奠基礼。当日，炮台街命名为沧白路，新生路命名为邹容路。

△　日本召开第八十四届议会，日皇裕仁参加并发表讲话，谓：“彼我之攻防愈急，战局非常严重”，号召臣民“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东条报告陆军战况时称：“敌人反攻日益走向大规模”，要求国人增产飞机与船舶，以挽救危局，28日再次演说，要求国人“避免磨擦”。

12月26日　　蒋介石以中央政治学校校长身份，主持该校大学部第十二期学生开学典礼并讲话，要学生“特别注重精神之修养”。

△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在《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中，披露日军在常德会战中前后共使用毒气74次，其中在常德城及其附近就有35次，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被毒32次。

△　淮南新四军地方武装胜利出击，攻入盱眙城，摧毁伪县府，俘伪官员47名。

△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兼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病逝。

12月27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高建白为第十七军副军长。

△　中印公路利多至新平洋段完工。次日，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孟关西北重镇于邦。

△　驻山西省汾阳、文水、交城、离石的日军，联合围袭三道川中庄地区，抓捕133人，全部用火烧或用石头砸死，烧房千余间。

△　日机18架窜袭韶关，在市内外投弹，市民数人伤亡。同日，日机20多架分批由粤境窜袭江西省遂川、泰和、吉安、临川等地，其中四架被击落。

12月28日　中国驻印军分两路向缅北进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纵队，向太白家、甘家之线攻击；新编第二十二师之第六十五团（加强）为右纵队，向大洛攻击。12月31日，第六十五团附工兵一营自新平洋出发，渡过大龙河，逐段开路，克服困难地形，沿途驱逐日军小部队，至翌年1月21日开始向大洛之日军攻击。

△　云南省赈济会向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呈报关于云南省旱灾惨状，称：云南130多个县中有90余县遭受旱、霜、冰雹和虫害等灾，不少地区收成仅为去年的二三成，灾民数百万。“诚为滇省百年来未有之现象”。思茅、陆良等县已发生“饿死百余人，饥民遍野，同类相食之惨况”。

△　四川烟叶示范场就各区烟叶滞销烟农破产惨状致电财政部，略称：“烟农痛苦已臻极限，有地主索租不得迫令解佃几至悬梁投井者”，“有冷釜断炊惟对烟哭泣者，有愤激铲去翌年烟苗誓不再种者”，“近日米价飞扬，百物高涨，一般烟农惶恐异常”，请求迅谋具体

解决办法。

△　伪满公布《临时邮政取缔法》。

12月29日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谈学生从军，称：此“似系一新的运动”，过去数周来约有二万名学生自动投效，其中大学生二三千人。拟在重庆、成都设立两训练团，经初步训练，而后赴印度参加远征军。据统计，中国4.5亿人民中大学生仅有6.4097万人，高中学生11.6771万人，初中学生58.6985万人。

△　国民政府免去沈鸿烈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特派端木恺代理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

△　下午3时，日军第十一军以电报的形式（“吕战参电第639号”）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常德作战的战果及损失，内容如下：一、日军第十一军全歼中国军队13个师（第七十三军所属暂编第五、第十五、第七十七师，第十军所属第三、第一九〇、预备第十师，第四十四军所属第一六一、暂编第五十四师，第一〇〇军所属第六十三、第十九师，第七十四军所属第五十七师）。击灭七个师（第七十九军所属第九十八、第一九四师、暂编第六师，第六十六军所属第一八五、第一九九师，第七十四军所属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师）、击溃四个师（第十八军所属第十一、第十八、第一六二、第十三师）。二、至12月8日止，彻底摧毁了常德附近守军的军事根据地。三、至12月8日止，已查明主要战果是打死中国军队2.9503万人（其中师长六名）、俘虏1402人，缴获各种炮151门、轻重机枪620挺、步枪5490支。日军战死1274人（其中军官116人）、负伤2977人（其中军官216人）。

△　罗斯福总统电蒋介石：“云南部队所需之大量重器材与教官，已经空运到华，予以为此项器材与教官需用之缓急，实以该部队最近使用为基准；如该部队最近不能使用，则耗费有限之运输力，交付此

类器材与教官之措施，宜加避免。”

12月30日　　国民政府令授予卫立煌青天白日勋章、刘峙一等云麾勋章、俞济时三等云麾勋章。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1943年度征实征购情形及1944年度粮政实施计划。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宪政实施协进会秘书长邵力子报告宪政工作，称：研究宪法草案办法连同告国人书一并于元旦发表。新闻检查局副局长李中襄对新颁《修正新闻禁载标准》作了说明。

△　行政院公布《整理自治财政办法》，凡八章46条。

△　国民党中央周刊社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王造时、黄炎培、陶百川等人参加并发言。王造时主张“宪政要成立，一定要想方法得到各党派及一般国民的赞同，中国最好不需要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宪政”。黄炎培提出：一方面要积极提倡宪政，一方面要积极防止不法事件、用法律严厉制裁不肖官劣。

△　新四军苏中第三分区部队今昨两天攻占古溪镇，进袭泰县运粮河镇，攻克运粮河，收复蒋垛，歼灭伪军一个营。

△　重庆欢送第二批征雇赴印度运输工人1700人。

△　重庆各界公祭在桃源战役中牺牲的第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一、特任高冠吾为江西省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九江绥靖主任，罗君强为安徽省长，张一鹏为司法行政部长，孙殿英为豫北“剿共”军总司令。二、将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改称绥靖总署，治安军改称绥靖军，所有“治安”机关二字，一律

改称“绥靖”二字。

12月31日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关于常德会战失败之检讨》中称：一个多月中我军伤亡官兵五万余人，而日军伤亡只有四万人。常德会战失败之原因在于，“高级干部仍有不坚定者”，“擅自弃守常德”，“高级指挥官之位置仍多未能遵照规定推进”，“不能把握战机适切指导作战”，“陆空联络之训练不足”。

是月　国民参政员刘明扬等在关于改进交通统制办法的提案中，批评交通部门“近年来邮电之速率大为减低，寄达之时日愈延愈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随时误期”。管制检查运输机关“太多”，“手续繁难，夹杂不清耽延时日，浪费人力物力损失之大难以估量”。交通运输管理检查人员“贪污舞弊彰彰在人耳目”，“交通技术人才非常缺乏”，“处处发生黄金走私，漏油做生意”，“司机生活奢侈荒淫意神昏眩，随时翻车出险”。

△　据统计，全国物价指数较1937年12月上涨157倍多。全国各大城市粮价猛涨，较1月份比，上涨199％者有桂林等八处，上涨200％至299％者有成都等五处，上涨300％至399％者有昆明等三处，上涨400％以上者有吉安等三处。

△　全国各地银行仓库检查结果，发现银行囤积居奇颇多。重庆市59家银行仓栈中有17家的货物手续不合，确属违法者至本月底有47件，已撤销看管发还者72件，尚在追求证件者32件，有货无主者63件，全无证件者21件。本月下旬在昆明检查中发现私仓78所。

△　各省节约建国储蓄总额已达80亿元。

△　行政院公布《兴办建设事业地区地籍整理办法》，凡五条。

△　晋察冀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击溃围攻边区的七万日伪军，毙、俘敌8000人。此次反“扫荡”战空前残

酷，群众遭日伪军杀害者7000人，房屋被焚毁5.4万间，粮食损失3000万斤。

△　新四军第五师发表《致鄂东各抗日友军各界同胞书》，列举鄂东国民党军与伪军夏南山部互相勾结，积极反共的事实。呼吁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勾敌反共”，“挑拨内战出卖抗战的罪行”。

△　日本在华反战同盟领袖鹿地亘在贵阳对记者说：该同盟盟员由刚组织的几十人已发展到1000多人，正加紧团结、训练、宣传、作战，来消灭日本军阀，解放日本民族，希望成立日本民族解放委员会。

△　阎锡山派代表与日军在太原签订秘密协定，其内容为：一、日本将沁源等13县让给阎军驻防；二、伪政府和军队中，阎锡山可派人充任要职；三、各交通要道重要据点由日军负责，对付共产党军队由阎锡山部负责，对共产党清剿后之地区由阎部接管。

△　日军在晋中大批抓壮丁扩大伪军，榆次集中青年120人，打算成立伪保安中队，太谷、寿阳、昔阳成立四至六个伪保安中队，平定也要抓壮丁400人，打算成立12个保安中队。

△　山西日军和汉奸将榆次、太谷等五个县作为特定“剿共”模范县。在政治上进行“清室”，设立“惩戒机关”，专门绑架杀害敌占区同胞，还加强乡村保甲自卫团的制度；军事上扩大伪军，派大批特务“督察员”去监视；经济上严格封锁抗日根据地，加强向根据地抢粮。在敌占区逼迫农民“农业增产”，令合作社大批收买和抢夺粮食。

△　日伪控制下的上海大、中学校学生数目，较太平洋战争前减少20％。据汪伪政府统计，现有中学生五万余人，大学生7300余人。

△　掠夺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源之枢纽《华北开发会社》总裁津岛寿一返抵东京声称：为使华北完全殖民地化，并迫使中国买办资本家在华北之2.46亿元之游资完全附属于该会社，只有军部的武力与财阀的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办到。

是年　　八路军作战2.4847万次，毙伤日军6.4472万人、伪军7.1929万人，俘日军421人、伪军5.1273万人。日伪军反正投诚6680人，缴获步、马枪4.7824万支，破坏铁路397里、公路2.6472万里、飞机五架、火车84列、汽车468辆、桥梁569座、封锁沟2.7961万里，攻克据点743处。八路军伤2.1874万人，亡1.1981万人。

△　新四军作战5327次。毙伤日伪军5.407万人，俘虏日伪军1.2357万人，反正投诚日伪军9357人。缴获步、马枪3.1317万支，破坏公路2512里、铁路102里、桥梁401座、汽车232辆、飞机一架、碉堡749座，攻克据点203个。新四军伤亡1.8997万名。

△　中共领导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增加到8000多万，军队恢复到47万、民兵27万，共产党员发展到90多万。

△　据财政部国库署公布，本年度国库收入为145.63亿多元，国库支出为588.145亿多元。

△　据财政部设计考核委员会统计处公布，是年共发行内债31.75亿多元，较去年的三亿元增加10倍以上。

△　本年度田赋征实3360.917万担，征购及征借2955.95万担，共计6316.867万担，较1942年度略有减少。

△　国民政府修复和新建铁路350公里，接管铁路288公里，修复公路3200公里。铁路军运、客运1600万人。

△　高射炮兵成立五个指挥区部，各负责其辖区所驻部队之作战，第一区部设重庆，辖四川省境；第二区部设巴东，辖鄂、湘省

境，第三区部设桂林，辖鄂、赣、闽、桂省境；第四区部设昆明，辖滇、黔省境；第五区部设西安，辖陕、甘、宁、豫省境。

△　本年度全国专科以上高等学校增至133所，在校学生7.3669万人，毕业学生1.0514万人，教师数1.0514万人，职员数1.0536万人，岁出教育经费4.19852372亿元。

△　春，日政府在东京召开鸦片会议，决定以伪满洲国和内蒙为生产鸦片的主要地区，负责供应亚洲全域的鸦片需要。会后，伪满禁烟局长拟定了鸦片的增产计划，奉天、四平、吉林三省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实行集团栽种。指定奉天省种200公顷，四平、吉林两省各种400公顷。原种植鸦片的热河省规定产量为1000万两，最高产量1400万两。是年，伪满与德国签订第三次经济协定，向德国输出鸦片10吨，其余向日本、香港输出。

△　日军1月至11月份向华北解放区军民千人以上“扫荡”87次，984天，出动兵力44.45万人。向华中解放区军民“扫荡”131次，1169天，出动兵力57.247万人。其中日军出动万人以上的大“扫荡”有21次，其中华中三次，华北18次。

△　日军在河北省张北县狼窝沟修筑巨大军事工程，为了工程保密，大批劳工遭秘密屠杀。仅在黑风口一个工地上，一次就有200多劳工被投入安固里淖冰湖里冻死。据统计有3000人被害。

△　在日伪军统治下，北平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都变成日本的军管区。协和医院也驻上了军队。公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私立的也只有中国大学和辅仁大学。另有“中华新闻学院”和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华北铁路学院”。北京大学校长换成亲日派钱稻荪，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辅仁大学教务长是德国人丰浮露。各校日文为必修课，北大、师大已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做教授，每校有一个日本顾问——太上皇校长，让学生们歌颂“大东亚圣战”。日伪为了镇压爱国师

生，收买特务，把大批爱国师生当作思想犯投进监狱。日伪把大、中学生组成“青训团”进行法西斯训练。日伪害怕“民众”二字，把过去的民众学校都改为“简易小学”，设“修身”课，强迫各中学学日文。地理、历史课大肆对日本歌功颂德。

△　河南省灾荒严重，灾民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的也有300万人，濒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有1500万人。

△　东南各省鼠疫流行。浙江云和为最猖獗，统计死者逾万。福建本年鼠疫传播地区达30余县，据卫生处发表死亡3844人。此外，江西省的光泽与广东省的大埔亦有鼠疫发生。

△　据《满洲帝国学事要览》对伪满20所高等学校统计：日本学生3717人，中国学生2716人，其中奉天工业大学，日本学生383人，中国学生85人；佳木斯医科大学，日本学生309人，中国学生九人；哈尔滨学院，日本学生660人，中国学生69人；新京工业大学，日本学生420人，中国学生180人；奉天商科学院，日本学生335人，中国学生27人。日本教职员777人，中国教职员263人。

△　日军在塘沽建立华北地区最大的劳工转运站——塘沽劳工收容所。至抗战胜利前每年约有几十万劳工从这里转运出去。

△　日本为在吉林省梨树县属修筑二龙湖堤坝工程，毁掉村庄50多个，赶走居民一万多人。施工中，从关内和当地掳来近二万劳工，由于劳累、殴打、疾病折磨而死的1500多人。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1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举行元旦纪念典礼。蒋介石致训词，指出今年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对日反攻的胜利。并训勉文武官员：一、加紧策动全国总动员；二、切实提高行政效率；三、忠心努力于本职；四、积极转移社会风气。同日，蒋介石又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词，提出全国军民工作的要点为：第一，加强军民合作，争取胜利；第二，各尽国民天职，贡献一切；第三，节约所有物资，补充前线需要；第四，人人自重自爱，实行新生活信条。

△　国民政府颁布授勋令：给予孔祥熙、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王宠惠、何应钦、宋庆龄、宋美龄一等卿云勋章；给予张人杰、邹鲁、冯玉祥、阎锡山、张继、熊克武、柏文蔚、李烈钧、叶楚伧、覃振、朱家骅、刘尚清、钮永建、李文范、王伯群、单嘉、马麟、沙克都尔札布、胡毅生、刘哲、麦斯武德、宋子文、陈果夫、许世英、周钟岳、吴忠信、翁文灏、陈树人、陈立夫、陈大齐、贾景德、林云陔、魏怀、张嘉璈、熊式辉、蒋廷黻、商震、陈布雷、张伯苓、莫德惠、王世杰、邵力子、张群、龙云、陈诚、薛岳、吴鼎昌、顾维钧、魏道明、傅秉常一等景星勋章。

△　国民政府公布受勋人员名单：宋美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陈绍宽、徐永昌、俞飞鹏各受青天白日勋章；何成濬、刘峙、商震、钱大钧各受一等云麾勋章。

△　蒋介石特颁元旦犒赏，慰问伤病将士，并亲撰慰问词，称："七年来，我们所获光荣的战绩，首应归功于为国效命的武装同志，尤其是你们百战疆场的荣誉军人。"犒金金额计分荣（残）官300元，荣（残）士兵150元，伤官200元，伤士兵100元，病官100元，病士兵50元，由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派员分发。

△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发表《元旦献词》，称当前切要工作有四：一、保持已获胜利，加强反攻准备；二、加紧全面生产，充实战力；三、加强人力动员，努力服行兵役；四、力行节约，严肃战时生产。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一年来国内战事，称："常德一役日军死伤逾四万。"并称："综计一年来之战事，敌寇除占领太湖西岸之广德、广东方面之雷州半岛等地外，其余一切大小蠢动，均被我全部粉碎。"

△　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请自是日起至本年5月5日止，从事研究《五五宪草》提供意见，以供将来国民大会讨论宪法时之参考。并指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说明书》、《约法》、《建国大纲》、《训政纲领》、《抗战建国纲领》等17种资料作为参考。

△　国民政府明令各省自是日起一律施行《公证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　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赞扬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勉励敌后军民在新的一年里，在对敌斗争、巩固根据地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胜利。

△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指出：1944年全华北的方针是坚持华北抗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局部攻势作战，

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为来年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只要第二战场一开辟，这一年就是纳粹覆亡的一年，是希特勒就擒的一年，是法西斯的恶势力及其造成的一切事物从欧洲大陆上扫除净尽的一年，是欧洲各民族与各国人民从死亡、饥饿、牢狱生活与专制独裁之下大翻身的一年。"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祝新年努力》的社论，指出：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人民得清楚时局的真象和发展，在于中国本身认真作到抗战、团结、民主，尤其是民主"。

△ 全国高中以上学校军训学生在重庆举行大检阅，蒋介石特颁训词，宣称："军事化即为现代化，军事训练与军事管理之主旨，即在造成全国青年为健全之现代国民。"

△ 重庆《商务日报》载：国民政府去年财政收入，税收与专卖收入总计为146.2亿元。其中直接税为72亿元，盐税为15亿元，烟、糖、火柴税为36亿元，海关税为4.2亿元。

△ 国民参政员李璜在成都《新中国日报》撰文《宣传民主，推进民权之年》，认为："如果号称民主，而国家的大权还是握在一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人人只准服从命令，不准说话，此乃是假民主。"

△ 由黄炎培发起出版的《宪政》（月刊）在重庆创刊。主编张志让，编委戴修缵、褚辅成、杨卫玉、王芸生、傅斯年等。创刊号出版后，当日销售一空。

△ 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在西宁宣誓就职。

△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分会和太行分会发表宣言，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唤起日本士兵的觉悟，为打倒日本军部，建立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

△　汪精卫发表新年谈话，声称：对于今后前进的方针和步骤，“只有一本历来的政策，向着‘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而更进一步的努力”，“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

△　日军在河北正定、井陉、建屏、平山等地成立“剿共”委员会，由各县知事兼任委员长，其任务是配合“讨伐队”“清剿”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

△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敦煌千佛山成立，其工作对象为保管与研究并重。

△　昆明月余来米价陡涨，富有机关、商号及市民大量抢购，云南省主席龙云是日下令制止抢购米粮。

1月2日　　何应钦设宴招待在重庆的美、英、苏、法、加（拿大）、比、荷等国军官，称：“同盟国之胜利及战后共建和平之基础，均已于1943年中奠定，而1944年则为同盟国之胜利年。”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扩大民主运动》的社论，指出：“倘使不能立刻实行宪政，而只腐心于宪法的草拟，则其结果，恐怕是费力多而收效少。”“目前首要应该做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

△　军政部在重庆召开1944年军需会议，历时四日。通过议案78件。9日，蒋介石接见与会代表，指示核实、节约为今后军需工作的方针。

△　经济部长翁文灏在《大公报》发表《建都济南议》一文，称：“济南对全国既有高瞻远瞩之益，对国外亦有密切注视之势，其胜与优皆有过于北平和南京。”

△　重庆市工业界义卖献金是日结束，共捐献国币100万元。

△　日伪军出动4000余人，对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句容县东南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十六旅及地方武装英勇作战，经过12天的反“扫荡”斗争，毙、伤、俘日伪军34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月3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发表训词，训勉僚属“发扬革命精神，加强建国信念”。各机关应“联系合作，践履笃实，贯彻命令，达成任务”。各党员应“忠心及努力于本职，真正做到不浪费一钱，不妄用一人”。

△　由国民参政员左舜生、王造时、张君劢等发起之宪政座谈会在重庆举行，王造时、左舜生、董必武、王芸生、吕复、张申府、刘王立明等60余人参加。张君劢发言称：“要谈实施宪政，就要先保障人权。”董必武发言称：“民主是讨论宪草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没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就不能真正由人民研究宪草。”吕复提出抗战期间，应该在民治大道上有所设施：第一，切实改进地方自治；第二，改善司法制度；第三，取消特权阶层。

△　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办张绣之对中央社记者称：该局所属各单位共献金68.5万元，物品88件。转送陪都献金大会。

△　甘肃拉卜楞寺藏族僧民代表团一行36人，在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率领下抵渝。下午，全体代表晋谒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报告一切。旋参观重庆附近各工厂及教育卫生机关。

△　据中央社称：湘鄂会战期间，鄂中损失惨重，计人口伤亡2.5万人，财产损失达100亿余元。湖北省政府拨款300万元，给予紧急赈济。同时将灾情呈报中央，请求加拨赈款赈粮。

△　美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书面报告美陆长史汀生，详述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的活动，内称：第十四航空队之飞行员在陈纳德将军统率下，自1942年2月2日至1943年10月21日，已击落日

机351架，而本身损失仅68架，而可能击毁或击伤之敌机，尚不在内。并称：中国仍为吾人自空中进攻日本之最有效基地。

△　美国委任苏尔丹将军为美国驻中印缅陆军副总司令，归史迪威节制。

△　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声称：大东亚各国应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克服一切困难，突破一切难关，实现共同理想。

△　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因受新四军不断打击，被汪伪撤职，转任“中央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原第一集团军改为第五集团军，由伪军将领项致庄统率。

1月4日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一部攻占孟普本，旋奉命向太柏卡进军。

△　国民政府明令未设绥靖公署的省份，应设省保安司令部。

△　行政院会议通过《盐务总局组织法》、《管理纱布买卖办法》、《国民学校法》及《学龄儿童及失学民众迫令入学法》。

△　成都、昆明各大学教授纷纷撰文，发表演讲，对宪政问题发表意见。华西大学薛愚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指出：“不能有独裁与一党专政。苟有野心家强奸民意，人民可立起而驱之。”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在联大讲演《中国宪政问题》时称：“只有空空洞洞的宪法，而没有老老实实的宪政，哪怕是十个、百个宪法，都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　全国慰劳总会举行陪都各界献金大会，由社会部长谷正纲，军委会政治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重庆市长贺耀组等主持。是日共收入献金总额达600万元。

△　中央社讯：湖南常德各界为崇敬常德会战中守城殉职官兵，特集资建筑伟大公墓。沅陵各界滨湖抗战将士慰劳团并捐修墓款六万元。

△　中国访英团团员、《大公报》总经理胡霖以中国新闻学会名义致函英国报界，概述中国报界战时奋斗之状况。5日，英议会议员及报人俱乐部主席阿斯特代表英国三新闻团体复函胡霖致意。此为中英报界的第一次接触。

△　中央银行在新疆迪化设立分行，是日正式开业。

△　经济部采金局因业务萧条，美黄金大量输入，生产成本增高，是日被迫裁撤。

△　海关副总税司丁景堂奉财政部令，以特派筹设新疆海关专员名义，率职员五人前往迪化，筹设迪化总关及边境关卡。按：此前新境关税，向由地方代征。

△　周佛海兼任汪伪政府中央税警团总团长。

△　安徽芜湖日军于拂晓向南陵以东珑瑯山、西河镇方面进犯，宣城日军亦同时向该县以西之寒亭镇窜扰。

△　美商务部长琼斯宣布：该部成立中国法律科，其工作为研究中国之商法及取消治外法权后中国商法对在华外商（尤其美商）之影响。由沙尔培克任科长。

△　重庆《大公报》载：东南地区鼠疫严重，以浙江省云和区较为流行，已死亡百余人，疫情有向瓯江流域扩张之势。福建省已蔓延至30余县，已死亡3884人。江西光泽与广东省之大埔亦有疫情。按：此系侵华日军投放细菌所致。

1月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忏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剑平

为第八军副军长，谢辅三为暂编第四军军长，张信成为副军长。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部长梁寒操、次长吴国桢、参事张平群出席。梁寒操致词宣称：中国数百万野战部队于今年内必将随时反攻，配合海上盟军军事行动，到处反攻。张平群答记者称：滇缅路打开后，大宗商品如衣料、车辆零件、电器、五金及药材可源源而来。军用品之接济，亦必大量增加。

△　全国慰劳总会举行慰劳盟军将士大会，英、美、苏等国将士百余人参加。代会长谷正纲致词称：我各同盟国发动抗战之开始日期虽有先后，深信到达胜利之时期则将一致，而1944年且将为吾人胜利之年无疑。

△　据中央社讯：1944年度全国农贷总额为38亿元，其中40％将用于农田水利工程。

△　伪军第三十四师副师长兼第一三五团团长施亚夫率部一个营在苏中如皋附近的加力镇起义，加入新四军。

△　中央社据新德里路透社电：中印航空线抵华物资已超过滇缅公路。1943年12月份的运输量为1942年同月份的10倍。

1月6日　　蒋介石指令三青团中央团部考选千名优秀团员出国留学，并成立团员留学生考选委员会主持其事。16日，国民政府有关部特甄选1200名出国留学人员，计教育部700名，经济部200名，交通部300名。

△　在常德会战中殉国的第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灵榇由重庆运抵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党政军领导亲往车站迎灵。随即移榇忠烈祠。7日，省主席张群代表蒋介石致祭。成都各机关、团体、学校暨民众将公祭三日，成都市参议会建议为许国璋铸铜像，以资标勋千古。

△　重庆《新华日报》载：大后方各地走私盛行，各重要关卡缉

获财物充公、变价和罚金数额为：广东曲江1.27亿元；广东雷州1.16亿元；河南洛阳9500万元；四川重庆7500万元；湖南长沙8000万元；广西梧州6900万元；广西南宁1500万元；云南昆明2200万元；甘肃兰州2300万元。

△　盟国军事代表及中外记者组成的常（德）桃（源）战绩视察团，历时27日，跋涉6000余里，是日返抵重庆。团员沿途至湘、桂各地，对参与常桃会战的将士备致赞扬。

△　据中央社讯：上海日军大肆逮捕教育、文化界人士，指称其仍潜伏有抗日意识，旬日内被捕者达300余人。

△　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报告租借情况，称：美对中、印出口合计达8.5682亿美元，其中68％为军火。

△　哥斯达黎加总统签署《限制华人移民案》。

1月7日　　行政院通电全国各省、市政府，切实推行《国民义务劳动法》，并提出注意事项八点，要点为：征调人民服役时，以不妨碍人民本位工作及地方秩序为第一要义；党团员及士绅子弟尤应率先服役，以资倡导；兴办事业，应切实遵照该法之规定，以有裨于地方自治及地方公共造产，与其他公益事业为限；施工对象不必强求一致，务宜因地、因时、因人、因事制宜，妥善办理。

△　国民政府明令《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施行期间，自1944年2月19日起延长一年。

△　广西靖西县黄岑捐助龙津县国民中学20万元，国民政府是日以其“慨捐巨资，兴建学校，加惠士林”予以明令嘉奖。

△　新四军黄克诚部袭击在江苏海安县抢劫的伪军陈才福部，毙伤其连长以下30余人，并将伪军抢劫财物全数夺回，退还群众。

△　罗斯福以中印空运大队克服困难，以大量主要军事供应品运华成绩优异，是日授予该队司令霍格准将军“罗斯福奖状”。

△　美国对外经济处对华空运科负责人在纽约对中央社记者谈话，称：中国人民需要吾人更多的援助，并已感觉吾人正设法赴援。目前有更多的军用物资源源运华，即其证明。

△　驻印军总司令史迪威视察缅境胡康河谷中国远征军，与孙立人将军举行会议。

1月8日　　国民政府以福建省1943年度征购粮食改为征借，全部发给粮食库券，裨益粮政，特予明令嘉奖。

△　军事委员会任命彭位仁兼第七十三军军长，张言传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

△　粮食部为防各乡镇盗卖积谷，特令四川省粮政局饬各县规定各粮仓积谷应于15日内表报上级机关转部备案，并应由省府随时派员分赴各县市仓库逐仓查验，以杜流弊。

△　新四军浙东抗日游击队正式宣布成立，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

△　据中央社讯称：日军进犯湘、鄂地区大量使用毒气，计达74次之多，其中常德地区共35次。毒气种类分催泪性、喷嚏性、窒息性、糜烂性等。中国官兵中毒者共1300余名，伤亡31名。

1月9日　　蒋介石接见拉卜楞寺代表团，并致勉词，盼各代表领导边地各寺院、各旗同胞发挥拥护政府、爱护国家之热忱，同心协力，完成抗战建国大业。同日，该团又分别晋谒孙科、周钟岳、张治中等，并向国民政府献机30架。

△　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将尽力赶速完成各长距离轰炸机机

场，并亟望将调派战斗机来华作战的数量告知，以作必需准备。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

△　行政院会议通过《管制花纱布办法》，规定：一、凡经营交易之商号、工厂，均须申请管理局或其分支机关核发执照；二、其交易应集中于核定之市场公开交易，按品质标准挂牌行之，不准有黑市；三、各商号、工厂应照实际需要作实物交易，不能有期货交易及套空之信用交易情事；四、货物之交易及存储量，应陈报；五、运出仓栈，应报请管制局核准。

△　毛泽东在延安观看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致信该院表示祝贺，并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　重庆《大公报》报道：新疆省建设厅长林继庸到职后，创办工厂均系官商合办，由省府出资，商家负责技术责任。计有天原电化厂、中国兴业公司设立的炼钢厂、裕丰纱厂等。机器、皮革、肥皂及轻工业等厂亦在筹建之中。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渡过大奈河，与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一部遭遇，战至13日，敌不支向百贼河败退。20日，该团突破日军防御线，22日完成对百贼河南岸日军的包围，23日发起攻击，25日战斗结束。此役共歼敌300余名，俘敌二人。

△　日军800余名在四架飞机掩护下，进犯山东潍县，被八路军一部击退。

1月10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主计长陈其采报告1944年度

主计中心工作要点：一、严格执行年度预算；二、节约经费，配合军事总反攻；三、切实推行国营机关预算决算；四、加强基层统计机构，扩大户口普查。

△　行政院规定：除蒙、藏僧人缓服兵役外，其余内地僧人一律依法应征入伍，已分令各省照办。

△　广西恭城县富源矿业公司捐助该县20万元兴学，国民政府是日以“裨益地方教育”予以明令嘉奖。

△　军政部教导第一团（即志愿从军学生）在重庆成立，约500人。蒋介石致训词，告以学生从军的意义与入营后应注意的事项。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在晋西北离石与“扫荡”日军一部激战，毙伤敌50余人。

△　浙江东阳、武义日军一部分股窜犯，是日至永康县北之象珠市。11日窜至马宅市、安文镇、南马市、四路口等地。

△　湘桂铁路衡阳湘江大桥通车。

△　英国克利普斯夫人主持的联合援华募款运动，再次汇11.4万英镑援华。

1月11日　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军政部军需署所属各司、处、各地军需局厂主官，详询各战区军需补给业务实况，勉各员“以无名英雄自居，以军队保姆自居，以完成建军建国的使命”。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交考试院转铨叙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位三为第五十九军军长。

△　行政院命令各省、市、县参议会研究《五五宪草》。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欢宴拉卜楞寺代表团，朱家骅、梁寒操、马超俊、程中行、董显光等出席。

△　司法院长居正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演讲宪政问题，宣称“现在宪政的基础需要建筑在国民党身上，谈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建筑在总裁身上”。

△　四川丝业公司所属第一制造厂女工500余人不堪资方虐待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卫生设备。

△　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轰炸台湾高雄铝厂及东石港。

△　日机20余架分八批袭赣，在赣县境内投弹数枚。同日，又34架从赣北南袭，与中国空军发生空战，被击落三架，坠万安、遂川附近。

△　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与日本帝国等银行签订《中央储备银行实施集中华中华南与南方地域汇兑要纲》。

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该部参事张平群答记者问，告抗战爆发以来政府赈灾情况：自1938年4月至1942年底，中央拨赈款共3.45亿元；自1943年初至10月，又拨款二亿元。最近湘、鄂战后，又拨500万元。

△　国民政府明令授勋：吴敬恒、丁惟汾、李石曾各给予一等卿云勋章；熊秉坤、吴铁城各给予一等景星勋章。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

△　据中央社讯：拉卜楞寺代表团集合飞机捐款国币600万元呈献国家。国民政府以该区同胞捐款献机，协助航空事业，给予嘉奖。

△　第一战区豫北挺进军重创河南焦作矿场，日军闻讯三次增

援，均被击败。计攻破日军碉堡七座，炸毁铁道桥梁六处及焦作市内四大建筑物。

1月13日　八路军冀东分区一部在河北遵化崔各庄战斗中，全歼日军两个小队70余人，俘伪军百余名，并毙伤增援部队8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迫使敌撤出夏家峪、张庆、河口、草场等据点。

△　交通部在重庆召开铁路会议，商讨战后铁路复员与复兴计划，并对当前技术标准问题、改善运输办法、训练技工等进行研讨。21日闭幕。

△　边疆文物展览会在重庆开幕。展品内容分边民照片、边民用品、边民经文、边民图画及模型等四部分，包括了边民政治、交通、畜牧、宗教、建筑、风俗、教育、用具、器乐等各种文物800余件。

△　驻山西临县三交日军远袭招贤镇时，夜宿距镇五里的贺家湾村，时村内群众躲一洞内，日军把抢来的棉花蘸上煤油，放上辣椒面在洞口熏烧，将隐藏洞内的200余老幼妇孺全部熏死。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设立淮海省，辖徐州市及铜山、东海、砀山、萧县、睢宁、宿县、淮安、涟水等21县，任命郝鹏举为淮海省省长。会议还通过并公布《战时物价管理暂行条例》。

△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东京发表演说，宣称每一日本公民“均需发挥最大之工作能力，从事军需生产，尤以飞机生产为最，俾供前线需要”。

1月14日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与会者有张伯苓、孔庚、黄炎培、李中襄、董必武、许德珩、邵力子等20余人。农林部长沈鸿烈报告农林行政工作及1944年度施政计划。提出工作要点为充裕军用、安定民生，以适应战时需要，并准备战后复员。通过

《调整经济机构，制定战后建设纲领》等案。

△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边疆教育会议，出席者计25人。会议通过议案40余项，并通过如下决定：一、从速培植台湾、澎湖各种人员；二、改进边疆教育师资；三、推行国语简体字；四、加紧训练边地实科人才；五、设立西北文化研究所；六、在边疆适当地方设立大规模国立民教馆，以为各该区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改进的中心。15日闭幕。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攻占大班卡，毙日军30余人，残敌向太柏卡方向退却。15日，第一一二团与乔卡日军交战，经多次攻击，于16日将该地攻克，歼敌40余人。

△　据中央社讯：淞沪抗战四行孤军壮士刘辉坤、许贵卿、魏何成、吴炳泰等日前奉军事委员会令派至远征军工作，已抵昆明。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袭击山东冠县北之赵固镇，毙伪中队长以下五名，俘伪小队长以下百余名。

△　新四军粟裕师一部在江苏如皋南公路设伏，击溃进犯该地日军800余人及伪军一个团，毙伤百余人。

△　原东北军第三支队参谋长石绍麟在率队进攻山东潍县战斗中为国捐躯，国民政府是日明令褒扬。

△　汪伪政府发行建设公债，总额六亿元。同日，又任命郝鹏举兼任淮海省保安司令。

△　重庆《大公报》讯：日军在上海抢购棉纱棉布，截至去年9月6日，登记数量达26万捆。

1月15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非常时期战地公务员任用条例》。

△　蒋介石复罗斯福本月5日电，表示不能同意美财政部有关阻抑中国通货膨胀的建议。

△　周谷城在《东方杂志》发表题为《世界民主政治之倾向与中国民主政治之创造》的文章，认为“人民言论限制之放宽，乃至完全撤销言论之限制，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

△　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以四个团的兵力及地方武装，向临沂、莒县、赣榆等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至4月1日，攻克鱼窝、大醋、柳树店、石沟崖、夏庄等日伪军据点。山东军区部队春季攻势从此展开。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河北安新县南设伏，毙伪县长、保安队附、翻译、秘书以下19名，俘40多名。

△　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开会，冈野进等参加。会议决定筹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并发表纲领，呼吁结束对华战争，撤退日军回国，严惩战争罪魁等。

△　是日至23日，山西汾阳、中阳、临县、离石等地日军千余人对柳林西北的石家峁方圆20里内的村庄进行反复“扫荡”，九天中屠杀民众500多人，制造了石家峁惨案。

△　重庆《大公报》载：豫北烽火连年，寇灾深重。去年复雨水失调，又有蝗灾，饥馑恐怖，尤以温县、孟县、济源、博爱等县最为严重，数万人流落他乡，百余里人烟绝迹。

△　国家总动员会议为平抑物价，通令各掌握物资机构配售存货，俾达到以物控价之目的。

△　中国访英团结束对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各大城市的访问，是日返抵伦敦。18日访英团长王世杰向英上、下院发表告别演说，并以国民参政会名义致函英国议会答谢。

△　美驻华大使馆官员戴维斯上书美政府，陈请尽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报告称："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刻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活动。"罗斯福表示采纳这一建议。

1月16日　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并称：如果美国拒绝上述要求，则"美国在华军队的支出应由美国政府负担"。美国表示同意承担在华美军的全部费用。26日，罗斯福通过高思致函蒋介石，表示愿意暂时每月支付2500万美元作为维持在华美军的费用。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沛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　董必武、徐冰在重庆宴请各党派人士左舜生、邓初民、翦伯赞、张申府、张志让等，交换时局看法。

△　成都市各界响应冯玉祥发起的节约献金运动，是日献金收入约千余万元。

△　国讯社、青年会在重庆联合举行宪政讲谈会。黄炎培发言称："抗战以来，人民尽了很多义务，所以应当把权利交给人民。"刘伯昌称："政府应给人民言论自由。有舆论才能促成宪政的实施。"向乃祺称："保甲制度是阻碍宪政实施的。"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部进攻甘卡，歼敌80余人。20日攻占丹般卡，30日占领英恩卡，并分兵向茂林河北岸攻击。

△　日机17架袭击广东韶关，在市郊投弹30余枚。同日又袭击河南广武、巩县，投弹多枚。

△　张一鹏就任汪伪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

1月17日　行政院采纳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建议，实施

《管制物价方案》，要点为：一、管制物资之上层机构，如有重复以及承转考核不负实际责任者，应按其性质尽量合并；二、各省、市限期成立物价管制委员会，统一办理有关管理物价事宜；三、国家总动员会议及各省、市物价管制委员会，应与经济建设策进会及该会驻各地办事处密切联系。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中古友好条约》，规定中国、古巴两国以平等及互尊主权为基础，并简派全权代表以昭信守。

△　审计部长林云陔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报告1944年度审计工作计划，要点为：一、加强就地审计；二、扩大巡回审计；三、推行岁入直接征收机关之就地审计；四、办理省、县、市公有营业事业机关财务之抽查；五、推进县财务之抽查。

△　毛泽东致电祝贺山西省沁源县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所取得的胜利。指出沁源抗击日寇的胜利，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一部向太柏卡发动攻击，毙日军100余人。26日，史迪威亲赴太柏卡前线督战，战至2月1日，歼灭日军第五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攻占太柏卡，完全肃清大龙河及大奈河沿岸的日军。

△　新四军粟裕师一部克江苏扬州东南长江北岸之霍家桥、大河口据点，并击沉日汽舰三艘。

△　由薛明剑、章慧剑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联合保险公司是日举行筹备会议，推选章慧剑等五人为常务筹备委员，决定资本为2000万元，并策动西南、西北两区的工业界参加股份。

△　中国访英团在伦敦发表临别声明，称：“吾人对诸君之镇静安详，有条有理，及纵在战时亦能继续享有个人若干自由，表示钦

佩。”

△　日军一部分三路冲入广东南雄县城，将广东省银行、雄华书局、县银行等尽劫一空，损失不可数计。

1月18日　军政部公布《学生自愿服役办法》，规定凡年满18岁以上的中等学校以上身体合格的学生均可申请登记。凡志愿服役的学生，如受军训合格者得选拔为军士，训练期满后，得择优送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凡服役学生训练期满后，得依其所习学科及志愿服任特种兵、特业兵、空军及适当之军事辅助勤务；服役中如有逃亡情形，除依法办理外，并开除其学籍。

△　军事委员会任命史泽波为第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刘赐熙为第三十九军副军长，袁庆荣为骑兵第四军军长。

△　访英团团长王世杰向英国上下两院发表告别演说，论述中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12年的奋斗，以及中国的未来问题。

△　行政院会议通过甘肃省设置会川县。

△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有关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问题电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有关区党委：为保持国共两党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要求有关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以自卫原则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出击山西阳城日军，歼灭该县潘庄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独立旅赵振祥部一个营。

△　山东八路军一部攻克山东莒县石渤沟、潘村、醋大庄等14处日伪军据点，解放民众30余万人，生俘汉奸朱信斋以下伪军官兵875名，日军一名，毙伤日伪军373名。

△　新四军一部攻克江苏滨海县日伪军据点14处，击毁围寨75座，碉堡200多个，毙伤敌300余名。

△　日机一架由汉口东飞，行至安徽石埭县境被中国空军击落，机内13人，跌毙一人，伤二人，其余全部俘获，解送后方。

1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在重庆举行宪政座谈会，提出“天赋人权”时代业已过去，中国现在与将来为“革命民权”。

△　日军中型兵舰一艘在安徽贵池县前江口江面触水雷，当被炸沉，日军官兵约千人溺毙过半。

△　八路军一部克复秦皇岛西北之海阳镇。

△　据中央社讯：日军继续在上海拘捕文化人，计有交通大学教员若干人、作家夏丏尊、开明书局编辑章锡琛等，陷狱者尚有200余人。同时日军迫令上海同文书院学生300余人全体服役，补充缅甸驻军。

1月20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宣布“本年除积极推进整个总动员业务外，将侧重于物资之管制及增产，召开各有关机关商讨花纱布、粮食增产问题”。决定在不妨碍粮食生产的原则下，本年于川、陕、湘、鄂、豫等省增产棉花300余万担。粮食方面，除注重灾区救济外，并注重灾荒之预防。且于甘、宁、青等省不单求军粮、民食之解决，并于牲畜饲料也为求供应无缺。

△　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以前政府所规定由外国汇款来华之补助办法业经修订，其新办法为：凡为经济、传教、医药、教育、文化及其他慈善之汇款，中国政府可予以汇价百分之一百补助。

△　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促进会黔区办事处发起的贵州经济建设促进会是日正式成立。决议创办贵州林牧公司与发展贵州纺织事业。

△　西藏、蒙古、新疆三同乡会在重庆招待拉卜楞寺所属108寺致敬元首代表团，汉、蒙、回、藏各族人士60余人聚晤一堂，尚望各民族间加强团结，早日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　湘省来渝人士向当局呈述常德会战期间所受倭寇灾害情形，计受灾者共11县，死亡13.19万人，伤3.8万人，焚毁房屋7.3383万栋，损失粮食1658.94万石，损失耕牛8.65万头。其中以常德受灾最为严重，死亡1.23万人，伤3680人，财产损失在53亿元以上。

△　新四军一部袭击苏中日伪军“实业垦区”，毙敌270余名。同日，新四军另一部攻克苏北东台以北的新丰镇日伪军据点。

△　日军2000余人在河北丰润、滦县、迁安、遵化地区“扫荡”。八路军一部与敌激战六日，予敌重创，是日敌开始溃退。

△　伪满洲国召开省长会议，策划强制征购粮食问题。决定1944年向日本供出粮食量为270万吨。

△　国际合作会议在华盛顿开会，通过如下合作方案：一、尽快设立国际合作贸易及制造协会；二、请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设立基金，用于贷款各被灾国家之合作机构；三、发起募捐筹集自由基金，用以协助被灾国复兴其合作事业；四、努力于国际壁垒之清除，并促进各国人民间自由交易及各国间货物及货币之流通。

1月21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山东堂邑县北之履东歼灭伪军吴连部一个营和团部，毙伪团长黄竹斋，俘伪营长以下200余人。

△　据《扫荡报》讯：军政当局倡办军需独立以来，成绩卓著，仅1942年度节省军费即达10亿余元，结存军粮达100余万大包以上。本年度军需独立将以“核实”、“节约”为工作方针，以充实战时力量。

△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发表演说，承认战局“空前严重”，“盟国攻势益见猛烈，日方交通大受影响”，呼吁“以全力增产飞机和粮食，增

加赋税”。

1月22日　　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在重庆对《大公报》记者称：“《五五宪草》草拟十年来，时事更迭，潮流起伏，内外大势，均已丕变，宪草内容是否合乎时代要求，与夫实行后之坚韧性如何？似有充分考虑之余地”，并建议国都设于北平。

△　内政部次长张维翰抵贵阳，途经独山、都匀、贵定等县，视察各该地推行“新县制”及行政实效，是日对中央社记者称：“目前全国实施新县制者已达1036县。”

△　湖南省醴陵县陈盛芳捐助280万元，兴办湖南私立东方初级中学，国民政府是日以其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予以明令嘉奖。

△　重庆《大公报》讯：交通部驿运管理处为开辟川、新间的移民工作，从四川广元至新疆哈密间设立79个驿站，全程2322公里，行程约100天。

△　新四军地方武装一部乘驻苏北邳县伪军火并之际，予以袭击，毙敌20余名，俘40余名。

1月23日　　延安《解放日报》载：重庆《中央日报》社改组，原社长陶百川去职，新任社长为胡健中，总主笔为陶希圣，副总主笔方秋苇，总编辑陈训畬，副总编辑胡春水。

△　国民政府明令定是日为中国妇女节。

△　重庆《大公报》讯：各地先后设立专科以上学校公益互助社。该社以辅助各校师生生活并举办其他福利事业为主，依合作社方式经营。资金方面，教育部已与特约银行订立合同，以所需额四分之三低息贷予学校。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六区队在崔各庄战斗后转移到遵化南部

前稻地村，由于汉奸告密，日伪军1800多人施行报复围剿。第六区队应战，毙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

△　翦伯赞著《中国通史》在重庆出版发行。

△　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关于游击战争的社论，称："中国人的游击战术和游击队，在击败日本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多数观察家估计的还要大。"中国游击队"向侵略者表示：他们愈是深入，灾难就愈加大"。

1月24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总理纪念周，铨叙部长贾景德报告本年度施政方针的重心在建立省、市地方及中央驻各地机关的人事机构，彻底管理财务、交通、金融人员之事。蒋介石指示建国首要在建立法律制度，并宜力求简单、快当、尽职。

△　丘吉尔接见中国访英团，王世杰向丘呈送蒋介石信件。本月30日丘吉尔给蒋介石作了礼节回函。

△　财政部长孔祥熙复函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申述中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努力建筑盟军机场，并因此负担庞大支出以致通货膨胀等情况。

△　据重庆《大公报》载：战后利用外资从事建设，国民政府已与英、美等国开始接洽，英国并有数大工业派出代表常驻重庆专事联络。据悉，初期利用外资办法，将以国家对国家形式出现。

△　据中央社讯：陕西省棉花开始实行统购统收，至是月中旬共收购棉花38万余担，力争完成50万担之目标。另还实行纱换布的办法，规定由三原、西安、宝鸡、南郑四处集中举办。预计可换布四万余匹。

△　日本议会通过政府提出的1944年、1945年非常时期军费追加预算380亿日元。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今，日本非常时期之总军

费将达1000亿日元。

△　占驻承德日本宪兵队在日伪军配合下，搜捕半壁山区村民900多人，其中100多人被判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

△　山西沁县日军包围郭家庄，大肆烧杀，计被残杀的无辜群众共56人，房屋被烧毁480余间。

1月25日　孔祥熙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研究宪草之要纲》一文，对国民讨论宪草提出如下要义：一、不能违反三民主义；二、要适合本国国情；三、要顾及国际上的应用；四、必须以整个国家的福利为前提，而不应杂以团体、学派的利害。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及中美混合机队击沉停于东海海面的日货轮两艘及扫雷舰一艘。

△　山西太谷、寿阳日伪军2000余名向太行山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根据地进犯，越三日，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击溃，窜回原地。

△　日机昨、今两日轰炸福建建瓯、福州，在建瓯投弹40余枚。

1月26日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五十六团一部沿大奈河攻击大洛，战至31日，占领大洛，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残部向大奈河右岸逃窜。大洛作战先后歼敌400余名。

△　驻美大使魏道明返国后，是日晋谒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述职。27日，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国内物价情形与封锁甚有关系，倘封锁能早日打开，则国内经济状况必可大为好转，瞻望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　日机两架袭击广西梧州，在市区上空低飞扫射。同日另有五架在广东南雄肆虐，亦以机枪扫射。

1月27日　立法院长孙科就宪政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批评宪草必须根据三民主义”。在谈到中共对宪政有无影响的问题时称：“一个独立、自立的国家断不许有两个政权同时存在的。”

△　国民政府特派沈士远为民国三十三年第一次高等考试再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派陈立夫、程天放、杨汝梅、赵琛、李超英、关吉玉等25人为委员。

△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招待党外人士，参加者有李鼎铭、李丹生、柳湜、贺连成、毕光斗等人。林伯渠、谢觉哉等发言，内容有关于肃清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及保证完成1944年各项任务等。

△　重庆《扫荡报》讯：军训部为加强军事教育，使全国青年有普遍从军的机会，特自本年起办理全国军事学校统一招生。将来招考时，各种兵科班队同时考选，依照成绩，分发各校。

△　四川兴文县杨吴德成捐助兴文中学建筑费25万元国币，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　新四军一部袭击南京近郊日伪军据点官集，摧毁碉堡11个，毙伤敌170余名。

△　伦敦《每日电讯报》刊载中国访英团团长王世杰对记者发表的谈话，称：“中国希望战后联合国全力合作，尤其中英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并称：“各联合国，至少为联合国中之主要国家，应在战争结束前成立将来合作之广泛机构。此事至为重要。”

△　中央警官学校派遣第一届公费留美学生五人。

1月28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召开会议，到会有张伯苓、莫德惠、江庸、孔庚、许孝炎、李中襄、董必武、许德珩及秘书长邵力子等20人。首由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次由教育部长陈立夫报告最近教育设施及1944年度施政计划。继黄炎培、李中襄等就大学课

程、华侨教育、蒙藏教育、师范教育、技术教育等问题提出质询，陈立夫均作答复。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部长梁寒操称：“本党对于国民大会会期长短殊无成见，但对另设机构行使最高政权，不能赞同。”又称：“现在省区过大，行政效率已受影响，又易造成封建割据，故应加以缩小。”

△　行政院核定公布《水陆驿运管理规则》，凡15条；《奖励民营驿运事业办法》，凡11条。

△　行政院颁布《推进乡镇公益储蓄办法》、《规定乡镇公益储蓄办法》，规定乡、镇机关应做到每年按户劝储一次，派额应达平均每户至少100元。

△　重庆文化界联谊会欢送拉卜楞寺代表团，主席刘文岛致欢送词，刘氏畅论佛教“无我、无常、无挂、无碍”之精神与抗战建国之关系，对该团此行成就尤加赞许。

△　国民政府儿童保育会总干事熊芷对中央社记者谈该会工作状况，称该会全国直属及分会所属儿童保育院共34所，现有儿童1.9万人。一年多来，因经费困难，故未再招收新儿童。

△　中国访英团团员王云五、杭立武、温源宁结束访英活动，是日离伦敦赴土耳其等国访问，尔后返重庆。其他二员王世杰、胡霖则将访问美国，再返重庆。

△　中国政府赴印度农业考察团一行四人返抵重庆。该团在印考察历三个月，行程7000英里，重点考察印度各级农业机构之彼此联系问题、农业增产之实际问题及农田水利与甘蔗制糖等项。

△　日机三架袭击湖南汉寿县纸料洲，炸死民众10余人。

1月29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委员有孔祥熙、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朱家骅、刘尚清、刘哲、钮永建、邹鲁、冯玉祥、张继、胡毅生、李文范、李烈钧。蒋介石亲临主持。会议通过议案数项，蒋介石就党国大计作重要提示。

△　蒋介石出席并主持中央警校开学典礼，蒋介石致训词称："警察系代表国家政府，与民众最为亲切接近，政令赖以贯彻于社会，故其职责重大。"

△　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在纽约发表演说，主张完全解除日本武装，并令其交出一切征服之土地，称：日本必须交出全部空军，此后不得制造任何飞机，如彼需要商用飞机，必须向他国购买；日本海军如未完全歼灭，则应交与中国、菲律宾与澳洲等国，用以监视日本；日本陆军应完全遣散，军火工厂必须停闭；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必须交还中国；朝鲜必须恢复独立。

△　由杨杰将军率领的中国军事考察团抵达英国伦敦，将参观各项军事设施。3月7日访问英国南部海军设施。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省安新县城。

△　八路军太行军区一、二、三分区军民粉碎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及伪军共3000余人的"扫荡"。

1月30日　重庆《中央日报》全文发表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凡八章147条。

△　宪政实施协进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到会有张伯苓、莫德惠、孙科、吴铁城、陈布雷等32人。蒋介石到会指示国民应精诚团结，促进宪政。会议通过提案10项，重要者有：一、由本会遴派考察人员分驻各省地方，以便普遍切实执行本会考察之任务案；二、建议政府从速设法完成并充实地方各级民意机关案；三、人民基本权利三

项之保障建议案；四、请成立晋、绥两省临时参议会案等。

△　行政院通令各省限于民国三十三年内一律依法成立县参议会，完成地方自治。对于事实上不能由乡、镇、保层层成立之县份，亦责成先成立临时参议会。

△　农林部发表统计：全国各省公营垦务机关团体共153个，以四川最多，占53个。垦民以陕西最多，四川次之。

△　罗斯福62岁诞辰。重庆《大公报》发表题为《罗斯福与中国》一文，称罗斯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始终表示最诚挚的同情，最友善的态度”；“他不但是西半球一万万三千万人所爱戴的领袖，而且是人类和平与平等的支柱”。

1月31日　蒋介石亲任蒋经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5月，该校第一期正式开学。

△　缅北中国远征军一部在胡康河谷歼灭日军一个联队。其中毙日军联队长一名及大队长三名。

△　军政部发言人宣称：全国将继续开展青年学生从军运动，并拟将这一运动扩展至西康、青海、陕西等省。

△　国民政府派张公权为全国工业协会常驻美国代表，与美国各工业团体取得联系，共同研商战后工业复兴等问题。

△　陕西泔惠渠工程竣工，全长五公里，可灌溉耕地3000亩。

△　伪满协和会在“新京”召开全“满”会员大会，决定开展“战时紧急国民储蓄增产运动”。3月16日，伪满政府公布1944年度强迫人民储蓄目标额为30亿元。

△　中美工商协会在纽约成立，协会主席为国际机器事业公司总

经理华特逊，会长为美国前商务部次长柏德生上校。该会的主要任务是：一、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及商业之可能发展；二、与中美两国政府及中国私人企业合作，使两国经济计划取得联系；三、研究中国商法及经济组织；四、保护美国之公正利益；五、为中美两国作各种商业上之服务。

△　美国援华委员会驻华办事处捐款5000万元，交由该会鲁山教会区作为救济豫灾之用。

是月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突破畹达克山脉，攻击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侧背，并抵近至大洛地区之百贼河一带。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关于美国经济援华的请求，称："根据已经得到的效果来看，给中国一笔贷款……是说不出理由的。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贷款，而且从中国和美国的角度来看，贷款也是不妥当的。"

△　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郭征询关于两党合作的意见，毛泽东答：中国共产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毛泽东答：林、周或可先后赴渝。郭又提及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两点。毛泽东答：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线。

△　行政院决定两项积谷专款办法：一、由田赋下附征5%；二、营业税项下除原附征5%外，再附征5%。

△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逝世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行政院令暂为兼理省政，阎是月遵令在防次兼理政务。

△　西康省李万华捐款10万元及代募款30余万元，徐健捐款五万元及代募款20余万元，胡玉隆捐款26万元，湖南省黄翠竹捐田30

亩，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社会部呈国民政府请予以褒奖。

△　戴季陶、朱家骅、翁文灏、陈立夫等发起组织川康采冶地质研究社，“从事川康矿业调查与研究，以期促进国防重工业建立”。

△　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为打破日伪军对苏北高邮、兴化、宝应、海安、如皋、泰县、泰兴等地的“扩展清乡”，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先后攻克宝应附近的大官庄、王家营，如皋附近的左溪、运粮河以及东台附近的安丰等17处日伪军据点。

△　平、津《晨报》、《新北京报》、《新天津报》因发生纸荒被迫停刊。

2月

2月1日　　驻中印缅美国陆军总司令史迪威在新德里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胡康河谷之华军已深入缅甸内部100英里。华军作战甚为得手，士气旺盛，在宛河上游阵地击毙日军300人，作战次数就欧洲标准观之实属不多。

△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所属各部，乘日军撤退据点集中兵力之机，适时出击日伪据点，迫其撤退，并消灭其一部。

△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胡宗南，告知驻甘肃镇原、西峰镇等地国民党新编第二师、暂编第五十九师及当地保安队，近日不断进犯陕甘宁边区，并声言将大举进攻，请转令各该部队，各返原防，勿开衅端。

△　国民政府决定本年度移新垦民名额为二万人，是日开始登记。主要区域为陕西华阴、大荔、蓝田和河南洛阳。

△　行政院会议通过《中国农民银行农业债券发行原则及条

例》。

△　重庆《中央日报》讯：军事委员会决定从本年度起，公私立大学四年级男生学生，除医学院、师范学院外，一律调征充任译员。重庆各大学被征调学生总数近千人。

△　重庆《中央日报》讯：留居重庆的各国使节、军事代表团及侨民共1431人。其中人数最多者为美国464人；英国次之，共330人。

△　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赴川省各地劝募献金，共历10余县，募得金额2500万元，是日返回重庆。

△　是日至10日，黄金及美金储蓄券价格突然高涨，黄金每两自1.2万元涨至2.4万元；美金储蓄券一元从兑换60元法币涨至兑换140元。原因之一为日伪抢购；之二为投机。黄金、美券涨价刺激物价飞涨。粮食涨20％至50％。重庆市评价委员会重新核定物价，最低增加20％，最高达150％。

2月2日　　蒋介石复罗斯福两次来电，提出法币对美元汇率改为30比1，说这是在不危害中国经济战线崩溃，以及不危害中国民心继续抗战的原则下尽量满足阁下的期望。并允称只要缅南进行大规模两栖作战，本人即派驻滇部队入缅作战。

△　国民政府明令追赠陈调元为陆军一级上将。

△　军令部致电驻陕甘宁边区联络参谋郭仲容，称："周、朱、林各位来渝，甚表欢迎，来时请先电告。"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部长梁寒操发表谈话，对日军在菲律宾屠杀美军俘虏7700人，菲军俘虏1400人及香港、马来亚、缅甸等地英国战俘与平民，表示极大的愤慨。继之该部张平群答记者，详述战区内各省之县政情形，称：全国共有1958县，在战区

各省内者，约有少半数，共为924县，其中县区完整者422县。

△　中共中央对敌后根据地发出指示，强调在敌后必须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开展对敌斗争和大生产运动。

△　中国工矿业协进会在重庆成立。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重庆市市长贺耀组等到会。协会的中心工作称有：一、如何调整今日之生产情形；二、如何使大多数之商业资本逐渐转变为工业资本；三、技术顾问之组织，以求生产技术之标准化；四、工矿资源之调查、资料之收集与书报之刊行。陈其采、雷震等31人为理事，胡西园、陈华洲等15人为候补理事；毛庆祥、徐学禹等九人为监事。

△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党务工作人员训练团，分期集训中央及各级党部人员。汪精卫兼任团长，陈春圃为教育长。15日开学。

2月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蒋当翊为第十二军副军长，李伦为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王毓文为第八十五军副军长。

△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制定本年度《推行储蓄计划纲要》，决定继续实行节约竞赛，并发起乡镇公益储蓄运动。定本年度储蓄总额增至130亿元。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袭击山东平度麻兰伪军据点，俘伪中队长以下4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40余件。

△　重庆《扫荡报》发表《日寇在我国暴行汇志》一文，首次揭露上海日军虐待四行孤军俘虏的罪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军便被日军押赴南京集中营，名为严格管理，实则生杀由之。营中生活直牛马不如，每日仅二餐糠粥，而一切非人的劳役，则悉由其驱策，稍不听从，轻则令其裸体任意鞭挞，重则活埋。日军还不以此为满足，更时时抽调一批批所谓“不稳分子”，集中枪杀，故押到南京时的460余

壮士，现在仅剩120余人。

2月4日　　蒋介石电令从优奖励宣导学生及公教人员志愿服役运动得力人员，其中有川省主席兼军区司令张群、川省军区参谋长徐思平、西康省军区参谋长王靖宇、成都市长余中英和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

△　国民政府特派戴季陶为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县长挑选第一次定年挑选及第二次考试后挑选委员会委员长，派周钟岳、陈立夫、贾景德、张厉生、陈大齐、李宗黄、王德溥、程泽润等为委员。12日，挑选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应选人成绩，计录取54人，并决定将此次录取人员予以短期训练后，分发各地工作。

△　考试院制定《考试及格人员署工作审查奖励办法》，根据该办法，组成审查委员会，史尚宽为主任委员。每年办理奖励一次，按照超等、优等、一等分别给予奖励。

△　国民政府以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穆藕初“推广植棉，创办纱厂，成绩卓著”，近年“奖进农业生产，提倡手工纺织，有裨战时衣食之筹给”，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毛泽东就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董必武，指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见我，要求林、朱、周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以后赴渝答之。郭又提及何、白皓电、西北军事二点，我则答以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　据中央社讯：日军两度侵犯湘省滨湖各地，南县、华容、澧

县、安乡、常德、桃源、慈利、石首、临澧、汉寿、沅江等县人民死伤、财物损失严重。据官方初步统计：人民死亡13.19万人，受伤3.8085万人，被奸妇女3.5185万人，奸毙妇女4237人，掳去男女8.3497万人，被焚毁屋宇7.3383万栋，损失粮食1658.9484万担，耕牛8.6512万头。湘省政府已电请行政院迅拨急赈3000万元，善后救济7000万元，以资救济。

△　中国政府访英团团长王世杰及胡霖、李惟果结束在英国活动，是日离伦敦赴美。另一部分团员王云五、杭立武、温源宁抵达土耳其。

△　美陆军部特许35架双引擎P—47式运货机一队，各载重五吨，自巴西出发，经非洲、印度、缅甸到达中国。该机队所载物资计有军火、炸药、食品、药物及飞机零件等。

2月5日　国民政府决定本年度国家总预算保留20%，此外中央及省、市机关均不得再额外追加。政府严令各机关尽量删减预算，节约开支，尤重要者在求国家预算之平衡。

△　中国银行在重庆举行第二十一届通常股东总会，到会股东511户，股数23.2021万股，官股出席代表96户。董事长宋子文主持会议，代理总经理贝祖贻报告自1927年起至1943年止之各年营业状况，并进行商股董事会及监察人改选。孔祥熙、宋子文等12人当选为商股董事，卢学溥等四人当选为商股监察人。同时，该行奉财政部令，派陈其采、徐堪等13人为官股董事，俞鸿钧等五人为常务董事，俞鸿钧为监察人会议主席。孔祥熙继宋子文任董事长。

△　是日为第三届农民节。农林部公布后方15省1938年至1943年6年间重要农作物生产总量统计：秈粳稻40.58261亿担、糯稻2.72578亿担、小麦1.176254亿担、大麦5.11509亿担、甘薯16.89334亿担、大豆2.11162亿担。并公布1937年至1942年六年间

农村肉畜产量数字：猪2.29935亿头、山羊4458.9万只、鸡8.05531亿只。

△　据重庆《中央日报》讯：兵役署副署长陈凤韶日前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学生志愿从军运动遍及全国，教导第一、二团已超出定额，拟再成立第三、四团，负责训练入营学生。

△　据中央社讯：豫东黄河大堤去岁决口，泛滥成灾，黄河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亲赴豫东主持工务，并赴泛区督饬抢修，已将荣村及宋双阁口门先后修复。行政院特予嘉奖。

△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在重庆向全国劳工广播《劳工与宪政》，称：劳工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与国家社会利益关系非常密切，必须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求早日实现宪政。

△　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下达攻击孟关的命令：本军应确保太柏卡，以固大奈河以南之桥头堡，着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进出腰班卡、拉征卡至大奈河之线；新编第三十八师应驱逐大宛河之东及南方之敌，并肃清森邦卡西北地区之敌。

△　新四军一部攻克江苏淮安、盐城一带日伪军据点七处，毙伤敌130余人，俘连长以下97名，缴获长短枪百余支。

△　日机四架袭扰湖北老河口，在郊外投弹10余枚。

2月6日　　国民党当局对林伯渠到重庆谈判事，一面表示欢迎，一面密示特务人员监视，是日作出如下部署：“（一）普遍注意渝地奸伪动态；（二）注意外人对林来渝之舆论及活动；（三）注重各党派人士对林来渝之舆论及活动；（四）注意《新华日报》对林来渝事之宣传计划予以针对应付；（五）加紧注意争取奸伪工作。”

△　拉卜楞寺藏族代表团总领队黄正清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临别播讲，表示边区藏胞愿与内地同胞共同担负复兴国家民族的重大任

务。

△　重庆《中央日报》讯：中国农民银行自1941年兼办土地金融业务以来，共对照价收买土地、土地征收、土地重划、土地改良、扶助自耕农、地籍整理及乡造产等放款6673.8851万元。本年度核定放款总额为四亿元。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克复热河省宁城县城。

△　华侨代表周锦超在旧金山唐人街招待美国名流，副总统华莱士应邀出席并发表讲演，表示："美中军队将永远摧毁自由威胁。"

△　伪杭州市长谭书奎在湖滨公园被刺毙命。

2月7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绝密会议，决定林伯渠到重庆后的应付对策：一、密令在西安特务人员监视；二、到重庆后借招待之机，指定住所，派宪兵任警卫；三、发动与林有关之党国元老，劝林脱离延安；四、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五、控制其与外人接触，若与外人谈话，事先须予以劝导；六、请其到中央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七、利用国民党可掌握的人士劝告中共放弃军、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

△　我国"中山号"自由轮首航驶抵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驻美大使刘锴、驻纽约总领事于焌吉与中美人士百余人在巴尔的摩港举行庆祝会，欢庆首航成功。按："中山号"自由轮系租借美国之巨轮，排水量1.1万吨。

△　四川省南充县奚致和捐助国币50万元、西充县鲜伯良捐助国币20万元、陕西省蒲城县许润生捐助国币11万元兴建学校，国民政府是日予以明令嘉奖。

△　监察院监察委员视察陕、豫、鄂、皖、冀等省归来，是日向记者叙述沦陷区灾情。其中以河北省为甚，受灾区域已达三分之二，

灾民2000余万；大名、长垣、束鹿、濮阳各县收获仅有二成，有达五成者，如静海、丰润等地。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攻占卡甸渣加。16日又在太柏卡以东河套地区歼灭日军100余人。

△　新四军一部在苏北盐城附近设伏，将开赴该地的伪第三十六师第一〇七团代团长张辛如以下12人击毙，生俘伪区长二名，士兵38名。

△　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沙河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因病在山东莘县病逝。3月17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马本斋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送挽联。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使第六十一军梁培璜部进犯太岳区浮山东南之西马、合鹿地区。8日，在赵城村、庞家垣地区被八路军击退。

△　《宪政》月刊社举行第二次宪政座谈会，由黄炎培主持。关于省自治问题，瞿绍伊及向乃祺认为，《五五宪草》中规定省长由中央任命而非由民选一项，与《建国大纲》不符。中央大学教授吴斐丹发言称："实行计划经济又必须有民主政治，使人民了解、讨论以至于拥护此种计划经济政策。"

△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开会，决定成立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并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章程》、《粉碎军部特务政策声明书》等。

2月8日　　宋庆龄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阐明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的密切关系，呼吁美国工人"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军队，不论他在什么地区"。

△　朱德致电阎锡山，指出阎部第六十一军的三个团与中共太岳

军区的薄一波部队小有接触后，薄部即后退，而第六十一军仍节节迫近，请予制止。

△　重庆《时局新报》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拟定华北灾区社会重建计划：一、工赈——修渠、探井、凿塘、筑堤等；二、农赈——组织互助社；三、急赈——散放粮食、衣物或设院收容妇孺老残；四、医药——组织巡回医疗队。其工作区域以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近及曾一度沦陷之地带为救济区域。

△　中央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湘省滨湖各县灾情严重，中央及省当局已先后拨款3460万元，交由湘省府与赈济委员会第十救济区特派员何绍南会同发放。各县中以常德灾情特重，中央曾专案拨发急赈费400万元。

△　汪伪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决定设置农业增产策进委员会，任命顾宝衡为委员长。

△　罗斯福在华盛顿宣布：彼已签署废除《限制华人入境案》之宣言，并规定本年及此后各年度之华人移民额为每年105人。

△　美联合援华运动委员会主席牟康诺吉在纽约发表谈话，称：1943年度该会汇华861.2155万美元，较1942年多350万美元。

2月9日　　国民政府明令陆军中将、上将衔薛岳晋升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

△　外交部宣布：中国与伊朗互派使节，伊朗首任驻华公使为伊外交次长艾宁纳。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日军有进攻西北之企图，阎部东进，目的在于挑起内部冲突，缓和日军进攻，我们万万不可中计。阎部东进无论多少，我们应该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部长梁寒操对记者讲述宪政促进运动称：去秋国民党中央全会决定于抗战结束后一年内颁布宪法，实施宪政，故于最高国防会议下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该会于今年元旦起，发动全国研究宪草。参事张平群答记者问，告中国劳工情况：截至去年底，已登记各种工会团体共有2864个单位，会员共有102.7万余人；在大后方工作的工人大约有30万名。

△　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会员江恒源提出之要求政府从速设法完成并充实地方各级民意机关决议案。10日，又通过关于先在后方大都市试行完全自治决议案，并决定先在成都试办。

△　重庆《时事新报》载：四川矿业萧条，仅嘉陵江区域就有56家停业，近期又有嘉陵煤矿歇工，天府、宝源等大矿亦不胜赔累。

△　第一战区一部攻克河南滑县。

△　新四军第四师一部全歼伪淮海省剿共第一纵队第二总队刘夫庭部一个团，并攻克尤集据点。

△　日机14架由晋窜陕，在南郑县上空被中国高射炮射击，并在近郊投弹20余枚。10日，又有七架袭击西安，在西郊外投弹30余枚。

△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决定，成立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对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进行调查，以备战后交人民公审。

△　罗斯福通过史迪威转告蒋介石，要求允许英、美军立刻向西北派遣代表团，理由是华北和东北是日军主要聚结地区，美军非常需要那里的情报。

△　美军尼米兹将军对中央社记者称：美军志在横渡太平洋，在中国获得基地，以最后击败日本。并称：吾人将设法在中国之任何可能地点登陆，此无庸保守秘密。

2月10日　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亲临主持，第三、四、五、六、七、九战区高级将领参加会议。会议对常德会战进行了检讨，并对今后阶段的对日抗战进行了研究。蒋介石指出："我们现在实已到了全面反攻的时期。我想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蒋还指出决战阶段的战略特点，就是要采取主动，把握机会，多用小部队，断然出击。蒋介石还提出了对敌反攻的两个方案，即当敌先发制人，轻举进犯时，各战区应精选两个军，纵深配备，蹈瑕抵隙，断然深入敌之基地；当敌军不动，严阵待攻时，各战区应精练选锋，加强战斗力，攻占敌人的重要据点。14日会议结束。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宪草座谈会，吴铁城认为："本党领导革命，以实施宪政为主要阶段。""我国宪政之渊源在于国民党所领导之革命，而深植其巩固之基础，则须对国民作普遍深入宣传。"

△　国民政府拟定利用外资方案，内称：全国中外工厂不过3000家，计每1.3万里或每15万人仅有工厂一家。若以产品价值与世界比较，每人每年所消费国货工业品不及二元半，与美之344美元，英国785英镑，苏联287卢布及日本347日元，皆相距甚远。我国应利用外资发展国力，对于国外的机器工具，尤应大量购置。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并明令废止1929年1月29日公布实施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

△　蒋介石向三青团中央发布指示，提出本年度该团的中心工作为推行新生活运动、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并辅以展开青年学生从军运动及促进宪政。

△　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成立，该支团所辖除重庆外，尚有川东40县，共有40分团，三直属区队，团员2.63万余人。

△　重庆《扫荡报》记者走访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

国，郑陈述中国军队驻印军作战情况称：我驻印部队士气高昂，莫不以打通滇缅路凯旋归国为其最大决心。如缅北丽都路之修筑以及目前缅北打罗、太白佳等处的收复，日军第五十五、五十六联队（一部）之被歼，敌联队长之被击毙，实为有力之见证。

△　内政部政务次长张维翰结束对东南及西南各省政务视察返渝，是日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县各级民意机关不难于成立，而要在如何切实指导，俾能熟谙《民权初步》及四权行使练习。否则，虽然成立也不过徒具形式而已”。

△　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在纽约对美国工商界名流发表演说，称：国防与国民福利乃驱中国手工业化之途之两大动力。而中国军事力量及国民经济之弱点，即为不能得到科学技术与组织之助益。

△　重庆《大公报》发表《五五宪草中的中央政府》一文，建议：一、为使宪法有保障，立法院的职权要充实。二、为加强监察权行使，必须：（一）监察院得接受人民的诉愿，经调查有据而提出弹劾案。无须另设情报机关。（二）弹劾案得发表。（三）宪法中应将惩戒程序具体规定，保证监察院之弹劾权。三、在五权宪法中应对总统及行政院长之间的权责关系多加考虑，以免总统陷入院际纠纷中。

△　重庆《大公报》发表《论物价指数存款之建议》一文，提出解决物价上涨的办法“必须着眼于如何使其上涨的程度与速率减至最小限度，并充分打击囤积投机者，以消灭人为的物价高涨”。并批评物价指数存款是“表面上好看而实际上行不通的理论”。

△　新生活运动总会所属之盟军之友总社在重庆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

△　新四军江都独立团一部在苏北高邮八字桥伏击伪军，全歼其一个营，俘虏260名。

△　琼岛旅渝同乡会开会纪念海南岛沦陷五周年，由新近来渝的琼崖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报告全岛军民五年来的抗日事迹。

△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中支部成立。

△　日机10余架乘夜分四批袭击江西赣县中国空军基地。中国空军即起机迎战，击落日机一架，驾驶员三人殒命。

△　汪伪政府行政院召开清乡工作会议，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鲍文樾等参加，日军顾问紫山、前田亦出席。周佛海代读汪精卫训词，声称要把清乡地区作为“大东亚作战的前线”。11日会议结束，《中华日报》发表题为《今后的清乡工作》的社评，称：今后清乡工作要求更进一步，必须在军事与政治之外，特别注重经济。

2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由部长梁寒操、副部长程中行主持。交通部长曾养甫报告过去一年交通建设情况，共计修建完成铁路350公里；西北重要边区公路完成过半；增辟嘉陵江及金沙江航线；开辟中印空运；举办西北驿运站。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耀明为第三十八军军长。

△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举行常会，由张伯苓任主席，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社会部长谷正纲报告该部最近的行政设施为：社会法规的制定与修正、人民团体之组织、社会救济之推进、合作事业之发展等。

△　中美航空队袭击香港、九龙，击毁日机五架。

△　朝鲜独立同盟华中分盟第一次盟员大会和朝鲜义勇队华中支队成立大会在淮北举行。支队长李成镐在大会上讲话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毛泽东的路线，就是朝鲜人民的路线。”

△　据中央社讯：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在上海召开日军官联席会，决定掠夺华中物资的基本方针：一、利用“中日新关系”，促进收买工作；二、尽量使用沦陷区人力、资源，配置各重要部门；三、加强联络，以有限资财收十分效果。

2月12日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互换《中比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杰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华盛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山西辽县曹家寨附近伏击日伪军抢粮队，毙日军中队长以下40余名，俘10余名。

△　拂晓，河北固安、永清、霸县、新城、雄县、高碑店等地日伪军1400余人，分六路合击霸县西北之义店一带八路军冀中第十军分区部队驻地。八路军迎头痛击，共毙伤日军中队长、伪治安军营长以下官兵250余人，伪治安军一团长负重伤。

△　中国空军一队出动轰炸闽江口外日舰队，当即击沉、击伤六艘。同日，空军在浙东击沉日舰一艘。

△　日机17架袭击广东南雄，在郊外投弹多枚，毁民房数间。

2月13日　国民政府特派翁文灏为民国三十三年第一次高等考试初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派吴尚鹰、林彬、楼桐荪等18人为委员。又派定郭有守、黄朴心、黄麟书、程时煃、许绍棣、鲁荡平、郑通知、万昌言分别为重庆、成都、桂林、曲江、泰和、云和、鲁山、兰州、立煌八区高等考试初试典试办事处处长。

△　由邵从恩、张澜发起组织的成都市民主宪政促进会成立。邵从恩为主席，张澜、李璜为副主席。21日，张澜发表谈话，认为“今天急切需要者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只有从这一点着手，民主

宪政才能成功”。

△　国民党兰州市党部成立，张文郁为书记长。

△　汪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佛海命令汪伪军委会政治部保卫局副局长胡均衡，今后“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

2月14日　重庆《中央日报》载：四川省田赋征借总额已达1500万担。省府除将收足配额及收达九成半以上各县征实出力人员汇报中央从优奖叙外，对于短收及成绩低劣县市特别派人前往宣传，各县市如再玩忽，定以贻误要政从严惩处。

△　重庆《中央日报》载战时陕西工业情况：工厂由战前72家增至246家。战前各厂资本总额为1913万元，动力总和为1427匹马力。现各厂资本总额已达9639万余元，动力总和为1.1879万匹马力，外加汉中、西京电厂3570匹马力，应有1.6449万匹马力。

△　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第六十六团、第六十五团及新编第三十八师山炮连组成的左翼队，攻击缅北孟关，是日在山尼河附近歼灭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一部。18日继续进攻，直迫魁邦河附近地区。

△　苏北新四军一部克复涟水。

△　冀东八路军一部克复昌黎。

△　日军突袭山西榆次侯峪村，打死村民14人。

△　日机分四批分别袭击湖南湘潭、长沙、攸县、衡阳、零陵。同日，又有20架袭击广西平南，在郊外投弹多枚。

2月15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通过设置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王正廷任主任委员。并通过《国民普遍储蓄运动规程》、《战时火柴专卖

暂行条例》等。

△　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在招待记者会上宣布：该会所属厂矿共计105单位，其中工业40单位，矿业42单位，电业22单位，运输业一单位。

△　交通银行举行通常股东总会，由董事长钱永铭主持，总经理赵棣华报告自1937年起至1943年止各年业务状况。会议通过1943年财政增加官股国币4000万元案，并改选商股董事及监察人。钱永铭等12人当选为商股董事，徐柏园等四人当选为商股监察人。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主力向胡康河谷东南地区挺进，先后歼灭日军第五十五联队300余人，并于大奈河西岸击退日军一个加强中队的阻击。

△　据中央社讯：湖北省主席陈诚指定专家多人会商战后大武汉建设计划，历时数月，基本拟就。其内容一为有关政策，包括经济、土地、独占事业、社会、劳动、文化、住宅等项；二为建筑规划，其宗旨要使武汉成为工业之中心。市区范围约为60平方公里，容人口1000万以上。

△　美东路空军指挥部司令斯特拉特梅耶少将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将在此战场以装甲之运货机、巨型新式运输机载大量物品自印度飞往中国。

△　是日为首届戏剧节。教育部优良剧本审查委员会公布《桃李春风》、《蜕变》、《杏花春雨江南》、《金玉满堂》四种剧本作者及导演均获奖。

△　英国科学家尼德汉博士及陶德思教授去年2月来华，商洽中英科技合作事宜已略具基础。尼氏将主持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加强中英间科技交流，俾互通有无。

△　新疆海关成立，下辖阿山、塔城、伊犁、乌什、喀什等分关。

2月16日　何应钦与董必武谈判，表示欢迎延安来人谈判，说驻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已撤回四个师，并解释取消办事处电台是为防止泄密，各军办事处都停，不单对第十八集团军这样做。董必武则说，我重庆办事处名义上是军队电台，实际上是政治电台，不同于各军办事处电台。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袭击热河凌源伪军据点，将其新编行动队全部消灭，俘74名。

△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与苏联代表马克罗夫订约，以总价170万美元购买新疆乌苏县独山子油矿属苏方的建筑与设备，中国方面于2月21日接收完竣。

△　重庆《中央日报》载：东北四省自去年以来旱、虫灾严重，吉林一省灾区达10余县，灾民约百万人以上。四省秋收仅占1941年的60％。入冬以来，灾民饿毙冻死者日以数千计。而日军自东北运至日本的大米达140万担。

△　中央社讯：兰州西北师院教授何乐夫及学生数人在洮兰公路沿线山沟谷掘获新石器时代之古物百余件，计有彩陶、素灰陶、浅黑陶及石斧、石刀、石镰、陶弹、陶丸、石镯、骨针、骨料、火烧骨等，并发现灰层、灰坑洞穴及后汉遗址等。

△　黔桂铁路独山至都匀段通车，计70余公里。至此，黔桂铁路通车四分之三以上。

△　是日至20日，日机四次轰炸河南临汝县城，炸死炸伤居民甚重。

△　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卡德完成在中国和苏联的考察后，是日在

重庆对记者盛赞中国人民与战士的英勇精神，称：“中国军士体格强韧，中国人民为伟大之民族，其爱国心尤超越常度。”

2月17日　　重庆《中央日报》公布行政院、军事委员会核定的《严防粮食资敌要点》，规定：禁止输出国界及封锁线之粮食为米、谷、麦、豆、面粉、小麦、玉米、高粱、大粟等及其制成品；凡通谋敌国而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粮食出国界或封锁线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其粮食及财产，包庇纵容者一律同罪。

△　中国、加拿大使节升格为大使。国民政府是日特任原任公使刘师舜为驻加特命全权大使。26日，刘向加拿大总督麦肯齐·金呈递国书。

△　据盟利社讯：伪满日军为加紧对蒙古文化侵略，特组织各种蒙古词调查委员会，拟以日语为根据，将现行各种蒙古语“整理”成为统一的混合式语言，在伪蒙一带推行。

2月18日　　蒋介石为纪念新生活运动十周年发表广播讲话，强调“新生活就是战时生活，亦就是现代生活。不能实行新生活，就不配生存于现在的时代，不能立国于现代的世界”。勖勉国人厉行普遍储蓄，实行义务劳动，人人成为现代的新国民，建设现代的新国家。

△　国民政府在全国发动各乡镇公益储蓄运动，旨在增进乡镇公益，配合新县制之推行。要求各地省、县、乡党部积极引导，率先认储，以树风声。

△　国民参政会主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访美归来，是日抵昆明，22日抵渝。23日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盛赞美国战时生活之简朴，一切食用品皆由政府精密统制，定量分配。并告美国各大学未曾入伍的学生约占四分之一，女生应征者约七万人。

△　伪满政府决定将鞍山昭和制钢所、本溪湖煤铁公司、东边道

开发株式会社合并，成立满洲制铁株式会社。4月1日，该社成立，资金7.4亿元。

2月19日　　汪伪政府内部矛盾重重，皖省主席高冠吾被排斥垮台，遗职由伪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接任，罗之遗职由张一鹏接充。伪皖省会由蚌埠迁芜湖。

△　日本公布截至1943年9月止，在华日侨人数共63.9909万人。

2月20日　　粮食部奉蒋介石指示，拟订《县长办理粮政奖惩事项》，关于应奖事项规定共29项。要者有：办理征实征购超过数额者；征实征购提前办竣者；奉拨军粮如期、如数、如地拨清者；防止粮食资敌卓著成效者；管理市场得力，无囤积居奇、黑市操纵者；督导大户按时出售余粮而有成绩者；督导粮商营运使供销平衡者，等等。与本规定事项相反者，则应受惩戒。

△　外交部征得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英辖殖民地锡兰首邑哥伦坡设立领事馆，并以翟凤阳为领事。

△　据中央社讯：各省田赋征实、征借、征购自去年9月陆续开征，至今各省征收数额平均达八成以上，宁夏、江西两省均已超出定额，河南、四川、绥远、福建、安徽等省已达九成九以上。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击溃魁邦河附近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一部，敌伤亡百余人。21日后该师所部在腰班卡附近地区又歼灭日军200余名。

△　重庆《大公报》载：日人自1937年7月起在华投资共为15亿元。东北、华北、华中日方经营的厂矿计325家。资本额厂为5.4312亿元，矿为1.9685亿元。

2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开会，吴铁城主持，何应钦、梁寒操、叶楚伧、潘公展等出席。决定责令何应钦、梁寒操草拟中共中

央“违背诺言”（即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的四项诺言）的声明，并决定以国民政府发言人谈话的方式发表。

△　国民党中枢举行总理纪念周，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报告设计工作，提出1944年度设计工作的要点为：一、充实本局人员与资料设备；二、编订复员总计划；三、草拟国家战后五年建设计划纲要。

△　国民政府任命郭德华为外交部驻粤桂特派员。

△　梁寒操在重庆社会服务处讲演宪政问题，宣称：《五五宪草》的依据一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　国民参政员、成都市民主宪政促进会副主席张澜在成都发表谈话，认为只有从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着手，才能使民主宪政成功。

△　史迪威再次下达攻击缅北孟关的作战令，以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翼，主力向南攻击，包围孟关之敌而歼灭之；以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翼，其主力渡过大宛河，向大奈河及南比河右岸地区之敌攻击；战车第一营附第六十六团第一营于大奈河附近秘密集结，待命迅速向南沿孟关、瓦鲁班、沙杜渣出击。

△　美军飞行员克尔驾机在轰炸香港时被击落，克尔跳伞后被广东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营救。半月后安全归队。

△　蒋介石手令行政院，着将宝（鸡）天（水）路今年预算工款于两个月内提前拨足。

△　日陆军部宣布：天皇已亲任东条英机首相兼陆军参谋总长，后宫淳大将为参谋次长。同日，日海军部宣布：天皇已亲任岛田繁太郎海相兼海军军令部长。原陆军总长杉山元、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调任日天皇之最高军事顾问。

2月22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熊斌免职，任命祝绍周为省府委员兼主席。29日，祝抵西安。

△　蒋介石电复罗斯福，同意美国派遣军事视察团来华搜集敌情。

△　兵役署颁订《归国侨胞服役办法》，规定：一、凡被征召之侨胞，不使入营服任现役，另派以军事辅助勤务；二、生长于海外之侨胞，正在国内学校肄业者，仍从《兵役法》学生服兵役之规定；三、凡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单独一人携眷返国之侨胞，负家庭责任者，经查明确实，暂准缓役。

△　据中央社讯：民国三十二年度第一次高等考试初试及格人员，在中央政治学校受训期满参与再试及格后，已由铨叙部呈请考试院转呈国民政府核准，分发中央及地方各机关任用。计分发中央各机关者78人，地方各机关者13人。

△　西北建设考察团任务完成，是日返抵重庆。该团于去年6月出发，历陕、甘、宁、青、新五省，历程1.8万公里，最后草拟报告书，计15册。

△　拉卜楞寺所属108寺代表团团长黄正清及纳格苍活佛等五人离渝飞兰州。该团在渝近50天，曾谒党政机关要人，并与各文化学术团体取得联系。

△　中国合作事业协会举行第四届会员大会，到会会员500余人。通过《改善合作金融并建立合作金库制度》、健全合作社之组织并加紧社职员之训练等案。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团越过宛托克山，进入胡康河谷地区。同日，与日军一部发生激战，并逐次击溃日军第五十五联队冈田大队余部及余菊大队主力，攻占腰班卡。

△　新四军一部攻克苏中大顺集伪军据点，俘分队长以下140余名。缴获长短枪120余支。

△　日军在台湾设立台湾军总司令部，由谷正清任总司令。

△　丘吉尔在英下院作战局报告，宣称英、美、苏三盟邦现在都坚决团结一致，对我共同敌人采取一致行动，并且抱有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

2月23日　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业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饬行，是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对于日军之一切罪行作积极普遍之调查，详加审核，俾将来对于罪行者予以惩处。该会直隶行政院，设委员11至15人。行政院指定王正廷、谢冠生、管欧三人为常务委员，王正廷为主任委员。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该部参事张平群在回答记者所提“中央训练团的组织目的如何”问题时称：中央训练团实为一教育机构，其目的在于集合各方具有相当学识、经验及办事能力之人员予以深造，使成为建国复兴及实施宪政事业中的干部。过去五年内该团毕业学员共有2.2万余人。全国各地有1200个训练单位，已受训者达116万余人。

△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第二十六届红军节。同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举行招待会，纪念苏联第二十六届红军节，蒋介石特派商震出席，孔祥熙、孙科、王宠惠、何应钦、冯玉祥等300余人应邀出席。

△　拉卜楞寺所属108寺代表团长黄正清在兰州对记者谈话称：中枢即将在夏河设立医院一所，在拉卜楞寺设立青年喇嘛职业学校及汉藏文编译机构各二所，交通、畜牧等改进计划亦在分别举办之中。

△　缅北中国驻印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右翼队击退日军第五

十五联队之阻拦，攻占大林卡。24日进占贾昆并突破日本据点数处，歼敌数十人，渡过大宛河。

△　新四军一部攻克苏北涟水城北王集伪军据点，俘伪营长以下500余人，缴获步枪270余支。

△　佛学大师欧阳渐（字竟无）在四川江津逝世。

2月24日　军政部拟定学生军教育实施计划，其主旨为：一、以现行之典范令为基础，佐以必要之辅助学；二、熟悉战斗及射击动作；三、熟知步兵兵器性能与操作；四、精神教育以坚定意志，效忠党国，服从领袖为主。教育期为三个月。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实施宪政必须具备三个前提：一、给全国人民民主权利；二、开放党禁；三、真正实行人民自治。同日，吴玉章向记者指出：欲进行对日反攻，争取抗战胜利，一定要实行民主，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义的宪政，这是我们历来的主张。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是抗战建国实行宪政的基本条件和必要前提。

△　经济部工矿业产品展览会在重庆开幕，部长翁文灏出席并亲自招待来宾，展览共分资源、煤矿、石油、钢铁、非铁金属、特种矿产、化工、电器、电力、机构10个馆。

△　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兼驻多米尼加公使李迪俊，是日向多总统呈递国书。

△　汪伪首都宪兵司令部改称中央宪兵司令部，陈皋、马啸天为正、副司令。

2月2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耀武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彭位仁为副总司令，沈发藻为暂编第二军军长。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三年来粮政，称：三年来政府掌握之粮食，为数甚属可观。1941年征集之谷麦为5200余万石；1942年征集数量为7100余万石；1943年度估计征集可得7600万石左右。地方积谷一项，截至本年1月底止，有四川等19省、市已清理就绪，计谷1537万市石，麦21万市石，杂粮34万市石。本年度可望增储谷麦200余万市石。

△　重庆《大公报》报道资源委员会抗战以来之成就：该会资金已达10亿元，事业单位105个，包括属于重工业范围的工、矿、电三大项目，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其中技术成就有：机构专题研究19项；电机专题研究13项；化工研究14项；矿冶技术研究11项。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张伯苓、江庸、莫德惠、郭仲隗、李中襄等20人出席，江庸任主席。首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办理建议案情形；次由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继由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报告该部工作及1944年度施政计划。

△　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在重庆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告以中国军队在印度的作战、生活状况，称：驻印军中官兵生活较国内优良，军事由美军官予以训练。

△　中国访英团团员王云五、温源宁、杭立武抵达安哥拉，对土耳其进行考察访问。

△　联合国任命中国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为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副署长，负责总署秘书处事宜。

△　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在重庆举行首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推选陈其采为理事长，并推选常务理事、总副干事。

△　据中央社讯：中国驻印军力谋打通滇缅路，未足两月业将泰洛河谷全部及胡康河谷半部之敌肃清，使通华新动脉之利多公路更事

伸展。

△　盟机一队空袭芜湖，适有军用车一列由南京开来，当被盟机全部炸毁，内有敌军1500人全部毙命。旋敌机六架赶到，被盟机击落二架。

△　日本内阁常会会议决定通过《决战非常措施纲要》，凡15条，要点为：一、动员全国学生参加战时工作；二、加强防空；三、强制节约及促进与调整粮食供应办法；四、荒地利用；五、停止奢华娱乐；六、加强运输能力，以应急需；七、刷新并加强战时运输工作；八、授地方政府以中央行政权；九、现在资源之积极利用；十、加强行政考核与严格执行奖惩。

2月26日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县政府及军事、交通等机关，以后凡有公共营造之修筑机场、铁路、公路等，倘遇古物发现，应电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处理，并收归国有，以免散失。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在河南杞县宋吉屯歼灭日军一个小队。

△　美国《民族杂志》发表史蒂华撰写的《胜利须在中国争取》一文，认为："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的正规部队除在装备上较差些，在组织上与指挥上和中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相等。与正规军配合作战的游击部队，数量比正规军还大得多。他们指挥得力，纪律良好，能发挥最大的军事效果。"

△　据中央社讯称：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战俘肆加虐待。被俘如身体强壮，堪充劳役；如受伤者均被就地刺死。在武汉之被俘者稍有小病即被隔离，既不医治，亦不予饭吃，直至奄奄自毙。

△　驻加拿大新任特命全权大使刘师舜在渥太华向加总督呈递国书。

2月27日　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李鼎铭、吴玉章、续范亭、徐特立、贾拓夫、陆定一、周扬等50余人参加。一致主张实行宪政首先要实行三个必要条件：一、给全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二、开放党禁；三、真正实行各地方人民自治。

△　四川省政府命令各地切实检举囤积居奇、投机操纵者，并限令大户出售余粮，严禁非法交流。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亲率左翼队挺进孟关敌后，是日偷渡大宛河成功，并夜袭中马高日军据点，日军猝不及防，仓皇逃遁。

△　旅美华侨中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代表37人在纽约开会，讨论华侨教育及海外党务，并捐美金1.5万元救济祖国难民。

2月28日　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陈仪在中枢纪念周报告1944年度党政考核的中心工作为：一、属于一般的，加强行政三联制之实施；二、属于中央的，加强国营事业、专卖事业及新兴事业之考试；三、属于地方的，考核党务基层组织，推进地方自治及实施新县制等。

△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召集重庆商会、生丝、药材、猪鬃、牛羊皮等输出业同业公会代表会谈，讨论促进出口贸易问题，并决定组织进出口贸易协会，以在主管贸易机关指导下共谋发展。

△　重庆《中央日报》讯：兵役署以学生从军运动踊跃，拟成立教导第三、四、五、六团。第三团在重庆北碚筹设，主要容纳来渝学生；第四团在西安设立，主要容纳陕、晋、鄂等地从军学生；第五团主要容纳东南各省从军学生；第六团设在昆明，主要便利西南各省学生就近入伍。

△　国民政府以欧阳良烺近年潜入敌区，办理汉口党务，“乃以事漏被逮，备受酷刑，终遭戕害”，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梁寒操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研究宪法，实习宪法》，宣称：“研究宪法首当树立基本信念。”同时，还“应当认清本国国情”，“应注重国家民族利益”。又称：“实习宪法要养成守法习惯，发扬忠恕精神。绝不可为一党一派之私或为一人一己之利，不择手段以法乱纪。”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二分区一部收复山东朝城县城。

2月29日　军政部计政会议举行大会，通过特别委员会所提重要案件多件，计《增强计政实效办法》、《核实开支办法》、《军事计政准备工作及战后复员要点》等。3月1日会议闭幕。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赖汝雄为第七十八军军长。

△　洛阳海关奉命在皖北阜阳成立分关，并将在正阳关、六安等地设立分卡。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左翼队攻克下马高、巴班、拉曼渣卡及瓦卡道三线地区和拉树卡、沙鲁卡道、山那卡等30余处日军据点，直逼孟关东南侧的瓦鲁班附近。

是月　国民政府决定将平准基金委员会并入外汇管理委员会，公债筹募委员会机构缩小。

△　中国政府征得伊朗同意，特在该国麦什特设立领事馆，并以前驻苏大使馆秘书田宝齐为领事。

△　国民政府拨款156.6万元，救济浙江灾荒。

△　财政部决定本年度征收土地税总额为4.2亿元。

△　四联总处本年度推行乡镇公益储蓄目标为100亿元。其中以四川省最多，为24亿元；山西省最少，为1.5万元。

△　教育部核定《大学教授、副教授自费出国进修办法》，规定：抗战期间研究社会科学之教授、副教授暂缓出国；已出国之教授、副教授，一切言行须绝对接受监督处及使馆之管理与指导。如有违背三民主义之言论及越轨行为，经查明属实，立即取消留学资格并勒令返国。

△　教育部战区学生指导处自1940年7月成立至今，共收容学生达12万人。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自成立至本月，击沉、可能击沉及击伤日船舰逾2000艘，约60万吨；毁日机866架，可能击毁者420架；本身损失116架。

△　日本鉴于南方战局恶化，将关东军驻锦州的第二十七师团调至华中作战，驻齐齐哈尔的第十四师团调至澳大利亚北部，驻辽阳的第二十九师团调至中部太平洋岛屿。又将驻东北各师团各抽出步、炮、兵，混编成七支派遣队，开赴中部太平洋岛屿。

△　日军和伪军“讨伐”队包围伪热河省兴隆县洒河川，逮捕民众2000余人，集体屠杀120人，其余均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　日军强令广东、福建两省农民种植罂粟，每户须种一亩，多者不限，并以金门五星海为“示范园”。又在厦门组织株式会社，制造烟膏，运入内地。

△　北平发生粮、油、煤荒，天桥一带居民有食野草、树皮者。汉奸组织“政务会”发行粮食证券，已逾二亿元，借此掠夺农产品，益增民食恐慌。

3月

3月1日　　中央训练团成立五周年，蒋介石对该团留渝学生发表训话，称："我全体毕业学员，应深切反省是否达到受训之目的与本人之期望。""深望大家今后更自警惕，其对本党对国家责任之重大，发挥训练精神，培养建国能力，尤以注意纪律与组织及服务道德，以达成抗战建国之伟大使命。"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之下，国民党不得不允许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然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间，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中央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在我党周围，达到战胜日帝和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　史迪威驻华总部宣布：在广西设立云南干训团，此校为训练中国地面部队之第二所，系奉军事委员会之命为训练中国陆军军官而设。管理方面由中国陆军负责；课程方面由美国陆军军官担任。蒋介石任团长，张发奎任副团长，罗卓英任教育长。美方负责人为安默斯准将，巴斯特布鲁克副之。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认为中国似尚具备民主国家的形式。梁寒操答复称：很多友邦人士对于中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尝不免有所怀疑。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民主国家来中国，看到许多情形与他们国家颇有不同。但我可以告诉诸君，中国乃是一个正在建筑中的最民主的国家，只是目前尚未建筑成功而已。

△　重庆《扫荡报》发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五年来训练毕业学员统计数字，计党务2449人；团务718人；行政970人；民政995人；司

法234人；外交56人；金融财政1150人；经济建设712人；教育2035人；训练1451人；交通667人；农林54人；地政21人；社会273人；卫生129人；粮政102人；军事3042人；军法13人；航空29人；海军八人；政工2470人；军训754人；兵役216人。

△　八路军一部攻克河南辉县临淇镇等处日伪军据点，毙中队长以下30余名，俘九名，缴获各种武器300余件。

△　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工人因资方将车票增价数倍，但工人工资增加甚微，又受日伪压迫，生活困苦，是日正式罢工，要求资方将工资按车票增价比例同增，并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　孙科在重庆创办《民主世界》月刊，由钟天心为社长。

△　美国对外经济局长克罗莱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谈话称："增加对华援助终已获得成效。1943年最后三个月中，由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之货物较以前九个月为多。"并称："吾人唯有增加对华援助，始能打击日本之心脏。"

△　中央通讯社在宁夏设立分社，是日开始发稿。

△　伪满政府将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解散，设立满洲农地开发公社，投资5000万元。

3月2日　　重庆《中央日报》载：资源委员会为测勘全国矿产，在贵阳特设矿产测勘处。四年以来，在云、贵、湘、康等省概测面积达9.796万平方公里，详测面积2490平方公里，代测国营矿区38处，共计面积118平方公里。

△　大后方现有钢厂10家，铁厂20家，其中国营者仅占三分之一。不论国营、民营皆陷绝境。一钢铁专家是日在重庆对记者称："今日钢铁问题不在技术，而在通盘配合与各部门有计划合作。"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敌后军民的道路——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指出：革命军队把打仗与生产结合起来是一贯的传统，是战胜日寇灭绝人性的扫荡所造成的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

△　《中阿（富汗）友好条约》在土耳其首都安哥拉签字。

△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爵士奉召回国述职，是日对记者谈话称：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作战首属英勇。并称：战争前途尚多艰苦，但胜利必属中国和同盟国家。

△　汪伪政府聘请日本小仓正恒为最高经济顾问。4月17日，小仓正恒抵南京。

3月3日　　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偕省府委员彭昭贤、刘霭如、王友直、杨尔瑛、刘楚材、孔令恂、张大同、刘恺钟及秘书长林树恩到省府履新。祝对记者谈话表示：今后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役政、粮政、水利、交通等要政，悉以充裕民生，健全国防，树立民治精神，奠定宪政基础为职志。同日，西安各报发表社论，建议新政府：一、军政配合，贯彻政令；二、管制物价，安定民生；三、惩治贪污，清明政治；四、官民合作，善用民力。

△　立法院会议通过修正《战地守土奖励条例》，其中修正后第二条规定奖励的种类为：一、晋级；二、授官授职或授官衔；三、建就纪念坊塔；四、颁给奖章；五、题赠匾额；六、发给抚恤金；七、给予奖金；八、免除子女教育费。

△　中国访英团团员胡霖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谈对华供应问题。6日，该团王世杰在谈话时称：仅赖美国空运，实不足以运输中国所急需的重型机器及其他物资。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向中央社记者谈缅甸战况：中国驻印军与

英美军并肩作战，三周来克复塔奈河前线75哩之土地。一部已攻抵孟关北六哩之蒙滩；另一部已占领曼宁河南岸之占停及丁克来卡，并继续向前推进。

△　缅北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命令美军第五三〇七支队向瓦鲁班攻击前进，华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向于卡日军攻击。是日攻克于卡并向瓦鲁班急进，对孟关形成深远包围。孟关日军第十八师团一部据险顽抗。

△　苏中如皋民兵与各界人士组成反清乡同盟，提出八条盟约：一、不伪化；二、不投降；三、不动摇；四、不逃跑；五、参加民兵斗争；六、清除汉奸特务；七、救济被难同胞，八、党政军民密切团结。

△　美国陆军总长史汀生在华盛顿对记者发表谈话，盛赞中国军队之英勇抗战，并称：租借装备现由中美两国飞行员飞运中国，数量日益增加。对日战争之大部责任须由中国担负。

△　汪精卫赴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就医。4日，帝大医院为汪施行手术。

△　美国政府为制止美金在华黑市特发行美金新钞，只许在中国境内流通。

△　据中央社讯：重庆市共有16.449万户，95.0614万人；男58.9489万人，女36.1125万人。

3月4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施中诚为第七十四军军长，李天霞为第一〇〇军军长。

△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袭击海南岛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0架。

△　华侨兴业银行兰州分行开业，协助发展西北实业。此为侨资

开发西北之先声。

△　中国空军一队轰炸安徽芜湖，炸毁日运输舰、大轮舰各一艘，并击毁火车站，毁火车头两个。

△　盘踞山西柳林之日伪军进扰石家峁村，在水井里施放慢性毒药。全村24户人家86人中，有16户39人中毒，11人死亡。

△　洪都拉斯废除《限制华人移民法》。

3月5日　　缅北孟关克复。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以强炮火力分三路向孟关发动攻击，战至下午占领孟关，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之两个联队主力大部，仅一部突围至瓦鲁班方向。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左翼部队从拉班卡分兵两路，一路进至泰诺，一路从东、南两面向西北围攻瓦鲁班，断绝由孟关南窜日军的归路。

△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宪政运动问题，提出在大后方要利用旧民主，强调国会制度，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谈到时局和方针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给国民党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声明对共产党问题要政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斗争没有弄好，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我们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

△　新四军第一师集中五个团的兵力，组成三个纵队，发起车桥战役，攻克苏北淮安县东南之车桥镇，全歼防守车桥镇的伪军。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为配合第一师部队作战，攻克涟水、车桥之间的朱圩子。此役历时一天一夜，歼灭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三泽大

佐以下460人，歼灭伪军780人，俘日军24人，占领日伪军据点12处。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袭击山西榆社县城，歼灭伪军赵瑞部80余人，毙30余人，俘48人。

△　由重庆各党派人士发起的宪政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参加者有沈钧儒、董必武、左舜生、张君劢、梁寒操、史良等30余人。与会者认为应把《五五宪草》中规定的“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为民主共和国”。梁寒操表示反对，指出：“国父对三民主义曾指出：民族主义讲自由，民权主义讲平等，民生主义讲博爱。”“今日已无解释问题，而是接受问题。”

△　孔祥熙、宋子文和美国军、政两部代表安吉生、爱特拉及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特亚德等赴昆明，代表蒋介石慰劳云南省军民，考察物价及美军供应、美金黑市等问题。

△　重庆《大公报》载：资源委员会工矿展览会化工馆说明大后方化工生产状况：一、后方各省酒精厂计有221单位，生产量占全额三分之二。其中国营及公营工厂在技术及产量上均居领导地位，但多因糖蜜原酒等原料缺乏及经济困难，每年开工时间不及半载。二、后方各省汽油工业约有90余单位，在四川者98家，产量占三分之二，近期调整核准继续制造者35家，其中有15家为兵工及国营，多因价格及原料关系未能开工。

△　日本宪兵逮捕江苏省粮食局长侯大椿及粮食部苏州办事处长胡政，称其妨碍收购军米，利用粮食谋取暴利，并提出要处以死刑。11日，汪伪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对侯、胡着即撤职，交特别法庭从严惩究。15日，特别法庭判处侯、胡死刑，立即执行。

3月6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考试院长戴季陶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报告1943年施政概况及1944年度中心工作。提出本年度中心工作为：一、建立制度；二、特别注重公职候选人考试；三、加强人事管理。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缵绪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仲芳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廖震为第三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以3月29日为“青年节”。

△　西藏驻重庆代表阿旺坚赞、罗桑札喜、土丹参烈、图登吉格等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陪同晋谒蒋介石，向蒋介石献呈贺函及藏产礼物，恭贺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次日，蒋介石款宴西藏驻渝代表。

△　教育部任命叶叔良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院长。

△　重庆《中央日报》载文报道中国铁储量状况：全国铁储量估计为1.206兆吨，其中东北四省为0.884兆吨，其他各省0.322兆吨。较之世界储量225.689兆吨，仅占0.535％。

△　国民政府以陕西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典章“主持该省赈济事务，筹维擘划，寝食俱忘，全活灾民，数逾巨万”，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稳定粮价》一文，揭露四川省自本年1月至3月初两个月粮价上涨130％，随粮价上涨，其他物价也飞涨。

△　湖北随县伪军200余人携枪120余支，由团长周彭五率领反正，并在猩猩庙与追击日军激战一日，毙敌多名。

3月7日　　行政院派李平衡、谢徵孚为政府代表，刘鸿生为资方代表，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为劳方代表，出席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

会议。

△　行政院会议决议免青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郭荣礼本兼各职，遗缺由马绍武继任。并任命委员陈显荣兼财政厅厅长，委员刘呈德兼教育厅厅长，委员马骕兼建设厅厅长，委员马骥兼秘书长。

△　国民政府以前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许世英近年“主持首都空袭救护，扶危急难，辄以身先，并随时循俯灾区，解民疾苦”，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中央警政学校组织警政考察团，分两组进行考察。其中一组由该校教育长李士珍率领，是日赴陕西；另一组由内政部长周钟岳率领，14日赴成都。此次考察警政要旨为：一、各地办理新县制及推行地方自治情形；二、建设警政为目前重要工作。21日，李、周返渝。

△　农林部长沈鸿烈赴陕、豫视察春耕及蝗灾，19日返渝。沈谈此行遍历灾区十余县，其中受水患最重者为河南扶沟、西华两县，辖境多被淹没，其余各县亦甚凄凉。

△　重庆妇女界为纪念三八妇女节，发表宣言，提出健全妇女组织、积极参加地方自治工作、普遍研究宪政问题、扫除妇女文盲四要项与全国妇女同胞共策同勉。

△　缅北中国驻印军各路对瓦鲁班日军发动全面攻击。第一一三团一部粉碎日军多次反扑，歼敌300余人。第六十四团进至宁库卡，随同战车队分向昆年卡、大班前进。

△　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与副司令史迪威视察中国驻印军孟关战场。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陪同。

△　缅北中国远征军与美军一部在瓦拉本区会师。

△　英国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克利浦斯招待中国驻英大使顾维

钧，认为：中国应为远东一强盛之主要民主国家，对世界极为重要。并称：英国在远东安全，亦将大部系于中国之强盛及与中国之密切联合。

3月8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该部参事张平群在答复记者关于中国物价问题的询问时称：最近物价总指数约为战前之230倍。除黄金不由政府统制外，其余价格经调整，提高比例最多不过四五成。岚炭现为3600元一吨，烟煤1700元一吨，糖54元一斤，盐38.5元一斤，米平均价格约110元至200元一市斗。

△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年会在重庆举行，讨论抗战以来的科学研究工作，决议：一、扩大训练研究人员；二、多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三、选派专家赴国外考察；四、战后召开全国学术会议；五、建立纯粹科学研究机关与应用科学研究机关的联系。会议建议政府应努力充实国内各研究机关及大学之设备，以建立本国科学研究之基础。10日会议闭幕。

△　重庆《中央日报》载：我国水利资源利用时间若为25％，可得2100万马力。若利用时间为50％，即可得4100万马力，在世界上可与加拿大颉颃。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青海已勘测河流37处。

△　国民政府令各工矿企业一律设立职工福利委员会，以推行劳工福利事业。

△　革命先烈黄兴之妻徐宗汉在重庆病逝。10日，吴铁城前往黄宅慰问，特致赠治丧费五万元，并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赠花圈。

△　缅北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越过原始森林进抵瓦鲁班西北侧，与日军一部遭遇，日军在第一战车营的强火力扫射下，死伤惨重。计击毙日军作战课长与第五十六联队长等官兵450人。同日独立战车第一营冲入日军第十八师团指挥所，摧毁其指挥机构。

△　缅北中国驻印军在印度新德里联合广场举办常德会战及印缅作战战利品展览，是日观众达数万人。

△　据中央社讯：日本因兵员缺乏实施“战力总动员”，规定凡男子60岁以下至22岁，女子12岁至40岁者均须登记服役。同时调查人民所属产业，分定等级，强制摊派公债及国民储蓄。

3月9日　　蒋介石及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至柔分别致电陈纳德，祝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成立一周年，称赞第十四航空队“年来扬威东亚，战绩辉煌，若以同等之人员器材为比例，则收获之大，应冠于世界各战场”。

△　史迪威在缅北利多接获攻占瓦鲁班的捷报，即下达向杰布山攻击前进的命令。其要旨为：以最大迅速，由瓦鲁班继续南下，攻取沙杜渣及两侧之杰布山高地。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瓦鲁班，下午与新编第二十二师及战车第一营会师。旋新编第二十二师等部向日军追击，于15日夺取丁高沙坎，日军乃占领杰布山隘口，阻止中国驻印军南进。

△　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举行第二次常会，张伯苓、莫德惠、邵力子、冷遹、许孝炎等20余人出席，讨论通过调整钢铁及机器工业、改善粮食征收及储运办法、加强交通运输、改善花纱布毛管理办法、调整滇省粮食、兴办云南水利等提案13项。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题为《中研院评议会的使命》的社论，指出中研院的使命为：一、在革命的三民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指南针”作用；二、能站在学术界的最前面，作有益于抗战期间国防民生的贡献；三、能领导学术界为战后的各种国家建设预先奠定理论及技术基础。

△　美海军部长诺克斯在众议院会上宣称：该部将调查全世界之

油源，以防止石油将来自美国运出。并称：通往中国之油管，现在正在建筑之中。

3月10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内政部次长张维翰报告全国新县制之实施情况：目前全国除少数情形特殊之沦陷区外，其余21省、市均已分别拟具实施计划，积极推进，并以重庆之江北、巴县两县为示范县。并称：全国各县临时参议会本年度可普遍成立。

△　陈纳德为纪念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成立一周年在昆明发表《告将士书》，宣称该队成立一年来，在中国战区抵抗数量远超我们的敌人，在扬子江、香港、广东、台湾、泰国及缅甸屡创日军运输线，炸沉日舰27.4939万吨，可能炸沉或伤28.2350万吨。在洞庭湖及常德均得到无数次的胜利。

△　中国访英团员杭立武、温源宁、王云五等应印度总督魏菲尔的邀请，是日离加尔各答前往新德里。

△　湖北松滋县士兵黄东亚入伍二年，多次致函家人变卖家产，获二万余元支援抗战。军事委员会是日特以嘉奖，并晋升三级。

△　四川省增设武隆县。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1号作战计划”，其作战目的为“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其作战方针为：“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只要情况允许，于1945年1、2月份攻占南宁附近，将桂林至谅山通道打通并确保之”；“在进行作战时，应努力将平汉南路及粤汉两条铁路修复，如

情况允许，将湘桂铁路一并予以修复。”该作战计划预定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先实行河南作战，打通平汉铁路，时间为1个半月；第二步实施湖南作战，攻占长、衡，打通粤汉铁路中段；第三步在湘南、广东和越南驻屯军协助下，三方面配合，打通湘桂铁路后，再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其平汉路作战称为“虎号作战”，湘桂作战称为“特号作战”。

△　苏北东台日军一部因厌战情绪益增，且知三泽大队在车桥、芦家滩被新四军消灭，是日12名士兵在东台县城上海银行仓库内集体自杀。同日，该县城工艺厂内日军三人亦剖腹自杀。

△　新疆库车、新源一带发生7.3级地震。

3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决定自本月12日起至15日在重庆举办“转移社会风气运动期”。主要内容有：由主任张道藩主讲《转移社会风气运动之意义》；《中央日报》、《大公报》出版特刊；举行广播讲演及座谈会；举办植树、街道清洁等劳动服务。

△　立法院长孙科在重庆对记者谈宪草与地方自治问题时称：无论政府命令、人民言行，均须以法律为前提。命令不能代替法律，更不能违法。

△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王叔陶任书记长。

△　冯玉祥前赴川西一带发动献金运动，各地官绅商民，踊跃响应。蒋介石是日分别代电自贡市余述怀等，予以嘉奖。

△　旅居美国西部华侨筹款50万美元，建立一所飞机制造公司，旧金山华侨首领邝炳舜任经理。

△　日机三架袭击桂林，在市区西南部及兴安县城投弹多枚，毁民房数间。

3月12日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欲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作基础，必须实行以下三个先决条件：一、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开放党禁，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三、实行地方自治，承认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并提出将来宪法的制定亦应具备以下五个原则：一、承认非少数人能私有民权；二、承认由上而下之民主集中制；三、承认少数民族之平等与自决；四、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五、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周恩来还指出：在国内团结问题上，国民党及其政府如真愿用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做到：一、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国民政府之一部分；三、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游击队伍、民众武装为军委会所管辖，予以接济；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销包围陕甘宁边区之50万大军。

△　宋庆龄为在美国举行的“孙逸仙日”发表《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广播演说，指出：要了解孙中山遗嘱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民族或国家间的‘自由’和‘平等’的联系；‘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联系”。并指出：“只有当国际民主实现之后，世界上才会有巩固的和平。”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指出：世界形势正要变到彻底民主自由的新阶段。打倒日寇，实行民主，改善民生，这是中国今天三个基本口号。全体共产党员与全体人民均应百倍努力，使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在人民面前得以兑现。

△　美国纽约举行“孙逸仙日”大会，罗斯福总统在会上称“中山先生的思想与联合国家共同目标中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蒋介石向美国民众发表纪念国父广播词，称：“今天美国友人为我们国父举行纪念，足证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战侣，对于国父建设新中国的方案，怀着热烈的期望。”

△　蒋介石为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五周年发表广播讲演，宣称国民精神总动员应达到的目标为：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欲达此目标，对于“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还提出思想言论方面的标准：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

△　重庆各界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五周年暨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梁寒操在大会上讲话，勉励国人发扬国民精神，继续努力，齐心一致，集中于一个共同信仰之下。

△　孔祥熙在昆明答记者问称：民食供应问题政府正拟利用积谷，当无问题；盟军供应问题，政府早已有调整办法；关于通货膨胀问题，希望大家实行节约，共度难关；政府对实施宪政之准备工作，已有各种组织着手推行中。

△　重庆《大公报》载：自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底止，全国发明专利核准者共334件。其中以化学物品94件最多，次为机械及工具56件，再次为印刷及文具49件，交通工具27件，矿冶14件，家具45件，电器具35件，其他28件。以时间计，民国三十年最多，共90件；次为民国三十二年，为89件。

△　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攻克晋西黑龙关。

△　日机六架由河南新乡飞经平汉、陇海线侦察，下午在广武上空投弹多枚。

△　甘肃平凉至陕西宝鸡公路筑成，是日开始通车。

3月13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由何应钦报告1943年度军事重要工作之检讨及1944年度工作之展望，其中谈及军政工作时称：军政部经营之军费收支，事前事后均同样受审计部及主计处之监督审核。关于兵工方面，各种武器弹药制造之技术，均有很大的改良进步，出产数量亦均超过预定数。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常委会秘密会议，决定中共代表林伯渠到重庆的对策，主要内容为：中央之对策应注意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关于对策：一、在大的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易于理解；二、对于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关于宣传：一、林到渝的消息，由中宣部长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简短消息；二、重庆应有一二家报纸提出对林氏来此之责问；三、在谈判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再由中宣部在招待外国记者席发布消息；四、当林去渝时，应披露具体细目均可商决之消息，暗示中共不能接受国家纪纲完整之原则。

△　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苏联军队和飞机侵犯新疆之行为提出抗议。

△　《宪政》月刊社在重庆举行座谈会，由张志让主持，出席有沈志远、章乃器等30余人。与会者认为：国民政府“统制资本促成了商业资本畸形发展”，“中国经济应走向世界经济民主的趋向”。

△　河南唐河县士绅李天灰热心教育，创办唐河蔚文中学，捐田500亩，捐款210万元，国民政府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美国《新共和杂志》载《远东的混乱》一文，称：“中国国民党已投入内地的地主方面去了。该政府已为无效能与腐化所侵蚀。”“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中央政府在目前对打共产党比打日本更为关切。虽然对日作战实际上已停滞，重庆数十万最精锐的部队却浪费在西北共产党统治的约有五百万人民的区域的边缘上。”“中国共产党虽

只有有限的资源，但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事情，却比重庆国民党政府为多。”“只有专制国家内，共产党才成为威胁。那里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是十二分之贫困。只要中国向民主主义方向前进，共产党和重庆之间的矛盾是能缓和的。”

△　日机轰炸湖南衡阳、长沙及江西吉安、泰和等地。

△　英国联合援华募款会举行第二次全英“中国国旗日”，并宣布该会募筹援华款额已达100万英镑。同日，全英工会售出中国国旗4500枚以上。

3月14日　行政院公布《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条例（草案）》。

△　史迪威在缅甸前线对中央社记者谈胡康河谷中、美军的战果，称中、美军大捷，歼敌约达3500人。就军事而言，中国军与中国军驾驶之坦克车队及美国作战部队，皆能合作无间，卒歼我共同之敌人，胡康河谷不久将归我军掌握。

△　国民政府令准免胡先骕中山大学校长职，由萧遽继任。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及炮兵二营自10日起与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交战，至是日切断丁高沙坝北侧交通。15日，第六十四团攻占丁高沙坝。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山西晋城。

△　美国授予廖耀湘美国军团勋章，以酬其1942年在缅甸战役中的勋绩。此为美国给予外国部队长官之最高勋章。

△　日军令华中米粮统制委员会实行《以物交换购米办法》，规定换购大米时每担付农民800元的“物资券”，而农民实际只得200元的物资，其余全被伪地方政府、奸商作为“手续费”掠去。

△　日机七架分六次袭击桂林，并以机枪扫射，在西南郊投弹数枚。同日，日机又袭击梧州，在市区投弹多枚。

3月15日　蒋介石就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伯渠将赴重庆一事发布训示，要求国民党负责人员注重其宣传性，“各负责人员，每次与林祖涵谈话情形与内容，可逐日予以公开发表”。尤应注意对国际之宣传，注意：“（一）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瞭其阴险可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二）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三）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

△　国民政府明令废止《小学校法》，并公布《国民学校法》。

△　蒋介石密示张治中，令其与中共代表谈判时应“坚持军令、军政、纪律之绝对统一”。

△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行将出任中国驻美军代表团团长，其办公厅主任之职由宪兵司令贺国光调任，贺之宪兵司令职由副司令张镇升充。17日，蒋介石派商震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　据中央社讯：陈纳德致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对中国军民在洞庭湖作出的忠烈事迹尤感赞许，并率全体官兵捐献54.92万元，慰问参战将士及救济难民。

△　日军对山西柳林县兴旺村“扫荡”。村民们躲进村东南大山洞里。日军找到洞口，把干草、辣椒面堆放洞口，点火熏烧，洞内躲藏的74人，被熏死者72人。

△　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欧德兰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日本政府任命宇佐美珍彦为驻汪伪政府公使。

3月16日　全国行政会议在重庆召开，由社会部长谷正纲主持，到会4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为健全社政机构、筹助救济经费、保护童婴、策进职业团体及国营事业、举办劳工福利及战后社会救济和复员的准备等项。20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会致训词，指示八点：一、社会建设要注重基层工作；二、加强农工组织；三、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四、增进社会福利；五、倡导义务劳动；六、培养社会民主化，确立宪政基础；七、研究战后复员计划，加强国际合作；八、训练社政人员工作的修养，以提高效率。会议决定：在人民团体组训方面，注重团体组织干部健全及会员的训练；在社政机构方面，注重县社会科增设与人员充实。会议22日闭幕。

△　行政院通令嘉奖献金机关及倡导献金人员，其中献金最多的学校有四川省彭山女子师范学校、自贡市盐场等；协助倡导献金人员有乐山县长幸蜀峰、双流县长吕秉仁等12人。

△　立法院会议通过《战时征收土地税法》。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示中共山东军区的罗荣桓、黎玉等：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应坚持自卫原则，决不衅自我开，保持我党经常的政治主动地位。

△　重庆《大公报》讯：战后公路建设计划业经有关部门草定，拟在10年内完成25.3万公里公路修筑任务，工程分为五等，以适合现代国防之用为标准。其业务以民营为原则，其属边远区者则由政府经营。

△　新四军淮北军区部队在淮北津浦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对日伪军发起攻势作战。历时50天，先后攻克大店集、归仁集等51处日伪据点，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追认陈君慧兼任粮食部部长。

3月17日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考虑缅北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正给日军第十八师团以沉重打击，日本缅甸方面军主力已被拖在英帕尔或阿恰尔方面，英国温盖特兵团正威胁第十八师团背后的有利战机，命令“云南军司令长官发起攻势，以促良机更趋发展”。“盟军倘若失此良机，日军恐将重整旗鼓再度进攻”。

△　军事委员会发表一周战况，其中称：缅甸中美联军先头部队已进抵胡康河谷最后数英里地区，杰布山将被占领。

△　孙科在重庆对西南实业界发表谈话，称：实现民主政治与实施计划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须同步加紧完成。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健中辞职获准，遗缺由陈绍贤继任。

△　山西应县清水河镇伪军李纲、梁万栋等率部500余名，携枪支300余支，马50余匹向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投诚。

△　加拿大总理向下院宣布，加国与中国将谈判互助协定。

3月18日　国民政府任命中央银行理事兼常务理事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陈行、徐堪，中央银行理事叶楚伧、钱永铭、宋子良、张群、李国钦，中央银行监事贝祖贻、李铭、虞洽卿、徐陈冕任期届满，均着连任。特派陈其采、陈辉德为中央银行理事，并指定为常务理事。特派王宠惠、朱家骅、席德懋为中央银行理事；熊式辉、顾翊群为中央银行监事。

△　何应钦日前赴桂林视察，是日返回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美混合空军合作非常密切，其患难与共之精神及相互之亲切诚恳，均显露于无形之中。

△　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在1942年缅甸战役中解救困于仁安羌之英缅军第一师，是日获美国军团之奖章。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重庆举行第三届全国工作会议，到会有该会所属西南、西北、东南各区暨东南盟军服务处负责人，通过决议案百余件。25日闭会。

△　日机一架向赣南地区中国空军基地窥察，中国空军起而迎击，将其击落，坠于万安县境内。

△　日机五架轰炸长沙、衡阳。同日又轰炸河南广武、尉氏。

3月19日　行政院参事室外交组黄正铭草拟《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提出，日本除对我军费赔偿外，还应用以下方式对我予以经济赔偿：一、赔款与债权：日本对华所得赔款无论已未交付，所享债权无论有无担保，一律取消；二、损害补偿：日本非法侵略所致中国一切公私损害，日本应负赔偿之责，并以实物或金钱交付；三、投资与建设：日本在华所有投资以及在侵占或割让地区公私建设，包括路矿厂舍各种财产以及存贮物资一律交与中国；四、复兴资源：日本在若干年内应负责供应中国复兴建设所需资源及制成品；五、债票伪钞：日本及其所支持伪政权的中国占领区域内所发公债、伪钞、军用票及其他有价证券，应由日本政府以国际通货全部赎回。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突破杰布山隘后继续前进。是日分两路攻击前进，第六十六团一部攻击高鲁阳失利，被日军击毁战车七辆。

△　史迪威将军以中国军队坦克部队在孟关与瓦拉本间一周大战中战绩卓著，特在胡康河谷颁给中国军官七人以银星奖章。

△　财政部重庆市田赋管理委员会成立，由许大纯兼任处长。

△　冯玉祥在四川合川县白沙镇主持节约献金大会，军民总共捐献720万元，实物不计其数。

△　中国赴英访问团第一批团员王云五、杭立武、温源宁结束访

英活动，是日返抵重庆。

△　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始分期发表。22日连载完。

△　日轮“南海丸”号由广州驶至南海、顺德交界处水面，触水雷爆炸，搭客400余人半数毙命。

△　美国佛吉尼亚州斯威特布赖埃学院募得60万美元，捐赠中国各大学。

3月20日　美国中印缅战区副司令霍恩少将衔罗斯福之命由缅北飞往重庆，以第163号备忘录一件呈送蒋介石。备忘录要求：“一、请求滇西方面之远征军及时开始攻击，牵制当面敌军第五十六师团，使驻印军作战容易；二、远征军若能推进至腾冲或龙陵，则驻印军可乘机推进至密支那。”

△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国旗党旗帜制用升降办法》。

△　国民党中央举行纪念周，外交部长宋子文报告去年外交成就有四端：一、取消不平等条约，订立平等新约；二、美国废除限制华人移民律；三、发表四国宣言；四、参加开罗会议。提出1944年外交工作的中心为研究战后外交方案、计划战后海外贸易等。

△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日本将从中国掠夺之黄金转移他国事发表宣言，称：“对于敌国政府在其占领或控制区域以内，就各该区人民之财产或权益如有转移或交易行为，不论出诸公开劫掠与强夺之方式，或出诸形式上似乎合法，或甚至迹似由当事者自动履行之买卖方式，均保留宣告无效之权。”并指出：对于日本掠夺之中国黄金所有权的转移，中国政府现时及将来均不拟予以承认。

△　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在重庆举行会议，莫德惠任主席。讨论提案20件，内容有：增进川、康、滇运输、改善云南运输检

查办法；切实执行收购棉花及奖励商人抢购办法；提倡工业；慎重税务机关人选等。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密派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赴山西临汾与日军签订《各部队对日协定书》，主要内容为：为免除摩擦，协定各部队之势力范围，各予一定之地盘，各部队在该地盘内之要处构筑阵地，设哨警戒，以防共军之侵入；构筑阵地之地点及其数目据各部队之报告，由日军决定；将来于日本军讨伐或有其他理由，须要各部队之兵源时，即刻供出所需之兵源；不论在何时何地，誓必遵照日本军之指示，对于命令绝对服从之。

△　四川江津县民众献金大会在县城举行，冯玉祥亲临并致词，是日献金总额达1300余万元。

△　交通部公路总局在重庆举办全国公路展览会，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展览共分西南、滇缅、西北、川康、综合五馆，对全国公路各干线及后方各省之特产与文物均作具体介绍。

△　英国政府派罗克斯裴为驻中国首席代表。

3月21日　吴铁城召集各党派关系小组会议。董必武重申中共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抗战到底的立场。指出何应钦所说边区周围已撤四个师实为换防，又换上四个师；最近又发生了压迫《新华日报》的事。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赵县城。

3月22日　据中央社讯：行政院会议通过1944年度各省推进乡镇公益储蓄款额，总额为229亿元，其中四川省最多共40亿元；山西、绥远两省各5000万元。

△　财政部为加强节约储金，发行收购物资及专卖物资搭销储券，搭销种类包括纱、花、布、烟、盐、糖、火柴、猪鬃、桐油等，

并以法定利润搭储20％为原则。

△　《中加互助协定》在渥太华签字，凡11条，其内容与中美协定大致相同，由加方以战争供应品供给中国。

△　罗斯福致蒋介石电，对中苏边境纠纷表示关切，请允美视察员前往新疆，收集苏联军机炸射国民党部队事。

△　以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日本人反战同盟等团体为基础组成的日本人解放联盟在延安成立。其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日本民主制度，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在汪精卫易地治疗期间，由立法院长代拆代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拆代行。

△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议会发表演说，承认“东亚战局已异常严重”，并称“帝国已临决战之门，其结果将决定帝国之命运”。

△　据中央社讯：四川江油县发现油矿，含油量为70.63％。

3月23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陆军抚恤条例》、《海军抚恤条例》。

△　财政部以1942年财政收支系统改制后，原有省财政一级已并入国家财政系统，所有省政府原投入省银行资本，已属国库所有，是日特规定该项资本非商得该部同意，不得有所变更。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总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就第一届青年节发表讲话称：青年节定在3月29日，系经蒋总裁兼团长指定，盖具有勉励全国青年效法革命先烈之至意。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检讨会务并对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各种统制之原料，希予以便利；二、豁免一切捐税；三、加拨资金。

△　兵役署长程泽润视察东南各省役政归来，是日对记者称：此行印象最佳省为广西省，在役政上可列为最优等。

△　重庆《大公报》载：汪伪江苏省长陈群任职后，广置妾14人，穷奢极欲。王昆山以60万元买得常熟县长；秦重光以180万元买得无锡县税务局长，并自增各县税额，以饱私囊；又密组“特工”，扩大至华中沦陷区，以替代前李士群主持的特工组织。

△　爱因斯坦以数学若干问题未能解决，特邀世界各国数学教授赴美举行讲习会，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系应聘担任该会四指导员之一，是日离昆明赴美。

3月24日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在重庆举行常会，到会有主席团张伯苓、莫德惠、江庸及委员孔庚、杭立武、董必武、江一平等20余人。粮食部长徐堪报告粮政要点，提出1944年度粮食中心工作为建筑仓库、加强运输、预防旱灾、把握粮食。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孔祥熙在重庆招待各界，报告该会业务概要：西南区有合作社457社，主要业务为麻棉丝毛纺织、造纸、制革、化学工业；西北区有合作社325社，主要业务为棉毛纺织、制革、机器；东南区有合作社514社，主要业务为纺织，其次为造纸，并积极训练荣誉军人制革、制伞等技能。

△　国家总动员会议代理秘书长端木恺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物价管理问题，称：1943年度物价较1942年度平均上涨一倍半，本年度到目前为止较1943年度又上涨一倍，物价上涨原因不外二端：一、成本增高；二、黑市影响。

△　行政院传令嘉奖办理驿运尚著成效的四川、福建、陕西等省。

△　民生公司“民惠”轮由四川江津下驶重庆，因船身陈旧，载重超量，在小南海险滩处，机械发生故障，致遭沉没，乘客400余人遇难。28日，行政院令饬交通部彻查肇事原因。4月2日，交通部查明，由于水道凶恶，载客超重所造成。后经行政院核示，处以民生公司暂停重庆至江津间航线航行之处分。

△　汪伪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委员会主任办事处在北平成立，胡毓坤就任驻华北委员会主任委员。

△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招待记者会上宣读关于轴心国罪状书时，特提及日军之南京大屠杀，提醒勿忘日军此暴行。

3月25日　行政院正式核定9月1日为记者节。

△　夜，八路军山东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以七个团的兵力发起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役。至4月20日，歼灭伪军70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

△　晋军第六十一军两个师强占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驻地山西浮山县的左庄、杨树掌、杜村、柏村、岭上等处。

△　美军方发言人对合众社记者称：美国必须立即予中国以较大援助，如能以小型舰艇为训练中国海军人员之用，则中国海军将来必能在比较接近日本之地从事海战。

△　侵华日军修复黄河铁路桥梁，作展开平汉线攻势准备。

△　前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兼教育总长高恩洪在北平逝世。

3月26日　军事委员会奉派至东南亚盟军总部的冯衍少将及其所

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印度，将充任中国陆海空军之联络官。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收复山西榆社。

△　国民参政会宪政座谈会举行会议，黄炎培主持，到会有沈钧儒、史良等50余人，一致要求“保障民权”。

△　重庆《大公报》讯：交通部邮政总局为增进物资进口，与苏联邮政方面商妥，由陆路互换包裹，以中苏两国互寄的包裹为限。中国方面指定以新疆省霍尔果斯局为国际包裹互换局，与苏联阿拉木图局互换包裹。

△　中国妇女宪政研究会在重庆成立，主席陈逸云。该会之宗旨为提高妇女之地位，发动全国妇女研究宪草，协进宪政。同时训练妇女运用四权，帮助国家实现民主政治。

△　中国社会行政学会在重庆成立，孔祥熙等19人为名誉理事，孙本文等31人为理事，罗鼎等九人为监事。

△　日机15架分六批在平汉、陇海两线窜扰，其中五架在广武县境内两次投弹。

△　台湾总督府命令全台日刊六个报社合并，自本年4月1日起发行《台湾新报》。

△　纽约《前锋论坛》发表评论，指陈日军有在中国境内发动攻势之可能。其原因为印度与其邻区陆上交通开放后，美国大量兵力、物资乃可开入南中国海及长江。日本欲破坏此种优势，则必须取得粤汉铁路，亦即再度揭开湘北大战。

3月27日　　蒋介石复罗斯福3月20日电，明确拒绝进行滇西反攻作战的要求。其理由是：“中国在过去长达七年之久的对日战争中所征之兵、物资已达到相当大的数量”，“倘若再强行投入超出本国国力

的作战”，“必将招致日军入侵云南、四川以及新疆革命、山西赤化与最终全国赤化的局面，进而使我政府无法尽战争之义务，以致失掉对日作战之基地。”蒋介石还提出：“权衡上述理由与中国之义务，唯有中国战区得到适当加强，方能策划自云南发起攻势。”

△　史迪威作出进攻缅北密支那的战略决策；以廖耀湘新二十二师进攻甘马因；以孙立人新三十八师迂回袭击孟拱；另以梅里尔准将军率领的中美联合突击兵团奇袭密支那。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一部迫近拉班以东地区，并迅速抢渡孟拱河，28日攻占拉班。

△　中国访英代表团团员王世杰、胡霖及秘书李惟果结束访英全部活动，是日返抵重庆。王世杰在机场对记者谈此行之观感，称在英国曾受到极热诚之接待，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民坚持七年之艰苦抗战始终不渝；第二，英国人民及其领袖对于中英战后合作之重要有普遍之认识。

△　王云五应中央广播电台之请对全国播讲《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认为任何国家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地方自治”、“法律主治”和“人民的基本自由必须尊重”。王云五深望政府早日成立各级民意机构，俾人民有练习参政的机会。尤盼各地人民与其代表克尽责任，善用职权。

△　云南省政府向中央报告该省灾荒及盟军供应情况，谓：因去年大灾荒秋收很少，因此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甚至饿死冻死者很多，灾民用草根树皮充饥，并不稀奇。但对驻滇盟军供应，单在昆明采办的每天约需牛40头，猪60头，鸡1000只；猪油2000斤，鸡蛋六万枚，白糖3000斤，面粉150袋，水果4000斤，蔬菜7000斤，洋柿5000斤，柴、炭一万斤，煤10吨，皂70箱，盐300斤。

3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征收土地税条例》。

3月29日　蒋介石为第一届青年节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勖勉全国青年切实做到：一、竭尽天职，严守纪律，牺牲个人的自由而求取国家的自由；二、踊跃担当与接受革命成功、国家存亡、民族盛衰的责任；三、完成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大建设。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攻占高鲁阳。是日又攻克沙杜渣，与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会合。

△　重庆各界在南区公园举行邹容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由张继主席报告邹容传略等。

△　新中国农业建设协进会在重庆成立，主持人包望敏，该会之宗旨为提倡改良农业生产，并将筹组农业公司。

△　美机炸南昌火车站，日机15架起飞迎战，被美机击落一架。

△　汪伪政府在安徽省设立第一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并开始清乡。清乡区域为芜湖、当涂两县及两县四角地带以内的区域。在两县边界线修筑封锁线和设立大小检查所41个，修筑碉堡35座。

△　据中央社讯：上海日军本年度起开始征用在华日商经营的与作战有关的物资。沪日商各大公司、行号，如资金在数千万元以上的株式会社数十家，均因物资被征一空而倒闭。

△　萨尔瓦多国政府废止《限制华人移民法》，放宽对华侨待遇，规定：一、移民禁例，华人除外；二、给予华人签证无须特许；三、废止华人登记册。

3月30日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三、四分区部队收复山西沁水县城。

△　据中央社讯称：东南学生志愿从军运动热烈兴起，800余人已组成学生教导团，团部设江西上饶。

△　重庆市教师、学生何家、林林等28人捐赠八路军4000元，并在慰问信中称：“你们会打仗，会生产，会团结群众，真是人民的军队。”

△　汪伪中央大学校长李圣五因为日方所不满被迫辞职，由汪精卫妻弟陈昌祖继任。

△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大使衔代表贝志高将军偕武官德兰拉特等抵重庆。

△　苏联与日本签订《关于库页岛日本油矿和煤矿租界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规定北库页岛日本油矿、煤矿租借权移交苏联，并将《苏日渔业协定》再延长五年。

3月31日　国民政府命令免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王树常本职，特任于学忠为该院副院长。

△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并指出，对敌人要打击、消灭，对同志、士兵、人民要尊重说服，如果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　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在该校作题为《现代国家与宪政》的讲演，认为：“只有法治，没有民治，宪法就只有形式。”

△　中捷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孔祥熙任名誉理事长，曾养甫为理事长。

△　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发表谈话，称：关于调整华中铁道、电气、通信、矿业、淮南煤矿、中华轮船等11家国策公司问题；已与汪方取得一致意见。关于调整大纲，要点为：一、各国策公司受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下同）直接指挥与监督，其经办事项依国民政府法令处理；二、各合办公司的资本及职员数目，依中国方面占半

数以上为原则；三、中国方面在各国策公司中取出英、美敌产全部或一部，以增加合办公司之资本，并欢迎中国民间人士及资本加入；四、在可能范围中录用中国职员，待遇平等；五、由华中振兴公司负责对合办公司在资金、材料及技术上予以协助。

是月　监察院长于右任首倡之开发西北“十年万井计划”，业经国民政府正式核定。计划本年度为筹备期，总经费为440万元，由陕、甘、新三省分担；1945年度为试凿期，由训练毕业人员试凿20井，作为推行之准绳；1946年度开始普遍期，发动三省民力从事大量凿井，预期10年完成1.022万井。

△　军事委员会鉴于驻外武官人士之需要，筹设训练班，名额300名，资格是曾在军事学校毕业而有直接指挥作战经验之军官。

△　是月与去年7月相比，各地物价增长状况为：重庆41％，贵阳208.4％，昆明152.2％，西安132.4％，兰州28.6％。

△　日伪在华中抢掠米、麦、棉花及其他农产品，于本月中旬组织米粮统制委员会，实行所谓“以物资交换购米办法”。规定在沦陷区“收买”米粮时，不付以应得米价，仅每担付以“物资券”800元。但每一万元“物资券”所得之物资，仅值1363.2元。以此推算，农民出售一担白米，仅得四五十元的物资。

△　汪伪在沦陷区大增“税目”，名目有300种之多，最多者为“地方税”、“消费特税”、“墙壁广告税”。

△　日伪军万余人对热河省兴隆县进行连续15天的春季大“扫荡”，仅中田村被日伪军杀害即达197人，全县被捕3000余人。

△　《黄陵志》编纂告成，由黎锦熙主持。该书主要部分为《黄帝本纪》参证注疏，引书150余种，并附有图像，为轩辕大帝传记之最详博者。

4月

4月1日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谢徵孚为出席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政府代表；派李铭、朱学范分别为出席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雇主方代表和劳工方代表；派于峻吉、谢嘉为出席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政府代表顾问。同日，又任命黄同仇为安徽省政府秘书长。

△　国民政府公布《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

△　重庆《大公报》载：资源委员会经营的煤矿事业共有20单位，分布于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甘肃九省。该会各煤矿产煤用于国际工业者占39％，交通事业占19％，普遍工业及电厂占28％。

△　中国第五十师自昆明飞往印度，以应印缅战场之急需。

△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在贵阳举行，到会有名誉会长吴鼎昌、会长孙云铸等68人。孙云铸报告会务，提出两点意见：一、地质人才缺乏，国内各大学每年地质系毕业生仅有60人，供不应求；二、地质机关的联系，常为调查一地的地质，有重复几次的，浪费人力、财力。3日，本届年会会员60余人由李四光率领赴贵阳地区作地质调查，后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

△　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发起水林战役，是日一度攻入林县县城，并切断林县至水冶公路。战至14日，伪军东逃，八路军共歼敌900余人，收复林县城及水冶以西地区。

△　宁夏省建设厅长李翰园对记者讲述宁夏工业化问题，称该省已设有面粉、棉毛、纺织、制革、造纸、印刷、酒精、火柴、玻璃等工厂；基本工业方面，煤、铁、碱亦均设厂，本年又将设钢铁工厂一处，并着重于水力发电厂之筹设。

△ 《新华日报》（太岳版）在山西沁源县创刊。

△ 东北日伪当局为满足其战时需要，决定成立佳木斯营林局，区域包括营林局管内之东部小兴安岭和三江省地区中心的森林资源，约占全东北木材资源的四成。

4月2日 由邵从恩、张澜等发起的民主宪政促进会举行宪政座谈会。邵从恩首先说明组织该会的宗旨在于促进民主宪政的早日实施。该会研究组对《五五宪草》提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意义等六个问题。张澜发言认为“《五五宪草》第一条‘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不如改用《训政时期约法》第三条规定的‘中华民国为永久统一共和国’为好”。

△ 司法行政部为重庆等地美军借口物品被盗滥施杀人，有损本国司法威信，致函四川高等法院，要求今后对此类盗窃案件“从严惩办”。

△ 中国政府出席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劳方代表朱学范、政府代表张鸿钧、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程海峰等离重庆赴美，13日抵达华盛顿。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轰炸机在中国东南海外作海上扫荡，袭击日军运输舰一艘，投弹二枚，该舰当被击沉。

△ 日机轰炸河南临汝县城，炸死居民数十人。

4月3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财政状况，指出1943年政府财政概况为：推进专卖、筹募公债、管制物资、促进财务行政、整理自治财政、加强金融管制。并提出今后财政设施之五大趋向：一、力谋负担平均；二、稳定战时预算；三、建立国家基本；四、加强金融管制；五、安定国民经济。

△ 《中央日报》讯：中国旅外海员约有六万人为盟军维持运

输，航线所经要地为利物浦、埃及、孟买、加尔各答，并在该地成立海员分会。

△　据中央社讯：外传中国政府有没收外国教产之意，国民党中央已训令各省、市政府，对于外国教会产业，在遵守我国法令之条件下，均予妥为保护。

△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晋察冀地区协议会成立。津田秀、宫本哲治、渡边晃、林一雄、中山太郎五人当选为联盟负责人，津田秀当选为委员长，宫本哲治为副委员长。

△　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开始反攻。电称："我方过去装备、训练阁下之云南军，即为了在这种时机利用。""倘若云南军不用于协同作战的目的，则空运准备、提供训练教官等我方呕心沥血的广泛支援，亦将完全失去意义。"4日，罗又致蒋函，最后要求"中国应迅即越过怒江开始攻势"。

△　中国滑翔总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在重庆举行，陈立夫、白崇禧出席，蒋介石特颁训词。该会成立以来，在全国七省一市设立分会，会员五万余人。

△　周佛海委托重庆国民党在沪情报人员葛湛侯去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及蒋汪联合反共的意见。

4月4日　　蒋介石以驻桂中国空军年来打击日军，战绩卓著，特饬由空军一部参谋长丁普明给予嘉奖，受奖者约20余人。

△　宪政协进小组会议在孙科寓所举行。董必武在讨论关于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不满的问题上，主张开放言论、出版自由。

△　中国驻印军下达攻占缅北卡盟为直接目标的作战令，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分兵两路沿南高江之线进攻。中国驻印军发动的孟拱河谷作战开始。

△　教育部呈文行政院，告以中正大学纪律无人过问，一片混乱；校方贪污舞弊，横行无度；伤寒病流行，无处防治，已死学生430余人。

△　《时事新报》载：汪伪中政会决定缩小省区，将江苏分为江苏、淮云、苏南三省；浙江分为浙东、浙西两省；安徽分为皖南、皖北两省。

△　汪伪广东省长兼保安司令陈耀祖被刺毙命。

4月5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罗荣桓、黎玉等，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11条条文，修正条文内容为：国民参政会每六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4日。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延长其会期，或召集临时会。

△　财政部为整理中国茶叶公司业务，将该公司组织为董事长制，由潘宜之任董事长，李泰初仍任总经理。是日，潘宜之就职视事，提出该公司业务以履行美销、与苏贸易、边销三大合约为目标。

△　粮食部为掌握粮食及稳定粮价，拟定八项办法：一、追收1943年度欠粮；二、督促1943年度派募积谷；三、督促各省运用所拨资金，调剂民食；四、调整1944年度征粮数额；五、严禁囤积居奇；六、督促各省切实执行粮管法令；七、节约粮食消费；禁止主要粮食酿酒；八、加拨农建经费，增进粮食生产。

△　三青团第一届干事会第二届全体会议确定十年计划总纲，要求团务工作要与党务工作密切配合，以求发展，并与学校当局联系，

加强青年领导工作。

△　《时事新报》载：缅北之新利多公路每日可筑成二英里。该路若与缅甸公路接通，中国即可每月获得多于目前六倍之供应品。

△　据中央社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工作，并成立设计委员会，分聘张道藩、陈树人、高一涵、罗家伦、傅斯年、李书华、张大千、徐悲鸿、顾颉刚等58人为委员，统筹该所事宜。

△　四川灌县都江堰举行开闸典礼，省府主席张群亲临主持并致词。该堰可灌溉农田8000余亩。

△　新四军一部袭击安徽泗县伪军据点，毙敌104人，俘中队长以下80余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

△　日军战斗轰炸机32架袭击南宁机场，美第十四航空队即起飞迎战，击落日机9架，创日机三架。第十四航空队损失三架。

△　日本最高军事会议制定《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法》，内容为：以英、美撤出中国为条件，由中国撤退日军。除“满洲”以外，把中国的统治权交与汪伪政府。

4月6日　　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公在中央广播电台作题为《敌寇毒化罪行与损失赔偿》的广播讲演，历述日军自九一八事变后至今在沦陷区的毒化罪行：东北全境种烟面积共达27.775万亩，年产烟土254.2万斤，吸烟者达1300余万人；山西仅太谷一县烟田达6000余亩，每年勒收烟税200余万元，吸食烟毒达18％以上；广州市内烟馆林立，日军勒令人民申请种烟，并规定烟亩生产，由日方官价收买。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李门应中国政府代表蒋廷黻之请，派遣专家二人来华，协助中国政府计划战后救济工作，并调查中国之需要。是日抵昆明。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河北博野。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袭击日军海南岛琼山机场，对机场之设备投杀伤弹及燃烧弹28吨，致大机库三所、指挥塔一所、营房六所、修理厂七所受创，另有飞机二架在地面被毁；另一机队在海南岛外海面重创日军1200吨货船二艘。

△　日机轰炸河南沈丘县城，炸死民众15人，伤三人。

△　美国1500家进出口贸易商组成全国对外贸易协会远东委员会，由史密斯为主任，着重研究对华贸易问题。

4月7日　　中国访英团团员王世杰、王云五、胡霖、杭立武在国民参政会驻委会报告访英经过及感想，并详述英国援华总会的情况，该会共有478区委员会分散各地，捐款者达3000万以上，该会共收捐款已超过100万英镑。并称中英同心击溃日寇，战后盼能继续合作。8日，王世杰、王云五、胡霖谒蒋介石，报告访英经过，并面交英首相函件。

△　全国公路总局召开筑路座谈会，由赵祖康主持，提出在边疆筑路系当前之急务，与会者就路线辐射式、兵民农工合一、实行屯垦、中央征工筑路等问题进行讨论。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王用宾在重庆逝世。

△　八路军太行军区八分区部队一部袭入河南温县县城。

△　日机三架分批袭击桂林，在西南郊外投弹三次。

4月8日　　全国第五届兵役会议（重庆分区）召开，到会有川、康、滇、黔、鄂五省军管区参谋长等。蒋介石对会议指示五项：一、忠实检讨兵役业务；二、因地因事，切实改进缺点；三、简化兵役法

令，并普及宣传；四、工作上应切取联系；五、确定工作重心及进度，按期实施。东南各省会议已分别在湖南耒阳和江西铅山两地举行。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委员陈建晨、杨大乾、王德崇、高文洁、唐德源暨省府主席祝绍周，委员彭昭贤、李崇年、陈庆瑜、王友直、马师儒、刘蔼如、刘楚材、张大同、孔令恂，秘书长林树恩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派蒋鼎文监誓，并致训词。

△　国民政府公布《惩治盗匪条例》，凡11条。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向中央社记者谈近日绥西战况：大青山游击队近来异常活跃，屡创日军，已攻克新城（包括黄河南岸）。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暂时搁置外蒙、新疆边境事件，以待战争结束后解决。4月12日，蒋复电，认为苏联和外蒙古入侵新疆事件，恐非仅赖中国方面的“自制”所能平息，希望美国能全力支持中国处理外蒙、新疆边境事件。

△　由缅北南高江西岸南进的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部队渡过纳姆生河和柏拉河，战至11日，攻占瓦康。13日，日军退守瓦良南之河沟。15日，肃清瓦康之敌。19日进至瓦拉河。

△　在苏北车桥战役中被俘的日军山本一三、宫本一郎等14人座谈新四军优待俘虏政策，并对新四军表示衷心感谢。

△　中国国际经济协会在重庆开会，孔祥熙在会上讲战后合作问题。

△　史迪威总部发表公报：美第十四航空队先后袭击广州白云机场及南昌日军军营，予敌重创。

△　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将军致电史迪威，对中美将士在胡

康河谷取得的优异战果予以嘉奖。

△　中华慈幼协会在重庆举办工作成就展览，共分行政、教养、生产、服务四部分。该会抗战以来先后救济难童达3.59万名，由该会直接设立教养者共1.2万余名。在后方所设教养院共有10余所。该会目前正准备战后难童复员工作，研究战后慈幼事业推行计划。

△　日本照会苏联，表示愿调解苏德战争。12日，苏联复照日本表示拒绝。

4月9日　　第十战区傅作义部大青山游击支队向百灵庙进袭，18日在山臼落花村附近与伪蒙军第三师所部300余人遭遇，即展开激战，至晚，敌不支溃窜冈村。11日，傅部派精骑40余夜袭该村，卒将该敌第八师大部歼灭，击毙师长扎布扎青、日军教官及指导官，俘伪蒙军45人。

△　《宪政》月刊社在重庆邀集妇女界代表座谈宪政问题，出席者有史良、曹孟君等30余人。一致主张“妇女要有社会活动权和研究宪草权”，“宪法上应详细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和男子一样平等”。

△　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在重庆举行第五届年会，讨论土地所有权问题，一致认为“土地国有是平均地权的终极目标”，并主张对《五五宪草》中有关土地各条予以修改。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派农业专家陶孙及经济专家史塔雷来华，是日抵达重庆，拟在华六个月，并将赴各地考察。

△　美国务卿赫尔在哥伦比亚发表题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广播讲演，表示决与盟邦协力击溃德、日，并称“屹立于自由与灾祸之间，在西方仅有英国，在东方仅有中国”。

4月10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由王世杰报告访英观感，并

提出增进中英友好关系两项建议：一、两国在彼此的大中小学教科书增加有关内容，以深切相互间的了解；二、两国在关涉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如国际和平组织问题、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处置敌人问题等必须努力合作，采取一致的政策。

△　财政部公债筹募委员会发表《为筹募民国三十二年同盟胜利公债告同胞书》，规定总额为30亿元。重庆由是日起举行扩大筹募公债宣传周活动。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题为《筹募三十二年同盟胜利公债的意义》演说。

△　国民政府农业促进委员会发表关于战时13省169县、市农副概况：多数农家不得不经营副业，以资补贴；但农家副业薄弱，故应推行合作制度。

△　教育部拨款2800万元，救济贫苦学生及加强全国各学校公利组织。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一营攻占般新东北日军警戒阵地，并与日军主力激战。战至12日，歼敌大尉以下官兵数十人，13日攻占柯拉卡道。

△　缅北中国远征军一部克复瓦康。

△　八路军平北支队第四十团一部在河北宣化东北20公里处猴儿山一带开辟工作，遭张家口、宣化等地日伪军900多人合击包围。激战九小时，毙伤日伪军170多名，黄昏时成功突围。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轰炸滇缅路交界处畹町南北两处之公路，使该路大规模破坏。

△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电令美国中印缅战区副司令霍恩少将，将对中国远征军物资暂时停拨，俟远征军出动后再予恢复。旋霍恩命令将中国远征军4月份应得之734吨物资移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使

用。

4月11日　太行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南林县。

△　军政部制订出国奖励办法，规定学生、公务人员志愿服役者，在教导团短期受训后一律赴印服务。

△　湖南衡阳《大刚报》因发表《贪污及其他》一文揭露湘政黑暗，自是日起被湖南省政府下令停刊三日。

△　重庆《中央日报》讯称：美国商务部下设中国法律科，主持者为斯雷帕克，该科主要业务是为美国商界和政府研究、翻译及解释中国之法律。

4月12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时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发展阶段，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招待外国记者，有记者询以教育部所订国外留学生、自费生派遣办法，其中似有统制学生思想之条文，其意义何在？张平群答称：该办法中并无统制思想之意。又有记者询以留学生是否均须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张平群答称：受训的目的无非为说明我国抗战之全盘情形，俾有充分的了解，并注重新生活之训练。

△　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举行茶会，欢迎访英团王世杰、王云五、胡霖、杭立武、温源宁五团员归来，王世杰等发表演说，称英国朝野之感情乃中国七年来英勇抗战之结果，并盼战后中英共同维持世界和平。

△　胡适在芝加哥侨民保护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宣称：“本届美国议会因两大立法而为中国人民所不忘，即批准中美新约废除在华之治外法权与废除限制中国移民法。因美国国会之通过此两大具有历史

性之法案，遂使此两大民族传统之友谊得更加强。”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与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渡过南高江后，沿东岸继续前进，战至是日，共歼敌近百名。14日攻占丁克林、中丁克林和东丁克林等地。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一区队在滦县尚坨、安各庄一带击溃伪治安军第二十六团两个营的进犯，俘伪团长以下官兵170余人，毙伪营长以下40余人。

△　据中央社讯：日军近在平、津大肆搜捕学生，先后入狱者达700余人，日军称此为“思想肃正”。信件检查亦极严。

△　《时事新报》载：上海一金融家向报界人士谈话称：近年来日寇在上海掠夺纱布达69万件，在苏、浙、皖掠夺纱布达二万件。纱布被掠劫后，上海之中国商业资本即告破产，资本家致自杀者甚多。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派遣来华专家陶孙、史塔雷抵渝后，分访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是日拜访粮食部长徐堪，详细磋商未来工作事宜。

4月13日　军事委员会为滇西反攻作战电令中国远征军：一、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之目的，着以第五十四军为第一线，第三十六师、第一九八师于栗柴坝、双虹桥间地区超越防守部队，渡河攻击当面之敌，向固东街、江苴街之线进击，相机攻占腾冲。二、各部队作战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待命开始攻击。三、怒江防守部队（第十一集团军）除第一线师各派一营以上之兵力，加强怒江右（西）岸游击，牵制当面之敌，使攻击部队易于进展外，其余仍负原任务。四、着第八军赴祥云、云南驿地区集结，限6月5日前到达，归卫（立煌）长官指挥。

△　缅北孟拱河谷中国远征军攻占瓦康丁林。

△　延安蒙古族同胞及各界人士百余人纪念成吉思汗，由乌兰夫主持。与会者一致表示，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团结中国各民族，抗日救国，争取彻底解放。同日，兰州各界亦举行致祭仪式，由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主祭。

△　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中国战区内的美国远程作战空军由蒋指挥。

△　日军为加强掠劫上海物资，是日在“上海第一警局”下设“经济保安处”，名由陈公博管理，实由日本人五岛茂主持。下有“经济警察”550余名，多由日军宪兵及浪人、流氓充任。

△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布作战以来美军兵员损失状况：陆军死伤13.4632万名，其中阵亡为2.3322万名，负伤5.5066万名，失踪2.8014万名，被俘2.8230万名。

4月14日　驻加拿大大使刘师舜与加拿大总督麦肯齐·金在渥太华签订《中加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加拿大宣布放弃在华之治外法权。

△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昆明向美军提出在中国远征军实施反攻时，分担下述责任：一、进攻怒江时，以渡船使五万中国军渡江；二、实施空中掩护；三、使美军炮兵协助；四、负责对云南军的补给。

△　缅北孟拱河谷中国远征军攻占孟古加拉。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节约建国储金条例》第七条，规定节约建国储金，得以外国货币存储，满期后仍以外国货币偿付本息。

△　国民政府给予沈宗濂三等景星勋章。15日，沈离渝赴拉萨，就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职。

△　蒋介石给西南联大拨款30万元、云南大学拨款10万元，救济两校贫苦学生。另孔祥熙亦对两校贷款400万元，计联大300万元，云大100万元，作两校周转金之用。

△　汪伪政府任命陈春圃为广东省长，陈君慧为建设部长。5月1日，陈春圃抵广州就职。

△　日机16架分两批袭击广东南雄及江西玉山，在郊外投弹。同日，又12架日机袭击鄂北老河口，在郊外投弹20余枚。

△　印度孟买船坞因爆炸起火，死伤300余人。中国驻东南亚盟军总部海军联络官曾万里遇难。

△　英国女议员华德访华返英后，于是日在《观察》周刊上撰文，主张战后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并称归还香港于中国，“决不致危及英国之安全及商业利益”。

4月15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周体仁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李世龙为第三军军长。

△　立法院开会通过《省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和秘书、会计二处。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袭击鲁中青龙山、黄山庄等地伪军，攻克伪军据点七处，俘伪连长以下500余人，缴获步枪350余支及弹药等。

△　皖南日军一部陷南陵。

△　日伪军在平、津地区到处捕人，是日将北平中国贫民300余人拘捕后押往南苑，全部烧死。

△　据中央社讯：桂林北之恭城、百寿、宜北、融县、兴安等地

冰雹为灾，其中以宜北、百寿为最，损失在500万元。广西省政府正在救济之中。

4月16日　国民党拟定《中共政治问题解决办法草案》，其中规定：一、方针：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二、进行步骤：第一，军令政令问题：1.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2.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3.军需必须独立，严格遵守编制、员额及给与规定；4.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第二，关于第十八集团军问题：1.第十八集团军可准增编一个军，即共编为两个军（每军三师每师三团）；2.编制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3.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4.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予规定发给；5.该集团军各级部队长、副部队长人选，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保请委；6.该集团军如保送干部前来西安或桂林军官训练团受训，可予照办。第三，关于政令问题：1.严格遵守政府现行法令规章；2.实行新县制；3.取消现有一切破坏政令之行为。第四，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1.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2.区域：陕西省之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延长、延川、延安、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及定边、靖边之各一部（定边县城不在内），甘省之合水、环县及庆阳之一部（县城不在内），以上共18县（内三县系一部分）；3.隶属及管理：陕北行政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领导；4.组织：区公署设主任一员，其详细组织，由政府以命令定之，县以下之行政机构，一律按照中央现行规定，不得变更；5.人事：区公署主任由中央简派，其所辖各县县长，依照各省通例办理；6.其他各地区所有不合法行政组织，一律取消，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恢复其原有之行政系统及区划。第五，以上四项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后，政府可准予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　宪政座谈会第四次座谈中央政府职权等问题，沈钧儒说：“要保持三民主权在民的原则，行使四权不能妨碍此原则”，“地方政府应

由人民自下而上选出。”刘王立明指出：“《宪草》第五十五条中表现出总统权力太大，总统好像就是‘万能’。”黄炎培认为：“考试院院长应由国民大会选出。考试院的权力太大。考试制度有控制思想的趋势。”史良说：“目前保甲制实施须待研究改善，否则对人民的权利和地方自治都是很大的障碍。”

△　台湾革命同盟会为《马关条约》四十九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号召台民与祖国同盟共同奋斗，争取最后胜利。

△　成都市民主宪政促进会举行座谈会，一致希望国民政府“实施约法，实现人民的基本自由”。

△　军事委员会重庆译员训练班685人在中央训练团受训四周后是日结业。将分派航委会、交通部、后方勤务部、战地服务团等处服务。

△　全国基督青年学生救济委员会召开救济事工会议，全国25个分会派遣代表来重庆参加，以检讨该会以往救济学生的成绩，计划今后学生救济工作的改进，并商定战后学生救济的方针。

△　是日、5日和8日，日机数十架两次轰炸湖南益阳城区，死伤民众数百人。

4月17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内政部长周钟岳报告内政概况，据称：全国实施新县制已历四年，先后实施者共计21省、1103县。设立保民大会者共有34.2301万保，成立县临时参议会者共530所，成立乡镇民代表会议者共1.1305万所。

△　中央设计局分设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收复台湾的筹备机构，由前福建省主席陈仪任主任委员。又设东北委员会，由沈鸿烈任主任委员，以熟习东北各省情形，策划战后重建工作。

△　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行第七届年会，由会长潘仰山主

持，会议通过议案数项，要者为：一、请政府对于战时迫切需要之民营工矿事业扩充设备及新设者，均予以保本息之奖励；二、请政府从速制定工业会法；三、设筹工业联合保险公司、工业银行等。

△　重庆文艺界举行茶会，纪念老舍从事文学创作20年，邵力子主持，郭沫若、黄炎培、沈雁冰等发言，一致称赞老舍对国家之忠忱，对朋友之亲切，年来维持文艺界抗敌协会之苦心与努力。

△　教育部决定国立高中毕业生须服役一年，始能获得毕业证书。

△　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奉军事委员会之命，拟定渡怒江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一、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二、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责怒江左（东）岸之防守。另以该集团军之新编第三十九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各派一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之作战。三、攻击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

△　日伪军4000余进犯皖北，驻该地之第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由阜阳、颍上败退至河南商水地区。

△　日机分12批沿平汉、陇海两线侦察，其中三架在郑州投弹多枚。

△　重庆《中央日报》载《敌在台湾的战时统治》，揭露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奉公会”的分布情况及日本在台警察的专制统治。

4月18日　日军大举进攻河南，豫中会战开始。拂晓，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及独立第七旅团由河南中牟渡河，向第一战区黄泛区守备部队暂编第二十七师第一、三两团发动猛攻。至午，南渡日军在中牟南部整顿部队，工兵架起轻便桥梁，大队人马源源开过黄河。

△　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请制止第五十三师等部对陕甘宁边区鄜县、洛川等地进行扰乱。

△　重庆15个文化团体举行茶会，欢迎访英团返国，到会代表共200余人，由吴铁城主持，王世杰、王云五、胡霖发表演说，共盼中英两国战后的经济、文化合作。

△　日机13架分别从河南新乡、信阳，山西运城起飞，袭击河南广武等地，投弹多枚。

△　汪伪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米粮采销总管理处清理委员会，派陈君慧为主任委员。同日，汪伪政府决定发行第一期建设公债，总额三亿元。

△　缅甸英军突击队司令林戴尼在孟拱河谷会见史迪威，两氏商定通力合作，以收复缅甸及打开对华之陆上交通。林对记者称：中美军队有争取胜利之意志，并以全力开辟雷多路及消灭日军。

△　美国中美工商协会会长柏德生在纽约发表谈话，称：战后中国需要84万匹以上棉布或320万包棉花，作为紧急救济。然而，中国沿海一带棉织厂有2.5万架纺织机及500万枚纺锤，均在日本人手中。

4月19日　国民政府免熊斌兼陕西全省保安司令职，任命祝绍周继任。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部长梁寒操答记者问时称：过去数年，由于军事国防机密之故，于新闻检查办法有若干不适宜之处，致使报界感受许多烦闷。半年以来，中宣部已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准备放宽尺度。

△　财政部为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民营进出口业务，规定六项办法：一、凡公司、行、号经营进出口贸易者，除依法办理公司或商业登记外，并应取得同业公会之证明，向本部贸易委员会或其各地办事

处申请登记，领取登记证；二、向财政部领取特许进出口证件；三、由贸易委员会予以国外推销或采购货物之介绍；四、向贸易委员会申请进出口运输吨位；五、得申贸易委员会协助，商请国家银行予以通融资金之便利；六、得在贸易委员会指导之下实行进出口连销运输。

△　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蒙古宣化师章嘉活佛抗战爆发后坚拒日伪军胁诱，毅然西行，是日与青海光迹寺朝藏呼图克图同行来渝。

△　新四军第三师第七、第十旅对苏北涟水县城西北的日伪军据点高沟、杨口发动攻势。战至5月4日结束，先后攻克高沟、杨口等日伪军据点14处，全歼伪军第七十二旅、保安第五大队2000余人。在阻援战斗中毙伤从新安镇、大伊山出援的日军140余人，收复六塘河两岸地区。

△　豫中战场日军突破暂编第十五军阵地后，是日分向郑州、新郑、尉氏、洧川等地突进，与第二十八集团军在上述各地发生战斗。至21日，日军攻陷新郑、尉氏，暂编第十五军所部及第二、第三两旅退守许昌西北地区。

△　豫北日军第一一〇、第六十二师团向第八十五军邙山方向阵地攻击，后又以步、骑兵在飞机和毒气攻击的掩护下猛扑。21日，突破河防阵地后，分陷广武、汜水。22日，攻陷荥阳。

△　日机轰炸河南巩县，投弹18枚，炸死民众23人，炸毁民房79间。20日，又轰炸禹县，炸死民众17人，伤数十人。

△　占驻山东阳谷、威县、临清之日军对临清县下堡寺进行“扫荡”，用枪杀、刀挑、水淹等手段，残杀无辜群众28人。

△　新生活运动总会盟军之友总社在重庆成立。

△　陈纳德向罗斯福告急，报告日军即将在中国发动大规模攻

势，由于正集中物资在缅甸作战，对中国内部国军实没有给予援助，人员、物资、运输俱感缺乏。

△　美国驻两广总领事林华得在桂林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本年1月美国运华物品较去年1月多15倍，而且按月在增多之中。

4月20日　郑州失守。19日，日军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先遣队到达郑州火车站附近后，其第三十七师团郑州挺进队主力随后赶至，与守城的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发生激战，战至是日下午，守军向西溃逃，郑州陷敌。

△　军事委员会任命丁德隆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刘安祺为第五十七军军长。

△　常德会战阵亡将士公墓建成，是日常德各界人士在墓前举行追悼大会，蒋介石为大会题词“浩气丹心”。同日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一律下半旗志哀。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聘用派用人员管理条例》。

△　行政院决定组设民食改进委员会，设委员11人，分由行政院及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等部各派代表充任，并以行政院代表为主任委员。

△　中华文协桂林分会在桂林开会纪念文协总会成立六周年，柳亚子、欧阳予倩等讲演，主张应把“抗战、团结、民主”作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同时应该“讴歌光明，暴露黑暗”。

△　中国访英团团员杭立武应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之约，作题为《英国战时经济情形》之讲演，对1939年以来英国消费、节约、增产、租税等一一概述，并称：战后英国可供中国大量机械，两国合作以保证战后世界繁荣。

△　日机数批袭击洛阳，并在孝义、偃师、白鹤等地投弹。同日，又有日机27架分三批袭陕，在南郑、安康、潼关等地投弹。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武汉行营，设立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任命杨揆一为绥靖主任。又任命陈春圃兼代广州绥靖主任。5月7日，杨揆一抵汉口就职。

△　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与会40余国代表参加。中国代表李平衡、谢徵孚，劳方代表朱学范，资方代表李馥荪。顾问张鸿钧等参加。大会议题为确定国际劳工组织今后之政策、工作，对同盟国推荐现在及战后之社会政策，调整由战时至和平时期之劳工组织等。

△　重庆《中央日报》讯：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中国大型词典《清代名人录》第一部，内容包括名人传记800篇。主编为国会图书馆亚洲系主任荷美尔博士。胡适为该书作序，称该书为“国际学者合选中国历史传记的空前杰作”。

△　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日军在中国发动的新攻势，其目的在于“亟待开辟一陆上路线，以运输缅境日军所需之供应”。

△　韩国临时议会在重庆开会，选举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获选连任。

4月中旬　　为进攻缅北密支那，史迪威决定以缅北的中美军队组成中美混合突击支队，下辖两纵队：第一纵队为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八十八团及新编第二十二师山炮连，加美军一个步兵营，由美军基尼逊任纵队长（简称为K纵队）；第二纵队为第十五师第一五〇团，加美军一个营和山炮一个排，由美军汉德任纵队长（简称为H纵队）。

△　日伪军在平、津地区肆虐，以文化、教育为甚，逮捕各大学

教授，工商学院被迫停课，中国、辅仁两大学亦难维持。华北伪政府将故宫博物院重达2095斤的铜器奉送日军，熔造军火器材。

4月21日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举行常会，到会张伯苓、王世杰、许孝炎、黄炎培等。首由秘书长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次由何应钦报告最近国内战场、缅甸战场及世界战场之局势，称：总观全局，各战场除曼尼坡外，均有重大进展。并称：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其政治方面之意义，尤重于军事。

△　何应钦密示张治中、王世杰：中共代表林伯渠到达重庆后，应拟一谈话稿，原则是不能离开“军令政令之统一”。

△　社会部公布《儿童福利法》，凡六条。

△　冯玉祥在四川泸县主持献金大会，当地士绅刘心柏捐款30万元，施晋生捐款60万元，冯玉祥赠物予以褒奖。

△　滇西中国远征军奉命以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集团，准备强渡怒江，向高黎贡山及腾冲方向攻击；以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集团，固守怒江东岸阵地；另以第一线各集团分派加强团强渡怒江，以策应攻击集团；并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配合作战。

△　日机15架分两批轰炸洛阳，先后在洛阳东车站一带投弹，炸死炸伤居民数十人，毁房屋百余间。同日又袭击河南临汝、登封等地。

4月22日　中、美、英公布《联合国家专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之联合宣言》，其宗旨在于建立商讨国际货币问题之永久机构，以谋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便利国际贸易之扩大与平衡发展；增加会员国之信力；增进汇兑之稳定。基金之摊派，各会员国应以资金及本国货币摊派一定数额之基金，总数约为80亿美元。基金之管理，由各会员国组成董事会及执行委员会管理，执行委员会至少由董事九人组成，其中

五人应为摊额最多之五个国家之代表。

△　财政部长孔祥熙对《联合国家专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之联合宣言》发表谈话，称：此项宣言中的建议，适合于各有关政府之考虑，希望各专家所完成之贡献，能进而产生一项协定，借以协助稳定国际汇兑制度之恢复，俾有利于国际贸易与投资之发展，而造福于全世界。

△　孔祥熙向蒋介石报告，英国5000万镑借款及租借协定的约稿已商妥。

△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告以根据货币专家暂时规定之纳款数额，中国在赞成本日声明基本原则之30个联合国家中，将列前四名。中国将纳款六亿美元，居于美、英、苏之后。

△　国民政府追赠王立业为陆军中将。

△　孙科在重庆保险业界座谈会上作题为《必须实行民主》的讲演，认为："宪法的功用在保障人民自由，规定国家组织，但自由与组织必须合理解决。过分强调组织，则剥夺人民的自由。"孙科指出："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以真正的民主应付目前的难关。"

△　为适应豫中战场的新形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将所辖兵力分为南、北两兵团：南兵团以李仙洲为指挥官，统辖部队以第十二、第二十九军为主力；北兵团以王仲廉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三、第八十五军。又划分了阵地，准备"以有力之钳形态势包围由中牟及邙山头两方面之敌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而歼灭之"。

△　由中牟渡河之日军万余名，在大炮配合下进至密县境内。23日由邙山头渡河之日军一部亦赶来会合。时第八十五军约千人由密县西南地区反攻，为日军打退。24日密县失陷，第八十五军转守西方山地，阻止日军。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冀南赵县、高邑。

△　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动全国党员储蓄，并成立党员储蓄竞赛推行委员会。是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各级党部经办党员竞储须知》，凡23条。

△　长沙《大公报》讯：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乘飞机去美国举行婚礼，所耗费的资金可救济中国一万难民，可办一所完全的大学，其制作嫁衣的功夫可以制成两个师人的军服。

△　甘肃省继湟惠渠、溥济渠、兆惠渠之后，汭丰渠是日举行放水典礼。全渠长13公里，支渠11道，可灌溉农田约一万亩。

△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举行会议，一致推选中国为常任理事国，以继任日本退出后之空席。朱学范、李平衡分别任理事会中的正式代表和正式劳工代表，李铭为劳工局业主组副主席。

△　据英国《新闻纪事报》特派员报道：战事结束后，美国将把中国作为一广大的棉织品市场。为此，联合国救济总署希望美国政府于最近非常时期救济中国难民8400万人。

△　据中央社讯：伦敦大学东方专科教授赛蒙氏出版《基本中文一千二百字》一书，以作为研究中国文字学之用。中国访英团员王云五为该书作序。

4月23日　重庆《中央日报》载：1943年四联总处农业贷款总额为14.5153亿元。年底贷款结余总额共15.2747亿元，其中以四川省最多，贷款结余总额为4.92亿元。

△　兵役署长程泽润对记者就兵役及优待抗属等问题发表谈话，认为中国抗属优待之责，应仿照欧美制度，以法律明定之。

△　社会部召开研究人口政策会议，全国社会学专家陈达、吴文

藻、李景汉等10余人出席，会议拟就人口政策、纲领及实施方案内容，呈请当局核定实施。

△　豫中战事日紧，第一战区政治部是日成立战时工作总队，会同地方党、政、军、警各方发动民众致力战时工作，工作项目为救济、肃奸、协助疏散等。

△　新四军彭雪枫师在运河至津浦路300里外线出击，攻克日伪军据点16处。

△　中美工商协会会长柏德生在纽约宣布该会工作的12项方案，要点为：研究中国关于公司注册、商标、专利版权赋税、所有权、保险等法律暨其他商法及其对中美交易之影响；保留及修改（遇必要时）对华贸易法，作为美国商界从事对华贸易之联合工具；研究租借法案及商品借贷所予对华贸易之影响；研究中国之建设计划及经济目的与见解；拟定在美训练中国技术人员计划。

4月24日　　粮食部长徐堪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报告粮政，提出1944年度必须增加征收征购数额，期于足敷军需民食公粮，并有余粮调剂市场价格与积储备急。

△　行政院设立行政效率设计委员会，任命甘乃光、狄膺等12人为委员。

△　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云南、贵州区办事处派员赴被灾地区调查，是日报告灾情称：云南曲靖、沾益等县灾情十分严重，一般人民将草根、树皮掘食一空。

△　国民参政员胡霖在重庆播讲《宪政风变》，认为民主而不宪政，则民主是空的；宪政而不民主，则宪政也是空的。并提出四点意见：服从法律、尊重自由、公道竞争、容纳异己。

△　豫东第一战区所部攻克太康县城。

△　豫中战场日军第十二军各部全部集中于密县、新郑等地。25日，各部日军继续南犯，于26日到达许昌外围。

△　豫中战场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与由开封西犯之日军会陷密阳，并继续西犯。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扼守马驹岭、虎牢关之线，阻止日军第六十二师团之西进。

△　日机78架分批袭击河南，在渑池、登封、偃师等地投弹。

△　据中央社讯：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拟运生棉320万包及20万万粗码棉织品来华，救济中国难民。

△　印度政府派遣农业访问团来渝，将依次访问四川成都、重庆、乐山、自贡、五通桥及广西桂林、柳州等处，为期两个月。

4月25日　蒋介石就强渡滇西怒江作战分别致电卫立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指出："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人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

△　蒋介石电复丘吉尔4月24日预祝远征军入缅作战成功来电，表示将尽全力协助印缅盟军作战。

△　洛阳各界发动扩大慰劳前方将士及救护难民运动，是日由第一战区政治部召集会议，决定立即募集军鞋万双，咸菜万斤，派员携往前方慰劳。

△　晋察冀边区动委会控诉日军暴行。据不完全统计，去年秋季日军在31个县约1000万人口的地区，杀害中国同胞6674人，烧毁房屋5.4779万间，抢掠和烧毁粮食2734万斤。

△　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计划主持人斯维特抵渝，并发表谈话，称该会自1941年以来，拨给中国款项计1886.6717万美元。从1944年

1月至9月，计划汇华救济款2.6亿美元。

△　日机133架由山西运城、河南新乡两地起飞，袭击河南各地，先后在新安、临汝、卢氏等县境内投弹。同日，又有日机39架袭击陕西潼关。

△　日机32架分批袭陕，侵入西安上空时，在中正门内外投弹多枚，死伤平民10余人，毁民房20余间。

△　日军去冬在绥西东公旗、西公旗强征壮丁250名，经训练编为伪警察，该警不甘受敌驱使，是日全部哗变，携械向第十战区一部投诚。

4月26日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在答记者询美国对华援助若不能大量增加，中国对抗战能坚持多久时称：我国不仅为争民族生存而战，亦且为维护正义而战。在未有外援可期之时即已单独作战，现在倘盟邦无大量之物质援助，自亦将尽其在我继续作战，故我作战之决心无可动摇。以前国际路线完全断绝时，吾人又何曾作战稍懈？

△　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代表朱学范、李平衡在大会发言，朱学范称：余希望各国政府与制造厂商，彼等不论在中国开创何种工业，均不应遵循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劳工之不开明途径。李平衡指出：日军在其占领区内雇用大量工人，中国深望国劳会议能通过某种办法，使此等工人返籍。

△　全国慰劳总会给第一战区汇寄国币50万元，慰劳中原作战将士。同日又分电陕、豫两省分会，克日发动民众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并扩大组织救护伤兵运动与战地服务工作。

△　中美工商协会发表中国政府之统计数字，表示须在15省内建筑新屋1200万所，借以容纳8400万难民。中国政府表示，建屋所用木材将由中国供给，其他材料须赖输入。

△　浙江义乌在乡军人何芸生抗战以来组合乡兵，奋起御敌，去年5月为日军包围，不甘作俘，自戕成仁，国民政府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令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主力向豫西密县、马驹岭之日军反击，压迫密县西北地区之日军改取守势。战至30日，日军后续兵团之第二十七师团、战车第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等陆续集结于密县、新郑等地，向禹县、许昌、襄城等地猛攻，与第二十八、第三十一两集团军激战。

△　豫中战场日军约六七千人到达许昌外围的石象镇、五女店、和尚桥，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许昌附近各据点猛犯。经守军新编第二十九师痛击，创敌甚重。

△　日机27架在陇海线窜扰，并在河南新安投弹三次，在洛阳投弹一次。

△　日伪在全东北进行大逮捕，大肆屠杀抗日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仅黑龙江双城就有40余人被捕，20余人被处死。

△　绥远至重庆汽车首次通行，全程1342公里，约15日可到达。

4月27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著作权法》，凡五章37条。

△　赈济委员会、新生活运动总会、中国慈幼协会、美国援华总会派代表艾莹生等前往河南黄泛区视察灾情，历时九个月，视察40余县，是日返渝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去年以来，中央拨予豫省之赈款约3000万元，地方赈济则侧重以富养贫。此种办法亟宜改进，地方上富者甚众，而养贫者不多。

△　蒋介石致电萨尔瓦多政府总统，对该国宣布废除对华移民限制表示感谢。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奉命开抵清河。5月1日，该师第六十五团在北、第六十六团在东北、第六十四团在西南对英开塘形成三面围攻之势。

△　八路军冀中第九军分区一部在任丘县大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将任丘县城包围，伪县长兼伪军联队长刘潮如等以下官兵520余名伪军被迫向八路军投诚，县城一度被收复。

△　浙江金华日军古内师大郎携带枪支及日军所绘中国地图一份，向中国军队一部投诚。

4月28日　行政院为统筹战后救济及一切善后事宜，特设立善后救济调查设计委员会，蒋廷黻任主任委员，顾翊群为副主任委员，夏晋熊、张忠绂、洪兰友等为委员。是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今后工作计划及内部组织，并请联合国救济总署代表报告总署工作情况。

△　行政院决定：1944年度全国田赋征实数额为一亿担，比1943年度增加3500万担。

△　重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联合举行文化界招待会，提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民主改革等要求国民党实施。

△　四川省主席张群致电冯玉祥，感谢冯在川中各县发动献金之劳。

△　中华慈幼协会河南禹县慈幼院长陈子敬抗战爆发以来，收留难童达1.4万人，并在河南筹设抗战军人子弟教养院，日前抵渝。是日甘乃光、马超俊、徐恩曾等设便宴款待。

△　中国民众教育专家晏阳初应古巴教育家与该国英美友人之请，是日由英转往古巴，开始作普及民众教育之实验，拟推行下列计

划：一、基本教育；二、科学耕收；三、农村合作；四、公共卫生；五、自治。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冀南鸡泽、曲周。

△　新四军一部袭击江苏江阴马头镇等伪军据点，毙敌官兵20余名，俘144名。

△　一列西去特快客车行至河南新安城西铁塔山峡谷间，遭六架日机轮番轰炸。数节车厢中弹起火，旅客死伤甚众。

4月29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王用宾，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并交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

△　军事委员会任命施北衡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天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　中共代表林伯渠偕王若飞、伍云甫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离延安，于5月2日抵达西安。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亦于同日由重庆抵达西安，同中共代表林伯渠会谈。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林伯渠，告诉他可按周恩来3月12日讲演中所提五条，同王、张谈判。

△　新任海关总税务司李任对记者发表谈话，详述海关税收状况，略称：1943年度海关税收总数超过10亿元，应征战时消费税物品34种。谈及海关机构，李称：共约450单位，东至温州、福州，西达新疆边境，北起绥远，南迄法属安南之边境。

△　驻美大使魏道明访美国务卿赫尔，递交蒋介石致罗斯福函件。

△　行政院公布《学龄儿童失学民众强迫入学条例》，凡九条。

△　教育部拨款20万元整修敦煌千佛洞石窟，是日竣工。

△　陕西各界在西安发动募捐运动，资助河南难民，是日共募捐500万元。

△　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与美第十四航空队初步达成滇西方面作战的协定，其要旨是：第十四航空队担任在怒江以西地区直接协助地面作战，对腾冲、龙陵、芒市之敌攻击；间接轰炸敌后交通线及八莫、腊戌、滚弄要点之仓库；并担任第一线作战军之空投补给。

△　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由缅北胡康河谷之太克利出发，经库芒山区向密支那突击。

△　豫中战场许昌外围日军增至万余名，战车及汽车达150多辆。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从不同方位对许昌城实施包围，切断许昌守军的退路。

△　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宣言，阐明国劳局之目标以及会员国拟订政策时应采取之原则，并声明一切人类不论其种族、信仰及性别为何，均有权在自由与尊严，经济安全及机会平等诸条件之下，获致物质幸福与精神发展。

4月30日　　蒋介石电令汤恩伯兵团“对窜犯许昌之敌应予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据此，汤恩伯命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守备许昌；又命令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两个军万余人急速向襄城、禹县方面北上，攻击南下日军侧面。

△　豫中战场许昌守军新编第二十九师三个团和补充团约2000人与日军在西门、北门激战。下午，日机12架对守军进行轰炸，炮兵也集中向西门外和城墙西南角轰击。城内多处起火，工事大部被毁。至晚，南关和西门等处相继告失，城内巷战、白刃战至烈。

△　蒋介石密派中宣部邓友德、魏景蒙、陶启湘，中央社徐兆

镛，中统局杨嘉勇，军统局任海山，军委会徐佛观监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密示他们“沿途可把握机会作适当之宣传，但不必多说话，应尽力避免故意挑剔之形式。仅遇重要之所，可略加指点，或暗示即足。切不可流露监视或干涉之态度”。

△　驻美大使魏道明密电蒋介石，报告与美国务卿赫尔晤谈苏联的远东政策，以及中共在美的晤谈等情况。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对长沙、衡阳两地报纸揭露该省暴政不满，手令两地政府严予查禁，并勒令有关杂志停刊。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山西沁水。

△　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在鲁中地区歼灭伪军吴化文部四个团，俘少将以下2000余人。

△　日机16架分七批袭击河南，在偃师、临汝、叶县、孝义等地投弹。同日，又七架自湖北竹山西窜陕境，在安康城郊投弹。

是月　行政院核定绥远省新设狼山县、晏江县。

△　日军因准备进攻中原地区，急需大批自行车军用，在天津与日商昌和洋行勾结，出动武装，首先将春立德、华利成、同丰、兴立德、永盛合、仁利成等6大车行的存货全部查封，勒令自行车业公会在浙江会馆内成立“协助东亚圣战完成临时购车委员会”的代办组织，抢走自行车1.5万余辆，仅给30％的代价。

△　日军将芜湖到湾沚间铁道全部拆毁，所有铁轨悉数运往安庆。计划利用此项旧轨建就安庆至九江之铁路。

△　日伪在平、津地区大肆搜捕教育界人士，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工商学院等校教授及各中学校长、职员、学生等共达200余人入

狱。

△　湖北省东至应山，西达郧县，北至豫边，南达长江，连遭旱、蝗、风、雹等灾，千里荒芜，灾民盈野。

5月

5月1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交通部长曾养甫报告铁路、公路、驿运、航业、电信、邮政等建设与业务，提出1944年度的建设方针为：一、便利军运军讯；二、加强服务精神；三、规划复员复兴。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祖舜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郑洞国为驻印军指挥部副总指挥，孙立人为新编第一军军长，廖耀湘为新编第六军军长。

△　重庆《大公报》载：国民政府拨款100万元，救济云南灾荒。云南省成立赈济委员会，亦募得赈款4300万余元。

△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重庆召开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西南、西北三区负责人及该会正、副总干事会议，商讨如何配合工作问题，并宣布蒋经国为该会常务理事。

△　闽台协会总会在柳州正式成立，推张贞为会长，吴石为副会长，将筹集基金500万元，创办闽台企业公司，并拟编印丛书。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一部进至拉吉以西地区，8月攻克拉吉，毙日军第五十五联队数十人。同日又攻克大弄阳，毙敌40余名。

△　许昌失陷。拂晓，许昌守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在日军强攻下停止抵抗，向东北方向退去。至于庄附近又与日军一部相遇，师长吕公

良在战斗中阵亡，该师团长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

△　新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大使代表贝志高抵渝，是日向蒋介石递交到任书。

△　重庆文化界人士创办的《国是》月刊正式出版。

5月2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战区各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战区各县政府组织规程》及《专利法草案》。

△　《中英财政协助协定》、《中英租借协定》在伦敦签字，英国政府将以5000万英镑供应中国，用于在使用英镑区域内，购用其因战争需要之货物与劳役，并以租借物资供给中国军器。

△　黄炎培、王云五、莫德惠设宴招待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张君劢、左舜生等，黄炎培称：国民政府摧残工商业，以至从沦陷区载巨金来渝者多愿回去。孙科称：中华民国不能亡于一人之手。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三个团开抵英开塘，并实施反击，日军死守不退。史迪威乃下令使用陆、空军联合攻击。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一部在河北行唐县沟里镇伏击伪绥靖军第六集团军第十五团获胜，击毙日军指挥官、伪营长以下43人，俘伪团长以下官兵47人。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袭击鲁南伪军荣子恒部九个据点，毙伪第二师师长刘国桢，俘伪团附宋奇思以下200余名。

△　日军陷河南临颍，并以战车第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向襄城、郏县突进，以步兵万余围攻禹县。

△　国际妇女委员会在重庆开会，选举英驻华大使薛穆夫人为1944年度主席。

5月3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部长梁寒操报告中原战况，并称：目前战争关键在于滇缅路重开。我国拥有优秀之人民与军队，一旦现代武装到手，胜利自有把握。

△　张治中、王世杰及胡宗南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访晤林伯渠。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自去年发动“青年号”飞机团员献金运动以来，已捐得1000万元，是日召开结束会议，决定将全部献金呈缴委员长侍从室，转献蒋介石。

△　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张申府、曹禺、张静庐等50余人出席，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的审查制度。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在美空军战斗机36架支援下，对英开塘之日军实行猛攻，经反复冲杀，将英开塘阵地全部摧毁。5月4日，攻占英开塘，日军第五十六联队残部沿公路退守马拉高。

△　新四军第三师一部攻克江苏滨海县陈家港等日伪军据点10余处，歼灭伪军800余人。

△　拂晓，豫中战场日军以第六十二师团为主力，一万多名日军在20辆战车配合下，对河南禹县进行包围攻击。一天内占领了禹县县城及附近地区。第一战区守军约三万人，放弃阵地向西南方向逃去。同日，日军七八千人，在战车和大炮的配合下，猛攻襄城，至夜由南门突入，占领该城。

△　日军混成第七旅团侵犯河南省襄城地区，屠杀六王冢各村群众2000余人，奸淫妇女200余人。

△　汪伪广东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遇刺身亡。

△　英国外相艾登在下院报告《中英财政协助协定》问题，表

示：中国在使用英镑区域所购用因战争需要之货物及劳役，均由以前之英方信用借款支付。并称：鉴于目前协定之订立，特先根据租借条款供给军火。

5月4日　　国共双方代表在西安开始正式接触。张治中首先表示，他们是代表中央政府及蒋介石来欢迎的，因为郭仲容参谋电报中说林伯渠先生有病，须乘飞机赴渝，而飞机每月只有2日和6日两次，故蒋介石派他们先来西安商量一个具体解决问题的轮廓。林伯渠说：中共中央的意见去年林彪等已谈过多次，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张治中表示他们不能提办法，现在亦不能向蒋介石请示，坚持要林伯渠首先提谈判方案。

△　延安各界青年代表3000余人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吴玉章讲话，称："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我们在政治上实行了'三三制'等政策，使广大人民获得了抗日民主的自由；在经济上实行了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按户计划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使人民达到丰衣足食；在文化上，我们实行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革命"，并号召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的广大青年，要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　西南联大3000余师生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等教授讲话，表示要继承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为当前的民主而奋斗。

△　第五届全国兵役会议西安区会议开幕，安徽、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八省代表40余人出席，兵役署长程泽润主持开会。主要议题为士兵教育，充实兵源，革除弊端，优待征人家属等。6日，会议结束，通过提案百余件。14日，程泽润赴兰州视察兵役并检阅各省国民兵团。

△　军政部颁布命令，定本年度起实行现役士兵退伍制度，时间

在每年12月31日举行。

△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在重庆开会，审定1943年度学术获奖者：一等奖获得者计有汤用彤、陈寅恪、陈侯功、杨钟键、杜公振、邓瑞麟等；二等奖获得者计有朱光潜、唐君毅、胡世华、闻一多、刘节等；三等奖获得者计有程伯臧、宗威、洪深、高华年等。

△　农林部组织西南各省农业调查团，四川省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组进行，西康省调查团已于3日分两路出发。

△　豫中战场日军第三坦克师团对郏县发动进攻，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守城应战。战至中午，10余架日机赶来轰炸，掩护地面日军部队登城，守军第八十一师伤亡惨重，向宝丰一带退去。日军占领郏县。同日，日军又占领临汝。

△　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杂志。

5月5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国民政府成立二十三周年（按：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纪念会。蒋介石及国府委员等200余人出席，蒋介石致词，策勉同仁“光大我们革命的事业，完成总理未竟的志事，达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使命”。

△　中国政府与哥斯达黎加政府在圣若瑟签订《中哥友好条约》。

△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在重庆举行第三届联合年会，到会员200余人，陈立夫、梁寒操、朱家骅、谷正纲等出席，会议讨论通过《战后世界和平与教育改造》、《实业计划最初十年人才培养》等。6日会议闭幕。

△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发出攻击滇西龙陵的命令：令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军，继续攻击高黎贡山及腾冲；令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

军，担负龙陵、芒市攻击；命第七十一军攻击龙陵，并配属第五军山炮一营。

△　湖北洪湖地区新四军战士救出美国飞行员叶里罗拉；7日又在沔阳救出美机师白莱德。

△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袭击洛阳日军，炸毁敌货车40余辆，日军伤亡300余名。

△　豫中战场日军由机动步兵第三联队、坦克第十三联队和机动炮兵第三联队一部组成龙门支队，到达洛阳的南大门龙门，分三路向洛阳城发动进攻。守军第一战区所属新六师、暂第十四军所部第八十三、第八十五师与日军展开激战。至7日拂晓，日军占领龙门东山最高峰。守军撤至龙门伊河西岸，龙门阵地被日军突破。

△　豫中战场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部分兵力自许昌南移，向郾城方面行动，以期打通平汉线。是日由郾城东关进入城区，突破守军第八十九军新编第一师的防线，将郾城完全占领。

△　日机一架在安徽颍上骑兵第八师司令部投弹四枚，副师长卢文广遇难。

△　是日、6日，日机连炸广东南雄、江西赣县。

△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会成立，推选香河正男为委员长，高峰红志为副委员长。下辖豫鄂边、淮南、淮北、苏中、苏北五个支部。是年秋，又成立苏浙支部。

△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将尽力加速供应品与军需援华，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境。

△　英国外交部顾问、英情报部远东课长普拉特在远东发表演说称：英国重建远东地位，唯有借中国之富强。

5月6日　　国共双方代表继续会谈。张治中出示其去年所记的林彪所提的四项条件，要求林伯渠表示意见。林伯渠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讲演中阐明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地方政府、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等五点要求作为这次谈判的基础，但遭到国民政府方面的拒绝。国民政府方面提出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谈判边区问题时，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政府代表则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执行国民政府的法令。

△　国民党中央制定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五项：一、不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家总动员法》及《出版法》之规定；二、不得泄露国防军事机密及其有关财政、经济、交通、外交等机密事项；三、不得妨碍政府外交政策；四、不得歪曲史实；五、不得污蔑中国文化。11日，梁寒操在重庆对记者称：该审查标准“即将交十二中全会讨论。一般社会人士认为四、五两条甚难加以具体解释，然舍此殊难找到适当办法”。

△　第二十集团军奉命担任反攻滇西怒江之任务后，是日制定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于怒江左岸之栗柴坝、双虹桥间地区集结，主力保持在左，强渡怒江，攻击当面之敌，进击固东街、江苴街之线，攻击腾冲而占领之。”

△　中美突击支队第一纵队通过缅北南卡，是日对雷班附近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发动攻击，战至9日，将该阵地击破，10日占领阿兰日机场。是役共击毙日军大尉以下80余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克复河南内黄。

△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轰炸汉口。同日，又袭击河南临汝至襄城公路日军车队，毁敌车30余辆，毙日军250余名，炸中油库一处。

△　豫中战场日军攻陷河南登封、宝丰、鲁山，各地守军第四集团军及第九军予敌重创后，向郾城方面转移。

△　驻防皖东含山一带之伪军长马云龙、自卫团长陈仰光等率领全体官兵携械反正，并毙追截之敌多名。

5月7日　　蒋介石电告罗斯福，派商震将军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　国共双方代表继续会谈。张治中最终提议以林彪提案四军12师为限，林伯渠同意以此作为最低条件向中共中央请示。同时，双方对军队作战区域、人事、经济、边区及党的问题等亦原则上交换了意见，张、王事实上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8日，双方继续谈判。

△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选举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为该局理事。

△　驻美大使魏道明招待记者，告之华莱士副总统不日将访华，对中美两国于此重大时际之合作当极有助力。并称：新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即将抵美，其任务乃在欧战进入高潮之际，协助增加中美两国之军事合作。

△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韩振声接任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　重庆《中央日报》载：中茶公司自潘宜之兼任董事长后，外销问题大体解决，本年度国销茶叶已定为10万包，在东南区货茶已定1500万元。

△　军政部教导第一团学兵举行出营典礼。参加远征军者有1690人，第一批600余人于是日出发。

△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分批在河南登封、临汝、白沙、龙门一带公路袭击日军，毁敌各种车辆2000余辆，毙敌百余名。

△　龙门失守，洛阳告急。第十四集团军是日命令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统一指挥第九十四师担任洛阳之守备；着第九十四师死守洛阳城，第十五军即占领洛阳外围既设阵地，协同第九十四师固守洛阳10至15日。

△　自许昌南下日军陷漯河。同日，自信阳北进之日军独立第十一旅团陷遂平。8日，日军南北会攻西平，打通平汉线南段。

△　英王乔治六世授赠何应钦K.C.B勋章，商震C.B勋章，周至柔C.O.B.E勋章各一枚，由英驻华大使薛穆代表授予。

5月8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常德会战中阵亡的第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暂编第五师代师长彭士量、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并准入祀首都忠烈祠。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耀明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唐永良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　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枢联合纪念周报告1943年度教育工作概要，并提出1944年度教育工作重点为：一、督促发展工业教育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二、普遍提高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劳动服务；三、着重师资之培养与学校内部之充实；四、指导中小学教职员协助推行地方自治及举办社会服务；五、充实学校设备等。

△　据中央社讯：1943年度全国征粮数额已达6100万市石，占预定总额的95％。其中闽、皖、桂、豫等省征足数额，且多超收。粮食部正在加紧储运配拨工作，以充分供应军需民食。

△　第十军接受固守洛阳的任务后，是日研究对洛阳的布防，决定把阵地分为西工、邙岭、城厢三个地区加以固守，并分别由第六十四师、第六十五师及第九十四师担任守备任务。同日，各部全部到达新防区，进行战前准备工作。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负责开展豫北游击战争。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任丘。

△　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在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七里岗、大山寺对来犯之桂军第一八九师第五六五团、豫鄂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开展大悟山自卫战，是日至12日，打退了桂军的进攻，毙伤桂军470人，新四军第五师伤328人，死117人。

△　美国参议院通过《租借法案》延长一年，并发表报告运往中国的租借物资在10亿元以上。

5月9日　　张治中、王世杰托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将国民政府整理的商谈初步意见以书面形式送交林伯渠，请其签字认可以便上报蒋介石："一、关于军事者：（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委会之命令。（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1943年林彪所提出四军12师之数。（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规呈报请委。（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二、关于陕甘宁边区者：（一）名称可改为陕北行政区。（二）该行政区直隶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行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其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能经常交

换意见。（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三、关于党的问题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行民治，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中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四、其他：（一）中共表示继续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二）撤除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商业、交通，即先予以便利。（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抗战的原则去解决。”

△　三民主义学会在重庆成立，名誉理事长蒋介石，名誉理事为吴敬恒、戴季陶、孙科、王宠惠、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邹鲁、陈布雷。理事为梁寒操、潘公展、甘乃光、张铁君、陶百川等。蒋介石在成立大会上勖勉该会以“信”、“解”、“行”、“证”之精神，努力于研究及实践，使三民主义不独普及于全国，并能弘扬于世界。

△　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由商震率领离渝赴美，15日抵美迈阿密。该团将依据三项要点进行工作：一、促进中美谅解；二、为中国军队获取重装备；三、使中美两国取得更密切联系。17日，商震一行抵华盛顿，并称：来此目的“系本可能最密切之途径与美国官员合作，并竭尽绵薄，使作战努力趋向某种胜利之途”。22日，商震访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及海军上将金氏等。31日，魏道明陪同商震谒美总统罗斯福，向罗解释中国军事形势。

△　第二十集团军奉命下达反攻怒江的作战命令，要求攻击军及防守军之加强团一律于5月11日开始渡河攻击。其开始时间应为白昼或夜间、拂晓。

△　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增设东北、台湾两调查委员会，分由沈鸿烈、陈仪主持。

△　军政部教导第二团学生716人毕业，其中出国者605名，以志愿服务机械化兵种为最多，次为辎重、炮、通讯、化学等兵种。

△　中国空军一队出击河南临汝、伊川及龙门一带地区，攻击日军战车部队，在白沙北击毁日军各种战车10余辆。

△　豫中战场日军第一军一部为策应对洛阳的攻击，是日由山西垣曲南渡黄河，分兵向河南渑池、英豪一带进击。12日占领渑池。13日主力一部沿铁路东进，威逼洛阳。

△　豫中战场洛阳龙门方面日军步、骑兵共2000余人，在战车百余辆的配合下，沿公路向北进犯，另一股2000余人猛攻七里河。10日，洛阳城防警戒线被突破。

5月10日　国民党中宣部参事张平群在重庆就外国记者所提河南战事紧张，究竟美国训练华军成效如何时称：河南战事演变至今，并非训练问题，其主要关键仍在我军缺乏精良装备及优势武器，并表示深望盟邦今后加紧援华。关于英国援华问题，张平群称：英国5000万英镑借款，其目的与美国五亿美元借款相同，乃为增强我国战时经济。

△　驻美大使魏道明奉命谒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战区情势，并转交蒋介石致罗斯福信函一件。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安新。

△　驻河南宝丰县日军泽野大队，在观音堂、柏林一带屠杀中国民众300余人，其中有俘兵200多名。

5月上旬　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致电蒋介石，要求根据重庆黄山会议记录第30条规定，履行将滇西中国远征军交史迪威指挥。蒋以此次向怒江西岸出击只是牵制日军，策应盟军，并非实行黄山会议决议案为由予以拒绝。

5月11日　　林伯渠将张治中、王世杰9日所送书面初步意见作了重要文字修改，并签字交予张、王，内容如下：“（甲）关于军事者：（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之四军12师之数；（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活动之防地；（四）前项部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规定呈报请委；（五）前项部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等待遇。（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一）名称：可改称为陕北行政区；（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三）区域：以现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其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实行；（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六）该行政区及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行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经常交换意见；（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丙）关于党的问题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包括新疆被押人员在内），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不受损害和歧视。（丁）其他：（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二）撤销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以便利；（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经济、政治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抗战的原则去解决。”12日，张治中、王世杰致电蒋介石，强调这些意见是林伯渠单方面的意见，而并非双方会谈的结果。

△　滇西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怒江作战。11时，第二十集团军（即攻击军）首先以第五军第五九四团于栗柴坝、孙足渡口渡过怒江，与原在怒江西岸之预备第二师游击营配合，攻击那瓦寨，并向北斋公房之日军警戒。19日，第五十四军之第一九八师主力由勐古渡、水井渡，第三十六师由康郎渡、勐獭渡、缅戛渡、大沙坝、龙潭渡，在强大空、炮火力和工兵支援下，分别强渡怒江。至12日拂晓前，各部均已渡过怒江。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即防守军）为策应第二十集团军渡江作战，以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由惠仁渡、第八十八师加强团由打黑渡、第七十六师和第九师联合编成之加强团由罕拐渡分别渡江，因行动秘密，均未遭日军抵抗。

△　皖北第一战区一部击退犯阜阳日军后，乘势向颍上城垣猛攻，至晚将该城克复，残敌向东南方向逃窜。

△　豫中战场日军步兵千余人，在战车40余辆配合下，向第六十四师驻守的洛阳西工防区发动进攻。该防区第一九一团先后炸毁日军战车五辆，毙敌300余名，旋日军增援，不支，排长李景义及全排官兵全部殉国。12日，日军大量来援，守军伤亡亦重，奉命放弃西工阵地。

△　行政院会议通过《战时省县政府组织条例》。

△　日机三次袭击长沙，其中一架在水风井一带投弹九枚，毁店房10余栋，死亡平民32人。

5月12日　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致电蒋介石，报告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商谈情况。电报称：“职等2日抵西安，林祖涵同日到达，3日职等偕胡副司令长官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作初次访晤，自4日至11日曾约林祖涵来职等寓所商谈，计经五次，每次半日，林于谈话中表示此来系向钧座报告情况及请示办法，职等遂详询彼对各项问题之意

见，彼所提议，诸多不当。嗣经职等一再驳斥纠正，彼渐将提议降低，综计历次谈话暨林最末次提议各项摘要如下：（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前新四军部队，服从军委会命令至少编为四军十二师，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抗战胜利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二）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隶行政院，以现在地区为范围，实行三民主义及中央法令，但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以后不得发行钞票，该行政区内，中央可以办党办报。（三）希望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并盼释放被捕人员，撤除边区军事封锁，对于边区商业、交通，首先予以便利。（四）中共当表示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以上为林祖涵提议之大要，所有商谈详情容再面陈，职等拟不在此间予林以书面意见，当俟回渝请示后提出，并定本月16日偕林祖涵及其秘书王若飞乘班机返渝，谨并陈明。”

△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举行常会，由经济部次长秦汾报告经济设施情形，要者为：一、经济根本计划及战后建设问题；二、国营、民营问题；三、沦陷区收复后对敌伪财产处理问题；四、利用外资问题。

△　中美突击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缅北丁克路高，美军与该地日军第一一四联队二个中队遭遇，被日军包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团闻讯驰援，13日下午两面夹击，将日军击退,终解美军之围。

△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出动各式轰炸机袭击河南信阳铁路西北仓库区，毁日军车六辆，仓库四座，日军被扫射死伤近百。

△　据中央社讯：中美空军旬日来分批出击，予敌重创，自6日至是日，共击落日机七架，毁战车及各种车辆220余辆。

△　由龙门、伊阳犯新安、嵩县之日军，是日攻陷宜阳、洛宁。

△　豫中战场日军步兵2000余人，战车70余辆，大炮数十门，继

续向洛阳七里河、兴隆寨、瞿家屯阵地发起进攻。第六十四师守军一部以手榴弹大量杀伤敌人，并多次进行白刃格斗。激战竟日，敌一部由兴隆寨与瞿家屯之间突入兰隆寨村边，切断了前进阵地与主阵地的联络，兴隆寨被敌包围。13日拂晓，终因弹尽援绝，阵地上的第九连官兵全部殉国，阵地陷敌。

△　日军在河南嵩县杀害河南大学师生，校长王直青等数十人遇难。全校图书馆仪器全部损失。

△　在美国费城举行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闭幕。通过《费城宪章》，载明其目的是“保持全部劳力获得职业和提高全世界劳工生活水准”。并规定四条原则：一、劳工不是商品。二、劳工有言论、结社的自由。三、贫穷是繁荣的威胁。四、消灭战争。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国民政府代表李平衡呼吁外国以剩余资本投于中国以助工业复兴。中国资方代表李铭表示欢迎国际银行的存在。

△　截至是日，本年度迁入伪满通化、三江、龙江、奉天、东安、黑河各省的朝鲜集合、集团开拓民共2.4万户。

5月13日　　宋子文电呈蒋介石，报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事宜。称华莱士希望6月20日后抵重庆，勾留三日，即赴昆明，并拟访问西南各处，再径赴成都。

△　滇西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渡过怒江后，于是日攻占红木树。第七十六师和第九师合组之加强团与第八十八师合攻平戛街。日军退向芒市。

△　第一战区所部克复河南遂平。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肃宁。

△　豫中战场日军战车16辆进犯洛阳苗家沟，与第六十四师第一

九二团发生激战。同时，日军战车30余辆由金谷园、西工分向第一九二团苗家沟阵地和第一九一团关帝庙、煤土坑阵地发动进攻。竟日激战，守军阵地失而复得者三次，敌被击退。至晚，围攻洛阳之日军步兵已达1.5万余人，战车200余辆，各种炮60余门。

△　豫中战场日军一部攻占洛阳城区之周公庙。日军派城东富绅入城劝降，遭守城官兵严词拒绝。

△　南昌伪军一部84名、伪警14名由伪保安中队长张仁寿等率领向第九战区一部投诚，是日抵临川。

△　美国各大学校友联合会赠宋美龄荣誉褒扬状。蒋夫人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播送答词，称："我们应当善自利用过去所享受的优惠，发挥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为了本国，也为了他国，导引我们的同胞向更完满的生活迈进。"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宣布：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已抵河南前线，指挥豫中战事。

△　日本在上海设立直接掠夺上海区域的"经济保安处"。

5月14日　蒋介石电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积极备战，以防日军向粤汉路进攻。

△　沈钧儒、黄炎培等在重庆举行宪政座谈会，立法院长孙科及董必武、章伯钧、张君劢、李璜、左舜生等300余人出席，孙科发言称："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给人民以政治自由。"

△　冯玉祥在四川隆昌主持献金大会，是日共收到献金2552万元，金戒指200多枚。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对怒江西岸大尖山、唐习山发起攻击，在优势炮、空军支援下，于15日将两据点攻克，并续向江苴街

前进。

△　第一战区一部围攻豫南驻马店。遇日军顽强抵抗，激战至午夜毙伤敌500余，残敌突围南窜，退守确山，克复驻马店。

△　拂晓，豫中战场日军800余人冒雨向洛阳苗家沟第六十四师阵地、第六十五师破陵冢阵地发动进攻，守军以手榴弹先后炸毁日军战车五辆。15日，日军施放毒气，第一九二团一连官兵除20余人逃生外，全部壮烈牺牲。

△　日机一架在皖北阜阳以东三十里铺一带向中国守军阵地低飞扫射，守军以重机枪将其击落，坠于阳明镇附近。

5月15日　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拟定的谈判方案电告林伯渠，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关于全国政治者：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17条，其要旨为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16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日结束后另行商定；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请政府释放各地被捕人员；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破

坏发行；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请政府允许中共代表及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人员有往来于渝、延间及西、延间之自由，及允许西、渝两办事处人员有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

△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社会部长谷正纲报告社会工作概况，提出1944年度的工作重点是积极运用社会力量，推行社会行政和发展社会事业，并准备战后复员工作。

△　缅北中美突击支队第二纵队切断密支那至孟拱间公路，16日抵达密支那西北的南圭河畔。并决定5月17日攻击密支那西机场。

△　皖北日军乘豫中大战之际，突由寿县以飞机掩护沿颍河西犯，是日陷颍上，窥阜阳。

△　湖北省政府以该省两度沦陷，灾情奇重，向财政部要求免征同盟胜利公债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

△　加拿大宣布取消华人入境限制。

△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返国述职。

5月16日　中国、印度、美国、加拿大、法国等18国代表在伦敦签订协议书，设立联合国情报组织，其目的在交换情报与意见，中国代表为中央宣传部驻英代表叶公超。

△　是日为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周年纪念日，重庆军政长官及将军生前友好前往梅花山张自忠墓前致祭。同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1940年5月8日张自忠出师前致冯治安及致部属遗书两件。

△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处报道称：四川省同胞在冯玉祥倡导的节约献金运动鼓动下，献金运动蔚然成风，自贡、成都、江津、合江、隆昌等14县共献金二亿元，其中泸县最多，共5300万元。

△　重庆《大公报》载西南联大李树青等五名教授联名所撰《我们对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提出解决当前物价问题的办法：一、政府宣告停止通货膨胀，停止钞票发行内运，限制银行存款、提现、放款、点现。二、改革租税制度，实行强迫借款。三、声明各业自力更生，政府不予扶助。四、继续改善推行限价与管制办法。五、调查国民财富及国民所得的分配与数额，并进行全国财产总登记。六、立即着手改善官兵实际待遇，并筹划调整公教人员的薪给。

△　滇西中国远征军右翼第一九八师在炮、空火力支援下，攻占怒江西岸之马面关。17日又占领桥头。28日日军一部反扑，桥头一度被占。6月2日，第一九八师再战，摧毁日军大小地堡20座，歼敌一个大队。

△　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在河南孟津上空击落日机一架，并在洛阳近郊与敌机遭遇发生空战，击落敌机一架。

△　汪伪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通过调整各省政府机构案：一、决定将各省行政权力集中于省长。二、各省普遍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撤销经济局和粮食局，将其合并于建设厅；撤销社会福利局、宣传处、卫生处，将其合并于政务厅。

5月17日　张治中、王世杰及林伯渠、王若飞同机由西安飞往重庆，继续进行国共谈判。19日，蒋介石会见董必武、林伯渠。董、林提出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释放叶挺等要求。蒋答可以研究，对董、林所提党派合法问题则未作正面回答，说首先是军事问题，民主以后再谈。

△　国民政府特派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特命全权代表，代表团美国顾问杨格已于14日先行赴美。

△　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商震等一行抵达华盛顿。据有关方面称：该团工作任务有三点：一、促进中美谅解；二、为中国军队获取

重装备；三、使中美两国取得更密切之联系。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由领队谢保樵、副领队邓友德率领，乘专机飞抵宝鸡后，乘专车前往西安，将转赴西北各地参观。

△　张平群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河南战事时称：日军虽已占有若干据点，我英勇将士非但处处坚强抗敌，且已奋勇反攻，遂平、驻马店之克复即其实例。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成安县城，歼伪军一个中队。

△　上午10时，缅北中美突击支队在轰炸机、战斗机的配合下，第二纵队第一五〇团冲入密支那西机场。日军守备队百余人仓促应战，被歼大部，残敌向市区窜逃。至下午3时，完全攻占西机场。

△　豫中战场日军步兵近千人多次向洛阳史家屯第六十五师阵地进犯，被该师第一九二团二营击退。黄昏时分，日军又向该阵地发起冲击，多次冲入外围阵地。守军官兵与敌白刃格斗，将敌击退。

△　日机30余架袭击衡阳，即与盟军机队发生空战，被击落四架。

5月18日　第一战区所部克复豫南西平。同日，第三战区一部克复安徽亳县。

△　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华盛顿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彼来此之目的“系本可能最密切之途径与美国官员合作，并竭尽绵薄，使作战努力趋向某种胜利之途。”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高邑、元氏两县城，并破坏邯郸至大名间公路150余里，炸毁桥梁九座。

△　中美突击支队第一纵队进抵缅北密支那以北遮巴德。同日盟

军战斗机对密支那市区频繁轰炸，扫射日军阵地。

△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对河南宜阳附近日军车辆部队联合出击，毁日军卡车、装甲车及坦克车共200余辆。同日又对宜阳东日军停车场出击，毁车100余辆。

△　豫中战场日军步、炮兵2000余人猛攻陕县，同时陕县对岸日军亦强渡，第四十军迭次反击。至午，守军阵地多被摧毁，陕县遂被日军攻占。

△　伪第二方面军张岚峰部工兵一团在河南许昌、临颍间由团长李公敏率全团反正，接受第一战区一部改编。

△　据盟利社讯称：社会部为研究战后社会救济及设计战后社会重建方案，委派有关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搜集战区及收复区人民灾害损失资料。

△　中国艺术展览会在英国爱丁堡开幕，由顾维钧大使主持。

△　伪满协和会制定《战时工作要纲》，主要内容为：刷新市、县、旗本部，明确其机能，“练成先锋团员”。要求所属组织加强活动，支持“圣战”的完成。

5月19日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伦敦与英国战时运输部大臣签署中英《海员协定》，规定中、英海员待遇一律平等。

△　军事委员会任命何绍周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请新近由江津、泸县、隆昌各地劝导国民节约献金返渝之冯玉祥报告经过。冯略称：各地男女老幼，皆自动争先献金，此为四川之光荣，亦为我国前途之光明。

△　豫境平汉线两侧第一战区所部第五十五军及豫南挺进军向日

军不断夹击，是日连克漯河、西平、遂平、上蔡等地。

△　豫中战场日军向洛阳邙岭区发动总攻，先以炮火袭击，继以战车掩护步兵进犯。第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官兵待敌接近时冲出外壕，与敌激战一夜，双方互有伤亡。20日，日军施放烟幕、毒气，守军官兵坚持至午后。后洞、庄王山、史家屯各阵地失而复得数次。

△　缅北中美突击支队四路出击，开始争夺密支那火车站。至黄昏，第二纵队中国军队第一五〇团攻击车站附近，突破铁丝网，但被日军强火力所阻，激战至晚，第一五〇团伤亡较重。

△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淮南、淮北支部举行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解散，另行合并成立解放联盟淮北支部，选举藤勇为淮北支部长，知庄、林博为委员。

5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到会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153人。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指出：现在正是抗战最后胜利以前必须作艰苦战斗的阶段，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设施，无论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要与作战要求相配合，因此，我们必须有自信心、责任心和忍耐心，共同勖勉。

△　蒋介石手令第十五军“着仍固守洛阳，勿轻信谣言，至迟一星期，我必负责督饬陆空军增援洛阳”。

△　前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上海逝世。

△　《宪政》月刊社在重庆召开座谈会，讨论民生主义中保护私人企业问题，与会者认为：一、现阶段工商业遭遇严重危机，应速确定国家经济政策。二、应节制商业资本，控制金融资本，保护并发展工业资本。三、西南联大李树青等提出之解决物价办法尚欠实行之可能性。四、去年游资做美金、黄金之投机，今年则做粮食投机。五、

政府宜重视私人经营独占性以外之企业之自由。六、对未来及目前之生产机构，除保护企业本身及资本家外，并应保护职工生活福利。

△　第一战区一部切断豫南确山至明港间交通后，即分向确山、明港猛攻，是日克复确山，毙敌500余人。

△　八路军冀中第九军分区部队在地方游击队、民兵配合下，于保定南约90里之芦家庄、郑庄一带伏击由蠡县南犯之日伪军120余人。经二小时战斗，歼敌大部，俘伪县长、特务队长以下百余人。

△　豫中战场陷陕县日军分股南犯，其一股是日被第三十六集团军一部击退；另一股在姚凹与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遭遇，并分占附近高地包围之。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率部与敌奋战，旋为夺取有利地形，即向西突进，至秦家坡又被日军包围，李家钰等不幸中弹殉国。21日，第四十七军一部将敌击溃。

△　豫中战场日军2000余人附战车20余辆向洛阳邙岭后洞猛攻。自晨至午，阵地失而复得者三次。守军副连长黄东民在战斗中冲入敌阵，炸毙日军数十人后殉国。

△　豫中战场日军向河南卢氏县发动攻击，守军第九军据城死守不支，渐向城郊西侧山地转移，卢氏陷敌。21日，第九军与驰援之预八师协力合攻，敌分途东窜，收复卢氏。

△　缅北中美突击大队第二纵队第一五〇团向密支那市区及火车站攻击，曾一度攻占火车站，毙日军100余人。由于补给不济，通讯联络中断，日军以强炮火轰击，致该团伤亡670余人，被迫退守火车站附近，火车站得而复失。

△　福建省政府决定举办纪念林森事业三项：筹募林森奖学金500万元；创办林森公园；创办纪念林，并拟定造林计划。

△　日本天皇下令日本居民集体自本土向亚洲大陆迁移，借以避

免被盟军包围及军需工业被毁的危险。

△　罗斯福在白宫宣布：副总统华莱士今日启程赴华，其任务之一是收集与吾人日后和平及繁荣具有重大关系的战区消息。随华莱士同来华者有国务院中国司司长温森德、战时情报局之拉铁摩尔及对外经济联络部主任哈萨德。

△　华莱士发表启程声明，谓亚洲对美国与欧洲同样重要，“中国民众求取生存与抗战之意志，唯有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列宁格勒防御战能与之比拟”。并表示美国将以一切之可能援助中国。

5月21日　国民党五届十二次全会举行第一次大会，由冯玉祥任主席。首先向全国抗战阵亡将士及国内外死难同胞致哀。次由居正作党务报告，各委员旋就党务提出质询，经由各部、会长分别予以答复。下午分组审查提案。

△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研究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并分四个委员会起草“七大”文件。

△　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端木恺在重庆谈物价问题，认为“政府兼顾国计民生，非万不得已不应轻易过分的加重人民负担，而且法制国家一取一予，俱应依照法定手续”。

△　财政部鉴于日军急需木材建造船只，在沿海大肆收购，特订定加强管制输出办法，乃将木材改定为特许结汇出口物品，即商人报运木材出口，须先经财政部查核。

△　新疆省政府与苏联对外贸易委员会签订《承认让售苏联农具制造厂合同》，内容有：苏方将坐落在新疆迪化区内价值420万美元的头屯河农具制造厂全部建筑、水电设备、柴油机等让售予中国。

△　军事委员会发表战讯称：中美联军将守备密支那之敌截成数

段后，经连日巷战，联军已占领该城三分之一及该城各重要车站。

△　缅北中美突击大队指挥部命令第二纵队第一五〇团撤至跑马堤，转任对南圭河方面的警戒。同日，第一纵队之第八十八团向密支那继续攻击，先后攻占日军据点四处，毙敌50余人。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主力对怒江西岸日军重要据点北斋公房发起攻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部据险死守，双方形成对峙。

△　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高阳。

△　冀鲁豫军区九分区部队于河南滑县双营村战斗中毙伤伪军400余人，分区参谋长胡乃超在战斗中殉国。

△　豫中战场日军步兵6000余人在战车四辆掩护下，越过洛阳史家屯外壕阵地。守军第一九五团一部官兵坚持战斗，弹尽后与敌白刃格斗，阵地失而复得者二次。战至22日，部队伤亡过重，晚8时30分放弃史家屯阵地，固守后洞、营庄、庄王山西侧及苗家沟至西北城角一线。

5月22日　国民党五届十二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首先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致训词。继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报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施政概况，并答复各委员提出的质询。

△　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二十条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并请张、王将此文件转交蒋介石。

△　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分别拜访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等。

△　江西省九江县党部第三区党部书记虞济民于日军占领九江后，不避艰险，屡创敌寇。今年又两次在星子县境内营救美军机师。

国民党中央是日特予奖励。

△　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远征军迅速攻占滇西腾冲、龙陵，与中国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是日，第十一集团军制定了渡江攻击的计划。其方针是："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并以第七十一军为右翼攻击军，第二军（欠新三十三师）为左翼攻击军。

△　豫中战场第十五军根据蒋介石20日手令，变更作战部署，将主力全部撤入洛阳城区，与第九十四师合力守卫城厢。

△　第一战区一部克复豫西鲁山；同日，另一部克复长葛、洧川。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一部在滦县南之葛代坨、任各庄、东西沙窝伏击伪绥靖军第五团四个连，经六小时激战，毙日军三人、伪军50余人，俘伪营长、连长以下150余人，缴获枪支150余支。

△　豫中战场日机30架向洛阳邙山阵地轰炸、扫射。同日，又出动战车50余辆及步兵2000余人向庄王山攻击，守军第一九五团官兵伤亡过重，遂弃阵地，在后洞、营庄、八里营、史家沟、烧沟至城西北角一线防守。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陕西临潼、华阴等地后，是日访问大荔，并参观洛惠渠工程，下午前往合阳。

△　罗斯福在华盛顿就物质租借情况报告国会，其中称：吾人竭力之所能援助中国，目前每月空运至华之供应品吨数比去年增加15倍。

△　上海邮局职工要求增加米贴举行罢工，使全上海邮件大批积压。6月1日，局方被迫答应工人所提条件，6月4日恢复正常工作。

5月23日　　国民党五届十二次全会举行第三次大会，邹鲁任主席。由何应钦报告整军、军需、军械、兵工及滇西战役、中原战况、缅北战役等。

△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由张继宣读工作报告。旋讨论订定战时稽核党务经费原则、整顿党办事业营业机构，以发挥实际效能等六案。

△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天来的谈判情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了估计。电文称："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其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绝无所得，这种情形，在西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

△　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关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接受中共20条意见问题。电报称：昨日（养日）约张、王在张宅会谈，我把中央二十条交给他们，张、王看后，沉默很久，才说出以下意见："（一）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表示；（二）与西安谈判内容不符，为何又不以林彪案为谈判基础；（三）你们无决心解决问题诚意；（四）是否因我们这样欢迎你，以为示软可欺；（五）我们正在令有关各部门研究西安谈判材料，准备提示案；（六）希望你考虑修改二十条内容词句，并告你们中央。我的答复：（一）全文都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二）西安初步谈判的意见，约定各向自己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而且我曾提过六军18师，现在文件是五军16师，已有让步；（三）我们是真正诚意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才出来，我们中央于接到西安的谈判经过后，即来答复；（四）我们说不上欺人，只是想公平合理解决问题；（五）你们

既拒绝接受我党中央文件，则你们中央的提示案，我也要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接受与否；（六）二十条内容、字句，在此无研究修改余地。我与张、王争辩两小时，张、王最后托打电话；退到内室密商半小时，出来后，将二十条文件交还我，坚持拒受与转递给蒋。”

△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论保护私人企业》，结论中称：“国家应严惩奸商投机，但应保护柔弱的公私企业，以培植工业化的根芽。”

△　史迪威偕新一军军长郑洞国、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等亲往密支那前线，组织临时指挥所。同时，史迪威宣布：解除梅利尔的突击队指挥官的职务，送回雷多，由柏特诺接替梅利尔的职务。并正式发布命令：美军第五三〇七支队麦根少将，负责密支那区并指挥该区内所有各部队；胡素少将负责指挥新三十师第八十八、第八十九两团；潘裕昆少将负责指挥第五十师第一四九、第一五〇两团及第十四师之第四十二团；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第二纵队长韩特上校负责指挥美军第五三〇七支队。

△　豫中战场中日两军争夺洛阳城厢的战斗全面展开。日军向洛阳城区西关、周公庙、苗家沟、庄王山、上清官、五里铺及东、西车站实行炮击，一天内发炮8000余发。至晚，攻城日军增至3.5万余人，战车400余辆，各种大炮120门，各种汽车1000余辆。

△　日军为向湖南发起进攻，将第十一军司令部由汉口迁至蒲圻。25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亦从南京进驻到汉口的前进指挥所。

△　日军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易县狼牙山地区“扫荡”，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第二十九团第三连第四班后撤时担任掩护，最后被日军包围，战至粮尽弹绝，在班长耿五华带领下，战士孙红喜、刘金、苏士文、贾振武砸毁武器，跳下深崖，贾振武受伤生还，其余四人壮烈牺

牲。

△　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湖北黄陂地区，新四军鄂豫皖军区第一、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在反“扫荡”中歼灭伪军第十一师一部，俘日军顾问渡八次郎及伪军官兵32人，毙伤伪师长李宝连以下官兵90余人。

△　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中国生产促进会联名向国民党中枢提出“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建议分为：一、对于当前局势之分析；二、关于政治之建设；三、关于货币财政之建议；四、关于物资补充、调剂、分配之建议等。

△　据中央社讯：日军近月来在华北大肆逮捕青年男女，平、津各大学教授、学生被捕者已达6000余人。

△　罗斯福在致英国大使馆函中谈及美国援华问题，宣称：吾人可将中国需要之租借物资尽量涌入中国，使中国军队与其他联合国家军队结为一体，以达到完全击溃日本之最后目的。

△　据中央社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20华侨团体代表开会，拟于下月起募集100万战时公债，购置美陆军运输机八架，派往中缅战场服务，各机将被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

5月24日　国民党五届十二次全会举行第四次大会，由李文范、叶楚伧任主席，听取外交部长宋子文关于外交的报告；旋由国家总动员会议代秘书长端木恺报告物价管制问题。最后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四川省主席张群等分别报告各该省施政概况。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称：林伯渠已于19日晋谒蒋介石报告一切。关于河南战事，中央宣传部次长吴国桢称：如盟邦予我以更多武装接济，我作战定将有更惊人之表现。

△　史迪威视察密支那附近各部后，于是日晚下达攻击密支那的命令，指出："以新三十师为主，攻击密支那西郊之日军；以第五十师第一五〇团及第六十四师第四十二团一部于跑马堤附近构筑阵地，并不惜任何牺牲确实固守该地。"

△　八路军一部在河北滦县西南的葛代坨、任各庄等处伏击伪军，毙、伤、俘伪团主任教官等200余名，缴获步枪140支。

△　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出击山西运城，对运城火车站及发电厂给以猛烈轰炸。同日又对河南洛宁以东及陕县、渑池间公路上日军骑兵及各种车辆予以攻击，毙敌70余人，毁坦克车六辆。

△　延安大学举行改组后的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周扬等出席。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凡是我们的盟邦，都喜欢抗日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打了58％的日军和90％多的伪军。没有根据地，就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要学习为根据地工作。朱德在讲话中号召要学习当前的实际，把学与用联系起来。

△　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代表50余人在重庆举行宪政座谈会，到会者一致认为：一、政治民主化为实现民生主义之先决条件，亦为抗战胜利之先决条件；二、现阶段之国营事业流弊颇大，工业界须负责促进其向正当途径发展；三、在工业未发达以前，平均地权应重于节制资本；工业发达以后，节制资本应重于平均地权。四、国营、民营事业之间应有妥善之计划，求其协调互助，共谋发展。到会者还建议：国民代表大会三年召开一次，相隔时间太长。

△　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华盛顿招待记者，并发表谈话，认为同盟国唯有攻入日本本土，始能击败日本。又表示日本决不能打倒中国，使中国退出战争。同盟国收复密支那之后，即可居于有利地位。

△　新任巴西驻华大使游兰略抵渝。

5月25日　国民党五届十二次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由孔祥熙、何应钦任主席。首先通过全会慰勉前方将士、沦陷区同志、海外侨胞、全国人民暨慰问抗战将士家属及遗属电。旋通过提案16案，计军事类二案、经济类11案、党务类三案。另通过对于政治、军事、教育、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四件。

△　洛阳失陷，豫中会战结束。日军以第六十三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为主对洛阳城发动总攻击。先以飞机轰炸、扫射，后以120门火炮向城内轰击。至午，在飞机、火炮掩护下，日军战车300余辆，分六路向城区猛攻。战至下午3时，守军第九十四师防地东北城角和第六十五师防地西北城角被攻破。至晚，守军各部弹药将尽，各区通信断绝。各部按计划夺路出城，在城外集结待命，洛阳遂告不守。

△　中国驻印军左翼新编第三十师在炮火掩护下，向缅北密支那日军发动攻势，终日激战，该师第八十九团遇敌坚固工事，攻击火力不强，攻势受挫。

△　中国空军一队出击中原，在洛阳上空击落日机一架。

△　日机24架袭击长沙，投弹多枚。

△　由中国政府聘请的资源委员会顾问美籍水力发电专家萨凡奇抵重庆，为期半年，将于31日起在金陵大学理学院举行会议三日，讨论大渡河等各重要水力计划，随后往大后方视察各地水力工程。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陕西韩城，并谒司马迁墓。旋北上黄龙县，参观黄龙山垦殖区。

△　为发动湘桂作战，日本侵华派遣军在汉口成立前进司令部。

△　重庆《大公报》载文称：陕西水利工程居全国之冠。全省12

渠，计秦岭南三，渭南四，渭北三，陕北二，可灌溉农田250万亩。

5月26日　国民党五届十二次全会举行第六次大会，由孙科任主席。首先通过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紧要措施案，并决议稳定经济、管制物资，亟应特设一强有力之机构，俾得集中统一指挥，交中央常会迅速决定办法施行，又通过对于财政、经济、交通、农林、水利、粮食、地政各部门工作报告之决议案及大会宣言。最后以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恳请辞职，由大会改选陈果夫继任。旋由蒋介石任主席，举行闭幕典礼。

△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举行常会，首由邵力子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继由交通部长曾养甫报告交通施政暨视察西北交通情形，并答复参政员的质询。

△　中国驻印军右翼第一五〇团由缅北密支那西机场出发，向密支那南郊攻击，是日抵达南毕塔。27日该团在南毕塔工厂南端被日军优势兵力包围，营长欧阳中弹殉国。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取瓦兰日军各据点后，其第一一二团沿蒙古河、西凉河谷开辟前进，是日强渡孟拱河，27日攻占西汤，并向南、北进攻。

△　中美空军混合机队数批出动，出击河南陕县西日军车队，毁油车5辆。又在济宁附近击毁卡车三辆，杀伤敌兵员60余人。

△　商震在华盛顿发表广播讲演，表示中国坚具决心，竭其全力与盟友继续联合作战，直到最后胜利之时为止。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自陕西宜川渡黄河入晋，抵吉县兴集，当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设宴招待。27日举行座谈会，讨论“兵农合一”及“新经济政策”。28日致祭故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参观电厂、纺织厂、经济管理社等。

5月27日　　日军分三路大举南下，向长沙方面发动进攻，长（沙）衡（阳）会战开始。通城方面为东路，由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组成；新墙河方面为中路，由第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组成；湘西方面为西路，由第四十师团组成。同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另以步兵第二一八联队及海军为先导，亦从岳阳出发，准备在营田登陆，截断第二十七集团军的退路。第四十四军主力在通城、平江方面阻滞日军东路进攻；第二十军在新墙河一线阻滞日军中路，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在常德以北阻滞日军西路部队。

△　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一、非中央委员不得任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二、中央各主管人员均不得兼任职务，以求精力集中。

△　国民党中枢提出改进教育三点意见：一、改善学校教职员及学生之生活；二、提倡体育；三、动员知识分子协力扫除文盲。教育部次长余井塘对记者称：教部历年救济战区学生已达12万人，今年可救济五万人。

△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电示史迪威，优先建立盟军在中国的空军实力，并准备设法打通中国陆上交通。

△　重庆《中央日报》载：日伪勒令闽、粤沿海各地民众每户栽种罂粟一亩，尤以闽之金门壶江、粤之南澳为甚，并以金门五里海为“示范罂粟园”。刻下苗高六寸，将近收割，日军又在厦门组织“南方株式会社”，图将全部收获物制成烟膏或烈性毒品运往各地，毒害中国人民。

△　日机16架袭击鄂北老河口，在郊外投弹10余枚。

5月28日　第一战区所部再克河南鲁山。

△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一部在墨城湖一带截击从诸暨出犯的伪军独立第四旅。激战五小时，将该部伪军击溃，共毙伤伪军副旅长以

下官兵200余人。

△　中美混合空军大队第二队中国飞机师辛仲连不幸失事，坠入长江，被新四军皖中部队救出，治疗痊愈，是日返队。

△　重庆《大公报》载：盟机轰炸九江，将九江车站全部炸毁，毙敌近百人。

△　日军再度侵占湖北通城县城、九岭，进犯湖南，沿途烧毁民房1094间，屠杀百姓千余人。

△　进攻长沙的中路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分六股渡过新墙河，向守军第二十军阵地进攻。第二十军利用新墙河南岸纵深阵地与敌战至29日，旋按照战区部署向平江以东地区实行逐步转移。

△　自湖北崇阳南下之日军东路部队一路4000余人向通城东南、一路2000人向通城西南分进合击。30日合股，31日进至长寿街一带，守军第七十二、第二十军等部遇敌不支，长寿街失陷。

5月29日　国民党中枢举行纪念周，出席者有在渝的各省、市政府主席等。蒋介石致训词，指示加强推行地方自治，实施新县制、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及行政三联制。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应邀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作报告，称："本党及政府对目前物价之管制现象不满，因我国管制物价无成轨可循，政府缺乏管制经验，人民亦无接受管制之习惯，故实行以来，未见大效。"又称："本党自立党迄今，对言论之自由，始终尊重，并加以保障。"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专利法》，凡四章133条。

△　陈纳德致电史迪威要求增供物资。6月3日，蒋介石急电召史迪威返回重庆。5日，史到重庆会见蒋介石，蒋要史为陈纳德增供飞

机和物资。6日，史飞抵昆明会见陈纳德，对增供事宜作了安排，晚赶回缅甸前线。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夜袭冀南清丰城，毙日伪军10余人，俘伪冀南道尹薛兴甫、伪清丰县长张裕元、伪邯郸县长午纯一等10余人及其他伪官兵共千余人。缴获战马百匹、步枪700余支，其他战利品甚多。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七、八分区主力克山西郎待岗、杨寨等据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及伪军500余人。

△　进攻长沙的东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在通城、平江方面由东向西，中路日军第六十八、一一六师团在新墙河南岸由西向东，向正在转移的第九战区第二十军实行包围。30日，包围态势形成。

△　土耳其新任驻华大使陶盖抵渝。

△　川、皖、陕、豫四省参加远征军人员抵渝，重庆各界人士数千人集会欢送。

△　全国行政会议在重庆开幕，到会者共120余人。会议主旨为：一、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事项；二、加强地方自治之推行事项；三、安定物价，稳定经济事项；四、战后复兴事项等。6月1日会议闭幕。

5月30日　蒋介石电令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求美方速增第十四航空队实力，以阻日军打通粤汉路。

△　重庆《中央日报》载：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成立已届五年，在全国已成立各种合作社17.2万余所，社员1500万人，以信用合作社最为发达。该局局长寿勉成向记者称：该局的工作目标为动员整个体系力量；健全合作行政；巩固合作运动基础；建树合作金融制度等。

△　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在重庆复旦大学发表讲演，批评国民党将民国招牌挂了30多年，没有颁布宪法，没有实施宪政。并称："政治问题不是少数人可以解决的。少数人来'求'也不成，必须成为一个大的运动才行。"他提醒大家要"为民主而战，还要反对假的主义"。要求当局"不能再用恐怖手段"，"因为法西斯才用恐怖政策"。

△　军政部教导第一团第一、二、三营志愿从军赴印学生1550人全部抵达昆明。不日将开往印度从事战地工作。

△　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发表题为《我们在实施宪政前的要求》的宣言，指出："真正的民主国家，主权应在人民手里，政治由人民管理。人民必须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人身、居住等自由权利。"

△　缅北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命令，令各部向密支那发起攻击。其中，第一五〇团及第八十九团向北攻击，务须竭力进攻；第四十二团及新三十师第八十八、八十九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由其阵地撤退一步。

△　第一战区所部克复河南嵩县。

△　湖南战场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向南突进至湘北汨罗河，另以第六十八、第三师团包围我第二十军。第二十军主力第一三三师和新编第二十师在平江陷入困境。经战竟日，军长杨汉域率领新二十师突围，第一三三师被日军分割包围在平江山地，与军部失去联系。

△　日机21架分三批袭击长沙、湘潭、衡山、湘阴、宁乡等地。

△　驻美大使魏道明应美国邀请，奉命参加中、美、英、苏在华盛顿举行的建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之非正式会议。

△　美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与英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苏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及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会谈建立国际和平机构问题。

5月31日　蒋介石下达长衡会战计划，命令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准备于长沙附近与北犯之敌决战，第七战区应以现有兵力以曲江为中心与北犯之敌决战，第六战区应拒止沿湖西犯之敌，策应第九战区作战。为防止日军一部奇袭衡阳，蒋命令第十军方先觉部固守衡阳；为保护湘江通往衡阳的交通线，命暂编第三军守株洲、渌口。蒋将第十、暂二军交给第九战区指挥，但规定“不得用于长沙之会战”。同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命令第四军死守长沙、第四十四军死守浏阳，第五十八军死守醴陵。

△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认为国共两党谈判短期内不可能结束。强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并提出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自由”。并联合苏、美、英，整饬财政。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次长吴国桢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完全赞同美国务卿赫尔关于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主张。

△　缅北中国驻印军各部再度向密支那周围发起攻击，战至6月14日，右翼第一五〇团及第四十二团先后将密支那市南区日军坚固防线之高公路突破并占据。左翼第八十八团则沿铁路攻击前进。在日军火力封锁下，强行通过开阔地，进至密支那市东北隅。

△　八路军一部攻克河北河间县城。

△　商震谒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讨中美军事。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一、加强美第十四航空队，使输送补给的总吨数增到每月一亿吨；二、将B29飞机储存在成都的汽油、零件和飞机交第十四航空队，用于平汉线；三、加强中国空军；四、拨交国军8000门火箭炮，每门配弹100发，增加地上部队火力。商震电呈蒋介石，报告美国决定增加第十四航空队吨位至万吨。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2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向记者介绍开发建设南泥湾经过。3日，参观团到达延长，参观延长油矿。

△　第一战区攻克遂平后，先后俘日军12名，是日解抵南阳。日俘备受优待，表示对侵华战争极为厌恶，均愿早日退出中国，恢复和平。

△　南昌伪保安队百余人携械反正，是日接受第九战区一部改编。

△　日机炸湖北老河口、均县、郧县等地。

△　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大伟在上海遇刺毙命。

是月　八路军冀中第八军分区第三十七区队一部在内线配合下，攻克献县以北之日军臧桥镇据点，伪水警队130余人全部就歼。

△　侨务委员会成立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

△　伪《满洲日日新闻》与《满洲新闻》合并为《满洲日报》。

6月

6月1日　全国行政会议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强调抗战期间最重要者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会议通过各项提案70余件，要者为：重申法治精神，以利宪政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紧要措施；加强推行地方自治；确立中央与地方行政之关系等。

△　滇西方面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各部向怒江西岸发动攻击。至3日，各部分别由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各附近渡过怒江。其新编第二十八师（欠第八十四团）于4日攻克腊勐，向松山进攻。

△　八路军太行军区一部袭入山西陵川县城。驻高平日伪军300余人来援，被歼100多人。

△　平江失陷。由鄂南南下日军进抵湘北平江，在城北、东北面与守军第七十二军等部展开激战，因日军主力火力强大，伤亡较重，其中第一三三师被日军包围在平江西北的山地，几被全歼，平江遂陷。日军随即往南、西分路突击。5日，抵浒市、官渡一带，遭守军第四十四军、第三十军的抵抗。

△　日军独立第八旅团纠集伪绥靖军、伪保安队、日本关东军及伪满军等部约1.7万余人，开始对冀东迁安、滦县、丰润、承德、兴隆、玉田等地进行大规模“扫荡”。6月3日，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和第二区分队分别在平谷土门、熊儿寨，将前来奔袭的日军二个中队、伪满军四个大队和四个特务队共1100余人包围，经10小时的激战，毙、伤、俘日伪军500余人。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轰炸汉口日军白露洲机场及洞庭湖之日舰。

△　据中央社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日前远征北平，袭击北平铁路线，炸毁或重创火车头22辆。空战中击落日机一架。

△　重庆《大公报》载：该报为纪念国民党创立五十周年（即1894年兴中会成立），编辑《中国国民党丛书》，内容有国民党历史之文献；孙中山与诸先烈发表之革命理论；中外学者发扬三民主义之论著等。

△　邹韬奋在昏厥数日后是日深夜苏醒，口述遗嘱，称目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伟大斗争，使他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骨灰迁葬延安。

△　汪伪政府任命项致庄为陆军第十二军军长。

△　美国拟定战后世界和平机构草案，共分五个要点：一、成立联合委员会，由中、英、美、苏四国之代表及联合国大会选出三个或四个小国代表组成之；二、联合国大会由35个联合国组成，各国在大会中有同等发言权及主权；三、大会之军力主要由四大强国之军队组成；四、设立国际法庭，处理国际间所有之法律问题。

6月2日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总统，支持建立联合国组织。表示：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维持世界和平之国际机构，并望在战争结束以前成立。

△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论豫湘战事》，认为“只要大家坚定信心，统帅运筹帷幄，将士效命疆场，军民协力奋斗，湖南一定会有第六次的光荣胜利”。

△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发起济（源）垣（曲）战役。首先攻击济源以北伪军，然后打击王屋地区伪军。8月29日至30日，又以主力在济源以南展开攻势，攻克陈岭。是役共歼灭日伪军800余人，攻克据点20余处。

△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称：美下半年援华之租借法案项，将为1.49亿美元。

△　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长韩正义以外籍人员在华服务医疗工作有年，“急难扶伤，忠勇任职”，国民政府是日特予明令褒扬。

6月3日　　蒋介石训示薛岳：此次长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亦即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时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勿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置，并由该长官全权处理，彻底执行”。

△　军事委员会任命赵锡田为第一〇〇军副军长。

△　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同意他们对时局的估计与谈判的方针，同时将修改后的提案12条和口头八条一并电告，指示据此同张治中、王世杰谈判，并望告诉即将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各民主党派人士。

△　蒋介石为“六三禁烟”纪念日特颁训词，提出三点禁政措施：一、彻底肃清后方各地之残余烟毒；二、防遏日寇烟毒侵入战区省份；三、规划收复沦陷区之除毒工作，并完成其应有之准备。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黄兴之妻徐宗汉及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英夫、蒙民伟。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分区部队一部克河南辉县之薄壁镇及庙岗据点，歼伪军50余名。

△　重庆《大公报》载：中美混合空军大队近日扫射山西临汾日军机场，毁在场日机六架。同日，该队又袭击山西河津日军机场，击毁敌机一架。

△　据中央社讯称：英国教育部将中国文化名著及地理、日常生活之名著100种，作为英国标准教育课程之一部。

△　日本从南京向重庆发出诱降广播，宣称蒋介石经十数年苦心育成的精兵200万，已在第六、第九战区被日军消灭，日本对华之“新政策”为中国开辟“独立自由途径”，“目下为重庆当局下一最大决心之时，重庆所必须者，既非武器，亦非借款，而为适应世界潮流之决心和勇气”，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放弃“以不变应万变”之政策，转为与日本“合作”。

6月4日　　全国县政检讨会议在重庆开幕，由内政部长周钟岳主持。会议检讨要目有10大项，要者为：一、县各级组织之改进；二、县与乡（镇）权责之划分；三、四权行使之训练；四、县长任用与考

核办法之改进；五、户政、警政之推行等。

△　湖南战事日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是日发出手令，激励所部，令称："把握战机，忠勇战斗，誓灭此寇，毋使生还。须知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我不畏敌，敌必畏我。中华民族，在此一战，愿与我袍泽共勉之。"

△　湖南战场日军一部渡过洞庭湖，突向沅江，另一部向南侧迂回，与守军第九十二、第一九七师等在沅江城郊一带接触。5日夜，日军冲入城内，并截断郊外与城内的联系，沅江城陷敌。

△　日军犯豫中，各地学校颇遭损失，师生多逃往后方。河南省当局是日向中央请拨1000万元作为救济专款，分别用于收容逃出师生及各校就读。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向松山日军发动第一次进攻。晚，攻克竹子坡，旋以一部迅速沿腊勐以南迂回，切断腊勐至龙陵间的滇缅公路。

△　中共中央任命宋任穷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为副司令员，黄敬为政治委员，苏振华为副政治委员。

△　蒋介石电贺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创立一百周年。

△　新疆省河南县改宁西县。

6月5日　　国共双方在重庆再次举行谈判。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送交中共代表林伯渠。关于军事问题共七条，主要内容有：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共九条，主要内容有：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公署。公署直隶行

政院，该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可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关于党的问题；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　中共代表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面交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共12条：一、关于全国政治者：（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二、关于两党悬案者：（一）请政府对中共军队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16个师的番号。（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接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八）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九）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边区办党办报。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金城为第九军军长，张弛为第六十四军军长。

△　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在重庆举行守法运动座谈会，发言者一致认为中国下层人民无大问题，上层实应以身作则，并对当局提出三点意见：一、法令应简单划一，不要乱下命令；二、赏罚分

明；三、宣传法令，尊重正当舆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

△　第五战区一部克复湖北公安县。

△　由鄂南南下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抵达浏阳东北之达浒市附近，图攻浏阳。第九战区遂决定将日军歼于浏阳以北，随后调集第五十八、七十二、二十六、四十四、二十等军及新编第十三师等部于浏阳北方设防。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沿白泥潭、咬郎及大小河一线向黄卓坝、龙陵攻击；新编第七十六师一部围攻平达，以该师主力和第九师攻击象迈、油菜地，向芒市推进。

△　滇西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对松山附近阴登山发起攻击。日军工事坚固，火力严密，致第八十二团攻击部队伤亡惨重。

△　行政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致电各省、市、县政府，嘉勉乡、镇各级自治负责人。

6月6日　　粮食部公布《粮食征购办法》，规定自本年度起，粮食征购一律改为征借，办法为：征购改为征借，不再配发现款，并将粮食库券废止，即于粮票内载明数额，代作凭证，借粮不给利息。自第五年起，分五年平均偿还，或抵纳当年新赋。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戡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　林伯渠致函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国民党5日提送的《提示案》与中共的12条意见“相距甚远”，但仍允将《提示案》转交中共中央，也要求张、王将中共中央12条意见转交国民党中央，并声明西安谈话记录是“为最后共同作成的初步意见”。

△　行政院以湘战又起，战地难民待赈，特拨1000万元，交湘省府办理湘北急赈。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县南泥湾的金盆湾。7日，参观南泥湾伤兵医院、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南泥湾军垦区和干休所等。

△　蒋介石手令内政部转饬各省、市、县，限于本年度内完成户籍登记工作。

△　中美商谈战后航空问题的代表张嘉璈对记者谈话称：中国政府准备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消除战前各种阻止国际航空之障碍。并表示赞同成立国际性之航空协定。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机两架炸正太路，一架受伤落于北岳区，飞行员被八路军营救脱险。

△　盟国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半岛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局面。同日，何应钦为此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于日寇的打击极大，可以加速日寇的崩溃。”

6月7日　　蒋介石分别致电罗斯福、丘吉尔，祝贺盟军在西欧登陆成功。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前湖北省政府主席严立三等。

△　梁寒操在重庆招待外籍记者，抨击友邦人士对国民政府的批

评，称：“吾人确信其带有偏见或感情冲动之言论，必将为冷静的理智所否定。如其为不符事实与别有作用之言论，亦必将为历史的事实所粉碎。”

△　滇西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对阴登山再次发起攻击，收复阴登山。8日后，双方继续进行拉锯作战。至7月初，新编第二十八师在松山地区先后收复三座高地，歼敌500余人，全师伤亡1600余人。

△　湖南战场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进抵湘北浏阳东北古港附近。9日，第七十二、第五十八、第四十四、第二十等军展开攻击，先后击破古港及东门市之日军。旋日军以其主力向第五十八军反击。11日，日军突破第五十八军石湾附近阵地，续向南突进。

△　湖南战场日军紧逼湘中，守军第十军一部自动炸毁衡阳湘江大桥。

6月8日　　行政院成立战后救济调查设计委员会，派蒋廷黻为主任委员，顾翊群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分10组进行工作。

△　张治中、王世杰复函林伯渠，指出中共6月5日所提12条意见因与前边所提“出入太大，不能转呈”；“西安谈话记录，既经你修改、签字，应作为你的意见，且已将此件上报，政府《提示案》已尽量容纳了你的意见”。

△　兵役署负责人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告之该署发动全国各分署募款献机以来，至今已募得200万元，拟购飞机10架。

△　据中央社讯：教育部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培养战后十年建设所需人才，其工作重心是大量造就技术干部，扩充职业学校，在大工厂及产业机关附设职业训练。

△　蒋介石致电长沙前线各部将士，策勉“各就岗位，各尽职责，

争取胜利”。

△　第九战区所部收复湖南南县。

△　湖南战场日军两个师团强渡捞刀河往南突击，又跨过浏阳河向长沙守军阵地猛扑。同日，又两个师团西渡湘江，湘阴守军迎敌不支，伤亡较重，县城告失。至中旬，进至长沙市郊，开始对岳麓山主阵地发动攻势。

△　日军将冀东划为“特别行政区”，建“特区公署”，实行“军、政、会一体化”。由汉奸姜鹏飞任“行政长官”兼“行营主任”和“新民会总裁”，负责调整中、日、“满”关系。

6月9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设宴招待。10日，朱德等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招待，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贺龙、林彪、博古（秦邦宪）等出席。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称：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称：我们一定要把所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11日，记者团的中国记者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

△　据守缅北北斋公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实行反击。中国远征军以第三十六师主力复攻击桥头等据点，以配合第一九八师的攻击。战至16日，在第一九八、第三十六师和预备二师的配合下，终将北斋公房攻克，残敌向腾冲方面溃退。是役共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300余人，远征军亦伤亡较多，团长以下官兵阵亡数百人。

△　国民参政会举行常会，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财政近况，提出1944年度财政设施为改进田赋征收、改善直接税稽征手续、取消货运登记、食糖盐专卖改为征实、筹备参加国际货币会议、严格管制银行等八项。

△　中美混合机群联合出击，轰炸宜昌日军据点，多处起火，返航途中与日机遭遇，发生空战，日机被中国空军击落二架。同日，又出击湘江上日舰，击沉多艘，并有五艘起火。

△　美国政府对外经济处根据租借协定，拟就在美训练中国专门人员，使其从事战时主要服务工作之计划。计划规定本年度训练中国铁路工程师100名、军医40名等。1945年度训练专门人员1200名。1944年度需经费73.2万美元，1945年度需经费480万美元。

6月10日　蒋介石为第三十六集团总司令李家钰在豫中会战中殉国，特致电李家钰家属节哀。22日，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部，沿毕（寨渡）龙（陵）道路南侧地区向龙陵突进，是日进抵龙陵近郊。12日向龙陵日军发起攻击。第八十八师主力即攻克龙陵城郊之广林坡、老东坡、风吹坡、三观城。第八十七师攻克文笔坡及龙陵老城。日军据守城内外据点顽抗，双方陷入苦战。

△　八路军冀中第八军分区第三十七区队和饶阳、武强两县大队袭入武强县城，并摧毁小范镇、簸箕厂、铺头三个伪军据点，俘伪军官和伪组织人员500余人。

△　日军汽船30余艘在长沙以北的丁字湾向白沙洲偷渡，遭中国空军猛烈轰炸，击沉其中23艘，日军死亡300多人。

△　日军一部由浙江金华进犯，是日晚陷汤溪。

△　日机七架由湘北南窜，四架在衡阳投弹，三架在零陵投弹。

△　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工作委员会，经李济深、黄旭初等发起，是日正式成立。决议设戏剧、美术、宣讲、编撰、电影、音乐、广播、义卖、总务等委员会。

6月11日　林伯渠再次致函张治中、王世杰，对他们拒绝接收中共意见书转报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信中说对他们8日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中共中央所提的12条与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六军18个师，你们只允四军12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现在中共中央提出的不是六军18个师，而是五军16个师。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四军12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四军10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中共中央提出的12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后反攻，使中国获得自己解放。因此，中共对此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中共中央的12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

△　宪兵学校学员队毕业，军士队入学典礼在重庆举行，校长蒋介石到会讲话，勉励宪兵不徇情，不自私，以竟整军饬纪之全功。

△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举行年会，代理事长徐祖善宣读孔祥熙训词，提出战后10年内建造商船300万吨的任务。

△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攻击孟拱的作战命令：一、着新编

第三十八师（欠第一一二团）由西北方向孟拱进攻，并占领之，与正在东南方进攻孟拱之英印军会合。二、着英印军第三十六师以其第七十七旅由东南方攻击孟拱并占领之，与新编第三十八师会合。

△　湖南战场第七十二军主力及第五十八军协力尾追并截击向南突进的日军；第二十军及第四十四军转向浏阳方面，阻击日军。

△　河南灵宝、闵乡失陷，潼关告急。第三十四集团军转进西南。

△　日机分批扰湘，二架在长沙投弹，另一批在浏阳投弹。同日，日机14架在江西遂川投弹。

6月12日　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致欢迎词，在谈到国内外形势时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方能走向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在谈到统一时，指出："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晚，毛泽东欢宴记者团。

△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张晓梅、张申府、刘清扬等在重庆曾家岩50号讨论国际形势及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等问题。

△　广西省各界发起"保卫东南半壁河山"运动，是日重庆各界纷纷响应，力主用民主的方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

△　湖南战场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击溃第九战区第五十八军后，是日直扑浏阳县城。防守城北的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被日军围困，陷于苦战。

△　加拿大战时情报局宣布：根据中加互助协定，迄今为止，加

拿大曾以大炮、高射炮、勃伦枪、斯丹枪、无线电器材及车辆援助，数量相当可观，约值加币400余万元。

△　巴西、土耳其两国首任驻华大使游兰略、陶盖分别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6月13日　《中挪条约》在重庆互换批准书。

△　益阳失守。湖南战场日军占领湖南沅江后，直向益阳城进击，守军第七十七师于城郊内外展开阻击，苦战数日。是日，日军突破城东南角进入城区，益阳遂告不守。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十分区部队一部在河南东明之郝庄歼灭伪军赵云祥部200余人。

△　山西省解县县长马文彬率领地方武装民众与日军激战，被掳后不屈遇害，是日，国民政府予以明令褒扬。

△　《宪政》月刊社在重庆举行座谈会，讨论“私人企业与宪政”问题。发言者一致要求减低工商业之税捐负担，并认为当前经济危机不能离开民主政治以谋解决。孙科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唯有实行民主政治，以达政治统一之目的。

△　重庆《中央日报》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对记者称：目前海外侨胞共有1100万人，已归国者100万人左右。教育部与侨委会合办之华侨教育事业，以及在国内各地设立的侨生机构收容侨生万余人。该会的工作重心，为计划战后如何使侨民复员，各安工作。

△　全国慰劳总会以近来中原、湘北、鄂西、滇西各地前线将士英勇抗敌，至为艰辛，是日在全国各地发动捐献劳军运动，并要求运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举行劳军宣传。

△　重庆市警察局长徐中齐招待新闻记者，报告就任以来之警

政，称重庆市人口90余万，居民职业商人最多，全市不识字者占30％，同期内共发生重要案件7035件，其中以盗窃案为最多，烟毒案次之。

△　日机32架袭扰江西、福建等地，在福建建瓯郊外投弹。

6月14日　　重庆各界500余人集会纪念“联合国日”，由重庆市党部主任杨公达主持。同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格鲁为纪念“联合国日”，发表对华广播，保证美国与中国、英国合作到底，“非至完全击败并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决不休止”。

△　延安各界四万余人举行庆祝“联合国日”及保卫大西北动员大会。大会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满足全国人民的团结、民主要求，并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发弹、发药，释放叶挺将军及八路军、新四军一切被捕将士。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亦出席参加。

△　浏阳失守。湖南战场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猛扑浏阳城区，与守军第四十四军在城内巷战。同日，日机多架临空扫射，城内大火四起，军长王泽俊率部突围，浏阳遂告不守。15日，由通城、平江南下的日军经浏阳渡过浏阳河。

△　李济深在桂林“联合国日”纪念会上号召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东南半壁河山”。同日，宋美龄在重庆发表“联合国日”纪念广播演说，称：“不论是国家或个人，惟有精神上保持自由不受束缚，即能抗御任何不人道的打击，克服任何的变动与困难。”

△　宪政实施协进会在重庆举行全体会议，兼会长蒋介石到会讲话。会议通过黄炎培所提关于滥用职权押捕久禁情形事，整肃改善方法建议案；张君劢所提扩大国民参政会职权，以养成宪政习惯案；张志让所提建议保障言论自由办法案等。

△　粮食部公布1944年度粮食征借额为9572万担。其中征实总额为6100万担，借征总额为3472万担。

△　日机九架分批在衡阳市东郊投弹18次。同日，日机20架分两批在福建建瓯市郊投弹60余枚，伤三人。

6月15日　　张治中、王世杰复林伯渠6月11日函，对中共正式提出的意见发表看法。认为国共谈判必须共同遵循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为改善现状，增加团结的前提。至于中共正式提出之意见，认为对如何实行国民政府之军令政令和改善措施、整编部队等，均未提及。

△　蒋介石纪念中央军校（其前身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二十周年，发表《告历届同学书》，勖勉学生修身、立志、自爱、自强，发扬黄埔光辉，完成革命大业。

△　国民政府特派钱泰为驻北非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大使待遇代表。

△　李济深、柳亚子等组成桂林长老团，向全市富商大户登门劝募，支援湖南抗战。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中共中央西北局以潼关危急，西安吃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是日联合发布保卫西北训令，号召西北军民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保卫西北。

△　第一战区第十六、第四十军克复豫西灵宝。

△　湖南战场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向长沙守军第四军主阵地红山头、黄土岭猛攻。至午，守军伤亡较多，阵地被日军占领。16日，日军以红山头、黄土岭为突破口，向城区核心阵地妙高峰、天心阁方面猛扑。至17日，两阵地失去大半，守军亦伤亡很大。

△　滇西方面日军1500余人自腾冲向龙陵增援，是日越过龙川河。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以第八十七师主力迎击，双方激战于龙陵北侧地区。同日，芒市方面日军600余人也向龙陵增援，与新编第二十八师一部激战于放马桥附近。

△　美国47架重型轰炸机“超级空中堡垒”自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东京、门司、八幡、小仓等地。

6月16日　国民政府明令派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全权代表。同日，又明令公布《省防空司令部组织条例》。

△　国民党中央任命韩振声为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　旅渝台湾革命同盟会开会纪念台湾沦陷四十九周年，定是日为“抗日反帝纪念日”，并发表宣言及《告台湾同胞书》，鼓励台胞倍加努力奋斗，协助盟军打倒倭寇。

△　湖南战场日军主力一部分兵向宁乡展开进攻，是日同宁乡守军第五十八师在城郊一带展开争夺，并以大量毒气弹突破守军的防守，攻入城区。旋南下往湘乡方面进击。

△　湖南战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向长沙岳麓山发动进攻，占领守军第九十师前沿阵地。至晚，日军步兵开始向岳麓山主峰发起攻击，经第九十师反击，日军被压迫于山下。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六〇团于邦乃附近与日军腾冲援军发生激战；第八十八师与日军增援部队发生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　鉴于龙陵地区敌情骤变，第七十一军遂决定暂时停止龙陵攻坚战，转入阻敌援兵战。旋远征军长官部急调第八军荣誉一师主力和新三十九师增援第七十一军。

△　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缅北加迈。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在延安举行招待会，宴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观看电影及活报剧等。

△　日机15架分三批袭击河南内乡，其中一架在城西郊投弹。

△　罗斯福发表讲演，向全世界阐述成立世界机构之计划，称：此组织中设有一委员会，由代表一切国家之机构每年选举一次，其中应包括四大国家。此会将负责解决国际纠纷，并维持相当武力，以应防止战争之需要。

△　民盟成员、西南联大教授罗隆基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作题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的讲演，称："我们所需要的民主，必须建立在'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在政治上必须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思想、研究、集会、结社的自由；在经济上必须做到生产手段公有。"

△　李济深在桂林发表广播演说，呼吁铲除失败主义，加强民主，组织民众，实行抗战。

△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驻重庆特派员司徒华就"超级空中堡垒"炸日本本土事播讲，称："中国西部某区今日已成为美空军集中之处。此种庞大机场系由43万中国农民所建立。诸机场所用之碎石，足修20尺宽、60里长美国公路一条。"

△　伪天津市政府强迫妓女86人赴河南"慰劳"日军。

6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减刑办法》，并修正公布《邮政储金法》。

△　蒋介石以四川省各界人民抗战以来"出钱出力，有功国家，粮政、役政之负担，甲于各省，增产、运输、购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

战之工作，莫不有最佳之表现”，是日特予以嘉慰。

△　国家总动员会议为充实四川省经检力量，加强经检机构，将原有重庆、成都、自贡三个经检队及宜宾、万县经检支队改为第一、二、三、四、五大队，并将全川划为五个经检区。

△　故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灵榇由陕运川，是日抵成都，各界数千人前往恭迎。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以第一一四团为先头，全速在孟拱以东地区渡河，于是日进抵孟拱东北之康堤及其以南地区，第一一三团进抵孟拱巴陵附近地区。

△　自是日起，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先后重新集结于预定阵地，对龙陵发起第二次攻击。18日，龙陵日军对第七十一军空树坡等地区发动猛攻，第七十一军即展开反击，日军被击退。同日，象达方面日军亦被远征军第二军击溃。

△　薛岳命令第四军：“长沙确保与否，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所系，望该军晓谕各级将士，奋勇杀敌，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要确保长沙。”

△　湖南战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占据长沙岳麓山下一小阵地，对主峰云麓宫攻击，第九十师组织多次反攻，均未成功。中午，日机数十架前来助战，日军步、炮兵协同猛攻，岳麓山阵地告急，师长陈侃请求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派兵救援。

△　湖南战场湘江东岸日军一部先头部队3000多人，进抵株洲东南一带，随后又逐渐增加兵力。守军暂编第七师不支，遂放弃株洲。同日，日军另一部进抵湘潭，守军三个师不战而退，日军兵不血刃而下湘潭。至此，长沙陷于日军的夹攻之中。

△　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及伪第二方面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扫

荡”冀鲁豫第九分区之卫河南侧地区。

6月18日　长沙失陷。日军第六十八、第五十八、第一一六及第三十四师团全部进入攻击长沙和岳麓山的战斗。凌晨6时，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六联队一部冲上岳麓山顶，占领顶峰云麓宫阵地，控制主峰。同时，日机30多架轮番轰炸，低空扫射；日炮兵也进行猛烈轰击。市区守军在失去红山头等主阵地后，纷纷向浏阳方向突围而去。下午，长沙城陷敌。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六军预备第二师占领怒江西岸明光、固东街。20日，第三十六师攻克瓦甸。21日，第五十三军攻占江苴街。旋各部于龙川江东岸集结，准备向腾冲攻击。

△　英印军第七十七旅被日军围困，请求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救援，师长孙立人即命该师第一一四团强渡南高江增援，19日到达孟拱东方。

△　孙科在重庆对记者谈话，谓：“欲谋亚洲之安全及不使日本帝国主义再抬头，必须中苏亲密合作。”

△　中国空军一队及中美空军混合机队联合出击湘中，在湘阴北炸中日军船队，并于长沙上空发生空战，击落日机一架。同日，另一批中美机队出击山西永济车站及日军机场。

△　日机袭击湖南常德、桃源。

△　东北四省抗日协会根据国民党中央命令，为积极准备复员工作，扩充常务理事名额为11人，计有洪钫、张振鹭、李锡恩、刘风竹、师连航、赵宪文、武尚权、马亮、陈先舟、吴焕章、谭文彬等。选单成仪为总干事，卡宗孟、王汉倬、毛春圃为副总干事。

△　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正式成立，李济深任会长，李宗仁、欧阳予倩、陈劭先等27人组成工作委员会。

△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西伯利亚抵达新疆迪化，蒋介石特派王世杰及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等到机场迎接。19日，参观新疆学院及新疆女子学院。

6月19日　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各部迫近缅北卡盟西、北两侧地区，完成对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五十六两联队的包围，是日开始全面攻击，攻入卡盟。日军残部1500余人向南溃退。

△　全国慰劳总会以湘北战事甚烈，保卫长沙将士忠勇牺牲，可歌可泣，是日致电慰勉，并电各省、市分会加紧推进劳军运动，支援湘战，尽歼敌寇。

△　兵役署长程泽润为继续征集青年服兵役事，对记者谈第二期征集计划：6月宣传；7月各地策应；8月1日至15日集体入营。全国共编10个教导团。

△　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薛笃弼在中枢纪念周报告1943年度水利建设施政状况：完成整理航道2788公里；完成水利放水工程34.3860万亩，完成整理水利工程324.1308万亩。

△　中、美、苏三国在华盛顿举行航空会议。

6月20日　华莱士由王世杰及美国驻华代办艾其森等陪同，由迪化抵达重庆。蒋介石、孙科、何应钦、宋子文等国民政府要人30余人到机场迎接。随同华莱士来华者有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对外经济处对苏供应科首席联络官查德等。华莱士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

△　军事委员会下达保卫衡阳的作战部署：“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击破之。”命令第七十二、第五十八、第二十六、第二十、第四十四军在醴陵东北方和北方攻击；

第三十七军及暂编第二军等在渌口、衡阳间坚守抗阻；第七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九、第一〇〇军及第四军余部在湘江右岸担任攻击；第十军、暂编第五十四师等固守衡阳；第六十二军在衡阳西南待机行动。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　日军第十一军下达进攻衡阳的部署：第六十八、第一一六两师团应迅速攻占衡阳；攻占衡阳前，第六十八师团先占领粤汉铁路长衡段和衡阳飞机场，第一一六师团先在衡阳西南地区歼灭守军。第三十四师团在长沙外围清除残敌，第五十八师团协助在长沙、湘潭设立飞机场，第三师团集结萍乡以南地区，搜索和打击长、浏东北山地前来进攻的中国军队。

△　日军攻占湖南醴陵、株洲、渌口、湘潭。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攻击日军之侧背，解英军第七十七旅之围，并掩护其安全后撤。旋与第一一二团及第一一三团相配合，对孟拱守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　日军第五十三炮兵联队1000余人由缅北南堤返援孟拱，与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发生激战，该团将敌击溃。

△　日军一部在河南巩县蒋岗把俘虏的抗日游击队重伤战俘30余名集中起来，全部用机枪射死。

△　航空委员会制定三项办法，以预防日降落伞部队降落，滋扰后方。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禁载标准》及《战时书刊审查规则》。

△　由张澜等人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提出

《对国是之十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要求国民党切实实施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目前征兵、征实、征税中的各种弊端；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利，实行全民动员和武装。

6月21日　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官邸与华莱士进行单独会谈。华莱士转达罗斯福关于国共关系的意见，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我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够一致，我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并且表示他可能充当这个朋友。关于中苏关系，华莱士认为：任何足以造成中苏两国不睦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蒋介石表示愿意与苏联取得友好谅解，并建议由罗斯福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或“中人”。

△　张平群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就长沙失陷事表示：“长沙现已失守，但我军地面部队及中美空军确已竭全力之所及，达成消耗敌军之任务，尽其保卫职责。”

△　日军攻占湖南湘乡。23日攻占萍乡。24日攻占衡山。

△　第一战区一部克复河南嵩县。

△　滇西龙陵方面日军约5000余人分向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各师反击，战斗至烈，双方陷入对峙。22日，荣誉第一师加入第七十一军对龙陵的攻击，战局得以稳定。

△　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抵抗纳粹强盗侵略，发动伟大爱国战争之第三周年表示敬慰。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陕北安塞参观八路军兵工厂、被服厂等，是日返延安。

△　据中央社讯：山西省战区辽阔，年来灾情严重，国民政府特拨2800万元赈灾，并派查放主任委员邓鸿懋赴晋办理急赈。

△　上海电车公司全体职工不堪日伪压迫，实行总罢工。28日，伪警察按职工住址分往拘捕工人50余名，并强制复工。

6月22日　　蒋介石与华莱士进行第二次会谈，中国方面有宋子文，王世杰及宋美龄，美国方面有范宣德、拉铁摩尔、哈沙德。关于中国抗战和美援问题，蒋介石称：他曾期望缅甸战役能够展开一个全面战争，这样将使得中国军队得援助和喘息。但缅甸战役没有全面发动起来，对中国士气有着决定性影响。中国人感到是他们被抛弃了。关于美国在华军队问题，蒋介石认为美军军官明显地表示对中国缺乏信心；并言及史迪威，称其不合作的态度是难于进行工作的，他对史的判断没有信心。关于中共问题，蒋介石建议美国对共产党采取“冷淡”态度，并请美国认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

△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战绩，指出：“七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大小战斗9.1594万次，毙、伤敌伪83.2815万名，俘敌伪军18.5548万名，敌、伪投诚反正7.3822万名，缴获长短枪2.2995万枝、轻、重机枪3000挺，各种炮509门。我军伤、亡40.2567万名（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555名），敌我伤亡比例为2.1：1。”并说明1941年、1942两年日寇以在华六分之五的敌、伪兵力压在敌后解放区，致战斗残酷异常。解放区人口由一亿降至5000万。军队、土地面积亦趋缩小。“但共产党人毫不动摇，坚持斗争，执行党的十大政策，发起广泛进攻，自1943年以后，解放区又趋扩大，人口已增至8000万，军队已至47万，民兵更达200万”。“在华北敌后建立五大块根据地。政令所及的人民5000多万，占全华北一亿人口51％”。“华中敌后战场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赣、鄂、湘七省地区，政令所及的人口3000万，占华中沦陷人口的50％”。“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岛大部为我控制；另一处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下午，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与中外记者团座谈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　延安《解放日报》统计今年上半年五个月中日军“扫荡”次数：1月份内，1800人“扫荡”北岳区，1000余人“扫荡”山西北部第八分区，1800人“扫荡”冀东，4000余人“扫荡”苏南，1.5万人“扫荡”河北白洋淀地区，2000余人“扫荡”山西太行。2月上中旬，在鲁西进行了8000余人连续四次“扫荡”，在豫中，3000余人连续进行两次“扫荡”。1.5万人“扫荡”热河中部。2月下旬至3月，3000余人在苏北进行10次“扫荡”，5000人“扫荡”苏中，7000人“扫荡”淮海区。4月，5000人“扫荡”鲁中，2000余人“扫荡”冀中两次，2000人“扫荡”晋北两次。4月下旬至5月上旬，5000人“扫荡”鲁中，3000人“扫荡”平北区，3000人“扫荡”胶东，2000人“扫荡”太行区，2000人“扫荡”冀南。在以上比较大的“扫荡”中，日军所用兵力约13万人，八路军、新四军作战1.4万余次。

△　粮食部长徐堪在成都发表粮政问题讲话，提出如下要求：一、必须实物入仓，不能代以金价；二、征实要如期完成。

△　鄂豫皖解放区举行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代表共产党员42人，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2人。大会主席由国民党员、解放区行署副主任杨经曲担任。杨在会上讲话指出：“今天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方有办法，才能顺利地进行反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代表全师指战员在会上表示：“誓愿坚决为保卫民主、保卫团结而奋斗到底。”中共华中局代表郑位三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一贯为新民主而奋斗。会议选举郑位三、陈少敏、涂云府为解放区临参会正、副议长。

△　缅北日军由沙貌派出增援部队600余人对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发动攻击，被该团击退。同日，该师第一一四团攻破建支，毙敌96名。23日该团又攻占孟拱外围汤包、来生、雷鲁等重要据点，并将孟拱公路及铁路截断，完成了对孟拱城的包围。

△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开会，各参议员就重庆市种种苛政提出严

厉批评。会议通过修筑成渝铁路案。

△　四川省内江县50余万民众举行献金大会，一日内献金总额达5400余万元。

6月23日　　蒋介石与华莱士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国方面有董显光、王世杰，美方有拉铁摩尔、范宣德。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华莱士表示美国不可能参与中苏之间的协商，蒋介石完全同意，并称中国政府会及早与苏政府进行会谈。关于共产党问题，蒋介石要求华莱士应该明白，共产党必须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配，而不受美国陆军支配。共产党应该听从中国政府的条件。关于中国经济状况问题，华莱士表示希望政府必须赶紧采取步骤来改进中国的经济状况。末了，蒋介石提到中国经济困难是缺乏消费品，要求增加“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的吨数，每天供给2000吨民用物品，包括布匹、药品和零件。华称要劝服美国陆军准许航运民用物品不是容易的事。

△　华莱士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发表谈话，称与蒋介石晤谈三次。谈及援华问题，华氏称：目前必须先打通滇缅路，恢复海上交通极为重要。并称战后美国将以大批机器援华。

△　国民政府特派覃振兼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　孔祥熙率领出席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代表团抵华盛顿。24日在招待会上称：此次来美主要任务，为出席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并与美国领袖讨论战后问题。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对孟拱城发动总攻。该师集中大炮摧毁城外铁丝网等障碍物，经六小时激战，相继攻入市区，巷战至烈。

△　新四军苏中军区主力及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为配合第四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集中兵力进攻日伪军的“清乡”封锁线。同

日，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在如皋以东的海河滩全歼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击毙日军百余人，俘日军14人，击毙伪军200余人，俘伪军200余人。

△　湖南战场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在衡阳附近渡过湘江和耒水，开始对守军第十军方先觉部第一九〇师和暂编第五十四师阵地攻击。24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先头部队亦到达衡阳外围，逐渐对衡阳形成包围之势。

6月24日　　华莱士离重庆赴昆明。行前就中美互助对日作战，中美、中苏友善谅解及复兴中国经济，发展中美商务等问题与蒋介石发表联合声明。

△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举行会议，由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报告司法行政设施及改进计划，拟以督促各县成立监所促进会，推行公证等作为本年度工作重心。

△　孔祥熙访晤美国务卿赫尔，并讨论中美两国利益及未来两国之合作等问题。

△　湖南战场日军渡过耒河，进攻五马归槽第一九〇师阵地，被击退。25日再攻，续战至26日中午，五马归槽失守。

△　川康经济建设服务社在重庆成立，张群任理事长，徐堪、康心如、胡子昂、卢作孚为常务理事。该社旨在联合川、康两省生产、贸易、金融、交通等项事业，首求解除目前困难，进谋将来协调发展。

△　宪政实施协进会举行常务会议，讨论王造时所提迅速健全临时民意机关人选并提高其职权案，张君劢所提扩大国民参政会职权案，张志让所提保障言论自由案。

△　延安文艺界50多位作家举行集会，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

团，由陕甘宁边区文协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边区文化运动概况。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介绍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情形。随后，丁玲、吴伯箫、艾青、萧军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　湖南战场经醴陵南进之日军陷攸县，直趋安仁。

△　中美空军混合团驱轰联合机队轰毁黄河铁桥，同日，又轰炸洛阳车站，击毁日军汽车11辆。

6月25日　缅北中国驻印军攻克孟拱。24日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孟拱火车站和部分城区，入夜日军反扑，双方再次激战，至是日，日军伤亡过半，纷纷跳入南恩河泅水南逃，被伏击部队歼灭。下午5时，孟拱城被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克。是役共毙日军1500余名，生俘21名。新编第三十八师亦伤亡247人。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和第五十三军分别自龙川江西岸、清水河南岸向腾冲推进。26日，第三十六师之先头部队越过老祖坟，继续向南推进，预备第二师到达那寨、宝华之线，准备向宝凤山攻击。左翼第五十三军进至千榨山、杭勐山之线。

△　湖南战场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组织千余名决死队员乘夜潜入衡阳机场周围高地。26日，突然发炮轰击，并将机场完全占领。该师团主力乘势渡过湘江。27日，第六十八师团与第一一六师团在衡阳南部会合。

△　华莱士在昆明参观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向两校5000多名师生讲话，希望中美两国尽心互助，积极进行对日作战。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民主、自由的国家。

△　朱德、叶剑英在延安会见英国记者史坦因，朱德称：我们和盟国都是为着打倒法西斯这个共同目的，都要争民主。并称：只要中国内部政策改变，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中国是有希望

的。

△　第四届诗人节在重庆举行，胡风主席并致词称：诗人节不一定仅为纪念屈原，也可以借此检讨抗战以来之诗歌写作。

6月26日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提出保卫桂林、柳州的作战意见，主要内容为：固守桂林，应彻底集中兵力，予进攻之敌以反击。为收歼灭之效起见，拟以第七战区总司令所部担任粤汉路以东之作战，俾抽调第七战区主力之两个军，控制于龙虎关、富川、贺县一带；第六十二军掩护桂林，相机进击桂林、全县以东地区，侧击进攻桂林之敌；另密调第三十一军之第一八八师及第一三一师集结柳州。又南宁机场及其附近之警卫，由原有第一七五师之两团担任。一俟敌进入我桂林核心阵地，受我相当消耗后，即以第七战区主力之两个军进入恭城附近，第三十一军于柳州分途推进，适时由东南、西南方面转移攻势，将敌人夹击而歼灭之。

△　湖南战场日军从西、南两面将衡阳守军第十军包围，并展开攻势。军长方先觉命令湘江东岸部队撤回城区，并将作战中心转入城区。

△　陈纳德发布命令，饬部属用其空中实力予中国陆军以极大之协助，继续威胁及消耗日方供应线之交通。

△　重庆《中央日报》讯称；敌犯中原，豫民受灾颇重，国民党中枢先后拨款4100万元，救济灾民及公教人员、学生，并将特派大员前往抚慰。

△　河南唐河县李子炎捐资783万元，捐助河南蔚文私立中学，国民政府是日明令嘉奖。

△　盘踞在河南商水县周家口的日伪军1000余名，乘夜闯入焦芦埠口集，残杀豫鲁苏皖第四纵队官兵120余人，寨内无辜被害者37

人，其中有五户人家被杀绝。

△　美国新泽西州立师范学院宣布：自是日至7月8日止，在该院设立中国文化研究班，邀请中国文化界名流及教育家出席演讲。

6月27日　孔祥熙访美总统罗斯福，谈中国战局、经济情形等问题，并递交蒋介石给罗的亲笔函件，保证中美合作。同日，孔又与中美工商协会会长柏德生会谈，并发表声明，表示赞成罗斯福及赫尔所提倡互惠及多面贸易的原则，欢迎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经济合作，促使中国经济之现代化。

△　华莱士在桂林与中、美将领商讨中国抗战形势，并听取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介绍战区战况详情。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向孟拱至密支那铁路上日军重要据点南堤发动攻击，于是日突破敌阵。28日上午占领南堤，截获日军火车车厢300余节。7月11日，到达密支那附近，与围攻密支那城的第三十师会合。

△　湖南战场日军第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与第一一六师团长岩永旺协商，从6月28日开始，第六十八师团从南、第一一六师团从西两面对衡阳发动总攻。

△　滇西日军由龙川江东岸后撤，退守腾冲城郊附近地区。

△　驻冀东平谷、顺义、密云、三河、蓟县的日伪军约千余人，合围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和第二区队驻地平谷县的岳各庄、赵各庄，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300余名。

△　据中央社讯：粤南第七战区一部向雷州半岛之洋鞍、乌蛇岭、中伙等日军据点发动突击，共计毙伤日军300余名，毁仓库多所。

△　驻山东茌平、博平、聊城、阳谷日军对茌平城南进行扫荡，残杀无辜群众134人。

△　汪伪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通过调整商业统制总会机构和人选案，决定在该会下设棉业、米粮、粉麦、油粮、日用品五个统制委员会，分别办理物资统制事宜。总会理事长闻兰亭，监事长唐寿民。

6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谈中国战局及中共问题，称：衡阳附近战事日来已臻剧烈。中国陆军与中美联合空军正竭尽其一切可能之努力，予敌寇以打击。关于中共问题，梁称：中央政府始终诚意执行其采用政治方法解决之决议，已提出具体条件，静待中共之答复。并称：只要中共能遵守法律，其军队能服从统帅之命令，则一切问题皆迎刃而解。

△　立法院会议通过《强迫入学条例》、《战区各省府设置行署条例》、《出国护照条例》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条例》等案。

△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答《新华日报》记者关于国共谈判的问题时称："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中共无不可以商讨。"

△　孔祥熙在驻美大使魏道明陪同下再访罗斯福，商谈中美经济合作等问题。

△　华莱士致电罗斯福，报告在华访问观感及史迪威已不为蒋介石所信任，请另派人接替。

△　第三战区所部克复浙江衢县。

△　凌晨，湖南战场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依据27日协定，同时对衡阳发动总攻。第六十八师团以太田旅团主力攻击停兵山预十师阵地，防守停兵山的该师一部以手榴弹和刺刀打退了日军的数次冲击。日军志摩支队在西北侧的进攻亦受挫。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令进至宝凤山北端之线的第五十四军主力沿公路以西地区，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助第五十三军攻击腾冲城。

△　是日至30日，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各部对龙陵日军防御阵地进行全线攻击，并恢复了第一次攻击时围攻龙陵的态势。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八分区沁河支队王遵部挺进道清路南，在河南武陟遭日伪军夹击，伤亡150余人。

△　是日至次日，中美混合空军不断出击，轰炸洞庭湖至衡阳间日军供应线。

△　日机15架袭击闽东沿海，向宁德东部港口及三都澳投弹20余枚。

6月29日　军事委员会复电令白崇禧并转俞飞鹏、张发奎、余汉谋，策定关于桂林、柳州作战的部署，主要内容是：国军决固守桂林，依第六、第九战区之夹击及第七战区之协力，先击灭进攻湘桂路之敌。第四十六军之主力固守桂林，一部在黄沙河担任桂林之掩护；第三十一军主力即秘密开柳州待命，准备参加桂林会战；第六十二军暂位于祁阳附近，掩护湘桂路及零陵机场，依状况转移全州，参加桂林会战；第七战区应秘密准备一个军，转移连山方面，参加桂林会战。

△　湖南战场预十师一部在衡阳五桂岭、江西会馆阵地打退日军数次进攻。30日下午，日军又对五桂岭南端阵地连续炮击，并趁势发射毒气，守军官兵80余人中毒死亡。

△　日军陷江西萍乡。

△　攻击缅北腾冲的各部队迫近腾冲外围据点，正准备攻击之际，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令第二集团军对部署稍加修正，将攻

击重点移于左翼。

△　据中央社讯称：乌兰察布盟公旗沦陷区参领达赖鄂森不、佐领尺格达色等不堪日伪之压迫，率所属苏目蒙民向第八战区投诚，傅作义派员前往善丹庙安置。

△　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讷著《中国的防御是能够加强的》一文，称：在整个反轴心联盟中，中国战场最危急。日本利用了中国的缺点，进行了这次打击。“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游击战，这对于中国的战略具有十分巨大的贡献”。

6月30日　军事委员会以桂林以北之黄沙河、大溶江地形险要，可以逐次阻击敌人，电令白崇禧、第四战区及第六十二军，饬即在该两地设施阵地，并预行研究阵地编成要领，以使尔后第六十二军得以随时进入阵地，能为适当之利用。第四战区遂遵令于黄沙河、大溶江各地构筑阵地。

△　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现梁寒操已发表谈话，应以林伯渠、周恩来名义分别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表公开谈话以答复之，文稿另电告。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机来延安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政府提示案。如张、王均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审查标准第十条各项之解释》，其中关于“违背我国建国之最高原则者”解释为：一、挑拨离间国内各民族之团结者；二、鼓吹侵略者；三、鼓吹法西斯主义或阶级独裁理论者；四、鼓吹私人垄断政策者；五、鼓吹阶级斗争者。关于“危害国家利益，破坏公共秩序者”解释为：一、侮辱国家元首者；二、响应汉奸敌人谬论者；三、恶意抨击政府既定政策与现行命令者；四、挑拨党、政、军、民感情者；五、对于地方治安、粮荒纠纷或其他骚动作不符合事实之报道或挑拨煽动之言论者。

△　湖南战场日军增派黑赖联队，并增炮数十门向衡阳城南张家山高地猛攻，终于攻占张家山两个据点，守军预十师一个营大部伤亡。7月1日晨，援军到达张家山，将日军赶至山下。

△　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约集兵役署、教育部、政治部、军训部、社会部、三青团等机关在重庆举行“学生从军座谈会”，一致认为青年学生参军“国内训练时间缩短为一个月，出国行军时间一个月”即从事作战。

△　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举行本年度征实征借业务会议。据悉：1943年度征实3360余万担，征购及征借2955余万担，共计6316余万担，较之1942年度减少。其原因系由于湖南战事及灾害之影响。

△　华莱士经昆明、桂林、成都飞抵兰州。

△　中韩人民联盟代表韩吉沫在渝称：日政府为制止朝鲜爱国志士的秘密活动及破坏，刻正准备恢复朝鲜之君主政治，成立类似“满洲国”政府及“南京政府”之傀儡政府，以收买朝鲜诸领袖。

△　美国陆军部决定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赞扬他克服种种困难，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

6月下旬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电令第二十集团军兵分三路，主力保持在右，向腾冲攻击。为避免日军利用既设工事阻击攻击部队前进，应先以一部由左翼迂回奇袭腾冲。

△　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及盐阜区地方武装，先后攻克日伪军沿海的重要据点大兴镇、合顺公司等，共毙、伤、俘日伪军655人。

△　日军第三十三军向缅北密支那日军下达命令：一、军企图向靠近龙陵方面之敌发起攻势，仍继续防卫八莫、南坎地区。二、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

是月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机二架在飞经正太路轰炸日军运输列车时，其中一架受伤，降落于北岳区，受到八路军一部营救脱险。后陈纳德和美驻华大使高思先后致函朱德，表示感谢。

△　李济深、柳亚子等倡议在广西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主张立即动员民众，坚持抗战。

7月

7月1日　新华社记者为国共两党谈判事走访周恩来，询其究竟，周恩来答称：国共两党谈判由西安谈到重庆，已历时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尽管政府提案与我党的书面意见内容相距很远，中共中央现在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们无不乐于商讨”。

△　国民政府发行《民国三十三年度同盟胜利公债》，定额为国币50亿元，按票面额十足发行，年息六厘，每六个月付息一次。该公债自1947年6月起开始还本，分30年还清。

△　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撤销，改组为中国供应委员会，由驻美大使魏道明兼任主任委员，毛邦初、江彪、黄汲青、刘瑞恒、王国华、谭绍华为委员。毛邦初主持航空，江彪主持军火，黄汲青主持实业与矿业，刘瑞恒主持医药，王国华主持交通。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民兵210万，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要求各中央局作出全盘计划，在一年内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

△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甘肃铺隆山，向成吉思汗陵致祭，并参

观“工合”工厂及国际合作节举办的产品展览会。晚，在兰州致电蒋介石、宋美龄，表示将为“加强中美及盟邦合作当继续尽力”，希望中美两国“在重庆交换的意见能产生积极而有建设性的结果”。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延安大学，校长周扬介绍延大的历史和现状。下午参观鲁迅艺术学院。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电令各兵团乘敌后空虚击破进犯之敌，电称：国军决乘敌深入，后方空虚，并使用正面阻止及侧背猛攻而击破之；除已令第十军固守衡阳外，即督促所部集结兵力，各向当面之敌猛攻而击破之；饬对沅江、益阳、宁乡方面之部队，应主动袭击敌后交通，牵制敌兵力，协助主力作战。

△　湖南战场日军黑赖联队步炮兵、速射炮两个中队同时向衡阳张家山阵地发动猛攻，至下午5时，张家山阵地的碉堡均被破坏。守军预十师以迫击炮对射，日军伤亡惨重，其一个中队全部被炸死。入夜，日军组织突袭，又被守军击退，一个大队全部伤亡。

△　滇西中国远征军对龙陵发起第三次攻击。第七十一军荣一师、第八十八师分向回头坡、空树坡日军阵地攻击。3日后，第七十一军转入攻势，分路向退却日军进行追击。至此，第七十一军攻击部队全线进入围攻龙陵城郊各据点的作战位置。

△　是日至4日，日伪军一部开至广东三灶，焚毁民房531间、学校三所、商店41间，死亡民众700余人，受伤44人。

△　《武汉日报》（敌后版）在湖北黄冈县三里坪创刊。

△　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布里敦森林开幕，出席者共44国代表，美国财长摩根索任主席，中国代表团孔祥熙等参加。会议主要讨论未来经济合作与和平进步的永久计划，项目为：一、拟定平准基金计划，稳定世界币制。二、组织从事战后复兴的国际银行。会议拟以

8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推进战后世界贸易。

7月2日　　蒋介石出席中央政治学校成立第十七周年纪念会，并发表训词，策勉本校师生“必须人人自勉为建国之基本干部，努力修养为健全之政治人才”。

△　华莱士及其随员拉铁摩尔、范宣德、哈查德等离兰州返国。行前，华对中央社记者发表书面访华观感，认为“中美两军的关系，完全基于自然的合作精神，尤为欣慰”。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经过准备，向腾冲外围各据点发起攻击。第五十四军预二师一部越过大盈江向芭蕉关攻击；第一九八师一部向蜚凤山攻击。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一部向飞凤山发动奇袭，经三小时激战，遂将该山占领。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发起的湖西战役结束。此役攻克日伪军据点和碉堡97处，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

△　湖南战场日军连日屡攻衡阳张家山不克，是日以大量毒瓦斯助战，并以数十人为一组，分头向张家山阵地攻击。预十师守军官兵中毒昏迷，张家山阵地陷敌。师长葛先才闻讯，亲率师部工兵连和搜索连增援反击，再次将日军击退，夺回张家山阵地。

△　赈济委员会为救济豫省寇灾，特拨款1000万元作救济专款。

7月3日　　军事委员会特派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　林伯渠约见张治中、王世杰，对6月5日《国民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希望国民政府“将民主尺度放宽”；第二，希望将八路军按五个军16个师扩编；并转告中共中央邀请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安去谈判。张、王表示，关于民主问题，我们将采取各种措施；关于军队问题，不同意扩编；访问延安问

题，只有中央谈出结果之后，方可考虑。

△　孔祥熙在美向《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为战后国际合作的基石。该报报道，孔特别重视各国不得以基金项下的外汇或银行贷款用于其他琐碎目的，而必须用于能增加债务国生产机构的生产量及收入。

△　行政院以各地兵役仍多弊端，妨碍役政前途，特通电各省、市、县转饬办理役政人员，恪守法令，如予违犯，决严厉处分。

△　日机向衡阳市区实施轰炸，并投掷大量烧夷弹，城内守军屯粮、弹药多被焚毁。至5日，大火未熄。同日，日机分八批袭击湖南芷江，投弹11次。旋又袭击常德。

△　美国财政部货币金融顾问怀特发表谈话，表示计划之中的80亿美元国际货币平准基金，将用以协助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健全货币制度，重建国民经济及外汇之安定。

△　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选举蒋廷黻为国际货币基金宗旨政策及责任委员会主席。

7月4日　　林伯渠、董必武致电毛泽东称：在目前时局下，谈判绝无解决希望，启封电台及放人等小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蒋介石要谈判，不敢公开和中共破裂，是在故作姿态，欺骗舆论，即令谈判破裂，好把责任尽量推在中共。真正解决具体问题的时机，还有待于时局更大的发展。我们对谈判仍是不抱任何幻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向各方宣传和推进大后方争取民主运动及研究上。我们已将双方条件的主要内容及蒋无诚意谈判的事实告诉了关心这一问题的中外人士。我们也认为根据今天的情况，不能采取退回《提示案》，拒绝商谈的形式。

△　孔祥熙在招待记者会上详述中国经济情形，并欢迎外资帮助

中国战后之建设，尤盼与美国之资本与技术合作。

△　延安各界举行应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赞扬美国国内团结、民族团结的精神，表示希望到会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把八路军、新四军关于在团结、民主基础上来求得战争胜利的要求转达给国民政府。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的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　为迅速扫荡腾冲外围日军，达到攻占腾冲之目的，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命第五十四军攻击来凤山、来凤寺，确实扫荡城外残敌。第五十四军即令预二师、第三十六师、第一九八师向老草坡、龙光台、毗卢寺及忍娘娘庙、董库日军发起攻击。第五十三军除固守飞凤山阵地外，即以全力攻击芹菜塘、大董、倪家铺、满金邑等地。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改组成立两周年纪念，发表两年来战绩中说：共出击2.5万架次，毁敌机1004架（此外尚有464架或亦被毁），伤敌机282架。

△　日机二架袭击成都，中美空军混合机队当即升空，将其击落一架。

△　马歇尔等向罗斯福建议，"要求蒋委员长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国全部军队"，因为"仅有史迪威是能够统率中国军队与日人对垒的唯一人物"。为了提高史的威望，"减少对内外之困难"，还建议"晋升史迪威为陆军上将"。

7月5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会，申明凡限价物品及政府国营公共事业之价格，必须力求稳定；其他议价物品自应相互配合，不准任意调整加价。

△　史迪威在缅甸前线对中央社记者发表纪念抗战七周年讲话，盛赞“中国士兵品质优良”，虽历尽艰辛，而最后胜利的信心从未动摇。

△　第九战区以日军连日攻击衡阳受挫，仅以小股部队干扰，特调整作战部署：一、以岳屏山高地和回雁峰沿城墙至北门为第一线；二、以距辖神渡约三公里处至城西南约三华里的高地及张家山和东山两高地区、铁路北侧之线为第二线。并强调第二线为全军的生命线。

△　滇西日军一部由腾冲大道急进，企图增援蜚凤山日军，经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各师打击后，仓皇退入腾冲城内。同日，第二十集团军攻占腾冲城外围5138高地大部，残敌逃往密林之中。

△　日本情报局以“帝国政府”名义发表声明，宣称日军进攻河南、湖南之目的在于“粉碎美、英的侵犯和制霸的企图”，中国是与我为友而拒绝与英美合作的，日本是不以中国为敌的。同日，东京广播电台广播，称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对重庆方面予以一种猛省的机会”。

△　汪伪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决与日本合作，“根据大东亚共同宣言，使中国之自由独立早日奠定，以安定东亚”。

7月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凡24条，主要内容为：全国军队必须积极作战，加强团结，粉碎敌人的新进攻；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西南，保卫西北；要求国民政府改革军事机构，提高军纪和战斗力；要求国民政府改革内政，立即实行民主，保护大后方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

△　孙科为纪念抗战七周年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国际和平和国内的真正的永久和平”。并称，要实现国内和平，只有以自由讨论方式谋求解决。中国“已经决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建立宪政”。

△　陈纳德为纪念中国抗战七周年特发表纪念词，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便会将日本驱逐出中国，使我们两国共享康乐与和平。

△　林伯渠与王世杰会谈。林询问对中共中央提案的答复，再请张治中、王世杰去延安，并就梁寒操在《大美晚报》的造谣提出质问。王世杰表示：中共提出的民主自由问题，我们是想办法解决；关于中共军队扩编四个军10个师，请重新考虑；关于启封电台和放人等小问题，待大问题解决后都可解决。他们二人去延安事，要待重庆谈出一点结果来后才能去。

△　林伯渠、董必武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是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情况。电报说：“目前谈判绝无望具体解决问题，但他们总要故意做出谈判姿态，不完全拒绝去延安，也不让我们离渝。”电报提出：现在我们的原则是，一方面要求张治中、王世杰对我提案逐条提出具体意见；另一方面访问国民党的一些中央常委，如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邹鲁、居正等。

△　国民政府明令开征1944年度各省征粮配额，规定各省、市应储备积谷1800万市石。

△　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纽约接见记者，证实日军1943年在湘省西北部使用芥子气，致中国军队死200余人，伤800余人。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师为继续扫荡腾冲外围之日军，其预二师越过大盈江攻击来凤山；第三十六师向杨家坡、干龙东西之线

推进。7日，第五十四军所属各师部分部队进至马鞍山、松园后山、金堂坡之线。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四九团攻克那汉，至10日，击溃阻击之日军，与第一一二团会合，并打通了卡孟公路。

△　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抵达缅北密支那前线督战，是日晚下达为纪念抗战七周年之总攻击命令，决定于7月7日对密支那日军发动全线攻击，并在攻击成功后施行果敢之追击。

△　日机乘夜侵袭衡阳上空，并向市区投放大量烧夷弹，若干建筑物起火燃烧。其步兵以密集队形向城郊中国守军猛扑，预十师一部在炮火掩护下与日军搏斗，将其击退，大火亦被扑灭。

△　伪军陈立德部奉孙良诚之命，出动4000余人由山东东明南犯至裴子砦一带，八路军一部及民兵对其发动攻势，战至8日晚，将其大部歼灭，俘副司令李英及参谋长、副团长以下千余人，收复小井集、裴子砦等据点。

△　英国联合援华募款运动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分配救济金办法，宋美龄及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等出席，决议将救济金14.3万英镑大部分用于中国战区的紧急救济。

7月7日　　蒋介石为纪念抗战七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称中正对国家、对军民“负有领导复兴之责任，对我阵亡袍泽与死难同胞，负有雪耻复仇的责任”。愿我全国军民同胞“生死一致，安危与共，以达我驱除敌寇，收复河山的初衷”。

△　延安各界隆重集会，纪念抗战七周年，大会向国民政府要求：一、实行民主政治，像陕甘宁边区一样，老百姓有说话、开会、抗战等自由；二、开放党务，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的自由；三、实行地方自治；四、改进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

△　毛泽东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关于国共谈判，现在应“是要求和张、王见面，在见面时声明提示案已转交中央，中央来电认为双方意见相距尚远，为求进一步商谈计，邀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张、王拒绝来延则林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便讨论对提示案之复案。如彼方既不派张、王来延，又不让林回延作详细报告，则继续商谈无法进行，对于提示案之复案亦无从作出，谈判拖延之责全在彼方，我方不任其责”。

△　国际金融货币会议举行中国抗战七周年纪念会，孔祥熙发表演词称：“盟国以供应品运华越快，则中国最后胜利的时期也越早。”表示战后中国“除使农业现代化外，还将实行工业化的广大计划。中国希望获得现代化配备技术援助和资本，以加强战后发展”。

△　驻美大使魏道明在旧金山发表演说，向联合国家提出警告，称：勿以为德国失败后日本即可自动投降。日海军受盟军重压，其陆军仍企图在大陆巩固地位以作最后挣扎。唯有完全击败日本陆军，始能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　胡适就联合国召开货币金融会议发表演说，强调中国“对友邦与同盟国之坚定信念，故不惜七年来忍受长期艰苦”。指出：“此次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倘能为未来新世界秩序之具体证明，则中国之作战即非徒然。”

△　朱德发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号召全体将士更加奋勉，创造出更多的英雄，以进一步提高工作，加强斗争，担负起目前战争形势所赋予的战斗任务，最后战胜与消灭日本侵略者。

△　朱德、叶剑英在延安再次接见英国记者史坦因，朱德对史称：中国抗日战争需要盟国帮助，同时盟国也需要中国抗战，这是相互帮助的。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再次对龙陵城发动攻势，战至是

日，予日军以重大打击，日军被迫逐次向龙陵城郊撤退，第七十一军迫近城郊，与日军对峙。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八军主力第八十二师和第一〇三师由昆明驰抵松山。是日，第八军开始投入攻击松山的战斗。由于日军防守严密，在各处无法立足，致攻击失利。

△　13时，缅北中国驻印军各部在炮兵掩护下，向密支那发动全线攻击。战至18时，右翼第一五〇团进展约140米；第四十二团将火车修理工厂全部占领。另第四十二团一部亦由利多空运到达前线，进迫市区，攻占八角亭据点。是日共击毙日军200人以上。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为打通孟拱至卡盟公路，经四个小时跋涉，是日分别向卡盟公路南北两侧发动攻击，至10日，攻克卡孟公路上日军最大据点曼卫特飞机场，毙敌227名，并攻占平道。

△　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师生3000余人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闻一多在会上讲演，指斥当前的所谓“太平景象”正如“肺结核患者脸上的红晕”，是“将死前的回光返照”，号召青年打破“可怕的冷静”。

△　罗斯福鉴于中国军事形势告急，致电蒋介石称：“据我目前所了解的危急情况，亟需委派一人，授以调度中国境内所有盟军武装力量，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并称：“我正将史迪威将军提升为上将。我建议，请你急迫地予以考虑，将他自缅甸召回，在你的领导下，统率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阻止敌军的深入。”还称：史迪威的“优越判断与其组织训练之能力，均已在此次华军作战中表现”，“足以抵御日敌所施之威胁”。

△　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重申美国政府将对中国“永久支持”，“并对它能够度过可怕艰危的精神抱着信心”。

7月8日　　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对其将史迪威召回中国，统帅中国一切军队的建议“原则赞成”。但有一巨大障碍不能立即实行，“即中国部队和他们的国内政治情况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他们不像现时在缅甸北部作战，为数有限的中国部队那样易于指挥”。故这一建议匆匆付诸实施，不仅于战局无所帮助，亦“会引起误会和混乱，因而损害中美合作”。希望罗斯福派遣一位“完全信任的、具有政治远见和能力的、有影响的个人代表，授予他全权，经常和我合作，并能调整我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

△　蒋介石复美副总统华莱士6月27日来函，告中国正竭尽一切方法以谋抗战力量的增强，并请商承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一私人全权代表来华，以实现彻底合作。甚望阁下大力促成中美合作大业。关于派遣我全权代表常驻美国问题，在宋子文一时未能赴美之前，决派孔祥熙充任此职。

△　蒋介石电在美的孔祥熙注意史迪威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国共军队的后果。并于10日再电孔，要孔向罗斯福进言，说中国军队抗战七年之所以维持不颓，决非如其他国家军队可由一纸命令与纪律，或仅凭能力与学问所能指挥。中国国内的军队性质复杂，不能贸然交史迪威指挥。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陆军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令称：李家钰“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策，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部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为国成仁，深堪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入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　董必武向中共中央报告日寇迫近衡阳，桂林正作疏散，柳亚子、何香凝均向桂东南八步转移，李济深拟向梧州撤退。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开始向腾冲城区实施包围。第

三十六师攻克观音堂。第一九八师攻至距腾冲约300米之线。10日后，该集团军基本控制了除来凤山外的腾冲外围大部分地区，即将转入对来凤山和腾冲城区的攻击。

△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命令第一线各部（除第四十二团外）各抽调一个营兵力，至后方进行短期对日军据点攻击演习；其第一线其余攻击部队从继续对日军展开掘壕攻击，并不断抢筑工事，以对日军防御阵地进行包围。同日，炮兵第十二团一部亦由雷多空运至密支那前线，以增强对据点之攻击火力。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攻克孟拱城后，沿铁路线继续攻击，是日攻占卡孟公路间火车站日军据点，至11日，进至山克浪之线，将威苏、卡西、恩康、山克浪日军全部击溃。

△　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邓初民、张志让、茅盾、夏衍、胡风、侯外庐、宋之的、叶以群等联名致电广西党、政、军、学界人士，指出敌寇图犯广西，我们决响应保卫西南的号召，力主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抗战到底。

7月9日　延安观察家发表声明，驳斥日本政府5日发表的诱降声明，指出今日日本看到希特勒即将灭亡，太平洋美军杀进日寇防线，我国军民坚持抗战已历七年，自己死亡迫近，“企图再用诱降手段，以求找到万一的出路，只是徒劳的”。

△　湖南战场日军第一三三联队再次向衡阳张家山发动猛攻，预十师一营官兵与敌冲杀10余次，伤亡大半，乃于10日拂晓退至萧家山至市民医院之线。

△　华莱士抵西雅图发表演说时称：美国愿意帮助中国，但必须确定中国内部及中苏间不发生争端。中国要实行土地改革和新政。

△　驻墨西哥大使程天固在国际民主联盟大会上发表演说称：中

国目前正迫切需要美国有力之援助及大量租借物资，以对抗日军。

7月10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决议：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孔祥熙出国期间，由居正暂为代理；中央组织部设立组织委员会，朱家骅、陈立夫、谷正纲、叶秀峰等15人为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强辞职，遗缺由余井塘继任。

△　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孙元良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张文心任第八十五军副军长。

△　何应钦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报告中原会战之经过及长衡会战之战况，并对作战之得失作了检讨，称：日军在豫、湘蠢动系最后之挣扎，我须努力度此最后艰苦阶段。

△　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呈外交部长宋子文，报告美国务卿赫尔面告，关于战后和平组织事，昨接苏联答复，愿与美、英开始讨论，借口苏、日关系尚未决裂，坚不与中国会商。现美、英、苏定于8月3日在美开始谈判，美希望中、美、英三国谈判亦能于此时间中分别进行。蒋介石批示：应可赞成。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新四军第五师，应相机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北发展，争取与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五十师师长胡素接替美军麦根准将，负责指挥密支那地区作战。

△　重庆各界举行七七劳军献金大会，是日献金总数为8500万元。

△　湖南战场日军为对衡阳再次发动总攻击，从后方输送的火炮和弹药到达衡阳前线，第六十八师团新任师团长堤三树男亦就职到任。

△　华莱士在白宫向罗斯福汇报访华时指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根本得不到广大人民的信任。“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又指出：“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有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7月上旬　沈钧儒、邓初民、史良、陶行知等发表联合通电，主张立即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铲除失败主义，并希望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

△　滇西日军第三十三军派出第五十六师团主力、第二师团第十六联队及第二十九联队第三大队，步、炮兵共7000余人，由芒市增援龙陵。

△　日机轰炸湖南桃江、益阳城，总计炸死民众30余人，毁民房13间。

7月**11**日　蒋介石出席重庆市党员代表大会并发表训话，指出：党员应效法总理及革命先烈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党尽忠诚，为国争光荣。各代表之生活行动、言论、态度，均应为全国党员作模范。

△　国民政府公布湖北省第二届参议会议长名单：议长沈肇年。

△　孔祥熙同罗斯福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世界战局及战后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

△　冀东八路军两个连在唐山北约70里之小松林、城北寨设伏，将伪绥靖军第二集团军七个连击溃，毙伪营长以下70余人，伤百余

人，俘52人。

△　中美空军混合团机队轰炸湖南湘阴东北之新市，在空战中击落日机一架。

△　湖南战场日军第一二〇联队和第二联队在炮兵支持下，猛攻衡阳西南虎形巢，飞机轮番轰炸并投掷烧夷弹，许多建筑物被毁。预十师第二十九团阻敌前进要隘，敌施放毒气，预十师守军官兵多中毒昏迷，唯仍坚守，战至12日终不支而退，虎形巢为敌所占。

7月12日　蒋介石下令对衡阳解围，主要内容为：一、决加强外围兵力，速解衡阳之围；二、着李玉堂督率第六十二军即由衡阳西南迅速猛攻敌背，务期一鼓歼灭围攻之敌；第七十九军应协同第六十二军向衡阳西北郊猛攻，并以第六十三师由北向南协助永丰方面之攻击，以资策应；三、湘江东岸各军亦应向预定目标猛攻，配合作战。

△　孔祥熙再次拜见罗斯福，讨论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问题。罗说他当时考虑就顾虑到事实上的困难，并说派代表驻重庆问题则甚觉人选困难。

△　湖南战场日军一部2000人越过湘桂铁路，突至衡阳五桂岭南街。守军第三师一部冒毒反攻，将突入之敌歼灭过半，敌残部被驱返到湘桂铁路地区，战斗彻夜未停。

△　苏北新四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攻克如皋西石庄镇，毙、伤伪军孟宪平部全部，俘伪区长以下150余名，缴获长、短枪百余支。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国记者离延安返渝，25日到达重庆。8月30日，外国记者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等陪同下东渡黄河，到晋绥边区继续参观访问。

7月13日　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谈判，林伯渠申明中共所提12项意见之原意，希望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各项作出答复。张、王

未作具体答复，商定改期再谈。

△　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座谈会，讨论台湾接收及复员纲要草案有关问题。本月21日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讨论收复台湾有关问题。

△　滇西中国远征军各部攻击龙陵外围的勐连坡、红土坡、山神庙等要地。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敦促其采取一切步骤为史迪威尽早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

△　湖南战场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衡阳张家山、萧家山附近猛扑，并有一部突入新街，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亲自指挥官兵与敌白刃搏斗，将突入新街之敌悉数歼灭。下午，日军再攻张家山前两高地，守军第三师第八团组织反击，因日军大量增援，守军无力夺回，张家山阵地失守。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八军第一〇三师等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松山滚龙坡地区发动再次攻击。官兵虽反复冲击，终被日军击退，攻击受挫，伤亡150余人。

△　缅北中国驻印军各部及美军加拉哈德团在空军39架重型轰炸机和重炮的支援下，对密支那发动全线攻击。战斗中美空军共投弹754吨，连攻三日，密支那城几乎全被炸毁。城街道路大部被毁，日军弹药库、汽油库以及停车场均被击中。

△　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荣膺英国研究院通讯研究员。

7月14日　　国民政府以老同盟会员、国会议员景耀月“抗战以来，困处北平，屡遭敌伪威胁利诱，不为所屈；且于沦陷区协助抗战工作，志节坚卓”，是日明令褒扬。

△　湖南战场第六十二军黄涛部、第七十九军王甲本部奉命向衡阳进发，是日到达衡阳外围，与日军发生战斗。16日夜，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一部进攻衡阳附近的谭子山，18日攻占两母山。20日攻占火车南站。

△　中美空军混合团以大队机群数次轰炸岳阳白螺矶和长沙北之许家洲日机场。在岳阳炸毁场内日机20余架，炸伤10余架。在空战中击落日机一架。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称："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与中共的谈判，你要诚意以政治方式求得解决"；关于中苏两国代表之谈判，我们正在慎重考虑。

△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意大利驻汪伪政府大使戴良谊签订关于《意大利交还天津租界，撤废在华治外法权及放弃驻兵权协定》及其《了解事项》和《附属议定书》。

7月15日　　孔祥熙奉蒋介石指示建议罗斯福：中国军队情况复杂，须依个人情感为维系，统率人选之威望、资格与人事关系极为重要，不是由一个外国将领发号施令即可收效的。中美合作重在政治，恐怕史迪威难孚此重望。

△　国民政府特任原驻巴西大使陈介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大使，原驻墨西哥公使程天固为驻巴西特命全权大使。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定8月1日起施行。

△　国民党中央派沈鸿烈为中央设计局东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在重庆召开，到会有吴铁城、陈立夫、莫德惠、王家桢、高惜冰等10余人。会议就准备收复东北，以及反攻期

间军队之挺进、警察人员之储备、后方青年之救济等问题进行了商讨。

△　军政部将广西学生军2000余人编为教导第八团，以武装全省学生，保卫国土。

△　缅北中国驻印军各部攻取密支那郊外各据点，日军残敌退入市区顽抗固守。将城区分为城北、城中左、城中右、城中南四个守备区。16日晚，中、美军攻击部队开始迫向市区，并形成三面包围之态势。

△　湖南战场日军从湘潭、衡山调来大量生力军，对衡阳守军第三师、预十师施行步、炮兵压制性射击，其步兵侵入江西会馆、外新街等地。经第三师、预十师联合夹击，一度收复。终因兵力薄弱，无法持久，乃将第三师左翼与预十师右翼衔接。

7月16日　滇西腾冲外围日军据点大部被攻克。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为尽快攻克腾冲，是日召开各军、师长作战会议，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以攻占腾冲城为目的，决定消灭来凤山之敌，再以全力攻略腾冲而占领之。

△　湖南战场日军以40多架飞机对衡阳萧家山高地进行俯冲轰炸，以掩护地面步兵的冲锋。下午4时，日军攻占市民医院，旋又攻占了萧家山、枫树山等据点。

△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改组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由张伯苓任理事长，常道直为总干事。

△　据中央社讯：美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发表声明，称：自太平洋战争开始至今年5月1日，美国运往中印缅战区之租借物资，共约值14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三的物资乃供给中英印军用之飞机、坦克、大炮及其他配备。

△　国际金融货币会议通过货币基金总数及派额，总数为88亿美元，由联合国及44个赞助国认缴，中国政府派额为5.5亿美元。20日，又增派额为六亿美元。

7月17日　何应钦密呈蒋介石，建议将重要战区的军队分为攻击兵团（第一线部队）和守备兵团（第二线部队），攻击兵团由每个战区拨出二至五个军组成，拨归史迪威指挥，其编制、装备与后方勤务皆由美方负担，其兵员补充及人事配备，仍由中方掌管。第十八集团军则不应列入该部队。如果美方不同意此案，亦不予迁就。至于守备兵团，仍归委员长直接指挥。

△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日本当局否认在侵华战争中使用毒气一事发表声明，予以斥责，并揭露在近月长衡会战中屡放毒气的事实。

△　湖南战场日军在其空军掩护下，两度进袭并轰炸衡阳市区西南平地据点和主阵地之岳屏山，市区东北部之防御设施均被毁。

△　交通部设滇缅公路运输局，以葛沣为局长。

△　湖南省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特在沅陵设立行署，由毛秉文兼署主任。

7月18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改组河南、湖北两省政府。免李培基河南省政府委员、主席职，任命刘茂恩为河南省政府委员、主席；免陈诚湖北省政府委员、主席职，任命王东原为湖北省政府委员、主席。免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职，任命刘季洪为西北大学校长；国立湖南大学校长李毓尧呈请辞职，准予免职，任命鲁荡平为湖南大学校长。

△　国民政府明令改陕西中部县为黄陵县。

△　奉命增援衡阳的第六十二军先头部队第一五一师通过何家桥、许家冲之线，向欧家町攻击。19日，该军第一五七师亦攻黄泥坳

，遇日军第四十师团增援，双方激战，第一五七师被迫转至黄泥坳以南地区。

△　湖南战场日军复以最大火力向衡阳郊区发起攻势，第十军守军官兵被围，乃抱定必死之决心，与敌肉搏。至晚，日军彻夜向易赖庙、杨林庙、接龙山及五桂岭猛扑，至次日晨，守军予敌以重创。

△　滇西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再次发动攻击，重点保持在第五十师方面，步兵在强大空军、炮兵火力的支援下，逐步进攻。同时，迫击炮亦参加炮兵支援射击，日军阵地顿成一片火海，各攻击师步兵随炮兵延伸射击，逐巷、逐屋进攻。

△　中国空军及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河南新乡西南忠义亢村日军油库，适遇日机六架，双方空战，日机被击落二架。

△　日本陆军省宣布：免东条英机兼陆军参谋长职；由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继任。任命山田乙三为陆军航空教育总督兼陆军航空司令部司令，任命杉山元为陆军教育总监。

△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向日天皇提交总辞呈。20日，日天皇召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和前首相米内光政合作组织新阁。

7月19日　周恩来就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情况致电董必武：经过月余的参观、谈话，中国记者“一致承认我党组织力强，与人民打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

△　国民政府公布《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条例》，凡六条。

△　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宣布：中国被推选为世界建设及开发银行12董事之一。

7月20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寄峤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

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张雪中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祖舜为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鲁应禄为第三十三军副军长，阙汉骞为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素农为第九十七军军长。撤销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务。

△　湖南战场增援衡阳之第六十二军进抵火车西站，日军集中主力向该军猛攻。22日，第六十二军因受优势日军的反击，且粮弹告竭，乃将主力南移至硫子坑、盘古岭、侍郎铺附近整顿。

△　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向诸城、临沂地区发动攻势，攻克伪军刘家旺、太和、口头等据点，守敌全歼。22日继向王坟、劳凹、张庄等据点进攻，俘伪军214人。

△　胶东平度、胶县日军及伪治安军第二十二团王铁汉部南犯，八路军一部对敌展开出击，战至8月1日，连克兰底、外刃家等日伪军据点，毙伤伪军500余人，俘伪副大队长以下400余人。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特任陈恩普为司法行政部部长，钟洪声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乔万选为特别法庭庭长。

7月中旬　蒋介石接受何应钦建议，决定如下方案：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史迪威应秉承蒋介石的命令，负指挥中国战区前线各军作战之全责；凡中国战区列入战斗序列的前线各部队，皆归史迪威指挥；前线部队的作战地区及战斗序列另定。前线部队的所有军需，凡中国国内所缺乏者，概由《租借法案》内供应，此等租借物品的支配，全按中国政府命令行之；中国战区内（包括东北、台、澎等地）各级地方行政与人事概由中国政府管理；中国军队的人事行政应按中国法规及行政系统处理。

7月21日　蒋介石在黄山整军会议上发表训示，指出目前军队中的通病为：军事主管思想落伍，精神涣散，不求长进；高级主官不讲气节廉耻；军事机关弊端丛生；军队荣誉丧失殆尽；兵役办理不良

等。勉励与会人员人人负责知耻，尽职服务，务使军事机关与部队朝气蓬勃，面目一新。

△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声明，驳斥日本中国派遣军否认在华使用毒气的谎言，指出：数年来日军在敌后战场使用毒气，据不完全统计，不下10次之多。

△　东江纵队五少年英雄黄友（班长）、李查礼（副班长）、傅天聪、尹开、赖志强在广九路平湖地区阻击日军藤本大队400余人，掩护主力转移，光荣殉国。

△　桐柏山南麓四十里冲农民7000余在王川等组织下，反对第五战区军队抓丁拉夫，摊派粮款，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主任副官何堃被处死。

△　八路军山东军区一部及清东独立团等将伪灭共建国军王道部驻区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的11个据点包围。王部1600余人起义，广饶伪军一个中队也同时反正。王部起义后，被改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

△　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拟定《乡村建设大纲》，选定江宁、昆山、当涂、嘉兴、南汇五县为实验县，并成立乡村建设实施委员会，由陈君慧任秘书长。

7月22日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电令衡阳外围援军，应集中全力，先突破衡永公路附近之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敌人阵地，再图扩张战果。并令空军应集中力量轰炸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之敌阵地，期发挥陆、炮、空协同战斗之全力，得突破之迅速成功。

△　湖南战场日军停止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总攻后，开始将主攻目标转向增援衡阳的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是日攻占第六十二军阵地

雨母山；前线指挥所亦受到日军炮火袭击。23日，双方在火车南站激战，第六十二军军部被袭击，军长黄涛命所部撤出南站。

△　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派遣的第一批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成员抵达延安。观察组组长为包瑞德，成员有谢伟思、戴维斯等。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出国护照条例》、《国产烟酒类税条例》。

△　冯玉祥发动的节约献金大会在四川自贡市蜀光中学举行，参加群众3.5万人，献金1.3亿元，金戒指130个，金镯八只，布鞋一万双。其中个人献金最多者为王德谦，达1500万元。

△　日本新内阁组成。首相小矶国昭，海相米内光政，陆相杉山元，外相兼大东亚大臣重光葵，藏相石渡庄太郎。下午，全体阁员谒日天皇。同日，小矶向全国发表声明，宣称将努力使政府和大本营团结一致，并以坚决的意志加强国策的执行，借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并称将加强和德国的关系，追求共同的目标。

△　汪伪政府为日本小矶内阁组成发表声明，称：小矶内阁的成立，“必将有更强力之新姿态出现，以适应此新局面。我国民政府对此，当仍本过去同盟道义之精神，集中人力物力，共同向击灭英美之途迈进”。

7月23日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出史迪威自缅甸调回重庆担任新职务之前的三个条件：一、中国共产党不得处于史迪威权力之下，一直要到他们同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时才能这样办；二、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义和对大元帅的关系；三、《租借法案》安排之下的一切军事供应物资的分配和处理，完全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

△　林伯渠致函张治中、王世杰，询其对中共6月4日所提12项意见是否已请示答复，并邀请他们到延安商谈。

△　湖南战场第六十二军从衡阳火车南站撤走后，军事委员会是日再令该军及第七十九军速解衡阳之围，并指示“第六十二军应以一部监视衡阳以南之敌，集中步、炮主力向虎形巢及其东南之敌阵地突击”；“第七十九军应集中兵力由贾里渡方面向汽车西站以西之敌阵地突击，以收突击之效”。

△　缅北中国驻印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一部于密支那市区以南强渡伊洛瓦底江，切断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以阻止日军增援。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出动飞机21架，第一大队出动飞机六架，轰炸日军仓库和岳阳羊楼司车站，返航至岳阳洞庭湖上空，先后与日机约40架遭遇，空战中击落日机10架。

△　八路军太行军区六分区部队邢（台）沙（河）攻势作战结束，历时七天，攻克德旺、范下曹等敌据点12处，摧毁敌邢、沙第二道封锁线。

△　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部队向盘踞在诸城、胶县、日照三县边缘地区的伪军李永平部发起进攻战役，战至8月4日，攻克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680余人。

△　是日至月底，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对桐柏山农民暴动进行镇压，第二十八师在该地大肆屠杀民众。仅天河口一带，凡在10岁以上的男女均未幸免，被杀害者达5000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

△　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闭幕，与会44国代表团团长和丹麦观察员在最后决议书上签字，并通过《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章程纲要》。

7月2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民国三十四年党务方

针》，要点为：一、发扬革命精神，集中党的力量，贯彻三民主义；二、加强战地党务，巩固敌后政权；三、加强基层组织，扩大民众组训；四、充实海外党务，辅导侨民事业。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派方治为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沣岭为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王东原调任鄂政，遗缺由陈仪继任。同日，国民党中央特派段锡朋为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　国民政府派陈大齐为民国三十三年第二次高等考试再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陈立夫、程天放、叶秀峰等为委员。

△　邹韬奋因病在上海逝世。9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邹韬奋家属，对邹韬奋一生的事业予以热烈赞扬，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中国空军数度出击衡阳，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在西北之小高地及太子码头附近炸毁日军工事多处。

△　中美空军混合团出击岳阳白螺矶日军机场，炸毁场内日机30余架及场外油库四处。

7月25日　林伯渠和张治中、王世杰会谈，张、王对中共之12项意见作了口头答复，并告林伯渠，中央提出的《提示案》即系中央的具体意见，要求中共中央对《提示案》作出具体答复。

△　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四路进军河南敌后，发展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具体行动为：从太行、太岳抽调精干部队进入豫西；以冀、鲁水东区部队作策应，以新四军第五师一部从平汉路北上配合行动。从华中抽调新四军第四师一部西进豫皖苏边，首先恢复萧（县）永（城）夏（邑）宿（县）根据地，然后打通与睢杞太地区之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

△　国民政府特派潘公展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进迫龙陵市区。时日军千余自芒市经象达东南地区入平戛，会该地日军向西北出击。第七十一军侧背受敌，第二军增援向日军夹击。出击之日军退回芒市。

△　外交部宣布：中国与捷克斯拉夫（今译捷克斯洛伐克）使节升格为大使。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领队谢保樵、副领队邓友德及本国记者九人、外国记者一人返抵重庆。

△　据中央社讯：赈济委员会积极救济湘省灾民，呈准行政院增拨1000万元，并饬所属妥善救济难民。

7月26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国共谈判已谈了三个月，“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了”。又称：国共关系“极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说的话相反”。

△　毛泽东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晚宴。席间，毛同坐在身旁的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并说他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　蒋介石致电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嘉勉所部坚守衡阳。

△　缅北中国驻印军第五十师逼近密支那市中心，第八十九团一部向日军阵地实施猛攻，激战至晚，与第八十八团一部会合于密支那公路与铁路交汇点。同日，新编第三十九师第九十团亦空运至密支

那，第一四九团抵达城郊，并部分投入战斗。

△　中国空军重轰炸机30架、轻轰炸机18架对滇西来凤山等日军据守地进行轰炸。炮兵以一天5000发炮弹的数量向来凤山射击。战至15时，将营盘坡完全占领。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有记者询问日本新闻是否向中国试探和平。张平群答称：据吾人所知，并无此试探。我政府素视与日寇商谈和平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无得，且遭反噬。

△　前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博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　汪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兼任教育总署督办。

7月27日　周恩来同谢伟思在延安会谈。在谈到国共谈判时，周说：国民党是利用谈判来捞宣传上的好处，主要是为做给美国舆论看；国民党希望战争结束时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它会继续不断地衰落。另外，周还就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的战略，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等问题同谢伟思交换意见。

△　孔祥熙在纽约美国工商界欢宴会发表演说，欢迎美国与中国经济合作，称：中国不仅有一良好的市场，且为维持远东和平之必要条件。

△　军事委员会调第四十六军、第七十四军投入增援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的战斗。战至8月2日，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占领衡阳西之鸡窝山，第四十六军攻占雨母山。

△　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兼任第四军军长。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电令衡阳前线部队：衡阳周围之敌，久

战疲惫，我应趁后续部队之到达，先将鸡笼街之敌歼灭，继续增援前线，击破衡阳以西地区敌人，以贯彻打开敌围，与第十军会合之目的。

△　滇西腾冲城内日军200余人深夜冒雨由文笔坡地区向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所部发起突袭。经预二师猛烈回击，日军放弃来凤山高地，向腾冲城内逃窜，来凤山终被攻占。

△　日军为死守密支那城，将缅北八莫之第一一四联队第一、三大队2000余人及汽车200余辆运密支那增援。同日，英军一个营开进密支那机场。

7月28日　蒋介石主持黄山整军会议，称这是国家和军队起死回生的一次会议，指示调整部队、确定补给制度、整饬风纪、改善新兵待遇及接送征补办法。勉励打破畏难却顾心理，养成任劳任怨精神，以自力更生的决心，改造军队，充实力量，完成此次会议使命。8月18日，蒋在黄山整军会议上再次指示调整机构、部队及整军的重点，在于分别裁撤业务重复与充实重要而人力不足的单位，并注意被裁减人员的安置。9月6日，蒋在黄山整军会议上再作指示，提出了反攻时如何注意组织地下部队为国军应援，与利用伪军的问题。

△　国民政府公布《外国人在华充任律师办法》，规定：外国人经许可在中国充任律师者，应遵守中国关于律师之一切法令。

△　中美空军混合团驱轰联合大队出击岳阳白螺矶日军机场，击毁地面日机34架，日军飞行员等100余人被炸死。

△　湖南战场日军对衡阳赖庙前街、西禅寺、五显亭、岳屏山等发动进攻。至次日，敌占西禅寺、五显亭、岳屏山，炮、空联合炸射，第三师阵地大部被摧毁，官兵死伤较重。

7月2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兴中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在中美空军掩护下，缅北中国驻印军各部再次发动攻势，其右翼第一四九团攻入密支那火车站；第一九〇团占领市区第五条马路；左翼第八十九团在重炮掩护下进至新街市。

△　美机70余架轰炸大连、鞍山，昭和制钢所炼焦炉和高炉附属设施被破坏。31日，美机又轰炸鞍山、抚顺、本溪。

△　据中央社讯：日军进犯长沙时肆意行虐，凡70岁以下妇女多被奸淫。将该战区之男女分组捆缚手足，五人相连，强其修筑公路，并不与饮食，任其自毙，稍有拂逆，即被绞杀。

7月30日　衡阳守军血战月余，蒋介石命令空投食品。

△　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电令增援衡阳各军，全力攻击日军。

△　缅北中国驻印军第一五〇团通过密支那城区第六条马路；第一四九团全部攻克火车站。至此，密支那市区大部为驻印军占领。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在湖西地区对苏北挺进军发起反击作战。至8月17日，将其四个纵队大部歼灭。

7月31日　军事委员会致电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省政府主席，告以张治中、王世杰与中共代表谈判的情形，并宣称："凡中共方面意见，中央政府所能容纳者，该提示案已尽量予以容纳，希望中共能接受提示案，并提出确切之答复。"

△　国民政府授予何键一等云麾勋章。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攻克山东莘县县城。8月1日，又攻克该县西吴家、燕店等日伪军据点，伪军400余人向八路军一部投诚。

△　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位于山

东附近的日伪军重要据点西团，全歼守敌。

△　陈纳德率美第十四航空队机群一队轰炸岳阳白螺矶日机场，毁地面日机18架。

△　日机10余批分头袭击广西柳州、梧州、平南等地，在平南投弹两次。

7月下旬　　蒋介石电告孔祥熙并转罗斯福：史迪威在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中难孚重望，故特须谨慎从事，周到准备，操之过急恐致意外之失败；史迪威要指挥作战，必须明确其职权与范围，并尊重统帅，租借物资须交由统帅支配，否则中国军民对史迪威的误会与反感必将与日俱增；中国经济困难，官兵给养必须保证，共产党的军队不可交由史迪威指挥。

△　活动在平绥线张家口附近的平西八路军，救出1941年5月晋南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军俘虏去作苦工的政府官员33人，送到晋察冀军区。

△　豫南数万农民反抗第五战区第二十八师对民众的血腥镇压，将该师全部缴械，杀死师长，组成豫南农民救国军，活动于回望山、吴家大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

是月　　行政院设立战区失学失业青年招训委员会，陈立夫兼任主任委员，钱大钧、顾毓琇任副主任委员。

△　教育部决定：河南大学文、理、医三院迁往陕西城固，与西北大学联合办理。广西大学由桂林迁往融县。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设立青年奖学金，旨在“鼓励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进德修业”，每期2000元，学生500名。

△　北岳区八路军攻克易县、徐水、蔚县等县城。

△　日军在平、津各大学逮捕男女青年及教授达6000余。北平辅仁大学工商学院中外籍教师大部分被捕。

8月

8月1日　　蒋介石就征收民国三十三年田赋指示如下方针：财政、粮食两部按照各省赋额，核定军、公、民粮，复实配定；征购改为征借，不发券款，不计利息；注重征借大户，以期负担公开；各省除征实、征借外，不得私立名目；因灾减免应据报灾情。

△　交通部两南进口物资督运委员会在贵阳成立，是为中美增强运输合作、军事与交通密切联系，便利迅速运输进口作战物资的强力督运机构。

△　湖南战场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致电蒋介石，告之该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并申述该军面临之困难一为无医药治疗，二为官兵伤亡惨重，弹药缺乏，空投补给有限。

△　湖南战场日军集中炮火攻击衡阳杏花村141高地与西禅寺，战至2日拂晓，141高地守军第三师第二营第五连全连官兵壮烈殉国。入夜，敌又攻西禅寺，三次突入，第三师第三营营长赵寿山发起逆袭三次，卒将突入之敌悉数歼灭。

△　缅北密支那残敌开始渡江向伊洛瓦底江东岸逃窜，其指挥官水上源藏自戮身亡。

△　缅北中国远征军一部攻占密支那市区第七条横马路、十字路口、日军营房修械所等。

△　美总统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中将为上将。2日，蒋介石致电祝贺史迪威。

△　孔祥熙在纽约接见记者，宣称：中国乃美国投资与扩充市场之理想处所，中国对美人投资公私企业均有保障。

8月2日　　国民政府特派朱家骅为民国三十三年第二次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史尚宽、顾毓琇、钱天鹤等为委员，陈大齐为试务处处长。派郭有守、欧元怀、徐箴、王友直为成都、贵阳、福州、西安办事处处长。

△　国民政府派胡世泽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出席代表。

△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美驻华军事代表派员赴延安观察一事时称：该团系分赴我国各地，不仅延安一处，其任务为：一、促进陆、空部队之联系，探采有关情报；二、搜集气象资料。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及空军对腾冲城发动攻击。经两日激战，攻占城垣及城外堡垒七个。日军猛烈反扑，并施放毒气，攻击部队伤亡较重，攻击失利。

△　缅北中国驻印军第五十师为攻克密支那城北日军据点，组成104人参加的“敢死队”，在当地爱国华侨的引导下，接近市区日军最后坚守的两条马路，并破坏了日军全部通讯设施。3日，炸毁大部日军工事，日军仓皇后撤，跳入伊洛瓦底江逃命。

△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经多日准备后，于是日偕同僚自长沙飞抵衡阳，亲自指挥第六十八、一一六、四十、五十八、十三等师团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总攻击。

△　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致函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在正太路营救美国飞行员表示谢意。

8月3日　　蒋介石电示在美的孔祥熙，从速解决中美币值交

涉，“如能于法币百元至百廿元之间换得美币一元亦可”。

△　国民政府授予陆军第四十七军、第五十七师荣誉旗，晋给孙连仲一等云麾勋章、薛岳一等宝鼎勋章；给予郭忏青天白日勋章；晋给王敬久、周碞二等云麾勋章，冯治安、王耀武二等宝鼎勋章。

△　缅北中国驻印军各部向密支那发动最后攻击。第十四师副师长率部先后攻占宛貌、息东。自北向南进攻的美军亦进至西大坡。日军残部数百人于4日渡伊洛瓦底江逃至江东岸丛林，在马杨高地集结，后逃往八莫。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八军第一〇三师攻击松山滚龙坡。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一部从腾冲城西南角突入城内，并利用烟幕、云梯攀登城墙，攻击敌人。

△　八路军冀中第九军分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第二次收复肃宁县城，俘伪军600余人。

△　八路军一部攻克河北雄县城。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以三个团、五个县大队的兵力在北线担任主攻任务，以一个团、二个县大队的兵力在南线阻援，向山东郓城至鄄城间日伪军封锁线上各据点发起进攻，历时七天，共攻克据点36处，歼灭伪军近3000人。

△　湖南战场第六十二军被日军阻止于衡阳洪山庙附近，第四十六军先头部队被阻于雨母山附近。同日，日军又向天马山、西禅寺、苏仙井、杏花村附近高地进攻，守军牺牲甚众，西门和北门相继失守。

△　湖南战场日机六架乘夜对衡阳中心和南侧地区实行轰炸。4日拂晓又轰炸岳屏山高地中心据点，飞行第四十四战队轰炸城西北及南

侧高地。

8月4日　　军事委员会公布：在历时两个半月的雨季丛林战斗中，中国军队将攻克密支那，中印交通即可打通，已歼日军3000人。并称：本年内缅北战场已消灭日军四个师团，计五万人。

△　湖南战场日军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总攻击。清晨，日军五个师团附各种火炮100多门，炮弹四万余发，在横山勇统率下，向衡阳西南阵地发动进攻。守军第十军因大炮多已埋藏，无法对日军进行还击，任凭日军狂轰滥炸。至黄昏，预十师伤亡将尽，防守第一线的任务由第三师接替。第三师第八团在五桂岭北部，第九团在天马山附近，第七团在杨家庙附近，预十师余部在岳屏山附近阵地与日军搏杀。

△　日本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关于设立最高战争领导会议案》，规定最高战争领导会议的方针为“负责策划决定领导战争的根本方针，配合调整政略和战略”。其成员由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组成。在审议重要案件时得奏请天皇亲临会议。

8月5日　　王世杰与董必武、林伯渠谈话，问双方谈判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如派人到延安是否有把握解决问题？林、董回答根本问题在于实现民主和军队数目与驻地问题，欢迎他们去延安。王说，双方互对对方提案提出答案，然后同林到延安，再约周恩来同时出来会谈。

△　缅北密支那克复。中国驻印军第一五〇团攻占密支那市中心，并与西大坡方面进军的美军第五三〇七支队会师。新编第三十师、第十四师各部均攻占指定目标。至此，密支那城区攻坚战结束。

△　史迪威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一年来在缅境击毙之日军相当于四师团之众。

△　美军B—25型飞机终日轮番轰炸滇西腾冲城垣，13处被炸塌。6日，美机32架又轰炸腾冲。

△　湖南战场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军指挥所召集紧急会议，所部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以无可抽调之兵，弹药亦将告罄主张突围。唯方先觉因伤患6000余难以随军行动，挥泪宣布继续死守衡阳。

△　湖南战场日军继续以强大火力向衡阳城区攻击，守军第十军阵地几被全毁，遂转至天马山、五桂岭、岳屏山一带，伤亡较大。至晚，日军攻占第十军第二线主阵地大部分，守军士兵仍顽强拼杀，终于阻止日军的深入。

△　山东郓城八路军一部及地方武装向伪军刘本力部发动进攻。战至11日，解放村镇600余，摧毁敌据点37处，平毁日伪军封锁大堤200余里，毙伤伪大队长以下官兵300余名，俘虏2300余名。

△　孔祥熙访问罗斯福，商谈中国战局及国共谈判问题。

8月6日　　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指出："（一）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九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二）国民党将阎锡山与外记者所谈诬蔑我党的全部谬论在西安报上发表，我们决定日内将叶剑英六月二十二日与记者团谈话登报并广播，同时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

△　湖南战场日军由衡阳演子坪向城区突进，旋向第十军军部前进，形势危急。军长方先觉与所部师长致电蒋介石，称："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　湖南战场衡阳城北蒸水南岸第一九〇师演武坪阵地被日军攻

破，守军全亡。师长容有略请方先觉派特务营反攻，又中日军埋伏，伤亡过半，反攻失败。日军继续向市中心突进。当日上午，日军发起全面攻击，守军阵地多夷为平地，战斗兵员所剩无几。同日，第三师第八团一部在市民医院阵地与敌拼杀，敌第五十七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被炸死。

△　缅北中国驻印军第八十九团奉命渡伊洛瓦底江向卡卒追击日军；第四十二团及第四十一团一个营攻克畹貌、满那后，于11日返回密支那。

△　蒋介石致电史迪威和蒙巴顿，对其率部克复缅北密支那表示祝贺。

△　重庆《大公报》载：河北省历受寇、旱、蝗、水之灾，人民流离，中央特拨款300万元作救济之用。

8月7日　　湖南战场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令所部炮兵部队的所有野战重炮、加农炮、榴弹炮向衡阳城区轰击，全城火光四起，建筑物全毁。日军从小西门等突破口不断涌入市区，巷战至烈。傍晚，日军再次发起总攻，第十军军部指挥所国旗举目可见，守军仍在各地与敌进行拉锯战。

△　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一行18人抵达延安。

8月8日　　蒋介石电示在美的孔祥熙，成都机场经费即照美方所提在1.25亿美元之内方案从速处理。

△　衡阳陷落，长衡会战结束。日军于黎明前分向衡阳市中心突进。迨4时，第十军军部指挥所、中央银行周围枪声逼近。清晨，日军攻占第十军军部指挥所，军长方先觉率军参谋长孙鸣玉和四位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会见日军师团长，日方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方先觉表示答应。后方先觉逃出，4个月后辗转到重

庆。衡阳战役中第十军守军苦守47天，伤亡共1.5万余人，其中阵亡7600余人；日方死伤1.938万余人。

△　国民政府任命顾毓琇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原任校长朱经农改任为教育部政务次长。

△　据中央社讯：晋东南各县灾情严重，人口锐减。晋城县原有人口36万，现不足13万。长治、屯留县十室九空，民众无米无炊，牲畜、野草均被食尽；饿毙妇女婴儿，随处皆是。

8月9日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郑洞国在重庆发表演说，报告中美联军在缅北作战状况，并称收复密支那的原因有四：一、主动进攻；二、运动迂回的战略；三、官兵士气旺盛；四、盟军配合作战。

△　八路军一部对山东菏泽、定县、曹县边日军封锁线发动攻势，战至11日，攻克据点七处，碉堡12个，俘伪中队长以下160余人，光复国土700平方公里。

△　军事委员会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在豫中会战中指挥失利，予以撤职。

8月10日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函称：“从5月3日在西安晤面起，已逾三月；自6月5日弟等以中央政府提示案面交先生，为时已二月有余，迄今尚未得到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此等情形超出弟等意料之外。政府在提出提示案以前，特命弟等赶赴西安与先生晤谈至两周之久，借以充分洞悉中共方面之意见，用意已见慎重。政府提示案之内容，不但对于去岁中共代表林彪师长所请求，基本范围已全部容纳，即对先生最近在西安所表示意见，亦已大部容纳。这是事实，只须将有关文件略予比较、分析，即可知。然立意政治解决既为中共所表示赞同，团结与统一又为中共所宣言拥护，弟等今兹实不能不敢请先生向中共主持诸公，剀切敷陈，促其接

受政府提示案，并速予答复。至6月5日先生交来中共方面十二条意见，弟等于6月15日业就政府指示及弟等观感，以书面送达左右，兹因先生一再敦促弟等为更详尽之答复，因将政府意见再为先生详谈。”关于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与地方自治问题，函称：“对于此类问题，政府提案中业已剀切申示两点，即在抗战期内厉行中共暨一切党派所已接受之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关于军队编制数额，军队驻地，医饷军械问题，函称：“十八集团军过去规定编制，原为4.5万人，政府提示案允许编为四军10师，确属从宽核定。带兵官自行扩编军队，其事原不可为训，且政府正厉行精兵政策，一般军队，均在裁减单位，于此时期独允许十八集团军扩编为四军10师，自属委曲求全之至。并于军队驻地，政府亦正考虑至再，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则，一面规定在未集中使用前，受所在地战区司令长官之整训指挥，原则与事件实情兼顾。……至于军饷，提示案业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享有与一般国军相同之待遇。”关于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问题，函称：“陕北边区问题，政府愿予考虑，并已于提示案中提出十分宽大之办法，借以容纳中共之意见；至其他任何地区之行政机构，自当依照提示案之指示，由各该地省政府接纳，以免分歧而杜流弊。”

△　国民政府令改湖北宜城县为自忠县，以纪念故陆军上将张自忠将军。

△　中美空军混合团袭击日军太原机场，毁飞机25架。

△　黄炎培致函陈布雷、邵力子，为萨空了被羁兴隆场战时青年训导团事，请蒋介石特准恢复其自由。

△　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在上海对记者谈话时称：小矶内阁对华政策不变，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方面与中国协力迈进。今后惟有根据既定方针，逐步求其实现。

△　罗斯福致函蒋介石，提出派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中国，以调整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派纳尔逊偕赫尔利到中国，以处理租借与其他经济事务。

8月上旬　军事委员会为准备桂柳作战，调第九十三军陈牧农部自四川綦江至湘桂路方面，即以警戒部队推进至湘、桂边境之黄沙河，主力布防于湘、桂要冲之全县周围，占领防御阵地。

8月11日　国民政府令改福建省闽侯县为林森县，以纪念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　国民政府授予何应钦一等景星勋章；授予程泽润二等景星勋章。

△　调查抗战损失委员会召开会议，由翁文灏主持。会议决议：将抗战时期分为两个阶段调查，即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一日，自七七事变至抗战结束。调查区域分沦陷区、战区及后方。必要时派员分赴指定地点，实际督导各级政府调查损失。

△　周佛海自名古屋抵东京，与日本外相重光葵会谈，讨论对国民党诱降及实现全面和平问题。

8月12日　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指出：国共谈判迄今还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固执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只有国民党“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周恩来还指出，国内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要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

△　国民政府派顾维钧、魏道明、商震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出席代表，派毛邦初、刘田甫为专门委员。

△　蒋介石复罗斯福10日电，称：赫尔利与纳尔逊“两君才誉卓越，余甚为欢迎”。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为尽快击破腾冲守敌，乃重新调整部署，加强了炮兵火力。入夜，日军向第三十六师登城部队反扑五次，均被击退。

△　日机10余架三批袭陕，其九架在西安上空投弹，二架在南郑上空投弹。

△　周佛海分别拜访日首相小矶国昭、海相米内光政、陆相杉山元、藏相石渡庄太郎、军令部长及川古志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分别讨论对国民党诱降及汪精卫死后人事安排问题。

8月13日　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在中枢纪念周报告施行《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法》要旨：一、事前防范；二、事后结束；三、临时救济；四、行政监督。

△　军事委员会任命胡琏为第十八军军长，罗广文为第八十七军军长。

△　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代表在重庆举行各党派临时会议，就各党派国民参政员应取得密切联系，采取一致行动，增加民主同盟力量诸问题进行讨论，一致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切实实行民主。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莲花县城。

△　意大利向汪伪政府交还天津租界，是日履行交接手续。16日，褚民谊主持交接仪式。

8月14日　　蒋介石电示在美的孔祥熙，史迪威的名称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职权则以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负指挥本战区前线各军的全责。至于战区内地方行政权，仍以由中国政府直接管理为要。

△　是日为空军节。国民政府授勋空军将士：授予周至柔、张廷孟、王叔铭、毛邦初、高又新青天白日勋章。

△　重庆市各界举行空军节庆祝大会暨国民兵团第三届献机典礼，到会2000余人，市长贺耀组致词。献机50架。

△　连绵淫雨过后，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对龙陵日军再次发起攻击。在炮火和空军的支援下，第七十一军左翼队新二十八师攻占老东坡。旋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新二十八师攻击受阻。18日，在第八十八师一部增援下，终将老东坡攻占。

△　美机24架联合机群轰炸滇西腾冲城中东门日军守备队本部，步兵第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被炸死。

8月15日　　八路军山东鲁中军区以四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下，发起沂水战役。以两个团进攻由伪军驻守的沂水城，以一个团进攻由日军驻守的南关。攻城部队从四面突入城内，至16日全歼守城伪军1000余人。与此同时，攻击南关的部队攻破日军围寨，全歼守敌，毙31人，俘20人。此役使鲁中、滨海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　山东八路军一部攻克利津县张许伪军据点，俘伪营长以下400余名。17日，克复利津县城，毙、伤、俘日伪军团长以下1600余名。

△　彭雪枫率所部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五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由淮北地区向豫皖苏边进军。

8月16日　　国民政府决定有权逮捕人犯及协助逮捕机关：（甲）

军事机关：（一）有权逮捕机关；军法执行总监部、战区司令长官部、卫戍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戒严司令部。（二）协助逮捕机关：宪兵司令部、警察机关。（乙）司法机关：（一）有权逮捕机关：最高法院临察署、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县司法处、兼理司法之县政府等。（二）协助逮捕机关：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

△　参谋总长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南洋侨胞奋起抗日，并准备参加战后一切复兴工作。

△　国民参政员、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元鼎在故里陕西蒲城病逝。

△　日军在河南周口县南寨决开沙河砖堤，河水泛滥，周口、商水、沈丘尽成泽国，淹死、失踪200余人，二万多人无家可归。

8月17日　国民政府明令派顾维钧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首席代表，派朱世明、张忠绂、宋子良、刘锴、李干等为专门委员。

△　孔祥熙电呈蒋介石，报告与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晤谈经过，强调了要维持世界和平，美国必须有力扶助中国，始克达此目标。

△　新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对《大公报》记者申述其办学宗旨：一为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二为改善研究人员的待遇，校政以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学术成就。

△　日机七架分批窜扰闽西南各地，其中五架向建瓯郊外投弹20枚。

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规定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策。说明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对新中国有

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是我们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和外交工作的开始。提出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　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林伯渠，指出："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小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们可副署，但不单独提案，表示在政治解决未达到目的前，一切提案都无从说起。"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何应钦、俞鸿钧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　河南杞县、睢县八路军一部及地方游击部队摧毁日伪军据点九座，击溃增援敌军300余名，俘伪中队长以下148名。

△　苏北解放区军民集会追悼邹韬奋，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代政治委员饶漱石致词，称邹韬奋"是坚持进步的模范"。邹韬奋生前好友范长江、钱俊瑞、于毅夫等作了讲演。

△　罗斯福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决定派赫尔利少将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中国。罗斯福是日在白宫与赫尔利谈话，讨论派赫尔利到中国的事宜，罗斯福交予赫尔利书面"训令"，指出赫尔利到中国的任务是：一、担任总统派往蒋委员长的私人代表；二、增进蒋与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并使后者对其所辖的中国军队便于指挥；三、另负若干关于军事补给方面的责任；四、与高思大使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日，罗又在白宫召见纳尔逊，向他下达了赴华的重要使命。并将决定派纳尔逊作为自己私人代表同赫尔利一起赴华的消息正式电告蒋介石。

△　伪湖北省省长、伪武汉绥靖主任杨揆一和伪江西省省长、伪九江绥靖主任高冠吾，与武汉日本最高指挥官佐野忠义签订《关于武汉地区治安肃正之现地协定》及《附属了解事项》。

△　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决定，将西安市政处改组成立西安市政

府，任命陆翰芹为首任市长。

8月19日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变更作战部署，集中兵力于城南方面，突破腾冲城垣。20日，该军各师先后突入城街市区，终日巷战，城南日军大部被歼，53名日军向远征军投降。

△　八路军胶东军区发起大规模秋季攻势，历时五周。24日夜，连克大泽山周围日伪军据点。30日，解放文登县城。9月3日，荣成伪军600余人反正，并解放该城。9月8日至23日，八路军向烟（台）青（岛）路出击，攻克敌伪据点多处。此役共歼敌5000余人，解放国土5000余平方公里，胶东解放区四个分区连成一片。

△　日军轮船一艘，帆船400只，满载抢劫物资自湘江北运，行至岳阳，被美机全部炸毁。

△　续范亭撰《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表示："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阎锡山，是因为他背叛了三民主义，并无私人的恩怨。"

△　日本御前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决定《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要旨为：全力发挥日军战斗力，与美国决战，避免日、苏战争，离间美、英、苏、华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一面重视日本和汪精卫政权及"满洲国"合力开发资源，"促进贯通日、满、华地区和南方地区的自给自足，独自作战的阵势"；一面对重庆"迅速发动有计划的政治工作"，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促进蒋、汪合作，"设法解决中国问题"。

△　罗斯福致函蒋介石，指出派赫尔利到中国的任务是，"调整作为军队总司令的你（你当然是整个地区的总司令）所领导下的整个军事局势，协助解决你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一切问题"。

8月20日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攻占龙陵城区文昌宫、余家寺、桅杆坡、钟山、张家寨等日军据点。日军困守西山坡、黄土坡、伏龙寺等处待援。

△　八路军冀中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一部在肃宁县游击队配合下，在河（间）肃（宁）公路上的白家村、张庄、大史庄伏击向河南赴肃宁之日军，毙、伤、俘日伪军200余人。

△　新四军一部及地方武装攻克江苏盱眙县城。

△　日军5000余人、伪军6000余人由济南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统率，对山东滨海地区进行“扫荡”。到31日，滨海地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攻克日伪军据点25处。

8月21日　滇西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再次发动总攻击。中美空军出动飞机达100多架次，投弹多达1.5万枚。第五十四军围城部队全力扫荡城上日军，并向城内发起攻击。22日，中国空军出动飞机60架，分五批轮番轰炸日军据点。

△　财政部专卖事业管理局成立，刘鸿生任局长，陈公亮任副局长，下设营业、财务、总务、会计四处及技术、人事两室。

△　八路军一部攻克河北枣强县城，摧毁日军碉堡10余座，解决伪新民社、工作社、合作社等，俘伪组织人员300余名。

△　苏、美、英三国代表为组织国际和平机构，在华盛顿巴敦橡树园举行会议。29日，三国代表发表联合宣言。

8月22日　毛泽东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对他们16日来电提出的在国共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词问题答复如下：“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

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中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　蒋介石以中印缅战区美国空运大队维持中国之供应线，并与中国部队配合作战，深为嘉许，特授予奖状。

△　中美空军混合第三大队出动飞机八架在湖北嘉鱼江面上空袭击日船，旋遇日机12架攻击，双方空战15分钟，日机被击落二架。

△　台湾总督府召开警备、防务会议，宣布台湾全岛进入战争状态。

△　罗斯福正式宣布派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赴华，协助国民政府工作。纳尔逊访史汀生时称：此行的使命“含有研究中国复兴”之重要一项。

△　美国官方宣布：截至本年6月30日，美国运往中国之租借物资总值为1.5亿美元；运往各国者总值为282亿美元；英联合王国所获物资总值93.2亿美元。

8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谢伟思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谢伟思告诉毛泽东，美国政府训令高斯大使，要其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他问毛泽东的意见当如何实现。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说来，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毛泽东表示：国民党必须改造自己和改组他的政府。目前的方法是，国民党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

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周恩来阐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惟一办法是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　粮食部颁发《粮食征借大纲》：一、征借划分计算，合并办理；二、征实标准，由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查考上年度情形切实改进，订定计算之公平标准；三、借粮标准，仍按田赋银额计算。

△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训导问题研讨会，教育部长陈立夫任主席。会议议题包括生活管理、清洁卫生、劳动服务、学生组织、训导处与导师的联系、学校训导与家庭社会的联系等。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敦促蒋尽快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并称：如再延误，对扭转中国战局、对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来说，都是悲剧性的军事灾难，甚或已为时过晚。罗还建议用一个新的安排以处理《租借法案》事务，免除史迪威的负担。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继续向腾冲城区攻击。日军利用街巷堡垒，处处设防，致远征军在争夺战中伤亡异常严重，各部每日伤亡均在400至500名以上。24日，远征军一部攻占腾冲西门。

△　新四军第十六旅发动苏南长兴战斗，战至次日，歼伪军一个营部及两个连，俘一个连。25日攻入长兴县城，守敌退至吴兴。26日，敌大举增援，重占长兴。

△　日军偷袭河北肃宁县丰乐堡，烧死、杀死、打死村民87人，其中妇女和10岁以下孩子约80人（八年间，该村被日军屠杀150余人），烧毁房子710间。

△　法国内地军解放巴黎。2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祝贺巴黎之捷。

8月24日　军事委员会制定桂柳会战各战区作战指导要纲。在第一期作战中，要求第九战区湘江东各军以现态势续行攻夺要点，牵制消灭敌人，并相机击破之。要求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之一个师调柳州后，将第三十一军移驻桂林，担任固守；第九十三军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州。要求第七战区以现态势防阻敌人，以六个团兵力固守曲江；依状况先抽调两个师，秘密开赴连山、梧州构筑工事，并固守之。在第二期作战中，要求第九战区李玉堂所率第三十七军转移湘江西岸，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转移湘桂路以南地区，而王耀武直属各军则在湘桂路以北地区，并以邵阳为根据地积极夹击，侧击西犯之敌。要求第四战区第九十三军以一部占领黄沙河，以主力死守全州；敌如钻隙深入桂林附近，则适时抽调第四十六军及第七战区转用之两个师，协力守军包围而歼灭之。要求第七战区准备以一军长率领两个师，适时参加桂林决战；梧州仍留一个师固守之，并另以西江两侧之挺进队部队及地方团队，准备攻击沿西江进攻之敌。

△　蒋介石密电王世杰，提出国共谈判中的宣传方式，共三条："（一）在行动上，表示中央对中共问题之解决期待殷切，拟请程潜、王世杰先生等加紧联络林祖涵，或于宴席上无形间充分表示中央之真诚热望，促其迅速答复中央6月5日之提示案。凡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之重要人物，均可设法使其参加。（二）在文字上，拟由《中央日报》以及其他报纸、刊物，从正面或侧面撰拟论文，诉诸社会，热烈期望中共倾诚答复，速谋解决与自拔之方。（三）逐渐发表谈判情形，表示中央本不愿将其经过发表，乃为中共某种言论行动所迫，不得不令社会洞悉其真相。"

△　孔祥熙在美国参议院发表演说，申述中国政府愿以所有的力量支持适应局势发展的世界和平组织，"对于国际合作问题和美国的政策，无不表示赞同"。强调中国政府决"执行民主计划，向完全发达

之民主国家迈进”。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十分区一部攻克山东曹县之古营集，歼伪曹县警备大队1200余人。

△　日军第二师团第十六联队及第四联队之一部6000余人到达滇西芒市东北地区。25日又日军一部约200余人由象滚塘附近击破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一部，进入龙陵。

△　周佛海与日外相宇垣一成会谈。宇垣声称：他始终一贯希望实现全面和平，更盼望在国际和平会议召开以前，直接和中国政府会谈。他扬言：“中国若不看清东亚大局，日本经过若干时间准备后，将对重庆实行彻底的进击。”

8月25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本届驻会委员会向下次大会提出的会务报告和检讨三届二次大会后各项建议案政府实施情形的报告草案。并请求政府拨款二亿元，赈济湘省灾民。

△　顾维钧、魏道明、商震等飞抵华盛顿，出席世界和平机构会议。30日，拜访美国务卿赫尔，谈中美关系等问题。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九师、第三十九师在龙陵桐果园、一丘田、张金山、南天门等地与来犯的日军激战。日军一部突破远征军防线进入龙陵城内与守军配合，其援军主力则继续向双坡、三官坡、锅底塘进攻。27日，新三十九师伤亡惨重，全师战斗兵员仅剩100余人，师长洪行单人突围，向昆明方向逃生。

△　八路军一部攻克山东沾化之下洼、张王庄、黄升镇等日伪军据点，俘伪军前线总指挥赵立善及团长王亚山以下230余人，毙伤130余人。

△　第九战区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奉命固守长沙，因作战不力，终致岳麓山失陷，长沙为之弃守。军事委员会以张“贻误戎机，情节重

大”，依法判处死刑，是日执行枪决。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飞机五架在郑州、洛阳一带侦察敌情，在郑州上空与日机八架遭遇，击落日机二架，击伤一架。

△　日本海军陆战队200余人及伪军300余人，在海、空军掩护下，进攻浙东岱山以西的大鱼岛。守岛的新四军浙东海防大队一部与敌激战七小时，毙伤日军40余人、伪军20余人。

△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与日本银行总裁结成签订《借款契约书》。借款总数四亿日元，五年内分期付给。

8月26日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对长衡会战作出检讨，认为此次会战该军的优点在于能够破坏敌之交通，攻袭敌后；突围巧妙；始终维持指挥系统，行有组织之战斗；利用地形，坚守阵地；经常实施尾击、侧击；陆空协同，良好空中补给确实。劣点为逐次使用兵力步调不齐；缺乏机动；各兵团战斗未形成重点；弃阵地与敌争夺，致增伤亡；守军与野战军不配合；纪律废弛，战志不旺；装备劣，兵员少；补给不灵活。

△　蒋介石密电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令该军应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确实掌握要地，与铁路两侧友军配合，阻敌西犯。

△　孔祥熙访罗斯福，面递蒋介石亲笔函，并对美国政府派赫尔利、纳尔逊来华致谢。罗告孔称：吾深知中国物资之困难，故纳尔逊使华的重要任务在于经济计划，确切协助中国。只要是“以纳主管范围内，可尽量供给中国，增强抗战及复兴之用”。

△　黄炎培往访董必武、林伯渠，就国内外形势及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谈话。

△　华南东江游击纵队一部配合民兵进攻广州市郊之新造，解决

伪军垦区区署及联防队等九个伪机关，俘伪军官兵50余名。

△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决定，关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工作，在中央由首相与外相协商确定，在当地则指导汪政府负责实施。

8月27日　国民参政员邵从恩上书国民政府，恳请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能在保障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方面有些成就，并将民国三十一年度购谷本息归还人民。

△　董必武约见张治中，表示欢迎张和王世杰到延安商谈。

△　军法部以第四军团长、长沙紧急疏散城防队队长杨震，第四军军部副官处长潘孔昭，第四军副官处中校陈继虞滥用军权，枉法贪污，是日在湖南前线执行枪决。

△　滇西芒市日军主力沿芒（市）龙（陵）公路，向包围龙陵之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部队袭击，击破围攻部队之一部，打通由芒市至龙陵之交通线。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飞机13架，出击湘潭至长沙公路上之日军车辆，焚敌车30余辆，旋又袭击湘潭日机场，毁敌机一架。同日，该团第一大队又分批夜袭岳阳、广州、衡阳等地。

8月28日　中央社记者就美国派赫尔利、纳尔逊来华事专访翁文灏，翁称："纳尔逊是罗斯福手下最得力的助手，罗派这样有见解有能力的人来华，足以证明美国援华之决心。"并称："中国战时及战后经济，需要彻底而大规模之建设，确为一刻不容缓之举，瞻望纳尔逊与蒋主席之会谈，对于中国经济之前途，必有莫大之裨益。"

△　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龙云曾催华岗提出民盟、滇、川康、李济深及中共五方面的问题，与龙云、朱蕴山（代表李济深）数度磋商，归纳为五条：一、实行民主政治，废除一党专政。二、驱逐日寇出中国，恢复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三、保障人民身体、信仰、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实行中央、地方分权制，在民主基础上完成国家统一，加强与美、苏、英及其他同盟国家的邦交，共同消灭法西斯，争取实现世界民主与正义和平。五、因电台未通，不及事先商妥，这一初步纲领草案，望五方面各派正式代表，择地再度会商，以便确定。

△　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开展以攻歼忻（县）静（乐）离（石）岚（县）公路沿线之敌为重点的秋季攻势。先后切断静乐至宁化堡的公路交通和离岚公路，攻克汾阳外围据点。至9月30日，攻势作战结束，共歼日伪军2000余人，攻克和逼退日伪军据点48处。

△　八路军渤海军区一部克复山东乐陵县城。29日又攻克日伪军下竑、张王庄等据点，俘伪团长以下230余名。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分批袭击湖南岳阳、白螺矶日机场，与日机在石首上空遭遇，双方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五架。

△　美机轰炸上海，电力公司被炸，死一人，伤八人。工人要求躲避空袭，被日本厂方拒绝。

8月29日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派朱绍良暂行兼办。30日朱绍良飞抵迪化。

△　军事委员会任命宋瑞珂为第六十六军军长，方靖为第七十九军军长。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八军攻占松山主阵地最高点音部山，在作战中该军伤亡200余人。

△　国民政府任命徐思平为军政部兵役署署长。31日，徐对记者称，今后推进兵役的方针为“贯彻抽签法令”，“扩大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　八路军冀中军区一部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向肃宁县城发起猛攻，30日攻入城内，全歼守敌，俘伪军600余人。

△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二、四分区向豫北发动攻势，攻克济源西南之陈岭。伪济源保安联队司令王奠甫和伪自卫团长马明山率部反正。

△　江苏溧水县地方武装攻入溧水、溧阳县城。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飞机13架轰炸湖北沙洋日军仓库、车厂等，旋日机15架在嘉鱼上空拦截，双方空战20分钟，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五架，美机被击落三架。

△　重庆《中央日报》载：日军犯豫西，致国立河南大学损失严重，图书、仪器全部毁坏，教职员、学生大部分被俘充当苦力，部分被杀害。

△　中华农学会举行年会，讨论农村民治推进问题，由吴藻溪主持。发言者认为推进民治首需农村工业化，加强农村组织，发展农村交通及教育。一致主张废除农村保甲制度，实行土地国有，成立县级以下的民意机关，如乡议会、村议会等，实行普选。

△　谢伟思从延安发出军事观察第16号报告，称“美国陆军与中国共产党部队开始合作”。批评了国民党虚弱、无能、不合作、反民主，赞扬中共得到人民支持，反对内战，扼守着抗日前线战略阵地据点，英勇善战。建议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予中共军队。

8月30日　林伯渠致函张治中、王世杰，并转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指出：国民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提出的书面意见12条及口头意见八条，在原则问题上相距太远，中共无法接受。希望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有利于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于促进民主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使双

方的谈判易于接受。林伯渠在信中再次邀请王、张赴延安继续谈判，以便看看中共是怎样忠实实行四项诺言与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

△　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见美驻华大使高思。高依美国务院指示，请蒋调整对苏联与中共的关系。蒋提出中共应服从国民政府。

△　蒋介石电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派兵驻防甘肃马鬃山，以保护当地蒙族居民。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外国记者到达晋绥边区，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晋绥军区参谋长陈漫远向记者介绍了根据地各阶段的军事概况。9月4日，记者赴第八分区参观。

△　秘鲁首任驻华大使贝多亚抵重庆。31日，双方商定两国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　八路军渤海军区一部克复山东文登县城。31日，继向莱阳城西北之马连庄日军据点攻击，两日歼灭日伪军1100余名，俘虏450余名。

△　周佛海结束在日本的活动回到上海。是日，周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去日本，分别拜访了日本新旧内阁成员和其他朝野人士，并举行会谈，“大抵均确实表示中日关系决不致因新内阁成立而有所变更既定政策，今后当切实加以执行”。

△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决定《对中国政治工作实施纲要》。关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驻华大使”和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只能指导南京汪政府采取“自己发动的方式”进行，而不能直接实施。

△　纳尔逊、赫尔利离美抵莫斯科。31日，拜访莫洛托夫，纳尔逊称赴中国的目的是改进中国对经济问题的处理及其前景。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统一。莫洛托夫对纳尔逊的谈话及到中国的行动表示赞许，并称：如果美国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取得军事上的统一，并选择最佳人选担当此任，苏联人民感到非常高兴。

8月31日　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通令军政机关，在实施《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逮捕人犯之前，应将人犯之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逮捕地点及逮捕原因分别报告行政院和军委会。

△　《宪政》月刊社举行时政座谈会，讨论保障人身自由问题。黄炎培指出人身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首要条件，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我们主张认真实施约法；要法治，而不要人治”。沈钧儒指出：“我们主张法权一元化，拘捕一元化，审判一元化”，“一切拘捕人犯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交法院，否则拘捕机关即以侵害人身自由论罪”。

△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答记者问称：8月份重庆市零售物价总指数，较1937年增加441倍。

△　卫立煌电令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务必于9月2日内将滇西松山及大寨之敌全部肃清，不得借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如逾期限未能达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团长一齐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长亦不能辞其责”。

△　日本对台湾实施征兵制和学生劳动令。

△　高思致电美国务院，提出美国宜予中国政府以绝对之同情与支持。

8月下旬　日军大本营颁布命令，在中国派遣军之下新设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司令部设于衡阳南岳。下辖第十一军、二十三军、三十四军及第二十七、六十四、六十八师团等。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一团和第四、六两个区队，在司令员李运昌率领下，分两路向蓟县、玉田、宝坻一带挺进，相继攻克蓟县

孔子庄、三岔口、六百户、下仓镇等日伪军据点，毙敌400余人，迫使蓟县日伪军退守县城及马伸桥、邦均等据点。

是月　中国空军为击破日军进攻桂林、柳州之企图，确保湘西，制定作战计划。规定作战兵力继续使用长衡会战之原轰炸机队。梁山、恩施地区部队之行动，由第一路司令张廷孟指挥；中美混合团之行动，由副司令张辅翼及摩斯共同指挥；美空军之行动由陈纳德统辖指挥。

△　国民政府制定推动乡镇公益储蓄办法，规定大县一亿元到5000万元，中县5000万元到3000万元，小县2000万元到500万元，全年总数为200亿元。

△　1月至是月，粮食部办结粮政贪污和违反粮管政令案件，计判处死刑者四人，无期徒刑者五人，10年以上徒刑者25人，予以撤职和行政纪过处分者82人。

△　北野政次接任日军“731部队”队长。本年内，日本大本营决定将“731部队”研制的钢笔式喷射器投入生产，作为连、排必备武器装备部队。

△　伪满国务院向各省发出《关于刷新强化地方行政的指令》，要求在省级行政机构中，进一步加强日本官吏的地位，各省设日本人主任参事官。由省次长、主任参事官、各厅长组织省政会议，决定省政的最高方针。并将全伪满分为东、南、中、北、兴安五个地区，由总务长官分区加以监督。

△　晋南新绛、汾城、万泉、荣河等17县蝗害为灾，饥民达18万余人。

9月

9月1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毛泽东提议讨论联合政府问题，并谈及8月23日同谢伟思谈话的情形。周恩来发言说，要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扩大参政会名额和权利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明年我们可组织解放委员会，在解放委员会未成立前，先把救济委员会成立起来”。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高岗、刘晓为委员。

△　中共中央决定由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王恩茂为副政委，挺进湘南、粤北，开辟以衡山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与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打通与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以便配合盟军的反攻与可能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城部队攻克腾冲东南角日军阵地。同日，又攻占城内武侯寺、城隍庙、秀峰山、文星楼、县政府等日军主要据点。

△　日军独立步兵第十旅团一部千余人，对太行区二分区和顺县之横岭、双峰一带“扫荡”，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击溃。

△　中国新闻学会及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举行记者节纪念会，到会50余人，大会发表宣言，阐明“厉行法治，保障人权；尊重舆论，宣达民隐，以慰国民之愿望”。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全国计有通讯社177家，报社889家。

△　黄炎培、张志让等30人联名在《宪政》月刊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陈明对时局的九项建议，要者为：“实施人民渴望的民主制度”；“严厉告诫文武官员，一切设施，力行法治，有犯必惩”；“切实开放言论”；“给学生以言论与人身自由”；“行政机关，自中央至基层，一切政令皆须绝对公平，与民更始。”

△　豫湘战后，日军图攻桂省，是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评《号角与警钟》，指出：中国“军事、政治方面的弱点已绝不能再事讳饰，而亟须实行动大手术”。

9月2日　　蒋介石密电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令该军迅速完成桂柳作战的诸项准备。工事之构筑务加紧实施；并要求各据点能独立作战，并能互相支援。

△　八路军冀中第七军分区部队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攻入深泽县城，毙、伤、俘日伪军170余人，摧毁伪县政府、伪新民会等，并从监狱中救出抗日干部、群众百余人。

△　胶东荣成县伪军六个中队及伪官员、士兵160余人向八路军一部投诚。

9月3日　　滇西中国远征军各部向松山发起第九次攻击。第八军各官长严督猛扑，士兵奋勇搏战，遂攻克大寨据点，歼灭日军300余人。

△　国民党中央派邵华为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　蒋介石致电丘吉尔等，对欧战五周年致祝颂之忱，希望中英两国建立持久之友好和平。

△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开会，到会112人，江庸主持，讨论大会议程及有关提案。褚辅成发言称：“对于国家的重要问题，我们要有勇气，有话就讲，不要讲空话。”

△　伪满洲国举行联协会议，“国务总理”张景惠宣布国政方针，宣称：“吾满洲国决成为建设大东亚之先驱，不达击灭英美之目的，誓不终止。”

9月4日　　蒋介石密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等，要求第二十七

集团军李玉堂部应在湘桂路两侧及湘江南岸，竭力迟滞敌之西犯，以掩护全州构筑工事；第二十四集团军王耀武部应在现阵地竭力拒止敌人，确保邵阳，并相机侧击沿湘桂路西进之敌。

△　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政府问题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发出指示，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伪宪法。

△　军事委员会任命高树勋为冀察战区代总司令。

△　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在中枢纪念周报告民国三十四年（1945）国家施政方针，共95项，要点为：本“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旨，一切施政均与此配合；健全并发展各级民意机关，促进地方自治，厉行法治，奠定宪政基础；注重物价稳定，贯通内外交通运输；加强控制物资，扩大征收实物；稳定财政。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外国记者参观晋西北后发表观感，认为“这里的军民团结抗日是中国旁的地方所没有的。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充分证明在延安时所听到的是千真万确的”。

△　重庆教育、文化、法律、工商、金融各界代表人士黄炎培、张志让、江恒源、王云五、吴蕴初、卢作孚、胡西园等人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九项建议，迫切主张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

△　国民参政员张澜对记者陈述对当前国是的意见，认为当前的急务，“第一在如何使人才集中；第二在如何使己意表现；第三在如何使党争停息。此三点一言以蔽之，即迅速实施民主政治”。

△　伪满国务院为适应战争需要，制定《金融事业整顿法》，规定伪经济部为调节金融事业，可对金融机关命令其转让或合并。如有违令者，可令其停止。

△　据中央社讯：平、津日军近日大举拉夫，北平搜拉6000余人，天津搜拉万余人，仍在继续中。

9月5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举行。出席参政员、国民政府要员、各国驻华使节等500余人。大会中心议题为宪政与经济建设。蒋介石致词，宣称："目前我国军事上的危险已过去了"，"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统一"。参政员林虎致答词，指出政府"万不可专靠盟国的胜利当胜利，当前军事、政治情形令人隐忧"，"若将此状拖延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下午，举行首次会议，何应钦报告军事，谓"各战场攻守兼施，将随时予敌以严重消耗"。参政员郭仲隗目睹豫战惨状，对此予以反驳。参政员徐炳昶要求枪毙汤恩伯，并交出国民党党证，表示不要党籍。

△　大后方报界为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召开，纷纷发表社论、社评，重庆《大公报》希望这次大会"把应该讲的话讲出来"，"少开秘密会，多容纳旁听人"，"多有些民主的气象"。《云南日报》指出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加强民主团结，"应根据约法和抗战建国纲领，实现抗战中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6日，重庆《新华日报》指出，应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等方面，实行彻底转变，毅然改弦易辙"，"把一切不能适应抗战要求以至阻碍抗战进行的政策和行为，勇敢加以革除"。

△　蒋介石密电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令该战区应先抽一个师的兵力，速开广西连山防守，并准备两个师由连山方向参加桂林附近之决战。

△　由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团和新编第三十五团组成的豫西抗日

游击支队（即第一支队）由林县出发。22日，在济源西南的渡口击退日军河防部队，渡过黄河，进入豫西。

△　八路军一部在鲁中追击伪军陈三坎部，毙、俘伪军官兵1600余人。

△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决定《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其方针为："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关于当前的工作目标，汪精卫政权应与重庆方面进行活动，"制造彼此之间直接会谈的机会"，如有可能，使汪精卫政权"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关于中日"全面合作"的条件，共八条。"全面合作"后，美、英驻华军队必须"自动撤退"；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汪、蒋直接谈判，调整关系；如果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缔结友好条约；"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蒙疆以中国的内政问题处理；香港归还中国，南方地区的权益另行考虑等。

9月6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翁文灏、张厉生、徐堪分别报告经济、总动员会工作及粮政。参政员黄炎培质询称："从前是人民囤积，现在是政府囤积；从前是人民居奇，现在是政府居奇。囤积居奇犹可，却不该官吏趁此发国难财。"参政员傅斯年要求政府彻底肃清贪污，"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参政员王云五要求政府彻底惩治粮政弊端。参政员邓飞黄揭露花纱布管理局霉烂布匹价值3.6亿元。

△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及纳尔逊由印度飞抵重庆，宋子文、何应钦等往机场迎接。下午，赫尔利晋谒蒋介石。

△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指出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之主张的办法。

△　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及淮海区地方武装在淮海区发动攻势作

战，连夜奔袭宿迁县东南60里的日伪军据点林公渡。9日，攻克该据点，毙日军中队长金井以下66人，毙、俘伪军90余人。

△　日军一部陷湖南祁阳，并继续西犯。

9月7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四、第五次会议，首由俞鸿钧报告财政，继由参政员提出口头、书面质询。参政员郭仲隗以中原战场所见，质询中原会战失职军官的惩处、官兵待遇的改善及新兵的加强等，何应钦对此作保密性答复。

△　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告诉史今后作为中国军队司令官应注意工作的政治性，并强调必须在共产党承认军委会权力之后才能使用共产党军队。同日，又召见赫尔利，要求中共军队的装备必须在其接受政府管辖之后才能进行。赫告蒋，美国政府仍竭诚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

△　中共中央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同意用中共中央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作报告的机会，提出中共关于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并联系说明这是中共原来提案中三条政治主张的具体解决方案。

△　赫尔利、纳尔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赫尔利称此次来华的目的“是使我们计划怎样在最短期内打垮日本”。在华期间“对于目前军事和战后经济问题的商讨，完全根据这种目的作出发点”。同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纳尔逊会谈，对中国军事、经济及中美合作等交换意见。

△　孔祥熙在美报人俱乐部演说，认为盟邦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是“误解和缺乏认识”，并否认中国政府将盟国租借供应品“移作对日作战以外之用”。

△　军事委员会公布：日军犯湘使用兵力达11个师团，共25万

人。

△　湖南战场日军第十三师团犯零陵，守军第七十九军与敌在冷水滩之线激战。旋日军用大炮轰击，又发起冲锋。守军军长王甲本率部抵抗，不幸身中数弹，仍奋力督战，与敌肉搏，头、背、手、足均遭敌刺，壮烈殉国。

△　日伪军千余人“扫荡”太行军区第四分区长治、潞城和襄垣地区；11日，敌6000余人又分两路“扫荡”太行军区第五、七分区林县、辉县地区。根据地军民以地道战、冷枪战和窑洞保卫战抗敌，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9月8日　　滇西克复松山。中国远征军第八军军长何绍周下令将松山顶峰筑成的炸药室起爆，刹时松山顶峰浓烟四起，日军第一一三联队一部全部被炸死，联队长切腹自杀。松山战役结束，是役全歼松山守敌3000余人。

△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六、第七次会议，周钟岳、雷法章、曾养甫分别报告内政、农林和交通。有参政员质询财政部统制政策不合理，政府专卖机关贪污事件甚多；政府严厉禁烟，而在重庆烟案累累，内政部管的是什么？参政员卢前指出政府任用人员太糟，“用人讲究私人关系，有钱人更有办法”。参政员刘蘅静称：“现在从省府主席到保甲长，层层都有问题，内政部责任大，只管小问题。”参政员黄炎培质询：“各地交通官长贪污事件甚多，为什么报告中没有提到？”

△　是日至12日，中美双方就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进行谈判，双方最后议定：由史迪威担任中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指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给蒋介石核准，对部队的任免须依中国法令行事。在谈判中，宋子文提出中国必须控制《租借法案》物资，美方表示不同意。双方还议定在重庆设立美国委员会，中方可派人出席，但一切决定须由美

国裁定。

△　蒋介石与赫尔利、史迪威会谈。蒋介石要史迪威将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调动支援龙陵的中国远征军，被史拒绝。同日，赫尔利、史迪威又拜访何应钦、翁文灏、曾养甫、俞鸿钧，对一般军事、经济问题进行交谈。

△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请董代表中共中央及军队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

△　在滇西腾冲方面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一部自腾冲南下，越过龙川口，10日到达邦乃，立即参加作战。

△　沿湘桂路进攻之日军抵达东安附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即电令第九十三军以一部在黄沙河占领阵地阻敌西进。至晚，敌迫近黄沙河附近。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起青浮反击战，经四天激战，全歼阎锡山部第七十二师，收复浮北地区。

△　八路军一部攻克山东临城县城，毙、伤、俘日伪军260余名。

△　美机100架轰炸鞍山、本溪。

△　美《纽约时报》评论中国政局，认为中国需要盟邦“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援助，但较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内部的团结”。

9月9日　蒋介石训令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松山阵地9月7日已被第八军攻占，甚为欣慰，应着手防备来自龙陵方面敌之反攻。务须于9月18日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越。同日，又电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死守全州。

△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八、第九次会议，谷正纲、

宋子文分别报告社会行政、外交和司法行政。参政员许德珩发言称政府长官的报告都是“一只鸡两只蛋——太长”，《大公报》称其为“疲劳报告”。参政员黄起立报告：现在的士兵生活不如狗，大腿只有拇指粗，政府应着力解决这些“严重而严重的问题”。参政员周炳琳称：在昆明街头天天可以见到死尸，但无人料理。多数参政员发言要求惩治战争罪犯、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改善法官待遇、加强中苏邦交等。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致函蒋介石，报告胶东地方游击部队兼任行政官长者“拥兵割据，互相磨擦”，建议“增设特工监视”。

△　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令第九十三军黄沙河部队即日进入阵地，对敌攻击。下午，日军便衣队攻周庙头，被第九十三军一部击退。10日黄昏，又有日军步、骑兵千余人由东湘桥西进，与第九十三军第二十九团遭遇，我军逐步抵抗后退至栗山阵地，与敌对峙。

△　滇西中国远征军新二十八师在华坡、老东坡地区与日军激战。战至12日，全师仅余战斗兵员120余人，遂奉命撤出战场。龙陵城郊大部分据点又陷敌手。

△　日军第十三军一部攻占浙江温州。

△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决定《对中国政府传达有关〈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的要点》。《要点》规定：由中央派遣适当人选，并会同在华机关，共同向国民政府传达。

△　美国务卿赫尔致电美驻华大使高思，称：他和罗斯福总统都认为高思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的建议“既合时宜，又切实际，值得予以审慎的考虑”。

9月10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十次会议，陈立夫报告教育行政及各级教育推动情形。参政员陈逸云质询时指出：“现在小学程度低落，教科书编得太坏，印刷又糟。”卢前指出：“现在教育

质量低，学生程度差，学校里不读书。”“大学讲师、助教的待遇和部队士兵的待遇一样，受尽穷苦。”周炳琳要求国民政府“对大学校长都应当郑重选定”。

△　张治中、王世杰复林伯渠8月30日函，称林的来函“为夸张抹煞之词”和“不实之言”，且“要求与时俱增”。仍要求中共切实拥护国民政府的统一，“切实实行军委会之指挥”，希望中共再派代表至重庆谈判。

△　邵力子到曾家岩50号与董必武、林伯渠晤谈，提出如董回延安，要偕五参政员一起返重庆，表示民主和联合政府都愿意赞成，但必须有步骤。

△　滇西龙陵外围据点部分被日军夺回。是日复向荣誉第一师攻击，经该师反击，日军攻击受挫。

△　桂林城内开始疏散人口。11日，广西省政府机关撤离。15日城内大火四起，北面自东钲路燃至北极路，毁屋近2000间；东面自中正桥东烧至花桥西左右两边，毁屋近2000间；西面自西门外烧至五里圩，全城约毁房屋六七千间。

△　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部于武汉成立，指挥湘桂第二期作战。

△　日机10余架袭击滇西腾冲，中国空军迎击，日机被击落四架。

△　日本利用一贯道进行间谍活动，陆续由京、沪入川，国民政府是日电饬各地严密查禁。

9月上旬　　蒋介石两次电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要点为：“全州工事及其他作战诸准备应迅速完成”，“国军以乘敌突进与以打击之目的，决在黄沙河及全县附近夹击之。”并要求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第二十、第二十六、第四十四、第三十七军在道县集

结，攻击敌之侧背，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率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新编第十九师等，转向新宁附近对敌之右侧攻击。

△　鲁南八路军一部攻克临城车站，毁敌兵栈，毙伤日伪军260余名。

△　衡阳方面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以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四十、第五十八等六个师团为基干，沿湘桂路附近及其以东地区，向广西全州、桂林方面攻击前进；另以第二十三军之第一〇四、第二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自广东之清远、三水、新会方面，沿西江方面西进，向桂林、柳州方面攻击前进。

△　宪政实施协进会将全国划为七区，派员分驻各地考察地方民意机关设立情形及有关宪政法令的实施状况。

△　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宣布：美国政府愿采取积极的措施，使重庆政府与中共协调。并称：美军代表团到达延安访问，“意味着美国打破了使美国部队和中国战斗游击队隔离的障碍”。

△　赫尔利声明来华之使命为：一、阻止国民政府之崩溃。二、支持蒋委员长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及统帅三军之委员长。三、协调蒋介石与美军统帅的关系。四、促进中国军用物资之生产，并阻止其经济崩溃。五、统一中国所有军事部队，以达成击败日军之目的。

△　盘踞粤中之日军第二十三军各部为进攻柳州，先后西犯。其在清远方面之第一〇四师团分兵两路，由清远西进；一部向山地迂回，于9月12日占领怀集。

9月11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政府各项施政报告全部结束，分别交付审查。是日起分作军事国防，外交国际，内政，内地，蒙藏，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物价，司法，社会，救济，医药卫生等组审查议案。

△　桂境栗山方面日军300余及步、骑兵700余分向黄沙河附近港底村、茶园岭、青木塘侧背猛攻，守军第九十三军第二十九团一部驰往堵击，被击退，被迫向下改州附近转移。同日，黄沙河方面亦有日军千余向第九十三军阵地进迫，军长陈牧农以前进阵地被敌突破，乃饬第二十八团退守和好铺东、西之线，黄沙河守军撤退。旋日军占领黄沙河。

△　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挺进河南敌后的部队，在夏邑县八里庄遭国民党第二十八纵队第八十二支队攻击，新四军予以还击，歼其支队长以下600余人。师长彭雪枫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　经济部统计：截至本年6月底，已登记之公、民营工厂共4346家，其中在重庆者为1228家，其他四川各地者共729家。各项工厂中以化学工业为最多，共1209家，其次为纺织、机器、饮食、五金、冶炼、服装、烟业、电气制造等。

△　美总统罗斯福和英首相丘吉尔率双方高级军政人员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研究对德、日作战问题。会上制定了美、英军队对德作战计划；达成积极参加对日作战的协议，规定从德国失败到打败日本的期限为一年半。会议于9月16日结束。

9月12日　蒋介石与赫尔利会谈，就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及职权范围达成协议：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其职权范围为受最高统帅（委员长）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核议。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　赫尔利、史迪威等美国官员磋商后，向蒋介石递交十点大纲，内容为：一、中美合作的首要目的在于促成所有在华军队之统一，立即打败日本；二、中美合作，使其对苏、对英关系更臻密切协调；三、在蒋介石指挥之下统一所有军队；四、集中中国所有的资源

以供作战需要；五、支持蒋介石在民主的基础上关于政治联合的努力；六、提出目前和战后的经济计划；七、确定史迪威前线指挥的权限；八、确定史迪威为蒋介石参谋长之权限；九、准备提出指挥系统表；十、讨论将来在华租借物资的控制问题。

△　史迪威于11日转呈罗斯福来电，说，据麦克阿瑟将军称，为加速新几内亚前进，亟需大量后勤部队，能否自中国征集民工五万名，组织临时后勤队。蒋介石于本日复电罗斯福，以桂、柳告急，国内亦感人力不足婉拒。

△　国民政府派罗良鉴代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　蒋介石电令张发奎：第九十三军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

△　广东雷州半岛方面之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并附伪军一部，为参加桂柳会战，向北进犯。9日，到达廉江附近，与守军第一五五师激战，战至是日，突破第一五五师阵地，廉江遂告失守。桂柳会战开始。

△　日军进攻桂境全州的先遣部队出没于全州城郊附近，黄昏时进攻七里桥、江家村、金背岭阵地。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出动飞机八架，轰炸长沙至湘潭间公路之日军，至湘潭上空与日机六架遭遇，双方空战，中国空军及美军各击落日机二架。同日，该队又在衡山上空与日机12架激战，击落日机二架。

9月13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熊式辉报告国民政府交议之民国三十四年度（1945）国家施政方针。参政员刘风竹继之质询，认为："方针只表示了政府的志愿，而没有提供达成的保证，关键是没有国家的总预算。"傅斯年称："方针是静态，不

能应付活生生的场面。”

△　国民参政员王云五、胡霖向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建议，请国民政府派员向大会报告国共两党谈判之经过，并希望中共代表林伯渠亦作同样之报告，当经大会通过。

△　蒋介石接见赫尔利、纳尔逊，继续商讨当前经济及战后建设问题。

△　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作出保卫桂林、柳州的部署：一、第九十三军推进全州固守其阵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二、杨森率第二十、第二十六、第四十四军取道零陵、宁远间向道县前进侧击敌人，阻敌西窜，并准备参加桂、柳之决战；三、李玉堂率第十、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于湘桂路沿线迟敌行动，诱敌至全州附近时向北转入湘西山地中，侧击东安向资源窜犯之敌，掩护全州守备军左翼之安全；四、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迅速集结桂林机动控置，并于城郊构筑永久工事，相机击破突入桂境之敌。

△　桂境全州失陷。日军第十三师团攻破黄沙河阵地后，是日在大炮、战车的配合下向全州境内第九十三军防守的阵地扑来。14日，军长陈牧农所部撤守城防，退至郊外及兴安附近。日军遂从东、北门进入城区。撤退前，守军焚毁了全部军需物资，城内大火十余日未熄。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由腾冲南下，加入龙陵作战。14日，日军攻击部队被迫退回。

△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命令韦国清赶赴津浦路西，指挥路西部队继续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

△　山东八路军一部攻克临邑县城，守敌大部被歼。

△　八路军晋绥军区一部在民兵配合下攻克方山县城。

△　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一部攻克淮海区灌云、新安镇之间的伪军据点三里沟，全歼伪军200余人。

△　日本陆军省次官柴山兼次郎到南京，向陈公博、周佛海传达《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陈公博提出以“反共问题作为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相接近的方法”，并声称：“现在能作为两方的共同目标的就是反共。”

△　史迪威致函马歇尔，称：中共代表已经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我们总得想办法把武器交给共产党，他们是要打仗的”。

9月14日　滇西腾冲克复。13日，中国远征军攻城部队加强对腾冲的攻势。日军大尉太田率残兵作最后挣扎，全部被歼。是日上午10时，攻城部队完全占领腾冲。

△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讨论各项提案，与会者对改善兵役问题尤为重视，计通过提案33项。是日，大会致电湘桂抗日前线将士，对其“以血战之勋名”，“捍卫西南要冲，巩固反攻基地”表示嘉慰。

△　军事委员会任命王毓文为暂编第一军军长。

△　第九十三军抵达桂境兴安后，是日依照预定计划，以第十师占领井上田、七家岭、飞龙殿、五旗岭之线，以新编第八师占领大溶江附近，准备拒敌西犯。

△　桂境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进占灌阳，主力东移湖南道县，进攻湘桂路正面的作战任务改由其第五十八师团担任。

△　日军一部侵入广西陆川县清湖，占据33天，杀害民众1320

人，伤830余人。

△　军事参议院参议李纯如呈文政治部，检讨河南战役失败之原因为：指挥命令不能统一与贯彻；军官舞弊，克扣薪饷；军队掠夺百姓，引起民愤。建议政府派员入豫，恢复机构。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举行会议，决定：一、任命傅式说为建设部长，项致庄为浙江省省长，孙良诚为苏北绥靖主任，庞炳勋为开封绥靖主任；二、设置蚌埠绥靖主任公署和杭州绥靖主任公署，任命罗君强为蚌埠绥靖主任，项致庄为杭州绥靖主任；三、撤销第五集团军番号。

△　柴山兼次郎和周佛海、陈公博继续会谈。周佛海表示对日本的意图遵命照办，并决定由陈公博返上海后约周作民、李思浩详细商量办法，选择适当人员去重庆，转达日本新提出的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

9月15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林伯渠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向大会介绍了四个月来国共谈判中的主要问题、重要分歧、事实真相及挽救抗战危局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等。他郑重要求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国是会议。并作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以求国内政治问题根本解决的详细报告。他在讲到谈判的重要问题时说：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首先是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其次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47.75万人，并组织了民兵220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发给我们五个军16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已建立了15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8800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林伯渠在

报告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六个军18个师，后又提出先给五个军16个师的番号，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四个军10个师，并要“限期集中”，将编余的人员“限期取消”；我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我党和各党派以公开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国民政府都未能做到。下午，举行第十四次会议，由张治中作《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报告，认为“中共对于服从军令政令的根本观点，只是片面的要求”。希望中共“以事实和行动来践履诺言，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

△　国民参政员王云五、胡霖对林伯渠、张治中的报告发表意见。王云五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政权公开，一个是军令统一”。希望政府与中共继续谈判，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求得问题的解决；希望政府采用宽大政策，向宪政的道路上迈进。胡霖认为“中共发言要求促进民主政治，这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心愿”。

△　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14日来电，指出：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决议，以参政员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组织延安视察团，其任务为“赴延安视察，并于返重庆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同日，又通过关于物价与物资、从速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等议案。

△　国民政府特任驻荷公使兼代捷克公使馆务金问泗为驻比利时国、挪威国特命全权大使。

△　史迪威自桂林前线返回重庆，与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要求密支那部队向八莫进攻，以增援龙陵，否则他即将中国远征军撤回怒江东面以保卫昆明。史迪威表示异议，称：密支那的中国军队必需休养。如需援军，可调在陕西方面监视共军的胡宗南部队来援，云南的远征军不宜撤回。

△　史迪威、赫尔利与宋子文会谈，宋要求租借物资由中国控制，称这涉及一个大国的尊严。赫反驳道：这是我们的物资，这也涉及1.3亿美国人的尊严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尊严。史就指挥权问题告诉宋称：他并不想要这个可憎的职务，但是如果接受了，就必须拥有全权。否则就不干。

△　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指出：蒋介石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昆明，“则多年来为打通滇缅路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

△　张发奎电令第九十三军“须沿铁路线逐次极力拒止敌人，以全县、兴安、大溶江各附近地区为第一、第二、第三抵抗线，非有本部命令不得撤退，并限9月27日前不得使敌突破大溶江抵抗线”。下午2时，日军便衣队一部推进至咸水附近，被第九十三军警戒部队击退。

△　滇西中国远征军荣誉第一师及第二〇〇师之一团在炮、空火力支援下再兴攻击，将龙陵北侧之外围据点全部夺回。

△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及中央信托局开办黄金及法币折合黄金储蓄。

△　延安知名人士评论盟国援助物资分配问题，指出这种援助，决不能以国共两党所拥有军队之数量作标准，而应以抗战能力、抗战

成绩作标准。“国民党军队虽多，但仅仅打了六分之一的敌伪军，共产党军队则抵抗了六分之五的敌伪军，应按这个标准公平地分配同盟国援华物资”。

△　日伪军集中六万多兵力对冀东进行大规模“扫荡”，冀东抗日军民采取内线与外线、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主力与民兵密切配合的战法，展开长时间的反“扫荡”作战。直至1945年1月，反“扫荡”结束，共歼日伪军3200余人，攻克据点58处。

△　新四军谭震林师攻克江苏江阴之申港、利港等伪军据点，击溃伪申港“清乡”行动总队特务大队及伪警察署等，俘伪官兵62人。

9月16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蒋介石发表关于政治、外交、军事及经济情况的报告，强调中国现正处在最艰苦的时期，必须加强战斗力，因此，军令必须统一，一切军队必须听命于军委会的调遣，第十八集团军不要再扩大编制，更不可在正规军以外另立其他名目，就地筹饷派款。在谈到中共问题时，强调中共必须服从军令、政令、法纪。并称只有在“军令统一”、“政令统一”、“法纪统一”之下，中共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又称林伯渠15日的发言“态度很好”，表示继续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可以考虑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12个师，俟依法核编完成，就照国军一样发给饷械及医药用品。

△　林伯渠、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治中、王世杰本月10日给林的复信的用意及林、董准备回答的信函内容。18日、27日，毛泽东先后两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张、王10日信函是无理取闹，应严肃批评，非如此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仍可请五参政员及张治中、王世杰来延，但不必再催，来与不来，或迟或早来，听其自然。同时将修改后的给张治中、王世杰的复信电告林、董。

△　国民政府命令：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任期届满时，应照

新定名额进行改选，限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1月底改选完竣。至第三届参政员之任务，即延至第四届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召集之日为止。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并决定参政员名额由原来的240名扩充到290名，驻会委员由25名扩充到31名。

△　桂境日军一部利用黄昏攻击全州、兴安方向之新板山警戒阵地，激战竟夜，为守军第九十三军一部击退。17日拂晓，日军附炮二门向警戒阵地猛扑，我守军抵抗，毙日军大队长以下300余后，旋向主阵地撤退。18日，日军进占新板山。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飞机16架轰炸长沙北许家洲日机场。旋在湘潭西上空与日机12架遭遇，中国空军击落日机四架，美军击落日机一架。

△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共问题之公开，民主统一之进步》。指出：在目前我们所要求的有三件东西：一、国家的统一，是国民政府的立场，凡属反统一的现象都应消除；二、中共应尊重国家的统一，服从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三、国家的一切军队应统筹调遣，划一军令，赶快打击敌人，抢救湘桂线。

△　美国陆军部宣布，在中国成立指挥官及参谋人员学校，由卫立煌任校长。

△　罗斯福与丘吉尔致电蒋介石，告知对缅作战的决定，说蒙巴顿元帅在北缅的作战将继续并予扩大；一旦欧洲战场发展顺利即准备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将加紧对太平洋日军的进攻，包括打通一条通往中国的海路。

△　正在魁北克出席美英首脑会议的马歇尔将史迪威15日电报向罗斯福作了汇报，罗指示回电致蒋：若撤回中国远征军，正中敌军奸

计，“我们必将失去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线的机会，并直接危及驼峰线的安全。阁下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承担全部责任”。并指出：“必须立即委托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最后警告：如果再来拖延，你们和我们拯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

9月17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十六、第十七次会议。讨论国民政府交议的改善官兵生活的议案及蒋介石16日的报告，江庸、褚辅成等80名参政员对此提出如下意见：一、加强同美、苏、英的关系；二、改善军队官兵生活；三、扩大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四、加强军政国家之完全统一与团结。同日，又通过建设统一的现代国防军，确立军人不干涉政治之制度，救济湘省寇灾、湖北旱蝗灾等提案。

△　是日，日军迫近桂林，美第十四航空大队炸毁桂林机场西撤。

△　美《纽约时报》记者、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爱迪生抵延安访问。

9月18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举行第十八、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刷新政治、改善抗战阵亡将士遗属救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等提案以及加强中苏合作案。通过对于政府施政报告的决议。选举褚辅成、林虎、孔庚、王云五、冷遹、左舜生、董必武、杭立武、李中襄、王启江、张君劢、陈博生、许孝炎、胡霖、钱公来、郭仲隗、江一平、王普涵、许德珩、李永新、罗衡、陈启天、朱贯三、胡健中、黄炎培25人为驻会委员。下午，大会闭幕。

△　蒋介石致函罗斯福，说明与赫尔利会谈军事合作情况，表示凡足以增强对日军事力量的一切规划，必不失时间与赫充分洽商并迅付实施；希望在最短时间内仍令美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来华工作。

△　国民政府公布《赈济委员会组织法》，由23条。

△　国民政府公布陕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名单：议长王宗山，副议长李梦彪。

△　驻印军与远征军在滇缅边界高良工山口会师，打通了自陆上通往中国本部的供应路线。

△　中国驻印军总部总结缅北作战的经验教训，主要有：森林战法；防敌埋伏；防树上敌；防敌假冒；人人自卫；曲射炮使用；训练重于作战；注意方向；开辟道路；提高下级干部能力等。

△　原在粤西的第七战区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奉军事委员会电令，率第六十四军之第二六六、第四七六两团由广东沿西江及其两侧入桂，归入第四战区序列。

△　滇西芒市日军向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侧背袭击，被击退。23日，平戛之日军向芒市撤退，第七十六师收复平戛。

△　日本大本营给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命令：一、为完成大东亚圣战之任务，确保大日本帝国之国防圈，必须破坏敌人之战斗意志，下半年以后，要摧毁美军主力进攻，对苏要极力防止战争发生；二、关东军总司令官负责满洲与关东的防卫，同时要支援太平洋战争，根据北方形势的变化，作必要的对苏作战的准备；三、关东军总司令官根据需要可以指挥朝鲜军司令官。

9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决定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盟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并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张澜、左舜生、章伯钧、梁漱溟、张君劢等36人为中央委员。推举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下设组织、宣传、国内关系、国际关系、文化教育、财务六个委员会，其中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君

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社会六个部分，凡46条。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条例》，凡26条。规定征收的实物指各地主产的稻谷或小麦。不产稻谷或小麦之地方，得由省、市田赋机关呈财政部、粮食部折征杂粮。盛产棉花的地方，得将应纳田赋改征棉花。其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呈行政院核准，按当地市价折收国币。田赋征收实物应依各省、市、县册载赋额为基础，征收稻谷区域，按赋额每元折征稻谷四市斗；征收小麦区域，按赋额每元折征小麦二市斗八升；征收棉花区域，按赋额每元折征皮棉五市斤。赋额较轻或较重的区域，粮棉价格相差过甚的地方，经行政院核定酌量增减其征率。还规定：田赋征收实物应于农产物收获一个月内开征，自开征之日起，满三个月收齐。否则，分别加额5%、10%、20%。在征收中，征收人员如有利用职务刁难舞弊者，依法从重处罚。

△　蒋介石与纳尔逊进行两次会谈，上午纳尔逊就发展战时生产提出了种种补救办法，并就成立战时生产局诸问题陈述了意见；蒋介石同意纳尔逊的意见，并希望其能来华主持中国经济。下午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战后中美经济合作问题。

△　下午4时，蒋介石与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等商议任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之发布手续，以及签署中美协定之事，适史迪威接18日罗斯福致蒋介石电，即晋见蒋介石。蒋与赫尔利会谈遂即而散。当晚，蒋介石与赫尔利共进晚餐。

△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加在萨尔温江的中国兵力，加强攻势，否则蒋要担负其所发生后果之责任。同时，要求授予史迪威不受限制的指挥中国所有军队之权力。

△　大后方报界为实施民主宪政，纷纷发表社评、社论，成都《华西日报》社评《论民主、团结和胜利的关系》指出："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挟少数人的偏私，与人民为敌，必定失败无疑。"《云南日报》社论《民主与统一》指出："不循民主路线而谈统一，将永远无法获得统一。"国家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指出："民主宪政，不仅是中共而且是中共以外其他政党一致的主张。只有民主宪政，方能解决国家一切问题。"

△　新四军一部在江苏高邮伏击歼灭伪军顾树森部100余名，俘伪连长以下100余名。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飞机16架袭击湖南归义至长沙公路之日军，炸毁日军卡车、炮车14辆，伤31辆，毙敌60余人。

9月20日　蒋介石会见宋子文，讨论对罗斯福18日来电要求授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问题的处置方针，蒋要宋转告赫尔利与纳尔逊，对罗斯福的要求很不满。同日，赫尔利与纳尔逊前来辞行，蒋在谈话中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的侮辱，"此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

△　梁寒操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谈国民参政会国共问题讨论观感，宣称："政府唯一顾虑的问题，厥为军令政令之不统一。盖此一条件不能实现，势必大大减损对敌反攻之力量，且此恶例一开，又使中国陷于分崩离析之局面。""除此而外，政府对中共更无其他之苛求。"他否认曾以英文发表谈话时说中共问题"一部分是不能解决的"等语。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　军事委员会以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擅弃全州阵地，判处死刑，是日执行枪决。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延安权威人士对国共谈判的评论，指出中共在谈判中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感及大公至诚的态度”。而国民党“对目前危局，熟视无睹，轻率乐观，对于贻国家民族于此危急之局，毫无引咎自责之意。在整个谈判中，抱着自大与武断之精神。企图以国民党一党一派之私利，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而强迫他人服从之”。评论指出：“我们是最坚决地拥护政令军令的统一的，但是这政令须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政令，这军令必须是有利抗战的军令。相反，如果这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这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则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不能服从，亦绝不容许其统一的，中国人民是严肃的鄙视这种反革命的‘统一’滥调的。”“今日欲谈军令政令之统一，必须彻底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必须彻底改变国民政府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把那些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赶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政令军令，使其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必如此方能真正挽救目前的危机及争取抗战胜利。必如此方能谈得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必如此军令政令之统一才于国家民族有利。关于改组现在抗战不力腐败无能之国民党寡头专制政府这一点，林伯渠同志于其在参政会报告中提出，可谓恰合时宜。”

△　冀中八路军一部克复河北肃宁县城，摧毁伪县政府。10月1日，高阳日伪军600余反扑，遭八路军阻击。毙日军顾问一名及伪队长以下20余名。

△　粤中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陷新兴县。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分区一部于林县西南王家掌伏击“扫荡”之日伪军，毙伤70余名。

△　宇垣一成来华策划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尔后，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和陈公博、周佛海、周作民、颜惠庆、缪斌、郑

洪年、王克敏、王揖唐等人会谈。

9月21日　延安观察家撰文评国内战局，指出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自本月2日湖南敌人进陷常、宁后12日间，造成日丧一城的失败。因此，中心问题是应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废除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分子、法西斯分子全部清除出去，并交于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

△　赫尔利、纳尔逊谒蒋介石，表示定日后纳尔逊即启程返美，向罗斯福报告会谈之经过，并履行和蒋介石商定的经济计划中的美国部分。蒋介石表示采纳纳尔逊关于中国军事的建议。纳尔逊称：美国今后空运将尽量供应中国所急需而不能生产的物资，同时树立战后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良好基础。

△　董必武、林伯渠接见记者，表示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冷遹、王云五、胡霖、傅斯年、陶孟和五位参政员去延安视察。

△　宪政实施协进会在重庆举行全体会议，张伯苓、莫德惠、王世杰、董必武、王云五等出席，会议提出应充实人民个人和团体发表意见的权利；修正《五五宪章》；注意地方民意机关的土劣势力，并通过《扩大言论自由案》。蒋介石到会勉各会员鼓励知识青年从军。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出动飞机15架，轰炸湖南宁乡及新市日军高炮阵地和仓库，毁仓库四座及高炮六门，旋在新市上空遇日机10架攻击，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二架，美军击落日机一架。同日，该团第一大队又袭击河南广武黄河铁桥，桥被炸毁后遭日机攻击，双方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一架，伤二架。美机一架被击伤。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致函罗斯福，报告中国军情危殆，检讨中国华东战役失利原因之一是物资严重不足，挽救中国之道

在于全力支持重庆，并力促国共统一。

△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通过《德国屈服时的国内措施纲要》，要点为：德国屈服时，应采取指导措施，制止国内动摇，同时下决心使一亿国民全部投入战争。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北平《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

9月22日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旅美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谭赞，令称：谭赞“抗战后屡输巨款，救国救民，群情钦慕”，“应予明令褒扬，以资矜式”。23日，国民党中枢及重庆各界公祭谭赞，蒋介石挽曰：“功在党国”。

△　经济建设策进会召集国民参政会驻委会及各区办事处正、副主任举行座谈会，讨论献粮及征实问题，通过如下议案：一、根据政府原案，献粮仍拟就地出售。二、各县拟定派额后，应交由党团机关、县参议会审核。三、经收机关应采公开方式，层层公开，以期涓滴归公。以上各点将交驻委会常委会，作成共同意见书，提交军政当局商讨。

△　第九十三军一部克复桂境兴安城及东亚村、富贵村、鸡坝山、南元村之线，并着各部队在原阵地酌留有力一部，保持与日军接触。

△　粤中日军第一〇四师团进袭广西梧州。其第二十二师团到达梧州南之岑溪，并继续向丹竹、平南前进。是日陷郁南、德庆、云浮等地。

△　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举行会议，李德全呼吁抢救战区儿童。熊芷要求政府增加儿童工作经费，供给生活教育的人才和教材。25日，会议闭幕，通过大会宣言及决议多项。

△　于斌在梵蒂冈会见天主教皇，被任为教廷行政官。

9月23日　何应钦告诉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谈判陷于僵局，主要是因为租借物资问题。史为了打破僵局，起草了一份建议书交赫尔利，提出："派我去延安向共产党提出以下建议：a、共产党承认大元帅的最高权力，通过我接受命令。b、在黄河以北使用共产党部队，与中央政府不相接触。c、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支援。d、使这些共产党的师始终保持充分的实力。e、国共双方在打败日本之前停止讨论政治事务。"租借物资交大元帅按以下原则分配：驻印军与远征军有第一优先权，共产党部队有同等优先权。

△　桂境第九十三军第十师除留有力一部于原阵地与日军接触外，主力于黄昏后移占兴安、畔塘、鸡坝山之线。

△　廉江方面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经石角、陆靖圩、黎村等地向北进犯，是日攻陷广西容县，守军第一五五师向北转进，沿陆川、郁南道依次阻击日军。

△　山东八路军一部进击泰安天宝寨日伪军，俘伪大队长以下433名，毙日军九名。

△　据中央社讯：湘桂战区扩大后，灾民纷至金城江及独山一带，颠沛流离。国民政府特饬财政部拨款2000万元予以赈济。

9月24日　蒋介石与赫尔利会谈，蒋告之已决定要求召回史迪威，因史向他递交最后通牒，严重损伤了他的威望。若任命史，中国军队将会叛变。蒋将回复罗斯福的信函交赫，赫认为措辞对罗不敬，要求修改。蒋当晚重新修改后又交赫。回函中坚决反对给史以指挥权，但愿意接受另一位美军人员来担任此职。

△　董必武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指出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为其自身性质所限，不能解决积极配合盟邦反攻的重大问题，但由于时局的迫切，国民党当局不能不在此次参政会上更加逼真地玩弄"民主"。在国民党这种"决策"下，这次参政会表现了一个特点：说

话的人多，而且说的比较露骨；其次这次参政会也提出并通过了一些好的议案，如加强中苏合作，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改善官兵生活，加强总动员，刷新政治等案。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此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的卑鄙伎俩”。社论正告国民党统治集团及蒋介石：“‘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彻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

△　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冯玉祥、邵力子、覃振、孔庚、邓初民、屈武、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申府、章伯钧等500余人集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沈钧儒发起成立重庆民主促进会，并提议钟天心、王昆仑、司徒德、屈武等为筹备人，当经大会通过。

△　桂境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4000余人，附炮10余门，大举进攻兴安东北之八甲村、界首之线。25日，第九十三军与日军在五旗岭、飞龙殿之线激战终日，成对峙状态。

△　粤中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一部陷罗定县城。

△　纳尔逊携带与蒋介石商定的《中国工业力量计划书》自重庆返抵华盛顿。

9月25日　蒋介石再度召见赫尔利和宋子文，嘱赫向罗斯福转达下列三点意见：“一、我国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

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　蒋介石以“备忘录”送赫尔利并转电罗斯福，称：史迪威在华两年间，对于中美合作极少贡献，拒绝畀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华军之重任，请“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予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

△　蒋介石电孔祥熙说明撤换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委。28日又电嘱孔勿在美要求任何接济，并令速行回国。孔接蒋25日电，于27日约见白宫助理霍普金斯谈话后，即于28日电告蒋，罗斯福有意召回史迪威，惟尚须与马歇尔商酌再复。

△　国民政府明令免李培基、陈诚河南省、湖北省兼保安司令职；任命刘茂恩、王东原兼河南省、湖北省保安司令。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设置兵役部，直隶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

△　伊朗首任驻华公使欧林沙抵重庆。

△　中国飞机制造公司在美国成立，邝炳舜为总经理，资本为50万美元。

△　美、英、苏世界和平机构会议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即为中国与英、美两国的会谈。

△　延安《解放日报》载：西安发动“清共”运动，特务机关设立监狱很多，仅柏树林公字一号，入狱者即达300人之多。

△　周佛海以《国民公论》杂志“捏造事实”、“诬蔑政府”、“煽惑人心”为由，令伪南京警察总监部查封，永远禁止发行。

9月26日　白崇禧偕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到桂境兴安视察阵

地，第九十三军代军长胡栋成面告兴安阵地过广，兵力不敷分配。白崇禧即指示以兴安城为搜索警戒据点，俾阵地正面缩小，并抽调一个团兵力至老堡村南北之线构筑预备阵地。

△　民盟等组织共同召集宪政座谈会。董必武在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国是会议，改组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　行政院决议免黎照寰国立交通大学校长职务，遗缺由吴保丰继任；免王广庆国立河南大学校长职务，遗缺由张广兴继任。

△　国民参政员张澜、邵从恩、李璜、刘王立明离渝抵蓉，对记者谈话，力主改变国民党寡头政权为各党派、无党派的联合政权。李璜称："国际的希望，国内的需要，均不能不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刘王立明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最迫切的是民主，要诚，要为公着想"，"最好是召集国民大会。"

△　史迪威致电马歇尔称："蒋介石对于进行（抗日）战争没有作进一步努力的企图"；"他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是中国统一和真正为抗日而合作的主要障碍。""我现在确信，蒋介石掌权一日，美国就不能从中国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会继续运用他的故伎与拖延，同时攫取贷款与战后援助，以维持他现有的地位。"

△　日本东京电台广播称，日本为开发华北和内蒙古的资源，将由日本矿务工业会社率金属工程专家20余人前往勘探。

9月27日　　毛泽东关于复张治中、王世杰9月10日给林伯渠的来信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由于美国的需要与国民党情况的危急，国民党急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解决问题，张、王10日信又最无理取闹，复张、王信原稿语气欠健，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故修改如另电。你们收到并交张、王后，请在报上发表，如不能发表，则印单张广为散发，并多送外国人。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林伯渠复张治

中、王世杰信，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指出：“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　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日军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

△　美国第二十轰炸机总队轰炸东北之鞍山、大连及河南之开封、洛阳。

△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以一直停泊在重庆江面上的航江浅水炮舰“柏年号”赠送中国，本日在王家沱该舰上举行隆重接赠典礼。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欧洲司司长梁龙、法国科科长郑向举等参加。新任舰长陈嘉桓率部登舰。

△　据中央社讯：晋南蝗灾严重，田禾被蚀，以晋城、高平、阳城、沁水等县灾情尤重，灾民达36万余人。晋省府及赈务办事处呈请行政院及赈委会设法救济。

9月28日　蒋介石致电白崇禧，拟调整第四战区指挥系统，由韦云淞指挥桂林防区之第三十一、四十六两个师。左地区部队由李玉堂指挥，右地区部队由杨森指挥。

△　桂境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自广西容县北进，分兵两路，一路与梧州之第一〇四师团协力攻击丹竹机场，与守军第一三五

师一部激战，至是日，因双方力量悬殊，丹竹机场陷敌。同日，另一路日军攻占平南。

△　军委会第一侍从室林蔚告诉史迪威，他推测麻烦出在共产党身上，若史不坚持武装共产党，蒋可能会同意对他的任命。史即建议暂不讨论使用共产党部队问题。

△　丘吉尔在下院报告世界战局，评论中国战局时称："尽管美国给予中国以丰实的援助，但那个庞然大国仍遭受了严重的军事挫败"，"这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烦恼的事。"10月3日，国民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中国东部军队之'过分援助'，自珍珠港事件至今，其实际数量不足供给英、美军队一个师作战力量一星期之用。""中国东部所得唯一外来切实之援助，乃为十四航空队之空中助战。"

△　美国旧金山广播电台称：中国只有蒋介石下定决心，改革现在政府之成分，形成联合政府，并把中共和其他党派团结到政府中来，中国的局面才能改变。

△　美国新闻处广播称："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

9月29日　　顿巴敦橡树园世界和平机构会议的第二阶段，中、美、英三国会议开幕，会商战后世界和平组织的有关问题。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发表演说，表明中国参加这次战后国际和平机构会议的目标，是希望维持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国的地位，并在这基础上同英、美合作。在成立新国际组织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有：一、成立一个有效的组织；二、保证这个组织所有成员独立自主及领土完整；三、经公正原则及国际法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四、本着促进和平的利益修订国际法，并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合作；五、中国能继续得到小国的同情；六、力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原则。

△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太行八路军入豫部队应以嵩山为枢纽，建立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派一部渡黄河，在水西开辟根据地。

△　八路军冀中第九军分区第二十四团、第三十四区队在肃宁、高阳、蠡县、博野县大队和民兵配合下，乘夜攻入肃宁县城，至30日下午1时，全歼城内守敌，并将城周围日伪据点全部攻克。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分区部队在河南辉县勒江口伏击“扫荡”日军，歼敌200余人。

△　据中央社讯：腾冲克复后，由滇西保山至密支那之国际通路已着手兴修。该线全长300余公里，由滇缅路工程局负责逐段兴工。

9月30日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河南发展各部队行动的指示，要求迅速加强水东地区的领导与实力，至少增派一个团，渡河向西发展，并控制泛滥区之大小洲。太行南进支队，应以嵩山为枢纽，在登封、密县、禹县、临颍、宝丰、襄城敌后建立根据地。

△　以孙科为会长、邵力子为副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会，讨论促进中苏邦交、沟通中苏文化问题，对参政会通过促进中苏邦交各案表示赞助，建议政府早日实施。郭沫若、林伯渠等先后致词，强烈呼吁为消灭法西斯、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　《中阿（富汗）友好条约》在土耳其京城换文。

△　汪伪政府任命王克敏兼任伪北京大学校长。

△　盘踞山西岚县东村的日伪军侵入西川蔡家庄，一部分老弱病残的男女躲在地洞里，约近50人。日军用毒气、浓烟熏死24人。接着日军又在边家庄纵火烧死村民20多人。

是月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向大会印发国共谈判双方来往的七个重要文件：1943年林彪在重庆所提的四项、1944年5月林

伯渠在西安签字的国共两党谈判记录、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致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的信（1944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8月30日）、9月10日张治中、王世杰给林祖涵的信。

△　周恩来致史迪威说帖，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正面战场，尤其是国统区存在着政治、经济、军事的空前危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化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所造成的”。我们坚决主张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二、“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持要求“制止这种内战危机”，以便将全国力量都投入抗战；三、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应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和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全数的二分之一”。

△　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完成出使中国任务后辞职，由柯鲁格继任。

△　史迪威发表声明，认为“蒋介石无意为抗战付出更大的努力”，“无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共同作战”。“中国统一和真正抗日的主要障碍就是他自己”。

△　教育部制定《从军歌》，鼓励知识青年从军，歌词为：“教崇射御礼乐，宏书数。六艺备成才，好男儿经文纬武。唐隆宋替，积弱近千年，黄龙取，金瓯补。黄龙取，金瓯补，还我河山主。龙蟠虎踞，龙蟠虎踞，五业恢明祖。总理覆清廷，建中华，群尊国父。总裁抗战，唤起我青年。从军旅，争先赴，从军旅，争先赴，万里长空舞。”

△　因战事影响，国立河南大学迁至荆紫关，广西大学迁往融县，中山大学文、理、师各院迁临武，法、工、医各院迁东陂，农学

院迁坪石。

△　皖省自5月以来连遭旱、蝗、水、风四灾袭击，受灾达30余县，其中以宿松、六安等13县受蝗灾、太湖等县受风灾尤甚。

△　鄂省自6月以来遭受蝗、风、雹灾，灾民达8.2万余人。

10月

10月1日　宋子文通知赫尔利，蒋介石已收到孔祥熙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称：霍普金斯告诉他，罗斯福已准备接受蒋的请求，召回史迪威，另派一美国官员代替史。同日，赫将此消息转告史。

△　新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偕民政厅长邓翔海、秘书长曾小鲁离重庆抵迪化履新。

△　重庆数千人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黄炎培主祭，郭沫若致哀词，称邹韬奋“生前致力于民主、团结和进步文化事业，他是为民主而死的”。沈钧儒、林伯渠、褚辅成等致词，力争民主自由，呼吁向法西斯进军。

△　八路军一部攻克河北平谷县城，毁敌碉堡10余座。

△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一部攻克兴隆县日伪军重要据点前苇塘，歼灭讨伐队100余人，击毙日军副大队长增田茂。

△　广西兴安失陷。日军第五十八师团进攻兴安，守军第九十三军与敌激战竟日，不支，乃放弃兴安，退守大、小溶江附近。

△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一部陷湖南常宁。

△　美国务卿赫尔接见记者，对国民政府发言人9月29日声明中提到美国对华作战援助都是很少一节表示遗憾，并称：这不是美国缺乏

合作精神，只是由于空运的实际困难。

△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说：今年1至6月，新四军作战1000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1.1万余支，攻克敌伪据点420座。7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13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1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以上。

△　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成立，陈公博、熊剑东分任司令和参谋长。

△　伪蚌埠绥靖主任公署及安徽保安司令部成立，罗君强就任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

10月2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上讲话，指责美国在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上侵犯了中国主权，是新型帝国主义，并声称不怕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援助。

△　对外贸易货物委员会函告行政院，第三次中苏信用借款交于中国的兵工器料、汽车、飞机等物资，价值4.8982亿美元。

△　新四军军部召开该军成立七周年纪念大会，副军长张云逸、代政治委员饶漱石等致词。大会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国民政府，组织真正的国民联合政府；改组失败主义的统帅部，成立坚决抗战的联合统帅部；驱逐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等失败主义者；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民选政府；立即释放叶挺军长。

△　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全体官兵电唁邹韬奋，对邹逝世表示哀悼，决定在全区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并呼吁民主自由，革新政治。

△　湘境日军第三十七、第一一六师团自衡阳方向向邵阳攻击，守军第二十四集团军一部与敌激战三日，战力不敌，是日邵阳城终告失陷。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外籍记者离晋西北，渡黄河返延安。

△　顾维钧在中、英、美三国世界和平会议上提出14个问题，英、美两国代表分别予以答复。下午，起草委员会及三国军事专家分别详细讨论中方提出对草案应补充各点，美、英接纳三点：一、处理国际争议应注重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二、国际公法的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三、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

10月3日　林伯渠致函张治中、王世杰，指出：目前国内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造成这些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一党独裁制度。因此，克服时局危机，挽救国家民族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新政策。要求国民政府按中共所提方案，承认打日寇有功之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及一切抗日的军队，承认他们收复的国土。指出：目前国内还有一部分人在继续准备打内战，而且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愈益加紧。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对日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的目的。对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表示将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表示欣慰，对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表示欢迎。仍请张、王到延安一行。至于延安是否派负责代表到重庆事，林伯渠答复说：这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　军事委员会就丘吉尔9月28日在英下院发表演说中谓，虽有美国过分援助，中国军事仍遭受严重挫败之事，发表声明予以澄清，并说在缅北彪炳战绩的记录中，中国先人后己，仗义增援，宁受其东部一时之失败于不顾，此种事实自有公论，不计较一时毁誉。

△　国民政府令派李迪俊为庆贺古巴国新总统就职典礼专使。

△　国民政府晋予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一等云麾勋章。

△　中国进出口贸易协会在重庆成立，由邹琳主持。

△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向人民申诉！向世界控诉》，抨击丘吉尔9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指出中国曾得到苏、英、美三大友邦的援助，而同时也遭受过英国封锁滇缅路的苦难，也挨过以美国钢铁造成的炸弹、以美国汽油驾驶来的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指出：美国《租借法案》的供应，中国确有一份，中国所得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英国则所得占30％以上。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举行时事座谈会，到会各党、各派、各名流人士均作了发言，集中对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等问题进行讨论，一致要求立即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

△　罗斯福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丘吉尔所说美国对中国的过分援助和中国军事委员所说美援“数量之少出人意料”问题，发表正式声明，称：“美国对华空运物资，一年前每月二三千吨，现在每月增至二万吨，仍感不足。”“其运输总量的大部分，除供给陈纳德超级空中堡垒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供给中国军队。”罗斯福对国民政府军事发言人10月3日声明中“美国予我援助数量之少出人意料”之语表示遗憾。

△　日军独立步兵第十旅团一部对八路军太行第二分区和顺县之横岭、双峰地区“扫荡”。同日，“扫荡”林县、辉县之日伪军撤退，八路军歼敌700余人。

△　顾维钧、魏道明、商震谒罗斯福，建议成立六个国际委员会，处理经济协定、劳工社会福利和国际法等问题。

10月4日　孔祥熙与罗斯福会商中国战局，认为日军在中国境内发动新攻势目的有四：一、鼓动士气。二、建立通往南部占领区之陆上交通线。三、阻止美机自中国机场出动轰炸。四、阻挠美国打通中国海港，从而以大量物资供应中国军队之计划。孔又称：美国援华空

运物资大部分供给美国空军所急需，“中国军队所得者数量极微”。同日，罗斯福告孔，美国准备召回史迪威。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记者询及国民政府对成立联合政府有何意见，行政院发言人张平群答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也不拟讨论。10月8日，新华社发表述评，指出张的发言是对一切爱国同胞及盟邦人士一致呼声的蔑视。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广西省、绥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议员名单：广西省议长李任仁，副议长陈锡珖，议员陈雄、马保之等36人；绥远省议长张钦，副议长阎肃，议员张登鳌、印明星等190人。

△　秘鲁新任驻华大使贝多雅、伊朗首任驻华公使纳塞尔向蒋介石递交国书。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纪念“双十节”发表纪念口号，主要有：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收复一切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　成都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五大学的七个学校团体在华西坝体育馆共同举行国是座谈会，到会者2000余人，到会者一致呼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六、八分区各一部攻克河南博爱北之汉高城、柏山镇、坛庙等日伪军据点，歼灭伪河南保安第一师300余人。

△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称：“日本当局已发表声明，日军目前在中国的作战是针对英、美军队，而不是重庆。”“日军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消灭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空军。”

10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部分改组新疆、湖北省政府：任命邓翔

海、彭吉元、许莲溪、佘凌云、周昆田、张宣泽、阿西木、太平、加里木汗、于达为新疆省政府委员，任命邓翔海、彭吉元、许莲溪、佘凌云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任命钱云阶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　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代表陈光甫、卢作孚、范旭东及顾问王志华离重庆赴美。

10月6日　罗斯福复电蒋介石，对蒋介石取消对史迪威的任命表示“惊讶和遗憾”，认为中国局势的恶化，使美国政府不能再承担任命官员指挥中国军队的责任，表示“接受阁下之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之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务；但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之训练指挥，则仍交史迪威管理”。

△　河北文安县伪军柴恩波部2330余人出犯至安祖店，八路军及地方武装一部急袭，毙伤40余名，俘伪大队长等以下168名。

△　据中央社讯：日军犯广西全州，万余民众逃匿山洞中，被敌包围纵火焚烧，逃出者剥衣枪杀，遇难者逾半。

10月7日　中、美、苏三国顿巴敦橡树园会议结束，通过《国际和平组织及机构计划大纲》，并发表联合声明。顾维钧发言，希望中、美、英、苏四国会议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三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业已议定国际组织与机构之计划大纲。”

△　蒋介石与赫尔利续谈撤换史迪威之事。蒋表示：“史迪威将军既不能服从余之命令，又缺乏与中国合作之精神，故不能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其继任人选，惟有请另派来华。”赫氏认为撤换史迪威只可说“此乃仅对史迪威将军个人不赞同，而词意之间，不致得罪罗斯福大总统”。蒋表示同意。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玉堂为第十军军长。

△　奉命固守广西平南县之第四〇五团团长曹震，于敌骑犯境之际，擅自放弃阵地，失地辱国，经军事当局判处死刑，是日晚在前线执行枪决。

△　据中央社讯：湘省耆绅郑家溉于日军犯湘乡时为敌所俘，劝其出组伪维持会，郑氏骂敌不屈，遂遇害殉难。湘省府给予特恤五万元，旅渝湘人程潜、章士钊、何键、贺耀组等发起举行追悼大会。

△　苏鲁战区挺进第十纵队王洪九部在山东临沂投降日军。14日，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二分区出师讨王，毙王部官兵40余名，俘虏200余名。

△　日机10余架夜袭四川后返掠陕境，在南郑、西乡、汉阴及西安市郊投弹。

△　美陆军部发表援华物资空运情形：印华区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最高峰到中国空运的物资，一个月中达4600万磅，包括飞机、军需品、汽油、卡车、吉普车。

△　法国驻中国政府经济代表毕威廉抵重庆。

10月8日　延安评论家就国民政府发言人驳丘吉尔在下院报告发表评论，指出国民党当局把他失败的责任推诿给盟国，认为是由于同盟国对华物资援助不足，于丘吉尔对国民党当局所遭受的严重军事挫败“极大遗憾”表示不满。评论强调国民党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官僚主义的寡头政治不加以根本改变，再多的援助也是无济于事的。

△　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举行座谈会，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李璜出席。李璜称“要实现民主政治，就要有真正的民意机关”。与会者提议立即发动组织各种职业的民主组织，发动全民的民主运

动，扩大民主宪政促进会组织等，当经会议通过。

△　顾维钧在美国接见中央社记者，宣称“新国联能行使有效之职权，因为责任集中在大国，世界武力将以大国为主要组成分子，还打算设立国际空军”。强调中国“所提各项建议，非纯以国家性之原则为出发点，系以世界观点为根据”。

△　重庆《大公报》载：地主、绅富献粮献金办法业由财政、粮食两部草成。地主献粮以其收益累进，50亩之户献总收益5％为起点，累进至收益25％为最高点。献粮献金总额预定为400亿元。

△　广西省政府为应付非常，加强自卫力量，成立广西省民团指挥部，以张发奎为总指挥，黄旭初为副总指挥。划全省为17区，由各专员和遴员任区指挥。

△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一周年，是日，陈纳德致函中美混合大队司令莫斯，报告该部一年来之战绩：出击5000余次，击毁、创伤敌机420架，击沉敌船1305艘，击毙敌军5.7万余名，军马7310匹。

△　史迪威对美广播声明：中国西南部怒江区域及缅北之美、英、中军队，刻已进至利多公路与旧滇、缅衔接处，其结果将造成通往中国更佳之供应路线。

△　日伪军千余对八路军太行区第四分区黎城庄苗、北庄镇地区“扫荡”。

△　陈公博、周佛海决定派朱文雄去重庆，向蒋介石送交日本关于实现中日全面和平的条件。14日，朱文雄离上海，转道去重庆。

10月9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美、英、苏和平会议通过的《国际组织建议案》，凡12条，内称国际组织名称：联合国。国际组织之宗旨：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有效及集体步骤，防止并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二、发展国际友谊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步骤，以加

强普遍和平；三、在国际经济、社会、人道等方面，求国际之合作；四、在一定时期内，以本组织为中心，协调各国行动，以达上述目的。国际组织之原则：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各尽其责，保障会员国权利与利益。主要机构有：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及秘书厅。

△ 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坚决拒绝给予史迪威以任何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声称不仅不信任史，而且对他的军事能力也无信心。认为史虽然收复了密支那，但对几乎失去整个华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蒋介石致书美国援华总会，并告美国热心援华人士，对其七年来从精神上物资上援助中国抗战，表示忠诚之感谢，并愿两国同声相应，造福于人类，贡献于世界。

△ 国民政府特派王宠惠为中国出席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代表。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表《告全国青年文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提出“丢下书本，背上枪炮！”“丢下职业，跨入军营！”“出了学校，走上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

△ 晋察冀边区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到会百余人力主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挽救危局，惩办法西斯分子、失败主义者、投降派和卖国贼。

△ 第四战区为保卫桂林、柳州，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其作战指导方针为：战区以确保桂柳之目的，以必要兵力固守桂林，另以有力一部，配置于桂平、江口附近地区，相机先行击破西江方面之敌，主力控置于阳朔、荔浦、修仁间地区，乘敌深入，于荔浦、平乐间地区包围歼灭之。

△ 重庆《大公报》载：日军占洛阳后，初改洛阳为浮阳，认为

欠妥，复于最近改为福阳。在洛阳之日军大量收买废铜碎铁，连同城关之军需物资、工业器材，被运走一空。

△　据中央社讯：前甘肃省会宁县长王一恕、前张掖县长张戈、前甘谷县长戴海林，庇纵贪污、囤积居奇、扣发公粮，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2年、15年。

△　美海空军联合行动，开始连续袭击台湾日军基地。至14日，击毁日机600余架，击毁、击沉日舰70余艘。

10月10日　　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联合举行国庆纪念典礼，蒋介石及党政军500余人参加。同日，重庆各界1500余人举行纪念大会，并分别电慰前方将士及沦陷区同胞。下午7时，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演，勖勉全国军民于时局艰难困苦之际，奋勉自强，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后的奋斗，来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

△　蒋介石电告孔祥熙，说罗斯福于本月6日给蒋的复电仍要求留史迪威指挥我滇、缅军队，对此蒋已复电罗，坚持要求撤换史，说无论其派美军官指挥中国全线军队或滇、缅一部军队，我都可接受其建议，但其人选必须为我信任而能与中国合作者。如孔在美以此事为难，可置之不问，以蒋未有通知来推托。

△　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双十节”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作题为《如何解决》的重要讲话。周恩来说，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错误的失败主义和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政策，致使国民党战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域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他指出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正面战场却节节败退，而敌后战场是节节胜利。正面战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政策所造成”，“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

所造成”。周恩来在讲演中强调：挽救目前危机的惟一正确方案是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他要求国民党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并且指出中共所提出的12条与委托林伯渠口头提出的八条，“仍应成为今后国共谈判的根据”。希望张治中、王世杰能到延安“观察和谈判”。他急切呼吁，时机太紧迫了，希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抓住关键，扭转时局。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一、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二、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权，实行民主。三、确立亲邻的外交政策，加强对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四、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及政策。五、革新目前的教育、文化政策。

△　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及昆明各界6000余人举行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闻一多、李公朴等相继发言。大会发表宣言，响应中共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提出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保卫大西南的主张。

△　复旦大学师生千余人举行国庆纪念晚会，检讨目前时局，教授张志让指出：“唯有刷新政治，团结全国，抗战危局方可克服。”教授周谷城指出：“在这空前危机的时候，应该团结各种力量，才能渡过困难，但这就必须首先实行民主。”学生发言指斥正面战场的溃败局面及大后方的黑暗统治，喊出：“要大胆的说话，勇敢地行动。”

△　孙科发表《民主世界中的民主中国》，认为建设国内民主的条件，须有四个起码的条件：一、人民基本自由的法律保障；二、民间政治团体的合法存在；三、军队武力的绝对国家化；四、国家行政的完美无缺。

△　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防守桂林，是日策定作战计划，其方针为：以确保桂林之目的，以主力固守城北要点及杉湖、榕湖以北城区为核心阵地；以一部固守近郊各要点，掩护核心，采取持久防御，吸引胶着敌人于桂林近郊，俾与我外线兵团协力合击敌人而歼灭之。

△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攻击缅北八莫的作战命令：一、本军分三纵队于10月15日开始，向南攻占印道、杰沙、瑞古之线而确保之。二、英军第三十六师为右纵队，10月19日以前肃清和平之敌，占领英杰、印道地区而确保之。三、新六军之新二十二师为中央纵队，于10月19日到达和平，22日前肃清和平之敌，经摩面前进，占领伊洛瓦底江以南之瑞古地区。四、新一军为左纵队，迅速向八莫推进，击灭或包围八莫至曼西地区之敌。五、第十四师、第五十师及美军第一四八团为总预备队。六、暂编第一战车队为本军机动部队。

△　美海空军特种部队联合袭击台湾日军基地，毁日机221架。12日又袭，击落日机百余架。

△　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认为他与蒋介石矛盾僵局的症结在于蒋介石无意作出任何自愿的军事努力，要求召回他不过是蒋介石的拖延策略。

△　纳尔逊在美国援华总会报告访华经过，认为中国的情势“非常严重”，“这不但和中国人民而且和每个美国人有重大的关系”。

10月上旬　　戴维斯建议罗斯福、马歇尔“将在欧洲战场掳获的武器拨给共军使用，令其攻夺江南地区，而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报酬”。此即所谓“戴维斯计划”。

△　河南延津、新乡伪自卫军一部300余人向八路军反正。

10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召集三青团及有关部门，各省、市政

府、党部、团部、教育界人士召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通过如下决议：一、成立远征军，名额10万人，从军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二、征集时间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1月1日至3月底。三、10万人编成10个师，分驻贵州独山、扎佐，四川绵阳、成都、万县，陕西汉中等地。四、全国设立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省、市、县设立征集委员会。会议14日结束。

△　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救济总署发表战时救济计划，请联合国在中国所需经费总额35亿美元中，拨九亿美元以上之数供救济之用。要求总署派遣专家2300人赴华，协助进行复兴经济工作，并供应中国4.61亿人民之日常生活必需物品。

△　新华社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指出：蒋介石的双十节演说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这就说明了蒋介石坚决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仇视中国共产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为此，评论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认清中国的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

10月12日　　立法院会议通过《兵役部组织法》，规定该部直隶行政院，兼受军事委员会指挥监督，掌管全国兵役行政事宜。下设役政、征补、国兵、总务、人事、督察等处。2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周恩来同谢伟思在延安会谈。周指出：蒋介石10月10日的演说标志对中共态度又趋强硬，眼前不存在国共谈判取得成果的希望，也不存在所许诺的改组政府的希望；政府必须全面改组，共产党人将会仔细考虑任何建议，并不一定就是拒绝。

△　董必武电告中共中央，报告目前美、蒋关系，称：从6日蒋介石约孙科等谈话透露，中美商谈濒于破裂。蒋说，史迪威袒共，要求

美国撤换史迪威，还说美国压迫已超过极限。

△　桂境桂平、蒙墟失陷。广西平南、丹竹之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到达桂平郁江东岸后，于11日强渡郁江，守军第一五五师仓促迎击，阻敌不力，日军分头由官江、社步、夏湾等地渡过郁江，向桂平城进犯，与守军巷战，桂平遂于是日沦陷。同日，由社步、官江渡江之日军突破守军沿江之警戒线，与第一五五师主力在蒙墟血战至晚，该师伤亡过重，奉命西移至官桥。蒙墟亦告不守。

△　日伪军万余人分别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分区之长清地区，九分区之南乐、清丰、濮阳地区，十分区之曹县东北地区“扫荡”。至31日，被八路军击溃，收复日伪军据点30余处。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委员会，任命褚民谊、罗君强分别为正、副委员长。

△　美国《新政治家》周刊社评批评国民党“日益反动且多束缚”，认为“中国内部的经济及社会情形较之日本更为可怕”，但有希望的一件事是：随着军事危机的增长，将如同战争初期一样，政府被迫依靠人民的力量。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李门宣布，任命吉塞为中国分署主任，并负责成立分署。

10月13日　　林伯渠致函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明确表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

△　赫尔利就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致电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介石则谋屈服，而史迪威之误，想屈服一

革命家。”“窃以为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介石，甚至还可能失去了中国。”并请罗斯福派与蒋介石能够合作的年轻将领来华。

△ 国民政府为完成地方自治，通令全国各县、市一律裁撤县政府军事科，或市警察局之军事科，其一切业务归并国民兵团办理（按：国民兵团为地方自治系统中之治安力量，由保甲及乡公所直接指挥）。

△ 新疆同乡会发表对宪草的意见，请确定新疆民族为突厥民族；在宪法中规定突厥民族自治之条款；增加“中华民国疆域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社会、语言、文字各方面一律平等”等条款。

△ 第四战区策定桂柳会战作战计划，其方针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柳州空军基地为目的，决以有力兵团于荔浦、桂林各附近地区，拒止湘桂路及龙虎关方面之敌，以优势兵力集结于武宣东南附近地区，先击破西江之敌，以利尔后作战。西江方面会战日期，预定10月20日以后。

△ 晋绥边区各界人士举行国是座谈会，呼吁驱逐国民政府中的法西斯分子、投降派和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美国新闻处广播中国局势，认为中国有改变局势的必要，最好的办法是迅速组织联合政府。

10月14日 蒋介石致函罗斯福，建议在帕资、魏德迈、顾律格三名美籍将领中，选一人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 国民政府明令修正公布《战时管理进口出口物品条例》。

△ 白崇禧发表《告桂民书》，要求年龄在10岁至45岁之壮丁加

入民团，每乡成立一大队，每县集中使用一至三个大队，由县长兼民团司令，统归黄绍竑指挥。

△　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成立，何应钦、吴铁城、陈立夫、张治中、白崇禧、陈果夫等为常务委员，张伯苓、莫德惠、蒋梦麟、顾毓琇等为委员。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中条山阵地，建立沁河豫北基地的指示》，要求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是豫北之沁阳、济源、孟津等县，山西之垣曲、平陆、芮城三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联系。

△　毛泽东、朱德发布《关于华北准备反攻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应尽量消灭伸入抗日根据地的日军及其小据点，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并利用冬季认真练兵，以准备敌人严重的“扫荡”。

△　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向监利社记者谈中国局势，认为近来有人主张发动各种政治社会势力共商国计，“其结果将造成克伦斯基式政府，而陷中国于大乱之局面”。

△　史迪威飞赴柳州，同白崇禧、张发奎共商反攻的计划。下午飞成都。15日返重庆。

△　桂境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一部300余人沿湘桂公路向大溶江警戒线阵地进攻，渡河之际，守军新编第八师第二十二团乘机攻击。下午，日军突入大溶江阵地，与第二十二团激战，该团伤亡较重，旋退守大溶江。同日，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另一部陷松江口。

△　日本任命西春彦为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

10月15日　　战后建设协进会在重庆成立，选吴铁城、潘公展、

杨虎、吴开先、吴蕴初、姜豪、卢绪章等31人为理事，俞鸿钧、韦以黻、毛应祥、龚学遂等九人为监事。

△　军事委员会任命甘丽初为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九十三军军长。

△　《国是》月刊社举行国是座谈会，胡秋原、龚德柏、孔庚、莫德惠及文化界180余人出席。与会者认为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应力求普遍，要人应送子入伍，以为表率；国民总动员应以实施宪政为先决条件，实施宪政，应从地方自治着手。

△　美国政府宣布在《租借法案》下拨款训练中国各项技术人员1200名，其20％计240名由考选委员会考选，11月分别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举行考试。

△　柳州《大刚报》迁贵阳出版。

10月16日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编练计划等，并决定各省、市征集额：一、200人至1000人以下者西康、青海、宁夏。二、1000人至2000人以下者甘肃、浙江、云南、重庆市。三、2000人以上3000人以下者贵州、湖北、广西、安徽、江西、广东。四、3000人以上4000人以下者湖南、陕西、河南、福建。五、四川为8000人。

△　第四战区为保卫桂林、柳州，下达第二号作战命令，其要旨为：战区以确保桂林及柳州空军基地之目的，决以有力兵团拒止由龙虎关方面及湘桂路进攻之敌，以优势兵力集结于武宣东南地区，先击破由西江进犯之敌，俾利尔后之作战。

10月17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与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首次会谈。在林、董首先陈述了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等问题

上的严重分歧和中共中央对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之后，赫尔利说：他约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中国现政府不民主，等等。董、林在致中共的电报中指出："蒋见我态度强硬，怕我们不承认他是抗战领袖。"

△ 1944年度后方经理会议开幕，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并致词，说此次会议将就加强经理权责、迅确查报人马、核实发放薪饷、按期依法报销、彻底革除积习等中心项目，研讨具体方案，以配合整军作战要求。

△ 陈光甫率国际通商会议中国代表团离重庆赴美。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分区一部配合地方部队攻克山西翼城北常镇伪军据点，攻克碉堡12座，毙伪军中队长以下30余名，俘伪大队长以下56名。

△ 桂境占领大溶江之日军经连日袭击，顿呈不支，新编第八师第二十二团是日以空军及炮火掩护，奋勇攻击，攻克大溶江，将敌驱至江边。

△ 日军大举进犯河南长垣县前后小渠一带，惨杀民众690余人。

△ 汪伪行政院举行会议，任命孙福基为杭州市市长，并决定将首都警察总监署直隶于内政部。

△ 中央社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设立献铜献木委员会，将北平故宫明代铜缸66只，铜炮三尊，准备献敌。另以天坛、先农坛、西山等处古木编号砍伐备献。

10月18日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决定正式宣布召回史迪威，并针对蒋指责史反攻缅北得不偿失进行辩护，称反攻缅北是由英美联合

参谋委员会作出并得到丘吉尔和罗本人批准的，是为维持中国供应线所必须进行的。重申美国不再为中国部队作战承担指挥责任。

△　赫尔利与林伯渠、董必武再度进行会谈。赫尔利称：蒋介石在10月15日与其谈话时专门说，他个人对中共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但部下还不明了。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在军事领导机关中也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军事物资也不应偏于哪一党派。他计划先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董谈，得出两党合作的初步结果后由他同蒋介石商量，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介石、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盐专卖条例》，规定：食盐未经政府许可，不得擅自制造；产盐区及每年产盐数量由政府统一规定；制盐人未经许可不能停业；成品盐必须于限期内交存于政府指定的仓坨和其他指定地点，由专卖机构收购；盐的运销由专卖机关办理，价格由财政部核定。

△　军事委员会制定《陆军官佐退役俸给与办法》，规定一次给予退役金额，上将为19.2万元，中将12万元，少将7.68万元；上校5.06万元，中校4.08万元；少校3.24万元；上尉1.92万元，中尉1.44万元，准尉7680元。

△　据中央社讯：1943年度田赋征实最后核定总额麦谷6316.867万市石，已征收6356余万市石，超额1％以上。新、闽、皖、赣、桂、甘、宁、湘八省皆超定额，绥、豫、粤、川等省达预定目标。

△　占领桂境蒙墟之日军以步兵千余，附炮二门，向第一五五师之清泉、官桥、全塘阵地进犯，该师起而迎战，至午后敌未得逞，仓惶回窜，守军乘势追至石塘附近，是役共毙敌百余名。

△　纳尔逊在中美工商协会理事会演说，认为中国“目前最要紧的

是增加生产”，并称“美国正考虑派遣工商界代表团前往中国，和中国领袖会商加强政府的谈判问题”。

10月19日　　下午，赫尔利谒见蒋介石，转达罗斯福最后决定召回史迪威的电报：“余现在颁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及指派魏德迈。目下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应分二——中国为一方面，印缅为另一方面。印缅区由索尔登中将指挥，中国区由魏德迈指挥。陈纳德将军之第十四航空队仍留中国，受美军司令魏德迈之指挥。”

△　史迪威接到马歇尔来电，获知召回他的命令已下达。同日，史约见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爱金生，向他们介绍了围绕指挥权问题与蒋介石斗争的经过，指斥蒋介石“从来不想打日本”，“这场战争中每次犯下的大错误都可以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找到根源”。

△　桂境第四战区为击破桂平方面之日军，命令第三十五集团军各部队于是日作好攻击准备。命令第六十四军于20日晨开始向蒙墟之敌攻击；命令第十六集团军以一部向桂平之敌攻击。

△　新四军鄂豫皖湘军区成立，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兼军区司令员，郑位三兼任政治委员，刘少卿兼任参谋长。

△　重庆文化界人士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茶会，宋庆龄、沈钧儒、茅盾、孙伏园等出席。孙伏园发言称赞鲁迅“爱人民，爱自由，爱民主，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深爱的”。

△　国立西北大学教授兼北平文治中学校长郁士元决心投笔从戎，前抵重庆准备入营训练，蒋介石是日召见郁，对其从军志愿备加赞赏，唯念郁士元年已逾龄，特令担任政治工作，以示慰勉（郁为大学教授从军者第一人）。

△　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程天放在校报告知识青年从军，即遭学生反对，大部退出会场。20日，该校训导主任徐志明组织人员拘捕学

生16人。

△　据中央社称：女性青年从军后，拟组织服务队，随同青年远征军担任政治工作及医务工作。初期计划征集2000人。

10月20日　　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一官员向史迪威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史通过一美国官员拒绝接受。下午，史迪威由赫尔利陪同向蒋介石辞行，蒋对史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们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同日，史向宋庆龄告别，并电告朱德，"以不能共事为歉"。

△　蒋介石电复罗斯福，完全同意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授予索尔登以指挥在缅华军之全权，"唯如缅甸战略与所在中国部队有关时，索尔登应与中国战区统帅随时协商"。

△　军政部制定《优待知识青年从军办法》，凡八条，要者为：保留职务、学籍；薪津照发；入伍前奖金；留学考试优先录取。

△　军政部开会讨论兵役问题，提出兵役之要项为充实抗战兵员，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改善新兵待遇及革除兵役弊端等。

△　第六十四军下达攻击桂平、蒙墟日军的命令。第一期攻击目标为乌阳村、500高地、蓝山、猛风坳之线，重点攻击指向500高地；第二期攻击目标为西山南北之线至桂平城，攻击重点指向桂平城。攻击时间为10月22日上午8时。

10月中旬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经调整部署后，以主力向三宣坡、庙房坡、锅底坡、双坡攻击；以荣一师向观音寺、红土坡攻击；以第二〇〇师由左翼攻击篱芭坡、一碗水至张金山一线，与第三十六师共同封锁龙陵城区日军。

10月21日　　国共双方应赫尔利要求，分别提出国共合作书面原

则。国民政府坚持军令、政令统一原则，必须是中共先将军队缩编，听受军事委员会指挥，而后方可议及中共军队保留数目；在政治方面愿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并开放政府某些职位予中共党员。中共则坚持基本政策及政府人事的改革，结束一党统治，召开国是会议，由全国各党派代表组织联合政府，承认占领区的中共部队及其政权。

△　内政部为考核各省、市1944年户政，决定组成户政督导团，前往川、康、滇、贵、陕、甘、宁、青、鄂、重庆等省、市实施督导，并在兰州、成都、昆明三地召开户政实施会议，由部长周钟岳兼任团长。

△　华北联大举行时事座谈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罢免陈立夫等，保障大后方青年学生的思想、学习、言论、集会自由，改善学习生活。

△　桂境第六十四军各部以飞机多架为掩护，向蒙墟方面推进。第一五五师在炮兵支援下，攻占古城、古狂之线，日军第八十四联队退据500高地西麓一带；第一五九师占小东村、良秀村一带，对蒙墟形成包围态势。第一五六师亦向兴隆推进。军指挥所进至古铜村附近。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以第一一三团为前导，向八莫方面攻击前进，主力分两纵队前进。其右纵队于27日进抵太平江北岸之大利。

△　史迪威飞离重庆。22日飞抵滇西保山，会见美军驻中国远征军总联络官多恩准等官员，向七名联络飞行员授奖。旋又飞抵缅北密支那。11月2日，回到美国。

△　美国政府任命赫尔利代替高思为驻华大使；任命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

10月22日　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告勉“全国同胞互相督促，父谕其子，兄勉其弟，妻劝其夫，朋友相规，师生相勉，藉以志愿从军为光荣，以规避兵役为耻辱，恢复我民族尚武的德性，改造我们社会颓靡的风气”，“整我军旅，而灭彼敌寇”。

△　军事委员会公布《知识青年从军办法》，凡八条。规定：知识青年（男性）年满18岁至届满35岁，曾受中等教育，体格健全者，均得志愿参加。女性青年征集办法另订。数额暂定为10万人。集中时间，自1945年1月1日至3月底。服役时间为两年，期满退伍。

△　第六十四军军长张弛指挥所部在步、炮兵协力下，向桂境蒙墟方面日军发动攻击。第一五五师攻占苏塘村、新龙、林村，日军退至该地东侧高地一带；第一五九师攻克良秀村以北村落之大部。桂绥第一纵队攻占新德村、新洞村、沙洞之线，日军向岭脚、赵李坳退却。

△　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一部攻克苏北日伪屯垦区重镇合德镇，全歼日伪守敌800人。

10月23日　赫尔利同林伯渠、董必武举行第三次会谈。赫尔利称：蒋介石10月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　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驻重庆代表，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临时政府。同日，美、英、苏三国亦同时正式予以承认。

△　国防最高委员会特任鹿钟麟为兵役部部长。24日，鹿对记者称：役政改革“须从治本、治标两方面着手，治本要以认真的精神研讨釜底抽薪的计划。治标要彻底查出目前役政中的弊病，对症下药，扫除一切病象”。

△　军事委员会任命傅立平为暂编第九军军长。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知识青年从军问题》，指出：目前开展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当局认为是“挽救危局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实，挽救目前危局最根本、最重要的办法，“是政治上有一个全面的彻底的革新”。我们认为“知识青年从军，不失为提高军队素质和作战力量的方法之一”。

△　据中央社讯：重庆市保甲整编办理完竣，全市计有18区，408保，7177甲，16.9127万户，人口100万以上。

△　桂林方面第六十四军各部继续向日军攻击，第一五九师攻克永和乡、良秀村间六个村落据点，并向蒙墟外围迫进。第一五五师攻克500高地，日军残部退至东北方向。旋盟机多架助战，该师为策应第一五九师作战，乃将主力转向蒙墟、罗扬村实施攻击。

△　桂境郁江右岸之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一部由社步渡江，进至曹村附近。邓龙光得悉敌情，即令第一八八师派兵进出镇隆乡附近，策应第六十四军之作战。

△　桂境第十师及新编第八师之第二十四团克复松江口，第十师以一部将日军尾追至界脚底附近，毙敌第五十八师团第一〇六大队长今掘少佐以下400余名。

△　新四军一部在南京、溧阳间对日伪军展开攻势，激战竟日，歼灭伪第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全部，俘伪团长以下官兵600余名，毙伤日军40余名。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外国记者离开延安，回到重庆，结束了历时半年的参观访问。

10月24日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国立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等24校院长联

名电呈蒋介石，表示拥护知识青年从军，指导青年踊跃应征，以雪国耻。同时通电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望能一致倡导，发动全国知识青年从军。

△　国民政府特任保君建为驻秘鲁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任李骏另有任用，应免本职。

△　重庆《中央日报》载：发动女青年组织军中服务队办法，已经知识青年从军会议通过，要点为：一、对象：18岁以上、35岁以下受初中以上教育的健康女青年。二、人数：暂定1000名。三、工作范围：暂定救护、卫生、缝纫及文书等。四、服务期限：暂定二年。

△　桂林方面第六十四军桂绥第一纵队在陆、空军协同下攻占脚岭；第一五九师策应桂绥第一纵队先后攻达罗阳村、新施村北侧高地之线。

△　桂境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一部乘第六十四军各部不断进展之际，是日向桂平附近推进。

△　汪伪政府对重庆发表诱降声明，宣称“现在中国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希望贤明的蒋委员长认清时局，自动停战，为保卫民族国家而崛起”。

△　美国借轻型舰艇八艘、英国借三艘与中国。

10月25日　　桂境第六十四军各部向蒙墟发动重点进攻。桂绥第一纵队到达大化、佛子，日军退向荔枝洞，第一五九师一部乘势攻占新、旧乌阳。

△　桂境大溶江附近西安乡日军进占反璧江、油路界之线，向第十师第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击。27日，第九十三军奉命转至大庙墟、大泉墟之线。

△　中韩文化协会开会，选举孙科等五人为常务理事，梁寒操等为常务监事。

△　美机轰炸连云港。

△　康青公路修筑完竣，全长500公里。是日，行政院派交通部公路总局专门委员容祖诒前往接收。26日，西宁至玉树段开始通车。

10月26日　国民政府特任鹿钟麟为兵役部部长；特派陈立夫为派遣国外实习农工矿业技术人员考试典试委员长。

△　外交部宣布承认意大利政府。外交部已电示驻罗马教廷公使谢寿康正式通知意大利政府。同日，美、英、苏亦正式予以承认。

△　捷克斯洛伐克兼任驻中国大使米诺夫斯基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八路军冀中第七军分区一部和安平县大队攻入安平县城，歼伪治安军团部和一个大队，并将伪县政府解决，伪县长以下人员全部被俘，俘伪军200余人，缴长、短枪300余支。

10月27日　张发奎电令防守柳州的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派遣所部第一五七师堵击自金田村附近进犯之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一部。29日到达东乡。30日占领香信、界顶、双髻山之线阵地，阻止由三江墟西进之敌。

△　日军向桂境大溶江一带发动总攻击。28日，攻破守军第七十九、第九十三军阵地，全线危急。守军遂向桂林、永福一带退去。29日，日军五六千人分三股攻占高上田，2000人向灌阳西北攻击，占领铁坑附近。30日到达桂林火车站附近。

△　八路军冀中第八军分区一部及饶阳、献县大队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乘夜袭击献县城，毙伤日军30余人，俘伪县长以下200余

人。

△　三青团中央团部举行知识青年从军广播讲演大会，分由张伯苓、邵力子、蒋梦麟、王世杰、罗卓英主讲。

△　中美空军混合团出击荆门、嘉鱼、土地堂，击落击毁日机19架。

△　日机六批乘夜在恩施和成都近郊投弹。29日晚又袭恩施，被第六战区防空部队击落一架，坠于巫山境内。

10月28日　　赫尔利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五点建议，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官兵，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将根据其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的待遇，其各单位军火和军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待遇。"

△　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外围发动攻击，企图将第四战区桂林防守部队向西压迫，使桂林陷于孤立。桂林守军第九十三、第七十九军等部为避免态势不利，奉命向桂江西岸转移，准备作战。

△　桂境第六十四军各部以炮、空军助战，主力向蒙墟围攻，日军凭断墙顽守待援。战至是日，第一五九师攻入蒙墟城内。同日，第一五五师主力亦向罗阳村、新施村附近之敌猛攻，战至入暮，各占领村落一半，巷战至烈。

△　桂境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突破黔江北之金田村附近阵地，沿三

江墟、东乡大道西攻，柳州东南重镇武宣告急。第三十五集团军为减少损失，集结兵力准备转用计，即停止对当面之敌攻击，下令以第四十六军接替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四军集结向武宣方向转进。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驱逐日军警戒部队，攻占庙堤，将太平江北岸之日军全部肃清。

△　教育部制定《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凡九条，要者为：中等学校学生应届毕业者，准免试升学；参加留学考试者，准备优先录取；志愿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以及出国研究国防科学者，由政府择优优先保送。

△　日本政府设立临时内阁顾问，由有田八郎、小野实信、末次信田、丰田贞次郎等12人组成。

10月29日　　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发布命令：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任索尔登为中华民国驻印军总指挥。

△　桂林方面桂江东守备队在普陀山以东与日军先头部队发生战斗，临桂之大村、大河墟、大面墟及乌石街以北均有日军出现。入夜，第四战区出击部队于城东郊及北郊与日军均有战斗。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各部在炮、空军的配合下，对龙陵发起最后攻击。左翼攻击其芒市以北之红岩山，右翼攻击龙陵以西之黎巴坡。战至31日，左翼完全占领红岩山，攻抵木康，封锁住龙芒公路。

△　周恩来同戴维斯谈战后中国建设问题。周称：中共进入城市后将派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去美国学习技术，还将招聘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贸易方面，中国需要大量的在沿海航行的船只等。

△　伪满国务院广播声称：“满洲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与亲

邦日本结为一体”，要努力增产粮食、煤、铁，以完成“圣战”。

10月30日　桂境第三十五集团军指挥所到达武宣，11月1日，第六十四军将防务交接完毕，亦分由新隆乡及奇石向武宣前进。攻击蒙墟、桂平之战斗结束。

△　平南西北雷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一部，向双髻山东侧守军第一五七师阵地袭击，主力占领界顶，该师于31日拂晓向敌反攻，收复界顶。

△　晚，桂林东郊之日军约300人袭击星子岩、申山等处，被守军第七十九军击退，被歼数十人。

△　重庆《大公报》载：财政部去年烟类专卖超收甚巨，至今年5月，除去开支，总额达8.1062亿元，较年度预算超收1062万元。

10月31日　魏德迈抵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职。

△　国民政府明令派张嘉璈、毛邦初为出席国际民用航空会议特命全权代表。

△　何应钦发表谈话，说明青年远征军之编制与装备，“拟完全与我国驻印军相同”，并称：青年从军之待遇“除享有国家各项优待外，其衣食住行之设备及供应，在国家财政可能范围内，当尽力设法改善”。

△　山东省各界集会，呼吁国民政府立即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及统帅部。省临时参议长范明枢病中投书称：“江河日下，国势垂危，当局毫无改过之意，将置国家于何处？！”

△　成都市立中学学生800余举行反对特务统治的大罢课。午后，成都市警察局长方超亲率警察近千人包围并冲进该校，打伤学生20余名，捕去40余名。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主力一部攻克河南濮阳县城，伪军孙良诚部在日军掩护下撤退。八路军收复城郊柳下屯、胡庄、徐镇集、文留集等据点30余处。

△　桂林灵田墟日军约300余人攻占笔架山。城北日军三个突击队攻占凤凰山、虞山及吕祖山，守军第七十九军一部与敌激战竟日，敌受创不支，各循原路退去，死伤50余人。

△　日伪军5000余对山东渤海地区“扫荡”，八路军渤海军区一部与敌战至12月10日，反“扫荡”获胜，毙日伪军300余名，歼灭伪军七个中队。

△　罗斯福对记者称：史迪威之更调，因彼与蒋介石之意见不合，其起因由史本人负责。此事“纯系于人事之关系”，“并不牵涉战略，亦与中美两国之政治无关”。又称：史与蒋意见不合，“蒋要求撤换，美国政府不能不答应”。罗斯福还宣布：“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曾表示有退休之意，此与史迪威召回无关。”

△　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认为史迪威是在中国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史、蒋矛盾是积极对日作战与囤积美援物资用于反共内战的矛盾，召回史迪威“表示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

10月下旬　　新四军第十六旅向苏南溧阳日伪据点发动攻势，先后攻克周城、社渚、南渡三个据点，歼灭伪军第二师第四团700余人。

△　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设立邹韬奋出版奖励基金，共1000万元，专门用于奖励对办报、办刊及出版事业、发行事业有特别成绩者。

是月　　社会部电告各地社政团体：一、加强人民团体组织，扶助

民意机关，培养人民民主精神；二、消敛豪绅势力，递增民主势力，运用新的社会力量，促进民主之实施。

△　行政院通令各级政府：一、迅速督促所属青年公务员踊跃入伍，藉示倡导；二、青年从军所需之营舍、交通工具，必须事先妥善筹划，必要时酌量征用。

△　晋察冀边区政府决议设立晋冀区、冀察区、冀中区、冀热辽区四个行政公署，分由杨耕田、张苏、罗玉川、李运昌任行署主任。

△　湖北省第四届参议会选举李荐延、李四光、孔庚、杨一如、石信嘉、张难先、喻育之、饶凤瑛、黄建中、刘叔模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偌万和国民党“军统”戴笠签订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补充合同，规定美国为国民党军队培训美式特务并向“军统”提供美式刑具；美国为中美合作所提供大卡车2000辆、中小吉普车500辆、病床1000张，以及医药器材等。此后，在重庆、安徽、湖南、河南、绥远、贵州、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开办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培训特种警察人员。

△　自夏秋以来，湖北10余县发生旱、蝗灾，受灾面积858万余亩，灾民274.8555万人，待赈者168.97万余人。

11月

11月1日　国民政府任命吴忠信兼新疆省保安司令。

△　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机场举行誓师阅兵大会。以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为主组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下辖六个大队。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滕代远、邓小平、杨立三，告王震、王首道率4200余人由延安出发南下，令做好接应工作。

△　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长蒋介石、副会长戴季陶颁词勖勉："忠勇为爱国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据报载：全国童子军计有男童子军383团，2.9546万人；女童子军28团，6593人；幼童子军10团，1561人。

△　桂林城北日军步兵四五百人附炮二门、战车三辆，向第七十九军第一三一师阵地攻击，守军战约二小时，敌不支退去。同日，又有日军300余人进攻北极山，被击退。

△　日军开始对桂林外围发起进攻，中国守军一部托石岩洞进行抗击。日军对七星岩中国守军施放毒气，守军300余人惨死洞内。

△　桂境平南界顶附近日军分股向第一五七师第四六九团阵地进攻，均被击退。旋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电令该师西撤，至晚，主力经三里墟撤至二塘附近，集结待命。

△　滇西龙陵战事由城郊转入市区。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在300门重炮和山炮及空军的支援下，占领市区核心阵地观音寺和段家祠堂。敌据守段家公馆抵抗，激战两小时，被击退。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进至伊洛瓦底江岸，2日攻占叶克、摩首，3日攻占八佛因。

△　新四军一部攻入江苏阜宁县城，毁敌据点七处，俘伪中队长以下30余名。

△　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制定打通粤汉铁路南段作战计划，决定于1945年1月中旬，以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三军攻占粤汉路南段，同时以有力一部摧毁遂（川）赣（州）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并规定第二十军以第十师团集结道县、零县附近，1月中旬开始行动，

攻占韶关以北粤汉铁路；第二十七师团集结攸县、茶陵附近，1月中旬进入遂川、赣州地区，消灭该地区美国空军基地；第二十三军以有实力的一个兵团集结清远，1月中旬开始作战，攻占韶关以南铁路。

△　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由东京返回南京，会见周佛海。称其在东京期间，先后会见首相、陆相及参谋总长，讨论如何实现全面和平问题。并称：日本政府希望南京政府打通与重庆的联系。

△　国际民用航空会议在芝加哥开幕，51个国家的代表700余人出席，中国代表张嘉璈、毛邦初出席，并发表声明称：在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国家主权不受影响和本身民用航空发展不受阻碍的原则下，欢迎国际航空线扩展到中国。同日，会议选中国首席代表张嘉璈为大会副主席，指定中国代表张定为世界航空机构副主席。

11月2日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占领庙房坡第四号山头；第三十六师占领锅底塘坡和庙坊坡，控制西南制高点；第三十六师另一部攻占龙芒公路上重要据点查庙房，完全控制了滇缅路交通；荣一师占领城内重要据点大奎阁。

△　桂林城北莫路村、乌石街方面日军集结兵力万余人，东郊同主村、冰水塘一带日伪军集结4000余人。第四战区炮兵集中向乌石街轰击，空军亦飞临助战，敌死伤甚多。至晚，城北、城东、城南及西北部各正面阵地均遭袭击，四郊有激战，桂林核心战斗逐次展开。

△　重庆《大公报》载：经济部花纱布管制局与云南省建设厅合组云南木棉公司，资本为二亿元，官方认股6000万元，余招商股。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调整军政机构人选案：选任江亢虎为政府委员。特任陈群为考试院院长，任援道为江苏省省长。设置军事委员会驻苏州绥靖主任公署，特派任援道为主任；特派凌霄代理海军部部长。

△　美白宫宣布：纳尔逊奉罗斯福之命，将再赴华，协助中国政府建立战时生产机构。同日，罗斯福宣布：任命纳尔逊为其私人外交、内政顾问。

11月3日　滇西龙陵克复。中国远征军各部先后占领龙陵城区和郊区各重要据点后，日军退守西山坡、红土坡、伏龙寺等处，处于三面被围境地。是日拂晓沿滇缅公路逃向芒市。至凌晨，远征军克复龙陵。龙陵战役结束。

△　张发奎为确保柳州及黔桂路之安全，令防守柳州的第六十二军归第三十五集团军指挥，调赴武宣、来宾以南地区，阻击日军。并命令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担任柳州防务，5日抵达柳州。同日，又调在修仁、蒙山方面作战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回防柳州。

△　桂林四郊之日军仍不断进袭，大部被守军击退，唯西北郊之日军以优势兵力攻占笔架山。城南方面之日军曾向将军山进攻未逞，旋在斗鸡山以南之开阔地利用耕牛300余头，以侦察及触发守军之预设地雷区。

△　山东费县伪军荣子城部千余人奉命调兖州，途中遭八路军伏击，毙伤50余名，俘伪少校团附以下158名。

△　日军陷广西贵县。

11月4日　外交部长宋子文对美记者谈话，称史迪威奉召回国之事，“纯为军事方面之人事问题”，“与中美两国政策绝对无关”。关于军事、政治、经济之政策，“中美两国意见完全一致”。“深信今后两国关系，将较以往更臻了解，更趋密切，更有效果”。

△　毛泽东致函美总统罗斯福，表示深愿经过罗斯福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　国民政府任命王东原为湖北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

△　军事委员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部，以罗卓英兼任总监。

△　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制定《妇女服役办法》，规定征集女青年2000名，分两期进行；定名为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应征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服务二年，不得自由离队。

△　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一、在西南加强同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促使他们向蒋介石要求民主，但不公开反蒋；二、组织联合政府问题，也要在川、康、滇酝酿起来；三、请党中央速与昆明龙云通电，并转告刘文辉。

△　中国科学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二十四届年会，假成都华西大学举行。蒋介石电颁训词，希望更注意于现实的社会问题，使今后科学的发达能与社会实际进步相配合。

△　成都国民党特务乘黄包车不付车资反而殴打车夫致死。5日，全市黄包车夫罢工，抗议特务暴行。经调解，国民党当局答应惩办凶手，给死者家属丧葬费和抚恤金。7日复工。

△　桂林东郊之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攻至中正桥头，与守军第一七〇师逆袭部队激战。城南将军山方面日军亦乘虚侵入，当即被守军击退。西北郊守军第一三一师屡次进攻笔架山，终因伤亡过重而致攻击受挫。下午5时，日机八架在桂林上空投弹10枚，弹落南门及文昌门附近。

△　桂境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永福阵地，向西进犯，守军第九十三军主力新编第十九师与敌陷于苦战；由湘桂路西侧前进之日军第四十师团亦乘机南下，图攻中渡，出柳城；其第三师团则由修仁西攻，为守军第一八八师所阻。

△　桂境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突破傜僮山地，越过花雷高地，迂回攻击武宣。第六十四军兵力薄弱，战力不支，日军于是日攻占武宣。

11月5日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与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晋见蒋介石，商谈调停国共问题。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渡过伊洛瓦底江，击破日军第二师团及伪缅军一部，7日攻占瑞古。

△　桂林东郊日军数百以炮火助战，向申山、七星岩、星子岩猛攻，守军第一三一师耗手榴弹200余枚，终未将敌击退，星子岩顶及东南麓被日军攻陷，并侵入普陀山东端。北郊方面日军以重炮四门向桂林各要点轰击，其步兵在战车六辆支援下向虞山、吕祖山攻击，守军第一七〇师一部在炮兵支援下，予以还击，敌受创溃退。

△　桂境西江方面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及第二十二师团分别突至武宣及来宾以南地区；湘桂路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攻陷永福，并向南进犯，图攻柳州；平乐方面日军第三师团被阻于修仁附近。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为固守柳江西岸要地，电令第二十军由修仁方面经四排墟、连江向柳州转移，第三十七军由蒙山向象县转移，占领沿江要点，阻敌西进。

△　中国著作人协会在重庆成立，张道藩任会长，于右任、吴敬恒、孙科、张继等为名誉会长。张道藩报告该会筹备经过和成立意义，一面在使著作家如何能贡献于国家，一面在帮助著作家解决困难。

△　山东威海卫、刘公岛伪海军600余向八路军一部投诚。10日，荣成附近龙须岛伪军六七十人反正。以上两部合编为八路军胶东军区海防支队，郑道济为上校支队长。

11月6日　军事委员会决定由第六战区抽调第九十四、第八十七

军至黔东黄平、镇远集结，并由第八战区抽调第二十九、第九十八军两个军及第一战区之第九、第十三、第五十七军三个军集结于贵阳、马厂坪、都匀、独山间，准备夹击入黔之日军。

△　为防守柳州，第二十六军军部抵达柳州南岸之马鞍山；第四十四师进至雒容附近占领阵地，阻击进攻之敌。同日，第四战区又急调第一八八师赴柳城，以事阻击。

△　桂境西江方面日军一部在象县附近渡过柳江，与第一五七师在鸡沙附近激战。平乐方面日军陷修仁，并以一部进攻榴江。永福方面日军亦由矮岭墟至黄冕，西渡洛清河，直迫柳州。其第四十师团则趋中渡，指向柳州。

△　日机七架向桂林城区投弹多枚，数处起火。城北日军乘势以战车12辆突破平头山阵地；城东日军在猫儿山与守军第一三一师一部发生激战，经往返冲锋，守军全部殉国。同日城西磨盘山、茅头山，城西南猴山两侧高地为日军攻陷，日军一部突抵三仁村、四义村。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攻占太平河南岸高地，并掩护后续部队安全。该师另一部攻克莫马克以东的卡五，并完全攻克莫马克以北至苗境间公路东侧的日军据点，形成对八莫的钳形攻势。同日，该师第一一三团渡过太平河，沿密支那至八莫公路，直扑莫马克和马于滨等地，并将八莫外围的大小村落和两个飞机场完全占领。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攻克龙芒公路西侧重要据点张金山、南天门等地。

△　由八路军太岳军区第十八、第五十九团等部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即第二支队）渡过黄河，在歼灭伪军一个河防中队后，进入新安、渑池、陕县南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　日伪军千余对江苏丹阳北进行“扫荡”，新四军一部与敌战至19日，收复敌据点11处，俘伪连长以下200余人。

△　汪伪政府为纪念《大东亚宣言》发表一周年发表声明称：为进一步协助日本，民国政府当倾其全力，共同对英、美作战。同日陈公博亦发表广播讲话，声称目前战争形势正面临着紧要关头，必须竭尽东亚整个的总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11月7日　国民政府拟定国共谈判的《协议之基本条件》，共五条：“一、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期能先迅速击败日本并建设中国。二、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接受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三、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采取多种政策，以促进及发展民主政治。四、中国仅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之官兵经中央政府编定后，将依其职阶享受与国军相同之待遇，其各单位对军火及军需品之分配，亦将享受相等之待遇。五、中央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使之为合法之政党，所有在国内之各政党将予以合法之地位。”后来，蒋介石修改为：“一、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以求国内军队之统一，期能迅速击败日本与解放中国。二、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三、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及发展民主政治。四、中国仅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个军队。共产党之军队经中央政府编定后，将享受按照国军之同样待遇，其各单位对于军火及军需品之分配上，亦将有相等之待遇。五、中央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使之为合法之政党，所有在国内之各政党，将予以合法之地位。”

△　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如董必武能同林伯渠一道回延安，仍望王若飞留重庆主持工作。在王若飞主持下，可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七人为委员。

△　林伯渠偕赫尔利由重庆飞抵延安，周恩来、包瑞德等前往机场迎接。董必武本拟与林伯渠同机返延，因国民党当局阻挠未能成行。

△　第四战区为保卫桂林、柳州，下达第三号作战命令，其要旨为：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黔桂路之目的，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桂、柳，主力沿红水河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吸引敌人于柳州附近，转移攻势而击灭之。

△　桂林外围日军已达二万余人，桂林城核心战斗骤剧。城北日军一万余人在重炮、战车支援下，向平头山第一三一师一部阵地猛攻，被击退。旋日军又攻，战车、机炮、平射炮齐发，守军全部牺牲。城东屏风山、普陀山方面守军第一七〇师一部与日军激战两日后，伤亡惨重，屏风山陷敌，普陀山亦进入混战状态，电信中断。另日军一部步兵百余人经月牙山突进至中正桥，被守桥部队击退，并将该桥破坏。

△　桂境第二十军杨汉域部、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到达柳州。旋丁治磐闻由象县附近渡河之日军已渐向柳州逼近，湘、桂之日军攻陷黄冕，第十三师团、第四十师团分别南下、西进等情况，乃决定转向南方，准备作战，保持重点于柳州东、西两端。

△　桂境黄冕方面日军一部5000人攻陷中渡，图趋柳城。

△　新任中印缅战区总指挥索尔登抵达缅甸前线，是日发表广播讲演，表示史迪威去职后，其“任务不变，战略也不变”，目前最紧迫和最具体的任务是打通滇缅路。

△　美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戴维斯致信罗斯福，称中共“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不仅遭受了比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而且还遭到蒋（介石）的严密封锁”。但是，“他们生存了下来，并且壮大了”。

△　美军C—87型运输机，装载美国钞票公司为中国政府印制的关金券3.5亿元，自檀香山起飞，赴中国重庆途中，是日（美国时间），在四川汶川县三江乡上空盘龙山（海拔3970米）坠落失事，机上四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半年之后，重庆国民政府获悉此事，派人赴飞机失事地点搜索，一无所获。

△　合众社电称：纳尔逊不久再赴华，任务为协助国民政府成立战时生产局。随纳尔逊前往中国的美国专家计有：匹兹堡·琼斯劳佛林炼钢公司研究室主任格拉汉姆，宾夕法尼亚州新堡联合工程冶炼公司冶炼总监其尔，匹兹堡美国炼钢公司军需物资主任史特伦，战时生产局钢铁科科长华尔施密特。

△　美国大选揭晓。罗斯福以1974万票压倒杜威，第四次当选总统。

11月8日　上午，中共与美国开始第一次会谈。中共方面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美国方面参加的有赫尔利、包瑞德、一名译员和一名秘书。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表示：美国无意于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声称：蒋介石同意由一个美国调解代表团来促进民主，并通过“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加速打败日本的步伐。赫尔利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蒋介石准备承认共产党和各少数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以某些形式参加军事委员会。接着，他宣读了一份他于10月28日起草、经蒋介石修改过的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是：“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

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央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　下午，中共与美国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赫尔利来延安。接着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然后，毛泽东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主要是：增加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的条文；将原条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遵守和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要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组，修改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统帅部所承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他说：“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今天上午提出的五点建议，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到需要讨论一些与这个基础有关的问题。至于具体条款，我还不准备提出。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不可能达

成什么协定。没有这一结果，协议没有稳固的基础。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以便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毛泽东指出：“改组政府，最重要和最必要，它是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的首要问题。解放区尽管面临困难，但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各种机构，腐化达于极巅；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关于‘政府民主程序’的问题，我党认为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一年后，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按蒋先生的办法，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如果蒋先生坚持拖延到战后解决危机，并违背建议改组政府的人民，危机将会拖延和扩大，政府会面临崩溃的危险。”

△　桂境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以日军向柳州进逼，令柳州西站附近之第二十军以第一三四师在柳江西岸鹅冈屯、渡口屯之线担任防务，并派出有力一部占领鹅山阵地，协助第二十六军作战。

△　桂境柳州榴江方面日军第三师团一部700余人进至三门江附近一带，准备渡江，被第四十一师警戒部队驱逐。同时，象县方面由鸡沙渡过柳江之日军，陆续增加，突破第一五七师之阵地，至晚攻陷马坪墟，图攻桂林。中渡方面日军攻占马泉。

△　桂林城北日军以炮空火力掩护，以战车分组向守军第一三一师北极路阵地终日猛攻。城西南之猴山隘、两路口阵地大部被日军攻

陷。城东方面之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分乘竹筏渡过桂江，向中正桥、伏波山间登岸，守军第一七〇师主力迎战。至晚，日军攻入城内，与市区守军发生街市战。

△　桂境日军一部向桂林七星岩第一七〇师第三九一团阵地进攻，守军坚守不降，毙敌甚众，团长覃泽文战死岩洞口。敌久攻不下，乃以毒气弹、燃烧弹攻击，洞内守军及伤员、医务人员千人罹难。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七分区部队收复山东莘县城。

△　新四军第五师游击兵团挺进第四团在河南舞阳县西南的辛集附近与日军展开遭遇战，经五小时激战，将日军击溃，毙日军20人。

△　据延安《解放日报》载：史迪威奉召归国后，美国舆论界哗然，认为改变中国的局势，必须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罢免何应钦。

△　魏德迈在驻华军总部首次招待记者，称其今后拟训练更多之中国军官，同时“予士兵以基本训练”，“力求中美之友谊及有效之合作”。并称：“中美间政策及设施并无变动，联合国家之战略毫不动摇。”

11月9日　下午，中共与美国进行第三次会谈，讨论经过修改后的协定草案。会谈一开始，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过后表示：这个方案是正确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蒋介石接受。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会议按照他的提议作了修改。毛泽东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介石先生也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赫尔利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毛泽东说：“我很希望在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以前见蒋先生。”赫尔利主张毛泽东立即去重庆

同蒋介石会见。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随员在会（见）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接着，毛泽东说：“这次赫尔利将军回去，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先生的同意。……就是说，在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适当吧。”赫尔利建议毛泽东在协定上签字，并表示他也要签字，题目定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双方商定，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

△　军事委员会任命鲁崇义为第三十军军长。

△　国民政府令内政部常务次长兼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德溥专任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免内政部常务次长本职。

△　突入桂林城内之日军与守军第一三一师在皇城、东环路展开激战。城北日军700余人利用战车、火焰放射器及炮、空火力之支援，攻古清潭山、龙山、虞山、吕福山等据点，守军第一三一师一部全部牺牲。城西日军自晨到晚先后攻占两路口、猴山隘、中心山、阳家山各地。城南将军山方面守军激战竟日，至夜弹药耗尽，遂放弃阵地。

△　柳州四面受敌，战局告急。柳城方面日军第四十师团突破东泉第一一八师阵地，并压迫至柳城西南之流山墟附近，柳城遂告失守。湘桂路方面，柳江北岸日军300余人亦先后占领兵营岭、凤凰岭阵地。三门江方面日军于10日渡过柳江。陷修仁之日军第三师团主力经江口墟附近进至鸡拉街对岸，至晚渡过清江，向大桥屯进攻，旋与陷马坪墟之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一部会合，向柳州守军猛攻。

△　由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一部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共4000余人，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率领下从延安出发，经绥德东渡黄河，沿汾阳、

平遥、垣曲、渑池、鲁山、确山南下，1945年1月27日在湖北大梧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29日，在陈家湾广场举行誓师大会。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出动飞机12架袭击衡阳西北之日军车场，炸敌车四辆后与日机四架遭遇，中美空军共击落日机三架。

△　日伪军6000余对淮南解放区“扫荡”，新四军及地方民兵与敌战至下旬，将其击溃。

△　成都市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为抗议警察局10月31日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组成请愿团，向四川省政府提出六项要求，要求立即公布镇压学生运动事实真相，撤职查办凶手及帮手等。

11月10日　　上午10时，中共与美国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纲领协定，我们已取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理，但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

△　赫尔利与毛泽东在延安签署《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内容为：“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

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赫尔利、毛泽东签名后，在上方给蒋介石留出签名的位置。

△　赫尔利和周恩来同机飞离延安赴重庆，同行的还有包瑞德上校。次日，赫尔利将与中共签署的协定交与蒋介石。

△　毛泽东应赫尔利的建议，写信给罗斯福，信中称：“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间，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同日，又致电罗斯福，祝贺他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

△　桂林失陷。桂林四郊之日军均突入城区。守备部队四面受敌，仍作寸土之争，终至弹尽粮绝，大部战死，部分被俘，各阵地相继失陷。守军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率部喋血苦战，见将士伤亡殆尽，乃自戕殉国。11日，桂林守城部队余部奉命突围，桂林城陷敌。

△　张发奎电令第二十六军：桂林情况已不明，该军应避免无谓牺牲，着即适应情况开放西侧道路，配属之野炮营应撤至大塘，河北市区之一个团，可撤至南岸，对所有仓库应遵前令彻底破坏。

△　柳江北岸之日军第十三师团以一部于渡口屯渡河后，向鹅山要点攻击，另部千余人以炮火掩护，向柳州北市进攻。由三门江渡河

之日军第三师团一部突破马草塘、天长岭阵地，旋与援军一部合攻蟠龙山、独登山，守军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一团退至柳州南市。

△　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在鹦鹉洞内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守城各部弃城突围。至夜，韦等突围西走，守军仅存三分之一。

△　日机五架临空轰炸柳州，各据点及核心阵地工事多被炸毁。守备北岸之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一团第三营，经与敌激战至11日全部牺牲。守备南岸市区之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一团遭敌轰炸，死伤亦重，11日夜，由团长赵风铭率余部突出重围，至15日始脱离战斗。

△　新疆暴民攻占伊宁行政专员公署，宣布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　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病死。

△　汪伪政府建设部分别与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及舰队参谋长签订《关于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之军事上协定》及《关于华中轮船股份公司之军事上协定》。两个协定分别规定：日本陆军及海军最高指挥官，对于华中铁道及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得直接行使军事上的要求与监督权。公司有关日本军事机密事项由日本籍副董事长单独处理。

11月上旬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以该部新三十八师一部越过缅北太平河，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布兰丹及黄龙卡巴一线对八莫、曼西作迂回攻击，以截断日军退路。

△　据中央社讯：日小矶内阁设立三个新作战委员会，组成集体独裁力量，第一个为最高政治会议，第二个为顾问委员会，第三个为综合计划局。

△　山东省各界人士51人致电新华社，并转傅斯年及旅外同乡，申明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国是会议，厉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承认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大量扩充并装备

八路军、新四军；将误国罪魁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及祸鲁元凶沈鸿烈等撤职查办。

△　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准备将在缅甸作战的中国五个师抽调两个师返回阻击日军，旋蒋介石召集政府要员开会商讨，几经磋商，与会人员主张以第一、第八等战区部队增援，尚能堵击犯敌。军政部长陈诚则竭力支持魏德迈的建议，始行通过。并决议以后战局恶化，则必需将缅甸作战之远征军全部调返。

11月11日　　柳州失陷。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以桂林失陷，柳州已无固守之必要，当令第二十六军向西转移，该军乃于9时率领郊外部队西移至六道墟附近集结。又命令杨森指挥第七十九、第二十、第二十六军移至六塘、中脉、小长安之线占领阵地。第三十七军亦于是日向西转移。桂柳会战结束。

△　柳州守军各部逐次转移。第二十七集团军向宜山东北地区转移；第十六集团军撤至宜山以东地区；第三十五集团军撤向大塘附近。同时，柳州附近日军各部亦分头西进。柳城之日军第四十师团以有力一部向柳城北方向突进；柳州方面日军第十三、第三师团沿黔桂路及其南侧地区向西攻击前进；来宾、迁江之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各以有力部队向西及西南方向分途攻击前进。

△　第四战区为继续阻击日军、确保宜山及掩护黔桂路之安全，下达第四号作战命令，其要点为：邓龙光右兵团主力转移渡口、忻城、大塘附近之线占领阵地，阻敌西进；夏威中央兵团主力即于冷水、三岔附近之线占领阵地，阻敌西进；杨森左兵团主力于六塘、中脉、小长安附近之线占领阵地，阻敌西进。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与第一一三团在柏坑会合，随即转入对莫马克的攻势。14日攻占沙王加荡和莫以克，切断八莫至南坎的惟一通道。17日攻占曼西。

△　国民政府特派陈肇英为安徽、江西监察区监察使，杨亮功为福建、浙江监察区监察使。

△　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7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10月31日成都学生运动，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凶、恤伤、保障人身自由等。学生至四川省府门前，要求面见省主席张群，张群出面允诺学生的要求。

△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出动飞机11架，炸衡阳日军机场，击毁日机八架。

△　美B—29式“超级空中堡垒”袭击南京、上海码头区及堆货栈。

△　汪伪建设部与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签订《关于通信之军事上协定》，规定：日本陆军及海军最高指挥官对于华中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得直接行使军事上的要求及监督权，公司有关日本军事机密事项，由日本籍副董事长单独处理。

△　项致庄、任援道分别就任伪浙江省、江苏省省长职。

11月12日　　国民政府明令昭告全国军民，在纪念国父诞辰之日，应切实“念国父遗教之谆切，知国家创业之艰难，法先烈为国牺牲之忠勇，合全国亿兆之同胞，成一德一心之团结”，“奋起迈进，以竟国父与一切先贤忠烈将士未竟之志，而成革命建国之功”。

△　蒋介石为孙中山诞辰及中国国民党建党五十周年纪念日发表纪念词，宣示：一、本党旨在救国，50年来一贯相承；二、三民主义适合国情，为我立国之最高原则；三、国民革命成败关系整个国家，愿爱国同胞天下为公，共负革命的责任；四、认识义务责任，决不丝毫放弃规避；五、争取抗战胜利要铲除自私。

△　国民政府明令实施《特种案件诉讼条例》，并充实各地法院，每院增员一至三组。

△　重庆《大公报》载：国民政府决定加强沦陷区各省政府工作，实行党政一元化，各配属以相当之武装力量，并饬相机进入敌后省境，建立根据地，治理省政。东北各省政府，除黑龙江省政府已在绥西外，其余吉林、辽宁等省政府亦将移往接近前线之地工作。

△　武汉大学师生举行时事座谈会，要求国民政府走民主的道路，挽救国内危局。学生们表示：不管政府当局怎样镇压学生运动，后方青年学生都依然炽热于民主救国。

△　为配合缅北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对八莫的攻击，新二十二师攻占曼大。17日两师会合于八莫以西的马哈。30日两师合兵截断八莫至南坎公路。八莫陷入驻印军的四面合围之中。

△　八路军一部在河北枣强歼灭抢粮日伪军180余名，俘伪县府秘书长以下150余名。

△　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临时革命政府在伊犁成立。

△　归国侨领侯西反乘机由成都赴昆明，途中失事罹难。

△　云南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龙云任主任委员，赵澍、裴有藩任副主任委员。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推选陈公博为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新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6日，东京广播，陈公博所遗伪上海市市长职由吴皋代理。

11月13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宴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并向在座100多位文化界人士介绍时局和国共谈判问题。

△　罗卓英对中央社记者谈知识青年志愿军编练方针：以高度学

术研究为训练最高原则；以先经选择而训练，再在训练中选择为“编”之方针，以热诚、负责、活泼、确实为“训”之原则。

△　桂境柳城方面日军第四十师团先头部队约300余人，由柳州西北之大浦向宜山北侧急进，与铁路正面之日军协力迫近宜山。同日，铁路正面之日军第十三师团亦突破第十六集团军之三岔阵地，直趋宜山。15日日军陷宜山。

△　伪淮海省保二旅刘然部及伪军一部1500余人，配合日军向苏北邳县“扫荡”，占领铁佛寺、朱红埠等地。16日，八路军一部强袭铁佛寺，毙敌80余名。

11月14日　　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叙利亚及黎巴嫩二国。

△　行政院核颁《中华民国境内出入及居留规则》。

△　中共中央致电林平，提出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力量，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广西与南路。

△　柳州附近之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与其由迁江渡河之第二十二师团，分由南、北向第四战区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攻击，15日陷思练，16日陷忻城，旋继续进入拉烈、金钗，与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隔红水河对峙。

△　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集中一个独立旅另四个团和七个营，共一万人的兵力，内应外合，攻入莒县城。城内伪军3500余人反正，日军50余人就歼，其余日军于29日弃城逃走。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一部攻克山东菏泽东北舜城集、刘庄、徐胡同及定陶东北半截堤等据点。

11月15日　　国民政府向赫尔利提交关于国共两党谈判的反建

议，共四条。内容为：“一、中央政府承认中共军队，并认为此种承认为必要。中共军队应当遵守和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防军委会的命令。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共同支持孙逸仙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两党将制定政策，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及其他民事权力的开放，在战争期间将以不妨碍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原则和有效进行战争为限，予以保证。三、中国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经中央政府整编后，中共军队的官兵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享受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其他政党将取得合法地位。”

△　周恩来会见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魏德迈，商议成立联合政府事宜。

△　国际太平洋学会定明年1月5日至15日在美国开会，讨论朝鲜之前途、对日本的处置及中国的合作等。国民政府派蒋梦麟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　重庆《大公报》报道称：中国主要产棉区大部沦陷后，唯陕西省棉产供给后方军民。至去年底，陕西棉田由30万亩增至207万亩，皮棉产量由31万担增至54万担。

△　滇西中国远征军所部第五十三、第七十一、第六、第二军等分别向遮放东北的三台山、芒市、马鞍山、诸葛营、五峰山等地区攻击前进。战至18日，复将来劳山、张隈终山及共球附近之日军击退，并继续向老城搜索前进。

11月16日　赫尔利致电罗斯福，报告他于10日在延安同毛泽东签订的五条协定草案和国民党人的反应称：“在和共产党完成这个建议案并返回重庆后，我发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根本不接受这个提案。不过几天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委员长一直在为修订或提出建议而工

作。我与两党一致同意，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或最终否决之前，要对建议案的条款保密。局势非常困难。蒋介石似乎认为，建议案最终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我认为，他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正不断与委员长和他的助手磋商，可能会使他们认识到，与共产党达到合理的协议是必要的。蒋宣称，他希望统一中国军队，在政府中给中共代表席位，并为便于组成民主政府，进行一定的改革。但是，他希望这一切不能好像是受共产党所迫而为之。我相信蒋介石本人是急于和所谓的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以及他的私人助手都强烈反对他这样做。我想你明了，建议案中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仍在寻找一个方案，实现统一，却不出现打败任何重要派别的现象。这本身就是个大难题。从统一中国军队和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来看，我知道时间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我仍尽可耐心地与各方会商，而且正不懈地努力争取尽早达成协议，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予以保障。各项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各种军事需要之限制。”

△　蒋介石与魏德迈研究中国战区统帅部组织方案及西南作战计划。蒋称赞魏直谅坦诚，与史迪威相反。

△　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宴请美国新闻处外宾，董必武、王若飞、徐冰、王炳南等陪同。

△　兵役部正式成立，部长鹿钟麟称该部主要使命有三：一、革新役政；二、充实兵源，准备反攻；三、奠定平时役政基础。

△　战时生产局正式成立，翁文灏任局长，彭学沛任副局长，下设秘书、优先、材料、制造、军用器材、运输、采办等处及审议、技术委员会。

△　纳尔逊再度来华，是日抵重庆，偕来美国专家13名，计钢铁专家五名，酒精专家一名，其他专家七名。同日，纳尔逊对中央社记

者称：“吾人将以筹划全力战时生产之经验，贡献于中国。”

△　桂境宜山之日军进攻怀远，第四十八师之战车营及战防炮营与敌隔龙江对战至18日，终使日军渡河未逞。

△　陈光甫在国际通商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中国政府“愿与各国开辟经济合作之路，希望各国外商以赊帐方式向中国投资”。

11月17日　　国民政府再次向赫尔利提交关于国共两党谈判的反建议，内容为：“一、中国国民政府为迅速打败日本和战后重建中国，希望保证有效地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作为战时立法，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立即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中共军队作为政府军队之一部，在薪饷、津贴、军火和其他分配方面，享受与其他部队同等的待遇。二、中国共产党在爱国战争中和战后重建中充分支持国民政府，将其全部军队交于国民政府和国防军事委员会控制。三、国民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亦表赞成——是实行孙逸仙的原则，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并将制订政策，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项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需要之限制。”

△　蒋介石接见罗斯福私人代表、美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商讨使中国新设的战时生产局迅速获得重大效果的步骤。

△　周恩来、董必武、王炳南出席美驻重庆广播记者福尔门、劳工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杂志》记者白修德、国际宣传处顾问夫聪等举行的宴会。

△　新四军黄克诚师一部进攻江苏淮阴北朱集镇，歼伪淮阴保安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俘中队长夏瑟夫以下89名。

△　金陵大学学生发表声明，反对政府当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

并称：知识青年志愿军不应作为私人或党派的工具，入营后应有救国言论、行动的绝对自由。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特派傅式说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11月18日　　罗斯福电令赫尔利转告蒋介石，为求迅速有效击败日本，美国及苏联皆期望国、共能早日达成协议。

△　日军攻占桂境宜山西之安马，直扑金城江。19日，守备金城江之第二十七集团军一部向西转移，日军乘隙攻占金城江。

△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特任梁鸿志为伪立法院院长，顾中琛为监察院院长、徐苏中为副院长，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周隆庠为国民政府文官长。会议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将副委员长改为一人。

11月19日　　18日至是日，赫尔利与蒋介石在重庆长谈，赫将11月10日与毛泽东签署的五项协议案送交蒋介石，蒋介石予以拒绝。是日另提出《三点提示案》交于赫尔利，内容为："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经费、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

△　周恩来接待英国军官哈米士、英国驻渝使馆秘书赫戈登和赫尔利的华人副官伍汉民来访，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成绩，强调成立

联合政府的必要。

△　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知识青年从军优待办法》，其要点为：一、知识青年自入伍之日起，原任职于党政、教育机关者，保留其职务；原从事于国营公共事业者，由原机关保留其职务；原肄业于各级学校者，保留其学籍；二、从军知识青年之家属，继续享受原优待职员家属之各项待遇；领取入伍补助金；三、知识青年退伍后，在升迁、升级考试、留学、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等方面，政府择优，优先保送。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各部在炮、空军火力掩护下，对芒市发起全线攻击。其中，第六军右翼第二〇〇师以主力由北向南，一部由东北向西南夹攻青树坪子日军，并攻占该地八个山头；左翼预二师以主力攻击大湾东山，以一部攻击蛮燕后山；第二军则以第九师攻击松园包、大洞坡日军阵地，经反复争夺，夺取日军堡垒五座。新三十三师攻击右家坟、回旋山，下午将各该地占领。

△　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所部进至黔、桂边境，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新到达之第九十七军推进至南丹东南之野东河、那地州之线占领阵地，准备迎敌。

△　绥西、东公旗伪军队长任德全率部120余人反正。

△　中印油管敷设工程大部完竣，可将汽油及柴油自加尔各答输入中国。

1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决议：选任宋子文、周钟岳为国民政府委员，周钟岳为考试院副院长。陈立夫任组织部部长，王世杰任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任海外部部长，张厉生继周钟岳为内政部部长，陈诚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俞鸿钧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部长，朱家骅继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宣布：任命麦克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陶思为华军训练作战部司令。

△　中国新闻学会举行第三届年会，陈立夫、梁寒操等出席。大会通过发表声明响应新闻自由案。

△　美水力发电专家萨凡奇，在考察长江及其支流各处水电工程并拟就《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后，本日飞赴印度，转返美国。

△　第四战区以桂林、柳州失守，日军西进，战况恶化，指示各部队行动概要：一、右兵团在现地极力拒敌进攻，必要时向果德、隆安附近转进，掩护南宁通百色间大道。二、中央兵团在平保墟以西地区占领地拒敌。三、左兵团占领思恩要地，以掩护黎明关之安全。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荣一师向遮放、芒市间三台山发动攻击，战至21日，荣一师攻占三台山；第八十八师将邦歪、蛮红占领，并逼近囊左寺附近地区。28日攻占南座寺。

△　山东八路军一部发动对临（沂）费（县）边日伪军攻势，战至27日，攻克据点四处，毙伤日伪军170余名，俘虏500余名。

△　燕京大学学生举行座谈会，讨论抗战建国及知识青年从军，与会者认为，开展抗战救国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争取救国工作的自由权。要求国民政府放弃对各党派的成见，一致对外，挽救危局。

△　宁夏省政府划银川市为省垣。

△　陈公博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职，并发表就职讲话，宣称今后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他奉行的政策。

11月中旬　　国民政府改军事委员会运输局为战时运输管理局，并划归交通部公路总局，所有业务由龚学遂主持。

△　成都市立中学学生为10月31日惨案通电全国学界，控诉成都警察局残杀、迫害学生的罪行，要求国民政府将制造惨案的元凶成都市长余中英、成都警察局长方超撤职查办；保障人权，保障人身自由。

11月21日　　国民政府再次向赫尔利提交关于国共谈判的三点建议，内容为："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编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等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兹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

△　周恩来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在自己的办公室向周恩来宣读了国民政府11月17日提出的三点反建议。赫尔利在宣读后即向周说明：在你们所提方案中，我认为最重要者，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构。但他们认为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的，我已经争过了。但蒋委员长现在还是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意你们参加中枢机构，因为这是神经中枢，一切军队调动和外国物资的来源与分配都要经过那里。我也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个脚趾，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要怕，他们认为我从延安回来就被共产党包围了，所说的都是共产党的话。但蒋仍告诉我：他允

许他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赫尔利解释说，我原来不知道实际情形，所以在延安时，毛泽东提出意见后我也添上一大堆，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是谈判的基础。赫尔利的意思很明白，即他试图告诉周，他已经为共产党争到了所有目前可以争到的东西。但周当场表示：共产党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结果仍然不能参加决策，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

△ 下午，周恩来与董必武再度拜会赫尔利。周恩来向赫尔利提出：第一，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他不能使用同意这个字眼儿，但他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和民主的，问题在于国民党不能接受"联合"这个字眼儿，而他也不能单方面表示同意共产党方面的意见，所以他只能转而劝共产党与政府间取得谅解。第二，中共代表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仍不能参加决策。赫尔利解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对此均有承诺，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只是不愿写在纸上。第三，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祥、李济深便是先例。赫尔利回答说，军事委员会应该行使权力，而且能够行使权力，因为军事委员会将成为最高统帅机关。

△ 新任内政部长张厉生对新闻界宣布其施政方针：一为训练人民，实现民主。二为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执行地方自治工作。

△ 桂境宾阳失陷。占据柳州南来宾之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沿公路西进，是日与攻占忻城、迁江之第二十二师团主力会合，攻陷宾阳，继沿邕宾公路向南宁进攻。

△ 滇西腾冲至龙陵公路通车，全长90公里。

△ 侵占山东高青县的日伪军组织特务部队包围田镇东北的尹

家、傅家。次日冲入村内，残杀男女老幼34人。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宣布：作战参谋队与在中国军中服务之美军联络人员、医药、信号及训练组织，业已并入中国战区。前作战参谋部司令杜恩被任命为中国军队之训练与作战司令。23日魏德迈对记者称："他提出的建议，原则上业已被蒋委员长采纳。"同时，成立第一个空运大队，负责中印间及国内的空中运输。

△　美国白宫宣布：罗斯福已任命纳尔逊为其"个人之外交内政顾问，授阁员衔，有利用所有现行政府机关的无限权力"。美报界报道：纳尔逊已定明年2月中旬自华返美，出任总统顾问。

11月22日　　周恩来和董必武到赫尔利寓所会见王世杰，宋子文参加。周恩来说，他这次代表中共中央出来谈判，目的在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以谋全国团结，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没有这个精神，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友邦的好意，抗战反攻的急迫，我们仍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愿为之继续奋斗。接着周恩来向王世杰问道："政府准备采取何种措施，使党派合法？"王世杰回答："现在政府还没有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并无具体计划。"周恩来又问："根据政府的建议，足以表示国民党并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王先生的意见如何？"王世杰回答："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律上，目前无从宣布废止党治。""不过政府在实际上并非不准备容纳党外人士。"周恩来请王世杰明确回答："如果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请问这种代表是属观察者的性质，还是有职有权？"王世杰说："这一点我不能具体答复，因为没有讨论。"周恩来再问："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如何？王先生是否能够见告？"王世杰说："现在军委会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周恩来称："这是汇报，不是开会。""我们要提醒王先生几句，汇报不是开会，譬如冯玉祥、李济深将军就从没参加开会。"王世杰表示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周恩来不同意国民党的协定草案，坚持联合政府主张，但愿从双方协定中找出共同点，为成立联合政府作准备步骤。

△　周恩来、董必武应约同蒋介石会面。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但他也留了余地："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忙着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周恩来称："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蒋介石回答："是的，是的。"

△　赫尔利约见周恩来，将国民政府19日所提的《三点提示案》递交于周。周即对赫尔利表示，国民政府背弃了在延安签订的协定，要求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提供飞机送他回延安。

△　翁文灏、纳尔逊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报告战时生产局之任务，翁称该局的任务是"督导各生产机构对战时必需的物资，发挥最大生产能力"，同时，"对公私战时生产机构负有指挥监督及联系之责"。纳称：战时生产局与美国租借法案"两者有密切联系，租借法案下的物资，战时生产局可以尽量运用"。

△　延安权威人士评论国民党党政人事的局部更动，指出：这是"今日国民党统治方面危机深化的反映，企图以此缓和各方面批评，拖延时日，仍想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寡头统治"，因此，"此次更调不能不是表面的、不彻底的，用以敷衍一时的"。

△　日机数架乘夜扰川西，被美机击落二架。

△　日本陆军省宣布：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元帅转任陆军教育总监，遗缺由现任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继任。现任西部军司令官下村定继任华北最高指挥官，横山勇继任西部军司

令官。

11月23日　　蒋介石颁发文告，勖勉全国医药界青年及地方医师应征投辕，献身军旅，“行湛深之医术，维将士之健康，增强抗战武力，争取胜利肤功”。

△　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裴昌会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行政院设立国际捐赠财物接收监理委员会，由外交、内政、交通、农林等部及军事委员会、红十字会等机构代表组成。

△　朱家骅辞考试院副院长职，改任国民政府委员。

△　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五工业团体举行招待翁文灏、纳尔逊茶会。会上，五团体向战时生产局建议：增加工业资金；调整国营、民营工厂之器材原料；工业专业化、标准化；与生产界联合设立生产设计委员会，研讨各项生产问题。并请求翁文灏准许该五团体派遣代表参加战时生产局中美经济委员会。

△　陕西省临时参议会三届四次大会选张凤翙、高文源、李芝亭、张丹屏、赵和亭、张守约、王维之、杨大乾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魏德迈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盟军对日战略谈话，表示盟军将在中国登陆，由大陆击溃日本。

△　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举行年会并庆祝该会成立二十五周年，朱家骅、王世杰、王正廷等到会讲话。

△　河南省初夏以来遭受寇祸，入秋前后又蝗、旱、风、雹接连为患，受害达数十县。严冬即届，灾民衣食无着。河南省政府是日投

书重庆大公报馆，呼吁社会各界劝募，以济灾民。

△　汪精卫遗体于11月12日运回南京，是日葬于南京梅花山。

11月24日　　南宁失陷。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一部约3000人由桂境隆山南下，经上林，陷武鸣，是日与其师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协力攻占南宁。另一部经罗墟陷果德、隆安。

△　周恩来在南方局工作人员会上报告大后方形势，指出目前民主运动有五个特点：一、强调联合政府；二、具有广泛性；三、全国要求的一致性；四、有同盟国赞成；五、处在两种力量极大变化之时。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于单县东北插花刘楼歼灭伪山东挺进军第二十九纵队200余人，单县日伪军来援，被歼400余人。

△　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在昆明讲演《国事出路》，指出解决国事的出路，“只有彻底更弦易张，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间组成的国事会议”，并应“紧急处置”。

△　美“超级空中堡垒”对日本东京航空工业区发动首次猛袭，西郊中岛飞机场六处起火。

△　陈公博在南京召开军政会议，声称汪精卫“手订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汪精卫“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不标新立异，另订方针”，各省长、市长、绥靖主任、方面军司令等在会上作军事情况报告。会议决定实行军政一体化。26日结束。

△　美国医药、科技界华侨发起成立中美药厂，支援祖国抗战，负责人为侯德榜。

11月25日　　国民政府聘请纳尔逊为高等经济顾问，孔莱为战时生产局顾问。

△　山东八路军一部攻克寿张县城。27日复陷。12月5日，八路军再度收复，俘日伪军400余人。

△　交通部重新划分全国电信管理机构，浙、赣、闽、皖等省各局合并为东南电政管理局，设于泰和，王若僖任局长；黔、桂、湘等省各局合并为西南电政管理局，设于贵阳，陈树人任局长；陕、甘、宁、青、新、豫等省各局合并为西北电政管理局，设于西安，聂传需任局长；川康、云南两局维持原状。

△　罗斯福另一私人代表孟斯菲尔特日前自密支那抵昆明，是日对中央社记者称，吾人来华系奉罗总统命，“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以求中美间进一步合作”。26日抵重庆，谒蒋介石。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署督办汪时璟与日本顾问旬松前往东京，商讨中国钢铁、煤炭、棉花、白矾、食盐输入日本等问题。

11月26日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宣布：麦克鲁少将已被任命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参谋长；陈纳德将军于原任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外，兼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之空军顾问。

△　蒋介石派外交部顾部事务处长卜道明前往迪化与苏联领事交涉伊宁事件。允诺只要能与我开诚合作，使早日恢复秩序，于我领土与主权无损，则在新疆的经济合作尽可商讨。

△　河南省临时参议会以嵩县、广武、洧川、临颍等县县长罗渭滨、赵希贤、张延龄、姜萃俭、阎受典于中原战役时放弃守城职责，携带地方巨款先逃，特请省府分予通缉，归案法办。

△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发表宣言，声称反共为其“基本国策”和“一贯政策”，号召党员“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完成汪先生未竟之志”。希望“重庆同志解脱美英之桎梏，与共产党搏斗，以获全面之和平”。

△　日军一部“扫荡”河南上蔡县蔡沟、高庙一带，俘获高庙村自卫队员112人，将110人用铡刀铡死、钢刀砍死，仅二人生还。

11月27日　　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就职，并向记者谈其施政方针：一方面协助稳定物价，“切实整顿统制，加强金融管理”；一方面“筹供经费并扶助生产”。

△　桂境池河失陷。金城江方面日军于22日沿黔桂路进攻第九十七军阵地，战至是日，阵地被敌突破，池河失陷。同日，思恩方面之日军第三师团亦突破第二十七集团军阵地，攻占思恩，又经黎明关攻占荔波、三合，守军不支，乃转向都江方面，待机侧击日军。

11月28日　　国民政府任命钱泰为驻法国大使，徐谟为驻土耳其大使。

△　孔祥熙自华盛顿电呈蒋介石，报告与美洽商解决美军垫款问题，美方允拨付2.1亿美元，成都机场之款答应记入互惠租借项下，将来清算。

△　第九十七军以腹背受敌，乃逐次向桂境南丹、六寨方向转移，是日日军第三师团一部攻占三合、六寨，另一部向都匀迂回。

△　驻越南之日军第二十一师团分路向桂南进攻，其一部以小川支队（含伪军）五六千人，由谅山、同登入镇南关。29日陷凭祥。

△　继康青公路试车之后，青藏公路试车成功。青藏公路为国防大动脉，由玉树出发，越横断山脉经长江、黄河分水岭及巴颜喀喇山，海拔4960米，为世界最高公路。

11月29日　　周恩来将所拟准备向国民政府提出的谈判复案及其“备忘录”电告毛泽东。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实现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之目的，允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

的代表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并由这个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和颁布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决全力拥护之。其一切军队应遵守与执行改组后之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同时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编列为正规国军，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开分配。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实行用以促进民主与进步的政策，因此，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释放爱国政治犯，并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免除威胁自由及免除贫困自由等。如国民政府一时不能改组其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其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愿提出“备忘录”三点：一、中国敌后解放区根据战争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将先组成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敌后各解放区政府军事的领导，并便于参加今后的联合国防最高委员会。二、为适应目前战争最迫切之需要，中国战场应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此统帅部以统率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抗日军队，并负责进行各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三、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愿重申诺言，坚持彻底的抗战胜利，坚决反对内战，保证决不向中国任何抗日部队进行军事挑衅，并保证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解放区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实行民主政治，给一切抗日党派以合法权利，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之自由。周恩来还在电报中说明复案采纳了孙科的意见，“是用现有形式放进我们内容”。如原则同意，提议由董必武先回延报告，他拟将复案交赫尔利转蒋。

△　国民政府颁布《优待从军知识青年家属办法》10条，要者为：减免临时捐款及劳役；子女弟妹入公立学校，免交学费。债务未

清者，可展至服役期满后二年清偿；承租之耕地房屋，出租不得收回改租他人；出征期间，其妻或未婚妻不得离婚或解约；无耕地者，可申请分地供种。

△　国民参政会举行茶会，招待纳尔逊、翁文灏。纳尔逊致词称："中国如果能在战时获得内部合作，举国一致，向建设性目标迈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将得到良好反应。"并指出：中国目前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遏止敌人前进，和取得生产、供应战斗的胜利"。

△　山东八路军一部再度克复莒城。

△　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在重庆成立，王宠惠为分会主席，张平群为秘书长。

11月30日　　国民政府特派兼驻哥斯达黎加公使涂元檀为互换《中哥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战时生产局设立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翁文灏、纳尔逊为正、副主任。

△　驻美大使魏道明发表演说，希望美国政界人士"应彻底了解中国，不应以误解或偏见而减弱两国友谊"。并称：美国对中国时局的大量批评，"吾人已注意"。

△　中美文化协会欢迎罗斯福私人代表纳尔逊及同行专家。副会长陈立夫致词后，纳在致词中称战时中美合作所产生的力量是抵抗敌人争取胜利不可少的力量，也是战后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民幸福、提高生活水平的力量。

△　魏德迈在其总部招待重庆市中外记者，对中国战局发表评论，承认战局日趋紧张，但"正采取有效之补救办法，以期局势好转"。

△　重庆《大公报》载：中央研究院已派定10名专家赴美考察，计有柳大纲（化学）、周行（工程）、斯行键（地质）、喻德渊（地质）、张天佑（地质）、倪达书（动物）、林树堂（物理）、朱恩隆（无线电）、张宝堃（气象）、单人骅（植物）。

△　中国新任驻墨西哥大使陈介呈递国书。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各部向遮放市区及其西南方面实施猛攻。第五十三军占领来劳山西南高地、老城、蚌哈外以及所有在芒市大河西岸的日军据点。

△　缅北日军下达守备八莫的命令：由山崎支队长指挥一部兵力，由南苗方面突破八莫之中国军队背后，以利八莫守备的突破退出。第十八师团以其主力向北采取攻势，牵制八莫方向之敌，以利八莫守备队的突破。

△　越南方面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一部约千余人由爱店北进，是日攻陷桂南宁明、明江。12月3日陷思乐。

是月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免新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盛世才职，奉调离新，遗缺由吴忠信继任；派蒋经国为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

△　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共签订合作协定，要点为：双方如有谈判，得互相通知；互相同意后始得与国民党成立协议；凡中共所有主张，不违背民盟原则者，民盟有支持义务，如双方主张意见有相左者，不公开发表。

△　是月至1945年3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一行四人在晋察冀边区进行考察。他们分赴冀晋、冀察和冀中三个二级军区，以考察军事为主，同时在中心区也考察了边区经济及民主建政等情况。

△　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成立，许世英为主任委员，陈铁为

副主任委员。

△ 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在成都成立，李璜为主任委员，并成立了邛崃、南充、江津、大邑、内江等10余个县分部。全省约有盟员2000人。

△ 国民政府通令确定数位以万万为亿。

12月

12月1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新四军第五师，同意其“停止北进，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地”的方针。此后，该师派一部兵力深入河南临颍、上蔡地区活动，策应冀鲁豫军区部队西进水西地区；派另一部兵力向襄城、郏县地区活动，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

△ 毛泽东电复周恩来：一、国民党方面的对案同五条协定距离太远，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解决目前时局的关键，既不同意，则无法挽回时局；二、国民党态度至今未变；三、党中央须召开会议讨论。电报说：过早交复案不利，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并告赫尔利，周不能原机返渝。

△ 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促参谋总长何应钦即驰赴贵阳前线，并嘱戒勉各军事主管面对紧张战局，各本良知，负起责任，不为中外人讪笑。

△ 魏德迈致蒋介石建议贵阳防守作战计划备忘录，指出当务之急，即将中国所有可资运用的部队全部立刻加以组织，攻击并切断日军在长沙地区以及通往南方与西南方的交通线。

△ 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在成都发表讲话，宣称：桂林、柳州陷敌，宜山失守，安定川、康后方是我们天职，并提出加强军队训练，建立民众武力等主张。

△　梁寒操辞海外部长职，遗缺由陈庆云代理。

△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举行会议，张伯苓、莫德惠、王世杰、江庸、邵力子等出席。会议通过冷遹提中印公路即将通车，请政府迅与美军合组运输机构案。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中央攻击部队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攻占遮放新城；第八十七师攻占遮放老城；荣一师攻占鸭子塘、蛮大以及一碗水。同日，该集团军右翼第五十三军第一三〇师攻占来劳山、蚌哈、蛮里、红球山南侧高地。

△　据中央社讯：盘踞福州的日军月来洗劫商号、住宅在3000家以上，其中粮食、五金、皮货等被劫一空。

12月2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1日来电中提出的三点意见转告赫尔利，并称：第一，政府三项与延安三条距离太远，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无法挽救危局。第二，国民党的态度至今未变，梁寒操三天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目前所需者只是军令统一，党派合法问题须留待战后一年再讲。第三，根据目前形势，中共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再行讨论，因此他将留在延安，不再来到重庆。赫尔利对周恩来说："请你告诉毛主席，梁寒操的话不能算数，他根本不懂委员长的意思。委员长说过，他愿意现在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务必参加进来，你们是同我——美国政府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周恩来回答："也许我们之间对于联合政府的提议有不同的了解。参加并无实权，并非联合政府，这就是关键的所在。"

△　国民政府明令修正公布《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凡28条。

△　魏德迈建议蒋介石实施阿尔法计划，以确保昆明地区及重庆地区的安全，制止日军向贵阳地区推进。并建议对中共部队进行补给，利用空中运输提供武器、军需与装备。

△　沿黔桂路西进的日军第三师团一部攻占贵州八寨，另一部到达上下司附近，与增援之第二十九军第九十一师遭遇，激战竟日，日军以一部迂回至独山城郊，经第九十一师主力部队反击，日军前进受阻。

△　越南方面日军第二十一师团由塔溪侵入桂南水口关，与其由凭祥北进之部会攻龙州，即与当地地方团队发生激战，是日攻陷龙州。

△　纳尔逊离开重庆前往成都。4日飞赴印度。

△　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再次更换，下村定就任，冈部直三郎去职。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陈公博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中央将校训练团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禁烟总监署，由陈公博任总监。

△　美战时情报局宣布：日军兵额至少有400万人，一半被牵制于中国大陆。

12月3日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越过曼西，其先头一部是日分别在康马西北地区以及南于一带山地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战至5日，第九十团占领八莫至南坎公路西侧的5338高峰，旋被日军夺回，集中数十门火炮对新三十师阵地猛攻。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第二〇〇师攻占猛古街。5日，攻占拱择。

△　中国空运大队成立，由勒恩少校统率。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一队攻克河北尧山县城。

△　日军为掩护伪军孙良诚部主力南下盐阜地区，以第六十五师团及伪军6000余人“扫荡”苏北。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十旅及地方武装进行反“扫荡”，破袭交通，阻止孙部伪军南下。经过八日数十次战斗，毙伤日军147人、伪军622人，俘日军二人、伪军284人。

12月4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事务繁冗，不能兼理院务”，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仍兼外交部部长。

△　周恩来同赫尔利、魏德迈、麦克鲁、包瑞德进行会谈，赫尔利等尽力想说服周恩来接受蒋介石政府的三项建议，均被周拒绝。会谈时，赫尔利首先提出要求：“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认为如何？”周恩来回答道：“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说：总希望你们参加，“先插进一只脚来”。周恩来回答：“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崇禧不止参加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结果毫无实权。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赫尔利又说：“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队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严正回答：“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养，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参加的一面是不能在政府中有任何作为；另一面就要受牵制，一切不好的军令政令都来了。”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鲁也参加劝说：“我们美国有句话，叫要舍身救火。现在一把火烧起来了，你们

得救。”周恩来回答：“不错，火应当救。但是要两只手能动，才能救火。现在请我们来做客，也只能坐在旁边看火。”赫尔利又改换一种方式继续劝说周恩来：“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之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都要拒绝。”

△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调任军政部次长，遗缺改派钱大钧继任。

△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到会议员187名，华中、华北各解放区代表参加会议。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任弼时等分别在大会上讲话。

△　据中央社讯：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自本年2月成立以来，征集到敌人罪行资料3000余件，正在审核和编译之中。

12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凡26条；《省参议员选举条例》，凡31条。

△　行政院会议决议：任命吕炯为中央气象局局长，徐诵明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杭立武为教育部常务次长，何廉为经济部常务次长。

△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明孔祥熙虽辞财政部长兼职，仍全权代表中国政府在美经办财政、金融、经济等要务。

△　自桂、黔沿线到达贵州都匀附近之第九十八军第一六九师一部，将进攻之日军第三师团击退，是日克复八寨，6日又收复三合。

△　伪军孙良诚率第二方面军1.6万余人向新四军苏北根据地进犯，苏北各据点伪军近万人同时开始“扫荡”，企图占领东沟、益林、

东坎等镇。新四军第三师及苏北地方武装经一周奋战，毙、伤、俘日伪军1040余人。

△　重庆《新华日报》载：华中沦陷区月来物价飞涨，平均涨至战前的2000倍左右，其原因是日伪军搜括物资和滥发钞票。

12月6日　国民政府特任罗良鉴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原任吴忠信另有任用，应免本职。同日，派蒋梦麟、吴文藻、杨云行、邵毓麟、张君劢、宁思承、钱端升为出席太平洋学会代表。

△　中共中央军委为准备反攻，增加装备，由游击战转入运动战，决定在延安创办第一所炮兵学校。1945年3月，学校正式开学，郭化若为校长，丘创成任政治委员，全校编为三个大队，10个中队，学员1000余人。

△　龙州方面日军一部沿左江南岸向东进攻，是日陷响水，7日陷崇善，10日陷扶南。

△　日本在东京召开兴亚运动协议委员会议，讨论《兴亚运动纲要》和确立东亚各国体制问题。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副秘书长、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等参加。

12月7日　周恩来、董必武等乘飞机由重庆回到延安。

△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高岗、薄一波等142人，党外由李鼎铭、续范亭等19人组成。

△　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联合总处理事会决定：拨专款100亿元，交战时生产局支配，扶助战时工业。

12月8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包瑞德进行会谈，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

建议作说客。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牺牲我们自己的蒋介石的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　周恩来写信给赫尔利，说明不能再去重庆谈判的理由，称：国民党方面“既拒绝我党五条最低限度提案，而政府所提三条又明显不同意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的主张，使我们实无法找得两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因此，我实无再去重庆谈判之可能”。他在信中表示为了击败共同敌人，始终愿同美方继续磋商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同美军观察组保持密切联系。

△　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大后方近况》的报告。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军政部长陈诚报告军政情况。新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以午餐招待参政员并听取对行政兴革的意见。

△　兵役部长鹿钟麟为革新役政弊端，通令所属严饬奉行三事：一、与士兵共甘苦，不准虐待凌辱；二、严禁克扣中饱；三、切实优待出征军人家属。

△　贵州独山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所部，经第二十九军第九十一师增援部队袭击及空军扫射轰炸，乃开始撤退，该师是日克复独山，

旋跟踪追击，进击六寨。

△　新四军第七旅向淮北路永城东北的大茴村、吕店子伪军窦殿臣部发动攻势，经两日激战，将其大部歼灭，共歼伪军1160余人。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袭击香港、南京、安庆等地日军机场和军事设施。在香港击沉日驱逐舰一艘；在安庆机场，毁地面日机14架；在南京击毁地面日机20架。

△　陈公博发表对国民党诱降的讲话，宣称："国人现立南京及重庆二立场，我们南京者，对重庆同志最近的艰难，俱衷心谅解及深为同情。""望速舍过去一切，与我们向统一之途迈进。"

△　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发表讲话，鼓吹"与亲邦日本共存亡"，要求"国民应各尽其本分，忠其职责，忍苦含辛，直待战局完全胜利"。

12月9日　周恩来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报告时局及国共谈判的经过。同日，又出席延安青年学生及各界代表举行的"一二九"九周年纪念会，号召：沦陷区青年回到沦陷区去，参加敌后的抗日战争！青年们回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在交通线附近的青年，就近抵抗敌人！

△　陈诚宣布：准备在美国的协助下，装备和训练30个新式战斗师。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主力与增援八莫的日军混合支队在南于附近发生激战，该师与敌战至13日，阵地被攻破，师指挥所亦遭袭击。旋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赶至南于，指挥战事。14日战局得以稳定。

△　缅北八莫日军山崎支队向中国驻印军南茴高地发起猛攻，一度占领了高地。11日，驻印军转入全线反攻，并派出一部进入伊洛瓦

底江南岸预伏，截阻流窜的日军。

12月10日　　赫尔利函复周恩来，阻止中共公布五项协议。称五点协议和三点反建议案都是谈判的基础，可以修改，“在双方谈判尚未终结之前，该项协议草案，不宜遽即发表。”又称：“三点反建议也不是国民政府的最后一言”，希望周恩来再次来渝谈判。

△　中国政府决定在锡兰（今名斯里兰卡）科伦坡设立领事馆，首任领事为杨冕璜。

△　南宁方面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经吴村墟沿邕龙路南下，是日与由思乐北上之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一部在绥渌会师。至此，日军完成打通大陆与法属中南半岛交通之目的，桂境重大战斗暂告结束。

△　第九十八军第一六九师一部克复贵州荔波。另一部克复六寨。

△　武汉大学举行时事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要求最高当局采取紧急办法，挽救目前危局，政治上要实行民主；军事上要改善士兵待遇，发动民众力量，真正做到军民合作；经济上严格分别公私经济，平均战费负担；外交上，应该与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　黄炎培病中投书《大公报》，深感“国家大局艰危之至”，认为“第一件大事是打退敌人。国军当然尽力，但民众不来合作，中原及湘桂之覆辙，大可引为鉴戒”。

12月上旬　　魏德迈建议蒋介石，为防贵州万一陷落，应作由重庆迁都昆明的准备。蒋介石表示：“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

△　赫尔利与蒋介石会谈。赫尔利告诉蒋介石，如果政治上不妥协，就不能统一中国军队和“在战争中产生一个强大、自由、统一和

民主的中国”。旋与蒋介石共同制订了一个新的谈判方案：“（一）成立包括共产党和其他非国民党人士参加的战时内阁；（二）建立一个由政府代表、共产党代表和美军军官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制订出中共军队编入国民政府军队的详细计划；（三）由一名美军军官统帅共产党的部队；（四）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12月11日　　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昆明发表演说称：日军已占湘、桂，滇省将成前线，号召全省军民发奋图强，加强防御力量，人人要准备作战，要准备自卫，一切牺牲都在所不惜。

△　冯玉祥应中国战时社会问题研究会之邀，在重庆作《敌之总崩溃与最近战局》的讲演。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第二〇〇师攻占拱撤、蛮蚌。芒市、遮放战役结束。是役共歼日军1014人，俘日军20人。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袭击广州天河机场，击毁日机九架，击伤八架。

12月12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渝与国民党谈判的王若飞，并转告包瑞德、戴维斯，指出：一、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议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我们想发表的仅是我们向蒋建议的五条；二、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三、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等“七大”会后再说。

△　赫尔利致电罗斯福，报告国共谈判的情况，称“现在蒋介石授权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有关人与共产党商谈，找出解决办法。并要求我从中斡旋，重新开始与共产党谈判”。并称：蒋介石多次向我保证，他现在决心把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工作放在首位。还希望我向您转达他的保证。

△　蒋介石召见从衡阳出逃归来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听取守城及脱险经过报告。

△　是日至20日，滇西畹町日军以城郊各据点为基地，屡向第十一集团军第五十三军正面弄坎阵地，第六军正面排那、小湾山、天盘山、虎尾山阵地，第二〇〇师正面六丁西南、拱撤西南、双坡南、谢边西南、猛占街附近阵地猛攻。

△　第二十九军第九十一师克复广西南丹，继向河池进击。

12月13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汉章为暂编第五军军长。

△　经济部长翁文灏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明战时生产局是一个取得美国租借物资的管制机关，研究国内生产和国外输入的物资，为反攻作准备。翁又宣布：中美专家已成立钢铁制造和液体燃料两顾问委员会，加强该两项生产。

△　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赞扬中国人民的长期抵抗敌人侵略，已奠定了民主势力的基石。并称："对于中国军事方面的成就表示满意。"中美将"共同迎接胜利"。

△　中法科学合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其宗旨为沟通中法两国文化，任务是交换教授，选派留学生赴法等。李石曾、吴稚晖任名誉会长，王宠惠、张继、王世杰等为中方委员。

△　新任瑞典驻华全权公使亚勒德抵渝。是日接见记者，称：他来华的重要任务是谈判取消治外法权的问题。

12月14日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在中美空军的猛烈轰炸掩护下，攻夺八莫城北监狱、宪兵营和旧炮台。同时，又展开对日军腹廓核心阵地的攻击，击毙其城防指挥官原好三大佐。

△　日军以密集部队向缅北5338高地发起猛攻，一日之内发射炮

弹3000余发，新编第三十师第九十团第三营阵地全被摧毁。双方死伤惨重，日军死伤1260余人，其中少佐以下军官达40名。

△ 是日至16日，日军先后侵占广西罗城、天河，其间对该地烧杀抢掠。天河县民众被杀1802人；罗城县民众被杀1158人。

△ 山东八路军一部在胶东路南侧对日伪军发动攻势，占领高崖、寺台、高家庄等10余处日伪军据点。同日，冀中八路军一部攻克石家庄日军监狱，救出抗日干部、群众8000余人。

△ 胶东八路军一部克复山东栖霞县城。

△ 江西省临时参议会选举张国焘、李中襄、王又庸、杨不平、王冠英、甘家馨、王德舆、吴健陶、熊在渭、王枕心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衡阳《大华晚报》因战事影响，是日迁贵阳出版。

12月15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我们惟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毛泽东强调："1945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柏德上校磋商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问题。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包瑞德上校在座。美就中共在美军登陆时所可能提供的合作与援助作了试探。

△ 王若飞会见孙科。孙科认为中共关于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要

求是合理的，但实行须有步骤，并提议国防最高会议如有委员30人，可考虑国民党15人，军队10人，各党派五人。蒋介石曾表示可以考虑此种方案。又说，蒋无良策解决中国问题，可能愿意接受此种方案。

△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招待记者，在谈及中美关系时称：中美间志同道合，惟一的目标是打击敌人，希望中国所有力量能团结一致，为打击敌人而使用。

△　美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电呈罗斯福，报告苏联提出了对日作战所要求的代价。斯大林宣称，希望再能租借中国旅顺、大连两港及其周围地区和租借中东铁路，并要求承认外蒙古现状。

△　中国儿童福利协会举行成立大会。

△　缅北八莫克复。14日夜，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对八莫再次实施夜间攻击，日军残敌拼死顽抗。战至是日晨，日军不支，500余人的守备队除残部60余人利用夜暗泅水向南坎逃脱外，其余全部就歼，驻印军完全占领八莫城。八莫攻坚战结束。

△　新四军第十六旅一部发起泗安战斗，攻入浙江长兴县泗安镇，全歼伪和平建国军第五集团军第三十四师三个营，俘伪官兵400余名。

△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选举王国源、郭湘、丘翥双、彭革陈、余若南、高秉生、夏良工、李琢仁、李翥仪、傅况麟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陈公博、褚民谊、林柏生等去日本，是日抵东京。16日，陈等拜会日本天皇和陆相杉山元、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

12月16日　　周恩来复信赫尔利，指出国民党对中共的五点建议出乎意外的直截了当的拒绝，使谈判完全陷于停顿，我回重庆已无所裨益。表示接受赫尔利的要求，暂不公布五点建议，但坚持将在适当

的时机予以公布。周恩来明确指出：有关这次谈判的基本困难就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针对赫尔利认为最近国民政府的人事调整表示国民党在走向民主的看法，指出："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生产局组织法》，凡23条。规定该局为综理战时生产事务之最高机关，隶属行政院，并受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监督。

△　国民政府以四川自贡市私立中学校董余述怀捐助国币100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是日予以明令褒扬。

△　日首相小矶设宴招待陈公博。陈在席间讲话称："今日中日两国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我们唯有本于汪先生昭示我们的由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决议，勇往迈进。"

12月17日　　张伯苓、胡适、于斌、胡霖、蒋梦麟、林语堂、吴蕴初、钱永铭等21位实业、文化、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立取有效之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　华西大学邀加拿大文幼章作题为《以民主来抢救中国》的讲演，指出：十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治不民主，经济不民主，社会不民主，国家永不会强，年青人永不得出路。要达到民主世界，唯有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唤起民众"是当前最急切最正当的工作。

△　新任比利时驻华大使德尔富抵达重庆。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八十八团奉命从蚌家塘越过5220高地，向日军后方推进，迂回至卡的克后面的马支，于是日攻占马支。19日攻占日军主要阵地卡的克。至22日，完全击溃日军主力，残敌向南溃退。

12月18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设立善后救济督办总署，并任蒋廷黻为督办。同日又决议：赈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辞职照准，特任许世英为赈济委员会委员长。2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法新任驻华大使贝志高昨日抵达重庆，是日对记者谈话，称其来华的主要任务在促进中法关系，并与中国政府谈判治外法权问题。

△　美国第二十轰炸总队及第十四航空队全部飞机250余架联合出动，轰炸汉口及岳阳日军供应基地、军事设施，空战中击落日机15架。

△　日机数架自鄂入川，在梁山、万县及成都等地投弹。

12月19日　　美国空军轰炸汉口，造成民众生命财产惨重损失。19日，蒋介石以事先未得同意，特嘱宋子文转告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军应尊重战区纪律。赫即进见蒋，作出保证，以后美军轰炸中国城市前必得蒋的认可。对国共谈判事，蒋告赫，“军事取严，政治放宽”，允赫再约周恩来来重庆谈判。

△　蒋介石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调任军政部长，派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理司令长官职。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大会闭幕。大会通过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迅速成立联合政府及统帅部案；要求国民政府释放叶挺、杨虎城、张学良等抗日将领及一切爱国政治犯案；加强边区武装力量，准备反攻案及1945年边区经济建设方案等。

△　罗荣桓、黎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从7月至12月，山东根据地共扩大面积2.9万平方公里，村庄1.29万个，人口583.5万人。文登、栖霞、乐陵、利津、沂水、莒县六县城均为我控制。

△　行政院会议决定盐政司、盐务局合并改组为盐政局。

△　中美混合空军机队轰炸汉口日军机场，日机四架起飞迎战，中美空军击落其中二架。

△　美第十四航空队袭击香港附近日军启德机场，在空战中击落日机二架，击毁地面战斗机三架。

△　重庆《新华日报》载：日军占领衡阳、长沙、宝庆等处后，将占领区分为长岳、潭宝、衡永郴三个伪省，并分由唐蟒、唐生明、黄政民任伪省主席。

12月20日　　瑞典驻华公使亚勒德向蒋介石递交国书，并表示瑞典愿意放弃在华治外特权，并与中国缔结平等新约。

△　冀鲁豫区八路军一部攻克山东肥城。

△　英外相艾登在下院就中国战局发表声明，称：蒙巴顿、尼米兹、麦克阿瑟给公敌的协同打击，可以使日寇全部崩溃和中国收复失地的日期加速到来。

12月21日　　赫尔利致电复周恩来，希望他来重庆谈判。并称，他相信共产党建议的一般原则的成功机会，将“较以前任何时候光明”。

△　卫立煌转达蒋介石“着远征军迅速攻击畹町之敌，并限期占领”的命令，并命令第十一集团军“即就现属各部队积极部署，攻占畹町”。

△　蒋介石以黔桂战事中前方将士英勇作战，是日派员携巨款前往贵阳犒赏前线将士。

△　兼川省主席张群邀请战时生产局局长翁文灏、副局长彭学沛

及川、康生产界、金融界人士数十人商讨增加战时生产问题。与会人员一致对于管制机关太多、借款手续太多、子金太贵等提出意见，希望设法解决。

△　美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麦克鲁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这次中美机队轰炸汉口，是今后共同努力出击的先声。并表示：我们将用可能出动的最大数目之飞机，以及最大吨数的炸弹，轰炸敌人在中国本土的每一供应港口。

△　美机机群袭击沈阳“满洲飞机公司”，击毁地面机15架，击伤七架。同日，又袭击济南日机场，击毁日机五架。

12月22日　　毛泽东致电赫尔利称：周恩来正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难以离开延安，并且国民政府并未表示充分诚意，以保证在五点建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他提议在延安举行一次会谈。

△　毛泽东致信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对其在抗战中支撑北线，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绩给予赞扬。略谓：“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　行政院令饬各部、会、署暨省、市政府，遵行肃清贪风整饬吏治办法四项，要求严格执行“惩治贪污条例”；“惩办贪污案件，得随时宣布社会，使其发生示儆作用”。

△　马寅初在重庆星期五聚餐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的演说，指出：“今日唯有从速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开放言论，确立各党派合法地位，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可能。”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越过南王河，进抵拉康地区与日军对峙，其另一部沿南宛河西岸向东猛进。23日，将八莫至南坎公路切为数段，并包围了南开地区日军。

△　八路军冀热辽一区一部六个连及民兵千余人，在长期潜伏在伪绥靖军内部的敌工干部配合下，一枪未放，拿下乐亭县刘各庄日伪军据点，将伪绥靖军第五团1500名官兵全部俘获。

△　新四军淮南津浦路东军分区来安支队，在六合县以北羊山头地区，伏击伪军警卫第三师一个营和日军一个小队，全歼该部日伪军。

△　美财长摩根索宣布：以1.5万美元的支票交给孔祥熙，偿还美军在华建筑空军基地费用。

12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改善士兵待遇献粮献金办法》，凡24条，训令通饬施行。

△　国民政府任命刘季洪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会议，任命赵尊岳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

12月24日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向拉康南之日军发起攻击，并击溃日军两个中队的援军，是日占领南开。26日另一部占领曼切姆和马王。

12月25日　　蒋介石召集军政、兵役两部主管，会商征集新兵30万办法。要求两月内征集完成。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何应钦任总司令，龙云、卫立煌为副总司令，负责西南地区各部队统一指挥及整训。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赫尔利于11月来延，目的在于调停国共关系。国共谈判尚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国民党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统区人心惶惶，各界人士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使我党在国统区人民中

威信极大提高。最近八个月来，中国政治形势起了大变化。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状况。中共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1945年的任务，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部署，特别要注意抓好发展生产、城市工作以及扩大解放区三个方面，争取明年军民生产的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将来的丰衣足食；努力在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普遍建立地下组织，发展广大的地下军，并在将来占领大城市；扩大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数年以后如能达到100万至150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完成1945年的任务，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

△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在四川北碚开馆典礼暨中国科学社三十周年在北碚区纪念会联合大会举行。主席翁文灏致词，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解释西部科学院的工作。科学研究者300余人出席。

12月26日　　蒋介石接见赫尔利，告知坚拒中共所提联合政府主张。

△　国民政府公布《县长考绩条例》，凡21条。

△　重庆市商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期望国民政府：一、实施宪政，厉行民治，以发挥天下为公之精诚；二、厉行监察制度，加强法制精神；三、容纳人民公意，裁减政府不必要之机关与冗员，并简化行政手续，提高行政效率；四、提高士兵待遇，扫除中饱，整饬军纪；五、免除一切不必要之猜防，贯彻民官合作、军民合作之精神。

△　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武为第九十七军军长。

△　福建省临时参议会选举李黎洲、康绍周、石磊、李钰、林学渊、叶道渊、梁龙光、黄哲真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袭击济南日机场，击毁地面战斗机九架。同日又在台湾海峡击落日机二架。

△　汪伪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特任周佛海为伪上海市市长兼保安司令，林柏生为伪安徽省省长兼保安司令。

12月27日　国民政府派蒋梦麟、赖琏、陈东原为出席联合国教育会议代表。

△　军事委员会任命李玉堂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方先觉为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包瑞德会谈，就美方所提在欧战结束后美军一个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登陆时要求中共暂时提供后勤供应，进行磋商。

△　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攻击南开附近之劳文机场和垒允第一飞机制造厂。28日占领彭坎，1945年1月6日攻占曼温。至此，基本完成了对南坎的包围。

△　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南下部队在师长粟裕率领下，分两路渡长江南下。1945年1月上旬于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会议，任命林柏生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赵尊岳为中央宣传部部长。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袭击广州白云、天河和黄埔机场，空战中击毁日战斗机九架，伤七架。毁地面日机一架。

12月28日　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愿在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向国民政府提出四点要求：一、释放全国政治犯；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

停止一切特务活动。对此要求，蒋介石视作“趁火打劫”。赫尔利亦复电表示“至感遗憾”，“因与吾人原定先谋原则上之同意，再讨论细节之程序相违”。为促使双方再度商谈，赫尔利在周不愿前往重庆的情况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提议：“（一）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及余本人，同赴延安，作短期之勾留，与阁下面商一切；（二）若原则上已获同意，则毛主席及周将军应与吾人同回重庆，以完成协定。”

△　行政院训令贵州省政府，自即日起，贵州省党政归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导。

△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九次会议选举潘昌猷、邓华民、胡仲实、陈介生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各军在炮、空火力掩护下，向畹町东、北、南三面发起攻击。第五十三军进至上寨、萌龙寨西南、遮勒、蛮信、户弄以北地区，先后攻占景坎、户下、蛮信、蛮良、户三、遮勒等地；第二军攻占谢连、户蚌；第六军在进攻中受回龙山日军阻击，与日军在虎尾山、蛮蚌南端森林附近对峙。

12月29日　　原中国战区美军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之副参谋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司令；美国陆军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出任中国陆军司令部后勤司令。

△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通过《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凡7条。指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项进行，第一项为民营企业；第二项为国家经营。规定：一、由政府独营之经济事业，包括五大类：邮政电讯、兵工厂、铸币厂、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厂等。二、未经指定政府独营之事业，均可由人民经营。三、凡民力不足，或政府认为须特别重视之事业，如大规模石油矿、钢铁厂及航运事业等，政府乃得单独经营，或与民资、外资合办。四、政府与民资、外资合办

之事业，应采用公司制度。政府除依法行使监督权外，对于公司业务、财务及人事之管理权，应以股东地位行使。五、政府经营的事业，除第一条独营者外，无论单独经营或与民资、外资合办，其具有商业之性质者，均与同类民营事业之权利义务同一待遇。还规定民营重要事业之创设，依法经政府按照建议总计划予以审核；民营工业合乎工业建设计划之规定者，政府应特别奖掖资助，并予以技术上及运输上的便利，使之依照计划如期发展。对于外人在中国直接单独经营的事业，应依照中国法令办理。对于外资的利用，应依照平等互惠、国际合作的原则，在不妨碍主权及计划实施的前提下，以各种方式加以吸收。

△　国民参政会驻委会举行会议，莫德惠主持。由财政部长俞鸿钧报告今后施政方针、最近金融财政重要设施以及1945年度收支预算。

12月30日　　国民政府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原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牟中珩免本兼各职。

△　战时生产局招待中外记者，首由局长翁文灏报告该局成立以来之工作实况，继由顾问孔莱发表谈话，称：中国兵工厂和战时生产局所担任的军火增产计划，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中国制造的战地臼炮、炮弹、地雷、刺刀，甚至斧头、镰刀和锄头等，都将早日准备作对日抗战之用。

△　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招待会，招待西南战区来渝文化人士和在渝文化界人士，会长孙科发表讲话，称：中国今天先要真正的实现三民主义，要使主权在民，而不能再是一个阶级，或者一派少数人把持包办的国家。号召文化界人士为实现民主而奋斗。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等相继发言，表示赞同。

△　重庆《中央日报》讯：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人数总数为12.2572

万人。

△　滇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展开对日岗、蛮蚌、黑猛龙地区的攻坚作战。第五十三军在景坎阵地抗击日军的反扑，并克复猛戛、户栏山、日背及龙川江右岸渡口；第六军进至蛮蚌附近地区；第二军攻占上下蛮卯等地。

△　据东京广播称：台湾陆军指挥官安藤利吉兼任台湾总督，前总督长谷川充任最高军事参议官。

12月3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指出：一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敌作战二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2万余名，俘获各种炮百余门，收复县城16个，攻入县城47个，光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1200万人。同时，正规军由过去的47万增加到65万，民兵由200万增加到220万，解放区人口由8000万增加到9200万，增强了反攻的力量。

△　坚守衡阳抗战的将领方先觉、李玉堂、周庆祥、孙鸣玉等应山东旅渝同乡会之请，在重庆报告衡阳作战及脱险之经过。

△　美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袭击汉口附近日机场，在空战中击毁日机二架，毁地面日机二架。

△　由王正廷任团长的湘桂难胞慰问团由重庆出发，前往贵阳。

△　日机轰炸鄂北老河口。

是月　中国青年党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在军事上应以争取胜利为前提，改正种种错误；政治上应立即宣布结束党治，以民主的政制代替现存的官僚政制；经济上以提高生产力为前提，停发纸币，扩充战费；外交上推进与英、美、苏的关系。

△　黄炎培、褚辅成及重庆各界人士60余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献

言，要求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在野学者与领袖互相推诚，切实合作，并要求切实保障人身、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准许人民对政治发表意见，以开言论。

△　美军在云南建成六个军事人员培训中心：参谋学校、步兵学校、阵地炮兵学校、摩托学校、翻译学校、兵工培训学校，学员近万人。

△　11月至是月，日军为阻止华中新四军的攻势作战，防止盟军可能的登陆作战，在华中大量增兵，除原有的五个师团和六个混成旅团外，又增加三个师团、七个混成旅团，以加强沿海地区及城市、重要交通线的守备。

1944年△　据统计，截至是月，日军在冀、热、辽地区抓捕14万青壮年去东北充当劳工，80％以上的人被虐杀于苦役之中。另外，日伪军强行扩大罂粟种植面积，仅围场一县就种植13万亩。热河全省本年度计划征收数为600万两，实际超过1000万两。

△　据伪满洲国国务院弘报处《旬报》载：截至1944年末，日本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公顷，约占当时全东北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

是年　　国民政府财政总支出为1716.89亿元，其中军费为1310.8亿元，占总支出的76.3％。

△　全国田赋征实、征购总额为9572万市石，较1943年增加54％。

△　资源委员会统计，本年度事业解缴资本官息为1496万元；股东红利为3453万元。

△　春，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将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支队，共4000余人。

△　伪满中央银行本年度货币发行总额为58.76亿元，略低于发行货币量多的1941—1943年的三年货币发行量的总和。

△　全东北煤炭总产量为2562.7万吨，其中“满炭”系统为1529万吨，“满铁”系统为646.3万吨，其他煤矿为387.4万吨。

△　日军在华北成立特别警备队，由驻华北宪兵司令加藤泊次郎兼任队长，下辖七个情报队及10个侦谍队，人数为一万至1.5万人，任务为调查、破坏华北地下抗日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一卷
(1945—1946)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一卷

(1945—1946)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返回总目录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1月

1月1日　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发表元旦广播讲话，称：“去年一年之间，我们中国处境的艰危，不仅是抗战八年中所未有，亦是我们革命五十年以来未曾遭遇过的险境”，“所以今年这一年真是我们励志雪耻，发奋图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唯一枢纽，也是我们配合盟邦发动反攻最后的时机”；并宣布：“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

△　上午9时在重庆国民政府花园，东向遥祭孙中山陵墓，蒋介石主祭，党政军要员居正、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500余人与祭。

△　蒋介石在重庆复兴关体育场检阅重庆市国民兵，并致词勖勉全体员兵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奉行孙中山遗教，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争取胜利早日实现》的新年献词，提出全国军民1945年的任务是：“一方面在可以反攻的地方要进行反攻，另一方面则必须努力停止敌寇对大后方的前进”；并号召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指出“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

△　延安各界欢度新年。中共中央设宴招待在延盟国友人并举行

新年干部晚会，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则对敌人的打击也越有力量。会上，边区群英会代表向毛泽东和朱德献旗。

△　新疆省政府举行元旦庆祝会，各界代表700余人出席，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宣布今年施政重心，为实施三民主义之民、财、建、教四大建设。

△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1945年献词》，希望中国成为“真正民主而又统一的国家”，全国的抗战军队“能真正联合作战”；并提出召集紧急时局会议，“树立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国策之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政府”。

△　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冷遹、康心如、江恒源、张肖梅、江一平、吴蕴初、潘仰山、潘序伦、史良、沙千里、史东山、张志让、杨卫玉等60多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均提出具体实施意见，要求国民政府与各党派切实合作，挽救时局。

△　国民政府明令颁授郑洞国、霍揆彰、萧毅肃、周福成、何绍周、王凌云、孙立人、廖耀湘以青天白日勋章；颁授卫立煌以一等宝鼎勋章；颁授巴梯斯达以特种大绶卿云勋章；颁授萨拉里架以特种大绶景星勋章。

△　国民政府战时运输管理局在重庆成立，俞鹏飞任局长，龚学遂及麦克鲁（美籍）任副局长；交通部之公路总局及各公路机构均归并于管理局。

△　国民党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罗卓英对记者谈话称：“此次蒋委员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预定发动10万青年，分两批征集。现为时仅两月，而全国从军青年已超过十二万人”；并表示要使青年远征

军“成为全国之模范军队”。

△　青年远征军第二〇一、二〇二、二〇三、二〇四、二〇五、二〇六、二〇七师成立，师长分别为戴之奇、罗泽闿、钟彬、覃异之、刘安祺、杨彬、方先觉，师部分别设于四川璧山、綦江、泸县、万县、贵州修文、陕西南郑、云南昆明，各师接收从军青年分别为8106、7189、8591、10127、5912、11631、11000余名。

△　第四战区一部克复广西思恩县城（今属环江县）。

△　滇西我第十一集团军由黄杰指挥，进逼黑山门、畹町，并续向缅边，夹攻九谷日军。

△　由日俘浅轺太郎等发起组织的反对日本军阀侵略的“日本革命同志会”正式成立。

△　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广东省军政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梁鸿钧、副司令员谢立全，政委罗范群，下辖四个团。

△　前四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刘成勋在大邑原籍逝世。5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刘成勋。

△　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发表新年讲话，叫嚷“宜乘时奋起”，“以根绝赤祸，以排除在华之英美外力，更实行中日同盟条约”。

1月2日　　国民政府兵役部长鹿钟麟为改革役政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四大方针：一、实行三平原则；二、澄清兵役积弊；三、改善新兵生活；四、切实优待征属；以及三点要求：一、对士兵以父兄之待子弟，严禁虐待；二、饷物及时发放，不得克扣；三、实惠征属，违则军法严惩。

△　国民政府通令改善士兵生活，自本年起，现役军人每人每月

伙食费500元，草鞋费100元，马乾1000元，猪肉二斤。

△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在贵阳对记者谈中原战争失败原因有三：一、敌使用大量机械化部队，敌我武器悬殊，难于取胜；二、我对敌情判断有误；三、与民争利，军民合作没有做好。

△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就国大选举问题答外国记者称：依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之《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应有代表总额1200人。其中区域选举产生665人，职业选举产生380人，特种选举产生（包括东北、蒙疆、侨民代表）155人。战前选出代表共为950人，尚未依法产生之代表共250人，又职业选举之代表总额380人中，农、工、商团体占322名，自由职业团体占58名。

△　罗荣桓在中共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作《1944年过去和1945年的到来》的报告，要点为：一、在1944年斗争中，山东根据地扩大了四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1000万；二、我军已超过15万，民兵30万，为完成20万大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三、1945年山东的主要任务是：（一）继续扩大解放区，扩大与建设根据地并重；（二）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军民丰衣足食；（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四）大练兵，拥干爱兵，严肃军事生活；（五）发扬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复电毛泽东、周恩来，称：现得国民政府同意，提议：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与赫尔利同赴延安，与毛、周面商一切。二、若获原则同意，则毛主席及周将军与吾人同回重庆，完成协定。

△　第七十军一部反击福建霞浦日军，是日将敌击溃，完全克复该城。

1月3日　　延安权威人士对蒋介石元旦讲话发表评论，指出：“还政”之说是蒋氏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的空文，召开“国民大会”是蒋氏用以

抵制建立联合政府的挡箭牌；并质问蒋氏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国民政府，消灭特务机关，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

△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在该部举行的授勋典礼上获颁勋章，以表彰其在华对中国空军的壮大及对日攻防的功绩。

△　中美混合大队飞机轰炸平汉路之确山与漯河车场，毁敌机车五辆、创三辆。同日，美舰飞机对台湾及冲绳岛实行48小时之攻势，共毁损日本飞机331架、舰船95艘。

1月4日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华盛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谈两国关系。孔向罗保证："中国不仅将支持美国获得战争之胜利，同时并将支持美国准备和平之工作。"

△　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改组为田赋署，改隶粮食部。

△　中国军事代表团由桂永清将军率领抵达伦敦。

△　据中央社讯：财政部税务署去年度税收预算为40亿元，目前收入已超出原额，其中以烟酒税收最大，统税次之，糖类和矿物税又次之。本年度之预算已拟具，将超出100亿元。

△　周恩来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晋察冀边区工人抗日救国总会、晋绥边区总工会等名义，致电伦敦英国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西特龙·菲利浦斯，并转英、美、苏三国职工会代表会议，要求允许以中国解放区职工会的名义，派出代表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职工联盟大会。

△　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复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等1944年12月24日来电。李等来电系报告他们对美军少校欧哥士前去要求在对日作战中给予配合的答复。中共中央的复电指出：你们的答复甚好。关于破坏工作，只能允其先作小试验，进行一定目标的轰炸，看其效果与影响，再商以后的计划；至于配合轰炸，夺取碉堡，在无炮兵条件

下，我们不能作肯定答复；对抢夺汉口侦察台，也应慎重。总之，我们不能答应他做超过目前可能限度的工作和破坏。

△　中国空军作战机群飞临海南及泰、缅，轰炸日军重要设施。

1月5日　　中美混合机队飞机在汉口机场击毁日机49架，创一次击毁日机之最高纪录。次日，中美飞机又轰炸汉口及武昌，共击毁日机49架。

△　蒋介石设宴招待盟邦在渝军官，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孔士德将军、苏联尼科尔斯基上校等70余人应邀与会。

△　进入缅甸的国军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主力攻占大青山，另部亦连克拱尾寨等日军据点。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在东京向大本营提出中国派遣军今后作战之指导方案，并说明进攻四川计划。22日，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中止四川作战。

1月6日　　蒋介石与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商谈同中共继续谈判的方针，决定由赫尔利偕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安进行两党商谈，以表“诚意”。次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告以将陪同宋、张、王到延安会谈。

△　国民政府专卖事业管理局局长刘鸿生对记者说：“本年专卖事业预算，奉令核准为58亿元，内烟类占五亿，火柴八亿”；并称各厂所需原料，拟在国外大量订购，以及采取有效办法防止商人偷税。

△　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克复缅北孟温城。

△　福建集美学校师生节衣缩食，捐献飞机，将捐款60万元交国民政府航空建设协会总会转送国库。

△　美国总统罗斯福向第七十九届国会致送咨文，阐明美国外交政策，声称决不松懈作战，坚持国际合作政策，增进军火生产，继续援华工作。

△　太平洋学会第九次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城举行，至18日结束。中国以蒋梦麟为团长的16名代表参加。大会议题是：一、1944年太平洋各国之重要发展；二、日本之将来；三、中国、印度、荷属东印度及澳洲经济复兴之步骤；四、文化种族关系；五、战前属地区域之将来；六、太平洋集体安全计划。

△　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在重庆招待外籍记者，称：日军在华空军主力三分之一已被击毁；并强调说，第十四航空队所创毁敌机、舰远较美国其他航空队为多，以B—29式飞机为主的对汉口的大队轰炸，今后仍将连续进行。

△　罗斯福分电丘吉尔、斯大林，约定2月2日在雅尔塔会晤。

1月7日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致电毛泽东称："深信国民政府诚恳企望作一种使解决成为可能的让步"，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谈。同日，又与蒋介石商谈召开国民大会和改组行政院事宜。

△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举办茶会，欢迎桂、柳来渝文化工作者，到郭沫若、张志让、郑贞文、宋云彬、邵荃麟、孙伏园、茅盾、金仲华、祝世康、刘清扬、邓初民、李剑华等70余人。沈钧儒致欢迎词，左舜生、章伯钧相继报告同盟的性质和最近的努力方针，说明实现民主为目前挽救危局的迫切要求。张申府致结束词，表示中国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而斗争。

△　汪伪空军飞行员林文威、邓志伟、刘炳球、傅浩璋、郑润诲、胡天海等九人驾驶九八式战斗机三架，自武进机场起飞，于当日抵达浙西某地向第三战区部队投诚。

△　日伪军5000多人对山东滨海区进行“扫荡”。八路军奋起抵抗，战至14日，敌被迫撤退。同时，日伪军7000多人对豫西嵩山、临汝、登封等地进行“扫荡”，八路军予以痛击，歼敌1000余人。

1月8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本年5月5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选任陈庆云为海外部长、魏怀为国府委员。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府向蒋介石呈递国书。晚上，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赫尔利。

△　教育部为鼓励外籍学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政治等学科，特在英国、美国和印度各大学设立中国文化奖学金，每校五名，每名每年奖学金1500美元。

△　战时生产局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成立，内定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主任，副主任由国民政府高等经济顾问纳尔逊担任。

1月9日　　法驻华大使贝志高、比利时驻华大使德尔福向蒋介石呈递国书；贝志高并将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将军所赠“荣光大勋章”献予蒋介石。

△　中共中央领导人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罗伊·克罗姆利一封信，请他通过驻华美军司令部传递给华盛顿。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军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国错综复杂的问题。克罗姆利立即打电报给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称，毛泽东和周恩来准备去华盛顿与罗斯福面谈，希望代约会晤日期和安排交通，并且嘱咐此事向赫尔利保密。

△　行政院会议议决：一、后方勤务部改组为后勤总司令部，直隶于军政部，由陈诚兼总司令；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划归战时生产局管辖。

△　重庆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该会理事长邓华益及民生公司杨成质、四川合众轮船公司经理骆远泉等发表讲话，称该会会员轮船公司共计九家，均因煤价黑市高涨，每吨约达一万元，而官价之煤供应大感不足，故每次长途航行中，往往客货运费所入尚不敷煤价。如民生公司一家，上月赔本达7000万元之巨，大有不能维持之势，要求政府将运价管制改为议价办法。

1月10日　国民政府特派翁文灏为战时生产局局长；任命王懋功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原任韩德勤免职。

△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发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强调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必须从农村根据地出发，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要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决不滥用浪费，为解放全中国作好物质准备和干部准备。

△　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就如何筹措战费问题发表谈话，称：中国大后方既大部为农产区，中国政府自须赖土地生产以为税收主要来源，征实、征借已实行三年；而且自本年起将令较富裕之地主献金献粮，此三项土地收入总额，本年将达谷麦9000万市石，以币值计算，将占政府税收之大部。此外有盐税、俸给所得税、营业税、遗产税、过分利得税、货物税等。不足之数，政府用出售黄金、信用借款、公债三项办法解决。

△　中印利多公路从利多至密支那长265英里的两线公路筑成，是日通车。运输队每月可载运物资七万至八万吨到中国。输油管已铺到密支那，每月输油几千吨到中国。

△　第四战区一部克复广西钦县（今钦州）、合浦及广东廉江。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第八团自梁山官庄出发，西渡黄河，挺进豫中，插入敌后，沿黄河故道经郓城、东明等县，进入河南

兰考县，于27日晚越过陇海铁路敌人封锁线，28日进抵杞县东北部，开辟豫中根据地，打通与新四军第五师的联系。

1月11日　毛泽东函复赫尔利，提议在重庆召开各党派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由国共两党和民盟三方参加，会议记录要公布，代表要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并表示此项提议如获国民党方面接受，周恩来将前往重庆商谈。

△　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江西赣州设立委员长行辕，经办第三、第七、第九战区军需补给事宜。

△　国民政府通令发动“献金献粮运动”，改善士兵生活。

△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审议并通过《建立中国战时经济的对策》与《中国物资统一调拨要领》，其目的在于保证军队自给自足，独立作战，对日本、“满洲国”提供援助；并统一调拨驻华军队的自给物资和运往日本的物资。

△　日军发动对粤汉路南段之进攻。敌分数路进犯，西路之敌一股于是日由桂东之恭城、富川向湘粤边境窜犯，窜至坪石、宜章间之三公桥；一股14日由道县分两路犯连县，窜至连县西之洛阳堡及临武以东地区。北路敌一股由耒阳南白沙与耒水东岸沿粤汉路南犯，一股由新田、宁远间桥下洞于18日窜至桂阳南仙人桥。此后南北敌分由耒阳、新田及坪石向粤汉路最后一段120公里地区窜犯。

△　太平洋学会讨论处置日本问题。会议认为台湾归还中国等悉照开罗会议宣言，并主张废除日皇制度。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任命丁默邨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吴颂皋为司法行政部部长。

△　日小矶内阁召集非常会议，决定以决战来推动和平停战谈判，结束战争。

1月12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战时生产局长翁文灏作对今后扶植生产方针的报告，略称：战时生产局为战时集中生产之最高机构，同时亦为中美两国间经济合作之一联系机构，将来全部美籍顾问约20人左右，但纯任技术方面工作。该局对国内外主要器材的购办，有审定之权。翁并报告经济部工作情况，指出工矿业当前最大困难为资金筹措问题。

△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安徽立煌（今金寨）成立，李品仙、王懋功等就任长官、副长官职。该战区作战区域为平汉线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　中国西南研究协会星期五聚餐会邀请于斌主教在重庆作《从美国舆论方面观察中美经济合作之前途》的讲演。于称，美人热心我战后建设，2000余技术专家愿来服务，福特筹备在华设分厂。

△　中法科学合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聘李石曾、吴敬恒、郎之万、哈达马为名誉会长，翁文灏、贝志高为会长。

1月13日　中国国际经济协会在重庆举行讲演会，孙科作《我国战后之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讲演，略称：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原则是，迅速求得工业化，因此不能完全采用英、美和苏联的经济制度，应建立自己的三民主义经济建设制度。

△　中国驻印军第五十师于缅北万好击破日军一个联队，攻占万好，日军向茂罗溃退。

△　盘踞广西恭城、富川的日军，经我军反攻，向湖南方面溃窜，我军将该两县完全克复。

△　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11日开始向广东省乐昌、坪石突进，于是日攻陷湖南省临武县。

1月14日　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徐冰就中共中央关于召开

有国共和民盟三方面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张，同左舜生、张申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杨杰等人在重庆座谈。他们认为中共态度完全正确，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并对国共谈判提出一些提议。

△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闭幕，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等出席并讲话。李鼎铭副主席致闭幕词，号召劳动英雄注意深耕细作，发展家庭手工业，组织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发展生产。

△　桂南日军分股经化龙侵陷横县。我军与地方民团不断反击，至19日卒将日军击退，收复横县。

△　赫尔利会见蒋介石后，致电罗斯福报告中国局势。主要叙述国共第四次商谈后双方交涉及谈判情形，以及阻碍中国统一的各项因素等。

△　美国记者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中国抗战的脊骨》一文，赞扬中国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说："占中国广大人口85％的农民，是中国抗战力量的源泉。"特别称赞解放区农民以游击战不断打击日军，把被迫降落在敌占区的美国飞行员拯救出来，送回基地。

1月15日　蒋介石发表《从军知识青年第一期入伍训词》，提出青年军人应有之基本认识：一、要立志革新，改造心理，以实践军人之修养；二、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以克尽军人之本职；三、要虚心求知，随地学习，以提高战斗的效能；四、要锻炼精神，坚守节操，以创造光荣的战绩。

△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发表对时局宣言，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中所谓"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之说，表示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指出："以此而居

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要求国民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开党派会议”。宣言稿送交各报后，仅《新华日报》发表。当日《新华日报》因此被扣。

△　丘吉尔致函蒋介石，派魏亚特将军为驻华代表。

△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三十师及新三十八师一团在空军、炮兵和战车火力支援下，向日军发动猛烈攻击，是日突入南坎，后续部队陆续突入市区，经激烈巷战，至午全部占领南坎，日军残部向腊戍方向溃逃。此役毙日军1780人，俘获12人，缴获机枪15挺，步枪560支，火炮12门。

△　中共冀热辽特委根据伪满军进关的严重形势，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对敌总力战，以巩固和扩大解放区。自本月中旬开始，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抽调伪满军四万余人“扫荡”冀东，冀热辽军民开始为期四个月的反伪满军战斗。

△　河南登封、临汝、禹县敌伪约5000人开始向登、临交界之白坪、马峪川、大峪店解放区进行“扫荡”，19日合围。解放区军民于20日冲破四五道封锁向北突围。27日，八路军以奔袭战术迅速楔入伪军王光林老巢会华山，当将王部第二、三团全部解决，生俘正、副团长各两名及士兵160余名。29日夜，复奔袭登封之颜仗川。31日歼灭舜王庙之敌，包围东白坪之伪军王克昌部，俘伪大队长张树振以下百名。

△　粤东增城、深圳等地日军于14日分三股向东进犯，是日侵至博罗，续犯惠阳。

△　周佛海就任汪伪上海市长。同日，汪伪国民政府特任凌霄为海军部长。

1月16日　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大户献金办法对记者谈，此次政府为改善士兵待遇，发起全国大户献金运动，全国献金数目以达到国币200亿元为目标，由本年1月开始收集，3月底办竣。

△　冀鲁豫八路军攻克河北大名县城，新任伪东亚自治军军长刘昆当场被击毙，前任伪军军长王天祥率所部突击团400余人反正。18日，日伪军再占大名县城。5月14日，八路军再克大名县。

△　郑州、荥阳、汜水、巩县、登封、临汝等县日军3000余名，配合伪军共约7000名，于7月向嵩山东南及临（汝）登（封）解放区进行报复“扫荡”。是日敌伪一部首先向登封以南的桐楼、东白坪、西白坪合击。八路军除留一部在内线抗击和牵制敌伪军外，主力已事先跳出包围圈侧击敌人。敌首次扑空后，18、19两日又连续三次合击均又扑空。22日，八路军选择曹村、东西刘碑地区予以痛击，一次消灭敌伪200余，旋继续出击，粉碎了敌伪的“扫荡”。

1月17日　蒋介石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就当前整军抗日要务和军事教育问题讲话。

△　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张厉生对记者谈：今日社会之苟安心理与享乐奢靡之生活，殊非战时所应有，亟应加以纠正，要真正做到前方充裕后方刻苦，使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完全集中于作战。

△　国民政府调任原驻土耳其公使邹尚友为驻阿富汗公使。

△　赣州在赣南专员蒋经国主持下开始作有计划疏散，迄30日止，除留守部队外，均已疏散竣事。专员公署已迁往安远，其他机关、学校则分别迁往长汀、宁都。蒋经国已于30日返渝，主持三青团干部学校校务。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二分区侦察队由赵亨德率领，于正太路芹泉至寿阳间之西庄村伏击敌东行之特别快车，毙伤敌军官、伪政府机

关顾问等60余人，俘虏伪山西省教育厅学务专员铃木三川郎等八人，缴获文件8000余件及军用品。

△　山东诸城伪保安队副大队长张希贤率部1000余人反正，八路军山东军区改编该部为独立第三旅，张希贤任旅长。

△　美机猛炸上海虹桥机场，计炸毁敌机18架；又炸龙华机场，敌贮藏之7000桶汽油全部被炸焚毁。同日，又袭击福州，炸断横跨闽江之万寿桥。20日再袭沪，炸虹桥机场，毁敌机八架，并将虹口公大纱厂及公大第三厂炸毁。

△　湘东茶陵日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师团一部，12日开始东进，于是日侵入江西莲花，次日晚向宁冈之古城流窜。

1月18日　贵州省政府改组。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政府主席，谭克敏、杨公达、傅启学、谢耿民分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长，李寰为秘书长；原任主席吴鼎昌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长谭克敏、周诒春、欧元怀、叶纪元及秘书长郑道儒均免职。

△　国民政府特任吴鼎昌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原任魏怀免职。

△　周恩来、董必武致电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指出目前对大后方文化人整风不宜扩大到党外，因为现在正开展民主运动，“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主张即使党内文化人整风也“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　意外相加斯巴莱在国务会议上宣布，以前意大利法西斯政府

所订关于意国支持日本在华政策的一切条约都归无效；并希望驻华大使将能解决一切争论，恢复意中两国的传统友谊。次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并宣布废除与日本政府的同盟关系。

△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建立日本本土及中国、朝鲜等占领区防御体系，准备与同盟国军队决战。旋即指令其中国派遣军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地区为防御重点，力求挫败美军登陆和中国军队反攻的企图。

△　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一〇四师团一部乘军舰分向粤东稔山、平海谷附近强行登陆，于是日晚占领海丰、陆丰两县。

1月19日　英援华委员会主席费蕾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不惜牺牲，表示钦敬，并相信统一、民主与自由之中国必能对世界之文明贡献其智能。

△　山东惠民县敌伪千余于是日开始出动，对滨（县）惠（民）霑（化）等地区进行抢粮“扫荡”，窜至沙窝、阳信之水落坡一带。20日敌分股进犯皮店、二十里坡，25日又窜犯水落坡。连日皆遭当地军民截击，26日窜回惠民县城。

△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向北攻击，是日攻占清远县。

1月20日　滇西远征军克复畹町，自此中印公路畅通。

△　赫尔利经蒋介石的同意致函毛泽东，说明在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某些变更，并估计这些都不可能得到中共的同意，但希望中共不要马上予以拒绝，建议再派周恩来赴重庆谈判。

△　国民政府特任蒋廷黻为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　是日至3月1日，日军侵占江西永新县城共41天，全县33个乡被日军骚扰达22个之多，杀害村民353人，殴打致残178人，被抓走

54人，另有540人失踪，烧毁房屋392栋。

△　罗斯福在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位连任四届之总统，并在简短之就职演说中，要求全国在此争取胜利之最后一段期间，从事全面之作战努力。同日，蒋介石电贺罗斯福四度连任美国总统。

1月中旬　　据重庆《中央日报》讯：重庆市之银行除国家银行外，商业银行总行共49家，外地商业银行以往呈准在渝设分行者14家，外商银行二家，目前商业银行总数为65家。

1月**21**日　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抵贵阳，并对记者谈黔政方针，称今后一切行动设施以能配合军事为先决条件，在军事第一之原则下，求取政治之进步。又称为解决民食，将实行川粮济黔办法。

△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民主运动老战士首次座谈会上讲话，介绍国共谈判现阶段的状况。为使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更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听取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并针对所提意见说：一、我们的确不能把建立联合政府的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但目前情况又不能不以蒋介石为对象来开展这个运动”。二、《共同纲领》应照顾到全国各方，“集思广益，更适合人民的要求”。三、在大后方不一定要征得国民党同意才开展民主运动，要用各种方法逼迫蒋介石改变其一党专政制度。

△　中共中央就召开党派会议与推动孙科参加民主运动问题给王若飞指示，指出党派会议只能是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会上应讨论国是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之组织及其实际步骤，应通过共同纲领，保证放人、撤兵、自由、废特四条之实现。望与民盟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交换意见，征求他们的主张。各党派会议我们是采纳孙科的意见精神提出的。从孙科所提建议的立场看，尚不太坏，但必须告诉他：民主运动应不怕与蒋介石对立。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是各党各派联合

的基本原则。

△　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在滇缅路与利多公路交会点苗斯举行会师典礼，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两军官兵数百名参加。

△　陪都各界湘桂难胞慰问团返抵重庆，团长王正廷对来访记者谈，此行曾至贵阳、贵定、独山、都匀等地，历时三周，散与难民之现款达1000万元，实物估值4000万元，现沿线难民约有七八千亟待救济，准备再筹款千万元救济。翌日，陪都各界黔桂前线将士慰劳团返抵重庆。此行历川、黔、桂三省，凡20县市，完成黔南、桂北、黔东、黔西及贵阳城防部队劳军工作，曾举行慰劳仪式11次，军民晚会六次，分赠慰劳金约2000万元及纪念章。

△　八路军太行军区以第七、第八军分区和平原分局党校警卫团等部共四个团又三个独立营的兵力，发起道清战役。至31日，第一阶段结束，拔除敌据点16处，解放道清铁路南修武、获嘉、博爱、武陟间的广大地区。

△　侵占浙省永嘉的日军乘船艇驶入飞云江，在瑞安东南登陆，午后侵入瑞安县城。国军反击，于23日克复瑞安县城。

△　日本第八十六届帝国议会续开。小矶首相发表施政报告，承认战局极严重，声称要加强日、“满”、华间陆上交通，加紧飞机生产，动用全国一切可用的人才进行战争。同日，藏相石渡庄太郎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称自日华战争发生以来，发行的公债已达848.7亿日元，上年度共发行公债269.9亿日元，本财政年度的目标是410亿日元。

1月22日　毛泽东再次电复赫尔利：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函魏德迈，提出要求美国借款

2000万元，中共将用此款策动南京伪军携带武器装备投诚，以及鼓励伪军在日军后方怠战和进行破坏。并称，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已争取3.4万多伪军反正，如果得到美国借款，1945年可以争取九万名伪军反正。至于2000万元款项，中国将在战胜日本之后负责归还。魏德迈把此事告诉赫尔利，赫尔利没有给予答复。

△ 粮食部长徐堪在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粮政近况，称：去年7月至12月全国粮价平稳。在45个主要都市中，16个都市粮价下跌，20个都市平稳，九个都市略涨。原因为：一、去年春小麦丰收，8月全国丰收；二、设粮食调剂处；三、征借粮食去年总额初为8300余万担，后减为6600余万担。今后粮价因天时关系似可乐观。川省已准备好10万包米调剂黔省军粮，并不影响四川粮食，四川收成六成即可足食。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去年6月10日在豫西抗日捐躯之第八师副师长王剑岳。

△ 重庆《大公报》讯：今年棉花增产贷款，重点在陕西泾、渭两水地区，内定棉贷在10亿元以上，并望扩展棉田300万亩，实现此项巨额贷款将成为棉贷史上之新的一页。

△ 湘、赣边境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一部陷江西永新县城。

△ 美财政部长摩根索宣布：美国已拨交中国2.1亿美元，以偿付中国政府为在华美军垫付之款额与所出之劳力、供应之物资及代建之军事建筑所费之款项。

△ 美军500余架飞机空袭冲绳和台湾各地。

1月23日 行政院召开临时会议，通过调整税制、简化机构办法：一、取消茶叶、竹木、皮毛、磁陶、纸箔、麦粉、水泥、火酒、饮料品统税；二、全部取消棉花、夏布、植物油、药材等战时消耗

税；三、停办盐、卷烟、火柴专卖，改行征税；四、裁撤缉私署、海关监督、海关内地卡和公债劝募委员会等。

△　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北方局必须亲自到平原去工作，用至少半年到一年时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　广东曲江仲元中学校长梁镜尧率子在曲江抗日，是日父子同时殉难。

△　敌伪1700余人突分路向山西省洙山北及沁河以西解放区“扫荡”，八路军展开反“扫荡”战，击退敌伪的攻击，并以一部主力越过同蒲路，攻克羊解庄据点。

△　印缅战区司令索尔登正式宣布，利多公路和滇缅路相接，皮可已率第一支运输队来华，日军对华三年封锁从此打破。

△　美副国务卿格鲁在华盛顿呼吁中国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权间成立协定，并表示“我们急切地愿望一个强大和团结的中国之发展”。

△　英国工党副主席拉斯基致书中国人民，表示英人保证愿尽全力协助中国完成战后建设之艰巨工作，并协助其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伟大目标。英自由党主席庞汉卡德夫人亦致书中国人民，保证助中国完成战后建设。

△　中美工商协会运输委员会主席凯塞在纽约对中美运输专家谈话，称：该会此后将举行会议讨论中国运输系统之重建，及在此计划中美国工业承担之职务等各种问题。

1月24日　周恩来由延安飞重庆。离延时，在机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去渝，要向国民政府、国民党、民主同盟提议召开

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是晚，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宴请周恩来，赫尔利及王世杰作陪。宋子文提出拟请中共和其他党派参加行政院下准备设立的行政委员会。周恩来声明，如不取消一党专政，任何形式的组织，中共不参加，只有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才能解决问题。

△　周恩来在重庆招待《大公报》和《新民报》记者，向他们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主张。

△　国民政府特任俞飞鹏为交通部长，原任曾养甫免职。

△　重庆《大公报》载：农林部本年施政之重心为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其预算已确定为8000万元，占该部总预算62.5%。

△　美“巴布号”潜艇在厦门附近击沉日本驱逐舰三艘和其他船只四艘。

1月25日　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晤。赫尔利说，昨晚同国民政府方面人士商谈五点：一、去年11月21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四、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官作总司令；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周恩来予以拒绝，声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应约同宋子文商谈，参加的有赫尔利、王世杰、张治中。宋子文陈述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商量的几点，周恩来坚持先解决一党包办问题，会谈无结果。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

△　周恩来邀集各方面民主人士代表黄炎培、冷遹、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范朴斋等至曾家岩50号商谈召集党派会议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谈当前形势和共产党对党派会议的意见。

△　魏德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其参谋长麦克鲁赴昆明任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官，副参谋长克罗斯代理参谋长，并设一新机构处理租借等项事务。

△　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致电蒋介石，祝贺中国国际通路重开，表示深信不久之将来即可顺利完成对日之战，且对中国于本国遭残暴敌人之严重威胁时，犹能派军远战缅北协同歼敌，尤表敬意；并称："中国大军之卓越作战素质，吾人均极敬慕。"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空袭北平机场，击毁、击伤日机40架。

△　珠江三角洲伪护沙队李郎鸡部一大队进犯南村、市头解放区，东江纵队予以反击，毙伪集训大队长一名，伤伪军60余名。事后李郎鸡企图报复，调集该部所有伪军3000余名，一连三天向解放区进犯，东江纵队与民兵配合作战，将数度来犯之伪军击退。

△　日军第二十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五十七旅团陷湖南省郴县。

△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决战时期非常措施纲要》，决心全力以赴地维持与扶植以日、"满"、华为基地进行战争的能力，确立起适应本土决战的态势。

1月26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鹿钟麟报告役政。略称：吾人办理兵役，一方面应训练良好壮丁以适应需要，同时亦应顾到人民疾苦，使其不受苛扰。故今年征兵决定于1、2、3月内将全年数征齐。会议同时通过请政府调整收购陕棉价格议案一件。

△　周恩来访孙科，双方就当前国家重大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商谈。接着出席赫尔利、王世杰的午宴。午后又出席郭沫若举行的茶会，同文化界人士进行交谈。

△　周恩来召开扩大的各党派座谈会，共40余人到会，高崇民、马寅初、柳亚子、章伯钧等讲话赞成中共态度。

△　战时生产局主任秘书吴景超向工业界谈战后如何利用外资问题。略称：吾人欲利用外资，须先知需要若干外资；美国投资我国可无问题，但吾人如何利用及政治上如何走上安定，实为吾人所宜注意者。

△　川康盐务管理局长曾仰丰发表谈话，称川康区1944年度产盐较1943年度增加20余万担，计川省销出322余万担，外省180余万担，合计500余万担，尚存盐170余万担。

△　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在重庆成立，其宗旨是配合政府促进自治的完成，推定李宗黄为理事长。

△　国府委员、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麟在临夏原籍病故。

△　陈纳德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接见《大公报》记者黎秀石。陈称：中国战区将来大举反攻时，第十四航空队必大有作为。一旦美军于中国海岸登陆，亦必可自空中充分协助之。目前第十四航空队美机扬威各地，自北平至南海处处创敌，1月份已毁日机达305架，创新记录。

△　重庆《中央日报》载：陈纳德及其飞虎队队员捐款35.4278万元，赠给中国儿童保育会。

△　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林田旅团主力及伪军一部共兵力2500余名，向沁源西解放区进行“扫荡”。是日，敌由安泽出犯唐城、中峪店，沿途遭八路军伏击，在元驿会合后，又遭八路军及民兵围攻两日，敌伪损失甚重，于29日即分股向安泽城逃窜。

1月27日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克复南坎后乘胜猛攻，16日以新三十八师主力沿芒友公路进击，新三十师主力围歼老龙山地区之敌，经10余日激战，遂于是日全部攻占芒友。新一军进抵芒友时，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亦陆续开来，两军于此相会。新一军军

长孙立人紧随其前锋队进入芒友城。至此，整个中印公路最后之残敌已完全肃清，中印公路全线打通。

△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宋子文等会谈情况。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这两个补充办法。

△　国民政府核准将云南省昆明县改名为穀昌县。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南下支队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　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一〇四师团一部占领广东省曲江，粤汉线南段被日军打通。

△　中美空军混合机队飞临豫、晋、湘各省及南京，袭击日军水陆军事设施。

△　美教会主办之海外救济复兴委员会宣布服务预算，共计427.9万美元，其中10万美元用以赈济亚洲区之贫民，60万美元用以赈济中国区之灾荒及捐助辅育儿童与医药供应等费用，另以五万美元作复兴中国灾荒区之用。

△　日藏相石渡庄太郎解释追加军事预算时称："1945至1946年度之收入约为900亿日元，此中来自全国及地方税收者占180亿，来自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公债者占470亿。"同日及次日，众议院与贵族院分别通过数达850亿日元之特别军事追加预算案。

1月28日　蒋介石、赫尔利、魏德迈应美国互通广播公司之请，于是晚10时在渝播讲《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蒋介石并宣布命名该路为"史迪威公路"，以纪念史迪威将军打通该路之努力。赫尔利称：

此路象征美国对同盟国之忠实及无私。魏德迈称，援华物资将大增，可自中国发动攻势。同日，史迪威亦在纽约发表广播演说，对开路兵工备致赞扬，并称："中国军人已向世界证明，如彼等能获得适当之装备、训练及领导，必不亚于世界任何之部队。"

△　中、美两军在滇西畹町举行会师典礼，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出席并检阅各部队。

△　首批运输队循中印公路是日越过中缅边境进入中国，打开三年来中国之陆上封锁。修筑中印公路之皮可率车队于午后2时驶入边境城镇畹町。中国政府在畹町举行热烈的欢迎典礼，美国将领索尔登、戴维孙、陈纳德，中国方面宋子文、卫立煌、孙立人等出席典礼。同日，美方人士在畹町称，第一批运输队乃纪念性质，其中仅有新车约百辆、大炮数门以及弹药与汽油。中印路之运量不致低于滇缅路之每月1.7万吨，如能有更佳管理与组织，运量可能倍之。

△　孙科在重庆寓所举行晚餐会，邀请周恩来、王若飞，吴铁城、王昆仑、黄炎培、章伯钧、李璜、左舜生、沈钧儒、王世杰、邵力子亦应邀。餐后谈国共问题，孙科主张以中共的方案作讨论的基础。周恩来介绍几次来渝谈判经过和双方分歧点，说明只有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才有出路。

△　周恩来在重庆招待产业界人士，吴蕴初、刘鸿生、章乃器、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胡西园等30余人出席。与会者一致赞成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抗战要坚持到底，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业家要为国家作贡献。

△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应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使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川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

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

△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的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同时表示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我们不赞成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还不可能。"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爱金生对林语堂新著《枕戈待旦》一书的书评，称国共两党必须根据民主基础，共同拟定一个反攻日寇与改革政治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已作了积极而进步的贡献，整个中国至少应实行一部分中共的措施。

1月29日　蒋介石听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关于编组攻击师与防御师计划的报告。何称：筹备编组的36个攻击师的火力，将相当于日军的甲级师团的三分之二；九个防御师的火力，则与中国远征军相等。蒋批准该计划后，魏德迈即命令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立刻进行。

△　国民党中央举行纪念周，社会部长谷正纲报告赴黔、桂救济难胞经过，略称：此次中央支出救济经费及粮款在3.5亿元以上，对受救济的难民不但予以收容招待、医药寒衣的紧急救济，而且予以疏散安置。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战讯：27日我军攻占芒友，两路部队大规模会师，完全打通中印公路。自1943年10月底以来，我缅北、滇西部队抱攻击决心及勇敢拼战精神，先后发动攻势，转战迄今，共死伤7.9154万人，除毙敌4.8858万人及大量虏获品外，打通封锁数年之中印交通，扫清滇缅敌寇，歼灭精锐师团，如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全被歼灭，第五十三、第二、第四十七等师团及第二十

四混成旅团被击溃。此皆我滇西及驻印军健儿之丰功伟烈。

△　财政部决定自是日起烟类、火柴改征统税，并制订临时办法。其税率为：一、机制烟从价征收100％；二、手工卷烟从价征收6％；三、雪茄烟从价征收60％；四、熏烟从价征收30％；五、火柴从价征收20％。同时，茶叶、竹木、皮毛、瓷陶、纸箔、麦粉、水泥、火酒、饮料品等九项统税亦一律停征。

△　据重庆《大公报》载：陕西全省纺织工厂现有300余家，织布机约4000架，每机每日以产布24匹计，每月则在10万匹左右。

△　湖南省团队乘日军向粤汉路进攻之机，于是日连续收复新田、宁远、临武、蓝山等九县。

△　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南京召集所属12个方面军、军司令官联席会议，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表示要竭尽全智全能，善谋善战，以期打开危机，挽回国运；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传达中国派遣军命令：一、关于从两个正面对付重庆的各军应担负的一般任务及对美作战准备纲要；二、关于华北方面军及第六方面军分别攻占老河口及芷江，破坏其航空基地的命令。

1月30日　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王世杰、张治中在会上口头承认应结束一党统治，并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周恩来提出党派会议成分应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内容应是讨论结束一党统治，制订共同纲领，改组政府；并要有一个基本的政治解决方案，才会有利于真正解决问题。

△　国民政府颁布训令，要求全国上下做好军队服务工作：一、各级将领应以士兵之保育为第一要务；二、关于征集入伍之壮丁，无论地方机关与补充训练机构，对衣、食、住、行、娱乐均须妥为筹划；三、各地方行政与自治机构，必须积极发动民众，服务军队。

△　国民政府决定将《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自1945年2月19日起，延长至抗战结束后两年为止。

△　教育部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揭晓，计录取留英研究生65名，实习生69名，留美研究生61名，共计195名，其中理、工、医、农名额约占96％。

△　“伊宁事变”的哈萨克乱民攻陷新疆伊宁。国军预备第七师副师长杜德孚以下官兵4000余人，在突围中于2月1日阵殁。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区办事处处长凯萨于27日飞抵重庆，是日对记者谈：来此之主要任务，乃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竭诚合作，务使此项艰巨之工作得以推行而达到成功。

△　英记者斯坦因在英国《新闻纪事报》上发表《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一文，记述作者第一次和毛泽东会见和谈话的情况。按：斯坦因是把延安情况报道给英国公众的第一人。

1月31日　王世杰与周恩来在重庆谈判。王世杰主张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政府承认党派合法、同意召集党派会议，但不接受结束一党统治。周恩来表示不赞成成立整编委员会，主张改组军委会，坚持结束一党统治。

△　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谈战局，略称关于中国现状有三点值得特别重视：第一，缅战胜利我已无后顾之忧；第二，铁路线以东我军继续击敌；第三，敌企图在中国战区进行大战，所以中国战区的日寇未被击败以前，日寇是不会全面溃败的。

△　立法院通过《三十四年度国家总预算案》及《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案》等案。

△　政治部长张治中为招待苏联在渝之外交、军事、商务及文化人士，在胜利大厦举行联欢晚会，孙科、邵力子、贺耀组、贺国光、

刘斐、周恩来、郭沫若、何浩若等应邀作陪。

△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一部攻陷江西遂川。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向美驻华大使馆官员训话称，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以后所有工作人员不得私向任何党派或部队商谈军援和经援问题。2月15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亦向美军司令部军官作同样内容的训示。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致电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称："在我与共产党的所有谈判中，我都坚持美国愿将对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或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者而向它提供物资供应或给予其他援助。美国对共产党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通过中国国民政府给予该党。"

是月　第五十二军改为远征军，赵公武为军长，下辖三个师：第二、第二十五、第一九五师，均暂时直属统帅部。

△　教育部为彻底改善小学教员待遇，制定改善待遇办法五项，其中规定：全国各地小学教员之薪金及补助费，至少应以维持当地两个人生活之需要为最低标准。

△　昆明新论衡周刊社举办新年笔谈会，邀请西南联大教授和昆明学术界人士曾昭抡、吴晗、徐茂先、周新民、伍启元、蔡维藩、杨西孟等参加。与会人士认为，我国应有新的合时代合人民要求的新变革，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真民主，动员全民，一切才有办法。

△　宝（鸡）天（水）铁路铺轨已抵石门车站，计已铺42公里，穿过隧道51座，距天水尚有120公里。

△　1月底止，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累计收存数额：重庆收入法币37.69亿元，折存黄金1.9026万两；昆明收入法币20.69亿元，折存黄金10.8618万两；西安收入法币12.18亿元，折存黄金6.2271万两。

△　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二届群英会。会上总结了冀晋、冀察两区1944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并提出今年的任务是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精耕细作，消灭熟荒，争取耕三余一，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为工业品的逐步自给自足而奋斗，开展对敌经济攻势，扩大边币市场，发展农工商业。

△　广东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后改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南路纵队，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大队，林锵云任司令员，梁嘉任政治委员。

△　中共潮汕地区党组织是月正式成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

△　泛东挺进军第十八纵队司令赵文灿在郑州刺探敌情时殉职。

2月

2月1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孙科、王昆仑、左舜生、李璜、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雷震等，商讨国内团结问题。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方勤务司令部在昆明成立，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挥，并与美军供应处联系；其主要任务为统筹中国陆军司令部所辖第一至第四方面军、中印公路东段警备部及总预备军等各部队之运输、补给及装备，同时担任滇、桂、黔暨湘西地区各军事机关、学校之补给，并兼办西南补给区业务。美籍齐福士中将为司令。

△　财政部通令全国取消征收战时消费税，以纾民困。

△　数万邮务员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是日交通部批准按原薪一律加20％。

△　上海数千报贩集体罢工，是日敌伪报纸几无法发行。

△　八路军光复鲁南泗水城，将城中伪第十军全部消灭，击毙伪第十军军长荣子恒、参谋长朱也、日顾问长泽以下200余人，俘伪第十军第三师师长朱级勋、伪县长李香亭及日指导官石川等以下1100多人。

△　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北特警及伪满军24个团共数万人，再次向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扫荡”、“奔袭合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举行反日、伪、“满”军战役，战争一直持续到6月初，共歼灭日伪军5035人。

△　日第二十军第四十师团侵陷广东始兴。

△　台湾日本当局杀害台湾抗日文艺作家欧剑窗、赵鸿藩于狱中。

△　海斯将军接任英驻华大使馆武官兼英军事代表团团长，原任孔士德将军即将返英。

△　美代理国务卿格鲁发表声明，称鉴于吾人对华关系之重要，国务院已采取增强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之步骤，遣派布利格思赴华协助大使，从事联系重庆与美国政府机关之工作。

△　魏德迈在美军总部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称：敌军扰粤，其目的在防美军登陆；并称在蒋委员长指挥之下，余与中国各长官相处极好，彼此无不以诚相见。余甚愿早日结束战争，返回乡里与家人共聚。

2月2日　　王世杰与周恩来谈判。周恩来提出关于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出席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

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起草的施政纲领草案，应在将来的国是会议上通过后，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此案未被国民党接受，遂由王世杰主持草拟一建议案。建议案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任务是商定："（一）从事结束训政时期，以建立宪政之步骤；（二）将来共同遵行之政治决策及军队之一元化；（三）国民党外各党各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并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各党派必须停止一切责难。当晚及次日，周恩来、王世杰分别将此建议案报告两党中央，并通知赫尔利。

△　驻美大使魏道明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运交中央政府作抗日之用的租借供应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共产党，以便用于同一事业。"4日，新华社奉命声明，魏氏所说与事实完全不符，纯系毫无根据的谎话。事实上迄今为止，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从没有由国民政府分配给一支枪、一颗弹、一粒药、一文钱。

2月3日　　蒋介石任命龙云兼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同日，蒋介石电令将第十一集团军八个军编并为四个军，即第六、九、二十九、五十七军四个军撤销番号，第二、五十三、五十四、七十一军四个军用美械装备。

△　国民政府特任夏勤为最高法院院长，原任李茂免职。

△　王世杰向赫尔利建议由国民政府邀请各政党代表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政治、军事问题。

△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继续开会，讨论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来电。会议认为去年9月提出成立联合政府，是原则的转变。当前要反对右倾危险，要注意到前途是流血斗争。

△　毛泽东两次致电周恩来。一电要周恩来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其

他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至于会议名称、成分及方式，可以从长考虑。另一电内容是：除坚持废除一党统治外，请着重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请直接告诉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除一党统治、实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万难加入政府。

△　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破坏钱塘江大桥，炸毁该桥两孔，敌伪交通顿告中断。

△　日军第二十军第四十师团一部陷广东南雄。

△　纽约战后经济研究局召集亚洲建设问题会议，印度、伊朗、中国、菲律宾等国代表出席。中国代表李卓敏在会上发表演说，称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为交通运输、农业、轻重工业、公共卫生及教育之恢复等问题，并称太平洋方面持久和平大有赖于中美间之谅解与合作。

2月4日　　蒋介石发表农民节与感功节训词，称抗战八年农民同胞实为抗御强寇最大之力量，表示希望农民同胞敬其世业，勤其工作，增强国力。同日，重庆各界举行集会表示庆祝，并举办大规模农产展览会。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晋谒蒋介石，商酌王世杰等所拟政治协商会议草案；并表示可以以此草案同中共谈判。

△　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里瓦吉亚宫举行会议，主要讨论议题为：一、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的问题；二、苏联对日作战的问题；三、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

△　重庆《中央日报》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计省、市党部277人，边疆党部19人，特别党部25人，学校党部13人，海外党部89人，工矿党部七人，军队党部110人，青年团60人，总计600人。

△　史迪威公路首次车队驰抵昆明西站，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行欢迎仪式，并代表政府接受盟国援华物资。车队游行全市，沿途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晚上，龙云设宴招待全体运输队人员。

△　美军攻克菲律宾首府马尼拉。6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马尼拉发表声明，称马尼拉之攻占乃太平洋战争重要阶段之结束；同日，蒋介石分别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麦克阿瑟将军，庆贺马尼拉光复。

2月5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已准备两个方案，拟择其中之一向蒋介石提出。第一案是坚持我方协定内容，另以口头要求实行放人、撤兵、给自由、废特务四条。第二案是将放人等四项加进协定中，再加党派合作一项。蒋绝对不会承认结束一党统治、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因此，坚持第一案，以口头提出四项更会有利，并使赫尔利、小党派、孙科派及各省人士都能承认我们所取的态度。究以何案为好，请即电示。同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同意你的做法，但请注意：一、对王世杰提案不完全拒绝，只说可回延商讨；二、不要强调国是会议；三、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

△　粤北国军于3日向始兴县城反击，至是日午后8时完全光复该城。

△　新四军苏浙军区在浙西长兴成立，粟裕任司令、谭震林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

△　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成立抗战建国学院，黎玉任院长。学院任务是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响应毛泽东两三年内学会经济工作的号召，

着重培养经济工作人才。

△　美国在昆明成立中国空运大队，以加强中国境内空中运输及协助中国地面部队作战，美籍卜郎里上校任大队长。

△　美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在华盛顿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借物资运输方案》，计划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万辆卡车在中国使用，并完成由加尔各答经由缅甸到中国的油管。

△　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举行大会，欢迎30余名脱险来渝的韩国青年，邵力子、马超俊、方治等百余人出席。

△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延安成立，金白渊任校长。

△　日军第四十师团攻陷江西大庾县。

2月6日　　杨杰光、谭平山、郭春涛、邓初民、祝世康在重庆棉花街58号李绍涵家宴请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陈铭枢、杨虎、郭沫若、柳亚子、沈钧儒、左舜生、李璜、章伯钧、张申府、马寅初等，商谈时局问题。

△　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辞职，由叶秀峰继任。

△　湘桂难胞救济委员会在重庆举行茶会，欢迎黔、桂难胞慰问团，许世英、钱新之、黄炎培、黄少谷、康心如、胡政之等百余人出席。王正廷报告慰问团工作概况和观感，并提议组织“幼幼会”救济流离失所的难童。黄炎培演说，呼吁各界重视难胞职业问题。按此次慰问团总共发出现金和实物；国币999.58015万元，灰布870匹，白布869匹，棉被478条，女夹裤279件，童棉衣裤100套，棉衣680件，男棉裤400件，食盐4.2万斤，棉花一万斤。

△　陈纳德在空军基地接见中外记者，称衡、柳一带机场陷敌

后，敌人目标转向东南，企图攫取空军基地，掩护粤汉路和公路运输线；并称1月份第十四航空队活动范围和击毁敌机数量均超过任何一月，由北平、天津到缅甸、越南，屡得重大战果，黄河以南平汉路敌运输量减低，津浦路敌交通几告断绝。

△　日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师团占领江西赣县（今赣州市），大肆烧杀，阳明路、中山路附近几乎全成灰烬，死于日军奸杀的民众约百余人。

△　“长远”轮航行于宜宾至南溪，是日下驶至南溪筲箕背时，因载客超过定额200余人，轮船沉没，淹死乘客300余人。

△　由英国总工会召集的世界职工联盟大会在伦敦开幕，会期10天。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同盟国38个机构和中立国家七个团体的代表250多人，代表着5000万以上的工人。中国首席代表朱学范当选为副主席。

△　法驻华大使馆文化联络官桂博离渝返法，行前曾与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商定中法交换教授、留学生及文化交流工作：一、中国派遣500名学生赴法留学，法国派50名学生来华留学；二、中法互派五名教授讲学，来华之法教授讲授物理、化学及法文，中国赴法教授讲授汉学及中文；三、文化交流工作由中法科学合作会沟通。

△　据重庆《新华日报》载：美红十字会以10吨药品、显微镜、X光仪器及医疗用具等，由美军飞机空运到延安，捐助边区敌后解放区。此为四年多以来敌后战士初次得到外国大批的医药接济。

2月7日　　军政部长陈诚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谈目前军政，略称：目前中国的军政工作已由计划阶段进入实行时期，一定能够争取时间配合盟军作战；当前军队的主要工作，则是补充兵员，改进生活。

△　国民政府任命陈继承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　新一军联络官袁复德上校代表孙立人军长在昆明招待记者，报告该军第三十八师三年来战绩，略称在缅北战役中，该师共获敌炮27门、轻重机枪134挺、步骑枪226支、俘敌官兵105人。敌我死伤为6：1；从利多至南坎共推进550英里。

△　重庆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发动全国妇女促进宪政及捐献百万军鞋运动。

△　延安各界举行前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追悼会，朱德主祭，毛泽东、彭德怀、陈毅及各界代表千余人出席。

△　空中运输总队中印区司令藤纳少将宣布：中印区运输机1月份运送中国之作战物资几近4.4万吨，较去年同期的1.3万吨多两倍有余。飞往中国之飞机，一天24小时，平均每2.5分钟即有一架。

△　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宣布，对华供应与租借物资运输方案延续一年，以增强中国对日作战之能力。

△　朱学范在世界职工联盟大会报告战时中国工人概况和贡献，略称：中国现在极力增加战时生产。从事大陆运输的工人在各城市间轮班肩负货物。“超级堡垒”的基地是由40万毫无机械可用的工人所筑成的。他称颂中国有组织的工人在中国历史上已建立辉煌的功绩，在国民革命期间就极有贡献，今日又努力以助战争的胜利。

△　日军侵陷南康，嗣与侵赣州之日军会合。

△　据中央社讯：菲律宾四万名华侨组织中国游击队同盟军并肩作战，近日又配合美军攻入马尼拉，协助盟军解放菲律宾。

2月8日　　孙科、王世杰、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章伯钧、王昆仑与周恩来、王若飞在参政会商讨国内团结问

题。会后，王世杰与周恩来再次举行商谈。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发表1月份空中战绩：第十四航空队击毁敌机334架，内战斗机176架，轰炸机90架；打沉敌船15艘，计2.075万吨；击毁敌机车342辆，创每月击毁敌机、机车的新纪录。

△　据美新闻处讯：美科罗拉多州丹佛垦拓局工程处总设计师萨凡奇正主持设计中国长江三峡水电工程，其方案为：水电工程建于重庆下游，可灌溉农田6000万英亩，可发电1056万千瓦，其电力可供之地区东达南京，西至成都，南至贵阳、桂林，北至天水、太原。若再应用水闸控制水量，则一万吨之大船可上溯江直达重庆。

△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攻占南巴卡，切断腊戍和芒友的敌后交通。

△　进攻湘粤赣边区的两股日军会师于江西新城，达成覆灭中国赣南空军基地及打通粤汉铁路之目的，但未能击溃中国军主力。

△　下午3时30分，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立瓦达宫会谈，斯大林要求恢复沙皇时代在华特权，作为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　汪伪政府免王克敏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本兼各职，特派王荫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2月9日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何应钦任总司令。

△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将王世杰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相告；周恩来将党派会议协定草案文稿交赫尔利，表示不能同意王世杰的意见。

△　旧金山《中国世界》、纽约《中华新闻》及《中国每日新闻》、檀香山《新中国日报》、温哥华《中国时报》等美洲十大华侨

报纸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宋庆龄、中国民主同盟各领导者，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各派领袖组织最高的行政机关，建立全国的联合政府。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会议，教育部长朱家骅报告最近教育上之措施，略称：今年政府政策均在紧缩，教育亦不图更大发展，而是如何维持现状，渡过难关；并称：大学、中学教育均待研讨改进，将分别组织视察团考察得失；希望能召开一小规模教育会议，公开征求意见，以策改进。

△　交通部任命前驻美大使馆空军武官沈德燮继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沈于是日接事。

△　英国联合援华募款总会宣布：该会募款总额已达143.7457万英镑。

2月10日　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赫尔利与周恩来在重庆继续谈判。周恩来提议在召集党派会议前，改善环境，先实现放人等四项主张。赫尔利提议发表共同声明，周恩来拒之。

△　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特派王缵绪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原任刘峙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　国民政府决定将湖北省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以纪念抗日殉国之张自忠将军。

△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袭青岛机场，毁、伤敌机98架，并在胶济铁路沿线炸毁火车头12座。

2月11日　雅尔塔会议闭幕。会议签署《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并发表《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公报》。按《雅尔塔协定》美、英同意以外蒙古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日俄战争以前俄国在中国东北之权益及得到千岛群岛，作为苏联参加盟国方面

对日本作战的条件，这是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赫尔利。赫尔利仍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并说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国共关系已接近；周恩来表示，如果发表声明，就要说明我方的要求和国共双方意见不同之点何在，以明真相，同时还要求应将真相报告罗斯福。后周恩来于2月中旬写出一份声明交赫尔利，阐明两党的基本分歧。

△　周恩来复电毛泽东：苏、美、英和蒋方对国共问题的真正态度是，苏联倾向于扶持民主运动和组织联合政权；美“深恐分裂”，正“拉拢局面”；英“不耐此种拖延，想另打开局面”；蒋“无民主可能”，但形式上想敷衍。

△　新四军苏浙军区一部开辟莫干山敌后地区，旋攻克浙江武康（今并入德清县）、德清两县。

△　中国与伊朗两国政府同意将两国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是日，宋子文外长电伊朗外长恩特赞致贺。

△　重庆妇女界举行春节联谊会，刘清扬、史良、曹孟君、罗叔章、胡子婴等百余人出席。李德全报告黔、桂前线情形，并指出：归结到一点，就是政治要民主；逃难也不是办法，应该就地同敌人打游击。

△　经济部专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谈，自1928年1月至1944年12月底止，全国呈请专利1188件，经审查准予专利者计434件；1944年全年申请专利者凡247件，审查准予专利者共94件。

△　真象航空模型制作竞赛在重庆滑翔俱乐部举行，由中国滑翔总会举办，参加者有重庆各学校及香港的模型制造者60人。比赛结果，交通大学获团体第一，马龙章获个人第一。此为我国首次举办的航模比赛。

2月12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略称：断然拒绝赫尔利企图控制我军的打算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先决条件，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并谓我们必须改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不要怕他们生气和大骂。

△　国立北平研究院石曾物理奖金委员会决议，本年度奖金四万元赠予清华大学教授任之恭。

△　汪伪政府采取紧急措置，断然施行物价对策，指定2月5日之价格为标准市价。

2月13日　蒋介石会见赫尔利及周恩来，周将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及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告蒋。蒋说："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拒绝接受共产党所提先决条件，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

△　据重庆《中央日报》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社会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鉴于前方将士浴血抗战鞋袜供应不及，甚至天寒地冻的时候或山岳荆棘的地方打着光脚板打仗，特发动全国民众捐献鞋袜劳军运动。

△　重庆妇女界史良、李德全、胡子婴、曹孟君、刘王立明等91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时局的主张》，呼吁政府立即邀集各党各派和各方人士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共商国事，成立全国人民一致拥护的政府；并要求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国民党当局对签名的一部分人进行迫害，或予以警告，或解雇辞退。

△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重申台湾归还祖国，并分别电蒋介石、麦克阿瑟致敬，于次日晚闭会。

2月14日　蒋介石批准魏德迈呈送《进攻广州、九龙计划》，此为中美结盟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同意美国将军提出来的大攻势计划。同日，蒋介石为提高行政效率，令饬召集中央党政军总检讨会议。是日，吴鼎昌、陈布雷在国府文官处举行茶话会，吴铁城、狄膺、王宠惠、甘乃光、陈果夫、张厉生、贾景德、林云陔、熊式辉、邱昌渭、沈鸿烈、贺国光等20余人出席，商讨办法。

△　周恩来在重庆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李璜、章伯钧、屈武、陶行知、杨杰、陈铭枢、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特生、黄炎培，报告最近国共谈判经过及昨日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说明鉴于蒋介石的态度，谈判无法进行。

△　外交部声明，同意雅尔塔会议之决议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并赞同我国为邀请国。

△　王世杰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雅尔塔会议的“最大成就为定期召开联合国会议，成立国际和平安全机构”；并向记者报告，中国业已同意共同召集旧金山会议及三国会议关于未来国际安全机构投票程序问题的决定。同时，王还就国共会谈发表声明，说政府方面作出了让步：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二、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容纳共产党高级人员；三、在行政院中附设一机构，吸收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四、组织一个有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派人组成而由美国人为主席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改编中共军队。但共产党拒绝了这些提议。

△　毛泽东向前来拜年的延安市西区警备团、枣园机关和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200余人回拜，并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工作也有进步，去年八路军、新四军只有四十几万人，几个月以前有了六十几万，现在已经有七十几万了，“明年这时候，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有一百万以上”。

△　周恩来在重庆面告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2月13日蒋介石说除了成立政治咨询委员会外，不同意其他任何事情，这同共产党的建议大相径庭，它甚至比以前提的“战时内阁”的形式还后退了一步。并说在离渝之前，他将发表声明说明共产党的立场，还说这次协商的再次破裂，表明蒋介石决不会对限制他的权力或根本改变现状作出让步，这次谈判破裂的责任在于国民党。

△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续沿缅甸公路向南攻击前进，于是日完全攻占缅北贵街。

△　日本天皇裕仁召见近卫文麿，近卫呈奏对战局的看法，表示战争失败已无可避免；并称如果从维护国体的立场来说，必须研究尽早结束战争的方法与途径。裕仁旋相继召见冈田启介、平沼骐一郎、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重臣听取意见。

2月15日　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王世杰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正的”。周恩来说：国民党愿作让步的先决条件是：一、共产党首先把全部军队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一党统治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的“一切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日力量”。并指出，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拒绝接受中共关于召集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政策的建议。次日，周恩来自渝返延。

△　魏德迈在重庆中美文化协会招待中外记者，宣称中国之中央政府为美国所承认之合法政府，美国之合作对象自应为中央政府；并称中国军队之训练以及将来反攻之准备工作，进行亦甚顺利。魏在谈到中国士兵之营养时说：“中国士兵向被歧视，生活标准极低，此次改善士兵待遇，一则使其精力充沛，一则提高其地位，使人民有与士兵共患难共生死之心。”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远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澳洲拉浦斯敦开幕，澳洲、新西兰、法国、中国、印度、英国、荷兰及美国代表出席，蒋廷黻任主席。

△　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联合《新闻报》的“社会服务栏”编辑组，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为期两天。30余所大中学校，1000余学生参加服务工作，到义卖市场的各界人士达10余万人。这是上海人民对日军残酷统治的一次示威。

2月16日　阎锡山在吉县召开民族革命同志基干会议（扩大），并提出“民主选举”、成立同志会工作委员会、取消高干驻委员会制、实行高干分职负责制。

△　周恩来飞返延安。

△　滇缅远征军慰劳团团长于斌赴美军总部，将全国慰劳总会特制之胜利锦旗一面当面赠与魏德迈，以表彰其在中国战区内之伟大成就。

△　衡阳保卫战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于是日脱险辗转抵渝。

△　第七战区一部光复广东翁源县城。

△　大队“超级空中堡垒”袭击日本飞机工业中心名古屋，工业区被炸起火。此乃“超级空中堡垒”开始作战以来第一次之大规模出击。同日，1500架美机从航空母舰起飞，轰炸日本东京及其附近工业区。美机投弹约达1000吨，毁创敌机近700架，沉、伤敌船舰32艘。次日，再出动1000架美机，连续猛袭东京区。

2月17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关于雅尔塔会议和当前国内政治问题的重要谈话，略称：三国领袖联合声明根据民主原则解决了欧洲问题，这种方法亦必适用于远东；中国要在旧金山会议中获得成就，就必须以民主统一的

中国出现于世界人士面前，党派团结问题、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就必须迅速解决。

△　旅渝福建、台湾及华侨人士以台湾收复在即，特发起组织闽台建设协进会，于是日在新运服务所开成立大会，到会员70余人。大会选举王泉笙、周士观、庄希泉、陈碧笙、林庆年等21人为理事。

△　美第十四航空队飞机袭击陇海、同浦、平汉及衡阳以北之粤汉铁路线，击毁火车头二座、创15座，袭击载有货物之火车四列，并轰炸信阳与临汾车站。

△　晋绥八路军对日展开春季攻势，历时两个多月，收复敌据点54处，包括山西方山、岢县、五寨三座县城，根据地扩大面积3840平方公里，解放村庄724个、人口9.4万，缴获大批武器。

△　世界职工联盟大会闭幕，会议通过建立世界职工联盟，总会设法国巴黎。

2月18日　周恩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扩大），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其内部在对日战略问题上的不同主张，略称：此次谈判依据三点：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开党派会议；三、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取消特务活动。国民党的办法是以民主的幌子来保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这次会见了蒋介石，蒋说：国民党是人民的惟一革命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对此，我逐条作了批驳。美方现在还是扶蒋拉共打日本。重庆现在是天怒人怨，国民党已不能照旧独裁统治下去，想耍弄一些民主幌子。

△　周恩来就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问题致电赫尔利称，4月25日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不能由国民党一方派代表参加，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国民党只能占三

分之一，其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三分之二应是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要求将意见转达美国总统。20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能同意。

△　国民党公布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

△　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王荫泰、苏体仁、杜锡钧、汪时璟、文元模、陈曾栻、唐仰杜、余晋龢、喻熙杰为常务委员，赵琪、潘毓桂、吴赞周、冷家骥、周作人、张仁蠡、张仲直、祝书元、邹泉荪为委员。苏体仁兼总务厅长、内部厅长，杜锡钧兼绥靖总署督办，汪时璟兼经济总署督办及财务厅长，文元模兼教育总署督办，陈曾栻兼农务总署督办，唐仰杜兼工务总署督办。

2月19日　蒋介石为纪念新生活运动十一周年通电全国，要求人民厉行战时生活，适应时代要求，节约衣食，振奋精神，改造风气，增强国力。同日，重庆市各界在夫子池新运广场举行新生活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大会，各机关及市民800余人参加。

△　滇缅远征军慰劳团团长于斌等一行六人携款2200万元及各种锦旗、纪念章，是日自渝乘飞机赴昆明，沿昆明至保山一带，进行为期四周的慰劳活动。

△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对缅北新维发动攻击，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自曼文经西鸟西进，击破日军抵抗，17日进抵新维南方。是日新三十师主力一举突破日军新维主阵地，并予攻占。

△　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政委会公布《山东省土地租佃条例》，规定必须实行二五减租，租额为37.5%，并废除“带种地”、“干拔工”、送礼等额外负担。

△　美军以800艘船舰组成之大舰队，载陆战队两师约三万人，开始在距东京仅750英里之硫磺岛登陆。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以伤

亡二万多人的代价，于3月14日完全攻占硫磺岛。此后美军以该岛为空军基地，置整个日本于中程轰炸机的袭击范围之内。

△　美军舰队飞机4000余架次连续四天空袭日本东京、横滨一带，投弹达5000吨。

2月20日　国民政府举行国府委员会议，居正、刘哲、胡毅生、钮永建、叶楚伧、冯玉祥、宋子文、覃振、李文范、邹鲁、李烈钧、魏怀、孙科、于右任出席，蒋介石主持并报告国府一年来公布施行之法律命令及重要施政情况。会后，各委员就当前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期两日，检讨第一期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次日晚，蒋介石到会致训，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意义，不仅在求得目前抗战之胜利，且欲于抗战期中，使一般知识青年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习惯于军事的生活，具备现代国民的生活与技能，庶几将来抗战结束之后，人人能成为建国之干部，而负荷建国之使命。

△　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发起道清战役的第二阶段攻势，经过激战攻克修武以北五里源。至23日，相继攻克赵固、峪河、百泉等重要据点，并袭入辉县城关，解放除县城以外的全部地区，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　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坚持边沿区对敌斗争对策的指示》，指出必须针对敌人“以游击对游击”、“以政工对政工”、“以组织对组织”策略，以及“九分政治一分军事”等新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特别要加强边沿游击区，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政策。

△　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刘振基、吴兴方、张光荣四人，奉公司命前去中韩文协餐厅检查该厅违章用电，引起争执。该餐厅“外交经理”（卫戍司令部第一警备区司令部特务）田凯，伙同保安队员行凶，用枪击倒胡世合，胡因重伤而死。张光荣、刘振基两人亦

受伤。各界对这种摧残人权，压迫弱者的暴行甚为愤懑。电力公司及其全体职工一致要求惩凶，并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

△　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许修直为北平市长、关迪平为天津市长、荣臻为河北省省长、杨毓珣为山东省省长。

△　美租借法执行人克罗莱在致国会的每季租借实施报告中说：华工40万人徒手搬运石块和沙砾16万吨建筑机场，开工后不满三月第一架“超级空中堡垒”就降落在此基地上；并称美空军在华作战的成功，大部分有赖中国的葡萄藤式防空警备，其组织和中国的沦陷区秘密相通。

2月中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通告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题：一、召集国民大会；二、研讨宪法草案；三、修订本党总章；四、研讨政治纲领。

△　国民政府决定加强金融管制办法：一、废止《沦陷区内移银行办法》；二、各商业银行绝对不准在任何地方增设分支机构；三、加强对商业银行、钱庄之检查与监督，凡不遵守法令者决予严格处分或勒令停业。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评议会原有评议员周鲠生、李任仁、顾颉刚、王云五、冯友兰等37人，为加强该会工作又加聘李书华、蒋复聪、陈文渊、贺麟、许恪士、袁昌英、吴尚鹰、陈芷汀、朱学范、蔡乐生、晏阳初、夏维海、杨绰庵13人为评议员。

△　山东胶东海（阳）莱（阳）群众二万余，不堪忍受敌伪蹂躏揭竿而起，武装讨伐通敌叛国的赵保元部。八路军立即出兵援助，打退敌伪进攻。

2月**21**日　　王若飞、郭沫若在重庆郭沫若寓所邀集沈钧儒、何公敢、潘怀素、张申府、陈铭枢、陶行知、郭春涛、屈经文、高崇民、

章伯钧、邓初民、王昆仑、许宝驹、谭平山、李璜、左舜生、杨杰、黄炎培等集会，讨论雅尔塔会议及国共两党团结问题。黄炎培提出以公意请周恩来尽早返渝。中共南方局徐冰、王炳南与会。商定以后每隔十天左右举行一次集会。

△　晋西北八路军第八分区第四十五支队袭击太原西南30里的白家庄煤矿，烧毁碉堡四座、汽车一辆及警察所与煤矿公司厂房，毙日军五名，俘日伪军38名，伤日伪军二名，缴获迫击炮一门，机枪二挺，长短枪80支。经此破坏后，太原炼钢厂、兵工厂等因主要燃料断绝，已陷于停工状态。

2月22日　　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312名重庆文化界人士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以及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官吏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等六项主张。

△　新四军粟裕师配合淮南军区反“扫荡”，于是日及次日连克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四县之水网中心的五个据点，毙伪团长以下官兵100余人，俘伪纵队副司令以下700多名，扩大解放区约2400平方里。

△　滇缅慰劳团在昆明举行首次慰劳式，团长于斌向各级将领及美军将官献“国族干城”纪念章。受章者有何应钦、龙云、萧毅肃、黄琪翔、卢汉、关麟徵、杜聿明、何绍周、麦克鲁、陈纳德、齐福士等40余人。

△　蒋梦麟在美国联合援华总会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明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使中国其他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并将确定召开国民大会之日期，以便完成及实施宪法；并称中国军事力量薄弱

之原因，系由于外受封锁，内则通货膨胀，加上中国为农业国家，故有此现象。

△　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就胡世合事件谈五项处置办法：一、对中韩文化协会餐厅先予以行政上停业处分，其窃电部分由法院办理；二、以后电力公司取缔窃电，应遵市政府规定，会同军警执行，免滋事端；三、殉职工友胡世合商由电力公司备棺收殓，家属领葬，并报请市政府予以抚恤；四、凶犯田凯及有关人犯，并送军法机关依法严惩；五、双方滋事之首要及捣毁杂物之损失责任，由法院讯明依法处理。

△　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红军节，在重庆举行“1944年的战时苏联”画片展览，并请屈武演讲《苏联红军胜利攻势与红军节》。次日又在重庆青年馆举行晚会庆祝。

△　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举行六周年纪念会，并选举孔祥熙为会长，陈立夫为代会长，王宠惠及赫尔利为名誉会长。

△　台湾革命同盟会第四届执监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选举李万居、谢南光、张邦杰、刘启光、李友邦为常务执行委员，游弥坚为常务监察委员。

△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之中国侨胞及当地人士，捐购高级训练机三架献给中国政府，备中国留美受训空军练习之用。是日在坡特兰，飞机场举行献机典礼，三机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由航空委员会刘敬宜上校代表中国政府接收。

2月23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社会部长谷正纲作社会行政报告，称今年之中心工作是组训和普遍健全民众团体，倡导改进社会救济事业，充实合作业务，切实管制人力与推行义务劳动，策划收复地区一切社会设施等五项。

△　蒋介石指示陈纳德有关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改编的要旨与扩展计划。

△　川东区田粮会议在重庆开幕，粮食部长徐堪、次长刘航琛等60余人与会，议题为调整县级田粮机构及四川各县历年欠粮追收办法。27日闭幕。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莲花城。

△　陈公博、周佛海召集伪军长官会议，到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项致庄、任援道、郝鹏举、杨揆一、鲍文樾、叶蓬等，讨论汪日军事协定。协定规定：如美军在中国登陆，日军将以全力进行抵抗，伪军则集中兵力全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军队不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

2月24日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致电华中局，指出："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苏南粟裕部、浙东何克希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地的基础。

2月25日　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等党、政、军机构，掌握建国建军的主要工作，指出建国、建军在在需要人才，故须注意延揽人才、培植人才、考核人才，而且要言行一致，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

△　中共中央就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域民主运动问题指示王若飞，指出：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有利于国内民主，我们应抓住机会争取，但是蒋介石在这时不一定让步。目前国内各方面拥护我党的主张，由国、共、民（盟）三方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望以我党之主张发动各方面，说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国民公意。并准备在大后方成立民

主运动统一委员会，以进一步推行大后方的民主运动。

△　自贡盐场场商代表王缵良等在重庆对记者谈，自贡盐产量总额已由最高年产额500余万担减至400余万担，原因是目前官收盐价照去年12月份核价，每斤平均为18元，虽较诸战前约增600余倍，但制盐所需物资照同月盐管局公布之平均价格则已增至1200余倍，故盐价不足之数几达一倍。因此，场商历年以来亏累约达100多亿元，要求合理核价，增加合法利润。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湖南平江。

△　美“超级空中堡垒”逾200架轰炸东京区，此为“超级空中堡垒”白昼轰炸东京工业区以来机数最多之一次。据侦察机摄影显示，最稠密之东京工业区约有2907.4万方英尺地区之240处房屋被焚烧殆尽。同时，美航舰飞机1600架亦轰炸东京市区，予以严重破坏。

2月26日　军政部长陈诚在中央纪念周作军政报告称：军政设施以配合军事反攻及国家预算为原则。今年中心任务为：充实反攻力量，改善官兵生活，调整军事机构，安置编余人员。

△　国民政府公布《改善官兵生活办法》，其要点为增加官兵薪饷，官兵所需食品一律发给实物，并规定针对军事需要分期逐步施行。

△　枪杀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的凶手田凯，经卫戍总部讯明后，是日枪决。28日，重庆市举行胡世合追悼会，市长贺耀组主祭，并慰问死者家属，发给抚恤金10万元。

△　美国援华总会会长麦克科诺非宣称：美国人民于1944年捐赠给中国950万美元。该会自1941年成立以来，捐赠总数已达2500万美元。

△　美驻华大使馆代办乔治·艾其森向美国务院报告关于对华政策

的意见，明确表示美国只支持蒋介石这种做法的结果，“使得蒋介石方面不愿作任何妥协和超现实的乐观”，从而导致不是和中共讨论解决问题，而只希望早日与苏联求得解决。并认为美国这种做法继续下去，将会加速中国内部的冲突，“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

2月27日　据行政院调查：去年12月物价指数为卢沟桥事变前之485倍，1月份增为655倍，2月份又增为875倍。是日国家总动员会议与行政院先后举行会议，对当前上涨之物价加以检讨，并研究对策。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湖南茶陵。

△　苏南无锡、常熟交界的安镇农民举行起义，杀死镇上13名日军和十几名特务，缴获大部武装。从此，江阴、无锡、常熟地区农民纷纷举行起义，28日几百农民在张浣桥杀死伪保安队员10名。3月3日，1000多农民在东湖攻打伪军，3月14日及16日数千农民在璜塘追击伪军等。

△　四十年代读书会约请国内各科专家及新闻出版界人士数十人组织新书评选会，推荐1944年国内出版好书12种：翦伯赞著《中国史纲》、赵超构著《延安一月》、夏衍著《滩离草》、聊伊译《前线》、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袁水拍著《冬天冬天》、王亚南著《中国经济论丛》、梁纯夫译《苏联经济新论》、贺湄著《中国地理新讲》、张栗原著《教育生物学》、骆宾基著《姜步畏家史》、冰之著《我在霞村的时候》。

2月28日　远征军慰劳团在保山举行慰劳大会，远征军将领1000人与会。于斌向卫立煌赠胜利锦旗及纪念章，向黄杰、周福成等77人赠纪念章。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发表公报，公布2月27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机群空袭湘江走廊、海南岛等敌阵，及越南沿海敌舰的战果。

△　何应钦偕麦克鲁将军飞抵缅北战场，与美方兼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将军晤商中美作战联系等事宜，本日赴战地视察野战医院。

△　第四战区一部克复广西龙胜城。

△　济南日军特务机关派队至邹县，以召集伪军官开会为名，将伪大队附李亥章、伪安清道义会会长陈善亭等14人扣押，次日在东门外悉数枪杀。特务队于返济南途中，经东滩店又枪杀伪军92人。

是月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华北部队与地方联席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华北抗战七年来经历三个阶段：从1937年9月平型关战斗到1940年百团大战为大发展阶段；从百团大战到1942年7月，为敌后斗争最艰苦阶段；从1942年7月至现在，是根据地恢复发展阶段。

△　据中央社讯：自去年8月起省、市设置民意机关，至本月止，后方川、康、滇、黔、粤、桂、湘、鄂、皖、赣、闽、浙、豫、陕、甘、宁、绥、青、新19省共1428个县、市、局中，已设参议会者1053处，已设乡镇民代表会之县、市、局共834处，已设保民大会之县、市、局共1162处。

△　广东省政府迁抵龙川，主席李汉魂积极恢复各部门工作。

△　广东人民抗日军东江纵队北江支队进至英德后，沿粤汉路东侧向北发展，在破袭粤汉铁路和粉碎顽军一个团的进攻后，于佛（冈）、新（丰）、翁（源）之间开辟拥有20万人口的新区；西北支队越过北江后，在清远东北攻占横石和高田等据点，开辟以文洞（清远东北）为中心的新区。

△　广东人民抗日军南路游击队于是月间挺进廉江以西的新塘地区，开辟有10万人口的游击区。

3月

3月1日　　宪政实施协进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会长蒋介石出席并发表演说。重申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后，政府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

△　蒋介石派彭位仁为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监，戴之奇为青年军第二〇一师师长。

△　周恩来在延安向西北公学学员作题为《民主与专制》的报告，阐明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采取了两条相反的路线，指出：目前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我党主张彻底的民主，国民党要玩弄民主外衣，继续一党专政。我们的联合政府的方针已得到国内外更多人士的拥护，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使各种有利条件完全成熟，争取新民主主义胜利的前途。报告提出目前工作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大后方的工作，关键是怎样深入农村；二、大城市的秘密工作，要研究在同盟国军队登陆、敌伪和国民党对我的压迫增加时如何进行的问题。

△　教育部召开留渝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顾毓琇、梅贻琦等4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并决议：一、专科以上学校不得由省设立；二、关于战后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三、修订公费生办法；四、本年暑假招生的四项办法。次日下午结束。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唤起沿海民众准备响应盟军登陆，于是日起至15日约请潘公展、刘纪文、陈策、周雍能、王泉笙、肖吉珊、杨绰庵、胡木兰等十余人，假中央广播电台，分别以上海语、广州语、琼州语、厦门语、汕头语、福州语、客家语向各沦陷区广播。

△　国民政府以青康公路前工程局长骆美轮建造该路卓著勋绩，授以五等景星勋章一枚，并派赴美考察，以资深造。

△　中国人事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资本3000万元，其中一半系四行及中央信托局投资，王晓籁任总经理。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永新。

△　渝市总工会、电力公司产业工会等为胡世合出殡。送丧行列由长安寺出发，经民权路到达大溪沟暂厝，准备不久将灵榇运回岳池故乡安葬。

△　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季良在四川万县病故。25日，蒋介石电唁陈季良家属，并拨发治丧费10万元。5月25日，国民政府追晋陈季良为海军上将。

△　旅渝韩国人士举行韩国“三一”革命二十六周年纪念会，韩国临时政府长官赵景昂、李青天、柳林、王海公、严大卫、申基彦，以及旅渝韩国侨胞300余人出席。下午，中韩文化协会举行纪念演讲会，由司徒德与金柔吉分别讲演《韩国革命成功之展望》、《韩国学生动向》。同日，朝鲜独立同盟留延人士亦举行“三一”独立运动纪念会。

3月2日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奉令裁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滇越边区总司令部，与第一、第九、第十一、第十六、第二十、第二十四、第三十五等集团军番号及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司令官。

△　蒋介石令调俞济时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　新华社记者发表对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演讲的评论，

称蒋氏演讲鲜明地反映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并指出其要旨在于：一、坚持党治，严拒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曲解国共谈判经过，污蔑中国共产党；三、玩弄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无聊戏法，保持其法西斯独裁。

△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提出：一、蒋介石的演说证明王世杰所说接受党派会议、“结束党治可以讨论”、“可以改组政府”等等，“都是哄骗”，望告民主同盟、孙科、黄炎培和李璜；二、蒋党御用“国民大会”必须坚决反对，我们和民盟意见相同，主张先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等到国土恢复、人民解放、条件具备时，再开全民普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民主政府。次日，王若飞在重庆访晤黄炎培，讲述延安来电内容。

△ 驻英大使顾维钧返重庆述职，次日晋谒蒋介石，旋即对中央社记者谈，英人观察欧战今夏可结束；英国对我国之了解日有进步，民众也极为同情，对我国建设当亦可能用种种方法加以协助。

△ 赫尔利以美国大使身份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并无法西斯心理”，而中共是“有武装的政党”，是“统一”中国的障阻，要中共将军队交给蒋介石；并声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3月3日 蒋介石由戴笠与贝尔利等陪同在重庆检阅中美合作所特种部队及特警班。

△ 美代理国务卿格鲁邀见中国大使魏道明和苏联大使葛罗米柯，会谈筹备旧金山会议的事项。格鲁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称：蒋介石宣布今年召开国民大会，表明国民政府与中共之谈判走向政治团结与宪政政府之趋势，今年之内中国军事必有决定性之发展。

△ 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华盛顿，与美国联合参谋首长李海上将晤谈关于苏联参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借以探询雅尔塔会议时有无秘密协议。

△　汪伪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调任杨揆一为军事参议院议长，萧叔宣为陆军部部长，叶蓬为湖北省省长兼驻武汉绥靖主任，黄自强为江西省省长兼驻九江绥靖主任，高冠吾为国民政府委员。

3月4日　　是日为童子军节，中国童子军总会向全国各省、市之学校童子军团发出通令，自是日起至4月4日止之一个月内为童子军活动月，以智、仁、勇为每旬活动之中心。

△　日本反战外交官盐见圣策在重庆国际电台发表广播讲话，称联合国对日作战目标只在打倒军阀，并不伤害日本国民，希望日本国民不要被军阀的恶宣传所蒙蔽，及早反抗这个绝望的战争。

3月5日　　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由美国政府出面邀请向敌宣战之协约国（共44国）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会议，商订国际组织宪章。至开会时，已增为50国。

△　周恩来、董必武电复在云南做统战工作的华岗，阐释党派会议是成立联合政府的一个实际步骤，用以坚决反对蒋介石包办的御用国会。电文还询问龙云对中共最近的主张和作法的意见。

3月6日　　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对华南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目前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区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二、东江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必要注意山地的发展；三、沦陷区要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四、对国统区要“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五、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等联系。中央决定将临委和军政委合并成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

△　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由澳洲返抵重庆，在机场对记者谈，此次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远东区首次大会最大收获：一为确定远

东区善后救济之重要性，二为商妥各食米区域办理善后救济时所需白米之来源。

3月7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国民大会之询问，称在七七战争爆发以前国民政府曾举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全体代表1440名中，约有三分之二业经选出；现在政府决定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但无论如何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

△　周恩来致函王世杰，声明：一、蒋介石3月1日的讲话表明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的商谈再无转圜余地，所以，对王所拟政治咨询会议的草案不再答复；二、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表示了分裂的立场。提出代表团应有中共和民主同盟人员，中共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参加，如不采纳，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要王世杰将意见转达国民政府。

△　远征军慰劳团在八莫慰劳驻印军，团长于斌向副总指挥郑洞国献胜利锦旗及慰劳书，向其他五名高级官佐赠纪念章。下午，全团至美国第十航空队司令部向司令戴维孙中将献旗。

△　窜至桂境扶南（今扶绥）的日军，经第四战区一部不断袭击，向苏墟溃窜，我军遂克复县城。

△　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蒙巴顿偕同夫人及参谋长布朗林中将，暨中国战区美军总部参谋长麦克鲁将军等由印度抵渝，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参谋部代总长程潜、军政部长陈诚及重要将领多人至机场欢迎。

3月8日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及新三十师一团分三路向缅北重镇腊戍日军进击，经约50余日之激烈战斗，于是日冲入市区，并将日军歼灭，完全克复腊戍。

△　蒙巴顿及其夫人由宋子文陪同晋谒蒋介石。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次日，蒋介石为表彰蒙巴顿打通史迪威公路之功绩，特授以特种大绶云麾勋章。

△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指出蒋介石以御用“国大”伪装民主，这更危险可恶，必须公开揭穿，严词驳斥；建议说服民主同盟同我配合痛击，秘密印发《解放日报》评蒋介石演讲的文章。并强调现在更要到处坚持我关于开党派会议、结束一党统治、成立联合政府、战后无拘束的国民大会选举这一系列主张，以及对旧金山会议仍应提出参加等。

△　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评论王世杰7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指出：所谓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实际上就是由蒋介石自己审议决定，至于“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更是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最后指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　重庆妇女界集会纪念“三八”节，蒙巴顿夫人被邀参加。主席张蔼贞报告本届“三八”中心工作，是促进实施宪政，完成百万双军鞋。

△　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延安妇女宪政促进会致电重庆妇女界李德全、刘王立明、史良、刘清扬、胡子婴、曹孟君等，赞同她们2月13日对时局主张，并对她们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表示义愤。

△　赫尔利、魏德迈联袂返美，于3月4日抵华盛顿，是日赴白宫晋谒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最近形势。

3月9日　　行政院举行临时会议，检讨本年度各机关工作计划及本年度国家总预算，并决定裁撤国家总动员会议、战时货运管理局、

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等30余个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同日，行政院决定自即日起盐税每斤增50元。

△　周恩来将7日致王世杰信的内容通知已回美国的赫尔利，要他转达罗斯福总统。数日后，赫尔利从美国复电周恩来，要求切勿作最后决定，待他来后商谈。

△　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西南实施协会为统一团结实施宪政事，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向全国同胞献言，略称："我国民在抗战时期出力出钱，服兵役，冒牺牲，受损失，已经八年了，值此国家存亡兴废的重要关头"，"我们希望各党各派一致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旨，而共同向统一团结和民主宪政之途迈进。"

△　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由青年军第二〇一师师长戴之奇陪同，抵四川铜梁视察青年军，对训练情形颇表满意。

△　鲁中八路军进攻蒙阴，经一日两夜激战，于是日光复。据不完全统计，毙日中队长以下95名、伪军250名，俘日兵七名、伪军956名，缴获重机枪二挺、轻机枪13挺、长短枪1019支、战马18匹、汽车两辆及其他各种军用品，解放国土5000余平方公里，人民7.04万人。后日军又纠集伪军向蒙阴反扑，11日又占领蒙阴，八路军即以主力袭击围困日军，经一周连续战斗，日伪于18日上午突围向新泰窜去，蒙阴重获解放。

△　美"超级空中堡垒"300架袭击东京，投掷燃烧弹1000吨，东京15平方英里面积之市区烧为平地，击毁工厂3000余所，烧毁房屋16万余幢，伤亡18.5万余人。这是二次大战以来对日本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

△　日本驻越南大使松本向越南总督德古面交最后通牒，促其采取实际步骤加强联合防卫越南之力量，德古予以拒绝。

△　驻越南日第三十八军突然发动进攻占领越南总督府、电厂、广播电台、火车站、邮政局、银行及车站码头，并拘禁越南总督德古及陆军总司令阿麦中将、海军司令贝伦日中将、空军司令塔维等，解除法越军警武装，直接接管越南政权，印度支那变为日军独霸的殖民地。

3月10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在重庆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反对国民政府定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主张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之领袖会议。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对日作战及正式成立两周年纪念，蒋介石致电陈纳德祝贺。

△　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重庆举行七周年纪念会，总干事熊芷报告会务：七年收容2.9万余人，去年九省共有32个院，今年因经费困难缩减为28个，共有儿童9800人；并谓新近第十一院新屋系由美国妇女服装业联合工会捐助1000万元建成，最近该工会又捐助750万元作为发展第十一院院务之用，为感谢该工会会长杜宾思克先生，特将该院大礼堂命名为“思克堂”以资纪念。

△　中印油管工程初步完工，总长1760公里。5月5日，中国战区美军后勤司令齐福士与印缅战区美军后勤司令克维尔在昆明发表联合声明称“由印度加尔各答经缅甸入中国为世界最长之油管，将输送汽油供应中国作战部队”。

△　美对外经济处宣布，该处已为中国制订10亿美元的战后工业计划。计划中拟建立953所工厂，包括采矿、冶金、化学、基本制造、动力运输等。其目的在于制造工业器材，使中国能利用这些器材发展自己的工业。

△　上海日军为了配合越南方面日军的行动，将沪法租界1200名法军、797名法警解除武装，并接管由法人管理的交通机构。12日，

日军亦解除驻北平、天津的法国军队。

△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华北及华中铁路自4月1日起，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进行军管。

3月上旬　上海米价涨至每石伪中央储备银行券18万元，如按伪币官价计算，已至战前的4.48万倍。

3月11日　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曾昭抡、罗隆基、李公朴、夏康农、沈从文、吴晗等314人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提出举行国事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筹备召集真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等项主张。

△　晨，第九战区一部向赣西遂川发起最后猛攻，敌仍在城外顽抗，经竟日冲杀，至薄暮时分但建勋师长率敢死队一部首先突入街市，复经三小时巷战，攻克遂川城，残敌循六路向赣州败逃。

△　蒙巴顿等自重庆乘机返印度。蒙巴顿在渝期间，除由蒋介石特别约谈数次外，并举行中、英、美重要军事将领会议，就中国和东南亚两战场合作问题达成一致之协议。次日，蒙巴顿夫人自重庆赴昆明，13日离昆返印。

△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在重庆举行，李四光、孙越崎等200余会员出席。该会理事长李春昱致开会词，略称：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已有20余年之历史。本会会员总数不过500余人，人才之缺乏，为今日地质界一个严重问题。会上选举李四光为下届理事长，尹赞勋为书记。下午及次日宣读论文，13日闭幕。

△　伪满洲国决定民生部改为厚生部；并令原民生部学务司与国民勤劳奉公局合并，成立国民勤劳奉公部。同时，修改《国民勤劳奉公法》，将勤奉队适龄年龄延至30岁，服役时间为每三年服役两个月，必要时可延长。

△　日本第八十六届议会续开，首相小矶与陆相杉山发表演说。小矶称："战局之未来发展，目前尚难预料。"吾人必须准备"本土未来将化为战场"。杉山称：现陆、海军已完成一切战略上准备，一旦"敌军"企图在本土登陆，全国海、陆军将联合作一大规模之特种袭击，将"敌军"主力舰击沉于海底。

3月12日　蒋介石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十周年及策进国民精神总动员，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内称：要达成抗战胜利，必须努力做到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三点要旨：第一，"我们要坚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第二，"我们要恪守'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宗旨"；第三，"我们要秉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方针"。同日，重庆各界举行孙中山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在重庆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说，所谓武力统一，在过去20余年间，国人已深受痛楚之教训，故内战为国人心理所不容。吾人自来主张军队国家化。目前中国不仅迫切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更须做到"还军于国"。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领袖会议，就军事与政治问题求得切实解决办法。并重申反对以八九年前国民党一党"选举"出的代表当"国大代表"。同日，民盟云南支部亦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　驻美大使魏道明晋谒罗斯福总统，讨论即将举行之旧金山联合国会议。魏保证中国将"作每一可能之事项"，俾有助于大会的成功。

△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分别在太行、太岳、冀鲁豫（包括冀南）三地举行，23日闭幕。三地共同选出申伯纯、邢肇棠为正、副议长，王乃堂为秘书长，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按此时晋冀鲁豫边区面积已达17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有三个行署，25个专署，209个县。完全在八路军手中的有范县、濮

县、观城、朝城、莘城、寿张、清丰、内黄、邱县、黎城、榆社、平顺、沁水、大名、涉县等18个县。

△　延安为纪念生活教育社十八周年举行座谈会，徐特立、柳湜、艾思奇、赵毅敏、艾青、贺绿汀、齐燕铭、张宗麟、董纯才等百余人出席。林伯渠发表讲话，称生活教育社陶行知和诸位先生等18年的劳绩，在中国教育事业上有一定的收获，他们打破了中国历代把读书当成士大夫阶级特权的思想，使教育为群众服务。

3月13日　毛泽东会见9日返抵延安的美方人员谢伟思，指出：美国对涉及中国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并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

△　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在仰光监狱拒绝日军诱令加入伪组织的阴谋，3月8日为日军刺伤腹部，并不准医生敷治伤口，于是日伤重逝世。按：齐学启于1942年5月9日在缅北霍马林行进途中被日军追袭，身负重伤为日军俘虏，囚于仰光监狱。

△　山东省私立胜利中学师生协助抗日，魏秀峰、李景星等13人殉难，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美外交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新近自美来华，是日赴财政部访晤俞鸿钧部长，商讨有关财政金融诸问题。

3月14日　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提高行政效能及三联制总检讨会议开幕，吴铁城、吴鼎昌、贺国光、沈鸿烈、李文范、陈果夫、张厉生、林云陔、贾景德、陈布雷、钱大钧、陈仪等101人出席。蒋介石出席致训示，希望无欺无隐揭发缺点，研拟切实方案适应军事。继分组举行审查会，第一组审查行政效能改进方案，第二组审查设计改进方案，第三组审查考核改进方案，并商决各项应兴应革之要政。于17日闭幕。

△　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司令部参谋长滕代远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去冬今春华北各地八路军普遍展开整军练兵活动，现练兵热潮已经普遍到各个角落，成绩很大；并指出目前整军工作中应注意三点：一、集中练兵要与边沿区的积极对敌伪活动配合起来；二、整军应与作战配合；三、春耕即临，除布置生产工作外，部队本身仍应集中力量对练兵作最后之努力。

△　越南北部法越军仍坚持抵抗日军，芒街、高平、海京等地战斗很激烈。芒街区法越军和粤境中国游击队已取得联络，滇越边境的老街方面，法军坚持抗击日军。

△　汪伪国民政府发行1945年公债，总额200亿元。

3月15日　美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请其考虑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之代表团成员应包括各党派。26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告以中国旧金山会议代表团成员包括各党派及无党派者在内。

△　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三一五”纪念大会，冈野进发表演讲，指出：“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于我党有利，纪念‘三一五’，必须向统治阶级的心脏冲锋。”按：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同时逮捕1600名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后有484人被提起公诉。继而下令禁止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等左翼三团体的结社。因此，“三一五”成了日本革命者悲痛的纪念日。

△　驻大同日军派兵200余名至灵丘县城，将城内伪军200余名全部缴械。伪军自感不安，灵丘城南波头、东张庄等据点伪军45名，于17、18两日向八路军投诚。

3月16日　冀南清河、威县抗日游击队配合八路军部队围攻盘踞在清河县王官庄一带的日伪，迫使敌人从王官庄撤走，清河县即告解放。

△　延安市回民为穆圣1301年逝世祭日举行座谈会，决定成立解放区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

△　汪伪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缪斌由上海飞抵东京，晤日本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提出《中日全面和平案》，主要内容有：一、南京政权立即宣布自动取消，成立留守政府；二、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政府成立时，立即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三、停战协定正式发表时，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　汪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京畿地区剿匪总指挥部”，任命郑大章为总指挥官，并拟定方案计划对南京周围的新四军，以茅山为重点，“实施彻底歼灭讨伐”。

3月1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加强伪军工作》的社论，内称：“1944年解放区军民对伪军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的统计，去年一年伪军反正者3.4万余人，比1943年增加一倍以上。”并指出：“现在敌后战场上的伪军数量还是很庞大的。据去年11月以前的统计共78万，其中伪正规军38万，伪地方武装40万。如果加上伪警、伪自卫团，全部伪军当在90万以上。”“所以瓦解和争取这些伪军，还是放在我们面前的极其艰巨的任务。”

△　据重庆《新华日报》报道：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蓬勃发展，已由去年“双十节”时的57万发展到76万。

△　川北26县旅蓉同乡会在成都招待新闻界，报告川北各县灾害实况，略谓：去年春夏两季普遍荒旱，秋收无望，平均不及十分之二三，其中乐至一县多数颗粒无收，而入秋以后则又霪雨为灾，连绵至冬，天气寒冷，以至川北人民之主要食粮红苕完全腐坏，小麦受冻又未能生长，2000万以上人民皆陷于濒死之境。

△　日军运输机一架自西贡方面飞往上海，于上海附近上空遭遇

美机攻击，迫降于浙江沿海。机内12名敌海军官佐企图登陆潜逃，浙江水警部队立予围捕，击毙八人，生擒四人。

3月18日　中国民主同盟代理主席左舜生在重庆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民主同盟将不参加不民主的“国民大会”；并称民主同盟站在右边国民党与左边共产党的中间，它毫无保留的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并相信全国团结是胜利的先决条件，同时亟盼沟通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鸿沟，衷心希望两党恢复谈判。

△　驻美大使魏道明电蒋介石报告与罗斯福谈话内情，罗斯福谓斯大林要求三事：一、蒙古独立而主权当属中国；二、中东铁路由中、苏、美共管；三、旅顺由苏租借。

△　周恩来出席延安文化界百余人讨论大后方文化运动座谈会，并报告大后方民主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情况，号召延安文化界努力工作，多写作品，并将自己下乡工作与工农兵结合的经验转告大后方文化界，作为他们“文化下乡”的参考。座谈会决定致电慰问和支援在大后方艰苦奋斗的文化界。

△　英王乔治批准以荣誉勋章授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中将及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少将。

3月19日　蒋介石是日自渝飞滇，视察中国陆军总部与在滇各青年远征军营地。20日先在曲靖温泉向青年军第二〇七师官兵训话，24日至中国陆军总部视察，25日返回重庆。

△　国民政府特任董霖为驻荷兰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任金问泗免职；着金问泗专任驻比利时国特命全权大使，仍暂兼驻挪威国特命全权大使暨驻捷克斯洛伐克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兼代驻波兰国公使；任命梁龙为驻瑞士国公使，原任胡世泽免职；任命吴泽湘为驻智利国公使，原任张彭春免职；任命胡庶华为国立湖南大学校长。

△　中法国际无线电路恢复直达通报。

3月20日　国民政府为维持币信，自实行黄金政策、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来，法币回笼者为数甚巨。据统计显示，后方六大城市，至是日止，黄金存款累计总数达90万两，收回法币计为180亿元。

△　重庆土布业同业公会召开大会，商讨土布生产问题，呼吁改善管制，增加工缴费，并向主管机关提出六项要求：一、取消收布等级，不扣不罚工资；二、重订工缴标准，按生活指数每月调节一次；三、补给各厂因工缴不敷的各项损失；四、准许各厂自由向沦陷区及农村采购原料；五、管制机关采用订货制度，订货以外准许自由买卖；六、土布业所得仅是工缴费，故应豁免所得税。

3月21日　豫西鄂北会战开始。日军集结第三十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五、第六十九、第一一四师团，并骑兵第四旅团等部共七万人，战车百余辆，于是日分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西峡口进犯；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及南阳、老河口守军奋起抵抗。

△　是日至28日为世界青年周，重庆、西安、成都、贵阳、昆明等地青年举行向盟军献旗、演讲会、联谊会、图片展览等各种活动。

△　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小矶国昭首相报告缪斌东来经过，说明中日全面和平案的内容，拟即根据此案作基础，准许缪斌在东京使用无线电直接询问重庆的意见。重光葵外相坚决反对通过缪斌进行中日和谈。会议无结果。

3月22日　空军于是日起，以第四、第十一大队、中美混合队及第一、第三大队之兵力，全力支援第一、第五两战区的豫西鄂北会战，阻止日军进攻。由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王叔铭于南郑设指挥所，指挥全部空军对日军作战。迄5月31日，各大队共出动各型飞机1047架次。在直接协助陆军作战、对日军后方及交通线的攻击等方面，均获

得很大战果。

△　八路军发动道清战役第三阶段攻势，经过10天之激战，攻克王村、盐店、葛村等10处据点，逼近开封城郊，控制除原武、阳武县城以外的大片地区，并以一部主力南渡沁河，向温县、孟县地区挺进。

△　甘肃省政府三年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已于湟惠渠特种乡获得初步实现。该乡计有土地2.5万余亩，有农民1000余户，依其耕作能力，以20至30亩为分配标准，可划分为1000个单位，农民踊跃请领耕地。

3月23日　经济部核定1944年全年核准公告之专利案件94件。其中发明专利者43件，新型专利者50件，另追加专利者一件。各种门类中，以化工物品为最多。

△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鄂北自忠县。同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一部4000余人攻击豫西洛宁县长水镇，第三十八军主力、第九十六军一部奋起迎击，战至4月9日，由两翼迂回将日军击退。次日日军转向西峡口方面。至4月底，中日双方对峙于长水镇附近地区。

△　驻正定、灵寿、新乐、行唐四县的敌伪军以及驻石家庄的日军炮兵一部共计1500多人，联合向正定县高平村进攻。该村民兵爆炸组利用地雷和地道与日伪军激战到下午4时，毙伤日伪军220余人，打退敌人的进攻。

3月24日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与新六军第五十师在缅北西保以东10英里处会师，所有由腊戍经西保迄南修姆沿缅甸公路之敌，已悉予肃清。

△　周恩来致电王若飞：中央决定《新华日报》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可提章汉夫，《解放日报》可提余光生，敌后不再提；我们尖

锐批评蒋介石的目的是在压蒋之分裂的演说，逼其取消11月召集国大；至于逼美放弃扶蒋政策，一时还做不到。

△　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政治顾问卢登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坚决抗日的，“虽然共产党部队缺乏武器，他们仍然在有效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在他们经过的地方有许多日本碉堡，“这些碉堡是专门造来打共产党的八路军的”。并指出，“共产党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区域内，是确实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的”。

3月25日　中国陆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齐福士宣布：该部定于4月1日成立六个补给区司令部，并宣布各区负责人名单。

△　重庆各界举行追悼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大会，美、英、法、苏、加、澳、墨、土、荷、波、巴西、伊朗、瑞典等国使节及各界人士共千余人出席。于右任主持，郭沫若致悼词，法使馆代表致谢。

△　遵义浙江大学学生因副食费及灯油问题严重，不得解决而停课。旋接校长竺可桢由重庆来信，副食费由1月份起增至750元，3月份起可能增至1500元，且校方决定发与每名学生木油半斤暂且应用，学生遂于月底复课。

△　美国前物价统制局长韩德逊应聘膺任国民政府特别顾问，以助我国稳定特价，是日飞抵重庆。

△　美机连续轰炸台湾。是日，美机对日月潭大水电厂投下145枚2000磅的炸弹，使台湾的主要电力供应遭到破坏。

3月26日　远征军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在缅境继克南修姆、闹亨、卡康姆等地。

3月27日　粮食部招待新闻界，徐堪部长报告粮政，略谓：该部所属仓库在渝者共有八处，所存米麦总量共有36万石以上。因春雨及

时，年成决无可虑。现在成问题的是运输困难，只好发动木船、板车、民夫去加强运输。

△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华政策，赫尔利、魏德迈、梅乐斯应召出席。赫尔利等三人在会上一致表示，共产党是个力量单薄的少数党，“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乱就可以镇压下去”。会议采纳了他们三人的意见。

△　美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向日本列岛和其占领区水域投下数以千计的水雷，揭开“饥饿战”的序幕。此后，美空军又不断向日本海域投掷水雷，并以强大的火力向日本猛攻，致使日军仅有的一艘6.3万吨战列舰“大和号”被击沉，日本岛本土陷于枯竭瘫痪状态。

3月28日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鄂北南漳。第三十三集团军之第七十七军增援反击，于次日收复南漳。后日军又调兵猛攻，南漳于4月4日晚再陷。5日，中国军协力反击，日军于10日晚再放弃南漳，向荆门东阵地撤退。

△　日军经豫西南阳西南向邓县、文曲集猛攻。第二十二师予以阻击后，向西北转进。日军陷李官桥，同时镇平、内乡相继失陷。

△　八路军一部在石家庄以南60英里地方，将沿平汉线南下的敌军用火车炸毁，毙敌30人，伤敌40人。

△　宋子文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希望旧金山会议早日成立安全组织，并回答对日本天皇处置之态度时称，各方对此问题意见不一，“余意在战后日本天皇应予以推翻”。

△　财政部宣布：自3月29日起，出售黄金价格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折价，改为每两3.5万元。

△　美国报纸主笔协会代表福勒斯特等三人抵达重庆，次日与渝市新闻记者会晤，并交换对新闻自由意见。在渝逗留一周后，经由印

度赴澳洲返美国。

△　中国航空公司开辟西北新航线，是日由重庆起飞直航新疆哈密，次日由哈密飞重庆，暂定每月飞行一次。

3月29日　　国民政府特派宋子文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霖为代表，施肇基为代表团高等顾问。

△　是日为第二届青年节，蒋介石发表文告，勖勉从军知识青年要在对敌决战中发挥最大的力量，而且要为建国奠立良好的基础，以达成继往开来的时代使命。张治中在重庆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勖勉青年应从自省中求进步，求知能，不自馁，不自满，始能赶上欧美之科学建设而跻中国于真正强国之林。

△　国民政府在重庆公祭国军、盟军阵亡将士，蒋介石主祭，国民党中委，国府委员，各院、部、会首脑，美、英、苏等国驻华使节，各盟国军事代表团和盟军将领200人陪祭。同日，又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蒋介石主持，邹鲁作《从辛亥四月二十七日广州之役以观吾党》的报告；同时重庆各界亦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

△　中国航空委员会在重庆黄山公葬公祭47位空军烈士，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主祭并致词。

△　周谷城在复旦大学宪政研究会上演讲《青年运动在历史中的地位》，略谓："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　昆明报纸登载黄金储蓄存款提价消息，金融市场顿即引起波动，一般投机家相率争购黄金，行市混乱，金店曾自行关门，多数至下午4时才恢复营业，牌价售出6.4万元，收进六万元，一日工夫，上

涨一万元。晚间其他物价，如棉纱市场亦受刺激发生波动。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加强边缘区的对敌斗争》的社论，指出入春以来在华北几乎所有地区，敌我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在边缘区的争夺上；并强调加强边缘区的对敌斗争，最主要的是以武装斗争，支持与组织边缘区广大群众的对敌斗争。

△　日军攻陷鄂北襄阳，次日陷樊城（今属襄樊市）。

3月30日　中国驻印军新六军第五十师一部在缅北乔梅与英印军会师。至此，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胜利结束。缅北、滇西作战，自1943年12月至本月底，为时一年余，中国军队共俘获及击毙日军2.512万人；中国军队阵亡3.1443万人，负伤3.5948万人。

△　日军侵占豫西淅川县，第八十九军于荆紫关拒止日军。同日，南阳守军第一四三师与日军激战，一周后，由城东南突围，南阳失陷。

△　日军侵犯老河口，黄昏曾一度被渗入，守军英勇搏战，将渗入之日军悉予逐退。次日，日军复三度猛攻均未得逞。守军先后歼敌计1200余，并卤获轻重机枪13挺及其他军用品。

△　晋察冀八路军收复灵丘县城。至此，晋察冀军区已控制肃宁、阜平、灵丘三个完整县。

△　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设宴欢迎美国新闻界代表福勒斯特、麦吉尔、亚更曼等三人，称支持新闻自由运动。4月2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界代表福勒斯特等三人。

△　中国新闻学会举行茶会欢迎美新闻界福勒斯特等三代表，重庆各报负责人、总编辑、主笔等40余人出席。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肖同兹致词，略谓：自新闻自由运动在美发轫后，在中国不仅新闻界深为兴奋，朝野人士也无不表示赞同。福勒斯特发表讲话，称：我们主

张新闻自由明文将载于战后和会条约中，各国政府不得压制舆论及检查新闻传递，如此人民可明了国际形势，巩固永久和平。晚，国民党中宣部设宴欢迎福勒斯特等，王世杰部长表示，战后当可废弃新闻检查。

△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召开第二届第三次大会，会期两日，朱家骅、吴敬恒、陈立夫、陈大齐、张道藩、竺可桢、傅斯年、茅以升、吴有训等出席。朱家骅就最近高等教育设施、调整院校科系、充实图书设备、改善教员生活、推进国际文化合作诸方面，提出扼要报告。并以高等教育重要问题征询各委员意见。会议决定1944年度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给奖人选，计给予一等奖金五万元者一名、二等奖金三万元者17名、三等奖金1.5万元者46名。

△　文化工作委员会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命令解散。按：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主持，于1938年成立，委员有阳翰笙、李侠公、茅盾、杜国庠、沈志远、胡风、老舍、洪深、田汉、张志让、孙伏园、冯乃超等。

△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签订《关于华北及华中铁道运营之军管理协定》。《协定》规定：自1945年4月1日起，华北交通及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所经营的铁路业务，由日军司令官管理，“国民政府”停止对铁路运行的监督权。

3月31日　重庆《新华日报》载文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文章写道：“统制思想，以求于一尊；钳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并谓：“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的和平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

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

△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否决以缪斌为谈判对手及其提案。

是月　　蒋介石昭告全国爱护士兵，略谓：“务须在尊重军人第一之原则下，各应激发天良，爱助军队，使能饱暖无缺，乐于为国效命。各级军官对士兵不得有滥施刑罚，克扣军饷，作损害其生活及人格之行为，如有阳奉阴违者，查出将予重惩。”

△　青年远征军第二〇九师成立，师部初设于江西铅山，旋移福建上杭。师长为温鸣剑，接收从军青年计1.251万名。

△　财政部顺应自贡盐业的请愿要求，决定自3月份起花盐价格每市担增至3645.41元，巴盐每市担增至4024.4元，较之3月以前之花盐价格增加46％，巴盐增加37％强。

△　重庆中央各机关公务员待遇，经由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调整办法，自是月起实行。调整后月薪为100元的公务员（低级委任），全月所得为1.62万元，较调整前增加5500元；月薪为600元的公务员（最高级简任），全月所得为3.42万元，较调整前增加1500元。

△　广东东江纵队又派出第三支队北渡东江，协同原在博罗地区第四、第五支队等部，扫除这个地区的日伪势力，开辟了罗浮山根据地。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南下支队渡过长江进入湖南，即把番号改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开辟湘东根据地。

△　迄是月止，美国对中国之支出总额为8.37亿美元，其中军事项为4.14亿，余者为非军事项。同期自中国获得的收入总额为1.37亿美元，美国非军事机关在中国用去6400万美元。

△　石井四郎再次就任设在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细菌部队）

部队长，并把“七三一部队”番号改为“二五二〇二”部队。

△　美水利专家萨凡奇博士在《新共和国》杂志撰文述长江水坝计划，认为长江为一尚未开发之世界最大水力，水坝建筑后可供电10050万瓩，灌溉地域数百万亩，水患可以完全防止，万吨船只可直驶重庆。此工程如中美合办，可以达到互利。资源委员会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对萨凡奇此项计划颇为重视，并着手研究。

4月

4月1日　　蒋介石以守南阳黄樵松师长、守老河口汪匣锋师长率所部官兵坚守名城，迭挫敌气，战果丰硕，是日传令嘉奖。

△　蒋介石任蒋经国为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胡轨为副主任。所属青年军师部均设政治部。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谢伟思。毛泽东说，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还说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支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继续愿意实行合作。谢伟思于4日离延安奉召回美国。

△　青年远征军第二〇八师成立，师部设于江西黎川，师长为黄珍吾，接收从军青年1.1万余人。同日，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在重庆大坪成立“女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女青年军的司令部，负指挥训练之责，接受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之指导，由陈逸云任总队长。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自是日起实施士兵膳食补给计划，其要点为：膳食补给以就地采购为原则，每人每日定量分配米25两、豆二两、花生米一两、菜油九钱、盐五钱、鲜肉一两、蔬菜10两、柴火21.5两。

△　八路军自1月21日发起的道清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日伪

2500余人，扩大解放区2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使以新乡为交点的平汉、道清、新（乡）汴（开封）三条铁路均暴露在八路军的直接打击之下。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之飞机是日及次日袭击上海机场，击毁敌机92架，击损16架。

△　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翦伯赞等百多人出席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七周年纪念聚餐会。郭沫若在会上就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一事激动地表示：始于今日，终于今日；“花瓶”摔掉，还我面目。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是更自由了。沈钧儒亦发表讲话说：“机关可以被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精神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解散的。”

△　在渝美国报纸主笔协会代表麦吉尔参加复旦大学举行的新闻自由讨论会。晚，访问新华日报社，看到一件被删得支离破碎的送检稿样甚感惊异，认为不论在平时或战时，对政治新闻的检查都是不应该的。

△　重庆居民疏散委员会决定，自是日起至9月底止，疏散市民30万人，疏散地点陆路为璧山、綦江，水路为涪陵、长寿、江津、合川。

△　监察院派监察委员韩骏杰等调查重庆市习艺所案，据称该所每日仅供两餐稀饭，且数量极小，冬季棉被至阳历2月中旬方发给，患疥疮者占十之六七，患病者无医无药，仅1至3月间即死亡400余人。

△　中国茶叶公司奉令停止营业，并入复兴公司。

△　《太岳日报》改为《新华日报》太岳版，魏克明为总编辑。

△　美军六个师约10万人在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冲绳岛登陆，盟军攻势已逼近日本本土。

4月2日　　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陈绍宽、王家桢、吴经熊以及专门委员徐淑希、张忠绂、杜建时、郭斌佳、李惟果、朱新民等，是日乘机离渝赴美。

△　王若飞同黄炎培、吴贻芳、胡霖、邵力子、雷震、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孙科等谈国共问题，一致电请延安，欢迎周恩来、董必武再到重庆协商。

△　八路军山东军区独一旅旅长王道、独三旅旅长莫正民、独二旅旅长张希贤等率所部将士通电全国，要求立即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立即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

△　晋察冀八路军解放边区交通要道紫荆关。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共产党曾向美国要求供给武器军火，但以武器供给一武装之政党，无异于承认其为一对日交战者，而美国已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之政府，中国一日如有拥有武力之政党存在，则中国即一日不能获得统一。"

4月3日　　蒋介石召见四川粮食储运局局长席新斋，指示目前粮运业务。按上月份统计，所有途次之粮食达四万余吨，平均每日参加运输工作之民夫、船户以及各种运输工人总计达10万人。

△　宋子文与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在重庆互换去年4月14日签订之《中国与加拿大平等条约》，该约互换后立即生效。

△　孙科在重庆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会员名人讲座"上，发表题为《怎样促进民主？》的演说，称：国内团结统一问题，只有民主方式才能解决，当前需要彻底实现民主，不能再扭扭捏捏了。

△　第一战区一部克复豫西淅川县，歼敌400余。

△　美轰炸机驾驶员史乐根随机坠落上海浦东，由忠义救国军营

救，后救国军派员转送后方。

△　驻土耳其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徐谟向土耳其总统伊诺鲁呈递国书。

△　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邀英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苏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及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举行非常会议，商谈旧金山会议之组织与程序及计划。

△　赫尔利离华盛顿，取道伦敦、莫斯科返重庆，准备与英、苏政府首脑商讨美国对华政策。

△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亚波隆·彼得罗夫为驻华大使，原任亚历山大·潘友新因病免职。

4月4日　　鹿钟麟谈调整兵役机构情况，略谓：此次调整裁撤机构421个，减缩108个，共计529个，占原机构数60％以上；被裁官兵达35万，占原官兵数40％以上。

△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二、四分区部队由阳城出发，直插豫北，发起豫北战役。经20多天的战斗，共攻克据点40余处，毙、伤、俘日伪军2800人，投诚与反正伪军1700人，收复河南济源、孟县、沁阳三座县城。

△　太行区阳泉煤矿60余工人举行暴动，反对敌伪统治，旋投奔太行解放区。

△　是日为儿童节，重庆各界在川东师范举行纪念大会及第一届儿童运动大会。

△　川省资简区壮丁队长王平章在裘溪河强拉三名壮丁，经军法总监部依法判处死刑，是日处决。

4月5日　　宋子文兼外交部长与瑞典驻华公使亚勒在重庆签订《中瑞关于取消瑞典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

△　国民政府特任李铁铮为驻伊朗国特命全权大使。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律师法》。

△　截至是日，绥远、宁夏、河南、山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青海、湖南、陕西、安徽、浙江、甘肃、贵州、云南、湖北、新疆、西康、江西20省及重庆市，1944年征实2617.085万市石，征借2494.1315万市石，累进征借27.5966万市石，共计5139.8131万市石，占配额78%。至于赋棉部分，已征收者计陕西、湖南、湖北三省，共计2.7658万市担，占配额52%。

△　南洋华侨协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吴铁城、许世英、陈树人、陈庆云、王泉笙、马超俊、梁寒操、陈立夫、钱新之、贝淞荪、徐恩曾等31人为本届理事。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指出：赫尔利4月2日谈话“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　晋绥区八路军收复山西省岚县。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声明苏联政府废止《苏日中立条约》。

△　日小矶内阁垮台，铃木贯太郎奉命组阁。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

4月6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通过陈博生、钱公来、冷遹等16人所提黄金提价消息透漏案，请政府彻查。原案谓此次黄金提价命令系至28日下午5时以后送达各银行，而28日下午出售之数竟达

三万余两之巨，显有舞弊之情事，建议政府彻查严惩。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就苏联政府废弃《苏日中立条约》发表谈话称：“中国闻悉此举，甚感欣慰。他姑不论，只就精神方面而言，此举所给予日本之打击至为严重，由此将加速日本之完全崩溃。”

△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偕章汉夫、陈家康自延安赴重庆。同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举行茶会欢送董必武。8日，重庆妇女界亦举行茶会欢送。12日，董必武、陈家康、章汉夫离渝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

△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发表《对国是的意见》，主张：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及检查制度，确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思想、言论、出版、身体等自由；立即以断然手段没收因人民的饥饿与死亡而发国难财者的财产，以及在美冻结的三亿美金存款，以充战费；立即成立联合统帅部，平等提高全国抗日军队待遇，以及确保出征军人家属生活；立即根绝党化教育，实施战时教育，确保公教人员生活；加强与各盟国合作，目前尤应从速敦睦中苏邦交。

△　中华图书协会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欢迎来华之美籍图书专家诺伦堡。诺伦堡称：美国新成立之图书救济联合会将援助各国补充图书，中国亦可指派代表前往联系。

△　上海人民群集苏联新生命日报社前，阅读莫洛托夫关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的声明。市民预感“天快亮了”，纷纷抛出伪钞、商品，购进黄金、股票，一时金价突由每两值伪储备币56万元涨至62万元。

△　3000余日军侵入湖南隆回县侯田乡，盘踞八天之久，杀害民众154人，强奸妇女228人，烧毁房屋3372间，抢走粮食二万余担。

4月7日　　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离重庆赴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于13日抵华盛顿。

△　财政部就提价前夕黄金存款舞弊事发表公告，拟具三项处理办法：一、请政府派员彻查3月28日黄金存款；二、本部会同四联总处派员彻查经办人员舞弊情形；三、凡于3月28日以转帐申请书抵充现款及以一本票或一支票化名多户分存之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一律无效。

△　第一战区一部对豫西重阳店以东至西峡口以西长约30里地区残敌进行扫荡战，至是日已全告肃清，歼敌5000余名，击毁战车15辆。

△　日军侵入广东龙门县城。

△　日陆军省宣布，为求加强日本本土之防御，特设立陆军统帅部及陆军航空部队统帅部，并以杉山元元帅及畑俊六元帅各任其统帅。同日，任命土肥原为军训总监。

△　南非约翰内斯堡人士于是日开始举行“中国周”，以游艺会、街头募捐、义卖等方式，发动群众援助中国。

4月8日　日军攻占老河口。3月26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进至老河口、光化附近。次日，猛攻老河口，占领老河口机场，随后得到日军第一一五师团增援，于是日攻占老河口。

△　中国外交政策协会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会员154人，选出吴铁城、王宠惠等为理事。

△　陆军伞兵团改组为陆军突击总司令部，设于昆明，原任团长李汉萍升充司令。

△　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

工作人员。沈钧儒、左舜生、侯外庐、史东山、王若飞、邓初民、马寅初、翦伯赞等相继发言，对郭沫若表示慰问和赞扬。王若飞代表中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欢迎他到边区解放区去，半个中国是需要郭先生及诸位先生的！"郭沫若致答辞表示："文工会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五十四年唯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发表空战战果：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在两年零九个月内击毁日机3000架、敌船舰沉伤在200万吨以上。

4月9日　　湘西会战开始。日军为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的交通，以第二十军指挥第一一六、第四十七、第三十四、第六十八师团等部，于是日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王耀武第四方面军部队奋起抵抗。

△　中国空军于是日起至5月11日，以驻芷江第五大队与第一大队之第四中队为主力，及驻陆良之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与驻梁山之第三大队一部，协助陆军作战，并联合美空军袭击日军后方，冒日军猛烈炮火，日夜不断出击，使日军伤亡惨重，取得巨大战果。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召开评议员首次全体会议，到评议员王云五等20人，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中央监察会书记长王世杰（罗家伦代）等均参加。会议报告和讨论中央干事会两年来工作、青年思想领导及学校团务问题，于11日结束。

△　1943年8月20日签订之《中巴（巴西）条约》业经双方批准，并于是日在巴京里约热内卢互换约本。

△　日本铃木内阁任被称亲俄的东乡茂德为外相，并即派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会晤，企图遏止苏联对日参战。

△　昆明金价突破八万大关。此后每两饰金的价格，均在8.4至8.6万元间跳动，14日又涨到每两8.9万元。

4月10日　魏德迈返抵重庆。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发表公告称，魏德迈返美期间，曾与罗斯福总统、李海、马歇尔、金氏、尼米兹诸元帅及政府其他高级官员晤商；在其往返途中，复在菲岛与麦克阿瑟元帅会晤，商谈促进中国战区空军及地面部队之协同作战。同日，军委会代参谋总长程潜邀请盟国驻渝军官举行春季聚餐会。魏德迈发表谈话称，余自美所带回之保证，即美国决心于可能范围内，竭尽一切援助中国，以求迅速击败日本。

△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记者谈：黄金加价泄露消息案，欢迎各方供给有关确实材料；并称此案自非退款所能了事，事关盟邦援助，国法自当严办。

△　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收复山西省陵川城及附近九个据点。

△　据重庆《大公报》报道：在璧山破获以刘纪民为首犯的贩卖壮丁团伙。刘纪民系一失业者，自称为“兵帮主席”，拥有党羽，怀有手枪、利刃，经常假若干茶肆作贩卖壮丁之市场，而以渝、璧交界之虎溪河作壮丁转运站，以利诱及威胁手段收买老弱残废转卖保甲，以顶替兵役名额，每名壮丁卖价自四万元至八万元不等，而被卖者仅获数千元。

4月11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四川省负责人李相符、杨伯恺、田一平及成都文化界120余人发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党治、尽速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普选国民大会、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10项主张。

△　八路军太岳军区军民自1942年11月对沁源县敌军经过两年半围困，共作战2730次，于是日收复沁源县城。是役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

△　重庆13所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潘序伦、陆诒、魏学仁等到教育部面见朱家骅，以物价压迫，维持困难，请迅拨巨额补助。朱家骅表示当代向行政院呈请拨款补助。

4月12日　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各一部向光化、老河口实施反击，将日军逐出该地。同时，第四十七军于13日向李官桥等地日军攻击，激战至15日，日军第一一五师团退守邓县。后日军再侵占老河口，并于27日攻占新野，第五十五、第六十九等军主力转移至枣阳以北地区。28日，第二十二集团军部队一度攻入老河口，迄5月1日，与日军隔襄河对峙。

△　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当晚，副总统哈里·杜鲁门宣誓继任美国总统，并宣布继续执行对德、日两国作战与准备永久和平之政策。

△　美国纽约州州卫军第十二团为对中国之军民表示崇敬，邀请魏道明大使检阅。

△　中央设计局设立东北与台湾两委员会，以准备抗战胜利时有关接收事宜。

△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赴英国出席国际劳工局理事院会议及世界职工联盟大会后，是日飞抵重庆。

△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特任荣臻为伪河北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和驻保定绥靖主任，特任杨毓珣为伪山东省省长兼驻济南绥靖主任。

4月13日　国民政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通令全国于14、15、16日下半旗志哀，并令全国各军队及各机关，于16日上午9时举行中央纪念周时为罗斯福故总统默哀。同时，蒋介石亲往美军驻华总部，致唁罗斯福总统之丧，另派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赴美大使馆致唁，并特电罗斯福总统夫人致唁。

△　毛泽东、朱德致电杜鲁门总统，吊唁罗斯福之丧；并派叶剑

英、杨尚昆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赴驻延安之美军观察组致唁。

△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收复山西阳城，至此全区已有沁水、沁源、阳城三个完整县。

△　兵役部派军法执行监徐业道到江安县组织军法会审，审理接兵部队连长肖鸿宪、排长王春芳、班长尹继胜克扣军米、虐待病兵，以及虐杀六名壮丁一案，判处肖鸿宪三人死刑，于是日枪决。

△　据重庆《大公报》报道：重庆每月供应食米20余万担，面粉七万余袋，由此统计人口约130万人。供应食米之价格计分四等：供应市政府60元及800元一担之贫民食米2700担；供应平民1100元一担之立约购米四万余担；供应市内一百七八十家米店成本米一万余担（每担售价770元），其余为军米及公教人员食米。供应面粉价格分三等：特粉每袋3400元，成本特粉1800元，统粉1400元。

4月14日　蒋介石电贺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

△　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何键谈改善抚恤遗属办法，称：阵亡将士遗属恤金最低级者，由现在每人每月160元，提高10倍，最低每人每月改发1600元。现在本会调查应予抚恤者共达100余万人，而实际能寄达恤金者只有40余万人。

△　湖南沅江之日军第六十四师团一部约2000余人，于是日侵占益阳，17日又进至桃江，21日经守军反击后退回益阳。

△　日军在各个战场遭到愈来愈严重失败的形势下，决定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区，抽调兵力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本土的守备，日本大本营于是日秘密指示日本中国派遣军："把第三、十三、三十四、二十七师团调往华中、华北。"27日，中国派遣军下达调动上述师团的命令，并指令"第六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

武汉地区及粤汉线北部要地”。

△　美巨型飞机约400架空袭日本东京。日本皇宫大部分建筑被炸毁。

4月15日　八路军晋绥军区第二分区部队收复山西五寨县城及周围三个据点。

△　赫尔利自华盛顿经伦敦到达莫斯科，即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晤，商谈对华政策及对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斯大林表示赞同美国对华政策。

△　伪满洲国人事变动：李绍庚任驻汪伪南京政府大使，阮振铎任外交部大臣，金名世任民生部大臣。

4月16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美国故总统罗斯福追悼大会，蒋介石亲临主祭。下午，各机关团体分别公祭。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行政院组织法》。

△　驻美大使魏道明致电蒋介石，报告杜鲁门总统就任后对苏政策的趋向。杜鲁门在国会本日的演说中宣示：“决全心全力，以实现罗斯福故总统所宣称的理想，并坚持德、日必须无条件投降。”

△　第三十八师主力克鄂北襄阳，第一七九及第一三二师各一部克自忠县，续尾追日军。

△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主力及第六十八师团第五十八旅团于4月上旬起分由湘西东安、桂北全县向我军进攻，是日两路日军会合陷湖南新宁县。

△　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邹洪积劳致疾，于是日卒于粤桂边区。

4月17日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举行纪念台湾沦陷五十年大会，陈仪、洪兰友、王泉笙、青山和夫及在渝台湾同胞20余人出席。李万居主席就台湾人口、地理、经济诸点，说明其与祖国之不可分性，并申述光复故土决心。同日，中央电台请谢南光、林忠以闽南语、国语及日语作纪念广播。

△　中国童子军全国干部会议首次大会在重庆举行，由陈立夫任主席，听取工作报告，于次日通过几项要案后闭会。时全国有童子军9.4588万人，童子军团6083团，内男5470团、女522团、幼童91团。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国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驻汪伪大使谷正之，在南京召集最高指导会议，提出“日华军官民的真正一体”之要求。

4月18日　　鄂北第三十八师克复樊城，至此襄河以西恢复豫西鄂北会战前态势。

△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收复晋城。

△　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将军代表美国政府，在新一军孙立人司令部给该军官佐16人与士兵26人颁发美军银星、铜星奖章，以表彰攻占八莫、南坎之战功。同时给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各授予旗帜一面，以纪念攻占腊戍、南坎、八莫三地之功绩。

△　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对记者谈黄金案彻查经过，谓现已决定将全案送往重庆地方法院依法侦察，并令将各行、局不依规定接受购户转帐申请书之负责主管人员先行撤职，听候法院侦察。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太平洋学会午餐会演说，保证中国以全力用以击溃日本。

△　日本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实施同重庆国民政府实现停战的政治谋略；同时为应付美、苏两国的未来行动，命令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师团应在8月以前集结在徐州以北待命。

△　成都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暴徒于今日及次日捣毁《华西日报》及《华西晚报》。成都各界人士甚为愤慨，纷纷慰问两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在人民声援中，《华西晚报》于21日复刊，旋《华西日报》亦复刊。

4月19日　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谒晤美总统杜鲁门，报告中国最近情势。杜鲁门对中国极表同情，并允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　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认为赫尔利关于与斯大林晤谈报告过分乐观，将来苏联参加远东战争必支持中共，甚或在东北、华北建立其“傀儡”政府。

△　美国援华总会会长麦克科诺菲博士称：美国将以飞机载运布匹前往中国，以稍解救中国普遍缺乏布匹及衣着之痛苦，首批20万磅现正准备装运，希望至少100万中国平民可因此受惠。

4月20日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兼团长主持，并就团务组织及干部选拔等问题作指示。会议通过《团的组织与活动方式案》、《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工作报告审查意见案》、《青年领导问题案》等，于23日结束。23日晚，蒋介石召集与会人员餐叙，并举行同乐晚会。

△　财政部将黄金提价舞弊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该院检察官业经依法开始侦察。中央信托局储业处建储科主任戴仁文及助理员

朱治廉两人，亦于19日由该局送交实验法院予以羁押，依法究办。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第七届年会在中四路该会会所举行，陈立夫等150余人出席，陈致开会词，宣读蒋介石训词，勉与友邦人士为求世界和平而努力。

△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部总监部在重庆举行从军女青年入营宣誓典礼，到官长41人，入伍女青年391人，以及各界来宾、记者20余人。

△　重庆嘉陵江区宝源、天府、全济、三才生、建川、江合、东林、和平八煤矿公司招待各报记者，报告各公司目前最大困难是限价与成本相差太远，呼吁合理调整官价，至少要增加120％，才能勉强维持生产。

△　晋绥边区文化界救国会向全国全世界提出控诉，揭发日军在边区大量施放老鼠，散布鼠疫菌的罪行，大声疾呼要求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注视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并予以有效的制裁。

4月21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毛泽东作《“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起来，争取胜利。他号召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要用民主来解决。

△　中国战区美后勤部队从是日起空运新六军至芷江，至5月11日调遣完成。魏德迈称，该项业已调遣之中国军队，可以遏制前线日军之攻势，并可于数月内对日发动首次强大之反攻。

△　宪兵学校、警官学校员生暨中央训练团台湾干部训练班毕业员生共2000余人，在中央训练团举行联合毕业典礼，蒋介石兼校长主持并训话。

△　兵役部长鹿钟麟在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施政方针及废

除役政弊端；同时宣布华阳志愿兵团第二营第四连强拉壮丁案审理结果，判处连长刘志道、排长屈茂死刑，排长王茂钟无期徒刑，谢少奎有期徒刑10年；隆富师管区第一团第七连班长赵春堂枪杀逃丁，亦经判处死刑。

4月22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饬全国各地所有机关、部队、学校，以及社会工商各业，水、陆、空交通通讯各方面，均应于5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实行“夏时制”一律将时间提早一小时，盟邦驻在中国之各机关亦同样适用。

△　据《扫荡报》讯：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从去年11月12日开始至是日，报名应征的有12万人。到月底止，实际报到入营的共有8.6万人。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湖南永兴城。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返抵重庆，24日晋谒蒋介石，报告与丘吉尔、斯大林会晤情形。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党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为主席团，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及日共领袖冈野进先后发表讲话；彭真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名单。参政员名额由原有240名增到290名。其中由各省、市临时参议会选出者为150人，占总额二分之一以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及陈绍禹被遴选为参政员。

△　宋子文在华盛顿首次出席中、美、英、苏四国外长会议，商讨旧金山会议会前要案、投票规则及其他程序。

△　第二方面军一部克复广西武鸣、上林。

△　中共山东分局发布《关于展开民主运动的决定》，决定从7月到9月进行由下而上的改造政权，贯彻“三三制”，改选充实各级参议会和政府，中心要求是：一、进行深入的民主教育；二、整理巩固村政权；三、改造县及行政区的参议会和政府；四、纠正党委包办政权的作风。

△　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就中苏关系给赫尔利的指示称：苏联现在忙着对付欧洲，无暇他顾。我们可以料到苏联会重新审查它的政策，修改它的政策，因此当你告知蒋介石委员长以斯大林所发表的声明时，你应特别费心将前面一段所表现的全部思想转达给他，为得使他充分察觉情况的急迫。请你促使蒋介石委员长感觉必须早日得到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不仅为得促进对日战争胜利结束，而且还为建立一个基础，使中苏关系终于变为互相尊重与永远友好。

△　大东亚会议在东京举行，汪伪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蔡培参加，会议决议将《大东亚宣言》扩大为《大东亚共同声明》。

4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第二次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报告指出：作为一般纲领，我们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具体纲领，当前我们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三部分组成。报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的相关问题作报告，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讲到几个政策问题时，讲了对于资本主义、对于共产主义、对于国民党、关于由乡村转到城市等。讲党内几个问题时，讲到个性与党性，整风与生产，党内几部分干部的对待，关于讲真话以及提议读五本马列著作。报告最后说，我们是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成立，吴铁城为处长。

△ 冀鲁豫军区第三、第七、第九军分区部队发起南乐战役，至27日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攻克河南南乐县城及其外围据点32处，解放卫河以东大片地区。

△ 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旧金山宣布，旧金山会议中、美、英、苏四邀请国以中国在顿巴敦橡胶园会议三项建议列为联合建议，下数周内提付正式商讨。中、美、英、苏四国首席代表及其代表团人员于本日抵旧金山。

△ 新四军第三师攻克苏北阜宁县城。

4月25日 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美、英、苏、中、法等46个国家的856名代表参加，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为大会临时主席。杜鲁门总统在总统府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称“旧金山会议将集中全力，专心处理建立主要机构以维和平之问题。基本宪章将出自诸君之手”。斯退丁纽斯致开会词，表示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

△ 军政部长陈诚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要点为：一、对欧洲盟军表示敬佩；二、湘西敌有扰芷江企图；三、据军政部所得

到的各方报告，自抗战开始至今年3月止，军事人员的伤亡人数共约计310万人。

△　朱德在中共七大第三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今后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大反攻的战斗。

△　八路军晋绥军区“春季攻势”结束，从2月17日以来，共作战537次，毙伤日伪军1590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三县城及据点54处，夺取离（石）岚（县）、五（寨）三（岔）两条公路。解放村庄724个，人口9.4万人。至此，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拥有九个完整县：兴县、岚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岢岚、偏关、五寨。

△　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西浦进在东京联络后返南京，是日向总部报告：大本营不仅准备放弃湖南，更有放弃武汉的意向。冈村宁次于是决定在调第三、第十三和第三十四师团北上的同时，撤回湘桂铁路沿线的全部兵力，仍保持武汉至广州的粤汉铁路沿线要域。27日，中国派遣军命令第六方面军撤退湘桂铁路沿线的兵力。

△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伦敦援华委员会上发表演说称：中国未来和平的惟一希望是成立中国联合政府，并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

4月26日　国民政府通令《惩治盗匪条例》施行期间自期满之日起展限一年。

△　第二方面军一部克复广西那马县。

△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二分区部队克复山西省辽县，28日收复和

顺县。

△　挪威驻华大使赫沙尔返国述职公毕返任，是日抵达重庆。

△　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在重庆病故。7月24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8月27日，虞洽卿遗族向国民政府献黄金1000两。

△　汪伪政府人事变动：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任伪广东省长兼广东绥靖主任，伪教育部长李圣五兼任伪外交部长，伪参谋总长鲍文樾改任伪河南省长兼河南绥靖主任，胡毓坤改任伪参谋总长。

△　美国务院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对华政策基本方针的报告，略谓：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共同对日本作战；从长远观点来看，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作为远东所必需的主要稳定因素。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在战后理所当然地要帮助中国发展现代的、有效的军事组织。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联的复杂关系，美国不准备向现在的中国政府承担给予这种援助的义务。

4月27日　旧金山联合国会议通过：一、任命美国务卿为国际安全会议主席；二、国际安全机构主席由主要国家轮流担任。并宣布：宋子文、莫洛托夫、斯退丁纽斯及艾登四外长为联合国会议主席。

△　第二方面军乘日军撤退之际，以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于是日攻占广西都安，尔后由都阳山方面向南宁迫近。

△　日军3000余人窜入湖南新化县洋溪，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共杀害民众3461人，强奸妇女227人，烧毁房屋2.8万余间，毁粮食126.3万余斤，抓走民夫2056人。

4月28日　赫尔利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三点新希望：一、希望中国能达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广播自由。二、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中，有共产党代表一人参加，这证明中国的团结已

经有进步。三、中国武装党派的团结问题，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本身的事情，但“一个团结与民主的政府，却是我们一向的期望”。

△　晋察冀边委会发出《关于新解放区人民负担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县要制订简易合理办法，其中应包括免征点与负担面的规定。负担面以70％至90％为原则。各阶层最高负担率，以占其收入计，地主最高可到52％、富农18％、中农10％、贫农4％至5％。

4月29日　湘西日军陷武阳、白家坊，并猛攻瓦屋塘，于5月1日进攻水口。此时第五十八师主力与第一九三师在空军协力下向日军反击，当即予以重创。

4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第四次会议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阐述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总结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指出：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

△　重庆《新华日报》刊载成都文化界李劼人、周太玄、常燕生等126人发表的《对时局宣言》，列举六大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建立全国一致的政府，召开真正民意的国民大会，实现国民的基本自由。

△　重庆《新华日报》报道赫尔利大使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并加编者按指出：今天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有一万万人口，90万正规军，230万民兵，他在中国抗战中起着这样重大的作用，但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全部75人中，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共三人参加，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共及解放区在今天中国政治上的比重的。然而我们仍委屈求全地接受了。赫尔利大使如果以民主及公平的眼光来看问题，便不能认为“中央政府此种措施”是“极感愉快”的“良好现象”了。

△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致电郭沫若及前文化工作委员会，对国

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倒退政策，公然宣布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反动措施表示坚决抗议，对诸先生刚直不阿的伟大精神表示敬意，并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工作。

△　苏军为夺取柏林中心防御地区而展开激战，希特勒自杀。是日晚，苏军战士冲进国会大厦，次日晨把胜利红旗升到国会大厦上空。

是月　国军从去年冬起接受美械装备，至是月已达35个师。

△　广东珠江纵队在1至4月间，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解放村庄400多个，巩固了五桂山根据地。

△　教育部决定，学生公费自是月份起调整，重庆区按公务员生活补助费每月发给1750元，昆明区2000元。成都区与重庆区同。其他各地按当地公务员补助费四分之一发给。

△　驻守漳州海外某岛屿之伪闽南警备司令莫清华，率所属第一、第五两大队伪军400余，机枪三挺，步枪240余支，分乘帆船至海澄登陆，向我方投诚。

△　据中美合作所统计，本年3月份该所人员进行132次行动，毙日军1728人，俘33人；4月份282次，毙日军2958人，伤1467人，俘44人。两个月份成绩已超过去年下半年之总数。

5月

5月1日　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夏时制”，通饬全国自是日起提早一小时，一律施行。

△　国民政府任命郑亦同为驻澳大利亚国公使，原任徐谟免职。

△　第三方面军第九十四军主力4月30日由湘西长铺镇（今绥宁）

向武阳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实施反击，是日夺回武阳。3日，日军增援反扑，但力不从心，经激战后向东南溃退。

△　重庆市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到各工厂代表1000余人，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任主席，并致词呼吁加紧生产，改进工作技术，加强训练精神，以争取最后胜利。

△　延安纪念五一劳动节，30余工厂职工及各界代表1500余人与会。刘少奇讲话，阐述工人阶级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号召工人加紧生产，努力增加产量与提高质量，在英明的毛泽东领导之下，向胜利前进。

△　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在太行区五一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演，总结八路军在华北攻势战果，四个月中光复县城10余个，攻克据点千余，收复国土六万平方公里，解放同胞300万。

△　农林部向各省农业主管机关传达《三十四年度各省棉花增产实施计划大纲》，指令本年拟于后方陕、川、豫、鄂、湘、赣、浙、黔、桂、滇、康、甘、宁、闽、新、晋16省继续扩充棉田面积158万亩，预计最低限度增产皮棉49.51万市担，并于云南省扩大推广木棉10万市亩。

△　云南农林工矿展览会在昆明开幕，分农林、工矿两馆，参展公私厂矿共80单位，规模之大为近年来昆明所未有。

△　《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出版，社长成舍我。该报创刊于1925年，北平沦陷后，全部资产为日军没收，并改名《新民报》。世界日报社同人不忍被日军窒杀，于1944年9月呈准在重庆复刊。

△　衡阳失陷。被困敌营之第一三〇师师长容有略、副师长潘质、预第十师师长葛先才、第三师副师长彭问津四人，相偕脱离衡阳险地生还。

△　缅甸国民军一部在英军协助下，克复缅甸首都仰光。

△　日军包围河北定县大小近同村，向地道内施放毒剂，致使干部、群众24人遇难。

△　美军统计，4月份共击毁日本各型军机2500架，占其全部实力十三分之一，自太平洋开战以来日机损失最大的月份。

5月2日　　战时生产局长翁文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战时生产，谓就实际较有关系之27种产品，上年11月及本年3月之产量互相比较，其中有18种产量显为增高，有九种无甚增减，或略为减少。在产量增多之产品中有铁增20％、钢增30％、汽油及酒精各增30％、纯碱增70％、漂粉增90％、水泥增90％、电动机及工具机各增150％，皆为甚关重要之物品。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部队收复河北南宫、新河两县城。

△　斯大林宣布：柏林完全攻占。3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胜利解放柏林。

5月3日　　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在是日出版的昆明《民主周刊》上撰文指出：国民参政会不过是国民党政府用来掩饰国际视听的一种工具，对于国内党派团结实不能起任何作用，而且“绝不能引起社会上任何良好印象”。

△　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解放区青联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由冯文彬、胡乔木、黄华、蒋南翔等24人组成筹委会，冯文彬为筹委会主任，蒋南翔为秘书长。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议：军事委员会设立军令部，胡毓坤兼任部长；丁默邨任浙江省省长兼驻杭州绥靖主任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分会主任委员；徐天琛为国民政府文官长；选任陈春

圃、项致庄、蔡培为国民政府委员。

5月4日　　蒋介石分电斯大林委员长、杜鲁门总统、丘吉尔首相及戴高乐将军，祝贺盟军攻克柏林。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听取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厉生报告。黄炎培提出复旦大学教授费巩被特务绑架、《新蜀报》被国民党武装占领、中华职专女教员离婚案问题，要求进行彻查。

△　中共云南省工委发动昆明市一万多大中学生及民主人士举行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并宣告成立昆明学生联合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　成都市各大中学105个团体在华西坝广场联合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及营火大会。叶圣陶、陈中凡以及加拿大籍文幼章教授作演讲。会后举行火炬游行。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该会成立七周年年会暨第一届文艺节纪念会，邵力子、郭沫若、老舍、胡风、巴金、曹禺等百余人出席，通过要求保证作家身体自由、写作自由等提案。

5月5日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出席代表574人。蒋介石主持并致训词，提出三项任务：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三、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强调要坚定三民主义战胜一切的信心。开幕式后举行预备会议，推选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宋庆龄、孙科、冯玉祥等36人为主席团，并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

△　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团向旧金山会议提交《关于顿巴敦建议案之若干联合修正案》（即《四国修正案》）。此项修正案经会议讨论后获得通过。

△　中美合作所之浙东特种破坏组以水雷引火爆炸浙赣铁路浦阳江铁桥，计全毁桥墩两座、桥面钢梁两座，炸斜桥墩两座，桥面钢梁亦多炸毁，敌伪交通顿告中断。

△　汪伪政府财政部发行金证券，面值分一两、五两、十两三种，由伪中央储备银行发售。

5月6日　　第四十四师击破强渡湘西巫水之日军后，以一部向新宁追击，5月4日迫近石狮，是日克复新宁城。

△　河南新乡日军“北支派遣第十二军弘1468部队”士兵赤田清治，在当地青年李鸿钧的帮助下，是日携带枪支弹药投奔第一战区新乡贺堤贺兰亭游击队。按：贺兰亭游击队当时共450人，基本成员为当地农民，还有日本人赤田清治，一名朝鲜人，有美军操纵无线电台及美军军官协助指挥游击作战，并有国民政府的两名特派员。

△　日本宣布废弃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军事同盟瓦解。

5月7日　　国民党六全大会举行第一次大会，蒋介石主持，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程潜作军事报告。

△　第四十四师以一部向湘西武冈追击日军，5月6日追至武冈西南，遂联系第五十八师守城部队夹击日军。是日日军被杀伤甚重，向东北方向溃退，武冈解围。

△　据重庆《中央日报》讯：玉门油矿及迪化、伊犁间之乌苏油矿战后可供大量开采。乌苏油矿有水分；玉门则系纯原油，油层深厚，质量亦佳，尚在探凿中，希望甚大。惟炼油地点，当以兰州为宜。

△　凌晨2时41分，德军统帅部代表、参谋长约德尔在法境兰斯红色学校艾森豪威尔元帅总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军

总部签字，索斯罗巴罗夫将军代表苏方签字，塞林柯将军代表法方签字。此为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初步协定。

△　美陆军部宣布：欧洲美军将直开远东。

5月8日　　晚11时，德国无条件投降批准仪式在柏林举行。有苏联代表格·康·朱可夫元帅、英国代表阿·泰德空军上将、美国代表查·斯巴兹将军、法国代表德·拉特尔·塔西厄将军代表武装部队出席，德国全权代表凯特尔元帅、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什图普弗空军上将签署投降书。该投降书从1945年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欧洲战争至此结束。

△　国民政府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盟军完全胜利，通令全国各地自9日起至11日止，升旗三日，以志庆祝。同日，蒋介石分电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及戴高乐祝贺，并发表广播演说。

△　英王乔治六世致电蒋介石，称："今日西方战争已告结束，自将集中敝国所有之力量，以彻底击败日本。"

△　旧金山联合国会议各代表在会场静默一分钟，庆祝欧战胜利。五强代表团各首席代表发表广播演说；中国代表团代表顾维钧及法国首席代表皮杜尔称，全世界将如何对日，日本可拭目待之。

△　世界各国人民狂欢庆祝胜利。当杜鲁门总统广播演说时，纽约之内河船只之汽笛及教堂之大钟齐鸣，彩纸自摩天大楼窗中纷纷如雨而下，遍布市内各热闹街道。伦敦遍悬联合国国旗达数百万幅，丘吉尔首相宣布欧战结束后约十分钟，全国教堂钟声齐鸣，传布胜利消息。巴黎街头拥挤着狂欢人群，晚报用六吋宽的头条新闻刊载欧战结束的消息。中国各地连续升旗三日庆祝胜利。次日，莫斯科广播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旗帜到处飘扬，千千万万的人涌到红场，互相拥抱，欢呼胜利。

△　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蒋介石呈递国书。彼得罗夫致颂词，表示愿尽力发展及巩固中苏间善邻关系。蒋介石致答词，对抗战期间苏联给予我国极大之援助表示感谢。

△　美国新强力电台发动对日广播攻势，忠告日本应即无条件投降，并申明投降并非消灭日本全体人民。

△　第四方面军于5月6日挫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约6000人向湘西江口、青岩等地的进攻后，在中美空军全力支援下，于是日向日军实施全线反攻。

△　马寅初教授在重庆交通大学发表演讲，主张中国应实行民主政治、土地改革，并表示："为今日计，惟有从速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开放言论，确定各党合法地位，建立地方自治。"

5月9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说：同盟国的团结与其政策的坚定是欧洲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记者询问，蒋介石曾言及苏联对华之援助，其意何指？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答：中国抗战初期，现为我国盟友之诸邦尚持中立国态度，惟苏联则在军械及技术方面予我以重大之援助。1938年、1939年苏联政府更贷我以大量信用借款，苏联因此获得我国政府与民众之友谊，蒋介石所言必系指此无疑。

△　八路军冀中部队光复河北省河间，此役攻克大小据点87个，俘伪正、副大队长以下500余人，毙伤50余人。

△　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元帅在关岛宣布，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已经拟就，欧洲和地中海战区海空军全部力量将立刻加诸日本，日本已没有一处可免受航舰机队的袭击。必要时，多处进攻日本之举即将发动。

△　日本中国派遣军以中国调集重兵反攻，于是日给第六方面军

下达中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

△　日本政府召集临时阁议，并发表声明称：德国向反纳粹国家作无条件投降，日方虽深表遗憾，但日本为求自保自卫和东亚的解放而作战的决心，丝毫未感动摇。

5月10日　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谓德国投降后击败日本会加快，但整个形势，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并请转告杜斌丞谨慎地运用各种可能，联络西北军人，动员知识分子下乡，为民主培养庞大的基础，以利长期斗争。

△　周恩来致电王若飞，请设法托邵力子转询在新疆被捕的百余中共同志恢复自由否，如未，望要求立即释放。

△　出席六全大会的国民党美国总支部代表梅友卓，代表美国芝加哥城侨胞向蒋介石面呈慰劳前方将士、改善士兵生活、航空建设等捐款美金11.825万元。

△　大足石刻考察团杨家骆对重庆《中央日报》记者谈考察结果：北山以窟计，共有二百数十处，造像数约在5000之谱，宝顶造像有半身即达10丈者，总数当以万计。此行考察重大之发现甚多，并有很高学术价值。

△　第三战区一部攻克浙东新昌城。次日，克复嵊县。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署长李门在华盛顿称：美将派遣医药及卫生专家30人赴华，入中国政府设立之营所，训练医药及卫生工作人员。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需要，乃熟练之医药及技术人员。据统计，中国每四万人中仅有医生一人，每一万人仅有医院病床一架。

5月11日　国民党六全大会举行第七次大会，翁文灏作经济报告，说明抗战八年来政府对于经济建设之措施；并论国营事业的发展，1944年国营事业产品达172亿元；继论民营事业状况，谓民营事

业之痛苦，为运输困难、资金缺乏与器材补充不易等项，为此政府由国家银行给予贷款，自1938年迄今，贷款总额超出民间所出之资本。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欢宴苏、美、英等国留延盟友，庆祝欧洲战争胜利结束，毛泽东亦亲临致贺。朱德在致词中指出：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在东方只剩下一个法西斯日本，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配合美、英同盟国，最后击败日本。

△　宪政座谈会在重庆举行，黄炎培、褚辅成主持研讨对参加联合国会议诸代表之建议等问题，与会者300余人。张西曼、沈本强、章乃器、董时进、冷遹、张申府相继发言。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破坏，绑架揭露国民党军事、政治黑暗的青年焦志诚，抢走签名簿。

△　日本政府决定退伍军人和16岁以上尚未被征入伍之男子，自5月20日起，即将听候政府征召入伍，并决定组织全国志愿军，以保卫本土。

5月12日　蒋介石为庆祝欧战胜利结束，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盟邦使节及各国驻华武官，并邀各院、部、会首长作陪，共700余人出席。席间，蒋介石致词赞扬英、苏、美功绩，并深信在不久之将来日本定必遭逢与希特勒德国相同之命运。

△　蒋介石电示宋子文，与美交涉应先解决物资运济与平定物价问题，以后乃可洽商基金计划。

△　第九十四军克复湘西武阳后继续向东追击日军，于是日收复高沙。日军残部3000余人在向东溃退中，又遭第九十四军的截击，伤亡惨重。14日晨，该日军再向东突围逃窜，被第九十四军跟踪追击，包围于武冈以东的茶铺子地区，迄16日全部被歼。

△　湘西会战，我军获胜。此役日军以第二十军为主力，出动八

万兵力，包括五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二师伪军，目的在破坏或夺取湖南芷江机场，亦附带欲作试探机会，希望能由湘西打开一条路进入贵州，以北攻重庆。至是日止，日军死二万，伤三万左右，被俘一万多人。此次战役，实已证明敌我战斗力之逆转。

△　延安发表解放区战场春季攻势胜利公报称：自1月到最近，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向敌伪展开猛烈的进攻，大小战斗百次以上，计收复县城22座，攻克敌占重要据点300余处，切断或彻底粉碎敌之重要公路16条，解放国土八万余平方里、人民500余万，毙伤敌伪1.5万余名，伪军向我投降反正者6000余名。

△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一分区部队克复山西安泽县城。

△　冀察军区集中主力部队和地方军向察南地区发动夏季战役攻势，至7月底结束，解放县城三座，土地一万平方公里。

△　川南古蔺县出征军人家属因该县前任县长沈季皋、现任县长苏艺风等舞弊及虐待征属，派张肖等25人组成请愿团，自是日起由该县长途跋涉徒步来渝，于6月3日到达，分别向军政、兵役两部控诉。

△　上海5.5万人力车夫举行大罢工，抗议车商提高车租。车夫携带铁器将各大车商已放出在马路上的营业车辆打毁500余辆，顿时上海马路上人力车绝迹。经过斗争，车商被迫同意车租暂时按原价放出。

△　美总统杜鲁门派赴中国私人代表纳尔逊辞职获准，由洛克继任。

5月13日　第四方面军以第十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军等部，向湘西日军展开截击、追击。第十八军攻占金龙砦以北之山门，接着又夺回金龙砦以南之石下江各点，并在第七十三、第七十四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于是日攻占金龙砦，消灭日军一部，其残部千余人再向龙

潭铺溃逃。

△　八路军冀中第八分区部队克复河北饶阳县城。同日，八路军冀察军区部队攻占河北怀安县城。

△　国民政府拨款500万元作为鄂北救济之用。

5月14日　刘少奇于是日及次日在中共七大第十一、第十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报告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工作的一切指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　蒋介石特电令嘉奖痛击侵犯湘西日军、力挫敌锋的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及中美混合总队。

△　甘肃省临夏县马振武捐资147.8万元，为青海省一国民学校兴建校舍51间，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　敌伪调集约600人进扰绥北大青山中美合作所基地。大青山游击基地在指挥官鄂友三和美员威克斯率领下，动员约1000人与敌接战，激战三小时，毙敌70人。

△　杜鲁门总统会见宋子文，商谈租借问题及其他有关中美两国之事项。

5月1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迎接新局面》的社论，提出

今后战斗任务是要把沦陷区的工作提高到与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团结群众，准备力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完成从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

△　《湖南日报》在安化创刊，由湘省文化界人士陈大榕、汤继成等主办，为湘中战地惟一与敌伪作文化斗争之新闻刊物。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宣布：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混合总队飞机半年来共击毁日机1634架。

5月16日　据中央社讯：我国旅法物理学家蔡柏林，在巴黎大学物理研究所建成实验宇宙光磁场，此为世界惟一可能分析原子及实验宇宙光之磁场。

△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修正通过党章及地方自治、侨务行政等要案。

△　第一〇〇军主力包围攻击湘西放洞之日军，使之受重创，日军残部700余人于5月8日向东南突围至白马山附近，复被我军包围，是日全部被歼。

△　日军第六十九师团之一部约5000余人，由陕县分别向灵宝、官道口进犯，经第四集团军主力及第四十军协力夹击，于24、25两日将日军击退，双方伤亡均重，至29日恢复原态势。

5月17日　国民党六全大会举行第十五次大会，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通过政治、外交、教育等报告决议案。下午举行第十六次大会，通过党务五大类决议案。

△　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开联席会议，讨论七大的会议日程问题和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非正式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

名单和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　冀鲁豫军区集中四个军分区部队，在鲁西地区发起东平战役，以配合山东军区反“扫荡”作战和扩大解放区。至24日东平战役胜利结束，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　八路军冀中部队攻克河北新镇县（今属文安县），第九、十两分区连成一片。

△　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于旧金山会议期间赴华盛顿，同美国洽商黄金运华及物资供应事，至是日，美国财长摩根索终于由杜鲁门总统之交办，同意中国出售黄金由美提供，并确定各月份运金清单。至此，黄金交涉已圆满洽成，宋子文飞返旧金山继续参加联合国会议。

5月18日　第七十军第八十师一部克复福建福州，19日克长乐，22日续克连江。日军残部2000余人经罗源、福鼎道向浙江境内退却，又经我军节节截击，死伤惨重。

△　新二军新四十五师师长郭岐，率所部进击新疆精河县沙山子乱民，毙伤300余人，俘数十人，并搜获俄文文件50余件，由此证明“伊宁事变”有苏联人插手其间。

△　董必武在旧金山用英文发表《中国解放区实录》，向全世界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及中共和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情况。

△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旧金山共和国俱乐部发表谈话，称：中国政策与目的在于维护和平安全，抑制侵略，促进联合国人民之福利。

5月19日　蒋介石采纳宋子文提议，允准设立售金委员会，并聘美方驻重庆人员参与。

△　第一九三、第一一八师在湘西龙潭铺附近地区，截击自金龙

砦溃逃之日军。20日，日军残部又继续向东溃退，被第十八军尾追及截击，死伤甚巨。迄6月7日，湘西邵阳方面恢复会战前态势。

△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应艾森豪威尔邀请，自重庆赴欧洲参观战场。

5月20日　蒋介石欢宴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使馆官员，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吴铁城、吴鼎昌、王世杰、邵力子、吴忠信、钱大钧等出席作陪。

△　中央政治学校于重庆小温泉举行第十八届校庆典礼，校长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致训词称：政校求学之目的，在求以一人之力量，完成千百人之任务；并要求每一学生应以总理知难行易哲学为一切学问之基础。

△　西南联大教授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于是日及次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一文，略谓：1月至4月后方各重要城市的物价约上涨三倍至七倍，平均每月的上涨率竟到50％以上。这表示通货膨胀确已达到恶性膨胀的末期。并指出：通货、物价、投机、垄断，再加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物价与经济恶化的趋势还要愈演愈烈，可能演变到不堪想象的境地。

△　第二十九军克复广西河池县，旋沿黔桂铁路向宜山追击，于23日克德胜。同日，第二方面军一部克复广西金城江，次日收复贵县，攻入宾阳。

△　新四军第四师为消灭盘踞在安徽宿县西南之伪第四方面军直属第十五师，集中第十一旅全部、第九旅一部和师骑兵团及八个县总队共1.3万余人的兵力，发起宿南战役。

△　鲁南八路军策应滨海反“扫荡”战役，发起以江苏邳县为目标

的攻势，激战一夜，攻克邳县县城及周围四大据点，俘伪支队长以下官兵480余人，粉碎日军控制陇海路两侧的企图。同日，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克复山东东平县。

5月21日　国民党六全大会举行第二十次大会。蒋介石宣布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选举结果：中央执行委员222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名；中央监察委员104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名。通过《军事报告决议案》及《大会宣言》后即举行闭幕典礼。蒋介石宣读《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揭橥五项任务：一、当前最急要任务，在于充实军队之配备，努力最后决战，消灭敌寇，竟抗战之全功；二、亲仁善邻，敦睦盟谊，欢迎外资建设中国；三、彻底实行民族主义，扶助边疆各族经济文化发展，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权；四、排除万难实现宪政，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五、实施民主主义，鼓励民营企业，发达国家资本，其基本工作即为实现实业计划。

△　国民政府任命徐诵明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

△　重庆《大公报》载：川省民政厅去年人口调查结果，全省共有4618.4777万人。

5月22日　蒋介石在重庆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代表，谓中共意在消灭国民党，非使中共服从军令政令，决难与谋。同日，会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获悉《雅尔塔协定》内容真相，即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王世杰致电宋子文，告知赫尔利所谈关于苏联对东北及外蒙等问题之态度，以供其在美交涉时之参考。

△　美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的租借法报告称：在过去五年中，运往印度和中国的租借物资，共20.023亿美元。德国战败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可以集中用于对日作战，因此要继续供给国民政府，以便获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5月23日　蒋介石复致电宋子文，嘱相机使杜鲁门向斯大林有所

陈述，即有损中国领土之主权与行政完整之要求，与美国对远东一贯政策有违。

△　褚辅成在重庆国民参政会招待王若飞、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冷遹、傅斯年、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商讨恢复国共商谈办法；并决定将讨论情况报告蒋介石征求意见。

△　交通部长俞飞鹏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作关于交通方面的报告，略谓：一、铁路：战前全国有一万余公里，现在连新建者亦为数有限。宝天铁路秋间可以完全通车。二、公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新筑一万余公里，改善工程8.89万余公里。战前登记全国公商车辆共2.2万余辆，现行驶于各路线者为数不多，配件、器材奇缺。三、水运：战前有海轮及江轮共500余艘，现在存数甚微。四、空运：中航公司担负物资之运输，贡献很大。

△　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胡霖应美战时情报局之邀，在旧金山会议总办事处以日语对日本民众广播，要求日本民众摒弃其军阀使日本陷于自杀之政策，俾享受和平与繁荣。

△　蒋介石集中第三战区第五十二、七十九等10个师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指挥官、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向苏浙边区新四军进攻，企图夷平临安、孝丰、天目山、莫干山地区，将苏浙军区新四军一举歼灭。新四军为顾全大局，节节退让。

△　在华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执行委员会首席委员大串胜利、执委兼书记长井户丰，应国民党中宣部对敌宣传委员会之约，在广播电台分别作《日本投降问题》、《日本民主革命的前途》演说。

△　美巨型机550架火攻东京。

△　英首相丘吉尔及其联合内阁辞职，英国国王委托丘吉尔组织临时内阁，行使职权直至7月份大选结束时为止。

5月24日　蒋介石会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研究对越南、香港、朝鲜及满洲之军事政治方略，并表示关注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之情形，因此举不仅关系欧洲安危，对于中国旅顺和大连之关系更是重大。

△　中共七大举行第十六次会议，毛泽东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员40人左右，候补中央委员30人左右）的建议。

△　河南孟津县县长姚安之、邓县县长刘万斯卫民守土，不避艰危，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应予晋级。

△　据中央社讯：重庆警察局举行户口总普查，调查结果：全市户口20.2234万户，口数126.6464万人，其中男76.2442万人，女50.4022万人。

△　八路军冀中部队完全克复河北安平县。同日，八路军太岳第五分区部队发起“条西战役”，以扩大中条山以西地区，至6月11日战役结束，攻克敌据点20余处，收复土地4000平方里，歼灭日伪军700余人。

5月25日　宋子文就蒋介石于两日前电嘱对雅尔塔密约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等问题洽商对付苏的方案，复电蒋介石，报告在美与顾维钧、王宠惠研商对苏应付方案问题的谈话情形。

△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为互换《中比条约》批准本全权代表。

△　第七十军第八十师一部克复福建省罗源。27日，续克宁德。

△　八路军冀中第九分区部队克复文安。

5月26日　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举行记者招待会，顾维钧答复各项问题：现在有否决权国家，只限于安全理事会之五个常任理事；关于托治问题，中国并无代治领土，吾人只希望托治之原则与目标，可获当地人民之信赖与支持，以促此新体制之成功。此外，还就托治委员会、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及其他重要问题，表明中国代表团的意见。

△　国民政府任命吴保丰为国立交通大学校长。

△　浙境永嘉、乐清日军向瑞安进犯，旋即占领瑞安。

△　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对日作战及中国问题。斯大林谓8月8日苏军将进攻满洲，但须视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而定。

5月27日　南宁收复。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令第六十四军以有力之一部进出武鸣、玎珰圩，相机攻击南宁。第四十六军以第一五六师及第一五九师一部攻击南宁。26日拂晓，全线攻击开始，傍晚各部队迫近南宁。入夜，第一五九师一部攻克城北望仙坡高地后，继续向日军阵地突破，于夜半渗入市区。此时，第一五六师亦由石埠、心圩经南宁西郊突入市区。彻夜巷战，至是日8时，残余日军分别向宾阳、苏圩撤退，并纵火焚城。至10时，完全攻克南宁。

△　孙科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演说，称：工业化要弄好，非做到政治民主不可。今天中国政治不够民主，赶不上世界潮流，要快些设法。外交关系必须要内政配合，主要就是国内的团结一致。

△　据中央社讯：粮食部已收各省1944年度田赋征实征借粮，截至本年5月10日止5406.8376万市石，占应征总额82％。其中绥、宁、豫、晋四省业告扫解，闽、川、皖、滇四省达90％以上。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分区部队攻克冀省阜城县，冀察部队

解放冀省涞源全境。

△　重庆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宣布，中国战区美军后勤总部司令齐福士中将即返美，遗职由奥兰德中将继任。

△　美国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同人代表全美华侨，欢宴我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与会者400余人。代表团代表向华侨代表报告，我在联合国会议中之奋斗成就与列为五强之一的崇高国际地位。

5月28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典礼暨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宣誓典礼，在重庆合并举行。蒋介石主持并致训词，指示全会重要任务在完成反攻计划，获致抗战胜利，实现主义，建立民国，全体同志必须继承总理遗教，遵照《建国方略》，践履笃实，身体力行，则革命建国期日可成。继即举行预备会议，决议组织主席团、提案审查委员会、方案审议委员会、决议案整理委员会。

△　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开会商讨出席参政会态度问题，左舜生、黄炎培表示将完全与中共采取一致的行动，沈钧儒、章伯钧亦持同样态度。左舜生还表示要向王若飞建议，请中共中央先有正式表示，他们才有所依据去说话。他们希望以此问题逼迫蒋介石重开谈判，达成召开党派会议的协议。民盟还决定由左舜生起草致国共两党的信，内容为反对内战，促速实现民主团结，重开谈判。

△　苏联大使馆秘书费德林访郭沫若，递交苏联科学院邀郭参加该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邀请信。丁西林亦收到邀请信。

△　冀中八路军解放安新。

△　伪满洲国撤销东满总省，设立东满省和间岛省。

△　日本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一、务必迅速撤离湖南、广西、江西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据地域，将兵力转用到华中和华

北去；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须准备对苏作战。

5月29日　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在伦敦签订《关于荷兰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事件条约》。

△　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居正主席，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方案。

△　新华社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民党大会的路线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是违反世界潮流及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所以这个路线与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将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战斗到底。

△　据中央社讯：财政部发言人谈：我政府与美方洽妥，现已由美开始陆续运送黄金来华，预计所有未付现货及到期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可于7月底全部付清。自即日起，现行售现办法暂行停办，存款照旧办理。

△　蒋介石批准军法执行总监部所判关于新疆阴谋暴动嫌疑案中林继庸等400余人无罪。按：林继庸等前被盛世才诬认为有阴谋暴动嫌疑，捕系狱中，经查明全系虚构，予以恢复自由。

△　冀鲁豫八路军克复武强。

△　驻防上海浦东之伪保安警察纵队第二大队第六、七两中队，因借米无着拖枪逃走140余人。尾追的第八中队，枪杀领队大队长，亦随之哗变。6月5日，又有三个分队80余人携带武器离开驻地不知去向。

5月30日　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通过《修正中执会组织大纲》及六全大会之决议，责成中常会规划处理，并设抗战官兵复员安置筹委会、确定工业建设纲领实施步骤、水利建设纲领等

项决议案。

△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张继、吴敬恒、邵力子、程天放、王宠惠、王秉钧、林云陔七人为常务委员，推定王子壮为秘书长。

△　第六十四军第一七五师自26日起攻击广西宾阳，迄是日拂晓，各攻击部队已迫近宾阳东南及西北城郊，7时第五二四团首先冲入市区，其余部队亦相继突入，巷战至9时，日军突围北退。

△　空军第四大队飞机出击南京之敌，击落日机10架。

△　是晚，自称警察的便衣乘车不买票并毒打司机王焕章，次日重庆牛角沱派出所警察又将公共汽车司机周德民倒拖到所内毒打，引起全市公共汽车司机的激愤。

△　日本大本营拟定《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并命令关东军进入战备状态。

5月31日　　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议：一、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二、选任翁文灏为国民政府委员，于右任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旋即闭幕。

△　中国政府与阿根廷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　中共七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指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并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规定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任务。

△　豫西鄂北会战结束。是役作战经72日（3月21日至5月31日），日军动用六个师团计七万余兵力，我军投入者有14.8万人。日军虽达成进占豫西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但遭到相当的打击，

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576万人，俘虏六名，缴获轻重机枪92挺，步枪556支，迫击炮四门。

△　美国政府根据《租借法案》向各国提供的款项至是日止，英国为290亿美元，苏联100亿美元，法国5.1亿美元，中国3.62亿美元。

△　联合国战罪委员会在伦敦召开战罪会议，15个国家代表与会，我国代表杨云竹等出席。

△　美陆军部宣称，自5月10日美机向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作12次燃烧弹袭击以来，所毁市区面积甚大。

是月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向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议书，主张“结束党治”，“组织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规定自6月1日起，实行以贸易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

△　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偕同副主任梅乐斯，在浙江于潜县（今临安县）方元铺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举行军事会议，日军乘机围攻，激战两昼夜，始为我军击退。

△　冀热辽区军民结合展开反宪兵敌特和打击伪满军的斗争，至本月底共攻击敌据点碉堡11处，解放村庄250个，面积4000平方公里。至此，全区共有25个县，人口560.06万人，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

△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负责人周保中、李兆麟根据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制订抗联反攻作战计划。该计划被纳入苏联远东军对日作战计划，抗联教导旅以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的番号编入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担负向佳木斯地区的作战任务。

6月

6月1日　　蒋介石在重庆邀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谈话，王世杰、邵力子、雷震作陪。褚辅成等谈及发起促成国共继续商谈，并商定由他们致电延安征求意见，蒋介石表示“无成见”。

△　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各部队于31日拂晓先后进抵广西迁江。日军千余人凭工事顽抗，战斗激烈。中午，空军四架飞机飞临上空助战，并低空扫射毙伤日军甚多，日军不支乃乘夜渡过红水河北撤。是日晨，第四十六军收复迁江。

△　中国政府与比利时政府于1943年10月20日签订之《中比新约》，业经双方批准，是日在重庆互换批准约本，该约于互换后立即生效。

△　川江叙渝段引水人员因要求航商履行按照政府规定发给薪津食物未获解决，举行罢工，经社会部调解，于4日复航。

△　重庆公共汽车全体司机为抗议特务、警察行凶，于是日及次日罢工，后经市长贺耀组出面调解遂得复工。

△　重庆中国毛纺厂1000工人因厂方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经与有关当局及资方谈判，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于4日晚复工。

△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1945年版五千元及一万元券两种，引起物价波动。

6月2日　　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两党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不惟抗战得早获胜利，建国新猷，亦基于此。

△　军政部长陈诚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纵谈军事，称美对我租借武器近已增加，决全部用以装备军队打击敌人；并表示“如中央部队遭受不友好之部队袭击时，若望中央部队不用其所有武器自卫，亦为不近人情之事”。

△　第二方面军一部收复广西罗城、融县。

6月3日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详谈东北问题，并明白表示我国之态度，“务须达成我抗日目的，即求得东北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彼得罗夫表示不难友好解决，并希望行政院长宋子文尽快访问苏联。

△　中美文化协会等七团体举行茶会欢送心理学家郭任远博士赴美讲学，邵力子、张道藩、潘公展等百余人与会。

△　董必武出席旧金山救国总会举行的侨众宣传大会并发表演说，切望大家一起努力争取中国的民主政治早日实现。

△　自是日至29日，日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驻日大使马立克进行四次往返密谈，日本以交换大陆利益为条件，要求马立克转达苏联政府调停对美战争，然而马立克反应冷淡，对于日本提议只允应用普通邮件由西伯利亚铁路寄达本国。

6月4日　　重庆《中央日报》报道近年教育设施概况：三十二年度（1943年8月至1944年9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41所，比1937年增加二分之一，学生共计7.3669万人，较战前增加一倍以上；中等学校计全国有3455所，学生110.1087万人，比战前增两倍；全国国民学校计有25.8664万所、学生1780.1655万人，比战前增加学生三分之一以上；对于战区青年之招训，截至上年年底，共计24.9万余人之多；自去年秋开始，即实行10年经济建设人才培养计划，积极造就专门人才。

△　浙西国民党军在上官云相指挥下向新四军进攻，是日新四军退出新登，8日又撤出临安与全部天目山地区。

△　中美工商协会在旧金山欢宴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及新闻记者，宋子文发表演讲，表示中国在战后复兴与经济建设方面，将欢迎外国之资本与技术，尤欢迎美国之资本与技术。

△　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宣布，美地面部队第四七五步兵团及一二四骑兵团已调至中国战区。该两团均系“战神”特种混合部队之一部分，在缅甸森林、山地作战时极著战绩。

△　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到大连，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传达《对苏作战计划要领》。

6月5日　　苏、美、英、法四国在柏林发表《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及《关于同其他联合国家协商的声明》，宣布：1937年12月31日前的德国领土划为四个占领区，由四国分别占领；“大柏林区”则由四国共同管理；苏、美、英、法各国总司令将在各占领区内，遵照各该国政府的训示行使最高职权；关于涉及德国全部的事务，则由四国共同处理；四国总司令将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

△　旧金山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宪章》序言，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等。

6月6日　　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电呈蒋介石，报告苏联要求租让旅顺事，似曾为罗斯福总统所默许，并告以斯大林邀其访苏。

△　为解除桂越边境威胁，我国军队攻入越边占领重庆府，日残敌向高平方向退去。同日，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第四六六团攻占广西明江。

△　八路军冀中第七分区主力一部解放河北深泽县。

△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和各专门工程学会联合年会，于是日工程师节分别在重庆、成都、西安、兰州、贵阳、昆明、宁都七区同时举行，9日闭幕。各区利用无线电相互联络。渝区会员达1450余人，收到论文300余篇，选举曾养甫为第十四届学会会长。

△　据重庆《中央日报》报道：我国钢铁专家周志宏最近荣获著名之南芝加哥钢铁技术研究会金质奖章一枚。按：周氏服务钢铁界10余年，战前首先创制钢质飞机炸弹获得成功，战后对后方合金及合金钢之制炼颇多改进。

△　美国发生所谓《美亚杂志》间谍案。是晚，美联邦调局以违反间谍活动法，捕逮刚从中国返国的谢伟思、《美亚杂志》社的菲利普·贾菲、凯特·路易斯·迈克尔、马克·盖恩（金斯保）及国务院中国科专员伊曼纽尔·拉森与海军中尉安德鲁·罗思六人。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的时评，认为这一事件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表明美国当权者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领袖蒋介石。

6月7日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抵华盛顿会晤杜鲁门总统，商谈关于加强对华租借供应及中美合作等问题，杜鲁门表示欢迎蒋介石访美。

△　国民政府主计处发表，民国三十四年度岁出入预算总额为3396.7亿元。

△　第七十军一部克复福建省福鼎县城，败敌残部向浙境平阳逃窜，闽东沿海已无敌踪。同日，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克复广西思乐。

△　中印油管工程完成，全长1760公里，是日开始输油，至8月中旬已输油500万加仑。

△　重庆市及外地均发现霍乱流行。据重庆传染病医院方面消息，自今日起至12日，本市收容霍乱病人百名，其中居住市区者占80％以上，表明霍乱流行地带以市区为猖獗。

△　旧金山会议决定，新的世界组织定名为“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美、苏、英、中、法五国就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取得协议。

6月8日　　国民政府任命杨森兼贵州省保安司令，原任吴鼎昌免兼职。

△　中国政府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在旧金山签订《中多友好条约附加条款》，规定两国人民入境自由。

△　财政部调整黄金价格，自是日起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价格改为每两五万元。

△　延安召开第三批南下部队欢送大会，周恩来发表讲话，说：你们要沿平汉路、粤汉路南进，把北中国与南中国连在一起，指出国民党的军队不能打走日本军队，解放人民，只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队伍才能解放中国。希望你们扩大自己，团结起来，争取胜利。

△　冀中军区八路军发起子牙河东战役，在河北省独流至献县间子牙河沿岸打击日伪军。至7月下旬，歼日伪军3600余人，收复大城、献县县城。

△　沦陷区同学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举行，天津、北平、保定、张家口以及冀东、东北等地的同学代表13人出席。会议倡导组织沦陷区同学会，通过《告沦陷区同学书》，拥护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促成联合政府的实现。

6月9日　　中共七大第十九次会议举行中央委员选举，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

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秦邦宪。

△　国民政府明令宣布《新闻记者法》，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　郭沫若、丁西林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出席该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是日，郭沫若离渝，26日抵列宁格勒，参加纪念大会。16日丁西林亦启程赴苏。

△　中央大学在重庆举行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到该校校友及在校师生3000余人。校长顾毓琇致词勖勉师生共同努力，并希望社会人士密切合作。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和杭立武，教授会、校友会及同学代表分别致词，并隆重举行张士一教授服务该校三十周年纪念仪式。

△　第三战区一部收复浙东沿海平阳。

△　美总统杜鲁门约晤宋子文告以《雅尔塔协定》，宋表示不能同意关于中国方面的条款。同时，杜鲁门并训令赫尔利将该协定告诉蒋介石。

6月10日　　中共七大第二十次会议选出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黄克诚等33名。

△　八路军渤海部队于是日晚对蒲台城及其周围据点发起攻势，经一昼夜激战将山东蒲台县克复。

△　傅作义部步、骑兵万余，向乌兰、不浪一带集中，并逐渐南移，向八路军大青山根据地压迫。是日该部前头部队千余突然偷袭东坡、福盛永等八路军防地。12日又增兵数千，分四路南犯，侵占归绥西北之二道沟、李气沟等地。13日，又进至井儿沟、大塔一线。八路

军忍无可忍始起而自卫，卒将傅军击退，守住原有阵地。

△　第一军法执监部讯办后勤部贪污案，确认后勤司令部部附黄曜购买营具，索取回扣41万元，英文秘书曾恩奎利用建筑工程，索取回扣140万元，梁霖盗卖军用品借端勒索财物，判处三犯死刑，于是日执行枪决。

△　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军司令官会议，确定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对中、苏采取持久战，同时挫败进犯沿海重要地区的美军，以策应本土决战；并确定对美战备先以华中三角地带为重点，次为山东半岛，但应极力查明美军之登陆地区和企图，以便适时集中兵力粉碎之，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要确保南京、北平、武汉周围重要地区。

6月上旬　　日军在黑龙江富拉尔基部队演习场，发射“赤筒”毒弹30发，致使附近10名群众受到伤害。

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修正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并议决关于六全大会及一中全会决议与交办各案之实施与处理办法。

△　蒋介石召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雅尔塔密约事，并电宋子文嘱对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

△　粮食部长徐堪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粮政，称1944年度征粮，最后定案数额为谷麦6524万市石，截至上月底止，据各省表报到部者，实收5500余万市石，约占总额84％强；并称1944年度全国军粮需要量约占全部征粮定额的三分之二。

△　蒋介石之代表孔祥熙在华盛顿以宝鼎大绶勋章授予李海、金氏、麦克阿瑟元帅。

△　昆明与加尔各答间之电话线已完成，是日首次通话。此线长约1750英里，途中经过世界上最崎岖及最原始之地区，由中印劳工于1943年4月开始架设，与铺设中印公路、油管同时进行。

△　驻河北丰润日伪军500多人，为报复村民捉了一名日本兵，包围照燕洲村。日军挨家搜查毒打村民，至次日有近100人惨遭毒打，有28人被杀害。

6月12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反对苏联租借旅顺、大连及外蒙古独立。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部队收复河北省威县。

△　中、美、英、苏、法在旧金山举行五强会议，讨论联合国机构对于会员国内政所持态度问题，中方对澳国排斥亚洲人种移民入境规定，力主修订宪法草案以纠正之。

△　旧金山联合国会议通过维持和平实施办法，中国军队将为国际和平担负任务。

△　美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宣布：本年3、4两月间运到中国的租借物资共值4.5887亿，较去年运华者多15倍。租借物资中以军需品、飞机、坦克、车辆、工业品及农业品为主，运华之租借物资在美国全部租借物资中，从0.3％增至6.3％。

6月13日　　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依照六全大会之决议，中央常会已决定：一、军队中党部限8月1日以前撤销；二、各级学校中党部在国民大会召集前完成撤销工作；三、后方各省、市、县成立民选参议会。并称中常会正考虑将党部所办若干事业及机关移交给政府。

△　中美合作所直属行动单位派员秘密炸毁苏州附近之宝城煤矿第一、二两矿井及开煤机、发电机等，使矿场全部停顿，敌伪燃煤供应遭致严重之影响。

△　旧金山联合国会议通过否决权案；中国列为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6月14日　　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在华盛顿访晤美总统杜鲁门，杜鲁门告以美国迫切希望看到苏军早日向日军发动进攻，以便缩短战争，减少美军的损失。宋子文问美国如何理解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某些行文的确切含义，杜鲁门含糊其辞地声明：他“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并说斯大林表示愿美助华复兴，苏联无领土野心，蒋介石为中国惟一领袖。

△　第二十九军于6日收复广西宜山后，日军迭次由柳州增援，与第二十九军在宜山反复争夺，鏖战至是日，第二十九军再克宜山，日军向柳州退却。同日，第三战区一部收复浙东瑞安。

△　日军900余围攻豫西雷风岈，守军暂编第六十二师第一团死守阵地，与敌激战至15时，该团第一营营长邱经纬少校及第三连全体官兵均壮烈殉职。

△　据重庆《新华日报》讯：重庆出版界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耕耘出版社、大时代书局等29家，以目前书业濒于绝境，印书成本较战前上涨4069倍，邮费上涨一万倍，而书价只上涨800至1000倍，相差太大，特发出紧急呼吁，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对各出

版家一律供应平价纸张；二、印刷价格公开评定；三、恢复印刷品寄递办法；四、设立出版业文化贷款。

△　文协昆明分会及昆明各大学共15个团体，在至公堂联合举行“诗人节”晚会，1000多人与会。徐梦龄主持并致词，论述我国大诗人屈原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姜亮夫、闻一多、尚钺、田汉、楚图南等先后演讲，以新的观点对屈原及其所开辟的道路作评价；最后进行诗歌朗诵表演。

6月15日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向蒋介石转达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方面秘密协议，促与苏联成立谅解，并强调斯大林对中国在东北主权的明确保证，和对中国门户开放原则的口头赞同。蒋介石镇静地听取这一消息，虽然觉得难以忍受莫斯科对东北港口和铁路的“优越权益”以及“租借”旅顺海军基地的强硬要求，但对苏联答应承认他在东北的主权感兴趣。

△　中国政府与哥斯达黎加政府于1944年5月5日签订之《中哥友好条约》，业经双方批准，是日在圣约瑟互换批准约本，该约互换后立即生效。

△　全国邮务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23日闭会，通过参加国际邮务工会组织、改善各级邮务员工待遇等项决议案。

△　美机轰炸日本本土一周年。期间轰炸计达77次。美航空总司令安诺德元帅警告日本，此后一年内将向其本土投弹200万吨。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队B—29轰炸机首次从成都机场起飞，直飞日本轰炸。

6月16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中共不参加本届国民参政会，因为：一、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二、此次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事前并

未与中共及其他党派协商，仍和过去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
三、国民党六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决定今年11月12日召集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这次参政会上就要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这将造成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　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孙连仲、傅作义为第六、十一、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昆明中央军校分校主持黄埔建军二十一周年纪念，并对全体官兵发表训话，略称：我国过去有陆军300个师，500余万人，现已缩为400余万人，拟再缩为360余万人。陆军总部所辖部队已裁撤二个长官部，九个集团军部，10个军部，18个师。每一部队皆缩减三分之一。凡已实行整编之部队，每一士兵每月可领副食费3600元。我国境以内尚有敌寇200万人，吾辈不能依赖盟邦坐以待胜，凡属军人均宜尽其职责。

△　重庆市军、警、宪在左营街、较场口、珊瑚坝等处举行联合大演习，特务营、宪兵第三团、宪兵第二十四团、警察局保安总队及渝市国民兵团等部队参加，以检查对敌空降部队防御作战的准备情况，并谋加强军、宪、警部队与地方团队之协同作战。

△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在重庆举行文化界座谈会，该会主任潘公展报告出版情况，称重庆出版界自1月至5月已出书籍达487种，平均月出100种，较1944年月出120种已显稍减，并称优良书刊五种获奖：给予奖金者有《德育原理》（姜琦著）奖一万元；赠奖状者有《生之原理》（陈立夫著）、《三民主义新论》（崔书琴著）、《政治学原理》（萨孟武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研究》（孟云桥著）四种。

△　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

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为此，“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平石、南雄之线”，“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的）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陪祭。毛泽东致悼词，称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一万万人的解放区，100万人民抗日军队，120多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纲领，就是这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很好，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能胜利。

△　孙科在重庆复旦大学演讲，表示中国今后的道路，必须国内团结统一，达到团结统一的道路，只有厉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从世界大局看，决不许可中国有内战。

△　周恩来电复重庆的王若飞，指出：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的错误政策。我们反对内战，同时要表示我们不怕内战。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在大后方，应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

△　旅渝台湾革命同盟会集会纪念台湾沦陷五十周年，连震东以国语、谢挣强以台语、谢南光以日语分别播讲《台湾沦陷五十周年纪念之意义》。

△　八路军渤海部队第四分区主力解放山东滨县。

△　绥远伪蒙古军第五师第四团团长金吾达阚罕率所部300余人，

向国军投降。

△　四川省威远河水闸建成，是日举行通航典礼。该项水闸系川康盐务管理局于1942年兴工，全部工程包括水闸三座、水库三处及灌渠，耗资1.2亿余元。通航后，威远河之运量可增加三倍，并便利威远煤矿及自贡食盐的运输。

△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日军分布情况统计：日本本土165万人，东北、华北及朝鲜112.5万人，华中、华南及台湾90万人，越南、缅甸、泰国及马来亚34.5万人，荷属印度支那21.5万人，琉球群岛13万人，西南太平洋10万人，中太平洋10万人，菲律宾六万人。此外，尚有在中国的伪军100万人，以及台湾、朝鲜工人队100万人。

6月18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参政员，谓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拒绝党派会议，坚持召开包办分裂之国大，已进一步造成内战危机。诸公的热心呼吁，倘能使当局觉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之民主改革，我党无不乐于商谈。并表示热烈欢迎七参政员赴延。黄炎培遂将此电内容转告雷震。

△　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修正公司法原则。副秘书长甘乃光对记者称：自不平等条约废除后，外国商人已放弃其特权，在中国经商与中国人处同等地位，加以战后中国需吸收外资，以促进经济建设，故特修改各种涉外法规。

△　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接见重庆《大公报》记者谈豫西战役，略称：敌企图减少交通线之威胁未逞，目前豫、鄂前线战争呈胶着状态。在华南战场迭复失土之时，中原战场益趋重要，如国军获得良好补给。不但可在中原战场获胜，亦可直捣白山黑水。同时对豫西民团

助战劳绩表示赞扬。

△　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发言人称，该团首席代表宋子文离美返国后，由顾维钧大使继任。20日，宋子文偕蒋梦麟返抵重庆。

△　第三战区一部攻克浙江永嘉、温州两县城。

△　墨西哥首任驻华大使易斯克兰抵渝，并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墨西哥全国人民素对中国人民表示敬仰，尤对中华民族八年抗战之精神表示钦佩。

△　重庆《大公报》特派记者萧乾在伦敦采访从纳粹俘虏营中获得解放的中国海员。他们称，在纳粹俘虏营中一共拘禁225名中国海员，其中有30人以上被纳粹杀害，一人因拘致疯，另有数人失踪。他们在拘禁期间口粮只是黑面包，面包成分有一半是面粉，有一半是锯末；并受尽威胁利诱，但他们宁死不事敌伪。

6月19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　国民政府令，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定本年7月7日召开。

△　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授勋典礼，孔祥熙代表蒋介石以云麾勋章授与乔治中将、威尔逊少将等人，以表彰其在中印缅战区空中运输及空军训练方面的功绩。

△　重庆市召开扩大防疫会议，决定通力合作扑灭病菌。本年霍乱之可疑病例，系在2月下旬发生于滇省顺宁，后陕西、四川均有发现。6月3日重庆白市驿有真性霍乱发生，嗣新桥、新开市、青木关、

重庆市区亦相继发现，其特点是霍乱较往年发生为早，流行期间亦较长。

6月20日　国民政府公布新疆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及参议员名单，议长为色益提艾买提，副议长为胡廷伟，参议员为王积章、尼牙孜等60人，候补参议员霍汉琦、哈的尔等30人。

△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谈财政，称本年度国家总预算数字较之抗战前一年约增加190倍，将来为应付反攻军事需要，实际开支恐将超出预算甚多；并称过去七八月间，因出售黄金及办理法币折合黄金存款，所收回之法币已达700余亿元，储蓄方面亦有200余亿元之数。

△　解放区妇女联合筹备会在延安正式成立，选出以蔡畅为主任，邓颖超、白茜为副主任，区梦觉为秘书长的1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　长江上游引水人员待遇争议，经仲裁委员依法裁决，各段引水待遇略有提加，并自本年3月、4月两月份改发特别津贴1.8万元，5月份起改为2.2万元。后又经社会部、交通部等主管机关调解，劳资双方意见已获协议，于24日复航。

△　北部湾之围洲岛日军中之台胞13人，向我投诚。次日，又有12人向我投诚。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及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在华人员之间有意见的分歧进行辟谣，称美国在华之外交及军事代表现正努力工作，和谐无间，且将继续不变。

6月21日　国民政府授予在滇西、缅北建功部队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荣誉第一师、第五十四军之第一九八师、第一〇三师及驻印军新一军之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新六军之新二十

二师、新十四师、新五十师等11个单位以荣誉旗。

△　第二方面军一部收复桂省桂平。

△　豫鄂慰劳团赴汉中行营慰劳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由团长刘文岛代表向李氏献旗。李宗仁致词，称："敌人屡战屡胜，我则屡败屡战。相信最后一击，总可把敌人打退。"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社论，略称：根据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应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条件之下，并且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扩大发展资本主义，对各阶层人民都是有利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想要求得发展，除了这条路线之外，再也没有其他道路。

△　素称中国米市的芜湖，由于敌人掠夺粮食，发生10万饥民抢米。是日上午，饥民迫于生计，高呼："买不到就抢！"一呼百应，全市男女老幼十万余人群起参加，从米行到米船，从食米到杂粮，连抢两日一晚，直到22日下午经敌伪严重镇压，始暂告平息。

△　战时生产局新任美籍顾问杰克逊和助理顾问鲍煦由美抵渝，原美籍顾问卡内和助理顾问勃鲁克斯22日返美。

△　美军占领大琉球群岛。此役双方伤亡之惨重为太平洋战争中所仅见：美军伤亡4.9万人；损失飞机763架，战舰被击沉36艘，伤369艘。日军伤亡11万人，被俘7800人；损失飞机7830架，战舰被击沉16艘。

6月22日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二分区部队收复山西高平。

△　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机在衡阳以北炸毁日军卡车40余辆，又在衡阳东北炸毁日军卡车30余辆。

△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电告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筹备会，决定派遣董必武、陈郁、邓发、章汉夫四人前往参加将于今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大会。同日，邓发以同样内容电告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希望多加赞助。

△　印度加尔各答侨胞团举行联席会议后宣布，为纪念七七抗战八周年，决定向中国政府献机15架。

6月23日　第二方面军一部收复广西平南。同日，第三战区一部克复浙江乐清。

△　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顾翊群在中国财政学会讲演黄金问题，称：目前物价上涨标准已超过法币发行总值之标准，全国流通通货总值在1943年底为战前20％，至1944年底为战前18％，至今年2月底止为战前6％。以目前情形推测，至年底通货价值将贬至15％至13％，物价继续上涨将无法抑制。如能实行金本位，规定法币之黄金价值，通货稳定、物价问题自然解决。

△　据中央社报道日军的新罪行一则：湘西武冈一县被日军焚店铺1800余间，房屋3700余栋，死伤人民4300余名，被掳未回者6000余名，公私谷米被焚18.7万石，杂粮六万石，耕牛被杀8000头，妇女被辱2800余人。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迅速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社论，指出：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从敌人手中收复86万平方里的国土，解放近一万万的人民，建立19个敌后解放区。应迅速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抗日的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

△　中国留学生600人抵达华盛顿，各生将在农、工两学科学习，

其中攻农者约150人。留学生费用由《租借法案》款项支付。

6月24日　　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高等科、语文科学生共292人毕业，是日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致训词，称：中国必须于此次战后20年中，遵照三民主义之原则，致力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之建设，使之具备现代化国家之基础，乃能求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

△　财政部宣布明日起暂停受理法币折合黄金储蓄存款。

△　重庆文艺界举行茶会祝贺名作家茅盾50寿辰，沈钧儒主持，柳亚子、邵力子、张道藩、常任侠、马寅初、王若飞等五六百人与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致信祝贺，成都、昆明等地文艺界人士亦纷电致贺。茅盾在会上说：看到许多中国优秀的儿女牺牲了，看到许多年轻人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了许多许多的事，在中国胜利在望时，我要活下去，不看见民主的中国，我死也不瞑目。成都、昆明两地文艺界人士亦集会表示庆贺。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及王若飞的文章《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贺茅盾寿辰。

△　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致函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重申中美友谊，称美人愿对中国保持深厚恒久友谊，愿与中国合作以达共同愿望。

△　《大美晚报》（重庆版）停刊，在告别读者辞中批评中国新闻检查制度。按：该报是15年前旅居上海的美国人创办，原来只有英文版，后来增加中文版。1942年曾被迫停刊；1943年在纽约刊行美国版，改为周刊，同时也开始刊行英文重庆版。

△　成都发现真性霍乱，后不断蔓延到遂宁、叙永、大竹、广安等31个县，并发现“干霍乱”，到7月21日止，经查明死亡者有257人。

6月25日　行政院长宋子文、副院长翁文灏宣誓就职。

△　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行政院秘书长，原任张厉生免职。

△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昆明举行的滇西作战有功将领颁奖典礼上，代表政府授予卫立煌一等宝鼎勋章、萧毅肃与何绍周青天白日勋章、邵百昌与傅克军三等云麾勋章。

△　八路军冀中部队收复河北献县。冀鲁豫军区一部收复河北枣强县。

△　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飞抵西安访问，受到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胡宗南等欢迎。28日，魏德迈在西安记者招待会上称：过去两周曾访问中国西北部与华北，对中美两军之合作精神与一切进步，至感愉快。美军在华无领土愿望，所希望者，即协助中国击败日本与怀有尊重中国之心理而凯旋返国。

△　旧金山会议举行第九次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章程》，此外并通过《建立联合国筹备委员会》之文件。最后通过之《宪章》包括一序言及19章，111条，计一万余字，明确规定联合国组织和各会员国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以及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有效办法。

△　旧金山会议我国代表团代表顾维钧、王宠惠、张君劢、李璜、董必武在旧金山对《中央日报》记者谈话，对大会成就一致表示欣慰，认为系合作、互谅、民主之结晶。次日，我国代表胡霖、吴贻芳、魏道明亦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赞旧金山会议。

△　杜鲁门总统按照各国英文字母次序依次接见出席会议之50国代表，我国代表排列在第五位。

6月26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谈宋子文赴苏商订中苏条约事；并宣示我国对于此事之严正立场。

△　国民政府任命吴奇伟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原任薛岳免职；任命孙连仲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原任马法五免职；任命周览为武汉大学校长，原任王星拱免职。

△　参政员褚辅成、冷遹、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黄炎培在重庆中央研究院会商，对团结问题议定三点意见：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并决定将此项意见致函蒋介石，俟蒋同意后即偕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商谈。

△　《联合国宪章》签字典礼于午间在旧金山退伍军人大厦举行。在《宪章》上签字的总共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首先签字的为中国代表。下午，在旧金山歌剧院举行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闭幕式。首由四邀请国代表与法国代表发言，接着使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与阿拉伯语的各国代表先后以本国语言演说，然后杜鲁门总统致词，表示："你们方才签字的《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基础，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建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行政院会议通过拨给广西省5000万元，福建省2500万元，浙江省1000万元，作各该省办理收复区紧急救济之用；拨给山西省2000万元，作救济灾荒之用。

△　第三战区一部收复浙东黄岩。29日，续克临海。

△　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部发表1944年7月1日至1945年6月底的战绩：一年中在豫西、豫北、汾南、晋西南及白晋路两侧地区共发动10次大规模的攻势战役，解放国土四万多平方公里，使太行解放区连成一片，并控制黄河沿岸210里，与河南军区衔接。

△　英国定是日举行第三届"中国国旗日"，以扩大援华运动，广募捐款救济中国难民。前年第一届，去年第二届，售出3000万枚中国国旗章。自1942年以来，截至最近止，英国对华捐款已逾150万镑。

6月27日　参政员褚辅成、王云五、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由邵力子、王世杰陪同晋谒蒋介石。蒋介石对七参政员热心奔走团结颇表赞许，并愿迅即恢复商谈，争取抗战胜利。

△　签署《联合国宪章》的50个国家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由澳洲、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法国、伊朗、墨西哥、荷兰、苏联、英国、美国、南斯拉夫14个国家组成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在伦敦。

△　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部次长胡世泽及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自重庆赴莫斯科，商订中苏条约问题。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亦同机飞赴莫斯科。

△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六分区部队收复河北故城。

△　北部湾涠洲岛居民在乡绅廖毕执率领下，将岛上日军歼灭，光复该岛。

△　我国留法学生秦国献在法研究改良小麦成绩卓著，法国农业部特赠金牌奖章。

6月28日　蒋介石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外国记者并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抗战在军事方面之最终目标，系欲使日本全面溃败而向盟方作无条件投降；对于盟军与中国之合作情形甚表满意；对旧金山会议的成就表示欣慰。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到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重庆特警班检阅并讲话，表示在日本被打垮后，美国将帮助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为了修明内政，美国愿帮助国民党统一政令和建立法制与警察制度。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告以褚辅成、傅斯年、左舜生等将于7月1日赴延安协商。王若飞重提过去四项

建议。

△　中英商会在伦敦成立，泰佛亚任董事长，李德燏副之。其发起人告中央社记者：中英商会之首要目标，乃建立双方联系，俾获得关于中国建设计划之正确报告，最后目的在使中英两国之出口贸易得以增进。

6月29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及《省参议员选举条例》，均定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

△　前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孔庆宗在重庆星期五聚餐会谈今日之西藏，称西藏全区面积较四川大两倍，人口约150万人，其中贵族约170余家。全体人民皆信奉佛教，以达赖为政治、宗教之主持者。全藏耕地约占面积十分之一，金、煤、铁等矿皆有发现。出口以羊毛为最大宗，该地之对外贸易常保持出超。

△　据重庆《中央日报》讯：据美国政府记录，1942年共分配租借物资50亿美元，我国所得计值6921.8189万美元，列第八位。自租借物资第一年开始至今年3月1日止，全数已达400亿美元。

6月30日　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当晚晤斯大林，商谈中苏条约问题。

△　柳州克复。第二十九军在第四十六军协力下向柳州日军发动攻击，于28日以两个师分沿柳江两岸向柳州突进。29日，第二十九军之第一六九师一部突入柳州南城及机场，此时潜伏市区部队亦乘机发动，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至是日零时，日军沿柳桂公路撤退，我军遂克复柳州南城。同时，第二十九军之预备第十一师等部队，亦先后突入柳州北城，战至是日23时，北城亦完全为我军克复。

△　华中新四军一部解放浙东上虞。

△　八路军太行军区集中五个军分区共九个团兵力组成三个支

队，在三万民兵和自卫队的配合下，于平汉铁路西侧发起安阳战役。至7月9日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虏日伪军25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3万，并进一步逼近平汉铁路及安阳敌军据点。

△　中国劳工福利协会在重庆成立，选举马超俊、孙越崎等31人为理事。

△　西宁水力发电引水工程自去年4月开工兴建，已全部完成。该工程系以长约四公里、深达三米之渠道，引湟水北川之水，提高水位30余米，功率达600马力，发电420万瓩。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陕西灾荒严重：截至6月中旬为止，陕西各县向陕西省政府报灾者已达50多县，约占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统治县份的十分之七，受灾县份包括第一行政区（榆林一带）全部，关中差不多全部及陕南一部，受灾种类共有旱、风、虫、霜、寒、水、雹七种之多。夏季的麦子、豌豆、油菜籽大部干死。棉花则大部分未下种。秋季作物或尚未下种或已下种，因干旱异常，势必减产。

△　军委会办公厅少校副官孙德祥等人，乘中航机贩运鸦片，为航检所及海关察觉，经军委会军法总监部分别讯问明确，判处孙德祥等三名死刑，于是日枪决。

△　前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贪污舞弊案，是日重庆实验法院开庭宣判：高秉坊处死刑，姚遐龄处有期徒刑15年。

△　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矿山800名被抓去强制劳动的中国劳工，在耿谆领导下举行暴动，杀死四名日本监工和一名通敌分子，据守矿山附近的山地。日本警官队开赴矿区镇压，大部工人被捕，受到严刑拷打被折磨而死者多达418人。

△　日本自1936年起大规模向中国东北迁移所谓“开拓民”，至是

月底业已移来24万人，其中日人16万，余为朝鲜人。

是月　　河北定县、定兴、徐水日军500余人将易县北七、石相二村包围，将地道两口堵住，向地道内放火、放毒，毒死群众70余人。

7月

7月1日　　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为促成国共恢复商谈，以私人资格由王若飞陪同从渝飞延商谈国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前往机场欢迎。

△　延安《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发表社论，指出："过去的二十四年，给了中国人民以最艰苦的锻炼。中国人民在这种锻炼之中，完成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深结合起来的过程。"社论号召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一齐团结起来，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彻底解放中国人民而奋斗。

△　蒋介石在西安听取胡宗南报告第一战区现况。同日，蒋介石令赣州行辕改称为委员长东南行辕。

△　邵力子应中苏文协之请，假重庆抗建堂讲《中苏邦交问题》，略称：中苏壤地相接，过去友好之外交关系有悠久历史，以目前世界形势论，中苏邦交必趋日益亲密。

△　据重庆中央社讯：自德方夺获之文件表明，中国在牵制日本方面贡献极多。自战争初期起，日本即已向德国苦诉人力不足，并自称大部分是由于对付华军需要大批军队之故。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浙江天台。

△　八路军晋察冀部队攻克河北崇礼。

△　晋察冀军区发表综合战报：本区八路军和地方部队今年4月开始主动出击，扩大解放区，不断取得胜利。冀晋区：南线的井陉、建屏地区已连成一片，北线阳高至东集井间，日伪军已完全肃清。冀察区：解放国土3.4万平方里、人口52万余人。冀东区：连续击退五万敌伪的“扫荡”。冀中区：光复县城九座，恢复到1939年大“扫荡”以前的局面。

△　新四军第四师于5月21日发起的宿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伪第十五师两个团大部及一个团一部，计2100余人。这一胜利使新四军巩固涡河以北的阵地，并开辟宿南新区，津浦铁路以西八个县，至此连成一片。

△　赣南星子县伪军第六师第十七团800余人反正来归，到达宁都附近等待改编。

△　杜鲁门总统就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工作概况向国会提出书面报告称：“供应接济中国之计划，或将为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一俟军事情况许可，即将执行之最大单一之善后救济计划。”“中国政府估计将运入约1000万吨之供应品，以供救济善后之用，仅此即值价约25亿美元。”

7月2日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颁发反攻广州计划，其方针为“以打通广州海口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并牵制越北之日军，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

△　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到杨家岭毛泽东住所拜访毛泽东，在座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盛大晚会，欢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席，李富春主持晚会。周恩来致欢迎词称，中共中央的愿望也就是全解放区人民

的愿望，是树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希望六位先生把这个愿望带回给大后方各阶层的人民去。黄炎培讲话说，在延安看不到荒废的土地、游手好闲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是进步的、踏实的。

△　冀鲁豫军区发表公报称，在抗战第八年冀鲁豫八路军对日伪军作战1200多次，组织10个较大的攻势战役，收复大名等县城10座，解放国土五万余平方公里、同胞500多万人。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赣南信丰。

△　青海省自1930年发动军民植树，至今已成活2000株。其栽植之区域大部为黄河、湟水及大通河两岸地区。

7月3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到招待所，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商谈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问题。

△　国民政府军委会因各省绥靖公署等机关与各省保安司令部或行营业务重复，决定裁撤川陕边区绥靖公署、滇黔绥靖公署、广西绥靖公署、广东绥靖公署、太原绥靖公署、豫省警备司令部，并限月底结束竣事。

△　第一五六师收复广西龙州、凭祥。

△　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宋子文，苏方高级官员、陆海空军高级将领、艺术家、作家，以及各盟国使节、记者等500人与会。

7月4日　　蒋介石特电杜鲁门祝贺美国国庆；国民外交协会及中美文化协会等团体亦致电杜鲁门祝贺。重庆美使馆举行招待会，国民政府官员及各国使节应邀参加。重庆市广播电台播送特别节目，各影剧院放映有纪念意义的中美两国影片表示祝贺。

△　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在延期间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三次正式商谈，至是日商谈结果达成五点共识：一、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建议：（一）政治会议应由国、共、民（盟）三方各自推出同等数目的代表加上无党派代表组成。（二）政治会议的性质，应该是公开的、平等的、自由的、一致的，有决定权的。（三）政治会议应讨论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制订民主施政纲领及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等。（四）政治会议前释放政治犯。（五）政治会议前，应由国、共、民（盟）三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中共提出的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由粮食部长徐堪报告粮政，略谓：1945年度全国各省、市征实、征借总额核定为6474万担，另随赋代征县级公粮1000余万担。按：1944年度征实、征借已实收5490余万担，占总额86％。

△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称：德国虽然被击溃了，但东方的日寇还在作最后挣扎。目前中国的任务是废除党治，实行民主，加强国内团结一致，配合盟军登陆实行反攻。

△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在重庆成立。竺可桢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涂长望为总干事，成员有任鸿隽、丁西林、严济慈等100位科学工作者。

△　郭沫若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报告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丁西林参观苏联物理问题研究所，对于苏联注重发展科学备加赞誉。

△　中美合作所成立两周年，戴笠、梅斯乐在福建建阳基地主持阅兵典礼，以资祝贺。

△　八路军冀中部队光复河北大城。

△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会见宋子文、胡世泽。

△　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敌伪毒化华北情况，内称：现在全华北经营伪禁烟局准许设的土膏店共1395家，售吸所共1308家，伪组织所征的毒品税额占全年度预算20％弱。

7月5日　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问题。据黄炎培7月5日日记记载："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褚辅成、黄炎培等七参政员离延返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至机场欢送。褚、黄等返渝后对记者称：本届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不拟出席。"日来数度商讨之结果，前途颇为乐观，一切尚有进一步解决之希望"。

△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波兰民族统一政府。

△　参政会秘书处邀集参政员在军委会礼堂举行谈话会，166名参政员出席。首由秘书长邵力子报告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较晚之原因，系因各省选举未能如期竣事；并说明议事规则第17条业经修正，各参政员提案原须20人连署，现已改为五人。嗣依历次大会惯例，推定参政员张伯苓为开会式临时主席，参政员周炳琳为开会式致词代表，并推定张难先、黄宇人、彭革陈、许孝炎、傅斯年、萧一山六人与周炳琳共商致词内容。

△　中央训练团译员训练班举行第三期毕业典礼，蒋介石主持并致训词，魏德迈亦被邀出席。该期毕业学员计217名，将飞昆明受短期武装训练后开始实地工作。

△　全国邮务总工会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理事长王宜声报告全国邮务近况。据该会统计，全国现有邮局、所共计1867局所，邮务员工2.0586万人。目前邮政最大困难，一为交通问题，各线共有汽车不过3700辆，零件器材奇缺，正准备从美国进口3000辆汽车，以便恢复包裹寄递；其次为员工生活问题，高级邮务人员每月收入不过二万元，最低者仅六七千元，并无任何公粮及津贴，生活极不易维持。

△　驻墨西哥大使陈介向墨西哥总统呈递国书，并面呈蒋介石赠墨总统之特种大绶卿云勋章。

△　第三战区一部克复浙西浦江。

△　前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经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于是日执行枪决。

7月6日　　蒋介石电宋子文，苏联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割据”，不鼓励新疆叛乱，中国愿于抗日胜利后，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案，否则相机中止交涉。

△　延安总部发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抗战第八周年

（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主要战绩统计：作战3.0342万次，日军毙伤6.0849万名、俘虏782名、投诚104名，伪军毙伤10.0418万名、俘虏13.2667万名、反正4.0455万名，缴获长短枪14.6364万支、机枪2572挺，攻克县城50座，解放国土8.7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380万。我军负伤3.7759万名，阵亡1.431万名。

△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支部举行大会欢迎民盟主席张澜暨由延安回来的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会上张澜大声疾呼：要将国内不民主的现象澄清，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主团结。黄、左两人延安之行的结论是“印象很好，美不胜收”。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太行一年来民主建设的总结》，略称：一年来太行区的民主建设，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与巩固，已获得显著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选举成立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政府工作人员开展自我批评，发扬了民主精神。

△　张嘉璈在巴黎约见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乔维尔。据告：“法国在中国之租界，拟照英美办法，另订条约，与英美采取同一步骤。广州湾拟照英国交与威海卫办法退还中国。滇越铁路拟修改行政管理方式，惟保留法国权益。至海防铁路，力图予中国以便利。总之，安南当力图予中国以出海通路便利。”

△　第三十七军第九十师克复赣南大庾、新城。

7月7日　　上午9时，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开会式与抗战八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合并举行，出席参政员220人暨政府首长，各国使节，各界来宾及中外新闻记者，合计约800余人。首由临时主席张伯苓致开会词，略称抗战八年来赖政府领导与军民用命，卒能克服困难局面，今后应努力加强团结，实现民主。继由蒋介石致训词，阐述国际形势、对日战争及政府实施宪政之决心，并希望各参政

员对于有关国民大会各问题，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主张。最后由周炳琳代表参政员致答词，旋即礼成。10时许，接开预备会议，选举张伯苓、王世杰、吴贻芳、莫德惠、李璜、江庸、王云五七人为第四届主席团主席。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首由本会驻会委员会作会务报告，接着军政部长陈诚作军事报告，最后参政员对军事问题提出书面及口头询问。

△　蒋介石于抗战第八周年纪念日向全国军民发布广播演说，指出必须容忍谅解，团结奋斗，贯彻外求独立、内求统一的基本国策，迎接胜利。

△　美总统杜鲁门、英首相丘吉尔在抗战八周年纪念日，特电蒋介石致敬。蒋介石亦分电答谢。

△　军政部长陈诚发表告将士书，略称：今日之整军实为当前的急务，确定四项中心工作：一、充实反攻主力；二、改善官兵生活；三、调整军事机构；四、安置编余人员。并承认去年中原战事之失利，以至桂柳溃败，都与军队纪律不良有关，强调军队要恪守军纪，保持军人固有荣誉。

△　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谈：溯自1937年7月7日至今，在我国各战场共计毙伤敌及俘敌达250余万人，我阵亡官兵130余万人，负伤170余万人。

△　第二十九军第一六九师克雒容。次日，第一六九师又克中渡，13克黄冕。日军退永福凭险顽抗，第二十九军以预备第一师由正面攻击，第一六九师向日军左侧背迂回，激战至26日始克永福，从此桂林南方门户开放。

△　重庆《新华日报》报道解放区兵力和战绩：主力部队约92万，民兵约220万，作战总次数约12万次，毙伤日军约51万，毙伤伪军约46万，缴获步枪约44万支，我军伤亡总数47万。

△　八路军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军区一年来战绩：解放县城14座，国土五万平方公里，村庄近万个，人口700万，毙、伤、俘敌伪4.7万人。现解放区拥有人口2000万，从雁北、察南到平北、冀中，再从冀中平原到津南海滨，在许多大块地区中，驱逐并肃清敌人。

△　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公布抗战第八周年战绩：自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共进行大小战斗4549次，光复利津、乐陵、临邑等15座县城，解放国土3.52万平方公里，人口849.807万人。

△　八路军冀绥军区司令部公布军区部队、民兵一年来战绩：攻克县城三座，歼灭敌伪万余，光复国土1.5万平方公里，村庄2000余个。

△　华中新四军克复江苏省睢宁县城，冀鲁豫八路军克复山东省单县。

△　加尔各答城侨胞集会热烈纪念“七七”八周年，并踊跃捐输，至7月13日捐款已逾10万盾，献机40余架。

△　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计22条，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国际等各个方面。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抗战八周年，指出：抗战进入第九年度时，中国人民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力量，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而斗争。只有实现这个任务，才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　国民政府宣布：全国各公路车辆自本年10月1日起一律改为靠右行驶。后延期到1946年元旦起施行。

△　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在重庆缔结《关于两国军队人员在彼此

领土内管辖权问题之协定》。

△　蒋介石会见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褚辅成等报告延安商谈结果，蒋介石允对中共方面意见加以研究考虑。

△　昆明文化界文艺沙龙举行“检讨会”，中国民主同盟昆明负责人闻一多、李公朴、潘光旦及田汉、安娥等300多人参加，一致认为：“政治不民主，一切文化都没有前途。当前的文化正在被绞杀，我们要把文化从严酷的灾难中救出来，我们要把绞杀文化的黑手击退，文化才有发展的前途。”

△　美军战报宣布：7月之第一周中击沉、击伤日舰33艘，海空封锁已使日方围困待毙。

△　法国朝野名流及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中法协会，于是日在巴黎成立，其宗旨是增进中法邦交，沟通两国文化，赫礼欧任会长，郎之万、伯希和、穆岱任副会长。

△　宋美龄致电在伦敦的克利浦夫人，对她募款援华表示感谢。

7月8日　　蒋介石核准军事委员会设置战地政务委员会。该会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处理该会事务，规定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或省府主席兼任。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经济部长兼战时生产局长翁文灏作经济及战时生产报告，财政部长俞鸿钧作财政报告。

△　邵力子请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出席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张表示他已好几年没出席参政会了，这次来渝系加强盟务。只要国民党有诚意实行民主团结，我当竭力促成。他希望国民党顾到国内外局面，不要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要在党派会议上解决一切问题。

△　孔祥熙自美返抵重庆。

△　世界基督教会定是日为中国祈祷日，渝教会人士在美国新闻处礼堂举行联合礼拜。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兼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分向蒋介石、魏德迈请辞本兼各职。

7月9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四、第五次会议，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作外交报告，教育部长朱家骅作教育报告。朱家骅宣称：半年来安置战区学生4.2万余人，选拔师生国外深造285人。

△　中央纪念周及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在重庆国府大礼堂合并举行，蒋介石任主席。叶楚伧报告，谓国民革命之进展，每因外患易加速；国民革命之成功，除军事力量外，主义思想普植人心，最关重要。因此吾人对今后主义思想之宣传与发扬，应特别共同勉励。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公祭全国抗日阵亡将士暨盟邦抗日阵亡将士，由何应钦主祭，卫立煌副总司令、麦克鲁将军等陪祭，参加者300余人。

△　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集会谈。今井询问中国方面是否接受日华两国直接进行和平谈判，并表示日本以维护国体、保全国土为绝对条件，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希望做到“不违背道义”。何柱国强调说：在《开罗宣言》发表后日华单独讲和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蒋介石主席对日本天皇制的继续存在表示善意，已向各国首脑表明了这个意向。战后，日本首先从满洲以及海外撤走全部兵力，台湾等地区必须交还。会谈进行两天，未取得结果。

△　第九战区一部收复赣南新城县城，次日又克南康。同日，第三方面军一部克复广西蒙山。

△　陕籍参政员王普涵对重庆《大公报》记者谈陕灾，略谓：陕

境自去秋以来，迄未落透雨，致今夏二麦收获平均不及二成，且因田地干涸，秋禾多未播种。据陕省府勘灾报告，灾重之区已达60余县，待赈人数约计300万人。

△　郭沫若赴斯大林格勒参观工厂、医院和战争遗迹、城市复兴工作，回莫斯科后对塔斯社记者说：斯大林格勒是英雄们的城市，中国人民应该学习斯大林格勒人从事复兴工作的英雄气概。

7月10日　　墨西哥首任驻华大使易斯兰特将军向蒋介石呈递国书，并代表墨西哥政府赠送蒋介石阿芝特克雄鹰勋章一枚。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六、第七次会议，兵役部长鹿钟麟作兵役报告，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作司法行政报告。

△　褚辅成在重庆对记者谈：只要政府电约中共商谈，延安代表即可来渝，相信最短期间可望恢复商谈。

△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评论，批驳赫尔利和蒋介石的所谓还政于民，并质问既然愿意“还政于民”，为什么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此文发表于次日延安《解放日报》。

△　新四军第四师于6月19日发起的睢宁战役胜利结束，计克睢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17处，歼敌2200余人，收复国土3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0万，直接威胁敌在苏北之战略要点徐州。同日，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收复河南虞城。

△　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黄金舞弊案，是日开庭宣判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王华等六人，分别判处三至17年有期徒刑。

7月11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八、第九次会议，内政部长张厉生作内政报告，农林部次长钱天鹤作农林报告，粮食部长徐堪作粮政报告。同日，褚辅成等六人将访问延安情况报告送交参政会主席团。

△　驻英大使顾维钧返抵伦敦，14日拜晤英外相艾登。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宣布日军在柳州之暴行与破坏，称："我军攻入柳州，但见一切建筑乃至平民房舍，均遭彻底破坏，致成一片瓦砾，伤心惨目。查此种暴行，既非敌军因军事需要加以摧毁，亦非作战时为炸弹、炮弹所损毁，实由日军残酷成性，组织烧杀队，有计划的破坏。如此惨无人道之行动，实开历史上未有之先例。"

△　八路军山东部队克复沾化县。同日，八路军冀南部队克复冠县。

△　美国当局发表斯特梅耶任中国战区美陆军航空司令部司令。

7月12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的评论，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此文于次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次会议，首由军政部长陈诚答复参政员质询，略谓：全面反攻在准备中，美军亦将全面参加。继由社会部长谷正纲作社会报告。

△　印缅战区中国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在华盛顿对美国战时情报局谈战局，略谓：日本于一年内必将投降；中国兵士士气十分强劲，并能耐苦，诸公当知余之士卒于缅甸一隅曾与日军周旋一年有半，此实为作战历史中之伟大纪录。

△　中国解放区记者联合会筹委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范长江、艾思奇、曹若茗、向仲华、穆欣、胡绩伟、陈克寒等人为筹委会常委，派柳湜、范长江、艾思奇、陈克寒、胡绩伟参加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

7月13日　国民参政会各组审查委员会分别开会审查各项提案，

政府各有关部、会长官均列席以供咨询。此次大会各参政员所提询问案凡580件，其中军事61件，经济及战时生产56件，财政79件，外交46件，教育56件，兵役37件，司法行政28件，交通68件，内政58件，农林18件，粮食41件，社会37件。项数之多，为历次大会之冠。15、16两日继续进行审查。

△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委员会在延安正式成立。各方筹备参加工作的代表129人，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等25人为常务委员。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使命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帮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

△　山西省参政员潘连茹对记者谈晋西北蝗灾严重：晋西北20县因蝗害小麦颗粒未收，百万人民之生机陷于绝境，拟向政府请求除减免本年赋额外，并速设法自川省购粮运往救济。

△　伊克昭盟盟长兼绥蒙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逝世。23日，蒋介石拨100万元为沙克都尔札布治丧。

7月14日　中苏双方就宋子文访苏之行发表公报，称：斯大林、莫洛托夫与宋子文于过去数日中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之主旨在改进中苏关系，因而有关双方权益之重要问题均曾讨论。会谈中，斯大林坚持要求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则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双方未达成协议。因斯大林将赴柏林开会，宋子文暂返重庆，不久将再继续商谈。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一、第十二次会议，开始讨论提案。一为《国民大会问题案》，参政员江一平等74人曾于第六次会议临时动议：国民大会应否即时召集，或须缓期召集，以及其代表人选与组织方法，应如何规定方臻完善，须指定日期在大会先行讨论，决定方案，经决议通过，因此本次会议特就此案进行一般性讨论。关于本问

题之提案凡24件，除由各原提案人作补充说明外，其他各参政员发表意见者甚众。经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大会问题审查委员会，以参政员邵从恩等30人为委员，由主席团召集之，审查关于本问题各提案，最后提出审查报告交付大会表决。二为政府提出的《三十五年度国家施政方针草案》，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代表政府作说明，会议决定将该草案交付由各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组成的特种审查委员会审查。

△　蒋介石致电戴高乐庆贺法国国庆日，法大使馆举行酒会招待各界人士。

△　内政部通告：福建省新设周宁县、四川省新设旺苍县。

△　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辞职获准，将于第十四航空队改组后返国。陈氏在昆明发表谈话，盛赞中国艰苦抗战，并颂扬魏德迈将军之成就。

7月15日　蒋介石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邀宴全体参政员，参政会主席团张伯苓、王世杰、莫德惠、江庸、王云五，以及参政员孔庚、达浦生、褚辅成、冷遹、傅斯年、黄炎培、左舜生等200余人出席，各院、部首长于右任、翁文灏、吴铁城、蒋梦麟等作陪。蒋介石致词，对参政会备致称许与期望，略谓："参政会成立以来，对国家贡献甚大"；"今日吾人最切要之任务，愿为不顾一切困难，实施宪政，制颁宪法，使全国有共同之轨道可循，而后吾人抗战之胜利，始能造成人民真正之幸福。"

△　国民党中央决定，宣传部改隶行政院，所有新闻、图书等审查机关隶辖该部，以收事权统一之效。

△　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成立，李德全为理事会主席，史良、罗叔章、刘清扬等26人为理事会成员。该会先后在昆明、成都、重庆、桂林、南京、上海、北平、港九等地建立分会。

△　胡宗南将河南前线、韩城与朝邑河防线及西安、华阴等地驻军九个师兵力，开至陕甘宁边区南线附近的同官、耀县、三原、淳化等处，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

△　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由莫斯科飞返重庆。次日，宋子文晋谒蒋介石，报告对苏交涉经过。

7月16日　蒋介石分别召见李宗黄及杜聿明，商谈改组云南省府政治、军事诸军宜。

△　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克复广西荔浦。同日，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湖南益阳城。

△　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攻克河北赞皇。

△　云南省临时参议会二届四次大会召开，省主席龙云出席致词。略谓：人民痛苦要由人民自己解除，各参议员今后应更积极协助地方政府，提高民众知识，加强民众组织。大会通过议案55件，于30日闭会。

7月17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于德国柏林近郊之波茨坦举行会议，研究处理德国和解决欧洲以及起草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问题。是日下午5时召开第一次会议，美总统杜鲁门被邀为会议主席，初步交换意见，并决定组织外长会议，以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

△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通过日本天皇裕仁为战争罪犯案。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赣南赣州。

△　行政院会议决定，拨六亿元救济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省蝗、旱灾，并减免受灾地区田赋。

△　盟机数架袭击敌占城市济南，并轰炸津浦路上万德车站，其中一架被敌击伤，被迫降落万德车站西九里之胡家崖山沟，当经我方民兵赶往将机上美籍驾驶员安大卫营救出险。次日，安大卫到达解放区，并发表书面谈话感谢八路军的救命之恩。

△　美机200架空袭上海，猛烈轰炸江湾日军机场。

△　昆明文化界、音乐界人士千余人，在南屏大戏院举行纪念民族歌手聂耳逝世十周年大会。

7月18日　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发表谈话称：国民党负责当局应即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如错认时机固执成议，则此后纠纷益增，演成分裂将难以邀国人之谅解。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并通过《教育决议案》。

△　国民政府特派保君健为庆贺秘鲁国新总统就职典礼大使。

△　第三战区一部收复浙江永嘉。

△　斯特梅耶在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美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并兼魏德迈将军的空军顾问。

△　伪满洲国划分南满、北满、东满、兴安和锦热等五个战区，准备在最恶劣情况下，施行“自战自治”体制，进行最后挣扎。

7月19日　蒋介石会见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告知在外蒙问题上我已牺牲重大，在东三省及大连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我将坚持立场。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六、第十七次会议，继续讨论各组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对国民大会问题引起激烈争辩。最后通过请政府确

定国民大会召集日期、妥定代表产生办法、实施宪法以及国大召集前继续求取统一团结等内容的决议。

△ 桂境第二方面军一部克复良丰。

7月20日 蒋介石向华盛顿发电报，请转波茨坦交杜鲁门总统，电报阐明他过去及今后仍将在与莫斯科谈判中所坚持的立场。这一立场是：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明确保证“停止对中共和叛乱集团进行任何道义和物资援助”，作为交换条件，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直至战争结束，那时将举行公民投票。同时还准备：一、同意苏联海军舰队有权与中国海军舰队一起利用旅顺作为基地；二、同意把大连变为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的开放港口；三、同意把对满洲铁路的管理权转交给中苏联营公司。蒋在电报中请求杜鲁门在苏联政府面前支持这一立场，“使斯大林确信上述立场是有根据的”。同日，蒋介石致函斯大林称：“您坚持要中国承认外蒙独立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将是我的政府成员所最不希望的事。”并强调说：“为达到中国在行政和军事上的统一，必须让苏维埃俄国不给中国共产党人任何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任何给予中国的援助都应当预先规定只是给国民政府。”还请求苏联政府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来镇压新疆的叛乱分子”，请求在东北完全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的统一”的原则。23日，杜鲁门电复蒋介石称：美国政府建议履行《雅尔塔协定》，“但我不请求您作出超过这一协定范围的任何让步”，并建议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同苏联政府达成完全的谅解”。

△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行政院长宋子文出席报告，其要点为：一、依个人之观察，日本至迟必于明春以前投降；二、各机关应提出复员实施方案，由行政院作成整个计划；三、美、英、苏、加等国均能协助我国进行战后建设；四、经济问题为目前最大的困难，政府除继续运用黄金政策控制金融外，并将大量输入布匹与其他必需物资，故此后经济上已无危机；五、政府将继续调整机构。会议选举林虎等31名参政员为第四届驻会委员。下午，举行第十九次会

议，继续讨论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通过对军事报告和《三十五年度国家施政方针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结束后，举行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闭幕式，莫德惠参政员致闭幕词。

△　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攻克山东堂邑。

7月21日　国民政府为酬庸前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对华之贡献，明令给予特种大绶云麾勋章。

△　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突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发起攻击。23日，又以预备第三师加入进攻。八路军7月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国民党军队继续以六个师三个团的兵力集结在边区边境的官庄、梁庄、龙高、早胜、彬县、耀县、小丘、黄陵、洛川一线，企图再次扩大进犯。

△　四川省温江县郑石均以重庆马鞍山约值5000万元之产业，捐助私立华西大学为奖学基金，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　日本政府电令驻苏大使佐藤往告苏联政府，表示日皇求和诚意，然电文为苏联人故意稽延，至25日始送日使馆，而斯大林早已前往波茨坦参加三国会议去了。

7月22日　新华社记者发表题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指出：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决不会改变这一形势；惟有三个条件可以制止内战：一、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三、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斗争。

△　毛泽东电重庆中共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刘少文，指出内

战危险空前严重，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望用最大的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的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

△　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开会研究救灾及兵变事，通过决议：一、富平、邠县、陇县等11县亢旱成灾，负担繁重，请予减免粮赋，以苏民困；二、凤翔、同官等四县遭受雹灾，请予救济；三、淳化县梁于乔部哗变，请政府迅予解决。

7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要准备他们大打大闹。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会议决定：集结八个团的兵力，由张宗逊、王世泰指挥，打击进入关中的国民党顽军；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由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国民党调动大军进犯八路军关中分区一事，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请予以制止。

△　中共中央致电徐冰、张明，告以在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调集九个师的军队进攻边区；并指示向大后方人民、民主人士及各国使节、新闻界说明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呼吁共同起来制止。同时，电令王炳南、龚澎在记者会议上进行揭露，《新华日报》加强宣传和戒备。

△　第一三三师连日来均向百寿城垣猛攻，22日拂晓一部终于突入城内，日军据守家屋顽抗，并由城外实施逆袭，迄傍晚突入城内部队又被迫撤出，激战终夜始将日军击退，至是日7时将广西百寿（今属永福县）完全收复。同日，第七战区一部攻占粤北南雄。

△　八路军滨海区部队克复鲁南郯城。

△　阎锡山与日军达成“汾阳协议”，规定山西日军防务初步交给阎锡山军队接管，日军调出一部分兵力“剿共”。同时，阎锡山负责保护日本在山西财产。此后，阎锡山军队陆续开进敌占区之离石、中阳、孝义、汾阳等地接防，并以两师部队换穿伪军服装，在同蒲路上与日军一起驻防。

△　国民政府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其保卫衡阳血战之功。

7月24日　第一五六师第四六六团协同地方团队再攻凭祥，日军续向镇南关撤退，我军跟踪追击，于是日克复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将日军驱出国境之外。

△　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告淳化军事冲突经过，内称：驻防淳化的保安队叛乱，已抽调暂编第五十九师两团驰援，于21日收复淳化县等地。

△　各民主党派人士在重庆集会纪念邹韬奋、杜重远逝世一周年，号召民主力量团结起来。民盟主席张澜表示：人民的民主团结，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分化动摇的。

7月25日　国民政府特任俞鸿钧兼中央银行总裁，原任孔祥熙免职；宋子文兼领四联总处副主席，原任孔祥熙免职。

△　行政院决议：一、裁撤赈济委员会，其主管业务移归各有关机关；二、中央气象局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改隶教育部；三、敌产处理委员会改隶内政部；四、政务电讯管理处改隶交通部；五、通过《修正国产烟酒税条例》；六、通过《甘肃省肃北设治局组织规程》；七、通过福建省拓洋特种区改设为拓荣县。

△　中共驻渝负责人徐冰至参政会访秘书长邵力子，谓：“陕北边区中共军队与中央军队发生冲突事件，希望各回原地。”次日，邵力

子答复徐冰称：中央军事当局声明只要中共军队退回原防，决可无事；并称：政府深盼续商统一团结。

△　第九十一师攻克广西阳朔。

△　八路军冀中部队克复冀中交河。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在柏林发表。《公告》促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必须归还中国。苏联对日本宣战后，也于8月8日在公告上签字。

△　预十一师及第一六九师攻占广西罗锦。

△　冀鲁豫八路军攻克山东阳谷，解散寿张、莘县、阳谷三个伪县府，并克复馆陶。

△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说明淳化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并主张组织公正社会调查团体前往考察真相。

△　据重庆《益世报》报道：甘肃旱灾严重，被灾县份40余县，占全省县份五分之三强，被灾人民已达400余万，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二。小麦价格由每市石3000元上下飞涨至一万元左右。有些县份连沟渠也被晒涸，饮水无法解决。饥民无衣无食，妻离子散，树皮草根已成盘中的上餐。

△　郭沫若应邀至莫斯科东方语文大学作《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次日，全苏对外文化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盛会招待郭若沫。

7月27日　毛泽东致电徐冰、刘少文，说21日至今七天侵入边区的胡宗南部，战线长达百余里，我们决将入侵的胡军打出去。

△　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攻克广西义宁。

△　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克复河北广宗。

△　我国驻纽约总领事于焌吉在总领事馆招待美国联合援华救济会和其他援华团体，对美国人民援华表示感谢，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胡霖、董必武等出席。按：联合援华会是积极从事援华工作的美国民间团体之一，从1941年以来为中国募款几达400万美元。

7月28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一、确保人民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居住之充分自由；二、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三、彻底取消一切特务及类似特务之法令与机构；四、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之权利。

△　桂林克复。第三方面军于6月30日克复柳州后，即以第二十九军及第二十七集团军分三路向桂林并进，同时更以第四方面军攻击宝庆、衡阳，策应桂林方面之作战。迄27日15时，第二十七集团军之第二十军一部从五里街由桂林南门突入市区，日军凭家屋顽强抵抗；同时第二十九军之部队亦由南门继续进入市区，经激烈巷战后日军不支，逐渐向北撤退。入夜，第二十七集团军之第九十四军两师均突入桂林，混战终夜，至是日晨，桂林近郊残余之日军始完全肃清，桂林遂告克复。

△　新任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抵沅陵，新省府即日开始办公。

△　日本铃木首相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不予理睬”，并表示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

7月29日　第二方面军一部克复粤南阳江。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福斯特及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恢复美国共产党。

7月30日　行政院改组。国民政府特任张厉生为内政部长，王世杰为外交部长，陈诚为军政部长，俞鸿钧为财政部长，翁文灏为经济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俞飞鹏为交通部长，谷正纲为社会部长兼农林部长，徐堪为粮食部长，谢冠生为司法行政部长，鹿钟麟为兵役部长，原任张厉生、宋子文、陈诚、俞鸿钧、翁文灏、朱家骅、俞飞鹏、谷正纲、盛世才、徐堪、谢冠生、鹿钟麟免职。

△　蒋介石以中国政府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章授与陈纳德，以酬谢其在华八年作战之成果及对中国空军训练之努力。

△　财政部制订《黄金购户献金办法》，规定依购存额捐40%，一两以内者免予捐献，是日公布施行。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南次郎的幻想》社论，指出：日本前陆相南次郎幻想中、英、美三国终因生命物资牺牲过巨而自动停止对日作战的日子，是永远不会来的。并强调指出：在这一次战争中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者，是日本的敌方而不是日本自己。日本的敌方现将以日益增加的军事力量促日本的毁灭。

△　毛泽东就美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一事，致电徐冰、刘少文，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够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同

日，又致电徐冰、刘少文，告以胡宗南军进占爷台山情况，“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

7月31日　蒋介石、宋子文在重庆与魏德迈会谈，就美国援华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即由美国帮助国民党军占领华北各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国民党军队能够控制之前，扼守战略要地。

△　旅菲侨胞蔡及时、吴九如、施教锯、李逢耀、杨耀杉等18人忠于祖国，领导侨民戮力御侮，菲岛陷敌后被捕，矢志不屈，为国牺牲，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驻英大使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以特种云麾勋章授予前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孔士德少将。

△　台湾革命同盟会假重庆广东酒家举行茶会，招待留渝参政员暨新闻界。李万居致词，对政府收复台湾之决心，以及今后建设台湾之积极准备表示欣慰。继由近自台湾来归之青年林鸿鸣、吴思汉二人报告台湾近况，略称：台湾虽沦陷50年，但台胞仍心向祖国。自抗战以来，台胞对祖国之热爱已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　重庆经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及前出售黄金期货各行、局，开始发付黄金现货。中央银行牌价为每两17万元，各应兑得黄金之购户及存户均依次照章捐献，兑现秩序良好。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宜丰。

△　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克复河北巨鹿县城。

△　新疆三区民族军攻占塔城。

△　美海军部宣称日本海军已无作战能力，遭受盟军飞机空袭的日本本土已告瘫痪。

是月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温怀光到祁县和伪山西保安副司令赵瑞会面，指示赵要“掌握部队，在日军投降后听候改编为省防军”，要“确保太原和晋中各县以及孝义到太原的交通线”，为阎锡山军队回太原开通道路。

△　据社会部统计，截至是月底，全国职工福利设施机构已达3619个，计重庆168个、四川534个、陕西411个、福建242个、甘肃168个、云南133个、广西129个，其余省、市共318个。其设施种类计食堂525处、宿舍516所、医院及诊所385所、俱乐部265所、体育场202处、理发室181所、合作社180所、补习学校126所、洗补室20所、代笔处86处、保险处58处、托儿所21所，其余设施共64所。

△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于是月中旬成立，由林美南、谢育才负责，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计600多人，活动于饶平、潮安、流沙（今普宁）、惠来之间地区，并于是月底建立流沙抗日民主政权。

△　中共广东琼崖纵队在白沙县阜龙乡取得立足点后，于月初以第一、第二、第四支队的主力大队组成挺进支队，南下开辟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8月

8月1日　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到部视事。下午，对外籍记者谈我国外交政策，略谓：中国将尽其所有力量以助联合国机构早日成立，并且得到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并将继续以全力与英、美、法合作。关于对日政策，中国并不采取复仇态度，但凡为维护公道及保障安全所必需的条件，我们必须完全求其实现。

△　军政部拟定《改善官兵待遇办法》，自是日起实行，按官照原额增加1.5倍，兵照原额增加二倍之标准增加后，各级官兵每月薪

饷如次：上将五万元，中将4.5万元，少将四万元，上校3.5万元，中校三万元，少校2.5万元：上尉二万元，中尉1.5万元，少尉1.25万元，准尉一万元。上士3600元，中士3000元，下士2400元；上等兵1200元，一等兵1050元，二等兵900元。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对记者谈党部退出学校事，略谓：中央组织部已通令各校直属党部即日起停止党务活动并开始办理结束移交。所有学校员生将分别归并各校所在地之地方党部管辖，其一切活动当由各级党部负责，学校不再负责。

△　行政院核准甘肃省设肃北治局。

△　湖南省政府主席吴奇伟召集在沅陵的省县级机关团体人员讲话，提出本年施政中心工作六项：一、加强动员人力物力，配合军事，策应反攻；二、努力实现新县制，推进地方自治，特别注意各级民意机关之建立，树立民主政治基础；三、增加工业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四、努力办好各级教育；五、扩大防疫运动，赈济灾民；六、准备复员工作。

△　第二方面军一部克复广东廉江。

△　据重庆《大公报》报道：湖南澧县、临澧、石门、慈利一带，旱灾严重。自5月20日及6月18日微雨后，截至7月10日止，亢旱未雨，泽枯田裂，加以蝗虫为灾，秋收无望，灾情之重为几十年来所未有。刻米价飞涨，百物昂贵，穷苦民众食树皮菜根者大有人在。

△　美国第十航空队自缅甸调到中国作战。

△　美国陆军中印空运大队于24小时内将5327吨供应品飞越驼峰运到中国，创中印空运新纪录。按：驼峰运输初期运输量每月仅1200吨。

8月2日　　昨晚10时40分，波茨坦会议举行第十三次即最后一次

会议，审定并签署《柏林会议议定书》（又称《波茨坦协定》），至今日凌晨3时会议正式闭幕。并于次日在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及柏林同时发表《波茨坦会议公报》。

△　陪都各界举行慰送陈纳德将军大会，由参政员张伯苓任主席，数万民众与会。

△　第三方面军一部克复广西灵川城；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上高城；第四方面军收复湘西新宁。

△　希腊彼得新王抵达重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　杜鲁门在结束波茨坦会议回国途中下令对日本两城市作原子弹爆炸。

8月3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发表谈话，介绍民盟成立经过和基本政治主张，表示：一、反对国共两党打内战；二、坚决反对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并提出对当前时局的五项主张：第一，允许人民有一切自由权利；第二，允许各党派合法存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制定临时施政纲领，筹集真正的国民大会；第四，改组政府为临时民主联合政府，筹备真正的国民大会；第五，积极对敌反攻，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

△　美杜鲁门总统、英艾德礼首相发表联合声明：集中使用盟国对日作战部队，于最早可能期内，彻底击败日本陆、海军，使之无条件投降，并解放日本之占领区。

△　魏德迈对记者谈视察前线观感，称：中国战区一切进行甚为顺利良好，战事活动均照计划实行，中美两国军队在前线上合作甚佳，自缅甸调回之军队正待令作战。

△　据路透社报道，上海2000个小工厂停闭，150万雇员失业，罢工频繁，上海已陷于饥饿边沿。

△　福开森在美国纽约病故。福氏曾在中国居留56年，任金陵大学校长及南洋工学院长达九年之久，1920至1930年间任中国政府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北平被日军拘留，1943年12月乘换侨轮离华返美。

8月4日　　蒋介石会见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说明中苏谈判在条约中务须顾到我国主权、行政之独立与完整。

△　孙科在重庆接见记者说，“淳化事件”是胡宗南保安队哗变所致，并表示解决时局的惟一方法是建立联合政府。

△　国民政府特派驻墨西哥国大使陈介为互换《中国墨西哥友好条约》批准本全权代表。

△　国民政府任命图布陞吉尔格勒及鄂齐尔呼为伊克昭盟正、副盟长等职务。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吉水。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敌伪毒化北平情况，称：北平城已成为“云雾弥漫”的毒窟，据《华北新报》公布，华北各大城市现有“官膏店”1395家，售吸所1306家，其中北平即有膏店260家，售吸所251家，但实际数目远多于此。

△　重庆《中央日报》报道本年小麦收成情况良好，略谓：小麦本年产量估计约225.79万市担。总计本年15省小麦、油菜、大麦、豌豆、蚕豆、燕麦六大冬作总产量估计约4.3208亿市担，仍比战前增加5435万市担，惟较去年4.8602亿市担减少5394万余担。

△　日军窜逃江西新余县与罗坊、水北、新桥等地，历时七天七夜，据不完全统计，杀害村民79人，刺伤70多人，强奸妇女数十人，烧毁房屋2000余间。

8月5日　　行政院长宋子文偕外交部长王世杰再度赴莫斯科，蒋经国、熊式辉及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等同行。7日抵达莫斯科，即往克里姆林宫晤斯大林及莫洛托夫，继续会谈中苏缔结同盟条约及苏联出兵进攻日本诸问题。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迁驻柳州，另于南宁设置指挥所。同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自昆明飞抵南宁检阅各部队。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孝义瑶圃村会见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垣、山西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汉奸苏体仁与梁上春等。高桥垣要求通过阎向蒋介石建议："日本单独向中国投降。"

△　第十三军一部收复广西濛江、藤县。

△　美国在东亚对日作战，以尼米兹、麦克阿瑟、史巴兹分任海、陆、空统帅。

8月6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于延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事实，指出八路军在自卫战中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枪械都标有号码印记，其中不少是美制武器。

△　第九战区一部收复江西峡江。

△　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今年又是一个灾害年。仅据各地报纸报道，受灾区域已达12省之多，灾害有旱灾、水灾、蝗灾、地陷及春荒。甘肃省有40余县受灾，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二分之一强；至于受灾人民则达全省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

△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后于是日返渝。据丁氏谈称：苏联科学成就极大，有数种研究已超过各国之研究成果。

△　美国B—29轰炸机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次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

8月7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揭露暂五十九师等部大举进攻，并侵占爷台山、野狐嘴等防地村庄40余处，杀人抢掠，人民损失甚巨，要求饬进攻部队撤返原防，并对居民损失予以赔偿。

△　八路军为反击国民党军对爷台山的进攻，以新编第四旅五个营为主攻部队，第三五八旅为助攻部队，教导第一、二旅为战役预备队，于是日奉命出发，次日展开总攻。为迅速解决战斗，第三五八旅第八团投入战斗，配合新四旅第十六团攻占爷台山，经顽强战斗，9日全歼守军，至10日战斗结束，收复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并歼灭国民党军五个连，俘连长以下百余名，缴获轻重机枪19挺。

△　第一三四、一三三师及第二十六军攻占广西兴安。同日，第七战区一部克复粤东惠来。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第三届全体大会在伦敦召开，44国代表出席，蒋廷黻代表国民政府与会。

△　日本内阁紧急会议，讨论美机8月6日在广岛投掷原子弹事。广岛共约34.3万人，全城被毁90%，死伤人口80%，震惊日本。日皇面谕外相东乡茂德："敌既已使用此种武器，战争继续更不可能。为图获得有利条件起见，不得逸失结束战争时机。"

8月8日　　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布苏联政府声明：苏联政府忠实于同盟国的义务，加入美、英、中三国要求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公告，因为日本拒不执行这项要求，所以苏联认为从8月9日起即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　国民政府派毛邦初、沈德燮为出席国际民航机构临时理事会议代表；15日改派张嘉璈为代表，沈德燮为顾问。

△　陈纳德将军由昆明起程返回美国。

8月9日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对日宣战表示佩慰，并称："余深信已陷绝境而仍顽强抵抗之日本，必因贵国压倒势力之加入，迅速完全崩溃，而东亚之永久和平必能早日奠定也。"同日，蒋介石会见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翁文灏，商讨苏联对日参战出兵我国东北后之对策。

△　国民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称：苏联对日宣战，将缩短战争时间，加强世界和平秩序之恢复；并对苏联自抗战初期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同日，军委会发言人亦发表谈话，对苏联对日宣战，表示衷心无限欢慰。

△　毛泽东、朱德致电斯大林，表示中国解放区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　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指出：由于苏联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号召"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　苏军从蒙古南部边界二连浩特到滨海地区波谢特港，在5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同时开始对日军全线进攻。西面一路已占满洲里，东北一路从伯力分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占领城市数处，东面一路亦占数城。

△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按七大讨论意见修改后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的垮台而增加。

△　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新淦。同日，陆军突击队伞兵降落衡阳，与日军作肉搏战，获致成功。

△　戴笠在浙西昌化汤家湾率忠义救国军击退来袭之日军，毙伤逾400人。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得知日本准备接受同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拟定向太原前进。同时，派赵承绶到太原与山西日本军司令官澄田徕四郎面商划分防区、防止八路军进入太原地区等问题。

△　日本“七三一”部队和关东军司令部派出工兵部队，于是日及14日先后两次将哈尔滨“七三一”部队的方型楼（楼内有特设监狱）炸毁。

8月10日　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辽宁省主席万福麟、吉林省主席邹作华及热河省主席刘多荃，指示收复东北问题。同日，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示各战区日本投降应行注意事项。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评苏联对日宣战，指出：“苏联的对日宣战，无异宣告日本侵略者的死刑，其效力将等于数十百颗的原子炸弹同时爆炸于东京。”

△　周恩来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投降，并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即进占所有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

△　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的可能，也有投降的可能。各地党委应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和民兵占领小城市。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们的委任和改编，并指定防区驻扎，否则立即消灭之。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多种方法阻止或消灭之。当我军进占城市时，应宣布纲领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并注意爱护各种资材，照顾统一战线。

△　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军区并罗荣桓、黎玉、萧华：山东军区有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的任务，但着重于徐州、济南及其他可能占领的城市。望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山东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省主席。

△　八路军冀察部队克复河北省涿鹿，冀晋区部队克复河北省平山。

△　第三方面军一部攻克湘边全县，另一部攻克粤边梧州。同日，第九战区一部克复江西清江与丰城。

△　老同盟会员程子楷在敌犯其故乡资兴时，胁诱不从，卒以身殉。前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抗战以来居贫处约，晚节弥坚，日前溘逝。是日国民政府均予明令褒扬。

△　凌晨1时，苏联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从沿海地区越过国境，开始向哈尔滨、吉林挺进，上午8时30分部队已进入我国境线内20公里地方。

△　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密电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军进入辽东半

岛，为满洲日军受降之地。

△　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瑞士和瑞典政府，托两国政府转达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同日夜，日本政府令同盟通讯社及日本广播协会，秘密对国外广播《日本乞降照会》。

△　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提抗议书，由瑞士政府转美国政府，抗议美国使用原子弹，已构成“违反人道”及破坏文明新罪恶。

△　下午7时，日本投降消息传出，重庆百万市民拥到街头欢呼跳跃，歌声、锣鼓声、鞭炮声彻夜不绝。

△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魏德迈发出命令，指示全面援助国民党部队以武力取得所有日本占领地区和日军的装备，并允许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肯定会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冲突的地区去。

8月11日　　四强接受日本投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美、英、苏、中四国，以复文致瑞士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托其转致日本政府，宣称：“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　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到蒋介石、吴敬恒、居正、于右任、孙科、叶楚伧、戴季陶、邹鲁、丁惟汾、张继、林云陔、邵力子、程潜、陈诚、陈其采、陈布雷、吴铁城、程天放、陈立夫等，讨论日本请求投降问题，通过中央对于日本请求投降之决策暨有关受降及沦陷区各问题之决议案。

△　国民政府就日本投降问题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各省、市政府：日本投降确期未经政府公告以前，全国军民工作应一如战时，

不得稍有疏懈。

△　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一、令解放区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令其嫡系部队“加紧进军”、“勿稍松懈”；三、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

△　参政员莫德惠、傅斯年、黄炎培、刘叔模、陶玄等及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职员共200余人，列队至国民政府向蒋介石致敬。蒋介石接见各参政员，并告以日本请求投降情况。同日，拉萨各界为日本投降致电蒋介石致敬。

△　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和日军第一一四师团长三浦三郎在临汾签订《妥定事项》，商定同浦沿线之守备主要由日军担任，晋绥军负责掩护铁路运输并防止八路军进驻，并便于日军物资之运输。

△　周恩来以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名义为受降事连续发出六道重要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张学思部、万毅部及李运昌部，各由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二、贺龙部、聂荣臻部各由现地向北行动；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四、中国境内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解放区抗日军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五、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与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等向东北进兵收复朝鲜；六、公布收复各城镇军事管制办法，饬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

△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王震、王首道：“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旧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　中共中央发布《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将要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胜利果实。目前应集中主

要力量迫使日伪投降，扩大解放区，占领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

△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广东区党委电，要他们“向粤北发展，和王震部会合，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琼崖及其他游击区发动人民坚持游击斗争。后因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王震部回师北上。

△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自延安发出通电，号召日本士兵投降八路军、新四军。同日，朝鲜独立同盟总盟通电，号召日军鲜籍士兵投降。

△　前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万毅、张学思通电要求国民政府释放张学良将军。

△　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军、东北义勇军在解放区代表关向应、吕正操、李延禄等致电斯大林，欢迎红军进入东北消灭日伪军。

△　日本投降消息传出后，各地物价下跌。昆明市20支棉纱由五万元跌至3.5万元，饰金每两由20万跌至17万元，百货交易尤为疲滞。西安市面各种物价狂跌，计黄金每两约跌二分之一弱，西药约跌三分之一，洋布约跌五分之二，颜料约跌二分之一，香烟约跌五分之三，惟粮食价格稍平稳。皖南及浙西各地市场物价颇有波动，黄金跌价最甚，由一两16万元跌至10万元。

△　上海全市为日本乞降休业，各报竞出号外，日军实行戒严。

8月12日　最高统帅部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　蒋介石连电宋子文、王世杰，外蒙古问题如对方不允以中国地图为根据，决裂亦所不惜。宋、王复电，请授以全权。蒋经国电

告，如坚持必破裂。

△　周恩来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表对蒋介石11日命令的评论，毛泽东修改后，于13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有直接派遣它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军事管制日本和将来出席和会的权利。

△　重庆《新华日报》载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为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表之谈话，内称："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

△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必须力争占领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的指示》，指出：华北各交通要道及沿线城市，包括太原（含）以北的同蒲路，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北宁路，正太路，道清路，白晋路，德石路，必须力争占领。平绥路西端、太原以南的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和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乡村，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城市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

△　八路军绥远部队攻占绥远陶林城。次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克绥东之兴和县。

△　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领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八个主力团和朝鲜义勇队共万余人及四个地委书记和2500多地方干部，分三路跨越长城，向东北挺进。

△　苏联军队进入察北地区，在察北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多伦、商都、察哈尔盟、张北等城镇。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致电美国务院称："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

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收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会因而不可避免”，并建议依照投降条件，日本须向国民政府投降，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交给国民政府。同时，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亦向美国参谋部发出一份内容同样的电报。

△ 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于延安发表《关于波茨坦宣言及天皇问题的声明》，表示以满腔热情拥护盟国《波茨坦宣言》；并指出天皇不能推诿战争的责任，天皇的存废问题应由战后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决定之。

△ 伪满皇帝溥仪及伪满政府高级官吏逃到吉林通化地区大栗子沟。

△ 日本陆相阿南惟畿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联名致电大本营直辖各军司令官，略谓：陆军认为敌方之回答“违犯我国体护持之真意，决定断然拒绝，坚持继续战争”，“尚盼各军断然向作战任务迈进”。

8月13日 国民政府举行中央纪念周，蒋介石发表讲话称：“吾人在抗战八年以后之今日得见敌人屈服投降，以实现吾人最后胜利之目的，实为吾全国将士与文武在职人员，尤其全国同胞忍恨茹苦，坚定不移，同忧患，共荣辱，团结一致，牺牲奋斗之结果。”“八年抗战，固属艰苦非常，然以我国土地之广，人口之多，各种社会基础之薄弱，今后一切善后与建国工作，其艰巨而繁重，尤将十倍于抗战之时。”继而对复员工作，特别是筹划恢复交通、加强运输、稳定金融各项要政作具体指示。

△ 国民政府任命周诒春为农林部长、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并决定熊斌任北平市长、张延谔任天津市长、钱大钧任上海市长、马超俊仍任南京市长。

△　蒋介石电复宋子文、王世杰，授以对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权宜处置之权；宋子文等与斯大林续作末次会谈。

△　蒋介石复函告麦克阿瑟，指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中国战区受降代表。

△　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起草给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坚决拒绝蒋介石的“驻防待命”的命令，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

△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情况和新的任务就是建立什么样国家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蒋介石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揭露美蒋反动派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以及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反革命两手。最后，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制订“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组织起人民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行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推选黎玉为政府主席。

△　陪都各界集会纪念“八一三”，军政部长陈诚对官兵播讲今后建国任务。

△　南京汪伪军最精锐的警备第三师3000余人在师长钟建魂率领下，分别在苏北之六合与苏南之句容向新四军投诚。

△　驻美大使魏道明访问美国务卿贝尔纳斯，旋谒杜鲁门总统，商讨中苏关系问题。

△　美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远东盟国最高统帅。

8月14日　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分别由王世杰、莫洛托夫代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其要旨为：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战后“共同密切友好合作”，“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苏联向中国提供道义的、军事的和其他物资援助，苏联尊重并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完全主权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苏联无意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同意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民意赞成独立则承认之。中东和南满两条铁路干线由中苏共有共管。中国同意大连为自由港，但一切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根据地，而该市民政归中国执行。条约有效期为30年。另外，斯大林在备忘录中表示，战胜日本三个月后从东北撤退全部苏军。同日，斯大林接见宋子文、王世杰，莫洛托夫在座，双方商讨有关共同利害关系之政治、经济及军事问题。

△　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电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

△　庆祝“八一四”空军节，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对日作战有功之徐焕升、赖名汤、刘立乾、廖广甲、周训典等330人。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令汪伪要员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京苏（指南京、苏州）一带治安。

△　中美合作特种部队收复厦门岛。

△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克复安徽定远。同日，八路军冀鲁豫第八分区部队克复山东东阿。

△　忠义救国军京沪路行动总队兼江阴县长包炎民阵亡。

△　自战争发生以来第一批从欧洲返国之中国留学生26名，是日搭机离巴黎返渝，内有女生一名及留法时期最长（达25年）之刘志华博士。

△　日本天皇裕仁在皇宫防空室御前会议上决定无条件投降。当夜11时，日本政府用紧急电报向瑞士政府发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通告。

8月15日　同盟国经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裕仁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宣告无条件投降，于是中、美、英、苏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同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　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指出："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要求人民"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　蒋介石分电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艾德礼、斯大林，祝贺日本无条件投降，并特派文官长吴鼎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前往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致贺。同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又令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　蒋介石发言人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共产党必须服从蒋介石给朱德总司令"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违反者即人民之公敌"。

△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以说帖一件送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请其转达美、英、苏三国政府，内称：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和抗日武装。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及将来的和会与联合国会议。说帖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不要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令其命令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分派代表至指定地点接受我军命令，所有在华日军静候我军受降。

△　国民政府立法院审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一致通过。

△　国民政府任命陈介为驻阿根廷国特命全权大使；李先良为青岛市市长，原任沈鸿烈免职。

△　国民政府派定大员马超俊、钱大钧、熊斌、张廷谔、李先良、何思源、孙连仲、阎锡山、傅作义等，分别驰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保定、太原、察、绥等地，迅速恢复地方行政与秩序，安抚人民，并办理招降事宜。

△　宋子文自莫斯科赴华盛顿。次日，王世杰等离苏返国。

△　陆军突击队司令部改编为“空军伞兵总队司令部”，由马师恭继任司令。

△　第二方面军一部收复桂省梧州。浙省宁海及绥省包头市亦克复。

△　彭毓斌率领进驻太原的第二梯队，于是日到达太原城郊小店区。17日，赵承绶奉阎锡山命令从临汾到达太原，与山西日军司令官

澄田面商，规定双方任务，由日军驻防原地抗拒八路军受降。

△　新四军第二师部队克复江苏盱眙。同日，第七师克复安徽无为县城。

△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发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提出反对召开国民大会、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会议等十项主张。

△　重庆中国妇女联谊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方面是如何巩固彻底的抗战胜利，另一方面则是怎样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去和平建国；并提出全国抗日军队共同解除日伪武装、召集紧急政治会议等七项主张。

△　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播讲胜利述感，并向美国国民表示我同胞的感谢。

△　美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向苏联投降外，在中国（包括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　日本因陆军部反对投降及阿南惟畿自杀而激起“八一五事件”，铃木内阁引咎总辞职，内定东久迩宫组阁。

8月16日　国民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菲律宾，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18日，徐永昌率领之中国代表团抵达马尼拉。

△　蒋介石电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处理受降事宜；并通令全国各行营、各行辕主任、各战区司令长官，听候何总司令指示。同日，并电令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陈公博、周佛海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以30万军队“保卫京、沪、杭三角地带”，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

△　朱德再电蒋介石，进一步揭露他准备内战的阴谋，要他收回8月11日的命令，并提出六项要求：一、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定条约时须先征得解放区之同意；二、解放区之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及同盟国规定受降；三、共产党有权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四、有权派代表接受敌人投降及处理投降后之工作；五、制止内战，共产党军队所包围之敌军由共产党军队受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之敌军由国民党军队受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指出：蒋介石发言人15日的谈话是蒋介石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并指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惟一办法，就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

△　毛泽东对蒋介石电邀赴重庆谈判事致蒋复电称：“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徐冰、张明电，指出蒋介石3月1日演说已经拒绝国共谈判，后来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目前，蒋介石正在扩大内战宣传，所以请毛泽东赴渝全系欺骗。我们“应集中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极有利于我们反对蒋之内战，望坚持此方针，以便放手动员群众，巩固和发展我们已得的胜利”。

△　第五战区一部收复河南陕县；同日第三战区一部又收复浙江嵊县。

△　新四军第二师解放安徽来安。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电令汾东赵承绶，派其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所部1.6万余人，由临汾、浮山出发，向晋冀鲁豫解放区

上党地区进攻。

△　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周镐任指挥。晚，行动总队在南京开始接收各伪军政机关，逮捕南京伪市长周学昌。

△　从是日起美国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开始空运新六军去南京，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

△　麦克阿瑟命令日本天皇、政府、大本营停止战斗行动。旋，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及关东军，分别命令各军司令官及参谋长、海军舰队、所属部队停止战斗行动。

△　联合国临时执委会首次会议在伦敦举行，美、英、中、苏等14国代表出席，顾维钧大使以中国代表资格出席。英国代表贝克赞扬中国八年抗战之贡献。

△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一、解散国民政府；二、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为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发表《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　安徽无为县襄安镇日军拒绝投降，新四军一部发起攻击后，日军竟发射毒剂弹，致使中国军民30余人中毒。

8月17日　联合国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在中国境内（东北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　蒋介石令饬五院及有关国民政府直辖单位，迅即提报派赴收复区之负责人名单；并命内政部从速完成抗战损失调查。

△　8月15日由莫斯科飞往美国的宋子文，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请示此间有传闻战后美国仍旧供给为中国装备的美国师编制30个师军火情形，重庆是否有所接洽，有否需他向美国总统提出要求之处。

△　各战区促日军停战待降，我军收复北平及粤、赣、浙、豫、晋、绥各省境内重要县份。

△　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称："今派今井副总参谋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18日乘机飞至杭州等候尊命，再继飞玉山。"后因玉山机场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

△　日本天皇裕仁派皇室为专使，分赴中国关内、中国东三省、缅甸、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监视督促各地军队执行停战命令。

△　全县克复。第三方面军收复桂林后，令一部沿湘桂路挺进，于8月初旬到达全县附近，是日拂晓第一三三师主力发起向全县攻击，10时许攻入全县城，此时进至全县南郊之预备第十一师亦随后攻入，于是广西全县克复，日军残部纷向黄沙河及东安撤退。

△　八路军冀中部队克复河北雄县。同日，山东部队克复威海卫及牟平县城。

△　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为互换《中瑞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中国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发表社论称：要实现民主，军队才能国家化；要求国民政府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束缚民意的法令。

△　驻马尼拉副领事告马尼拉美新闻处称：开战之时此间有4000名华侨被日军杀害，其中领馆职员八人或九人。据某银行界领袖说，过去三年半期间，菲岛13万华侨中共有一万人被日军杀害。

△　前陆军营长杨作云、连长崔振民于接收新兵时沿途任意凌虐新兵，计自4月26日至7月3日，沿途虐死多名，经军法总监部研讯明确，依法判处死刑，是日执行枪决。

△　英驻华大使薛穆于本月11日离渝赴印，原拟返国述职，抵印后突改变计划，于是日自印飞返重庆。

△　日本东久迩宫内阁成立，东久迩宫任首相兼陆相，重光葵任外相兼东亚相，近卫文麿任国务相。

△　国际民航组织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我国代表张嘉璈出席。

8月18日　　蒋介石明令何应钦，规定中国陆军总司令之12项任务。同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分为15个受降区，同时下达《各战区受降主官、指挥部队、接收地区以及日军投降部队番号的电令》，任命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刘峙、孙蔚如、余汉谋、薛岳、李品仙、傅作义、孙连仲、李延年分别为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和第一、二、三、五、六、七、九、十、十二、十一战区及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部受降官。

△　中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分别由吴国桢、戴立堂代表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中法两国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该专约规定将广州湾租借地完全交还中国，签字后立即生效。

△　蒋介石派蒋伯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上海代表，何其巩为驻北平代表。

△　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对记者称：工业复员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即派员前往各地接收敌伪工厂。重工业分东北、华北、长江三区。对民用工业复员，视其价值及发展可能当尽力协助。

△　重庆中国教育学术团召开第四届联合年会，教育部长朱家骅

出席并致词，与会者300余人，集中讨论战后计划及教育问题，于次日结束。

△　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领所部入太原城，并即行布告安民。旋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亦到达，组设前进指挥所准备受降。

△　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克复桂北黄沙河。

△　新四军一部克复江苏如皋、泰兴、靖江、泰县四县的联络枢纽黄桥；另一部克复宿迁。

△　魏德迈在重庆美军总部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战区敌军将向中国代表投降，美决派大批运输机护送中国官员到沦陷区。

△　斯大林复电蒋介石称：日本投降“足示盟国间军事合作之密切无间”，此次胜利“实为人类前进发展之界石”，表示深信中苏友谊及合作必有裨全人类和平及繁荣。

△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表示对日军向苏联投降之事深以为憾。认为苏联是在日军投降前三天之内才进入中国东北和热河、察哈尔的。

△　联合国远东战犯调查委员会在伦敦开会，名单上所列日本战犯，均将拘往犯罪地国家的法庭审判。

△　苏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命令日本关东军停止战斗，并于20日中午前投降。

△　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冈野进在延安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阴谋，呼吁联合国人士提高警惕，主张必须彻底粉碎日寇一切军国主义势力，完全剥夺天皇的独裁权。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拟定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规定日军武器“完全彻底地”交付国民党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对于共产党方面，“需以武力自卫时，应不失时机地采取断然态度，发挥皇军的实力”。

△　伪满洲国群奸在通化大栗子沟召开所谓“重臣会议”，伪满皇帝溥仪宣读“退位诏书”。至此，伪满洲国政府垮台。

8月19日　中、美、英、苏盟国代表在马尼拉，接受日本降使副总参谋长河边虎四郎签定初步投降书，我国代表徐永昌等参与此项接受日使初步投降仪式。同日，代表中、美、英、苏之受降国盟军第一批占领军，已跳伞降落东京湾沿岸。

△　国民政府民政部电令各战区、各省政府，运用伪军维持治安，控制重要据点，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保持安定。

△　据重庆《大公报》报道：调整公务员薪津办法，业经最高当局照案复核通过，定自本月份起实行，除将生活补助费加至1.6万元外，并将薪津按底薪由现行之35倍增发至100倍。

△　八路军绥南部队克复绥远清水河县（今内蒙古自自治区清水河），山东部队解放山东胶县。同日，新四军华中部队收复江苏扬中县、安徽泗县。

△　胡宗南部第十六、第三军和第一军之第一六七旅经风陵渡北渡黄河，在阎锡山军队配合下，向晋南解放区平陆县进攻。

△　苏军空降长春、沈阳、齐齐哈尔、承德、吉林等地，并在沈阳机场逮捕准备逃亡日本的溥仪一行。

8月20日　蒋介石再电促毛泽东来渝。电称：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规定，未便因朱德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又称：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由重庆赴芷江，即在芷江成立前方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

△　王世杰自苏返渝，即谒蒋介石报告中苏缔约经过。郭沫若亦同机返抵重庆。

△　财政部为维持金融，安定市面，准银钱业以黄金为押品互相拆款，并可向中央银行转抵押。重庆市面之黄金、美钞与桐油等，其市价继续下跌。

△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同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成立，聂荣臻任书记，刘澜涛、罗瑞卿任副书记。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　新四军华中部队解放江苏六合。

△　八路军克复热河兴隆，至此热河全境解放。

△　解放区各军自朱总司令号令向敌伪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进军以来，为时10日，已攻克重要军港威海卫一座，光复县城19座，拔除重要车站与据点百余处。

△　入越中国军队抵高平，另路向河内、谅山推进。

△　国军收复河南新乡、商水、襄城、漯河，湖北蕲春，湖南宜章、永兴，广东乐昌、新会等县。

8月21日　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收复湘南东安，同时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追击队亦收复零陵。此时日本已宣布投降，战斗遂告终止。

△　陆军总部所辖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及杜聿明先后抵芷江，何应钦是晚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今后部署问题。

△　日军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飞抵芷江，即由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召晤，并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面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之事项。今井随将带来之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地图面呈萧毅肃。据今井报告，除台湾、东北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区域外，冈村宁次所指挥之日军共计109万人。

△　国民政府颁令告诫在泰国、越南、马来亚及荷属南洋等地中国侨民，务各维持秩序，遵守法律，泯除成见，博爱为怀。

△　蒋介石接获李承晚及魏德迈电告，美、苏已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分朝鲜半岛为南、北韩。

△　外交部长王世杰分别致电驻美大使魏道明、驻英大使顾维钧、驻苏大使傅秉常，说中、美、英、苏四国已决定向中国政府及其交战国政府要求接管日本使领馆的财产案卷，并已饬令日本政府通知其驻中立国使领馆及其权益代管国。希即与驻在国政府及英、苏使节保持联络。

△　国军收复江西南昌，湖南零陵，山西曲沃、侯马、介休、长治、屯留、猗氏，河南上蔡、鲁山等地。

△　瑞士经济考察团沈德勒等五人到渝，中国工业界暨政府主管机关与之商洽如何协助我国铝之开发问题，尤其贵州省铝之生产问

题。按我国铝之储量占世界第一位，在工业建设计划中占极重要地位。

△　联合国战罪委员会决定成立远东战罪委员会，负责讨论惩处日本战争罪犯的程序和方法，委员会直接由与远东战争有关国家的代表联合组成，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当选为主席。

△　美总统杜鲁门宣布终止《租借法案》。

△　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正式向苏军投降，苏军将日军59.4万人悉数俘走。

8月22日　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电麦克阿瑟，授予英军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权限。

△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渝商谈团结大计。同日，毛泽东特此电告蒋介石。在此前后，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来电：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国际形势联合发出指示，将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　国民政府令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辞职，派吴有训继任。

△　蒋介石电示何应钦，受降签字地点决定改在南京。另电又告，今井武夫在芷江继续接受我所致中字第二、三、四号备忘录。何应钦于本月18日被指派为代表中国战区盟军统帅，负责处理在中国战区内的全部敌军投降事宜。

△　蒋介石命军政部长陈诚向魏德迈将军提出整军计划，希望美国支援武器装备等。

△　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告在中国建设海军之事，望美派考察团来华研究。

△　国民政府同意由美发起邀约中、美、英、法等国组织处理对日问题十强咨询委员会。

△　宋子文在华盛顿晤美对外经济处处长克罗莱，商谈租借物资及商借20亿美元问题。

△　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就收复区工矿事业之处理问题发表声明，谓收复各区工矿事业，已由中央规定办法，分区设立特派员办事处监督接收。

△　苏军空运部队在大连和旅顺港降落，至此东北全部为苏军占领。

△　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依兰长胜屯，屠杀村民110多人。

8月23日　　蒋介石三电促毛泽东来渝，电称："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美、苏都不愿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因中苏条约的限制不能公开支持共产党，美也不便公开支持蒋介石。蒋因兵力分散，不能马上发动内战。经过讨论，将周恩来草拟的《目前紧急要求》修改为《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决定今后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会议认为毛泽东应去重庆谈判，时机可由政治局、书记处定，毛泽东出去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并增选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还决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经过研究，决定派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

△　国民政府特向沦陷区民众申令：一、各伪组织负责人员，在中央接收部队尚未到达以前，应以全力维持地方治安，切实保护人民，为最后惟一自赎之机会；如有勾结盗匪，或残杀人民，以逞私欲者，罪加一等。二、沦陷区同胞应力持镇静，切勿采取报复行动，敌人及汉奸一切暴行，将来当依合法之手续处置。

△　何应钦在芷江中国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召见今井武夫，令其转告冈村宁次对已发的备忘录切实照办，并于26日至30日期间准备好迎接空运回南京的中国部队。今井一行旋即飞回南京复命。

△　八路军收复张家口；并宣布恢复察哈尔省建制，省会设于宣化。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均设于张家口市。

△　苏大使彼得罗夫返抵重庆。

△　上海爆发群众性斗争，工厂区五万工人将敌营工厂占领，阻止敌军抢运厂中物资。上海近郊农民亦奋起响应，建立自卫队，收缴敌伪武装。

△　八路军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七团第三连一部在副营长薛暮荣带领下在汾阳城西北角挖地道，准备突入城内，日军拒不投降并向地道内连续施放毒剂，致使67名八路军战士殉国。

△　盟军总部公布中、美、英、苏、澳、荷、法等盟国受降签字代表名单。

8月24日　国民政府隆重举行《联合国宪章批准书》签署典礼，蒋介石亲莅签署批准书，王世杰副署。

△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作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持国际和平》的致词，略谓：“我们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乃有三事：第一、首先要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第二、要恢复我们台湾和澎湖的

失土；第三、要恢复高丽的独立自主。”同时指出香港问题，“我们中国亦必循两国外交及条约的途径，以期解决此最后东方的一个问题”。

△　毛泽东复电蒋介石称：“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　胡适自纽约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以耐心毅力，和平发展，前途无量，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函蒋介石，提出抢占地盘和利用伪军阻止八路军收复日军占领区的建议。

△　李品仙部进驻南京对岸之浦口，先头部队并已渡江进入下关。

△　八路军胶东部队解放烟台。

△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内指示，要求彻底破坏所有铁路，将铁轨和可能夺获的机器以及其他器材尽量运回根据地。

△　毛泽东指示华中新四军，应尽量占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创造纵横数百里广大根据地；迅速占领运河、串场河沿线各城市，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　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刘万春率所部向八路军进攻，并攻占萨拉齐（今划归土默特旗和包头市）。

△　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就中茶舞弊案作出宣判：一、刘孔贵、丁文浩共同对于主管之事务直接图利，处有期徒刑七年。二、李泰初在逃，候获案另结。

△　重庆《大公报》发表《澳门应归中国》之社论，请政府向葡萄牙政府索还失土。

△　韩国金九要求我承认其临时政府，蒋介石允拨助三亿元济急。

8月25日　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分别批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并于27日全文公布。

△　蒋介石复电宋子文，同意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第一期应定五年。又另电嘱向美海军部提议赠舰只，并协商战后海军助华的整个法案。

△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自马尼拉电呈蒋介石，报告代表团将赴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上参加日本投降典礼。9月2日为签定日本投降书之期。

△　中国陆军总部发布《各部队分向各地受降地区重要城市挺进的命令》，并制定大规模军队调运计划。此计划是运用海、空以及内河和铁路运输力量，在美国海军第七、第十三舰队以及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将远在内地之四川、云南、滇缅边境的26个中央军（其中13个美械军计39个美械师）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执行受降任务。

△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罗卓英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青年军概况，略谓：知识青年报名应征的有12万人，至本年4月底止实际报到入营的有8.6万人，现在确数为7.6万人，编成九个师，此外尚有一个师亦将编成。

△　全国工业协会总会暨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假重庆江苏同乡会召开联合临时会员大会，商讨复员及解决工业上之困难问题。到各会员400余人，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应邀莅会指示。大会通过下

列议案：一、请政府拨100亿元救济各工厂；二、请政府宣布经济政策与后方工厂免税之优待；三、请政府收购成品及后方旧机器。

△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并决定在谈判中作出一定让步。

△　刘伯承、邓小平奉中共中央指示，从延安乘飞机返回太行指挥上党战役。

△　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就重庆谈判事致电毛泽东。当日，毛泽东复电魏德迈，电称：“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　据重庆《中央日报》报道：魏德迈宣称美国运输机将被用以运输国民党军队，飞往蒋介石所指定之中国战区内之任何地点。中国现有20个师军队配备租借武器，尚有19个师配备50％至75％之租借武器，上述部队将调往北方。

△　汉奸陈公博、莫国康、林柏生、何炳贤、陈君慧、李励庄、周隆庠在日军顾问小川哲雄大尉率领下，秘密飞往日本九州山阴县米子。

8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

谈判的通知》，将毛泽东将应蒋介石电邀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事通告全党，说明党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要求全党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　中共中央军委向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下达关于晋冀鲁豫的军事部署：太行应集结主力，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区，消灭顽伪，逼敌投降。太岳应集结主力向同蒲路进击，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造成迟滞与打击胡宗南北进之有利条件。冀鲁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控制黄河铁桥，必要时破坏桥梁，保持桥基。晋察冀军区赵尔陆部主力应进占正太路榆次、娘子关段，夺取阳泉兵工厂。晋绥军区应协助聂荣臻所部夺取大同，保卫张家口。

△　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等自日本投降至是日，从敌伪手中解放大小城市59座和广大农村。华北收复了威海卫、烟台、益都、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城镇。至此，已有城镇175座。

△　重庆市百货粮价相继跌落。是日开盘、收市黄金均8.8万元。美钞价竟日盘旋于1200至1300元之间。桐油批发价虽再跌至每百市斤三万元，然零售价每市斤仍为600至700元。菜油零售价每市斤500元。百货零售价近日已开始跌落；粮价亦跌，尤以杂粮价格跌落甚巨。

△　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刘万春率所部抢占归绥（今呼和浩特）。28日，傅作义及第十二战区司令部进驻归绥。

△　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协助台、澎与越南（北纬16度以内）的日军投降。并派冯衍少将为东南亚日军投降的受降代表，参加当日投降谈判会议。

△　日军东宁支队和虎头国境守备队接到停止战斗、解除武装的

命令。至此，东北全境日军停止战斗行动。

△　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致电朝鲜国内外各党派、团体领袖，呼吁团结一致，共同准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朝鲜共和国。

8月27日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偕同蒋介石代表张治中，为迎接毛泽东赴重庆乘专机离渝。离渝时，赫尔利发表声明称："余现将赴延安，曾获得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到达延安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至机场欢迎。

△　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为互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照会、协定、议定书与记录、批准书全权代表。

△　国民党中央任命吴国桢为宣传部长，原任王世杰免职。

△　蒋介石召见英军代表魏亚特及英使薛穆；我国接收香港之坚定立场，获致英方认同。蒋介石认为："英国强欲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其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无已。"又谓："英国对余委派英军官接收香港敌军投降之指定，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　冷欣副参谋长率100多名官兵，自芷江飞抵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南京前进指挥所。

△　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与美国海军部长佛雷斯特尔、海军上将金开德商谈中美海军合作及商谈派遣海军考察团来华和继续供给军火等问题。

△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飞赴越南受降。定于9月初在河内举行签字典礼。

△　行政院核准宁夏省增设银川市。

△　是日为教师节，教育部公布全国优良教师名单，计专科以上学校1000余人，中等学校400余人，均分别发给奖状、奖金。同日，重庆举行教师节纪念大会，并在孔庙祭孔。

△　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研究员王永焱，在武都县龙家沟上部第三纪地层中发现原始石器一枚，推定此一石器为古原始人削皮割肉所用之工具。

△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为反击国民党军对上党地区的进攻，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军区主力进行上党战役。

△　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晤斯大林，请其发表一尊重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之声明；斯大林允诺，并谓东北尚无中共游击部队，望国民政府不久即派军至东北接管。

8月28日　　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周恩来、王若飞等同机飞渝。到机场欢迎的有蒋介石代表周至柔及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遹、郭沫若和中外记者数十人。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晚上，蒋介石在林园设宴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并邀请赫尔利、魏德迈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周至柔等作陪。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新时期的路标》的社论，指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等各项主张，是当前最迫切的行动纲领，它

的意义是提出行将到来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和平、民主、团结。

△　朱德在延安对即将开赴东北工作的干部发表讲话说，国民党不要和平，要消灭我们，但事实上行不通。我们是要民主、团结、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派五万军队，万把干部去，去争取3000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

△　中国纺织同业公会联合会在重庆成立，束云章为理事长，李升伯、荣尔仁、杜月笙、苏汰余为常务理事。

△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率同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到南京前进指挥所拜会冷欣主任。冷欣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颁发之第六至第十三号备忘录八份面交冈村，并说："本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的命令，来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在何总司令没有到京以前，负责随时传达何总司令命令，希望贵方切实照办，并给予本人一切便利。"冈村回答："照办！"

△　中国受降代表冯衍少将在仰光参加东南亚日军洽降会议，签订初步协定。

△　美国政府送给国民政府租借舰艇八艘，是日中国接舰军官在美迈阿密正式接收赠舰，计有护航驱逐舰二艘、驱潜舰二艘、布雷扫雷舰四艘，分别命名为"太康"、"太平"、"永兴"、"永泰"、"永胜"、"永顺"、"永定"、"永宁"。

△　长江决口。长江水位激涨，为抗战以来所未有。湖北公安县东北叫湖堤附近之大堤突于是日崩溃约200米，水势甚大，其水头一股已到陆逊坡，一股已到黄金口，人民房舍、船只均被冲一空，灾情颇巨。

8月29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会谈。下午，毛、周、王与蒋介石会谈。晚间又和张治中、王世

杰、张群、邵力子作长时间的谈话。是日国共双方主要是商讨这次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及谈判的原则、方针与程序等问题。

△　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各界人士，说明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实行中共25日公布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军队，划定中共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会议商讨各项重大问题等。

△　蒋介石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规定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　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冯执正为驻墨西哥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任陈介免职。同日，又明令颁给藏南孟地庸顿喇嘛以“辅教通览”四字禅号。

△　中国陆军总部奉蒋介石之命，将原属中国方面受降的香港及九龙两地之日军投降改由英国接收，并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全权受降，另派罗卓英中将为中国代表、威廉逊上校为美国代表参加香港受降。

△　陈诚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日本投降后，我整军工作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并对整军工作提出三项要求：一、使军令、政令统一；二、使军队成为国防的武力；三、使军队在编制、装备、训练、补给等方面都臻现代化。

△　胡宗南部先遣支队进入郑州。胡部张耀明军于9月4日进驻郑州。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切实布置可能为蒋介石所占地区的合法斗

争的指示，强调：凡我不能切实占领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工作仍须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同日，又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指苏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山东干部和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热河、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

△　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负责人王震、王首道鉴于日本投降后形势根本变化，建立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是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北上。中央军委接此电后，即命令王震挥师北上，同时命令由刘转连、晏福生率领的南下第二梯队停止南征。

△　何应钦密令各战区重新印发1933年编辑的反共文件《剿匪手册》，发给排以上官佐阅读。

△　经济部公布《收复区敌国资产处理办法》及《收复区工矿事业接受整理办法》。

△　长江及嘉陵江近因上游山洪暴发，水位激增，是日上午重庆长江水位继涨至84.4呎。嘉陵江水位为海拔197米，沿江居民损失甚重，仅北碚一地受灾者达500余户，灾民万余人，估计损失在10亿元以上。

8月30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往访宋庆龄、张澜及赫尔利。毛泽东、王若飞旋在桂园会见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章伯钧及张澜、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迎宴

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吴铁城等应邀作陪。

△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　加拿大加华联谊会等九团体联名致电蒋介石及毛泽东：“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目前的谈判，结果能重新接近，以防止任何内战。现在最必要的，是立即取消一党专政，并尽早完成民主的联合。”

△　何应钦偕麦克鲁自芷江飞抵重庆，下机后即赴美军总部与魏德迈晤谈，旋晋谒蒋介石，报告关于接受日本投降各项部署情形并请示机宜。下午乘机飞昆明，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指示有关接受日本投降事宜。

△　国民政府特派驻墨西哥国大使冯执正为互换《中国墨西哥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派兼驻多米尼加国公使李迪俊为互换《中国多米尼加友好条约附加条款》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国民政府颁发《三十五年度国家总预算编审办法》。

△　《租借法案》停止后，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商订三年计划，获贷款20亿美元，并限以采购交通器材等为主。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抵达太原，连夜召集山西省高级官员及伪省长王骧等开会部署工作，决定由王骧向各地日伪政权、武装发布一切照常办理的密令；又委任汉奸苏体仁、梁上椿为高级顾问，冯司直、王骧为高级参议。同时，严令山西各据点日军就地待命，计划将山西日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并委任日俘坂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

△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说明“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

△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东北先遣纵队由曾克林司令员率领与苏联配合攻占山海关。该部先头部队于本月下旬业已绕道义院口、九门口出关，相继占领前所车站和绥中、兴城等镇，与苏军会师。

△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自8月21日至是日止，继续解放70座县市，控制五个重要港口，收复10余处著名矿区，切断10条大铁路及无数铁路支线，毙、伤、俘敌伪五万人。

△　拂晓，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共约九个团兵力，向襄垣发起猛攻，与守军暂三十八师第一团发生激战，迄晚城墙多处被毁，第一二九师战士由缺口处蜂拥而入，以白刃格斗进行巷战，于9月1日攻下襄垣城，俘虏县长翟大昌以下官兵多人。此战为上党战役之前哨战。

△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协进会、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本部在延安举行出发纪念大会，欢送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赴前线工作，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席并讲话。大会通过向毛泽东、朱德致敬电。

△　北平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被敌人拘于北平，直至最近始行获得自由，是日自北平飞抵昆明。

△　魏德迈对记者称："美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将以99%的力量运输中国军队至收复区。"

△　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在重庆举行欢迎郭沫若、丁西林归国茶会，由孙伏园主持。郭沫若发表谈话说，苏联这次战胜法西斯德国，当然首先归功于红军，但苏联文艺工作者在胜利的事业中也有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最后茶会决定由文协、剧协、新书业敦请中苏文协，于最近征募新书千卷转赠苏方，作为加强中苏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

△　上海《中央日报》创刊。

△　川西霪雨成灾。据官厅报告，8月上旬以后，无日不雨，累计

雨量最大的为每小时100公厘以上，川西平原沟浍皆盈，田禾没顶，灾情普遍。蓉市灾情尤重，仅中央制药厂一厂之损失即达千余万元。是日夜起，大雨如注，次日午后始停。西南一带河水倒灌，东门城墙倒塌数处，情况之严重为1917年大水灾后所仅见。

△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等抵达日本横滨。

8月31日　国民政府颁行《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综理一切；在长春设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并将东北三省重划为九省：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同日，又颁行《台湾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

△　毛泽东在重庆桂园宴请柳亚子、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聚谈国共合作问题。

△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在该会设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约请曾赴延安之六参政员黄炎培、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作陪。

△　徐冰向民主同盟方面传达毛泽东来重庆的态度，决以柔软态度与国民党商谈，纵使谈不成也不采取拂袖而去的办法。谈判中的主要问题，希望国民政府能承认现状，互不攻击和抢夺对方的占领地区。今后如何，可交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一切问题均须以民主办法解决。对民主同盟所发宣言中的十项具体主张，表示绝对同意。

△　何应钦上午在昆明召集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开会，指示各方面军接受当面日军投降及有关事项。下午，在美军总部

开中美联席会议，商订派赴北平、上海、南京等要地各部队开始航运顺序及其他重要事项。

△　宋子文由华盛顿赴渥太华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于9月2日返回华盛顿。

△　中国受降代表团团长徐永昌一行抵日本横滨。

△　贵阳《中央日报》记者储裕生、贾耀恺，《贵州日报》记者徐斌，中央社贵阳分社记者袁睽九，贵阳《大刚报》记者黄邦初五人，于军事紧急之际，冒险奔赴前线，报道敌寇暴行及难胞惨状，成绩卓殊。行政院是日授予储裕生等五人一等金质奖章，以示奖励。

△　中国第五十二、第六十、第九十一师进入越南北部，以解除日军武装及监视其撤退。

△　八路军晋绥军区调吕正操、林枫率晋察冀第三十二团及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

△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战后中国》的社论，略谓：中国的任何政治解决，若是能够发挥需要的热力以维持和平，并促进民主进步，才能被重视。在达成这一愿望中，美国应该大有可为。

△　苏联《红星报》观察家发表评论说，中国将来的发展靠国共两党民主合作，当今两党领袖在重庆开始的谈判，即是以克服旧日分歧，讨论战后中国的新任务为宗旨。

8月下旬　美国陆军上尉约翰·伯奇和一名国民党军军官带领情报小组，在徐州附近侵入解放区，为当地八路军所阻拦。伯奇不认错并辱骂八路军，被八路军处决。魏德迈向中共代表提出指责，中共代表对此进行解释，并对伯奇的死表示歉意。

是月　第十二战区部队进攻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解放区，攻

占归绥、集宁、丰镇。

△　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由刘峙任“剿共”总指挥，大举进攻豫、鄂两省解放区，四面包围李先念、王树声等部。豫、鄂解放区人民军队对进犯军予以坚决斗争。

△　至是月止，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控制县城285座。抗日武装力量获得大发展，军队达93万多人，民兵达220余万人。

△　华南抗日游击武装在广州失陷到是月将近七年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数百人发展到二万多人，建立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共在华南的重要战略支点。

9月

9月1日　　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

△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委派英军官接收香港敌军投降之指令，英国正式接受。

△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重庆成立，同时成立台湾警备司令部，陈仪任长官兼警备司令。

△　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海军处，专管海军行政、教育、建造等军政事宜。

△　新疆临时参议会成立，蒋介石致电勉以遵循三民主义之真谛，发扬民权政治之精神，同德同心，群策群力，复兴建国。

△　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会长孙科主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等苏联友人数十人与

会。党政当局官员冯玉祥、吴铁城、陈立夫、陈诚、张治中、吴鼎昌、朱家骅、吴国桢等，及社会各界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左舜生、张申府、张西曼、王昆仑、阳翰笙、宋庆龄、史良等均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也应邀出席。

△　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何思源，率领保安部队进入济南。同日，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等一行抵南京，准备接收工作。

△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时局献言》，要求实现民主、和平、团结，立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严惩工商汉奸，切实救助工商业危机，救济失业员工。

△　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克复秦皇岛。

△　《时代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由《新生活报》改名，时代出版社出版，姜椿芳负责，是为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第一份在上海出版的报纸。

△　禁烟委员会在重庆较场口公开焚毁所查获之烟土万余两。

9月2日　日本投降书签字。上午9时，盟军受降典礼在东京湾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首先由麦克阿瑟致词，接着，日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裕仁及日本政府，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先后签署投降书。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后，美国、中国、联合王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九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代表为徐永昌上将。全部典礼约30分钟即告完毕。

△　日本天皇裕仁为正式签署降书发表诏书，内称：根据《波茨坦宣言》及《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条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　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

的还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莫德惠、江庸、王云五、张群、左舜生、傅斯年、冷遹、黄炎培、邵力子、吴鼎昌、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甘乃光、吴国桢、周至柔、雷震、白崇禧、翁文灏、许孝炎等。宴毕，蒋介石同毛泽东单独会谈，双方对军队编组数目、军队驻地和解放区、政治会议、国大代表等问题阐明各自的意见。

△　何应钦遵蒋介石命令向各部队发出指示，要求以接收名义“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

△　民盟中央常委会在重庆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冷遹、张申府、章伯钧、罗隆基、鲜特生等出席作陪。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宾主并就时局问题进行亲切交谈。

△　据重庆《中央日报》报道，新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谈治台方针，表示今后台湾省之政治方针，必须遵照孙中山遗教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文化思想方面须先推行国语国文运动。

△　台湾同胞特推举林献堂等四人为代表来沪，准备转往南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大典及欢迎陈仪赴台，是日向蒋介石驻沪代表蒋伯诚致敬，并请代为与陈仪取得联络。9日，林献堂等四人赴南京拜访台湾长官公署葛敬恩秘书长，商谈台湾之政治、经济及日人居住等问题。

△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立即入城办公，尚无县政权者，成立临时县政权，在较大的城市中还须成立市政权，管理县、市的民政、治安、经济等事项。

△　美军开始空运国民党军汤恩伯部至南京、上海，每日各100架次飞机分别运输3000人，运往南京、上海。

△　华北地区军民从8月9日至本日，共解放县城32座，歼灭敌伪军二万余人。

△　据新华社讯，山西105县中已有36县为八路军完全占领，这些县是：垣曲、夏县、平陆、晋城、阳城、安泽、高平、陵川、壶关、平顺、黎城、潞城、沁源、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昔阳、兴县、方山、临县、岚县、岢岚、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左云、右玉、平鲁、山阴、文水、盂县、灵丘、阳高。

△　延安800余名干部，在绥德抗大一个大队、延安教导旅两个团的护送下出发，到晋西北与林枫干部团会合，组成1500人的干部队伍，向东北挺进。

△　越境日军代表酒井中佐等抵开远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洽降，由参谋长马锳、副参谋长尹继勋、英军代表海门接见。马锳宣读备忘录，并询问有关问题；酒井详细答复，并允转交备忘录。

9月3日　国民党中央于上午8时半在国民政府花园东向遥祭孙中山陵寝，蒋介石主祭，中央委员、国府委员暨各院、部、会长官与祭。旋于9时在礼堂举行庆祝会暨国父纪念周，蒋介石致词，宣示内政方针：减轻农工负担，实施民生主义；实施民主宪政，以法治为宪政基础；军队国家化，凡受国家编组和恪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一视同仁。12时，蒋介石戎装乘敞车检阅重庆市民。

△　外交部通知美、苏两使馆，国民政府已决定没收日方在华财产，请暂代协助保护。

△　国民政府为庆祝抗战胜利发表四道命令：一、“凡我曾经陷敌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其他后方各省，为今年军糈民食

所赖，准俟明年亦予豁免，全国兵役自本日起一律缓征一年”。二、“所有抗战以来殉职官兵，应由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限令各军务师查明籍贯与其遗族直系亲属，于本年10月10日以前详报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凡阵亡将士家属及残废官兵并各依例优待，加以平时之抚慰，予以生活之保障，明定规条，通饬施行”。三、“着由军事委员会传令全体官兵，一体优予褒奖，厚为慰劳”。四、“所有在抗战期中颁布之各种战时法令，着各主管院、部、会、署立即分别检讨，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时规范，损及人民自由者，得先申请废止”。

△　中国国民党为抗日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揭橥当前工作任务：准备实施宪政，实现民主政治；积极进行复员，从事经济建设；尊重统一，避免分裂。

△　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胜利大会，由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莫德惠任主席，吴铁城致词，嗣由荣军代表、青年代表、妇女代表讲话。大会通过向国民政府主席、盟邦领袖、抗战将士、太平洋盟军、抗战家属及收复区同胞致敬等六电。会后，四万多人游行庆祝。

△　魏德迈发表胜利日公告，向盟国英勇将士及中国人民致敬，表示“深信吾人当能，吾人并必须集中精神、物质之力量，以建立和平正义及有秩序之世界”。

△　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大使馆设酒会共祝胜利，到中外人士百余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亦应邀莅会。

△　毛泽东在重庆桂园约见王世杰，周恩来、王若飞在座。毛泽东对两党谈判的重大问题提出八项原则性意见，略谓：一、在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果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给人民以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

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府；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　下午3时，毛泽东往访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及白崇禧、吴敬恒等，5时在桂园会见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6时又在桂园会见郭沫若夫妇和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等，询问他们对时局的看法。

△　政府方面代表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与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交换意见，周恩来将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要点11项面交政府方面代表转蒋介石。其要点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1924）宣言中的三民主义。二、拥护蒋介石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至此，两党普遍交换意见阶段完毕。

△　美国国会议员史奈德等一行13人，自马尼拉飞抵重庆。晚间，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欢迎，并请政府长官及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等作陪。

△　重庆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吴藻溪、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促进中国各方面力量联合建国和中国人民的民主幸福，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并于是日成立筹备会。

△　新编骑兵第四师推进到大同。次日，第十二战区受降官孙兰峰到达大同，并准备受降事宜。

△　广州日军将海珠桥头之纺织厂内机器及物资全部炸毁，又炸毁河南岸工厂及仓库三间，工人30余名被害。同时，广州及广州湾一带日军将枪弹焚毁，并将大量物资抛沉海中。在此前后，湖南、浙江、河南、江西等省各地亦发生日军违反投降规定，擅自破坏机器，焚毁仓库，甚至烧杀掳掠情事。

9月4日　　国民政府发布对台湾布告，宣布按照《波茨坦宣言》，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华民国。“本政府即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来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陆、海、空军及警察，皆应静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轨，残害民众生命财产，并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其行政、司法各官吏，交通、金融、产业、教育各机关，在本府未派员接收以前，亦应照常奉公，不得破坏毁损，舞弊营私。如敢故违，定予惩办”。

△　国民政府发表东北各级官员任命令：一、特派熊式辉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冯庸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张嘉璈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二、任命徐箴为辽宁省政府主席，高惜冰为安东省政府主席，刘翰东为辽北省政府主席，郑道儒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关吉玉为松江省政府主席，吴瀚涛为合江省政府主席，韩俊杰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彭济群为嫩江省政府主席，吴焕章为兴安省政府主席，忱怡为大连市市长，杨绰庵为哈尔滨市市长；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同日，又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　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了解谈判情况，商讨对付办法。蒋手定“对中共谈判要点”四条，令本此四条作出对中共3日提案之复案。此四条内容为：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

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双方商定。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三、拟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　毛泽东在桂园接见来访的白崇禧。中午，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午宴，美国会访华团团长史奈德及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吴国桢作陪。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再度单独谈话。晚上，毛泽东等三人赴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举行的招待会。

△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主要就军队整编和解放区政权等实质性问题举行首次谈判。政府代表提出中共方案第九、十两条与蒋介石主张相距甚远，并要求中共放弃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此，周恩来阐释由于中共处于少数党地位，方案只是按事实解决问题，以保证中共的政治地位，促进全国政局安定。

△　蒋介石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茶会，招待各国使节及盟国将官，庆祝共同胜利。美、英、苏、法各大使及魏德迈将军等出席，戴季陶、居正、于右任、孙科、冯玉祥、叶楚伧、张继、邹鲁、吴铁城、翁文灏等政府长官作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亦应邀出席。蒋介石发表简短致词，感谢各同盟国家的联合一致的努力。

△　何应钦奉蒋介石意旨，规定各部队官员进入收复地区必须遵守之戒条10项，内容有严守军纪风纪、绝对服从命令、随时随地维持地方秩序、不得擅自逮捕人民等。

△　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张雪中、副司令郑洞国等一行40余人，分乘两架运输机自柳州飞沪，进驻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并即成立第三方面军前进指挥所，从事初步接收准备工作。次日，郑洞国又奉命到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南京分所，并兼主任，负责办理南京地区之接收准备工作。

△　美国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在运完新六军后集中到柳州，自是日开始空运第九十四军和汤恩伯总部到上海。向南京、上海、北平空运国民党军队后，美第七舰队派出军舰把国民党军队从华南运往华北，通过海上运送的国民党军队约有40万到50万人。

△　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抵达重庆。

9月5日　　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干部学校举行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党政各长官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作陪。

△　毛泽东对重庆《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之事体，然统一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继而谈到协议之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最后表示愿团结商谈早获结果。同日，毛泽东并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及其他友好人士。

△　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遹等五位参政员设晚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交谈国共两党关于商谈军事等问题的情况。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了巨大的贡献"；继而具体论述："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

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　延安各界集会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朱德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晚间，各地演剧及举行晚会庆祝胜利。

△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举行胜利庆祝会，并欢迎郭沫若访苏归来。沈钧儒致词，郭沫若谈游苏观感。

△　中国妇女联谊会发表时局宣言。宣言中指出，抗战彻底胜利的意义，是彻底消灭法西斯和保证战争胜利果实属于人民。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幸福、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绝不允许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仍然停留在分裂、落后、不团结、不民主的局面里”。中国妇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饱受夫离子散、亲人死亡的痛苦，“不愿在抗日胜利后，再有任何战祸发生”。

△　昆明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迅速根绝内战危机，国共的谈判必须公开，在人民监督下，实现团结，实施民主改革，提出召开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征粮征兵、惩办战争罪犯等主张。

△　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在芷江成立，主任由何应钦兼任，副主任由谷正纲、萧毅肃兼任，秘书长李惟果兼。下辖党团、经济、内政、交通、财政、外交六组，各组召集人以及该会成员均由行政院各部、会所派代表充任。该会为中国陆军总部幕僚性质之机构，并以“陆总”命令行之。具体负责起草“陆总”接收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收复地区日伪各项组织事业财产接收通则、日人在华私人产业处理、

日俘日侨管理、清查隐藏日伪财产及军用品、日伪仓库物资接收处理等项事宜。9月8日迁至南京正式办公，同时，各省（市）党政接收委员会也相继建立。

△　宋美龄自美国返国抵达重庆。

△　新六军廖耀湘部自芷江由美国空军运抵南京。7日入驻城内，13日接防城区，17日进驻挹江门下关。

△　第十二战区部队进攻察绥解放区，攻占兴和、尚义、武川、陶林、新堂、凉城，迫近张家口。

△　延安广播电台成立并开始播音，节目有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言论政策和建设介绍以及纪录新闻。每日播音两次。

△　美总统杜鲁门根据美军方的建议，批准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六个月的租借物资。其中包括：利用美海空军为国民政府运兵、继续运送已经贮存在印度和缅甸的准备供应中国的物资，以及将中国西部贮存的美军物资转交国民政府。

9月6日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丁惟汾、叶楚伧、陈立夫、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出席作陪。晚上，宋庆龄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

△　我国参加盟国受降代表团团长徐永昌一行回抵重庆。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指出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并称改造中国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和信心，要建立一个体现着团结、民主、和平三大目标的国家。

△　成都文化界常燕生、叶圣陶、李劼人等200余人在《华西晚报》上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六项要求：一、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政治会议；二、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信仰等人民基本权利；三、立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四、废除一切束缚和剥夺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五、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六、严惩一切汉奸，解散伪军。

△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往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访晤柳亚子，毛泽东将旧作《沁园春·雪》一词相赠。柳也和了一首。

△　王耀武第四方面军所部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进入长沙市区。

△　第三方面军第四十九军副军长杨文琼率领先头部队，于是日陆续飞抵上海，数万市民热烈欢迎。次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飞抵上海。

△　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八路军向山西省屯留围攻，与国民党军暂三十八师副师长徐其昌部发生激战，经两昼夜鏖战，攻下城郊据点工事及碉堡，8日拂晓向城垣发起攻击。12日，徐其昌率残部突出重围，八路军攻下城垣。

△　八路军冀察热辽军区李运昌、曾克林等部约一万人进入沈阳，沿途接管铁路沿线的锦州、黑山等县城。

△　中央通讯社记者在新加坡查明，日军占领三年半期间，星洲一隅约有七万华侨被拘入马来半岛之集中营受到迫害。

9月7日　　蒋介石为苏联飞机于本月3日、5日轰炸乌苏、精河事件，分别约见美、苏驻华大使，告知苏联干涉我新疆内政之事。同时，召集外交人员讨论处置方略。次日，又召见美、苏两使与魏德迈等，商防止新疆局势继续恶化的办法。

△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往访英大使薛穆、法大使贝志高。旋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出席欧德伦大使举行的招待茶会。晚上，赴冯玉祥的晚宴。

△　第二方面军广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张励一行飞抵广州。新一军孙立人部正式进驻广州市。第十战区李品仙部进入徐州及蚌埠，正式接防。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交通部长俞飞鹏报告交通复员计划，内称：在渝之机关共有212单位，公务员约3.7025万人，工役约1.2084万人，公务员眷属以每名三口计，约11.4万人。现交通部已准备45艘大小轮船，10月间并可增加五艘，此50艘船中有八艘可航行至南京，其余只可开往宜昌、汉口。如以此现有之船只计算，两月半可将公务员全部运往南京，嗣后再运眷属、必需的工厂及普通民众，明年6月以前可全部还都。

△　国民政府派定中国长春铁路拟订章程委员及议定资产委员，进行有关长春铁路的对苏交涉。

△　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由英返渝，旋召开署务会议，决定：一、一个月以内成立各地分署；二、10日以内派员赴上海成立机构，并准备接受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拨给之首期救济物资，现已有2．2万吨自美、加两国起运。

△　成都17个文化团体推举叶圣陶起草《成都十七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对重庆《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等八种杂志抗议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决定不再送稿审查的行动表示支持。9日，叶圣陶又为成都言论界起草《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的宣言。

△　晋察鲁豫军区下达关于上党战役的第一号命令，决定彻底消灭侵占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队。参加上党战役的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整编为太行纵队、太岳纵队、冀南纵队。

△　内蒙伪头目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四人，由北平经西宁抵达重庆，再度投靠国民政府。

△　麦克阿瑟元帅代表中、美、英、苏盟国进驻东京，接管日本首都。

9月8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就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进行商谈。中共代表说明，解放区乃既成之事实，只求中央承认，并非要求中央另划地区；提出华北五省由共产党负责，其他六省由共产党参加，解放区120万军队缩编为48个师。政府代表不同意以上要求。最后，张群将一份政府方面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交给中共代表，只允许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不同意使用“解放区”这一名词。

△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为感谢各国友好对解放区和中国抗战的援助，在重庆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英国援华会薛穆大使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代表及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应邀出席。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孙科招待宴会。

△　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统一主办对敌伪党政及物资接收事宜。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撤销原派在南京之前进指挥所，另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于南京中央军校旧址，由何应钦主持。

△　蒋介石接见美、苏两使赫尔利和彼得罗夫，与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等商谈防止新疆局势继续恶化。

△　顾维钧主持联合国战争罪犯委员会特别小组委员会，宣布日本战犯名单，并分送盟国批准。

△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乘专机从芷江飞抵南京，并发出布告三则：一、市民均应各安本业，严守秩序，所有宪警应尽忠职

守，照常服务，维持治安；二、废止伪政府颁布之一切法规章程，宣告所有因爱国行为而致遭逮捕者无罪并恢复自由；三、南京市所有捐税暂行豁免。

△　何应钦以第二十一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饬即将匿居日本的汉奸陈公博等逮捕，押解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究办。

△　新一军第五十师奉命进驻香港与澳门，负责守备工作。

△　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开幕，由该会理事长朱学范、书记长易礼容柬邀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按：该社筹建于1944年5月1日，建筑及设备费共2625万元，设有诊疗所、茶室、理发室、交谊室、咨询室、淋浴室等。诊疗所有内、外、五官、妇产等科，工人暨会员诊病完全免费。

△　今井武夫对中央社记者表示：蒋介石8月15日之广播谈话，“至使吾日本上下军民深深感念，吾日本人民于感念涕零之下，绝对以最忠实及诚意的态度履行投降之条款”。

9月9日　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中外代表千余人出席，何应钦主持，参加受降的有陆军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日军投降代表有冈村宁次、小林茂三郎、今井武夫、小笠源清、福田良三、泽山春树、三泽吕雄七人。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将《日军投降书》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交给冈村宁次，冈村签署降书后呈交何应钦签字。第一号命令内容为：一、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暂留原地静待命令；将所有一切武器物资等予以暂时保管，不加损坏，待命交纳。二、日本部队须保证严守纪律及秩序，不得有伤害及骚扰人民。三、联合国战俘及被拘人民必须妥慎照护，并充分供给其衣、食、住及医药等。四、日军须协助何应钦所指定之军队收复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

区及中华民国境内各日本军占领区。五、对于本命令或此后之命令所规定事项，倘有迟延或不能施行，将立刻严惩违犯者及其负责之军官。

△　蒋介石电请美军报纸转致对美军来华作战之谢忱。同日，召见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命即飞迪化，协助解救新疆危局。次日，郭寄峤飞抵迪化。

△　蒋介石复电宋子文，嘱往晤马歇尔商谈国军90个师所需军火事宜。

△　第十一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率领参谋人员由西安飞抵北平。同日，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亦派参谋长王鸿韶飞抵北平筹设行营。

△　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六十四军开始接收广州湾日军所占地区。

△　薛岳第九战区鲁道源部第五十八军进入南昌市区。

△　北平私立燕京大学重庆校友会举行聚餐会，欢迎该校校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宣布燕大复校计划，并决定10月10日在北平复校。

△　汉奸陈璧君、褚民谊在广州被捕。

△　美军在南朝鲜登陆，苏军从日本手中接管北朝鲜，是日美苏双方划定以北纬38度线为南北分界线。

9月10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举行会谈，商讨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中共代表提出，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政府方面原则上赞成，主张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基本上同意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但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代表表示，若重选有困难，就应

增加三分之一代表名额。

△　张澜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全盘”“彻底”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将国共谈判内容随时公之于众。

△　蒋介石电示宋子文关于利用前《租借法案》物资问题，同意照所陈处理意见办理。

△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白宫访晤美副国务卿艾奇逊，要求美国协助国民政府将军队从广州直接送往大连。艾奇逊答复，美国不直接参与关于接收东北的谈判，可以提供运兵舰船。

△　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指示处理日军投降事宜。冈村表示：自签订降书后，“就脱离日本政府之节制，完全听从何总司令之命令”。

△　黄金价跌落至每两五万元左右。

△　南京《中央日报》复刊。

△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共3．1万人，在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发起上党战役，消灭进入晋东南地区的阎锡山部。是日开始战役第一阶段。

△　据中央社东京电称：在日本之中国战俘现处在极端无人照顾之状态中，挣扎于饥饿线上。据中央社记者估计，在日本之中国战俘至少在二万人以上，另外还有3．7万被日军“征用”的华工在日本作苦工，待遇与奴隶并无差别。

△　苏联情报部发表1945年8月9日至9月9日远东苏军战果公报：投降日军有59．5万名以上；其中受伤的有二万名，将官148名。被击毙日军有八万名。日军全部损失（不包括日舰上被击毙的水兵）：

被俘或被击毙的官兵计共67．4万名以上。苏联远东军的损失：死亡的计829人，受伤的2264人。

9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桂园宴请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就促进国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并谈及国民党部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情况，张澜等表示愿尽力斡旋。

△　张群、邵力子、叶楚伧、张厉生与周恩来、王若飞就国民大会问题举行会谈。周恩来说：国大的任务是制宪、行宪和选举总统，国大代表不重选，中共殊难通过；提出增加三分之一代表作为补救办法，并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

△　五国外长会议在伦敦召开，中国外长王世杰、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英外相贝文、苏外长莫洛托夫、法外长皮杜尔均到会。贝文任主席，讨论国际形势，并起草对前轴心国之和约，会期定两周。会议程序与波茨坦会议大致相同，每日晨间由各国代表自行集议，下午五国外长会商。

△　国民政府任命王星拱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原任邹鲁免职；派徐会之为汉口市市长，原任吴国桢免职。

△　中南区工业协会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由该会理事长胡厥文及胡安恺等报告中南区各工厂情况，略谓：去年湘、桂、粤三省奉令迁渝之136家民营工厂，在搬徙途中损失奇重，本年春始陆续抵渝，多数厂家尚未复工，目前各厂对复员问题均茫然无计，要求政府能在复员方面予以救济，以谋继续生产。

△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所属之赵公武第五十二军已开入越南河内，是日卢汉率该司令部人员由开远乘飞机抵河内。

△　中共中央给山东军区发出紧急指示：“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

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进入东北后，要“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

△　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自8月11日至是日向敌伪大进军中取得重大战绩：一、收复大小城市156座，内有省会一座，海港与商埠五个；二、控制胶济路、津浦路、陇海路、平绥路、北宁路、德石路、平汉路、道清路中的部分路段；三、控制自山海关至杭州湾海岸线，以及黄河、长江、运河部分沿岸；四、俘虏及受降敌伪军10余万；五、缴获长短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各种口径炮200余门。

△　重庆工商界代表仇秀敷、万静安、蔡鹤年、范仲渠、潘仰山等组织“工商请愿团”，向行政院、财政部、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贷款100亿元，以黄金货物作抵押，以资救济。

△　重庆中国兴业公司设有炼铁、炼钢、轧钢、机械、窑泥等部，规模宏大，原有4000工人，近因胜利后战时生产局停止购货，生产不振，现只剩下2000多工人。是日资方宣布炼铁厂停办，致使400多工人失业。窑泥厂亦决定于月底停工，到时又将有500多工人失业。

△　新疆伊宁哈萨克乱民进至迪化西北200里，李铁军部拒之，省垣各校疏散。同日，蒋介石电嘱外长王世杰向苏外长莫洛托夫交涉。

△　麦克阿瑟发布逮捕日本战犯名单，内有东条英机等40人。同日，东条在东京寓所畏罪自杀，未遂。10月7日，美国宪兵将东条收押于大森收容所。

9月12日　　蒋介石在重庆官邸约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张

群、张厉生、邵力子作陪。餐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商谈军队缩编问题，毛泽东表示中共愿再作让步，由原提48师减至28师；蒋介石只是笼统答复说，政府对中共的困难无不为之解决。

△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就国民大会、政治会议、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及承认解放区五个问题进行商谈，双方说明各自立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九三学社发起人许德珩等，建议把九三学社建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　美国纽约华侨领袖李国钦致电毛泽东，对国共谈判表示关切，热望中国实现和平团结，建设真正民主国家。

△　何应钦令冈村宁次取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名义，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自是日起伪钞一律停用，沿用法币，并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

△　第一战区胡宗南、第十一战区孙连仲两部结合日伪军，共20万兵力沿平汉线、道清线向中共晋冀鲁豫地区发动进攻，至10月7日先后进占封丘、延津、原武、武陟、获嘉、辉县、汤阴等城。

△　山东八路军解放临沂县城，使鲁中、鲁南、海滨三区连成一片。

△　晋冀鲁豫军区八路军围攻长子，与国军第二挺进总队发生激战，相持三昼夜后，攻下各城关，遂于是日攻占长子，俘虏总队司令白映蟾以下官兵多人。次日又攻占壶关。

△　南洋日军签降，日军板垣征四郎代表日本南洋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在新加坡举行之投降典礼中签订降书，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冯

衍中将参与受降。

9月13日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于中午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下午3时，毛、周、王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毛泽东说明共产党和平民主主张，表示将为和平尽一切努力。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应接受在他们区域内的日军投降。毛泽东、周恩来并说明：目前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但仍继续与敌伪军作战，因敌伪依然攻击共产党军队。晚7时，毛泽东等三人赴考试院长戴季陶邀宴。

△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告》，指出我们与国民党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只强调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具体问题未获进展，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些时候。蒋介石表面上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招待很好，实际上在一切问题上，不放松削弱以至消灭中共的方针，并企图压迫就范。

△　蒋介石召见魏德迈，商谈战后中国军事组织，并望美国派遣实业、交通、医药专家来华协助复兴。

△　蒋介石派张治中赴新疆处理“伊宁事变”，是日张治中由渝飞抵迪化。

△　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仪式在太原举行，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代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受山冈代表、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之投降。

△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抵达杭州成立司令长官部，进行对浙江省的接收工作。

△　空运抵京之新六军奉何应钦之命，开始布防南京城郊。

△　海军司令陈绍宽抵沪后，即开始接收敌伪海军，是日接收日舰17艘，14日为37艘，15日为30艘，三日共接收84艘，均为小炮

舰。

9月14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及张申府等约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等共进午餐。餐后举行商谈，气氛极为融洽。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来访好友。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白崇禧之请出席宴会。

△　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该报记者谈目前国是问题。章呼吁全国党派共同进行和平建国，并认为解放区军队和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而汉奸伪军必须彻底解决，不可姑息，不可利用。

△　宋子文在美晋谒杜鲁门总统，商谈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杜鲁门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援助中国发展适度的武装力量，借以维持国内和平与安全，并承担中国解放区包括满洲与台湾在内的有效控制"，而且，"甚明了向东北运兵的重要性"。同时声明补充援助不得用于内战和支持不民主的政权。同一天，杜鲁门告诉宋子文，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陆军部队已接到命令，从即日起运送国军到东北港口。16日，宋子文离美飞抵伦敦，在英伦停留三四日后经法国返国。

△　中国各战区、方面军自是日起开始解除日军的武装，至次年2月13日止缴械基本结束。投降日军合计为，派遣军总司令部一个，方面军三个，军10个，师团36个，独立旅团41个，独立警备队19个，海军特别根据地及陆战队六个，总计俘虏日军128．3206万人。

△　张治中在迪化会见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征询对"伊宁事变"意见。叶谢也夫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并希望和平解决。张治中请叶谢也夫代为疏通阻塞和平解决的道路。

△　国民政府派邹秉文为中国出席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第一次大

会代表。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在南昌接受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笠源幸雄签署的投降书。

△　汤恩伯部第三方面军牟廷芳第九十四军是日起逐次接收上海市区及虹口地区之防务，并解除日军武装。至21日市区接收完毕，月底上海外围亦全部接收完毕。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张云逸、饶漱石等：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派范长江、钱俊瑞、阿英等去上海工作，要多去人，快去人。在此期间，还和夏衍谈话，派夏到上海恢复《救亡日报》。

△　朱德在延安会见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贝氏转达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行撤退，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次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略谓在热河、辽宁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

△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辽宁省沈阳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座谈东北的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10万部队和二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朱德表示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组织40万至60万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对抗。

△　湖南方面日军于是日至17日间由湘潭仙女乡、永嘉田、何家

桥向长沙撤退时，沿途奸淫掳掠，杀人烧屋。宁乡日军撤集长沙时，将军用品完全毁坏。沅江、益阳日军撤往白马寺时，掠去大批猪、牛及民用物品。豫南之南阳日军撤退时，亦焚毁军用品400余车，枪毙马80余匹，并毁枪炮弹药等甚多。此外，其他地方日军撤退时，亦不断发生违反降约规定的烧毁罪行。

△　忠义救国军浦东行动总队第三大队在浦东海面营救美海军扫雷艇，扫雷员克维斯、赛维基、叶可万葛罗、华锡比、葛歇尔、塞维生、挪维格、金斯其等八人获救登陆，送至总队部后转送上海美驻华海军基地。

9月15日　张群、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就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的推荐、军队缩编和军队驻地等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商谈。周恩来重申中共主张某几省由中共任主席，某几省由中共任副主席，并以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复80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县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为例，说明中共办法切实可行。政府代表表示，这种办法“有悖政令之统一，政府不能接受”。关于军队改编，中共方面要求中共军队缩编为28个师，政府只允许编12个师，双方分歧很大。关于军队驻地，中共代表表示，中共军队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南方各省军队将考虑予以撤出。

△　毛泽东往特园访晤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向他介绍国共谈判情形，说症结仍为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张澜以其体验说，深知政权、军队对于人民的重要性。你们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并说，国共关门谈判，应把已经谈妥的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帐。毛泽东欣然接受。晚，毛泽东在桂园设宴招待中国青年党在渝中委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常燕生等。

△　毛泽东在重庆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　首都警察厅与南京市区宪兵司令部相继成立，林锡钧为司令。

△　湖南长衡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长沙湖南科学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举行，日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代表长衡一带20余万日军签字投降，中方受降主官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签字后，王耀武即以《武字第一号训令》交坂西一良。同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杭州接受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的代表野地嘉平等投降，并于18日正式举行受降典礼。

△　中共中央决定在沈阳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由彭真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时决定罗荣桓率山东主力五万人，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全部三万余人，另由各军区抽调一部分兵力共计15万人及地方干部二万余人挺进东北，会合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等力量，消灭敌伪残余，建立各地民主政府。

△　中共中央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中央决定组织东北中央局，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立即赴东北工作，办事处暂设沈阳。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并告谈判无进展，说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　阎锡山为解救长治守军，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第八十三军、省防军等八个师共二万余人，应援上党区作战，由祁县东关镇向沁县南进，于9月26日行抵沁县，继续向关上推进。

△　中国航空公司渝汉、渝京、渝沪线是日正式开航，航机次日到京，当日转沪。京站开始登记乘客并运输货物邮件。

△　“民联”轮由重庆猫儿石启碇出发，乘客500余人，载货350吨，作抗战八年来渝宁间首次正式通航，于23日抵达南京。

9月16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红岩住地接见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三人，并设宴招待。

△　张治中晋谒蒋介石，报告解决新疆伊宁事变之途径，建议请苏联政府调解伊宁事变。

△　海军总司令部接收上海日本海军设施及江南造船厂。

△　广州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中方受降官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参谋长甘丽初及美国博文将军；日方投降代表为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参谋长富田直亮。23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命令田中久一，广州附近日军自当日起开始解除武装。

△　马寅初在重庆市商会大礼堂作题为《黄金政策所表现的经济政策》的公开演讲，指出：民主与和平是安定目前中国经济的钥匙；并谓一个民主国家一定有几个代表不同意见的政党存在，比如说，假定中国国民党代表银行、工业家和地主，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农民。如今政府的经济政策把民营银行和工业都搞垮了，可以说是自杀政策，也可以说没有政策。

△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任命书。

△　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全国内战危险虽然较大，但和平局面仍有可能。你们苏南、浙东、皖南三地区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之可能"，要求立即准备渡江北上。2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

△　晋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两个团于13日起围攻潞城，激战至是日，又增援两个团，迫国民党守军撤出潞城。

△　同盟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典礼在香港总督府举行，日军投降代表为冈田梅吉、藤田赖太郎，接受降礼者为哈考脱少将。中国代表潘华国将军参与受降，并致备忘录声明：九龙日军系向我国投降。

9月17日　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赫尔利，张群、吴国桢出席作陪。宴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及赫尔利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赫尔利提出国共双方军队以4：1的比例进行缩编。

△　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颜跃秋等，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　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国民政府参军长。

△　国民政府军委会密令发送《剿匪手册》。

△　何应钦抵上海视察日军缴械情形，并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于投降的日本，不要有报复企图，更不可对他们已投降的官兵和无辜的侨民加以侮辱，应保持我们文明大国的风度。

△　刘少奇、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河、察哈尔，除派部队去东北外，必须立即调集10万到15万部队到冀东、热河一带。江南新四军主力转到江北，调到冀东或山东，由山东调出部队去冀东、热河。

△　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与曾克林及苏军代表乘飞机离延安。当日在山海关降落，改乘火车于18日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成立。

△　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

9月18日　“九一八”第十四周年纪念，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人民广播，指出14年来国耻虽雪，教训永垂；并宣示建设东北方针：发挥

自己力量奠定建设基础，需要盟邦援助，完成建设全功。

△　国民政府特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莫德惠前往东北代为宣慰。

△　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伦敦以备忘录分致美、苏两外长，就日本应赔偿我国损失问题提出希望与建议。

△　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纪念“九一八”茶会，毛泽东、周恩来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致词称：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之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经过说，这次谈判问题很多，我们相信和平建国符合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　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重庆江苏同乡会召开“九一八”十四周年纪念大会，到东北同乡约500人，莫德惠及萧振瀛任主席。与会者提议即日登记旅渝东北同胞，要求政府无条件遣送回籍，免费运送并安排职业，当即决定组织东北义民回乡委员会，进行调查登记工作。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东北同胞致庆——纪念“九一八”十四周年》的社论，号召东北同胞组织起来，协助苏联红军彻底扫除藏匿在山林中继续杀害人民的敌军残余，彻底摧毁敌伪的一切统治机构，成立新的地方民主政府，改善人民生活，开始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生产，使东北同胞很快恢复日军长期掠夺所造成的创痕，进入繁荣富足的境地。

△　张澜分别致书蒋介石、毛泽东称：“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事之实”；商谈“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

△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在汉口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之投降。

△　重庆铁路员工400余人代表平汉、津浦、胶济、黔桂、湘桂、粤汉、京宁、北宁、江南、平绥、陇海等11路流落后方的数万员工，到交通部请愿，向政府提出救济失业、资助复员还乡等六项具体要求。

△　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回美述职，其职务由美国驻华空军司令斯特梅耶代理。

9月19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就军队缩编、军队驻地和解放区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我方“愿让至七分之一”，即“如中央军队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关于军队驻地，我方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山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八个地区的军队撤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由中共推荐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的主席，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及天津、北平、青岛三市副市长；北平行营由中央主持，并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政府代表对于中共这一重大让步方案仍不同意，坚持要中共开名单，由政府量才任用，不同意指定省份。

△　蒋介石召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指示与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进行谈判东北接收问题。

△　毛泽东在重庆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

△　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委员罗香林等，由渝飞抵广州就职。民政厅长李扬敬、财政厅长杜梅和、教育厅长姚宝猷、委员黄范一、萧次尹、黄文山、詹朝阳已于18日先抵广州。

△　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规定全党全军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在东北的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并决定派张闻天、高岗、李富春、林彪、罗荣桓赴东北工作，成立冀热辽中央局；还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和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

△　毛泽东、周恩来自重庆致电新四军，指出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越快越好。同意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及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亦以快为好。

△　四川省民政厅厅长胡次威谈：川省本年水灾严重，为逊清同治九年（1870）以来所未有。截至18日，报灾者已达39县。省政府拟定办法拨款救济，并呈请中央豁免灾区本年田赋、献金、献粮及乡镇公益储蓄。

△　美国第七舰队第一支舰队60艘军舰由海军上将金凯德率领驶进上海港。

9月20日　毛泽东先后往访叶楚伧、程潜、陈立夫、贺耀组。毛泽东会见陈立夫时，对陈所提要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武装和政权、把一切都交给国民党的荒谬意见作了驳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重庆大公报社午宴。席间，毛泽东针对该报负责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问题称：“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河南漯河接受日军代表、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之投降。

△　第一方面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进入越南海防。次日，第二方面军第六十二军黄涛部亦进入海防。

△　河北省政府在西安成立，孙连仲任省政府主席。后于10月30日由西安迁到北平。

△　1944年度田赋征实、征借，至是日止已征得5736．8387万石，占总赋额十分之九弱。其中已征足者有福建、河南、绥远、宁夏四省；四川省已征得96％，重庆市已征得66％；陕、湘、鄂三省赋棉共征得3.2256万担，占总赋额61％。

△　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到各大学校长、独立学院院长、各省市教育厅局长、中等学校校长、教育专家等200余人。会议主题为：一、内迁学校之复员问题；二、收复区及光复区教育之整理问题；三、西南、西北继续发展教育问题；四、战时失学青年补习教育问题。会期五日。

△　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同意将我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并谓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国民党提出，影响很好。26日又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目前谈判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即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决定将延安炮兵学校迁到东北，作为建立东北炮兵的基础。

△　上党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八路军攻占襄垣、屯留、壶关、潞城、长子五城，歼灭长治外围各据点的国民党军暂三十八师等部6100余人。此后即进入第二阶段，围攻长治守军。

△　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外交部提交照会，内称：如中国政府愿意，苏联政府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旋外交部向蒋介石请示后答复彼得罗夫，对苏联政府愿意协助表示感谢，并请苏联驻伊宁领事代为通知与介绍伊宁领事代表到迪化晋谒张治中，商洽进行和平解决办法。

△　战后美国第一艘货船“胜利号”驶抵上海港口。

9月21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说：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不平等对待中共，今日商谈应取平等态度。如果成立联合政府，中共一切军队皆可交出；建议用民选方法解决解放区问题。政府代表提出，要中共先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于是谈判陷于僵局。

△　军政部长陈诚由渝到蓉，商讨川、康整军问题，决定川、康部队今后保留三军、六师、两独立师。24日陈诚由蓉返渝。

△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必须以一切办法，阻碍胡宗南及孙连仲部在两月以内不能入平、津，使我肃清热河、冀东伪军，控制东北门户才比较有保障。”指出晋冀鲁豫野战军目前主要任务是寻求消灭胡军一两个师，组织同蒲、正太路战役，打击胡军。

△　据重庆《大公报》报道：日本《每日新闻》首次承认作战期间对日本人民所隐瞒之日军在南京之奸掠行为，已使日本促进日华友谊之一切努力归于失败。

△　晚，暹罗军警以不准华侨悬旗祝胜为由，出动9000多人，配有铁甲车13辆、坦克车11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包围华侨居住地区，用机枪滥行扫射，死伤华侨几十名，并乘机强迫华侨交出财物，制造震惊世界的血案。2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驻美大使馆向驻美暹使提出质问，并请其电暹罗政府迅速制止此类不法行动。

△　据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毕生、卡德夫人、大卫德森、爱泼斯坦、费尔德等21位美国作家、记者和社会名流联名上书杜鲁门总统，表示：“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之下，美国对华的政策，是应该防止中国的内战，不阻止敌人就地向爱国的中国军队投降，并同时进而鼓励中国的一切力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

△　英太平洋舰队司令福拉塞将军访问广州。

9月22日　毛泽东会见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说：商谈近20日，时间白费。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贵党张君劢先生给我的公开信，主张我方把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党派也无人理睬”。

△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接受日军代表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之投降。

△　行政院长宋子文返国抵重庆。

△　法国大使贝志高晋谒蒋介石，陈述越南问题。

△　外交部为曼谷军警残杀华侨事件向泰国提出质问。

△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离渝回国述职。

△　八路军华中军区一部攻克江苏淮安，至此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区连成一片。

△　伪第二集团军第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率部在河南永城起义，后编入八路军华中第九纵队。

△　日本《每日新闻》根据美联社记者田伯烈著作《南京大屠杀》一书，披露日军占领南京时实行血腥大屠杀事实，致使日本人民震愕万分，成为轰动世界新闻。

△　美海军部宣布赠我国驱逐舰20艘。

9月23日　英太平洋舰队司令福拉塞到渝晤蒋介石。次日，美第七舰队司令金凯德亦到渝晤蒋介石。

△　中共中央电告正由太行转赴华中路过冀鲁豫地区的陈毅，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陈毅、饶漱石均到山东工作，要陈毅和所率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去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荣桓迅速去东北。林彪、萧劲光已决定不去山东，直去冀东履行新任务。陈毅于10月上旬到达山东解放区。

△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一部配合苏联军队，消灭热河境内日伪军，沦陷14年之久的热河及18县完全解放。

△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以35个团之兵力发动对长治地区核心战，与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部五个团发生激战，至8日晚史泽波率部分三路突围，向浮山、翼城逃走。

△　河北滦县大地震。

9月24日　蒋介石召见军事委员会驻延安联络参谋胡自立，听取报告。

△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在蚌埠接受日本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之投降。

△　苏军当局在中国东北发行军用票，变相地让中国负担苏军驻扎东北期间的军费。至12月1日，已发行了28亿（相当于此时东北货币总额），到苏军最后撤军，其总数不下60亿元。

△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宣布，从军青年已达12万人。

△　汉奸陈春岳在杭州被枪决。按：陈在日伪时期任伪宪兵队密探长，罪恶重大。

△　苏联政府向伦敦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提出备忘录，建议设置由中、苏、美、英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美

国则提出由美、苏、中、英、法、澳、新、加、荷九个受降签字国代表组成远东顾问委员会，作为驻日盟军统帅的咨询机构。10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致信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持成立四大国对日管制委员会。

9月25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设宴招待周恩来、王若飞及张澜、左舜生、沈钧儒、罗隆基、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等，国共双方代表报告商谈情况，军队问题略有眉目，国大问题未获结果，将交给政治会议讨论，政权问题将继续商谈。黄炎培提出应一面继续商谈，一面着手组织政治会议。

△　国民政府派朱家骅、胡适、程天放、罗家伦、赵元任为参加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代表，朱为首席代表。

△　老同盟会员吴剑学在敌犯湘乡时拒绝充任伪职，不为屈挠，卒惨遭戕害，是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　全国慰劳总会举办之胜利劳军献金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冯玉祥、莫德惠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等千余人与会。各界踊跃献金，总额达二亿元，实收8023.9192万元。

△　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宣布，航空队飞机已载送国民党军四万多人抵各收复区进行接收。

△　世界职工大会在巴黎开幕，有56个国家的工人代表团参加。中国由中国劳动协会推派朱学范、刘松山、邓发、安辅庭、陈铁夫等出席。各国代表讨论世界职工联盟会章程。

△　美海军红十字会船“圣·粤拉夫号”等抵沪。

△　暹罗军警又与华侨发生冲突，至次日晨始止，据警察称，死者四人，伤者10人。

9月26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第二次通知》，指出：在最近谈判中，国民党除允许我军在原承认的12个师之上再增加几个预备师外，其他问题基本上无任何进展。国民党的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国帮助，强迫我党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但他的矛盾太多，困难很大。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重庆谈判问题。朱德认为，国民党幻想消灭我们。他们要动手，我们也得动手。三个月内我们只要组织好，东北就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占有优势，他们就不得不同我们谈。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正式分电各有关机关，令缉捕汉奸及查封逆产。

△　第一战区司令部收编驻在开封的伪军庞炳勋部为第一路军。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政府将依照与盟国商定之计划，派遣军队共同占领日本。"

△　宪兵第十六团自广州派赴香港，会同英军担任市区巡逻。

△　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闭幕。此次会议讨论提案112件及临时提案11件，另105件交教育部参考。讨论的主要问题为：内迁学校复员、收复区教育之整理、东北台湾教育之改进、南洋华侨教育之提高、战时失学青年之复学等问题。并通过《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规定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为伪学校，一律关闭；在校学生是"伪学生"，要"甄审"。

△　宋美龄受任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称：四川水灾区域大约均在涪江及嘉陵江流域所经之29县沿江地带，据报农产品估计减少三十分之一。省政府除将灾区田亩免赋外，并发放急赈8000万元。

△　美海军上将金开德自重庆返沪，表示第七舰队的基地将设在上海。

△　魏德迈与赫尔利抵华盛顿述职，杜鲁门并召见前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

△　曼谷六华侨领袖访晤暹罗总理普拉莫特，对中暹友谊之破裂表示关切。暹罗华侨工人罢工以示抗议。

9月27日　毛泽东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个问题，指出：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愿作重大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严惩汉奸伪军，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问题进行会谈。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说明中共先后提出过四种主张，都遭到国民党反对，现提出暂维现状，政府代表仍不同意。最后决定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代表还提出政府军要受降、进兵，中共不得阻止。周恩来表示：胡宗南、阎锡山、李延年部队利用黄河以北铁路向前推进，有以武力解决解放区的意向，我们不能坐视。

△　行政院缩编兵役部为兵役署，归还军政部建制。

△　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在广州湾赤坎接受日军投降。

△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向美军观察组伊万·叶敦上校口头声明，拒绝美军在山东省烟台市和威海卫市、河北省秦皇岛市登陆，并要他转告美军总部。

△　财政部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和《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准以200元

换取法币一元，其他伪钞收换将陆续规定办法。

△　重庆《大公报》发表《莫失尽人心！》的社论，略谓：国民党军接收京、沪以来的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手先抢。一部汽车有几十个人抢，一所房子有许多机关争，而长长的铁路，大大的矿场，却很少人过问。继谓：因币制迟迟无规定办法，更形成了收复区之乱，更加重了收复区人民的苦。由后方去的人，满箱满笼的关金券法币，成了武器，成了法宝，伪币与法币的比价无定，物价一日三迁，大大的苦了收复区同胞，大大的发了后方去的人。

9月28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进行谈判。双方互相通报派出参加军队整编技术小组的人员，政府方面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中共方面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着，双方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各党各派领袖及社会贤达推选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37人。

△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日军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之代表中巽之投降；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在汕头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之代表参谋长富田直亮之投降；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在越南河内接受越南北纬16度以北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之投降。

△　财政部指定中国银行代理买卖黄金。黄金牌价买进每两纯金8.5万元，卖出8.9万元。黄金捐献即以黄金献缴，不再以法币折款。同日，张福运经财政部指派接任关务署署长。

△　中共中央军委给东北局发出《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

体部署》的指示，指出在伪、美、英一致助蒋与我争夺东北的形势下，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夺和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暹罗军警袭击华侨表示深切遗憾；并称：暹罗华侨对暹罗的文化经济作出重大贡献，而又安分守己，和平仁恕，所以暹罗实无可以排斥华侨的理由，希望暹罗政府改善对华侨的态度，迅速处理此一事件。

9月29日　何应钦抵达武汉，召集第六战区高级将领及重要幕僚举行会议，指示受降及缴械事宜，并听取第六战区受降及缴械之经过报告。次日，召见武汉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冈部直三郎，对武汉地区日军缴械及有关事项予以训示。

△　四联总处核准收复区紧急农贷40亿元。

△　周恩来、王若飞往访黄炎培，商讨国是问题。

△　旅渝暹罗归侨举行集会，商讨支援在暹华侨办法，一致认为现暹罗政府执行一贯的排华政策，决定电呈蒋介石向盟国交涉，并请盟军统帅部逮捕元凶。

△　美驻华海军团长兼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返美述职。

△　中、美、英、苏四国同意成立盟国远东委员会，监督日本实行投降条款。

△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致函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对中国八年坚毅抗战备致敬慕，并望中印合作共造世界和平。

9月30日　张群、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国民参政会宴请各方人士，曾琦、左舜生、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王云

五、罗隆基、陈铭枢等应邀出席，商议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等问题。

△　国民政府通令是日午夜12时停止夏时制，将时针拨回一小时。

△　海军在厦门接收日舰130艘。

△　京、沪一带捕获汉奸周佛海、丁默邨等100余人，是日由戴笠押解到重庆收押。

△　旅渝台湾同胞欢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澎警备总部长官陈仪、葛敬恩等。陈仪致词勉共建新台湾，台胞代表希望速予办理抚恤救济。

△　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1.8万人，在天津附近之塘沽、大沽登陆。其先头一部1200人于下午6时开抵天津，另有一小部队在秦皇岛登陆。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远东委员会拟定运输17．3091万吨之供应品至华，以应急需。该项物品大部分已开始运往上海、九龙及青岛，物品主要为小麦、面粉、米、炼乳及豆类。此外尚有肥皂、纺织品、医药用品以及农工业复员物资等。

△　新四军军部率部分主力北上到达山东。随后，陈毅由延安抵临沂指挥新四军。

是月　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冯仲云、李运昌等出席。会议分析形势，确定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装，加紧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摧毁伪满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在农村要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打仗。会议于10月17日结束。

△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率领下，向拒绝缴械的日军展开进攻，至9月底，解放东江两岸、沿海及粤北等地城镇60余处，部队发展至1.1万余人。

10月

10月1日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特园开幕，张澜、沈钧儒、曾琦、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陶行知、潘光旦、史良、邓初民等48人出席，代表盟员约3000人。大会历时12天，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政纲》、《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等文件，选举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主席。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会议协商国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团结、统一；废除旧国大代表，普选产生国民大会；废止特务制度等10项主张。民盟“一大”是民盟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关于国共谈判答读者问，谓国共谈判所争的是民主与非民主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能否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和中国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能否保持的问题，即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因此谈判才分外困难。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和避免内战，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作了重大让步。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是建立在它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出发点上面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就必定以极大的努力来克服谈判中的困难，去争取实现人民的愿望。

△　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周炳琳、吴之椿、钱端升、闻一多等十教授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谓国共两党不应只商谈地区军额，一党专政固须中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应速成立立宪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前，一人独揽之风应先纠正，用人应重德能，军人不应再令主政，叛国通敌之元凶应予重惩。

△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目前时局的通知》，内称：国共谈判在停顿几天之后，又继续进行。我方在谈判中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国民党是防御招架，民盟诸人批评国民党。京、沪接收，群狗争食，闹得不成样子。美军助蒋占各大城市要道，但大量使用美军打内战，可能性不大，美国舆论助我者多。国民党是外强中干，忠奸不辨，将迅速丧失人心。希望各地坚决斗争，迅速扩大与编组力量，并尽可能争取国内外方面的同情。

△　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蒋介石之命，携国旗一面单机飞赴台北，与驻台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交涉，要求降下台北的“日本台湾总督府”上的日本国旗，升起中国国旗，日军同意。张廷孟亲手升起中华民国国旗。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结束，所有业务分别移交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两处接办。参军处增设军务局，文官处增设政务局，办理侍从室第一、第二两处工作。

△　农业推广委员会及陪都农场互助会等23个团体，在重庆合作大会堂举行联谊会。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到会发表谈话称：战后我国仍以农立国，进行工业建设。过去我国虽以以农立国自称，然1938年海关贸易记录入超八亿元，其中粮食一项即占二分之一，沿海一带皆赖洋米补国米之不足，故今后提倡农业一事甚为迫切。

△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解放察哈尔省南部蔚县。至此，察哈尔省一市、19县、18个盟旗与200万人民完全获得解放。

△　松江省民主政府在哈尔滨成立，省长谢雨琴（后改任李杜），副省长李兆麟。

△　八路军是日将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所率第二十三、第八十三军共六个师及省防军一部组成的援军合围于屯留西北地区，两军展开激战。

△　旅渝暹罗华侨互助社推选代表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军委会请愿，盼政府积极保护侨民。

△　苏联大使彼得罗夫通知外交部，东北苏军准备于本月下半月开始撤退，11月底撤毕，已派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是日，外交部复照，中国军队定于10月10日前后自九龙乘美国船只，由海道前往大连登陆。

△　盟国当局于日本京都拘捕伪南京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等汉奸六人。3日，由日本京都解到南京。

10月2日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命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执行下列五项命令：一、昆明委员长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着即一律撤销。二、昆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龙云，着即免除本兼各职；特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三、昆明行营原属独立旅、炮兵团、工兵团、高射炮大队、交通兵大队，着即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四、昆明宪兵司令部原属各宪兵改编为中央宪兵独立团，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着即日开往晋宁附近改编整训。五、昆明市郊及云南省各机场设备，统由昆明防守司令部派部接防，与美陆空军各司令官确取联络，令所属部队妥为警戒，以防奸伪捣乱。昆明防守司令部执行蒋介石命令，撤销行营、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三机构。自晨6时起，城内各街道分段暂禁通行，至下午3时后即渐恢复。

△　国民政府改组云南省政府，任命卢汉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原任龙云调长军事参议院；任命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原任陆崇仁免职；卢汉未到任以前，派李宗黄兼代主席。

△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商谈召开政治会议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政府方面表示只考虑承认60余县，实际上解放区已是280余县，中共代表提议将解放区问题交政治会议解决。周恩来

并提出，中共方面已拟将一个月来的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政府方面表示赞同。

△　何应钦乘专机飞抵河内，视察中国军队及受降情况，并代表蒋介石宣慰侨胞。

△　王世杰在伦敦主持五国外长最后会议，向报界发表谈话，望与盟邦互惠协议达成普遍和平。会议未发表公报。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孙廷义重划省界的来信，建议增设海南岛省。

△　美空军第一批人员60名于是日正午抵达北平。7日，第二批美军千余人亦到达北平；同日，美海军陆战队1420人在秦皇岛登陆。

10月3日　昆明防守司令部发表通告：一、奉中央命令，云南省政府改组，昆明行营、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一并撤销。二、昆明市郊治安奉命由本部派队接收。三、自10月3日起实行戒严。四、各重要机关、银行及高级长官住宅，一律由云南省警务处派警负责保护。五、如有乘机擅入民间抢劫财物施行捣乱者，一律就地枪决；危害盟军生命财产者，并连坐惩处其家属。六、本部官兵如有扰害民间情形，准市民随时具名呈报，立即查明严惩，并补偿所有损失。

△　昆明戒严，杜聿明所部与云南部队在昆明城区及市郊均发生战事，双方互有死伤。

△　国民政府明令白崇禧晋任为陆军一级上将；张治中、张发奎均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特加陆军上将衔。

△　第七十军之先头部队第七十五师在台湾基隆登陆。

10月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还政于民”的诺言》，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各种反民主行为和言行不

一致；要求给人民以自由，给各民主党派以合法地位；释放一切政治犯，解散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反民主的法令，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停止进攻解放区，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军队；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八路军解放邯郸，至此太行、冀南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　龙云所属部队防务已由昆明防守司令部迅速接收完毕，是日上午10时半起，市区交通全部恢复。晚间8时至次晨6时前仍戒严。

△　中国化学工业巨子范旭东在重庆病逝。

△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解放区烟台，并派代表上岸要求接收烟台，八路军代表严词拒绝美军的要求，9日美舰被迫撤离烟台港。

△　八路军冀中军区一部攻击石家庄外围藁城日军据点。次日日军负隅抵抗并施放毒气，在八路军强攻下，日军于6日被迫投降。

10月5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就政治会议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举行会谈。周恩来将谈判记录交给政府代表，政府代表提出，用行政专员区来解决解放区问题。周恩来答称，解放区的存在是历史事实，只在苏北、皖北等地可用这一办法。

△　中国青年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主张10条，主要内容是：从速召集建国会议；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用人行政一本惟才惟贤之旨；严惩汉奸，肃清贪污；解散伪军、裁汰冗兵；挽救工商业危机，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改进教育，教师讲学自由；加强对美、苏、英、法之平等合作。

△　台湾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副主任范诵尧率领接收人员80名由渝飞抵台北，即于次日成立台湾前进指挥部。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备司令部未正式在台办公前，台湾前进指挥所代表上述两机构办理若干事务。

△　第四十七军暂一师攻占中原解放区太康县城，第八十五军及第五十五师侵占解放区原武县城。7日，第八十五军侵占武陟县城。

△　八路军将太原援军包围于老爷岭、磨盘垴地区。是日夜，国民党援军向北突围，八路军迂回部队迅即抢占虎亭以北制高点，截断国民党军退路，八路军主力部队乘势跟踪追击、拦腰截击和猛烈穿插展开攻击，激战至次日，该军除2000余人逃回沁县外，大部被歼灭。

△　中共湘鄂赣边区的湘中、湘北、赣北、鄂南等地区部队奉命北撤，于11月到达长江以北，与中原军区部队会师。同时，新四军苏南、浙东、皖南、皖中部队亦开始向苏北、皖东北地区转移。

△　日东久迩宫内阁总辞职。次日，币原喜重郎被任命为首相，9日币原内阁正式成立。

10月6日　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官洛基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天津接受日军在津最高司令官田内银之助之投降。自是日起即由美军开始陆续将天津区所有日军全部缴械。

△　龙云由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陪同来渝。晚，龙云对重庆《大公报》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称："今后更当一本初衷，乘承中枢及元首之领导，努力建国。"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陕西略阳县辛亥举义死难之张俊彦、康炳熙、刘利川等24位烈士，并由行政院转饬陕西省政府于殉难地方立碑纪念。

△　宪兵第四团之先遣部队自福州分乘摩托帆船两艘开赴台北。

△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美军拟在烟台登陆事，致函美军观察组伊万·叶敦上校转达驻华美军总部，郑重声明如未经与我军商妥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方负其全责。

△　中共冀热辽行署电全国，呼吁救济自东北返归各省劳工。电称：自苏军解放东北后，过去被日军抓捕之总数达300万劳工，现正沿沈阳、天津间徒步而行，每日以万计，生活极困苦，甚望全国广为募集财物紧急援助。

△　苏驻华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拒绝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声言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9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说明，国民党军队登陆大连并不违反《中苏条约》。15日，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正式照会外交部，不允国民党军由大连登陆。

10月7日　蒋介石接见张嘉璈，并核定东北经济委员会委员、中长铁路理监事及发行流通券等要政。同日，又会见美国《生活》、《时代》、《幸福》三杂志发行人鲁斯，谈中美文化交流。

△　陈嘉庚在荷属印度尼西亚避居三年半后，于是日安返新加坡；并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一、管制日本应该像管制德国一样严密；二、数年来日本在南洋所散布的烟毒应设法扫除；三、被破坏的华侨经济圈必须重加修建。

△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晋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主力部队，依次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每个纵队辖三个旅，每旅辖三个团。第二、三、四纵队还组建炮兵部队。第一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

△　山西当局枪决史葆青等三汉奸。按：史葆青在日伪时期任伪山西产业自卫队长，罪恶重大。

△　英王以最高勋章授予我陆军突击队总司令李默庵将军。

10月8日　张治中在重庆军委会礼堂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也应邀到会。张治中致词称：今后我们实行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埋头努力30年，迎头赶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强之一。毛泽东发表谈话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

△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举行会谈，商谈即将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问题。

△　云南省党部、政府及防守司令部在昆明省党部举行省府改组后首次党政军联合纪念周，李宗黄致词称：滇省政党改组后，中央与地方二位一体。为建设新云南，党政军应该三位一体，精诚团结，和衷共济。杜聿明作改组云南省政府的意义与接防昆明经过的报告，提出希望建设新云南，使成为民主化的模范省。

△　太原国民党援军被歼后，上党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是日，长治守军以待援无望向西突围，企图逃回浮山、翼城。八路军当即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并以太岳纵队自虒亭地区直出沁水之马壁进行兜击，在太岳区地方武装配合下，终于12日在沁河以东之将军岭、桃川地区歼灭败逃国民党军主力一万余人。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　外交部长王世杰自伦敦返抵重庆。

△　世界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世界职工联盟宪章》，成立世界职工联盟，选出联盟主席团，朱学范被选为副主席。同时，决议要求参加联合国各机构，于是日闭幕。

10月9日　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山洞林园邀请毛泽东午宴，周恩来、王若飞及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餐后，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会谈，蒋介石仍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同意。

△　毛泽东答英国记者甘贝尔说，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政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　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讲，提出从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建国的三项方针，并强调建国的根本之计，在于国民的心理建设与精神改造。

△　国民政府派关麟徵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李书华为参加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代表。

△　国民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及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楚明善、航空委员会政治主任简朴等15人，前往外蒙古督导外蒙公民投票事宜。

△　国民政府以张道藩、邵毓麟、李宗黄、陶希圣等107人有功于抗战建国大业，明令给予二等至六等不同之景星勋章。

△　第十一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派兵查封驻平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大使馆。

△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派副参谋长董彦平率少数军政人员自重庆飞抵长春。

△　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目前不应集中部署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迅速发展扩大”，迅速成立北满、东满指挥机关，开辟北满、东满工作。

△　美总统杜鲁门致电蒋介石祝贺国庆，同时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作战贡献表示敬意，并保证支持中国达成建国任务。

10月10日　　《双十协定》签字。国共双方代表：政府方面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中共方面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要旨为：一、关于和平建国的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同意蒋主席所创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双方未能成立协议，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该享受之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法常轨，今即可行承认。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相关有拘捕、讯审和处罚人民之权。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

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提出四种解决方案，同时认为可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　蒋介石至曾家岩张治中寓所访毛泽东晤谈国是，旋即相偕至国民政府礼堂出席中华民国国庆招待会。后毛泽东复应蒋介石邀赴林园官邸，与蒋介石商谈解放区政权、召开政协和国民大会等问题，当晚即下榻林园。次日晨，再次进行会谈，蒋介石表示不能承认解放区民主政府。毛泽东告知蒋介石，他返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渝，就未解决之问题继续谈判。

△　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纪念国庆大会，蒋介石发表谈话，勉励人人应加倍努力，反省自新，完成建国工作。

△　国民政府令授予蒋介石及何应钦、吴敬恒、戴季陶、张伯苓、胡适等7278人胜利勋章；方先觉、端木杰、刘膺古等1822人忠勤勋章；肖勃、宋锷、王可襄等12人云麾勋章。

△　南京各界军民五万人在明故宫举行国庆纪念大会，何应钦在会上提出三事要军民共勉：一、共谋国家真正的统一；二、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三、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军。

△　延安全市庆祝国庆。上午，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庆祝茶话会，林伯渠、李鼎铭主持，朱德、叶剑英、徐特立、吴玉章以及各界

代表邓颖超、周扬、何思敬、丁玲、崔田夫、王克温、柯促平等数十人与会。留延的美国、法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国30余友人也应邀出席。晚间，各机关举行庆祝晚会。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题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建设》，指出：如果民主政治不建立，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会象辛亥革命以后一样，重新陷入黑暗分裂的惨境，人民的光明希望有完全成为泡影的危险。

△　台湾省500万同胞庆祝本省第一次“双十节”。台北市举行庆祝大会，各界代表数千人与会；全市商铺住户均悬旗庆祝，并自动放假一天。

△　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会见中国青年党曾琦，就民主同盟和青年党问题进行商谈。

△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偕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政治委员会委员莫德惠、热河省主席刘多荃、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离渝飞北平。12日，由北平转往长春，主持接收东北事宜。

△　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从8月10日至是日，在对拒不缴械投降的日伪军进行大反攻中，共毙伤敌伪军23万多人，缴获长短枪18万支，轻重机枪2500多挺，各种炮600余门，收复国土31万余平方公里。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解放；山东、河北、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地除少数大中城市为国民党军占领外，绝大部分地区被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收复，并收复东北的一部分地区，总计攻克敌占城市197座。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仍为“文协”。

△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北平接受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

官根本博之投降。北平行营接收伪“华北政委会”。

△　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前清肃亲王善耆之女）在北平被捕。

10月上旬　　萧华率八路军山东军区机关1000余人，由山东渡海到达安东。沙克率冀中军区第三十一团约1500人，到达锦州地区。

10月11日　　毛泽东由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自重庆飞返延安。毛泽东在重庆机场答记者说：“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下午，毛泽东到达延安，在机场受到党、政、军、民两万多人的欢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这次谈判已得到了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次日，张治中偕王若飞由延返渝。

△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报告重庆谈判情况，会议同意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　中国陆军总部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何应钦谈受降及接收情况称：各指定地区办理之受降事宜，正继续顺利推进；党政接收完成。刻正加紧恢复交通，想不久可望改善。继称：越北完全归中国军队控制；重要汉奸大都就擒，将交军法、司法审讯。

△　由徐州北进之国民党军骑二军、第十二军及由伪军改编之第四路军吴化文部先头部队，到达山东济南。其后第九十七、五十九、七十七、五十一军向徐州开进。皖西国民党军第七、第五十八军占领蚌埠，控制蚌埠、浦口段津浦铁路。

△　台湾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在台北南方资料馆，举行到台后首次记者招待会称：台湾今后之方针，以救济、发展、光大三目标按步推进。

△　教育部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设临时大学补习班，收容沦陷区大学学生。

△　成都人力车夫因当局限价过低，难维生活，全体举行罢工，提出违规不罚、增加车价或不限价，恢复自由讲价、减低车租三项要求。

△　美国向中、英、苏、法等九国发出请柬，决定于10月23日在华盛顿召开远东咨询委员会成立会议。

△　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决定于本月15日由重庆移驻上海，原驻重庆陆海空军官兵即将离重庆赴上海候轮归国。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重庆林园官邸举行茶会，表示欢送。

△　杜鲁门强调中国战后亟待外援。

△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14日，国民党第八军由美国军舰自九龙运抵青岛。1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致电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抗议美军干涉中国内政，要求迅速撤离驻华美军。

△　苏联将哈尔滨以北路轨改轨，今起莫斯科火车可直达东北。

10月12日　　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等，同时发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政府与中共的会谈》的社论，内称：全国人民本于过去国内长期不统一，政治因而不能上正轨，经济建设因而不能获得重大发展的痛苦经验，现在一致热望是：第一，政府与中共能就未决的若干问题继续会谈，促成迅速的解决；第二，完成军令、政令的统一，消灭团结的障碍；第三，对于若干情形复杂的收复区，立刻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统一其军令、政令。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的社论。次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的社论。两报社论一致肯定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也都指出要把《纪要》上的东西变成现实，仍须全国人民继续不懈的努力。

△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指出《双十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但局部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必须战胜国民党军队正在向我进行的大举进攻，解放区问题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此问题不解决，全国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必须保持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整编部队问题。

△　蒋介石指示战时公私财产损失、人口伤亡调查报告，应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人数列入。同日，以第十四军军长余锦源吃空额令即撤职，交军法总监查办。

△　宋子文在上海中央银行召集沪军政首长暨工商界领袖举行重要会议，除听取各军政首长报告接收收复区敌伪机构及物资之详情外，并商讨沪工厂复业及交通恢复等问题。

△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临时代表大会宣言》，选出中央执委66人，推选张澜连任主席，于是日闭幕。

△　教育部宣告专科以上教员审查合格者计教授2361人，副教授1002人，讲师1671人。

△　据重庆《大公报》报道：行政院战时生产局为救济重庆工业界，拨40亿元作为收购成品及继续订货之用。

△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八路军、新四军，目前中心任务除调兵东北外，是切断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消灭其一部或大部。

△　新四军军部发表八年来战绩：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西迄湖北，东至大海，南达钱塘江，北指陇海路，解放4000万同胞。新四军抗击敌军13个师团、伪军23万，总计战斗近万次，缴获枪24．2万

支、机枪4700挺，各种炮448门，毙、伤、俘敌伪42．9万名。

△　辽宁省民主政府在沈阳成立，张学思任主席。

△　上党战役结束。是役八路军收复长治等五城，共歼灭阎锡山主力13个师计3．5万余人，内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以下3．1万余人。

△　周恩来在重庆出席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学习会，对高崇民、阎宝航等人说：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地回到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留在东北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后该会派21人回东北。10月，周恩来帮助高崇民秘密离开重庆。

△　郑振铎主编之《民主周刊》第一期在上海出版。刊有郑振铎《走上民主政治第一步》、许杰《肃奸与民主运动》等文。

△　暹罗华侨代表张百基是日由暹罗经越南飞抵重庆，次日向外交部、海外部、侨务委员会等机关报告暹罗当局屠杀华侨、劫掠财产真相，吁请政府迅速采取有效保侨措施。

△　甘肃省甘谷县渭济渠竣工。该渠计长20余里，可灌溉1．4万亩土地。

10月13日　　宋子文在上海对各接收人员指示接收工作，其要点为：一、业已接收者，须由接收机关将接收所得之物资即速加以整理；二、尚未接收者应迅速前往接收；三、整理后之各企业应迅速恢复生产。

△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沪主持四行二局会议，商议金融汇兑问题。

△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上海对记者谈：一、欲谋经济复兴，须力谋健全经济机构；二、对于币制宜力谋稳定；三、接收当分四步骤，

即接收、点验、清理、处理；四、接收之物资统一处理，分区进行；五、税收应加调查、整理，然后作合理征收；六、外商银行准其复业，惟须依法登记。

△　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督励所属”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15日，又发出巧电，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围剿”皮定均、王树声部队。

△　行政院为救济目前工业界之困难，拟拨50亿元办理紧急工贷，重庆各厂矿申请贷款者300余家，请求贷款总额40亿元。惟截至是日止，获得贷款者计172家，总额仅12.8250亿元，尚有半数厂矿未获贷款。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团体再度请求负责贷款之当局，放宽贷款范围，使各厂矿普遍获得救济。

△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及张嘉璈、蒋经国会晤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马表示欢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来此商谈，并将苏联撤兵计划见告。熊请其协助接收各省、市政权，并告以运兵东北计划；马建议国民党军队最好经铁路进入东北，同时要求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密组织停止活动。

△　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同意以张学思为辽宁省政府主席，朱其文为副主席；白希清为沈阳市市长，焦若愚为副市长。同意成立东满临时指挥部，萧华为司令兼政委。

△　香港政府封闭国民党在港党团机关，令其停止活动。国民政府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郭德华于是日抵穗转港，向英国当局交涉。

△　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孟斯菲尔德在众议院发表演说，主张美国撤退所有驻华美军，并指责美军在华北登陆造成对中国内政的不公道干涉。

10月14日　　何应钦赴徐州、郑州视察。次日晨，在郑州召集军

政长官会议后，乘机经开封返京。何氏对记者谈：据徐、郑、汴各地方人士见告，徐州附近之津浦、陇海铁路及彰德附近之平汉铁路近被破坏，道清路西段被拆毁80％，现民众还乡因交通阻滞，勾留各地者20余万人，扶老携幼，情况极惨。

△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第三十军主力、第四十军（附第二十七师）及新八军约四万人，从新乡沿平汉路北进，第三十二军及第三十一集团军随后跟进，企图以10天左右时间打通平汉路进抵石家庄，尔后会同胡宗南部继续北进。

△　空军司令部派机赴台空投《告台湾同胞书》。

△　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在南京举行首次感恩弥撒，以庆祝胜利。

△　广州地区大汉奸吕春荣经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是日从第二方面军执行监看守所提出押赴天字码头执行枪决。按：吕曾在日军侵占广州后充任“广州维持会”副会长、“和平救国军”总司令、汪伪南京政府“军参院”中将参议等伪职，血债累累，罪大恶极。

△　日本大本营遵照盟军总部命令宣布解散。16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布，日本军队已被完全解除武装。

10月15日　　蒋介石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对国内团结问题表示乐观，宣称他与毛泽东谈话已获甚大进步；并谓在时间许可时将访问美国；登陆华北之美海军陆战队，一俟中国军队到后即可撤退。

△　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会晤马林诺夫斯基，阐释国民政府政策。

△　苏使彼得罗夫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反对国民党军由大连登陆。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指示》，指出：为争取我党我军应有地位，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中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国民党军，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因此，必须全力作战，将最得力的干部派到前方，去亲自组织这一交通战。

△　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召开，讨论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交议的议案，决议将全国组织划分七区，筹办机关报，通过成立中央秘书处及组织11个委员会，最后通过大会宣言，于次日闭会。

△　第九十二军侯镜如部由汉口空运至北平。

△　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经山西进入石家庄。同日，第五十四军由梧州全部开抵广州，军长阙汉骞、副军长叶佩高、郑挺铎等同时到达。

△　第三十军鲁崇义部、第四十军马法五部、新八军高树勋部攻占豫北解放区汤阴县城，于18日进抵安阳。

△　渝沪、沪平民航是日开航。

△　中国战区美军总部由重庆迁抵上海，美陆军航空队驻华总司令斯特梅耶亦抵沪。

△　驻华美空军代表团在重庆成立，协助中国建设空军，蓝度少将任团长。

△　盟军总部揭发日军练习冲刺用中国战俘作目标之暴行。

10月16日　　国民政府改组原“昆明防守司令部”，组成“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首先调其所属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转运东北。

△　蒋介石函熊式辉、张嘉璈，运兵应海运与陆运并进，大连登陆须坚持到底，同时积极恢复北平至沈阳铁路，作陆运为主准备。

△　蒋介石、宋美龄设宴款待视察太平洋及中国战区、于昨抵重庆的美国陆军助理次长麦克劳与陆军部专家一行七人。

△　宋美龄在重庆林园官邸为行将归国的美第十四航空队举行茶会，以示惜别。

△　国民政府派白云梯为蒙旗宣慰团团长，率团赴东北暨热、察、绥等省境内之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察木兰等盟旗抚慰，是日由渝乘机返京，转赴各蒙旗。

△　国民政府派严家淦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原任徐学禹免职。

△　国民政府训令各机关节用经费，并宣布税率减半征收，纾解民困。

△　联合国粮食农业机构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美、英、中等30余国代表出席，苏联派代表列席。各国代表签署会章，并讨论增加粮食生产，改进分配等问题，于11月1日闭会。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平绥战役及准备消灭阎锡山残部的指示》，指出：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之局面关系极大，为收复失地，打开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应在不妨碍速援东北之条件下，尽可能彻底歼灭阎部残余。

△　毛泽东电示彭真，苏方已拒绝蒋军在大连、旅顺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等处试探。“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在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　八路军渤海军区为迫使山东平（原）禹（城）日伪军缴械投降，控制津浦铁路北段，发起平禹战役。经二个多月战斗，至12月31日，禹城日军弃城南窜，后被我军围困，鏖战三小时，毙日军145人，俘其大队长以下613人。至此战役结束，克县城四座，毙、伤、俘日军约2000余人，伪军近万人。

10月17日　　蒋介石接受美国合众社社长贝利采访，畅谈中外局势；对日主张不计旧怨，并望中美加强合作。

△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对反动派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并告戒全党："已经达成了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进而指出："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最后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　熊式辉、蒋经国第二次晤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六事：一、修理沈阳至山海关铁路使之通车；二、修理沈阳经热河至古北口铁路使之通车；三、中国准备接收邮电及长春以外铁路；四、发还被苏方封存之中国法币；五、由中国编练地方团队；六、行营派人赴各地视察。马同意一、二、三各点，并允将非政府之部队解散，余需向莫斯科请示。

△　苏联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一、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应作苏军的战利品；二、伪满洲国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三、日本和伪满合办的工厂企业，由中、苏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等要求。

△　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与伊宁代表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

烈、阿合买提江在迪化会晤，张治中向伊宁代表阐明中央关切边民的政策，又以《恢复兄弟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为题，说明伊宁事件的不幸，希望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伊宁代表表示，他们除了“解放”外，没有什么意见，愿意先听中央的意见。

△　第七十军由军长陈孔达率领乘军舰于是日上午在台湾基隆登陆，下午抵台北，30万市民夹道欢迎。次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自闽乘扫雷舰渡海，20日驶抵基隆港。

△　何应钦以训令致冈村宁次，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徒手官兵服役办法，饬修复战时破坏工程。

△　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一部空运到平转津，其余部队将陆续到津。

△　蒋介石密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拦击依照国共协议北撤的浙西、皖南新四军，电称：“（一）浙西奸匪酉微北窜，现集贵池，匪似有溃窜之模样；（二）皖南铜、繁地区奸匪第七师一部，申有开始北渡等情。希望派队截击歼灭。”

△　贺龙指挥八路军晋绥野战军由左云、右玉地区北越长城，向绥远之凉城、天城、新堂运动，准备攻击，绥远战役开始。此次战役由晋绥、晋察冀两军区组织，12月15日结束。

△　财政部决定自本年10月起，全国各地营业税税率减半征收。以前按营业收入额征收3％营业税，现改1．5％征收；以前按营业资本额征4％，现改按2％征收。同时，运输业、粮食业两种营业税从本年9月起免征一年。

△　据新华社讯：日军在占领绥察、晋北等地期间厉行毒化政策，勒令农民种植罂粟竟达80余万亩，年产烟土3000万两。现这些地区大部为八路军解放，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设立禁烟督察局进行禁

烟。

△　外交部长卫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称：最近暹罗所发生之排华事件，系暹警之不法行动，致令华侨遭受重大损害。吾人坚持暹方必须采取有效步骤，以防止类似事件之再演，并须严惩此番暴行责任者。为求中暹关系之改善，中国政府已通知暹罗政府，中国政府有立即派遣外交代表赴暹之必要。

△　暹罗排华案，截至是日止统计：一、耀华力路事件，呈报案件共155宗，财物损失总数292．9933万铢，死六人，伤18人，被捕33人。二、新城门事件，呈报案件188宗，财物损失276．2598万铢，死七人，伤24人，被捕10人。三、其他各地呈报案件172宗，财物损失253．2944万铢，死13人，伤90人，被捕41人。

△　美总统私人代表洛克飞抵重庆，旋赴广州、台湾等地视察，28日再飞重庆。29日，谒见蒋介石，探讨战后中、美经济合作途径。

△　美陆军部次长助理麦克劳率美太平洋区空军总司令齐尔斯、美宪兵总司令赖奇等大批重要军政官长飞抵上海。

△　1684名华工由日本乘船回国，是日到达塘沽。次日，乘车到天津，住西沽北洋大学市府招待处，是为自日本回国的首批华工。

△　重庆中华自然科学社第十九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到社员110余人。会议通过提案：要求政府拨款，提倡科学研究；在各大城市成立科学博物馆，以普及科学；奖励各团体和私人研究。会议一致声讨汉奸科学人员。18日闭会。

10月18日　　蒋介石在重庆与苏大使彼得罗夫商谈国民党军登陆大连问题，并愿借苏船运兵，请其报告斯大林。

△　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称：除正在开始解除山东、河北两省日军武装外，各战区及各军区之日军几已全部缴

械。在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立将全部解除武装。我军一军已抵台湾，数日之内即将接收日军防地。中国战区解除武装之日军共109万，东北之日军未计算在内。

△　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在昆明对中央社记者称：目前工作要旨为：肃清散兵游勇，根除匪患，绥靖地方；举行人民身份登记；定期登记私人枪弹；严整军队纪律及后方机关。

△　据重庆《中央日报》报道：四联总处核准之工贷50亿元，分配情况为：机电13亿元、化工八亿元、冶炼八亿元、液燃五亿元、煤矿三亿元、纺织三亿元，其他10亿元。其中贷款数目较大者有：中国毛纺厂、四川水泥公司各一亿元，渝鑫钢铁厂9000万元，中国纸厂、建国纸厂各8000万元，华新水泥公司6000万元，中南橡胶厂、中国汽车公司各5000万元，其余厂家核准数100万元者甚多。

△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在台北开始办公。

△　内政部次长雷法章率领外蒙古公民投票督导团飞抵库伦（今乌兰巴托）。按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决定以“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作为苏联对日作战的首要条件。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附件规定：苏联政府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而中国国民政府则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　新四军军部发言人为该军江南部队奉命北移事发表谈话，告别江南父老，并希望国民政府及地方当局保持当地的民主措施，更望国民党当局迅速实现已确定的和平建国方针与实施民主的诺言。

△　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队从8月下旬以来进占已解放的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又以六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夺占已解放的张家口，控制平绥路。于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集中14个旅5．3万余人于是日发起绥远战役。至12月15日结束，共歼

1．2万余人，收复绥东、绥南广大地区。

△　据新华社电讯：国民党军继续以压倒优势兵力，拦击为和平、团结奉命北撤之新四军浙东纵队，企图歼灭于钱塘江畔。仅澉浦至松江一线，封锁与进攻新四军者即有三个师11团之众。在澉浦被围的新四军一部夺路突围，双方伤亡惨重。现国民党军队仍在沪杭甬铁路沿线阻击新四军。

△　国民党军自10月以来进占济南、滕县、兖州、泰安等地，企图先控制津浦路南段，然后北向进攻解放区。于是，新四军于是日开始发起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战至1946年1月13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邹县、滕县、大汶口等地，歼灭2.8万余人，控制铁路200余公里。

△　驻天津美军官兵30余人，下午3时包围搜查驻天津英租界八路军冀中军区办事处，捕去五名工作人员，带至美军兵营审讯。下午6时被捕人员被释放，但四支手枪被扣，办事处房屋被美军强占。

△　据美新闻处报道：第一批海运来华之美国黄金已抵沪。中国官员称：黄金将由中央政府保存，用以稳定币制。黄金共值5000余万元。

10月19日　　蒋介石明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展开日俘、日侨遣返工作。同日，又令准程东白等四人无罪，新疆冤狱得告大白。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与废止特务制度，以及军队、经济、外交、内政、教育等十个方面阐述立场和态度，力求全盘彻底地总解决。

△　熊式辉第三次与马林诺夫斯基会晤，坚持登陆大连，马允可转达莫斯科，并要求向蒋介石说明苏方意见。

△　重庆西南实业协会星期五聚餐会邀请周恩来作《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阐明中共对工业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一、政治环境问题，“一国的经济建设，不能离开政治而独立，政治环境的不良，足以影响经济建设”，“所以我们要求的第一是和平、第二是民主”。二、资本问题，应有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今后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同时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三、发展问题，为发展工业，首先要进行农村改革，实行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其次是区域经济，“工业建设，应该按照地区情况，分别规定”。四、税收问题，对于关税，我们采取“各种货物不同的税率，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至于内地税，“工业税在原则上应该课得比较轻些”。五、劳资问题，“厂方劳方一定要在互让原则下求得劳资的合作”。按此努力，在二三十年后，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强、独立、民主的中国。

△　重庆文化界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冯玉祥、邵力子、周恩来、郭沫若、柳亚子、老舍、叶圣陶、曹靖华、冯雪峰以及美、苏友人约500人出席。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叶圣陶、周恩来等发表讲话；周恩来希望文化界能参与政治会议，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必须实行双十协定》社论，指出：“全中国人民和各党派人士要清楚认识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必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必须停止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努力，把国共会谈中已获协议的条款见诸实施，并争取尚未获得协议的问题达到圆满解决。”

△　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在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23日，中央又给东北局发出战略重点的指示，指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可造成对抗力量，以利

将来谈判。”

△　聂荣臻率领四万余八路军自兴和、阳高西向，自是日至23日与傅作义部新三十一师、新骑四师激战后，连续攻下隆盛庄、集宁，续与新三十二师激战后攻下丰镇。24日，与马占山、王英部激战后攻下柴沟堡、聚乐堡，马、王两部退守大同。

△　时遣返日本战俘及日本侨民，初步统计已逾200万人，内计日俘124.5万人，将分由12个港口陆续返日。

△　首批台湾籍军人、军属3000人由日本还抵基隆。

10月20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重开团结商谈。双方就政治协商会议之性质、代表总数和各方应推出的代表数、会议之职权、表决方式以及由谁出面召集等五个问题进行商谈。这是签订《双十协定》后的第一次国共谈判。

△　王若飞在重庆访晤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各方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进行协商。

△　蒋介石偕白崇禧、俞济时等一行自重庆乘专机飞泸州检阅时已编入第九军之青年远征军第二〇三师，并视察野战医院，参观亲爱社。晚，接见军、政、党、学各界首长及地方耆绅。次日，离泸州赴宜宾。

△　张嘉璈致书蒋介石，报告攸关东北经济问题，反对中苏合办东北工矿。

△　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在长春会见苏军参谋长巴佛洛夫斯基，提出要在大连设立航空站，并派接收人员前往大连地区视察。次日，东北苏军当局答复东北行营，不准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设立航空站和派军事人员视察；对于前往北宁路视察的国民党接收人员，苏军可以陪同，锦州以南地段不能保证安全；不准国民政府收编伪满

军队。

△　张治中在迪化会见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并将《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交给他们。赖希木江等表示要带回伊宁详细研究之后才能提出答复。22日，赖希木江等三人返回伊宁。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的斗争，将是决定我们今后的政治地位的关键。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发动民众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和救济失业。

△　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称：蒋介石现以70万大军向解放区进攻，如不停止，中共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叶剑英出来也无可谈。伪军、受降、解放区三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合作解决其种种问题，鼓励并协助其发展为统一、强大、合作与民主之国家。此种国家对于远东和平至关紧要。

△　首批遣送归国之天津日本侨民3400名，内有伤兵300余名，搭车赴塘沽，乘船返日。

△　外蒙古举行赞成外蒙古独立公民投票，历时3日，将于22日完毕。

10月中旬　　万毅率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约3500人，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一带；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00人，到达沈阳。

10月21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就停止进

兵、重划受降区、恢复交通、解散伪军和承认解放区等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说，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已达70余万人，再前进必致引起内战。军事上停止前进，重划受降区，恢复交通，解散伪军四者互相关联，必须先行解决，办法是承认各边区政府。会上对于伪军、受降、解放区三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只确定各方面参加政协代表的人数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六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

△　张群往访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问题交换意见。张群表示政府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于11月1日举行；张澜则表示会议代表应孚众望，迩来工业界及文化界均已向政府提出请求，希望能推选代表参加会议。

△　国民政府加拨1．2亿元赈济豫省沦陷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辽宁、安东两省工作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正急于派部队及党政人员赴东北与我争夺，我党的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一线，次要力量是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绝、阻止蒋军登陆及打退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迅速接收各级政权，守住东北的大门，然后掌握全东北。

△　美军飞机十余架在八路军驻地河北安次县上空盘旋约一小时，时适安次军民正在广场举行大会，美军飞机突以机枪向会场扫射。同日，美军飞机约10架在河北固安城上空低飞盘旋一小时，并投下一函限该地八路军于3日内退出，否则即进攻该地。

10月22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参政会继续就停止进兵、恢复交通和解放区政权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一、规定双方停止攻击，各守原防不动；二、规定受降区，各自执行，不得相犯。

△　国民政府特派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刘文辉为川

康绥靖副主任。

△　马法五、高树勋率领的三个军，主力由倪新庄，一部由丰乐镇分别渡过漳河。23日起，两兵团开始交互前进，当晚攻抵磁县附近。24日，右翼兵团再占秦家营、何红城、柴庄、夹堤、崔曲、赵庄诸据点，左翼兵团占领马头镇，进出屯庄阎家线一带。八路军以先期到达之第一纵队实行运动防御，阻止和消耗国民党军队，以掩护和等待八路军主力到达战场。

△　魏德迈在华盛顿对记者谈话称：驻华美军任务，是帮助运输国民党军至东北及收复沦陷区。驻华美军为陆军6000名，海军陆战队5．3万名。最后表示美军绝无干涉中国内争的意向，但对于内争得以消弭殊表欣慰。

△　中国空军第一联队在汉口成立，徐焕昇任司令。

△　美国总统杜鲁门私人代表洛克由重庆飞抵广州，“了解广州经济情况”。

10月23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就停止军队前进和军事冲突问题举行会谈。周恩来指出：孙连仲部队向河北，阎锡山部队向大同，胡宗南部队向石家庄前进，抗战初期这些地区早已划为第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现在国民党军进兵，而中共不能撤退，冲突无法避免。

△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重庆召集东北九省主席、两市长及各部特派员举行会议，熊氏报告东北近况，盼各省主席及两市长早日前往接收。下午，熊晋谒蒋介石报告一切。

△　据合众社讯：最近视察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归来的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承认，在中国“收复地区”，现有600余万工厂工人失业；京、沪物价之突然上涨有四因：一、由于中国内地来人的集

中，形成了更大的需要；二、由于工厂停顿引起供应品的减少；三、国营企业价格的提高，如邮政、电报等；四、京、沪等市周围的和平秩序尚未恢复，更加减少供应品流入城市。

△　外交部派员在南京接收日本大使馆。

△　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臧启芳等启程飞长春接收东北高等教育。

△　国民党中宣部宣布上海《大公报》、《立报》等15种报纸获准发行。

△　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主持接收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沈称：古物、图书、文献等幸获安全，但日军先后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残破铜灯亭91座，又在历史博物馆运走铜炮三尊、铁炮1369尊。此外，先后搬走及撕毁图书一万余册。

△　重庆中国进出口贸易协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吁请政府解除阻碍贸易正常发展之桎梏，而予进口商人以有力之扶助，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彻底取消贸易管制；二、调整外汇，取消官价，重订汇率；三、活泼资金，准许官民自由携带钞票出入；四、改善运输，俾商货源源外出，以换取大量之外汇。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强调要加强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民族上层应积极争取他们参加自治运动，打击对象要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派乌兰夫回内蒙统一领导自治运动。

△　苏大使彼得罗夫拜谒蒋介石，声明不同意国民党军登陆大连；蒋介石请其再向斯大林报告，根据友谊关系予以答复。

10月24日　　美、英、苏、中、法五大国及其他24个国家都将《联合国宪章批准书》交存美国政府，《联合国宪章》从是日起开始

生效。联合国作为战后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正式成立，此后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重庆设宴庆祝韩国光复，并欢送韩国志士金九、金奎植、赵琬九等回国。金九致词，对中国朝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之热忱，致衷诚之铭感。

△　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偕同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严家淦等，由沪飞抵台北履新。

△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致电毛泽东，提出所谓“明示内战责任”的问题。26日，新华社奉命驳斥，指出傅作义企图推脱内战责任。

△　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为华中局常委。邓子恢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任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任副司令。10月25日，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正式成立。10月29日，中央同意粟裕提议：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军区副司令员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集中第一、二、三纵队及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主力共六万人，于是日发起邯郸战役，11月2日结束。

△　王震、王首道率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桐柏地区会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郑位三、李先念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统一指挥该地区的斗争。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和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共有六万余人。

△　中央社电，浙江省立图书馆收藏文籍30多万册，其孤山分馆

文澜阁并藏有《四库全书》，是国内具有宏大规模的图书馆之一。杭市陷后，遭受浩劫。该馆大学路馆地的雄伟大厦被敌拆筑仓库，只剩四处残壁，孤山分馆房屋还残存，内部损毁很多。该馆藏书除《四库全书》已运渝保存幸免于难外，善本散佚三分之一，杂志报章荡然无存。

10月25日　　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陈仪为受降主官，日方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首由陈仪宣布，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官，并把《第一号命令》和受领证交给安藤利吉。安藤在受领证上签字，径呈受降主官。受降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下午3时，台北市举行民众庆祝大会，陈仪出席并发表演说。国民政府为纪念台湾光复，明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

△　行政院公布：台胞即日恢复为我中华民国之国籍。

△　台湾《新生报》出版，此为台湾光复后首创报纸，社长李万居，总编辑陈超飞。是日发行18万份。

△　国民政府改组江苏省政府，任命王懋功为江苏省政府主席，王公屿为民政厅厅长，董辙为财政厅厅长，陈石珍为教育厅厅长，董赞尧为建设厅厅长，陈言为省政府秘书长，贾韫山为保安副司令。

△　何应钦飞抵琼崖视察。据广东第九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丘岳宋统计，六年来海南岛遭受敌伪蹂躏，民众被杀害者达25．5554万人，民房被毁26．1621万间，田地被占30．8669万亩，耕牛被掳4．7398万头。

△　张群在蒋介石官邸宴请黄炎培，商谈政治协商会议事。

△　外交部长王世杰面告苏大使彼得罗夫，请依照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所商，国民党军改由葫芦岛、营口登陆。28日，蒋介石会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要求苏方为国民党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提供保证。

△　杜聿明以内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身份在上海与美第七舰队指挥官金凯德达成协议，由美第七舰队负责运送国民党军队到营口和葫芦岛。

△　东北苏军搜查设在长春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和中央党部特派员办公室，切断东北行营同外部的通讯联系。次日，苏军当局通知东北行营，禁止国民党官员到各地视察，不准国民党在长春组织保安队，并指责国民党在东北进行反苏宣传。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决定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以加强对国军的宣传、争取、瓦解、策反工作。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江南新四军开始撤退》，同时发表新四军发言人声明：为了实现和平、团结，新四军受命撤到长江以北。

△　贺龙、聂荣臻等部队会合于卓资山，同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六十七军、新骑四师、暂骑五师发生激烈战斗，至27日国民党军放弃卓资山阵地。贺龙等三路部队继续西进，28日连下旗下营、白塔，30日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　青岛日军正式签降，受降主官为美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耳与军政部胶济区接收委员陈宝仓，日军投降代表为青岛日军司令官长野荣二。

△　何应钦饬令冈村宁次应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所属军队为国

军，并令查告在外台侨及在日军中的台人数字。

△　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遣返日人联合会议，决定使用中国的秦皇岛、上海、青岛、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连云港、雷州、三亚、汕头及越南的海防等港口，遣返日俘、日侨。

10月26日　　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就国民党停止进兵、恢复交通、避免冲突问题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奉蒋介石的提示提出三点：一、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中共军队撤退铁路以外，其已占领区域暂维持现状；三、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日来渝进行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要求以此三点电达延安。周恩来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以前，国民党军进兵，即为进攻。必须停止进兵，才能恢复交通。

△　周恩来、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提出关于恢复交通、避免内战的具体方案请中央指示，并要求中央按日具体广播国民党进兵与进攻事实。

△　国民政府派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原任关麟徵免职；派关麟徵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报告收复区财政状况及设施情形，略谓：中央在收复区普遍推行减免赋税政策，除田赋业已明令免除一年外，其他中央各税亦分别酌予宽免。继谓：以京、沪区财政、金融、经济情形言，目前亟待解决之问题，为物价、工潮与煤荒。又谓：财政部正积极安定后方金融，救济工商实业，将工贷总额定为50亿元，由各行、局贷放，使面临崩溃之工商业得以转危为安。最后称：今后财政计划之改革重点在于：一、平衡国库收支；二、调整财政系统；三、改进赋税制度；四、调整内外债；五、稳定币值；六、健全金融机构等工作，以奠定坚强之财政金融基础。

△　熊式辉于是日自重庆返抵长春。29日，熊式辉第四次与马林

诺夫斯基会谈，告以国民党军决定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同时由山海关前进，请苏方协助并保证安全。马氏表示，可以掩护国民党军队在营口登陆，在葫芦岛不能负责。国民党如果经北宁路运兵，在山海关至锦州一段，苏方不能保证国民党军队的安全。如果国共发生武装冲突，苏军不予干涉。但是，苏军于11月11日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不能进入锦州。

△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同盟的成立和历史，以及此次临时代表大会的经过和成就。张澜强调同盟不愿中国再见内战，军事冲突应立即停止，希望舆论界一致主张、一致努力。

△　台北全市学生为庆祝台湾光复举行大游行，参加者计有大学、专门学校及中等学校等28校，学生5000余人。下午，台北各界民众数万人，复自大龙洞保安宫前出发，环绕全市大游行一周，以庆祝光复。

△　闸北四行孤军抗日八周年，上海各界公祭谢故团长晋元，蒋介石赐颁“军民楷模”挽额表扬之。

△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密令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围剿”豫西八路军，令称：“兹为适应北进政策起见，着该长官剿匪指挥任务，由第五战区刘长官负责，围剿伏牛山平汉路中段以西、黄河以南地区奸匪皮定均、王树声部而歼灭之。又该奸匪现已大部南窜南召以北，战区所属第十五军应在豫西嵩县一带防堵。”

△　叶剑英奉朱德之命，为秦皇岛美军向解放区山海关等阵地推进事，向延安美军观察组伊万·叶敦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采取有效步骤制止向解放区推进行为。

△　国民党石家庄之第十六军、安阳之第三十二军，南北对进增援邯郸。八路军集中两个纵队歼灭国民党第四十军，以一个纵队钳制

第三十军和佯攻新八军，以另一部阻止国民党援军。

△　中央社记者沈宗琳报道上海物价上涨情况，略谓：8月10日以前，一般物价较战前约涨10万倍（以法币、伪钞一对一计），胜利到临之初期，物价曾一度惨跌，如米每担由200万元（伪币）陡降至60万元，阴丹士林布每尺由三万元跌至6000元，猪肉每斤由四万元降至2．6万元。然胜利二阅月后，物价不特恢复8月10日前之一般平均价格，若干种如百货匹头抑又过之，如以昨日行市言，米已涨至140万元，阴丹士林布六万元，猪肉3．5万元。燃料则以来源断绝，胜利前后始终上涨，白煤215万元一吨；煤球15万元一担。物价上涨系由于受敌伪八年经济压榨与近来残余物资又渐多内流所引起。

△　民生公司在重庆向新闻界报告公司在抗战中所作贡献和存在问题，略谓：公司现拥有船只84艘，总吨位为2.6069万吨。到胜利时为止，共抢救或装运兵工器材19．4万吨，航空油料、器材3．9万吨，枪弹、辎重、马匹等30．6万吨，运送军队壮丁270．5万人，运输美军器材2400吨。公司损失也大，总计被敌机炸沉船只1．2万吨，炸死员工270人。最大的损失是历年的亏空，自从1939年政府统制政策以后至今，亏折已达四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拉差扣船与营业受统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植，把在抗战中破旧了的船只和工厂整顿起来，逐渐成为工业化中国的一条活跃的交通动脉。

10月27日　　蒋介石训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全权指挥第六战区协同第五战区追击桐柏山附近新四军李先念部，电称：“四望山李先念部主力，现既北窜桐柏附近，希派有力部队追剿，不受作战地境限制，以协助第五战区剿匪，期一鼓歼灭，勿使漏网为要。”

△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包华国、谢嘉、张天开、余长河、李铭、寿景伟、朱家让、朱学范、安辅庭、冷隽、刘选萃分别为出席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华民国政府第一代表、第二代表、代表顾问、代表秘书、雇主代表、雇主代表顾问、雇主代表秘书、劳工代

表、劳工代表顾问。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称：政府为谋迅速恢复铁路交通，已同意中共部队在让出各铁路线后，其在各铁路线以外之驻区维持现状，惟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使无障碍。

△　国民政府派驻东京救济我国战俘的代表团六人，由李华英中将率领抵东京。

△　立法院通过《处理汉奸条例》，规定曾任伪职荐任以上者均须检举。

△　阎锡山在重庆对记者谈：此次来渝任务有三：一、向中央报告第二战区受降经过；二、向中央报告最近晋境军事情形；三、向委座请示今后措施。并谓今后晋省施政方针，决本中央政策建设地方，提高生产能力，改善民生。

△　重庆《新华日报》报道："国民党部队继续进攻，用优势兵力拦击我为和平、团结而奉命令北撤的新四军浙东纵队，企图歼灭我军于钱塘江。在澉浦、松江一线封锁与进攻我军的就有三个师十一个团之众，我军一部曾在澉浦被包围，夺路突围，双方伤亡都重，现在国民党军队仍在沪杭甬铁路阻击我军。"

△　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反日俘日侨会议闭会，订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

△　美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华北各铁路沿线布防，并在货车上担任护卫。

△　英国赠我舰艇11艘，第一艘"震旦号"驶抵国门。

10月28日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由谭平山主持，到会的有全国18个省、市代表和会员。大会制定《三

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总章》，通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案》等文件，选举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等为中央常务干事。

△　杜聿明飞抵长春，当晚会见苏军远东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要求苏军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同意，但说明该地苏军业已撤退，无法予以协助。

△　陈仪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见高山族代表鹿毛等八人，对各代表爱护祖国之精神予以慰勉。

△　新疆省会迪化设市，金绍先任市长。

△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提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

△　八路军对马法五、高树勋所部发起总攻，战至30日，歼马法五第四十军第一〇六师大部，争取高树勋新八军一万余人起义。

10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云南省党部主任以李宗黄继任。

△　蒋介石致函蒋经国："万一我军不能在葫芦岛登陆，则决心在秦皇岛与天津登陆，由山海关入东北。"

△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关切各地尤其东北地区韩侨宣抚工作。同日，令司法行政部调查收复区日军战犯，提交盟国战罪委员会远东分会。

△　阎锡山在中枢纪念周谈艰苦抗战及与中共之战争。午间，蒋介石设宴招待阎锡山。

△　美总统私人代表谒蒋介石报告视察台湾情形；蒋介石以晚宴

款待。

△　陈仪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首次纪念周上发表治台方针：一、消极方面：废止日人统治下之苛捐杂税，废弃压榨台胞之法规制度，保障民众合法权利，禁止官吏贪污及扰民行为。二、积极方面：增加民众受教育及服务之机会，建立民意机构，提高民众之生活水准。

△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苏军远东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签订协定，苏军分三期撤退，即沈阳以南自11月2日开始，哈尔滨以南自11月25日开始，12月2日前东北苏军全部撤完。

△　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等离平飞长春赴任。同日，辽宁省主席徐箴、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兴安省主席吴焕章、大连市长沈怡等，亦离渝飞长春赴任。

△　中共中央华中局电告中央：苏南、皖南、皖中、浙东约七万部队、地方武装及干部，均已胜利到达江北皖东地区。31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祝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在华美军的方针和应注意事项的指示》，指出：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与其合作。

△　据暹罗华侨抗战建国联合总会调查，截至是日，暹罗军警抢劫、虐杀华侨造成的损失为：财产损失452.5948万铢，华侨伤亡及被捕者共149人。此多系暹罗军警借故搜查而破门抢劫、虐杀之暴行所造成。

△　暹罗总理普拉莫特称：暹罗将与中国协商建立中暹外交关系，对迭次发生之华侨与暹人冲突事件表示遗憾。

△　世界青年会议在伦敦开幕，63个国家计500余人与会，中国代表25人参加。

10月30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举行谈判。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26日所提的三条意见作如下答复：一、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中共方面提议：（一）停止进兵、进攻、进占；（二）停止利用敌伪；（三）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四）政府方面如须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方得拟具体办法，否则无权解决此事。三、如不能于事先商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行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四、政府方面须表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双方就这四项问题进行商谈。

△　黄炎培为国共双方军队冲突日趋激烈，致函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议组织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商谈解决。11月2日，张群以电话告知黄炎培，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接受其建议。3日，王若飞访晤黄炎培，表示中共愿接受其建议。

△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让他们告诉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召开国民大会必须慎重，不可草草决定，强制执行，并坚决反对旧国大代表、旧宪草和速开“国大”。

△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山东省政府，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刘道元为民政厅厅长，赵秀勋为财政厅厅长，李泰华为教育厅厅长，丁基实为建设厅厅长。

△　何应钦抵北平视察，并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惟有全国同胞自身之努力，才能拯救国家的危急。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社论，指出：“根据最近各地电讯，南自广东，北至察、绥，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八十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进行着攻势。”并

严正指出："我们解放区军民，坚决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但在国民党军队进逼太甚、让无可让的情形下，解放区军民不能不起而自卫，和全国人民一致制止反动派挑动内战的阴谋。"

△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在邯郸马头镇召开总部科以上军官会议，宣布新八军（包括所属第二师、新六师）起义。会后，高树勋打电话给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及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表明率所属部队与八路军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实行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并要求他们也脱离国民党阵营。

△　美军一部配合第九十四军一部进攻并占领八路军冀东解放区临渝县之海阳镇，解除游击队之武装；并以悬有美国旗之车辆运输国民党部队。国民党军在美军掩护下向山海关八路军进攻。同日，国民党军队由美运输舰载运，在秦皇岛登陆。

△　苏军开始自中国东北撤退。原定12月2日前撤完，后应国民政府的要求而延期。

△　远东顾问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美、英、法、中、澳、新、加、菲、印等国代表出席，讨论管制日本问题。苏联代表未出席。

△　美国《纽约时报》、《纽约先锋论坛报》等报纸发表社论，主张美国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应采取不干涉政策，对于美国军队和飞机帮助国民党一方表示痛惜。

△　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因患肺病不治，在莫斯科逝世。

10月31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举行谈判。政府方面对中共四点主张予以答复，避开停止进兵一条，提出"由路局警察维持铁路秩序"，以抵制中共的双方都不驻兵的主张。

△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实施二五减租办法，办法规定照租约应缴额减四分之一，未免田赋省份明年度开始实行。

△　重庆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及工协重庆市分会召开临时联合会员大会，讨论当前工业问题，并发表《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要求政府拨出100亿元作为定货收购成品专款，支持工业生产以解决失业恐慌；稳定经济，实行“经济第一”、“建设第一”之国策；召集工业复员会议，确定建设大计；大量兴建西北、西南公共工程，以利工业发展；鼓励后方民营工业界人士参与接收、经营各收复区敌伪厂矿；拨款救济一切失业员工，并予以还乡就业之便利。下午，由80余位经理、厂长组成请愿团，赴行政院请愿。

△　美军与国民党军各一部，由秦皇岛犯北戴河，八路军被迫撤出北戴河。

△　魏德迈在纽约重申美军之任务仅在协助中国政府撤退日军，决不参与中国内部之争执。

△　粤富商谭礼庭将全部家产（约合法币二亿元以上）献予岭南大学作教育基金。

△　新四军为肃清苏北伪军，发起盐城战役。战至11月11日，守城伪军被迫投降，歼伪军两个师，俘一万余人，缴枪近1900支。

△　东北人民自治军组成，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萧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自治军相继建立东满、北满、西满、南满四个军区，并迅速发展到30余万人，自治军总部于11月4日成立。

△　吴克华、彭嘉庆率八路军山东军区（胶东）第六师和第五师两个团，约8000人，到达东北营口地区。杨国夫、刘其人率山东军区（渤海）第七师，约12万人，到达山海关、古北口地区。第三五九旅刘转连、晏福生部，约3000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文年生率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约30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

10月下旬　　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王震为中原局常委，同时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中原军区下辖河南、江汉、鄂东三个军区与第一、第二两纵队。

是月　自是月底起，我国开始将分别集中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海南岛、越北各地的日俘、日侨212．9826万人，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12个港口遣送出境。自内陆运输到港口由我方担任，海上运输则由美方负责；美方以登陆艇85艘、自由轮一艘及日船一部分担任运输。截至次年6月底始全部遣送完毕。

△　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以编练任务完成奉令撤销；而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仍继续存在，直至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局成立后始撤销。

△　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自陕北迁往东北，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在此前后其他地区也都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以原抗大分校为基础，先后建立军政大学或军政干校。

11月

11月1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就避免冲突、恢复交通问题进行谈判。政府代表将对中共10月30日所提四点提案的复案交给中共代表。其主要内容为：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各驻守原地；二、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干线10里以外；三、由国民参政会组织交通考察团，会同当地公正人士赴各铁路线考察；四、中央军队如在平绥、同蒲、正太、胶济、平汉北段、津浦北段各铁路有运输之必要时，共同协商定之；五、双方应在一个月内商定对中共军队驻地及其整编等根本办法；六、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何香凝致函宋庆龄、孙科、宋子文表示：“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

△　财政部决定今日起收换伪币，并指定中央银行等先行处理伪储券。

△　财政部派陈果夫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原任孔祥熙免职；李叔明为总经理，原任顾翊群免职。是日，陈果夫、李叔明到重庆中国农行视事。

△　翁文灏在南京接见记者谈称：收复区经济调整问题结症在交通。以沪纺纱工厂言，恢复数十万锭原无问题，存棉尚可应付一时，惟以缺煤未能如愿。物价上涨，一部分系由于伪钞大量出笼。政府曾接收大批布匹，2日起平价供应，衣可无虞，米亦在分头采购，煤亦商由盐船运输，惟开滦矿场情况之紊乱，实非初料所及。

△　苏联大使彼得罗夫通知外交部，营口已被来历不明的军队占领。同日，美军运输舰到达营口、葫芦岛，发现港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决定折回秦皇岛。

△　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系由原有之银、钱两业票据交换所合并改组而成，内设交换、代理交换、总务、会计四科。

△　大华航空公司经经济部、交通部批准，于是日正式成立，此为中国民营航空公司之第一家。该公司有美制C47飞机三架，用于渝京、渝沪、渝汉三线之飞航。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重庆成立。

△　上海横贯黄浦江汽油输送管完成。按此运输管全长4英里，起自浦东美孚与德士古油栈，经黄浦江底，止于江湾机场，油管直径为四英寸，每小时输送汽油250桶。

△　重庆《中央日报》特派员杨政和著文《今日台湾》，内称：台湾人口共约600余万，日人约50万人，为12与1之比。台胞多为闽、粤两籍，通行语言以厦门话及客家语为主，一般台胞虽受日人50年之统治，而归向祖国之赤心终未减灭。

△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晋绥分局，同意在绥远收复后仍用绥远省政府名义，以云泽（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

△　八路军由卓资山西进，是日攻下归绥城郊南北据点多处。守归绥的国民党外围部队退守城垣，依有利地形连续反扑；八路军攻击不克，改为围困，并以主力进攻包头。

△　中共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在沈阳创刊。

△　钟泉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请听东南父老的呼声！》一文，称法币一元换伪币200元的规定不合理，希望政府设法解除沦陷区民众的倒悬，合理规定对兑比例。

△　美国军舰将国民党第十三军全部运抵秦皇岛。在8月至9月间，美国空军已运送国民党军14万到华北。至10月上旬，美国海军又开始大量运送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

11月2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会谈，拟定停止军事行动的具体办法，商定俟分别请示各自中央后再继续商谈。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为制止内战提出四点主张：政府应在10天内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国共双方停止冲突；由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视察团，分赴冲突地点，就地调解纠纷，并公诸社会；政治协商会议全盘彻底的合理解决军队的编遣与地方政治的调整。

△　何应钦在北平电台对华北同胞广播称：抗战八年我军阵亡的

将士计达140余万人，受伤和失踪的170余万，同胞生命财产和其他有形无形的损失牺牲尤属难以数计。并谓日前急要的工作有两项：恢复交通与治安；普及教育与进行工业建设。

△　外蒙观察团雷法章等一行返抵重庆。

△　蒋介石函示蒋经国与苏军商谈护路以待国民党军逐段接防问题和国民党军空运东北计划。

△　毛泽东、朱德联名电贺高树勋，欢迎他率部起义，电称："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对美国希望什么？》的社论，希望美国政府重视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帮助中国立刻停止内战，帮助中国迅速完成和平团结与民主统一，并在实际上使美国切实避免"参加中国内部的争执"。

△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的邯郸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伤亡1．5万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以下官兵2．3万人放下武器。八路军伤亡约4700人。

11月3日　国民政府对东北同胞发表布告，表示将努力安定地方秩序，建立政治制度，扶植经济活力，治标治本，并顾兼筹。

△　陆军总司令部布告取消各机关办事处，并严戒军警人等不得占住民房及招摇勒索、嫖赌、游宴。

△　王世杰复电驻美大使魏道明，要求续向美方交涉日舰分配事，说明我国所受损失较其他盟邦为巨，故赔偿比例自应较大。

△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公告台湾法制原则：中国现行一切法律适用于台湾，日据时代的一切法律、法令一律废止。

△　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王若飞，内称：我方对傅作义、阎锡山军队发动自卫反攻，具有充分理由，如他们诬我发动内战，我将发表蒋介石酉皓致胡宗南电及其他各项内战文件。国大代表必须重选，会期必须推迟一年以后，否则我方坚决反对。政治会议问题，由你们商定初稿，待恩来回来讨论后再定。平、津、青三市应驻我军。

△　安东省民主政府成立，高崇民、刘澜波任正副主席。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副署长韩雷生来华，是日抵达重庆。次日与蒋廷黻等举行会谈，商洽善后救济事项。5日，在重庆对记者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已购价值1.92亿美元之救济品，待轮运到中国；并称中国将列为被援助国之第一位。

△　杜聿明自秦皇岛乘舰抵营口港外，布置国民党军登陆。

△　国民党第五路军吴化文部，由山东滕县北犯，在界河遭到新四军第二纵队和八路军山东军区第八师伏击，大部被歼，军长于怀安被俘。6日，山东军区第三、第四师击退进犯西下店的吴化文残部。

11月4日　朱德致书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就美军10月18日搜查八路军冀中军区驻天津办事处及10月21日美军飞机在河北安次县、固安县上空寻衅等事提出抗议，要求美军保证不再发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及参加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解放区之行为。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美军干涉我国内政真相》文章，略谓："美军正在积极干涉中国内政，不仅以武器、运输工具、训练人员等帮助国民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而且美军已直接向我解放区军民开火，侵犯我华北解放区，逮捕我军人员，收缴我军武器。美军在事实上正在积极进行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　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党部礼堂举行茶会，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正、副主席金九、金奎植等官员返国。次日，金九等一行33人乘专机

离渝飞沪，由沪转乘美机返韩。

△　周恩来就与国民党谈判的办法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次日，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周恩来、王若飞：邯郸战役获得大批文件，证明国民党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在谈判中应采取强硬态度。

△　中共中央向刘伯承、邓小平等发出关于开展西北军工作的指示说，在高树勋起义后，应即从各方面展开对西北军的工作，争取西北军在内战中守中立，并进而起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　中国伊斯兰青年会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更名为“中国回民青年会”，并将宗旨修正为团结全国回民，增进回民利益，融洽民族感情，共负建国责任。

△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所谓“伪学校”、“伪学生”甄审事，发动学生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愿，要求取消甄审，无结果。交大、上医等六所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秘密组成学生协会，提出：“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等口号，6日有千余学生向接收大员李熙谋请愿，并举行游行。11日，学生再次游行。北平、南京等地被列为“伪校”的学生也先后行动起来，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办法。

△　美驻华使馆向美国务院报告称：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威胁正在增长中。共产党从事阻止中央政府占领他们所控制的区域的主要武器，就是共产党部队在那些区域内对付铁路的有效性。共产党相约只要政府答应停止运送政府部队前往华北，就不进行攻击交通线，但政府明确表示拒绝。并表示对中国的情况感到“切乎绝望”。

11月5日　　蒋介石接见重庆工业界代表胡西园、胡厥文及吴羹梅。胡西园等提出：复员工作刻不容缓，工业化应集中使用国内资本，后方工业应能接收日伪工厂，即速召开复员会议等九项意见。蒋介石当向各代表表示：今后将由行政院随时与工业界密切联系，商讨工业复员、善后救济及工业建设诸问题。同日，又接见第一方面军总

司令卢汉，听取其报告在越南受降经过。卢汉称：开赴越北受降之国军约10万人，完成任务循海道返国者已有三分之一。彼等在越期间曾受到当地及邻近地区11万爱国侨胞之欢迎，及越南人士的合作。

△　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谈话，指出吴国桢4日对合众社记者所说“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均居守势”全系撒谎；并指斥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不过是缓兵之计；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　何应钦在北平居仁堂召集高级将领30多人举行“华北剿共会议”，宣布华北“剿共”军事步骤：第一步，借美舰帮助运兵到秦皇岛、塘沽、青岛，并由此到达内地，确实控制大城市。第二步，占领胶济路，肃清胶东和胶州附近的八路军，实行分割华北，占领同蒲路，以分割晋察冀和陕甘宁边区；占领平绥路，以分割晋察冀与东北。第三步，依靠铁路分区“围剿”各解放区。第四步，实行封锁各商业交通线。

△　重庆中国农业协进社、中国经济事业协进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世界科学社、农村科学出版社、环球出版社六团体，发出为停止内战的紧急呼吁，内称：“我人所期求者无他，惟望内战不致造成，民主得以安定，经济建设得以顺利推进。”

△　中苏文协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为庆祝苏联革命节二十八周年纪念，在重庆招待新闻界。孙科发表谈话称：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并加强中苏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称：苏联主张四国共同管制日本的方案，我国应予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继对盟国保留日本天皇一事予以猛烈抨击，谓利用天皇而改造日本为一民主国家，简直是破天荒的奇想。

△　迪化各宗教、文化、教育团体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政治部长张治中、国民政府委员麦斯武德及其他中央来新人员。张治中致词，

谓中央决以同胞之爱扶助边疆人民。

△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指示在和国民党谈判恢复交通等问题中必须强调立即制止内战，应先解决解放区担任受降、解散伪军、实行自治三个问题，才能恢复交通；应揭露国民党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所谈尽是欺骗。

△　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五次会谈，熊氏指责东北苏军故意设置障碍，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不负责北宁路运兵的安全，禁止东北行营视察交通设施，还把营口、葫芦岛转交中共，所有这些行动完全违背中苏条约的精神。马氏反驳说，苏军不可能阻止八路军进入营口，葫芦岛早已被中共军队占领，苏军不能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并谴责国民党在东北进行反苏活动。

△　中共中央关于热河施政纲领问题给胡锡奎、赵毅敏指示，指出宗教问题在热河至关重要，应增加宗教信仰自由，还应增加各党派、各阶级合作及三三制；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保护盟国外侨，欢迎盟国资本正当投资等内容。

△　周至柔在南京对记者称：美驻华空军所有器材，包括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将全部移交中国使用。中国已开始训练接用人员。按：中国战区美空军飞机，包括飞驼峰空运总队，总数在3000架左右。

△　俞飞鹏在记者招待会称，北方各铁路合计1413公里被毁；并称治安问题一日不解决，燃料终难如愿解决，今后将分段驻兵切实保护。

△　辽北省民主政府成立，阎宝航任主席，栗又文任副主席。

△　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成立，张苏为省主席。

△　南京硫酸铔厂复工，日产肥田粉百吨，为我国最大之硫酸铔

厂。该厂原为永利公司所有，战前数月始完工，八年来被敌盘踞，制造硝酸部分设备且为敌转往日本。

△　在华美军租借组长霍克称：美军用汽车1．5万余辆，已在美租借条款规定下转交华军，用以协助华军运往收复区。

11月6日　国民政府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为处理战犯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日，又任命田培林为河南大学校长。

△　中共发言人在延安就国民政府提出组织交通考察团事发表谈话称：中心问题是内战问题，不是交通问题，因为内战是基本问题，交通是技术问题，基本问题不解决，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因此，主张组织内战考察团分赴各省考察两党军队移动、作战、占地及对人民态度、人民反应、敌伪表现和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等事实，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中外新闻记者等自由访问解放区。

△　翁文灏接见工业界代表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商谈有关工业诸问题。翁氏表示，前此工业界对挽救当前工业危机、协调劳资纠纷、接收敌伪厂矿及今后工业建设诸建议，已由行政院会议提出讨论，短期内可有具体决定。至工业界于5日上呈蒋介石之各项意见，蒋介石亦已交由行政院商讨办理。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美军应立即停止参加中国内战》的社论，指出：美国在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如空运国民党军队到华北解放区、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北登陆、美军担任所谓“护路”任务、美国继续装备与训练国民党军队以及仍拟军需品等贷给中国当局等，都必须立即改变。这样，中美的友谊才能持续于永久，东亚的和平也将得有发展。

△　东北苏军当局通知熊式辉，同意用美军运输机将国民党军队空运至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于苏军撤退前5日降落。地面设备由苏方负责，每次只准许降落飞机一架，空运部队的驻地由苏方指定。

△　美国社会服务员工会致电蒋介石、张澜、毛泽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指出："这种片面干涉中国内政政策的结果，已经加重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　林伯渠、李鼎铭在延安主持鸡尾酒会，邀集在延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代表与各解放区代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吴玉章向《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十月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次日，延安各界二万群众集会庆祝，并在致全国各界电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

△　中国军队在老挝（寮国）解除日军武装完竣。

△　马来亚森美兰邦之爪拉霹拉一群马来人，冲入华侨所居之村落，大肆屠杀华侨。据森美兰华侨总会调查，华侨84人被杀，四人受伤，另有抗日军四人被杀，二人受伤，难民达3197人。被害侨胞派代表面见陈嘉庚、连瀛洲陈述一切，经陈促请英国殖民当局注意戒备，以防事故重演。

△　作为中国战区处理战争罪犯的惟一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成立。徐永昌、陈诚、王世杰、谢冠生、蒋麟、王化成等任该会委员。

11月7日　蒋介石致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加里宁祝贺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希望共同维护远东和平。同日，苏联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各界及各国使节。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对外国记者称：政府深切期望中共能即指定其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之代表，以便早日召开会议；并盼第十八集团军之代表能从速来渝，成立军事小组，庶可对中共军队驻兵地区及其整编等商定根本办法，以利和平建设。

△　熊式辉致马林诺夫斯基备忘录，开列六次会谈内容七点：

一、苏方同意于苏军撤退前5日，由中国空运部队至长春、沈阳；二、苏方于10日前将撤兵日期通知中国；三、苏方保证空运部队之飞行安全；四、中国可用美国飞机空运部队；五、苏方负责解除营口方面非政府军队之武装，并保障政府军队之安全；六、中国政府所派行政人员即赴各地到任，苏方通知军队协助，请作准备；七、行营即派人至哈尔滨、长春、沈阳筹组地方团队。

△　周恩来、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我们对于美国人及其政策的批评，宜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最近延安广播的评论说他们说谎，这两个字在基督教国家等于骂人无人格，最易引起反感。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意见，将延安、重庆的英文评论稿中说谎用语改为“不合事实”。

△　重庆中国妇女联谊会为制止内战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双方马上停止军事行动，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目前的军事冲突和国共会谈纪要中所未解决的各项问题。同日，延安各界通电反对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

△　据新华社统计，国民党用以进攻解放区之正规军，迄是日为止已达49个军100万人。

△　新华社在延安公布国民党第一战区“清剿”计划，其内容是：规定七个清剿区的指挥官、范围和兵力，统归副长官裴昌会指挥，要求“凡接近黄河之清剿区，应确实控制各渡口，接近山区，应确实控制各要点以阻奸军流窜”。

△　远东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处置日本工业问题；美代表对日俘遣返问题表示关切，说在华日人仍有400万，在太平洋方面则达600万之多。

△　魏德迈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华北美海军陆战队须三个月以后撤离；希望国民党中央与中共能谋取解决内争，不致使事态扩

大而影响及于中国与诸盟邦一致所祈求之目的。

11月8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为有效的停止内战，应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先下令所属部队实行下列四事：（1）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2）从进占区全部撤退；（3）从八条铁路线撤退；（4）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以后再不进攻各解放区。"政府代表以中共所提四点对他们在本月1日提出的六项未予明确之答复，表示无从商谈，谈判陷于僵局。

△　外交部电驻苏大使傅秉常，令查明苏联兼并我唐努乌梁海真相。11月22日，傅秉常复电称："苏报最近发表选举区，确将唐努乌梁海列入在内，称为杜伐自治省。"

△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山海关3日已打响。"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关于宣传工作，你提的意见很对，应当采取"哀者"态度，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保留伸缩余地"。

△　台湾省接收工作业已完竣。是日台湾省长官公署委员分赴台北、台中、台南、新竹、高雄各州及台东、花莲港、澎湖各厅分别接管；派黄朝琴、石延汉、连谋为台北、基隆、高雄市长，成立市政府。并根据地方实际情形，分置七市24县。

△　重庆《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新中华》、《中学生》、《东方杂志》、《再生》、《文汇》等十大杂志，联合出版增刊《呼吁停止内战》专号，主要内容有：重庆27种杂志的呼吁《不要内战》、黄炎培《老百姓不能再流血了》、章伯钧《谈内战问题》、俞颂华《为制止内战危机呼吁》、叶圣陶《也算呼吁》、陈翰伯《请美军退出中国》等文。

△　八路军晋冀鲁豫野战第四纵队攻克同蒲路上的赵城及什茨、南关等车站，控制同蒲铁路150余里，截断国民党军继续沿同蒲路北上的道路。同时，太行、太岳军区部队解放沁阳县城。

△　魏德迈在上海对记者称：已决定派5．3万名海军陆战队代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执行任务，并称美军在华之立场，乃在完成协助中国军队接收，促成日军缴械之任务。对中国内政及政府与中共纠纷，绝不愿作任何批评与干涉，并希望中国不发生内战。同时，美国务院以对华外交要领通知驻华大使馆，以促进中国安定统一为主，中国现政府为国民党专政，政权无力，军队贪污，政治缺乏人身安全保障，应迅速建立宪政，必须随时注意现实状况，在华美军不得卷入内战，亦不得予中国政府以戡剿叛乱之便利。

△　行驶粤、港“海珠号”轮船在虎门爆炸沉没，千余人罹难。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自今年10月至明年12月止15个月内，中国区救济经费为九亿美元。

11月9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商讨制止冲突、挽救危局办法，建议政府提前召开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共同讨论国家大计，集中各方意见，合理解决国事。

△　行政院电告各收复区省、市政府及田赋粮食管理处，对于历年旧欠田赋，亦一律缓征一年，俟明年新赋开征时再行并征，以纾民困。

△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欢宴马林诺夫斯基及苏军其他高级将领，并邀张嘉璈、蒋经国及九省主席、两市市长等作陪。席间，熊式辉、马林诺夫斯基、张嘉璈、蒋经国均发表致词，表示要彻底实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马林诺夫斯基亦表示全部邮电设备可交还，多余武器亦交中国政府。次日，熊式辉自长春飞回重庆，直接向蒋介石请示对策。

△　周恩来、王若飞邀请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告以最近国共商谈情况，以及缴获蒋介石重新印发之《剿匪手本》与发动内战的作战命令。

△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在重庆对记者称：我军任务为接受越北日军之投降，故对法越冲突绝对采取中立态度，不加任何干涉，惟负责安定越北秩序，并保护法俘、法侨使其重获自由。入越我军任务今已部分完成，一军业已奉令他调，另一军亦待运中。由此可知，我对越南并无任何领土野心。目前越北侨胞为数约11万余人，与法越人民相处和谐。

△　原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校级官佐百余人，在太行解放区集会，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并揭露阎锡山强迫进攻八路军罪行。

△　美国中国学社开会讨论中国政治问题。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李璜说，中国政治由两个主流支配着，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和武力割据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就是现代合作统一的民主思想。《时代》、《生活》、《幸福》三大杂志发行人鲁斯说：中国目前是建设一个强大和工业新国家最良好的机会，希望这个黄金时代不为自私的内战所毁坏。

△　据重庆《中央日报》报道：桂省敌军退却时，沿途所经城市悉被彻底破坏，尤以桂、柳两城为甚，桂林房屋被破坏者约99％，柳州约98％。广西99县遭敌蹂躏者达72县，各县耕牛亦遭屠杀，今春各地大半未能播种，秋收极微，民食颇成问题。全国各省中广西沦陷最后，收复最先，而受害最惨。

11月10日　　国民政府任命黄朝琴为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并派包华国等10人分别为出席国际劳工组织海事专家预备会议的政府、雇主、劳工代表以及代表顾问、秘书。

△　美军移赠国民党军飞机200余架，并助国民党军建立空军。

△　中国空军荣誉第一联队司令徐焕昇获选世界飞行员之一。

△　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及迁川工厂联合会三团体，为制止内战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政府及中共双方即日停止内战，并请政府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争端，议订和平建国纲领。

△　中国民主实践社致函重庆各报社紧急呼吁大家起来制止内战，要求立即停止任何地区军事冲突，停止进军，惩办伪军头目和勾结敌伪的不肖将领。

△　华中野战军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四个纵队。

△　高树勋起义部队齐集武安县阳邑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

△　孙良诚部苏北绥靖公署所属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四十师师长戴心宽，率五个团一个总队共一万余人在苏北起义。

△　重庆妇女界人士黄三妹、李亦芳、杨祯、陈英等发表致美杜鲁门总统、美国妇女及各界人士公开信，要求杜鲁门总统停止帮助中国反动派，美国各界人士动员起来要求美国政府撤退驻华美军。

△　重庆《民主星期刊》第七期发表陶行知教授致美国名教育家杜威函，请求杜威联合美国各界名流，号召全美人民起来制止美国对华干涉政策。同日，美国5000名基督教牧师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实现不干涉中国内政诺言，不要让中国成为亚洲的西班牙。

△　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迅速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

——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作当前紧急任务。

△　四川綦江铁路通车。

△　朝鲜汉城发生劫杀华侨事件，张金明全家三人遭杀惨死。近两月来，汉城及郊外已有40余家华侨家庭遭抢劫。

△　英军与印尼人在泗水血战，当地华侨六万人陷于绝境。

11月11日　　复员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诚、张治中、张群、顾祝同、阎锡山、刘峙、孙蔚如、卢汉、汤恩伯等军委会各部、会长官及行营、战区长官等出席。蒋介石到会致训词。何应钦报告中国陆军总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并对今后整军工作有所指示。会议制定“对共产党全盘战争”作战计划，“三个月到半年消灭共军”，于16日闭幕。

△　国共双方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邀请民主同盟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鲜特生、周鲸文在重庆特园举行会议，商谈政协会议和国民大会召开时间及停止军事冲突问题。商得三点：一、政治协商会议日期主张本月20日左右召开，希望中共速复；二、国民大会日期，政府主张明年5月5日，不加可否；三、双方先电令停止军事冲突。

△　美舰31艘载运国民党军四个师在秦皇岛登陆。

11月12日　　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定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

△　蒋介石主持孙中山八十诞辰中枢纪念会，并派员飞南京代表谒陵致祭。东北、台湾及海外亦举行纪念孙中山八十诞辰纪念活动。

△　孙科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作“和平统一，和平建国”广播讲

话，要求以作战精神争取和平胜利，盼各党派忍谅恕让，相安相成，勿因小我得失危及国家前途。

△　国民参政会举行在渝参政员茶会，周恩来发表谈话，报告目前各地军事冲突及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等问题。

△　军政部长陈诚在复员整军会上作报告，说明整编军队的目的，在于如何使现在庞大复杂之军队，调整为少数必须之常备军，编余官兵则将予转业资遣，全部整军工作明年完成。

△　翁文灏在北平对记者指斥收复区之种种不良现象“坏到使人不敢相信”，并厉声称：“本人官可以不作，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

△　国民政府派赴香港参加受降之潘华国、刘方矩等，于是日由港返渝述职。潘氏在渝对记者谈及香港目前情况，并说港胞均希望有一强大、独立、统一之祖国。此次祖国军人堂堂正正出现于香港，并与英方官员平等往来，实为百年所仅见。

△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四项主张：一、立即停止各地的军事行动，不进兵，不进攻，不增兵；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切实解决有关受降、驻军及地方自治等问题；三、立即阻止国共两党在东北各省区发生军事行动，改组东北接收委员会，首先成立地方联合政权；四、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

△　东北银行在沈阳成立，叶季壮任总经理。该行属辽宁省民主政府，在东北各地共设18个分行，发行东北地方法币一元券、五元券、10元券三种，与伪满币比价为1：10，通行东北全境。

△　《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下辖南京、上海、汉口、重庆、兰州五分社。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华工合作会致函杜鲁门总统，请求：一、

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二、不要以武器和文通工具协助任何一方；三、承认维持远东安全是维持世界和平所必需。

△　美陆军部长柏德逊在华盛顿发表谈话称：在华美军将协助中国中央政府解决在华100余万日军之武装，并遣送返回。除非遭遇攻击，决不参加内争。美军将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倘或遭遇攻击，将必予以有力之抵抗。

11月13日　　蒋介石核定法学家王宠惠草拟之对日本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

△　杜聿明部第十三、第五十二军攻占山海关。

△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在重庆谈南京近况称：南京之秩序已完全恢复，现有人口74．025万人（战前为118．9506万人），房屋战前为6.2156万栋，被毁者共4596栋。教育方面，计有中小学生三万余人。物价问题据市府估计，自受降迄今，最高者涨达五倍，因之市民生活至感痛苦。

△　重庆复旦大学等30多个团体、1000余人，举行纪念孙中山八十诞辰晚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老舍、陈望道等呼吁与会者“联合起来，用口、用笔、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14日，成都各大学等21个团体也发表制止内战宣言，并提制止内战的三项要求。

△　黑龙江省民主政府在北安成立，陈大凡任政府主席。

△　苏大使彼得罗夫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国空运长春等地部队以宪兵、警察为限。

11月14日　　伊宁代表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再来迪化。是日，张治中会见赖希木江等三人，赖希木江等出示《伊宁方面对中央提示案之意见及所提要求》，全文共分11项。张治中在研究之后于次日提出答复，其要点：（甲）县长可由民选，但副

县长应由中央委派；（乙）官厅文书汉文、回文并用；（丙）小学用固有文字，中学以汉文为必修科，大学汉文、回文并用；（丁）在国内准予自由贸易，对外贸易须候对外商约及经济合作办法商定后才能确定；（戊）改编军队由中央派员点验，按实有人员大部编为地方团队，其余编为国军，以团为最大单位。

△　嫩江省民主政府成立，于毅夫任政府主席；并成立护路军，郭维城任司令员。同日，热河省民主政府成立，李运昌任政府主席。

△　中共中央给林彪、彭真发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主力集中作战之枢纽”的指示。

△　国民党军队开始在青岛登陆。

△　香港政府取消进口限制，中国各地来客可自由登岸。

△　魏德迈向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提交报告，内称：海军陆战队在天津到秦皇岛地区采取的行动，对保护交通是完全必要的。目前运抵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有第十三、六十二、九十二、九十四等四个军。这些军队足以把美军从其占领区替换下来，并同时保护一些有限的地区。但是，蒋介石如果坚持要守住现在已占领的所有地区，并企图加以扩大，特别是准备进入东北，肯定需要美军继续替他看住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

△　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报界称：杜鲁门总统曾下令再予中国租借援助，以助其达成使全中国各地（包括东北在内）日军投降之任务。美国官方认为中国内争乃“一大憾事”，惟美国迄未参加中国任何一处所发生之纠纷。

△　赫尔利在新墨西哥州对记者称：美国在华绝无帝国主义之野心，亦不拟谋取任何特权。今美军在华之任务，确系盟国对日作战之结束阶段；并称：美国深盼中国政府能成为其一己之领导政权，厘订

其一己之政策。

11月15日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就避免内战、解放区政权、敌伪受降、国民大会、政治协商及外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周恩来指出：接受日军投降工作不若想象之困难，不需美军在点与线上驻兵，现在美军行动与原定计划不符；魏德迈将军所说关于美国准备给中国50师装备和在华剩余军火物资的计划，就是要以武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　蒋介石自是日起连续三天在重庆林园举行座谈会，各战区、方面军高级将领参加。会议首由12个战区分别报告，次为四个方面军报告，最后由蒋介石作讲评，并由各将领检讨工作。会议策划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剿。

△　蒋介石因接收东北遇到困难，令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全部自长春撤至山海关。17日，东北各省主席及接收人员撤离长春。

△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林彪、彭真的指示，指出待敌疲劳时，由林彪、罗荣桓亲自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　东北人民自治军黑龙江军区成立，叶长庚任司令员，王鹤寿任政治委员。次日，吉黑军区成立，高岗任司令员，陈云兼政治委员；松江军区成立，聂鹤亭任司令员，张秀山任政治委员。

△　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致电感谢美国旧金山国际码头工会声援中国人民；并希望他们号召美国工友和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督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美军武装干涉中国，立即禁止对中国反动派任何形式的援助。

△　驻华美空军代表团在重庆成立，并由蓝度出任团长，协助国民党军建立新空军。

11月16日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大召开问题称：此举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双十协定》的又一次背弃，足证国民党方面对目前国内重大政治问题，均无诚意经政治途径与各党派会议协商解决，亦透露国民党政府现在已下定破裂国内团结、实行大规模内战的决心。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特讯《国民党调动200万大军发动全面内战真相》，指出：国民党下达“剿匪”命令以后，“各个有关战区及其所用兵力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十个军，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七个军，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五个军，孙蔚如的第六战区五个军，余汉谋的第七战区二个军，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四个军。此外，还有不属上述战区六个军，人数共达56个军，加上挺进部队及奉命参加内战的敌伪军50万人，共约200万人”。此外，还简要介绍国民党各个战区对解放区的进攻和“清剿”目标和计划。

△　杜聿明部攻占已被八路军占领的山海关，随即沿北宁路北进。

△　重庆中共发言人对《新华日报》发表对于赫尔利最近在美谈话的评论，指出：我们不能不认为赫尔利谈话是极不公正，且与事实完全不符。鉴于中美关系是如此重要与处于如此重要的发展阶段，而赫尔利却如此不了解中国的情形和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我们诚恳希望美国政府采纳美国舆论的意见，使中美的友谊能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真实的进步，而不致为这类轻率的谈话所破坏。

△　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已通知美军第三军，在唐山、秦皇岛之间如“受中共军队之袭击而发生危险时，可执必要而适宜之军事行动”。

△　爪哇泗水英军与印尼人激战一周，华侨死伤逾五万人。

△　苏军将溥仪改囚伯力收容所。

11月17日　　张群、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德安里谈判东北等问题。周恩来提出：让东北发展成为平等、民主与和平的模范区，要求停止在北宁线上运兵。

△　张治中与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于是日及次日继续在迪化商谈。在两天商谈中，大部分条款都获得协议，但伊方代表还坚持下列各点：一、要求给予完全自治，自省主席以至县长各级行政官吏都由人民选举；二、政府机关官方文书均用回文，大、中、小学均用国文施教；三、商民得对外自由贸易；四、组织民族军队。

△　重庆青年界召开大会纪念世界学生日。按：德军攻占捷克后，自1939年11月17日起，将布拉格及捷克各大城市学生捕入集中营，并封闭一切高等教育机关。世界学生大会于1941年定此日为世界学生日。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真和平与假和平》，揭露国民党玩弄假和平的阴谋，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一切“剿匪”密令，停止向解放区进攻和运兵，公开合理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地区。并忠告国民党当局：你们现在还在骗美国政府，说中国人民没有力量，说三个月到半年就可以消灭共军。你们的如意算盘，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　原阎军将、校、尉217名官佐在太岳解放区联名发表通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政府履行《双十协定》，立即撤退进攻解放区军队，实行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

△　苏大使彼得罗夫照会外交部否认国民政府关于苏军支持中共的指责，并说明中共军队占领苏军撤出的某些地区，是国民党军队无力控制的结果。如果国民政府同意，苏军可以暂缓撤退，并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沈阳和长春等大城市。

△　美国21艘运输舰自是日起运送青岛区之日俘及日侨回国。第

一批计有海军1700人，陆军4300人，日侨1.5万人。

△　英国牛津大学授予胡适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　印度著名美学教授甘歌利应教育部之聘来华讲学一个月，是日抵达重庆。

11月18日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军事会报，决定仍要求苏军先解决长春中央军安全接收等问题，至于进军东北则空运暂缓，陆路照行。

△　中国人民反内战同盟发表《为国共军事突冲告全国同胞书》，内称：内战的炮声频频传来，我们正站在毁灭与新生的岔路上，只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挽救我们自己的命运。情势太紧迫了，我们必须立刻起来，制止内战，彻底消灭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因素。

△　上海、青岛港口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负责协助运送日俘、日侨返国，唐君尧兼任司令。日俘自是日起自青岛、塘沽、上海各港乘美船返国，平、津两地每日载送3000人。

△　美国舰队司令柯克到广州与宋子文会商开发海南岛资源及黄埔、榆林开港事宜。

11月19日　　外交部答复苏联大使照会，提出接收东北应重新拟订具体办法，经双方同意后实行。所谓具体办法就是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和阻止中共力量的发展同时进行。它包括：解除沈阳、长春及其周围机场附近中共部队的武装，苏军必须给予方便，使通过北宁路和各港口运兵顺利进行；苏军协助国民政府接收行政权，并准许编组保安队。如果上述条件被接收，可以同意苏军缓撤一个月。20日，苏联大使又照会外交部，对外交部所提条件除保证空运至沈阳和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安全着陆之外，其余一概拒绝。

△　重庆各界人士500余人集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郭沫若、陶行知、黄炎培等在会上发表反内战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包括以罢工、罢课、罢市、拒绝纳税等来制止内战，号召国民党官兵拒绝内战，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　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出长春、吉林等地，26日主动撤离锦州。

△　魏德迈接到美陆军部命令，责成他把美海军陆战队限制在华北，避免卷入对东北的军事行动，只能从“心理上加强”蒋介石的力量。

△　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题为《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的社论，内称：美国应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协助中国完成统一独立，亚洲始有永久和平可言。

△　盟军总部下达第二批拘捕战犯令，列名者荒木贞夫等11名，以侵华战犯居多。

11月20日　　国民政府明令第二次改组云南省政府，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为民政厅厅长、华秀升为财政厅厅长、王政为教育厅厅长、陇体要为建设厅厅长。

△　国民政府任命张笃伦为重庆市长，原任贺耀组免职。

△　中国政府开始接收澎湖。

△　行政院拨款40亿元救济后方工业。

△　宋子文在重庆再度接见工业界代表吴蕴初、胡西园、胡厥文，表示前此工业界请求之增拨紧急工贷及放宽工贷范围、继续定货、收购成品、接收敌伪工矿拨交民营工厂经营、修改解雇工人处理

条例、召开工业复员会议等项意见，均经行政院批复，所应办之各事项亦交由主管机关办理。至有关劳资问题之法规，应予改正者，亦由社会部办理。

△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决定改变10月19日以来拒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要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　东北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根据上级将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交国民政府接收的指示，决定凡苏军驻扎地区，中共军队不得进入，并不准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内，亦不准作战；中共军队必须退至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大城市撤出。

△　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社论，反驳美国官员所持“共产党遭到袭击，只是因为他们干预受降敌人事宜”的说法，指出围攻山海关，源源冲入东北的重庆军队，并不是以日人作对象，他们的主要目的在和共军竞赛，以便占有远东最富足的农业地区。

△　美国纽约《太阳报》刊载赫尔利对《生活》杂志关于中国之社论的评论，赫尔利重申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称美国在华部队今日正执行受降令以解除日军武装，并移交其装备于中华民国。

△　发动九一八事变引起中日战争之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畏罪自杀身亡。次日，美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社论称：本庄繁的自杀，对于美国将是一个备忘录，警告美国不要重蹈1931年在东北的覆辙。

11月21日　　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长江三峡水力发电计划委员会合约》。旋资源委员会组设“三峡水力发电计划研究委员会”，主持三峡开发事宜。

△　国民政府批准《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按照此项协议，美国飞机得以在中国领空进行军事调查活动。

△　梁漱溟在重庆区海关同人进修会讲《中国的统一问题》，内称：中国今天是最最需要统一了，但是，统一是要统一于一个能够十足代表全国国民利益的民主的政府，统一于明确的建国的目标之下。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严正驳斥《大公报》说中共要求特殊化，要求南北朝，要乱不要变的谬论，指出《大公报》把内战的责任写到第十八集团军的帐上，不是大公无私的态度。在一切首要问题上拥护国民党当局，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　合江省民主政府成立，李延禄任政府主席。

△　招商局接收日轮告竣，其中江轮改名“江宁”、“江陵”等，多艘续驶长江航线。

11月22日　　蒋介石以东北、华北接收困难，电请美总统杜鲁门拨足船只，以赶运五个军前往冀、鲁、热、察、绥诸省接收。

△　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复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于美、英、加三国关于管制原子能之联合宣言申明两点：为废止战争，必须增强并扩大联合国机构之权力；尽速成立原子能管制委员会，以便保证原子能不能用于破坏之目的。

△　熊式辉电促张嘉璈将东北行营限期撤离长春。

△　马林诺夫斯基在与国民政府驻长春的军事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苏军在中国政府军队未到达及中央政府的行政基础未确立之前，暂不撤离。

△　财政部规定法币一元兑伪联银券五元，是日起实行并定期收

换。

△　据重庆《新华日报》报道：工业界巨子吴蕴初具呈经济部，表示愿将生平投资于各种事业的股票，计票面509.28万元，以目前价值计，至少在五亿元以上，完全交出，另组织保管委员会共同保管，自1946年起，产业盈利收入完全作为公益费用。

△　上海《申报》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被敌伪侵占，是日正式复刊。

△　第五十二军是日先后攻占兴城、连山、葫芦岛等地，秦皇岛与葫芦岛间铁路电信均恢复。

11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凡11条。同日，行政院公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

△　据重庆《新华日报》载：郭沫若、洪深、老舍、茅盾、叶圣陶、孙伏园、曹靖华、胡风等17人致函美国援华会作者委员会赛珍珠和全美作家，请求他们发挥如椽之笔的力量，使美国人民明白在中国发生的事实真相，为中美两国人民悠久的友谊采取有力的措施。

△　马来亚华侨团体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呼吁早日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反对内战。

11月24日　　蒋介石会见美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续商华北、东北受降事宜。

△　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在成都对记者称：月来在渝继续与共产党代表商谈，主要问题为避免冲突、恢复交通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三事。此次参加商谈代表秉承政府意旨，努力不懈，对避免冲突、恢复交通办法已略作具体之商谈，意见尚未一致。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业经商定，并已预定下月1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均系各党各派人士及社会贤达参加，悉心研议，谅能获得合法合理之解决。

△　云南省党、政、军当局举行联席会议，代理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徵、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等出席会议，议决："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次日，李宗黄召集各大学负责人开会，要求各校务必制止学生集会。

△　齐齐哈尔市民主政府成立，朱新阳任市长。

△　重庆世界科学社致电全世界科学家、教育家、宗教家、实业家、政治家和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请求一致敦促美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供给过剩军火，以拯救中国人民，及早扑灭亚洲原野的熊熊战火。

△　东北各地区工会代表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与会代表30余人。陈郁作当前东北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以及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等问题的讲话，各地代表交流工运工作发展的情况和经验。一致决定以到会代表为委员，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吉林、鞍山等工会九位代表为常委，建立东北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并推举陈郁为筹委员会主任。

△　魏德迈在上海对记者谈话称：北方美军暂不撤离；并称：美军计划助华配备36个师后，以装备有余，乃以所剩余者再配备三个师，共成39个师，其中20个师曾受新式训练并参加抗战。

△　长春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之经济顾问斯拉特哥夫斯基，正式向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要求中苏共同经营东北工矿及民航事业，计154种。

11月25日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张嘉璈，听取其报告留守长春近况。张强调东北局面有转机，并谓："中央军五万人去东北，应无问题。""经济合作方案宜早决定，庶几省、市接收可望顺利进行。"

△　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和昆华、南菁、五华等校学生，以联大学生自治会名义准备在云南大学礼堂召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时事晚会，国民党军队当局闻讯发布禁止集会、游行的命令，并不准云南大学借给礼堂。时事晚会遂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到会学生约6000人。闻一多、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等教授发表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愿望和利益打内战的阴谋，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座谈会开始不久，国民党第五军即包围会场，鸣枪威胁，国民党特务切断电线，企图引起混乱。与会学生不怕恐吓和破坏，严守纪律，坚持开会。联大等四大学学生团体联合建议：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提案。

△　行政院命令在接收原“台湾帝国大学”基础上成立“台湾大学”。

△　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讨论和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并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任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

△　重庆各大学学生张永和、张宫、王金、李诚、黄左、赵明礼等614人联名致书美国学生，请他们发动人民，督促政府停止帮助国民党运兵，撤退在华美军，阻止政府把租借物资交给中国反动派。

△　黄金价格在战后几个月中，经过当局的稳定金价措施，慢度回涨，旋即回升到11.5万的价格。黄金暴涨，出现黑市，与政府牌价差距日大。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救济船六艘抵沪，载运小麦、面粉、车辆与医药品等计三万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接收后，将视各地需要统筹分配。

11月26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

联席会议，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并决议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

△　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最高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通过该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决定以行政院正、副院长兼任正、副委员长，经济、交通、农林、粮食、财政、教育、社会等部部长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等为当然委员。

△　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对记者称，东北接收工作甚为乐观，我接收人员即将陆续派赴东北，苏联极愿协助我方进行接收。接收东北技术人员，须有经验及技术者，政府将尽速训练大批人员备用，在过渡期内恐一部分矿厂人员将暂时借才异地。

△　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表示接受苏方的建议，立刻派代表前往长春恢复谈判。同日，外交部与有关部、会商定接收日本船舰与索还日本掠夺我国之文献、古物办法。

△　国民党军以第十三军为攻击兵团、第五十二军为迂回兵团续向锦州攻击，于是日攻占锦州。

△　董必武从美国纽约乘机回国，是日抵达重庆，章汉夫随行。

△　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当局派军警破坏昨晚时事晚会的暴行举行罢课，要求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的反动命令，反对内战，并呼吁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　港、沪航运恢复，第一艘航轮“永生号”是日晨离港驶沪。

△　魏德迈向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报告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认为即使蒋介石暂停接收东北，全力巩固长江以北和长城以南地区，如果没有美军的帮助，这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12月初，再次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华北形势，称驻华美军实际上正为国民政府防守着秦皇岛、天津、北平和青岛，并控制塘沽到秦皇岛的铁路线。大约有一万日军在

协助美军护路。除非协助国民政府增调军队，否则美军无法执行解除日军武装的任务。并要求美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确定美军驻华北的目的，而且宣布美国不向任何人发动攻击。

△ 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在上海对记者称：今日华北局势诚为严重，现今驻防华北之美海军陆战队共有五万人，以协助国军完成受降工作。

△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德拉西在众议院提案，敦促杜鲁门总统立即召回驻华美军部队。

△ 美总统杜鲁门私人代表、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洛克离渝返美。行前招待记者谈在华工作，谓商谈经济合作结果圆满，并对中国经济前途表示乐观。

△ 国际妇女联盟在巴黎成立，中国为发起国之一。

△ 印度尼西亚国会宣布：泗水事件华侨死伤5.5万人。

11月27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取消战时生产局与战时运输管理局，并通过设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等案。

△ 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为互换中荷条约批准本全权代表。

△ 国民政府向新闻界发表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计38人。其中政府代表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等八人，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七人，青年党代表为曾琦、陈启天等五人，民主同盟代表为张君劢、张东荪、梁漱溟、沈钧儒等九人，无党派人代表为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等九人。

△ 何应钦在重庆对记者称：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事宜，现除山东及河北两省区外，其他各地区均照原订步骤完全解除日本武装，所收缴日军武器亦悉数点验封存。各地日俘、日侨均集中管理，现已

开始遣送回国。此次召开之复员整军会议，主要在讨论编余官兵之安置、残废官兵之教养、阵亡将士遗族之抚恤等具体办法。至于今后军区划分，俟核定后即可公布。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副署长韩雷生、上海分署署长凯塞及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正、副署长刘鸿生、王人麟等，在上海招待中外记者报告工作情形。韩雷生称：各地破坏情形以柳州、衡阳等地为最惨重。载运救济物资船已有六艘抵沪，以后平均每月将有30艘来华，每船载重约8000吨，盼望中国政府能迅速动员各种交通工具，将救济物资由沿海运入内地。继由蒋廷黻报告谓：政府已拨善后救济款项1000亿元，明年将增至4000亿元。至于救济物资之分配，将以战时破坏之程度及最近二三年内所遭天灾程度决定。

△　重庆各大学学生联合会致书美国政府，呼吁美军退出中国，反对美国政府资助国民党加剧中国内战。

△　据重庆《大公报》报道：据约略统计，在日之侨胞约五万至六万人，亟待返国者约1.3万余人。各有关机关已商定办法，利用日侨回国空船接运。

△　美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决定：海军陆战队必须留驻中国；继续帮助国民党向华北运兵；在日军撤出地区实行停战；在国共之间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把共产党地区和部队包括在内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和中国军队。

△　赫尔利在美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宣布辞职，并指责职业外交人员设置阻力，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混乱。28日，向美国报界发表辞职书。

△　杜鲁门总统批准赫尔利辞职，同时任命原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28日，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就杜鲁门此项决定

答外国记者称：“赫尔利大使为中国之真实伟大友人，赫氏辞职自令人惋惜。马歇尔元帅为美国当代名将，此番以特使身份来华，自必获我朝野欢迎。”

△　美国将其在中印缅战区所有飞机包括战斗机、运输机共700架移交国民政府。

11月28日　国民政府宣布以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结束日期。

△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魏德迈、巴贝，会商加速运送国民党军进驻东北事宜；并改变暂不接收东北主张。同日，又召见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计氏报告班禅大师堪布会议厅工作近况，蒋介石予以慰勉。

△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东北部队在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将工作重心放在群众工作方面。

△　朱德在延安就中国共产党对于东北问题的态度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当局不经过与中共正式协议，而经过美军的援助，硬把军队开入冀热辽解放区，这是北宁路上发生内战的原因。希望国民党在国共《双十协定》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东北纷争，其基本关键在于成立全国的及东北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还要求美军不要参加中国内战，以免加深中国的分裂与中美的误解。

△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明俄文专科学校、省立英语专科学校、联大附中等31所学校全体学生，联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并抗议国民党军警武装干涉集会。

△　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称：“美国对华政

策将无改变”，“美国乐于运用其善意的机能，使中国的两党联合。”

△　魏德迈接到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通知，重申要他执行美国继续在后勤方面援助国民政府的命令。

△　美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对记者称：马歇尔使华将执行美国一贯对华政策，惟此种政策将较以往有更明晰之说明。同日，魏德迈在重庆对记者称：马歇尔代表杜鲁门总统到中国来考察军事及一般情形，然后向总统提出具体的方案供采择。

11月29日　蒋介石批准拨发100亿元，备日俘、日侨三个月食粮之用。

△　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央。《意见》共有七条，分析苏联在东北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总结我军转入东北后三个月来的斗争经验，阐明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党在东北工作应采取的基本方针。认为我们首先独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没有了。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个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这个电报于是日及次日分两次发往中央。中共中央收到第一天电报后即复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央完全同意。

11月30日　国民政府与苏军当局就接收东北问题谈判达成协议：苏军同意协助国民党军队空运到沈阳、长春两地；苏军延至1946年1月3日撤尽。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蒋廷黻称：据内政部统计，抗战八年来全国难民共约4900万人。重庆方面因交通困难，自胜利迄今，输送回乡之难民仅4000人；黄河堤防工程为本署计划中之最大工程，修筑即可开始；豫北、苏北、鲁西等黄泛区灾民亦将运送还乡。

△　据重庆《新华日报》载：黄炎培在重庆对《自由导报》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和平建国四原则：一、中央政权应从速开放；二、地方政治应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三、全国军队可以在政权开放后整编；四、在情势特殊复杂或于国际上特殊关系的区域，应集合各方面有才志之士，用合作方式来处理一切行政。

△　中国人民反内战同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严正指出：谁要“把人民的血肉当作政治的赌注，谁就要受到中国人民的唾弃，受到亿万祖孙的诅咒”。要求全国人民一致起来，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制止内战，“准备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的意志”。

△　兰州至宁夏之兰宁公路与酒泉至架积之酒架公路完工通车。

△　前日本南方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仰光以古剑献与蒙巴顿将军，作为率其部队投降之最后表示。

是月　中共东北局撤离沈阳，迁往本溪。同时，东北人民自治军亦撤出沈阳。

△　至是月底止，八路军、新四军到达东北的部队约10.8万人，党政干部约二万人，总计近13万人。

12月

12月1日　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徵和民政厅长李宗黄派军警、特务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罢课学

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师院女生潘琰、师院学生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人，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

△　云南大学71名教职员联合签名发表《为昆明市学生罢课并受枪击致遭伤亡事敬告各界书》。同日，联大、云南同学会派代表向省政府、省参议会面陈惨案经过，要求严惩凶手，伸张正义。

△　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徵到联大新校舍询问“一二一”惨案真相，表示道歉并负责惩凶。

△　兵役部正式改为军政部兵役署，徐思平任署长；军法执行总监撤销，业务移交军法司。

△　中国民主同盟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张澜主持，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等出席，对记者回答说：一、民盟欢迎马歇尔使华；二、主张成立东北的地方联合政府；三、华北问题，主张县由地方选举，省由各党派协商成立联合政府；四、中国事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军帮助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五、东北苏军缓撤系应中央政府的请求，仍属在履行中苏条约范围内；六、由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协议，成立联合政府。

△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王若飞，要向国民党提出再开谈判之门，约王世杰、邵力子商谈；并提廖承志为中共党代表、叶挺为无党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国民党先行释放他们。如彼同意先放人，又要求不为代表，中共方面可以同意。

△　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会为纪念“一二九”十周年，给各解放区青年团体发出通知，号召青年行动起来，坚决反对内战，制止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呼吁美军不要参加中国内战。坚决要求实现双十公告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同时提出给国统区的昆明、成都、重庆各地青年学

生的反内战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　东北人民自治军以修复的日军坦克为基础，在沈阳市郊建立全军第一支坦克队——东北坦克大队，全队30余人。

△　国民政府代表熊式辉要求苏军从东北缓撤，苏军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允暂缓一个月撤走。6日，蒋经国又向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国民党军空运一师至长春、陆运二师至沈阳，要求苏军将驻区内之“非法武装”予以解除。

△　东北国民党军继续由锦州向前推进，越过义县、沟帮子之线；另一路沿铁路向盘山进击，并派铁甲车沿北宁路天津至秦皇岛间往来巡逻。

△　美驻华军事代表团成立，魏德迈任团长，并向蒋介石递交备忘录。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运华物资分批到达沿海各港口。是日，装载有卡车、面粉等物品的货轮八艘抵上海，以后每日均有物资运到。

△　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正式成立。

12月2日　中国青年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于12日闭幕。发表宣言，反对以武力作政争工具。

△　行政院会议通过在广州、汉口、天津、上海设置金融管理局。29日，广州市金融管理局成立。

△　重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紧急呼吁》，坚决反对内战，提出立刻停止全国各地的武装冲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解放区进攻；美军迅速撤离中国；立刻从严逮捕及严惩汉奸，解除日伪武装；迅速召开政协会议等项要求。

△　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举行“一二一”死难四烈士入殓仪式，联大代常委叶企荪主祭，各校学生、教师和各界群众6000多人参加，联大教授会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教授致悼词。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代表伊罗伦也参加了仪式。

△　周恩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邓子恢：“自高树勋发难、马法五被俘后，西北军受了极大波动。”冯玉祥、鹿钟麟、赵寿山、余心清都在活动，冯治安、刘汝明有初步觉悟，表示开会不说反共话，前线不打八路军。西北军将开往陇海、津浦。可进行工作的有：池峰城、孙连仲、何基沣、刘汝珍、曹福林、张岚峰、孙良诚、梁冠英等。6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告陈毅、饶漱石，望刘、邓、陈、饶迅速布置对西北军各部进行工作。

△　美驻华空军司令斯特梅耶在上海称：从是日起，美空军飞机开始遣送第十、第十四航空队1600名官兵返国。

△　美国国外清理委员会在沪设办事处，处理在华剩余物资；印缅战区剩余军用飞机700架开始移交中国。

△　盟军总部下达第三批拘捕战犯令，拘捕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59人。

12月3日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动农民减租和肃清土匪的指示》，指出：“你们从长春铁路沿线大城市退出以后，除开继续发展与整训部队以外，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

△　陈嘉庚组织南洋侨胞卫生调查团32人，将赴全国各地工作。

△　被强制押赴日本作苦工之同胞1300余人返国抵上海。

12月4日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胡世泽分别为出席联合国筹备会议代表、副代表。

△　蒋介石接受阿根廷首任驻华大使阿尔西呈递国书。

△　张嘉璈、蒋经国自北平返长春，次日晤马林诺夫斯基，谓中苏合办工矿问题，于苏军撤退后方可商谈。7日，苏方答复，东北工矿为苏军战利品。此后苏联将东北工矿机械设备拆搬到苏联。

△　云南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吁请政府“立即设法禁止暴徒在市区任意逮捕及殴打学生，波及市民；甚至任意闯进学校掷手榴弹伤及学生，从而激动舆论，影响社会之安定秩序”。

△　驻华美军炮轰冀东解放区卢龙县村庄。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拨赠中国医院1210所。

△　首批由上海遣归日侨启航返国。时日人回国者将达70万人。

△　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投掷手榴弹凶犯陈奇达、刘友治在云南警备总部公开审判。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为审判长、总司令关麟徵、厅长李宗黄陪审。

12月5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荷新约》在重庆互换批准约本。

△　蒋介石派邵毓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韩代表，并令外交部等对韩侨妥善处理。

△　教育部训令各省、市教育局继续实施普及失学民众识字教育计划，以肃清全国文盲。

△　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同驻东北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举行会谈，苏方同意国民党部队一部空运到长春，一部陆运到沈阳，

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　中共中央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策略问题致电董必武、王若飞，指示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之前，不要明确答复国民党提出的问题。

△　周恩来在延安写成关于国共谈判向中央的报告稿。报告指出反内战求和平的方针深得人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候现在还看不出来。美国在抗战时是扶蒋用共，现在是扶蒋压共。要蒋介石放弃灭共企图是不可能的，但由于国内外的要求，一时的表面的停止则是可能的，边打边谈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国共关系的特点。建议恢复中共南方中央局（或重庆中央局），由董必武（书记）、王若飞（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共16人组成，以领导国统区工作。另组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组成，负责谈判和出席政协会议。并谈国统区的统战、城市、乡村、情报、军事等工作。

△　中共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我们仍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7日，中共中央复电指出：“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

△　冈村宁次在南京对记者表示，感谢蒋介石、何应钦之宽大待遇。

12月6日　　国民政府公布重行制定之《惩治汉奸条例》，凡16条。

△　何应钦在上海就日军缴械情况对记者称："截至目前在华日军35个师团，缴完者有25个，正在缴者八个，仅余二个尚未缴械。独立旅团41个，有24个缴完，正在缴者六个。独立警备队及支队20个，有13个队缴完，三个队正缴中。特种兵队五队，仅余一队未缴。"何继称：若以战区及地区计，各地缴械情形，第一、二两方面军及第三、五、六、七、九各战区均已全部完成，惟第三方面军之苏北，第十战区之海州，第十一战区之保定、石门、沧县，第二战区之平遥、沁县，均因交通被破坏，国军不能如期到达指定地点，致缴械迟延。关于接收东北九省问题，何称：苏方没有问题，所余者仅为我方内部问题，目前共军"窜扰"长城各口，致使国军接收东北一再迟延。关于八路军反击国民党军队之情况，何称："目前鲁南一带最为严重。"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国民政府委员黄郛及在马来亚进行抗战工作、被捕殉难之爱国华侨林谋盛。

△　驻美大使魏道明会晤由杜鲁门总统任命以特使身份接替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马歇尔将军，就其使华若干问题交换意见。魏于当日将情况呈蒋介石。

△　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举行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到会常务理事有彭一湖、章乃器、曹孟君、罗隆基、郭沫若、沈钧儒、何公敢等，由何公敢任主席。决议以该会名义致电慰问昆明各校为反对内战而遭枪杀之学生，并电汇国币10万元作死伤同学善后及医药费用。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为昆明惨案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血案，表示希望政府应速采妥善合理之办法，勿使迁延扩大，并提出：一、严惩肇事军政首长；二、优恤受害青年；三、撤销特务；四、政府以后对青年爱国运动勿再听任军警干涉。

△　平、津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许修直、汪时璟等240人被捕，押于北平陆军监狱。

△　盟军总部发出第四批逮捕日本战犯令，列名者有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等九人。

12月7日　蒋介石特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飞昆处理昆明惨案，并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称：学生惨案“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而演成，“对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理”。目前一切问题必须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当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安定秩序之职责”。

△　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赴苏访问。

△　蒋介石接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听取东北近况报告。

△　苏军驻长春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再次提出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要求，张嘉璈复告需苏军撤出东北后再谈。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外交部长王世杰作报告，黄炎培提出议案：请政府特派大员彻查昆明学生及教员因反对内战在校开会惨遭伤害，究明凶犯依法严惩，以重人道而伸国法。

△　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冯雪峰、胡风、阳翰笙等18人，致函昆明各校师生，“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昆明惨案》，指出昆明一二一惨案是当前全国政局的一个缩影。在昆明，国民党当局把要求和平的学生加以无情屠杀；在全国，国民党当局发出“剿共”命令，调了20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军民，其原因也只因为解放区要求和平。昆明惨案说明谁要和平，谁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就是敌人。

△　成都各大中学教授、学生4000余人，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并成立“成都大中学生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联合会”。

△　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声明，对华根本政策在于建立统一、民主、稳定之中国，并且“始终相信蒋委员长领导下的政府，是发展民主中国最满意的基础”。不过这个政府必须“扩大范围容纳各党派的代表”。同时认为赫尔利指摘前驻华职业外交官破坏美国对华政策，是毫无根据的。

△　解放区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致电国际妇联，“抗议美国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撤退在华美军与收回对华租借之武器与物资，以便有效地制止中国内战，实现远东的和平与民主”。

△　教育部长朱家骅分别急电昆明朱经农次长、联大常委傅斯年、云大校长熊庆来，要求“对昆明学生惨案从优抚慰，妥为善后，各校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

△　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会主席冯文彬写信给昆明罢委会，慰问全体教职员及全体同学，对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流血牺牲的师生表示沉痛哀悼；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青年的残忍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并表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目标下，解放区青年将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12月8日　周恩来在延安向干部作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略谓：国共谈判可以分两个阶段，前50天，毛泽东在重庆，国民党偏向于和。后50天，国民党偏向于战。它沿铁路线前进，分割华北、华中解放区，“清剿”华中、华南解放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边打边谈”。我们的方针仍是：团结、和平、民主、统一，用自卫力量挡住他的军事进攻，用和平力量向他作政治进攻。美国是扶蒋压共。我们的对策是使美国知难而退。对美国的批评要有区别。

△　平、津又捕逮汉奸，主要有周作人、文元模，曹汝霖、殷汝耕、张璧、秦臻、余晋龢、周大文、管翼贤、陶尚铭、温世珍、杜锡

钧、潘毓桂、冷家骥、刘玉书、池宗墨、邹泉荪、张燕卿等140余人。

12月9日　蒋介石以昆明学潮案防范欠周，令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停职，由霍揆章代理，李宗黄调离云南。

△　第五战区刘峙指挥“清剿”新四军的战事于是日激烈展开。刘峙扬言：非将鄂豫边区新四军“全部歼灭”决不停战。

△　重庆各界3000人在长安寺举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沈钧儒主祭。郭沫若读《祭昆明四烈士》，痛斥“屠民以逞”的“佞人”，表示“誓步后尘，戢彼披猖”。柳亚子亦赋诗志痛。张澜、梁漱溟、张东荪三人合送的挽联上写着：“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邓初民在会上演讲时疾呼：“今天有人在争论是谁在发动内战，是谁先放的第一枪，是谁？”

△　成都各大中学生在华西坝举行追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到会学生5000多人，并有国际友人参加。会后游行示威。

△　云南省主席卢汉、教育部次长朱经农、代理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代表政府邀请四大学当局和学生代表，谈判复课条件问题。卢汉对抚恤死者、医疗伤者和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等项均表示负责解决，但对追究射击联大事件责任和惩凶等，则需转请国民党中央处理。同日，卢汉发出《告各校同学书》，要求“即日复课，恢复常态，至惨案则应静候法律解决”。

△　延安各界青年2000多人举行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号召全国青年为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平而奋斗。大会通过致全国青年等电。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董必武、王若飞，指示：对国民党我们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同时又应使它在军事上知难而退。这次中共参加政协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请告民盟朋友希望他们也在纲领、联合政府、国大及宪法草案方面作准备。

△　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蒋经国商定苏军撤退日期再展至明年2月1日。

△　马林诺夫斯基再次表示必须从速解决东北经济问题，称所有东北的重要工矿事业均为苏联对日作战所获的战利品，现苏联决定以50％之股权让予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的资本。张嘉璈答称双方意见纷歧，且赔偿问题不能由中苏两国间解决，已将最近与苏方经济顾问谈话报告政府，同时拟与经济顾问继续商谈。

△　马歇尔与贝尔纳斯、艾奇逊、文森特和陆军部参谋赫尔等人，在国务院研究对华政策问题，结论是：可以协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在国共达成协议之前，停止向华北运送国民党军，应妥善准备向华北运兵；是否实施向华北运兵计划，应由马歇尔根据情况作出决定。

12月10日　　国民政府特派俞鸿钧为议订中苏关于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之财政事项协定全权代表。旋俞鸿钧与苏大使彼得罗夫签订财政协定，允东北苏军发行红军票，将来由中国兑换收回，其损失归日本赔偿。

△　粤省主席罗卓英访问香港，以增进港、粤间接触。

△　台湾省开始与福建通邮。16日又开始与全国各地通邮。

△　国民党军攻占营口。

△　桂永清离英赴德，就任兼驻德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　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山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要他们给因受国民党围攻考虑转移的新四军第五师以财政援助，要第五师在原地坚持。以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将第五师转移到华北或华中。12月下旬，第五师撤离桐柏山区，准备开往安徽五河一带。次年1月行进到以湖北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的地区，因停战令发布而留在原地待命。

△　美国务卿贝尔纳斯签署范宣德所拟之备忘录，命马歇尔劝令国民政府扩大组织，容纳各党各派。

△　据中央社讯：法、越在越南南部冲突中，我侨胞直接间接因冲突而受损害者，两月来仅西贡一地已达351起，侨胞死难者81人，伤205人，财产损失（越币）1306．9531万元。华侨妇女被法军奸污者18人。西贡侨胞已派代表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并吁请各方救济。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上海、九龙、青岛等六地设储运局；在首都成立冬令救济署。

12月11日　　蒋介石飞抵北平，巡视与慰问北方同胞；并部署进攻热河解放区及冀热辽边区作战，企图切断东北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使东北解放区陷于孤立。

△　国民政府任命梁华盛为东北保安副司令。

△　行政院召开例会，决定设立“中国蚕丝公司”，总公司设上海，并在国内外设分公司或办事处。20日，成立董事会，由经济部、农林部会同聘任谭伯羽、周诒春等11人为董事，陈郁等五人为监察，周诒春为董事长，葛敬中为总经理。

△　据行政院秘书处致经济部的情报称：滇省共有公私工厂77家，抗战胜利后已停业37家。各业代表曾赴渝请求解决工贷、收购成品及恢复交通等问题，均未获结果，咸表不满。近又召开会议，准备

再扩大请愿。

△　国民党中央派出各地宣慰特使分别出发。是日，苏浙皖宣慰使叶楚伧、钮永建乘机飞上海转赴各地慰问。13日，粤桂宣慰使陈济棠赴柳州转粤慰问。18日，华中各省收复区宣慰使刘文岛飞汉口转往各地慰问。同日，华北各省收复区宣慰使张继、鹿钟麟飞平转往各地慰问。

△　云南省主席卢汉亲临联大吊奠死难烈士，并劝告同学复课。罢委会代表表示：在中央尚无合理的措施之前，同学复课实有困难。

△　昆明学生罢委会为警备司令部定于本日枪决所谓投掷手榴弹罪犯陈奇达、刘友治两人事致函警备司令部，认为在真正主谋凶犯尚未根究严惩之前，遽然将二犯枪决，显有灭口嫌疑。陈、刘二犯都不是现役军人，既未正式通过法庭处理，又未经过正式程序，冒然枪决，便为违法，故必须从缓执行，否则警备司令部必须负一切法律责任。

△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惨案凶手陈奇达、刘友治枪决。按：此二人原为因盗卖军用品被判死刑之军官，并非真正凶手。

△　阎锡山由晋东南及同蒲北段抽调精锐第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八、六十九、七十一、七十二共七个师，集中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带，由王靖国统一指挥，企图再度进犯晋东解放区。

△　马歇尔在华盛顿与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总统杜鲁门会晤，商定运送国民党军到东北应成为公开政策；并商定作好将国民党军海运和空运到华北的准备，但准备工作应保密。

12月12日　　蒋介石视察北平行营，并发布公告，准许人民陈诉痛苦；还于数处邮局特设密封信箱，以便市民投递有关信件。

△　国民政府明令派沈鸿烈及楚明善分往华北及东北各省，考察接收及帮同办理盟旗事宜。

△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迅开政治协商会议》，略谓：蒋介石与毛泽东重庆会谈，国共双方代表签定双十会谈纪要，是积极成果，并期望政治协商会议迅速召开，以使一切问题得到可能合理解决。并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到共产党身上，要共产党“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正以强大兵力布置进攻解放区，反民主、反人民、反和平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即将大爆发。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作一切有效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空前大规模军事进攻，为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战。

△　江苏高等法院判处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死刑（12月24日改判无期徒刑），伪江苏高等法院院长陈福民无期徒刑。

△　第三战区将新四军撤出的苏南、浙江、皖南和江西、福建地区划为八个“绥靖区”，实行“清剿”。

△　安徽沦陷区代表金童子上书宣慰使叶楚伧、钮永建，揭露国民党接收人员、地方官吏之黑暗甚于敌伪，随意指责民众某为汉奸，某为奸商，或用假名控告，明取强夺，拘押敲诈，而真正汉奸、地痞则仍复起用作为耳目，要求重新修订惩治汉奸条例从严惩办。

△　安东省民主政府处决汉奸、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和伪安东省副省长渡边兰治。

△　苏军拆运东北鞍山钢铁厂机器，经大连运往海参崴。

△　美总统杜鲁门对美国人民重申：美海军陆战队办理日军投降事宜竣事后，即行从中国撤退。

12月13日　　蒋介石在北平接见蒋经国、傅作义，听取东北与绥远局势报告，并任命陈继承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　国民党军进驻沈阳。

△　八路军解放冀南水陆码头衡水，冀中、冀南解放区连成一片。

△　八路军山东军区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在津浦路阻击战中，率领第八师围攻滕县城时牺牲。

△　首都各界举行仪式，为八年前南京大屠杀罹难军民志哀。

△　上海举行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公祭大会。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金仲华等担任主祭团，各界团体70余单位，约二万人参加。马叙伦读祭文并发表演说。柳亚子致词，说昆明死者之血并未白流。

12月14日　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举行茶会，政军各界负责人350余人出席。同日，蒋接见久居天津之东北军在野将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以及负责整编华北伪军的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　行政院等单位首批还都人员陆续抵南京，另经由水路载送者亦已在途。

△　国民党军空运抵长春。

△　傅作义部骑兵第五纵队向八路军反攻，攻下萨拉奇。

△　晋冀鲁豫边区文化、教育界杨秀峰、申伯纯等500余人，致电声援民主同盟及重庆反对内战联合会的反内战行动，号召大后方各界立即以各种行动坚决抗议，以制止国内反动派反共反人民之狂悖行为。次日，张家口文化界成仿吾、肖三、艾青等数十人亦联名致电重

庆反内战联合会及郭沫若、茅盾、老舍、洪深等，响应重庆等地的反内战运动。

△　东北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在哈尔滨市因公牺牲。

△　香港当局利用日俘兴筑屏山机场，任意拆毁附近农民房舍，强征乡民田园，使广大乡民无家可归，引起乡民极大愤怒。是日，屏山附近乡民以英文发表《告盟邦书》，要求停建机场，并报请国民党当局予以处理。

△　美联合参谋部指示魏德迈：驻华美军的任务是协助国民政府解除中国战区的日军武装，以及控制包括东北在内的解放地区，并有责任与国民政府协调行动。美国应援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并提供相应的装备和补给，美军不承担进一步向华北增调国民党军队的任务。华北港口除了为向东北运兵所必需者外，不得再用于调动军队。驻华美军应尽可能避免与中共军队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得扩大到美军的介入影响中国内部冲突和进程。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副署长韩雷生由华返美后对报界称：国民政府船运殆已全部停运，该署决定在援华全部计划中加倍侧重船只计划，共分三项：一、利用得自盟军之登陆艇；二、以硬木及其他原料接济中国造船；三、设法使外国船只恢复中国沿海及内河船运。并称：“联总援华全部计划，至少当达六亿余美元。”

12月15日　　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举行盛大茶会招待中外来宾，到靳云鹏、张作相、朱启钤、谷钟秀、陈垣、陆志韦及美军驻平、津长官、英、美记者，对华北人民八年来在敌伪压迫之下，忠贞不屈之精神，备致赞扬。

△　交通部次长龚学遂在重庆告记者称：日本投降后，接收敌伪大小船舶2751艘，其中一千吨以上者22艘，500吨至1000吨者23艘，100吨至500吨者86艘，炮舰17艘、炮艇96艘。继称：并拟定航

运分段计划：专驶渝宜段者19艘，宜汉段者15艘，汉沪段者12艘。以上海为中心，行驶北方各港口者24艘；以广州为中心，行驶南方各港口者21艘。

△　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奉令结束，设立徐州绥靖公署。

△　北平行营命令所属机关就平津区展开逮捕第二批汉奸，其名单中有邵文凯、吴赞周、林景龙、舫兆芝、罗庆山等。

△　据重庆《新华日报》载：国民党军事当局根据11月军事会议计划，布置全面内战，企图在六个月之内，从全面范围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六个月计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打通津浦，肃清山东，控制山东海岸；第二步，以平、津为“扫荡”华北基地，向冀、晋、察、绥、热作辐射性“扫荡”；第三步，打通平绥，占领察、绥。

△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全体会议，确定派代表团去重庆谈判的纲领和方针，通过出席政协代表七人名单，以及周恩来关于正式成立南方局（目前称为重庆局）的提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准备在将于月底召开的政协会上实行有利于它的条件的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保持旧国大。中共代表团的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我们出去后将向国民党提出：全面停止内战；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原则，充实新民主主义内容；实现双十公告，在政协召开前释放叶挺、廖承志；解决东北问题。

△　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强调要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有独占东北之可能。当前任务乃是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力争我在东北之优势，并准备明春的大规模作战。"为此我军主力应放在控制沿长春铁路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建设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肃清土匪，整编军队。对于沿长春铁路大城市的争夺战基本上应放弃。

△　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公布首批日本战犯名单：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者及侵略战争的积极执行者和积极支持者冈村宁次等52名（南次郎、东条英机等已由盟国捕逮，从略）；侵略战争的积极执行者及与军部合作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者松井太久郎等116名；与军部合作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者清水澄等201名。

△　北平市商会整理委员会孙锡山等17人上书蒋介石，要求建都北平。

△　据重庆《大公报》专电称：北平流传"三洋开泰"民谚，即捧西洋，骂东洋（一作爱东洋），挣现洋。在上海、南京一带，则有"五子登科"民谚，即"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婊子"。

△　美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阐述美国对华外交的主要原则：一、赞成召开有中国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国民会议，尽快解决目前的纠纷，促成中国统一。为了实现统一，国民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改组后，中共应将其"自治性军队"统编于政府军队中。二、一切联合国家均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国统一的基础。三、美军继续留在华北是为完成遣返日军，并保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会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

△　美总统杜鲁门致函马歇尔，对以总统特使身份使华规定基本原则；并指出："我特别希望你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

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

△　旅居烟台的法国、罗马尼亚、希腊、奥地利、意大利等12国外侨41人，联合通电美国朝野，电称：“如果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必然招致中国的内战，而造成千百万人的牺牲。希望美国当局尽最大努力，避免使中国人民流血的屠杀；应该根据贝尔纳斯先生所表示，促使强盛、团结、和平、民主的中国早日实现。”

12月16日　蒋介石在北平太和殿召集北平市大中学生1.8万余人训话，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恢复民族伦理；二、要研读《中国之命运》；三、要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下亲爱团结。同日，蒋介石在东交民巷美军操场检阅在平美海军陆战队，对美军协同国军接受敌伪投降备加赞扬，并授勋有功美军官兵。

△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员93人。大会通过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宣言中提出对于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五项主张。其要点为：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必须即刻停止以武力干涉人民的政治活动，充分尊重人民身体等项基本自由；各政治党派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大会选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等37人为理事。

△　中共政协代表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及随员30余人，由延安飞抵重庆。叶剑英在重庆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如何停止军事冲突，是迫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抱着和平的希望，希望双方先停战。

△　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商谈远东问题及对意、罗、保、匈、芬和约问题。

△　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私寓畏罪自杀，自认须负中日战

争责任。同日，日本菲律宾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在马尼拉法庭被判绞刑。

△ 第十一战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北平成立。

△ 台湾区战俘管理处成立。

△ 北平军事当局下令对华北境内日本战犯进行第三次逮捕，约为120人。

12月17日 美特使马歇尔自美来华履任途次北平，是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作首次晤谈，论及美军继续在华北协助受降、遣送日俘、日侨，以至国民党军进驻东北问题等。

△ 中共中央发言人在延安发表谈话称："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藉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并愿为上述建议的彻底实现而努力。我们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我们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指出：根据《国共会谈纪要》规定，政协的使命是"邀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的各项问题"。即然"国是"有待各党派与社会贤达"协商"，那么现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必然有"不是"之处，是无庸置辩的。而"其中最大的'不是'就是进行内战与固执独裁"。因此，政协的"最大使命也就是要找出一条把'不是'变为'是'，即把内战与独裁变为和平与民主的可行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　中共政协代表在重庆向报界发表声明，希望在政协开会前及开会期间，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解放区。

△　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等分访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张澜等，商谈政治协商会议事。

△　王炳南到美驻华大使馆，通知美代办罗伯逊，周恩来等中共政协代表已到重庆，中共欢迎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来华。

△　国民政府特派魏道明为中华民国签署《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特命全权代表。

△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主张实现和平、团结、民主。

△　傅作义骑兵第五纵队、新骑四师向八路军反攻，攻下毕克齐。八路军遂撤出对归绥、包头的包围，集中主力于绥东、绥南休整，察绥战役至此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近万人，收复绥东广大地区，减轻国民党军对张家口地区的威胁。

△　赫尔利电复蒋介石说明其回国原因并介绍马歇尔来华，电称："今后，马歇尔将军赞助阁下统一中国之全部军队使隶属于国民政府，必不致遭美国官员之反对而能获成功。"

12月18日　　蒋介石由北平飞抵南京。行前对记者称：杜鲁门总统深知中国情形，尤其对中国现在情形更为了解，其最近宣言表现对华友谊深挚，至堪钦佩；并称：杜鲁门总统所声明之意见，正与我之意见相合。

△　中共政协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等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50余人。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中共代表这次来重庆，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谈判。当前"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尤其是解

放区一万万人民，现在处于被进攻的状态中，更是迫切的要求停止内战”；其次是“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它“将包括共同纲领、政府改组、复员善后问题等”；还要讨论国民大会的问题，“包括国民大会代表的改选问题”。解放区的问题，“要在讨论全国实行地方自治问题下去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我们不能把抗日的军队交给它，也反对参加请客式的政府。我们要求改组成为各党派参加的民主政府，由它来统一全国的军队。关于东北问题，“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去接受东北主权，这是应当的。但是如何建设东北，却是内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　中共中央电告华东局，同意由陈毅等五人为华东局常委，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

△　美官方正式宣称：美国政府决定为中国建立一支强大之海军，以维护太平洋上之和平。海军部长福尔斯特尔向国会提出法案，建议授予杜鲁门总统下列各项权力：一、借售、交换、租借、赠送，或以现货购买，将海军过剩船只让与中国。二、供给中国技术顾问。三、美海军官兵在航海事务上协助中国。福氏还称：如中国提出要求，美国深愿派出代表团赴华，从事海军方面顾问事宜。

△　丹麦政府自动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愿复交，修复旧好。

△　香港政府将接收的五艘敌舰经国民政府特派员在港移交接收。

12月19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在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宴请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周恩来说：中共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迅速召开，并望在政协开会前，立即停止内战，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都可以在战争停止后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中共希望双方不提任何停战前提条件，以求得立即停战，如能做到这点，

就可以使全国人民不失去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和信心。要求邵力子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并使张群、王世杰尽速返渝，以便国共谈判重新继续进行。

△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五人往晤青年党代表曾琦，对有关政协会议各项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同日，中国民主同盟张澜、张东荪、梁漱溟、蒋匀田往访中共政协代表，双方对召开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　中国民主同盟文化委员会负责人张申府、沈志远举行茶会，招待学术界人士和新世纪学会会员，到会有张东荪、梁漱溟、陶行知、邓初民、张西曼、杜国庠、王寅生等数十人，商讨增进团结及对和平民主建设应有之努力。

△　美国海外部队约2300人开到天津，与华北同一数目的部队调防。

△　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对黄金提价泄漏消息案再次进行宣判，判处王绍斋徒刑八年。

△　西南联大教授会举行会议，决议发表《告同学书》，劝告学生于12月20日晨务必复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还向同学保证：关于一二一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将于本晚推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以尊重”。“如学校早已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

△　华中野战军集中主力第七、八纵队及地方武装共15个团，向驻守在高邮、邵伯等地日军和伪军发起进攻，激战至26日，攻占高邮县城，歼灭日军1000余人（俘900余人）、伪军4000多人。

12月20日　　国民政府任命程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　财政部驻东北财政金融特派员陈公亮，在请示接收东北财政金融办法的签呈中透露东北流通券印制情况：一元券一亿元，五元及10元券各二亿元，50元券五亿元，100元券1000亿元。伪满币暂准与流通券等价使用。

△　天津市商业联合会及各业公会代表500余人召开紧急会议，反对该市当局印发钞票垄断物资。会后全体代表赴市政府请愿，提出：停止发行5000元票额的大钞、开仓发放敌伪物资、平抑物价、取缔金银黑市并检举囤积奸商等四项要求。天津市当局拒不接受。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为加强西满工作，决定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林彪兼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由李、黄、林、吕、李及张平化任西满分局常委。并指示："西满分局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建立西满（包括热东）根据地，统一合编西满一切部队，保卫热河，有计划地肃清土匪，统一筹备给养经费，划定军分区，建立地方党政，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锄奸增资运动。"

△　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建承中学等校学生约4000人，在上海中央路广场（现中央商场）集合，准备到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递交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援助政府进行内战"的《全市大、中学生给马歇尔特使的公开信》，遭到国民党派遣的暴徒殴打。学生们奋勇反击，当场抓获八名暴徒。后《公开信》由美总统特使私人秘书艾利奥脱出面转交马歇尔。

△　在重庆召开的救国会通过《中国人民救国会政治纲领》，凡52条。纲领规定："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所课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

是反对外来的殖民帝国的民族压迫，反对国内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残余势力的压迫，因之，其革命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

△　美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上海，蒋介石派何应钦赴沪迎接。

△　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在上海发布告所部将士书，谓撤退计划延缓实行，继续协助遣送日俘工作，并运输国民党军至收复区，支持马歇尔元帅完成使命。

12月中旬　国民党以11个军24个师和八个游击纵队向桐柏山区进逼。中原解放区主力部队由桐柏山越平汉线东进，到大别山寻找战机反击。

12月21日　美国特使马歇尔偕魏德迈由上海飞抵南京，蒋介石夫妇亲往机场迎接。当晚蒋介石在寓所举行晚宴欢迎马歇尔。宴毕，蒋介石与马歇尔会谈，王世杰在座，魏德迈亦参加。马歇尔向蒋介石说明立即停战的利害关系，指出美国援华取决于国共争端能否和平解决，除非国民党采取明确的行动解决目前的问题，否则在中国继续保持美国的力量是非常困难的。蒋介石表示，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的统一，而取消中共自治性军队是中国统一的根本途径。政府目前的方针首先是占领华北，只要在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就可以迫使中共妥协。并希望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能达成协议，促使苏联履行条约义务，政府将据此决定在东北采取行动。

△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柳亚子致马歇尔书，揭露赫尔利改变罗斯福对华政策，袒护独裁，干预政治，以至造成中国之内战；呼吁美国“勿与人民为敌，勿以民主为仇，速撤驻华美军，速罢袒蒋之吏，勿以军械与空运制造中国之分裂，勿以租借法案与政治借款鸩毒中国之民萌”。

△　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就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及马歇尔来华，访问孙科、张澜、黄炎培、章伯钧、郭沫若、马寅初等各方人士。他们均表示欢迎和感谢，但认为中国问题还须中国人民自己作更大的努力去解决，希望美国多看事实，认清事实，与赫尔利的错误政策一刀两断，不被假象所蒙蔽；并要求对华政策见诸于实行，如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装备不民主的军队等。

△　交通部与泛美航空公司订立合同，合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从管理及监督、财务、经营、驾驶员、领航员、无线电报员、机械员训练等，全以美国为主。

△　重庆千余家小织布业因受当局花纱布管制关系，不能领纱，行将破产，是日招待新闻界吁请当局求平价供应原料、贷款，大小厂应平均分配棉纱，俾免穷富悬殊。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东北长久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通化、延吉、宁安、东宁、密山、穆棱、佳木斯、嫩江、黑河、洮安、开鲁等地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部队，开办学校，以便供给前方。“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　魏德迈以备忘录呈蒋介石，否认美机曾在华北扫射解放区军民，以及参预国民党军对八路军作战。

△　魏德迈在上海电台广播称，鉴于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中国战区美军的归国问题势将延阻。并称他与马歇尔会谈后，已决定保留美军，以便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人归国，以及把国军运至收复区，同时为保护美方财产，组织美国志愿军事咨询团。

12月22日　　马歇尔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渠希望能于年前完成与各党派人士交换初步意见之工作，以为决定在华工

作具体计划之参考。

△　国民政府公布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正、副议长、参议员名单，裴鸣宇为议长，贾慕夷为副议长。

△　新任长春市长赵君迈经苏军同意进入长春视事。旋沈阳、哈尔滨市长亦分别进入两市。

△　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开业，东北流通券发行。东北流通券与伪满币同值使用，与法币比值为13元：1元。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内战必须立即停止》的社论，大声疾呼："非和平不可！非停止内战不可！中国人民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一致要迅速停止内战，我们竭诚希望国民党当局也顾念老百姓的痛苦，顾念国家民族的前途，下定决心，悬崖勒马。"

△　邓颖超应邀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茶话会，并发表讲话，说明中共代表来渝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为和平民主奋斗，只要全国人民能一致为民主奋斗，积极主张，发挥人民力量，督促政治协商会议，为真理奋斗，是可以成功的。

△　中共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组成特别法庭，于23日公审大汉奸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27日执行死刑。

△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巴贝抵南京。据合众社电称：巴贝来华是为"运用美水陆作战船只训练青岛华军，加速遣返日军及其他有关共同利益事宜"。

△　美国第七舰队运输舰一队开始运送杜聿明部抵葫芦岛港，并由该港开赴锦州。

12月23日　　蒋介石由南京返抵重庆，与马歇尔会谈。离南京

前，召见冈村宁次询问有何困难，冈村宁次对此深感敬佩。抵重庆后急电卢汉，指示对学潮忍让为怀，谨慎处理。

△　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在重庆访晤马歇尔。马歇尔阐明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表示中国必须寻找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存在两支军队的局面。周恩来说：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牺牲重大。日本投降后，毛泽东来渝，本希望在抗战胜利后立即能和平建设，不幸当时有些问题未能获得协议，终于出现了目前的战争状态。我们的政策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中国不能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走入宪政的国家。

△　中国经济实业协进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胡厥文等应邀出席。会议通过章程和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选举阎宝航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林大琪、罗叔章、胡子婴、王寅生、耿一民为理事。

△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部从八路军手中再次夺回绥远。

△　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发动对黑山、北镇、义州、阜新地区进攻。24日，占黑山、北镇；28日，占义州；30日占阜新。

△　山西省防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第三营营长苏文率240余人，在襄陵城南史村起义，后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支队。

△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署长李门称：对国民政府救济计划总额为6．75亿美元，台湾将列为中国救济计划的15个行政区域之一。

△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组织管制日本委员会，设于东京，麦克阿瑟地位不变。

12月24日　　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停

止武装冲突，接纳各党派所提民主要求；同时致函毛泽东呼吁和平。28日，周恩来、董必武复信表示感佩，并说明这次来渝已向国民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一切争论和平协商解决。

△　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书，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必须确定，应讨论当前最迫切最大的现实问题，应组织处理收复区军事冲突监察团，应议定和平建国纲领，作为现阶段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

△　江苏高等法院判处前伪江苏省府民政厅长张北生死刑。

△　梵蒂冈教宗庇护第十二擢升青岛田耕莘主教为东亚有史以来第一位枢机主教。

△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在清华大学办事处联合举行本市各报社、通讯社记者招待会，就一二一惨案经过发表声明，宣布事实真相，以驳斥中央社诬蔑师生之言论。梅贻琦详细报告事变经过，指出这次惨案自非偶然事件。熊庆来表示："本校教授会认为对此事件负责之当局应受应有之处分，本人认为政府该有公平处理。"

12月25日　　蒋介石在重庆林园欢宴美国特使马歇尔，并作第二次长谈；马歇尔返城后又先后接见民主同盟及青年党领导人及无党无派人士。

△　蒋介石应苏联政府要求，并经马歇尔同意，派蒋经国为其私

人代表，前往莫斯科交换中苏合作的看法。

△　行政院决定续拨农贷专款10亿元。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临时会议，首次执行职权审查政府交议之1946年度国家岁入岁出总预算草案。财政部长俞鸿钧报告预算案编制经过称："编制方针乃在要安定民心，使逐步开始建设工作。"

△　伊宁代表第三次来迪化，次日会晤张治中，对中央代表的修正文件表示原则接受。

△　中国航空公司开辟沪台线班机。

△　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复课宣言》，略谓：为顾全大局，为顾及地方及学校当局之困难，更为了顾全我们的学生，乃于12月27日在最低条件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并继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切实保障人身自由等要求。最后表示要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奋斗到底。

△　傅作义部沿平绥路东犯，占领陶卜齐、旗下营两地，向集宁进攻。

△　汉奸王克敏病死于北平陆军监狱。

△　国际气象会议于是日起在伦敦举行大会，讨论战后国际气象之建设发展及联络等事宜。国民政府派赵九章、涂长望出席。于1946年3月2日闭会。

12月26日　　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刘王立明、周鲸文往访马歇尔，说明民盟对停止内战、联合政府、国民大会等问题的意见。

△　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华东局，同意华中入鲁部队编组为山东野

战军第一、二、三纵队。

△　日本战俘和侨民开始撤离台湾。

12月27日　　国共恢复谈判。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国民参政会就全面停止内战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谈。中共代表以书面形式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建议：一、双方应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发生战争区域实地考察，并将事实真相公布之。并建议政协开幕日期定在明年元旦。此外，中共代表要求恢复被国民党查封的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国民政府代表答应将这些意见报告蒋介石后再续谈。

△　马歇尔在重庆宴请周恩来，商谈政协会议和东北等问题。

△　山东日军代表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中将，在济南向受降官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签降。

△　八路军与第十五、十九集团军经过激战，解放鲁南滕县。同日，八路军解放禹城。

△　吉林省民主政府于岔路河成立，周保中任省政府主席。

△　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离延安返日本，并致电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感谢对其帮助，誓言为日本民主及远东和平而斗争。

△　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31个国家代表在华盛签署《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国际银行协定》，中国由魏道明代表签字并认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正式宣告成立，总部均设在华盛顿。

△　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闭幕，发表公报，对中国统一、管制日本、托治韩国及成立远东国际法庭，均有所决定与声明。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公报还说明：美、苏两国外长在尽快撤军的问题上，“彼此意见完全一致”。

12月28日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北平视察，并与行营主任李宗仁会晤，召集军政首长汇报。

△　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东北局的指示，要求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　在上党战役中被中共军队俘获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第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等数十名高级将领联合通电全国各党派暨政治协商会议诸先生，提出四项愿望，要求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行动，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一切问题应由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结束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民主化等。

△　中共代表团在曾家岩设午宴，招待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及在重庆的中央常务委员，交换对政协会议的意见。

△　盟国管制日本及托治朝鲜两项协议生效，中国与美、英、苏同列为主持国。并成立国际法庭，审讯日本战犯。另远东咨询委员会改组为远东委员会。

12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首席代表王世杰，代表顾维钧、傅秉常、钱泰、张彭春。

△　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成立，谭伯羽抵平主持。

△　外交部举行鸡尾酒会欢迎马歇尔特使，中共代表应邀出席。同日，马歇尔与左舜生、陈立夫、张群等晤谈。

△　中央政府代表同伊宁代表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处理方案获致协议。

△　广州湾易名湛江市，郭寿华任首任市长。

△　中共代表团分别设宴招待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陶行知、邓初民、李公朴、史良等，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等，同他们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交换意见。

△　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在香港成立，李章达为主任、丘哲为副主任，李章达、丘哲、胡愈之、陈此生、萨空了、黄药眠等为委员。南方总支部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澳门、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英国、美国等地的民盟工作。

△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对记者称：台币与法币兑换率，暂定为台币一元合法币30元；在台美军可以美金一元向台湾银行换取台币37.5元。

△　台湾省专卖局规定以烟、酒、火柴、樟脑、度量衡为本省专卖品，无论产、制、运、销须经法令许可，不得私营。

12月30日　　国共双方代表继续举行谈判。国民政府代表复文中共代表团，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并主张对所有同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复文并说蒋介石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宣

告成立。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等26人出席。大会通过会章、对时局宣言等决议。

△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发表谈话，指出："三强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中所达到的协议，对于建立巩固与持久的和平，开创新的局面，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热烈欢迎。"对于中国的协议，"这是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相适合的。这便是：（一）中国一定要是团结的和民主的中国；（二）国民政府必须改组，必须广泛地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参加国民政府一切（各级）机构；（三）中国的内战必须停止；（四）列强不干预中国内政和外国军队在最短期内撤离中国"。发言人说，中共愿乘此机会，再度向国民党呼吁，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一切争端，国民党当局应抛弃武力解决的意图，诚意地以和平友谊的态度和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代表商决国家大计。

△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两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在即，至希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予迅鉴纳施行。

△　国民政府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应斯大林邀请，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抵莫斯科。蒋经国要求斯大林调解中国内战，斯大林予以拒绝，并再次声明支持国民政府。

△　第十一战区在济南逮捕汉奸136人。

△　前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飞抵上海。

△　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分别在南京设首都警备司令部，镇江设指挥所。

12月31日　　国民政府代表向中共代表团提交复文：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　蒋介石宣布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会期14天。

△　蒋介石设宴祝贺元旦并庆同盟国胜利，兼为马歇尔贺寿，到中外来宾500余人。

△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北平宣布《处理敌伪产业办法》，凡16条。

△　何应钦就受降结果及处置伪军等事对记者称：全国十大受降区已受降完毕。日军各军、师均缴械，仅冀、鲁、晋尚有少数步兵大队在继续办理中。长江以南各战区受降进行顺利。惟华北第二、第十一、第十二三个战区因受共军“妨害”进行困难，尚正在继续努力。日战犯名单仍在调查中。长江以南伪军已处理完毕；长江以北伪军在共军“阻挠”中，亦已缩减半数或三分之一。

△　海军总司令部奉令撤销，该部业务由军政部海军处接管，原陈绍宽总司令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　财政部海关复员工作告竣，海关总税务司李度由渝飞沪，总税务司署移沪办公。

△　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函复张澜，重申中共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主张，表示完全同意于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

△　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

△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群众运动仍以联合一切人民肃清土匪及敌伪残余，反汉奸特务运动为中心，争取一般地主。但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可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只有充分发动农民，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才能确立起优势。

△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从9月3日至12月，在挫败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继续攻歼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在平汉铁路沿线连续攻克滑县、内丘、高邑、邢台、汤阴、磁县、邯郸等19座城市；在新乡以南地区攻占原武、中牟等县城，在道清铁路沿线攻克焦作、修武、孟县、沁阳；在其他地区先后收复齐河、夏津、高唐、曹县、茌平、菏泽、宁阳、衡水等县城。

△　八路军解放河北省遵化县。同日，鲁南八路军解放曲阜。

△　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就记者所询华北汉奸迟迟未送法院事答称："华北环境特殊，谅为人民所共知。"

△　美空军后勤司令部正式结束。

是月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立，隶行政院经济部，为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机构。资本60％为官股，40％为商股。在上海设总公司，天津、青岛、沈阳设分公司，统一接收日本在中国的棉、毛、麻、绢纺织、针织、印染及纺织机械等工厂。

△　《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负责人为金仲华、冯宾符、王德

鹏。该刊执行利用合法、长期隐蔽、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剖析国际形势、介绍国际知识为主。

是年　　上海物价指数自1945年9月—12月，逐月平均增长率为71.5％，超过日伪统治末期1945年1月—8月的55.5％的平均增长率。职工生活指数压低，有些系统如教育部门，工资停滞不动。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1月

1月1日　　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讲演《告全国军民书》，谓日本业已投降，我全体国民可仰首伸眉，稍纾喘息，但我国之处境还备极艰难，停止内战必须首先恢复交通，实现民主必须首先军令政令统一。

△　国民政府令：傅作义、徐堪晋给一等景星勋章；董其武、何文鼎、楚溪春、马占山各给予青天白日勋章；李汉魂、宋希濂、陶希圣、陈行、叶恭绰等党、政、军、文化、学术界967人给予胜利勋章。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0条。该条例规定：委员会设置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国民政府特派之，并就中指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综理本会一切事务。

△　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与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于重庆晤谈。马歇尔建议中共接受政府关于国、共、美三方会商的提议，成立三人委员会，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周恩来表示：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但也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

△　国民政府委派杨绰庵正式接收哈尔滨市政。是日，东北经济专员张嘉璈于哈市召集银行、路局人员指示接收事宜；并访晤苏军驻

东北军区司令马克西莫夫、哈市城防司令喀查夫，商谈东北接收事宜。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1946年全国人民奋斗之任务，首先是力争迅速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时指出：解放区应继续开展减租、大生产、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整理财政等五项任务。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命令第三军团将所接管之仓库物资和日侨移交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同日，敌伪产业处理局将法币1000万元，汪伪币4000亿元，黄金30万两，白银1000万两，银元534箱等并上海市各金融机关原有之敌伪存款总额1000亿元“委托”中国银行接收保管。

△　华中野战军解放江苏高邮城，歼日军第四补充兵团山本原所部、岩崎大队等千余人，俘大队长以下900余人；歼伪孙良诚之第五军第四十二师两个团、特务团全部及伪顾秀伍之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各一部共五个团，生俘伪军几千人。

△　郑州绥靖公署成立，刘峙任主任，胡宗南、刘汝明、孙震副之。

△　国民政府以绥远灾情惨重，特派鹿钟麟前往视察，并拨发救济款200万元，抚慰灾民。

△　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成立。是日，徐（州）汴（开封）特别快车通行；宝（鸡）天（水）铁路于天水举行正式通车典礼。

△　国民政府代表张彭春由渝启程飞赴英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　重庆市电影业不堪苛捐杂税之苦，是日被迫宣告停业。2日下午2时，电影、戏剧业招待新闻界，呼吁当局立即取消一切附加税，开放票价。

1月2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七百二十七次例会，翁文灏主席。决议通过《收复区所有各年田赋，自沦陷之日起至收复之日止，除敌伪征收者准予人民持据向政府登记、以备对敌清算外，一律免予追收案》；并通过何修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等13项任免事项。

△　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与新疆伊宁人民代表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于迪化签订《中央对于新疆伊宁事件之和平条款》，凡11条。其要点为：一、政府给予新疆人民选举行政官吏之选举权；二、政府予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三、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内之文书，准予单独使用其本族文字；四、在小学及中学，用其各族本族文字施教，大学则依照教学需要，并用国文与回文施教；五、政府确定民族文化与艺术之自由发展；六、政府确定出版、集会、言论之自由；七、政府按照人民之实际生产力，并视其力量规定税率；八、政府给予商民以对内外贸易之自由，但商民应遵照中国政府与外国所订商约之规定；九、在专区内准予组织民族军队；十、新疆有政府之组织，应由中央增加委员25人（其中中央派定十个委员）；十一、事件解决十日后，双方相互开释拘捕之人士。

△　中午，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各代表邀民主建国会李烛尘等晤谈，交换对时局意见，并共进午餐。

△　马歇尔于重庆邀华西公司总经理胡光镳晤谈，探询中国工业界对当前政局意见。3日，又与中国农业协进社理事长董时进晤谈，探询中国农业详情。

△　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办法》，激起各地师生强烈反对，是晚夜深青岛市文德女中教员费筱芝张贴标语，遭枪杀惨死，全市震愤，各中、小学即日罢课，疾呼当局严缉杀人凶手。

△　天津市21所中学6000余学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历四小时，提出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保障教职员工不失业，取消对学生的思想检查等五项要求。

△　中央社上海电称：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张国焘称：赣省灾情严重，全省84县，有300万亩土地荒芜，难民达160万人，亟待救济，医药奇缺，饥民遍野。

1月3日　　下午5时，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偕王若飞、叶剑英、董必武，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商谈停止军事冲突事宜。中共指出：军事冲突应马上全面停止，目前尤应从速制止进攻热河；全面恢复交通（包括邮电航空）并撤除封锁；军事考察团由各界人士组成。

△　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转告中共中央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马歇尔提出在北平设执行部，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组成，一切行动须根据一致协议。并称美国有义务帮助国民政府运兵去东北。周恩来表示：东北有特殊性，如何规定尚在考虑。

△　行政院长宋子文于北平接见各省主席，同意东北一元化接收办法，指示东北物资归中央银行统一调用。4日，宋飞抵青岛，召见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义隆，决定组织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审议委员会及青岛日用品平价委员会，指定彭石年为该二委员会主任委员。

△　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与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上将会谈，并向其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提出编组保安队等通知八点。特罗增科对编组保安队事表示无异议。

△　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兼上海指挥所主任张雪中奉调离沪，遗缺由副司令官郑洞国继任。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程子华、萧克、罗瑞卿、林彪、李运昌、聂荣臻等，说国民党企图在停战前占领热河，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退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

△　国民党军占领热河重镇阜新。4日，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偕热河省长刘多荃到阜新、朝阳视察，下午1时国民党军占领北票。

1月4日　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代理陆军总司令职务。

△　中国民主促进会对时局发表宣言，阐明现阶段的中国，民主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和目的。在八点主张中要求，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强调“为争取民主，须先自动的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的自由，反对一切摧残人民自由的举动”。

△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任命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

△　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发表通告，谓：为清理本市党员党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自1月5日至1月20日止，举行全市党员重新登记。附逆党员及于汪伪党部入党者，一律不准登记。

△　国民政府派法学家梅汝璈、向哲濬为代表首次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向任检察官，梅任审判官。

1月5日　我国承认外蒙古独立。是日，国民政府公告：“外蒙古人民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　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谈判，商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规定：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二、停战、恢复交通、受降、遣送战俘等“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公正人士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考察军事情况、交通情形等。

△　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讨论《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条文。周恩来称：我们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它关系到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中共不参与其事。

△　上午，马歇尔会晤蒋介石。下午，会晤周恩来，同意为国共纠纷出任调停。

△　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出席中国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陈启天等五人为招待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双方就政协会议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

△　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东北主权，松江省主席关吉玉率接收人员飞抵长春，嫩江省主席彭济群一行经长转嫩，接收辽北省政。

△　上午，首批空运东北之杜聿明所部由北平抵长春，天津牟廷芳部亦步尘北上。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会见新闻界，宣称：驻沪国军精锐部队今起空运东北，另有2.6万国军在沪作进入东北之种种准备，周内由美海军登陆舰负责运至葫芦岛。另有美兵5000名正于来华途中。同日，美军总部宣布：美军船只运输新六军之工作，将于本月16日开始。

△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巴贝抵青岛，视察国民党中央海军训练团。24日，美国海军考察团团长墨利、美第七舰队副参谋长兼国民

党中央海军训练团顾问卡罗抵青岛视察。

△　重庆市银行开幕，市长张笃伦兼任该行董事长。同日，财政部宣布：南京停业之商业银行、钱庄共160余家。

△　中国红十字总会改组，蒋梦麟为会长，杜月笙、刘鸿副之。

△　美国进出口银行批准对华棉花信用贷款3300万美元。

1月6日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正式公布，规定会议名额为38人，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施政纲领、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及军事问题五项。同日并公布政协各方代表名单，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九人。成立秘书处，雷震任秘书长。

△　冯玉祥为中共代表团举行招待宴会。当晚，孙科亦为中共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席间就时局问题交换了看法。

△　驻秘鲁大使保君健与厄瓜多尔总理特鲁吉罗在基多（厄瓜多尔首都）签订《中厄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发展两国友好与文化关系，并便利双方国民之入境。

△　南京临大补习班学生因不满英语甄试爆发学潮，无意中殴伤班主任王书林。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开除滋事学生于柏青等14人，以施镇压。19日，临大斗争不息，又有八人被逮捕，13人被南京地方法院提出公诉。该校实习班全体学生集体绝食，表示抗议。23日全体补习班学生300余人列队前往地方法院请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八名同学，恢复14人学籍。

1月7日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茶话会，商谈正式会议应筹备的各项问题。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言，说这是第一次政治协商会

议，如两星期不能完成，亦应延长，以便从长讨论。并就议程问题提出意见，希望两三天内发表停止内战的命令，使政协会议能在和平空气中开幕。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决定这次不向政协提出，而将列入和平建国方案中去解决。并说，秘书处工作，中共方面定齐燕铭参加。

△　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三人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周恩来提出：停止冲突应包括全国。拆除阻碍交通的障碍物应包括影响交通的碉堡、工事。关于交通的定义包括铁路、公路、轮船、电报、邮政等等。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认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因为政府要从苏联手中接收主权。并认为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周恩来提出，接收主权涉及苏联，讨论时应有苏联代表参加。现在赤峰、多伦已由中共接收。马歇尔提议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自此到10日，三人会议进行了四天六次的商讨。

△　蒋介石下达密令："政治协商会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其尚未缴械地区速令当地驻军即行缴械，免被奸军利用。行动务希秘密迅速，免资共方借口。"

△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在山东的部队与山东军区部分主力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

△　周恩来所写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说：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大会""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我们反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演说一字不提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他的"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必然是愈'统一'而民主民生愈悲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必须是实现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之战结束，国民党军被中共军队歼灭2.8万余人，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万余人投向中共。

△　上海新新公司职工800余人联名检举汉奸李泽（该公司总经理），事被当局拖延数月之久，激起民愤，是日，当局被迫逮捕李泽。

1月8日　　晨10时，周恩来、张群会同马歇尔续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等问题，讨论焦点为停止冲突后政府军坚持进军问题：国民政府欲令杜聿明部继续进军承德、赤峰，中共代表坚持热河政府军应就地停止前进。未获协议。4时半至8时再度集议。

△　下午，民主建国会于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主席宣读该会致政协呼吁书，呼吁会前先要停止内战，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结社等基本自由必须迅速获得。董必武、郭沫若力表赞同。

△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招待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的宁梦岩、阎宝航等，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　宋子文与美军总部签订购买美剩余物资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将以美金2500万元及国币61．6亿元购买美国在华剩余物资及全部美国留于中国西部之器具。

1月9日　　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反对国民政府从中共手中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当夜，经马歇尔同蒋介石会商，国民政府决定撤回要求。自此晋察冀解放区北部的安全与东北解放区交通的畅通获得保证。

△　全国妇女界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代表，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邵力子、沈钧儒等到会。李德全、史良、曹孟君发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化，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特务组织，废止一

切妨害人民自由之现行法律。最后，邓颖超应邀发表讲话，表示一定把会上的意见带到政协去。

△　国民政府任命董文琦为沈阳市长。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率干部14人进驻锦州。自锦州、盘山向东推进的国民党军进驻营口。进驻热河省境国民党军部队的南路主力，其先头部队于本日晨进抵叶柏寿，接收车站。

△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和第七纵队主力解放山东济宁，歼伪军7000余人。

△　重庆文化、出版、学术、电影、杂志等七团体联合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诸代表，到300余人。七团体代表发言，一致要求政府全面无条件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废除妨碍民主生活、自由权利之法令，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府。

△　广西各县、市商会代表团向行政院请愿，要求：一、举办商业贷款；二、定期停免营业税；三、取消战时过分利得税；四、偿还抗战期间征用物资；五、解除盐商痛苦；六、修复湘黔铁路。

1月10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政协由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社会贤达九人组成。蒋介石致词，说这次会议将商讨“国家由战时渡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的基本方案”。并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又宣布说，经政府与中共签署的停止冲突命令即日生效。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在致词中对四项诺言表示欢迎，并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提议：“在

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　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本月5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

△　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发布停战命令，严格遵守国共双方达成之停战令。并谓：“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　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协议规定：军调部设于北平，设委员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三委员各有表决、互让权，一切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

△　蒋介石电令陆军总司令部，各行营、绥靖主任公署，各战区，各方面军，各警备司令，卫戍司令，各集团军，各省主席，各军长：自即日起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命令，规定限自即日起开始实行，至迟不得超过本月13日下午12时，务必在各地完全实施。

△　晚7时，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邀各界代表集会，决定组织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即日开始工作，举陶行知、胡厥文、施复亮、茅盾、曹孟君等35人为该会主席团主席。

△　财政部发表公告，谓：民国二十五年复兴公债第二十次还本；民国二十八年建设公债第二期债票第二次还本；民国三十年军需公债第一期债票第六次还本，于今日重庆市执行抽签，持有中签号码债票，归还本金。

△　新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面晤蒋介石述职。按：衢州绥靖公署辖浙、闽两省及皖南、赣东之一部分，李汉魂、蒋光鼐任副主任。

△　上海市社会局召开第一次物价平抑委员会，会议商决敌伪产业处理局，将封存之物资及早大量低价出售，以资平抑物价，规定商人合理利润不得超过原价二成。会议公决彭学沛等10人为该会顾问。

△　北平粮价陡涨20％，金价涨至8．55万元，百物相继暴涨。19日，金价突破10万元大关，3．25万名饥民拥塞街头，市民叫苦不堪。天津、上海、汉口粮价亦突飞猛涨，广州4个月来米价飞涨六倍，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平均每天路毙20余人。

△　联合国首届大会于伦敦开幕，51个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出席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率团员36人参加。11日，大会举美、苏、英、法、中五国为常任理事国。

△　中国政府赴暹罗代表团抵曼谷。11日，暹罗国王接见代表团长李铁铮。12日，双方正式谈判中暹邦交问题及解决上年9月曼谷枪杀华侨事件。按：1945年9月21日晚，曼谷军警枪杀华侨，捣毁侨宅，损失500万元至800万元暹币。

1月11日　　国民政府令：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诚、张治中、李济深、何键、张群、冯玉祥、宋子文、宋美龄、戴笠、康泽、蒋经国等党、政、军要员82人各给予忠勤勋章。

△　下午3时，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张群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商谈经过。周恩来重申：全国人民亟待无条件停战，商谈停战不应争论条件，谈判方法应公之于众。政府代表坚持军队国家化问题由三人军事委员会讨论，中共代表周恩来反对。

△　晨，马歇尔偕美驻华武官罗德飞抵北平，筹设军事调处执行

部，实施停战协定。

△　中共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停战与政协问题。指出：和平实现了，但和平并不巩固。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发展民主。民主愈发展，和平愈巩固。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令解放区党、政、军各机关遵照停战令，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牧师、教授各界代表马叙伦、赵朴初、周建人、林汉达等42人致函马歇尔，坚决要求立即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全民之政府，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保障各政党享有合法地位，个人自由不受威胁。

△　太岳军区第四纵队主力解放同蒲线上之侯马镇。

1月12日　　上午9时，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大会，到代表35人，听取周恩来、邵力子报告国共会谈的四点经验教训：一、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二、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三、互相让步，不要独霸；四、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等。继通过何基鸿、李可玑、王葆真、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伍观淇八人为军事考察团团员，冷遹、林虎、张奚若、任鸿隽四人为候补团员。

△　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首次集会，邀章伯钧代表作报告，与会者同声疾呼当局立即取消政府独霸之纺织公司和蚕丝公司，实现经济民主化；撤销特务机关，使自由真正兑现。该会更名为“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综合五个专门委员会，主席团改为理事会。

△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转发蒋介石手令：“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尤其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命令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须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

△　国民政府松江省政府成立。是日晨，松江省府主席关吉玉举

行就任典礼，即日开始视事。

△　冀东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师、第十二军等三个师兵力向解放区古北口猛烈攻击。次晚，河北第九十二军及第十六军再次猛攻古北口。14日，第九十二军、第十六军集结三师兵力犹向古北口以南之新开岭、下河庄、香水峪一带阵地猛攻。

△　美运输机10架运送国民党军北上长春。

△　英国协助国民政府建立海军，赠军舰13艘。本日晨在英国普利茅斯正式交接第一艘“伏波号”。勃维斯海军上将代表英海军部，桂永清中将代表国民政府，先后致词。

1月13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由重庆飞抵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宣告成立。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委员会领导，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国共双方各130人，美方150人，加入军调部工作。

△　中共中央电令林彪、彭真，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坚决击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　国、共两军在津浦路近三个月之战结束。国民党军方面的北进严重受挫，伤亡被俘共2.8万余人。中共军方面亦有五六千人的伤亡和被俘。

△　东北民主联军辽南吴克华部击退第五十二军，是日占领营口。

△　上海驶往台湾之“复兴号”客轮于基隆附近淡水镇二公里处遭遇狂风险浪，驾驶失灵，机房进水，下午5时许船身破裂，乘客60名匆忙跳水逃生，均遭灭顶。

1月14日　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改组国民政

府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问题。政府代表强调改组政府不能根本动摇法统，国民党代表应占多数；中共代表董必武提出政协应决定改组政府的共同纲领，各党参加政府的人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周恩来提出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　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要求对政治犯于七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国家的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对于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问题，则说要对现行法令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拟在十日内拟订办法，呈核后交政府施行。

△　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访问苏联后，今返抵重庆。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谓蒋经国：如美国有一兵到中国，东北问题即难解决；美国如不在东北取得利益，苏必可作必要让步，并盼蒋介石访问苏联。

△　下午，第五十二军开抵沈阳接防。15日，新六军一部6000人乘美运输舰开赴东北。

△　美陆军部长柏德逊自东京飞抵上海，同魏德迈等20余名美高级将领作重要商谈。次日，柏德逊举行记者招待会，答复遣送美军返国诸问题，并声称："美对华政策与计划已有固定方针，杜鲁门总统宣布不容改变。"

△　上海市新闻记者丁梅村等61人，因名记者羊枣（杨潮）冤死扬州狱中，联名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当局立即查究羊枣遭受酷刑之情形和死因，并严惩祸首，释放一切无辜人士。按：羊枣于1945年7月23日在福建永安被捕入牢，同年12月31日因不堪虐待身患重病，不得治疗，于1946年1月12日病逝牢中。

△　是日，《解放日报》公布八年抗战中解放区遭受损失为：被敌伪屠杀者196．9296万人；被捕壮丁70．5722万人；被烧毁的房屋

569．7122万间；家畜损失494．0652万头；粮食损失2．78923536亿石；农具损失776．2707万件；被服损失1701．8021万件。

△　为法战犯卡可平诺为驻沪法领事偷运出境一事，上海各校三万余人游行示威，抗议法方侵犯中国主权；游行队伍行至前法领事馆门前高呼“立即交出法奸”等口号；旋又至市府请愿，提出：交出被捕法奸、撤回驻沪法总领等五项要求。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卡可平诺事照会法使馆，封闭法在华所有领事法庭。

1月15日　　上午8时，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讨论施政纲领问题。董必武提出中共《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分为10项主张，强调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与党派平等合作化是纲领中必须首先规定之方针。吴铁城发言攻击中共10项主张为“分赃”，遭民盟代表痛击，民盟力主中共10项主张为纲领之依据。青年党主以六全大会政治纲领为依据，各持己见，未获结果。大会确定分组委员会名单，分别讨论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五大问题。

△　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一号公报，称今晨派遣三人执行小组携带停战命令前往赤峰调查冲突地区情况。下午1时，军调部派赴赤峰之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托尔·提罗，中共代表杨建中，政府代表谷汉礼飞抵承德，当即会晤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托尔谓“此行任务调查赤峰国共双方冲突实情，并监督该地停战之执行”。4时三代表飞赴赤峰，程子华亲往机场欢送。

△　冯玉祥上书蒋介石，要求大赦除汉奸、贪污外之一切政治犯及普通罪犯。

△　香港《华商报》、《自由世界》、新华南通讯社等12家媒体分别致函政协会议，抗议广东党政当局任意逮捕人民，钳制舆论，践踏民主，要求该会力促政府实践民主诺言。

△　马歇尔邀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宁武等晤谈，交换对东北问题意

见。

△　国立浙江大学学生会为敦促国民政府当局释放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发表《敬告社会人士书》，书谓："政府一再表示还政于民，但空言无补实际，本校教授费巩先生自去岁3月5日于陪都突告失踪，已逾一载，至今踪迹渺无，由是同学疑为此次失踪与特务组织不无关联，如政府倘不以事实真相白于天下，即不能释同学之疑。特务组织一日不解散，全国人民之身体自由一日不得保障。"书中提出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机关等五条要求。

△　苏北新安镇伪军向海州逃窜，华中野战军部队占领该镇。

△　南京日俘八万余名起运上海，候轮返日。长江各地日侨亦经沪返日，每日轮运日侨6000人。19日，青岛市日俘2919人是晨9时遣送返国。30日，魏德迈于上海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谓"自1945年12月底至今，已遣送日俘、日侨逾30万人"。

1月16日　　上午9时，政治协商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军队整编的原则和办法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军事改革十二项建议》，并强调国共军队应立即实施改编，中共军队可在六个月内缩编为20个师。张澜提案则要求所有军队脱离党派关系，大量裁减常备军，从事科研和工业建设。青年党提出实行公平编遣、军民分治、军党分立，设立国防部实行征兵制，民意监督军纪。张群承认停战令下达后，各地仍有冲突，并说：已组成周恩来、张群、张治中三人小组讨论军队国家化各项基本工作。

△　政治协商会议分组委员会名单发表，分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组，王世杰、罗隆基、张厉生、董必武、胡霖、张东荪、邓颖超、曾琦、傅斯年、陈启天分别为上述各组召集人。各组委员七人。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为军事组及宪法草案组委员。

△　国民政府令：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定于本年3月20日在陪都召集。

△　国民政府公布《台湾法院接收民事事件处理条例》、《台湾法院接收刑事案件处理条例》。

△　晋绥边区参议会代表晋绥边区500万人民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三点：一、忠实执行停战协定，即刻停止对热河、绥远、冀东等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二、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三、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商定和平建国纲领，结束一党专政。

△　美进出口银行宣布：美贷款中国3500万美元，以购买美棉。此贷款将于货物抵达二年后偿还。该款可购美棉27．5万至30万包，足敷60万枚纱锭一年之用。

△　美运输舰六艘首批运送新六军在秦皇岛登陆。

△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斥政府军队大肆进攻热河、绥远、冀东、冀南、豫北、豫南、苏北解放区，坚决要求政府军队从1月13日午夜零时以后由所侵占的地方撤退。

△　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工矿处代处长兼经济部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前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是夜于返回沈阳途中遇害。嗣后，围绕“张莘夫事件”国内各大中城市发生学生游行示威。

1月17日　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政府代表孙科等八人提出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书，提议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旧代表有效。章伯钧宣读民盟五项意见。大会发言对旧代表是否有效引起争论。

△　新华社记者就山西阎锡山军撕毁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一事，访陈赓将军叩询真相，陈答称：被阎锡山军王靖国部攻占的集

宁、浮山、孟县已为我军收复，16日收复浑源城。

△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病卒狱中。

1月18日　　上午，政治协商会议第八次会议，续议国民大会问题，承认或否认旧代表为争论焦点。中共、民盟、各社会贤达坚决否认旧代表有效，陈立夫发言提出“不能抹煞现有一党之政治制度，否则各项问题不能解决”，并称政府指定代表符合中国国情。争论僵持未决。大会对于本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预计计划，未予赞同。

△　军调部发表联合公告，谓：本部为积极执行停战协定、恢复交通、迅速结束受降工作、遣回战俘，已组成八个停战协行小组于负责区内执行停战命令，如获令仍冲突不止者，该部将据实报告重庆谈判当局。并称，今日出发三组分赴济南、集宁、赤峰冲突地区调查，并以飞机于察、绥、热、冀、鲁五省15处村镇散发停战命令，监督各冲突区立即停战。

△　军事三人小组国民政府方面由原先参加人选林蔚、刘斐改为张治中、张群参加，中共方面因叶剑英已去北平，改由周恩来参加。蒋介石提议以马歇尔为顾问，周恩来同意。

△　中午，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12人飞抵济南。19日清晨专机赴泰安、兖州、滕县、罗山等地，传布停止冲突令并调查实地情形。

△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于沧白堂第五次集会，政协代表邵力子、王若飞演讲，李公朴主持会议。散会后，一位于会场发言的青年走到沧白堂大门口，突被一群特务包围，打伤于地，腹部重伤；另一青年急上前扶救受伤者，也遭毒打，头部重伤。

△　九三学社筹备会提出，“应从速开放中央及地方政权，使全国人才参加各级政治机关，刷新政治，以新中外人民耳目”。

△　蒋经国偕大连市长沈怡飞抵长春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日，先

后两批飞机空运国民党军数百人抵长。

1月19日　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九次大会，讨论宪草问题。各代表对宪草中之五院制备加批评和反对。吴玉章代表中共提出民权不应受法律限制；中央与地方均权；地方自治制定省制，省长民选；军队实行民主等原则。曾琦主采内阁制以代总统制。黄炎培反对宪草中限制人民自由之各项规定。沈钧儒就地方政权，力言省长民选并依地方文化、风俗习惯情形不同制定省宪。会议决定成立宪草审议委员会研讨该案。

△　军调部公布三委员下设联合参谋部，由政府代表蔡文治、中共代表耿飚、美方代表罗斯克组成。联合参谋部除执行三委员之命令外，并可提出有关建议事项。

△　军事调处执行部会集三方代表，就目前各项工作问题举行会议。本日派三执行小组分赴徐州、大同、张家口。

△　晚7时，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七次集会，请张群、吴铁城、梁漱溟作报告，到千余人。张、吴未出席，当梁报告整军方案时，阵阵石块从窗外而入，狂击会场，呼打之声大作，一群暴徒将场内桌椅全部捣毁，殴打大会主持人和到会群众，张东荪等被殴伤。后暴徒狂呼口哨而去，迫使大会终止，制造了“沧白堂事件”。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联合急电军调部、政治协商会议，要求立即制止国民党军向同蒲、平汉、道清、陇海等线的侵犯行动，并自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后，从侵占之所有城市乡村全部退出，以昭停战信义，维持和平。

△　《新华日报》载称：前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四十军副军长刘芳圃、第四十军参谋长李照东联名致电政治协商会议，要求立即停止冲突、终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

△　重庆市中小工厂联合会致书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并提出10条经济改革措施。

△　国民政府授予杨格等四人特种领绶云麾勋章；授予杨克瑞门特种襟绶附勋表云麾勋章；授予杨廷义忠勇勋章。

△　晨7时30分，北宁铁路平沈线自“九一八”沦陷15年后在锦州首次举行通车典礼，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保安司令杜聿明派参谋长赵家骧前往主持。

△　盟军最高统帅发表特别通告，宣布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便“审理犯有破坏和平罪及包括破坏和平罪行在内的个人、团体成员以及兼有此双重资格而被起诉者”。同日又批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对法庭的组织、管辖权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

1月20日　国民政府令免李汉魂广东省保安司令职，任罗卓英兼广东省保安司令；免韩德勤江苏省保安司令兼职，任王懋功兼江苏省保安司令。

△　国民政府特派张彭春为出席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

△　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宴请军调部执行小组并发表讲话，略谓：全力支持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所作之和平努力。

△　上午11时半，军调部徐州小组美方代表哈利斯、政府代表李树正、中共代表王世英及随行人员专机抵徐，即日开始办公。

△　民主建国会邀政协代表邵从恩、缪云台作报告，听众百余人，施复亮主席，会中有人捣乱，遭群众喝打离去。

△　晋绥野战部队收复左云城。

△　下午3时半，满载日侨、日俘5000余人归国之“江岛丸”，于扬

子江口外60里之花岛山附近触及水雷爆炸沉没，近千人死亡。

1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谈判条件问题给东北局发出指示，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是：“（一）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时各党派及东北民主人士及民众团体均须有代表参加，要求取消行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包括各党派代表为委员，释放张学良并仍参加接收工作；（二）承认在东北的八路军及东北人民组织的自卫武装，并编为地方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及民警；（三）派进东北的政府军数目不应超过10万至15万，另驻东北各地军队之数额和运进路线预加协商。”

△　宋美龄乘“美龄号”专机飞抵长春，代表蒋介石赴东北宣慰东北同胞，11架飞机满载慰劳品30吨同时运抵长春。22日，宋美龄以糖果三万匣赠与驻东北国军、苏军和东北同胞并举行隆重授勋式，授予苏军将校级以上军官各式勋章，以示嘉奖。

△　军调部发表第二号公报，命令互相冲突的国共双方于冲突地区停战，务各后退一日行程之距离（至少60华里），并采取步骤恢复到13日晚12时以前双方驻防地。

△　军调部徐州小组美方代表何华德、政府代表李树正、中共代表王世英，赴津浦北段韩庄实地视察。济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等一行赴胶济线调查，双方军民沿途热烈欢迎。22日晨抵张店、淄川、博山等地调查。

△　国民政府全国公路会议开幕，会议通过重组全国公路交通委员会、统一各省公路名称等提案60余件，25日闭幕。下午，公路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全国公路今年分四期修复。

△　行政院电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电请：以原有我国国籍之台湾人民，应自去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之日起，恢复我国国籍。

△　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奉命撤销，其业务移交经济部接

收。

△　阎锡山军王靖国部，以三师兵力奔袭侯马镇，太岳军区第四纵队发起反击，歼其一个师。

△　云南当局是晚密令昆明市社会局，嘱其警告鼎新、昆明、崇文、云南四大印刷厂，不得代印呼吁民主之报刊，致使《民主周刊》、《时代评论》、《中国周报》、《昆明新报》、《学生报》等五种刊物被迫停刊。

△　上海文泰公司客轮一艘，于焦山西北尖滩附近漏水沉没，死600余人。

1月22日　蒋介石就苏军将于2月1日撤返苏联，致信苏军表示惜别，并派宋美龄到东北慰问，分发《致在华苏军将士书》40万份。

△　下午，政治协商会议“施政纲领”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外交、侨务两章。23日，通过经济、财政两章。25日，通过政治并前言部分，纲领问题全部告竣。决定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　午后，政治协商会议“宪草组”开会，各方达成下列协议：同意改组一党立法院，政权机关系两院制；立法委员由人民直接选举，监察委员由各省参议会选举；考试院增选各党派人士任委员，司法院不兼管行政，由司法官若干组成。

△　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开会。下列问题达成协议：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现役军人脱党，并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废止军事旧委员会，设国防部，各党派参加，将校放弃党籍；政府军六个月内编为90师，中共军队三个月内编为20师，明年则混合编为60师。整编之具体问题意见仍未统一。“政府组”以参加院、部、会人数问题尚待折冲，“国大组”仍以旧代表问题为阻力，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延期三天。

△　国民政府释放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廖承志。按：廖承志自1942年在广东乐昌被捕，监禁四年，经中共与政府多次谈判后，中共释放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人（1月26日释放），政府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廖承志。是日，廖承志在重庆获释。

△　军调部发表第三号公报，称：派赴济南执行小组，协同国共双方指挥官于泰安成立协定，协定规定立即停止一切冲突，互释俘虏，修复铁路。

△　《大公报》发表社论，呼吁国民政府立即兑现四项自由，杜绝特务到处横行、贫苦百姓时遭拘禁之可怕现象；立即取缔战时限制人民自由之各种法令。社论痛斥特务暴行，并严正指出："最近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集会数遭流氓破坏，代表遭石头毒打，其卑劣行径令人发指，决不是无人指使漫无组织的行为。"

△　晨7时，上海沪东区62家工厂6000余失业工人云集杨树浦公园，举行反饥饿大示威。游行队伍包围市政府，提出"从速实现国内和平，消灭内战"等六项要求，至晚7时结束。23日下午2时，上海永安、新工、中华等几大公司全体职工万余人，举行怠工，要求合理待遇。

△　台北市1000余市民为抗议物价高涨举行请愿。是日，台湾各地发生抢米风潮。

1月23日　政治协商会议为谋解未决问题成立综合委员会，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曾琦、陈启天、王云五、傅斯年等为委员。

△　政府代表陈鼎勋、中共中原军区参谋长王震、美方代表福特签订《罗山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包括非正规部队及民兵）停留于现在各自所在地，不得再向对方前进。同日，军调部派赴武汉之执行小组与中共中原军区司令兼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于

吕王城达成临时协议。

△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沈阳指挥所成立，彭璧生任主任。彭称：苏方已将锦西防务移交国军。同日，沈阳警备司令部成立，刘德川任司令。26日，新民、彰武苏军全部撤退。

△　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参谋长会议代表团团长商震偕团员孙立人飞伦敦赴会。

△　中国与暹罗于曼谷签订友好条约，两国互换大使。

1月24日　宋美龄于上午10时由长春起飞，11时到达锦州，出席民众欢迎大会并致词表示慰问。

△　午后，张群、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军事小组继续会谈，就整编军队原则问题进一步取得一致意见。

△　军调部发表第四号公告，称：大同已无军事冲突，罗山双方同意下令停止冲突，徐州冲突减少，集宁尚在协议中。

△　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哈勒德、中共代表马金桥赴枣园寺执行军调部命令。徐州执行组亦飞抵峄县。同日，陈毅发表谈话，指出“我军要求受降日军是应有的正当权利，蒋介石企图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是非法的”，并揭露济南、兖州国民党在重新武装被缴械之日军。

△　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复抵泰安，国共商谈结果，迫使济南执行小组政府代表涂叙五保证不再发第一枪。25日返济，雷克专机飞兖州会晤陈毅。

△　国民政府新任嫩江省主席彭济群接收省政，嫩江省政府成立。

△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文化界协进会成立，李公朴、茅盾、侯外庐、邓初民、翦伯赞、陶行知等17人为理事。

△　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八校师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四项诺言、国大代表重选、收回香港澳门等七项要求，历六小时之久。

△　中国纺织公司成立，宋子文发表谈话，谓此公司每年可获利一亿美元。

△　杭州爆发抢米店风潮，是日五万人冲进200余家米店，杭州市府出动大批军警分乘摩托车开往出事地点，鸣枪镇压，伤二人，死一人，逮捕多人。

1月25日　政治协商会议军事、宪草两组达成协议，其他各组意见仍僵持未决。蒋介石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图谋打破僵局。

△　军调部赴粤小组（第八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密勒、政府代表黄维勤、中共代表方方飞抵广州调处粤省冲突。下午4时，第七执行小组林光炯、王振民、孙志远（中共代表）、克瑞格（美方代表）一行17人由集宁飞抵归绥会晤傅作义。26日晚，广州张发奎于胜利大厦宴请第八执行小组。

△　重庆各高等院校师生举行游行示威，于英国大使馆门前摇旗高呼“收回香港、澳门”、“停止建筑九龙机场”、“惩罚一切汉奸、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必须彻底实现”。同日，天津2000余学生集会游行，庆祝国共停战，抗议昆明政府当局残杀学生。

△　下午2时，上海市商会、轮船业同业公会、中华商船驾驶员总会、轮机员联合会、航业学会、中华海员工会等七团体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决议通过吁请政府切实保持领水权完整、严禁悬挂外旗之船舶航行内河以及经营中国沿海贸易，并电请政府迅速修复现有各种船

舶及其他船业设备，迅速扫除水雷、恢复夜航、增加运输量。

1月26日　政治协商会议政府组初获协议，议定府委40名，委员由主席遴选，各党派推出人选，主席如不同意可再另推，行政院增设政务委员，各院、部、会概可开放。

△　政府代表王世杰访中共代表周恩来、民盟代表罗隆基，提出让步建议：主张“彻底改革政府机构，规定国府委员会议由各党派参加后，应赋有任命各部长之权；国府主席发布命令须由国府会议核准；国府会议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之决议案，国府主席无权加以否决”。中共及民盟代表对此项建议未置可否。

△　行政院长宋子文偕随员一行12人于中午由广州飞抵香港访问，港督哈科特少将、英驻港空军司令布鲁克等到机场迎接。

△　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选举张道藩、朱光潜、焦菊隐等31人为理事，王蓝、何如等10人为候补理事，熊佛西、傅抱石、徐悲鸿等九人为监事，陆丹林等五人为候补监事。

△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等21人赴新乡参加停战执行小组谈判。

△　上午11时，佩带枪支宪警并便衣特务四人非法搜查民主同盟政协会议代表黄炎培寓所。当日，民盟主席张澜召开紧急会议，当即决定向国民政府严重交涉。黄炎培亦致书蒋介石要求对此侵犯人权行为立即追究。

1月27日　周恩来、陆定一飞抵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停战、政协等问题的谈判情况，对解放区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所持原则立场有详细说明。

△　民盟九代表因黄炎培、张申府、史良等住宅遭非法搜查盘

问，宣布退出政治协商会议，以示抗议。原定今日召开之政府组、国大组会议陷于僵局，宣布取消。

△　午后，民盟负责人郑重声明：鉴于蒋介石对于宪警搜查政协代表住宅，悍然破坏四项诺言尚无答复，本会代表无意参加预定28日之会议。

△　政府代表张群急访民盟总部，表示对黄炎培案严加追究，并谓："限制人民自由法之废止或修正报告即将提交大会，切望民盟代表复会若何？"民盟代表当即声明："须获政府书面答复，才能保证其诺言之兑现，否则仍无意出席会议。"

△　晚，政府代表孙科等八人联名致函民盟代表团保证："一、关于战时所颁涉及人民自由法规，已分别命令各主管机关拟具应行废止或修正，于本月28日提交国防委员会通过，依照手续办理，并拟向政协会议提出报告；二、黄炎培住宅被搜查事已交主管机关切实查究。"民盟得此复件，为顾全大局，决定28日出席政协会议。

△　军调部发表声明：重申本部未命令杜聿明部占领热河省之赤峰，反之本部命令国共两军之各司令，遵照停战命令自1月13日12时起停止一切军队移动。

△　白崇禧、汤恩伯偕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抵镇江、扬州视察并检阅该地驻军第五十七师。28日，白、汤由常州赴无锡视察防务。29日，白召集第五方面军军官暨党政负责人训话，江南各县县长亦参加，白谓："军事方面以统一军令、整军建军为第一；政治方面以加强组织、健全基层组织为第一。"

1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府之名单：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停战、三人会议、政协等情况及讨论中共参加政府之名单。会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

会议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签字。

△　是日及次日，蒋介石在重庆听取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关于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和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通报。

△　民盟致函政府代表，同意出席政协会议，并提出五点意见：一、听取政府一切有关人民自由法规如何废止及修正后协商会上作一公开检讨；二、政府应制定《损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并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三、明令各地军政机关不得妨害各党派公开活动；四、立即兑现蒋介石宣布之四项诺言，并明令各地党、政、军机关，所有政治犯就地释放并公布名单，若宣布释放令后有被害者，该执行机关应负一切责任；五、黄炎培住宅被搜查事，政府于彻究后向大会报告。

△　军调部发表第六号公报，谓："据大同执行小组报告，山西北部、河北南部、察哈尔西南之一部分及绥远东南之区域内，军事冲突完全停止。"并谓：大同执行小组已成立协定，规定各部队恢复1月13日午夜之阵地，并恢复本地区内各村镇间之交易；双方互派联络官，互释俘虏；对正太、同蒲两铁路沿线路轨、电话线等交通器材进行严密调查与紧急修理。

△　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调处达成协议，双方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冲突，如某方违令，经执行小组调查属实，由进攻一方负完全责任，双方第一线部队互派代表保持联络；对执行小组人员，不得搜查留难；双方部队应即恢复13日24时原防位置。

△　军调部派赴全国各地执行停战令工作告一段落，是晚彻夜会晤，着手恢复交通事宜。中共主张恢复包括铁路、河道、公路、邮电等全部交通，政府代表意在恢复铁路一项，双方争持未决。

△　何应钦偕王耀武飞抵济南视察。美方代表雷克报告调处情况并请示各项问题。

△　联合国大会决议，以中、英、美、苏、法五国文字为大会正式语文。

1月29日　蒋介石接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及美特使马歇尔，倾谈良久。蒋介石指出，最近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如中国不统一，则不贷款与中国及不代运国军北上，凡此适与其援华及促成中国统一之政策相反；此无异苏俄破坏中美合作之诡谋已成。

△　张嘉璈致电蒋经国，告苏军以煤缺影响军运、国军以御寒设备不齐，未大量开入为由，撤军需缓至开春。31日，张嘉璈再次电告苏方延缓撤军。

△　陪都重庆青年联谊会于青年大厦举行成立大会，沈钧儒、李公朴及会员数百人到会，大会通过会章，以维护青年权益推进民主运动为宗旨，选出宣言起草委员会，举祝公建、胡静之、梁公任等11人为理事。

1月30日　国民政府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决定31日闭幕。“国民大会组”旧代表僵局问题，暂且搁置，由各党会外接洽。

△　国民政府令：米都登给予特种领绶云麾勋章；麦克鲁、威尔逊等44人各给予特种襟绶附勋表云麾勋章；克罗斯贝等28人各给予襟绶附勋表云麾勋章；魏金生追赠襟绶附勋表云麾勋章；罗门斯等二人各追赠襟绶云麾勋章。

△　军调部新乡执行小组政府代表曾杰陶、中共代表纪明、美方代表康斯威一行18人飞抵新乡，即赴修武调查冲突实况。

1月31日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决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五项决议，主要内容为：一、改组政府：充实国府委员会，府委40名，国民党占半数，由主席

选任，为最高国务机关，得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预算，任免各部、会长官暨任用立法、监察委员。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用人不得有党派歧视。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之部、会数目于会后续商。二、和平建国纲领：宪政实施前之施政准绳奉三民主义为建国指导原则，全力建设统一、自由、民主新中国。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三、军事问题：军队国家化，实行军党分立及军民分治。军事三人小组应即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中央军亦应依限期完成整编。军委会内设整编计划考核委员会。四、修改宪法草案：决定修改原则12项，组织审议委员会主持，两月内完成修正案。五、国民大会：本年5月5日召集，制定宪法，旧代表不动，另增850名。是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报告。

△　从延安返南京的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中国共产党认为马歇尔处理停战问题的态度是公正的，中共愿在这一基础上就全国与地方性的事务与美国合作。同时，周恩来还转交了毛泽东致马歇尔的信件，信中对马歇尔的“公正态度”表示赞赏。周恩来还说，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目前不打算将它付诸实现，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从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马歇尔表示他要说服蒋介石解除对中共动机的疑惧。

△　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雷克一行冒恶劣气候飞抵临沂调处鲁省全面和平工作，并与新四军军长陈毅、参谋长陈士榘晤谈。

△　民主促进会致函政治协商会议，疾呼：组织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政协会议代行最高权力机构之职权、重选国大代表、修正“五五宪草”、保障民权、发展民主经济等。

△　重庆文艺界茅盾等50余人，戏剧界洪深等50余人，音乐界、美术界知名人士分别致函政治协商会议，吁请停止内战、改组中央及

地方政府、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废除文化统制政策、确立民主之文化建设政策等。

是月　从军女青年全部退役。

2月

2月1日　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的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指示全党全军做好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思想准备。

△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马歇尔建议国共双方军队混编，中共军队主要驻华北，一部可驻在东北、华南；周恩来希望三人会议能尽快到各地视察，他们既可调查停战和恢复交通的情况，又可就整编问题同各地将领交换意见。

△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各记者所提关于最近延安之行及关于整编中共军队等问题一一作答。

△　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照国民政府颁布之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规定，将全部议决案及“了解事项”，呈送蒋介石交付政府实施。

△　下午，军调部发表第七号联合公报，略谓：“结束国共冲突已获满意成果，今日又派出三个军调小组飞侯马、承德、大同开展工

作。原有之大同组，明日将转移至太原工作。尚有12个组于不久之将来亦将派出工作。目前问题是积极恢复交通。”

△　济南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雷克上校视察胶济线。胶济沿线已无军事冲突。

△　新四军控制下徐州至海州全长170公里之陇海铁路全线通车。9日，新华社电称：自徐州以东横贯晋、冀、鲁、豫四省，东起临沟，南达泌阳，西接翼城，北迄商邑，全长1548公里之12条公路恢复通车。

△　新六军5000余人分乘三艘登陆舰开赴东北。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偕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巡视新六军登舰情形。自上月16日至是日，驻沪新六军主力全部运送完毕。

△　上午，军调部新乡调处小组于焦作成立协议，议定：一、双方停止攻击；二、释放俘虏；三、立即修复修武至焦作之公路。

△　国民政府为购置留印美军剩余物资，成立上海接转处，将布匹、机械、卡车等三万吨货物经海路运沪。16日，美军海外剩余资产清理委员会委员马克贝宣称：中国政府购买堆积在加尔各答全部美军剩余物资，计值2500万美元，此项物资计有载重三吨之卡车5700辆，此外尚有纺织品约值500万美元。

2月2日　　军调部济南小组在临沂与新四军军长陈毅举行会谈。美方代表雷克承认：“本小组得中共协助，进展顺利，倘若中央军与中共携手合作，问题的解决将无障碍。”陈毅表示：“本人指挥新四军及山东境内军队70万人，执行停战，已无问题，但须公平，伪军及未降日军均应归新四军缴械。”旋经彻夜长谈，双方于3日就泰安问题获一致意见。

△　军调部德州小组政府代表梁汉及中共、美方代表乘专机飞赴

该地区视察。3日，德州成立临时停战协定。

△　中国赴缅甸代表团代表李铁铮，就缅甸士兵袭击、枪杀华侨事，向缅甸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缅甸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处罚肇事者，并保证在缅华侨安全。

2月3日　　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派龚澎等两人飞渝，向周恩来请示机宜。4日，叶剑英访晤熊式辉，就东北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　延安两万余人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指出：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一切民主力量二十五年奋斗的结果，是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八年奋斗的结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实现，使国内和平一天天巩固，今后还要作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些决议；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参加政府，以便站在负责的地位来与各党派合作，实现这些决议，保证国家的民主化。大会通电拥护政协，要求早日解除敌伪武装，立即释放政治犯，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　军调部济南小组美方代表雷克与陈毅在临沂继续会谈。陈毅提出：新四军在济南、徐州各设办事机关；建议撤销徐州、济南绥靖机关，徐州、南京间15个军分散复员；未降日军应由新四军受降缴械；泰安、兖州、淮县、德州、枣庄、即墨伪军应由新四军就地缴械等六项意见。雷克于当日午后飞济电军调部报告。

△　军调部太原小组政府代表邹陆夫、中共代表许光达、美方代表和礼乘专机飞抵该地区视察。

△　新华通讯社于重庆设立分社。

2月4日　　行政院训令：《战后编余官兵安置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改名为《复员官兵安置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同日，行政院公

布废止《非常时期奖励捐款及募捐款承购国债条例施行细则》。

△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近情。5日，张嘉璈向报界发表讲话，谓：东北九省经济接收工作，将由东北行营组织“东北敌伪产业接收委员会”统一接收。

△　下午，军调部武汉执行小组飞抵武汉，中原军区参谋长王震同机到达。6日，赴信阳监督停战及恢复交通事宜。7日，武汉小组就开放交通、运输、购粮等问题进行商谈，未获一致意见。

△　新四军参谋长陈士榘代表陈毅飞北平军调部请示解决山东问题之方针。

△　张家口5000余群众举行欢庆和平民主大会。大会通电拥护实行和平建国纲领，改组各级政府。会后游行。

△　陪都重庆纪念第五届农民节举办之农产展览比赛会开幕，6日闭幕，三日内观众共达八万余人。

△　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首次会议于伦敦举行，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商震偕团员六人出席会议。

2月5日　　蒋介石在官邸接见英、美记者，谈国内外政策，宣称，“吾愿中国各党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设国家。政府决定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即行改组。”“国民党现在将其一部分责任分与各党派，实为还政于民愿望之开始，还政于民以后，国民党仍当与全国人民共负建国的责任。”又谓：此次政协会议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军队国家化，相信共产党对于此事必能切实做到。关于马歇尔在华活动，蒋谓：马歇尔来华主要任务，以军事问题为中心，对于其他方面亦有间接之帮助。

△　周恩来于重庆举行茶会，招待文化、文艺、戏剧界代表，百余人出席。周恩来报告政协会议成果及今后民主宪政发展之趋势，指

出：改组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枢纽。“民主道路崎岖，大家要努力争取。”

△　军调部石家庄小组政府代表胡屏翰、中共代表徐德操、美方代表葛瑞波乘专机飞赴石家庄、元氏县视察。

△　上海时装、煤气、自来水、公共汽车、机械、毛织、卷烟等70余家行业工人代表200余人集会，商讨组织上海劳工自由保障委员会。各行业代表纷纷发言，对当局指使暴徒毒打工人、逮捕代表事极表愤慨，强烈要求有关当局披露事件真相，严惩凶手，并表示誓作电力工潮之后盾。

△　山东解放区最高学府山东大学在临沂正式开学。

△　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一致通过授权总统以美国过剩之海军战舰、巡洋舰及驱逐舰271艘移交中国政府之议案，该提案并授权总统遣派海军顾问团援华，并将运用并保养上述舰艇以及训练舰只上人员所需之物资同时移交中国。

2月6日　　国民政府令：傅作义给予特种领绶云麾勋章；李德生等26人各给予特种襟绶附勋表云麾勋章；波脱莱等八人各给予襟绶附勋表云麾勋章。

△　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孙科、周恩来、曾琦、张君劢、傅斯年、吴尚鹰等35人组成；蒋介石指定孙科为召集人。

△　立法院长孙科对记者谈政协决议实施步骤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决议案将由国民党代表向二中全会说明，期获通过，惟各案现已逐步实施，政府最近已着手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及行政院组织法，一俟组织条例公布，各方人选推定后，政府改组当可实现。

△　中共中央电中共重庆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中共方面人选，毛泽东、

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中共方面人选；并表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　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美国《读者文摘》记者乌特莱，指出政协通过的纲领和中共的原提案出入颇多。并在回答经济政策时指出，国有工业应真正掌握在国家手里，使其有效自行经营或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经营。现在国营包而不办，以致工厂废弃、工人失业，有些国营变成了少数官僚资本的统制。即使将来国营企业经营得法，也不应独占一切。中国太大，太落后，私人企业存在是客观需要，和国营企业竞争可以刺激国营企业进步。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就东北苏军撤退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称：苏军迟迟未撤，是为交通障碍之故。26日，苏军驻东北总部发表声明，说明苏军暂时终止撤退是考虑到中国当局的要求而决定的；宣布自本年1月15日起，苏军撤退重新开始，完成日期“不会迟于美军的撤退”。

△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飞抵上海会晤宋子文，磋商金融措施。

△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上海市分会举行成立大会。上海市长钱大钧宣读蒋介石训词，略谓：“今抗战胜利，建国肇始，凡我同胞应协助建立航空事业，以复兴中华民族，巩固国防，保障世界和平。”

△　军调部晋南侯马小组国共双方举行首次会晤，太岳野战纵队司令员陈赓列举中共遵守停战命令以及阎军屡次向解放区进攻之具体事实；双方重申尊重停战命令。同日，陈赓命令所属部队严格执行军调小组有关停战之各项通知。

△　临汾地区达成停止洪洞以北之三阳堡及临汾南之邓曲等地冲突协议。

△　日军4000余人在济南缴械，至是鲁境日军全部缴械，总计6.6673万人。

△　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徐谟当选为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

△　美国技术团炼油、制糖、化肥专家爱格洛夫、罗比、胜雷、司马尔等七人应资源委员会聘请，是日飞抵台湾，就任技术顾问，协助台湾糖、油、化学、肥料工业之发展。

2月7日　　中国政府与加拿大贷款协定在渥太华签字，加拿大贷予中国6000万加元，年息为3%，自1948年起30年还清，支付方式为今明两年内向加购买产品。

△　蒋介石就派往各收复区之接收人员利用职权兼营商业囤积居奇事，电令收复区各军政机关“严厉查禁”，声称：“此种恶劣行为……一经查出，决予严惩不贷。”

△　行政院长宋子文于上海主持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理事会议，通过第二期紧急救济农业贷款10亿元之分配方案等四项议案。次日上午，召见彭学沛、刘功苓、徐乐元询问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及上海区燃料管理委员会工作状况。晚间，出席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各要员报告，并对平抑物价指示机宜。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向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斗争已开始激化。我们应努力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为执行上述方针，中央决定暂时停止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

△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招待中外记者，报告日军缴械情形称：日军缴械工作由于交通破坏，进行缓慢，直到1月初旬方告完成。又谓：遣送工作截至目前止，业已遣送33．5011万名日俘、日侨返

日。

△　北平军调部就铁路管理权争执问题举行会议。中共代表重申两点：一、黄河以北之全部铁路线，应归中共控制管理；二、国民党军区域内之全部铁路由国共双方联合控制。政府代表以“全国铁路必须统一管理，否则有损国家主权完整”为由，坚决反对。

△　军调部太原小组国共双方代表于丰镇成立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等三项协定。同日，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一行10人上午抵石，调处石家庄周围50公里至70公里地区之战事。

△　新华社电称：苏皖解放区迅速恢复交通，目前可通车之公路达2125华里；以淮阴为起点，西北可达徐州东南70里双沟镇；北经沭阳，东到阜宁、盐城；南达上海对岸之南通、海门；西南可达南京干线之六合附近乡间。苏中、苏北、皖东北等地有15条河道通航。

△　监察院战地第一巡视团负责人对《文汇报》记者发表谈话，略谓：“两周来接获人民控告政府接收人员之呈文已逾90件，其中控告接收人员营私舞弊、化公业为私产者最多，控告与汉奸暗通声气、私相接收者亦不少，其中更甚者为控告接收人员诬蔑善良人民为汉奸，从而霸占其产业，人民呼吁无门，只有听命彼等鱼肉。”声称：“对此，本团正严密查询中。”

△　教育部任吴敬恒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林语堂、黎锦熙、魏建功为常务委员。

△　重庆杂志联谊会、重庆出版业分别举行茶会、新年联欢会，庆祝政协会议圆满闭幕。同日，上海市报业工会举行代表大会庆贺政协会议圆满成功，并一致通过强烈要求改善待遇等提案10余件。

△　中央银行在锦州、哈尔滨、沈阳、长春之分行复业，中国银行在长春复业。

△　前美军中国作战司令麦克鲁及魏德迈之前参谋长柏德纳飞抵上海，主持组织“援华”军事顾问团。

△　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美国积极协助中国建立强大海军，计在青岛受美国训练之中国海军军官为660人，而在美国受训者1100人，即将训练者1500人，此乃美国协助中国之苦心。”

2月8日　　马歇尔同外交部长王世杰密商东北敌产问题，马告诉王世杰“不应对苏联作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承诺，从而承认它所提出的战利品其中包含它正在要求的那类经济权利”。

△　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目前在美军协助下，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海南岛、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被遣返的日人已达36万人。”又谓：今年3、4月间，可能有4500名美军被遣送回国，但同时亦将有人担任彼等未完成的工作。

△　张治中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联欢会。中共代表周恩来出席并讲话，指出写在纸上的文字要去做，去执行，要遵守诺言，要倾听人民呼声实行政协决定。

△　山东泰安国共两军对撤防问题未获一致意见，军民绝粮九日。是日，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雷克偕双方代表飞抵北平，请示军调部解决。

△　国民政府委派上海市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参加审讯日籍战犯。是晨，向哲濬飞抵东京，就任国际军事法庭副检察官。

△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访华代表团一行八人由团长、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齐米特多尔济苏龙甲布率领飞抵重庆。

2月9日　　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商谈恢复交通及军队整编之实施办法，白鲁德以本案草拟人资格参加会议。下午达

成12项协议并签字。泰安僵局亦商妥解决办法。

△　军调部发布第一号特别指令，指定徐州顾长官、太原阎长官、北平孙长官、山东王长官、各执行小组立即与下列对峙之共军指挥官设立联络机构，以解决粮食运往下列城镇：陈毅将军（司令部在山东临沂）辖即墨、张店、枣庄、泰安、兖州等处；山西丰镇之刘伯承将军（司令部在河南武安县）辖聊城（山东）、东明（河北）、永年（河北）、闻喜（河北）等处；聂荣臻将军（司令部在丰镇）辖大同以东（山西）；贺龙将军（司令部在丰镇）辖大同以西（山西）。

△　北平军调部发表第九号联合公报宣布：国共双方同意伪军包括于停战范围之内，公报规定：属于停战范围内之一切部队应保持1月13日午夜所驻守之位置。

△　军调部德州小组会同中共驻军代表签订德州区域临时停战协定。中共允供粮五万斤以救德州缺粮之急。

△　参政会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王云五主席，邵力子秘书长宣读外交部书面报告后，农林部长周诒春报告最近农林设施及收复区农林事业接收情形。

△　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北平召开，熊式辉主席报告接收经过，会议通过请政府速订处置东北汉奸条例及训练东北各机关工作人员等议案。

△　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抵北平，指示华北恢复交通事宜，谓：该部对于恢复胶洛、津浦、平汉、陇海四大干线交通正在努力准备中，数以千计之修路工程技术人员已按原定计划到达各工段。

△　“人权保障委员会”发起人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冯玉祥、李烛尘、沈钧儒分任正、副主席，举董必武、邵力子等27人为筹备委员。会议通过：一、广泛发动省、市、县、区、乡、村成立本会；

二、敦促政府明令公布实行提审法，积极取消特权，清理失踪、遭非法逮捕人员情况等六项决定。

△　上海黄金、食粮、布匹继续高涨，米粮、绸缎、人造棉、日用品、卷烟等一致暴涨，投机活动猖撅。财政部京沪特派员办事处急于控制局势，是日派员分别到各银行检查账册、簿籍、库存。同日，天津金价扶摇直上，突破12.9万元，美币每元1650元，面粉每斤190元，蓝布每匹4．7万元。10日，北平金价涨至8．55万元，突破重庆官价8．5万元之数，各种物价因之高涨30倍。

△　美国国务院正式向苏联和中国政府发出关于处置中国东北工业之照会，宣称："中俄两国政府对于满洲工业问题协议之谈判，被认为将会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对可能盼获机会参加满洲工业开发权利的美国人将会形成明显的歧视，并且会使美国商业利益，在其与满洲建立未来贸易关系时陷入明显的不利地位。"又称："满洲工业的最后处置问题，事关曾担当击败日本主要任务的诸盟国共同利益和利害关系。"要"在各个申请国家之间实行最后的分配，因此，在此期间进行对满洲的日本国外财产的最后处置，不应当作战利品将此种工业财产搬走，或是由俄中两国政府关于这些财产所有权的掌握问题进行协议，都似乎是最不恰当的"。

△　马歇尔致杜鲁门，建议撤销"中国战区"，迅速建立军事顾问团。略谓："我们必须尽快在这里脱身，以避免类似今天俄国人对英国在希腊驻军问题上的那种照例的指责。对此，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结束中国战区，并迅速发展军事顾问团来代替它。"并谓："魏德迈在我敦促下，正在实际上但非正式地在南京组织该团。"13日，杜鲁门复电，对马歇尔上述"尝试性行动方针"颇为赞赏。并告以关于驻华军事顾问团的修正计划几天之内便可拟就，拟好后，当请其提出意见。至于撤销中国战区一事，杜鲁门谓："我颇感兴趣，愿闻你关于这一撤销时间的看法。"

2月10日　上午，陪都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3000人，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郭沫若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席宣读《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共同为政协五项协议彻底实现与和平建国成功而努力奋斗。会间有人提议由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充大会主席，为李公朴阻止，发生争执，台下哗然，一伙暴徒上台抢夺扩音器，占领主席台，捣乱会场，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及《大公报》记者等十数人，到会群众多人亦遭殴击。大会被迫中止，是为重庆较场口血案。

△　政协代表孙科、邵力子、周恩来、沈钧儒、陈启天、李烛尘等10余人就较场口血案紧急磋商，公推周恩来、李烛尘亲晤蒋介石面述惨案经过。蒋介石避而不见，次日离重庆飞抵上海。

△　下午，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筹备大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李德全、章乃器报告大会遭暴徒袭击经过。是晚，民盟政协代表举行特别会议，紧急磋商较场口事件。

△　下午，重庆各界青年团体就“二一〇”较场口血案举行紧急座谈会，决议组织陪都各界青年“二一〇”血案后援会，紧急呼吁政府惩办凶手，取消特务，释放政治犯。

△　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负责人谈称，政协宪法草案与总理五权宪法及建国大纲之遗教“出入处颇多”，提出意见12项，“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

△　上海举行授勋典礼，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向行将离华返美之空军司令斯特拉特梅耶、空军参谋长麦克纳、副参谋长伊文斯、副参谋长鲁特克颁授勋章，市长钱大钧及美方魏德迈等人出席。

△　广州举行授旗典礼，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代表蒋介石将荣誉旗五面，分授予缅北滇西会战中抗战有功之新一军及所属之新编第三

十八师与第五十四军及所属之第三十六师、第一九八师。

△　青年远征军第二〇七师由沪开赴东北，全副美式装备之国民党新一军自广东开往东北。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访华代表团团长齐米特多尔济苏龙甲布就建立两国外交关系问题举行首次会谈。下午，齐米特多尔济苏龙甲布会晤蒋介石。

△　中央社长春分社正式成立，即日开始发稿。此为中央社创立以来首次在东北境内设立分社。

2月11日　上午，周恩来、张治中就执行冲突命令所发生的临时问题举行会谈。午后，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继续就中共军队整编办法进行广泛协商。

△　北平军调部就恢复华北、华中交通初获协议并发表第十号联合公报。公报责成各驻军司令长官立即采取有效步骤协助重建一切公路、铁路、水路、邮政、电话线、无线电设备等；各指挥官须立即撤去或平毁各交通线上之一切地雷、碉堡及其他障碍交通之军事设施。一切非法或假借任何理由阻挡平民旅行、行商运货，破坏私人货物，强迫检查，障碍邮电等措施均应停止或废除之；各司令长官并应协助解决抢修交通人员的食物、住房、运输、建筑材料，修复工作将于执行部监督之下由交通部之代表机关完成之。指出："修复中国之已断绝之交通线及对此所需之协力，将被各方及全世界视为国民政府与中共对于实现真正停战确具诚意之证明。各指挥官务须际此时机一致奋起，将此种目的视为至上，以求获致长期和平。"

△　北平军调部增设铁路管理组，由政府代表陈农华、中共代表耿飚、美国代表奚尔组成。下设几个小组，分别监督平汉、平绥、平承、津浦北段、陇海东段、胶济、同蒲、正太八大铁路之修复和通车事宜。14日，铁道管理组举行首次会议，议定津浦、平汉、胶济、平

绥四条铁路修复工程于三月内动工。

△　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致马歇尔备忘录，抗议广东张发奎部队于停战令下达后仍不断进攻惠阳大鹏湾一带东江抗日纵队。

△　蒋介石由渝乘“美龄号”专机飞抵上海。同日，蒋介石向市民发表谈话，称：今日邪正不能并存，奸忠不容并立，我要求上海同胞加紧团结，明辨是非，忍艰忍苦，奋斗到底。

△　国民政府指令改四川省理番县为理县。

△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麦斯武德继罗家伦任新疆监察使。

△　交通部派出视察团11人，飞赴华北各地视察交通接收修复实况。

△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民主同盟等民主团体代表许广平、胡厥文等40余人就较场口血案举行紧急会议，一致通过立即组织人民基本自由保障委员会上海分会。

△　下午，重庆各界，就昨日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场扰乱事，在市参议礼堂举行伸张正义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会章宣言，并捐款二万元慰问受伤民众。

△　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雅尔塔秘密协定。按：此为1945年2月11日英、美、苏三国领袖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后对日宣战之秘密协定，该协定损害中国主权，其中包括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管中东、南满两铁路；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各岛归还苏联；大连辟为国际港，并保障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以日本千岛群岛割于苏联。上述条件作为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对日宣战的代价。

△　美驻华空军总司令史特拉特梅耶离任返美，遗缺由参谋长威

利云接任。

△　上海市粤菜业职工怠工半月，资方被迫妥协，同意职工工资自2月份起实行调整。14日全体复工。同日，僵持半月之上海电力公司工潮，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资方被迫答应职员任免事需工会同意等11项要求。

2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会见魏德迈，就中国地区军事问题作重要会谈。当晚，魏德迈宴请蒋介石夫妇，陈诚夫妇及各高级将领、党政委员出席作陪。

△　行政院第七三三次例会通过《华侨复业贷款办法案》。14日，财政部为协助华侨恢复海外事业，饬由中国、交通两银行举办华侨复业贷款，其总额为5000万美元。

△　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远、美方代表茫茂隆、政府代表孟文和一行11人抵解放区云岗镇视察。

△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致函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表示慰问。同日，《希望》、《文艺》等四杂志联合致函李公朴、郭沫若，谓："较场口事件铁一样的事实教育我们，在人民的民主力量逐渐抬头之前夕，旧的没落势力必然表现得更卑鄙，更无耻。"

△　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谓："美国对中苏关于东北之谈判深表关切"，要求中国速将中苏关于处置东北财产及设备事通知美国。

2月13日　蒋介石在上海召集"蒙难"代表训话，蒋伯诚、吴开先、戴济民等参加。蒋介石对彼等在沦陷区之"艰苦奋斗"备加慰问。下午，蒋介石夫妇举行茶会招待沪上耆绅，章士钊、杜月笙、黄金荣等数十人参加，蒋介石发表演说，勖勉上海父老同胞共同完成建国大业。

△　蒋介石在上海设立主席行辕秘书处，办理各界公函及陈诉函件。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齐米特多尔济苏龙甲布举行建立中蒙外交关系换交式，并决定最近将来互派外交代表。

△　中共中央发言人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都应予承认并整编，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维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如认为他们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至于收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如姜鹏飞部新二十七军）去接收东北之权，则应予以禁止。"

△　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百六十五团一营分由新立屯、彰武进犯法库县，11日抢占东北民主联军之秀水河子镇。是夜22时，民主联军第七旅及第一师共四个团的兵力分别从东南、正南及西北、正北四面发起反击，次日凌晨战斗结束，歼灭国民党军1500人，收复秀水河子镇。

△　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美方代表赫里斯、政府代表谢慕庄、王世英一行七人再赴临沂会晤新四军军长陈毅，谈修复交通问题。陈毅表示，我方早有修复铁路准备，希望政府拆除军事

障碍。

△　泰安达成停战协议。15日下午，军调部泰安执行小组召集粮食运输会议，决议运粮办法六项。同日，石家庄停战协议亦告成立。16日，山东张店停战协定成立。

△　重庆新闻界代表42人联名致函中央通讯社，抗议该社关于10日较场口惨案之歪曲报道。同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报告较场口血案真相。书中并提出严惩肇事主犯刘野樵、吴人初等六人，彻查幕后全部主使者，立即解散一切特务机关等七项要求。

△　重庆黄金黑市交易猖獗，游资竞购黄金，是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宣布停止出售黄金。

△　广州国民党当局以《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界》等四杂志“手续不合”、“内容荒谬”为由，禁止出售。

△　印度访华贸易代表团飞抵上海。

2月14日　　上海市国民党党政、公教、民众200余团体举行欢迎蒋介石莅沪大会，15万人参加。蒋介石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建国与保障独立自由，最重要就是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明礼义，知廉耻，守纪律”，希望上海同胞，“人人都能身体力行，来做全国同胞的模范，共同一致完成我们建国的使命”。

△　政协宪章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周恩来、董必武、王云五等25人出席，中共中央派秦邦宪出席会议。会议就国民大会问题决定成立协商小组，协商国民大会、中央政制、地方制度、基本国策等六项专题。

△　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就全国军队整编各细节问题举行首次会议，周恩来要求派执行小组到营口调停军事冲突，

政府代表反对。15日、16日继续商讨。

△　临汾停战协议成立。协议规定国共双方互派联络组，确定运输物资路线并保障双方人员安全。

△　蒙古人民共和国访华代表团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返蒙。

△　广东省高院判处伪广东华侨联合会会长李起群死刑，为广东省汉奸明正典刑第一人。

2月15日　上海市物价直线上升。是晨，蒋介石召见参政员奚玉书征询平抑物价意见。旋召杜月笙等询问交易买卖情况，复召沪工商界人士指示组织专门委员会以谋对策。

△　上海市长钱大钧邀财政部驻京沪金融特派员陈行、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彭学沛、敌伪产业处理局刘攻芸、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等就平抑物价应采取之步骤、方针进行磋商。16日彭学沛召集抑平粮价会议，决定对非法交易严加监督，对提高价格、囤积居奇者“严惩”。

△　财政部驻京沪财政金融办公处会同上海市警察局赴华商证券交易所大楼突击检查各证券字号账册，取缔投机，涉嫌投机者百余家，黑市交易全市停顿，银楼亦停止饰金买卖。

△　陆军总司令部召集武汉、广州两行营，徐州、郑州、衢州三绥靖公署及徐州、郑州两绥署所分辖之八个绥署区，与武汉、云南两警备司令部及分布各地之八个集团军，44个军及111个师各单位主管、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在南京开军事复员整军会议预备会议，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白崇禧、顾祝同、张发奎、刘峙、余汉谋、薛岳等200余人出席。

△　国民政府令：汤恩伯陆军中将特加陆军上将衔。

△　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董必武、莫德惠、陈布雷等23人出席，孙科主席，继续讨论国民大会组织、职权、任期与议会制度之关系等问题，各方意见未获一致。

△　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就立即修复大同、阳泉间之公路问题达成正式协议。

△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抵锦州，向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报告该军北运情形，并请示机宜。

△　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由沪飞渝。次日，在曹家岩美军总部作战室举行记者招待会，答复关于遣送日军返国及运载国民党军前往东北等问题。宣布已遣送日军39万人，表示当尽力利用美所有的工具负责运载更多的军队前往东北。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在上海病逝。27日，国民政府明令发给治丧费一万元，派孙科、钱大钧等21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料理丧事。

△　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召集在北平蒙旗委员茶会，到50余人，表示拥护中央政府。

△　中国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于重庆正式成立。举田汉、马思聪、贺绿汀、欧阳予倩等25人为理事。

△　中央通讯社于台北成立分社。

2月16日　军事复员整军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蒋介石亲临主持并致训词，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报告各战区受降经过及接收情形，嗣由各将领报告各部队情形。

△　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央政制问题，孙科主席，各方就分权制度与议会政治之利弊争辩热烈。下午举行第

四次会议，王云五、周炳琳相继发言，力主中央采总统制，各方意见仍未获一致。

△　北平军调部发表第十二号联合公报，宣布遣送华北日俘、日侨为该部目前主要工作。略谓：本部组成后，其第一项主要工作，停止一切冲突已完成；第二项主要工作，监督华北、华中交通之恢复，并进入解决之途；目前已开始第三项主要工作，即遣送华北日俘、日侨。

△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张发奎否认粤境解放区和华南抗日纵队之事发表声明予以驳斥："中共领导的广东华南抗日纵队，自民国二十七年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下不战而弃广州后即已组成并英勇抗战，七年战功卓著，不但中国人，且英、美各国人士无不承认其战绩。三人军事委员会与军调部应迅速采取步骤纠正广东当局此种错误言行，并停止其进攻。"

△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建设"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东北人民有十四年并肩作战血肉相联的关系。不承认东北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企图以军事解决，势必发生内战。东北问题的解决仍须坚持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协商原则，依照东北人民的愿望，考虑中共主张和中共及地方力量，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　成都金大、齐大、华大、川大、中大等校学生5000余人及文化界10余团体代表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及声援重庆"二一〇"血案大会，一致通过强烈要求当局取消特务组织。会后游行示威，高呼"严惩'二一〇'血案祸首"、"中国民主一定胜利"等口号。

△　东北旅渝同乡会举行大会，要求苏军立即撤离东北，到1400余人，杨秉文主席。会后，同乡会会员400余人结队前往国民政府"请愿"，沿途张贴反苏标语，散发反苏传单，高呼"苏军立即撤离东北"。

△　中、中、交、农四行及中央信托局员工要求调整待遇，怠工两小时，迫使营业停顿。17日，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答应增薪，怠工风潮解决。

2月17日　军事复员整军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各部队长报告各地国共停止冲突情形；继就军队文化、官兵娱乐、加强部队教育等项进行讨论。

△　武汉行营主任程潜自重庆飞抵汉口，就任新职。当即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本行营所辖区域为湘、鄂、赣三省暨豫、皖边境之一部。26日，该行营正式成立。

△　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就恢复该地交通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决定即日开始修复津浦、陇海两线受破坏之地段。

△　军调处执行部开始遣送日俘、日侨。北平的日俘、日侨遣送工作，由塘沽港口运输司令部主办，于去年10月18日开始，迄今已遣送17万余人，尚有23万人待轮遣归。

△　根据长江区航政局统计，迄今全国已接收敌伪船舶2751艘，共15.1218万总吨。长江区航政局管核川、鄂、湘、赣、皖、苏六省所有长江及其支流航务，川、鄂、湘、赣四省重要港阜该局均已设立办事处，皖、苏两省则定3月1日接管，并成立芜湖、镇江、南京三个办事处。

△　上海民主促进会等32个团体集会，欢迎政协代表沈钧儒及文化界人士叶圣陶。大会一致通过要求蒋介石严惩较场口血案主犯，停止保甲编制，撤销戒严令和撤销邮电新闻检查制度等五项提案。

△　晋冀鲁豫边区文化、新闻界驰电慰问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并要求严惩暴徒。

△　昆明万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并

抗议重庆“二一〇”惨案，闻一多主席。大会宣读昆明学联抗议国民政府重用“二一〇”惨案祸首李宗黄的抗议书，会后游行，高呼“严惩重庆血案凶手”、“切实保障人身集会自由”等口号。

2月18日　国民政府令：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定于民国三十五年3月20日在陪都召集。

△　军事复员整军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蒋介石主持，通过本年度全国陆军整编计划：步兵90个师，骑兵10个旅。

△　蒋介石手令财政部订购暹米300万石。

△　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王宠惠主席，讨论地方制度问题。莫德惠赞成制定省宪，周炳琳、余家菊反对，各方意见未获一致。19日，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人民权利与义务。

△　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就军队整编方案举行第四次会议，获若干协议。19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　北平军调部第十三号联合公报，发布遣送日人回国命令，略谓：在华北有日军12万人，日侨18.9万人，将分别从塘沽、青岛遣送回国。执行部将协同中国政府及中国战区美军采取必要步骤，设法输送此等日人至登船港口，至于各地日人之遣送次序问题，则将由执行部根据铁路设备等情况以决定之。并谓：对于华北日人尽可能从速遣送一点，亦已获得协议，任何其他因素，不得容其延缓此项运输工作。

△　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从广州沙石出发赴惠州视察大鹏半岛，当晚抵惠后即召开小组会，驻军第六十三军副军长欧鸿应邀参加，美方代表米勒宣读军调部对于大鹏半岛方面第六十三军第一五三师进攻中共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一事进行调处之训令，欧称：“在六十

三军防地之内，并没有什么中共部队，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扰乱地方治安”，加以抵制。21日，执行小组因无法进行调处任务，遂返回广州待命。

△　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略谓：“全国实现民主团结，东北问题自可解决。反苏反共决不会有出路。”25日，民盟发言人就东北局势发表讲话，要求政府早日公布外交真相，遵循政治解决途径，协商具体解决办法。

△　重庆、万县、泸县、江津等中小工厂代表因受战后经济危机影响无法开业，是日组成中小工厂联合会，并招待新闻界陈述困难，呼吁当局给予救济。

△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之东北》的社论，宣称：“东北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和太平洋战争的摇篮，美国对于东北的命运，由于其传统的政策及其所负的特殊义务，具有真正的关切。东北地位重要，拥有中国70％的重工业，美国对这一形势的牵涉，自不言而喻。”

2月19日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十二周年纪念会上训示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与各省、市分会以及机关、团体暨全国同胞，称：“新生活运动实为民族复兴之运动，建国一日未成，此义一日不废。”并要全国同胞“务必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振衰起敝，贯彻始终”。

△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王世杰为商定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暨中法关于越南之协定及换文全权代表。

△　军事复员整军会议闭幕，通过国军整编等项决议案，蒋介石训话重申“军令、政令统一”，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应邀出席演说，表示：“吾将尽全力协助中国建设现代化军队。”

△　北平军调部发表第十四号联合公报，宣布津浦、胶济、陇海、平绥铁路立即开展修复工作，首先修复津浦线，其他三线依次修理。

△　济南执行小组涂叙五、邝任农、雷克一行到达泰安。21日下午，双方代表再度磋商解决泰安紧张局势之具体办法。

△　河南省黄汛区灾情调查：灾及20县，死亡12.2万人，淹没田地959.3474万亩、房屋415.9647万间，淹毙牲畜51.5434万头，农具损失共值68亿多元。

2月20日　蒋介石飞抵杭州视察，检阅青年远征军第三十一军第二〇八师及第二〇九师。是日举行茶会听取各机关首长报告并训话。

△　外交部发表声明，谓中国不受雅尔塔密约的拘束。

△　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赴孤山勘察。经双方磋商，同意于平绥铁路线上罗防村以北30米处设立双方防区界牌（大同北四五里），于公路线上之山底村正南设一界牌，界南为国军防区，界北为八路军防区。双方同意恢复铁路交通亦以界牌为线。

△　美军《星期报》载称：美军遣送日俘责任业已结束，今后在华美军任务为：一、运输中国军队北上；二、组织军事顾问团；三、守护在华美军产业。

△　国民党中央监委、国民政府委员、陆军上将李烈钧在重庆病逝。

△　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李宗黄到职视事。3月4日，昆明30余学校三万余学生罢课，抗议当局提升“一二一”惨案杀人凶手李宗黄，并提出要求政府赔偿一切损失，立即改组政府等六项要求。

△　上海43家官营、民营棉毛纺织厂四万余工人为要求补发上年11、12两月按生活指数计算不足之差额及新工人借薪万元两事，是日举行总怠工。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被迫妥协，同意由资方照办，工人复工。

2月21日　国民政府令授予魏德迈青天白日勋章。同日，上海市长钱大钧主持授勋典礼，授予对付“异党分子”成绩表现甚佳之中美合作所美方将领贝乐利、海基、钱普三人高级勋章，表示双方进一步“精诚合作”。

△　中共代表周恩来自延安飞抵重庆。同马歇尔会谈，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感谢其好意，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和民主的道路。赞成美国在技术上帮助中共军队。原则同意军队分两步统编的步骤。并提出，三人小组应去东北，停战令适用于东北，军队整编方案应包括东北。

△　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举行第五次会议，继续就第三、第四次会议中整编军队问题的困难项目谋取解决办法。

△　“冀省难民还乡团”在北平东四一带示威游行，狂呼：“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沿途散发反共传单。旋至协和医院军调部，捣毁中共办公室，殴打中共办事人员，守门宪警不加阻拦，暴徒扬长而去。

△　北平军调部叶剑英、罗伯逊等就暴徒捣毁军调部一事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执行部三方工作人员之办公所、住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日驰电蒋介石，要求责成各有关机关对军调部克尽保护之责。

△　军调部参谋长罗瑞卿就军调部被捣毁一事发表谈话，指出：“全国人民正拭目以待政府实施政协五项决议之际，而特务竟敢如此横行，实属令人费解。”重申：“中共代表团为了停战、恢复交

通、受降遣俘之共同任务来到北平，绝不会因外来阻力而终止工作。”

△　军调部归绥执行小组赴凉城视察。22日，该小组举行首次正式会议，决定赴绥东铁路沿线视察。

△　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肾结核病复发离职静养，蒋介石命京沪卫戍副司令郑洞国暂代。是日，郑飞北平履任。3月8日，杜聿明飞美治病。

△　上海电讯职工5000余人要求改善待遇，实行怠工，嗣后，扬州、南京、镇江、丹阳、无锡、广州、天津、青岛、成都、北平以及苏、鄂、赣各地相继通电响应。26日，上海市当局表示妥协，商决四项临时解决办法，职工复工。

△　陇海路中牟大桥通车。

2月22日　重庆大、中学校万余名师生为“东北问题”发生反苏反共游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告东北同胞书》、《致苏联抗议书》及《质问中国共产党书》等宣言，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等口号，捣毁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该报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及职员徐曼君、管佑民等受伤，书籍、财物用具损失达一亿元左右。民盟《民主报》亦被捣毁。当日，中共代表团招待记者，明确指出：此次事件纯属预谋已久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共事件，希望具有爱国精神的青年学生，不要上特务的排外阴谋的当。并严正声明：中共始终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受挑拨，也绝不退却。

△　国民政府委派刘增华为驻东京盟军总部外交特派员，是日刘增华飞抵东京。

△　上海市物价激烈波动，蒋介石再度飞抵上海。次日，分别召见上海市长钱大钧及中、中、交、农四行总、副经理陈行、宋汉章以

及杜月笙等人，听取沪市金融物价波动情况，商讨稳定物价办法。

△　军调部第五号特别指令，规定国共双方在3月15日呈递驻军详细报告，注明部队番号、部队实力、指挥官姓名、指挥所地点及部队驻地主要位置，再由军调部将此报告通知各该执行小组。

△　保定停战协议成立。26日，保定地区全面冲突停止，国共双方签署停止冲突保证书。

△　《解放》三日刊在北平创刊，5月29日被政府下令查封。该刊系中共北平市委创办，共出版37期。

2月23日　　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另有任用，应免本职；特任朱绍良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特任贺国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

△　蒋介石手令行政院实施平抑物价办法三项：一、迅速恢复铁路、公路及航运；二、帮助收复区各工厂开工；三、收复区农、工、商业并重，农贷应迅速办理。

△　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就《新华日报》被捣毁事向政府提出抗议书，提出立即查究主犯，解散特务组织和赔偿损失三项要求。同日，民盟主席张澜亦就《民主报》被捣毁事致函蒋介石，要求严惩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　军事三人小组举行第六次会议，就国共军队整编问题达成协定。25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在重庆举行《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仪式。《基本方案》凡八条23节，规定协定公布后12个月内，将政府军编为90个师，中共部队编为18个师。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10人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要求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

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

2月24日　蒋介石巡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完毕，是日返抵重庆。

△　重庆警备司令王缵绪发表声明，对于《新华日报》、《民主报》两家报纸被捣毁事表示遗憾。并谓："捣乱分子九人已经警察局保安大队当场逮捕，送交法院处置。"

△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举张西曼、许德珩等25人为理事。大会发表宣言，并通过取消保甲制度等11项主张。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地须从事整编军队的准备工作的指示》，通报整军方案内容，说周恩来"到各处时，请你们和他商量"。

△　成都各校和各界人民团体数万人，在华西坝广场集会并游行，一致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华西坝五个大学校长及全体教职员为此致电蒋介石，贵州大学20名教授签名发表宣言，对东北问题提出七点意见。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学界响应。

△　美国财政部长文森发表美国冻结各国在美财产之统计报告，其中冻结中国3．56亿余万元。

2月25日　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国民政府纪念周发表讲话，宣示政府对于东北问题的方针，即："（一）必须遵守我国之法令；（二）尊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不抵触我国所签订之一般国际协定。"望全国民众"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

△　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通过宋子文所提开放外汇市场案，该案规定：一、中央银行指定若干银行买卖外汇；二、现行官价外汇汇率废止。中央银行应察酌市面情形，并依照供求实况；随时供给或收

买外汇，以资调节，而防止过度波动。对外币钞票及黄金之买卖，亦依同样原则办理；三、拨美金五亿元为法币准备金，并由中央银行于现有外汇中划出一相当数量为基金，作随时平准市场之用。又通过《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

△　马歇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周恩来提出，停战和整军协定应包括东北在内。对国民党军大肆进攻解放区、一直不同意派执行小组到营口等提出批评。

△　军事三人小组就全国军队整军方案达成协议，并经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准，是日下午4时，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在重庆举行《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仪式。《基本方案》规定于12个月内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18个月内，政府军编为50个师，中共部队为10个师。

△　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东北问题意见，指出：一、一切友邦必须承认并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凡一切有关中国问题的协议，如未经中国同意，中国国民绝对不能承认；二、希望苏联充分地履行条约的规定，使两国的友谊更加强；三、必须充分由外交途径解决中苏间的悬案，以增进两国间的友谊；四、关于东北问题的内政部分，必须与外交问题分开，本协商的精神，求合理的解决。

△　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建立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

△　驻苏大使傅秉常返国述职。

△　山东聊城国民党军王金祥部与城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部隔城对峙，间有枪声，局势紧张，城内军民粮食、燃料断绝。济南执行小组是日抵聊城，立即发放善后分署急赈200万元。同日复召双

方开会，成立协议三项：一、双方严格执行命令，停止冲突；二、组织粮食委员会，解决城内军民食粮问题；三、允许城内外居民自由往来，不得干涉。27日，雷克一行返回济南。

2月26日　国民政府令准免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职，特任贝祖贻为中央银行总裁。

△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学生快报》上发表对东北问题的意见：一、从东北行营到各省政府应吸收东北民主人士参加；二、承认东北抗日民主部队；三、承认东北各县民主政府；四、国民政府开入东北的军队应有限制，并禁止利用伪军接收东北。

△　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参谋长特罗岑科陆军中将关于苏军撤离中国东北问题对长春市报界发表声明，指出因中国政府行动极为迟缓，未能按时到达苏军撤出的地区，中方也曾多次提出，待中国政府军到达后，苏军再自行撤离；煤炭的缺乏和严冬环境给铁路运输造成各种障碍等，是造成苏军延缓撤离的原因。驻满洲苏军司令部期望，苏军撤离的期限，将早于，无论如何也不会迟于美国将美军撤出中国的期限。

△　重庆文化界人士茅盾、巴金、史良、胡绳、杜国庠、徐迟、冯雪峰、郑君里、何其芳、侯外庐、翦伯赞、欧阳山尊等152人签名发表《告国人书》，要求惩办较场口“二一〇”血案祸首，取消特务机关，赔偿医药费和损失费，释放无辜被捕人员。

△　中墨友好条约在墨西哥外交部互换。

2月27日　北平军调部发表第十五号联合公报，宣布：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将于明日飞抵北平，视察华北地区，巡视路线计划为集宁、济南、张家口、新乡、太原、徐州等地。并将赴汉口、广州地区视察。本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将陪同前往视察。

△　沪海关禁止外币出口。

△　重庆文化界、产业界以及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重大教育学院一部分教授，对东北问题发表共同宣言，要求美、英、苏三国应坦白承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错误，苏联应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迅速撤退东北驻军。

△　长春“满洲电业会社”突被此间苏军总部派员接收。沈阳4000余家工厂仅余空壳，剩20家在苏军守卫下艰难开工。

2月28日　立法院举行第二九五次会议，通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该《条例》依选举法规定除1200名代表外，补充东北、台湾等区域代表150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总计国民大会代表为2050名。

△　民国政府特派蒋延黻为出席联合国救济善后会议第四届大会代表。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法国驻华大使梅里霭在重庆签订《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同日，王世杰与梅里霭签订《关于中越友好关系协定》及《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

△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飞抵北平。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军调部三委员叶剑英、罗伯逊、郑介民前往机场迎候。是日，张、周、马与郑介民、罗伯逊、叶剑英三人举行会议。晚，军调部于北京饭店举行鸡尾酒会，欢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熊式辉、孙连仲以及美、英、苏等中外来宾200余人应邀出席。

△　重庆妇女团体联谊会28个妇女团体，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表示反对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要求苏联立即自东北撤兵。

3月

3月1日　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269人出席，蒋介石主席并致开幕词，宣称："全体会议的任务，是要检讨过去的工作，分析当前的局势，以决定今后的方针。"10时，接开预备会议，决定会议程序，仍由蒋介石主席，于右任、居正、戴季陶、陈果夫、孙科、陈诚、何应钦、邹鲁、陈立夫、白崇禧、张道藩11人当选为主席团，11时散会。

△　国民政府特派张厉生为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主任；特派邵力子为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飞抵张家口视察，听取第五执行小组的报告后与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等举行会议。下午飞抵绥省集宁听取第一执行小组的报告，当晚飞返北平。

△　资源委员会华北钢铁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

△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与苏联政府并无关于东北战利品之秘密或其他协定"。

△　澳大利亚新任驻华公使高伯兰飞抵重庆，23日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3月2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大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作党务报告，报告分别列举了国民党在贯彻实行三民主义方面的成绩，检讨了施政方面的缺点，承认："战争结束以后，亟待处理的问题，有许多事没有做好。如收复地区的物价，没有能够制止它的狂涨。接收的敌伪财产，没有能够防止走漏和损坏。金融的调节，货币的整理，没有能够迎头赶上。接收的工厂学校，没有能够有效运用。地方秩序和全国交通，没有能够迅速恢复。亟待还乡的人民，没

有能够全力扶助。军队的调防，没有能够迅速做到。各地区在沦陷时期产生的恶势力，没有能够彻底扫除。”报告谈到党务的改革与推进时承认，“成效还是不足，事实上也有些积重难返”。并谓：“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革新的最后阶段”，“本党同志，必须忏悔过去，改革现在，创造将来，才能达到革新党务，推动政治的目的。”下午继续开会，讨论党务报告，戴季陶主席，决议推谷正纲等66人为党务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

△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一行飞抵济南视察，与政府高级官员王耀武、何思源及从临沂到济之新四军军长陈毅晤面后，即慰问山东受难同胞。午后，陈毅随三人小组飞抵徐州，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来徐欢迎，即与三人小组会商实行整军方案。是晚，国共双方达成三项协议，将枣庄列为共管区，即日解围，徐州僵局初获解决。

△　上海中央银行公布经营外汇之27家银行名单（其中外商11家）。3日，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召集27家银行代表举行会议，商讨外汇开放后各行业务上之联系法及解释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之内容，决定有关外汇办法七项，4日，外汇市场正式开放。

△　前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在苏州被捕，押上海提篮桥监狱。

△　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以卖国罪判处前伪蒙疆自治政府司法部长文书君、伪高等法院院长许维本死刑。

△　中国与多米尼亚共和国友好条约附加条款在巴西互换批准书。

3月3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邹鲁主席，军政部长陈诚（次长林蔚代）作军事复员报告，宣布部队复员时间定为18个月，分为两期，第一期12个月，第二期六个月；第一期将242个步兵师复员到90个师，第二期由90个师复员为50个师。居正等七委

员发表意见，陈诚当即作答。次推程潜等51人为军事复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旋又通过组织地方行政委员会及边疆问题委员会，推张继等51人为地方行政委员会委员，白云梯等24人为边疆问题委员会委员，先行研讨地方行政及边疆问题之报告事宜。

△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离徐州飞抵新乡召开军事会议，下午，偕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飞抵太原视察，听取太原小组报告。当晚召开国共双方军政负责人会议，未获协议。

△　军事三人小组在河南新乡同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赵守钰，商谈黄河堵口、复堤、勘测、迁移居民问题，商定由赵直接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地方政府代表具体商讨进行步骤。后经国民政府黄委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晋冀鲁豫地方政府代表会商，于4月7日、15日签订《开封协定》、《菏泽协定》，决定先复堤后堵口，给河床居民每人发法币10万元迁移费等。

△　军事三人小组在太原会见阎锡山和执行部驻太原第三小组代表陈赓，听取了太原执行小组的汇报。

3月4日　　上午9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居正主席，财政部长俞鸿钧作财政金融报告。下午继续开会，白崇禧主席，经济部长翁文灏作经济工作报告。

△　上午8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主席并致词，称："此次全会关系本党之成败与国家之兴亡。希望各位同志平心静气，认清国内外之现实环境，研讨实际办法，勿以一时片段之现象，而有愤慨空洞之议论。"并谓："全会同志，今后一切之言论行动，必须有政策、有目的、有宽大之气度、而不必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之得失，尤应在会议中发扬党德，发扬民主精神，并须尊重纪律，以完成吾人革命建国之使命。"

△　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在太原同阎锡山举行会谈。旋乘机到达归绥视察，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及马占山等到机场欢迎，12时出席各界欢迎大会，傅致欢迎词，表示忠诚执行停战命令，希望和平、统一、民主。

△　下午，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偕军调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一行自归绥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及各界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随至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会谈。晚，中共中央举行宴会，毛泽东致词，对于马、张、周三将军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中国而奔波宣劳，深表谢意。表示："中共刻已准备以一切努力于建国事业。"宴会后，延安各界举行盛大集会欢迎三人小组。

△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在重庆获释。5日，叶挺致电延安中共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日得延安电复批准。

△　第十八军破坏停战协定，加紧进攻鄂东、豫南一带中原解放区。是日，第十八军所部围攻湖北黄陂县抱树店、洪家河，当地驻军两个连仅40余人冲出重围，其余惨遭牺牲。

△　美国务院宣布美国要求中苏两国就苏军自中国东北搬运工业设备一事提供正式报告。

3月5日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大会，孙科主席，讨论财政金融和经济问题两报告。各代表对敌伪财产业处理不当和官僚资本的弊端意见纷纷，略谓："经济部接收人员颇多失职"，"生产低落，民生凋敝，物价高涨，人民深受痛苦。"大会推俞鸿钧、翁文灏等50余人为财政金融经济问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下午，二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何应钦主席，外交部长王世杰作外交报告。

△　国民政府令：《提审法》自民国三十五年3月15日起施行；派俞鸿钧为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席德懋为代理理

事。

△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由延安飞抵汉口，武汉市长徐会之、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参谋长王震等百余人前往欢迎。当即以三人小组名义，向报界发表书面谈话，略谓：根据各地各有关军事长官间所达成之协议，吾人坚信各地之围困即可解除，人民自由往来之束缚亦可停止，并使恢复各种交通之搁延得以消失，各地之军队在精神上现已准备从事整编及统编之艰巨工作，吾等并对各军事首长在明了重庆协议之广大目的后所表示之合作愿望，表示感谢。下午，张、周、马召开会议，听取武汉小组报告。

△　重庆中国毛织厂全体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三次怠工，厂主派数十人闯入工人宿舍毒打工人，强制工人复工，并枪伤20余人，逮捕20余人。6日，罢工工人绝食一天，抗议厂方暴行。8日，该厂军警密布，厂方继续迫害工人，百余工人纷纷离厂。

△　西藏代表团访问印度，是日，中国驻印专员公署及驻印军事代表办公处，分别招待该代表团。

△　越北法军不顾中法双方议定的登陆日期延至7日的协议，突以兵舰五艘于海防强行登陆，炮轰港口中国守军，死伤10余人，弹药库一所被击中着火。6日，法驻华代办戴礼访外交部，就法军接防越北磋商办法。7日，中、美、法三方派人抵海防调查冲突真相。

3月6日　　国民政府以正式照会送达苏联政府，请东北苏军即行撤退。22日，苏驻华大使复照王正廷，谓苏军正在撤退中，并声明至迟将于4月底前完全撤退。

△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六次大会，陈果夫主席，继续讨论外交问题之报告。黄宇人等16人发表意见，指责秘密外交的错误作风，继推定王宠惠等55人为外交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下午，二中全会举行第七次大会，陈诚主席，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浦薛凤作

善后救济工作报告。声称：联总暂定资助我国救济物资总值6．75亿美元，我方正在交涉增加；中央本年度预算列有善后救济专款320亿元，用于恢复全国铁路及黄河、长江堤防。大会推宋美龄等54人为善后救济问题报告检察委员会委员。

△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一行结束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归绥、延安、武汉等10地视察停战事宜，是日飞返重庆；军调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三委员并中外记者飞返北平。

△　济南执行小组雷克、涂叙五、邝任农携粮20万斤，抵张店解救粮荒。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废止收复区新闻检查。

△　川汉铁路公司财产清理委员会在成都成立。当即议决请四川省府向交通部交涉，将公司存款2700余万元如数归还。

△　重庆电信职工2200余人，因生活艰难，是日赴交通部请愿，提出增加薪金、改善生活等三项要求，交通部邮政司负责人接见，声称三项要求须再予修改方可接受，请愿终无结果。同日，中航公司渝沪线班机飞行人员不满待遇，宣告罢工，停机拒绝飞沪。是日各线客机亦停机拒飞，地勤人员纷起响应，怠工一日。

△　东蒙代表团放弃前往重庆要求“高度自治”的原定计划，是日乘飞机离北平返海拉尔。

△　前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抵沪，12日抵渝会晤蒋介石。15日，陈表示将留在中国为国民政府效力。

3月7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八次大会，戴季陶主席，孙科作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下午续开大会，检讨政协报告，谷正纲、潘公展等人发言，公然反对政协决议，扬言要共产党“放弃割据之政

权”、“放弃武力夺取政权之野心”、“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并声称：五权宪法原则不容变更，“宪草修改原则”必须设法纠正。经主席团决定，增加专题报告两项：一、张群作关于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经过报告；二、张治中作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之视察报告。

△　国民政府授予马歇尔、张发奎、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孙蔚如、余汉谋、朱绍良、李品仙、刘斐、林蔚等青天白日勋章。

△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暴徒捣毁《新华日报》事再次致函国民政府，指出：“继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及《民主报》社遭暴徒袭击后，24日成都《新华日报》营业部分处亦遭破坏，职员李某身负重伤。3月1日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亦发生暴徒聚集逞凶。一月以来，《新华日报》向外邮寄、航寄报纸屡遭各方刁难，不能顺利寄出，似此情形，使恩来等生命自由无时不在特务威胁之中，一切民主团结工作均难进行。”要求国民政府实践四项自由。

△　晨，苏军开始从沈阳撤退，至12日午夜，全部撤离。

△　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滕代远、新四军参谋长陈士榘飞抵重庆，出席军事三人小组整军会议。

△　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分别急电北平军调部及重庆军事三人小组，要求制止第五十三军第一五三师、第一八六师、第一五二师及第五十四军之第三十六师、新一军之第三十师、第五十师连日向大鹏半岛解放区的疯狂进攻，恢复广东和平。

△　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政府代表萧凤岐、中共代表韩念龙、美方代表邓克抵淮阴视察，受到解放区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盛宴款待。

△　上海军事法庭筹备就绪，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派杨继章为上海指挥所参谋长，主持军事法庭以审讯日战犯罪行，并定于3

月15日正式办公。

△　上海永安、先施、大新等九大百货公司职工云集街头，再次举行集体示威，敦促资方合理解决底薪问题，提出自2月16日起，最低底薪不得少于11.6万元。九公司资方集会磋商对策，无结果，被迫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是日起停止营业。

△　巴拿马新任驻华公使兼驻沪总领事布瑞森诺抵华。

3月8日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九次大会，居正主席。行政院长宋子文作政治报告，谓："当前最紧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目前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即本席个人，亦觉得不但不能满意，而且是极不满意的一个人。"提出政府应付的方略四项：第一，谋收支平衡；第二，增加物资的供给；第三，尽速恢复交通运输；第四，开放对外贸易。次推孙科等54人为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

△　下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次大会，何应钦主席，主席团推张道藩说明关于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商定之经过，吕云章等对政治报告发表意见，宋子文答复关于政治报告之质询，推李文范等73人为政治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旋由交通部长俞飞鹏作交通报告。

△　阎锡山撕毁临汾协定，所部第三十八师纠集日步兵第二四五大队1500余人，是晚偷袭北晋路东侧长坡沿村八路军防地。八路军阵亡九人，伤13人，余部因寡众悬殊，含泪撤退。次日晚，阎部省防第五军分三路夹击北晋路两侧，八路军阵亡连长以下共20人。

△　青年军退役管理处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处长，彭位仁、蒋经国为副处长。

△　重庆各界妇女万余人集会庆祝战后首届妇女节，宋美龄为总主席并致词，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巩固世界及国内和平、争取妇女本

身的权利等四项努力方向，要求全国妇女同胞共同实践，以求实现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　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抵渝，10日向蒋介石述职。

△　中央银行开始抛售黄金，售价为165万元；次日价增至170万元；11日又增至175万元；12、13两日减至165万元；14日以后均为160万元。

3月9日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一次大会，白崇禧主席，主席团推白崇禧宣读阎锡山关于报告中共活动情形来电，并略加说明，戴季陶就阎来电发表意见。陈希豪等人对交通报告发表意见，推张嘉璈等32人为交通问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长徐堪作粮食问题报告，说明最近各地粮价高涨、粮食恐慌酿成当前严重局势之主要因素，提出该部四项补救办法。

△　下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二次大会，邹鲁主席，张继等人提出临时动议：《为解除人民痛苦，安定北方大局，所有政治协商会议有关北方各省市之决议，应请予以修正案》。河北省旅渝同乡会等团体推派代表刘次箫等三人向大会“请愿”，“立即取消中共所谓解放区”，“立即将中共军队调离现驻地点，另指定适当驻扎区域，迅速整编”。次推徐堪等41人为粮食问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末由黄绍竑作地方政治报告，略谓：“各地控告贪污或指责庇纵之事件不断发生，被灾各省市疮痍满目，亟待救济。”并谓：“各省市物价波动特甚，各省之公教人员及团队警察生活已难维持，而怠工怠教之情事已不断发生，若不急筹调整，则地方行政势将难以维持，影响国家前途至为重大。”

△　军调部发表第十七号联合公报，宣布国共协同开采枣庄煤矿，由政府、中共、中兴公司各派代表一人合组委员会监督修理、开采事宜，并责令国共双方部队撤离矿区及枣庄临近地区。10日，徐

州、枣庄矿区生产委员会宣告成立。

△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讨论铁路统一管理办法，决定分路分段而治。

△　马歇尔同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时说，他近日将返美，由吉伦中将参加三人会议。并提出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准备接受政协决议时，延安发表社论指责国民党内有法西斯分子活动，使结果变坏了。

△　英驻苏代办罗柏兹向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递照牒文，声明英政府不同意苏搬走日本在中国东北工厂之机器设备。并称，此项日本财产应由盟国共管，在未商定办法之前，暂由中国保管。

△　魏德迈正式宣布：美驻华军事总顾问团于南京正式成立，前美军驻华作战司令部司令麦克鲁任团长，参谋总长冰克，军训主任麦加麦。顾问团下设人事、情报、战略、交通等部，该团总人数为750名，任务是助华训练军队。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总指挥、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于下午3时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3月10日　下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陈果夫主席，何应钦作受降报告，称：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东北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各地日军投降兵力总数为128.32万人，计有：总司令部一个，方面军三个，军10个，师团36个（内有战车师团一个，飞行师团两个），独立旅团41个（内有骑兵旅团一个），独立警备队、支队19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及陆战队六个。需遣送之日俘、日侨者213.8353万人。嗣后各委员对地方行政报告发表意见，并推张继等53人为地方行政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

△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表示，希望马歇尔在解决

东北问题后再回国。说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企图推翻政协决议，不愿放弃一党独裁政府。所以延安发表的社论没有错，东北问题“责任不在我方”。提出解决东北问题原则，外交和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军事和政治平行解决，政府军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的兵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在马歇尔转达9日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后，周恩来认为，蒋的五条，实质是其军队可以接收一切地区，要中共军队从任何地方都撤出。马歇尔表示此问题再协商。

△　军调部为军事三人小组出巡圆满结束发表第十八号联合公报，宣布：“军事三人小组三委员决完成对华中及华北之视察，将加速军调部工作速度。”“此次视察所得之结果，殆可于军调部任何工作方面看出，三将军解决在途中面临彼等之许多问题，均能完全扫除党派主见……以完成吾等共同之目标，并建立一和平统一繁荣之中国。余等希望将来之工作，得因此次之视察而趋向平坦之途。”

△　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成立协议，决定成立物资交换委员会，主持双方物资交换、输送事宜。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行营副主任薛岳飞渝述职。

△　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成立，由宋庆龄主持。

△　范文澜抵解放区邯郸，任北方大学校长。

△　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正式开工，征民工二万人。

3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附表》，规定国民大会代表除原定1200名外，另增补由国民政府直接遴选者700名；依《附表》规定产生者150名，连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之45名，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台湾者一名，共为196名。

△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四次大会，孙科主席，听取边疆问题报告：一、白云梯作内蒙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报告；二、格桑泽仁作藏旗现状报告。12日上午，二中全会举行第十五次大会，邹鲁主席，推李文范等15人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次由张治中报告新疆问题解决方案。下午，六届二中全会继续开会，何应钦主席，推白崇禧等39人为边疆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次由张群报告关于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经过，张治中报告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之视察情形，最后由陈仪作收复台湾报告。

△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就《调处东北军事冲突草案》继续会谈，双方同意将北平军调部工作范围扩大为包括东北在内，并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执行停止冲突，周恩来不同意《草案》中第四项关于“政府部队有权占领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之规定，其他各项取得原则上之协议。

△　晚，马歇尔离重庆返国述职，其军事三人小组顾问一职，经政府和中共认可，由吉伦中将代理。

3月12日　国民政府公布《褒扬忠烈条例》，凡六条，规定凡抗御外侮忠勇义烈之官兵、人民，合于下列条款之一者，依本条例褒扬之：“一、杀敌致果，建立殊勋者”；“二、尽力守土，忠勇特著者”；“三、临难不屈，以身殉国，或不受敌人利诱威胁，致伤亡或拘囚者”；“四、举义乡里，抵抗敌人，或毁坏敌用重要战具者”；“五、毁家纾难，或计划守土，著有功绩者”；“六、个人或全家或全村与敌搏斗，致伤亡被毁者”；“七、因守土伤亡者”；“八、其他忠勇义烈事迹，足资矜式者”。

△　东北民主联军占领辽北昌图县；同日占领开原县，县长王应敏被俘。

△　军调部太原中心小组政府代表邹陆夫、中共代表许光达、美

方代表和礼赴太原县视察，受到当地民众学生热烈欢迎。三方代表分别指示自由贸易和城市解围之意旨。当晚中心小组成员返回太原。

△　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哲濬飞抵上海，专程调查日战犯之罪行。

△　内政部近据报告各收复区有所谓“一贯道”、“先天道”等邪教组织，是日请饬各省、市政府依法查禁。

△　上海市400余家旅馆业职工因要求增加工资未获结果在下午4时实行总怠工。次日下午，旅馆业职工代表600余人赴社会局请愿，迫使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代表举行谈判，劳方要求增加工资70%，资方允40%，双方僵持。14日，过往旅客无处投宿，舆论大哗，社会局急召劳资双方代表协商，资方被迫允增工资60%，劳方初获胜利，是日下午复工。

△　秘鲁首都利玛成立中秘文化协进会，到秘鲁总统代表及大学教授等百余人，中国方面亦有多人参加。

3月13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于重庆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中央监委71人，候补监委24人出席，张继主席。大会报告党务、政治、财务及三委员会等工作，通过请政府迅速严惩汉奸等五议案。

△　周恩来、张治中继续磋商东北调处事宜，吉伦代表马歇尔出席。周恩来声明，他尚未接到延安对他请求作进一步指示的答复。双方对草案各持异议，吉伦建议修正原草案，会议中止。

△　连续两日，第五十二军军部及所属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共二万余人接收沈阳，新一军之第五十师进至沈阳西北之平安堡，新六军之第二〇一师进至沈阳以北之公主屯，第十师进至沈阳以西之大民屯。

△　中、瑞两国关于瑞士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有关特权之协定，由中国驻瑞公使梁龙与瑞士代表卜蒂比爱尔于伯尔尼签字。

△　中法两军交接防务协定签字。根据中法协定，北纬16度以北越南地区华军防务于本月22日起至31日止，全部移交法方接收。

3月14日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六次大会，白崇禧主席，军政部次长刘斐报告东北军事情形。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报告东北经济接收情形。次推朱霁青等30人为东北问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李嗣璁等四人临时动议："张委员治中报告：尚有25城市被共军包围，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应由调处执行部令共军即日解围，撤退至60里以外"，经主席团决定：送政府即电调处执行部切实办理，主席团根据张继等60人提出临时动议：经请示蒋介石，决定中央常务委员名额定为36名。最后修正通过对于粮食问题之决议案。

△　政协综合委员会、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举行联席会议，孙科主席。会议举王世杰、王若飞、曾琦、罗隆基、王云五、莫德惠六人就改组国府人选问题再行协商，决定各方于3月25日前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赴天津视察。

△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偕第四方面军前进指挥所主任陈金城抵青岛视察军务，16日返济南。

△　晋冀鲁豫解放区执行整军方案，首批7.5万人复员，缩减军费35亿元，追加复员建设费七亿元。

△　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返国飞抵华盛顿。当晚，会见杜鲁门就远东形势提出初步报告。16日，马歇尔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三个月在华调停工作及中国局势。略谓：今后数月，对于中国人民关系重大，亦为世界和平所系，中国如能统一，在政治及经济

上必能获得西方诸国需数世纪方能达到之进步。惟中国完成统一具有两项基本条件：一、美国须援助中国；二、其他国家勿以阴谋妨碍东北重归和平统一之新中国。并谓：中国东北局势极为危急，收复东九省主权，责在国军，而不在共军。由海道运输国军至东北系美国之责任，运兵船只即系美国船员，此项责任迄未有所变更。在回答记者所提问题时，马歇尔谓：对华援助非常复杂，但极需要，美国应以财政优先权给予中国。

△　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美棉贷款合同》，美方提供3300万美元贷款，用于中方购买美棉。

△　美陆军部长柏德逊抵沪，次日召魏德迈、柯克等20余高级将领作重要商谈。会后，柏对记者宣称："美对华政策不容改变；美军在华任务亦未完成。"

3月15日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七次大会，邹鲁主席。通过：一、军事复员工作报告之决议案；二、交通问题报告之决议案；三、善后救济报告之决议案；四、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地方行政报告之决议案交原审查委员会再行审查。下午继续开会，何应钦主席，财政金融经济之决议案，交原审查委员会再行审查，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大体通过，并交原审查委员会整理。

△　政协会议综合委员会、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孙科主席，会议就国民大会职权、行政院与立法院关系、省宪等三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决议修正宪法草案原则："一、国大应为有形之国大，行使选举或罢免总统、创制立法原则及复决法律之权；二、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关系，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权取消；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自治法规或省单行法规。"

△　国民政府特任命于焌吉为驻意大利大使，任命张平群为驻纽

约总领事。

△　顾祝同、汤恩伯由徐州飞抵青岛，视察山东省驻军情形。

3月16日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八次大会，蒋介石主席，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及对于外交报告两决议案。政协报告决议案称“属望中国共产党切实依照协议，在其所占区域内首须停止一切暴行，实行民主”。外交报告决议案要求政府提出日本赔偿方案，并积极参加盟国行将设立之赔偿机构，“以求我赔偿要求之实现”。次对东北问题报告之决议案决议提交常会。下午续开大会，戴季陶主席。首由主席团报告：一、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产生办法；二、国防最高委员会应即撤销，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三、国民大会本党代表之产生办法。均经大会通过，并决议由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大会国民党代表，次则选举常务委员及国民大会国民党代表。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二次大会开会，张继主席，吴敬恒、王宠惠等99人出席。大会通过《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条例》。选举吴敬恒、张继、王宠惠、邵力子、程天放、贺耀组、姚大海、邵华、刘文岛、鲁荡平、林云陔、李敬斋12人为本届常务委员。

△　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着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同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时，对周所说中共军队在东北所占的地方不能让，表示谅解，并承认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地位。周继续提出，国军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出的地区，如要进驻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应该经过商定，以后东北驻军依整军方案另定。张坚持删去“现时”两字，未达成协议。

△　蒋廷黻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主席。

3月17日　上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九次大会，蒋介石主席，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共303人出席，首先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结果：于右任、孙科、戴季陶、居正、陈果夫、陈诚、白崇禧、邹鲁、何应钦、梁寒操、宋庆龄、陈立夫、吴铁城、朱家骅、贺衷寒、谷正纲、张道藩、张治中、张厉生、李文范、宋子文、段锡朋、刘健群、丁惟汾、潘公展、朱霁青、萧同兹、赖琏、陈布雷、田崑山、萧铮、白云梯、王启江、麦斯武德、邓文仪、柳克述36人当选。梁寒操等149人当选为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通过对于东北及华北党务、对于边疆之党务、对于边疆问题、对于地方行政、对于财政金融经济五项报告之决议案及总裁交议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案，修正通过全体会议宣言。下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典礼，蒋介石主席并致闭幕词，谓“中国必须采取和平统一的道路”。

△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四平街，国民政府辽北省主席刘瀚东等被俘。

△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就国民党背信弃义集重兵包围该师断绝五万官兵粮食一事，急电北平军调部和军事三人小组，要求立即制止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

△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是日自北平经青岛飞返上海，因气候恶劣，飞机在南京西南郊板桥镇附近触戴山焚毁殒命。戴之副官及将校级军官23人同时殒命。

3月18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保障人民权利、改组政府、整军、停战等问题，批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说内政问题必须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

△　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表示对15日所决定的修正宪

草原则三点“深感不妥，因为这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必须迅速加以挽救”。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　下午，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淮阴组政府代表萧凤岐、中共代表韩念龙、美方代表邓克抵南通。是日，按照中共南通城工委的布置，南通各界千余人冒雨举行游行示威欢迎执行小组。游行群众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彻底实现政协五项决议”、“反对一党专政”等口号。南通军警荷枪实弹并设置铁丝网封锁线，阻止群众接近执行小组。游行群众冲破国民党军的三道防线，到达执行小组驻地门前请愿求见，并派代表向执行小组政府代表递交南通文艺协会招待执行小组茶话会的邀请函及公开信、建议书，旋美方代表出见游行群众，并与群众代表约定第二天出席文协招待会。群众欢呼斗争胜利，继续游行示威，至深夜始散。是晚，国军第一〇五师、南通县党部、县长、三青团书记、军统、中统负责人紧急集会，决严加防范，对各为首分子施特别制裁。

△　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中将与苏军总部参谋长特洛曾科举行会谈，特洛曾科声明，长春以南已无苏军，董彦平提出利用大连港口运输救济物资问题，特洛曾科表示须向莫斯科请示。

△　宋美龄招待东北旅渝人士商讨救济办法，当即筹商组织东北救济会，举宋美龄为会长，莫德惠为副会长，韩仁为总干事，周至柔等七人为筹备委员，当即起草章程，并规定于两月内募足一亿元捐款。

△　江苏高等法院对汪伪南京政府代理主席、汉奸陈公博以叛国罪正式提起公诉。检查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

状：即一、缔结密约，辱国丧权；二、搜索物资，供给敌人；三、发行伪币，扰乱金融；四、认贼作父，宣言参战；五、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六、公卖鸦片，毒化人民；七、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八、托词清乡，残害志士；九、官吏贪污，政以贿成；十、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　下午，魏德迈在北平就日俘遣返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至本月底止，中国境内日军民遣返本国者，可达100万左右。"

△　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福拉塞抵厦门访问。

3月19日　行政院举行第七三六次会议，院长孙科主席，讨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之《加速经济复员紧急措施办法实施办法案》及外交、教育报告，通过《取消硫磺统制、裁撤硫磺机构案》及处理台湾公私产业案。

△　新一军从沈阳沿中长路北进，23日占铁岭，27日占开原。

△　下午，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就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违背政协决议一事，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举行会议，促请按照政协决议从速实施，商谈无结果。

△　陆军副总参谋长兼军调部参谋长蔡文治由北平飞抵南京，对中央社记者谈称：冲突大体停止，修路已开始进行，"目前之基本问题，厥为整军，更进而将国军共军统编，是乃北平调处执行部之职责"。

△　美国官方宣布：美进出口银行与中国签订五种借款，共计3379．375万美元，作为购买船只、铁路及煤矿之修理材料设备及辅助动力厂之用。

△　美国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宣布，将价值一亿美元之陆海军剩

余船只、药品、食物售予总署，以供“救济”中国之用。出售物品中，有价值4000万美元之船只及港口设备，以恢复中国水运，此外尚有干粮4.5万吨及供疏导黄河计划用之大量医药品。

3月20日　上午，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参政员159人出席，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王世杰、莫德惠、李璜、江庸、王云五为大会主席团，莫致开会词，强调当前国家之急务有二：一、为制定宪法；二、为经济建设，盼与会同仁，善尽言责，并努力求得成果。蒋介石出席大会并致词：承认各地民众不能安居乐业，“真所谓如水益深，如火益烈”，要大会把握重点，注意现实，贡献实际可行而且行之必成的办法，关于解除地方痛苦与增进地方福利的一切建议，都要顾及国家整个利益与实际情况，权衡轻重缓急，提供方案。下午，举行首次大会，交通部长俞飞鹏作交通报告。旋各参政员提书面询问61件，口头询问案九件。

△　政协综合小组开会，孙科主持，达成三点协议：一、宪法草案乃提交国民大会承认之惟一文件；二、一切党派有义务使其出席国民大会之代表支持大会所提出的宪法草案；三、国民党中执会只任命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国民党员，其他成员由各该党派分别任命，无党派人士由蒋介石任命。

△　郑洞国飞抵锦州主持东北军事。

△　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汉口办事处主任郑绍文为新四军第五师处境危急，发表谈话，呼吁国民政府当局停止进攻，开放运粮道路，否则一切后果由国民政府方面负责。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飞抵东京任职。

△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视察”青岛、秦皇岛、北平、天津、塘沽各地海军基地，并赴东京访麦克阿瑟归来，是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该舰队协助运送国军队北上，已达七军计官兵22万人，

又谓：在美之米亚密受训之中国海军人员1100人，将于下月1日分乘美军舰八艘离美回国，在青岛受训完毕之中国海军人员，则达800人。

△　温州米价急剧飞涨，全城罢市。

3月21日　上午，参政会举行第二次大会，经济部长翁文灏作经济报告称：目前经济情况，更较战时恶劣，整理促进，备感困难。参政员纷纷对接收人员贪污舞弊盗卖接收物资、经济汉奸逍遥法外、物价飞涨、工人不能复工、企业不能复业等问题提出质询。

△　重庆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宣布："因本届参政会将重演国民党二中全会各种造谣诬蔑政协决议的活动，故中共参政员决不出席大会。"

△　周恩来离重庆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国民党二中全会关于政协决议及东北问题。23日，军事三人小组美方代表吉伦派高海上校由渝飞延，同周恩来协商打开东北问题僵局，周恩来提出对东北问题两项具体建议：第一，由执行小组至东北立即执行停战，调查当地情形，然后报军事小组；第二，由军事小组审核东北军政问题，俟决定后再派执行小组至东北执行停战。

△　陈赓接替许光达担任军调部太原中心小组中共代表。

△　刘峙、程潜集结大军进犯中原解放区，以第六十六军一部集结信阳，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集结泌阳，豫南保安队王翰声部集结桐柏，第四十一军所部集结确山，形成四面包围之势。是日各该集结地以压倒优势兵力围攻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防地宣化店。新四军第五师处境危急。

△　新六军占领辽阳，第五十二军占领抚顺。

△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集临时会员大会，就东北问题通过决

议五项，要求政府迅速允许三人小组急赴东北实行无条件停止内战；依照整军方案整编东北一切部队。

3月22日　参政会第三次大会，行政院长宋子文作行政院施政报告，内容包括关于解决抗战胜利后人民衣、食、住、行问题及经济复员问题等项。参政员书面询问37件，口头询问32题，涉及诸如贪污腐败、经济危机、物价高涨、民生凋敝、汉奸逍遥法外等项，政府如何解决？下午，参政会续开第四次大会，陈诚作军事报告，称：整军之根本办法，现已开始实行，年内决可达到90师之目的。刘叔模等60人临时动议，要求单独为接收问题开一次检讨会，并请行政院长及各部长出席答复有关问题案，获通过。

△　军调部发布和字第六号命令，重申：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1月13日中午12时正所在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违令者将以违反停战命令论罪。命令由蒋介石及军调部郑、罗、叶三委员共同署名。

△　军调部新闻发布组发表第十九号联合公告，声称大同小组在解决政府及中共管制区间双方币制、物品交易、加速该区交通恢复等工作方面取得七项协议。

△　越北（北纬16度以北）中国军队，根据中法协定，是日开始向法国军队移交防务。31日，中法军队交防全部完毕。

3月23日　参政会举行第五次大会，邵力子、张群分别作政治协商会议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整军方案报告。在政协会议报告中，邵力子强调指出：会议召集之目的为求国内之和平、团结、统一、民主，系根据参政会去年大会之决议案精神而来，又谓：宪改修改意见大体上保持了五权宪法的精神与形式，邵并表示，为和平及为国家前途着想，均应实行政协各项决议。张群在报告中称，在国共双方军队整编商谈中，政府作了“极大让步”，已由赫尔利建议之七比一，让至

五比一。参政员共提出31项询问案。下午，续开第六次大会，外交部长王世杰作外交报告。

△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为互换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暨中法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及换文批准约本全权代表；特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为互换中暹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延安接待美方哈特·考伊上校时表示，广东和第五师问题必须同东北问题同时解决。

△　民盟举行记者招待会，罗隆基谈东北问题谓：民盟认为国共两党在东北之军队，事实上已发生冲突。民主同盟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东北军事冲突必须停止，迅速实行马歇尔临行前之派遣执行小组至东北之决定，东北执行组应即出发调处东北各地之冲突。至东北行政机构，须通过协商方式，容纳各方人士参加，并谓：民盟希望国府改组以前，先将东北问题求得合理解决。

△　夜，军统南通小组组长顾思明和副组长唐绍曾带领特务13人潜伏在西北水关桥，绑架文艺协会会员顾迅逸、郑英年及青年艺术剧社社员孙日新，次晚，唐绍曾同谍报连连长带领特务数人，将顾、郑、孙三人蒙上黑布，抛入江心，制造了屠杀进步青年的“南通惨案”。

△　中国出席联合国参谋长会议代表团团长商震、团员桂永清等七人离渝飞赴英国出席会议。

△　澳大利亚新任驻华公使高伯兰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3月24日　参政会举行第七次大会，农林部长周诒春、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分别作农林、司法报告。参政员王冠英等40余人临时动议《请政府迅速救济各地粮荒》一案，当经表决通过。旋由参政员进行

质询。农林书面询问32件，口头10件；司法书面27件，口头八件。下午，续开第八次大会，社会部长谷正纲作社会报告。

△　新一军孙立人部、第五十二军杜聿明部占铁岭，东北内战扩大。

3月25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法及中央党务机构调整办法。

△　参政会举行第九次大会，财政部长俞鸿钧作财政报告称：三十五年度国家预算赤字庞大，支出为2.5万余亿元，收入仅7500亿元。各参政员就黄金政策、通货膨胀、盐税名目繁多等问题提出口头、书面询问等94件。下午，参政会第十次大会，粮食部长徐堪作粮食报告，承认入春以来，各地粮价竞涨，粮食发生恐慌，并提出补救办法。参政员提出书面询问案40余件。

△　周恩来由延安返抵重庆，美国代表高海上校同机返渝。当晚，周恩来在怡园与吉伦会谈。周恩来指出，政府在东北正不断增兵，扩大内战。并要求马歇尔在美交涉借款，最好在改组政府、修改好宪草后实现，否则政府改组更困难，影响整军进行。在次日再次会谈中，周恩来说，延安已批准东北停战协议。并反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说国民党军占领抚顺不是打仗的说法，认为“只要不执行协商的进占便是冲突”。

△　重庆忠恕沱兵工厂第十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全体罢工。27日夜11时，厂方突然调入卫兵百余人，抓走工人13名。28日以武力强迫工人复工。

△　南通国民党军统特务四名闯进进步青年孙平天宿舍，将孙勒死，并投尸江中。至30日下午，天生港江滩上发现孙平天浮尸，其状惨不忍睹。

△　印度访华贸易代表团抵渝，26日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团长齐特赞扬中印两国悠久的传统友谊。

3月26日　国民政府令：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黄绍竑，江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曹浩森，另有任用，均应免本兼各职；任沈鸿烈兼浙江省主席，王陵基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副总司令郑洞国另有任用，应免本职；派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

△　国民政府令：国民大会前经明令于民国三十五年5月5日召开，所有当选及遴定各代表，均应依照《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九条之规定，于开会前10日内，即自本年4月25日起，来到南京国民大会代表报到处报到，并缴验当选证书。

△　上午，参政会举行第十一次大会，教育部长朱家骅作教育报告。下午举行第十二次大会，内政部长张厉生报告内政，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浦薛凤作善后救济工作报告，通过本届大会各组审查委员会名单，至此大会报告全部结束。

△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由平抵津。28日偕杜建时视察遣送日俘情形。

△　中国出席联合国参谋团会议代表商震，当选为联合国参谋团会议首届主席。

△　《大公报》镇江是日电称：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邓克、政府代表萧凤岐，中共代表韩念龙视察南通、如皋，国共双方达成双方军队驻地各隔60里；解除封锁，流通物质；通用法币，废除苛杂；取消民兵，保障人权四项协议。

3月27日　上午，参政会举行提案审查委员会。午后，蒋介石设茶会招待各参政员。

△　张治中、周恩来、吉伦于重庆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执行小

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协定，旋就新四军第五师及东江纵队遭受围攻事举行会谈。

△　军调部发表第二十号联合公告，内称：军调部于星期五（29日）将有四执行小组飞往东北九省，今晨9时重庆三人会议，已获得协定，已决定即刻慎选人员组成执行小组依据下列训令开往东北：一、此等小组之使命，将仅限于军事问题之调处；二、此等小组将在政府军及中共军之地区内工作，而不进入现仍在苏军占领下之地区；三、此等小组应赴政府军及中共军之冲突地点，或两军密集之处，使其停战，并作必要之公平调处。

△　《中巴文化协定》由驻巴西大使程天固与巴西外交部长冯妥拉于里约热内卢签字。

△　外交部照会西班牙总领事格兰哥利，敦其即日撤除驻沪领事馆，停止活动。按：西班牙于沪设领事馆，事先未取得中国方面同意。

3月28日　国民政府特派张治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

△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司法院及军事委员会切实遵办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有关惩治汉奸办法五项："（一）各地已就捕之汉奸，应即加增审判人员，迅速公开审判。（二）曾任伪政府特任以上或各省、市长之汉奸，应由政府饬送法院从速公开审判，从重治罪。（三）未经逮捕之汉奸，应严令有关机关迅予逮捕检举，勿使逍遥法外。（四）已逮捕而未移送法院侦察者，应依提审法之规定，从速移送，以一事权，即免拖延。（五）汉奸于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以后自首者，不适用自首减免其刑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六条已有规定，执行时，应切实审慎，勿稍宽假在案。"

△　即将去迪化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的张治中，接

待来访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邓颖超。周希望他释放在新疆被关押的100余名共产党员。

△　孙立人所部新一军攻占四平街，旋向长春急进。

△　本年1月23日在曼谷签字之《中暹友好条约》是日上午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与暹罗访华代表团团长銮实在重庆互换批准书。

3月29日　　国民政府令：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吴忠信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所遗新疆省主席职务，派张治中兼理。

△　下午，新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乘专机飞抵兰州，与伊宁人民代表赖希木江等三人续谈未解决之问题。

△　是日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青年节，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称：中正深知青年战后的境遇是交通断绝，回乡无路，就学无力，就业不易，以致衣食不给，疾病无告，比之抗战时期还要苦闷。又谓：青年要认识国家的现实，抱定坚定的信念，锻炼身心，努力前进，促成我们国家民族的复兴。

△　上午参政会续开提案审查会议。下午，参政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翁文灏、俞飞鹏答复经济、交通之询问各案。各参政员相继发言，揭露接收敌伪财产之流弊。最后经大会议决：建议政府组织调查接收及处理敌伪资产委员会；各参政员对各地接收舞弊情形之报告，一并送请政府查明究办。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在重庆曾家岩官邸，代表美国政府举行赠予典礼，以特等功绩勋章赠予蒋介石，谓其在1943年5月至1945年9月“抵抗日本侵略有功”，是晚，蒋介石为魏德迈离重庆回美治病设宴饯行，授魏青天白日勋章，盛赞魏对于中国建军与中美合作“功绩卓著”。

△　军调部发表第二十一号联合公告，告以该部执行处长白鲁德

将军已飞往沈阳，安排一切，以备执行小组按时前往，白将军并将在锦州东北行营稍留，与政府长官会谈，且拟布置国共双方会议由此而达成协定之基本原则，重申执行小组皆根据重庆三人小组之指示，前往国共两军冲突地点或密接处所，专任军事调处，以便停止冲突。

△　内政部训令各直属机关，以三十四年（1945）9月3日为对日战争结束日期。

△　教育部发表上年度全国师范教育状况统计，计有师范学院11所，学生7418人；师范学校562所，学生15．7806万人。

△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于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代表，马寅初、郭沫若、沈钧儒等会员数十人到会，阎宝航主席。举马寅初等15人为该会国大代表候选人。

△　郑州花园口黄河复堤堵口工程与江汉干堤堵复工程均开工。

3月30日　　上午9时，参政会举行第十四次大会，讨论第五审查委员会有关教育文化之审查报告，通过教育提案37件。下午续开第十五次大会，通过教育报告之决议，以及有关社会、司法行政、善后救济及卫生等提案63件。

△　下午，政协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就国府委员名额、国大代表人选及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关系诸问题进行磋商。王若飞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鉴于政府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实行，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的混乱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事端亦未解决，在此种情况下，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

△　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政府代表胡屏翰、中共代表陶希晋、美方代表董瑞波连日开会。是日达成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物资交流、难民还乡等项协议。其中停战协定规定：绝对禁止军事调动；任

何运输站不得运输军队及军火。

△　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白鲁德偕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四执行小组政府代表及美籍代表离北平飞东北，是日抵锦州，会晤东北行营主任后，续飞抵沈阳。31日，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沈阳指挥所主任彭璧生、沈阳市长董文琦。

△　中共代表廖承志、政府代表皮宗石偕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飞抵广州，贯彻军事三人小组关于广东问题之决定。4月1日，东江问题达成协议。

3月31日　上午，参政会举行第十六次大会，讨论内政、地政、蒙藏、交通、农林、水利等提案之审查报告。是日通过议案99件。下午续开第十七次大会，通过《撤销边区政府》，《取消中共解放区之特殊组织》及《东北局势日趋严重，拟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保国权而维民命案》等七项决议。

△　美国允诺再为国民政府方面运兵五万到东北，使国民党军用美机运到东北的兵力超过整军方案，中共代表周恩来对此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次日与美方代表吉伦会谈中强调指出，在政府军在东北已有七个军的情况下，美国仍应允再运四个军去东北，对东北停战是个威胁。

△　下午，中国驻日本代表朱世明将军抵东京，范惠尔将军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在厚木机场欢迎。

△　中国学术工作协会成立，侯外庐主席。通过会章，举郭沫若、侯外庐等45人为理事，并发表宣言。

4月

4月1日　上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十八次大会，161人出席，吴

贻芳主席，蒋介石到会致词，声称：“东九省之非法组织，政府决不承认”，“东北军事调处只能在不影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会通过财政、经济议案30件，军事、国防议案21件。下午参政会举行第十九次大会，李璜主席，通过内政、地政、善后救济、蒙藏、司法、行政等提案23件；通过呈请政府明令定都北平案。是晚，蒋介石邀宴全体参政员，对参政会与政府“共甘苦共患难”备致赞许。

△　国民政府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　下午，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与宪草审议组召开联席会议，就国民大会职权、组织、任期、会期及与行政院之关系获相当协议。青年党代表陈启天企图取消地方自治，提出省自治法宜经立法院通过，遭中共代表秦邦宪驳斥。13日，政协综合小组开会决议成立“宪草检讨修正案条文起草组”。

△　外交部为促请保护撤退区内公私财物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指出，中国政府接获报告：一、驻在长春法政大学校舍之苏军，于3月21日撤退时，将校舍纵火焚毁；二、长春飞机场附近之大仓库于3月25日被苏军爆炸加以破坏。中国政府认为苏军上述行为实与中苏友好同盟之精神不相符合，特请贵大使转电苏联政府电知东北苏军司令部迅予有效制止此类行为，并于苏军自东北各地撤退以前，对于各该地区内之公私财产及建筑物加以切实保护。

△　魏德迈往访宋子文，讨论中国经济建设及整军问题。魏氏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应着重于铁道、公路、水路之修建，且经济建设计划中之轻工业与重工业，尤应保持适当比例。宋表示完全同意。会后，宋子文宣称，最高经济委员会定最近移沪，由翁文灏暂留沪主持，厘定政府经济政策之实施方案，并规定建设计划之优先顺序。

△　军事三人会议代表廖承志、林平与广州行营代表皮宗阚、美

方代表柯夷、米勒等会商东江问题。2日，三方获得协议，于一个月内将东江南北及北江三地区中共武装人员2400人（包括妇孺300人）在大鹏半岛集中，由美舰北运烟台。琼崖纵队等其他未决问题另行商议。

△　山东枣庄解围。国共双方协议自即日起，双方部队同时撤退，以枣庄为中心，五公里半径之周围为非武装地区，不得驻扎任何部队。

△　军调部铁路小组政府代表陈麓华、中共代表黄逸峰、美方代表谢尔由北平到济南，会同济南执行小组政府代表涂叙五、中共代表华诚一等飞沧口，转车至高密，召集国共双方负责人商恢复胶济路交通事。3日，铁路小组返济，召集济南、泰安、晏城三小组听取修复铁路报告。4日飞平向军调部报告。

△　长春西部通宵激战，长春苏军司令特洛申科急晤市长董文琦，双方商定三日后了结双方一切未尽事宜。

△　拂晓，新六军第二十二师李涛所部四个团自辽阳沿铁路进犯辽阳西南的首山和鞍山，民主联军被迫自卫，激战竟日，伤亡各700余人。

△　空军战斗机八架飞抵延安上空低飞盘旋半小时，进行威吓。2日，重庆中共代表团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徐谟飞抵海牙，就任国际法院法官。

4月2日　　上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二十次大会，通过交通、水利、农林报告决议案多件。大会举林虎、马乘风、孔庚、钱公来、褚辅成、李洽、罗衡、傅斯年等31人为该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休会期驻会委员。下午参政会举行第二十一次大会，讨论第三特种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对于政协会议与停止冲突等报告之议案，因引起争辩，主

席宣布由原审查会召集人进行会外协商。续通过有关财政、经济、粮食等议案70余件；通过对施政报告的审查报告。是晚大会闭幕。共通过议案453件。

△　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副院长翁文灏于上海中国银行大楼院长办公处复召徐堪、钱大钧、郑介民、吴开先、徐寄庼、刘鸿生等，就粮食供应，“抑制工潮”，振兴工业等问题续行商讨。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并东北局：照目前情况看，四平街、本溪、鞍山都有失掉的危险，长春也暂难为我所有。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

△　饶漱石、耿飚、许光达、张经武分别充任东北四个军调执行小组之中共代表。是日四人偕小组成员40余人飞抵沈阳开展工作。

△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一次参议会在延安开幕。3日，大会举高岗连任正议长，谢觉哉、宋文钦为副议长。

△　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于焌吉离上海赴任。

4月3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于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军政部长陈诚继张治中为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

△　政府代表陈诚、美方代表吉伦、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恢复交通问题。周提出，应恢复一切交通，铁路可以先修，其他水陆交通也要恢复；拆除交通线上一切碉堡特别是国共双方交界地方。并对陈诚坚持保留“保护”交通线的碉堡意见，表示现已停战，没有必要，如果通车了，交通再被破坏即是又有战事。

△　国民政府令：《陆海空军军官佐官籍规则》着即废止。

△　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八师占领营口，第九十四军第五师攻占海城、鞍山、牛庄。

△　凌晨，北平军警当局以检查户口为名，突然武装包围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寓所，逮捕李耕涛、李新等五人。与此同时，200余武装宪警包围了《解放》（三日刊）编辑部及营业部、新华通讯社，将钱俊瑞、姜君辰、杨赓等29人及发行科马建民等10人捕去。4日晨，滕代远亲赴北平行营及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叶剑英就此事质问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惩搜查者、公开道歉等六项要求。5日，熊斌下令全部释放。

△　东北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以国民政府接收满洲代表之身份，求见东北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之参谋长特罗曾科，要求苏军延缓撤退，谓："中国政府军队来不及接收苏军将要撤退的城市"，遭特罗曾科严词拒绝。同日，特罗曾科奉命宣布苏军撤退日期，谓：马帅总部所有僚属4月5日离长春返国；长春苏军将于4月14日、15日撤完；哈市苏军4月25日撤完；吉林市苏军3日至16日撤完；齐齐哈尔苏军4月26日或29日撤完，本月30日前苏军可全部撤至苏联国境。

△　中共东北中央局、民主联军总部以及东满地区铁路员工各界代表万余人举行李兆麟将军追悼大会。彭真、林枫、吕正操等12人为大会主席团。

△　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开庭审讯汉奸、汪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

△　中央社南京3日电称：中国陆军总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已正式成立，负责审判重要战犯，庭长石美瑜。陆军总部并指定各地军事机关设立军事法庭14处，分别审判于各地犯罪的战犯。10日，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军事法庭首次公开审理日本战犯丰台警务段分所长岩利春等五人。

△　南通军统特务、第一〇五师谍报连继续搜捕进步青年，季天择、戴西青、钱素凡、罗镇和相继被捕。是夜12时，第一〇五师特工

人员将以上四人用刺刀刺死后投入江心。

△　成华大学在重庆成立，是日举行立校纪念典礼，该校董事长邓锡侯出席并讲话。校长为王兆荣。

4月4日　　第七十一军、新一军及辽南第一九五师分别占领昌图、法库。

△　周恩来就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煽动内战事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周恩来列举事实，指出国民党内顽固派破坏和平、曲解停战与交通协议以及整军复员方案，并郑重声明：如此种种破坏活动未能澄清之前，决不可能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安定的中国，倘政府不以政治协商会议为基础加以改组，则中共决不参加政府。关于美援，周恩来指出，目前美国予国民政府之援助，将增加混乱，延长一党专政，中国人民与共产党并不欢迎此项援助。

△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抵四平街，同日并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集中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飞抵迪化。5日与伊宁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三人就军队改编、伊宁参加省府名单等问题再行正式磋商。

△　驻美大使魏道明致电外交部，报告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关于美国对华贷款之声明，略谓：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决定，准备1947年6月30日以前，贷给中国政府机关及私人企业信用贷款总数五亿美元，作为在美购买物资、装备及雇用服务人员之用，俾协助中国经济之复兴与发展”。

△　暹罗访华代表团结束历时40天的访问，是日飞抵昆明，5日自昆明飞返本国。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派审判官马鲁奉命自东京飞抵南京，调

查南京沦陷时期日军大屠杀之详情。

△　教育部公布国立学校迁校办法。

△　中央社兰州4日电称：甘肃灾情惨重，仅皋兰县13万人口中，赤贫无依、流离失所、掘食树皮草根者居10万人以上。甘肃各界紧急呼吁“联总”物资需大量运甘，并请豁免驻军之补差价及严禁就地征发，以苏民困。

△　北平中小学教职员工要求增薪，全体罢教。5日，中小学教职员工联合招待新闻界，呼吁各界声援，同时于会上发表声明，略谓：“课毕归家，则老者呻吟，幼者号泣，点金乏术，告贷无门，请求一饱，决无苛求。”10日，上海交通、复旦、同济、临大等国立大学教授以生活困苦举行联席会议，决议通过即日罢教。

△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自沪乘飞机返国述职，其职务由吉伦将军代为执行，由参谋长麦特辅助。临行前，魏德迈在沪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将于5月1日起改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仍设上海，美军人数将大量减少；又谓在华美军数已由6.5万人自本月份可减至5000人，美海军陆战队在华北之数额，亦自5.3万人减至3.4万人。

△　香港政府正式宣布停筑屏山机场，并成立特别补偿委员会，补偿该地居民因筑机场所受之各项损失。按：香港政府以《江宁条约》及《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为由建筑九龙屏山机场，该场侵占农田一万亩，迫使1．2万余人流离失所。经九龙居民群起抗议，中国政府多次交涉，香港政府被迫妥协。

4月5日　长春苏军大量撤退。6日上午苏军总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偕总部人员分乘专车赴哈尔滨返国。

△　东北保安司令部移至沈阳办公，是日熊式辉、范汉杰由锦州

飞抵沈阳。东北保安代司令郑洞国偕赵家骧亦专车到达沈阳。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提出解决东北问题之方针，略谓：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让步。关内，国方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系起来解决。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对情况的估计及其所提的应付方针。

△　中共代表周恩来致美方代表吉伦备忘录，就北平40余人被捕和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在沈阳机场被扣事提出抗议。并在同吉伦会谈时指出，中共军队是在停战令发布前于遭到进攻的情况下被迫进入苏军撤走的一些地方和原来伪军占领的铁岭、四平、昌图的。现在国民党军要接收，必须经过协商。

△　重庆中共代表团就北平当局无理逮捕新华社、《解放》（三日刊）工作人员和滕代远公馆被非法搜查一事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西藏出席国民大会代表扎萨普嘛图丹桑批等八人飞抵南京。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主席蒋廷黻于纽约会晤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吁请美国急速援助中国解决粮食问题。

4月6日　　国民政府特派郭忏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主任。

△　毛泽东电令林彪保卫四平街，指出："希望你所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　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政府代表涂叙五、中共代表邝任农、美方代表雷克以鲁境小冲突仍未停一事，致电国共山东司令官、军长王耀武、陈毅，要求双方遵照军调部和字六号命令，严饬所属，立即停

止冲突，停止构筑工事，停止封锁政策，停止逮捕人员。

4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就蒋介石在4月1日参政会上的演说发表《驳斥蒋介石》的社论，指出："蒋介石报告的真正'要点'，是两个：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议，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转载。

△　湖北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罪行判处伪汉口市长石星川死刑。

△　本溪周围激战，第五十二军以一师兵力进逼本溪，新六军第十四师策应，与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两昼夜。9日，第五十二军、新二十五师、新六军第十四师全部溃败，副军长郑明、新二十五师师长刘世懋毙命，伤亡团长以下官兵1800名，被俘700人。民主联军缴获美式武器轻重迫击炮10余门，轻重机枪60余挺，步枪数百支。

△　新一军第五十师、新三十八师沿长春路向四平街方向发起猛烈进攻，民主联军坚守四平顽强抵抗，新三十八师全部溃败，伤亡营长以下官兵1300余人。

△　中国民主运动协会于重庆新生活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会章、宣言及选举理、监事，宣言要求"整饬内政挽救危机"，"政令军令必须统一，反对秘密外交"等。

△　平汉铁路一〇一次列车自郑州南下，出武胜关百余里处发生覆车事件，九辆车厢出轨，死亡33人，伤19人。

4月8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合众社远东经理伏恩，谓"联合政府可于数周之内组成"，并诡称：俟中共提出国府委员人选后，始能成立联合政府。蒋对伏恩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维持其对世界之"有

力量与有决断的领导地位”。关于中国国内的现势，蒋谓：“中国经济恢复之速度，与美方供给品到达之迟早，极有关系。”

△　国民政府令：《惩治盗匪条例》施行期间，自是日起再展限一年。

△　新一军所部第五十一师、新三十八师连日猛犯四平未逞，是日集中五师兵力复向四平扩大其推进攻势，以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第九十一师自法库向四平西南重镇八面城急进，以昌图新三十师北上增援策应新一军，与民主联军于四平西南30公里的大洼一线展开激战。

△　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及新四军军长叶挺，由重庆飞返延安途中，飞机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触山失事，不幸牺牲。同机遇难者尚有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及叶挺夫人李秀文等17人。

△　哈尔滨苏军自黑河、绥芬、满洲里三路撤退。哈市市长杨绰庵是日发表声明，称：“日昨曾与共军负责人晤谈，双方表示决依政府指示以和平原则解决一切问题。”

△　江苏高等法院宣判汉奸、汪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死刑。

4月9日　　上午，行政院举行第七三九次会议，更换湘、鄂两省主席及改组绥远政府。决议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湖北省主席王东原免职，任命王东原为湖南省主席，万耀煌为湖北省主席；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主席。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　蒋介石偕蒋经国飞抵贵阳视察。

△　东北行营及各省主席在锦州集会，商讨东北接收及各省府组织问题。

△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转东北局：三人小组到沈阳后可先提出：一、停止冲突；二、停止运兵到东北；三、国民党军退出3月2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表中国灾情调查报告，略谓：“战争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饥荒，19省人民已有3000万濒于饿莩境地，湖南省2300万人民中，有700万人嗷嗷待哺或不久于人世，数百万人日食草根树皮沙土以苟延残喘。”

△　法国内阁会议通过废止《中法协定》。

4月10日　　下午5时，民盟宴邀国共双方代表，就东北局势交换意见，建议双方立即下令停战数天进行商谈，使东北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中共代表指出：政府军队于3月27日后攻占中共七个城市，故必须立即停战，坚决要求彻底实行3月27日三人小组之三项协定，主张先行停战，再商谈一切。政府代表坚持先行“接收”，然后才能停战商谈其他。

△　上午，蒋介石视察贵州省政府及国民党黔省党部；下午，视察贵州大学，对该校千余名师生训话，勖勉全体师生刻苦耐劳，建设三民主义的新贵州。

△　立法院通过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凡20条，并于17日公布施行。

△　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乘专车赴沪视察京沪沿线防务及各地接收敌伪仓库情形，旋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京沪国军将于视察后开始整编。是日上午抵镇江检阅驻军第五十七师，下午抵常州视察第四十九军军部，抵无锡视察绥靖区司令部，并对记者宣称：决不承认东北非法机构。

△　军调部发表第二十二号联合公报：军事三人会议代表秦德纯

（政府代表）、吉伦（美方代表）于是日下午2时飞抵北平，至军调部商谈赴东北调处问题，视察东北之行，或将延缓。

△　军调部济南小组三代表抵高密，商讨胶济全线修路具体办法。

△　中共华中第一军分区致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邓克备忘录，斥责政府军队不顾和字第六号命令，向南通、如皋、泰兴、靖江中共驻军防地猖狂进攻，先后侵占小海镇、袁家圩、陈家桥、刘桥、兴仁镇、大生桥等地，要求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的军事蚕食行动，退回原地。邓克允将备忘录转达第一〇五师当局。

4月11日　行政院颁订《中央党政机关还都办法解释及补充》，凡六条。

△　蒋介石在贵阳检阅青年军第二〇五师，贵州省主席杨森、青年军军长刘安琪、第二〇五师师长胡素等人随行。蒋于检阅毕后发表讲话，谓："青年远征军的责任，在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建设我中国为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国家"。"望我全体官兵，认清自己责任的重大……不辜负我们从军报国的初衷。"

△　下午1时，东北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偕团员邱楠等，与苏军参谋长特罗曾科中将在苏军总部会谈，就国军运输及各主要城市治安问题达成谅解。关于溥仪引渡问题亦获具体协议。

△　为纪念较场口"二一〇"血案，李公朴、施复亮、黄次咸、王葆真、曹孟君、史良、黄洛峰等50余人成立"二一〇"社，致力民主运动。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中国迄今收到之救济供应物资共9．8148万吨；本年三个月内，共有货船19艘已于上海交卸，且有13艘正在该地卸货，尚有货船98艘正在赴华途中，此类货船载有火车

头、货车及小麦、肉类、牛奶、罐头等食品。

4月12日　　国民政府令：兹指定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西康、青海、新疆、热河、察哈尔、绥远、辽宁、安东、辽北、兴安、吉林、黑龙江、嫩江、合江、松江、台湾、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27省、市为《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实施区域。前经明令指定之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甘肃、安徽、陕西、河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湖北、宁夏、重庆16省、市仍应继续实施。

△　是日至21日，国民政府公布《公司法》，凡10章361条，规定公司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五种。同日，明令废止十八年12月26日公布、二十年7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及二十年2月21日公布之《公司法施行法》暨二十九年3月21日公布之《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

△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9月9日（按：系日本签订降书之日）为胜利纪念日，并决议停止9月18日及7月7日举行纪念仪式。

△　蒋介石举行茶会招待贵阳绅耆，到200余人，蒋介石致词指示：一、发展民众卫生，以增强人民体格；二、造林植树；三、提高文化，尤其要提高苗胞之文化。

△　陆军总部第二处处长曹士澂少将向记者称，我国战区日侨、日俘205万人，遣送已达136万人。现我国内，东北除外，尚有日人69万人决于6月底遣毕。

△　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正式判处汉奸陈公博死刑。

4月13日　　国民政府令：程潜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

△　政协综合小组开会，孙科主席，就宪法草案中行政院与立法

院关系一项达成三点协议。国民政府改组中之国民大会代表名额扩充案，国共意见不一，未果。

△　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局势已发展成为内战状态，再次抗议美国输运国民政府军队往东北。声明东北民主联军有充分权利接防东北主权，接防苏军撤退的城市。

△　军事委员会发布青年军复员命令，规定青年军各师及拨入其他军师、宪兵教导团、辎汽团内之知识青年志愿兵，除有任务者应延期至任务完毕，交通恢复，再行复员外，其余统着于本年5月底经考验后结业复员。军事委员会为办理青年军复员事宜，特成立青年军复员管理处，陈诚兼处长，彭位仁、蒋经国、邓文仪为副处长。

△　首任驻阿根廷特命全权大使陈介向阿根廷总统法勒尔递呈国书。

4月14日　长春苏军城防司令卡洛夫率领最后一批苏军北撤，上午10时，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副司令刘德摩正式就职，同时宣布接收长春全市防务，并张贴布告宣布是日10时起全市临时戒严。戒严期间执行停止集会、结社自由；检查新闻、邮件、电报、出版物；检查旅馆、公共出入场所及可疑之私人住宅等六项决定。下午3时，陈家珍首次招待中外记者，报告长春防务及民主联军进攻情形，略谓“长春周围受共军压力甚重，本人决尽全力保卫长春”。晚7时，陈家珍向市民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誓死保卫长春”之决心。

△　军调部发布第二十三号联合公报：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秦德纯、中共代表罗瑞卿、美方代表吉伦于今晨飞赴沈阳视察，以期获得关于东北之直接情报，俾于马歇尔返华时，立即呈交。北平执行部政府委员郑介民、中共方面陈士榘（代表叶剑英）、美方委员罗伯逊同行。

△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就北

平国民政府当局蓄谋查封中共北平机关报《解放》（三日刊）事函告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张厉生，请转饬北平政府当局，实践保障人民自由诺言，制止此种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停止查封。

△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成立，李济深任主席，李未到任前由蔡廷锴代理。

4月15日　蒋介石为谋求国民大会如期召开，是日亲邀政协会综合小组各会员茶叙，要各党派于本月20日前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周恩来、张君劢、王云五、陈启天先后发言，希望指定专人进行协商，当即由蒋介石指定邵力子、张群、张厉生及雷震四人为政府代表负责协商。

△　国民党中央常会选出叶实之、何兆麟、蒋经国等71人为国民大会国民党党员代表。

△　财政部公布《公有土地管理办法》，凡19条。

△　延安中共中央隆重举行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19日，重庆各界追悼“四八”烈士，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各党派人士、学生、工人、青年、妇女、文化、工教人员等5000多人参加，孙科主席，张澜主祭，周恩来、孙科、王云五、沈钧儒等陪祭。周恩来报告殉难烈士生平事略。

△　朱德致函第一集团军司令孙渡、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希望他们发扬滇军护国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

△　法国访华代表团一行14人飞抵重庆，白崇禧代表蒋介石赴机场迎接。16日，法国访华代表团团长、法参谋总长余安代表法政府授赠王世杰一等荣光勋章一座，刘锴等五人分别授赠二等、三等、四等

荣光勋章。17日，余安团长偕代表团团员会晤蒋介石，并授赠十字勋章一座。

△　美国垦务局为协助中国资源委员会设计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即YVA计划），派该局设计总工程师、水利专家萨凡奇于上月来华，勘察三峡水闸坝址，是日抵南京，并对记者谈称，三峡工程对中国的贡献：一、可发电1056万千瓦。二、工程完工后，一万吨的船只可由宜昌直达重庆。三、可以防洪。四、可灌溉1000多万亩良田。五、宜昌一带的湖沼可变400多亩良田。六、每月至少可吸引六万人参观旅游。七、以宜昌为中心，输电区域南至广州，北及郑州，东达上海，西到成都。

4月16日　东北民主联军周保中、曹礼怀、张庆和等部向长春市挺进，15日夜，民主联军进占长春市郊三处机场，并以密集炮火围攻市区，战斗彻夜不息。是日，国共两军于长春激烈巷战，新六军等7000多人被迫龟缩至市中心大同广场、煤炭大厦、中央银行等高大建筑物内顽抗。长春电台与沈阳、锦州、重庆等地电讯联络全部断绝。是晚，援长新一军被民主联军阻于四平。

△　东北民主联军保卫四平的战斗历时33天，是日于四平以西八面城西大洼反击战中全歼第八十七师。17日，美机数架低飞四平助战。20日，四平前线激战不息，国民党军以六师兵力在美式轰炸机配合下向市区狂轰滥炸，落弹两千多发，市郊民房毁伤惨重。

△　国民政府派刘敬宜为出席国际民用航空第一届临时大会代表。

△　是日至23日，国民政府公布《营业税法》、《遗产税法》、《所得税法》。同日并明令废止《遗产税暂行条例》。

△　豫北、豫东国民党军频繁调动，连日集结九军兵力，于平汉路沿线赶修碉堡工事，仅安阳至新乡210里路之两侧碉堡达192座。

是日，军调部新乡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黄镇飞抵北平，向执行总部要求迅速派人前往调处。

4月17日　军调部发布第二十四号联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三人小组美方委员，已于今晨偕其夫人抵北平，将其离华期间所发生之事件检讨完毕后再行返渝，参加三人小组会议。公告并谓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军之代表罗瑞卿参谋长及陈士榘少将已于今晨飞返重庆，美方代表齐兰中将尚留北平，将与马歇尔一同回渝。

△　行政院修正通过《财政部管理银行办法》，凡27条。同日，财政部令：《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着即废止。

△　教育部公布《留学生考试办法》。该办法规定本年考区设在南京、重庆、北平、西安、武汉、广州、昆明七处。并规定无论公、自费留学生，均须经过留学生考试合格方可出国留学。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署长马杰由开封抵南京，对报界发表谈话称："河南迭遭黄泛旱灾、兵燹蝗灾之结果，现已田园荒芜，十室九空，难民达820余万人，亟待救济。"

4月18日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生俘市长赵君迈、秘书长张大同等30余人，城防司令陈家珍负重伤，副司令刘德溥毙，其余官兵伤亡4000余人。

△　晚，蒋介石夫妇于重庆林园官邸宴请法国访华代表团长、法参谋总长余安将军以及代表团全体团员，席间蒋介石授赠余安以大绶云麾勋章并致赞词，并再次授赠法驻华梅里霭大使大绶景星勋章。

△　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病愈，飞返沈阳重主东北军务。

△　军事委员会与行政院联合颁发《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凡八条。

△　何应钦就遣送日俘、日侨事招待新闻界，略谓：“截至本月18日止，陆军总部已运走日俘80.5551万人，日侨80.9932万人，剩余日侨日俘60.9万余人，可于6月底遣送完毕。”

△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携夫人自平飞渝。

4月19日　国民政府特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私立金陵大学前校长、美籍福开森博士。

△　行政院例会决议设立“行政院执行决议案检讨委员会”，以切实执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常会、参政会、国民大会等对该院有关之决议案。

△　中共中央电林彪、彭真并转周恩来等，其要旨为：传令嘉奖占领长春有功将士；用全力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用全力发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及哈齐线东西两侧各200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同日又电令重庆中共代表团：“如国、美要求我让出长春，请断然拒绝。”

△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布告严令禁止游行请愿，否则以“防害治安论罪”。

△　援长新一军抵公主岭，谋求再度争夺长春。

4月20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绥远、宁夏、南京、上海、青岛、西京24省、市区域及职业团体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共计781人。同日又公布国民大会自由职业团体代表名单，计52人。

△　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各部纷纷还都南京，是日组织部长陈立夫、宣传部长吴国桢、财政部长俞鸿钧、中央文委主委张道藩于下午飞抵南京。行政院定于25日起在南京正式办公，规定各省、市公文自25日起径寄南京，中央各部则于28日起在南京办公。

△　国民政府特设“中央党政军机关留渝联合办事处”，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朱绍良为主任。

△　中共中央电令东北局及林彪保卫长春：“长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指示“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彪）直接指挥作战”。

△　晨，鄂省第七十二军新十三师由麻城分兵两路偷袭新四军防地界岭、周家河等数处及黄安、黄陂、经扶、商城、麻城的无数村庄，开始大规模围剿新四军中原军区的主力部队。

△　财政部公布《货物税查检验规则》。

△　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福拉塞抵沪。

4月21日　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今日诚不可再进一步”。

△　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在四平街会战中，“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

△　中共代表团向政府代表提交声明：中共从不认可可以孤立解决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大会的名单问题，而置政协决议、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任人破坏于不顾，尤不认为在内战重新扩大、民主毫无保障的现况下可以参加政府，召开国大。

△　中共中央致林彪、彭真《关于保卫长春、哈尔滨的电示》，指示："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指出谈判中要力争东北停战，东北问题政治解决，力争民主宪法，力争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兑现，国大和宪草审议问题可放后一步。对国民党应强硬，但不要与美国搞僵，与马歇尔要搞好关系。

△　下午，"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于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国大代表选举问题演讲会，揭发选举中的舞弊事，主席宣布开会，预先埋伏在会场中的暴徒大肆捣乱，将鸡蛋、砖块狂掷主席台，主讲人陈瑾昆教授的眼镜被击碎，右眼受重伤，数十人遭石头击伤，讲演会遭到破坏，被迫终止。

△　粮食部通电全国，指出："粮荒日臻严重，全国同胞自应一体警惕，特加节约。"通电并颁布办法六项，其中第四项为："策动社会改变消费习惯。例如向以米面为主食者，尽量配食杂粮。日食三餐以上者，减少次数。日食干饭者，酌改稀饭。各就当地情形，提供推行。"

△　人民自由保障会在沪成立，选王晓籁、朱学范为理、监事。

4月22日　　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说明中共愿执行3月27日的指令，而政府军违背指令，武力占领我方七个城市，我方遂也进占长春。他们既不能遵守这些条款，我们只能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苏军即将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并强调说，非实现全面停战，中共不能参加政府。

△　苏军撤离齐齐哈尔。

△　江苏高院刑事法庭判决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以无期徒刑。同时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决褚民谊死刑。

4月23日　蒋介石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要求彻底使用空军助战，设法抽调新六军备用，坚定各军官兵信心；并答应给增调援军。

△　中共代表周恩来致函政府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对他们22日的来函没有对中共代表团21日声明所提各点作具体答复表示不满，“似在卸脱责任”。声明：给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按八、四、四、四分配政府委员名额，动摇了三分之一否决权（即14名），我方绝对不能考虑；东北内战又在扩大，何能改组政府？宪草争议未决，何能先开国大？

△　国民政府令：政府还都在即，为加速完成西南各省建设及协助复员未定工作，着将二十八年1月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予以恢复设置，原设成都行辕撤销，所有业务归并重庆行营办理，特派何应钦为行营主任。何未到任前，由张群兼任。

△　国民政府公布平、津两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参议员、候补参议员名单，谷钟秀、许惠东分任北平市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时子周、喻传鉴分任天津市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一致通过对时局的意见书，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全国地方自治；停止东北内战，严惩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凶手；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恢复交通，平毁碉堡；释放全国政治犯。大会致电美国政府，要求立即撤走驻华美军，停止运送国民党军到东北扩大内战。

△　文学家夏丏尊在上海病逝。

4月24日　下午4时，蒋介石再度邀请政协会议综合小组各党派

代表及社会贤达茶会，商讨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张君劢、周恩来，王云五、曾琦、莫德惠、傅斯年相继发言，周恩来询问蒋对四项诺言保证问题，蒋表示已经在办。各方代表协议：政协原定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

△　下午6时，重庆举行陪都各界庆祝国府胜利还都及欢送蒋介石重返南京大会，国府各院、会于右任、戴季陶、周钟岳、吴铁城等及川、康籍国大代表、渝市参议员、各机关团体代表600余人到会，会上渝市地方耆绅致词，蒋介石致答词，赞扬重庆对于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谨祝重庆日益发展，成为全国模范城市。

△　国民政府令：原定5月5日召开之国民大会延期举行。

△　国民政府特派雷震为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　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发表社论，表示除非立即停止内战，否则将不提出参加国府和国大代表名单。

△　军令部长徐永昌继军政部长陈诚为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

△　行政院指令上海市政府组织委员会，清理前租界官有资产及清算官有义务债务事宜，市长钱大钧奉令兼任主委。

△　西安全城戒严，军警分批奔赴西北大学本部宿舍、各公共场所严密搜查共产党。同日，四川大学教授刘连龙等85人不堪政治迫害，要求改善待遇，于是日起罢教七天。

4月25日　　正午，哈尔滨苏军全部撤离哈市。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关吉玉、杨畸庵以下各省、市委员、局长，中央接收人员47人，沈阳市长董彦平及代表团员杨作人、朱新民、邱楠等14人亦追随苏军撤退。

△　上午，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为谋求东北问题的迅

速解决，于重庆再度集会，决定罗隆基、章伯钧与共产党商谈，陈启天、莫德惠与国民政府商谈，征集双方意见后，拟就解决东北问题的折衷方案。

△　国民政府特派驻秘鲁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君健为互换中厄（瓜多尔）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　陕甘宁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举习仲勋等九人为常驻议员，举林伯渠为边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2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和平建设计划与复员提案，通过边区地方宪草原则。同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及政府委员、各厅厅长宣誓就职，历时25天的参议会闭幕。

△　法国访华团团长余安以荣光大十字勋章赠予何应钦，当日飞赴越南。

4月26日　民盟代表罗隆基、张君劢会晤周恩来，双方就东北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再度重申东北应无条件停战。

△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齐齐哈尔。

△　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发生后，民主人士张君劢、郭沫若、沈钧儒等66人特致函陈瑾昆教授、江绍源教授及受伤者表示沉痛慰问，紧急呼吁保障人权，严惩凶手，解散特务组织。

4月27日　蒋介石于25日飞抵成都，告别川中父老，是日公宴成都耆宿绅学及党、政、军、民各首领。陆、空军官学校高级军官、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等24人列会。蒋介石致词，叙及四川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抗战中的伟大贡献及今后四川“以建设为第一”的努力目标。提出今后三五年内，在交通运输方面，要修成成渝、天成、叙昆、渝筑、川康五条铁路，在电气事业方面，首先完成都江堰大电厂，扬子江水闸亦正在计

划中，希望四川同胞以“诚”、“拙”、“实”为自立立人的南针，“来建设新四川，成为我们中国的模范省”。28日上午蒋介石飞返重庆。

△　国民政府特派冯玉祥前往美国考察水利事宜。

△　国民政府令准免中国出席联合国战犯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代表王宠惠本职，派刘锴继任；派刘秉文为中国出席世界粮食紧急会议代表。

△　国民政府令：增订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省为《边远省份公务员任用资格暂行条例》适用省份，其施行期间，并与新疆等省至三十七年（1948）1月10日同时截止。

△　美方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东北问题，马歇尔征求对接替陈诚人选的意见，周表示：既能代表蒋介石，又确愿把事情办好。徐永昌是好人，但不能代表蒋，陈能代表蒋，但太冲动从事。

△　衡阳、长沙、上海米价暴涨，宋子文急召徐堪、钱大钧商讨对策。

4月28日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商谈东北停战问题。

△　东北民主联军和平解放哈尔滨，市民10万余人夹道欢迎。

△　四平外围战斗激烈。第五十二军第一九四师、第六十七军第一八二师、新一军新三十八师、第五十师等七师兵力三面迂回弧形包围四平，民主联军坚守四平顽强抵抗。

△　国民党军连日从关内源源赶运东北，继续扩大内战。是日第九十九军奉令北调，其先头部队第九十四师全体官兵由副师长刘国光率领自九江抵上海转赴东北。驻昆明炮兵十团于27日启程北上。

△　重庆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等20余团体联合组成之“民主运动联盟”，于青年大厦举行成立大会，阎宝航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并向南通、北平等地血案受害者家属致慰问电；举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等九单位为理事。

△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等20团体联合致函马歇尔，提出立即停止东北内战，成立由东北地方人士及各党派参加的东北临时政务机构，美国必须立即停止运兵东北等五项主张。

4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是日至5月4日）及《土地法施行法》（是日至5月2日）。

△　马歇尔同周恩来会谈东北问题，转达蒋介石的解决方案：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并由政府军进入；政府军占领长春后，由三人小组考虑军事和政治局势的各项问题，蒋介石建议：一、执行停战令；二、按照2月25日达成的军队整编协定确定国共双方的兵力；三、政府控制铁路沿线两侧30里地带，以重建在东北的主权；四、进一步讨论政治事务。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一、不愿承认中共已有的地区；二、凡是能用武力则用武力，只有不得已时才能谈判；三、他是“中央”，一切要听他的命令，他只有被迫时才让一点。因此很难协商。

△　民盟提出解决东北问题方案，其要旨为：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政府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长春，不得派军队进入；国共重开政治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的精神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请示延安后决定。马歇尔表示接受，蒋介石坚持打长春。

△　远东国际法庭检察官季楠提出日本主要战犯28名之起诉书。28名战犯名单如下：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宜、木户幸一、木林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

明、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条英机、东乡茂德、梅津美治郎。

4月30日　国民政府颁布定于五月五日还都南京令。

△　蒋介石于还都在即离重庆飞抵西安。

△　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东北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指出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的主张是十分危险的，“早下决心，回头不晚”，仍希望协商在南京继续进行。最后宣布中共代表团迁南京后，在重庆设立驻渝联络处，与中共四川省委合署办公，并介绍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兼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等同记者见面。

△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离重庆飞抵南京。

△　美国前总统、美国急赈委员会主席胡佛偕随员七人飞抵上海“视察”中国灾情。

是月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林亨元、郭沫若、阎宝航等对南通惨案提出抗议，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严惩凶手，保证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由政府进行抚恤；必须切实实行蒋介石的四项诺言。

△　上海成立南通惨案后援会，发表控诉书，要求严惩凶手，立刻释放被捕诸人，切实保障他们的身体自由和生命安全，撤销一切特务组织，实行政协决议，结束一党专政。此案直到南通解放，于1949年3月18日经各界人民代表集会控诉后，由南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凶手姜铁石等八人死刑，当日执行。

5月

5月1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渝约见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揭露政府当局“围歼”新四军中原军区六万军队之密令，并要求立即停止该命令的执行。徐允电告蒋介石。2日，周续就该事追询徐，徐称已电蒋，尚未回电。

△　周恩来在渝电南京马歇尔，指出政府当局已下达“围歼”新四军中原军区之密令，其预定进攻之日期为5月4日至9日，企图在东北未攻占长春以前，突然发动全国性大内战。请马歇尔立即阻止国民政府方面的军事攻击行动。并申明政府如果破坏停战，进攻中原，应负挑动全国内战之责任。同时提议三人小组三方代表同至宣化店监督停战。

△　蒋介石西安行辕发言人对中央社记者谈称，关于东北问题，长春共军应先撤退，交还中央接防，才能谈其他问题。

△　新六军廖耀湘部向驻本溪之中共辽东军区程世才部发动猛攻，中共军顽强抵抗，打退进攻10余次。3日，廖部攻占本溪。

△　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宣布撤销，另组驻华美军总司令部。吉伦、麦克鲁任正副司令。其公告称，至4月30日止，在华美军官兵已缩减至4581人，5月起将逐月减少，但五项任务尚待完成：一、协助中国军队之整理与训练，由军事顾问团执行之；二、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敌侨之撤退；三、运载中国军队与配备；四、处理剩余物资；五、完成剩余工作，如坟基登记及追寻失踪美方人员等。

△　美国急赈委员会主席、前总统胡佛在上海与粮食部部长徐堪、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奥斯特、美国粮食部委员、杜鲁门总统私人代表哈利逊等讨论中国粮食之分配及救济问题。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正式成立，张群兼代行营主任。

△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陈修良（女）任书记。

△　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遇害被救。是日，李被国民党特务从西安街头架上汽车，拉至咸阳西北枪杀，李中弹未死，为当地农民救护。李于7月17日抵延安，29日电罗隆基转民盟中常会，陈述遇难经过，请诉诸全国公论。

△　民盟中常委、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在西安主办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被国民党特务捣毁。3日，该报被迫停刊。

5月2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西安飞抵汉口，即召见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副主任孙蔚如、郭忏、湖北省参议会议长何成濬、省府主席万耀煌、省党部主委方觉慧等党、军、政要员听取湖北地方情况。蒋过新乡曾召见豫北将领（内有伪军将领庞炳勋、孙殿英等），下达5月5日至9日围歼中原部队的密令，号召他们“雪耻自强，扫荡反动派共产党”。

△　国大联谊会在南京举行国民大会准备会议，到国大代表234人，呼吁国大如期召开。

△　《和平日报》报道，军事委员会规定现役军官佐限龄：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上将衔）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准尉34岁。凡现役各级官佐服现役至上列规定年龄时，即核予退为备役。

△　美国粮食部委员、美总统杜鲁门私人代表哈里逊从上海赴各地视察粮荒情况，是日抵天津，3日到北平，6日到汉口，8日到开封，11日到衡阳，13日到广州，16日到南京，旋返美国。

5月3日　　蒋介石由汉口飞抵南京。同日，蒋在京举行茶会招待

美国前总统胡佛。

△　国民大会准备会议开第二次大会，到165人，议决请政府迅即召开国大，并以此意致电蒋介石。

△　中共政协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由重庆飞抵南京。晚，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重申中共对时局之态度：在东北应首先实现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并指出国共谈判重开时，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全国内战。

△　中共南京局成立，下设外事工作委员会。6月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对外称“周恩来公馆”。

△　民盟主席张澜由重庆返成都，行前对记者谈，民盟日内将派代表赴京，协同调解东北之国共冲突。

△　胡佛离上海飞往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行前对记者谈赈粮，谓：“中国无论需要如何之大，目前所有运输工具每月仅能运输粮食20万吨而已，本人鉴于运输上之限制，深觉无须亲赴灾区视察。”

△　东北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境内（大连除外）。

△　联合国九国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检查官向哲濬出庭。

5月4日　　周恩来访马歇尔，提出欲解决东北问题，应先解决中原问题。同日，徐永昌由重庆抵京，三人小组会议复会，就调处中原战事达成协议：三方代表5日赴汉口，作初步调处，再赴宣化店视察。

△　马歇尔向徐永昌提出解决东北问题之计划：中共军撤出长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以维持治安。由政府任命一名市长，组织地方保安队。8日，马向蒋介石的联络人、交通部长俞大维重提该计划，并建议规定政府军在六个月左右的期间内进入长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肯定农民的土地要求，批准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退租中从地主手中获得的土地合法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要求各地党委必须认识解决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　九三学社是日在重庆成立。褚辅成、许德珩等为发起人。宣言声称："愿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主张立即无条件停止东北及中原的内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在国民政府未根据政协决议改组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任何党派之行为。

△　至是日止，四川省呈报旱灾之县已达53个，省府请中央即拨赈款10亿元。

△　《中央日报》报道，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已与美国马立森克努公司订立合同，实施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之萨凡奇计划，将在宜昌附近筑一大坝，使大轮直通沪、渝，利用长江水力发电，扩大农田水利。

△　青年党机关报《中华时报》在上海出版。

5月5日　　蒋介石率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中山陵举行还都大典，与会者万余人。蒋率领党、政、军、民恭谒中山陵寝，并由张道藩委员宣读告文。读毕，蒋致训词，谓："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今后

一致的建国方针是："一、要戒浪费；二、要尚节约；三、要明礼义；四、要知廉耻；五、要负责任；六、要守纪律。"下午4时，蒋介石夫妇于国府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外宾。到马歇尔将军夫妇及各国驻华使节，以及我各院、部、会首长、中共代表等共400余人。晚8时，蒋介石亲临中央广播电台，在还都大典所致训词，复向全国军民广播。

△　是日为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之纪念日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武昌、青岛、南昌、广州、成都、太原、开封、济南、西安、宁夏等全国各地及越南侨胞，均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及纪念革命政府成立大会。

△　周恩来、徐永昌由南京抵达汉口。同日，马歇尔的代表、军调部执行处美方处长白鲁德偕新派光山临时执行小组从北平抵汉口。三方代表听取汉口第九执行小组报告，紧急商谈调处中原战事，议定三方代表赴宣化店中共中原军区实地视察。6日，周恩来、白鲁德及徐永昌的代表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前往宣化店。

△　中共中原军区就国民党发动对中原军区六万余部队之围歼阴谋事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当局已调动第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二、六十六、十八、十五、十、四十一、四十七、六十九、八十四军共26个师，30万兵力向中原军区围攻，呼吁全国人民努力制止内战爆发。

△　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52个团体在上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建立联合政府等17项主张。并一致反对上海官办的"人民自由保障协会"。选出马叙伦、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等29人为该联合会理事。

5月6日　　蒋介石在京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联合谈话会，讨论当前经济情况、公教人员待遇问题、还都各机

关和职工房屋问题，分饬各主管机关限期拟报具体办法。

△　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招待来京之“国大”代表，宣布“‘国大’延至秋凉后举行”。

△　蒋经国应约与苏联驻华武官罗申会谈后，向蒋介石报告斯大林有意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蒋介石决意拒绝，于5月8日让蒋经国婉告罗申。

5月7日　蒋介石招待来京之200余名“国大”代表，各代表要求蒋如期召开“国大”，蒋答：“国大”将于东北统一完成之时召开，决定延期系出于政府“尊重民意”，绝不是因受各党派的压迫。“国大”延期而不定期，亦为本人之坚决主张，因不愿再授各党派以把柄。

△　《新华社》在延安公布，自1月10日停战令下迄今，政府当局正在紧张地非法调动军队，布置全国大内战。已查明：一、苏皖、山东方面调动九个军21个师；二、鄂豫方面调动五个军12个师；三、豫北、陕西方面调动九个军20个师；四、广东方面调动三个军九个师；五、东北、热河方面调动10个军28个师。非法调动的兵力达100万人以上，正进迫各解放区，新的全国大内战已迫在眉睫。

△　国民政府特任李铁铮为驻暹罗国特命全权大使。

△　行政院通过严禁公务人员不正当娱乐案，规定公务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一律撤职，长官知情而不处置者，应予惩戒：一、涉足备有舞女之舞场或其他不正当场所；二、招致妓女、舞女、歌女陪席。

△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拟在华组织航空运输队未果，是日离沪回国。

5月8日　周恩来、王天鸣、白鲁德一行抵宣化店视察，中共军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报告，自1月10日停战令发布以来，国民政府

军调集11个军26个师包围封锁，先后挑衅进攻240多次。同日，三方代表返汉与徐永昌会商。同日，汉口第九执行小组新成立的附属小组（亦称光山小组）由汉口抵达宣化店。9日，周、白、王三人由宣化店返回汉口。

△　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在莫斯科讲演《中国的数学研究》，苏联数学研究所所长称华的成就已达世界第一流水平，其科学成就不亚于西方国家。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中国重灾18省，营养不良者达3300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者700万人。

5月9日　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答记者称，军事委员所属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后勤部、政治部及参谋本部于15日结束，陆军总司令部于月末结束，成立国防部，直隶行政院，最高统帅权属于国家元首。何又指责中共军不遵停战令，自1月14日至4月底止，共军违停令，“攻击国军三百九十三次，破坏交通六十九次，攻占城镇九十二处，劫夺物资三十三次”。

△　美国陆军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上将视察太平洋地区之美军，是日由菲律宾飞抵南京。何应钦、陈诚等前往迎接，蒋介石设宴款待。艾森豪威尔召集在京美军官训示，饬其协助中国完成和平统一工作。同日，艾离京抵上海。10日，离沪飞往东京。

5月10日　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在汉口签订关于调处国共双方军队在中原冲突的协议，规定双方停止冲突和调动军队，停止修筑工事，交换被俘人员，释放政治犯，保护中共军复员人员回乡之安全，保护中共军伤病员安全转移到安阳。该协议同时发致北平军调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转令长江以北各有关部队实施。同日，周、徐、白三人由汉口飞抵南京。

△　中共中央发言人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指出：国民党当局企

图撕毁菏泽治河协定，不先浚河复堤，而竟抢先堵口，蓄意水淹冀、鲁、豫三省解放区黄河故道700万人民。若当局一意孤行合龙放水，解放区人民势将被迫自卫。

△　马歇尔就满洲问题致蒋介石备忘录，其要点：军事方面，政府军队应集中在南满，与中共军队保持5：1的比例。政府军应配置在长春及长春以南，并且让中共军配置在哈尔滨以西及满洲里之间。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前进指挥所，在谈判期间控制该市；政治方面，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希望改组东北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而且这两个委员会不受军人控制。对该问题必须正视。最后指出："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军事地位是软弱的，而共产党在那里拥有战略上的优势。"某种妥协必须尽速获致，否则后果严重。

△　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宣布，东北日本人130万名，将由政府与美军合作遣送回国。遣送事宜在9月30日完成。

5月11日　马歇尔将其所拟关于解决满洲问题之折衷办法交俞大维，略为：一、中共军撤离长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作为谈判之基础；二、由马歇尔与中共代表达成谅解，政府军至多不超过六个月进占长春；三、在东北军队的比例，中共军一个军，政府军五个军；四、由马歇尔出面阻止中共军占领长春以北的关键性城市。

△　徐永昌、白鲁德分别向蒋介石、马歇尔报告中原解放军的情况。周恩来访邵力子、王世杰，交换对时局的意见。

△　政协秘书长雷震由南京赴上海，联络在沪之各党派和无党派政协代表，商讨时局问题。14日返京。

△　《中央日报》报道，第五十三军荣誉第二师，奉令调赴日本，与盟军共同担任占领日本工作，该师已于越南海防集中，定下周乘船直驶横滨。

5月12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京会谈，蒋表示大体上同意10日备忘录中关于军事条款之建议，但须明确规定中共不应占领哈尔滨。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军事司令部和东北政治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应予撤销，然后通过九省政府主席实行控制。马歇尔强调现时华北危急，迟误可能引起不可挽回的崩溃。蒋要求马不要急于重开谈判，最好由中共代表提出初步建议。

△　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对北平“四二一”血案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是“反民主罪行的表演”，这“根本不是选举”，“我对于以如此横蛮手段制造出来的所谓平津国民代表，万难予以同意，并望全国民众一致力争”。

△　司徒雷登由上海至南京。17日，马歇尔会见司徒雷登，问询其对中国时局之意见。18日，司徒雷登赴北平。

5月13日　马歇尔与周恩来就东北问题会谈，马提出：中共军撤离长春，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前进指挥所，政府军留在目前的阵地，由此便开始就军队的配置和政治问题进行谈判。希望中共能够接受他的建议。并强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希望的前景，他不愿作调解人。周表示将马的建议转达延安，劝马不要放弃调解的努力。14日，马、周继续会谈。周申明中共对马提议之态度：一、担心政府一旦占领长春后将继续提出对其他城市的要求，如对哈尔滨；二、希望把整军方案所列东北中共驻军由一个师改为五个师。

△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军事，其第一部“日本投降后中国陆军总司令执行任务之情形”，谓最高统帅所规定的12项受降任务现已全部完成。现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国防部即将成立，本人在下月前辞职，以让少壮贤能，本人出任战略咨询委员。战略咨询委员会直隶元首，其成员平时研究国防及战略，战时担任高级指挥官。

△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达进攻四平街之命令。14日，廖

耀湘新六军、彭锷第八十八师等10个师组成左、中、右三个兵团，轮番向四平街实施进攻。

△　第八绥靖区夏威部第四十八军第十三师攻占苏皖解放区之定远。

5月14日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在京通过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协议，略为：国共双方对执行小组之行动给予帮助，不得有任何延迟或限制，保证执行小组人员之自由与安全。在任何执行小组区域内，双方将有同等调查之机会。关于前往各地区巡视之次序，由小组美方代表拟定，各代表一致同意后执行，若小组成员一直不能取得同意，美方代表将不同意见直陈军调部三委员，三委员于24小时内达成一致决定，或将该事呈报三人小组决定。

△　国民政府令免钱大钧上海市市长本职，任命吴国桢为上海市市长。

5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还都后首次会议决议：调整中央组织，缩编党务机构，依照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执会分设组织、宣传、海外、农工四部，妇女、文化、抚恤、革命勋绩审查、党史、财务、甄选七委员会及秘书处。中央党务专任工作人员以500人为限，大部分多余人员设法转业。通过彭学沛继吴国桢任宣传部部长。

△　民盟政协代表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在上海对记者谈，目前时局严重，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局。望国共双方尊重军事调处部停战令，各地一律奉令停战。

△　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原杨虎城部）师长孔从周率该师全体官兵在河南巩县起义。随后，该部冲破胡宗南指挥的追围，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

△　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创刊。

△　美国社会党领袖汤麦斯、劳工同盟协会主席葛林、《密勒士评论报》发行人鲍威尔等美国名流62人联名发表《对中国东北宣言书》，要求修改雅尔塔秘密协定，保持美国在华之门户开放政策，对苏联洗掠东北严加谴责。

5月16日　国民政府令免翁文灏经济部部长本职；特任王云五为经济部部长；免俞飞鹏交通部部长本职；特任俞大维为交通部部长。

△　白崇禧从南京飞抵北平。16日在平召集军事会议后下午飞沈阳，对中央社记者谈，此行到东北视察，“凡国军所在地，均拟前往巡视”。

△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海军上将在沪对记者谈：美登陆艇试航长江，结果良好。上海至重庆，全程需144小时。该舰队大部力量将移驻青岛，帮助运输国民党军25万人到东北的工作业已完成，帮助中国训练海军将在青岛继续进行。

5月17日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颁发和字第七号命令：一、政府及中共双方之军事及行政当局，对执行小组之行动，给予一切帮助，不得加予任何迟延或限制；二、双方保证执行小组人员自由与安全；三、在任何小组执行区域内，双方得同等调查之机会；四、往各地区巡视之次序，由小组美方代表拟定，各代表一致同意执行之；五、若发现有违反协定之虚伪报告，应将该报告交三人会议，以定制裁办法。

△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局问题，周提出：一、东北的政治委员会和东北各省的各种委员会应予改组；二、应依政协会议决议，在各县推行自治政府；三、所有交通应予恢复并由一个临时委员会管理；四、东北的军队整编方案应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必须调整国共军队在东北的人数。东北问题须同停战令、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宪法草案及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等问题一起解决。马歇尔提出，双方军队

都要保证停止敌对接触。并强调，若无相当把握，他不能再作调解人签订带重要性条款的协定。

△　董必武、李维汉访张厉生、雷震，要求尽快重开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会议。

△　廖耀湘之新六军在向四平街迂回包抄中攻占西丰。

△　中国政府答复美国政府，赞同美国关于订立中、美、英、苏四国公约，以防止日本重整军备再度侵略之提议。

△　湖南“国大”代表10人在南京向新闻界介绍该省灾情：湖南连年战争，复经旱、风、虫灾，全省灾民达2000余万。长沙、衡阳、常德等市房屋被毁者无数。公私中学400余所，被毁损者达80％。

△　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上海工商业“星期五聚餐会”上说：国民政府4月12日公布实行的新公司法是丧权辱国的法规，迎合美国资本输出的需要。“中国民族资本被摧残，而官僚资本将更进一步与外国资本勾结，操纵中国经济”。

△　最高法院复判原任伪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璧君无期徒刑。

5月18日　“联总”、“行总”、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代表与晋冀鲁豫政府代表达成南京协议。“联总”中国分署代理署长福兰克芮·雷、“联总”总工程顾问塔德，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会议中亦达成六项口头协议。其中决定“行总”在菏泽设立办事处，中共参加一事，22日“行总”署长蒋廷黻在同周会商后，决定菏泽办事处处长由政府派，副处长由中共派。

△　中共代表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称：前已商定黄河堵口之前应疏浚复堤，给黄河道内的居民拨款救济，这一点应在汛期前办到。

△　白崇禧与杜聿明从沈阳往四平街前线视察，当日返回沈阳。白向杜转达蒋介石之意图，谓暂不攻取长春，以待与中共重开谈判，不战而取得长春。白主张攻至公主岭而止。杜坚持一举攻占长春、永吉的命令已下，不容变更。并表示有绝对把握达到预期目的。白亦同意按原计划攻击前进，待返京后再向蒋汇报。

△　廖耀湘之新六军攻占四平街东面之平岗，向四平街侧后迂回。陈明仁之第七十一军越过四平街西面之梨树，向四平街侧背夹击。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在四平街正面进攻。夜，东北民主联军全部从四平街撤退，部分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

△　资源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统一经营中国石油事业之产、炼、运、销。由翁文灏任董事长。

△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包华国为出席第二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代表；派卢作孚为出席第二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华民国雇主方面代表；派刘师舜为出席国际民用航空第一届临时大会首席代表，王承黻、李景樅为代表。

5月19日　孙立人之新一军进占四平街，陈林达之第一九五师攻占四平街东侧哈福屯，历时33天的四平街攻防战至此结束。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分五路继续向长春推进。

△　军政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陈诚在镇江对记者谈，第一期国军整编27个军已完成，第二期整编29个军本月即开始。

△　山东省府主席何思源急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谓鲁省共军调动主力谋攻济南，17日已攻占胶济路之明水（今章丘）、龙山、郭店。

5月20日　马歇尔向报界发表声明，称他本人为恢复和平正在作出努力，但国共双方目前仇恨的宣传战，使局势更加严重，执行小组之工作至感困难。中国之和平，“多半有赖于此等执行小组之成功，

各小组中之美方代表，正以坚定而公正之努力应付危险之局势，以谋改善现状”。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丹麦专使高福曼在南京签订中丹两国关于取消丹麦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蒋介石接见高福曼。

△　杜聿明从沈阳至四平街视察。自四平街进攻长春的五路国民党军已迫近公主岭。

△　粮食部长徐堪在总理纪念周报告粮政，谓上年订购粮食740万石之计划，至今仅办到三分之一。遵照六届二中全会决议，行政院业已决定，自7月1日起，恢复田赋征实。

△　上海市长吴国桢为平抑米价采取紧急处置办法：限豆米商三日内登记存粮，否则没收；非米商不得营米业，违者严办；今后米商交易须严格登记，对投机米商严厉取缔。

5月21日　蒋介石接见马歇尔，商谈东北对共方针。

△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周表示同意马歇尔20日之声明，已将声明全文电告延安。并表明共产党对时局之态度：政治方面，将东北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改组为三、三、三制的行政委员会，由一名无党派人士为长春市长。军事方面，应依双方同意的整军方案实行复员，中共希望在东北驻五个师。马歇尔表示，为了避免政府军进攻长春和华北局势恶化，必须速达协议。不同意中共在东北驻五个师，建议降低兵员总数和调整军队配置。

△　新一军攻占公主岭，新六军攻占西安（今辽源）、伊通。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全线北撤。

△　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自沪致电南京蒋介石和延安毛泽东，为在东北实现和平，“吁请即停

战：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所有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后由中央简任之。其他一切问题俟停战后协商解决”。

△　邵力子以参政会秘书长名义同政协秘书长雷震宴请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吴铁城、王世杰作陪。席间，邵力子提议恢复国共商谈。

△　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缪斌在苏州被枪决，此为高等法院枪决汉奸之第一人。

5月22日　东北民主联军完全撤出长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就此发表公告称：放弃长春，“不是我们没有防卫长春的力量，而是由于我们希望以自动撤出长春的让步，看国民党在东北是否有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诚意，并由于我们不愿使长春80万人民及长春城市遭受战争的毁灭”。

△　熊式辉、杜聿明致三人小组、军调部通电称，国军虽收复四平街，仍本和平统一之方针，“只要共产党军队遵守停止军事冲突与军队整编方案等协定，自动退出安东（今丹东）、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我政府前业已接收之各地，并退出铁路沿线，尽先恢复交通，而由三人小组或执行部负责调处，则我军情愿求得和平解决”。

△　白崇禧由四平街返沈阳，同日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战况。

△　蒋介石告知马歇尔，表示赞成马歇尔的见解：即在跟中共签订协定的基础实际已经完成之时，攻占长春是不合宜。为了控制局势，蒋定24日动身赴沈阳。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南京对外国记者谈：接收东北，乃国民政府之责任，吾人希望共军自动撤出长春，政府不愿用武力。关

于新闻方面，政府对报纸根本不加统制。

△　国民政府令免翁文灏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兼主任委员兼职，免钱昌照副主任委员本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改隶行政院；特任钱昌照为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外交部长王世杰为议订中丹条约全权代表。

5月23日　廖耀湘之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和孙立人之新一军第五十师进占长春。新六军一部进占东丰，新一军一部进占怀德。陈明仁之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进占辽源（今双辽）。东北民主联军续向松花江以北撤退。

△　毛泽东复电民盟张君劢、黄炎培等五政协代表，对其关于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提议，谓“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

△　马歇尔把蒋介石提出作为获致任何一般协定的三项先决条件递交周恩来：一、中共必须尽力促成交通之恢复；二、在关于东北问题的任何协定里，必须规定在一定日期之内实行军队复员和整编方案；三、双方应谅解，当执行小组或高级参谋小组的成员由于意见不一致而陷于僵局时，应由美方成员作最后决定，否则，蒋不愿受进一步的协定的约束。周表示，他愿尽力与俞大维商谈恢复交通，对第二点不反对，第三点尚需商议后才能答复。并指出，蒋去沈阳有使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意图。并要求派执行小组到长春，停止政府军队的进攻，遭到拒绝。

△　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发表公报，称：对中共武装人员自粤境内撤退的安全问题及中共借款问题，已获解决。第八小组定25日派出三个支组，分赴东江以南，东江以北，及粤北开始工作。下午3时50分，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在沙面该组办事处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美方代表密勒上校、政府代表黄维勤少校、中共代表方方少将主持。方方表示，此次粤中共武装人员的撤退是为贯彻中共“撤退长

江以南武装人员”的诺言。

△ 蒋介石偕宋美龄、白崇禧、张嘉璈由南京飞抵沈阳。

△ 蒋介石召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胡建议改征兵制为民众组训方式，则预期陕境可训壮丁30万人，需军官5000人；河南可训壮丁50万人，需军官9000人，即可解决兵源补充问题。蒋嘱拟订办法。

△ 巴拿马首任驻华公使白善乐在京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5月24日 宋美龄代蒋介石由沈阳致函马歇尔，详述蒋介石与中共谈判的条件为：一、依照停战令的字面规定和精神实质予以执行。二、依照计划进行复员和整编军队。三、恢复交通必须完成。四、程序办法：中共不得阻碍政府依中苏条约接收主权；不得干涉或阻碍政府修复全国各地铁路；在执行停战令、军队整编方案及恢复交通协定中，国共观点分歧时，在军调部或执行小组里的美国军官必须有决定权和解释权。

△ 宋美龄再次代蒋介石自沈阳致函马歇尔，内称：如果中共接受前一封信中所提建议，蒋介石可能接受马歇尔关于中共在东北可驻三个师，政府在东北驻扎15个师的建议。但中共军应驻在黑龙江省新省界之内，该驻军区域内的省府主席人选，可于军事问题决定时解决之。

△ 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陈启天以及左舜生、李璜等在上海邀请张群、张君劢、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等政协代表交换对时局之意见，各代表均一致希望仍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

△ 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由京赴上海，与留沪政协代表商议时局，25日、26日与民盟政协代表连续会商，并邀他们赴京参与谈判。

△　政府政协代表张群在上海对记者谈，政府接收长春后，将按既定方针沿中长路各城市自当先行接收，齐齐哈尔、哈尔滨自亦包括在内。又称，倘中共在华北、苏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围攻济南、青岛，政治协商当可继续进行。

△　廖耀湘新六军一部攻占梅河口、海龙。

△　军调部济南第七小组赴临沂。25日，与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会谈，政府代表文泽要求停止冲突，包括将明水、龙山、千里堡等地交还政府，陈表示上述地方暂不能交出。双方争执，未获协议。同日，该小组返回济南。

△　杜鲁门总统私人代表、处理远东赔偿委员会专员鲍莱由汉城飞抵南京，鲍莱对记者谈，决定在沈阳从速设立办事处，以便调查东北九省生产原料制品，协助远东工业复兴。25日，鲍莱与马歇尔及翁文灏、钱昌照、王云五、王世杰等会商后赴北平。26日飞沪。27日，鲍在沪对中外记者谈，“日本对中国之赔偿数目，应较任何国家为多”。同日，离沪飞往汉城。

5月25日　　政治和谈会议在南京重开。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雷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就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宣传休战诸问题进行商谈，双方均表示愿努力促和平早日实现。

△　马歇尔邀周恩来会谈东北局势，马表示希望立即停止冲突，并声称在接到蒋介石来信之前，除23日转达的蒋的三点建议外，没有谈判的基础。

△　蒋介石在沈阳接见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新一军军长孙立人，面允新一军休息三日，再去解鞍山、海城之围。

△　陈诚、白崇禧、顾祝同、李宗仁、张发奎上书蒋介石，主张

用武力“接收”整个东北。

△　东北行营发表，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尚传道兼代理长春市长、刘守刚为秘书长。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兼任长春警备司令，副军长舒适存、保安第二总队长刘德溥兼任警备副司令。

△　美国务院代表吉莱柏特抵沪，吉氏对记者谈，此来参加第四届远东粮食会议，并考察“联总”在远东之工作，以求补救之道。

5月26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阅得美方代表马歇尔所转的宋美龄在24日代写的蒋介石致马歇尔的函后，致函马，对蒋愿意停战恢复和平表示欢迎，要求实施3月27日三人会议通过的东北执行小组的三项任务。

△　马歇尔复函蒋介石，提议：一、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二、我劝你立即发出在24小时内停止国民政府军队前进和追击的命令并公开宣布这一命令，以促成和谈解决问题。如不能做到这两点，就将违反你最近向共产党提出的建议。

△　蒋介石在东北行营召集沈阳附近驻军营长以上军官542名训话，谕其努力安定社会，保护人民，协助建设。并特命行辕秘书处在各邮局设置信箱五处，从27日至29日止，接受人民直接向蒋本人投陈诉函件。

△　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经两昼夜之围攻，是日攻克鞍山，全歼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第五五一团，并击溃由辽阳增援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一部，控制沙河至海城之铁路。

△　国民政府发表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列举我国最迫切需要日本赔偿之设备及其数目，要求尽速拆迁我国。

5月27日　廖耀湘之新六军向长春以北推进，抵占九台。

△　国民政府令派桂永清为中华民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及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荣誉第二师师长戴坚从上海飞抵东京，与麦克阿瑟总部接洽中国占领军驻防地区事宜。

△　海军部就美国已决定将200余艘舰艇移交中国，英国亦拟赠中国各式舰艇事在上海成立舰队指挥部，陈诚任指挥官。

5月28日　宋美龄由沈阳致函马歇尔称：蒋介石对于周恩来26日所说“原则上”同意履行三项协定感到恼怒，蒋认为如果你和政府立场坚决，共产党就会让步。万一共产党不让步，剩下的惟一办法是占领东北各战略中心，这样共产党就将被迫履行协定。

△　蒋介石由沈阳复函马歇尔称：基本同意马26日的建议，为实现该建议，必须补充以下条件：一、发出停战令前，马歇尔必须取得中共的保证，即军队整编方案立即实施，并首先在东北实行。军调部前进指挥所于发出停战令之日设立。二、政府不能放弃接收东北任何地区的权利。三、必须给予美国代表以关于修复铁路与其他交通以及完成该工作时限的决定权。四、同意美国代表的决定权限于特定事务，但修复铁路及其他交通的行政事务应包括在内。五、希望马歇尔对所参与的一切协定的实施规定时限，并负责监督中共方面严格遵循。

△　廖耀湘之新六军主力附第八十八师进占吉林省城永吉及盘石，中共军向永吉东北面退走。新一军第五十师进占德惠。同日，杜聿明以该部进占永吉、迫近松花江岸与中共军对岸向蒋介石报捷，蒋以拉法为永吉以东铁路公路之交叉点，令杜派一个团渡江攻占。

△　国民党中委张道藩、郑彦棻、谷正鼎由京飞抵沈阳。同日，留北平之黑龙江省府主席韩俊杰、兴安省府主席吴焕章、吉林省府主席郑道儒、合江省府主席吴翰涛、东北行营政治委员邹作华飞抵沈

阳，着手东北接收工作。

△　宋子文、俞大维先后访马歇尔，就蒋介石、宋美龄信件内容进行商谈。同日，徐永昌访马歇尔，商议在政府取得东北军事优势情况下如何恢复国共谈判。

△　民盟代表张君劢、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向中共代表周恩来、陆定一、齐燕铭表示，东北已无主权问题，应立即停战。

△　国民政府特派汤恩伯为首都卫戍司令。

5月29日　　马歇尔要求宋子文将下列电文转达蒋介石："国民政府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与你经由蒋夫人5月24日信中所提条件全不相符，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

△　蒋介石出席沈阳各界民众欢迎大会并致训词，谓应勿忘过去之痛苦教训，"人人习勤劳，尚节俭，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大家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军民同心一德，埋头苦干"，保卫领土，建设东北。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举行中外记者会，就国共和谈问题答记者，谓政府曾同意若干协定，该类协定均有三点规定：一、停止冲突；二、恢复交通；三、整编国军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此三点为政府方面基于和谈之方针。

△　民盟张君劢等五政协代表在京电沈阳蒋介石："长春既定，局势应趋好转。同人愿本我公爱好和平之初衷，从事于消弭战祸之工作，因于28日相偕来京，矢心奔走。深盼钧座公毕早日言旋。"

△　民盟政协代表黄炎培向王世杰提出调停国共东北冲突新方案：中共退出哈尔滨，政府不再进兵，一切协商解决。

△　北平市政府奉国民党中央电令，派警察局非法将北平《解放报》、新华通讯社北平分社查封，同时被查封的尚有其他报刊、通讯社75家。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改组皖、苏两省党部案：皖、苏两省党部主任委员，原分由各该省主席李品仙、王懋功兼任，现免去李、王各兼职，以刘真如任皖省党部主任委员，以汪宝瑄任苏省党部主任委员。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重庆行营辖区为川、康、滇、黔四省，西藏全部及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地带。

△　中共中央军委对各军区发出指示："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各战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

△　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和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为消弭工潮，共同在上海工会理监事及工人团体代表会上宣布：依中央政策，现制定惩处怠工罢工办法五项，违者依法严办。

5月30日　蒋介石偕白崇禧由沈阳飞抵长春，在长春接见当地士绅，发表讲话，谓："盼望东北同胞努力协助政府恢复地方秩序，加紧复兴工商业，使东北迅速成为富强康乐之地。"同日，蒋、白由长春飞往北平。宋美龄由沈阳径飞北平。

△　马歇尔邀周恩来就蒋介石28日致马信所提问题会谈。周指出，蒋计划把战争进行下去，特别是在东北，直到攻占完大城市及占领铁路线为止，才会考虑重新谈判。马表示，谈判能否成功，必须同蒋本人讨论。并强调"倘若没有达成妥协的相当可靠的基础，我就不作一个调解人重新参加谈判"。

△　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攻占海城、大石桥、营口。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率第五五二团、第五七二团于

海城举行反内战起义，并参加东北民主联军。

△　新六军第二〇七师第一八一团进占桦甸县黑石镇，新一军一部进占农安，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进占小丰满发电厂及松花江北岸桥头堡。

△　罗隆基在京对合众社记者谈，谓："美国对国民党军队之支援，仅足以拖长内战，增加中国法西斯主义之威胁。""美国苟一旦中止援助，政府立即无法继续战争。"

△　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黄炎培等六人在京聚商调停东北问题，拟劝中共放弃哈尔滨。同日，王世杰、邵力子等访民盟代表，交换对时局之意见。

△　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从河内返国，行前接见中央社记者，谈称，越北接受日本投降工作已完竣，所部于6月10日前全部撤回国内。次日，卢抵昆明。

5月31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革中央军事机构，"所有原设之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以及行政院之军政部，着即裁撤，改于行政院设立国防部，俾臻完善，而专责成。除颁布国防部组织纲要，先行成立外，其有关改制事项，并着行政、立法两院迅即分别办理"。

△　国民政府特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免顾祝同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本职，特任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特任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特任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特任黄镇球为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特任薛岳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　国民政府公布《国防部组织纲要》，凡12条。

△　陆军总司令部举行结束典礼，何应钦通电，自6月1日起，解除其本人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

△　马歇尔电蒋介石重申：“在政府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的情况下，我的调解工作不仅日益困难，而且即将达到这样的地步，我的正直诚实的地位要成为严重的疑问了。因此我再一次清求你立即发布停止政府军队前进、攻击或追击的命令，并准许军调部前进指挥所立刻出发到长春去。”

△　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在北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着重指出：北平《解放报》、新华通讯社北平分社和其他75家报刊、通讯社被查封，是第二次“七七事变”，表示中国民主的危机十分严重，国民党内反动派摧残舆论的暴行，是其扩大内战阴谋的一部分。

△　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沪对记者谈时局，略谓当前大局关键在于政府对中长路沿线之接收，东北问题告一段落后，和谈当可恢复。中共军应改编为国军，不能另划驻防地区。

△　下午3时半，蒋介石在北平召见军调部政府方面参谋长蔡文治中将，对军调部工作询问极详。5时，听取北平市长熊斌报告，饬熊应特别注意公共卫生，希望每一市民均能遵照新生活运动之原则实行整齐清洁之生活。

△　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在南京高等法院被判处死刑。

是月　第六十军暂编为第二十一师、第一八二师、第一八四师，全部由美国军舰运抵东北。

6月

6月1日　蒋介石在北平复电马歇尔称：“倘若我不能立即发布停止政府军队前进的命令，我准备同意你提出的派遣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到长春去以便进行初步工作的建议。”

△　马歇尔在京邀罗隆基会谈，提出东北调停方案，主要内容为：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由美方代表最后决定，并要罗劝中共代表接受此方案。下午，罗访中共代表团，转述马歇尔方案，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

△　国防部正式成立。2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京对记者谈该部之任务：一、使军政密切联系，政略战略协调；二、使陆海空军、军政、军令一元化。该部当前主要任务为：一、确立国防计划；二、发展国防工业；三、建立现代化之国防军；四、发展科学，研究国防科学。

△　东北行营奉蒋介石电谕，吉林省府主席郑道儒未到任前，暂派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代理。

△　新六军第二〇七师第一八一团进占桦甸县黑石镇，是日被东北民主联军吉辽部队包围歼灭。

△　上海常熟区开始实行“警员警管区制”。此后，南京、重庆、天津、开封、南通等地也次第实行。

△　美国政府所派总统赔偿问题专员鲍莱调查团之先遣人员抵达沈阳，该团由地质、钢铁、矿务、人造汽油及化学、纺织、机械、电力等方面专家八人组成，主要调查苏联在东北拆去工矿机件数值。16日，鲍莱由汉口抵沈阳，巡视沈阳铁西区，17日，巡视抚顺煤矿及附属工厂，18日，巡视鞍山，19日，巡视锦州、葫芦岛，20日，离沈阳返美。

6月2日　　蒋介石在北平党政军扩大总理纪念周上训勉各界，应根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心理，对一切事必须自动负责。并指出华北过去之混乱在于事权不能统一，今后由北平行营负全责，一切应听从行营主任李宗仁之指导。

△　立法院院长孙科在沪对记者谓，“警管区制”立法院未通过，本人更不知有其事，当然是不合法的。如果内政部或警察局擅自实行，则人民可向行政院控告。

△　天主教中国枢机主教田耕莘抵沪，在徐家汇天主堂主持大弥撒，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襄礼，南京教区于斌主教、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海门教区朱主教均参加。到上海教区公教进行会等100余单位教友5000余人，盛况空前。

△　最高法院复判陈公博、褚民谊死刑，陈璧君无期徒刑，移送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厦门第一号汉奸伪厦门市长李思贤，被高一分院宣判死刑。

6月3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北京经济南返南京。在济停留四小时，向驻济中上级军官训话后，分别召见师以上长官。

△　蒋介石向南京各界举行的禁烟纪念会颁布训词，谓政府决心在最短期间禁绝烟毒。“凡属接收区域，在政府权力充分到达后六个月内，必须完全禁绝”。

△　陈诚在国府纪念周作军事报告，略谓国军现有步兵89个军，239个师（青年军三个军、八个师在内，共军三个师除外），骑兵二个军，13个师，应于本年3月起至明年2月底止，整编为步兵30个军（共90个师）及骑兵10个旅，编余官兵分别退伍或转业。首先各军均裁减三分之一，然后照三人小组签订的整军方案实施。关于华北方面，共编七个军，在本年9月之前，先编成一个军，俾与中共军统编为集团军，其他六个军稍后编成，并指定其中三个军与中共军统编为集团军。

△　美方代表马歇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周批评了美国的两面政策，一面表示要赞助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一面仍帮助国民党运兵到华北、东北打内战。并说国民党用各种方法欺骗美国，把美国推到

与中共对立的立场上。马表示愿意等蒋介石从沈阳回来后，面商停战。

△　全国青年远征军除第二〇七师士兵自请延长服役外，自6月起开始退伍。是日晚，蒋介石对该军各师士兵致广播训词，要求退役士兵珍惜这一年多的军营生活经历，继续保持守秩序、守纪律的作风，才能在事业上成功。并称自己“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仅因为24岁时在日本野炮联队入伍一年，受到严格训练。如果没有那一年的当兵经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业。

△　民盟政协代表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积极进行和平调解活动。上午访青年党中常委李璜。下午访国民党政协代表张群。晚上访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再次表示拒绝马歇尔1日所提方案。

△　八路军冀东部队攻占伪军据点香河县安平镇。

△　上海市总工会召集各界工会代表讨论民族工业危机问题，理事长朱学范指出，民族工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外货倾销，官僚资本垄断，政局不稳，工潮起伏所至。建议劳资双方须通力合作，合作办厂，减少工资，充实资本。

△　代理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陈公博在苏州被枪决。

△　中共刊物《群众》从重庆迁往上海出版，并由半月刊改为周刊。

6月4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蒋提出关于国共和谈的建议：同意派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去长春，命令在东北的政府军停止军事行动10天。并就下列各点与共产党完成谈判：“一、制定在东北停止敌对行动的详细办法；二、制定于一定期限内完全恢复华北交通的明确办

法；三、确立立即实行军队整编方案的基础。”同时强调：这是他同共产党打交道的最后努力，否则，他宁愿进行全力以赴的战争。

△　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关于和谈的建议，周表示接受蒋的建议，但10天的停战期限太短，谈判内容复杂，需返延安请示，要求将休战期限延长为一个月。

△　马歇尔电北平军调部三方委员，谓已与蒋介石商妥，成立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令军调部先作准备事宜。

△　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译雅加达）西面坦其隆华侨聚区惨遭当地恐怖分子劫掠和焚烧，数千华侨被杀害。7日，外交部长王世杰电令驻巴达维亚总领事蒋家栋向印荷当局严重交涉抗议，要求严惩凶手，抚恤伤亡，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6月5日　　马歇尔向蒋介石转述中共方面对休战之意见，请将休战期限予以延长。经马说服，蒋同意休战15天。同日，马歇尔会见周恩来，就国共双方宣布休战15天达成协议。

△　马歇尔总部宣布：三人小组已下令设立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准备实施为了停止冲突可能达成的任何协定”，令军调部派先遣小组前往长春，进行商讨获致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白鲁德将军为该指挥所美方高级代表，白鲁德在军调部的执行组主任的职务由廷伯曼暂行代理。

△　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例会，通过宋子文关于暂时开放内河航行，以一年为限，准许外轮在南京、汉口、芜湖、九江四口岸停靠的提议。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美国应立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的社论，指出：“美国应当停止并收回对于国民党政府内战与独裁政策的任何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只有这样，马歇尔将军关于停止中

国内战的努力才不致成为一种徒然的装饰。”

△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反内战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要求国共两方立即停战，立即恢复政治协商，将东北问题一并解决。

△　新一军第五十师沿中长路北渡松花江，进占陶赖昭。第三十师、第三十八师进占海城、大石桥。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进占双山。

△　国民政府派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主办救济苏北难民事宜。

△　国民政府令：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着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淞沪警备总司令李及兰免本职，派宣铁吾兼淞沪警备司令。

△　国民政府令：《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之施行日期，自1946年3月3日起，延长一年；《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即废止。

△　广州市党、政、军、警、特机关奉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是日大举没收刊物、书籍多种，捣毁书店多处，兄弟图书公司、广州书报社、《华商报》等被捣尤重，30余种刊物被勒令停刊。

△　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讲话，略谓：“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极望看见尽快出现一个稳定、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并谓为达此目的，“完全依赖于国共两党争端的解决”。

△　驻华法国海外部队第一批（越南兵）离天津回国。9日，第二批及工部局职员离北平、天津回国。按：法军驻华始自1857年英法联军之役，依据二次大战后的中法新约，法国放弃在华军队驻屯权和领事裁判权。

6月6日　　蒋介石向新闻界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余刻已对我

在东北各军下令，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下列各点必须在十五日内获得完满之解决：一、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二、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三、获得一确切之基础，迅即实施1946年2月25日有关于全国军队复员、整编、统编之协定。”

△　中共代表陆定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周恩来关于东北停战的公报，表明中共是主张无条件停战和真正停止内战的，由于中共的坚持，现在蒋介石下令在东北停止进攻15天，进行谈判。希望国民党方面能有诚意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

△　美方代表马歇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周对蒋介石所提凡是苏军驻过、现在是中共军队占领的地方，都必须退出来才能停战的要求，表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东北问题的关键。

△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会见北平执行部交通处美方代表希尔上校时，特别说明恢复交通，不仅是铁路、水路、邮政，同时要拆除碉堡工事。

△　蒋介石致马歇尔函称：“关于阁下和共产党代表建议派遣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赴东北的事，可以派遣它到长春去从事工作，但当然是直到具体措施获得解决时才开始工作。”

△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总部执行处主任白鲁德少将率随员由北平飞抵长春，并正式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准备执行停战令。

△　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派一个加强团抢占永吉以东之交通要点拉法（属蛟河县）。

△　财政部、粮食部在京召开实施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会议，财政

部长俞鸿钧称，政府将继续推行征实。政府于胜利后所定豁免田赋一年办法，今改为三年分期豁免，每年免征三分之一。

△ “伊宁事件”最后协议在迪化签字，张治中下令释放全新疆的政治犯。

△ 朱德电贺在海城起义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全体官兵。

6月7日 周恩来从南京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休战谈判问题，陆定一同行。中央中共决定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

△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沈阳对中外记者宣布：东北各军自7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现国军追击到达之要点，北自辽源亘双山县、农安县至中长路松花江北岸陶赖昭附近；东至亘拉法、桦甸、海龙、梅河口、清源各附近；南至温泉寺、连山关、析木城、大石桥南十五公里各附近；西面仍在热境平泉南北附近守备”。“国军预计于十五日后继续接收之主要区域为：大连市、安东、嫩江、合江、黑龙江与兴安诸省”。中共军必须集中退往不妨害国军接收之区域内。

△ 黄炎培、罗隆基、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莫德惠、李璜、曾琦、陈天启等举行会谈，讨论促国共双方重视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一切的办法。

△ “联总”远东区委员会在南京开会，中、美、苏、英、法、印度、荷兰、菲律宾、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出席。9日闭会。会议决定设立一特别小组，为“联总”关于中国分配政策之实行机构，由中、美、英三国代表组成。

△ 整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七旅攻占苏皖解放区之来安。9日，该旅从来安、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八旅从六合、整编第二十五师第一

〇八旅从仪征同时向淮南路东解放区进攻。

△　国民政府特派何应钦为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

△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收到蒋介石函称：在6月15日至21日停战期间，“即在东北，国军有行动自由，及政府在东北接收政权，不受阻碍。若共军再有攻击之举，即予反击。共军恐难就范，故须准备进攻。”

△　世界航业会议在美国西雅图揭幕，中国代表包华国发表演说，为中国海员争取平等待遇。

6月8日　　新四军山东部队与八路军晋冀鲁豫部队同时在胶济线、津浦线发动攻势，占领张店、周村。9日攻占胶县。10日攻占津浦路之德州、泰安、枣庄。共解除1500多名伪军武装。12日，新四军军部暨山东军区发言人就此事发表声明：军调部迭次命令解散伪军，但无奈国民党方面让伪军充作内战先锋，以致数月来伪军活动猖獗，攻击我军，残害和平居民，我军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

△　黄炎培、罗隆基等访马歇尔，提出休战谈判之建议：一、希望休战期限延长；二、军事与政治商谈应配合进行，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马表示，对第二点主张不反对，但这不在他的权限之内。

△　立法院例会，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及有关部（署）长列席。各立法委员以国民经济已临崩溃前夕，纷纷提出质询，财政部长俞鸿钧答称：国家预算无法控制，军费依然以紧急命令支出，1月至5月国家支出1．5万亿元（法币），而财政收入仅2500亿元。粮食部长徐堪承认，因征购军粮而造成粮价高涨并发生种种弊端，国家免赋，人民未受实惠，其所受痛苦则远在征实之上。

△　蒋介石在财政收支系统会议上致词，谓这次会议决定田赋征

实延长一年，此举对完成复员工作十分必要。并强调丈量土地、调查户口、登记财产三事，是建国的基本工作，一定要努力完成。

△　经济部长王云五在立法院报告接收敌伪资产情况称：据最近统计，除东北及台湾情形特殊外，一、苏浙皖区出售收入为2500亿元，华北区出售收入145亿元，现金证券收入35亿元，华南区出售收入76亿元，湘鄂赣区出售收入70亿元，共收入3726亿元。二、本年可能收入者，苏浙皖区2500亿元，华北区300亿元，华南区100亿元，湘鄂赣区30亿元，共2930亿元。

△　国民政府就印度尼西亚恐怖分子在荷兰军占领坦其镇后，对我华侨生命财产所施行的种种残害暴行，饬外交部电令驻荷大使董霖，向荷兰政府提出严重交涉。外交部长王世杰所发电文中称，“查此次事件发生系在印尼军撤退，荷军占领之际，荷军应有力量及机会保护华侨之安全”，“仰迅向荷政府提出惩凶、抚恤暨保留我方要求损失赔偿之权，并要求荷政府立即采取有效之措施以防止此类事件之续发”。下午3时半，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情报司司长何凤山报告对事件处置的经过。

△　上海文化界、实业界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人致函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并附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于6月11日复函马叙伦等，表明中共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之职志，进行谈判，永息戎争，“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

△　外交部长王世杰、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南京互换批准法国关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暨中法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

6月9日　　周恩来从延安返抵南京，中共中央委员李敏然（立三）同行。

△　白鲁德按照马歇尔的要求，向三人小组和军调部呈送一份长

春前进指挥所和东北执行小组的工作计划草案，提出在东北初步使用八个执行小组，并立即把这些小组的美方成员派至指定地点，为迎接小组的中国成员作准备。

△　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二师攻占法库。

6月10日　俞大维邀周恩来会谈恢复交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凡交通线两侧的碉堡均拆除；二、津浦路山东境内线路归中共管理；三、中共在东北控制的铁路，政府应承认其管理权；四、政府不得用中长路作军运，双方军队撤离中长路两侧20公里或30公里以外；五、东北若干铁路以及平汉、平绥两路若干站负责人，政府应委派中共人士担任。政府方面亦提出五项对案：一、无条件恢复交通；二、如地方治安无虞，碉堡可考虑拆除，但复员计划未贯彻前，暂缓拆；三、先行抢修平汉、津浦、陇海、北宁四路；四、同意双方军队从中长路两侧撤退20或30公里；五、政府改组后，中共即行参加政府，此时不必特别指定某段铁路由中共人士管理。

△　中共代表周恩来专访美方代表马歇尔，说明中共的方针是要争取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正在开军事、财政、粮食会议，准备15天后大打，内战危险日益严重，将迫使中共不能不抵抗。

△　马歇尔致徐永昌备忘录，建议由长春前进指挥所直接领导已在东北的四个执行小组，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严格遵守3月27日的协定。11日，马歇尔会见徐永昌，讨论10日备忘录事，徐再三强调，蒋介石不愿前进指挥所在休战15天内有所活动。

△　实施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会议通过财政部所提关于调整1946年下半年度各省（市）县（市）财政收支案及对省县机构紧缩之建议案。同日，该会闭幕。

△　新疆释放的政治犯131人首途离新回延安，西北行营派专车八辆护送。按：该批政治犯系1940年至1943年间在新疆被盛世才捕押

的共产党人，曾一度在新疆负重要责任。

△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国府纪念周报告最近财政主要措施：改革税制，增加税收，运用黄金外汇稳定币值，收缩通货及储金银行制度促进生产，以达财政收支平衡。

△　瑞士首任驻华公使陶伦德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应东京远东国际法庭要求，中国选定南京大屠杀目击者许传音、尚德义、陈福宝、伍长德及前金陵大学校长贝士博士为证人赴东京作证，是日离沪飞往东京。

△　东北民主联军第一、二师夺回6日被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加强团攻占的拉法，并将该团全歼。

△　美国《时代》杂志是日以《坏政府》一文，表示对国民政府失望和反感。指出：国民党现在已有足够的武力可以保障自己的存在，但他不能永远压住四亿不快乐的人民。中国政治不搞好，共产党的革命是没有办法可以停止下来的。

6月11日　蒋介石电杜聿明，饬其遵守停战命令，停止前进，以待15天之休战期限。

△　徐永昌向马歇尔递交“真正实行《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补充办法草案”，提出允许中共在东北驻军由一个师增加为三个师，但原驻华中之一个军应即取消，强调中共军在关内外均须驻于偏僻、边远之地区。

△　徐永昌与周恩来会谈，首次就休战谈判交换意见。

△　中共代表邓颖超在京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指责政府阻挠她出席本月27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　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函复7日上海各界人士来信，谓来信已转陈毛泽东，在15天休战谈判中，“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

△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应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之邀，离京飞沪转日，为审讯日战犯作证。秦行前与记者通话，告以此行乃因七七事变发生时，适任北平市市长，兼廿九军副军长，军长宋哲元已赴山东，整个政治、军事、外交问题之折冲均由其一人负责，对于敌人侵略阴谋洞悉无遗，对于当时侵略之敌寇首脑亦甚熟知。

△　杭州14所大、中、职业学校组成学生联合会，发表响应罢工、罢教、反对开放内河航权、反对内战的宣言，并决定自12日起总罢课三天。

6月12日　马歇尔与周恩来讨论当前国共军事冲突，并就恢复交通、停战问题交换意见。同日，军调部交通组主席希尔上校与周恩来商谈恢复交通之具体问题。周恩来声明中共军队绝不攻济南、青岛，除非国民党军要消灭我第五师。会上商定派参谋飞青岛调查。当日，中共南京局军事组参谋郝汀和美方柯克上校飞青岛，调处胶东半岛战事。

△　中共代表周恩来连续两日会见美方代表白鲁德，希望白尽快到长春，并欢迎他到哈尔滨，可由王首道、李立三陪同。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为尽快实施二中全会各决议案，实行督导办法，推李文范、吴铁城、梁寒操等九人为督导委员；二、中央训练团改隶行政院，训练团原教育长陈诚免职，由薛岳继任。

△　白鲁德奉马歇尔电召由北平抵京（白于10日由长春返平），向马报告东北冲突详情，研究东北调处方案。

△　彭学沛在京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称目前时局严重，“共军必须撤退其在6月7日以后所占之城市，并迅速恢复其所破坏的交通线，方能除去谈判之极大障碍”。为保证一切协定能迅速实施，“政府坚持美方代表必须有仲裁之权力”，“共党在周恩来将军从延安返京后，仍拒绝这种建议”。

△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因青岛形势紧张，由沪赴京，与马歇尔会商后，携蒋介石给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之手令，由京赴青，与丁治磐、驻青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克莱门少将研究防务。同日，青岛警备司令部宣布水陆戒严。克莱门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决与中国军事机关合作，于戒严期内实行联防。”13日，柯克由青返京。

△　管理东北经济委员会呈文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请转呈国民党中央，内称：“查目前东北每月支出之数，计军费20．65亿元，政费11．41亿元，共32．06亿元。”“若继续增发东北流通券，势必变成第二法币。”

△　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驻华英大使，请转告东南亚洲最高司令，申明爪哇华侨被杀害近3000人，要求其采取紧急措施，保护荷属东印度华侨之生命财产安全。

△　南京《中央日报》报道，国际劳工组织航运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开会时，中国代表要求对世界船舶的吨位应作合理分配。中国雇主代表卢作孚为中国发言称：在过去十年内，中国之需要与中国之地位全被忽视，中国本有船只15.7万公吨，现在只剩10万吨，大多数为内河轮船，中国有权公平支配日本船舶，中国将建设内河运输。

6月13日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电沈阳执行小组转北平军调部，略谓自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仍继续向民主联军进攻，民主联军除被迫自卫外，并“向国、美双方保证，如国军不继续向我军进攻，我军决不向国军攻击”。同时向执行部报告，此时，“政府军队仍

在法库及海城、本溪地区向我军进攻”。

△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将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援助的法案提交参议院讨论。14日，将该法案提交众议院讨论。贝尔纳斯在附函中强调：对华援助极为重要，中国曾请求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至华，此准许对华实施军事援助的法案，系由陆、海军及国务院联合拟定。

△　白鲁德在京与周恩来商谈停止东北冲突问题。同日，白鲁德与马歇尔商拟东北调处方案。

△　梁漱溟访周恩来，了解当前谈判情况。14日，梁离京赴沪。

△　杭州市学生举行反内战大游行，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向学生演讲，痛斥政府贪污、内战，并亲自带领4000多名学生冒大雨示威游行。

6月14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就目前时局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国民党军待援仍再谋大战，接收主权只是内战借口，自停战令下后，国民党军非法调动军队130多万人，进攻解放区已达3675次，在冀南等地修筑碉堡2104座，鄂北地区修筑碉堡6000座以上，阎锡山留用日军7000名，各地顽军频频骚扰，苏北形势日益紧张。重申中共不放弃任何一线和平希望，警告反动派玩火必自焚。

△　美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一项军事援华法案。同日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以保证向国民政府充分供应军火和器材。

△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军队整编问题，周重申中共希望在东北驻五个师，分驻于五个大城市。关于军队重新分布，有四个因素须加考虑：一、军队的数目；二、分布的地区；三、运输条件；四、供应条件。马歇尔表示，相信政府会接受国共两党在东北军队的比例为

5：1，代替原整编方案规定的14：1的比例。周还指出，蒋介石6日的声明是一篇最后通牒，15天停战是临时的，是在争时间准备更多的冲突。希望白鲁德尽快去长春，并欢迎他到哈尔滨。

△　八路军太原军区部队攻占山西闻喜县城。同日，八路军另一部攻占绛县县城。

△　美国赔偿代表团团长鲍莱偕代表团一行35人抵沈阳，代表杜鲁门总统在中国东北从事赔偿调查。

△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执行租借法案的二十二次报告》中披露：日本投降后，美国对各国都已停止租借，但仍继续援助中国军队，为空运华军赴中国各处，美国已用去三亿美元，并由美军供应品中借给华军价值6800万美元的车辆及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火。胜利日后给中国的援助等于胜利日以前向中国租借物资总量的两倍。自1945年12月31日迄今，美国向中国租借物资价值13．35632亿美元。并重申，美国不愿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

6月15日　马歇尔向国共双方提出《结束东北之战事》之建议，略谓：双方紧密接触或正在战斗中的部队应立即停战，各自后撤，受当地执行小组指导，6月7日正午存在的当地局势为调整的基础，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应以前进指挥所美方高级军官之决定为依归，政府不再增兵东北，但整军方案所允许的额定补充，则例外。

△　北平军调处交通处中共代表黄逸峰到南京，与美方代表希尔会谈恢复交通问题。

△　军事三人小组签署批准白鲁德9日呈送的关于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及东北执行小组的工作计划，并指示军调部迅即实行。训令指出：在东北的执行小组按照3月27日之协议进行工作。

△　国防部发言人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谬称中共军不遵协议，违

反停止冲突之命令，扩编部队，袭击国军。

△　政协综合小组主席孙科宴请中共政协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以及国民党政协代表吴铁城、张厉生、邵力子、王世杰、雷震，席间，双方对谈判中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　军调部沈阳中心小组中共方面组长李敏然（立三）、代表王首道访马歇尔、白鲁德，商谈长春前进指挥所之组织与东北停战的具体问题。

△　《益世报》上海版出版。该报除上海版外，原已在天津、北平、重庆、西安四地出版。

6月16日　周恩来、俞大维和军调部交通组主席希尔上校就恢复交通问题达成协议：国共双方各自就控制区内尽速先行修复津浦、胶济、陇海三条铁路；碉堡可以拆除；中共区内铁路管理可由中共推荐人员负责，国际铁路中共可派代表若干人参加管理；双方均不得用铁路运兵；中共区内路警由中共自行训练。

△　马歇尔与蒋介石商讨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同日，马歇尔根据蒋介石意见，拟成《修正东北驻军提案附带中央政府关于华北驻军之规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共须将部队于9月1日前，自热河及察哈尔两省完全撤出；政府须自由派一个军占领烟台及威海卫，将青岛兵力增至一个军，以便接管美国海军之防务；6月7日正午后中共军在山东强行占领的大小城镇须于7月1日前撤出各该城镇30华里以外；政府于9月1日起派一个军驻防天津，接替美国海军陆战队。

△　立法院院长孙科邀宴在京的青年党、民盟等政协代表。席间，梁漱溟代表中间人士提出三点建议：一、15日休战应谋得永久和平；二、国共双方均在备战，中间人士无从制止，吁请双方克制，缓和局势；三、双方敌意之宣传应立即彻底停止。

△　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美方代表白鲁德、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李敏然（立三）、王首道由京赴北平。18日，经沈阳抵长春。

△　午12时15分，美国赔偿专员鲍莱在沈阳铁路宾馆招待中外记者，称："在各盟国内，中国应获得较多之赔偿，因为最有要求赔偿权利者为中国。"

△　八路军胶东部队攻占即墨县城。

△　《东南日报》上海版出版，该报董事长陈果夫为此宴请上海各界著名人士。

6月17日　蒋介石提出恢复交通方案：一、铁路线三公里外的碉堡可以拆除，保护车站，桥梁、仓库、隧道者不拆；二、中共区内铁路管理人员，中共可以推荐，但需经政府考训，合格者方能录用；国际铁路中共不能参加管理；三、护路警察由政府统一派遣，每公里驻五人；四、中共区铁路不许运兵，其他铁路不受限制。

△　徐永昌致马歇尔备忘录，提出东北整军方案：一、东北国军与共军比例可改为5：1；二、共军须驻在齐齐哈尔、海拉尔、延吉三地，其军管区指定为兴安省、合江省、黑龙江省；三、共军须立即退出安东、敦化、牡丹江、洮南、哈尔滨等地及各铁路线。

△　马歇尔邀周恩来会谈整军方案，马表示最大的困难是不明确中共的条件和建议。周答：中共没有提出建议，是因为愿意作出让步。同日，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后，向周恩来提交一份备忘录，并附国民政府关于在停战期间达成协议的主要文件三份：一、政府关于东北驻军的重新分布及华北驻军的规定；二、东北驻军附加条款；三、关于恢复交通的方案。

△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讲演国内政局，宣称政府始终采取政治

解决之方针，然中共一面拖延，一面破坏国家和平统一，现停战期限仅有数日，希望在此期间能决定具体办法，以获圆满结果。

△　徐永昌致周恩来备忘录，提议国共双方谈判争执之问题，将最后仲裁权赋予马歇尔。

△　美国国务院宣布：中美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中国长期偿付所有租借物资之协定，即中国将对日战争结束后订购或启运的军备租借法项下物资5890万美元，自1947年7月1日起，分30年偿还美国。

△　英国人白礼查继丁贵堂任江海关税务司。19日，宋子文在京答记者称，“一切关务行政仍然操于我手，不过利用外人富有经验之技术”。

6月18日　马歇尔在京与徐永昌、俞大维会谈时，提出：蒋介石关于和谈对中共所提的条件太苛刻，是否可以撤回。俞说蒋在军队重新分布方案中，愿予中共较富饶的地区，并以据蒋意绘制的地图出示。同时说明，如果中共同意这一建议，就完全处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了。马表示，中共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

△　马歇尔邀周恩来会谈17日备忘录所附三文件，周表示，关于华北方面的条款，除了在山东省恢复6月7日以前状况的那部分外，他不能考虑这项建议。关于东北附加条款，要中共让出许多地方给政府军，这不能接受。并建议，共军驻扎在其当时已控制的地区，在若干地区不配置军队驻防，政府军不应这时进入处于中共军控制的地区。关于恢复交通，中共已作出让步，现在政府方面试图迫使中共作出远远超过1、2月份协定的让步，对于争论的政治问题却不给予保证。

△　国民政府代表徐永昌、俞大维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整军方案，在周拒绝了政府方面所提中共部队在关内分驻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热察五个地区的要求后，再次提出承认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周愤怒指出，这是丧失国权的办法。

△　青年党、民盟及社会贤达代表张君劢、罗隆基等12人请中共代表报告谈判情况，董必武说明谈判因蒋介石提出使中共无法接受的方案而陷于僵局。同日，诸代表又访政府代表，交换和谈意见。

△　青年党宣传部长左舜生在京对记者谈：在当前国共商谈争议中，罗隆基言论有第三者立场，左袒中共。同日，罗隆基亦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指出：左舜生抨击他“亲共”，国民党正在利用左氏言论分化民盟。

△　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对新华社记者谈：目前华中形势十分严重，由于国民党军在淮南、淮北、苏中、苏北各地区27个师的兵力，已经开始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　在海城起义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官兵及在东北各地携械投奔民主联军之国民党军官兵，整编为民主同盟军第一军，下辖新一师和第一八四师，由潘朔端任军长，郑祖志任副军长。同日，潘、郑通电全国，表示誓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　中国驻英国军事代表团正式结束，该团团长桂永清在伦敦举行告别宴会。

△　南京大屠杀美籍见证人，前上海密勒士评论报发行人兼主笔、曾任南京鼓楼医院内外科医生鲍威尔，耶鲁大学圣公会牧师麦克基，把日军暴行摄下电影的魏尔逊，三人到东京出席远东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作证。

6月19日　　国民政府致北平军调部备忘录称：“今为自卫之绝对需要，不得已已将第五十四军等运送青岛，第七十三军等运送济南。”共军须立即履行停战协定，退出停战令下达后所攻占之城市，“否则共军应负破坏和平及因此而发生的一切不幸之责”。

△　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司徒雷登。周对司氏所提先从改组政府、制定宪法、打击贪污等着手和由美国分开装备训练国共两军的意见表示同意。并请其转告马歇尔，蒋介石先停战才好再谈判，中共愿意和平，但解决问题必须双方让步。

△　第三方面人士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曾琦等积极活动，以求转圜和谈僵局之办法，议定：一、希望政府下令延长停战谈判期限；二、希望中共赞同马歇尔仲裁权；三、分派代表向国共双方转圜。

△　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访周恩来，劝其对美方仲裁办法让步，周答，须向延安请示。

△　上海市72所大、中学校学生召开争取和平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反对内战宣言。

△　重庆各界人士4270人联名向蒋介石、毛泽东发出通电，呼吁全面停止内战，协商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　国民政府特任徐永昌为陆军大学校长；任命包尔汉（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代）为兼新疆省政府副主席。

△　马歇尔电美国国务院，对杜鲁门总统所提对华继续进行军事援助，并协助中国陆军现代化之议案表示赞同。

6月20日　周恩来向马歇尔说明中共对当前谈判之基本态度，强调指出，对政府建议美方代表有最后决定权之方案表示拒绝，每一问题，须各方面共同协商。并向马歇尔递交一份声明书，略谓："关内及东北战事均应停止，而不受时间限制，以待重新调整；国共争执，如需盟国调停，应以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声明及1945年12月26日莫斯科三国会议公报所定原则为依据。"

△　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美方代表马歇尔，说明蒋介石要中共军

队分驻几个地区，是要中共军队退出城市和铁路线，以便消灭，这不能接受。现在情况紧迫，内战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建议东北全面停战，关内重申停止冲突。

△　中共代表周恩来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说明中共主张，不分关内外，不受时间限制，停止一切冲突，静候调处；如果国共争端需要友邦调解的话，必须按去年12月15日杜鲁门声明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原则办理。

△　马歇尔与俞大维讨论国共和谈问题，马认为政府方面必须考虑以下各点：将关于热河、察哈尔和山东的条款删去，并将这些省份包括在军队重新分布的方案内；在第一阶段，政府方面只调一个军入华北；同意中共控制某些铁路；停战至少延长五天。并强调指出，美国不会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

△　彭学沛在京对记者谈，关于国共和谈中美国代表之公断权（仲裁权、最后决定权）之解释，“公断为中国名词，仲裁为日本译语”。“近代国际之争，常请海牙法庭公断，无损主权。有人译为最后决定权，亦殊不符”。“请各报注意，以后概用公断二字”。

△　第三方面人士在京邀请政府政协代表会商，交换对时局之主张，要求政府延长停战期限，继续和平，永绝内战，并托政府代表将该要求转告蒋介石。

△　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高涨。各界妇女三万人、经济界17团体分别上书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呼吁永远停止内战。影剧界著名人士104人致函美国同业，请其促使美国政府撤退驻华海陆空军。同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代表赴京请愿。

△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决定，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分作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北路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机关和第二纵队（缺第十五旅两个团），自广水与信阳间突破

国民党军在平汉路的封锁线西进。南路由王树声率领第一纵队（缺第一旅）从孝感、花园间突破平汉路封锁线西进。同时，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由皮定均率一纵第一旅向东佯攻，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东进大别山腹地，黄林率河南军区部队，罗厚福率江汉军区部队在平汉路西侧掩护突围，王海山率二纵第十五旅控制宜城襄河一线渡口，掩护南路部队。24日，各部奉令在根据地秘密集结，向突围方向运动。

△　美国杜鲁门总统赔偿问题专员鲍莱由沈阳飞赴东京，该调查团留下八名团员继续在东北调查。据鲍莱调查团估计，苏联红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的价值共8．58亿美元，而弥补转移、损坏和一般损失的全部重建费用将达20亿美元。

6月21日　　蒋介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休战期限延长15天，内称："为了再一次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个机会，以便对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军队整编与重新配置等问题获得圆满的解决，余已命令我军各司令官将余以前的停止前进、攻击和追击的命令的有效期限延长至1946年6月30日中午。"

△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周奉中共中央命令，提出四点新建议：一、由三人会议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命令双方部队严格遵守；二、由三人会议立即协商恢复全国交通之具体办法，首先恢复重要铁路；三、由三人会议定期商定全国及东北整军复员之具体补充办法，并立即实施；四、由政府经协商定期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迅速解决政府改组、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各项政治问题。同日，中共代表团将上述四点建议函告政府代表，如赞同即交三人会议及政协综合小组协议施行。

△　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对记者谈：中共对东北军事冲突，素主长期停战。今政府宣布延长停战期限至6月30日，"此虽与我们之主张相距甚远，但凡有一线和平希望，我们无不努力以赴"。只要政府军队严守命令，"我敢保证我方军队必坚守原防，以便双方在

马歇尔将军协助之下，求得长期停战，实现和平”。

△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七人致函蒋介石，指出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三人会议应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协商恢复全国交通的具体办法、商定整军复员及东北整军的具体补充办法等。

△　俞大维电话通知马歇尔，托马转告共产党，蒋介石延长停战令有两点附加要求：一、胶济路沿线的中共军必须于1946年8月1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的地区；二、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一致表决程序必须于1946年6月30日以前加以修订。

△　财政部长俞鸿钧向驻会参政员报告最近财政金融措施，称：“欲谋收支平衡，政府自然要积极整理税收，以期渡过当前的危机，即使加重人民负担，也不能不忍耐一时，原则上确是如此。”除税收外，处理接收之敌伪财产为国家收入，严谨运用黄金外汇，利用善后救济物资，向友邦洽借外债，以救稳定金融，收缩通货。

△　国民政府特任薛笃弼为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特派外交部政务次长甘乃光为庆贺菲律宾独立特使。

△　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在华从事教育事业垂50年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　教育部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处、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国立中等学校，对抗战阵亡将士女子就学，应予以优先录取，免费入学。

6月22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

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　军事三人小组举行自3月份停开以来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结束东北战事问题。周恩来建议起草关于执行小组和美国军官决定权的文件，以便既适用于东北，也适用于关内。徐永昌赞成，并提出恢复交通、在东北停止冲突、修改军队整编方案三问题须一并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协议须同时签字。

△　国民政府特派宋子文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兼副委员长；特派王云五、俞大维、周诒春、徐堪、俞鸿钧、朱家骅、谷正纲、蒋延黻、蒋梦麟、钱昌照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特派吴蕴初、陈受昌、郭顺、徐继庶、李铭为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特派翁文灏兼最高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　傅斯年、莫德惠等第三方面人士招待中共代表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并就和谈提出三点建议：一、一切谈判希均公开；二、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别协商；三、不赞成在整军中重划驻军区域，以免引起大争执。中共代表表示赞同。

△　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令各县县长，限10日内动员民伕，将下列公路抢修完毕：一、上海至苏州；二、上海至无锡；三、南京至镇江；四、无锡至镇江；五、口岸至泰县（今泰州）；六、扬州至泰县。

△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在青岛宣布，该舰队将无限期留驻中国境内，总部已由沪迁青，在青常驻舰40余艘。将扩大规模训练国民党海军。

6月23日　上海学生、工人及各业民众五万余人齐集北站，欢送赴京和平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阎宝航等10人，欢送大会通过四

项提案：一、组织上海各界和平促进联合会；二、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十代表请愿不成功，发动群众步行赴京请愿；四、电美国政府，请勿助长中国内战。11时，代表登车启程后，五万与会者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

△　上海和平请愿代表抵南京，在下关车站被200余名自称“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困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四代表被打伤。《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及民盟前往欢迎的代表叶笃义均被殴伤。

△　军事三人小组开会讨论恢复交通的建议草案，俞大维（代徐永昌）提出四点进行讨论：一、拆毁防御工事问题；二、在铁路管理中使用中共人员问题；三、中共希望政府不派铁路警察前往修复的线路问题；四、中共不仅希望恢复铁路交通，而且恢复一切交通问题。

△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　港、粤各界著名人士何香凝、徐傅霖、彭泽民、蔡廷锴等98人，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各民主党派、杜鲁门及美国国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　南京大屠杀惨案调查委员会在京成立，参议院副议长陈耀东、参议员伍崇、卢前学等为委员。该会请王世杰、吴鼎昌为顾问。

△　驻无锡第十七军官总队军官200余人以《大锡报》、《锡报》刊登军官滋扰该市之新闻，将该两报馆捣毁，损失约一亿元。同时，因不满军人胡为而罢市的九家商店亦被捣毁。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亲往报馆慰问，并赔偿损失。

△　国民党军青岛守备军阙汉骞之第五十四军以主力向即墨县马山地区进攻。7月2日，攻占即墨县城。9日，攻占蓝村。12日，攻占

胶县。

6月24日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通过《完全结束东北冲突训令》，该训令规定：1月10日停战协定除由三人会议修改外，均仍有效；密切或实际交锋部队双方立即就地停战，各自后撤；以6月7日正午存在的局势为基础，由执行小组就地指导调整；双方一切战术性调动均应停止；本训令颁布15日内，双方应将在东北的一切部队并团以上指挥官、兵力位置之清册送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政府不调部队入东北；不执行训令的军官应撤职法办。该训令未签字。

△　军事三人会议继续讨论恢复交通问题，通过《关于重开华北、华中交通指令》，指令规定：立即恢复华北、华中的一切交通线；修筑各路的工作受各交通小组监督，并受交通部管制；在铁路管理中任用合格的中共人员。但该指令未签字。

△　军事三人会议通过《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议定：执行小组及交通小组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致时，美方代表可就其观察意见直接向军调部报告请求指示，美方代表有权决定执行小组在所辖区域进行有关军事行动之调查，在双方对停止冲突及隔离部队之事项不一致时，美方代表有权令双方长官立即停战实行隔离部队；军调部及分部国共两方意见不一致时，美方资深人员可向三人委员会单独报告，在双方执行上级命令或指示意见不一时，美方资深人员有权指导该命令或指示之执行。该条款未签字。

△　周恩来在军事三人小组会上报告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殴经过，并以备忘录致马歇尔、徐永昌，提出惩凶、取消特务机构、保障人权等六项主张。

△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分别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南京下关事件”，并致电蒋介石提出抗议，致电中

共、民盟吁请予以声援。

△　汪伪政府军令部长、苏豫区总司令胡毓坤、海军部长凌霄、湖北省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

6月25日　俞大维向马歇尔提交《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修正事项》，主要内容为：协定签订后，中共须将热河、察哈尔两省的部队集中到两省边境以待统编，政府军进入上述地区；政府派一个军驻烟台及威海卫，加派一个军驻青岛，胶济路之中共军全部退出，待政府军接收；9月1日起，政府派一个军驻天津；苏北各地的中共军全部退到华北统编驻地；凡6月7日以后为中共军占领的地方，均得退出，由政府军进驻。

△　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就下关事件联名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指出“此事件，并非全由下关军警之不得力，而实出于一种特务活动”，“政府必须取消特务机关”。

△　中共代表团在京招待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周恩来说明中共一贯致力和平民主经过，并阐明中共之土地、工商业各项政策。同日，毛泽东、朱德电慰上海和平请愿代表，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

△　徐州市徐州中学发生大血案。该校学生酝酿进行反内战游行示威，校内驻军连长方某指挥架起三挺美式重机枪向学生扫射，打死教务主任及学生10多人，伤学生20多人。

△　立法院通过大赦案，凡犯罪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判为有期徒刑以下者均赦免之；战犯、汉奸、贪污、贩毒罪不赦。

△　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在行政院例会上检讨下关事件的发生，说治安当局未能尽到保护之责，内政部当局亦难辞其咎。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军在华之任务，系应中国政府之要

求，用以协助遣送在华之大量日军。

△　戴伯尔门由北平飞往长春，代理白鲁德执行调处任务。

△　第二绥靖区王耀武部李弥第八军自昌乐强渡弥河向西进攻。26日，与山东中共军在益都以东激战，27日攻占益都。

6月26日　全面内战爆发。奉蒋介石之令，第五、第六绥靖区（第六绥靖区属武汉行营，临时划归郑州绥靖公署）第一线部队10万人，凌晨自信阳、罗山、光山、经扶（今新县）、黄安（今红安）、黄陂、孝感分路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共中原军区军民奋起自卫。

△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整军问题。周提出两项可供选择的办法：一、先实行在东北停止冲突和恢复铁路交通，然后讨论军队整编方案；二、确定关于军队整编的几项原则：在整编期间双方军队驻扎在不威胁对方的地点；军队不干涉政治；在整编期间政府地区和共产党地区都有某些地方可以不由双方军队驻防。马歇尔表示可以考虑第二个建议。

△　第二绥靖区陈金城第九十六军自济南出动沿胶济线向东进攻，占领龙山，韩浚第七十三军（缺第十五师）沿胶济线北侧东进。7月6日，第七十三军与由昌乐沿胶济线西进的第八军在张店以西地区会合，11日，该两军攻占博山，控制了淄博煤矿区。

△　国民政府令：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魏道明免本职；特任顾维钧为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驻伊朗国特命全权大使李铁铮免本职；特任郑亦同为驻伊朗国特命全权大使；驻阿富汗国特命全权公使邹尚友免本职；特任许念曾为驻阿富汗国特命全权公使。

△　国民政府令：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长张国焘免本职，派蔡孟坚继任。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通过党员总清查实施要点；二、通过中央党务机关缩编办法。

△　内政部公布全国人口总计为4．70026252亿人。

△　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正式撤离河内。至此，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受降工作完全结束。

△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延长对华军事援助之法案。该法案规定以剩余军备移交中国，并派军事代表团来华，训练中国军队。援华时期，以该法案生效之日起，以十年为限。

△　中央航空第八大队第五十三中队机长刘善本上尉，驾驶B24式530号飞机由成都飞往延安。29日，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刘善本大会，朱德致词，谓“刘上尉退出内战义举，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高潮到来”。

6月27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蒋进一步提出军事调整条件：共军应在10天之内撤出苏北、胶济线、承德、古北口、安东省和哈尔滨，这些地方在一个月内由政府军队占领；中共军还须在一个月内从其他指定的地方撤退，但政府军可以延缓两三个月进入。马歇尔认为蒋的条件过苛，必须寻求某种妥协的基础。

△　马歇尔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关于整军条件，周表示：中共愿考虑关于哈尔滨、热河承德以南、察哈尔张家口以南等地区国共双方驻防问题，但不能接受政府对于胶济线、承德、古北口及其他地方的要求；中共可以减少苏北驻军；如果政府军只驻济南、潍县和青岛，中共军可撤离胶济线，并撤出烟台、威海卫；中共军可以撤出枣庄煤矿，铁路专作营业用，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中共军退出的地区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不得损害。

△　第五、第六两绥靖区攻占宣化店四周战略要点，中原解放区

主力军部队向西转移，军区司令部撤离宣化店。

△　宋子文访马歇尔，吁请美国给予经济援助。

△　上海赴京和平请愿代表马叙伦等10人见马歇尔，希望先造成中国的永久和平，然后美国再给予物资上的援助。

6月28日　蒋介石通知马歇尔：中共军应撤出山东滕县，不得在山东菏泽、河北大名、山西闻喜驻防。同意中共军驻防邢台。同日，马歇尔将蒋之要求转告周恩来，周指出目前局势危险，蒋已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同时指责蒋要把共军分隔成五个孤立的地区，只有张家口、邢台在铁路线上，这样容易将共军包围。

△　马歇尔致蒋介石备忘录，指出在谈判现状和2月25日军队整编协定规定军队分布的问题上，政府与中共有多处不可调和，整军协定的正式详细修订文件在6月30日中午以前不能制定出来，如果把休战期限延长到6月30日以后，会使局势完全崩溃。因而，“建议达成一项包含对于危急地区的足够详细的解决办法的特殊协定，以充分地保护政府的利益，以便可于6月30日发出停止冲突的命令”。

△　美方代表马歇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周指出国民党军已于6月26日开始进攻，迫使中共军队起而自卫，蒋介石应立即电鄂、豫部队停止进攻，蒋的进攻是违反政协决议的。

△　第三方面人士与政府代表会谈，黄炎培等提出折衷方案：一、东北停战、恢复交通两大问题既可成立协议，应先签字，以和缓气氛，继续商谈；二、中共在军事方面既多让步，则政府在政治方面应多开放，以此为交换条件；三、先局部解决整军和驻地问题。国民政府代表表示愿转陈蒋介石。

△　民盟代表访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向其介绍谈判情况，谓中共在东北、热河、察哈尔、山东、苏北等地驻防问题均作了重大让步。

民盟代表定次日访马歇尔、王世杰和邵力子，呼吁以中共之让步打开谈判僵局。

△　上海赴京和平请愿代表蒉延芳向蒋介石请愿，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蒋佯称："就是这次谈判不成，停战期过，我也不打。请回去告诉上海人民。"

△　上海赴京和平请愿代表向中共代表团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周恩来说明谈判情况，由于蒋介石要求中共撤出苏北、胶济线、承德、安东省等地，使谈判陷于僵局。周表示，中共力争和平，倘政治民主有保障，在军事问题上还可以让步。

△　国民政府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改为重庆警备司令部，任命孙元良为重庆警备司令。

△　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阐释美国对华政策。略谓美政府为协助中国而采取的各项行动，其目的为协助整个中国消除对日长期战争所引起的种种影响。此等步骤不能解释为支持中国内部任何党派之军事集团。

△　《大公报》报道：兰（州）宁（夏）公路全部竣工，定7月1日正式通车。该路全长489公里，费时两年零三个月，用款近二亿元。该路为国有干线。

6月29日　马歇尔拟定整军折衷方案，主要内容为：一、明确规定国共军队的分布；二、不变更5：1的兵力比率；三、军队在六个月内开入指定的地区；四、军调部立即决定1月13日以来双方占领的地方和在20天内应该撤离这些地区的军队；五、军调部立即决定6月7日中午以后东北国共双方占领的地方和在10天内应该撤离这些地区的军队；六、中共同意政府军在哈尔滨驻防5000人；七、中共军集中到规定的地方，关内中共军撤退的地区现在的政治状况不变。

△　马歇尔将所拟折衷方案面交蒋介石，蒋拒绝改变自己提出的关于中共军配置的条件，特别坚持要共军撤出承德、整个江苏省和东北的安东省，并坚持在共军撤出的地区里的现有地方政府应撤销。马表示，政府没有作出妥协，进一步谈判是没有基础的。

△　马歇尔以其折衷方案及蒋介石之意见与周恩来会谈。周表示“除去牵涉到共军撤离苏北和政府军队占领那个地区的地方民政问题之外，他准备考虑任何方案”。对马提出的方案，“除一两项次要问题外，这个文件的主要条文共产党几乎完全可以接受。”周恩来还说，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一套，希望同国民政府方面代表在明天12时前达成整军方案协议。

△　罗隆基、张君劢向马歇尔提出三点建议：一、中共已让步，希望政府亦能让步；二、中共撤出地区之政治问题应由政协综合小组解决，或由未来之联合政府解决；三、中国内战能否停止，美国之态度关系甚大，希望马歇尔取强硬态度为中国求和平。

△　第三方面人士与政府代表会商，邵力子告称，蒋介石已明确表示，政府方面坚持中共退出苏北、承德、安东，并不得保留地方政权及保安队。政治问题亦交三人会议解决。

△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新四军第五师主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王树声率新编第一纵队，在平汉线信阳至广水间开始向西突围。

△　王震向军调部光山第三十二小组送交备忘录，内称：政府军大规模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已爆发，中共军将被迫自卫，李先念将军已离宣化店，请该调处小组本日上午11时以前撤离宣化店。

△　驻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团长克莱门少将飞抵临沂，会晤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交换关于停止目前山东军事冲突的意见。并邀陈去青岛与王耀武会谈。陈表示：目前中原、淮南、

苏北等解放区正受国军大规模进攻，时局紧张，难离职守。克莱门当日返青。

△　国民政府特任汤恩伯、范汉杰为陆军副总司令；任命毛邦初、王叔铭为空军副总司令；任命黄维、陈良、何世礼为联合勤务副总司令。

△　驻粤中共武装部队2400人乘美轮离粤开赴烟台，留粤者仅781人。

6月30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蒋表示对于承德愿意接受稍折衷的办法，但苏北的共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撤到陇海线以北，否则，难以实现和平。马歇尔指出：所有关于华北的要求都是政府提出的，除去条件的某些修改外，政府没有向中共作出让步。政府正在使用武力独裁的政策。蒋最后说，他已对军队发出命令，“除了自卫外，不得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并建议成立一个由政府和中共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讨论共军依照政府要求而撤出的地区的地方政府问题。

△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马说，蒋介石已命令他的军队不得从事任何进攻行动，但应保卫他们目前的阵地。并表示继续进行谈判。周指出：目前局势和谈判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苏北、热河和津浦路沿线，蒋对这三个地方有关的问题非常顽固。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发布公告称：今停战命令虽已满期，政府对于和平统一之方针决不变更。除非共党进攻国军，加以抵抗与驱逐外，“中央军队不对共军采取军事行动，以静候各项未决问题之解决”。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在京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彭学沛所宣布的公告形式特别，一方面声明中央军不对共军采取军事行动，但并未说明政府方面是否已发布此项命令，尤其未说休战时间。另一方面指责中共军在进攻，破坏交通，以便在“自卫”、“恢复交通”等借

口下，不受任何限制地向中共军采取军事行动。

△　周恩来在京对中外记者谈，中共对马歇尔提出的整军方案“绝大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包括驻军原则、军队比例和东北问题的处理等，大都是同意的。但政府坚持要接收其所指定的区域，致此方案未被同意”。“现在政府提案竟把军队驻地和当地民政联系一起，变成以军干政的防区制或军管区、师管区制，这就是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　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第三十七团进占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

△　《解放日报》载，上海各界名流黄墨涵、黄次咸、邓初民等4271人联名电陈毛泽东、蒋介石，力述目前民族深重危机，呼吁全面停战，延长协商期限，一切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式解决。

△　香港、九龙各界召开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彭泽民、何香凝、千家驹等在会上发言，一致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并决定组织反内战大同盟。

△　国民政府将驻海南岛之第五十四军由海路运抵青岛，从而开始了为1月10日停战协定所禁止的对华北部队的全面增援。

△　据中央银行统计，到是月底止，全国各省、市金融机构共4634家，其中银行总数3489家，内官营者2446家，商业银行1043家。

7月

7月1日　　蒋介石向国军各司令官发布命令：“如共军不进攻我军，则我军亦不进攻共军。若共军向我军进攻，则我军为自卫、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及维持地方治安计，将集中力量予以反击。”

△　毛泽东、朱德令共产党全体战地司令员："在任何地点，如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被攻击，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以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并维持民主政府的法令。"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合举行纪念周，国防、经济、交通、水利、资源等部、会首长白崇禧、陈诚、王云五、俞大维、薛笃弼、钱昌照、顾祝同、周至柔、黄镇球等45人宣誓就职。蒋介石授印并致训词，饬其"树立建国之模范，求政治之修明，不多用一人，不浪费一文钱，要负责任，守纪律，为一般僚属之模范，以奠定修明之政治基础，完成国家所赋予之使命。"并领读《党员守则》。

△　参谋总长陈诚发表《告全国官兵书》，说明国防部成立之意义，强调当前之急务是继续完成整军，进而改革军事制度。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京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谓未来大局之发展，将取决于共党之态度。政府对政治问题，一本政治解决之方针，决不诉诸武力，在军事上无任何新部署。

△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令所部全力追击由平汉路突围西进的中共中原军区部队：第六十九军、第十军调天河口、高城一线；第十一军、第七十五军分别取捷径赶赴天河口、高城之西北和西南；第十五军、第四十七军、第六十六军迅速向天河口、高城追击，务须将中共军围歼于天河口、高城地区。4日，刘峙所部还未到达指定地区，中原军区主力突围越过天河口一线。

△　王树声率领中共中原军区由南路突围，主力在湖北花园以北之王家店越过平汉铁路，向襄河挺进。同日，皮定均率领掩护主力突围之一纵第一旅进入鄂皖边界的大别山腹地。

△　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召开首届全体会议，讨论《民国三十六年经济部施政纲领》，拟订挽救工业危机、物价管制等决议案，财政部

长王云五表示对各议案保证实施。5日闭会。

△　粤汉铁路修复通车。

△　新疆全省举行和平庆祝会。监察院长于右任在迪化市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省主席张治中宣读告全疆同胞书，提出永保全疆和平之四原则：一、增进中苏亲善；二、拥护国家统一；三、实行民主政治；四、加强民族团结。

△　前英美混合部队第六军司令美军鲁加斯少将抵南京，担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

△　国防部命令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所有人员当晚向上海集中，遣返回国。次日晨，前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以下人员乘船离京赴沪。5日，大部人员由沪返日。10日，小林等乘最后一艘遣返船离沪。中国政府内定扣留的冈村宁次总司令官等14人在南京成立总联络组，指挥北平、太原、汉口、青岛、上海、广州、台北七个联络组，继续收容运送散居在偏远地方未遣返的日人，以及处理其他悬而未决之事。

7月2日　　蒋介石与周恩来在京举行还都后之首次商谈，蒋重申政府过去之立场及态度，希望中共对整军及商谈作同样之让步，对亟待商谈之问题，政府方面由邵力子、陈诚、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商谈。周表示：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商讨；政治问题希望提早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解决。

△　周恩来、董必武与邵力子、陈诚、王世杰商讨政局，双方均坚持过去立场。周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政府方面代表反对。

△　“联总”副署长罗克斯奉署长拉加第亚之命来华视察中国善后救济工作，在蒋廷黻陪同下拜会蒋介石。蒋提出，救济物资分配应不拘政治派别，必须由“联总”与“行总”派员会同监督办理。

△　国民政府令：废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布《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及《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例》。

7月3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一、国民大会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二、修正通过粮食部呈拟1946年度田赋征实征借办法及田赋、粮食之紧急措施方案；三、国民参政会本届参政员任期延长六个月（原于7月6日届满）。

△　五人小组会议（政府代表邵力子、陈诚、王世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京举行正式首次会议，讨论解决地方政府问题。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就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事声明：中共对此事事前毫无所知。“当现存国民政府未照政协决议改组政府之原则实行改组之前，国防最高委员会仍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机关，中共对该委员会之决定不受任何约束”。

△　国民政府令派王陵基兼江西省保安司令并兼江西省军管区司令，万耀煌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并兼湖北省军管区司令，沈鸿烈兼浙江省保安司令并兼浙江省军管区司令，王东原兼湖南省军管区司令。

△　武汉行营主任程潜首次在汉招待各报记者，指责中共违反《罗山协定》，宣称中原军区李先念部集结主力于宣化店附近，猛向信阳、花园间之平汉路发动攻势，如事态扩大，本行营将“作有效制止”。

△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沪召集航业界领袖杜月笙等商讨发展航业办法，与会者提紧急建议：取消开放沿海各口；收回英商航业资产；协助航商订购船只；建上海为东方大港；从速确定航业政策。

7月4日　　国民政府令：民国三十五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任期自民国三十五年7月7日起，延长六个

月。

△　周恩来、董必武、陈诚、王世杰、邵力子继续举行五人会议，就国大召开之代表名单及苏北问题进行讨论，未获一致意见。

△　国防部新闻局长兼首都各界抗战死难军民追悼大会筹备会秘书长邓文仪在京对记者报告抗日战争中军民死难情况：一、由国府褒扬者有上将总司令张自忠、李家钰及军、师、团、营长148人；二、经军委会褒扬者有团长李庚星等1854人；三、按照战地守土奖励条例奖恤之文职官吏共282人；全国死难军民一时难有正确统计，仅南京一市即达30余万；四、呈报有案之阵亡士兵达350万人，全国死亡军民当在1000万以上。

△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美国国庆》社论，对美国《独立宣言》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及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表示赞赏；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进行强烈谴责。社论呼吁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坚决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7月5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同国民政府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会谈中指出，7月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未经商量，即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完全是分裂行动。提议立即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补救办法。同日，周在与美方代表马歇尔会谈中，向马告知这一情况。

△　周恩来会见英国驻华代办华仑格，介绍马歇尔来华后的中国政局变化过程，希望他转告英国外相。指出现在的情况完全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两面性造成的，一方面帮助中国建立和平，另一方面又给国民党军火、借款、运兵。希望各国都遵守三国公约，使中国不致走到

内战和独裁。英国也有责任“提醒美国不要用错误的方法来违背三国公告”。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决议：一、请政府迅即裁撤粮食部，以慰民望；二、请政府对京、沪主要物价作有效之管理。

△　民盟暨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而未向彼等商议一事，均表示不能同意。

△　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美方组长戴伯尔门由长春飞哈尔滨，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会晤，讨论军调部东北执行组之活动问题。林表示愿与杜聿明会晤，但中共军决不退出哈尔滨，东北国共驻军人数应相等。戴氏当日返回长春。

△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由美返国抵沪。

7月6日　　五人会议继续商谈，政府方面坚持先谈整军问题，中共方面则要求整军与政治合并讨论，双方意见难接近，谈判成僵局，无任何决议而休会。

△　军调部电各执行小组及长春前进指挥所，谓国共双方业已声明，在进一步谈判获得结果之前，全国继续实行休战。执行部三委员指令，在此期间，双方均不得有前进、攻击和追击之进攻行动。

△　中共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王树声第一纵队进占湖北枣阳县南之北茅茨畈，文建武第二纵队进占河南唐河县之湖阳镇，鄂东军分区张体学部进占罗田西北，迫近立煌县。

△　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政府。

△　监察院长于右任在迪化接见新疆各族代表600余人，代表中央慰问全疆父老，勉励各族团结一致建设新新疆。在场代表一致通过以“新新疆之荣誉公民”赠予于氏。

△　是日至7日及8日至11日《中央日报》讯：中、美、英、苏等11国向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同控诉日战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等27名，犯破坏和平与杀人罪。

7月7日　　南京党、政、军及各社会团体、学生二万余人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蒋介石致祭抗战死难军民祭文，并在大会上致词，要求全国同心一德，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现代国家。同日，全国各大城市均举行隆重纪念大会。

△　中共中央为“七七”九周年纪念发表宣言，指出抗战胜利后，人民没有得到民主与和平，主要是美国反动派“帮助了我国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并对时局提出四项主张：一、立即向全国重行发布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战令；二、重开政协会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三、在政协监督下从速复员裁兵；四、通知美国立即从华撤退一切军队。同时声明，在联合政府成立前美对华一切贷款中国人民概不负责。

△　中共代表团对国民党方面单独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书面抗议，指出国大之召集，须由政协各方决议，若国民党单方面决定，中共不受其拘束，引起纠纷，由国民党负责。

△　民盟代表张申府、梁漱溟、罗隆基等访邵力子，谓民盟希望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能提早召开，以便讨论政治问题。邵以蒋介石对苏北问题态度坚决，无退让余地，而对谋政治解决无动于衷。同日，罗隆基等访周恩来、董必武，劝延安不要反对美国。

△　中共中原军区司令李先念将军发表声明，国民党军10万人分路进攻，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被占，我部现虽突围求生，坚持和平立场决不动摇。只要国民党“允许我军和平撤往华北解放区，并保护中原解放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则我方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如此

背信弃义，仍可曲于原宥，不咎既往。否则，我六万员兵不惜一切，誓当死里求生”。一切后果应由国民党当局负责。

△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艾伦德等一行八人来华访问。

7月8日 周恩来送备忘录致马歇尔，并附中共中央为“七七”抗战九周年纪念发表的宣言。马向周指出：中共的反美宣传给他同政府方面的谈判以严重打击，这种宣传继续下去，他在调处工作上就无能为力了。

△ 蒋介石接见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在京团长张知本、刘文岛、钱公来等，要求清查工作愈详细愈切实愈好，该工作完毕后，须做一总检讨，俾可作一具体处理办法。

△ 宋子文在沪招待新闻界谈当前诸问题称，政府正在考虑抚恤抗战殉难烈士遗族，根绝官僚资本，奖励出口办法，制定稳定金融措施，维护航权，肃清贪污。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沪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指责共军违反协议，在东北及津浦、胶济两铁路沿线采取军事行动，中共拒绝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名单。政府为速还政于民，故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7月9日 马歇尔会晤五人会议的政府代表王世杰、陈诚、邵力子，交换对时局之意见。政府坚持中共军须撤离下列四个地区：热河省承德以南（含承德）、安东省、胶济铁路、苏北，政府不要求中共军在所有撤退后的地方交出地方政权，但上述四个地区须交出地方政权。

△ 马歇尔与青年党领袖曾琦商讨时局问题，曾表示该党“乃国共之外，始终保持独立与中立之第三大党，代表小资产阶级”。该党之特性为“独立性，中和性，建设性”。

△　马歇尔派专机赴汉口，接回军调部汉口小组成员，询问湖北境内国共军事冲突情况。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拉加第亚宣布中国政府一再以“联总”物资作政治及其他用途。自是日起。暂停运救济物资往华。白米、小麦及牛乳等食品继续运华，但须以中国政府迅速出清各口岸及“行总”将救济物资运往中国内地，以满意方法分配为条件。

△　顾祝同由沈阳飞往长春，视察附近驻军。同日，杜聿明亦由沈阳抵长春，准备与林彪会晤。

7月10日　五人会议续开，讨论中共军撤退区之行政问题。政府代表表示，他们不能改变蒋介石关于中共军必须撤出热河、安东、胶济路、苏北四个指定的地区并交出地方政府的指示，只能许诺在政府接收这些地区时，考虑中共现存的机构。周恩来对此表示不能接受。

△　杜鲁门总统任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对记者谈，司徒雷登旅华最久，对中国情形了解最深，相信必能胜任，并成为他的最佳助手。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对彭学沛8日谈话严加驳斥，谓彭氏长篇谈话充满捏造与诡辩，破坏政协及整军基本方案的实为国民党。国民党御用之国大，中共自当不能承认。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举行外籍记者招待会，指责中共七七宣言“实于寻求和平之外，别有用心”，其反美宣传，“实不值得讨论”。并诡称中共军正集中重兵包围海门、六合、大同，在湖北、河南、苏北、山东、山西、东北等地攻击国民党军。日本投降前共军占领区域仅74县，迄今已达337县。

△　上海《中央日报》报道：南京人口最近调查为72万人。

7月11日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周建议全面讨论关于在所有共

产党控制地区的地方政府问题，并表示，中共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少承德等四个政府指定撤军地区的军队，但不能接受把共军和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从这些地区完全撤出的要求。周恩来还对政府军在湖北、苏皖的进攻表示极大不满，要求其停止对第五师的进攻。

△　国民政府就联总署长拉加第亚指责政府分配救济物资作政治用途，未将物资公平分配给共产党，并暂停运救济物资到华事发表声明，谓联总人事更迭，使运华救济物资减少，拉氏之指责系片面之词，行总分配物资全视需要，绝不分政治关系。

△　晚10时许，民盟中执委兼民盟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公朴在昆明学院遭凶犯狙击，弹穿腹部。次日5时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去世。

7月12日　国民政府训令直属各机关：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通过的《请政府厉行革新政治案》、《请政府改革官僚政治肃清贪污以利建国案》、《剔除时弊贯彻法制精神以完成建国大业案》、《请政府速采有效措施彻底刷新政治以振人心与民更始案》、《制宪行宪之期已近请政府忠心努力于此以致太平案》，经国防最高常委会决议，饬各机关应即分别采择施行。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在沪对记者谈，“联总”对政府之批评多出于误解，未考虑我国交通不便等特殊情况。对“联总”建议自当重视，“行总”将不断努力以合理数量物资设法运入中共控制区。

△　行政院物资供应局负责人对记者谈，“联总”救济物资对华停运，美国剩余物资输华并无影响，不断有大批物资源源而来。

△　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由沪飞美赴任。

△　中共中原军区北路突围主力抵达内乡、淅川、荆紫关地区。南路主力越过襄河，向武当山进军。

△　中央航空公司由上海飞北平的C46＋五号飞机在济南失事，机组人员及乘客16人遇难，伤多人。

7月13日　周恩来访马歇尔，表示需要全面休战。如果国民党再进攻，一定会在山东爆发战争，如果山西的胡宗南、阎锡山发动攻势，中共军将以进攻大同来报复。如果国民政府不改组，地方政府问题不能解决。

△　马歇尔与俞大维会谈，马希望政府方面努力稳定军事局势，以便避免内战。指出政府不愿派执行小组到汉口以北的关键地区去，是为其军事行动不受监视。并表示，如果进攻的军事行动有所发展，他将被迫退出谈判。俞说只要中共军撤出的地区不保留保安队，蒋介石可以再一次参与地方政府问题的讨论。

△　毛泽东、朱德致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唁电，对李遭反动派狙击逝世，表示“无任悲愤”，“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　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致张曼筠唁电称：“公朴先生之牺牲，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

△　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在汉招待记者谈：一、中原军区共军向西北进攻，目的在与西北共军会合；二、共军之军事行动系达政治目的之手段；三、鄂省境共军之扰乱最短期内可以平定。

△　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在京招待新闻界。报告国防部改组、青年军复员等情况，国防部六厅八局人事编制大致完成，现已整编五十九个师。青年军复员后三分之二已复学或就业。

△　苏浙皖区产业处理局发表接收敌伪物资价值共10012.018375亿元。

△　古巴新任驻华公使孟德沙在京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7月14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京飞往庐山牯岭避暑。

△　军调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决议：该组分两队赴老河口、麻城调处，为和平作最后努力。

△　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在淅川城三里外之大石桥渡过丹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郑州、武汉、西安三绥靖公署调遣的大军包围。同日，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经过激战突破荆紫关，进入陕南。

7月15日　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兼云南支部常委、宣传部主任闻一多在昆明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又在府甬道14号招待记者，痛斥反动派特务暴徒的野蛮罪行。下午5时半，闻一多偕其子闻立鹤返家途中，于民主周刊社外遭暴徒狙击，闻一多身中数弹，即刻身亡。其子亦中弹多处重伤。

△　昆明警备司令部向各报投登悬赏启事，凡能捕获谋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100万元，闻风报讯而缉获者，奖法币50万元。同日，滇省府亦悬赏50万元缉凶。

△　国民政府令：本年度田赋仍须继续征实征借，各级办理粮政人员，倘有舞弊营私，一经查实，定依法严惩。应于1946年度免赋之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福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九省及重庆市，一律改为两年平均豁免，本年予免征半数，余者明年再豁免。

△　蒋介石电四川省府主席张群并省参议会，略谓为挽救经济危机，纾解国内困难，政府继续实征国策，今年需在川省定减半征额，计征实415万市石，征借450万市石，带征县级公粮135万市石，望依

限完成。

△　国民党调动12个军以上的兵力对苏北中共军发动大规模攻势，西起天长、东至淮南、北自兴化、南迄泰兴的广大区域蒙受战火。

△　周恩来偕中共黄河复堤代表王笑一在沪与“行总”署长蒋廷黻、“联总”驻沪代表福坎莱会商黄河复堤工程，周对黄水入旧道，危及下游中共区域表示担心。蒋保证复堤后对下游两岸无危险，“行总”对中共区域复堤工程亦负担工赈经费。

△　白崇禧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强调今后应加强国民之组织与训练国民兵制度。根据蒋介石最近指示，民众训练必须加紧进行。

△　中共发言人宣布，中共已向外交部长王世杰正式要求中共代表董必武应列入出席巴黎21国欧洲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员之一。

△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由北平飞往南京。

7月16日　第一绥靖区李默庵部整四十九师由苏北如皋东南之白蒲向中共军华中野战军张鼎丞部粟裕新一师发动进攻。同日，邱清泉第五军分两路向华中野战军淮南军区进攻，胡长清第四十五师由六合向天长进攻，黄翔第九十六师由耒安向盱眙进攻。

△　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俞大维向马歇尔、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中共军在苏北调动大军发动全面攻势，使局势益增紧张。

△　周恩来由沪返京，与马歇尔讨论时局问题，马建议，中共保持在日本投降以前占领的县，以后占领的县撤出让政府接收，这些县的土地调整问题等国府改组后再行解决。如不能就特殊的初步文件达成协议，他无法说服蒋介石下停战令。

△　俞大维与马歇尔会谈，俞称苏北共军发动全面进攻，力图消

灭那个地区的精锐的政府军。马即否认，指出此非事实，因这与政府方面曾说在三至六个月能消灭所有的共军相违背。并预示，谈判暂停期间，政府在军事上可能一时得利，但形势可能并不依蒋介石的信念发展。

△ 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鲁门总统呈送国书，保证与美国合作，保持世界和平及增进繁荣。杜鲁门答词赞扬中国逐出侵略者所表现的坚忍卓绝精神，对顾所带来的蒋介石函札表示谢意。

△ 美白宫宣布：杜鲁门总统签署协助中国海军法案。该案规定，总统认为在协助中国及解除在华美军任务有必要时，得向中国“出卖租借交换或移交浮动船坞，修理器材，训练用机及劳役等，并授权总统指派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军官100人及士兵200人前往中国充技术助理”。交予中国的舰艇总数不得超过271艘。

7月17日 周恩来访马歇尔，周指出由军事冲突的蔓延和政治性的暗杀，中共对接受政府关于苏北问题的要求越来越困难。如果蒋介石以武力威胁迫使中共让步，中共则将坚决抵抗。

△ 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指出目前最严重最急迫的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大规模的战事正在中原、山东、苏北、晋南四个战场进行，其内战责任应由国民党负责。昆明两次政治暗杀，肆无忌惮，如果国民党当局不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都将徒然无望。

△ 中共代表团就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事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期捉拿凶手，严责各地政府军警机关，保护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彻底实施四项诺言，取消一切特务机关，释放一切政治犯。

△ 毛泽东、朱德致闻一多家属唁电：“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

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此致唁。”

△　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廖承志电唁闻一多夫人高真，说：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

△　中华文艺协会总会就该会理事闻一多被暗杀事电南京于右任监事和邵力子理事，请其转呈蒋介石严饬昆明当局破案雪冤，并公开申令保障全国文化教育人士之自由安全。

△　蒋介石手令四川、云南军政当局，限一周内缉获狙击李公朴、闻一多之正凶，依法严办。

△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切实加强保护一切人民生命安全与自由，尤应对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昆明凶案显系奸人意图扰乱，今后如再有此种狙击事件发生，各省、市长官及所属管治安人员，不能辞其咎责。行政院派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督办。

△　国民政府特任郑天锡为驻英国全权大使。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一、各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其组织及职权仍照旧；二、汉奸在判刑前死亡，得单独宣告没收其财产之全部；三、通过1947年度政府总预算编审办法。

△　李震整六十五师由靖江向中共华中军区新一师驻地如皋攻击前进。18日，攻占黄桥。21日，攻占搬经镇。23日，协同第四十九师攻占如皋。

△　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在鄂、陕边境南化塘与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激战。20日，李先念部击退胡宗南军，进入陕南。28

日，与陕南红色游击队会师。

7月18日　周恩来在沪对中外记者谈：现在局部的内战正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激烈的战争正在中原、胶济铁路沿线、苏北、山西进行，国民党向这四个地区调入了大量军队。还指出，昆明暗杀事件，是反动派妄图用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和平民主人士。陈立夫来沪，系加强特务组织，布置新的暗杀，此种暴行随时可能在渝、蓉、京、沪发生。同日，陈立夫函周恩来，对周的谈话表示不满。

△　周恩来与蒋廷黻及“联总”远东区代理署长赖氏会商黄河堵口工程问题。议定：一、由中共担任修堤工程方面之工作，政府负责经费、器材、救济、工赈工作；二、堵口工程及救济全部费用80至100亿元。同时，周要求中共参加“行总”各部门之工作。

△　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第三、第八绥靖区及第十九、第三十二两集团军在津浦线南段铁路两侧向中共军发动全面进攻。

△　中共华中野战军新一师粟裕部、新六师王必成部、第七纵队刘培善部在如皋城东之丁堰与整四十九师王铁汉部激战，整四十九师师部阵地被中共军突破，残部败退顾家庄。

△　美国赠给中国八艘军舰编成的新舰队在古巴受训完毕后，是日抵达吴淞口。八舰共有军官70余人，士兵900余人。旗舰“太康”及“太平”两舰各为1200吨位，“永胜”、“永顺”、“永定”、“永宁”四舰各为800吨位，“永泰”、“永兴”两舰各为700吨位。

△　国民党中组部长陈立夫在沪招待市商会全体理、监事，征询挽救工商危机之意见，市商会要求政府调整现行财政政策。

△　民盟北平负责人孙中原被暴徒绑架。

△　昆明14个人民团体组成的“李闻惨案后援会”向全国同胞紧急呼吁：一、要求当局严惩杀害李、闻的正凶及主谋人；二、要求政府

立即取消特务制度，取消中统、军统；三、要求政府切实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四、要求立即停止内战，重开政协会议；五、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华租借法案和一切军事援助。

△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就“李闻惨案”发表书面谈话，指出这是政府政治上的暗杀，并正告政府当局，若不取消特务机关，民盟断不参加政府。

△　重庆各界各团体组织“陪都各界反内乱大同盟”，至是日止，参加者427个团体及3．9267万人。该盟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并发表宣言，愿为国家纾难，甘作前驱。

7月19日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庐山牯岭蒋介石行馆向蒋呈递国书。20日，司徒雷登返回南京。

△　周恩来同黄河筑堤工程师泰德及“联总”驻沪分署代署长赖氏由沪飞开封，视察黄河筑堤工程。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决，向政府提十项要求：一、迅速拯救丝业危机；二、彻查“联总”停运救济物资入华之内幕及“行总”运用物资情况，并速拟改进办法；三、速解决京市房荒；四、明令保护人民房屋财产；五、对菲律宾排华速筹对策；六、饬云南省府严办暗杀凶手；七、整理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八、严密注意汉奸案之处理；九、优待边省教学人员；十、逮捕通敌叛国汉奸现任上海市秘书长何德奎。

△　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等13名著名文化界人士联名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谓中国著名的文化领袖李公朴、闻一多被政府的反动爪牙暗杀，中国一党独裁的政府为了无情地摧毁它的反对派，成百的民主人士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请联合国立即派调查团来调查。

△　东京日警枪杀中国台胞，中国驻日代表团声明此事严重，刻采适当步骤以应付局势。7月23日，国民政府电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迅速调查此案真相，详加报告。

7月20日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王世杰为中国出席巴黎和平会议代表团团长。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全党立即行动起来，“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联名为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立即派人与本盟人员同赴滇调查事件真相，依法究办正凶及主使者，撤惩昆明治安长官，抚恤李、闻遗属，立即撤销国民党党部及军事机关之调查统计局，以后设置情报机关，并保证不作对内政治斗争之用。

△　河北省政府迁保竣事，是日，省府主席孙连仲及各厅厅长正式在保定办公。

7月21日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王世杰偕同新任驻英大使郑天锡、欧洲司长吴南如、新任驻波兰代办葆毅等七人离京飞赴巴黎。

△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自京抵庐山牯岭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视察情形。

△　周恩来偕“联总”驻远东区代理署长赖氏自汴返沪。22日，“联总”、“行总”及中共三方代表在沪开会议定：黄河堵口工程年底完成，“行总”允拨15亿元救济黄河旧道居民，此款作中共取得善后救济供应品之用。

△　中华文协总会在沪召开临时大会，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50余人出席，与会者愤怒控诉反动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无耻罪

行。大会通过《中华文艺协会总会为李闻惨案宣言》和《告世界学者和文艺作家书》。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在延安病逝。

7月22日　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这种内战已经是不宣而战地开始了。""我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并谓："美国的反动分子正在与中国的反动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我向美国朋友们呼吁，你们应当阻止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

△　司徒雷登在京对记者谈，"目前国共争议，仅属人类问题，而所有人类问题，均能解决"。"国共谈判，我当竭尽全能，促成全国四万万人民所期望之和平。"

△　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三方首席代表议定：在松花江桥头堡附近，保持停战，并设立一中立地带，以避免冲突。27日，指挥所派第二十五小组、第二十九小组在所辖区域内设立中立地带。

△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作证，证明卢沟桥事变最初鼓动华北战争者为土肥原贤二。

7月23日　整四十九师、整六十五师攻占如皋县城，中共军向海安、东台退却。

△　国民党军第一七二师攻占灵璧，26日攻占长沟，28日攻占泗县，30日会同第一七一师攻占五河。

△　美国务院发言人重申对华政策意在促成中国各党派团结，组

成一联合政府，将全力阻止内战扩大。

△　调查轴心战败国赔偿问题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私人代表鲍莱在华盛顿对记者谈，以其在沈阳、抚顺、鞍山、哈尔滨等处所见，所有电力、钢铁及其他制造工厂，凡可移动之设备，均被苏军搬运一空。苏俄在中国东北搬走的工业设备价值20亿美元，复原最小需30年。拟向麦克阿瑟将军建议，将日本本部之机械运至东北之抚顺煤矿。

7月24日　青年团庐山夏令营自七七抗战中断后，是日举行首次开学典礼，到教职员151人，学员838人，兼团长蒋介石致训词，要求学员“认清目前的时局”，特别要研究如何求得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以完成建国的伟大使命。

△　马歇尔在京会见参政员、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听取对和谈之意见。吴谈，政府不得放弃由协商途径与共党商获达成协议之希望，中国大多数人皆希望国共统一。

△　挪威驻华大使奥尔及阿富汗公使哈比布拉唐济在庐山牯岭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国民政府特任陈质平为驻菲律宾全权公使。

△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王树声率领中原军区向西突围的南路部队，“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

7月25日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询问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饬其务必迅速破案。

△　民盟代表罗隆基等访邵力子，要求由政府、民盟、美国共同派代表调查李、闻被杀案。邵表示向政府转达，恐政府不能同意美方参加。

△　社会教育家、民盟教育委员会主席陶行知在沪病逝。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前往吊唁。

△　毛泽东、朱德致陶行知家属唁电，内称："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人民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同日，中共代表团致陶家属唁电，谓："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

△　军调部第九小组、第三十二小组对中原战事调处失败，两小组是日由老河口飞往西安。

7月26日　周恩来分别往访马歇尔、司徒雷登，提出解决目前局势的两项措施：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下午，马飞抵庐山转告蒋介石。

△　蒋介石在牯岭召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云南省主席卢汉、宪兵司令张镇、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饬其同飞昆明处理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由顾祝同全权负责。27日，顾等由牯岭飞赴昆明。

△　延安各界群众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并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等烈士，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演，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打垮反动派的进攻。

△　苏皖解放区各界军民万余人在清江市叶挺公园开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对国民党当局以大军进攻解放区，以特务进行政治暗杀的罪恶行动表示极大愤慨。大会通电，决心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代表李立三在沈阳与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会谈东北停战诸问题。

△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国政府派许

传音在法庭作证，许陈述其目睹日军在南京杀人、放火、强奸暴行。

7月27日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上海对中外记者谈称，目前经济困难最主要原因是共党占据山东、河南、苏北所造成，如果中共不封锁农村，全国物价即可普跌。中共关于“无条件停战”建议，“无异于无条件延长政治军事之混乱局面，而陷国家于困境”，实质上是“东北无条件割据，交通无条件截断，以及军队扩充与军费增加之无条件竞争”。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飞庐山牯岭，当晚偕马歇尔与蒋介石会商时局。

△　胡长清第四十五师攻占苏皖边境天长县城，中共军向黎城镇退却。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撤销停止救济物资暂运华之命令。

7月28日　重庆各界6000余人开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张群任主席，并致词称：“我们追悼两先生，应该一致努力，共求中国和平团结的早日实现。”史良报告李公朴的生平，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报告闻一多的生平。

7月29日　美海军陆战队42人护送载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的汽车队由天津开往北平，在平津公路上的安平镇，该美军与中共军发生冲突，双方交战四小时，美军死三人，伤12人。

△　民盟代表罗隆基与政府代表吴铁城商谈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事，吴称政府仍坚持分别调查，但政府可派人照料民盟赴昆人员。

△　海军总司令部特派“长治”舰舰长邓兆祥中校前往接收英国赠舰12艘，该舰队最大巡洋舰“震旦号”载重7000余吨，为中国历来军舰中之最大者。

7月30日　马歇尔谒见蒋介石，请允民盟要求，组织三人调查委员会，由政府、民盟及美方各派一人，前往昆明共同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蒋告，调查此案为政府应尽职责，自应有政府负责，如调查公布结果彼尚有怀疑，自允许有关团体参加研究。

△　马歇尔与俞大维就时局会谈，马指出：目前政治形势比军事形势更为严重，由于秘密警察大肆活动，任何自由观点的人都受到监视、压制和迫害，使蒋介石的威望在美国人心中降低，这是悲惨的。

△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王世杰为互换中国与丹麦关于丹麦取消丹麦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特派驻阿根廷大使陈介为议定中阿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整六十五师由江苏如皋、整八十三师由江苏姜堰分别向驻海安的中共军攻击前进。8月1日，整八十三师攻占曲塘，整六十五师一部攻占海安。3日，整六十五师第一〇五旅攻占李堡。

△　立法院邀“行总”署长蒋廷黻报告该署工作后，各委员相继质问，为何物资滞存上海，不赶运灾区？“行总”救济工作，仅在“救济本署”，今年拨“行总”补充费4320亿元，该署行政费竟达289亿。蒋答称因客观条件未能圆满完成任务，但该署工作人员能洁身自好。

△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王世杰在大会发言，阐明对和约之立场，战胜国必须恪守战时所作诺言，意大利之殖民地应立即予以独立或托管。

△　行政院公布《市县佃租委员会组织规程》，该委员会之职能为实施二五减租。

△　上海泰山警察分局在大西路破获一大制毒机关，抄获毒品价值2．5亿元以上，擒要犯10人。

7月31日　蒋介石令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彻查安平镇美军被袭

真相。并令李会同北平军调部政府代表郑介民代其向受饬之美军慰问。

△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就中共要求出席巴黎和会事再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谓此次出席巴黎和会之各国代表团非限外长一人，中国出席和会之代表为国民党垄断，中共仍望照现时各国出席和会代表方法允予出席。

△　彭学沛在京对中外记者谈当前时局，称由于中共军展开全面攻势，和谈毫无进展，政府仍不放弃和谈之努力。对美军在安平镇被共军袭击表示震愤，当彻底追究处罚。

△　国民政府令：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二级上将万福麟、徐源泉、上将张之江、鹿钟麟、王陵基、李济深、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周濂、金汉鼎、王树常退为备役；谢濂、陶广等201名中将退为备役；海军中将杨宣诚、空军中将汪强退为备役；陆军少将王履阶等499人退为备役；马腾蛟等九名中将除役；范庆熙等23名陆军少将除役。一级上将阎锡山、程潜留延役一年。

△　国民政府令各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其组织及职权，均照旧办理。中央党政军机关留渝联合办事处着即撤销，其未了事宜，统交由重庆行营办理。

是月　月底，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国民参政会共同组成苏浙皖、东北、湘鄂赣、粤桂、冀热察绥、闽台、鲁豫七个区的“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

8月

8月1日　司徒雷登在庐山牯岭向蒋介石建议，组织一个特别小组，只包括国共两党的代表，由司徒雷登任主席，专门讨论改组政府

事，获致协议，立即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需要展缓进行。

△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京会谈，周指出目前国民党军正继续在山东、山西、苏北向中共军追击，这样下去会使内战蔓延。并提三项避免内战办法：一、6月30日以前达成的协议应予签字公布，地方政府问题将来讨论；二、先派执行小组到冲突最严重的地方去解决冲突；三、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道解决。马认为组织联合政府，是挽救局势所必须的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

△　中共华东中央局发表《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争取第二次自卫战争的胜利告同胞同志书》，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动员起来，全力投入自卫战争。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南京记者公会成立会上宣称，和平统一迄未成功，共产党应负全部责任。

△　国防部新闻局在庐山牯岭召开“业务会议”，各行辕、各绥靖公署、各军、师之高级政治干员60余人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训话。会议总结检讨20余年来军队政工制度及成果。通过取消军队政工制度等决议多项。5日闭会。

△　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决定自是日起苏联红军在撤离东北前所发行的百元钞票停止使用，10元以下者照常流通。

△　北平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谷钟秀在冀热察绥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招待会上说：“迟至今日始来北平清查，十分遗憾，因物资之盗卖已入无法清查阶段。”

△　民治党在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由国内外致公党及海外洪门团体组成，大会通过政纲，选举朱家兆、司徒美堂、赵昱等为该党领导人。

8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修正条文，参政员总数为314名，川、湘、赣、皖、鲁、豫、浙各10名，苏、冀、陕、闽、桂、滇、台各八名，贵、甘各六名，晋、新、重庆各四名，察哈尔、绥远、上海、青海、西康、宁夏、辽宁、安东、吉林、松江各三名，辽北、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热河、南京、北平、大连、哈尔滨各二名，天津、青岛、西京各一名，蒙古五人，西藏三人，海外八人，国民党中央选75人。

△　国民政府公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凡21条。凡制造毒品者、聚众抗铲烟苗者、运输或贩卖毒品者，均处死刑。该条例施行期为二年。

△　空军飞机轰炸延安，历时20分钟，投弹10余枚。6月26日刘善本驾驶飞往延安之美制B—24型飞机在延安机场被炸毁。同日，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就轰炸延安事向军调部政府代表提出抗议。

△　中共晋绥野战军贺龙部攻占大同南面的怀仁，暂三十八师韩步洲部退守大同。中共军迫近大同四周。

△　军调部政府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在北平就安平事件发表声明，宣称中共军在安平袭击美军，完全出自预谋，“其企图于逼迫美军撤退后在华北各省发动全面内战”。

△　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柯克上将在庐山牯岭拜会蒋介石，讨论美军帮助政府训练海军计划及安平事件。4日，柯克离牯赴沪，旋返青岛防地。

△　苏浙皖区敌伪物资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团长张知本在沪邀请各业代表征询清查工作意见，各业代表纷纷陈述敌伪物资处理局“假公济私，对民有资产多延不发还。同时对已查封之仓库管理不严，‘开后门’盗窃物资，比比皆是”。清查委员程中行承认，“关于敌伪物资接收处理情形，实在弄得民怨沸腾”。

8月3日　　美方代表马歇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周指出，昨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这是空前严重事件；徐州国民党军又向山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蒋介石现在同意改组政府不过是要以政治谈判拖长内战时间，如不停战，全面内战不可避免。马认为，问题在于如何为停止冲突获致协议。午后，马即三上庐山会晤蒋介石。

△　中共军贺龙部继续在大同外围作战，4日，攻占口泉、平望及马坡山，四面迫近大同，与守军激战。

△　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与进军伏牛山的河南军区部队会合，奉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豫鄂陕区党委和豫陕军区，汪锋任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文建武任军区司令员。

△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副秘书长周新民受民盟委派由南京飞重庆转昆明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被惨杀案。6日，梁、周抵昆明。在昆明历时半月调查，22日，梁、周携带全部调查材料返回南京。

8月4日　　周恩来致函蒋介石，严重抗议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如不承认此举为全面内战开始之信号，则请立即制止暴行扩大："一、下令调查此次暴行之经过，并严惩此次暴行之负责者。二、将全国空军置于北平军调执行部管理监督之下，以保证中国空军不参加中国内战。"

△　国防部发言人谎称，所谓国军飞机轰炸延安，其任务是奉令炸毁6月降落于延安机场的B—24型国军飞机，以免被共军用以对付国军。执行轰炸任务之飞机并未经过延安上空。

△　行政院长宋子文、参谋总长陈诚分别由沪、京抵庐山牯岭，向蒋介石报告军政近况。

△　陕西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在西安发表谈话，限令中共军李先念部立即离开陕境。

8月5日　　蒋介石通知司徒雷登，表示同意成立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五人小组，政府和中共各派两名代表，以司徒雷登为主席，讨论获致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协议。

△　中共延安总部发言人为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本部已电令南京、北平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重抗议，除要求国民党道歉赔偿外，并要求完全禁绝在内战中使用任何空军。

△　周恩来、董必武第三次致函邵力子，请政府允派中共代表出席巴黎国际和平会议。

△　北平军调部宣布，应国共双方代表之请，该部派特别小组赴出事地点调查安平事件真相。

△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组织条例》，设处长一人，秘书四至六人，随员四至六人，主事六人，专门委员四至六人，顾问二至四人，雇员四至六人。

△　经济部长王云五在京中枢纪念周报告敌伪工矿接收情况，共接收2411单位，移转者577单位，发还者127单位，已复工者852单位，标卖者114单位，未处理者951单位。本年度预算变卖敌伪物资收入5000亿元，迄今仅得半数。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美国目前对华政策仍一如代理国务卿艾奇逊6月28日所宣布者，绝无变更，并无从华撤退美军之意。

△　下午，中国《密勒氏评论周报》发行人鲍威尔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席作证，历述前首相东条英机及其他26名战争罪犯罪状。

8月6日　　司徒雷登由牯岭返回南京，对记者谈称，在牯岭与蒋介石广泛详细地交换了对时局之意见，其对和平解决仍极有希望。

△　司徒雷登在京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在5日所提的五人小组会议

中共必须接受的初步条件：除实行停战令、恢复交通协议及军队整编方案外，“一、苏北共军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二、共军应自胶济铁路撤退；三、共军应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的地区撤出；四、东北共军应退入新黑龙江、嫩江及兴安省；五、共军应撤离6月7日以后在山东和山西两省内所占领的地区”。蒋还强调，中共接受此条件即停火恢复谈判。周表示，该条件太苛，违反政协决议，任何一项中共均不能接受。中共仍要求无条件停战，召开政协综合小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周强调指出，蒋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也不能卸脱参加内战责任。会后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内战形势：“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

8月7日　　中共主持召开的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举行，出席代表187人，中共东北中央局及民主联军总部代表彭真致词，号召大家为中国实现独立和平而奋斗。会议决议成立“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为东北各省行政之最高机关，选举林枫、吕正操、张学思、周保中等27人为该办事处之行政委员。11日，通过《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15日，行政委员会推选林枫为主席，张学思、高崇民为副主席。同日，联席会闭会。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中宣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报告战事情况，称苏北共军决淮河多处，阻碍国军行动。山东无冲突，中原李先念五万之众仅剩7000人。山西共军正准备攻大同。东北共军正在发展实力。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政治大学，隶属教育部。

△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史蒂文森在庐山牯岭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8月8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庐山牯岭会谈，马向蒋转达周恩来

不能接受蒋对五人小组所提的五个条件之意见后，并指出，政府方面现在的做法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美国的舆论对蒋及政府压制人民民主和自由的行径已极为不满。蒋认为，中共的谴责多为歪曲。并要求马如果在京与周恩来协商有任何达成协议之可能即通知他。晚，马歇尔由牯岭冒雨返回南京。

△　司徒雷登在京与青年党领导人曾琦等交换对时局之意见。曾表示，在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原则下，愿与友邦人士共同努力，在实现政协决议，变更政治形态，进入宪政阶段，在安定繁荣的原则下，愿与朝野各党共同努力。

△　军调部调查安平事件之小组由北平乘美军用车赴出事地点安平镇调查。政府代表要求先听地方政府报告，中共代表要求先去中共军司令部，双方各执己见，调查无结果，当晚返回北平。

△　上海各大学校长暨教授吴保丰等64人联名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请美国“对中国国民政府继续予以协助，藉使民主与统一之中国早日奠定基础”。

△　关于遣送归国侨胞赴原居留地事，经侨务委员会办理外交部与有关各国交涉结果，首批决定五万人，在上海、厦门、汕头、广州四港集中，然后至香港后即由“联总”负责送至南洋各地。

8月9日　　俞大维访马歇尔，谓整个军事形势更加恶化，中共军大规模进攻大同，同时破坏了山西与河北之间以及同蒲铁路。同日，司徒雷登向马叙述与周恩来会谈情况。同日，周恩来访马歇尔，详述中共对谈判以来的看法，认为蒋介石没有和谈的诚意，而是在按他自己早已选定的路线行动。

△　北平军调部三委员致电武汉程潜、南阳刘峙、老河口孙震、西安胡宗南暨中共军李先念，告以三委员拟订之中原停止冲突之临时协定，政府军停止追击，双方各以现在据点退后10英里。中共军应停

止移动，派代表9日抵西安与第九或第三十二小组会商。

△　上海市工商界请愿团吴蕴初等47人赴国府请愿，要求：一、加强银行专业化，改善金融措施；二、速办生产贷款，抢救金融危机；三、实行进出口连锁制度；四、组织复兴实业投资公司，请求工业救济贷款2000亿元。文官长吴鼎昌表示即向蒋介石请示。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签订透支800亿元贷款合同。此为中央银行成立以来所办最大贷款。

△　南京中外记者16人乘飞机巡视战火殃及的苏北泛区，目击数百公里之田园房舍尽成泽国，窑湾、东海（海州）、灌云等城及陇海路之运河站等均被洪水浸绕，若干村落人畜绝迹。

△　重庆各界联合组织成立“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史良在会上号召“把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坚决要求政府彻查惨案真相，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与生命安全”。大会发表宣言，要求政府严处凶手及祸首，撤换云南警备司令，保障人民自由与安全，立即明令撤销中统、军统及一切变相的特务组织。

8月10日　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谓国共和平调处难获妥协，“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几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但双方难获致发布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关系于军队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撤兵地区之地方政府究竟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　马歇尔、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会谈。周希望美国调处成功，否则，中国将陷于内战或“国际干涉”。司、马向周提出非正式建议：中共军应：一、从整个苏北撤到陇海路以北；二、撤出胶济铁路；三、撤出热河含承德以南的地区；四、退入新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省。周认为此问题都是6月29日以前五人会议上讨论的老问题，希望关于6月

29日以前没有解决的军事事务的任何建议，应在这时解决；地方政府的问题应交政协的政治小组处理。

△　俞大维与马歇尔会谈，俞提出形势恶化的责任全在于共产党违背协定。马谓导致形势恶化是由于双方进行了军事报复行动，而且双方各不能正确估计对方。并指出：蒋介石在防止共产主义的努力中，以它目前的财政、经济的混乱和内战，正在创造对共产党政权有利的种种条件。

△　美总统杜鲁门致蒋介石函，表示对中国日益恶化的政治军事形势深为关切，对政协决议不能实施而失望。并指出，如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不能确保在短时期内有真正的进展，美政府将重新解释对华政策之立场。

△　中午12时，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言人情报司司长何凤山说明保侨情况，正积极交涉东京涩谷、新侨区7月19日晚日人枪击华侨惨案；对于法军6月21日在越南南圻槟省新香市杀害旅越华侨，7月10日、13日在距西贡两公里的富寿村杀害华侨的暴行，中国政府特向法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凶、赔偿。

△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开封以东的兰封至徐州以西60余公里的李庄车站间200余里之宽的正面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将该段铁路线控制占领并破坏。

△　中共苏北新四军向海安以东之立法桥和李堡反攻，激战至11日晚，全歼国民党军第一〇五旅及新七旅。

△　“联总”远东区代表在沪举行特别会议，中、美、英、法、苏、印、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代表出席。“行总”署长蒋廷黻说明财政措施，本年1至7月，共支出900亿元，其中370亿元为分署所用，300亿元为储运局所用，80亿元为附属机关及其他用。各代表要求“行总”增加运输效能，救济物资不能作政治用途，分配不平均的现

象必须纠正。

△　中共八路军第七纵队独立第一、第二旅向徐州西陇海路上的黄口、砀山进攻，经两天激战，12日攻占砀山。13日，整十一师由黄口向西进攻，与中共军连续激战，19日攻占砀山，中共军退往单县。

8月11日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京会谈，周认为司、马联合声明表明美国政府认为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了，司徒雷登即予否定。周提出接受蒋介石五项条件之前提：一、中共军在苏北配置一个师；二、中共军完全撤出胶济铁路；三、除承德外，热河南部之中共军撤走；四、满洲除安东外，问题易解决；五、山东、山西，只要政府方面采取同样行动，中共军撤出6月7日以来所占领的城镇。

△　司徒雷登在南京基督教协会举行之抗战胜利周年庆祝礼拜致词，谓“民主政体为现行政体中之最佳者；然如国民缺乏责任心，亦可演成最劣之政体”，凡基督徒及中国之青年，均应为民主之实现而努力。

8月12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七月的总结，评司马联合声明》的社论，指出美国七个半月的“调处”和“援华”，导致了更大的内战”。“马歇尔可以宣布自己使命的失败，但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国民党反动派横行到底”。美国应放弃片面援助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撤走陆海空军，中国人民是有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　司徒雷登在京对记者谈，“吾人正期待谈判之进展，余将不放弃希望，直至吾人认为无从为力为止”。外间对司、马联合声明反响悲观，“是吾人所预料者”。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抵庐山牯岭，旋对记者谈，交通不能恢复，军队不能整编，为当前威胁和平两大因素，欲求和平，必先去其威胁因素。

△　上海《中央日报》报道，绥远省府令各县普遍训练壮丁，18岁至45岁男丁一律入营，以县为纵队，乡为大队，保为中队，甲为小队。自卫队枪支弹药由政府补助，战利品则政府不取，预定年底训练40余万壮丁。

△　张嘉璈在沈阳欢迎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东北农业现况，东北约750万户，其中540万户为农民，东北之繁荣，必赖于农业之发达，现在生产低微之原因是肥料、水利不足，农机短缺，种籽低劣。

△　中央银行向华盛顿国际复兴建设银行汇股本894万美元。按：原股本为六亿美元，国际货币金融会决定因受战争损失过大者，先付总额2%，此中0．5%还可在五年后筹付。中行原已付六万美元。

8月13日　徐州绥靖公署薛岳部为策应郑州绥靖公署作战，令整十一师由徐州西面的黄口沿陇海线向西发动进攻。19日复攻占砀山，中共八路军第七纵队退向单县。

△　国民政府令，兼任捷克斯拉夫国特命全权大使金问泗免兼职，特任梁龙继任。

△　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对记者谈，马歇尔无返美之意，司、马联合声明十分完善。

△　国民党军第一八一师在陇海路民权地区与中共八路军激战，被八路军击毙、俘获7000余人，师长米文和仅率随从数人逃走。

8月14日　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日文告，宣称国共谈判破裂和国家经济的窘困，责任均归共产党。又谈政府今后对时局之方针：一、结束训政时期，建立立宪政府，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二、坚持政协决议；三、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以完现政协的和平建国纲领；四、遵守1月10日停战协定，只

要求中共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的地区；五、如果中共保证执行各项协议，政府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分歧；六、必当尽力解除对和平的威胁。

△　彭学沛在京对外国记者谈国共军冲突情况称，刘伯承以27个团的兵力向陇海路兰封一线发动进攻。山西共军正围攻大同，张家口已成为共军向山西一带策动军事进攻的总根据地。

△　民盟代表罗隆基对记者谈蒋介石之庐山文告，“其中若干与事实不相符”，所列六项方针，“其前三项即完全与政协精神违反”。罗认为在朝在野党都要反省，“彻底停止内战”，“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国家问题”。

△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接见青年党领袖曾琦，征询国是意见。曾表示拥护蒋介石之文告，希望庐山成为和平的发扬地。

△　北平军调部美方代表罗伯逊、中共代表叶剑英由平飞京，向马歇尔报告安平事件。

△　西安调处工作经第九小组三方面代表一致协定，自是日零时起正式宣布停止。

△　中共豫东八路军攻占杞县。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对意大利战争结束日期应为1943年9月8日，对德国战争结束日期为1945年5月8日。

△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表《继续抗战精神，努力完成建军》一文，历述八年抗战中空军战绩：击毁敌机568架，创伤603架。击毙敌官兵3.8282万名，骑兵3800名，战马5472匹，击毁敌舰30艘（内航空母舰一艘），其他船舶252只，创伤1347只，击毁车头及车厢2548辆。中国损失：轰炸机473架，驱逐机1229架，空地勤人员死伤6794人，其中空勤军官死亡827人，失踪332人，伤残970人，死伤占

空勤军官总数的二分之一。

8月15日　蒋介石接顾维钧转来杜鲁门本月10日密函。杜称，如中国内部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其本人将重行审定美国立场。蒋“既甚以为异，又甚以为辱”。

△　马歇尔在京会晤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安平事件。

△　马歇尔由京飞牯，四上庐山，声称为和谈奔走。宋子文同行。

△　陆军总司令军法处暨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第十三团组织军事合议审判法庭，对杀害闻一多之凶犯云南警备总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及该连排长李文山审讯，该二犯供称，因闻一多在“追悼李公朴会中辱骂政府痛诋军人，迫于一时愤激，共同行凶”。民盟代表梁漱溟、周新民参加观审。

△　民盟代表梁漱溟、周新民在昆明致函顾祝同，谓“观审闻案后，发现该案疑窦甚多，请勿定案”。16日，梁、周再函顾祝同，要求将该案审讯记录抄送一份，顾拒绝。19日，梁访顾，问询该案是否要再审，顾面有难色，答称：“我做不得主。”

△　李立三由哈尔滨飞抵沈阳，商订遣送中共控制区域之日俘、日侨协定。

△　陇海路中段国民党军夏邑、虞城、永城联合总指挥蒋嘉宾率所部5000人起义，参加晋冀鲁豫解放军。

△　内政部警察总署在南京成立，唐纵就任署长。

△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所属政治行动委员会及美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分别上书杜鲁门总统，要求将美军从中国全部撤退。

△　美国圣公会南京传教师马琪在东京战犯法庭陈述日军南京暴行，称“南京大屠杀”诚为一“不可置信之恐怖行为”，日军进入南京即开始杀人，不久即变为有组织的屠杀。

8月16日　蒋介石在庐山接见马歇尔。马在行前探询周恩来对蒋在14日发表的文告的意见。周声明，仍须立即全面停战；要求政府，并须由国共两党事前商讨，延请司徒雷登大使参加，俟获协议后再咨商他党；须待政府改组后方得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军决不自苏北撤退，并要求在东北方面驻扎三个师，分三个地点集中；地方政权问题须重行选举，并须商谈选举办法。蒋则提请马注意两点，中共是否愿意放弃以武力夺取政权以及组织波兰式的极权政府的本质；能否不受俄国指挥，而不妨碍中国的建设与打击美国在远东的政策。

△　国民政府令：公布《货物税收条例》；《货物统税条例》着即废止。

△　国民政府公布《国产烟酒类税条例》。烟叶征税50%，烟丝征税30%（先纳烟叶税），酒类征税80%。

△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飞抵大同视察防务。

△　美国陆军部宣布，在华美军不撤退。

△　伪满皇帝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作证，陈述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及参谋板垣征四郎等组织伪满洲国胁迫其充当伪满皇帝之阴谋。

△　邱清泉第五军由宿县分两路向西北进攻。19日攻占永城及大回村、鲁楼等地。22日，攻占夏邑、韩道口。25日，军部进入砀山。26日，攻占虞城、马牧集。中共军退向单县，陇海路徐州至开封间战事暂寂静。

8月17日　宋子文与马歇尔在庐山会谈，宋谓蒋介石14日文告主

张正确，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愿意在正常的基础上进行政府改组。

△　美国陆军部次长彼特森及美对外清算委员会委员麦凯布偕随员28人飞抵上海，与国民政府商谈让与太平洋各岛剩余作战物资及借款问题。

△　马歇尔之代表在京问询周恩来，中共是否派代表参加国府委员会。周表示只要履行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随时即派代表。

△　交通部长俞大维由京抵庐山牯岭，对记者谈称，此来为向蒋介石报告恢复交通步骤。

△　中共代表李立三同军调部美方代表就东北遣送日侨、日俘问题，获得协议。

△　延安《解放日报》载，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一年来，东北民主联军与地方武装毙、俘蒋军14．6963万名，缴获枪支4．1254万支，各种炮558门，轻重机枪1540余挺，高射机枪57挺，冲锋枪453支，各种子弹78．7万余发，汽车153辆，电台两台，坦克五辆，战马3093匹，飞机五架。民主联军死伤三万余人。

8月18日　　行政院长宋子文发表声明，谓中央银行调整外汇汇率，政府取消出口税，目的在于："一、鼓励输出减少输入；二、激导侨民汇款回国；三、扶助国内生产事业。""今后且将继续运用黄金储备，以稳定国内币值。"

△　军调部政府代表郑介民送交中共代表叶剑英备忘录，内称如果中共军不停止围攻大同，政府军将对中共区三个主要城市（延安、张家口、承德）之一发动猛烈攻击。

△　宋子文由庐山飞沪。晚，宋与美陆军部次长彼特森等商谈购买美太平洋剩余作战物资及借款问题。

△　太岳八路军攻占晋南重镇洪洞县城及赵城县城。至此，灵石至临汾北200余里之同蒲路全为八路军控制。

8月19日　　蒋介石致函杜鲁门，称中国政府已于8月14日发表对时局方针，“将尽力与马歇尔将军合作”，“以求达到彼此共同之目标”。

△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京对记者谈，调整外汇汇率，旨在扶助国货，鼓励出口，减少消费品之输入，此次调整，全由宋子文主持，财部18日始知。

△　中央银行宣布调整外汇汇率，由美金一元合国币2020元提高到3350美元。中央银行公布外汇汇率调整后，是日，沈阳、天津、广州、杭州、上海、昆明、兰州、成都等地黄金、美元顿时暴涨。

△　上海市长吴国桢邀请各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开会，吁请商民在外汇汇率调整后，与政府合作，稳定物价。并说明：“米、煤、油、布、面，政府决不使涨价。禁绝摊贩，协助百货。公用事业，也不预备涨价。”

△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牯岭会谈，蒋表示“只有国府委员会的问题达成协议，才能同意发布停战命令”，这是重大让步。马指出：“战争一再拖延，对政府是不利的。”20日，俞大维告知马歇尔，不要向中共代表谈及蒋介石昨日会谈时的主张。

△　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成都被暴徒殴辱。

△　国民政府派李平衡为中国出席第二十九届国际劳工大会第一代表。

△　溥仪在东京战犯法庭陈述日本控制东北经济情况，日人的重重剥削使“中国蒙受可惊之损失”，在其侵略经济之下，在东北建立的64家企业公司的资本达数十亿日元，一切银行俱操日人之手。还称，

27名主要战犯之一前“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为关东军下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控告梅津美治郎使用压力强行在东北推行神道教以先奴化东北人民，并称自己完全是日人的“招牌而已”。溥仪在次日的出庭中又作证详述了日人统治东北奴役中国人民情形，称在其鼓励日人移殖东北的策略下，20年内日本移民到东北者达600万人，而东北人民被驱至荒芜不毛之地。

8月20日　司徒雷登由北平飞回南京，对记者谈，获悉中共全面动员，令人惊异。全面的内战开始，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的问题，应当循政治方式解决。

△　马歇尔由庐山牯岭飞回南京，与司徒雷登长谈时局至深夜。

△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淦宣布自是日起，台币与法币的汇率，由台元一元折合法市30元改为台币一元折合法币40元。

△　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为筹救济款举行“上海小姐”及平剧、歌星、舞星“皇后”选举。王韵梅以6．55万票（即6550万元）当选“上海小姐”，言慧珠以3770万元当选“平剧皇后”，韩菁菁以2000万元当选“歌唱皇后”，管敏莉以2315万元当选“舞国皇后”。此次共募款2．2亿元。

8月21日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会谈。司建议先进行改组政府的谈判。周认为，在谈判前要弄清三个问题：谈好改组政府之后，国民政府能否保证放弃8月6日的五条，立即停战以及根据政协决议商谈成立国府委员会。如不保证这三点，谈判仅仅便利于政府拖延时间。

△　蒋介石接见比利时驻华大使戴尔福，接受其递呈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所赠文哲博士学位证书。

△　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就物价上涨对记者谈，政府19日调整汇

率后，各地物价上涨，政府已通令各省、市政府严密监察，不准奸商抬价，中央党部、团部亦已通令各地党、团部协助政府平定物价。

△　军调部调查安平事件的第二十五特别小组离平赴出事地点调查。主要成员：美方代表马丁上校，政府代表张叔衡少将，中共代表黄逸峰少将。

△　中共华东野战军向苏北如皋以东的丁堰、林梓反攻，激战至22日，国民党军交警第七、第十一总队及第二十六旅一团大部被围歼，少数突围逃至白蒲。

△　东北保安长官部郑洞国部在热河向中共晋热辽野战军发动进攻。右路石觉之第十三军分别由黄土梁子、天义向宁城攻击前进，24日占领宁城，集结平泉。左路周福成之第五十三军分别由绥中、秦皇岛向西攻击前进。

△　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正式就任第四绥靖区司令长官及长春警备司令。

△　徐州绥靖公署薛岳指挥所部向苏北运河西岸地区之中共军发动进攻。夏威之第七军为右翼兵团，辖第一七一、第一七二、整六十九、整七十四师，分别自泗县、长直沟、古城集、双沟镇、庙山圩、单集四面向睢宁、宿迁进攻。冯治安之左翼兵团，辖整二十八师、整五十九师、整七十七师，分别由曹八集、板桥集向台儿庄西南地区进攻。

8月22日　司徒雷登与马歇尔会晤，司氏建议马向蒋介石继续施加压力，迫使蒋发布停战令，以便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马表示赞成。

△　司徒雷登问询俞大维，蒋介石是否仍然坚持五项条件。俞答，由于中共军沿陇海路发动进攻，整个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即使

中共完全接受蒋之五项条件，也不会对问题的解决有实质性的帮助。“中国没有和平的希望，而且苏联对中国构成一种威胁”。五项条件是政府的最低条件。

△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会谈。司再次建议成立非正式小组先谈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问题。周表示中共愿意讨论国府委员问题，并谓，非正式小组开会谈好改组政府之后，国民政府能否保证立即停战；最好一面开非正式小组会议，一面谈停战，否则谈判会拖下去。

△　宋子文与周恩来在京会晤，商谈时局问题。此为宋子文参加和平谈判之开始。

△　张君劢、张东荪等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与海外华侨所组织的宪政党宣告合并，定名为民主社会党。宣称以渐进的步骤，以民主的方式达成社会主义为政纲。该二党合并后，将仍积极参加民盟工作。

△　中共代表团致民盟主席张澜慰问电，内称“李、闻追悼会，特务捣乱，先生受惊，谨致慰问”。“成都暴行，更证明昆明暗杀为特务系统所为。不粉碎特务系统，中国人民不能安生，民主政制无法建立。为民主，必须反特务，愿与先生共勉之”。

△　东北中共控制区域之日本侨、俘首批遣送到长春。

△　马歇尔通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谓由于华北国共军事冲突，国民政府军增援部队向华北调入，美军保护运煤列车及铁路桥梁的职责将由政府军接替。

8月23日　马歇尔与周恩来在京长谈，就国共谈判中一系列重要争执问题交换意见，周特别指出：如果战争无限地打下去，将迫使共产党进行全国性的战争。如果国民党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将迫使中共在其辖区域也开一个大会。

△　为美国陆军助理等到华同宋子文谈判出售战时物资和蒋介石

正准备以中国的航空权与美国分享一事，周恩来致电马歇尔，指出蒋正以过去美国转让的军用物资从事内战，在此时机又转让剩余物资等于火上加油。“我受令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坚决反对对中国领空权的任何损害。”

△　马歇尔与俞大维会谈，俞坚持先开五人小组会议，然后再讨论蒋介石提的五项条件。马指出：“形势在继续恶化，有可能迫使共产党寻求外部的支援，例如苏联的援助，这最终会使得和平解决的任务更加困难。”

△　马歇尔由京飞牯岭，为调处时局五上庐山。

△　蒋介石在庐山夏令营结业典礼致训词，勉其以“力行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努力“完成国民革命成功的使命”，党员“无所谓权利，而只有义务；无所谓享受，只有牺牲”，“必须勤劳努力，为民众服务”。

△　财政部长俞鸿钧、国防部长白崇禧应蒋介石电召由京飞抵牯岭，俞对记者谈，政府对金价、粮价、物价之抑平极有把握。

△　太岳八路军攻占晋南同蒲路上之霍县县城。

△　历任汪伪政府驻日大使、外交部长、广东省长等要职的大汉奸褚民谊在苏州枪决。

△　柯克通知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洛基，饬其对当地的国民政府军司令官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军尽快接管当时由美军保护的所有桥梁、运煤列车及煤矿的警卫职责。

8月24日　蒋介石在庐山接见马歇尔。马提议组织五人小组，专门商谈国民政府改组问题，而不涉及其他行政院的改组或停战问题。蒋勉允一试。

△　周恩来致函蒋廷黻，说中原部队被迫撤出，不少人躲避国民党军清剿和迫害，逃亡武汉，请救济安置。我方在宣化店负责救济工作的七名人员，被国民党军扣留，望查寻并促早日释放。

△　苏北战事愈趋激烈，国、共军在邵伯鏖战。如皋、睢宁、铜山等处战火不绝。

8月25日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昆明发表闻一多被杀案审判经过及结果，杀闻凶手云南省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第三连连长汤时亮及该连排长李文山判处死刑，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由陆军总部看管，派何绍周为警备总司令。

△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在北平对记者谈，政府处理闻一多案“吞吞吐吐”，“破绽甚多”，民盟希望政府把这一政治暗杀案坦白公布，“把这一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　民盟负责人张君劢、张东荪、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梁漱溟、周新民等在沪发表书面谈话，阐述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抗议这没有理由的内战”，主张全国立即停战，实施政协决议。现在当政的国民党必须实行民主，保障各党派人士和人民的安全与自由。

△　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之第九十九旅由黄桥向如皋开进，图谋援救林梓，行至分界，被新四军第六、第一两师包围，激战至27日，该旅全军覆没。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牯岭对记者谈，今后将以电影作为教育工具，普遍深入地进行国防教育。又称“国防部有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地方安宁之绝对把握”。

△　上海市学生总会发表告全体学生书，抗议各校提高学费，要求政府及教育当局对各校无理提高学费予以有效制裁。

8月26日　中共代表团在京招待新闻界，散发新华社印就的《群

众周刊》社论《立即无条件停战，实行政协决议》，作中共对时局之正式声明。周恩来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14日文告，不仅未改变紧张局势，“而且更加恶化了这一局势”。“自6月7日到现在，政府军已损失了16万人”。“六月商谈中，协议已达成90%，但政府不签字，反提出要求中共退出苏北、热南、胶济线及安东等地区，甚至行政亦须退出，遂使全部和平谈判前功尽弃。在商谈陷于僵局之后，司徒大使曾建议先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中共表示愿予以考虑，唯有两条件：一、是否改组政府谈妥后即无条件停战；二、是否政府放弃中共退出苏北等五项要求。但政府始终未放弃其五项要求，且无条件停战亦无表示”。

△　周恩来向马歇尔设在南京的总部递交抗议书，谴责美国和国民政府在沪商谈转售剩余战争物资，蒋介石正打算让美国“分享中国航空权”作为对美国援助战争物资之酬劳。

△　石觉第十三军由平泉分两路向承德中共军队攻击前进。

△　刺杀闻一多之凶犯汤时亮、李文山在昆明由宪兵团执行枪决。

△　中共哈尔滨公安机关破获国民党阴谋大暴动案，捕获主犯姜鹏飞（蒋介石委任的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李明仪（国民党中执会敌后工作委员会东北四省分会军事委员）、崔大刚（第六路军第三军军长）。姜等潜入哈尔滨，已组织队伍600余人，计划本月28日暴动。9月9日，中共哈尔滨军政当局对姜、李诸犯公审，10日枪决。

8月27日　美国陆军部次长彼特森及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主席特别帮办麦凯布为中美买卖剩余物资发表声明，称该剩余物资纯系民用物品，并未包括军火在内。谈判中更未曾涉及中国民用航空权问题。

△　中共驻沪发言人严厉谴责中美关于剩余物资之买卖，指出该项物资之谈判，实为美国以大量物资投入中国内战中，违背杜鲁门总

统去年12月对华政策宣言，违背莫斯科三国外长公告及联合国宪章。

△　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对记者谈，国务院已令外国清理委员会调查不守规则，以剩余作战物资转交中国之责任。美国已将作战物资转交许多国家，惟对中国已停止此种措施。

△　马歇尔由庐山返抵南京。行前与蒋介石长谈，就五人小组、政协会议、苏北、胶济、大同、承德及东北诸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　王树声率领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到达湖北房县之上龛，建立鄂西北军区。

8月28日　马歇尔与俞大维在京会谈，马指出：一、应尽早建立国府委员会，作为导致和平解决的步骤；二、中共主张停战，但不能肯定这种主张会继续多久，如果战争蔓延到满洲，招致苏联介入，将是国民政府的祸根。晚，俞访马，谓经蒋介石批准，政府指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和内政部长张厉生为五人小组成员。

△　司徒雷登在京与周恩来会谈，司徒向周转告蒋介石对停战的声明：鉴于有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不需要发布停战命令，需要的是共产党停止作战。周表示，毛泽东可能向中共军发布停火令，希望马歇尔向蒋施加压力，使蒋亦采取同样行动。当周得知蒋已要宋子文派两人参加非正式小组谈判改组政府，谈好后马上成立国府委员会之事，指出：首先应下停战令，如蒋不做，在召开非正式小组商妥组织国府一事后，蒋仍不停战就是欺骗。成立非正式小组的目的在于从速解决问题，不能以此拖延，否则我们要发表声明。

△　上海《周刊》出版休刊号，马叙伦著文指出国民党想用武力解决共产党，“只是有自讨苦吃，终归失败，是必然的”。

△　军调部三委员会议议定，安平事件由第二十五特别小组继续调查，其争论之问题，由三委员继续解决。

△　马歇尔指示洛基将华北美军撤退的时间表递交华北政府军司令长官，以作促使尽快接替美军防务之声明。同日，洛基电告马歇尔，由于政府军在这一地区的进攻战已开始，无兵力接防，请缓交替。

8月29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反对美、蒋罪恶买卖的声明，谓美国陆军部次长彼特森与蒋介石政府商谈出卖美国在西部太平洋之巨量剩余战争物资，将价值20亿美元的物资仅以五亿美元低价出售，以换取中国之领空权与延长中国内战。美、蒋的此项协定及同类谈判中的任何密约协定都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对此决不负任何责任。

△　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对记者谈，购买美军在太平洋剩余物资，商谈已半年，此乃中美互助，中美民用航空磋商完全是另一问题。中共将此不相涉之两者混为一谈，系任意曲解。

△　中共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自7月13日至8月27日，新四军粟裕部在苏中保卫战中击败蒋军汤恩伯之进攻，七战七捷，消灭汤军七个整编旅（即七个师）之多，俘获五万余人和大量美国装备。

△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京会谈，周表示赞成召开以司徒雷登为首的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中共以周和董必武为代表，集中精力讨论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并要求马从蒋介石处获得对中共8月21日提出的保证作出明确答复。马解释，谓迫切要求赞同成立五人小组的是他本人而不是国民政府，他已几乎停止了对国民政府军事方面的一切直接支持。但当前的宣传运动中，他受到中共、苏联及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攻击，这会使停战更加困难或成为不可能。

△　民主社会党致函民主同盟，要求“民盟重要声明均须预先取得本党同意”。

△　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等中原突围部队经两个月苦战在陕甘边境之阳庆与彭德怀亲自指挥前来迎接的中央警卫第三旅会师。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王震，“一、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二、你部即在陇东适当地点休整，望与陇东党政军接洽”。

△　石觉第十三军攻占中共部队驻地热河省城承德。并继续向北推进，热河战事扩大。30日，该军攻占隆化县城。

△　吕梁八路军攻占晋中汾西县城，至此，太岳、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　军调部调查安平事件之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之中共代表黄逸峰以未获得叶剑英的命令，不能前往调查。美方和国民政府代表要求立即出发，双方争执，未成行。

8月30日　　中共延安总部发言人对记者谈：“凡为着进攻解放区为目的而运载军火或军队或军官到内战前线的一切飞机，我们都下令射击，因为这些飞机无论来源如何，都是参与了作战行为。”主张把空军放在北平执行部管理之下”，“尤其坚决反对蒋政府强迫征用民航机从事内战。”

△　周恩来与王炳南往访司徒雷登，就改组政府问题交换意见，再次明确要蒋介石放弃8月6日所提五条要求，并立即下令停战。

△　马歇尔与俞大维会谈，俞责怪美国政府没有批准中国政府购买军火的请求，这将使国民政府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马表示，美国只能支持联合政府下的国家军队。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决议，通过吁请政府及中共迅即停止冲突，恢复商谈，以实现和平统一案。

△　马歇尔由南京飞牯岭，为国共和谈六上庐山。

△　赴昆明处理李、闻案之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抵牯岭向蒋介石复命。同日离牯飞京。

△　财政部美籍顾问杨格博士回国前发表声明，谓其任财政顾问逾17年，因体力不支，不得不离华休养。中国当前之首要关键问题，是裁减军费，开创和平局面，以求财政稳定。

△　《中央日报》公布《东北工业损失概况》，内分电力、电气、煤矿、燃料、钢铁、五金、机械、化工、纺织、交通、军火，共11大类。

8月31日　　上午9时半，蒋介石接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商谈五人小组会议原则及政府问题。蒋力主从速实现扩大政府基础，希望中共即将国府委员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提出，政府委员名额问题可由五人小组商讨。

△　行政院长宋子文与美国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主席麦克勃在沪签订购买美国太平洋剩余物资合同。该项物资原成本为五亿美元，现以5500万美元让售。此物资不包括飞机、军火或未先改为民用之军用品。

△　周恩来致函宋子文，就黄河、淮河、沂河、沭河等涨水冲破多处堤岸事，要求江北运河工程局立即开放沿江各坝，以免苏北人民遭受水灾浩劫。9月2日，再次致函宋子文，谴责国民政府不但不开放沿江各坝，反而不断轰炸高邮附近堤身，扫射修堤人民，致使堤岸又告溃决，演成宿、沭、灌各县空前水灾。再次强烈要求开放沿江各坝。

△　杜鲁门致蒋介石函称，盼望中国停止内战能达到满意的政治解决。中国的内战威胁消除后，美国援华的政策不会变更。

△　司徒雷登由京飞沪，对记者谈："中国今日必须致力于统一与和平，然后始可建立强大之国家。"又称："美军在华北之任务，从前为协助遣散日侨，目前则为暂时协助保护铁路。"

△　新四军经两昼夜激战，是日攻占苏中南线重镇黄桥，国民党军第一八七旅残部全被俘。

△　军调部调查安平事件之第二十五特别小组由平抵安平、继续询问有关证人曹玉亭等三人。中共代表黄逸峰认为安平政治环境既变，一切证人证物不足信。三方代表同意将一切材料留待以后讨论。

△　在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限令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于8月底撤销的情况下，朱德电令办事处所属人员撤返延安，并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要求拨给交通工具，保障沿途安全。

△　美军驻华北海军陆战队司令洛基再电马歇尔请示，华北美军与政府军的接防将从9月23日开始至10月15日结束。马即指示，要求将接替时间提前。

9月

9月1日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五人小组成员吴铁城，重申："八一四文告中六项原则务必贯彻，而尤以扩大政府基础一项，促其迅速实现。视政府改组完成后，再协商其他五项原则。"

△　周恩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的签订，抗议美国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并宣布，中共赞成司徒雷登所提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但政府应保证按政协精神办事。又强调指出，五人小组会是非正式的。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开幕，出席代表800余人，兼团长蒋介石致开幕词称，"这次大会的性质和任务，要彻底检讨三年来整个团务进行的利弊"，"互相交换工作的经验，厉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以策进今后工作。

△　民治党正式成立，重要负责人为司徒美堂、赵昱、朱家兆、

骆介子等，多系海外华侨。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司徒报告组党经过。接着发表对时局主张。

△　聂荣臻指挥中共军猛攻大同，与大同守城军楚溪春部激战竟日，攻占水泉湾飞机场。4日攻战火车站。至此，大同市四面均为中共军控制。

△　董其武之暂三军由归绥向东开进援救大同。5日，攻占卓资山。8日，抵中共军绥远总部所在地集宁西郊。

△　八路军陈赓之太岳部队攻占同蒲路中段傅家滩及矿区。至此，同蒲中段270余里全部被八路军控制。

△　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在天津访问美驻华北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中将，骆基谓安平事件发生，美军初无预感，绝无政府军队参加。

△　蔡廷锴等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在香港发表对时局主张：一、反对任何政党把持政权不放，军调部必须恢复仲裁调处，使国共双方停战；二、反对任何国家援助某一党派助长中国内战；三、要求政府实行四项诺言；四、反对国民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

△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自是日起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内部组织与人事除增加一调查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外，均无变动。3日，重庆行营、武汉行营均改称行辕，一切内部组织均照旧。

△　台湾省今起正式发行新台币，以一对一之比收回印有“大日本帝国”字样的旧台币。

△　美国众议院军委会议员夏弗等11人视察太平洋美军基地及驻防日本之美军后，是日抵沪。宋子文、吴国桢设宴招待。

9月2日　　蒋介石接见马歇尔，告以改组国民政府与召开国民大会、请中共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及重行颁发停战命令三事应同时解决，而停战命令乃为政府所持的最后一着。马歇尔则仍急于要求停战。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诚、朱家骅、蒋经国、谷正纲、贺衷寒、郑彦棻、罗家伦、邵力子等29人为主席团成员。

△　五人小组政府代表吴铁城、张厉生由庐山返南京。吴对记者谈，五人小组专为讨论改组国府委员会而设立，只讨论中共参加国府委员会之名额问题，并不涉及其他。

△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向热河境内长城一线进攻，攻占中共部队驻地冷口等重镇。

△　国民党军冯治安部整五十九师、整七十七师以猛烈炮火掩护，强渡运河，占中共部队驻地台儿庄。

△　军调部调查安平事件小组访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孙希望小组于调查后获得公平合理之解决。孙之副参谋长高松元谈："安平为政府控制区域，在安平事件发生之时，并无政府军参加，事后亦无美军在该处协助政府作任何活动。"

△　冯玉祥赴美国考察水利，乘"美琪斯将军号"轮离沪，孔祥熙、张之江等送行。

9月3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谈称，须政府对中共两项要求（即无条件停战，放弃蒋介石提出的五项要求）有圆满答复，中共始能出席五人小组会议。

△　司徒雷登与吴铁城、张厉生在京会谈，吴表示，以最大诚意参加五人小组会议，决不提出任何先决要求。

△　周恩来抵南京，与非正式五人小组中共代表董必武，接待政府方面五人小组代表吴铁城、张厉生，询问政府方面将如何保证停战，在吴、张回答奉命只谈改组政府、军事问题未在权限内时，表示：不保证停战，不放弃五条，改组政府无从谈起。

△　国民党中央在京举行抗战胜利周年纪念会，白崇禧致词称，必须用建设来保障胜利硕果，国家必须统一，政令、军令应统一，“一切妨碍统一之力量，均当排除，此为政府之责任。”

△　国防部决定在全国42个军管区恢复征兵制。

△　军调部调查安平事件小组由北平飞抵张家口，访中共晋察冀边区司令聂荣臻，聂希望调查小组调查后，合理公平解决，并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不幸事件。

△　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指挥所部在鲁西定陶大杨湖、天爷庙、大黄集将国民党军整三师（原第十军）包围，激战至6日，将该师全歼，生俘中将师长赵锡田及师部八大处全部人员。

△　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在青岛对记者谈，“美军在华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和平与安定，并协助中国建立海军”。“美国不愿与中国内战发生任何关系，惟此亦将视内战发展之情势而定”。“海军舰只将经常停泊于中国沿海各口岸，目前驻青岛舰只约五十艘”。

△　美众议院军委会视察太平洋基地之议员团由沪飞京，议员西克斯在京机场对记者谈，访京目的在于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会晤，借使美国人民对中国有一较深刻了解。同日，议员团与司、马会晤后飞往北平。

△　曾任江苏省伪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及吴江、无锡等伪县长、现为太湖匪首的杨彦斌在无锡向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投诚，表示愿招抚太湖为匪之旧部，肃清匪类。汤即允准。

△　驻沪美军法庭判处虐杀美飞行员荷克的日本前任香港总督、日军第三十四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及其参谋长福地春功少将绞刑。按：1944年秋，荷克少校驾机轰炸香港，飞机失事被日军逮捕，处其死刑。

9月4日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京会晤，长谈时局问题。周表示，政府方面拒绝全面停战，不放弃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中共不能参加五人会议。同时，周尖锐批评美国将剩余物资转售给政府。马认为在五人小组提出改组政府以外的问题，以致将一事无成。

△　延安中共发言人对记者谈称，“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终于完成了西太平洋大宗战争物资的让售谈判，这种行动无异于挑战”。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此种协定。

△　参谋总长陈诚在京对中外记者谈军事兴革情形，谓政府已将59个军整编成59个师，需再编31个师。整编部队已完成60％，另30％因职务关系无法整编，但政府将继续完成整编方案。同时详述各地共军最近发动新攻势的情形。宣称国军将进攻张家口，8月6日的五项条件不能放弃。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京开工作检讨会，署长蒋廷黻报告该署成立以来工作概况。蒋介石向大会颁训词，对该署工作成绩表示称赞。

△　第一战区胡宗南部整一军第一师及第三师攻占晋南翼城，继向浮山进攻，与八路军陈赓部激战于浮山太阳城间。

△　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社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武装搜查，搜去《群众周刊》72本。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向内政部提出抗议。

△　上海接收敌伪物资要员叶燕荪少将，因接收舞弊，敲诈勒索黄金140两，国币880万元，并收受汉奸贿赂200万元，是日由淞沪警

备司令部处决。

△　美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部发布任命：华北美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调任太平洋区司令，驻节旧金山，由现任南卡罗林群岛派里斯岛基地司令霍华特调任华北美军陆战队司令。

9月5日　　周恩来会见马歇尔、司徒雷登，表示可再一次让步，同意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谈改组国府委员会办法，但必须明确三点：改组国府委员会按政协决议程序办理，应由政协综合小组最后商决；在商定改组国府委员会办法后，政府是否同意立即下令停战；政府是否放弃8月6日的五项条件。马、司表示后两项无法保证。

△　马歇尔与俞大维在京会谈，就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所碰到的主要问题，即无条件停战和蒋介石的五项条件交换意见。

△　国民政府特派戴季陶为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县长挑选委员会委员长；派周钟岳、张厉生、史尚宽等10人为委员。

△　财政部公布《营业税移交地方接管办法》、《契税移交地方接管办法》、《土地税移交地方接管办法》、《国地共分各税征收缴纳办法》。

△　美军驻北平宪兵开枪打伤辅仁附中高三学生曹桂明。7日、8日两日，北平学生集会抗议美军罪行，并联名致书杜鲁门总统，提出严重抗议。

9月6日　　周恩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在京会谈，商讨召开五人小组会议问题。周提出，政府是否可能在五人小组提出与停止冲突有关的某些要求（例如五项条件）。马表示，政府会提出某些要求，但他尽量说服，将其条件调节到中共能接受的程度。同日，周与司、马校正由周草拟的《七、八两月谈判要点总结》。周向他们表示，中共不能再无限忍耐，要求美、蒋表示明白态度。

△　俞大维与马歇尔会谈，俞称，蒋介石对五人小组会议取得进展很感兴趣，蒋想了解中共是否坚持同时讨论停战。马称，中共坚持政治、军事问题同时讨论。并指出“国民政府的宣传运动正在使问题的解决日益困难”。

△　朱德致电孔从周，对他率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于5月15日在河南巩县投向中共，并于近日安抵河北邯郸市表示欢迎和慰问。

△　马歇尔为谋打开和谈僵局，携带与周恩来校正后的《七、八两月谈判要点总结》由京飞牯，七上庐山。

△　中国民主社会党在沪发表对国是主张：一、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二、拥护统一，反对国内有两个政府，两种军队，政党不应有军队；三、要求实行民主；四、实行社会主义。并申明对时局之态度：一、改组政府；二、召开国民大会；三、实现整军方案；四、和平统一。

△　美国商务部公布，本年上半年中美贸易中国入超2.08亿余美元，美输入中国之货总价值2.49561亿美元，中国输入美国之货总值4075.2万美元。

9月7日　　行政院饬各县市设立佃租委员会，解决推行二五减租中地主与农民之纠纷问题。

△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巡视新疆两月余后回到南京。于对记者谈，新疆新政府成立，张治中主席励精图治，今后永久和平必可实现。新疆甚富庶，有些地方还比内地好。

△　青年党主席曾琦在北平对记者谈，时局之解决，必须以实现政协决议为前提，先停战，边谈边打不能解决问题。

△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史蒂文森在京对记者郑重否认英国参与中国之和平谈判，谓英政府“且从未有令其他人士参加是项谈判之任何

建议”。

9月8日　　蒋介石在牯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训词，号召全国青年参加三青团，但入团做官的观念必须打破，“应立志从事基层建设与社会改革工作”。

△　经济部长王云五在沪对记者谈今后工作重心，行政方面，将在全国主要工业大城市设立工商督导处，代表该部扶助民营工商业。挽救入超危机办法：一、提倡节约；二、减低国货成本；三、提高国货质量。

△　晋冀八路军在平汉线北段漕河站歼灭企图打通平汉线的高德林暂第二十八军两个师9700余人。

△　国民党军周福成第五十三军攻占热河喜峰口及迁安县。9日，攻占古北口。11日，攻占遵化。

△　“行总”工作检讨会闭幕，署长蒋廷黻提出今后工作任务：一、“联总”运华物资三分之二未到达，须集中力量完成该工作；二、提高办事速度；三、克服官僚化；四、各分署不能逾权处理物资和经费；五、物资经费应达于贫困者之手；六、厉行考核分署工作人员；七、各分署应与各地机关团体配合工作。

9月9日　　中共驻京代表团发言人就国民党方面指责中共军在作战中放毒气事予以驳斥，谓中共军现无化学兵种，根本无毒气可放，官方此种宣传之目的是为其施放毒气作掩护。并严申，凡国民党指为放毒气之地区，应允中外记者立即乘飞机前往参观，以明真相。

△　上海市参议会开幕。出席议员170人，共收到提案341件，准市长交议案五件，收到人民意见书及请愿书10件。市长吴国桢作《施政报告》，包括粮食、工潮、房荒、社会、警察、教育、工务、公用、卫生、财政10个问题。

△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经济部长王云五由京专程前往参加。王致词称，交易所是完全法制的经济组织，在目前，政府对其暂采监督制度。交易所理事长杜月笙称该所之使命为：一，吸收并运用游资，以增加生产；二、消纳游资于正轨，以稳定金融，安定小民生计；三、确立现代资本市场机构，从而推行国策，补益财政。

△　美国纽约争取和平委员会及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决定本月22日至28日举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全美35个主要城市同时举行群众大会，“要求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9月10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牯岭商谈时局，蒋表示“在国府委员会成立后，地方问题可提交国府委员会处理”。

△　马歇尔由庐山牯岭飞抵南京。马即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备忘录，内容略为：一、蒋介石同意：（一）如果中共同意五人小组实施恢复交通的协定及以前商定的停止冲突和满洲军队重新分布的条款，并实施军队整编协定中关于中共军驻防地点的规定，则停止冲突的军事条款将由国府委员会解决；（二）江苏地方政府问题由国府委员会解决。二、蒋介石声明：（一）希望宪草委员会恢复工作；（二）在停战令发布之前，中共必须指派国大代表。

△　青年团二全大会通过团纲、团的工作方向，团员的基本职责及服务项目等法规。

△　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在市参议会报告称，上海现有娼妓不下10余万，警局现正以“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三项原则对娼妓实行管理，使之“寓禁绝于管理”。

△　国民党军苏北绥靖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所部向中共华中军区泗淮地区发动进攻。钟纪第七军第一七一、第一七二两师由洋河镇向泗阳攻击前进。12日，攻占泗阳城。13日，第一七一师渡过运河。14日，攻占众兴镇。15日，攻占来安镇。20日，攻占渔沟镇。中共

军退往涟水。

△　南洋华侨领袖东南亚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及马歇尔、司徒雷登，谓蒋介石政府“是腐朽的暴政，以欺骗、劣迹及反动成性的霸权为其特征”，要求美国停止一切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并从中国撤退美军。

△　苏浙皖区敌伪物资清查团团长张知本等抵杭州。张言浙省接受物资已标售200亿元，现尚余物资不足100亿元，故告密不多，清查较易。

△　国民政府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因病给假，派邓锡侯代理。同日，张群乘美军专用机离沪赴美治病。

9月11日　马歇尔与周恩来在京长谈，讨论10日备忘录所列各问题。周认为蒋介石不断提出新问题，不利于停战。应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以寻求发布停战令的某种基础，这一措施也将使五人小组便于采取行动。马认为“如果三人小组会议不与讨论国府委员会同时进行，或先作出改组国府委员会的努力，那只不过又回到以前的僵局而已”。会谈无结果。

△　马歇尔与俞大维会谈，马首先转述了在牯岭与蒋会谈的内容及回京后与周会谈的情况。俞认为“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共产党军队各师和政府军队各师之间的比例问题。如果在地区分布上安排共产党10个师的驻地，全部问题就解决了”。马认为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已引起目前的僵局”。

△　三民主义青年团二全大会通过取消团员年龄限制案。并选举中央干事、监察，经兼团长蒋介石核定，陈诚、蒋经国、贺衷寒等72人当选为干事，谭平山、朱经农等49人当选为监察。

△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三十六年度（1947）政府施政方针案，

并通过各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直隶于国民政府案。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记者招待会上谈，中共如真能与政府合作，冲突即可停止。政府不主张武力解决中共问题，只切盼恢复安宁与秩序。中共所信仰之马克思主义及极权主义，早见于周秦诸子之中，中国无人畏惧此等古旧学说。

△　下午3时，全国性文化社团联谊会假南京香铺营公余联欢社举行成立大会，出席有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中华全国美术会、中国合作事业协会、中国著作人协会、中华农学会、中国天主教协进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回教协会等30余单位代表胡一贯、李浚目、刘子亚等50余人。议决改称中国文化社区联合会，各省设立分会，使成为永久性会社。

△　国民党军石觉第十三军攻占热河丰宁。

△　前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由沪飞庐山，会见蒋介石，商谈“行总”物资空运问题。

9月12日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京会谈，表示中共十分重视行政院的改组，行政院改组的问题必须早日在政协综合小组处理。并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解决所有军事问题。司徒雷登希望周能向他或马歇尔秘密提交一份国府委员会共产党委员的名单，被周拒绝。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牯岭闭幕。兼团长蒋介石致词，要求其“遵循大会宣言各点，身体力行，克尽时代所赋予之重大使命，勿蹈能说不能行之覆辙”。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略谓该团自1938年3月9日在武昌成立，八年抗战中，发展团员达140余万人。该团今后的任务是：“充实内部，强化组织，明确规定工作方针”，与国民党在“同一主义，同一领袖之下”担负共同之任务。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刘伯承将军指挥所部在陇海路中段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胜利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的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南方前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　国民政府公布《资源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该委员会隶属行政院，其职责为创办及管理国营基本重工业、重要矿业、动力事业及工矿电力事业。

△　胡琏整十一师攻占鲁西定陶，中共军刘伯承部退往菏泽。

△　上海市长吴国桢向市参议会提交五议案：一、增加房捐；二、举办市政捐；三、征收清洁捐；四、公用事业附缴市政捐；五、恢复赛马。

△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新任驻教廷公使吴经熊在京对联合社记者谈称，其遵蒋介石之命，1943年开始译《新约》全文，于今年2月始完成。在抗战军事最严重的时刻，蒋“日理万机之余”，亲自对译稿“专心致志校编，前后凡三遍”，为译本与其会晤长谈20余次。

△　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在华盛顿演说，重申对中国联合政府之希望，谓：“除非有一统一和平之中国——建于该国各团体之合作，且居于不干涉政策之上，否则在中国之贸易，门户开放，以及经济发展机会，即为无意义。”

9月13日　马歇尔由南京飞往牯岭，为和谈事八上庐山。

△　邯郸四万人集会，庆祝西北联军第三十八军成立，军长孔从周、副军长刘威诚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通电，表示“今后将与八路军并肩团结，保卫人民利益而奋斗”。

△　下午，张平群以华语向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与非官方团体交涉委员会议讲演，是为联合国开会以来首次应用华语，同时译成

英、法、俄、西等语。

△　日本战犯酒井隆经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8月27日判处死刑，是日在南京雨花台枪决。

9月14日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内称“最近反共战争正如火如荼之际，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又订约，让售价值8.25亿美元之剩余物资与设备，这种火上加油的办法，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愤怒”。“受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1.4亿人民，对此项交易，经过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冻结援蒋物资。

△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会谈。周坚持要政府保证，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会中有14票；坚持要政府早日发布停战命令。如果做不到，就没有必要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

△　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着改为西昌警备司令部，隶属于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特派贺国光为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兼西昌警备司令；特派傅秉常为中国出席莫斯科国际电信预备会议代表团团长。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干事、监事会议选举陈诚为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陈诚、李蒸、张其昀、贺衷寒、赵仲容、何浩若、郑彦棻、袁守谦、黄少谷、黄宇人、倪文亚、蒋经国、程思远、何联奎、汤如炎15人为常务干事。谭平山、朱经农、朱光潜、刘健群、李曼瑰为常务监事。

△　司徒雷登在京对记者谈，其对目前局势甚为焦虑，“余与马帅抱有同一意见，即先自政治问题着手，而后解决军事问题”。

△　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暂三军、新三十一师、骑兵第十一、十四纵队、第三十五军及骑四师向集宁发动全面进攻，在空军协助下，

攻占集宁城。中共军贺龙部向东退走。

△　立法院会议提议，建议最高国防会议令行政院转饬各级政府及各级军事机关，不得禁止有关政论学术思想刊物之发行。

△　陈纳德离庐山飞上海，其组织空运机构运送“行总”救济物资事已与蒋介石谈妥。

△　中共东北解放区之日侨除安东外，全部遣返完毕，共遣送20余万人。

△　香港英当局发言人发表谈话，否认九龙为中国领土及中国在该地区行使治权。16日，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郭德华会见港督杨慕琦爵士，声明中国不放弃条约权益，得在九龙设治。

△　汉奸梅思平经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是日在南京首都监狱刑场枪决。按：梅历任汪伪政府组织部长、工商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职。

9月15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牯岭会谈，马转述周恩来对10日备忘录的意见。蒋表示，一旦五人小组对国府委员会作出达成协议的表示，就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关于国民大会，中共应提交他们的代表名单。

△　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致马歇尔函称，自停战令生效以来，政府方面违令调动180个师（旅），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占政府军总数的85％，“规模之大，乃为二十年来内战所无”。美国政府又以价值11.25亿美元的物资让售国民政府，助其内战。鉴于目前情况，请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问题”，“愈早愈好”。

△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王世杰外长返回南京。王对记者谈，此次和会较上次和会公道，英、美均声明不向战败国索取赔款。我国虽然蒙受战争之巨大损失，始终亦未提赔款问题。和会“原

则上处理军事问题较为严格，处理政治及经济问题较为宽大”。

△　晚，围攻大同之中共军开始撤退。16日晨，大同国民党军攻占外围据点八处。

△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因指挥陇海路中段作战惨败，损失军队八个旅，被蒋介石撤职，由顾祝同到郑州接替刘的职务。

△　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煤矿和铁路桥梁的美海军陆战队的防务开始由国民党军接替。30日，移交全部结束。

△　海内洪门组织民治建国会在上海成立，林有民、许君武、刘澄宇、刘惠民等为主席团。大会发表宣言，谓该会“以为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以完成社会建设，光大民族文化遗产，以树立建国风尚，实为确立民治基础迈进宪政阶段之先决条件”。

△　青年党主席曾琦在长春对记者谈，“今日最关紧要者，为民主政治之实现，而民主政治取决多数，所有问题，均可于国会或以国民总投票方式决定之”。“目前吾人当致力者，实为宪法之制定，使民主政治得以确立”。

9月16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牯岭会谈，蒋坚持必须司徒雷登为首的五人小组会议已经召开，并对达成组织国府委员会的基本原则作出某种表示，他才授权政府代表参加三人小组会议。马就国府委员会席位问题建议，中共九名，两个少数党各四名，无党派三名。蒋表示同意。

△　周恩来由京飞沪，并在沪致马歇尔函，谓因事须赴沪，有事请与廖承志、王炳南联系，三人会议一经决定召开，即可返宁。

△　国民政府令：“各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应直隶国民政府。”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指示不论在战役或战术的部署均得“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　监察院长于右任在京中枢纪念周报告视察新疆观感，谓新疆“各族均爱好音乐”，新疆400万人口中，维吾尔族占大多数，其次是哈萨克，乌孜别克，其余俱为少数，汉族为少数之少数。

△　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吴化文部攻占山东济宁。

△　湖北省府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焚毒大会，焚烧接收敌伪物资委员会所存烟土4.8856万两，吗啡2174两，烟具1753件，共值110亿元以上。

△　上海市参议会通过《请政府积极进行交涉收回香港、九龙、澳门及其他因不平等条约割让与租借之土地，以维持土地领权之完整案》。

△　冀高检处宣布伪新民会创办人、副会长张燕卿无罪释放。按：伪新民会创办人中，张与缪斌齐名，缪已由江苏高院判处死刑枪决。

△　京杭国道正式通车。

△　陈诚在沈阳召集军事会议，布置东北内战。国民党军东北前线高级将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以及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梁华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等出席。

9月17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牯岭会谈，蒋明确表示：缔结停止冲突的协定是他迫使共产党指派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的最后王牌。他要利用战争的继续来确保参加国民大会的所有政党提出代表名单。

△　苏北绥靖军钟纪第七军、张灵甫整七十四师攻占苏北淮阴县

城西门，中共军第五纵队、新六师、第七师增援淮阴，战况异常激烈。19日，中共军全部撤离淮阴，退往涟水。

△　青年党主席曾琦在长春向中央社记者发表三点书面意见：一、吾人应提高民族自信心；二、国家未统一，内战未休止之原因在于团结力不足；三、国家长此乱而不治，势将招致外侮，切望国人提高警觉。“救国之道，法治为先”，只要“政协决议之宪草原则通过于国民大会”，和平统一不难实现。

△　陈纳德在沪对中外记者谈来华组织空中运输队协助“行总”运输之情况，该队本四原则工作：一、给灾区人民交通之便利，早归故里；二、协助灾区重建；三、为灾区运赈粮；四、改进交通，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预计每月运输救灾物资1000吨。

9月18日　国民政府令：民国三十年（1941）上期以前各年田赋旧欠，着一律豁免。

△　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京对中外记者谈中国对外政策，凡与我国缔结商约之国家，在互惠原则下，我国仍门户开放，欢迎外国输入资本技术。中国抗战最久，损失最大，日本赔偿之资产，应得优越之比例。

△　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主任秘书沈冠亚向上海市参议会报告该局工作概况后，各参议员群起质问，认为过去接收工作毫无成绩，处理不当，反而成为剥削人民的机构。

△　“联总”远东区会议在沪召开，蒋廷黻任主席，讨论“行总”之交通运输及欧籍难民之遣撤问题。欧籍在华难民约15万人，仅遣返820人。“联总”运华物资已达100万吨，“行总”运输速率必须与之相合。

△　中国国民外交会上海分会秘书长汪竹一向记者称，该会对港

府发言人否认九龙仍为中国领土及中国目前在该区不得行使治权一事，表示愤慨。该会除呈报总会转请政府予严重交涉，使早日收回九龙租界以维护主权而彰正义外，刻正草拟大纲，交付讨论，以期获得结论。

9月19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记者谈，中央已训令驻南京代表团要求马歇尔将军冻结美、蒋最近成交的“剩余物资”。美国对华贷款和“租借物资”已达28亿美元，此巨款“除用于内战及供国民党官吏贪污外，未闻作任何建设之用”。

△　周恩来在沪对联合社记者谈，“本人暂已退出南京政治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国代表进行无意义之磋商，此项磋商，殆为掩饰中国内战情形”。“除非蒋主席同意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本人将不返南京”。

△　马歇尔致周恩来函，内称已将15日函中的建议转告蒋介石，蒋表示“在举行以司徒博士为首的五人小组会议，并且对有关国府委员会组织的协议获致若干进展之前，将不授权三人会议的政府代表出席会议。”

△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会商时局，力谋打开沉闷之僵局。司、马会谈后，司徒氏对记者谈，“吾正等候周恩来返京，仍盼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可以召开”。

△　俞大维会晤马歇尔，就美国停止装备中国空军，问询美国国务院拒绝对向中国出口的弹药核发必需的出口证一事。马答，这是美国高级官员发出的一项政策决定的结果。

△　行政院公布《军粮计核委员会组织规程》，为全国军粮拨购协调，特于中央及主席行辕（绥靖公署、战区）分设军粮计核委员会。由参谋总长任主任委员，粮食部长及次长二人、财政部长及次长二人、国防部次长一人、联合勤务总司令、交通、农林二部次长各一

人为委员。

△　行政院公布《行政院各部、会、署及各省、市政府派遣人员出国考察或实习办法》。

△　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16日自集宁分两路南进，是日，一路攻占凉城，一路攻占丰镇。

9月20日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绥远致毛泽东长电，劝中共放下武器，促成宪政。表示："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一员的资格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现在的职位，我不仅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促成。你们如果不嫌的话，我自己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而绝对忠实地服从你。"

△　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盟员大会主席王廷俊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吁请竭力避免军事冲突，以和平方式达成联合政府。10月8日，毛复电，略谓本党以和平民主与独立为奋斗目标，但国民党好战分子持有美国外援，坚持独裁和内战，"希海外侨胞诸贤达再接再厉，为祖国之和平民主独立而努力，敝党亦本此方针，奋斗到底"。

△　周福成第五十三军与石觉第十三军会同攻占冀东中共军最后据点兴隆县城。

△　胡琏整十一师攻占鲁西菏泽县城，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部退往巨野。

△　新任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包毅德中将及第十九驱逐舰队队长蒲斯莱上校分乘巡洋舰"贝尔法斯蒂号"及驱逐舰"特拉法尔加号"来华首次访问，抵南京下关。同日，包毅德分别拜会马歇尔、王世杰、白崇禧等。

9月21日　周恩来在上海接阅马歇尔19日的备忘录，得知蒋介石

提出须在非正式五人小组商谈组织国府委员会确有进展之后才能召开三人会议，即致马歇尔备忘录，谓解决严重局势的中心在于停战，停战的惟一合法机构是三人会议，要求立即召开。指出，改组政府并不复杂，只需同意中共及民盟在国府委员会中占14席，以保证政协共同纲领不变即可。蒋介石则称，“共产党所切望者在停战，而其所不愿者在参加国民大会；至于参加政府，则不过为其夺取政权之一种手段而已。此乃共党对我政府之策略也。而其最大关键乃在反对美国之调解，此成为苏俄之授意耳。故我军收复张家口以后，可宣布停战十日，由马歇尔电共党商谈”。

△　国民政府公布《证券交易税条例》，凡八条，规定各种有价证券，万元以下者，按万元计，现货交易，征万分之五，交易期在七日以内者，征万分之十五，逾七日者，征万分之二十，政府公债，现货免征，七日内征万分之五，逾七日者征万分之十。同日明令废止《交易所交易税条例》。

△　内政部公布《国民身份证实施暨公务员首先领发办法》。国民身份证中央及省级公务员于本年10月办完，省会及省辖市民国三十六年内办完，各县由省政府统筹规划。

△　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与大同守军楚溪春部在大同北面得胜堡会合，中共军从大同外围全部撤退，自8月初开始的大同之战全部结束。同日，傅作义部主力向张家口攻击前进。

△　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李正先第十六军、牟廷芳第九十四军分别由怀柔沿永宁赤城及平绥路向张家口推进。

△　攻占淮阴的国民党军沿运河东岸南进，与新四军激战，是晚攻占淮安。中共军退往涟水。

9月22日　蒋介石由江西省府主席王陵基及皖赣监察使陈肇英陪同巡视南昌第六军官总队及中正大学，分别对军人、学生训话，勉其

为建国多作贡献。随后游北坛故居，凭眺赣江景色。

△　周恩来在沪对记者称，大规模内战正在全国进行，国民党军以其257个师中的206个师，即170万人进攻解放区，1月至8月，攻击达6000次。6月《东北停战协定》满期至8月下旬，国民党军死伤已达20万人。

△　马歇尔向俞大维递交周恩来21日致马备忘录抄本，并就该备忘录所提问题进行讨论。马强调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支持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他过去愿意从事于种种方案，仅仅是因为这些方案是为人民利益考虑的。

△　中共代表王炳南会晤马歇尔，面交周恩来要求全面停战，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的备忘录，并告以如政府不允停战，中共将公开宣布谈判的经过情形，以明内战的责任属谁。马表示待细读后，再与政府方面商讨。王辞出后对记者谈，此为中共第二次提出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亦系最后一次要求。

△　中共中央决定，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两个指挥部合并。

△　《中央日报》报道，广东省府奉命在中国南海西沙群岛上设置卫戍，并实行探测资源。

△　苏浙皖接收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团长张知本在沪向各界代表报告两月工作情形后，谈感想三点：一、政府接收处理政策失当；二、接收机构众多，组织散漫，致形成骚扰凌乱；三、处理工作迟缓，接收物资，或隐匿盗卖，或腐烂，未能充分利用。工厂停闭、生产衰落，物价腾贵，人民生活不堪其苦。

△　青年党主席曾琦在天津国民党党部谈，蒋介石结束训政之决心甚值称颂，只有制宪行宪，乱源才可廓清。“青年党为非武装政党，不擅破坏，凡以国家为重者，应同时猛醒”。

△　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等一行完成东北厂矿之视察工作，在沈阳对记者谈复兴东北工业规划，先成立东北电力局、抚顺矿务局、阜新煤矿公司等15个工矿公司。

△　中国考政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京召开，戴季陶、周钟岳、陈立夫等400余会员出席会议。蒋介石颁训词，勉其努力研究“如何贯彻考试权能，健全人事制度，使全国行政不受政治竞争之影响，而能于安定中求不断进步”。

△　王敬久部新第二十一旅攻占鲁西金乡城。中共军退往巨野方面。

9月23日　南昌各界群众10万人集会欢迎蒋介石，蒋在大会上致词，谓：北伐，南昌是第一个前进根据地。剿匪，信仰政府，保乡保国。抗战，江西是抗战胜利的发祥地。新生活运动亦发祥于江西。“期望三年之内，建设江西成模范省”。

△　蒋介石在南昌招待中外来宾，并致词，略谓：“建设事业，必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江西之建设，应自南昌始，全国之建设，应自江西始。”并表示相信三五年内，江西必成为全国之模范省。

△　“国大代表国选事务所”致函驻京各派代表处，催其速提国大代表名单。中共代表团发言人表示，内战犹在扩大中，此举完全推翻政协决议，系国民党单方决定，“所以中共仍如过去所声明的，对此不受任何约束”。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王炳南称，“中共军队在全国采取大规模游击战术，除哈尔滨及张家口两地外，中共将放弃一切据点”。

△　国民政府令：陆军上将衔杨森、刘建绪、黄旭初、罗卓英、李品仙、卢汉应予停役；陆军中将谷正伦、王懋功、刘多荃、万耀煌、刘茂恩、王东原、李扬敬等27员应予停役；陆军少将职田齐等18

员应予停役。

△　上海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全国文艺协会、中国基督教妇女节制会、上海妇女联合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经济事业协进会等10余团体为响应美国人民发起的“退出中国周”运动，组织发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并发表正式声明：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并撤销一切足以助长内战的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　国民党中常委兼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在中央广播电台作题为《我们大家应为民族健康努力》的讲话，号召注重健身运动，促进民族健康，全国厉行防疫，减少疾病死亡。

△　上海《文汇报》报道，内战加深经济危机，国民政府月支达一万亿元，而月收入仅1750亿元，8250亿元依靠发行钞票弥补。

△　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

△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向安理会提请注意中国时局，谓美国海军陆战队留在中国，所造成之局面或可引起国际摩擦。并援引中国名人多人促使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务之呼吁为证。同时请安理会对此予以讨论。24日，安理会以七票对二票否决了苏联代表的提案。

9月24日　蒋介石离南昌飞赣州巡视新赣南建设，赣省府主席王陵基及前任赣南专员多年的蒋经国等随行。蒋介石在赣州凭吊王阳明遗址，参观儿童新村及正气中学，在八井台观看章、贡二江合流处。

△　中共代表王炳南在京对记者谈，延安方面不坚持“无条件停战”，主张由三人小组速商停战办法。“如果须在和平之后，美国方始援助政府，则美国有力量可使局势好转”。

△　中共军陈赓太岳纵队在晋南浮山将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美械装

备精锐第一师第一旅围歼，生俘中将旅长黄正成以下官兵2500余人。

△　出席安理会的中国副代表夏晋麟声明，反对苏联代表葛罗米柯23日之提案，谓“美军驻在华北，旨在完成某项使命，并协助中国政府以减轻处理战败敌国之若干责任”，此项任务何时完成，应由中美两国政府决定。美军在华，从未干涉中国内政。宋庆龄等人抗议美军驻华，乃自由国家中人民常有的批评与反对的事项。

△　国民政府公布《标准法》，该法包括各种单位名称、定义、符号及常数，各种品质及尺度标准，各种试验法标准，各种关系互换性标准，各种安全标准及其他应遵守之标准。

△　北平军调部美方代表罗伯逊飞京，分访马歇尔、司徒雷登，讨论军调部事宜。25日，罗伯逊对记者谈：“执行小组有退出危险区域者，因彼等显已不能遏止战争”，但其否认放弃调停任务。同日，罗伯逊返平。

△　上海市首届参议会闭幕，并发表《大会宣言》，称该次会议所通过之决议，将取严格立场监督市政府执行，尽到400万上海中外市民喉舌之义务，尤望人民督促匡助，以期其成。

△　青年党主席曾琦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谈，该党之主张为“国家主义，民主政治，社会政策”，其特性为“建设性，独立性，综合性”。

△　民盟在重庆出版之机关报《民主报》被国民党当局强迫停刊。

△　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全部集中于北平、天津、塘沽、北戴河、秦皇岛、青岛，该部总数已减到1.4367万人。

9月25日　外交部次长刘锴在京对中外记者就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安理会所提及的美军驻华事发表声明：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协助遣送日本人民，本其为中国战区同盟国一员之义务，亦为中国政府所许

可，吾人并未看出美军驻华将如何引起国际摩擦。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答中外记者称：“中共叫嚷停战，政府更希望停战。但政府所希望者，为真正之停战，而非一时策略之停战。”“苟不实行整军协定，确定共军驻扎地带，则冲突必停而复起”，目前“所谓冲突全面化，实中共宣传，实际上，除热察区域外，其他冲突，几近中止”。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全党，谓本年10月31日为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六十大寿辰，蒋以国家多难，毋事铺张庆祝。“届时除文字致敬外，不必举行任何仪式”。

△　发起组织“美军退出中国”运动的上海10团体聚会决议：一、“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在中国不应有时间限制，直到美军退完为止；二、电联合国安理会，请注意中国局势发展，促美军退出；三、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团体致电致意。

△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沈阳召集东北九省府主席开会，商讨当前局势。

△　皖省府主席李品仙到沪筹募救皖灾款，李对记者谈，皖东北10余县灾民400余万在死亡线上挣扎，黄泛区20余县被水淹田400余万亩，损失粮食达600余万石、房屋10余万间。全省无一县无灾，吁请各界赈济。

△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上海办事处主任宣铁吾派副主任韩城代其慰问谢元晋团长夫人，向谢夫人宣读蒋介石电谕：一、发抚恤金一次；二、谢之遗族送遗族学校；三、上海孤军有证明者，军官送军官总队训练后另委，士兵送往各部队，晋升为副排长；四、派宣铁吾慰问谢团长夫人及部属。谢夫人说，谢团现存200余人，流浪于各地，在沪者仅18人，以擦皮鞋、卖毛巾为生。

△　民治党中央电国民政府，要求国内和平统一，保障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国内各党派协商，从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民主政治。

△　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包毅德离京抵沪，对记者谈称："英国海军界将尽力协助中国海军之重建"，其在京期间，与白崇禧、桂永清等商讨了中国派海军赴英训练问题。英政府以巡洋舰一、驱逐舰一、炮舰一、潜舰二、汽艇八艘让予中国海军。

9月26日　蒋介石自赣州飞抵南京。

△　国民政府任命桂永清为海军副总司令，兼代海军总司令。

△　马歇尔、司徒雷登致周恩来备忘录，谓"目前情势继续下去，对于中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催周"立即回南京，以便我们可以共同为着寻求达到的目标，探求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办法"。

△　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在京对法新社记者谈，日军遣送完毕，美军当然全部从华撤走。政府从未拒开三人小组会议，因召开无济于事，所以至今未开。共军须按政府要求撤退，并取消退出区域之中共地方组织，停战令才能有效。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澜在京签订《中加通商暂行办法》。

△　教育部长朱家骅在京对记者谈中国教育新计划，本年大学生人数在3.5万以上，小学教师60万人，其中师范毕业者仅40%，中学教师50%不合格，急需设师范学校，大量造就师资。专科以上学校设夜校，但并非正式学校。

△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向边区军民发出号召，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日益扩大，蒋军正沿平绥路两面向张家口进攻，边区军民应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全线自卫反击。粉碎蒋军进攻。

△　暂第三军孙殿英部在豫北向浚县、滑县的八路军进攻。27日攻占浚县。29日攻占滑县。八路军退往濮阳。

9月27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京会谈，就召三人小组会议、五人小组会议及达成停战协定等问题交换意见。蒋希望马能提供有益的建议，马歇尔当即拿出一份代蒋草拟的声明，详述停战条件，强调政府在目前的谈判中应取容让的精神和谨慎的态度。晚，蒋告诉司徒雷登，表示赞同是项声明，但须作修改再发表。

△　周恩来在沪致马歇尔、司徒雷登备忘录，谓目前局势恶劣与严重，其并非不欲回京共商停战办法，惟因政府当局不仅无停战表示，更加紧了对张家口、哈尔滨、安东、苏北等地的军事攻势。回京作一般商谈无益，徒骗人民，而为政府放手大打之烟幕，“故宁留上海以待三人会议之召开”。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京对合众社记者谈，上海各界发动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为“上海一小部分同情共产党者所策动”，“美军战后驻留中国，是经中国政府许可的”，对美军驻华，他表示感激。

△　美国政府发言人对记者谈，美军驻华总数不过两万五六千人，“目前如撤退美军，则共军必将截断交通线，割断上海与华南之煤炭供应”。美军在华“尽量严守中立”。

△　马歇尔宣布，美驻华负责经济方面之公使，军调部美方委员罗伯逊将退休回国，其遗职由吉伦中将继任。

△　军调部三委员获致协议，撤退徐州第二十四小组，张家口第二十五小组，济南第二十七小组，宜阳第二十九小组，枣庄第二十二小组，朝阳第二十六小组。

△　朱家骅在京对记者谈，青年失学问题严重，教育部拟尽量扩

充原专科以上学校，中小学校则推行二部制，使一校作两校用。目前专科以上学校共182所，其国立者71所，省立者45所，私立者67所。全国专科以上学生12万人（东北、台湾在外），中学生116.3万人，小学生1860.22万人。

△　自中原突围的王震所部第三五九旅抵达延安，受到延安人民热烈欢迎。

△　傅作义部孙兰峰骑兵集团军攻占兴和，继向张家口攻击前进。

△　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宣布，请求杜鲁门总统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及停止片面援助蒋介石政府之请愿书，已有40万人签名。

9月28日　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致电张厉生，表明：政府方面擅自定开国大，在未经协商前，中共方面不能提出国大代表名单。

△　立法院通过《兵役法草案》，凡35条，共分10章。规定“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义务”，“自年满十八岁之翌年1月1日至届满四十五岁之年12月31日除役”。“适龄女子，平时得施以相当军事、辅助勤务教育，战时得征集服任军事、辅务勤务”。

△　参谋总长陈诚偕代陆军总司令汤恩伯、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等巡视苏北南通。30日，返回南京。

△　上海《中央日报》记者分访外交耆宿王宠惠、王正廷、颜惠庆，向其征询美军从华撤退之意见。颜谈：“在原则上，美国撤退在华驻军是当然的。”王宠惠认为：“美军驻华，是协助中国，是好意，一俟完成任务。随时可以撤退，不必担心。”王正廷说：“美军驻华，是政府外交的问题。”

△　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向报界发表声明：“美国35个城市所召开

45万人的大会，已致电杜鲁门，要求马上从中国撤退美军。”

9月29日　蒋介石通知马歇尔，在发布停战令前，三人小组应为军队的复员和整编达成部队重新配置的协议，五人小组亦应达成协议。并请马向中共转达，他表示赞成同时召开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马认为这种建议不能导致问题的解决，不愿替蒋向中共转达这种口信。

△　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王炳南访马歇尔，商议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同时召开会议的问题。马认为此项建议已向蒋介石提出，但未得到蒋的明确答复，无法进行讨论。马对在调解中所遭到国共双方攻击的苦衷作了很长的解释。董说：“共产党是信任你在调解中的努力的。”

△　邱清泉第五军、胡琏整第十一师由菏泽向巨野进攻，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三、六、七纵队在巨野的龙堌集、张凤集一线进行运动防御。第三、六、七纵队在张凤集激战五天，二纵坚守龙堌集11昼夜，邱、胡两军的进攻被击退。

△　孙连仲指挥第十一战区三个军，傅作义指挥十二战区两个军、两个集团军，杜韦明指挥东北保安军三个军，分三路于凌晨2时向中共察哈尔和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市发动大举进攻。

△　八路军在国民党军向张家口市进攻19个小时后，即向平汉铁路北段发动进攻。经12小时激战，平汉路被截断。至30日，八路军攻占望都、徐水两城及望都、王京、清风店等10余车站集镇，炸毁唐河、沙河、拒马河、漕河、徐水河等铁桥，迫近保定、定兴城下。

△　蒋介石电第八集团司令楚溪春，嘉勉其完成保卫大同之使命。并犒赏全体官兵1000万元。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对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斯蒂

尔谈时局问题。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如美国放弃片面援蒋政策，撤退在华美军，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

9月30日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声明：“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其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由政府方面负之。”并请马转告政府方面。

△　中共代表团致蒋介石函，内称自六月休战谈判中断以来，政府大举在关内进攻，现又以三路大军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该团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由政府方面负之。”

△　民盟政协代表张澜等九人联名电蒋介石，略谓国共两党正在进行中国历史上之空前内战，不可能在此刻讨论制宪大业。“国家必须立即终止内战，立即恢复和平，而后举行全国拥护之国民大会”，否则，民盟不仅不参加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且将呼吁国人共起反对而制止之”。

△　行政院长宋子文发表声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之规定，我国可以无需在本年底宣布其法币外汇价值，因为凡曾由敌人军事占领之各国均可予以此种豁免之规定。

△　中共驻京代表团正式通知政府当局，拒绝参加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因开会日期非政协综合小组规定。

△　蒋介石邀请于右任、戴季陶、孙科、宋子文、邵力子、吴鼎昌、吴铁城、陈果夫、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张厉生、陈布雷、

梁寒操、王云五、彭学沛商谈时局，政府方面对三人小组、五人小组同时召开予以考虑。同日，蒋告知马歇尔，他此时不发表任何有关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同时开会的声明。

△　俞大维与马歇尔会谈，讨论政府同意参加三人小组、五人小组会议之条件，俞重申局势之关键是中共部队各师的驻地问题。马指出，如果会议确实进入僵局，他的使命就完结了。

△　司徒雷登与五人小组的政府成员吴铁城、张厉生会谈，司徒指出，局势不能令人容忍，如果这种局势继续下去，他和马歇尔将不能继续在谈判中充任一方。美国甚至可能退出调停，并撤销对中国的其他支援。

△　八路军冀中、冀晋、冀察三军区为全线出击平汉铁路北段发表声明，谓此举乃为对蒋介石进攻张家口暴行之报复，并表示："决心继续不断以英勇战斗的胜利响应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全线自卫反击的号召，与边区及全国人民一起，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　第二绥靖区调集夏楚中第二十集团军于胶济路东段向八路军胶东军区许世友部发动进攻。集结于潍县、坊子的李弥第八军为西路军，沿胶济线北侧及烟（台）潍（县）公路向东推进。以阙汉骞第五十四军为东路军，从集结地兰村向西进攻。并以交警第一、三、五、十、十二、十五总队及暂十二师协同作战。

△　内政部令："在国民身份证未制发前，各县、市居民出行请求发给证件者，得由县、市政府发给通行证。"

△　台湾致敬团代表邱念台等10余人谒见蒋介石，敬献"国族干城"锦旗一面。另献金5000万元，以慰劳阵亡将士之家族。

△　军调部张家口第五执行小组美方及政府方面的代表分乘六架飞机返回北平。

△　苏浙皖区接收敌伪物资清查团工作结束。团长张知本在沪对记者谈称，经济部特派员接收之财物最混乱，上海“市政接收物资，一言以蔽之，是不清”。“此次接收工作混乱之症结所在，乃为接收物资，而未接收原始清册”。

△　意大利总理加斯巴莱电外长王世杰，重申意大利自动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租界，在友谊及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两国关系。10月2日，王复电称，意大利在巴黎和约前自动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租界，无任感纫，中国愿意与意大利建立友好关系。

10月

10月1日　　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王炳南向马歇尔递交周恩来9月30日致马备忘录。马表示，他“既不同意国民政府的行动方针，也不同意共产党的行动方针”，局势差不多已经到了使他不能继续当调停人的地步了，但亦表示愿将周的备忘录与政府讨论，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　马歇尔致蒋介石备忘录，说明他不同意政府和中共之目前行动，并向蒋声明：“除非觅致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而不是以建议和反建议更事拖延，我将向总统提议将我召回，美国政府亦终止其调处的努力。”

△　宋子文向司徒雷登提出，政府希望在采取任何恢复谈判的行动之前，先夺取张家口。

△　周恩来在沪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略谓全国正在进行“空前大规模的内战”，参加内战的军队比抗战的军队增加了一倍多。九个月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城市107座，村镇5000多。“全面内战的一切责任，都应由国民党政府担负”。美国的错误政策，助长了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如果国民党军继续进攻张家口，美军继续驻华，

中国的内战无法停止。

△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及边区政府致电嘉勉平汉线自卫反击大捷之八路军，并饬："再接再厉，继续扩大战果，把胜利的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心脏。"同日，边区政府派民政处长柯庆施携款2000万元前往犒劳。

△　上海参议会工商请愿团入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要求政府：一、调整银行业务；二、调剂农工商业资金；三、发展国际贸易；四、活泼沪市土地金融；五、补偿沪市抗战损失；六、解决煤荒。蒋介石允将此意见交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后实施。

△　新任军调部美方委员吉伦将军由沪飞平。

10月2日　国民政府对目前时局发表声明，公开答复中共备忘录所提的要求，略谓政府已赞成召开五人小组会议，亦准备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而中共不愿开会和谈，只要求无条件停战，"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自当由中共完全负其责任"。"政府对解决时局可能让步之最大限度"为：一、政府同意国府委员中共八名，民盟四名，由中共荐无党派人士一名。但中共须即行提交国府委员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二、切实实行整军方案，先行规定中共军18个师的驻地，并遵规定期限进入。如中共愿从速解决此二问题，并双方获致协议，政府立即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　蒋介石致马歇尔备忘录，称：国民政府控制张家口对于国家的福利具有绝对重要性，中共如不退出，国军则以武力夺取该城。并提出，如中共同意，五人小组与三人小组同时召开会议；国府委员会名单为中共八名，民盟四名，中共可推荐一名无党派人士，共13名，中共应即提出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迅速规定中共18个师的驻地，限期进入。则一俟张家口战斗结束，就颁布停战令。

△　国民政府任命梁华盛为吉林省府委员兼省府主席，原省府委

员兼主席郑道儒免本兼各职。

△　国民政府特派李迪俊为政府宣慰荷属东印度华侨专使；派金问泗为中国出席世界贸易及就业会议准备委员会首席代表。

△　八路军在平汉线北段继续发动进攻，攻占容城。3日，攻占定兴。

△　中国中和党主席尤永昌由港到穗，尤对记者谈，该党历史已垂60年，为其父尤列所创立，党员分布海外，以南北美洲、马来亚、暹罗、安南为多，中央执行部设于香港九龙。其宗旨为在三民主义决策下，努力建设强大之中国。其最近主张为依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宪还政于民，任何政党绝对不许可有武力存在。

△　英《新闻记报》记者沈森在京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递呈《英自由党致中国人民书》，内称："英自由党认为强大及统一之中国，为持久之世界和平所不可缺者，故彼等对于中国达到此目标所作之努力，深怀同情之关切。"

△　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包毅德抵青岛，视察中央海军训练团及留驻华北海军舰队。代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亦飞往青岛。

10月3日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对目前严重局势两度会谈，马认为政府方面在利用美国的调处进行战争，应明确向政府指出，美国政府不能参与在可疑的不公正的行为里充任一方。

△　司徒雷登向中共代表团建议：一、同意国府委员名额为中共九名、民盟四名；二、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三、撤出苏北；四、撤离大同附近。

△　国民政府派宋子文兼行政院绥靖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兼任副主任委员，张厉生、俞鸿钧、王云五、徐堪、蒋梦麟、袁守谦、邓文仪、邱昌渭为委员，何浩若为秘书长。

△　中共发言人就政府声明对新华社记者谈，该声明避开进攻张家口，表明蒋介石对和谈决心破裂。国民党扩大征兵，却片面要求中共实行整军方案，是其要消灭民主力量的阴谋。“只有在1月10日停战令基础上的和平获得保证后”，中共才能考虑参加政府与国大的问题。

△　孙科、吴铁城等国民党政协代表联名致函周恩来，希其即日返京，“继续商谈，俾和平团结能早日实现”。

△　马歇尔授权美大使馆正式发言人康纳斯向新闻界发表声明：“9月30日中央社南京发表声明，大意为蒋介石委员长同意接受马歇尔将军三人小组与五人小组同时召开会议之建议。将该建议归之于马歇尔将军是不正确的。”

△　驻美大使顾维钧在旧金山对记者谈，上海部分团体“请求美军退出中国与美国停止对华援助，并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之意见”，“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友好与正义援助，均感欢慰”。

△　青年党主席曾琦在京访司徒雷登大使，对其为中国和平统一之努力表示敬意。司徒答称，“劳而无功”。曾希望大使与马歇尔“续作最后之努力”，青年党将以国内第三者协助和平统一之成功。

△　《中央日报》报道：自1月13日停战以来，林彪指挥20万兵力在东北进攻，陈毅指挥15万兵力在山东进攻，贺龙、刘伯承、韩均、聂荣臻指挥九万人在晋绥进攻，陈毅指挥兵力四万余在苏北进攻，贺龙指挥五万兵力在大同进攻。共军对国军总攻击达4852次，日军投降以来共军攻占县城344座。

△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强调如果要实现真正和平，必须双方军队恢复到1月13日停战时的位置并实行全部政协决议。

△　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面粉厂商开会，严格抑制面粉价格上涨，厂方每天销售数须呈报社会局，所有存货本月10日前登记。如违法抬价，不但货物没收，且依法严惩。

10月4日　马歇尔与蒋介石在京长谈。蒋表示不能改变用武力攻占张家口的立场。马最后说："在我们的讨论中没有透露什么可以使我改变观点的事情，事实上，我愈益深信美国政府正被置于其公正行为成为疑问的地位。因此，我一定要向总统提议将我召回。"蒋对此"感到极为遗憾"。

△　董必武、王炳南访马歇尔，声明中共所能同意之停战办法，即为恢复1月间的停战令的效力。国府委员中共与民盟必须占有14席，以便行使否决权。董强调，目前形势最严重的是政府无意停战和进攻张家口。

△　民盟代表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在沪向记者说明对时局之态度，民盟认为"军队必须国家化，绝不许党军存在"。民盟希望美国援华，但须以不参加中国内战和干涉内政为原则。假如国共各自召开国大，民盟反对这种分裂局面。

△　石觉第十三军为配合傅作义、孙连仲两部对张家口的进攻，在热河自隆化、宁化分两路纵队向围场、多伦之中共军发动大举进攻。7日，攻占围场。12日，攻占多伦。13日，攻占沽源。至此，热境大多被国民党军占据，热境战事暂告停顿。

△　国民党军向苏北运河咽喉之重镇邵伯发动进攻，经两昼夜激战，6日，攻占邵伯。

△　上海各界代表2000余人开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吴国桢、潘公展、沈钧儒、郭沫若、张君劢、罗隆基、邓颖超为主席团。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出席。赵丹读祭文，史良、楚图南报告李、闻之事迹。邓颖超代周恩来宣读悼词："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

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会后，周率中共代表团到墓地谒祭陶行知、邹韬奋、杨潮、刘光、鲁迅等。

△　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总部宣布，塘沽西五里新河处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之弹药库于3日晚遭约200名华人武装袭击，美军轻伤一人，华方死伤各一人，伤者被俘。6日，美陆战队总部宣布，据被俘者供称，袭击该弹药库者为中共军某部所为。“彼等袭击之目的，乃欲夺取军器与弹药”。

10月5日　马歇尔电杜鲁门总统及代理国务卿，谓由于共产党恶意的歪曲事实的宣传和攻击，国民政府的将领们扩大军事进攻，使其对中国和平的调处已告失败，要求终止使命，并立即将其召回。晚，蒋介石得知马请求召回消息，即会见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停止进攻张家口五天，若美国调停人坚持，还可以延长，但共方必须立即参加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当晚，司、马会谈，马再电国务院，请将召回电缓发。

△　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驳斥国民政府2日声明，谓该声明并非让步，是又一次破坏政协决议的无理要求。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京对合众社记者谈，国军进攻张家口，乃中共军包围大同之后果。“若共军早日解围大同，决无今日张垣之战”。并强调：“一地之停战，无济于事，政府要求全国永久停战，但此须共军履行整军方案，并将其军队移至规定区域。”

△　蒋介石饬行政院拨款两亿元赈济大同。

△　上海金融市场美钞价格暴涨，物价急剧波动。上海市府及中央银行洽定：取缔美钞黑市，并规定：一、经中央银行指定准备经营外币银号，对美钞买卖不得超过规定电汇定价的5%；二、对旧券不得贬价或拒收；三、倘有巨额买户高价收买者，由该行向市府告密。

同日，宋子文偕财政部长俞鸿钧赴沪，全力抑制市场波动。

△　军调部四平街第二十八小组政府代表马俊之向中共代表张松涛提出抗议，要求中共军无条件从3日攻占的西丰退出，否则引起严重事件，由共军负完全责任。

10月6日　蒋介石与马歇尔、司徒雷登长谈，讨论张家口地区休战事宜。蒋坚持停止冲突须视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情况而定。在马的坚持下，蒋同意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停止10天。蒋要求休战以司、马的建议宣布，而不由政府宣布。

△　马歇尔致司徒雷登备忘录，请转中共代表王炳南，司、马建议，蒋介石同意在下列条件下，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停止10天：一、休战的目的在于实行10月2日蒋介石备忘录中所提出的两项建议；二、由军调部执行小组在一切危险地点执行监督任务；三、停止进攻由司、马宣布，两党均不宣布。

△　马歇尔电告杜鲁门总统和代理国务卿，谓国共和谈局势有新的进展，请取消5日电中关于他要求结束在华调处使命并将他召回的部分。

△　马歇尔密电北平军调部美方工作人员，告以关于对张家口拟以休战的建议，令其制定必要的计划，但须在保密中进行。

△　董必武访梁漱溟，交换对时局之意见。会谈后梁对记者谈称，民盟坚持中共和民盟出席国大代表必须占四分之一，国府委员名额须占三分之一。

△　上海《新闻报》、《申报》、《大公报》、《正言报》、《益世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民国日报》、《和平日报》、《侨声报》、《文汇报》、《立报》、《中华日报》、《中央日报》、《华美晚报》、《大晚报》、《大众夜报》、《新民晚

报》、华东社、申时社、大光社、中央社、中国社等报社的军事新闻记者联名致沪淞警备司令宣铁吾公开信，要求给予采访便利，不要阻碍和封锁记者采访，使记者履行自由采访之天职。

10月7日　　司、马之关于张家口停战之新建议提交周恩来。同日，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发表声明：一、张家口只停战10天，是缓兵之计，决非真正停战。二、停战只谈蒋10月2日两项要求，是限期逼中共作城下之盟，并非平等商谈一切有关问题。三、所谓政府同意全面停战10天之说，更非事实。

△　邓颖超致函国际妇女会议罗斯福夫人、卡特夫人及与会代表，说明彼因国民政府不发护照，无理阻碍不能赴会。特向国际妇女领袖们呼吁，请求“特别关切今天中国是一个怎样没有和平，只有进攻解放区的内战，没有民主，只有压迫人民的独裁国家。并给予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以有效的支援”。

△　国民党军南北两路在鲁南临城近郊沙沟会合，被中共军围困达11个月之久的临城解围。

△　向张家口进攻的傅作义部攻占万全。8日，攻占张北。

△　军调部长春前线指挥所政府代表朱戒吾上校致共方代表备忘录称，自10月3日以来，共军向东丰、西丰、朝阳镇、西安一带进攻，请速制止。8日，政府首席代表邓为仁向中共代表提严重抗议，并声明：如中共不停止军事进攻，国军将采取自卫行动，其后果将由共方负责。

10月8日　　上午，蒋介石在国府先后接受意大利、多米尼加、秘鲁、丹麦新任驻华使节呈递国书。

△　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将周恩来9月30日备忘录、蒋介石10月2日备忘录、10月6日马致司徒备忘录及中共10月8日口头

答复中的要点逐一公布，但未作一字评论。

△　中共代表王炳南拜会司徒雷登，转达周恩来从上海转来的延安对张家口10天休战建议的口头答复：一、休战应无时间限制，除非政府军队撤至原来阵地；二、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应不限于讨论蒋介石10月2日所提出的两项问题；三、中共希望司、马阐明局势。

△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略谓政府为打开和谈僵局，曾提出两个建议：一、由司徒大使召集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政府改组，中共予以拒绝；二、同时召开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中共未予答复。政府允张家口休战10天，讨论政治、军事之关键问题，又为中共拒绝。

△　中共驻沪发言人陈家康发表严正声明，指出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声明及宋子文的谈话与9月29日政府军开始进攻张家口以来的实际谈判经过有出入。

△　董必武、王炳南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会谈。马表示“对共产党目前的立场感到完全迷惑不解”。董解释说，“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全面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而不是十天休战”，“政府表示诚意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它的军队撤回他们的原驻地”。马最后说：“目前，我深恐在谈判中所尽的努力已告终结，这就是我必须要说的全部。”

△　立法院院长孙科在沪对记者谈时局，谓现在的和平空气仍未建立，“似乎还是武力高于一切”。强调在国大召开前，军事行动必须停止。“制宪工作，应由全国各党各派参加，大家一致遵守”。并指责政府财政主管当局的政策“颇有若干错误”。同时，亦认为美军在华并不对主权有多大的危害。

△　周恩来、孙科及民盟、青年党的代表在沪开会议定，派一个第三方面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南京，同政府商议和谈办法。10日，蒋介石托孙科转告代表团，表示欢迎进京。

△　东北国民党军攻占清源县。同日，国民党军攻占苏北高邮县城，打通了运河运输线。

△　中共晋察冀八路军在平汉路北段漕河站将欲打通平汉路的高德林暂第二十八军两个师9700余人全歼。

△　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汉奸林柏生在南京老虎桥枪决。

△　由前英国国会议员、运输业权威鲍尔斯爵士率领的英国商业访华团一行12人抵沪。

10月9日　　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纪念国庆三十五周年讲话，略谓全国达到和平统一的途径，就是要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各党派参加政府，出席“国大”。并强调“政府当务之急在保障统一”，“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政府希望“全面的永久的停止冲突”，虽然“共党坚持成见，致商谈停顿”，但政府“绝不放弃和平商谈”。

△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谓中共拒绝张家口休战原因为：一、中共、民盟在国府委员会中的14席位被变动；二、蒋介石要求立即将“国大”名单交给一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三、实施整军方案，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驻地。并托马转告蒋：“为表示最大诚意和让步，只有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小组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

△　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对外国记者谈，中共拒绝改组政府之商议，又拒绝休战谈判，其目的在于阻碍国家统一。政府仍盼谈判继续，以和平解决。并强调“国大”不再延期，以免国人责难。

△　马歇尔飞往上海，在吉伦将军驻地与周恩来会谈三小时，此为马访周之首次记录。周明确提出中共关于军事、政治之立场。军事：一、双方军队在关内应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6月7日的位置；二、双方军队均应固定，直到整编时为止。政治：一、中

共及民盟应在国府委员中占14席；二、行政院与国府同时改组；三、重新召集宪草委员会审议宪法草案；四、“国大”召开日期和代表席分配由政协综合小组决定；五、地方政府问题维持现状；六、释放政治犯，恢复1月以来取缔的报刊杂志、人民团体，取消秘密警察；七、严格实行军民分治。马声明：对周拒绝张家口休战表示遗憾，他的努力变为徒劳，中共已对他的公正立场不信任，他将退出谈判。同日，马返回南京。

△　参谋总长陈诚在北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军、师长多人。陈诚宣读蒋介石手令，谓“国大”召集在即，为安定民心，鼓励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陈即向与会者征询意见，均面面相觑，明知不能不敢言否。惟李宗仁认为“以现有兵力，无此可能”。并当即用其个人名义向蒋介石电呈“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旋蒋复电准允“暂缓执行”。

△　青年党主席曾琦对记者谈，国家要拨乱返治，期国十事：一、以宪政代训政；二、以议场代战场；三、以建议代破坏；四、以合作代斗争；五、以法治代人治；六、以廉洁代贪污；七、以进步代保守；八、以诚意代诈术；九、以和谐代暴戾；十、以互助代互毁。

△　湘鄂赣区接收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工作结束。该团对其工作未期目的表示遗憾，认为物资分散，情形复杂，清查工作无法着手。“老虎未捉到，苍蝇未打死”。

△　新任“行总”署长霍宝树在沪首次招待记者，谈改善救济工作之成败，一在于工作人员努力，一在于国际物资之数量。该署今后将加强组织，加速把物资运往重灾区。

△　英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来华访问，飞抵南

京，宋美龄等到机场迎接，乐队奏中、英国歌。克利浦斯夫人声明；访华期间，“对英国援华募款所助设之各种事业，将予特别观察”，并保证英国人民尽力协助中国。按：该会于1942年成立，援华募款达180.4823万英镑。

△　中国出席11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代表团人选，确定为朱家骅、赵元任、程天放、李书华、竺可桢，以朱家骅任首席代表。

△　美国外交当局表示，反对苏联将琉球群岛重归日本的建议，美国认为该群岛须归入中国版图，或将其交联合国委托管理，而由中国执掌行政事宜。

10月10日　　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凡10章35条。自即日起，全国恢复征兵制度。凡18岁至45岁的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义务。

△　国民政府通告：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期延至宪法实施后依法当选之总统就职日止”，饬全国各机关一体知照。

△　蒋介石夫妇在京邀请政府要员及各国驻华使节、军事代表团与顾问举行国庆茶会。

△　空军伞兵总队在京明故宫机场举行大规模伞兵战斗检阅，表演枪炮、火箭等新式武器。蒋介石御戎装与白崇禧、陈诚及空军司令周至柔等检阅。到场观众数万人。

△　第三方面代表莫德惠、梁漱溟、陈启天、张君劢、余家菊、缪云台、罗隆基、李璜、章伯钧、左舜生联名提国共和谈建议：一、双方立刻颁发停火令，部队各驻留于现防阵地。停战及恢复交通的办法由三人会议经由军调部执行之，双方军队根据以前协定整编。部队

之分配由三人会议处理。二、全国地方政府由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处理。三、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筹划改组政府。

△　参谋总长陈诚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官兵致词，强调政府当前的方针在保障国家统一，祛除地方割据。军队要为扫除和平障碍战斗。

△　青年党代表李璜以第三者身份为和平谈判积极斡旋。上午分别访梁漱溟、司徒雷登、邵力子。下午，梁访董必武后再与李会谈。晚，梁乘夜车由京赴沪，促周恩来返京。

△　延安各界群众万人举行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暨保卫边区动员大会。大会强烈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并“警告蒋介石，如果国民党一党坚持在11月12日召开伪国民大会，通过分裂卖国的独裁宪法，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解放区人民并将考虑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大会号召边区人民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要打出一个新中国。大会电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称赞该两会发动的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给予中国人民极大鼓舞。并希望继续努力，恢复已故总统罗斯福的国际合作政策，中美人民共建和平民主的新世界。

△　驻美大使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美国发表《中国与美国》演说，谓两国之经济并不竞争，中国欢迎美国合作。

△　东北保安军杜聿明部卢濬泉第九十三军及陈明仁第七十一军一部攻占赤峰。

10月11日　　傅作义部主力董其武暂第三军、鲁英麐第三十五军及孙兰峰骑兵团攻占中共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聂荣臻率中共军南撤涞源、阜平山区。

△　国民政府令：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凡当选之代表

于11月2日亲自来京报到。

△　国民政府令：废止《战时征收土地税条例》。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对记者发表谈话。云：“国大”如期召开，第一届大会之职权，仅为制定宪法。行宪机关待宪法颁布后六个月内，举行全国普遍选举产生。此次大会代表总数2050名，各党派名额，仍照原商定数。望各党派从速提出名单，以便政府早日公布。

△　周恩来会见梁漱溟，表示政府如有诚意恢复和谈，必须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将进攻张家口的部队撤回原防，否则中共不参加任何商谈。

△　参谋总长陈诚乘专机飞北平，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商谈军事局势。12日，陈飞往张家口视察，随又飞往绥远慰问傅作义，当日飞返北平。

△　郑州绥靖公署顾祝同部王仲廉整二十六军三个整编师在豫北道清路西段发动进攻。12日，右翼整三十八师协同中路整三十二师攻占煤矿区焦作。13日，左翼整八十五师攻占博爱，14日，攻占沁阳，15日，攻占温县。17日，整三十八师攻占济源，18日，攻占孟县。至此，将道清路西段全部占据。

△　阙汉骞第五十四军和李弥第八军在胶济线高密附近的柳沟河会合。胶济线上的中共军全部撤走。

△　新华社评蒋介石“双十节”演说是重弹“武力统一”老调，“把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抛到九霄云外”。并指出，“正是由于美国当局的支持，蒋介石才敢下最后全面破裂的决心”。

△　中共中央公布9月30日至10月9日间中共、蒋介石、马歇尔三方面之来往备忘录四件。

△　中央银行在京召开第三届行务会议，到该行高级负责人及各分行经理共120余人。总裁贝祖贻主持，蒋介石特颁训词，勉其认真检讨行务，妥定办法，提高效率，“务使中行今后一切业务，均能确符政府政策，负起领导之大任”。随后，各分行、支行报告当地金融情况。

△　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纱布厂商讨论抑制纱布剧涨办法，吴要求其成立纺织委员会，对纱布作统一配售及评价。对于黑市，定严惩不贷。

△　新运妇女指委会指导长宋美龄在京举行茶会欢迎英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对克氏热心募款援华，表示感谢。克氏表示将继续为援助中国募捐。12日，蒋介石亲赠克利浦斯夫人特等大绶星勋章及褒词一份，以酬答夫人主持援华之功绩。

△　中国妇女团体联谊会等18妇女团体在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黎剑虹谈，本月12日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妇女会，对中国妇女代表之邀请，未能代表全国妇女，所邀的邓颖超，只能代表她自己。

10月12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大如期召开令后，第三方面为和谈斡旋工作停顿。

△　梁漱溟由沪抵京。梁谈，第三方面人士原已决定立即全体晋京，兹以张家口被国军攻占及国大召集令之颁发，使局势全盘改变，民盟代表将暂不去京。

△　青年党、民盟及社会贤达三方面在沪代表访孙科，说明在政府未改组前召开国大，各党派不能出席参加。同时，军事行动不停止，商谈改组政府亦不可能。孙表示向政府转达彼等意见。

△　孙科在沪对记者谈，政府收复张家口，应为和平之转机，目前应停止军事行动，恢复政治商谈，按政协决议改组政府。政府颁布

的国大召集令，仅系通知报道性质，各方仍继续商谈，促进和平之实现。

△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我人员为争取时间疏散，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16日，南京、上海的中共工作人员第一批撤退飞赴延安。

△　上海党政各机关及各民众团体发起组织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筹备委员会，议定祝寿办法三项：“一、铸铜像；二、献校祝寿；三、开祝寿大会。”

△　蔡廷锴由沪抵京，对记者谈，“当务之急，在安定社会，各党派应推诚互让，不应多出问题”。又谈，他组织的民主促进会，旨在实现民主。他是国民党员，外间讹传他另外组党，殊为惋惜。

△　上海《中央日报》报道，据司法行政部统计，全国各省、市法院办理的汉奸案至8月底止，共呈报2.7569万件，其中1.8968万件已结案。

△　原中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旧金山逝世，蒋介石致电悼唁。

10月13日　　马歇尔、司徒雷登在京与蒋介石会谈，蒋坚持决定召开国大是正确的。并重申政府停战令下达之前，必须取得某种有利条件。希望司、马代为考虑他准备发表的文告。

△　政协政府代表吴铁城、邵力子等邀晤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盟代表梁漱溟，以政府对时局之态度请二氏转达留沪之第三方面人士，望其为和平尽力。李当日飞沪。

△　外交部长王世杰宴请克利浦斯夫人，对英国援华总会在战时及战后向英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为中国募捐巨款表示高度赞颂。并

谓中国以国宾之礼款待女宾，此为首次。

△　孙连仲部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攻占怀来。第十一战区参谋长朵肯堂谈，怀来为贺龙之精锐部队防守，双方激战，伤亡均重。

△　陕北保安队副指挥胡景铎率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新编第十一旅及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第九团官兵共5000余人在横山一带起义，通电表示拒绝内战，为和平建国而奋斗。

10月14日　　司徒雷登、马歇尔访蒋介石，递交由马代蒋草拟的声明文稿。略谓：司徒雷登主持召开的五人小组和马歇尔主持的三人小组会议照下列谅解即同时举行：立即执行6月拟定的满洲停战程序、恢复交通办法、解决军调部的争执；整军未获致协议前，长江以北的国军暂驻原地；五人小组之协议，应由政协小组确认；地方政府问题，由国府委员会改组后解决；中共同意以上诸点并宣布参加国大，提交代表名单，政府即下停战令。

△　蒋介石邀政府政协代表孙科等共商时局，孙向蒋转达在沪与第三方面人士会商情况。会后孙对记者谈，其归纳各方之意见向蒋建议，同时召开三人小组、非正式五人小组及宪草审议会，以解决停战、整军、改组政府及完成宪草等问题，并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以取得协议。政府“希望周恩来及各党派代表早日返京，重开和谈，务期早日停止军事冲突”。

△　国民政府公布《罚金罚锾提高标准条例》，规定依刑法或其他法律应处罚金者，就其原定数额提高100倍，依违警罚科罚锾者，就原定数额提高50倍。

△　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冯钦哉应免本兼各职；董其武为绥远省委员兼主席，原任傅作义应免本兼各职。

△　国民政府令：行政院善后救济署署长蒋廷黻免本职，特任霍宝树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　蒋介石电勉鲁南临城守军张雪中，对其孤守重镇10个月，完成使命，特予嘉奖。并发给犒赏费1000万元。

△　白崇禧在中枢纪念周报告整军工作。谓中共“称兵作乱”，政府为保卫地方，不得已用兵。强调“军队国家化，不容任何一人或一党派有其军队”，“吾人并不欲消灭共党军队，只希望共军整编为国家军队”。

△　民盟主席张澜在沪就目前时局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民盟一贯主张：“和平、民主达到统一。”指斥国民党以占领张家口的胜利，下令召开国大，实行一党独裁。并表示民盟决不怕威胁利诱，绝不参加国大。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拜访在沪各党派领袖左舜生、张君劢、曾琦、沈钧儒、章伯钧等，希望其促成国内和平团结，共同参加国大。并与周恩来会谈，促周早日进京商讨和平大计。

△　朱德总司令电唁史迪威夫人，对史氏逝世表示吊唁，谓：“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　克利浦斯夫人由京飞往重庆，晚，对新闻界报告英援华总会工作情况，谓该会援华募捐之款，“非来豪商工资，而来自一般出于同情中国之英国平民手中”。“今后仍将继续维持七十八万人每周一便士之捐赠及其他募款”。捐款“全系为人民而募，不分党派，不带政治色彩”。她本人应周恩来之请，亦赴中共区视察接受该会捐款资助之各医院。

10月15日　　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与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在宣化以东之下花园会合，将平绥线北平至张家口段全部控制。

△　宋美龄将马歇尔代蒋介石草拟的声明稿由蒋修改后送马，马认为修改后的声明“思想混乱，并且极具挑衅性质”。马与司徒雷登商定，对蒋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使蒋迅即发布由马拟定的声明。

△　雷震及参加政协的东北无党派领袖莫德惠在沪与第三方面代表举行竟日会议，商讨促成重开和谈办法。第三方面代表提出：一、政府对停战态度应切实声明；二、政府应派大员来沪亲与中共及第三方面续行谈判。雷震带该意见当晚返回南京。

△　梁漱溟等民盟政协代表在沪对记者谈，希望马歇尔、司徒雷登支持彼等努力，以确保孙科所提的和平方案成功。

△　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通电全国，呼吁全国人民拥护中央之统一，尤希望“中共及各党各派之领袖人士，各本八年来抗战谋国之精神，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同心协力，共商国是”。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晋冀鲁豫边区经过八年的减租减息和四个月的土地改革运动，3000万人口中已有三分之一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　四川省府代主席邓锡侯响应为蒋介石六十岁祝寿，决将成都市图书馆改名为中正图书馆，并拨一亿元作扩充费。

△　英国商务访华团由沪抵京。代表团团长鲍伊斯谈，来华目的“系谋发展英国在华商业，英国输出货物必须超过其战前数额30％以上，否则不能继续生存”。“此来系与华商合作而非与之竞争”。该团将赴青岛、北平、沈阳、重庆、昆明、汉口等大都市考察商情。

10月16日　　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解决时局之具体办法八项：一、依照今年6月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

二、军调部双方不能解决之争执，依照本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三、今年6月间所拟定之东北军队驻地，应即定期实施。四、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以待三人小组协议，商决整编。五、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应即交政协综合小组获致协议。六、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解决之。七、宪草委员会应立即召开，商定宪法草案，送交国民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俾为讨论之基础。八、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停止军事冲突令，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名单。

△　立法院长孙科在京对记者谈，蒋介石今日之声明，“实为解决当前大局之惟一办法”。政府尽量容纳中共意见，为求和平统一之实现，不惜一再忍让。“盼周恩来迅即返京，为和平统一而努力。”

△　国防最高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绥靖区施政纲领》，包括：一、财政金融紧急措施；二、难民急赈；三、田赋粮食管理；四、土地处理等办法。非法发行之币券，一律作废，禁止使用。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招待外国记者谈，政府恢复征兵征粮，乃“恢复平时制度”。今年“征实”稻谷3488.1791万石，麦482.24万石。“征借”稻谷169.2763万石，麦332.87万石。带征公粮稻谷956.4537万石，麦144.672万石（以上不包括热河、东九省及平、津、青、济等省市）。

△　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自绥远迁到张家口。

△　平汉线保定至石家庄段国、共军战事激烈。

△　上海市参议会分别致电蒋介石、周恩来、社会贤达及第三方面人士，吁请各方晋京共商国是，拥护蒋介石本日所提出的八项办法。

10月17日　　延安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声明：谓自抗战结束，中共为和平计，不惜向国民党作了八次让步。中共虽不咎既往，但要求蒋介石首先恢复信义。“为表示最后最大让步计，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实行政协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只要蒋介石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中共一定继续通力合作。

△　陈诚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阐述目前时局，谓今后之军事冲突，须视中共之态度。“国军将于遭受共军攻击时始进攻延安”，“整军方案，必须施行”，“任何国家，可以有许多政党，而不能有许多军队”。并谓政府可于三五个月内击败共军。否认中共所宣传的“国军分散广大地区，其实力正日就削弱”的真实性，确认“共军的损折也已达20万人，丧失物资尤难补充”。

△　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另有任用，免本职；特任徐堪为主计长；免徐堪粮食部部长本职；特任谷正伦为粮食部部长；免谷正伦甘肃省府委员兼主席本兼各职；任命郭寄峤为甘肃省府委员兼主席。

△　政府政协代表吴铁城、邵力子奉政府之命偕政协秘书长雷震由京飞沪，与各党派人士作非正式商谈时局问题。晚，青年党、民盟、社会贤达等第三方面人士与吴、邵、雷三氏进行会谈。同日，周恩来向吴铁城等表明中共对蒋介石16日声明之态度及意见。指出国民党的谈判程序是要谈判后停战，表示对蒋介石昨日所提八项条件不能接受。

△　梁漱溟在京访马歇尔、司徒雷登，转告上海第三方面人士对促进国共和谈之意见，并代表第三方面人士邀请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赴上海出席第三方面人士的会议。司、马认为这样的旅行为时过早。

△　中共军贺龙部在平汉线北段定县南北集结，其主力猛攻涿县，战事激烈。

△　《中央日报》报道，粤省银行为蒋介石六十岁祝寿，献粤北昌乐30万亩林场一处，呈献后，该场由农林部收管。

△　日本战犯田中久一被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0月18日　　政府、中共、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各方代表在沪周恩来宅首次交换恢复和谈方式之意见。会上提出三种商谈方式：一、先停战，后商谈；二、先谈后停战，停战后再谈；三、谈好后再停战。国共双方都同意第二种方式。

△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声明，指责国民党毫无信义，在过去14个月中，对任何庄严的命令、诺言与保证均可任意撕毁。“所以本党没有旁的要求，只要求首先恢复信义”。兹特郑重声明：“承认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商谈的准则。”

△　吴铁城在沪对记者谈，延安中共所发对时局之声明，“令人对和平谈判之前途，又发生一种忧虑”。要和平，必须停战，停战必须获得保证，才能实现永久之和平。

△　民主社会党发表对目前时局意见。该党认为“我国应遵照政协的决议和程序，解决一切问题”。该党要求民主、和平、统一，“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反对一切推翻政协的行动”。在战火中，该党决不参加国大。

△　周恩来致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及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召开的“中国与远东大会”贺电，谓：“美国错误政策促使中国濒临全面破裂”，“中国人民竭诚热望贵会能尽一切力量，以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其政策，撤回在中国之驻兵，并在中国和平与联合政府实现以前，停止

对中国政府的一切援助。”

△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代表晋察冀边区宣布：“除非蒋介石撤出张家口、承德、集宁和今年1月停战命令以后非法侵占的一切地方”，否则，解放区军区“一定要用血肉夺回来”。

△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由沈阳飞赴北平。同日，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由济南飞抵北平。19日，陈诚与李宗仁、孙连仲、熊、杜、王讨论华北、东北军事局势。20日，陈诚返京；杜、王分返防地。24日，熊返防。

△　整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统一指挥的第五军、整第十一师、整第七十五师、整第八十八师及刘汝明部第五十五师、第六十八师一部向鲁西中共军刘伯承部发动大举进攻，攻占巨野、嘉祥。中共军退往郓城方面。

△　国民政府训令，“我国各地缺乏可以代表公共信仰之场所，致一般人民不易成诚敬习惯，此诚影响国民道德与民族性格”，决定全国普遍建立“中山堂”，作各地人民集会修身之所。并公布《修建中山堂办法》及《中山堂建筑及设备标准》。

△　上海市政府会议决议，设立“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市长吴国桢兼任主任委员。预定12月中旬开赈，举办施粥、平粜、施送衣被，设庇寒所。救济费暂定10亿元。

△　渝川汉铁路股款清查团成立，选胡文澜等43人为委员，发布宣言，通电全国，提出三项主张：一、请交通部将所保存之川汉铁路股款拨建成渝铁路。二、彻底清算张澜等经手的川汉铁路股款旧账。三、请张澜报告经收路款经过。

△　司徒雷登由京飞往杭州，为双亲及亡兄扫墓，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及各界代表到机场欢迎。19日，司徒雷登在杭出席接受杭州市荣

誉市民典礼，市长周象贤授荣誉市民书。21日，司徒返回南京。

△　英国商务访华团会见蒋介石，呈交英商务大臣克利浦斯致蒋函。蒋对该团访华，表示极为欢迎。

10月19日　　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李维汉、华岗、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蒋匀田、胡政之、郭沫若在沪继续讨论恢复和谈办法，一致同意按“谈——停——谈”的程序进行。政府代表即日返京，中共及青年党、民盟、社会贤达代表21日返京。

△　黄炎培根据18日会商记录，拟定第三方面意见：一、为解除民众疾苦，国共必须在互谅之下，尽速实现和平停战；二、双方下令全国军队各驻原地，一律停战，一切依军队整编方案进行；三、依照1月10日停战令，恢复交通三协议，除三人小组外，并组织考察团协助停战和恢复交通之迅速进行；四、尽速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

△　民主社会党在沪总部招待在沪举行非正式会谈的政府、中共、青年党、民盟及社会贤达代表，吴铁城、周恩来、曾琦、张君劢分别致词，气氛融洽，均表示愿为实现停战、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

△　整第七十四师分三路向苏北涟水新四军发动猛烈攻势。25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第一九二旅调往增援。经八昼夜激战，新四军将进攻的国民党军击溃。26日晚，战斗结束。

△　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谓史氏“在印、缅境为领导中、美、英、印各盟军比肩驱敌，出入榛莽间，身先士卒，迭奏肤功。尤以创筑中印公路，协助我国训练军队，改善装备，裨益抗日，拯救印、缅人民，其于此次大战之获致全胜，贡献至伟”。

△　南京隆重举行史迪威将军追悼大会，蒋介石主祭，宋美龄、宋子文、白崇禧陪祭。到国防部、陆、海、空及联合勤务四部、首都卫戍司令部、中央训练团等单位军官2200余人。

△　国民政府特派驻伊朗国特命全权大使郑亦同为商定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间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在哈尔滨对记者谈，蒋介石16日提出的八项无理要求，实为大举进攻东北的借口。蒋军如不退出违令侵占的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就要把他们打回去。

△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在沪成立。该会由人民动员委员会改组而成。杜月笙、杨虎、杨庆山、何海潜、范绍增、张子廉、徐为彬、田得胜、张钫为理事。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为监事。

△　上海市总工会电呈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及各党派领袖，表示拥护如期召开国大，遵循蒋介石16日声明所提出的八项办法，实现和平。

△　南京法院宣判伪南京市长周学昌死刑。

10月20日　　邵力子、吴铁城由沪抵京，即向蒋介石报告在沪与各方会商经过，蒋听后极表欢愉。并饬其代表政府对各方代表来京表示欢迎。

△　王世杰访马歇尔，王谓延安中共的声明发表后，蒋介石感到悲观和愤怒，蒋认为那是谩骂。

△　俞大维通知马歇尔，三人小组中的政府代表徐永昌由于生病，其代表职务由参谋总长陈诚代替。俞则协助陈工作。

△　孙科在京召集政府政协代表开会，邵力子、吴铁城报告在沪

会商情况，各代表就目前局势及今后商谈步骤交换意见。

△　中共驻沪发言人陈家康发表继续和谈声明：谓自政府攻占张家口，颁国大召开令后，和谈之门本已关闭，由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努力，使和谈之门重开，中共为救中国于分裂，“有一线生机，无不竭力以赴”。成败之关键，虽仍在政府之手，但“中共愿追随各党派代表、社会贤达及全国人民之后，一致努力争取”。

△　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所部向辽东中共辽东野战军程世才部大举进攻。以廖耀湘新六军及第一八四师为右翼兵团，一部由大石桥向盖平攻击前进，主力由海城沿海大（孤山）公路攻击前进；以赵公武第五十二军、保安第一、六、十一支队及第九十一师为中央兵团，由本溪沿沈海铁路向凤凰城、安东攻击前进；以唐守治新三十师及第一八二师一部为左翼兵团由柳河向通化攻击前进。

△　南京市长马超俊就征兵事答记者称，该市自下月16日起开始征兵，不论独子或任何职业，均不得缓役或免役。

△　中央研究院第二届三次评议会在京召开，评议长朱家骅主持。吴鼎昌宣读蒋介石训词，谓“建国万端，要以学术为基础”，“评议会更负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合作互助之使命”，应为国家之科学事业多做贡献。北大校长胡适致词，强调“必须安定学者生活，才能集中精力从事研究”。

△　上海市地方协会、市农会分别致蒋介石电，表示拥护蒋提出解决时局的八项办法，如期召开国大。

10月21日　　周恩来乘马歇尔之专机由沪抵京。青年党、民盟及社会贤达各方政协代表乘政府特派专机由沪抵京。蒋介石即会见各代表，表示欢迎，并与周交谈，周表示被严重破坏和恶化的情况，只有按政协决议办才有希望。

△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京飞抵台湾，国府总务局长陈希曾、军务局长俞济时、秘书沈昌焕随行。蒋行前向马歇尔保证，如果南京谈判需要他，只要马通知发出四小时后，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回京。

△　孙科邀政府、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各方政协代表在京私邸开茶会，交换对和谈之意见，着重讨论蒋介石16日文告中所提出的各点。

△　翁文灏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报告三年来工作情形。谓该院经费太少，研究工作无论实验或调查，均无法开展。

△　联合国善后物资救济总署署长赖加第亚在华盛顿宣布："由于中国各口岸对救济品之分散能率大为改进，现行对华禁令已撤销至相当程度，得于中国请运时，运出救济品，其数量将视目的地之中国口岸能力而定。"

△　傅作义部攻占察南天镇县。22日，攻占中共军察南根据地蔚县。

10月22日　　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罗隆基、曾琦等赴美使馆访司徒雷登、马歇尔。司、马表示愿与第三方面人士合作，竭力促成中国之和平。

△　社会贤达莫德惠、郭沫若、胡政之、缪云台、钱新之、李烛尘、傅斯年与国共代表及第三方面代表分别会谈。晚12时，莫德惠、梁漱溟、陈启天、罗隆基临时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梁宣读第三方面代表声明："连日非正式商谈，正在积极进行中，一切报载彼此发表之政治的言论，均不影响商谈。"

△　民盟代表张君劢访马歇尔，张认为政府的八项建议中，关于停止冲突的同时中共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及地方政府问题的考虑把满洲除在外，与政协决议相违。并认为"中共丧失张家口，很可能意味

着他们绝不会放弃哈尔滨”。马表示对此局势严重关注。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提出的八项办法，“是无理要求”，中共绝不承认。中共中央声明中的两点，不是新要求，亦不是条件，仅是过去的协定。

△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陈仪陪同前往台湾红忠烈祠向革命先烈、抗战阵亡军民以及明朝延平王郑成功献花圈致敬。

△　国防部史料局发布征集抗战史料启事，包括文献、著述、图片、物品四大类。

10月23日　　国民政府特任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派朱家骅、俞大维、谷正纲、郑震宇、郑道儒、徐柏园、谷正新、雷殷为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令：山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何思源免本兼各职；任命王耀武为山东省府委员兼主席；北平市长熊斌免本职；任命何思源为北平市长；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均免本职；任命杜建时为天津市长。

△　第三方面人士在京继续商议和谈办法，并与政府代表孙科、王世杰、雷震商定，先讨论宣传休战问题。政府方面推邵力子、彭学沛，第三方面推陈启天、罗隆基，再请中共推两人，共同商订具体办法。

△　彭学沛在京对中外记者谈时局，谓各地军事大致趋平靖，惟陕西中共军围攻榆林。“蒋主席八项提示，除提出新让步外，不包括任何新要求，实为最诚意之表示，为实现停战惟一之途径”。并指责中共17日之声明，系挑衅谩骂文件，影响谈判进行。

△　中共驻沪发言人陈家康发表谈话，南京非正式商谈系采取“谈——停——谈”的程序，政府与中共双方代表除在宴会上见面外，并

无直接商谈。蒋介石16日所提八项要求，中共屡次已表示不能接受。

△　蒋介石在台游览日月潭，巡视日月潭发电工程。按：该工程1919年动工，1934年完成第一发电厂，发电10万瓩。1937年完成第二厂，发电4.3万瓩。

△　彭学沛向中外记者宣布，行政院已批准陈纳德与卫劳尔组成的航空运输队。该队隶属“行总”，有飞机12架，专运救济物资至国内各地，不与中航公司竞争，该队与“行总”同时结束。

△　傅作义部从张家口沿平绥线西进，与驻大同第八集团军楚溪春部在阳高会合。至此，平绥铁路全线为国民党军占据。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改为国史馆。

△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修改组织法，中央研究院设置院士，今后评议员由院士选举，再由国民政府聘任。

△　上海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电蒋介石，表示拥护国大如期举行及蒋提出的处理时局之八项要求。

△　沪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民主建国会等10人民团体电贺在旧金山开幕的中国与远东大会，并希望大会“尽最大努力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促使美军立即从华退走，并停止对中国的军火援助。

10月24日　　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李璜、莫德惠访中共代表团，商谈宣传休战办法。中共推李维汉、邓颖超为商谈代表。

△　政府方面新任三人小组的代表陈诚由俞大维陪同访马歇尔及司徒雷登，询问中共对政府八项建议的态度，司徒答称，中共表示不能接受。陈对第三方面调停的效用表示怀疑，认为整军方案不能实行，所有其他政治、军事商讨都是空话。

△　行政院长宋子文飞抵台北，向蒋介石报告政务。25日，宋飞返上海。

△　国民政府公布《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凡35条。

△　经济部次长潘序伦对记者谈，中国工业发展不易之因素有三：运费高，工价高，拆息高，经济当局必须赶紧全力应付。管制物价在目前最为重要。

△　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梁华盛调任吉林省府主席，其副司令长官职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继任。

△　中国文化社团联谊会等44个文化社团发表联合宣言，申明对时局之态度，“希望中共放下武器，变武装暴动的党为和平合法的政党”。

△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二届三次年会闭幕，会议通过《天文所改气象台案》、《授予博士学位案》、《筹设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年纪念案》、《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1950年在中国召开大会案》等多件决议案。

△　《解放日报》报道，近三个月来，各解放区已有30万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赖加第亚向联合国大会秘书长赖依提交援救各国报告书，关于中国部分称，战时农业损失甚巨，粮食匮乏须赖输入，国内交通多受破坏，东北工厂被拆一空，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建议“联总”结束后，设新机构继续救济中国。

10月25日　　罗隆基会晤马歇尔，交换停止军事冲突意见。罗并转述第三方面人士对蒋介石八项建议及周恩来关于政治的七个问题之反应。马认为，执行政协决议，要准确的理解，整军是政协纲领的一部分，中共却只字不提，继续和谈的基础，是对整军问题的圆满解

决。

△　蒋介石在台北纪念台湾光复周年大会上讲话称，“中央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的省份”。慰勉全体台胞为建立统一独立的新中国更加努力。台湾青年团、妇女会代表全台民众向蒋夫妇赠献“功昭寰宇”、“德溥蓬莱”两锦旗。

△　蒋介石在台北接见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嘱“注意领导民众，推行国语，认识历史，爱护国旗，熟悉国歌”。同日，蒋在台湾全省首届运动会上致词，勉励青年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　台湾各报日文版一律取消，统治台湾51年之久的日本文字全部结束。

△　国民政府令：《国民大会组织法》定自民国三十五年11月12日起施行。同日，国民政府公布各省、市国大代表名单。

△　政府代表邵力子、彭学沛，中共代表李维汉、邓颖超，第三方面代表陈启天、罗隆基在京首次会商宣传休战问题。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发表谈话，谓“在国民党当局和平攻势的烟幕后面，大规模内战正继续在各线进行中”，国共“双方宣传休战固然好，但炮火之战能停尤其好”，如不对其军事进攻予以揭露，宣传休战将会变成国民党扩大内战的烟幕。

△　《中央日报》就琉球问题发表社论，指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无不迫切要求，琉球群岛应并入中国版图，最低限度亦应由联合国托管会托中国单独治理，而不应为其他任何国家尤其是日本所取得。”

△　东北保安军杜聿明部赵公武第五十二军攻占安东。26日，该

军攻占大东沟，中共军沿鸭绿江岸退往辑安方面。沈海铁路全线被国民党军控制。同日，廖耀湘新六军攻占大孤山、青堆子。

△　中共军苏北鲁南重要补给要道之涟水为国民党军攻占。

△　“行总”空运大队在沪成立。“行总”署长霍宝树与陈纳德签订合同。该队由“联总”供飞机12架，以广州为总站，南昌、汉口、桂林、衡阳、柳州设空运站。运费每里吨美金九角。

△　行政院训令绥靖区政委会，公布《绥靖区难民急赈实施办法》、《绥靖区财政金融紧急措施办法》、《绥靖区田赋粮食管理办法》、《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

10月26日　　周恩来自沪返京后首次访马歇尔，就时局问题与马长谈。周指责国民党自攻占张家口后，其军队在所有前线推进，长此下去，继续谈判已无必要，希望三人小组对此事应采取一致行动。马表示，他曾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停止战事，均无结果。希望第三方面的努力能够成功，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

△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行政机构，贯彻法制精神，凡发布命令，制定规则，须针对现状，不能向壁虚构。摒弃造册、具报等官场积习，除军事、外交保密外，均得公开，不得妨碍司法独立。行政司法机关，必须安法定程序办案，不能借口便宜行事或越级处理。

△　国防部兵役局局长徐恩平在京对新闻界报告当前兵役情形，谓为配合国军整编计划，依法继续征兵。并在东北、华北各省先实行征兵，以21岁至35岁的壮丁为主。目前征兵困难很多，但该局决心克服困难。

△　蒋介石夫妇视察台湾基隆，数万民众集于市府广场欢迎，蒋致词勉其“将台湾建设成一个模范省，将基隆建设成一个模范市”。

△　中国宣布接受国际法庭之约束，顾维钧将此项公文送交联合

国秘书长赖依。此项约束为期五年。

△　香港警察驱逐街头小贩，卖花生小贩黄永祥被葡籍警察赛埃德踢死，陈尸街头。1000余港胞激于义愤，反抗野蛮压迫，与警冲突，达七小时之久，警察开枪镇压，打伤七人，逮捕22人。

△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指挥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整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率所部向冀鲁豫边境鄄城之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部进攻。30日，刘伯承部在鄄城西南将进犯的整第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及整第五十五师第二十九旅一部包围，激战至31日，第一一九旅被全歼，旅长刘广信被俘。

△　河南省参议员王友梅在省参议会上指责省府没有尊重民意，减轻民负，并提出豫人治豫的主张，要求省府实行政治革新方案，裁并骈枝机构，保持财政收支平衡。27日，省府主席刘茂恩及各委员愤而辞职。11月1日，刘打消辞意，豫政潮平息。

10月27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台北飞抵上海。行前在台北对记者谈巡视台省观感称，该省交通、水电事业已恢复到战前日本时代之水平，经济迅速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与内地比较，实不可同日而语。台省教育普及，三五年后，台湾必可成为模范省。

△　罗隆基访马歇尔，转达第三方面关于对和谈的三点建议："一、全国所有的部队均各驻留于现在的阵地，停战应立即实施。二、全国的地方政府问题应由国府委员会加以解决。三、政协的五项决议应按照政协规定的程序执行。"

△　俞大维访马歇尔。马指出，政府军在东北突起军事攻势，使他无言向中共调处。并向俞递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请蒋介石必须尽快回南京。同日，马歇尔电蒋介石，催请速回南京。

△　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在联大发言，申述

中国对行使“否决权”之立场：表示赞同限制否决权之使用，但修改宪章尚非其时。

△　上海各界在震旦大学举行陶行知追悼会，到2000余人，陈鹤琴主祭，史良陪祭。翦伯赞叙述陶氏平生事迹，孔祥熙、郭沫若等分别致词。

△　国民党军在平汉线北段继续发动攻势，由保定北进的部队与由北平南下的部队在徐水会合。

△　国民党军攻占苏北东台县城。

△　《中央日报》报道，南京参议会将南京大屠杀案调查确实证据2784件送交东京国际法庭。

10月28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由上海飞回南京。即召见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邵力子、陈布雷、张厉生、王宠惠、白崇禧、陈诚、俞大维、雷震等会谈，研讨当前时局。会后，孙科、邵力子、雷震深夜与民盟代表会晤。

△　孙科在京特向中央社记者谈话，声明：“此后本人如系代表政府发言，自当正式由中央社发表，其由各报自行采访之记载，发刊之前，既未经本人过目，其所载内容如何，本人当然不能代负责任。”

△　马歇尔与罗隆基、张君劢会谈。张认为倘若政府拒绝作任何政治方面的让步，则第三方面的建议为中共接受的可能性就小。并指责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已经独裁了二十年，因而习惯于完整的和公认的权力”。罗认为蒋介石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会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指出，美国好几个月已没有对蒋提供军需品，“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此种信念深感幻灭和沮丧”。

△　国民政府再颁禁烟令，“着由全国军队机关严行监督，切实查禁，各级地方政府务于所辖区内普施检查”，“遇有烟苗，立即铲除净

尽，将布种之人依法惩治。如有凭借权势，包庇种烟或抗铲者，并各处以严刑”。

△　英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由太原飞抵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到机场迎接。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设宴欢迎，林致词称赞克夫人援华功绩，希望中英人民的友谊更加增进。

△　青年团书记长陈诚在中枢纪念周报告团务称，截至目前，已有团员130余万人。

10月29日　　蒋介石邀第三方面代表黄炎培、李璜、陈启天、莫德惠等会谈，蒋希望其在提出有关实行停战令之非正式建议前，集中全力以觅取政府与中共间相互谅解之基础，并告以“中国之命运——和与战，大部分赖于诸君之力”。请其向中共转告，中共必须先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方能停战。

△　周恩来与第三方面代表会谈，周对第三方面参加国共会谈表示赞许，但中共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必须依下列条件：一、行政院改组；二、宪草行政院长须对立法院负责，全案保证通过；三、国大名额及日期须协商；四、实践蒋介石在政协开幕词中的四项诺言。

△　蒋介石通电告全国同胞，不准为其六十寿辰有任何铺张庆祝，以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严禁分派款项为其建置铜像，“此种封建残余之恶习，实非今日时代所应有，尤违中正平日提倡节约、廉洁与洁身自爱之夙志”。“关于捐款建校，必须自由任捐”。

△　国民政府公布《赔偿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行政院为调查统计抗战公私损失，规划对于日本责令赔偿，及审议支配赔偿物资，设立赔偿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组织条例》即废止。

△　立院法例会，简贯三等委员提议，改善公务员待遇，谓自去

年9月至本年10月，京、沪地区物价上涨17倍，而公教人员薪津平均只增加七倍。南京生活指数为7780倍，而公教人员薪津及生活补贴尚未达1000倍。如此菲薄之待遇，无法生活。

△　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体官兵再接再厉，彻底歼灭国民党军。

△　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招待记者，报告军事概况称，该行辕所辖区内“共军几乎已全部肃清，虽偶有最少数之零星散股，也均藏匿于崇山峻岭之中，各地民众可安居乐业”。又称冬防期间，对于盗匪，决严厉惩治。

△　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代表团与英国、捷克、印度相联合，坚决支持成立世界粮食局，以提高世界的营养标准，并稳定农产物价格的建议。中国代表陈之迈称，中国的农业已为日本所摧毁，农业善后事宜是中国政府及人民当前的要务，中国对联合国农业组织计划建立机构以完成哥本哈根所协议的目标极表欣忭。

10月30日　　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会谈，蒋表示在和谈上再作两点让步：“一、停战令对满洲及中国本部均属有效，根据6月间的协定将军队予以重新配置。地方行政亦将全国划一办理。二、沿中长铁路干线的城市和县城，除了那些已在政府占领之下者外，在国府委员会改组前不去接收。”

△　蒋介石邀孙科等政府政协代表商谈，听取对和谈各项问题的意见。

△　在第三方面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表示：不应把提“国大”代表名单作为停战条件，且“国大”名单更不能引为停战的保证，要保证停战必须实现政协决议和1月停战协定。

△　国民政府任命吴南如为中国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派金宝善为中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过渡委员会代表。

△　立法院临时会议通过，自11月1日起，邮费增加五倍，电报电话费增加10倍。邮政平信每件增为100元，电讯寻常商电每字增为200元。京、沪地区生活补助费增加到1000倍，由生活补助基数11万元增加到33万元。其他地区亦按比例增加。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南京市长马超俊任中央农工部长，遗缺由大连市长沈怡继任。

△　全国各大城市均开会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大会。各地均筹款修建中正图书馆、中正堂、中正学校。

△　英援华联合会总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在延安对记者谈该会援华情况，并希望建立中英人民永久友谊。总会驻华秘书哈里斯谈，在援华捐款中，分配到解放区的占7%，物资占35%。同日，毛泽东、朱德宴请克利浦斯夫人。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林伯渠主席作政府工作报告，李鼎铭副主席作《减租工作报告》。11月5日闭会。会议通过《试行土地公债》、《一切为了自卫战争》等决议多项。

△　赵公武第五十二军所辖第二十五师进攻辽东磏阳，被中共辽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包围。经两昼夜激战，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第七十五团团长赵振戈等被俘，全师覆没。

△　东北政委会主席林枫就国民党军进攻南满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只有粉碎蒋军进攻，才能实现真正和平。并表示决心收复安东及一切失地。

△　美国陆军部宣布在华美军不足3000人，均非战斗部队，此数包括军事顾问团人员750人及坟墓登记队、医药人员、行政管理人

员、看守剩余物资之少数卫兵。

10月31日　　社会贤达、青年党、民盟在京继续商谈和平办法。会后，罗隆基对记者谈，“今后继续商谈，由政府与中共多多直接交换意见”。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在京发表书面谈话称，“中共认为停战系一事，提出国大名单又系一事。政府不应以提交国大名单作为停战之条件，且国大名单更不能引为停战之保证”。“要保证停战，必须实行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现在国民政府片面决定召开“国大”，“应被认为非法集议，我们坚决反对”。

△　蒋介石偕宋美龄乘专列由京赴无锡避寿，泛舟太湖游览，马歇尔夫妇及美国《生活》、《时代》、《幸福》杂志发行人鲁斯同行。当晚返京。

△　戴季陶为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撰文，谓蒋之思想行为要点：一、“事母至孝，事兄至弟，处人至忠，待友至信”；二、“对部属内严外宽”，“以礼义廉耻，亲爱精诚待人律己”；三、“一生为模范军人”；四、“手不释卷，知即必行”；五、“败而不馁，胜而不骄”；六“私人生活致力于克己复礼”。

△　全国各大城市均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南京悬旗结彩，励志社前祝寿人拥挤不堪，33架飞机挂着红绸带，在市空排成“六十寿诞”。汉口各界献校献金10亿元。上海1.5万童子军列队游行为蒋祝寿。

△　政府方面坚持蒋介石所提八项条件，第三方面调解失败，张君劢、黄炎培、郭沫若相继离开南京回上海。

△　“国大”代表报到处在京正式成立。

△　内政部发表全国县市统计，2005县，42市，人口总额4.7

亿。

△　南京中外记者20余人由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卿汝楫及中宣部国际新闻宣传处长曾虚白带领，飞抵张家口视察，傅作义、董其武报告收复经过。

△　《中央日报》报道，邓颖超出席国际妇女大会赴美护照问题，因美国检察长根据美国有关不准共产党人入境的法令，未批准。

△　《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为保卫民主中国的中心，征收三十五年度公粮16.3万石，公草2100万斤。采用民主评议的方法进行征收，力求负担公平合理。

△　国民政府公布《绥靖区施政纲领》，凡17条。

△　行政院公布《土地重划办法》，凡30条。

11月

11月1日　第三方面再度建议召开非正式综合小组会议，由国共及第三方面各派两名代表参加会议。政府方面认为如果不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则任何会议都无意义，主张仍须以蒋介石声明所述八点为商谈之基础。

△　立法院长孙科向法新社记者谈称，第三方面已决定放弃其调解现行政争之任务，因中共拒绝彼等之方案。“蒋主席此际亟望中共提出其国大代表名单，仅须答复到达，当立即下令停战”。

△　国民政府公布河北、察哈尔、北平、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热河、哈尔滨、大连诸省、市“国大代表”名单。

△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南京成立。宋子文致词称，“胜利以来，各

地交通阻滞，生产萎缩，税收困难，预算失平，物资匮乏，物价飞腾，以致工潮踵起，社会不安，演成困顿危难之现象”。望各地商界领袖协助政府，“同体时难，共矢贞恒”。大会决议是日为“商人节”。

△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该库理事长陈果夫强调，“金库应以合作事业成功为成功”。并宣读蒋介石之训词，略谓合作金库应“深入农村，广泛推动，务使农民之资金均得合理使用，农村之生产，均得集体提高”。

△　蒋介石就任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班青年辅导处处长。原兼处长陈诚，因公务繁忙，辞去兼职。

△　国防科学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由白崇禧兼任，副主任由朱家骅兼任，下设委员25至30人，设计委员约40人，由参谋总长陈诚，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教育、经济、交通各部部长，国防部物资次长，陆、海、空、勤四总司令，及学者专家分别担任。

11月2日　蒋介石接见民盟代表张君劢，垂询对时局之意见。张建议召开一次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面代表参加的非正式会议。蒋表示同意。

△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在京对记者谈，政府业已同意在国民大会开幕之前先改组国府委员会，行政院须俟各党派参加国民大会之后改组。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直接遴选之国民大会代表名单”。

△　行政院决定组织“急救总队”，办理各绥靖区救济业务。该总队由社会部、国防部、善后救济总署、财政部、粮食部、卫生署等机关联合组成。社会部长谷正纲任总队长。总队设于南京，各绥靖区成立大队。救济费定为100亿元。

△　中国青年党在沪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该党赴京参与第三方

面调停国共恢复和谈之代表全部返沪出席会议。

11月3日　张君劢、罗隆基访马歇尔，商讨时局。张认为，政府于行政院改组前应做三件事：一、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官制度，以便统一用人标准；二、建立预算制度；三、确立各部、会的基本方针。马希望第三方面集中努力解决国共间的政治问题。

△　周恩来致函“联总”驻华办事处埃奇顿，说国民党军在进攻中抢走大批物资，使得中共方面不能修复危险地段的堤坝，要求政府停止在花园口堵口工程，否则一切后果由政府负责。并在函中催促“行总”按协议拨款拨粮和归还抢走的物资。

△　国民政府公布依照《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由政府直接选举的代表名单。

△　东北行辕经委会主任张嘉璈奉蒋介石电召抵京，商讨东北流通券之存废问题。

△　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在天津《大公报》撰文，严厉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指出自抗战胜利至此，国库支出约法币四万数千亿，70％用于军费，其余主要用于既得利益集团。用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微乎其微，农民完全得不到支出之恩惠。政府贪污成为制度。

11月4日　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王化成为商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　外交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签约全权代表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凡30条。同时签订《议定书》，凡10条，其效用与该条约相等。

△　宋子文与司徒雷登会谈。宋表示，如果此时行政院改组，共产党人也不会被包括进去，国民政府改组以后，根据普选，共产党人

或许能够被纳入行政院。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声明：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片面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一概反对，一概拒绝参加”，“以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拟定之宪草为蓝本”，“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附表》。

△　行政院公布《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组织规程》。

△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传令嘉奖萧华、程世才暨辽东军区全体指战员，祝贺其在宽甸西北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之战绩。

△　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5000官兵起义，在横山正式成立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任师长。7日，胡通电全国，表示誓为粉碎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实现民主而战。

△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视察唐山毕返抵北平对记者谈，冀东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机构，隶属于冀东绥靖司令部。

△　美国援华会儿童福利工作设计委员会在沪开首次会议，到各地代表及“联总”、“行总”专家100余人。大会讨论训练儿童福利工作人员、发展并扩大儿童福利机构诸问题。教育部长朱家骅应邀出席会议。

11月5日　社会贤达、民盟代表在京与周恩来会商时局。周提出中共方面之要求，政治方面：一、改组政府，包括改组行政院；二、召集宪草审议委员会议，根据政协决定原则修改宪草；三、关内外地方政权，应依照政协决议实施之；四、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之分配及国大会期，应由政协小组商定；五、履行蒋介石的四项诺言，启封各地查禁报纸、书刊、人民团体及释放政治犯等。军事方面：一、全面停止冲突；二、召集三人会议，商讨驻军地点及复员问题。三、恢复交

通；四、加强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代表职权。

△　马歇尔、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会商时局问题。马对第三方面人士提议召开国、共和第三方面人士非正式会议，政府拒绝参加表示遗憾。蒋谓“由于许多事迹表明共产党要排除美国调停，所以政府不愿参加”，并表示，他准备无条件停止冲突，希望司、马能对宣布实行停战和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贡献意见。

△　中国青年党十届二中全会闭幕。该党对时局之态度决本政协决议精神，以促进各方之团结合作，俾中国之民主宪政得早日实现。同日，李璜、左舜生赴京参加第三方面商谈时局。

△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后，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感想，均认为条约在条文宗义上虽属互惠平等，但实际上美方所得利益，远胜于中方。

△　滨海八路军占领安丘，俘获山东保安第一师所部2500余人，缴炮10余门，枪3000余支。

△　广东省政府派委员萧次尹为接收西沙群岛专员，顾问麦蕴瑜为接收南沙群岛专员。是晚，萧、顾二人率团员乘舰前往，次日抵达，办理接收事宜。

△　美国赠中国1.5万吨之“峨嵋号”军舰在青岛举行接受典礼。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美方代表毛瑞少将分别致词。按：此为美赠华第十九艘军舰。

11月6日　国民政府任命沈怡为南京市市长、龚学遂为大连市市长；派陶峙岳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宋希濂为新疆警备司令。

△　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答中外记者称，国民大会如期举行，绝不再拖延。

△　邵力子向第三方面人士转达政府对和谈之意见：政府不拒绝商谈，但希望第三方面对于商谈方式及程序，提出更具体的办法。

△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商议蒋介石用何形式宣布停战和召开国民大会，并代蒋草拟宣布停战和召开国民大会的声明稿。

△　民盟代表梁漱溟离京飞往北平，退出对国共和谈的调停。梁对记者谈，其在平稍住即赴重庆。

△　毛泽东、朱德电斯大林元帅，祝贺苏联二十九周年国庆。

△　全国商会联合会大会闭幕，蒋介石亲临致训词，勖勉协助政府，恢复交通，发展交通事业。“建立现代化商业组织，注重精确之调查与统计”。大会选举王晓籁为理事长。

△　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宣言，谓目前工商业痛苦所在为：一、高利贷压迫；二、舶来品倾销；三、营业萧条；四、捐税繁重；五、运输阻塞；六、工资高昂；七、动力机械和技术人员不足。要求政府从速制定经济政策，改善金融措施，撤销四联总处，保护贸易政策，废除新增简化征税货物税手续。

△　四联总处依照交通部意见，核准贷款26亿元，作公路紧急修建费。

△　马歇尔、司徒雷登访蒋介石，提交其代蒋草拟的声明稿。蒋强调，草拟他的声明必须考虑如下要点：一、政府内对武力解决的方针已完全一致；二、1936年合法选出的国大代表反对国大延期；三、国民党军政首脑们反对无条件停战；四、相信应该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问题和停止战争的只有蒋一个人。

△　孙科等政府政协代表向蒋介石报告近来国共商谈经过。

△　《新华日报》载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为中美新商约发表谈

话称：“4日签订的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度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该商约的成立，“政府不但将获得前次所谈五亿美元借款，而且将获得更多的借款与投资，以便加强统治与扩大内战”。

△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在北平对记者谈称，南京和谈是“打摆子”，时冷时热，前途看不准。他本人绝不参加国大，民盟行动绝对一致。

11月7日　国民政府令：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徐堪免兼职，特派谷正伦继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员会委员徐堪免本职，派谷正伦继任。

△　社会部长谷正纲由京抵沪，谷对记者谈，此行除在沪向各界商讨救济鲁资办法外，并视察该部在沪各机构及谋彻底解决及抑止沪酝酿之中的工潮。

△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京举行酒宴庆祝苏联国庆，宋美龄、孙科、于右任、王世杰等出席。

△　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大汉奸周佛海死刑。

11月8日　蒋介石向全国军政长官发布停战令，“务于11月11日正午12时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各守原防，以示政府和平忍让之至意”。同时发表声明“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决定于“11月12日如期开会”。

△　马歇尔、司徒雷登访蒋介石，向蒋提交重新代拟的声明草稿，马并说明，该声明稿仅是按蒋的意见拟成，他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并不赞同该声明，也完全不赞同蒋的军事首脑们的意见。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向中外记者宣读蒋介石声明，其要点为：一、政府已令关内外国军，除为现地所必需者外，自11日午刻起停止其他军事行动。二、国民大会11月12日如期举行。三、保留

中共及其他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应有的名额，望各党派随时参加。望中共派代表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四、国府改组希望早获致协议，在国民大会闭幕前，行政院不予变动。五、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会未完成之修正案，国民大会后六个月进行普选；产生下届国民大会。

△ 蒋介石召集于右任、戴季陶、孙科、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陈布雷、张厉生、白崇禧、陈诚、俞大维、雷震、彭学沛商讨时局，决定停止军事冲突，国民大会不延期。

△ 蒋介石着戎装在励志社晤见“国大”代表，谓“国大”对国家前途关系重大，“民族盛衰，人民安危，都系于此次大会，故希望各代表多多发表意见”。

△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称，自沪来京后，“一切商谈，均经过第三方面人士。现经他们之斡旋，三人会议，政协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或有开会的可能，我们亦正为此努力”。

△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就蒋介石是日之声明向中外记者发表意见，谓“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宣布之‘停止其他军事行动’，事前既未与中共代表协商，而‘防守现地所必需’的除外，仍可作一切军事行动的藉口。至于政治方面新提的一切办法，均与政协决议及程序相违背”。

△ 第三方面人士沈钧儒、罗隆基、张申府举行记者招待会，罗隆基就蒋介石声明宣读书面感想，认为“停战一点，自符全国人民之期望”，“声明中所举之一切办法，与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出入甚多”。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通过《请政府迅速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彻底平抑物价，以安定公教人员生活，而增进工作效果案》。

△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商约答记者，谓该条约签订后，关税自

主问题不受影响，最惠国条款，本部曾会同有关机关详加审议后始定。

△　宪兵司令部奉令改组为陆海空军宪兵总司令部，于明年元旦实行。

△　蒋介石之私人顾问端纳在沪病逝。

△　中国和法国就实施越南协定在京举行首次会谈，中国首席代表凌其翰，法国首席代表莫代。主要内容为：一、滇越铁路滇段估价；二、滇越铁路修复及通车；三、海防通运办法及特区划定；四、北越敌产之清理；五、中国对越军费之清算。

△　《解放日报》载，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华中、山东、东北各解放区及延安、哈尔滨、齐齐哈尔、邯郸等各市农会、总工会、参议会、妇女协会、青年救国会、教育界协会、记者协会、文艺作家协会、文化协会、商会、商工公会、回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华侨联合会、人民自卫队、民主建国学会等人民团体的8778万余会员的代表王克温等联名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要求其“立即下令撤退驻华美军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及停止对蒋介石内战政府的一切物资援助”。

11月9日　蒋介石令立法院，限于本月15日以前将宪法草案审议完竣呈复。“在不违三民主义之原则下，尽量容纳各方面提供之意见”。

△　孙科宴请社会贤达、共产党、青年党、民盟代表及司徒雷登。各方代表就蒋介石8日之声明各点交换意见。司徒雷登对政府发布停战令表示欣慰，并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奠立国基础。周恩来表示，不能单方面颁布停战令；“国大”如12日不停开，一切都谈不上。

△　俞大维向马歇尔转交陈诚致马的备忘录，内称，蒋介石11月8日已令全国国军一律停战，请马通知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出席一次小组会议，以便讨论停战措施。

△　国民政府公布社会贤达“国大”代表70人名单。同日公布国民政府直接遴选之代表名单及新疆、重庆、军队、蒙古、山西、甘肃、福建、云南、绥远、青岛“国大”代表名单。

△　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教员核定办法》，并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执行。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飞抵南京，出席“国大”。

△　上海高等法院于6月21日判处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伪“中华政府联合委员会”委员、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长、汉奸梁鸿志死刑，是日梁在沪提篮桥刑场被枪决。

△　美国海军部次长凯尼奉命视察西太平洋各区海军基地，是日抵上海。10日，由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陪同飞青岛视察。同日飞北平。11日返沪。12日，凯尼对记者谈，美海军在华为数不多，主要协助军调部工作。至本年5月止，美海军转与中国之港口设备及器材，共1500万美元，不包括购美国剩余物资。13日，凯尼离沪回国。

11月10日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吴铁城到“国大”代表报到处报到。自本月2日至是日，九天内报到之“国大”代表共1115人。

△　政府代表孙科、王世杰、吴铁城，民盟代表张君劢、罗隆基，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社会贤达胡霖、莫德惠，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及政协秘书长雷震在京举行非正式综合小组谈话会，由孙科主持，讨论国民大会等问题。

△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局，周认为蒋介石的停战命令不会给

时局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国民大会的召集方式违背了政协决议，这样的国大将得不到共产党的承认”。

△　延安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发表声明，蒋介石本月8日之声明，决定在一党专政情形下召开“国大”，表明蒋氏要长期独裁和内战的决心。蒋氏同时宣布的停战令，亦同历次的一样，“是继续大打的作战令”。若蒋介石对和平真有诚意，必须：一、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按政协决议召开“国大”；二、将侵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撤退，恢复到1月间第一次停战令的位置。

△　中央训练团兵役研究班第二期及交通管理、农林垦殖、财务、地政人员训练班第二期在京举行开学典礼，兼团长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训话。第一期学员，兵役研究班305人，交通管理班993人，财务训练班476人，农林垦牧班395人，地政研究班154人，将官班1298人。

△　军调部政府委员郑介民致美方委员吉伦、中共委员叶剑英备忘录，转告蒋介石之停战令。

△　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代表边区2400万人民通电全国，并电联合国大会，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及军事顾问团，停止并收回一切给予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1月11日　　第三方面代表张君劢、缪云台、莫德惠等两度与蒋介石会谈，要求延迟召开“国大”。蒋最后表示，国大延迟三天召开。

△　国民政府令：国民大会改定于民国三十五年11月15日开会。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就“国大”延期三天召开发表谈话，谓中共对此事并不重视，不论延期三天或30天，都是违反政协决议，中共均反对。国民党如有尊重政协之诚意，就应停开其一党包办之“国大”。

△　军事三人小组自6月谈判中断以来，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停战问题。陈诚建议：一、双方军队就地停战；二、执行小组对双方接触部队进行调整，以11月11日中午存在于当地的位置为调整之依据；三、执行小组成员间意见分歧，应循6月间所作规定解决；四、军队的整编和配置由三人小组尽早讨论解决。周恩来指出，“国大”一开，便表明政治的分裂，国民党正在布置向延安进攻。并主张恢复关外6月7日、关内1月13日以前的军事态势。

△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保卫陕甘宁边区与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到各方干部1000余人，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在会上讲话，指责蒋介石正调大军向边区边境集结，号召全体干部准备过更艰苦的生活，要求全边区60万壮年男女，紧急动员起来，全民皆兵，保卫边区。

△　冀鲁豫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界联合会代表全区1200万人民电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大会行使职权，制止美国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并要求美国立即撤退在华驻军。

△　行政院公布《举发烟毒案件给奖办法》，《禁烟考核奖惩规则》、《各省（市）县设置肃清烟毒调验所办法》。

△　鲁南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九师、第七十七师附装甲车数十辆，炮数十门，在美制飞机24架掩护下，向台儿庄以北峄县南津浦支线的竹罗、圈沟新四军阵地进攻。同日，胶济路中段国民党军李弥第八军攻占掖县县城。

△　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举办党员总登记，并发《告全市同志书》。

11月12日　　政府代表孙科、邵力子、吴铁城、王世杰，社会贤达莫德惠、胡霖、缪云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民盟代表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举行第二次非正式

综合会谈，讨论“国大”问题，历时三小时，无结果。

△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周指出，如果国民党坚持国民大会不延期，就会引起全国政治分裂，目前最重要的是重开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审订宪法。马认为目前的僵局在于政府方面认为中共不愿贯彻任何协议，中共则对政府的任何建议的诚意彻底怀疑。

△　国民党中枢在南京中山陵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诞辰八十一周年，蒋介石主持，到京“国大”代表1000余人全体参加。

△　第三方面人士举行会议。周恩来和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也出席了这一会议。周恩来就第三方面准备交出席“国大”的名单一事声言，20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现在国民党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把中共踢开，却有人要去跳火坑进“国大”，我们愿意谅解各位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事后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接受中共劝告，勾去签名。

△　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美全国对外贸易会议上呼吁美工商界毋躁急，中国政府正努力改善港口与内地的交通运输线，且正在推行土地改革，经济现状与美国南北战争后粗可比拟，中美贸易的潜在可能性未可限量。并称中美商约具有美发展在华贸易的重要因素，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　民盟在京代表举行会议，会后发布公报称：“民主同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愿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

△　张君劢、蒋匀田由京抵沪，即召集社会民主党在沪干部会议，交换对时局之意见。该党宣传部长徐傅霖对记者谈称，“国大”展期三天，象征平和转机。更希望政府在政治上迅速改良，则大局统一，才能增进基础。

△　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乘美军用飞机离京飞回延安。

△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10月份解放区军民战果：国民党军被击毙、俘虏、击伤及起义者共8.754万人。缴获长短枪5.3571万支，冲锋枪358支，轻机枪973挺，重机枪255挺，迫击炮108门，火箭炮10门，战防炮10门，榴弹炮八门，六〇炮56门，平射炮12门，山炮23门，掷弹筒210个，汽车51辆，坦克八辆，马1700匹，炮弹5900余发，子弹90余万发。

11月13日　　非正式综合小组开第三次会议，政府代表王世杰、吴铁城、中共代表周恩来、社会贤达胡霖因事未出席。讨论各问题仍未获得一致意见。夜，在交通银行聚餐续会商，仍无结果。

△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表明，如政府真有和平诚意，就应在停战办法上，除就地停止一切战斗外，规定双方军队恢复1月间第一次停战令所规定的位置，将侵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撤出，然后停止一切军事移动。

△　立法院召开审查宪草会议，王宠惠、吴经熊列席报告对“五五宪草”之修订经过。因该案系因蒋介石直接交议，发生立法程序问题，多数委员佥信不应提付讨论，会议暂停。

△　马歇尔与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会谈，马指出，“美国非常愿意帮助中国，但是不会支持一个不代表人民的政府”。“中国如果不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指望美国援助”。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答中外记者称，“国大”决不再延期，国军已奉令停止军事行动，唯中共仍未下停战令。

△　中国民主社会党发言人孙宝毅阐述该党对时局三点希望：一、“国大”能延期至12月1日，在此前，能照政协决议办事；二、蒋介石与毛泽东面晤，解决政治军事问题；三、政府包括行政院彻底改

组。以上三点实现后，该党即提国大代表名单。

△ 《中央日报》报道：据教育部最近统计，自1936年至194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由108校增至182校。学生人数由四万余人增至12万人。

11月14日 蒋介石在京招待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勉其依法执行制宪任务，体察国家政治现实情况，制定可行之宪法。

△ 立法院长孙科接见立法委员代表，对宪草政治协商经过详加说明，并指出“五五宪草”订正稿提交立法院审议系国民党总裁之意。但各委员对立法程序问题争论激烈，仍未获得一致意见。

△ 周恩来对法新社记者谈，“除非政府取消召开国民大会，而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委员会，则中共驻京代表团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总部中共代表将返延安重新请示”。

△ 民盟主席张澜就“国大”问题对记者谈，“目前即使第三方面提出了国大代表名单，不特不能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相反更会造成纠纷，使将来连第三方面也没有了”。“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 社会贤达、青年党、民盟代表在京开会，继续商谈当前时局问题。无结果。

△ 青年党秘书长陈启天晚11时在京对记者谈，该党决定参加“国大”。

△ 民主社会党负责人张君劢由沪飞京，晚又离京赴沪，会商该党出席“国大”代表名单。

△ 社会贤达莫德惠、钱新之、缪云台、胡霖、李烛尘向“国大”报到。彼等谓“国大”延期三日，乃系彼等要求，现三日已过，当实

践前言。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国民政府部分：特任800，简任一级680，八级430，荐任一级400，十二级180，委任一级200，十六级55。

△ 行政院训令各省、市政府，重申："凡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机关非法逮捕拘禁时，其执行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将逮捕拘禁之原因，以书面示知本人及其最近亲属。又在接到法院之通知或提审票后，应即依期具复。或于二十四小时内，将被逮捕拘禁人解送，如有故违，依法处治。至接受申请法院，亦应履行其职务，不得因循敷衍，致违法令。"

11月15日 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应到代表2050人，出席代表1355人。吴敬恒任大会临时主席致开会词，蒋介石致词说明国大筹备之经过及政府实施宪政之决心。勉各代表执行制宪任务，为国家谋长治久安，制定完善可行宪法。

△ 中国青年党向"国大"提交代表名单，国民政府同日将该名单明令公布。左舜生就该党出席国民大会理由发表书面谈话称，惟有一致参加"国大"，和平、统一、民主始能获得保障。

△ 国民政府公布山东、河北"国大"代表名单。

△ 四川省府主席张群赴美治病后回国抵沪，当晚赴京出席"国大"。

△ 中国出席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代表兼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在华盛顿宣布：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使命结束。按：该代表团于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派往美国，担任联络工作。

11月16日 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及讲话，指责"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

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协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美国政府援助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并说，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两三天内回延安，京、沪两办事处仍将保留，由董必武及钱之光主持。

△　周恩来往访马歇尔，告以他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即将返回延安，中共在南京仍保持一个总部，北平、上海、重庆均留一些工作人员，要求如果国民政府进攻延安，希望美方协助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人员返回延安。马歇尔表示愿意为周回延安提供飞机，他有义务保护以上各地中共人员的安全，负责送他们回去。

△　马歇尔电告国务院，谓他已与柯克在南京商定，立即削减在华海军陆战队5000人，仅留约一万人。如果军调部不继续存在，除青岛一个警卫分遣队以外，海军陆战队全部从华撤退是适宜的。18日，国务院复马歇尔电，表示同意。

△　上海市参议会通电全国各省市参议会，谓战前银行月息不过1％，抗战胜利后，物价涨跌失常，月息竟有超过20％者。为解工业危机，请一致吁请政府严厉取缔高利贷。

△　南京高等法院宣判文化汉奸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

11月17日　行政院公布《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

△　河北等北方22省之“国大”代表在京举行谈话会，由河北代表张继主持，讨论对宪章综合意见：一、建都北平；二、添设副总统；三、谋全国经济平均发展；四、谋全国人才文化平均的发展。

△　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全国总会在南京圣公会保罗堂成立，由该会总干事朱及渔主教主持。会后朱对记者谈，“圣公会于国传道，已逾百余年，今后将普遍推行自养自立运动”。

11月18日　国民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到会1289人，推立法院长孙科为临时主席，讨论主席选举办法。

△　中（国）瑞（典）新约批准书换文在京举行，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瑞典驻华公使亚勒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该约1945年4月5日于重庆签订，7月20日两国政府批准。

△　周恩来向马歇尔递交一份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人员名单（南京中共代表团的50名成员，上海中共代表团的10名成员及解放区救济署的七名成员；重庆约100名中共办事处和报纸工作人员），并说明，一旦情况紧急，请马歇尔提供空运方便；使其返回延安。

△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对蒋介石开“国大”和进攻延安，应向党内作充分说明，以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　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向马歇尔声明，政府没有进攻延安之意。

△　北平军调部美方代表吉伦电告马歇尔称，仅为保证军调部继续工作及美方人员的安全撤离，满足最低限度的后勤和战术需要，驻华北美军兵力只需要4055人。

△　行政院最高经济委员会下设的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兼任主任委员。贝氏召集办理外汇的29家指定银行负责人谈话，说明政府管理输入之用意。该委员会发表公告称，进口商先办理登记，输入数量须经核准，已订购而未进口货物，亦须申请领取输入许可证。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霍宝树函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谓该署出纳科科长吴燧人盗用公款27亿元，请依法处理。

△　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棉纱纺织业有关各同业公会举行紧急会议，表示坚决取缔棉纱黑市。

11月19日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乘马歇尔之专机离南京返回延安，李维汉、邓颖超等15人随行。政府政协代表邵力子、吴铁城等前往送行。董必武等留南京与政府保持联系。

△　周恩来在延安接见联合社记者谈，“中共将同意与南京重开谈判，但须以下述三点为基础，即：一、重新成立各党各派会议；二、组织联合政府；三、召开新国民大会”。

△　国防部电令各师管区，谓青年军系国家干部，其已办理退伍手续而有证件及在各该军通讯处登记者，不再服国家兵役。

△　国民大会开第二次预备会议，到会1380人，孙科任主席，讨论并通过《选举主席团办法草案》。

△　蒋介石在京宴请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等，孙科、吴铁城、王宠惠、王世杰等作陪。

△　民主社会党发言人孙亚夫在京发表谈话，谓“本党参加国大与否，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绝不受任何牵制。本党与民盟的关系，是自主的政党。

△　北大校长胡适在京对记者谈关于“宪章”中的教育问题，希望政府重视教育经费，国民教育经费应占政府预算的50%。目前公教人员生活太苦，望政府能切实保护公教人员的生活。

△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指挥第五绥靖区孙震部五个旅向濮阳解放区进攻，与八路军激战至20日，八路军全歼孙部第一〇四旅，

俘旅长杨显明及河北保安第十二总队司令何冠三以下官兵7500余人。30日，国民党军攻占濮阳。

△　国民政府派赵元任为代理中国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第一届大会代表团团长。

△　福州市政府为增加每年六亿元的税捐收入，坚持实行公娼管理制度，是日，市府召开妇女界代表座谈会，省妇运会及妇女会极力反对市府政策，双方商谈无结果。

△　马歇尔电告国务院，谓他正在为最大限度地削减海军陆战队在华人数，而又不至于损害军调部工作和美舰队在青岛时海岸警卫能力而努力。

11月20日　　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国府组织法修正案》，宪草修正案原则通过，交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同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行政院组织法》，该法规定扩大行政院组织，设15个部，三个委员会。

△　民主社会党组织委员会主席张君劢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就如何“彻底实行停战命令”及如何“彻底实现政协决议”等当前国是提出七项意见，并作为该党参加“国民大会”的条件，略为：一、军事调处继续积极工作，以免冲突扩大；二、实现整军方案；三、政府以政治方式解决政治纠纷的主张应坚定不变；四、政协宪草应在“国大”中通过；五、切实保障人民各项自由；六、结束党治，首先做到党费不由国库开支，党部不干涉行政，党团退出学校；七、改组政府后，应刷新政治，用人惟贤。

△　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答中外记者，否认国军进攻延安，谓此种宣传完全是中共宣传之策略。又称，“国大”中共代表名额仍将保留。

△　中共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对外国记者谈，中共军准备保卫延安。

△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坚壁清野的指示，谓必须把一切可以资敌用的粮食、物品及早分散埋藏起来，在敌人进犯之地区，须在敌人未侵入之前，将所有碾磨埋藏，将所有水井填塞，将所有不能带走或不及掩埋的东西全部加以毁坏，务使敌人饥不得食，渴不得饮。

△　陕甘宁边区妇联代表边区75万妇女急电美国妇女界，吁请“采取一切办法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蒋介石独裁政府一切物资援助，立即撤退驻华美军”。

△　司徒雷登大使由北平飞回南京，行前在平对记者谈，抵京后仍将与马歇尔继续努力，对中国时局，再行调处。

11月21日　　国民大会开第三次预备会议，出席1467人，选举大会主席团。蒋介石、孙科、白崇禧、于右任、曾琦、胡适、吴铁城、陈果夫、李璜、左舜生、程潜、白云梯、吴贻芳、邹鲁、张厉生、于斌、莫德惠、孔庚、谷正纲、陈启天、李宗仁、张群、吴敬恒、陈诚、图丹根枇、陈立夫、朱经农、阿合买提江、胡庶华、孔祥熙、林庆年、何成濬、朱家骅、黄国书、张继、梁寒操、郭仰颖、黄芸苏、曾扩情、段锡朋、孙蔚如、刘蘅静、贺衷寒、王德溥、余井塘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　国民大会第三次预备会议一致通过朱经农等临时动议案，保留共产党和民盟在国民大会主席团的九名名额。

△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复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函称：“函中所举诸端，均为政府所当为，亦为中正个人所愿竭其全力，以求其实现者。”望民社党与国民党通力合作，出席国大，完成建国大业。

△　民主社会党北平、天津两支部电民社党主席张君劢称，关于

本党参加国民大会问题，“拥护钧座向政府所提附条件的参加”。

△　第七届防空节纪念大会在京举行，兼防空司令汤恩伯主持，宣读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国人必须充实积极性防空建设。

△　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政府区中五个小组的中共方面代表组员奉令撤出。同日，中共区三个小组的政府方面代表组员亦撤回长春。

△　马歇尔电告国务院，同意把海军陆战队再削减5000人，削减总数为一万人左右。留华兵力约5000人，主力驻天津，以保供应物资的调运和塘沽、北平间交通线的安全，其余兵力分别驻于北平、青岛。

△　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顾维钧在大会上就裁军及调查驻外国军队问题发言：一、各国应向联合国报告军备情报；二、调查国外驻军亦应同时调查其国内军队。

11月22日　国民大会开第四次预备会议，出席1502人，主席团46人登台，吴贻芳、陈立夫、陈诚三人辞任主席团成员职务。主席团会议推定洪兰友为大会秘书长，陈启天、雷震为副秘书长，蒋介石任第一次大会主席。

△　立法院审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到会51人，各委员纷纷对宪草发言争论，最后以34票多数通过。同日，立法院一致通过《行政院组织法修正案》。

△　中共中央华中局负责人对新华记者谈，蒋介石胆敢向民主圣地延安进攻，全华中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将更加坚决的歼灭蒋军。

△　国民政府令，萨镇冰任海军上将，并予除役。

△　英国援华联合总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在京对记者谈，该会援华捐款并无政治歧见，对宋美龄及王宠惠主持该会捐款分配及处理表示满意。今后该会援华工作将由纯粹救济改为协助复员及教育工作。

11月23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国民大会函，谓："《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立法院通过，呈送前来，相应函请查照，予以制定为荷。"

△　国民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议事规则草案》、《各审查委员会组织规则草案》、《旁听规则》。主席团分五组轮流主持会议。

△　民主社会党提出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同日，国民政府将该名单明令公布。

△　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在京对记者谈，本党与国民党交换出席"国大"之条件，纯为国家人民之需求，本此精神参加"国大"。本人自重庆各方讨论"国大"代表名单时，即一再声明不任任何名义。

△　司徒雷登由京飞沪，参加圣约翰大学新任校长就职典礼。司徒雷登用华语致词，勉学校应为国家教育良好之公民，学子应有世界观，养成大同精神，基督教大学更应发扬基教精神，寻求真理，讲求道义人格。

△　国民政府公布《国史馆组织条例》，该馆隶属国民政府，掌管撰修国史事宜。

△　克利浦斯夫人一行离京飞广州转香港回国，宋美龄为之送行，临别表示对中国之行殊为满意。

△　虞洽卿灵柩由渝专轮运沪。24日，上海各界在四明公所礼堂举行追悼大会，蒋介石、于右任、宋子文等国民党要人均送挽联。

△　上海高等法院判处伪政权最高法院院长张韬无期徒刑。

11月24日　　民盟代表罗隆基等在京招待新闻界，发表对时局态度之书面谈话云：民盟始终坚持二原则：一、拥护政协决议；二反对武力党争。今后仍以“第三方面”立场，继续努力促使和谈恢复。对民社党参加“国大”事，“保留批评态度”，同时要求民社党退出民盟。民盟不参加“国大”，不承认“国大”通过的宪法。

△　北平军调部中共发言人称，军调部关内各小组的中共代表至本日止，已全部撤退完毕。

11月25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1248人，蒋介石任主席。蒋介石就与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交换之函件作说明，谓本人与张之函件中，“有‘政协宪草各方应负责使之通过’一语，此乃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函复，此系党与党之文件，与国大无关。至政协所决定宪草原则，在当时协商时，系决定参加政协之各党派，应负责使其党员将此项宪草通过。而国大依法行使职权时，自不受任何之拘束”。大会讨论《国民大会议事规则》，争论激烈，规则规定本届大会只制宪不行宪，四五百名代表坚持本届大会须制宪兼行宪。

△　南京中共发言人就民主社会党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发表评论，谓该党提交“国大”代表名单，“丝毫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包办‘国大’的性质”。

△　蒋介石主持中枢纪念周，出席“国大”的国民党代表均邀参加，蒋致词称，这次“国大”完成制宪，责任重大。“本党代表，对党要共信，对同志要互信，共同遵奉国父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使命”。

△　司徒雷登在沪招待中外记者，为中美商约事发表声明称，若干中国报纸不合理的指责“美国已将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国”，并非事实，“美国并不期望中国牺牲主权或妥协”，“美国并不想要，也没有得

到在华的特殊权利”。

△　马歇尔由天津飞往北平。记者询以对和平前途之意见，马答谓“不知”。

△　《中央日报》报道，教育部规定，凡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经部审查合格者，按月发给研究费，教授五万元，副教授四万元，讲师三万元，助教二万元。省和私立学校，则由省和学校自行筹发。

△　《中央日报》报道：国防部对东北各级官兵月薪进行调整，上将4.64万元，中将4.17万元，少将3.71万元，上校3.24万元，中校2.78万元，少校2.32万元，上尉1.85万元，中尉1.62万元，少尉1.39万元，准尉1.16万元，上士4650元，中士3450元，下士2750元，上等兵1900元，一等兵1500元，二等兵1500元。均按东北流通券发给。

△　国民政府令，授予张群青天白日勋章。

△　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代表竺可桢，在巴黎于大会的建设及善后委员会上称：中国学校遭日人破坏损失达7.3亿美元以上。第二天会议讨论世界教育计划，竺可桢说明中国教育任务艰巨，尚需其他国家的协助。

11月26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二次大会，于右任为执行主席，讨论《国民大会议事规则》，经激烈争辩，由于蒋介石一再坚持和国民党代表的活动，该规则全部获得通过。大会增选民主社会党推定的李大明、徐傅霖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　行政院拟定改善公务人员待遇方案：一、加成数1000倍，基数为20万；二、加成数900倍，基数22万；三、加成数800倍，基数24万。自本月份起实行。

△　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群、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陈立夫宴请

青年党全体“国大”代表，曾琦、左舜生分别答词，强调党派合作，为促进民主宪政努力。

△　中共中央代表全国200余万党员向朱德致送祝词，庆祝朱德六十大寿，谓“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事业伟大胜利的活证明”。

△　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董必武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救济工作发表声明，谓该两署违反“联总”理事会不歧视政策之决议，未合理向解放区分配救济物资，解放区共收到9820吨，仅占运华救济物资总数的7.5‰。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善。

△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国际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朱学范在香港皇后大道上遇刺重伤。28日，解放区职工会筹备会、陕甘宁边区职工会致电慰问，并声讨蒋介石派特务行凶的罪行。

△　马歇尔赴北平军调部视察，接见中共委员叶剑英、政府代表蔡文治及美方委员吉伦，对该部工作详细询问，并征求意见。

△　东北辽（宁）吉（林）区国民党军新一军之第三十八师、第五十师、新六军之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军之第二十一师、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八师、第九十一师，由怀德、农安等地向北及西北进攻辽吉地区，当日攻占长岭。

△　国民党军整八十三师之第十九旅、第六十三旅，整六十五师之第一六〇旅、第一八七旅及整二十五师之第一〇八旅共11个团向盐城华中新四军发动进攻。12月13日攻战盐城。

△　湖北省府召开各界商讨兴修武汉长江大桥事宜，并决定组织公司经营大桥有关事业，筹款50亿元，以平汉、粤汉两路局及省府担任20亿元，其余30亿元向银行支借。

11月27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第二条条文：除原选出的国大代表1200人外，另增加由国民政府直接遴选者700名；依附表产生者150名，连同《选举法》第二十四条及第三十二条规定，共196名；新疆区域代表12名，职业代表三名。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货物税条例》，该税为国家税，由财政部税务署所属机关征收。

△　国民政府令，驻荷兰国特命全权大使董霖、驻葡萄牙国特命全权公使张谦均免本职，特任张谦为中国驻荷兰国特命全权大使。

△　全国军官总队长会议在南京召开，除讨论业务外，对16.6万余名复员军官的安置问题亦力谋迅予解决。

△　马歇尔夫妇由北平飞青岛，参观中央海军训练团，对该团训练方式及受训人员精神颇为赞许。

△　北平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由平飞哈尔滨，叶称此行系为商讨如何开展今后东北之调处工作。29日离哈返平，叶对记者谈，东北分部仍保留现状，中共已同意美方派联络官驻哈尔滨。

11月28日　　国民大会开第三次大会，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向大会执行主席胡适提交《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蒋并发表专篇演讲，陈述宪法草案制定经过，以及对制宪问题之意见，希望大会对该宪草予以通过。立法院院长孙科对宪草逐条作解释和说明。

△　国民大会主席团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张厉生等101人名单。

△　青年党代表余家菊代表该党出席“国大”的全体代表向国民大会提出书面声明，谓蒋介石向大会提交的宪法草案，“其内容随时代而进步，确能反映全国各方面之意见”。青年党代表定将对宪草虚心商讨，以制定完美之宪法。

△　国民政府公布《战略顾问委员会组织条例》，该委员会为军事最高建议及储备战时高级指挥官之机关，隶属国府主席。定额19名。

△　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在京就中美商约问题发表声明，谓各界对该条约内容未能完全明了，故批评甚多。并阐明该约签订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根据平等之原则为指导。该条约之签订，对中国实为必要。

△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致函朱德，庆贺其六十大寿，函称："你所创造的人民军队，已成为保卫人民利益的坚强力量。"

△　南京苏联大使馆发表谈话，谓中长铁路苏联籍职员将撤回，因事实上颇难执行职务。

△　晋绥八路军经两日激战，攻占蒲县、隰县、石楼三城，生俘阎锡山部晋西地区总指挥杨澄源上将（原第三十四军军长）、参谋长胡芳珍少将、行政区专员孙海丞以下官兵2500余人。

11月29日　国民大会开第四次大会，出席1433人，各代表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竞相质询，由张厉生解释后，结果以811票通过。继而讨论宪法草案，各代表发言热烈。

△　民主社会党"国大"代表团秘书长孙亚夫在京对记者谈，表示竭诚拥护蒋介石提交大会的宪法草案。

△　国民政府特派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公使陈质平为商订中菲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　国民大会南京市的代表在京对记者谈，定都南京不容变更，南京地势虎踞龙蟠，民国定都南京为孙中山所主张，水陆交通便利，符合二十世纪时代要求。

△　上海前公共租界法租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在市政府成立，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下设前公共租界华洋职员退职金养老金小组、前公共租界官有产债及其他有关各事业小组及前法租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小组。

11月30日　　中美两国在南京签订航空运输协定草约。该约规定："美国民航公司得有权经过中国境内及作非营业性之停落，并在上海、广州、天津三处得有权装卸国际客运、货运及邮运。中国民航公司在美国境内，亦得享有过境与非营业性停落之权利，并于旧金山、纽约、檀香山三处，有权装卸国际客运、货运及邮运。"

△　国民大会开第五次大会，到会代表1180人，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的代表均缺席。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审查办法》，大会代表共分九组分别审查宪草各章。

△　"国大"社会贤达代表章士钊就宪法问题对记者谈称："任何良好之宪法，不在条文之完密，而在能切实可行。"又称，国民大会共产党参加与否，无足重视，对制宪毫无影响。

△　"国大"绥远代表祁志厚向大会提案，谓"为保卫东北，巩固国防，防止国土再被侵略起见，应建都北平"，并陈述理由14条。于右任、张继、莫德惠、孔德成、丁惟汾等380人对该提案连署。

△　董必武会晤司徒雷登，董谓据其所知，周恩来并未答应要为美国的调处征询延安的反应，并坦率表示，他不信任美国的调解努力。

△　上海市黄浦警察局为整饬市容，拘押摊贩300余人，是日被押者之家属老幼300余人前往递送寒衣，遭警局拒绝，群情激愤，与警方冲突。引起过往数千群众不满，将警察局包围，警方出动警车和大批警员对群众镇压。市长吴国桢被迫亲临警局令将被拘者全部释放。

△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部向鲁西郓城发动猛攻，经数日激战，12月5日攻占县城。

△　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顾维钧就国际裁军问题提出四项计划；一、依联合国宪章组织国际军；二、禁止所有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规模破坏之武器；三、依加、澳两国修正案之原则，设立国际管制及监察制度；四、各国均应支持安理会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

11月下旬　　郑州绥靖公署调集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三十二师、第八十五师、第四十师共10个旅的兵力由滑县和安阳地区分向濮阳、濮县和大名之八路军进攻，企图打通平汉铁路。

△　国民党监察委员兼两湖监察使苗培成、监察委员何汉文弹劾现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前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列其贪污渎职之要者：一、接受伪军长邹平凡金条数百根，现款数十亿元及大批物资，免邹之罪；二、乘升任参谋次长之机，敛取大批财物；三、霸占行驶渝汉间之“华府号”轮船为己享用。

是月　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委托江海关及中央信托局标卖物资款收入240亿元。

12月

12月**1**日　蒋介石与马歇尔在京会谈，双方对时局之意见分歧。马认为共产党已是一支大得不可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要靠军事力量消灭多半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争取中共参加政府，切不可让军事行动破坏谈判。蒋则认为“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自信“能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并谓他虽已年届六旬，须尽快结束做领袖的角色，但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决不交出统治权。

△　中国青年党为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发表宣言，阐明该党对时局之态度，希望各党派要真正了解民意，从速完成民主的宪法。

△　因上海黄浦、老闸两区摊贩继续为反抗市府警察当局取缔沿街摊贩事进行斗争，是日，军警出动镇压，摊贩十余人死亡，百余人受伤，221人被捕，市区一片混乱。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参议会议长潘公展、江浙区监察使程中行、商会理事长徐寄庼举行紧急会议，商讨维持治安对策。吴国桢在上海电台发表讲话，指责摊贩的正当要求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暴行，市府定将追查、惩办暴行者。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告称，为制暴勘乱，再有暴行者，“概予格杀不贷”。

△　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对“摊贩事件”发表谈话，谓“昨日因摊贩问题发生的混乱，表面上虽为摊贩生计，实际是个严重的经济问题”。

△　出席“国大”的热、察、绥代表发表声明，谓内蒙与外蒙、西藏不同，内蒙区域蒙族人稀少，绥远、察哈尔蒙人更少，因而，内蒙无自治之必要。同日，内蒙代表亦发表宣言，请中央彻底实行二中全会对边疆决议案，增强盟旗地位，充实中央边政机关。

△　延安总司令部发表11月份自卫战绩，据已获统计，大小战斗647次，歼国民党军六个旅，缴获步、马枪2.5万余支，机枪1100余挺，各种大炮264门，坦克二辆，击落飞机三架。

12月2日　国民大会开第六次大会，出席1179人，继续讨论宪法草案，各代表发言踊跃。河南代表张善舆等提案，要求设东都南京，中都兰州，西都疏勒，并强调设此三都是孙中山之主张。

△　蒋介石主持中枢纪念周并致训词，要求“国大”代表“要注意会场秩序，并遵守议事规则”，“国大”已进入制宪阶段，“要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一心一意实行三民主义”。

△　蒋介石听蒋经国报告与苏联使馆人员谈话经过，蒋经国说："俄方故意表示：（一）中国政府如能不亲英、美，则俄亦不扶助中共；（二）政府军队如进攻延安，则中共总部必迁往东北；（三）中、俄两国有关东北之协定，希望早日实行，并应先由签订经济协定着手；（四）希望政府对中共能迅谋协妥。"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乃俄国与共党最近之企图也。"

△　孙科在京对中外记者谈，"本次国大代表于制宪完成，任务即告终了"。并强调，国共"和平谈判，随时均可恢复"，"如中共参加政府，当所欢迎"。又谓："国都已在南京，非有特殊严重事件，于逼得不得已之情况下，不易变迁。"

△　青年党秘书长、"国大"代表陈启天在京对记者谈，该党现在有党员46万人，各地党部均由基层选举而成。该党基本主张是：一、国家主义；二、民主政治；三、社会立法。该党目的：对内造成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对外促进平等合作的和平世界。该党的特性：独立性，中和性，建设性。

△　中长路苏联职员及家属365人由沈阳乘车抵塘沽，旋转轮回国。

△　《中央日报》报道，安徽祁门县西乡和江西浮梁交界的竹源潘村组织"重道会"，发展极为迅速，声势颇大，公开阻碍兵役及抗缴捐税。县府派自卫队镇压，会徒逃入山中。

12月3日　国民大会开第七次大会，出席1166人。大会议定接受审查宪草提案于本月7日结束。西藏、新疆等地代表发言，呼吁保障少数民族地位，要求在宪法中增加少数民族一章，明确规定边疆民族之自治，并非独立。

△　张嘉璈由沪飞京，与张群同往见蒋介石，讨论当前金融、经济之情势。张嘉璈谓"一般舆论，认为以往政府政策变更太多，而执

行又不彻底，致人民对于政府失去信用”。由于种种政策失当，“致金融经济百孔千疮”，“必须全面改革”。蒋拟让张嘉璈任财政部长，张以对政治非所长婉拒。

△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者有会长吴贻芳、总干事陈文渊及各地教会负责人160余人。会议以研讨如何提高人民道德生活、策进新中国之建立为中心。

△　粤宝安、深圳边界文锦渡英界守军一名越境追捕两名十三四岁中国儿童，予以殴打，经深圳民众交涉制止，该英兵退回英界后即向中国民众开枪，打死乡民张添祥。晚，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郭德华就该事件向香港当局提出强烈口头抗议，港警备司令费斯丁口头表示道歉。9日，香港政府与香港军事当局分别声明，对深圳3日发生之不幸事件表示歉意，愿与中国当局商议适当赔偿费。

△　上海市轮船业公会以营运“行总”水运大队船舶与“行总”签订空船租赁合同，成立中国轮船业济运联营处。参加者有国营招商局、三北公司、中兴公司、民生公司、大通公司、益祥公司等77家轮船公司，杜月笙、钱新之等27人当选为理事，陈涤生等九人当选为监事。

△　晋冀鲁豫八路军攻占郓城。6日攻占濮县。国民党军邱清泉第五军由菏（泽）济（宁）公路以北败退。

12月4日　　董必武致马歇尔备忘录，转交周恩来致马歇尔的电报，内称：“由于一党操纵的国大之召开，政协协议已为蒋介石主席所撕毁无遗，国共两党间已无谈判的基础。然为符合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本党主张，如国民党立即解散刻在开会的非法国大，恢复1月13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两党仍可重开谈判。乞将上述各点转致蒋主席。”5日，马将该备忘录副本交俞大维转交蒋介石。

△　中共南京发言人梅益发表谈话称，关于和谈，“中共态度甚为

明朗，对美国使者之和平调解，从未予以拒绝”。因国民党一党召开“国大”，使和平中断，至今尚无新基础使和谈恢复。

△　马歇尔与俞大维会谈，马指出，要使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大会，惟一机会是国民政府真正有所改变。并表示完全不能同意蒋介石关于“八个月到十个月摧毁共产党”的观点。同时告诉俞，美国进出口银行拒绝为粤汉铁路和黄河大桥提供贷款，“这是因为考虑到了国民政府的性质、公开的贪污和这个政府的军事政策”。

△　国民大会开第八次大会，继续讨论宪草。出席1064人。青年党代表发言称，该党“主张责任内阁制，议会政治，政权治权互相控制”，“民意机关，须与行政机关立于平等地位”，以保证发扬民主。“总统职权，不可过小，亦不可过大”。民社党代表发言称，“虽宪草内容若干与民社党尚有相当距离，但实无反对之理由”。

△　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就摊贩事件对记者谈，11月底将摊贩完全取缔，市府早已明令公布。这次事件系阴谋分子参与所致。该事件中，商店被捣毁110家，警察受伤者40人，拘捕嫌疑人犯共221人，已保释126名，其余95人，除二人处以违警，10人解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外，均移地方法院检查处依法侦讯。

△　上海市长吴国桢就该市摊贩事件招待新闻界谈称，此事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并承认“摊贩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警察态度确有改善必要”。

△　周恩来、董必武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拉加第亚，告以“联总”运华物资，中共区所得甚少，要求“联总”改善此不合理状况，并请“联总”理事会将中共提议予以讨论。9日，“联总”理事会罗克斯将军复电拒绝在理事会讨论中共提议。

△　《中央日报》报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副长官郑洞国、参谋长赵家骧、军长孙立人、廖耀湘、赵公武、石觉，荣获美国

杜鲁门总统颁予的自由勋章。

△ 《中央日报》报道，中国与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签订协定，规定该公司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用以训练飞行员的“开德”式飞机转让中国制造，并将美军剩余物资中的70架“开德”式训练机运往中国，作为制造此飞机之模型。

12月5日 国民大会开第九次大会，到1125人。继续讨论宪草后，大会决定：一、停止广泛讨论宪草；二、宪草审查委员会通过；三、自6日起，分组审查提案；四、大会原定12月8日闭幕，延期至12月19日。

△ 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记者招待会上谈，“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均将于最近之将来改组，可望有党派领袖与无党派人士参加”。又谈，“冈村宁次仍以联络员资格继续协助遣送未完之日侨及日俘”。

△ 胡适在京对中外记者谈，宪草不会有重大变更，宪草曾经各方讨论所得，绝非一党意旨。又谓“胡适之不组党，余无此兴趣，余之兴趣在于学术”。

△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讨论董必武4日递交的备忘录，司徒认为，周恩来的声明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武力挑战，如果蒋介石坚持奉行武力政策，美国的援助将全部撤销。并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设想：“在国民政府军队整编方面提供军事援助，在经济领域内提供技术性援助，在政治领域内提供专门性咨询。”马对此表示同意。

△ 中共南京发言人梅益发表谈话，谓国共和谈，“在如下之基础上始能进行谈判：一、召开各党派会议；二、组织联合政府；三、召开新国民大会”。同日，政府方面表示，中共此等要求绝对无法考虑。

△　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一二一”大会，痛斥蒋介石独裁卖国，指责蒋介石政府与美国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中国人民的卖身契。大会决议，该条约签订日为“中国国耻纪念日”。大会并通电全国各界人士，力争废除辱国条约。

△　上海《中央日报》发表《从摊贩事件看社会经济》的社论，指出摊贩事件，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现在币值低落，物价腾涨，所有工商业在风雨飘摇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国家前途，只有日趋暗淡”。

△　国民政府公布《营业牌照税法》、《筵席及娱乐税法》、《房捐条例》。

△　上海市参议会电国民大会主席团，“建议国民大会在宪法内增加保障人民健康之条文”。并阐明“国民体格日趋羸弱，精神不振，志气消沉，人民不重卫生，社会习尚简陋，长此以往，影响民族生存”。国家复兴，人民之健康与卫生至为重要。

△　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上书国民大会，陈述“健康系人生最大财富”，“国民健康系国家最宝贵之资源”，“卫生即经济”，近代国家已将“健康权”列为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望国民大会在宪法中增加“保障人民健康权一条”。

△　台南县新化镇一带发生地震，死亡58人，伤300余人，房屋全毁者633栋。

12月6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及中常会连续举行：一、通过国家总预算审议会办法，三十六年度（1947）中央政府总预算委员会，以五院院长、中执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文官长、主计长、财政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组成，总预算会议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召集；二、通过三十六年度党务工作方针。

△　国民大会分八组审查宪法草案。各组分别推选参加综合审查委员会的人选。

△　驻北平美军当局宣布，北宁线上担任护路工作的美军，将于本月底前两星期内撤退，此次美军撤退后，华北仅北平、天津、塘沽、青岛四处驻有美军，美军留华北人数将不足1.5万人。

△　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奉行政院训令，制定《密报逆产奖金暂行规则》，规定一般人密报逆产经判决没收后，按值给30%的奖金，公务员、情报机关或侦缉机关人员密报经判处没收者，按值给3%的奖金。

12月7日　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会谈，蒋表示，中国政府有聘马歇尔当顾问的意愿。司徒答谓，由于中国正进行着内战，马歇尔不会对此职位加以考虑。

△　中国中和党主席尤永昌在沪对记者谈，该党未能参与制宪，甚憾。此非本党之损失，实为制宪本身之损失。目前国内内战未止，贪污风气日盛，官常失肃，百业凋疲，民不聊生。因此，该党力倡孔教革命，用挽世道人心。并拟在沪开设模范工厂，收容失业青年，协助政府安定社会秩序。

△　越南海防市法越两军冲突，法军以越军逃匿于华侨区域为由炮击华侨区，侨胞死亡2000人，3000余人无家可归，法越两军抢劫华侨住宅、财物，300余人被越军逮捕下落不明。

△　“联总”署长拉加第亚宣布，中国境内“联总”供应物资分配速率及港口清理已改善，供华物资除少数中国尚未准备接受之项目外，停运令一律取消。

△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直属第二军械补给库上海江湾体育场第一分库弹药爆炸，巨声震撼市区，历时一天一夜。军人死四人，伤九

人，失踪五人。损失手榴弹一万余颗，八二迫击炮弹8000余发，七五山炮弹1.73万余发，照明弹19颗，曳光弹83颗，信号弹100余颗，杂色步枪弹45吨，日八九重掷榴弹9000发，一公斤烟幕罐80余个，杂色炮弹1000余发，山炮弹二万余发等。库长王仁珊畏罪潜逃。

12月8日　　上午9时，国防部在南京中山门外沧波门解脱村举行陆空联合对敌坚固阵地攻击演习，由白崇禧、陈诚主持。招待“国大”代表和新闻记者参观。白致词强调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才能巩固统一，保卫国防。参加演习的部队有步、炮、工、通讯各兵种，配合空军驱逐机、轰炸机、伞兵，使用的轻重兵器、自动兵器、火焰放射器、火箭炮等，均为近代最新式的武器。

△　国民大会代表报到处公布报到代表总数为1675人，国民政府公布的代表名单未报到者仅69人。

△　中国劳动协会在沪开四届五次理监联席会议，改选常务理事，推选安辅庭为理事长。派张子清等15人收回该会重庆福利事业机构。

△　《中央日报》报道，广州查获白银走私案，一走私者图将价值法币10亿元之白银由广州运香港，为粤海关查获。此案将使广州13家银行倒闭。该白银没收后交中央银行。

△　张嘉璈在北平约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经理商谈稳定东北流通券价值办法，议定：一、该券市价格在法币10.5元以下，中央银行向市面收购；在21.5元以上，中央银行卖出。二、收回流通券，由中央银行委托中、交两银行代办；流通券行市提至11.5元后，中、交两行可自由开市。

△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五个团向中共陕甘宁边区之关中分区进攻，进入边区30余里。

△　中国审计学会在南京成立，刘纪文、蔡屏藩、杨汝梅等20人当选为理、监事。

12月9日　“国大”主席团决定审查宪草办法：一、各代表提案并案审查；二、口头提案与书面提案一样重视，审查委员会审查完毕后，应提出具体意见，交大会讨论。并推定孙科、邵力子、陈启天、雷震、王云五、王宠惠等为各组宪草解释人。

△　蒋介石在中枢纪念周致词，对“国大”连日来顺利进行表示欣慰。又谓，国内问题，“政府始终未关和谈之门，且一贯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

△　蒋介石在国府礼堂召见中央训练团兵役研究班340名学员训话，谓“兵役工作之成败，关系建国建军至巨”，并勉其“涤荡积习，切实负责，执行新法令，完成政府所赋予之使命”，“分发各地服务，应谨守岗位，克尽厥职”。

△　“国大”主席团成员、天主教总主教于斌在中宣部举办的记者会上谈“国大”与宗教问题，谓“天主教义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对共产党，“天主教亦仅能用真理说服及道德感化之”。并认为“现行宪草较五五宪草为佳”。

△　马歇尔与中国前驻美大使、现任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会谈。马重申，必须通过一部健全的民主宪法并改组政府，以作为达成一项和平解决中国时局的一种可能的手段。并强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危险的政策。

△　月全蚀。据台北天文台观测，零时10分初亏，3时25分复圆，共历时3小时15分23秒。最大蚀分达月面直径117％。

12月10日　“国大”各组继续讨论审查宪法草案，共提出修正意见421条。其中最集中的意见为定都问题和边疆问题。关于建都之

地，大略为：一、南京；二、北平；三、北平为首都，南京、西安为陪都；四、北平为首都，南京、兰州为陪都；五、北平为首都，南京、西安、成都、沈阳为陪都。关于边疆主要是要加强边疆自治。

△　王世杰在京对记者谈，政府虽有派其赴延安商谈之意，惟尚须征得中共方面之同意。

△　中共南京发言人王炳南对记者谈，国共“妥协解决已属无望”，周恩来提出的国民党立即解散“国大”及恢复1月13日双方军队位置乃最后条件。王并预示今后将继续发生流血战争。

△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沪中央银行召集沪商会、银钱业公会理事长及常务理事及国家财政、经济两部负责人开会，商讨挽救工业危机办法。宋提出措施五项：一、由四联总处设置生产事业款临时审核委员会审核贷款；二、减低生产贷款利率，由中行以转押方式调节之；三、简便各项手续；四、生产业所需材料由“行总”、物资局优先供应；五、改进运输。

△　中和党中执委兼驻沪特派员杨孝权对记者谈，该党认为，国共争执，政府委曲求全之精神，堪可称颂，中共应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觅和平之出路。

△　四联总处生产事业贷款临时审核委员会在沪成立。该会由四联总处聘请市商会、银钱两业公会理事长、市政府、经济部代表及国家行局主管等12人组成，“行总”署长霍宝树为主任委员。该会旨在配合政府管理进口政策，协助生产事业资金周转。

12月上旬　　福建省府召开全省行政会议，省府主席刘建绪在会上承认，“各方面措置都不能称人意”，“二五减租有名无实，许多佃农都遭威迫”，“交通发展无一可言，增加生产终成画饼”，“症结所在各县不亟思改进”。

12月11日　　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与该党北方负责人梁秋水、胡海门等在沪交换意见。梁、胡等主张该党决不参加政府，“国大”若不能通过民主宪法，民社党即退出“国大”，希望该党“保持第三者的立场”。

△　全国基督教第十二届大会在沪闭幕，该会代理秘书柏恩纳士博士宣读医药政策之报告，全国有教会医院370所，药房和诊所30处，其中中医203所。外籍医师105人。大会通过今后三年工作计划，务使基督教能传布至乡镇及广大农村。

△　美、英、法、苏四外长在纽约开会，讨论草拟对德和约，美国务卿贝尔纳斯以中国是波茨坦外长会议一员，主张中国应参加对德和约之讨论。苏外长莫洛托夫坚决反对。

12月12日　　蒋介石会见司徒雷登，蒋表示对中国的时局深为苦恼和困窘，并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尤其对改组政府，能提供咨询、贷款和物质援助。司徒向蒋提交一份备忘录，说明美国对华技术性援助和咨询问题，其中包括一项重新开放平汉、津浦线计划。蒋表示接受开放两铁路线之建议，并愿为此和中共接触。

△　国民大会审查“宪草总纲”的第一组对国都问题，南北代表经过激烈争辩后表决，以117票对63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定都北平。南京代表要求交综合委员会重行考虑。

△　青年党“国大”代表左舜生在京对记者谈，“青年党支持此宪草”，“宪草主要各点希望勿多修改”。并主张国都地址在宪法中不必规定。

△　“国大”主席团决定，孙科、陈诚、陈启天、徐傅霖、孔庚、白云梯、奚玉书、王世杰、何鸿基为宪草综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　彭学沛在中宣部答中外记者，谓政府有派员赴延安之意，目

前尚无任何具体决定。又谓“政府曾警告中共勿攻榆林，以免延及延安”。“中共宣传政府遣重兵包围延安，亦非事实，现驻各该地之部队，驻扎其地已久”。

△　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即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发表演说。西安事变亲历者原第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申伯纯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大会决议：请全国人民督促蒋介石立即释放有功于国家与民族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誓死反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要求蒋介石将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交人民公审；号召全边区军民加紧自卫战争动员，保卫边区。

△　李宗仁由京乘专机离京返平，李称因胃病未愈，暂请假休养。又谓共产党问题不甚简单，“时局前途难推断”。

△　驻京外国记者参观中央训练团，该团教育长黄杰对记者谈该团情况：中央训练团共分五个团，分设上海、武汉、重庆、西安及东北，此外辖三个军官总队，共有转业军官7.3514万人，在京受训者2493人。训练项目为：交通管理、农林牧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金融财务、国民教育、劳动服务、警官、水产、地方卫生、工矿管理11个专业。学期半年至一年。

△　上海黄金价续涨，每两价301.3万元，美元一元价达5650元。

△　中华海员总工会在沪正式成立，杨虎担任理事长。

△　苏皖北线国民党军第一七一师两团及第七十四师之第五十八旅、第二十八师之第五旅、第二旅由两淮及宿迁分路向涟水、沭阳之新四军发动猛烈进攻。

△　吕梁八路军攻占晋西中阳县城，生俘阎锡山部第四十五师副师长张居乾以下1600余人。

△　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李华堂等150余人在东北合江刁翎西北山林中被东北民主联军捕获。

△　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及中国水利专家萧庆云等八人由京飞往西北考察，沿途视察淮河流域、洪泽湖、黄河新道、济南至利津之黄河故道及支流小清河等处后抵开封。13日，由开封沿黄河飞往晋、陕、宁考察。14日在宁夏考察附近渠道。15日沿黄河飞往兰州。

12月13日　　周恩来、董必武再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罗克斯将军电，重申“联总”运华救济物资在华分配时存在严重的政治歧视，希望能将中共提出的问题交“联总”理事会讨论。同日，周恩来、董必武致函“联总”理事会，阐明中国善后救济工作存在严重缺点，请理事会对中国解放区的要求予以讨论。

△　司徒雷登与马歇尔会谈中国时局，马认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国民政府中的反动派权势；二、由于共产党对国民党极不信任而产生的和中共打交道的困难。并谓“抵御共产主义的无上良策是由中国现政府完成足以赢得民心的改革”。

△　民盟主席张澜在汉口对记者谈，此次民盟未参加召开之国大，民盟始终秉着一贯政策，反对分裂，反对内战。

△　南京市的“国大”代表20余人向国民大会请愿，要求定都南京。大会主席团成员孙科及秘书长洪兰友接见，孙谓“自蒋主席以下政府官吏，无一人不赞成南京为首都者”。请愿者大悦。

△　上海黄金、美钞狂涨，黄金每两价高达326万元。美钞每元价值6300元。

△　陕甘宁边区银行变法币牌价，流通券一元换法币二元三角。

△　成都各报印刷工人因工资过低无法生活，要求提高工资，是日全体罢工。

△　美国国务院宣布，据美总统赔偿专员鲍莱报告，苏联攫取东北工业设备，阻缓中国之经济进展30年，并妨碍美国之政策。苏军在东北占领期间，工业损失达8.5亿美元，全部损失达20亿美元。苏方在东北除搬取机械及没收贮藏品外，并攫得价值30亿美元之金块，从各银行取去五亿满元，100亿元占领流通券。

△　南京《救国日报》刊载《多作孽必自毙》一文，恶意讥侮苏联元帅斯大林。15日，内政部以其妨害邦交，罚该报即日起停刊二周。

12月14日　　“国大”分组审查宪法草案完毕。宪草综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修正“总纲”第一条“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主共和国”。并增加“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一条。

△　林遵上校率“太平”、“永兴”、“中建”、“中业”四舰完成接收西沙群岛任务。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电“国大”，要求在宪章中加列职工代表一节，以便他日再开“国大”时，确能代表各阶层之意识。同日，上海市商会电“国大”，要求建都南京。

△　张澜离汉赴沪。行前对记者谈称，中共要求恢复本年1月13日双方军事区域形态，实不可能。又谈，四川人士欲与本人清算川汉路款问题，该款当时已移充四川省在京之学生学费。

△　中央航空公司C—47型第31号航机由平经京飞沪，在浙江长兴县境堕毁，机员三人及乘客二人均死亡。机上载运中国银行钞票1579公斤，总价12亿元，撒落遍地。

△　“行总”卫生处长刘恒瑞由沪飞华盛顿，行前对记者谈称，此行为接洽美明年援华医疗费预算额。原预算额为4130万美元，恐有减

少600万元之可能，故前往商谈。

12月15日　　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工作检讨会议在京开会，江庸、邵力子、姚大海、贺耀组及各区团长、委员50余人出席，由各区团长报告检查工作情形。并建议，凡经查有舞弊实据者，务请政府依法严办。

△　“国大”宪章综合审查委员会讨论代表名额问题，争辩激烈。边疆及妇女代表均要求宪章明文规定名额，议无结果。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镇江对江苏党务训练班训话，疯狂鼓动反共，主张大打内战。他说：共党因有地盘和军队，单求和平解决似不可能，必须付诸力量。今后中央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推行国内政治。

△　第十一战区为减轻中共军对平汉、平津两路的威胁，是日，攻占平、津、保三角地带之重镇固安县城。

△　晋察冀八路军攻占宝坻县城。

△　《中央日报》报道，浙江省田粮处颁布《三十五年度田赋紧急催征办法》，明令各县政府、县田粮管理处立即指派科员以上人员或以总动员方式，下乡督催田赋，限12月底将田赋一律征足。如有违令未达任务者，以贻误军机议处。

△　英国赠华之防潜舰“伏波号”抵京。该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小型防潜护航舰，装备火力极为完善。

12月16日　　国民党全体“国大”代表被邀参加中枢纪念周，蒋介石致训词，要求该党“国大”代表“认清今日世界潮流与国内形势，明利害，互规劝，对政府提出的宪草，重大原则，勿作变更，共同一致完成制宪使命”。

△　蒋介石宴请宪章综合审查委员会全体委员，希望其对政协修正宪草能顺利通过，重要条文勿作改动。

△　青年党华北区负责人在北平对记者谈，该党自明年起将在全国各地公开活动。其组织与国民党大致相同。

△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沪召集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市长吴国桢、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纺建公司经理束云章、直接税务局主任楼国威等讨论全国税制及新颁税制收入情形，并研讨全国金融经济及生产问题。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法国驻华大使梅里霭在京签订《中法临时航空协定》。该协定议定在上海与越南西贡间开设航班，为期半年。

△　全国各报驻京记者100余人赴交通部请愿，要求减低新闻邮电价格。交通部长俞大维表示体谅新闻界之苦衷，由各报推代表与该部研究具体办法。

△　胡适在京励志社对部分“国大”代表谈，谓国民党虽然当政20年，其自由精神与纪律效用，仍能同时表现，殊为可贵。其所“表现能发能收之精神较之纪律更足称颂”。

△　上海市开展“禁烟宣传周”，自明年起，仍吸毒品者，决处极刑。

△　新四军军长陈毅率五个师猛攻宿迁东北地区，战事激烈。同日，国民党军攻占涟水县城，该城已成一片焦土。

12月17日　　宋子文在沪召集俞鸿钧、吴国桢、贝祖贻、王云五等开重要会议，检讨加强管制纺织业、抑平物价、挽救垂危之工商业等问题。

△　周恩来致函宋庆龄，阐明现在在美国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

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的重要性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并预计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地处于平衡的地位”。

△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王世杰为议订《中美航空协定》暨换文全权代表。

△　上海黄金、美元价再涨，黄金每两价值法币342万元，美钞每元值法币6600元。

△　北平辅仁大学2000余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将每人教室取暖费由1.5万元提高到3.5万元。学校当局宣布学生不缴足费不给学分。是日，学生罢课，并将校长陈垣锁入大礼堂，旋上街游行。

12月18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对美现实对华政策重新作了肯定和回顾，表示美对华仍继续遵行去年宣布的政策不变。“过去与现在均相信统一及民主之中国，对世界和平至为重要，相信扩大国民政府之基础，使其代表中国人民，即可促使中国向此一鹄的进展”。美国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在避免卷入中国内争之际，将保持其协助中国人民完成和平及经济复元之政策。马歇尔将军将继续留在中国，调解内争。

△　中共驻京代表王炳南通知司徒雷登，谓中共代表团再次致电延安请对美国调停的问题作直接的回答是无益的，本月4日周恩来的电报，其含意已表明共产党确实希望美国调停。

△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会商中国时局，一致认为举行国共和谈，应拟订明确的议事日程。政府应派代表去延安，并作促成和谈的让步。

△　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并告陈家康说，“国大”讨论宪法，无论通

过什么，都不承认其为有效。一旦“国大”闭幕宣布宪法实施，仍当发表声明驳斥，罗迈（李维汉）已在准备。

△ “国大”主席团决议，“国大”再延期两天。同日，“国大”开第十次大会，出席1326人，主席团报告宪草综合审查委员会人选名单及推选经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审查办法，各组审查委员会报告审查经过。

△ 民盟主席张澜抵沪，民盟在沪负责人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以及李济深等到码头迎接。张发表书面谈话称：今后民盟仍当一本初衷，拥护政协，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统一之实现。至于参加政府与否，在内战未停止、政协决议未实现以前，民盟不考虑此事。

△ 国民政府特任张继为国史馆馆长。

△ 至是日止，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国大”代表为1744人，报到者1697人。其中区域代表733人，职业代表350人，自由职业代表56人，蒙藏代表42人，华侨代表40人，军队代表40人，妇女代表20人，国民党代表216人，民社党代表37人，青年党代表99人，社会贤达代表65人。

△ 民主社会党在沪召开中常会，张君劢主持，北方代表梁秋水、胡海门未参加，会议仅讨论党内问题，未涉及时局。

△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寻歼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恢复嘉祥、巨野、金乡、鱼台、城武、单县各地。该野战军立即部署以一个纵队围攻聊城，尔后进军鲁南，以一个纵队及地方武装佯装主力攻豫北，以两个纵队向巨野、金乡、鱼台地区进攻。

△ 美国赠中国坦克登陆舰一艘，在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举行交接仪式。

△　《中央日报》报道，皖北黄水泛滥区灾情惨重，受灾难民达350万人。

△　汉奸齐燮元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按：齐历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署督办、伪华北绥靖总司令等伪职。

12月19日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答中外记者，否认政府将发行新币。

△　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京对中外记者谈，“政府宪法草案原则及精神，将为国民大会接受”，“最重要原因，是‘国大’代表富有容忍精神，容忍精神是民主政治成功的第一个条件”。这次制宪不会失败，它是“三十五年来的痛苦经验的结晶”。

△　国民大会开第十一次大会，出席1190人，宪草各组审查委员会继续报告审查结果。

△　国民党军与华中新四军在苏北宿（迁）沭（阳）地区历时五天的激战结束。新四军全歼整第五十七师之预第三旅、整第二十六师之第四十一旅、整第六十九师之第六十旅、整第六十九师之第九十二旅的第二七六团、陆军总部工兵第五团及整第十一师之第十八旅和第十一旅一部。共歼灭整第六十九师（原第九十九军）师长戴之奇以下官兵6000余人，俘获整六十九师副师长姚少伟、第六十旅旅长黄保德以下官兵1.6万余人。

12月20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京正式签订《中美航空运输协定》。

△　国民大会开第十二次大会，到1208人。陈诚报告宪草综合审查委员会开会经过及审议结果。全体妇女代表因陈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国大”妇女代表的名额问题，纷纷表示不满。

△　中国青年党发言人在京就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发表谈话，表示对该声明十分赞赏。并希望国内各有关方面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就内争问题从速和平解决。

△　晋察冀八路军向沿保（定）满（城）公路进攻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一三〇师的第三八八团、第三八九团、第一一六师的第三四六团、第三四八团及暂编第一路军刘化南部第一纵队的第二团、第三纵队的第三团发动全面反击。经一天两夜之激战，至22日，第三八八团、第二团、第三团被歼灭，三个团长被生俘。其余三个团遭重创后败退保定。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该条例规定，地主除应留土地外，超过部分一律征收，地主自留土地一般高于当地中农人均土地50％，抗战及自卫战中有功之地主，自留土地应高于当地中农人均土地一倍。

△　《解放日报》报道，国民党政府为供应内战浩大支出，除由中央印刷厂每日印发纸币230余亿元外，复向英国订制大批新钞，装运抵沪者已达一万箱之多。

△　张嘉璈与资源委员会驻东北办事处主任谢树英、鞍山厂矿负责人邵逸周、电力负责人郭克悌讨论1947年度重工业预算，预计电、钢铁、煤三项共需185.98亿元，连同恢复交通，1947年度东北支出达500亿元。

12月21日　　国民大会开第十三次大会，到会1345人，宪草一读通过。下午开第十四次大会，开始二读宪草，蒋介石代表大会主席团对宪草各要点作说明。

△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国民党政府召开“国大”发表谈话，指出：“独裁者蒋介石及其青年党与部分民社党仆从”开的“国大”是非法的，“人民决不承认蒋记伪宪”。“现在蒋记‘国大’通过的‘民主宪法’，就

字面说，甚至还不及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和曹锟宪法”。并强调“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不取消，中国人民就休想得到民主”。

△　马歇尔特邀青年党中常委周谦冲晤谈，马希望各党派由互让以建互信，由小异而趋大同，则和平民主才可以实现。周表示该党“愿与朝野领袖继续为民主团结而努力”。

△　民主社会党发言人徐傅霖在京发表谈话称，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之声明，同该党之希望完全相同。

△　下午2时，中国自然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联合组织科学促进委员会，假南京卫生署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由主任委员杭立武主席，到萨本栋、金宝善、周鸿经等科学界50余人。杭在致词中称：“两会之组合，有如组成科学家之十字军，今后加上政府之协助及奖励，必能达到科学大众化之目的。”

△　上海黄金、美钞价再暴涨，黄金每两价为法币372万元，美钞每元价为法币7200元之空前高价。同日，宋子文由京抵沪，谋抑平黄金、美钞暴涨办法。

△　由于金价暴涨，大量流动资金以黄金方式向香港逃避，香港成为走私口岸。是日，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及中国政府英籍财政顾问罗杰士由沪飞往香港，与香港当局交涉。

△　国防部电令上海市政府，谓僧人不得缓征缓召服役，“兵役为国民应尽之义务，无宗教种族之分”。

△　国共军队在保定西北激战。同日，鲁南中共军向苏北推进。

12月22日　国民大会开第十五次大会，到1312人，继续二读宪草。代表提修正案颇多。

△　民主同盟在沪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张澜主持，除张君劢、黄

炎培未参加外，其余各常委均出席。决定明年1月6日在沪召开二中全会。

△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京对记者谈，谓中国海军正在重建中，希望有志青年，踊跃投效海军，并称，其即去台湾视察日本在台海军建设及训练新海军之基地。

△　南京老虎桥监所二级看守涂宝兰被南京高等法院扣押。涂利用职务之便，对周佛海以下大小汉奸敲诈，敛款达数千万元，金银珠宝一暗柜。

12月23日　国民大会上午开第十六次大会，出席1244人，下午开第十七次大会，出席1401人，继续二读宪草。代表对宪草提修正案颇多，尤其对基本国策的争辩激烈。

△　民盟中常委在沪继续举行会议，决议，因民主社会党违反盟约，独自参加“国大”，“碍难继续合作”，民主社会党应予退盟，惟张东荪可以以私人资格出席该盟中常会及二中全会。此议案交二中全会复议追认。同时电请民社党力拒参加“国大”的张东荪来沪参加民盟领导会议。张于27日抵沪。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在京答记者，谓宪法公布后将须逐步实施。“宪法为全国国民代表所制定者，如任何党派反对，立即与全国国民之意志相违”，政府态度将视国民之态度而决定。又称，“国民党为一革命党，与其他政党争义务而不争权利”。

△　国民政府特派沈士远为三十四年高等考试再试典试委员长，派翁文灏、陈立夫等10人为委员。

△　《中央日报》报道，南京娼妓充斥，该市有妓女1.5万左右，有关当局正拟采取公娼制度。

12月24日　驻北平美军两名晚8时半在东单广场将北京大学女生

沈崇强奸。其中一美兵被警察当即拘获，另一名逃逸。次日，北平市府向北平美军当局严重抗议，要求其道歉、惩凶、赔偿、保证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美军陆战队当局表示接受。

△　民盟正式致函民主社会党，内称由于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经本盟决定，认为民社党“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但对于不主张参加‘国大’之民主社会党党员，深表同情。至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

△　国民大会上午开第十八次大会，到1230人，下午开第十九次大会，到1412人，宪草二读通过。

△　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该案规定：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宪法公布后，现行法令凡与之抵触者，由政府予以修正或废止；政府于三个月内制定并公布下列法律：国民政府之组织法，国大代表、副总统、立法委、监察委员的选举及罢免，五院组织法；各省市议会尚未成立之前由现参议会选出监察委员；依宪法产生的“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之选举于有关选举法公布后六个月完成；国民大会由国府主席召集；首届立法院于“国大”闭会之第七天自行集会；首届监察院“国大”闭会后由总统召集之；“国大”代表及立法、监察委员已选出三分之二时，则为合法集会；立宪之“国大”代表有促成实施宪法之责，任期至下届代表选出之日为止；由国民大会代表组织宪政实施促进会，其办法由政府定之。

△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沪召见各军政长官，了解物价波动及民食问题。

△　上海金价狂涨，每两达400万元。中央银行大量抛售黄金，两日总数达五吨之多，金价下落90万元。

△　教廷枢机主教、北平总主教田耕莘发表《告全国教友书》，要求教徒把对天主的信仰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成为一种活的信

仰。“在今日道德衰败纲纪失堕的社会里”，“尤应为社会的表率”。

12月25日　国民大会开第二十次大会，到1485人，宪法三读通过。并决定宪法于民国三十六年12月25日实施。下午，历时41天的“国大”举行闭幕典礼，吴敬恒任主席，吴将宪法送交蒋介石。蒋致词表示：“必当遵照国大的程序，一一施行。”希望“全体代表，领导全国民众，共同一致拥护这部宪法”，“从今天起，国民政府得偿其还政于民的夙愿”。

△　民主社会党发表声明，该党退出民盟，继续为“争取和平，实现民主，军队国家化之主张”而努力。“至于本党党员参加民盟者，在此情形下，本党当依据本党党章处理之”。

△　国民党中宣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请王宠惠谈宪法要点，王称，此次“国大”制订的宪法，政协原则完全包括，三民主义和五权制度，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特点。“这部宪法，就一党一派的眼光看来，固难觉得完全满意”，条文亦不尽善尽美，但“这部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

△　上海重雾疾风，是日空难三起：自重庆飞沪的中央航空公司C—49型48号飞机坠毁于沪郊张家浜，中国航空公司C—46型115号飞机坠毁于闵行公路七号桥附近，C—47型140号飞机坠毁于龙华机场。机组人员和乘客共死亡63人，重伤13人，仅一个三岁小孩无恙。此为中国航空史上空前惨剧。

△　司徒雷登在北平燕大同学欢迎会上讲话，谓“今年是燕大开办以来最困难之一年”，“希望燕大同学，多从事建设工作，少做批评、破坏、推翻等事”。“国大”顺利通过宪法，是实现民主之象征。望燕大同学共作实现民主政体的先锋。

△　上海市肃清烟毒委员会开会，主任委员吴国桢主持，决议：自明年元旦起，凡未投验之烟民，一律送法院依法治罪。贩运、制造

毒品之毒犯，请法院处以极刑。

12月26日　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略谓宪法业已制定，明年1月1日公布，各省、市、县均应普遍热烈举行庆祝会，庆祝会一律举行三天，此间一律放假。各地均须组织宣传队，并应深入乡村，广泛宣传，务使家喻户晓。

△　参谋总长陈诚在京招待部分“国大”代表，陈称：“下届国民大会，明年12月开会以前，国军将肃清共军，俾本届国大通过之宪法，可予忠实执行。”

△　“国大”秘书长洪兰友在京对记者谈，国民大会自5月间开始筹备迄闭幕日止，共支出费用94亿元。

△　国民政府明令褒奖攻占张家口和保卫大同诸将领：傅作义给予国光勋章，楚溪春给予二等宝鼎勋章，孙兰峰给予三等宝鼎勋章，董其武、郭景云、李昆岗各给予四等宝鼎勋章。

△　教育部召开边疆教育大会，教育部长朱家骅报告关于边疆教育之新政策，谓对边疆教育，政府已拨专款，惟人才缺乏，今后如何培养边疆人才，极为重要。除已设立的边疆师范十校外，另拟在兴、辽、察、热再办边师六所。同时充实现有的六所职校及34所小学。

△　司徒雷登在北平与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会晤，交换意见。叶对记者谈，其与司徒交谈者，均为私人友情。

△　国际文化合作协会在南京成立，杭立武等31人当选为理事，彭学沛等九人为监事。聘请王宠惠、于斌、陈立夫、邵力子、李石曾、朱家骅、吴铁城、张伯苓、蒋梦麟、王世杰、戴季陶、宋美龄、翁文灏、孙科、吴敬恒、陈布雷、胡适、吴有训、张继为名誉理事。

12月27日　蒋介石与马歇尔会晤，蒋请马发表对时局之看法。马认为，目前共产党对政府极端怀疑，不愿作任何协定。政府的军事

将领们对取得镇压共产党的成果作乐观的错误估计，破坏了有希望的国共和谈。虽经蒋之努力，制定了一部合理的宪法，但重要的在于实施。建议蒋应即实行宪法，同时促成各小党派联合成一个大的自由党派，让其参与政府。这样才能使蒋的地位免受攻击。蒋表示赞成马的设想。

△　国民党中央召集各地党、团部负责人开党团工作检讨会，中央各党团负责人均参加。会期两天，其检讨内容：一、协助政府建立民意机关；二、参加绥靖区党团工作；三、研订各地党团切实联系配合办法。28日散会。

△　蒋介石在京宴请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陈启天、余家菊、常乃惠、刘东岩、何鲁之等，洽商政府改组问题，并交换关于宪法完成后对时局之意见。

△　司徒雷登在天津对中外记者谈，“中华民国宪法之制成，实系幸福中国之吉兆，此一宪法，既符合政协决议，尤充满民主精神。本人目睹蒋主席为宪法之通过，曾以空前之勇气，克服若干困难，尤足敬佩”。

△　民主社会党出席“国大”的代表宴请青年党出席“国大”的代表，徐傅霖、蒋匀田、曾琦、左舜生等发言，一致表示共同努力促成宪政。

△　行政院拟订公务员调整待遇标准，经蒋介石核准，自本月起实行。一、京、沪、平、津、迪化，基数17万元，加1100倍。二、太原、青岛、济南、保定、杭州、镇江、苏州、常州、无锡、徐州、合肥、安庆、芜湖、厦门、承德、东北九省、新疆，基数14万元，加950倍；三、武汉、广州、桂林、长沙、衡阳、昆明、开封、郑州、西安、兰州、酒泉、福州、康定、归绥、万全、西宁、江苏、浙、皖、鲁、晋、冀、热，基数11万元，加750倍。四、重庆、成都、贵

阳、广东、广西、湘、鄂、陕、甘、豫、云、赣、闽、西康、绥远、察哈尔，基数九万元，加600倍。五、四川、贵州、宁夏、青海，基数八万元，加500倍。六、警长支基数七成，警士六成，并加支倍数；工役支基数六成；东九省按11.5折算，发给流通券。

△ 《中央日报》报道，据内政部本年10月份统计，全国共计2005县，42市，47设治局，217行政督察区。据本年2月统计，全国人口为4.70026252亿人。人口密度以天津市最大，每方公里2.219万人。以省计，山东每方公里265人，新疆、青海每方公里二人，兴安每方公里一人。

△ 国共军在苏北激战，国民党军欧震兵团黄百韬师攻占阜宁县城。

△ 美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报告：自1941年3月至1946年9月止，美付出租借物资总值共506.92亿元，中国所得值15.65亿元。

12月28日 周恩来在延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对时局谈话，指责杜鲁门总统本月18日之声明是为美国对华反动政策辩护，一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违背了去年12月莫斯科公告与杜鲁门总统声明之原则。国共和谈破裂之责任全在国民党，“美蒋合作以破坏《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也愈到后来愈明显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制定的“蒋记宪法”，“我们及全国民主人士决不会承认它为合法有效”。指出国共双方的交战情况，从本年1月到现在蒋介石动员了他88％的兵力，约218个旅（或师），侵占解放区183个城市。从7月份起，蒋军已损失45个旅（或师）左右，占其兵力的五分之一。指出美国违约助战在1月停战令之后为蒋运送了九个军，为蒋装备了45个师，美援超过36亿美元。重申若国共恢复和谈，“蒋政府必须：一、根据《停战协定》恢复1月13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根据政协路线取消非法国大及宪法，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否则，中共“决心反对到底”。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核准《三十五年度国库收支结束办法》；通过《财务罚锾处理办法》；通过行政院调整公教人员生活补助标准；核准《三十六年度及行政院辖市预算编审办法》，预算总额为9.3万亿元。

△　暹罗驻华大使塍古安杜拉勒克及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分别向蒋介石递交国书。

△　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司令部就该部两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案发布公告，谓两名对中国女郎强行无礼的美兵已由宪兵扣押，现正与市警当局配合调查，搜集证据，此事当积极解决。

△　教育部议定调整专科以上教员薪金：助教80元至200元，讲师140元至300元，副教授240元至400元，教授320元至600元。

△　国民政府任命董洗凡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

12月29日　　中共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就华中形势发表谈话，重申收复华中失地之决心。指出："华中将是爱国自卫战斗最频繁最残酷的战场，也是最后击败蒋介石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蒋介石如对华中不能再打时，他在其他战场早已不能打了。"

△　陕甘宁边区银行紧急通知，自是日起，法币牌价改为通券一元换法币2.5元。

△　民盟发言人罗隆基在沪宣布，"民盟不参加将来之政府改组"。

△　北平市府鉴于各大学师生对美兵强奸学生案极为关注，是日，分函各校，说明市府对该案之抗议交涉经过。

△　北平各大学学生500余人在北大开会，决议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对美兵奸污女生事件向美军当局提严重抗议，要求惩

凶赔偿，保证不再发生相同事件。并发表《告全市同胞书》。

△ “联总”代表艾格顿向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提出严重抗议，谓11月23日“行总”运输局卡车二辆装载“联总”捐赠之汽油于古北口八里处遭共军袭击，司机一亡一伤，货物焚毁。该车印有清晰的“联总”标志。此类事在中共区已非一次。并请将抗议书转告朱德，请其向所部发布有效的命令。

12月30日 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师院、中德、交院、朝阳11所大学学生2000余人罢课游行，抗议美兵强奸北大女生之罪行。并派代表到北平市府请愿，要求保护市民安全，公布事实真相，会同美方当局组织联合法庭，公审犯罪美兵。市府表示接受学生的要求。同日，天津南开、北洋两大学罢课游行，抗议美兵奸污北大女生罪行。

△ 上海市学生总会为抗议美兵奸污北大女生之暴行，发表《告全市学生书》，坚决要求政府向美军当局郑重抗议，美方必须做到：一、按军律严惩主犯；二、美军当局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 北大校长胡适出席“国大”后由京飞抵北平，胡对记者谈，美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深表愤慨。“此事件纯属法律问题”，望美方接受抗议，迅速处理。“至撤退美军，乃系政治问题，希望学生不做联想，以免问题更趋复杂”。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审议1947年度中央政府岁入岁出总预算。国府主计长徐堪、财政部长俞鸿钧奉蒋介石命出席报告总预算编审办法及经过。徐称预算支出，须视物价而定，党费、参政会经费未列入预算。俞称明年度岁出岁入等于本年度之四倍，岁出仍以军费为第一位。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京对中外记者谈1947年度总预算情

况，总支出约为9.32万亿元，军费占3.81万亿元，建设性支出1.5万亿元，其中交通经费1.09万余亿元，国营工业经费约2300余亿元，余为农村水利卫生之支出，教育经费约3400亿元，复员救济费1.4万亿元，省市补助费6900余亿元，第二预备金4000亿元，公务人员退休抚恤费45亿元，党部经费未列入。

△　彭学沛对记者谈，政府已邀请参加“国大”的各党派会商改组政府，现在正积极进行中。中共、民盟如有参加之征兆，当立即邀请。

△　行政院邀请国民党“国大”代表举行政治检讨会，出席代表及行政院所属各部、会长官共约800人，宋子文主持。各代表对物价、工资、公教人员待遇、敌伪物资之接收情形、“行总”救济业务、贪污之惩办、交通、财政金融之现状等均提出质询。宋表示对所提诸问题用书面答复。

△　民主社会党发表对“国大”闭幕后时局之意见，其主张：“一、停战命令，应由国共双方彻底施行，且由执行小组参加。二、即日恢复国共两党的和谈，政府当局应派员赴延安，或邀请中共首脑来京，商讨一切。三、国共两党应以最大忍让，解决关内外地方政权，以及驻军地点。四、依整军方案，切实实行军队国家化。五、由国共谈判中，求得基础后，扩大为全国党派会议，各民主有力团体，亦应邀其参加，共商一切政治问题，以奠法制基础。六、从现时起，政府应即依照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切实保护人民身体、言论、结社、教学等基本自由，换句话说，切实结束国民党一党党治。”

△　参政会决议，由该会组织调查委员会，彻查上海飞机失事真相，请政府严惩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负责人。

12月31日　　国民政府举行签署公布宪法令仪式，“国大”主席团及中外记者多人被邀观礼，由蒋介石签署，五院院长副署。

△　蒋介石向全国同胞发表长篇广播讲话，其要点略为：一、政府维护和平统一之方针不变，对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决不关和谈之门；二、全国道德沦丧，工商不振，望全国同胞矫正战后变态的恶习；三、愿全国青年要有抱负有作为，爱惜光阴努力建国；四、要求安定进步，勿再坐误良机。

△　民主同盟对政府公布宪法发表声明：一、“国大”违背政协决议的程序及精神；二、宪法许多重要条文，为政协争议未决之问题，与真正民主原则相距甚远；三、“国大”通过的行宪办法十条，“系假借制宪之名，为长期内战永久分裂作准备”，与全国人民利益根本冲突，本盟愿唤起全国人民共起坚决反对。

△　上海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工商协会、妇女节制会等11个团体发表声明，指责国府公布的“宪法不仅其产生的基础和基本精神是反和平反民主的，就是它的作用也是反和平反民主的”，因而“反对这个宪法”。

△　中国青年党对政府实施宪政准备问题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政府公布的宪法外，并建议在全国广泛宣传宪法要义，并望政府在宪法公布但还未实施前这过渡时期悉心商讨准备工作，在这一时期对实际政治之设施必须以和平建国纲领为准则，有断然一新之改革。

△　张群由京抵沪，对记者谈称，政府准备改组，希望各方面参加，并欢迎中共参加。政府对恢复和谈方针未变，随时都在等待。

△　国民政府令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李迪俊应免本职；任命梅景周为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任命黄杰为中央训练团教育长。

△　荷兰海军又扣我商船，新加坡华侨后援会电请外交部对荷兰政府提出抗议。

是月　美军帮助中国大规模遣返日本籍人员之工作完成，共遣返

日籍人员298.3550万人，其中军人123.3244万人。

是年　国民党政府增发通货四万亿元。

△　全国物价腾涨，上海物价指数以1936年为100计，食物类1月为173579，12月为708879.9；纺织品类1月为223065，12月为944745；金属1月为389704.5，12月为1773395.1；其他物品都上涨三至十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二卷
(1947—1949)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二卷
(1947—1949)

韩信夫　姜克夫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返回总目录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1月

1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定于本年12月25日施行。宪法凡14章175条，主要条文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非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代表任期六年；"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统率军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经行政院长副署），并可于立法院休会时，发布紧急命令；任期六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议决法律、预算等，由选举产生，任期三年；省得制定省自治法，省议会、省长民选；外交实行独立自主，平等互惠；经济以民生主义为原则，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　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词，宣称：国民政府今天公布宪法，"完成了多年来实施宪政的夙愿"，"汉、满、蒙、回、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各政党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人民权利自由的积极保障，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一部宪法的精神，是荟萃全国各方面的意见，是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所定的原则"。又称："政府决不关闭和平商谈之门，而且还希望中共参加政府。"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新年祝词》，指出：“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预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将要得到比1946年更重要的胜利”，“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表元旦广播词，提出1947年的十大任务，号召解放区军民为在今年停止反动派的进攻，收复失地，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加强支援前线工作，声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而努力。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去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和现今公布的“宪法”，都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程序与精神，表示要“唤起全国人民共起坚决反对”。

△　中国青年党对实施宪政准备问题发表宣言称：“此次宪法，乃朝野各政党相互忍让之光荣的结果”，“中国制宪已有三十余年以上之历史，直至今日，始有一部经合法手续制成，经公布之宪法。”

△　北平各机关举行新年团拜会，胡适在会上发表讲话宣扬国民大会的“成功”，并称《中华民国宪法》“乃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

△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世界和平促进会、国际人权保障委员会、工商业协进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金融业民主和平促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九三学社11个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宪法的基础及其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反政协的，其根本目的，又在于利用这一所谓‘民主宪法’作为政治武器，藉以伪装民主，对付异党，扩大战争，重苦人民”，“它的作用也是反和平、反民主的。”

△　上海20余所大学学生四万余人游行示威，抗议圣诞节夜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天津学生亦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　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除战争罪犯等罪外，犯罪在1946年12月31日以前，其最重本刑为无期徒刑以上者，死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或并科罚金者，减其刑期或金额二分之一，由司法、行政两院分别施行。

△　国民政府公布《特种过分利得税法》，税率由10％至30％，同时废止《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16日，财政部订出年度货物税税收预算为1.2337万亿元，其中上海货物税局占6500亿元，占全额50％强。财政部并规定税额随价上涨，从价增收，并于2月10日公布《特种过分利得税法实行细则》。

△　政府重行纱布管制，规定自是日起，凡由政府供给外汇购棉之纱厂，所得之棉纱或由纱自织之棉布，均由政府依其成本并加20％的利润之价格，收购其半数。收购办法自1月13日起实行。

△　美国政府财政部宣布解除于1941年6月冻结之中国在美资产。美财政部估计中国资产时值3.564亿美元。

△　交通部东北运输总局在沈阳成立，职掌东北九省之铁路、公路、航政等运输业务。交通部特派员陈延炯兼任局长。

△　中央防疫实验处新厦在北平举行落成仪式。

△　台湾省自即日起废止日本制度量衡，改用全国标准制即万国公制。

△　于斌就任天主教南京教区总主教职。

1月2日　　傍晚，山东野战军集中苏北、鲁中八个师，约七万兵

力，分左右两路发起鲁南战役。战至4日下午3时，先后攻克卞庄、向城、兰陵等40余重要据点。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及第四十四、第一六九两旅）和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二十八师之第八十旅、直属炮兵第五团、战车营等。鲁南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　蒋介石接见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雷震，听取雷赴沪与民社党、青年党等商谈改组政府的情况。

△　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傅斯年，听取对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意见。

△　南京专科以上各校学生约2000人，为抗议美军暴行，不顾教育部禁令，举行示威游行。队伍先至国民政府，向蒋介石请愿，继至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官邸示威，要求立即撤退驻华美军。次日，3000余学生再度游行示威。

△　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密电北大校长胡适，以最迅速方法查明沈崇事件真相、家庭意见、学生情绪等报南京。

△　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抵沈阳，与苏方交涉东北接收问题。

△　南京、北平、汉口各大城市工商界以农历年关已近，成立请求贷款团，要求政府贷款维持业务。

△　台湾省高雄发生大火，焚毁房屋百余间，损失约7000万元。

△　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公开指责国民政府单独召开国大，进行所谓改组，是关闭和平之门，准备长期内战与长期分裂。章伯钧提出，要进行和谈，“政府应先消除征粮征兵，停止依赖美国援华政策，真正实现四项诺言，五项决议”。

△　重庆市民盟支部会同民建分会及其他民主人士集会，成立“沈案”后援会和反对伪宪委员会筹备会。

△　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奉召昨日专机抵南京，是日见蒋介石，谈打破国共僵局问题，在座者有陈诚、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雷震等。

1月3日　　雷震对记者谈称：国内政治商谈，将于短期内恢复。政府改组本月内可实现，改组之步骤为各党派提国府委员名单，经国府明令公布后，即共商各院、部之改组。

△　中国民主社会党开会讨论应否参加政府事，议决在现阶段时局情况下，民社党绝不参加政府，如参加，必待政协所商定之包括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实现后。6日，民社党发言人徐傅霖否认上述消息。

△　民主建国会召开常务理事会，通过决议，反对国民党不顾政协协议，单独召开国大，通过宪法。

△　中共派饶漱石会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北平执行部代表兰士英、联总驻华卫生专员卜放，并邀联总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塔德、联总驻华办事处河南区代表韦士德、联总豫北办事处卫生医务主任朱志民，在邯郸举行黄河问题会议。晋冀鲁豫解放区代表滕代远及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参加会谈。饶漱石指出：黄河堵口放水不是一个单纯工程技术问题，而是严重的军事政治阴谋。滕代远指出，黄河问题实质是蒋介石企图利用黄河归故来淹没解放区7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塔德表示次日即停止堵口，并立即分赴郑州、上海进行停堵和督促拨给迁移费诸工作。

△　中共驻京办事处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及黄河水利委员会分别提出抗议书，抗议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破坏复堤工程，提出：立即停止堵口放水工作；在此期间依据协议迅速进行中下游复堤工程及办理居民迁移救济工作；“联总”援助黄河复堤之物资器材，应由“联总”直接交付解放区。

△　上海各大学教授伍蠡甫、洪深、陈望道等30余人，签名致书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政府惩凶、道歉、赔偿，改变对华政策，即刻撤退美军。武汉华中大学教授黄溥卡、彭许衍、熊文敏等及英、美教授薛世和、江贝宁、威海世、哈顿女士、渥浮女士等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并以中国法律制裁美军暴行。

△　美国国务院电召马歇尔回国“磋商中国问题及其他事项”。

△　美驻华北海军陆战队第一批4600人开始撤退。驻北戴河及秦皇岛之第七联队全体官兵登美运输舰三艘，定48小时内启程归国。美方声明，此次撤退与中国学生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无关。

1月4日　　蒋介石召见王世杰、朱家骅，指示处理学潮原则，谓中美关系不应以美士兵个人罪行而致破坏。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对记者称：政府确在准备改组，正与参加“国大”各党派商洽改组办法，现一面布置改组，一面谋恢复和谈。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第四届国民参政员任期延至年底，名额增加44名。

△　行政院对教育部及各地军政机关发出指示，命令压制各地学生对北平沈崇事件的抗议运动，称“此事为该犯美兵私人行为”，“至中美两国间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

△　教育部就沈崇事件电北大、清华校长胡适、梅贻琦称，京、沪等地学生游行“查系有人鼓动反政府及反美运动”。“此系美兵个人行为，纯属法律案件，并非外交问题。现美军已将凶犯交军事法庭审判，自应听候依法解决。诚恐有人扩大煽动，特电注意防范”。

△　上海学生成立“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号召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并吁请市内各公共团体签名支持，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　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向通化集安线展开反击，迫使进攻的国民党军收缩。

△　黄河顾问团萨凡奇等13位专家到达黄河花园口，视察堵口工程。

△　菲律宾排华加剧，宣布暂不准华侨入境。

△　中国为保侨，经外交部多次交涉，获法国及越盟双方同意，在越南法越冲突地区设立中立区。

△　河南人民反对国民党为打内战抓壮丁，投函《大公报》，抗议河南征兵额达10.2万人之众。

△　汉口市催收壮丁顶替费，有按户征收一万至三五万元者，有按名征收3000至一万元者。汉口市参议会以“工业萧条，民生痛苦”电国防部请求缓征，以苏民困。

△　美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提出：大连应交由中国管理，恢复中国长春铁路交通。

1月5日　　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抵沪，连日分晤各党派人士，探询各方对改组政府及恢复和谈意见。民社党表示党内意见尚不一致。青年党表示原则上决定参加政府。

△　民盟中常委章伯钧对记者表示，民盟在全国停战、和平实现后，一定参加政府，目前应首先恢复和谈，民盟不放弃调解国共之责任。

△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下午在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对黄河堵口放水，并重申恢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即召开党派会议，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

△　东北民主联军以12个师渡松花江南下吉林作战，采取远途奔袭、围城打援战法，攻击其塔木，调国民党军出援。至8日歼灭其塔木国民党军大部，及援军两个团。此役迫使攻击南满的国民党军回援。17日民主联军撤回江北。

△　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后，腿上发现伤痕五处，是日下午3时，北平市政府外事处派员会同美国军医检验，仍有两处伤痕未痊。沈已写3000余字之自白书，交其法律顾问费青教授等人，详述被蹂躏经过。市府恐此举对肇事美军不利，特将担任法律顾问之北大三位教授召去，出示两年前国民政府与驻华美军签订之文件——美军“治外法权”协定，声称美军犯罪时应由彼方军法审判，被害者及我官方只能旁听，被害人之律师亦不能出庭。三教授对此极为愤慨。

△　重庆市民盟支部、民主建国会等10余个民主团体成立陪都反对美军暴行委员会，并发表《慰问爱国游行同学书》、《反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及《慰问沈崇书》。次日，又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废除中美商约，公开审判各地暴行美军，严惩凶手，抵制美货等。

△　中国航空公司由沪飞平班机第一〇一号7时45分在青岛失事，乘客39人及机师三人全部罹难。

1月6日　　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向蒋介石辞行，告以将回国磋商中国问题，并称美国两位参议员默里和弗兰德斯倡议美、英、法、苏四国共同保证中国之稳定。蒋介石要马歇尔转告杜鲁门总统，不管什么情况，只要他担任中国政府首脑，就决不会接受有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参加作出的关于中国内部事务的任何行动。

△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巴德华照会外交部长王世杰，促请迅速恢复大连正常状态。

△　国民政府令：经核准退役之陆军中将蔡廷锴任为陆军上将。

△　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审查国家总预算完毕。

△　内政部公布《内政部地方自治督导团设置办法》，将全国各省、市分为六个督导区，分别组织地方自治督导团实行督导。第一区川、康、滇、黔、桂、湘及重庆市；第二区陕、甘、宁、新、青、绥；第三区粤、闽、浙、赣、台湾及海南岛；第四区苏、皖、鄂及南京、上海两市；第五区东北九省及哈尔滨、大连两市；第六区冀、鲁、豫、晋、察、热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各督导团由内政部指定高级人员三至五人组织。同日公布《内政部内政专门委员会组织规程》。

△　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对黄河堵口问题发表谈话，并函复中共代表董必武为扣发解放区应得之工款与救济款进行辩解，并攻击中共“妨碍国家建设大计”，“有意陷害人民”。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霍宝树称：黄河旧道居民迁移费即日发放，惟该款不拟径交中共当局，而由“联总”、“行总”、水利委员会派员前往，会同中共当局点名发放。

△　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在上海开会，出席中央委员及各地总支部代表36人。主席张澜致开幕词称：“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也不可失去自己的立场。”10日全会闭幕，通过若干决议案，要求和平、统一、民主，反对内战，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张澜连任主席，张东荪继梁漱溟为秘书主任。会议期间，参加民盟之第三党首领章伯钧宣布第三党决定改名为农工民主党。

△　美驻华第一陆战队司令何华德中将就北平沈崇案件发表声明称：公众不能希望此事的调查审判在数日内处理完毕，并称此事与政治不相联系。

△　北大校长胡适接见记者谈沈崇案件称：学校决定聘请法律系刑事专家集体为被害人搜集证据。对北大今后学生运动，胡适称：不

应以罢课为手段。

△　就平、津、京、沪学生反美示威运动，中共中央电董必武并转北平军调处中共方面委员叶剑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指示："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

△　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开幕，由总库拨予资金10亿元，其业务以推展各地合作社为主。

△　陈嘉庚发动他所主持的新加坡华侨促进中国和平民主协会，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并以10万人签名信件致杜鲁门，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同日，又致电港、京、渝、津、平、延各报，提出"凡属中国同胞，均应支持学生运动"。

△　《解放日报》载，中国劳动协会发表声明说："本会特向中国全体工人并代表中国工人向美国工人弟兄呼吁，以共同的力量要求修正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切实执行帮助中国停止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　新华社电：晋绥解放区百万贫苦农民经几年来减租、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已获得土地300余万亩。获得土地的人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每人平均为三亩九分。

1月7日　　蒋介石设晚宴饯别马歇尔。蒋介石再次邀请马歇尔重返中国担任特别顾问，答应赋予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共同为使中国成为中美两国人民所想望的国家而努力。

△　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奉召离华返美就任国务卿。是日发表对华局势声明，称："和平最大之障碍，厥为国共两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国民政府"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对于余促成真正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几无不加以反对"。中共方面"真正极端之共产党徒，则不

惜任何激烈之手段以求达到其目的”。“对于时局的挽救，系于自由主义在政府中的和在少数党中担起领导作用，而他们如果能够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活动成功，或可通过一个好的政府而达成统一”。

△　马歇尔会见外交部长王世杰，王世杰转交蒋介石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信中表示接受美国所提的许多改革项目。旋又会见宋子文，马氏称他经常向蒋坦率直言，而蒋亦接受他的坦率。宋表示蒋之需要马歇尔胜过马歇尔之需要蒋。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额表》。

△　蒋介石以特急电令浙江省对上年未征起之田赋，限一月终收足，如不收足，县田粮处长将严予惩戒。

△　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宣布：留居中国各地约300万日侨、日俘已遣送完毕。

△　内蒙卓索图、昭乌达两盟代表团和东、西两部内蒙古代表团吴南鹏、扎奇斯泰、任秉钧等12人，向行政院请求：一、恢复内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二、实行国民党二中全会有关边疆民族问题之决议；三、拨款一百亿元救济自嫩江至新疆之一百万蒙古同胞；四、彻底改组蒙藏委员会。

△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2000人，游行示威历五小时，响应宁、沪、平、津反美军暴行运动。中华文化学院、国民大学、省立文理学院学生1000余人半途加入。

1月8日　马歇尔离华返美，蒋介石夫妇至机场送行。

△　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立法委员任期延长至依宪法产生之立法委员集会之日为止；立法委员名额增加50人。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请求全国同胞和国际正义人士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一致起来紧急制止蒋介石政府以黄河水势淹没豫鲁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的阴谋。声明再次要求立即停止堵口放水，并按协议立即拨付解放区应得之全部工款、工粮、器材及河道居民之全部救济款。

△　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偕驻汴代表赵明甫等由宁抵沪，与“联总”、“行总”当局交涉停止黄河堵口放水，以便进行复堤，并迁移故道居民。

△　行政院以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已于三十五年（1946）终撤销，明令所遗业务，交中央信托局接办。

△　行政院修正公布《德侨处理办法》和《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

△　川省参议会大会决议，要求政府停止田赋征实。

1月9日　　蒋介石电令正在郑州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陇海东段与鲁南，先集中主力对付陈毅一部，再肃清刘伯承部。称此“实为堵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既定不易之方针”。

△　驻美大使顾维钧，在世界问题协会讲演，指责雅尔塔协议使苏联重新进入中国东北及东北亚洲。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发表谈话称：“政府对于停止冲突，及改组政府等问题，具体办法甚愿与中共竭诚商谈。”

△　张群与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曾琦、左舜生会谈改组政府、恢复和谈等事。

△　民社党发言人孙宝毅称马歇尔声明“无疑是医治中国病状最好的诊断书。他指出和平建国的一线希望端在两党温和分子与其他开明

分子的抬头，此项认识相当准确”。青年党宣传部长左舜生亦称马歇尔声明“相当深刻并具有正确性”。

△　董必武等在沪访晤“联总”分署长艾格顿，要求就停止堵口放水问题进行会谈。花园口堵口工程已完成十之八九，口门日益缩小，复归故道水流已到长垣，宽约20米，深达一米。

△　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率所部第六十二旅以及刚由台湾调来之第七十师第一四〇旅，由山东鱼台出援至金乡，是夜，在鱼台西北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一个半旅共万余人，第一四〇旅旅长谢懋权以下7000余人被俘。

△　中共山东野战军猛攻枣庄。激战至12日，攻占外围阵地。

△　参谋总长陈诚报请裁撤军官总队，蒋介石批复同意。

△　外交部长王世杰密电胡适，制止胡为沈崇事件出庭作证。电谓：“美方刻正羞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

△　台湾学生组成“台湾省学生界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是晨，台湾大学、延平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建国中学、台北女师等10余校学生及一部分公务员、店员、工人约万余人，在台北市新公园集会并示威游行。

△　解放区青年、妇女联合筹备会为沈崇案件发表通电：代表解放区9000万青年男女抗议美军暴行，并声援平、津、沪、宁及全国各地学生罢课游行的爱国运动。

△　云南省参议会电行政院长宋子文，呼吁自今年起停止田赋征实。

1月10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书面谈话称：解决国共和谈问题的方法，最好于不久的将来各党派负责代表再举行一次圆桌会议。

△　青年党、民社党举行联席会议，商议恢复和谈及政府改组方案，拟将两党草案合并为一共同方案，由民社党领袖张君劢亲赴南京面交蒋介石。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广播演说，评马歇尔离华声明，指出马歇尔声明只提政协决议不提停战协定，有意回避他的责任，并为军调部美方人员寻求解脱。要求美国停止援蒋内战，重新调整中美关系，以利于远东和平与国际合作。

△　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王炳南表示中共之和平愿望，重申中共所提恢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即：取消宪法，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

△　军调部中共发言人称黄河堵口问题系政治阴谋，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故道居民应假以时间迁移他处；二是故道沙堤应予修筑，沙道应予以疏浚，然后循上游建筑大小闸。

△　上午，民主同盟二中全会举行第九次会议，决定对于北平美军暴行事件，以民盟名义谴责政府，并推罗隆基、史良、章伯钧起草抗议书。

△　国民党军占领苏北沭阳，蒋介石指示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继续进击，求于10日内结束苏北军事。

△　四川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通过成渝铁路修建案。办法为：一、改组川黔铁路公司为成渝铁路公司；二、官商合办；三、速筹260亿元；四、确定股款筹集办法；五、目前急需之款，由省府向中央先行借贷；六、从速清理收回川汉铁路股款，作成渝铁路资金之一部。

△　中国与阿根廷友好条约在阿京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

△　美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杜纳格抵华，将视察平、津地区美

军设施。

△　刘元瑄指挥的国民党川康靖边军与康属及川滇交界之大凉山彝族民变武装发生激战，彝族民变武装在沙哈橹领导下，有10万人参加战斗，双方均伤亡数百人。

1月上旬　　全国学生掀起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运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成都、广州、福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地50万以上学生，连日相继举行抗议罢课和反美游行示威，要求严厉惩办凶手，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1月11日　蒋介石对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马歇尔离华声明“似有若干漏略”，指责中共“无诚意遵守三人小组之协议”。

△　蒋介石接见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与国防部长白崇禧，商讨接收大连问题。

△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就孙科建议举行党派圆桌会议事发表谈话，认为国民党应对中共的两项要求明确答复。同日，民盟中常委章伯钧亦认为，国民党应以事实表示诚意。

△　上午，“行总”署长霍宝树、“联总”中国署长艾格顿、总工程师塔德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伍云甫、赵明甫、王笑一等正式会谈黄河堵口问题，经数小时，未获结果。董必武会后告记者，中共为使下游700万人民不致葬身鱼腹，要求：一、停止放水；二、暂停堵口五个月。均遭“行总”拒绝，无法继续商谈，故不再出席下午会议。

△　山东野战军攻占峄县，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二师各一部及第二十六师残部被歼，整编第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及第一一四旅旅长李步青以下7000余人被俘。

△　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南京谈判中长路业务问题，中方主张以1905年以前中东路产权为限，苏方则要求应包括南满路之产权。

△　负责审理沈崇案件之美方军事法官费滋洛中校宣称：被害者沈崇女士“仅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而不能以“原告人地位”出席；至于沈女士之法律顾问，亦“不得在法庭代证人发言或回答问题，并不得在法庭表示本人对此案意见”。除与该案“有特别关系者”则一概不准旁听。

△　东北解放区政务委员会常委会决定合并黑龙江、嫩江两省政府为联合省政府，于毅夫任主席。

△　“巨港旅星华侨受难同胞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另巴邻旁亦有华侨救济组织，均展开护侨工作。

△　菲律宾远东航空公司巨型客机“吕宋小姐号”在中国海失事，旅客大部分为中国人，已有36人获救，六人失踪。

△　中国盐业公司成立。

1月12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英、美、法、苏四国外长，声明：一、将来和会必须由五国外长（即中、美、英、法、苏外长）召集；二、莫斯科外长会议，在未经中国外长同意前不得讨论德、奥和约以外之问题。

△　中共代表董必武就马歇尔离华声明发表谈话，指出：如无美国之装备，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国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

△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第六纵队主力于金乡西南地区歼灭由定陶增援金乡之国民党军暂编第四纵队第一支队，暂编第四纵队司令张岚峰被俘。

△　孙科、张群、雷震乘专车抵宁，就恢复和谈事请示蒋介石。蒋对孙科召开各党派圆桌会议之建议，认为可以考虑研究。张群抵宁时称：和平仍有希望，但中共如坚持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国大重订宪法两条件，则和谈恐难谈得好。

1月13日　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表示极端赞成孙科所提圆桌会议建议，认为任何一方均不应提出恢复和谈之先决条件。民社党发言人孙宝毅称：如和平无望，民社党仍将参加政府，因和谈主要系国共两党之事，决不能因其无成而任令其他重要问题长期搁置。民社党既已参加制宪，则依照宪法参加政府，实属义不容辞。

△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本年度总预算为9.3万余亿元，其中军费3.8万余亿元。

△　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丁聪、于立群、史良、李伯球、沈钧儒、沈志远、杜国庠、洪深、陈铭枢、胡绳、侯外庐、冯雪峰、楚图南、华岗、廖梦醒、许广平、胡子婴、田汉、吴祖光、徐迟、胡风等，分别参加签名活动，向美蒋提出抗议。

△　北平市政府通知新闻记者公会，推定记者九人组成美军法庭审讯美兵案中国记者观审团，并宣布消息由中央社统一发布，各报刊载时，不许增减一字，如违反则立即停供消息。

1月14日　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陈立夫、雷震等在孙科私邸集会，商拟恢复和谈方案：一、尽速实现就地停战；二、逐项实施整军协定与恢复交通协议；三、对地方政权作一定让步；中共所占区域较大、县份较多之省份中，中共可在省政府中多占席位。其所占区域较小、县份较少之省份中，以政府之省委为多数。县级政府则暂维现状，由政府重新加委。

△　蒋介石召见张群，商谈改组政府问题。

△　美驻华军事法庭宣称：出席审讯美兵案之中外人士各九人已核准出席旁听。国人九名为：沈女士之父、沈之监护人、北平市长何思源及市府女性公务员六人。美军官九人亦将出席，以维持中美双方人数平衡。

△　据《文汇报》报道：台湾工业生产处于半停工状态。蔗糖去年仅产八万吨，不及全盛期十六分之一；特产樟脑业已全部停顿，价格飞涨不已，现有价无市。

△　湖北省参议会要求省府严禁各县摊派勒捐。

△　西康最近发生空前激烈之民变，有组织之民兵超过10万人，有枪支四万余，已占领县城四座，西康保安团六个团前往镇压，反被包围，重庆行辕已派三个旅前往“清剿”。行辕副主任兼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是日乘军用飞机离京经汉口、重庆，飞往西康。

1月15日　蒋介石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晤，提出政府决定恢复和谈的四点方案：“一、国民政府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或是邀请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到南京来，以继续谈判，或同意在任何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举行圆桌会议；二、政府与共产党方面应立即颁布停战命令，并商讨命令的实施问题；三、政府愿意根据三人小组会的原则，重新讨论有关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的实际计划；四、政府表示愿意对于发生争执地区的政治管辖问题与共产党方面立即达到一项协议。”蒋请司徒雷登与在南京之中共代表接触，以探知中共方面的态度。

△　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协代表会商恢复和谈方案。

△　宋子文抵沪，召集贝祖贻、钱昌照、秦汾、林凤苞、束云章、杨锡仁等会议，商促进输出争取外汇，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下，成立输出推广委员会，宋子文任主委，王云五、俞鸿钧、俞大维、周诒春、贝祖贻、钱昌照等为委员。输出推广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研究如何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情况下，尽量增加输出物资种类，争取外汇资源，谋求平衡我国国际收支。

△　依据中、苏、韩三方本日于新义州签订的协定，于一周内，我军正式接防安东省水丰发电所总水闸的拉古哨。

△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赴郑州晤参谋总长陈诚、郑州绥靖主任顾祝同检讨战局，研究作战方案。

△　司徒雷登分晤张群及中共代表王炳南。

△　晋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农工青妇各界联合总会向全国同胞及世界公正人士通电，抨击国民党破坏治河协议堵口放水的行径，望国内外人士急起制止。

△　北平各报记者对记者公会理事会推定“美军法庭审讯美兵中国记者观审团”表示异议，认为该项决定未经全体记者同意，且统一发布新闻之规定违反新闻自由之原则，理事会决定凡不遵照统一发布办法之记者予以取消会员资格，也与该会章程不符。

△　福建省参议会电请政府不再征实、征借，以苏民困。

△　沪宁铁路货运，自本日起加价一倍。

△　上海数日内有89家商店及59家商业公司宣告破产，六家毛纺厂及10家其他工厂停工；另有千余家商店未通知社会局而自行关闭。失业人口达200万，约占全市人口之半。

1月16日　蒋介石决定派张治中携和谈新方案到延安商谈和平。和谈方案四项，计有就地停战，整编军队，恢复交通，解决地方政权等。此一方案经由司徒雷登转交中共在京代表王炳南。

△　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指出：蒋方正通知你们恢复和谈，并派张治中来延安。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介石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毛泽东在此电上加写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

△　国民政府派刘大钧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小麦会议代表。

△　驻美国大使顾维钧与美副国务卿艾奇逊会晤，就日本对华赔偿等事进行磋商。

△　长春卫戍司令部派遣10余名官兵，闯入军调部长春分部中共人员宿舍，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20余人被迫停止工作，行动被监视，电台被封闭。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举行记者招待会，答记者关于中共要求花园口黄河堵口延期五个月完工一节，以堵口不久可完工，中途停顿则木桩石块随时有冲去可能等理由，表示不能停止堵口。

△　由山东菏泽增援金乡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师、第五十五师三个团于14日夜被围于定陶附近后，是日全部被歼。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的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至此结束，歼灭国民党军2.8万人。

△　集安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两个师北进，企图打通通化集安线，至19日未果而返。

△　国民政府分别向英、美、苏、法四国提出备忘录，要求依据波茨坦协定，参加对德及对奥和约之起草工作。

△　中央银行发行新关金券，分250元及500元两种，规定对法币比例为1：20。所谓新关金券实系5000元及一万元法币大钞之替代品。同日，财政部公布实施携带国币出口限制办法。

1月17日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共中央两项要求置之不理，证明其所谓和谈完全是骗局。我们对于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心。

△　民社党发表对和谈之意见称：国共两党和谈之所以不能成功，其最大原因，在彼此各有其兵力。希望国共两方皆能切切实实还军于国，还政于民，共同造成一个超然于各党之上公平正直之法治政

府。

△　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通知驻长春军调部执行小组之中共代表停止活动，并禁止其无线电通报。

△　军调部中共方面委员叶剑英为当局非法封闭长春分部中共代表团电台及监视该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向国方和美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转请长春军事当局立即发还电台，恢复中共人员之自由，惩处卫戍司令部肇事人员。

△　参谋总长陈诚近日往来于徐州、开封、郑州一带指挥军事。

△　美驻华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沈崇案件。

1月18日　中共驻南京代表王炳南至美驻华使馆访司徒雷登，转告延安之答复：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两条件，即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二、取消伪宪，重新拟订宪法。如政府同意，则恢复和谈即刻可在南京开始，否则即使政府派人赴延，亦无补于事。

△　司徒雷登面见蒋介石，告以中共对政府和谈方案之答复通知。

△　政府代表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与青年、民社两党领袖在孙科公馆会晤，认为延安之答复已关闭和谈之门，考虑另辟新途径，由政府发表声明。

△　外交部宣布，对因荷印苏门答腊岛东部巨港荷军与印尼军最近发生战事致使该地华侨所受严重损害事，政府已在南京与巴达维亚两地分别向荷方及印尼当局提出强硬抗议。同日，中国驻巴达维亚领事宣布，巨港荷军与印尼独立军最近冲突结果，华侨150人罹难，另500人受伤，无家可归者800人。

△　驻法大使钱泰以1月17日法军舰“东京号”到西沙群岛一案发表声明：西沙群岛属于中国。19日法军舰在西沙群岛登陆。

△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会同晋绥野战军攻克孝义，守军第三十四军第四十五师一部及地方团队2500人全部被歼。

△　阎锡山以孝义失守，是日赴平遥前线部署，调九个师及两个纵队共三万余人分三路往援。

△　广东省主席驻琼办事处主任兼第九区专员蔡劲军宣称：“海南岛现尚有中共冯白驹部六千余人，以前用全面进剿办法收效不大，近正采取碉堡政策进行清剿。”

△　在发行新关金券刺激下，汉口市场黄金饰金每两陡增四万元，其他物价亦随之趋涨。南京、上海金价亦涨。各地美钞、港票亦被金价拉高。中央银行在上海极力抛出黄金，但仍求过于供，金价上涨不已。

1月19日　蒋介石在官邸宴请青年、民社两党领袖张君劢、曾琦等人，商洽和谈声明等事，孙科、吴鼎昌、张群、邵力子、王宠惠、张治中等作陪。

△　民盟发言人张东荪发表谈话称：当前所谓的恢复和谈运动，系政府与民社、青年两党共同计划之行动，政府并未与民盟正式接洽。

△　外交部长王世杰约见法驻华大使梅里霭，就法军舰“东京号”在西沙群岛登陆一事，郑重表示西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

△　国民党军占领新安镇，打通陇海路东段。

△　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沈崇案件之审讯方式，要求改由中美双方组织军事法庭审理。

△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首届年会在南京举行，曾虚白、傅抱石等150余人出席。会议改选理事，张道藩、王平陵、朱光潜等31人当选理事；熊佛西、陈树人、徐悲鸿等九人当选监事。

△　美海军上将柯克宣称：国民党青岛海军训练团系完全由美人负责，美政府专为该团运来之训练器材、物资价值法币150亿元。美方在青岛移交给国民党的船只已有26艘，大部分为登陆艇，重六万吨。美海陆军在华之费用每月为100万美元。

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政府对和谈问题的声明，对中共两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并公布《和平方案》："一、政府愿意派员赴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南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二、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三、整编军队及恢复交通，政府仍愿根据三人会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四、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

△　午后5时蒋介石邀民社党张君劢至官邸谈话，表示公开政权。

△　张群、陈立夫访青年党曾琦、左舜生等，吴鼎昌、王世杰、雷震访民社党张君劢、伍宪子等，邀请两党参加政府。两党均表示须经党内讨论决策。

△　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四项主张：一、努力促成和谈；二、重新举行政治协商；三、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四、成立联合政府。

△　国史馆在南京正式开馆，张继与但焘任正、副馆长。国防部史料局亦告成立，吴石任局长。

△　山东野战军经10日激战，是日攻占枣庄，歼灭国民党军整编

第五十一师8000余人，俘师长周毓英。自1月2日开始的峄枣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五万余人。

△　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南战役。26日占新乐，28日占定县，控制了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的平汉路。

△　广东省参议会响应江西、湖北省参议会建议，要求政府今年停止征实、征借。

△　交通部成立民用航空局，戴安国任局长。

△　陕甘宁边区政府明令规定，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和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之日为“国耻日”，并举行国耻纪念集会，直至该约废除。

1月21日　国府秘书沈昌焕将和谈声明（即《和平方案》四条）送交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转致中共。23日，司徒雷登派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持政府声明赴中共办事处，面交王炳南。

△　蒋介石接见民主同盟秘书主任张东荪。

△　国防部长白崇禧宣称：“西沙群岛主权属于我国，不仅历史、地理上有所根据，且教科书上亦早载明。去年敌人投降退出该群岛后，我政府即派兵收复。本月10日有法国侦察机一架飞临侦察，18日复有法国军舰一艘驶至群岛中最主要一岛，我守军当即表示守土有责，不许其登陆，并责令其退走。”

△　保南战场，晋察冀野战军攻克望都。

△　国民党军第一次对临江的进攻被迫停止，东北民主联军收复通化以南地区。

1月22日　蒋介石邀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为促中共恢

复和谈事宜。

△　蒋介石核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并交行政院付诸实施。

△　印尼、越南华侨受害惨烈，外交部与侨务委员会分途救侨护侨，并向荷兰、印尼、法国提出严重抗议。

△　北平美军暴行案因罪证确凿，庭审宣布伍长皮尔逊为强奸已遂罪，但应处何罪须呈华盛顿海军部长核定后宣布。

1月23日　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

1月24日　参谋总长陈诚赴鲁南视察，部署军事。

△　蒋介石召见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俞叔平，了解有关上海治安、卫生、警员、学术等各项问题。

△　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中美航线，首次试航班机是巨型“南京号”，今后中航班机将定期由上海往返旧金山。

△　法军再度登陆西沙群岛，中国政府对法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派军舰驰赴西沙群岛巡视。

△　天津工业界李烛尘等电国民政府反对日本请运盐100万吨，指出：如大量供应，无异培植日本化学工业，而中其“原料中国，工业日本”之毒计。

△　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占定陶。

1月25日　蒋介石召见国防部长白崇禧、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等，商谈中共拒和问题。

△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反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月20日关于政府《和平方案》的声明，指出政府的《和平方案》无诚

意可言，全系骗局。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必须恢复，否则等于鼓励反动派大打内战；蒋伪宪法必须取消，否则等于承认独裁。

△　中国航空公司第一三八号班机，在由广州飞重庆途中，于贵州上空失事。

1月26日　　为影响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谈，蒋介石制订“鲁南会战”计划。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共31万余兵力，分由陇海线徐州至海州段、津浦线徐州至济南段，及胶济线中段三方面向鲁南进攻，图与华东野战军在临沂地区决战。主力组成南、北两集团，以临沂、蒙阴为目标，经陇海、胶济两线夹击。南线，以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新安镇、城头，分三路向临沂进攻。左路为第十一、第五十九、第六十四三个整编师，由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指挥。中路为第七十四、第八十三两个整编师，由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指挥。右路为第二十五、第六十四两个整编师及第六十七师（旅），由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指挥。整编第二十、第二十八、第五十七、第七十七等师位于徐州、海州段，随后跟进。是日左路自运河站向北进占邳县。右路30日自徐塘北进占桃林及河村。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九个师（旅）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淄川、博山、明水经莱芜、新泰南进蒙阴。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声言“党国成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免遭各个歼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击”的战法。

△　外交部为“中长路及大连接收案”，再与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举行谈判。

△　外交部情报司长何凤山称：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汉马伏波曾到该群岛，清宣统二年李准亦悬旗鸣炮，正式成为中国领土。根据1887年中法条约规定，红线以东属于中国，故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西沙群岛均为中国领土。法军之登陆，无疑系属非法。

△　北平大学生联合会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将沈崇案件罪犯皮尔逊交由中美联合法庭重审。

1月27日　西贡法国当局向报界发表关于西沙群岛争端之声明，略谓："法军舰'东京号'载有少数军队，一部分奉命在波西岛登陆，其余在拔陶儿岛登陆。上述两岛有1938年法军所建军队营房、码头及气象站，可见主权属于法国。"

△　经济部派李铭等参加中美两国商人会议，并即筹设中国商事协会。

△　年前起义的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郝鹏举通电归顺国民政府，出任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防区为鲁南七县，司令部驻连云港附近之白塔埠。

1月28日　蒋介石电示顾祝同，称陈毅、刘伯承各部正分由东、西两面对徐州发动钳形攻势。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抵沪，分别与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陈启天晤谈。吴发表谈话称：和谈暂时已无恢复希望。改组政府事正依计划积极进行，短期内当可使其实现。

△　外交部照会法国驻华大使，抗议法军入侵我国西沙群岛珊瑚岛。

△　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离京飞郑，赴花园口视察。中共驻汴代表王笑一亦由"行总"豫分署长马杰陪同至花园口，察看黄河堵口工程进行情形。

△　晋察冀野战军于26日收复新乐后，是日又攻占定县，保南战役至此结束，共歼国民党军8200余人；收复县城三座，控制大圾店至新安间铁路100公里。

△　自沪飞渝之中国航空公司第一四五号机在湖北天门失事，乘客23人及机师三人均罹难。

1月29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决定退出旨在调停中国国内冲突之三人会议，并尽速撤回军事调处执行部之美方人员。

△　司徒雷登面见蒋介石，告以美国决定退出军事三人小组与军调部。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中共正式拒绝和谈，吁请各党参加政府。

△　民社党召开中常会，对是否参加政府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意见未能统一。

△　联合国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商讨该会结束和善后工作。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欧洲各机构已定于本月底全部结束。亚洲部分则延至今年6月底全部结束。中国行政院之善后救济总署定今年9月结束。

△　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的汾孝战役结束，连同上年11月的吕梁战役，国民党军在山西损失2.2万人。

△　外交部次长刘锴在国民党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否认法国政府外交部声明中谓中国于1938年同意法国占领西沙群岛之说。称中国于彼时仅重申其一向立场，中国对该岛之主权，为无可争议者。

1月30日　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　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再次与民社、青年两党商谈改组政府事，民社党徐傅霖称：民社党“没有理由不参加政府”。惟望政府先提出改组之新名单，如人选系采人才主义，并非国民党包办，民社党参

加政府并无问题。

△　国民政府特派白崇禧为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督察团团长，谷正纲、邓文仪为副团长。

△　行政院颁发“保障人权”令，称：“保障人民身体自由，为实行法治之要图。乃据报载，有若干机关滥用职权，非法逮捕拘禁人民，妨碍人权及法治前途。嗣后各机关务须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自由，以重人权而维法治。”

△　中国通知英、美、法、苏四国，指出中国有权参加对德、奥和约起草工作。

△　国民党军集中四个师分三路第二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2月3日，左、右两翼各一个师出动，直指临江门户八道江。

△　美海军法庭是日公审沈崇案件帮凶美兵普尼查德，判其以不报强奸罪行及帮同皮尔逊殴打沈崇有罪。

1月31日　国民党军发动鲁南会战，以临沂为中心目标。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20个旅，自陇海路向北行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推进。

△　立法院通过三十六年度总预算。主计处处长徐堪在立法院说：“本年度预算最主要为军费，如整军不成，现列之数恐难维持。”

△　中共军队聂荣臻部进迫冀北保定，国民党军失守豫东鹿邑，鲁东共军逼近即墨、胶县，威胁青岛。

△　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总部公布去年7月至今年1月爱国自卫战争几项重要统计：七个月中，共歼灭国民党军56个整旅、其中1月份歼国民党军12个旅（仅计整师、旅、团、营被歼的正规军及交通警察总队）；毙、俘其将级以上军官103名，其中俘获87名，俘获后逃跑

四名，击毙12名。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城市199座，人民解放军攻占国统区城市100座。

△　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对美国退出三人小组会议及军调部事发表个人感想：美国今退出军调部，但决不能逃卸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

△　民盟发言人叶笃义称：美国退出三人小组及军调部，是马歇尔特使返国后的必然结果。政府同时宣布单独改组政府，这种举措实为关闭和平之门，准备长期内战的表示。

△　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十一团是日自塘沽开拔回国，华北所驻美军因之减少至一万人，天津所驻第十一炮兵团则已撤至关岛驻防。

△　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发表宣言，要求生活安定，力言物价高涨和职业无保障之痛苦。

是月　　《解放日报》讯：川、康、滇、黔四省民变武装发展迅速。西康民变部队组成人民自卫军，以陈经武、李元亨、赵国祥为正、副司令。部队分七路，提出组织人民政府口号，已占领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城，四川民变武装已达12人万以上，新旧部队共百余单位，川西邛崃、岷山中一部达数万人，称“民主人民军”。川滇边境的殷禄才、曾子明等17个民变领袖合组“川滇总司令部”，所属各部分驻成犄角之势。云南全省民变武装二万余人，共约20个单位，以滇西北金沙江北永胜一带彝族武装力量最大，人枪一万余。贵州织金、黔西、金沙、大定、桐梓、仁怀等县均有民变活动。重庆行辕及西昌警备司令部遣驻川康边的三个旅、驻云南的航委会特七旅与整七十九师等部，会同各省保安团队向四省边境变民“进剿”。

△　冀中中心地区土地改革，截至今年1月，已大体完成。据高阳、肃宁等37个县、市统计，完成土改的村庄已达6287处，占全部

村庄83％强。参加运动人数，据任丘、安平等14个县统计，有76万余人。据安国、饶阳等17个县统计，有55.5万余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经土改后的农村大为改观，大城全县已无赤贫。安平全县2760户升为中农，96户雇农变为自耕农。翻身农民生产热情高涨，热爱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青县泰庄去秋布置征收公粮，当晚群众即缴纳完毕。为保田保家，两月内冀北已有四万翻身农民参军。

2月

2月1日　下行5时，蒋介石偕宋美龄在励志社举行茶会，招待立法院全体立法委员，到孙科等60余人。蒋称，今兹胜利复员，实施宪政，立法委员工作益加繁重，特表慰勉。下午7时半，又在黄埔路官邸邀宴于右任、孙科、戴传贤、邵力子、王宠惠、吴鼎昌、张厉生、陈立夫、张治中等，就行宪准备工作交换意见。

△　北平军调部电令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人员撤回北平。

△　政府宣布解散北平军调部后，军调部政府方面以备忘录致中共方面：请将撤退人员名单提交政府。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要求在军事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巩固解放区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实行土改；党的任务是为争取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及胜利而斗争。

△　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表示对1946年1月10日以后，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丧权辱国条约及协定，与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

△　民主同盟在沪招待各界，交换当前时局意见。主席张澜致词称：民盟“将尽心尽力求得和平民主的实现，惟感力有未逮，尚望各

界多予督促指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称：“政府前所表示恢复和谈，并非诚意的。”“中共现在是为生存和自卫被迫应战的。”人民团体联合会负责人马叙伦提出：“希望民盟负起领导中国民主运动的责任。”

△　行政院长宋子文准拨500亿元低息贷款，作生产钢铁之用，俾于本年内生产钢至少17万吨、铁六万吨，以供国防、交通之需要。

△　中国石油公司与招商局合组之中国油轮公司在沪正式成立，资本总额为800亿元。董事长翁文灏，副董事长徐学禹，总经理李允成。该公司为全国惟一专运石油机构，由招商局拨油轮20余艘，共载重六万多吨，本月起开始运输。

△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巴德华于1月6日照会外交部长王世杰，促请恢复大连为国际贸易港，并同时照会苏联方面。王世杰本日答复美大使馆，称：“中国政府业经努力，并愿继续效力，以期达此目的。”

△　美海军陆战队总部在华盛顿声称：陆战队并未接到关于撤退驻华军队之命令。

2月2日　　蒋介石上午专机飞徐州，布置“鲁南会战”，责令前方将领“把握战机，督率所部前进”。下午原机飞返南京。

△　敌伪产业处理局奉行政院令，将英人与日伪合作之门头沟煤矿资本中英资部分，发还中英公司总经理麦边。

△　黑龙江省解放区军民擒获国民党收编之匪首混成第六旅旅长刘山东，击毙其副旅长刘汉臣、团长李万臣等350人，缴获军马400匹。7日，又擒窜扰牡丹江地区之匪首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东山（匪号坐山雕）以下25人。

2月3日　　第三党在沪举行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40余人。

会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修改党章。会议决定完全同意民盟政治纲领，党员参加民盟者应忠诚遵守民盟决议，并愿为实现政协决议及《和平建国纲领》而奋斗。会议选举章伯钧、丘哲、郭冠杰、李伯球、张云川、季方等34人为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彭泽民、韩卓儒等15人为中央监委、候补监委。

△　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宣言，提出四项主张：一、“完全同意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及其时局对策，凡本党党员参加民盟者，均须切实遵守民盟决议，为实现其主张而奋斗”。二、“本党所组织之农工平民群众，当与全国工农结成联合力量，进行共同的斗争，以求自身的解放”。三、“本党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之改造，一贯主张首须改善农民生活，实现耕者有其田，增进工人福利，由工人参加国家生产管理，并与工商业者一致合作，以发展生产。当前之任务，则在于停止征兵征粮，求农村之安稳，停止通货膨胀及官僚买办之垄断，求工商业之复兴与失业之救济”。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本可完成于抗日之后，然卒以当权政党的利用外援进行内战而自毁其功。若帝国主义势力遂益加深入，吾人势必加以拒抗，确系国家的独立自主，以与世界民主力量共同维护人类之和平幸福，而免致中国沦为世界的战场”。

△　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钱泰为签署对意大利和约全权代表。

△　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陈立夫与青年党代表左舜生等，商谈改组国民政府问题。

△　驻美大使顾维钧及驻联合国参谋委员会代表何应钦，拜会美国务卿马歇尔。何告记者，美国撤退军调部人员之后，中国内战不致因此趋于激烈。并估计目前政府军约有150个师。

△　中共华东野战部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总兵力达30万人。

△　河内中华会馆及华侨互助会电南京华侨代表，吁请政府速予救济。政府官员宣称，法国政府已在原则上同意赔偿华侨损失，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援助华侨，并决定撤退战区内的华侨。

△　美国驻华大使馆否认司徒雷登参加中国政府改组之任何工作，并称：大使与中国各方政界人物之接触，乃其例行公事。

△　美方非正式通知南京中共办事处，谓如拟撤退，可代准备交通事宜。中共办事处答复：无撤退计划。

△　美军驻延安联络团成员撤离延安。

△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曼斯斐尔德在众议院向总统杜鲁门提议，主张召开中、美、英、苏四国会议，为中国内争觅致和平解决办法。

2月4日　上午10时，蒋介石乘专机飞往郑州“视察”，当天下午5时原机飞返南京。

△　外交部人士称：中国政府已就印尼巨港华侨所受之损失；向荷兰政府提出抗议，并建议重划安全区，组织华侨民团，保护安全区内华侨。巴城荷兰当局已接受此建议。中国政府亦已向印尼共和国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设法救援华侨。

△　各华侨协会一致向陈嘉庚建议，由东南亚1100万华侨对荷兰实行总抵制。

△　国际民用航空南太平洋区会议在澳洲墨尔本开幕，会期三周。中国派刘敬宜等代表出席。

△　荷兰女王函谢中国东印度华侨抗战有功。

△　中国向日追还善本古籍首批10箱运返，尚有108箱待运。

△　黄金上涨，上海每两达48万元，美钞每元8500元。

2月5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出口结汇由政府补贴100%，进口货物从价征附加税50%，自次日起实行。美国以此举危害美国对华进出口利益为由，表示反对。

△　北平军调部美国方面向派往各地的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发出紧急命令，要求迅即集中北平与长春，以便撤退回国。

△　首都警察厅发表南京人口数字，计为102.0371万人。

2月6日　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听取报告北平军调处结束与遣返国共双方人员事宜。

△　宋子文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交备忘录，说明需要美国财政上之援助，请贷款1.5亿美金，购买棉、麦。

△　美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于3月5日前协助中共负责人员撤回至合理而可至之中共地区，及执行小组中之政府人员撤回至原来地区。""双方人员中，任何人于3月5日后仍留驻于现在地区者，概应自行负责。"

△　军调部组织一特别小组，负责办理交换国共两方互相扣留之联络官及遣回事项。中共方面扣留者周北峰等三人，及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扣留者袁剑等五人，均于是日在北平交换遣回。

△　行政院救济总署运输登陆艇"万敬号"装载救济物资800吨，自上海运往山东解放区。是日上午驶近石臼所，突遭青岛方面飞来空军飞机两架投弹轰炸，船员五人受伤。该艇不及卸货即转驶烟台。

△　平津学生团体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发表声明，指出：美方退出军调部，为美国表面充作调人、暗中资助一方进行内战的必然结果。美军遣俘任务早已完成，军调部又告解散，中国主权独立不容侵犯，美军应立即全部撤离中国。声明最后并呼吁废除片面受惠的中美商约。

△ 教育部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实行男女分校。

△ 汉口、广州金价每两超过55万元，天津64万元。

2月7日 行政院令全国各地行政机关，“凡足以引起人民反感及受人煽动利用之行政措施应予避免。如取缔摊贩、取缔人力车、拆除棚户等政令，易招人民之反感，均宜酌量缓办，更不得有强迫情事”。

△ 是晚，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参谋长薛子正于北京饭店举行酒会与北平各界话别。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以次高级军政长官、各大学校长、民社党、民盟人士及美方高级军官等，均应邀出席。

△ 军调部美方工作人员及眷属300余人首批由北平赴塘沽搭轮返国。

△ 军调部长春分部美方代表泰森上校书面通知国共两方，美方工作即日起正式结束，另组北平美军总部对华联络处长春分处，执行撤退前之未完任务。一俟该部东北区内之运送事务完毕，即行撤退。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关于美国在华保有军事基地问题，认为谈判仍在进行，并无任何困难，目前尚有少数陆战队留驻青岛，协助训练中国海军。

△ 美国西南太平洋舰队赠中国900吨中型登陆舰一艘，在青岛大港码头举行交接典礼。

△ 由华中民主建国军叛变后改编的第四十二集团军在连云港附近白塔埠地区被华东野战军歼灭，总司令郝鹏举被捕。

△ 4日及是日，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新加坡两次召集社团代表举行座谈会，商讨对付荷兰惨杀我侨胞及夺船劫货等暴行之步骤。议决：一、关于荷兰暴行，如交涉无效，对荷发动抵制；二、将来发动

抵制时，各有关团体损失估计，可提出办法或来函南侨总会。

△　上海金价每两达55万元（一日五涨），美钞每元达一万元。

2月8日　　各地金价暴涨：南京每两61万，汉口62万，重庆61.5万，天津暗盘达70万元。各业市场亦随之节节上涨，人心不安，形成抢购物资之疯狂状态。同日，中央银行停止暗售黄金。次日，米价受金价影响，继续狂涨。广州上米每石12.5万，汉口上机米8.4万，福州上白米13万，南京各汽油站全日停售汽油，以观望上海新价。

△　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商讨上海金钞物价暴涨问题。

△　国民政府任命王化成为驻葡萄牙国特命全权大使。

△　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九个师（旅）参加鲁南会战，自胶济路南下，占新泰、颜庄、莱芜等地，企图与南线部队夹击华东野战军。

△　由于东北民主联军反击，国民党军第二次进攻临江受挫，损失4000余人。

△　首都高等法院判决伪特工总部主任、社会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丁默邨通敌叛国，处以死刑。

△　外交部派代表往印尼巨港，调查荷兰海军扣留中国船只及办理受难侨胞善后事宜。

2月9日　　上午9时，上海市百货业职工筹组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成立大会，郭沫若、邓初民、马寅初、马叙伦出席演讲。9时15分，突发生暴徒行凶事件，殴伤22人。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因伤势过重当晚死亡。沪警局黄浦分局赶往“弹压”，反将被殴群众悉数带局讯办，是为“二九”血案。郭沫若、马寅初、沈钧儒、胡子婴等以中国学术工作协会代表名义，前往上海市警

察局提出质问。

△　国共双方代表商定：一、小丰满电供哈尔滨；二、中共放回张大同、曹志瑚等重要俘虏；三、中共保证小丰满通长、沈电路之安全。

△　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在三原召开作战会议，布置对关中地区的进攻。

△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通过新一届理事会章程，选举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等九人为理事。28日，理事会推马、王、许三人为常务理事。

△　新加坡27个华侨团体决议向联合国控诉荷兰人在印尼屠戮和杀伤成百名华侨之暴行。

△　美国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致函马歇尔，指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抨击国民党，谓恢复中国之和平与统一所以失败，其主因为美国一方面企图调解，一方面在军事及经济上援助国民党之反动分子，致使调解基础破坏殆尽，国民大会最近所通过之宪法，亦仅为一种姿态而已。主张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不为国民党或共产党所控制。

2月10日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国共恢复和谈的条件是：恢复1946年1月10日双方控制区域；取消“宪法”，恢复政协决议。

△　中央银行停止对金号配售黄金，仅配与银楼180条。各地金钞价格狂涨，市场混乱。上海金价升至72万，美钞1.6万。天津黄金暗价72万，无卖主。汉口上等机米每石近10万元，零售千元一升，且谢绝整购。

△　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二九”血案发表谈话，认为罪过全在于主持此次爱用国货抵制美货之人员，声称要社

会、警察两局查出主持者，予以严办。

△　中国民主同盟为劝工大楼梁仁达血案提出抗议，称：“希望政府一方面制止恐怖压迫，一方面严饬出事地点之负责当局，对血案彻底办到惩凶、抚恤等，以息民愤，而重人权。”

△　“联总”驻烟台人员奉命撤回，“联总”副署长傅克逊等亦中止赴烟巡察之行。山东解放区善后救济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联总”迅速派员至解放区继续救灾工作。

△　《中国阿根廷友好条约》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中国驻阿大使陈介、阿外长布拉玛葛里亚代表双方签字，要点有三：一、中阿两国互相合作，以维持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二、两国人民居住、工作、旅游及信仰自由。三、早日签订航行及通商条约。该约经立法院与阿根廷国会批准后即告生效。

△　外交部令驻法大使钱泰在对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战败国之和约上签字。同时签字的有苏、美、英、法等国代表。

△　国民政府任命汪德耀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　广东各界组织紧急救济越侨委员会，决先请省银行垫汇1000万元赴越救济。同时发动各县、市募捐，限一个月汇齐。

2月11日　　各地物价继续上涨：上海金价为73.4万，南京为93万，武汉为95万，重庆为95万，广州为110万，北平为86万，天津为83万，青岛为75万。各地金价均高出上海，各地纷纷向上海抢购黄金。上海黄金黑市高达94万，白粳米达14万元，有价无市。黑市米价喊至18万元。

△　蒋介石召集宋子文及政府金融经济要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应付金价物价飞涨之对策。各市参议员为行政院对金价物价飞涨、币

值暴跌无能为力，纷起责难。立法委员楼桐荪、简贯三等建议宣布黄金收归国有，否则停止黄金买卖。

△　军调部中共首批撤退人员共20余人，是晨由北平搭美机分别撤回延安、邯郸。第二批撤退人员10余人于14日由北平撤至哈尔滨。

△　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抗议国民党特务两次袭击学生宣传队之恐怖暴行。重庆各民主团体组成联合后援会，声援学生。

2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蒋介石主持讨论金市狂潮及物价飞涨之经济混乱状况，决议设立经济政策委员会研究具体对策。

△　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召集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商讨制止金潮对策，美籍顾问数人亦与会。

△　彭学沛答记者问，称：对经济危机更改货币名称、汇率均难奏效，根本办法在及早恢复建设。政府改组何日进行尚难确言。目前情形难言和平。

△　青岛、成都市参议会以黄金、美钞连日猛涨，紧急决议停止市场黄金、美钞交易。

△　北平军调部中共新闻处黄华、张香山在北京饭店宴别平市各报记者，叶剑英、薛子正等出席，与各记者畅谈目前战局及中国之前途。

△　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束出击豫皖边，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

△　上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发表《为梁仁达烈士惨死告顾客书》及《我们的抗议》，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彻查真

相、惩办凶手；二、抚恤受难同事家属及负担一切治丧费用；三，赔偿一切损失；四、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

△ 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杰克逊抵青岛视察。

△ 张东荪等教育与文化界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改建学社”。

△ 国营招商局中印航线班轮“海天”轮由上海首航。

2月13日 蒋介石与宋子文及美顾问研商经济对策。宋主继续抛售黄金，蒋反对。最后决定停抛黄金、管制物价、取缔投机、禁用外钞等。

△ 监察院召开会议，院长于右任主持讨论最近黄金风潮事，决议选派何汉文、谷凤翔、张庆祯、万灿四监委为上海黄金风潮案彻查委员，并责成上海审计处协助工作。

△ 苏联答复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谓对德和会由原起草的四国召集，不包括中国。王外长斥其不合波茨坦协定。

△ 美驻华使馆发言人康纳士称：军调部美方人员大部分自2月7日起60日内可撤退完毕，留官兵25人负责清理财产、房屋等事宜。彼等于此期间，行政上隶属于美军顾问团，然此非美军顾问团将在平设立分团。

△ 国民党军五个师分四路第三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其中二个师攻八道江，二个师攻临江。东北民主联军内线阻击，外线迂回。加上北满部队二下江南，迫使国民党军于10日后开始退却。

△ 菲副总统兼外长季里诺与中国驻菲公使陈质平重行谈判中菲通商友好条约。双方同意设立特别委员会，调整最后草约中之争论点。

△　交通部6日令中央、中国航空公司恢复国际航线。是日，中央航空公司沪港、渝港、昆港三线同时起飞，途经厦门、广州两地。中国航空公司决定恢复沪菲（至马尼拉）、沪印（至加尔各答）、沪港等三线。于次日先行飞航沪港线。

△　宜昌以下船只全数被国民党军调用，航运中断，滞宜乘客3000人，食宿均极困难。

2月14日　立法院举行例会。楼桐荪、简贯三抨击政府对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要求宋子文到院接受质询。陈志平则要求宋子文辞职以谢国人。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经济部长王云五、财政部长俞鸿钧到会报告，认为金潮案源于游资过多。参政员纷纷抨击政府经济政策，指斥少数人搜刮国富民财，要求政府迅采有效办法。傅斯年称：现在国家资本被官僚资本吃尽，官僚资本又被豪门资本吃尽，此现象如不取缔，国家将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　军调部长春分部派驻哈尔滨市之美方人员格莱因斯中校等五人，是日飞返长春。行前，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宴饯行。

△　教育部函各省政府，请于本年上半年内，在各县恢复县教育局。

△　教育部训令各私立大学及学院，谓：青年军退役复学学生可领全公费，由教育部统筹办理。各校对由教育部分发入学学生，应准先注册入学，不得将膳费扣抵学宿杂费。入学后其膳费由校按月造册报部请领。

△　广州中山大学师生举行反内战、反独裁大会，是日起罢课两天，抗议政府内战政策造成之金融危机，百物狂涨，使师生生活困苦。

2月15日　蒋介石与五院院长及财经主管首长研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　国民党中央常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商讨全盘经济方案。

△　中央银行公告停止抛售黄金。自1946年3月8日至是日，该行共抛售黄金350余万两，耗费外汇3.54亿美元；截至抗战胜利为止，该行原储备黄金600万两，美元八至九亿元。

△　联合国提出报告草案，详述中国八年所遭战争破坏的惨状：据估计战争死亡人数逾900万，由于战争死于疾病及受伤人数达数百万，劫后余生者亦陷于穷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坏，教育受严重损害，工矿业十损其九，灾荒和瘟疫波及广西500万人、湖南千万人。美对华经援在考虑中。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举行酒会，为军调部三方人员送行。叶剑英表示，决17日离平返延。

△　第四届戏剧节在上海举行，周信芳、梅兰芳分别获改良京剧奖及忠贞荣誉奖。

△　傅斯年在《世纪评论》撰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抨击宋子文黄金政策“彻底失败”，工业政策“毫无常识”，官商不分，“公私不分”，办事只依靠“三几个秘书”与“亲信”，为了“中国将来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其后，傅又在2月22日的《世纪评论》上撰文《宋子文的失败》、3月1日的《观察》上撰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继续猛烈抨击宋子文。

△　中国民主社会党发表声明，决定参加改组之立法院、监察院、宪政实施促进会及参政会四机构。17日，民社党将参加该四机构之47人名单递交政府。

△　国民党军占领中共华东局与华东军区总部所在地临沂。华东野战军主力日前已秘密北移，准备围歼李仙洲部。

△　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撤出鲁西曹县、定陶等地。

△　中央合作金库信托部开幕。理事长陈果夫，常务理事谷正纲、俞鸿钧、霍宝树、刘攻芸、赵棣华、寿勉成，总经理寿勉成。

△　东北人士周鲸文、宁武、卢广绩致函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称于法于理，张学良再没理由受禁闭的了。

△　上海各人民团体“二九”惨案后援会招待各界，报告组织动机，为劝工大楼血案呼吁。马叙伦、邓初民、马寅初、施复亮等表示为保障人权而奋斗。

2月16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蒋介石主持，于右任、孙科、戴季陶、宋子文、张继、邹鲁、吴铁城、陈立夫、吴鼎昌、俞鸿钧、王云五、彭学沛、王宠惠、陈布雷等30余人出席。会议通过施行蒋介石提议之《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一、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币在国境内流通；二、调整外汇牌价，以法币1.2万元合美金一元；三、取消出口补助进口附加办法；四、标售敌伪剩余物资；五、国营事业酌售民营；六、指定地点限定物价，薪工以本年1月份生活指数为最高指标，亦不增加底薪；七、禁止闭厂、罢工或怠工；八、先于京、沪试办民生日用品定价供应。此方案于次日公布。同时宣布《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禁止外币券流通办法》、《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及《修正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

△　蒋介石发表谈话，说明《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之必要，认为经济情况“日见严重”。“政府对于经济政策，必须全盘重加检讨”。

△　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政府对目前经济紧急措施。

△　蒋介石电召长江沿线各省主席、市长来南京，商讨实施稳定物价办法。

△　宋子文与王云五、俞鸿钧等到上海处理管制金融物价事宜。

△　监察院四委员抵沪调查黄金风潮案。

△　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正式结束。

△　山东国民党军李仙洲部因态势突出，惧怕被歼，自新泰后撤，次日又因南京严令而重占新泰。

△　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董必武致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谴责国民党空军飞机故意轰炸“联总”运往山东解放区之救济供应品，恐吓“联总”和“行总”的官员，企图停止一切驶往解放区的运输船，迫使“联总”人员从烟台和石臼所撤退。要求：一、立即采取行动停止轰炸“联总”赴解放区口岸的救济船；二、“联总”人员立即返回烟台和石臼所。

△　中荷双方代表是日起在新加坡谈判交涉扣船及保侨事，至20日获初步结果。荷方答允发还华侨之土人产品，负责赔偿因检验及扣货而引起之损失；对华侨在巨港战事中遭受之损失表示歉意，并允考虑我方提出之赔偿数字；赞成在军事地带划安全区等。华侨团体代表表示暂缓抵制荷货运动，听候交涉。

△　甘肃省天水麦积山发现万佛洞，深广五丈余，计有大佛像25座，巨碑18座，碑侧面亦刻佛像。

2月17日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发表讲话，称“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目前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四者问题甚为严重”，但又称“确有把握击败共产党”。

△　行政院在上海召开最高经济会议，由院长宋子文主持。

△　上海经济监察团是日起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五楼办公。该团由警备司令部等四单位组成，其发言人称：经济监察团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在上海之监视执行机关，任务为彻查金融风潮之责任与来源，执行新颁布之《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通过决议，称：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及有关当局未能预为防止，贻误国计民生至巨，应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查明责任所属，认真处分。

△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凡中华民国之人民、公司或团体存有外汇在外国者，应向政府自行申报。此项外汇存款除有合法用途者外，应由政府定期按照法定汇率收买。其不申报或拒绝收买及收存于本国银行者，应严予处罚。

△　美国政府由其代表团向联合国提出托管昔日在日本统治下、现为美军占领的太平洋1500个岛屿的要求。中国对此原则支持，但是，其中原本隶属中国版图的冲绳、琉球诸岛的问题，保留原有要求。

△　财政部分电各海关，切实严防黄金走私出口。

△　中央银行开出黄金收兑价格为每10两480万元，美钞收兑价格为一元兑1.164万元。黄金由中央银行业务局出纳科收兑，美钞由中央银行业务局外汇科收兑。

△　四联总处召开临时会议，各国家行、局负责人出席，会商执行《加强金融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各项放款，以协助民生必需品及出口物资之增产为主，数额在5000万元以上，需经四联总处核定。各行局多余款项，应一律存放中央银行，不得以买汇贴现及其他方式以资金转放省、市银行或商业行庄。军政及国营事业机关支用存款时，一律使用抬头支票，必需提取现款时，应注明用途。

△　南京、汉口、杭州、昆明、蚌埠等各地金号、银楼及兑庄均告停业。

△　驻美大使顾维钧访晤美国务卿，讨论中国财政危机，希望日本赔偿早日实行，并提出美国援助中国之五项要求。

△　中央研究院复员后第一次院务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举行，到该院总干事与各研究所所长萨本栋、傅斯年等30余人，除听取教育部长朱家骅报告外，并讨论召开全国学术会议，收集集中敌伪时期图书仪器，会同教育局合理分配，将各研究院集中首都等案。

△　重庆行辕主任张群在成都召集会议，讨论“进剿”川康民变武装，会后抵渝称：已责成川康绥署负责此事。西康民变武装5000人集结于雅安以东数里之地准备发动攻击。

△　越南法军以大炮、飞机猛攻河内华侨区内之越军。该处尚余华侨5000余人，生命财产大受威胁。马来亚华侨因此发动抵制法国运动。槟榔屿码头工人亦宣布：是日起拒绝为法国船只装载货物；本月底起并停止为法国船只卸货，荷兰船只亦在此抵制之列。

2月18日　蒋介石及宋子文要求美国务院同意“联总”将所余价值2.4亿美元善后救济物资中，调换价值二亿元而可由黑市出售之物品，以便取得现款。

△　平、津、京、杭各地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代表抵沪，与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举行会议，筹备成立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筹备会决定总会设沪，并分电渝、蓉、穗、昆各地学生“抗暴会”派代表来沪共同筹备。

△　越南国民联合会代表黄荣协在广东侨务处招待记者，报告法越战争发生后华侨之遭遇。并指责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袁子健的渎职行为以致华侨遭受重大损失。

△　驻菲律宾公使馆奉命停止谈判中菲友好通商条约，指责菲政府缺乏诚意，对菲律宾10万华侨有歧视行为。

△　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中美工商会议上发表演说，促请美国增加对华援助。

△　德文报刊《纽约州先锋时报》称，1937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曾保全无数华人生命的德国人，现已确定其人为前任某德商公司南京分行经理约翰·拉贝。

△　据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德籍职员洛森（现任职于纽约州汉密尔柯尔凯大学）、前德国军官兼华军顾问亚纳多（现住纽约）提供材料称：拉贝曾创办难民收容所，保全数千名华人生命，并主持国际救济协会南京分会。1938年返德，因发表演说，展览照片，暴露日军在京暴行，遭秘密警察逮捕，关押集中营，至于目前下落，彼等亦无所悉。

2月19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例会通过《民生日用必需物品供应办法实施细则》，决定3月15日以前完成实施手续，先在宁、沪试办，然后通行全国。《细则》规定：一、供应物品为：米、面粉、纱布、燃料、食盐、食糖、食油。二、经济部主管纱布、燃料、食油；粮食部主管米及面粉；财政部主管食盐；资源委员会主管食糖。三、对公教人员之物品供应，按定量定价配售。四、对于工厂职工之物品供应，按代购方式办理。五、对于市场所需物品之供应，以扶助商营为主，政府于必要时出售物品，调剂市场。

△　财政次长徐柏园召见海关总税务司李度、副总税务司丁贵堂等，研讨防止走私问题，决定加强稽查，如发现走私黄金、美钞，即予没收。

△　山东国民党军占领枣庄、巨野。

△　陈诚、王耀武判明华东野战军有围攻新泰、莱芜之意图，又令李仙洲兵团后撤。

△　云南省政府令省警务处及昆明市府封闭《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

△　农林部、外交部与驻东京盟军总部协商订立《关于准许日本渔轮在中国朝鲜琉球外公海捕鱼办法》，凡10条。

2月20日　蒋介石与宋子文直接要求美国务院将联合国救济总署拨给中国复兴农工业的2.4亿美元中的二亿元改购棉麦等能在市场上售卖的生产品，以纾解中国经济危机。对此，中共代表董必武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身份表示反对，认为这将使为战争所损毁的区域中受创甚巨的人民，尤其是中共区人民，无法再得任何善后救济。并将巩固目下对中共区进行的战争。

△　蒋介石派赴东京盟军总部联系代表王之少将会晤麦克阿瑟元帅。

△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通过平抑物价实施办法。25日，行政院例会通过实施，适用地区为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兰州、太原、郑州、济南、青岛、天津、北平等32城市，并规定南京、上海为严格管制区域，工资不能增加，公教人员配售实物。

△　中共发言人在延安发表声明："京、沪、渝三处中共联络处之设立与存在，以前皆为国、美双方所请求及国方所许可，其任务为与中外各方联络，包括与联总、行总之联络在内。除非国方决心从此以后再不谈判，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机关，或中共方面自行决定撤回，则决无取消三地联络处之理。如国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应由国方完全负责。"

△　南京中共发言人声明："中共中央已决定继续其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区办事处之工作，因办事处除与军调部有关之活动外，尚有其他许多活动。"次日，再次发表谈话：政府现正以种种手段欲迫使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联络处关门。除非国民党政府予以正式通知，则上述三处决不实行结束。倘政府施行卑劣手段，如扣押或逮捕等，则需负此责任。国民党政府已两次要求南京中共联络处自动关闭，并告知中共联络处房屋将改作他用，由此可知国民党显已决定关闭谈判之门。

△　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发起莱芜战役。次日包围莱芜城。

△　北平军警进行空前大逮捕。自14日起一周间，各界人士被捕者已达200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文字学家、《联绵字典》编著者符定一、年逾七十高龄之河北名著书家耶檐亭、北大教授王之相、张东荪之子张宗款等。

△　长春市警察局是日起至26日实行联保连坐编组。每甲以五至十户编为一组，分为若干连坐单位。编组完毕后，办理联保连坐切结，规定凡与"奸匪"勾结者、私藏军火者、发现上项情事而不具报者，出具联保连坐之切结人均受同等处分。

△　迪化发生示威游行，参加者要求罢免哈密、和田、莎车专员，军队不得干政，中央军撤出新疆，重新地方选举等，游行得到三区方面支持，其后两天，游行继续，并向省政府请愿。

2月21日　　晨八时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偕参谋长薛子正、新闻处长黄华等最后一批撤退人员20余人，全部由平撤返延安。

△　东北民主联军12个师为配合南满作战，再次渡松花江南下。其后连占城子街、九台、农安，27日开始攻击德惠。因国民党军自长春三路北援，迫近德惠，东北民主联军乃于3月1日停止攻击，撤回江北。

△　蒙藏委员会所属蒙藏学校是日断炊停课。学生及校方急电请政府按照其他蒙藏边疆学校办法与国立学校同等待遇。

2月22日　蒋介石批复经济监察团组织章程修正案，并指示经监团今后工作对象不仅限于金钞、粮食、纱布，凡违反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之经济活动，均须同样注意取缔。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延安接见合众社记者称：中共欢迎与解放区进行正当贸易之美商，并欢迎一切美国记者之光临。同时重申将坚持所提恢复和谈之两项先决条件。

△　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董必武致电华盛顿“联总”署长鲁克斯，抗议政府要求“联总”允其在公开市场上出卖谷物与棉花。

△　美国农业考察团一行九人，由东京抵沪，该考察团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组成部分之一。

△　上海银楼业职业工会为政府颁布金饰处理办法，致制造金饰工人顿告失业事举行紧急会议，决议推派代表向总工会、市长、社会局、市党部直至行政院、财政部、社会部请愿，准予复业。银楼业暨其附属各业劳资代表同日下午在职员联谊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联合请愿团晋京请愿。次日，南京、上海、扬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地银楼业代表200余人在上海市商会举行大会，讨论成立银楼业图存委员会，向政府请愿。大会决议要求当局撤销限期登记、限期出售及限令兑换法币之规定；要求准许经营收兑、加工暨出售金饰业务；要求中央银行配售原金藉供民间要求。此后数日，江西、福建、武汉、重庆等各地银楼均开会决议派代表赴沪联合晋京请愿。

△　上海市总工会召开临时全体理监事会议，讨论政府冻结生活指数事，决议推派代表晋京向行政院、国防最高委员会、社会部、组织部、参政会等机关请愿，要求继续发表生活指数，工人工资仍依生活指数计发。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朱自清、张奚若、许德珩等十教授就当局以检查户口为名，出动8000余军警，午夜闯入民宅，滥捕市民达2000人以上事，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者，保障人权、安定人心。

△　国民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四国，声明："此次莫斯科四外长会议之议程，应限于德、奥和约之起草，如有变更，应得中国之同意。"美、法已复文同意，英国亦口头同意。

2月23日　　被困于莱芜之李仙洲部在突围中被华东野战军于莱芜、吐丝口间设阵全歼，李仙洲被俘，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部5000余人在青石关亦被歼，韩被俘。自20日开始之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共被歼二个军七个师（旅）5.6万余人。

△　上海学生抗暴联合会千余人开展街头宣传、揭露国民党特务暴行，宣传爱用国货，听讲市民达数万人。

2月24日　　午后四时蒋介石乘专机飞抵济南，在王耀武司令部召集有关军事人员举行会议，研讨山东战局。次日午后返京。

△　蒋介石手令在沪经济监察团，限月底前查明金潮案真相报核。

△　全国邮务总工会发出紧急呼吁，指出政府颁布之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硬性规定工人工资不得超过1月1日之生活指数，不合实际物价情形，影响工人生活至巨，要求解冻生活指数，仍按原有办法根据当地当月生活指数计算支给。

△　迪化举行拥护中央政府之游行，要求取消三区特殊化，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与前几日三区方面支持的反中央游行对抗。

△　开鲁为西满民主联军攻克，李守信部参谋长以下1100余人被俘。

△　远东委员会是日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将已指定之日本工业设备，先行分配30％与中国及菲律宾，作为初步赔偿。所有拆卸、搬运费用，由日本负担。运输船只及其他费用，则由中、菲两国负担。

△　香港法庭判处第一名日本战犯野间贤之助死刑。

2月25日　蒋介石召集军事将领，检讨莱芜战役失败的原因。

△　中、美、苏等国商讨日本赔偿问题。同日，联合国救济总署决定对华救济工作将延至9月。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在未来之莫斯科外长会议中，并无讨论中国问题之具体计划，对中国问题之考虑，并未列入会议之议程。但又称：马歇尔或将在会议中讨论不少其他问题，包括中国问题。

△　王世杰发表谈话，称政府将严格履行中苏条约。

△　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就政府对公私校教师配给实物不公事招待新闻界，指出：公私校教师所负教育国民责任相同，今政府实行配给制度竟有公私之分，实在不公。宣布：本会将与本市全体私立中学教职员及文化界人士联合争取，并愿与首都私校同人取得联系，共同要求行政院修改配给条例。

△　迪化再度发生游行，反对三区“特殊化”。游行者至省府请愿，与维吾尔族群众发生冲突，双方各有死伤。省当局宣布临时戒严。

△　美国农业部宣布，四月份内将以9000长吨小麦供给中国。

2月26日　应驻日美军总部麦克阿瑟之邀请，中国赴日记者团乘机前往日本访问。团长为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团员为上海《申报》总编辑陈训畬、《新闻报》社长程沧波、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等10人。旅程包括东京、横须贺、广岛、大阪等地，同时参观日本

议会、盟国对日委员会及国际战犯法庭。期间受到日首相吉田茂宴请。3月14日全团飞返上海。

△　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声明抗议国民党包办救济工作。

2月27日　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延平北路查缉私烟，女贩林江迈逃避不及，遭查缉员殴打，当即昏倒在地。民众义愤，包围查缉员，查缉员又开枪打死市民陈文溪。群众涌向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惩凶，交涉无结果，群情激昂，烧毁查缉车，包围警察局及宪兵团，直至天明，是为“缉私血案”。

△　青年党将参加立法院、监察院、参政会及宪政实施促进会四机构名单提交政府。

△　北大、清华学生罢课，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市民及学生。中午，各大学代表在北大举行联合会议，提出释放被捕市民及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四项要求。

△　财政部发出公告称：所有上海市业经核准复业之银行、钱庄及增设之分支行、处迄至2月16日尚未开业者，其核准原案应即予以撤销，不得再行开业。

△　全国银楼业联合请愿团暨银楼业附属各业联合请愿团代表20余人，由沪搭车抵京请愿，要求政府修改迫使银楼、金店破产的金饰处理办法。

2月28日　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因对当局处理昨日“缉私血案”方式不满，台北市民早起结队游行，并到市专卖局请愿。因无人接见，更引起民众不满。下午1时，民众齐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撤销专卖局，遭军警开枪射击，数人死伤，激起民众怨恨。市内停工、停课，民众自发开会，并占领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呼吁全省民众支援台北民众反贪官污吏的斗争。请愿演变为

起义。下午3时，陈仪宣布戒严，出动军警镇压。消息传出后，台湾全省各地均发生民众反抗，响应台北的行动。

△　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分别通知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返延安，并强令关闭重庆《新华日报》。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国民党强令撤退在宁、沪、渝之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事致电蒋介石，要求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延长撤退期至3月底。

△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民社党、青年党参加立法院、监察院、宪政实施促进会、参政会等四机构名单，同时通过国民党与社会贤达名单。

△　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对延安的军事进攻。中共得到秘密情报，部署延安紧急疏散。

△　华北绥靖会议在北平举行，李宗仁、白崇禧、谷正纲与华北国民党高级官员研讨华北对共战略。

△　《合众社》华盛顿电：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在华府的记者会上强调，美国不因已退出中国政局而减少驻西太平洋的海军。美国在青岛仍将驻泊舰队。

△　国民政府特任罗家伦为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吴泽湘为驻智利国特命全权大使。

△　国民政府完成接收西沙、中沙、南沙群岛任务。

是月　　物价委员会统计，本年2月份生活指数（以民国二十六年上半年之物价为基数）：汉口、天津为1.3万余倍，上海、南京为1.2万余倍，广州为1.1万余倍，重庆为7600倍，平均指数为1.155万倍。

△　苏北盐阜区自去年7月开始土地改革工作至今已大部完成。淮安、盐城、阜宁、射阳等七县初步统计，已有110万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200余万亩。

△　冀南全区已有四分之三县份完成土地改革，30余县中，450万农民参加翻身运动，250万农民加入农会、妇女会及民兵。

△　吉林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60万农民平均每人得地五亩以上，28万人参加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并成立了自卫武装。

3月

3月1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留京同学联谊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不出一年半载，'国家建设障碍'必可排除。"

△　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蒋介石主持，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

△　国民政府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本职。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　宋子文辞职后，在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措施。对于立委质询，答以自有新院长答复，言毕扬长而去。

△　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发表谈话："为切实推进宪政实施之准备工作起见，国民政府特增设员额，延致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参加立法院、监察院及国民参政会工作，共策进行。至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之改组，当即赓续办理。"

△　国民政府公布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参政会新增委员名单，计：立法委员50名中，国民党17名，青年党13名，民社党12名，社

会贤达八名；监察委员25名中，国民党九名，青年党六名，民社党七名，社会贤达三名；参政员44名中，国民党11名，青年党11名，民社党11名，社会贤达11名。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条文及附表，规定国民参政会置参政员362名。由各省、市公私机关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选227名；由曾在蒙古、西藏地方上公私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或熟谙各该地上政治、社会情形，著有信望之人员中选八名；由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8名；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119名。

△　国民政府聘孙科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会长；曾琦、徐傅霖、莫德惠、张继为副会长；曹明焕等125人为常务委员。

△　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讨进攻延安计划。

△　第二、第十一、第十二战区撤销，成立太原、保定、张垣绥靖公署，阎锡山、孙连仲、傅作义任主任。

△　上海马思南路一〇七号中共办事处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人严密看管，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赴办事处时被拘留，《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及群众出版社亦被监视。

△　解放区救济总会致电华盛顿“联总”署长鲁克斯，抗议当局软禁董必武及伍云甫，要求立即恢复其行动自由，并保证所有解放区救济总会人员之安全。

△　中共《新华日报》在重庆停刊。

△　成都警备司令部通知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即日起结束一切业务，集中返延。川、康两省各县、市内中共人员亦被限于3月5日全部集中撤退。

△　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市参议员组织“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向陈仪提出五点要求：一、立即解除戒严令；二、被捕市民应即开释；三、下令不准军警开枪；四、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五、请陈仪对民众广播。下午5时，陈仪向全台广播，宣布处理办法：一、惩凶；二、抚恤伤亡；三、今晚12时起解除戒严，禁止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陈广播后，又秘密召集手下集议对付办法，电请中央派兵到台并调台南凤山部队北上增援。

△　台北民众与铁路警察冲突，巡逻车开枪射杀，死18人，伤40余人。

△　基隆要塞司令部宣布戒严。全市交通断绝，停工、停市、停课。

△　台中民众进攻警察局及仓库驻军，将其全部缴械。

△　台中市、彰化市、台中县召开参议员联席会议，要求改组长官公署，民选省、市、县长。

△　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派军警搜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行知小学也被迫停课。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因刊上述消息，被迫于3日停刊。前社会大学教员及小学教员多人被逮捕。

△　监察院弹劾新疆省前任主席盛世才，以其假公营私，贪污违法，决移付惩戒。

△　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政治大学。蒋介石兼任校长。

△　刘文辉召开西康行政检讨会议，讨论西康民变事件。会后派人到荥经、天全、芦山、保兴等县说服招抚。西康民变事件结束。

△　中央监委王秉钧接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

△　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瑞克少校及柯林斯上尉在长春附近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美驻华使馆次晨通知中共驻京人员转告延安方面，要求立即释放。

△　苏联驻汉口领事馆是日起暂行裁撤。

3月2日　　蒋介石电令驻京沪线的第二十一军全部开赴台湾“平乱”，军部及直属营、连和第一四六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第一四五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限3月8日前到达，该军到台后归陈仪指挥。

△　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蒋方强迫中共驻京、沪、渝代表撤退，表明蒋方决心最后破袭，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　中共南京办事处一部分工作人员25人，晨9时乘美军用专机一架，离宁飞返延安。

△　中共上海办事处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提出撤退人员名单，计马思南路一〇七号周恩来公馆17人，朱葆三路新华日报社17人，共34人。

△　台北市“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与长官公署讨论解决方案，陈仪答应并广播四项解决办法：一、对参加者不追究；二、被捕人民免保领回；三、死伤者不分省籍，一律抚恤；四、“处理委员会”增加各界人民代表。

△　台北市成立“处理委员会”，并由处委会组织自卫队，负责巡逻及维持治安，局势有所缓和。

△　国立台大、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各中等学校学生约数千名，于中山堂举行学生大会，决议组织学生队伍，协力维持治安，同时准备应付意外突变。

△　台中市民众在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推选谢雪红为大会主席。会后游行，包围警察局，解除警察武装。另一部分民众包围台中县县长刘存忠住宅，发生冲突。同日，各界人士集于市参议会，成立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在谢雪红、杨克煜等领导下，组成青年武装队，控制了台中市及近郊各军政机关。

△　新竹、嘉义、台南等地民众纷起行动，抢夺武器，攻打官署。

△　北大、清华、燕京、北平师范学院及中法大学五大学教授、讲师200余人发表宣言，响应北平十教授保障人权宣言。

3月3日　　晨7时中共代表董必武自沪抵京，车抵下关。遭国民党特务囚禁一小时。董必武回中共办事处后，即往访张治中，询问政府有无致中共人员撤离京、沪、渝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继访张群，商谈有关渝、蓉两地中共人员撤退问题。

△　首都卫戍司令部函中共代表团，将留京人员速造册函送该部，以便于3月5日前护送离境。中共代表团函复称："美方协助之空运工具未能于贵部限定之期内充分拨用，须延至本月7日。"

△　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被警探拘留于马思南路一〇七号50小时后，是晨获得自由，赴"行总"办公，与"行总"署长霍宝树商议中共救济人员留驻问题，未达成协议。6日午后，"解总"代表伍云甫访"联总"中国分署长艾格顿，商谈留驻人员问题。次日，又与霍宝树再度商议，仍未获协议。14日，艾格顿答称予以同情支持。但至17日，"解总"留驻人数问题仍未解决。蒋介石手令重申前令，只准留沪五人，天津二人，开封一人。"解总"未表同意。

△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就中共人员撤退，与国民党政府全盘改组事，发表谈话称；中共不承认上年6月以后政府对外所缔任何协定，

实为促成政府限令其留驻人员撤退之主要原因。

△　陆军总司令部移驻徐州，顾祝同统一指挥山东、河南战事，撤销徐州、郑州两个绥署，另设陆总郑州指挥所，范汉杰任司令。

△　台北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首次会议，商定军队于下午6时撤回军营，由宪、警、学生联合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治安。“处委会”向陈仪提出要求：一、撤销贸易、专卖两局；二、解散警察大队；三、任本省人为秘书长；四、处长以上半数人由本省人任职；五、改正现行政策。长官公署彻夜开会，认为难于接受。

△　台湾旅沪同乡会上书蒋介石，要求彻查台湾“二二八”惨案真相。

△　驻华美军当局判处沈崇案件主犯皮尔逊徒刑15年，帮凶普利查德下士降为普通兵，处监禁劳役10个月，两犯均开除军籍。惟称此项判决，须俟华盛顿当局复准后始可成立。

3月4日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民盟主席张澜，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三地中共遗留全部房屋财产。民盟总部向政府洽商并获得同意。民盟负责人谈称：接管后之中共财产，民盟仅负看管责任，不拟予以使用。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宴为中共联络处人员饯行。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章文晋应邀赴宴。次日，董必武、王炳南、章文晋等至美使馆向司徒雷登辞行。

△　北平警备司令部发言人称：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撤退后，理论上当无中共人员之存在，今后如有发现，当依法惩处。

△　行政院例会修改最高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易名为全国经济委员会，蒋介石兼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兼副委员长。

△　监察院派往上海调查“金潮案”之监委何汉文等四人，发表调查报告书，指出宋子文、贝祖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应对黄金政策之决定及业务之实施，负有重大责任，且与承办中央银行配售黄金之金号、银楼两业公会理事长詹莲生相互勾结图利，致造成金价波动，“演成今日经济危机，使投机者获利，而国家人民皆蒙其害”。

△　监察院电令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即日前往台湾查办二二八事件有关问题。

△　台北“处理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通知17县、市参议会，紧急组织“处理委员会县市分会”，并派代表参加全省处理委员会，目的为“要求政治改革”。政府代表宣布退出“处委会”，各人民团体要求“处委会”扩大组织机构。会后，“处委会”代表市民向长官公署提出条件，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释放被捕群众，不得追究当事人，取消专卖局、贸易局，各级官吏尽量任用本省人等。

△　台湾各地局势仍不稳定。台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等地仍有武装冲突发生。

△　南京下关三号码头江岸崩塌，死11人，伤14人，沉船28艘。

3月5日　　蒋介石约见民社党张君劢、徐傅霖及青年党左舜生、余家菊等人，谈改组政府问题。

△　晨7时，中共上海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全体人员陈家康、潘梓年等23人，离沪赴京。陈家康发表临别谈话，希望早日实现和平民主统一，以后再回上海相见。至此，中共上海办事处人员全部撤离。

△　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处职员九人，是晨由成都警备司令部派车送渝。

△　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经济

紧急措施系政府正式会议通过，国府主席暂兼行政院长，原因之一即为表示政府切实实施紧急措施之决心。

△ “联总”通过价值500万美元之棉花在中国公开市场出售方案。方案规定中国应在此批棉布中拨出10％布匹及5％棉花，直接分发穷苦人民，作为缝补冬衣之用。

△ 高雄市成立“处理委员会”及“总指挥部”，集合队伍攻击宪兵队、陆军医院及军械仓库，占领市内一切军政机关，并以700多人攻击高雄要塞，遭到要塞司令彭孟缉的武力镇压。

△ 上海台湾同乡会、上海台湾同学会、台湾革新协会、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闽台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等六团体组织台湾“二二八”惨案后援会，提出五项要求：一、台湾即日实行自治，省、县、市长一律民选；二、废除特殊化之行政长官制度及其他一切特殊法令；三、撤换陈仪，严惩暴行凶手；四、取消台湾特有之专卖及省营贸易；五、抚恤伤亡，即日释放被捕民众，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 通辽为西满民主联军攻克。

3月6日 滇省警备总司令部召集党、政、军有关机关首长开会，商讨中共人员撤退问题，决定在昆明之中共人员，限15日办竣登记手续；各县方面，限文到一周集中送昆明，再行护送出境。并决定如确系中共人员而不依限前往登记者，政府对其安全不负责任。

△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 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准备改革省、县行政机构，同时又秘密与部下策划援军到后之行动方案。

△　杜聿明飞抵德惠，指挥国民党军对撤回江北的东北民主联军实施反突击。是日，国民党军一部渡过松花江，遭到东北民主联军反击。

△　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曾任汪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中央党部秘书长的罗君强无期徒刑。

△　黄河花园口堵口合龙工程开始。口门下游旧河床内加挖之三道引河，昨日全部竣工。

3月7日　　蒋介石接见外交部长王世杰，商谈收复旅顺、大连事宜。

△　原留京、沪中共人员董必武、王炳南、陈家康、梅益、潘梓年等74人，晨8时乘美军飞机四架飞抵延安。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及中外记者数十人前往机场送行。董必武离京时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见合众社记者，表示：中国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行加以解决，此次莫斯科外长会议当仍将遵行以前之原则，即维持和平、停止冲突、设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府，及不干涉中国内政等项，否则应加以反对。

△　日本赔偿物资约达1000万吨，中国可获得30%。

△　国民党军发起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徐州指挥，以汤恩伯第一兵团18万人为南线，王敬久第二兵团、欧震第三兵团20万人为西线，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决战，或压迫其北渡黄河。至4月中旬，国民党军在西线打通了津浦路兖州至济南段，在南线占领了鲁南山区，打通了临兖公路。两路齐向鲁中进攻。

△　胡宗南部第一军董钊与第二十九军刘戡部分别在宜川、洛川集中，准备进攻延安。

△　行政院通令全国各地行政机关，凡易遭人民反感之措施，如取缔摊贩、取缔人力车、拆除棚户等，应酌予减免。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取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省政府。

△　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到京，向蒋介石报告台变经过并请示善后办法。

△　奉派抵台处理二二八事件的闽台监察使杨亮功由基隆至台北途中遭民军袭击，伤随员、卫士各一人。

△　绥远省参议会首届一次大会开幕。参政员对粮政兵役大加抨击，并通过意见书，陈述当前役政强抓乱要，敲诈贿赂等现象。

△　上海各高等学校教授发表宣言，支援北平各大学教授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大批民众。

△　汪伪军政部长、伪河南省长鲍文樾被判处死刑。

△　“中亚轮”在九江下游失火，乘客百余人遇难。

△　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名誉校长卜舫济博士病逝。

3月8日　　国民政府免去兼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子文职，特派蒋介石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　重庆中共代表吴玉章等50人离渝返延。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延安招待记者发表谈话，抨击美国对华政策，重申惟政府接受中共两项要求，始能和平。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为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宣言》。对政府令京、渝、沪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国共和谈从此正式破裂而深表痛心，宣言声述内战惨痛，希望政府能切实保障人权，对以善意调解内战纠纷者，表示欢迎。

△　民社党北方代表梁秋水、胡海门电张君劢反对全面参加政府。

△　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作战，北进之国民党军全线撤退。

△　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向陈仪提出改革台省政治的建议，包括省自治、县市长民选、改选县市参议会、实行统一累进税、废除杂税、撤销专卖局、贸易局等。

△　台湾全省除高雄、基隆、新竹外，大部县、市被民众控制，各级处理委员会实际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并成立治安自卫队。

△　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赴台，是日抵达，在基隆港登陆。

△　台北数千市民为2月27日夜被查缉员枪击身亡之市民陈文溪举行葬礼，参加者达数千人。

△　中美民航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互派飞机往返连贯两国间之指定航线。

△　国民政府令免驻埃及国特命全权公使许念曾本职，任命何凤山为驻埃及国特命全权公使。

△　花园口口门合龙工程开始引河放水，缺口已缩小至15公尺，缺口上游水位被抬高约二公尺，进入新引河水流已达全河流量四分之一。

3月9日　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电各省地方当局，抗议当局迫害，要求实践保障各民主党派诺言，共同维护民主。

△　李济深发表对时局意见书，谴责蒋介石应对目前的国难直接负责，号召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正拥护者起而求改革，并提出七点改革意见。

△　东北民主联军围攻靠山屯。10日，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二个师分由德惠、农安来援。11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德惠西围歼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杜聿明几被捉。12日，第八十八师被全歼。16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回江北。

△　青年党左舜生对记者称：青年党仍希望地方政府之改组能早日进行，并亟愿在党员较多之地方参加省、市、县各级政府。

△　政府代表雷震、洪兰友到沪与民社党、青年党洽商政府改组事。

△　台南召开市民大会，全体参议员、区里长、人民团体及学生代表等4000余人参加，依据陈仪之诺言，选举过渡时期的市长，并将选出的三人名单报省署，等待任命。

△　奉监察院命抵台“视察”之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上午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希望迅速恢复秩序。

3月10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死刑。判决书宣布：“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谷寿夫部驻京之期间。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　蒋介石在中枢扩大纪念周演讲，称：“务希台省同胞深明大

义，严守纪律”，“自动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

△　陈仪下令解散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湾警备司令部通告取消台湾所有“非法”团体，禁止集会游行，并限令民众上缴枪支。

△　杨亮功致电于右任，报告抵台情形，称与陈仪商议，对事变“将采镇压与安抚兼施办法”。

△　财政部公布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乙种债票等八种公债还本，是日在上海中央信托局抽签，由各地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与中央信托局给付。

△　首都警察厅发出公告：“自本月25日起，举行国民身份证总检查。倘未持有身份证，或有证而无照者，均予以严厉之处分。”

△　彭德怀到南泥湾、金盆湾、临真等地检查前线防务，并于第二天在茶坊召开营业员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阻击国民党军作战部署。

△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出席会议之四国外长为：苏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务卿马歇尔、英外相贝文、法外长皮杜尔。苏外长提议由美、英、苏三国报告1945年3月3日外长会议时关于中国决议之实施情况，并反对马歇尔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之提议。

3月11日　立法院长孙科接见合众社记者，反对苏外长莫洛托夫所提四强外长在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称此“乃干涉中国之内政”。

△　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反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

△　美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声明，认为莫斯科外长会议在无中国出席的情况下讨论有关中国问题实属非当，表示愿意在会外交换关于执

行《莫斯科声明》中任何条款之报告。因英、美、法三国反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决定只就中国局势作非正式意见交换。

△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行政院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评议工资实施办法》，并决定公用事业不准加价，收支赤字由政府补贴。

△　民社党中委蒋匀田是晨飞港，探询该党在港副主席伍宪子、常委李大明对参加政府决策机构的意见。

△　国民政府宣布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前往台湾“宣慰”，并权宜处理各项事务。

△　国防部长白崇禧接见台湾旅沪六团体请愿代表杨肇嘉等，面告政府处理台变方针为：一、关于台人对政制改革之要求，将立即着手实施；二、关于经济之要求，政府拟即取消专卖制度；三、台省省内省外人一律平等；四、派兵赴台为国防上之需要，此次派兵决非为镇压人民。

△　台湾旅沪六团体代表杨肇嘉等五人飞台北，了解此次暴动真相，并“协助政府当局向人民解释政府政策”。

△　台湾民间报纸《人民导报》、《中华日报》、《大明报》、《重建日报》、《民报》及所有定期刊物，均先后被警备司令部封闭。罪名是“异党分子”操纵，“挑拨政府与民众间的感情”以及“深中日本毒化思想的遗毒”。各报刊负责人及总编辑全数被捕。全台仅保留《新生报》、《和平日报》继续出刊。

△　花园口口门合龙工程昼夜赶工，缺口已缩至八公尺。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表《告故道沿岸同胞书》，谴责政府违背信义放水归故的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抢险自救，武装自卫。

△　国民政府特派严庄为监察院江苏监察区监察使，高一涵为湖

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邓春膏为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使。

△　国民政府特任李迪俊为驻土耳其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任徐谟应免本职。

3月12日　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到宜川、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三路进攻延安。

△　国民党军再占通辽。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莫斯科会议的意见：第一、要一致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特别要纠正美国政府一年来违反这一约束的种种国际行为；第二、要尊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包括全国真正的民主统一联合政府成立以前，任何国家都要停止一切财政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以免扩大并延长中国的内战。

△　农工民主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一、反对内战，反对分裂；二、国共问题政治解决；三、保障人权；四、保障国权；五、废除经济统制政策；六、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

△　昨日飞台北之旅沪台胞赴台慰问团陈碧笙等一行10人乘原机返京，并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报告台北情形混乱，行动不自由，请中央速设法制止报复行为，以求台局之安定。

△　马寅初、沈体兰、孙起孟等组织上海教育界人权保障会，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警宪之任意拘捕，要求释放被捕人民。

△　国民政府公布《户口普查法》，废止《户口普查条例》。次日又公布《内政部人口局组织条例》。

△　“联总”署长鲁克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联总”接获中国政府一项提议，要求将计划中尚未拨送中国之款项悉数购置棉花。

△　黄道会会长、汉奸常玉清在上海监狱被执行枪决。

3月13日　蒋介石召见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商严惩涉嫌操纵黄金图利商人及中央银行人员。还商有关接收旅、大答复苏联照会事。

△　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损失66个旅、71万人后，被迫停止，改为向陕北与山东的重点进攻，出动兵力为34个旅25万人。是日，胡宗南集中15个旅14万人，分为右集团董钊（整编第一军军长）、左集团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两部，同时自宜川、洛川一线向延安攻击，并出动飞机45架对延安进行轰炸。

△　监察院以黄金案违法渎职为由，对中央银行原总裁贝祖贻正式提出弹劾。林凤苞、杨安仁、詹莲生三人，则于昨晚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拘捕解送法院。

△　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宋子文辞职，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组织外交研究委员会，推定委员23人，计：王宠惠、孙科、邹鲁、邵力子、刘文岛、吴铁城、陈立夫、彭学沛、马超俊、陈诚、朱家骅、袁守谦、谷正纲、萧同兹、张道藩、刘蘅静、王世杰、甘乃光、王正廷、柳克述、赖琦、刘健群、蒋经国。该委员会旨在研究当前中国外交问题。

△　青年党为苏外长莫洛托夫提议将中国问题列入四外长会议议程事发表声明称：吾人以一独立国家之资格，无受其拘束之义务。

△　苏外长莫洛托夫致函美国务卿马歇尔及英外相贝文，同意在外长会议范围之外非正式商谈中国问题，并同意中国得派遣代表参加。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辖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学术研究最高机关，设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动物、植物、气象、哲学、教育学、中国

文学、历史语言、法律、经济、社会、医学、药物学、体质人类学、工学、心理学、地理、考古学、民族等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设院长一人，院士若干人，第一次由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举80至100人，嗣后每年由院士选举，其名额至多15人。国外学术专家，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经院士10人以上之提议，全体院士过半数之通过，得被选为名誉院士。中央研究院设评议会，由院士选举，经国民政府聘任之评议员30人至50人及当然评议员组织之。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总干事及直辖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院长为评议会议长。

3月14日　外交部再度声明，坚决反对莫斯科会议以任何方式讨论中国问题，并拒绝派代表参加。

△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主张中国派代表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谓四强已同意非正式讨论中国问题，“与其让人家讨论，不如我自身参加”。

△　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办事处发表声明，对外传“利用黄河工款搜购黄金”事，严词驳斥。

△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乘专机飞南京，代表陈仪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葛谈话称，28日暴动原因系日本统治时代遗留之鹰犬与近由海外遣回之台籍浪人受奸徒煽惑。

△　台北商店复业，学校陆续复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上午访问已复课的台湾大学。

△　《大公报》驻台湾办事处因3月12日刊社评《请爱护台湾这片干净土》一文，被台省警备司令部封闭。经交涉后，16日启封。

3月15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主持，出席中委146人，候补中委46人，列席各地党部及三青团书记长68人。蒋介石致开幕词，推卸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

决议之责任，反诬“中共全面叛乱”，声称“政府为捍卫国家统一，保障人民安全，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同时声称实行“民主”，“结束训政”，“改组政府”。

△　驻苏大使傅秉常向马歇尔、贝文送交外交部部长王世杰13日复文，并请转达莫洛托夫。表示中国政府不能参加四国外长会议，并要求“美、英、苏三外长停止涉及中国内政问题之任何讨论”。

△　台湾二二八惨案慰问团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李伟光、陈碧笙等报告赴台慰问经过。会后发表旅沪台湾六团体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声明书，谓此次事变为“官逼民变”，要求：一、立即撤废行政长官公署；二、为维护国家纲纪应对陈仪予以处分；三、对台变善后，须避免使用武力，停止恐怖行动，释放无辜被捕人民，保证对参加事变人民不再追究。

△　黔省参议会通过议案，请政府停止黔省征实、征借，以纾民困。并建议中央迅速制颁实现民生主义有效办法，规定私有财产最高额，以免资本集中。

△　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晨3时合龙，黄水全部复归故道。

△　行政院公布《协助建设示范城市办法》，并暂定南昌、长沙二市为建设示范城市区域。

3月16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三中全会作外交报告，阐明外交政策为：拥护及支持联合国机构，对美保持传统友谊，对苏严格实行中苏条约，对日本不采取报复，而求军事方面充分保证，不使其再事侵略。

△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所有陕甘宁解放区各野战部队及地方部队编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美国务卿马歇尔致函苏外长莫洛托夫，正式拒绝苏方关于由

三国外长会商中国问题的建议，并提议在4月1日以前，美、英、苏三国彼此以书面交换关于中国之情报，并以副本送达中国。

△ 经济部成立中央标准局，原全国度量衡局撤销。

△ 北平国立研究所设原子学研究所，聘钱三强夫妇主持。

△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发表公告，废止2月15日公布之限制进出口货物办法，惟对下列货品仍须公署核准，始可运输出口：一、粮食（包括杂粮）；二、金属及其制品；三、木材；四、酒精、烧碱、漂粉、盐酸、硫酸；五、水泥；六、纸张、纸板、纸浆；七、肥料；八、煤及木炭；九、樟脑。

△ 菲律宾与国民政府签订华侨复员办法，限制极严。24日，闽南华侨千余人到厦门申请复员出国，经菲领馆签证者仅121名。侨胞对菲方如此限制苛待华侨极表愤慨，致电请外交部严重抗议。

3月17日 参谋总长陈诚向三中全会报告军事，历述一年来建军、复员、整军工作之情形及对中共之军事情况，称："剿匪绝对自信，绝对有把握"，"剿匪应以军事为中心。"

△ 英外相贝文函复苏外长莫洛托夫，同意对履行1945年关于中国之莫斯科声明事交换情报，惟反对任何会议。

△ 东京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向东京记者团发表讲话，称据目前世界形势，开始商讨对日和约，业已成熟。提请英、美、苏、法、中等对日早订和约。

△ 美国务院重申苏联应即将大连交还中国管理。

△ 民主同盟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坚守在野的、和平的、公开的民主政团的立场，主张由美、英、苏三国共同调解中国内战，严重抗议政府在北平、青岛、上海大肆逮捕无辜人

民。

△　国防部长白崇禧偕蒋经国专机抵台，“宣慰”台胞，处理台变善后。下午，白崇禧发表宣字第一号公告，宣布处理台变之基本原则：一、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县、市长提前民选，并尽量选用本省人士。二、台湾警备总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尽先选用本省人士，政府机关职员，凡同一职务官阶者，本、外省人员待遇一律平等；三、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现行经济制度及政策分别修正或废止；四、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不合法组织自行宣告结束，参与事变有关人员，除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公布，本月上旬行总共开往冀、鲁中共区域货船五艘，载运物资计4584吨。次日，解放区救济总会发表声明，谓“行总”公布之开往中共区货船共五艘，实际其中二艘共2000吨物资运抵天津，即遭扣留，未能前运。现被扣留于天津之物资，已达3440吨。

△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聘定第二届指导员吴稚晖、戴季陶等25人，评议员周鲠生等49人。

3月18日　　蒋介石下令：“各师到达杨家畔以北之线，如时间许可，应即编成突击队直袭延安，突击成功部队赏洋一千万元。”

△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始质询外交报告。若干中执委抨击外长王世杰对苏外交政策屈膝无能。王世杰作答时表示准备在三中全会闭幕时辞职。前驻苏大使邵力子直言辩正：中国不应忘记过去革命成功，大部分由于苏联援助，如今不应采取对苏太不友好态度。

△　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临行前，毛泽东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指出：我军打仗，不在

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向晋南禹门口和风陵渡方向进攻，打击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侧背，配合陕北解放军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集中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三个独立旅及第二、第三分区部队共五万余人，在134个民兵连和六万余参战群众支援下，以优势兵力，向晋南实施突然进攻。

△　午后4时，白崇禧在台北宾馆招待各界，称台省事件系受少数共产党分子及少数浪人之煽动，现大致安定，仅有少数青年现仍避居深山，盼望彼辈早日归来，各安生业，政府决不追究。

△　自8日国民党军抵台以来，对台胞进行血腥屠杀。据旅沪台湾七团体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印发《台湾大惨案报告书》统计，截至18日止，“高雄为最多约三千余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约二千余人，嘉义一千余人，淡水约一千人，新竹、桃园、台中、台南、苗栗等其他地多一二百人不等，总计在一万人以上，连重伤者计之，至少在三万以上”。

△　北平警察局为美兵枪杀小学生王夙喜事件发表声明。

△　上午8时，蒋经国抵基隆，由要塞司令史宏熹陪同视察，下午返台北。

△　张君劢致函蒋介石，提出：《和平建国纲领》，本为各党共同参加政府时代之决议，但“就年来之国内局势与主席最近之演说观之，已有出入”，“兹特列举各点为商讨之资（另纸列陈），此项《和平建国纲领》依旧保存，此外加以补充。窃愿本此精神先行商讨，俾各党有一共守之信条”。

△　民社党召开临时中常会，通过《政治建议书》。建议以政治

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及保证人民各项自由，如此项建议能获得政府完全同意，则民社党即可参加政府。次日，蒋匀田携《建议书》晋京交雷震转蒋介石，受到蒋介石接见，蒋并表示建议诸事均可考虑。

△　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汪伪宪兵司令陈皋无期徒刑。

△　花园口堵口后全部黄水涌入故道，河水暴涨不已，沿河濮县、范县、寿张等县辖境，自15日至18日四天内，河水普遍上涨20公寸。

3月19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第四次大会，开始军事报告质询，要求振奋士气，提高兵员待遇，加强兵役。

△　海军总司令部桂永清在青岛欢迎英国太平洋舰司令鲍毅德长访华。英所赠“伏波”炮舰不幸在澎湖近海被撞沉没。

△　是日、24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连续下达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作战命令，称：“国军决先扫荡黄河右岸亘津浦路沿线之共军，打通津浦路中段，遮断陈、刘之联络，诱致共军主力于当面而击破之”，“我军决于打通津浦路之同时，急袭费县梁邱城前泗水一带山地之共军而歼灭之，于3月底前打通临沂、费县、太平邑、卞桥、泗水、曲阜之公路，准备尔后之攻势。”

△　西北野战军放弃延安。

△　民盟14日开始举行中常会，是日闭幕，决议设立政治计划委员会，总会设上海，负责人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北平分会张东荪、潘光旦；南京分会何公敢、周新民、李相符；重庆分会邓初民、郭则沉、彭大魁；香港分会沈志远、李伯球、千家驹。

△　许德珩教授等对时局发表宣言：一、希望有效的调处办法，使真正民主早日实现。二、盟邦不能公正调处，即请不干涉他国内政，任何外军全请速撤。三、美、英、苏如有会议，不能损害中国主

权及人民利益，尤不可有助内战行为。

△　解放区救济总会驻“联总”代表为黄河归故问题发表声明，谴责“联总”和“行总”违反协定，在故道居民移居前，即允堵口放水，要求立即拨付筑堤工程费，及故道居民的迁移安置费用。

3月20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秘书长吴铁城报告国民党党务概况，分析党务的缺点与成功，提出希望中共问题即刻解决，挽救经济危机，安定民生大业。

△　参谋总长陈诚招待记者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是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被动挨打。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

△　“联总”中国分署宣布逐渐结束直接参加中国善后救济事业之计划：“联总”之康健福利组将于3月底结束；遣送难民业务于6月底结束；“联总”之农业、工业复兴工作，及“联总”以专家借与“行总”及行政院各部之办法，于9月底结束；最后结束工作，由少数职员担任，至年底截止。

△　民盟中常委、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所谓“贩卖毒品”罪，在西安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逮捕。杜在法庭上痛斥特务栽赃陷害。

△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全省分为七个绥靖区，分区清查户口，办理连保。

3月21日　蒋介石致电胡宗南，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诚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

△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第六次大会，检讨党务及经济。下午，举行第七次大会，蒋介石致词，对军事、政治、经济情形详细说明。

大会通过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一年召开，中常会三分之一委员改选于次日大会中选举等两项议案。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货物税条例》第三、第四、第七、第十条，规定征收货物税之货物为卷烟、熏烟叶、洋酒、啤酒、火柴、糖类、棉纱、麦粉、水泥、茶叶、皮毛、锡箔及迷信用纸、饮料品、化妆品等。税率从价征收2.5％至100％。由国外输入者，除缴纳关税外，仍应依照本条例征收货物税。

△　监察院加派何汉文赴台调查事变情形。

△　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参议院提出请求批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　黄水已全部流入故道，深达二丈余。长垣、鄄城等地黄水已宽达三里，上涨至堤岸。鄄城县小屯、贺楼等河床居民，未及迁移，已被黄水冲淹。范县、濮县、寿张等县人民奋力抢修河堤。

3月22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第八次大会，检讨经济、政治，并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三分之一。会议通过将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及取消东北行辕下属之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两案。

△　国防部通令，禁止各地保安团队或驻军利用征召壮丁机会，强捕人民，变价卖与当地保甲顶替，及已接兵部队辗转敛财。

△　白崇禧在台中向全省广播称："对于此次图谋叛乱的主犯，必须从严惩办"；"现台湾警备总司令已决定分区绥靖，如共党暴徒仍执迷不悟，将劫夺警察枪枝及仓库武器弹药被服不予缴还，国军为绥靖地方，必须痛剿，彻底肃清。"

△　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开代表会，由理事章乃器、耿丽淑、刘王立明代表该会招待各界，呼吁制止秘密捕人，推派张君劢向政府进行交涉。

△　美军枪杀王夙喜案，中美联合发表公报，美方承认“防卫过当”，愿赔偿惩戒以善其后。

△　西康贡噶呼图克图抵京，接受册封为辅教广觉禅师。

△　北平《民强报》因刊《国军入延，国无宁日矣》社评，被罚停刊三日。

△　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汉奸、鸦片大王盛幼盦死刑。

3月23日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九次大会，中央执行委员黄宇人等100人，提出临时动议，请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贻。大会讨论通过《惩治金潮案负责大员，并彻查官办商行帐目，没收贪官污吏财产案》。

△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彻底改革党务案》，该案承认“演变至现阶段之本党，无论从党的本身或从党与政治及社会之关系上观察，皆已暴露其严重病态”；“若不从速彻底改革，无待外力之压迫，亦必自趋崩溃”。为此，决议设立党务改造委员会，彻底改革本党，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从基层以至中央各级党部立即废除指派圈定等落伍办法；重新确定团的地位，并澄清党团关系，指出“今日之党团关系，若即若离，含混不清，党团在表面上虽未严格分离，实际上早已自成体系，省级以下之党团摩擦日益显著，如不速谋澄清，长此以往，实为本党自杀政策”。全会还通过《宪政实施准备案》、《工人运动实施纲要》、《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对于外交报告决议案》、《党团关系案》、《对于党务报告决议案》等项决议案。

△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各级监察委员会考核党员政治活动办法》，并改选常委，张继、吴敬恒、王宠惠、邵力子等12人当选。

△　蒋介石主持召开紧急征实征借会议，江苏、浙江、广西、广

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主席及中央有关各部、会首长出席，研究加紧征收办法。

△　蒋介石设宴招待青年、民社两党人士，就改组政府事交换意见。

△　青年、民社两党领袖提出与国民党商定之参政《共同纲领》，交各自中央批准。《纲领》主张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中共问题应以政治方式解决；行政院长由国府主席任命，但须经各党同意，实行责任内阁制；省级实行军民分治，省、市参议会与政府容纳党外人士；废止训政时期特殊法令与机关，保证人民自由等。

△　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乌兰浩特开幕。会议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并选举乌兰夫为主席。大会于5月5日闭幕。

△　财政部公布《银楼业收兑及制造金饰管理办法》，废止前颁布之《银楼业及首饰店金饰处理办法》。新法规定银楼业制造金饰每件不得超过市秤二两，收兑价格不得超过中央银行挂牌价，不得收兑黄金条块，违反规定者，勒令停业并处以罚款。

△　泛亚洲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开幕，除日本外，亚洲32个国家均有代表参加。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内阁副总理尼赫鲁致开幕辞。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郑彦棻。会议讨论：一、民族自由独立运动；二、种族问题；三、移民问题；四、殖民经济转为国民经济；五、农业改进和工业发展；六、劳工问题和社会服务；七、文化问题；八、妇女地位与妇女运动。会议于4月2日闭幕。

△　皖东北灾情严重，安徽省政府在滁县设站，阻止灾民南下。

3月24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第十次大会，通过提案三项：一、国民政府增加副主席一人；二、国府五院院长为当然中央常务委员，如已当选为中常委者，其缺额由选举常委之次多数递补；三、通

过《经济改革方案》、《政治改革方案》、《刷新政治风气，限制公务员兼职案》。下午，通过宣言，并选举中常委，孙科、陈果夫、于右任、邹鲁、赖琏、李文范、张群、钱大钧、康泽、谷正纲、柳克述、李宗黄12人当选。

△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并发表宣言，宣称国民党之任务为：完成宪政准备，确立建国规模；消除统一障碍，巩固国家基础；实行民生主义，稳定经济秩序；维护国际正义，致力国际和平；充实教育内容，培养建国空气。

△　国民党三中全会纪念周与中枢纪念周合并举行，蒋介石在席上为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及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辩护，称“批评应有所根据，不能捕风捉影。三中全会通过之决议案大部分属破坏性，党内派别纷争殊为扼腕”。要求大家精诚团结，渡过此严重关头。

△　蒋介石接见北平市长何思源，研商建设新北平市。

△　美国务院公布德黑兰、雅尔塔及波茨坦三项秘密协定全文。

△　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发表声明，要求“联总”停运一切救济物资给“行总”，并撤回一切参加黄河工程的技术人员及器材，将救济中国尚未付出之2.2亿美金的救济物资直接送给解放区，救济黄河故道被难居民。

△　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国民党军进攻部队后退时，出击南满各地，并于20日开始围攻通化。因国民党军援军赶到，是日停止围攻。第三次临江保卫战至此结束。

3月25日　　苏联答复美国照会，准备履行协定，将大连交还中国。

△　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伏击胡宗南部，歼其一个旅部及一个团

近3000人。

△　白崇禧在台北对记者称："据各地所见，台湾之骚乱，大致平息"，至逃匿深山僻壤之少数暴动分子及共产党徒，约1000人，"凡不明向政府悔过自新者，国军将追踪搜寻"。

△　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彻底实行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民族平等团结。同日省府通过《处理危害和平案件办法》，规定对聚众闹事、散布谣言、侵犯他人自由者处以刑罚。省府决定对"二二五案"死伤者发给抚恤，对案件进行调查。

△　上海地方法院检查处就前美军驻台湾联络组军官艾文思及副官爱隆生串同侵占应由我国政府接收之敌军移交黄金60公斤一案，宣称：艾文思、爱隆生两人虽罪嫌重大，但均已离华赴美，且又属现役军人身份，全案仅能循外交途径，委托美国法院就地审理，依刑诉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七款管辖错误之理由，对上述两人予以不起诉处分。

3月26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发行美金债券四亿美元案。

△　全国粮政检讨会在南京召开，决定军粮供应政策：一、加紧催缴田赋征实；二、折价收买省、县两级应得之存粮；三、以上两项办法仍不敷军粮供量时，谋向外国购买食粮，以敷军需及公务员之用。

△　民社、青年两党分别于24日、25日举行中常会，决定接受《共同纲领》。是日，青年党通知政府，要求在行政院中占四部、会及国民党全部开放地方政权。民社党表示，必须与青年党同等待遇。次日，雷震抵沪，敦促民社、青年两党提交国府委员名单。

△　福州学生举行万人示威游行，抗议军警无理殴打并逮捕学生，并到省府请愿，军警枪杀二人，致成惨案。

△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改汉口、沈阳、广州、西安四市为行政院直辖市。

△　美国务卿马歇尔在莫斯科会议提议由四强再加中国，邀请以前对德作战之全体盟国，在对德条约最后拟成之前，举行关于德国问题之和平大会。贝文及皮杜尔均支持中国为对德和约签字国之一，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考虑。

△　英国代表团拒绝参加三强交换中国问题情报，谓：英国并无代表驻在华北，故无情报可以交换。

△　苏外长莫洛托夫表示同意4月1日前交换关于中国问题之情报，放弃由三强非正式讨论中国问题之计划。

△　南京69家银楼全数开市。汉口、上海、北平各地银楼，亦先后复业，但成交极少。

△　汉奸周佛海由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理由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

3月27日　　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10万人第四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企图第一步占领辉南、金川、柳河、桓仁，第二步进攻临江。

△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停刊。

△　华南头号日本侵华战犯、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州北郊被执行枪决。

△　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通令各警察分局，今后若有市民无故失踪，各分局长应负全责。

△　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函张君劢，敦促其向上海市政当局交涉援救失踪人士。张君劢31日致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呼吁保障人权，

处非法行动者以重罪。

△　中央银行发行2000元、500元法币。

3月28日　白崇禧召集台省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等举行会议，指示四点：一、现所拘捕关于二二八事件之人犯，应速依法审判；二、今后拘捕人犯，必须公开依照规定手续为之；三、除台省警备总部外，其他机关一律不得发令捕人；四、参加暴动之青年学生，准予复学，并准免缴特别保证书及照片，但须由其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可予免究。

△　立法院通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及《总统选举罢免法》。

△　国民政府派金问泗为出席世界贸易及就业会议第二届准备会议首席代表，吴南如、张天泽、董季龄、马绍良、庄智焕、陈长蘅为代表。

△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决议成立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定在上海举行。

△　行总联总社会福利会议圆满闭幕，宋美龄特赴会致词。

3月29日　是晚及次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枣林子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留陕北，继续中共中央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前往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又决定中央及军委机关大部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同时组成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　宪政实施促进会举行成立后首次会议，出席会员178人。会议于31日通过提案，请政府迅予废止所有与宪法抵触之现行法规，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彻查人民无故失踪案件等。

△　国民政府特派洪兰友为宪政实施促进会秘书长。

△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三十六年短期库券条例》及《民国三十六年美金公债条例》。短期库券发行价值三亿美元之法币，美金公债发行一亿美元。于4月1日及10月1日各发行半数。财政部长俞鸿钧为此发表谈话，特别强调债券信用，对以往政府若干失信于民之举，表示遗憾，谓今后当尽力树信。

△　经济学家马寅初就美金债券发表谈话，指出政府发行以美金为单位的债券无异自认为殖民地。

3月30日　蒋介石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指示接收旅、大事宜。

△　立法院通过五院组织法等法律。

△　蒋介石宴别即将离华的美国吉伦中将等人。

△　中国泛亚洲会议女代表陈逸云在会上讲演，称：在中日战争中，中国妇女英勇负起责任。中国妇女运动贡献实属宏伟。

△　中国侨胞商船九艘在印尼遭荷兰海军扣阻。

△　中、英、法、比等18国19家报纸在纽约签字，采用30种文字联合出版《世界画刊》。

3月31日　国民政府公布行宪法规十种，《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院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行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司法院组织法》、《考试院组织法》、《监察院组织法》。

△　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说明政府决定最近接收

大连。

△　美国务卿马歇尔致函苏外长莫洛托夫，叙述驻华美军数目及遣俘情形。

△　青岛美兵发生刺杀车夫事件。

是月　南满民主联军以“北打南拉”方针先后攻克辉南、桓仁、汪清。国民党军第二师第五团被歼。

4月

4月1日　军事参议院撤销，成立战略顾问委员会，何应钦任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鹿钟麟、杨杰、陈济棠、陈绍宽、黄绍竑、刘峙、卫立煌、蒋鼎文等为委员。

△　国民党军占领泰安，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随即向鲁中山区推进。

△　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发行美金库券、公债事宜。3日，中央银行拟定经募本年度美金债券之银行48家、钱庄27家，在23座大中城市设募销委员会，并聘钱新之、杜月笙等17人为上海募销委员会委员。上海银、钱业公会决定认购短期库券美金3000万元，美金公债1000万元，占第一期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据业内人士称，表面为认购，实与摊派无异。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台北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台湾今后局势宣布“善后措施”，谓必须以“杀一儆百之效”在台湾厉行统治。

△　台北地方法院检查处对前台湾省专卖局长任维钧被控接收物资舞弊案，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任于是日乘“中兴”轮离台赴沪。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葡萄牙驻华公使樊西嘉在南京签订关于取消葡萄牙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其他事项之换文。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国务院不欲对进出口银行行使压力，迫其以五亿美元贷与中国。美国政府对于贷款中国所抱态度，自杜鲁门总统于去年发表声明，谓此项贷款惟有至中国政府恢复国内秩序及政府扩大基础，改组完成之后，始能贷与中国政府，迄今未曾改变。

△　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柯克（海军）上将发表声明称："撤退驻华美海军陆战队至关岛之工作已在进行中，目前撤退之人数已逾五千名。"并宣布，迄今除第一营之一部分外，天津已无美军，惟驻在北平之第五海军陆战队仍完全未动。现在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约计尚有8000至一万人。次日，柯克再度发表声明：美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之撤退，系视美军运输船只之多寡而进行，故美海军陆战队撤退工作，何时完成，未能有确定日期。

△　泛亚洲会议通过中国代表团提案，成立亚洲关系协会。第二天会议圆满闭幕，决定下届大会将在中国举行。

△　门头沟煤矿公司产业公会会员代表郑庆禄、柳达刚等，具文呈请政府收回英人麦边股权。因麦边于民国三十一年与日本白马签订赠与条约，实系丧失自身所有权。

△　《惩治盗匪条例》施行期自民国三十六年4月8日起再展限一年。

△　南京《大刚报》停刊半月后，经改组是日复刊，总经理毛健吾辞职，由张志智接办。

△　黄河故道济阳、利津间十处险工告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率同沿河居民抢修，并以全部船只抢移灾胞。下午国民党空军美式飞机

二架，袭击渤海黄河故道渡口，投弹扫射，死伤河工民伕数人，牲口20余头，炸毁民房三间。

4月2日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通过三中全会各决议案，主要有：一、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案，请政府立即执行。二、黄金潮案，请行政院、监察院迅予处理。

△　民社、青年两党参加政府委员名单经各该党中常会通过后，由蒋匀田、左舜生当晚携京，提交政府。民社党府委人选为伍宪子、徐傅霖、胡海门、戢翼翘四人。青年党府委人选为曾琦、余家菊、何鲁之、陈启天、常乃德五人。

△　国防部长白崇禧专机离台返南京。临行前指示台湾各军政机关，务必将这次“图谋叛乱之首要分子依法严惩”。

△　中宣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外交部参事张沅长代表该部发言人答记者称：“3月31日王部长以声明书一件面交苏大使彼得罗夫，说明中国政府决定在最近将来接收大连及旅顺区之行政权，并告以一切步骤。中国严格遵守1945年中苏条约之规定，履行其一切义务，行使其一切权利。”

△　美国务卿马歇尔根据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英、美、苏三国交换有关中国情报之协议，公布其致苏外长莫洛托夫之函件。函称：美国依据《波茨坦协定》及日本投降条件，将在华之300万日军遣送返国。至于在中国东北之日俘约70万人，苏方如何处置，余尚无情报可稽。美国终止与三人小组及军调部之关系，美军自中国裁撤完成时，估计当在本年6月1日。其应国民政府之请而驻留中国之美陆海军人员，将为6180人。

△　晋冀鲁豫野战军对豫北反攻之第一阶段结束，先后收复原武、阳武、封丘、延津、濮阳五座县城及据点数十处，歼敌5400余人，解放黄河以北，平汉路以东，东西200余里，南北140余里地

区。

△　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致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谓解放区所收到之物资，迄3月底止，总数为1.09435万吨，仅及原协定55％。

△　停泊在山东石臼所卸货的“行总”“万善”轮，遭国民党空军飞机扫射，五人受伤，美籍船长重伤。该船随后驶往青岛，“联总”对解放区救济物资的运输工作被迫中断。“联总”于次日向政府提出抗议，“联总”中国分署长艾格顿且奉令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　在新加坡屠杀华侨要犯日军司令河村等处绞刑。

4月3日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因与杜聿明不和被解职。

△　东北民主联军打退国民党军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至此，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粉碎国民党军在东北“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　中共领导下的关东公署成立，下辖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金县。4月27日，改名为旅大行政公署。

△　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举行理干事紧急会议，讨论营救失踪人员。出席者有章乃器、许广平、马叙伦、史良等10余人。会议通过《抗议当前全国各地人权被摧残宣言》，决议协助失踪者家属向法院申请提审失踪人员。

△　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在2月27日开枪射杀台人的台省专卖局缉私人员傅学通死刑。

△　美国政府发言人宣称：美国政府已训令麦克阿瑟于短期内依照临时计划，提前将日本赔偿品的30％拨给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

度、缅甸与马来联邦各国，中国可得15%。

△　行政院公布《奖励民垦办法》，规定人民开垦荒地酌予免纳土地税二年至八年，从事垦荒之人民，得酌予减免其义务劳役。

4月4日　　上海地方法院正式审理黄金潮案中之中央银行业务局配售黄金“舞弊嫌疑”案，传讯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及金业公会理事长詹莲生三人。6月12日宣判林凤苞无罪，处杨安仁有期徒刑七年，詹莲生有期徒刑四年。杨、詹二人表示不服，向上海高等法院申请复判，经高院合议庭评判仍维持原判。9月13日高院复判书下达地院。

△　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发起晋南反攻，当即收复翼城县。

△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发表公告称：3月1日在长春附近被民主联军俘获的美国军官瑞克与柯林斯，虽确系向我军阵地作军事侦察，但本宽大精神决定遣送出境。15日美驻华使馆发表布告，称该二名军官之行动完全为“独立性质”。24日，该二名军官到达长春。25日飞抵南京。

△　首届全国航空模型大赛在南京举行。

△　上海失踪者家属成立联合会，并发表呼吁宣言，要求政府当局迅速确实地处理有关事件。希望热心的社会人士继续给予支持，为人权而努力。

△　上海天花、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本月至今已发现天花患者81人，流行性脑膜炎患者19人。

4月5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三青团游园会中对记者称：“宪政政府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此次各党派参加政府之人物，皆系由各党内产生，既未经民选程序，当然不能称其为宪政。且在本年12月25日宪法正式实施之前，训政时期约法仍属有效，盖国家决不能一时无法

也。故今日之改组政府确为自一党训政改为多党训政，然后再达到民主宪政之阶段。”

△　民主社会党梁秋水、张东荪由北平函伍宪子、胡海门，质询参加政府理由。

△　台北市缩短戒严时间，改为自夜间11时半至次晨5时止。一度停顿之工矿生产事业逐渐复工。众多报纸仍未复刊。

△　据《大公报》南京电：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元帅以日本赔偿物资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国应得之15％，将达130余万吨。驻日盟军总部已将65家机器厂及12家火力发电厂之名单公布，为先行拆迁之赔偿物资之一部分，供中、美、荷、菲之选择。中国之运输计划已拟就，第一批赔偿物资将分两次运回，所需费用将达8000余亿元。须俟远东赔偿委员会之通知到达，即可派员前往拆运。

△　国民政府代表田炯锦在黄陵主持祭陵大典。

△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省民作告别广播，强调炎黄子孙应以中国人为荣。

△　四川灌县都江堰举行放水大典。

4月6日　　国民党军继续向山东实施重点进攻。汤恩伯、王敬久、欧震三个兵团，共13个整编师、34个旅约25.5万人，沿临沂至泰安线，向北并进，重心在鲁中的新泰、蒙阴地区，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

△　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宣布，塘沽新河军火库于昨日被袭击，美军士兵亡五人，伤16人。冀东军区发言人声明：无论美军配合蒋军或单独向解放区进攻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概由美方负责。

△　为接收旅顺、大连，中苏双方军事联络小组在普兰店举行会

谈。中方代表为周璞上校等四人，苏方代表为加里斯基少将等七人。本日午后，双方代表作首次拜会，中方代表向苏方提出照会。

△　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在行政院内设置新闻局。17日、1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分别通过《新闻局组织条例》。于4月22日公布。

4月7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各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其组织及职权依旧。

△　政府核准施行行政院所呈《国营生产事业配售民营办法》。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资产决定先行出售七成。中国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天津及东北造纸厂等全部售予民营。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先就股份五成发行股票，公开出售。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中枢纪念周报告台湾事变之起因，并提出善后措施：政治上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并增加省府委员人数，于省府各厅、处、局增设副职，经济上将专卖局撤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供应物资机构等。

△　海军总部副参谋长高如峰谈称：关于日舰64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苏四国一事，海军总部已接获通知，刻正遴选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

△　盟国官员对中央社记者称：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国外公司及私人资产总数约为400亿美元，其中99％分布于中国东北、朝鲜、中国台湾、库页岛、千岛列岛、中国内地及南洋各岛之中。日本官方对其1939年国外之政府资产发表估计数为：中国东北80亿，中国台湾10亿，朝鲜60亿，库页岛10亿，中国内地11亿美元。此外尚有其他资产，此项数字不包括日本私人之国外资产，而私人资产较政府资产尤巨。

△　苏联《真理报》发表苏外长莫洛托夫致美国务卿马歇尔关于交换中国问题情报复函。函称：苏联政府认为外国干涉中国之内政，尤其外国军队参加中国内战，仅能鼓动中国之内争，并为中国之统一增加各种困难。苏联政府认为惟有美、苏政府不忽视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协议，以及切实执行协议，则莫斯科会议对中国问题之协议，始可履行。复函指出苏军已于1946年5月3日全部自中国撤退，而未悉美军究于何时履行撤离中国之协定。马歇尔及莫洛托夫来往文件之副本，俱已分送英外相贝文及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

△　国际妇女法学会中国分会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成立大会。会长郑毓秀。大会通过分会章程，选出理、监事11人。

4月8日　　驻北平美军总部吉伦中将及最后一批官兵369人，晨9时离平赴塘沽，换乘“威格尔将军号”离华返美。驻北平美军总部宣告结束。

△　陈延炯继张嘉璈接任长春铁路公司董事长。

4月9日　　粮食部以本年度军粮不敷分配，向四川省征借公粮200万担，补充军粮。翌日，川省参议会决议：请省府转呈中央，自三十六年度起，停止田赋征实、征借，以纾民困。

△　外交部参事叶公超在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赞成美国政府主张提前拆迁日本国内可充赔偿物资之一部分。此次中国所得日本之提前赔偿百分比，当然不得影响将来中国于总清算时提出之要求。

△　中共晋察冀军区部队发动正太战役。至5月4日，国民党军被歼灭3.5万余人。中共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区联成一片，石家庄的国民党军完全孤立。

4月10日　　一万元新钞自8日上市应用后，上海市场涨风弥漫。

今日，米市求过于供，价格暴升，白粳高达14.7万元，油、麦、杂粮及其他纱布各物一致报涨，金、钞黑市死灰复燃。

△　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订抑止京、沪地区物价上涨办法。翁文灏主席，俞鸿钧、王云五、张嘉璈、吴国桢等出席。决定采取在沪尽量抛售洋米，京、沪区工人平价配售食米，棉纱收购价格酌量提高，沪市用煤尽量设法供应等措施。

△　财政部重行规定旅客出国携带国币限制办法，规定每旅客出国携带本国货币，除经本部核准颁有护照者外，不得超过50万元，其超过规定数额者，所有超过数额部分，一律予以没收。

△　台湾旅沪六团体代表陈碧笙、庄希泉等招待新闻界，发表台湾事件之书面报告，提出五点主张：一、组织调查团、严惩失职官员；二、立即停止清乡，实现政府诺言；三、陈仪胁迫国大代表等17人通电挽留陈仪，绝非出自彼等本意；四、坚决反对美国报章主张将台湾交与联合国托管；五、台胞思想绝非受日寇奴化，人心向背，在于台省行政设施。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会谈接收旅顺、大连问题。

△　司徒雷登辞燕京大学校长职务。

4月上旬　　阎锡山经营多年之西北实业公司，以7000亿元之代价，全部押给中国银行。该公司系阎锡山用以生产军火及垄断山西工业之总机关。拥有全国著名之太原兵工厂、炼钢厂、机械厂、铁道工厂、晋生纺织厂、西北洋灰厂、西北面粉公司、晋华卷烟公司、西北火柴厂等，近因经济破产，美货倾销，原料缺乏，成品滞销，公司赔累甚巨，遂有此举。

△　杭州丝织业因丝织品外销无望，成本飞涨，资方拟将工资减

至四成，劳方要求六成，引起工潮，罢工工人已达6000余人。

4月11日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请政府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门，以增进中葡邦交案。19日广州民众成立收回澳门运动促进会，电请政府积极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门，又电各省民众团体呼吁共同行动，同时派人与住澳侨团联络。澳门葡当局闻讯，立即禁止广州各报入口，并加强市内警戒。

△　美国国务院宣布：日本驱逐舰级军舰140艘，将立即平均分配与中、美、英、苏四国。是为根据1943年四国宣言，对239艘军舰之首次分配。

△　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公布“不需外汇准予输入”之外汇来源审核原则。上海各厂商纷纷在市上收集美钞，以备汇至国外，购置原料。美钞黑市复呈活跃，继续上涨，港币、黄金亦同。至13日，各银楼均已停止售出，仅限收进，物价亦因之刺激上涨。

△　法国银行团代表沙班与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在京签订投资兴筑成渝铁路贷款合约。

△　西康民变领袖朱世飞等向政府投诚。

△　朝鲜独立运动领袖李承晚到南京。13日会见蒋介石。

4月12日　行政院公布施行未经配售实物之重要地点评议工资实施办法，并指定为镇江、无锡、杭州、宁波、芜湖、安庆、广州、汕头、桂林、梧州、福州、厦门、南昌、九江、武汉、重庆、成都、康定、贵阳、昆明、长沙、西安、兰州、太原、开封、郑州、济南、青岛、天津、北平30个城市，分别设立工资评议会，参酌当时当地主要日用必需品（米、煤、油、盐、棉布、糖）物价，作增减工资之评议。

△　参谋总长陈诚对记者称：接收旅、大之准备仍在布置中，如

外交无问题，东北国军对击溃旅、大之共军有充分把握。

△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将在中国设立中国委员会，定6月在南京成立，是日教育部长朱家骅主持首次筹备会议。

4月13日　蒋介石召集上海市长及地方人士，询问物价情形。

△　联合国文教组织决议调查中国战争损失。

4月14日　白崇禧签呈蒋介石，胪陈今后对台改进意见，其要旨为：甲、行政：“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可即改组为省政府”；“各县市长民选”；各级公务人员，“施以短期训练”。乙、经济：“为复兴台湾之农工企业，于三年内，在经济上，中央似应扶助台湾，而不取给台湾”，专卖制度，“可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物资供应机构；“调整台币与法币之比率”，“按一比三十五逐步提高至一比五十之比”；“极力减少公营企业之范围”，“奖励民营”。“丙、教育”：“积极推进‘台胞祖国化’之教育”；“普及国语运动”。丁、军队及宪警保安部队：“驻台国军，经常以一个整师为宜”；台湾省成立保安团一至二团，各县市成立保安警察队，驻台宪兵保持一至两个团。戊、其他：奖励台民与其他各省人民通婚，以融合民族之大一统。16日，蒋介石批示：“所拟皆可如拟”。

△　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6000余人在陕北瓦窑堡以南羊马河地区，被西北野战军包围后全歼，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000余人被俘。

△　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林仲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对空军轰炸运往解放区救济物资事提出抗议，重申三项要求：“一、联总在华未完成计划部分之物资，应全部划归解放区人民。二、联总直接在解放区工作。三、联总物资直接运往解放区。”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丹麦驻华公使穆克对1946年5月20日在南

京签订之中丹关于取消丹麦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之批准约本，举行换文仪式。

△　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对德和约问题发表声明，要求严格执行《波茨坦协定》，中国必须为对德和约召集国之一。

△　外交部长王世杰致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召集中、美、苏、英四国会议，“全面协商解决”朝鲜问题。美国赞成，苏联反对。

4月15日　行政院公布施行《国库拨款限制办法》，通令全国各级机关切实遵办。计四项：一、本年度各机关应严守预算，凡非国家大政之紧急措施合于紧急命令拨款办法者，不得于预算外请求紧急拨款。二、切实遵守军政机关公款存进办法。三、各机关应妥为分配本年预算，以免头重脚轻，要求追加。四、各机关不得借口急需，请求担保向国家银行透借，即或奉准、亦视同预发经费。

△　沪市米价猛腾，上白粳每石15.5万元。社会局抛售2000余包，涨风仍难遏止。16日，米市涨风益见汹涌，形成无货应市。17日，白粳涨达18万元，食油亦飞涨，行市混乱。

△　全国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胡子昂代表同业向政府呼吁：一、金融政策不应偏重管制方面，而应领导资本入生产之途。二、希望能有一共同遵守而合理之银行法，以资准绳，但不可朝令夕改。会议通过章程及各项提案，并选出李铭等31人为理事，王延松等11人为监事。会议于18日下午闭幕。

△　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晋南反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控制同蒲路200余里，切断运城、临汾间联系。

△　下午4时，越南法军用飞机在南圻永隆省泳滩市上空，对该市华侨第二集中区和谷栈轰炸，死侨胞三人，伤一人。翌晨9时，法机三架复飞临该区大施轰炸，华侨死百余人，重伤10余人，轻伤数十

人。27日，外交部为此向法驻华使馆提出严重抗议，并电令驻法大使钱泰采取同样步骤，要求法方切实承认责任，履行法国保护华侨之诺言，实行惩凶、赔偿。

4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例会通过《国民政府施政方针》（即《共同纲领》）。晚9时，蒋介石代表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代表在官邸签署《国民政府施政方针》。

△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各级政府、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及学校，均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俟国民政府改组后，另定纪念办法；政府机关、团体、学校仅悬国旗及国父遗像；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开会时，不再诵读国父遗嘱；国歌在未颁订新国歌前照旧。

△　是晚，晋察冀野战军切断正太线东段，攻占获鹿县。次日占井陉煤矿区。

△　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将派董彦平等赴旅顺、大连视察。

△　杨亮功、何汉文向监察院提交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报告认为事变原因是物价高涨与失业增加，政府统治政策失当，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建议撤销长官公署，改设省政府，选用省内人士任职；改组省、县、市参议会；实行二五减租，公地分配；撤销专卖、贸易局，辅助产业发展；进行赔偿、抚恤；鼓励台湾与内地文化教育交流。

4月17日　　《国民政府施政方针》公布。宣称："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之准绳"，"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之原则，为各党派合作之基础"；"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试行行政院负责制"，任用院长应先征求各党同意；各省行政应行军民分治原则，省、市参议会及地方政府应尽量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彻底整顿税制及财政，简化稽征手续，减少赋税种类及

附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严格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之逮捕与干涉”。施政方针共12条。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国府五院院长名单，孙科为国府副主席，张群、孙科、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分别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张人杰、李煜瀛、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熊克武、孔祥熙、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等，秘书长陈立夫。

△　国民政府任命白崇禧兼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家骅兼副主任委员，任命翁文灏、陈诚、钱昌照、朱家骅、俞大维、王云五、秦德纯、顾祝同、桂永清、周至柔、黄镇球、钱昌祚兼委员。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撤销中央调查统计局。

△　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要求接收旅顺、大连。

4月18日　国民政府明令改组。除五院院长为国府当然委员外，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以上为国民党）、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以上为青年党）、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以上为民社党）、莫德惠、陈光甫、王云五、包尔汉（以上为社会贤达）为国民政府委员。

△　国民政府加聘宋庆龄、胡毅生、刘哲、魏怀、陈其采、许崇智、陈树人、陈策、张钫、尧乐博士、迪鲁瓦、萧萱、李根源为政府顾问。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后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共九章56条。规定：国民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国

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设委员40人为限，由主席就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

△ 蒋介石在国府礼堂招待新闻界发表谈话称：国府委员会之改组乃我国自训政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此次改组使各政党及社会贤达得以参加全国最高之决策机构。

△ 国民政府举行奠都南京二十周年纪念。

△ 民盟主席张澜致函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郑重声明从未表示拟参加国内首次选举。

△ 民社党中常委伍宪子、沙彦楷，汤住心、李大明、汪世铭、卢广声、孙宝刚发表声明，不承认张君劢提出之参加政府人员名单，声明称：张君劢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一事，纯系不合法行为。张氏擅行提出名单，一意孤行，同仁等绝不承认。以倡导民主自命之人，而所作所为，全与民主精神相反，殊堪惋惜，除将依法予以制裁外，特此声明。

△ “中华革命同盟会”刘杨等人电蒋介石，对民社党、青年党参加政府猎取官位，极为不满。

△ 《中菲友好条约》由中国驻菲公使陈质平、菲总统罗哈斯分别代表双方在马尼拉签字。次日分别在南京与马尼拉两地公布条约全文。

△ 国民政府特派钱泰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邮政会议代表团团长。

△ 国民政府派陶寅为中华民国出席贸易及就业会议第二届准备会议代表兼秘书长。

△　远东委员会决定："日本应保留足以使其维持1930年至1934年间生活水准之工业动力。"

△　国民政府免去湘鄂区征粮督导团主任委员苗培成本职，派高一涵兼任。

4月19日　《中国厄瓜多尔友好条约批准书》在厄京基多举行互换，同日宣布该约生效。

△　国民政府特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　浙、沪、闽、粤、台、鲁、辽、渝、京、苏、黔11省、市渔联会代表，分别向社会部、农林部、财政部、中国农民银行、合作事业管理局、中央党部请愿：一、催促修正渔会法，俾依法组成全国渔会。二、要求依照渔民人数选出国大代表与立委。三、扩大渔民贷款数额，并简化贷放手续。四、请中央向盟国要求以日本渔业设备赔偿我国渔民战时损失。五、取缔各种变相渔税。

△　广州民众成立收回澳门运动促进会，电请政府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门；又电各省民众团体呼吁共同行动，同时派人与住澳侨团联络。

△　菲律宾当局对华侨7600人仍拒绝重新入境。

4月20日　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闭气工作完成，泛区完全断流。

△　蒋介石接见民社党宣传部长徐傅霖。

4月21日　国民政府定于5月20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

△　浙赣路金华、兰溪段通车。

△　韩国独立运动领袖李承晚自上海飞返汉城。

4月22日　蒋介石接见抵华访问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邓斐尔上将。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及第十五条条文：第一条加“为由训政达到宪政之过渡时期”一句，第十五条删去“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节。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行政院组织法》，规定行政院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交通、邮电、农林、社会、粮食、水利、司法行政、地政、卫生等部及资源、蒙藏、侨务等委员会，并另设新闻局。

△　国民政府公布《新闻局组织条例》，凡14条，规定：新闻局隶属于行政院，掌理宣达政令政绩，阐明国家政策，发布重要新闻等事务，分设三处一室。并规定置局长一人为特任，副局长二人为简任。

△　行政院会议议决：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主席，各厅增设副厅长，由台湾本省人担任。

△　海军总司令部派马德建、姚玙赴日接收日本赔偿中国的军舰。

△　华东野战军向山东泰安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当夜，相继占据泰安四周据点，包围该城。25日黄昏发动总攻，26日上午，泰安大捷。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及新编第十三旅、第十四旅共二万余人，俘中将师长杨文泉，少将旅长杨本固、李则尧、少将副旅长宋竹青、少将参谋长韩明、刘新甫等官兵1.5万余人。

△　《新华社》以《新筹安会》为题发表社论，评论政府改组实为继承袁世凯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名称虽然不同，但实质都是媚

外、残民、打内战。

△　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及其他民主人士发表宣言，指责新改组之政府仍为国民党之一党政府，其目的无非欲取得美国之借款，以继续内战。

△　上海《大公报》是日转载美、苏报纸对国民党改组政府之反应。《华盛顿星报》称："详细检查新政府组织，我们会发现不但国民党继续独揽大权，而且国民党内部的控制权，仍旧操纵在那些反动分子手里。"《明尼阿波里斯论坛报》称："国家政事仍在先前那些国民党领袖的掌握中。该党在国府委员会二十九席中占十七席，未有放弃控制迹象。"《纽约先驱论坛报》称：改组"将博得美国的赞许，而将发放由于南京政府的性质而暂时保留的对华援助"。苏联《真理报》载评论家马里宁一文称："国民党政府正领导中国走向严重危机，其用意乃藉美国之援助，以压倒民主。""中美反动派采取一致阵线，决非偶然之事。此对于中国之独立、统一及政治民主化，足以构成严重之威胁。"

△　美国政府宣布：原允贷予中国的五亿美元撤销。

△　行政院公布修正《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

4月23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与国民党中常会联合举行，蒋介石主持，决定国民党参加行政院人选。

△　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撤销。其职权根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由改组成立之国民政府委员会接替。该会秘书厅发出公告，是日起停收文件，办理结束。

△　国民政府委员会晨10时在南京开会宣告成立。主席蒋介石及委员张群、孙科等23人举行第一次国务会议，决议通过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各部、会首长人选。

△　国民政府特任王云五为行政院副院长。

△　国民政府准免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部长王云五、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农林部部长周诒春、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部长谷正伦、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地政署署长郑震宇本职。特任张厉生、王世杰、白崇禧、俞鸿钧、李璜、朱家骅、俞大维、左舜生、谷正纲、谷正伦、薛笃弼、谢冠生、李敬斋、周诒春、翁文灏、许世英、刘维炽、常乃德、李大明、蒋匀田、缪嘉铭、彭学沛、雷震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张厉生兼内政部部长，王世杰兼外交部部长，白崇禧兼国防部部长，俞鸿钧兼财政部部长，李璜兼经济部部长，朱家骅兼教育部部长，俞大维兼交通部部长，左舜生兼农林部部长，谷正纲兼社会部部长，谷正伦兼粮食部部长，薛笃弼兼水利部部长，谢冠生兼司法行政部部长，李敬斋兼地政部部长，周诒春兼卫生部部长，翁文灏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刘维炽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　国民政府准免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本职，特任甘乃光为行政院秘书长。

△　国民政府特任董显光为新闻局局长。

△　青年党参加国府之委员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发表参加政府声明。

△　民社党汪世铭、卢广声、孙宝刚发表声明，否认蒋匀田、李大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　行政院院长张群广播施政方针：追求和平，恢复统一，完成行宪准备，突破经济难关，改善人民生活，并与各友邦和平相处。

△　行政院公布修正《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第七条条文：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29日，行政院又决定："绥靖区内农地，经非法分配者，应由县府征收，其地价应依法估价，折合农产物，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给予合法所有人，分年偿付。该债券以农产物为本位，偿付期不得逾十五年。"。

△　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乌兰浩特开幕。会议先后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暂行组织大纲》，决定撤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兴安省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选举云泽（乌兰夫）为主席。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6日，会议闭幕。

△　宋美龄受聘为世界妇女公民协会名誉主席。

4月24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规程》，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称为国务会议。

△　国民政府通过《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总事务所组织条例》。

△　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石家庄视察。

△　晋察冀野战军攻占冀、晋两省咽喉娘子关。

△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闭幕，此次会议经45天之激烈讨论，对德和约、对奥和约及四强防德公约等，均未获得协议。

△　山东大学全体教员举行会议，决议向行政院、教育部呼吁，请求与京、沪、平、津各大学教员同等待遇。

△　南京市各公私立高级中学应届毕业生组织南京市三十五年度高中毕业同学联谊会，招待记者，要求停止举行会考。并于次日分别呈文教育部及市教育局。

4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组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定陈立夫、谷正纲、赵仲容、王世颖、陈果夫等为该会当然委员，吴铁城、马超俊、蒋经国、萧铮、钱天鹤、楼桐荪、于树德、陈仲明为委员，即依组织规程组织成立，并推定陈立夫为主任委员，王世颖为总干事。

△　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发表时局宣言称：目前政府改组，虽以政协决议为标榜，但其所采取的步骤与集合的成份，与政协决议根本不符。目前改组之政府，实与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途径背道而驰。宣言严重抗议无端逮捕民盟领袖及盟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与中共和平合作。

△　海军军官学校在青岛成立。该校系沪、渝海校及驻青之海训团合并组成，包括学生总队、接舰训练班及军官训练班。

4月26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邀“行总”署长霍宝树报告一年来善后救济概况。报告称：截至今日，“联总”运抵中国物资逾180万吨，尚余七八十万吨将陆续运来。运华物资美国部分约在八九月间可全部运到，英国及澳洲二部分则尚须明年始可运齐。

△　中国农工民主党为政府改组事发表宣言，略称：改组不是依据政协决议原则和程序的，它只是训政的延长，而且是扩大国家分裂，延长残酷的内战。如否认这事实，必须首先自动停战，重新召开党派会议，照政协决议办事。

△　华东野战军攻克泰安，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主力2.4万余人。

△　蒋介石以泰安守军第七十二师失利，再电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示沂蒙地区作战要旨。

△　国际母亲大会在巴黎揭幕，宋美龄任荣誉主席。

△　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将美国海军剩余船只271艘及船只器材、浮动船坞等移交中国，并派遣海军军官100名、士兵200名予以协助。国民政府决将青岛作为美国第七舰队之海军基地，仅许美国船舰入口。

△　四联总处与农林部棉产改进处，洽定本年度全国美棉生产贷款1265亿元，并洽定各省分配额，均以生产之棉花作抵。

△　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会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办法，并决定联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加速全国大学教授会联合会之组织，共同进行。

△　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柏文蔚在上海病故。

△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改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潘裕昆继任军长。

△　梁秋水、伍宪子先后自北平、香港到上海，调解民社党内争。

△　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4月27日　政府特派郭泰祺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全权代表。

△　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央工委到达河北阜平。

△　台湾旅沪六团体致电台省府主席魏道明，要求立即停止对台

湾之“扫荡战”，取消“戒严法”，准许各报复刊、学校复课。

△　永定河治本工程开始，全部预算近3000亿元。

△　国际妇女法学会中国分会在上海成立。

△　中国留美同学会监事会公推孙科、陈立夫为正、副理事长，宋美龄为名誉理事。

4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恢复后第一次会议。蒋介石主持，王世杰报告外交工作。

△　国民党军占领蒙阴。5月1日又占新泰。陆军总部判断华东野战军被迫后撤，5月10日下令各部向鲁中山区进攻。

△　行政院长张群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商讨有关物价波动的对策。

△　国民政府公布《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凡八条。规定：银行、钱庄未受政府允准买卖黄金外币者。处经理人五年以下徒刑，没收其黄金、外币，并撤销其营业执照。携带黄金、外币出国，每人以黄金关秤二两、美元100元或美、英钞等值之数为限，超过者没收其超过之数。

△　浙省参议会电请中央自三十六年度起，田赋仍征法币，以苏民困。谓自施行征实以来，粮官舞弊自肥，民怨沸腾。

△　上海市中学生组织响应南京同学请愿停止会考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反对教育部公布高中毕业生统须于本学期举行会考之办法，说明会考之弊，当局如欲提高学生程度，应从增加教育经费着手，而不应求之于会考制度。

△　安徽合肥发生抢米风潮。翌日，宣城外运米车和船被抢光，

30日，芜湖又发生抢米风潮。

4月29日　行政院首次政务会议，通过台湾省政府各委员及各厅长人选，任命丘念台、严家淦、许恪士、杨家瑜、林献堂、朱佛定、杜聪明、马寿华、刘兼善、李翼中、南志信、游弥坚、朱文伯、陈启清为台湾省政务委员，以丘念台兼民政厅长、严家淦兼财政厅长、许恪士兼教育厅长、杨家瑜兼建设厅长、李翼中兼社会处长。任命徐道邻为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　外交部与内政部、海军总部会商确保南海岛屿对策。

△　国民政府公布热河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参议员、候补参议员名单。议长王致云，副议长胡之焕。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组织规程》，凡16条。

△　国民政府任命黄如今为国立长春大学校长。

4月30日　全国物价会议昨今两日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讨平抑物价办法。张群主席，王云五、俞鸿钧、翁文灏、庞松舟、张嘉璈、吴国桢等均出席。讨论决议：一、粮食问题：5、6、7三个月粮食部应尽量在国内各地收购余粮，供应京、沪两地，必要时向国外购粮接济。二、纱布问题：依然限价，每件提高为460万元。棉花来源可向国外购置。三、公用事业继续贴补，其范围为京、沪两地公用事业、交通、煤斤三项，贴补数额照四月份增加10％。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宣部改组办法、组织规程及党史史料陈列馆改为开国文献馆等案。中宣部改组办法为：中央党部仍设宣传部，并设置宣传设计委员会，以宣传部部长为主任委员。现中宣部之政令宣传、图书杂志登记审查、对报纸通讯社之指导联络、国际宣传等业务划归行政院新闻局。

△　新闻局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局长董显光在回答记者时称：“冈村宁次系日军投降及遣送事宜之联络班班长，其工作尚未完毕；至于本身战罪部分，尚待将来决定。”

△　据新华社统计，国民党军在4月份被共军折损合10个半旅，夺占国民党军驻守的县城48座。

4月下旬　各地物价继续飞涨。23日，上海物价达到新高峰，一周中上涨20％至50％。上海黄金黑市78万元，美钞黑市1.8万元。24日，上海黄金黑市涨达110万元，美钞黑市2.2万元，面粉上涨50％。米市货样绝迹，场内一无成交，场外白粳已涨至近20万元。30日上海米市喊价混乱，白粳创21万元。面粉、杂粮、油、糖亦升腾不止。

是月　因中、美、英、苏、法、荷、澳、加、印、新西兰对日要求赔款数目超过日本资产之总额，麦克阿瑟宣称，必须坚持二原则：一、允许日本留存维持最低国民生活水准之产业；二、水准以上之资产，由各国分配。此外，关于日本之可以流动资金，美国有优先获得权，以作：一、美军驻日占领经费；二、对日供给食粮之贷款；三、对日供给再生产原料之货款。

5月

5月1日　蒋介石接见行政院长张群、财政部长俞鸿钧与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等，听取财政应急措施。

△　行政院院长张群在立法院例会报告施政方针，主要内容为：一、多方努力迅速结束军事措施，早日实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恢复统一；二、当力求收支平衡，同时努力整理通货；三、遵守宪法精神，保障人民自由，严惩贪污；四、对外关系希望有一和平正义友善合作之世界，维持联合国宪章，保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并称“立法院与行政院系并立而非对立，希望立法院体谅事实困难，信

赖行政院之经验及能力，两方面切实保持联系”。

△　由地政署、卫生署改称之地政部、卫生部以及新设之水利部分别举行成立典礼。

△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施行条例》，凡七章71条。

△　田粮业务检讨会议在南京召开，22省田粮处长出席。

△　山东国民党军整十一师及整六十五师进占新泰。

△　美大使司徒雷登在山东大学讲演，学生代表当面递抗议书，抗议美军强驻中国。

△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先后通过宣言、告海外侨胞书、党章等文件，要求国共双方恢复去年1月13日位置，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平等联合政府。

△　上海总工会在跑马厅举行“上海市劳工节庆祝大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出席。国民党操纵会议进行反共宣传，但与会者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并于会后举行要求解冻生活指数大游行。

△　国民政府决定将日本赔偿物资分上海、南京、塘沽、汉口、广州、青岛、广州湾、葫芦岛、马尾、厦门、营口、石灰窑、基隆、高雄14地起卸。赔偿物资包括工具机、造船器材、钢铁、化工原料、电力以及轻金属等。

△　国民政府派秦汾为赔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邓斐尔宣布美军将于7月1日以前全部退出中国。

△　美国驻华海军总司令柯克对记者称：美国海军在中国自香港至天津沿海一带，计有巡洋舰两三艘、驱逐舰12艘、其他军舰若干艘。

△　外交部就法国军用飞机3月8日、4月5日两次轰炸我在越华侨集中处一事，向法国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次日，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赴法国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

△　暹罗入境移民法，自是日起生效，规定华侨每年入境限额为一万名。

△　中央纺织公司预备让渡民营，由潘序伦等组成估价委员会。

△　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在庆祝该社成立二十三周年茶会上称：中央社将由国民党办而改为民营。

△　广东省江门市《复兴报》被粤省社会处以“为奸匪张目、影响观听，淆乱人心”为词，勒令停刊，该报于本日宣告停刊。

5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特种营业税法》，规定：特种营业税由中央统一征收，课税范围包括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交易所及交易所发生之营利事业，进口商营利事业，国际性、省际性交通事业，其他有竞争性之国营事业及中央政府与人民合办之营利事业。

△　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九个半旅占领绥德。当晚，西北野战军攻击胡宗南部补给基地蟠龙镇。至4日，全歼守军6752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少将副旅长涂建、少将参谋长柳屈春、少将政治部主任陈献金，获取大量军用物资。

△　驻守汤阴之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王自全部万人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司令孙殿英及部下7000余人被俘。

△　民盟上海支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今后以合法公开的团体

身份，促进上海民主运动。

△　杭州米店均以28万高价出售食米，激起公愤。中午，全市大小米店均被抢，警察出面干涉，部分警察局亦被捣毁。

△　中国、英国、荷兰就中国商船被扣及贸易前途问题在新加坡举行会议。

△　国民政府特派张彭春为中华民国签署国际难民机构章程全权代表。

5月3日　　蒋介石飞徐州、济南视察，与顾祝同、王耀武等研商作战部署，次日返南京。

△　尼泊尔特使克利希娜率尼泊尔访华团抵南京，外交部长王世杰设晚宴款待尼特使。

△　浙江永康及上海发生抢米风潮。

△　上海市沪新、南洋模范、大同等36所中学派代表在交通大学召开座谈会，反对教育部恢复会考，成立“上海市三十五年度高中毕业同学反对会考联合会”，并发表宣言，要求教育部立即宣布停止恢复会考及一切变相恢复会考的办法。

△　全国文艺协会在上海召开年会，邵力子任主席，通过设立文艺通信委员会、抗议骆宾基被非法逮捕、争取人身自由等决议。

△　国民政府特派吴南如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难民机构筹备委员会代表。

5月4日　　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对政府改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这样的改组，不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只能助长内战，增加人民之痛苦……”表示对改组后的政府“不存在任

何幻想，并愿与我爱国同胞共同反对之”。

△　苏联驻华人使彼得罗夫复外交部，重申拒绝中国派军接收旅顺、大连。

△　正太前线晋察冀野战军进占寿阳及阳泉矿区。

△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团体和文化界纷纷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一致呼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

△　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上街张贴“反对内战”、“保障人权自由”、“打倒官僚资本”、“解冻生活指数”等标语，与军警冲突，多人受伤。

△　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教员全体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　黄河花园口举行黄河堵口复堤合龙典礼。

5月5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总事务所组织条例》。又令《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组织条例》着即废止。

△　国民政府聘查笑山、郭昌鹏、郭子清等51人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委员；聘杨慧存、孙岱亭、徐佩齐等49人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聘张孔嘉、朱棠、李正韬等52人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考察委员会委员。

△　外交部长王世杰再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驳斥有关大连受军管等问题。

△　资源委员会组成的赔偿委员会由孙越崎、吴兆洪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　驻日本代表团赔偿组长吴半农与其他七国赔偿代表赴日本南

部视察日掠夺物品。

△　上海法学院全体学生罢课，成立“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赴市府请愿。次日，该校“抗委会”联络交大、圣约翰、复旦、暨南、同济、中华工商、中国女中等34校代表成立“上海学生五四事件后援会”。

△　美国驻军调部物资处理团结束业务，翌日该团人员离开北平，将价值350万美元之剩余物资转交政府方面。

△　美国驻长春总领事署成立，首任总领事柯樾博，副总领事史彬士。

△　暹罗大使塞古安拜见蒋介石，代表暹罗政府赠白米500吨。

△　国民政府派刘锴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成立大会首席代表。

△　成都发生抢米风潮，号称“吃大户”运动，警察开枪，打死二人，全市戒严。市参议会10日决议，电请中央停购、停运军粮，以维民食。

△　无锡粮价暴涨，发生抢米风潮，波及全城米店，警察开枪，死二人伤二人。

5月6日　　蒋介石手令京、沪市政府，严予取缔囤积居奇扰乱粮价之奸商，并颁布四项调节粮食办法。

△　蒋介石接见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与秘书长徐道邻，指示施政方针。

△　中央警官学校举行开学与毕业典礼，蒋介石主持并发表训词。

△　参政员许德珩、周炳琳、钱端升致函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建议派飞机前往延安，接中共参政员来京出席本届参政会。

△　中央大学教授发表宣言，要求改善待遇。

△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电请教育部调查教授待遇。

△　山东国民党军再占泰安。

△　中共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刘晓任书记，主管长江流域、西南各省的中共地下工作。

△　国民政府派柯象寅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召开之食米研究组会议代表。

△　国际邮政会议在巴黎揭幕，中国派钱泰等代表出席。

△　国民政府派卢宋澄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无线电行政高周率广播会议总代表。

5月7日　　张群在国务会议报告物价波动情形及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及生活指数解冻问题。

△　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总处在行政院举行第三四三次理事会议，议决借款1200亿助江、浙蚕丝产销，另由农行贷款1000亿为黄泛区复兴。

△　国民政府公布《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

△　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就中国军警能否随同接收人员进入旅、大一事进行谈判。

△　国民政府免去驻委内瑞拉国特命全权公使李迪俊兼职，任命梅景周兼中华民国驻委内瑞拉国特任全权公使。

△　外交部电令驻沪办事处，就美水兵饶德立克击毙人力车夫臧大咬子案，继续同美军事法庭进行交涉。

△　美国务卿马歇尔称中国政府改组已具备美国贷款条件。

△　上海米价飞涨，今日连续发生五起抢米及打米店事件。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弹压。同日，浦口米价几点钟内涨约二倍，铁路、码头饥馑员工2000余人，捣毁镇内所有米店。军警、宪兵驰往开枪镇压，全镇宣布戒严。

△　浙江金华英士大学学生罢课，要求迁校京、沪，充实设备，另派校长及恢复医学院，并拟进京请愿。次日沪杭铁路奉令停运。

△　万隆华侨发起集资百万盾开发西沙群岛的计划。万隆市已有5000侨胞表示愿往西沙进行开发，现已募款一万盾。

5月8日　　国民政府免去驻加拿大国特命全权大使刘师舜本职；任命于望德为中华民国驻哥伦比亚国特命全权公使。

△　上海二万名丝织业工人，举行“经济紧急措施”实行以来的首次示威游行，要求立即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及平抑物价。

△　上海米商因上海滑稽戏演员筱快乐（原名朱良）在电台播唱“米蛀虫”，请愿并捣毁筱快乐住宅，打伤其妻女。

△　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南渡松花江，向四平、长春间国民党军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接合部发起攻击。双方在长春、怀德、公主岭、伏龙泉、农安地区展开激战。

△　加拿大取消限制华人入境法案。

5月9日　　行政院举行检讨会，决定调整公教人员待遇，解冻生活指数。

△　张群出席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物价问题。

△　驻美大使顾维钧电外交部长王世杰，报告向美务卿马歇尔提出请求美援中国10亿美元经过。

△　中英双方联合发表新闻，即将签订中英空中运输协定。

△　安庆民众袭击低购、强购军粮之县银行，警察开枪伤三人。

△　下午3时，参加“上海学生五四事件后援会”的34所大中学校代表700余人，聚集市府广场，向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请愿示威，要求保障人权，严惩凶手。

△　上海市50余所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3000余人，赴市教育局请愿，要求废止会考及联考制度，提高教员待遇，并举行反会考游行。

△　国府委员莫德惠赴台湾，以私人资格探视张学良。

△　行政院公布《灾赈查放办法》。

△　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国民政府故委员李烈钧。

5月10日　国民政府特任薛岳为国民政府参军长，原委商震应免本职。特任何应钦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鹿钟麟、杨杰、陈济棠、陈绍宽、黄绍竑、刘峙、卫立煌、蒋鼎文、贺耀组为顾问委员会委员。

△　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决定：京沪区生活指数自5月份起解冻。

△　蒋介石与张群研讨经济、物价及加薪等问题。

△　南京发生抢米风潮，市政府宣布实行凭户配米，取消粮食议价，恢复自由买卖。

△　上海市卫生公务人员因物价狂涨，难维生计，全体呈请辞职。卫生局长劝勉慰留，表示将代向市长力争待遇。

△　行政院物价委员会调整上海市工资。

△　新任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抵东京。

△　鲁南国民党军欧震兵团进占莱芜，鲁西国民党军进占东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下令对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

△　教育部制定各省、市高中毕业生会考与大学入学考试联合举行之办法（即“联考办法”）。各地高中毕业生及欲投考大学者闻讯无不反对。连日来，南京、上海、北平、长沙、青岛、福州、合肥等地学生纷纷至市府请愿，要求会考暂缓一年。

△　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国民政府故委员蔡元培、故陆军上将张自忠。

5月上旬　　上海铁路、交通、无线电信、印刷业和杨树浦发电厂共数万余工人，相继实行怠工、罢工、请愿、游行，要求解冻生活指数，冻结物价，安定工人生活。

△　河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先后罢教，要求调整生活待遇。

5月**11**日　　蒋介石接见外交部长王世杰，听取其对苏联交涉接收旅顺、大连问题。

△　因二二八事件被政府撤职之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返回南京，翌日，受到蒋介石召见并共进午餐。

△　山东国民党军南线汤恩伯部自蒙阴沿沂蒙公路北进，直指坦埠附近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　民主党派代表黄炎培、沈钧儒、马叙伦等九人就时局发表谈话，强调要求真正的民主与和平。

△　粮食部通电各省，因粮价急涨，自本月起暂停收购军粮，以维持民食供应。

△　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五团撤离北平。

△　菲律宾移民当局同意，凡系在菲出生之华侨，无论何时归国，均可以归侨资格返菲。

5月12日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向苏大使彼得罗夫提出接收旅、大备忘录。

△　进攻沂蒙山区的汤恩伯部整七十四师占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等要点。

△　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500余人因生活无着，到中山陵哭陵。

△　负责处理日本赔偿事宜之中国赔偿及归还代表团组成，吴半农为团长。该团负责和盟军总部赔偿执行处及民间物资保管组联系，执行赔偿事宜。

△　越南西贡及堤岸华侨为救济去年广东及福建之粮荒，购越米1500吨起运回国。

5月13日　蒋介石决定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令汤恩伯部占莒县、沂水、欧震部占南麻，王敬久部占淄川、博山，以达成包围歼灭淄博山地的中共部队为目的。

△　参政会将电邀中共参政员来京赴会通知送交解总驻沪办事处中共代表伍云甫。伍氏复函邵力子，略称：自董必武先生等离京后，

敝处与陕北已断通讯联络，故无法直接拍发，现经由烟台善后救济总署办事处转致，何时到达实难预料。

△　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南满、东满、西满、热河五条战线发起夏季攻势。17日占怀德，18日占长春机场及冀东昌黎、抚宁、迁安等地。

△　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兼省主席张群辞职，以邓锡侯为主席。汉口、西安、广州、沈阳改为院辖市。

△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2000余人为反对停办轮机、航海两系罢课后，是日进京请愿，京沪车阻。次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到沪处理，表示接受学生各项要求。

△　上海闸北南星路贫民区发生大火。焚毁棚户200余间，千余贫民无家可归。

5月14日　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会议，以中央监察委员李济深擅自在香港发表谈话，猛烈抨击政府，违反党纪，决定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次日，李济深在港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被开除系意料之中”，但由此亦证明“国民党反动独裁已至如何程度”。

△　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对记者称：民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有密切联系，政府对该盟之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动如何而定。16日，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罗隆基发表谈话，反驳董之言论，称民盟是个独立自主的政团，对任何党派不能任意附和苟同。

△　民盟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民盟参政员出席即将召开的参政会，发起和平运动。

△　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召开庆祝三战三捷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仍留陕北领导解放战争。

△　行政院会议决定，军公人员待遇自本月起增加85%。

△　中央大学学生代表向教育部及行政院请愿，要求副食费每月每人10万元。上海医学院学生响应中央大学学生，开始罢课。

5月15日　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孟良崮一带。南京一面令其固守，一面调九个师增援，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　蒋介石手令海军总司令部拨军舰六艘，交由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绥靖浙江海面。

△　中、法、印、荷、美、英、缅甸及菲律宾八国在印度举行米粮会议，讨论如何增加米的产量及其他与米有关的经济问题。

△　南京中央大学及戏专、音专、东方语专等四校学生3000余人游行请愿，包围教育部及行政院，要求增加副食费，反对内战。

△　自政府禁止金、钞交易以来，游资大量涌入证券市场，股票波动日烈，天津市永明证券行以亏空三亿余元而告倒闭。

△　上海沪江大学及之江大学分校学生罢课，要求取消积点制。

5月16日　国民党军各路援军均被阻于孟良崮附近。华东野战军发起对孟良崮的总攻，至下午5点，全歼整七十四师3.3万人，击毙师长张灵甫。

△　中共中央中原局改组成立，书记邓小平，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

△　首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在台北宣誓就职，宣布解除戒严令，结束清乡工作，废除新闻、图书及邮电检查，撤销交通及通讯机构之军事管制，台币与法币之比率改为1比44。

△　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将各大学公费生副食费依照公教人员待

遇比例增至4.8万元，以后每三个月调整一次。

△　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生响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本日起罢课三天。

△　南京金陵大学学生响应中央大学学生，开始罢课。

△　上海大同大学学生罢课，要求改善待遇。

△　立法委员梅恕曾、孙九录、简贯三、崔心一等63人联名建议简化国家金融机构，将四行二局一库合并为中央银行及国家业务银行两机构。

△　教育部在全国一片反对会考的呼声中，决定会考暂缓一年。

△　菲律宾参议院通过《中菲友好条约》。

△　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鲍毅德率官兵130余人访问福州。

5月17日　参谋总长陈诚飞徐州指挥军事。

△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布公报称：自5月16日晚至是日晚10时，在怀德战役中，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及第八十八两个师，新一军第三十师及第九十团、第十七团，共1.7万人。

△　上海暨南、复旦、同济大学，杭州浙江大学学生罢课，响应中央大学学生行动。

△　资源委员会决定在各大学设置奖学金，以奖励毕业前即实际参加国家重工业建设和管理之在校学生。

5月18日　蒋介石发表针对学潮的《告全国学生》谈话，要求整饬学风，维护法纪，必要时将采取断然处置。

△　国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计分五条，主要内容为；一、团体请愿不得越级进行；二、团体请愿代表以十人为限；三、对学生罢课、游行应采取必要措施；四、对团体罢工、游行应采取必要措施；五、对不遵守以上各条者，各地政府可采取紧急处置。

△　清华、北大、北洋三校学生，分别组成“反内战反饥饿”宣传队赴市区讲演，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队伍行至西单街头与军警冲突。学生重伤二人，轻伤六人，数十人被捕。华北平、津、唐地区11所院校学生当晚成立“华北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联合会”，决定一律罢课，抗议当局暴行。

△　国防部通令全国部队：如遇报章所载传闻失实，或言论记事有涉及军誉之处，可权衡轻重，报由主管机关请予更正，或诉诸法律听候裁决，如有捣毁及其他不法举动，定予严惩。

△　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呈外交部，报告与苏联外交部次长玛利克商谈中国军警自由进入大连问题。

△　上海《中央日报》实行企业化，改为公司组织，是日开创立会，通过公司章程，选彭学沛为董事长，杜月笙、赵棣华等六人为常务董事，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为监察人，吴铁城为常驻监察人，社长仍由冯有真担任。

5月19日　蒋介石飞徐州，与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全面整训，改正战术，准备最后决战。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追加各部、会经常费，调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学术研究补助费。

△　国民政府令：选任常乃德为国民政府委员，郑振文、陈启天为行政院政务委员，陈启天兼经济部部长。

△　彭德怀发布西进陇东、歼灭马步芳部整编第八十二师命令，决定首先歼灭分散孤立之敌，然后攻占庆阳、西峰镇。

△　上海国立专科学校以上学生7000余人，在北站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后，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

△　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南之公主岭。

△　南京大屠杀日本主犯之一田中军吉由日本押解到沪。

△　中央航空公司中暹航空线正式开航。

5月20日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致词，称和平统一能否实现，完全系于中共是否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全国交通。主席张伯苓致词，希望和平早日实现。

△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向蒋介石报告东北战局，请求从速增援。蒋令坚守长春、永吉、沈阳，以待增援。

△　京、沪、苏、杭区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并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南京卫戍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使用水龙、木棍、皮鞭等阻止学生行动，学生重伤21人，轻伤97人，被捕20余人。是为“五二〇”惨案。

△　北平学生一万余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议决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在同一日游行示威，并议决将北京大学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　天津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遭到特务殴打，学生受伤50余人，被捕20余人。

△　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命令各警备部队及宪警稽查人员全力制止罢工、罢课、结队游行及其他“妨害秩序”之一切举动。

△　外交部就19日法机两架，自越南侵入我广西边境龙津属水口关，低飞扫射，击毙渡夫三名，士兵一名事件，向法国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

5月21日　行政院院长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报告政府工作。各参政员就国内和平问题及人民生活等问题提出口头及书面质询共百余件。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五二〇血案处理委员会”，要求政府撤销《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惩打人凶手，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人身安全。

△　上海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成立“上海学生抗议五二〇惨案后援会”，决议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号召各校学生一致参加后援会，争取人权保障。

△　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抗议殴打学生，议决明日罢课一天，并向北平行辕请愿。

△　昆明各大学学生罢课。南昌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

△　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对记者称，以后如再有游行请愿事发生，“仍依照现行法令处理”。

△　国民党加紧新闻统制。北平《国民新报》因报导学生消息，编辑部被20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捣毁，二人受伤。天津《大公报》因刊登该报记者的报道，未用中央社消息，被严重警告。北平、上海多名记者被捕。

△　国民政府令免驻丹麦国特命全权公使吴南如本职；免兼理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兼职；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任命艾沙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

△　“永兴”、“中业”两军舰驶抵南沙群岛之太平岛，驻守南疆。

△　国际紧急粮食会议宣布：本年度中国所得配给食米36.3964万吨。

△　香港《华南报》讯：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战绩公报称，由去年7月蒋介石开始全国内战的月份，到今年4月十个月中，蒋正规军整营以上被歼灭的兵力，已达79个半旅，在今年2、3、4三个月中，蒋正规军整营以上被歼灭的，有23个半旅，其中包括14个整旅。

5月22日　蒋介石电示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保卫四平街战略。

△　外交部长王世杰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外交情况，强调促进国际合作，谓为防止日本再起，盟国将订公约；对美加强友谊，对苏严守条约；接收旅、大仅军队问题尚未协议，对英港九问题可望合理解决。

△　国民政府特派蒋廷黻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团首席代表。

△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向参政会提出和平方案，建议邀请中共代表重开和谈。

△　上海“抗暴联合会”召集全市102所学校学生代表，决定成立“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并决议23日、24日全市总罢课，抗议南京“五二〇”血案。同日，南京市学生联合会在中央大学举行慰问晚会，慰劳“五二〇”受伤被捕学生。

△　上海市长吴国桢公布四项紧急措施，决对煽动罢工罢课者，予以逮捕究办。

△　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希望全国青年一致起来，共同参加全国性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要求政府放弃武力统一政策，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宣言，吁请政府对学潮勿用高压抑制手段。

△　武昌学生及湖南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现在全国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5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　东北民主联军收复通化。

△　司徒雷登在汉口对记者称"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亦'不愿支持'中国内战延长"。

△　汉口市西府路晚起大火，焚毁房屋约400余户，灾民1000余人。

5月23日　财政部长俞鸿钧向国民参政会报告财政，谓去年预算赤字2.7万亿元，原因为军费及复员救济支出过分庞大。在答复参政员质询时，称中孚、扬子公司调查报告不能公布，黄金潮案尚在审理中。粮食部长谷正伦报告，谓管理粮食办法，为抛售粮食，抑平涨风，平价配售等。

△　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局驻沪代表争取经费，拨为上海市粮食配给之用。

△　民盟参政员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五人，

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要求：一、依据政协路线，重开和平会议；二、恢复国共联系，商讨停战方案；三、政府停止征兵、征粮、征实；四、尊重人权，保障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恐怖行为。

△ “京、沪、苏、杭18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会”向政府及参政会请愿，提出六点要求：一、严惩首都代理卫戍司令及宪兵司令张铁、首都警察厅长韩之焕及东区警察局长陈善周；二、赔偿损失；三、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紧急办法》；四、释放被捕同学；五、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六、保证人民身体、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等基本自由权利。

△ 上海40所学校为抗议南京暴行一致罢课。次日，罢课学校扩大到70余校。

△ “联总”驻烟台工作人员史鲁域祺驾驶吉普车，碾死洋车夫杨禄奎。次日，烟台市人民政府及市总工会向驻烟“联总”代表李普尔提出严重抗议和五项要求。29日，李普尔发表郑重声明，向解放区人民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6月16日烟台市地方法院判处史鲁域祺有期徒刑二年。

△ 台湾省政府决定撤销台省专卖局，改为“台省烟酒公卖局”，火柴部分设股份有限公司，樟脑公司改归建设厅管理。

△ 万宝山事件祸首郝永德，在长春病死狱中。

5月24日 蒋介石鉴于时局危急，决先安后方再图军事进展。并召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入京询问陕北战局。

△ 国民参政会继续举行会议，农林部长左舜生、国防部长白崇禧、交通部长俞大维分别报告农林、国防、交通情况，对军事报告质询，和战主张不一。

△ 广州中山大学开始罢课，持续三日。

△ 杭州学生2000余人游行，抗议“五二〇”南京事件。

△ 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农安并猛攻中长路要地四平街。

5月25日 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参政会报告教育工作，参政员严厉质询学潮。朱谓学潮系因共党分子在学校活动所致。

△ 中央大学教授会劝导学生复课。

△ 燕京大学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停战，成立联合政府。

△ 上海各校学生宣传队在街头宣讲时，82人被警察逮捕。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以“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为由，勒令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自本日起停刊。中央宣传部电话训令南京各报馆，禁止对此三家报纸之停刊表示任何同情。上海《铁报》因透露蒋介石曾批准此事，被勒令停刊四天。

△ 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撤离秦皇岛。

5月26日 国民参政会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大会讨论和平方案，并电邀中共参政员来京出席会议。

△ 水利部长薛笃弼、内政部长张厉生向参政会报告水利及内政。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南开大学等校复课。

△ 第五绥靖区奉令与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合并，孙震继范汉杰为郑州陆军指挥所主任。

△　新任“联总”中国分署署长克利夫兰到部视事。前任“联总”分署署长艾格顿是日返美。

△　美国决定解除对华军火出口禁令。

△　台湾省今晨一小时内连续发生四次地震，震中在花莲港以东63公里的海底。

5月27日　国民政府令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何应钦、兼代主任张群职；特派朱绍良为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萧毅肃为副主任。

△　参政会继续举行会议，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善后救济总署分别报告工作，至此行政院所属各单位工作报告结束。晚，蒋介石宴请参政员，谓和平能否实现完全系于共产党之态度。

△　上海市参议会致电政府请与中共恢复和谈，致电毛泽东促莅京会商，并致电各法团呼吁和平。

△　京、沪、苏、浙、豫五区19所专科以上学校联合会向行政院投递备忘录，要求四点：一、即刻答复5月20日关于改革教育及23日关于“五二〇”血案善后要求共11点；二、立即启封《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三、释放5月22日以后所捕全部同学；四、保证今后无类似事件发生。

△　北平行辕声明，对预备于6月2日举行的罢课游行，不能再事容忍。

△　海关总税务司发表本年第一季度进出口数字：进口货物总值为7975.64231亿元，出口货物总值为2753.42915亿元，共计入超5222.21316亿元。

5月28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审查会，讨论和平问题。国民党方面

参政员纷纷主张“政府戡乱”，“明令讨伐”。其他方面参政员许德珩、黄炎培、程希孟、王造时等10余人则请大会以人民为重，拟出和平方案，向政府及中共双方呼吁和平。参政员发言完毕后，主席团宣布有关和平提案，交特种审查委员会审查。

△　蒋介石对参政员发表谈话，谓政府之和平初衷绝未变更，并谓此次学生行动完全为共产党预定计划，政府不得已方有《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之颁布。

△　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输入管理委员会，修正进出口管制办法，出口税视情况分别减免，进口税修定后原则如下：一、国内不能制造之工业机械减免；二、国内加工出口之工业成品所需输入原料或半成品酌予减免；三、国内供应不足之民生必需品征以较轻之进口税；四、进口物资与国内工业有竞争性者课以重税；五、奢侈品进口则寓禁于征，仍课以重税。

△　北方教授580余人联名发表和平宣言，认为学潮起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为内战之恶果，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

△　东北民主联军攻克梅河口，守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被全歼。师长陈开文以下6000余人被俘。

△　国民政府公布《监察院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施行条例》，凡28条。

△　新任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宣誓就职典礼与新疆省参议会成立典礼，在迪化合并举行。

△　外蒙借口新疆乌斯满部侵占边境，进攻新疆北塔山，与守军发生冲突。

5月29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02人发表宣言，劝学生避

免牺牲，不废学业，“盼政府深切有悟，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

△　西安西北大学学生罢课。

△　河南大学罢课与反罢课学生互殴，军警拘捕学生48人。

△　南京市一部分中学生在国民党操纵下，成立“爱国护学学生联合会”，举行反罢课游行。

△　民社党组织委员会决定推徐傅霖代表该党出任国府委员，开除孙宝刚、卢广声、汪世铭等党籍。孙宝刚、汪世铭另行成立“革新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及告民社党全国同仁书。

△　国民政府特任刘锴为中华民国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免去经济部常务次长潘序伦本职；任命张子柱为经济部政务次长；任命童季龄为经济部常务次长。

5月30日　蒋介石飞临沈阳巡视，接见熊式辉，听取有关东北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的报告，并指示作战计划。

△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继解放军作战之外的第二条战线。

△　参政会分组审查工作报告及有关提案。

△　民盟领导人黄炎培会晤美大使司徒雷登，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

△　华北学生联合会致书参政会，盼为和平努力。

△　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续有学生10余人被捕。并有军警分别搜查复旦及交通大学。

△　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抗议搜查捕人，宣布罢教。

△　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以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七校为主席团，并产生执行委员会。

△　南京《中央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陈立夫为董事长，陈布雷、彭学沛、王启江为常务董事，陈诚为常务监事，社长仍由马星野担任。决定除南京《中央日报》称为《中央日报》外，其他各地中央日报则均冠以当地地名。

△　美军阵亡将士纪念日。南京美军于清凉山外侨公墓举行纪念仪式。美大使司徒雷登、美军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亲临主持。参谋总长陈诚、次长黄镇球、联勤总司令郭忏等参加。

△　台湾省政府决定撤销台省贸易局，改设物资调节委员会。

△　台湾省政府宣布台币与法币的比率提高为1：51。

5月31日　参政会决议请政府商洽美国借款，尽力收回旅顺、大连，预防日本重建军备。

△　国民政府令免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本职；特派关吉玉暂代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派李平衡为出席第三十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华民国代表团政府第一代表，派安辅延为劳方代表，庄智焕为资方代表。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正式结束。遗留事务将由总署赈恤厅继续办理，救济部分移交社会救济会主持。

△　广州中山大学等校2000名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与便衣特务冲突，受伤及被捕40余人。

△　京沪苏杭学生联合会决议，6月2日之罢课游行由各校自行决定。

△　上海交大被军警特务围攻，捕去学生多人。围攻解除后，学生和教授立即集体赴市政府请愿，途中又遭军警、特务的殴击。

是月　“五二〇血案”发生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苏州、南昌、武汉、广州、唐山、青岛、昆明、郑州、福州、厦门、西安、重庆、沈阳等地60余所大中学校相继罢课，示威游行。全国各地支援函电纷至南京，要求生存、要求和平、要求自由，抗议政府的暴行。

△　上海白粳米从月初每石24万元左右涨至下旬每石46万元。

6月

6月1日　凌晨，军警包围武汉大学，逮捕教授五人，学生数十人，并在冲突中枪杀学生三人，重伤三人，轻伤20余人。是为“六一”惨案。上午，武汉大学召开师生大会，通过为无辜死难者伸冤、抗议当局暴行、要求保障师生安全、释放被捕师生，本案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无限期罢课、罢教等决议。午后，武汉各机关团体代表、各报记者到校实地勘查。

△　华北学生2000余人在沙滩北京大学操场举行“民主广场”命名典礼，同时，欢迎受伤同学返校。会上华北学生反饥联宣布：取消“六二”示威游行，改为总罢课一天，为死难于饥饿及内战的军民举行追悼会。

△　重庆军警逮捕学生、记者（其中八人为《大公报》记者）、市民200余人，并宣布戒严，成都、开封、沈阳、天津、福州等地亦有逮捕事件发生。

△　天津各报自是日起复行新闻检查。10日，新闻检查停止。

△　东北行辕自是日起开始限制关内报纸、杂志运往东北，平、

津各报均在榆关被扣。5日限令解除。

△　外交部宣布中国正式承认匈牙利政府。

6月2日　　国民参政会讨论、审查并通过480件提案后，宣布闭幕。通过的主要提案有：《请政府速派大军分路应援，以挽危局案》、《建议政府迅以最大决心建树绥靖区地方武力以固国本案》、《请政府迅向美国切实磋商借款案》等。会议选出本届驻会委员31人。

△　武昌军警在珞珈路上严密设防。武大学生原定今日举行抬尸游行，在教授会劝阻下取消。午后，全校师生列队执绋，将死难者移至体育馆装殓。武汉各专科以上学校同学，不顾军警干涉，依然列队徒步到武汉大学，公祭殉难者。

△　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抵武汉大学调查。

△　北平、上海、天津、沈阳、青岛、杭州等地学生纷纷在校内举行“内战死亡军民追悼大会”，哀悼为内战而牺牲之无辜军民。昆明36所大中学校学生二万人，桂林广西大学数千人分别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

△　当局于1日、2日在上海、北平、南京、天津、广州、沈阳、重庆、成都、开封、贵阳、福州、青岛等地逮捕学生、教授、新闻记者、公务员达2000余人。

△　青岛、昆明、桂林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　成都《华西晚报》报馆被特务捣毁，工作人员多人被捕，致该报自此停刊。

△　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开原。

△　董彦平、张剑非率领之接收旅大视察团自沈阳赴大连进行调查。

△　台湾省府主席魏道明命令举行全省军事演习，并实行戒严。

△　上海各报在《日本野心未戢》的标题下刊载法国通讯社东京消息，日本希望获得“跟美国共同托管琉球群岛，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外有捕鱼权及在台湾有特别移民权”等项权利。

6月3日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访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在华白俄团体之反苏活动提出抗议。王世杰亦抗议苏联报纸及通讯社之反华言论。

6月4日　　行政院举行会议，议决：海南岛设立特别行政区，并设建省委员会，筹备建省之方案，其范围包括三部分：一、大陆部分，勾漏山脉以南16县；二、海南岛本岛16县；三、东、西、南与中央四群岛，共约7.6万余平方公里。省会设于海口。

△　接收旅大视察团乘“长治号”炮舰抵旅顺。

△　国民政府发表抗战损失统计，中国抗战直接损失达310亿美元。

6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1945年9月重新划定之东北新省区区划，共计有：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九省，下设15个市、159个县、21个旗及大连市、哈尔滨市、沈阳市三个行政院直辖市，此新省区划自8月1日起实行。

△　新华社发表题为《破车不能再开》的社论，评论刚刚闭幕的国民参政会。指出“这个参政会仅仅是个呼吁战争的机关；人们绝对不能也不应向它呼吁和平”。“这次参政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借外债，打内战两件是真的”。

△　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胡孝扬等因6月1日武汉大学惨案，被撤职查办。

△　京、沪、平、津各大学纷纷致电武大，对“六一”惨案表示慰问。武汉各界连日有数千人前往武大吊唁慰问，并参观惨案遗迹。

△　上海地检处上午传前中央银行负责人贝祖贻、林凤苞、杨安仁、王松涛四人出庭，扩大金潮案之侦察。

△　中国与蒙古在中蒙边境新疆北塔山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外交部于11日称“此事并非寻常边界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中央社电讯称苏联亦卷入其中。中方向苏、蒙两国提出抗议，苏、蒙两国声明否认中方指责。

6月6日　　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参政会的和平方案，并谓：能否实现和平，全系中共态度。

△　国民政府任徐傅霖为国民政府委员；李文范为司法院副院长；黄绍竑为监察院副院长。

△　武汉大学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决议：一、派代表赴南京及上海向中央请愿；二、向各界报导惨案真相；三、在问题未完全解决前，死者暂不安葬。同日，蒋介石、张群、朱家骅、白崇禧、陈诚派员向武汉大学“六一”死难学生献花圈。

△　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部长薛笃弼主持，到各省水利工作者130余人，分“水利行政”、“整理水道”、“勘测实验”、“江河修防”等组，审查提案。9日闭幕，通过《五年水利建设计划纲要》。

△　无锡市之《锡报》、《人报》、《大锡报》、《江苏民报》、《导报》五报，因受物价上涨之影响，负债额已超过资产总值，工人、职员工薪无法发放，宣告停刊。经劳资双方调处，10日起复刊。

6月7日　　国民政府以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处理学潮无方，下令撤职查办，遗缺派阮齐代理。

△　台湾省议员、国大代表联席会议，电请蒋介石妥筹对策，坚决反对日、美共管琉球群岛及台湾特别移民权等无理要求。同日，台湾旅沪同乡会代表旅沪同胞发表通电，请政府采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复活。

△　国民政府令：沈阳市、西安市、汉口市、广州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自8月1日正式实行。

△　国民政府调联合勤务总部总司令黄镇球为国防部参谋次长；原任参谋次长郭忏为联合勤务总部总司令。

6月8日　　进攻陕北的刘戡部先头部队当日进至离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仅一个山头之处，毛泽东等连夜转移，脱离险境。

△　东北民主联军攻击部队向四平开进集结。

△　东北民主联军冀热辽军区部队于叶柏寿北歼灭自赤峰弃城南逃之第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一部，占领赤峰。

△　国防部致函佛教会称：届满20岁至23岁之适龄僧侣，仍须同普通男子一样照服兵役。

△　冯玉祥在美国发表声明，警告蒋介石政府官员应对国内逮捕、镇压学生的暴行负责。

6月9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就国营事业出卖问题决定两项原则：一、能立即出卖者即行出卖。出卖时将资产分别为最小单位一一出卖，俾稍有资产者均能有力购进；二、不能立即出售者，拟分以股票式出售。

△　国民政府公布《宪法说明书起草委员会组织规程》，凡七条。该会置委员10人，由国民政府主席遴选，委员为孙科、王宠惠、王世杰、张君劢、蒋匀田、陈启天、常乃德、王云五、雷震、浦薛凤。并指定孙科为召集人。

△　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成立，实施计口授粮，以安定上海400万市民的粮食问题。

△　东北民主联军收复安东。

△　新加坡华侨新闻记者公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最近在学生运动中被捕之记者，撤销报纸停刊令及新闻检查制，并请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转呈张群。

△　“达丰”轮在浏河附近沉没，淹死30余人。

6月10日　蒋介石接见外交部长王世杰，听取苏联、外蒙军入侵新疆之北塔山事件经过，决意向苏、蒙提出抗议。11日，驻苏大使傅秉常奉命向苏联政府就北塔山事件提出严重抗议。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国防部长白崇禧向立法院报告外蒙军队入侵新疆事件。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令保障新闻自由，天津停止新闻检查。

△　上海5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一天，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之暴行，要求立即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停止非法逮捕，保障学生安全。同日，天津、武汉等地学生亦举行罢课请愿运动。武汉大学学生代表抵南京进行请愿。

△　行政院公布《联合国各组织及人员在华应享受之特权及豁免办法》。

△　葡萄牙殖民部长杜亚德发表谈话，称将以武力保有澳门。

6月上旬　晋察冀野战军再次成立，下辖三个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

6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特种营业税法施行细则》，凡27条。

△　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七个师攻击四平，另以17个师打援。14日攻入铁西区。

6月12日　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发动清沧战役。至15日，歼灭国民党军9500余人。中共的冀中和山东渤海两大区连成一片。

△　武汉大学学生代表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六一”惨案经过详情，要求政府：一、惩办凶手；二、保障人权；三、保障学校之安全及尊严；四、保障新闻自由。

△　驻华北之美海军陆战队1500人，于12日、16日、19日分别离津返美。

△　旅大视察团结束视察，离开旅顺回沈阳。

△　国民政府决定全国轮船客货运输自6月份开始加价。客运加价90％，货运粮价加60％，杂货加70％，危险品加90％。

6月13日　国民政府特派张厉生、洪兰友、蒋匀田、刘东岩、金体乾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总事务所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张厉生为主席。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工会法》，凡13章63条，内容有：劳资间之争议，非经过调解程序后，于会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经全体会员过半数之同意，不得宣告罢工，其已交付仲裁或应付仲裁者，仍不得宣告罢工。工会于罢工时，不得妨害公共秩序之安宁及加危害于生命

财产及身体自由。工会不得要求超过标准工资之加薪而宣告罢工。

6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施行条例》，凡七章67条。

△　国民政府公布苏、浙、皖、赣、鄂、湘、川、冀、鲁、晋、豫、陕、甘、闽、粤、桂、滇、黔18省立法委员名额分配及选举区划分表，及蒙古、各民族在边疆地区与不分区之各省、市立法委员名额分配表。

△　东北民主联军总攻四平，晚21时，第一纵突入四平，进行纵深战斗。

△　蒋介石会见张君劢，交换对于时局之看法。

△　晋察冀野战军占领沧州。

6月15日　　原任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飞抵沈阳，当夜趋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长谈东北战况。

△　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秘密举行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华北学联、京沪苏杭豫五区学生联合会和武汉学联。会后，昆明学联打电报表示完全拥护学联成立。19日，教育部、社会部以其未事先登记，于“法”实有未合为名，下令取缔。

6月16日　　蒋介石接见东北保安副司令孙立人，听取对东北战况之报告。同日，蒋经国飞四平、公主岭等地视察。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二十三周年校庆，历届校友黄杰、桂永清及该校官员生等2000余人出席。蒋介石在庆典上发表《总理创办军官学校的意义》讲话。

△　上海学生联合会与上海被捕学生家属共23人组成请愿团抵南

京，向教育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及停止捕人，保障人权。

△　北大、清华罢课一天，追悼武汉大学死难同学。

△　东北民主联军一度攻占本溪。

△　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开幕。到会的有中、苏、美、英、法、印、澳、菲、暹、荷十国代表。蒋廷黻被推为主席。25日会议闭幕。

6月17日　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访美副国务卿克莱顿，商讨亚洲经济复兴问题。顾提议将“马歇尔经济援助欧洲计划”扩展至亚洲，并提出中国分享日本国内工业资产赔偿计划。

△　东北民主联军与四平街守军在城内进行激烈巷战。

△　行政院会议议决：婺源县划回安徽，光泽县划回福建。

6月18日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时局，各委员咸认为有作重大决策之必要，有主张国军全部撤出东北者，决议推孙科、陈立夫将讨论意见呈蒋介石核夺。外长王世杰在会上报告新疆事件处理经过，对外交涉情形，并谈战事。

△　新闻局长董显光就北塔山事件发表声明，驳斥外蒙古之声明，表示北塔山系中国领土。

△　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南京政府官员对中共威胁时存戒心，遍布失败情绪。自由与粮食为人民怨忿政府之重心。中共之成功，多由于国民党之无能与腐败。

△　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对记者称：国营事业决定出售转为民营的单位有：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烟草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　国民政府派汤吉禾代理国立英士大学校长。

△　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派董守义参加在瑞典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6月19日　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告以东北战局，并询问美国对华政策。司徒雷登表示将电政府请示。

△　伪浙江省长、铁道部长傅式说在沪被执行死刑。

△　国际第三十届劳工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包华国代表出席。

6月20日　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报告军事情况，会议决议取消公用事业大部贴补等案。

△　国民政府任吴铁城为立法院副院长。

△　国民政府组织中央军事慰问团，分苏鲁皖、察绥冀晋、陕北、豫鄂、东北五个区团，今起分批由南京出发。

△　苏联塔斯社声明否认美国及中国通讯社所刊苏联指挥中共军队在满洲之攻势。

6月中旬　越法战争以来，政局混乱，在越华侨生命财产均无保障，近纷纷向滇、桂两省边境避难，人数已达4000余人。滇省侨务、社会两处已派员前往救济。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就越方限令华侨疏散，19日电请行政院派舰保护撤退。

6月21日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邀宴政府委员，交换时局意见。陈布雷、王宠惠、邵力子、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吴鼎昌等出席。

△　财政部、经济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侨务

委员会等，共同组成赴日商务考察团，潘序伦任团长。

△　经济部在上海成立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邹秉文任主任委员，王启宇任副主任委员。该会之任务为：调节全国纺织品之供需，稳定物价，增加生产。

△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从长春、沈阳地区急调10个师增援，以解四平之围，其中八个师自沈阳北上，二个师自长春南下。

△　苏联答复中国外交部抗议，否认苏联飞机参加北塔山战事。

6月22日　孙科就接收旅大问题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又称：中国若失东北，即对美国为威胁，美国应有所表示，美国反应冷淡，即等于放弃中国。孙氏末称：目前已经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产党，否则即是共产党推翻国民政府。

△　武汉大学举行追悼“六一惨案”殉难同学大会，中央及地方各界分送花圈、挽联，到中外来宾、校友及师生2000余人。

△　东北民主联军再度对四平进行猛攻，国民党军退守铁东。

6月23日　国务会议决定铁路加价，订7月1日起实行，各路客货均照现价各加200％，川滇、滇越增加150％。

△　中美租借法案债务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内容为：租借债务之清理、战时三国间财政债务、未整理之战时剩余物资移交问题及其他战时财政帐目，债务总额计达20亿元。

△　国际铁路协会在瑞士吕森召开理事会，中国首席代表凌鸿勋当选大会副会长。

△　国民政府与法国政府就《中法临时民航协定》本月底期满，

决议延长有效时期半年。

△　是日及25日，顾维钧在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助理国务卿索普和马歇尔，要求延长五亿美元贷款的拨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二亿美元贷款。无果。

6月24日　陈诚在宪政促进会报告军事形势。

△　孙科发表谈话，主张：中国应准备早日与日本议和，因为亚洲今日之最大危机，为共产党破坏经济复兴之企图，应使日本成为遏阻赤色极权扩张之缓冲区。

△　北上增援四平之国民党军占领昌图。

6月25日　最高法院检察署发布《平字第一九〇六号训令》，“通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29日，陕北中共观察家发表声明指出：任何一个解放区政府和任何一个中国人有更大理由缉拿蒋介石并审判其罪行。

△　山东国民党军经过40余天的修整后，开始鲁中第三期会战计划。以九个师25个旅的兵力，由莱芜、新泰、蒙阴、青驼寺、葛沟、汤头一线，采取密集平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再度向鲁中山区进攻。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指挥四个师向南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　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保北战役。至7月6日，国民党军被歼灭8000余人。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分署呼吁国共双方，在全部黄河河床及河堤两岸五英里内，立即停止任何军事行动，使复堤工作依最高速度进行。

△　外交部根据旅大视察团报告发表声明，说明旅、大接收交涉

经过及“种种障碍”，宣布暂停开放大连港，并提请苏联政府遵守条约，中国政府派遣军警接收旅、大行政之权，既无条件限制，中国政府自得随时决定行使全权。同日，外交部向苏联政府提交照会一件。

△　国民政府特任温源宁为中华民国驻希腊特命全权大使；任命王友直为西安市市长；欧阳驹为广州市市长；金镇为沈阳市市长。

6月26日　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纪念联合国宪章签字两周年。

△　国民政府令免兼驻委内瑞拉国特命全权公使梅景周兼职；任命于望德兼中华民国驻委内瑞拉特命全权公使。

△　国民政府公布《公务员退休法》；《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捐资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褒奖条例》；《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

△　林彪、罗荣桓根据敌情变化，改变坚决攻克四平之决心，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四平，而以九个师迎击由沈阳北援的国民党军右路新六军。30日，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

6月27日　美国政府以价值65.6658万美元之1.3万发子弹，售于国民党方面，并允许签发军用品出口证。30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不予承认此项血腥交易。

△　长春南下之国民党军第一军占领公主岭，沈阳北上之国民党军第六军、第五十三军占昌图北之泉头。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拨五亿元赈济水灾款，汇粤分署，令该署立即发放全部存粮，救济灾民。

△　首批日舰抽签分配：中、美、英、苏各得八艘，下月将由日本分驶各国。

6月28日　立法院例会通过立法委员职业代表由56名增至84名。

△　外交部长王世杰训令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美国对沈崇案件凶犯皮尔逊返美后被撤销判决一事作出解释，并经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政府维持原判。同月，上海学联发表抗议书，要求维持原判。

△　行政院核准由中国、交通两行在海外办理南洋侨胞复业贷款，总额为5000万美元。

△　中央银行总裁张家璈派员赴港，与香港政府交涉协防走私、取缔金、钞黑市事宜。

△　南京警察厅统计五月份南京市人口共106万人。

6月29日　由彭学沛、贺耀组、汤恩伯三人负责筹备，中宣部“亚东问题研究会”及“改造出版社”合并组成之“亚东协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该协会宗旨为：联络亚东各族感情，促进文化交流，并协助国际文教工作。贺耀组当选理事长，彭学沛等31人为理事，并聘请张群为名誉理事长，戴传贤等39人为名誉理事。

△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被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的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　菲律宾粤侨各团体联合会汇款2000万元，救济粤省遭受水灾难胞。

6月30日　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共四个纵队12万人，在鲁西南东阿至濮县横宽300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　国民党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议决：一、加强“剿共”军事；二、撤销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以集中党团力量；三、依照宪法实施准备程序，办理选举。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叛乱问题案》，称：中共“武装叛乱，割据地方，破坏统一和平，危害国家民族”，“亟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

△　华东野战军决定分兵出击。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出击鲁南，为外线部队路南兵团；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出击鲁西，为外线部队路北兵团；野司率四个纵队在正面待机。次日各部开始行动。

△　国民政府下令废止一、《战时地价申报条例》；二、《战时地籍整理条例》；三、《各省市地政施行程序大纲》。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分署署长克利夫来宣布：联总分署在华工作将提前至十月底结束。

△　国民政府特派刘锴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电信全权代表会议首席代表。

6月下旬　　四川省粮荒严重，各地不断发生抢米风潮。成都饥民成群，连日结队吃大户、抢米店。隆昌县饥民1000余人，26日围攻县府，饥民五人被打死。

是月　　内战爆发一年，国民党军损失正规军97.5个旅，78万人；非正规军34万人；共112万人；占领解放区城市335座。人民解放军损失35.8万人，收复城市288座。

△　民社党党旗、党歌，经该党组织委员会通过决定：党旗为红、白、黑三色，中央缀有绿色“井”字，表示对中国历史上井田制之崇拜，党歌系张君劢所拟定。

△　粤省各地淫雨成灾，各江水位暴涨，东、北、西江水势最

烈，无家可归之灾民近百万。

△　广西省洪水泛滥，报灾者已达50余县，南宁城亦水深数尺。

7月

7月1日　　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结束。攻势历时50天，歼灭国民党军8.3万人，攻占城镇42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国民党军被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狭长地带的少数据点上，被迫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宣布，已接获周恩来、董必武由烟台中共办事处转来的答复，同意讨论“联总”建议黄河沿岸五哩内的地带停火，以利在本月底大汛到来之前完成修堤工作的计划。国民政府日前已接受休战的建议，并派叶南参加讨论此计划。

△　东北民主联军攻克北票。冀东军区部队攻克北戴河车站。

△　国防部成立美方剩余物资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上海港口司令施北衡兼任，下设陆、海、空军及联勤四组。

△　广东与上海两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宣布合并，总部仍设上海。宣言主张国家民主，全国和平，民族独立，社会进步。

△　民主建国会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由章乃器等七人负责筹备海外分会。

△　美国教育家及担任中国语文、历史之大学教授23人联合致电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吁请大使“向中国当局请求立即释放被捕之中国教授、学生、记者，保障人权”。签名者有耶鲁大学教授加德纳、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罗兰、威尔华纳等。

△　导淮委员会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分别改组为淮河水利工程总

局与长江水利工程总局。

7月2日　　蒋介石召见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研讨币制改革方案。

△　国民党军占领沂蒙山区华东野战军后方基地南麻。

△　重庆《商务日报》，因刊布粮价消息被勒令停刊一天。

7月3日　　驻美大使顾维钧电外交部，已向美国务院提出贷款具体计划。

△　根据美、英、苏、中四国协议，解散日本海军所得的战舰92艘，四国平分，中国获23艘。是日，日本赔偿中国首批军舰八艘抵沪。

△　孙科与青年党、民社党领袖会谈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事。

△　立法院通过法案，决定将驻华美军享有的特权延长至美军完全撤出中国之日。

△　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在沪正式成立。杜月笙为理事长，杨管北、李云良、卢作孚等九人为常务理事。

△　上海民船业会员一万余人为提高待遇罢工。

△　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收回台湾、东北和新疆的流通券，以确立法币的统一地位。同日，台币与法币汇率，自是日起改为1：65。

7月4日　　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提案称“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中国共产党拥兵割

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张继认为该案“相当于讨伐令”，孙科说，“目的在加强剿共之军事行动”，陈立夫主张“应集中人力物力加强戡乱”。会后，各省、市参议会及国民党控制的组织，纷纷通电拥护“戡乱”令，并召开所谓戡乱救国大会。

△　国民党军调集三个师一个旅，组成第二兵团，由王敬久指挥，自陇海路北援鲁西南，企图与原在该地的三个师一起，堵住被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的缺口。

7月5日　　行政院长张群就“戡乱动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以戡乱求统一，以苦干谋复兴”。

△　西北野战军陕甘宁部队收复定池、安池、盐池。

7月6日　　美大使司徒雷登以国务卿马歇尔函转蒋介石，称对中国情形深为“关怀”与“忧虑”，但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在中国人自身，美国仅能在援助实际有效时，作一援助。司徒雷登并再劝蒋行彻底全面改革。

△　张钲奉命任首都卫戍司令。

7月7日　　蒋介石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声称实行“戡乱”总动员，既是为了“争取胜利”，也是为了“求取国家改革与努力建设”，一方面“集中力量，加强军事，戡平匪乱，实现统一”，一方面“努力建设，增进生产”，“改革内政”。

△　孙科在沪回答记者问时称：总动员令下达后，政党不能再言反对内战，否则即为反对政府政策，必予以断然处置，此意诸君不妨转告民盟。

△　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路南兵团攻克鲁南费县县城。9日又占枣庄、峄县等城，解放津浦路东纵横300里之广大地区。

△　张群主持行政院赈灾会议，决定采取切实有效之救济办法，救济各地灾民。本年度已拨赈款252亿元。

△　监察委员10余人以王世杰办理对苏外交软弱失职，对其提出弹劾。

△　全国航政会议在南京举行，会期四天。决议向日交涉船舶赔偿等案。

△　四川省政府、储运处、法院等合组清查团，清查官、商、民欠粮900余万石。如拖延不缴，决从严惩办。

△　台省日产处理委员会在其总报告中，列载台湾“接收”敌产之总额为156亿元。

7月8日　民盟主席张澜在沪发表书面谈话称：“不意在政协决议已告成立之后，始则一面和谈，一面战争，继则撇去和谈，由局部战而演成全面战，至今日而政府下总动员令矣。同人痛心之下，复有何言。”“宪政之大本大原，不外乎保障人权，尊重舆论，此则同人于惨痛之余，仍愿竭诚献议者。……同人一日为中华民国之民，矢愿一日为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

△　晋冀鲁豫野战军经二日激战攻克郓城，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五师一万余人。10日又克定陶，歼守军一个旅4000余人。

△　外交部就外蒙军队入侵新疆制造北塔山事件，致苏驻华使馆照会，提出抗议。同日，外交部电令驻苏大使傅秉常照会外蒙驻苏大使，要求外蒙军队迅速从中国境内撤退。

△　凌晨2时，重庆市民园路新建之康乐大剧院倾塌，死伤近百人，财产损失逾三亿元。

7月9日　蒋介石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九周年团庆，并致训词，

发表《对党团合并的指示》，称“统一党部与团部的机构，这是要使本党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措施”。团书记长陈诚书告全国青年实行总动员。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为统一革命阵线，加强党国力量，齐一步骤，戡平匪乱”，通过党团合并案，“决定党与团统一组织”。通过李惟果升任宣传部长。

△　美国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为特别代表赴中国，“对中国目前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计”，以帮助美国政府“考虑对于复兴计划的援助”。

△　国民政府决定撤销政治协商会议名义及其秘书处组织。

△　国民政府任命徐会之为汉口市长。

△　行政院七人小组会决定加强征粮，办法一是扩大征实，二是对地方征借，三是对人民征购。

△　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国营事业配售办法：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出售全部资产之七成；二、中华烟草公司全部出售；三、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原有官股四成，全部出售；四、中国蚕丝公司先就股份五成，发行股票，公开出售。

7月10日　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总事务所决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于10月21日至23日进行，立法委员选举于12月21日至23日进行。

△　参谋总长陈诚由南京飞抵北平，12日上午出席北平行辕军事会议，讨论补给问题。日内转赴沈阳部署军事。15日抵四平、长春视察。20日飞返南京。

△　国民党军范汉杰部占领鲁中沂水、东里店。

△　教育部决定：公费改为奖学金。规定除师范、保育、青年军复员学生等公费外，其余均改为奖学金。各校新生中家境清贫、成绩优秀者，按全体新生的20％发予奖学金，待遇暂同于公费。

△　汉口市政府勒令11家未经许可登记之报纸、杂志迅速停业。共计日报两家，晚报一家、周刊四家、半月刊一家、月刊三家。

△　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电报中总结一年战事，指出，除山东外，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在一切区域均已停止，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并说，第二年作战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

△　粤汉路八十五次列车，经过英德大桥时，因该桥前被水冲毁，修复不牢，致列车出轨，堕入河中，死伤近百人。

7月上旬　　国民党军为配合《戡乱动员》令，决定编余军官除志愿退役者外，一律留用，由中训团分发各部。

△　广东发生水灾，受灾县份67县，人数391万，死亡5614人。

△　四川省政府公布，今年水灾遭灾79县，死亡7000多人，财产损失29万亿元。

7月**11**日　　国民政府任命于望德兼中华民国驻厄瓜多尔国特命全权公使。

△　塔斯社发表公报，声言苏联政府从未反对在旅顺、大连设立中国行政机构。

△　川康绥署、四川省府电令各市、县，以各地粮荒严重，应速拨积谷出售。如有抢米阻运者，准由军警当场格毙。

△　中国经济建设研究会在昆明正式成立。该会以研究中国各项经济建设问题为宗旨，总会暂设昆明，各大都市均将设立分会。

7月12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欢迎魏德迈来华，表示魏氏此行将“增进中美间之友感与合作”。

△　江、浙、皖、赣、沪、宁四省二市商业联合会及粮食面粉商业同业会，为请求继续免征粮食营业税，派出代表10余人，在宁集会，向政府请愿。

7月13日　国民党军在鲁中停止进攻，调七个师回援鲁西，留四个师固守要点。

△　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原长官杜聿明8日因病离职。

△　上海大同大学校方以少数学生假借学生自治会名义，干涉校政为由，勒令80余名学生自下学期始转学。该校附中亦有31人被勒令退学。

△　广西灾情严重，行政院决定拨款20亿元赈济，并由四联总处贷款50亿元救灾。

△　上海中国实业公司之“国星轮”，是日晚在南京浦口码头撞沉，损失在百亿元以上。

7月14日　新华社发表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指出“七月四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人民的方针就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军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殉难学生王志德、陈如丰之灵柩，由暂厝处移至张家山下葬。参加执绋之师生达500余人，校长周鲠生及王

志德之母主祭。

△　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路北兵团8日占泰安，10日占平阳、肥城，是日占大汶口。

△　上海市铅印、印刷业工会职工因劳资指数纠纷举行罢工。

△　上海民船业会员罢工经社会局调解至资方将工资增至150％后开始复工。

△　内政部人口局发表全国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共4.61006285亿人，内男子2.41485555亿人，妇女2.1952073亿人。人口最多的省份为四川，共4710.772万人。各大城市人口为：上海315万，天津168万，北平160万，广州128万，沈阳118万，南京104万，重庆100万。

7月15日　蒋介石会见司徒雷登，表示欢迎魏德迈使华，承认人民对政府不满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

△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　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闻一多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校内外人士及外籍记者千余人参加。同日，昆明市各校学生及联大校友、青年万余人，在昆明师院公祭闻一多遇害一周年。

△　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与美国航务委员会在华盛顿签订《售购战时建造船舶合约》，美国将战时建造的船舶159艘售给中国。

7月16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将军偕顾问五人启程来华。

△　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羊山集战役，开始围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经反复攻击，25日攻入村内。

△　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路北兵团第三纵队攻济宁，因敌情不明，连攻三夜未果。第十纵队15日攻汶上亦不利。

△　重庆发生抢米风潮，市民杨泉林以“抢劫食米”罪，被判处死刑。

△　监察委员万灿、于树德、杜光埙、李世军、王冠吾等反对开放对日贸易并建议终止派遣商务代表团赴日。

△　侨居东京、横滨之华侨，在东京成立战后第一个由第三国人士组成之永顺贸易公司，主要业务为国外贸易。

7月17日　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四个纵队围攻南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因连日暴雨，加之守军顽抗，形成僵持状态。19日国民党军四个旅开始增援，21日突破阻援部队阵地。华东野战军于21日晚停止对南麻的攻击，撤出战斗。

△　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开幕，来自各解放区的代表107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将讨论土地改革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问题。

△　上海市铅印、印刷业工会职工经劳资评断会调解复工。

△　日本赔偿舰只第二次抽签，中国共得八艘8000余吨。26日自日本启碇，28日到达上海。

7月18日　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一、《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继续征借实物以充军粮。二、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国府委员保留名额，中共现任国民参政员予以除名。三、粮食部长谷正伦辞职照准，任命俞飞鹏为粮食部长。

△　国民政府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

7月19日　蒋介石偕顾祝同飞开封视察军事，部署鲁西南战事，决定抽调六个半旅组成第四兵团，由王仲廉指挥，另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分别增援鲁西南与津浦路中段。

△　国民政府颁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凡“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军粮、物资、运输等，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及妨碍“戡乱”之言论行为，均应依法惩处。行政院并可随时发布必要之命令。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说：“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冀。”

△　为策应陈、谢集团南进，毛泽东决定：“胡拟8月由保安向靖边，我军8月打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增援，以利陈赓出潼、洛。”

△　北大校长胡适、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及平、津学者、名流、专家60余人，发起组织“平津市民治促进会”，是日在北平举行成立大会。该会章程中规定任务为：谋求全体市民之福利，促进城市经济、文化之发展。

△　国民政府派王懋功为江苏选所主委，沈鸿烈为浙江选所主委，王陵基为江西选所主委，李品仙为安徽选所主委，邓锡侯为四川选所主委，万耀煌为湖北选所主委，王东原为湖南选所主委，刘文辉为西康选所主委，刘建绪为福建选所主委，罗卓英为广东选所主委，黄旭初为广西选所主委，卢汉为云南选所主委，杨森为贵州选所主委，孙连仲为河北选所主委，王耀武为山东选所主委，刘茂恩为河南选所主委，阎锡山为山西选所主委，祝绍周为陕西选所主委，郭寄峤为甘肃选所主委，马鸿逵为宁夏选所主委，马步芳为青海选所主委，

董其武为绥远选所主委，麦斯武德为新疆选所主委，傅作义为察哈尔选所主委，刘多荃为热河选所主委，梁华盛为吉林选所主委，徐箴为辽宁选所主委，韩蛟杰为黑龙江选所主委，吴瀚涛为合江选所主委，关吉玉为松江选所主委，彭济群为嫩江选所主委，高惜冰为安东选所主委，吴焕章为兴安选所主委，刘瀚东为辽北选所主委，魏道明为台湾选所主委，沈怡为南京选所主委，吴国桢为上海选所主委，何思源为北平选所主委，杜建时为天津选所主委，欧阳驹为广州选所主委，张笃伦为重庆选所主委，徐会之为汉口选所主委，王友直为西安选所主委，金镇为沈阳选所主委。按：一、选所系选举事务所之简称；二、国民政府同时派定上述人员为国大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　国民政府特任俞飞鹏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

△　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会晤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拟派财经专家赴美商讨援华方案事。

7月20日　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路南兵团第一纵队14日攻滕县不克，第四纵队17日攻邹县未果，18日两部合攻滕县。因由鲁中回援之国民党军已近，是日部队撤出战斗，东返鲁中。因受暴雨及回援国民党军所阻，主力折而向西，31日到达兖州、济宁间，脱离险境。

△　蒋介石命令驻昌潍地区的整编第八师（原第八军）："应立即攻占临朐，向南麻进击，牵制共军之攻击。"

△　绥远乌盟西公旗女王奇俊峰及幼王奇法武，在公庙子被该旗保安团长郝游龙率部暗杀。21日凶讯传来，董其武主席极为震惊，已电令包头警备司令温永栋驰往调查。

7月中旬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自月初起发动豫北攻势，收复县城九座。

△　豫皖苏军区部队本月共收复县城七座。

△　新疆托克逊、吐鲁番、鄯善相继发生袭击驻军的事件，国民党军予以镇压，省政府与三区的关系因此而更形恶化。

△　福建省淫雨连绵，低洼县份泛滥成灾。福州、林森、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漳浦、连城、龙溪、顺昌、浦城、宁洋、明溪14县、市，灾情尤为严重，行政院拨款四亿元赈灾。

7月21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出席。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部署各地区在战略进攻中的协同配合。决定主力出击外线，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歼灭国民党军，为此，陈赓纵队不来陕北而渡黄河南进；西北部队北攻榆林，诱敌北上，配合中原作战。毛泽东首次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用五年时间打倒蒋介石集团。

△　行政院会议通过经济改革方案。方案提出：一、金融改革，设立县银行，树立地方经济自治基础；二、增加生产，稳定物价；三、整理财政、稳定币值。同时应注意合理解决军、公、教人员待遇，国营、民营事业地位同等，发动扩大之经济建设运动。

△　国民政府特派郭泰祺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兼安全理事会代表。

7月22日　　美国特使魏德迈及其率领之考察团到达南京。魏氏在机场发表声明，表示将“根据客观彻底之考察而断定为真实之事实”来判断中国局势。

△　美国对外清算委员会中国及东亚办事处宣称：自1946年8月30日至1947年5月30日美国已供给中国之剩余物资共约1.7亿美元。

7月23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团统一组织原则》，决定，一、现任省、市、县支区分团部干事监察，一律改任为省、市、县党

部执监委员；二、扩增后之省、市党部执行委员，由中央指定五至九人，组织党团统一委员会，负党团统一组织任务；三、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一人，由中央指定之。常会决定设立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由吴铁城、陈诚、陈立夫、刘健群召集。决定9月9日召开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及六届四中全会，任命李俊龙、陶希圣为中宣部副部长。

△ 魏德迈由司徒雷登大使陪同拜会蒋介石，告以此次来华，纯为了解国民政府与共军作战中失利的原因，准备先到各地广泛调查，然后再回京陈述意见。

△ 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要求刘邓大军休整10天，然后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 《中英航空协定》在南京签字。

△ 国民政府任命喜饶嘉错、白云梯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

7月24日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私邸设晚宴招待魏德迈。饭后，双方对南京政府面临的军事形势做了长谈。白崇禧说，一年来的作战经过证明了蒋介石在军事上指挥无能，蒋介石以最高统帅指挥到军级甚至到师级部队，使各级指挥系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战局发展至此，应由蒋氏独负其责。白氏又说，去年夏初，国军以5：1的优势超过共军，仅仅在一年中，战略的主动，便由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孰令为之？孰令致之？最高统帅当不能辞其责任。

△ 外交部照会荷兰当局，要求保护印尼华侨安全。

△ 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转移北上途中攻击临朐国民党军第八军。因遇暴雨，部队疲劳，攻击数次未果，而国民党军援军迫近。30日晚，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撤出战斗，转移休整。南麻、临朐两役，华东野战军伤亡减员共2.1万余人，未达预期作战目的。

△ 国民政府特派邓锡侯为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

△　国民政府任命姚从吾为国立河南大学校长。

7月25日　　行政院通过《中央及地方权限划分案》及修正通过《调整各省军管区机构，改订军管区司令部组织条例案》。

△　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发表谈话，认为时局严重，政府应采取积极方针，扩大民主基础。

△　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代表潘仰山、罗霞天、陶桂林等，前往行政院、经济部、社会部等机构，面陈请暂缓开放对日贸易等五项意见。

7月26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爱国自卫战争第一年战绩总结公报，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78万人、非正规军34万人；解放区原有面积239万平方公里，现有面积220万平方公里；原有人口1.49亿，现有人口1.31亿；原有城市506座，现有城市423座。

△　魏德迈自南京到上海。次日会见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李璜、金融界首脑陈光甫等。

△　监察委员刘士笃、杨宗境、蔡自声、王冠吾、刘延涛等人，向监察院提出建议，指出对日应有明确立场，反对提高日本工业水准，主张延缓开放对日贸易。

△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通过参政员郑揆一等提出的请政府在未签定对日和约前，暂缓开放对日贸易案，并请政府保留对日和会否决权。

△　外交部照会美国政府，主对日和会在上海举行。

△　为救援绥南伊盟受旱灾群众，绥远省府召开紧急会议，拨粮速行救济，并电请中央拨款急赈。

7月27日　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声称，国民政府将履行诺言，于本年底实施宪政，产生立宪政府。共匪叛乱不能妨碍我宪政实行。

△　蒋介石三次致电李弥，其中称："据空军报称，第八师拟于本午放弃临朐，闻之不胜系念。我第九师、第六十四师今已由悦庄出发，明日可到达临朐夹击残匪。如我放弃临朐，则战略上将受重大影响，希饬固守。"

△　行政院召开全国粮政会议，各省主席、参议会议长、田粮处长等出席。蒋介石到会声称，现剿共时期，应足兵足食，军粮至为重要，希望大家努力，完成剿匪戡乱及实施宪政工作。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以及第三十八军和第八纵队一个旅，合组野战兵团，挺进豫西，并任命陈赓为兵团前委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

△　上海大同附中、二院等11所中学遭受开除等处分之学生家长正式成立"上海市被不合理处分学生家长联谊会"，就各校无故开除学生发表宣言并提出三项要求：一、立即收回一切无故开除、停学、勒令转学及其他一切不合理处分；二、给予留级学生以补考机会；三、赔偿因不合理处分之一切名誉损失。

△　太原《晋强日报》被驻太原空军捣毁，报社负责人、编辑、记者五人被打伤，财物等损失约近400万元。报业工会、记者公会及外勤记者联谊会三会定于28日下午7时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声援等一切办法。

△　上海市金都大戏院发生宪兵、警察冲突事件。警察七名死亡、六名受伤，市民三死二伤。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赴沪处理。

7月28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27日对羊山集发起总攻，经二日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六师1.4万余人，俘师长宋瑞珂。至此，历

时28天的鲁西南战役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以15个旅的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半旅，5.6万人，为进军大别山打开通道。

△　魏德迈自上海返抵南京。

△　民主社会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百余人。张君劢报告参政经过。

△　吴蕴初以工商界代表立场，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小组会上，提请政府暂缓开放对日贸易。同日，经济委员会综合小组决定：暂缓开放对日贸易。赴日私人商务代表团亦暂缓派遣。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自是日起，北纬34度以北地区，暂停华北国共区所有物资之运送，一切预定运往物资均由“联总”中国分署予以保管。

△　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外蒙古入会问题，中国代表表示反对。

△　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辞职后，是日成立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担任主任委员，决定限期一个月，将校务整理就绪。

7月29日　　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等，在美国大使馆与魏德迈会谈。民盟领导人表示，民盟主张和平民主统一，且是一贯的、独立的，国民党应对政协决议遭破坏负更大责任。魏德迈称美国对中国任何党派及个人均无特殊态度。魏德迈是日还会见了青年党曾琦及国府委员莫德惠等人。

△　蒋介石再次召见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研究维持币信方案。

△　经行政院核定，成渝铁路主权收归国有，前投资之省股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之商股应予退还。

7月30日　　国民政府就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询问经济改革方案中

外国资本一节提出书面答复，声明欢迎美商向国营及民营工业投资。美国公司及私人对于中国各种工业，除铁路、兵工厂及与国防有关之专营事业外均可投资。

△ 国民政府任命阿不都克力木汗买合素木兼新疆省政府副主席。

△ 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徐淑希声明北塔山属中国，外蒙入侵并非边界事件。

△ 民社党副主席伍宪子因调解党内纠纷未果，声明不参加该党全国代表大会，其后又称将与该党革新派人士合作，与张君劢分庭抗礼。

△ 粮食部长俞飞鹏在粮政会议上称：中国现已经由美国转请联合国粮食委员会拨付粮食39万吨，借以救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厦门、青岛及福州等17城市。

△ 上海《新民晚报》自5月20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后，是日正式复刊。

7月31日 《国民政府公报》第2892号：将中共毛泽东、林祖涵、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周恩来、吴玉章八人现任参政员除名。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改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晋绥军区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午宴招待民盟负责人，交换对于和平问题的意见。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在原则上开放对日贸易。

△　全国粮政会议闭幕。决定三十六年度征借总额为3500万担，内四川最多，为450万担。通过《三十六年度田赋征实暨征借粮食实施办法》。

是月　　四川省西、南部水灾严重，共殃及33县、市，受灾农田65.6785万亩，灾民44.242万人，中央允拨10亿元赈款。

8月

8月1日　　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一、通过经济改革方案。二、决定原则开放对日贸易，主要原则有三：政府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代表团，以私人团体名义赴日考察商务；对日进出口贸易以不妨碍国民经济为原则；中国对日本所需物资，优先在赔偿物资中取给。

△　魏德迈自南京抵北平。

△　北京大学正式接收北洋大学北平部。

8月2日　　蒋介石决定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并入东北行辕。是日接见陈诚，令其前往东北负责指挥军政。

△　魏德迈在北平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北平市长何思源及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等人。

△　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在南京以《中国海军现状》为题，向全国广播演说：一、海军员额已扩充为3.45万人；二、海军舰队实力，现有海防第一、第二舰队，江防舰队与运输舰队共四个舰队，另有10个炮舰队；三、海军已于沪、青、左营及榆林港四处设置基地司令部，另设巡防处11处；四、海军现有沪、青、左营、榆林、马公、黄埔、大沽等海军造船所；五、现海军军官训练，集中于青岛海军军官

学校，士兵训练集中于海军军士学校，造船、造械、造机、电工各项则集中于海军机械学校。

△　空军大队驾驶员王守本、看护兵葛发平在南京光华门外中河桥上乘凉时，被驾吉普车经过的美军伍长阿尔瑞与下士塞凡抛下护城河，惨遭溺死。美军行凶后，狂笑不已，并从容驾车逸去。南京民众闻讯，愤怒不堪，而当局却表示“一切将循国际法解决，甚盼各方持以镇定”。

△　国民政府特派蒋廷黻暂代常驻联合国代表兼安理会代表。

8月3日　　民主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纲，凡45条，要求保障人民自由，实行军民分治，地方自治，保护民族工业。

8月4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一、三、四、八、十纵队组成西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外线作战任务。10日又以华野第二、七、九、十三纵队组成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执行内线作战任务。

△　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费德林照会外交部，申辩未协助旅大视察团事，称查与事实不符。

△　魏德迈抵天津。

△　国民政府派孙立人代理陆军总司令兼任陆军总司令部陆军训练司令。

△　民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选出执委、监委若干人，主席张君劢。

8月5日　　蒋介石在兵役座谈会上作特别指示两点：一、地方政府职权必须提高，现在“戡乱”总动员时期，省主席及县长自须提高职权范围，庶可增加工作效率，在地方政府中提高县长职权，尤为切

要。二、各省主席须具决心，振作精神，切勿用政治制度不良，而推诿责任。

△ 蒋介石致电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告以东北必须确保的理由。

△ 行政院通令简化政治机构，其办法为：一、中央机关各院、部、会、处、厅应竭力裁并，凡所司职责相同者，不准有两个以上同时设立；二、中央在各省、市、县应尽量少设直属机构，凡委托地方政府执行之事，应由地方政府代行；三、省、市、县各机关应尽力裁并，以能行使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任务为限；四、事业机关虽其事业性质重要，但国库暂无力负担其事业者，应即撤销。

△ 行政院决议：由经济部、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及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信托局等单位各派一人联合组成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

△ 魏德迈抵沈阳。

△ 重庆《时事新报》，因发表指责渝某要人囤米储鸦片之文章，被行辕勒令停刊三日，8日始复刊。

8月6日 国民党中常会修正通过《各级党团统一组织实施办法》，主要内容为：团干事改任党执行委员，团监事改任党监察委员，党团经费合并办法先由省、市、县地方着手办理。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李济深党籍的决议。

△ 蒋介石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要求加紧陇海路防务部署。

△ 西北野战军集中八个旅发起榆林战役，攻击晋、陕、绥边境要点榆林。

△ 陈诚自南京抵沈阳。行前，蒋介石接见，指示东北党、政、

军整理方针。

△　魏德迈到抚顺视察。

△　中国民主宪政党美国旧金山总部宣布：由于民社党内部之分裂，已不能使民宪党与之继续合并，该党决定完全与民主社会党脱离关系，仍然作为独立政党存在。

△　国民政府准免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职。

8月7日　国民党军八个师18个旅14万人由菏泽、嘉祥等地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合击。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提前结束休整，隐蔽突然南进，挺进大别山。是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跳出合围圈，分西、中、东三路向大别山疾进；国民党判断为“北渡不成而南窜”，未进行重点堵击，而是调20个旅尾追，企图在黄泛区包围歼灭晋冀鲁豫野战军。

△　蒋介石飞抵延安策划增援榆林军事，拟定在榆林、米脂、葭县三角地带围歼西北野战军的方案。次日返宁。

△　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助理国务卿亚莫尔会晤，顾表示中国同意尽早召开对日和会，惟正式和会须在中国举行。

△　魏德迈自沈阳抵青岛。

8月8日　魏德迈自青岛经济南返回南京。

△　上海巴川、正和两银行，因周转不灵，未能及时弥补，宣告倒闭。

8月9日　西北野战军基本攻占榆林城外据点。

8月10日　魏德迈向蒋介石递交详细提纲，列举国民党需要改革诸点：军事方面按才用人，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南京对前线作战少

加干涉；清除贪污无能官员；约束特务活动；改变外贸设施。

△　参谋总长陈诚在沈阳商定改组东北军政机构。

△　蒋介石会见司徒雷登。司氏表示，现政府必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方可得到美国援助。蒋表示他将考虑司氏提议，并称将请求魏德迈任顾问。

△　鞍山钢铁公司举行升火式，正式复工。公司经理邵逸周称，日产现为300吨。

8月11日　陈毅、粟裕奉中共中央命令，率六纵及特种兵纵队进入鲁西南，与西兵团合为外线兵团作战，配合刘、邓部挺进中原。

△　魏德迈抵台北。

△　民宪党旧金山总部声明否认与民社党之革新派联合。

△　去年12月在北平犯强奸罪之美兵皮尔逊，被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以证据不足宣布原判无效并恢复职务。

△　上海金都大戏院警宪冲突事件在押警宪开始受审。

△　驻守南京之宪兵独立第三营抵沪，接防因金都大戏院警宪冲突事件而调往南京之宪兵第三团。

△　印尼政府宣布：在印荷战争中被毁坏之一切外侨财产，印尼政府将予以赔偿。中国侨民所受之损失，印尼政府将遵照特别条例进行赔偿。

8月12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越过陇海路。14日涉渡涡河，进入豫皖苏解放区。

△　西北野战军10日、12日两次攻击榆林城未果。胡宗南调八个

旅向绥德、葭县急进，第三十六师钟松部避开阻援部队，沿长城外沙漠迫近榆林。西北野战军是日撤围榆林。

△　苏北解放军攻克盐城。23日，国民党军重占盐城。

△　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离开迪化回伊宁，随后三区方面人员陆续离开迪化，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

△　美、英、中、苏四国第三次抽签分配日本残余军舰，每国各得八艘。27日，分给中国的日舰驶抵青岛。此八舰仅有躯壳，除发动机及铁锚外，一无所有。

△　战时被日军载往新几内亚服劳役之中国战俘481人，于今晨自澳洲送抵香港。

△　中国、瑞典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　原驻上海之宪兵第三团第一、第二营亦全部离沪调京。

8月13日　行政院长张群就外商投资工业问题发表声明称，外商可以直接投资之工业范围有：大型动力机、工具机、汽车、机车、飞机、大船制造业。除政府独营之兵工厂、铸币厂、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厂外，中国政府对于外商与中国人合资举办工业尤表欢迎。

△　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在南京成立，首次会议决定进出口物品种类：一、出口品以猪鬃、桐油、生漆、麻、糖、蚕等为大宗；二、入口品以交通器材、人造肥料、化学原料、金属原料、木材及仪器为主。

△　国民政府派邹秉文为中国出席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第三届年会代表；黄育贤为出席世界动力协会燃料经济会议首席代表；张鸿钧为出席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会议代表。

△　魏德迈自台湾抵上海。

8月14日　蒋介石召见范汉杰，指示胶东作战部署。

△　蒋介石误判刘邓大军“以后路被我军截断，乃经由黄泛区，窜入大别山”。

△　中国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蒋廷黻发表声明，赞同组织委员会视察荷印迫害华侨事。

△　援榆之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沿咸榆公路南下，董钊、刘戡率七个旅北上绥德，企图南北夹击西北野战军。

△　美国务院宣布美向苏联提出抗议，指责苏联一再延宕开放大连港口。

8月15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一、《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二、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文武待遇一致，追加武职官员8月至12月增支经费2680亿元；三、调整盐税；四、国府委员伍宪子、政务委员李大明因久未到任而免职（均为与张君劢分离之民社党员）。

△　蒋介石为党团统一组织发表《告党团同志书》，称党团组织合并统一，造成戡乱建国的动力，更是当前急切之图。

△　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美国对华援助问题。

△　魏德迈自上海抵广州。

△　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8人，由伍宪子、张东荪、梁秋水、万武、沙彦楷、孙宝刚、汪世铭、卢广声、唐才质九人充任主席团。伍宪子致词称：我们的主张是和

平、民主、统一。

△　北京大学教授生活困难，90余位教授，当面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合理改善待遇。

△　国民政府与香港当局就贸易、侨汇、走私、金融等问题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　香港中国机械职工协会，下令所属职工即时罢工。参加罢工的有海军船坞、黄埔船坞、广九铁路、英段路局、青洲、士敏土厂、煤气局、自来水等厂之机工，约7000余人。

8月16日　外交部致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备忘录，说明中国政府的措施与政策。

△　国民政府令免去首都卫戍司令汤恩伯本职，派张镇为首都卫戍司令。

△　魏德迈自广州返抵南京。

8月17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越过20公里宽的黄泛区，次日又渡过沙（颍）河。全军毁弃重武器，向汝河急进。国民党发现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意图，急调整编第八十五师至汝河南岸布防，企图与追击部队前后夹击。

△　财政部公布外汇管理及进出口贸易新办法（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官价（美金每元合法币1.2万元）仍旧，市价逐日挂牌；日用必需品均由市价结汇；对外贸易采输入许可制，设置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及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

△　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陈光甫，委员徐柏园、沈熙瑞。该会指定中国、交通、英商汇丰、美商花旗四银行为准予凭证按市价结汇结售外汇的银行。

△　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致函民盟中央，建议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在争取公开合法地位的同时，建立地下工作与海外工作。

△　武昌第一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自今日起全体罢工。

8月18日　　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后，主力集结于米脂沙家店地区。是日，在此包围由榆林南下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并发起攻击。至20日，全歼该师二个旅共6000余人，收复三座县城。西北野战军从此转入战略反攻。

△　蒋介石飞抵青岛，向王耀武布置胶东作战计划。

△　青年军第二〇五师一部5000人，自穗抵台，接受美军顾问团之训练。

△　民社党革新派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决定沿用“中国民主社会党”名称，否认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的一切行动。大会通过该党宣言，主张实现和平，保障人权，发展农工商业。大会选出伍宪子、张东荪、梁秋水、沙彦楷、李大明等为中央执监委员。21日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选出中常委15人。23日中常会选出伍宪子为主席，沙彦楷为副主席。

△　印尼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印尼军总司令联合发表保障印尼领土内华侨生命财产之新法则，法则中规定：对被命令迁入“保护营”居住之华人须予释放，华人之安全须予以保证，任何人乘乱劫掠华人财产可予以枪决。

8月19日　　魏德迈见蒋介石，谈六小时，就政治、军事、党务等问题交换意见。

△　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在中央银行成立。主任委员张嘉璈，副主任委员李铭、李干，委员：俞鸿钧、陈启天、翁文灏、缪嘉铭、徐柏园、沈熙瑞、徐寄庼。

△　行政院通过对日和约审议会编制。

8月20日　蒋介石飞西安筹划军事。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党员总动员“戡乱建国”方案，要求党员协助政府推行节约，推行宣传并确定党员工作原则。

△　行政院宣布，暂停开放大连，任何外轮驶往大连者，必须经中国政府同意，并不得从事中国沿海贸易。

△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裁撤归并行辕事宜完成。行辕编制自21日起开始办公。东北所有部队均由行辕直接统一指挥。

△　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宣布：两年来美援总数原定为20亿美元，实收5.6139亿余美元。

△　加拿大军事代表团自日本到南京。

△　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原牡丹江专区和合江省东安专区合并，成立牡丹江省，辖牡丹江、东安两市及14个县，张静之代理省主席。

8月21日　国民党军占领益都、临淄、张店、周村，是日打通胶济路。

△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领导人选，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

8月22日　陈赓、谢富治兵团八万余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垣曲、济源间强渡黄河，进军豫西，配合中原作战。至31日，先后攻占豫西数座县城，吸引尾追中原野战军的国民党军一个师及三个旅回援，并迫使陕北胡宗南部主力南撤。

△　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全体部长召开联席会议，魏德迈出席演

讲，抨击国民党政治、军事腐败无能，称“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的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衷心的、热烈至诚的拥护”。

△　前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应中央银行邀请，由美抵沪，出任该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顾问。

△　国民政府已核定全国选举经费为600亿元，以此补助全国各级选所。

△　印尼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侨民在印尼军政当局退出若干地区后所受之侵略及恐怖行动拒绝负责。照会要求中国政府派代表前往印尼护侨。

△　外交部令驻巴达维亚总领事蒋家栋调查印尼华侨受害情形。

8月23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到达汝河北岸。国民党军一个师前堵三个师后追，形势严重。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渡口指挥强渡。次日突破国民党军防线，25日全部渡过汝河。

8月24日　魏德迈离南京赴东京，临行在蒋介石官邸发表《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称其来华所见是“麻木与怠惰”。“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须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必须清除贪污无能的官吏，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中国急需的“能振奋人心的领导”，“道德的精神的复兴”只能“来自中国内部”。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处长克利夫兰一行14人抵北平视察。

△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该盟本年来在陕、沈、蓉、榆等地被捕盟员，迄今尚未释放，而七月份又在桂林、南宁等地发生逮捕该盟盟员杨荣国、张毕来等10余人事件，特向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书面抗

议。

△　晋察冀野战军攻克正定。

△　财政部创设新税种，名为“行商一时所得税”，首由获利较多、交易普遍之营业着手征收。

8月25日　　国民政府聘请孙科、居正、张继、胡适、程潜、卢汉、龙云、孔庚、傅作义、鹿钟麟、刘文辉、黄琪翔、邵力子、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曾琦、于斌、王云五、陈启天、萧一山、高一涵、吴贻芳、李烛尘、胡子昂、吴蕴初、潘公展、傅斯年等1733人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

△　蒋介石召见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询问魏德迈发表声明，是不是美国真想逼他（蒋）下台。

△　行政院通令整饬县政，紧缩机构，充裕财源，减少县长兼职，慎选县役员吏。

△　上海复旦大学勒令15名学生退学。同日，暨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三名被开除，交通大学勒令12名同学退学。当晚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大会，决议发起签名保证运动，会后有1000余名学生签名，保证12名同学确非“不妥份子”，并要求校整理委员会收回强迫12位同学退学命令，不得解聘教授。

△　上海复旦大学自洪深、马宗融等教授离校后，近又有顾仲彝、章靳以、方令孺、张肖松等教授辞职。

△　国民政府任命林庆年为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月26日　　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称：“内乱之责任应绝对由共党负之”，解决共党问题可能途径有三：一、共党完全放弃军事行动之政策；二、共党完全控制中国；三、完全消灭共党。“魏使虽称武力

将不能消灭共产主义”，“但中共行同盗匪，非戡平不可”。

△　民主同盟就魏德迈离华声明发表观感，认为魏氏批评诸现象之根源，实由一党专制20余年所致；魏氏不强调现时中国迫切需要之民主政治，以及保障和平统一之有效方法，实为舍本求末。魏氏不求建立巩固之和平基础，而劝中共自动片面放下武器，实非公允。

△　外交部照会美国务院，抗议北平东单强奸事件罪犯美兵皮尔逊被美国防部复判无罪并释放复职之措施，要求美国防部根据审判纪录，重新予以审核，秉公处理。

△　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代表蒋廷黻，对印尼虐待华侨事发表声明。

△　南京15家报纸工人因增加工资未获结果实行罢工。28日经社会处调解复刊。

8月27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商城、光山、息县、潢川地区。全程历时22天，行程千里。挺进大别山标志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开始。

△　中共中央军委急电陈毅、粟裕，令即南渡黄河，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越过陇海路，向淮北前进，支援刘、邓部队。

△　陕北国民党军八个旅因西安空虚、潼关告急而被迫自绥德以北南撤。沿路遭西北野战军阻截、追击，至9月20日才到达延安地区。

△　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大连暂不开放，该港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依法不得单独使用之，外轮亦不能利用此港从事中国沿海贸易。

△　国民政府暨中央各机关在国府大礼堂举行仪式，纪念孔子诞

辰，蒋介石亲临主持，到于右任、戴季陶、张群、吴鼎昌、曾琦、吴铁城、白崇禧、邵力子、张厉生、陈启天等300余人。

8月28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征收“建国特捐”方案。课征对象为中国公民个人，征课之客体为：一、土地房屋；二、现存款、外汇、公债、股票；三、黄金外币；四、国人在外国之动产不动产；五、独资式合伙营业之财产净值；六、汽车轮船；七、机器货物等。起征点为50亿元，先于全国各大都市施行。

△　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称日本对中国威胁已消失，代之而起者为苏联。

△　塔斯社声明苏联船只有进入大连港权利。

△　因“行总”东北分署署长刘广沛被东北九省主席、三特别市长联名控告贪污舞弊事，“行总”派分配厅厅长汪伏生赴沈，免去刘之职务。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委员会比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教育、大众传播、图书馆及博物馆、艺术与文学六个专门委员会，并选出执行委员胡适、朱家骅、吴贻芳、朱经农、梅贻琦、杭立武、竺可桢、张道藩、萨本栋、瞿菊农等10人。

8月29日　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王世杰外长报告外交，就魏德迈之离华声明作简要说明；蒋介石强调中国应自力更生，励精图治，自立自勉。

△　国民政府令免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职；特派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

8月30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后，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现由周恩来代理军

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仍任副总参谋长。

△　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要求“在剿匪第一之原则下”，“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在此过程中，绝不容有任何之幻想”。

△　行政院决议，美金库券按指定银行挂牌市价照常出售。

△　台湾银行宣布自9月1日起台币对法币汇率奉令改为1：72。

△　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决定自9月1日起客运一律加价80％，货运加价50％。

△　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解剖学会七科学团体联合在中央研究院举行年会，会议讨论议决了统一“世界历”的问题，促请政府善用科学人才，切实保障科学工作者自由，并彻底改善其生活问题，发起组织全国科学团体联合会。

8月31日　蒋介石与宋美龄自宁抵庐山牯岭。

△　国民政府派王世杰，顾维钧、蒋廷黻、刘锴、张彭春为出席联合国第二届大会代表。

△　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孙立人，自南京飞抵台北，筹划国民党新军训练事。

是月　民主同盟西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在成都成立，潘大逵任主委，负责领导川、康、滇、黔四省民盟工作。

9月

9月1日　蒋介石为组织中原防御，迅速结束山东战事，转兵他

用，乃制定进攻胶东之“九月攻势”计划，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第八、九、二十五、四十五、五十四、六十四等师，共20个旅，组成胶东兵团，在海空军配合下，企图首先攻取平度、莱阳，然后总攻烟台，以求将山东人民解放军压缩于胶东半岛的牛角尖内加以消灭。同时，另以一部南攻诸城，配合由临沂进攻日照之国民党军，侵占滨海解放区，牵制位于滨海之解放军部队。是日，范汉杰率领之胶东兵团集中第八、九、二十五、五十四共四个整编师，由胶济路东段昌邑、高密、胶县之线出动，开始进攻，第六十四、第四十五师尾随。

△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一部分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

△　中共华东局根据战场态势，拟定作战计划与部署：以许世友率第九、第十三纵队及胶东地方武装在胶东内地组织运动防御；由谭震林率第二、第七纵队和从鲁南返回之独立师、第十师，及地方武装集结在诸城地区作战，威胁进犯胶东的国民党军侧背。

△　中国政府照复美国政府，同意参加华盛顿中、美、英、苏四国会议，讨论韩国独立统一问题。

△　国民党军以八个旅组成第五兵团，由李铁军指挥；以四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谢甫三指挥，企图东西夹击在豫西的陈赓兵团。

△　新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自南京抵沈阳。9月5日熊式辉离沈阳。

△　国民政府废止民国二十年3月30日公布之《银行法》和民国二十三年7月4日公布之《储蓄银行法》，同时公布新《银行法》。

△　青年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丽都花园开幕。曾琦主

持并致开幕词。在次日大会上，曾琦作政治报告，称“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

△　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向达、孙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该校校长胡适称：“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更谈不到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　上海各自来水公司自是日起水价一律上涨一倍。

9月2日　　陈诚正式就任东北行辕主任职，副主任郑洞国，参谋长董英斌。陈诚发表告东北军民书称：今后行辕首要任务在执行政府“剿匪”国策。

△　行政院长张群对美国记者谈魏德迈声明，谓有甚多事情为魏氏所不知。魏氏建议的改革办法正在实行。魏氏来华之结果，“将不致使中国政府之内政与外交政策有所变更”。

△　王世杰致电顾维钧，说蒋介石及政府其他负责人均对魏德迈讲话表示愤慨。指示顾停止催办已向进出口银行提出的各种项目。

△　陈赓、谢富治兵团第四纵、第三十八军和第二十二旅等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准备举行灵宝战役，留第九纵在洛阳东南地区阻国民党军第五兵团西援，一部向伏牛山麓展开建立根据地。

△　吴景超、刘大中等在《大公报》上撰文评论国务会议通过之经济改革方案，称“此方案对目前之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即作为长期计划而论，亦仅为胪列目标，并无具体内容，于工业化过程中各项问题之分析及策划，更属不得要领”。该文分析当前经济危机之起因是由于：“一、军费支出之浩大；二、过去经济、财政金融政策之错误；三、行政机构及人事之劣败。”

△　南京美宪兵中和桥暴行案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　燃料管理委员会调整各项配煤售价，比前增三倍左右。

△　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职，任命顾毓琇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

△　行政院例会通过中暹航空协定案。

9月3日　　行政院新闻局召开记者招待会，局长董显光称：今夏以来，水、旱、蝗、雹各种灾害遍及粤、桂、川、湘、闽、苏、皖、豫、冀、晋、甘、鄂，绥、台、辽15省，估计受灾耕地面积达数千万亩，灾民2000万人以上。

△　国民政府任命庞松舟为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在南京召开，中国代表杭立武当选为主席。会议主题是关于推进基本教育。

9月4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例会通过《中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申报登记条例草案》，规定凡在国外银行存有款项者，必须履行下列手续：一、以关于其外币资金数额之一切情报陈报政府。二、承认此等资金得由政府按外汇公开市价收买。凡不依条例规定申请登记其外汇资产或作虚伪之申报者，得处以五年以下之徒刑，并没收其外汇资产。

△　成都各报排字技工举行罢工，各报一致停刊。9日复刊。

9月5日　　行政院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凡12条。《办法》规定：“凡愿遵照本办法脱离共产党手续者，应自动觅具妥实保证，依限申请登记”；“核准登记之人，得施以感训及劳役”；“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工作人员，潜伏后方”，不为登记之申请，“应由当地治安机关一律予以逮捕”；“共产党在各地组织之机关团体，一律予以封闭”。

△　陈毅、粟裕及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渡黄河后，进至郓城地区。

△　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称，苏联轮船“伊里奇号”由大连载运客货至沪，“未经特许擅入暂停开放之港口，并侵犯沿海贸易权”，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抗议。

△　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谈话，声明参加联合国第二届全体大会之立场：一、对于修改宪章，准备充分尊重大会之多数意见；二、对日和约问题，不轻作放弃某些国家之合作而单独与日本媾和之拟议。

△　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中央干事、监事第二次联席会议，在南京中央团部大礼堂开幕，讨论党团合并问题。6日，三青团二中全会第一次大会，接受党团统一决策。

△　青年党大会讨论开放地方政权问题。决定向国民党交涉，要求开放地方政权及民意机构，解除各地方党、政、军对青年党之压迫，如无圆满结果，则考虑退出政府。

△　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通过《节约监督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厉行节约消费之各项办法》：一、营业性跳舞决定在9月底前一律禁绝，以后问题俟禁绝后再议。二、私人使用汽车限制办法。三、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四、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五、厉行守时运动实施办法。六、厉行节约消费检察办法。

9月6日　　陈诚到东北后，实行“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新战略，企图争取局部主动。是日，集中四个师，分为左、中、右三路，自绥中、锦州向热河东部建昌方向扫荡。

△　王世杰离沪飞美，出席联合国第二届全体大会。

△　上海沪东区纺织业工人，因不满劳资评议委员会裁决的工资办法举行罢工。

△　行政院决定四川水灾救济办法，加拨赈款20亿元（连前拨共30亿元），发放农贷100亿元，酌减田赋。

9月7日　　冯玉祥在美国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希望美国人民及政府帮助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自由，而不可帮助国民党内战独裁。

△　国民党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师占胶东平度。13日，第八师又占掖县。

9月8日　　蒋介石自牯岭返回南京。出席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二届二次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关于党团统一的意见。

△　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平原，国民党军紧急布置长江防务。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是日飞赴九江，视察江防。海军自13日起封锁南京以上长江交通，并禁止南京江面及近郊居民在晚9时至晨6时间活动。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各城亦加紧防务部署。

△　青年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99人，中央检审委员21人。

△　《人民日报》报道，东北解放区一年来经过土改，已有629万农民分得5003万亩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觉悟提高，一年来参战群众已达39万人。

9月9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上午在南京开幕，到会者580余人。蒋介石在讲话中称："目前本党所遭之危机，至为重大，党内同志工作效率欠佳，有待改进。""本党最大之敌人为共产党，吾人不应过低估计共党之力量"，并谓："目前最迫切之工作，尤在肃清武装叛国之共匪，完成国家统一与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关于党团统一的问题，蒋介石谓乃改进国民党本身之"唯一急务"。午后，举行第一次大会，吴铁城

作党团统一组织的报告。张群继之作政治及外交报告，说明改组后之行政院乃“依国府委员之决策负执行之责”。陈述财政经济情形时称因“军事紧张，经济凋瘁，支出繁浩”，以致造成财政困难及收支不平衡。政府之对策“主要为整顿税收，其次便以发行公债弥补”。关于外交，张群强调：“政府一面要尽力维持自身和各主要盟邦之友好关系，另方面要拥护联合国，来促进主要列强的合作。”最后白崇禧报告军事，着重说明目前战争以东北为主要战场。

△　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于郓城以南之沙土集，围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全歼该师师部及其第六十旅、第一一七旅全部，生俘中将师长段霖茂、第一一七旅少将旅长罗觉元以下官兵7000余名，毙伤2000余名。

△　西北野战军转入反攻。6日收复米脂县城，是日又收复葭县。至此，西北野战军已收复陕北之靖边、吴旗、安定、安塞、志丹（保安）、吴堡、米脂、葭县、府谷、固临10座县城。

△　陈赓、谢富治兵团发起灵宝战役。10日占卢氏，12日占灵宝。

△　青年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实施民主宪政，中央地方分治，军民分治，实行民营经济，改革币制，厘定税制。

△　冯玉祥在美国发起组织“华侨和平民主协会”。

△　上海舞厅业职工会在新仙林舞厅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到会会员代表舞业2.7万余人，并邀请本市有关机关代表及新闻记者参加，讨论禁舞后生计问题，决定成立“上海市舞厅业全体同人禁舞申援委员会”，推派劳资代表10人晋京请愿。

△　上海沪东区天尊、恒丰、亚文等大小200余家纺织厂工人再度

罢工。上海市社会局通令各纺织厂工人限10日起一律复工并函请警局派警驻守各厂。

△　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已正式同意与缅甸政府互换大使。

9月10日　国民党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蒋介石主持，讨论党团合并与加强“戡乱”问题。秘书长吴铁城报告党团合并办法，并谓：此次中常会提出之《党的新建设纲领草案》与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所拟《党的改造纲领草案》并案讨论。在大会发言中邓文仪称：“剿匪宣传之努力不够，大家应到前方去。”农工部认为必须积极吸收农工分子入党，各路、厂、矿党部不公开办公，采取秘密活动。郑洞国提议吸收青年入党。杨虎、毛秉文提议：加强组织，完成“戡乱”建国。当晚，举行党团联席会议整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整理关于《党的新建设纲领》之意见及其他提案。

△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恢复中日商用电报。

△　贵阳《力报》被当局以“言论时为共党张目”为由查封。该报登载南京通讯《从京沪各报消息看最近战局情形》，中引有沪报所载刘伯承所部南下情形与分析，谓：人民解放军力量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土地改革的结果，增加了共军的新血液”。

△　福州《中央日报》就党纪问题发表社论，感叹：“今日本党之大患，在于党的纪律过于松懈。”“目前轰动社会之所谓‘豪门资本’，哪一个不是本党党员？哪一个不是攀援本党‘革命’壁垒而起家？‘革命’党员从政，而结果又贪又污。”

9月上旬　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河，越过陇海路，进军大别山后，蒋介石以23个旅跟过淮河尾追，并以第八绥靖区（合肥）夏威所指挥的第四十六师进到六安、霍山地区；第五十八师进到固始、商城；以郑州前线指挥所（信阳）张轸所指挥的第八十五师进到罗山、信阳地区，第十师、第四十师则往宣化店沿公路向黄安、麻城前进；

以武汉行辕程潜所指挥的第六十五师，经平汉路进到黄安；以第五十二师、第五十六师在信阳以南平汉线和武汉外围，分散攻击解放区地方政权和后方机关。国防部长白崇禧则指挥其对大别山情况熟悉且战斗力强之桂系第七师、第四十八师沿新县、麻城公路向南寻找解放军主力作战。

9月11日　国民党党团联席会议继续举行。上午，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作新疆问题报告，组织部副部长谷正鼎作关于中共问题报告。下午，整理委员会提出《党的新建设纲领》及《党的改造纲领》两草案合并而成的《中国国民党改造纲领草案》，内分《党的当前组织纲领》及《党的当前政治纲领》两部分，提交会议讨论。

△　美国顾问团人员正式开始在国防部工作。

△　青年党召开中常会，选举曾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18人为中央常委。

9月12日　上午，国民党党团联席会议继续举行，修正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纲领》及《中央党部团部统一组织办法》，并提交四中全会。

△　下午，国民党四中全会在国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大会，讨论通过：一、《国民党改造纲领》；二、《中央党部团部统一组织办法》；三、明年5月5日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案。《党团统一组织办法》规定：一、三民主义青年团本届中央干事和候补干事，一律为国民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事和候补监事一律为国民党本届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额扩增为45人至55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名额扩增为15人至19人，其人选由蒋介石提请全会决定之。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青年部。四、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理论研究委员会，负责主义及政纲政策之理论研究责任。《当前组织纲

领》规定，党员团员应一律重新登记。

△ 8日，行政院政务会议决议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后，设立善后事业委员会。是日，国务会议通过《善后事业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善后事业筹议保管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以继续办理“联总”及“行总”结束后之善后事业。

△ 国民党军发表改善军纪吏治之建议书。建议书中谈到国民党军的腐败情形称：“目前军纪不良之主要现象为：一、滥征给养、工料；二、强占强购；三、空额太多；四、战斗情绪低落；五、不能爱护人民，扶植地方武力；六、滥用军权，干涉行政。”“军纪不良之主要原因为：一、士兵待遇不够；二、官兵生活悬殊；三、军粮不能按时运济，品质且多恶劣；四、服装鞋袜品质太坏，数量不够，且不能按时发给；五、办公费、副食费太少；六、训练工作废弛；七、赏罚不能严明；八、少数军人误解军事第一，不尊重系统；九、军民官兵间感情隔阂等。”关于吏治部分，则称：“吏治不良之主要现象为：一、官吏贪污，由公私不分，假公济私，以致以私害公，不一而足；二、机关滥收滥支，伪造报销，营利分肥，空额补亏；三、事权不一，遇事互相推诿牵掣；四、法令繁杂，解释分歧，奸滑之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五、一般公务员工作情绪低落，服务精神太差，致影响行政效率。吏治不良之主要原因为：一、公务待遇过于菲薄，不惟不能养家，甚至不能糊口；二、机关经费距离实际需要太远，预算等于具文，会计审计徒成形式；三、机关骈枝，人员冗滥，不能密切联系，竭诚合作，尤其中央直属机关太多，各行其是，无法统属；四、法令与事实脱节，前颁后颁，此一机关与彼一机关所订定者又不免矛盾出入，官吏奉行不力；五、人事制度未能确立，公务员毫无保障；六、高级主管人员与低级职员生活悬殊，同一地区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事业机关与行政机关，待遇亦失均衡；七、是非混淆，赏罚不能严明；八、中央过于集权，而事实上鞭长莫及；九、民意机关只能建议，政府敬而远之。……总之军纪吏治之败坏，多系由上而下，过去

维持军纪与整顿吏治，虽有法令与主管机关，而力行实感不足，以致有明知而故纵情事。”

△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在山西临县病逝。13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　民主建国会邀集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对日贸易与对日和约问题。与会者主张中国不单独签订对日和约，开放对日贸易必须在对日和约订完之后。

9月13日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闭幕，发表党团联合宣言，通过蒋介石提出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人选名单。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者有：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朱霁青、李文范、麦斯武德、邹鲁、马超俊、吴铁城、李宗黄、戴季陶、张群、张治中、陈布雷、宋庆龄、朱家骅、田崑山、白云梯、孙科、陈果夫、宋子文、白崇禧、钱大钧、潘公展、萧同兹、范予遂、梁寒操、陈诚、段锡朋、张道藩、张厉生、陈立夫、贺衷寒、谷正纲、王启江、赖琏、刘健群、萧铮、柳克述、邓文仪、康泽、吴忠信、何浩若、蒋经国、张其昀、袁守谦、黄少谷、何联奎、倪文亚、赵仲容、汤如炎、郑彦棻、李蒸、程思远、黄宇人55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者有：吴敬恒、张继、王宠惠、邵力子、刘文岛、姚大海、王秉钧、邵华、张知本、张默君、李永新、鲁荡平、朱经农、李曼瑰、白瑜、刘赞周、李世军、朱光潜、程天放19人。

△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提出“目前具体要务如下：（一）澄清吏治，根绝贪污；（二）安定经济，建立经济基础；（三）建设收复区，解除人民痛苦；（四）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告：宋子文发起募集基金，救济为抗战、“剿匪”而殉难之党员家属。宋子文本人捐献在中国

建设银公司主要投资事业如淮南煤矿铁路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汉口电气公司中之全部股份。

△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宣言，称："颁布宪法，结束训政，更足以表示本党一贯努力，不断前进，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决心与诚意。而戡乱与总动员，乃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统一和完整。"

△　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　民盟主席张澜致函行政院长张群，指出政府对于民盟若仍目为反动集团，一任各地特务之胡行，则所有实施宪政、保障民权之诺言，何能取信于人？各地盟员被捕者，务祈速予分饬各地官吏一律释放，而重人权。

△　国民政府特派戴传贤为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县长挑选委员会委员长。

△　行政院制定奖励密告贪污办法。

9月14日　　外交部公布8月16日交给魏德迈的《关于中国政府措施与政策之一般说明》，为国民党政策辩解。内称中国自抗战结束就面临诸多复杂问题，"中国政府本身在环境许可之限度内已曾尽其全力以求各种问题之解决"。今后解决办法为：一、"共产党武力必须使之消灭"；二、"通货膨胀必须设法加以控制"；三、"加紧经济复兴工作"，"改革地方政治"。

△　东北民主联军在梨树沟门围歼出击热东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师大部。16日，又在杨家杖子围歼暂编第二十二师大部。

△　战略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代主任龙云及委员于学忠、陈济棠、刘峙、贺耀组、何键、鹿钟麟等出席，通过会议规程、

办事细则、工作概要等案，并对军事、政治问题提出意见，向国府建议。

△　湖北广济县发生械斗。14、18两日，广济周姓居民，先后纠集魏、张三姓，与刘、宋两姓展开械斗，双方备有轻机枪及步枪等武器，战线蔓延10余里。双方死伤甚多，结果，刘、宋两姓败北，周姓复乘胜纵火，将刘、宋两姓10余村庄付之一炬，计破产1000家，损失约百亿。据《申报》载："肇事原因，传与去年竞选有关。"

9月15日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寄信给胡适，提出三项要求：一、积极向地方当局交涉，务使受难同学早日恢复自由回校。二、坚决制止恶势力进校，保障师长同学安全，维持学府尊严，维护北大自由、独立之光荣传统。三、与有关当局交涉，合理解决学生公费冻结及本学期入学同学公费问题。

△　全国对外贸易会议在上海开幕。出席苏、浙、赣、湘等23省、市及南洋、墨西哥等地华侨代表、各工商团体代表共36个单位、167人。

△　长江各区内河轮船客货运价加价18％至85％。

△　立法院批准中英民航协定及中意和平条约。

△　苏北水灾严重。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下午在南京招待记者称："苏北被水灾区，较重者有灌云、东海、沭阳、邳县、萧县，较轻者有丰县、沛县、砀山、铜山、睢宁、宿迁、赣榆、徐州、连云等县市，被灾面积耕地三千万亩，灾情惨重者在二千五百万亩耕地以上，几达苏北全部耕地面积二分之一，灾民近九百万人，急需救治者约五百万人。"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宁举行首次执行委员会议，推定朱家骅为主任委员，胡适、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并推定自然科

学等六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人选：一、自然科学为萨本栋、任鸿隽、梅贻琦、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李书华、赵莲芳、金宝善；二、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为蒋梦麟、周鲠生、杭立武、陶孟和、楼桐荪；三、教育为程其保、陈鹤琴、常道直、朱经农、瞿菊农、程时燏、俞庆棠；四、大众传播为孙明经，陈礼江、黎锦熙、顾颉刚、顾一樵；五、图书馆及博物院李济之、袁同礼、蒋复璁、陈桢、凌纯声；六、艺术及文学为张道藩、吴伯超、陈之佛、余上沅、陈和铣。

9月16日　　蒋介石手令国民党全体将领，“共体时艰”，完成“剿匪”之任务。

△　孙科对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俟获魏德迈报告书内容后，将研究其对美、俄立场。中国不能长久傍徨，需有更有效之政策。

△　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因刘邓大军进入皖境，急电各专员、县市长“严加防范”，命令：一、各专员以“剿匪”为第一任务，县长应亲自“督剿”，并须重视守土之责；二、江南各县速以地方武力及严密保甲组织，根绝“共匪扰乱”；三、切实讲求各县区联防；四、统一编练民众自卫队，以县保安队为中心，肃清“散匪”等。

△　上海大米、食油、棉纱、其他日用品、外国证券价格均高涨。大米剧涨至60万一石，生油涨至116万一桶，细纱20日冲出2000万。27日，中国农民银行在无锡收购稻米，米市再涨，高达67万元。

△　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华南分会在广州成立。该会辖区为粤、桂、闽三省；并暂兼管理滇、黔业务，分别在梧州、厦门、汕头、湛江、海口五处设办事处。

△　东北行辕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合并为政务委员会，陈诚兼主任委员，王树翰为副主任委员。

△　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丁文渊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程孝刚为国立交通大学校长。

△　苏联轮船“伊里奇号”又到上海，被禁止进口。

△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中国首席代表王世杰用国语演讲，呼吁各国合作。

△　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黑嫩联合省重新划分为黑龙江省和嫩江省，范式人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任嫩江省政府主席。

9月17日　陈赓、谢富治兵团占领陕县，逼近潼关。至此，国民党军陕东兵团一万余人被全歼。国民党军将第六十五师等部空运西安，集中10个半旅在西安、潼关间布防。

△　九江近期自晚9时至翌晨6时实行戒严，并详查户口，拘捕男女53名。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亲至九江小池口布置。九江、南京间江面由炮艇巡视，航运受阻。

△　外交次长叶公超答复记者，中国希望一切有关政府全体参加对日和会。

9月18日　国民党党团统一组织后第一次中央常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青年部组织规程》及《理论研究委员会组织规程》，以陈雪屏为青年部长，梁寒操为理论研究会主任委员。

△　国民党军整第二十五师在第五十四师协同下，攻占胶东莱阳，第八、第九师进至招远以南地区。

△　汪伪军委会参谋本部部长、陆军部长叶蓬被执行枪决。

△　全国对外贸易会议闭幕。通过了128个提案和大会宣言，包括反对开放对日贸易、建议政府采行实物侨汇办法及明令取消外汇官价

等要案。

△　河北省旅京同乡会、复员协进会暨该省国大代表联谊会下午在南京举行茶会，河北省参议会议长刘瑶章在会上报告冀省状况时称："人民负担奇重，清苑一个四十余户的小村，不足两月，摊派约三千万元；涿县七个月摊派约三百亿。"

△　国民政府特任谢维麟为驻瑞典国特命全权大使。

9月19日　魏德迈向杜鲁门总统提交长篇秘密报告。报告认为在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前，美援不能完成它的目的。国民党的军事地位已经恶化，军事形势有利于中共，而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报告建议美国应继续全面援助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应做到：一、将请求美援一事通知联合国；二、请联合国促成东北停战，将东北置于五强监护下，或由联合国托管；三、健全财政，减少亏空；四、继续实行政治、军事改革；五、在指定部门接受美国顾问，协助中国运用美援。

△　行政院长张群飞沈阳视察。其后又到抚顺、鞍山、长春巡视。

△　王世杰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称，对日和约应由远东委员会讨论，中国将与苏联一致拒绝召开对日和会，因为其中不包括四强之否决权。

△　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九师由锦州增援建昌，在杨家杖子地区被东北民主联军包围。经数日激战，至23日，该师一万余人被歼。至此，东北民主联军在辽西三战三捷，标志着大规模秋季攻势的开始。

△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李卓敏因贪污案被停职。

9月20日　国民政府免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罗卓英本兼各职，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蒋介石飞西安，指示潼关方向暂取守势。

△　全国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在上海开幕，苏、浙、皖、川、滇、冀、鲁、湘、鄂及东北各省代表221名参加。大会通过反对农民银行收购棉花、要求纱锭赔偿等案。22日大会闭幕。

△　民盟中央复函南方总支部，对其8月17日建议作答，强调继续“争取和平合法公开之地位”。

△　扬子公司派员10余人，携款500亿，到云南向各地分期搜购美种烟叶，若干地区之青苗被购一空。

△　由苏皖各地涌来浦口之难民每日达千余人，多以乞讨为生。

9月21日　国民党军整第十一师自商丘北进至土山集后，分两路北进曹县，第五师、第七十五师则自郓城、巨野南下，企图在曹县地区夹击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华东野战军以三个纵队阻击与警戒，集中四个纵队攻击整十一师。战斗竟日，双方反复争夺。23日，因国民党军三个师援军迫近，华东野战军撤出战斗。

△　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琼崖“清剿”指挥所改组为琼崖“清剿”指挥部，由第九区专员蔡劲军兼任指挥官，王国治任副指挥官，张应安任参谋长。指挥部下成立三个自卫总队，21个自卫大队，64个自卫中队，255个自卫小队，全岛点线碉堡除旧有者外，新筑者有595座。

9月22日　宋美龄在国际妇女联谊会成立会上讲演时称，无论中国获得世界援助与否，都将奋斗到底。

△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南京接见《中央日报》及美联社记者时称：新疆仍有叛乱与不安，其原因皆在以前中央代表未能公平处置，因此中央必须给予新疆一剂切实的民主良药，俾各民族相信中央政府能与之合作，而非旨在统治。

9月23日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通过对日和约建议及积极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案。

△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中撰文称：魏德迈使华为极大错误。“我国外交上有一日渐增长之趋势，认为美国有武力与金钱，其他民族之完整与复兴均唯美国是赖。故此辈民族决定其国内政策之权利，以及被视为平等主权国家之权利，均可置之不顾”。

△　上海电力公司职工2000余人因20日警察局逮捕上海电力工会第三分会干事张仲之及文化课负责人吴可文等六人，是日下午分批集中社会局请愿，坐守社会局广场八小时，要求释放被捕者。

9月24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一、王启江、郑彦棻为中执会副秘书长；二、洪兰友为中政会副秘书长；三、郑通和、赵仲容为青年部副部长；四、倪文亚为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委；五、蒋经国、郑彦棻、谷正鼎、李惟果、袁守谦、胡轨为干部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

△　行政院公布《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依照该规程，各县、市组织“民众自卫队”。“民众自卫队”分两种：（甲）自卫队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无饷给；（乙）常备自卫队视实际需要编组之，有饷给。凡18至45岁之壮丁，除以兵役法应行免役、禁役、缓役者外，凡有两丁之户，出一丁，五丁之户出二丁，超过五丁之户，每满三丁出一丁，参加自卫队编组。县（市）长兼自卫总队长。

△　经外交部与美驻华大使馆代表商讨，美国对华救济物资协定草案达成初步协议。美拟以粮食、医药品及种子、肥料等物资援助国民党，价值为3000万美元。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约1000人签名反对教育部保送未经正式考试之学生入学。

9月25日　行政院长张群在北平怀仁堂举行茶会，北平各大学校长及教授200余人参加。胡适申述北大教授23日会议意见，要求改善教职员待遇。张群表示政府外交力求自主，促进邦交；内政力求改进，发挥民权。

△　监察院及立法院分别讨论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办法。

△　全国度政会议在中央标准局举行，会议议决修正度量衡法规；颁布特种度量衡法规，扩充检定范围；拟订度计法草案；修正各种科学上应用之单位名称等案。会议于30日结束。

△　中国驻日代表团成立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负责赔偿与被掠的财产归还事宜。代表团的经济与科学组组长吴半农兼该委员会主委，王树华、李式琛、周茂柏、康崇孔为委员。

△　杭州第一纱厂职工1500名，为要求厂方公布底薪数目未果，举行罢工。次日，杭州土布染业工人450人也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9月26日　是晚至次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在砀山、商丘间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地区。

△　国务会议通过国大代表选举展期一月，于11月21日至23日举行。

△　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时期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

9月27日　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连克杞县、夏邑、睢县县城。28日，克亳县城。29日，又克通许。

△　经济部全国纺织工业生产会议在沪举行。金融、经济、工商界代表180余人出席。会议通过经济部提出之纺织工业建设计划：棉纺织工业，10年内预备建立800万纱锭，连原有400万锭共计1200万

锭；毛纺织工业，10年内拟增加30万锭，连现有10万锭，共40万锭；麻纺织工业，10年内拟建立15万锭；绢纺织工业，10年内预备增10万锭。

△　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全体职工2700余人一致罢工。次日，英商电车公司赫德路厂的司机、售票员等，亦于下午6时全体罢工。所有十六、十七、二十、二十四各路无轨电车及一、三、五各路有轨电车一齐停驶。此次罢工坚持了七天半，使上海全市半数以上电汽车停驶。上海市社会局训令法商电车公司工会即日复工，否则由公司无条件开除。

△　凌晨1时，福州、厦门及台湾省全境发生地震。

9月28日　蒋介石会见司徒雷登，表示国民党的政策是明确的，表面的冲突不会影响中美长期友好关系，中国应在对日和约中得到保障和赔偿。

△　张群回到南京，表示将尽力恢复东北，安定华北。

9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书记长、副书记长及党团统一委员会委员全部人选，并通过统一党团监察组织案。据中央社电称：各地党团统一组织人选，曾经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则上以省（市）党部原任之主任委员为主任委员，支团部干事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市党部原任之书记长为书记长，支团部书记副之，并成立各省、市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全部人选名单今日经中常会通过后，呈请总裁作最后决定。

△　上海市长吴国桢招待记者，宣布压制罢工斗争的四项办法：一、煽动罢工者，按总动员令予以严惩；二、罢工期内工资不发；三、拦阻开车者，由警备司令部、警察局派员当场立予逮捕，以妨碍交通、危害公共安全论罪，并依军法严办；四、必要时饬令社会局将

延不复工者作自动弃职论，而予无条件解雇，另招集失业工人递补。同日，警察局长俞叔平告记者称：警局已令各分局“如发现拦车者，立即予以逮捕法办，若彼等企图武力抗拒，当场格杀勿论”。

△　地政部召开之全国地政检讨会议在上海举行。王云五、张厉生、萧铮及各省、市地政主管人员、专家、有关机关代表共百余人出席。会议讨论通过有关地籍管理、地权、地用及地价等提案。10月3日会议结束。

△　外交部长王世杰由纽约抵华盛顿，与美代理国务卿罗凡特、商务部长哈里曼举行会谈。翌日，王世杰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讨论中国局势。

9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7、8、9三个月战绩：共歼灭营以上国民党军七个师部，106个团，又一个营，共消灭国民党军兵力28.26万余人，内正规军21.14万余名。解放与收复县城129座，国民党军占解放区县城111座。

△　东北民主联军七个纵队，以远距离奔袭方式，出击中长路长春至铁岭段。至10月7日，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余人，彻底破坏了中长路。

△　国民党军占领烟台，胶东攻势达到顶点。

△　上海第三区百货业职工会理事长陈施君、书记姚达人、王守权、孙寿康、马家庆、糜步云、梁仁阶、丁盛雅、糜仁、周衡等被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上海市社会局是日深夜发出致第三区百货业职工会之“训令”称：“该工会负责人多名，与匪党勾结，频图扰乱，着即停止活动。”并指派该局专员方显民、龚祥生等为整理指导员和整理委员，前往整理接收。

△　内政部拟定设立国境警察办法，规定：国境警察为国家警

察，由警察总署统筹办理，经费由国库开支，配备由中央供给。陆境国境警察局分设于通化、哈尔滨、海拉尔、居延、乌苏、疏勒、腾冲、蒙自、龙州，海境国境警察局分设于广州、福州、上海、天津。

△　天津查获大规模走私组织，主犯为前驻津美军需官上校纳拉姆，牵连其他海陆空军人员甚多。纳拉姆被控之罪名有三：一、利用美军交通工具飞机、舰船等，与津市中外籍人勾结，自美运入大批货物，包括汽车、化妆品、药品等，偷漏关税甚巨；二、利用美军交通工具，自津向国外输出大批货物，包括皮毛等；三、代人运美钞，不受外汇管制，从中取得佣金等。

△　中国工业管理协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翁文灏、吴兆洪、吴蕴初、荣尔仁、刘鸿生、王云五、甘乃光等为理、监事。

是月　晋冀鲁豫野战军完成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先后解放城市22座，建立17个县政权。

△　海关总务司统计科统计，本月全国进口总值为1.0766万亿元，出口总值为2867亿元，入超达7899亿元，创本年来入超最高纪录。

△　据行政院新闻局统计，全国经核准登记或补行登记之报纸为1284家，通讯社566家，杂志1448家。

△　上海卷烟业因美烟倾销，日陷绝境。现卷烟每箱成本须500万元，售价400万元，平均亏蚀率达20％。许多工厂不能维持，纷纷倒闭。全市原有大小烟厂73家，现只有32家，每天能继续开工者不到五家，大部分烟厂每周只开工三四天。而英美烟草公司上海颐中烟厂业务却日益发达。

△　广州物价高涨，贫苦市民生活日见困难，饥病倒毙者日增，9月份路尸共237具，平均每日近八具。

10月

10月1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三青团中央团部举行交接手续，正式合并。同时，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宣布成立，部长陈雪屏，副部长郑通和。

△　蒋介石辞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兼职，遗缺以该校教育长李士珍继任。

△　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董显光招待记者发表谈话，指责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共附庸”。

△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全面展开。北线民主联军向中长线长（春）沈（阳）段大举进军，连续占领伊通、西丰、法库、梨树共四座县城及江密峰、八面城两重镇，以及叶赫车站、威远堡等重要据点多处。计歼国民党军1.28万余人。

△　西北野战军发起延（川）清（涧）战役。次日解放陕西延长、延川两座县城。

△　苏北解放军再次恢复盐城。

△　国民政府本年度粮食调配预算编就，仍以长江流域各省为主体。规定各省除就地配拨驻军食用外，调拨外运军粮总数计996万石。湖南居首位，计218万石，四川190万石，江西160万石，安徽129万石，浙江123万石，湖北116万石。此项数额来源为该年度征实三成及征借全部，再加中央收购省县级赋粮及洽定采购粮四者之和。

△　财政部发言人称国务会议决定汽油、柴油之进口税一律增收价格的50％，原油暂免征进口税。

△　四联总处成立八周年，秘书长徐柏园举行茶会招待南京新闻

界，报告该处核办投资贴放之方针。

△　上海市六家电力公司经呈请经济部核准自本月是日起调整电价。上海电力公司每度自1130元，调整为2700元；法商水电公司每度自1132元调整为3340元；闸北、华商、浦东三公司每度自1255元，调整为闸北3370元；华商及浦东3360元。

△　第四批分配赔偿与中国之日舰10艘抵青岛。4日，在青岛三号码头，国民党海军第二基地司令董体曾代表接收。

△　盟国对日委员会主席、美国代表施巴德在东京举行之会议中报告日本工业生产情形时表示："远东委员会所议决之日本战后经济，应保持其1930至1934年间之水准事，实规定过严，而不足供日本平时之需要。"次日，上海《大公报》短评指出："美人若拿他们自己的经济水平来看日本，主张把日本的水准提到美国的一样的高，那是他们的天真；若是为了把日本做为一个战斗力量，而尽量提高日本经济水平，那居心是不可问的。"

△　香港总督葛量洪夫妇抵南京访问，4日返港。

△　由宋庆龄主持之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举行中秋游园会，筹募艺术界医药救济基金。到会者有郭沫若、茅盾、许广平、柳亚子等四五千人。游园会演出戏剧、舞蹈，并举行义卖。

△　中国社会学社第八届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开幕。宣读论文、举行讨论会、选举理监事后，次日下午闭幕。

10月2日　　蒋介石出席各省市国民党党团统一组织视察员谈话会，向即将分赴各地视察党团统一组织工作的视察员谈注意事项。

△　陈诚向蒋介石报告，东北共军已发动攻势，请令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督促第九十二军军长侯境如迅速率部出关，协击北宁铁路附近的中共军队。蒋即急电李转令预定出关各师限3日内开拔完毕。李

复电称：“出关各师，已饬归陈兼主任指挥，刻大部被阻于榆关、前卫间，已再饬迅速前进。”

△　国防部长白崇禧飞赴徐州，布置防务。

△　民盟中央决定由黄炎培以个人名义发表谈话，对新闻局长董显光诋诬民盟事提出反驳，表示：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标，反对分裂，反对战争，文件俱在，事实俱在。

△　陈粟大军自9月26日越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七天内，在600里长宽正面前进300里，先后解放河南省的尉氏（1日）、通许、杞县、睢县、夏邑、柘城、沈丘、鄢陵、扶沟（2日），安徽省的太和、涡阳、蒙城（1日）、亳县（2日），共13座县城，及义门集、龙山集、睢溪口、界首集（1日）、烈山煤矿等重要集镇数十处，并切断津浦、陇海铁路。

△　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发起胶河战役，至10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山东战场转入反攻，标志着国民党军在全国进攻的最终停止。

△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宣布，自10月15日起停止对日本战犯的检举，各地军事法庭在年底前办理结束。

△　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正式提出草案，建议联合国大会对安理会五强限制使用否决权。

△　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三十七年度中美农业合作计划方案》，允许美国资本与美国技术直接介入中国农业，以便于美国获得其工业所需要的中国羊毛、桐油、丝、茶等农产品。

△　广东省主席宋子文与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第三次会谈“华南投资问题”，及发展广东矿藏问题。

△　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又有电车、公共汽车20辆停驶。工人并组织“罢工委员会”，散发《告社会人士书》和《告会员书》。上海市长吴国桢与社会局长吴开先、公用局长赵曾珏、警察局长俞叔平等20余人开会决定限令全体工人一律3日复工。4日开始，由社会局另雇工人并将调用一批汽车兵团驾驶兵，接开公共汽车。法商电车公司通告全体工人，限令“3日复工，否则无条件解雇”。

△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各专门工程学会联合年会在南京开幕。年会选举茅以升为本届会长，顾毓琇、萨福利为副会长，董事胡庶华、吴蕴初、支秉渊、顾毓琼、侯德榜、谭伯羽、恽震、夏光、王星拱。会议于5日闭幕。

10月3日　　蒋介石主持作战会报，决定作战方略为：一、勿使“匪”南越长江；二、以消灭黄河以南股“匪”为主旨；三、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

△　东北民主联军北线部队，向中长路长春、铁岭间铁路线进击，连克公主岭、开原、昌图三城及大屯、范家屯、郭家店、双庙子等重要车站，仅余四平一座孤城。南线辽南部队连克海城、大石桥，直逼营口。辽西部队连克北宁线的白旗堡、绕阳河、高山子、白庙子、沙后所、前卫、中前所等重要据点，并破击巨流河车站。陈诚确保北宁路的企图已经失败。

△　晨，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工人96名在重庆南路被警局逮捕。吴国桢再度到社会局与吴开先、俞叔平、赵曾珏、法电公司代表戈特龙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复工登记延期到4日下午4时截止。并通知警备部、警察局，再有拦车，格杀勿论。

△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职工为抗议逮捕职员陈施君等事，下午4时宣布停工，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警察局派军警到场，逮捕六人。上海市社会局发令称，倘有不守本分、乘机捣乱者，立即无条件开除。

△　京沪、沪杭两路客货运价剧涨，客票一律照现行价目加80％，行李包裹杂项运输等加160％。

△　国营招商局及三北、民生各长江大轮船公司是日起票价一律涨45％。

△　中国农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开幕。5日闭幕。

10月4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军务局长俞济时等由南京飞抵北平，召见李宗仁、孙连仲、傅作义等，并举行军事会议，以应付国民党军在东北及华北的危急局势。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罗隆基在京梅园新村接待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称，民盟自有其独立自主的政治目的，此即民主、和平、统一、团结，民盟亦有绝对独立自由的政策，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与人民共同争取生存机会，此则虽有任何威胁与压迫，民盟决不改变此宗旨。

△　国防部在浙南、闽东地区设浙闽绥靖区。

10月5日　　监察院公布民国三十四年8月19日至三十六年8月底《外汇使用及各公司营业情形调查报告书》。其中指出，政府“原存黄金600万盎斯（约合中国制600万两），美金九亿元，在日本投降后至去年11月间，大半消耗于非建设性物资之进口，且系由前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一人核准使用所浪费”。

△　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工人复工。此次法电罢工损失约50亿元。被捕工人由工人福利会会同社会局、警察局审讯，凡有嫌疑工人，将送警备司令部惩办。

10月6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见北方各重要将领：第六十二军长林伟俦、第十军军长袁朴、第九十二军军长郑挺峰，指示作战方略。

△　蒋介石接见傅作义，嘱其即日之赴沈阳，与东北行辕陈诚面商协助作战方略。

△　国民党军占领胶东威海卫。

△　国民政府特派陈诚兼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树翰为副主任委员。

△　国民政府聘陈仪为国民政府顾问。

△　美国国会军事考查团一行六人由团长、美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柯尔率领，自汉城飞抵北平，其后又至青岛、南京、上海等地考察。

△　中国航空公司之中美航线通航。是日中国航空公司在上海龙华机场举行中美首次直接通航典礼。南京教区主教于斌随机赴美，以《益世报》记者身份前往各地作研究性旅行。随机赴美者还有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上海《大公报》副经理费彝民、上海《申报》总编辑陈训畬、上海《大陆报》编辑张国勋及天津《民国日报》发行人卜青茂等六人组成的记者团。

△　中国航空公司今起涨价，计客运加25%，货运加20%。

△　上海市社会局宣布：过去三个月内，上海市直接失业人数已由15万人增至30万人。大部分系机器、造船、公用事业、纺织、针织及缝纫诸工业中被解雇者。

10月7日　蒋介石在北平检阅青年军并训话。同日，接见北平各界人士。

△　立法院例会，通过《改善公教人员生活案》，规定：一、公教人员最低生活之标准，应以战前所得之薪水30元为基础，照生活指

数分区计算，其超出部分之薪给，在300元以下者，照生活指数十分之二支给；在300元以上者，照生活指数十分之一支给。此项办法于9月份起实行。现行之生活补助费即予取消。二、改善现行实物配购办法，防止舞弊。三、请政府供给公教人员宿舍。四、公教人员及直系亲属患病时免费就医，其子女在各级学校就学者免学费。五、各机关及国营事业人员待遇，应一律平等。

△　东北民主联军占领辽西彰武县城。

△　陕西全省戒严总司令部对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等12人加以“私蓄武力，贩卖烟毒，图谋不轨，并怂恿国军叛变”罪名，判处死刑，是日，杜等在西安遇害。

△　联合国救济总署署长鲁克斯抵沪，视察“联总”在中国的工作，并筹划“联总”与“行总”结束办法。

10月8日　　蒋介石由北平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沈阳外围决战”。指示陈诚巩固沈阳及其与关内的交通线，加强沈阳以北各据点的守备力量，并从华北抽调部队出关增援。

△　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修正通过《党团员重新登记确立党籍案》，规定：党团员无故不参加登记，或参加登记经中央最后决定认为不合格者，即丧失登记。有反党言论或行为者，跨党者，在党内造成或参加小组织，以破坏本党之统一者，有贪污行为者，参加总清查或总甄核未能合格者，均不得参与登记。

△　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南下部队开始在徐（州）郑（州）间的800里平原上，向国民党军出击，至12日，先后占领临泉、沈丘、通许、尉氏、扶沟、新沟、新蔡、鄢陵、阜阳、灵璧、泗县11座县城及朱仙镇。

△　晋察冀野战军一部于平汉路平保段及平、津、保三角地区发

动攻势，至22日，先后占领容城、雄县、霸县、新镇四城，及松林店、漕河、牛驼、柳泉等车站据点20余处。

10月9日　蒋介石自北平飞青岛转返南京。

△　宋庆龄发表“双十”通电，吁请美国人民“协助吾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基本主义”。

△　国民政府在台湾设立的第一个金融机构中央信托局台湾分局成立。经理为周绍曾，副经理林楠。该分局办理信托、储蓄、购料、易货、保险、地产、仓储七项业务。

△　英国议会访华团亚蒙、艾穆里、麦克里维、罗伯兹、哈里逊、林赛一行六人由香港抵南京。英国议会访华团携英国首相艾德礼致行政院长张群函，函中表示希望议会访华团之行，能促进中英友好关系。12日议会访华团抵北平，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愿为增进中英关系上尽一份力，盼恢复中英贸易。

△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一文称，如国民党政府垮台，苏联将控制整个亚洲，过不了一代人，美国的独立也将不保。建议美国在三年内拨款13.5亿元援助蒋介石政府，并主张杜鲁门总统应任麦克阿瑟为其私人代表，以大使身份，协助蒋介石筹拟阻止苏联征服中国之计划。文章影响很大。10月间，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四名代表访华，致电杜鲁门，要求“刻不容缓地援助”蒋介石。

△　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准设文、理、医、工四学院及二年制体育专修科。

10月10日　蒋介石就“双十节”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民众与政府通力合作”，“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中

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重申解放军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第一次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并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一）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惩办内战罪犯，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肃清贪官污吏。（四）没收官僚资本。（五）发展民族工商业。（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八）废除蒋介石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与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行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土地及公地，连同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接收地主除土地外的财产及富农多余财产，分给农民及贫民。《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提出：“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　华东人民解放军收复牟平、栖霞两县城。

△　陈诚在沈阳国庆纪念会上谈东北战局时称：“东北局势危险期已过，当前战争不仅斗力，还要斗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只准共匪有第六次攻势，不容有第七次攻势。”

△　冯玉祥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号召中国留美学生及中国人民，奋起为实现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并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反对美政府贷款援蒋内战。冯在讲话中痛斥蒋介石为中国之希特勒。

△　中国技术协会第一届年会在交通大学举行，出席会员500余人。12日下午闭幕。

△　国际检察团首席检察官美国代表季南对《日本时报》发表谈话，为国际东京军事战犯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23人予以不起诉处分之举辩护。谓日本之实业家并无制造战争之罪行，“日本天皇及产业界、实业界人物，现已决定不受战犯之裁判”。因为“日本实业家与德国之实业家不同，在德国如希特勒骑在马上，产业界人物则牵马缰，但日本的银行家或工商业指导者之牵马缰系受枪杆所胁迫”。

10月上旬　　上海市长吴国桢举行经济检查会报会，决议通过四项办法：防止金、钞黑市；严办囤积棉纱；加配平民食米；禁止食油出口。

10月11日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美国国会军事考察团。

△　美国国会军事考察团团长在南京发表谈话，宣布赞同蒲立特援华计划。

△　中央社是日电称：国民政府战时国外信用借款、战时财政协助借款、战后政府借款等三项，共计现欠外债达7.34余亿美元。

△　中共发言人就国民政府向加拿大贷款6000万美元一事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政府在内战时期所借的一切外债，概不承认。”

△　西北野战军发起的延长、延川、清涧战役结束，共收复县城五座。是日，西北野战军攻占清涧，全歼国民党军整七十六师，俘师长廖昂。

△　晋察冀野战军发起徐水战役，吸引国民党军五个师增援，双方成胶着状态。

△　北平燕京大学学生800余人及清华大学学生2400余人为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学生举行罢课。12日，北京大学学生5000人亦为该校学生10余人遭非法逮捕举行罢课。

10月12日　　蒋介石犒赏河北保安团队全体官兵二亿元，以鼓励其“剿匪”有功。

△　西北野战军解放陕西绥德，14日解放瓦窑堡，至此延安以东及以北解放区已全部收复。

△　中国共产党中原局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区普遍宣传《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并决定成立鄂豫和皖西两区党委和军区。

△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杜斌丞遇害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屠杀只会使反蒋运动扩大，独裁者愈加疯狂好杀的时候，就是他愈加接近死亡的时候，中外历史已经千百次证实了这个真理。”

△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为杜斌丞被害发表书面抗议，谓此实违背政府历来公布保障人权之法令，且根本破坏国家的司法独立。

10月13日　　联合国救济总署署长鲁克斯抵南京，蒋介石接见并授予一等勋章。

△　柯尔率领之美国会军事考察团结束在华考察，自上海飞亚、欧、非继续进行考察。

△　国防部在台湾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主持其事，计划10年内训练200万军官。青年军第二〇五师师长刘树勋等是日招待记者称：第二〇五师在警卫台湾全省的同时，按陆军训练司令部指示开始新的训练。

△　中国文化界戡乱建国总动员会诬蔑民主同盟参加“叛乱”，并

提出“政府不宜再承认民盟为合法之政党，而应以乱党视之，明令解散”。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人权保障委员会，抗议政府非法逮捕学生。两校及燕京大学、贝满女中等大、中学校学生9000余人先后罢课。

△　上海市长吴国桢招待记者，宣布平抑纱布价格四项办法：登记纱商存货；检查纱厂帐簿；拒绝检查则予以拘留；奖励告密。

△　上海邮政管理局发表通告宣布邮资加价，普通国际邮资增加400％，国际航空邮资除重量单位由五公分改为10公分外，增加200％。

10月14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调整公教人员待遇过渡办法。薪金增加125％，自10月份起实行。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无许可证自备外汇到埠及起运货物处理办法》。规定凡自备外汇未经许可之已存放上海海关仓库中之价值4000万美元之货物及8月16日前由国外起运在途之货物，均由政府收购而不付现款，以中央银行发行之特种外币存单付给货款，在三年中分六期付齐。收购后按市价由政府出售。并规定进口商若不愿遵照此办法办理，只能将货物退回出口港口，而不得运往其他如香港、越南等地。以后凡无许可证之进口货品以走私论一律没收。

△　“解总”驻沪办事处代理处长林仲发表谈话及致“联总”署长鲁克斯与“联总”中国分署署长克利夫兰的函件，指出：自七月以来，“联总”之政策在国民党《总动员令》下完全屈服，放弃了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救济机关的地位，违反了不歧视的公平分配救济物资政策。林仲严斥“联总”署长鲁克斯在处理对华救济事务中所表现的无理袒护蒋介石的态度，这正是“联总”不能实行其政策之主要原因。

△　以霍尔为首的英国众议院贸易代表团由英飞抵上海，与国民政府会商英国对华贸易问题，并在南京与交通部长俞大维商谈发展中英民航事业问题。

△　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梅农，面交《中印通商友好条约》中方条约草案，其中第二十九至三十一条系有关西藏事务。叶指出：1908年《中英续订印藏通商章程》将于1948年4月20日届期，中国愿与印度讨论修改问题。

△　上海棉纱市场因经济警察监视及银根抽紧等原因，价格急剧回降。

10月15日　山东解放军攻占诸城。

△　刘伯承、邓小平所部攻占湖北礼山县城和宣化店。

△　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秘书长张耀章，对《无许可证自备外汇到埠及起运货物处理办法》发表评论认为：此乃政府得利、进口商受苦之举，实在太不公允。

△　国民政府派谢家声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理事会会议代表，陈之迈为副代表。

△　世界女青年会代表大会在杭州开会，美、英、法、德、捷克、印度、印尼、朝鲜及中国等25个国家代表参加。宋庆龄、宋美龄出席开幕式。17日闭幕。选出美国代表包恩慈为会长。

△　中央研究院第二届第四次评议会开幕，评议长朱家骅主持。会议经各评议员讨论决定第一届院士候选人，计人文、生物、数理三组共150人，俟四个月后再开评议会正式选举，最后当选之院士定为80至100人。10月17日闭幕。

△　民社党发言人徐傅林向记者发表谈话，声明“若民社党不能获

得国大代表400名，立法委员100名额，该党将保持在野党地位，放弃本年普选”。

10月16日　　蒋介石巡视青岛。19日主持军事检讨会议，研讨部队部署问题。

△　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该军主力1.7万人离石家庄北上保定，企图在保北徐水地区夹击晋察冀野战军。18日罗军到达定县。晋察冀野战军改变部署，调集主力自保北南下围歼罗军。

△　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副厅长赖希木江复函张治中，提出四项要求作为谈判先决条件：一、撤换现任省主席麦斯武德；二、释放被捕所谓暴动分子；三、禁止政治关系捕人；四、彻底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

△　上海市警察局派经济警察会同纺调会抽查各大纱厂并监视各交易市场。各市一致下跌。特粳75万元，次日再下降至73万元。12磅龙头细布81.5元，次日又跌为77万元。纱市42支兰凤降为3200万元。

△　淞沪警备司令部拟就《平抑物价紧急办法》，是日下午派专员送南京蒋介石核阅。警备部发言人称：紧急措施是一种很严厉的非常处置。

△　全国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南京开幕，到各地代表29单位83人。通过宣言、章程，并选举理、监事。19日闭幕。

△　《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在日内瓦成立。美国国务院在公布这一协定的分析报告中称：中国政府已答应对美国110项物品减免进口关税，其中包括普通消费品、烟草、干果、军用物资飞机及棉花、无线电、汽车、食粮、燃料、曳引机等，或维持现行税率15％不得再行加增，或按现行税率再减低16.7％。美国则答应对中国军用原

料如钨矿等物品的某些关税“让步”。

△　魏德迈致函美联合援华会妇女部副部长柯立治夫人，主张援助中国，但援助必须在美国监督下进行。

10月17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发表《中美换文声明》，称：“现在驻扎中国领土之美国武装部队，系由中国政府之同意而驻扎。”

△　国务会议通过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案，并决定自本月起实行。

△　东北民主联军攻克阜新、九台。

△　进出口商业同业会秘书长张耀章等代表16业公会至中央银行约见张嘉璈，对自备外汇善后处置细则提出物为原主承售等要求。

△　国民政府与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商定，拨给台湾省法币5500亿元。第一次2000亿以台糖5000吨作价，余3500亿以樟脑90万磅、凤梨10万箱、茶叶30万磅、糖2500吨四种物资作价偿还。另外拨给美金950万购化肥9.5万吨，内80％购自美国，余购自智利等处。

△　中国民主同盟英国伦敦支部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宣布该支部正式成立。

10月18日　张群在参政会报告内外情势：外交不偏不倚，对日和约须保持否决权，东北局势已经转稳；对于平定物价将有具体对策。

△　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接见记者谈进京任务及受蒋介石召见情形称：蒋介石特别面嘱要尽量加强经济警察工作，并允派拨装甲车40辆给警局，以加强镇压。

△　国民政府向加拿大政府商购剩余“蚊式”飞机150架谈判完成。

△　滇南民变武装遍布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附近的石屏、元江、龙武、新平等县广大地区。是日，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副司令马铿等专车赴开远，召开各部队及专员县长会议，以谋应付。

△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上午举行常务会议，朱家骅主持，杭立武、陈立夫、胡适、茅以升、郭连峰等委员出席。会议通过张约翰等六篇硕士学位候选人论文；核定袁翰青等30人合于专科以上学校教授资格，张光炎等23人合于副教授资格，张志岳等33人合于讲师资格，胡佩英等131人合于助教资格。

10月19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纽约发表声明，主张朝鲜应获独立；朝鲜撤兵日期及条件由联合国大会与莫斯科协定签字国协商决定。

△　中华儿童教育社第十二届年会在南京励志社举行，由马客谈主席。

10月20日　　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地区围攻第三军。战至22日，全歼第三军1.7万人，俘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及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等人。

△　外交部长王世杰离美取道日本回国。23日在东京会晤麦克阿瑟。

△　国民政府特派竺可桢为本年高等考试初试典试委员长，狄膺、闻亦肖、刘师舜等29人为典试委员。

△　据海关税务署统计，自今年1月截止到是日，全国各海关缉私1.7886万件，总值1450余亿元，其中以粤海关走私案件最多，江海关价值最巨，占总值33％强。

△　天津轮船业公会作出紧急决定，指出美议会访华团团长亚蒙

所谈开放内河航运完全漠视我国主权，航业界应严正表示，纠正其错误观念。23日，中国轮机师总会亦发表声明，申述维护航权之决心。

△　美国务院声明：魏德迈对中国与朝鲜之报告暂不发表。

10月中旬　　上海市物价继续上涨，米、食油、肉、煤、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平均涨幅在30％以上，美钞黑市价格13日高达9.1万元左右，黄金市价每两高达350万元。据上海经济观察家统计，米价以1936年为基础，现已增高八万倍，棉纺织品则增高10万倍。

10月21日　　民社党就国民大会代表名额问题与国民党达成协议。

△　“联总”署长鲁克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联总”已和国民政府就“联总”中国善后救济工作结束后的种种问题达成协议。

△　西北野战军攻占宜川县城。董钊率国民党军来援，24日复占宜川。

△　行政院第二十六次会议，免去茅以升国立北洋大学校长职，改任刘仙洲为国立北洋大学校长；免去臧启芳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职，改任刘树勋为国立东北大学校长；任李士珍为中央警官学校校长。

△　上海市公用事业涨价已经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核定。电费、电话费、煤气费自10月1日抄表日起计算追收，其余电车、公共汽车等均自今日起涨价。

△　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是日开始接受自备外汇到埠物资商人之申请登记。

10月22日　　蒋介石自青岛赴上海，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详细询问上海物价波动情形，指示无论如何，必须彻底平抑

物价。上海市政府随后举行经济会报，研究蒋介石指示并商讨具体办法。蒋介石当日返南京。

△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指示职员工作方向12条，主要为：对东北热河及陇海路以北区域，采取“维持生产”，对中部、南部以及西南等区今后须“加强经营”；对台湾则须“发展进步”，“努力经营”。

△　“联总”、“行总”及国民政府社会部在上海“行总”办公厅举行会议，商谈“行总”结束后所遗赈济业务及剩余物资之接管问题，签订《处理剩余救济物资协定》，规定“行总”结束后，剩余救济物资交社会部分配。

△　“联总”署长鲁克斯返美。“联总”中国分署署长克利夫兰偕同返美。

△　刘邓大军占领九江、汉口间之武穴、黄梅、广济一带，是日起，由上海上驶之大小轮船均停九江，九江江面已戒严。长江中下游一带航运宣告中断。

△　福建省政府通令各县修筑碉堡，以配合民众自卫力量，限年底完成。福建省各县、市民众自卫队，已组成41个总队，476个大队，5212中队，员丁共64.9万人，长短枪2.1万支。

△　河北高等法院宣判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死刑。

△　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锦承线上之朝阳。

△　全国经济委员会例会通过经济部提出之《棉纱凭证联合配销办法》。

△　纱布市场价格回升。42支兰凤为3180万元，25日涨至3350万元。12磅龙头细布为83.7万元，24日涨至89.8万元。

10月24日　　张群到台北参加台湾光复二周年纪念会，并视察台省行政及工矿交通事业。下午发表谈话称：政府重视台湾经济建设，台币制度目前不会改变。

△　孙科、吴铁城、陈立夫邀民社党、青年党举行小组会，讨论跨党分子参加竞选国大代表之处置办法。民社、青年两党均表示：如证件属实，确为跨党者，两党愿将原提人选退出，另提他人。

△　国务会议通过修正之《出版法》，该法凡六章43条，其要点为：一、禁登载事项：（1）意图颠覆政府及危害中华民国者；（2）妨害邦交者；（3）意图损害公共利益及破坏社会秩序者；（4）妨害本国及友邦元首名誉者；（5）妨害善良风俗者；（6）妨害他人名誉及信用者；（7）对正在诉讼中之事件加以批评者。二、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件之纪事。三、外人必须遵守本出版法一切法律发行出版品。四、国外发行出版品凡有违反此规定者，内政部得禁止进口。

△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周以德抵北平访问。

△　山东解放军收复著名矿区枣庄。

△　教育部核准第二届自费留学生出国名单，计美国918人，法国53人，英国25人，瑞士36人，加拿大九人，荷兰一人，比利时四人，澳大利亚二人，瑞典一人，墨西哥一人，共1050人。

10月25日　　国民政府全国选举总事务所宣布：选举如期举行。国大代表选举正式投票日期为11月21日至23日三天，当选人名单于12月2日公布。

△　国民党中常会暨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上午举行联合会议，通过国大代表候选人审查小组名单：第一组苏、浙、闽、台、皖、京、

沪，共30人。召集人为朱家骅、陈立夫；第二组豫、鄂、湘、赣、汉，共22人，召集人为居正、李敬斋；第三组粤、桂、川、康、滇、黔、渝、穗，共34人，召集人为孙科、白崇禧；第四组晋、冀、鲁、察、热、绥、平、津、青岛，共18人，召集人为张厉生；第五组陕、甘、宁、新、青、西安、蒙、藏、回教生活习惯不同之民族，共27人，召集人为于右任；第六组东北九省三市共11人，召集人为朱霁青；第七组职业团体、妇女团体，共30人，召集人为谷正纲。

△　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农艺系四年级学生于子三及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四人被杭州市警察逮捕。

△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致函校长胡适，表示自是日起全体罢课三天支持教授罢教行动。

△　台湾全省休假一天庆祝光复两周年。上午九时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光复节纪念大会，行政院长张群发表演说。下午2时，全市举行化装大游行。

△　台湾省参议员建议行政院长张群向日本追偿日人过去所欠台湾的国债款台币11亿元及股票120亿元；要求日本赔偿硫酸铔厂一所。

△　琉球革命同志会请行政院长张群索回琉球。

△　河北、北平、天津21个民众团体在北平国际联欢社招待记者，反对行政院将门头沟煤矿发还麦边与周奉璋。指出麦、周二人出让矿权与日本人及与日人合作之事实，并将麦、周与日人白鸟来往函件多种，于会中交记者传观。

10月26日　　蒋介石指示行政院与内政部，要求加紧民众“戡乱”动员工作。

△　西北野战军发起第二次榆林战役，集中六个旅攻榆林。至31

日，攻占飞机场等外围据点。

△　王世杰在东京发表谈话称，对日和约中国将坚持保留四强否决权，中日未来关系，须视日本黩武主义是否扫除而定。

△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明令公布接受《中国土地法大纲》为边区土地法，并立即实施。

△　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陈留县城。

△　断绝三日之汉、浔水上交通，是日恢复客货轮航行。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乘“永绥”舰赴武穴江面巡视防务，并亲自指挥“护航”。是日，海军开始“护航”，但一律暂停夜航。29日，桂永清再度赴武穴、圻春江面一带，视察江防。30日下午返九江后对记者称：武穴至浠水江面防务巩固，可保无虞。

△　中央合作金库第一届库务会议在南京召开，到总库及分支库代表100余人。定11月1日闭幕，并以11月1日为该库成立纪念日。

△　全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南京文化会堂开幕。到中国教育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儿童福利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17个团体。年会讨论主题为“民主与教育”。

△　国际学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强烈抗议国民党血腥镇压中国学生运动，要求立即释放一切被捕学生和教授，停止法西斯恐怖。理事会并开除由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大学生联合总会”的团体会员籍。

10月27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往牯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华中战局，并对长江防务作出部署。

△　内政部宣布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应视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份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

缔”。

△　民盟在沪负责人张澜、黄炎培、史良、章伯钧等会商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后之办法，决定民盟不得已时可停止活动，并派黄炎培、叶笃义赴南京交涉。

△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揭露美、蒋政治阴谋，强调：“我们必须彻底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政纲，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或改良主义政纲。”

△　刘邓大军攻占长江北岸重镇团风、武穴后，政府方面急调整编四十师及整编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由黄冈、浠水向广济急进，人民解放军于广济以西高山铺地区预设伏击阵地，国民党军陷入重围。今晨9时，解放军全线发起总攻，国民党军向西南突围，经八小时激烈战斗，全歼整四十师师部、第一〇六旅、第三十九旅之第一一五团及整五十二师之第八十二旅全部等，共1.26万余人，其中生俘9562人。

△　国民政府免去宋子文国民政府委员职，任丁惟汾、黄绍竑、颜惠庆为国民政府委员。

△　国民政府免去黄绍竑监察院副院长职，任刘哲为监察院副院长。

△　行政院修正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

△　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联谊会在南京社会服务社招待记者，发表给蒋介石之快邮代电，670余人联名签署，要求召开国民大会临时会议并延期选举。

△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支持教授罢教行动，组成争温饱委员会，致书北大师长，表示在共同道路上全力争取生存。

△　昆明市学联发动全市性冬季助学运动，许多学校临时停课，学生们卖报、洗衣、义卖、劝募以助学。云南当局拘捕赞成助学运动的政府公务员李仁荪夫妇及新民书店经理王平，封闭新民、华侨、金马等书店，并具文给云南大学要求在昆明市学联及云大自治会工作的学生于月底前到云南警备司令部“自首”。

△　《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救济援助中国人民之协定》在南京签订并生效，规定美以粮食、医药、燃料等270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国民政府。12月19日追加1800万美元。

△　外交部公布中缅两国正式互换大使。迈因为缅甸首任驻华大使，涂允檀为中华民国首任驻缅大使。次年1月21日，涂由上海启程赴任。3月3日，向缅甸总统呈递国书。

△　冀、平、津29个团体致函敌产处理局并分呈行政院、监察院，请收回将门头沟煤矿发还麦边、周泰璋之成命。

10月28日　　昨日返京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到牯岭向蒋介石报告赴美经过。

△　张群自台湾返南京。

△　黄炎培晤张群，谈商民盟事。张群表示向各方接洽后再谈。

△　重庆行辕发言人宣称，民盟已被宣布为非法团体，本行辕辖区内的所有民盟分子及民盟有关组织，限于11月底前办理脱离手续，逾期不予保护，并将依法制裁。

△　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罗隆基南京住宅被搜查。

△　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为南京政府非法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发表声明：民盟是一个坚持民主和平的公开合法政治团体，言论行动，世所共见。按任何国家，除法西斯独裁者外，无不容许有和平

的反对党派的存在。我们今后当为本盟一贯的主张与目标，继续奋斗，再接再厉，为中国和平民主之实现而努力。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

△　行政院第二十七次会议，任马师儒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10月29日　刘邓大军自8月29日进入大别山，两个月来，共歼国民党军3.3112万名，其中生俘2.1552万名。先后攻克广济、浠水等县城23座及武穴、宋埠等重要据点百余处，建立了独山、商城、礼山等33个县政府及军区、行署等各级军政机构，解放了人口500余万之豫东南、鄂东、皖西广大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

△　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发表谈话，谓民主同盟是“国家之叛徒”，并希“治安机关不任其逃出国境”。

△　张君劢、李璜致书张群，盼对民主同盟适可而止，不必株连。

△　国民政府粮食部制定公布《田赋征实暨征借粮食考成办法》。规定各县（市）经征官于截限以前，照该县（市）应征、应借数收足八成五以上者嘉奖，九成以上者记功一次，九成五以上者记大功一次，照额全数征齐者记大功二次，并给予特奖；征收不足八成五者申诫，不足八成者记过一次，不足七成五者记大过一次，不足七成者记大过二次，不足六成者免职。《办法》同时规定各省级经征官于截限以前，照该省应征数应借数收足八成以上者嘉奖，八成五以上者记功一次，九成以上者记大功一次；九成五以上者记大功二次，照额全数征齐者给特别优奖。征收不足八成者申诫，不足七成五者记大过一次，不足六成五者记大过二次，不足六成者免职。

△　前被捕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于晚6时20分被国民党特务用利器杀死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浙大校长竺可桢闻讯后即往

趋视，见于生倒卧床上，咽喉有创口。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称：“于子三畏罪以玻璃片割喉自杀身死。”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三生是晚移送杭州高等法院。

△　美众议员周以德抵南京。声称美将迅速援华。

△　国民政府特任驻秘鲁大使保君建兼中华民国驻玻利维亚国特命全权大使。

10月30日　　民盟负责人黄炎培与罗隆基拟定会见张群时的方案，或由政府下令解散民盟，或由民盟中央总辞职，解散民盟总部，各地盟员停止活动。

△　上海市警察局卢家湾分局、黄浦分局，下午4时分别派员接收中共请民盟代管之思南路107号（新号73号）及朱葆三路25号新华日报社旧址房屋。

△　浙江大学学生因于子三案举行罢课并示威游行，号召杭州及各地学生举行总罢课，共同声讨政府屠杀青年罪行，并要求公开审讯另三名被捕同学。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宣布杭州戒严。

△　立法院举行常会，讨论通过两提案：刘舆训等人所提《请政府通知各政党，将现任立委除自愿放弃竞选者外，一律由各政党提名支持为立委候选人案》，谭惕吾所提《请规定女立委候选人遴选标准，送请主持选举之最高决定机关采纳施行案》。

△　国民政府举行海军修造会议，详细研究新海军之建设技术问题。国防部长白崇禧出席，11月6日会议闭幕。

△　全国经济委员会例会通过煤价提高40%。

△　经济部处理日本赔偿物资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主任委员童季龄，副主任委员顾葆常，委员吴承洛等16人。

△ 张治中在台湾新竹会见被拘的张学良。

△ 美众议员周以德晤张群、王世杰。

10月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布10月份战绩：共歼灭营以上国民党军三个师部、69个团，又三个营，另起义一团余。共消灭国民党军兵力17万人，其中俘10万人，俘国民党军将级军官21名、县长11名，毙将级军官四名。收复县城106座，国民党军占74座，得失相抵，人民解放军得32座。至此，解放战争第二年头四个月（7、8、9、10月）内，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45万人，解放县城235座，国民党军占县城185座，得失相抵，人民解放军得50座。

△ 黄炎培会晤张群，张表示，政府对民盟不再下解散令，民盟自行结束。

△ 国务会议否决国大代表联谊会书面请求召开临时国大之建议。

△ 参谋总长陈诚在沈阳召集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与东北将领郑洞国、董彦平、廖耀湘、周福成等举行军事会议。

△ 国民政府公布《善后事业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会业务以涉及二个部、会以上或非一个部、会所能单独执行而需集中办理者为限，其业务范围为：一、黄泛区复兴；二、渔业机轮；三、机耕及农具制造；四、乡村工作示范；五、其他未完成之善后事业，经行政院核定交办者。

△ 国民政府准免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本职。

△ 行政院临时会通过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全文，并送立法院。

△ 四川省政府通令各县、市加强地方武力，编组乡镇警察队。

本月已编乡镇警察队4600余队，大巴山已建碉堡1400余座。

是月　　陕北各界举行杜斌丞追悼会，毛泽东题“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在杜武丞生前，毛泽东曾誉杜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周恩来称杜是“革命的教育家”。

△　晋冀鲁豫解放区自反攻以来，收复永年、博爱等18座县城，歼国民党军3.5万人，形成巩固的战略优势。解放区仅陇海路以北内线地区即有县城125座，人口3000万。

△　晋冀鲁豫军区自本年6月至今，五个月中共释放国民党军军官3992名，其中包括第一一九旅少将旅长刘广信等将级军官五名。并发给足够路费，有病者派给牲口或担架。另有国民党军军官1118名则因其自愿要求，被批准参加人民解放军。

△　国防部在上海专设监狱，集中监禁战犯，监狱长为邹任之少将。是月开始，各地已判处徒刑之战犯将集中在此执行。

11月

11月1日　　黄炎培会晤张群，商定由黄致函张再由张答复方式宣告民盟解散。黄要求文件中必须公告盟员免除向政府登记手续。3日，张群约见黄炎培，表示取消换函方式，改由民盟自行发出解散启事。

△　陈赓、谢富治兵团在河南发起伏牛山东麓战役，26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经此役豫鄂陕解放区扩展到南临汉水、北至陇海路、西越丹江、东至平汉路的广大地区。

△　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时期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定自是日起施行。同时废止现行之《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

△　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废止《复员期间劳资纠纷评断办法》。

△　行政院废止本年4月11日公布之《兵役奖征规则》。

△　广东、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分别通令各县、市，是日起实施“冬防”。南昌、苏州市亦开始冬防，并实行宵禁。

△　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第六次委员会议拟订通过之《无许可证自备外汇到埠货品处理办法施行细则》，即日施行。货款仍定三年发还，但存单可以转让。

△　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之代表对合众社记者称：一俟对日和约批准，即应允许日本加入联合国。中国虽与日作战长逾十载，然对日本并无永久憎恶之意。日本于履行其战败国所负全部义务后，即必须应允其立足于国际社会。

△　中华民国法学会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律师公会举行，推选居正、谢冠生、章士钊、邵力子共82人为理、监事。大会闭幕后，举行第一届理、监事会，推选居正、邵力子等14人为常务理、监事，并决定下届年会在北平举行。

△　吴贻芳、程修龄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大学妇女会，下午开成立大会，到会员百余人，晚7时结束。

11月2日　　西北野战军二次攻击榆林城未果，改用坑道作业。9日爆破，但因协调不好，攻城失败。

△　冀热辽军区部队在义县以西九台关门附近歼灭企图驰援朝阳之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俘该师师长郭惠苍。

△　英议会访华团在南京国际联欢社招待中外记者，团长亚蒙勋爵就所作外轮航行中国内河之提议作出解释。亚蒙宣称：“余所建议

者，仅为汉口及南京等港口应重新开放，一如同样情况下，广州、厦门、汕头、上海及天津之对外远洋巨轮之开放者然。”

△　昆明各校停课，全市大、中学生三万余人在云南大学操场集合，分队向全市宣传演讲、演街头剧、义卖、募捐，展开助学运动。

△　上海三轮车工人为反对车租涨价，一度罢工。上海市警察局嵩山、邑庙、卢家湾分局开出警备车，驱散三轮车工人，并拘捕66人。

△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理监事会议，讨论修正通过出席第十四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人选及足球、篮球、田径、游泳遴选训练办法，并决定中国参加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为孔祥熙、王正廷、董守义三人，总领队为王正廷，总干事董守义。

11月3日　蒋介石召见白崇禧，指示在九江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负责“进剿”大别山区，并决定自津浦线及胶东调五个师至大别山附近，以形成合围之势。

△　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偕美军顾问团团员七人飞台，筹划训练新军。

△　华东野战军山东部队攻占胶东之招远县城。8日收复平度县城。21日收复胶县县城。27日攻克高密县城。

△　加拿大政府支援国民党军之2500吨机枪子弹及大批军火，是日于加拿大东岸之蒙特利尔移交中国。加拿大海员工人联合会、青年工人联合会等团体在蒙特利尔举行群众大会，一致反对加政府以军火援助中国内战。

△　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负责人是日谈接收东北敌产情况：自上年9月1日起至今年8月底止，共接收4962单位，估计约值流通券（下同）1181亿元，其中工厂约值868亿元，房地产约值231亿元，码头

仓库约值1436万元，物资约值14亿元，其他约值68亿元。

△　中国驻日代表团是日对记者称：盟军总部已正式照会日本政府，限其于今年底将战前之中国永利化学公司硝酸厂偿还中国，该工厂全部共值50万美元。

△　全国轮船联合会对英议会访华团团长亚蒙所主张开放长江京、汉两埠之内河航行权，再次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坚决反对。谈话指出：开放长江京、汉两埠之内河航行权，必使中国出现一线曙光之幼稚航业永无出头之日。

11月4日　蒋介石电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令抽调暂三军一部入关内增防。

△　美国务院宣布，根据中美两国签订之“联总”结束后对中国3000万美元之救济协运，美将采办小麦五万吨，食米7.3万吨（价值2700万美元），于月底起运抵沪。

△　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将民盟解散启事交给张群。张群随后通知黄等，表示认可启事稿。当日下午，黄、罗、叶三人离开南京去上海。

△　日本归还中国之轮船——“和顺”轮晨抵沪，日战犯、原日本“出云号”旗舰舰长、海军中将原田清一等四人，亦被押解抵沪，同时载来战前被日人劫走之历朝古书800多册。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交通部第二交通警察总局组织条例》。

△　教育部发表民国三十五年全国各省、市设公私立中学之统计数字，共恢复及新设公私立中学1430所。

11月5日　新闻局长董显光为民盟宣告解散事发表谈话称：“因民主同盟种种不法行动，使政府不能再视该盟为合法团体，然政府之

政策不拟拘捕该盟盟员，亦不强迫彼等必须赴治安机关登记。倘民盟不再有违法行动，仍可受法律之完全保障。中央政府即将通令各地遵照办理。”

△　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在上海举行中央扩大会议，黄炎培报告与国民党交谈经过，议决民盟自即日起解散，各地盟员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沈钧儒、史良等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因形势所迫，解散决定最后被通过。

△　新华社发表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民主同盟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就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幻灭。时评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和在各大城市中大施迫害民主分子，其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和加重南京统治的异常急迫的危机，而决不能丝毫减轻这个危机。时评又指出：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和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结束。共历时50天，歼灭国民党军七万人，扩大解放区3.8万平方公里，收复城市17座。国民党军在东北被迫收缩到34座城市及附近地区。

△　晋察冀野战军集中三个纵队及六个独立旅攻击石家庄，9日占领外市沟各点。

△　冯玉祥在美国《民族周刊》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的谈话。

△　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开幕。出席会议者100余人，司法行政

部长谢冠生主持。

△　美议员周以德离华返美。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柯克率一舰队抵台湾。

△　全国渔业公司联合办事处及上海市渔轮业同业公会招待记者，坚决反对“行总”渔业物资管理处假救济之名经营渔业，在沪倾销全部鱼货，致使鱼价惨跌，民营公司无法生存。要求把“行总”的渔业物资分配给民营公司，真正达到救济目的。渔业界并电呈行政院长张群、农业部长左舜生，要求迅速令饬渔管处停止捕鱼，以维护民营渔业的生存。

△　教育部重申前令，严禁战时敌伪所编中小学各科课本，学校需采用经教育部审核合格之教科书。

11月6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公告，说明民盟已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经与政府洽谈后，决定即日起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即日解散。同日张澜又发表声明，表示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

△　青、民两党对国民党方面交出的两党候选人名单都表示不满。张君劢致信吴铁城、陈立夫说，“兹经本党中常会议决认为，台端所提名单中，于本党前提之重要人员，漏列甚多，倘照此公布，将令全党哗然，有碍于目前合作之局，断难同意”。左舜生、余家菊、刘东岩致信陈立夫、吴铁城、张厉生说，“本党对先生等未经采纳本党所请增改之意见，而公布之名单，势必难以承认也”。两党都又另提了名单。

△　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午举行例会，通过《让售国营事业办法》，采用发行股票方式，由银行组成银团经募。同时，通过电、自来水、煤气、电话、电车、小火车、公共汽车、轮渡八种公用事业价

格计算公式，规定以燃料生活指数及外汇价格为标准，明年1月1日起，作公用事业价格自动调整计算之用，地方政府及主管机关亦以此公式作为审核价格之标准。

△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总罢课一天，并在校内“局部绝食”，抗议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惨遭杀害，及国民党在各地逮捕屠杀学生的暴行。各校学生在市内向公众为于子三募捐，并在各处广贴标语。

△　昆明3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以限期登记共产党分子为借口非法捕人。

△　在蒋介石电令下，宁夏马鸿逵派出援军三万余人，绥远傅作义派出援军6000余人，分由三边、包头出发，增援榆林。

△　美国儿童急救基金会决定将价值美金350万元之救济物资分配中国，作为儿童救济之用。

△　英国议会访华团离开广州回国。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举行第二届全体大会。次日，推选墨西哥教育部长费达尔为主席，通过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及瑞士四国入会，全体会员增至38国。中国政府代表杭立武为该组织行政及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19日，陈源再度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1月7日　北平各校联合举行于子三烈士追悼会，警察捕去学生六名。

△　昆明二万余学生整队示威游行并赴云南省府请愿，包围省府主席卢汉住宅，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　清华、北大教授163名联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立场，吁请政府尊重宪法权利。燕大外籍教授亦在燕大师生联合宣言上签名。

△ “行总”是日公布“联总”与“行总”的合同，决定将渔业管理处保管的“联总”机动渔轮及各种辅助渔船，大约半数卖给民营渔业公司，保留十分之一的渔轮，作为渔业研究机关或训练机关使用，其余部分供设立公营或公私合营渔业机构。

△ 东北缺煤，锦州、锦西两发电厂因存煤用尽，是日起停工。

△ 教育部发表民国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国立中等学校校数：一、国立中学七所，师范三所，职业学校14所。二、国立边疆中学四所，边疆师范12所，边疆职业学校八所。三、国立华侨中学二所，华侨师范二所。四、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附设中学18所，师范一所，职业学校13所。

△ 上海市政会议讨论通过分期禁舞实施办法，决定明年4月至9月底分期抽签禁绝。

11月8日 蒋介石约见五院院长及有关部、会负责人，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决定选举照常进行。

△ 中国民主同盟华南支部在香港《自由中国文摘》发表声明宣称：今后仍本为和平民主而奋斗之素志继续努力，绝不因独裁政府之非法压迫而停止其活动。

△ 中国代表顾维钧在联大政治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投票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

△ 周以德会见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说“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的内战不能结束，共产主义不能被遏制；而美国的援助必须是全面的，包括道义、军火的援助以及大规模训练军队”。

△ 苏联代表在伦敦四国外长代表会议发言，反对邀请中国参加起草对德和约。

11月9日　陈毅、粟裕部向陇海路徐州、兰封段发动破击战，至18日结束。控制了500里铁路线。同时在徐州、固镇间破坏津浦路30余里，摧毁铁桥10余座，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大部及江苏省保安第一团和砀山、虞城、单县保安团、宪兵队全部。解放砀山、虞城、夏邑、民权、萧县、巨野、嘉祥、沛县、鱼台等九座县城及17处车站和据点多处。

△　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纽约成立，冯玉祥被推为主席。大会宣言反对美国援蒋。

△　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继续罢课，为于子三治丧，酝酿游行呼吁人权。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说劝令学生复课，“能否生效，实无把握”。

△　上海22家舞艺传习所开会，决定推代表就政府停闭舞校事向市府、参议会、社会局、警察局等机关请愿。

11月10日　蒋介石召见国防部长白崇禧，令其赴九江设国防部长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策应南京安全。

△　选举事务所公布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之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国民党为1758人，青年党为288人。民社党为争得其所提260名候选人，致费周折，15日再公布时仍只238人。

△　晋察冀野战军对石家庄发起总攻，至11日突入市区，进行巷战。

△　美国务卿马歇尔向两院外交委员会声明：“美国与其他世界列强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之合法政府”，并宣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政府及其人民以相当经济援助与协力”。

△　外交部发表声明：坚持必须参预关于对德和会一切程序问题之决定，任何决议如无中国政府之同意，不得视为有效。

△　《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在南京签订。

11月11日　　京、沪、杭学生为抗议于子三事件相继罢课。南京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女大、上海交大、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纷纷罢课，并召开追悼大会，发表《告同学书》，《告同胞书》，节食捐款，慰问浙大同学。

△　美国务卿马歇尔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建议美国议会自明年4月起拨款三亿美元援助中国，其办法为每月付2000万元，共付15个月。并称：中国之通货膨胀已临“非常之程度”，中国之财政已因军事预算而渐成空竭。

△　行政院会议通过设立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及其组织规程，以配合中美救济协定之执行，并推定缪云台为主任委员，派顾毓琅为委员兼主任秘书联络专员。

△　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闭幕。共议决提案580余件，并通过宣言。

△　行政院免去松江省府委员兼主席关吉玉本职，以原省府委员洪钫暂代主席职。

△　行政院公布《执行没收汉奸财产联系办法》。

△　由全国工业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行政院批准，是日为第一届工业节。上海市工业界在各报出版特刊，并于上午10时，在上海新新第一楼举行庆祝大会。

11月12日　　苏、皖、豫、赣、湘、鄂六省绥靖会议在南京举行，各省主席王懋功、李品仙、刘茂恩、王陵基、王东原、万耀煌出席，讨论建立地方武力、加强各省联系及厉行政治战斗体制等问题。

△　晋察冀野战军解放拥有近30万人口之工业城市石家庄，全歼

国民党军2.4万人，俘守军师长刘英等，开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之先例。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发表《台盟对当前的政治纲领》、《台盟章程》及《对时局的口号》，提出台盟以团结本省人民、争取台湾自治、响应全国人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斗争为宗旨。

△　行政院发出《奖励密告提示要点》，希借此达到“肃清贪污、整饬吏治”。

△　上海青年会为配合国大进行宣传，主办“中国青少年民主实验共和国”团体，模仿民主议会组织，设中央及地方各级机构，并举行国会议员选举。参加此团体活动者为12至18岁之青少年913人，是日下午举行“共和国”成立大会。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希望国民政府扩大政治基础，更近民主，美国始能有所作为。

△　中央银行通知各指定银行：进口远期付外汇停止结售，出口远期结汇仍维原状。

△　上海市商会举办之商品陈列所在上海开幕。主席徐寄庼致开幕词称：陈列所诞生于民国十年，距今已有27年。“八一三”抗战后停办。此次陈列，参加厂商450家，陈列商品一万多种，大小橱窗376架。

11月13日　　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自京回沪，接见记者称：蒋介石面嘱今后必须加强物价管制，对工人活动须特别谨慎。

△　驻美大使顾维钧访马歇尔，为美援作紧急呼吁。他称：“中国局势实为战后世界全局之一部分，以汉鼎为喻，美、欧、亚为三足，欧、亚均弱；三足中如缺其一，此鼎即不能站立。”

△　国民政府免驻联合国代表兼安全理事会代表郭泰祺本兼各职，特派蒋廷黻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兼安全理事会代表。

△　北平公共汽车公司员工因待遇菲薄罢工，全市五条线60余辆汽车仅开出一辆。

11月14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务会议，听取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军事报告，内政部长张厉生关于国民大会选举准备工作的报告。蒋在会上说："国军现在战略，在华北、东北仅图控制北宁、平绥两铁路线，将集中兵力消灭华中共匪。"并称："今冬消灭刘伯承部。"

△　美大使司徒雷登会晤蒋介石，表示美援尚待时日。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向联合社记者宣称，美国务卿马歇尔建议以三亿美元助华，无异沧海一粟。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偕随员尼斯少将等八人应宋子文邀请赴广州。

△　青年党发出"合作竞选"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共策竞选互助"，以求国民党对其进一步的支持。

△　厦门大学学生罢课，抗议于子三被害事件，并发表宣言。

11月15日　立法院例会修改各省、市、县参议会法规，决定用"遴选方式遴选各党人士共同参加"各省、市、县参议会，以使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地方政权。

△　宋子文继张发奎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黄镇球任副主任。张发奎改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　北平行辕照准原驻津第六十二军军长兼警备司令林伟俦呈辞兼职，改由保定绥署副主任马法五兼任天津警备司令。

△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公共关系局答合众社记者称：美国军事顾问团将负责接管步兵师团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原隶属于中国陆军总部，业已设于台湾，由孙立人负责。

△　天津市开始冬防，宵禁提前于晚10时半至翌晨6时，军警加强戒备，驻军数量亦增加。

△　立法院批准《中荷航空协定》。

△　中央银行规定《公费留学生结汇手续》。

△　国民政府任命陆志鸿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　中央研究院发表公告称，经本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大会依法选定第一次院士候选人，数理组江泽涵、华罗庚、熊庆来、吴有训、周培源、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等49人，生物组王家楫、贝时璋、童第周、林可胜等46人，人文组吴敬恒、冯友兰、胡适、郭沫若、梁思成、王世杰、马寅初等55人。

△　上海市场上半月物价继续上涨。米价4日特粳重叩70万元大关，上白粳68万元。5日、10日，上市警局派出大批经济警察四出侦查，监视交易，本市又因各路客货到埠，价格止涨转跌。锡粳5日66万元。13日又挫落为64万元。布市因汉、渝客帮及同业竞购，直线飞升。12磅龙头细布7日午收93.5万元，晚收97.5万，8日升至99万。13日又猛升至104.5万元。14日飞升至110万，15日稍挫，跌至106万。纱市亦疾速飞扬，42支兰凤7日叩3500万关，8日，升至3650万，13日，升已3820万，14日，更飞升至4150万，且转至场外极秘密之交易，15日跌至3950万。

11月16日　　西北野战军15日在元大滩地区击退马鸿逵援军，但马军改道继续援榆。西北野战军决定撤围榆林。

△　台湾省东北部宜兰及罗东区洪水成灾，农田被淹9000余町

（合百余万市亩），受灾人民约3.2万，损失总计达台币20亿元。

11月17日　蒋介石接受法国政府所赠最高军事勋章。

△　张群致书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谓军事、经济情势愈加严重，请求紧急救济与长期援助。

△　国民政府照会美、英、苏三国，建议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但须保持中、美、英、苏之否决权。

△　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张彭春驳斥苏联代表指责中国侵略蒙古之说。

△　有关当局不顾平、津各界的反对，决定将门头沟煤矿发还原主，并发表谈话称："河北省门头沟煤矿公司原系国人周奉璋与英人维廉·麦边合伙组成。太平洋战争发生，该矿即为日军部接办。胜利后，由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接收。因周奉璋等不服处分，向行政院提起诉愿，后决定撤销原处分，将矿产全部发还。"

△　行政院因铀、钍矿产走私出口影响国防工业，拟定禁止开采、绝对禁止出口、收购及通知海关严密查禁等五项办法。

△　教育部发表抗战中全国各级学校所蒙受之财产损失数。据各省、市呈报统计：自七七事变至1945年9月止，除东北各省教职员私人损失及珍奇、古物、文献之损失不计外，依照战前美金一元合国币3.93元之价格折合美金计算，总数已为9.66023亿美元。

△　基督教卫理公会上午在福州天安堂举行来华传教百周年纪念大会，到中外人士1500余人。

11月18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剿匪"方案。要点：一、加强军法职权；二、加强中央与地方之组织；三、各地组织动员"戡乱"运动委员会；四、充实地方团队自卫武力。

△　行政院会议通过苏、皖、豫、赣、湘、鄂六省联防方案。

△　行政院会议通过各省、市新闻处设置原则六项；另决定任命粤省府主席宋子文兼该省军管区司令。

△　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傅作义、孙连仲及行辕高级人员举行军事会议，以加强河北军事部署。

△　“联总”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原定接济中共区域之物资五万吨，改在国民政府辖区分配。同日，“联总”宣布成立一托事会，并规定一切善后计划受托事会监督。

△　资源委员会决以台湾为经济建设主要基地。

△　上海前公共租界、法租界官有资产及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开第九次会议。上海市长吴国桢主席，英、法、美驻沪代表出席，英汇丰银行派代表参加。中方赵曾钰报告称：目前所知债务有两件：一为中方向英汇丰银行的借款，总数共51万余英镑；一为中方向港政府的借款，总数是200多万港币。吴国桢认为此项债款应由行政院偿还。外国代表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以英镑和港币尽快偿还。

△　交通部核准调整航空客货运费增加25％。

△　航业界钟山道等人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航业界坚决反对开放内河航权的态度。对《大陆报》5日发表短评《长江航运》主张开放长江航运，极为不满。

△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在台湾大学开幕。

11月19日　　中国向美、英、苏三国建议，对日和约预备会应由远东委员会全体会员组成。

△　国民政府令，《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施行期自民国三十

六年11月20日起延长一年。

△　国民政府令，《复员后办理民事诉讼补充条例》施行期自民国三十六年12月18日起延长一年。

△　输管会规定关于无证到埠生产器材证明确系自用、不在收购之列之处理办法。

△　行政院对日赔偿委员会商船小组为商讨限制日本船舶吨位及要求赔偿船只事，在沪召集航业界各团体负责人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一、日本商船总吨位不得超过100万吨；二、每艘商船不得超过3000吨；三、船只航行速率及造船能力务加限制；四、如总吨位已超过100万吨，超出的商船一律赔给我国。鉴于此四点决定与美国主张日本船舶不得超过150万吨至200万吨，每只商船不得超过5000吨有相当差别，商船小组决定呈请政府据理力争。

△　国民政府代表陈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届全体大会上再度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　中美进行棉贷谈判。

11月20日　　与于子三同时被捕之浙江大学学生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三人被浙江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浙大学生表示抗议，22日再度举行罢课。

△　外交部照会苏联，重申中国对旅顺、大连立场。

△　中央、中山、浙江、武汉、复旦五大学研究生同学会为增加待遇，到教育部请愿。

△　宁夏、绥远两路国民党军援军会师榆林。23日，宁马主力西撤。

△　内政部人口局宣布全国人口为4.61亿。

△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闭幕。俞建章当选为学会理事长。李四光、尹赞勋被推定出席明年8月29日在伦敦举行之国际地质学会。

11月21日　　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今日投票，政府称选民为2.5亿人。

△　外交部致美国驻华大使馆备忘录一份，请求美国作临时紧急援助，自明年一月起，每月贷款2500万美元。

△　山东解放军收复胶县。至此，胶济路西起潍县以东之坊子，东迄胶县以东、沽河东岸200余里，除高密一座孤城外，全部为解放军控制。

△　孔祥熙在美国奥柏林大学发表演说称：国民政府需要“数倍”于美国拟议中之3亿元贷款，以恢复法币之信用。

△　国民政府特派张彭春为中国签署修正《禁止贩卖妇孺及成年妇女公约议定书》暨修正《禁止淫刊公约议定书》特命全权代表。

△　联合国贸易暨就业大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金问泗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大会。

△　国民政府大选开始之日，法币再度猛烈贬值，沪市美钞每元开盘为法币11.9万元，收盘时暴涨至14万元左右。各种股票均猛跌，证券交易所宣布暂时停止买卖。

11月22日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

△　国民政府特派孙科、张继、曾琦、徐傅霖、莫德惠、吴铁

城、吴鼎昌、甘乃光、邵力子、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洪兰友为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孙科为主任委员，张继、曾琦、徐傅霖、莫德惠为副主任委员，洪兰友兼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　国民政府公布《中意为解决由战争所引起之损害赔偿问题及关于处理在华意国若干官产及意侨产业换文》。按：该换文于本年7月30日在意首都罗马分别签换。

△　日本战犯“花花太岁”芝原平三郎被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是日在上海监狱广场被执行枪决。

△　全国经济委员会核准，上海自来水、煤气、电力、电话改订新价。

△　行政院制定公布《粮食流通管理办法》。

△　芜湖商民因不堪苛捐杂税之重重勒索，群起反抗，爆发罢市风潮。上月21日，该地有四家商店因无法应付苛捐，被捕去四名店员。是日，当局又查封裕成布庄及公茂商号，税吏与店员发生冲突。税警当场逮捕裕成布庄店员吴俊华，引起群众公愤，大街上立时一呼百应，蜂拥而上，将吴抢回，全城商号一致罢市抗议。

11月23日　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今日结束。

△　财政部称：国民政府所欠外债，“除战前部分因需清理尚未恢复偿付外”，战后部分各项外债，至本年6月底，已偿付本息共折合美金达6.513亿万余元（包括已偿付之战前债务部分在内）。关于内债部分，至本年10月底，已偿付本息共计法币41.9180余亿元，关金3230余万元，美金7340余万元，英金600.9万余镑。

11月24日　山东野战军攻克高密县城。

△　民社党、青年党立法委员名额分配决定各为75名。

△　武汉再度宣布戒严，规定每晚11时至翌晨6时为戒严时间。由警备司令阮齐兼戒严司令。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中共人员有狂热之信仰，政府人员则颓丧悲观、自私自利。美援之根本目的在协助政府区域人民获得自由与经济福利，产生新的希望，抵制共产主义。

△　美国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校友会上演说，强调援蒋之重要。

△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区经济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菲律宾碧瑶召开。蒋廷黻为中国出席代表，李干为副代表。12月8日会议闭幕。

△　资源委员会所属之华北钢铁公司正式成立。

11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党团员重新登记限期由11月底延至12月底。

△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及野战军，决定取消东北民主联军称号，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　广州行辕主任宋子文主持召开粤桂绥靖会议，行辕副主任黄镇球、邓龙光、缪培南，桂省府主席黄旭初，及高级将领参加会议，研讨加强两省保境实力与两省边境联防“剿匪”及与地方团队配合协同“剿匪”等。

11月26日　　蒋介石飞北平，熊式辉、俞济时、李惟果、郑彦棻、蒋经国随行。

△　陈赓、谢富治兵团自本月1日开始对伏牛山东麓发动攻势。月初连克临汝、郏县、登封、宝丰、鲁山、南召、方城等城。西线沿伏牛山和秦岭脊峰南下，横渡丹江，解放山阳、镇安；东线越过洛河、白河、唐河到达桐柏山麓，攻克泌阳、桐柏两城。是役至本日止，歼

国民党军1.2万余人。至此，豫陕鄂解放区已扩展到南临汉水、北至陇海，西越丹江、东达平汉广大地区。自9月至11月，三个月来，陈谢兵团共解放了豫西和豫陕边36座县城，建立了40多个县政权，完全孤立了豫西重镇洛阳，并直接威胁潼关。

△ “联总”中国分署署长克利夫兰在沪宣布，自7月28日起被冻结之7.8万吨物资开始解冻，重新分配于中国非战争区域。上海、天津冻结物资中原拟定运往共区之五万吨物资现正式宣布完全分配给中国中部及南部。

△ 国民政府特派王云五兼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表示全国灾民过4000余万，政府已拨千亿以上救济，尚待各方襄助。

△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为加强内蒙人民自卫军各部队之统一指挥与政治工作，是日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及政治部。由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云泽（乌兰夫）任司令兼政治委员，阿思根、王再天任副司令员，方知达任政治部主任。前兴安军区及自治政府之军事部已决定取消，其一切业务与工作，均并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及政治部。

11月27日 蒋介石在北平接见北方高级将领李宗仁、孙连仲、傅作义等，并招待各大学校长胡适、梅贻琦等。

△ 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成立，辖区为苏、豫、鄂、湘、皖、赣六省，作战地域为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白崇禧指挥33个旅展开对大别山区的围攻，采取军事围攻、分区清剿与政治组训相结合的总力战方针，分进合击，分区清剿。

△ 中央银行监事会决议，50元、100元面额的法币，因“用途已少”，分别煮销。10万元大钞将于下月发行。

△　内政部训令部直属机关，抄发《划定绥靖区县（市）标准》。

△　中华农学会及18个农业团体联合年会上午9时在南京励志社开幕。12月1日结束。

11月28日　　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北平行辕及张家口、保定两绥靖公署主要官员及各野战指挥官到会。会议决定成立华北“剿匪”总部。会后，蒋留李宗仁、傅作义、孙连仲密商“剿共”事宜。

△　国务会议决定，将监委选期延至明年1月10日为止，立委选举则延至明年1月下旬为止。

△　国民政府为紧缩通货，遏阻物价涨风，决定自是日起，国家行、局及省、市银行均暂停放款，并限制汇款，上海中央银行每周调拨汇款不得超过500亿元。

△　上海市长吴国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按蒋介石训令拟定之《经济戡乱紧急措施》自是日起实施。措施内容主要有：一、抽紧银根。国家银行及各行庄均停止放款、不准透支。法币之流动性尽量使之萎缩，外埠对沪汇款将予以拒收。二、物资管制。所有民生必需之各项物资，大部分由政府掌握。

△　苏联答复中国政府提出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之建议，并通知美、英政府，建议明年1月在华举行四国外长特别会议，讨论对日和约筹备事项。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训令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向蒋介石建议改组陆军勤务机构。

11月29日　　蒋介石自北平飞返南京。

△　北平行辕公布蒋介石对收复区人民实行的八条措施：收复区的农地要“归还原业主所有”，佃农对地主交租以正产物的三分之一；农民必须参加当地保甲、参加自卫队、帮助检举共产党干部及其积极分子，对“执迷不悟”之共产党人要逮捕处置等等。

△　吴国桢、张嘉璈、宣铁吾连日筹商经济对策，确立抑平物价原则，首先彻查金、钞黑市，并决定两项办法：一、四联总处紧缩贷款；二、由警备部、市府、央行三方会同彻查行庄票据，追究非法往来，本日起实行。

△　立法院经济、立法、法制三委员会重行审查通过并公布《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

△　美前驻外大使12人致电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及国务卿马歇尔，呼吁对中国予以军事装备及经济财政援助。

11月30日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速中国革命的势力。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11月份战绩：共歼营以上国民党军一个师部36个团又一个营，共消灭国民党军12.54万人，其中生俘7.6万余名，毙伤4.89万余名。

△　苏中军区部队发起李堡、栟茶战役，至12月10日结束，攻克国民党军据点73处，解放土地5000余平方里，人口60余万。

11月下旬　　北平市场物价狂涨，旬日间粮食涨一倍有余，布匹平均涨三分之一以上，且无停止征象。

△　下半月物价继续飞涨。上海20日上白粳72万元，特粳76.5万元。27日，白粳高至76万元，特粳涨达81万元。29日，更狂涨为上白粳80万，特粳84万。纱市18日42支兰凤4260万元。20日，大批经

济警察到场监视，场内不敢活动，场外喊4650万。27日，更昂达5380万元。12磅龙头细布18日117万，19日即狂涨至130万，26日又锐挺至137万，27日高达140万。国家行、局紧缩放款及限制汇款发表后，重要物价回低，29日回泻至上白粳77万，特粳81万。42支兰凤跌至5050万，12磅龙头细布跌至128万元。

是月　　华北工业中心天津全市大小工厂5000余家，经常保持全部开工的仅1％，局部经常开工的占4％，40％的工厂已陷入停工状态，其余55％的工厂则均处于半停工状态。全市工业全部产销数，最多等于开工时产销量的10％。国统区惟一制碱厂——塘沽永利化学厂，日产仅八九十吨，不足战前三分之一。

△　四川省第一条准轨铁路綦江至猫儿沱铁路本月通车，全长67公里。

12月

12月1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缅划界问题发表声明，谓：北纬25度35分之北一段边界，即由腾冲之尖高山起以北一段，几经中英交涉未果，今缅甸将告独立，愿双方循正当之外交途径，求得合理合法与满意之解决。任何片面之言论或行动，自不能强使对方认为有效。缅甸外交部发言人则宣称，缅甸将不顾中国对其北部一部分领土之主张，而于来年1月4日接管卡伦尼邦。

△　内政部核定公布南海各岛名称。这些岛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自经国防部会同各有关机关接收后，整顿竣事，由内政部命名。一、东沙群岛，包括东沙岛等三岛；二、西沙群岛、包括：（甲）永乐群岛，其内有甘泉岛、道乾群岛等九处；（乙）宣德群岛，其内有西沙洲、赵述岛等21处；三、中沙群岛，包括西门暗沙等29处；四、南沙群岛，包括：（甲）危险地带以西各岛礁，其内有双子礁等27处；（乙）危险地带以东各岛礁，其内有海马滩等四处；（丙）危险

地带以南各岛礁，其内有保卫暗沙等16处；（丁）危险地带以内各岛礁，其内有曾母暗沙等40处。

△　国防部为处理军人妨害水陆空交通运输、走私经商及一切违纪案件，于上海、沈阳、徐州、广州、天津五区先行设置军法执行部。各执行部主任分别为周伟龙、冯庸、陶柳、鲁宋敬、邹容勋。

△　上海各金融及商品市场对《经济戡乱紧急措施》有所反应。棉纱价格下跌15％；粮食、原料、日用品等价格均有下降。

△　交通部邮政总局公告：国际邮资照现行资例增三分之一，尾数不满千元者，进为千元，包裹暂按现行资例加五倍，尾数亦进为千元。

△　为纪念“一二一”学生运动两周年，昆明三万多大中学生举行总罢课并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暴行。

△　山西大学教授因太原物价登全国最高峰、无法维生而集体请愿，并电行政院长张群，吁请与京、沪、平、津各大学平等待遇，并于翌日下午招待记者，发表宣言。

△　前伪冀东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是日上午在北平监狱刑场被枪决。

△　长沙《大公报》、《新潮报》因纸价狂涨无法支撑而停刊。

△　汉口《中国》、《建国》、《新闻》三晚报因纸张不足，是日起合出四开一张合版。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筵席及娱乐税法》。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房屋租赁条例》。

△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联合会在南京下关工人福利社举行成立大

会，会期三天。重要议案有三类；一、员工福利；二、路政建设；三、时局主张。

12月2日　接蒋介石手令，国民政府设置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即行撤销。调孙连仲、傅作义兼北平行辕副主任，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指挥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

△　行政院政务会议决议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分设金融管理局，直属财政部管辖。

△　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花纱布管制方针：一、政府为要控制棉纱，全部代纺；二、政府为要掌握足够原料，除“行总”外国棉花外，并输出棉纱换取棉花；三、立即实行代织。

△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郭德华与香港总督会谈，重申中国管治九龙旧城主权。

△　黄维出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

△　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因与省参议会冲突而请辞。

△　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成立，彭文应任主任委员，有成员500余人。

△　联合国劝募救济儿童基金委员会远东区劝募代表柯柏慈在京招待记者，称希望中国能踊跃参加此项劝募运动，并将在沪设立联合国劝募救济儿童基金委员会远东区总办事处，代表总处与中国、暹罗、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联络。

12月3日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各省市县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遴选补充规程》。并依据该规程第三条之规定，公布用遴选方式选定之各省、市参议员名单共451人。

△　中国青年党京、沪、穗、筑、南昌等地党部举行建党二十四周年庆祝。

△　新闻局长董显光答记者称：截至三十六年6月止，过去两年内，法院审理贪污案件共1.6794万起，涉案之公务员1.7454万人。

△　中华学艺社在沪举行京沪杭区战后首届年会及三十周年纪念。总干事李毓因作报告。

12月4日　白崇禧自九江抵汉口，指挥大别山区战事。

△　“解总”代表林仲在上海新亚酒楼举行离别鸡尾酒会，“行总”署长霍宝树、“联总”中国分署署长克利夫兰等参加。

△　沈阳连日大雪，物价飞涨。玉米面流通券1000元一斤，高粱米1300元，块煤200元一斤，窝头200元一个，煤油600元一斤。东北大学学生每晚8时即就寝。

△　广学会在沪新天安堂举行六十周年纪念会。

12月5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三十七年度（1948）上半年国家预算，预算仍以“戡乱”军费占第一位，总数10万亿元，为总额50%以上。

△　国民政府送出关于对日和约预备会议对苏联政府11月27日照会之复文，称对日和会组织及表决程序，应照远东委员会成例。

△　白崇禧自汉口到信阳布置军事。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葬法》、《公葬条例》，废止《国葬墓园条例》。

△　外交部重申未放弃九龙立场。

△　河北省政府委员会全体请辞。

12月6日　傅作义在张家口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职。他以平、津、保三城为犄角防守阵势，组成津浦、平汉、平绥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的机动防御，同时以地方武装固守据点。

△　教育部修正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限制学生自治会活动。

△　中荷空运协定在南京签字。外交部长王世杰、荷兰驻华大使艾森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

12月7日　白崇禧在汉口部署“清剿”计划，主张加强地方自卫武力，军事与政治、经济密切配合。

12月8日　《中美有关转让海军船舰及装备之协定》在南京签字。王世杰和司徒雷登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协定规定美国将向中国转让船舰共约140艘，并帮助建立海军机构，培训海军人员。

△　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访外交部长王世杰，商讨中港关税条约与九龙城问题。

△　中国恢复九龙沿岸之沙鱼涌关卡，检查进出大鹏湾区一切货物。

△　北平物价随金钞暗市一致猛升，小袋粉门市价由52万升至56万。大米一斤由8500元升至9800元。天津物价亦疯涨。兵船粉涨至43.5万元，元阳光布每匹131万元。

△　稳定两周之穗市金融市场复告汹涌涨价。港币一日间上升30％，突破2.7万元关。上米涨达100万元100市斤。

△　清华大学全体教授及助教为校方不予配给救济物资及争取合理待遇，是日起罢教。

12月9日　蒋介石手令四联总处：全部贷款暂停贷放；各处汇往上海之汇款应严格限制并检查其确实之户名与款项来源；各国家行、局不得以收益关系擅自开放。

△　行政院制定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

△　行政院会议修正通过《省县自治通则》。

△　国民政府任命沈士华为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国特命全权公使。

△　行政院会议派李立侠为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施奎龄为天津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庸为汉口金融管理局局长，高方为广州金融管理局局长。

△　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沪开幕，出席各邮区代表172人。17日闭幕，改会名为中华民国邮务工会全国联合会。

△　沈阳工务局长李荣伦因贪污被枪决。

12月10日　中央银行发行二万、四万、十万元大钞三种。财政部发言人为此发表谈话指出，有借此抬高物价扰乱金融情事将依法严办。

△　行政院令上海市政府成立经济会报机构，由市政府约集警备部、金融管理局、花纱布管理委员会、燃管会、社会局、警察局等机关负责，由市长吴国桢主持。

△　傅作义自张家口到北平。华北“剿匪”总部即将自张家口移至丰台。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代表美总统杜鲁门举行茶会，将丰功勋

章授予孙立人。

△　日本战犯、前日本上海宪兵队本部外情班准尉情报员浅野隆俊，是日中午于上海监狱刑场被枪决。

12月11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常委会，依据统一党团监察组织案规定，指定党团统一后各省、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委名单。

△　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对中、法、意、奥四国5.9亿元紧急援外法案，包括援华6000万元在内。

△　山东野战军收复海阳县城。

△　交通部邮政总局通告国内邮资加价三倍，明信片普通1000元、航空2000元；平信普通2000元、航空3000元；平快普通4000元、航空5000元；挂号普通5000元，航空6000元；双挂号普通8000元、航空9000元；快汇普通7000元，航空8000元；快递普通一万元、航空1.1万元。

△　交通部电信总局通告：电报、电话价均涨两倍，电报每字3000元。因加价未经立法程序，立法院大哗，王云五14日到立法院解释，立法院决议请停止加价，重新审查。

△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楼桐荪在南京对合众社记者谈话中承认，通货膨胀已迅速地接近按钞票付成本都抵不上的时候。他说，就是发行一万元的国币也已经很不合算了，因每发行一张万元钞，就得花费7000元的成本。

△　据四川军管区报告，四川本年征兵额5.9万名，已征4.7434万名，另以青年从军方式，提征下年兵额二万名。

△　行政院制定公布《民营事业价购日本赔偿物资缴款办法》、

《民营事业价购日本赔偿物资契约》、《配售民营事业日本赔偿物资评价办法》、《配售民营事业日本赔偿物资评价委员会组织规程》、《民营事业申请价配日本赔偿物资申请表》、《民营事业申请价配日本赔偿物资建厂计划书格式》。

△ 上海米市场上午10时因经济警察在场逮捕米商18人，一度停市。至10时半恢复交易。

△ 是日为香港政府强迫九龙城居民迁移之最后期限，九龙城全体居民高悬国旗，停止工作，准备应付非常状态。

△ 津浦路浦济段抗战胜利以来首次恢复通车。

12月12日 国务会议通过《训政结束程序法》，并决定第四届国民参政员任期延至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

△ 国民政府公布中美救济协定。

△ “解总”留沪人员纪绛、成润、郭端正、袁光华、张兰菊等五人由沪飞津，撤返解放区。“解总”代表林仲则已先行离沪往香港。

△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京召开全国造纸工业增产会议，次日结束。出席资委会、经济部及各区纸厂代表、专家数十人。决定发展造纸工业治本治标办法。

△ 安庆商人为抗议当局无限度增加营业税举行罢市。

△ 陕西省洛惠渠竣工，是日在大荔举行放水典礼。

12月13日 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决议将中国列为美国对外紧急援助法案中四受助国之一，并规定授权拨款数目为原定之5.97亿美元。

△ 国防部九江指挥部迁至汉口办公。

△　山东野战军攻占胶东中心县城莱阳。

△　陈、粟部队在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和陇海路郑州至商丘段，陈、谢部队在平汉路许昌至确山段展开破击战，策应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反“清剿”作战。

△　英国政府分别照会中、苏两国，拒绝苏联所提中、美、英、苏四国外长来年一月在中国举行会议，草拟对日和约之建议，以及中、苏两国所提四国在对日和会中保留否决权之要求。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二十届年会，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举行。选举蒋梦麟为董事长，翁文灏、司徒雷登为副董事长，胡适为名誉秘书，并确定下年度补助机关有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科学社、文华图书馆及及专科学校等。

12月14日　连日米市波动剧烈，是日，上海米价再晋高峰，锡粳89万元，靖江籼86万元。16日，锡粳升达94万元，籼米亦高至90.5万元。18日常锡特粳升至104万元，靖江籼95万元。同日，纱市亦昂腾，42支兰凤达5050万元高价。布市飞升，12磅龙头细布135万元。

12月15日　东北民主联军以九个纵队兵力发起冬季攻势，出击沈阳外围地区。半月歼灭国民党军2.3万人，攻克城市七座。

△　美国魏德迈将军致函蒋介石，告以巴大维将出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

△　民社、青年两党徐傅霖、蒋匀田、杨浚明、王世宪、余家菊、郑振文、林可玑、刘东岩等开会商讨监察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取得协议如下：全国27省10市，两党各占12省五市，每一单位提一候选人。另山西、新疆、青海三省未定。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组织规程》，凡八

条。

△　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张继病逝于南京。

12月16日　美国战时资产管理局宣布售予中国150架寇蒂斯C—46型运输机已谈判竣事，由每架30万美元改为每架5000美元，外加装修费4000美元。定于明年1月1日左右交货。

△　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市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实行第二次配米，范围扩大至30个区，以抑平米价。

△　“行总”、“联总”、社会部代表签定《移交救济粮食协定》。行总将一万吨救济粮食移交社会部办理，以结束“行总”二年来经办之救济工作。

△　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将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农民银行合并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并确定以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农币作为西北解放区之本位币。

△　国民政府决定在老河口设豫鄂川陕边区“剿匪”司令部，任康泽为司令。

△　国营招商局举行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交通部长俞大维、航政司司长李景璐、上海市长吴国桢、全国轮联会理事长杜月笙等参加。总经理徐学禹作报告。

△　香港政府再令九龙城居民迁出。外交部特派员郭德华为此发表声明，称将尽力满意解决九龙城问题。

12月17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次攻打运城。至23日扫清外围。

△　国民政府免去首都卫戍司令张镇兼职。张镇专任宪兵司令；准免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孙连仲本兼各职。特派孙连仲为首都卫戍总司令；任命楚溪春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行总”宣布“行总”两年来经办之救济工作完全结束，留下必须办理之工作分别移交给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中外人士合组保管委员会、善后物资供应总库。

△　上海金融管理局停闭钱兑业。

△　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开会，蒲立特应邀出席，主张确切援华。国务院发言人重申援华保证，并说长期具体计划业已拟就，但拒绝公布方案内容。

12月18日　　蒋介石电令傅作义抽调一个军增援东北，在华北暂取攻势防御。傅复电称：“已奉陈诚总长电，着由热河方面进击，明（19）日职赴承德部署，此一行动，可能东北、河北兼顾，并可完全主动。”

△　蒋介石以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身份召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总处理事会全体理事会议，说明“戡乱”之政策，经济重于军事，决定继续停止国家行、局之贷款。会议通过《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修正案。

△　最高法院检察署发表“通缉令”，“通缉”贺龙。

△　行政院制定公布《陕西省陕北行署组织规程》。

△　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出动劝募小队募集寒衣，以救济处于饥寒交迫中之贫民。

△　加拿大政府在温哥华港口继续装运步枪子弹1500多万发和空军地面装备数百吨，送给国民党。该港加拿大总工会所属海员及汽锅

工人拒绝装运军火，并组成纠察队巡逻海面，禁止军火上船。加拿大劳工阶级及若干大学、宗教团体皆抗议装运军火。

△　以杀人比赛闻名之日本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及南京攻城时屠杀我同胞几百人之日本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受审，被判处死刑。

△　沈阳陷于孤立，市内除军事机关外，用电全停，全市一片漆黑，5时后街头即断行人。物价逼人，以法币计算，大米每斤法币3.5万元，高粱每斤二万元，煤油每斤8000元，面粉每袋140万元。

12月19日　　陈、谢兵团自13日起，配合陈、粟大军，对平汉路许昌至信阳段展开大规模破击战，昨日攻占驻马店，是日又攻克漯河两大军事重镇，并接连解放确山、西平（19日）、遂平（20日）、临颍（19日）、桐柏（15日）、泌阳、舞阳、叶县、襄城（12日）九座县城。控制许昌到信阳间铁路390里。

△　白崇禧自汉口到长沙视察。

△　楚溪春到沈阳协助防务，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到南京。

△　参政会请政府坚持保留对日和会之否决权。

△　美国会通过对中、法、意、奥四国5.4亿美元紧急援助法案，内对中国之援助1800万美元。

△　上海米市回落。常锡特粳98万，靖江籼91万元。纱布市场亦降，42支兰凤4700万元，12磅龙头细布127.5万元，收市135.5万元。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利率管理条例》；修正公布《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废止《银行存放款利率管理条例》。

△　天津港口封冻，航运停顿，轮船多艘为冰所困。

12月20日　　国民政府以冯玉祥在美作反政府言论与行动，撤销冯玉祥赴美考察水利专使名义，令其回国。按：11月5日美国《民族周刊》刊载冯文《我为什么和蒋介石决裂》。

△　张群对美记者谈话，称中国外交独立自主政策及对日和约所持政策迄今并无更改。

△　教育部发表公报，阻止国内学生团体参加世界学联活动。

△　国民政府任命林一民为国立中正大学校长。

△　北京大学教职员电行政院长张群，要求按生活指数调整待遇。

12月21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耶稣圣诞节广播，谓："当我想到今年耶稣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想念到我们中国在这个令节的一天，就要开始实行民主新宪法了。"并谓新宪法的实施，"对我们三千年来专制政体和封建社会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我愿我们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我相信一定很快的能够完成我们所预定的路程，就是建立我们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完成"。

△　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飞抵南京，谒蒋介石报告东北军事，请示机宜。24日飞返沈阳。

△　武汉宣布解严。鄂中、鄂北各线公路停驶。汉宜路已中断三日。

12月22日　　外交部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提交节略，提出以四年为期之15亿美元援华计划，并聘用美人协助执行。

△　楚溪春到张垣会晤傅作义，当日又返沈阳。

△　立法院例会，通过《商业会计法》、《大学法》、《专科学

校法》、《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组织条例》、《省银行条例》等要案。

△　国民政府准免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本职。

12月23日　　蒋介石召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商讨西北军事。

△　华北“剿总”司令部宣布，陈继承、上官云相、宋肯堂、刘多荃、邓宝珊为华北“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8年1月6日，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任命）；北平行辕副主任孙连仲辞职照准，由冯钦哉继任；并自本月25日起，将北平行辕军事指挥权移归“剿匪”总司令部行使。

△　行政院制定公布《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

△　国防部长白崇禧电令豫、鄂、皖、湘、赣五省对共区实施经济封锁。

△　东北粮价猛涨，高粱米每斤3800元。

△　上海米价涨风又趋炽烈。常锡特粳高迫110万元，靖江籼创百万元高价。

△　中国、中央航空公司呈准交通部，是日起，国内各线票价照原价增加20％；货运普通货物每超出一公斤，照客票价1％收费；贵重物品照客票价2.5％收费。

12月24日　　蒋介石召见马鸿逵夫妇暨胡宗南，宣布调整西北军事防务，决设立宁夏兵团指挥部，马鸿逵任指挥官，该部另行成立四个团，其防务扩大可能至延安区。

△　国民政府特派叶公超为中华民国庆贺缅甸独立特使，叶公超

一行30日飞缅甸。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罢课，抗议学校当局干涉压迫学生自治会选举。

12月25日　　《中华民国宪法》今日开始施行。国民政府宣布，明年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

△　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总结了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总结了土改经验，阐明了土改方针。报告提出中共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防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时期内，中共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28日会议闭幕。

△　美海军陆战队伍长波拉德率士兵五名，在山东省即墨县王麟陶附近人民解放军阵地，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全部被俘。

△　国民政府明令延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任期至1948年3月28日为止。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行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司法院组织法》、《考试院组织法》、《监察院组织法》。

△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条例》。

△　行政院制定公布《政府机关接收运用敌产业处理办法》。

△　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新闻处召集各报记者宣布，行辕奉最高当局令，明日起恢复新闻检查，并以《戒严法》12条为约束，通令各记者遵守。

△　中国五权宪法学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宣言，选举张知本、夏勤、楼桐荪、谢瀛洲等33人为理、监事，推聘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吴稚晖、孙科、戴传贤、居正、于右任为名誉理事长，朱家骅等为名誉理事。

△　上海纱市价格再昂，42支兰凤4950万元，米市亦重起涨风，常锡特粳109万元，30日为112万元。

12月26日　　各省、市参议会开始选举“行宪”后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

△　莱阳战役结束，山东兵团歼灭国民党军1.7万人，收复胶东大部分失地。

△　“行总”署长霍宝树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报告“行总”两年来之工作，公布两年来“联总”运华物资共计225万吨，合6.6亿美元，受惠人民7600余万。

△　在国内民主舆论指责以及运输工人罢工压力下，加拿大政府下令停止以机关枪子弹650吨、飞机照明弹35吨运华援助国民党。

△　国民政府制定公布《银行业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及附表。

△　行政院公布《全国花纱布管理办法》。

△　国民政府准免驻巴西国特命全权大使程天固本职，特任郭泰祺为中华民国驻巴西国持命全权大使。

△　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及债务清理委员会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工作大致已告一段落，定本月底宣告结束，未完成事务移交市府办理。今天下午3时该会何思源等委员代表中方与英、美、法、比、荷五外籍顾问签订协议书，使馆界正式移交中国。

△　北平整日大雪，粮价大涨，统粉跃过90万元一袋，玉米面、小米面每斤均达七八千元。

12月27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对运城发起总攻，突破城垣，次日全歼守军，占领运城。

△　中共中央电告华东局：你俘获的美军，正好为美军参加中国内战作证。被俘人员暂勿释放，必须由青岛美军司令部公开作出书面表示，方能考虑释放问题。

12月28日　蒋介石自南京飞汉口，召集程潜、白崇禧等将领举行军事会议，研讨大别山战局。决定划分若干绥靖区，分区“清剿”。次日蒋回宁。

△　蒋介石电令四川省政府，要求成立追粮委员会，追收欠粮，以应急需。四川省府前已通令各县、市，本年征实限年底集中上缴，准备调运。

△　东北民主联军是日经五小时激战攻克沈阳西北战略要地彰武县城，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共一万余人。自15日民主联军发动冬季攻势以来，两周中连克昌图、开原、北镇、玉田、海城、辽中、彰武七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2.3万余名。

△　冯玉祥在美发表《美国应立刻停止援蒋》的讲话。

△　清华、北京、燕京、中法、北平师院、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八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教育部剥夺学生自治权利的《修正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规则》，要求立即将其取消，并呼吁大学生共同起来争自治权利，粉碎一切奴化青年的意图，为保卫学府、保卫人权而斗争。

△　金陵大学学生为抗议学校当局阻止成立学生自治会而罢课。

△　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在平举行年会，改选理、监事。张嘉璈等当选理事，茅以升等当选监事。

12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例会通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国民党党员让与友党实施办法》，规定国民党党员当选为代表时，得与民社党、青年党当选之候补人互换。同日，国大代表提名当选人联谊会代表51人不满“竞让”办法，向中常会请愿。

△　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保管委员会召开首次委员会，决定明年1月初在原上海“行总”驻地开始办公。

△　内政部滇缅边界测勘队由方域司司长傅角今率领，一行12人由渝抵昆。

12月30日　　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与陈粟、陈谢部队在河南确山会师。

△　成都市参议员官箴予因支持学运言论遭逮捕。成都各校学生示威抗议，并向省府请愿，迫使当局稍后释放了官箴予。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3000余人游行示威，抗议剥夺学生自治权利及非法开除学生并要求训导长辞职。

△　行政院会议决议，派徐永昌为陆军大学校长。

△　热河省惟一新闻报《长城日报》因经费困难宣告停刊。至此，热河已无报纸。

△　苏联照会中国，申明其由中、苏、英、美四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之主张，并表示远东委员会其他会员国可参加各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之工作。

12月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下半年共歼国民党军营以上兵力共一个兵团司令部、20个师部、32个整旅、七个旅部、112个整团、192个整营，75.892万人（其中正规军占48.349万人），内生俘45.948万名，起义1.702万人，毙、俘国民党军将级军官76名、专员一名、县长27名。缴获炮3266门。解放与收复县城95座。国民党军占解放区县城29座。现解放区共有县城488座。半年内新解放区面积约19万余平方公里，连原有解放区面积共239万余平方公里。新解放人口3700余万，连原有解放区人口，共有人口1.68余亿。

△　新华社发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东北民主联军自1948年1月起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结束。“行总”结束后，其未了任务，转属善后事业委员会保管委员会办理；“联总”未了任务亦归保管委员会办理。

是月　　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等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先后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

是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本年出国留学生共1293人。计公费生130人，自费生1163人。所赴国别计：英国64人，美国1050人，法国81人，瑞士51人，瑞典11人，丹麦六人，荷兰七人，加拿大12人，意大利三人，比利时四人，澳洲二人，墨西哥一人。所学科目

计：工科376人，数理155人，法律、政治134人，经济129人，文史111人，农科109人，医科102人，商科95人，教育56人，音乐美术18人，图书博物馆六人。4月至12月应聘应约出国讲学及研究之人员计382人：美国311人，英国39人，加拿大15人，法国10人，意大利四人，丹麦二人，印度一人。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1月

1月1日　　蒋介石发表题为《继续八年抗战精神，肃清匪患安定民生》的元旦广播词，声称将在“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全国各地的“散匪”也可望能在一二年内“肃清”。

△　财政部发布1947年全国税收消息：货物税37275.7925569亿元，直接税14296.27756405亿元，盐税14112.23522904亿元。

△　水利部决定六项中心工作：一、汉江治本准备工作；二、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三、黄河修防工程；四、淮河灌溉航运修防工程；五、黄泛区整理工程；六、农田水利工程。

△　社会部订立本年救济计划，决定各项赈灾物资款项统筹运用，救济全国难民。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改称开国文献馆。

△　外交部次长、中国庆贺缅甸独立特使叶公超抵达仰光。

△　参谋总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即将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以新六军、新三军为右路，新七十一军、新一军为中路，新五军为左路）出兵，向沈阳西北作扇形推进，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决战。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发表《我们齐向民主迈进》之讲话。

△　范汉杰被免除第一兵团司令官兼职，由山东调往南京，专任陆军副总司令。

△　孙连仲被任命为首都卫戍总司令。

△　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发表题为《行宪与戡乱》之广播讲话称，戡乱是行宪的手段，行宪是戡乱的目的。

△　湖北国民党军罗卓英部攻占潜江。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许昌。

△　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原联军总部机关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参谋长。军区下辖辽东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内蒙军区及吉林、松江、合江、牡丹江、龙江、辽吉、嫩江等军区。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共九个纵队另10个独立师，计42万余人。

△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并成立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河北人民解放军聂荣臻部开始进攻保定。

△　中共松江省委作出《关于加强财经工作的决定》，指出：为节省开支支援前线，后方机关应厉行节约，开展整编，党、政、军均应按正规编制设机构、配人员。同时决定成立省委财经委员会，并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为中央常务委员。《成立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它的《行动纲领》规定，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等基本原则。

△　沈阳市物价大涨，到2日，大米每斤由法币六万元涨到九万元，高粱米由每斤3.8万元涨到4.5万多元。

1月2日　　外交部接到苏联上年12月30日照复，申明苏联主张由苏、中、美、英四国准备对日和约。按：此照会乃是答复外交部上年12月5日之照会，在该照会中，国民政府主张应由远东委员会担任对日和约之主要工作。

△　自豫西渡河北上的国民党军进占晋南运城。

△　鄂中国民党军进占沔阳。

△　豫南国民党军攻占确山。

△　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孙越崎东北视察完毕，返回南京。

△　国民政府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　东北人民解放军以第二、三、六、七纵队在辽西公主屯对左路之新五军展开围攻，激战至7日，全歼新五军军部及其第四十三、第一九五师共二万余人，生俘其中将军长陈林达。

△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将右路之新三军、新六军阻击于公主屯以东，第一纵队将敌中路之新一军、新七十一军阻击于辽河东岸。经过激战，共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

△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第八纵队攻克新立屯，第九纵队进占沟帮子，追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一部，并占领盘山。

△　中原野战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及第二、三、六纵队及地方武装发出指示：应用主动分遣攻敌弱点、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以小牵大、以大击小、打小的歼灭战、钻空子深入发动群众的斗争方针，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重兵“围剿”。

1月3日　国民政府向美国购买C—46型运输机150架。据美国战时资产管理局有关人士称，南京政府当时只付代价75万美元，这批飞机的修理和交货费用将超过买价，每架需三万至八万美元，全部合计当在450万至1200万美元之间。

△　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在国民参政会驻委例会上报告财政设施情况，1947年度国家总预算，全部支出总数为原预算额9.3万余亿元的四倍半，收入总数约为13万亿元。强调当前财政困难，必须严格管制物价，增辟财源，使增加国库收入。

△　中国教育学年会在金陵大学举行。

△　加拿大“阿加诺甘号”轮载价值120万美元的军火，启运来华，接济国民党军。

1月4日　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讲演，要求学员“重新振作民国十三年北伐和二十六年抗战的精神，同心一德，共同奋斗，来完成我们剿匪救民的任务”。

△　国民政府决定派交通部长俞大维及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赴

美国商讨援华事。

△　保定国民党军进占漕河车站，国共两军在易县、满城附近展开激战。

△　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由南京返国。

△　缅甸正式独立。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作为特使出席了缅甸独立典礼并递交国书。行政院长张群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国际联欢社发表讲话，庆贺缅甸独立。

△　中国教育学第九届年会闭幕，大会建议政府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小教待遇，矫正学风。

△　苏联照会中、美、英三国，建议于本月召开四国外长特别会议，起草对日和约。

△　华北“剿匪”总部设于北平新市区，定于次日开始办公。

△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九、一纵队及热河独立师近日连克黑山、大虎山、台安和北票等城镇。

△　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殡葬于子三，遭到浙江省当局和特务组织的阻挠，20多名学生被殴成重伤。

1月5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核准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忍茹代行主任委员职权。

△　上海市戡乱救国运动委员会成立。

△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持召开11国会议作为起草对日和约之初步程序，并由四强保留有否决权合理的运用。

△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由

苏、中、英、美四国准备对日和约的建议，反对四国保有否决权，坚持由远东委员会各国起草对日和约。

△ “海康号”轮自上海启航，前往日本载运赔偿物资。

△ 去年8月15日之《中港金融协定》，是日开始部分实施。

△ 《管理中英庚子款董事会章程》废止。

△ 港英当局派大批军警武装进入九龙城，强拆民房70余间，并拘捕当地居民代表二人。

△ 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杨秀峰任政府主席，张友渔任副主席。

△ 中共冀热辽分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

△ 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进攻新民。

△ 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沈钧儒、章伯钧、柳亚子、邓初民、周新民等28人，另有12人列席。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和《今后的组织工作计划草案》等重要文件和决议案，会议为民盟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实行密切的合作。会议还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和领导机构，暂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主持工作。会议至19日结束。

△ 近日，天津、上海等地粮价猛涨。从2日起，天津粮价成倍暴涨，大米每斤由法币8100元涨到1.95万元；小米每斤由5600元涨到1.2万元。是日，上海米每担涨至150万元，为抗战前的15万倍。美钞

黑市汇价涨到16.5万元，较官定市价8.9万元几乎高出一倍。

△ 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开业。

1月6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任命霍宝树为输出管理委员会主任；任命陈继承、宋肯堂、上官云相、邓宝珊、刘多荃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任命张含英为天津北洋大学校长。

△ 外交部就昨日九龙城中国居民2000余人遭香港军警驱逐事向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提出抗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已经要求英大使电话香港政府，停止现正采用之强暴举动。

△ 国民政府决定邀请新疆省副主席阿合买提江来南京商谈解决新疆问题，如果阿氏不能来南京，即由政府派员飞往迪化商谈；另一方面，则进行新疆省主席民选。同日，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亦在兰州就如何解决新疆问题发表谈话。

△ 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助理国务卿索尔甫谈中国经济问题。

△ 宋美龄任联合国儿童教育救济劝募运动中国委员会主席。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玉田。

△ 中国出版协会在上海新生活俱乐部成立。

△ 华北工商界吁请国民政府恢复国家银行贷款及押汇。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

△ 鄂豫皖解放军再克河南许昌县城。

△ 湖北解放军攻占黄梅。

△ 成都米荒严重，饥民集体抢米。

△　暹罗移民局通告，本年允准进入暹境的华侨限额仍是一万人。

1月7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通过《海外各级党团统一组织实施办法》。

△　国民党中常会以冯玉祥“在美发表谬论，诋毁政府，并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为由，决议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　国民政府派于望德为庆贺委内瑞拉新总统就职典礼大使衔专使。

△　国民政府公布《商业会计法》，凡57条；《荣誉军人受田条例》，凡24条；《加强金融业务管理办法》，凡16条。

△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奉命回国，特向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辞行，并会谈中国局势。罗申说：“我认为中国内部首先要自己想办法，停止战争，这战争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会有结果的。”他表示，苏联政府希望结束目前的中国内战，并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恢复和平，蒋介石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

△　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规定将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剩余”弹药，以原价之1％售给中国。

△　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主持召开该部审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运用接收救济物资配合原有救济款物实施救济工作计划纲要》。

△　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国会咨文，保证不久将援助中国，并将提出有关中国的特别计划。

△　外交部次长、贺缅甸独立特使叶公超本日在仰光发表谈话称：中国将坚持在远东和会中保持否决权，但仅为其本身的利益之合法保障而已。

△　冀鲁豫地方人民武装收复山东东平县城，歼山东保安第三旅旅部及该旅第十七团大部，俘其旅长张岭秀。

△　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部队阻击南下增援保定的暂编第三、十六、三十五、九十四等四个军，至8日止，歼敌4000多人。

△　江汉军区解放军部队解放湖北随县县城，全歼保安第四总队，生俘1400余人。

△　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辽阳。

△　河北解放军向北平西南之门头沟及保定西北近郊进攻。

△　苏北解放军进击与南京隔江相对的六合。

△　山东解放军猛攻东平。

△　广州学生准备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香港政府强拆九龙房屋，致使2000余居民无家可归。

1月8日　　行政院长张群主持召开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经济改革方案实行办法》中有关金融和农业部分内容。

△　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宣布参加“行宪国民大会”副总统竞选。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发表谈话称，对剿除“共匪”有绝对信心，并认为“在理论上共产主义不能对抗三民主义”。

△　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由缅甸返国抵昆明。

△　外交部为九龙事件向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提出严重抗议，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对港英当局的违约行为予以谴责。

△　监察院监察委员开谈话会，认为香港政府强驱九龙城中国居民有违国际公法，决定致函外交部敦促立即查明真相，切实与港英当局交涉。

△　广东参议会举行驻委例会，就九龙城事件决定四项办法：一、吁请政府向香港政府严重交涉；二、采取善后办法，组织慰问调查团，10日赴九龙城慰问受难同胞，并实地考察；三、请两广外交特派员到会报告交涉结果；四、发动广东各界一致声援。

△　美国海军少将泰伯启程来华，将在美海军顾问团中担任要职。

△　加拿大政府援助国民政府之重2500吨价值120万美元的军火及战具（其中包括四架“蚊式”轰炸机）由“崖边号”启运来华，15日抵上海虹口码头。

△　东北行政委员会发给黑龙江省农业贷款九亿元。

△　华北解放军向天津进攻，占领小站，国共两军在塘沽附近发生激战，海河停航。

1月9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过四项议案：一、定北平为陪都，1月14日明令公布；二、公教人员待遇办法；三、建国特捐改为经济特捐；四、1948年上半年总预算，收入总额定为58万亿元，支出总额定为56万亿元。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称：他本人拟与即将赴美的中国代表俞大维和贝祖贻亲自会谈美国援华事宜。

△　菲律宾政府决定任命谢伯襄为首任驻华大使，并征得中国政府同意。

△　晋南国民党军攻占赵城。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彭德怀、张宗逊等，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线部队之作战分作三个阶段，以达到在两三个月内歼敌10个旅左右的目的，并协助刘、邓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陈、谢建立豫鄂西及陕南根据地，彭、张建立渭北根据地的目的。

△　自是日起，豫南桐柏军区解放军陈赓部发动豫西邓县战役，向国民党驻守邓县地区的地方武装共11个保安团发起围攻。

1月10日　蒋介石率国防部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等由南京经北平飞抵沈阳，在沈阳励志社召集军事会议，追查新五军失败的责任，对东北全局战事进行新的部署，并研讨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事宜。

△　经济部长陈启天对记者表示：经济部已拟定《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施行办法草案》。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关于援华问题，细则尚在拟定中，数额何时解决，尚未可知。

△　香港政府就九龙事件发表声明称：九龙城之整个拆迁问题，完全为有关殖民部内部行政情事。

△　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经香港到广州处理九龙事件。

△　四川省政府为稳定粮价，通令各县、市，切实实行粮价管制。

△　晋南国民党军进占解县等地；北路进占霍县、赵城、洪洞。

△　北平参议会致电蒋介石，建议国民政府建都北平。

△　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惩治贪污条例》。

△　中共牡丹江省委发出《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问题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工作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倾向。

1月11日　蒋介石偕刘斐、范汉杰、俞济时等人由沈阳同机飞返南京；傅作义飞返北平。

△　司法院举行司法节扩大纪念仪式，院长居正发表讲话称：修明法治之首要条件在于普及法律知识。

△　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召由台湾飞抵南京。

△　广东省参议会组织之九龙城同胞慰问团一行八人，携慰问物品由广州出发前往九龙。

△　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国民党军再次进占小站、葛沽、咸水沽。

△　保定国民党军进占满城。

△　连日来，热河国民党军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沈阳展开激战，沈阳西北35公里的兴隆店战况尤为激烈。是日，国民党军攻占兴隆。

△　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南京国民党当局“分区防御”的计划和人民解放军进入解放战争第二年来的形势的发展，指出：目前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反攻阶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强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要求西北解放军要坚决地打到外线去，“不但发展大西北，还要向西南发展”。

△　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战略进攻，晋察冀解放军进击河北涞水，发起了庄疃战役。

△　湖北解放军由钟祥北之老河口渡过襄河。

△　晋南人民解放军撤出运城、解县两县城。

△　中共松江省政府发布《一九四八年度经济建设计划（草案）》，计划农业上增加产粮达111万吨，工业上要发展城市贫民纺织，大力发展手工业，发展公营工厂，特别是铁矿厂和各种油的生产；创立玻璃和造纸工业；大力发展民用工商业；发展合作事业、交通运输业等，修复公路应以军需和经济上需要为重点；扩大汽车公司，组织运输，支援战争。

1月12日　　国民政府公布《大学法》，凡33条；《专科学校法》，凡24条，同时明令废止《大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　香港军警再度进入九龙城，开枪击伤中国居民六人。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为港英军警强制拆迁九龙、发生枪击中国居民事件邀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到部，要求英国政府训令香港总督停止暴力行为，接受国民政府1月8日所提之要求。英大使允立即电达本国政府。

△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英国大使施谛文以《中国与香港间之关务协定》业已成立，是日在南京正式换文。

△　胡宗南部整一师整七十八旅进占运城。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指示：打阎锡山部的作战既已停止，对由灵宝北渡的胡宗南部，应让其留在晋南三角地区，这样有利于下一步西北我军进行的战役。

△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

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并全面阐述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问题和划分阶级的标准，以作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他指出，对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对工商业者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对开明绅士也要采取保护政策。他宣布：共产党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取肉刑。

△　中共黑龙江省委发出《关于动员新兵补充兵力的通知》，后来，全东北其他各省委也发出类似的通知，使新兵源源不断地补入军队，保证了前方作战的需要。

△　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线北段涞水以东地区与前来图解涞水之围的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激战。截止翌日，歼灭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官兵共2000余人，击毙第三十二师师长李铭鼎，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在高碑店自杀；同日，又在定兴西北及松林店两地歼灭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各一部近千人。

△　天津近郊之解放军撤退，海河航运恢复。

1月13日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陆军训练会议，决定在北平、沈阳、汉口、重庆、西安设立五个新兵训练中心，由汤恩伯负责，计划训练后备军10个师；并决定在南京、徐州、郑州、汉口、西安、沈阳、台湾等地设立八个轮训前线部队机构和一个军官学校，这些训练机构皆由美国人直接控制。会议于15日结束。

△　国民政府明令定北平为陪都。

△　行政院开政务会议，通过文武职人员待遇调整实施办法，规定文武职人员一律以薪俸30元为基数，照生活费指数计算，超过30元之数一律以十分之一照指数支付。

△　河北、天津、北平参议会代表致电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就九

龙城事件向港英当局提出强硬交涉，以制止港英政府现行措施，释放被扣之两名中国同胞，并责其赔偿因此事件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　济南总工会就九龙事件，电请国民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交涉，以期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　广东外交特派员郭德华与香港总督会晤，就九龙事件向其提出严重抗议，驻英大使郑天锡也就此事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审查《三十七年度国家总预算草案》。

△　苏北国民党军进占大中集等地。

△　豫北国民党军地方武装进占滑县及道口。

△　晋南国民党军进占安邑虞乡。

△　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北镇、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军一个团及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一部共1440人。

△　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永宁城东之大石岭一带全歼傅作义部暂编第三军暂十一师1800余人。

△　皖北解放军占领灵璧县城。

1月14日　　行宪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孙科公馆举行第二次会议，开始拟制选举总统之程序草案。

△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就九龙区居民代表两人被香港政府判处劳役事，电令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向英政府表示，要求英政府赶快命令香港当局将两人立刻释放。

△　贝祖贻率中国技术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美访问，俞大维因故

未能成行。

△　冯玉祥在纽约发表公开谈话，宣布抗拒国民党当局的命令，表示要“效忠于一切推翻蒋介石的势力”。

△　北平、河北参议会议长及部分工商界代表刘瑶章、时子周、李烛尘、姬奠川等飞赴上海，当夜转乘火车至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求放宽输入限额，解除南粮北运之限制，以华北外汇之一部换取外国麦面，以煤易粮，美国救济物资中之粮食全部运交华北，恢复生产贷款，开放申汇等。

△　“冀热辽边区剿匪指挥部”成立，范汉杰为司令官。

△　晋南国民党军攻占平陆，陕南国民党军攻占山阳。

△　伪新民会会长张燕卿被判处徒刑10年。

△　英国驻东南亚特派员基勒恩到南京会晤外交部长王世杰。

△　中共中央在《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指出，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都应该采取争取与合作的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对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要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

△　《哈尔滨日报》报道，一年多来，哈市参军9318人，捐款30亿元支援前线。

1月15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会晤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商谈解决九龙城事件。国民政府监察院建议收回香港、九龙。19日，双方再就九龙城事件晤谈。

△　蒋介石电告傅作义：决在东北行辕之下，设立东北“剿匪”总

司令，内定以卫立煌任斯职。

△　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南京向中央社记者发表去年9月1日、10月16日及12月12日致新疆伊宁方面阿合买提江、赖希木江之三函内容：澄清形势，敦促新疆伊宁地方特殊化措施，停止备战行为，恢复交通常态，提议伊宁方面省委即返迪化或来南京，对和平条款之实践作彻底之检讨，同时商谈进行省长民选的办法。

△　中国派驻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何应钦发表讲话，呼吁东方、西方国家从速解决政争，达成国际合作。

△　全国交通安全促进会在南京成立。

△　新华社报道：豫陕鄂新解放区民主政府废除苛捐杂税，物价普遍下降。南召、南阳地区解放前麦子每斗法币21万元，现每斗只合法币八万元；泌阳、舞阳地区棉花由法币3.8万元降到合法币2.8万元；其他物品的价格也分别下降了20％至30％。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晋冀鲁豫边区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

△　下午2时，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建国法商学院、国立边疆学校等15单位代表40多人，到外交部请愿，抗议英国在九龙城对中国居民的暴行。全国各地学生接着响应。

1月16日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九江召集湘、鄂、赣、皖、豫五省主席举行绥靖（联防）会议，决定加强民众组训，加强对长江南岸的防卫和民船的管制。同时还通过了加征自卫特捐案，规定食盐每担征收10万元，其他粮、棉、烟、酒及各省矿产依相当比例征收税捐。会议于18日结束。

△　中国技术代表团抵达美国华盛顿。

△　美军海军少将萨克奉命在南京建立美海军顾问团总部，作为国民党海军最高监督机构。

△　第一批2600吨日本赔偿物质（453箱机器），由中国“海康号”轮装载自日本横须贺港启运来华。第二艘开往日本之“海浙号”轮亦于是日由虬江码头启锭，前往日本仙台港装运赔偿物质3000吨。中国首批私人贸易代表四人，亦搭是船赴日。

△　港英警察向九龙城中国居民提出警告：如在一周之内不自动迁出“肇事区”，即行驱逐出境。

△　广州群众四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港英当局制造的九龙事件，焚毁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及太古、渣甸、渣打三洋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00余人被捕。

△　各地学生为抗议九龙城事件，纷纷请愿罢课。行政院电令各省、市“严惩违法暴行，保护英人生命财产”。

△　上海开始执行禁舞，全市舞厅一律封闭。

△　湖北国民党军进占礼山。

△　陕南国民党军攻占山阳县。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边区政权机关性质给邯郸局的指示》，强调指出，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应是代表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群众及中产阶级，而以工人劳动群众为主体。

△　桐柏军区解放军陈赓部解放豫西邓县，前后共歼国民党军6000多人。

1月17日　　国民政府特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

匪”总司令。按：东北“剿总”下辖总兵力14个军49个师，加上保安队共60万人。

△　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东北新军事机构的设置，其意义在于“显示中央对剿匪的决心”，并称卫立煌“与本人为患难生死之交，今后东北军政更可配合”，扬言“戡定匪乱亦仅时间问题”。

△　国民政府特派沈士远为三十七年第二次司法人员考试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再试典试委员长。

△　上海学生为抗议九龙城事件罢课，举行示威游行，包围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　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离开南京返回台湾。

1月18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会议，研究部署沿江防务问题。

△　第一批美国救济小麦9300吨、面粉8482吨运抵上海。市长吴国桢表示“极感感谢，而且要好好的去利用，来挽救危机”。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必须注意的几个具体政策。主要有：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以及学生、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的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对于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改的条件下，应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旧富农加以区别，对新富农应按富裕中农对待，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中、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

△　晋察冀人民解放军第三次收复河北雄县城。

1月19日　蒋介石以旧历年关防务重要，电催孙连仲速赴南京就任首都卫戍总司令职。

△　行政院颁令各部、会自2月至6月止，每月减员5%。

△　外交部长王世杰再次就解决九龙城事件问题与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晤谈。

△　以贝祖贻为团长的赴美技术代表团五人在华盛顿与美国务院官员及经济专家会晤。

△　前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少将在南京宣称：不论南京政府改革与否，美国政府均给予支持；美军事顾问团应扩大权限，于实际作战策略下，训练中国士兵。

△　河南解放军攻占禹县。

1月20日　行政院颁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犯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一条第一项之罪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通谋外国或其派遣之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处死刑，预备或阴谋犯前项之罪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到广州与宋子文商谈广东工业建设事宜。

△　粮食部长俞飞鹏答应北方请愿代表按月供给平、津米面。

△　陕南国民党军进占漫川关。同日，晋南国民党军进占猗氏、蒲县。

△　松江省政府为发展农业生产发放贷款7.5亿元。

△　国际友人、著名医生、哈尔滨红十字半月协会副董事长特罗瓦博士在哈市逝世。

△　自沈阳飞往北平之中航机“四十一号”失事，死伤32人。

1月21日　内政部公布1947年人口统计，三十六年度下半年全国人口总数计4.62798093亿人。该局发言人称，现全国计有47省市与西藏地方，共有4.9812万乡镇，62.383万保，共8663.7312万户。旅外侨民人口数870.0804万并未列入。

△　卫立煌由南京飞往北平，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会谈。次日飞往沈阳就任。

△　国民党军范汉杰部由山东开抵秦皇岛。

△　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为16日广州市民焚毁英领事馆事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亦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要求英国政府赔偿九龙城居民的损失。

△　从是日起至23日，开始投票选举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

△　上海同济大学为学生自治会问题发生风潮，校方先后开除学生11人。

△　畏罪潜逃之前农民银行总经理、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在香港被捕。

1月22日　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宣布参加竞选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副总统。

△　装载日本赔偿物资之“海康号”轮抵上海张华浜码头。

△　新华社报道：驻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残杀无辜华侨900多人，拘捕数千人。

1月23日　行政院长张群为稳定当前财政金融，特拟定财政经济改革十项计划：一、节约一切开支；二、改善关税及地方税以富国库；三、增进公务及军队官兵之工作效率；四、加强对日用品供给之

控制；五、努力建立一种使币制趋于稳定之基础；六、改善银行与信用制度；七、鼓励货物进口，排除出口之障碍；八、改善进口货之管制；九、发展农业生产并实施土地改革；十、恢复交通及重要工矿。

△　行政院长张群召集此前至南京的河北、北平、天津工商界请愿代表谈话。

△　国务会议通过《救国赈灾特别捐献办法》，中央公教人员每月配米由原来的八斗改为三斗。

△　武汉大学学生罢课，要求全部公费待遇，至28日复课。

△　由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发起的美国对华及远东政策全国会议在纽约召开，至25日，会议决议号召以行动抵制美国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中国民主同盟特致电贺："特代表中国爱好民主和平的人民，向为中国、远东民主努力著有成绩之贵会致谢并申贺意。"美国码头工人及仓库工人工会，也决定实行援外作战物资禁运工作。这一行动致使美国政府决定支援东北国民党军10个整师的武器装备未能及时运到。

△　美国人雷诺及波士顿博物馆馆长华士本在南京宣布探测积石山计划。

△　英国工党议员斐尔农促请政府支持中共。

△　华东地方人民武装攻克江苏如皋县城，歼灭国民党军1300多人。

1月24日　行政院长张群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实行币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政府的外汇管制政策不会变更，现行的措施已能控制黑市活动，并预料美国可望给中国以财政援助。

△　行政院公布施行《民营事业申请政府保证向国外借款审核办

法》，凡九条。

△　英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郑天锡，声称港英当局对九龙城的措置是合理的，至于该城的管辖权问题，则应另行商谈。

△　辽北国民党军进占东丰、西丰。

1月25日　南京政府宣布，本年度征粮预算总额为9000万市担。

△　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四师一部由山东青岛运抵葫芦岛，增援东北。

△　资源委员会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南方工矿业。

△　中共中央工委在关于对地主经营工商业的政策给邓子恢的指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保护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有工商业，对于地主、富农工商业一般应给予保护，而不应是一般没收，并且要鼓励他们经营工商业。

△　中国嫩江省委发出《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通知》，中共合江省委亦于次日发出《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通知》，对保护工商业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旨在纠正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做法。

△　曾任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向《新民报》记者称：对日和会目前在程序上有若干争执确已形成和会僵局，但远东各国对和会的主张，其原则距离并不太远，如和会一旦召开，和约可望早日完成。

1月26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党员登记尚未办理完毕，且因3月29日将举行国民大会，时间仓促，决定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举行。

△　蒋介石接见在南京的北平、天津、河北工商界请愿代表，表

示将尽可能地安定北方，扶植北方。次日，该请愿团北返。

△　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宇敏登抵南京。

△　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抵长春。

△　上海海关职工2000人罢工，要求提高薪津。

△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第八纵队攻克辽西铁路交点新立屯，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共9000余人。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就中原三支大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问题发出指示："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1月27日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徐州主持召开苏、鲁、皖、豫四省绥靖会议，决定加强民众组训，充实地方武力。会议于30日结束。

△　新任首都卫戍司令孙连仲由北平抵南京。

△　国民政府决定恢复各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由各省主席兼任，行政院为此制订《组织规程》。

△　国务会议讨论通过设立东北运输总局，期统一调度东北九省及热河省区内交通运输业务，并得在东北省区内设立铁路管理局及水道、公路运输机构。

△　外交部就九龙城事件再向英驻华使馆交涉。

△　广东省主席宋子文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发表共同声明，吁请各方合作，为广东省工矿业建设树立基础。

△　新任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抵南京。

△　晋北国民党军进占浑源。

△　豫东国民党军第三次进占太康。

△　湖南大庸发生械斗，新任县长黄颖川被杀。

△　本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调回黄河以北之濮阳地区休整，编成一个兵团，由华北野战区副司令员粟裕指挥，准备挺进江南，开辟东南战场，继续发展战略进攻，以吸引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从而达到减轻中原战场压力、分散敌人兵力、各个击破的目的。是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指示渡江后的方略："你率三个纵队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有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然后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

△　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实施由哈尔滨市政府发布的《战时工商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以保证有计划地发展战时经济，支援前线，安定民生，保护工商业者的财权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条例》还规定，对于有贡献的工商业者，政府给予资助。

1月28日　行政院长张群发表声明，公布由其所拟的《财政经济改革十项计划》，称已获得美国政府同意，将于美国国会本届会议中提出对华切实援助办法。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接见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中国访美技术代表团团长贝祖贻，会见表明华盛顿对援华事宜仍持拖延态度。

△　下午，新任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

△　经济部发布接收处理敌伪工、矿、电、商事业及去年煤产概况。

△　晋南国民党军进占襄陵。

△　缅甸驻华大使宇敏登会见外交部长王世杰。

△　全国防痨协会在上海成立。

1月29日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报会，国防部代部长秦德纯，次长郑介民，代参谋总长林蔚，次长刘斐、方天、桂永清，南京卫戍司令孙连仲等10余人与会，听取华中、苏北及沿江防务问题。

△　蒋介石电令陈诚：锦州城防工事及机场工事应派专人负责督构，限半个月，最迟一个月内完成。

△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攻占沟帮子，歼灭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一部，切断了北宁路沈锦线。

△　下午3时，全国经济委员会例会，陈立夫主持，通过办理国际合作贸易实施办法等议案。

△　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决定全体赴南京举行反压迫请愿，全市27所大学的学生5000余人前往欢送和声援。国民党当局出动装甲车数十辆，上海市长吴国桢指挥军警3000多人前往镇压，捕去学生200多人，殴伤69人，其中重伤四人，失踪多人，是为上海“同济血案”。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蒋介石亦在南京亲下手令，声称要消灭各大专院校参加反压迫运动的势力。

△　上海申新纱厂第九厂工人6000余人为抗议厂方停发配给物

品，开始罢工。

1月30日　国民政府颁令将《惩治贪污条例》施行期间，由1月1日起延长一年。

△　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一九三次会议，商讨国大代表选举及退让事。中常会与选举指导委员会经过多次争执后决定：原定青年党、民社党之名额为无党派人士占去者为有效；为国民党籍人士占去者，“本党一律递让”；国民党代表名额落选者，自行退让，否则以党纪处分。

△　行政院美国救济物资处理委员会决议，南京市自3月1日起，每人每月配给食米一斗，价格较市价为低，每月调整一次。

△　蒋介石电令陈诚固守锦州。

△　蒋介石召见桂永清，策划长江防务。

△　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康泽任司令官，郭勋祺任副司令官。

△　南京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美国将国内战时所有“剩余物资”出售给中国。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刘伯承和邓小平等，决定：一、韦国清率二纵于2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纵、十二纵

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国清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受陈毅、粟裕指挥；二、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

△　东北野战军九纵第二十五师收复盘山。

△　上海各银行库局开始执行《上海国家行局代政府收购成品临时办法》，接受厂商申请，办理收购业务。

△　港英政府公布《银行条例》，规定凡经营银行业务的注册有限公司，须经财政司登记，申请执照。

1月31日　　国防部长白崇禧发表广播演说称："我们必须以剿匪军事为第一，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实施战时体制，发挥总动员的力量来剿除匪患。"

△　陈诚派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飞往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范汉杰等会商华北与东北的协防问题。

△　魏德迈向南京政府献策开发华南。

△　江海关舞弊案宣判，帮办尹兰荪等三人被判处死刑。

△　西藏商务代表团到达南京。

△　上海29家舞厅资方、职工、舞女、从业员等共三四千人在新仙召开大会，反对当局强迫抽签停业，要求政府收回成命，遭到上海警备司令部镇压，797名请愿群众遭到逮捕。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决定以主力转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辽南地区作战，以第四、第六纵队及辽南独立师和炮兵主力攻取辽阳，并以第一、二、七纵队进至沈阳以南待机。是日，第四、第六纵队包围辽阳。

是月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被迫采取“分区防御”的方针，强化南线20个绥靖区。在绥靖区内，加强对民众的组训，扩大地方武装，纠集一切人力、物力，进行“总体战”。在兵力部署上，也加强了对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的防守，企图继续坚守华北、东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在中原战场上集中了三个整编军、34个整编师、79个旅共54.6万人，以胡琏、邱清泉、张轸三个兵团执行监视人民解放军和机动救援任务。并企图摧毁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以确保南京、武汉安全，防止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西出汉水。

△　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山东抽调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进入华中，会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开展华中战局，为渡江南进创造条件。第二纵队即由胶东南下。

△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也已经破产。党的统战工作尤其应当记住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统战方针，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

△　察东、平北解放军在平郊四海县包围前来扫荡的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一师，毙伤1500余人，俘300多人。

△　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作出《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中共中央致电在巴黎参加世界工联大会的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筹备会主任刘宁一，请其转告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欢迎他到解放区。朱学范在从伦敦前往解放区时，向世界各国工人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拥护民主革命运

动，拥护实行土地改革，拥护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政治力量，造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2月

2月1日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卫立煌为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同时就“行辕”与“剿总”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划分：“剿总”专司军事，是一执行机关；“行辕”着重政治，为一监督机关。国民党军政人士称，如此明确地划分职权，将有助于当前东北局势的解决，同时还表示对未来抱有“严肃而乐观之信念”。

△　国民政府特派罗家伦为中华民国庆贺锡兰独立特使。

△　罗卓英、范汉杰及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副主任吴奇伟自北平飞抵沈阳。

△　“粤赣湘边剿匪总指挥部”成立，叶肇任指挥官。

△　运载第二批日本赔偿物资的“海浙号”轮抵上海张华浜码头。

△　新任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宣布就职。在就职仪式上，孙氏略称：首都卫戍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与诸位同仁勉力同心，达成任务；关于人事方面，则不拟轻易变更，国家事，国人办，不可划分界限，请各界多加协助。

△　河南国民党军与解放军中原部队刘伯承部在正阳、新蔡发生战斗。

△　中共中央军委就粟裕部渡江问题致电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等：“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取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

△　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六纵队扫清辽阳外围国民党军据点。

△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

2月2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报会，副参谋总长林蔚、联勤总司令郭忏、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等10多人出席。

△　范汉杰自沈阳飞返北平。

△　军警3500多人镇压上海申新纱厂第九厂罢工工人，打死女工三名，打伤43名，逮捕190多人。另有400多名工人被开除。

△　上海市社会局强令全市各舞厅停止营业。

△　上海连续发生市民骚动事件后，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联合宣布处理群众激烈行动紧急措施：今后再发生暴动事件，将格杀勿论，必要时将宣布戒严，望市民不要为“阴谋分子”利用。

△　上海被捕之26名同济学生，转送警备司令部交由军法处审讯。

△　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雷博济到外交部就上月九龙城事件进行商谈。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在中英双方正在就此继续磋商，惟九龙城管辖权一点，尚未获得协议，致使问题解决之细则无从进行讨论，至希英方本着友好精神让步，裨助于该事件的早日解决。

△　于二战期间停止之由美国寄往中国的挂号包裹邮寄，是日正式恢复，并规定包裹最大不得超过50磅，每磅寄费美元二角二分。

2月3日　　毛泽东致刘少奇《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电，就土地法的实施问题，指出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前的解放区）、半解放区（日本投降至战略进攻前解放的地区）和新解放区（战略进攻后开辟的地区）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以保证《土地法》的贯彻落实。

△　卫生部透露，全国现流行黑热病区共有18省九市，患者约在200万人左右。

△　西北各省旅南京人士主办的中国边疆文化学社等四个文化团体，开会决定由全体会社员共2800多人签名促请于右任参加本届行宪国大副总统选举，并设置了竞选办事处。

△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致公党等七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援华法案。声明指出："目前南京独裁政府违法摧残民主政党，逮捕学生，执行内战政策，早已不能代表民意，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之政府，美国政府如再继续积极援助南京政府，实具有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我们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之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

△　燕京大学学生成立"穷人过年运动委员会"，发动校内募捐，调查了解当地贫民生活情况，开展帮助穷人过年运动。清华大学学生也参加了这项活动。至5日将募得的面粉50多袋、现钞四万余元、衣服400余套、赤豆20余麻包、布10余匹分发给贫苦市民。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校学生组成"华北学生争取民主反迫害声援同济血案后援会"，呼吁全国学生"共同起来争取自治的权利"。截至7日，有六名学生遭到逮捕。

△　全国难民约达4800万。

2月4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党员当选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自愿退让与友党奖励办法》，规定退让者将受到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面奖励，同时还规定可以给予退让者一些"经济上的奖励"。另外，本次会议还通过了《各级党部本年度经费预算补充办法》等案。

△　蒋介石召见联勤总司令郭忏，询问有关徐州四省绥靖会议之情况及后方工作状况。

△　《中央日报》报道：中国银行将在日本之东京设立分行，财政部业已核准，并经中国政府与驻日盟军总部商洽获得同意。该分行的任务是：一、办理中国驻日官员之款项收付事宜；二、办理驻日侨民及核准在日成立之私人商号款项保管事宜；三、按照盟军总部规定，办理关于进出口贸易事宜。

△　海关总税务司丁贵堂飞抵香港，即转赴澳门视察当地走私情形。

△　国防部新闻局发表自元月29日至是日之《一周来全盘战局》，虚称："这一星期以来，各战场的国军，均随战况而活跃起来。"

△　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时昭瀛在行政院新闻局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时称：中国政府已训令驻英国大使郑天锡，就上周英国政府为九龙城事件致中国外交部之照会内容提出答复，以表示中方希望英政府认识此问题急需从早合理解决。

△　外交部特派员昆明公署就去年12月27日驻越南法国武装侵入中国滇边江城县事，向驻滇法领事提出严重抗议。

△　社会部制订《人民团体派员出国申请办法》，从即日公布施行。

△　社会部福利救济事业审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美国救济经费使用原则》、《申请分配美国援华经费之处理程序》等案。

△　范汉杰自北平赴泺东，视察北宁线情势。

△　豫北国民党军攻占浚县。

△　苏联新筑五条通往东北、外蒙边境铁路。

△　浙赣铁路杭州、南昌间通车。

△　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后南下牵制国民党军一部分兵力。

2月5日　　行政院长张群向立法院报告，三十七年度国家总支出为96.2766万亿元，总收入为58.3408万亿元，赤字达30余万亿元。

△　立法院通过两项议案：一、公务员待遇指数每月调整一次；二、同意邮电加价案。

△　新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自沈阳抵达北平就职，其原任之沈阳区防卫司令官一职由原副司令官王铁汉继任。

△　行政院救济特别捐献督导委员会成立，王云五任主任委员，下设秘书处及总务、调查、稽核三组和设计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救济特捐推行纲领》和《工作进度日程》。

△　南京政府明令定北平为陪都后，是日决定拨款修缮保护文物。

△　经济改革方案之水利部分实施办法是日通过。

△　驻英国大使郑天锡就九龙城事件照会英国外相贝文，外交部亦以同样内容照会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表示中国政府愿以合理方式，使问题早日得到解决，深信英国政府也有同样需要。同时重申九龙城之管辖权属于中国，九龙城事件之责任应由港英当局承担。

△　市上米价每担涨至166万元，次日又涨至180万元。电灯、自来水、电话和煤气等费亦均上涨20％至30％。

△　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离开沈阳飞抵南京，当晚谒见蒋介石汇报东北的情况。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就近日上海市连续发生三次市民骚动事件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这种趋势本质上是表示政府由于行政的失当，已失去人民的拥护，这种行政上的失当现在已发展到危及政府稳定的时候。"

△　豫南国民党军进占邓县。

△　美国大学生150余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阻止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该校礼堂发表演说，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南京政府的援助。

△　上海市与国民大会选举有关人士潘公展、方治、徐寄庼等在新生活俱乐部举行联谊会，决定致电国民党中常会、选总所，请早日公布国大代表名单，"以昭大信"。

2月6日　　国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本年度2、3两月减发各机关生活补助费10%，法官、教员等不在此限。

△　财政部拟就《三十七年度地方财政紧急措施草案》，呈行政院核示。该案主要内容为：一、中央绝不补贴各省、市三十七年度公教人员之生活补助费；二、县级原有营业税，全部划归省级，县级所受之损失，以土酒、土烟税分成补足；省级辖市营业税收，由省、市各得一半；三、院辖市营业税、土地税，全部划归院辖市，各地应以三十六年中央核定员额为准，普减三成。

△　国防部长白崇禧由汉口抵南京。当晚蒋介石召见白氏听取了有关华中军事发展的情况。

△　外交部发表驻英国大使郑天锡于本月5日答复英国外相贝文的照会，称：九龙城管辖权属于中国，拆屋责任在香港政府。复文内容在本日下午由中国大使馆及南京外交部同时发表。

△　新任美军驻华海军顾问团团长塞柏尔少将，乘舰抵达青岛。

△　比利时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第二批援助军火60吨启运来华。

△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同意他们于4日所提之建议，决定组织两支部队，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2、3两月作充分准备，3月底或4月初行动，并以陈再道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游在内。

△　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名称问题给贺龙、习仲勋等人复示："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辖军（分）区。"联防军司令为贺龙，政治委员为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

△　东北人民解放军四纵、六纵向辽阳守军发起总攻，经过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克辽阳，歼灭国民党军新五军暂五十四师、新五军和第五十二军留守部队共1.07万余人，生俘暂五十四师副师长曹济民、参谋长杨福涛。

2月7日　　立法院法制、财政、经济、外交、军事五个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重新审查《三十七年上半年度总预算案》。

△　蒋介石宴请政府各院、部长官，声称本年之军事、政治均将比去年有所起色。

△　中国及中央两航空公司各线票价上涨30％至40％。

△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华北文法学院、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学生6000多人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反迫害争民主大会，大会致函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丁文渊，抗议镇压同济同学的行为，与会学生作联防宣誓，一致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同济、北平学生，并对教育部所制订的《学生自治会章

程》提出抗议。会后，学生们在校内举行了示威游行。

△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与美国人雷诺、波士顿科学博物院中国探测团华士本在南京签订《中美积石山探测合约》。

△　驻菲律宾大使陈实平就菲律宾当局取缔华侨摊贩事向菲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　西班牙政府下令：撤销对中国、暹罗等26个国家之人民在西班牙资产的冻结。该项命令称：目前由于政局之发展，足以保证此等国家人民之基本权利可受其本国政府之尊重，故此等人民可以自由处理其在西班牙之财产。

△　首任缅甸驻华大使宇敏登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国书。

△　蒋介石召见西藏商务代表团。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将中原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三个纵队，陈士榘、唐亮四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兵力，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期将国民党军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的放手发展。

△　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总部，就东北野战军作战部署作出指示：“你们现在打辽（阳）、鞍（山）、本（溪）、营（口）地区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　人民解放军再克晋南运城、解县县城。

△　中共哈尔滨市委作出《关于在城市消灭封建势力的决定》，指出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加以保护，地主兼工商业者，其土地分配给农民，工商业不动。

2月8日　　蒋介石自南京飞往庐山牯岭。临行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前往晋见，请示“全盘剿匪”机宜。

△　英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对记者称，英国首相之私人代表将于下周来华访问。

△　冯玉祥在《纽约下午报》上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抨击蒋介石独裁腐败，镇压人民，撕毁政协决议，依靠美援大打内战的罪恶。他在信中说：“现在我已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要向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并告以自己已被选举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誓矢奋斗，以推翻你的反动政权，务求在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和平”。

△　国民政府委员包尔汉编成《维汉俄词典》。

△　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南之苏家屯。

△　人民解放军豫东部队陈毅部攻占兰封。

2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傅作义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副主任。

△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小麦会议特别会议之全权首席代表。

△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表示对东北局势关切，并决定加强东北党务工作，以求配合政治、军事方面之“建设性设施”。

△　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南京防卫周密，治安无虞，并谓今后要加强民众组训，发展生产。

△　监察院长于右任对记者称：“关于是否将竞选行宪后副总统问题，正在考虑中，两周内即可完全决定。”

△　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南之森林子、莫子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师长文礼不战而退。

△　人民解放军陈毅部攻占考城。

△　豫西解放军陈赓部渡过黄河返回晋南。

2月10日　　国民政府令：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定于3月18日开始报到。

△　地政部制订《改善土地利用办法》，期图发展农业生产。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及其他重大战犯之检查工作是日结束。

△　解放军陈毅部经河南民权县返至鲁西，攻占曹县。

2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例会决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确定办法将由国大代表100人以上连署提名推荐。

△　行政院长张群发表谈话称，政府正与美国政府商洽改革币制事宜，并否认中美之间有合作开发台湾的谈判。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国务院已正式建议以5.7亿美元援助南京政府。

△　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自南京飞往徐州，晤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13日，张治中飞抵兰州。

△　上海申新纱厂7000工人静坐罢工，要求借支工资。

△　攻占苏家屯之解放军部队南进，国民党军进占沙河堡。

△　南京各大学学生发动助学运动。

△　中共中央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

2月12日　国民政府任命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兼代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

△　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第五、第六两季输入物资限额为每季3736万美元。

△　中央社公布本年度国统区所得税起征额及税率：公司营利所得税，以每年所得额满资本额10％者起征；合伙、独资及其他组织营利事业，以每年所得额满5000万元者起征；业务或技术报酬所得税，以每年所得额满2400万元者起征，税率3％；定额薪资所得税，以每月所得额超过200万元者起征，税率1％。此外还有他项税征。

△　行政院颁布实施平价米配发办法：自2月份起，各地公教人员，一律平价配给中等米三市斗。

△　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前往台湾考察，14日返南京。

△　解放军陈毅部由曹县撤退，鲁西国民党军重占该县城。

△　东北野战军由法库南进，进抵沈阳以北。

△　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六两纵队包围鞍山。

2月13日　行政院长张群对东北旅南京人士表示：“中央对于东北情形，不仅极为重视，且极有信心。”

△　莫德惠向蒋介石建议，起用东北宿将，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力量。

△　美国政府宣布去年12月23日国会通过之1830万美元对华救济款之使用办法。

△　沈阳国民党军越过辽河，防御南下之解放军东北野战部队。

△　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与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吴兆洪在台湾召集国营及省营事业负责人会议，听取报告，以图解决台湾经济问题。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关于日本侵略中国方面之总公诉书，确认日本之战争罪责。

△　新华社报道：晋察冀边区政府为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决定发放九万大担粮食、500亿元边币（每元合法币八元左右）的农贷。

2月14日　行政院开会讨论加强地方武力事。

△　美国宣布对华1800万美元之拨款，并称该款将大部用于米麦。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前往台湾。

△　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通过《三十七年度对日贸易输出入计划表》。

△　上海《大公报》报道，美国垄断商雷诺金属公司投资台湾铅业之合办草约在南京签订。

2月15日　李宗仁邀请万福麟、马占山、王树常等人商谈东北目前局势。

△　豫东国民党军进占考县。

△　中华全国戏剧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张道藩、梅兰芳、洪深、田汉等31人为理事。

△　中共中央发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党内指示，指出："新区土地改革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同时要求各地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

△　东北野战军部队逼近新民。

△　湖北解放军张健部进占应山。

△　中共合江省委发出《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发挥妇女的作用，领导她们参加民主运动和走上农业生产战线。

2月16日　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参谋总长陈诚分邀张作相等，交换关于东北问题的意见。

△　外交部宣布：中国与澳大利亚政府，业经同意将双方之外交使节，由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18日，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史丹佛抵南京。

△　英国驻华公使施谛文就九龙城事件交涉问题访外交部长王世杰。18日，双方就该事件再次商谈。

△　国民政府以海南铁苗8000吨运往日本。

△　河北"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成立。

△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兰州成立。

△　鲁西国民党军进占定陶。

△　上海市物价飞涨，大米每担涨至210万元，一日内上涨15％；美元黑市每元兑法币21.5万元，一日涨幅达20％；其他日用物品也均上涨15％至40％。

2月17日　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北平、天津、广州、上海、南京五市市长粮食配售会议，通过《五市配售粮食计划纲要》，拟定五市粮食配售通则。规定市民凭证每月购粮限额一斗，每月配售一次，暂定四个月，自3月或4月实行。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发表谈话称，军事必须配合政治推进，并以土地政策对抗中共之分田政策。

△　国民政府派农林部次长谢澄平为出席热带及亚洲营养问题专家会议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筹备会代表团团长，农林部渔业司司长刘发煊等为专门委员。

△　行政院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特派谢维麟为出席第十七次国际红十字会政府代表，胡兰生为副代表。并通过任命徐梁、董彦平、王铁汉、范汉杰为辽北、安东、辽宁、热河等省主席，董文琦与曾恕怀为沈阳与昆明市长。

△　莫德惠等东北名流向蒋介石提出紧急呼吁，吁请国民政府解救东北局势。张作相亦拟到南京请愿。

△　加拿大驻华大使戴维斯访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协商开发华南事。

△　国民党军进占大别山区之经扶县。

△　《人民日报》报道，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本年度发放救济粮1000万斤小米，救济春荒，支持春耕。并决定先将边区预算救济粮

730万斤，分配给太行区300万斤，冀南区200万斤，冀鲁豫160万斤，太岳区70万斤。

△　湖北解放军张健部进占安陆。

2月18日　国民政府令：命范汉杰代刘多荃任热河省政府主席，王铁汉代徐箴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徐梁代刘翰东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董彦平代高惜冰任安东省政府主席，董文琦代金镇任沈阳市市长。

△　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纪念新生活运动十四周年，声称要戡定“内乱”，完成行宪进程、克复经济危机。

△　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时昭瀛答复记者有关云南边境、沙面、九龙等事件的外交问题的询问。其中说，去年12月27日法国武装军队一部侵越云南边界，袭击我江成县治下的中国居民，中国政府于今年2月4日已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

△　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提请批准国务院建议的援华议案之特别咨文，提出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

△　美国航务委员会批准售给南京政府舰只12艘，价为994.8876万元。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部骑兵第四师、第九十三军第四十三师、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一部共约七个团的兵力，沿永定河对大兴、涿良宛解放区进行“清剿”。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声称希望中国“爱好自由的爱国人士”“一切急公好义的公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克服中国今天面临的“隐忧”。

△　河北高等法院检查处，提出对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起诉书称：“被告原系逊清皇帝，九一八事变后，与敌人勾结，出关组织伪

满政府，自任执政，旋即成立满洲国，充任皇帝，继续到七七事变以后迄敌人投降。应予检举。”

△ 河南国民党军进占漯河。

△ 滇黔桂边区联防指挥部在广西百色成立。

△ 台湾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许寿裳在台北被暗杀。

2月19日 国民政府救济特捐督委会举行会议，通过救济特捐、捐募对象及捐额标准案。另外还通过了救济特捐各区捐额分配、捐募程序及各区捐募组织等案。规定资产逾50亿者捐五分之一。

△ 邓小平、李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大别山的四个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集结补充，形成一个作战单位，以便于中原野战军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每个部分都能独立歼敌。该建议获得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

△ 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机关及西线兵团之第一、第四、第六等纵队，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由鲁西南北渡黄河，并于3月16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进行休整。

△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第六两纵队向鞍山发动总攻，经过17个小时的激战，解放鞍山，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等1.31万余人，俘师长胡晋生。

△ 华东野战军再克兰封，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旅部和第三五六团全部。

2月20日 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副厅长李树正携新方案飞沈阳，与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商谈“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事，决定仅留第五十三军及第二〇七师驻守沈阳，其余主力尽快从沈阳撤至锦州。卫立煌主张全力固守沈阳，当晚，卫召请东北“剿

匪”副总司令郑洞国协商。他认为：“现在放弃沈阳去打通锦州，途中要通过几道河流，加上共军设有几道坚固的阻击阵地，依我军目前的士气，很可能会全军覆没。”“我们最好能说服委员长，是有希望扭转战局的。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

△　苏联政府宣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次延长两年。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援华计划的听证会上称，战后援助南京政府数额为14.09亿美元。他认为：“只能提供使中国获得喘息的机会和减缓局势恶化的经济援助，而任何长期援助都是不可能的。”在是日下午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他又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已注定不是一个有力的盟友了，即使共产党掌权，也同样会受到中国固有弱点的拖累，在人们对国民党的巨大的不满中，那一点点共产空谈也将无济于事。”

△　中国驻日代表团宪兵队40人乘“海康号”轮启航赴日。

△　河南国民党军进占许昌。

△　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法库，歼灭新六军暂编第六十二师等部。

2月21日　美国合众社报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谈话，主张国共重开和谈，解决中国问题。

△　海军部队进驻营口。

△　美国二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12艘驱逐舰在中国东海海面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美国常驻青岛之西太平洋舰队及原驻珍珠港之第三十八机动部队均参加了这次演习。

△　美国国务院一份备忘录称：美国之军事援助已启运来华，接济南京政府之反共军队。合同数额已被批准，美国境内之“剩余”战具将会以最低价售于中国政府，其中包括飞机及其他军火。

△　《中央日报》是日载发《美援华建议案》全文，该案又称《一九四八年度援华法案》。

△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美国总统杜鲁门18日在国会所提出的援华方案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就是为了延长中国的内战，是美国帝国主义奴役东方人民、奴役世界人民，破坏世界和平的冒险的侵略计划的一部分。”并指出：“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　河南解放军再占禹县。

2月22日　行政院新闻局和外交部否认蒋介石同意与中共重开和谈。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美国驻南京记者谈话，否认自己曾作过主张国共重开和谈的表示，日前美国报纸有关报道，纯属误解。他并说明自己对中国问题之意见，完全如前日发表之《致中国人民书》，其主旨是在希望中国无组织、无党派人士增加对政府之关心，多协助国家为人民谋福利。

△　应国民政府之邀，原东北军将领张作相、马占山由北平前往上海，当晚进抵南京谒见蒋介石，协商东北问题。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对在老区、半老区如何进行土改和整党作了部署。

△　东北野战军开始进攻本溪。

2月23日　罗泽闿、李树正飞返南京，卫立煌派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同往，亲向蒋介石陈述固守沈阳的意见。

△　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我国一日不能保卫海防，则美国海军有一日驻留的必要。美国对于维护中国海岸线北段的安全，贡献极多。”他还称，目下中国海军仅有五艘驱逐舰，各式小舰艇也不足300艘。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谈话，称爱国分子应具有积极精神，以建设性的态度协助政府，解决中国局势。

△　苏联驻华大使馆否认有意调停中国内战事。

△　豫东国民党军进占柘城。

△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向南进攻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西北野战区是日发起宜川战役，首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诱使洛川、宜君国民党军来援；并将主力集结于宜川以西地区，准备围歼援敌。

△　东北野战军进攻新民。

△　华东野战军苏北部队攻占宝应汜水镇。

2月24日　行政院通过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五市粮食配售通则与计划纲要。

△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郑洞国、罗泽闿、李树正。蒋介石认为：固守沈阳，“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不同意卫立煌的意见，令他立即由北宁路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否则，以后会后悔不及的”。

△　蒋介石手书致北平李宗仁、傅作义，告以决定撤退东北主力

部队，并促其抽调有力部队出关接应。

△　东北耆宿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与白崇禧、陈诚、张群等人商谈东北局势问题。

△　美国海关总税务司核准将小型货轮12艘售予中国，定于3月移交。

△　清华大学、北平师院、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六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抗议南京政府今年教育经费仅占其总预算的0.3%。

△　教育部告戒全国学生要尊重法纪，恪守校规。

△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2月7日电示，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从大别山区之新县北上，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所在皖西北临泉县会合。

△　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汜水、泾河、黄浦、王营、望直港等六处重要据点。

2月25日　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由庐山飞返沈阳，向卫立煌报告晤见蒋介石之情况。卫氏立即召集将领开会，研讨蒋介石的指示和方案，皆觉此时在沈阳的军队没有把握打通锦州，况且也不能丢下在长春、永吉、四平街等地的十几万军队不管，因此，一致主张固守沈阳，不同意实行蒋介石的方案。卫立煌决定再派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骥、第六军军长罗又伦飞南京面蒋陈述理由。

△　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为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是日由上海抵南京。

△　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升任苏联驻华大使，与美使司徒雷登

商谈调整停中国内战事，并频与南京政府要员接触。

△　上海物价继续暴涨，米价每担涨至300万元；美元黑市兑率达1比31万；黄金每两2000万元；中外股票从21日起每日上涨15％至20％。

△　驻美大使顾维钧设午宴招待美国奥尔曼法官、前军需官皮尔尼上校和中国访美技术代表团团长贝祖贻，“讨论了促使国会加速通过援华计划的最佳途径”，皮尔尼则称“国务院的援华计划根本没有通过的希望”，因为马歇尔“真正感兴趣的是欧洲复兴计划”。顾维钧则就席间提出四项要求：“商品信贷、用于初步稳定货币计划的白银贷款、复兴计划和军事援助。”

△　国民党军豫东部队和地方团队进占尉氏、鄢陵。

△　上海1000余名小学教员举行反饥饿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注意做好城市工作。

△　中共合江省委、合江省政府、合江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清理集中各县市财产的命令》，要求对一切能动财产都要进行清理，以便集中财力、物力支援前线。

△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和南满独一师包围营口，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在师长王家善的率领下投诚起义，并逮捕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等，进而协助人民解放军歼灭城防司令部及交警总队共3000余人。

2月26日　蒋介石自庐山牯岭返回南京。

△　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桐油、生

丝、茶叶及羊毛等产品增产数字。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称中国已向美国要求改革币制之贷款。

△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盖谟赛及新任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至南京。

△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国务卿马歇尔到会对5.7亿美元援华计划进行说明。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等发表谈话，诬称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共外围”，“受中共津贴”。

△　重庆二万余名群众捣毁海棠溪“警犬训练所”，并放火焚毁洋楼五座。

△　智利新任驻华大使白朗柯抵南京。

△　东北人民解放军四纵及南满独一师攻占营口。

△　华东人民解放军攻占皖北亳县。

△　哈尔滨广播电台与佳木斯广播电台合并，改称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作为东北广播系统的中心，向东北各地区广播。

2月27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过一系列重要议案：一、筹措扩编地方自卫武力经费办法，规定地方新增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政府全额拨发，不须地方筹措；二、提高国产烟酒类税率，作为统筹补助各省自卫武力经费之用。规定：烟叶征收60%，烟丝征收42%，并望在五个月内通过这两项税征增加税收4000亿左右，另增盐、鱼等业税收5000亿元。

△　新任热河省主席范汉杰至南京谒见蒋介石。

△　张作相、马占山等晤见美使司徒雷登，称东北人民心理倾向中央。

△　美国空军部长苏雅特·薛明顿向国会提交一份函件称：按照1946年7月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秘密订立之“八又三分之一队空军”计划，美国以1071架飞机，廉价售给南京政府，为国民党空军编制一个重轰炸机大队、一个中型轰炸机大队、四个单行引擎战斗机大队、二个运输机大队、一个摄影侦察机中队，并供给大量空军设备训练5137名包括飞行员、轰炸手、领航技师之空军人员。截至目前，已有936架飞机交付南京政府。

△　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将在本月9日于沈阳南之森林子、莫子山战斗中不战而退的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师长文礼处以死刑。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各地迅速纠正违反中共中央工商业政策的错误现象，预防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运用于城市，对城市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应当保护，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工作方针。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与边区参议员常驻委员在绥德召开扩大联席会议，总结边区一年来自卫战争成绩，并作了恢复边区建设，迎接解放大西北的规划。

△　东北人民解放军三纵、十纵攻克开原，歼灭国民党军暂编第三十师一个团及第六十二师一部共3400余人。

△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达夺取四平之作战命令，决定以一纵、三纵、七纵独立二师等10个师攻城，二纵、六纵、八纵、十纵等四个纵队及独四、独五师、李虹光支队向沈阳打援。次日，各部队开始行动。

△　东北解放区与苏联在哈尔滨签订第二次《对苏贸易合同》，规定东北向苏联出口粮食72万吨，豆油5000吨，原煤30万吨；从苏联进口棉布2000万米，棉纱2000吨，载重汽车3000辆，摩托车150辆。

2月28日　立法院通过三十七年度上半年度之总预算。

△　参政会呈请政府加强东北保卫战。

△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报会议，白崇禧、秦德纯、范汉杰、汤恩伯、林蔚、刘斐、方天、郭忏、桂永清、周至柔、郑介民等出席，着重讨论以海、陆、空、联勤全面支持东北之问题。

△　外交部在致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之书面报告中，称中英关于九龙城事件之解决，双方正在磋商之中。

△　国民党军刘戡部之整编第二十九军到达宜川西南瓦子街地区，被西北野战部队王震部包围，两军展开激战。

△　河北国民党军进占永清。

△　甘肃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100余万。

△　自安海开往厦门之“中兴”轮在金门县小登乡附近沉没，船上乘客100多人遇难。

△　北平、天津国立之13所院校教职员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每月配给麦面粉两袋。

△　汉奸周佛海在南京监狱病死。

△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　中国劳工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筹备会主任刘宁一参加世界工联大会后，自巴黎抵哈尔滨。

2月29日　蒋介石向张作相、马占山、万福麟等人宣称，中央对东北有决心有办法，即将派大军出关，恢复交通。

△　东北旅京同乡会发表宣言，提出八项紧急呼吁，要求政府抽调大军确保东北现存据点、打通重要交通线、接济东北军民粮饷、改革东北币制、组织地方武装力量。

△　国民党军范汉杰部进占辽西大虎山。

△　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苏尔由南京到沈阳拜访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

△　陈诚请求辞去东北行辕主任等职，并往上海住进医院。

△　联合国劝募儿童救济金中国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宋美龄到会致词并被推为委员长，谷正纲为副委员长，通过《中国委员会组织大纲》，并规定劝募数额为1000亿元，自3月15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

△　探测积石山之美方人员启程来华。

△　朱学范在哈尔滨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中共“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

△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言人在香港就26日吴铁城等人的诬蔑发表宣言，予以驳斥。

△　中共辽北省政府由白城子迁往郑家屯。

是月　上旬，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机关及一纵、四纵、六纵，由漯河出发，进入鲁西南休整并进行渡江准备工作。

△　下旬，为加强与巩固新解放区工作，辽南行署发布民字第八十一号命令，决定以新解放之营口、辽中、台安、盘山、牛庄、王县建立新的第五专区，原第五专区领导的庄河、新金、万福、盖平、复县由行署直接领导。鞍山市、辽阳市由第一专署领导。

3月

3月1日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留京同学春季联谊会并发表讲话称：为解决目下危局，政府各级官员及本党全体同志，要肃清官僚政客作风，打破自私自利心理，发挥组织力量，奋起努力，完成“戡乱建国”任务。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中央纪念周上发表题为《最近剿匪军事》之报告称，当局十分重视“剿匪”军事，正在图谋全力确保东北，并强调实行“经济剿共”。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台湾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容外国袭扰。对于美国一些记者歪曲事实的言论，他要求中国新闻界要予以驳斥。在谈及中苏邦交问题时，孙氏称：中苏关系如果不能正常发展，其责任不在中国。

△　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至北平，称沈阳防务绝无问题，增援之国民党军已在秦皇岛登陆。

△　赵家骥、罗又伦由南京飞返沈阳，向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汇报此行的情况，称蒋介石允准在东北维持现状。

△　四川省国民大会代表共40余人拥戴蒋介石竞选总统，并通电全国一致主张。

△　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举行就职宣誓仪式，称以政治协助军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食米会议开幕，中国代表谢澄平当选为副主席。

△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电邀麦克阿瑟和陈纳德对美国政府之援华法案提供意见。

△　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成立。

△　陆军装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由徐庭瑶任司令。

△　上海市开始实施粮食配售制，每斗粮价24万元。

△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复刊。

△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成立。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华东、西北各军区及集团军，对中原、山东野战军的作战计划作出指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应即将第一、二、十、十一四个纵队组成一个集团军，于3、4月两月在津浦和平汉两线之间、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并于5、6两月或仍在上述地区配合粟裕部队机动，或向平汉线以西机动；由陈士榘、唐亮指挥陈、谢集团军主力，于3、4两月发动陇海、郑潼线作战，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段，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大部、孙元良兵团一部，配合彭、张渭北作战；许世友、谭震林部除留十三纵队于胶东外，主力七、九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3月上旬开始向胶济线西段作战，由韦国清率二纵由诸城南下，与苏北华东野战军十一纵、十二纵组合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作战。

△　西北野战军在瓦子沟全歼国民党军增援宜川之整编第二十九

军，击毙第三十七集团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和师长严明。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和性质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90％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而那些依附于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资产阶级左翼分子和从封建阶级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开明绅士，也是统一战线中的分子，虽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对他们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而不应当采取“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与边区参议员常驻委员扩大联席会议结束，推举杨明轩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3月2日　　国民大会代表当选名单由选举总事务所逞送国民政府。

△　行政院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成立处理日本赔偿物资委员会。同时还通过财政部拟具之《发行逆产钻宝义卖券办法，以为救济之用》一案，行政院长张群主张将义卖所得款项，提拨1000亿元作为救济中等以下学生之用，亦获通过。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与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在北平商谈救援东北问题。

△　东北区监察使谷凤翔在吉林对省政府职员和路工队演讲，力辟“放弃东北之谣言”，强调中央视东北为政略之重要部分，军事上之胜利“确有把握”，“吉、长今日之困厄，最近可望改观”。

△　东北民众请愿团到南京，希望政府实行坚守东北之政策。

△　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由南京返抵广州。

△　美国前驻俄大使蒲立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演说，要求

美国政府拨10亿美元作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并建议派遣“能够找到的最优秀人才”配给中国的反共战争。

△　美国政府决定放弃其搬运日本赔偿物资计划，并致力促请远东委员会其他十个委员国接受这一立场，中国、菲律宾等国表示坚决反对。

△　国民党军攻占沟帮子巨流河。

3月3日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商讨东北问题，东北民众请愿团代表王化一、李仲华、张宝慈等列席会议。王化一陈述了东北当前局势，向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一、派大军增援东北；二、接济军需民食；三、改善币制；四、救济难民；五、放宽各级公务人员学历审查及铨叙尺度。中常会和行政院原则上表示全部接受。

△　国防部发言人对记者称：北宁路即可全部打通，增援国民党军已纷纷出关，且已趋过锦州，向沈阳进发。

△　国防部政工局（由前新闻局和民事局合并而成）局长邓文仪发表一周战况称：战局重点在东北三省，大别山区战场已成残局。

△　《中央日报》报道：“今年全国各地地方保安团之武力，均将增加三分之一。”

△　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对记者称，国民大会筹备工作大部分完成。

△　豫东国民党军攻占杞县、永城。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称：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商讨以欧洲复兴计划作为援华计划之蓝本问题，“吾人已与中国外长王世杰、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及刻在美国之中国技术代表团，就上述问题作商讨”。

△　麦克阿瑟电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登称：“一自由、独立、和平而友善之中国，对世界和平乃极为重要者，目前中国一切问题之根本，厥为军事问题，其在内部复原可望获得进展以前，此问题必予以解决。”此为麦氏统帅盟军总部以来有关中国问题之第一次声明。

△　英国政府决定将14艘舰艇赠与国民政府，并代为中国训练海军1000人。

△　西北野战军解放宜川，并歼敌一个旅。宜川战役取得胜利，该战役共歼敌一个军部、二个师部、五个旅共三万多人。

3月4日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举行币制改革特种审查会，审查张肇元所拟之改铸银币案。结果以“改革币制尚非其时，而改铸银币，困难尤多”，决议请张氏另拟改革币制原则，送请政府参考。

△　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上就宜川之战发表谈话称：“这次陕西宜川，又遭一次大的挫败，五师三旅，全被共匪消灭，这完全是由于指挥官没有依照我的话去做；否则决不至于失败，就是失败，也决不会如此惨重。”

△　经济部拟定《让售国营事业发行股票由银团经募办法》。

△　教育部发言人就私立学校立案程序发表谈话称：希望各私立学校依法立案，如未经核准而私自开办招生，皆在取缔之列。

△　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曾于去年10月间将停泊于苏必克湾之登陆艇50艘以140万美元的价格售予南京政府。

△　京沪、沪杭、津浦、平津四路客票增价一倍，货运费增价120%。

△　中、英两国间无线电话正式开通。

△　中、葡两国在澳门签订《金融协定》。

△　积石山探测中国方面人员在中央研究院召开座谈会，拟定中国方面之计划。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本战犯之辩护律师宣称："九一八事变及中国事变均非不宣而战之侵略战争"，故日本不负有被诉之战争罪。

△　美国军令处长魏德迈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陈述意见，主张对南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　中共中央就对待外侨事致电各中央局、前委：对于在解放区犯罪的外侨，要敢于依法检查、拘捕、审讯和判决，以"使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对我有所戒惧"，但要正确掌握政策，"凡有关外交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可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学范："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　辽南战役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即集中兵力包围四平，由一纵、三纵、七纵和炮兵全部担任攻击任务，二纵、六纵、八纵、十纵及独立师，在四平阻击由沈阳和长春增援的国民党军。是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向四平进攻，占领飞机场。

3月5日　经济部拟定《三十七年度进出口贸易计划原则》。

△　蒋介石主持由南京各文教团体发起之甘地先生公祭大会，中外各界人士千余人参加。

△　应国民政府之请赴南京的东北耆宿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

离开南京，经上海返东北。临行前，三人发表书面谈话称：“即今日政治、军事形势，虽较严重，但以现有之广大人力、财力与物力，如能妥善组织运用，在主席之英明领导下，必能取得戡乱建国之最后胜利。”

△ 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对记者称：国大筹备工作，积极进行，大致业已完成，19日起各报到处可开始工作，各代表招待所亦可及时布置妥当。

△ 东北民众请愿团与上海市参政会分别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促请美国政府早日实现对华军事援助。

△ 美国前驻华大使馆参事罗伯森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表意见，主张军事援华。

△ 新任奥地利驻华公使施德复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

△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在南京成立。

△ 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 国民党军派援东北之一部由葫芦岛登陆。

△ 四川省各地米价飞涨，成都双市石价达310万元，重庆每市石逼近200万元。

△ 西北野战军发动黄龙山麓战役，至10日，连克陕西黄陵、宜君、白水县城，包围洛川，进逼蒲城，迫使胡宗南从豫西调五个师组成第五兵团，增防西安，往援洛川。

△ 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由襄城、禹县地区向洛阳进逼。

△　中共嫩江省委作出《再建兵团的决定》，决定将县大队和区中队集中，成立五个独立团，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二线主力。

3月6日　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由北平飞返沈阳。

△　蒋介石手令财政部拟具汇兑存款必须用真实姓名之办法。

△　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审查通过经财政部拟定修正之《货物税条例》和《国产烟酒类税条例》。

△　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政府决定自6日起，承认暹罗新政府，恢复两国之间正常外交关系。

△　陈纳德偕其妻陈香梅，应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之电邀返国，提供对华援助之意见。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离开台湾飞抵上海。

△　《中国与澳门缉私协定》签订。

△　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与美国救济物资配售委员会成立。

△　豫南国民党军攻占新蔡，豫北国民党军攻占博爱。

△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会，决定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由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不合并。

△　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部队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进攻洛阳之部署：拟于7日晚以八纵抢占黑石关、偃师，突破铁道，切断洛郑线之交通；以九纵袭占新安，切断洛陕联系，9日由第三、四、九纵直袭洛阳。

△　进攻洛阳之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进抵登丰、临汝、宜阳地区。

△　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进攻东台。

3月7日　中航中缅航班正式恢复。

△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发现解放军有进攻洛阳之征候，乃令整编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军统归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主任孙震指挥，集结待命增援洛阳。

△　豫中国民党军攻占禹县。

△　国共两军在香河激战。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一纵、三纵等部队在四平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　中共中央军委就发动对洛阳及洛郑线进攻致电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华东、晋冀鲁豫野战军三、四、八纵队“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完成此项任务”。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共28团兵力，发动洛阳战役。

△　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攻占沭阳。

△　豫西人民解放军自登封攻克偃师，进迫洛阳。

△　晋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纵队及吕梁、太岳军区部队各一部共五万多人，开始向国民党军在解放区内的设防据点临汾城发起进攻。

3月8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东北战局，白

崇禧、秦德纯、林蔚、刘斐、方天、桂永清、周至柔、郭忏、汤恩伯等出席，决定打通沈阳锦州线交通。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向蒋介石建议，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动撤退至关内。

△　国民政府明令聘请张作相、万福麟为国民政府顾问。

△　立法院财政、经济两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通过《中港经济协定》。

△　蒋介石在会见东北民众请愿团代表王化一、张宝慈、李仲华、田雨时等人时称：确保东北，为国本所系，政府具有最大之决心，业已增调部队，加强军事力量，局势必将逐渐好转，希望东北军民同心努力，以期早日完成“戡乱任务”。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在宴请中华民国盐业工会联合会代表时演说称：“中国过去最重局面均能安全度过，今日国家情势，虽极困难，若吾人组织有方，奋力对抗，终可克服一切障碍，完成革命使命。”

△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派郑洞国、赵家骥飞往永吉（今吉林），下达第六十军向长春撤退和炸毁小丰满电站的命令，并布置撤退事宜。临行前，郑洞国向卫立煌建议，在放弃永吉的同时，也主动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与其将来坐待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　驻守永吉之第六十军军部根据郑洞国的指示，制订撤退长春的计划：一、即于3月9日晨，趁解放军之不备，以秘密迅速之行动，撤出永吉，退往长春；二、各部队和机关必须把可能撤退的人员物资一律撤走，但不能撤走居民，同时也须对居民保守秘密；三、由于吉长公路已被解放军破坏，汽车不能通行，所有物资尽可能用马车或人

力运输，对不能运走的重要物资，皆以秘密方式藏匿或投入松花江中；四、撤退序列分为两个纵队，左队为第六十军，沿吉长公路前进，右队为吉林省保安旅、地方机关和警察部队，在吉长铁路与公路之间行进。

△　美驻华大使馆向本国国务院报告称，中国政府眼下于各个方面显露出解体征象，建议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则将使馆撤退至广州。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女同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举办展览，宣传劳动妇女的解放。

△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六个金融机构的全体工人静坐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上海新闻记者、工商、医业等公会、复旦大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等22个团体发表宣言，拥护监察院长于右任竞选副总统。

△　前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陈述意见，主张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　由沈阳飞往青岛的民航运输机，中途被印有“红星标志”的“俄机”攻击。

△　沈阳、长春城内国民党军之补给全靠飞机运输。中航公司是日决定每天只派出四架飞机运输救济物资。

△　晋察冀边区《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对1月民盟宣言和民革宣言及行动纲领的谈话稿，表示愿意在新民主主义事业中，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前进；同时指出“第三条道路”在中国与世界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　进攻四平之东北野战军攻击部队扫清外围：一纵攻占海丰

屯、新立屯；三纵攻占红嘴子、东门外高地，兵临四平城下。

△　进攻洛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地方武装攻占渑池、宜阳等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二十三师攻占偃师，控制了洛阳市东、西两面有利地区。

△　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称，拟以华东野战军之十纵、中原野战军之十一纵于本月底攻占皖北之阜阳。按此部署，十纵于中旬由太和渡过沙河，进至阜阳地区，十一纵于28日由临泉地区开至阜阳。

△　河北人民解放军猛攻保定。

△　华东野战军十纵攻占太和。

△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进迫淮阴。

△　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部猛攻洛川。

3月9日　　蒋介石飞抵徐州，召集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人，听取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安徽五省“绥靖”工作汇报。

△　行政院召开第四十六次会议，由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主持，审议通过：一、鼓励人民兴建房屋实施方案及奖助民营住宅建筑条例；二、法官转任条例；三、清理各省田赋办法；四、禁烟委员会第五、六、七条修正案；五、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

△　交通部长俞大维、经济部长俞鸿钧、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致电访美技术代表团团长贝祖贻，要求增加美国援华计划中工业和商业项目的分配额。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此表示：“在援华计划中各部需要多少，政府可以在南京通过各部间协议解决，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很难决定如何满足各部的愿望。”顾氏还称：“现阶段应致力于援助的总额，而不应化整为零使问题复杂化。”

△　新任美军驻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正式到南京访问。

△　美国援华委员会主席麦克纳至南京。

△　北京大学组织争取公费联合会，向当局提出：一、全面公费；二、取消三分之一课程不及格者取消公费的规定；三、复学学生得全免费。

△　上海米价每担涨至420万元，较1月份上涨了一倍半。

△　国民党军青岛军火库发生爆炸，原拟由此增援东北的军队受到影响。

△　第六十军开始向长春撤退，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并未执行炸毁小丰满水电站的命令，使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得以保存下来。当天，东北野战军解放永吉和小丰满水电站。

△　是日晚，进攻洛阳的解放军部队袭占洛阳四关，基本肃清外围国民党军。

3月10日　蒋介石于徐州在顾祝同、汤恩伯、徐庭瑶、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下检阅特种兵团并视察装甲兵学校，分别授予特种兵团团旗和装甲兵学校校旗。在授旗礼中，蒋介石声称："现值共匪发动全面叛乱，企图出卖国家民族之时，吾革命军人，应本过去传统精神，戡平匪乱。"

△　国民政府特派张彭春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首席代表。代表一行是日由上海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

△　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主要城市成立特种刑事法庭。

△　外交部就前日民航运输机被攻击事件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

△　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谈话，公开声明在中国政府中不愿有共产党人参加，希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参加政府。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声明称："估计约值五亿美元、现在太平洋诸岛上的剩余物资，已根据'就地运取'的原则售与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接收。"

△　陈纳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就政府之对华5.7亿美元之援华计划发表意见称："如不立即予中国以军事及经济两方面的援助，则必将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战。如不供给军事援助，则共党将控制整个亚洲，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中在外交政策方面之最大失败。"

△　攻占东台之人民解放军苏北部队撤退，国民党军进占该地。

△　向长春撤退之第六十军行至太平岭附近，遭东北解放军一个旅兵力的阻击，吉林保安旅首先被击溃，第六十军运送团团长潘尧被解放军生俘。此役，解放军歼灭该军共3000多人。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向中直机关干部、战士作形势发展和中央机关转移的动员报告。指出，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

△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决定于3月20日动身东移。

3月11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提名问题，出现主张自由竞选和政党提名两种不同的意见。

△　第一届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于南京成立。

△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组织"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

△　蒋介石由徐州返回南京。

△　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召集初步审查会，审查《总统府组织法案》。

△　监察院全体监察委员举行座谈会，一致决议以全体监委名义，促请院长于右任速即主动宣告参加副总统之竞选。

△　李宗仁对记者谈参加竞选副总统之动机时称：此举“系基于提倡民主作风与对国家之责任观念”。并称如果当选副总统，“当本三十年来从事军政经验与心得，辅佐元首处理国事，实行国父遗教，并以确定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安定民生，复兴国家”。

△　四联总处召开理事会，决定恢复放贷，并通过三十七年度生产事业贷款方针及《三十七年度农业及土地金融贷款计划》，农业贷款原则上以15亿元为限。

△　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呼吁美国政府速以军事、经济援华，声称远东和中国是美国的“后天井”，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反共之成功，不仅与中国利害攸关，即对美国亦利害殊切”。

△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希望中国政府扩大基础，此系指容纳自由主义派人士，而反对容纳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信仰专制政体。

△　上海市特别刑事法庭正式办公。

△　第六十军及吉林保安旅涉过饮马河，与新三十八师师长史说所率之接应部队会合，当天中午开进长春。蒋介石对第六十军的这次撤退称赞道：“吉林撤退是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撤退。”中外一切右翼报纸和通讯社也把它誉为“东方敦克尔克最成功的撤退”。

△　沈阳物价暴涨，高粱米每斤法币五万元，大米每斤6.5万元，

鸡蛋每个三万元。

△　豫西国民党军攻占登丰。

△　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即转潘汉年等，指出卫立煌对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表示“无信心”，“卫有可能争取”。同时还交待了争取卫立煌的工作原则。

△　华东野战军发动胶济线春季攻势，周（村）张（店）战役开始。是日，胶济路西段之张店市解放，人民解放军全歼整编第三十二师第一四一旅等部。

△　进攻洛阳城的解放军部队由东、南、西三门相继攻入城内，与国民党军进入激烈巷战，青年军第二〇六师等部退至城西北角核心阵地死守待援。

△　人民解放军豫东部队攻占永城。

3月12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二十三次国务会议，决议通过多项议案，其中要案有：一、《核定本届国民大会名称案》，规定本次国民大会定名为“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二、《省县自治通则立法原则草案》；三、《黑龙江省等八省市成立临时参议会及监委产生办法案》；四、《设置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案》。

△　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拟定《第一届国民大会日程草案》，提请大会主席团讨论。是日《中央日报》刊发了该《日程草案》。

△　立法院举行例会，财政、经济、外交、交通、资源、善后事业诸部、会负责人均列席，报告战后美援及敌伪物资利用情况。

△　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与美国政府中华救济团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处理美国救济物资事宜。

△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拨价值四亿美元以上的资产，交中央银行作为法币准备金，以稳定币值。该四亿余美元之资产来源于：一、中纺公司资产一部分，价值二亿美元；二、招商局资产一部分，价值一亿美元；三、资源委员会资产一部分，价值5000万美元；四、日本赔偿物资一部分，价值8000多万美元。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认为以谈判求取和平已不可能，主张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指导国民党军与共军作战。

△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决定将援外法案分为经济援外部分和军事援外部分，以期加速该援外法案在国会通过。在此两部分中，中国都是受援国。

△　北平市20多家报馆约800多名工人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致使报纸暂时停刊。

△　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至桂林，与广西当局商讨粤桂“联防剿匪”事宜。

△　中葡两国在澳门签订《关务协定》。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要求严令各部队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犯”。

△　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董必武向中外人士痛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蹂躏，呼吁救济150万难民。

△　华东野战军攻克周村，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师等部共1.5万多人。

△　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攻占阜宁。

△　担任攻击任务的东北野战军一纵、三纵、七纵和炮兵部队在二纵、八纵、十纵及独立师的配合下，开始向四平发起总攻。入夜，占领四平东市区。

△　1941年汪精卫访日时赠送日本皇室的一对屏风、三只玉瓶，及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一批古物归还中国。

3月13日　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第七期毕业典礼及聚餐会上对宜川之战进行检讨时说："最近陕西宜川之役，第二十九军刘军长戡、严师长明、王师长英俊，同时殉职，这是我们革命军高级将领革命精神的表现，值得大家效法，但亦非常可惜，我们必须由他们的壮烈牺牲，求得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然后他们的牺牲才有价值。"

△　蒋介石函示卫立煌，将主力提前西进，集结于锦州附近。

△　行政院长张群发表演说称，"戡乱建国"的重点应放在长江流域，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工业，所得利润之适当部分可以自由结算。

△　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等在立法院例会上报告美援物资分配及使用情况。

△　财政部修订《东北流通券行使及兑换办法》，凡六条，即日施行。

△　重要出口物资收购审价委员会成立。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政府当局敦促苏联交还旅、大，并称必要时须向联合国提出申诉。

△　苏联照复中国政府，对前日外交部就截机事件所提之抗议予以拒绝。

△　湖北国民党军进占随县。

△　经过23个小时的激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四平，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两个团、三个保安团、新一军、第七十军留守部队共1.93万多人，从而切断了沈阳和长春之间国民党军的联系。此役史称“第三次四平街会战”。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军区部队解放博山市、莱芜、章丘三城。

△　豫陕鄂解放区颁布工商业政策12项，规定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内地自由贸易，奖励土货，抵制美货，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

△　冀鲁豫地方人民武装攻占山东东阿县城。次日收复平阴县城。

3月14日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称美国援助中国，应军事、经济并重；苏联企图赤化世界，因此中国政府幻想亲俄已不可能。关于国民大会，他对记者称：“行宪第一届国大之唯一任务，实为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　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召开本年度会员大会，外交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朱家骅到会致词称：希望“全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及国际合作而努力”。

△　沈阳市清查户口，全市人口计139.008万人。

△　中共中央军委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中央工委、晋绥分局等电指示：“你们的机动范围是，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

△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之苏北、苏中军区合并为苏北军区，管文蔚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同日，华东野战军二纵与十一纵、十二纵在苏北阜宁地区会师，正式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

△　人民解放军向洛阳守军发起最后攻击，全歼敌青年军第二〇六师五个团、中央炮兵第八、十、十五团各一部及部分后勤、地方部队共约二万人，并活捉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

△　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部猛攻陕西蒲城。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猛攻龙山车站。

3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讨论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当选人退让于青年党、民主党和社会贤达等事，已当选之代表先后有427人被强令退出国大代表资格。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偕吴奇伟飞往承德视察热河军政情形，并参加新任热河省政府主席范汉杰及各府委厅长之就职典礼。

△　交通部与陈纳德空运队签订合同，规定该队“纯系民航空运组织”，飞机数目照旧，航线固定，有效期为一年。

△　王铁汉辞去沈阳区防守司令职，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梁华盛兼任。

△　日本战犯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在上海被处决。

△　新疆全省警备总司令宋希濂飞抵南京。

△　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拨款150万美元，作为救济中国贫苦儿童之用。

△　北平各大中学学生成立北平市抢救教育危机联合会，上海

3000多学生举行反迫害大示威。

△　上海申新纱厂第二厂2000多工人罢工，抗议厂方解雇工人，要求职业保证。

△　国民党军攻占辽中。

△　东北野战军发动的东北冬季攻势全部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八个整编师约15.6万多人，使东北解放区面积扩大10.9万多平方公里，收复城市18座，解放东北人民610多万。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区缩小到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面积仅占东北总面积的3%。

△　豫陕鄂人民解放军攻占河南襄城。

3月16日　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拟定代表报到程序。

△　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飞抵长春，视察军政情形。卫立煌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不听谣言，不受迷惑，为今日吾人所应持之正确态度。”对于今后之军事进展除表示有绝对信心外，拒绝发表任何谈话。当日下午，卫氏飞返沈阳。

△　《中央日报》报道：“迄15日止，刻由各该区选所奉令发给当选证书之代表，共计1337人。”是日之《中央日报》刊发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名单。

△　新疆全省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对记者称：伊宁问题并未进入严重阶段，当前重要问题在于“全盘剿匪”。

△　国民政府将600多件文物由上海运往台湾。

△　国民党军胡琏兵团整编第十一师，协同第一二五旅进抵偃师地区，与孙元良兵团会合，向洛阳攻击前进。

△　豫西国民党军攻占观音堂。

△　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二纵在益林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19日，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及来援之第七十二师等部共7000多人，生俘第一一三旅旅长王匡。解放军部队伤亡2800余人。

△　部分国民大会代表发表启事，否认“非法退让”。

△　行政院开会讨论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事。

△　教育部发表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全国中等学校学生统计结果：完全中学1654所，学生31.7835万人；初中2612所，学生117.8021万人；师范902所，学生24.5609万人；职业学校724所，学生13.7040万人。总计学校5892所，共4.3183万班，学生187.8523万人，其中男生149.9436万人，女生37.8087万人，教员计18.3501万人。

3月17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于本月28日召开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推选本届国大总统、副总统之候选人。

△　蒋介石主持召开华中地区绥靖会议，讨论“华中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总体战方略”，决定“华中总体战”之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原则：一、军事上撤销武汉行辕，改设华中绥靖公署；二、政治上组训地方团队，建立地方武装，从保甲入手，强化地方行政组织；三、经济上对解放区实行封锁。会议还决定推行“自清、自剿、自卫、自富”的“四自原则”。

△　蒋介石召见熊式辉，就东北军事失败原因进行检讨。

△　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与河北省军政工作检讨会议，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致词称，要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精神检讨军事，并称：“今日政府戡乱已非狭义的敉平匪患，实具有更广泛之重要意

义”，“亦即用三民主义扑灭共产主义。”傅作义讲话则强调动员人民，训练干部，变“防匪”为“打匪”，则局面必可扭转。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表示将参加副总统竞选。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本国国务院报告称：南京政府“政治与军事的崩溃现正在迅速地接近期待已久的高潮”，“在一向最忠于蒋委员长的那些人中，已有了不满他的政策的明确征象，在他本身方面也看不出有进行必需的根本改革的任何意图。所有集团在失望之中，便斥责美国主张组织上的变更或改革，但是美国仍然迟迟不予美国许诺已久的、而为民主制度存在所赖的援助”。

△　由郑州、许昌开援洛阳之整编第十八军、整编第四十师迫近洛阳。占领该城的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阻援部队亦退出战斗，洛阳战役结束。

△　鲁中人民解放军部队攻占桓台。

3月18日　外交部就前苏联飞机截击民航运输机事再次向苏联提出抗议。

△　监察院举行全体委员座谈会，对目前军事、经济及教育现状进行检讨，认为行政机关多数行政措施“均需及时改正”。

△　王云五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讨论平抑物价问题。议决以招商局、中纺公司等国有资产拨交中央银行作为法币基金，以稳定币值，平抑物价。

△　《中央日报》报道：第一届国民大会法定代表总人数为3045人。

△　国民大会代表开始报到，是日报到共17人。

△　蒋介石会见山东请愿团代表。

△　智利驻华大使白郎柯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国书。

△　上海英商电车公司职工300余人罢工。

△　国民党军孙元良兵团整编第三十八师、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二四旅重占洛阳。

△　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表接管城市的训令，保护工商、文教、慈善事业。

△　人民解放军苏北部队进袭南通、海门。

△　东北野战军第五、七、八、九、十等五个独立师开进长春近郊，对长春形成了初步的包围。

3月19日　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30多人举行联谊会，本届参政会主席莫德惠致词称："国民参政会于本月28日宣告任务终了，但责任仍至为艰巨"，希望各参政员在当选国大代表或其他职务后，仍同心致力于国家建设与安定。

△　被迫退让的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向内政部索要当选证书，并与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谈判。

△　联合国劝募儿童救济金中国委员会会长宋美龄、副会长谷正纲致函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请发动国大代表"一日运动"，节用一日，以所得救济全世界三亿儿童。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印度与巴基斯坦之克什米尔纠纷，中国代表蒋廷黻提出一折中方案：一、巴基斯坦停止援助当地土人反叛印度政府；二、印度军队由该地区撤退，仅留少数足以保护该地区治安之军队；三、组织一特别机构，负责由当地人投票公决所

属问题。

△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62.05亿美元的援外法案，其中以5.7亿美元作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　河北军政检讨会决定“发展中层、保护自耕农”的土地政策。

△　豫北国民党军攻占淇县。

△　华东野战区苏北兵团解放益林，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

△　人民解放军热河部队由阜新撤退。

△　行政院核定施行《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办法》划分全国时间为五个标准区域，即：长白区、中原区、陇蜀区、新藏区、昆仑区；全国各地标准时刻以中央广播电台所播之时刻为准。

△　东北新华广播电台试验播音。

3月20日　华中区绥靖会议结束，蒋介石致词称：《华中总体战方案》系经会议慎密研究通过，希望到会人员确守岗位，遵照方案规定，切实执行，密切合作，“俾使剿匪戡乱之使命以迅速完成”。

△　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发表土地改革方案，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

△　上海粮价猛涨，大米每石达440万元。

△　北京大学等七所学校学生联合致函蒋介石及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各大学实施全面公费制，把教育经费提高到总预算的35%。

△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报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

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七纵队攻克鲁中淄川，歼灭国民党军1.2万多人。

△　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以一部兵力与地方人民武装，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积极机动，掩护主力部队向察南挺进，发动了察南绥东战役。

△　人民解放军苏北部队偷渡江阴，受国民党军阻击，未果。

△　晋绥人民解放军攻占山西怀仁县城。

3月21日　据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公告，至本日各地依法选举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已达2832人。

△　国民政府宣布南京地区安全紧急措施，规定戒严一切渡口，严厉检查一切过往民船和乘客。

△　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部每天以100架次以上的飞机从四川、徐州空运部队到陕西，连续四天。

△　美国国务院派员来华，调查湘、粤、赣经济。

△　中国技术协会在南京成立。

△　皖北国民党军攻占亳县。

△　湖南省辛亥首义同志会在长沙成立。

△　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机关东移事。并指示：“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立担任。”

△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前往晋绥区。当日到达绥德县吉镇。

△　中共中央致电刘宁一指出：反对马歇尔计划及美帝援蒋罪行，应成为你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的主要提案。反美援蒋宣传重点应该是：揭露美帝以金钱和军火物资助蒋屠杀中国人民，揭露美军及其派出的顾问团直接参与屠杀中国人民，揭露美帝扶持日本侵略反动势力复活，并运输日本军人来华助蒋内战。

△　周（村）张（店）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3.8万多人，山东国民党军退守济南、青岛等少数据点。

△　晋察冀野战军在平绥路大同至天镇段发起攻势作战，解放阳高、广灵两县城。

△　人民解放军察南部队猛攻蔚县。

△　晋绥人民解放军进占山西左云县城。

△　苏皖第九分区部队攻占著名渔港吕四镇。

3月22日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以4.63亿美元援助国民政府，其中3.63亿美元为“经济援助”，一亿美元由国民政府购买军火。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由北平飞抵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完全同意麦克阿瑟的意见，即在实施其他改革以前，军事解决最重要，我当选副总统之后，定可协助未来之国家元首戡平“匪乱”。

△　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在“兴安号”军舰上招待记者称，美国所赠舰艇年内接收完毕。

△　美国开始实施其赞助华南复兴计划。该计划为重修河堤22处，由出售救济米而得的基金拨款。

△　上海市参议会人权保障委员会成立。

△　广州开始发放粮食计口配售证。

△　洛阳国民党军进攻龙门，遭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阻击，被歼700余人。

△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一行到达陕北葭县刘家坪。

△　西北野战军晋绥部队解放绥东丰镇县城。

△　人民解放军晋北部队攻占阳高永嘉堡。

3月23日　　国防部长白崇禧由南京飞往汉口，指挥华中地区军事。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东北之局势，“国军之力量，仍足以确保目前之据点”；华北方面，“国军之力量远优于共匪”，华北局势很乐观。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至张家口，视察军政情形。

△　行政院政务会议讨论决定，从4月起，按月调整公务员待遇。

△　国民政府任命郑洞国兼任代吉林省政府主席。

△　台湾教育参观团15人在台湾省教育厅长许格士率领下至南京。

△　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政府反对外蒙古参加。

△　上海泰利铁厂工人800多人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无理解雇工人。

△　加拿大援助南京政府之军火经港运沪。

△　据有关方面透露，日本东京政治研究所之东亚研究所，存有劫自中国的书籍共计1.547万册，其中古籍5931册，《万有文库》2293册，《四书集成》1990册，杂志5256册。业经我驻日代表团向盟总交涉，全部退还，将于近期内运返国内。

△　毛泽东一行由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

△　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高等法院并健全司法机关的指示》。

△　晋察冀野战军解放天镇县城。

△　平西线解放军部队进攻密云。

3月24日　蒋介石与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商谈军火问题。

△　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对记者称："总统府成立后，现设各地之行辕均可能改组为绥靖公署。"

△　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发表谈话表示要加强"政治剿匪"。

△　驻美大使顾维钧访谒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与谈对华军事援助问题。顾氏向马氏提出1.5亿美元的军事物资的信贷请求，并称：该项信贷的提出，"是由于若干原因而需要增加的。第一，最近两个月战争扩大了，因此中国军队的需要量大大增加。第二，美国国外地区的剩余战争物资定价颇低，而国内地区同类物资的定价则高得多。而且运往中国的包装费、保险费和运费往往高达价格的15％至17.5％"。

△　中国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首席代表何应钦自美抵达英

国，访问英国外相贝文。

△　中共中央在致中央工委及陈毅等人电中指出，我们反对美帝的中心政策是：反对美帝将中国殖民地化，推翻美帝在中国的侵略统治；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从总体上认识美帝援蒋内战甚至直接出兵，也不能挽救蒋介石覆灭的命运，但绝不可轻视美帝对蒋介石的每一援助，要动员国内外人民起来反对，来阻碍并减少之，还要利用美帝内部及美蒋之间的每一矛盾，来加以动摇和推迟。

△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到达中共中央后委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与杨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员见面。当晚，中央机关研究今后行动路线问题，决定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在此逗留，然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中央机关和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

△　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察南蔚城县。同日，解放阳原县城。

△　人民解放军攻占绥远。

3月25日　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兼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高惜冰为副主任委员，任命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在长春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政府主席。同日，郑洞国在长春励志社礼堂宣誓就职，郑氏在就职仪式上向各文武官员称：蒋介石为其规定“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战略任务，要求大家精诚团结，共守长春，只待蒋委员长指挥大军出关增援，我们即转入战略反攻。

△　立法院开会审查通过《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

△　国民政府公布《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决定于4月21日起实行。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立法院宣称：“特种刑事法庭之成立即在制裁共军，今日吾人已不允许对共军再有同情心理，凡同情共军者请退出去。”

△　立法院通过《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

△　蒋介石致电希腊国王保罗一世，祝贺希腊独立。

△　蒋介石召见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60多人，劝慰要“体认革命环境，互谅互让，牺牲小我，顾全大局”。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称：此次国民大会选举，只有蒋介石一人有资格当选大总统。

△　蒋介石召见李宗仁、程潜、邓锡侯、宋希濂等人，听取各人辖下军政事务之汇报。

△　长春第一兵团正式编成，该兵团辖有新七军（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滇六十军（第一八二师、暂二十一师、暂五十二师）、吉林省保安司令部、骑兵第一、第二旅、吉林师管区、长春警备司令部、联勤兵站支部等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7万人。根据司令官郑洞国的部署，长春守军大体上以纵贯市区南北的中正街为界，由新七军防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防守东半部。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先后正式宣布参加行宪国大副总统之竞选。

△　在日本侵华期间充当国际间谍并任伪安国军司令的金壁辉（川岛芳子）以汉奸罪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枪决。

△　河南地方团队攻占淅川荆紫关。

△　上海市军警当局大搜捕，数十名工人被捕。

△　晋察冀野战军之攻势作战，迄于本日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多人。

3月26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出售国营事业充实发行准备

办法》，该《办法》规定的出售范围是：一、招商局股票50%；二、中纺公司之官股70%；三、资源委员会所属价值5000万美元之事业；四、接收敌伪物资资产剩余部分；五、日本赔偿物资之25%。同时规定以股票的形式出售，以美元计值。

△　行政院长张群举行茶话会，招待国民参政会全体驻会委员会委员，并发表演说称：政府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形下，均曾努力于民主、政治之推进与谋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莫德惠致词称：参政会同人，十年来与政府共甘苦、历艰辛，其意见盖在鞭策政府体认时局以觅得其应循之途径，故本会同志均能爱护国家，维护主权，以期国家之前途在富强康乐中迈进。

△　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在记者会报告该会筹备经过。

△　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返回南京述职并参加国民大会。

△　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选举出第一届院士81人。

△　南京政治大学教授刁作廉等100人发表时局宣言，提出挽救危局之主张。

△　攻占蔚县之解放军部队撤退，国民党军进占。

△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由双塔村乘车出发，经白文、康宁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驻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等会面，并在这里停留了八天。

3月27日　　蒋介石发表《为解决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纠纷的声明》，称自己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在民选政府尚未成立以前，对国家负有责任”，而作为国民党总裁，“对中国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完成宪政之目标，亦负有责任”。关于国民大会代表资格问题，他在声明中说：“兹当国民大会开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

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乃负责予以全部解决。余以为本党同志相互的问题，应依一般选举之通例，使得票比较多者当选。至本党同志与友党候选人之间的问题，则应以政治方法为之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格，俾友党候补人膺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之宗旨。”

△　李宗仁、程潜发表竞选演说。李氏声称：“余认为，吾人如欲使整个国家迈上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政治途径，必须发扬民权主义，同时实行有计划的民生主义，则乱源定可消灭。”程氏亦在相同场合，发表其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之主张。

△　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参加陕西旅南京同乡会欢送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赴东北之集会上称，其本人是出自乡村，无时或忘中国广大农民以至边胞之痛苦与希望，故此次参加副总统之竞选定能获得最有力之支持，取得胜利。

△　南京3000多饥民上街抢食，蚌埠难民也上街抢夺食物。

△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太岳、吕梁军区部队各一部，为突破临汾城国民党军的防守，在城墙下秘密掘成两条各长110米左右的破城坑道，分别填入黑色炸药6000多公斤和黄色炸药3500公斤，将城墙炸开两个各50多米长的缺口，保证了突破的成功。

△　人民解放军察南部队进攻怀来。

△　上海市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

△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新十一师及渤海纵队攻占潍县。

△　中原野战军一纵由临泉开抵阜阳地区。

△　中原野战军六纵于是日转出大别山区，北渡淮河，经临泉转师西向。

3月28日　国民大会代表是日报到661人。截止是日，共有1694名国大代表报到。

△　国民参政会举行茶话惜别会，正式宣布结束。蒋介石、莫德惠、张伯苓分别致词。同时成立历届参政员联谊会并选举产生理事、监事。该会先后共召开四届十三次会议。

△　中国青年党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本党为协助行宪，实现民主完成建国大业，参加国大。"

△　在南京之23个青年文化团体成立"于右任先生竞选副总统助选团"。李宗仁、孙科、程潜之助选团也先后成立。

△　被迫"退让"之国民大会代表10人到国大会堂绝食抗议，另有一些人闹事、哭陵，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甚至抬着棺材拟拼一死。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学院、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河北大学、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九校学生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成立华北院校自治会保卫自治权利联合会（简称华北学联），一万多名学生发出联防誓言："同甘苦，共生存，一校有事，各校支援！一人被捕，全体入牢！"

△　北平当局下令查禁华北学联。

△　陕北国民党军攻占澄城。

△　中原野战军十一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包围阜阳。一纵攻击东关，十一纵攻击北关。

3月29日　行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法定代表总额应是3045人，现已产生2908人，至昨日报到达1694人，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679人，已足法定人数。政府各部、会首长应邀出席，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应邀观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会词称：这次大会是中国有

史以来“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国家的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并指出这次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之组织”。他还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能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就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　蒋介石在第五届青年节上发表《告全国青年书》称：“现在我们的国家和国民，又面临着一个大考验的时代……凡是青年们信仰一致、行动一致、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战胜艰难、开辟光明的时候，只要我们能继承革命先烈为国献身的精神，体会青年节伟大的意义，正视现实，负荷艰巨，忍劳耐苦，积极奋斗，那我们就不仅能保持先烈们艰难缔造的光荣史绩，更必能消除匪患，芟夷障碍，建造一个三民主义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　国民政府委员莫德惠对《中央日报》记者表示自己决定参加副总统之竞选。

△　孙科发表纪念黄花岗之役广播讲话，主张实现三民主义，号召国人“善尽责任”。

△　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学生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同时抗议北平当局查禁华北学联的命令。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到会演讲，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上海贫寒学生与挽救教育危机联合会、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联合会等团体发出呼吁，要求按生活指数调整教师待遇。北平、天津、南京、唐山等市的教师、学生也都先后罢课、罢教，与政府当局开展反饥饿反迫害斗争。

△　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发表声明，抗议杜鲁门提出之5.7亿美元援华法案，决定于4月4日至11日举行“中国周”，抗议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的政策，同时号召码头工人与海员抵制运输货物来华援蒋。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视察大同、归绥。

△　国民党军攻占平绥线天镇、阳高。

△　空军轰炸齐齐哈尔等地。

△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在上海逝世。

△　进攻阜阳之中原野战军扫清外围，十一纵猛攻北关。

△　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攻占新泰。

3月30日　国民大会召开第一次行宪预备会议，是日共有104人报到。胡适主持讨论大会主席团问题，根据《国民大会组织法》第五条之规定，大会主席团应由出席国大之代表25人组成。但此次预备会不得结果。

△　立法院院长孙科宣布：国民政府第四届立法院至迟将于4月底结束。

△　立法院通过《行宪后立法院组织法》及《监察院组织法》。

△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奉召飞往南京。中午过北平时，卫氏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在机场长谈。旋续飞南京，当晚谒见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蒋介石以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力维持补给为由，一再要求卫立煌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只留少数部队防守沈阳和长春。卫立煌则主张部队残破未加整训，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反对蒋介石的方案。卫氏最后向蒋介石表示，

只要蒋同意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全部补给由他本人设法请美军顾问团帮助运输。

△　李宗仁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三民主义可击败共产主义。如果全国才智之士均能团结一致，努力推行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之主张，同时全力以求民权主义之发扬，“则共产主义当可不攻自灭”。他还表示：“在主观上，本人相信余竞选副总统为最有希望。”

△　北方29省市救建协会暨北方建设研究会全体理监事举行联席会议，主张副总统应由北方文人中选举产生。

△　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一年内对国民政府之4.63亿美元之援助法案。

△　华北学联发表声明，驳斥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诬蔑，号召华北学生“要提高警惕，加紧团结，英勇起来击退反动的逆流，保卫自己”。

△　陕北国民党军攻占甘泉。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解放威海卫、龙口、蓬莱。

3月31日　　国民大会第二次预备会议，讨论大会主席团选举办法，并决定增加主席团名额。

△　司法院长居正宣布参加大总统竞选，同时还表示希望于右任能当选副总统。

△　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首席代表何应钦由美国飞抵上海，次日至南京。

△　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发表《对于国军今后战略行动之声

明》称：“国军证诸东北永吉撤退之成功，使兵力集中，能争取主动起见，对无军事战略之价值之次要据点，今后于必要时仍将予以放弃。”

△　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发表谈话，称此次参加副总统之竞选的动机，实于26年前即产生。他还说：“依照宪法，副总统系备而不用，故在大总统在位时，副总统并无任何军事或政治职权，其地位实与美、法副总统似。”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其本国国务院报告称：“现在正在开会中的国民大会的发展，对未来的发展应有裨益。副总统的选择将为一指标。中国又再度处于十字路口上”，“或者是那些心灵脆弱的人占优势，而我们将看到一个由苏联主持的联合政府，或者是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们团结在蒋委员长的周围，重新鼓舞起来恢复专制仁政，以再度吸引人民的拥戴，以克服共产主义的威胁。我们企望后者而惧怕前者。”

△　行政院新闻局发布全国儿童福利机构数额187所，容纳人数约2.5万人。

△　用于中美积石山探测之飞机遭到损坏，探测计划不能按时进行。

△　中共中央就英国政府愿与解放区建立通商关系事致中央工委转香港分局电：望通知刘宁一，原则上可非正式表示欢迎，对通商的具体事宜可继续进行试探。另电中央工委并转东北局，指出：解放区与英国“建立通商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在地区上，最好对英国开放山东、苏北口岸，而暂保留东北”。

△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保护工商之布告，以图恢复和发展收复区之经济。

△　东北野战军进攻长春飞机场。

△　中原野战军陈赓部第四、第九纵队攻克豫西重镇陕州。

是月　上旬，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总结检查了各地土地改革的工作，并指出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　下旬，国民党军事指挥当局发现解放军进入阜阳地区，急调大别山区之张轸率整编第五十八师之四个团，整编第十师之三个团，整编第二十师之四个团共11个团的兵力，向临泉、阜阳地区进击，因受到中原野战军之十纵的阻击，乃于26日向南退缩。

△　香港《大公报》复刊，负责人费彝民。

△　中共东北局明确提出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要逐步由乡村移到城市，加强城市党的工作。

△　美国政府向盟总颁布劫物归还临时指令，盟总即令日本政府将劫掠物资集中于若干大城市及港口，由盟国代表前往参观认领。至1949年9月止，日本归还中国的掠夺物资总价值约在1800余万美元，仅为日军侵华劫掠物资极小部分。

4月

4月1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国大代表报到已达2110人，是日出席会议1687人。会议抽定各单位代表席次，工会居第一。

△　立法院通过决议，将国民大会主席团名额由原来的25人增加至85人。

△　蒋介石召见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商谈东北军事问题，

并最终同意卫氏之意见，暂不把沈阳主力撤至锦州。

△　行政院批准经济部所拟具之《抚助出口事业办法》，该办法主要内容有：一、对于重要外销物品，设法协助增进产量，改进质量；二、鼓励国货外销；三、适当解决各出口行业之间之实际困难。

△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　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国民大会之北方代表联席会议上发表谈话称：欲救中国，须先救北方。

△　行政院救济特捐督导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议决：国营与党营事业，一律免缴救济特捐。

△　香港、澳门之间无线电话正式通话。

△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之新所得税法。

△　中美积石山探测协定终止。

△　华北钢铁公司北平石景山大铁炉出铁。

△　关于外间传闻北京大学已全部实行公费事，北大校长胡适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北大学生公费，由公费审查委员会负责办理，向依教部规定，并无例外。”

△　保卫华北学联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四院召开，大部分同学签名赞成罢课。

△　进攻阜阳之中原野战军一纵第二十旅攻占南关，伤亡1100多

人。

4月2日　　国民大会召开第四次预会议，通过《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选举办法》，规定主席团候选人之产生办法、主席团之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办法等。

△　何应钦出席国民党中政会，报告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一年来在美国之工作情形。

△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委任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杨森为重庆市长，谷正伦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张笃伦为湖北省政府主席，胡家凤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偕联勤第六补给区司令刘耀汉拜会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商谈有关东北国民党军部队装备补给和增加空运力量的问题，巴大维表示将给予全力支持。

△　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对记者谈宁夏之防务称：宁夏之正规军近30万，需要较好之美式装备，方足以确保西北。同时强调美国应对华采取积极的军事援助。

△　国际戏剧学会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

△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以60.98亿美元之《全盘援外法案》，其中《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案》规定：该年度以不超过3.38亿美元为对华经济援助，以不超过1.25亿美元以赠与方式作为军事援助。

△　河南地方团队攻占登丰、洧川、鄢陵。

△　冯玉祥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资格向美国登记。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学院、中法大学、燕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七校学生代表为反对当局查禁华北学联

及逮捕学生事，到北平行辕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查禁学联之成命。

△　由于国民党军之增援部队从四面围扰逼近，围攻阜阳之中原野战军部队撤围转移。一纵向西北转至太和地区，并将该地区之国民党军引至黄泛区，于中旬转移至太康地区；十一纵向北转进，将国民党军邱清泉整五军引向陇海路北，至中旬，共急行1200里，将邱部引至陇海路砀山地区，然后转至鲁西南。

4月3日　国民大会召开第五次预备会议，出席代表2254人，推定大会主席团候选人142人名单，但选举主席团未果。

△　蒋介石召见李宗仁，对李称："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孙科）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向蒋表示："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是唯命是从；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　李宗仁就当选后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边疆民族问题、华侨问题、妇女问题、外交问题等方面发表谈话。在谈到东北问题时，李氏称："东北从国防上说，为华北之屏障，无东北即无华北，无华北则长江流域亦难自保"，主张"欲挽救中国之危机，必须先挽救东北，中国人必须与东北共存亡"。他还表示："余将来如能获选副总统，必以全力促中枢重视东北。"为了共同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他还通过黄绍竑与于右任、程潜达成协议。

△　澳大利亚当局责令在境之中国侨胞300人即日离境。

△　苏联照复国民政府，不同意中国政府在东北各地享有自由行动主权。

△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自美国返抵上海。

△　驻守洛阳之国民党军整四十一师第一二四旅旅部率第三七〇

团残部开抵偃师，洛阳守军仅剩第一二四旅第三七一团共2900多人、宜阳县保安团冯克功部500多人。

△　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师范学院五校学生自治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自即日起实行总罢课三天。当天下午，北大等学校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召开反迫害、保卫学联大会。

△　平津区铁路局北平电务段交换所分段全体话务员举行罢工，使铁路通讯中断一天多时间。

△　中原野战军陈唐兵团向刘伯承、邓小平及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第二次进攻洛阳的计划："我为对刘邓有力配合，并歼击薄弱之敌，决以由陈赓指挥四、九纵本日起攻歼洛阳守敌，得手后除以九纵一部控制洛阳开展工作外，主力继续沿着陇海路向东扩张及掩护河北后方交通，四纵即经登丰、禹县向东行动，靠近三、八纵，攻歼许昌、新郑之敌"，"我们率三、八纵于7日进至禹（县）襄（城）线，视机攻歼许昌、新郑之敌。另以四纵二十二旅留郾城西北、西南地区，监视十一师行动，配合我攻歼许昌及刘邓行动。"

△　晋察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晋绥部队各一部攻克凉城。

△　国共两军在长春外围展开激战。

4月4日　国民大会代表是日报到54人。国民大会休会。

△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提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将不参加总统竞选，"总统一职，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同时强调这个候选人须具有富有民主精神、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对国际问题及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与研究、忠于国家五项条件。副总统原则上决定自由竞选。

△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由南京飞返沈阳，开始着手整训部队，并准备坚守沈阳、长春、锦州三大据点。

△　外交部长王世杰就美国援华法案发表声明：“美援华案业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经美国总统签署，中国政府与人民闻之欣感。此为美国对华友谊之又一表现，并且是美国对中国严重局势之一种认识。此案多项条款尚待两国政府以合作精神付诸实施。本人此时所欲郑重申述者，为此案之通过，可能给予中国人民以重大的精神鼓励，此案的影响非单就款额之数字所能估计。但中国政府接受此案，其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此案之成功或失败，吾人势将负最后之责任。中国今日实面临多种困难。当此共党公然作乱，通货恶性膨胀之际，其他国家如遭遇相似情形，或将采取别种政治途径，但吾人则决心于此时推行民主宪政。此项政治计划与夫张院长所曾宣布的十项经济自助方案，中国政府将必以极大之决心与毅力使之实现，盖此为达到中国统一及建设之道路，亦即保全整个远东和平与安全之途径。只要吾人循此目标迈进，吾人的努力决不是孤单的，此为余所深信不疑者也。”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接见国民大会河南籍代表时称：“豫省形势重要，中枢向极重视。郑、汴两地为中原重镇，不论局势如何变动，当局绝不肯放弃。”

△　洪兰友等在南京组织成立中国民众法律教育社。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飞机在集宁失事，傅氏当场被震昏，寻脱险。

△　中美积石山探测美国方面队长雷诺自行离开上海，抵达日本东京。

△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联合举行保卫华北学联营火大会，会上教员联合会、职员工会、工警联合会等决定于6日起联合罢教、罢工三天。

△　毛泽东一行到达岢岚县城。同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西北战场重要性已增长，战争规模已扩大，400万人支援这战争已感吃力，民负应减轻不应加重。"

△　中共合江省政府颁布《奖励技术发明暂行办法》。

4月5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六次预备会议，选举产生于右任、谷正纲等85人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是日国大代表报到98人，截至是日，共有2743名代表报到。

△　国民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核准施行《国民大会旁听办法》。

△　国民党中央常会商讨总统候选人问题，行政院长张群称："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结果中常会派人向蒋介石征求意见，获得同意。中常会遂于下午通过张群所提之"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同时决定仍推选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　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报会，商讨西北军事问题。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副参谋总长林蔚、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联勤总司令郭忏及马鸿逵、邓宝珊、马步芳等人出席。会议决定下令抽集20个旅的兵力合围中原野战军集合地带临泉、沈丘地区。具体部署是：以驻守信阳的张轸兵团第十一、二十、五十八整编师及第十八、五十二旅，向临泉、沈丘、新蔡攻击；以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三八旅出三河尖，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一二一旅、新编第二十五旅向太和，整编第五师三个旅向肥水、太和，整编第五十一师两个旅向周口（今商水）、淮阳、鄢陵、扶沟前进，商丘地区吴化文部整编第八十四师与驻罗山之整编第二十八师在纵深策应。

△　司法院长居正发表竞选总统谈话，提出三点主张：一、改革地方政治；二、挽救农村危机；三、养成守法精神。

△　瑞典驻华大使汉麦斯特伦抵上海。

△　苏联大使馆将关于3月8日苏联飞机截击中国运输机事之复照送达中国外交部，内称中国外部前日所提之抗议，“并无根据”，予以拒绝。同时重申：中国C—46型飞机，曾于3月8日晨侵入旅顺苏联军事区，苏联飞机因根据国际惯例，仅向其开枪作为警告信号，但未击中。

△　国内邮资调整：平信每封5000元，寻常商电每字一万元，其他各类邮件资费亦均作调整。

△　绥远国民党军攻占丰镇。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等七个单位的教职员、工警联合会联合发表《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痛陈生活之疾苦，宣布自6日起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三天。清华大学系科代表大会决议响应教职工的号召，罢课三天，同时还成立了“反饥饿、反迫害行动委员会”。

△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并转香港分局电：可与美国官方人员中反对援蒋的一派作普通来往，向他们强调援蒋必遭到失败，排共的运动必然无成。

△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合围，中原野战军前委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陈赓部应即向黑石关及其以东扩张，陈赓兵团于7日夜围攻许昌、新郑；二纵、十纵6日夜围攻驻马店；三纵、六纵8日夜围攻上蔡，9日围攻西平、遂平；十一纵引邱清泉军向东北；一纵在国民党军第十一师部援许昌、新郑时，尾追侧击之，配合陈唐兵团行动，或适时与三纵、六纵、二纵合歼向平汉线抵进之张轸部。

△　毛泽东一行到达神池县城。

△　人民解放军九纵、四纵再度攻克洛阳，全歼驻守洛阳之国民党军整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三旅第三七一团及部分地方保安团共2400多人。

4月6日　　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行政院长张群代表中常会作关于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建议以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临全会通过决议：本届总统候选人，仍拥护蒋介石，但党不提名，由国民党籍之国大代表“依法联署提名”。张群并在临全会上说明：根据这一决议，蒋介石和居正都可以依法联署竞选总统；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四位国民党人都可以联署竞选副总统。

△　国民大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出席代表2268人，讨论《议事规则》。

△　空军总司令部发布公告，公布抗日战争期间阵亡或因公殉职而尚未领到恤金者2415人名单，“请各遗族即依照所刊表式详细填明各呈由住在地之地方政府，转送南京空军总司令部，以凭给恤”。

△　金陵大学一部教授赞同蒋介石不参加总统竞选。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等校师生员工和北平研究院的职员举行罢教、罢课、罢研、罢职斗争。

△　东南名刹镇江金山寺发生第七次火灾，大火持续半天一夜。

△　毛泽东一行到达代县。

△　人民解放军九纵再次收复河南偃师。

△　西满省及齐齐哈尔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在西满革命

烈士陵园举行烈士追悼大会，与会者共三万多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东北局、东北军区政治部等，都献了挽联。

△　华东野战军十纵再占汝南，歼灭地方武装300多人。

△　晋察冀解放军攻占和林。

△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命令以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之西府挺进，相机夺取宝鸡，发起西府陇东战役。

4月7日　　国民大会下午举行第二次大会，代表共到2551人，通过《国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织法》、《国大纪律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同时通过对蒋介石之致敬电、慰劳“戡乱”将士电、慰问各绥靖区同胞书和慰问海外侨胞书。

△　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一部分监察委员共200多人，并发表谈话称：国民大会此次在南京召开，实为一极好良机，使地方情形能转达中央，以备政府采纳。

△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举行审查会，通过《中华民国卅七年短期国库券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短期国库券分一个月期、二个月期、三个月期三种，面额有1000万元、5000万元、一亿元、五亿元、10亿元、50亿元六种，均为不计名，月息五分。

△　司法院长居正发表竞选总统演说。

△　北平市长何思源、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强令北京大学校方于次日12时前将柯在铄等12名学生自治会理事、人权保障委员会负责人等，交到北平警备司令部，否则将进校搜捕。校学生自治会闻讯后，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群众进行保护。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到达繁峙县伯强村。

△ 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之一部攻占河南巩县。

△ 华东野战军八纵收复河南许昌城。

△ 华东野战军十纵攻占驻马店。陈赓部攻占禹县。

4月8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三次大会，修改通过《议事规则》第一章第一条至第六章第卅七条。大部分代表强烈要求“将地方情形反映于大会，反映于中央政府，对于当前时局及政府施政方针，应有广泛之检讨”，同时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是日，国民大会代表报到46人。

△ 司法院长居正发表声明，决定放弃参加总统竞选。

△ 蒋介石召见国民大会河南籍代表，询问当地政情，表示：“国军绝不放弃开封、郑州，目前汴、郑一带军事部署已告完成，许昌、洛阳、漯河短期内可以收复。”同时还称，拟在三个月内，将长江、黄河中间地区之“共匪”肃清。

△ 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在南京成立。

△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由上海至南京。

△ 驻巴西大使郭泰祺向巴西总统递交国书。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监察院长于右任、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分别招待国大代表，发表竞选副总统之演说。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等由南京前往广州。

△ 北京大学学生在民主广场开会决议：与12位同学永远在一起，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也纷纷表示要与学生们一起去坐牢。学生们把12名同学围坐在中心，以保卫他们的安全。北平当局不得已把逮捕人

数由12名减到六名，同学们仍不同意。斗争一直坚持到下午。

△　山东国民党军攻占平阴。

△　李富春、王首道等80余人发起成立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筹委会。该会的宗旨在于施展科学才能，建设新东北、新中国。其任务是组织科学讲演会、搜集各种图书、杂志、报章等，并出版各种科学刊物，使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密切联系，共同研究。

△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要求注意城市政策，指示："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　晋察冀野战军攻占怀安县城。

△　中原野战军三、六纵攻占上蔡、西平、遂平，四纵之一部攻战汜水、虎牢关。

4月9日　　蒋介石在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称，"截止上月底为止，我们法币发行总额不到70万亿元"，"自从剿匪战争展开以来，国军确实损失了17个师……约为总数10%，而这几个月来已完成了八成的补充"。同时还称"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月以内，肃清在黄河以南集结的匪部"。

△　国民大会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第一届国民大会议事规则》，凡13章66条；《提案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章》，凡八条。大会接受大部分代表的意见，决定扩大提案的审查范围，对军政大事进行检讨。

△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与青年党主席曾琦举行晤谈，决定支持蒋介石为首届国民政府总统。

△　清晨，北平当局派出军警80多人袭击北平师范学院，捣毁该校自治会筹备办公室，抢劫财物，毒打学生，有八名学生被逮捕，数十人受伤，是为“四九血案”。晨8时，北平师院学生五六百人前往北平行辕请愿，北平各校闻讯也各整队往援，到下午5时，会场聚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学生六七千人，许多大学教授、讲师、助教也都到会，痛斥当局的非法行径。由华北学联常委会和各校代表组成的主席团，向北平当局提出释放被捕学生、停止传讯北大12名同学、严惩凶手、保障员工生活等六项请愿条件，同时派出代表进入行辕进行谈判。结果迫使北平行辕在当晚9时答应将八名被捕的学生释放，同时不再传讯北京大学的12名同学。

△　成都各大学学生1000多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军粮之请愿游行，要求发给平价米。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弹压，130多人被捕。

△　南京11家印刷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绥远国民党军攻占和林。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淮阳。

△　河北省地方团队攻占青县。

△　中美积石山探测团正式宣告结束。

△　华东野战军十纵攻占确山。

△　人民解放军陈赓部九纵攻占荥阳，四纵占漯河。至此人民解放军部队已控制陇海线郑州至渑池400公里路段。

△　华东野战军三纵第九师收复新郑，逼进郑州。解放军控制平汉线郑州至许昌间路段。

△　《新洛日报》在洛阳创刊。同日，新华社洛阳支社成立。

4月10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代表共到2660人，通过《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日程表》。

△　天津南昌路中央戏院屋顶塌落，在场观众八人死亡，70多人受伤。

△　国际邮电费调价：信函三万元；明信片单二万元，双四万元；挂号费加4.5万元，快递加6.5万元，国际航空费每10公分八万元，国际航空邮简每枚5.5万元，回执每件3.5万元。

△　成都市各大院校学生罢课。

△　鲁南国民党军攻占新泰。

△　河南国民党军再占确山。

△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等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指出："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

△　新华社报道：南京政府内政部下令查禁上海之《世界知识》、《国讯》及《时与文》三杂志，并禁止《国讯》香港版向大陆发行。

4月11日　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视察官训练班第三期等五班学员毕业典礼上训词称："戡乱必定，建国必成。"并称此"必定"、"必成"之基础有四：一、要恢复民族的正气与革命精神，不要违反天理

与人心；二、革命精神要在生活行动中表现出来，至少要做到与士卒共甘苦；三、要自动地负责任，自己所订的计划，要自动地去完成；四、处理每一件事情，必须做到事要躬亲，而且要能做到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去实行。

△ 蒋介石在官邸召见国大代表中之大学校长胡适（北京大学）、张伯苓（南开大学）、姚从吾（河南大学）、王星拱（中山大学）、顾毓琇（政治大学）、朱经农（光华大学）等20多人，告以“教育经费，当谋增加，以符合宪法之规定”。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国防部大礼堂举行茶话会，招待边疆各省之国大代表，致词称：“我们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应团结国内各民族，以求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实现”，“以平等原则来求加强各民族之团结。”同时还声称，戡乱与行宪必须并重，只有“剿灭共匪，始能保障宪法之顺利实施”。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招待国民大会妇女代表及中央妇运委员会全体成员，到会者共200多人，孙氏席间就妇女问题发表演说，以竞选副总统。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至海南岛进行视察。

△ 国民党军张轸兵团攻占驻马店及唐河，胡琏部进抵西平。

△ 陕北国民党军攻占宜君。

△ 民社党决定拥护蒋介石竞选国大总统，同时推举徐傅霖竞选副总统。

△ 北平当局在天安门主持召开“北平市学生民众清共大会”，北平国民党党、政、军首领出席讲话。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打伤过路的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随即冲入北京大学教授宿舍，并将传达室和

吴恩裕等四位教授的住宅抢掠破坏。下午，又包围北平师范学院，打碎临街玻璃，张贴反共标语，制造了“四一一”事件。事件发生后，各校师生相继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等联防组织。

△ 南京中央大学生100多人为反饥饿开展绝食斗争。

△ 毛泽东一行从伯强出发，到达杨林街，夜宿台怀镇塔院寺。

△ 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部、陈赓部、陈毅部分路进逼郑州。

4月12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六次大会，国防部长白崇禧报告军事，提出加强国防建设之三点目标：一、建设现代化国军，健全对突破性攻击之防卫设施；二、普遍实施军训，完成全民战争之准备，“现代国防既为科学的技术的，同时更为普遍性的全体性的”；三、建设独立性的国防科学与国防工业。他强调：地方武力之建设，已成为今日“戡乱”军事之重要课题。关于大别山区之军事，白氏称：此项战争为“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以对付共军求食、求兵、求战三求政策之战争”，他希望来自各省的代表回乡后，从速协助地方，以“拼命保命，破产保产”之精神，完成地方团队之组织，以“根绝赤祸”。会上，华北、东北各省代表强烈要求当局采取有效措施，挽救军事危机。

△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致词要求国民党人要“发扬党德，遵守党纪，拥护党的政策，服从党的决定；尤其处理一切问题，必须一本简单迅速之原则，方能争取时间，挽救国家。”

△ 国民政府明令增加盐税税率，规定普通食盐每担35万元，土膏盐每担30万元，渔业、农业用盐每担15万元，工业用盐免税。同日，又明令公布《关税临时附加税征收条例》，规定关税临时附加税按照关税税率之45％征收。

△ 行政院核准通过将教授研究补助费增加一倍，自3月份起发

给，教授由原来之50万元增至100万元，副教授增至80万元，讲师增至60万元，助教增至40万元。

△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不相信共产分田办法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惟“戡乱”工作之完成，政治之改良为当前要务，耕者有其田政策应切实推行。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招待北方九省国民大会代表，就东北问题发表演说称：希望代表“对东北不要过分悲观，不要灰心，不要消极。我们现在还有力量，并且还有几个据点可以收回东北，现在所要努力的，就是要检讨自己的缺点”。他还承认：“两年以来，东北造成这种局面，有些是无可奈何的”，“在动乱不安定的形势下，行宪是有名无实的。”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的陪同下视察海口。

△　北京大学教授为抗议北平当局制造的“四一一”事件，宣布罢教一周。全校师生为声援教授，一致罢教、罢课、罢研。清华大学也宣布罢教、罢课一天，以支持北京大学师生。

△　毛泽东一行到达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晚间开会议定，待到达阜平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及中央机关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暂留城南庄。

△　中原野战军十一纵与国民党军邱清泉整五师在兰村、民权间接仗，十一纵占内黄车站。

△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外国教会的临时办法的决定》，集中阐明中共对宗教教士的态度和政策。指出：外国教士如遵守解放区政府之政策法令，不搞间谍非法破坏活动，则允其信教和传教自由，不加排斥。但人民也有不信教和破除迷信的自由。外国教职

人员如有非法破坏或从事间谍活动者，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材料，报东北局审查批准后，方得依法惩处。凡未被斗争查封的教堂、教产、教士及其附属的医院、学校、育婴堂等，应加以保护，不准再动；凡已经查封的，除土地外，应分别发还。外国教职人员生活无着落者，当地政府应给予照顾，维持其生活。

4月13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七次大会。财政部长俞鸿钧作财政金融之施政报告，称：现阶段财政金融之中心政策为以下几点：一、举凡财政金融之一切措施，务求与动员戡乱军事需要密切配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早日肃清“共匪”；二、财政金融政策须与经济政策配合，在调整税制时，“应设法力求国民负担之公平及财富分配之改善”；三、戡乱军事支出，不可避免，“但求支出合理敷实”，设法使国军收支，接近平衡；使货币价值相当稳定，以奠定将来改革币制之基础；四、关于税务原则，“与其举办新税，不如整理旧税；与其提高税率，不如清除积弊；与其增加人员，不如增加经费”。

△　经济部长陈启天在国民大会第七次大会上报告经济部施政简况，报告内容分四个部分：甲、经济部之职掌及政策重点；乙、当前工商业现况；丙、重要物资生产及供应情形；丁、战后物价变动情形。

△　交通部长俞大维在国民大会第七次大会上作交通部施政报告，内容分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电信、邮政六个方面。

△　粮食部长俞飞鹏在国民大会第七次大会作粮政报告，分为军粮之筹措、公粮民粮之配售、各地民食之调剂、今后之目标与措施四部分内容。

△　国民大会代表继续检讨军事，东北地区代表纷纷指责陈诚之过失，甚至有人提出“杀陈诚以谢国人”，会场秩序极乱。

△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招待国民大会代表，致词称：本人此次

竞选副总统，即希望协助元首，推动革新运动，今后勿论当选与否，当本一贯精神，勇往迈进，以期不负亲朋国人之期望。

△　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发表谈话称：本人深信“共匪”不足忧，可忧者在吾人能否痛下决心，作一彻底和平的大改革。

△　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抵省，发表谈话表示要：一、发挥总体战力量，加强戡建工作；二、预防水患，疏导江河；三、普及教育，辅导失学青年。

△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写给国会的报告中称：截至本年12月31日，美国对中国提供救援物资将有五万长吨之小麦、4.3万长吨之白米，另拨500万美元在暹罗等地采购援华白米等。

△　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民食调配讲习会，各配售店经理参加会议，商讨压缩北平市民的粮食供应。

△　国民党军调整军事部署：仍以十几个旅在大别山区分区清剿；以孙元良部整四十七军、胡琏整十八军及整九师分别于郑州、漯河、南阳地区，监视中原野战军行动，并钳制攻击中原野战军主力部队；以张轸兵团之整十、整五十八和整八十五师等驻守驻马店、确山，向西行动，扫荡桐柏、江汉地区；以整五十六师守备襄阳、樊城地区；以邱清泉兵团在鲁西南监视粟裕兵团。

△　毛泽东由聂荣臻陪同，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

△　中原解放军十一纵攻占民权县城。

△　中原野战军指挥部进入豫西叶县郭店镇，六纵亦于本日到达叶县休整。中原野战军主力部队全部由大别山区转出，二、三、六、十一纵和华东野战军十纵均进入平汉路西豫、陕、鄂地区。

△　东北军区在哈尔滨召开炮兵干部会议，总结炮兵作战经验，

以加强炮兵建设。

4月14日　国民大会召开第八次大会，出席代表2717人。外交部长王世杰作外交报告。报告分五部分内容：一、世界和平和我们的主张；二、中美关系；三、中苏关系及其他；四、日本问题；五、华侨的保护问题。王世杰在报告中称：目前世界局势至为严重，而根本危机在于不愿战争甚至害怕战争的国家，也并不都在为和平而工作，中国对世界和平之期望，寄托于联合国，并将竟尽一切力量，促成联合国之计划得以实现。谈到中美关系，王氏称：两国悠久而坚强之友谊，绝不致为任何批评或宣传所能动摇；中苏关系之不能改进，其原因不在于条约本身，而在条约之违反者；对日本，中国政府的态度，一贯政策是不主张报复，但也不容姑息。

△　内政部长张厉生在国民大会第八次大会上作内政报告，内容分：一、地方自治工作；二、办理各项选举；三、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四、结论。

△　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国民大会第八次大会上作教育报告，内容分学校数量的增加、基本教育的重视、边疆教育的重视、教育经费的筹措等几个方面。朱家骅在报告中称：至1947年下半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207所，学生14.8万多人；中等学校至去年上学期共达5892所，学生187万多人；国统区小学校共29万所，学生2180万多人。

△　社会部长谷正纲在国民大会第八次大会上作社会部工作报告，主要有加强难民救济、推进劳工行政、辅导职业团体等内容。

△　河北国民党军攻占河间。

4月15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九次大会，审读国大代表有关修改宪法等六项提案，并继续检讨政治。

△　行政院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绥靖区绥靖临时费筹集办

法》、文武职员4月份调整待遇分级标准。

△　立法院召开第四届第三五二次会议，通过《主计处组织法草案》、《修正行政院组织法草案》、《中华民国卅七年短期国库券条例》等，并对《提审法》、《戒严法》分别予以修正。

△　李宗仁致电北平党政负责人，指示对学潮“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

△　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市长何思源向北平师范学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疚。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答应赔偿损失。

△　中英两国政府会同勘定沙角界址，重新竖立在日军占领期间被移动的界石。17日，勘定工作结束，双方签署《重竖沙角中英界石备忘录》。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招待民社、青年两党之国大代表时称：必须三党继续合作，始能“戡平内乱”，以进行艰巨之建设工作，而三党合作之基础，即在于党与党之间互谅与互助。

△　第一届国大女代表联谊会在南京成立，通过联谊会组织简章。

△　河北国民党军攻占任丘。

△　湖北国民党军攻占均县。

△　全国学联发表宣言，重申学生争取公费，教师改善待遇的要求。

△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向校方递交反迫害请愿书，提出惩凶、

赔偿损失、保障安全等项要求。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联合颁发布告，规定自是日起冀南银行发行之冀钞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之边钞，在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全境互相流通，同时规定冀钞与边钞之比价固定为1：10。

△　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布《东北解放区荣军复员条例》。

△　东北文物保管会黑龙江省分会成立，负责领导全省文物保管事宜。

△　东北解放区吉林大学正式复校开学。

4月16日　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中正、居正。

△　国民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分七组举行审查会，审查修改宪法、国防、外交、国民经济、社会安全、教育文化、边疆七方面之提案。

△　莫德惠在中国社会建设协会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参加副总统之竞选，系本人多年来对民主之信条，及对当前政治之责任感。

△　监察院长于右任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我的竞选动机与方法》的竞选演说，称“我竞选副总统是为着辅助总统，求一部宪法完整的实现，以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新中国”，并说：“穷就是我竞选的本钱。”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招待国民大会全体回教代表，就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发表讲话称：建设中国，最重要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至少要使各民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护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

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内地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而平等机会与权利的获得，则必须采用保护边疆政策，多予边胞以各种有利之机会。

△ 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宴请山西、内蒙古等省国大代表并发表谈话称：全体国大代表应同心合力，协助政府，共谋有效措施，挽救北方危局。

△ 豫西国民党军攻占巩县、汜水、荥阳。

△ 青年部长陈雪屏由南京前往北平，慰问教育界人士。

△ 中原解放区江汉军区部队在湖北京山东北之三阳店、宋河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七旅。

△ 晋察冀野战军进攻应县。

4月17日 蒋介石作为浙江省奉化县代表至国民大会报到处报到，所领报到证为2765号。是日为国大代表报到之第20日，续有16人报到。至此，共已有2748人报到。

△ 国民大会秘书处报告：国民大会代表共提出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等方面之提案853件。

△ 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一次大会。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在会上宣布：国大代表连署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者共2489人，提名居正者共109人。代表继续审查修改宪法案，讨论修宪问题，因各派意见不同，发生争执，会场秩序大乱。

△ 蒋介石在国防部大礼堂召集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谈话，称：各党员应尊重本党传统精神，珍惜本党50年奋斗之历史，明了国家当前之需要。关于修宪问题，仍宜依照本党既定之方针，除对于戡乱有关者可予以补充临时性条款外，均以不修改为宜。

△　被迫取消国民大会代表之资格的签署国大代表刘运筹、黄淑芬等20多人，集体赴国大会堂，企图冲进会场出席大会，受到宪兵的阻止。大会主席临时推派于斌、王云五、张希文等与签署代表会商，至午2时，签署国大代表始渐离去。

△　国民政府副主席、副总统候选人之一孙科招待四川籍国大代表并发表竞选演说称："在今日戡乱期间，四川亦不失为西南戡乱大本营，至盼川籍人士，努力建设，并充实自卫实力，以捍卫乡土，戡平匪乱。"

△　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招待东北各省之国大代表并发表谈话称："今日东北情势，虽极严重，然极有好转之希望，深信地方武力如能迅速组织，配合国军作战，则收复全东北，并非难事。"

△　监察院长于右任发表题为《我愿与前方将士为民主中国而努力》的广播讲话，称："只要我们国民人人都有戡乱剿匪的决心，都把戡乱剿匪当作自己的任务，都能一心一意拥护神圣宪法。宪法实施，则国家生存，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叛乱的土匪集团，必然走向崩溃的命运。"

△　副总统候选人之一莫德惠招待陕西、甘肃、河南、安徽等省国大代表，发表演说，竞选副总统。

△　河北国民党军再占易县。

△　察哈尔国民党军攻占龙关。

△　苏北国民党军攻占益林。

△　中央航空公司之飞机飞往积石山进行探测。

△　西北野战军发起陇东战役。

△　西北野战军攻占栒邑。

4月18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二次大会，通过修改宪法案，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和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之限制。"

△　国民大会主席团提出《国民大会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及开票办法》，向第十二次大会报告。

△　东北各省国大代表谒见蒋介石，陈述关于东北之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之意见。

△　全国总工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社会部长谷正纲、农工部长马超俊、组织部长陈立夫、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及英、美等国大使馆之劳工参赞等莅会观礼。谷正纲在成立大会上宣读了蒋介石的训词，对该会提出四点"期望"：一、珍视过去革命历史，认识国家民族危机，领导全国劳工同胞，为动员戡乱而奋斗；二、认识劳工组织为拥护民主宪政之基础，亦为保障劳工群众本身利益之共同需要，切实健全各级工会组织，并发挥民主领导精神；三、改进技术，努力生产，发挥高度之服务精神；四、团结国际劳工组织，消灭战争危机，尊重世界和平之基础。并称："在政府动员戡乱与国大会召集的期间，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实负有领导全国劳工同胞促进戡乱行宪的时代使命。"

△　青年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总统。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声援北平、天津、上海、杭州、成都及其他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南召。

△　南京金陵大学及厦门大学学生罢课，要求公费，并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的罢课运动。

△　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要负责人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就攻打长春问题进行讨论，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计划，建议：东北野战军部队在经过军事、政治整训后，用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其中七个纵队担任攻城任务，两个纵队在四平以南打援。新成立之三个纵队和独立师，则在锦州、沈阳之间和沈阳、四平之间牵制国民党军。准备时间拟用10天至半个月，再用10天到半个月时间即可以解决战斗。

△　西北野战军在常宁歼灭国民党军青年第二〇三师。同日，解放永寿县城。

△　哈尔滨市召开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在民青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青年团。

△　西北野战军南渡泾河，向关中地区发展。

4月19日　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大会召开第十三次大会，投票选举总统，出席代表2734人，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总统。居正得269票。

△　立法院长孙科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声明放弃行宪立法委员之当选资格。按：孙科之反对派攻击孙氏欲获副总统及立法院长双重身份和职位，孙氏声明即针对此种攻击而发。

△　副总统候选人之连署提名完成，各候选之提名国代名单送至国民大会秘书处。

△　副总统候选人孙科、李宗仁、莫德惠等分别招待各单位之国大代表，发表演说，竞选副总统。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飞抵山西太原，晤见阎锡山，会商华北军事。

△　由《大学周报》举办并由南京之四大学校长具名邀请之大学校长座谈会在金陵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北平师院院长袁敦礼、同济大学校长丁文渊、上海法学院院长朱国杰、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中山大学代校长戚寿南、政法大学校长顾毓琇等10多人参加，就中国当前之教育问题进行座谈。

△　广西大学教授以生活无法维持，宣布自20日起开始罢教。

△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以北京各大院校教授支持学生运动发表谈话称：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位教授上月29日在北平、天津等地学生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是“凭一时的快意，作刺激学生的言论……其结果是演出一幕害己、害人、害国家的惨剧”。

△　新任瑞典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希腊驻华大使艾寄乐、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菲律宾公使谢伯襄先后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

△　由济南东进之国民党军攻占明水、章丘。

△　新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万福麟至沈阳。

△　西北野战军解放邠县县城。

△　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高等法院，于天放任院长。

4月20日　国民大会秘书处公布副总统候选人签署代表人数：孙科540票，于右任512票，李宗仁479票，程潜338票，莫德惠211

票，徐傅霖132票。

△　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会字第二号）》，公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计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

△　于右任发表题为《中国的命运决定世界的前途》的谈话，对于国际外交问题发表看法。

△　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程潜等分别招待国民大会代表，发表演说，竞选副总统。

△　蒋介石宴请东北、陕西、热河各省国民大会代表，致词谓：政府对于东北同胞最感困难之粮食问题，必负责迅速解决。对于全盘“剿匪”之军事，则表示乐观。他还希望各代表加强对国家民族的信心，协助政府共同完成“戡乱建国”的工作。

△　斯大林复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称：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前是会这样。

△　中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对法庭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对凡在对华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战犯，予以“严厉与公正”之处罚，这种处罚并非意在报复，而实在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向氏还在接见中央社记者时称：就在狱关押之日本25名头号战犯中，中国坚持要求庭方严厉处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

△　抗战期间曾在中国华南地区残酷杀害我非武装同胞之日本战犯小西新三郎、田岛信雄、海芥悟三人，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决。

△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葛里芬至南京访问。白吉尔由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海军顾问组长塞柏尔陪同谒见蒋介石。

△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罢课三天，声援北平、天津、上海、成都等地学生。

△　由青岛西进增援潍县的国民党军攻占胶县。

△　河南国民党军再度攻占偃师、漯河。

△　天津粮价暴涨，高粱米每斤价达2.75万元，大米每斤达4.5万元，面粉每袋245万元。

△　沪宁铁路3000多工人卧轨罢工，抗议交通部取消铁路工人30％的生活补助及一切补贴。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华商报》上发表《否认伪选及伪国大的声明》，称这次国大之“丑恶程度，较之袁世凯的筹安会和曹锟的贿选，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独裁者及其御用下的民族败类，是人民的公敌，正是自掘坟墓。

△　西北野战军攻占长武，向南进逼武功。

4月21日　　是日国大代表报到22人，连前共2804人。国民大会举行第十四次大会，通过《请即宣布废除中苏航空条约案》、《请政府切实举办救济事业案》等一系列议案，要求当局加强职权，统一指挥，敦促苏联彻底履行中苏友好条约，归还东北物资机器，收复琉球、旅顺、大连、香港、九龙、澳门，确定对日和约原则等。

△　蒋介石召见杜月笙、钱新之，询问上海治安、经济情形。

△　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招待民社党国大代表，发表竞选谈话称：中央与地方、三党之间必须精诚团结，完成“戡乱”之目的。副总统之另一候选人徐傅霖亦在招待会上表示：在必要时，将对程潜作“最大支持”。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正式宣称：“余本人已决辞去已当选之立法委员一职，以是，行宪立法院院长之竞选，余决不参加。”他还对记者称：“许多人反宣传，说我要拿副总统及立法院长两个职位，我为了表明心迹，才作如此决定。”

△　监察院长于右任向国民大会之妇女代表发表题为《怎样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谈话，提出解决妇女之职业、教育、经济问题之主张，并得出结论称：行宪后的中国妇女，一定要求要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上一切与男子全面平等。

△　联合国劝募儿童救济金中国委员会与联合国之协议书由宋美龄签字。

△　驻联合国代表兼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蒋廷黻，代表中国政府在《关税贸易协定》之《暂行实施议定书》上签字。

△　北平、天津、唐山地区11所院校学生为抗议当局制造的“四九血案”，宣布总罢课一天。

△　西藏于是日晚8时32分发生地震，波及面积约广4500平方哩。

△　西北野战军收复被胡宗南部侵占一年零三个月又三天的延安。

△　西北野战军解放陕西长武城和永乐镇。

4月22日　　自是日起，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等副总统候选人之“助选团”、“竞选委员会”等机构连续在《中央日报》上发布启事，“敬请”国大代表对各自拥护之候选人投票支持。

△　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五次大会，讨论通过各种议案533件。同时代表们还讨论了闭会后设立机构案，未获结果，会场秩序极乱。

△　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国务会议第三次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一、《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办法》，决定：“由国务会议就职业团体原有国大代表名额增加300名”；二、《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补充办法》，决定：“在职业团体立法委员名额中增加150名”；三、《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组织规程》。

△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我为什么竞选副总统》讲话；莫德惠亦发表题为《信心就是力量》的副总统竞选广播讲话。与此同时，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分别招待国民大会代表，发表演说，竞选副总统。

△　由济南东进增援潍县的国民党军攻占邹平。

△　西藏是日凌晨零点39分再次发生地震，波及面积约达4250平方哩。

△　西北野战军攻克陕西麟游、扶风和甘肃灵台三镇。

△　国共两军在晋北应县激战。

4月23日　　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德惠得218票，徐傅霖得214票。由于无人得票超过代表总额半数，依据选举法的规定，定于次日将前三名之李宗仁、孙科、程潜三人作为第二轮候选人，再次进行投票选举。

△　立法院长孙科主持召开立法院第四届第九次临时会议，讨论昨日国务会议通过之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选举补充办法》，出席者均认为用立法程序解决政治问题，有背法治精神，“困难殊多”，且极有可能引致更多的纠纷。

△　陆军训练总司令、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至南京，并出席国民大会参加副总统选举。

△　新任之东北行辕副主任万福麟在沈阳就职。

△　南京交通服务社在《新民报》上刊布启事，对参加副总统竞选之李宗仁大加诋毁，称李氏“加官”后将继之以“逼宫”。

△　龚德柏所办之《救国日报》上刊载《孙科和他的“小妾”蓝妮的故事》，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之广东省籍国民大会代表十分恼火，在薛岳的率领下，前往捣毁了该家报馆。

△　由济南东进之国民党军攻占周村。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临颍、博爱。

△　武汉大学学生罢课，声援平、津等地学生的斗争。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等校教授共90多人向北平市国民党党部主任吴铸人提出质询，抗议当局迫害学生。

△　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会合。

△　人民解放军收复察哈尔省南部之重镇多伦。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攻占田马。

4月24日　国民大会举行第二次副总统选举大会，结果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均未获得半数通过。

△　国民政府令：一、兼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免去兼职；卫立煌着无庸代国民政府主席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张作相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二、任命周福成为松江省政府主席。

△　行宪立法院立法委员是日开始报到。

△　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致电蒋介石，祝贺其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行宪大总统。

△　蒋介石示意程潜，令其放弃竞选并劝其支持者将票投向孙科，遭到程潜的拒绝。当晚，程潜发表声明放弃竞选，与之有“攻守同盟”协定的李宗仁随即亦决定放弃竞选。

△　甘肃国民党军开向长武、邠县，增援洛川，由延安败退之陕北胡宗南部与洛川国民党军会合。

△　河北南部国民党军攻占东明。

△　为庆祝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中共中央致电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希望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　晋察冀野战军热河部队进逼承德。

△　进攻潍县之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突入城内，国民党军退守东城。

△　陈赓为发动宛西战役下令：以中原第二纵队、华野第十纵队共四个旅及桐柏军区主力为南路，围歼邓县之敌，以四纵及第三十八

军第十七师为北路军，围歼镇平、内乡、西峡口之敌。

4月25日　李宗仁、程潜在南京各报上发表放弃竞选的声明，声称这次国民大会在选举副总统时，存在着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宗仁还称：最近有人制造谣言，谓本人此次竞选，志在“逼宫”，为肃清谣言，消除误会，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支持程、李二人的国民代表也纷纷罢选。孙科亦致函国民大会主席团，“郑重声明放弃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国民大会休会。

△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副总统选举问题，称决不参加意见。同时推举白崇禧、王宠惠、张群等向李宗仁、孙科、程潜三人解释误会，劝服他们停止互相攻击之宣传。

△　国民大会主席团派胡适、于斌、曾宝荪等分别谒访李宗仁、孙科、程潜，敦劝他们继续参加副总统之竞选。

△　拥护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之国大代表，组织成立“民主宪政运动委员会”。

△　程潜发表书面谈话，否认自己系“受命”放弃副总统候选人资格。

△　驻香港各民主党派暨无党派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等致电慰问北平许德珩等三位教授，侯外庐发表文章《谁敢制造第二次闻一多事件》。

△　陕西胡宗南部攻占永寿，陇东国民党军马步芳部攻占长武。

△　由济南东进增援潍县之国民党军攻占长山、张店。

4月26日　国民政府颁令公布《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组织规程》、《提审法》。

△　由于副总统候选人放弃竞选，国民大会继续休会。

△　民社党与青年党发表联合声明，称选举必须严格遵守自由原则。

△　放弃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之李宗仁、孙科、程潜分别发表谈话。李宗仁称“放弃竞选系个人权利，而是否接受余之放弃则系大会之权利”；孙科表示“唯大会决定是从”；程潜则表示：对于副总统竞选事，已决定接受大会之解决办法，在不影响党的团结、不增加行宪困难、有利于诸选举人之谅解的大前提下，“个人不再坚持己见”。

△　国民党军攻占邠县、扶风。

△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恩茂报告称，自去年10月至今年3月，该省殉职及被俘之专员四人，县长27人。

△　西北野战军攻占凤翔。

△　人民解放军皖北部队进袭津浦路南段之明光和全椒两县。

△　西北人民解放军攻占胡宗南部深远后方基地陕西宝鸡，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2.15万多人，俘其师长徐保。28日又主动撤出，向陇东转移。

△　中共中央在《关于应吸收技术人员参加企业管理委员会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在任何企业中，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可能也要利用。

4月27日　国民政府令派刘克俊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

△　李宗仁、孙科、程潜等决定继续参加副总统竞选。

△　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飞抵南京。

△　教育部消息：本年上半年度国立各大学、研究所经费共47亿元，行政院决定对此项经费予以追加一倍，教部将以下列标准分配：一、文、法、教育及数学、农业等研究所之经费每所1500万元；二、心理、地理及教育等研究所各2000万元；三、其余理、工、农、医等研究所每所3000万元。

△　由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民事组组长诺斯少将暨美国政府官员10余人组成之经济代表团抵南京，将分访中国外交、经济等部门，就有关中日贸易问题进行商谈。29日，该代表团离开南京至上海。

△　毛泽东致函晋察冀中央局工作部长刘仁，请他邀请北平之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许德珩、吴晗等人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议决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攻克潍县，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五师2.5万多人，生俘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

4月28日　国民大会第三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依旧无人超过半数获得通过。

△　李宗仁发表竞选演说，主张政治革新。

△　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回抵南京述职。

△　参加日内瓦国际新闻自由大会之中国代表张彭春飞返上海。

△　陕西胡宗南部进占宝鸡、凤翔、虢镇。

△　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在南京宣告成立。

△　中原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一部猛攻邓县、镇平、淅川、内乡等地。与地方团队展开激战。

△　国民党军三个军联合顺义县保安队等数万人，向顺义县东部的解放区进攻。

△　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向中共中央及中央工委发出的关于东北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同时对工资标准作了原则规定。

△　《东北日报》报道：两年来，哈尔滨市有2.1万多青壮年参军，8000多民工上前线助战；全市工商业有2.2万多户，合作社遍及各区，市场繁荣；小学校168所，学生共五万多人；各级司法工作机关亦相继建立。

△　山东潍县自卫总队两个大队、13个中队共1500多人在副总队长范起爽之率领下，在昌乐于家庄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4月29日　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大会举行第四次副总统选举大会，李宗仁以1438票击败孙科之1295票当选第一届副总统。对于此番副总统的竞选结果，蒋介石大为不满。白崇禧事后也曾发表评论说："当时竞选党内副总统提名者，有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诸人，孙科为国父哲子，深获党国及广东之支持；于右任为党国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时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因此中央难于取舍，争执结果，遂决定不提名而改为自由竞选。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的宝座。惟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系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所不及者。"

△　新当选副总统之李宗仁发表书面谈话称："本人膺选后，自当本平昔一贯主张，辅佐元首，革新庶政，完成戡乱建国之使命。"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对于公开决意支持孙科的蒋介石是一严重的挫折”，也是“国民党内反对分子对以CC派和黄埔派为中心的政党机器的独裁进行挑战的胜利”。

△　赴美之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贝祖贻由美国返回上海。

△　广西法政学院教授、立法委员廖竞存在美国访谒驻美大使顾维钧称，他要代表中国人民的立场访问美国总统杜鲁门并向杜氏强烈要求把中国内战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同时他向顾氏声称，只要中国内部的战事还在继续，美国对中国的一切的援助都应停止。

△　陕西国民党军攻占汧阳。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攻占安丘城。

△　热河解放军部队攻占平泉西七沟、凤凰岭等地。

4月30日　国民大会第十六次会次通过《全国总动员戡乱案》，内称：“为早日肃清逆匪，救国救民，政府固应充实前方，加紧进剿，我海内外同胞，尤当淬励振奋，共济时艰，宏军民合作之精神，以动员戡乱为第一，愿我海内外同胞念国家缔造之艰，人民痛苦之甚，群策群力，一致动员，扫除民主障碍，建立永久之邦基。”

△　国民大会召开第十六次大会，议定设置宪政督导委员会。

△　孙科发起组织成立“建国协会”，孙氏任会长。

△　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互换《美国援华草约》，规定，中美在双边援助协定谈判期间，美国对华援助的扩大，除某些例外，要按1947年10月27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后协议的规定办理。

△　美国务院向其国会报告称：美国已将其出售协定中所包括价值五亿美元可移动物资中之价值3.6亿美元之剩余物资供给中国。

△　中华民国卅七年度短期国库券开始在上海发售。

△　陕西国民党军攻占麟游。

△　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陈毅、粟裕、薄一波等前往参加，是为“城南庄会议”。会议在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时，采纳了粟裕等的建议，作出了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会议还作出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并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部署。

△　中共中央颁布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23条，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是月　中旬，为解决军粮问题，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命令在长春市内进行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郑洞国一面屡屡致电卫立煌请求加紧空运补给，一面部署在市内和四郊搜购粮食。

△　教育部根据美国人史利夫所拟之《中国社会教育计划》，并参照本部实情，拟具《普及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决定先自12至18岁之失学青年实施，由大都市逐步推展到乡村，估计共需经费1681.5504亿元。同时该部拟定预算中地方基本教育补助费共为8000

亿元。

△　内政部本月公布全国行政区域如下：首都南京市，陪都为重庆与北平。全国共35个省、1个地方、12个直辖市，210个行政督察区，2023个县，55个省辖市，35个设治局，21个旗。江苏省，省会镇江县，9行政督察区，61县，2市，1设治局；浙江省，省会杭州市，6行政督察区，77县，1市；安徽省，省会合肥县，10行政督察区，63县，1市；江西省，省会南昌市，9行政督察区，81县，1市；湖北省，省会武昌市，8行政督察区，70县，1市；湖南省，省会长沙市，10行政督察区，77县，2市；四川省，省会成都市，16行政督察区，139县，2市，1管理司，2设治局；西康省，省会康定县，2行政督察区，48县，4设治局；福建省，省会福州市，7行政督察区，8直属省管县，67县，2市；台湾省，省会台北市，不设行政督察区，8县，9市；广东省，省会驻广州市，9行政督察区，100县，2市；广西省，省会桂林市，9行政督察区，99县，1市；云南省，省会昆明市，13行政督察区，13直属省管县，112县，1市，16设治局；贵州省，省会贵阳市，6行政督察区，78县，1市，1设治局；河北省，省会清苑县，15行政督察区，132县，2市，2设治局；山东省，省会济南市，16行政督察区，108县，3市；河南省，省会开封县，12行政督察区，111县；山西省，省会太原市，14行政督察区，105县，1市；陕西省，省会驻西安市，11行政督察区，5直属省管县，92县，1设治局；甘肃省，省会兰州市，9行政督察区，69县，1市，2设治局；青海省，省会西宁市，1行政督察区，1设治局直属省管，19县，1市，1设治局；辽南省，省会沈阳市，不设行政督察区，22县，4市；安东省，省会通化市，不设行政督察区，18县，2市；辽北省，省会辽源县，不设行政督察区，18县，1市，6旗；吉林省，省会吉林市，不设行政督察区，18县，2市，1旗；松江省，省会牡丹江市，不设行政督察区，15县，2市；合江省，省会佳木斯市，不设行政督察区，17县，1市；黑龙江省，省会安化市，不设行政督察区，25县，1市，1旗；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不设行政督察区，18县，1

市，2旗；兴安省，省会海拉尔市，不设行政督察区，7县，1市，11旗；热河省，省会承德县，不设行政督察区，20县；察哈尔省，省会张垣市，4行政督察区，19县，1市；绥远省，省会归绥市，4行政督察区，20县，3市；宁夏省，省会银川市，不设行政督察区，13县，1市；新疆省，省会迪化市，10行政督察区，77县，1市，4设治局；西藏地方。行政院12直辖市为：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重庆市、大连市、哈尔滨市、沈阳市、西安市、汉口市、广州市。另外，英租借九龙租借地；英据香港，葡萄牙据澳门。

△　港九进步工人组织成立港九工会联合会。

△　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黄克诚为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冀察热辽军区政委及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同日，东北军区任命程世才为安东军区司令员。

5月

5月1日　　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在南京闭幕。蒋介石在闭幕式上致词称，“自今以后，中央政府是依宪法产生的政府”，“今后政府一切措施，必须遵守宪法，以发挥宪法中所赋予其治权之能力”，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同时他又承认“戡乱建国是最艰难的时期”；于右任致闭幕词。

△　国民政府颁令：民国三十六年3月31日公布之《行政院组织法》，定自三十七年依宪法任命行政院长之日起施行；民国三十六年12月25日公布之《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定自三十七年5月8日起施行；民国三十六年3月31日公布之《司法院组织法》，定自三十七年依宪法任命司法院长之日起施行；民国三十六年3月31日公布之《考试院组织法》，定自三十七年依宪法任命考试院长之日起施行；民国三十六年3月31日公布之《监察院组织法》，定自三十七年依宪法产生之首届监察院召集之日起施行。

△　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经立法院院会于3月25日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凡29条。

△　贝祖贻偕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由上海抵南京，谒见蒋介石，报告中国技术代表团赴美访问经过。

△　程潜组织成立宪政协会并发表宣言，提出“全面改革、和平革命”的口号，并就“当前国是”提出八项主张：一、拥护“戡乱建国之国策”；二、起用贤能；三、改善前线士兵生活，组织地方武装；四、实行财政、人事、制度之大改革；五、取缔豪门资本垄断；六、充分体现国内各民族之和平团结；七、保障公教人员生活待遇；八、拥护国际和平。4日，该会推选程潜为理事长。

△　立法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即第四届第三五三次会议，否决4月22日国务会议通过之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补充办法，反对增加名额以解决代表资格之纠纷事件。并决定将主计处改为主计部，隶属于行政院。

△　毛泽东写信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称：“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收复山东昌乐。

△　哈尔滨市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390人。大会围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劳动法草案》，确定了今后五大任务：发展生产，支援战争；拥护政府，参加政权；加强教育，提高觉悟；兴办福利，保障生活；扩大队伍，巩固组织。大会于13日闭幕。

5月2日　内政部开始公布当选立法委员名单。

△　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视察北平、天津两地驻军，并就华北军事问题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进行商谈。

△　中国驻暹罗大使谢保樵离南京赴任。

△　南京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就南京之大学生罢课事发表谈话，“希望学生勿为共匪所惑，倘执迷不悟，决执法以绳”。

△　中国回教协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理事长白崇禧致开幕词。

△　中原野战军发动宛西战役，以二纵、四纵、华东野战军十纵、桐柏军区主力部队为主作战集团，是日起向邓县、镇平、内乡、淅川四县进攻。

5月3日　　蒋介石在南京对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作题为《国民大会后本党同志应有之努力》的谈话，称中央与地方同志之间关系，“中央对地方关于党务政治一切的要求，未能充分认识，对于地方同志的心理，未能充分明了”，并承认国民党人“对革命的信心呈现动摇，对戡乱建国的前途，缺乏信心，尤其来自匪区邻近的各位同志，焦急忧虑，情绪失常，在会场中充满了互相责难、互相怨怼空气”，号召国民党员要切实“自信、自强、自反”。

△　国民政府令：任命张含英为国立北洋大学校长。

△　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公布4月30日换文及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照会，内容有：“（一）确定中国政府须遵守1948年援华法案第四〇二节所载的目的及政策；（二）规定在援华法案第四〇四节（甲）款所批准的对华援助应照1947年10月27日所订立的有关美国对外救济方案的协定暂行办理，但如双方同意可酌予更改；（三）关于为了与中国经济合作而建立的特别代表团双方达成谅解，中国政府保证对于实行援华法案的美国政府代表予以最充分的合

作。”

△ 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关于立法委员选举问题，并推选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

△ 吴铁城、陈立夫分访民社党、青年党负责人徐傅霖、曾琦，就立法委员名额之争执问题进行商谈。

△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蒲立德自美抵上海。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在《华商报》上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否认伪选的声明》，称国民大会授予总统以“戡乱”特权，不过是以此来“满足独裁者‘帝制自为’的大欲”，是为了使反动政权及内战合法化。声明民革对“凡伪国民大会所作的决议及由其产生之政府所签订的对外条约，对内一切立法及行动措施，一概不予承认”。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再接再厉为铲除人民公敌结束卖国独裁政权而奋斗到底”。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关于否认伪国大伪宪法伪总统的紧急声明》，指出：“南京独裁政府，经过这次民选的粉饰，民主伪装，将更盗用民主、民意的名义，来肆行其法西斯独裁的暴政，并骗取美帝的种种援助，以延长中国内战的战祸。”

△ 中国致公党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称：“本党对美蒋勾结，迭次揭发，对民主政治，坚持不懈，故对南京卖国独裁政府强奸民意的行为，如所谓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及其他决议案，一概反对。”

△ 豫东地方团队攻占鹿邑。

△ 陕西国民党军攻占洵阳。

△ 察南国民党军攻占阳原。

△　国共两军在平泉附近展开激战。

△　中原野战军豫西部队攻占陕州。

5月4日　　国民政府特派吴铁城为行宪第一届立法院集会筹备处主任，同时派定“行宪第一届立法院集会筹备处筹备委员会”。

△　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通过设立美援运用委员会案及政务委员会总辞职案。

△　上海150多所大中学校1.5万多名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会上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一些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也参加了该团体。在上海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联络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谴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复活侵略势力和活动。

△　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五四”纪念大会，高喊“教授、职员、工友、学生是一家”的口号，并举办“五四史料展”。

△　南京政治大学一部分教授组织成立“中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学会”。

△　上海市大米每担价涨至450万元。

△　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香港发表声明，表示对“伪行宪国民大会”所选举之“窃国卖国残害人民尤甚于袁世凯、曹锟之总统，尤为深恶痛绝，反对到底”。

△　中原野战军河南部队攻占镇平、内乡、郾城、漯河。

△　中共中央“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发出后，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是日，新加坡10万华侨中120个华侨团体举行会议，原南洋华侨总会

主席陈嘉庚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迅速召开政协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 豫陕鄂解放区军政大学正式开学，陈赓任校长。

△ 新华社报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放无息农贷边币38亿元，其中延属分区13亿元，内三亿元指定用于延安及延属各新收复区。

△ 哈尔滨市“毛泽东青年团”正式成立。

5月5日 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兰州上书蒋介石称，目前大局已经达到最严重的阶段，必须彻底检讨，设法补救。外交方面，“现在政府所执行的对美外交，完全表现一面倒之倾向，结果必至愈陷愈深，不能自拔”。主张“我国对美、苏平时采取美苏并重，战时采取善意中立之态度，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中共，“决非专恃军事力量所能消灭，现在我党党政及军事方面所表现力量，皆属不够之至，坐是一着之错，全局皆输”。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就立法委员分歧问题发表谈话，希望民社党、青年党能与国民党合作，“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但两党发言人均坚决表示，两党如果不能获得三党事先协定之立法委员名额，则绝不出席。

△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

△ 驻华美军顾部团团长巴大维会晤蒋介石，商讨东北军事问题。

△ 美国经济援外总署任命前旧金山市市长兼轮船公司总裁莱普汉为该署驻中国代表团团长。

△ 海军部宣布：英国5000吨巡洋舰“震旦号”及驱逐舰“孟狄浦号”，将于5月19日在朴茨茅斯港移交中国海军，中国之接受舰员现正

在英国受训。“震旦号”由中国接收后将更名为“重庆号”。

△　被迫退让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之马文章等组织成立中国民主协会。

△　来华访问之美国前驻苏联大使蒲立德至南京，蒋介石主持召开接待会。

△　在香港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等致电毛泽东，赞成中共“五一”口号，主张迅速召开新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他们还发出通电，号召国内各界及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　南京4000多名三轮车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资方将租金从每日15万元抬高至25万元并将押金增至400万元的措施。

△　驻青岛美军行凶枪杀中国工人，致三死一伤。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华东局，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牵制国民党军力以歼灭江、淮、河、汉地区的国民党军，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间，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为协同作战，电报还要求粟裕兵团“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

等六个纵队集结打大仗”；“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

△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指挥部林彪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所提之攻打长春三个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二、少数兵力围攻长春，主力到北宁和热河冀东作战；三、对长春以二至四个月较长时间的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并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 人民解放军山西部队猛攻临汾、应县城。

5月6日 截至是日，立法委员报到共227人。

△ 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例会，决议暂准银币流通。

△ 上海市每担米价突破500万元大关。

△ 山东国民党军复占淄川。

△ 中原野战军河南部队攻占淅川。

5月7日 截至是日，首届立法院报到立法委员共370人，“较立法院组织法所定法定集会人数之155人业已超过”。

△ 蒋介石再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退往锦州。卫立煌再派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参谋长赵家骥、第六军军长罗又伦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陈述利害，请示机宜。

△ 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就苏军3月间进入中国唐努乌梁海事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 蒲立德分访财政部长俞鸿钧及新当选之副总统李宗仁，就中国当前的财政金融问题进行商谈。

△　陈纳德在上海招待中外记者，就自己前此赴美出席众议院有关援华法案作证事宜发表谈话：美国国会中人士大部分代表主张对中国予以更大援助，唯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足以证明此次援华能于短期内实现。

△　中国航空公司之“空中霸王XT103号”飞机首次试航日本。11日，该机由日本羽田机场飞返上海。中日首次试航成功。

△　中央信托局之在美国所设第一家保险分处正式成立，地址位于华尔街。

△　801名留日华侨乘“开阳丸号”轮离开日本九州西岸，返回台湾及大陆。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全体人民“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

△　香港工商界人士发表宣言，指责美国政府扶植日本。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总指挥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同意他们前日致中央军委电中所提攻打长春之第三方案，同时指示：“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3月份战绩：歼灭国民党军共16万多人，克复城市57座。

5月8日　　国民政府令免除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高惜

冰、王家桢等本职；特派王家桢、冯庸、王铁汉、范汉杰、郑洞国、赵家骥等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出外邮代电，称："中华民国总统蒋、副总统李，定于三十七年5月20日在首都举行就任典礼。"

△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南京中央训练团主持召开绥靖区政务会议，各绥靖区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等出席，主要讨论绥靖区之政治、经济、地方武力之组训与土地问题等。会期从8日至10日。

△　陈立夫就首届立法院之工作对记者称：此次集会，除同意行政院长人选外，将对现行法规中与宪法精神有违者予以订正，另对据宪法规定所需制订之法规进行制订。

△　行宪后第一届立法院在南京举行开幕礼，就院长人选问题进行讨论。由于立法委员名额问题没有解决，民社党和青年党委员均未出席。为打破僵局，国民党推定张群、王世杰、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雷震七人与两党商洽。

△　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见国民党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员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吴铁城等10多人举行午餐会，就行政院院长和立法院院长人选问题征询意见。蒋介石提名张群为行政院长候选人、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候选人，获得通过，但提名陈立夫为立法院副院长时遭到反对。会上，蒋介石还强调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

△　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就中共中央之"五一"口号，是日起连续召开座谈会。

△　上海市米价每担涨至580万元。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胶济线春季攻势结束，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5万多人，攻占潍县、昌乐等17座城市，国民党军在津浦路以东的山东地区只据有青岛、烟台、临沂等少数几个据点。

5月9日　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和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授予总统以"紧急处分"权。

△　蒋介石任命洪兰友为"戡乱建国"委员会秘书长。

△　由济南东进增援潍县之国民党军败退至周村以西。

△　河南国民党军复攻占许昌、密县城。

△　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同时建立华北军区，由聂荣臻兼任军区司令员，薄一波兼任政委；决定加强中原局，任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建立中原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南下部队刘邓野战军、陈谢野战军正式改番号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兼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七个军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纵队及第三十八军。

5月10日　第一届立法院召开预备会议，截至本日，立法委员报到人数共计480人。

△　廖耀湘等由南京飞返沈阳，向卫立煌汇报称蒋介石同意沈阳方面行动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

△　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包毅德中将乘“伦敦号”舰由香港抵南京，作为期五天之访问。

△　中法两国在南京进行换文，补充前此成立之《中法关于中越间航空线临时协议》，规定双方政府指定之空运组织，均得经营昆明至河内间之商业航运。

△　美国总统杜鲁门咨文国会，要求拨款4.63亿美元，以实践援华法案。在该咨文中，杜氏首次将经济援华计划分作两部分：一、2.78亿美元用作支助维持中国民生经济所必须之输入品；二、6000万美元用以从事中国不受战事影响地方之农村复兴及建筑计划。

△　晋察冀解放军于正太路以北寿阳、盂县间，歼灭阎锡山部第三十四军暂编第四十九师师部及两团之一部，俘其中将副军长张翼，解放寿阳县。

△　中原野战军攻占邓县。

△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东北科学院，是日起在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四平等地开始招考。该院设有农林、理工、医学、教育等系及自然科学研究所。

5月11日　蒋介石召见湖南省国民大会代表赵恒惕等11人，询问湘省情形。赵氏等人向蒋介石提出配发枪弹、增加农工贷款、提前修复湘黔铁路、赶修各边区公路、拨发救济经费、修理洞庭湖、开发南岳、发还田赋附加，以配合中央“戡乱建国”等要求和建议。

△　立法院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讨论拟订院长、副院长互选办法，并推定委员拟订议事规则草案。至本日，立法委员报到共516人。

△　行政院通过姓名使用条例。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梅汝璈由东京飞抵上海。

△　关中绥靖区司令部成立，由第一军军长董钊担任司令，即日开始在咸阳办公。

△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及译员一行共九人由南京飞抵沈阳，会见卫立煌，并视察沈阳、抚顺等地国民党军队。

△　民社党、青年党对立法委员名额问题不作让步，青年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发表声明，指责国民党背弃协商、立法委员由党部少数人决定之做法。

△　上海市米价每担涨至600万元，较年初涨达八倍。

△　豫西地方团队攻占陕州。

△　陕西国民党军攻占栒邑。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杨得志、罗瑞卿率三、四两纵及二纵一个旅共七个旅于14日或15日出发，17日或18日过平绥线，以歼击国民党第十三军为目标，向密云、古北口之线及承德方向进击。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请即令陈、唐率三、八两纵迅速东进，直达汴徐线附近，接受粟裕指挥，协力歼击五军。"

△　中原野战军攻占遂平及临颍。

5月12日　蒋介石在官邸接见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包毅德夫妇及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

△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就新疆问题答记者问时称：伊宁方面坚持片面要求，张本人已复函表示要求伊方履行此前所提出之解决新疆问题的五项办法，同时，张氏还表示，"吾人对新疆问题，坚持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既定政策，实为解决问题之唯一可循之大道，绝对不

容更变。至于省主席问题，待举行省长民选时，即可诉诸全省人民之公意，伊方殊无于此时要求调换主席之理”。

△　外交部将总统、副总统于20日就职消息分电各友邦。

△　宪政督导委员会审查委员在国民大会会堂开会，通过：一、宪政督导委员会组织规程案；二、推定代表25人于次日前往国民政府文官处，商洽成立宪政督导委员会之准备事项。

△　前任瑞士驻中国公使陶伦德调任该国驻英国公使后，该国驻中国公使由叶鼐继任。

△　为时一个月的人民解放军西府、陇东战役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共2.1万余人。

△　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及冀察热辽部队发起冀察热辽战役。

△　察哈尔南部国民党军再度攻占蔚县。

△　陕西国民党军攻占澄县。

△　湖北国民党军攻占枣阳。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禹县。

5月13日　国民政府颁令公布修正《行政院组织法》第三、五、十五条条文，决定行政院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行政、农林、水利、工商、交通、社会、地政、卫生、粮食等部和资源、蒙疆、侨务三委员会及主计部，另设新闻局和会计室。

△　行宪首届立法院召开会议，讨论《立法院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草案》及《立法院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投票及开票办法草案》，规定院长、副院长之选举，采取自由竞选方式，全体立法委员

均为当然之候选人，不用任何方式提名，以得过半数票者当选。

△　前美国驻苏联大使蒲立德在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的陪同下飞至台湾。

△　行政院长张群召集财政负责人俞鸿钧、贝祖贻、徐柏春等人开会，商讨美援物资使用分配办法。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梅汝璈在南京向外交、司法等有关方面报告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审判近况，称："十一国法官正在草拟判决，开脱战犯谣传全属无稽。"

△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一行由沈阳飞返南京。临行前，巴大维向卫立煌答应，美国向东北国民党军提供19个师的装备，以更换东北国民党军的一切旧式武器。

△　南京政府免除陈诚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任命余汉谋为陆军总司令。

△　日侨400多人离开台湾回国。

△　中原野战军攻占西平及荥阳。

5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之《所得税法》第一〇一条条文。

△　蒋介石晚间召见张群、王世杰、陈布雷、雷震、吴铁城、陈立夫、张厉生，希望他们设法早日解决有关民社党、青年党之立委争执问题。会后，雷震夜赴上海，与民、青两党在沪负责人交换意见。

△　《中央日报》报道：本年度中央拨给各省、市基本教育经费共计为8000亿元，教育部奉命商定标准并制出分配表，已获行政院核准，并予公布。

△　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补发100多人代表当选证书。

△　苏北国民党军张雪中部攻占阜宁。

△　国共两军在承德、平泉间激战。

△　朱德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在濮阳休整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干部作《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　中原野战军部队第四次攻占许昌。

△　中原野战军攻占漯河及郾城。

5月15日　国民政府特派刘哲为行宪第一届监察院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　立法院召开第四次预备会议，讨论通过了院长、副院长互选办法。

△　立法院黄宇人、王启江、程思远等一部分委员发表意见书，主张推选傅斯年出任副院长，反对陈立夫。

△　行政院公布施行《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组织规程》，凡17条。

△　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包毅德乘“伦敦号”舰，偕“敏捷号”离开南京，访问上海。

△　美国国务院将其拟定之建议中国政府应采取之八项特别经济办法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该八项办法包括政府收入与开支、内政与军政、重要商品的分配、银行与贷款、农业的改进、对外贸易及其统制、鼓励私人企业等方面内容。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镇平、唐河。

△　中原野战军配合地方人民武装解放登封县城。

△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新路周刊》，发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一文，提出该会在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其他方面共32条政纲，欲图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另组一新党”，“寻求一条新路”，以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

△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罗马举行第五次执委会，会议通过决议，向中国解放区妇女致敬，并推举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蔡畅为国际妇联副主席。19日会议结束。

△　中原野战军皖北部队攻占泗县。

△　西北野战军在鄜县集结。

5月16日　行宪首届监察院集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定李崇实为筹委会秘书长，并决定制定集会临时费概算送国府核定。

△　各地公祭张自忠将军阵亡八周年。

△　江西省民政厅长刘时范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现全赣男女人口共1250.0995万人，又全省现有年满12岁之男女人口共934.0679万人。

△　陈立夫招待立法委员，发表演说，竞选副院长。

△　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闭幕。

△　暹罗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说胡宗南部仍在向北压迫，企图干扰西北野战军休整，因此陈赓应以有力一部攻占卢氏、商南，向雒西、商县行动，调动胡部分兵南移。

△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公布胶济中段战果：共歼灭国民党军

4.5万人。

△　中原野战军攻占湖北光化。

5月17日　　立法院开会投票选举正、副院长，孙科以558票当选院长，陈立夫以343票当选副院长。截至是日，立法委员共637人报到。

△　新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在接见《中央日报》记者时称，今后将恪守宪法，与全体立法委员共图宪政大业之推进。副院长陈立夫亦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团结才能革新，他表示今后之行动，仍当听命于国家之使命与需要。

△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兵团一部，配合晋绥及太岳军区部队解放临汾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十师第三十旅、第二十七旅炮兵营、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及晋南地方武装、晋南师营区司令部以及四个专员公署、14个县政府等共2.5万多人，俘阎锡山部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及临汾最高指挥梁培璜。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　中原解放军在豫西南镇平、淅川、邓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2.1万人，宛西战役结束。

△　由日本回到南京向司法部及外交部报告25名日本甲级战罪嫌疑犯被审讯情形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本日飞返东京。

△　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就美国援华问题进行会谈。

△　驻暹罗新任大使谢保樵离开香港前往曼谷就任。

△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飞往承德视察。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方城。

△　上海同济大学自费生150人因要求公费迄无结果，是日9时起开始绝食抗议。

△　华北解放区召开工商会议，320名代表出席。会议讨论了工商业政策中的公营和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劳资关系、工商业负担、工商业行政工作及纠正土改中侵害工商业的偏向等问题。会议至6月27日结束。

△　中原野战军解放密县。

5月18日　　行政院第五十六次会议通过5月份文武职人员生活补助费分配支给标准，同时还通过张继、陈其美、郝梦龄、柏文蔚、覃振、李家钰等六人之国葬案，呈送国府核定。

△　行政院举行最后一次政务会议，决定由行政院长张群领衔向国民政府提出行政院总辞职书。张群同时还表示，自己无意担任行宪后之行政院长一职。

△　蒋介石召见何应钦，就行宪后新行政院之有关问题进行商谈。

△　行宪后第一届立法院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之立法委员共385人，由新院长孙科主持，讨论立法院议事规则草案。

△　外交部公布：中国政府特派甘乃光为中国驻澳大利亚首任大使。

△　蒲立德在孙立人陪同下由台湾返至南京。

△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建议联合国召集各主要鸦片生产国和消费国家，举行会议制定一项“货物协定”，限制鸦片生产。

△　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官梁华盛。

△　国民党军攻占河南新野。

△　马来西亚槟榔屿71个华侨社团召开会议否认蒋介石当选总统，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慰问，誓作后盾。

△　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击中毛泽东的住房。晚，毛泽东转移至离城南庄20多里的花山村。

△　中共东北军区任命潘朔瑞为嫩江军区副司令员、韩梅村为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师长、马逸飞为吉林军区独立第六师副师长、魏瑛为辽吉军区第五分区副司令员、王家善为辽东军区独立第五师师长。

△　人民解放军攻击平绥路之南口，兵锋所及，迄于北平近郊之清河。

△　中原野战军攻占湖北之老河口。

5月19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词称：“现国民政府行将结束，然国家多难，时局艰危，仍望各位同仁发扬已往合作之精神，努力奋斗，克服目前的困难，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　南京政府颁布《戒严法》，凡13条。

△　新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之李宗仁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职，并称“希望全国上下今后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削平内乱”。

△　国民政府撤销各地行辕。东北行辕之职权与业务归并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北平行辕之职权与业务归并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武汉、西北、重庆、广州各行辕，均改为绥靖公署。

△　新任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正式就职视事。

△　《中央日报》报道：国际粮食紧急委员会本年允中国获得食米44万吨，中国已获得数额中之16万吨，余28万吨将在美国援华计划下输华。

△　上海市“民众自卫总队妇女组训座谈会”决定在该市13个行政区每区编组一中队，对18至45岁之间的妇女进行组训，第一批将先对知识妇女进行组训。

△　古巴驻中国代办玛格丽特·奎塔娜博士抵南京就任，她是各国驻华使节中第一位女外交官。

△　陈纳德否认在中国参加反共战争，称自己从无此项意向，也从未主张美国军队积极参加中国的战事。

△　英国政府正式交付中国政府巡洋舰二艘。

△　国民党军榆林前线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参谋长张之英率部起义。

△　中原野战军解放荆紫关及商南县城。

△　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攻占延庆县城，歼灭国民党军1883人，俘1473人，伤176人。解放军牺牲55人，受伤221人。

△　美国政府公布“特莱伯计划”，旨在通过减少日本战争赔款，达到扶植日本财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之目的。这一计划激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愤怒。

△ 皖北之国民党军攻占泗县。

△ 中原野战军部队逼近湖北沙市、江陵。

△ 晋冀热辽解放军部队攻占滦平。

5月20日 蒋介石、李宗仁在南京分别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国民政府结束，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蒋介石并发表就职演说，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戡平叛乱”。政府长官、立法委员、在京国大代表及各国使节共3000余人出席就职典礼。

△ 行政院公布实行《中华民国境内外人出入居留规则》。

△ 总统府第五局公报室发行第一号《总统府公报》，以之继替前国民政府发行之《国民政府公报》。

△ 立法院通过《议事规则》，同意权问题折衷解决。

△ 由山东抽调的国民党军第九军黄淑部在葫芦岛登陆，归范汉杰指挥。

△ 国民党军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驻锦州。

△ 南京、上海各大学学生举行“五二〇”周年纪念会，并发动抗议美国扶植日本运动。

△ 苏北国民党军攻占沭阳。

△ 晋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察冀解放区正式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华北中央局；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与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两解放区之解放军各为华北军区之一个野战兵团；两边区政府合并成立华北区联合行政委员会。

△　中共嫩江省委发出各级党、政、军统一编制的指示，要求实行统一编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　中原野战军豫西部队攻占卢氏。

5月21日　蒋介石、李宗仁上午10时在南京举行谒中山陵礼，另有文武官员200余人参加典礼。

△　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全体立法委员举行谈话会，提名张群为行政院院长，要求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同意。立法委员投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辞行政院院长提名，离开南京。

△　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见参谋总长顾祝同，就当前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　蒋介石颁令以吴鼎昌为总统府秘书长，薛岳为总统府参军长，二人已遵令先行到府办公。

△　新任陆军总司令余汉谋由其前任顾祝同陪同到部视事。

△　暹罗政府正式宣布任命陈拱巴侯爵为新任驻华大使。

△　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辞职，俞鸿钧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

△　湖北国民党军再占老河口。

△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打出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陈毅，指示津浦线中段作战之部署：刘伯承、邓小平所部钳制国民党第十八军使不能东援；许世友、谭震林部主力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以钳制胶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国民党军不能西援，由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十一纵全力歼灭国民党之第五军。

5月22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面交中国内部改革问题备忘录。

△　苏联新任驻中国大使罗申抵达南京。

△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至锦州及辽西一带视察并督导该地区战事。

△　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10万人签名运动，北平、武汉、成都、昆明等地学生积极响应，举行万人以上的大示威。

△　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宣布罢课三天，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学生。

△　察哈尔南部国民党军攻占延庆。

△　湖北、河南之间国民党军攻占内乡、光化。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转陈毅、粟裕电：“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5月23日　何应钦发表谈话，谢绝行政院长提名，同时向蒋介石面辞，获得允准。

△　驻丹麦公使李骏昨日突发脑溢血，是日病逝任内。

△　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一致通过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并指定在香港的章乃器、孙起孟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取得联系。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许昌、尉氏。

△ 鲁西国民党军攻占平阴、东阿。解放军南渡黄河。

△ 绥远国民党军增援山西北部之应县。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偕驻华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到台湾视察。

△ 威海卫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30多人受伤。

5月24日 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提出“统（一）字第一号”咨文，送达立法院，提名前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获立法院通过。

△ 晚，蒋介石召见翁文灏，指示行政院组成人选之原则。

△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会见外交部长王世杰。

△ 长春守军郑洞国部为保持外围防地并确保飞机场，以新七军两个师出长春以西小合隆和大房身飞机场活动，遭到东北野战军一纵、六纵的攻击。至次日晨，该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第六十一师及保安旅各一部共6000多人遭到解放军部队的歼灭，余部退回长春，解放军部队占领长春西郊之大房身飞机场。通过这次战斗，东北野战军总指挥部认识到原来对长春守军之战斗力下降情况估计过高，长春并不能通过一阵猛攻可下，乃决定改强攻为围困。

△ 国防部兵工署署长杨继曾率中国军事代表团一行六人抵美国，目的“在于解决获得并使用1.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手续问题”。

△ 河南地方团队进占禹县、襄县、郏县、宝丰。

△ 华北人民解放军之一部解放晋北之应县城。

5月25日 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发表施政演说称：“目前一方面实行宪政，同时动员戡乱，必须以公正积极之精神，认真进行各项改

革之工作……尤当注意民生之改进，运用美援，作适当之配合，以减轻经济之危机，人民之疾苦。”同时他还表示要努力增加生产，挽救目前国内危局。

△　驻美大使顾维钧设宴招待赴美访问之中国军事代表团。

△　四川理塘发生七级强烈地震。

△　河南国民党军攻占鄢陵、漯河。

△　晋察冀野战兵团及冀察热辽部队解放隆化县城。

△　为策应粟裕兵团渡江南进，中原野战军分东、西两兵团，分别由陈锡联和陈赓指挥，在南阳东部发起宛东战役。

5月26日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特派张肇元为立法院秘书长。

△　蒋介石令：“依宪法产生之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定于民国三十七年6月5日在首都集会。”

△　蒋介石明令公布施行《主计部组织法》及《宪政督导委员会组织规程》，前者凡25条，后者凡八条。

△　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于宅中召集王世杰、张厉生等10余人，听取他们对组阁之意见。下午，翁又面见蒋介石进行汇报。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本国国务院报告称，中国现政府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且蒋介石仍将继续其个人统治，不愿作根本之政治、经济改革，故亦不能希望他能号召民众，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

△　司徒雷登与巴大维在台湾屏东参观新军训练。

△　河南地方团队进占舞阳。

△　陕西国民党军进占郃阳、澄县。

5月27日　行政院长翁文灏飞至上海，专程访晤何应钦和吴国桢等人，听取对组阁的意见，并与民社、青年两党负责人进行接洽。晚，翁文灏又赴顾孟馀宅，请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

△　蒋介石公布施行《预算法》，凡64条；《决算法》，凡29条；修正《会计法》部分条文。

△　毛泽东离开花山村，乘车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　苏北国民党军进占盐城、阜宁。

△　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发动宛东战役。

△　进攻临汾城的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吕梁军区的解放军部队攻克城垣，全歼国民党军2.5万多人，晋南全境解放。

△　中原野战军再占河南驻马店、确山。

5月28日　行宪后第一届监察院集会开始报到，是日监委共报到42人。

△　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自上海返回南京，面见蒋介石报告其组阁进展情况。

△　雷震至上海，与民社党、青年党负责人士，继续就两党立法委员名额问题及参加新内阁事宜进行商量。

△　苏联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否认苏联将出面调处中国问题。

△　河南国民党军再占荥阳、淮阳、太康。

△　台北市火车失事，乘客100多人死伤。

△　晋察冀野战兵团及冀察热辽部队解放丰宁县城。

△　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每日三次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向国内外广播。

5月29日　翁文灏偕新任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至行政院办理交接手续。

△　行政院公布施行《财政部金融管理局组织规程》，凡15条。

△　中国青年党向翁文灏表示仍参加行政院，但民社党予以拒绝。

△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向北平当局要求撤销特别刑事法庭。

△　河南国民党军进占柘城。

△　陕西国民党军进占龙驹寨。

△　晋察冀野战兵团及冀察热辽部队解放滦平县城。

△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在南阳东之白河、唐河中间地区向国民党军张轸兵团发动攻势。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东野战军许世友、谭震林部于四五月间逐一攻克津浦线上之国民党军据点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邹县、滕县、临城、韩庄七点，然后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之一点。

△　杨得志、罗瑞卿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所拟之冀热察战役之两个方案：一、集中兵力进攻承德；二、出冀东对平谷、平津、津榆线进行广泛攻击。

△　中共淮南、淮北两军区合并成立江淮区党委与江淮军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书记兼政委。江淮区辖运河以西、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总面积共九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建有20多个县政权。至1949年6月撤销，成立皖北军区、区党委。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军区部队在津浦线徐州至胶南段发起兖州战役。

△　晋冀热辽解放军猛攻承德。

5月30日　中央银行宣布外汇采取结汇证明书制度。

△　华北北平、天津、唐山等地12所大专院校及沈阳中正大学来平学生共3000多人，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五卅”纪念大会，会上成立“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表致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电，并致电美国人民，通电全国各界一致行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　中共中央军委电复杨得志、罗瑞卿：“我们觉得攻承德如无把握，似以出冀东较为适宜。”

△　中共中央电示陈士榘、唐亮，即依刘、邓令坚决阻截国民党第十八军，“不使南下增援张轸”。

△　华东野战军许世友、谭震林部收复新泰、泰安及大汶口等地。

5月31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

△　北平中法大学学生为抗议当局逮捕本校一名学生罢课一天。次日，北平八所学校学生为营救中法大学被捕同学，向北平当局请

愿。

△　上海市各大学校长和教授致电美国总统及国务卿，抗议美国政府之扶植日本的政策和计划。

△　热河省国民党军再占滦平。

△　华东野战军解放肥城、泰安，切断国民党军兖州与济南之间的联系。

△　山东西部黄河北岸之解放军部队南渡黄河。

△　解放军攻占萧县，进抵距徐州以西20里之天河寨，津浦路宿县至固镇路段被解放军切断。

△　上海《申报》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在四五月间的三次讲话，指责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行动，说："不幸，中国的学生却被另一暴戾政治宣传歪曲宣传之诱惑，而在参加反美运动。"

是月　蒋介石组织成立总统府，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参军长一人，资政若干；总统府下设六个局，并有机要、侍卫、统计三个室，警卫、军乐两队，文武官员加上工勤人员约有1500多人。

△　国民党CC系立法委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组织成立"革新俱乐部"、政学系立法委员在吴铁城支持下组织成立"民主自由社"、三青团的立法委员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组织成立"新政俱乐部"，立法院内国民党籍的立委们由此分为三大组合。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平地下党先后动员安排吴晗、马彦祥、焦菊隐等知识分子前往解放区泊镇。

△　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兼合江军区政委张闻天调东北局工作，张启龙继任合江省委书记。

6月

6月1日　　蒋介石特任顾孟馀为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为内政部长，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何应钦为国防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王云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左舜生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农林部长，陈启天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工商部长，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长，谷正纲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薛笃弼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水利部长，谢冠生为司法行政部长，李敬斋为地政部长，周贻春为卫生部长，关吉玉为粮食部长，孙越崎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刘维炽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堪为主计部主计长。特任李惟果为行政院秘书长，梁颖文为副秘书长。

△　蒋介石令范汉杰集中力量经营锦州，并加紧准备攻打沈锦线。

△　蒋介石特任白崇禧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任华中“剿匪”总司令。

△　行政院召开首次政务会议，院长翁文灏在会上说明施政方针。

△　立法院第六次会议决定增设美援特种委员会。立委李云良临时提出紧急动议，“请政府迅速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一切助长日本军事及经济力量之行动，并警觉美国特莱伯计划可能造成之严重危机”。并付讨论。

△　原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奉命改组为重庆绥靖公署，仍由朱绍良任主任。

△　青年党发表声明称，该党是否参加行政院须视立法委员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而后定，同时表示不承认所发表之行政院青年党政务委

员及部长名单。

△　新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猛攻大汶口。

△　东北行政委员会为保证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特颁布命令，发放土地执照，宣布土地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犯。

6月2日　　由翁文灏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第一届“行宪内阁”正式宣告组成。

△　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称，政府将有币制改革之计划。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陈立夫辞职，由陈布雷暂代。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辞职，以曾扩情继任。

△　北平、天津、唐山七所院校联合致电蒋介石、翁文灏、朱家骅，要求改善学校的教务条件和师生的待遇。

△　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纪念“六二”反内战日，正午鸣钟一分钟，向在内战中死难的同胞及在反内战中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同学致哀。

△　华北野战军发动冀东攻势。

△　皖北解放军进占泗县。

△　国共两军在南阳白河以东激战。

△　黑龙江省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开幕，大会决定成立省职工总

会，并选出出席全国及东北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提出今后工人运动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开展劳模立功运动。

6月3日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如数核准其政府所提4.63亿美元的援华计划。

△　上海各大学学生三万多人在交通大学举行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威胁中国的示威大会。

△　长春大学代理校长兼教务长张德馨由长春出走抵达哈尔滨，受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哈尔滨文化界的热烈欢迎。

△　华东野战军攻占大汶口及界河。

△　中原野战军收复郾城，次日再克漯河。

△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在宛东战役中共歼灭张轸兵团1.1万多人，其中生俘5300多人。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韦国清、陈丕显、姬鹏飞、粟裕等人，指示：目前苏北兵团应以华中当前的敌情为依据，采取临时分散作战的方针，避开敌人的主力追剿，配合地方武装，疲惫敌人，“取得各个歼灭敌人的胜利”。

6月4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学生反美扶日的爱国运动进行干涉和威胁，声称：“此举对中美间的传统睦谊实有严重的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

△　日本渔船侵入我领海被扣留，搜出大批测量仪器。

△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发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之宣言。

△　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柳亚子、沈雁冰、章

乃器、胡愈之、朱蕴山等125人发表联合声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 中共中央就东北党、政、军机构的设置及分工问题致电东北局、热河分局并各个中央局、各前委：一、同意在东北局常委领导下，设立党、政、军三种分工组织，即东北局办公厅、政府党委会、军委会分会；二、东北局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洛甫、林枫为常委，林彪为书记，罗、高、陈为副书记，高兼秘书长；军委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为副主席；三、林枫、张学思、高崇民仍为东北政委会正、副主席；政委会下设财经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陈兼任政府党委会书记；四、热河分局以黄克诚为书记。

△ 湖北人民解放军收复鄂北随县县城。

△ 华东人民解放军收复沭阳县城。6日，又占阜宁县城。

6月5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称，日本工业水准以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为原则，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之复兴必须有确定保障，同时他还表示深信中美两国均无纵容日本重整军备之意。

△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

△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决议立法委员仍以得票多者当选。

△ 中华民国政府监察院成立，蒋介石出席开幕礼并致词称：“凡宪法赋予贵院之职，自必依法遵行，使之完全行使”，“而奠定国家长治久安之基础。”于右任任监察院长，刘哲为副院长。

△ 蒋介石任命戴季陶为国史馆馆长。

△ 行政院公布施行《行政院议事规则》，凡17条。

△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表谈话，对司徒雷登之书面声明表示赞同。

△　上海学生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拯救民族危机，举行示威游行。当局出动军警、青年军、警备车等到各大学阻拦镇压，并将学生队伍冲散。在这次示威游行中，仅上海美专就有两名学生被特务打成重伤，30多人受轻伤，50多人被捕。

△　上海市政府以“为匪张目，扰乱政府金融政策，煽动学潮、工潮”为词，查封《时代日报》。

△　空军对鲁西及河南南阳附近之人民解放军大举轰炸。

△　国民党军邱清泉部整五军抵山东曹县、单县一带，整七十五师进定陶。

△　侨务委员会开会商讨暹罗当局封闭华侨学校事件。

6月6日　　北平、天津、唐山11所院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抗议司徒雷登的声明，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中国人民和中国学生不是任何恐吓和暴力所能吓倒的”。

△　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人在《华商报》上联合发表《反对美帝扶日宣言》，斥责美国正在“全力支持反动势力，以华制华”，表示“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以自卫答复侵略”。

△　上海学生被当局镇压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北平学生开始罢课。

△　豫南国民党军再占驻马店。

6月7日　美国经济援华代团团长莱普汉抵达上海。

△　华东野战军苏中地区部队发动海（安）泰（县）攻势，至次日，解放姜堰等多处重镇。

△　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通令，撤销辽东办事处，辽宁、安东及辽南三个省、区改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

△　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成立，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该军区隶属于中原军区领导。

6月8日　孙科主持立法院开会讨论征收临时财产税问题，工商业界立法委员多表示反对。

△　北平各大学共400多名教授、讲师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严正驳斥他4日所发表的书面声明。

△　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并抗议司徒雷登之声明，号召各院校学生自即日起罢课两天，并组织学生进行示威游行，遭到北平当局军警的拦截和枪击，五名学生头部被击伤。下午，游行队伍共5000多人回到北大民主广场，召开了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大会，并通过进一步开展反美扶日运动等五项决议。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4月份战绩：歼灭国民党军10万多人。

6月9日　北大、清华、燕京、南开、中法、北洋、朝阳、河北工学院等校学生在北平举行大规模的反美扶日示威游行。当学生行至东华门时，突遭预伏的军警袭击，重伤三人，轻伤10多人。

△　教育部长朱家骅对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发表谈话，强调对日本不采取报复主义。

△　蒋介石委派刘峙为徐州“剿匪”总司令。

△　国民党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开始办公。

6月10日　上海各界人士包达三、张朱绍文、胡厥文、陈叔通、郑振铎等14人联名发表声明，抗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4日发表的对华书面声明。

△　《江淮日报》创刊，新华社江淮分社及所属淮南路东、淮南、前线等三个支社亦开始发稿。

△　华东野战军许世友、谭震林部第七纵队攻占曲阜，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入城前，解放军颁布了保护文物古迹之守则。

6月11日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发表声明，驳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4日发表的声明。同日，广州中山大学等2800多名学生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危害中国的政策。

△　下午3时，上海市各有关机关在市府举行临时经济会议，决定实行粮食等四项管制，以免物资囤积居奇。

△　行政院长翁文灏在立法院报告新内阁施政方针时提出：军事上，最大的目标是加强各战区的实力，培植民众自己的力量；在行政方面做到真正的廉洁和有效的政治；关于财政来源方面，则强调有钱出钱，加强税收，并改革币制。立法委员对其报告感到不满，希望立即拿出具体方针。

△　白崇禧向蒋介石力辞华中“剿匪”总司令职。

△　美国国务院在向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在现在的领导人管理下，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也不是援助可以挽救的，援助期满之日，中国的情况还会和现在同样糟糕，经济援助充其量只不过是白白浪费，而军事援助，则有可能有损美国

的声誉，比不援助还要坏，因为它有可能使美国卷入一场同苏联的冲突。

△　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晋中平原地方人民武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五个旅共六万余人兵力，发起晋中战役。是日，解放军部队先以地方武装之一部围攻孝义以东之高阳镇，阎锡山调其闪击兵团共13个兵团的主力由介休、平遥等地西援。

△　中原野战军进占河南新郑。同日攻克山东鱼台县城。

6月12日　立法院继续就新一届行政院施政方针质询行政院长翁文灏。

△　北平各大学教授、讲师、助教费孝通、袁翰青、吴之椿、许德珩、吴晗等共437人联合发表《为反对美国扶日致司徒雷登书》，列数美国扶日之五大事实，严厉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内战扩大，人民生灵涂炭。并正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之力量，足以击溃任何外来之干涉与压迫”。美国若不改变其扶日政策和违反波茨坦协议的行为，则“必须准备承受行动之结果”。

△　下午5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招待记者，发表谈话称：已电请行政院粮食部尽速从江西等产区运粮30万担来沪。

△　驻美大使顾维钧接到报告说，“因为马歇尔和他的国务院的代表们不同意”，美国对华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拨款“可能有危险”，顾氏急忙与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参议员交涉。布氏在谈到昨日国务院的备忘录时说，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以致美国政府对它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只是一条间接供给中国共产党的途径。”

6月13日　燕京大学学生共230多人拒绝领取美国提供的营养补助，以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

△　华北野战军冀东部队在北宁路唐山至滦县段北侧发动攻势，攻克丰润，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多保安团共约1.24万余人。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攻济南附近之龙山。

6月14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其本国国务院报告称，蒋介石对其已允之由何应钦、巴大维共同指挥作战之建议已食言，仍由其本人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亲自指挥。

△　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决定恢复原定之援华款额。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呼吁“共同为结束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　粮食部长关吉玉由南京赴沪，与吴国桢商谈稳定粮价对策。下午5时多，关在市府举行记者会，分发书面谈话，称：“所有米粮，政府已准备充足。”但物价继续猛涨，米每担突破1000万元。本日宁波发生抢米风潮。

6月15日　行政院长翁文灏继续就行政院的施政方针答复立法院的质询。

△　白崇禧表示不再辞却华中“剿匪”总司令职。

△　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抵达美国华盛顿访问，“考察美国民主体制的实施情况”。

△　中国致公党发表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与任务的文告。

△　重庆市物价狂涨，黑市黄金每两突破9000万元。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蓟县。

△ 豫西国民党军进占卢氏。

△ 《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在石家庄创刊，两个解放区的新华社，合并成立华北区新华社。

△ 华东野战军攻占邹县。

△ 华北野战军冀东部队攻占唐山城北之任各庄及滦县城北之鸡坨。

△ 东北军区在吉林召开野战军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最后决定：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和打援部队训练的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及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守军内部矛盾与恐慌的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主要封锁长春守军空投和防止粮草入城。另外还成立生产救济委员会，有计划地供应群众粮食，改变过去不让群众出城的办法。会议还决定由第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政委萧华指挥新成立的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旅担任围困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把攻打长春改变为“久困长围”的战略。

6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推派王宠惠、张伯苓分别担任司法院和考试院院长。

△ 行政院通过6月份文武职人员待遇标准。

△ 监察院因目前物价飞涨，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

△ 行政院第三次会议通过特派邓锡侯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 四川重庆发生抢米风潮，参加抢米的饥民达5000多人，从晚6时至次晨2时历时八个半小时之久，抢米店70多家，抢米7000多

石。

△　北平印刷工人为要求加薪，一致举行总罢工。

△　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香港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目前的任务，在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

△　冀东国民党军攻占玉田。

△　粟裕、张震是日午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为迫敌分散，求得在运动中歼敌一路，乃以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纵队于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

△　平汉线胡琏兵团进至上蔡城，急行北援开封。受到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阻击。

△　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部攻占陈留。

6月17日　青年党主席曾琦发表谈话，说明该党退出行政院之原委称：立委名额三党早有协定，嗣经国民党和青年党一再协商，由80名减为41名，迄尚无实现之期，并提案联署之30名亦不可得。以具有25年历史之政党，如何能以寥寥数人出席会议，行政院自不便参加，更谈不上考试院、司法院等问题。

△　冀东国民党军重占丰润。

△　昆明各校学生共三万多人举行反美扶日示威游行。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同意他们关于进攻开封的部署。同日，还致电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张震，华东局，中原局，要求山东解放军部队攻击兖州，"调动八十三师、二十五师来援，减轻敌对粟、张方面之压力"。

△　华东野战军为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配合中原野战军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决定于本月中旬起华东野战军七个纵队及中原野战军二个纵队，发起豫东战役。是日，解放军陈唐兵团第三、第八两个纵队开始进攻开封。

△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各解放区应公开响应蒋管区学生反美反蒋运动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大城市中的工人、学生、市民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决议等，支持蒋管区学生的爱国运动。

6月18日　立法院开会讨论平抑物价问题。

△　北平市各大学教授吴晗、朱自清等100多人发表宣言，抗议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

△　孙元良兵团以整第四十一师第一二四旅由郑州向东进援开封，进抵中牟。解放军第九纵队借机迫近郑州。

△　山东国民党军进占章丘。

△　陕北国民党军攻占白水。

△　热河国民党军攻占丰宁。

△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之两个纵队攻入开封城关。

△　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主力向同蒲路介休、平遥段出击。

6月19日　财政部宣布：所遗中央信托局局长一职，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任。

△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决定援华数额为四亿美元。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韦国清、吉洛并告粟裕、张震，华东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苏北兵团趁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第

七十二师外调之机，向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歼敌万人。”

△　中共中央电示粟裕等：从今日起，广播电台将播送对开封的国民党官兵及市民的广播，你们可收录后印成传单，用炮打入城内。

△　为解开封之围，邱清泉兵团进至兰封以南地区，遭到解放军一纵、六纵在内黄、民权一线阻击，至23日，该兵团只前进10多公里。

△　人民解放军攻入开封城内，城内国民党军困守省政府及龙亭。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亲自飞抵开封上空视察，空军对开封城内进行猛烈轰炸。

△　东北野战军冀东部队攻克北平、承德间之铁路重镇石匣镇，歼灭守护部队及保安部队共1825人。

6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攻占开封后的几个政策问题致电粟裕和陈士榘，指示：一、对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自应逮捕；二、对国民党官方银行的存款，除留极小部分作为职员薪金外，其余应全部提用；三、开封是河南文化中心，希望对该地知识分子尽量招收，对河南大学、各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应加意保护。

△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号召响应燕京大学同学拒绝美援运动。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北京大学750余名学生、清华大学100多名学生声明拒绝领取美援平价面粉，以抗议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　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至葫芦岛。

△　驻美大使顾维钧得到报告说，美国国会削减了所有已经核准的对外援助的数额，“结果是按众院的提议中国可以得到总额四亿美元，但期限为12个月而不是15个月。总额中的1.25亿美元的军援数额保持不动，而削减的完全是经济援助计划中的数额”。

△　暹罗警察当局于日前开始搜索华人秘密会社，截至是日，已逮捕华侨60多人。

△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及军区部队开始向东海、灌云、沭阳地区展开扫荡战。

△　中原野战军收复上蔡县城。

△　鲁西国民党军进占曹县。

△　空军开至郑州增援河南作战。

△　国共两军在开封城内展开激烈巷战。

△　郑州孙元良兵团复以整四十五师第一二二旅及整四十七师第一二五旅等部共七个团兵力，向东开进，图援开封，受解放军之九纵阻击，滞于中牟地区。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包围兖州。

6月21日　蒋介石飞往郑州，并往开封上空视察。

△　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任命刘瑶章代何思源为北平市市长，程潜代王东原为湖南省政府主席，陈仪代沈鸿烈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孙渡为热河省政府主席。

△　因顾孟馀不就行政院副院长职，蒋介石特任张厉生充任该职；任彭昭贤继任内政部部长。

△　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至昆明视察。

△　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至营口视察海军。

△　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军区部队在晋中平遥、介休间全歼

阎锡山军第七十二师。至24日，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

△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向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近万人。

6月22日　蒋介石飞抵西安,同胡宗南研讨陕西局势，指示军事改进要点。

△　立法院通过决议，决定接受美国援助。

△　上海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两校学生要求将该两校改为国立。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从17日至是日共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3.9万多人，击毙中将师长李仲辛。蒋介石急调鲁西南黄百韬之整编第五兵团、新组成之区寿年第七兵团和平汉线南段邱清泉之整编第十八兵团三个兵团进行反扑，并出动大量飞机对市区进行轰炸，市民死伤数万人。

6月23日　黎照寰继程孝刚任交通大学校长；张云继王星拱任中山大学校长。

△　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与分会留港理事郭沫若、马叙伦、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千家驹、曾昭伦等19人，发表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声明。

△　安徽合肥连日发生抢米风潮。

△　豫东国民党军进占民权县城。

△　济南国民党军进占万德。

△　人民解放军冀东部队向昌黎、滦县间之北宁路发起进攻，攻占安山、留守营。

6月24日　立法院开会检讨中原战局，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出席报告。

△　监察院对国民党中常会推派之由王宠惠任司法院长、张伯苓任考试院长表示赞同。

△　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与市参议会发生争执，汤氏及警员辞职。

△　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进占中牟、兰封，进逼开封。

△　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26日撤出开封，如敌重占开封，兵力必将分散，则拟以五个纵队进至睢县、杞县、太康之间与民权地区，待机歼灭进入杞县之敌。

△　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主力在平遥、祁县之间歼灭阎锡山军第四十师、第七十二师残部及地方“民卫军”一部。

6月25日　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参谋总长顾祝同、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马步芳、马鸿宾至西安出席。

△　新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自南京抵汉口。

△　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报告军事称：“吾人必须坚定信心，同时接纳一切善言，方能提前消灭共匪。”

△　立法院决定组织“戡乱”将士慰问团。

△　上海物价连续猛涨，黄金每两价达二亿元。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市参议会提出抑平物价办法：清查仓库，严防囤积，禁止非本业贸易。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认为中共中央发表之“五一”口号，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

应遵循的途径”，呼吁在国民党独裁政权控制下的各军事单位、地方政府、各界团体人士响应中共的这一号召，站到民主革命阵营方面来。

△　北平、天津、唐山三市12所院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内河航运权给美国，对外交部长王世杰所谓的“开放内河航运权不妨碍中国主权”的谬论予以严正驳斥，坚决表示，为了反对开放内河航运权，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维护主权的完整，决心促进各阶层的团结，排除万难，不避艰险，共同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

△　无锡饥民五六百人在城外四郊米店抢米5000余石。

△　中共中央军委电复粟裕、陈士榘等，同意撤出开封待机歼敌的部署。

△　粟裕、陈士榘、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称，拟待邱清泉兵团入开封后，以第三、第八纵队分割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联系，以主力发起睢杞战役，歼灭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南。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　华北野战军出击北宁路，连克石门、安山、封台等国民党军据点30多处，歼灭交警第五、第八总队等部共6800多人。从6月2日至是日，华北野战军在冀东攻势中，连续袭取丰润、平古、昌黎等地，歼灭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七师各一部及地方保安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团全部。

△　自是日起，东北野战军正式加紧了对长春的围困工作。

6月26日　监察院以物价狂涨，催请行政院答复本月16日提出之纠正案。

△　中国政府批准《国际小麦协定》，规定五年内中国总进口量

为1360.8万吨。

△　新任副总统李宗仁由南京回到北平。

△　上海市长吴国桢宣布平抑物价四项办法：一、日用必需品的同业公会，在三天之内报告交易情形；二、报告仓库存储物资情形；三、对票据交易所，查清有利用款项囤积者办，挪用公款者办；四、将上海已存有的15万包棉纱，马上配给各厂。

△　江苏无锡、镇江饥民抢米。

△　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由汉口至豫南前线视察。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石门。

△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调至滕县，第八十三师亦由民权车运滕县，准备进援兖州，以解许世友、谭震林之山东兵团对兖州的包围。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指示：为便于了解和决定各重大问题，中原局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峰为常委。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中原军区分作两个兵团，李先念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同意成立中原解放区行政委员会。

△　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西北局以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马文瑞、李井泉为常委，并以习仲勋为书记，马明方为副书记。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5月份战绩：歼灭国民党军13.7万人。

△　攻占开封之人民解放军两个纵队主动撤离，国民党军邱清泉

兵团整五军进占该城。

△　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薄一波联名召集的联席会议在石家庄开会，通过了召开华北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讨论产生统一的华北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的决议。

6月27日　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第五军进占杞县。区寿年第七兵团第七十五师沈澄年部进至睢县。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部队在开封东南地区以一部兵力予以阻击，发起睢杞战役。

△　南京禁售银币。

△　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闭幕，中共华北中央局第二书记薄一波作总结发言。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许世友、谭震林，要求山东兵团暂时“仍应吸引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援兖，该两师不到兖州附近不要解围，以利粟、陈、张行动”。

6月28日　蒋介石自西安经郑州飞返南京。

△　行政院长翁文灏致函监察院，说明稳定物价之措施。

△　北平市九所院校河南籍学生抗议政府派飞机轰炸开封城。北平各大学教授徐炳昶等100多人发表宣言，呼吁停止破坏文化机关及滥炸城市。

△　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职并发表演说称：“今日匪祸猖獗，必须举国上下痛下决心，以剿匪军事为第一，始克有济。”

△　山东大学学生罢课三天，抗议美国扶植日本。

△　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反对政府征收临时财产税。

△　上海军警长官警告投机商人，称必要时将采取直接行动。

△　上海拖船及驳船水手1.2万多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次日，上海码头工也举行声援罢工。资方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7月2日，工人复工。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昌黎。

△　陕西国民党军进占商南。

△　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山西保安副司令及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率两个军及一个总队之兵力由太原南援，企图在祁县以南地区与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主力决战，但被解放军部队迅速插入其侧背之榆次、太谷间广大地区，切断了后路。赵承绶被迫向北突围。

△　自苏北经徐州北上增援兖州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进抵滕县以北。山东兵团即撤围兖州准备打援。因睢杞战场紧急，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转而南下增援睢、杞。7月1日，山东兵团再度包围兖州。

△　中原野战军围困国民党军区寿年之第七兵团沈澄年部于河南睢县、杞县之榆厢铺桃大岗。同时歼灭由津浦路中段来援之黄百韬兵团之一部。由平汉线北援的邱清泉部，被中原野战军主力部队阻击于上蔡以北地区。

6月29日　监察院、立法院召开联席会议，检讨当前物价。

△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至铁岭视察，当日返回沈阳。

△　武汉绥靖公署改为长沙绥靖公署，由程潜任主任；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改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改为徐州“剿匪”司令部，由刘峙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

△　北平师范学院学生2000多人，拟赴南京请愿，要求恢复大学名称。出发时受到北平当局军警拦击，11名学生受伤。

△　美国国务院照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称，军事援助之1.25亿美元即可提取。

6月30日　蒋介石正式任命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　蒋介石接见翁文灏、王云五，讨论改革币制及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

△　邱清泉部第五军自豫东杞县进援在睢县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之区寿年、沈澄年部，国共两军展开激战。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七校学生自治会就昨日北平师范学院请愿学生被军警击伤事发表联合声明，抗议北平当局对学生的迫害。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其本国政府报告称："如果没有持续不懈的美国指点，军事情形不可能改善，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了。然而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不顾其他因素给予支援，其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　为保障粟裕、陈士榘、张震所部之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国民党军吴绍周兵团，并予之以重大杀伤，迫使邱清泉整编第十八兵团向吴绍周兵团靠拢。

是月　东北野战军合围长春。长春市粮价飞涨，高粱米价每斤竟高达三亿元。

△　为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和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4日的声明，声援上海、北平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青岛、福建、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广州、昆明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进行罢课和游

行；上海文艺界人士巴金、周建人、姚雪垠、叶圣陶等13人联名发表《正告美国大使》，表示：“美国扶日政策不变，则中国人民反扶日运动不停”；中国文化工商界人士390人联名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终止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复兴”的运动。同时，上海杂志界、上海妇女界、航业界、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香港九龙各华侨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抗议或宣言，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　留香港妇女界人士何香凝、刘王立明、于立群、沈粹缜等232人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

△　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刘澜波为安东省政府主席。

△　驻守长春之滇军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收到潘朔端所致劝其弃暗投明之信函。陇耀表示要走潘朔端的路，并相机进行曾泽生、卢浚泉的工作。

△　海南岛琼崖纵队解放白山、保亭、乐东等县城，初步巩固了五指山根据地。

△　各地物价狂涨。8日，上海大米每担价格涨至800万元，为年初之八倍。9日，黑市美金每元涨至160万元，黄金每两涨达8000万元。14日，上海黑市美元涨至190万元，15日又涨至210万元，黄金每两涨达1.01亿元，半个月内法币贬值100％。15日，大米批发价为每担1100万元，16日，肥皂、香烟等均在一天之内上涨40％。同时，电气、自来水、电力、电话等公用事业也开始涨价，涨幅达27％至35％。15日，电车、汽车、轮渡等交通事业也开始涨价；20日，北平兵船粉每袋价格涨至820万元，小站稻每斤为26万元，玉米面每斤为12万元；26日，天津兵船粉每袋1600万元，大米每斤36万元，小米每斤25万元，玉米面每斤17万元。

△　自1947年7月1日至本月底，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内，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94个旅（内50个整旅），加以非正规军共达152万多人，收复与解放土地面积共15.5万平方公里，收复与解放城市共164座，解放人口3700万。解放区面积恢复至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解放区人口增至1.68亿，占当时全国人口（4.75亿）的35.3%；解放区城市增至586座，占全国城市总数（2009座）的29%。国民党军队总数减至365万，人民解放军总数增至280万。

7月

7月1日　　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该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同时成立，沈熙瑞任秘书长。当晚，委员严家淦由沪至南京，报告美国史蒂尔曼调查团赴粤、湘、鄂、台各省考察经过。是日，美国经济援华团团长莱普汉亦由沪赴宁。

△　为统一华中“剿共”军事，国防部将九江指挥部及武汉行辕编并，成立华中“剿匪”总部于汉口，由白崇禧出任总司令，夏威、张轸、徐祖贻任副总司令，下辖第六（商丘）、第五（信阳）、第八（蚌埠）、第十三（南阳）、第十六（咸宁）等绥靖区，以及鄂西绥署（旋扩编为鄂西绥靖司令部）。并将所辖机动部队先后编成第三、第十二、第十四兵团。

△　蒋介石特派外交部长王世杰为议订中美关于美国援华双边协定全权代表。

△　司法院长王宠惠、北平市长刘瑶章正式就职。

△　为解救区寿年兵团，豫东邱清泉兵团全力东援，占领陈留、杞县后，继续向聂庄、桃林岗、李岗等地猛攻，遭到华东野战军第三、四、十纵队顽强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　黄百韬兵团（下辖整编第二十五师、第三快速纵队和交警第二总队）从商丘增援在杞、睢地区被围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抵达帝丘店地区。

△　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继续向杞县、睢县间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发动猛烈进攻，在陈小楼地区歼灭新二十一旅。

△　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在平汉线西平地区阻击由南阳北援的国民党军吴绍周兵团。

△　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和鲁中军区部队再度包围山东兖州，守军第十绥靖区指挥之整编第十二师所属部队及保安团，共10个团2.5万余人陷入包围。

△　解放军冀中军区部队再克天津附近之胜芳镇。

△　华北野战军徐向前部破击山西榆次、太谷段铁路，并向太谷发起攻击。

△　皖北人民解放军攻占蒙城。

△　昆明学生数队在街头宣传演说，反对美国扶日，被军警包围，捕去20余人，昆明宣布临时戒严。

△　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宣布，美国军事顾问团一小组，于是日在保灵上校率领下赴广州，开始整编与训练三个中国师的咨询工作。

△　美国送给中国政府之扫雷舰四艘，由菲律宾开抵高雄。

7月2日　　蒋介石飞徐州指示作战机宜，布置豫东黄泛区军事计划。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亦飞往视察。

△　蒋介石令派张鸿钧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

会议代表。

△　立法院举行会议，讨论下半年总预算和物价上涨情形及其对策，行政院长翁文灏到会报告，谓政府平抑物价有具体办法，对稳定物价甚表乐观。

△　监察院第十六次会议通过议案，决咨请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该院所提出的法律案问题案。

△　翁文灏函促青年党籍农林部长左舜生、工商部长陈启天就职。

△　社会部长谷正纲自南京飞抵开封，办理因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开封市民伤亡损失之赈济与宣慰工作。4日，转赴郑州，出席各界救济会议并听取关于河南现状之报告。6日，离郑返宁。

△　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市长吴国桢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以下稳定物价之措施：一、建议南京，除中央银行外，禁止其他商业银行办理申汇；二、规定旅客来沪携带现钞，不得超过二亿，超过之款，强制存入中央银行；三、实行粮食全面配给；四、取缔证券黑市交易，密查投机操纵分子，予以严惩。

△　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调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　中原野战军发起老（河口）襄（樊）战役。是日，第六纵队自新野地区进抵老河口，国民党军于当日下午向谷城撤退。

△　华东野战军攻占杞县龙王店，歼灭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兵团司令区寿年、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被俘。

△　黄百韬兵团继续向解放军马口、楚寨、柴寨等阵地进攻。

△　济南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四师、第二师由吴文化指挥，开始

南下增援兖州。

△ 阎锡山派第三十三军增援太谷。

△ 津浦路之浦口、浦镇两地铁路工人5000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及补发所欠津贴，举行两天罢工和怠工，迫使当局签字接受。

7月3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协定》规定：美国援华四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种赠予1.25亿美元；美国对于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有最高监督权和决定权，在中国执行监督的美国人员均享有“治外法权”待遇；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任何战略物资；民国政府承允改善对外商务关系，接待美国代表团并协助其执行任务；一切执行细节须中美双方代表协议，美方保留随时停止援助之权。

△ 吴铁城、陈布雷发表书面谈话，切望民、青两党参加行政院，谓“三党在抗战制宪时期，精诚团结，具有悠长之历史，今日更为吾人贯彻初旨，为国效命之时”。

△ 蒋经国抵沪，访晤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传达蒋介石关于稳定上海物价之指示。

△ 太谷阎锡山军在赵承绶指挥下沿铁路北向发动猛攻，与华北野战军徐向前部展开激战。

△ 山东国民党军进占肥城。

△ 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各一部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激战竟日，攻占田花园、何庄、柴寨、李辛庄等地，将该兵团压缩于帝丘店地区及其周围十余村庄，使之未能与相距不足五公里的整七十二师会合。

△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发起涟水、众兴战役。是日，第十一纵

队开始围攻涟水。

△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进抵鄂北谷城，国民党守军第一六三旅弃谷城南逃，被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截歼其一个团又一个营。

△　山东兖州围城之解放军攻占新乔、赵家村、豆腐店等外围阵地。

△　中共中央发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党的重大任务，应大规模地举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对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对原有的学校，要维持其存在并加以改良，防止知识分子被国民党争取过去。

△　新华社报道，长春、沈阳、北平、天津、青岛、南京、汉口、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大中城市的工业资本和社会游资大量南移香港、广州及上海，仅北平一地，6月份第二周涌入上海的游资每日即达一万亿元，4月16、17两日逃往广州的游资即达五六千亿元。

△　上海米价涨至每担2600万元，较上月上涨200万元，为抗战前的260万倍。

7月4日　　行政院长翁文灏谒见蒋介石，报告有关管制物价等各项重要问题。

△　立法委员200余人组织“革新俱乐部”。该组织发言人称，俱乐部之宗旨，乃在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团结进步分子，共同促进政治之革新及民主宪政之实现。

△　青年党举行中常会，会后由王师曾发表声明，称该党决议继续参加立法、行政两院。6日，左舜生、陈启天分别就任农林和工商部长。

△　外交次长叶公超发表谈话，希望早日达成对日和约。

△　至是日晨，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全歼榆厢铺等地整七十五师残部。

△　察南国民党军再占延庆。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遵化。

7月5日　　白崇禧在汉口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报告，阐述总体战之意义，谓："总体战必须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紧密配合"，"惟有实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彻底改革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土地有合理的分配，同时实施'将士授田'办法，而后始能掌握全体民众，'剿匪'才有光明前途。"

△　傅作义在河北省参议会讲演，称要贯彻总动员，爱民保政，实施精神动员，造成军政民整体作风。

△　新疆访问团暨西藏班禅堪布会议代表团谒见蒋介石。

△　流亡北平的东北大、中学生数千名举行游行，在东交民巷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住宅前集会，抗议北平市参议会通过"征招全部东北（流亡）学生当兵"的议案。警察局长白世雄指挥军警开枪镇压，伤学生100余人，死18人，逮捕37人，造成"七五"惨案。

△　华北及东北18所大学的河南同学会在北平举行"哀悼开封10万冤魂控诉大会"，到会教授、学生及平、津、唐13校学生自治会代表，一致谴责国民党飞机轰炸开封、屠杀人民的罪行。

△　华东野战军为加强进攻力量，调第八纵队参战，对豫东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战至次日，攻克王老集、孙庄等地，歼敌三个团；因黄兵团及时收缩，据帝丘店地区顽抗，未能将其分割围歼。

△　中原野战军攻占鄂北谷城，并围攻樊城。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6月份战绩：共歼国民党军15万人，解放县城22座。

△　豫南国民党军胡琏、吴绍周兵团全力北进，进占周家口、商水。

△　由津浦路南下之山东国民党军进占泰安县城。

△　四川省拟定实行保甲组训方案，规定每甲出三个壮丁，全川59万余甲可组训民兵170余万。

△　南京市私立小学教师代表向参议会请愿，要求保障职业和维持生活。

△　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安徽大学校长陶因被免职。

△　中央大学教授、文学家乔曾劬（大壮）在苏州投河自杀。

7月6日　　傅作义为北平惨案发表声明，称对东北流亡学生生活寄以同情，希望事态勿再扩大，防止暴乱行动。

△　为制止囤积居奇，以稳定米价，上海当局出动数千人检查全市各粮食仓库，发现未呈报物资即予没收。

△　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抵加拿大渥太华，拜会总督亚历山大，并称“吾人在抗战多年后，犹致力反共，全系因笃信孙中山先生遗教使然”。次日，陈氏离加赴纽约。

△　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在豫东主动撤出战斗，分别向睢县、杞县以南及鲁西南转移。睢杞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整七十五师及新二十一旅，共约12个团，毙、伤、俘敌共四万余人，解放军伤亡2.1万余人。至此，豫东战役结束。

△　中原解放军袭占南漳县城并包围襄阳。是夜，开始攻击城外制高点虎头山、铁帽山等地。

△　华东野战军十一纵攻克涟水，将守军整四十四师第一六二旅大部歼灭；部分逃跑敌军，为第十二纵队在野外歼灭。

△　华北野战军击退太谷阎军进攻，歼敌千余。

△　昆明各界人士及耆绅秦光玉等180余人，上书卢汉及何绍周，请求释放因举行反美扶日运动而被捕的学生。8日，昆明各大、中学教职员171人向社会人士呼吁，请求军警当局停止逮捕、殴打学生及包围学校行为。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务卿报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南京政府的威信和权力“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鉴于蒋介石不能以其权力改善时局，“地方军政长官被迫考虑区域谅解或组织区域政治结合以应付南京政府失败或权力崩溃的局面”。“现在尚不能预计什么事件会使总统与任何可能的区域领袖间发生分裂”。

△　东北各大、中学校组织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北平八院校成立“七五”惨案后援会，并通电世界学联及全国学联抗议法西斯屠杀学生暴行。

7月7日　　民国政府定是日为陆军节，国防部长何应钦对全体官兵致词，勉励发扬八年抗战的光荣历史，“保证建国必成”。

△　行政院举行第六次会议，拟订调剂民食办法，决定疏导粮源，平抑粮价，以免青黄不接期间发生粮食恐慌。

△　国共两军在豫东黄泛区200华里地域内大会战，战况空前激烈，持续九昼夜。迄本日晨，刻告结束，国民党军称大捷。

△　晋中前线徐向前部将阎军赵承绶集团（第三十三军、第三十

四军）包围于大常镇地区。第八纵队攻克祁县城，全歼第十九军暂编第三十七师大部及保警队全部；吕梁军区部队解放交城县城。

△　北大、清华、燕大等八院校学生代表向李宗仁请愿，提出包括追究“七五”惨案制造者责任和妥善处理死伤学生后事在内的五项要求。

△　中国民主同盟为纪念“七七”十一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用更强大的爱国运动，更普遍的反法西斯独裁的民主运动，来纪念今年的‘七七’吧！”

△　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本会愿本素志，追随全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之后，为展开新政协运动和反美扶日运动而加倍努力。”

△　上海公用局200多员工向社会局请愿，反对无理解雇。次日，又赴市政府请愿，公共汽车停驶，全市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

7月8日　　蒋介石任命董钊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原任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祝绍周免去本兼各职。

△　内政部勒令《新民报》南京版“永久停刊”。该部发言人称：“该报屡次刊登为匪宣传文字，散布谣言，煽惑人心，近更变本加厉，谎报事实，污蔑国军，妨害戡乱军事”云云。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兖州战役。是日开始攻城作业，以第七纵队肃清西关，第十三纵队进攻南关。

△　山东国民党军进占平阴。

7月9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由谷正鼎代理中央组织部长，黄少谷代理宣传部长。

△　北平学生万余人为“七五”事件向副总统李宗仁请愿，要求惩治凶手及赔偿损失等，最后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七五”血案追悼控诉大会。

△　李宗仁对外国记者称：目前华北局势与三个月前大致相同，对救济特捐不无影响。政府已决定追加各区捐额：上海区已追加三万亿，连前配额共8.5万亿；汉口区追加1500亿，连前配额共3500亿。

△　上海当局为稳定物价，制订《仓库检查实施办法》。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召集会议，检讨上海平抑物价工作，并宣布已列出上海奸商名单，将呈南京核示。

△　西藏商务代表团赴华盛顿。

△　中原解放军攻克樊城，并攻占襄阳城外真武山、铁帽山等阵地。康泽急令樊城国民党军退守襄阳。

△　华东解放军完成对众兴（今泗阳）的包围，并发起攻击，扫荡该城外围据点和地堡。

△　晋中前线解放军攻克清源县城。

△　粤南人民武装攻入广州湾湛江市。

△　交通部令各铁路客、货运费即日起同时涨价，计客运涨90％，货运涨150％。

7月10日　蒋介石宴请先后就职的五院院长孙科、翁文灏、于右任、王宠惠、张伯苓等。

△　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进截陈毅部归路，“予以一网打尽”。

△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由汉口飞蚌埠，主持第八绥靖区绥靖会议。

△　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以作战不力（奉命率部救援潍县，贻误战机），被扣押至南京枪决。

△　上海物价又起波动，突破过去数日之暂时平稳局面，米市市场交易趋于停顿，大米价格涨至每石2700万元左右。

△　上海《世界知识》、《观察》等16家周刊决定停刊半月，以抗议航邮加价。

△　中原解放军集中攻击襄阳，占领东关护城堤，作为攻城出发阵地。

△　晋中前线徐向前部在榆次、太谷间完成对阎军赵承绶部的包围，开始对大常镇发起总攻击，是日解放徐沟县城。

△　北平至山海关铁路修复通车。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宣称：迄今援华数额共2788万美元，其中214万元购买小麦和麦粉，1162万元购买食米，1300万元购买棉花，其余112万元为航运费用。

7月上旬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为挽救“战局危机”，进行全面部署。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以便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的坚固阵地实行坚守防御，同时组织强大兵团进行机动作战，企图转攻为守，扭转败局。并决定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在大后方加强二线兵团的编组训练。为了集中兵力确保华中，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决定保持三角（即徐州、汉口、西安）、四边（即陇海路、兖州以南之津浦路、郑州以南之平汉路、宝鸡至成都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商丘、南阳、襄樊、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东西呼应，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

7月11日　　“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举行第一次会

议，孙科任主席。蒋介石致电该委员会称：“军事通行，仍有待于政治之相互为用。为特延揽全国英彦，组设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集中意志，合理进行。”孙科向记者透露，外间人士对该委员会印象甚坏，“认为是政治性安插人事的机构，安插那些落选的立委监委”。还说：“戡委”现在数目为990余人，将来还要加聘到三四千人。

△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与驻印度武官杜武由沪到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华北局势及军事部署。

△　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校教授404人联合宣言，抗议“七五”事件，要求追究责任，安葬死者，医疗伤者，释放被捕学生，从速救济东北流亡学生。

△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于是日13时发起总攻，至17时攻克众兴（泗阳），歼灭国民党军3000人。随即沿徐（州）宿（迁）公路向宿迁进击。

△　晋中前线解放军攻克平遥县城。

△　济南国民党军南下增援兖州，进展缓慢，是日方抵泰安。

△　豫东国民党军进占考城。

△　香港教育文化界59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暹罗政府于5月5日发布禁止华侨学校命令，以及近来封闭华侨学校与逮捕华人之残暴行为。

7月12日　蒋介石特任田炯锦为考选部长，沈鸿烈为铨叙部长，谢瀛洲为最高法院院长。

△　上海市政府邀请市各有关机关代表、商业公会代表，举行检查仓库检讨会议，修正实施要点并分区调查，举办贫民配米。市长吴国桢主持会议，出席者40多单位、50多人。上海《大公报》并报吴氏

昨曾电请行政院彻查无锡屯粮和仓库。

△　北平军警对北大、清华及燕京大学加紧监视和控制，清华及燕京各有一名学生失踪，清华助教夏翔被殴伤。

△　沈阳学生为抗议“七五”事件举行大游行。

△　包围兖州的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突破兖州瓮门一线城防，先头部队登城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歼敌大部。

△　晋中前线徐向前部第八、第十三纵队在榆次西南大常、南庄歼灭阎军第三十四军军部、第七十三师、暂编第四十四师全部及暂编第十总队大部共6000余人。

△　苏北国民党军孙良诚部放弃宿迁，向睢宁逃窜。

△　济南国民党军进占大汶口及定陶。

△　河南国民党军队进占镇平。

△　立法院通过邮资加价案，规定邮资一律增加两倍以上，平信由5000元增为1.5万元。

△　台湾省参议会通过实施地方自治，速行省、市长民选，切实保障人权与言论自由等提案。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在香港正式成立，负责人为谢雪红（女）、杨克煌、苏新等。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经济顾问派克一行赴华北、东北视察，并与傅作义商讨华北经济建设问题。

△　司徒雷登向美国务卿报告，说目前街谈巷议的是普遍怀疑南京政府的继续存在，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其重要性正日益缩

小，这已是确凿不移的估计了”。并提出，“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　加拿大贸易部长贺威对记者称：加拿大政府同意以小型武器和军火输往中国，俾以“阻止共军”。

△　美国派特别探测队赴新疆探铀。

7月13日　民国政府立法院三读通过《监察法》。

△　教育部首席参事刘英士抵昆明，与云南当局商讨解决昆明学潮问题。

△　民社党发表声明，说明该党立法委员出席立法院之原因和经过，并称将以少数党和在野党之地位，对国民党“尽其在会议中协助与监督之责”。

△　中原野战军攻占襄阳西关铁佛寺和同济医院。

△　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兖州。战至下午4时，守军残部分路突围，为解放军全歼。兖州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共歼国民党军3.7万余人，俘整编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副军长熊仁荣等，第十绥靖区司令李玉堂化装逃跑。

△　济南南下国民党军援军得知兖州失守，立即北返，在汶河以南受到华东野战军的堵截。

△　晋中前线解放军攻克太谷县城。

△　广东人民武装袭击九龙附近。

7月14日　监察院同意蒋介石提出之大法官江庸、燕树棠、黄右昌、郗朝俊、张式彝、李伯申、胡伯岳、洪文澜、张于浔、林彬、刘克儁、沈家彝12人，史尚宽等五人未获同意。

△　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抵南京谒见蒋介石，商讨有关接济太原之军事、粮食与补给问题，旋即返回太原。

△　傅作义飞抵太原晤阎锡山，即返北平。

△　国防部长何应钦代表民国政府对美海军顾问团及美驻华海军武官颁发勋章。

△　行政院会议通过议案，决定将财政部之货物税署及直接税署合并为国税署，原货物税署署长姜书阁充任该署署长。

△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沿宿（迁）睢（宁）公路追击国民党军孙良诚部，于是日包围睢宁，并开始攻城。

△　晋中前线吕梁军区部队与第八纵队一部在太原、交城之间，歼灭阎军第四十三军军部、第七十师等部共8000余人，先后解放介休、孝义、汾阳、文水等县城。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计划的指示》，预言解放战争大约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根本取得全国胜利。指出要遵循和实现毛泽东“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主要取之于敌”的战略方针。基于上述意图，规定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是：南线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中原、华野共歼敌30个旅，使敌人逐渐失去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华东战场，山东兵团攻占济南，并南下机动，连同苏北兵团可歼敌20个旅。西北战场，每月歼敌一个整旅。北线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三兵团攻占除平、津、沈以外的各大据点，华北第一兵团配合晋绥部队攻占太原，然后明春第一兵团南下，晋绥部队调至山西战场归建。北线我军一年内可歼敌50个旅上下，使敌人将不能挽救其颓势，而我军则可开辟第四年南进发展的宽广道路，打通东北与华北，并发展西北、中原，并打开建立全国性的联合政府的局面。

△　内政部人口局公布全国保甲户口数字。全国计有4.8165万个乡镇，5.9480万个保，630.214万个甲，8728.3513万户，人口总数为4.63493418亿人。

7月15日　　蒋介石电各省、市政府主席、市长，勉励加强“剿匪戡乱”工作，趁此豫东胜利之机，加倍振奋，力求政治上之有效改进，扫除积习，脚踏实地，以赴事功。

△　监察院同意蒋介石提出之考试院考试委员陈逸松等10人；江庸、燕树棠等12人任大法官。

△　前行政院长张群夫妇由宁抵沪，旋赴昆明。18日，抵昆明，对外宣称此行乃应云南省主席卢汉邀请，将在滇逗留10天。

△　东北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进占辽阳。

△　昆明当局派出大批宪警强行进占云南大学、南菁中学，当场逮捕学生300余人，死伤100余人，造成昆明大血案。

△　陈立夫与顾维钧同访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讨论执行1.6亿美元军事援华之计划。

△　中原解放军对襄阳发起总攻，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佯攻南门，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和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从东北、东南两角攻城，中野六纵进攻西门。

△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汶河以南地区阻截国民党军整八十四师和整二师，歼敌7580余人。至此，历时45天的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共歼敌6.3万余人，攻占兖州、泰安等城镇12座，控制了徐州、济南间铁路线700余里，完全孤立了济南。

△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主动撤出战斗，向宿迁以南地区转移。涟水、众兴战役结束，共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攻克涟水、众兴、宿

迁等城。

△　为减轻冀东负担，配合东北作战，华北野战军杨成武部在冀中地区发起保北战役。是日第二纵队攻击涞水城，全歼国民党军新二军暂三十一师所属一个营。第七纵队与冀中军区部队攻克新城，歼守军200余人。

7月16日　孙科主持立法院会议，否决保障人权案。

△　中原野战军攻克襄阳，全歼守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被俘。至此，老襄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镇。

△　晋中前线徐向前部在榆次西南小常镇，全歼阎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第三十三军军部、第七十一师及暂编第四十六师共三万余人，第七集团军司令赵承绶被俘。

△　山东人民解放军再克泰安。

7月17日　蒋介石公布《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及换文。

△　蒋介石公布《监察法》，凡六章30条。

△　首批国民党军援军空运抵达太原。

△　华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攻克冀中定兴，歼灭国民党军暂第三十一师师部及二个营，师长陈治平被俘。

△　晋中解放军逼近太原郊区，攻克鸣李车站，切断榆并段铁路，并包围榆次、晋源（即太原县城）。

△　山西介休“民卫军”副司令郭竞武率部千余人起义，参加解放军。

△　暹罗政府经联合国照会并与中国政府驻暹罗大使数度商谈后，已准华侨学校立案，获准立案学校已达419所。

7月18日　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宣布，自即日起增加发行关金券一万、2.5万、五万及25万元等四种新的大面额钞票（每元合法币四元），物价猛涨。

△　部分国大代表在南京对记者发表声明，援引宪法，要求与立委、监委同等待遇。

△　沈阳各界“七五”血案慰问团抵北平。

△　冀东人民解放军向天津西北地区发起攻势，是日由遵化出发奔袭香河。

△　徐向前部收复晋中榆次，国民党军弃城北逃。

△　华北野战军七纵攻克冀中高碑店，歼守护第八团大部；又攻克固城，全歼守军暂三十一师一个营。

△　中原解放军部队在河南南召县西南地区截击国民党军暂编第九师第七十六旅一部，歼敌2100余人。

△　河南国民党军进占漯河、郾城。

7月19日　国民党中央社报道，盟军东京总部已批准中国银行、中国航空公司、招商局、中央社等在日本营业。

△　华北野战军杨成武部攻克冀中北河、大沟，并在长沟附近阻击由北平南下增援保北之国民党军，双方激战竟日。第二纵队攻克徐水，全歼暂三十一师第三团。

△　山西解放军徐向前部进占晋源，国民党军弃城逃跑被歼。

△　苏北国民党军进占泗阳。

△　陕西国民党军进占栒邑。

△　中共中央致电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等，庆贺晋中战役的胜利，指出："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

7月20日　蒋介石电召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到南京，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兼指挥所主任。

△　立法院特别委员会讨论物价问题，认为物价狂涨原因，是因人民对法币失去信仰，必须改革币制。

△　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乘军舰抵达武汉，24日抵长沙就任。

△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决定成立参战委员会，动员全体党工干部参加太原保卫战。

△　由北平南下之国民党军进至冀中高碑店。同时，保北地区阴雨连绵，河水暴涨，军事行动遂告停止，保北战役结束。是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解放军伤亡4100余人。

△　中原野战军部队向津浦路徐（州）宿（县）段发起破击战，连克李庄、曹村、夹沟等车站，并控制宿县至符离集南50公里路段。

△　冀东解放军攻克香河，全歼守敌保安团千余人。

△　解放军徐向前部收复晋中忻县，国民党军弃城南窜。

7月21日　立法院决议撤销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退还《戡乱建国委员会预算案》，不予审议。

△　民国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熊式辉自南京到北平，晤李宗仁、傅作义。

△　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由南京飞返沈阳。

△　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辞职，蒋介石任命周鸿经接任；并任命龚学遂为青岛市市长，赵惜梦为大连市市长。

△　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晋中国民党军纷纷弃城逃跑。解放军在忻南小豆罗地区截击逃敌，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军暂编第三十九师。晋中战役历时36天，至此结束。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7.467万余人，非正规军三万人，解放军伤亡1.7万余人；解放了灵石、太谷、汾阳等14座县城，太原已成为孤城。

△　新华社揭露蒋介石准备在各个前线施放毒气的计划，并痛斥自1948年2月以来，国民党军在沈阳附近、苏北益林、临汾、兖州、襄阳等战斗中施放毒气的罪行。

△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许建业在重庆大坪被当局杀害。

7月22日　　蒋介石偕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考试院副院长贾景德、参谋次长刘斐、军务局局长俞济时飞往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并召见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及各军、师、旅、团、营长，继又召见各级党政官员，要其与军方精诚合作，坚定信心，达成消灭“共匪”之使命。

△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由武汉飞赴豫南前线视察，指示“剿共”作战机宜。

△　立法院同意林云陔为审计长。

△　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康泽在襄阳战役

中“殉难”。

△　鲁西国民党军进占巨野。

△　津东解放军奔袭武清，再克三河，歼敌2000余人。

7月23日　　立法院通过民国三十七年度下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收入、支出为3236215亿余元，8月13日正式公布。

△　国民大会代表300余人愤立法院退还《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待遇案》，召开“留京代表大会”，定明年元旦召集国民大会，修改宪法，并宣布立委违宪事实。

△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对甘肃省参议会致词中，强调土地改革为当前要务。

△　蒋介石电令傅作义，指示由大同空运一师增援太原；又电令王叔铭，令集中B—24轰炸机，连日轰炸太原附近汾河以西地区。

△　平、津间恢复通车。

△　沈阳民众“七五”血案后援会决定8月1日举行罢市、罢工、罢教、罢课、罢公，以示抗议。

△　台湾省地方自治协会成立，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出席成立大会。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西进兵团开赴绥远作战的指示，命令杨成武部立即组织西进兵团（共三个纵队七个旅），由杨成武任兵团司令兼政治委员，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

△　长江大水，安庆沿江地区被淹。

7月24日　　立法院第一届会期结束，此届会期内之重大决议案为

通过翁文灏任行政院长及其施政方案，并通过本年下半年度总预算案和特别预算案。第二届会期预定于9月上旬开始。

△　行政院核定美国在华的经济合作组织正式中文名称为“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

△　行政院公布《侨资及国人在外资金投资国内生产事业申请输入办法》。

△　行政院长翁文灏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宣称：“训政时代正式结束。”在实行宪政之初，政府“必须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以担负我们戡乱建国的神圣任务”，并谓“政府决定实施粮食征实征借办法”。

△　李宗仁对所谓“和谈”进行辟谣，谓：“任何人相信和谣都是无道理的，现在并无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　加拿大合作联盟反对美以军火援助蒋介石政府。

7月25日　　蒋介石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立法及监察委员，谓“三个月来经济、军事根本上无变化。物价虽然上涨，而法币基金并未减少。军队偶有挫失，而新生力量正在长成。其所以形成人心不安，社会动荡如今日者，乃因若干人不明真象，受共匪宣传之影响，致失去信心之故”。

△　被国民党中央剔除的立法委员签署候选人冉仲虎、郭湘、罗承烈等在成都成立“被非法剔除立委签署候选人护宪会”，并发表宣言，谓彼等之目的“在根本否认违法选出之立法委员，并主张严惩办理选举违法之人员，争民权，护宪法，以湔涤民主宪政史上空前之污点”。

△　河北国民党军进占固城。

△　香港权威经济杂志《远东经济评论》称：香港已成为内地游

资充斥之地，据估计，香港华人存款之总额约为15亿港币，合美金3.5亿元。

7月26日　白崇禧奉蒋介石电召，自汉口到南京，向蒋报告华中局势。

△　蒋介石偕宋美龄离南京，抵杭州转赴莫干山避暑。

△　阎锡山电山西旅京同乡会，称“决与太原共存亡”。

△　美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在天津向记者发表谈话，谓美援未忽视华北。

△　中共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方抢救黄河险段。

△　原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与原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8月24日，在石家庄正式举行成立典礼。

7月27日　蒋介石在莫干山接见陈仪、汤恩伯。

△　张群在昆明发表讲话，称近来和平谣传甚盛，甚至谓张曾在北平晤周恩来，均属谣言，并称“和谈绝不可能”。

△　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东北流通券200万、500万两种大钞。

△　沈阳铁路工人1.4万人为改善生活待遇而举行罢工，铁路当局被迫“允予较好的生活条件”。

△　航业界对民国政府特许美国船只运货到长江宁、汉两地，表示反对；上海航业界为防止日本船只驶入长江，决定采取制止办法。

△　中共中央发出《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的指示，指出

在美帝国主义策动和鼓励下的假和平运动“表面上牺牲蒋介石，宣布停火议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

7月28日　行政院长翁文灏发表告全国国民书，题为《明辨是非，共赴国难》，谓“政府为巩固国本及保护人民计，迫不得已，决定实行戡乱”。又称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的每一行动，每一宣传，无不以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依归”，“确为危国害民的根源”。

△　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应蒋介石电召赴莫干山。

△　吴铁城、洪兰友假华侨招待所招待南京国大代表，勉劝代表勿作过分之争执，并劝勿签署发动召开临时国民大会；最后允无兼职之国大代表，尽量聘入“戡建委员会”。

△　民国政府国大与立法院之争仍在继续。立法院借用的国大会堂，于是日起被国大代表封闭，门上贴有“国民大会封”的字条。

△　“七五”惨案死难学生家属向法院控告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警察局长白世维、议长许惠东等。

△　苏北国民党军进占丰易。

△　鲁南地方人民武装收复枣庄。

△　英国政府送给中国政府的军舰“重庆号”和“灵甫号”由新加坡开抵香港。

7月29日　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赴莫干山，与蒋介石商经济财政问题。

△　监察院会议，决定派员调查“七五”事件真相。同日，行政院长翁文灏电北平市长刘瑶章，指示处理“七五”事件善后办法：一、教

育部迅即成立临时大学及中学，使东北大、中学生得以就学；并设立补习班，使私立大、中学生均有食宿之所及读书之地；二、由政府抚恤“七五”事件受伤者，并妥善安葬死者；三、组织“七五”事件调查委员会，调查肇事真相，俾得依法处理。行政院并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赴平调查“七五”事件。

△　鲁西国民党军进驻鱼台、金乡两县城。

7月30日　蒋介石自莫干山到上海。蒋在莫干山曾召见翁文灏、王世杰、徐柏园、严家淦等，对下半年度预算、美援运用以及财政收支实况，询问甚详，对如何增加收入，以平衡预算和管制物价，有所指示。赴沪途中，蒋视察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并发表讲话，称“空军是军事成败利钝最后决定的因素”。

△　蒋介石为“延揽人才，襄赞国政”，聘定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孔祥熙、许崇智、章嘉活佛、吴忠信、张君劢、徐傅霖、曾琦、李璜、莫德惠12人为总统府资政，邵力子、李文范、茅祖权、俞飞鹏、张作相、万福麟、王树翰、邓家彦、蒋梦麟、陈布雷、张难先、余家菊、何鲁之、戢翼翘、胡海门、包尔汉、张钫、罗桑坚赞、陈树人等为国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到保定视察驻军和防务。

△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依照蒋介石和卫立煌的指令，将锦州、山海关驻军编成四个军，除原来的第九十三军、第五十四军（补充为三个师）外，另增新编第五军、新编第八军两个军，以加强防御。

△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谓：“除非确确实实进行充分的剧烈改革，以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我们所给予的任何数量的军事咨询和物资，都不能造成中国的团结与和平。”

△　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的社论，指出人民解放军在过去的一年中，“消灭敌人兵力共达152万余人，其中俘虏95.3万人，毙伤54万人，争取起义2.8万人；解放土地15.5万平方公里，人口3700万”。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军区，指示：先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移师承德、张家口，攻打傅作义集团。

7月31日　蒋介石自上海返抵南京。离沪前召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上海市长吴国桢、参议会议长潘公展、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等谈话，对稳定上海的经济情况有所指示。

△　陕西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指挥整编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一、第十七师，共四个师10个旅7.8万余人，由澄县、合阳之线向黄龙山南麓之解放军进攻，企图进占石堡和韩城。

△　山西国民党军进驻榆次、晋源。

△　浙赣铁路在宜春接轨，全线恢复通车。

△　北平市市长刘瑶章向冀北电力公司、石景山钢铁厂、华北水泥公司等13家企业征收“城防捐”4000亿元，厂家被迫以钢筋、水泥、煤炭等实物代缴。

△　冯玉祥偕夫人李德全、子女及秘书赖亚力一行八人，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美返国，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启程前，发表《告别留美同胞书》及《告别美国人士书》，指出：“蒋氏独裁政权已日趋危殆，摇摇欲坠。”“人民的胜利就在不远的将来。”并希望美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来变更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

△　中共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在河南宝丰举行团以上干部整党整军会议。陈毅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邓子恢作中原新区政策和财经工

作报告，刘伯承作整军动员报告。

△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组成第七、第八纵队，司令员为彭绍辉、姚喆。

△　豫苏皖地方人民武装收复皖北重镇阜阳城。

7月下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之鲁中、鲁南军区及滨海、泰西军分区合并为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政委康生。

是月　　国统区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发生严重水灾。各省先后电请民国政府豁免征实，呼吁救灾。

△　太原绥署制定战时纪律六条："一、通匪者处死；二、抗命或擅离职守者处死；三、造谣惑众者处死；四、倡议降敌者处死；五、意图降敌或逃脱者处死；六、本纪律凡文武官佐士兵工役及其他享公费给予之一切人员均适用。"

△　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马列学院的名称，刘少奇兼任院长。11月8日在河北平山县李家沟开学。

△　中共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兼主任，李富春、张闻天为副主任。

8月

8月1日　　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副司令杜聿明抵达南京，出席重要军事会议。刘、杜在宁晋见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并访晤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

△　湖北师范学院学生为反对该院院长王治孚假公济私，贪污中饱，举行抗议活动，教育部特电命令将该院解散，并严惩为首学生。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在香港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郭沫若等，提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征求意见。

△　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局，对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作如下指示：对美国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取代蒋介石、以便取得喘息时间的和平阴谋应当予以揭穿；"但对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以促成他们间的更大分裂"。

△　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选出陈云、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李颉伯等53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执委，22日大会闭幕。

8月2日　蒋介石公布实施《海关进口税则》。

△　监察院派监委谷凤翔、胡文灏，赴北平调查"七五"事件经过。临行前，蒋介石接见谷、胡二人，对北平情况有所询问。次日，谷、胡抵平。

△　行政院拟订全面经济改革方案，在稳定物价方案中决先从整顿金融机构入手，令全国商业行庄重行登记和合并，使6000家银行钱庄减为2000家。

△　傅作义检阅平津铁路沿线部队。

△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前日军驻华司令冈村宁次以战犯起诉。

△　周恩来致电钱之光，要他即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

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8月3日　　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召集军事检讨会议，参加者80余人，由何应钦主持。会议检讨了两年来在作战方针、作战指挥、编制装备、新兵补充、后勤供应、士气、情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作出如下军事决策："东北力求稳定，华北力求巩固，西北阻匪扩张，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之主力。"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要"明耻教战、切实负责、保持信心、改正错误，以完成戡乱大业"。又称："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我不忍放弃这剿匪责任。"并称：这次军事检讨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要求各地将领"于两星期内执行"。8月6日会议结束。

△　行政院会议通过委任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马占山、罗卓英、万福麟、郑洞国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吴奇伟、冯钦哉为华北"剿总"副司令，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

△　国民党留京中央委员及立、监委497人举行党务座谈会，由吴铁城主持，检讨国民党过去党务之得失，商议今后党务改革问题。4日会议结束，发表宣言，主张竖立党的新作风。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丰润。

△　鄂中国民党军进占安陆。

△　豫北大水灾，灾民达六万余人。

8月4日　　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在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对东北战局发表四点意见：一、判断东北解放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

在锦州；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计划，但不轻举妄动，须应付解放军的10月攻势；三、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四、尽量以长春牵制解放军兵力。会议根据上述意见，对东北部队作了新的部署。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卢龙、迁安。

△ 鄂北国民党军进占南漳。

△ 陕南国民党军进占河南荆紫关。

△ 郑州国民党军进占新郑。

△ 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免职，由林崇墉继任。

8月5日 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关于设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中美双边协定》在南京签字。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委派的毕范宇、穆懿尔和民国政府委派的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翰五人组成。《协定》规定该会有权拟定和督察实行各项农业计划。还规定在该会的美国委员及美国职员，须“视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之一部分”，享有治外法权、免税法等特权。

△ 浙江省府主席陈仪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浙省历年田赋征不起的主要原因是大户不纳粮。又称：蒋总统在莫干山时曾面谕，大户不但新赋要先缴，旧赋亦须押追，必要时可以没收大户财富。

△ 东北、华北学生“七五”抗联会代表八人，向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请愿，提出八项解决条件，要求释放“七五”事件以后被捕学生，改善受伤同学待遇和治疗。

△ 交通部命令，全国各航运一律加价120％，空运加价34％。

△ 湖北国民党军进占襄阳。

△ 东北解放军以七个炮兵团编成炮兵纵队，苏进为司令员，邱

创成为政治委员。

8月6日　　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抵沪，与上海金融界及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维炽等多人商谈经济改革方案。

△　鄂北国民党军进驻樊城。

△　国民党军裴昌会兵团进占陕西韩城。

8月7日　　国防部发表《半年来战局总检讨》称：过去国民党军与共军的比例为3：1，现为2：1；半年来，国民党军收复重要城镇65处，放弃89处。

△　宋子文抵南京与蒋介石、翁文灏商讨经济改革方案。

△　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因上海物价上涨，特召集金管局长林崇墉及有关单位负责人进行紧急会议，决定即日起，紧缩放款及汇款业务，大量抛售物资，以平抑物价。

△　天津国民党军进驻胜芳镇。

△　郑州国民党军进占广武。

△　湖北解放军攻占远安，威胁宜昌。

△　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封丘县城。

△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开幕，出席代表541人，历时13天。大会于18日选举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19日会议闭幕。

8月8日　翁文灏、宋子文、张群会商经济改革问题。

△　美国参议员勃里奇发表声明称：杜鲁门总统已授权军事负责

人，按照1.25亿美元军援计划，即以武器拨交南京政府，使可抵抗中共。

△ 国民党军空运抵济南增援。

△ 郑州国民党军进占荥阳。

△ 西北野战军集中五个纵队11个旅的兵力，在陕西中部发起澄（城）郃（阳）战役。是日，在冯原镇地区包围并进攻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激战至次日，该师大部被歼，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参谋长张先觉等被俘。

△ 汉口景明大楼发生美国空军人员借举行舞会之机集体强奸中国妇女40余人的暴行，事后民国政府禁止报刊登载此消息，并竭力为美国军人掩饰和辩护。

△ 上海大雷雨，走电失火，死57人。

8月9日 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强调实施总体战，以继续进行反共内战。下午，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庐山牯岭避暑。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在沪发表谈话称：如果中国改革加速进行，美国人民将乐于多给援助。并谓华北、东北情势不如所传之严重，美援绝不忽视北方。

△ 陈立夫出席在瑞士柯城举行的欧洲道德重整会议，并在大会发表讲话称："世界现正面重大之危机，恶思想正图谋控制每一国家。中国历年来迄与威胁破坏我国家文化之力量相搏斗。"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遵化。同日，郑州国民党军进占汜水。

△ 解放军攻克湖北当阳。

8月10日　蒋介石电邀副总统李宗仁自北平往庐山会商。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认为现在“普遍地都在批评蒋委员长领导的无能，却普遍地没有人能提出任何人来代替他的地位。他是使这个巍然大国结合的人”。报告建议继续给予现政府援助，如有可能并予以增加。

△　东北、华北学生组织南下请愿团，为“七五”事件向南京政府提出八项要求。15日，请愿团被迫离开南京北返。

△　河南、山东籍学生1000多人包围南京教育部，要求增加救济费并立即分发各大学。

△　西北解放军击溃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收复陕西韩城、澄城、郃阳，国民党军南逃。

△　解放军攻占皖北颍上，次日主动撤出。

8月11日　行政院正式任命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翰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

△　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赴沪视察海军。

△　行政院会议通过浙江省增设四明县。

△　豫南国民党军进占淅川。同日，鲁西国民党军进占鱼台。

△　暹罗政府逮捕华侨商人100余名。

8月12日　蒋介石颁布民国三十七年度下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施行条例。

△　蒋介石特派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为西北军政长官，冯治安、刘汝明、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监察党营事业办法》。

△　美国务卿马歇尔给驻华大使馆政策指示："美国政府无意再担任中国的调解人。"次日再指示："美国政府显然必须保持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　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临时承认韩国政府，并派刘驭万为驻韩国大使衔外交代表。

△　湖北国民党军进驻当阳。同日，河南国民党军进驻巩县、新郑。

△　西北野战军在陕西韩城地区继续追击，击溃国民党军骑兵第二旅和第一六五团。

△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教授在北平病逝。

8月13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偕美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赴庐山与蒋介石秘密商谈。

△　留南京之国民大会代表再度商开国民大会临时会议，并痛诋立法院。

△　美援运用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美援物资棉、粮、油料之运用问题。次日，莱普汉、俞鸿钧在上海召集各小组会议，商讨美援运用问题。

△　各地物价连日猛涨，黄金每两超出六亿元，银圆每元近800万元。

△　陕西国民党军在大浴河以南转入防御，西北野战军停止追击，澄合战役结束。是役歼灭国民党军近万人，收复县城三座，解放军伤亡2300人。

△　豫东解放军攻占野鸡岗，截断甫经接轨之陇海铁路。

△　上海文化界为纪念“八一三”事件十一周年，特发表宣言，要求日本赔偿中国的战争损失。

8月14日　　蒋介石在庐山与司徒雷登、白吉尔长谈。谓：“今日中国地位之重要，不啻欧洲之全洲……乃美国只知全力援欧，而于中国之艰难困乏，则视若无睹……彼不知共匪之所以反蒋者，即所以反美也，更不知余之百折不回、誓死奋斗者，不惟护卫我民族与亚洲，抑亦所以护卫美国与欧洲，此为马歇尔氏所不察，得不为敌人所快乎？”

△　是日为空军节，蒋介石拨款1500亿犒赏全体空军，并授勋空军司令周至柔、副司令王叔铭。

△　英国所赠之“重庆号”巡洋舰及“灵甫号”驱逐舰开抵南京下关江面。

△　苏北国民党军再占泗阳。

△　华东野战军公布徐（州）济（南）段夏季攻势战果，歼蒋军六万多人，解放县城12座。

△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领导机关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谭政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代书记高岗兼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8月15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总统府战略顾问龙云、立法院秘书长张肇元等自南京到庐山。

△　冀、平、津成立美援合理运用促进委员会。

△　国民党军后续援军空运抵太原。

△　湖北国民党军进驻远安及潜江。同日，郑州国民党军进占长葛。

△　中国人民解放军晋中军区与行政公署正式成立。罗贵波任军区司令员，牛荫冠任行署主任。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将太岳军区部队编为第十五纵队，刘忠为司令员，袁子钦为政治委员。

△　上海物价继续上涨五成；汉口黄金涨至每两五亿元，大米超过7000万元。据主计局向行政院报告，宁、沪8月上旬生活指数为325万倍。

8月16日　吴铁城、张嘉璈、郑介民到庐山谒见蒋介石；宋子文自庐山回广州。

△　傅作义在北平召开华北五省两市军政工作会议，参加者为冀、热、察、绥四省军政要员百余人，主要讨论“剿匪戡乱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和“政治军事密切配合”等问题，22日会议结束。

△　驻苏北丰县之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三师特务营营长黄幼衡、副营长王子云率领全营官兵起义。

△　华北野战军一部自河北渡河集中鲁西，进趋菏泽、曹县。

△　川、滇、康三省成立三省兴业公司，内设瓷器、造纸、铁矿、炼铜及电力等厂。

△　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到汉口，处理湖北师范学院及流亡学生问题。

8月17日　　行政院发布《后方戡乱应注意事项》，宣布“对于匪徒鼓动罢工、及其他足以妨害生产之行为”，以及“各校学生意图妨害戡乱，而罢课游行、聚众请愿”者，都应“捕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并自19日起陆续在报纸上公布有关学生名单，限令其自名单公布次日到特种刑事法庭投案。同时进行大规模搜捕，至8月底，仅北平一地即逮捕学生322名。

△　驻美大使顾维钧晤访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催促美国加速接济军需物资。同日，美国务院发表报告称：1948年4月至7月，中国获得美国物资价值690万美元以上，包括弹药、炮弹、铁筒弹、火药线导火管、地雷及手榴弹等。

△　副总统李宗仁偕夫人自北平抵南京，发表谈话称：北方大局相当安定；报纸上关于国共和谈之消息纯属谣言，无聊至极。

△　行政院令各地治安机关依据刑事法令，发动“特种刑事检举”，彻底肃清“匪谍”。

△　民国政府发表《共匪青运组织及其国际背景》一文，谓青运工作“系由共匪中央青年部直接规划领导，而以伪民盟总部青年工作委员会为其外围领导中心。其核心组织为民主青年联盟。该联盟系共产赤色青年组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构成单位之一”。

△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自北平返回南京，报告“七五”事件真相。据秦氏事后对记者称：报告只列举客观的事实，而不下主观判断。凡有两种相反意见而无法证明的，均将两种意见并列。至于究竟是谁先开枪的责任问题，尚未调查清楚，现正由留在北平的两位监委继续调查中。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美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离庐山回南京。

△　暹罗政府滥捕华侨，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

8月18日　蒋介石及孙科自庐山返回南京。

△　民国政府特种刑事法庭票传南京、北平等地所谓“匪谍”学生数百名（南京147人，北平250余人）。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与史蒂尔曼同抵南京，与翁文灏交换关于工业建设及设备、器材补充计划之意见。

△　天津《大公报》报道，上海物价狂涨，上周批发物价总指数已达700万倍，比前周又上升二成半以上。分类指数中，食物类522万倍，纺织品740万倍，金属类1075万倍，建材719万倍，化学品932万倍，燃料810万倍，杂类659万倍。

8月19日　蒋介石明令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代替原来流通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规定以金圆券一元合法币300万元、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的比价进行兑换；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同时实行限价政策，规定各地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水准上，不得再行抬高，违者严惩。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禁止任何人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民间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

△　行政院通令各地物价改算金圆券以8月19日当地物价为标准。财政部亦通令全国银行、钱庄实行金融冻结，停业二天（20日、21日）。

△　翁文灏电邀上海金融、工商界之宋汉章、钱新之、席德懋、

赵华、程远帆、陈光甫、李馥荪、徐寄庼、王晓籁、杜月笙、秦润卿、戴铭礼、徐国懋、李道南、徐文迟、王伯天、骆美中、董希锦、傅沐波、宋子良、俞佐庭、骆清华、王志莘、方光、黄金畴等，及俞鸿钧、潘公展、方希孔、吴开先、蒋经国、林崇墉等赴宁开会，商讨实施政府制定的财政经济紧急措施。

△　蒋介石任命关麟徵为陆军副总司令。

△　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解放原武、阳武县城。

8月20日　蒋介石、翁文灏分别邀集京、沪民意机关及工商、金融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说明当局改革币制之决心，盼各界拥护政府决策。

△　行政院长翁文灏发表讲话，说明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意义，谓“此次所定改革币制，平衡收支及管制经济各项办法，其唯一目的为安定社会经济，保障大多数人民之利益”。

△　为切实执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行政院特设置经济管制委员会，并在上海、天津、广州三地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

△　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成立，公布委员名单：李俨（财政部）、庞松舟（主计部）、蔡屏藩（审计部）、刘攻芸（中央银行）、徐寄庼（商会）、王晓籁（商会）、李铭（银行工会）、秦润卿（钱业公会）、徐士浩（会计师公会）。23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　内政部长彭昭贤就改革币制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谓：今后不会再有黑市，各报以后不准再登载黑市物价。

△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飞返锦州。

△　天津、成都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共产党学生”。

△　旅法华侨参战华工总会、旅法华侨和平促进会、巴黎中国学生会、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等六个团体组成支援国内学运联合会，投函上海《观察》杂志，抗议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并表示将“在国外发起募捐运动以为国内学运之支持”。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人民军政大学成立，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称：“巴大维将军曾就当前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问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意见，即要蒋氏不要亲自指挥军队，而由巴大维将军协助国防部长指挥作战，但蒋氏完全置之不理。巴大维将军目前遭到的困难，完全是因为中国统帅不采纳他的建议所致。”

8月中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将原第二兵团之第二、第六两个纵队，以及第一纵队组成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

8月21日　蒋介石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民国政府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之决心，命各地切实执行。

△　蒋介石特派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分别为上海、天津、广州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王抚洲、霍宝树等分别协助督导。

△　行政院长翁文灏下令所有物价和工资冻结在8月19日水准，不许自行抬价。

△　前行政院长张群为策划建立“中日韩三角反共同盟”赴日本进行活动。

△　陕西国民党军进占商南及白河。

△　豫东国民党军进占陈留。

△　解放军进攻陕西澄城。

△　解放军攻克豫西卢氏。

△　北大、师院两校教授21人联名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任意拘捕学生。

8月22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谓严厉执行财政经济改革，清除各大学潜伏“匪谍”，决不姑息。复谓“戡乱乃抗战之延长，本质上为民族战争”。

△　翁文灏再电各省、市政府，严申物价以本月19日为准。

△　张群在东京会晤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　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在中央银行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

△　北大校长胡适发出布告，要求被法庭发出传票的学生，自动到特种刑事法庭报到。

△　华北“剿总”军政会议闭幕，傅作义致词，谓大会对各种问题均经详细讨论，获得结论，今后须使提案变为行动。

△　是日至9月17日，国民党军飞机连续轰炸石家庄，炸死炸伤市民160余人。

△　中共中央发出《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迫进、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

8月23日　金圆券正式开始发行，以金圆券一元兑换法币300万

元，兑换东北流通券30万元，兑换台币1835元；外汇牌价为金圆券四元换美金一元；0.75元换港币一元。各地市场大体平静。

△　行政院长翁文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声称：“当前最须切实进行的是两件事：一是禁遏奸匪的破坏与侵扰，以保障社会的秩序。二是停止通货膨胀与市场的波动，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并称在发行金圆券中要“收兑中国领土以内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货币”。

△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公审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承认曾奉命抗拒向新四军投降。

△　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协助督导蒋经国正式办公。

△　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汇报会上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在这10个月（指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能解决傅作义，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目前中原决战的时机还未到，“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最后指出：“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

8月24日　民国政府限令各业恢复8月19日价格。为防止物价波动，各地加强管制，南京、苏州等地逮捕抬价商人。

△　蒋经国命上海调查机关负责人员检举主要投机商人。

△　新闻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否认政府曾向国际复兴银行请求贷款六亿美元的消息。

△　宋美龄在庐山发表谈话，呼吁国民拥护政府财经新措施，并称将继续努力动员妇女。

8月25日　蒋介石任命夏威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李品仙准免本兼各职；任命张轸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省府委员兼主席刘茂恩准免本兼各职。

△　蒋介石特任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原任陈诚准免本职。

△　上海市政府发布批发商品指数，承认8月16日至21日，物价平均上涨15%。

△　张群在商震官邸会晤日本首相芦田，会谈两个半小时。次日，又会晤日本政界要人。

△　国民党军进占豫西卢氏及豫东周家口。

△　蒋经国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油、面、棉纱定价问题。

8月26日　　民国政府公布整理财政补充办法，规定变更稽征方式，改订税率，海关进口税加征“戡乱”时期附加税40%，食盐税每担征金圆券八元，营利事业所得税半年征一次。

△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决定限制利息（存放利率将减低），取缔囤积居奇，处罚违反限价，禁止食油出口。

△　监察院发表调查“七五”事件报告，谷凤翔、胡文灏并对案件关系人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青年军第二〇八师搜索营营长赵昌言以及北平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提出纠举。

△　上海区经济管制协助督导蒋经国召集上海军警及金融机关负责人会议，决定统一全市检查机构，由蒋经国统一指挥、统一执行；对违反财经紧急措施者，将予以严厉惩处。

8月27日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为加强经济管制，特设置上海区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和物价审议委员会。

△　蒋经国出席戡乱建国大队记者招待会，表示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实施经济管制。

△　张群在东京接见日本文化界人士，就中日情势交换意见。

△　南京中央社记者就报载中、日、韩三国防共同盟一事，询问有关人士，南京政府方面回答称：此项毫无根据之报道，不值一驳。

△　上海特种刑事法庭会同警察局到各大学拘捕所谓有“奸匪嫌疑”的学生，交大、复旦、大夏、同济、光华、暨南等校共拘捕61名学生。

△　孔子诞辰纪念日，即“教师节”，各机关放假，并举行祭祀。北平各界在国子监祭孔，北大学生举行尊师晚会。

△　国防部驻沈阳绥靖总队突击队官兵96人，在上校参谋权国英（朝鲜族）率领下起义，突破封锁到达解放区，起义官兵中有87人为朝鲜族。

8月28日　蒋介石接见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了解币制改革后上海金融情况，并听取意见。

△　行政院长翁文灏召集京、沪两地商业银行负责人举行谈话会，讨论经济管制实施情况。

△　上海全面展开“经济检查”，出动大批军警检查全市各码头、车站及交通要道，禁止货物私自出口。另有18家银行仓库被检查，查封大批棉纱、棉布。

△　冀东国民党军进占乐亭。

△　拟赴解放区之中央大学学生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人被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分别判处六年、五年徒刑。

△　中共中央致电粟裕，指出济南战役“关系甚大”，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济南，同时集中最大兵力准备打援。

8月29日　上海区经济管制协助督导员蒋经国召集警察局长俞叔

平、海关税务司张勇年、金管局长林崇墉等开会，商讨加强经检工作。同日，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处通令暂时禁止食油出口，并限制纱布南运。

△　豫东国民党军进占商水。

△　南京各院校教授代表20余人集会抗议南京政府新订的公教人员待遇标准，决定于31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将分别向行政院、立法院、教育部、财政部等方面请愿。

△　豫西解放军再占陕州。

△　陕南解放军攻克商南县城。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7月份战绩：歼、俘蒋军逾20万，解放城市28座。

△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言人就南京政府实行所谓“币制改革”紧急命令事，发表谈话称：此举“实无异对全国老百姓之最残暴的掠夺”。“我们深信这一举措不仅丝毫不能有补于其没落的命运，而且势必相反的更将加速其整个的崩溃”。

8月30日　蒋经国出席上海商会召开的各同业公会理事长会议，听取对管制和限价的意见，并答应对各种困难，当尽量设法解决。

△　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张厉生在天津正式办公。

△　皖北国民党军进驻涡阳。

8月31日　张群在东京再晤麦克阿瑟，会谈历两小时。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由美国回国，途经黑海，因轮船起火遇难。

△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致电蒋介石，对北平“七五”事件自请处分。

△　湖北国民党军进占随县。

△　豫西国民党军再占陕州。

△　南京各国立院校教授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并在中大校友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意见，希望舆论支持。

9月

9月1日　　蒋介石拟发起所谓勤俭建国运动，特令国民党中宣部长黄少谷起草《勤俭建国运动办法》。

△　蒋介石特派王世杰为出席联合国第三次大会首席代表，蒋廷黻、彭学沛、钱泰、张彭春为代表。

△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行庄增资办法草案》。并决定：1.凡以金圆券兑入的外币及黄金，应予补充金圆券准备金，俾现金准超过40％；2.凡以金圆券兑入之银元白银，应予补充铸造银辅币。

△　蒋介石任命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并兼原职。

△　江苏省政府改组，丁治磐接替王懋功任省主席，顾希平任民政厅长，奚炎任财政厅长，洪钧培任教育厅长，钱振荣为建设厅长，秘书长徐道邻。

△　监察院分别成立各区监委行署。是日，两湖区、苏浙区、豫鲁区、陕区、冀察热区、闽台区监委行署，分别在武汉、上海、青岛、西安、北平、福州成立。

△　胡适在北平记者公会讲演，要求记者服膺“勤谨和缓”，不要动火气，动感情，不要受政治党派的影响。

△　南京特别刑庭传讯中央大学学生范乃伦，天津特别刑庭审讯进步学生陈景胡、谢纪恩。

△　立法委员刘不同为政府拘捕学生事致函行政院长翁文灏，称：“旬日以来，各校莫不杯弓蛇影，人心惶恐，窃以为青年学生以言论行动过问国家政事，乃其国民天职”。政府“加以拘捕，施以拷掠”，“实为中华民族前途危”。

△　张群至日本关西之大阪、神户、奈良、京都活动，与日本商业巨头会谈。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宣布：补拨99万美元援助南京政府。同日，美援运用委员会联络委员严家淦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开滦煤矿公司、扬子江电力公司、资源委员会所属冀北电力公司及台湾糖业公司为首批美援拨款对象。拨款总额为440万美元，其中开滦、台糖各得100万美元，扬子、冀北各得120万美元。

△　豫中国民党军进占洧川。

△　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决议电请立法院废除出版法。

9月2日　　外交部宣布1939年《中苏航空协定》将于明年9月期满，到期中方无意续约。

△　泄露改革币制消息、并在上海抛售纱厂股票乘机牟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被捕。此案涉及该部秘书主任徐百齐，徐氏亦于5日被捕。

△　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卜道明途经莫斯科赴巴黎参加联合国大

会。

△　国营招商局筹备改组为公司，交通部特派刘鸿生、徐学禹担任正、副筹备主任，发行股票，定10月1日正式成立公司。

△　美国加紧扶植日本，以使日本成为“远东防线之堡垒”和“亚洲之工厂”，是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令将总数136万吨的915艘商船交还日本民营。

△　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召开，正式通过宪法，选举金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9月3日　　民国政府在南京灵谷寺召开抗日战争胜利三周年纪念会，并祭祀阵亡将士，国防部长何应钦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勉励全国官兵。

△　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港汇，证券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币制改革前夕抛售永安纱股，被上海经济管制协助督导蒋经国扣押审查。

△　广东广九铁路第七次特快列车翻车，死伤旅客100余人。出轨原因系道钉被人拔去，接轨夹板松离所致。

△　新华社奉命声明，揭露美蒋制造和谈谣言。指出：“当蒋介石匪帮的军事失败愈益明显，特别是在开封、豫东作战中遭受惨败以后，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对蒋介石匪帮的作战能力表示愈益丧失信心，企图利用李宗仁、何应钦、宋子文等反动军阀政客”，“以和平的假面具欺骗中国人民，代替蒋介石继续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

△　华北解放区召开全区财政会议，历时10天，讨论了华北财务行政方针，制定新的农业税则、工商业税、烟酒等税收法令和会计规程、粮库制度及战勤问题等10余种税则和制度。

9月4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外币债券处理办法》、《整理外币公债发行原则》，决定发行新债券以代换旧有债券，总额为5.23亿元。

△　蒋介石特派宋希濂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主任。

△　行政院通过《商营银行调整资本办法》。

△　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意图妨害戡乱，扰乱金融”，被特种刑事法庭判处死刑。

9月5日　　上海市长吴国桢因不满蒋经国之措施，赴南京辞职，为蒋介石所挽留。

△　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自兰州赴河西视察。

△　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六稽查大队队长戚再玉因在经济管制期间利用职权勒索财物、包庇并协助重要经济犯逃跑，在上海被处决。

△　皖北国民党军再占泗县。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与北岳军区五个团从易县、涞源地区出发向绥远进军。

9月6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报告改革币制、管制经济经过，称政府所拥有之金银外汇已达1.6亿美元，发行金圆券的准备更为充实；并要求全体党员“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谈话，要求各商业银行所有外汇，限本月8日以前自动存入中央银行。

△　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自美返国。

△　南京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授会代表，为请求调整全国公教

人员待遇及教授学术补助费，连日分别赴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教育部、财政部等机关，递交书面意见。

△　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以来，成都市“物价波动不已，粮荒日趋严重，市场情形混乱，人民怨声载道，舆论一致抨击”。

△　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杜维屏等，以违反“交易所法”等罪名，被提起公诉。

△　为策应绥远作战，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和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发起平北攻势，向平承铁路及密云、怀柔等地出击。是日，包围三河之敌。

△　皖北国民党军进占亳县。

△　滇西干崖土司刀京版成立“独立设计委员会”，决定组织傣族同盟，拟与缅甸都土司联络，成立南诏合众国，实行“独立”。

9月7日　　立法院第二次会议开幕，会议由孙科主持，否决修改组织法等案。

△　蒋经国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上海经济管制情况，随即返沪。

△　蒋介石派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徐柏园赴沪，督促商业银行限期交出全部外汇资金。

△　青年军第二〇二师第二旅奉命扩编为第二〇九师，该旅旅长方懋楷调升第二〇九师师长。

△　苏北国民党军进占宿迁。

△　豫西国民党军进占陕州。

△　中共中央就辽沈战役作战方针致电林彪、罗荣桓，要求东北

野战军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并指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北宁）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　冯玉祥遗体在莫斯科举行火葬。毛泽东、朱德致电李济深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吊唁冯玉祥罹难。同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致电李德全，表示吊唁。

9月8日　　蒋介石明令公布制定修正《国定纪念日日期表》：“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十月十日国庆日”；“十一月十二日国父诞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九月三日抗战胜利纪念”；“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纪念”。

△　张群在东京第三次会晤麦克阿瑟；同日，会见日本警察负责人斋藤等。

△　上海各商业银行迫于蒋经国之压力，将外汇3000万美元移存中央银行。

△　行政院会议决定设置节约指导委员会，社会部长谷正纲任主任委员，彭昭贤、陈启天、李惟果、雷震、秦德纯、郑彦棻、李俊龙、唐纵为委员。

△　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设人民解放军500万人，每年平均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里，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3日会议结束。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攻克三河，全歼守军保安第三十团1300余人；并出击平古路通州至怀柔地区。

△　华北人民解放军公布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绩：歼、俘蒋军28万人，解放城市31座。

△　苏州人力车夫为反对资方将车租增加一倍，一致举行罢工。

9月9日　　蒋介石召见翁文灏、王云五、徐柏园、俞鸿钧等，询问上海商业行庄缴存外汇资产情况。

△　行政院长翁文灏于下午假国防部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全体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500余人，报告财政经济措施，说明此次总统运用临时条款颁布紧急令之苦衷与决心，及四项办法的要旨。

△　宪政督导会在南京成立，莫德惠任会长，左舜生、徐傅霖、方觉慧、洪兰友任副会长。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呼吁会员“匡助政府戡乱”，并“研讨行宪得失”。

△　国防部长何应钦为纪念中国战区日军无条件投降，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

△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自南京返汉口。

△　《中央日报》就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一事发表社论，称经济管制“成败的关键就在上海”，并谓“上海区督导员蒋经国氏的铁腕，足以贯彻政府的决心”。

△　西安特别刑庭传讯西北大学学生10名，西北农学院15名，西北工学院19名。同日，南京特别刑庭再度传讯中央大学学生廖作润等七人。

△　北平研究院在怀仁堂举行成立十九周年纪念会暨第二次学术会议，由院长李石曾主持，专题讨论《中华民族接受外来文化问题》。

△　豫西国民党军进占卢氏。

△　华北解放军收复徐水县城和固城镇。

△　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

△　由航业界27个团体组成的中国海事建设协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

△　港督葛量洪偕夫人由港抵沪访问，商讨有关中港走私及币制改革问题。

9月10日　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行政院长翁文灏出席报告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施情形。

△　自币制改革以来，台北物价波动不定，香烟、布匹、什货、小菜、肉类波动更大，香烟上涨一至二倍以上。

△　张群在东京第四次会晤麦克阿瑟。

△　华北大汉奸、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委王揖唐在北平伏法。

△　日本战犯影佐祯昭病死，未及来华受审伏诛。

9月11日　中共中央军委就济南战役部署问题，致电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许世友，指出：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但在兵力部署上，则应以多数兵力打援，而以部分兵力攻济，并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

△　民国政府主计部长徐戡到重庆，视察财政经济情形。

△　工商部成立物价研究委员会，次长张子柱兼主任委员。

△　张群在日本发表声明，强调下列三点：及早缔结对日和约；日本复兴必须有助邻国；日本成为和平而民主的国家。

△　苏北国民党军进占沭阳。

△　察北解放军攻占沽源东北之平定堡。

9月12日　辽沈战役开始。为了攻克锦州，封闭敌军南逃之路，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条件，东北野战军发起北宁线作战，以第三、四、七、八、九、十一共六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歼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然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另以第一、二、五、六、十共五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新民地区及长春、沈阳间开原地区，阻止沈阳敌军向锦州或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逃敌。是日，东北野战军在滦县至山海关、山海关至兴城、锦州至义县、锦州北郊四个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

△　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发表讲话，谓“新经济方案是社会性革命的开始”，“日后无论任何人有官商勾结行为，国家法律绝不容情而定予严厉制裁”。并表示“决与上海五百万市民共同向恶势力斗争到底”。

△　韩国特使赵炳玉代表韩总统李承晚访问中国，是日抵南京，拜访外长王世杰，并由王世杰陪同谒见蒋介石。同日，赵炳玉在南京对记者称：“最终目的是建立不受共产独裁威胁的一个统一的韩国，希望中国继续帮助韩国。”并要求南京政府“不要承认代表金九的韩国驻华代表团”。

△　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复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称“正准备回至中国解放区，并继续为新民主主义奋斗”。

△　上海国立各专科以上学校教授于光远、李健吾、吴耀中、孙家寿、刘大杰等188人，致电教育部要求重新调整待遇，并增加学术

研究补助费。

9月13日　立法院举行秘密院会，质询财经紧急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部长王云五称下半年政府财政预算和收支可以相抵；行政院长翁文灏表示欢迎公开检举重大经济案件。

△　前行政院长张群结束访日，离东京返抵上海。

△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攻克北宁路上安山、石门、团山和后封台。

9月14日　傅作义急调第十六军、暂编第三军、第三十五军和新编骑兵第四师，分别从密云、昌平、延庆等地向解放军反攻，是日进占永宁和大小水峪，进攻三河，激战五昼夜，未能推进。

△　锦西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向兴城增援，遭解放军阻截，在兴城北发生激烈战斗。

△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攻克昌黎；第四纵队包围兴城、绥中，锦州、唐山陆路交通被切断。

△　津浦铁路宿县、固镇间之桥梁被解放军炸毁。

△　自政府发布《后方戡乱应注意事项》以来，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各地监狱人满为患。

9月15日　蒋介石发起勤俭建国运动，晚间，向全国广播该运动纲要，提出10项公约，提倡勤劳，厉行节约，号召全国国民参加。

△　蒋介石偕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南京雨花台检阅伞兵部队。

△　蒋介石任命李良荣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委员兼主席刘建绪准免本兼各职。同日派何浩若为行政院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　张群自上海抵南京，谒见蒋介石。

△　王耀武到南京面见蒋介石陈请增援，说：“如济南被围攻，陈毅部的主力极可能布置于兖州、济宁及其以北的地区，阻我援军北上。又加我军士气不振，增援部队力量太小了，很难完成任务。”同日，蒋介石命令第三厅“下令空运七十四师去济南”。

△　蒋介石委派马鸿逵、马步芳、郭寄峤、马鸿宾、陶峙岳为西北军政副长官。

△　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在南京成立，张文瑞、左兴中等10人担任审判官，唐诗繁等二人担任检察官，郑荣本担任主任书记官。

△　衢州绥靖主任汤恩伯在杭州招待省参议员，扬言可在三个月内剿灭皖南中共游击队。

△　立法院通过海南岛建省议案。

△　锦西国民党军再次增援兴城，受到解放军顽强阻击，被击退。

△　行政院任陈可忠为广东中山大学校长。

△　上海物价大波动，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处决定《申请出境办法》暂缓实施。

△　川西连续四昼夜大雨，造成重大水灾，成都市内部分地区积水深达三四尺，市内难民云集，状至悲惨。

9月16日　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许世友指挥山东兵团六个半纵队，附地方武装约14万人，组成攻城部队。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由东、西两面向济南实施钳形攻势。东集团以第九、第十三纵队及渤海纵队共24个团组成（内第十三纵队为总预备队），从东

面攻击城垣；西集团由第三、第十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共19个团组成，由西攻击商埠。另以八个半纵队约18万人组成打援部队，由华野司令部直接指挥，分别阻击徐州、河南和安徽的援军。是日，山东兵团各部开始向济南外围攻击前进。

△　教育部于江南各地设立临时联合中学，收容河南、山东流亡学生。

9月17日　　白崇禧在汉口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华中战场近况外，并谓其对政府负有责任，绝对对事不对人，凡违背清剿政策和命令的，就是反对国策。凡玩忽命令不能称职的，负责人一定要依法查办，民众绝对无罪。希望舆论界主持正义，发扬正气，不要替这些不顾大局的特殊阶级粉饰太平。

△　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外交部长王世杰离南京赴巴黎。

△　蒋经国在上海召开经济检讨汇报会，决定为防止金银外币私逃，将加强各出入口之检查工作。

△　监察院发表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秘书陶启明等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案调查报告（在币制改革前夕抛出纱股3000万股，获利五亿元），并纠举财政部长王云五用人不当之咎。

△　驻华美国军事顾问团改组，成立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其中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及混合部队四个顾问组，分别由巴大维少将、汤麦斯准将、奥尔特海军少将及达莱上校担任各组主任，并由巴大维担任顾问团团长。联合军事顾问团将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

△　为救援济南，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李弥部）由鲁西南北援；令黄百韬第七兵团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路向北攻击。

△　解放军济南攻城部队西集团陆续攻占匡李庄、杜家庙、琵琶山、崮山等地，逼近机场、腊山、党家庄；两广纵队攻克长清。东集团九纵攻克城东屏茂岭山、砚池山等坚固阵地，歼灭国民党军整三师一部；渤海纵队攻占韩仓，围攻王舍人庄。

△　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急调总预备队第十九旅及第五十七旅东援，以整七十三师第十五旅及空运刚到的整七十四师一部向解放军实施反击。

△　浙江大学学生吴大信被浙江特种刑事法庭以“匪谍”罪判处徒刑15年。山东大学学生王济民等15人被青岛特刑法庭拘押。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夫妇偕该署新任副署长葛里芬夫妇及秘书等五人，自沪经港抵穗。

9月18日　暹罗新任驻华大使罗亚皮班向蒋介石递交国书。

△　济南攻守战激烈，解放军击退守军反击，西集团攻占古城、玉皇山，歼敌整八十四师一部，并以炮火控制济南机场。

△　徐州守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空运济南，因受解放军炮火威胁，仅运不足一个团即被迫停止。

△　东北野战军击退滦县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向昌黎的进攻，并包围义县。

△　中共中央为欢迎香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致电东北局，指示由高岗、张闻天、林枫代表东北局，在哈尔滨与高崇民、张学思、朱学范等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问题。

9月19日　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两万余人在济南郊区起义。25日，吴化文率部发表起义通电，表示要“在人民解放军的统一号令下，为坚决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

略势力，为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完全解放中国人民而奋斗”。

△　为加强经济管制，北平当局在平施行经济检查。平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张厉生表示决心打老虎，虽权贵豪门亦不姑息。

△　浙赣铁路樟树西岸至株洲段正式通车。

9月20日　蒋介石特任刘茂恩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　傅作义在北平发表《告华北同胞书》，宣传所谓“清匪除奸”运动，谓“在戡乱建国工作中，还应打败第二线匪党一切潜伏分子”。呼吁“立即在乡村彻底清匪，在城市彻底除奸”。

△　剩余物资清查团在上海成立，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兼任团长。

△　财政部决心整顿盐政，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因违法渎职而被停职，由财政部常委次长李傥暂时代理。

△　陕西国民党军进占商南。

△　华东野战军利用吴化文起义有利时机，进占济南商埠以西地区。王耀武被迫收缩阵地，除留一个营守千佛山，以一个团守马鞍山外，其余部队全部撤进城内和商埠。解放军西集团第三、十、十三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同时猛攻商埠。

△　国民党军山东保安第八旅第二十三团第一营官兵530余人，在齐河城南之北店子起义，参加解放军。

△　毛泽东拟定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往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77人名单。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等，征询对77人名单意见，指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

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党、政、军的各级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由党委讨论决定。

9月21日　立法院讨论土地改革，决议交下次院会继续讨论。

△　联合国第三届大会在巴黎开幕。会议期间，王世杰向马歇尔建议，以麦克阿瑟将军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长，未获肯定答复。

△　苏北国民党军进驻涟水。

△　济南攻城部队调整部署，以十、十三纵从西向东进攻，九纵、渤海纵队从东向西进攻，三纵和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是日，十纵攻入济南永固门，并楔入商埠东郊，切断守军退路。

△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前线指挥所，由林彪、罗荣桓率领，乘火车从双城出发，南下赴辽沈前线。

9月22日　蒋介石在南京官邸接见山东旅京人士丁惟汾、秦德纯等，表示决心保卫济南。

△　国防部长何应钦偕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到青岛，视察山东军事形势。

△　财政部长王云五赴美出席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会与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会第三届年会，临行前蒋介石曾召见王氏，对此行任务有所指示。

△　蒋经国会见上海米业、工业和金融界人士，商讨解决上海经济困难之办法。

△　北平五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联合宣言，要求撤销针对广大爱国学生的特种刑事法庭制度。

△　华东野战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至是日中午，将商埠之敌肃清，歼敌两万余人。攻城部队不顾伤亡、疲劳，连续进攻，当晚突破济南城防外线，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

△　香港西环永安仓库发生大火灾，死伤180多人。

9月23日　解放军济南攻城部队全歼国民党军整九十六军整二师第二一三旅及保安第六旅，攻占外城，迫近内城。下午，东、西两集团猛攻内城，战况异常激烈。

△　因济南战局恶化，徐州“剿总”司令刘峙飞济南上空视察。

△　锦州第九十三军第二十二师北援义县，进至七里河附近，遭解放军阻击，被消灭一部，其余退回葛文碑、薛家屯一带防守。

△　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三分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起义，由北平驾P—51战斗机飞抵吉林四平。

△　中央研究院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及第一次院士会会议，院长朱家骅主持，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并致词，谓要提倡学术合作并提高学术水准。会议选出苏步青、吴有训、陈省身、李书华、竺可桢、茅以升、汤用彤、冯友兰、梁思成、胡适、陈垣、周鲠生、钱端升、翁文灏、庄长恭、王崇惠、王世杰等32人为该院第三届评议员。

△　上海经济管制督导专员办公处限令全市厂商五日内登记存货。

△　上海特种刑事法庭继续拘捕学生，至22日止，共拘捕学生86人。

△　上海《时与文》周刊因批评国民党之政策，被内政部加以“永久停刊”处分。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南京政府的所谓币制改革，是“对人民实行空前大掠夺的狂妄举动”，号召工商界以罢业、罢市等方式进行抵制。

9月24日　　济南解放。战至是日黄昏，华东野战军全歼济南守军，马鞍山、千佛山守军残部亦相继于25日、26日放下武器投降。是役共歼国民党军10.429万人（内起义两万人），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牟中珩以下高级将领23人被俘（王化装潜逃，于28日在寿光县境内被俘获），解放军伤亡2.654万人；同时攻克长清、齐河、历城三县城。至此，济南战役结束。

△　蒋介石电召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到南京，命令卫组织西进兵团，由沈阳驰援锦州；卫则主张应由关内出兵解锦州之围后，沈阳主力方可西进；蒋允由关内增兵三个军，由锦西东进，并以海空军增援之，惟沈阳主力必须立即西进。卫决定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

△　蒋经国召集上海工商界人士谈话，商讨不少工厂因限价而缺乏原料，导致减工等问题，各代表希望政府早日实行日用必需品配给，以安定工人生活。

△　上海《大公报》发表评论称：自币制改革以来，“广州、成都、重庆的物价波动最剧”，并且出现了三个新问题，即“（一）游资压迫物价；（二）全国压迫上海；（三）生产事业转见停滞”。

△　张治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巡视河西观感，谓山丹牧场如以科学方法开发，堪称世界大牧场；金塔县鸳鸯池为河西最大水利工程；河西除玉门油矿外，酒泉、永登等地亦有大量油田。

△　锦州外围激战，北二郎洞、旧飞机场、薛家屯、葛文碑等地均受到解放军攻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歼灭兴城东北地区守敌第五十四军一个团，切断锦州、锦西、兴城间的联系；第九纵队切入锦州以北，攻克达子营、五姓屯、白老虎屯。

△　为配合辽沈战役、牵制傅作义集团不使援助东北，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发起绥察战役，分兵五路向绥东进攻。是日，攻占隆盛庄和丰镇县城。傅作义自北平急飞绥远进行部署。

△　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继续在平北发动攻势，并以一部转战平承路，破坏密云、怀柔段铁路。

△　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次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9月25日　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攻占葛文碑、薛家屯两据点，歼敌5000余人，占领锦州东北和北部的外围阵地，并封锁了锦州机场，完全切断了锦州至义县的交通。

△　在绥东战场，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进占凉城，守军弃城而逃；第六纵队攻占绥南清水河城、和林格尔城。

△　鲁西国民党军复占曹县、鱼台。

△　冀东国民党军复占昌黎。

△　上海当局命令各厂商进行物资总登记，以加强经济管制。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谭震林为主任。

9月26日　卫立煌自南京返沈阳，奉命西援锦州，参谋总长顾祝

同同行，监督西援执行情况，顾、卫飞经锦州上空时，电告范汉杰：立即实施空运第四十九军援锦计划。

△　空军运输机50架，由沈阳向锦州空运第四十九军，至28日仅运到第九十七师（欠一个团），解放军以炮火控制机场，当即击毁飞机五架，至29日空运被迫停止。

△　华北野战军第一、第八纵队攻克绥远集宁，全歼守军保安一团，俘2000余人。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大会。

△　华莱士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10项建议，包括尽速缔结对德、日和约，停止援助蒋介石政权等。

△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就先打山海关或先打锦州问题电中央军委请示。次日，毛泽东复电：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应先集中兵力打锦州。

△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前委，通知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其任务是管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

△　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任主席，薄一波任第一副主席。

△　青海省发生特大水灾，骤雨倾盆，山洪频发，甘青、青新等公路大多被冲毁，损失惨重。

9月27日　东北野战军第四、第七纵队攻占高桥、塔山，歼国民党军暂六十二师和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各一部，截断锦西第五十四军与锦州的联系。至此，解放军已完成对锦州的包围，北宁路山海关

以东至义县间，除锦州、锦西两孤立据点外，都为解放军所控制。

△　是日起，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为配合绥远作战，全力在平绥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平古路南段展开破击，以吸引傅作义部东返。

△　国民党军山东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聂松溪，向济南解放军自行投案。

△　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三师第四十六旅旅长乜庭宾在江苏靖江县城率一个连起义。

△　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中共军中之原日军官兵总数约六万人。

9月28日　　卫立煌、廖耀湘再晤顾祝同，廖等提出“进军营口，再折向锦州解围”的方案，为顾所拒绝，坚持必须先向新民集中，不容再贻误战机。卫、廖请顾返京向蒋陈述东北将领意见，同时表示准备向新民集结部队。

△　绥远华野第三兵团和晋绥军区部队经四天作战，解放绥远东部和南部广大地区，歼敌5600余人，控制平绥铁路200余公里，形成合围归绥之势。

△　傅作义调第三十五军、暂四军及其他部队共两个军10个师六万余人增援绥远。是日，其先头部队进至集宁东北马连滩、台基庙、玫瑰营地区。

△　热河解放军攻克绥中，歼锦州指挥所直属暂六十二师第二团。

△　冀热察解放军攻克宣化东之赵川堡，歼新编第二军暂三十一师五个营，俘1200余人。

△　张群广播赴日观感，谓日本军国主义已无复活可能，唯思想尚待革命；日本经济复兴关键系于中国，我应主动领导亚洲世纪。

△　财政部长王云五偕驻美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与美副国务卿罗凡特会谈，并告以中国币制改革及其实施情形。

△　行政院召开谈话会，商谈调整物价问题，上海经济管制协助督导蒋经国等参加。

△　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马汉三等因贪污案，在南京被枪决。

△　中国政府与埃及政府决定彼此将驻对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9月29日　蒋介石与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会商。据巴大维向美国务院报告，谓“蒋委员长对济南之战的结局深表失望，并说，该城失陷实出意料之外”，蒋并称“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强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

△　蒋介石令派李品仙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派孙震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派李默庵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派张雪中为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派周嵒为第一绥靖区司令；派高桂滋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派谢辅之为第十九绥靖区司令。

△　因东北、山东战场军事形势日趋严重，立法院开会质询当前军事问题。

△　顾祝同飞返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辽沈作战情况。

△　财政部长王云五与美国财政部长史奈德会谈，讨论中国财政情况。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北野战军应把作战重心放在攻占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上，力求在援敌迫近之前迅速攻克锦州，“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

△　卫立煌派东北“剿总”副司令陈铁、副参谋长彭杰如去葫芦岛筹组指挥所。

△　锦州守军以第八十八师、第一八四师、暂编第十八师各一部，向锦州北达子营、冒儿山、二郎洞等阵地进攻，企图夺回锦北已失阵地，均被解放军击退。

△　鲁西国民党军进占城武。

△　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集结怀来以西，将新保安至康庄段铁路破坏。

△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经20小时激战，攻克兴城，全歼守军第五十四军直属团4000余人。

△　中共济南特别市政府成立，郭子化任市长；同时成立警备司令部，袁仲贤任司令员，刘顺元任政治委员。

△　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谭平山一行四人抵达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　上海当局宣布禁止日用品出口。

△　民社党革新派主席伍宪子辞职，并宣布脱离民社党。

△　台风袭击海南岛，100多艘船只沉没。

9月30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北平巡视，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总统府参军罗泽闿、青年部长陈雪屏以及俞济时等随行。

△　中央银行宣布：收兑黄金、外币展期至10月底，银币展期至11月底。

△　国民党中执会通过《党营事业方针》案，并决定湖南省主席程潜、陕西省主席董钊分别兼任湘、陕两省党部主任委员。

△　流亡南京之河南学生全部遣送完毕，分别由新设立之联合中学收容。

△　华北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进占绥远集宁，解放军主动撤离。

△　上海电力公司工人、上海电力工会常务理事、共产党员王孝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　新华社发表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指出："济南这个敌人在山东最强大据点的攻克，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现在"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是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以扩大和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号召国民党将士脱离蒋介石政府，到革命委员会来，和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

△　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解放儋县、昌江、陵水、万宁、乐宁、定安等地，歼灭国民党军4900多人。

10月

10月1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20余人发表讲话，对"剿总"成立一年来之成绩与进步表示满意与欣慰，并希望各将

领“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继续努力，俾完成剿匪任务”。同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援锦方案，决定从华北抽调第六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及山东烟台第三十九军两个师，海运葫芦岛，会同锦西第五十四军及暂六十二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从锦西北上，增援锦州。

△　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提出：“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　范汉杰调整锦州守军部署，以暂第四十八师守备机场，四个半师防守城区，第一八四师为预备队；炮兵第十三团及各军、师炮兵，实行统一指挥。此时锦州已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外围制高点失守，飞机场已处于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下。

△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向所属各兵团、纵队、独立师以及各军区，发出关于夺取锦州，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战斗动员令。

△　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三及炮兵纵队攻克辽西义县，全歼守城之国民党第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及一个骑兵支队，共一万余人，俘师长王世高。解放军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在战斗中牺牲。

△　绥东傅作义部继续西进，暂第四军进至玫瑰营、台基庙，与第三十五军会合，新骑第四师亦进抵兴和、高庙地区。

△　上海发生“扬子公司案”。该公司经理孔令侃（孔祥熙之子）囤积大批汽车、钢铁、棉纱，蒋经国迫于舆论之压力而将其拘留。是日，宋美龄乘“美龄号”专机自南京飞赴上海亲自为之调解。

△　上海区经济管制协助督导蒋经国致函上海参加经管人员，要求他们不参加应酬，不进娱乐场所，贡献所有力量，以报效国家和人民。

△　上海等处发生抢购风潮，当局决定下月开始配给日用必需品。

△　总统府国事顾问黄复生在重庆病逝。

△　解放军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菏泽县城。

△　毛泽东复电陈嘉庚，对新加坡侨团大会等支持中共5月1日对时局主张，表示“无任感佩”；并征求对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

10月2日　蒋介石飞抵沈阳，周至柔、郭忏等同行。蒋在沈阳对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讲话，要其“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并要求其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精神，努力剿匪”。当日下午，在东北“剿总”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沈阳主力第九兵团等部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从新民地区南下，与由葫芦岛北上的东进兵团相配合，东西对进，援助锦州，夹击东北解放军主力。

△　蒋介石派钱其琛为中华民国出席国际高周率广播会议总代表，钱凤章为代表。

△　范汉杰致电蒋介石，主张坚守锦州以吸引解放军主力，另从沈阳和关内抽调兵力，与解放军在锦州地区决战。

△　民国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宣布烟酒增税，烟酒店停业2日。此举导致物价上涨，表明限价政策已开始破产。

△　蒋介石颁布命令规定每年10月24日“联合国日”为国定纪念日。

△　绥远国民党军进驻和林、凉城。

△　东北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所到达彰武，获悉国民党军将由葫

芦岛登陆增援锦州，林彪“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动摇”，致电中央军委，提议放弃北宁路作战，回师攻打长春。

△　华北野战军调整作战部署，第三兵团主力由绥远昼夜兼程向东急进，转至天成、丰镇、卓资山地区，寻机攻歼西进之国民党军增援部队。

△　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于平北贾家湾围歼国民党军暂第三十一师两个团1800余人。解放军冀察热军区部队收复崇礼、尚义二县城，歼敌800余人。

△　南京三轮车夫、黄包车夫一万人举行总罢工，反对限价。

10月3日　　蒋介石在沈阳同卫立煌、廖耀湘、周福成等继续开会，决定将沈阳地区部队改组为守备兵团和攻击兵团，周福成负责守备兵团，留守沈阳；廖耀湘率攻击兵团驰援锦州。是日下午，蒋介石由沈阳飞北平，顾祝同回南京。

△　勤俭建国力行运动会在南京成立，公举蒋介石为指导长，选出蒋经国等39人为临时干事会干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勤俭建国。

△　毛泽东复电林彪：“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急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林彪接电后表示接受，决心攻打锦州，随即重新调整部署，加强北宁线作战力量。

△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电令第六十二军，迅即乘轮渡海运葫芦岛，准备增援锦州。

△　国防部改革军队人事制度，规定各级部队设立评判会，对各级军官实行考核；军官选拔晋升标准，前线部队以战绩为主，后方部队以训练成绩为主，机关学校以服务成绩为主。

△　河北国民党军复占徐水。

△　解放军冀中军区部队于新城县板家窝歼灭河北保安第一旅2000余人。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表示“极为欣慰”，希望其对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一事随时提出意见，以“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10月4日　蒋介石在北平接见顾孟馀等，并巡视卢沟桥。

△　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长春组织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各一部，进行试探突围，遭到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阻击，损失一部，其余退回长春。

△　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谓：希望能获得美国更多援助，以安定中国国内的经济与政治局势；称南京政府“更愿获得物资而非现款”，并称“中国早一日获得物资则中共早一日失败”。

△　总统府国策顾问陈树人在广州病逝。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华计划处处长克利夫兰、技术调查团团长司徒立门、纽约花旗银行葛林与严家淦等自美飞抵上海。

△　《中港关务协定》签字。该协定之实施，将允许中国海关巡逻艇于后海湾巡行，可于香港领海内设立检查站，中国海关人员并得登船检查货单，但不得执行检查及处以没收、逮捕、罚金等项处分。

△　为支援绥远战役，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北平至张家口段发动攻势，进逼张家口外围，迫使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开始东返，只留骑十二旅驻守集宁。

△　人民解放军占领河北固安。

△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批准林彪、罗荣桓等关于攻打锦州部署之报告，指示：“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10月5日　蒋介石自北平飞天津，到塘沽乘“重庆号”巡洋舰赴葫芦岛视察。陆大校长徐永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总统府参军罗泽阊、军务局长俞济时、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等随行。

△　东北“剿总”决定锦沈会战指导大纲如下：一、以一部固守沈阳，主力先攻略彰武，以截断辽西共军补给线。以锦州为饵，诱致林彪主力，以东、西两兵团对进夹灭之。二、锦（西）葫（芦岛）国军为东进兵团，直接解锦州之围后，会合锦州守军，协力西进兵团，夹歼共军。三、锦州国军应坚强守备，吸引林彪主力，以为我东、西两兵团开创外线作战最有利之契机。四、第五十二军略取营口，打开海上通路，策应尔后作战。五、长春国军，随时作突围之准备，俟机至沈阳会合。

△　东北“剿总”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向所属各军下达作战命令，命各部向新民、巨流河集中。

△　顾维钧自华盛顿呈报：美军部已同意由东京盟总供应我军用汽油三万桶，合126万加仑。

△　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海运抵葫芦岛。

△　河北国民党军进占满城。

△　抢购物资风潮蔓延各地，上海食米来源短绌，各大公司陷半罢市状态。

△　为配合中原作战，西北野战军在陕西中部发起荔北战役。是日，解放军进至澄城、合阳以南地区，向攻击地开进。次日凌晨，以五个纵队对据守永丰镇等地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七师展开全线攻击。

△　华北野战军趁阎锡山调动七个师向太原以南出击、脱离防御阵地的有利时机，以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兵团为主力，其他部队相配合，集中10个旅共八万多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原定10月18日发动）。是日，解放军由太谷、榆次出击，围攻据守小店镇等地之阎锡山部队。

10月6日　蒋介石抵葫芦岛，召集驻军团以上军官讲话，并宣布驻锦（西）葫（芦岛）部队统归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在侯未到前，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　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率军部到达葫芦岛，至9日，该军三个师全部到达葫芦岛。

△　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派何应钦、顾祝同兼中央训练团副团长。

△　行政院决定撤销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总办事处。其工作于本月底结束，由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继续办理。

△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辞职，行政院派王之卓接任。

△　鲁南国民党军进占郯城。

△　西北野战军在陕中连克寺前镇、双泉镇、韦庄，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八旅大部，俘旅长万又麟；下午又攻克东家村、新村，将整第十七师第三十四团大部歼灭，国民党军残部退守洛河西岸。

△　徐向前兵团攻占晋中小店镇、南黑窑、南畔村，全歼国民党军暂第四十四、暂第四十五师及第六十一军第七十二师一个团，共1.2万余人。

△　解放军再克河北新城。

△　驻守陕西朝邑县城之保安警备队二个大队1100多人，在两大队长杨海潮、王彦章率领下起义，朝邑城获得解放；次日，解放军又攻占平民城。至此，黄河以北、洛河以东广大地区除大荔城外完全解放。

△　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谓美国支持中国贪污无能的政府，是在实行道德破产而自己亦无可辩解的计划，并使中国倾向于苏联；他建议美援应当由联合国办理，并且只能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进行货币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停止收兑法币，新解放区宣布停用法币，协助商人把法币迅速排挤出去，换回解放区所急需的物资。并提出要把反法币、反假票的斗争作为边沿区重要工作之一。

10月7日　　蒋介石乘“重庆号”军舰由葫芦岛抵塘沽，察看新港工程。登岸改乘火车赴北平。

△　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运抵葫芦岛。

△　宁、沪、江、浙、皖五省市经济管制会议在南京开幕，俞鸿钧、蒋经国、陈仪、吴国桢、刘攻芸、陈启天暨三省建设厅长、两市社会局长等出席，研讨有关经济管制事宜。

△　监察院审计长林云陔卒于南京。

△　平汉路南段国民党军复占河南漯河。

△　华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攻克绥远集宁，守军骑十二旅逃跑。

△　西北野战军攻克陕西永丰镇，歼灭守军一个团；并调集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八师，战至是日下午，歼灭该师第一七七旅第五二九团全部及第五十五旅一部。

△　徐向前兵团围攻山西武宿机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军第二一八团及一个保安团。

△　华北解放军进攻平绥路上之昌平。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到北平活动。

10月8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见行政院副院长兼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张厉生，询问平、津粮食及经济情况。当日午后飞抵上海，召见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蒋经国，听取有关沪市治安及经济管制等报告，并对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有所指示。

△　立法院以“不合规定”为由，将行政院所编之明年下半年度中央总预算案退回。

△　廖耀湘兵团主力共五个军11个师，约10万余人，向新民、巨流河集结。是日，廖耀湘令先到的新三军向彰武城攻击前进。

△　汉口空军连日出动，轰炸豫南解放军。

△　上海出动戡乱建国大队、青年服务总队和警察共5000余人，进行全市物资大检查。

△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以胡适、张群、吴铁城、朱家骅、王世杰、吴贻芳、彭学沛、张道藩、杭立武、叶公超、罗家伦、于斌等24人为理事，戴传贤、于右任为名誉理事。

△　华北野战军在绥东攻击从土城子、玫瑰营逃窜之国民党军。

10月9日　蒋介石自上海返南京。

△　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七师从塘沽海运抵葫芦岛。

△　廖耀湘兵团新六军攻占彰武、法库间的叶茂台等地，策应新

三军向彰武攻击。

△　河北国民党军进占新城。

△　东北野战军集中第二、三、七、八、九纵队及炮兵纵队和坦克部队，对锦州城发起猛烈进攻。范汉杰急电葫芦岛部队请求增援。

△　华北野战军攻击绥东兴和，战至次日攻占该城，守军暂第四军逃跑。至此，傅作义援绥部队已全部撤至张家口附近柴沟堡以东地区。

△　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重新部署，是日开始再向北平、张家口段发动攻势。

△　全国钱业公会联合会各地代表秦润卿、王绛斋等，到财政部请愿，对增资数额、期限等问题请求从宽办理。

△　美共和党杜威在演说中，对于美国对南京政府之有限援助政策，深表不满，要求美国给予充分之经济与军事援助，以使中国成为亚洲“抵制世界共产主义的堡垒”。

10月10日　　蒋介石发表国庆文告，勉励同胞认清时局艰难，加紧努力贯彻民族主义，完成“戡乱建国”使命。

△　锦州继续激战，国民党军驻守之城南罕王殿高地及松山失守，东郊北大营一带陷入苦战。范汉杰鉴于援军无望，锦州危急，决定向锦西撤退，以求与东进兵团会合。并为此分电请示蒋介石和东北“剿总”。东北“剿总”复示：“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大局”，范遂中止。

△　锦西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代司令林伟俦集中暂六十二、第八、第一五一三个师，在40余门重炮、七架飞机和二艘军舰的火力支援下，于拂晓向东起打渔山，经塔山，西至白台山一线解放军阵地展开

猛烈进攻，遭到解放军顽强抵抗，塔山阻击战开始。

△　国民党军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海运抵葫芦岛。总统府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同日抵达。

△　郑洞国接蒋介石令其从长春突围之亲笔信，当即召集师以上将领研究，一致认为官兵体力甚弱，勉强突围有全军覆没之危险。遂复电蒋，说明不能突围之理由。

△　胡宗南为挽救荔北败局，从耀县、兴平、潼关等地急调整编第一、第六十五、第九十、第七十六师等部，共13个旅九万余人，进行反击。是日，先头部队进至大荔北柳池营、中山地区，被解放军击退。

△　民国政府中央造币厂奉令开铸辅币。25日，中央银行开始发行一分铜质辅币。

△　中华自然科学社等10个科学团体在南京举行本年度联合会，出席会员暨来宾有翁文灏、朱家骅等500余人。

△　解放军收复山东临沂城。

△　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平北地区歼灭太平堡守护团一个营；又攻克沙城，歼灭第九十二军所属一个营；并破击南口附近铁路。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向全党通告9月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文件通知全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0月11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讲述时局，承认当前政治、经济及军事情形相当严重，但谓绝不悲观，希望团结意志，安定人心，共同努力，则时局之转危为安，军事之转败为胜，可以立

待。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提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以11、12两月完成淮海战役。”

△　华东“剿总”政委会决定在所属辖区开征所谓地方自卫特捐，规定：食盐每市担附捐金圆一元五角，棉花每市担从价附捐3%，棉纱每包从价附捐5%，卷烟按原征货物税额附捐50%，运费附捐按原运价附捐10%，茶叶（限皖省内）每市担从价附捐10%，烟叶（限豫省内）按省征货物税额附捐50%。

△　美国国务院宣称：自4月份以来，已有8827万美元军事援华基金移交南京政府，占第八十届国会所通过的1.25亿之军事援华费用的75%。

△　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代司令林伟俦与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亲赴前线鸡笼山，督导第五十四军攻取塔山、第六十二军攻取大台山。第八师发动猛攻，一度进抵三孔桥及塔山附近，因遭解放军激烈抵抗被迫撤回原防。

△　侯镜如率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由塘沽海运抵葫芦岛。当日，侯在锦西中学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进攻塔山、增援锦州的作战方案，确定12日调整兵力部署，13日发起进攻。

△　廖耀湘西进兵团新编第三军攻占彰武，企图切断解放军攻锦部队的后方补给线。

△　国民党军第四兵团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为打通平张线，由

康庄分两路向东进击，与解放军发生激战。暂编第二十六师由宣化向东进击，以为策应。

△　陕西大荔国民党军两个旅经吕村向解放军进攻。

△　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占西拔子、青龙桥、八达岭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军守护团一个营。平汉路解放军进攻高碑店。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前委扩大会议在丰镇召开，决定主力向绥西、绥北进军。

10月12日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乘“重庆号”巡洋舰停泊葫芦岛外，分批召集军官训话，命令坚决拿下塔山。占领阵地者官升一级，畏缩不前者就地正法。并悬赏每人5000万金圆券，组织“奋勇队”，继续进攻塔山阵地。激战竟日，伤亡惨重，未能奏效。

△　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自美返抵南京晋见蒋介石，报告赴美参加9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会与国际开发银行理事会的经过。

△　卫立煌同总统府参军罗泽阔飞葫芦岛视察，当日返沈阳。

△　廖耀湘兵团第七十一军先头部队到达饶阳河岸。

△　行政院命令各地政府机关和学校从速肃清共党分子，“严密防范，彻底清查”。

△　河南信阳北上国民党军进占临颍。

△　东北野战军进占辽西小凌河，逼近锦州市区。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趁傅作义援绥部队东返之机，从是日起，挥师西进，攻略绥西、绥北地区。

△　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平北西拔子地区击溃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两个团，并在郭家堡全歼第二〇八团。

△　太原前线解放军攻占武宿机场和北营车站，全歼守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八团和保安第十八团。

△　西北野战军于是日拂晓在大荔地区发起总攻，在李家坡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五师一个团又二个营。整六十五师师部及整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南逃，伤亡惨重。

10月13日　　蒋介石委派刘峙、张钫、何思源、韩德勤等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

△　蒋介石因锦州危急，电令廖耀湘：“西进兵团应星夜强渡饶阳河，攻占新立屯，尽速向锦州挺进。”

△　廖耀湘西进兵团各部均先后进至彰武东、西地区。卫立煌、廖耀湘、罗泽阔同到新民、彰武、台门、新开河一带视察，卫当日返沈。

△　国民党军东进兵团调整部署，在海、空军及炮火支援之下，向塔山全线发起进攻。右侧第八师进抵三孔桥附近，第九十五师夺取二孔桥，左翼一部曾突入塔山，展开逐屋争夺，终被解放军击退，双方伤亡惨重。

△　解放军猛攻锦州，集中各种火炮进行猛轰，并以步兵发起冲锋，激战至是日夜，国民党军城外据点尽失，退守城垣。

△　行政院同意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呈请辞职，任命何廉代理校长。

△　河南参议会请求南京政府派大军分守开封、郑州。

△　长沙绥署副主任黄杰、参谋长王天鸣由长沙抵穗，访晤穗绥署副主任黄镇球。次日，黄、王赴香港，与宋子文会商湘、粤两省边界联防问题。

△　陕西国民党军以驻蒲城、富平、耀县等地共六个旅进行反击，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战斗，次日由澄城向北撤退，转移至石堡、韩城以南地区休整。

△　华北野战军四纵于平北延庆县康庄东北之郭家堡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六军第三八〇团。

△　朱德复电欢迎原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等率部起义。

△　上海《大众夜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

10月14日　　蒋介石颁发聘书，聘陈省身、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庄长恭、翁文灏、竺可桢、茅以升、凌鸿勋、秉志、伍献文、陈桢、胡先骕、钱崇澍、李宗恩、林可胜、冯德培、汤佩松、俞大绂、汤用彤、冯友兰、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梁思成、王宠惠、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达32人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三届评议员。

△　东北野战军经五昼夜激战，扫除所有锦州外围据点，并构筑交通壕进逼城下。是日上午11时，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从城东南角突入城内，展开街市战。

△　锦州守军预备队用尽，遂以警卫团及高射炮营担任城内第二线阵地防守。午后4时，范汉杰到卢浚泉指挥所，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黄昏后向锦西突围。

△　侯镜如指挥锦（西）葫（芦岛）各军继续猛攻塔山，仍无进展。

△　廖耀湘对西进兵团下达攻击命令：新一军、新三军分别强渡饶阳河与柳河，向新立屯攻击前进，并准备尽速向锦州挺进；以新六军、第四十九军为第二线，随后跟进；第七十一军向黑山攻击前进，相机占领之。

△　平北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集中八个团由康庄向东进攻。

△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秘密派人与解放军联系，表示决心起义。

△　太原国民党军攻占凤阁梁。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批准援华款项700万美元，作为购买茶、麦、机械工具之用。次日又宣布该署顷拨款460万美元，以援助中国购买小麦。

10月15日　　解放军攻克锦州。经31小时激战，东北野战军于是日中午攻占锦州国民党军指挥所——电力公司，守军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所辖第六兵团部、第九十三军及第一八四师、第七十九师，共八个整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地方部队全部被歼。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以下高级军官36人，其他被俘官兵8.84万余人，共歼敌10.8万余人。至此，北宁线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3.7616万人。

△　蒋介石偕宋美龄自南京飞抵沈阳，严令廖耀湘兵团西进，攻占新立屯，速援锦州；并写亲笔信令空投郑洞国，令郑率长春守军赶快突围。

△　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再次向塔山阵地发起轮番攻击，并组织敢死队反复冲锋，双方展开白刃战，战况空前激烈。锦州被攻克后，国民党军于17日停止进攻。塔山阻击战持续六昼夜，共毙、伤、俘虏国

民党军五个团长以下7700余人。

△　廖耀湘兵团强渡饶阳河，占领新立屯、无棵店、北大营子等地，并准备向阜新攻击前进。

△　烟台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撤退，运抵葫芦岛。

△　国民党军进占苏北东台。

△　由平北康庄东出之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复占青龙桥。

△　平北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予敌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至此，平北攻势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人。

△　太原城郊解放军经10昼夜连续进攻，于是日扫清城南大马村、北张、北营及城东南老坟上、石咀子一线以南所有据点，并占领东山碉堡线的重要门户石咀子及李家山、凤阁梁高地，以炮火控制了太原城及城北机场。

△　华北解放军攻占察北商都。

△　山东解放军进驻临沂、烟台。至此，山东全省除青岛外，均获解放。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中国8月19日的经济改革，现在似乎是要很快收场了"，"与此相并行的登记工业商品和检查仓库，现在渐渐停止，并无显著的效果。"

△　上海生活书店经理薛迪畅等，被特种刑事法庭检察官以"宣传共产主义"提起公诉。

10月16日　　蒋介石在沈阳召集东北将领训话，并单独召见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等指示机宜。蒋当日

飞北平，中途曾到锦西、葫芦岛作短暂停留，口头指定陈铁负责指挥锦、葫各军，继续攻打塔山，收复锦州。抵北平后，蒋即向卫立煌下达手令："应令西进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同日，蒋在北平听取傅作义关于华北军政情况的报告。

△　卫立煌获悉锦州失守后，即电廖耀湘回沈阳商议。卫认为西进兵团应立即退回沈阳，廖则主张向营口撤退，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　杜聿明等到新民与廖耀湘同赴新立屯视察。廖提出西进兵团向营口转进，与东进兵团会师的方案，获杜同意。当晚杜返沈阳以此复命，廖亦回沈请示。

△　郑洞国接到蒋介石要长春守军立即突围命令后，迅即召集军长和参谋长等开会，决定17日拂晓突围。

△　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获悉解放军欢迎起义后，当晚立即进行起义部署。

△　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称："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　陕北国民党军趁西北野战军主力转移，复占合阳；次日，又攻占阳澄。

△　陕南国民党军复占河南荆紫关。

△　是日晨，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攻克绥东陶林，俘国民党军300余人。

△　太原城郊解放军从是日起，开始重点进攻太原城的主要屏障东山主峰，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四大要点展开猛烈进攻。

△　黄杰由港返穗，参加黄镇球主持的粤、湘、赣三省联防会议。

△　南京各大学教授邱致中等105人，为呼吁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特发布告当局书，提出改善待遇之具体办法。

△　国立北平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10月17日　　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在沈阳会商，不主张廖兵团再继续西进，决定廖兵团先打下黑山。会商毕，廖即返回新民兵团总部。因行动方案迟迟不能决定，廖耀湘兵团数日来在新立屯一带徘徊不前。

△　曾泽生率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全部三个师起义，退出长春，并引导解放军进入其守备区东城。

△　立法委员尹树贤、罗衡等组织民主自由社。

△　西北野战军自14日起在陕北连续扫荡富平、蒲城地区，歼灭第一师一旅山炮营及保安团700余人。是日，解放军撤至白水地区。至此，荔北战役结束，此役歼灭国民党军2.5万余人，内俘1.1万余人，争取起义千余人，解放军伤亡9600余人。

△　中共中央电贺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号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西）、葫（芦岛）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15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11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

△　美国总统杜鲁门与经合总署署长霍夫曼及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举行会议。霍、莱汇报了2.75亿美元援华计划的进展情况，称迄今

为止，已有七千万美元拨作复兴计划的款项，正协助制止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蔓延，杜鲁门对此甚表欣慰。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在香港称：如青岛陷于中共之手，美国海军将利用香港之英方一切便利。

10月18日　　蒋介石自北平乘专机再飞沈阳巡视，在机场召见卫立煌、杜聿明等，在专机内举行军事会议，午后原机返北平。

△　长春守军骑兵旅1000余人、保安旅3000余人相继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进入长春城包围新七军，周恩来致信郑洞国，劝其率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加入解放军行列。是日晚，新七军派代表与解放军接洽，达成投诚协议。

△　湖北国民党军复占枣阳。

△　立法院开会检讨物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出席说明。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主张美国长期援华。

△　中英《香港关务缉私协定》及《划界附图》在南京换文。

10月19日　　长春宣告和平解放。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长春守军第一兵团部、新七军军部及所辖新三十八师、暂第五十六师、暂第六十一师、军直骑兵团、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第一、第二旅等共4.7万人，放下武器，并在大同广场向解放军举行缴枪仪式。

△　应蒋介石电召卫立煌、杜聿明飞北平，会商东北军队今后行动方针。决定东北实行总退却，令廖耀湘西进兵团经大虎山、黑山向南，在锦西东进兵团策应下，“规复锦州”，然后经北宁线入关；另以辽阳第五十二军抢占营口，准备陆路退却受阻时，即改经营口，会同

沈阳守军，从海上撤退。

△　午后，卫、杜同机飞回沈阳。随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刘玉章等转达蒋介石命令：西进兵团与东进兵团应同时以全力向锦州进攻；令廖兵团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令刘玉章第五十二军攻占营口；令周福成第八兵团固守沈阳。

△　蒋介石在北平召见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山西省参议会参议王怀明等。

△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愿与苏联开始新航空协定之谈判，以代替于1949年9月期满之协定，但要求结束苏联单独在新疆经营航线的权利，新中苏航线应以中、苏各控制一半为基础。

△　美国海军发言人宣布：美驱逐护航舰数艘，即将转让南京政府。

△　鄂北国民党军复占随县。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在绥远攻占托克托，守军渡黄河西逃；次日，解放军进占乌兰花，守军逃固阳、武川。

△　太原外围解放军经三天激战，相继攻占东山牛驼寨等阵地，歼灭阎军第八总队一个营，及保安第六、第十三团和第七十一师等部2000余人，驻罕山守军奋斗第八团投诚。至此，解放军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

△　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邹大鹏为长春特别市市长。

10月20日　　廖耀湘兵团开始向黑山以东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遭到顽强抵抗，国民党军陆续投入兵力，仍未获进展。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上海分期禁舞决定，以后绝对不增发舞

厅新执照，12月起每月抽签停业一家，分期禁绝。

△　上海粮食和物资供应问题日益严重，市场匮乏，生产停顿。是日，三省（苏、浙、皖）二市（南京、上海）物资调节会议在上海召开，蒋经国要求三省二市加强物资交流。蒋经国接见记者时又谓：上海工业原料，存货充裕，各种工业品存货亦丰富，三个月内不会有匮乏之虞，表示对上海区经济管制有确实之把握。

△　北平全体市立小学教师4000余人举行总罢教，提出冬季配煤、借薪两月等要求。

△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办公，唐天际为主任。

10月21日　　杜聿明飞葫芦岛，召集陈铁、侯镜如、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宣布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锦（西）葫（芦岛）部队23日再次进攻塔山。

△　廖耀湘兵团继续猛攻黑山，不克。

△　国防部发表一周战局，谓本周战事重心仍在东北，烟台国民党军转移有利阵地。

△　阎锡山以精锐第三十军和第十总队三个团在百门大炮支援下，向牛驼寨阵地反击，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

△　傅作义乘华北解放军主力不在冀中，决定抽调第九十四军、第一〇一军暂编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骑兵第二师等部，组成突击兵团，由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任总指挥，企图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

△　国民党军自西安空运抵太原。

△　晋北国民党军复占天镇。

△　上海区经济管制协助督导蒋经国抵南京访行政院长翁文灏，商谈物价问题。

△　为策应华东野战军作战，中原野战军发起郑州战役，是日分数路逼近郑州，并切断郑州黄河大桥，以防守军北逃。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攻克武川，向包头挺进。一部占毕克齐、台格木、卓资山等地，形成对归绥城的包围。

△　皖北解放军攻占凤台，次日撤离。

△　南京教师罢教，抗议粮荒，要求保障基本生活。

10月22日　　廖耀湘调新一军投入进攻黑山战斗，并亲自率指挥所赴胡家窝棚督战，激战竟日，仍无所获，遂决心向营口转移。于晚9时发布命令：新六军、第四十九军经大虎山以南，向大洼、营口转移；新三军随之跟进，并节节抵抗，迟滞共军南进；新一军、第七十一军继续猛攻，占领黑山，掩护兵团主力转移。

△　行政院长翁文灏邀蒋经国、王云五、关吉玉等商谈经济情况。

△　立法院讨论中苏关系，决议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公布苏联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事实。

△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我们的军事顾问们觉得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已荡然无存，而且也寻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改变这种局势。"

△　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守军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军第一〇六师、第九十九军第二六八师弃城向新乡北逃，在郑州以北30里之老鸦

陈地区遭解放军包围，一万余人全部被歼，郑州战役结束。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攻占绥远和林格尔，全部控制了镫口以东至台格木段铁路线。

△　毛泽东致电吴化文等，嘉勉该军起义，并表示："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上，对于任何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只要他们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幡然觉悟，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领导，加入人民解放军阵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即表示热烈欢迎。"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名致函联合国大会，就美国侵华提出控诉，要求转发各会员国予以讨论。

△　天主教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赴新加坡访问。

△　海关发表本年8月份全国进出口统计数字，计进口总值法币125万亿元，出口总值法币101万亿元，全月入超达24万亿元。

10月23日　　辽沈战役第二阶段辽西会战开始，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九个纵队27个师，对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12个师）实行分割包围，以达到全歼廖兵团的目的。是日，第五、第六纵队攻占彰武、新立屯，断敌退路。

△　杜聿明指挥锦（西）葫（芦岛）部队再次猛攻塔山，被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军损失惨重。

△　廖耀湘兵团继续猛攻黑山，反复争夺，均为解放军击退，损失惨重。

△　华北"剿总"突击兵团集结河北涿县，旋分路南开，次日抵定兴。

△　沈阳国民党军复占海城。

△　翁文灏到北平谒蒋介石，报告限价后之一般经济情况，并请示安定经济新办法。

△　立法院检讨时局，包华国主张立法院应发挥监督政府之权力，会上有人提出请孔祥熙、宋子文捐出财产作军费。

△　蒋经国为限价问题发表《向上海人民进一言》，希望上海市民“本着政府既定的决策，同心同德，一致协助政府，来保障此次经济改革已得的成绩，争取最后的成功”。

△　据统计，截至9月底，南京政府收兑的黄金共达190多万两，白银达100多万两，银元达190多万个，美金4400多万元。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进逼绥远包头，邓宝珊率部分守军西撤，解放军予以追击。

△　中共中央电贺郑州解放，指出：“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

△　司徒雷登向美国务院请示：“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并且更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吗？”“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吗？”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张申府在《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主张“以民主的方式结束战争，协议恢复和平”，提出“在军事上争取主动，诚不如在和平上赢得主动”。声称反对“穷兵黩武”，谓国共继续作战是“不仁也不智的冒险”。

10月24日　　蒋介石在北平邀请各大学校长、教授胡适、陈垣、梅贻琦等，征询有关目前经济问题的意见。

△　国防部长何应钦飞抵台北视察新军训练情况，并发表书面谈话，要台人协助政府“克服戡乱军事之困难，和衷共济，消灭共匪”。

△　国防部电示刘峙，加强陇海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路临城至蚌埠段的防御，以“攻势防御”“巩固徐州而确保之”。

△　宋美龄为本日联合国日向全国发表广播以庆祝，并报告联合国劝募儿童救济金中国委员会的劝募成绩。

△　廖耀湘兵团以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第九十一师，新一军第五十师，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及第二〇七师第三旅，共五个师的兵力，在200余架次飞机、200余门大炮支援下，向黑山、大虎山阵地发动三路猛攻，均为解放军击退，战斗异常激烈。

△　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由辽阳、鞍山袭占营口。

△　热河国民党军进占隆化。

△　苏北国民党军进占新安。

△　豫南国民党军进击桐柏山以西解放军。

△　开封解放。开封、兰封守军在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弃城逃跑，中原解放军随即收复两城。

△　豫北解放军收复华北煤矿区焦作县城。

△　北平各大学教授朱光潜、沈从文等100多人联名写信，为民请命，要求救济教职员生活，宣布停教三日。

△　天津海关及电信局职工实行怠工，要求改善待遇。

10月25日　　蒋介石再飞沈阳，于北陵机场召见卫立煌，要他严令廖耀湘兵团按原计划，日夜兼程，继续西进。

△　辽西黑山战斗趋于白热化，廖耀湘兵团多次组织集团冲锋，双方短兵肉搏，阵地几度易手，终被解放军击退。廖耀湘见进攻不能得逞，遂命令收缩部队，以第四十九军为前导，经台安向营口撤退。东北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纵队开始从四面对廖耀湘兵团实行合围。

△　蒋经国召集上海各业负责人谈话，谓经济管制政策决不放弃，要求厂商继续按限价供应市面。

△　行政院长翁文灏自北平回南京。

△　阎锡山为固守太原，集中兵力于城东东山之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四大要点；徐向前兵团决定缩小攻击正面，全力夺取东山制高点。是日，总攻东山战斗开始，双方均以主力投入，展开反复争夺，战斗极其激烈。

△　长春解放军南渡辽河，进逼铁岭以南之辽河屯、乱石山。

△　鄂北解放军攻占应山。

△　中原解放军收复陕州，27日收复灵宝县城。

△　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及中原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庆贺郑州、开封、洛阳三大名城解放。

△　北大教授罢教，要求一周内借薪二个月，以维持生活。清华、师大、燕京、中法、北平研究院、北平商工、北平蒙藏学校、辅仁、北平第一助产学校及北平16所市立中学全体教员纷纷响应，宣布罢教、罢课、罢诊、罢工。

△　江海关贪污案主犯尹兰荪等被枪决。

10月26日　　行政院订定安定经济新办法，有日用必需品价格分区调整，紧缩通货，增加生产，改善公教人员生活等内容。

△　立法院举行紧急会议，决咨请行政院根绝抢购问题，解救当前经济危机。

△　廖耀湘兵团在撤退中陷入重围，被东北野战军全部包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无梁殿以南，台安、魏家窝棚以北，厉家窝棚车站以西约1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解放军随即对之实行分割围歼，在胡家窝棚歼灭敌兵团指挥所和新一军军部，廖耀湘转移到新一军第三十师师部，廖部失去指挥，陷入各自作战的混乱局面。当晚，廖耀湘遵照卫立煌之命令，率残部经大虎山至老达房公路，企图突围向沈阳撤退。

△　卫立煌亲令暂编第五十三师立即由辽中西渡辽河，接应廖耀湘兵团。该师由卡力马渡河后，在牛心坨遭解放军截击，迅速后撤，退回辽河以东。

△　傅作义到张家口布置防务，28日返北平。

△　华北“剿总”突击兵团先头部队第九十四军乘火车抵达定兴，继乘车向保定前进，企图会同保定新二军偷袭石家庄，行至徐水，遭解放军伏击受阻，延至次日才抵达保定。

△　华北野战军十四纵和太行军区部队解放焦作煤矿和修武、武陟县城，在修武西南雁门等地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军补训团及河南省保安团等部共5000余人。

△　鄂北国民党军复占老河口。

△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台北开幕，选举沈怡为会

长，赵祖康、钱昌照为副会长，茅以升、朱其清等九人为董事，29日会议闭幕。

10月27日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分头猛攻廖耀湘兵团，由西、北、南三面向东南压缩，迅速与东面之部队靠拢。廖耀湘部主力被歼，余部溃不成军，纷纷投降；残部逃至六间房、大小兴庄等地，次日为解放军全部围歼。

△　清晨，蒋介石派飞机至葫芦岛接杜聿明到北平，面授机宜。午后，杜聿明由北平飞沈阳，中途在锦西降落，令锦西各部停止攻击，退回既设阵地。傍晚，杜聿明到沈阳，与卫立煌、赵家骧商定，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令周福成死守沈阳。

△　上午，蒋介石于北平偕徐永昌、俞济时等飞承德巡视。召集中上级军官，指示承德地区在国防上所占之重要性，并勖勉负责固守。当日下午返回。

△　蒋介石任命陈国廉为中华民国驻丹麦国特命全权公使。

△　沈阳守军收缩防区，第五十三军军部及第一一六师（欠一团）于夜间从铁岭南撤沈阳，途中遭解放军截击，一个团被歼。

△　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电令留守辽中的新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立即开往沈阳增防，又电令第五十二军固守营口，同时电报蒋介石，请求派军舰接应营口撤退。

△　坚守塔山的解放军撤离他去，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旋即进占。

△　行政院政务会议委任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陈鼎勋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李振清为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官。

△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两个师、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奉命调至平汉线，策应第九十四军进攻石家庄。

△　豫东国民党军退出民权。

△　湖北国民党军复占应城。

△　经济管制委员会讨论应付经济危机的新办法，决定放弃经济管制和限价政策，粮食可自由买卖，工资可调整，货物可合本定价。

△　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在新城子歼灭由铁岭向南突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军部及第一一六师和一个守备队，解放铁岭。

△　太原解放军第十五纵队攻占东山淖马主阵地后，是日阎锡山军在70门大炮的掩护下发动反攻，展开激烈争夺。战至次日，解放军击退阎军11次进攻，巩固了阵地。

△　华北解放军收复河南修武县城。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等：当面敌人解决之后，应以不少于三个纵队的有力兵团，星夜兼程东渡辽河，歼灭海城、牛庄、营口之敌，阻塞敌人海上逃路。如果沈阳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我军应迅速向海城、营口方向进击。

△　毛泽东、朱德电复原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等，对他们率部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欢迎。

10月28日　　东北野战军取得辽西大捷，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辽西会战全歼廖耀湘第九兵团部及五个军部，12个师（旅），共10万余人，其中兵团司令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以下官兵8.77万人被俘。至此，解放军已取得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决定性胜利。

△　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分头东渡辽河，向沈阳、营口急进。

△　华北国民党军分四路奔袭石家庄，石家庄战役开始。是日，国民党军在方顺桥、清苑、望都、安国、定县等地遭到解放军阻击。

△　中共中央电贺东北野战军辽西大捷，激励全体官兵“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体干部的决议》，指出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已经成为各级党委面临的重大任务。

10月29日　　蒋介石在北平答纽约《先驱者论坛报》记者斯蒂尔问，称“东北问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序幕，今日历史正在重演”。呼吁美国应重视中国局势，“无完整之东北即无和平之东亚，而拯救亚洲之努力，又须以中国为重心”。

△　辽西会战后，沈阳守军惊慌失措。东北“剿总”开始撤退，卫立煌偕高级官员赴锦西，沈阳守军交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

△　进攻石家庄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进占望都，第三十五军和第十六军主力奉命南下，开平保线向南增援。

△　立法院开会讨论当前经济危机，主张取消经济管制和限价政策。监察院亦对行政院当前之经济政策提出纠正。

△　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携经济改革补充办法飞北平，向蒋介石请示。

△　美国任命蒲立特为议会援外监督委员会对中国方面的特别顾问。蒲氏奉派来华调查中国紧迫情势。

△　美海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驶抵青岛，该舰队包括2.5万吨航空

母舰“普林斯顿号”，及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八艘。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并告聂荣臻、薄一波，指出：傅部以三个军及两部骑兵位于平保线向石门进攻，“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灭该敌”。

△　东北解放军攻克抚顺，歼灭国民党军第二〇七师一部；并在东陵、水泉等地歼灭第五十三军暂三十师一部，逼近沈阳；第一纵队攻克新民，追歼骑二旅一部。

△　河南解放军占领考城守军投降。

△　由吴化文率领起义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及其所辖之整编第一五五旅、第一六一旅和独立旅，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及步兵第一〇三、一〇四、一〇五师。吴任军长，杨友柏、赵广兴、何志斌分任师长。

10月30日　　上午，杜聿明奉蒋介石命令飞沈阳调整该市防务，因机场混乱不能降落，遂直飞北平向蒋请示锦（西）葫（芦岛）部队行止。蒋命杜回葫芦岛待命，并命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蒋旋返南京。杜飞返葫芦岛，计划撤退营口和葫芦岛之部队。

△　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白崇禧自汉口抵南京参加，何应钦推荐由白统一指挥徐州、华中两“剿总”，白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上蔡、太和地区，并提议以第三兵团随之行动。次日，继续开会，白又表示不愿承担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之责任。

△　卫立煌偕赵家骧、董文琦等由沈阳飞抵锦西，一周后卫奉蒋介石令飞北平。

△　蒋介石自北平飞回南京，当晚召集翁文灏、孙科、张群等于官邸举行紧急会议，商讨经济改革补充新办法，蒋经国亦参加。

△　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孙连仲为总统府参军长，派李文为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为南京卫戍司令。

△　进攻石家庄之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并新二军暂编第三十二师由平、津地区进抵定县以北唐河南岸，继遭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纵队顽强阻击，被迫退回北岸。同日，国民党军骑十二旅自望都进至东、西四旺，新骑四师进至蠡县北潘营。

△　美国务院发言人宣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因沈阳军事情势而有重大变更。

△　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到青岛。

△　南京《大学评论》周刊发表短评《识时务，知进退——欢送蒋总统访美！》称“我们认为在今天蒋总统如果肯谦冲为怀，取法孙中山先生和华盛顿总统，功成身退，赴美访问……必能对国事有补”。

△　东北野战军攻克本溪、辽阳、鞍山；第十二纵队在沈阳西吴家荒、大幸屯等地歼灭由新民撤退之第五十三军第一三〇团，逼近沈阳西南。至此，沈阳守军已被包围于沈阳市及其近郊。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在包头西拉哈忽洞，歼灭邓宝珊部新编第十一旅一个团，并于当日包围包头西公子庙，占领长乐店。绥西、绥北地区宣告解放。

△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进入冀东牵制傅作义，粉碎其偷袭石家庄的企图。

△　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密电华南分局，请即抄送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分别征询意见，并尽先邀请民革、救国会、农工党、致公党、民建会各派代表及郭沫若、马叙伦等早日北来。

10月31日　　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从11月1日起，取消限价政策，粮食作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糖、煤、盐及其他日用品，由政府核示定价，公用交通事业调整价格，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及工资，调整税收。至此民国政府推行的“限价政策”彻底失败。

△　周福成电蒋介石：“卫立煌弃职逃走，职正调整部署，竭力奋战，孤守沈阳待援。”

△　东北野战军分路向沈阳攻击，各路均逼近城郊。第十二纵攻克沈阳南苏家屯车站，歼第二〇七师暂十团；第二纵在三间房歼第二〇七师第二旅第四团一部，并突入沈阳市铁西区，沈阳以西国民党军三个骑兵旅投降。同时，东北野战军第七、八、九纵队对营口实行合围，以切断沈阳守军南撤路线。

△　华北野战军发起的绥西攻势胜利结束。是役，共歼灭保安第一、第二团，新十一旅三个整团，解放集宁、丰镇、兴和、陶林、和林等15座城市，控制铁路406公里，为解放绥远全省奠定了基础。

△　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歼灭企图偷袭石家庄之第九十四军第五师1000余人，并收复清风店车站和望都县城。

△　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主力除第四、第十一纵队和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即行南下外，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左右”，“于明年一月至六月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11月

11月1日　　解放军攻克沈阳。是日凌晨，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第一、二纵队为主攻，由西部和西北部突破；第十二纵队由南部突

破；独立第一、三、四师由东部和北部突破。10时，第一、二纵队攻占铁西全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二〇七师两个旅大部；十二纵攻占城南飞机场，歼灭守军一个团。下午，沈阳守军投降，在大东营继续抵抗之第二〇七师第一旅第二团被消灭。至此，东北最大城市沈阳宣告解放。是役歼灭东北“剿总”所属一个兵团部、二个军部、六个师、三个骑兵旅，共13.45万余人，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以下将官106名被俘。

△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明东北战局及其失败原因，并谓东北战事虽然失利，但共军主力尚难即予华北局势以直接威胁，整个战局必无可虞，应坚定信心，补救缺陷。

△　蒋介石特派翁文灏为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指定该会委员居正、王宠惠为常务委员。特任唐生智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葫芦岛与杜聿明商洽东北守军残部撤退事宜。

△　是日夜，营口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开始登船南撤，至次日，仅撤走该军军部及第五十二师。

△　傅作义得知华北解放军主力已南下，前锋已过蔚县，急令第九十四军由唐河撤至方顺桥，第三十五军退至保定、涿州间，驻定兴。

△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黄百韬部在郯城、邳县一带堵击自山东南下之解放军。

△　美国防部宣布，又以500万美元拨交南京政府购置武器及弹药。

△　美、英政府劝告本国在华北侨民撤退。

△　云南、山东等地大学教授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　太原东山牛驼寨战斗激烈。阎军部队在日本指挥官和“执法队”的威逼下发动五次反攻，均为解放军第七纵队击退，解放军乘胜夺取了牛驼寨主阵地。

△　东北野战军南下先遣兵团第四纵队由锦州以南出发，开始秘密进军关内。

△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将原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类。部队番号旅改称师，纵队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野战部队按其所在地区分为西北、中原、华北、华东、东北五个野战军，共有20个兵团。全国分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与中央分局同级者为二级军区，与区党委同级者为三级军区，与地委同级者为军分区。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从1949年1月起，全军组织和番号实现统一。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名义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署进行下列罪恶行为中的任何一种活动，皆以战犯论罪：一、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或拆毁焚烧人民房屋者；二、施放毒气者；三、杀害俘虏者；四、破坏武器弹药者；五、破坏通讯器材，烧毁文电案卷者；六、毁坏粮食、被服仓库及其他军用器材者；七、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及各种机器者；八、毁坏海陆空交通工具及其设备者；九、毁坏银行金库者；十、毁坏文化古迹者；十一、毁坏一切公共资材及建筑者；十二、空袭轰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　中国商船船员团体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致函司徒雷登，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航运业。

11月2日　东北野战军攻占营口。是日晨，第七、八、九纵队及辽南独二师从三路发起攻击，战至10时，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全部，第二十五师一个团及军部运输团，共1.48万余人。至此，历时近三个月、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宣告结束，东北及热河全境获得解放（锦西、葫芦岛和承德之国民党军相继撤走），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四个兵团，11个军部，32个整师，三个骑兵旅，四个守备总队（相当于师），其他独立团及特种部队、直属部队、地方部队，共47.2万人，其中毙、伤5.68万人，俘32.433万人，投诚6.49万人，起义2.6万人；解放军伤亡6.9213万人。

△　行政院长翁文灏出席立法院为经济改革失败召开的质询会，承认政府关于收支平衡、币制改革、限价政策和调整工资及公教人员待遇等目标均已失败，并造成了新的通货膨胀。

△　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不仅没有完成预定计划和任务，反而给上海市民带来了痛苦。表示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歉意。

△　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外交部长王世杰返抵南京。

△　华北野战军第二、六纵队兵临绥远归绥城下，预定11日扫清外围，16日攻城。

△　进攻石家庄之国民党军全面北撤。第三十五军开北平西郊，第九十四军开曹河，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开徐水、固城。石家庄周围恢复正常状态，保卫石家庄战役结束。

△　豫北解放军攻克获嘉县城，歼灭河南保安团等部3000余人。

11月3日　行政院长翁文灏及行政院各部长因经济改革失败决定总辞职。蒋介石批示慰留。上海区经济管制协助督导员蒋经国赴南京向行政院提出辞呈获准。

△　行政院通过公教人员待遇，按10月份新标准增加一倍半。

△　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葫芦岛，向杜聿明传达“放弃徐州，固守淮河”的方案，并令杜即赴蚌埠指挥。杜表示要待葫芦岛守军撤退完毕后才能成行。

△　杜聿明电蒋介石请示锦（西）葫（芦岛）守军撤退事宜。蒋复电：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仍归华北“剿总”建制，其他各军撤往上海、南京。杜即按蒋电示部署撤退。

△　冀东国民党军复占三河。

△　鄂东国民党军复占广济、黄梅。

△　豫北国民党军复占封丘。

△　太原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与解放军联系起义，因所属第三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告密，黄氏被捕并被解往南京，于27日遇害。

△　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保证中国政府“将继续视美国为旧友。并盼美国予我以合时及慷慨之援助”。次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表示祝贺。

△　武汉28所院校教职员提出总请假，要求改善待遇。南京小学教员亦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

△　北平各大学教授周炳琳、金岳霖等47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指出：“此举实难免于‘顺我者昌，逆我者死’之诟病。”

△　中共中央电贺东北解放，指出：东北全部解放“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基础”。

△　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朱其文为沈阳特别市市长。

△　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在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时所提出的意见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的建议。还同意在新政协筹备单位中增加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两个单位。

△　伊朗首任驻华大使华乐抵达南京，13日向蒋介石递交国书。

11月4日　华北“剿总”傅作义、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会商华北国民党军行动方针。确定“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

△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讲话中称：总体而言，美国救济中国计划颇有成功，但加强对华援助存在诸多困难，提出美援必须由美国人就地密切监督。

△　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奉命到徐州会晤徐州“剿总”所辖军以上指挥官，传达蒋介石关于徐州作战部署。

△　刘峙令孙元良第十六兵团（欠第九十九军）由商丘开赴涡阳、蒙城。

△　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军等部由葫芦岛撤往秦皇岛。稍后，独立第九十五师撤往塘沽。

△　察东国民党军复占赤城、尚义、龙关。

△　晋北国民党军复占阳高。

△　民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达成商务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在短期内以3500码之纺织品运往印尼，而印尼则以橡胶输至中国。

△ 南京中小学教员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 南昌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总罢工。

△ 中原野战军占领南阳，收复泌阳县城。

△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云为主任委员。

△ 是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判决书，确认日本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与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条英机应负扩大侵华战争责任，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及贺屋兴宜等人，应对日军占领南京后六周内屠杀20万中国人民的世界暴行史上最残酷的事件负责。

△ 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年会报告称：基督教会在全国各地维持13所大学，223所中学，202所医院，五所医学院，有外籍医师227人，护士180人。

△ 苏联重新要求远东国际委员会管制日本。

11月5日 顾祝同主持徐州“剿总”高级军事会议，刘峙、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均出席，会议讨论了蒋介石下达的徐蚌会战计划。决定以白崇禧部二个兵团、四个绥靖区的23万部队防御平汉路南段及长江中下游；将刘峙集团的四个兵团三个绥署的部队向南转移，重点置于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止解放军南下，确保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具体部署如下：第二兵团邱清泉部由商丘向砀山、永城地区集结机动；第七兵团黄百韬部由新安镇移至运河西防御，位于连云港、海州的第四十四军受其指挥同时西转；第十三兵团李弥部由徐州东碾庄圩转向灵璧、泗县地区防守；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由柳河地区移蒙城待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

部由商丘移驻固镇、蚌埠防守；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弃临城、枣庄，退守韩庄、台儿庄地区。第一绥靖区周岳部仍位于淮阴、扬州地区；海州第九绥靖区撤销；合肥第八绥靖区撤弃，辖区并入第四绥靖区，夏威所属四个师守蚌埠；此外徐州“剿总”直辖第七十二、一〇七、六十六、九十六军，分守徐州、蚌埠、睢宁、五河。为加强徐蚌地区作战，将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改归国防部指挥，由确山、驻马店向阜阳、太和前进，参加徐蚌地区作战。以上总兵力为29个军、70个师，约70万人。当晚，顾祝同、郭汝瑰飞返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　李延年接刘峙电，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是日，商丘及海州国民党军分别向蚌埠、徐州集中。

△　国民党军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复占皖北蒙城、涡阳。

△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抵宁，出席南京军事会议。

△　翁文灏、王云五分别到行政院、财政部办公。翁氏对记者发表谈话，盼美国积极援助。

△　南京各大学教授刘不同、倪青原等40余人联名在《大学评论》发表《致蒋介石先生呼吁停战书》、《致毛泽东先生呼吁停战书》，要求双方停战，“图谋和平”。

△　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南京、浦口、江苏、安徽等地美军眷属即日撤退。同日，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也正式宣布：“在南京的美军眷属已决定撤退。”

△　美国新任副总统巴克莱表示，美将继续援华，并称：“中国的需要，以及向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均将受到郑重与有利的考虑。”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由青岛抵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称：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无意放弃青岛基地，并可能派海军陆战队来沪保护美侨。

△　内蒙古伊克昭盟准噶尔旗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保安师师长奇致中率部1900余人起义，参加解放军。

△　农林部对卅七年度全国棉产发表第二次估计：棉田面积3693万亩，减少63万亩，（约占1.67％）；皮棉1072万市担，减少60万担（约占5.3％）。

△　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分局，责成分局和钱之光在12月内将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绸伯、陈嘉庚等准备参加人民政协的几十名各方面代表送往解放区。

11月6日　为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南线主力，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挥，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发起了淮海战役。解放军参战部队有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七、九、十三纵队，鲁中南纵队、渤海纵队；苏北兵团第二、十一、十二纵队，西线兵团第一、三、四、六、八、十纵队，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共16个纵队约36万人，另有冀鲁豫和江淮地区的地方部队。中原野战军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纵队，共七个纵队约15万人，另有豫皖苏、豫西和陕南地方部队。投入总兵力约80万人。是日晚，解放军发现国民党军有全面收缩、撤退的迹象，遂决定提前发起进攻。

△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傅作义，指示今后华北军政措施，决定华北军政事务将由傅全权处理。

△　南京军事会议结束，决定实行战时体制。当日夜，傅作义自南京返抵北平，白崇禧返抵武汉。

△　察北国民党军复占崇礼。

△　晋北国民党军复占天镇。

△　蒋廷黻会晤马歇尔，请求美国派一特别军事代表团来华，并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作战，未获马氏同意。9日，蒋廷黻再就此事会晤马歇尔。

△　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务卿马歇尔正改变其以前之立场，赞同“全面及尽速援助中国”。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谓中国局势恶化，任何军事援助亦于事无补，“因此，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　无锡丝厂全体女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1月7日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东线黄百韬兵团战斗打响。担任围歼黄兵团任务的11个纵队分四路向陇海路出击：华野司令部率第一、六、九纵队，鲁中南纵及特种兵纵队，从临沂南下，直取新安镇；第四、八纵队由临沂西南地区指向邳县；苏北兵团第二、十二纵队及中野第十一纵，从临沂以南十字路地区南下，经宿迁、睢宁向徐州东迂回；原在睢宁、宿迁地区的华野第十一纵沿运河北上，指向运河车站。当日，解放军扫清了陇海路北侧300余里的广大地区，第四、八纵攻占邳县、滩上。

△　在淮海战场中路，华野山东兵团第七、十、十三纵队，在谭震林率领下由邹县、滕县沿津浦路南下，是夜攻占万年闸，逼近台儿庄。第三纵队及两广纵队自鲁西南丰县、单县出击，插向徐州西南，钳制敌军。

△　在淮海战场西线，由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野第一、三、四、九纵队，从郑州进至商丘东南和永城、亳县地区，与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发起汴（开封）徐（州）段作战。是日，在徐州以西张公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第一八一师5000余人，俘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兼第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

△　国民党军黄百韬第七兵团奉命由新安镇西撤，按第一〇〇军、第六十四军、兵团部、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四军的顺序向运河西岸撤退；第六十三军经窑湾镇渡河向运河西岸撤退。

△　上海实行户口总清查。

△　上海米价暴涨至每石500元金圆券，8日再涨至每石900元，9日又涨至每石1800元。

△　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洛（阳）警备司令部成立，豫西军区副司令员孔从周兼任警备司令员。

△　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河南汲县县城，歼灭“人民自卫队”1000余人。

11月8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讲演，表示决心贯彻“戡乱”方针，经济上将采取有效措施，并指责说：“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检讨外交政策，提出外交政策应慎重，内阁权力须加强，均以便利军事为目标。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撤销金圆券发行额以20亿为限的规定。11日又通过《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新规定兑换率。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2：1降为10：1，贬值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由4：1降为20：1。12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13日，蒋介石明令公布以上两个办法。“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　白崇禧在武汉华中“剿总”发表训话称：要“提高战斗意志，彻底执行总体战”。

△　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判断解放军将东西夹击徐州，于是改变原定将各机动兵团撤至徐蚌线两侧的计划，决将主力集结徐州。令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星夜向徐州地区集中，分别守备徐州、徐州东北茅村和徐山、潘塘镇、山口间地区。并令孙元良兵团向宿县、符离集间地区集结。

△　民国政府令：刚由北平回到南京的杜聿明返徐州任该“剿总”副司令；令李延年第九绥靖区在蚌埠组建第六兵团，指挥第九十九、三十九（刚由东北撤回）、五十四军由蚌埠向宿县前进；刘汝明第四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将蚌埠第九十六军归其建制，会同第六兵团向宿县推进，并守备该地；黄维第十二兵团由阜阳向蒙城、宿县前进。

△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所属第五十九军全部及第七十七军两个师共2.3万人于临城、台儿庄地区起义。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七、十、十三纵队乘机越过该部防地临城、枣庄、峄县、台儿庄等地，渡过运河，直插徐州东侧，于10日进抵大许家以西，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退路。

△　上海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多起，七万军警宪特出动在全市进行“大清查”。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发表谈话，谓愿尽力帮助解决配粮困难，美援米面即将运至，下月起供应无虞。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副国务卿罗凡特会商中国局势，决仍继续对华经济援助。

11月9日　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直接指挥国民党军作战。谓：“华中之共军现迫近京沪，倘吾人不能阻止此狂澜，民主国家或将丧失中国。”“敝国政府将竭诚欢迎阁下派遣高级军官一人来华共同磋商一军事援华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作

战指挥之参加问题。……敬请早日赐复为幸。”

△　蒋介石召见孙科、翁文灏、张群，商行政院长人选及组织内阁事。

△　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立法院报告外交，重述去年6月25日所列举苏联未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之事实，并提出今后申请美援两原则，即欧亚并重，军事及经济援助并重。

△　立法院通过《临时财产税条例》。规定：“临时财产税之征收，以充作戡乱军费及地方自卫经费为目的。”在征收总额中，戡乱军费占60％，地方自卫经费占40％。

△　由CC派组织的立法院“革新俱乐部”发表当前时局主张，提出：组织举国一致的责任内阁，加强中美联系，实行民生主义及推行各级自治。

△　解放军发现国民党军正向徐州集中，装备辎重已撤到运河西岸。华野司令部立即指挥部队展开追击和和截击。粟裕、谭震林向各纵队发出指示，号召部队不分昼夜抢渡运河西进，不怕伤亡，敌人跑到那里就追到那里，直到将其消灭。第四、八纵队在官湖、邳县以南运河车站附近追上第二十五军及第一〇〇军一部，第一、六、九纵队在堰头、窑湾、瓦窑等地追上并包围了第六十三军，第十一纵队及江淮军区独立旅攻占赵墩，主力向运河车站以西协同四纵、八纵攻击敌主力。担任迂回任务的苏北兵团第二、十二纵队及中野十一纵已到宿迁，准备西渡运河。

△　黄百韬第七兵团自7日由新安镇西撤后，于是日全军渡过运河，在曹八集、碾庄圩地区集结整顿，准备继续西撤。邱清泉第二兵团之一部与解放军在黄口附近发生战斗。孙元良第十六兵团（欠第九十九军）奉命开赴宿县。

△　河北国民党军第一〇一军（原新二军，欠暂三十一师）军长李士林奉命率军部和暂三十三师由保定北撤，该军暂三十二师留守保定。

△　锦西、葫芦岛国民党军余部13.78万人由海运南撤。次日，解放军进驻锦西和葫芦岛。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　美国经济合作分署署长莱普汉电香港借米万吨以救济上海。

△　南京、上海骚乱，数千饥民抢米。

△　杭州浙赣铁路局全体员工举行罢工，要求维持生活。

△　北平美国侨民开始部分撤退。

11月10日　　蒋介石电令黄百韬第七兵团停止西撤，固守待援。同时，解放军已占领大许家，包围曹八集，切断了黄兵团的退路。黄百韬被迫下令停止撤退，以碾庄圩为中心，筑阵地防御。

△　总统府官邸召开作战会议，讨论黄百韬兵团被围后徐蚌会战形势。正式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负责指挥徐蚌会战。杜当晚飞抵徐州，正式就职。

△　淮海战场解放军各部队继续向西撤之国民党军加速追击、猛攻。沿铁路两侧向西追击的华野第四、第八纵队渡过运河后，从东、北两面向以碾庄为中心的黄百韬兵团展开攻击；第十三纵队在曹八集将黄兵团先头部队包围。在南线担任大迂回的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二纵队，中野第十一纵，经宿迁渡运河，向徐州东南地区前进，从左侧堵截逃敌。

△　徐蚌告急，南京卫戍司令部宣布在东至上海、西至安庆、南至杭州、北至蚌埠的广大地区，实行临时戒严。同时，蒋介石将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免职，而以陈继承代之。

△　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升任第九兵团司令官。

△　蒋介石明令公布《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对囤积居奇者分别处以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　蒋介石特任徐堪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原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云五准免本兼各职。特任庞松舟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主计部主计长。

△　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由台湾抵南京述职。

△　外交部证实王世杰在巴黎时曾与美国务卿马歇尔商谈借款，现在继续商洽中。

△　行政院政务会议就收缩通货及充裕粮源事项决定四项办法：一、出售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有毛纺织全部资产（连同厂房及设备）；二、美援棉花易得之纱布即照市价出售；三、用纱布及其他日用品换购粮食；四、允准商人自由运销货物，严禁各地方政府之封禁办法，派员就地督促实行。

△　南京、上海抢米风潮扩大，南京食品公司亦被抢，军警开枪镇压，打死饥民三人，打伤11人。

△　绥远国民党军复占陶林、兴和。

11月11日　　行政院通过《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金银外币复准私人保有，但除银币外，仍禁止流通买卖。

△　财政部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金银外币准许持有，银币准许流通，政府铸造金圆，金圆券存款时得以同额金圆券兑换金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贬值五倍），黄金每两1000元，白银每两15元，银币每个10元，美钞每元20元。

△　黄百韬兵团四个军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于碾庄圩及其周围不到18公里的狭小地区内。蒋介石严令徐州“剿总”立即组织东援。刘峙、杜聿明下达东援第七兵团命令。同日，顾祝同飞临碾庄上空，令黄百韬固守待援。

△　在淮海战场东线，华野第一、六、九纵队将第六十三军全歼于堰头镇、窑湾镇、瓦窑地区；随后向西追击，分割黄兵团。在中路，华野十三纵全歼黄兵团第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师，占领曹八集；第十、十一纵在东大庙、侯集地区与山东兵团第七纵队会合，南、北两路切断了黄兵团退往徐州之路。在西线，中野第三、四、九纵队与华野三纵、两广纵队进至宿县至徐州间地区，截断了津浦线。

△　上海淞沪警备区宣布临时戒严。

△　河北国民党军第一〇一军军部及暂编第三十三师撤抵涿县。

△　上海海关全体职员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

△　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讨论裁军，中国政府代表蒋廷黻指责苏联所提裁军提案“为间接干涉中国内政”，是削弱中国“戡乱”力量，苏联援助中共的政策“乃造成亚洲最大忧患之一种因素”。

△　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并各中央局、各前委，指出：国民党军队的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个集团中，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已经被解放军解决，徐州集团如再被大部消灭，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解放军9、10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7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军现已不足300万人，解放军则已增至300余万人。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以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并提出：“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1月12日　　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华野第四、六、八、九纵队，从四面八方展开攻击，紧缩对碾庄圩的包围圈，将黄兵团压缩于东西不及10里、南北不及六里的狭长地带。守军踞村落地堡工事顽强抵抗，解放军由运动战转入村落攻坚战。为加速进攻，调担任阻援任务之第十三纵加入围歼作战。

△　徐州“剿总”抽调邱清泉兵团第五、第七十、第十二军，李弥兵团第八、第九军，共12个师，组成东进集团，于是日沿陇海线东援，攻击前进。解放军以山东兵团第七、十纵队，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在徐州以东李家井、侯集至不老河边一线筑工事正面阻击，以第二、十二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中野十一纵队在徐州东南阻击援敌侧背。双方展开激烈攻防战。

△　苏北兵团第二纵队在大王集将由睢宁撤退之原第一绥靖区第一〇七军包围，经过争取，第一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孙良诚率部5000余人放下武器，西逃之第二六一师被全歼。

△　中野四纵、华野三纵及两广纵队在徐州至宿县间夹沟地区，歼灭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军部及其第一二一师，俘3000余人。

△　太原外围解放军经19昼夜残酷的短兵相接、白刃格斗，终于于是日全部攻占东山四大要点，八纵攻占小窑头，七纵攻占牛驼寨，十三纵攻占山头，十五纵攻占淖马，共歼灭阎军一万余人，解放军伤亡达8500人。

△　承德解放。承德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奉命由陆路撤向密云、通县一带，解放军冀热辽军区部队随即收复该城。至此，热河全境获得解放。

△　傅作义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致词，谓“战局严重，正是生机；团结奋起，前途光明”。

△　绥远解放军再占绥东兴和。

△　杜鲁门电复蒋介石，谓“美国正尽一切可能以加速依援华计划，采购在本国可以获得之武器与弹药，运往中国”；但对美国直接参加指挥作战一事，避而不谈，只提“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洞悉目前局势，可常备咨询”。

△　美参议员白里奇要求总统召集特别会议，加强援华。

△　美国防部宣布：已将五万吨小型武器及弹药加速运华。同日，美国报纸透露，大批美国军火正在运华，内有P—47型驱逐机42架。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25名主要战犯进行宣判。前满洲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前首相及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前陆相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广田三原则”倡议人前首相广田弘毅、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前东条内阁陆军省军委局长武藤章及前东条内阁陆军省次官木村兵太郎七人被处以绞刑；前陆相及“一二八”侵华战争策动者荒木贞夫等16人被处以无期徒刑；前东条内阁外相及驻苏大使东乡茂德被处以20年徒刑；主持《淞沪协定》的前外相及驻中国大使重光葵被处以七年徒刑。

△　驻守太原外围之阎锡山部第八总队司令赵瑞率部600余人在太原淖马前线起义。

11月13日　　蒋介石电促刘峙，限援军当日进至碾庄圩。是日，东援兵团再次发动强攻。华东野战军正面阻击部队第七、十、十一纵队利用河流、村落、山坡等有利地形坚守荆山铺、夺山口、侯集、邢楼一线。在侧翼阻击的第二、十二纵队、鲁中南纵队、中野十一纵队及华野三纵队，进至徐州东南40余里的地区，威胁徐州。

△　围歼黄百韬兵团之解放军继续攻击，至次日，六纵攻克彭

庄，歼敌第一〇〇军军部及其第六十三师。时黄兵团仅剩四个旅机动兵力，占据碾庄圩12个村庄。

△　华北野战军乘保定国民党军守备力量空虚，发起保定战役，以第八纵队沿车站西关实施攻击，第七纵队从城东进攻。

△　蒋介石任命张镇为首都卫戍总司令。

△　驻美大使顾维钧呼吁援华，希望美国给予10亿美元之援助。

△　民国政府举行粮食会议，苏、浙、皖、赣、湘、鄂、川、粤、闽、台等省主席均出席，会议由行政院长翁文灏主持，蒋介石亲临致词，谓必须按照应征粮额如期交纳。会议提出注重征粮足额，自由流通。

△　傅作义在北平召开地方保安旅旅长、专区保安司令、副司令会议，讨论“整军方案”，决定将地方保安团编入正规部队，要求本月18日开始行动。

△　绥远国民党军复占陶林、武川。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在南京仰药自尽。蒋介石、宋美龄前往吊唁。

△　入关之东北野战军抵达河北玉田、宝坻。

11月14日　　华东野战军调整作战部署，决定阻援部队后撤，诱敌援军向东深入，待围歼黄兵团后，再全力围歼援敌。当日晚，正面阻援部队按计划撤至台子、崔庄一线。

△　中野四纵队与华野三纵队在徐州南三堡地区歼灭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残部第三十七师4000余人，逼近徐州。

△　华北野战军八纵夺取保定车站、西关和城西南角堡垒，歼灭

保安团大部，其残部缩回城内顽抗。七纵攻克东关。解放军逼近城垣，对保定守军形成完全包围。

△　蒋介石特任何凤山为中华民国驻埃及国特命全权大使，陈继承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　民国政府辽宁、辽北、安东、兴安、黑龙江各省主席王铁汉、徐森、董炎平、吴涣章、韩俊杰，及沈阳、哈尔滨、大连各市市长董文琦、毕泽宇、赵惜梦等，联名致电行政院宣布总辞职。

△　绥远国民党军再度进占兴和。

△　湖北国民党军复占老河口。

△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为之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　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到达河北蓟县地区，隐蔽集结待命。

△　美国进步党全国委员会决议，要求政府停止援蒋。

11月15日　　蒋介石专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飞赴徐州督战，严促刘峙、杜聿明东进，以解黄兵团之围。

△　华东野战军围歼黄兵团作战暂停，各部队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补充弹药，决定先歼战斗力较弱的第一〇〇、四十四军，尔后围歼碾庄圩兵团部与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六十四军；在战法上，决定利用夜间插入各村落间，逐个攻取，各个歼灭。

△　蒋介石任命赵士卿为国立编译馆馆长，凌纯声为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

△　后藏代表王乐阶、索多杰·巴官保尔等一行抵南京，洽商奉迎第十世班禅活佛赞返藏事。

△　美国国会援外监督委员会派遣来华视察员蒲立德（前美驻苏大使），抵达上海。

△　立法院民主自由社主张征用豪门外汇，惩处失职官员，加强对美外交。

△　驻南京各国使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撤退问题。

△　为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西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战役。西野二纵在临皋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团；接着又向罗乳山第一四四师发动进攻，战至次日，歼灭敌军一个团又一个营。罕井、白堤国民党军缩回蒲城，解放军围歼第三十师之计划未能实现。

△　保定前线解放军调整部署，第八纵队两旅协同第七纵队攻城。至次日，攻击未能奏效，形成对峙局面。

△　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已包围绥远归绥，辽沈战役结束后，为防止傅作义集团逃跑，不过早惊动敌人，奉命于是日撤围。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出军事管制的任务是，完全肃清一切残余之敌及武装抵抗分子；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并维持正常秩序；解散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逮捕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党员组织和人民团体。随后，又根据各地军事管制的经验和意见，进一步拟定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条例》，规定军管期间各项政策，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颁布施行。

△　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中央执行委员暨各处、会负责人，举行第四次扩大会议，以“迭次违反本盟历来政治主张”为由，通过开除张申府盟籍的决定。

11月16日　　当晚，华野山东兵团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九纵在南，六纵在西南，十三纵在西北，四纵在北，八纵在东，向守军外围村落攻击，未能奏效。

△　淮海战场西线，中野三纵队攻克战略枢纽宿县，全歼守军黄百韬兵团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及交警第十六总队、第二总队第三大队，共1.2万余人。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攻占固镇，并破击乐曹村至固镇间铁路百余公里。至此，解放军已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的徐蚌间广大地区。

△　国民党军徐蚌战场，防守潘塘镇、三堡一线之第四十一军、第七十四军及第十二军之第一一二师，击退解放军的进攻。邱清泉令第九十六师主力及第三十二师前往增援。

△　蒋介石以宿县被攻甚急，黄维兵团已抵阜阳，令李延年指挥第三十九军、第九十九军，由固镇出发解宿县之围。

△　解放军冀中军区部队收复胜芳镇。

△　立法院通过改善公教人员待遇办法，依薪额十足发给金圆券，并另按各地区生活指数，以“八一九”为基期加成发给。

△　南京外交团会议，商讨中国情势，并宣读外交部备忘录，内称：政府并未计划撤离南京。

△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对华政策大体不变，并谓“现正与蒋总统通信交换意见”。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宣布，已运出价值1400万美元的沙特阿拉

伯石油以接济中国。

△　美海军部发言人称：美海军进行训练国民党海军人员之计划至为顺利，最近有两艘导航驱逐舰人员正在诺福克受训。

△　南京当局以违反新闻法、为共党宣传为由，逮捕新闻记者及公务员共82人。

△　上海12所市立中学教职员1200余人因生活困难，要求增加薪水及粮食配给，实行总请假一星期。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　中央军委通知徐向前兵团，为防止过早攻克太原，使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决定暂缓进攻太原，俟东北野战军入关进攻平、津时，再打太原。次日，华野第一兵团表示完全接受中央决定。

△　豫东夏邑县地方保安团6000人起义，夏邑县城解放。

△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发表对时局声明："我们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有丝毫的幻想。"

△　立法院通过国内邮资调整，平信一角，挂号四角。

11月17日　　因解放军佯装退却，徐蚌战场国民党军东援兵团获得稍许进展。南京政府欣喜若狂，徐州"剿总"即令东援兵团进行追击。是日，东援兵团进至杭山、黑山、岳海以东，大许家、吴窑以西地区。

△　是日晚，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黄百韬兵团再次发起总攻，攻占大牙庄、前后黄滩等据点，歼灭第二十五军一个团，第四十四军军部及其第一五〇、一六二两个师部另四个团。

△　为解保定之围，傅作义调集第三十五、十六、九十四、一〇一军等部共六个师由北平南下。

△　郑北国民党军复占谷城。

△　美军顾问团人员眷属自南京撤退。天津首批外侨358名撤离。

△　美海军部命令1250名海军陆战队由关岛增援青岛，并协助撤退美侨。

11月18日　碾庄地区继续激战。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一〇〇和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长赵壁光率残部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　徐州“剿总”发布“徐东大捷”战报，称解放军已全面退却。当日下午，刘峙又向南京告急，谓东援兵团在大许家地区遭坚强抵抗，不能前进；解放军并未退却，黄兵团仍处于包围中。

△　赶往徐州增援之国民党军刘汝明、李延年、黄维三个兵团，遭到中原解放军的顽强阻击，分别被阻挡在蚌埠、蒙城地区，进退两难。

△　美陈纳德空运大队重心自上海移往广州。时陈纳德正图恢复其飞虎队，准备帮助国民党军作战。

△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欧哈德就英侨撤退问题发表谈话，谓英国在目前正积极准备应付任何事变，但“今日英国在上海之地位，为百余年来此间英侨惨淡经营点滴业积所造成者”，英决不会放弃在沪之权益。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傅作义经人接洽“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各军于一二天内完成出发准备，21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由东北进入关内，迅速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不使敌人逃跑，并争取国民党军投降。

△　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并于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新币。

△　上海生活、新知、读书三书店因受国民党当局压迫，被迫结束业务。

11月19日　　解放军继续猛攻碾庄。黄百韬兵团此时仅剩不足八团兵力，据守七个村庄。当日晚，解放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击。

△　为解救黄百韬兵团，东援兵团竭力进攻，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被阻挡于离碾庄圩仅30里的大许家一线，一万余人被歼。

△　包围保定之解放军主动撤围，国民党军南下援军抵达保定，先头部队是日入城。

△　西藏商务考察团抵英国伦敦。

11月20日　　蒋介石以碾庄黄百韬兵团危急，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徐州，与刘峙、杜聿明共商陆、空军协同作战以解碾庄之围办法。

△　华野第八、第九纵队突入碾庄围，全歼敌兵团部及第二十五军军部。黄百韬率直属部队千余人撤至东边大小院上，会同第六十四

军军部继续顽抗。

△　自河南东援之黄维第十二兵团越皖北涡河前进，先头部队到达浍河南岸地区。

△　美国援助傅作义扩充军备之第一批物资运抵大沽港。

△　是日起，法币停止流通；平、津地区延长使用半个月。

△　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到东京活动，今日会晤麦克阿瑟。

△　胡适在北平华北“剿总”集会上演讲，宣称：“和比战要难千万倍，与中共谈和根本是幻想”，要“苦撑待变”。胡适同日对美联社记者谈话，要求美国直接援助傅作义作战。

△　上海反对生活指数急剧上升之工潮继续扩大，罢工人数超过10万。

△　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自苏联返抵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次日，该市各界妇女举行盛大欢迎会。

△　河北省第三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朱吕魁、副司令王洗凡，在天津以西王庆坨地区，率所部15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11月21日　宋美龄在南京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称“中国目前的局势，确乎十分严重”，呼吁美国“未来任何的援助，必须立刻见诸现实”。并警告美国说：如果共产主义在中国得逞，“你们最后也必难幸免”。

△　中共中央就国民党政府要求美国给予军事保护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现在即将覆亡，任何外国政府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援助，及其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任何协定，既不能挽救国民党政府

的统治，亦不能保护该外国政府的利益。此项援助及协定之唯一前途，即为随国民党政府同归于尽。”

△　进攻碾庄之解放军为消灭院上黄百韬兵团残部，进行坑道作业，并于当日晚发起最后强攻，战至次日下午，残敌突围，为解放军全歼。

△　西北野战军以一纵、四纵组成右翼兵团，于是日在陕西同官、耀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七师师部及三个营。

11月22日　　华东野战军经过10天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兵团部及四个军部10个师共10万余人，击毙黄百韬。华野、中野全部作战部队共歼敌17.8万余人，内起义、投诚3.08万余人，解放徐州周围县城19座，取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大胜利。徐州完全被孤立，国民党军被分割在徐州（第二、十三、十六兵团）、蚌埠（第六、八兵团）、双堆集（第十二兵团）三处，为进行下一阶段作战奠定了基础。

△　保定解放。驻守保定之国民党第一〇一军暂编第三十二师在援军接应下，弃城北撤。同日，解放军进驻，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任保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　华北“剿总”宣布：华北地区已进入作战状态，自本日起，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之间地区划为戒严区。

△　国防部、交通部联署发布命令，禁止上海两路局铁路员工有怠工或罢工情事，“否则依破坏后方交通论罪，从严惩办”。

△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言人为蒋介石致书杜鲁门要求美国开入军舰协助“剿共”，及上海市长吴国桢请求美军登陆，提议把上海国际化事，发表谈话：“我们认为蒋、吴的这种行动，完全是出卖民族、背叛国家的叛逆行为。”

△　监察院纠举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套购港汇与民争利。

11月23日　　蒋介石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举行紧急会议，为挽救徐蚌会战败局，决定南北对进，全力打通徐蚌段交通，徐州方面向符离集攻击，第六、八、十二兵团向宿县攻击。刘峙、杜聿明随即飞返徐州进行部署，以第十三兵团守徐州，以第二、十六兵团南下攻击。

△　驻美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吁请美国给南京政府以“更多更快的援助”，并称“中国如陷于共党统治，亚洲亦将如此”。

△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总前委决定，以中野、华野九个纵队位于浍河南、北地区围歼黄维兵团；为保证主战场作战，南线方面，以华野第二、六、十、十一、十三共五个纵队于宿县、西寺坡之间地区，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北线方面，以第四、八、九、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共八个纵队，位于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阻击徐州之敌南援。

△　东北野战军主力启程分三路入关：右路进冷口，中路进喜峰口，左路进山海关。同时，东北党政干部5.3万名和支前民工数十万人也随军入关。

△　陕西大荔地区，西北野战军右翼兵团攻击铜川以东军台岭、店子坡等据点，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又两个连。

△　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由香港秘密乘轮船抵达东北解放区。

△　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主席蒋梦麟率该会委员晏阳初等由南京飞四川、湖南视察。

11月24日　　徐州北线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完毕，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开始向南攻击前进，当日前进五里，进至刘塘、张集地区。

△　黄维第十二兵团辖四个军11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其中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强渡浍河，抵达忠义集、东坪集、杨庄、朱口地区，进入解放军预伏阵地。黄昏时，解放军五个纵队全线出击。

△　空军轮番轰炸徐州以东向南进攻灵璧的人民解放军。

△　行政院决定撤销经济管制委员会及各区督导员。

△　杜鲁门再与国务卿马歇尔会商欧亚时局。马歇尔对记者表示，美国忧虑共军在中国得势，但援助国民政府方面，决审慎从事。

△　上海私立中小学教员总请假，要求享有市立学校配给物品。

11月25日　　黄维兵团向东南突围未成，整个兵团四个军全部被解放军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不到20里的狭小地带内。

△　徐州南线国民党军奉命向宿县进攻。李延年兵团由固镇北进，刘汝明兵团由蚌埠北进，随即遭中野第九、十一纵队阻击，未能前进。

△　华野第十三纵全歼灵璧守军邱清泉兵团第十二军第二三八师。

△　西北野战军第二、三、六纵队，将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军包围于陕西永丰镇，准备围歼。

△　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建议南京政府迅即撤离徐州，将全部兵力南移。

△　高岗、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等文件，达成共同协议。

11月26日　　蒋介石令准免行政院长翁文灏本职，提名孙科继任。

△　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由张群继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　监委侯天民等27人提议纠察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于沈阳陷落前未能从容应变，且相率仓皇弃城潜逃”之责任，要求“严加惩处”。

△　顾祝同秉蒋介石命令致电黄维，要求被围的黄维兵团“应不顾一切即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

△　黄维兵团以第八十五军在右，第十军在中央，第十四军在左，从双堆集地区的西、东两面向东南大营集、奶奶庙方向攻击，第十八军在双堆集以北担任掩护。

△　徐州北线方面，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向南发起攻击。华东野战军集中九个纵队19个师，组成东、中、西三个集团，包围徐州南下之敌，阻其南援。是日，展开激烈阻击战，孙兵团稍有进展，邱兵团伤亡惨重，仅前进三公里。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得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灵璧失守后，遂向浍河南岸撤退。国民党军会攻宿县，打通津浦线之计划破产。

△　南京卫戍司令部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连日侦察搜捕，已有45人被捕。

△　滇南民军攻克马关，进迫文山。

11月27日　　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对合众社发表谈话，称其受过多年美国教育，其领导之政府将在许多方面反映美国的观点。并谓为尽早取得美国重大军事援助，中国必须准备作出让步。又称，中国需要麦克阿瑟那样的杰出军人担任最高军事顾问，以指导对共军的战事。

△　黄维兵团集中四个师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被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5000余人，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在战场宣布起义。

△　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军撤出山海关、秦皇岛，退往天津。东北野战军入关部队随即收复之。

△　蒋介石任命周体仁为北平警备总司令。

11月28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紧急会议，认为黄维兵团已无力自己突围，必须集中一切兵力与解放军决战方能挽救。决定徐州部队撤往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发动攻势以解黄维之危。会后随即命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撤回蚌埠，守备淮河。

△　顾祝同飞双堆集上空视察，令黄维兵团就地固守待援。黄维随即调整部署，组成环形工事，以三四个团向四周解放军作防御攻势。解放军“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逐步缩小包围圈。

△　接南京命令后，李延年兵团退至浍河南岸，刘汝明兵团退守怀远及淮南铁路。

△　宋美龄代表蒋介石离沪赴美，以“吁请加强援助，俾迅速完成戡乱任务”。12月1日抵华盛顿。

△　行政院长孙科在上海官邸邀约上海工、商、文、教各界人士潘公展、王晓籁、刘鸿生、杜月笙、钱新之、程沧波等20余人茶叙，承认“过去政府有许多政策是错误了，使人民受害”，表示“希望各位领袖领导上海市民，与政府切实合作，推诚相与，则力量集中，必能消灭共匪，保持我们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至于政府今后政策，当一改过去之所为，为人民服务，以取得人民的信仰”。

△　西北野战军肃清陕西永丰镇外围据点，并以坑道进逼城下后，是日发动总攻，全歼国民党第七十六军。至此，西北野战军冬季

攻势结束，是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5万余人，内俘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以下1.7万余人。

△ 解放军撤出包头，同日，国民党军复占之。

△ 青年党发表声明，称将不参加新政府。

△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镇辞职，由张耀明继任。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调任衢州绥署主任。

△ 上海航运界反对政府对外国开放内河航权。

11月29日 为解放整个华北，彻底歼灭傅作义集团（共四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约50万人），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参加此役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铁道纵队，约84万人；华北野战军七个步兵纵队，约13万人，加上地方部队，解放军总兵力近100万人。是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展开攻势，以切断平绥线，封闭敌军西逃之路，平津战役第一阶段开始。

△ 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移驻蚌埠。同日，杜聿明下达徐州撤退命令。

△ 蒋介石与熊式辉商请麦克阿瑟来华指导国民党军作战。

△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在建国法商学院发表演说，称“欲达到世界和平，必须铲除共产主义”。

△ 皖北解放军攻占固镇，国民党军在浍河南岸布防。

△ 围困太原的解放军，为夺取火力、控制西铭机场阵地，以晋中军区部队占领花七头、红沙梁。

11月30日 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及徐州机

关和部分青年共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解放军当即以华野十二纵进占徐州，以第一、三、四、八、九、十二纵队、鲁中南纵队七个纵队多路平行追击。宿县、固镇地区第二、十、十一、十三纵队也赶至永城地区围歼杜聿明集团。

△　蒋介石以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误戎机，致失重镇”，明令着即撤职查办。

△　华北野战军杨成武、李井泉第三兵团二纵、六纵攻占柴沟堡、万全；一纵攻占怀安，歼灭国民党非正规军2200余人。接着，二纵、六纵攻占张家口以西外围阵地，一纵向张家口、宣化间进攻，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

△　张家口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向傅作义告急。傅作义急令第三十五军及怀来第一〇四军第二五八师乘汽车增援张家口，以怀来第一〇五军第三一〇师增援宣化，另以昌平第一〇四军第二六九、二五〇师进抵怀来，第十六军由涿县移至昌平、南口，以确保平张线交通。

△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南京互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批准书，宣称该条约自即日起生效。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现军管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

是月　从本月起，公教人员分区加成发薪。

12月

12月1日　蒋介石接见美合众社副社长兼远东总经理房恩，称确信战局将转向有利于国民党军。表示将长期守住江南，并欢迎麦克阿

瑟为最高军事顾问。

△　蒋介石派汤恩伯兼京沪警备总司令。

△　蒋介石召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令其立即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

△　行政院会议通过非军事机关分迁于重庆、广州两地办公计划。

△　民国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声明政府不迁都。行政院通过疏散南京公务员眷属办法。

△　美国《外交杂志》载文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美国曾以35亿美元援助中国。其中在战胜日本以前，为14.69亿美元；战胜日本以后，达20.88亿美元。

△　太原城外解放军继续进攻。十三纵占领赵家山、丘岗、以火力控制了西铭机场；东面八纵、十五纵攻占松树坡；北面七纵占领苏村、阳曲、凤阁梁等地。

△　华东野战军解放徐州，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周林任徐州市长。

△　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蔡畅率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参加大会，并当选为本届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妇女为保卫和平民主而奋斗。6日大会闭幕。

△　民国政府开始将大陆黄金运往台湾。是日午夜，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首批黄金260万两，在军舰“美威号”护送下，由上海启程。

△　华北、华东、晋绥、陕甘宁各解放区政府协商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新币。

12月2日　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到北平，命令傅作义确实控制海口，以备撤退之用。

△　傅作义到张家口部署防务，当日返北平。

△　杜聿明集团继续向淮河方向撤退，在孟集、袁圩地区休整一晚；次日向永城急进，在青龙集北、红庙附近遭解放军阻击。

△　广州绥署主任宋子文命令禁止香港《大公报》入口，次日，广东当局宣布自即日起实行《新闻检查法》，检查由港来穗报纸，如有问题，悉数没收。

△　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于是日拂晓攻占张家口、宣化间沙岭子，将下花园至宣化间的铁路破坏。

12月3日　蒋介石派空军空投亲笔信给杜聿明，令其“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同日，蒋又派李以劻持亲笔信赴蚌埠，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集中力量北进，以解救黄维兵团。当晚，杜聿明被迫改变向淮河撤退的决定，以邱兵团为攻击部队，李、孙兵团左右掩护，转向濉溪口方向前进。

△　教育部长朱家骅发表对时局谈话，称“戡乱乃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　傅作义接见平、津、冀、晋、察、热、绥七省、市参议会议长，表示对保卫华北具有信心。

△　宋美龄访美国务卿马歇尔，吁请援华。

△　包尔汉代表张治中与苏联大使罗申订立解决西北问题密约。

△　为歼灭傅作义部队主力第三十五军，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程子华、黄克诚第二兵团奉命由平谷、蓟县地区出发，经密云、怀柔，向怀来急进。

△　招商局行驶沪甬线的“江亚”轮在吴淞口发生爆炸沉没，旅客1600多人和船员68人遇难。

△　空军运输机一架在台湾基隆失事，25人遇难。

12月4日　杜聿明集团在华东野战军围追堵截下，于是日拂晓在离徐州西南约65公里的萧县、永城间之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陷入重围。

△　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奉命向北发动进攻。李延年以第九十九军攻击曹老集及其东西两侧阵地，次日占领仁和集、曹老集、周家口，随即遭解放军坚决阻击。

△　为集中力量加快歼灭双堆集黄维兵团，总前委调战役预备队华野第七、第十三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参加作战。解放军八个纵队组成三个集团：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为东集团，攻击双堆集以东第十、十四军；以中野第一纵队和华野第十三纵队为西集团，进攻马围子北第八十五、十八军；以中野六纵及华野七纵为南集团，向双堆集及以南地区攻击。攻击重点为东集团。

△　傅作义飞张家口，召集孙兰峰等举行军事会议，征求防守张家口意见，未作决断。当日飞返北平，行前指示：张家口部队行止，待其回平后电告。

△　宋美龄要求美国援蒋30亿美元，以三年为期。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盐税改制案。将过去从量征收改为从价

征收，改制后之盐税收入可增加三倍，预计本年盐税，总收入当在10亿元以上。

△　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自6日起，铁路客运及货运加价五倍。6日，行政院咨请立法院增加邮资五倍。

△　淮阴守军周嵒部撤退，苏北解放军占领淮阴。

△　为争取太原和平解放，解放军对太原守军转入长期围困，同时加强对敌宣传，以实行政治瓦解。

△　陕西国民党军复占白水。

△　云南国民党军复占马关。

△　中国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以及严格保障人权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更贯彻的继续执行。"

12月5日　杜聿明集团被围后，连续组织向南突击，均未能突破解放军阵地。

△　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攻克密云县城，全歼国民党军6700余人。

△　傅作义得悉密云失守，急令第三十五军等部立即由张家口撤回北平。第三十五军倾全力进攻沙岭子，解放军因伤亡过大，放弃阵地后撤。次日，第三十五军乘汽车向新保安撤退。

△　中央航空公司飞机一架在上海失事，10人遇难。

△　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不干涉中国群众大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撤退一切驻华美国军

事人员，让中国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

△　马来西亚华侨52人被驱逐出境。

12月6日　　蒋介石决定设立长江江防总指挥部，以巩固长江江防。令汤恩伯总司令负责主持，召集陆海空军主管会议，策定具体实施办法。

△　杜聿明集团遭到解放军从北、东、西三面的猛烈攻击。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在李石林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开会，决定入夜后分头向南突围，到阜阳集合。邱清泉、李弥根据侦察结果，认为突围必败，遂停止行动。入夜，孙元良兵团以营为单位分股突围，在萧县、永城间的黄瓦房、张老窝地区遭到解放军拦截，第四十一、四十七军大部被歼，军长胡临聪、汪匣锋被俘，孙元良只身潜逃。

△　午后4时，华东野战军对双堆集黄维兵团发起全线攻击，展开激战。

△　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解放涿鹿县城。

△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继续由张家口向北平撤退，因公路被破坏，军行迟缓，是晚抵达鸡鸣驿、下花园一带。

△　宋美龄在美国为纪念珍珠港事变七周年发表文告，呼吁美国援蒋，以防止世界大战重新爆发。

△　美军事联合顾问团决定，在本月10日或10日以后宣布撤退日期，在宣布后的五日内，所有美籍人员均将回国。

△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领袖白鲁姆主张美国应以紧急援助给予中国政府，以“阻遏共产主义之苏联征服整个亚洲”，并提出美国应以第一流枪炮及弹药和美国之军事人员，增援并训练国民党军队。

△　为控制新闻通讯，南京政府在上海恢复新闻检查制度。

△　北平空军仓库发生爆炸。

△　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向西北军旧部广播，敦促及时觉醒，放下武器，为人民立功。

△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打电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并保证团结美国人民力量，制止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12月7日　　经过反复争夺，华东野战军攻占双堆集地区的李围子、李土楼、小周庄、宋庄等村庄。黄维兵团猬集一团，依托村落房屋继续抵抗。黄维派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飞南京向蒋介石紧急汇报，请求突围，获得批准。

△　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在18架飞机掩护下，由下花园继续东撤，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被滞留在新保安地区。华北“剿总”令第一〇四军由怀来向西接应第三十五军。

△　据守宣化之国民党军独立第三一八师奉命撤往张家口，中途在沙岭子遭解放军伏击，大部被歼，师长张进修负伤逃脱。华北野战军一纵乘胜占领宣化。

△　华北解放军解放涿县、顺义等县城。

△　美国援蒋计划之第一批1.25亿美元物资由美国启运。

12月8日　　在蒋介石严令下，邱清泉兵团多次集中兵力向南突击，企图强行突围，解放军三面突击、一面堵击，迫其退缩。

△　华北野战军杨、罗、耿兵团以强行军追击东撤之国民党军，是日将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第三十五军集中兵力向东突围，解放军第四、第八纵队顽强阻击，展开白刃格斗，激战竟日，将其击

退。

△　傅作义急调在怀来的第一〇四军和在昌平、南口地区的第十六军西援。第一〇四军在飞机掩护下，先进攻怀来县土木，后转攻下湾子、宋家营，均被解放军击退。

△　陈果夫抵达台湾基隆，对记者发表谈话，勉励青年党员向中共发动“心理战争”。

△　凌晨，龙云秘密离开南京，乘陈纳德飞机经上海转广州。当晚乘船赴香港，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

△　美国代理国务卿罗维特表示，美驻华大使馆将不撤退。同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携秘密计划来华。

12月9日　胡琏由南京飞返双堆集，转达蒋介石命令，要黄维率部“毅然突围”。

△　邱清泉兵团再次向陈官庄以南发起攻击，企图突围未逞。

△　在华北平绥线，国民党军第一〇四军继续由贾家营向西猛攻，一度攻抵马圈，即遭解放军顽强阻击。第三十五军仍被阻于东八里一带不得前进，双方相隔仅五公里，无法会合。是日夜，解放军发起攻击，第一〇四军退回怀来，第三十五军退回新保安。解放军完成对新保安的确实包围。是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北、东北野战军，必须用全力围歼傅作义主力第三十五军。

△　东北野战军四纵在康庄包围了准备西援之第十六军，发生激战。午夜，第十六军向康庄以南撤逃。

△　国民党军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率二个师自张家口东进，增援新保安，进至沙岭子遭解放军阻击，战至下午4时，退回原地。

△　云南国民党军复占石屏。

△　解放军山东军区部队收复威海以东刘公岛。

△　淮阴第一绥靖区部队南逃，中共地方部队收复淮阴、淮安、宝应等城。

△　英国外长贝文在下议院说明对华政策，谓遵守1945年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所宣布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但亦不能漠视英国在华侨民与巨大之商业利益，要求中国交战双方尊重英人之生命财产。

△　港督葛量洪公开警告中共，勿干涉香港。并表示香港准备在共军南下时，竭力应付任何事变。

△　据上海市工业技术委员会统计，沪市86种工业中，共有工厂1.2553万家，工人总数42.6万人。

12月10日　蒋介石颁布命令，规定东自长江口起，溯江而上，至鄂、川边界折北，沿川、鄂、陕、甘边界至天水、龙凤、海原（均甘肃境内）、沿甘肃省界至宁夏省盐池，向北之绥远省临河，折至甘、新边界上，划一界线，以东以北地域为接战地域，以南以西为警戒地域。宣布全国戒严。

△　立法院会议通过《工会法》和《民国卅七年整理公债条例》。

△　傅作义调津、塘地区的第六十二军、第九十四军（欠第四十三师）增防北平，是日到达丰台、清河、南口一带待命。

△　宋美龄访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与供应的制订工作；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杜鲁门对此答复说：“美国只

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在记者招待会宣布，他正调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最近来沪，以保护美侨生命财产。但陆战队不上岸，只有在美侨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才登陆。

△　南京全市进行大搜查，数十人被捕。

△　解放军攻占陈官庄周围50多个村落，将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压缩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　进攻双堆集之解放军调整部署，以第三纵加强南面，由陈士榘指挥。黄维兵团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师部及两个团向解放军投降。

△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跟踪追击，在康庄东南50公里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六军6600余人，控制了岔道、康庄、青龙桥一线。国民党军第一〇四军闻讯后，遂放弃怀来，向横岭城、马刨泉方向绕路向北平逃窜。解放军四纵进行追击，十一纵予以截击，当日占横岭城、镇边城要隘，断敌退路。

△　毛泽东、朱德复电原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对其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表示欢迎。

△　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胡愈之、吴晗、韩兆鹗、楚图南在河北省解放区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交换民盟活动的意见。

12月11日　　蒋介石公布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凡30条。

△　淮海战场解放军围攻双堆集，黄维兵团继续顽抗，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击毙。

△　由怀来南逃之第一〇四军（欠第二五八师）、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一部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被东北野战军包围。激战八小时，除军长安春山率千余人逃脱外，其余1.3万余人全部被歼。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抵达上海。同日，经合总署宣布，又有美援粮食1.1万吨大米由曼谷运抵上海。截至目前，经合总署已将小麦与食米5.2万吨运抵中国。

△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林彪、罗荣桓等发出的电报中，指出：为使蒋介石不迅速作出让傅作义集团放弃平、津南下的决策，“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

12月12日　刘伯承、陈毅致书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要其“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遭到黄维拒绝。华东野战军继续进攻，黄昏后逼近尖谷堆制高点。

△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从是日起，按左、中、右三路向平、津、塘国民党军展开分割包围。左翼以二、七、八、九、十、十二纵组成，由邓华、吴培善指挥，沿北宁线前进，执行隔断津、塘、唐的任务。中央以萧劲光、陈伯钧第一兵团指挥一、三、六、十纵，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右翼为程黄兵团，隔断平绥线。

△　在东北野战军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军放弃唐山撤往塘沽；第八十六军由汉沽、芦台退防天津。东北野战军随即解放唐山市及古冶、开平等镇。

△　傅作义调整部署，改为分区防守，北平、津塘各为一防区，分由李文、侯镜如指挥。津塘线被切断后，又将天津、塘沽分为两个

防区，分由陈长捷、侯镜如指挥。

△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召开驻军军长、军参谋长、天津市市长等开会，研究加强城防工事的措施和防守兵力的部署。决定将天津市区分为西北、东北、市南三个防区，分由第六十二军（欠第一五七师）、第八十六军和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等担任防守。

△　傅作义重建第一〇四军，将河北省保安部队补充第二五〇师、第二六九师两个师，新编第三〇九师划归该军建制。

△　霍夫曼与美援运用委员会举行会谈，翁文灏促请霍夫曼考虑“在美议会通过新援华法案万一较迟时，另拨暂时性之援助，以资援华工作不致中断”。

△　孙兰峰继傅作义任察哈尔省府主席。

△　上海各界自救救国会在沪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有杜月笙、潘公展等1000余人，会议表示“拥护元首，迅速达成救国救世之目的”，并选举方治、江一平、杜月笙、杨虎为该会委员。

△　中共中央军委就淮海战役后的作战方针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指出：在全歼黄维、邱清泉、李弥诸敌后，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休整二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要的物资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二个月的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路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以相当时间最后完成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5月或6月，华东、中原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福建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诸城而控制之。东北野战军协同华北野战军主力于明年1、2两月完成夺取平、津、张、唐任务，3、4两月休整，5月沿平汉路南下，6、7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8月

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长沙、常德、宝庆、衡阳、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内，第二步夺取两广。华北野战军主力协同东北野战军夺取平、津、张、唐后，如那时太原尚未攻下则协力夺取太原，然后以杨罗、杨成武两部夺取绥远、宁夏，与西北野战军配合。徐向前兵团则早日与西北野战军会合，先肃清兰州、潼关线及其以南以北诸敌，并夺取潼关、西安、天水、汉中诸城，然后入川。

12月13日　　进攻双堆集的解放军东集团攻占沈庄、杨围子、杨庄；西集团攻占西马围子、小马庄；南集团攻克大小王店等地。歼敌第十四军全部，第八十五军和第十军大部，第十八军一部。残敌第十八军两个师、第八十五军第二一六师及第十军一部被压缩在东、西不过三里的狭长地带，其兵团部核心阵地及临时机场完全暴露。

△　在平津战场，东北野战军左翼第七、九纵队进驻唐山；右翼程黄兵团占领南口，并挥师南下，经圆明园、北平以西向丰台、宛平间攻击，在枣林庄、岳各庄击溃由宛平东逃之第一〇一军，歼敌2000余人，当日进占丰台、宛平。

△　白崇禧对武汉三镇区、乡、镇保甲长发表讲话称：要发挥军民综合力量，与中共作全面的斗争，以“争取剿匪的胜利”。

△　美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在上海谈话，谓如中国现政府失败，美对南京组织的“联合政府”将仍维持援助。

△　国际紧急粮食会议，已指拨食米24万公吨予中国，作为明年前六个月之需要。

△　财政部电令南京军警机关及各地金融管理局，立即取缔银元摊贩。

△　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在上海晤周孝怀，请其将昨日黄向

张治中提出的实现国共和谈的办法转告张群，以共同进行。

△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接管平、津两市领导人员，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区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敬为天津市市长。

12月14日　　解放军以中野六纵、华野三、七、十三纵共四个纵队，直攻黄维兵团指挥中心双堆集。至当日夜，南集团攻占机场南端和双堆集南面阵地，东集团攻克杨子全庄。

△　东北野战军十一纵进至北平西郊香山，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第二〇五师及保安第二旅接触，歼敌千余人。第七、九纵队进驻芦台、汉沽，在茶淀站歼灭第八十七军3000余人。萧劲光兵团攻占永乐、安平镇、马驹桥等地，歼灭第三十一军第二〇五师一部。

△　蒋介石设晚宴欢迎美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并邀白吉尔、司徒雷登、巴大维等作陪。约定15日下午，中美双方官员将再度开会，对美援问题交换意见。

△　因解放军迫近北平城郊，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移往城内，国民党军大部亦退守城内。

△　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北平《平民日报》社长）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陪同出城联系和谈，原拟与中共中央直接商洽，未果，中途折回。向傅作义汇报后，再次出城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三河进行谈判。

△　解放军攻占安徽盱眙、天长。

△　江西省政府宣布即日起实行书报检查，凡港、沪及各地寄赣之书报，均需检查后发行。

△　杭州市商人3000余赴市参议会请愿，反对提高营业税。

△　上海市民因争相存兑金银而发生斗殴，伤亡多人。

12月15日　　淮海战场解放军攻克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黄维、胡琏率第十二兵团残部于黄昏后向双堆集西南突围，当即为解放军全歼，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被俘，胡琏只身逃脱。是役共歼国民党军四个军部12个师，约10.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3.6588万人。

△　东北野战军程黄兵团击溃丰台以东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一个师，及保安第二旅共五个师兵力的三次进攻，从西面包围了北平。第八纵队由香河地区分三路向天津前进。

△　华北野战军杨李兵团占领张家口外围西甸子等据点，北岳军区部队和蒙古骑兵第四、第五师等部解放张北。至此，平绥线国民党军被包围于新保安、张家口两处，解放军完成了对平绥线敌军的分割、包围。

△　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召集所部师长以上人员开会，秘密研商与中共实现和平的问题。

△　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长徐永昌由南京飞抵北平，劝说傅作义率部南撤。徐当日飞返南京。

△　民国政府派专机接北平著名人士和学者胡适、陈寅恪等到南京。次日，蒋介石接见胡适，听取关于北方局势的报告。

△　天津警备司令部决定自15日起，延长宵禁时间，每晚提前二小时于10时开始宵禁，断绝交通。自18日起，宵禁再次提前，于晚7时开始，至次日晨7时解除。

△　孙科自上海到南京，将于短期内完成组织新内阁的工作。

△　行政院修改存兑金银办法，每人三个月限购一两。

△　行政院政务会议任命傅斯年接替庄长恭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　美国务卿罗凡特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变，亦无召回驻华大使的计划，并称美国将避免在中国当前困难中的任何直接牵涉。

△　美驻沪总领事葛柏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中队及杂务人员一行695人，将于次日由青岛乘舰抵沪，担任保护上海美侨之任务。

△　美国海军运输舰“延色号”装载价值3500万美元之武器弹药及其他装备运往中国。

△　绥远国民党军复占凉城。

12月16日　　蒋介石决心部署长江江防，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退守淮河南岸，以掩护国防部构筑工事，防止解放军南下。

△　淮海战役进入围歼杜聿明集团的第三阶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淮海前线部队休整10天左右时间，然后集中华野全力发起攻击。总前委据此作出部署：华东野战军以第一、二、四、八、九、十、十一、渤海纵队，共八个纵队，为第一线部队，边围困边休整，围而不打，并加强对敌政治攻势。以第三、六、七、十二、十三、鲁中南、两广纵队共七个纵队，部署在夏邑、永城、濉溪口一线为第二线部队，进行休整，并随时准备参战。中原野战军全军位于宿县、涡阳、蒙城地区，准备截击由南北援之敌。

△　中共中央军委就同傅作义谈判问题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出四点指示，提出“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并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

△　黄维兵团被歼后，杜聿明集团陷入孤立、绝望之境地。是日开始连日大雪，大批人马冻死、饿死。杜聿明电蒋介石，表示决心固守待援。

△　华北“剿总”在北平、天津城内赶修临时机场。

△　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上海、平津间飞机航班停航。是日，沪、津海运停航。

△　美国借口护侨，派海军陆战队两个连自青岛抵上海。

△　空军总司令部直属第八大队中尉俞渤等五人，驾B—24式重型轰炸机自南京飞抵石家庄起义。

△　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阎达开为主任。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秘密离开香港赴解放区。

12月17日　　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受蒋介石之托，访问李宗仁，说明蒋氏有下野意向。李宗仁当即提出：“一、德邻（按：李宗仁字德邻）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二、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即行政院）主持和谈，其人选另行考虑；三、和谈应请国内进步人士赞助，共策进行。”

△　蒋介石电令杜聿明派人飞南京，面授机宜。

△　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司令部起草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播出。解放军通过放宣传弹、喊话、派遣战俘或投降人员返回劝降、释放俘虏等手段，加强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官兵的政治攻势。

△　东北野战军程黄兵团进占门头沟、石景山、万寿寺，逼近北

平西直门、德胜门，从北面、西面包围了北平。萧劲光兵团占领南苑机场、廊房、武清，此后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南苑的反击，切断了平、津联系，从东面、南面包围了北平。

△　傅作义谈判代表崔载之、李炳泉等一行五人，到达蓟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孟家楼附近之八里庄。

△　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军前哨部队撤至天津东北近郊。

△　绥远国民党军第一一一军三个师向卓资山、集宁方向进击，以策应张家口守军的作战。

△　华北七省市参议长许惠东等电蒋介石，吁请派海军驰援塘沽。

△　胡适与司徒雷登谈话，要求美国支持蒋介石。

△　国民党军对江阴、镇江各港口实施局部封锁。

12月18日　　杜聿明派参谋长舒适存由陈官庄飞南京接受命令，蒋介石指示杜率部“击溃当面之敌南下”。

△　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闿、联勤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光朝等持蒋介石亲笔信到天津，与杜建时、陈长捷等会商。李及兰口头传达了蒋介石忧虑津、塘两区兵力单薄，不如合并一区以固守海口为主的意图，因陈长捷不同意而作罢。是日，解放军已抵达天津外围，双方发生接触，国民党军在市区内赶修机场。

△　北平城内东单操场改建机场竣工，今日二架小型军用飞机试行降落，次日有四架客机降落。傅作义命令：北平军政人员一概不准撤离，违者处严刑。

△　京沪警备总司令部通令：“各地对于集会、结社、游行、请愿

等事，一律禁止”，各地工厂及交通事业，严禁罢工。

△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致美陆军部的电报中声称：“纵令时间容许，民国政府是否能取得必要的人民的支持，以动员这一地区（华南）的充分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之事。”并谓“国军的完全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　原隶中央博物院之北平故宫博物馆决定改隶北京大学，馆长仍为韩寿萱。

△　据《大公报》报道，上海市卷烟工业计有95家工厂，职工3.5万余人，每月出产各种卷烟约12万箱，占全国生产总量的50％左右。近来工厂被迫停工者达三分之二以上，面临危险境地。

12月19日　　行政院长孙科以组阁遇到困难，提出辞职，为蒋介石挽留。

△　杜聿明之参谋长舒适存偕空军总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飞返陈官庄，向杜聿明传达蒋介石要其“集中力量，在空军投掷甲种弹（即毒气弹）及轰炸掩护下，突破一方，实行突围”的命令。杜聿明获命后决定突围，并与董协商陆空协同计划，后因突围计划无法实施，乃派舒、董返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　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等由天津飞北平，因无处降落，乃将蒋介石给傅作义及各军军长的信空投，然后飞返南京。

△　傅作义令第九十二军向南苑机场发动反击，收复该地，但遭解放军顽强阻击，未能实现。

△　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攻占军粮城，守军逃往塘沽；第八纵队奔袭杨村，歼灭第一〇五军第三三三师师部及第九九七团，俘1900余人，并用炮火控制了天津张贵庄机场，使飞机无法起降。

△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拒绝傅作义谈判代表崔载之提出的关于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建议，说明中共和平解决平、津、塘、张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条件。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谈判未果。

△　广东南路人民武装攻入湛江市，击毙湛江第十区清剿司令张君嵩。

△　广东省保安第十团团长陈一林率领该团800余人在雷州半岛遂溪县城起义。

△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由香港抵达沈阳。

12月20日　　新任行政院院长孙科在南京陵园官邸招待外籍记者，宣布组成新内阁，称“政府将继继与共匪作战，以获得胜利之和平”。并谓“政府剿匪具有决心，决不轻言妥协”。

△　蒋介石命令第九十九、九十六、五十五、六十八军守备淮河，第二十八军于浦口占领桥头堡，第五十四、三十九军调江南，归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指挥。

△　徐蚌战场连降大雪，空军被迫停止空投，被围困之杜聿明部队饥寒交迫，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小部队和零散官兵纷纷投诚。

△　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攻占海滩车站，从北面、西面包围了天津；冀中军区部队解放静海。第一纵队进抵宝坻，冀东军区部队占领通县。

△　皖北解放军占领天长。

12月21日　　东北野战军第九、十纵队攻占新河车站，隔断津、塘联系，包围塘沽，并从南面、东面包围了天津。至此，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各路大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约500公里长的战线上，歼

敌八万余人，将华北“剿总”及二个兵团部六个军部22个师共25万人包围于北平；将二个军部11个师共23万人包围于天津；将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七个师包围于张家口；将一个军部二个师包围于新保安；将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五个师包围于塘沽、大沽两点。完成了分割、包围傅作义集团的任务。

△　平津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逐次攻歼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被围之国民党军。是日，华北野战军杨、罗、耿兵团开始攻击新保安第三十五军，以三纵在西面实施主突击，四纵由东及东南突击，八纵由西北及北面突击。战至下午3时，四纵全歼东关守敌第二六七师一个营及守护第十三团，占领东关、龙王庙，扫清东南敌外围警戒阵地地堡群；三纵攻占水温庙。

△　驻北平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密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事，并商定联络办法。

△　立法院通过《全国戒严案》及《起用在乡军人及转业军官加强戡乱力量案》等法案。

△　美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在华盛顿发表谈话称，由于中国局势之严重，7000万美元之“长期中国建设复兴计划”已予暂停。

△　新驻苏陆军武官张国疆一行抵莫斯科。

△　安徽省政府自合肥移安庆。

△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飞南京。

△　中国航空公司沪港班机XT—C4号在香港附近失事，乘客28人及机组人员七人全部罹难，中有上海中央日报社董事长彭学沛、无锡申新三厂经理荣守仁等。

12月22日　　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先后举行会议，通过孙科内

阁名单。同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该项命令并公布名单：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国防部长徐永昌、内政部长洪兰友、粮食部长关吉玉、教育部长梅贻琦、卫生部长林可胜、社会部长谷正纲、工商部长刘维炽、交通部长俞大维、水利部长钟天心、财政部长徐堪、地政部长吴尚鹰、主计长庞松舟、司法行政部长梅汝璈、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侨务委员长戴愧生、蒙藏委员长白云梯、行政院秘书长端木恺、新闻局长沈昌焕，农林部长未定，政务委员张群、张治中、翁文灏、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

△　蒋介石特任谢冠生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兼司法院秘书长。

△　国民党中常会提名李培基、刘健群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并批准南京市市长沈怡辞职，由滕杰继任。

△　行政院会议通过施行《戡乱军律》，凡26条。依照规定应处死刑的，包括有不奉命令，放弃守地，与军事上受重大损失者；临阵退却或托故不进者；向共投降者；惑众动摇军心者；战场逃亡者等。

△　解放军对新保安发起总攻，先以强大炮火摧毁敌军阵地，然后从四面突入城内，至下午5时，全歼傅作义主力第三十五军1.647万余人；俘副军长王雷震以下1.26万余人，军长郭景云被击毙。

△　下午，孙兰峰、袁庆荣接傅作义电令，要张家口守军“相机突围向归绥撤退”。袁庆荣随即部署突围计划：明日拂晓全军突围，主力向商都方向突围；整编骑兵第五、第十一旅向张家口以南突围，然后转道去商都会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鄂友三部占领张家口以北狼窝沟，接应突围部队。是夜，守军即出大境门向北作试探性突围。

△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命名义颁发入城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约法八章”，保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民族工商业和学校、医院和文化教育机关。

△　解放军桐柏军区部队攻克鄂北樊城。

12月23日　傅作义致电毛泽东，说“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

△　解放军占领张家口。是日晨，张家口守军分路突围，旋遭围城解放军围追堵截，被包围于乌拉哈达、朝天洼、西甸子。解放军随即对之展开猛烈围歼，战至下午3时，除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余部5.3万余人悉被歼灭，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被俘。至此，察哈尔省全境解放。

△　行政院长孙科正式视事，主持首次内阁会议，发表施政纲领，宣布继续“戡乱”，作战到底，称政府用兵最后目的在争取和平，对内不倚外力支持，对外努力敦睦邦交。

△　中国青年党决定参加孙科新内阁，仍由左舜生任农林部长，林可玑任政务委员。

△　蒋介石派其次子、陆军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蒋纬国携其亲笔信到北平，劝傅作义南撤。25日蒋纬国飞返南京。

△　行政院命令中央银行即日起停止申请存款兑现，以平息经济改革所导致的金融市场混乱。

△　上海三万市民挤兑黄金，造成惨剧，踩死九人，伤45人。

△　内政部命令吊销上海《观察》周刊登记证，永久停刊。

△　北平各界名流成立文物保护会。

△　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12月24日　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童冠贤以196票当选为立法院长，刘健群以202票当选为副院长。

△　蒋介石特任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原任吴鼎昌准免本职；任命滕杰为南京市市长，原任沈怡准免本职。

△　白崇禧自汉口发出亥敬电请张群、张治中转告蒋介石，谓人心、士气、物力均已不能再战，请停战以言和。略谓："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荇 荛：（一）先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旋斡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以上所陈，伏乞鉴核察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同时在汉口宣称，非蒋下台不能谈和，蒋应让别人来谈。

△　甘介侯奉李宗仁之命至上海虹桥疗养院，征询民主同盟负责人黄炎培、罗隆基对实现和平谈判的意见。黄、罗提出国民党应首先自动释放政治犯，以促进国共和平谈判。

△　青年党发言人宣称拥护孙科内阁作战到底，称："孙科内阁作战到底，与本党旨趣相同，故愿参加加以支持。"

△　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所属加强团在撤离天津北郊宜兴埠时，纵火焚村，1000多户居民遭难。夜间，天津守军在市郊丁字沽、北仓一带与解放军发生战斗。

△　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颁布圣诞大赦，释放日本甲级战犯19名，其中包括"中国通"须磨弥吉郎、谷正之、西尾寿造及儿玉秀雄等，并宣布日本境内主要战犯之审判业已结束。

12月25日　　中共方面宣布头等战犯名单，第一批43人：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王世杰、朱家骅、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　张群、何应钦、张治中与蒋介石商谈白崇禧昨日电报，蒋谓可请李宗仁负起和谈之责。

△　蒋介石特任左舜生为农林部长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林可玑为政务委员。

△　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在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称："新政府的唯一目标为继续对共党作战。现内阁为战时内阁，非投降内阁。"并称要加强江南防务，重振仍在北方的军队。

△　南京治安当局严禁市民收听中共广播，并派军、警、宪严予密查，有擅自收听者，即予惩处。

△　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军驻兵上海。

△　东北野战军一个团再次进攻大沽，为国民党军击退。

12月26日　　蒋介石下令公布《戡乱时期邮电抽查条例》，加强对新闻消息的检查和控制。

△　傅作义谈判代表崔载之等从蓟县八里庄返回北平。

△　徐蚌战场被围困于陈官庄之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部，因连日大雪，飞机停止空投，接济断绝。

△　海军第三舰队奉命增援塘沽。

△　原中央政治大学教育长段锡朋在上海病卒。

△　广东全境实施戒严。

△　解放军总部公布11月份战绩：攻克城市46座，俘、毙国民党军师级以上军官43名。

△　国民党军青岛警备第五旅副旅长顾镇光率旅直属队及一个团共1500余人起义。

△　空军飞行员谭汉洲驾驶P—51式战斗机自青岛飞至解放区，宣布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　新解放之新浦、海州、连云港被划为新海连特区，李云鹤任特区行政专员，胡定千任警备司令，谷牧任政治委员。

△　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翦伯赞、梅龚彬、吴茂荪、柳亚子、施复亮、孙起孟、马寅初、洪深等自香港乘船赴解放区。

12月27日　蒋介石电令杜聿明突出重围，易地决战。

△　蒋介石接见张群，询问其与李宗仁商谈情形。张谓“李亦谓公早日引退，其意图与白崇禧如出一辙也”。

△　宋美龄到美国务院访晤代理国务卿罗凡特，要求增加对华援助。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内部指示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

△　民国政府将重要文物运往台湾，内有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及外交部物品共3348箱，是日自南京启运。

△　交警第三旅第十二总队在海军第三舰队炮火支援下，在塘沽新河镇与解放军激战。

△　湖北国民党军复占樊城。

△　南京公教人员眷属连日紧急疏散。

12月28日　　各地重要负责人应邀来宁商议，阎锡山、胡宗南是日自太原、西安到南京，随即由蒋经国陪同晋谒蒋介石，要求粮食援助。白崇禧、程潜、傅作义均未至。

△　行政院新闻局否认孙科派代表晤李济深。

△　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应傅作义电邀，乘专机由包头飞抵北平，商谈与解放军谈判问题。

12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以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　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秦德纯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　湖北省参议会通电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国是。同日，立法委员黄绍竑发表谈话，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称“今天中国最重要之问题为改善人民生计，这一点是战争办不到的”。

△　阎锡山晤蒋介石、李宗仁、张群。下午出席立法院招待会，并发表演说，称“共产主义为诊断错误之医术，而共产党为诊断错误之医生”。

△　梅贻琦坚辞教育部长，陈雪屏代理教育部务；赵琛代理司法行政部务。

△　杜聿明之参谋长舒适存与空军第三署署长董明德飞南京复命，向蒋介石报告徐蚌战场杜聿明部被围之情况。

△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夺取天津”。

△　解放军冀热察军区部队解放宝昌县城。

△　东北人民解放军决定取消松江、龙江、嫩江、吉林、合江军区，同时在上述五省成立军事部；保留辽宁军区、辽北军区、安东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取消，所辖冀东、冀察热军区拨归华北军区，保留热河军区；成立锦州军区；内蒙军区不变。

12月30日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由平抵京，向蒋介石报告华北军事情况。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亦于同日抵京。

△　蒋介石电杜聿明，拟派飞机接杜回南京，杜未接受。

△　蒋介石令李延年第六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守淮河，其余在长江以北的部队退守长江以南。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由郑彦棻代理中央党部秘书长。

△　立法院通过外汇管理条例。

△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再发通电主和，促蒋介石表态。电云：“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　河南省府主席张轸与河南省参议会通电主张和平，“恳请蒋总统下野”。湖南、广西随后通电响应。

△　云南省府主席卢汉、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到南京。

△　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任主席，穆罕默德伊敏为副主席。

△　立法院通过，自元旦起，全国实行邮资加价五倍：平信五角，挂号信二元，航空平信四元。

△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12月31日　　蒋介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竟日，研究下野文告，四易其稿。

△　北平中央军校分校学生及宪兵，在城内鸣枪肇事，制造混乱，傅作义迅即派部队予以平息。

是月下旬　　蒋介石与李宗仁经过两次协商，就蒋下野让位问题达成协议：一、蒋主动下野，以便南京政府开始和谈；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宣布和平主张；三、与中共和谈事由行政院主持。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1月

1月1日　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却提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等条件。并表示：“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献词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年半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正在玩弄新的“和平”阴谋，向中外郑重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同时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向长江以南进军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　蒋介石举行元旦团拜，邀李宗仁到礼堂休息室谈话，表示自己“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并要李告诉白崇禧，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再发和平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　蒋介石以总统明令发表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5日，陈接任视事。

△　行政院长孙科发表广播演说，谓此次内战各方均有责任。并表示政府力求解除人民痛苦，改革征兵、征粮制度和稳定物价。

△　阎锡山乘专机返太原。

△　中共中央电复平津前线林彪，指示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工作要点，通过中共北平市委告诉傅作义：一、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二、将傅列为战犯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三、傅可派一有地位的代表及张东荪出城密谈。

△　北平市人民政府于北平郊区成立，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为巩固郊区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北平，着即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市长，徐冰为副市长”。

△　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主任，并发布第一号布告：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着令在北平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的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区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区军事和民政管理事宜”。同日，北平市军管会发《告北平各界同胞书》，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城市的一切公共财产，维护社会秩序，迎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进入北平”。

△　中共中央中原局、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举行元旦祝捷大会，并作准备过江的思想动员，号召广大干部向人民说明渡江是为了彻底

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中国人民求得永远的和平解放与和平生活。

△　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和桂滇黔边纵队成立。粤赣湘边纵队由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桂黔滇边纵队由庄田任司令员，周楠任政治委员。

△　民国政府承认大韩民国。

△　锡林郭勒盟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由北平抵南京。20日，由蒋介石加予德王阿莽仓佛辅教宏觉禅师名号。

△　《冀中导报》与《保定日报》合并为《河北日报》，是日在保定发刊。

1月2日　　蒋介石致电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略谓：“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生民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要求白“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匪所算”。同时致电河南省主席张轸，声言“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熟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骤，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

△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上年12月28日到南京向蒋介石述职，向蒋述诉与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势不两立，本人有职无权的苦衷，请求辞职。蒋答允撤销云南警备总部，并同意卢汉提出将云南的八个保安团扩编为三个保安旅的要求，责成卢汉负责维持滇省治安。是日，卢返回昆明，发表《以全滇力量拥护中央，支持戡乱》的谈话。次日，蒋介石明令撤销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何绍周调任第四十九军军长。

△　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改编长春起义之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本月29日，行授名典礼。

△　人民解放军苏北部队解放黄桥重镇，歼国民党军第二三〇师两个团大部及地方武装3000余人。俘第二三〇师少将副师长苏桂菁以下2900余人。

1月3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战犯求和，其目的是保存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统治法统与统治地位，以及军事力量等。指出“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定在本年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并选举出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同时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本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于4月中旬在华北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通知。

△　蒋介石致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勉励保卫平、津、华北，坚持最后五分钟，称“完成戡乱建国之功，端在此战”。

△　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上尉飞行官谢派芬、中尉蒋声翰及机械员李保瑕、田维初、苟富贵等驾驶C—46式运输机一架起义，自笕桥机场飞抵郑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蒋介石元旦文告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观感，认为该文告“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继予充分之退让”。司徒认为：蒋之辞职表示，是很勉强的。

1月4日　　蒋介石到傅厚岗拜访李宗仁，询问对时局的处置意见，要求李宗仁出面主持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自己五年内不干预政治。

△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商讨时局对策，马超俊主席，张群、黄少谷等先后发言，均表示拥护蒋介石元旦文告，向中国共产党“呼吁和谈”。同日，南京、汉口、西安、天津等各地参议会、国大代表等召开谈话会，并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停战议和。

△　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祝绍周向蒋介石密陈，建议以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在台湾、福建、浙江、广东及海南岛之间，以台湾为中心建立坚强军事组织。

△　蒋介石接见美国军事顾问团巴大维团长，获知美国援助之军械三舰是日运抵台湾。

1月5日　　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布《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指出：你们当前“只有一条路，就是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我们一律宽大待遇”。并表示欢迎他们与前线司令部接洽。

△　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东南灰堆镇，歼国民党军津南第一支队3000余人，俘少将支队司令白英杰。

△　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周碞为京沪警备副总司令。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通知李宗仁说：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介石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拟请司徒雷登向蒋提出抗议。李宗仁表示国民党当局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此时即作放弃大陆准备无乃太早，应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　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自宿县突围抵汉口，所部残余千余

人，逃至驻马店地区。

△　粤汉铁路南段数千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致使广九、广武、广三各次快车停开。工人要求按上年八一九物价指数折发实物。路局答允转报交通部解决，工人暂复工。9日，工人派代表往衡阳路局请愿，未得圆满答复。14日，工人再提五项条件，要求局方于15日答复，否则全体总辞工。后由官方答允薪津照中央标准核发，并免费加发食米，情况始趋缓和。

1月6日　　毛泽东致电林彪、谭政，指示天津作战注意事项："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取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办法，以便减少破坏。"同日，又电林彪，指示对占据学校之国民党军，亦应运用上述办法。

△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开始。下午4时起，华东野战军东、北、南三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河南永城东北之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之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在两小时内歼李弥第十三兵团万余人，攻占村落据点13个。李弥下达突围、转移阵地的部署和命令，令各部以密集纵队态势，利用空军投放毒气弹为突围开路，并在空军火力掩护下逐次对共军作集团冲击，以突破共军的包围。规定7日起转移阵地，8日作攻击准备，9日开始突围。次日，解放军突破第十三兵团青龙集阵地，第十三兵团逃入邱清泉第二兵团防区。华东野战军乘势连续猛攻，又攻占村落23处，并击伤第二兵团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邱清泉即提升邓军林任第七十军军长，准备作最后挣扎。

△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复派"总部"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往蓟县东南八里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洽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　林彪、罗荣桓致函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第二十六军军长林伟俦、第六十八军军长刘云瀚等，劝其仿效长春郑洞国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果能如此，则使天津不受破坏，为人民立了大功。人民和解放军即可原谅他们过去之罪恶，不把他们当成战犯和俘虏看待，并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与个人自由。希望他们于总攻之前，有实际行动。但陈长捷等拒绝。

△　蒋介石电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突围死战，达成任务。

△　郑介民代表蒋介石抵北平，携蒋亲笔信函访晤傅作义。

△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元旦文告说：国民党利用和谈，保持现状，不仅共产党不同意，人民也不赞成。此时张澜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

△　中央研究院公物4000余箱、交通部公物1600余箱，由招商局“海沪”轮运往台湾。

1月7日　　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函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　晨1时，东北野战军二万人向天津守军东局子阵地猛攻，双方

进行激烈炮战。空军连日轰炸天津外围解放军阵地。天津夜间戒严时间提前至下午6时开始，并实行交通管制。

△　行政院召集国防部长徐永昌、财政部长徐堪、主计长庞松舟、秘书长端木恺、交通部次长凌鸿勋开会，拟定疏散事宜。

△　中共中央根据贺龙的提议，同意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和民运工作。军事上，以西南军区司令员名义，指挥部队作战。

△　上午10时，南京71单位机关员工向行政院集体请愿，要求按照上海公教人员存兑黄金办法存兑黄金（每两2000元，每人存兑一两）。秘书长端木恺接见请愿代表，并接受请愿书，答允三日内由财政部拟具办法解决。

△　艾奇逊继任美国国务卿。

1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6日起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是日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计划，要求继续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警惕美国直接出兵的军事干涉。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决议提出1949年的任务，“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织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决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　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举行会谈。傅方提出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而采取以团为单位出

城整编；在新保安、张家口、怀来等地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文职人员给予安排等要求。林彪等人表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各地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者可留下安排，要求还乡者可资遣还乡。并表示："我们对傅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次日，双方草签《会谈纪要》，并附记：傅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

△　蒋介石派张群、黄绍竑由南京到汉口晤白崇禧，转达蒋两点意见："（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张群语白：蒋强调"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白表示他前后发出二电，均主张备战谋和，而不是无原则之妥协投降。10日上午，张群、黄绍竑往长沙晤程潜后返京。李宗仁认为蒋的意图"显然是恐惧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潜会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黄之行的最大目的是为稳定两湖"。

△　蒋介石召集行政院孙科及张群、张治中，会商运用外交促成和谈问题。会后蒋即授意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照会美、英、苏、法四国，希望协助中国和平谈判。

△　外交部分别向美、英、法、苏四国驻华大使致送备忘录，要求四国政府出面，调停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12日，美国政府答复表示拒绝，并称：美国"殊难相信出面调停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苏联政府17日答复说："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提的居间调停，是不适宜的。"英、法两国政府亦相继拒绝。

△　蒋介石决令北平各军由空运撤退青岛，以免为共军各个击破。

△　行政院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一、准1月份对全国文、武、

公教员工、军警各加发薪津一个月。二、公教人员待遇，决定自本月份起调整，仍照11月份计算方式，共分一、二、三、四区及特区。第一区增加25倍；二区20倍；三区15倍（京、沪包括在内）；四区12倍；特区36倍。三、中央银行办理军、警、公教人员存兑金银，上海方面的军、警、公教人员存兑金银办法殊属不合，应克日废止，南京方面不得援以为例。

1月9日　　中共中央军委就与傅作义谈判问题复电林彪、聂荣臻等，指示：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为了避免平、津遭受破坏，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时开始实施。平、津两地处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　傅作义通过北平平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转电林彪、聂荣臻，提出有关部队出城接受改编问题，“亟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

△　人民解放军继续对杜聿明集团盘踞之陈官庄进行攻击，上日已将陈官庄门户孔庄攻占。是日下午杜聿明与邱清泉离开陈官庄，逃到陈庄第五军司令部。邱清泉第二兵团第七十二军由胡庄往陈官庄增援，其主力被解放军击溃，接着该军军长余锦源、副军长谭心、参谋长许亚殷及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第二三三师师长徐华等与解放军接洽投降（是晚按规定路线进入解放军阵地缴械）。李弥第十三兵团阵地全线崩溃，从青龙集一带往西溃逃。晚，邱清泉命所属各部自寻出路。至次日凌晨2时，解放军将陈庄三面包围，第五军代军长郭吉谦指挥第五军突围过程中，第四十五师、第一一二师等部相继向解放军投降。杜聿明、邱清泉及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等从西南方突围。

△　汤恩伯视察辖区沿海各县防务，并训令封锁京、沪江面，自

吴淞口至马当间，只开放南北岸20余个口岸。

△　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徵抵达高雄，检阅台湾训练之新军。

△　上海市参议会通电建议于本年2月10日，在沪召开全国和平促进会。希望各省、市参议会正、副议长或指定之负责代表、各全国性职业团体理事长或互推常务理事到沪参加会议，共同商讨，促成和平。

1月10日　淮海战役结束。是日，华东野战军将邱清泉第二兵团陈官庄阵地瓦解，消灭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等残部共13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自诩为“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八军。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及第八军军长周开成、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等。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等。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逃脱。于上年11月6日开始的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国民党军损失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共五个兵团、22个军，共55.5万余人，另有两个兵团被击退。从此国民党军已丧失大兵团作战能力。

△　为统一指挥东北、华北野战军联合进行平津战役，中共中央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管理平、津、塘及其附近区域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及党务等各项重要工作。

△　蒋介石命蒋经国赴上海访俞鸿钧，促将中央银行库存准备金移存台湾。

△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限令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西安警备司令钟松于2月15日完成西安城防。

△　国民党军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于是日及翌日，两次派天津参议会组成之代表团出城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谈判，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

员刘亚楼出面接见。刘要求代表团转告陈长捷，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去留自便。人民解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答复，否则即于14日10时发起总攻。并给代表团以假象，使之认为围城解放军攻城主攻方向在北城。陈长捷拒绝和平道路，并匆匆将主力第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北城固防。

△　中原野战军收复鄂西北重镇襄阳、樊城，国民党军向南逃窜。另一部攻克房县县城，歼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师一个团。同日，豫皖苏地方人民武装解放安徽省淮南煤矿。

△　中共中央军委为争取在年内修复长江以北的主要铁路，以利中共军队南进，作出《关于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决定》。

△　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设立辽西省（辖九县一市），任罗德成为主席，李杰庸为副主席，省府设锦州市。撤销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

1月上旬　　月初，国民党当局阴谋胁迫上海知名人士逃亡台湾。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委托剧影协会筹委会负责人熊佛西去联系周信芳、梅兰芳等，希望他们留沪迎接解放。周、梅均郑重表示，决不跟国民党逃走，一定留在上海。

1月**11**日　　蒋介石电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指示治台方策，既授以在政治方针上要“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特别培植台籍有为之青年与组训；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又告诫要“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急躁，毋求速功速效”等个人修养。

△　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说“惟此时我军既处劣势，外交运用，恐难有大效”，处境之基本要道为患难相共，自立自助。并称倘苟有一线和平之希望，必竭尽一切方法，以求得之。

△　监察院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修正通过和平宣言，宣称：“全国国民一致期待的和平，自蒋总统本年元旦文告发表后，业已露出曙光，然而事势演到今天，仍在和战未决的阶段徘徊，令人万分悬念。”“在这和平呼声充满宇内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和平，一方面要加强团结，充实自身的力量，来争取和平，保障和平。”

△　蒋经国、俞鸿钧及吴崇庆奉蒋介石命，立“军费草约”，将上海国库99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及7000万美元“预支为军费”，交国军财务署监管。民国政府以军舰、民船及军、民用飞机将金银从上海南运台湾及厦门。

△　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务院通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变化后的立场：英国在中国最好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英政府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等地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并决定“承认中共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央政府”。

△　南京教育界于上午10时假中央研究院举行蔡元培八十二岁诞辰纪念会。胡适在会上讲演《四百年来〈水经注〉整理小史》。自谓他整理《水经注》已经五年，可告一段落了。

△　上海米高梅、派拉蒙、国际等九家外商影片公司职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举行怠工，资方表示让步后，15日复工。

1月12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聂荣臻，指出要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9日电所持立场，“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否则我军将于14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也不能拖延太久”。

△　白崇禧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拟通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与中共取得联系，共同反蒋，并邀请李济深及民革中央迁往武汉。黄绍竑到港时，李济深已离港北上解放区，黄便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黄函略谓：白崇禧“反蒋早具决心”，希望李向中共方面转告武汉桂系反蒋经过及以后的决心和行动；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当局与白崇禧成立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信中还说：白崇禧认为时机紧迫，能早日得到中共的答复，随即便可发表反蒋宣言，军事立刻行动。黄绍竑在黄琪翔的安排下，与潘汉年晤面。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

△　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招待在台之国民党中委、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等128人，征询对时局意见。陈诚表示：成立联合政府“不过为投降政府”；“倘主张接受不可接受之条件，此亦不过表示苟安之心理”。并表示以“民生第一”治理台湾。

△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李家庄成立。蔡畅、邓颖超、李德全分任正、副主任。蔡畅、邓颖超、李德全、康克清、沈兹九、罗琼、张琴秋等21人为常委，张琴秋为秘书长。

△　杭州空军学校教育处副官高全铮驾驶“空中吉普”L—5通讯飞机一架起义，由杭州飞抵安徽宿县，参加人民解放军。

△　国民党军飞机狂炸济南市，炸死炸伤市民140余人。次日，又轰炸徐州市，死伤市民30余人。

1月13日　傅作义邀请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及各教授商讨和平问题。

△　白崇禧将中央银行由粤汉路运往广州之银元中途截回。

△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抵西安，希望宁、陕两省加强合作。

△　《察哈尔日报》在张家口创刊。

1月1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提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　东北野战军在天津国民党军拒绝走和平道路的情况下，按预定计划于是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从东、西、南三面突入市区，向纵深发展，至翌日凌晨5时，东、西主攻部队在海河金汤桥会师。至下午3时，全歼国民党军13万余人，俘中将司令陈长捷、少将副司令邱宗鼎、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中将军长刘云瀚等将官29人，及天津市长杜建时等。

△　蒋介石召集陆、海、空将领，督导江防部署，并指示作战方针。

△　傅作义对走和平道路依然心存疑虑，对周北峰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草签的《会谈纪要》拖延不作答复，经他专机接到北平的好友、与中共方面有友好交往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及北平各方人士的开导、敦促，决定派邓宝珊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于是日赴通县西五里桥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再次会谈。当晚，聂荣臻告知邓宝珊，已下达攻击天津的攻击令，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在内（此前谈

判包括华北“剿总”管辖之平、津、塘及绥远等地区）。周北峰电傅请示。傅复电：“与邓相商斟酌办理。”翌日正式会谈开始。16日双方签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

△　白崇禧招待武汉各界人士150余人，宣称“我们必须认清时局的严重性，更须深切了解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

△　国民党空军第二十八中队驾驶员阎承萌驾驶P—51“野马式”战斗机一架起义，从南京飞抵济南，参加人民解放军。

1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原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一野战军（2月1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辖第一、第二兵团；原中原野战军改称为第二野战军（2月5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原华东野战军改称为第三野战军（2月9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原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3月28日正式改称），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邓子恢，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由华北军区原属之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为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均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原属东北野战军建制的铁道兵纵队扩建为铁道兵团。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指出：天津解放后“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

△　蒋介石召孙科、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多人研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4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16日、17日复增加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等人，继续研讨对付办法。

△　南京市参议会发表宣言，主张讨论中共八项原则和蒋介石五项条件。并吁请各省、市参议会及全国性人民团体（均包括解放区），立即派代表于本月内齐集上海，“筹组全国性的和平改革促进会议”。

△　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大量抛售黄金、棉纱，吸收游资，平抑物价等议案，以及中越民航条约延长三个月。

△　空军第二十大队第十一中队飞行员宋洪儒、刘焕统、邹灿坤三人驾驶C—46型运输机一架起义，自青岛飞抵沈阳，加入人民解放军。

△　中原野战军攻克鄂西北重镇老河口，俘边防司令陈别三等以下1200余人。19日、20日分别收复汝南、竹山县城。21日，收复襄河西岸宜城县城。

△　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天津市人民政府同日成立，黄敬任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

△　原冀察热辽解放区的察哈尔部分和原华北的北岳解放区正式合并为察哈尔省，张苏任省政府主席，李济寰任副主席。察哈尔军区同时成立，王平任司令员。

△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晋绥、陕甘宁两边区合并，统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　中共松江省委机关报《松江日报》在哈尔滨创刊。5月15日，

松江省委决定将《合江日报》合并于松江日报社，《合江日报》停刊。

1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的问题，“你们不要正面拒绝”。同日下午6时，再电林彪等，指出“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同时提出：“积极准备攻城。”

△　中共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致电傅作义，促自动放下武器，或离城接受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　在南京立法委员多人致函孙科，希望政府立即派定适当人选，与中共方面进行商谈，以“寻求促成和平之有效途径”。并特别指出：“断不容因循犹豫，致使国家续遭战祸。倘全国人民所企求之和平得早日实现，同仁等愿不计任何个人牺牲，以促其成。”

△　蒋介石在中山陵前检阅首都附近军警3.8万人。汤恩伯、张耀明等陪同。晚8时，又于官邸宴请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和孙科、吴铁城、张群、洪兰友、邵力子、张治中等，继续研讨中共中央八项条件。

△　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重庆绥署主任朱绍良奉召到南京见蒋介石。

△　华东野战军解放皖北之五河、凤阳两县城。18日，又收复苏北高邮县城，国民党军南逃。

△　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表第一号公报，宣布19天歼国

民党军13万，解放城市18座。

1月17日　　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表示对傅走和平道路“无可奈何”，要求于18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希望傅“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傅接电后一面复电蒋“遵照办理”，一面嘱“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将此情电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请届时对天坛临时机场实行炮击，阻蒋机着陆。次日起，蒋机飞临北平上空，在解放军连续炮击下无法着陆，粉碎了蒋介石运走其嫡系“精锐兵团”和装备的企图。

△　人民解放军解放塘沽、大沽。塘沽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五万余人在天津守军被消灭后，于是日在侯镜如率领下乘船从海上南逃。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歼其后尾的3000人，塘沽、大沽解放。

△　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在北平市参议会讨论北平和平问题。傅作义“总部”各将官、北平市长刘瑶章、前市长何思源等50人与会，推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11人为代表，拟通电致中共和南京两方。并决定于次日出城与解放军接洽。

△　旧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雷震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发表对和平问题看法。他认为：和谈先决条件必须现地停战；无和谈力量即不能言和。

△　中国青年党中常会开会，发表对时局之书面意见，强调必须具有和谈的力量，即“能战始能和”。

△　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决议于本日起停止金银存兑，自下月起，发行黄金短期公债。

1月18日　　国防部遵蒋介石令，作以下人事任命：一、汤恩伯专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二、衢州绥署撤销，改设福州绥署，派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三、派张群为重庆绥署主任；四、广州绥署主任宋

子文专任广东省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五、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派彭孟缉为副总司令。

△　蒋介石任命金宝善为卫生部长。

△　蒋介石闻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到北平参加和平运动，遂责令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电令北平站站长王蒲臣置何思源于死地，“以儆效尤”。是日凌晨3时，由特务在何宅屋顶安放的炸药爆炸，何次女毙命，何及二子一女受伤，何妻何宜文受重伤。何不畏强暴，裹伤于本日下午与立法委员、中国大学代校长吕复等率领代表团出城，向解放军表达和平愿望。

△　中国和平策进会致电毛泽东和蒋介石，提出和平纲领13条。其中主张：“人民之生活方式，非依法不得变更”；“政治、文化、社会之全面改革，均循和平革命之民主道路为之”；“政党政治应建基于独立的专家政治之上，依据国策处理各级政府之事务”等等。

1月19日　傅作义派“总部”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在北平依据16日双方达成的协议，共同拟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七、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

办法；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上除第十四条未予公布外，其他各条于22日在《平明日报》公布。

△　蒋介石会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之意。同时嘱由吴忠信、张群与李宗仁洽商接代手续。李表示一切以蒋之意旨为意旨，其接任时期由蒋决定。

△　顾祝同参谋总长签呈：“徐州剿匪总部所辖中间指挥机构，拟即予以裁撤。”并附裁撤机构番号表：一、徐州“剿匪”总部前进指挥所。二、第二兵团司令部。三、第七兵团司令部。四、第十二兵团司令部。五、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六、第十六兵团司令部。七、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八、首都卫戍总部滁县指挥所。其各主官分别为：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黄维、李弥、孙元良、冯治安、杨干才。是日，蒋介石电复准予照办。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在此情况下的外交原则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并提出“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指示》就不同国家的外交机构，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的学校、医院、报刊、通讯社及外国记者等项，都规定了暂行政策。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寓居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邀其“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为帮助宋庆龄顺利地经香港北上，同日，中共中央电中共上海局和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刘晓：“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　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会见吕复、何思源所率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代表，何思源等表示要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双方代表谈判应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莫文骅告以中共方面对傅作义及其所部的处理方针。何思源等感到满意，特别对傅部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及保障其本人、军官家属财产安全，认为干脆，很宽大。

△　行政院政务会议讨论时局对策。会议决议并声明：“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郑重表示，愿与共方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而对中共提出的八条只字不提。

△　在南京监察委员举行座谈会，于右任等20余人出席，“均望政府考虑释放政治犯问题，以作号召和平之进一步表示”。同日在南京之国大代表等百余人集会，余精一提出“亟要撤销戡乱建国委员会”的提案。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发《关于起义部队在解放区军属待遇问题的训令》。指出：凡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自起义之日起，其官兵之家属即为革命军人家属，在解放区内应享受革命军人家属之待遇。其生活确有困难者，得由民主政府按优属条例给以照顾。

△　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抵台就任。

1月20日　毛泽东分别致电南洋爱国华侨领袖、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美洲爱国华侨领袖、美洲致公党监督司徒美堂，电文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邀请其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同日，中共中央电示在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及刘晓，邀请张澜、黄炎培经港北上，参加新政协。

△　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将白崇禧代表黄绍竑关于白崇禧联共反蒋的意图电告中共中央。是日，毛泽东以周恩来、李克农名义复电潘汉年，告之以下列各点答复黄绍竑：“（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14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次日，中共中央通知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　李宗仁通过刘仲华转告中共驻上海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动作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

△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时局问题，孙科主席，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张群、王世杰等参加，议决由行政院尽速将和谈步骤和选派代表问题拟定具体方案，然后再由中政会讨论。

△　蒋介石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　蒋介石令撤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调刘峙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　蒋介石特任刘攻芸为中央银行总裁，特派俞鸿钧为中央银行理事兼常务理事。派黄珍吾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　蒋介石致函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略谓：“近日政局，即有变动，但陕省重要，一切工作皆应照常进行，而且比以前更积极准备，作死中求生之奋斗。”指示“今后主力应置于汉中附近，对四川关系，特别密切，将来应受重庆张主任之指挥，则公私皆宜”。“只要吾人能自立自助，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则最后胜利未有不属于我也”。次日蒋宣告下野离京前，又致电胡：“尚祈为国珍重，努力勿渝，以竟救国卫民之功。”

△　蒋介石于上年11月命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调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南京建立特别行动组，负责监视、刺杀李宗仁及白崇禧等桂系首领。本月中旬，蒋介石在桂系逼宫的情势下，意欲将李宗仁除掉，由毛人凤每日叮嘱沈醉作好随时行动的一切准备，由于蒋决定“引退”，推李宗仁到前台支撑危局，是日由毛人凤命沈醉结束这个特别行动组。

△　蚌埠解放。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令守军撤退前将蚌埠以北之淮河大桥炸毁。

△　国防部令派李延年负责指挥江北战事。

△　第二批黄金99万两从上海国库启运厦门鼓浪屿。

△　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辽西省政府。任命罗成德为省政府主席，省府设于锦州。

1月21日　　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宣称：鉴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

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宣布“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　蒋介石宣布下野前，亲书致傅作义函，告以“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共并无甚变易”，派国防部长徐永昌携往北平对傅“予以劝勉”。

△　上午10时，蒋介石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讲述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各方面“皆濒于绝境”，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提出由李宗仁“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挽救党国危机”。蒋宣布下野后，于下午4时由明故宫机场乘“美龄号”专机离京。当日蒋偕蒋经国等飞抵杭州，次日回奉化溪口。

△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评论《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19日决议要求所谓“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不但完全忽视毛泽东在本月14日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而且直接推翻了蒋介石1月1日的建议，“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

△　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代表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代表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在周北峰陪同下进入北平，当晚与傅作义会晤，商定按和平协议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处理执行和平协议的军政问题。中共中央指派叶剑英任联合办事处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为委员；傅作义指派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为委员。有关傅部城内部队开出城外改编的日期、次序、地点，以及军政机关、工矿企业移交等问题亦进行了商谈。

△　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机关及各军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条文，大多数将领均表示赞同。蒋介石嫡系第

九兵团司令石觉、第四兵团司令李文从中作梗，但在大势所趋下提出与蒋介石关系特殊，不能执行改编任务，要求带师长以上将领回南京。傅予以同意，令其指定接替人员，保持军队安定，不得破坏和平，否则以军法论处。石、李表示服从。傅作义即将协议条文下达各部，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　孙科决定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期间继续蝉联行政院长。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件。声明略谓："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义正词严，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次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

△　蒋介石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1000万元，汇交在美国之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连同原存美国余款悉数从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蒋此举系虑及和谈成功，建立联合政府，以防该款落入新政府。而采取此种非法私相授受措施。

△　华东野战军解放含山县城。另部解放安徽省会合肥，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两个团南逃。同日，苏北泰州、海安，及津浦路南段重镇嘉山县城亦宣告解放。

1月22日　　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任代总统职，宣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个人服务方针，亦夙以人民意志为依归。"并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　李宗仁派甘介侯在上海分别访问宋庆龄、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章士钊、罗隆基，就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　晚，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在平国防部保密局各单位头目会

议，参加的有新任北平站长徐宗尧、保密局北平督察（原北平站长）王蒲臣、北平市警察局长杨清植、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处长毛惕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等10余人。傅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订，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负责要飞机把你们送走”。此前，徐宗尧已与中共城工部刘仁的代表王博生建立了联系，愿意弃暗投明。24日，保密局北平站头目及特务人员在徐宗尧动员下，加入和平起义行列。

△　傅作义“总部”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奉傅命以“总部”发言人身份于是晚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五六十人，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处、南京民国政府行政院新闻局人员，阎宣布“和平协议”及傅以总司令名义发布的文告。

△　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从电台广播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消息，于是日飞平晤傅，傅向他指出走和平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希望董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董当即向傅表示“你怎样走，我就怎样走”。董回绥远后，即遵傅的吩咐，开始在上层军政人员中进行酝酿准备，以待时机。

△　李宗仁致函民盟中央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表示他“决以最大之努力谋和平之实现”，希望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一致主张，力加赞助”，作和平调解。

△　白崇禧致函李济深，宣称：“兹蒋已去位，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抉择。”

△　行政院会议决议特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和谈代表，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同日，邵力子对专访他

的记者表示：“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为保持国家之元气和减少人民的痛苦，大家都迫切要求和平，国共双方也都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又相信我们的使命能够达到，而能促进和平的成功。”同时希望中共方面“提出商谈的地点，使双方的谈判早日进行”。邵并向行政院长孙科恳辞首席代表职，次日获准。

△　到达解放区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4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

△　毛泽东等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邓宝珊，表示“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　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支持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谓：“中国的永久和平必须建筑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上面，这是一点也没有可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　美国广播公司比尔声称：“我想我们只要一年下8亿美元的赌注，就能阻止中国共产主义的狂潮。”

△　华东野战军解放来安、舒城两县城。次日解放安徽重要产米区巢县。

△　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日及本日先后将天津解放前被国民党当局擅自释放的原华北伪政权驻日大使徐良和伪天津市市长温世珍重新逮捕。

1月23日　　代总统李宗仁饬行政院实施七项和平措施：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　李宗仁、白崇禧派立法委员黄启汉、华中“剿总”总部参议刘仲华往北平与中共方面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军事进攻。黄、刘是日乘军用运输机到平。

△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　国民党中央重要党史资料108箱，运抵台湾省基隆港。

1月24日　　潘汉年再晤黄绍竑，说明李宗仁如能效法傅作义，先具体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为先决条件，然后好谈和平解决方案。否则，一切空谈均于事无补。

△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央人事调动：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由孙科代理；郑彦棻继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原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辞职照准，推李惟果继任；组织部代理部长谷正鼎真除组织部长；原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辞职照准。同时通过改派卢汉为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为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方天为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特别紧急宣传通报》，通报国民党党员：蒋介石“仍以总裁地位”继续指导国民党“致力革命”，要国民党

人“更须继续接受总裁之指示”。

△　清华、燕京两大学教授发表时局宣言，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

△　李宗仁为表示实施和平，指示顾祝同释放被拘押的张学良、杨虎城。2月1日，顾函复李宗仁，将此事推与陈诚、张群。

△　华东野战军解放长江北岸南京外围重要战略据点滁县及泰兴。同日，中原野战军解放皖西庐江、岳西两县城。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南京政府派定和谈代表发表谈话，指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关于谈判代表，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

△　晚，李宗仁、孙科、吴铁城、顾祝同、吴忠信五人集议，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定将政府迁广州办公，以2月5日为广州办公日期，并由外交部通告各国驻京使节。李宗仁表示自己决不离开南京，以等待和平实现。各机关疏散自按原计划实行。

△　张群、邵力子往上海虹桥疗养院专访民盟主席张澜，希望张澜重新出面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张澜断然表示：“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作调解人。”

△　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特种刑事法庭，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及被停刊之报刊准予复刊等法令。

△　上海市警察局制定《上海市警察局突击搜查实施办法》呈报上海市长吴国桢、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办法》规定突击搜查分作

甲种、乙种、丙种三种方式：甲种搜查法“发动所有警力（行政警、刑事警、保安警、义勇警、飞行堡垒及学警等），实施全面搜查”；乙种搜查法“指定地区，发动该地区内各分局、所、队所有警力，实施联合搜查”；丙种搜查法“各分局、所、队就所有警力实施局部搜查”。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分别于2月3日、2月18日核准。

△　原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代主任龙云自上年12月上旬逃离南京到香港后，宋子文曾往香港建议龙云出面组织“华南反共联盟”，遭龙拒绝。是日，龙在港接见法新社社长白龙沙及其他记者，发表长篇谈话，郑重否认自己参加“华南反共联盟”之事，并抨击蒋介石下野的幕后阴谋。龙将这篇谈话派专人送到昆明，在《观察报》上发表。

△　华东野战军解放江北重镇扬州城，国民党军渡江南逃。另部攻克浦口以西之全椒县城，全歼保安团1600余人。另部连克六合、如皋、定远三县城。

△　中原野战军攻占平汉路南段重镇驻马店。同日豫北解放军于滑县北面之卫河湾，全歼由新乡出城抢粮之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三一六团及国防部炮兵团、炮十四团等部2500余人。

△　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五绥区司令官张轸，已于昨、今两日释放政治犯胡德乐等13名。

△　青岛海军学校迁移厦门。

1月26日　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欢迎会，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李德全、郭沫若等34人。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致欢迎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任委员谭平山、中国妇女联谊会主席李

德全等20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

△　民国政府发言人评论中共发言人25日广播谈话，以所谓“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22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商谈”为其假和平辩解。且指责中共方面“不立即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委诸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

△　蒋介石于溪口密函南京、上海的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如果和谈不成，就作战到底。

△　美国国务卿艾其逊发表声明：美国对华政策不变。

△　国防部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樱庭子郎亦宣判无罪。伊东忠夫判无期徒刑。

△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没收战犯财产问题的指示》，指出中央所决定之43名战犯名单，是报道消息，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据以没收其财产，同时也不必急于实行没收，可先不露声色地进行调查，调查期间如确有逃避转移之行为者，可明令冻结之，但也不忙没收。

1月27日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他自“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并说：“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和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

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望中共方面“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并表示“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以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　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次日，叶剑英向黄启汉、刘仲华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日本投降以来对防止内战，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所尽一切努力及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在毛主席八项条件基础上愿意和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29日，黄回南京复命，刘暂留平。

△　国防部发布文告，宣称为了缩短战争，保护古都北平，同意傅作义宣布于22日上午10时起休战；并谓“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沈阳发表对于时局声明：“号召全国工、农、兵、商、学各界，号召党内爱国民主分子，一致拥护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对于时局之主张及八项和平条件。”并声明中国人民要求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新中国，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至重蹈辛亥以来革命失败之覆辙”，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进行，“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

△　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就22日李宗仁要求民盟调解和平事发表严正谈话，指出：“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解。”

△　中联企业公司“太平号”客轮于下午4时18分由沪驶台，于当晚11时驶抵舟山群岛时，在迷雾中与自基隆驶来之货轮“建源号”相撞，两轮同告沉没，乘客大部分罹难，获救者仅26人。

△　驻青岛外围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第二五二师第七五四团官兵，在团长方本壮、副团长张德义率领下，于即墨以南地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　杭州航空军官学校学员李延森、周梦纪驾PT—14教练机两架起义，自笕桥机场飞抵合肥。

△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对处理时机、登记办法等作出明确规定。

△　华东野战军解放苏北启东、海门两县城。次日复解放靖江县城。

△　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电告蒋介石：“奉本国政府命，撤离中国。”同日，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宣布停止工作。

1月28日　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严重警告南京政府：“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对其他日本战争罪犯，“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谈话严正驳斥南京政府发言人1月26日的谈话，提出“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

△　周恩来针对李宗仁进行的假和谈活动，致电吴克坚：向尚在沪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说明，应坚持李济深等55人1月22日声明所持的立场，“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毛泽东在该电上加上：“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

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

△　李济深致李宗仁公开信，指出“吾兄如真有和平诚意”，即全部接受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所提之八项条件，“方有和谈之可言”。

△　中国致公党发时局通电，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和平主张，并渴望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

△　白崇禧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晤见中原野战军负责人，转达他的意向，表示对毛泽东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宣布的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联合中共军队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够让他参加联合政府。

△　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在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帮助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作出贡献。他的老部下、并有师生之谊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本月上旬向陈提出要和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作商谈。是日，陈派外甥丁名楠持他的手书赴沪见汤。函谓：“兹有×××先生应邀去见你，请你和他畅谈。我们从前的计划他都同意，希迅速实行，以免夜长梦多。”并附四点意见：一、徐蚌战争已结束，蒋方彻底完结，这正合全民愿望。请你不要遵蒋方指示，上海工事应全部停止；二、有利于蒋方军事部署也完全停止，以免扰乱民心；三、上海全部物资，不必变卖，留给共方；四、我们早已商定，以保护沪、杭安全以至全浙人民安全，不受军事扰乱为主，对溃兵游勇，要严加管束。此函被特务头子、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发觉，汤为个人安危，于次日将陈密函送溪口蒋介石处告密，并向蒋誓输忠诚，自请诱捕陈仪归案。蒋介石得报，即命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派特务对陈严密监视，并安排其心腹周碞准备接替陈仪职务。

△　新任美国会援外监督委员麦卡伦声称将以15亿美元援助民国政府。2月8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表示希望于3月份向国

会提出延长援华计划法案。

1月29日　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下达《应付时局六要领》密令，一、认清中共企图。二、中共八条“第一条所谓战犯，意在侮辱我领袖，动摇我信心”，“须予严厉驳斥”。三、“军事最近作战重点，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宜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战术”。四、“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期短期变成劲旅”。五、“对后方治安秩序应加维持，地方散匪及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严加取缔肃清”。六、“对部队应特别注意激励士气”。2月4日，该通令转发中为解放军所缴获。

△　北平联合办事处于下午在颐和园益寿堂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共方面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傅作义方面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出席。会议决定：联合办事处即日成立；工作方式采用集体办公；办公地点设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议决：“本月31日，北平城中所有国民党军一律撤至城外规定地点，当日人民解放军即入城接防。”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解放战争两年半（1946年7月1日至1948年12月31日）的战绩公报：共歼灭国民党军207个整师433.1万余人，解放城市270余座。

1月30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批南迁人员抵达广州。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同时到达，对记者称：“此次南迁局面，使吾人深感惭愧，国民党革命本是由广东打出去的，今反退回原地。国民党要复兴，惟有再度打出去。”

△　中原野战军解放河南光山、潢川两县城，潢川五个保安队全部投降。

△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李筠、邢国铮等四人夺取C—47运输机一架起义，由上海飞抵济南，参加人民解放军。

△　美、英、法驻华使馆南迁广州。

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按照和平协议，自22日起首先将自己的嫡系部队骑四师、第一〇四军开出北平城，到达整编地点，随后华北“总部”所属部队均按指定地点陆续开出城外。是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从西直门开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北平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入城接收市政，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宣告和平解放，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结束。在这次战役中，东北、华北野战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共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　北大、辅仁等10余所学校学生及电讯局工人4000余人于下午5时在中南海与入城解放军举行盛大联欢会，欢庆北平和平解放。

△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和特点，并表明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决心。说明即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关旅顺港、新疆及外蒙古独立等问题。关于旅顺港问题，毛泽东赞成苏联保留海军基地，当中国稳定得有能力防止日本侵略的时候，苏联也就不需要旅顺港基地了；关于外蒙古问题，毛说内外蒙古应该统一起来，并入中华民国的版图；关于新疆问题，毛说，新疆的伊犁地区在闹独立运动，当地的起义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态，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议》是不平等条约”，根据斯大林的来电，表示“苏联政府决定，撤销这一不平等条约”，“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从旅顺口立即撤出苏联军队是适宜的，则苏联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要求”。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说，苏联“不支持新疆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对新疆的领土也没有任何野心”，表示“新疆将归入、也应

该归入中国的版图”。关于外蒙问题，米高扬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的主张。米高扬根据斯大林的来电说，“外蒙古领导人主张把中国的所有蒙古地区同外蒙古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表示“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个计划”，但是“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自己”。毛泽东表示“以后不再提蒙古统一问题”。2月7日，米高扬离西柏坡回国。

△　南京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中共中央发言人28日声明作出所谓答复。声称冈村宁次问题是一个“司法问题”，“完全与和谈无关”，拒绝重新逮捕日本侵华战犯，拒绝逮捕蒋介石等战争罪犯。

△　李宗仁偕邵力子由京到沪，于上午10时30分邀社会各名流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陈光甫、冷遹、张君劢、钱新之等10余人商谈和谈问题，提出以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陈光甫、冷遹五人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搭桥”。午后召集行政院在沪各部、会官员孙科、吴铁城、朱家骅、徐堪、刘维炽、左舜生、钟天心、刘攻芸、端木恺等商谈所面临的各项问题。继往香山路访晤宋庆龄后返京。

△　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决定继续顽抗，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为45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区，而对南京地区则不设重防。待将上海之金、银与美钞运抵台湾后，再放弃华东、华中，转而退守台湾。并于西北、西南地区继续抵抗。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发表谈话，宣称中共如渡江，本人“决以全力保卫”。并称“江防严密，绝无疏虞”。对扰乱秩序者，“决依戒严法令，严予惩处”。

△　南京政府遵从东京麦克阿瑟的命令，将日本侵华战犯260名连

同冈村宁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东京。

△　美国《旧金山纪事报》发表社评，攻击中共和谈条件要求惩办战犯“为破坏国际道义之行为”。接着《俊克兰论人报》、《华盛顿评论报》加以附和，称惩办战犯“既无道义上之理由，亦无法律上之根据”。

△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因癌症逝世于美国旧金山。

是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2月27公布本月份战绩公报：共消灭和改编国民党军61个整师，62.8万人；俘获师级、上校以上军官123名（包括投诚者17名）；缴获各种炮7069门、飞机57架（内起义者九架）、坦克271辆；解放人口960万、土地二万平方公里、城市39座。

△　张群往重庆就任绥靖公署主任前，往上海虹桥疗养院访问张澜。张澜告诫张群说：“到四川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停止征兵征粮，更不要在四川打内战。”张群回川上任后，即释放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21名民盟盟员（内有中共地下党员数人），并将征兵名额由42万人减为6.2万人。

△　外交部同意苏联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及塔斯新闻社分社。

2月

2月1日　　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要李宗仁使者刘仲华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和平条件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　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童冠贤致电在上海之行政院长孙科，希望孙为便于和谈大计，以政府各要员仍留南京为宜。同日，孙

科应李宗仁之召，偕内政部长洪兰友自沪抵南京。

△　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合组之人民和平代表团邱致中等一行，携带“和平纲领”，乘专机由南京飞青岛，准备往北平会晤叶剑英。

△　汉口市人民和平促进会分别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李宗仁代总统。致李电谓：“毛泽东先生子感电文，谦冲自牧，悲天悯人之精神，益征雅度虚怀，处处为国家民族着想。”促李宗仁积极进行和谈。致毛泽东电则称：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和平曙光掩映大陆。匝月以来，政府披沥诚求”，并说，“当和平使者整装待发”之时，“军事之冲突似迄未停止；宣传之言论，似仍多刺激，和平前途尚行暗淡”。

△　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下午抵达兰州，对记者谈话称：和平并没有绝望；自己为政府派定和平代表，愿为和平而努力。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迁移广州办公。

△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民主人士56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祝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次日，毛泽东、朱德复电，“极感盛意”，并指出：“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　周恩来交待齐燕铭、周子健立即赶往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并会同金城、申伯纯将暂住李家庄的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韩兆鹗、雷洁琼、沈兹九、何惧等送往北平。

△　中共中央电贺北平解放。指出：“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

利，连同东北、华东、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　华东野战军解放苏北纺织业中心南通，国民党军渡江向南退却。

△　北平联合办事处成立，中共方面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傅作义方面郭宗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焦实斋（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周北峰参加，叶为主任，郭为副主任。

△　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于北平成立，陈震中当选为筹委会主任，刘廉儒、邵敏、顾光顺为副主任，史继陶为秘书长。

△　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处长魏特迈与其他美政府官员到日本东京与麦克阿瑟、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参谋长坎贝尔等密商对华政策。4日至7日，司徒雷登在青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蓝姆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密商中国局势。

△　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公布《维持治安紧急处置办法》四条：一、聚众抢劫财物者杀；二、散布谣言、扰乱治安者杀；三、为首纠众暴动者杀；四、故意造成黑市扰乱币制者杀。

△　广州特刑庭结束。广州当局释放政治犯200余人。

△　南京卫戍司令部查封《南京人报》，谓该报假造要人卷款出逃丑闻，“挑拨离间”。

△　财政部重新调整货物税额，卷烟较上月增加113％，火柴增180％，毛纱增四倍，棉纱增21％，化妆品、土酒、食糖等均增一倍。同日，沿海及长江线轮运价重新调整，客货运价一律增加60％。铁道客货运费涨价四倍。

△　上海市长吴国桢密电台湾省府主席陈诚，提出对存沪物资予以紧急处理，凡为台方所需要者，应赶速运往。

△　广州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利字104号”油船于上午10时40分发生大火，焰高六七丈，至4日晨始告熄灭，烧毁飞机油6000余桶，搬运工人10余人丧生、失踪。

2月2日　　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部队进行荆门战役，是日，将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宋希濂部第七十九军军部和一个团部又两个营，包围于荆门城内。

△　空军飞行员李愚、刁家平驾驶L—5通讯机一架由上海起飞后坠毁，两人受伤，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到达苏北解放区。

△　中原解放军收复鄂西北房县城。

△　苏联驻南京大使罗申一行36人，随行政院迁穗。

△　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对美联社记者声称，建立粤、桂、闽、湘四省联盟。

△　南京卫戍司令部发言人以所谓“政府谋求全面和平，非谋求局部和平”，宣布取缔南京之自治会、和平促进会等组织。

△　北平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正式迁入北平城内办公，分别发布《入城办公布告》，申明继续遵行平津前线司令部颁布之约法八章。

△　北平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发布布告：奉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成立，任务是确保北平治安，保障革命秩序。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执行任务。程子华任司令员。

△　《人民日报》北平版正式创刊，发表社论（代发刊词）《为建设人民民主新北平而奋斗》，同日，新华社北平分社成立。北平新

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

△　粤汉铁路南段工人因路局不履行协议，再次罢工。次日上午广九、广汉、广韶各列车停开。下午局方答允对员工薪饷以米粮计算，晚8时复工。

2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上午10时，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开始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及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代表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欢迎的人群挤满了解放军通过的各条通衢大道，各民主党派人士、教授学者和社会名流也加入欢迎行列。

△　留京国大代表百余人于上午召开联谊会全体大会，通过多项提案，并促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等返回南京，共同促进和谈。

△　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致公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指出："南京独裁政府违法摧残民主政党，逮捕学生，执行内战政策，早已不能代表民意。"如美国政府再继续援助南京政府，是"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

△　马叙伦、沙千里等六人，发表《告上海同胞书》，劝告上海同胞勿上国民党假和平的圈套。

△　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于广州宣布施政三大原则：一、政治自由；二、经济民主；三、军事自卫。六大政纲：一、生民之政；二、养民之政；三、教民之政；四、卫民之政；五、管民之政；六、用民之政。三大目的：一、安；二、便；三、足。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在青岛声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为保护美侨，仍留在西太平洋，“使整个中国沿海的美国人感到安全”。

△　美国经合总署停止对解放区之救济工作。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长莱普汉、副署长葛里芬一行抵台湾考察经济建设。

△　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荣、黄友寿，中尉军械员黄文刚等四人驾驶B24—483号重型轰炸机一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

△　赣西新喻县因店租人与租店人发生冲突，引发大规模械斗，扩及清江、上高、宜春、分宜、高安等县，参加民众达千余人，步枪千余支，时间绵延一个月，死伤达数百人之众，仍未停止。

△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东、华中、华北、中原、东北各中央局调集干部，集训待命，准备随军渡江南进。

2月4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民党政府将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等遣回日本的严正声明。警告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立即追回移交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现时中国国防负实际责任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行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权利”。对于被东京麦克阿瑟总部擅自释放之其他多名战犯，“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保留要求重行审判的权利”。

△　行政院长孙科偕副院长吴铁城等由沪飞抵广州。

△　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于3日晚进攻荆门县城，占领东端要地文峰塔，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急电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求援，并下令部队向南突围。第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主张固守，并亲率

一团反攻文峰塔。虽然占领文峰塔之人民解放军当即退出，而驻守城内之国民党军仍按方靖的命令分路向西南突围，遭埋伏在各要点的人民解放军伏击。是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占领荆门，歼灭第九十八师一部，生俘军长方靖以下5000余人。

△　云南东南部人民解放军敌后武装解放马关县城。翌日解放云贵边境之罗平县城。另部解放滇越路西侧之屏边县城和滇越路支线终点石屏县城。

△　豫北前线解放军解放新乡西北之辉县，国民党军千余人全部投降。

△　美国军事顾问团最后一批人员由团长巴大维、海军组长奥尔特率领离华，抵达日本东京。

△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制订《各联合中学临时中学学生组训办法》检送国防部转饬各联合中学、临时中学执行。规定各校分别编组学生总队、大队、中队，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行动的控制。

△　《人民日报》消息，天津警备司令部及第六十二军和第八十六军两个军部、10个师及特种部队和地方军，共13万余人被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下将级军官28人及大批军官被俘。

2月5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指出必须在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项。即“（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

△　中共中央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复电中指出，只要李宗仁、白崇禧“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仿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指傅作义）的态度对待他们”。

△　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指出：为击破国民党的假

和平阴谋，配合即将进行的谈判斗争，对于各大城市首先是长江流域各大城市，应该有准备地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要求完全实行中共的八项条件，按照北平办法和平解决。

△　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组织由颜惠庆任团长的“人民和平代表团”六人，准备赴北平洽商和平。

△　黄绍竑、黄旭初到南京谒李宗仁。对于和谈问题，李表示最好能做到划江分治；白崇禧亦如此设想。黄绍竑则认为，在目前强弱悬殊情形下，隔江分治是办不到的。8日，李宗仁命黄旭初携李宗仁信函往广州访问孙科、吴铁城等人。

△　留沪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及监委50余人于上午9时召开座谈会，讨论促进和谈和政府迁移问题。多数监委对行政院迁穗表示不满，并提出纠正案，同时主张监察院不应随行政院迁穗，2月份院会仍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和平问题研究委员会，推刘平江、陶百川等七人主持其事。

△　鄂省人民和平促进会发起之鄂、桂、湘、赣、皖、豫、闽七省市和平促进会在武昌召开预备会议。6日下午1时，七省市和平促进会联合大会正式开幕，桂省参议会议长蒋缦 伊任大会主席，并即席发表讲话，强调立即停战言和。8日，通过大会宣言，闭幕。

△　行政院在广州正式办公。院长孙科和副院长吴铁城邀集立法院副院长刘健群及立委多人，以及省、市参议长垂询粤省治安和经济情况。

△　程思远应邀于台北会晤陈诚。陈就李宗仁饬释张学良问题对程表示，张非受台省管束，台省无权决定，予以推诿。

△　安庆以北桐城县城解放。

△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下令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停止外运在滇收

兑之黄金白银。12日，又禁令金圆券运入滇境。3月，又令省财政厅将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库存黄金白银移入云南富滇新银行保管，扣下黄金1.3万余两、白银60余万两和一批滇铸银币。

△　上海市大米每担涨至金圆券一万元。较上年8月19日限价时上涨470余倍。

2月6日　　行政院长孙科于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政府力谋光荣和平，使国内一切问题获“公平合理解决”；反对李宗仁愿以中共八项和平条件进行谈判的声明，声称：“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对不能接受者。”对各方反对行政院迁穗事，宣称迁穗办公，不等于迁都。次日，又在广州纪念周上作报告，宣称绝不接受投降的和平。

△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经在青岛与中共方面联系，中共同意接待，给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要求报告代表团成员名单，不得有记者随行。是日该代表团自青岛乘中航机到达北平，下榻六国饭店。其成员是邱致中、吴裕後、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浩。首席代表邱致中。随行记者留于西苑机场。次日，中共代表叶剑英与代表团见面，就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　驻重庆市宪兵第二十四团派驻泸县宪兵队自本月2日至本日，破获一大贩毒案。缴获烟土4.56万余两，抓获人犯14名、大卡车两辆、吉普车一辆。

△　因粮店拒绝售米，南京市自本日起，实行持证分区购买大米。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发表书面谈话，主张扩充台湾省肥料及电力生产。

2月7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

诸先生以私人身份来平，叶剑英市长将予接待；如果像甘介侯所声明，代表团惟一任务为从事敲门和“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不予接待。

△　行政院于下午4时在广州召开第四十二次院会，孙科主席，通过议案六项：一、“政府于2月5日在穗正式办公”，并电各省市政府、各绥靖公署、各总司令部知照。二、行政院留京办事处成立，由副秘书长负责。三、整饬纲纪，健全组织，调整待遇，改善生活。四、设立桂林绥靖公署，以李品仙为主任。五、国防部任命钱大钧为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国防部次长萧毅肃兼任重庆绥署参谋长；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兼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　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40余人，在市银行召开座谈会，决定电请广州中央党部从速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全体会议，讨论局势。

△　驻长江南岸芜湖至繁昌、荻港沿江地区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军第二八二师师长张奇率所部官兵5000余人起义，于下午6时30分起陆续渡江，顺利到达长江北岸无为县，与江北解放军会师，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独立师，张奇任师长。3月2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致电慰勉全体起义官兵。

△　上海监狱释放判刑汉奸92名，均系被判处五年以上至十年以下刑期者，其中不少系重要汉奸。8日，又释放132人，其中有盗匪60余人，次为烟毒犯和杀人犯等。

△　迁往广州之行政院欲占用中山大学校舍，激起学生愤怒，是日学生在校内遍贴反迁校标语，呼吁全校员生重振“五卅”焚烧宪法、

流血护校精神，誓死抵抗当局强占校舍，扼杀教育，并斥校长陈可忠为腐化官僚。

△　中央银行运出第三批黄金去台湾，于次两日（即8日、9日）内完成，约60万两。

△　京沪铁路局戚墅堰机厂工人因对所领2月份米贴不满，提出每月薪金照米计算等要求，部分工人采取卧轨阻止列车通行的行动，路局长王兆槐派警务局长钱鹤皋率警队前往弹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无锡指挥所主任周晷亦派军宪前往。至下午6时20分，待军警抵达时，工人自动分散。

2月8日　　叶剑英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进行长谈。吴裕後以书面形式责问中共：既然南京政府已表示承认八条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等等，要求答复。邱致中致送《和平谈判纲领》一份，内容大略为：一、双方各派全权代表，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并请公正人士参予；二、双方参战军队即刻停战；三、双方即刻停止一切宣传战；四、和谈后即行召开新政协会议，其构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成“六六比例制”；五、和谈及新政协地点在北平。叶剑英分别予以解释后，代表团成员开始承认中共确有和平诚意，蒋介石无和平诚意，李宗仁、白崇禧亦不足望。极力建议中共利用蒋、桂矛盾，争取和桂系和谈成功，则可不必另立新中央，而占有旧中央就能“号召全中国及发布讨伐令”，“西起宜昌，东至上海，即可解放”。叶剑英表示，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不会予以拒绝。

△　李宗仁鉴于由甘介侯组织的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试探和谈问题被中共拒绝，于本日抵沪，推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赴平。旋得北平同意，即决定以“上海人民和平

代表团”名义赴平。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广州举行迁穗后首次会议。邹鲁主席，讨论和平与党务改革等问题；并议决由黄少谷任宣传部长，中常会每周召开一次。

△　在广州立法委员40余人下午3时举行座谈会，童冠贤院长主持，决请各地立委南下复会。

△　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以及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等高级将领参加，李宗仁应邀与会。会议由顾祝同主持，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其要旨是将江防军主力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重点放在芜湖地段，以确保南京安全。汤恩伯声言此方案大违蒋介石的旨意，决意将主力集中于镇江以东，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南京上下游只置少数部队。蔡指出此种方针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汤以“总裁吩咐”压蔡，蔡谓“总裁已经下野”，应服从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会议在汤、蔡的激烈争吵中而散。李宗仁鉴于蒋介石幕后操纵，束手无策。汤恩伯便遵循蒋的旨意，制定京、沪、杭作战方针，要旨为：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兵力部署为：以第三十七、五十二、七十五三个军及青年军第二〇四师、交警总队等部在淞沪地带设立第一、第二道防线及核心防线；以第二十八军防守南京北大门三浦地区（浦口、浦镇、江浦），第四十五军守南京；第四、五十一、二十一、一二三军四个军布防镇江以东至江阴长江沿岸；第五十四、第九十九两军分驻丹阳、龙潭为机动，而湖口至马鞍山千里江防仅第六十六、二十、八十八、五十五、九十六、六十八军六个军和第四十六军之第一七四师。

△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小平等电，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

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　美国合众社记者基昂、穆萨对北平人民迎接和平解放作诽谤性报道，基昂2月1日报道称：“北平平静地好奇地接待征服者。……他们表示了据说四十年中用以迎接六次征服者的同样的保留态度。”2月3日，美国记者穆萨报道曰：“长列的市民在这个热烈的欢迎游行中，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如当日日本人占领北平，他们欢迎日本人，当美国人回来（？！）他们欢迎美国人，当中国国民党人回来，他们欢迎国民党人，以及他们数百年前欢迎蒙古人与鞑靼人一样，北平在欢迎它的征服者方面，是素享盛名的。”是日，新华社发表报道专文予以揭露。10日，北平各报刊、各民主人士、工人、学生予以严正驳斥。燕京大学自治会要求将基昂、穆萨驱逐出境。

2月9日　　在淮海战役期间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召开会议，中共中央中原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讨论渡江作战等问题，提出渡江时间“以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在战役部署上，“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

△　行政院于广州举行第四十三次院会，孙科主席，通过人事任免事项：陆军总司令余汉谋免本职，遗缺由张发奎继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发奎免本兼各职，遗缺由李汉魂继任；青岛市长龚学遂准辞，遗缺由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兼任；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李扬敬、黄光海、张建、谢文龙、欧芳浦、香翰屏、黄范一、韩汉英、吴逸志、陆匡文、萧次尹、黄晃为广东省省府委员；李扬敬兼秘书长；黄光海、张建、谢文龙、欧芳浦分别兼任民政、教育、建设、财政厅厅长。

△　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于下午3时在南京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

了骗局”。四、“备战以言和”。

△　第一绥靖区南通指挥所奉命改称苏州指挥所，迁移至常熟，克日展开江防任务。

△　上海监狱继续释放129人，其中包括大贪污犯、前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杨安仁等。

△　上海铁路工人千余人，为薪金问题齐集北站广场罢工，使京沪、沪杭两线中断六小时，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后经铁路局方答应于11日调整员工薪金，工人答允复工。

△　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赴京处理该院迁移事宜后返沪。该院除社会科学和地质两研究所外，其余11个所，均已分别集中到上海。

2月10日　中共中央复电在港之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同意他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急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指示潘“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　淞沪警备司令部重新策定上海市区警备计划。其方针为：“以确保上海市区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之目的，即以现有军、宪、警，配合各种自卫力量，统一指挥，分区警备，肃清奸宄，防止暴乱，加强各种军事设施，迅速完成决战准备。”其指导要领是将苏州河南北及浦东等处划分为三个警备区域。其兵力部署及任务区分均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　美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副署长欧里芬由行政

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副秘书长周舜年陪同于昨日抵广州，是日与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孙科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一、充分拨付华南款项，为华南（包括台湾）西南农村复兴之用。二、筹划充足款项，继续推进经合在华工作。三、向缅甸购米粮2.3万吨，在京、沪、穗和青海等地配售。四、协助广州添建仓库。

△　中央银行金银已大部分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所余黄金仅20万两转运工作完成。

△　国防部令：陆军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晋升为上校副司令。

△　芜湖特刑庭撤销，政治犯88人交保开释。次日，镇江特刑庭撤销。

2月11日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同意2月9日总前委会议所提渡江行动计划的建议。指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同时指令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为委员，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平返回南京。临行前在取得中共方面的同意后，在平发表该团发言人声明，说明代表因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下午3时半抵南京。

△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向青岛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提出严重警告，令其立即停止破坏青岛发电厂、码头等设施，否则以战犯论处，缉拿严惩。同日，蒋介石命顾祝同通知刘安琪暂勿撤退。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等，在南京

国民党警宪中发展成员，掌握了数千人的武装力量，经与江北中共江淮军区党委取得联系，决定发动一次5000人的武装暴动。本月6日晚，孟士衡召集吴士文、萧俭魁等人在吴士文家秘密会议，决定行动计划：一、控制飞机场；二、截断交通干线；三、扣留李宗仁及其他重要军政人员；四、成立南京人民解放委员会；五、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决定以2000人在市内暴动，3000人迎接解放军渡江。此一计划为首都卫戍总部稽查处特务、与吴士文同住一院内且混入民革的秦范五于7日向稽查处密报。9日，孟士衡往上海向民革京沪地区负责人、华东区军事特派员王葆真汇报。10日，首都卫戍总部政工处长罗春波派上校附员马志青追踪到沪，于是日将孟士衡逮捕。同日及11日，王葆真、萧俭魁、吴士文、马骏名、王鼎臣等先后在上海和南京被捕。接着，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先后拘押南京中区警察局长、北区警察局长以下10余人，及宪兵第七团的下级军官、宪兵20余人。

△　陕西栒邑县县长郝登阁率保安团起义。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上海宣布《维持上海治安秩序五项准则》：一、报纸刊物之言论记载，“必须根据正确之事实，不得妄载谣言，淆乱视听；并须以安定人心，维护秩序为准则”。凡停刊之报纸及刊物，“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一概不得复刊”。二、禁止罢工和怠工等。三、学校学生“应体会国事艰难，多用理智，勿作影响社会秩序之行动”。四、各界人士“切勿触犯戒严令”。五、本市驻军“必须绝对遵守淞沪警备司令部2月8日公告之整饬上海军风纪要令；如有违犯，严惩不怠”。

△　台湾省主席陈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成立台省自治研究会和经济建设研究会，为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作准备工作。

△　美国联合军事幕僚长李海答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称可派遣少数军舰巡弋或停泊台湾港口，并在陆地、空中建立联系系统，以表武力存在。

△　广东石井联勤总部第八十兵工厂第十地雷仓库于上午10时许起火爆炸，炸死工人20人。厂长李方园闻讯赴现场，为流弹击毙。

2月12日　黄旭初受李宗仁派遣往广州活动，是日返抵桂林，向李报告称：一、孙科不返京。二、张发奎热心联络余汉谋、薛岳、陈济棠，一致对李表示拥护。三、广东首要人物均主张罢免孙科，改组行政院。四、留粤立委受CC派影响，主张在广州开会。五、溪口（蒋）常以长途电话指挥广州党政机构。

△　张发奎派海南特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和广州绥署秘书长陆匡文携致李宗仁函飞南京见李。张在信中表示：务求党内进步分子团结一致，充实革命力量，加强领导中心。李汉魂到南京后，即改任总统府参军长，成为李宗仁得力幕僚之一。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遗缺，由陈济棠兼任。

△　辛亥革命同志会于南京市召集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商讨和平问题，梁烈亚主席。会议通过向国共两党发出呼吁全面和平通电，略谓："务祈国共双方执事，应以国家至上，人民至上为原则，弃嫌修好，敦睦和合，共拯人民于水火。"

△　全国和平促进会于下午2时在上海市参议会礼堂正式开幕。出席代表共48人，包括16个省、市参议会，36个职业性团体。沪市参议员31人，留沪监察委员十余人列席。甘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一）和平应以平等互谅为基础。（二）双方即行停战。（三）召开全国各党派法团、各区域及社会贤达的政协会议。（四）维护中华民国法统，并可依法修改宪法。（五）依据民生主义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政策。（六）保证人民生活自由。（七）军队属于国家，任何党派不得以武力当工具。（八）和谈一切应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作全国一致行动。"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关于严禁交通及公用事业员工罢工代电

上海市政府，重申上年12月14日禁令，要求上海市府依照切实执行。禁令规定：一、员工如有福利问题，应由主管机关依法处理，绝对不得罢工、怠工。二、如有怠工、罢工或聚众要挟情事，应由各地治安机关依戒严法强制其回复原状。三、如有不服从治安机关之命令，肆意破坏治安者，得由治安机关依军法就地枪决。

△　杭州警备司令部于杭州设立，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周碞兼司令。以警卫沪杭、浙赣两路为主要任务。

△　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限令前驻北平市国民党宪兵第十九团官兵，于本月20日前报到交出武器，遵命者不究既往，违命者决予严办。

△　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宣布其总行发行的版面颜色不一的金圆券为伪钞，拒绝兑换。受害群众涌向该行质询，要求兑换。该行竟关门拒兑。持票群众与银行人员由争吵、怒骂进而相互撕打。有人冲上大楼进行抢砸。昆明警务处长、军统特务李毓祯指挥军警将挤兑人群包围，下令逮捕200余人，并向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卢汉报告。卢赶往现场，亲自审讯被捕群众，承认冲上银行楼上的21名群众被立即枪决。造成震动全国的“昆明南屏街大血案”。本月22日，新华社以《警告杀人犯》为题发表评论，奉劝卢汉悬崖勒马。

△　广州市商会会议决定提请政府撤销输出入口管制及金融管制等六项要求，由该会理事长关能创等前往行政院及有关部门请愿，并函请香港各华人商会表同情，旋得香港华商总会的响应支持。

△　国史馆馆长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于广州寓所，上午10时40分逝世。戴被称为国民党“理论家”，他痛感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曾于上年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被人救治未遂。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关于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严正指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建

议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是荒谬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同时指出行政院长孙科11日在广州附和澳外长的论调，宣称“联合国调处或获致我国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不过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立场”。声明“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

△　毛泽东、周恩来就上海轮船业负责人杜月笙、魏文瀚来电表示愿以面粉交换煤炭事，复电称：“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对上海方面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表示欢迎。同时指出：“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放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要点为：一、“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二、“毛泽东1月14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三、“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

△　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受李宗仁之托，在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陪同下于上午11时在上海龙华机场乘中航专机启程赴平。随同前往的还有颜惠庆等四人的私人秘书，以及参予联系南北通航的金山、中航公司副主任雷仲仁等多人。次日下午5时抵平，受到叶剑英等的热情接待。

△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发表声明，纠正各种有关该团活动的谣传。诸如“中共当局对于所提八项条件中之‘战犯’、‘改编军队’二点可以让步”，“中共当局业有具体条件交由本团带回”，“叶剑英向代表团提出，保证在和谈前和和谈期间，不致攻击长江江防”等等，“不但纯属无稽，且迹近造谣”。并宣布该团任务完成，予以撤销。

△　全国和平促进会于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决二项：一、“电请双方立即就地停战，并停止一切指责对方之宣传，以示谋和之诚意”。二、“要求中共迅速派定代表，与政府代表即日开始会谈，谋取全面和平”。

△　上海市公用事业新价格核定实行，平均增加二倍半。其中自来水每立方米75元至97元；电每度42元至75元。

2月14日　中共中央致叶剑英电，指示接待上海和平代表要点与方针：一、招待周到，谈话恳切；二、对其应强调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第一条；三、痛责四大家族祸国殃民，揭露其和谈是美国指使的和平攻势，并无和平诚意；四、如要真和平，必须在八条基础上得到；五、讲明中共正在和各民主党派商量战犯名单及其他有关和谈问题，“一俟准备就绪，即将通知对方，约定时间、地点”。

△　李宗仁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茶会，招待来京之监察委员，交换有关意见。监察院副院长刘哲等50余人参加。与会委员提出三项意见：一、行政院迁穗办公应予纠正。二、中央银行将大批黄金白银运往广州，殊属失当，亦应纠正。三、急须整饬军风纪。

△　前国防部长何应钦自沪抵京，自称为养病到此。记者询以对和平之意见，何答称：“和平不仅中国需要，且为世界所切望，余在国外时即主张永久之和平；况此战事，皆系对内之事，如不求外助而能获得永久之和平，岂不更佳。”

△　空军总司令部迁移台北办公。

2月1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论文章《已经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揭露南京李宗仁和广州孙科以及国防部等之间的四分五裂局面及其和平攻势的破产。指出“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

行全面战争”。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等政策的指示，指出：为恢复南北联系，使南方各大城市之资产阶级了解中国共产党政策措施，便利于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接收和发展各大城市之生产及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中国共产党手中，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平、津与南方邮务、银行、钱庄及商家汇兑，亦应恢复。并指示由总前委、董必武、薄一波、彭真、叶剑英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南北通船、通航、通电、通汇诸事之具体办法报告中央。

△　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至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是晚设宴招待上海和平代表团，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邀请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表明中共的和平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颜惠庆等表示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并认为“中共调子唱得太高”。章士钊提出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其后，章士钊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毛泽东对这种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畏惧帝国主义干涉的说法，很是不满，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

△　李宗仁于晚9时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南京政府完成两个人民迫切要求的重要任务：“第一是谋求和平；第二是革新政治。”并说：“许多人批评我们政府是贪污无能，我以为这不是‘无的放矢’，也用不

着‘讳疾忌医’。我们惟有坦白承认我们以往的错误，检讨以往的缺点，拿出勇气和决心，彻头彻尾，从新做起，才能挽救国家劫难，解除人民痛苦，进而建设国家，造福人民。”

△　监察院在南京召开第三十五次会议，于右任主席，出席委员43人。会议决定：3月份月会与年会，均于3月12日在南京召开；严厉查禁任何机关之非法逮捕拘禁行为；纠正行政院违法委派江苏参议员、议长、副议长；纠正金圆券发行漫无限制；增派飞机接济太原粮食；派员调查国家行、局金银外运等案，分交各有关委员会审办。

△　立法院长童冠贤于南京召集在京立委座谈，到会立委均主张月内在南京复会，如果移地复会，必经院会决议。同日，童返沪召集在沪立委黄少谷等120余人会议，通过立法院在本月25日于南京复会。20日，立法院通告于21日在南京办理报到手续。

△　上午，全国和平促进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如下主张：“和平应以平等互谅为基础”；“召开有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和平会议，协定之签订，应有人民代表参加。”下午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中，又提出目前必须达到三点：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同时停止宣传攻击；三、双方尽快在不变更中华民国国体的大前提下，“对政治制度作适合时代环境的规定”。

△　阎锡山抵达上海，访问经合分署署长莱普汉，商讨太原粮食接济问题。即日，复转抵南京，晋见李宗仁，促请中央运粮接济太原。

△　张群于昨日抵成都，本日上午分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成都耆宿。午时，赴川省主席王陵基公宴，席间张强调“团结一致，以济时艰”。

△　美国众议院51人为中国局势问题致函总统杜鲁门，宣称中国局势已使美国安全“感受严重威胁”；“共产党在中国之胜利，将为吾人

重大的及历史性的失败”，要求杜鲁门指派一委员会研究中国问题。

△　立法委员李世军电请行政院长孙科，制止国营交通事业擅自加价，指出“近见不经行政院或交通部命令，一月之内，有四次加价情形”。

△　重庆绥署为抑制通货膨胀，颁发四项原则，分电川、滇两省和渝市执行：一、凡行庄运现金入境，由海关和特定人员检查，限令交送国行，进帐审核用途，陆续支付；私人携款，则由各地自行斟酌限制，超额者，仍须存入国行，查明正当用途后支付。二、饬各行、庄严格审核信用放款，制止滥发保付支票，各行、局并停止同业买汇。三、调节食粮。四、严禁金银买卖；棉纱交易严禁期货与投机贸易。

△　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员工，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再次举行罢工，使沪宁、沪杭两铁路自下午3时起停车。罢工员工提出要求三项：一、工人最低薪资应为食米三石之值；二、借薪每人二万元；三、员工待遇不低于电讯局与邮政局。局方允每人先发给5000元，待遇计算依电讯局办理，并由各单位派工人代表一人，会同往电讯局调查计薪办法。同日，戚墅偃厂、常州、无锡、苏州车站工人约6000人闻讯乘专车赴沪声援。车至真如、杨家桥附近，被国民党军警以拆毁铁路手段阻止前进。次日，沪杭、沪宁两线竟日停车。至17日晨4时，双方洽定改善待遇办法后，罢工结束。

△　制造上年北平“七五”大屠杀血案的首犯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被逮捕。此前，北平15个学校单位联合成立了“七五”血案控诉复仇委员会，要求对首犯许惠东，予以法办。

△　北平市公安局破获国民党军事特务案。主犯“华北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北民众自救会”主任委员张荫梧于下午9时被捕获归案。同时捕获者有副主任委员佟寿山及“华北敌后游击策动

军”第四总队司令马希援、第六总队司令李国昌、第七总队司令赵毅然、第九总队司令金明甫等人。缴获各种枪支234支，手榴弹二箱，子弹4650发，电台一部。

△　晋绥、陕甘宁两边区合并，统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原晋绥行政公署撤销，分别划为晋西北、晋南两行政公署。

2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揭露国民党战犯集团和死硬派，妄图挽救他们自己，从1月份发动“和平”攻势后，到2月上旬以来又重弹“和共党周旋到底”等破坏和谈、呼吁战争的论调，“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

△　孙科在广州主持召开行政院第四十四次院会。遵蒋介石密令，将酝酿准备和平起义的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陈仪免本兼各职，任命蒋介石的心腹周碞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准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张笃伦辞本兼各职，遗缺由朱鼎卿继任；派钱大钧为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会议议决停止征收“戡乱”时期海关附加税等六项议案。

△　上海航业界代表魏文翰、周启新、姜克尼、俞惠方乘轮赴天津转往北平，与中共方面商谈南北通航事宜。

△　经合总署驻华分署署长莱普汉应民国政府之请，向美政府建议拨款50万美元救济中国留美学生。

△　上海公共汽车公司工人于14日向公司提出改善发薪办法、取消公休训练、发放子女贷学金、与英、法商业公司员工享同样福利金及伙食津贴，以及每人发给应变费食米六担的要求。15日公司方面对应变费予以拒绝，对其他各项则答允设法解决或部分解决。是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等六大公用事业公司全体员工罢工，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奉汤恩伯命，枪杀罢工领导人钟泉周、顾伯康、王

元三人，逮捕监禁六人。上海市长吴国桢下令不立即复工者解雇，愿复工者即行登记。在强压下大部分工人于17日下午登记复工。

△　在沪中央机关交通部、社会部、地方法院等38单位代表20余人，要求调整待遇和发放安家等费，向财政部长徐堪请愿，被门卫阻止，社会部职员丁高林手臂被打伤，各代表深感愤慨。经财政部钱币、总务二司司长折冲，此事件始告平息。

2月17日　林彪、叶剑英、徐冰举行欢迎上海和平代表团晚会，首由徐冰致词，表示中共方面诚意言和。继由林彪讲话，主要内容三点：一、诚意言和；二、军力解决绝无问题；三、可以北平和平解决为例。叶剑英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长谈，表达和平至诚，只要南京政府方面确具诚意。次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再应董必武、罗荣桓、林彪、聂荣臻、薄一波五位的宴会，就和平问题作深谈。当晚，由黄启汉、刘仲华电南京李宗仁报告。

△　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转李克农，说“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

△　孙科在广州对记者称：他与李宗仁并无意见分歧，南京与广州意见完全一致。“余绝对相信李代总统决不接受形同投降之任何和平条件”。对传言他将辞职一事，则说“实则绝无其事”。并透露曾向经合总署提出，于援华方案4月3日期满后，继续援华，要求美国实行三年援华计划（1949年7月—1952年6月），经费为30亿美元。

△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吴裕後等，在广州访晤孙科，报告赴平经过。并谓“国共双方均有和平诚意”。

△　上海市成立所谓军民合作委员会，市长吴国桢兼主任委员，下设供应、征雇、总务三组。

△　李宗仁电令上海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以后库存金银不得运

往他处。

2月1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论文章，《评国民党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评析国民党中宣部，蒋介石、孙科等推卸战争责任的种种说法，并宣布“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

△　国防部电令重庆绥靖公署：宋希濂之第十四兵团着改为鄂四绥靖司令部，范围包括恩施、沙市及宜昌、巴东南北岸；孙震改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川东绥靖司令，移驻川境梁山，指挥川中第四兵团罗广文及整补中的第十六兵团孙元良两部，担任大巴山防务，以后准备进出长江北岸之湖北兴山九道梁地区，迎击由鄂西、鄂北西进之人民解放军。

△　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为准备和平起义创造条件，取得长沙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委托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刘斐向白崇禧活动，调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所部移驻湖南。白以陈“反共坚决”，第一兵团驻守湖南，既能保持桂系的退路，又可监视程潜，予以同意。是日，陈率所部开赴湖南，于长沙设兵团司令部。陈与程既属同乡，又有师生之谊。陈回湘后，“倾向和平的心理一天天增长”，表面上仍以“主战派”面目出现。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任弼时，副主任委员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胡乔木、李昌、宋一平、黄华、杨述、陈家康、荣高棠、陆平、张凡、张育英、高景芝。常委会议决定于4月10日至17日在北平举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　新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对记者宣称：“凡扰乱社会治安之不良分子，当彻底铲除。”同日，新任浙江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周碞对记者称：今后当以全力维持浙省治安，并组建军、宪

联合办事处，严禁罢工、游行、请愿等“非法行为”，如有违背者，概照戒严法予以惩治。

△　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发表谈话称：“本人职责所在，为谋全市人民之安全，对少数扰乱治安之分子，决采用一切有效方法，从严制裁。”

△　四川省和平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并通过致李宗仁、毛泽东及全国各省、市参议会、各人民团体电文和大会宣言。

△　淮海战役中起义之张克侠部第五十九军与人民解放军渤海纵队合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　北平军管会派员接收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北平办事处所存面粉6641袋。次日，前美国经合总署驻华北代表戴维斯向叶剑英表示“抗议”，称该项面粉属于行政院美援运用资产。3月6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揭露经合总署企图强霸中国面粉，指出此部面粉系属“美援运用委员会”所有，当然就归北平市军管会所有。

△　财政部长徐堪自沪抵京，晋见李宗仁，提出经济改革新方案：一、开放金银外汇市场，银元流通使用。二、办理银元存款及以金银作抵押品之放款。三、市面银币如不敷用时，除发行前铸五角银币作为辅币外，并将发行银元兑换券。四、银元券对金圆券之折合率，由中央银行每日根据市价挂牌，并由央行业务局设法平衡其价格。

△　湖北省省会公教人员致电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及财政部呼吁调整待遇。内称：2月份上旬生活指数为315倍，中旬为518倍，员等所领薪金，仅有15倍，与实际指数相差太远，要求“按照实际指数，重新调整”。

△　贵州省兴仁县鲁础营举行反对土司和国民党统治的暴动。年初国民党当局确定退守大西南的计划，企图消灭盘江地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为粉碎国民党的阴谋，中共领导的农民武装——海子支队制定了暴动计划，经中共罗盘地委批准后于是日开始暴动，海子临时支队开进土司龙家大院，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国民党当局匆忙调集重兵镇压，被海子临时支队击退。为巩固暴动成果，中共罗盘地委将海子临时支队改编为海子游击大队，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坚持斗争到贵州解放。

△　浙赣铁路南昌车站全体职工，为要求维持生活而罢工。

△　《新闻观察》杂志在上海创刊，由邹凡扬负责，倪子琨任主编，内容介绍解放区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受到读者欢迎。4月间，出至第四期，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2月19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五人组成之第二野战军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　北方旅沪国大代表，于上海召开座谈会，通过拥护李宗仁15日广播讲话；并请李宗仁下令，着国民大会秘书处迅速迁回南京。

△　空军第十大队驾驶员徐骏英、副驾驶员魏雄英、通讯员赵昌燕、领航员张玟荆和飞行员张时习等五人驾驶C—46式运输机一架由上海起飞执行任务时，飞抵济南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2月20日　　林彪、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叶剑英于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在平民主人士。到各党派及学术、文化方面民主人士400多人。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应邀出席。林彪首先致词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邵力子讲话，希望和平障碍得以

扫除，并表示“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

△　宋庆龄复函毛泽东、周恩来等，对邀请她北上表示“深厚地感谢”，说明“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同时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深信“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　李宗仁上午9时乘“中美号”专机离京赴穗，甘介侯、黄雪邨等偕行，下午1时抵广州，孙科、吴铁城、薛岳等到机场迎接。当日晚，孙科设宴欢迎，李即席发表书面谈话称：和平为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余不特愿为和平尽其最大之努力，而对和平之必然实现，抱有无限信心”。下午召见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广州绥署副主任邓龙光。当晚与孙科长谈，力劝孙科返回南京。

△　天津南开、北洋大学教授、讲师等135人，宣言拥护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声明。

△　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战役，由第一、二、三、四、六军及骑兵第二旅等部于是日向陕中渭河以北的泾河、洛河之间地区胡宗南部发起攻击，先后解放铜川、耀县、蒲城、富平、淳化、大荔、平民、朝邑等城。

△　阎锡山离京飞返太原，自云粮食运济太原问题已经解决。

△　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致函朱德总司令，说他“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惟念老母现年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维护，免受惊恐”。4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卫立煌上年被蒋介石软禁南京，本年1月25日由李宗仁恢复其自由后，于28日经上海乘英轮逃往香港。

2月21日　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北平受编之原国民党军部队师级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改编方案。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及傅作义代表郭宗汾等出席。改编方案规定：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兵团和其八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全部结束。其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队分别编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部及各军部。其所属的25个师则改编为解放军之独立师；各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改编方案由新华社于3月1日正式公布。

△　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及黄启汉由北平乘专机飞石家庄转车抵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起义将领傅作义、邓宝珊提出见毛泽东主席的要求，经中共中央同意，是日与上海和平代表团一同到达西柏坡。

△　李宗仁在穗出席扩大纪念周例会及在穗立法委员欢迎会，呼吁国民党要精诚团结，表明停战谈判为势所必然。晚间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孙科提出在平等地位上和谈，依照国际准则，内战不存在“战犯问题”，对政治体制，排除联合政府形式等主张。次日中午李离穗往桂林。

△　立法院院长童冠贤致电孙科、吴铁城，通告立法院第一届第三次会期在南京复会。

△　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后，是日在杭州举行交卸仪式，旋乘自备专车回到上海寓所。汤恩伯于深夜往访，欺骗陈说：“由于蒋家政权崩溃在即，各省主席都要换用有兵权的人充任”，要陈“不要介意，我们的计划照常进行”。陈对汤仍深信不疑。

△　李宗仁代总统令：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辞免，改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遗缺由刘士毅继任；第四局局长吴思豫免兼参

军，专任本职；侍卫室侍卫长石祖德辞免，遗缺由李宇清继任；参军长孙连仲辞免，特任为战略顾问，遗缺由李汉魂继任。

△　乡村建设派主要领导人梁漱溟在本日上海《大公报》上同时发表《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及《敬告中国共产党》两文。前文指责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中共八条之第一条惩办战犯问题所抱的态度，主张：一、“凡是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作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同蒋先生引退下野，闭门思过”。二、“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国家人民所遭损害，同深疚歉”。今后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三、由国共两方之外的公正人士采集证据，“确定破坏和平造成内战惨剧者究是哪些人。再经过公开审判和辩论，即为定谳，永垂史乘”。后文“敬告”中共方面“要容纳异己”，“不要用武力”，略谓：“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亦没有民主。”

△　财政部长徐堪偕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同机自沪抵穗，将向行政院报告财经改革方案。

2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亲切接见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原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邓宝珊。毛泽东向傅表示，将原傅部被俘人员放回，傅可接见他们，并准备将他们送往绥远。并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

△　张群在重庆召开西南川、康、滇、黔、渝五省、市军政首要会议，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并筹划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五省、市主席、市长及参议会议长为委员，张群为主任委员，钱大钧

为副主任委员。

△　海军“黄安号”舰在舰务官鞠庆珍、枪炮官刘增庆等率领下起义，由青岛开往连云港加入人民解放军。

△　空军第十大队驾驶员杨崇庆驾驶C—46运输机一架起义，由西安飞抵唐山。

△　广州市政府以该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经常发生停工、罢工事件，再次宣布所有社团不得采取罢工手段，违者“以扰乱社会治安治罪”。

2月23日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建议，决定由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部率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炮兵一团等部计20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归二野指挥，攻略武汉以北及其以东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东援，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作战。

△　行政院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一、海南岛特区行政长官兼建筹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汉魂免本兼各职，遗缺由陈济棠接任。二、派徐景唐、吴奇伟、陈策、梁华盛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三、派祝绍周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修正通过财政部经济改革方案；通过调整机构，统一事权案；3月份调整公教人员待遇案及开放梧州为对外贸易口岸案。

△　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奉蒋介石电令，会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陈仪扣押。毛人凤令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是日率30余名特务往陈仪寓所将其逮捕，由汤恩伯派专机押解浙江衢州秘密监禁。

△　中央社报道：南京释放已决政治犯77人，未决政治犯23人。并称南京在押政治犯已全部释放。

△　日本归还战时掠夺中国最后一批铜币、镍币700余吨，由“海辽”轮装运回国。

2月24日　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一行，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谈判，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章士钊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达成八点秘密协定：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约定该协定只交给李宗仁。协定达成后，颜惠庆等及傅作义、邓宝珊返回北平。

△　财政部长徐堪主持记者招待会，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方案》。《方案》包括财政、金融、进出口贸易三大项，除重申上年11月13日公布的《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关于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之规定外，又规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财政税收方面，中央政府停止对各省、市、县财政的补助，将原属中央所保留之田赋三成归还地方，并放宽地方征课税限制。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照规定税率征收实物。不便征收实物者，以缴税日当地实物价格折算金圆券缴纳。盐税除征收实物外，“政府得办理一部分官收官运”。外汇方面规定“凡出口货品所得之外汇及华侨汇入汇款，均应全部交由中央银行或其指定银行换取等值之外汇转移证”，由中央银行“维持外汇转移证之合理市价”等等。该《方案》2月25日正式施行。徐堪宣称：一、政府如能保有长江以南地区完整，则每年关税收入尚可获美金3000万元；出口所值，亦有美金二亿元以上。二、行使银元并非实行新币制，除使用旧有银元外，亦铸造新银元，成色等量。三、烟酒、田赋税划归地方，使其自给，不依赖中央。四、黄金、白银、银元与金圆券无固定比率，由市场自行订定，中央银行不挂牌等等。

△　新疆轮台、库车克日西村东北发生7.3级地震。

2月25日　李宗仁由桂林到长沙，是日在湖南省府举行的欢迎会上表示坚信和平终必实现。他“希望国民党左一点，彻底实行民生主义，共产党右一点，实行温和的革命”。并宣称“不得不于长江以南备战”。同日午时，离长沙经汉口，于下午5时飞抵南京。

△　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代表中央往沈阳迎接抵达东北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35人，于是日下午2时，自沈阳抵达北平，林彪、叶剑英、董必武到车站迎接。在天津之民主人士亦于同日抵平。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第三野战军：“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以前完成，待命行动。”

△　海军最大之巡洋舰“重庆号”官兵经中共上海局、南京市地下党的策动，在舰长邓兆祥率领下，于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开往烟台。3月4日，开往葫芦岛。3月5日，邓兆祥率全舰574名起义官兵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重庆号全体官兵，不甘再助纣为虐，咸愿秉诚赎罪，报效人民”，“今后誓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东北解放区军政首长直接领导之下，贯彻毛主席八项和平主张，为彻底摧毁美蒋勾结的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完成全国人民解放大业而奋斗”。3月15日东北军区宣布邓兆祥为舰长，任克加为政治委员。

△　浙江省参议会通过决议二项：一、电请代总统李宗仁从速释放政治犯，恢复言论自由，启封被禁报章杂志。二、电请广州立法委员从速赴京与会，团结一致，共商国是，以副民望。同时通电各省、市参议会一致主张。

△　北平军管会查封CC系立法委员成舍我主办之《世界日报》。

△　美国国会两院联合援外监督委员会主席麦加兰，向参议院提

出以15亿美元贷与中国政府，以为经济、财政、政治与军事各方面之援助案。该案规定以五亿美元稳定中国货币，以七亿美元为军事之援助，以三亿美元拨交经合总署。

△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沈阳迁抵北平。

2月26日　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联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到会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陈其尤等410余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林彪、彭真先后致欢迎词，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李德全、章伯钧等14人发表演说。

△　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在六国饭店宴请北平党、政、军各界领导人作临别答谢。林彪、董必武、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徐冰、戎子和、陶铸、谭政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出席。次日，邵力子往北京饭店分访李济深、李德全、沈钧儒、章伯钧等。

△　李宗仁于上午在傅厚冈官邸召集于右任、居正、何应钦、吴铁城、翁文灏、白崇禧、张治中、吴忠信、黄绍竑等商议将要在京举行之各省军政首要会议。李宗仁提出两点：一、“与共方开始和谈”。二、“依和平为基础，团结国民党，勿再继续战争”。

△　孙科于广州发表谈话，谓财政金融改革方案为治标之计，而当前之根本问题，“厥为实现和平”；如兵荒马乱之情形一日不得解决，举凡物价与通货等问题，均无法获得根本解决。

△　重庆《商务日报》员工总辞职休刊，3月4日起复刊。

2月27日　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一行于上午10时往西苑机场离平，叶剑英往送。下午返抵南京，李宗仁的代表李宇清和于右任、

童冠贤、居正、何应钦、吴铁城、张治中、白崇禧、吴忠信等人及各界代表往机场迎接。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联名发表书面谈话，告以此行经过，表示“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邮诸项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晚，李宗仁邀宴代表团各人。

△ 广州立法委员致电院长童冠贤，要求取消2月28日在南京复会的决定，并通电各地立委，促请到穗商谈复会地点。

△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军事管制期间，所有在平的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均应停止其活动。

△ 沪、杭、苏三地各国立大专院校校长联袂赴京，要求改善教职员待遇，增发经费和发给应变费。交通、复旦、同济、暨南、音专、唐山工学院、幼专七院校学生团体，同时联名上书李宗仁，提出同一要求，交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带京转呈。

2月28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聂荣臻、薄一波、杨成武、钟赤兵，指出人民解放军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和扰乱的可能。令杨成武、李井泉第二十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四野特种兵司令部钟赤兵、苏进纵队亦开该两处布防。

△ 行政院长孙科在李宗仁赴穗敦促下，于是日下午偕地政部长吴尚鹰、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等自穗回京。李宗仁和立法、监察院院长、在京军政大员前往机场迎候。

△ 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居正联合于国际联欢社设宴欢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当日晚，行政院长孙科亦于外交部宴请上海和平代表。

△ 立法院于上午在南京举行第一届第三期院会，到会立委共211

人，童冠贤院长致词，指出本院责任重大，主要是促进和平，革新政治。讨论议题为“督励政府扭转当前的危局”。

△　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报告》，主张在政治上不致力于推翻中共新政权，而是“通过允许恢复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关系，大大增强这种可以使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产生严重分裂的力量”。认为这样，可以在经济上使美国私人企业在中国继续做些生意。

2月下旬　　南京市公布2月下半月工人生活指数为535.01倍。兰州市府公布物价总指数为639.6277，较上月涨735％，较“八一九”涨639.63倍。

是月　上年由民革建立的滇黔人民自卫军于本月发动攻击蒙自的武装起义，散发《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和《告云南民众书》。同月，中共中央指示，对个别民主党派掌握的武装，原则上应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加以整编和改造。

3月

3月**1**日　　李宗仁在南京召集孙科、吴铁城、顾祝同、于右任、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黄绍竑、孙越崎、童冠贤、甘介侯、邵力子、江庸、张群等举行秘密会议，研讨“促成和谈方式”，并指定孙科、邵力子、吴铁城、张治中、何应钦、朱家骅、吴忠信、张群、刘斐、钟天心十人负责研究和起草和谈方案。

△　陈立夫于台中发表谈话称：“合则相亲，异则相对，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乃和平之真谛。”并云今后将从事伦理哲学撰述工作。

△　是日至7日，台湾召开1949年度全省行政会议。陈诚在会上

宣布：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在经济方面，要增加生产，稳定物价，实行三七五减租；在文化方面，要奠立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

△　台湾省政府规定入境补充办法，对军公人员和旅客入境者，有所限制。如军公人员入口证明书、旅客入境许可证有效期三个月，仅能使用一次，入境时由检查人员收缴；中央各机关派到台湾的工作人员及台省军公人员眷属，以随行直系为限；由港到台旅客应向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申请等等。

△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陕西省三原西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师和第十四师之第四十团，俘其师长褚静亚等。

△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成立。该军区由豫西、豫皖苏、桐柏、鄂豫各军区的河南部分组成。陈再道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治委员。

△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于北平开幕，6日闭幕。出席大会的各地学生代表204人。叶剑英、罗荣桓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赵毅敏、许之福、李德全、冯文彬分别代表中共北平市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及解放区青联出席；李济深、沈钧儒（沙千里代）、马叙伦、郭沫若、许德珩等民主人士与会。会议制定了《中华学生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选举刘希圣、冯彬彬、周寿昌等36人组成全国学联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学生运动当前任务决议案》，确定了今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方针、任务。

△　美国麦克阿瑟发表“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台湾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并指使台湾籍美国间谍廖文毅等，假台人团体名义发出要求台湾“独立”的叫喊。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向美国国会提出援助中国政府新计划。该计划提出以2.4亿美元作为援助经费，分12个月办理，每月供给2000万美元。莱氏称："能够而且应该给国民党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

3月2日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颜惠庆、江庸、章士钊自南京返沪，市长吴国桢等到机场迎接。颜等对记者谓：今后之事，当由国共双方开始商谈。下午3时许，章士钊访晤杜月笙，谈南北通航问题。

△　旅台立法委员联谊会举行座谈会，通过致京、穗立委电，主张在京召开立法院会议，并敦促留穗立委到京开会，讨论各项重要议案。

△　中央造币厂开铸银币。标型为1944年采用之"船洋"，含银七钱一分五厘。每日制造50万枚。

△　邮电部自即日起实行邮电加价，平信每件25元、航空70元，电报及电话普涨66％。

3月3日　　张治中、吴忠信到奉化溪口与蒋介石晤谈。就和谈限度及和谈代表人选问题、国民党党务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听取蒋的意见，并拟动员蒋出洋。此前，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传出国民党中正劝蒋出洋，以利推进和谈。是日，蒋与张治中、吴忠信一晤面就表示："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

△　行政院长孙科在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内和平之恢复，目前已有良好转机，预料和平谈判可于3月15日以后开始进行。并公布本月1日所已推定起草和谈方案十人名单，宣布政府决计取消征借食粮和缩减军队。

△　宋子文、徐堪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蒋介石特别顾问何

浩若在香港秘密会议，决定向美国进行白银贷款。6日，席、何即赴美与在美的贝祖贻一起向美国政府谈判。

△　华北解放区与上海口岸通航商谈在天津达成协议。规定在天津成立船舶统调委员会，由津、沪双方委员共同组成。

△　中原解放区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幕，6日闭幕，出席会议的有各区域之工、农、商、妇、学、军及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代表共81人。选出刘伯承、李先念、邓子恢、李雪峰、吴芝圃、李一清等21人为政府委员，邓子恢为政府主席，吴芝圃、李一清为副主席。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　驻美大使顾维钧访晤美国副国务卿威勃，讨论美援基金剩余部分运用问题。顾请求以50万美元资助在美之中国留学生。美方未予答复。

△　美国前驻华大使赫尔利于乔治大学发表演说，认为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对苏联让步“所造成之外交错误，乃共党在中国获得成就之原因”。

3月4日　　上午10时，行政院举行政务委员谈话会。孙科主持，政务委员张群、吴铁城、朱家骅、徐永昌、吴尚鹰、徐堪，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均出席参加。孙科提出准备向立法院报告之施政方针九条：一、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重新分配土地；二、裁减军队；三、废除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四、停止征借粮食；五、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并按宪法规定，实行地方政府民选制；六、加强税收、改征关元；七、鼓励出口，放宽原料输入，辅助工商业；八、提高官兵生活；九、改善公教人员待遇。

△　李宗仁电召陈诚、朱绍良、薛岳、余汉谋、陈济棠、张发奎等到南京对国是陈述意见。

△　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派李惟果到溪口，劝蒋介石出国。

△　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发起春季攻势，至6月5日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2200余人，解放了海南岛之新州、昌化、感恩等20座城镇。

△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陕西连克大荔、朝邑、平民三县城。

△　福建省府职员面对物价狂涨，自动召开“救命会”，要求省府增发食米二石，并按实际生活指数，借支薪津。同时通电全国，一致向中央要求按各地实际物价指数，调整待遇。

3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13日闭幕。出席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主席团。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全会根据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上被消灭的情况，认为今后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全会强调中国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这次全会，为中国革命的进一

步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　行政院举行第四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以下事项：一、三十八年度施政方针。二、《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着即废止。三、改善公教人员待遇办法，自3月份起，恢复依照各地生活指数分区标准逐月调整。四、任命宣铁吾、宋思一、石觉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

△　立法院上午于南京举行谈话会，讨论和谈问题，认为立法院对和平问题应提出一个原则提案，至于细节，授权政府对中共谈判，然后由立法院追认。

△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在北平设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原香港总部同时撤销，推举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朱蕴山、吴晗等22人为委员，推选沈钧儒、章伯钧为主持人，并为总部对外代表。7日，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上书毛泽东主席，表示“愿以至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日，毛泽东复电沈钧儒、章伯钧：“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

△　胡宗南在人民解放军一野发起的春季战役中，在陕中连遭失败，是日起，胡集中七个军及青海马步芳一部进行反扑。

△　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登记布告》。宣布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严禁其进行任何活动。并令参加反动党团人员自行登记，对悔过自新者予以宽大处理。截至5月底止，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76万余名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自新。

△　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刘鸿生代电财政部长徐堪称：上海市棉

纺、毛纺、卷烟等工厂实际开工数不过十之六七；水泥、火柴、造纸、化工等工厂，其开工率更低。

△　台湾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议决，请省府转请中央援照新疆省例，准台省提前于半年内实行民选县、市长制度，以及于三个月内改选民意机构。

△　江苏省临时参议会第五次大会决议：一、请省府从速裁并骈枝机构及冗员。二、组织江苏省清除贪污委员会。三、电请政府各院、部、会诸公，迅速集中首都，谋取和平，并廓清一切反和平法令。吁请中央停止征粮、抽丁、筑工事。四、电请全国各民意机关，拥护李代总统和平国策。

△　南京卫戍司令部以《救国日报》于4日发表社论《人民要求政局明朗化》，是日发表社论《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宣布罚停刊三天处分。

△　《报告》周刊在上海出版，徐中玉、姚雪垠创办。第一期介绍了解放区新面貌，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8000本刊物全部被扣。

3月6日　　新华社发表短评《注意国民党反动派布置新战争的阴谋》，揭露蒋介石集团以“和平”为掩护，而加紧扩军备战。如：一、已经制定了一个征募新兵250万的计划，准备把已经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重新恢复起来，这些部队的军长、师长大部分都已派定。二、国防部奉命成立12个编练司令部，一部分部队正在补训中。美帝国主义的军火继续输送给国民党政府。三、蒋介石每天都在发号施令，忙碌地进行作战部署；国民党死硬派首领们，不断向蒋介石请示行动计划。四、在所谓“备战以谋和”的口号下，对其内部进行公开的战争动员。五、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以实现其编组400个师200万人的狂妄计划。

△　民革主席李济深致函黄启汉，请其转告李宗仁饬上海军警机

关将被捕之民革上海地区负责人王葆真迅予释放。函谓：“王葆真先生在沪被捕。当德邻兄（李宗仁字德邻）力主和平，解决国是，并释放政治犯以取信于国人之时，尚有此违反人民意志之行动，闻之不胜愤慨。望即电知德邻兄即饬上海军警机关迅予释放。”黄将李函急电李宗仁，当日李宗仁用电话答复黄称，已派人到沪调查。未久王葆真被释放。

3月7日　　行政院长孙科向李宗仁提出辞呈。李宗仁即与在溪口之张治中、吴忠信相商，提出几个继任人选，特别着重于何应钦。张等向蒋介石当面请示，蒋答以“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何）任行政院长颇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并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而提出以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

△　立法院委员是日下午于南京举行秘密座谈会，出席委员百余人，对政治革新问题交换意见，并推定人选起草政治革新方案。

△　北平市公安局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国防部保密局民众别动军”，逮捕其组织成员21人，搜获电台、收发报机、手枪及伪造证件等罪证。该组织总指挥吴雷远假借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名义，阴谋组织暴动。17日，北平公安局向李济深、蔡廷锴、马叙伦等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破获该案情况，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对吴犯等人严惩。

△　空军第一大队王玉珂、刘继广、禹庆云等驾驶“蚊式”战斗机一架起义，自上海飞抵石家庄。同日，空军第十大队唐宛体、李学冕、彭树新自汉口驾驶C—47运输机一架起义，飞抵内蒙古赤峰。

△　广州市航业公会全体理监事会议反对开放梧州为对外贸易口岸，决定成立维护航权小组，集体前往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及省、市参议会请愿。15日，与海员工会广州分会派代表分赴省、市商会及工界社团陈述开放梧州为丧权之举，吁请支持。16日，复派代表赴南京请愿。

△　广州市公共汽车员工抗议宪兵无理殴打公共汽车沽票员李林举行罢工，并将汽车开至市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次日由市警备司令部答允员工要求，始恢复行车。

3月8日　　下午，孙科于总统府政务会议上提出辞职。行政院政务委员也一致决定提出总辞职，并请孙科敦促李代总统迅速另组新阁。10日，新华社评论指出："孙科承认在和平以及征兵征粮，军费开支，物价飞涨等问题上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自己有罪，但又不领罪受罚。""南京政府并不因孙阁总辞职而减少反动性质。"

△　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答记者称：根据宪法，并无总统辞职之规定，只有国民大会罢免总统之规定，但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可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并称蒋介石无意复职，亦无赴广州或台湾准备。

△　民国政府附设军事革新委员会，何应钦任主任委员，白崇禧、徐永昌任副主任委员，主司整军与复员事宜。

△　华北野战军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奉中央军委命往山西参加太原战役。是日至11日分两路向太原进军，第十九兵团由北平经石家庄、榆次到太原以南地区；第二十兵团由北平经阜平、代县、忻州进入太原以北地区。东北野战军亦派炮兵第一师往太原参战。

△　1939年3月9日中苏两国订立之合办哈密——阿拉木图间航空协定，共组中苏航空公司十年期届满，为签订续约，是日行政院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交通部派刘泽荣、萧立坤、穆罕默德·伊敏、刘孟纯四人为代表，以刘泽荣为首席代表，并派夏舜参、李如桐为顾问，最迟于3月底前与苏联民航总局代表在迪化举行谈判。

△　美国国务院发表本年援华款项数额称：至3月4日止，美财部根据1.25亿元军事援华计划，已向中国政府和若干美国机构付出1.2407869245亿元，用以购买武器及军火。同时经合总署已核准拨

款167.1万元，为中国本年第一季度之用。总署为中国购买货物用去经费总数已达1.97245亿元。

△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抵南京访问，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设宴招待。布朗将晤见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定于12日返回新加坡。

△　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榆林和大荔两个分区。榆林分区包括横山、镇川、神木、府谷等县；大荔分区包括韩城、郃阳、澄城、白水、蒲城、大荔、朝邑、平民八县。

3月9日　　李宗仁以孙科内阁总辞职，派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立法委员范予遂赴上海访顾孟馀，请其主持行政院工作。顾以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和战均无办法，不予接受。

△　立法院负责整理和平问题意见立委孔庚、江一平等22人于上午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江一平、杨玉清、卢郁文、张汇文、黄宇人五人起草和平意见书，向大会报告。

△　中国驻日代表团人员表示，经中国政府定谳之日本战犯，“盟总”无权减刑，如“盟总”不事先与中国驻日官员商讨即予减刑，中国政府将提出抗议。

△　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度内征兵200万人。各地相继召开征兵会议。

△　中国留美九个教育团体联名上书美总统杜鲁门，抗议国民党当局于北平和平解放前将北平古物8600件运往华盛顿美国会图书馆“暂为保存”。11日，美国务院声明，自供国民党政府曾于数日前申请将藏于北平图书馆之手抄本113件运美保存。

△　华北解放区与江南各地开始通邮，凡平信、挂号信、新闻纸、印刷品、商务传单、货样、贸易契约、普通包裹均可邮寄。邮资、邮票等一律以华北区现行制度为准。

△　中原人民解放军解放湖北麻城县城。

3月10日　张治中、吴忠信在溪口就李宗仁提名何应钦组阁问题继续征求蒋介石的同意，得到首肯。鉴于当时何应钦并不答允担当此任，蒋遂写了一封致何亲笔信交张、吴带往。是日，张治中、吴忠信自溪口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李决定提名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

△　李宗仁令："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着即撤销；江苏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余井塘辞职照准，遗缺由庞树森继任。

△　监察院财政、粮政委员会会议，通过如下议案：一、依照《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对公教人员与官兵，一律发给实物或银币。二、请行政院于本年3月起执行公教人员调整待遇和调整军工公教人员生活指数案。三、政府预算不敷之处，应另开财源，不得再以发行通货为弥补办法。四、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应迅予改组。五、各项公营、民营事业价格，由政府每月调整一次，私人不得擅自加价。六、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应予裁撤，由中央银行和海关代管其业务，各地金融管理局亦应裁撤，由中央银行代管其业务。

△　立法院政治革新方案起草委员会于昨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对革新方案进行了广泛讨论。是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袁其炯和崔学礼等四委员提出如下建议：一、请李代总统放弃《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二、登记豪门资产。三、限制私人银行发展。四、实施土地改革。五、停止征兵征实。六、监院、立院合作，促成廉洁风气。七、军人绝不干涉政治。八、核实军费开销。九、彻底改革币制，稳定金融。十、力戒生活奢侈浮华与人心涣散。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召集出版、新闻界宣布六项原则：一、今后报刊对和平问题，应以不违反全面平等合理之和平为准则；二、不得登载中伤、讥讽或违反该项国策之文字；三、言论、记载须正确公平，不得破坏团结，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危害国家；四、报

道消息，以事实为根据，不得无中生有，各种电讯，尤须慎重发表斟酌运用；五、严禁漏泄军事秘密及侮辱诬蔑政府之文字；六、对本区治安秩序之维护和军民合作之提倡，应共同予有力之鼓吹。

△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于本月5日起实行罢教，学生亦以罢课响应。是日该校教授急电代总统李宗仁及有关部、会，指出穗市“物价一日数涨，涨必数倍”，要求加薪，并提出薪津一半发银元，一半发金圆券。次日，当局答允薪俸照生活指数500倍借发，公费生亦照此办理。本学期于是日正式上课。17日，再以广州生活指数早已超过1000倍，金圆券仍继续贬值，生活陷入绝境，继续向教育当局请愿。

△　台中久旱，八仙山大森林继上年12月大火后发生第二次大火。幸赖降雨，12日大火被扑灭。

3月11日　　张治中、吴忠信、顾祝同往杭州晤何应钦，敦劝何“出任艰巨”，面交蒋介石亲笔信。蒋在信中说：“中正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散乱，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望吾兄能以中正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的局势也。”何于是接受李宗仁的任命，但要求张治中负起和谈责任，张应允。

△　李宗仁代表黄启汉在北平获知李宗仁任用蒋介石嫡系何应钦担任新的行政院长，致电李宗仁，指出：“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力避免引起误会。”16日，李宗仁复电解释说：何应钦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

△　下午，立法院第四次院会秘密举行，讨论通过由黄宇人等20

人起草的《和平意见书》。主要内容为：一、本院赞同政府促进和平措施。二、各项重大问题，应依双方所“共同主张之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合法平等原则，求得合理之解决”。三、和谈进行事宜，“应由政府根据上述人民对和平之愿望及前项原则，妥慎处理”。

△　云南省政府以同意省参议会建议的名义，宣布“自即日起停止田赋征实征借，并停止征兵”。

△　台湾省府第八十九次委员会议通过：一、健全县、市地方政府组织，加强县、市长职权，提高行政效率。二、改善地方自治财政措施。三、各县财政收支监督办法。四、撤销省肥料运销委员会。五、拟定烟酒公卖品价格等议案。

3月12日　李宗仁将提名何应钦任行政院院长咨文送交立法院，并于上午11时在国际联欢社茶会招待全体立法委员，声称推荐何任行政院长，可以整编军队、革新政治、争取和平，希望立法委员予以通过。下午3时，立法院临时会议审议，投票以209票赞成，30票反对，获得通过，即由李宗仁以总统明令发表。

△　监察院于上午召开本年度年会，出席96人。院长于右任致词谓：“监察权与惩戒权之不统一，弹劾案之提出又不能公布，使不少案件失掉时效，为廓清贪污、提高行政效率之最大漏洞。”

△　孙科自南京抵达上海，当晚在寓所接见往访记者，发表时局谈话称：外间所传南北分治问题，为不可能之事，因为“中共亦不必予赞成”。又谓：“中共控制中国，必然参加苏联集团而反对美国，盖我国今后外交，固不应反苏，亦不宜反美，以免三次大战之波及。故为今日之计，我外交政策须保持中立。”

△　江西省府主席方天对记者宣称土地改革运动决自4月1日实施，10月31日前完成总归户工作。并称为彻底实行民生主义，决不惜

任何牺牲。

△　胡宗南集团10日起回犯陕中，至是日止先后侵占宁平、淳化、耀县三城及其周围许多村镇。青海马步芳部八个团，亦由陇东平凉、泾川、灵台一带向东面出动，10日，占领淳化附近之通润、铁王等处。

△　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省南部正阳县城。

△　《中央日报》台湾版发行创刊号。

3月13日　何应钦偕刘峙、孙连仲、陈继承、孙蔚如、冷欣由杭州抵上海，何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日内即赴京与各方交换意见，期能集中人才，共图国事。以团结革新之精神，谋政治之改革与和平之实现。"同日，在沪会晤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李璜、左舜生，邀请民、青两党入阁。

3月14日　何应钦在沪访晤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钱新之、陈光甫等人，邀其入阁。颜、江予以谢绝。章表示考虑。同日，何语记者称：新阁面临重大课题为解决经济问题；今后行政事业中心仍在广州，因迁返南京费用过大；和谈将遵从各方意见；对任何国家之外援均乐于接受。15日，何由沪到京。

△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于2月底南下，进抵皖、苏境内之庐江、无为、滁县、六合、扬州、如皋一线，开始全面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是日，三野司令部指示所部于3月20日集中部分兵力发起扫除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的战斗，速战速决，力求全歼，使江南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前沿完全暴露于解放军炮火攻击之下。

△　立法院政治革新方案起草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将《政治改革方案》更名为《政治改革纲要》。各委员对革新政治再提如下要求：一、实行责任内阁。二、废止"戡乱"临时条款。三、彻底

检讨财政金融未经立法院同意之措施。四、改革银行制度。五、立法院授予代总统以实权等。

△ 监察院第三十六次会议，由秘书长李崇实报告自上年8月行宪以来所提出之45件弹劾案，64件纠举案，及46件纠正案。继由各专门委员会分别作10分钟口头报告。继讨论蓝妮（即蓝叶珍）颜料案纠举孙科。行政院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认为蓝妮颜料案与孙科个人无关，蓝妮并未经法院判为汉奸，其财产自不应为逆产，政府不能仅凭密报予以没收（蓝妮颜料案系1945年8月10日在沪查封，于同年10月7日由孙科函请发还。认为孙科假借职权，图利爱妾）。

△ 美国经合总署华南办事处宣布：前曾暂停拨运援华之美棉，恢复援华，第一批2800包已于本月9日运抵上海，供应各纱厂使用，尚有之9.2万包，将于本年4月全部运抵。

3月15日 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揭露美国正在进行侵略台湾的活动，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 立法院院会通过简化行政机构案。行政院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行政、经济、交通八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工商、农林、水利三部及资源委员会合并为经济部；社会部归并内政部；地政部、卫生部改为署，隶属内政部；粮食部改为田粮署，隶属财政部；主计部改为主计处，隶属于行政院。新闻局裁撤。

△ 美国务卿艾奇逊致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略谓：“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增加军事援助足以改变中国目前一切发展的状态。”“一旦共产党人以武力越过长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的军事抵抗的可能极为渺茫。”但仍提请美国国会将美国1948年援华法案的期限延长至12月31日。延长期内仍可动用3.38亿美元援华款项中之余额，原有1.25亿美元军事援华款项不受影响。

△　《人民日报》移北平出版，《人民日报》原北平版自本日起改为《北平解放报》。

3月16日　监察院会议通过设立业务检讨意见整理小组、监察法令研究小组、政治检讨研究小组，并推举出三小组委员。

△　行政院于广州举行第四十八次会议，议决承认外约旦和以色列国政府，承认萨尔瓦多国新政府等议案。

△　陈诚、朱绍良、王陵基、杨森应李宗仁电召，抵南京。

△　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晋中行政公署合并于太原市人民政府，任命裴丽生为太原市市长。

3月17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统一太原战役的领导，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等三个兵团，并以第十九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同时成立党的总前委，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等八人组成（4月2日增加赖若愚），徐向前任书记，罗瑞卿、周士第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三野司令部，告以渡江作战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以便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开始谈判十天或五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坏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是否炮击南京，则视谈判情况而定。本月19日，又电复三野陈毅等，是否攻占浦口、浦镇，“须看谈判情形及军事上是否必要才能决定”。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于广州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追认孙科辞行政院长职，由何应钦继任；积极准备五中全会召开；推黄绍竑、张发奎、余汉谋、薛岳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议案。

△　李宗仁、白崇禧一致邀请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傅以“身处局外”更能有所作为，未予接受。

△　立法委员刘锡五等58人联名致函何应钦，对新阁人选提出四项原则：一、慎选廉能前进有为人员，不使贪污无能及投机分子入阁。二、慎选堪任艰巨努力职守人员，不可崇拜偶像，强拉衰庸及腐败官僚入阁。三、慎选秉持大公为国为民服务之人员，不可引用专为派系利益或附益豪富分子入阁。四、凡久居阁员或居军政显要，素无成绩表现者，及因供职军政致发大财者，均不应入阁。

△　监察院各研究小组讨论革新政治事宜，决定就树立法治，整肃贪污，用人唯贤，整肃纲纪，慎重决策，加强改革，加强进步团结诸原则，向新任行政院长提出具体意见。

△　白崇禧自南京返回汉口，表示支持何应钦组阁。

3月18日　何应钦应邀出席监察院茶会，监委谷凤翔等代表全体监委发言，要求政府：一、加强改革决心；二、加强进步团结；三、慎重决策，树立政府威信；四、选任贤能；五、整肃纲纪；六、厉行法治，严惩贪污；七、促进和平；八、革政不应拉拢派系而放弃人民；九、政府不应朝令夕改；十、军纪政风尤当加力整饬。何应钦致答词谓：欲废除人民痛苦，惟有和平一途，本人此次组阁，可谓“和平内阁”。

△　中国青年党举行中常会，决议不参加何应钦内阁，而从旁努力支持。

△　立法院第三会期第六次会议讨论停止动员“戡乱”时期宪法临时条款之适用。

△　监察院对孙科擅支“机密费”1.1亿余元金圆券案提出纠举，纠举书谓：“行政院长孙科妄支巨额国帑，化公为私，亟应咨请总统，

严予处分，立即追回全部公款，并送司法机构，依法诉究，以彰法纪，而肃政风。”21日，将纠举书分别送交总统府和最高检察署。

△　民主人士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张炯伯、包达三、叶圣陶、郑振铎、傅彬然、宋云彬、曹禺、张志让、沈体兰、刘尊棋、赵超构、徐铸成、王芸生等抵达北平。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北平民主人士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20余人亲往车站迎接。

△　《北大西洋公约》公布，规定一签约国被攻，即认为全体被攻，其他签约国应采必要援助行动。有效期20年。21日，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斥北大西洋公约》，指出该公约“实际上就是美国企图用以指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实行侵略的大联合，是美国压迫和奴役世界人民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

△　《技协》双周报公开向社会发行。该报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工余联谊社创办于1945年10月，原名《工余社报》。1946年3月工余联谊社扩大成立中国技术协会，该报先后更名《技协会报》、《技协通讯》。1947年12月再改名《技协》双周报，以读者来信等形式，宣传解放区生产恢复情况。

△　上海出版之《和战》、《时局人物》、《政治观察》、《新时代》、《中共内幕》、《国情》、《时论》、《纵横》、《透视》、《野风》、《时局观察》等23种刊物被国民党当局取缔。《群言》、《中建》、《舆论》三刊被勒令停刊。

3月19日　　李宗仁于昨日晚自京赴护，是日访晤薛笃弼、梅贻琦、胡适、张嘉璈、陈光甫，请薛笃弼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薛坚辞；梅亦拒绝出任教育部长；李复邀约张君劢，动员民社党参加内阁，张仍未允参加。下午李宗仁由沪返京。

△　立法院小组委员会讨论草拟役政改革方案，推定委员王泽民等七人负责。其中心要点是废除征兵制，改由劝募。

△　监察院移送之公务员违法惩戒弹劾案40余件，半年来，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迄未处理。本日监察院会议决定请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谢冠生来京备询。同日，《中央日报》刊载中央银行将银元价格抬至7000元抛出，导致物价上涨，监委会议决定派员调查。

△　“重庆号”巡洋舰在葫芦岛附近被国民党军B—29式重型轰炸机炸毁，翌日沉没，在护舰中六人牺牲。24日，毛泽东、朱德复电慰勉全体起义官兵。

△　中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致电李宗仁、何应钦及交通部长，陈述前行政院长孙科准许外轮由接近战区口岸装运物资，直接运往其他中国口岸，即实行开放我沿海航权；而规定梧州为对外贸易口岸，又为开放我内河航行权之先声。指出：“航权完整，为国家民族之生命所寄”，“孙前院长一举而断送沿海航权，并开外轮享受我内河航权之恶例，其结果足以摧毁我国幼稚之航业。”

△　张群由广州抵重庆，对记者称：辖区内停止征粮，减少征兵，另以募兵制补充兵额之不足。

△　中原解放军解放湖北罗田、英山两县城。

△　《展望》周刊第三卷第十八期刚出版即被上海市社会局下令查封。该刊向读者寄发《告别了，再见》的告别书，略谓：“在这样一个翻天动地的大时代，一个刊物的被令停刊可说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被令停刊既不由《展望》始，言论自由的成为力量，也不会随《展望》停刊止。”

3月20日　新任行政院长何应钦草拟新阁施政方针，谓之四大目标：一、谋取和平。二、革新政治。三、稳定经济。四、安定民生。新阁组成后立待开展的工作为：一、公教待遇之调整。二、孙阁留穗人员之处理。三、当前财政经济之整顿。

△　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邀请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各委员以及各地来京之军政要员等60余人，于上午10时假励志社举行座谈会，就征兵征粮问题进行讨论。与会者均认为征兵征粮制度必须保存，但对经办机构及办法，必须切实改革，希望国防部与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订出切实可行办法。

△　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应李宗仁电召，下午3时许飞抵南京。

△　国际商会中国分会会长陈光甫赴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

△　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与美国驻华公使克拉克、美国驻粤总领事卢登及陈纳德等密谈美国空军使用海南岛空军基地及民航大队开辟穗琼线等问题。

3月21日　何应钦所组新内阁组成。代总统李宗仁发布新内阁任职命令：一、任贾景德为行政院副院长。二、任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贺耀组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三、任李汉魂为内政部长、傅秉常为外交部长、徐永昌为国防部长（后由何应钦兼）、刘攻芸为财政部长、杭立武为教育部长、张知本为司法行政部长、孙越崎为经济部长、端木杰为交通部长、白云梯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均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四、任庞松舟为主计长。五、任黄少谷为行政院秘书长。

△　李宗仁令：一、《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着即废止。二、《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着即废止。三、《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着即废止。

△　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于汉口谈本省施政方针云：一施政之依据为中央法令和军事需要、人民意见，即官民一体、军民一体。二、施政步骤采取重点主义，逐步实施，以期政无繁苛，功归实用。

三、以舆论的动向，作为施政的准绳。

△　皖中人民解放军解放潜山和商河埠。23日，中原解放军收复应城。

3月22日　　李宗仁令：一、派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二、任命陈成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　立法院第七次会议，各委员提出对当前财政金融改革案应详加检讨。认为此案毛病很多，不宜仓促通过。会议通过以下讨论事项：一、铁路、邮电按成本指数调整运价、资费办法。二、重行修改银行业战前存款放款清偿办法。三、为实行国家财产清查，组织国家财政研究特种委员会。四、拟具军事改革方案。

△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保卫世界和平，表示“必须坚决站在以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方面”。决派代表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

△　中国政府于上年10月9日通知印度政府，1908年所订《中英续行藏印通商章程》期满，应予废止。是日，印度政府复文，除声明印度政府继承前英属印度政府与西藏所订条约的全部条约义务，表示《中英续行藏印通商章程》早已失效，无庸再提外，并声称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当以1914年《西姆拉条约》及其通商附则为准”。所谓《西姆拉条约》，从未为历届中国政府所承认。这一复文暴露了印度政府对西藏的野心。

△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北平的总会理、监事与华北文协理事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推选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同时推选郭沫若、郑振铎、田汉、洪深、曹禺、萧三、曹靖华等12人出席于巴黎召开之世界和平大会。并决定将原设在上海的总会迁到北平。

△　黄金市场于上午10时开业。同日公布黄金买卖现货办法13条。

3月23日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即“绥远方式”，是日起人民解放军代表李井泉、潘纪文（后改由张友渔、李哲仁）和绥远方面代表周北峰、阎又文（后加王克俊），在北平就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绥联络站等具体问题举行会谈。

△　南京警卫部队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经由中共南京市地下党策动，率部于南京外围江宁镇起义。分批渡江，遭空军袭击，部队崩散，王率百余官兵到达解放区。

△　监察委员胡文晖纠举前财政部长徐堪、前敌伪产业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肇元“违法支领行政院长孙科1.1亿元，朋比为奸，结好豪门，滥用职权，徇情舞弊”。

3月24日　上午10时30分，何应钦新阁在总统府举行就职仪式，并召开首次政务会议，何应钦提出争取和平、革新军事、革新政治、安定民生等四项施政方针。会议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五人为和谈代表。任命张义纯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原任夏威免本兼各职。

△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北平召开，4月3日闭幕。出席代表421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会致词祝贺。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柳亚子及全国总工会代表许之桢等亦与会致词。朱德致闭幕词。会议通过《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选举蔡畅、邓颖超、何香凝、康克清等51人为执行委员。4月14日，第一次执委会选举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

△　宋希濂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徵到奉化溪口晤蒋介石。次日，蒋对宋、关说：“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旋授意宋希濂确保西南地区，必要时将湘省几个军退到湘西，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将宋所指挥的部队转移至鄂西一带山地，司令部设恩施。陈明仁第一兵团退芷江、沅陵一带，归宋统一指挥，以固川东门户。

△　监察院第四十五次会议，出席委员109人，议决以下事项：一、呼吁政府将大批粮食空运太原救急；二、另订新疆监察区行署组织单行法规；三、成立国库清查委员会，彻底核察接受敌伪物资和美援救济物资、收兑金银之数量。并召宋子文进京，以备查询。推举唐鸿烈、孙玉琳、谷风翔等15人为国库清查委员会委员。

△　前外长王世杰于台北扶轮社发表演说，声明台湾的法律地位，“无论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台湾是一个光复地域，不是中国或盟国的一个军事占领地域”。中国政府在这个地域内，对内对外有绝对的自主和自由。

△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华北文艺界协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及民主教授、宗教界选出之出席巴黎第一次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正式组成，共39人，公推郭沫若为代表团团长，刘宁一、马寅初为副团长，钱俊瑞为秘书长。本月29日启程。

△　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陈可忠于21日答允对该校教授待遇略事调整，因未履行诺言，176名教授于是日签名决定由25日起至31日止总请假“待命”。27日，该校学生千余人节食一天，得米2000斤，支援慰问教授。28日，研究生百余人发表声明支援教授罢教，并因两个月来未发研究费，定28日罢课一天，以示抗议。28日，成立国立中山大学

各院系联谊会，发表声援教授罢教宣言。4月1日因待遇未获改善，继续请假。至4月18日始结束延续24天之总请假行动，积极筹设师生员工生活互助会，决定自谋自救，以校养校。

3月25日　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于23日出发，途经唐县、保定、涿县，于是日到达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毛泽东、朱德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傅作义应邀参加检阅。

△　李宗仁复派邵力子、黄绍竑、张治中、章士钊、李蒸组成和谈代表团，邵力子为首席代表。

△　民主人士黄炎培偕盛丕华、俞寰澄、常任侠等于23日由香港乘轮到达天津，受到天津市长黄敬等迎接并宴请。是日黄等由津抵达北平，董必武等到车站迎接。

△　宋子文自辞广东省主席职后蛰居香港，是日由港到达广州，监督验收他任内订购到货的美国军火，并为粤省武装的招募、训练和部署出谋划策。

△　章士钊由沪到京，发表谈话称：以超然立场为双方意见折冲，不准备代替政府提出任何条件。

△　新华通讯社总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至北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原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

△　航行港穗线之“和平”轮在沥滘河面触水雷爆炸沉没，乘客约300人获救外，死难约130余人。

3月26日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4月1日加派聂荣臻为

代表），按照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同日由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举行谈判。

△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电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原定4月13日发起渡江战役，因该日正值阴历十六，月光通宵，不易隐蔽，建议推迟两天行动。翌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　何应钦主持召开国防部整军会议，徐永昌、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等参加。经讨论，拟将现有部队470万人缩编为400万人。陆军缩编工作，先核实兵额，撤销若干虚有其名的番号。同日，何赴孝陵卫对驻军官佐训话，宣布自下月份起改发银元和调整待遇。

△　监察院第四十七次会议，推选出各区监察委员行署第二届委员。

△　孙科致函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说明所支用之1.2亿元，系清偿三月以来在沪迭次临时应急款项本息，纯系公用。

△　国立贵州大学学生为抢救教师饥饿，自花溪入城，结队游行，向省府请愿。省主席谷正伦答允拨省级公务员米一个月给予教师，并拨稻谷1000石作为学生伙食之需。次日下午，学生返校。

3月27日　　李宗仁在总统府邀宴全体监察委员，席间致词谓："此后和平之能否成功，端视政府对和平所作之努力而定。"

△　白崇禧抵达长沙，与程潜商讨江南防务问题。接见记者称："和平绝不可幸致，必须相当代价，方能争取公平合理的和平。"

△　宋子文到奉化溪口晤蒋介石，蒋委托其到台湾视察，协助陈诚制订经营台湾的计划。宋应允，于29日离溪口，过台湾晤陈诚后返港。

△　胡适在台北中山堂演讲《中国文化自由传统》，说中国远在2000年前，即有自由主义者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而奋斗的史实。自由并非来自外洋的舶来品，实为国货。

3月28日　经何应钦召集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以及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黄少谷等人四次集会研究，对和谈问题决定：一、建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二、由李宗仁、何应钦，并由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和谈指导委员会。（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就中共所提八项作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根据“原则性限度”，写出腹案九条作为赴平商谈的依据。其大要为：一、双方不再追究战争责任。二、同意重订新宪法，南京方面应有相当比例人数参加起草。三、法统问题与前项合并商讨。四、双方军队分期自行整编。五、原则同意没收官僚资本。六、原则同意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由将来政府就过去对外所订条约加以审查，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但政府中人必双方相等。九、商谈开始前，就地停战。

△　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电谓：“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阎虽然叫喊“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而他于上年底即开始作逃离太原的准备，将其管辖的官僚资本企业，除西北实业公司外，一律结束，货物变价款运送上海，约合黄金4.5万两左右。阎接李宗仁电后，即安排出逃，任命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小组，掌管和控制太原行政、军事、经济。在军事上将太原划为五个防区，以温怀光第十九军守东北区；刘效增第四十三军守东南区；赵恭第六十一军守西区；高倬之第三十四军守南区；韩步洲第三十三军守北区；第三十军戴炳南部和铁血师、神勇师为总预备队。

△　监察院第四十八次会议，宣布通过代总统李宗仁提名之大法官人选夏勤、翁放棠等八人和考选委员人选柳贻征、张其昀等九人。

△　监察院财粮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议决向政府提交以下议案：促请救济告贷无门之迁穗公教人员；解救太原粮荒；改变征实办法；修正各机关办公费规定；裁撤台湾巡察团之烟酒公卖机构；纠正中央银行高价抛售金银作法。

△　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会长朱家骅于南京发表谈话，为《北大西洋公约》叫好，宣称该公约之签订，“诚为争取和平积极而有效的行动，亦可说是对于人类对于当前危机的觉醒”，“侵略因素，必可消灭，人类再度浩劫，亦当能解除”。

△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向国会提出报告并决定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应采取之基本原则：一、继续支持美国一向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之信条。二、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继续正常之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三、因经济援华一事，于美国本身利益甚为重要，故应尽可能继续下去。

△　海军封锁长江安庆江面。

3月29日　张治中往奉化溪口谒蒋介石，就和谈腹案向蒋请示。蒋向张表示：“为倡导和平，本人业已引退，因之对政治问题，不便表示意见。今后和谈大计，应由李代总统与何院长负责主持。本人甚愿以在野身份，尽力支持李代总统使和平早日实现。”次日，张偕屈武回南京，将蒋的表示写成新闻稿发表，用以压摄国民党内顽固派。并与邵力子参加立法院秘密会议，报告溪口之行，博得赞同。

△　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通过加派刘斐为和谈代表，并指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　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开会，对和谈从中阻梗，并致电李宗仁、何应钦转和谈代表，提出：“和谈为国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

可得而专。”“政府为国民大会依据宪法所产生，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谈判？”要求“克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同日，潘公展等亦电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电谓：“惟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

△　下午，阎锡山由太原围城中逃往南京。行前紧急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在绥靖公署内阎公馆开会，由秘书长吴绍之宣读李宗仁电报。阎对与会者诡称：此去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候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随即在梁化之、阎慧卿陪同下急忙乘车直奔西门外洪沟机场，逃离太原。

△　监察院年会闭幕，历时18天，院长于右任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希望一切为人民着想，不负民望。

△　陈诚出席台北青年节大会，致词称：青年学生之使命为帮助政府完成后期革命。“如有人对现状不满，觉得共党区域较此间安定，余极愿意拨付旅费，送其前往共区，且更欢迎前往者再度回来，俾为吾人证实台省与共区之间到底何方为佳”。

△　行政院“纠正”梧州开放对外口岸办法，由海关在梧州设关，轮船直开香港，不经广州，只准本国轮船直接来往。广州轮船公会及海员工会维护航船小组对行政院修正案仍表不满，要求撤销梧州开港原案。

△　《广州日报》改组为广东《中央日报》，是日创刊。

3月30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等，指出：白崇禧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崇禧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

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

△　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总前委决定进攻太原城方案，第一步打外围，争取消灭阎军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

△　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在广州举行谈话会，提出和谈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和谈一切报导公开；和谈进行详情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和谈内容坚持下列五原则：一、国体不容变更；二、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三、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四、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五、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

△　何应钦在立法院第九次会议上报告施政方针，声称：政治上，维持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努力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在不危害国家主权范围内，欢迎一切外援，以及实行土地改革、改善征粮制度、提高公教人员待遇、宽筹教育经费等等；军事上，前线部队保持现有防线与态势；财政经济上，田赋交还地方，税捐以银元计算缴纳，筹办财产税，酌办生产贷款，鼓励出口和价汇，奖励人民投资生产事业。

△　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分别在立法院第九次会议上报告整军情况，谓国军经本月份核实，为420万人，预定4月间裁减为400万人，所裁之20万人中，官佐占13万。将裁撤14个军包括30余个师的番号。今后拟在每一个地区配备若干个师，“其军费由地方负担一部分，以补国库之开支”。同时对中共军事力量作了说明，认为人民解放军缺乏船只，无法渡江。

△　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及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决议：健全省政府，推选康生、郭子化、方毅等19人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康生任山东省府主席，郭子化为第一副主席，方毅

为第二副主席。

△　中苏关于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延长协定谈判在迪化举行。

△　开滦唐山煤矿接连发生重大工伤事故，该矿职工临时代表会于昨日向矿务局递交抗议书，并提出四项合理要求，矿方置之不理。是日下午3时，遂召开临时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限矿方于15分钟内表明态度，否则即向人民法院起诉，控告矿方违反安全规章，玩忽职工生命之不法行为。矿方被迫答允职工代表所提以下三项条件：一、职工临时代表会提出改善设备意见，矿方保证执行。二、今后矿方应保证承担自己应负之责，不得推卸与离间职工团结。三、此次事件因果责任，矿方应登报声明，公开认错道歉。此外并答允对伤亡职工的抚恤条件。

3月31日　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在瑶岗召开兵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即渡江作战实施计划）。是日总前委将《纲要》呈报中央军委。《纲要》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及地方部队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及苏北军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破手段，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江面实施渡江作战。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

△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告上海人民书》，指出中共决定4月1日于北平举行和平谈判，是给李宗仁、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改过自新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如李、何愿意证明自己的求和诚意，就必须以八项条件为基础，立即停止征兵征粮，征拉民夫建筑防御工事；必须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停止逮捕，解散特务机关；立即实现与解放区通航、通商、通汇，并取消捐税征实；立即开放言论、集

会、结社自由；立即设法保障及改善职工生活；立即停止发行金圆券，并立即将强制购买自人民的金银全部运回上海。

△　晚7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和谈代表团。宴会后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汤恩伯、王叔铭、刘士毅、关麟徵、宋希濂等开军事会议，讨论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国防部参谋次长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概况后，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解放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出决定。国防部提出将驻新疆部队之大部分东调，张治中以无论步行或车运均有困难，提出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究后再作决定。李宗仁予以接受。旋讨论十个师的美械装备分配问题，白崇禧要求四个师的装备，顾祝同不允，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何应钦提出待仔细研究后再定，始告平息。

△　民国政府组成和谈指导委员会，由李宗仁（召集人）、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董显光等11人参加。

△　南京和谈代表团秘书处部分人员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领，于上午9时乘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赴平。下午1时抵达。

△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宣传指示，承认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之“缺点与错误”，招致今日失败，应“深切反省，痛加改革”。不承认今日失败为“中国反共斗争的最后失败”。认为“中国反共斗争为世界反共斗争一部分，一环节”，“中共今日的胜利，在世界大战上并无决定意义，而国民党今日失败，亦不是决定性的”。“必须继续奋斗，阻止中共发展”。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内政部组织法草案、主计处组织法草案、中央各部留职停薪职员救济办法。修正通过财政部长刘攻芸提交

的《财政金融新改革案》。

△　立法院全院委员第四次谈话会决定清理重要议案：一、征财产税案。二、省县自治通则。三、土地改革法案。四、简化行政机构后各部会组织法。

△　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一、凡与戒严法相抵触而企图捣乱社会秩序者，决依法惩处。二、依照戒严令，绝对禁止任何学校团体假借任何名义，非法集会，或聚众游行，违者严惩不怠。

△　张群奉召自渝抵京，谒见李宗仁。

△　教育部专门委员李维远向教育部呈报重庆各院校员生罢课罢教经过。内称：由于物价猛涨，汇款迟到，现钞缺乏，致公教人员月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加之武职人员薪俸改用银元折发等不平现象，各校教授终于2月底罢教，各院校学生，继起罢课。并于3月17日请愿游行。27日晚，重庆大学等四校学生在重庆举行营火晚会，提出“团结就是力量”、“争取温饱”、“打倒贪污”等口号。省立中等学校亦纷纷罢教，请求改善待遇。为避免“酿成更多事故”，要求教育部向行政院力争恢复渝、蓉地区待遇等级，及考虑提高奖学金名额，照指数补发师范生各项费用。

△　南京市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发表争生存、争和平宣言。提出生存权必须在全面和平下才能取得。这种和平，不是反动政权和封建势力为保存自己统治而备战的和平，而是真正民主下的永久和平，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泽东八项条件的和平。“坚信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历史是永远前进的”。

3月下旬　　李宗仁托龙云的亲属往香港向龙云表示致意，希望龙回南京“共商国是和云南的一些问题”。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后也致电龙云请其入京。

是月　上海地下剧影协会决定组织迎接解放的演出队，由吕复任演出队总队长。至4月底组成了40多个演出队。

4月

4月1日　南京民国政府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顾问屈武以及李俊龙、金山等一行19人，于上午在南京乘中航专机赴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意旨，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下午专机抵平。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在六国饭店公宴南京代表团一行。宴后周恩来、林伯渠与张治中、邵力子交谈。周恩来指出张治中离南京前往溪口见蒋介石，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张治中解释说，见蒋主要是形式上的礼貌问题，其次是借此消除和平的暗礁。并表示他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　傅作义通电毛泽东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并表示今后愿意拥护中共主席毛泽东的领导，和平建设新中国。

△　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11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实现真和平。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令军队和特务袭击学生，当场打死二人，打伤106人，失踪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

△　李宗仁特派顾维钧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届常会第二期会议首席全权代表，李惟果、刘师舜为全权代表；行政法院院长张知本另有任用免本职，遗缺由端木恺继任。

△　中原人民解放军解放豫南重镇信阳。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所部第五绥靖区10个旅从信阳撤退时，遵白崇禧阻解放军沿平汉线南下的命令，由张的主要助手朱其平指挥工兵营将狮河大桥和武胜关隧道炸毁。张轸所部在湖北孝感祁家湾火车站南北一带短暂集结后，撤至武汉附近。并遵令撤销第五绥靖区，将10个旅改为师的番号，编为第一二七军和第一二八军，组成第十九兵团，张轸兼任兵团司令，赵子立、朱其平任副司令，赵子立兼第一二七军军长，辛少亭任第一二八军军长。兵团部设粤汉铁路线上贺胜桥车站。

△　中原人民解放军解放花园市西周家庙地区，歼白崇禧集团主力第七军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二团全部，俘1300人，毙伤700余人。

△　陕南人民解放军击溃由商县、雒南赶来增援之国民党军第三军一个团及陕西保安第十一团共2000余人，毙伤及俘获290名。

△　汉口地方法院是日宣布上年轰动全国之景明大楼集体强奸案被告张月明、杨玉峰、刘宝山等共同意图营利，引诱良家妇女予他人奸淫，各处有期徒刑三年。章继宾、曹秀英同罪，各处有期徒刑一年。上列被告均系牵线犯。对外国人未作追究。

△　美国政府将四艘驱逐舰赠送中国政府，其中“太和”、“太仓”两艘于是日驶抵台湾左营港。

4月2日　　是日起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分别就中共八项条件个别交换意见。南京代表提出双方军队自即日起固守原防就地停战。对惩治战犯问题，除邵力子外，均不同意。同日，周恩来会见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指出李宗仁本来公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

△　毛泽东会见刘仲容，要他向李宗仁、白崇禧转告：一、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桂系军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待将来具体商谈；三、关于国家统一问

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出席；如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亦可，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一致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国和蒋介石的大当。

△　蒋介石由溪口向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关于和谈原则的三条补充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终止；（三）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

△　毛泽东复电傅作义，略谓："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但执行这个政策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　南京、上海等地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南京"四一"惨案，举行罢课、示威游行。行政院发表书面声明，宣称已"令教育部会同卫戍总部查明责任"，"令卫戍总部于五日内将城内军官收容总队迁移城外"，搪塞责任。以"令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亲至医院慰问受伤人员"缓和舆论。同时约束学生"不可再聚众游行，破坏戒严法令"。

△　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于是晚离南京遄赴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此次国民党中常会交换和谈问题之经过情形。

△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部第十一、十二军和皖西独立旅等部共五万人，分东、西、北三面向安庆猛攻。

△　成都省立18所学校教职员工反饥饿罢教已一周，是日各校学生集合师范学校开会，会后出发游行。

4月3日　　周恩来单独接见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部队在安徽让出安庆，桂军向武汉撤退；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黄启汉当即表示："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走。"当天下午，黄启汉由北平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周恩来的意见和忠告。

△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陈其尤等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英、法、意等12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谴责美国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　何应钦就"四一"惨案发布处理训令，指责学生"不顾戒严法令，集合游行，向总统请愿，沿途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反对政府，言行激越"。为缓和舆论，亦宣布将肇事凶首官佐六人"立予押讯"，并严饬收容总队官佐"不准至各学校寻衅，违者就地枪决"。次日，又拨送衬衣、被褥给受伤学生以示"安抚"。

△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日前赴溪口晋谒蒋介石，报告中央党部迁穗后党务推进情形，并请示五中全会召开之有关事宜。今晨离溪口。同日，国民党中常委雷震、前外交部长王世杰亦到溪口谒蒋。

△　中原解放军解放平汉路南段的花园市，国民党军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南逃。同日，中原解放军解放广水车站，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一部。

△　全国学联通电抗议南京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京、沪学生继续罢课示威，要求惩办凶手。

4月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指出摆在国民党政府面前只有两条路，即：向人民靠拢或继续与人民为敌，决无第三条路可走。

△　李宗仁、白崇禧通过黄启汉及南京和谈代表要求中共勿攻安庆及再向长江靠近，“以利和谈，免生枝节”。中共中央是日致电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并告刘伯承及中原局邓小平等，告知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

△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电声援南京学生，号召工人、妇女支援解放军渡江。北平各大专院校教职员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抗议南京当局制造“四一”血案，要求解放军早日渡江，结束南京反动统治。

△　立法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财政部长刘攻芸报告财政金融施政方针，哀叹目前财经十分困难，本拟发行国债，然不易取得国人信用，殊难弥补整个支出。期望外债，然美援数量及时间，均难预知。与会立委向刘提出质询：通货膨胀甚速，应由谁负责？关元、税元、金元、银元流行市上，究以何种货币为本位？以及要求纠正高价抛售金银、引导黑市上升的举措。同日，立法委员王力航致书何应钦、刘攻芸，痛斥国家行、局、库无法无天，要求改革金融机构。

△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议案，决定将1948年4月3日所通过的“援华法案”延期至1950年2月15日，以该法案拨款四亿美元中尚未动用的5400万美元继续援助中国政府。

4月5日　　国共双方和谈代表于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中共方面

对南京政府所持的基本意念与和平谈判的基准，“备战谋和”的动向与“停战谋和”的意向，以及蒋介石及各地区官员对和平的态度与战争的观点等深表疑虑。

△　中共通过李宗仁私人代表刘仲容向李宗仁提出双方建立联合委员会的建议，由毛泽东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4月12日以前建立。李到北平，共同进行国民党军的整编、没收官僚资本等事宜。另外，就李宗仁表示阎锡山已离开太原，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告知刘仲容转告李宗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

△　刘仲容偕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回到南京。当晚向李宗仁、何应钦转告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对和平问题的态度。“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并转达毛泽东提出欢迎李宗仁去北平直接商谈，参加和议签字仪式。同时转达李济深的口信，要李宗仁把总统印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签署和议都可。

△　白崇禧于昨日电中共方面，提出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名义复电白崇禧，指出其要求是不合理的，但为了和李、白建立合作关系，表示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一）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4月10日以前撤退完毕。（二）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三）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希望白通知所部照办。同日，黄启汉由南京到汉口，向白崇禧转达周恩来的谈话。白崇禧表示：“现在安庆驻防的是广西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我调刘汝

明部来接防。”又说：“最好以长江为界，共产党军队不要过江，划江而治，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事情就好办了。”依旧幻想南北分治。

△　行政院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特派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白崇禧为华中军政长官（14日李宗仁以总统明令发表）。派李良荣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　宋希濂抵长沙晤程潜，提出鄂中江南与湘西北接连地区为军略要地，拟即成立湘鄂边区军政机构，由他本人兼主其事。宣称：“巩固江防，坚守长江，阻遏共军南犯，殆为国军当前唯一之重大任务，亦即争取和平之有力条件。”

△　驻太原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一团团长孟祥瑶和中共工作人员王烈护、李焕卿、韩益才策划起义事宜，事泄，四人同时被捕。后经营救孟祥瑶等四人脱险。

△　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声援南京学生。华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特发抗议书，抗议南京反动当局制造南京血案。

△　美国政府于是年3月通知英国政府，美将对中国（包括香港）实行严格的出口限制，希望英国也照此办理。英国对禁运军火没有异议，但认为对其他商品实行管制有损香港的商业利益。是日答复说，采取出口许可证制度“只能是一种最后的办法，且无论如何只能用于据我们所知中共特别需要的那些物资”。

4月6日　　新华社揭露南京政府利用和谈掩护扩军备战的阴谋称：国民党国防部已设置14个编练司令部，妄图使其削弱得只剩100万的正规军，扩展为350万至500万。

△　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立台湾大学学

生张贴进步标语、提出合理要求，认为是受“共党职业学生”煽动，是“中共潜伏台湾的匪谍分子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下令师院立即停课整顿，并指示“要在不流血的原则下，清除匪谍，安定学校”，并于是日调军警包围师院及台大两校，逮捕学生20余人和两名记者，对未捕的学生一律重新登记，进行甄审。并将师范学院代院长谢东闵免职。

△　胡适自上海登轮赴美。14日在海轮中写成《〈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文中说：“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宣称：“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这篇反共宣言，是为他与雷震、杭立武商定要创办的杂志写的发刊词。

4月7日　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首先表白他“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南京和谈代表亦已采纳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为基础。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同时表示要“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北平和谈，经过几天来个别交换意见，在战犯和渡江等问题上双方距离很大。张治中说：关于战犯问题之第一条，“我们决不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

△　李宗仁于晚间宴请由平到京之李民欣、刘子毅、朱蕴山。表示对中共方面的建议，将于4月11日以前给予具体答复，仍希望划江而治，反对人民解放军渡江。

△　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何应钦报告时局及施政方针，通过和谈五项原则：一、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即宣告和谈破裂。二、保持国家独立自主精神。三、维护人民自由生活方式，

停止所有暴力政策。四、双方军队各就防区整编。五、政府组织以确能保证上列二、三、四原则之实施为条件。会议通过成立和谈指导委员会，推李宗仁、张群、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孙科、吴铁城、何应钦、朱家骅、吴忠信、徐永昌11人组成，研究和谈问题。会议决定任傅秉常为外交部长。

△　立法院财政金融及预算两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由院会交付审查之举办金价存款，稳定金融，改善薪饷办法，保障储蓄，及发行救国特别公债等提案。立委王力航对行政院施政方针报告提出书面质询，指责四大家族及其亲信操纵国家整个财政金融大权和人民的命运说："他们打着商股的旗帜，披着国家的外衣，右手抓住政府，左手抓住人民；一脚踏在中国，一脚乃在外国；咬紧我们的同胞，吸吮我们的膏血；咬得尸横四野，咬得血流成河。请问何院长、刘财长，面对这广大悲惨的场面，看清了事实么？打算怎样办呢？"

△　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及地方团队约万余人，进攻并解放浦口以东国民党重要桥头阵地仪征县城。

△　第四野战军解放湖北东部浠水县城。

△　在中共上海局领导下，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少将代局长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4000余人，在宁、沪、杭心脏地区嘉兴宣布起义，并向西天目山进发。国民党当局调集几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围追堵击。在突围中领导人刘异等部分人牺牲，部队溃散，大部被俘。贾亦斌突围负伤，被梅溪地区中共游击队和群众救护，只身进入游击区，嘉兴起义失败。

△　空军第一大队第九中队上尉飞行员梁惠福驾驶B—25式940号中型轰炸机一架起义，从汉口飞抵郑州，加入人民解放军。

△　南京大专院校"四一"血案善后处理会代表王善进、李绅、吴宴平向立法院呈交请愿书，要求查明事实真相，追究肇事责任，予祸

首以严重处分等六项要求。同日，立法院会议通过请愿书，咨请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处理。

△　湖南大学、克强学院、长沙一师等20余所院校学生万余人集会，追悼南京死难学生，追悼大会后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假和平”、“拥护中共和谈八项条件”、“严惩四一血案刽子手”等口号。

△　美国务院公布紧急补助中国学生办法，拨款50万美元专作救济留美学生之用。此项补助办法，系由日前返美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建议，而由中国政府提出。

4月8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和平谈判有关事宜，长谈四小时。毛泽东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南京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张治中晤见毛泽东后，感慨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是日起，毛泽东分别与南京和谈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及秘书长卢郁文晤谈。

△　张治中从西山回南京代表团寓所，立即召集代表团会议，传达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和内容。代表团各成员都深感释然，相信和平有望，但担心蒋介石及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从中作梗。经反复讨论，决定届时派黄绍竑亲回南京，向和谈指导委员会陈明利害，阻止其向蒋介石请示，并争取接李宗仁到北平签字。随即代表团致电南京，报告张治中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经过，并附两点意见：一、渡江问题，中共很坚持，恐势在必行。二、请李、何千万保守秘密，以免主战派破坏。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李宗仁，指出实现八项条件应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战犯问题，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并盼双方早日成立和平协定。

△　第三野战军陈毅部第二十军占领三江营桥头堡，并向高桥进攻，9日，解放高桥。

△　宋子文受蒋介石之委托到台湾视察，帮助陈诚拟订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抵御中共的方案。15日离台北经厦门返港。

△　上海市公用事业涨价，电车、公共汽车、轮船、小铁路四项交通票价平均上涨150%。水电部门上涨105%。

△　在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报纸接管小组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名义出版《上海人民报》，由唐守愚负责，陈虞孙主编。该报从5月12日开始报道上海战况。至5月27日上海解放，前后共出八期。

4月9日　　李宗仁于下午召何应钦、于右任、童冠贤、张群、白崇禧、阎锡山、顾祝同、徐永昌、桂永清、周至柔等军政首要会议，会商和谈及江防问题。同日晚，复与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等桂系人物密谈，均认为蒋介石在幕后控制政府，和战都无希望。提出蒋、李中只能有一人主张，蒋如不出国，李应即辞代总统职。白崇禧抱怨李当空头代总统不管用。12日，李挽请居正、阎锡山赴溪口，并带交致蒋函，表示蒋如不放手，他惟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

△　何应钦由广州致电南京和平代表团，传达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即：一、如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二、为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责任，对于以往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一切施行暴力之政策；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

有双方相互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二、三、四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　张治中致信蒋介石，针对何应钦传达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指出："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痛陈"一年来国人怨声载道，对于钧座之信仰，可谓低落至无以复加"，党、政、军一般干部，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皆谓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惟有断然暂时出国"，"倘不幸而和谈失败，亦惟有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与李、何两同志负责"。此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

△　国防部致电和谈代表团，要求通知中共方面，务必立即把自和谈开始以来向前推进的军队全部撤回原来的位置。

△　白崇禧与黄启汉由汉口飞南京。白到宁后听取刘仲容北平之行的汇报。刘仲容说，当初受白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中共方面态度坚决，认为政治既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白崇禧则声称："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之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八二次会议通过：一、中央宣传部长黄少谷辞职照准，推程天放继任；二、中央青年部长陈雪屏辞职照准，推倪文亚继任；三、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维辞职照准，派郭寄峤接充；四、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经国辞职照准，派陈诚接充。

△　空军第十大队第一〇一中队沈济之、刁光第、王伯泉、罗锡龄等七人驾驶C—46式飞机一架起义，自上海飞抵济南。

△　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渝市15所院校成立争温饱联合会。

4月10日　　白崇禧致电中共方面，声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请中共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

△　蒋介石命蒋经国电约何应钦、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在杭州会商时局。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代电上海市政府，令其对民盟外围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切实注意防范”。14日，上海市政府训令所属各局、处切实执行。

△　湖南省主席程潜发表书面谈话，表明他名列战犯“不加辩白”。并表示愿以至诚至正的决心，求使湖南免于战祸。

△　立法委员许闻天、金绍先下午在南京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派员拘捕，罪名是“煽惑军心，策动叛变”。金当天释放，许由京解沪。次日，金分别往谒李宗仁、童冠贤及何应钦，向何要求立即释放许闻天，保障全体立委言论行动自由。后经立法院抗议，12日许被释放回南京。

△　四川省重庆大学等22院校共2000余人，下午在重庆大学操场开“四一”死难同学追悼会。大会宣读抗议书，要求惩办主使凶手、保障人权、厚葬死难同学并发抚恤金，以及赔偿受伤同学精神和物质上之一切损失。

4月上旬　　参加太原战役之人民解放军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及炮兵第一师于月初到达太原域周，与围困太原的第十八兵团等部会合。

4月1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18日闭幕。到会代表340人。朱德到会致祝词。任弼时作政治工

作报告。冯文彬作关于青年团的任务与工作报告及会议总结报告。蒋南翔作关于团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纲领与团章；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选举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萧华、胡乔木、胡耀邦等45人为团中央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钱俊瑞、荣高棠、李昌、宋一平、陆平、韩天石九人为团中央常务委员，冯文彬为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依据和平谈判进展情况，决定渡江时间推迟一星期。翌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表明和谈诚意，命令前线各部队自即日至16日停止战斗。14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保持前线平静时间“请由原16日延长至20日。在此时间内即使敌方发炮，我方也不要还炮”。总前委旋令已占据渡江有利地形之宋时轮第九兵团后撤，并令各部队严格遵守中央军委命令。

△　龙云在香港浅水湾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他给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的信函。他在信中对李、何邀其入京共商国是，表示“今日之所谓国是，一言可决，即须兄等毅然决然，勇敢接受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原则，电嘱北上代表，依照原则，作出具体决定，付之实施。将为吾民族开万世永久和平，岂独吾滇省一时受赐”。并告诫李宗仁等，“今日之事，幕后操纵，怙恶不悛者已大有人在，指示作困兽之斗，荼毒人民。吾兄必须洞烛阴谋，作刚毅之决断”。信中还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信服。是为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后，第一次公开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态度，各报均以显著地位刊载。

△　阎锡山赴溪口谒蒋介石，转陈李宗仁书函，略谓中共节节进逼，陈兵江北，所提条件苛刻，似非作城下之盟不止，请预筹应对之策。12日，蒋介石复函李宗仁，称一本常理处之，万不可以一时之胁迫而有所自馁。

△　西北军政副长官兼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应李宗仁电召，乘专机抵南京述职。

△　南京民国政府因“重庆号”军舰起义，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事先疏于防范，并对该舰人事处理亦欠妥善，实属咎有攸归”，以总统令“着即撤职留任，以示惩儆”。

△　自4月1日国共和谈开始以来，飞机仍轰炸苏皖解放区之靖江、扬州、六圩港、无为等地。昨今两日，徐州、合肥两市也遭轰炸。总计炸死炸伤居民数十人，烧毁民房150多间。

4月12日　　9日至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又先后接见南京和谈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及秘书长卢郁文等。南京和谈代表认为在战犯名单、军队整编、解放军渡江、南京政府的过渡等问题上已达成妥协。各人均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是日，代表团电告李宗仁称：目前只等中共方案提出，一旦中共提出方案，代表团讨论后，即派黄绍竑、屈武回南京，如同意方案，即与李宗仁等一同飞返北平签字。如不同意，亦请派于右任等来平。

△　何应钦电南京和谈代表团，转达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即：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提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

△　下午，南京和谈代表团开会讨论和谈指导委员会的五项决议中拒绝解放军渡江问题。张治中、章士钊等均认为此问题原则上已向中共承认，不好推翻。会议最后决定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在和平协定签订后能够暂缓过江。

△　南京民国政府加派于右任、居正、吴铁城以顾问名义赴北平协助和谈代表团。

△　昨日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邀请刘仲容再去北平，得到李宗仁的同意。是日，刘仲容由南京飞北平，向毛泽东报告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4月20日就要过江，希望李宗仁不要离开南京；如果李宗仁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对他以贵宾款待，仍可继续会谈。刘仲容即用电话向李宗仁报告。

△　何香凝由廖承志陪同到达北平。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邓颖超及民主人士沈钧儒、朱学范、柳亚子、刘清扬等前往车站迎接。

△　李宗仁特任居正为国史馆馆长。任命韩德勤、上官云相为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

4月13日　国共和谈正式举行。经过12天双方交换意见，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南京方面首席代表张治中。晚9时，双方代表于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就草案原则及各项条款内容作说明，指出首先必须分清是非，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对南京方面最不能接受的战犯问题，提出中共对一切战犯，不问任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以实际行动表示悔悟，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处理待遇。张治中发言表示，代表团诚意承认国民党方面的错误和失败，但协定中有些过于刺激的字句，望能酌加删节；战争责任问题希望不要作成条文，不宜在条文中规定南京政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机构。并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

△　李宗仁接到中共和谈代表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派甘介侯找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商，司徒雷登要李宗仁坚定立场，拒绝承诺，观察事态的发展。

△　行政院会议通过南北通航交换物资办法。规定由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组织统一调配委员会，管理与统筹调配通航船舶及运载物资种类、数量。

△　湖南岳阳中小学生为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举行示威游行，专员王翦波指使军警镇压，学生死二人，伤20余人，失踪六人。15日，长沙各校学生获悉岳阳“四一三”惨案真相，举行示威、请愿、罢课等活动声援。17日，长沙市学联在湖南大学召开会议，49所学校100余名代表参加，商定声援办法。18日，长沙全市大中学生罢课一天，并推代表向程潜请愿。程潜对此案很重视，于17日派警卫处长李肖白赴岳阳调查，并代表他向受伤学生慰劳，赔偿医疗费用。

4月14日　周恩来与张治中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意见。南京和谈代表就草案继续研究，提出修改意见40余条，除对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及联合政府两项有若干不同意见外，大多为词句方面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当晚，张治中将书面修正案交周恩来。

△　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令发解放太原攻城部署：以第二十兵团由城北大、小北门地区登城向城内发展，歼灭所属地区之敌；以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组成之左、右集团分由大东门南、北地区登城向城内发展，歼灭所属地区之敌；以第十九兵团及晋中军区由城南首义门东、西地区登城向城内发展，歼灭所属地区之敌。18日，命令所属部队：“决定提前于本（4）月20日5时开始攻击，各部即按原计划准时动作。”

△　李宗仁令：兼国际货币基金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徐堪呈请辞职照准，特派刘攻芸兼国际货币基金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派黄珍吾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任命徐景唐为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特派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白崇禧为华中军政长官。

△　监察院内政、财政两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立即运回由蒋介石命令移运至台湾、厦门的国库黄金、白银及外汇。

△　美国国会否决民主党议员麦卡伦提出的向中国政府提供15亿美元新援助，和由美国军官指挥国民党军作战的法案。同日，美国新闻处公布艾奇逊3月15日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函，艾奇逊在信中说："美国于现在情况之下，出以如此规模之援助殊属不智，贸然为之，后果之恶劣殆必不堪设想。"

△　人民解放军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奉命撤销，其卫戍警备事宜由人民解放军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负责。

△　解放区太行专署公安局破获阴谋爆炸黄河铁桥、焦作发电机、机车及组织散匪刺杀解放区军政人员的特务案一起，主犯何成功等七人全部落网。

△　联勤总部从广州中央银行提运银元11.5万元用飞机运往桂系势力范围之柳州、长沙、南昌等地发放军饷，被广东军方截回。后经李宗仁、何应钦与粤方余汉谋、薛岳电商，于17日同意将银元运出。

△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

△　著名报业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患肝硬化不治，于是日上午在沪寓逝世。

4月15日　　国共和谈举行第二次会议。晚7时，中共方面将《国内和平协定》定稿八条二十四款送交南京和谈代表团。晚9时，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对修正稿作说明，表明中共代表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都尽量采纳，就是在某些大问题上，应该求得妥协的，总尽量妥协，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等

问题，都作了重大让步，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过江接收地方政权两点，决不让步，并坦诚地阐述理由。正式告诉张治中，转告李宗仁、何应钦，于20日以前给予答复，如届时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只有过江”。张治中发表意见和感想，声明次日派人回南京请示答复。会后，南京代表团郑重研究，认为定稿已接受了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犯等问题中共作了让步，一致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只有毅然接受。并决定派黄绍竑、屈武携带文件次日回南京，劝告李、何接受。

△　李宗仁请美国政府发表某种声明，以延缓人民解放军渡江。

△　空军伞兵第三团全部，伞兵司令部及第一、第二团各一部共2500名官兵，奉命乘船开往福建途中，在第三团团长刘农畯、副团长姜健等率领下，于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开往苏北连云港加入人民解放军。5月18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刘农畯等全体起义官兵，勉励其努力学习，为建设人民伞兵而奋斗。

△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谷正纲、张道藩飞溪口谒蒋介石，请示党务改革问题。

△　布拉格15日消息：国际学联致电李宗仁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南京学生的暴行，要求惩办屠杀学生的凶手。

4月16日　南京和谈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携文件回南京。周恩来赶往西郊机场，面嘱黄、屈，请其明白告诉李宗仁、何应钦，希望他二人在修正案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下午2时多，黄、屈到达南京。李宗仁见隔江而治的目的未能达到，也担心批准协定使自己陷入困境，便在傅厚岗公馆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听取黄绍竑有关北平会谈的报告，并传阅和平条款。何应钦表示要将和平条款经行政院开会讨论才能答复。李不表示态度，把牌摊

给了何应钦。

△　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及第二、第三野战军，要求将渡江立足点放在和谈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保证22日一举渡江成功。

△　行政院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国桢、谷正纲、邓文仪为委员兼常务委员。陈良、周碞、张强、丁治盘、顾希平、滕杰、潘公展、方治、范争波、陆京士为委员，陈大庆为委员兼秘书长。

△　淞沪警备司令部制定镇压学生运动的《纲领草案》和《计划草案》。《纲领草案》规定学运工作的原则二条：一、“治本重于治标，主动重于被动，疏导重于制压，攻击重于防御”。二、“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以上海市党、政、军、警、宪各有关单位成立联合小组，各部门分别负责对“匪谍学生”的调查、监视、跟踪、逮捕、侦讯。《计划草案》则提出“俟本市进入非常状态时，对各学校之‘匪谍分子’作全面之肃清”。

△　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廖承志任主任，冯文彬、吴晗任副主任，黄华任秘书长。

△　南京政府派驻比利时大使金问泗为出席法国安尼茜市举行的国际关税会议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薛裕祺、杨树人、叶遇春、黄延德、汤理胜为代表。

△　立法院临时会议讨论财政金融改革草案审查修正案，予以修正通过。修正要点为：一、规定军中薪饷及副秣费以船版银元为发给标准。二、各省、市、县课征地方捐税须经各该省、市、县民意机关之通过。三、举办财产税。四、一切捐税除关税外按各地物价指数计算。五、黄金、白银、银元运入国境者，暂行免征进口税。外国币券超过美金1000元者，其超额部分存入中国银行，由存款人随时按照中央银行收兑外币价格售与中国银行。

△　重庆发生抢米风潮，仅是日一天，就有15起抢米骚动，数百石大米为饥民夺去。

4月17日　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派居正、吴铁城、朱家骅携黄绍竑带回之《国内和平协定》及和谈记录往溪口请示蒋介石。蒋认为“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他当即拟定三种对付方案：“（甲）提出具体相对条件复之；（乙）不提出对案，仅以不能接受其所提条件而愿先订停战协定，以表示和谈之诚意。如其在此和谈期间，进攻渡江，则其战争责任，应由‘共匪’负之；（丙）用党部名义驳斥其条件之前文与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其共产专制政府。”19日，居正等返回南京向李宗仁等报告。

△　总前委电呈中共中央军委，将原中、西两集团作战部署进行部分调整：以第三兵团直出徽州，沿浙赣路东进；第九兵团担任芜湖、南京的监视任务，而将主力置于南京以南地区。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　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两个兵团、六个独立师共计20万人左右，在一个炮兵师协助下猛攻太原。城东、城南两机场已为解放军猛烈炮火完全轰毁，城西机场亦在解放军炮火射程内。

△　空军第八大队杜道时和第二十大队机械员郝子仪驾驶C—47运输机一架起义，自台湾新竹机场飞抵郑州。

△　立法委员王丹岑对记者谈话，反对中央银行发行大钞。次日，中央银行抛出五万元面额之金圆券大钞。

4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和谈声明，重申必须以

该党中常会本月7日关于和谈“五项原则”的决议为依据。下午，李宗仁召黄绍竑、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程思远、邱昌渭等桂系人员会商，黄绍竑汇报北平和谈情况后，指出桂系别无出路，不像蒋介石有台湾。并说：“如果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同意签字这一协定，则将来可选为联合政府副主席，即广西的部队亦因此得到安全的保障。”白崇禧认为代表团未坚持政府基本立场，有负付托之重。反对签字，并提前离开会场。

△　南京和谈代表团再电李宗仁、何应钦，指出：“和谈至此阶段，万无游移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何“当机立断”，或“亲来北平一行”。

△　白崇禧访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谓李宗仁拟请蒋介石出国，交出所有权力及国家财富。

△　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于下午5时起向太原西南之吴永堡南北堰发起攻击，与阎锡山守军激战彻夜。同日，阎锡山部第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率师部和第三团向太原新城人民解放军投诚。

△　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占领扬中对面之永安洲。第三十四军向镇江对岸十二圩进攻。20日，十二圩解放。

△　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经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员教育争取，决心走起义道路，制定了配合解放大军渡江，就地起义的计划。是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以芜湖告急，命林遵率舰增援。林奉命到芜湖，会见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张要林遵率舰沿江巡逻，防止解放军渡江。林却通知各舰只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以外的安全地带作短程巡逻。

△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致科技人员号召书。指出无论目前和谈的结果怎样，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江南进军了，号召全上海一切科技工作者和学生、知识分子，协助解放军接收管理上海，迅速恢复与

发展上海的工业生产，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上海与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　湖南省主席程潜在省府举行的例行月会上讲话，公开表示走和平道路，他说："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是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勉励僚属："应该拿出良心来，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为民族留一线生机。"

△　法国政府限制中国出席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代表入境人数为八人。是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科学工作者协会等11个人民团体在北平集会，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筹委会主持人鲍烈尔举行记者招待会，严厉谴责法国政府的专横行为。

△　日本赔偿中国之机器781件中之一部分，由"琪美号"轮运沪。

4月19日　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商《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拒绝解放军渡江和由中共负责整编国民党军两项。对于联合政府等项，则提出修改意见。次日继续会商后，推定张群、吴忠信赴溪口，吴铁城、黄绍竑赴广州，分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

△　阎锡山由南京急电太原梁化之五人小组为之打气，声称："你们要努力支持一星期，我就一切都有办法。"

△　李宗仁任命林伯森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仍兼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4月20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同日，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通过给南京民国政府和谈代

表团训令。晚，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按照蒋介石的乙种方案，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电文通篇列举所谓不能接受之理由，声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论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风之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所能挽救。"仍希望"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

△　参谋总长顾祝同判断人民解放军将于本日夜间渡江，电令所属各部：一、决固守长江，"击灭任何地区渡犯之'匪'于水中"。二、"江防各部队应迅即自行调整部署，立刻集结兵力及各种轻重武器，直接配备于巩固'匪军'渡点之我岸（或沙洲）"。三、"陆、海、空军应准备夜战"。四、"海军舰艇应即配置于九江、安庆、裕口、西梁山、瓜洲、江阴各桥头堡内，随时准备果敢击毁来犯之'匪'船。华中方面之海军，应抽调于安庆附近，参加皖南之作战"。五、"空军亦不分昼夜，轮流对上列各渡口集结之'匪军'船只、炮兵等予以侦炸"。"华中方面之空军，除留极少数外，余向南京集中"。六、"长江南岸，沿京沪、京芜路各重要城市，应即严防暴动，并从速肃清'匪谍'"。

△　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总攻太原。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分由东、南、北三面向太原城发起攻击。第十八兵团两个师于昨日（19）晚21时起向阎家坟，郝庄以东阵地插入，至24时与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军取得联系，完全切断马庄地区阎军归路，割裂歼灭城外之敌；第二十兵团于本日晨2时起迅速沿汾河两岸插入新城及其以北地区，至4时占领新城，并控制汾河大桥，歼阎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一师全部及坚贞师、第三十九师各一部，俘第七十一师师长张忠，击毙第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阎军部署被完全打乱，仓忙将城东

北第三十军收缩城北。第十九兵团及晋中军区部队于本日晨5时由城南及汾河西发起攻击，切断汾河西阎军归路，至晚将其歼灭。同日下午6时，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于城东发起攻击，至21时逼近太原城下。

△　太原阎军第七十一师副师长尤世定、参谋长孟壁、团长冯文亮、副团长李景春率所属两个团在太原城北起义，后编入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同日，太原剪子港要塞司令官梁象恒、副司令官狄玉率保安第九团百余人起义。工兵第一团在营长朱以慰、连长刘子聪率领下在太原西山大井峪起义。第六十九军副师长王熙明争取所部第二〇五团团长唐志宽率第二〇五团、第二〇七团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　行政院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任命孙越崎兼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兆洪为副主任委员。

△　重庆警备司令部以本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决定21日举行联合大游行，宣布实行特别临时戒严，从是日午后6时起至21日午夜12时止。

4月21日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解放军渡江作战中集团（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于20日晚8时起，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舰艇和江防炮火的阻击，先行从荻港一带渡江，迅速占领太阳洲、黑沙洲、白马洲等几个江心洲。第二十五军、二十七军先遣队遂以这些江心洲为跳板，一面向南岸国民党军阵地猛烈炮击，一面乘船渡江。半小时接近南岸，国民党军第

八十八军发现解放军行将登岸，仓皇乱射，难以阻挡，加之解放军后续部队接踵急渡，在荻港一带多处登岸。至是日晨6时止，解放军28个团渡过长江，占领荻港附近诸高地，随即以主力向繁昌突进，一部向左席卷。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不断向汤恩伯告急，汤除责令张世希以驻芜湖之第二十军杨干才部堵击突破口外，急令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欠第九十九师）由汤山车运芜湖支援。同日上午，汤亲至芜湖视察，令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指挥第二十军、第九十九军挽回战局，并许诺升杨为兵团司令。待第九十九军甫抵芜湖时，解放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繁昌防线，并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第九十九军即沿芜杭公路往杭州撤逃。同时第八兵团之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各军也分别向歙县、祁门、浮梁夺路南逃。

△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东集团（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由江苏境内的江阴至扬中江段实施渡江。第二十军、二十三军一部分由三江营、口岸镇向扬中强渡长江；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等部在炽烈炮火掩护下分向江阴东、西一带横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逐次向无锡撤退。同日晚，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在预定地段顺利突破国民党军江防阵地，于次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

△　周恩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告知人民解放军已胜利渡江，劝张留北平，不再返南京而为国民党特务所加害。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指张学良）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随从人员经开会讨论，一致同意留下。

△　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英国军舰四艘，和国民党军军舰一起，在镇江、江阴段江面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双方炮战中，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英舰"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于镇江以东江中，其余三艘英舰逃走。

△　李宗仁、何应钦电召在平的南京和谈代表团返京。要求电告“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同日，和谈代表黄绍竑以“身体不适，为拟小作休息，不愿作任何政治活动”为由，向李宗仁、何应钦提出呈辞，并辞和谈代表职务，于上午9时自穗飞港养病。

△　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扫清太原城东铁路两侧阎军，城北占领工厂区，城南攻占面粉公司、民众市场，并分别向卧虎山、双塔寺逼近，城外阎军除残留该二据点外，已被全部肃清。太原前线司令部通告困守在太原城中的蒋阎官兵停止抵抗，投向人民。

△　行政院长何应钦电令各地方政府及治安机关，“加紧维持社会秩序与治安”，并要求各地重新公布戒严法，严厉执行。

△　李宗仁、何应钦召集各院、部会议，决定各部门疏散转移。总统府及国防部迁沪，行政院迁广州，其他院、会、部分批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由行政院准备交通工具。规定于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行动。

△　立法院表示一致支持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　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告同学书》，号召：“全上海同学组织起来，保护学校，保护自己，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逮捕及屠杀，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同日，上海职业界协会，上海教育界协会、民主军警联合会、保警同仁会等民众团体均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拥护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号召全体同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配合解放军解放大上海。

△　重庆各大专院校学生数百人于上午10时列队游行。同日，成都宣布戒严，大肆拘捕所谓嫌疑分子，教员和学生遭捕者17名。

△　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重划东北行政区为六省四直辖市，并任

命各省政府主席、副主席。辽东省：由原辽宁、安东省合并，省府设安东市，张学思任主席，杜者蘅为副主席；辽西省：由原辽北、辽西省合并，省府设锦州市，代理主席杨易辰，副主席仇友文；吉林省：省府设吉林市，主席周保中，副主席周持衡；黑龙江省：由原黑龙江省、嫩江省合并，省府设齐齐哈尔市，主席于毅夫，副主席杨英杰、王梓木；淞江省：由原合江、松江省合并，省府设哈尔滨市，主席冯仲云，副主席李范五、李延禄；热河省：省府设承德市，主席罗成德，副主席阎顾行、杨雨民。直辖市：沈阳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

△　广西大学校长陈剑修辞职，由盘珠祁继任。

4月22日　人民解放军东集团渡江部队于是日凌晨击退从常州、丹阳等地来援之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等部的反扑。第二十军五个团登陆扬中，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一部；第二十三军控制上三圩至利港段，并于午时攻克百丈镇、桥墅，歼国民党军第八师一部，俘千余人，同时击溃其第一九八师和第二九一师的反扑；第二十八军亦于午时攻占申港、舜歌山，歼国民党军第二三〇师大部及第一四六师第四三六团一部，继续向宜兴挺进，并以一部控制戚墅堰，第二十九军占领江阴要塞，并分割歼灭国民党军第一四五师一个团的大部，继续向无锡挺进；第三十一军主力渡过长江。第十兵团指挥所进驻申港。

△　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游击炮团团长王德容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的争取教育下，秘密加入共产党，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是日为配合解放大军渡江，率要塞官兵7000余人宣告起义，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并对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及第二十一军阵地进行有力炮击，给予企图反扑的第二十一军毁灭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渡江。汤恩伯一面责令第五十四军星夜反击，同时令栖霞山之第九十九师速开上海。第五十四军派出三个团出击，被解放军包围。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不敢继续反击，改取守势掩护撤退。同日，泊于江阴附近江面的海军“逸仙号”等三艘军舰，在唐秉琳等的劝导下投诚。

△ 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群、汤恩伯等在笕桥航校会商对付时局办法。蒋问李宗仁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答以“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以解放军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拒绝。李表示和谈使命既终，要求卸职。蒋鼓励其“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旋在蒋的主持下决定：一、宣告和谈破裂，对中共坚决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二、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四、加强国民党内团结及党与政府的联系。同时决定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重大决策，先提交该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

△ 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撤迁广州，总统府迁往上海。撤迁前发表文告，声称坚决与中共作战到底。并正式通知在南京之各国外交使团迅即撤往广州。

△ 林伯渠、李立三分别与南京和谈代表章士钊、刘斐谈话。林伯渠向章士钊说明中共谋和诚意不因解放军过江而有所改变，并深信此举能协助李代总统，使得排除反动派，贯彻已所默认之和平主张。极望李不为反动派所胁走，仍坐镇南京，当机立断，电知代表团在平签字，随即商讨各项技术问题。李立三向刘斐亦表示相同意旨。同日，南京和谈代表团将谈话内容电告李宗仁，但此时蒋介石已直接出面干预，李宗仁已失良机。

△ 汤恩伯鉴于江防全线被人民解放军突破，是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江阴要塞以东的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沿铁路及公路径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的第五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经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向上海撤退。驻镇江之第四军及首都卫戍司令部所属之第四十五军，统归张耀明指挥，沿京杭国道撤往杭州。首都卫戍司令部改为第七兵团。第二十八军掩护南京部队撤退

后，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

△　首都卫戍总部下午接汤恩伯全线撤退的命令，立即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撤退部署。会上有人提出由第二十八军工兵营于撤退时破坏下关火车站及码头。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坚决反对，经反复争论，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同意覃异之的主张，并与覃共商撤退后维持南京社会秩序办法，决定由南京各界联合组织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由马青苑负责主持，并留下一个营组成纠察队保护水电厂及维持市区秩序。次日，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由马青苑任主任委员，吴贻芳任副主任委员，并致电毛泽东主席，恳请电饬金陵外围人民解放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毛泽东接电后，即由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并令邓小平、陈毅"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

△　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紧急政治命令：对不顾解放军多次劝告，拒绝放下武器，并威逼其广大官兵作绝望抵抗之蒋阎军首要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岩田等缉拿归案，依法严惩。

△　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各一部于上午分别攻克城东北卧虎山及城东南双塔寺阎军两孤立支撑点，至此城外四郊全部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在两天战斗中，全歼阎军12个步兵师，击毙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俘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增、第四十师师长许森、第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第六十八师师长武世权、第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工兵师师长王同海、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等以下官兵三万余人（内有铁血师及其他六个整营于战斗中投降），毙第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以下官兵4000余人。

△　阎锡山以电话训示梁化之在太原顽抗。梁报告所有应处理事项即行完毕，表示誓遵"不做俘虏，尸体亦不与敌人相见"的昭示。阎即命转告全体文武官员："成功是国家人民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

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唯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

△　李宗仁令：国防部部长徐永昌着专任陆军大学校长，特任何应钦兼国防部部长，指挥全国陆、海、空军。国防部参谋长改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

△　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召集军政领导人及民主人士联席会议，以和谈破裂，湖南怎么办为中心议题，试探各方意向。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见绥署参谋长刘嘉树、高参杨继荣等主战派人物均在座，便表示说：“我们要服从政府，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崇禧）长官领导之下作战到底，不能再有其他企图。”程潜大惑不解，一些主张和平的人士也大为失望，会议草草而散。次日，陈明仁回醴陵老家，程潜委托第一兵团高参李君九、经理处主任温汰沫等人到醴陵询问究竟，陈明仁表示跟程潜走和平道路的意愿不会改变。

△　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言人张泰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沪市即日起进入战时状态，每天提早一小时宵禁，全市实施全面军管制，颁布沪市紧急治安条例八条。同日，杭州城防指挥部宣布特别戒严。

△　上海工人协会宣言，号召工人发扬光荣斗争传统，“担负起中国革命历史所给予的光荣的斗争任务”，迎接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大上海。25日，上海市文化工作者协会发《告文化界同仁书》，号召上海文化工作者同仁，“再以最大的努力来作上海人民的号角”，迎接上海的解放。

△　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发表谈话，略谓：“现在重要之事实，则为中国政府已拒绝投降，此非仅四万万人民之命运所系，即全世界之命运，恐亦随之决定。”次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他仍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　杨森手令重庆市教育局解散重庆市第一中学，派教育局长罗

象翥、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率警前往执行。

△　湖南省参议会、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联衔召集湖南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等11团体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通过该会组织章程。章程提出：“本会以代表全省人民意愿，发挥人民力量，达成湖南免于战祸、保全地方元气为宗旨。”并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民大团结等主张和口号。决定邀请唐生智担任该会主任委员。中共湖南省工委认为利用唐生智的声望，壮大和平运动，促使程潜、陈明仁下定起义决心非常必要，遂通过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以省人民团体名义往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29日，唐生智到长沙，程潜亲自往车站迎接。

△　意大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冯雅德和外交部代理部务叶公超签订中意友好条约。

4月23日　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经浦口渡江，南京和平解放。

△　解放军渡江作战东集团主力解放常州，切断了沪宁铁路。中集团一部占领芜湖、青阳县城，芜湖保安队千余人投降，主力渡过青弋江，并在湾址地区歼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大部和第九十九军一部。西集团乘胜攻占贵池，于至德、贵池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一个团等部，俘3000余人。

△　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于下午3时15分率“惠安”、“永绥”、“安东”、“江犀”、“楚同”、“联光”、“太原”、“吉安”、“美盛”等9艘军舰和16艘炮艇在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起义。是晚，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联络部长张普生抵笆斗山与林遵会面，接见各起义舰、队长，向第二舰队全体起义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

△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立法、监察委员114人在广州开会，一致决议电请蒋介石、李宗仁来穗，继续领导国民党，顽抗到底。

△　何应钦偕桂永清等由南京迁到上海，召集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等举行军事会议，研究集中国民党军兵力，防守上海的各项部署。何在沪发表书面谈话，诡称："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之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宜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策源地，为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自由，继续奋斗。"

△　总前委根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退却的情况，调整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八兵团部率两个军执行南京、镇江的警备任务，以第十兵团一个军东进苏州，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聚歼南京地区甫撤之国民党军。

△　晨3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令江防各部队撤退。第一绥靖区向上海；首都卫戍部队向钱塘江以南，桐庐以东；第七兵团向富春江以南、遂安以东；第十七兵团向婺源、开化；第八兵团向皖赣边境；第九编练司令部部队向浦城、龙泉之线撤退。其第一绥靖区在镇江以东之第一二三军、二十一军、五十一军残部依次在常熟、无锡、宜兴掩护后，与第五十四军及第九十九师共同撤至上海。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文教委员会致函上海各广播电台，对沪市各电台近期播出的《日出》、《雷雨》、《原野》横加指责，认为："该剧反动色彩甚浓，如鼓动工潮、阶级斗争等均多穿插，希即予禁播。"并称："嗣后各电台广播剧本之采用，应送由本会审查核定之后始准播送。"

△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撤销和谈指导委员会。

△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

伦、谭平山、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陈其尤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竭诚拥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支持人民解放军迅速彻底消灭一切负隅顽抗的敌人，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

△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宣布：派重巡洋舰“圣保罗号”和轻巡洋舰“孟彻斯特号”载美海军陆战队第七大队官兵700人，定本月30日由珍珠港开赴上海，接替现驻黄浦江之第三陆战队。

△　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新编第七师副师长张少武率一个团在南京郊外汤山起义。”

△　据守靖江八圩港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两个团向解放军投诚。

△　李宗仁于上午9时乘“追云号”飞机离南京飞桂林。决定派程思远等分头去汉口、广州，与白崇禧、张发奎及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代办克拉克洽商。李在桂林机场下机时，对前来迎接的人表示：决不糜烂广西，绝不去广州。

△　重庆警备司令部下令重庆各校统于本月27日以前一律复教、复课；彻底取消各校组织的重庆学生争取生存联合会、“四一”血案救援会等一切组织；即日起根绝各种宣传品，并限各校长于一周内秘密呈报“鼓动学潮之阴谋分子”名单。以上各项如有不遵者，“本部即依戒严法处置”。

4月24日　　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向城垣发起总攻，晨5时30分以1300门大炮轰击城垣，第二十、第十九、第十八兵团等部相继于6时10分至7时40分之间，从东、南、西、北四面12个突破口登城突入城内，将蒋阎守军分割围歼。至上午10时，全部战斗结束，全歼太原绥靖公署第十、第十五兵团司令部，第三十、三十三，三十四、六十一军军部，及第三十九、四十九、六十九、七十、八十三师、亲训师、

铁军基干师、坚贞师、铁血师、神勇师、迫炮师等全部，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玲、十兵团副司令孙福麟、温怀光、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第三十三军军长韩步洲、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第四十三军副军长兼迫炮师师长贾毓芝、第六十一军副军长娄福生、第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第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工兵司令程继忠、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岩田（日人）等以下官兵四万余人，毙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等以下官兵7000余人。自4月20日至本日共俘9.7万余人，毙伤3.3万余人，投诚5300余人，总计13.5万余人。

△　山西省代主席、特务头子梁化之和阎锡山之五妹、省妇女会理事长阎慧卿，在绥署东花园自杀身死。太原市警察局长师则程在柳巷派出所先枪杀其日本小妾后也自杀。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徐瑞和首要分子岚风，自知难逃法网，为表示对蒋阎的效忠，将一批特务分子集中在指挥处大楼内，是日黎明解放军攻入城内时，徐瑞命武装科长李子云把守楼门，徐一声令下集体自杀，徐首先自戕，其他人有的开枪自击，有的跳窗逃跑。李子云先用冲锋枪扫射，然后纵火自焚。同时，山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尹遵党等百余人在八旗会馆先举火焚楼，旋集体自杀。

△　太原前线司令部发布布告，宣布保护人民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确保城市治安等约法八章。同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徐向前，副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发布《太原暂时实行军事管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部队及其机关人员入城守则》等文告。太原市卫戍司令部亦于同日成立，司令员萧文玖，政治委员赖若愚。

△　东路渡江之解放军部队解放镇江、丹阳、武进、无锡、句容等县城。越京沪路南进的解放军连克宜兴、金坛，切断宁杭国道。由芜湖向东南追击的部队解放宣城。另部解放当涂县。

△　李宗仁自桂林分电于右任、童冠贤、居正，促请即日赴穗。25日，于右任、孙越崎同机自沪飞穗。26日，童冠贤、阎锡山亦由沪飞穗。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发布命令，确定淞沪地区守备部署，以当时驻淞沪的第五十二、七十五、三十七等三个军区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守备兵团，分任沪西北区（浦西、铁路北）、沪西南区（浦西、铁路南）及浦东区之守备。另以驻在市区之交警、保警、宪兵统一编组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着三五三师师长欧孝全统一指挥三五三师、宪兵第九团、吴淞要塞守备总队、交警第二总队、保警第一、第二两总队、装甲兵第四营，担任上海市中心区（木城内及黄浦江以西区域）之警备。"各该部除"担任各学校、工厂、仓库、公共事业、木城、桥梁、码头加强警备，确实控制外，并对市内各要点、坚固建筑物制高点，速即分别派兵占领，严加守备"。

△　淞沪警备司令部颁发《广播电台管制办法》，规定："各广播电台节目未经本部核准者，一律不准播送，如有违背，立即查封"；"各台广播节目内容如有反动，或足以影响治安之言论，一经查实，按照戒严法从严惩办。"

△　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全体官兵5300余人，在太平、绩溪、休宁等驻地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并占领旌德县城，解决了地方团队百余人。

4月25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

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蒋介石于下午乘汽车离溪口，至象山港登“太康”舰赴沪，督导上海保卫战。

△　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第一八六次会议，出席者有何应钦、王宠惠等数十人，孙科主席。经讨论决定：一、和谈指导委员会任务终了，应即撤销。二、推派李文范、吴铁城两委员赴桂林促请代总统李宗仁早日来广州。

△　西路渡江解放军于贵池、东流间，歼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七四师两个团，第二三六师一个团及安徽保安团两个突击大队等部，俘5000余人。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共军刻对京沪发动总攻，本部为维护淞沪治安”，“对潜伏淞沪共党分子及蓄意破坏治安人员，决予集中管理”，令所属军、警、宪对震旦大学等14院校所谓“共党嫌疑分子”实行大逮捕，是晚9时开始行动，至次日晨结束，先后拘捕学生356人，羁押于建国西路达仁中学内。30日起进行审讯，虽经“派员或亲访各方，征集有关各生匪嫌罪证资料及平时行为记录，终难获得”，于5月21日、22日先后将未经提名而逮捕之学生190人交保开释。

△　上海市警察局训令各单位转发汤恩伯所颁战令11条：一、“为救世救人、自救救国而战”。二、“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生活自由而战”。三、“确守淞沪复兴基地是我们的神圣任务”。四、“发挥铁的意志、正义的力量粉碎暴力”。五、坚决完成任务，放弃阵地者处

死。六、确实掌握部队，混乱作战秩序者处死。七、确守战斗岗位，擅离职守者处死。八、随时保证行动之迅速准确，迟疑畏缩者处死。九、确守爱民军纪，扰害人民者处死。十、绝对服从命令，自由行动者处死。十一、忠党爱国坚定信心，造谣惑众者处死。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以所谓造谣惑众罪名枪决颜佩福、刘金山二人。

△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发布通令：一、所有违反国家及人民利益，妨害社会秩序之言论行为，必须予以取缔。二、一切妨害生产，浪费物资及垄断兼并者，必须予以制裁。三、一切树植非法武力，扰害地方，或潜伏城市、乡村之各种组织，必须予以清除。

△　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八兵团第二十三军解放溧阳，第九兵团由芜湖南进解放泾县。

4月26日　蒋介石到达上海复兴岛，即召见徐永昌、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石觉、陈大庆等陆、海、空高级将领及保密局长毛人凤、上海市长陈良等，听取上海防务报告，并指示方略。按照蒋的旨意，以原驻淞沪部队及预定从沿江撤退上海的部队，确定淞沪防务部署为：以第一二三军、第五十一军及暂编第八师守备南翔、华漕、七宝、川沙等外围据点；以第二〇四军守崇明；第五十二、五十四、七十五、三十七、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守备宝山、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虹桥、龙华、高桥、洋泾等主要阵地；第二十一、第九十九两军及交警总队控制市区重大建筑，构筑强固工事，组成核心阵地。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在沪成立。上午举行第一次会议，汤恩伯主持，谷正纲、潘公展、方治、邓文仪、陈良等出席，会议决定成立粮食、交通、公用、文教、经济等委员会及中央银行贷款审核委员会。由警备司令部成立新闻检查处，确定新闻检查标准：

一、不得有违反反共自卫战争之言论。二、不得破坏政府法令。三、不得有影响治安及社会秩序之言论。四、不得造谣惑众。五、不得为“共匪”张目宣传。六、不得有破坏军民合作之言论。

△ 淞沪警备司令部为检查入境旅客训令各检查站所，规定：一、凡由外埠来沪旅客，于启程地点一律应凭身份证购票，否则于到埠后，勒令乘原车船或飞机离境。二、持有“匪军”占领地区各省、市、县政府所发之身份证，不准入境。三、过境“难民”不准进入市区。四、苏北、华北旅客、“难民”及归俘官兵，一律不准入境。五、入境旅客绝对禁止私携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

△ 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解放皖南广德县城，并在宜兴附近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两个团。

△ 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并说这是得到民国政府的许可。同日，英国保守党头子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侵犯人民解放军的英舰是所谓“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

4月27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我们今日只有在一个政府之下，以对共的态度，为忠奸试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并谓：“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 行政院在穗举行第五十六次会议，何应钦主持，通过议案：一、撤销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二、对中共区邮电、汇兑一律停止。

△ 沿京沪路东进之人民解放军三野第二十九军解放苏州、长兴、吴兴。第二十五军解放郎溪，与苏浙皖游击队一部会师。三野另一部越沪宁铁路于句容、源阳公路歼南逃之国民党军2600余人。

△　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于25日擅自派兵进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是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等，指出“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要求将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并说：“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代电上海市政府，要求“各机关社团于文到三日内，应即再举行一次肃奸总清查，各就平日所得侦查记录，除罪嫌显着即予逮捕侦讯外，倘其言行有可疑者，亟须加紧侦察监视，务期肃清内部，以策安全”。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决定：“在军事区域以内之大学，如复旦、交通、同济、大夏、暨南等校，应限令提前放假，以便驻军。”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令该部政工处执行，并开列光华、复旦等15所大专院校为第一阶段疏散院校，统限于本月30日以前彻底疏散完毕，其迁移事宜，“统由上海市警察局严格督导办理，如有借故迟延，即予强制执行”。

△　广州西湖路真善美印刷厂因出版《真善美》期刊，抨击国民党当局，遭广州警备司令部搜查并下令封闭。经理徐国屿被拘捕。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等：“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

△　中华全国总工会等16个人民团体通电抗议英国军舰在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

4月28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伯承等并告中原局，指出“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由于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对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

仍不割断，前线部队仍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国民党员“救国护党”，“一致团结于本党中央领导之下，为保国保民而努力”。

△　在南京芭斗山江面起义的原海防第二舰队25艘舰艇于27日驶抵下关。是日上午9时45分，空军轰炸机六架，飞临南京江面上空，对起义舰艇狂轰滥炸。各舰均组织火力反击。“惠安”、“楚同”两舰被炸沉，两舰起义官兵英勇牺牲。当晚，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部通知各舰舍舰保人，各舰官兵全部离舰。30日，空军又炸沉“吉安”、“永绥”两舰，5月4日炸沉“太原”舰。拒绝参加起义之“永嘉”等四舰逃往上海外，其余八艘同遭轰炸。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以上海进入战时状态，发布布告两份，其一为规定沪市市区进出限制办法，规定：一、自4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其二为颁布紧急治安条例，规定：一、自即日起，本市进入战时状态。二、自即日起，本市宵禁时间提早二小时（自晚间10时起至翌晨5时30分止）。三、自即日起本市实施军事管制。四、特颁布上海市紧急治安条例八条：（一）造谣惑众者处死刑。（二）集中暴动者处死刑。（三）罢工怠工者处死刑。（四）鼓动学潮者处死刑。（五）窃盗抢劫者处死刑。（六）扰乱金融者处死刑。（七）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八）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

△　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分别按照军事、行政、财政经济、公安、文化教育、交通、国营企业等系统派出军代表，陆续接管国民党在南京的各级统治机构。

△　由上海到广州之新闻记者丁中江、陆铿创办之《天地新闻日报》，是日在头版全文刊载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命令，发行人陆铿、总编辑董品超被广州警备司令部逮捕，该报被勒令停刊。次日，广州《当代日报》因谴责国民党当局拒绝和平协定，遭广州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七天。

4月29日　人民解放军渡江各军追歼由南京、镇江、芜湖等地向南撤退之国民党军。在苏州、长兴、广德、泾县、彭泽之线以北地区内，自22日以来，已歼国民党军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六十、八十八、九十九等八个军全部及第三十军大部，第四十六、五十四、九十六军各一部，生俘国民党军八万余人。聚歼战役结束。

△　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解放皖南歙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八二师两个团、第二二师一个团、保安旅一个团，生俘第二八二师师长郭奉先以下官兵6400余人。同日，向江西东部挺进之二野第十三军解放乐平县城和景德镇。

△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告国民党各机关及保甲人员书》，指出解放军已迫近上海的形势，应该作一次最后的抉择，不要再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命令，不再压迫人民，不再做迫害民主人士的帮凶，保护自己所属机关的产业、资财、文件、帐册、档案，准备完整地、有秩序地移交给解放军。

4月30日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之化名为英国军舰的暴行发表声明，要求英、美、法三国在中国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以及要武力报复的恫吓。

△　起义海军将领林遵领衔全体起义官兵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

司令发致敬电。愤怒谴责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战争，以及对起义官兵惨无人道的轮番轰炸，表示今后“誓愿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领导之下，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进军命令，为彻底推翻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

△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大使衔代办克拉克到桂林与李宗仁会谈。克拉克表示只要李能继续在华南、西南组织抵抗，美国就有可能在“未受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对坚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并称“美国政府今后不再援蒋”，希望李尽快赴穗，“在广州组织一个与蒋氏截然分开的政府，否则不易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并表示：“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示意李依靠“第三势力”。

△　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党员书，称中共向政府提出《国内和平协定》八条24款，如果接受，则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从此消灭，当此党国危难之时，当各尽其在我，吾党应有自信，不必有丝毫之气馁。

△　蒋纬国自台湾到上海，向蒋介石报告台湾情况。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一篇题为《反对中国共产党赤化中国，扰乱世界和平》的文章，文中诬蔑中共为“赤色国际第五纵队，从建党起即受外国津贴”等语。

△　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马超俊，以纪念五一劳动节为名，发表《纪念五一与当前任务》一文，攻击中共“用极权主义的铁腕，剥夺人民自由主权”，并以保卫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名义，鼓吹组织自卫军。

△　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与外交部代理部务叶公超互换《关于修订航空临时办法》之换文（即无限期延展此办法之换文）。

是月　　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创作人员陈白尘、沈浮、郑君里、赵

丹、徐韬、王林谷等为记下蒋家王朝崩溃时的罪恶史，由陈白尘执笔，集体创作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并于本月投入拍摄，尽管在送审本中删掉一些场景和对话，还是被国民党当局察觉。下旬，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该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令其停拍。

△　成都四川大学教授、福州中学教员、桂林广西大学教授、江西南昌各省立中学教职员相继罢教，要求调整待遇，改善生活；贵阳医学院和贵阳师院学生，举行反饥饿示威游行。

5月

5月1日　　山西大同和平解放。大同于上年12月24日被晋绥、晋察冀人民解放军包围后，华北军区敌工部派科长叶修直，率原阎锡山部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隰县专员孙海丞、少将参谋长张西柱、第十九军副参谋长李又唐、第六十师师长秦炯等到雁北配合雁北地委城联部部长杜钰开展对大同国民党守军的争取工作。在北平的原国民党人员刘仪亭、王达之和阎锡山部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兼大同守备指挥部指挥于镇河之子于润仓、镇北专员孟祥祉之弟孟祥祚携带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的信件到大同争取，上月25日、26日，大同守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田尚志、副师长王元令出城与解放军进行谈判，草拟和平解放大同方案。是日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率所部一万余人开出城外，听候改编。至此，山西全境宣告解放。

△　中共中央致电二野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三野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两大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其他各野战军地方军及各游击队，全国工、农、商、学各界同胞，热烈祝贺南京解放。指出：“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勉其“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

斗”。

△　中共中央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及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山西及华北各省全体军民同胞，热烈祝贺太原解放。同日，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部队举行入城式。

△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起义海军将领林遵任第一副司令员。

△　人民解放军南京市警备司令部成立，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

△　行政院第五十七次会议议决：准上海市长吴国桢辞职，任命陈良为上海市长。

△　桂林绥靖公署成立，李品仙任主任，黄旭初、莫树杰兼副主任。

△　逃粤之“国代联谊会”分电蒋介石、李宗仁，请即来穗“主持国政”，电称：“国事不可无一人主持，务请两公即日命驾莅穗，共议大计。”

△　广州《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应该痛自反省了》的社论，指出国军军事的失败，“是二十余年来政治的必至结果”。

△　台湾进行户口总检查，自是日零时开始，午时结束。陈诚宣称此举“在于分别良莠，使奸犯无法逃匿”。

△　武汉《汉口商报》、《建国晚服》因经费问题停刊。《新世界》、《明道》、《小春秋》则轮流出版。

△　云南大学教授会为生活所迫，迭电各方呼吁无结果，是日全体罢教。

5月2日　　广州国民党中央推阎锡山、李文范、居正三人随白崇禧自广州飞桂林，敦促李宗仁赴穗。阎等力劝李宗仁“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李以蒋介石幕后不放手，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表示“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阎等告知来桂林前已得到蒋的保证，说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望李继续支撑残局。

△　下午3时，湖南省参议会、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召开扩大的湖南自救座谈会，各界代表120余人参加。唐生智即席发表演说，略谓：“现在湖南人应该站起来了，在目前情形之下，不必多说，除了团结自救，没有第二个办法。”“湖南人为救命而团结，才可对得起革命先烈不死的精神。”表示“本人一定以全副之精神拥护各位完成这一使命”。接着由唐伯球宣读组织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的提案，获大会一致通过，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由唐生智任主任委员，陈渠珍（一直未到职）、仇鳌为副主任委员，刘公武任总干事。7日，益阳县参议会、长沙市参议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致电“自救会”或唐生智，表示拥护，誓为后盾。

△　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报告山西溃败经过，检讨错误所在与个人对时局之意见，承认政府军事上“犯战略上的错误”等六点失败原因。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命令，派交警总局长马志超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官，该兵团归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指挥。是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增派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副指挥官，并饬令所属，将上海市区守备区域重行调整，划分为五个守备分区，规定各守备分区之任务及交接事项。

△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二军解放皖南绩溪县城，国民党军2000余人投诚。二野第十八军解放赣东婺源，歼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一部及皖保二团全部，活捉第一四一师参谋长及团长以下官兵2400余人，毙伤600余人。另部解放浙西淳安县城，于该城西北歼国民党军第十

一军一个营，缴汽车150辆。同日，二野第四兵团解放赣南鄱阳县城。另部于乐平以南歼溃逃之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大部与第四十六军一部，生俘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师长张勋亭、第四十六军第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以下4000余人。

△　由南京逃到杭州的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带领残余部队（改称第七兵团）和杭州警备司令兼浙江省主席周碞一道，经宁波逃往定海。

△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由沪到穗，宣告中央银行总行即日起在穗办公，上海中央银行改为分行。同日，中央银行推出面额10万元金圆券大钞1000亿元，引起物价狂涨。

5月3日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电示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指出杭州城内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在此情况下，似可不即去占领。上海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十天内如汤恩伯由海上退走，则去占领；如汤不走，则准备工作时间延至半个月或一个月。同日，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已进驻杭州。

△　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海南军政长官陈济棠衔蒋介石之命到桂林劝李宗仁到穗，向李转告说，蒋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决不再在幕后操纵。旋由朱、陈与阎锡山、居正、李文范共同磋商，拟定六条方案，由阎面请蒋作确切保证，为李重主中枢的先决条件。六条方案的内容为：一、国防部应有完整指挥权，蒋不得在幕后指挥。二、官吏任免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宪法执行，蒋不得幕后干预。三、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门监督。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四、各级政府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广州之政府机关，率先奉行。五、国民党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六、希望蒋介石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　监察院在广州举行第五十次会议，出席委员刘哲等45人，于右任主席，会议讨论今后工作重点放于督促政府全面改革，并通过以全体监委名义电促李宗仁赴穗主政。

△　台湾省政府警务处设立刑警总队。

△　台北《中央日报》刊登题为《台湾负担不起》一文，对于最近由京沪撤退到台之一批国民党官员加以抨击，称之为“政治垃圾”，并提议除直接与台省政有关者外，对赴台省官员不予招待。

△　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以纪念“五四”为名，发表《五四运动的认识》一文，扬言要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作彻底的反击。

△　财政部长刘攻芸于下午3时至中央银行召集有关金融负责人会议，商讨改革币制，即发行银圆券问题。迄5时许，复返财政部召开该部各负责人会议，讨论财金再度改革即发行银圆券之技术问题。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发布紧急公告，宣布中央银行发行之定额本票视同现钞，不得拒绝接受，或贴水、折价，违者按扰乱金融治罪。自5月5日起，除中央银行外，其他任何金融机构一律不得发行本票。

△　台湾银行公布，自是日起，台币对金圆券汇率，改为台币一元兑金圆券100元。26日，台币对金圆券兑换率改为1：1000。27日，台湾银行又宣布调整为台币一元兑金圆券2000元。24天内，金圆券与台币相较，竟贬值20倍之多。

5月4日　　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11日闭幕。出席会议代表480人。朱德、叶剑英等先后莅会致词。周恩来作《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会章》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青年运

动与今后中国青年的基本任务》，选举廖承志、钱俊瑞等87人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和22名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宣告成立。

△　行政院政务会议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留平未返，不能回任所行使职务，予以免职，派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另决定自5月份起，文武公务员待遇一律改用关元计算，并予以保值折发金圆券。

△　人民解放军西集团第四兵团于昨日至本日在赣东连克浙赣路上之横峰、弋阳、贵溪、上饶四城，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副军长王振声率所部第八十一师3000余人投诚。另部歼京沪杭护路指挥所2000余人。

△　第三野战军陈毅部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及三十一军四个军集结于上海半圆形外围。7日，陈毅将指挥部设于苏州。

△　西北胡宗南集团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上月26日决定放弃蒲城、铜川据点，撤至泾河、渭河南岸。是日，又决定放弃三原、高陵、泾阳，将主力撤过泾河，以十多个军的兵力收缩控制西安、临漳、咸阳、武功、凤翔以及川陕鄂边区。

5月5日　　蒋介石在复兴岛召集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训话。汤恩伯在会上报告战备情况说：大战在即，一切作战准备，必须昼夜兼行，克日完成。全部军眷和重患，即送普陀、定海集中。守备部队应能随时进入阵地，投入战斗，机动兵团应能随时出动；各特种兵应完成对各守备区的支援准备。汤吹嘘说：共军“虽在兵力、炮火上略居优势，但我有优势的坦克、飞机、兵舰，凭借坚固的既设阵地，只要各军、兵种和友邻间密切协同，团结奋战，定能达成固守上海之任务”。当时麇集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包括从长江防线撤退下来的各军残部，以及交警、保警在内，共约九个军、28个师，连同空军、特种兵，号称30万人，实际约25.6万人，共编为四个兵团，其部署是：

以第二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七十五、一二三军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一部，守备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外围之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其中第二十一、五十二军及吴淞要塞为第一兵团，归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指挥，守备狮子林、月浦、杨行、刘行、江湾、大场地区，确保吴淞；第五十四、七十五军及第九十五师为第二兵团，归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守备南翔、真如、虹桥、漕河泾、龙华一带；第一二三军附暂八师占领太仓、昆山、青浦、金山卫一带，担任搜索和警戒；另以第五十一军配置于川沙地区及南汇、奉贤，守备前进阵地。以第十二、第三十七军共五个师编为第三兵团，归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指挥，守备黄浦江以东地区。另设市区守备兵团，由交警总局长马志超指挥。其守备重点置于浦西市郊之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之高行、高桥，借以屏障吴淞和市区，以保出海通路。

△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其对解决经济任务提供帮助。谓："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　行政院长何应钦密电汤恩伯、陈良等，加紧抢运各中央机关存沪物资。种类包括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棉纱；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日本赔偿的铜元；中央银行所存德孚颜料；中央造币厂之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交通部之通讯器材及铁道材料；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他贵重物资；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卫生部200吨药品及吉普车；社会部救济物资500余吨，布16万匹；善后保管会之重要物资等。抢运地点"以台湾为原则，必要时则改运广州，惟外销物资可径运香港"。要求负责抢运之各机关"负责保持绝对机密"，限本月底以前全部抢运完毕。

△　青海马步芳与甘肃马鸿逵在甘、青交界地享堂会晤。马鸿逵主动表白说："甘、宁、青原属一家，彼此非亲即故，关系很深。目

前家乡之事，我们不管，让谁来管。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敌，保卫西北”，推拥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则许诺上任后再推举马鸿逵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彼此达成默契。

△　人民解放军三野第七兵团30日起向沪杭甬路前进，连续解放安吉、孝丰、武康、德清、余杭、桐乡等城，于是日渡过钱塘江，解放萧山县城。同日二野第五兵团解放赣东的铅山、东乡、玉山三城，击败国民党军夏威兵团。

△　驻豫北新乡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等部二万余人，向解放军投诚，开出城外，听候改编。新乡解放。

△　英国政府宣布不卷入中国内战，但声明：“凡对香港的任何攻击，将视作一种侵略行为。”同时，英国远东陆海空三军司令部与香港地方当局正式成立了防务委员会。次日，英国政府宣布派喷气式战斗机一队、巡洋舰一艘“增防”香港。

△　中央银行开始发行面额50万元金圆券大钞。

5月6日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粟裕、张震，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国民党军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

△　白崇禧自汉口飞桂林到长沙停留，晤程潜、唐生智。白强调反对北平方式之局部和平，谓局部和平为“个别宰割”。傅作义的局部和平“就是缴械”，暗示不能容忍湖南的和平运动，并提议湘、鄂、桂三省联防和加强“戡乱部署”。

△　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命令所属各部，对于“市区内在军事上有价值之坚固高楼大厦，不论属于何人之产业，着即派兵确实占领，并构筑工事”。并限三日内绘具要图报备。

△　立法院第三会期第十七次会议在穗举行，出席委员192人，童冠贤主席，讨论挽救目前财政危机问题，主张征用豪富金银，充作战费。

△　人民解放军对华北国民党军最后孤立据点安阳发起进攻，经两小时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之第四十三师郭清、王祝三等部1.4万余人，至此华北全境宣告解放。

△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五兵团解放衢州，俘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第八十八军各一部2000余人，缴汽车百辆。另部于浙江西部分水西南地区，歼第一〇六军二个团另一个营，俘2700余人。同日，三野第七兵团于萧山以南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个团，俘正、副团长以下千余人。

△　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于月初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份备忘录，指出只有对解放区各级政府给以事实上的承认，才能在维持领事关系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西方的利益，否则，便可能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侨民和西方利益带来有害影响。美国务卿艾奇逊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是日指示驻有关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讨此事。艾奇逊强调，不论是主动表示将给予承认或通过官方声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共寻求承认的措施将受到欢迎，所有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关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应结成“共同阵线”。

△　汉口《大同日报》被警备司令部以所谓为中共张目，勒令停刊。

5月7日　　阎锡山于5月4日携方案到上海与蒋介石经三日商谈，蒋表示完全同意交出一切权力，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决不出国亡命”。是日阎由上海到桂林，向李说明所要求六事，蒋已承认五事半。陈济棠、朱家骅亦自广州到桂林，共同促李宗仁赴穗。同日，白崇禧应李宗仁电召，由长沙到桂林。

△　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江静”轮离上海复兴岛，于12日达舟山岛。

△　武汉守备区司令部发言人费声远向报界宣布，即日起武汉三镇进入战时状态，实施军事管制与宵禁。同时颁布《武汉紧急治安条例》十项，违者一律处死。

△　人民解放军在浙江西部马金镇附近山区围歼安徽保安第三旅、第五旅全部，俘安徽省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张义纯、副司令阮云溪。同日，在江山县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重建的第九编练司令部7000余人。

△　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队，昨日至今日解放绍兴、诸暨。二野第三兵团是日占领金华，与南下之三野第七兵团在诸暨会师。三野第二十七军解放沪杭路上之嘉兴，国民党军逃上海。

△　驻温州国民党军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及保安独立团、永嘉自卫总队等共3300余人，在温州专员兼第二〇〇师师长叶芳、副师长夏雷率领下起义，浙东南重要港口温州解放。

△　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震林为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为副主任。杭州市警备司令部同日成立，王建安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姬鹏飞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2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谭震林任市长。

△　上海市长陈良为抢运物资召集各中央机关负责人员会议，研究抢运具体事宜。谷正纲转告汤恩伯的几项要求称：“要绝对机密，要迅速，要确实，要统一。”“恪遵行政院命令切实办理，如有员工阻挠疏运工作，将以军事力量强制执行。”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市物资调节委员会以为对外行文，另于该会下推定市长陈良、联勤总部经理署署长傅仲芳、中央银行局长夏晋熊、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港口司令杨政民成立五人小组委员会，以陈良为主任委员，负责物资抢运事

宜。

△　在上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电台工作之中共党员李白，在上海遭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5月8日　　李宗仁经两次促驾，在阎锡山等陪同下由桂林飞抵广州，发表书面谈话，污蔑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表示只有作战到底。又昭告官民，“上下一心，协助政府完成安邦定乱之重任”。李到穗后，即会同何应钦、白崇禧拟定全线防守计划。

△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攻占鄱阳湖之湖口县城。

5月9日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解放临川；二野第十二军解放义乌县城，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升率部5000余人在浙江义乌起义。二野第十五军自上饶铅山南进，越武夷山，进入闽境，解放崇安、浦城。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颁发《淞沪作战赏罚办法》。其赏则分别以晋升、记功、赏银元等奖励所谓“出力之陆海空军官兵”，规定缴获武器赏银元20元至千元不等，俘解放军士兵一名赏银元五元，俘军级司令员或政委赏银元三万元等等。罚则规定十条，如“司令官以下各级指挥官，在作战时畏缩，不赴重点方面督战，致战局陷于不利者”，“作战不利，致使匪军突破我防地者”，“未奉命令擅自放弃阵地者”，“行动迟缓，作战不利，未能达成任务者”，“增援部队如因观望，致陷友军不利者”，“谎报军情，夸张战果，因而贻误戎机者”，“部队长规避任务，或故意与上级失却联络，因而不能适切使用于战场者”均交军法审判。“遗弃械弹，离开个人岗位或擅离阵地而降匪者”就地正法。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4月4日命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京沪代表、南京分会主委孟士衡、该会宣传委员吴士文及萧俭魁三人押送上海处理，是日以所谓“推翻政府”之罪名将其杀害。

△　安阳市人民解放军捕获国民党军第四十军暂编第九纵队司令王三祝、河南第三行政区保三团团长程万府。

5月10日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等发布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规定以第七兵团控制杭州、余杭、萧山地区，争取数日休整，准备以一部继续分向宁波、奉化、青田等地区前进，协同二野浙赣路作战；另一部担任杭州警备。第八兵团警备南京市、镇江及金坛、句容、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地区。以第九、第十兵团并第二十六军首先包围上海，截断敌之一切逃路，封闭上海物资之窃运，进而全歼该敌或迫敌投降，求得和平解放上海。同日，陈毅在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入城纪律的报告。

△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三兵团5日至是日在浙赣前线连克龙游、兰溪、东阳、永康、武夷、缙云、丽水、宣平、松阳、遂昌、南城等城，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五十军、五十五军、八十五军、一〇六军及第三一八师等部7000余人。内俘省军管区副司令陈敢、师管区副司令刘书道、暂编第二总队教育长罗选伍等人。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由其秘书傅泾波向中共南京方面表示，他希望会晤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并愿意继续当大使和中共方面办交涉，并修改商约。是日，中共中央电复南京市委，同意黄华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如司徒态度是友善的，“应取庄重而友善的态度”。

△　何应钦出席立法院第三会期第十八次秘密会议，报告和谈破裂经过及当前施政方针。并表示：“本应退避贤路，惟念当前局势，严重已极，国家民族之命运，已在存亡绝续之交，政局不可动荡，军事应有重心。应钦以身许国，势逼处此，不得不牺牲一己，继续勉任艰巨。”各立委提议动用国库金银外币，稳定经济，加强军事战斗力；征用富豪金银充作战费，以及追究“叛变”责任，整肃投降分子。另由梁寒操等30人提出由立法院组织非常时期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所组织之工运委员会召集会报会，陆京士主持，会报与研究肃清工界“匪谍”办法，决定成立行动小组与审讯小组。行动组由警备部稽查处主持，审讯组由工委会主持，按照所得之黑名单，“择其最重要者先行逮捕，逮捕后必须严惩不贷”。“行动完成后由警察局、社会局会衔布告各厂，今后绝对禁止各项非法活动，并取缔各项非法组织”。

△　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率军警数十人包围虹桥疗养院。张澜临危不惧，严斥国民党反劝派的暴行。疗养院副院长郑定竹及医护人员均出面与国民党军警争辩，并以身家性命担保，要求将张澜“寄押”院中继续治疗。直到下旬上海解放前夕，始由上海地下党营救脱险。

△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辽宁省委与安东省委合并，成立辽东省委，书记张闻天，副书记刘澜波；辽西省委与辽北省委合并为辽西省委，书记郭峰，副书记喻屏；合江省委与松江省委合并，成立松江省委，书记张策。

△　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吴芝圃兼任省政府主席。

△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奉命迁至台湾。

5月11日　何应钦于广州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白崇禧奉召到穗出席。会议决定以最大力量保卫华南和西南地区，并决定粤、湘、鄂、桂、赣、闽、黔、滇、川等省联防计划。

△　驻美大使顾维钧会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除乞求援助外，并提请美国考虑参加类似北大西洋公约之太平洋区域协定问题，用以表明美国对共产党在亚洲进展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之进展同样关切。

△　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任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

△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五军进入闽境，解放建阳县城。二野第十一军在丽水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部，俘800人。同日，浙东游击队解放浦江县城。

△　美国赠送中国军舰四艘，驶抵台湾。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许闻天所领导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组织部长陈惕卢及盟员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宋五人以“组织非法团体，出卖党国，危害民族，甘心投匪”的罪名杀害。

5月12日　上海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九、第十两兵团是日起开始扫荡国民党军的外围据点。第九兵团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于拂晓攻占平湖，击溃守军暂八师。第二十七军攻占嘉善。在京沪线上之第十兵团以第二十九军（附炮五团）尾追国民党军第二九六师，于下午渡浏河，先后攻占唐行、华亭、潘宅、盛桥，于傍晚逼近狮子林、月浦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阵前。第二十八军（附炮六团）傍晚占太仓、嘉定，歼国民党军第三〇八师一团，于午夜迫近刘行、杨行国民党军第二师阵地。第二十八军于是晚攻占昆山，截获准备逃沪火车二列，俘国民党军第一八二师1500余人。

△　国民党军第二〇三师参谋长曹义，率两个营300余人，于金华东北向解放军投诚。

△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竞武（黄炎培之子）在上海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务逮捕。黄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剥夺人民自由等种种罪行。国民党特务企图获取民建地下组织的目的未能得逞，于18日将黄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

5月13日　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夺取金山卫、松江。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第二十八军于凌晨零时前后起，在北起狮子林、月浦，南至杨行、刘行一带，向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第一线阵地反复冲锋，激

战通宵，互有伤亡。经反复争夺，第二十九军攻占月浦镇。上午，国民党军第二九六师等部在海、空军支援下，对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大举反攻，激战过午，解放军退出月浦。进攻刘行、杨行之解放军第二十八军未能奏功，退回罗店、嘉定整补。同日，三野第十兵团解放昆山、太仓、嘉定三城及青阳港、陆家浜、刘河、罗店等重要据点多处，歼国民党军第一二三军之第三〇八师、第一八二师各一部3300余人。

△　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一部解放浙江省青田、龙泉两城，于龙泉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军暂三师，俘2000余人。同日，二野某部解放闽北吉水和回龙镇，歼国民党军京沪区军官教导团等部千余人。

△　海南岛行政长官陈济棠应陈诚之邀请，偕顾问孙家哲乘机飞台，商讨台湾及海南岛联防计划。陈携带李宗仁亲书长函一封转交陈诚、居正，请二人速赴穗一行，集商要事。

△　淞沪警备司令部代电京沪、沪杭两铁路管理局、铁道军运指挥部及各车站检查所。规定“自14日晨起，京沪、沪杭两路火车应酌量减少班次。凡疏散人口准尽量输出。但驶回上海火车只准空车开返，无论军队人民一律不准乘搭”。“每次火车均须酌派执法队随车押运”。

△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项条件：一、在事实上控制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三、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可。其第二项即要求新政权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维护美国的权益。同时要司徒雷登向英、法等国驻华大使强调：“给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

△　立法院第十九次会议，49名委员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及张嘉璈三豪门征借10亿美元，以充实继续内战的军费，即获全体出席委员的赞同通过。同时通过《为中共破坏和平支持政府对中共继续作战之决议》。

5月14日　　林彪、罗荣桓等指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多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次日，第十二兵团突破团风至田家镇间国民党军江防阵地。

△　白崇禧于昨日由穗返武昌，召集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守卫武汉问题。是日，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指挥对武汉三镇进行大破坏，炸毁三座飞机场和沿江船只50余艘，江岸机车厂厂房、徐家棚车站等均遭破坏。

△　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电令，以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军“于转进途中，既未采用机动方法，窥破好机，予深入之匪以反击，复未站稳脚跟阻止匪军之冒险穷追，似此消极性之转移如不严加纠正，则影响今后作战至巨”。要求部队“振作士气”，“凡有不遵命令专以避战为能事者，决按军法及连坐法从严惩处”。

△　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有关军事、经济、外交等重要事宜，并决定推举吴铁城、吴忠信、李文范、白崇禧、阎锡山、陈济棠、王宠惠七人起草军委会组织章程及党内革新方案。

△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会议，决议各案如下：一、请政府照会各国使馆，即派员来穗，藉增进邦交上之联系；二、中意友好条约案，推刘文岛等五人先行审查；三、西北航空协定及西北商约，视中苏之外交关系发展之情形，然后再进行商谈；四、废除中苏友好条约之步骤，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四条之规定，向联大提出苏联违约背信之控诉，并提供其事实，要求苏联赔偿损失，如联大及苏联对此控

诉均不重视时，政府得随时宣布废除中苏友好条约。以上各案，除第二案外，送程序委员会列入议事日程，提交立法院大会讨论通过后送行政院执行。

△　李宗仁发布总统明令：兼任青岛市市长秦德纯呈请辞职，秦德纯准免兼职，任命孙亹丁代理青岛市市长。

△　广州警备司令部发言人宣布，自5月15日起广州进入战时状态，开始疏散家眷。16日，复宣布自17日起实施戒严，珠江、虎门加派炮艇及装甲船巡逻，凡进出珠江口任何船只，均需接受检查，如抗命，以不轨论处。

△　国防部保密局特务继逮捕残杀民主建国会常务干事黄竞武之后，于是日又将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逮捕，本月20日将其杀害。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通报上海市政府，略谓："资源委员会、中纺公司、中央信托局不疏散物资，对于命令阳奉阴违"，要求上海市府"严行督促"。除"通报"所称当局"已现慌乱之象，步骤错乱，毫无方寸，黄浦江由军事控制，航运轮舶利用困难，且各机关以请拨、疏运、装卸、搬运等项经费浩大，中央银行迟迟核拨，故大部分物资均未及启运"外，国民党最大官办企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副委员长吴兆洪等已准备投向人民，从上年底起即团结各厂矿企业及业务部门负责人用各种办法抵制蒋介石命其将南京等地六个厂迁台的命令，对储存上海的大批煤油等物资，亦以请拨船位、经费等与汤恩伯等巧妙周旋，使储存上海的大量物资得以保留。孙越崎还以经济部长兼中纺董事长的身份，与总经理顾毓琇一起，在广大职工团结护厂斗争下，保全了中纺公司在沪的数十家工厂和物资。

△　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第二十六军沿京沪路东进，连克安亭、黄渡、南翔三个车站。第九兵团第二十军、二十七军解放上海西南的青浦县城与泗泾镇。此时，完成了对上海的三面包围。

△　人民解放军二野克闽北空军基地建瓯县城及闽中军事供给地南平县城，俘国民党军650余人。

△　美国陆续增派军舰、飞机和海军陆战队到青岛助蒋内战。上月30日，美海军陆战队400名由上海抵青岛。本月5日、7日，美军舰五艘、重轰炸机四架先后增驻青岛。是日，美海军陆战队1500名由美国运抵青岛。

△　广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联系爱国将领李洁之等八人，在粤东、闽西率部起义，发表《我们的宣言》，表示欢迎中共领导，拥护解放军向华南进军。6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吴奇伟等，表示欢迎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并希望他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

△　海关奉令从是日起改征关元。先将战前“国币”基数一比一折合金元，然后将金元一元折合关元0.625元，以0.5元为最低额，凡数在0.25元以上者，概作0.5元，在0.75元以上者，概作一元计算。如无战前基数者，得由各关按此标准实施。

△　台湾省政府以《台北晚报》于本月11日刊载《公教人员的哀鸣》一文，“内容歪僻，措词乖谬，显属造谣惑众”，饬台省警务处会同台湾警备司令部于是日将该报查封。

5月15日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移驻湖南衡阳，白崇禧率公署人员离汉抵长沙，暂留长沙指挥所指挥军事。同时命武汉守军撤退。守备司令鲁道源于下午发表书面谈话，宣布放弃武汉。国防部鉴于武汉撤守，拟以张淦、陈明仁、黄杰等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守赣西为右翼；另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一线为左翼；再以由长江退入洞庭湖的海军为辅佐，构成坚固防线以阻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

△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经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科方敬之等的教育争取，于三大战役后派代表与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接洽起义事宜。按照邓子恢的建议，张于5月上旬拟定了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配合解放军截击白崇禧部队南逃的起义计划。14日，张奉召到武昌出席紧急会议，白崇禧出示顾祝同密电，称已得密报，张轸图谋叛变，令将张及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张轸借机逃离武昌到金口所属第一二七军军部，一面召师以上军官会议，布置起义，一面阻击白崇禧部队的截击。是日，张率所部第一二八军之第三一二、三一三、三一四师，第一二七军之第三六九师共两万余人起义，并击退白崇禧部的包围和截击。16日，张轸受到四野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接见。

△　进攻上海之第九兵团第三十军一部由西面越过川沙，迂回到顾家路镇，切断川沙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一军、暂八师的退路；主力则猛攻川沙，歼保一旅一团、暂八师一营及第一二三军留守处。第十兵团第三十三军到达嘉定地区，各以一师配属第二十八、二十九军，继续对狮子林、月浦、杨行、刘行等地发动进攻。第二十六军于是日午后夺取南翔。

△　国民党军第六兵团暂编第一纵队司令李锡佑、原河西警备副总司令张权，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策定5月16日举行起义，是日事泄被捕。21日，李、张被杀害。

△　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第一、二、三、四、六军于本日由泾河以北多路进军陕中，对胡宗南集团展开追击作战。

△　浙东游击纵队10日至是日五天中先后解放玉环、乐清、瑞安、平阳、景宁、泰顺六座县城及广大乡村市镇，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

△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解放南昌东南浙赣路上之进贤县

城。

△　驻湖北黄冈之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之第九一三、第九一五团五个营起义，占领石灰窑，迎接解放军。

△　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乘机离穗赴美，携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

△　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约集民社党、青年党领导人讨论组织经济研讨委员会，朱家骅、陈立夫等50余人出席，会议推定阎锡山、陈启天、万鸿图、张其昀、钱穆、程天放、袁宇谦等13人为起草纲领委员。

5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请中央党部及政府分别通令全体党员及官吏人民，如有再发求和言论者，以“叛逆”论，予以党纪国法处分。

△　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四十军解放汉口，武汉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军及警备部队均逃窜。同日夜，解放大冶、鄂城、阳新等城。

△　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三十军再次猛烈围攻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暂八师阵地。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当晚率部向高桥突围，途中遭伏击，至次日凌晨，王秉钺以下6000余人被俘，师长丁作彬、邹煜南率残部逃回上海江湾。同日，第三十一军围攻周浦，歼保一旅一部、保二旅及青年军第二〇四师第六一二团，俘团长张海商、浦东沿海支队司令耿子仁、江苏保安二旅旅长孙宗玖以下2500余人。浦东外围据点悉被拔除。

△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令派毛森兼任“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统一指挥东南地区各游击部队，密切配合国军作战”。

△　淞沪警备司令部为战时集中黄浦江船只代电有关单位，规定“黄浦江江面及两岸附近所有各种船只，除系担任军运及正在分别

装卸者外，着一律停泊至复兴岛以北之黄浦江下游，集中西岸为主”，限17日前疏导集中完毕。

△　上海市长陈良于上午8时在扩大纪念周会上训话，鼓吹上海四周有坚固之要塞工事，“与斯大林格勒相同”；粮食储备“亦毫无问题”。“战事可以持久至六个月，甚至一年或两年”。要求市民“箪食瓢浆，以迎王师”，“尽一切所有，支持国军”。

△　上海市民政局订颁各区保甲长实施联保联坐办法，规定正、副区长以各区为联保单位，正、副保长以全区为联保单位，甲长以保为单位，每五人为一组，互相联保。“倘发现组内人员思想反动，言行乖谬，行迹可疑时，应即严予监察，并叙明事实，秘密层报本局核办（必要时得径行来局报告）。如有徇情隐瞒，应受连坐处分”。

△　宋子文对立法院所通过的“征借”一案向记者谈称：“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们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五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10亿美元，岂非捕风捉影。”下午宋子文偕夫人离港，道经曼谷赴巴黎。6月9日，由巴黎到美国纽约，此后定居美国。

△　广州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市教育工作者动员起来，迎接广州解放，并提出当前任务四项，即：一、加强团结，自助自救，求生应变；二、坚守岗位，保护学校，维护文化；三、健全教师联谊会组织，肃清教育败类；四、自我改造，学习理论，击碎反动教育。

5月17日　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继续对狮子林、月浦、杨行、刘行进攻，国民党军先后投入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增援。双方争夺激烈，形成拉锯战。在浦东方面，解放军第九兵团进攻高桥。汤恩伯调阙汉骞率第一九八师、第九十五师赴高桥增援。

△　上海合众图书馆被国民党军占用。该馆负责人徐寄庼、徐森玉向国民党有关当局交涉，希望不要占用文化机关，遭拒绝。次日，张元济亲自到馆坐镇守护。未久驻馆国民党军撤走。

△　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解放汉阳、武昌。同日第十二兵团第四十三军解放九江。

△　第一野战军解放陕中泾阳县城，并于该城以东之永乐镇及东南之泾阳塔地区歼国民党军第九十军第五十三师两个团大部。

△　蒋介石偕蒋经国抵达马公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请蒋介石“打销遁迹远隐之意”。蒋经国感慨：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

△　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财粮会议，22日结束。何应钦、张群、白崇禧、陈济棠、陈诚、张发奎、顾祝同等及西南各省省主席参加，决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征收巨额军粮，仅四川一省“征借”数目即达1350万担。

△　立法院第三会期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废止《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

△　胡宗南集团从西安撤逃前，准备将西安的大、中学校向陕南和四川转移，5月13日后，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董钊以集训为名，把学生编成五个大队，令各校学生携带行李，于本日前到指定地点报到，随军出发。各校学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反迁校、反集训斗争，并发动学生自行设法隐蔽，以防反动派的包围强拉，三天内几乎隐蔽一空。本日胡宗南军溃逃时，总共只带走百多名学生。

5月18日　邵子力、章士钊致函李宗仁，先就李在广州之声明，指责其“非惟不能坚持原议，砥柱中流，并设法孤立硬派使之就己，

而且放弃自己立场，投身于叫嚣隳突之漩涡，使顶踵尽随主战之洪流以没，旋以主战者之声口，抨击和议之不终。此不仅显示公之信念不笃，进退失据，抑又使持节往复始终其事如某等者嗒焉丧其信守，无以对中共降心僇力诸君子，某等诚私心痛之”。继针对李继续追随蒋介石内战，指出：“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粤，同流合污，阳冠僚寀，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主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　行政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决议：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郭寄峤无庸代理，派马步芳副长官升代。二、特派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三、派黄旭初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为桂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甘丽初为增设副主任。会议还通过立法院关于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三人征借的紧急动议。同日，张嘉璈致函行政院，声称在任职期间奉公守法，以薪水收入开支，并无多余的个人财产。

△　在浦东作战之解放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攻占高行、顾路后，向高桥及其外围据点发动猛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依舰炮支援顽固据守。至午，解放军突破市轮渡码头至东沟阵地，进抵江岸。沪西国民党军后方受到威胁，淞沪防卫司令石觉调第九十五师增援，向市轮渡码头以南反扑，虽小有进展，而高桥以东阵地则被解放军突入。汤恩伯令调第九十九师及战车、炮兵一部往援。

△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率部迁至汉中，西安由第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率部驻守。

△　国防部武汉巡防舰队三艘巡逻艇、两艘炮艇官兵，在爱国士兵张慎平、胡莹、曹学海等带领下，于岳阳附近长江江面起义，25日驶抵武昌。

△　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入江西，占领九江以西的瑞昌县城。另部占领粤汉路上的军事要点贺胜桥及金牛镇。

△　第一野战军解放咸阳城，在该城西北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个团全部及骑四团一部2300余人。

△　毛泽东、朱德复电起义海军将领林遵及全体起义官兵，赞扬他们起义是“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勉励其“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　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人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同告成立。谭政为军管会主任，吴德峰为市长，萧劲光为警备司令。

△　汤恩伯经手从国库第四批运往台湾黄金20万两。

5月19日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举行军事会议，参加者有白崇禧、程潜、李品仙、黄杰、陈明仁、夏威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华中区的作战部署。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第十四、二十兵团共六个军布防巴东至岳阳间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以白崇禧直属第三、第十兵团共七个军，布防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陈明仁第一兵团共四个军（后编并为三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以第五十六军、一二七军分别布防于桂林、常德；以江西绥靖公署方天部第四、十二兵团共四个军，布防于遂川、赣州间；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七个军，以一个军驻防海南岛，主力沿粤汉路防守粤北，屏障广州。如处境不利，则退保两广。

△　汤恩伯以浦东高桥地区战事吃紧，为确保高桥，秉承蒋介石旨意，调整部署，将守备沪西南之第七十五军抽调至高桥，以第三十七军与第七十五军重新编为浦东兵团，以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任兵团司令。在沪西南方面，则将原市区守备兵团改组为沪南守备兵团，改任郭履洲为兵团司令。由该兵团与第一二三军之第三三四师接替第七十五军原阵地。

△　第四野战军一部先后攻占粤汉路上之汀泗桥及其东北之咸宁城，歼拒绝起义而南逃之原张轸第十九兵团第一二七军第三〇九师的四个团，俘千余人。

△　第一野战军昨日至是日接连解放陇海路上之兴平、武功、醴泉、乾县四城，解放武功时保警300人向解放军投诚。

△　三野第十兵团第二十六军向市郊推进，攻占京沪路上之南翔及真如两站之间的国际无线电台及其西北的12个据点。

△　湖北沔阳县长刘崑生、自卫团长李太平，率所部8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　自由中国反侵略大同盟假留德同学会举行大会，邹鲁、余家菊、梁寒操、陆铿、唐纵、陈立夫、徐源泉、洪兰友等数十人出席，由阎锡山主席，通过该会组织纲领八章14条。

5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总攻上海的时间等问题电示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一、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二、总攻时间择在辰有（25日）至辰世（31）日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巳东（6月1日）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　是日至次日，进攻浦东之解放军第二十军东渡黄浦江，以第五十八师进攻金家桥、庆宁寺、洋泾镇，第五十九师进攻张家楼、东昌路，第六十师进攻周家渡。当日，解放军占领金家桥。该地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奉准放弃洋泾、东沟间阵地，固守洋泾、塘桥、白莲泾之线正面约10公里之桥头阵地。汤恩伯鉴于解放军据洋泾以北江岸，威胁沪西守军后方，遂令第三十七军反攻金家桥，恢复江岸原阵地。

军长罗泽闿亲率五个团，于次日晨反攻，激战至下午5时顷，虽夺回金家桥及洋泾以北原阵地，但伤亡营长三员以下千余人，元气大伤，当晚撤回桥头堡。解放军第五十八师亦受到一定伤亡。

△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进入我国内河、港口之外国军舰、轮船处理原则的指示。任何外国军舰及为敌军装载军队、物资的轮船进入黄浦江者，均得实行攻击。停泊未动者，则不予攻击。

△　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在进驻西安市区时，学生、市民齐集街头热烈欢呼。在解放西安和咸阳的战斗中，歼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师、第十二师、保六团等各一部，俘2600余名。另有2300余名携带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　甘肃东部地方人民武装收复庆阳。

△　周恩来出席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称“小民革”）招待会，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小民革”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说：“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彼此相知甚深，在斗争中同中共始终保持一致，在国民党内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建立于1941年，主要领导人有王昆仑、王炳南、阎宝航等。

△　张治中与原南京代表团留平成员致电李宗仁、何应钦，谓：“倘吾人能正视战败之严酷现实，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之常理，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唯有导仅存之残局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负之罪愆。”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令在沪美海军军舰驶离黄浦江以外35浬处停泊。美国总统邮船公司宣布该公司轮船即日起停驶上海。

△　湖北省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成立，李先念任主席

兼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

△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全省戒严，戒严区域划为台北市、北部（包括台北、新竹两县及基隆、新竹两市）、南部（台南、高雄两县及台南、高雄、彰化、嘉义、屏东五市）、东部（台东、花莲两县）、澎湖五戒严区。规定基隆、高雄两市实行宵禁。并颁布“罢市扰乱秩序者杀”等十条禁令。

5月中旬　　广东敌后人民武装解放龙川、五华、梅县、兴宁四城，歼保四师师部及所属四个连、保五团两个营、紫金保安团一个营，俘保四师师长彭建龙、保五团正、副团长等。

5月**21**日　　李宗仁再度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内战的责任推诿于中共，指责中共是“为效忠共产国际而战”。虽承认国民党所处的形势“相当恶劣”，仍表示要“负责领导反共战争”，顽抗到底。

△　资源委员会前任委员长钱昌照于上年5月赴欧洲“考察”，于上月下旬秘密回到上海，与现任委员长孙越崎、副委员长吴兆洪会晤。钱表示弃暗投明的决心，得到孙越崎、吴兆洪的支持。钱旋返香港，与中共夏衍、乔冠华会晤。周恩来嘱中共香港党组织尽快送其离港北上。是日，钱昌照化名从香港登轮北上。

△　淞沪警备司令部订颁《奖励检举共匪办法》，规定警备区居民，“如发现亲友、邻居及法团、店铺各色人等中有共匪潜伏分子，应即向本部或当地军宪警机关密报检举”，如属确实并能捕获者，按被捕人职务大小实赏银元500元至五万元，破坏电台一部，实赏银元一万元。反之则受连坐处分。

△　交通部向广州行政院呈报《关于路电困难交通事业已濒临绝境的报告》，诉说浙赣西段缺煤缺款，所有军车停滞株洲，无法续运。粤汉路旬日以来，全力疏运南下军队，所有客货车早已停顿。湘桂黔路缺煤尤为严重，每隔日始能开行军车一次。5月份电信贴补费

至月前尚未领齐，业已贬值甚多。要求行政院采取应急措施。

△　第一野战军在陕中连克永寿、扶风、麟游、岐山、鄠县五城。

5月22日　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解放江西省会南昌及赣江东岸新淦县城。

△　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南之郿县城及子午镇，并在麟游山区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二一四师、第二一五师）及第三十师，俘官兵万余人。另部于宝鸡东虢镇歼国民党军一个团，俘800余人。

△　上年发行之金圆券，除广州、重庆两市外，其他各省、市早已停止使用。是日，广州市以港币兑换金圆券已无人过问，50万元面值之金圆券正式拒用，市场交易概收港元。何应钦急令财政部长刘攻芸设法扭转。

△　内蒙古代表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一行在广州谒李宗仁，提出三项请求：一、给予内蒙古高度自治之权；二、经济上之援助；三、枪弹之援助，以加强内蒙古之武力，抗拒共党领导下之东蒙自治政府。

△　广州警备司令叶肇向市民广播，称凡同情共产党者限三日内一律出境。

5月23日　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一、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尽可能在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此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兼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一路由贺龙率领，协同二野解放川、黔、康三省。二、第二野战军在协同三野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沿线，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待此种干涉的可能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解放并经

营川、黔、康三省（7月16日增加滇省）。三、第三野战军以主力一部，向闽、浙进军，并准备提早入闽，争取6、7两月间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相机夺取厦门，解放并经营鲁、苏、皖、浙、闽五省。四、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　上海浦东兵团司令阙汉骞趁解放军后续部队未至，集中第七十五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及第九十九师等部在大炮、坦克、飞机助战下，对解放军第五十八师大举反扑。拂晓开始，第七十五军由高桥以西向东南进攻，第九十九师由高桥出击，夺回庆宁寺、洋泾镇等几个已失据点，并使解放军受到一定损伤。但第十二军海水浴场阵地和第三十七军洋泾阵地相继被解放军突破。在沪西方面，守卫七堡地区之交警第十一总队前哨阵地上日被解放军突破，是日拂晓将其夺回，但主阵地左翼联络据点为解放军攻占，交警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黄英及一个分队被俘。是日晚，解放军以七堡为重点，再次猛攻，击伤交警大队长洪均山以下百余人，毙数十人。同日，解放军第二十七军进攻虹桥机场，歼交警第十八总队一个排，突破国民党军虹桥阵地，进入市区。淞沪防卫司令石觉令第二十一、五十一、一二三军各残部沿苏州河北岸占领阵地，归罗泽阔指挥，阻解放军北渡苏州河。

△　国民党军15艘军舰抵高桥向人民解放军阵地发炮，两艘被解放军击沉在海滨浴场附近，五艘被击伤。

△　张轸代表起义官兵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表示“誓以至诚在你们领导之下学习、进步，作一支人民的队伍，拥护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和政策”。6月16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张轸及第十九兵团全体官兵，对其义举表示欢迎，鼓励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行列”。

△　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解放永修、德安，与四野第十二兵团在

永修会师。

△　白崇禧在长沙邀宴湖南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仇鳌等人，声言由唐生智领导的自救会“容易被共产党的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唐伯球将白崇禧的企图转告唐生智，唐被迫于次日深夜偕李觉秘密离开长沙回东安老家。

△　行政院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财政、金融、粮食三大问题，决定税收除盐税、关税、直接税外，其余各税由地方政府征收；军粮仍依照上年之征实征借办法办理。

△　教育部长杭立武邀请该部历任部长蒋梦麟、李书华、朱家骅、陈立夫、王世杰、梅贻琦、陈雪屏七人，会商反共内战期间教育施政方计，主要内容为加强以反共思想训练青年，实行“教育文化斗争”。次日，蒋梦麟等受李宗仁邀请，座谈是否重行建立一种战时教育体制。

5月24日　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继续对浦东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阵地逐次遭到摧毁。是夜，第三十七军奉命向西岸杨树浦地区撤退。撤退时混乱不堪，致使副军长张止戈、特务营长洪因等人遭西岸国民党军击伤。浦东除高桥一隅仍继续顽抗外，其余各处均已结束战斗。沪西南方面，解放军第二十七军于是日拂晓攻占虹桥镇，一部攻占万国公墓，歼交警一个营，午后2时占领铁路沿线。是晚，另一部夺取龙华机场，空军第四军区撤往定海及台湾。交警第十一总队及第十八总队均后撤，苏州河以南全被解放军占领。

△　下午，汤恩伯的京沪杭总司令部、石觉的淞沪防卫司令部和陈大庆之淞沪警备司令部三个高级指挥机构，相继撤至吴淞登上兵舰，并由石觉召集其嫡系各军长、各特种部队及各单位重要人员面授撤退机宜，分配船舶、码头，准备登船撤逃舟山。同时发表重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升兼淞沪警备副司令，授予指挥留守上海各残部

的权力。

△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徐源泉等368人于广州联名上书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要求蒋到广州“领导同志修明党务”以“共赴时艰”。

△　立法院会议通过《惩治叛乱条例》及《修正三十八年整理美金公债条例案》、《挽救目前财政危机，以免全部崩溃案》等议案。

△　蒋介石于马公岛命蒋经国飞福州访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商谈构筑防御工事问题。

△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动员令。同日，解放陕南白河县城，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七师一个团，俘1260名，伤320余名。

△　人民解放军西安军管会成立，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翌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和西安警备司令部成立，贾拓夫任市长，张经武任警备司令。

△　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解放浙东著名商埠宁波及慈溪县城，俘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军一部。另部占领奉化县城和溪口镇。

△　驻胶东即墨以南之国民党军第十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和驻即墨营口据点的国民党军第十一绥区之独立旅第二团大部及第一团（二个营）分别向解放军投诚。

5月25日　参加上海战役人民解放军突破上海市郊国民党军主阵地后，于是日夜续向市区发起总攻。一路由沪西南之虹桥、龙华地区及南市高昌庙等地攻入市区；另一路由浦东董家渡、周家渡、南码头等渡口渡江，向市区进攻。是日傍晚起，据守吴淞地区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十二军、二十一军（缺第二三〇师）、第九十九师、吴淞要塞、炮十团、战车第三营等部，先后在吴淞上船向舟山逃逸。淞沪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在江湾地区率部起义。

△　上海人民热烈迎接解放。南京路新新公司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啸峰和杨俊等人，利用设在该公司六楼的一家私营凯旋电台，向上海600万市民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促使一些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军扯出白旗，缴械投降。大新公司和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挂出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庆祝上海解放的长幅标语。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在该校中共地下党支部安排下，绘制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是日凌晨抬着画像上街，敲锣打鼓，欢庆上海解放。

△　李宗仁代总统令：《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着即废止；《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着即废止。同日颁令：特派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派黄旭初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甘丽初为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

△　国民党反共分子所组成的“中国反侵略大同盟”下午3时于广州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阎锡山、陈启天、陈立夫、张道藩等200余人。推选阎锡山、陈启天、胡适、于斌、陈立夫、贺衷寒等30余人为执行委员。发表宣言，提出所谓八个目标和八项任务，叫嚷“反对赤色恐怖”，“严肃反共阵营”。阎锡山在会中致词，号召其成员“要以战斗的姿态，紧密的团结，坚决的奋斗，抵抗惨暴共产党的南侵，进而打回老家去”。

△　蒋介石由马公岛到台湾高雄。

△　香港英国政府立法局通过《取缔社团活动条例》，该条例规定虽香港以外的社团在港的个别成员亦当作社团看待，警察可以任意进入所认为社团或社团成员的房屋内进行搜查及逮捕。

△　财政部决定将其统治区内税局编制重新调整，各省区局全部裁撤，所有各地税务直属财政部。各地货物税局与直接税局合并。

△　广东省政府成立迁府委员会，处理迁逃海口事宜。31日，省府主席薛岳派省府委员萧次尹、韩汉英赴海口部署，省府秘书处及各厅重要档案开始起运。

5月26日　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四个军在炮二、炮五、炮六三个团的支援下，对月浦、杨行猛攻。第三十三军于是晚攻占杨行，俘国民党军3000余人。第九兵团攻占高桥，并于下午对被围困在北站大楼及六国旅馆内之沪南守备兵团残部施行炮击。该兵团代指挥官李铁夫（郭履洲于24日借机脱逃）率部顽抗至下午6时，被迫放下武器，李及政工处长饶钦廉、交警大队长屈能伸等被俘。市内交警部队完全肃清。

△　李宗仁主持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党内团结案及党务革新问题。

△　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决定推派吴铁城、阎锡山、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五人，携李宗仁之亲笔函往谒，请蒋到广州主持大计。下午吴铁城等一行乘专机到台。

△　民国政府财粮会议决定“三十八年度”田赋征收原则。为配合反共军事需要，仍维持现行制度，继续征收实物，并随赋征借粮食。征实部分中央得三成，征借部分全归中央。

△　李宗仁特派钱泰为出席国际电报电话行政会议首席代表，派卢有澄、孙从钧为代表。

△　李宗仁令准云南省龙武、德钦、宁蒗三设治局改为县。

△　进军陕中的第一野战军24日至是日，连克潼关、华阳、华县、临潼、蓝田、盩厔六城。

△　阎锡山复函在美国纽约之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告以组织中国反侵略大同盟的情形，盼曾琦“早日返国，共襄国事”。

△　美援运用委员会联络委员张肇元等在分署驻台湾办事处集会，商议运用美援建设台湾问题。

5月27日　　上海解放。凌晨4时，解放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九军攻占宝山、吴淞，驻杨树浦国民党军8000余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联勤总部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官高星恒率部200余人起义，上海战役结束。是役共歼国民党军15.3万余人，其中击毙1.49万余人，俘9.45万余人，投诚4.37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1.7万人。

△　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同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兼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任副市长。

△　驻山东胶州湾西岸薛家岛之山东保安第二旅第六团及驻莲花之第一团两个连，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　浙南人民游击纵队解放温岭县城。

△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战绩公报：2、3、4月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起义和投诚敌舰56艘，解放南京等94座城市。缴获各种炮3800余门，飞机八架，俘师以上军官73名。

△　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下令通缉在粤东、闽北起义的吴奇伟、李洁之、萧文等11人。

△　国民党全国各地国大代表联谊会在穗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临时动议："速请政府以有效方法，限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等立即捐助戡乱军费美金十亿元，如逾期不捐，其已出国者将其出国护照吊销，其将出国者，不发给其护照。"

△　立法院第三会期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兵农合一"案，拟实施所谓"土地改革"而"裕兵源与粮源"。

△　蒋介石自高雄到台南，会见前来调解蒋、李矛盾的于右任。蒋对李宗仁来函不满意，仍不愿意和解，晤谈中即以“不再闻问政治”敷衍。

5月28日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各野战军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要求各野战军按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陆海军向后方袭击。

△　立法委员80余人所组织之“中社”建议组织“最高决策委员会”，由蒋介石兼任主席，李宗仁兼副主席，行政院长任秘书长，于紧要时期作紧急决策。

△　张澜、罗隆基、史良、郭春涛、陈铭枢、闵刚侯、连瑞琦、杨卫玉等12位在沪民主人士发表联合声明，热诚庆贺上海解放。严重警告被蒋介石抛弃在上海及其他地区的残余军人、特工人员等等，“不要执迷不悟，再做个人的奴才和走狗，再继续做人民的敌人”，“应立即大彻大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劝告中国南部一切尚未解放的各省、市的政治组织及军事力量，“今后任何苟延残喘的阴谋计划，例如所谓东南自保，所谓西南联防，甚至企图以台湾孤岛作为流亡伪政府的巢窟，都不过是全盘的幻想”。

△　吴铁城等五专使由台湾返广州，语记者称：蒋决定短期内来穗主持党务，“领导全党同志参加反共斗争”。除党务之外，一切人事问题，包括中央与各省及作战等决策，“决不干涉”。次日上午，国民党中政会、中常会联席会议，听取吴铁城等报告谒蒋经过。

△　李宗仁令：准外交部部长傅秉常呈请辞职，所有外交部部务仍由政务次长叶公超代理。

△　内政部在渝机关实验救济院、社会服务处、儿童福利站等九单位主管人迫于生活陷入绝境，联袂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请愿。

△　《解放日报》在上海发刊，发刊词题为《庆祝大上海的解放》。《解放日报》曾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本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一批即将南下的文化界人士时宣布，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将《解放日报》的报名交给上海，改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

5月29日　张澜在上海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庆贺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罗隆基）等来平聆教”。

△　驻榆林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经派参谋长张之因赴延安谈判和平解决榆林问题，达成协议。是日上午10时，与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代表曹力如在协议书上签字。

△　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宋时轮任司令，郭化若为政治委员。

△　撤退到台湾之国民党军，分别暂住基隆、台北等地郊区学校。

△　美国旧金山华侨工人互助社、华侨和平民主协会、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美国分部和轻骑文艺社四团体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祝贺南京等城市解放。

5月30日　第一野战军于盩厔马召镇歼秦岭警备司令部及第四十八师之第一四四团各一部1300余人。秦岭警备司令部所辖第三团第二营及第四十八师警卫营1500人向解放军投诚。另部于鄠县、子午镇、蓝田俘地方民团3000余人。

△　全国总工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名誉主席，选出刘宁一等26人为出席世界工联第二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并决议欢迎亚洲职工代表会议在中国召开。6月1日，刘宁一率代表团由平启

程。

△　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武汉军管会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汉口创刊。

5月31日　行政院长何应钦辞职获准。国民党中政会、中常会联席会议今晨通过李宗仁提名居正出任行政院长。下午4时，李宗仁出席立法院会议，商询对居正组阁的意见，并希望立法委员同意。

△　中苏关于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由中方首席代表、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苏方首席代表谢也维基在迪化签订。协定规定，中华民国交通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民用航空总管理局于1939年9月9日在重庆所订立之协定，予以继续延期五年。

△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决定接受国际民主妇联在中国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　兰州市的兰州大学、师范学院、农业专科学校、兽医学院四校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教育部所发学生膳费每月不过银币二角，员生生活已陷绝境。

△　邵力子、黄启汉在上海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55人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是月　是月底止，金圆券仅值1948年8月19日发行时的五百万分之一，即九个月左右时间内，其价值缩小了500万倍。

6月

6月1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复电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他和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等准备到北平表示

欢迎，并谓：“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　上午，立法院举行会议，审查李宗仁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一案，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被否决。

△　驻榆林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依照和平解放榆林的协议，与参谋长张之因率第二十二军直属队及第八十六师三个团共4000余人开出榆林城外。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进驻榆林，宣告榆林和平解放。左协中通电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之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远为人民服务”。依照协议，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派出委员三人，第二十二军派出委员二人组织整编委员会。随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

△　人民解放军解放崇明岛。次日，驻崇明县城国民党军暂一军第十师、十一师等部3700余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至此，江苏全省宣告解放。

△　蒋介石父子在台北拜访吴敬恒，晤谈后抵达冈山，于傍晚偕蒋经国等视察高雄要塞。次日，在高雄进一步研究台湾整军、防务及军政等问题。他认为“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　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致电云南省主席卢汉，谓即派桂军第三〇三师进驻百色，准备入滇“协助剿匪”。同时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发表成立滇桂黔边区绥靖司令部，以张光炜任司令。公然把云南划入桂军防区，作为蒋、白经营西南，保卫广西的阵地。

△　国民党中央监委常委会上午举行会议，讨论党纪处分案。决议将参加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国民党员刘不同、杨玉清、高宗禹、贡沛诚、郑吴明、谌小岑、杨沛如等永远开除党籍，并由法院依法办

理。次日，行政院密电通饬所属各级机关，协拿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盟员。

△　台湾省政府宣布经济独立，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生产，由陈诚兼任主任委员。省府同日又宣布设立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亦由陈诚兼任。

△　驻台湾省宪兵第四团于5月上旬在台中及台北市分别缉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海军联络员方铮及政治局组长何立人，冠以“颠覆政府”的罪名，今日在台北万华机场加以杀害。

△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战时船舶管理暂行办法》，宣布开放长江、黄浦江及吴淞。

△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在齐齐哈尔创刊。该报由《嫩江日报》、《嫩江农民》、《新黑龙江日报》、《齐市新闻》合并改组而成。同日，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创刊。

△　被国民党上海社会局于3月19日下令查封的《展望》周刊，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刊。

6月2日　　国民党中政会今晨在穗举行，吴铁城主席，李宗仁提名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经全体与会委员一致同意。

△　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国民党军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在美军撤出青岛后，登舰往台湾基隆逃跑。至此，山东省大陆全部解放。同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成立。向明为军管会主任，赖可可、谭希林为副主任，马保三为青岛市市长。

△　中共中央为与日本进行直接贸易问题致电东北局，指出：“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日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

△　国防部由广州迁重庆。

6月3日　立法院第三会期第二十五次会议以254票赞成，56票反对，通过李宗仁提名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组阁。

△　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庄明理、王雨亭、张殊明等由港北上，今午抵平，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及在平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200余人到车站欢迎。

△　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陈其尤发表联合声明，抗议港英当局通过《取缔社团活动条例》，剥夺中国政治党派、人民团体在香港活动权利及在港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民主权利。指出："根据这一反动法案，香港就要变成为'警察国家'。香港居民将时时刻刻遭受被警察搜查逮捕的威胁。香港当局这种强权夺理的举动，是自夸的'保持民主自由传统'的英国政府所干的勾当！"严正声明："英帝国主义这一连串反人民反民主的排华政策，是对于正在走向胜利道路的中国人民的一种挑衅行动。这种挑衅是万分冒险的，必然会引起各种严重的结果。"

△　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副军长兼师长萧续武在福建永春起义。

△　广东第二区（惠州）行政专员廖鸣欧及保安团军官陈佩、梁一飞策划起义事泄，遭枪决。

△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批准辖区各省、市之金银准许自由流通，不加限制。省与省之间金银流通办法另订。金银带至辖区以外各省之数量，黄金限二两，银元限50枚。辖区外携带金银入境者不予限制。上项规定，即通令执行。

6月4日　阎锡山3日在台北发表谈话，谓渠所主持之新内阁

系“作战内阁”，决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是日，阎在高雄与蒋介石晤商内阁人选及施政方针。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号召他们赶快觉悟过来，不应该附从背叛人民、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不应该跟着即将灭亡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走进坟墓。指出“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投到人民的队伍来，投到民主革命的阵营来，在消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残余这一工作上尽你们的能力”。

6月5日　　第一野战军于上月11日发起之陕中战役结束，解放渭河以南、秦岭以北、潼关以西、虢镇以东的陕中广大地区，包括西安及23座县城，共歼国民党军2.7万余人，内俘2.17万余人，毙伤2250人，起义1320人，投诚2070人。

△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会晤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指出中国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以及组织不纯等问题，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该组织中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停止其党务活动。本月25日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宣言》，宣布解散（2月25日董在港曾与黄炎培谈及该党领袖人物并非农民，考虑改名农业学会）。

△　上海科学文化界假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盛大座谈会。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方面代表吴有训、陈望道、周谷城、冯雪峰、茅以升、巴金、梅兰芳、周信芳、陈白尘、熊佛西、袁雪芬、张乐平等162人出席。座谈会由夏衍主持。陈毅在会上讲话，他首先对在反动统治下坚持正义斗争的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致以亲切慰问，然后就革命形势及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各种政策作了详尽的解释。谈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时说，“中国不仅欢迎与美、英的正常贸易关系，而且也欢迎贷款和技

术援助”。并表示欢迎文化教育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 蒋介石对即将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阎锡山交待：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岛、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

△ 阎锡山由台湾返回广州，对记者谈话宣称：他组织的新内阁，目标是争取军事胜利，稳定金融，提高士兵及公务人员待遇，组训民众，加大地方职权等等。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在杭州成立。王建安为司令员，谭震林、谭启龙、姬鹏飞（兼政治部主任）为政治委员。

△ 广东省政府派第四编练司令官欧震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代司令。

△ 国民党军增防江西吉安，在陕西宝鸡成立前进指挥所。

6月6日 李宗仁令：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辞准免，特任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行政法院院长端木恺请辞，准免本职，特任王令希为行政法院院长；任命孙越崎兼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派杨森、王缵绪、钱大钧、邓锡侯、孙震、贺国光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夏威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李宗仁在广州讲演，鼓励国民党人“重新领导革命运动”，痛改前非，肃清一切自私自利心理，捐除以往恩怨是非成见。同日，阎锡山谈话，叫嚷“确保华南，寸土必争”，要求英、美等国予以支持。

△ 行政院召开各部、会次长会议，讨论撤逃在广州的中央机关疏散问题。决定各机关按原编制遣散三分之二；留用人员十分之七赴重庆，十分之三留穗办公。

△　蒋介石在黎玉玺司令陪同下乘“永兴”舰由高雄海关码头出港，沿海岸至左营军港及海军总部视察。蒋向黎等鼓励说：“共产党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我们本身能否成功，要看我们自己的做法。”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会晤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黄华要求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停止对其援助，并撤退驻华的武装部队，以表明美国放弃了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在此基础上承认新政府。同时指出，中共在恢复经济、建设国家方面不可能实行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政策，新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商贸关系。

△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布解散在沪之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等组织；解散国民党中统局、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国防部第二厅及其所属一切法西斯特务组织。查封并没收其所有公产、档案。

△　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正人任主任，陈奇涵、邵式平任副主任。

6月7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及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同时成立，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罗荣桓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林彪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萧克任第一参谋长。原中原局及中原军区撤销。

△　阎锡山在广州招待中外记者，宣称：“今后政府决不再考虑与共党言和，坚决领导全国军民戡乱到底。”

△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在南昌创刊。

6月8日　　《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中共中央于3月提出不用战斗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并由华北人民政府和傅作义各派出代表在北平进行具体协商，拟订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经西北军

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同意，是日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签字仪式。参加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及华北人民政府方面有董必武、薄一波、张友渔、杨秀峰。傅作义及绥远方面有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康保安代表）在协议上签字。签字仪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　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告知黄华称：接到美国副国务卿韦勃最近来电，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以获知中共最高层方面对与美国关系的想法，希望黄华将此请求转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了这一请求，毛泽东亲自决定同意司徒雷登到北平晤谈。

△　李宗仁任命刘诚云为总统府参军。

△　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闽东北之福鼎县城，并在该城附近俘国民党军200余人。

△　流窜于南昌郊区的四个保安团共2000余人，在保安第九团正、副团长率领下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　中国反侵略大同盟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一、推定阎锡山、于斌、蒋匀田、贺衷寒、胡国伟五人为常务委员，并推阎锡山为主席。二、以蒋匀田、罗衡、郑彦棻、谷正鼎、张其昀、程天放等所提出之组织宣传意见为原则，交由常务委员会拟订工作大纲。三、大量征求农工及青年群众入盟，开展"反侵略"工作。四、筹备成立各省、市及海外支部。

6月9日　　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联合提出由联合国托管

台湾的计划，主张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台湾独立的目的；并由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

△　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由港抵穗，除晋谒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顾祝同外，并访余汉谋、薛岳等，策划加强赣、粤、湘军事联防。

△　监察院内政地政委员会、财政粮政委员会、交通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各地拒用金圆券，效用已失，财部迄无对策，应予纠正。

△　闽江泛滥，福州市区西南部淹没，部分地区水深达七尺以上。夜间洪水与海水高潮相逢。

△　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主力9日由鄂境通山附近进入赣境武宁一带，一部已至修水附近。是日，驻崇仁附近之二野第十三军第四十三师向新淦方面移动。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杨虎城党籍。

△　豫西国防部第三纵队司令刘希程率部在河南灵宝起义。

△　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秉哲潜藏在上海，被上海市军管会俘获。

△　由白崇禧策划组织的类似特务组织“湖南青年工作团”成立，白崇禧自兼团长，白的亲信、省民政厅长田良骥任团部主任。

△　财政部钱币司在一份签呈中承认：“目前金圆券贬值太甚，各地均予拒用，金圆券事实上已失去流通之效力，在币制迟迟未付诸实施前，市面上无合法之通货，系属实情。”施行了十个月的金圆券步法币之后尘，面临绝境。

6月上旬　蒋介石于上月下旬命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分由平凉、天水、宁夏驰援陕中，协助胡宗南集团反扑咸阳、西安。本月初，二马组成宁青联合兵团，由青海兵团司令官马继援任总指挥，宁夏兵团前线指挥官卢忠良任副总指挥。青海兵团辖第八十二、第一二九两个军，总兵力7.5万余人；宁夏兵团辖第十一、第一二八两个军，总兵力约四万人。宁夏海固兵团（司令官马惇靖）辖第八十一军和独立骑兵军，总兵力约二万人。兵分三路沿西兰公路东进，直扑咸阳。第一路军（中路），由宁夏第十一军担任，取道长武、邠县、永寿，沿西兰公路向乾县和醴泉进发；第二路军（右路），由宁夏第一二八军担任，取道十字镇（属泾川）、灵台县、关头镇（属永寿）、崔木镇（属麟游），沿西兰公路以南向咸阳西南之兴平推进；第三路军（左路），由青海第八十二军及骑八旅等部担任，于西兰公路左侧沿泾河推进。青海兵团之第一二九军后续到达邠县、长武一带集结，为总预备队。

6月11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新阁名单：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仇炯声、国防部长阎锡山兼、外交部长胡适、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端木杰、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政务委员张群、吴铁城、陈立夫、徐永昌、黄少谷、万鸿图（青年党）、王师曾（民社党）。次日，李宗仁以总统明令发表。

△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通过蒋介石关于设立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的提议，由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居正、孙科、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为委员。此委员会将从事党务之改革，以求配合新阁之“战时施政方针”。

△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为对付桂军入滇，力图自保，是日在五华山召集官绅各界座谈会，讨论桂军入滇问题。会议一致同意由省参

议会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议，并要求李宗仁“采取措施，肃清特务组织，保障民权”。省参议会还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作为抗拒桂军入滇的后盾”，“如果滇民呼吁阻桂军无效，决将坚壁清野对付”。卢汉亦宣布“本省绥署及各法团等，一致反对桂军入滇”。李宗仁见云南反对激烈，旋撤销滇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调回桂军第三〇三师，并派广西绥署副主任甘丽初往云南修好。

△　白崇禧宣布取缔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宣称：“各地自救会，擅自收编人枪，把持武力，苛扰人民，应严行取缔，以竭乱源。”

△　第一野战军在陕中的永寿、乾县之间地区，截击沿西兰公路东犯的宁青联合兵团第八十二军之第七十六旅、第二四八师、第一〇〇师、第七十四旅，第十一军之第一六八师，毙伤青海兵团第二四八师2000余人，并击伤该师师长韩有禄。同日，胡宗南部第五兵团趁解放军东撤，进占岐山、扶风。

△　陕北三边地方人民武装收复安边县城。

△　湖南《中央日报》因刊载“国军撤离赣州”的消息，被勒令停刊三天，社长段梦晖遭拘禁。白崇禧为加紧对舆论工具的控制，从5月中旬以来，先后有《长江晚报》、《新潮日报》、《晚晚报》、《实践晚报》被勒令短期停刊或永久停刊。

6月12日　胡宗南集团进占陕中郿县、鄠县。青海兵团马步芳部进占乾县、醴泉。第一野战军于郿县东南之宁堡、金渠镇地区歼胡部第二十八师、第一六五师大部约5500余人，其中俘第一六五师师长孙铁英以下3000余人。次日，胡、马军会合于兴平。18日，马步芳部骑兵在三原被解放军包围。

△　据美联社堪萨斯州尉契塔是日消息：美国比契克莱夫特公司已将该公司所制D—18式双引擎军事教练机20架交给中国政府，以帮助其继续训练空军人员。

△　新华社报道，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中国地理研究所、边疆文化教育馆、开国文献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等17个著名学术机构接收清点完毕。

6月13日　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及各部、会长官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阎发表就职演说及就职通电，宣称“当前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尤宜配合军事，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

△　白崇禧于本月10日致电在港的刘斐，请其回湘。刘复电表示如白能到广州，他愿同白及李宗仁在一起详谈。12日白从衡阳飞广州，是日晨刘斐由程思远、邱昌渭陪同秘密飞抵广州，在中华北路李宗仁官邸与李、白晤谈。刘斐介绍了和谈代表团在北平的活动情况，向李、白指出现在胜败之势已定，无法改变。并对白说“为今之计，只有德公（李）下野，因为他已失去讲和的资格，而由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举行局部起义。这样，不仅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而且还可救全多年追随你们的部下”。白崇禧竟以“汉曹不两立”，表示除与中共拼到底而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　监察院向行政院财政部提出对“通货贬值，币制紊乱，外币充斥，公私交困，财政当局熟视无睹”的纠正案。

△　北平各界代表、民主人士、华侨青年200余人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热烈欢迎南洋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等。北平市长叶剑英及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彭泽民、许广平等先后致欢迎词。陈嘉庚报告了南洋华侨的现状和南洋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近况。

△　向咸阳、西安反扑的宁青联合兵团总指挥马继援，侦知守卫咸阳之解放军兵力不多，西安也空虚，为与宁夏兵团争功，擅自改变原定进军路线，将担任左侧翼掩护的第八十二军移至西兰公路，当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到达乾县时，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越过乾县，令第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为咸阳步骑总指挥，集结第一九〇、第二四八师

和骑八旅近三万人攻打咸阳。马继援扬言："明天早上就把八十二军的军旗插在咸阳城楼上。"经是日一昼夜的激战，多次组织强攻，几度与守城的人民解放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均被人民解放军击退。马部被歼2000余人，败退乾县。胡宗南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　第三野战军解放古田县城。国民党军向福州方面逃窜。

△　粤东梅县、五华、兴宁、紫金、大埔、蕉岭六县人民起义驱逐国民党军。地方人民游击队解放惠来县城。

△　重庆市长杨森，以渝市财政困难，公教人员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电广州行政院呈请辞职。旋得复电恳切慰留，28日，杨打消辞意。

△　华北人民政府命令绥蒙区改为绥远省，绥蒙政府改名为绥远省人民政府，原绥蒙政府主席杨植霖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　上海《大公报》报道，华东军政大学成立，校址设在南京、苏州，陈毅任校长。

△　香港特务部不顾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顽固实行《取缔社团活动条例》，是日强行搜查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方方的住宅。

6月14日　浙江反共第二司令部司令曹家政率所部1358人向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第二军分区投诚。

6月15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产业界民主人士陈叔通、海外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等先后发表讲

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已经成熟，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两字。新华社同时发表了题为《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短评。

△　阎锡山召集行政院首次政务会议，通过封锁解放区海口等案。并通过对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张轸撤职并通缉，派赵子立（原张轸所部第一二七军军长）暂行代理河南省主席职务。

△　在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主持下，纽约召开“庆祝新中国——拥护和平的战友”大会，与会者万余人。大会通过致中国人民的贺电。

△　空军第十一大队毛履武驾驶P—47战斗机一架起义，由陕西南郑飞抵河南安阳。

△　浙东临海县城国民党军戚永年部三个团39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　台湾省政府正式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及《新台币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台湾省政府宣称此次新台币发行，有中央银行存台的80万两黄金作准备金，有美钞1000万元作为台省对外贸易的基金。发行办法为：一、指定由台湾银行发行。二、发行总额以二亿元为限。三、单位为元，面额为一元、五元、10元、100元四种。四、辅币为角、分，面额为一分、五分、一角、五角四种。五、以美元为计算单位，与美元的汇率为5：1。六、与旧台币的兑换率为1：4万，并限于12月31日前兑换。七、流

通范围以台湾省区为限。八、以黄金、白银、外汇及可以换取外汇的物资为准备金，十足准备发行，可以无限制储兑黄金。此外，台湾省政府为维持新台币币值，宣布割断新台币与大陆上金圆券的一切联系。

△　上海《文汇报》复刊。该报于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强迫停刊后移至香港出版。本月7日，该报社20余人由香港返抵上海筹备复刊。沪刊恢复后，其港版仍继续出版。

6月16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李济深任执行主席，周恩来作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和草案第八条关于表决问题的说明，指出筹备会的主要任务。会议修正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通过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李立三、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马叙伦、马寅初、乌兰夫、章伯钧、张澜、张奚若、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黄炎培、蔡廷锴、蔡畅、谭平山21人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

△　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余心清、周新民、孙起孟、宦乡、沈体兰、罗叔章、连贯、阎宝航为副秘书长。会议决定设立秘书处、庶务处、招待处、新闻处四个工作机构，以梁蔼然、周子健、申伯纯、宦乡分任处长。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该办法规定本届会议设立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之单位及其代表名单；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指定李维汉为第一小组组长，章伯钧为副组长；谭平山为第二小组组长，周新民为副组长；周恩来为第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董必武为第四小组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郭沫若为第五小组组长，陈劭先为副组长；马叙伦为第六小组组长，叶剑英、茅盾为副组长。会议还

通过《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执行表决具体办法》。

△　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西北局委员会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芳、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九人为常委。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　李宗仁、阎锡山联名致电蒋介石，坚请莅穗主持大局。

△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毛泽东主席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周恩来题词："光明之路"。该报刊登《发刊辞》，以民盟的奋斗目标"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目标，提出新闻方针四点：一、负责的态度；二、服务的精神；三、建设的批评；四、忠实的报导。

6月17日　中共中央就江西农工民主党及其武装问题，指示中共江西党组织，指出农工民主党在江西的地方组织颇多，成分虽然复杂，但确有一批进步分子，在赣南与我地下组织有合作关系，要慎重处理与该党有关的问题。对江西农工民主党地方组织或个别党员所掌握的武装，应交人民解放军整编。

△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在官邸宴蒋梦麟、晏阳初、陈开泗、卢作孚、何北衡等，就川省农地减租事宜交换意见。

△　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邵式平任主席，范式人、方志纯任副主席。本月25日成立人民解放军江西军区，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彭嘉庆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　湖南衡阳地区遭受水灾。是日长沙电称，房屋被冲毁7000余幢，田地被淹没、冲坏80万亩，死亡二万余人。

6月18日　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分别举行成立会和第一次会议，

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的第二小组推定周新民等草拟讨论提纲。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在会上说：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会议决定由中共起草共同纲领初稿。负责起草政府组织大纲的第四小组，推出张志让、张东荪、滕代远、阎宝航、雷洁琼、陈其尤、林砺儒七人草拟讨论提纲。负责起草新政协大会宣言的第五小组，推定郭沫若、胡愈之、胡乔木拟出宣言初稿。

△　蒋介石自高雄复电李宗仁、阎锡山，略谓：“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扶倾，辛劳倍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于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对于国际传闻台湾由联合国托管之说，蒋介石申明：“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

△　阎锡山向李宗仁报告拟议之施政方针。李询问几天来处理政务情况，阎答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进而说：“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财政，财政累倒金融，金融减低收入。财政又影响军事及庶政，中央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部署。”以及“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　行政院下令全面封锁中共占领区沿海港口，自闽江口起至辽河止，自6月26日起施行。

△　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公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经（日本人）、伯彦苍（蒙古人）、吴人杰（中美混血）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发机六部、发电机三台、密码16本，以及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罪证。

6月19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

行。周恩来任执行主席。就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问题作说明，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作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这个规定。会上还对16日全体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会议通过了两项临时动议：一、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敬，全体代表当即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二、毛泽东提议本年7月7日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单位联名发表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文件，即经会议一致通过。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告闭幕。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函在沪之宋庆龄，谓："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　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在北平举行。东北、华北、天津等地和北平的科学界人士共120余人出席。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陈云、林伯渠等出席并讲了话。大会推选吴玉章为主任委员。

△　人民解放军渭南、大荔分区部队在解放潼关后进军华山。根据华山天险，避开正面，在当地群众协助下，于14日凌晨3时登上北峰，全歼北峰守军。15日晨迫使温神洞守军投降，接连占领苍龙岭、千尺幢、温神洞三据点。盘据西峰的国民党保安第六旅旅长韩子佩，于是日上午缴械投降，华山解放。

△ “反共救国总队”在广州成立，参加者3397人。阎锡山在会上训词，谓“民国缔造艰难，不容失败”。

6月20日 行政院第六十九次会议通过《行政院战时施政方针案》，在政治上“加强省县地方职权，使能适应时机，走上全面总体战的目的”，并要求“加强地方武装，做到民众自清、自卫、自治”，“实行兵农合一，以充裕兵源”。军事上要“核定兵额，提高剿匪情绪”，“厉行赏罚，破格提拔忠勇有功将士，严格整饬军纪，务求做到令行禁止”；“发展民众武力，做到全面总体战”。经济上提出要“改革币制，稳定金融”，“扶植工商业”，“发展农业生产”。外交上要加强“与各民主友邦反侵略阵线的关系”。阎锡山还在会上提出控诉苏联案，他说：“我们不控诉苏联，是我们失了光明，鼓励了侵略”，“要世界各国知道侵略中国的祸首是苏联”。

△ 行政院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派潘文华、陈明仁、宋希濂、徐祖诒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兼副长官，宋希濂仍兼湘鄂边区绥靖总司令，徐祖诒仍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29日，李宗仁明令发表。

△ 蒋介石接获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告，略称：“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即电示该团负责人详告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一、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反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二、台湾很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反共力量之新的政治希望。三、美国政府即令单从实际的利害上考虑，亦决不能承认中共政权。四、“深盼麦帅本其在东亚盟国统帅之立场，以其对于赤祸与东亚前途之关系”，应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

△　行政院新闻处处长鲍静安发表声明宣布：“即自闽江口北东经119°40′，北纬26°15′之起点，往北至辽河东经122°20′，北纬40°30′为止点，沿海领海岸领海范围以内地区暂予关闭，包括永嘉、宁波、上海、天津、秦皇岛在内，严禁一切外籍船舶驶入。”“自本月26日零时零分起对外籍船舶之违反此项决定者，即予制止。至外籍船舶因违反此项决定而遭遇之任何危险，应由其自行负责。”以上各节，同时由外交部分别通知各国政府转饬遵照。

△　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召开，在粤之中常委及李宗仁、阎锡山、顾祝同、萧毅肃、程思远等出席。首由顾祝同报告上海撤退后的军事形势，继由参谋总部次长萧毅肃说明西安撤退后，胡宗南、宋希濂等部准备退守四川，而保卫广东仅能依靠白崇禧指挥的三个军。对此吴铁城责问说：“5月下旬汤恩伯从上海撤出，为什么调去福建而不调广东？刘安祺兵团从青岛撤出，为什么远去海南岛而不调粤北？从这些部署来看，国防部只准备守住沿海一些岛屿，从来没有制订保卫华南的整个军事计划。”提出“本党为救亡图存，复兴再起，当以保卫广东为首要任务”，并责问：“国防部这样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顾祝同答谓：“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问题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与会者均缄口不语。

△　白崇禧为阻挠湖南省主席程潜走和平道路，意欲吞掉驻扎宁乡至岳麓山一带的程嫡系部队第一〇二军第三一四师，便借整编之名，交由他认为“反共坚决”的陈明仁对湖南部队进行整编，并将第三一四师番号秘密撤销。该师师长陈达探知白的用心，即与驻该师中共地下党代表罗觉生等商定，接受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党第四军第二师番号，于本月10日率部进驻宁乡莲花山，提出“打倒白崇禧，保卫程主任”的口号。程潜担心陈达此举影响湖南整个计划，经与陈明仁、李默庵商定将该师改编为保安师，动员该师开回岳麓山。是日，陈达率第三一四师分两个纵队向岳麓山开进时，白崇禧密调转向衡阳开拔的嫡系第七军及其他一部共1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绕道湘潭，埋

伏于第三一四师必经之地，待其进入埋伏圈，突然发起攻击。第三一四师于仓促中被迫应战，激战一夜，击溃桂军两个团，终因寡不敌众，全师溃散，师长陈达、副师长刘隽只身逃走。其向西突围之第四九〇团一部加入中共地方游击队。

6月中旬　　参加太原战役之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辖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军）、第十九兵团（辖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及第七军、第一军之第三师、第三军之第八师等部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力量超过国民党军。

6月**21**日　　晚8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常委16人，列席五人，周恩来任会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五项决议：一、常务委员因故不能出席常委会，毋需请人代理。二、第四小组副组长黄炎培南下期间，其职务由张奚若代理。三、修正《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全文。四、关于工商、教育、社会科学等团体的筹备发起与促成工作，指定下列代表邀请有关方面举行座谈，于一周内拟出具体方案提交常委会：工商方面由陈云、李烛尘等五人负责；教育方面由李维汉、董必武等七人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由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三人负责。五、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文告由第五小组起草。

△　蒋介石偕俞济时等由台北松山机场飞福州，上午9时半在福州南郊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参加人员有福州绥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及各军正、副军长、师长等80余人。首由各单位主官报告军情概况后，蒋介石训话，声称他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并说“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异于寻常”，“没有福建就无以确保台湾”。这次会议就福建的防务，调整机构与部队整编等作出决定。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统一指挥浙、闽、粤、台四省军政事宜，长官人选待定。即行成立东南区点验整编委员会，以蒋鼎文、俞飞鹏充正、副主

委。会后，蒋分别召见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等九人个别谈话。下午3时，蒋乘原机返台。

△　刘少奇率领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随团工作人员有师哲、邓力群、戈宝权。

△　周恩来致函宋庆龄，略谓：“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　李宗仁明令公布《惩治叛乱条例》，凡13条，并废除《善后事业委员会组织条例》。

△　胡适电辞外交部长职。阎锡山要求胡不要公开发表辞不就职的消息。

△　香港太古公司代理之英国邮轮“安琪色施号”于是日晨在吴淞口外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四名船员受伤，一为重伤，该轮随即倾斜，搁于海滩。数小时后，国民党飞机复来轰炸，弹落英商亚细亚公司油仓，焚毁火油二万罐。英国大使馆驻广州代表科格希尔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并声明英政府保留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25日，外交部答复英国的抗议，要求英轮驶离各封锁港口。

△　广东省第三十次省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省银行，仍以现兑及兑现办法继续发行广东省大洋票，作为本省通用货币，票额分为一元、五元、10元、100元四种。

△　李宗仁代表甘介侯晤美国总统杜鲁门，面交李宗仁致杜鲁门亲笔函，并详细解释李宗仁和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抵抗共产党之秘密计划，要求美国予以援助。杜鲁门对国民党政府从东北到长江流域如此广大的土地连同美国提供的大量军火弹药如此迅速地落入中共手中表

示极为失望，他说：“我希望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军队仍然准备和愿意打仗。”

△　行政院第七十次会议决议：一、派张官玮为黔桂边区绥靖司令官。二、派孙渡为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

△　行政院电令各省中央银行，规定金圆券与银元比值为金圆券五亿元兑换银元一元，并准照此比值缴纳各项税款。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制订辖区各省、市第一期政务提要。对于土地改革，分如下四纲：一、实行农地减租，力求贯彻，以安定农村社会。二、督导垦殖荒地，扩大冬耕面积，推广优良品种，维护农村副业，运用义务劳动兴修水利。三、研究实施兵农合一政策。四、普遍成立保农会，并由下而上，彻底改组各级农会，以团结农民，促进土地改革，加强“戡乱自卫”力量。

△　《和平日报》总社董事会议决议，将各地《和平日报》恢复《扫荡报》原名，以配合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扫荡精神”，该报台湾版已定于23日起改称《扫荡报》。

6月23日　董必武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起草提纲委员会上谈政协的性质、地位和新政权的组织问题，他说：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产生政府，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关，将来是人民代表大会；政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

△　行政院长阎锡山今晨接见由闽飞穗之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研讨海军封锁各港口事宜。

△　行政院新闻处发表战时施政方针，以军事为核心，一切都为支前，做到全面总体战。

6月24日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史良、罗隆基，三民主义同志会郭春涛，民革王葆真等由沪抵达北平，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

董必武、李维汉以及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常委沈钧儒、章伯钧，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三民主义同志会中常委谭平山，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彭泽民等15人到车站迎接。

△　蒋介石在台北主持东南区军事会议。同日，蒋拜访吴稚晖，决定设立总裁办公室。

△　李宗仁令：一、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呈请辞职，准免本职，特任邱昌渭为总统府秘书长。二、准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辞职，特任徐堪兼中央银行总裁。

△　监察院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拥护立法院决议征借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等财产10亿美元一案，要求行政院迅予强制执行。下午，行政院长阎锡山举行招待监察委员茶会，哀叹目前情况“最困难的就是财政，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关头，如果我们再变不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路来，整个国政就都没办法了”。

△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自渝飞穗，次日晨往行政院晋谒阎锡山，报告川省政情，并请示今后施政要旨。26日，奉召飞台见蒋介石。

△　白崇禧为“围剿”中共湖南地方游击武装，从第一兵团抽调兵力分从益阳、安北、邵阳向宁乡、长沙方面压迫、包围；同时指使土匪头子、“西南民主联军”总司令尹立言率部从武岗到湘乡、安化边界插入中共游击队根据地。这一计划由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秘密抄送中共湖南省工委。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司令姜亚勋获悉，决定集中力量对尹立言部予以打击。是日拂晓向“西南民主联军”发起总攻，上午9时攻入其指挥所，“西南民主联军”溃不成军，尹立言落荒而逃，其副司令龙锡金以下千余人被俘。游击队获胜后向西北方向转移，致使沿宝潭公路进攻的国民党军扑空。

△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令长沙市警备司令部解散长沙市学联。

△　贵州安龙县（今安龙布衣族苗族自治县）永和一带的人民群众，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下，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举行武装暴动。是晚，群众武装开始袭击永和乡，乡长率乡丁逃跑，暴动取得胜利。其后，暴动武装采取灵活战术与前往镇压的大批国民党军展开游击战，一直坚持到贵州解放。

6月25日　第一野战军在陕西郿县东南地区的阻击战结束，粉碎了胡宗南及马家军由西向东分路向咸阳地区的联合反扑，共歼胡、马部1.354万余人（其中毙伤9770人，俘虏3410人，起义360人）。次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指示“杨（得志）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任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特别指出“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　陆军总司令张发奎辞职获准，遗缺以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张、顾二人于今日上午举行接交仪式。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在渝市参议会召开座谈会，到工商各界500余人，讨论平抑物价办法，决定恢复议价，物价以本月22日为准。

△　台湾警备总部在基隆成立海防指挥部。

6月26日　张治中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首先驳斥国民党中央社报道“张治中在平被扣”等几则电讯乃“一派胡言诳语”。阐述他留平80多天的所见所闻，“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势，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新的希望”，使他“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继则指出和谈破裂的责任在于国民党当局，希望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当局“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现在虽未为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

△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莫斯科。2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

△　上午10时，董必武、李维汉、孙起孟、张奚若、周扬、吴晗等40人在北京饭店举行教育界座谈会，讨论筹备召集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由到会者为发起人，推选董必武、林砺儒、钱俊瑞、孙起孟等11人组成干事会，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　蒋介石于24日到达台北。是日，李宗仁、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催其赴穗。立法委员180余人亦自广州联名函请蒋介石即日前往主持危局。同日，蒋介石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与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妄称“不出三年消灭中共”。

△　吴铁城在广州广播电台播讲《反共斗争与世界前途》。宣称：“如果世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无可避免，那么第三次大战实已在亚洲爆发了。在欧洲的只是冷战，而在中国的却是热战，这种热战发展的结果，便是世界革命，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底不能避免的了。”

△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由穗飞台，先与台湾空军当局策划共同执行封锁港口事宜，后见蒋介石，报告执行封锁工作经过。

△　美联社华盛顿消息披露：国民党当局用1948年4月“援华”拨款而在美国所购买的军火武器，已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运往台湾。

6月27日　民社党革新派领导人汪世铭就该党参加新政协事会晤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李维汉向汪表示，经过各方商讨，认为民社党革新派从过去的历史来说，如作为参加新政协的一个单位是不适当的，但革新派中之个别人士可被邀请参加，革新派的组织可以结束，其中为民主事业奋斗之青年可介绍加入民主党派。汪表示接受，但需等主席沙彦楷来平后再作最后决定。民社党革新派建立于1947年8月，因成份复杂，立场各异，造成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沙彦楷、汪

世铭倾向中共主张，被邀以个人名义参加新政协。

△　四川省府主席王陵基到台北谒蒋介石，报告四川政情。王向蒋告密说："熊克武等以中间路线之姿态，作通共的准备。"蒋嘱其"对川中抗战有功的将领，切实设法，一一予以安置，以安其心，俾免为共党所乘"。

△　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一行七人，于是日下午由穗飞台北，陈诚、桂永清、孙立人等数十人前往机场迎迓。当日，陈诚宴请顾等一行。

△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柯慎思与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互换《关于展延及修正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协定》，规定设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　华北人民政府命令施行华北各港口出口物资一律免征出口税，并颁布《奖励土产品出口办法》。

6月28日　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遵毛泽东继续西进的电示，于昨日至是日，收复为胡、马军侵占之陕中醴泉、乾县、兴平、盩厔四个县城，毙伤胡、马集团官兵1.3万余名。

△　监察院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一、加强战地巡察工作，以激励士气案。二、撤销豫鲁区行署案。三、纠正京沪失守措施案，交国防及有关委员会修正后再提出讨论。监委王冠吾临时动议请彻查外交部签发出国护照情形予以纠举案，决议推丘念台、宋英、王冠吾三委员先行调查。四、七月份院会暂停召开，必要时开临时会。

△　陆海空军司令部代表及交通部代表九人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封锁港口之若干技术问题。

6月28日　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斯大林表示，联共（布）中央委员

会决定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三亿美元的贷款。

△　李宗仁特任刘峙为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成武兼天津警备司令，王世英为副司令。

6月29日　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由阎锡山主持，讨论事项为：一、财政危机案，决议交财政部研究并拟具详细计划，改期讨论。二、监察院函请行政院强制执行征借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在美存款10亿美元案，担心强行征借引起外交问题，决议由政府向各富户筹借财产，将来仍由政府负责偿还。三、中央各机关分地办公之公务员及直系亲属之疏散问题，决议由政府免费空运。四、划一各机关公教人员待遇及补助费案，决议交财政部主计处拟具体办法再行讨论。

△　美国政府照会外交部，表示不承认封锁港口为合法，提出“除非能有效的实施封锁”。次日，外交部复照美国政府，声称封锁港口“系在主权范围之内，盼能与中国政府合作”。

△　绥蒙野战军第八军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民任政治委员。

6月30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该文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文章还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对于苏联和帝国

主义国家的不同态度，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一边，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篇文章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　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在中共地下党及章士钊等爱国人士的推动下，决心走和平道路，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他在《备忘录》中说：“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并提出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是日，毛泽东接到程潜的《备忘录》，一面电示四野陈兵湘、鄂边境，一面调派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湖南慈利人）和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灏往武汉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

△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发言人警告宋希濂：如敢破坏沙市江堤，将予缉拿严惩。

△　胡宗南部第一二三师第三六七团团长汪平、第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团长王宋义率所部一部向解放军投诚。

△　上海军警联合办事处破获蒋经国临逃前在上海布置的“中训团”特务组织，特务孙平等八名捕获归案，周百扶、刘少棠、张炳生三名投案自首。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称：如果他能获准去北平，这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同中共最高级领导人非正式

会谈的绝无仅有的机会，他将给华盛顿带去关于中共意图的最权威的报告；而且“此行将是迈向互相谅解的第一步”。

△　经济合作总署长霍夫曼宣布中国分署长莱普汉与副署长葛里芬辞职，由分署专门助理梅国章任代理分署长。

是月　章士钊在香港托程潜族弟程星龄带信致程潜，信中提到毛泽东关于陈明仁在四平街顽抗的一段谈话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的，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的。”陈明仁得悉中共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打消了走和平道路的顾虑，要求李君九向中共表示起义决心。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余志宏晤陈，陈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程潜字颂云）造福桑梓，酝酿义举，子良（陈明仁字子良）深表赞同。”又说：“我过去一向反共，四平街一仗更得罪了贵党，本人深为内疚，现在愿意追随颂公起义，以挽回历史过失之一二，但我的部队不能看作是投降。”

△　由英国租借给中国政府海军之“灵甫号”护航驱逐舰，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下曾酝酿起义，由于“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后，海军当局加强了对该舰的控制，起义计划失败。上月27日“灵甫号”开往香港交还英国。该舰爱国官兵尚坛、高光祥、张炳奎、曹助燕、陈淇川、张炳中等72人于本月从香港分三批北上，经天津到达东北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海军。

△　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所属各军分区武装部队先后肃清余姚、绍兴、诸暨、金华、兰溪、临海、黄岩、桐庐、建德等县国民党残余武装3470余人。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各地方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共歼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1.82万余名，其中5月份共歼1.1万余名，6月份歼6900余名。

△　黑龙江讷河、克山、拜泉、绥化等11县本月上旬先后发生虫灾、雹灾、风灾。中旬以来虫灾扩大到19县，灾情继续蔓延。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展开灭虫运动。下旬，肇东、洮安、洮南、嫩江、泰安、富裕六县又发生夜盗虫，肇东有1200垧庄稼被吃光。

7月

7月1日　　北平三万人盛大集会，热烈庆贺“七一”，毛泽东亲临参加，朱德出席讲话。

△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口号，首次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

△　国民党设置总裁办公室，下设设计委员会及各组，分别掌管党务、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及国际国内宣传和研究，王世杰、俞大维、张道藩、俞鸿钧、吴国桢、胡健中、方治、余井塘、雷震、端木恺、任卓宣、叶公超、徐柏园、罗时实等为设计委员。

△　行政院公布截断共区海上交通办法，船舶不得自任何港口驶往中共控制区，若无法截获时海军可以击沉之。

△　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在成都成立，熊克武任主任委员，邓锡侯、王缵绪、向传义、孟广澎、余中英为常务委员，陈古枝为秘书长。

△　代总统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在驻美大使顾维钧陪同下，会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援助，并表示反对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白皮书。艾奇逊表示，台湾作为军事基地是无法守住的。

△　台湾省通志馆正式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林献堂为主任委员，黄纯青为副主任委员。

△　艾奇逊复电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　英国驻华大使馆中国问题顾问柯希尔在广州向外交部提交照会，拒绝承认国民党军封闭解放区港口有效。

△　解放军榆林地方武装解放伊克昭盟之扎萨克旗，俘敌保安副司令董国山，肃清扎萨克旗王府至榆林间的国民党军。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出消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的战役指示及在少数民族地区作战的政策纪律。

△　京（宁）沪、津浦两铁路12年来第一次修复，晚8时在上海举行首次试车典礼，直达北平。

7月2日　菲律宾总统季里诺邀请蒋介石赴菲访问。

△　由于金圆券完全丧失信用，7月1日经行政院会议通过，是日由代总统李宗仁命令颁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进行币制改革，以银元为单位，并“为便利行使起见，由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规定每券一元同于硬币银元一元，各省得发行一元及一元以下之辅币券。

△　白崇禧在长沙召集湘桂联席会议，程潜、黄旭初、邱昌渭、李汉魂等出席。

△　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代表赵珮由兰州飞抵广州，谒见行政院院长阎锡山。3日上午谒见李宗仁代总统，报告西北战况，并请军需补给。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5、6月份战绩公报，消灭和改编敌军共46个整编师，42.3万余人。

△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从苏州、常熟、嘉兴等地开始向福建进军。

△　港英当局以公共卫生危险为由，是日出动大批警察，强行拆毁九龙城内谭公道两旁木屋数百间，此后共拆毁2000座木屋，致使6000余中国贫民无家可归。

7月3日　　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内政部长李汉魏及立法委员程思远从长沙返广州，向李宗仁、阎锡山报告白崇禧、程潜关于保卫华南意见。白、程均主张调遣有力部队增防华南，并以强大空军配合陆军主力，发动攻势，俾一举击溃共军主力，奠定反攻之基础。

△　国民党军重新进据福建长汀、连城。

△　空军轰炸上海真如、龙华。又飞机一架至皖南望江、宿松上空，轰炸抢修江堤民船，向修堤民工扫射。

7月4日　　蒋介石在台北接受美国国际新闻社远东总经理韩德曼及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报远东特派员范智华访问，蒋表示对美国的援助“决无为期太晚之意念”，断言“如亚洲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则另一次世界大战，更无法避免”，并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反共。当记者问：“阁下是否计划恢复政治之领导地位？”蒋介石回答说：“自孙总理逝世以后，余即继其为领导国民革命之领袖，早已献身于国民革命，以谋中国人民之自由与国家独立。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之地位，自将继续完成此一付托之重任。”

△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从长沙到达常德，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先期到达，举行湘西善后会议，收编湘西地方武装，并会商防务。

△　毛泽东致电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

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

△　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之情况，并谓：中共“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中国将实行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平等互惠地与各国通商贸易的外交原则；毛泽东将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后公开访问莫斯科”。

△　阎锡山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粤穗省市党部联合纪念周，作就职行政院长后的首次施政报告，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政治对政治，军事对军事，经济对经济，民众对民众的总体力量，以争取胜利”，并表示要“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任务”。

△　财政部公告，外币仍准许人民持有，但不得流通买卖。

△　国民党军四路围攻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解放军分两路撤退，国民党军胡琏兵团重占粤东平远。

△　空军开始向解放区各重要城市及交通线作有计划轰炸，安庆、九江、永修及沪宁、浙赣线遭到轰炸，平民损失严重。三架B—24型轰炸机向上海真如电台投弹25枚。

7月5日　　行政院战时经费筹募委员会议决推行临时财产税，发行爱国银元公债三亿元，并举办爱国捐献银元一亿元。

△　李宗仁令准免孙越崎兼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命刘航琛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　李宗仁任命张光玮为黔桂边区绥靖主任。

△　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在第一次战时经费筹募委员会上讲话，强调供应战时经济需要，必须真正做到有钱出钱。

△　解放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等部攻击浙江象山半岛，解放宁海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军一部。

△　解放军第十兵团解放福建尤溪。

△　解放军游击队在粤东揭阳、赤寨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

7月6日　　由蒋介石领衔，与李宗仁、阎锡山、胡适、于斌、曾琦、张君劢等中国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无党无派人士发表《反共救国共同宣言》，表示要“为救国家争自由而与共党奋斗到底”，由国民党程天放、青年党王师曾、民社党万鸿图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

△　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共中央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学习苏联以下问题：一、国家机构；二、经济的计划与管理；三、文化教育；四、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信中还提请苏联政府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作出帮助，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工作等。

△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对宜昌、沙市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发觉解放军企图后，即于10日收缩后撤。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确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即先歼灭胡宗南部主力的作战方针。

△　国民党军胡琏兵团重占梅县。

△　轰动全国的国民党军前联勤总部第四收支处长沈同尧、万国钱庄经理张裕良贪污军费一案，经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批示，

总统府核示，沈同尧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张裕良判有期徒刑15年，褫夺公权10年。公文到达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后，引起军官、士兵的普遍不满。

△　原驻上海美国副领事欧立夫，驾车冲击群众游行队伍，违反警章，打伤警员，被拘留后，判拘役三日，至7月9日释放。

7月7日　　北平各界20万余人，集会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朱德参加了集会。

△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发表宣言，强调处理日本问题必须征求中国的意见，决不允许由美国政府一意孤行，擅作决定，反对美国使日本继续军国主义化，宣言指出：“为了最后实现抗日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致要求迅速签订对日和约；我们一致主张在准备对日和约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照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的程序，并且必须由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派遣中国的全权代表。”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表广播演说，坚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要求按照波茨坦协定，实现日本非军事化，并进行民主改革。

△　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广播讲话，承认以往政治上腐败无能，造成今日糜烂挫败之恶果，申明反共意义，并强调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彻底改革。

△　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查全国各省除新疆、西康、青海、台湾四省及西藏外，均予实施戒严，并划长江以南各省为警戒地域。”同时，行政院会议议决，将苏南、皖南、鄂南及湘、赣、浙、闽、粤、杭诸地，一并划作接战地域。

△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宣称，中国政府在上海港口已作有效的关闭，倘使外国舰艇竟驶入上述领海内，政府海军必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国民党海军开始对上海等解放区港口进行封锁。

△　中共与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应负使中国人民蒙受苦难及稽延缔结对日和约之责，并要求代表中国出席对日和约的全权。

△　解放军攻占当阳、远安地区，扼制白崇禧的华中局部反攻计划。

△　行政院令在新疆迪化参加中苏通商谈判的代表暂缓进行谈判。

△　贵州省参议会决筹募自卫经费，并成立捐献委员会。

△　福州绥靖公署枪决逃到福州的霞浦县县长徐尧炤。

△　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东纵队攻陷饶平。

△　国民党军重占福建上杭、永定、新丰。

7月8日　　蒋介石主持国民党整理党务会议，讨论改造国民党的方案，蒋力主国民党性质应为革命民主政党，而不能纯为民主政党，并决定总裁办公室组织大纲。

△　驻东京代表团朱世明团长致电蒋介石，报告和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谈话情形："麦帅表示中国政府决不可放弃大陆，并须确保台湾，对共产党奋斗到底。对于我政府海、空军主力集中台湾，表示同意，对于封锁匪区（指解放区）港口亦表赞同"，并陈述麦克阿瑟本人极力主张援助国民党。

△　阎锡山主持中国反侵略大同盟第四次常会，通过保卫华南反

侵略宣传计划案。

△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五兵团、第十二兵团、附属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以第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诱敌增援，但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六军等部已先期撤退，四野即以第十二兵团由湖北通城、第四兵团由江西新淦分别向萍乡地区迂回，以求包围华中白崇禧所部于浏阳、醴陵地区。

△　国民党军失去象山半岛上的最后据点象山县城，除舟山群岛外，浙江全省解放。

△　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向各部队长宣布《绥远和平协议》，并进行说服工作。

△　归国华侨联谊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彭泽民任主任。

△　西藏摄政达扎与印度驻拉萨总领事（英国人）里查逊密谋，突然切断与外界的电讯联系，以西藏噶厦政府名义，通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章，以西藏境内的汉人中有共产党为由，限期驻拉萨的蒙藏委员会办事处人员撤离西藏，完全封闭汉族学校，驱逐汉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平措旺阶（汉名闵志成）。

△　空军轰炸福建建阳县城，全城民房被毁三分之二。

△　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枪决前国民党军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判处第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徒刑10年。按：原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在太原准备起义，被戴、仵两人向阎锡山告密，黄和解放军联络员晋天被捕，解往南京后遇害。

7月9日　　蒋介石飞抵福州，与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商讨福建军政问题，旋飞回台北。

△　中共中央电湖南省工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即将发动进攻，对

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潜，不要怀疑，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

△　阎锡山主持政务会议，特任邵毓麟为驻韩国大使；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另有任用，应予免职；张淦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配合研讨会在长沙开幕，白崇禧提出三大公开，即意见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实行空室清野。会议通过了军政配合方案。

△　国民党军自舟山进攻镇海及象山港。

△　《大公报》报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拒绝了蒋介石要求美国援助的请求，表示美国将继续援助广州的民国政府，而不会援助台湾的蒋介石。

7月10日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偕王世杰、吴国桢等10余人自台北赴菲律宾访问，在菲夏都碧瑶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商太平洋反共联盟问题。

△　中共中央军委电林彪等，令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及鄂西军区部队自竹山、白水西进，国民党军以第六十九军、第九十八军、第二十七军等部三个多师扼守陕南要地安康门户、陕鄂交界的要隘关垭子，经过激战，解放军攻占关垭子，歼敌2000多人，俘敌第一四四师师长符树逢，解放平利，进迫安康，威胁汉中。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部署发起扶郿战役，第六十一军攻击子午镇一带敌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八十四师一部，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入阻击阵地。

△　马步芳的私人代表马绍武在台北松山机场谒见蒋介石，面递

马步芳私人要件。

△　解放军进占高安，于高安以西歼敌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一个团大部。

△　英国商轮“岳州号”在浙江沿海被海军阻截。

△　福建绥靖公署令第九十六军以古田为目标，向西北发起攻击，在雪峰地区与解放军对峙。

△　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前中央大学教授张西曼在北平逝世。

7月上旬　　立法委员徐中齐等55人致函川康渝民意代表联席会驻渝常务委员，指责其侵越议会权责，拒绝迁都及废止金圆券，要求其自动解散。

△　自上月下旬以来，各地暴雨成灾。四川境内长江、沱江、岷江、涪江等江河暴涨，成都低洼之地，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停顿，宜宾、泸县、新津、乐山、简阳、内江、绵阳、遂宁等77县受灾。湖南资、沅、澧流域及滨湖地区几成泽国，为1887年大水以来所未有，52县市成灾，已有报告的23县市，共冲毁500万余亩农田，房屋5000余栋，被灾人民200万，二万余人死亡。两广地区，柳州、桂林洪水泛滥，为20多年所未见，西江水位超过粤省过去水患的记录，西江的鹤山、高要、三水，北江的清远，东江的河源、东莞，围堤崩决，淹毙人口七万人以上。长江大水，芜湖7月2日洪水漫进市区。冀中山洪暴发，滹沱河经过无极到达安平辛营漫出河槽，潴龙河、永定河等水位猛涨，天津已达警戒水位，黄河已超过去年最高水位，徐州旧黄河决口。

7月**11**日　　蒋介石与季里诺发表联合声明：“余等鉴于已往远东国家之彼此联系合作未臻密切，又鉴于远东国家之自由与独立，现正

遭受共产势力之严重威胁，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蒋介石并附带声明：“余此次系以私人资格应菲总统之邀请与会晤，但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中国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同日，蒋介石就组织远东联盟国家问题，致电韩国总统李承晚。

△　刘少奇应邀列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斯大林主持。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商谈。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主力第一、二、十八三个兵团，向胡宗南部发起进攻，胡宗南部第六十五军、三十八军及第十八兵团部连夜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一野第二兵团秘密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从胡宗南部和青、宁马步芳、马鸿逵两军的结合部，通过大沟悬崖，是日拂晓，从胡宗南部第三十八军后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前敌将领不相信解放军主力已经开始突击，反应迟缓。

△　解放军第六十一军在西安南子午镇一带歼敌第十七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部。

△　解放军第十九军进占平利县城。

△　毛泽东、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榆林驻军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勉励其接受和平解决榆林。

△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配合研讨会闭幕，将全省划为若干绥靖区，建立军政合一的指挥中心，贯彻总体战。

△　英国外交部就国民党军封锁解放区沿海港口问题，提出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

△　国民党军重占粤东饶平。

△　绥远奋斗日报社被国民党特务煽动士兵捣毁。

7月12日　蒋介石从菲律宾飞回台北。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于拂晓占领青化、益店、罗局镇和郿县车站，切断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的退路，将敌军压缩包围在渭河河滩绝地，国民党军西向突围，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

△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自赣江东、西两侧向吉安进攻，国民党军赣州指挥所主任方天奉命在广昌、吉安以北部署抵抗，发生激烈战斗。

△　代总统李宗仁令将起义的原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撤职通缉。

△　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西纵队占领海丰。

7月13日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记者表示："对于中菲会议，美国虽觉成立太平洋公约为时尚早"，但对蒋介石与季里诺"关于经济政治合作之意旨，并不反对"。

△　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和第六十五军军部南渡渭河，突出重围，所部大部被歼灭。

△　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和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在宜昌东北进行激烈战斗。

△　白崇禧发觉解放军迂回攻击，命令在萍乡一线的所属部队连夜后撤至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　行政院设立舟山防卫司令部，任石觉为司令官。

△　海军占据长山八岛，阻截巴拿马及英国商轮驶往天津，封锁了渤海湾。

△　中国驻菲律宾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　港英当局扣留广东省政府所购机关枪1600挺。

△　重庆市参议会预算审查会决定，市属公教人员、工役6月份薪饷发给标准，高级职员约30元，低级职员约19元，警察约10元，工役约九元，先发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力请中央补助后补发。

△　重庆警备司令部物价检查队，以囤积嫌疑和违反议价等罪名，查封仁记字号布店及协兴商号，拘押仁记经理吴汉初、协兴经理朱松涛。

7月14日　蒋介石率王世杰、黄少谷等大批随员飞抵广州，事先并未通知广州当局，仅蒋经国前往迎接。蒋介石并发表对时局的谈话："今日共匪窥伺我国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中正惟以民族大义及革命责任所在，仍当一本总理大无畏之革命精神，团结全党，拥护政府，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而奋斗。"着手超越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政残局。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宝鸡，扶郿战役胜利结束，胡宗南集团第十八兵团部及所属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军、第一一九军四个军四万多人被歼灭，迫使胡宗南集团退据秦岭一线。

△　江西省安福县县长晏继平率县保安团向解放军投诚。

△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发起人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朱德、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会议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主席，沈钧儒、郭沫若、陈伯达、李达为副主席，范文澜为秘书长，胡绳等为副秘书长。会议通过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简章。筹备会于7月17日开幕，董必武致开幕词。

7月15日　李宗仁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已决心重揽大权，会谈不得要领而散。

△　蒋介石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会上由黄少谷分发了四个文件：《国民党改造纲要》、《国民党改造实施程序》、《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筹备组织条例》、《总裁交议本案意见书》。蒋介石致词称："我们必须决心保卫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并以广州为据点，以保卫大广东。"指出，要与共匪拼命作战到底，相信最后必定能取得胜利。

△　是日至26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负责人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

△　宋希濂回抵宜昌军中，旋即部署撤退。

△　叙泸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任司令。

△　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督导专员、海丰县县长戴可雄率部向解放军投诚。

△　空军轰炸上海龙华机场及温州港。

△　滞留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贺耀组、罗翼群等11人联名致电代总统李宗仁："甚盼我公贯彻原来主张，重辟和平途径，用解人民倒悬，并葆国家元气。临崖勒马，纵已失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　华北人民政府在新乡枪决豫北惯匪王三祝。

7月16日　蒋介石在广州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

△　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非常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中央执

行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

△　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设东南、西南两分会，讨论通过行政院长阎锡山提出的《扭转时局方案》，军事上改变过去战略，保卫华南、西南，并企图组织国际志愿队。由此，蒋介石在事实上重登前台指挥国民党军政残部。

△　中共中央军委电林彪、刘伯承等，指出，白崇禧本钱少，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因此，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　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翌日推宋庆龄为主任。

△　中共中央军委下达进军华南、西南的战略部署，以第二野战军主力由湘西、贵州入川，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西入川，第四兵团暂属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两广作战，尔后进入云南作战。

△　阎锡山作出《保卫华南西北案》，强调“争时待机”含义有二：培养新生力量以待反攻之机；等待国际转变以待援助合作之机。徐永昌评论它“与学生们贴标语好不了多少”，但说它保卫台湾一案的指导思想值得重视。徐认为，台湾在“争时待机的政策上，实为最有价值的省份”。如中共“占了台湾，我们即无远景”，“我们今日应赶紧的巩固台湾”。

△　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撤出宜昌，向巴东转移。是日，解放军占领宜昌、沙市。

△　国民党军赣州指挥所决定放弃吉安，向泰和一线撤退，解放军进占吉安、铜鼓。

△　国民党军重占江西安福、崇仁及粤闽边的紫金、漳平等地。

△　空军轰炸沪宁路戚墅堰机车厂。

△　程潜派刘纯正到汉口向解放军接洽，转达程潜请解放军早日入湘的要求。

△　英国商船在英国海军护航下到达天津港口。

△　上海市军管会公布施行《国际电讯检查暂行办法》，凡经由上海市国际电台发出的电讯、口语广播稿本，均须经军管会电讯检查组检查，加盖放行戳记后始得发出和播送，并命令美英新闻处停止活动。

7月17日　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在黄埔会谈。

△　解放军第四兵团自10日渡赣江发起追击，是日进占江西宜春。第四野战军进占鄂南枝江、公安及宜都等地。

△　白崇禧飞广州谒见蒋介石，翌日回到长沙。

△　赣州绥靖公署以“附匪”罪枪毙南丰县长沈德尊。

△　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学校、电台、医院均被关闭后，100余名驻藏人员开始撤离拉萨。

7月18日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就军队南进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进行部署，并要林彪派出代表和程潜谈判。

△　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交议《中国国民党改造案》，会议通过接受。

△　李宗仁、阎锡山、顾祝同组成三人军事小组。

△　行政院会议决议设置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五省区，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同时，通过《民国

三十八年爱国公债条例》，呈请总统批准。

△　行政院电四川省政府转熊克武，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未经行政院批准，即行成立，殊属非是。

△　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声明，接纳中菲碧瑶协议，并饬外交部遵照，研拟计划，从速促其实现。

△　新华社就蒋介石和季里诺会谈发表短评——《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和远东人民的新阴谋》。

△　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渡江进占鄂南松滋、长阳、公安三县城。

△　国民党军重占永定、吉安等地。

△　空军轰炸皖南望江、东流一带江堤，扫射安庆沿江灾民。同时，轰炸南京电厂、自来水厂、广播电台。

7月19日　韩国总统李承晚邀请蒋介石赴韩国访问，蒋介石决定以私人资格接受访韩邀请。

△　蒋介石决定在台北设办公厅，并恢复军队党代表制度。

△　蒋介石召集在广州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开会，指示保卫广州计划。

△　西安绥靖公署第三军军长盛文到达安康，接任安康石泉警备司令，部署第六十九军、第三军、第二十七军、第九十八军等部，抵抗解放军第十九军的进攻，掩护汉中胡宗南部主力的安全。

△　中共中央军委电彭德怀等，建议以第十八兵团攻占秦岭凤县，压迫胡宗南部后撤，然后抽兵加强西进追歼二马的兵力。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制定了钳胡打马的陇东追击战和平凉决战

的作战计划，以三个军留守西安至宝鸡一线，以钳制汉中和秦岭一线的胡宗南部，保障一野后方安全，集中10个军的兵力，分左、右两路，追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力争歼灭其主力于平凉地区。

△ 解放军进占湘北浏阳、平江。

△ 阎锡山在广州接见马鸿逵的代表康玉书。

△ 北平市军管会命令驻北平的美国新闻处停止一切活动。

△ 赖琏等在纽约组织“民主自由联盟”，呼吁国民党政府彻底实行政治改革，要求美国紧急援助，反对西方国家承认中共政权。

7月20日 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会议，公教待遇一案，由于增加财政负担，收支难以平衡，和军人待遇也无法摆平，未获通过。

△ 解放军进占岳阳及长沙、平江间重镇金井。

△ 空军轰炸湘、赣前线及南京、浦口、淮南煤矿。

△ 中央政府驻拉萨人员全部被迫离去。

△ 西北军政副长官马鸿逵从兰州乘飞机到广州，晋谒国民党中枢，但未能见到蒋介石。

△ 华北人民政府派出的驻归绥联络组由潘纪文、鲁志浩率领进驻归绥。

△ 杨森就任四川省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7月中旬 各地水灾续有发展，湖南、广西、广东三省灾区已达百县左右，灾民已达千万以上，湖南至7月16日，已死亡5.7万多人。长江中下游水情严重，为1931年以来所未有，安徽芜湖、望江、铜陵，苏北泰州、扬州、高邮、东乡，苏南无锡、吴县被淹。

7月21日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请周接见卢汉代表李一平，“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

△　蒋介石离开广州，前往厦门，蒋经国、黄少谷等偕行。

△　华中长官公署司令官白崇禧鉴于解放军南进在即，国民党军态势不利，准备放弃长沙，部署后撤，以巩固湘西、湘南，屏障粤北、川东两大门户，并引诱解放军于衡阳以东湘赣山地决战为目的，向湘东转移，缩短防线。决定华中长官公署于22日自长沙移至衡阳，长沙绥靖公署自长沙移至邵阳。

△　程潜在陈明仁的建议下，离长沙赴邵阳，白崇禧、陈明仁前往送行，陈明仁即代行湖南省主席职权。

△　国民党军重占海丰。

△　李宗仁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分别为主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专使、副使。

△　美国参议院通过《北大西洋联盟公约》。

△　港英当局命令香港文艺协会常务理事周纲鸣限期出境。

7月22日　蒋介石从广州到达厦门。

△　程潜离开长沙后，白崇禧对陈明仁感到放心，即自长沙移驻衡阳指挥。

△　空军轰炸上海黄浦江轮船。

△　内政部以币制改革，就全国各地工人工资问题，特邀集各有关机关负责人会商，总以战前标准为根据，而视当地生活水准及习惯

由主管官署会同有关机关合理评判。

7月23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告以西进甘、宁、青、新四省的战略构想："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　蒋介石在厦门接见汤恩伯、朱绍良，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召集闽南各军、师长，举行军事会议。

△　解放军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平江，和程潜代表刘纯正谈判。

△　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二兵团分别进占江西萍乡、湖南澧县。第四、十二、十五兵团集结平江、浏阳、上高、分宜地区休整。是日，林彪等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部队疾病情况严重，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

△　胡琏所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向闽西进攻，重占上杭、武平等地，续向解放军刘永生部游击队所占永定进攻。

△　广州警察当局于凌晨3时，突然搜查市内各区"企图推翻政府的嫌疑人物"，武装包围中山大学和市立职业学校，共捕去教职员学生百余人，包括中大教授10人。

△　行政院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央文职公教人员薪俸及技工、警丁、公役工资支给标准一案，最低20元，最高52元。

△　南京军管会以人民政府尚未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而美国新闻处系美国国务院的一部分，命令南京美国新闻处停止活动。北平、天津、汉口美国新闻处也已被当地军管会命令停止活动。

△　天津美商大通银行拒绝按照人民政府法令交验资金，天津军

事管制委员会正式通知该行停业清理。

△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维护人民利益，巩固革命秩序，发布布告，进行反动党派人员登记。

△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北平召开，林伯渠到会讲话。指出，这表现了文艺工作者在全国胜利新形势下的空前团结；并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就发生了要进一步联系群众的问题。1953年9月，协会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7月24日　蒋介石自厦门乘轮船回到台北。

△　印度政府以“考察叛乱”为由，派遣锡金（即哲孟雄）行政专员达雅赴拉萨。

△　西安绥靖公署安石警备司令盛文率部在安康牛蹄岭与解放军第十九军等部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解放军于25日一度攻入安康新城后，即撤出战斗，东移至平利、蜀河口一线休整。

△　国民党军赣州指挥所各部退守武溪街、冈鼓岭一线，解放军进占泰和。

△　在马步芳派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主持下，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在甘肃静宁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制定了“保卫甘肃，保卫西北”的《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准备在平凉地区与解放军决战。会议决定将原宁夏兵团改为陇东兵团，以卢忠良为指挥官，固守陇东和平凉；原青海兵团改为陇南兵团，仍以马继援为指挥官；中央军周嘉彬的第一二〇军、王治岐的第一一九军、黄祖勋的第九十一军等部于陇南协同马继援兵团共守天水、陇西、定西等兰州外围地区。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21日至24日间，分别由乾县、醴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发，展开陇东追击战。

△　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出巡云南和西北，是日由广州飞抵重庆。

△　刘纯正从平江回到长沙，向程潜的老部下、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汇报去武汉联络情况。

△　解放军进占湖南临澧。

△　台风在浙江宁波登陆，袭击浙、苏诸地，上海灾民五万多人涌入市区。翌日，南京江水漫堤。

7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向斯大林提出苏联援建空军和海军，帮助解放台湾问题。谓："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不可能占领它的。"苏联能否"在六个月至一年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至200架歼击机、40至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斯大林愿意帮助建立空军和海军，但对帮助解放台湾问题则持谨慎态度。

△　中央银行于24日宣布，准镍币流通行使，24小时后，又发布公告称，据川、黔、湘、桂等省镍币均集中奸商手中，抢购物资，刺激物价，该办法暂予停止。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前线将领，指示自9月中旬起，陈赓、邓华两兵团入粤作战路线，配合在广东的游击队会攻广州，并指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于9月5日必须到赣州与叶剑英、张云逸、陈赓、邓华会合，商筹全局。

△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进部队分别进占湖南醴陵、石门。湘鄂边区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全部816人，在团长姜玉华率领下向解放军投

诚。

△ 国民党军重占福建大田、宁洋。

△ 驻韩国大使邵毓麟飞抵汉城。

7月26日 蒋介石决定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其党政军干部。

△ 代总统李宗仁飞到衡阳，白崇禧、陈明仁前往迎接，下午飞抵福州，会晤朱绍良。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 叶飞率解放军第十兵团到达建瓯一线。

△ 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沿赣江两侧前进，发起赣西南战役。

△ 国民党军撤出株洲。

△ 重庆中央银行发出暂停使用镍币公告后，行前上千群众聚集不散，警备司令部逮捕董自强等17人。

△ 徐永昌偕王叔铭、萧毅肃自重庆飞抵昆明，与卢汉会谈，防止卢汉起义。

△ 美、英两国政府通告自华南撤侨。

7月27日 李宗仁自福州飞赴台北，蒋介石、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当晚即与蒋介石会谈，前后与蒋介石长谈五次，李要求任白崇禧

为国防部长，并调兵保卫广州，但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李即于30日飞回广州。

△　卢忠良担心全军覆没，将陇东兵团自平凉后撤至固原一线。

△　行政院会议通过特任陈质平为驻菲律宾公使，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董其武兼西北军政副长官及包头指挥所主任。

△　行政院撤销广州警备司令部，任命李及兰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广州施行特别戒严。

△　陈明仁召集军、师级将领开会，宣布他决心与中共和谈的主张。同日，派程星龄、李君九在湖南地下党代表欧阳方陪同下到平江邀请李明灏入长沙面商。

△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三日间进占陕西、甘肃的邠县、灵台、长武、陇县、泾川、宁县六城。

7月28日　台北中山堂举行欢迎李代总统大会，同日，李宗仁在陈诚陪同下巡视基隆。

△　马继援率陇南兵团在秦陇要冲固关抵抗，被解放军击溃，马部骑十四旅被歼灭。

△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占平凉，二马的平凉决战计划成为泡影。

△　白崇禧命令第三兵团、第十一兵团攻击醴陵一线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并令第一兵团策应。

△　徐永昌、王叔铭、萧毅肃向卢汉递交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亲笔函，并与卢汉会谈后离昆明回重庆。

△　解放军第十三兵团进占湘西桃源。

7月29日　蒙藏委员会发言人指出，西藏强迫中央驻藏人员撤退是违法悖理。

△　解放军第十三兵团进占常德，压迫宋希濂部退守慈利、大庸一线湘西山地，将宋希濂部和白崇禧部的联络切断，于是，解放军进逼长沙。

△　国民党军重占莲花，以保障衡阳东侧安全。

△　解放军进占江西永新。

△　上海美国领事馆被前美国海军雇员包围。

△　程潜秘密返抵长沙。同日，李明灏到长沙和程潜、陈明仁会见。

△　白崇禧发现程潜秘密回到长沙，对第一兵团策应作战颇有疑虑，命令第三兵团、第十一兵团暂停攻击。

△　解放军进占甘肃镇原、崇信。

7月30日　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共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苏联向中共贷款协定。总额为三亿美元，苏联每年提供6000万美元贷款，利息1%，以设备机器各种材料和商品的形式支付，5年付清。中方在10年内还清贷款。

△　东北人民政府商业代表团和苏联成立交换商品的一年协定。东北将以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商品向苏联出售，苏联将向东北出售工业设备、汽车、煤油、布匹、纸张、医药器材等商品。

△　行政院会议决定，同意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辞职，专任绥靖公署主任，由陈明仁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　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与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在醴陵南的黄土岭展开激战，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袭击解放军第一三八师司令部得手，解放军向醴陵撤退。

△　晚10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强行和经过镇江江面的“江陵解放号”客轮并行，将“江陵号”夹在“紫石英号”和江岸之间，以“江陵号”作掩护，从镇江江面潜逃出长江。“紫石英号”潜逃过程中，被岸上解放军发现并发出警告，“紫石英号”竟发炮攻击。“江陵号”轮船在炮战中中弹沉没，木船多艘也被“紫石英号”撞沉。

7月31日　国民党中枢撤销长沙绥靖公署，阎锡山派黄杰、邓文仪持函于8月1日自广州到长沙晤程潜，劝阻程潜发动反蒋起义，并邀程潜赴广州，拟任为代理考试院院长。

△　马鸿逵自广州到达台北谒见蒋介石。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发布《农地减租实施纲要》，张群就此发表书面谈话。

△　解放军进占甘肃清水。

△　解放军进占湖南安乡、慈利，安乡县长率部400余人投诚。

△　空军轰炸淮南煤矿。

7月下旬　扶郿战役后，胡宗南部第五兵团及第十八兵团残部，退集凤县、佛坪、东江口及陇南地区。

△　冀东地区自7月29日起大风三日，海啸成灾。河北各地水灾继续发展，险情迭出。

是月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派宋一痕经香港秘密到达北平，与中共接洽起义。

△　河南省年余来歼灭土匪7.8万余人，人民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全省局面。

△　台北《民族报》上，叶青向傅斯年挑起了自由主义问题的论战。

8月

8月1日　　程潜发出个人和平通电，历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弃于民，呼吁“当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继续和谈，则全国治安，固可立时恢复。如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幡然悔悟，立致祥和”。

△　广州政府开始部分迁往重庆，是日起，国防部分渝、穗两地办公。

△　中共中央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电，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

△　东南长官公署下设舟山指挥所，由郭忏任指挥所主任。

△　徐永昌、王叔铭飞抵绥远陕坝，劝董其武将部队撤至五原以西，但不可退至河西死地，董其武则要求解决部队被扣发的补给问题。

△　马鸿逵拟由其子马敦静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电令卢忠良死守固原、瓦亭和三关口，但仅战斗一天，是日六盘山三关口要隘即被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突破，进占隆德。解放军切断了二马的联系，马部丧失了扼守兰州的门户。

△　解放军成立粤桂边纵队，梁广任司令员兼政委。

△　国民党军重占广东大埔。

△　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成立，分研究、事务两部。

△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司徒雷登大使归国期间，广州将成为美国大使馆所在地，美驻华公使克拉克将成为代办；同时，美使馆参赞惠脱勒将为大使馆办事处之领袖。”

8月2日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粟裕指出：“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等，同意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　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开始按照解放军的要求，下令第一兵团及保安部队开出长沙及各交通要道，仅留一部维持长沙治安。

△　国民党军赣州指挥所各部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击下，步步后撤，是日放弃遂川。

△　解放军进占固原，陇东兵团逃回宁夏。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直接回国。

△　贵州省政府特制定二五减租办法公布，自本日起施行，12月底完成。

△　英国商轮“摩勒号”自香港偷越海军封锁线到达上海。

8月3日　　李宗仁主持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通过阎锡山提出的《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保卫华南案》，由行政院交主管部门实施。

△ 李宗仁任命李及兰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本兼各职，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特任陈质平为中华民国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

△ 行政院会议讨论西藏问题。

△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在兴隆山祭成吉思汗陵。

△ 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陈明仁通电“见危受命，义无反顾，一切行动，全以卫国保乡、救亡图存为出发点”。

△ 解放军进占长沙东南军事重镇株洲，并进占沅江、益阳、华容。

△ 程潜部师长汤季楠占邵阳。

△ 马鸿逵从台北到达香港，在台北曾三次谒见蒋介石。

△ 解放军第一兵团进占天水，马继援部向定西和兰州逃跑。

8月4日 程潜、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告湖南将士书》，宣布：“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中共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藉以减轻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烂。”当天，原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成刚率第十师、第六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一个团逃走。

△ 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通缉程潜。令曰：“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通匪叛国，逆迹昭著，并于江日发表通电，措辞荒谬，为匪张目，实属罪无可逭，应予通缉。”

△ 彭德怀发布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兰州歼击青海马步芳部的

预备命令，以一部兵力分别牵制胡宗南和马鸿逵，以主力分三路进攻兰州，中路三个军沿西兰公路两侧经通渭进逼兰州，右路两个军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进逼兰州，左路三个军沿天宝公路西进，攻击二马官兵的老家临夏，再直取马步芳的根据地西宁。

△ 解放军陕北军区三边分区地方武装收复该分区首府定边县城。

△ 空军袭击上海，并第三次轰炸南京下关电力厂。

△ 达赖喇嘛之兄嘉乐顿珠应印度之邀，抵新德里。

△ 新华社香港分社因发表关于“紫石英号”的消息和短评，受到港英当局的无理警告。

8月5日 美国国务院在司徒雷登大使将到华盛顿之际，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即通称的《美中关系白皮书》，全文计1071页，包括过去五年美国对华重要政策公开与秘密文件的完整记录，为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失败辩护。由于白皮书对民国政府多所指责，民国政府在事先曾通过外交途径，企图阻止白皮书的发表。

△ 国民党中常委决定，行都仍设广州，绝不轻言搬迁，政府分地办公计划，仍按原定程序，自8月8日起实施。续后，广州政府机关分批迁往重庆。

△ 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支持设立由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并表示：“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 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发表通电称：“率领全湘军民，根

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

△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前锋进入长沙，受到50万市民热烈欢迎。

△　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副司令王景宋率两个师进抵邵阳东，第十四军进攻邵阳起义部队，重占邵阳。

△　参加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锷在湘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逃跑。

△　程潜派唐星等组成和谈代表团。

△　解放军陕北军区三边分区地方武装收复国民党军占领的老解放区的最后据点盐池县城。

△　行政院会议决定，撤职缉办陈明仁，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　经行政院长阎锡山签署命令同意，德王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名义，于是日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选德王为主席。会议至10日结束。

△　行政院电四川省政府，征实900万石，征借450万石，从9月1日到9月16日开征。

△　重庆市市长杨森兼第二十军军长。

△　四川成立全省减租推行委员会，由王陵基兼主任委员。

△　卢汉电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大理、保山鼠疫流行，居民死

亡甚多。

8月6日　蒋介石从定海飞往韩国访问，并发表声明：“余自将藉此访问之良机，与李承晚总统充分交换意见，不仅商谈有关中韩两国当前重要诸务，并将讨论远东各国筹组反共联盟问题。”

△　东北人民民主政府同苏联签订为期一年的商务协定后，广州政府外交部邀约苏联大使馆代办到部，以协定“违反中苏条约”为由，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

△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由平江到达长沙。

△　参加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率第十九师大部、第一九七师一个团从长沙逃走。

△　代总统李宗仁明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陈明仁撤职通缉究办。

△　李宗仁令财政金融改革案内有关田赋部分等暂缓实施。

△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表通电，宣布程潜“动摇变节、通匪叛国”经过。

△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西北地区民族复杂，兼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利多害少。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首次西南经济座谈会，由秘书长张笃伦主持，卢作孚、邓益光等出席，讨论修建成渝铁路，增加川、渝二省市电力及检讨“评议物价”。

△　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评论白皮书：“我们过去有着一种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凡事依赖外人。今天美国的白皮书，可以促使我国人民觉悟，从此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个白皮书对于我们并无坏处。”

△　广州中央政府接到西藏地方噶厦公所7月9日自科伦坡转发的电报，以防止共产党混迹为理由，请求中央驻藏人员撤退。是日，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电复西藏地方噶厦公所，强调噶厦公所的要求："于法于理，殊多未合，即希体察目前情势，撤销前议，迅再通知各驻藏人员仍回拉萨，执行职务。"同时，阎锡山就此事发表声明："切盼西藏地方当局体察目前情势，一本过去团结精神，勿为他人利用，迅予纠正此项措施。"

△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谈话，宣布"美国愿极力赞助中国成为独立稳定国家"等五项对华政策基本原则。

△　解放军第十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分别由古田、建瓯、南平向福州开进。

△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一方面部署接应从长沙逃归的部队，一方面部署诱歼解放军追击部队，以第四十六军、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等部，在永丰（现双峰）及其西南地区设伏。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西进兵团于5、6两日间分别进占甘肃甘谷、通渭、静宁三城。

△　解放军占领湘中安化。

8月7日　　蒋介石和李承晚在韩国镇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就中韩关系及组织远东联盟问题交换意见。

△　从青岛撤退的国民党军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部七八万人陆续到达广州外围。

△　驻美大使顾维钧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对美国在此严重的阶段发表这一文件表示遗憾，并宣布中国政府正在草拟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答复文。

△　青年党宣传部长王师曾就白皮书发表谈话，吁请美国针对现实有效援华，并认为："中国民主分子之推翻中国共党政权的运动，必须外能得到民主国家之精神的物质的援助，才易于收效。"

△　香港《华商报》发表评论白皮书的社论《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新宣战书》。

8月8日　　蒋介石结束对韩国的访问，回到台北。是日，蒋介石与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7月12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须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为此，吾人现在敦促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

△　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李及兰兼任总司令，刘安祺、张镇任副总司令。

△　国民党军从长沙逃归的第十四军军长成刚率部到达邵阳。国民党军收容长沙起义后逃归的部队，重编为第一兵团，由黄杰任兵团司令。黄杰到达芷江，移设湖南省政府。

△　参加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潜逃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九军向宁乡、湘乡追击，是日占领宁乡，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军暂一师大部；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六军向衡阳追击，第四十八军向茶陵、攸县追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八军向茶陵、安仁前进。

△　解放军鄂西地方武装占领兴山、秭归。

△　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在省府国民月会上称：四川安全决可保障。

△　宋希濂赴南郑与胡宗南商洽陕鄂边军事后回到重庆。

△　国民党军夏威兵团重占赣西莲花。

△　解放军进占赣南兴国。

△　胡琏到达广州，向外界表示，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先后收复闽西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粤东大埔、蕉岭、平远、梅县、兴宁、五华等县。

8月9日　李宗仁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　解放军进占湘潭。

△　解放军进克鄂西三斗坪。

△　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在舟山群岛的嵊山岛起义。

△　海军截获塘沽口外轮船13艘。

△　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美国向参议院演说，敦促支持反共联盟。

△　广州国民党政府与韩国订立航务条约。

△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人员宣布，上海外国侨民向该公司登记船票，准备离开上海，船期为9月14日。

8月10日　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以王世杰、张厉生、张道藩、陈诚、吴国桢、蒋鼎文、周至柔、谷正纲、桂永清、林蔚10人为第二分会委员，以黄少谷为秘书长。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委会发表为实施农地减租事宜告川、康、滇、黔、渝五省、市民众书。

△　海南岛国民党军重占乐东。

△　莲花县保安队投诚，解放军重占湘赣交界的要冲莲花。

△　第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大金瓦寺诵经堂举行坐床大典，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专使、马步芳副使（马继融代）主持，典礼开始后由关专使宣读总统命令后，即行颁赐礼。

△　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

8月上旬　　河北大清河、潴龙河在4、5日间突涨，容城一带三处决口，白洋淀水位7日为10.86米，超过1939年水位。自6月中旬至8月5日，除冀南、太行两区外，暴雨成灾，全省各河堤埝漫没者36县，共927村，被淹没土地2.6119万顷，各河下游泛滥成灾者12县，共462村，淹没土地1.5万顷，因雨涝成灾者24县，共1321村，淹地2.3万余顷。又：苏、浙、皖三省水灾严重，以皖北为重，灾民已达400万人。

8月**11**日　　参谋总长顾祝同奉李宗仁、阎锡山之命，赴台湾向蒋介石请示防卫广州的军事机宜。

△　蒋介石召见陈诚，促速成立东南长官公署。

△　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对参加人民政协、发表和平主张的罗翼群、蒋光鼐、谭平山、贺耀组、胡庶华、刘建绪、黄统、李宗理、张潜华、金绍先、陈汝舟开除党籍。在先，中监委还宣布永远开除黄绍竑、程潜等党籍。

△　解放军第十兵团发起进攻福州的外围战斗，右路第二十九军攻克永泰，截断福州、厦门交通。同日占领重要军港三都澳。

△　解放军进占宁夏海原、通渭西北马营镇。

△　马步芳由兰州经南郑与胡宗南商谈军事后到达重庆，与张群晤谈。

8月12日　新华社发表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是新华社发表的对白皮书的第一篇评论。

△　解放军山东军区部队于11日起进攻长山列岛，是日攻占南、北长山岛。

△　解放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主力强行登陆三都岛，配合第十兵团进击宁德。

△　解放军进占湖南新化。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继陇东追击战之后，开始向兰州进军，以第一兵团二个军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兵团，迂回敌后，进取西宁，断敌向青海的退路；以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共五个军分中、右二路攻击兰州；以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六十一军及第一兵团的第七军留守宝鸡地区，钳制胡宗南部，保障主力左侧及后方安全。

△　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自兰州到广州，应阎锡山之召，报告西北一般情况。

△　行政院颁布《国民反共公约》。

△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吴铁城以私人资格到达东京，希望与麦克阿瑟会晤。

△　四川大学奉教育部命令，大量裁员，职员裁三分之二，教授

裁五分之二。

8月13日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于9日开幕，是日毛泽东亲临讲话。

△　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在台北成立，蒋介石兼任主席。

△　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

△　吴铁城在东京晤麦克阿瑟。

△　进攻福州解放军左路第三十一军占领丹阳镇，并攻击连江。中路第二十八军向雪峰地区猛攻。福建省政府主席、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仍无心应战，至是奉准放弃福州撤退，第九十六军于桐口南渡闽江，向德化撤退。

△　白崇禧以所部张淦、徐汝明、黄杰、刘嘉树、鲁道源五个兵团、11个军约20万人南撤至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段，建立湘粤联合防线，东经汝城和乐昌与广东余汉谋部联络，西至芷江，力图与湘西宋希濂部重新建立联系。

△　解放军第四十九军进占湖南湘乡。

△　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进占江西雩都；第四兵团第十八军与湘南支队在遂川会师。

△　在香港的国民党人黄绍竑、贺耀组、龙云等44人发表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号召国民党人说："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

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　李宗仁派专机至衡阳接白崇禧至广州，胡宗南亦飞抵广州。

△　空军总部于“八一四”空军节前夕发表年来战果。

△　民国政府中央机关在渝办公布置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国淋称：中央分地办公的决策，表示有保卫重庆及四川乃至整个西南之决心，政府稳定，必能获得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

8月1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美国白皮书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　刘少奇离莫斯科回国。致信斯大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王稼祥留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待至8月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

△　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召集白崇禧、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秦德纯、邓文仪、陈济棠、马步芳、马鸿逵举行西北联防军事会议，计划在兰州决战，以马步芳所部在兰州城下牵制解放军主力，马鸿逵所部退出固原后，转用于兰州，胡宗南所部出陇南，三面包围解放军，并出动空军支援。

△　国民党军赣州指挥所放弃赣县、南康，向信丰地区撤退。

△　广州、台北等地庆祝第十届空军节，台北举行空中阅兵，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任检阅官，蒋介石亲往空军总司令部向空军将士致

贺。

△　广州石牌联勤总部火药库突然爆炸，全部炸毁。

△　前云南参议会副会长李一平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宣布龙云策动云南起义。

8月15日　新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陈诚就任长官职务，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告结束。

△　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军援备忘录和经援备忘录，一是要求把经济合作总署的余款用作应急性援助，二是关于为期六个月的临时性援助，三是关于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援助。

△　台湾开始在全省换订租约，实施“三七五减租”。

△　解放军进攻福州的部队中路第二十八军占领闽清、溪口，左路第三十一军攻击马尾，与马尾守军、由台湾增援的青年军第二〇一师第六〇三团展开激战。

△　国民党军退出攸县、茶陵。

△　解放军进占兰州南的会川。

△　解放军自12日至15日先后进占陇中和陇南的会宁、定西、陇西、漳县、渭源、西吉等县城。

△　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率四人小组自苏联到达伊犁。

△　马步芳、胡宗南到达台北谒蒋介石。

△　重庆市长杨森公告《重庆市物价管制办法》。

△　重庆市益民、永成、同心、聚丰、福华六行庄滥发本票一

案，由重庆地方法院开庭调查。

8月16日　毛泽东、朱德答复程潜、陈明仁8月5日通电，对长沙起义表示祝贺。

△　外交部代部长叶公超对美国白皮书发表书面声明：“中国政府必须郑重声明，吾人对于中美关系白皮书内容所涉及之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在意见方面或论据方面，实有不能不持严重异议之处。吾人雅不愿使两国政府间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传统之友谊，以及民主国家所维护之共同目标。中国政府为其本身之立场与责任，对于此繁复错综之长篇白皮书，不能不于适当时期，将所持观点及有关事实，对中美两国人民作详切之声明，期使两国人民能因此而更增加相互间之了解。”

△　留广州国民大会代表集会决议对美国白皮书发表声明，声称民国政府为合法政权，通过《促进政府加强国民外交案》。

△　吴铁城在东京发表谈话，拒绝台湾托管。略谓：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完全是中国人，如果中共不能获得外国的飞机、军舰，我们便可永久保护台湾。

△　港英政府宣布征用中国航空公司在启德机场内的发动机修理厂。

△　国民党福州守军放弃连江，第七十四军撤至琅琦岛；又放弃马尾，青年军第六〇三团撤至厦门，至9月4日撤回台湾。第六兵团由副司令梁栋新指挥，夜渡闽江南撤，后被解放军歼灭。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飞离福州到厦门。

△　海军元老萨镇冰，前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通电拒绝去台湾，表示拥护共产党，参加福州解放。

△　解放军粤赣湘纵队之北进支队进占江西大庾，并与南下的解

放军会师新城。

△ 解放军进占甘肃榆中、临洮。

△ 解放军粤东游击队进占广东陆丰。

△ 国民党军重占江西南康。

△ 马步芳从台北回到广州。

8月17日 解放军第十兵团解放福州，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五个军部、14个师共五万余人，俘虏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

△ 解放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九军第一四六师，于14日占领永丰，15日轻敌深入青树坪地区，在界岭一线遭到白崇禧部阻击，是日，又遭到白崇禧部的包围攻击，伤亡惨重，入夜被迫突围后撤。

△ 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电令联勤总部着即撤销。

△ 何应钦、程天放奉蒋介石之召前往台北。

△ 马步芳、马鸿逵离粤，分别于18日、19日返回兰州和银川。

△ 麦克阿瑟拒绝返国报告远东局势。

△ 港英立法局通过新的《人口登记条例》，即发给入境者及本土居民“香港身份证”，翌日正式公布并施行。同日，立法局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并一读通过《修订1922年紧急法》。

8月1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

△　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第十四军军长成刚、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锷、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联名通电，反对程潜、陈明仁实行“局部和平”。

△　福州绥靖公署撤至厦门，由汤恩伯代理主任。

△　国民党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吕省三、副师长陈言廉率900余人在闽南南安官桥、云台地区起义。

△　四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在成都中正公园检阅成都市自卫总队。

△　美参议员诺兰建议派高级将领来华。

△　就港英当局径行强迫中航迁离启德机场一事，广州政府饬驻香港特派员郭德华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交涉，并命驻英大使郑天锡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

△　美国西太平洋海军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乘旗舰“圣保罗号”抵达香港，布置从华南撤侨。美国政府已正式要求中国政府准许“戈登将军号”通过封锁线到上海撤侨，外交部在口头上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　美国众议院以164票对92票否决将中国包括在军事援外计划之内的建议案。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宣布：美国政府相信，推广日本与其他国家间的交往，在促进日本成长中，将具有极重要地位。这种交往包括参加国际会议，交换领事或从事其他双边活动。此后，战后一直没有活动的日本外交部开始活跃起来。

8月19日 行政院会议提出新疆撤兵案，主撤者认为可增兵内地，对军事有利，不主撤者认为，撤兵等于抛弃领土，将来很难恢复，且实际上撤兵十分困难。

△ 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委员会议，中国分得日本第三批赔偿物资有电力设备及各种整套设备约二万余吨，各机关分配赔偿物资分别安装于台湾或海南岛，以策安全。

△ 行政院会议通过《反共保民动员委员会组织章程》。

△ 解放军第七兵团自18日起向舟山外围岛屿进攻，是日进克大榭岛。

△ 国民党军从长山列岛撤退。

△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电贺班禅举行坐床典礼。

△ 遵照美国政府命令，美国驻广州新闻处于18日停止工作，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是日停止办公，迁往香港。

8月20日 李宗仁、白崇禧、薛岳、余汉谋举行会议，决定以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广东境内所有部队。但余以白崇禧部能不能入粤为是否就任的先决条件。

△ 吴铁城自东京返抵台北，向蒋介石呈递与麦克阿瑟会谈记录。吴铁城在为期一周的访问旅行中，曾两次会晤麦克阿瑟，对过去和现在的问题，都曾广泛交换意见。吴在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日本两年来“所努力的对外贸易，总额只能占战前百分之十九，就中国的输

出输入，在战前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现在则几等于零。所以日本朝野人士都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得到和平统一，俾可帮助他们的国家复兴”。

△　行政院通知中央各机关重庆区布置委员会，各国驻华大使馆将陆续疏散来重庆。

△　李宗黄谒蒋介石，报告云南卢汉态度不稳。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击兰州部队，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兰州。马步芳任其子马继援为守城总指挥，以第八十二军、第一九二军等部五万余人守城，以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第八十一军、新编军等部部署在城郊，构成所谓“兰州锁钥”的防御体系。

△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同意第二野战军19日发出的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攻略贵阳和川东南，以大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完全孤立川东一带及重庆敌军。

△　解放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先后占领信丰、龙南、安远后，是日进占粤赣交界的虔南。

△　解放军进占福建莆田。

△　澳大利亚悉尼中国饭店，被澳警方无理搜查，20名中国海员被捕。

8月中旬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由香港到广州，与白崇禧会谈，重申华中部队如能开到广州，他将尽力保障供给。

△　白崇禧部署在湘西与解放军进行局部决战，以川鄂绥署部队强渡资水、沅水，进击湘江西岸，以第三兵团指挥第七、第四十六军

由永丰向湘乡攻击，以第一兵团向邵阳北地区前进，相机攻占安化。20日起向北推进。

8月21日　行政院决定设立国防部长西北边区指挥所，由徐永昌任指挥，协调西北各军。同日，决定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携带有关新疆问题方案，前往迪化。三人决22日同行，自广州启程。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击兰州部队，判断敌有弃守可能，担心丧失战机，于是日仓促攻击兰州。马步芳命令由马继援指挥的兰州所部凭险抵抗，解放军攻击受阻，伤亡严重，决定暂停攻击，调整部署，准备攻坚。

△　胡宗南自广州经重庆返抵南郑。

△　驻美大使顾维钧与宋子文、胡适、蒋廷黻、贝祖贻等举行会议，讨论国内局势，并讨论了向联合国提出苏联违反条约义务问题。

△　美参议员勃里奇等联合声明，主张美国切实援华。

8月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7月份战绩总结公报称，本月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华中两个战场上追歼残敌，同时在已解放之河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清剿散匪，共消灭敌军九个整师，9.918万人，缴获大小炮847门，各种机枪3815挺，各种枪支4.5459万支，骡马4974匹，解放县城70座。

△　解放军第一兵团连克康乐、宁定、和政，是日进占临夏，马步芳从兰州抽调骑兵第八师、第十四师回守西宁。

△　白崇禧飞广州晤李宗仁、阎锡山报告战况。

△　国民党军黄杰兵团克安仁后推进至湘西新化。

△　解放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四师进占江西会昌。

△　解放军第七兵团进克梅山岛。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晏阳初、沈宗瀚和美籍委员贝克由广州飞抵成都，协助四川省农村建设工作。据报道，蒋梦麟、美籍委员穆懿尔将久驻台北。

8月23日　蒋介石从台北到达广州，蒋经国、黄少谷等随行，停留一日，仅与李宗仁、阎锡山等少数人见面，会商保卫广州战略。但在兵力部署上，蒋与李发生分歧，要求收缩兵力防卫广州，反对李宗仁将刘安祺部调往广东省境之外作战。

△　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在美发表声明，就白皮书所说李宗仁对苏政策问题，解释说：李代总统从来也没有同意所说的建立中苏真正合作基础，或尽量消灭美国在华势力两点。

△　连日来，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评论白皮书。是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表题为《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的评论文章，民主建国会在北平发言人，也对白皮书发表书面谈话，强调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

△　国民党军赣州指挥所节节溃退，残部已退入广东境内，国防部即电令结束，残部进行改编整补。

△　解放军进占甘肃兰州西南黄河南岸的永靖。

△　解放军第四十八军进占瑞金。

△　高雄港“众利”轮爆炸，延烧岸上物资糖2.4万吨，死伤数百人。

△　英国商轮“摩勒号”，在长江口外被海军截获，扣押至定海。

8月24日　　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巡视西南，发表书面谈话称："今日重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　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对重庆《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各部、会已疏散来渝的人员约万余人，现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员约千余人尚在广州。这批人员是否来渝，全由中央决定。

△　行政院会议通过：特派孙震兼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兼川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设置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特派余汉谋为军政长官。

△　马步芳电广州军政当局要求胡宗南、马鸿逵和空军支援，并飞离兰州至西宁。

△　国民党军重占湖南攸县、湘乡，进逼安化。

△　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长程天放在台湾发表题为《坚定反共战争的信念》的广播演说。

△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最后一批人员乘坐美国军用飞机飞往香港，从23日起，美领事馆一切事务暂托英领事馆代办。

△　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补充材料《中国的共产党运动》。

△　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卡尔威尔下令逮捕500名华侨，驱逐出境。华侨海员工会前曾上诉最高法院，要求判决所谓《战时难民出境法》无效。

8月25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惟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

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　李宗仁特任关麟徵为陆军总司令。

△　刘少奇自莫斯科回国，是日抵沈阳。同时来华的有柯瓦廖夫及率领的苏联专家220人。26日，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拟于27日开欢迎会，由刘少奇作关于与苏联专家合作问题的报告。刘与柯及高级专家30人准备于28日同赴北平。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华北总支部发表声明：台湾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领土，台胞定会起来粉碎美帝阴谋。

△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过充分准备，对兰州外围阵地发起总攻，至下午攻占敌南山主阵地。入夜，马继援见马鸿逵、胡宗南各部未能出兵支援，信心动摇，率部通过黄河铁桥弃城撤逃。

△　白崇禧返回湘南军中，指挥所部第一兵团第七十一军攻击湘乡。

△　解放军连克福建仙游、永春、晋江（泉州）、南安、惠安五城。

△　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从成都到重庆谒见蒋介石。

△　傅作义偕邓宝珊等从北平到达归绥，慰问绥远部队，动员起义。

△　中央航空公司飞行员李福遇驾驶C—47型运输机一架，由广州白云机场飞往解放区。

8月26日　蒋介石在重庆整日召见西南有关军政首长张群、钱大钧、王陵基、孙震、李弥、罗广文、余锦源、陈春霖、郭汝瑰等。

△　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马步芳部主力被歼，残部溃不成军。

△　中共中央电示滇桂黔边区党委，向卢汉转达中共中央的五点要求：一、要让云南人民武装发展，并支援武器弹药钱粮；二、发动省参议会群众团体拒绝蒋桂军队入滇；三、地方保安部队集中应变；四、控制特务；五、卢汉部队要严明纪律，保护国家财产。

△　重庆市永成、同心、聚丰、益民、福华六行庄滥发本票案经地方法院宣判，六行庄负责人表示不服，准备上诉。

8月27日　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毛泽东出席，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

△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宋希濂，听取宋关于川、鄂、湘边区军事情势的报告；接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省议会议长向传义，听取四川省自卫委员会与省政府纠纷的报告；接见重庆附近地区团长以上人员并训话。

△　阎锡山在广州主持孔子二千五百年诞辰纪念典礼并致词。

△　徐永昌26日飞抵西宁，与马步芳会谈军事。是日马步芳背着徐永昌乘飞机逃离西宁到达重庆，徐即飞银川，鼓励马敦静抵抗解放军。

△　胡宗南指挥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军向西和、宝鸡、虢镇反攻，重占西和。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以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展开反击，迫敌南撤，阻断了胡宗南对兰州的支援。

△　国民党军重占龙南，解放军进占粤东焦岭、平远。

△　昆明公私立大、中、小学教职员集会庆祝教师节，大会决议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政府招募日军来华助战，通电并呼吁肃清特务

分子。

△　新疆出席人民政协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五人因飞机失事在苏联境内遇难。

△　邓召荫、陈剑谱、李犁洲、黄祖培、陈翰园、朱紫朝、姚忠华、赖希如、王连庆、李达等91人发表《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声明》的书面谈话，续后，王普涵等13人也公开响应。

8月28日　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前往车站迎接。

△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四评白皮书》（即《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严斥白皮书》。

△　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军攻击湖南湘潭。

△　马步芳自重庆飞往台北，马步芳残部骑兵22个团到达武威。

△　行政院长阎锡山宴请参加教育会议之各大学院校长及各省、市教育厅、局长。

8月29日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国民党政府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及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是为蒋介石在大陆主持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会上决定，在川境之外抵抗解放军的进攻，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区。国民党军西南高级将领要求蒋介石常驻重庆指挥，但为蒋介石所拒绝。

△　蒋介石派俞济时赴昆明促卢汉赴渝，并对云南部署军事，进行防范。

△　李宗仁在广州召见阎锡山、顾祝同、余汉谋、薛岳，举行非正式军事会议。

△　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扩大组织，以程潜为主任。

△　国民党军第十四军攻占安化，并由新化向蓝田方向突进。但因川鄂绥署部队未敢积极出动，白崇禧计划的局部攻势受挫，不得不后撤整理。

△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进击胡宗南部秦岭防线，右翼部队进占秦岭之五林子、隘口等要点。

△　解放军第四十八军进占江西宁都，江西全境解放。

△　解放军进占湘黔边境的麻阳。

△　留日华侨联合会发表声明："任何想使台湾独立，或交盟国军事管制，或由国际共管的企图，都是不顾台湾人民意志的恶毒阴谋。"声明说："对日和约虽然还没有签订，但是，台湾的归还我国，已在开罗和波茨坦宣言内明白规定，和库页岛的归还苏联一样，已经是神圣的确定事实。"

△　由中国人租用、悬挂英国旗的货轮"良璧号"通过海军的封锁从香港进入上海。

8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五评白皮书》（即《"友谊"，还是侵略？》），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　《人民日报》刊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驳斥美国白皮书座谈

会的纪要。何香凝着重驳斥了白皮书对孙中山时代国共关系和中苏关系的歪曲和污蔑。

△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颁发命令，设立台湾保安司令部，彭孟缉为保安司令，设立台湾省防卫司令部，孙立人为防卫司令，定于9月1日成立。

△　广东立法、监察委员等致书政府，请查办参谋总长顾祝同。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举行首次政务委员会议，会议通过《公署辖区各省戡乱时期政务提要》。

△　韩国首任驻华大使申锡雨在广州向阎锡山呈递国书。

△　马继援乘飞机离西宁，逃往香港。

△　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策在广州病逝。

8月31日　李宗仁特派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

△　行政院会议议决，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侵略罪行”案，并派蒋廷黻、刘师舜、程天放等五人为代表。

△　行政院会议通过派宋希濂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马继援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开放广西南部的邕宁及云南南部的蒙自两处机场为国际航空站。于是，陈纳德航空队加紧将云南的锡、钨运至越南的海防，然后转运美国。

△　立法院决定第四次大会于9月1日起在广州报到。

△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训令各省政府和各部、会、处，切实整饬

纪纲、执行法令，一曰惩治叛乱，二曰肃清贪污，三曰统一权责，四曰健全人事，五曰撙节开支。

△　卢汉代表、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偕建设厅长杨文清自昆明乘专机到达重庆谒见蒋介石。

△　国民党军交警第三旅放弃福建洛阳（属惠安县）、晋江等地，经安海向莲河撤退，解放军进占泉州。

△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左翼部队攻占观音堂、大王山，沿川陕公路推进，与右翼部队在秦岭南的东皎桥以北胜利会师。

△　国民党军联勤总司令部撤销，改编竣事，9月1日起，关于军队后勤工作，改由国防部负责。

是月　　冀东地区自7月下旬以来，降水20多日，滦河、潮白河水位高涨，流量剧增，超过1930年，各河决口共计76处，淹地约337.6931万亩，毁屋2300余间。

9月

9月1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代表朱丽东，询问云南情形。蒋对卢汉的政治态度不放心，一面建议广州政府安定滇局，一面令李弥所部回滇部署，监视卢汉。

△　行政院发言人称：重庆已成政府行政中心，广州只是政治中心与政府所在地。

△　新华社发表短评《反对美国对日本“不宣而和”的阴谋》，抨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8月18日的谈话。

△　国民党军罗广文部增防陇南，支援胡宗南，加强陕南防御力量。

△ 马鸿逵应蒋介石电召飞赴重庆参加军事会议，将宁夏军政交其子、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宁夏兵团司令官马敦静负责。

△ 徐永昌自银川飞赴南郑，转回重庆。

△ 贵州实施“二五减租”。

△ 国民党军胡琏兵团重占兴宁，加强防卫汕头、厦门。

△ 陈明仁兼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

△ 昆明银行从业人员联谊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反对征兵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蒋桂系统军队入滇。

9月2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及川鄂绥署副主席兼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等。

△ 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通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19人。

△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分三路进攻宁夏。北路由兰州出发，沿黄河西岸，经景泰、营盘水一线向中卫进军。中路沿黄河东岸经靖远，向中宁前进。南路于10日由固原地区出发，向中宁进军。

△ 王缵绪等四川“民意代表”百余人，上书蒋介石，要求其“长期驻节陪都，坐镇西南，统筹全局”。

△ 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离渝赴穗，向外界表示，中央迁渝布置工作已完成十分之九。

△ 白崇禧经桂林、贵阳洽商军事后回到广州，向李宗仁报告。

△ 国民党军重占粤东普宁。

△　国民党军重占陇南礼县。

△　新华社发表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揭露英国、美国、印度策动西藏7月8日事变。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黄绍竑等在港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共领导，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的新闻稿，报道黄等8月13日声明。

△　重庆市中心陕西街朝天门中正路一带发生大火，延烧达12小时之久，金融业中心区付之一炬。据重庆警备司令部发表的统计，烧毁学校七所，钱庄33家，仓库、堆栈129座，民房1236幢，检获尸体2865具，受伤者4078人。

9月3日　　重庆成立“九二”火灾救济委员会，蒋介石派蒋经国出席，并代为慰问灾民，饬国民党中央党部捐五万银元，作为救灾费用。

△　重庆原定是日举行“九三反共救国”游行大会，因火灾停止。

△　蒋介石为以云南为最重要后方，决定解决云南问题的原则，应以政治为主，避免武力冲突，并于是日派徐永昌赴广州，向阎锡山转达对滇事的处置方针。同时，鉴于李宗仁准备秘密委任滇军将领鲁道源为云南省主席，空运鲁部入滇，是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说：“对于滇事处置，稍一失当，将误大局非甚少，故未决定以前，务望先电示洽商，并望能照弟嘱次宸兄所提议者实施，请以此意转告墨三兄为荷。”

△　卢汉致电张群，表示愿意到重庆面谒蒋介石。

△　代总统李宗仁就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发表告中外人士书，号召反共。

△　昆明工人、店员、学生及公务员等数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政府，政府中央系统人员被迫撤离。

△　国民党军重占梅县。

△　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行政检讨会议。

△　广州市警察局开始连续三天的突击检查，如发现无户籍者即予拘捕。

△　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命，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出现分歧，暂由方治兼代福建省政府主席，开始办公。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台湾的阴谋。

△　澳大利亚政府下令将过去25年来先后赴澳华侨2000名驱逐出境。

9月4日　　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决定，粤北军事由余汉谋负责指挥，部署防御华南。

△　李宗仁托人转告阎锡山，请阎辞国防部长兼职，以白崇禧代。阎锡山表示："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

△　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访问成都，翌日返渝。

△　致公党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到达北平。

△　解放军进迫厦门。

△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进抵凤县一线，汉中门户洞开。

△　解放军第二兵团对从兰州沿河西走廊西逃的国民党军实施追击。

△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由江西上饶出发，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开进，开始向大西南进军。

△　中共在南京成立海军军官学校。

9月5日　　为处理火灾善后问题，蒋介石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重庆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

△　四川省参议会临时大会开幕。

△　卢汉私人代表杨文清由重庆飞返昆明。

△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于8月28日至9月2日间渡过黄河，相继解放民和、化隆、循化，是日解放西宁。

△　石觉接替周碞出任舟山防卫司令官。

9月6日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到达重庆，蒋介石要卢汉肃清反侧分子，卢汉要求增编滇省部队至六个军，并请款现银2000万元。蒋仅建议广州政府拨款银元100万元，以示羁縻。

△　重庆于零点开始实行宵禁。

△　黄杰偕湖南省政府委员自邵阳飞赴芷江。

△　麦克阿瑟在东京对到日本视察的美国国会议员访问远东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援华尚为未晚。

△　杨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子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

9月7日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面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介绍参加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指出政协的任务是：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全国未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普选以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

△　阎锡山奉李宗仁之命，来重庆谒蒋介石，要求扣留卢汉。蒋介石未准。

△　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车站迎接。

△　李宗仁在广州邀宴留在广州的中央委员，表示要在短时间内，全国各地同时来一个总反攻。

△　李宗仁特派胡宗南兼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马继援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

△　李宗仁公布修正《所得税法案》。

△　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是日在江西赣州召开扩大会议，确定解放广东的作战方案和接管广东等重大问题，拟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等部分三路挺进。

△　解放军皖北军区部队，清剿国民党军残部，收复金家寨县城。

9月8日　　蒋介石与卢汉谈话，要卢汉肃清内部，并促其即日行动。当天下午，卢汉离渝回滇。

△　阎锡山与杨森同时谒见蒋介石。

△　蒋介石电示参谋总长顾祝同，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不要再蹈保卫长江全线的覆辙。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已到达赣州前线的叶剑英等，指示以陈赓、邓华两兵团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随后以陈赓兵团西进至梧州地区，配合第四野战军在广西境内寻找白崇禧部决战。

△　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要他给新疆方面发电报，动员起义。

△　马步芳残部、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等在西宁北率部投诚。该军第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等率部于11日在海晏县的三角城投诚。另一支新编骑六军第二旅旅长马子英于9日在临夏向解放军投诚。

△　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勃里奇、诺兰、惠理联合发表《对华白皮书备忘录》。

△　驻美大使馆驳美国参议员康纳利指责蒋介石移存台湾之1.38亿美元作为私人之用。

△　海军在长江口外截获英国货轮“隆美号”。

9月9日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广州，向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报告对滇事的处理办法。阎锡山偕同张群自重庆回到广州。

△　卢汉返回昆明后，保密局长毛人凤率大批特务到达昆明，是日夜开始大搜捕，时称“九九整肃”。军事学家杨杰闻讯先期脱险从昆明出走香港。

△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指示以程子华兵团二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邵阳地区的黄杰兵团，与程兵团出芷江的二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白崇禧

部采取大迂回作战。

△　撤退到恩施的湖北省政府召开湖北省三十八年度行政会议，由省主席朱鼎卿主持。

△　美国前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署长莱普汉促美国对中共政府予以事实承认，反对再予民国政府援助。代理署长梅国璋返回华盛顿，请求解冻和动用冻结的美援经费5000多万美元。

9月10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议在北平开幕。

△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于9日听取张群报告后，提出解散云南省参议会。是日，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指责云南省参议会“言论逾越常轨，违背戡乱国策”，予以解散重选。

△　卢汉在昆明解散云南省参议会，查封报刊。

△　中共中央致电邓力群并转彭德怀、张宗逊，指示以彭德怀为中共中央负责代表，在兰州与新疆方面谈判，并指示邓力群从伊犁进驻迪化，迅速架设电台通报。

△　白崇禧在衡阳指挥所部署决战计划，企图诱歼衡阳以东解放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引诱解放军于衡郴地区包围歼灭。9日起以张淦兵团向汝城、桂东、安仁一线反攻，是日，国民党军克资兴、汝城附近的文明。

△　马敦静在黄河仁春渡口召集卢忠良、马全良等会议，要所部送走团长以上眷属，烧毁仓库、公馆，把队伍拉向河西走廊，被部下拒绝。

△　解放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出发，北进迂回河西走廊，与第二兵团夹击国民党军西逃部队。

△　傅作义偕董其武进驻包头，筹备起义事宜。

△　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张治中发电报给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希望他们当机立断，正式宣布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举行起义。

△　国民党军在番禺附近击败解放军游击队。

△　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发言人，在东京郑重否认最近关于中国政府正征募日本飞行员到台湾的中国空军服役的传闻。

△　英国东南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与麦克阿瑟晤谈后离日赴香港。

9月11日　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声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所说蒋介石引退时自行动移国帑，绝非事实。

△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的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部于兰州失守后，沿河西走廊西撤，是日到达张掖。

△　云南省参议会议员万寿康、张敬惭等18人被捕，《正义报》等10家报馆被封，记者被捕，各处捕人达180人。

△　教育部奉行政院令，解散国立云南大学、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　昆明绥靖公署布告，于是日起严禁所有明、密集会结社、游行请愿。

△　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代理第一区保安司令孙伯泉及洮岷保安司令杨复兴等在陇南岷县接受中共八项和平方案，军政联合起义。

△　国民党军第九十军第一九一师骑兵团团长曲泽兴率部在兰州

西北永登以北向解放军投诚。

△　空军出动大批飞机猛炸上海、杭州。

△　重庆南岸大火，焚毁80余家。

9月12日　代总统李宗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部署湘、赣军事，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白崇禧、余汉谋出席。

△　蒋介石自重庆抵成都，视察军政设施。

△　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巡视厦门、金门防务并召开军事会议。

△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指示进军西南的战略部署，强调："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全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　重庆警备司令部由司令刘雨卿主持，举行三十八年度辖区各县局联防会议。

△　解放军第六十四军进军宁夏途中歼敌一个骑兵团，解放同心县城。

△　解放军进占青海北部亹源、大通县城。

△　广州一军火库爆炸。

9月13日　蒋介石在成都举行茶会，招待四川省耆绅及立法、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省参议员等300多人，表示要"确保"西南根据地。

△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部署三路进军，歼灭白崇禧所部。西路军是

日率先由常德、桃源出发，向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进军，至10月5日截断白崇禧部主力西逃贵州的退路。

△　汤恩伯由厦门飞抵台北；陈诚离开厦门回台北。

△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飞抵厦门，召集在厦门海军各单位首长举行会议。

△　解放军第二兵团沿河西走廊追击，是日进占古浪。

△　张群打消辞意，自广州返重庆，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同行。

△　昆明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全部解散。

△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外相贝文于华盛顿就远东问题举行会谈。

9月14日　蒋介石在成都对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师生训话。

△　行政院会议通过，特派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　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与李宗仁长谈四小时。

△　行政院会议决议，通缉黄绍竑、贺耀组、刘斐、刘建绪、李任仁、罗翼群、胡庶华、李觉、李默庵、潘裕昆、舒宗鎏、周一志等55人，同时决议，龙云专案通缉究办，并没收财产。

△　白崇禧在广州与余汉谋、薛岳商讨华南军事，至17日返衡阳。

△　解放军第十兵团一部自10日至是日，攻占福建沿海的湄州岛

及平潭岛周围的大、小练岛、草屿、鼓屿、长屿等六岛。

△　解放军第六十四军进占宁夏中宁县城，续后，第十九兵团中路、北路两军先后到达中宁会师。

△　驻新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整编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反对新疆起义。是日，叶成在景化召开紧急会议，下令将家属、物资转移哈密，部队整装待发。

△　香港英当局发表，三月来自香港开往解放区的船只30余艘，载货13万吨。

△　美国国务院答复伊斯勃兰公司，不允许派军舰护送商船进入上海。

△　海南特区军政联席会议开幕。

△　海空军出击大榭岛。

△　台风在台东花莲港附近登陆，全台水陆交通瘫痪。

9月15日　　李宗仁召开军事会议，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参加，商讨“反攻”计划。

△　蒋介石在成都接见财政部长徐堪，指示川、康财政问题。

△　中共驻新疆联络员邓力群从伊犁乘飞机秘密到达迪化，包尔汉等到机场迎接。翌日，邓向陶峙岳转交了张治中9月10日致陶峙岳、包尔汉等的电报，和陶峙岳等接洽新疆和平解放事宜。

△　阎锡山主持爱国公债筹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有钱人拿钱来认购公债，保护身家财产，强调如筹募失败，“戡乱军事必受打击”。

△　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自广州到台北，视察中央研究院，并晤陈诚。

△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龙云、黄绍竑等党籍。

△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向粤北推进，连克翁源县属的坝子圩等据点，俘翁源县长以下440余人。

△　国民党军重占陆丰。

9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六评白皮书》（即《唯心史观的破产》）。

△　蒋介石电告傅作义："已派徐永昌委员由渝飞宁夏转包头，希与恳谈一切。"企图继续拉拢傅作义。

△　傅作义部将领孙兰峰自包头致电蒋介石："傅作义到包，业已表明态度，现军师旅长一体要求通电和平，职已失去统驭力量。"蒋介石复电要孙"独善其身"。

△　阎锡山对外国记者谈，求反共国家团结一致，欢迎恢复美国军事顾问团，职权与范围由中美会商，美援到达，可保证合理应用。

△　解放军第二兵团进占甘肃武威。黄祖勋部第九十一军1700多人向解放军投诚。

△　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自9月12日起进攻福建平潭岛和南日岛，是日完全占领，李延年不战而退，至台湾后即被拘押。

△　徐永昌从重庆飞抵宁夏。

△　广州连日发生强拉壮丁纠纷。

△　东京盟军总部否认中国获得日本飞行员说。

△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答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兰金：“本政府的政策是不对驶向上海及其他中国口岸的商船护航。”

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126人，请假三人，缺席五人。周恩来代表常委会作关于筹备会议的报告，会议决议：一、批准常委会的筹备工作报告；二、基本通过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三、关于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同意原担任此两项工作的第五小组和第六小组直接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四、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日期，授权常委会决定并召集之；五、通过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蒋介石在成都分别接见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省议会议长向传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并要刘清除其掩护下的中共地下党员。是日，蒋介石回到重庆。

△　阎锡山主持为期一周的各高级将领参加的国防部改进业务会议。李宗仁指示应达成“指挥统一，命令彻底”。

△　美、英、法三国外长于华盛顿举行会议，英、法支持美国放弃中国的政策，并早日缔结对日和约。

△　解放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14日进入祁连山区，翻山越岭，于是日歼国民党军骑兵第十五旅，解放民乐。

△　甘肃省保三团、保四团及武威自卫队等共5800余人，在武威地区向解放军投降。

△　经济部部长刘航琛因经济部迁渝成员在火灾中伤亡甚多，从广州到达重庆抚恤慰问。

△　前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从台北到重庆晋谒蒋介石，报告西北情况。

△　马步芳离广州赴香港。

△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宁夏发动金积、灵武战役，马敦静部掘开汉渠放水，淹没金积西南一带。

△　徐永昌从银川赴绥远，马鸿宾同机前往。

△　陶峙岳、包尔汉联名复电张治中，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

△　昆明《复兴晚报》总编辑徐继濂被捕。

△　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麦克唐纳发表声明：美国除少数外交参赞人员外，并无任何美军人员留台，美国在台也没有任何军事基地。

△　重庆当局以9月2日“纵火罪”枪决吴朝富、童登里。

△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英国商轮“摩勒号”已经释放。

9月18日　蒋介石召见国防部次长萧毅肃。

△　台北中国反侵略大同盟东北盟员举行全体大会，发表纪念“九一八”宣言，要求政府明令废除中苏友好条约。

△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撤至酒泉。

9月19日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第九

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等在包头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集团。通电发表后，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准备参加人民政协会议。

△　徐永昌在包头与傅作义三度长谈，企图阻止绥远国民党军起义，未能达到目的，于是日回到银川。

△　李宗仁在广州夜访阎锡山，商谈应对联合国大会事宜。

△　财政部发布命令，取消金银进口限制。

△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突破青铜峡、牛首山防线，将马敦静部压缩在河东地区。

△　马鸿宾得到傅作义的鼓励，自绥远飞回银川，即电令其子马惇靖率第八十一军在中卫地区起义，与解放军签定和平解决协定。

△　解放军第一兵团在张掖地区歼敌五个团，解放张掖，同时，进占永昌。

△　解放军第十兵团主力发起漳厦战役，解放马巷、同安、漳州等地。

△　中国人民政协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军统局长毛人凤派叶翔之率特务小组暗杀。

△　留在南京、上海的前立法委员王又庸等53人发表声明，接受中共领导，决心努力学习，争取新生。

△　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所部解放沅陵。

△　美国伊斯勃兰公司两艘货轮突破海军封锁驶抵上海。

△　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舰官兵，在吴淞口外，击毙舰长胡

敬端、副舰长孔祥栋后举行起义。

9月20日　蒋介石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承认国民党的失败，但仍坚持声称："本党今日的实力，不仅超过了民二、民七和民十的革命时期，而亦绝非北伐时代和抗战初期所能比拟。我们用不着悲观失望，更不应丧气灰心。我们国民革命实在是操有最后必胜的左券，而其关键就是在我们有否健全的组织和明确的政策，能否以革命精神和严正的纪律改造本党。"

△　杨森晋谒蒋介石，蒋介石召见第二十军将领。

△　徐永昌偕马敦静飞离银川，到达重庆。

△　宁夏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联名通电向解放军求和。但所部仍在抵抗，解放军调整部署，进围吴忠，金积守敌乘机溃逃。驻守吴忠的第一二八军拒绝投降，翌日，被解放军第六十四军等部击溃。

△　解放军进占甘肃西南藏族区中心的夏河（拉卜楞）及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城。

△　解放军攻克厦门外围澳头。

△　新疆国民党军将领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根据胡宗南电示，密谋捕杀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胁迫陶峙岳率部南移，陶峙岳向叶成等陈明利害关系后，同意叶成等交出军队，离开新疆出国。

△　德王反对等待解放的意见，带着"蒙古自治政府"的印信，秘密出走，逃往阿拉善旗西北沙漠草原地区。

△　国民党军重占湘南的汝城。

△　立法院第一届第四次会期已决定在广州复会，9月24日报到。

△　卢汉任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台北向公私汽车开征公路建设捐，自7月20日至是日两个月征得240多万新台币，按市价约合40多万美元。

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634人，被邀来宾300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庄严宣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阐明内外政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代表先后发言的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

△　蒋经国携蒋介石致卢汉函自重庆到昆明见卢汉。

△　宁夏灵武国民党军政当局向解放军接洽投降，但第一二八军逃至灵武的残部旋即溃散，解放军当晚闻讯突入灵武维持秩序。同时，在第一二八军溃兵冲动下，驻守黄河西岸的贺兰军也一哄而散。

△　空军出动大批机群轰炸南京、上海地区。

△　国民党陕南省地政局组织地政督导团，进行土地改革，实行战士授田、三一减租、限制私有耕地面积。

△　美国"戈登号"轮船开往上海接侨。

△　香港警察连日搜查左倾人士的住宅。是日，香港法院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判《华商报》罚金4000元。

△　英国商轮“摩勒号”被海军释放后到达香港。

9月22日　　蒋介石偕张群、萧毅肃等飞抵昆明，亲自与卢汉面谈，并在卢宅接见驻军将领，会商西南局势。当日偕张群、俞济时、蒋经国飞离昆明到达广州。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广州开会，研讨蒋介石告全党同志书及召开国民党五中全会事宜。

△　卢汉举行茶会，招待云南省耆绅和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报告此次解散整理中等以上学校的经过和步骤。

△　经济部长刘航琛在重庆考察完毕，返回广州，表示要尽力救济重庆工商业。

△　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控告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案》。首席代表蒋廷黻并在当天的大会全体会议席上发表声明，鼓吹反共。

△　驻美大使顾维钧访代理国务卿罗斯基，请表明对华政策。

△　马鸿宾遵彭德怀对马全良求和电的复电，在银川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和家长身份召开军政负责人联席会议，敦促宁夏军政界接受和平条件，并派出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为宁夏军政代表，前往中宁签署和平协议。

△　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三十一军主力向龙溪迂回南下，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损失惨重，撤至厦门，解放军试攻厦门嵩屿。

△　广东省始兴县县长饶纪锦率自卫团千余人起义。

△　美国参议院通过“军援法”（即《1949年共同防御互助计划》），总数为13.14亿美元，其中有7500万美元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台湾办事处，签署美援肥料六万吨的使用合同，价值约400多万美元。

9月23日　蒋介石召集李宗仁、阎锡山、吴铁城、于右任等会商召开国民党五中全会、改组党务及华南军政事项。

△　毛泽东、朱德在北平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位起义将领。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和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签定《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但驻银川新城和老城的第十一军所部，于22日、23日分别溃散，协议已无法执行。而银川溃兵抢劫，秩序大乱，银川军政界向解放军告急，解放军星夜进驻银川，控制局面。

△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宁夏与绥远无关，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　毛泽东就包尔汉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的来电，复电说：“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　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代表到酒泉、兰州同解放军谈判，接受和平条件。

△　空军在南京燕子矶江面炸沉“长治号”军舰。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主持召集四行二局一库及参议会、银钱两业负责人会议，决定组织银团投资兴建成渝铁路。

△　农村复兴委员会四川区办事处招待新闻界，介绍该处成立九个月以来的工作，其中第一期美援贷款水利工程共12处，平均完成70％以上，陇西渠已全部完成。

△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抨击蒋廷黻演说。

△　日俘1127名从大连到达日本舞鹤。

9月24日　蒋介石在广州接见阎锡山、余汉谋、顾祝同、薛岳、李及兰等，部署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白崇禧自衡阳飞抵广州谒见蒋介石。

△　解放军进占粤北南雄、河源。

△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甘肃河西警备总部及第一二〇军、第九十一军残部在酒泉起义。解放军随即进驻酒泉、玉门、安西。

△　解放军进占泸溪，唐生智在东安武冈起义。

△　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治、中委雷震于23日在广州谒见蒋介石后返回厦门。

△　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到昆明与卢汉商讨清剿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

△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根据《开罗宣言》，台湾、澎湖列岛已移交中国。

9月25日　蒋介石接见白崇禧、阎锡山、陈立夫、顾祝同、桂永清等，会商军事。

△　李宗仁对记者表示，要用时间制胜，采取攻势防御，坚守华南、西南，一切外援不浪费，美援一定会来。

△　韩国驻华大使申锡雨拜访蒋介石。

△　解放军第十兵团攻克嵩屿、尾仔屿、集美，自漳厦战役发起后已先后歼敌1.2万人，汤恩伯率国民党军第八兵团、第二十二兵团残部退守厦门、金门岛。

△　解放军陈赓兵团克粤北始兴，激战韶关。

△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通电起义，声明自即日起，与广州民国政府断绝关系，服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领导，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和平条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处理，并将新疆省政府改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

△　新疆国民党军将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脱离军队，从迪化取道南疆出走赴印度。

9月26日　上午11时，周恩来举行午宴，招待出席政协会议的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周志祥、简玉阶六位老人，商讨国号问题。周就提交政协全体会议的文件（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一事征求意见。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余人均发言主张删去“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周同意多数意见，表示将讨论情况报告大会主席团常会最后决定。

△　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通电起义，与广州民国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即日起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领导。

△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示后勤保障问题，并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

△　蒋介石和李宗仁恳谈当前局势，蒋又与吴铁城、阎锡山、邱昌渭、叶公超、张群讨论外交问题。

△　国防部业务会议结束，通过增加士兵薪饷案。

9月27日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暂用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　蒋介石在广州邀集党、政、军首长阎锡山、张群、吴铁城、白崇禧、于右任、居正、顾祝同、陈立夫、桂永清等继续会商当前国是。

△　总统府发言人声明，李宗仁不同意汤恩伯继任福州绥靖主任。

△　立法院发言人在广州发表谈话，说明立法院复会，将讨论政治、外交及军事等重要议案。

△　蒋廷黻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控诉苏联破坏《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

△　宁夏额济纳旗扎萨克兼防守司令塔旺嘉布率部通电起义。

△　美国“戈登号”轮船自上海撤侨1250人到香港，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暹罗大使及美英使馆人员均随轮到港。

△　海军在上海口外扣留美伊斯勃兰公司三艘轮船。

9月28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军事援外的《1949年共同防御互助计划》。

△　毛泽东、朱德复电陶峙岳等："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

△　立法院长童冠贤、副院长刘健群举行茶会招待立法委员百余人，决定30日为第一届立法院第四会期的第一次会议日期。

△　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到达厦门东北的石井集结，闽粤赣游击纵队占领平和、漳浦等城，对厦门形成三面包围，国民党军失去所有厦门外围陆上据点。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8月份总结战绩公报，8月份解放军在西北、华中、华东三个战场上，继续向甘肃、青海、湖南、江西以及福建东南等地胜利进军，扫荡残敌，并继续清剿各新解放区内之残余土匪武装。一个月中，消灭敌军16个整编师，23.918万人，缴获大小炮1100门，各种机枪6456挺，各种枪支11.4036万支，解放县以上城市106座。

△　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在招待立法委员席上，驳斥台湾交联合国托管说，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自己有防卫领土的责任。"并谓：台湾防务已部署完成，安全定可无虞。呼吁各方"精诚团结，共渡难关"。

△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拨给中国12.5万美元，向美国购买肥料，截至现在，对华拨款已达2.16828亿美元。

9月29日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致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惟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

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

△ 蒋介石在广州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议决于非常委员会下设立军事、财政与外交三个小组，协助非常委员会筹划工作。三个小组由阎锡山、徐堪、叶公超分别负责。

△ 总统府令免咨政宋庆龄，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之职。

△ 立法院发生倒阎锡山风波，在台北的监委王冠吾等电阎锡山，请阎打消辞职意图。

△ 联合国大会以46票对五票批准程序委员会把蒋廷黻提出的控诉苏联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的建议。

△ 解放军进驻宁夏北部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

△ 解放军收复湘、赣、粤三省交界的汝城。

△ 甘肃省政府代主席丁宜中等500余人到酒泉向军管会报到。

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65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朱德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词，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民国的历史时期至此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一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一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出版前言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是在《民国人物传》十二卷本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扩编而成。

《民国人物传》的编撰工作，始于1972年9月。当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编撰中华民国史的任务，随后，在李新先生的组织和领导下，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但是，负责人物传编撰工作的同志们仍然尽心尽力，在1973年12月编辑完成、由中华书局内部出版发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第一辑。此后，我们不断积累研究的成果（至1988年共计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23辑），并以此为基础，于1978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民国人物传》第一卷，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民国人物传记集，以此为契机，民国史研究事业由起步而发展而繁荣，成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断代史研究领域。

编写《民国人物传》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大体已如李新先生在本书第一卷出版前言中所列明：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2．用记叙文，通过具体事实表现传主的生平，不作过多的评论；3．真实可信，事实确实无误，凡有疑问者宁可不写或存疑；4．反映传主的全貌而又有重点与特点，有详有略；5．用白话文，文字力求简练，引文注明出处。上述要求，既反映了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有对于人物传记编写的具体指导，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尊重学术规律的，并在民国人物传编写的实

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发挥了其应有的指导作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及其以后各卷出版时所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也说明了上述原则对于民国人物传编写工作的重要意义。

《民国人物传》的作者，早先主要是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随着收录人物的不断增多，作者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先后参与其事者有近百人，而在晚近出版的各卷中，邀约的外稿已经占到多数。对于海内外民国史研究专家学者给予本书编撰的热心支持，我们一向心存真诚的感激！正是由于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才使本书得以最终完成，并保证了所撰传稿的学术质量。

《民国人物传》的编辑工作，最初由李新先生和孙思白先生负责主持，他们还担任第一、第二卷的主编，对本书的编辑方针、撰写方法、人物选题、写作文风以至技术处理等等，多有贡献。自1981年第三卷出版时起，宗志文、朱信泉、严如平、熊尚厚、娄献阁等先生接续担任各卷主编，并请李新先生和孙思白先生分别担任第三至六卷的校阅工作。李宗一、耿云志、林印、李静之、陈民、齐福霖等先生也曾参加过部分人物传稿的审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都对《民国人物传》的编写工作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尤其是对《民国人物传》的撰写和编辑工作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李新先生、孙思白先生以及作者和编者中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更当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

负责出版《民国人物传》的中华书局，从前总编辑李侃先生到书局历任领导以及历史编辑室的编辑诸君，始终如一，无论出版市场和内外环境如何变化，总是为《民国人物传》的出版开绿灯、给方便，倾尽其力，精心编校，功莫大焉！

2005年，《民国人物传》原计划编撰的十二卷由中华书局全部出

齐，共收入传主861人，篇幅约380万字。不过，随着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民国史资料的不断开放，民国史研究环境的不断变化，本书也还存在若干的不足之处，诸如有些应收录的人物尚未收录，有些已收录人物的生平经历还有缺失，个别人物的史实还有讹误之处，人物评价可能还不够全面客观，等等。我们本有在全书出齐后进行修订增补的计划，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这样的殷切期望，因此，2006年，我们决定对《民国人物传》进行全面的修订和增补，主要工作是：对已出各卷收录的人物传进行修订，补正缺失、错讹之处，修正不妥的评价；对未收录而应收录的人物，尽力增补；统一全书的技术处理，编排收录人物的索引，以利读者的利用；等等。我们认为，应在修订、增补的过程中，尽量利用近些年来新开放的民国史资料，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尽力做到客观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此为这次修订、增补工作的基本方针。经过修订和增补，全书更名为《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共收录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传记共978篇，计约500万字，征引资料更全面，人物生平更丰富，历史评价更求实，并采用统一的编排方式，全部八卷一次出齐。至此，我们堪可以新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告慰于民国史研究事业的诸位开创先进、学界同仁以及广大始终关注并支持民国史研究事业的热心读者。

在本书修订、增补的过程中，已出各卷的人物传作者提供了各自的修订稿，也有许多新的作者加入撰写工作，提供了新收录人物的传稿。原先负责主持人物传编写工作的朱信泉、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诸位先生，已经离退休多年，本应安享晚年，但他们克服年高体弱的困难，本着退而不休、善其始终的精神，继续参加修订、增补工作，分工合作，认真负责。此次修订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及近代史研究所领导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并促成本书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民国史研究室的赵利栋副研究员担任课题主持人，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为本书修订、增补的完成作出很大的贡献。全书既有文稿的修订由朱信泉、赵利栋通读审定，新增文稿由赵

利栋编辑、审定，全书清样由赵利栋审阅校订。中华书局编辑部历史编辑室诸位先生，对于本书的编辑成稿贡献良多。值此《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修订、增补工作完成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编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的修订、增补工作虽已告成，但是我们深知，囿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还有少数应收录的人物，或因其生平资料难觅，或因种种原因难以下笔，只能暂付阙如；少数已经收录的人物传记，也还存在利用史料不够、生平叙述有缺等问题；有些已出人物传的修订，因为原作者已故或其他原因，叙述和评价还存有当年写作时代的痕迹；等等。所有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我们今后应当着力改进的方面。我们希望每过若干年，都能对本书进行新一轮的修订和增补，使其不断完善，成为学界研究民国人物和社会各界了解民国人物生平的可靠的、必备的参考著作，并经此而使民国史研究事业生生不息，代有传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2011年5月28日

目录

出版前言

A

阿炳　倪波　沈道初　沈祖方

B

巴金　张静

白崇禧　严如平

白朗　杜春和

白毓昆　徐辉琪

柏文蔚　刘敬坤

板垣征四郎　吕乃澄

包达三　汪仁泽

包尔汉　汪仁泽

鲍贵卿　孙德昌

鲍威尔　任嘉尧

贝祖贻　汪仁泽

边守靖　张学继

冰心　宗志文

C

蔡昌　汪仁泽

蔡楚生　张洁

蔡锷　张振鹤

蔡翘　李援朝

蔡廷锴　郑全备　薛谋成

蔡元培　宗志文

曹聚仁　任嘉尧

曹锟　张振鹤

曹汝霖　郑则民
曹锐　张学继
曹亚伯　朱信泉
曹禺　李仲明
岑春煊　闻少华
常燕生　李义彬
常荫槐　张学继
陈宝琛　陈贞寿
陈璧君　闻少华
陈炳焜　刘立道
陈布雷　严如平
陈策　陈开科
陈长捷　汪仁泽
陈诚　严如平
陈楚楠　陈民
陈春圃　黄美真　张云
陈达　汪仁泽
陈蝶仙　江绍贞
陈朵如　郑叔屏
陈公博　闻少华
陈光甫　江绍贞
陈光远　陈德军
陈果夫　严如平
陈鹤琴　严如平
陈焕章　郑则民
陈济棠　李静之
陈家鼎　许进
陈嘉庚　熊尚厚
陈锦涛　汪乾明
陈炯明　丁身尊

陈立夫　严如平
陈廉伯　熊尚厚
陈箓　刘清涛
陈明仁　萧栋梁
陈铭枢　邱涛
陈其美　黄德昭
陈其尤　吴仁
陈启天　李义彬
陈渠珍　张永攀
陈去病　杨天石
陈群　朱佩禧
陈三立　杨天石
陈少白　娄献阁
陈绍宽　陈贞寿
陈树藩　张学继
陈叔通　万江红
陈树人　陈民
陈天华　周天度
陈调元　侯鸿绪
陈万运　张志
陈望道　邓明以
陈仪　严如平
陈宦　马宣伟
陈友仁　陈民
陈裕光　钱益民
陈垣　陈智超
程璧光　郭烙
程德全　朱宗震
程家柽　潘荣
程潜　沈荆唐

程砚秋　林印

成舍我　熊尚厚

褚辅成　王娟

褚民谊　黄美真　张云

褚玉璞　张学继

慈禧　周衍发

返回总目录

阿炳

倪波　沈道初　沈祖方

阿炳，道名华彦钧，江苏无锡县人，1892年7月9日（清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生[(1)]。阿炳是他的乳名，中年双目失明后，大家就称他“瞎子阿炳”。

阿炳的父亲华清和，是无锡雷尊殿道观的当家道士。他擅长音乐，鼓、笛、笙、箫，件件皆能。华清和四十三岁时与寡妇陈五妹同居，生下阿炳。阿炳一岁时，母亲忧郁而死，华清和将他寄乳在东亭弟媳妇家抚养。五岁后，华清和便将他带回雷尊殿当小道士。阿炳七至九岁时读了三年私塾。1902年道教江西龙虎山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巡游各地，在无锡时为阿炳题了道名“华彦钧”。

阿炳少时常受富家子弟欺侮，唯有音乐是他的安慰和欢乐。他从父学二胡、琵琶等乐器，晨昏寒暑勤学不辍。为了掌握击鼓的软硬功夫，他用铁筷敲打方砖，练习鼓点和板眼。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每日清晨临风学习吹笛，笛子尾部还挂上一个铁秤砣，以练腕力。由于他勤学苦练，十三岁时已经学会多种乐器，参加拜忏、诵经、奏乐。有一次节日，各殿道士轮流奏乐，恰遇打鼓老道士病倒，阿炳代替，首次演奏成功，被赞誉为“小天师”。十八岁时，他在无锡道教音乐界中已被公认为技艺超群的人才。他不满足于道家音乐，不拘泥于陈规旧套，广泛吸取民歌及民间乐曲之长，为后来创作乐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炳二十岁时华清和去世，他继为雷尊殿的当家道士。此时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无锡市民请道士镇宅谢土、祭风降雨等迷信活动亦甚少。阿炳百无聊赖，加上他少年当家无拘无束，便染上吸鸦片等恶

习，并成了终身之累。1927年阿炳患眼疾无钱医治，左眼视力模糊，右眼失明。在苦闷中，他彷徨徘徊，向往光明，开始了《二泉映月》的创作。同年3月，无锡工人运动领袖秦起领导全市工人欢迎北伐军，也激励了阿炳，他欣然演奏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乐曲。不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快失败，军阀赖世璜派兵包围了设在崇安寺大雄宝殿的无锡市总工会，秦起壮烈牺牲。阿炳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对反动统治有所认识，从此不肯奉承权贵。后来他左眼也瞎了，成为双目失明的盲人。当雷尊殿中做“法事”时用的“庄严”（装饰用品）变卖完后，阿炳只得身背琵琶、手拉二胡，走街串巷说唱卖艺。他自编唱词，琅琅上口，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小曲小调，讥笑怒骂现实社会的黑暗。他用无锡的民间曲调唱道：“前门送走老虎后门来了狼，齐燮元赶走卢永祥呀，又来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接着又是孙传芳，走马换将，鸡鸭鱼羊一抢光！”“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经常弹唱《歌颂十九路军》；后来，又经常弹奏《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他还创作了《寒春风曲》，用音乐告诉人们，严冬寒月过后，风和日丽的春天必然会来临。

阿炳四十岁时，与寡妇董催弟（彩娣）同居，出入相随，互敬互爱。“七七”事变后，上海、无锡先后沦陷，阿炳夫妇一度到东亭老家避难。不久，阿炳赴上海，在昆曲班“仙霓社”担任琴师，弹奏三弦；并在电影《七重天》中担任表演盲人群众角色。阿炳艺术活动的全盛时期，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年代。这时他创作的《听松》，是一首气魄豪迈、情感充沛的二胡独奏曲，倾吐着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热情。1939年，他的名曲《二泉映月》问世。这是倾诉作者心灵深处感受的一支乐曲，每当万籁俱寂的夜里，这支乐曲发出的悠扬的旋律，给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带来几分慰藉。为了歌颂人民抗日，揭露日伪顽敌，阿炳每天上午去茶馆搜集各种新闻，回来构思创作，下午在崇安寺的听松园茶馆前演唱。他的琴艺十分高超，可将琵琶放置在头顶上弹奏，还可以用二胡模仿男女老少说话、叹息和欢笑以及鸡鸣狗叫声。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这使阿炳转喜为怒。他在演唱卖艺中，经常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因而一再受到迫害。有一次被反动警察殴打，他的二胡被折断，琵琶被摔坏。由于穷困潦倒又屡遭迫害，1947年他肺病发作，卧床吐血，三年没上街卖艺，仅以修理胡琴为生，艰难度日。当时有人劝他到南京、上海的舞厅去演奏，他坚决拒绝，表示宁可饿死也不去。

1949年4月无锡解放，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等乐曲获得新生。1950年暑期，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为了发掘、研究和保存民间音乐，专程奔赴无锡为他录制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和《昭君出塞》、《龙船》、《大浪淘沙》三首琵琶曲。正当他的艺术受到人民重视之际，不幸肺病转剧，医治无效，于1950年12月12日病逝[(2)]。

据不完全统计，阿炳创作、改编、承袭的乐曲，有二三百首之多[(3)]。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出版有《阿炳曲集》。

---

(1) 关于阿炳的出生日期，有几种说法：（一）1887年8月25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七），是解放前发的“身份证”上填的；（二）1892年8月30日（清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九），是无锡市公安局清查户口的档案；（三）1893年，见《阿炳曲集·阿炳小传》（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版），并见《太湖》1979年第4、5期（记为1893年8月20日）；（四）1898年10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是无锡市图书馆许忆和查看了阿炳故居的牌位，并调查访问阿炳的亲戚、邻居、旧友后得出的结论。此据无锡市崇安寺派出所1950年登记户口时保存的户口册。

(2) 阿炳去世日期也有不同记载：据无锡市公安局清查户口档案记为1950年12月12日；据阿炳故居的牌位记为庚寅年十月二十五日午时，即1950年12月4日。此据前记。

(3) 蒋宪基：《我所知道的瞎子阿炳》，《太湖》1978年第5期。

巴金

张静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为笔名，“巴”为纪念留学法国期间结识的一位巴姓同学，“金”取自俄国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曾用笔名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余一、余三等。1904年11月25日（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的一个士绅大家庭。其父李道河曾任广元知县，辛亥革命前夕辞官还乡。1914年、1917年，母亲与父亲相继病故。

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传入四川，巴金兄弟收集传阅《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刊物。1920年，祖父亡故，叔父们闹着分家。同年，巴金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他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受李石曾所译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及波兰作家廖·抗夫（Leopold Kampf）的三幕剧《夜未央》影响，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成都学生刊物《半月》上发表文章，讨论无政府主义和时事，并参与该刊编辑，后又参与成立成都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均社”，自称安那其主义者。1922年，与吴先忧等办刊物《平民之声》，并开始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发表新诗和散文。

1923年，巴金与三哥李尧林离开四川，赴上海求学，先入南洋中学，年底转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1925年中学毕业，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旋因病南归上海。在上海期间，巴金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讨论与宣传。他与出生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建立了通信联络，并视其为“精神上的母亲”。巴金所译介无政府主义学说中，较为重要的是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1927年上海自由书店初版，后经修订，更名《面包与自由》，

1940年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1926年，巴金等在上海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

1927年，巴金赴法国求学。留学期间，巴金大量阅读有关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著作，与各国无政府主义者广泛联系，并参与了营救被美国法院判处死刑的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凡宰特（Sacco and Vanzetti）的活动，并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出版）。这一时期，巴金的文学创作亦跨出关键性一步。他以军阀统治下青年革命者的苦闷、反抗和牺牲为主题，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连载于1929年上海《小说月报》第1至4期，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

1928年底，巴金回到上海，参加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该会机关刊物《绿光》，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探讨与宣传活动。1929年，以马拉为笔名，主编无政府主义者所办自由书店的《自由月刊》，并任该书店编辑，筹划出版《克鲁泡特金全集》等书，并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编）》（自由书店1929年出版）和《我底自传》（上海启明书店1930年出版）。1930年，巴金所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由自由书店出版，阐述其无政府主义主张，次年被国民政府查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巴金出席上海著作家抗日会成立大会，写出借童话形式呼吁抵抗侵略的《海底梦》。巴金虽一向置身文坛各派别及阵营之外，独立创作，但在30年代初期，他与一些左翼作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3年，巴金结识鲁迅。虽然巴金以无政府主义者著称，但鲁迅认为他是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引以为友。巴金曾与鲁迅、茅盾等人联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6年6月，巴金还参与了该宣言的起草）、《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巴金为治丧办事处成员之一。

30年代，巴金的文学创作进入高峰期。他勤奋而多产，其作品多

以青年的苦闷、压抑与反抗为主题，笔端蕴含情感，故而在青年学生中尤为风靡。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激流》（即“激流三部曲”之第一部《家》）在上海《时报》陆续连载。小说反映了正在崩坏中的传统大家族制对个体的迫害以及青年一代的反抗。虽然作者再三声明《家》并非自传，但其灵感源自其早年的亲身经历。

至抗战爆发前，巴金的主要作品还包括：1932年至1934年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这是他本人喜欢的作品；1933年连载于《东方杂志》的中篇小说《新生》，为《灭亡》的续篇，次年1月，以“鼓吹阶级斗争”被查禁；他还写了反映矿工生活的《砂丁》（1932年）和《萌芽》（1933年，后更名为《雪》），后来巴金承认，这两部作品的题材远离他所熟悉的生活，因而并不成功。

1933年9月，巴金到北平，不久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人筹办《文学季刊》。1934年10月，巴金又与卞之琳等在北平创办《水星》月刊。1934年11月至1935年8月，巴金赴日本游历，在日期间，曾遭便衣搜查和拘留。回国后，参加吴朗西等新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巴金为该社主持编辑《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等丛书。其中，《文学丛刊》标榜“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每集十六册，至1949年前，共出版十集，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已成名的作家，又不乏文坛新人。1936年6月，巴金与章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12月，被查禁；1937年2月，二人又创办纯创作月刊《文丛》，1939年初停刊。

1937年抗战爆发后，巴金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地。他继续从事文学出版工作，进行文学创作与翻译，并参与文艺界的抗战救亡活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巴金与茅盾、冯雪峰等人议定将《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刊停刊，以四社同人名义，自筹资金合办一个能适应抗战需要的刊物，初定名《呐喊》，两期之后，更名《烽火》，编辑人为茅盾，巴金任发行人。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烽火》被迫暂停，1938年5月，由巴金在广州复刊，10月，广州陷落之际，已排竣的第二十一期毁于轰炸，停刊。

早在1936年，巴金即开始为新创刊的《文季月刊》写作《家》的续篇《春》，至1938年完成；1939年至1940年，又作“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38年至1943年，以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主题，创作长篇小说《火》第一至三部，亦称“抗战三部曲”。抗战后期起，巴金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1944年）、《第四病室》（1945年），长篇小说《寒夜》（1946年—1947年）。《憩园》以成都一个公馆前后两任主人的家庭悲剧为内容，反映了旧传统、旧制度的必然没落。《第四病室》描绘了抗战期间大后方一个三等病室里一群病人的病痛被忽视、挣扎和无助，并以之作为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寒夜》写一对曾怀有改造社会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夫妇，抗战期间在大后方艰难挣扎，最终家破人亡的悲剧。这些作品大都反映善良的小人物、普通人的生活，与其早期作品相比，减少了情感的直接宣泄，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平实描绘，文学技巧亦更臻成熟。

巴金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深受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和俄国文学影响的一位。在创作之余，他亦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0年代，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出版）、《处女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出版），斯托姆的《迟开的蔷薇》（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出版）和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出版）等。

1946年5月，巴金举家迁回上海。1949年6月，巴金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9月，再赴北京出席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和第一届政协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66年前，巴金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等职。

1949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改组，巴金不再担任总编辑。12月，平明出版社成立，以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尤其是俄苏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巴金任董事长和总编辑。1956年该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起，主编《文艺月报》（1959年更名《上海文学》）。1957年，大型文学月刊《收获》创刊，巴金和章靳以任主编。

抗美援朝期间，巴金于1952、1953年两度入朝，著散文、通讯合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平明出版社1953年出版），散文、通讯合集《保卫和平的人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出版）。至“文革”前，他的主要作品还包括：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散文、小说合集《新声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散文集《友谊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赞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等。

“文命”中，巴金曾被关押。后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文革”结束后，巴金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等职。2003年，由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曾获多种国际荣誉及奖励。

1980年起，巴金倡议建立现代文学资料馆以搜集收藏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他捐出自己多年稿费、版税、奖金，以及藏书、书信、手稿等资料。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巴金任名誉馆长。

2005年10月17日，巴金病逝于上海。

1949年后，巴金作品在大陆数度结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包

括：1958年至1962年，《巴金文集》十四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作者1949年前的作品；1982年，十卷本《巴金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至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全集》二十六卷，与《巴金文集》相较，增加了作者1949年之后的作品，亦收入了一些早期的文章；1997年，《巴金译文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十卷。上述文集，均经作者本人参与整理编校。

主要参考资料

《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至1993年版。

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上、下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陈丹晨：《巴金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编：《世纪的良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白崇禧

严如平

白崇禧，字剑生、健生，1893年3月14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生，回族，广西桂林人。父亲白志书在苏桥圩开永泰林商铺经营粮、油等。白崇禧五岁入塾，勤奋苦读，颇得塾师李任仁青睐，勉以天下为己任。十岁转入会仙小学；十四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与李宗仁、黄绍竑同学，未及数月，因染疟疾停学，后改入省立初级师范。辛亥革命爆发，白参加陆军小学组织的北伐学生敢死队北上援鄂。南北停战，白入南京陆军伍生队，半年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后毕业，被选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三期步科生，学习两年。

1916年末，白崇禧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返回广西，先在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后至督军署“模范营”任代理连附，一年后升为上尉连长。1919年初至左江流域剿匪，力主“剿重于抚”，断然枪决了80名惯匪，使匪势收敛不少。1921年，白升任模范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年底，他在一次战斗中折断左腿，赴广州就医休养一年。这时，黄绍竑被沈鸿英委为旅长，驻防梧州，白任上校团长。白受黄之派遣，谒见孙中山，表达决心追随之意，受孙赞许。白连夜赴梧州与黄策划起义。

1923年7月18日梧州起义成功，建成“讨贼军”，黄为总指挥，白为参谋长。白前往桂平劝说李宗仁共同行动，两支军队乃合并为“定桂讨贼军”，共击南宁取得胜利，众推李为总指挥，黄为副总指挥，白为少将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此后，白与李、黄率部先后扫清了陆荣廷、沈鸿英两部，统一了广西全省；1925年又在粤方配合下，击溃了唐继尧滇军的进犯。是年秋，成立广西督办公署，李宗仁为督办，

白为参谋长，黄为行政长。

广西统一后，白崇禧积极推进两广统一，前往广州磋商获得成功。1926年3月，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任参谋长，黄绍竑为党代表。两广筹谋北伐，白受蒋介石之命赴湘，说动唐生智归附。北伐战启，白被蒋擢升为总司令部行营中将参谋长，亲临前线指挥战事。在攻占南昌、九江之役任追击司令官，大破孙传芳军；继又兼任东路军前敌指挥官，率部由赣入浙，攻克杭州后继续挥师北进。

白崇禧虽然十分敬仰孙中山，但对三民主义并不理解，对“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尤多怀疑，以后与蒋介石相处甚密，更受其影响而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其时，蒋介石蓄谋发动“清党”反共事变，于1927年4月2日向白表示“清党”决心；白亦对蒋表示，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尤其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着实忍耐不住剿共的决心”[(1)]。8日，白派兵查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逮捕十九名政工人员；9日，以戒严司令身份宣布上海戒严；接着，授意杜月笙等人以“上海工界联合会”和“中华共进会”名义，武装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于12日袭击工人纠察队，制造“内讧”假象，而白立即派出军队以调解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13日，十万工人向白请愿，第二师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死百余人。

白崇禧为蒋介石“清党”反共效力甚勤，但并没有得到蒋的重赏，颇为悻悻。其时蒋受到武汉方面的声讨，败走的孙传芳军在奉张支持下又图大举南下，白乃与李宗仁等联手乘势逼蒋下野，意欲握柄中枢。但白与李缺乏基础和实力，指挥不了全局，汉方汪精卫等人和沪方西山会议派均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此时孙传芳又乘机渡江南犯，形势危急。白与李急调各军反攻，终于取得龙潭大捷。之后虽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合作在特别委员会中得手，白一时颇为得意，但毕竟敌不过蒋介石的固有势力和纵横捭阖的手段。1928年初，蒋复职重新掌握

党政军大权后，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进行讨伐奉张的二次北伐，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领桂军北上，进驻津东。

北伐结束后，蒋介石号召“裁兵”、“编遣”，白崇禧想拥兵自重，表示愿率所部十万屯甘肃青海“殖边”，“为推行兵工政策作示范”[(2)]，与蒋发生龃龉。1929年2月桂系驱走鲁涤平，夺取湖南地盘，蒋介石策动唐生智北上，抓回一年前被白崇禧收编的三个军；蒋并布置特务拘白，白化装逃逸，经香港回广西。嗣后桂系在蒋介石的讨伐下全军覆没，白与李宗仁亡命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暂避。不久，白与李回到广西召集旧部，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但攻粤失利。1930年5月，白与李策应冯、阎反蒋，率军北上，次第攻占衡阳、长沙、岳阳，直指武汉。此时粤军在衡阳袭击桂军后续队伍，白与李只得回师南下，结果被蒋军歼灭大部。白沮丧之余，仍强硬表示：“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3)] 竭力劝阻黄绍竑离桂投蒋。接着他率领精兵轻装翻越崇山峻岭，直插南宁，击败并逐走了围城三个多月的滇军，使桂军有了立足之地。

1931年5月，反蒋各派系在广州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李宗仁、白崇禧与陈济棠释嫌修好合作反蒋。半年后，“非常会议”凭借胡汉民的威望，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形成西南半割据局面，广西得以偏安一隅达五年之久。白崇禧协同李宗仁精心治理广西，以恢复元气，为今后之发展建立基地。由于李宗仁大多时间住在广州协调与广东的关系，省内事务多委诸于白。白仿效春秋战国管仲相齐“作内政以寄军令”、“寓兵于农”等做法，依靠民团来建立和强化全省基层政权，贯彻实施其励精图治的政策。他首创自卫、自治、自给（“三自”），寓兵于民团、寓将于学校、寓征于募集（“三寓”），实行“三位一体”的“一人三长制”——村（街）长兼任民团后备队队长和国民基础学校校长，乡（镇）长兼任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和中心学校校长。他

在全省实行军事化，进行意志、力量、物资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还规定公职人员一律穿粗布灰色制服，男子一律不准蓄发，自己亲作表率，大力革除旧习。当时舆论称赞广西“政风朴实、简洁，政令贯彻乡村，干部朝气蓬勃，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4)]。

1936年5月，蒋介石借胡汉民病逝之机，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乃打起“抗日救国”旗号反蒋。蒋介石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派人收买陈济棠部下。结果粤方空军四十八架飞机飞赴南京投蒋，军长余汉谋亦通电拥蒋。陈济棠难以为继，离粤出走。蒋即下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南京任职。白与李宗仁商讨对策，准备拼死一战。后经各方人士调停，双方罢兵息争，使这次“两广事变”终于和平解决。白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广西绥靖副主任、第五路军副总指挥，继续辅佐李宗仁治桂。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白崇禧与李宗仁当即发出“请缨抗日”通电。蒋介石8月2日电召李、白共商抗日大计。白不加犹豫，4日即飞南京，旋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938年1月兼军训部部长。他在制定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以及许多重大战役的决策上，都有重要建言，受到蒋的高度重视。在战略防御阶段，他主张：“在战略上实行‘消耗持久战’方针的同时，在战术上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5)]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他强调“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还撰写《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及军校。他在许多重大战役中，亲临前线和阵地，具体协助指挥作战。1938年11月，他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四、七、九诸战区军事。在昆仑关战役中，亲自指挥机械化部队和广西军队奋战日本侵略军，取得重大胜利。1944年11月，白兼中国海军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6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蒋介石对抗战前曾多年反对过自己的白崇禧戒备甚深，并不赋予军事实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改制，白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蒋同时任命陈诚为参谋总长，掌握统率陆海空军实权，而国防部长只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不能决定任何问题。白受到戏弄，十分恼恨。他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也曾有过一些建言，但蒋刚愎自用，不予重视，白乃作壁上观。1948年3月，蒋召开“行宪国大”，除自任总统外，副总统人选属意孙科；但李宗仁决意参加副总统竞选，白联络桂系力量，积极为李出谋划策，与蒋介石等人斗智斗勇。在面对蒋之强大压力时，白建议李以退为进，以“弃选”置蒋于被动，进而反守为攻，终于使李赢得竞选的胜利。

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后，白崇禧被蒋介石调离南京，任华中“剿匪”总司令。1948年11月，淮海决战展开，蒋要白派兵东来增援，遭拒。嗣后白看到美国不想再支持蒋介石，蒋已难以为继，想以桂系取而代之，乃发动“和平运动”逼蒋交权。他对同僚说：“老蒋的老本丢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老蒋下野，德公（指李宗仁，字德邻）上台，和共产党谈和，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6)] 他于12月24日、30日连发“亥敬电”、“亥全电”，提出“和平”主张，逼蒋早日引退。他还请黄绍竑去港找“民革”主席李济深，以此压蒋。1949年1月20日，他在武汉召集桂系要员商议，准备以“呼吁和平”为旗帜，立即与蒋决裂。次日蒋宣布下野，白劝李宗仁：“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7)]

白崇禧一心想与中国共产党“划江分治”，让李宗仁和他来统占长江以南半壁河山，所以在李宗仁大造“和谈”声势之时，他整军经武，扩充兵源，竭力加强长江防务；同时四处联络各方，还想分化拉拢蒋介石的部属。中共的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打碎了他的美梦，他声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说：“以后谁再言和，给我抓起来！”[(8)] 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白守不住武汉防线，但他还想凭借手中三十万

兵力，依托广西，在西南再圆其梦；蒋介石也拉拢白，在重庆表示了“合作”之意。但是解放军大举南进，势如破竹，白崇禧的几支精锐部队在撤逃中大都被围歼，只有少数遁入越南。白黯然神伤，撤往台湾，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因心脏病在台去世。

---

(1) 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国民党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印。

(2) 《白之精兵主义》，《新广西旬刊》第19期。

(3) 黄绍竑：《我离开桂系集团的原因和结果》，莫乃群主编：《新桂系纪实》上册（《广西文史资料》第29辑），广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1990年版。

(4) 《全国瞩目的新广西》，上海《新社会半月刊》，1934年4月。

(5) 贾廷诗等访问：《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350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984年版。

(6) 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2年重印本。

(7) 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930页。

(8) 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白朗

杜春和

白朗，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农民家庭，幼时曾读书年余，稍长，在家务农。他家门户单弱，经常受本村地主的欺侮。1908年夏，白朗与一个叫王岐的地主发生口角，互相殴打，事后王家贿通官府，将白朗逮捕入狱。在狱中一年多，白朗受尽了狱吏的敲诈欺侮和非刑拷打，使他对反动的官府、地主积下很深的仇恨[(1)]。出狱后，因家产被勒索几尽，本村又无法存身，只好以赶牛车（拉官盐）和开炉场（冶铁）来维持家人生计。由于经常往来各地，对许多劳动群众遭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深表同情。他经常尽其所有地帮助别人，因此，群众对他很有好感，遇事都爱找他商量。年轻的人都爱称呼他为“大哥”，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

清朝末年的河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加之1911年夏季，宝丰、鲁山一带又遭受了严重的雹灾，夏粮颗粒无收，而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逼得饥饿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白朗也在宝丰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2)]。

白朗最初只聚集了二三十人，手中使用的是“笨炮”（土铳）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所以当时被人称为“笨炮队”或“袄片队”。他们的活动开始不久，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依然如故，因此，白朗军的斗争矛头便又指向了袁世凯的统治政权。1912年4月，白朗这支小小的队伍，“打劫”了民愤很大的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张礼堂的财富，得快枪二十余支。到5月下旬，已有“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支”[(3)]，初步站住了脚。接着就和各支农民武装相配合，打得宝丰、鲁山两县

的官军不敢出城。河南都督张镇芳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焦灼，他指使河南陆军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改用“招抚收编”的诡计，诱骗农民队伍就范。在当局许以官职、金钱的引诱下，杜启宾、秦椒红等十多个首领动摇投降，先后去鲁山“受抚”，被当局全部杀害[(4)]。白朗没有受骗，他率领全队穿过郏县，攻占了禹州的神垕镇。杜启宾等人被害后，他们的部众都纷纷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队伍很快增加到五六百人。

1912年冬到1913年春，白朗率众避开敌人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声称“打富济贫”，到处号召饥民参加，并攻下许多寨堡，把获得的官绅、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除一部分留充军饷外，其余全部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5)]因此，他们到处受到穷人们的欢迎。有的还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半年之内，许多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各色贫苦无以为生的人，纷纷加入，白朗军迅速发展到三千余人。

1913年的夏、秋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之时，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白朗这支农民武装，不断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派人到白朗军中来进行联络，并委任白朗以“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等名义[(6)]，有的还以参谋、顾问的身份帮助白朗赞画军务。孙中山曾派一名姓沈的参谋帮助作战[(7)]，黄兴也在致白朗的信中要求“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8)]，以牵制袁军的南下。白朗接受了孙、黄等人联合反袁的要求，在进行“打富济贫”的同时，又提出过响应“二次革命”的口号[(9)]，标志着白朗军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13年6月，白朗为配合“二次革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举攻克唐县县城，打垮守敌近一个团的兵力。7月又攻克以富庶著称的禹州，先后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和财物。他的队伍扩大到六七千人，半用快枪，并有机关枪数挺，大炮数尊，声威大震。同时分兵

袭击京汉铁路，使列车停顿，有力地牵制了袁军从河南南下。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曾报导："白狼（朗）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河）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10]。这时白朗军的斗争，已像插进袁政府管辖区的一把尖刀，搅动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9月下旬，当白朗军攻克湖北枣阳时，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白朗军在五六千敌人的围攻下，坚守枣阳达十天之久，焚烧了教堂，扣押了与起义军为敌的传教士十三人，使中外敌对分子大为震惊。10月初，白朗军退出枣阳，返回河南。11月攻克宝丰，白朗回到故乡大刘庄，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二次革命"失败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袁世凯政府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白朗军，张镇芳叫嚣要"在一个月之内"把白朗军全部消灭。白朗军面对着优势的敌人，要经历更大的战斗考验。正在这时，河南以及邻近地区一些不愿坐等屠戮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白朗军中[11]，他们向白朗提出"要革命，到南方找孙文"的主张。白朗也愿取得革命党人的合作和接济，遂自号"讨袁军"，于12月下旬越过京汉铁路，挥军东征。

1914年1月间，白朗率众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等地，并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进入安徽，26日攻下安徽的六安，随后又攻克霍山等地。当白朗军攻克六安时，把衙署、监狱、天主教堂等焚毁，并出示安民，开仓济贫，与六安民众共度春节。由于一路上各地饥民纷纷加入，白朗军大发展，"共有四十个大队，每大队约五百人"[12]，总计约二万人左右，这是白朗军的最盛时期。

白朗军的纵横驰骋与迅速发展，使得中外敌对势力都非常惊慌，驻华各国公使有出兵代为"剿办"的表示，北京的"国会"和中外一些报纸都对张镇芳镇压白朗军的失败大加指责，逼得袁世凯不得不把张镇

芳撤职，改派他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豫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以及豫、鄂、皖、苏等省地方军数万人进行四面包围。又令长江舰队“严密防堵”，阻截白朗军南下，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妄图把白朗军聚歼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13]。

但是，段祺瑞的围歼计划落空了。行动快速的白朗军，于2月中旬又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折回河南，并在商城以东的酆家集等地给王占元两个团的部队以重创，然后突破重围，日夜兼程，经光山、罗山县境，由信阳以南的柳林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湖北。3月8日攻克湖北的商务重镇老河口，打垮守敌一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并没收了一批外国企业，如亚细亚煤油公司、美孚洋行等。

白朗军的流动作战，把袁世凯政府搞得手忙脚乱，大丢其脸。袁在给段祺瑞的电文中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殊损威信。”段在回电中承认：“劳师糜饷，贻笑中外。”[14]袁世凯为此枪毙过弃城逃跑的县长，调动了十多万军队，撤换过许多将领，后来又把段祺瑞调回，改任田文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

白朗在攻占老河口后，曾召开过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他本想由老河口直接进入四川，建立一块根据地，使军队得以休整。但因蜀道险峻，川军已有防备，不利攻取，遂决定西进陕、甘，由西北再相机入川。3月中旬，白朗军由老河口出发，经荆紫关进入陕西境，陕西都督张凤翙赶紧调兵堵截。白朗军出其不意，打得张凤翙大败而逃，躲进西安向袁世凯呼救。白朗军连克商南、商县、山阳等地，并公开电告袁世凯说要攻取西安，要袁世凯作好准备。袁世凯吓得赶忙派遣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第七师昼夜不停地赶往西安，并纠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军队近二十万人，前堵后追，还由北京派飞机四架前往助战。白朗军忽南忽北，使北洋军顾此失彼。不久，白朗军出子午峪攻克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北渡渭水，

又连克武功、乾县、麟游、凤翔、陇县等十余县，于4月下旬由固关进入甘肃，攻占通渭、陇西。5月4日击毙秦州（天水）镇总兵马国仁，占领甘南重镇秦州。接着又攻下徽县、成县、武都（阶州），准备南下渡白水江进入四川，但因川边已有重兵戒备，乃转克岷县、临潭（洮州）等地。

在进军西北的过程中，白朗建军号为“中原扶汉军”，有时又用“公民讨贼军”的名义。他在沿途张贴的布告中，斥责袁世凯政府是“神奸主政，群凶盈庭”，“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声称自己是要“纠合豪杰，为民请命”[15]。说到西北来的目的是找寻根据地，扩兵囤粮，“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16]，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设立完美之政府”。几年的流转作战，白朗军声势越来越强大，所过州县，往往“武则逃避，文则开城迎降”[17]。同时，随着力量的成长，白朗对部队的纪律也逐渐严明起来，后期每攻下一地，除对那些敢于顽抗的官绅、地主给予打击外，对于开城迎降的官绅不再杀戮，并宣称保护正当商人和外国侨民。有时下令要部队“住在城外”，或“封刀入城”[18]。因此，和那些淫掠烧杀、残民以逞的官军对比，群众是宁愿欢迎白朗的。就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群众“现（视）兵如仇雠，视匪如家人”[19]。有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白狼（朗）过秦川》的版画[20]，描写了白朗跨马杀贼的英雄形象，据说当时就曾在陕、甘、豫等省广为流传。

白朗入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后来没能实现。一方面由于川、甘交界的白水江水涨，无船可渡，川军又有重兵防堵，不易通过，另一方面当他们深入甘肃后，部队已过于疲劳，岷、洮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甚至饮水也很困难，加上时疫流行，又有少数民族地主武装的顽抗，主力损失日渐严重。这种种原因，就使得全军上下思乡情绪严重起来，在临潭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许多重要将领都表示不愿再奋战入川，要求立即返回豫、鄂。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

1914年5月下旬，白朗率众退出临潭，经漳县、宁远（武山），6月上旬克秦安，接着就由清水长驱进入陕西。一路上虽然有敌人前截后追，但由于白朗军发挥了“善走”的特长，一日夜行一百六七十里，把追赶的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除在宝鸡、郭杜镇、子午峪等地和拦截的敌人发生过几次战斗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通过凤翔、扶风、西安郊外，于6月下旬就到达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白朗最初的打算是想回到河南故乡，补充兵力，取得喘息的时间，但不料一入河南境，战士们就纷纷自动离队回家，无法制止，沿途星散，不复成军。就这样，这支历时四年，纵横五省，攻克过五十多个县的农民队伍，终因缺乏坚强的领导，无法克服农民的落后思想，而迅速解体。最后，追随白朗的只剩下百数十人。8月中旬，他们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宝丰、临汝交界的虎狼爬岭时，遭到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当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和敌军血战两昼夜，最后由于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中壮烈战死。

---

(1)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历史研究所白朗起义调查组：《白朗起义调查简记》，《史学月刊》1960年第2期。

(2)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历史研究所白朗起义调查组：《白朗起义调查简记》。

(3) 《张镇芳藏札》，1912年5月22日王汝桂致王祖同探报。

(4) 《张镇芳藏札》，1912年10月24日张镇芳、雷震春致陆军部电。

(5)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历史研究所白朗起义调查组：《白朗起义调查简记》；又见《白狼猖獗记》，《时事汇报》1914年第5号。

(6)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7)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历史研究所白朗起义调查组：《白朗起义调查简记》。

(8) 《大公报》1913年8月21日。

(9) 1913年7月5日雷震春致陆军部电。

(10) 《民权报》1913年7月14日、16日；《民立报》1913年7月31日。

(11) 1913年11月30日张镇芳致袁世凯电中说："黄兴刊刻豫都督印送与白狼，无数青年混入贼中代为筹划。湘人邹永成、豫人刘怀锡等皆在其内，此外，粤人、浙人、闽人尚有数名……"

(12) 王仲霖：《麻黄支队防匪记》（稿本）卷三。

(13) 1914年2月22日段祺瑞致袁世凯电。

(14) 1914年3月21日袁世凯致段祺瑞电及22日段祺瑞复电。

(15) 1914年3月31日开封邮政分局邮务总办阿杜能（意大利人）致北京邮政总局总办柏利（法国人）函中所附中文抄件。

(16) 王士蔼：《白匪陷害陇南见闻录》（稿本）。

(17) 1914年5月29日吴中英致参陆两部电。

(18) 慕寿祺撰：《甘宁青史略》正编第二十八卷，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版。

(19) 1914年7月14日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致田文烈等电。

(20) 王树村：《关于白狼（朗）过秦川的一幅版画》，《文物》1964年第10期。

白毓昆

徐辉琪

白毓昆，字雅雨，号铣玉，辛亥革命时期滦州起义烈士。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1868年4月17日（清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祖父和父亲都是教师，祖父且在当地有一定名望。白童年进塾读书，十八岁补县学生。同年被江苏学政王先谦选拔到江阴南菁书院研读旧学及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

白毓昆于南菁书院结业后，“绝意仕途”。以后到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和澄衷学堂任教席。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白逐渐受到革命思想影响，觉得“不可不革命”[(1)]。他以“地理学救国”为志愿，专注中国地理学研究，并“以阐发民族观念为主旨”，自编教科书，由震东书局公开出版发行。由于白毓昆在地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力求贯穿革命宗旨，成为当时一个颇负盛名的爱国地理学者。

1908年秋，白毓昆接受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北洋法政学堂聘请，携家到了天津。白毓昆到津后，继续以地理学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1909年9月27日，他邀约张相文等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并亲任编辑部长，于次年1月编辑出版《地学杂志》。该杂志通过对祖国地理山川的介绍，隐喻清政府的丧权卖国。又配合边界交涉事件绘制相应地图，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同时，白毓昆对清王朝“预备立宪”的欺骗宣传和立宪派的请愿活动不满，开始直接投入革命斗争。1910年，天津学界准备向清政府发起请愿，他认为是“与虎谋皮”，力加劝阻。随后，他结合志士，“谋革命益急”[(2)]。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白毓昆认为京师是“清室的根本”，如

果“京师不动摇，则南军恐难持久”[3]。因此，积极主张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以加速清王朝的灭亡。他先组织了“红十字会”，借以集众演说，进行革命宣传。接着，于10月—11月间同胡宪、凌钺等组成“天津共和会”，自任会长，作为密谋起义的“总机关”。在此期间，白毓昆在女会员的掩护下，奔走于北京、张家口之间，参与策划，输送炸弹，并广派会员分赴各地联络民团。“共和会”很快成为活跃在北方的一个重要革命团体。

这时，驻防滦州的清军二十镇七十九标，由于统制张绍曾截留南运军火和通电要求“立宪”，被清政府逼迫离职，广大官兵极为愤懑，开始倾向革命。白毓昆立即把争取滦军起义作为“共和会”的主要活动目标，派会员凌钺等前去鼓动。凌等到滦后，“日夜宣传，不稍休息”，还专门组织了“敢死队”[4]。

11月24日，湖北军政府全权代表胡鄂公，为组织北方响应起义，来到天津。白毓昆当晚与胡取得联系，次日即偕孙谏声等到胡处讨论滦军“响应革命事”。同时，白还向胡表示了他对汪精卫的愤慨，说汪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就是与袁世凯“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5]。随后，积极参加了胡鄂公发动起义的组织活动。12月2日，京津地区各革命团体代表在天津组成总指挥处，他被举为交通部长兼滦州指挥之一。14日，又与胡鄂公作为同盟会代表[6]，同其他革命团体正式组成“北方革命协会”，宣布“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7]。

由于清政府和袁世凯的疯狂镇压，加之汪精卫又“使人四出阻止”，甚至诬蔑起义群众为“匪类”，革命党人这时在北方的起义、暴动计划迭告失败。白毓昆悲愤交加。为挽救革命，他决意策动滦军迅速起义，遂令其妻、子南归，于31日只身到了滦州。

白毓昆在妻、子离津时，把发动滦州起义的“密函”亲手缝入其子内衣，让他面交沪军都督府钮永键。其计划是：革命军即由海道北上

袭据山海关，断绝京奉铁路，然后会同滦州义军直捣北京。白到滦后，首先说服军警赞同起义，然后与二十镇七十九标一、二两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会商，并向下级官佐和士兵反复陈说利害。时王、施已倾向共和。1912年1月2日，滦军遂宣布独立，随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

滦州起义发生后，袁世凯急调军队前往镇压。白毓昆不顾胡鄂公的阻拦，“必欲与清军一战”。4日晚，他同王金铭、施从云率军向天津进发。次晨3时与清军激战于雷庄。清军伪示停战议和，王、施不听部下劝阻，前往谈判，遂遭杀害。白毓昆带七八人乘间从小道冲出，走到古冶不幸被俘。

白毓昆被捕后，在反动派面前，直言不讳自己是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并慷慨陈词说：“吾为国充兵，吾自当为国死，今被逮，吾何讳为！”“我死不足惜，惟诸君今为满奴，异日且为外人牛马，痛何如之！”[(8)] 受刑时，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令他跪下，他怒目瞪视，坚不下跪，说：“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之，何迫辱为！”[(9)] 7日，壮烈牺牲。白毓昆就义前曾赋诗一首，最后四句为：“希望后起者，同气志相连。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

民国成立后，白毓昆烈士的遗骸归葬家乡狼山，参加葬仪者数千人[(10)]。

---

(1) 吉乐：《白毓昆》，《中华民报》1913年2月25日。

(2) 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7页。

(3) 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辛亥革命》（六），第367页。

(4) 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辛亥革命回忆录》

（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6页。

(5)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82页。

(6) 关于白毓昆参加同盟会的时间，无文字记载，经多方查证，亦难确定。

(7)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2页。

(8) 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辛亥革命》（六），第368页。

(9) 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辛亥革命》（六），第368页。

(10) 江谦：《南通白烈士墓铭》。

柏文蔚

刘敬坤

柏文蔚，字烈武，安徽寿州（今寿县）人，1876年6月8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十七日）生。其父柏珉系塾师，柏文蔚随父熟读“六经”及《庄子》、《老子》、《韩非子》、《墨子》诸书，于1896年中秀才。后至寿州城内孙家设塾授徒，结识孙家鼐族孙孙毓筠，得与北京维新人士常通信息，遂于寿州城内设阅书报社，陈列《湘学报》、《申报》及《盛世危言》等；并创立天足会，倡导革除妇女缠足陋习。当地守旧士绅诬柏等“吃洋教，谋不轨”[(1)]。柏氏族人虑当局将加害于柏，乃集资助其赴省城安庆入安徽大学堂。

1900年春，留日学生陈独秀、潘赞化等回皖宣传中俄新订密约事，集安庆各学堂学生于安徽大学堂藏书楼演说，柏文蔚放言激烈，大学堂总办对柏等拟加制裁。柏遂退学离校，于1902年至南京，与赵声、杨作霖等人联合当地会党，秘密组织强国会。后以事机败露，杨作霖遇难，强国会遂停止活动。柏文蔚返回安庆，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为学兵，复秘密组织同学会，散发《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书籍。

1903年6月，柏于安徽武备学堂毕业后，拟集合万人配合在押大侠郭其昌，在安庆举行劫狱起事。因谋事不周，为安徽臬司侦知，派员捕柏，柏夤夜潜往南京匿居承恩寺。翌年春，柏至芜湖，任安徽公学体操教员。1905年，柏文蔚与陈独秀、常恒芳等人以安徽公学为基地成立岳王会。同年9月，柏文蔚应新军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二营管带赵声邀赴南京，任该营前队队官。不久，赵声升任三十三标标统，柏升任该标第二营管带，即在南京成立岳王会分会，自任会长。

1906年，柏文蔚与赵声、林之夏、林述庆、倪映典等人在南京加入同盟会，岳王分会成员亦均入盟，公推赵声为同盟会长江分会盟主。柏等积极在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联络士兵及学生。不久，孙毓筠自日本回国，在南京与柏文蔚、赵声联络，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不幸事败，孙毓筠被捕入狱，赵声走江西，柏文蔚投奔在吉林任军职的同乡胡殿甲。1907年4月柏任吉强军文帮带兼马队总教习。

时日本觊觎延吉日亟，派出间谍以旅行为名至延吉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柏将此事告知胡殿甲转报清廷外务部。外务部派奉天训练处总办吴禄贞前往调查，吴调柏为参谋，亲往考察延吉边务。9月，柏文蔚奉命赴汉城与韩国交涉延吉领土问题，以五百元高价自韩国户部尚书朴姓之子手中购得《大东舆地全图》。该图标明延吉为清国领土，可为今后交涉之铁证。日警侦知此事，下令搜捕柏文蔚。柏避入清驻汉城领事馆，乘隙登轮赴烟台转奉天，向吴禄贞报告赴汉城经过。此后，柏改任屯田营管带。1910年2月，柏文蔚调任奉天督练公所参谋。他在城内三江旅馆与同志商讨革命方略，联络冯麟阁、蓝天蔚所部官兵；复沿东清铁路至伊尔库茨克、海参崴等地，联络各路绿林豪杰。

武昌起义爆发后，柏文蔚即谋在关外起义响应。时范鸿仙、陈其美连电，促其南下。10月22日柏文蔚抵上海，与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紧急会商，决议黄兴与宋教仁赴武汉指挥军事，柏文蔚赴南京策动徐绍桢所部第九镇新军反正。清两江总督张人骏以第九镇新军不稳，下令收缴该镇官兵子弹，并限徐绍桢于月底前率部移驻秣陵关。10月24日，柏文蔚由沪抵宁，随后前往秣陵关镇司令部会见徐绍桢称："公为都督，余虽作弁目亦愿也；公若仍为统制，则不敢从命。"[(2)] 徐会其意，同意率部反正。柏随后返沪为第九镇筹集武器弹药。

11月初，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先后光复。11月7日，驻防镇江的第九镇十八协三十六标三营管带林述庆宣布起义，被推为镇江都督。徐绍桢闻悉后，在尚未得到弹药接济前，即于11月8日提前起

义，率部进攻南京，由于力量悬殊致全军大败，余部退往镇江。柏文蔚遂以上海运到的武器装备第九镇残部，编为宁军第一军，自任统制。

为了攻克南京，沪军都督陈其美提议：合组苏浙联军，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统兵会攻南京。柏文蔚并以大敌当前说服林述庆拥戴徐绍桢。在联军会攻南京时，柏文蔚率宁军先锋两营及学生队由镇江渡江，经六合进攻浦口，以防张勋率部过江北逃。12月2日，南京光复。镇军林述庆率部抢先进驻两江总督公署，并以临时江宁都督名义发布告示。浙军以林述庆独占战果，与林部发生冲突，一时内讧之势岌岌可危。宋教仁、范鸿仙等急至浦口与柏文蔚会商，决议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任林述庆为北伐军临淮总司令，徐绍桢为卫戍南京司令。柏文蔚以此告知林述庆，勉以大局为重，并诚恳表示："余可为兄部下，同阵北伐。"[(3)] 林是其言，纠纷立解。

南京光复为中华民国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其后，柏文蔚所部被编为中华民国第一军。1912年2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袁世凯停止议和，命柏文蔚统率五个军进行北伐。2月7日，柏文蔚率军北上，与张勋的江防军激战后，连克固镇、宿州。南京参谋部此时电柏："和议复开，停止前进。"柏文蔚为争取在议和中的有利地位，仍昼夜兼程，于11日进占徐州。2月17日柏文蔚遄返南京，18日晨至总统府往谒孙中山，建言北伐军须进至黄河以北。孙中山答称："大家皆愿讲和，不愿再事兵戎，吾岂能要大家牺牲，为吾人争总统耶？"[(4)] 柏文蔚力主陆军总长一职"万不让"（予袁世凯），以备"破裂再战"[(5)]。

此时安徽政局极为混乱，陆军部命柏文蔚迅速统兵入皖，统一全省。4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柏文蔚署理安徽都督，次日兼署民政长，7月1日正式任安徽都督，9月授为陆军中将。柏文蔚主政安徽，任用革命党人重组领导机构，以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各司、厅长亦皆为辛亥时期的先进人物；并积极筹设司法及审判机关，制定司法

章程。柏在全省严禁鸦片，限期铲除烟苗；对吸食者限期戒除，违者严惩；毅然派员禁烧奸商勾结英人私运的大量鸦片。英国出动兵舰相威胁，要求赔偿烟价，柏严予驳斥。全国各地对柏的禁烟措施纷纷来电支持，孙中山称赞安徽“禁烟办法，实可为各省之模范”[(6)]。柏更大力革除陋俗弊习，改庙宇为市场或习艺所，禁止演唱淫秽戏曲，提倡演文明戏；在城乡遍贴布告，禁止幼女缠足，取缔娼寮。柏在省内沿江沿淮兴修圩堤，改革田赋征收办法，并着手修建公路；对于文化教育尤加注意，严令军队不得侵占校舍，不得干预学校事务，使教育经费纳入省财政计划。皖省中小学此时增至三百七十余所。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后，柏文蔚应孙中山、黄兴之召至上海，会商讨袁事宜，但孙、黄二人意见分歧，致党人未能取得一致行动。袁世凯在下令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与广东都督胡汉民之后，6月30日下令解除柏文蔚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后，黄兴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受黄兴命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进行军事部署。7月27日，袁世凯下令褫夺柏文蔚中将军衔，任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柏文蔚衔黄兴之命至安庆，被推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组编淮上各军迎击倪嗣冲。在袁世凯北军围攻下，黄兴于7月28日夜出走南京；柏文蔚在安徽也不敌北军，于8月19日由芜湖率部千余人至南京，被推为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但此时讨袁的大势已去，柏于25日夜率卫队离宁赴沪，29日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指定柏文蔚、陈其美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并任柏为军务部长。但柏对另行组党持有异议，乃辞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于8月25日参加欧事研究会。1915年2月25日、5月9日，柏文蔚与李烈钧等五人以欧事研究会的观点，联名发表《致祖国同胞电》与《再致祖国同胞电》。电文所称党人倒袁，会“引外力以颠覆祖国”[(7)]，颇受各界舆论的非议；日本朝野人士对此亦态度冷淡。柏遂离日赴南洋，与熊克武、李烈钧等欧事

研究会成员成立中华水利促进会。8月，柏文蔚闻知袁世凯复辟帝制日亟，乃与李烈钧、熊克武、谭人凤等在槟榔屿集会，决议各人分途筹划起义。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举兵讨袁，委托柏文蔚在南洋为护国军筹款。1916年2月29日，柏文蔚由南洋返抵上海。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11月电召柏文蔚入京，1917年1月19日授予威烈将军。

1917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柏文蔚响应南下，在安徽、湖南从事护法运动，后至鄂西，被推为靖国军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任柏文蔚为总统府顾问。1922年4月，孙中山设北伐大本营于韶关，任柏文蔚为长江上游招讨使，策动地方部队接应北伐。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约集国民党重要成员五十三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柏与会并赞成改组国民党。1923年1月，柏文蔚被孙中山任命为军委会委员，奉命北上与直系代表孙岳及皖系代表吴光新商谈合作事宜。1924年1月，柏文蔚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2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报告[(8)]；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孙中山任命柏为北伐讨贼军（9月改称建国军）第二军军长。10月2日，孙中山在韶关召集廖仲恺、柏文蔚、白云梯共议，商定联皖（系）制直（系）方针；并派柏文蔚离粤北上，与张作霖商谈合作问题。12月下旬，柏文蔚至河南国民军中积极宣传三大政策，指导党务，组织党部。后柏至北京，与谢持、张秋白等人时相往还，受谢等反对联俄、反对国共合作之言论影响日深。

1925年11月，林森、谢持、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政策，并派李烈钧、柏文蔚、邹鲁、林森、张秋白、傅汝霖等六人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执行委员。柏文蔚虽未出席西山会议，但因观点接近，对会议的此项决议既未明言接受，也未予以否认。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柏文蔚虽未出席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次第光复湘、鄂、赣、闽诸省。柏文蔚为北伐胜利形势所鼓舞，于当年11月由天津绕道抵达武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率部东下，转战于安徽各地。“四一二”政变后，柏文蔚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柏文蔚任国民政府委员，10月被免去第三十三军军长职，改任北路宣慰使。柏回至安徽故里，仿照黄埔军校训练方法，在寿县创办学兵团，任中共党员为学兵团领导，集训学员达五百余人。1928年2月，柏文蔚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王乐平、朱霁青等人提出“以党治军，禁止军人割据”提案。柏复提出“实边导淮案”，撰《导淮说明书》刊于上海《民国日报》。

二次北伐结束后，国民党于1928年8月举行二届五中全会，决议成立中央政治会议为训政时期的最高指导机关，柏文蔚被推为政治会议委员。柏此时与柳亚子、陈树人、何香凝、于右任等人过往密切，对时政颇有非议，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变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9)]，对蒋介石的专权独裁更为不满，乃加入了反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史称“改组派”）。10月8日，柏被国民党中常会撤销国民政府委员职。1929年2月，柏文蔚列名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表。在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柏文蔚被撤销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等人“勾结军阀余孽，假窃名义，肆行煽惑，阴谋破坏编遣，颠覆党国，甘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宣布交国民政府“明令通缉”[(10)]。11月28日，国民党第五十二次中常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柏文蔚、王法勤等九人党籍。柏此后连续撰文抨击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摧残民众，并宣传民主法制，要求改组国民党。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汪精卫等人于8月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柏文蔚由沪北上出席会议，被推为常务委员，参预制定扩大会议的各种文件。9月18日，

张学良通电拥蒋，率兵入关，扩大会议仓皇移往太原；柏文蔚则离平去津，自后即脱离反蒋的派系斗争。

1931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恢复汪精卫、陈公博、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柏文蔚等三百一十四人党籍。12月，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柏文蔚又复列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但柏此时已无兴味于政治派系斗争，意欲退隐山林。同年底，柏文蔚由天津返回上海，寓居昆山风车浜，虽笃信佛学，但仍时时以国难为念。嗣后，在南京玄武湖筑陋室“柏园”居住，每与李烈钧、于右任、冯玉祥、方振武等过从时，均商谈抗日救国问题。“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柏文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9月15日，复与程潜、李烈钧等十六人质问政府：“对日承认伪（满洲）国持何政策？收复失地有无切实准备？”10月2日，柏文蔚与冯玉祥等十五人通电全国，强烈指责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混淆真象，颠倒因果……为日寇卸责”。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与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柏文蔚与李烈钧、程潜等联名电冯表示支持，赞扬冯等高举抗日旗帜；11月，复与冯玉祥等二十二人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提出《救亡大计案》七条，要求大赦政治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柏文蔚率全家由昆山移居徽州（今歙县），在皖南发动民众抗战；1938年夏秋，辗转至湘西永绥（今花垣）定居。1939年1月，至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主张对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作最严厉的处置，并声明今后认汪逆为全国人民与其个人最大的敌人。会后，柏专程至江津看望陈独秀，并脱下身上所著皮袍赠陈。柏文蔚表示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一再声言：“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抗战的都是好党。”[(11)] 同意其女柏培师由湘西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并给予流亡在湘西的皖籍进步学生以多方援助。柏文蔚一生廉洁正直，生活简朴，从无积蓄，仅赖其个人薪俸维持，有时不得不向友人借贷以维家人生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柏文蔚因无路费复员东返，困居永绥；直至1946年4月21日始离开湘西，5月28日返回桐城，9月移居昆山。柏因长年宿疾，生活困顿，于1947年4月26日病逝上海，终年七十二岁。柏文蔚病笃时，曾发表声明退出国民政府委员，文送沪上各报社，无一家给予刊登。

---

(1) 柏文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柏文蔚先生》，1986年版，第6页。

(2) 柏文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第22页。

(3) 柏文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第29页。

(4) 柏文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第34页。

(5) 柏文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第34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2页。

(7) 孙彩霞：《柏文蔚传》，淮南政协1997年印行，第40页。

(8)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

(9) 孙彩霞：《柏文蔚传》，第132页。

(10) 《中央党务月刊》，第15期，1929年10月。

(11) 刘敬坤：《皖籍师生流亡湘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21辑，1991年版。

板垣征四郎

吕乃澄

板垣征四郎，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23日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一个郡长家庭。其祖父直作是原南部藩主的讲师，汉学者，神道教徒；其父政德长期任郡长，神道教徒。板垣幼年丧母，主要由祖父母抚养教育，从小喜欢汉语。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因侵略中国获得大胜，顿时掀起一股扩张狂潮，板垣受其影响走上从军之路。1899年入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学校训育官大越兼吉以严格军人教育著称，后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喻为“军神”，板垣在校深受他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以他为崇拜偶像，梦想“长大之后，当大将”。

两年后，板垣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永田铁山同为十六期生。1904年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随即被派往日俄战争前线任小队长。1905年2月在奉天（今沈阳市）郊外红土岭作战中左胫部受了贯穿性枪伤，被送回国内治疗。这虽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却滋长了他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欲望与野心，从此竟“梦托支那”[(1)]。

1906年，伤愈后的板垣被派往天津驻屯军任步兵副（助理），熟悉和了解很多中国情况。1908年奉调回国任职。1913年以大尉中队长的身份考入陆军大学，一心“要在中国问题上有所为”[(2)]。1916年底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直属谍报武官）。他与“军神”大越兼吉的女儿喜久子结婚，有了军界的靠山。1917年夏，由参谋本部派往云南昆明，利用士官学校毕业生、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关系，大量收集关于中国西南各种情报。1919年被派往汉口任参谋，晋升为少佐，与石原莞尔一起供职，过从甚密，结为共识。

1921年板垣回国，为取得带兵的资格，短期担任了大队长（营长）。1922年被调到参谋本部任兵要地志班长，兼陆军大学兵学教官，悉心研究中国问题。1924年夏，他以中佐衔被派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任武官本庄繁的辅佐官。1925年1月，板垣与驻中国各地的武官冈村宁次中佐、酒井隆少佐、土肥原贤二中佐、铃木贞一大尉等聚集到一起，举行了“在支谍报武官会议”，商讨如何实现“大陆之梦”。

1927年夏，板垣被派任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武官。1928年升为大佐，担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参谋驻青岛。1929年3月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又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共事。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是“确保满蒙先行论”的倡导者和狂热鼓吹者，他们结成搭档，率随员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活动。1931年3月，板垣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观察之满蒙》的演讲，露骨地鼓吹“满蒙是帝国国防第一线”，它在对美作战上是“日本的补充源泉”，在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和“保卫朝鲜”上为“战略据点”，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帝国远大理想的使命”[(3)]。5月29日，板垣又在关东军部队长军官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鼓吹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是当前的急务”[(4)]。在此前后，日方制造“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接着又反诬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线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突然袭击中国北大营驻军，制造“九一八”事变。9月22日，板垣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召集的会议上提出：“将全满作为我国（日本）领土予以统辖占领。”[(5)] 10月23日，板垣同石原和国际法顾问松本侠炮制《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如何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实权，把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设想。

为炮制一个伪满蒙共和国，经由板垣决定，土肥原策划，11月8日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挟持溥仪由天津抵达营口。板垣将溥仪安置在汤岗子对翠阁温泉旅馆，后又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软禁起

来，并切断溥仪与外部一切联系，迫使溥仪一切听由板垣摆布。

日本关东军一举侵占我国东北，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抨击。为了分散国际上的注意力，11月间板垣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说："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西方列强的视线引开"[(6)]。板垣并给田中两万日元作经费，以致酿成"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6日，板垣回东京向日本军部汇报，并破格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召见和垂询。新上任的陆相荒木对板垣表示支持关东军的行动。13日板垣捧持经由参谋总长颁发的天皇敕语回到奉天，立即加紧炮制伪满洲国的活动。2月16日，板垣一手导演在沈阳举行了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四巨头"参加的会议，由板垣主持，关东军高级将领均出席压阵，会议决定立即筹备建立"新国家"。17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负责进行筹建工作。溥仪赞成建立"新国家"，也同意担任"首脑"，但是坚持复辟清王朝。后在板垣的软硬兼施下，被迫于2月29日接受板垣提出的伪满洲国政府人事安排，于3月6日抵达汤岗子，在板垣拟定的《溥仪·本庄换文》上签字。溥仪一行3月8日下午乘火车离开汤岗子前往长春，9日下午3时举行了溥仪就任"执政"仪式，宣告伪满洲国成立。由于板垣操纵和制造伪满洲国"有功"，是年8月被晋升为少将。

1933年2月，板垣征四郎又奉命在天津建立"板垣机关"，策划日本关东军侵略热河及华北的"谋略"工作。

1934年12月，板垣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他到任后即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肃正治安"政策，包括旨在对付抗日联军的最毒辣的"集团部落"通令。他又染指内蒙，策划在内蒙和华北制造伪政权，妄图把内蒙从中国割裂出去。

1936年，板垣升任关东军参谋长。他制订了对青海、新疆和蒙古进行渗透的《谋略计划》，委派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窜到百灵庙，挑动绥远事件。板垣甚至亲自窜到阿拉善（今宁夏区境）、额济纳（今甘肃省境）一带制造事端。他在策划华北“自治”的侵略活动中，竭力撮合伪满洲国、伪蒙古军政府与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协定”。

1937年春，板垣回国就任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中将师团长。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日本统帅部决定第五师团和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在一个月内一举解决事变问题”，迅即开拔来华。板垣师团担负华北机动作战任务，在山西与徐州一带的战争中，曾血洗山西十个县，屠杀上万无辜百姓；但在晋北平型关战斗和台儿庄战役中均遭到痛歼，“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粉碎，日本军部及板垣一伙一个月迅速解决“支那事变”的狂言更是销声匿迹。

板垣1938年奉召回国，连任近卫、平沼两任内阁的陆相。他参加重要阁僚会议，鼓吹打倒中国的国民政府，扶植建立汪精卫傀儡政权。他主张加紧扩充军备，积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在内阁中倡言日本与德、意法西斯加强军事同盟。他主张在哈桑湖一带对苏联使用武力，制造诺门坎事件。

1939年9月，板垣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面对中国军民持久抗战的战略，他具体实施“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计划，积极组织对蒋介石代号为“桐工作”的所谓“和平谈判”，进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板垣指令日伪代表竭力诱使蒋方代表同意举行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并表示自己可以到长沙参加谈判。与此同时，板垣还组织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

1941年7月，板垣晋升为大将，调任日本的朝鲜军司令官。1945年4月，板垣指挥日本第七方面军，占领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

岛、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及波罗洲。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9月12日板垣代表日本南方军在新加坡向东南亚盟军投降。

板垣征四郎犯下的累累战争罪行，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正审判，被审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11月12日判处绞刑，同年12月23日执行。

---

(1) 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秘录》，日本芙蓉书房1972年版。

(2) 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秘录》。

(3)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日本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9—144页。

(4)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73页。

(5)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田中隆吉：《上海事变是这样发动的》，转引自［日］《知性》杂志增刊《未公开的昭和史》，东京河出书房1956年版，第182—183页。

包达三

汪仁泽

包达三，字楚，1884年4月28日（清光绪十年四月初四）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父亲是杂货店店员[(1)]。包达三少年时在家乡私塾读书，十六岁到上海一家纸店当学徒，满师后留店任职员。

包达三业余刻苦自学，1906年考上公费留学，东渡日本，先学商科，后转入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他景仰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蒋介石、张群、周佛海等人。辛亥革命爆发后，应召与蒋、张等同船回国到上海。上海举义时，曾参加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光复后，当晚又随敢死队奔袭杭州，光复省城。回沪后任职上海沪军都督府。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袁，包达三在上海参加反袁军。8月各地反袁军先后失败，包达三等被通缉，乃亡命日本。9月，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包参与筹建工作，成立后担任部长。翌年他回到上海，匿居于租界，继续参加陈其美领导的反袁斗争。1916年5月陈遭暗杀，包在沪难以立足，遂于1917年去广州。次年，包与当地富绅的女儿王文宁结婚，乃弃政从商。

包达三经商目光敏锐，颇具魄力。他先在开封开设开封制蛋厂，经营蛋品出口业务。不久，又在上海创办黄海渔船公司，购置机动渔船数十只，雇员出海捕鱼，获利甚丰。在商业活动中，他结交了沪上知名工商界人士虞洽卿、张澹如、盛丕华、方椒伯、傅筱庵等。1920年，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成立，包为创办人之一，当选为常务理事。此后包又在苏北一带办理盐垦，围垦盐碱地数千亩。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利用权势，指使其部属向包敲诈勒索银元十万元，使他几乎破产。此后，包达三等人根据孙中山任临

时大总统时设想上海建立新市区的遗愿，倡议在江湾建设新上海市中心地区，辟引翔港，谋取代上海租界为中心的旧上海。包为此集资开办地产公司，收购附近大量地产，经营房地产业务，筹建引翔港跑马厅，自任董事长；并建造远东新村等住宅区，市面逐渐形成。上海市政当局亦在该地兴建市府大厦及江湾体育场。该地地价不断上升，包遂成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资本家，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等职。

1937年抗战军兴，淞沪战役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长，曾诱逼包达三出任伪实业部长。包不肯事敌，隐姓改名避居友人处，保持了民族气节。1941年，包先后在沪创办永达制药厂、雷石化学公司，制造成药和原料、咖啡因等药品，自任总经理职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1946年周恩来、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往来于沪、宁间，与蒋介石反复进行谈判。周到上海时，经常在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会见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包达三常参加会见，因而认清了形势，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包的住宅约见陈叔通、马寅初、胡子婴等民主人士。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上海各界五十多个人民团体，推举盛丕华、吴耀宗、蒉延芳、包达三等十一人，组成和平请愿代表团，去南京呼吁和平。临行前，包曾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警告和恫吓，但他不为所动，表示为和平奔走，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6月23日傍晚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代表团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人遭到凶殴。后来大批宪兵乘车赶来，将他们抬上卡车，竟要开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审讯。在包等强烈抗议下，才将他们送往中央医院。不久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代表团亲来慰问，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南京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慰问。在南京的一星期里，包和几名代表虽被殴负伤，但仍然不懈地进行和平请愿活动[(2)]。

从1946年下半年起，包达三和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黄炎培、杨卫玉、盛丕华、胡厥文等人，组织了多种名目的聚餐会。后来中共地下组织巧妙地利用这种聚餐会，作为开展工商界进行民主运动的一种组织形式，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交流情况、交换意见、统一思想认识的经常聚会[(3)]。1947年—1948年间，包达三曾利用其子包启寰的同学在国民党空军中任驾驶员的身份，多次将中共地下组织托带的文件和宣传品，成批运往重庆、昆明等地。这时包还曾接济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营救被捕的革命者。1948年秋，他卖掉地产四十八亩，捐献黄金二百两，赠给中共地下组织作为经费。同年底，平津解放在即，包达三在沪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甚为危急，在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化名离沪赴港。1949年3月下旬，他与黄炎培、盛丕华等民主人士，接受中共邀请乘船北上，经山东烟台到达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对解放军南下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9月，包达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达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从1950年起，包担任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在职期间，他不辞年迈辛劳，多次到各地视察。1952年，他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4)]。

1957年4月6日，包达三在杭州病逝。

---

(1) 《包达三自传》，稿存包启寰处。

(2) 陈震中：《下关事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75页。

(3) 金学成：《解放前夕的工商界叙餐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4辑，第266—267页。

(4) 《关怀·爱护·引导——追忆周总理登门访问我省几位知名人士》，《浙江日报》1979年3月5日。

包尔汉

汪仁泽

包尔汉，维吾尔族，新疆阿克苏县人。1894年10月3日（清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五）生于俄国喀山省特铁什县一华侨贫农家中。祖辈于18世纪末因避战乱迁至俄国侨居。父亲沙赫杜拉，母亲哈里玛（塔塔尔族）。包尔汉少年时因家庭贫穷，仅读了两年书。1909年经舅父介绍到喀山一家书店当学徒，业余自学文化和会计知识。1911年10月到俄国斜米地方一家进出口贸易商行当店员，次年10月调到俄国人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开设的天兴进出口洋行当店员，后任会计。1914年他向中国政府申请，恢复了中国国籍，此后全家迁到迪化定居。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宣布废弃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恢复中俄新疆边境贸易，在伊犁和塔城新设税关，包尔汉因通晓汉、维、俄三种语言，被省政府财政厅委为兼职关税稽察委员；不久他脱离了天兴洋行，成为专职委员。1921年包被新疆省长杨增新派去塔城检查税务，查获一起巨额逃税案件，包拒绝当事人的贿赂，及时追回税款，从此受到杨的信任。其后杨与外国人的重要往来常由包当翻译，重要工作也常交包办理。1922年包接管省政府办的马厂。1925年被委为新疆汽车公司委员，监修全省公路，兼任新疆司机学校校长。但包对杨在新疆实行愚民政策及吏政腐败十分不满，而与主张民族平等、铲除贪污、发展教育的迪化道尹兼督署军务厅长、交涉署长樊耀南密切交往，共同认为应当推翻杨的统治，为此包在友人中组织了一个拥樊主政新疆的秘密小组。此时杨增新对樊的反己情绪已有所觉察，因而对樊进行了监视。

1928年7月1日，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并拟定新省政

府委员名单上报，其中没有樊的名字，樊乃先发制人，在7月7日省政府的午宴席上枪杀了杨增新；但下午樊又被督署民政厅长金树仁伙同少数军人捕获，当夜遭枪杀。包尔汉当天正在吐鲁番，事前亦未参预，闻讯赶回迪化往见金树仁。此时金正接报阿勒泰地区不稳，即令包当日前往宣慰。此后包遭金派人暗中监视。

1929年9月包尔汉被金树仁派往德国购买压路机，办妥后正拟回国时，忽接金的电报，令包留在德国“尚有其他事要办”，此后即无下文。包意识到已被放逐，遂自学德文，于1930年末考入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1932年底获准回国省亲，但仅两个月又被金树仁下令去德。在赴德途经莫斯科时，他看望了曾长期给予帮助的原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贝斯特洛夫，表达了自己献身革命事业的愿望，经介绍结识了将去新疆的苏联人包国宁。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我的生活道路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同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改造旧世界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1)

1933年4月，新疆发生政变，金树仁下台，盛世才开始执政。盛为了稳定其地位，表现得颇为进步，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宣布实行民族平等、澄清吏治、推行自治等施政纲领。包尔汉6月初从德国回到新疆，正值阿勒泰山地区发生马仲英部武装窜扰事件，包被盛任命为阿山宣慰使，立即赶赴该地区。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在群众的支持下，平定了叛乱，恢复了生产和交通，并成立了阿山民众委员会。1934年6月包回到迪化，被盛委任为裕新土产公司总经理。包为发展全省进出口业务，同苏联的苏新贸易公司签订了多个贸易合同，利用土产换得了苏联的大批工业品。在1935年4月的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上，包获得了金质奖章，并当选为新疆民众联合会委员，因委员长经常生病，该会工作实际上由包主持。包尔汉以新疆土产公司名义同苏新贸易公司谈判，于1935年5月和1937年1月，签订了300万和250万金卢布的借款合同，为新疆建设筹得了两笔资金。

1937年3月，包尔汉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斋桑领事。此时盛世才

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接连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大批杀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包尔汉亦在被监视之中。1938年4月，包尔汉被盛世才以述职为由电召回国，未到迪化即被逮捕，投入迪化第二监狱。在审讯中被诬加“帝国主义的走狗”、“里通外国”等罪名，包拒不承认，备受重刑。审讯持续了两年，包坚贞不屈。1939年11月起，包被关入黑牢68天，受尽折磨。在黑牢中幸有同情他的看守人员送来了蜡烛、砚墨，他用火柴梗写下了维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其中有“无论狂风暴雨、山崩地裂，都扑不灭我心中对您无限热爱的火炬”的诗句。当他回到监狱时已骨瘦如柴、极度虚弱，但他以坚强的意志开始着手编纂《维汉俄词典》，其后又创作了反映1913—1914年新疆各族农民联合起义的历史剧《战斗中血的友谊》[(2)]。1940年春，包被秘密转押到第四监狱的一座破庙中，并令改名王福。监狱科长刘秉德交来一批批各种文字的信札和资料令其翻译，其中有盛世才给斯大林的信件等。后来刘又将汉文版的孙中山名著《三民主义》令包译成维文[(3)]。直到1944年9月盛世才被蒋介石调离新疆，11月包尔汉终于被释放回家。有人对他说：“你真幸运，盛世才临走前曾两次派人来杀你，都因没等到允许行动的电话而回去了。”[(4)]

包尔汉出狱后不久，被安排在新疆警务处翻译室任副主任，后改任省民政厅副厅长。这时新疆伊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的革命暴动（简称三区革命）取得胜利，三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46年6月新疆省政府改组，由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5)]和包尔汉分任副主席，赛福鼎和屈武分任教育厅长和迪化市长。但是担任警备司令的宋希濂及一些国民党官吏，仍采用强暴统治的手段欺压新疆各族人民，还暗中制造事端，包尔汉在1947年的“二二五”血案中遭到一群暴徒殴打。是年5月，新疆省政府改组，麦斯武德接替张治中任省主席，包尔汉被免去副主席职，改任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5月包改任总统府顾问，6月回新。

在三区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张治中的斡旋，1948年底国民政

府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主席。1949年1月，包发表《告全疆民众书》，强调各族人民团结、和平和民主，增进中苏亲善，拥护国家统一。2月包尔汉参加了张治中召开的甘、青、新三省首长会议。其时国共和谈正在酝酿，张对包表示：新疆前途有可能出现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或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包尔汉筹谋新疆和平起义。为了争取军方的一致行动，包于7月间召开国民党驻军将领会议，暗示新疆要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军队要认清形势加以支持，避免以卵击石。接着包与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商议起义方案。包尔汉侦悉马呈祥等一批国民党军官阴谋发动破坏性极大的暴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迫使马等逃离新疆。9月19日，包致电毛泽东表示“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25日国民党驻新部队通电宣布起义。包并派出代表团到酒泉，向解放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汇报情况，欢迎解放军早日进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尔汉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赛福鼎任副主席。根据包尔汉的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他于1949年12月31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6)]，并任中共新疆分局常务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其后周恩来曾对包说：“你过去的历史中央是了解的。过去你同苏联的关系也是进步的。”[(7)] 1955年包尔汉到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和第四、五届名誉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兼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会长等职。

包尔汉通晓汉、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等民族语言，以及德、俄、阿拉伯语，曾致力于中国突厥学的研究和发展。他1940年编写的《维汉俄词典》，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于1953年出版发行[(8)]，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的《论阿古柏政权》等学术论文汇编成《包尔汉选

集》出版。

1988年8月27日包尔汉在北京病逝。

---

(1)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另，包在《我的自传》（《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记述此事发生在1932年从德国回国路过莫斯科时。

(2) 包尔汉在狱中于1942年写完剧本《战斗中血的友谊》，后于1961年重新修改定稿，发表在1961年10月的《天山》杂志上，改名为《火焰山的怒吼》；次年又在《剧本》月刊上刊出。中央实验话剧团、新疆省话剧团先后上演。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经他修改后的剧本，书前附有包的序言《扑不灭的星火》。

(3) 维文版《三民主义》出版时，被刘秉德冒用译者之名，冒领巨额稿酬。

(4) 包尔汉出狱后的次日，回到第四监狱索取《维汉俄词典》手稿时，狱中科长赵继良告诉他这些话，见《新疆五十年》。

(5) 阿合买提江（1914—1949），新疆维吾尔族人，青年时在苏联塔塔斯坦留学，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回国后投身革命，被盛世才逮捕，曾与包尔汉关押在同一狱中，1944年释出后与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6年7月，为三区革命政府代表，任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1949年8月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议，途经苏联因飞机失事遇难。

(6) 《新疆五十年》，第376页。另，包在《我的自传》中记述："解放后，于1949年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新疆五十年》，第377页。

(8) 包尔汉在狱中所编的《维汉俄词典》，1948年在南京修改后交一出版商，但后来并未出版，且连原稿也无下落。1949年包的妻子拉希达到北京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时，向周总理述及此事，周表示一定要派人寻找。后来终于找到原稿，由民族出版社排印出版。

鲍贵卿

孙德昌

鲍贵卿，字霆九，奉天（今辽宁）海城人，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祖籍山东，其父鲍永宽迁往奉天海城架掌寺落户，以农为业。

鲍贵卿的父母早亡，由兄嫂照料，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十七岁时因家贫失学，在家做些农活。十九岁时离家投榆关（今山海关）驻军叶志超部，因办事干练为叶所器重，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二年，1888年毕业，拨充清军驻榆关正定练军炮队哨长。1894年随叶赴朝鲜，在平壤保卫战中，叶临阵脱逃，所部惨败，受到处分，鲍贵卿、田中玉等也被革职。

1895年12月，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鲍贵卿被网罗任武卫右军右翼工程营筑垒司队官。鲍在军中以骁勇闻名，深得天津武备学堂出身的王世珍、段祺瑞等的赞赏，称鲍“忠勤异侪辈”。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进行北洋常备军建设，不久以鲍为左镇左翼步兵第二营管带。1904年左镇改称北洋第一镇，他出任该镇第二协四标统带，后晋升为第二镇第四协协统。鲍发迹后曾回籍省亲，路过新民府时与时任五营统领官的张作霖相遇，二人为幼年好友，张将其长女首芳许配鲍的次子英麟为妻，遂成为儿女亲家。1911年4月，清廷赏给鲍陆军协都统衔。

同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后，第二镇调往湖北参与镇压革命，鲍贵卿随行。1912年1月参与段祺瑞、姜桂题、段芝贵等50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陆军的镇、协、标、改称师、旅、团，鲍贵卿任陆军第二师步兵第四旅旅长。10月授陆军少将，驻防直

隶。1913年6月加陆军中将衔。同年7月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随段芝贵至安徽与南军作战。8月，鲍贵卿任芜湖大通司令官，9月改任芜湖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时值倪嗣冲督皖，排斥异己，鲍无法立足，1915年8月芜湖镇守使缺裁撤，他内调北京，充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10月鲍晋升陆军中将，12月袁世凯称帝时鲍被封为“一等男”。

1917年7月，经张作霖保荐，北京政府任命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加陆军上将衔。8月初，鲍到沈阳面谒张作霖，张允支持鲍顺利赴任。9月下旬将扰乱黑省最大隐患的许兰洲及其所统骑兵五营、步兵三营调往奉天，隶属张作霖指挥；同时命张鸣九率领奉军4个骑兵营由奉赶赴黑龙江，并再从奉天募兵10个营以加厚实力。为了制止地方实力派英顺和巴英额的反抗，张作霖以剿灭匪患为名，命令吴俊陞率第二十九师立即北上调停。11月7日，吴俊陞率二十九师进驻齐齐哈尔，将驻军旅长巴英额和英顺的兵权解除。至此，鲍方始牢固掌握黑龙江省的军政大权。而张作霖则借鲍贵卿之手把黑龙江攫为己有，奠定了统一东三省的基础。

为解决中东铁路问题，1918年2月6日，黑龙江省成立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部，由督军署参谋长张焕相兼任司令。3月黑龙江省增编陆军第十九混成旅，由鲍督军兼代旅长又兼任滨黑铁路督办，兴修该省铁路。

1918年9月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为了控制吉林，次年7月6日，由北京政府下令吉林督军孟恩远到京供职，调鲍贵卿署吉林省督军，孙烈臣署黑龙江省督军。孟曾串通吉林第一师师长高士傧合谋抵抗失败，高被免师长职。又经鲍允保全孟及属下的生命财产安全，8月5日孟始交出督军印绶。

1919年8月11日，北京政府改派鲍贵卿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兼东省护路军总司令，免兼陆军第十九混成旅旅长职，改由张焕相接

充。11月11日又准鲍免兼滨黑铁路督办职，由孙烈臣兼任。1920年1月，鲍接管东省铁路，3月16日下令解除东省铁路旧俄武装并解除中东铁路坐办霍尔瓦特的职务。5月改订中东铁路司法权，取消中俄会审制度。至此，中东路主权被中国接收。6月鲍辞去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同年9月兼署吉林省长。

1920年10月东北人民掀起反日斗争，延边地区朝中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焚烧珲春日本领事馆，又烧日本占领的市街，日本乘机派兵万余人侵占大片中国土地，后又增调第十九师团从朝鲜来该地区。东三省巡阅使也集结重兵在延边，残酷镇压当地人民，并应日本要求派日人町野武马（张作霖的顾问）到吉林，会同鲍贵卿制定与日本人“会剿”办法八条。遭人民谴责，鲍不得不矢口否认。

1920年底及次年初，鲍向朝鲜银行、正金银行先后借款400万元一事，遭到吉省朝野人士的激烈反对。1921年3月12日，经张作霖同意，鲍以眼病辞去吉林督军，授将军府霆威将军。同年12月，梁士诒在张作霖支持下组阁，任鲍贵卿为陆军总长。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后，鲍贵卿以病为由辞去陆军总长，返回东北。1924年9月2日，张作霖任鲍贵卿为东省铁路公司督办事宜，次年1月，得北京政府认可，9月21日去职，由刘尚清继任。

1927年10月，鲍贵卿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分管文物、档案，时安国军大元帅府有意让鲍贵卿接替韩麟春的第四方面军团长职，但未实现，后被张作霖聘为帅府顾问。1928年2月，任审计院长。同年6月4日，张作霖撤归关外时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皇姑屯炸毙。鲍曾与张同车，因在天津已先行下车，幸免于难。此后，鲍贵卿退出政治舞台，在天津、北平寓居，曾自己设计、监修住宅、别墅多处。

鲍以居官搜括所得，曾投资于天津的房地产业及近代工业，为北洋军阀中的大地主兼官僚资本家。晚年，鲍开支过巨，所经营企业多

不景气，有时入不敷出，他便变卖或抵押房地产来渡过难关。1934年3月1日，鲍贵卿病逝于北平（今北京），葬于北平香山八大处。

主要参考资料

金天石：《鲍贵卿传（节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陈志新：《鲍贵卿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张作霖史料专辑），1986年版。

鲍威尔

任嘉尧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昵称“Bill”，美国新闻记者，1888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东北的一个农场里。早年在乡间小学就读。在伊利诺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课余为一家刊物任通讯员。1912年在新闻学院毕业，在汉尼倍尔一家地方报纸工作，任推销员、广告经理、本市新闻编辑，服务四年。随后，担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1917年初，汤姆斯·密勒（Thomas F．F．Millard）[1] 从上海打电报给新闻学院院长华尔脱·威廉斯（Walter Williams），要求介绍一位校友到上海参加正在筹办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威廉斯院长推荐了鲍威尔。1月间，鲍威尔从旧金山乘日轮“日本丸”横渡太平洋，取道日本长崎，再换乘货轮，于2月初到达上海。不久，他见到了密勒，这位美国记者，早在20世纪初就作为《纽约先驱报》的特派记者来华工作。鲍威尔初晤主编密勒时曾问道：“新办的刊物内容怎样？”密勒回答说：“我们喜欢登什么，就登什么。”[2] 创刊前，助理编辑鲍威尔考虑了哪些人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对象。当时，上海英美侨民有八千到一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商人和传教士，其他法、德、俄、葡萄牙、丹麦、北欧各国以及东方犹太人也有不少，还有年青一代能阅读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埠外国侨民，这些人都可能成为读者[3]。经过忙碌的筹备工作，《密勒氏评论报》创刊号于1917年6月9日出版，以后每逢星期六出版。除了英美侨民和其他国家的外侨外，鲍威尔发现许多中国大、中学校的学生把该报作为教科书来学习英文，不少在外贸单位、银行、工厂、学校工作的人也是刊物的读者。

鲍威尔抵沪不久曾访问了孙中山先生，畅谈中国革命和世界大势。当谈到朝鲜问题时，孙中山用一种谴责的语调说："美国应把日本从朝鲜赶出去。"又说：美国曾与朝鲜订约，美国答应朝鲜，当朝鲜受外国攻击时美国予以保护。但后来朝鲜受到日本侵略被并吞时，美国并未实践诺言。后来，又二次访问了孙中山，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的问题[(4)]。

1917年日本就"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再度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鲍威尔第一次去北京采访。当时自称为"世界最伟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贝克致电鲍威尔，嘱为该报采访这一消息。后来，鲍威尔兼任《芝加哥论坛报》驻中国记者，这一关系持续了近二十年。

是年年底，其夫人由美国来沪居住。1920年，其子约翰·威廉·鲍威尔（即小鲍威尔）[(5)]在上海出生。

1920年夏，鲍威尔受在沪美商的委托，到华盛顿为国会通过《中国贸易法》进行活动。1922年，密勒担任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顾问，无意兼顾《密勒氏评论报》，乃由鲍威尔接办，自任主编。鲍威尔一度将英文报名*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改为*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到1923年6月，采用*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文报名仍用《密勒氏评论报》。在鲍威尔主持该报期间，先后出版《中国名人录》四辑。

1929年中苏边境上出现的短促战争和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事件，鲍威尔都亲自前往现场采访，还到苏联旅行。他把所见所闻如实地作了报道。

1931年底访苏后，鲍威尔在东京帝国大楼参加日美协会的宴会。主人是前日本国会议员、新任日本在美国成立的所谓日本"文化局"负责人。当听到美国戴氏公司主席和《亚细亚》杂志发行人华而许（杂志主编是他的夫人——赛珍珠，《大地》作者）谈到打算把《亚细

亚》扩展成为一个报道远东消息的杂志，主人公然向华而许说："你需要钱吗？我们可以每年给你五万元，为日本宣传。"后来发现鲍威尔也是一家杂志的发行人，就对鲍说："我们也可以给你五万元。"华、鲍都坚决拒绝了这"慷慨建议"[(6)]。

1936年斯诺到陕北进行采访，《西行漫记》中的一些片断就是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最初几个月，鲍威尔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作了采访。其后经常披露日军侵略阴谋和罪行，刊载了进步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人的通讯，深受读者称道。鲍威尔并就美国一些商人唯利是图，把大量废铁售予日本，让日本把它制成武器，屠杀中国平民的行为进行谴责。他又出版了《抗战每日大事记》和《日军暴行特辑》等，以引起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重视[(7)]。

当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搞恐怖活动暗杀新闻从业人员时，一天傍晚，鲍威尔步行返花旗总会住所时曾遭手榴弹袭击，但未爆炸。之后，他常有密探随护，并时常更换汽车牌照[(8)]。

日伪曾于1940年7月14日要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驱逐外籍记者6人出境，其中就有鲍威尔和英文、中文版《大美晚报》总编辑高尔德（Randall Gould）、社长斯塔尔（C．V．Starr）等人[(9)]。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密勒氏评论报》即遭日寇查封。12月30日鲍威尔被捕囚入集中营（先后在提篮桥及江湾），在狱中遭受非人待遇。由于牢房阴湿，营养不足，他的双足患坏疽病，溃烂致残。鲍威尔曾被日本军方指控犯有"间谍"罪，同时被控的还有斯塔尔和专栏作家伍德海（H．G．Woodhead）。

1942年美日交换战俘时，鲍威尔终于回到了美国。此时他的双足已不能行动，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他把在中国的记者生涯，写成回忆录《我在中国二十五年》。1946年夏，鲍威尔从美国扶病前往日本

东京，在远东十一国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人时作证[10]。

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则由其子小鲍威尔接办。于1946年10月复刊。小鲍威尔自任主编，常在刊物上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

老鲍威尔于1947年2月28日在美国华盛顿密苏里大学同学会上发表演说后猝然逝世[11]。在最后一次演说中，鲍威尔预言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

---

(1) 密勒（1868—1942），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1900年来华，为该报采访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新闻。1910年在上海创办英文《大陆报》。1917年又创办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担任中国北洋政府顾问，遂将该报交鲍威尔接办。

(2) 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第二章《这是上海》，美国麦克米伦公司1945年第二版。

(3) 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第二章《这是上海》。

(4) 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第四章《孙逸仙与袁世凯》。

(5) 小鲍威尔，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初在上海《大陆报》实习，后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接办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比较倾向自由民主，1951年该报由周刊改为月刊，1953年停刊。小鲍威尔返美后，被美国当局指控为“煽动叛乱罪”。

(6) 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第七章《取道日本，回家（上海）》。

(7) 据前《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张丹子、陈邦祯回忆。

(8) 据前《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张丹子、陈邦祯回忆。

(9) 上海《大美晚报》1940年7月。

(10) 《“J．B．”鲍威尔逝世》，《密勒氏评论报》第105卷第2期，

1947年3月8日。

(11) 联合社华盛顿1947年2月28日电，刊《申报》1947年3月2日。

贝祖贻

汪仁泽

贝祖贻，原名骐祥，字淞荪。江苏吴县人。1893年3月12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出生。父亲贝理泰，早年考取秀才，被苏州知府聘为幕僚。1915年入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7年在苏州创设该行分行，任经理。生有八子四女，贝祖贻排行第三，幼年就读家乡私塾，十岁时到上海澄衷学堂就读，以优异的成绩（尤其是英语）毕业。1907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中学部，毕业后进唐山矿山路矿学堂学习两年。1913年卒业后南下，任汉冶萍煤铁公司上海办事处会计。次年转任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司账。由于工作勤奋，又能讲流利的英语，提升甚速。1915年调往广州任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主任，仅三个月即通粤语，业务迅即展开。1917年升任广东分行副经理。1918年去香港筹建分行，后任该分行经理。此时广东革命政府成立，急需军饷，广东分行经理马嘉锡因无力应付而辞职，所遗之职亦由贝兼任。

1924年广东政府拟成立中央银行（以后简称“央行”），筹备员宋子文欲将已存入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两广盐款十一万元转入央行，但贝祖贻以未经总行同意不允许提转而遭监视；不久，贝携眷化装后潜往香港并报告北京总行，得复函指示贝设法与宋缓和关系，并暗中予以协助。贝即亲赴广州，退还盐款，协助央行整理货币，并给予贷款五十万元，提高央行信用。1925年8月广州央行发生挤兑风潮，省港中行大力支援，借给巨额现金，使风潮很快平息。从此，宋、贝两人结为莫逆之交。1927年总行调贝祖贻任中行沪行经理。次年中行改组，成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总管理处从北平移至上海。11月召开的中行股东大会上，贝当选为商股十二人董事之一。

上海自开埠以来，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华人在租界上处于无权

地位。20年代起爱国人士发起华人参政运动，提出“无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经过长期斗争，工部局同意华董三人参政。1928年4月上海纳税华人会推选贝祖贻等三人为首任华董进入公共租界董事会。当月董事会通过决议，6月1日起，外滩、兆丰（今中山）等公园一律向华人开放。此后贝连选连任历届华董。在董事会上，凡涉及华人权益必与各华董共同据理力争。

1930年，贝祖贻转任中行外汇部主任后，积极开展外汇业务。通令国内外各分支行加强经营外汇业务，并作为考绩内容；对进出口商行和外贸经营者，给予信用贷款和提供保证金；扩展侨汇业务，提供各种方便和服务。此后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六十三处、特约代理处九十六处。不仅打破了外商银行对我国的外汇汇兑的垄断，且为今后中行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1年，贝祖贻代表中国赴美出席华盛顿国际商会联合会，并在欧美考察经济。1932年，在他的筹划和组织下，中行在世界主要城市先后创建了十八家分行。1933年，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白银风潮”。贝祖贻积极主张“废两改元”，参加财政部组织的七人研究会。4月，当局正式颁布《废两改元公告》，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白银外流。

1934年，贝祖贻参与币制改革的准备工作。翌年3月，中国银行改组，增加官股，由宋子文任董事长。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钞票为法币，可无限制买卖外汇，使法币对外汇汇率基本趋于稳定。

1937年抗战军兴，引起财政困难。贝祖贻掌握的中国银行外汇部与中央银行合作，共同经营外汇交易，以维护法币信用。随着战事的延续，中行行务日趋繁重，1938年4月决定增设副总经理一人，由贝祖贻担任，仍兼沪分行经理。是年中行外汇部与香港汇丰银行合作，以公开牌价提供外汇，避免了法币的急剧贬值。

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为了维持法币币值，1939年中英合作，由中国、交通二行与汇丰银行、印度专利银行和澳大利亚合组中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中方出资一千万英镑，贝祖贻任五人委员会中方代表。1941年基金用完后，中、英、美外汇基金平衡局随之建立，由中方出资二千万美元，英、美各出资五百万英镑和五千万美元，组成五人董事会，贝祖贻、陈光甫、席德懋三人为中方董事。是年贝升任中行代总经理，任职期间确定“应以扶持国内生产为范围，以期增加出口贸易，减少进口贸易，平衡国际收支，而以裨益国计民生的一切生产事业为贷款的对象”。1942年发放贷款八亿三千七百万元，1943年十七亿七千四百万元，1944年二十九亿八千二百万元，1945年达九十五亿三千六百万元[(1)]。其中虽含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也体现了贝对战时民族企业的积极财政支持。

1944年，贝祖贻赴美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出席联合国货币财政会议。1945年再度赴美，代表中方与美国政府商议对华五亿美元的战后复兴贷款。后因国内战争爆发而告中止。

1945年，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次年3月任命贝祖贻为中央银行总裁，并与宋子文等商定《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试图以开放外汇市场稳定币值。法定美元一元合法币二千零二十元，黄金十两为法币一百六十五万元。最初三个月，外汇供应尚属正常。此时中央银行拥有外汇资金八亿七千万美元、黄金六百万两及大量白银和银圆，以及没收的敌伪产业五亿多美元和美援的剩余和救济物货，可供随时运用。但自1946年7月国民党挑起内战后，财政支出激增，外汇市场逐步恶化。8月19日外汇汇率提高至法币三千三百五十元对一美元，立即引起舆论攻击，随之外汇黑市猖獗、物价大幅度上涨。宋子文、贝祖贻商议后，迫不得已大量抛售黄金、美钞，以冀压抑通胀。黄金最多一天售出达十万两。据统计1946年12月售出七十八万余两，1947年1月售出六十七万余两。但黑市价格反而愈抬愈高，套汇、逃汇之风也愈演愈烈。1947年2月15日，中央银行正式宣布停售美元、黄

金，宋、贝同时宣布下台。在此期间共售出黄金三百五十万两、美金三亿五千四百二十万余元。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怒，着即查处。次日当局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法币一万二千元换一美元。此后金价、黑市外汇和物价再次出现惊涛骇浪式的狂涨，市民发生骚乱，酿成“上海金潮案”。3月5日，监察院发表调查报告，对宋、贝及央行业务局长等人提出弹劾。除宋被指为执行政策错误外，余均被指为有舞弊行为[(2)]。6月4日，国民党政务官惩戒会议决定对贝予以申诫，次日上海地方检查处票传，贝接受申诫[(3)]。此后贝回任中国银行，8月继陈光甫任该行常务董事。但贝既曾蒙此不白之冤，已无心再复原职。1949年贝曾任国民政府技术代表团代表，赴美商谈美援，但以失败告终。

全国解放前夕，贝祖贻离开大陆寓居国外，曾任美亚保险公司董事长、纽约斯泰保险公司顾问。1959年起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副董事长。1973年退休后定居纽约。1982年12月2日因病在纽约逝世。长子贝聿铭，1935年留美学建筑，国际知名建筑师。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中央二银行档案。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

---

(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页。

(2)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

977、989页。

(3)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977、989页。

边守靖

张学继

边守靖，字洁清，亦作洁卿，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直隶静海人。边家是静海望族，其父边仲三是清光绪甲午科举人，但未及参加会试即病故，其时边守靖尚在母亲襁褓中，不久，边守靖交由叔父边锡三收养。边锡三非常喜爱这个侄子，让其夫人断了亲生女儿的奶哺育边守靖，稍长又亲自授以诗书，使边守靖得以考中秀才。

科举废除后，边守靖被送到天津中学堂就读，中学毕业后考入师范。几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资格，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科学习。在日本，边守靖受当时高涨的革命潮流的影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0年回国，到保定师范学堂任教。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边守靖回到天津与同盟会员王葆真等商定发动静海民团响应，边守靖随即返回静海鼓动四十八村民团约一千余人准备开往天津，被其保守畏祸的祖父严厉制止。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各省成立议会。边守靖以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资格当选为直隶临时省议会副议长，翌年当选为省议会议长。

当时的边守靖年轻气盛，锐意革新，很想有所作为。他对人说："民国议会是立法机关，各国皆然，决不同于清朝谘议局的咨询机构。当此民国初建民智初开之际，议会要根据约法赋予的权利独立行使职权，不能唯行政机关的马首是瞻，更不能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我们要各尽职责，不能辜负直隶省三千万乡亲父老之委托与期望。"边守靖当选议长后不久，与一部分志同道合的议员经过商讨，拟定了整饬吏治、整顿税收、疏浚河道、大办教育等十大议案，交省议会审议通过，咨请行政当局采择施行。十大议案的提出引起了社会

的关注和好评。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彻底失败，袁世凯随即在全国范围对国民党实行严厉镇压，勒令国民党自动解散，取消国民党员的军政职务，公开通缉参加“二次革命”的重要领导人。边守靖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地位，遂改变革命党人的初衷，与北洋军阀、官僚同流合污。袁世凯见边守靖已完全屈服，遂决定加以笼络。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先后授予边守靖勋四位、二等文虎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边氏欣然接受，并加入到劝进队伍中来，联络省议员以直隶省议会名义向袁世凯劝进书。袁世凯收到劝进书后，立即派人给边氏送来五万元“袁大头”（即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并允诺登基后另外给予加官。

1916年9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任直隶督军。当时，直隶督军公署在保定，直隶省长公署和直隶省议会在天津，每逢有重大事情，边守靖都要亲自到保定拜见曹锟，以博取他的好感。1918年1月，曹锟四弟曹锐署理直隶省长（次年7月改为实任）。2月6日，曹锟率军南下作战。临行前，曹锟委派曹锐以署理直隶省长代理督军职务。从此，曹氏兄弟全面掌握了直隶的军政大权。边守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一意结交曹氏兄弟，特别是同在天津办公的曹锐，不久两人即结拜为金兰兄弟，曹锐年长，边守靖称曹锐四哥。边守靖满腹文才，口才好，又足智多谋，深得曹锐的赏识。从此，边守靖成为曹锐的头号亲信。他们这对金兰兄弟，曹锐任直隶省长，边守靖为直隶省议长。省公署交议之事，省议会无不通过；省议会欲办之事，省公署一一照准。两人狼狈为奸，包揽了直隶的事务。曹锐读书不多，能力有限，省中要政、人事更动，曹锐都依边守靖裁决。久而久之，直隶各道、县官员到省城请见时，往往先谒议长边守靖再见省长曹锐，说到底，边守靖的意见也就是曹锐的意见。

直皖战争后，直奉矛盾开始激化，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不断对直系挑衅。面对和战问题，曹锐问计于边守靖。边守靖为曹锐具体分析

了直、奉两方的情况后指出，张作霖占据东北，兵力雄厚，如与奉系开战失败，曹氏兄弟多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将化为云烟；再则，吴佩孚大有功高盖主之趋势，作为直系领袖曹锟不能全听部属吴佩孚的，应结援张作霖儿女亲家，以抑制吴佩孚的气焰。边守靖的意见，与曹锐不谋而合。曹锐听从边守靖的主张，决定劝说三哥曹锟对奉系主和，不能开战。他奔走于保定和奉天之间，调停两方的矛盾，甚至不惜迁就奉方，张作霖提什么条件，曹锐都答应，只要张作霖不开战就行。曹锐主和，而吴佩孚等高级将领则主张与红胡子张作霖决一胜负。1922年4月11日，曹锟在保定督军公署召开会议，商讨和战问题。曹锐一向依仗曹锟之势，盛气凌人，在会上对主战派将领出口不逊，还掏出手枪来耍横，激起直系高级将领的愤慨。曹锟不得不决定对奉系开战，并请吴佩孚担任前敌总司令。曹锟为了安抚各将领，还当场责备了曹锐几句，遂使曹氏兄弟间发生冲突。为了妥善处理曹氏兄弟之间的僵局，边守靖多方设法，最后达成体面的解决办法，曹锐以有病为由提出辞去直隶省长职务，然后由曹锟任命曹锐为直、鲁、豫三省矿务督办作为补偿。

直奉第一次战争后，直系分成“津保派”和“洛阳派”。“津保派”以驻保定的曹锟和驻天津的曹锐为首，边守靖作为“津保派”的灵魂人物，极力赞同曹锟直接入主大总统府，与吴佩孚的迂回主张形成对立。为让曹锟尽快当上大总统，边守靖多次向曹锟献策，其中心意思是将黎元洪迅速赶下台，然后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让他们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边守靖不仅是献策者，还是这些决策行动的指挥者、参与者。

边守靖与众议院院长吴景濂策划，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幹受贿，由吴景濂在众议院提出查办案，逼迫黎元洪总统下令逮捕罗文幹，直系军阀由曹锟带头纷纷通电要求治罗文幹之罪，边守靖也以直隶省议会的名义发出通电，斥责罗文幹误国违法。边守靖还通过曹锐放出“秀才不倒，大选不成”的话，矛头直指吴佩孚。通过罗文幹案，迫使王

宠惠内阁总辞职，同时也给吴佩孚以沉重打击，迫使他服从曹锟强制驱逐黎元洪下台，重金贿选为大总统。

边守靖的第二步就是逼黎元洪尽快下台。为了办事方便，他在北京南池子买了一所房子，长住北京，为曹锟贿选进行谋划。为了制造民意，边守靖花大价钱雇用大批流氓地痞组成所谓“公民团”，1923年6月8日起在北京天安门前搭起高台，举行所谓国民大会，要黎元洪退位，以让贤路。“公民团”还到总统府所在的新华门前游行高喊：“改造时局，总统下台！”与此同时，直系将领由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和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率领下级军官宣布集体辞职，表示不再负责维持治安，并撤走了大总统府和黎元洪官邸的军警，北京警察也宣布罢岗。逼宫行动一步步升级，“公民团”从天安门移师到东厂胡同，将黎元洪官邸包围起来，摇动手中小纸旗呐喊：“总统下台！”“市民饿！总统肥！”黎元洪困守总统官邸，形同囚徒，寸步难行，僵持至6月13日悄悄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黎元洪下台后，曹锟即按照边守靖事先提出的“议员当中多数宦囊不满，钱能通神，每人酌给一笔款即为我所用”之策，抓紧进行贿选。但贿选得需巨款，边守靖向曹锟、王承斌建议用“捉财神”的办法筹集贿选经费，即逮捕贩卖毒品人，令其交出数千至数万元后再释放。他们随意将有钱的士绅均列入毒品贩子名单，敲诈勒索。边守靖还从天津长芦盐税中为曹锟筹集了一笔款贿选。曹锟将搜括勒索来的贿选款除一部分让曹锐以化名存在外国银行外，大部分款存在边守靖开办的大有银行。边守靖与吴景濂等经过数月奔波，终于达成贿选协议。普通议员投曹锟一票，给五千银圆支票（部分重要议员给予一万甚至更多的票价）。待投票后，议员们持加盖有边守靖和王承斌等人私章的支票分别去银行取钱，支票以边守靖的大有银行最多。

曹锟贿选前后，边守靖不仅出谋划策，而且赤膊上阵，为贿选成功立下汗马功劳。曹锟为酬其功，决定以边守靖为交通总长。但吴佩孚坚决反对，没有实现。曹锟为此多次向边守靖表示歉意，答应以后

适当时机一定给予调换更高的官职。但为时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遭到惨败，吴佩孚全军覆没逃亡长江流域，曹锟被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曹锐因舍不得家财吞鸦片自杀，边守靖的几大靠山顷刻全部倒台。但边守靖善于随机应变，很快与新入主直隶的奉系军务督办兼省长李景林拉上了关系。1926年李景林倒台，褚玉璞上台，边守靖又与褚玉璞搭上了关系。时局多变，直隶督军、省长换了一波又一波，但边守靖的议长职务却始终连任，这在北洋军阀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直到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将北京改为北平，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省议会取消，边守靖才结束他把持了十六年之久议长职务。

边守靖退出政界后，将过去搜刮来的巨额财产（有人说他有七千万元家财，知情人认为是夸大了）投资天津的工商业，长期担任恒源纱厂（后成为纺织厂）董事长，一度兼任总经理。此外，边守靖还开设有信记银号、稻香村食品店、西服店、酱园、铁厂等，成为天津最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1937年7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几次想拉边守靖出来担任伪职，边守靖坚持民族气节，保全了晚节。

1949年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接着，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一百万大军发起平津战役，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兵锋直指北平、天津。天津的大官巨贾纷纷离开天津南下。恒源纺织厂总经理曹郁文（曹锐之孙）惶惶不安，对边守靖说："时局阽危，我们必须赶快走，否则慢了后果不堪设想。"边守靖开始也忧心忡忡，后来他看了共产党有关政策的宣传材料，决意留下。他对曹郁文说："还是留下为上，不必出走。"

曹郁文最终还是去了香港，但边守靖没走，留在天津兼任恒源纺织厂总经理。天津解放后，他曾先后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工商联副主委、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津分会副主委。在边守靖的带领下，

恒源纺织厂顺利完成公私合营，获得模范厂称号，为天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树立了榜样。

1956年7月6日，边守靖病故。

冰心

宗志文

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原籍福建长乐县，1900年10月5日（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二日）出生于福州。祖上务农，祖父以教书为业。父亲谢葆璋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与黎元洪是同班同学，曾参加甲午中日海战，1903年被派往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任校长。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校中满汉学生矛盾掀起学潮，谢葆璋被当局疑为乱党，不得已避祸辞职，离开烟台。民国成立后，1913年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

冰心1903年随父母到烟台，四岁随母亲识字，六岁入塾读书。在舅父引导下，七岁开始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烟台的大海、山风、海涛和嘹亮的军号，终日环绕着冰心，陶冶了她的身心。有一天，她的父亲指着墙上的地图对她说："大连是日本的，青岛是德国的，秦皇岛是英国的……只有烟台是我们自己的了。"[(1)] 父亲的教诲，从小就培育了冰心的爱国主义思想，使她终身热爱自己的祖国。

1912年冰心入福建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3年随全家迁到北京。1914年秋季她进入贝满女中（当时称贝满中斋）。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学生每天要听牧师讲道，每星期还要听一次圣经故事，冰心对传教士宣讲的耶稣"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精神虽然感到可敬，但对"三位一体"、"复活"等宣讲都不相信，始终也没有入教。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接受。当时袁正密谋称帝，竟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支

持。全国人民怒不可遏，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冰心和贝满女中的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她有一天游行回家，看见父亲书房的墙上贴着“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的横幅。她站在横幅下，含泪向父亲表示永远不忘5月7日这个国耻日。

1918年夏，冰心在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和北京协和大学、通州潞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她当时的志愿是学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冰心立即投身到运动中，在学生自治会任文书，并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她除了进行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外，还为女学界联合会的会刊写宣传文章，发动人们罢课罢市、抵制日货、反对侵略等，有的文章被选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她最早在该报上发表的是《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是她旁听了北京法庭审问被捕学生之后写的。文章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迫害爱国学生的暴行，呼吁公众主持正义，营救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五四运动使只知埋头读书的冰心开始思考种种社会问题。她在1979年回顾说：“五四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我只想把我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2)] 从1919年9月开始，她陆续在《晨报》上发表了四篇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和《去国》，反映了当时的家庭、妇女、恋爱和青年职业等问题，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具有相当大的启迪作用，也受到文坛重视，人们称这些小说为“问题小说”。冰心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问题小说”的作家之一。阿英在30年代曾评论冰心的这些小说：“在旧的理解完全被否定，新的认识又还未能确立的过渡期中，青年对于许多问题是彷徨无定的，是烦闷着的。冰心作品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形，她抓住了读者的心。”[(3)] 不久，冰心又发表了一些同情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小说，如《还乡》、《三

儿》、《一个兵丁》等。当时有的青年为生活所迫沦为盗贼，有的青年被军阀强拉去当兵。瞿秋白曾说，冰心的这些作品，“对于士兵，对于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新的问题”[(4)]。

五四运动以后，不少青年感到空虚、苦闷，找不到出路。此时，冰心也正在努力研究探索人生，渴望以自己的作品唤起青年新的活力。1921年4月，她发表的小说《超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文中主人公何彬是当时颓废悲观青年的典型。他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认为“人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思”。但朦胧中，“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乃至邻居的孩子，又常常牵动着他的心，使他感动。冰心想通过主人公用母爱、自然、童心唤醒青年，幻想以“爱的哲学”使他们走上热爱人生、积极向上的道路。茅盾曾评论她的这一观点说，冰心“既已注视现实了，既已提出问题了，并且企图给个解答，然而由她生活所产生的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5)]。

1920年暑假，冰心读完预科，因为参加五四运动和不断撰写小说，耽搁了不少时间，有些理科的实验没有完成，加之喜爱文学，乃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二年级学习。年底，经许地山等人推荐，加入文学研究会，从此步入中国文坛。冰心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在燕京大学又受到外国文学的熏陶，她的文学作品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广泛的赞誉，使她很快成为当时文坛上跃起的一颗新星。

冰心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自由体小诗。其中著名散文《寄小读者》、《南归》、《关于女人》等，堪称经典之作。郁达夫曾评论她的散文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6)] 冰心的诗歌颂扬母爱，歌咏自然，赞美童心，也揭露社会的黑暗，鼓舞青年努力向上。她的诗集《繁星》、《春水》出版后，成为流行一时的“冰心体”。

1923年夏，冰心在燕京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获金钥匙奖，同

时获得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学习的奖学金。她8月赴美，9月入学。11月因病住进疗养院，直至翌年7月始返校。留学期间，她在北京《晨报》的《儿童世界》专栏上，以通讯形式先后发表《寄小读者》十九篇。通讯以纯真的感情、优美的文笔描绘了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自己病中的感受和对人生的种种思考，颂扬了母爱、童心和自然，抒发了对亲情的怀恋和对祖国的热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儿童读物，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

冰心留学期间小说写的很少，代表作有《悟》和《六一姊》。《六一姊》揭示了农村妇女沉重的精神枷锁，谴责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毒害。《悟》是她继《超人》之后，又一部宣扬“爱的哲学”的力作。不过，这时她对于用母爱、童心和自然解决社会问题的幻想已经产生怀疑，曾说：“我是一个盲者，看不见生命的道路。”[(7)] 1931年她的小说《分》，就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享受母爱的平等，对“爱的哲学”已经不存幻想了。

1926年7月，冰心获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文学硕士学位，不久离美返国，9月到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兼任《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冰心和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博士吴文藻结婚。婚后的生活虽然很幸福，但30年代的中国兵连祸结，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不断困扰着她，她的心情很郁闷，“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8)]。“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冰心写了《记萨镇冰先生》，讴歌八国联军之役时，我国海军名将萨镇冰不畏强敌，英勇奋战的事迹，以唤起国人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勇气。萨镇冰是冰心父亲青年时代在海军服役时的上级，她从小受父亲的爱国主义教诲，对萨镇冰有很深的印象。她的《记萨镇冰先生》写得生动感人，是一篇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

抗日战争爆发后，冰心一家流亡云南。吴文藻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冰心和孩子们住在离昆明四五十公里的呈贡。那里山清水秀，风景极为优美。她把住所称为“默庐”，写的散文集称《默庐试笔》。除

写作外，还义务在呈贡的简易师范学校兼课。她在《默庐试笔》中说，她生平在国内外游历过的名胜，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山水的风采，但是她仍然苦恋着北京。对祖国的河山破碎，感到刻骨铭心，时时不忘收复失地的决心。

1940年夏，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校友身份写信邀请冰心到重庆主持中华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工作。冰心到重庆后，一度参与该会工作。不久与妇女界的史良、刘清扬接触，听说该会的情况很复杂，乃向宋美龄婉言辞去了该会工作。1941年初，宋美龄推荐她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3月她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她对国民党颇为失望，在会上态度很消极。1947年5月，冰心参加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时，国民党当局邀她参加次年国民大会代表竞选，她断然拒绝。

冰心一家住在重庆歌乐山上，来往的都是文艺界的朋友，她还参加了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等人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时物价飞涨，冰心没有工作，经济上很拮据，有朋友向她约稿，她以“男士”为笔名，写了标题为《关于女人》的十四篇散文，陆续在《星期评论》杂志上发表，成为传诵一时的美文。后集结成书出版，是当时大后方最畅销的书籍。《关于女人》中，冰心写了十四位她所亲近熟悉的女性。她们大多数生活在抗战时期的后方，虽然不是在前线浴血奋战，但“忍得住痛，耐得住苦”，在后方平凡的生活中默默地为抗日作出种种贡献，表现了伟大的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叶圣陶曾评论说：“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9)

抗日战争胜利后，冰心一家由重庆回到北平，1946年冬，吴文藻被派为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成员，前往东京工作，冰心作为眷属随往。她先后受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聘请，开设有关中国文学的讲座。1948年6月，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和东京大学联合邀请冰

心作有关中国文学的讲座，并将内容集结成《如何鉴赏中国文学》（日文）一书出版。担任翻译的仓石武四郎在该书前言中说：“每次讲座，大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作为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的盛况是空前的。”1949年，冰心应聘为东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当时日本妇女问题比较突出，她曾在日本妇女杂志和东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批评日本不尊重女权。

冰心在日本期间，经常收听中国解放区的广播，研读有关中国革命的著述，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十分向往。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使她“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1950年底，吴文藻随驻日军事代表团部分成员起义，脱离代表团。1951年秋天，冰心夫妇利用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他们到该校任教的机会，得到离开日本的护照，途经香港回到北京。

冰心回到她热爱的北京后，心情特别振奋，决心用新的观点颂扬母爱、童心和自然，创作儿童文学，为培养儿童贡献力量。1953年9月，冰心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冬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第二、第三届作协理事。1976年当选该会名誉主席。50年代冰心参观工厂、农村、学校。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写出《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小五虎》、《一个高尚的人》、《大东流乡的四员女健将和女尖兵》等。她回国后所写的最早的儿童文学作品有《陶奇的暑假日记》、《小橘灯》、《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拾穗小札》等。

冰心常参加国际交往活动，进行文化交流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到亚、欧、非各国出席国际性会议，参观访问，接待国外朋友，等等。1958年3月至1960年3月，她将国外参观访问的观感和国内见闻的感受，写成二十篇《再寄小读者》。

“文革”中，冰心受到冲击，十年没有写作。1978年她开始写《三寄小读者》，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

财物；也讲不随地吐痰、不打人骂人、不撒谎等道理。

冰心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54年9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1978年，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2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1979年10月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99年2月28日，冰心去世。

---

(1) 冰心：《人民坐在罗圈椅上》，卓如编《冰心全集》第5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文艺研究》创刊号（1979年）。

(3) 阿英：《谢冰心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版。

(4) 瞿秋白：《老虎皮》，《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页。

(5) 茅盾：《冰心论》，《文学》第3卷第2号（1934年）。

(6)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7集《散文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16页。

(7) 冰心：《往事集·自序》，开明书店1930年版。

(8)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9) 翰先（叶圣陶）：《男士的〈我的同班〉》，《国文杂志》第1卷第4、5号合刊（1943年3月）。

蔡昌

汪仁泽

蔡昌，1877年11月2日（清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耕种、捕鱼为生，生计困顿。兄蔡兴早年离家去澳洲雪梨（今译悉尼）谋生。蔡昌幼年失学在家，帮助父亲务农，十四岁时随兄至雪梨，在其兄供职的永生行水果档当杂工。

1899年，蔡兴携带数年所有积蓄回国探亲，应澳洲归国侨商马应彪之邀，共12人集资25000元港币，合伙在香港开设先施百货公司。不久蔡昌回国进香港先施公司当职员。数年后与人合资，在香港开设一家小型百货商店。其时先施公司业务发达，已在广州设分行，蔡兴任该公司董事，交游甚广。

蔡昌在其兄的支持下，1912年向归国华侨筹得资金港币400万元，赁得香港闹市区德辅道中的狭长铺面，开设大新百货公司，英文取谐音：The Sun，寓意如日上升，并用出云旭日为商标，蔡昌自任经理。蔡自幼失学，识字不多，但遇事认真，工于心计。每晨4时即起，筹划当天事务。此时德辅道中商店林立，相邻同业先施、永安等近在咫尺。大新以铺面商品陈列整洁，备货充足，给人以面目一新的印象。他亲自掌握进货业务，讲究商品质量，不销残副次品，保证货真价实，因此信誉日著，营业兴盛。1916年设分店于广州城内惠爱中路，数年后又在广州西堤觅地，建造南方大厦八层高楼，为当时广州最大的百货公司。屋顶辟大新乐园，左邻附设亚洲旅馆，设备齐全。商场开业后，顾客纷至，营业额为同业之冠。

蔡昌为了进一步扩展事业，继香港、广州之后，谋求在全国经济

中心的上海开设大新公司联号。经数度审慎考虑后，先在沪地设立办庄，遣人来沪初探商情，然后开始着手筹备，于1934年招股集资6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广州大新公司先行拨款占股），亲自到沪擘划一切。他在闹市中心观测来往行人车辆流量，择定南京路上西藏路至劳合路（今六合路）一处为设店地点。其时此处多系里弄房屋，产权分属数个业主，蔡昌恐业主知情后哄抬地价，乃暗中分头购得，颇费周折，终于买进该处6亩见方的地基，招标营建。正待打桩兴工，不料北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出面阻挠，声称该处建造大楼，将危及同乡会大厦。虽几经解释，虞仍执意不允，最后诉之于法。蔡昌通过市长吴铁城的关系，并向租界当局申述设店后可繁荣市面，增加市政财税收入，因而获得支持，终于胜诉，得以施工。历时13个月新厦落成，建筑费耗资150万元。十层高楼全部用浅黄色瓷砖敷面，外观壮丽。但新厦落成，内部装修费用浩繁，所集股金耗用甚巨，乃商于英商麦加利银行，以新厦作押，陆续获得巨额贷款作为流动资金，购进各类商品，其中进口商品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1936年1月10日大新公司正式开张营业，蔡昌自任主席董事暨总监督，弟蔡慧民任经理，子蔡乃诚任副经理。地下室及一至三楼为百货部，面积达一万七千余平方米，为全国百货业之冠。商品琳琅满目，摆设新颖整洁。全公司职员八百余人，除少数从粤港调来外，皆系登报招聘及经人介绍而来。营业员服式一律，男的黑色呢制服，职员中山领，部长开口领系领带（夏天白帆布西服）；女的玫瑰色旗袍，食品医药部者外罩白大衣。室内装有冷暖气设备，调节气温；除设有多部电梯供代步外，又从美国沃的斯公司购进电气自动扶梯，为远东第一部。在沪地各大报刊的广告上，以“推销中华国产，搜罗美备；选办环球物品，总汇精华。本公司自建十层大厦，设备电动扶梯，无劳跨步；装置冷暖气管，四时如春”相招徕；尤以电气自动扶梯，引起市民好奇，皆以捷足一试为快。开幕之日，南京路上人山人海，顾客如潮。为了避免拥挤，开幕期间除印发入场请柬外，并发售兑货券，凭券入场，按值兑货。新厦四楼辟为画厅展览室及总办公

室；五楼设大新舞厅及大新酒家，供应中西酒菜宴席；六楼至十楼为大新游乐场及屋顶花园。由于适应了当时租界畸形发展的需求，大新公司遂跻身于沪上四大环球百货公司，且后来居上，营业额逐步超过比邻之先施及新新公司。此时沪、粤、港三家大新公司会计分开，各计盈亏，而以沪行为主。蔡昌大权独揽，定居沪地，每年往来粤、港多次，进行巡视。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广州南方大厦屡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翌年10月广州沦陷，粤行业务遂告停顿。沪行由于地处租界，形成畸形繁荣局面，蔡昌善于经营，营业蒸蒸日上。又因战时货币贬值，所欠麦加利银行贷款，得于1940年一次偿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大新公司被日方派监督官进店监督。日军占领香港后，香港大新公司亦受日本军方的管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沪地曾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景象，大新公司营业兴隆，获利颇丰。1946年起，美国商品源源涌来，充斥国内市场，上海百货商业濒临绝境。此时港行营业则日见好转。1947年，蔡昌携眷定居香港，沪行委托蔡慧民等管理，制定多销货、少进货的方针，逐步将资金抽调至香港。1948年沪行又经国民党政府“限价政策”的变相掠夺，元气大伤，内部空虚。迨至解放前夕，几名资方代理人又先后去港，蔡昌则专注于港行的经营管理，沪行遂形成既无资方、又无资金的局面，由职工组织“企业维持委员会”维持商店营业。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大新公司职工于1950年2月推派代表赴香港，向蔡昌宣传政府政策，希望他回沪与全体职工共同经营企业。蔡表示可予考虑，遂先行电汇上海大新公司港币3万元。但后来由于年老体衰，犹豫不决，终未成行。至1953年夏，蔡昌因病在香港去世。上海大新公司则在国营日用百货公司的委托代销及职工的群策群力下，克服重重困难，至1953年11月经申请核准改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主要参考资料

唐家俊：《一幢大楼的变迁》，上海《文汇报》1965年4月2日。

原大新公司职工唐家俊、麦朝宇、卢旷、梁文宁、林树芳等的访问记录。

蔡楚生

张洁

蔡楚生，广东潮阳人。1906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上海，后随家人返至原籍，就读于私塾，并从事田间劳动。

蔡楚生十二岁时到汕头一小商店当学徒，虽十分劳累，仍勤奋好学。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参加了汕头店员工会，担任工会的宣传和戏剧演出等工作，并学习写文章和绘画。

蔡楚生由于从事工会活动，受到迫害，1927年潜往上海。经友人介绍，在几家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和剧务、宣传等工作。1929年，他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郑正秋手下当了副导演，兼任置景。他协助郑正秋摄制《战地小同胞》（1929年）、《碎琴楼》（1930年）、《桃花湖》、《红泪影》（1931年）等影片，在工作中逐渐显露了艺术才能，得到郑正秋的重视和赏识，并为电影界所注目。

蔡于1931年离开明星影片公司，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制片第二厂，正式担任编导。从1932年起，相继拍摄了他编导的《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当拍摄《粉红色的梦》时，“一二八”战争爆发，深重的民族危难激发他转入拍摄抗日新闻片。为了配合当时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他和联华影片公司导演史东山、王次龙、孙瑜等协作，迅速完成了反映“一二八”抗战的《共赴国难》；同时还以“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为背景，编写了《血溅红颜》，后来国民党审查机关以“内容激烈”为借口，禁止拍摄。

《粉红色的梦》在上海放映后，左翼电影评论界曾给以热诚、中肯的批评和帮助。后来成为蔡楚生最好战友的聂耳，也曾希望他“能

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1]。经过批评、帮助，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电影小组的积极影响下，他很快提高了认识。后来，他在一篇题为《会客室中》的文章里，分析批判了自己，认识到《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是“两部盲目的创作”[2]；并诚挚地表示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即“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从此，蔡的电影创作由脱离现实转向反映现实。

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蔡楚生当选为执行委员。该会发表宣言，号召电影界“亲切地组织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3]。蔡楚生于同年创作了《都会的早晨》，受到电影界和观众的好评，被上海《良友画报》誉为联华伟大作品之一。这是他转变创作思想后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走上左翼电影运动行列的开始。

1934年春末，蔡楚生不顾国民党对进步电影的迫害，完成了又一部进步影片《渔光曲》。它以现实的题材，动人的情节，通俗的手法和精湛的技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6月1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时，正值高温盛暑，但盛况空前，连映84天，场场满座，创了连映的最高纪录。次年2月，在31国参加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这是我国获得国际荣誉的第一部影片。

继《渔光曲》后，蔡楚生在1935年又成功地导演了《新女性》，该片曾引起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

1936年，蔡楚生编写了反映旧社会流浪儿童苦难生活的《迷途的羔羊》，1937年上半年又完成了控诉旧社会、揭露汉奸罪恶的《王老五》。在创作《迷途的羔羊》之初，他曾在一些儿童故事和描写流浪儿的书籍方面下功夫，但发觉收效不大，不如设法去接近一些流浪儿童——活的书本。在实地接触流浪儿童中，蔡楚生发觉他们具有那

些“上流”社会儿童所没有的聪明、热情、理智和勇敢，从而更加强了他“为这些无告的人们而呼吁的决心”[(4)]。后来在创作《王老五》剧本时，他也曾到上海打浦桥一带污水河边的棚户区，进行深入的体验、观察和了解。这使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只有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才能充分发挥艺术的作用。

为了团结电影界的爱国力量，加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蔡楚生和欧阳予倩等于1936年1月27日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他们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电影界联合组成救国的统一阵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年7月11日，蔡参加了上海文艺、电影、戏剧工作者百余人联名发表的《争取演剧自由宣言》，抗议租界当局无理禁止和破坏我国电影、戏剧界爱国活动的蛮横行径。1937年7月28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当选为协会理事。

1937年8月，蔡楚生和夏衍等根据舞台剧《保卫卢沟桥》和自编的电影剧本《为自由而战》，综合编成为《华北的黎明》。后因战局影响，未能摄制成影片。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蔡楚生离沪南下，转移香港。当时港澳一带粤语影片盛行，蔡和司徒慧敏等人，制作了抗战粤语片《血溅宝山城》；接着又合作为启明影片公司拍摄了粤语片《游击进行曲》。后一部影片于1938年摄制完成后，竟被港英当局无理勒令禁映；直到1941年6月，经过删剪并易名为《正气歌》，才和观众见面。当时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建立了大地影片公司，蔡便参加该公司，于1939年9月完成了《孤岛天堂》。这部影片描写上海租界地区成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作生死斗争的不屈精神。在重庆、香港和南洋一带放映时，受到普遍赞扬。

1939年底，大地影片公司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次年6月，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又组成了新生影片公司，蔡楚生参加了“新生”的工作，

编导了反映当时香港工人群众拒运军火原料资敌斗争的《前程万里》，于1941年在港公映。为反映在日军铁蹄下南海渔民的凄惨生活，他写出了南海渔民与敌人作生死斗争的脚本《南海风云》，准备在香港拍摄。后因香港沦陷，没有拍成。

此后，蔡楚生由香港到了桂林，国民党文化部门曾派人拉拢他，要他去重庆，他拒绝了国民党人的“邀请”。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南侵，衡阳、桂林告急，蔡又由桂林转移柳州。后来柳州告急，撤往贵州独山。又几经波折，末后到贵阳住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和郑君里合作，开始创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于1947年10月完成了此片的编导和摄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是蔡楚生的代表作。影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艺术造诣，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轰动了整个中国影坛，被誉为“标志了国产影片的前进的道路”[(5)]。据1948年1月11日上海《正言报》发表的统计数字，该片自1947年10月至1948年1月连映三个多月，场场满座，总计观众达712874人次，打破了他30年代编导的《渔光曲》连映84天的纪录。

蔡楚生在完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又创作了《西湖春晓》电影剧本，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和其他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于1948年底再次由沪转移香港，这部影片的摄制也就被搁置起来。

1949年5月，蔡楚生和许多进步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奔赴解放了的北平，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此后，蔡楚生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他曾先后担任了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协会主席等职务；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蔡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底，蔡楚生到新

建的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整理改编《南海风云》原稿，并与王为一、陈残云合作，完成了改编剧本和上集的摄制任务，定名《南海潮》。影片通过一个渔民家庭的遭遇，概括了从大革命时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广东沿海渔民的斗争经历。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在北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

王为一：《悼念蔡楚生同志》，《作品》1978年第8期。

上海《良友》、《时代》画刊及有关报纸。

---

(1) 上海《电影艺术》第1期，1932年6月。

(2) 上海《电影·戏剧》第2期，1936年12月10日。

(3) 上海《晨报》1933年3月26日。

(4) 上海《联华画报》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

(5) 上海《新闻报》1947年10月27日。

蔡锷

张振鹤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生于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湖南邵阳人，后迁往武冈。七岁就学，十四岁中秀才，1897年9月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任教的有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蔡锷在校，深受梁启超的赏识。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谭、梁在北京一死一逃，时务学堂也因连累而被解散。蔡遂离长沙辗转到了上海，考入南洋公学。

1899年8月，他应梁启超函约到日本，先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后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求学。1900年，随唐才常等人回国，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事败又去日本。

他第二次抵日后，改名锷，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前后入日本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积极参与留学生抗俄义勇队的活动。1904年10月，于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

蔡在日本期间，同梁启超的关系更加密切。曾用蔡孟博、奋翮生、劫火仙等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

1904年，蔡从日本回国，先在江西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材官队（即将弁学堂）总教习及监督。1905年初到湖南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等职。同年夏，被调到广西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测绘学堂堂长等职。1906年秋，奉令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1907年春，广西陆军小学堂创办于桂林，蔡锷任该校总办。1908年，升新练常备军步队第一标统带，自桂林移驻南宁。次年，接任龙州讲武堂总办。1910年奉令兼

新军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等职。蔡锷在广西数年，创练新军，颇负盛誉，然亦招人妒忌。有人策动谘议局对蔡锷提出弹劾。这就促使他决意离开广西。1911年初，经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和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像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以同情和赞助。1907年，同盟会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时，黄兴和赵声二人于事前秘密去广西访问过他。他到云南后，对云南讲武堂李根源等人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蔡锷约集昆明的革命党人秘议响应计划，部署一切，被推为总指挥[(1)]。

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日），蔡锷按预定计划在昆明发动起义，令李根源率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北校场发动，他本人率新军七十四标在南校场巫家坝发动。第二天，起义军占领昆明全城。清总督李经羲自督署逃往法领事馆避难，后经蔡锷派人把他护送出境。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协统王振畿被起义军击毙，军事总参议靳云鹏化装潜逃。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公推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总长，唐继尧任次长。蔡锷掌权后，在行政上进行了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军官，财政方面则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2)]。

云南独立后，贵州革命派与立宪派竞相酝酿独立。四川总督赵尔丰还盘踞成都，和保路同志军对抗。蔡锷为了巩固云南，立即着手向邻省发展，从而对贵州、四川两省的政治变动进行了干预。

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革命派获得群众支持，掌握了政权。该省立宪派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请求蔡锷派兵援黔，武装镇压革

命派。蔡锷和立宪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竟然听信他们对革命派的中伤，派唐继尧率军到贵阳[3]。唐到贵阳后，围攻贵阳军政府，屠杀了大批革命党人。唐当上了贵州都督，戴戡、任可澄当上都督府左右参赞[4]。

四川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在云南起义后进一步高涨起来，清政府曾派端方率军进入四川，向革命势力反扑，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力量。11月11日，蔡锷派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共8个营的兵力援助四川起义军。赵尔丰的军队士气低沉，一与援川滇军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但是，援川滇军和四川起义军未能团结对敌，因争地盘、税款等问题，也不断发生冲突。1911年12月，谢汝翼在叙州和自流井对数万抗清保路同志军进行了镇压；1912年初，李鸿祥也在泸州属合江县杀死了革命党人黄方和大批保路同志军[5]。对于这场屠杀，事后蔡锷和重庆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两都督有截然相反的电报致黎元洪。蔡称“合江匪徒啸聚”，“随我军入城后彼乘间入城，肆行劫掠”。张、夏却说：“滇军以兵力解散同志会施放机关炮，杀伤过多……党人、滇人皆以为过当。”[6]

民国成立后，蔡锷的主要政治倾向仍受着梁启超的影响，以梁为首的进步党也把云南、贵州作为他们活动的地盘。但是蔡锷又被谷钟秀、张耀曾等组织的统一共和党推为总干事，从而他也和国民党内一些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二次革命爆发后，他不顾孙、黄等国民党人的善意争取，仍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末后，袁世凯把他调离云南，以唐继尧继任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10月，蔡锷到了北京，袁加以多方笼络，任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全国经界局督办、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衔。

但蔡锷到京不久，迅即察觉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便暗中与朋友、同道，小心翼翼地多方做应变的准备。当时全国各省除滇黔粤桂外，几乎都是北洋军队的防地，而广东都督龙济光早已投入袁的怀

抱，并牵制广西都督陆荣廷，使之不能对袁有任何异动。只有滇黔，一时成为立宪派活动的地盘。蔡锷的举动对该两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袁世凯对他倍加提防。袁曾向亲信曹汝霖泄露自己的心机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7)]

1915年，袁世凯酝酿称帝，引起全国各界人民的反对。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先投靠袁世凯，后又遭到遗弃。当梁启超看出袁的帝制必然失败时，便也反对帝制活动。8月间，"筹安会"在京成立，蔡锷立即暗中到天津去和梁启超商议讨袁计划。不久，梁启超针对袁世凯的帝制阴谋，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之后，袁对蔡锷的行动就更加注意了。袁派密探对他跟踪监视。10月，袁又派人搜查了蔡锷的住宅。蔡为了麻痹袁对他的注意，伪装意志消沉，同时又借故把眷属先遣送出京，为自己脱身作准备。

11月间，蔡借看病为名去天津，戴戡事先应邀自贵州来津，同在梁启超家里会面，进一步商谈讨袁计划。据梁启超事后追述：当时曾预计"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8)]。11月8日，蔡锷从天津乘日本商船经上海到日本门司。其部属石陶钧等自东京专程抵此在码头迎接他。不久，他乘轮船离日秘密到了香港，又从香港经海防到云南，12月19日回到昆明。蔡为了转移袁的注意力，在日本写了许多假信，报告他游历和养病的情况，托人陆续寄给袁的亲信。因而，袁世凯一点也没有察觉蔡离开日本的迹象，当他接到"蔡过香港到云南去了"的情报时，还不相信。

蔡锷回到昆明以前，军队中早已秘密开会，准备发动讨袁。革命党人也积极活动，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已先后从国外来到昆明，只因唐继尧态度暧昧，不能迅速发动。蔡锷到后，统一了各派力量，促使唐继尧下了反袁的决心。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废除袁政府“将军”、“巡按使”称号，仿辛亥革命例，推唐继尧为都督，通电讨袁。26日，云南正式组成护国军，以蔡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以扼长江上游，这是主力；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相机进取湘赣；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负责前线补给。蔡、李分途出征。

袁世凯得到云南警讯后，1916年1月5日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副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曹的第三师、张的第七师及李长泰的第八师等，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另调马继增率第六师、范国璋率二十一师等由湘西入贵州，令四川将军陈宦将所部伍祥祯旅、川军刘存厚第二师向叙府、纳溪、泸州布防。同时还派龙济光率军入广西进攻滇南。在袁世凯看来，云南一隅的护国军，不难一鼓荡平。

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向四川出发后，分兵三路，其左路第一梯团刘云峰于1916年1月21日一战攻下叙州，然后指向南溪，敌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溃不成军。蔡锷亲自率领两个梯团居于中路，于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后，由贵州威宁、毕节前进，指向四川泸州。敌方第二师师长刘存厚2月2日于纳溪起义响应，配合护国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于2月6日攻占泸州蓝田坝月亮岩。随即对泸州展开攻击。这是出兵以来的第一次大战斗。经此一战，护国军声威大振。另外右路军戴戡指挥的护国军第一军一部也于14日攻入四川綦江附近，并分兵进入湘西。但其后，北洋陆军万余之众开到泸州前线，护国军只有三千余人，敌众我寡，加以后方军饷得不到接济，又无预备队可增援，蔡锷不得不于2月下旬停止进攻，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对峙。3月2日，左路军退出叙府，7日，中路军又不得不放弃纳溪。同时，戴戡的右路军也退守黔边。这时，袁世凯兴高采烈，认为云南问题不久即可解决。不料15日广西宣布独立讨袁，消息传来，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大为振奋。又经过十几天的整顿补充，蔡于3月17日再次发动反攻，几天之内，就连占江安、南溪等县，重新夺回纳溪，北洋军死伤惨重，全

线崩溃，敌将张敬尧仓皇逃回泸州。

广西独立的消息使袁世凯大为恐慌。17日，袁召见梁士诒，让梁嘱四川将军陈宦，一面严防前线，一面试探与蔡锷商订停战办法[9]。19日，袁又接到北洋内部冯国璋为首的“五将军”将迫使其取消帝制的密报，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接着四川前线北洋军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并又有所谓五国公使的口头“警告”。到此，袁世凯才被迫于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委派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与护国军议和，徐、段等又责成四川将军陈宦先与蔡锷谈判。3月31日，蔡锷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要求，双方议定停战一星期。期满又延续。从此，川、黔前线转入长期休战状态。

自四川前线停战后，全国反袁形势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些地方军阀看到大势所趋，乘机由拥袁派转为反袁派，于是广东、浙江、陕西相继宣告独立。到5月22日，被袁视为可依靠的陈宦宣布四川与袁世凯脱离关系；29日，袁视为心腹的汤芗铭也被迫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在一片众叛亲离声中，于6月6日忧愤死去。

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本来长期患喉病，半年多艰苦转战，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声带已哑。7月29日，他抱病到成都，随即推荐护国军参谋长罗佩金代理督军，黔军总司令戴戡代理省长。8月22日，蔡到上海，由于病情日益加重，决定出国治疗。9日20日抵日本，住入福冈医科大学医院，治疗无效，于11月8日逝世。死后经国会决议国葬。蔡的遗体由日本运回后，湖南各界派代表迎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

(1) 李根源：《雪生年录》，腾冲李氏曲石精庐1934年版，第21页；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

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2)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页。

(3) 蔡锷：《云南都督来电》，易国幹等辑《黎大总统政书》卷九，上海晋益书局1916年版。

(4) 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06—208页；李文汉：《我对蔡锷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0页。

(5) 《云南辛亥革命长编》，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12—114页。

(6) 《黎大总统政书》卷六。

(7)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

(8) 梁启超：《盾鼻集》第2集，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461页。

(9) 凤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卷上，1946年版，第321页。

蔡翘

李援朝

蔡翘，字卓夫，1897年10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广东揭阳县仙美村一个富裕之家。父蔡增虔，母卢氏。蔡翘七岁入本村振华小学启蒙，1917年毕业于潮州金山中学。是年秋，蔡只身赴沪，入复旦大学附中就读。1918年9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翘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于同年秋自费赴美留学。

蔡翘从沪乘轮途经日本抵美，受先期留美并小有名气的同乡郭任远的影响，于1920年春先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心理学。1922年夏，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一学期后又转到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继续读研究生。一年后，蔡翘的兴趣逐渐转移到神经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蔡翘认为这两门学科非常具体，归国后能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他在芝加哥大学文理学院就读时，先后发表四篇科学论文，《大白鼠的记忆曲线》是其博士论文。他在导师赫里克（C．G．Herrick）的指导下，对美洲袋鼠脑结构进行研究。在实验中的细心观察，整整花去半年的时间，终于找到过去未曾发现过的下丘脑和中脑被盖间的一个微小新核团及两条视觉神经分支的起源和终点，并进行详细描绘和理论阐述。在研究中，蔡翘进一步发现中脑被盖中与眼球活动及其脏腑活动有关的一个神经核区。这一发现提供了视觉与眼球反身关系的解剖基础。这一重大发现，引起国际神经解剖学界的极大关注，誉其为“蔡氏神经核区”，美国神经解剖学家克拉克（C．G．Clark）教授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这一科研成果，直到70年代，这一成果还为外国学者所引用。不久，蔡翘被导师推荐为美国西格马赛学会的会员。

1925年夏，蔡翘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他由加拿大绕道日本回上海，受聘于复旦大学任教授。当时复旦大学尚无生物学科，蔡翘立即编写教材，筹措经费，购买仪器，建立实验室，逐步开展生物学和生理学教学实验室，建立了复旦大学的生物学科。1927年秋，蔡翘加入中国生理学会，担任《中国生理学会会志》的编辑。同年秋，他转到吴淞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执教，除教生理学外，还兼讲授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等课程。1929年，蔡翘用中文编著的《生理学》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大学生物系生理学课本。他又于1936年增订出版了适合医学院的教材《人类生理学》。这些教科书于解放前曾多次修订再版，一直为国内各类大专院校采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的八路军医学校及后来的延安卫生学校也用其为教材。

蔡翘于教学上讲究教学艺术，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地教学方法：首先他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其次他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尤其是实际操作能力；同时注重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与表达能力。蔡翘非常重视科研工作，他认为不搞科研，教学水平是不会提高的。他在复旦和中央医学院工作期间，与助手徐丰彦做过关于甲状腺与钙磷代谢的研究，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1930年，蔡翘得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进修。先于伦敦大学，与生理学系耶文思（L．Evans）教授合作研究肝糖原代谢问题，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1931年《英国生理学报》上。继之于英国剑桥大学神经生理学家艾德里安（E．D．Adrian）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任英国皇家协会会长）实验室从事神经传导生理研究，证明了蛙趾单条传入神经纤维的放电频率随着肌腱的拉长而增加，但电位的幅度不变。其典型神经电位记录图，后被著名的英国大型生理学参考书《人类生理学原理》及哈利斯（Harris）所著《实验生理学》所引用。1931年冬，蔡翘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进修，并访问了多名教授的实验室。

不久，蔡翘归国仍执教中央大学医学院。半年后，受聘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同助手易见龙、技术员蔡纪静从事肝糖原代谢的研究工作。1933年—1937年间，蔡翘与易见龙合作，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连续发表十多篇关于肝在糖代谢中作用的论文。这些实验和论文，第一次直接证明在安静不麻醉状态下，肝脏能利用食物中蛋白质的分解物以产生糖原，尔后再分离为葡萄糖离开肝脏，经由血液循环系统以供全身所需。当时国际生理学界非常重视蔡翘和助手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取得的研究成果。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动物处于清醒而安静状态下（排除了麻醉和外科手术的影响）可以保持正常的肝功能。1934年，蔡翘被推选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迫使蔡翘中断了这一课题研究。

蔡翘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认为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虽然生活条件较优越，科研成果也较丰硕，但毕竟是为外国人工作，不能实现为祖国服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抱负，发展民族的科学事业更是无从谈起。他曾对人说过："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像租界一样，受外国管，受洋人的气，心情不愉快。"1936年秋，蔡翘决定提前一年中断合同期约，接受中央大学新建医学院之聘，任生理学教授，再次创建生理科，并编著《生理学实验》一书。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是年秋，中央大学本部内迁重庆，中大医学院因实习医院迁成都，先借华西大学部分校舍开学。1938年，蔡翘发起组织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及中大医学院共同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每季度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交流科研成果。1941年6月，又倡议并主持创办了英文版《中华生理学学会成都分会会志》，四个月出一期，到1945年6月，共出十三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北京林可胜主办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被迫停刊，该《会志》成为大后方唯一的生理学学术刊物。

蔡翘是位富有献身精神和善于创业的科学家，中大医学院迁成都

后不久，他就在科内建起机械室，使用简陋的工具和自造的土车床、钻床，从维修本实验室的仪器开始，逐步发展到制造成套的生理学教学仪器。除供自己教学、研究需要外，从1939年起还陆续供应国内各大学、医学院校等六十多个单位，其中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成了当时国内各教学科研单位成套生理仪器的唯一供应地。他还带领助手们自己提纯药品试制，以解决教学、研究之急需。实验室迁到成都城里某中学后，蔡翘就亲自动手安装自来水，改善实验室的工作条件。抗战时期，成都科技图书资料奇缺，他把个人之藏书和尚能从国外寄来的科学杂志陈列在本科图书室，供大家阅览。1943年，蔡翘作为六位交换教授之一赴美讲学一年，回国时为中大医学院购得一大批较新的参考书和一些仪器。蔡翘十分关心本科同事的生活疾苦，在出售自制仪器和维生素B糖浆所获收益中，提取部分作为教学研究成绩优秀者之年终奖金和生活困难者之补助费；自制豆浆供大家饮用；利用麸皮、豆渣等下脚料养猪，年终每人分得一份；本科动物房周边之空地自种蔬菜，改善伙食，如此等等，他都亲自参与其事。

蔡翘为人正派，善于与人合作共事，团结各方面人才。他当时领导的生理实验室是后方条件最好的实验室，一时吸引了各方人才，使抗战时期中大医学院生理、药理两科的人员日增，教学和科研不断得到发展。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有易见龙、吴襄、李瑞轩、宋少章等二十多人。蔡翘还调来他处任职的徐丰彦、周金黄、朱壬葆等教授并配备助手，按他们自己的特长和思路开展研究工作。蔡还非常重视技术员和技工的作用，同时也要求技术员和技工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科内同事都能合作共事，和睦相处。蔡翘特别关心年轻人的进步成长，教育年轻人珍惜时间，发奋图强，在教学和科研上努力提高自己，为他们提职、出国深造创造条件。

抗战期间蔡翘主持研究课题有以下四个方面：猫在去大脑及切除垂体后的利尿率；中国人的肺活量、血象、生长率、血型感觉敏感度、基础代谢等正常生理标准；红细胞脆性及溶血与抗溶血机制的研

究；血清中缩血管物质的研究。这些科研成果分别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以及英美有关的生理学杂志上。与此同时，蔡翘还曾指导七八位学生和同事，研究胆固醇——卵磷脂的溶血对抗作用，发现胆固醇有保护红血细胞免于被卵磷脂从食物吸收过多而发生溶解。

1946年春，中大医学院迁回南京，蔡翘再次带领科内人员在医学院新址丁家桥利用旧仓库改建成教室和实验室，很快恢复了教学和研究，当时中大校长吴有训把改建成的实验室誉为Palace Hotel（皇宫旅馆）。蔡翘与两位美国教授在这里一起举办了一期血液技术研究班，有二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教学、研究、医务人员参加。他同陈定一阐明了小动脉的自动止血机制以及小动脉、小静脉和毛细血管受伤后的不同止血过程。1947年8月，蔡翘在国际生理科学牛津会议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这一成果至今仍被外国学者引用。1948年，蔡翘代理中大医学院院长职务，并被选为中研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翘先后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第五军医大学校长。受卫生部的委托，蔡翘举办了生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学员毕业后，被分到各医学院任教。1954年，蔡翘调往军事医学科学院出任副院长、研究员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蔡翘是我国航空生理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主持领导了航空、航海生理学的一系列研究。1967年—1969年，蔡翘完成了《航空航海医学基础》初稿，吸取各方意见后，定名为《航空与空间医学基础》，于1979年出版。1978年以后蔡主要从事基础医学的研究，虽年事已高，仍能洞悉当前生理学发展趋势，继续为科学事业而奋斗。

1954年，蔡翘被推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并连任到第五届。1961年，蔡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7月29日，蔡翘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黄家驷：《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第1卷，湖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

陈高钦：《蔡翘》，《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崔月犁、韦功浩等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1卷，吉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

蔡廷锴

郑全备　薛谋成

蔡廷锴，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清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九日）生于广东省罗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务农，兼做裁缝和兽医。蔡廷锴童年就帮做农活，九岁入塾，十一岁丧母，次年辍学，即随父做裁缝、学医。蔡性格倔强，贫困的生活使他对旧社会更具反抗精神。十二岁时，他听乡亲讲述刘永福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故事，深受感动。当听到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行径时，心甚愤恨，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萌发。

为寻找生活出路，加上存在当兵卫国的朦胧思想，蔡廷锴于1909年投入广东新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蔡转入广东省卫军。后经辗转，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陈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学堂学习一年。

1920年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派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铭枢部被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蔡任团本部掌旗官，后调任排长。邓铿对粤军第一师训练甚严，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蔡在该师受到熏陶和锻炼，并加入国民党，军事政治知识与日增进。1921年，蔡廷锴参加讨伐桂军沈鸿英的战斗，升上尉连长。1922年5月，孙中山督师北伐，蔡廷锴参加攻克赣州的激战。6月，陈炯明叛变，次年1月蔡参加驱逐陈炯明重占广州的战斗。4月，沈鸿英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5月占肇庆，蔡以战功升少校连长。1924年升为营长。1925年初，蔡营与第一师各部入桂，打败沈鸿英，旋出发东江，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甫告结束，立即从东江回师广州，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在与南北

军阀的征战中，蔡廷锴成为骁勇善战的军官。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营编属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是年冬，蔡营作为讨伐邓本殷的先锋，在南征中立下战功。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任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率部参加攻克平江、武昌等战役，勇猛苦战，立有战功，是“铁军”的一支有生力量。后第十师扩充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下辖蒋光鼐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蔡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初，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武汉归附蒋介石，蔡廷锴调升第十师师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蔡师在河南激战奉军，配合兄弟部队次第攻克临颍、开封。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蔡跟随叶挺部队行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军长叶挺）兼第十师师长，任左翼总指挥，率师南下。但蔡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在南下时便脱离了起义部队，把第十师开到赣东铅山。不久，蒋光鼐来铅山，回任十一军副军长，蔡率部随蒋入闽。

此后，蔡廷锴随同蒋光鼐不断参加了蒋介石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混战。1927年底至翌年初，十一军应李济深之请，在陈铭枢率领下开回广东，与黄绍竑率领的西路军合力打败了在广州发动政变的张发奎、黄琪翔所部。1929年初，国民党军队进行编遣，第十一军缩编为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蒋光鼐任第三师师长，蔡任独立第二旅旅长。是年夏，爆发粤桂战争，蒋光鼐、蔡廷锴所部打败了李宗仁、白崇禧之桂军。同年秋，独立第二旅扩编为第六十师，蔡任师长。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的粤桂战争期间，蒋、蔡又击退桂、张（发奎）联军对

广东的进攻，并进兵广西。

1930年，蔡廷锴第六十师与蒋光鼐第三师参加蒋介石对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的中原大战，先于7月上旬打败桂张（发奎）联军于衡阳，旋即北上山东击败阎军，于8月15日以奇兵从阎手中为蒋夺回济南。蒋介石于8月17日将蒋、蔡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驰往河南，打败冯玉祥所部。

1931年初，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蔡廷锴担任“围剿”军第一军团长。蔡在江西目睹城乡遭受战争破坏和人民困苦的悲惨情况，惊心怵目。当时红军依靠人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十九路军补给困难。处处被动挨打，为蔡历次征战所未遇。特别是8月的高兴圩战役中，十九路军受到红军严重打击，伤亡三千人，蔡本人冒死抵抗才得生还。蔡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恶战，深感跟随蒋介石打反共内战没有前途。“九一八”事变后，蔡不愿参加内战和决心抗日的思想与日俱增。其时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原来因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而造成的宁粤分裂，此时也不得不进行所谓宁粤合作的谈判。粤方提出十九路军警卫沪、宁，以保障粤方人员到南京开会的安全。10月，十九路军陆续从江西调赴沪、宁，十九路军总部和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等地，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

蔡廷锴爱国情深，曾在赣州集合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要求武装抗日。当他闻悉马占山东北抗日的事迹，心情十分激动，挽救民族危亡意志益坚。此时，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又不断在淞沪各地挑衅，蔡召开全军军官会议，要求班长以上军官轮流秘密侦察淞沪地形，自己也亲往淞沪各处视察防务，准备抵抗日军的袭击。12月，蔡在沪召集十九路军将领密商组织志愿军，赴东北援助马占山抗战。各师迅速选定志愿官兵六千名，编为两个独立旅、一个警卫营、一个山炮连，定名为“西南国民义勇军”，蔡自任总指挥，准备

翌年2月1日率军北上。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兵来沪，并进一步制造事端，甚至无理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国民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张静江先后劝蔡廷锴撤兵，蔡表示反对，认为十九路军驻地是中国领土，殊无撤退之理，我十九路军守土有责，万一日军胆敢来犯，决定迎头痛击。1月23日，蔡与蒋光鼐在上海召开了十九路军驻沪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抵抗日军的各种部署。24日，蔡又至苏州召开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紧急会议，表明抗战决心。虽然国民政府一再妥协退让，日军仍于1月28日夜悍然向闸北一带进攻，十九路军立即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在广大群众的鼓舞、支援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退日军的猖狂进攻。蔡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督战，激励士气。当时敌我兵力悬殊，十九路军全军约三万人，加上2月中旬来援的张治中第八军，计共只有四万多人。日方经不断增兵约七八万人，配有大量大炮、坦克、飞机、战舰。但十九路军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凭着一腔爱国精神，与敌血战33天，前仆后继，死伤约万人，经历了闸北巷战、吴淞要塞战斗、八字桥战斗、蕴藻浜战斗、江湾与庙行战斗、浏河战斗等战役。也使日本侵略军遭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最后，由于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不再增派援兵，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退守到嘉定等地。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新篇章。蔡由于指挥淞沪抗战功勋卓著，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蔡廷锴、蒋光鼐等于3月2日通电全国，表示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日军经十九路军严重打击，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于3

月3日宣布停战。5月5日，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蔡廷锴抵制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于5月6日令十九路军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剿共”，蔡等据理反对。蒋乃改令调往福建，冀图在与红军作战中使十九路军消亡。蔡等虽知蒋的阴谋，但为了避免在沪宁线上被蒋的嫡系部队围歼，乃率部到福建休整，积蓄力量，徐图发展。蔡于9月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蒋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于翌年1月继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蔡廷锴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32年底，他为《新中华》等杂志撰文，表示决心抗日卫国，主张迅速组织“人心的国防”、“军事的国防”和“经济的国防”。1933年1月，日军侵入关内，蔡多次请缨愿率所部北上抗日，纵不能全军出发，亦应以一部先遣队伍，策应热河抗战。乃于3月下旬与粤、桂共组援热联军，蔡任援热联军总指挥。蔡派出两个纵队为先遣军由福建出发，5月下旬抵湘南耒阳。国民政府此时正准备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命先遣军回抵闽西。蔡与蒋光鼐十分愤慨，5月25日联名通电，强烈抨击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力主抗日到底。5月31日传来《塘沽协定》签字的消息，6月1日他们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塘沽协定》。蔡等还多次致电冯玉祥，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些爱国行动，却受到蒋介石的一再申斥。蔡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进行反蒋斗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全国一致共同抗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

蔡廷锴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有了新的认识，跟蒋光鼐一起，和两广反蒋实力派联络，于1933年春签订闽粤桂三省联防草约。他们还于该年夏，将亲蒋介石的张贞第四十九师，整编为十九路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蔡还在十九路军内秘密成立改造社，清洗军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先是，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催迫下，利用福建红军主力入赣作战之隙，次第占领了闽西、闽北苏区不少地方。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在闽北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延平（今南平）、顺昌、将乐、邵武等县城，一直打到水口附近，威胁福州。蒋介石不但不理蔡的求援，反而追究军事责任。蔡等认识到进攻红军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反蒋抗日和“剿共”决不能并行，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立即采取积极步骤与共产党红军联络，于9月下旬实现停战。这时，陈铭枢已从欧洲回国，积极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奔走于港、粤、闽间，联络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和黄琪翔等反蒋抗日力量。经过反复商议，决定以福建为中心，发动反蒋抗日联共事变，以十九路军为后盾。10月26日，他们还与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使事变发动时无西顾之忧。

11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根据大会决定，22日成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等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颁布和初步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反蒋抗日联共的方针政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但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在组织上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政治上未能提出和实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路线，军事上则对蒋介石的进攻掉以轻心。而蒋介石却攻击闽变是“叛党叛国”、“容共”、“赤反”，收买福建的地方军阀、政客倒戈，并迅速调集十多万大军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众寡悬殊，又孤立无援，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十九路军完全解体。

蔡廷锴于福建事变失败后，出洋游历欧、美、澳洲一年，考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他以爱国主义激情，向侨胞和各国友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介绍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抨击国民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

策。各地华侨和各国友好人士，对蔡极表敬佩，使蔡深受感动。1935年7月，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推倒南京蒋介石政府，建立人民政权，组织联合战线，武装抗日为己任。为加强抗日反蒋宣传，他们还创办《大众日报》。“一二九”运动爆发，蔡给予声援，在对《大众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对华北军警镇压学生表示极大的愤慨。1936年以后，在共产党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放弃先前“反蒋”的口号，蔡和李济深等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贡献。

为武装抗日，蔡廷锴曾致力恢复十九路军。他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洽商，于1936年初在广西成立一个独立团，以他在原十九路军存下的公积金充作军饷，军官多由十九路军旧部担任。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扩充部队，独立团扩编为师。8月，蔡入桂与李、白商议后，决定在广西恢复十九路军，发表《宣言》，决心即赴前线抗日。十九路军设立总指挥部，蔡任总指挥，下辖翁照垣等三个师，另设一个军官团，蔡兼主任。但是李、白不久即和蒋介石妥协，广西部队缩编复员，十九路军的三个师也缩编为一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十九路总指挥部及军官团均撤销。蔡于9月离桂至港。

“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蔡廷锴爱国心切，赶抵南京共赴国难。但蒋介石对蔡耿耿于怀，仅委以军委会特任参议官这一虚职。11月，蔡在南京被车撞伤，回罗定休养。翌年10月，他从罗定赴广州，拟与广东当局共商抗日大计，半途又遭敌机袭伤。广州失陷后，他虽负伤未愈，仍任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委会常委，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准备抗敌。1939年，他先后出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所部驻桂南、粤西。11月日军在防城、龙门等地登陆，进攻南宁，蔡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从年底至翌年初，在桂南会战中，指挥桂南及广东南路各部对敌作战。7月，第二十六集团军

改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但所辖部队皆调离，只剩些游击队，蔡成无兵司令，无法实现抗日抱负，乃于9月辞职。以后几年，蔡以特任参议官虚职闲居桂林。1944年8月回归罗定后，与谭启秀等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

蔡廷锴不满蒋介石在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奉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闲居桂林时，曾跟李济深、何香凝等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问题。抗战胜利后，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蔡与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等于1946年3月在广州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目标。蔡任理事会理事，并在李济深未到任前代理主席，全盘负责“民促”工作。蔡曾到南京会晤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对共产党及其各项政策有了深刻认识，以后更积极开展和平民主运动，投入反蒋斗争。1947年底，在李济深、蔡廷锴等联络下，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于香港召开，1948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蔡任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管财务。5月，蔡和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月，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蔡被选为常务委员，参加建国筹备工作。9月，蔡作为“民促”的首席代表出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廷锴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历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对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很大努力。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前往朝鲜慰问中朝军民。他曾于

1950年11月赴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1957年率领代表团往东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1961年随同周恩来访问缅甸。

蔡廷锴热心培养人才，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曾在家乡捐资扩建或创办广东省立八中（今罗定中学）、泷水中学、罗镜圩龙岩乡小学（后改名廷锴小学）和罗定民众教育馆，对泷江医院和罗定公园等公益事业，也热心支持扩建。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蔡廷锴著：《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林一元、余勉群：《蔡廷锴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陈燕茂、黄和春：《十九路军史略》，《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

蔡元培

宗志文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生于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经理，叔父蔡铭恩是举人。蔡元培十岁丧父，幼年在叔父指导下读书。1883年入学补诸生，后来在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1889年中举人，1890会试中试，为贡士，1892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中，他同情维新派，很佩服其中激进的改良主义者谭嗣同。戊戌政变后，他认为维新派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1)]。同年9月，他自北京回绍兴，立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提倡新学。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清廷的腐败，开始倾向反清革命。是年，他到上海，先任南洋公学教员，继任爱国女校校长，又兼中国教育会会长。该会暗中鼓吹革命，蔡元培的革命活动由此开始。1902年夏天，蔡游历日本，结识了一些中国旅日的革命者。同年秋天，他在上海创设一所新校，名“爱国学社”，在社中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并施以军事训练。其间，蔡与社中教师轮流为《苏报》撰稿。1903年冬，他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日报》），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三省，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意在鼓吹革命。同时蔡又受到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04年元旦发表小说《新年梦》，宣扬废财产、废婚姻的主张。

1904年冬天，蔡元培与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反清的革命组织光复

会，他被推为会长。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是年，蔡元培在上海经何海樵介绍加入该会，并被指定为上海同盟会分部主盟员。以后，又加入何海樵等在上海组织的暗杀团，与杨笃生、苏凤初、钟观光等秘密赁屋，试制炸弹，想用暗杀清吏的手段进行革命。

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柏林留学，1908年8月底前往莱比锡，10月入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和心理学，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后，蔡元培回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任命他为教育总长。2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荐袁世凯继任。蔡元培等被派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因受了袁世凯纵兵哗变的欺骗，蔡等于3月11日发表文告，说明北来经过及不得不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原因。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唐绍仪任内阁总理，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7月，因不满意袁世凯擅权，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2)]。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等，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要求。

蔡元培辞教育总长职后，旅居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13年夏天，因宋教仁被刺案回国，奔走调停。7月，二次革命爆发，他发表《敬告全国同胞》文，主张“爱袁氏者”，劝告袁世凯退位，和平解决南北争端。

是年秋去法国，在那里从事著述，著有《哲学大纲》、《石头记索隐》等。并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1916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在清末十几年中，该校所招学生多为京官，校中官僚习气很重。民国以后并无多大改变，学生一心追求升官发财，整天游荡，校风非常腐败。蔡元培决心整顿革新北大，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讲就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做官发财，要研究学问。他在学生中发起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以及体育会、音乐会等，力图把学生的精力和兴趣引到研究学问和正当的娱乐方面去。在他的影响下，学生创办《新潮杂志》，组织讲演团，举办校役学习夜班，开设民众夜校，进行军事训练等。当时各大学还没有招收女生的先例，蔡元培说教育部“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3)]，1920年北大收女生旁听，暑假正式招收女生，这是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开始。

蔡元培治理北大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听其自由发展；各派教员，不分新旧，即使主张不同，也让他们并存，使学生自由选择。在“五四”前后的新旧思想斗争中，他基本上是站在卫护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五四运动中，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遭到封建顽固分子的激烈反对。林琴南在《公言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信，攻击北大的教育“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虽然没有正面驳斥对方，但他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

义”[4]，这对于捍卫新文化运动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五四运动中，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许多学生被捕。蔡元培同情学生，多方营救被捕者。后来被捕学生虽被释放，而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仍然采取镇压的态度，学生则继续罢课斗争。他既反对政府镇压学生，又不赞成学生罢课。当时社会上传言政府将免去他的北大校长职，他颇为愤懑，于5月10日辞职出京。当五四运动发展成群众性更广泛的革命运动，不断前进，不断深入的时候，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书》，劝告学生停止罢课斗争，不要纠缠于政治问题，号召学生“力学报国”。9月，他返回北大。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不满。1920年4月，他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用洪水喻新思潮，猛兽喻军阀，希望有人“驯伏猛兽”，“疏导洪水”。同年冬，他赴欧美考察教育，1921年回国。他说：“回国以后，看见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5] 到1923年1月，北洋政府因金佛郎案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幹，当时罗在北大兼课[6]，蔡元培愤而发表声明，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未等批准，即行离京。同年7月他赴欧洲，1925年到德国，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是年，五卅运动发生，国内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8月，他在欧洲一些报纸上发表《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说明惨案真相。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当时他尚在国外。1926年2月回国。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参加北伐，在江浙一带从事组织工作。冬天，他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蔡元培一度追随国民党右派，参加清党运动。4月2日，国民党中

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蔡元培任主席，会议议决，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各地共产党员[7]。4月9日，蔡元培又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与反动派相呼应[8]。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蔡元培到南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担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1928年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代理司法部长、监察院长以及中研院院长等职。1929年他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研院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刺激下，蔡元培的政治倾向有所转变，他主张对日抗战，对当局置日本侵略于不顾，加强反共内战、践踏民主强烈不满。1932年12月，他同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副主席。同盟曾设法营救政治犯（包括共产党员与各地被捕的抗日分子）。

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鲁迅曾几度在他主持的部门中工作。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蔡与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为执绋送殡。1938年为《鲁迅全集》作序，尊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淞沪沦陷后，蔡元培由上海移居香港，本打算转桂林或昆明，因多病未成行。他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表示高兴，曾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的大幸[9]。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

(1) 蔡元培口述、黄世晖记：《蔡子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3年

版，第2页。

(2)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31页。

(3)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第294页。

(4)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选集》，第79页。

(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第295页。

(6)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朗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

(7) 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印行，第383页。

(8) 《东方杂志》第24卷第11号。

(9) 《中国文化》第2册，延安中国文化社1940年版。

曹聚仁

任嘉尧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曾用笔名陈思、丁舟等，后期常用老儿的笔名。1900年6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今属兰溪市）。

曹先世从金华迁居浦江南乡，世代务农。其父曹梦岐，刻苦自学，举秀才。1902年赴杭州乡试时，正值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虞，他恨清室衰微，乃绝意科举，图教育救国。后在乡间办育才学堂，培育四乡子弟。曹聚仁在其父的教育熏陶下，培养起爱国主义思想。

1913年春，曹聚仁离开家乡到金华，在中学念了一年半书。1915年夏，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得校长经亨颐及老师陈望道、李叔同、夏丏尊、刘大白、单不庵诸先生的悉心教导，学业锐进。1919年五四运动烈火燃烧到东南，曹聚仁投入了反对旧礼教的斗争，曾担任学生会主席，领导“一师”的学生运动。

1921年曹聚仁在“一师”毕业后，到了上海。在邵力子等的提携下，曾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校等处教语文，同时，为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这是曹正式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开始。

其时，章太炎正在上海讲学，曹聚仁前往听讲，并将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教材。可是，曹对章氏最后一章中反对白话诗的观点，不予苟同，曾发表专文进行批评，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从1923年到1933年，曹聚仁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

学、路矿学院和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先后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大夏大学兼课，讲授国文、历史等课程。

1927年初，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强驻真如暨南大学校舍，教学无法进行，曹乃应单不庵馆长之聘，去杭州西湖文澜阁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半年多，在整理、校对四库全书时，得以浏览四库全书提要。

1927年12月21日，鲁迅到暨南大学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曹为之记录（原记录收入鲁迅《集外集》）。这是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并缔交。1931年8月，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周刊问世，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该刊曾被迫停刊，同年秋复刊。《涛声》是一种文艺杂志，刊头以“乌鸦”为记，用以讽刺国民党当局所谓“太平盛世”的欺人之谈。鲁迅用“罗怃”、“旅隼”等笔名为《涛声》撰稿，包括为曹等准备出版《守常全集》所写的《〈守常全集〉题记》一文。虽然曹自命为“虚无主义者”，而《涛声》中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1)] 发表。因其抨击时弊，刺痛了国民党当局，实际出版不过一年零三个月，就于1933年11月遭到查禁停刊。其后一段时期，一些文人就视曹为“异端”，把“乌鸦”、“乌鸦先生”的帽子套在曹的头上，并对其作品进行谩骂攻击。

1934年6月，曹聚仁在上海和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等提倡“大众语”，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开辟“大众语”运动的讲坛，轮流撰文发表意见。鲁迅曾给予有力支持，应约写了《门外文谈》，对大众语运动发展的道路提出了积极的主张。同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创刊，曹聚仁为编委之一。为什么它命名为《太白》呢？太白比白更白，实际上太白即启明星，暗示总有结束黑暗统治的一天。当时，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主张闲情逸致的论语派文字风靡一时，这对爱国救亡的现实是不合适的。曹和徐懋庸又合办了反对论语派的刊物《芒种》。

“九一八”事变时，曹聚仁主张抗日救国，任救亡协会理事，为国

民党当局所嫉视，因而被迫离开暨南大学。1935年12月12日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他又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2)]，在当时报刊上撰写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曹为《社会日报》写的呼吁抗日的社论，常常被检“开天窗”，有时只剩下标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曹聚仁握笔从戎，出入火线，为上海《申报》、《立报》、《大晚报》、《社会日报》采访战地新闻。曾在淞沪抗战火线上活动两个多月。上海沦陷后，他参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任该社战地特派员，随军至第五战区（徐州一带）和第三战区（苏浙皖地区）采访，他率先播发的台儿庄大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曹聚仁与范长江、孟秋江、陆诒齐名，被称为四大战地名记者。他还访问新四军叶挺、陈毅等将领，报道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1940年后，他在赣南为蒋经国主持《正气日报》，历时两年有余，担任过主笔、总经理兼总编辑之职。1945年主编《前线周报》，宣传新理性主义，主张“唤醒一般人的理智”，“继承科学的、民主的文化传统”[(3)]。

抗战胜利后，顾祝同在三战区所办的《前线日报》迁上海出版，曹任该报主笔，兼任香港《星岛日报》驻沪特约记者。1947年曾与舒宗侨合编《中国抗战画史》出版，文字部分都由曹执笔。当时，蒋介石已悍然发动内战，可是曹聚仁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的功绩，依然秉笔直书。这段时间，曹还在上海法学院和苏州国立社教学院任教，并兼上海前进中学校长。与此同时，曹有时参加沈钧儒、黄炎培等举办的聚餐会，曾在报刊上发表《观变手记》，对局势变化每好作预言。

1948年秋，蒋经国到上海任经济管制督导员，在金圆券推出前夕，向曹聚仁和冀朝鼎征询意见。曹坦率直言：金圆券发行一定失败，无法挽救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崩溃的命运。事态的发展变化，果如所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彷徨之中的曹聚仁，于1950年夏天应《星岛日报》社长林霭民之邀，离开上海赴香港任该报编辑。1955年后与林霭民相继脱离该报，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

1956年起，曹聚仁多次回内地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接见，还参加各种活动。曹将见闻观感向东南亚报纸作专文报道，并在《南洋商报》上，连续发表《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专栏文章，介绍祖国新貌，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5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设宴款待曹聚仁，陈毅、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席间，畅谈天下大势和祖国前途。曹提到祖国的统一问题。周侃侃而谈："国共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就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4)] 在颐和园一席谈后，曹聚仁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为沟通两岸往来、促进祖国和平统而一再奔走。其后，曹在两岸间多次往返沟通。

其间，曹聚仁和林霭民于1959年曾再度合作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和《循环晚报》，曹任日报主笔。林霭民谢世后，三报合并为《正午报》，曹仍任主笔。为了纪念鲁迅，曹聚仁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两书。前者是曹聚仁和鲁迅在世时约定，要为鲁迅写传记，写人而不是写作"神"，并得到鲁迅本人同意，直到曹聚仁到香港后才写成的，因此实话实说乃是《鲁迅评传》的特色。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患癌症不治，病逝于澳门，终年七十二岁。7月26日，澳门举行公祭，港澳爱国同胞和进步人士多人参加，曹夫人邓珂云偕女曹雷、子曹景行也从上海赶到澳门，遵照曹聚仁生

前的遗愿，“叶落归根”，将其骨灰运回故乡上海安葬。

作为一个毕生从事爱国文化事业的作家、记者、教授，曹聚仁笔耕50年，著作等身，约略估计，撰文逾四千万字，成书达七十余种。晚年犹广集资料，编撰成《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宣扬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成就。作为世纪同龄人的曹聚仁，经历了反清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见证人，拟撰写《现代中国通鉴》一部，计划分成：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国民党末运等五册，以昭信实，惜仅成第一册，病魔袭来，无法赓续。曹逝世的次年，香港出版他的遗著《国学十二讲》一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聚仁著作有《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书林新话》、《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即《国学十二讲》修订本）、《曹聚仁文选》、《曹聚仁散文选》、《曹聚仁杂文集》、《上海春秋》、《文坛五十年》、《曹聚仁论人物》、《鲁迅评传》、《听涛室人物论》、《曹聚仁书话》等，在大陆陆续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曹聚仁：《采访外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5年版。

曹聚仁：《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5年版。

曹聚仁：《采访新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版。

曹聚仁：《文坛三忆》，香港创垦出版社1954年版。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编），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73年版。

行止：《曹聚仁传略》，《晋阳学刊》1983年第2期。

(1) 鲁迅：《祝〈涛声〉》，《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1页。

(2) 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3、66页。

(3) 曹聚仁：《采访外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5年版，第238页。

(4) 曹聚仁：《颐和园一夕谈》，新加坡《南洋商报》1956年8月14日。

曹锟

张振鹤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生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其父为津市小贩。曹幼年失学，稍长，推车贩布于津沽间。二十岁投淮军当兵，继入天津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后往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4年中日战争，曹锟随军去朝鲜。战后，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投袁部，任右翼步兵一营帮带。袁任直隶总督后，1902年委曹任直隶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一营管带。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后编为北洋陆军第一镇，曹任第一协统领[(1)]。1906年彰德秋操时，曾担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1907年初，他以尽先补用副将升新军第三镇统制。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移驻长春，后升记名总兵。日俄战后，东北三省人民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剧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曹锟因对人民血腥镇压“有功”，而屡获清朝统治者的嘉奖。1911年4月，授他以副都统衔，7月补总兵后以提督升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曹锟受袁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

1912年2月，在南北议和的默契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袁南下就职。时第三镇改为第三师，驻南苑附近，曹锟任师长，于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袁任曹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2)]。曹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与湖南都督汤芗铭共同监视南方革命势力的活动。

曹锟死心塌地依附袁世凯，成为袁实行帝制的支柱之一。1915年

9月，他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改变国体[3]。10月，袁授曹以“虎威将军”的称号。袁称帝后，封曹为一等伯。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领导护国军讨袁，袁决心以武力镇压。1916年1月5日，曹锟、张敬尧受袁命率军入川，两部军纪极坏，沿途烧杀掳掠，川民恨之入骨。3月，曹、张统军和护国军战于叙（州）泸（州）间，张军大败，曹军亦受创后退[4]。6月，袁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率残部东归。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又成为段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任直隶督军，驻保定。

在黎、段“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中，曹的态度基本附和段，但也不愿结怨于黎。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附段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保持一定关系[5]。在此之前，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张的阴谋活动，早有默契[6]。及复辟丑剧登场，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曹见风转舵，投靠段祺瑞，担任了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借着这次政治投机，于军事结束后，担任了直隶督军兼省长。

复辟乱平，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了总理职位。段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纷纷随声附和声中，曹锟也通电助威[7]。自此以后，国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对抗；同时，北洋政府中的冯、段之间新的“府院之争”也发生了。冯、段分别以英、美和日本为靠山，成为北洋直、皖两系军阀的首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占有优势地位，段祺瑞妄想凭借日本的金钱与军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护法各省的反抗。冯国璋为了打击段祺瑞，作出“和平统一”的姿态，暗中勾结滇桂军阀，壮大自己。在冯、段对峙中，曹锟采取了骑墙政策。段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段；冯以直系结合为号召，抵制段的皖

系势力扩张，他又附冯。1917年11月18日，在冯的授意下，他和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衔通电，主张南北议和，声称愿作“调人”。事后，曹锟又赶紧向段祺瑞加以否认，声称签名系他人代庖。到21日他在徐树铮授意下，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和议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的亲日卖国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军队溃退之后，段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8)]。曹锟在徐树铮的利诱（许以“副总统”官位）下摇身一变，又积极主战，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冯国璋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之下，15日被迫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并兼两湖宣抚使；同时又策动直系长江三督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渐软化，曹锟乃于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湘桂军内部分歧，自动撤防，吴师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在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又一次组阁。组阁后，他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剥夺了曹、吴抢到的地盘，引起了曹、吴的不满。

段祺瑞为依靠外援，扩大实力，3月25日与日本秘密订立中日军事协定，进一步投靠日本，同时拟调徐树铮代曹锟为直隶督军[(9)]。曹锟获悉，便以病为辞，急回天津，并与张怀芝及长江三督联合声明，表示厌战。6月，曹锟又一次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他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表示仍坚守“副总统”之约，于是曹又主战。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想以此换取他重上前线，但他却又提出各种借口，留津不动。吴佩孚在衡阳前线和滇桂军方信使往返，与对方暗订协定，前方战斗遂告沉寂。

当时，欧战即将结束，西方英美重新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

国际背景下，吴佩孚于八九月间，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吴佩孚更加伪装同情群众运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遂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撤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迫徐世昌下令给曹、吴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直皖战争遂于14日爆发。奉系从东战场助直攻“定国军”，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皖系战败后，奉、直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发生争吵。1921年12月，由于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10)]。梁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企图出卖山东利权，与日本秘密谈判借款，同时并起用了著名亲日派曹汝霖等人，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们乘机纷纷通电斥责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直指奉张。张作霖乃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张本系姻亲，因而曹锟对奉初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姻亲关系终不能不让位于集团和个人利益，他终于同意了吴的应战主张。1922年四五月间，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方的局面。

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民国六年（1917）旧国

会，把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重光”的骗局来作为过渡办法，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于6月间拥黎重新上台。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曹急于爬上总统“宝座”，便唆使其弟曹锐及其党徒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之流，收买议员，作驱黎拥曹的准备。黎元洪为延长自己的任期，主张先制宪法后选总统，曹家党徒则主张相反。同时，关于黎元洪的任期，黎、曹两派各有自己的解释，黎派认为任期应至1925年9月，而曹家党徒则扬言黎到1922年12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1)]。此时，直系内部又分为保（定）洛（阳）两派，以曹锐为首的保派积极策划倒黎，拥曹锟上台；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企图先以武力征服川湘，而后通过制宪与选举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锟对吴的这种态度及其活动，甚“不见谅”[(12)]。到1923年春夏之间，保、洛两派在“驱黎拥曹”的步骤上才趋一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的住宅、断水断电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曹锟原拟于驱黎后立即进行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纳其党徒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见效，南下议员中一些见利忘义者，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受贿议员（人们斥为“猪仔”）把曹锟选为“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匆忙地赶制了一部“宪法”（人们斥为“贿选宪法”或“曹锟宪法”），企图用以掩饰其贿选罪行。10日，曹锟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

自曹锟当上总统起，表面上直系势力极盛，而实际上内部更加分裂，外部的反直力量也酝酿成熟。1924年10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

奉战争。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与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23日控制了全城。冯通电全国，痛斥吴佩孚，主张罢战言和。曹、吴对奉作战遂告失败。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南逃。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共推段祺瑞出来作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不久，冯、张矛盾又激化起来。1926年4月10日，冯部国民军将领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系，因而发动了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曹锟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1927年2月，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河南，奉系军阀渡河南下阻截之际，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西逃，曹锟又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此后，长期在天津作寓公。1938年5月17日，他在天津英租界本宅病故[13]。

---

(1) 张联棻：《北洋军的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7页。

(2) 《时报》1914年4月27日。

(3) 《时报》1915年9月15日。

(4) 《叙泸之收复》，中华新报馆编辑：《护国军纪事》第四册，战讯，1916年版，第70—71页。

(5) 《曹锟朱家宝等通电独立》，《中华新报》1917年6月2日、8日。

(6) 上海文艺编译社编辑：《复辟始末记》卷上，1917年版，第17页。

(7) 《民国日报》1917年8月6日。

(8) 《徐树铮致各省督军鱼电》（1917年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9) 《徐树铮致各省督军鱼电》（1917年12月6日），《徐树铮电

稿》，第93页。

(10) 白坚武：《知白堂日记》（原稿本），1922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11) 《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95页。

(12) 白坚武：《知白堂日记》（原稿本），1922年11月26日。

(13) 《晨报》1938年5月18、19日。

曹汝霖

郑则民

曹汝霖，字润田，1877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父曹豫材，主管江南制造总局材料库多年。

曹汝霖幼年入私塾，继往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政大学。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文武合计五十余人，组织留学生会馆，曹汝霖被公推为干事之一。在留日期间，他对日本帝国势力的发展十分崇拜，并站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鼓吹君主立宪。他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社，该社的活动主要是联络感情，研究学术，有时讨论时事，后改定章程，主张君主立宪。曹汝霖和同在日本留学的章宗祥、陆宗舆情趣很相投，对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很赞成。他们鼓吹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曾与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留学生张继等人进行辩论，甚至发生激烈冲突。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以留学生代表身份，“极力逢迎，大得载振欢心”[(1)]。

1904年曹汝霖归国，被派任清政府商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不久，他通过留学生特科考试，中进士，授六品奏任官主事，归商部候补。次年冬，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派代表来北京，要求清政府承认其在此次战争中从俄国手里夺得的有关我国东北三省的特权。曹充当袁世凯的随员，参与同日本代表谈判，订立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使日本的侵占合法化。此后，曹被调入外务部。1911年春，清朝政府设立以奕劻任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即“皇族内阁”），曹任外务部副大臣。

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改当律师。1913年袁世凯指派他为第一届参

议院议员。曹在担任议员的同时，还致力于为袁世凯办理政党事务。并曾受进步党首领汤化龙委派为代表，与国民党的邹鲁、张耀曾等协商两党合作问题。1913年6月30日，曹汝霖被参议院举为宪法委员，10月4日公布了总统选举法。10月6日，正式投票选举，曹前往投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同年8月，曹就任外交次长，“仪同特任，与总长同等待遇”[2]。

1914年9月24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龙口等地登陆。先是袁世凯政府已宣布中国守中立，至此又被迫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但日军竟于9月25日悍然占领潍县车站，准备西进。10月2日，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声明：胶济铁路将不转让给日本以外的第三国；战后日、德如对该路订有任何协定，中国政府将“不持异议”[3]，企图用出让主权来缓和日军的行动。但日本帝国主义不予理会，继续西进，强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重信内阁经过预谋，向袁世凯正式提交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接着袁起用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和曹汝霖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曹不仅参与正式谈判的全部活动，而且曾受袁世凯之命，多次私访日使，探听日方意图，密议成交条件，起草有关文件[4]。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声明，除第五号五项“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5月25日，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关于山东、南满的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5]。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借口“筹一国之治安”，公开鼓吹帝制。9月，曹汝霖参加筹议国体问题的宴会，他在会上发言，担心外国不承认袁世凯之帝制[6]。但当他知道筹安会是奉命行事后便恍然大悟。11月，曹先后前往日、英使馆进行活动，“谓现在各省安靖，中国政府自信确能维持地方秩序并完全负保护外人责任”[7]。他和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等一起加入“大典”筹备处，成为“办事员”[8]。12月20日，曹以外交次长身份，向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告知袁将于

1916年元旦称帝。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于3月22日被迫宣告取消帝制，仍任大总统。袁世凯于1916年4月任命曹汝霖为交通总长，5月又兼署外长，至袁世凯毙命时为止。同年秋，曹继梁士诒任交通银行总理。次年1月曹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台湾、朝鲜银行团借得五百万日元，此为“西原借款”的开端。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名义，起兵进京，重握北京政府大权。在此期间，曹汝霖通过日本银行替段祺瑞筹措军费。7月17日，曹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1918年3月又兼任财政总长。当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企图以借款等方式，支持段祺瑞政府，以便达到进一步独霸中国的目的，又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曹汝霖按照段祺瑞的旨意，和西原密谋，向日本特设银行团（由兴业、台湾、朝鲜等银行组成）进行大宗借款。曹直接经手者，公开数字达一亿多日元，是“西原借款”的重要组成部分[(9)]。这些借款主要供段祺瑞政府用于购买军火，充作军饷，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行内战。他们为了取得借款，不惜把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事业等作为抵押品。

1918年秋，日本寺内内阁眼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深恐日本从山东掠夺到手的利益有所丧失，除用二千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高徐二条铁路的控制权外，又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其中包括战后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等七项内容。北京政府只求有钱可借，不惜断送山东主权，而予以承认。由曹汝霖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授权他以“欣然同意”的复照，交付日本。

曹汝霖依仗着在交通、财政方面所窃据的职权，取代了交通系头子梁士诒的地位，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曹汝霖继任钱能训内阁的交通总长。当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曾经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等要求，但仅有“山东问题”一项被列入讨论。中国方面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

利。日本却以“二十一条”业已签订并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等为借口，坚持其既得利益。后来，中国的要求全被与会列强所拒绝，战前德国在山东权益由日本继承被明文载入对德和约。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但曹汝霖仍然坚持媚日卖国的立场，他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决不可失日本之欢心、必须顺从其意。”在国务会议上，还公开为日本侵占青岛辩护，说什么“独索日本之青岛，甚非公平之道”[(10)]。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三千余人，集会于天安门前，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学生游行队伍向曹的住宅赵家楼进发，包围并冲入曹宅。曹汝霖躲藏起来，正在那里的章宗祥遭到痛打。有人还放火烧了赵家楼曹宅。在工人阶级、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威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此后，由于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曹依赖搜刮所得的资财，进行投资。他在继续担任一个短时间的交通银行总理后，被他所投资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等推为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曹仍住北平。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伪临时政府，曾“聘曹（汝霖）为最高顾问，月赠公费二千元”。继又聘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咨询委员”[(11)]。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北平迁居上海。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曹汝霖往台北。1950年经香港赴日本，在东京等地居住，受到日本吉田茂等的庇护。1957年曹汝霖迁居到美国，1966年8月4日死于美国底特律。

---

(1) 粤东闲鹤：《曹汝霖》，1919年版，第9页。

(2)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

107页。

(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6页。

(4) 参见曹汝霖给陆宗舆的四封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60章。

(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集》第二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00—1114页。

(6) 《时报》1915年9月6日。

(7) 《时报》1915年11月3日。

(8) 《时报》1915年11月29日。

(9)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卷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6年版，第336页；周叔廉：《西原借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10) 《民国日报》（上海）1919年4月19日。

(11) 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曹锐

张学继

曹锐，字健亭，天津大沽人，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其父曹本生是贫苦渔民，以修造木船谋生，曹本生有子女七人，其排行是曹镇、曹大姑（女）、曹锟、曹锐、曹钧、曹二姑（女）、曹锳。在兄弟姐妹中，曹锟和四弟曹锐的关系最好。早年由于生活困难，曹镇随父亲学修造船，曹锟做贩卖布匹的小贩，曹锐在大沽钰盛号米庄当学徒。

在曹锟投军发迹后，曹氏兄弟姐妹沾光，鸡犬升天。没有上过几天学的四弟曹锐用曹锟给他的钱捐了个监生身份，然后弃商从政，首先当上了天津县清乡局长，后任迁安县知县。后又捐了个候补道，任北洋陆军第二镇执法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兵站总办。1912年4月，升任直隶布政使，成为掌直隶全省财赋和人事的主官。1915年10月，袁世凯筹备帝制，加封曹锐为上大夫加少卿衔。

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将军。护法战争爆发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为了对南方作战，任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兼第一路总司令，率部南下作战。曹锟为了确保他的老巢直隶的地盘，乘机向代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提出任命他的四弟曹锐为直隶省长，他本人仍遥领直隶督军。1918年1月30日，冯国璋以代总统的名义任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同时任命曹锐为直隶省长。曹氏兄弟二人分掌直隶军政大权。

曹锐从小在米店学做生意，深谙生财之道，很快表现出很高的敛财手段。本来在曹锐担任省长之前，直隶的税负就已经相当繁重。曹锐为了敛财，一方面在原有名目的捐税下继续征收各种附加税，一方

面增加新捐税。新捐税名目千奇百怪，有国民捐、巡警捐、房捐、铺捐、商捐，还有自治捐、油捐、妓捐、庙捐、会捐；更有什么杀牲口合手屠捐，量粮食用斗拿斗捐，演戏有戏捐，家有牛马拿牛马捐，养狗拿狗捐等等。曹锐对直隶老百姓横征暴敛的同时，还不择手段卖官鬻爵捞钱财。当时直隶全省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县，曹锐将一百三十多个县知事，按特、大、中、小四个等级定价，小县知事八千元，中县九千元，大县一万元。天津、滦县、清苑三个县知事属于“特缺”，临时议价，非三四万元不能到手，定期均定为一年，县知事都是一年一卖。不仅县知事公开出卖，全省的交通、河务、实业、财政等有油水可捞的部门官职全部论价出卖。曹锐从1918年1月到1922年6月当了四年多的直隶省长，不算别的卖官鬻爵，仅出卖全省县知事缺这一项就敛财达数百万元之多。

曹锐另一敛财途径就是包办直系军队的军需物资，经营粮店、大米店、被服厂、纱厂、饼干公司等。他利用三哥曹锟的权势，从各地低价采购米面、原料等，不出运费，也不纳任何捐税，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而后以高价出售给曹锟统率的直系各军和警察，从中牟取暴利。曹锐还将全省的官产攫为己有，如他在天津与人合伙开办恒源纱厂，将官产的直隶模范纱厂多年来升值的三十九万元全占为己有。他还经营大业公司，专做土地买卖，利用权势，廉价购进土地，高价出售，将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金钟河等大河流的河滩地强行霸占到他的大业公司名下。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所把持。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命京汉、京奉铁路局派出专车，接迎曹锟、张作霖等到天津开会。会上直系和奉系争地盘、争军饷，向北京政府谎报巨额的军费，北京政府的财政拿不出，也只好拖欠。4月2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开会讨论财政问题，曹锐在会上抱怨国务院欠直军军饷太多，国务总理靳云鹏对曹锐说：“你真不懂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都扣留军费，还伸出手来向

中央索饷，你来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曹锐与靳云鹏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成为爱国运动的中心城市之一，曹锐与警察厅长杨以德以欺骗与残酷镇压两手对付爱国学生与市民。事后，曹锟与曹锐以直隶督军、省长的名义联衔发出布告，取缔学生运动。

直皖战争后，直系和奉系矛盾日益加剧。到1922年初，直奉双方在相互通电斥骂的同时，加紧备战，战争一触即发。曹锐认为奉系军事力量强大，唯恐直系战败，他聚敛的巨额财富泡汤。因此，曹锐极力主张不要与奉系开战，并自告奋勇，前往沈阳谋和。3月8日，曹锐以祝贺张作霖四十七岁寿辰为名，赴沈阳与张作霖谈判。张作霖一直觊觎京畿地区，强烈要求将奉军开进山海关内。曹锐以直隶省长身份表示欢迎奉军入关，维持京津治安。曹锐的态度，让张作霖都感意外。可他和幕僚一商量，觉得曹锐不一定当得了直系的家。张作霖经与幕僚研究后，又提出京津地区完全由奉军驻防的要求。曹锐将这个要求带回保定，鼓动曹锟接受。4月11日，犹豫不决的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军政上层开会，决定对奉和战大计。会上，主战派占了多数，曹锟不得不拍板主战。曹锐对此极为恼火。

直奉决战在即，奉系先声夺人。4月14日，张作霖派奉军开进山海关内。当奉军进到天津前，曹锐将省长公署文件席卷而去保定，所有驻天津的直军也被曹锐下令撤退到保定。省公署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到天津外国租界。看守省长公署的仅有两营直军，被奉军缴械。但第一次直奉大战的结果完全出乎曹锐的意料，貌似强大的奉系军队开战不到一周就大败，狼狈退回山海关外。由于曹锐战前擅离职守，致使天津遭到奉军蹂躏。战争结束后，天津各界纷纷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将曹锐立免本职，拿交法庭依律惩办，并查抄财产。曹锟见众怒难犯，于6月18日宣布免去曹锐的省长职务，随后保举王承斌为直隶省长。

直系战胜奉系后，军事势力达到顶峰。曹锟环顾全国已无可与直系抗衡的势力了，便动了当大总统的念头。对此，曹锐极力赞成，他说："三哥与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北洋派的同期前辈。冯、段做过大总统和内阁总理，三哥年过六旬，做做大总统有何不可？三哥此时不当大总统，更待何时？"在曹锐等人的撺掇下，曹锟决心立即踢开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作为直系津派头子，曹锐成为曹锟贿选的幕后总策划人和主持人。为了筹集贿选所需要的巨额金钱，曹锐与新任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捉财神"的办法，将毒品犯逮捕后处以一万元至数万元不等的罚款。曹锐亲自将大名一带的商店店主、士绅不论是否贩过毒，一律开列名单交大名镇守使、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照单逮捕罚款，不交钱就严刑拷打，这样搞来的钱全部交给曹锐。贿选所需要的现金大多由曹锐经管，曹锐用化名存在美商花旗银行、英商汇丰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等。曹锐在为曹锟筹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捞一把。他将私人拥有的二百万元借给曹锟作大选经费，利息二分二，交钱时先付一年利息，并以1924年的盐税为担保。曹锐主持贿选，不仅没有花费自己一分钱，反而大捞了一把。1923年10月5日，曹锟以贿选的办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被人称为贿选总统。曹锟没有忘记四弟的功劳，荣登大总统宝座后，特派曹锐为直、鲁、豫三省矿务督办。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急电驻洛阳的吴佩孚火速进北京主持对奉作战。吴佩孚担任对奉作战总司令，曹锐任军需总监。曹锐将军需总监总部设在北海南门外西侧的团城。曹锐在团城上的承兴殿内颐指气使地对急需军饷军械的各军索贿，并大肆克扣。

10月22日晚上，直军第三路军司令冯玉祥和第二路援军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联合发动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将军队改编成国民军，进驻北京城，将当上大总统仅一年的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内的延庆楼。曹锐也于当晚被国民军逮捕与他三哥一起囚禁在延庆楼内，成为阶下囚。11月29日，曹锐正和曹锟在屋里愁容满面相视

而坐。忽然一名国民军的军官走进，说要传曹锐到国民军总部去问话。曹锟害怕曹锐被带出去凶多吉少，死死拉住曹锐的手，执意不让国民军带走。曹锐到旃坛寺国民军总部后，冯玉祥派人向曹锐索钱。无论问曹锐什么，他一声不吭。到夜间，曹锐悄悄吞服生鸦片自杀。看守他的国民军军官发现后，将他紧急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抢救无效死亡。

曹亚伯

朱信泉

曹亚伯，原名茂瑞，字庆云。1875年（清光绪元年）出生于湖北兴国州北乡曹家湾角海村。父亲曹衍森，好学，严于礼教。曹亚伯幼承庭训，勤奋好学。州人多有从太平军立功者，曹亚伯聆听父老讲述洪杨故事，遂有厌恶清政府专制之意。又曾“闻耶稣教为异端，痛恶之”，他十五岁那年，前往邻县大冶福音堂，向驻堂教士寻仇，对方不以为忤，反借予上海广学会所译《格物探源》一书，读后“顿悟守旧之非”，即入大冶福音堂为信徒，礼名亚伯，人们遂以亚伯称之。十八岁为邑庠生，其时家道中落，其父希望他去担任训蒙的塾师，1898年他向母亲求得路费，至武昌考入张之洞所设立的农务学堂。

1900年8月，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失败，干部数十人先后被捕弃市，曹亚伯于8月21日亲见林圭、傅致祥、李炳寰、王天曙、黎科、瞿河清等被杀于武昌之天符庙，益增对清廷之憎恨。不久，曹亚伯被学堂监督罗振玉疑为革命党人的日语翻译而遭勒令退学。是年冬，曹亚伯考入两湖书院，与同住南斋的同学王文豹、王恺宪、周震鳞、黄兴等往来密切；而对一些热衷名利、趋炎附势者则十分厌恶，常以“无气节”、“走狗”、“奴才”呵斥之，对方无可奈何，则以“曹疯子”目之。

1902年春，两湖书院舆地教授邹沅帆，应学部尚书张百熙之召，调曹亚伯、王文豹入京担任编纂，临行变计改派二人前往湖南新化县教中学。曹虽讲授博物和数学课，然而处处引导学生的革命思想。如在数学课上设一加法命题，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大杀汉人，在扬州十日杀八十万人，在嘉定屠城三次杀二十五万，其余汉人因不肯蓄辫投降者即杀无赦，又杀十八省同胞几三百万人，共杀汉人若干云

云。”又如体操课时，在操场上必向学生讲说汉人文弱被压制的苦痛。其时，谭人凤在新化教小学，常率小学生前来会操，聆听演讲。与此同时，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小册子在两湖各学堂各军营中广为流传，新化学界革命思潮遂一发而不可遏止了。

1902年冬，曹亚伯利用寒假东渡日本，次年3月返回新化中学。未及两月，新化县知事张某向湖南巡抚赵尔巽秘告曹亚伯为“叛逆”，侥幸是赵未予究办；其次新化中学校董彭庄仲等虽久谋革命，但终担心曹亚伯的言行可能累及学校，加之当时新化留日陆军学生杨源濬自东京带来的七千册《猛回头》被新化校董们所焚毁，曹亚伯遂于1903年5月到长沙，受聘于宁乡中学并在求中学校和长沙中学兼课。

在长沙，曹亚伯听说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牧师深富爱国思想，并办有日知会以启迪民智，遂前往结交。6月黄兴由日本返回长沙，任教于明德中学。黄经上海圣公会会长吴国光的介绍，与长沙黄吉亭牧师相识，而为记名会员。从此学界、军界皆入于圣公会之门，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

1904年2月15日，革命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被推为会长，曹亚伯为基干之一。同年春，曹亚伯与刘敬庵、张难先、吕大森、胡瑛、朱元成、欧阳瑞骅等集于武昌，一日谈及革命方略，咸认为应从运动新军入手，且不轻率发难，于是纷纷投入新军。为便于联络，乃于7月3日组成科学补习所，胡瑛任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时功璧任会计，高建唐任庶务，曹亚伯任宣传。旋黄兴来武昌，与科学补习处诸同志会晤，以华兴会将于阴历十月初十慈禧“万寿节”日，联合哥老会领袖马福益等在湖南起事，希望武昌能及时响应，同志均表赞成，于是推曹亚伯为湘鄂间联络员。因曹在长沙三所中学任教职，常往来于两省之间。

1904年暑假期间，曹亚伯由湖南前往武昌科学补习所召开会议，密议响应十月间的起事，分派各路联络人员，随后前往江西吉安向驻

地新军作策动，并向民众宣传，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品，事为官府所闻知，江西巡抚夏峀使用万急公文令吉安驻军逮捕曹亚伯就地正法，幸好营中教授江彤侯、张通焕同情革命，予以掩护并送川资三十串促行。旋抵武昌晤吴禄贞，留住科学补习所，继续为革命而奔走，直至秋季开学方回长沙，为三所学堂授课，参加日知会的革命活动。

1904年农历九月底，华兴会长沙起义计划泄露，署理湘抚陆元鼎密令缉捕黄兴，黄得讯后暂避明德学堂附近龙璋家，后赖曹亚伯、张继、黄吉亭等多方设法掩护，得以潜离长沙，脱险赴沪。武昌科学补习所等革命组织，后虽遭查封，但早已闻讯做了应付准备，使湖北当局一无所获。

1905年初，曹亚伯去武昌，与刘敬庵、胡兰亭共议以武昌圣公会在高家巷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为革命机关部，以刘敬庵主其事，对外仍称日知会，从而使革命活动再度恢复壮大。同年春，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到任，加紧对革命党人的镇压，4月12日会党首领马福益在萍乡车站被清军逮捕，惨遭酷刑，4月20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曹亚伯曾为两湖书院学生，故与曾署湖广总督的端方有师生之谊，而被端方奉为上宾的两湖书院分教陈庆年待曹甚厚，兼以曹为耶稣教徒，故端方不杀曹，而又不能任曹在长沙运动革命，不得已派曹赴日本为调查宗教委员。

曹亚伯东渡日本后，即入东京下淀桥町中田重治所办之圣书学院研究宗教，每周必至东京之神田区与华兴会、日知会的同志黄兴、宋教仁等会晤，谋划革命进行之法。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在东京召开，曹亚伯率先签名参加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曹亚伯被举为评议部评议员。

同盟会成立后，以《民报》为机关报，曹亚伯等大力为之发行，或包卷或书写封皮或贴邮票，命女佣用小车推至邮局，不数小时而三

千份《民报》皆发出送至中国内地矣。所余两千多份散布于日本中国留学中，亚伯每日提一大包往各学校发卖，一时《民报》风行海内外。

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发行，使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清政府便要求日本政府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引起留日学界的强烈反对，陈天华因此愤而于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想以此来唤起人们的觉悟。众多留日学生相率归国。1906年初，曹亚伯决定离日赴英，适日本东洋宣教会主教中田重治前往英国，曹亚伯遂与之偕行，过上海并引中田主教游武昌，住圣公会胡兰亭牧师家。曹亚伯在日知会将东京同盟会之组织情形介绍于刘静庵、冯特民，并请二人为同盟会之主盟人。自此同盟会与日知会之声气遂息息相通。曹旋返上海与中田主教乘法国邮船离沪，船中遇张继，过香港同谒陈少白，曹受陈邀约为香港《中国日报》在伦敦的通讯员。抵英后，欧洲留学生监督吴一清因王鸿猷等请求，上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请补曹亚伯官费学海军。张复电云："该生前在湖南充当教习，宗旨悖谬；去岁留东，风潮使强有力，性情尤属乖张，所请万不能允。"曹亚伯学费幸赖留欧同志之支援，及清驻英公使汪大燮暗予津贴。1906年夏，在伦敦曾介绍吴稚晖加入同盟会，其住处为中国同盟会联系处所之一。

1907年，张人杰、吴稚晖等在巴黎出版《新世纪》周刊，曹亚伯经常为该刊撰稿。1909年，孙中山途经伦敦前往美国，曹亚伯度先生旅费不充足，与旅英同志凑集四十镑奉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曹亚伯闻悉欣喜万分，不断去信吴稚晖，望以舆论促列强政府支持。11月中旬，孙中山由美国抵达伦敦，寻求英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曾邀曹亚伯与吴稚晖相偕返国。1912年春，曹亚伯自欧返国，秋季归武昌，黎元洪以旧识礼为上宾，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时共和党攀附黎元洪以排斥国民党，曹亚伯竭力为同志调护。"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曹亚伯至日本后于1914年7月宣誓加

入。其时陈炯明在南洋对组织中华革命党持异议，另立水利速成社相对抗。1915年1月，曹亚伯与陈耿夫奉孙中山之命至南洋各埠向华侨党员宣布改组宗旨。同年冬，参与陈其美在沪发动的肇和军舰起义。

1917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谋南下护法，绌于经费，由曹亚伯自德人处得百万元，于是程璧光所率海军的开拔费及国会议员的南下旅费皆有着落。9月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后，任命曹亚伯为大元帅府参议，辞未就。同年11月湖北第一师长黎天才响应护法，联络荆襄镇守使石星川组织湖北靖国军，曹亚伯往返湘鄂间做联络工作。1918年1月2日，曹亚伯抵广州向孙中山报告何成濬正经营长江军事，以期大举。孙命曹亚伯携函予何成濬，望专意经营长江军事并与黎天才、石星川两总司令商榷。11月底，曹亚伯抵达德国柏林，奉孙中山之命向德方提出联德建议，提出中德合作驱逐英日及其他协约国在华势力，建议德国与俄国联络，将在俄华人及士兵一万二千人与德军一万人合组一支中国军队，配以飞机三至五架，及制造军火等机器，打回北京，以购买食物及各种物资接济德国等。但当时德国已战败，曹亚伯撤回建议，在德国政府资助下回国。

1921年秋，曹亚伯由沪赴穗，孙中山聘其为总统府顾问。10月孙中山督师北伐，驻节桂林，曹亚伯随行，曾以细故与胡汉民不协，陈炯明从而挑拨之，后虽经陈少白、冯自由力说剖析，曹亚伯始大感悟，遂怏怏归沪，渐悟社会道德沦丧，自是厌闻时政，在昆山经营农业，并以莳花芟草、读书临池自娱。

1927年春，北伐军入江苏，曹亚伯聚集乡民数千，起而响应，以不慊某总指挥被缚禁于上海总司令部，事为上海交涉使郭泰祺所知，上白于蒋介石，始释出。曹亚伯慨叹“民国以来，新柄国者多数典忘祖，侮耆旧，擅兴作，皆由不知前事所致”。于是发奋作《武昌革命真史》，以前事之艰难示后进，凡五十余万言，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久即遭到查光佛、吴醒汉等所反对，谓其批评若干起义人物过于露骨，且抹杀起义之各团体，独归功于日知会，有失公道，联名请

国民党部禁止，并予没收。曹亚伯遭此打击，自是不欲问世事，诵佛茹素，每过沪常往访李翊东、章太炎，倾谈竟日。每晤老同志，必曰："吾辈革命党，作孽深，唯有竭诚念佛以求忏悔。"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军陷沈阳，曹亚伯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惟依赖国际联盟的做法不以为然，叹曰："不自御，国亡无日矣！"遂奔走南北呼吁，每至公共场所，必演说唤起民众抵抗。1937年"七七"事变起，曹亚伯突觉心痛，体益不支，10月27日在昆山寓所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29年版。

李翊东：《曹亚伯》，《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5年版。

吕实强：《曹亚伯》，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

陈哲三：《曹亚伯》，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曹禺

李仲明

曹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戏剧大师。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潜江县。其父万德尊，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黎元洪秘书、师长，后赋闲在家，重视对家宝的教育。万家宝生后丧母，继母给他讲故事，抱他看戏，使他体会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好迷人的东西！"(1)

万家宝少年时除跟家庭教师学习"四书"、"五经"外，也阅读了《红楼梦》（当时列为禁书）和《水浒传》、《西厢记》、《聊斋》、《镜花缘》等书。

1922年秋，万家宝入南开中学学习，结识章方叙（笔名靳以），开始读鲁迅的小说与郭沫若的诗歌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在张彭春指导下，读了《易卜生全集》，参加话剧演出并编写剧本、小说。1926年9月，《玄背》第六期开始连载万家宝小说《今宵酒醒何处》，万家宝开始用笔名"曹禺"，此后便正式改名。他参加演出了《压迫》、《织工》、《国民公敌》、《玩偶之家》、《斗争》、《悭吝人》等剧的演出。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同学郭中鉴的被捕和牺牲，深深触痛了曹禺，激起他揭露、批判黑暗旧制度的勇气。

1928年，曹禺南开中学毕业，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广泛阅读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的剧作及欧美文学作品，尤喜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剧作；课余常与巴金、章靳以等一起去看京戏，

兼看昆曲、曲艺。中西文艺对曹禺后来的戏剧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禺任清华大学抗日会委员兼抗日宣传队队长，每周六到郊区进行抗日宣传；又与孙毓棠、孙浩然、蒋恩钿等同学一起创办《救亡日报》，并经常在报上发表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4年7月，在巴金的推荐下，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雷雨》是四幕悲剧，写周、鲁两家八个人物，通过三十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写作时“没有那么多顾虑，也没有想到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社会效果”[(2)]，但剧作还是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通过周、鲁两家的矛盾冲突，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1935年4月，《雷雨》在日本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成功，获得日本戏剧界和观众好评。此后，《雷雨》在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得到戏剧界和观众的肯定。

《雷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是进入雷雨时代”[(3)]。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认为：“真正能够在现代文学史开一代风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剧作，恐怕还得从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国最早写出《雷雨》这样能演又能读的大型剧本的作家。特别是他通过话剧这种形式，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表达出来了，起点很高。对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说，确实了不起。”[(4)]

1934年，曹禺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教过一段《圣经》文学，同年夏天曾到上海参观。这两座大都市的畸形的社会生活，激发了曹禺的创作欲望。1935年下半年，为了创作《日出》，寻找剧本素材，曹禺深入社会底层，访问那些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们。“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我口袋里

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历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实事，一字一字记下来，于是才躲到我那小屋子里，埋下头写那一点点儿东西。”[5] 1936年6月至9月，《日出》在《文季月刊》连载，同年11月，《日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日出》亦是四幕悲剧，剧本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反映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上层社会的腐朽糜烂、尔虞我诈与下层社会的饥寒交迫、痛苦挣扎同时展示在舞台上，对比更加鲜明。从题材看，《日出》较之《雷雨》社会生活面更为广阔，较为深刻地解剖了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揭示了剥削阶级制度的罪恶，也体现曹禺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在《日出》创作前及创作过程中，曹禺心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6]《日出》获《大公报》文艺奖，评选委员会评价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出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7]

曹禺与马彦祥、戴涯等在南京组织中国戏剧学会时，演出过《雷雨》。马彦祥回忆：“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8] 1936年冬，曹禺创作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原野》，翌年公演后获得好评。《原野》通过农民仇虎复仇的故事，反映了农民反抗的必然性和盲目性，旨在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别具一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被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热情所鼓舞，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曹禺与宋之的合作写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并在演出时亲自扮演角色。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曹禺时，正赶上日机轰炸山城，两人来到附近山

上，周“面容愤慨而严峻，他指着火光起处，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告诉我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9]。由于重庆屡遭日机轰炸，曹禺随戏剧专科学校迁往川南的江安。在江安期间，曹禺先后创作了独幕剧《正在想》，四幕剧《蜕变》和三幕剧《北京人》。其中，《蜕变》以大后方某伤兵医院的变化，写出“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10]。剧中梁专员和丁大夫是根据共产党人事迹和白求恩精神写成。剧本的前半部揭露了国统区腐败黑暗的现实，《蜕变》公演后受到欢迎，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禁演。

《北京人》写于1940年，1941年12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1941年10月《北京人》在桂林公演后，颇受欢迎。柳亚子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北京人〉礼赞》称：“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摧残！老耄的白发翁，还依恋着古旧的棺材！长舌的皙妇，自杀的懦夫，都表现着旧社会的不才！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11] 也有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北京人》是作家“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是作家唱出的一曲低回婉转的挽歌。“当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的写作便转换了方向。他送给了我们《北京人》的悲剧。”[12]对此，署名茜萍者指出：“抗战为着什么？是为着打走敌人，为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但是为着建立新社会，就不能不对于旧的社会作深切的研究，明确的认识，尖锐的暴露，坚决的攻击，这才能说到正确的切实的改造，把旧社会送到曾老太爷漆了几十年的楠木棺材里去，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抗战胜利的真实果实。”[13]曹禺认为：“《北京人》可能是喜剧，不是悲剧。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喜剧的，应该让观众老笑。在生活里，老子死了，是悲剧；但如果处理成为舞台上的喜剧的话，台上在哭老子，观众也是会笑的。”[14]应该说，《北京人》是一幅中国封建大家庭走上衰落和崩溃的历史图画，只有像瑞贞、愫方那样冲出旧家庭的樊笼才能获得光明的新

路。“《北京人》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也不故作人为的冲突，而是在朴实中求深刻，在浓郁的抒情气氛中揭示生活的真理，具有淳厚清新而又深沉的艺术风格。”[15]

继《北京人》后，曹禺还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创作了四幕话剧《家》，剧本通过觉新、瑞珏和梅小姐的爱情婚姻悲剧，控诉了封建家庭和旧礼教吃人的罪恶。“剧本《家》在把小说的一二句对话和一二个细节发展成为完整的戏剧场面上，表明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的劳动。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家》还发展了《北京人》的抒情的特点，运用了大量内心独白，写得极富诗情画意。”[16]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禺创作了《桥》等话剧与电影剧本《艳阳天》。

1949年7月，曹禺参加了第一次文代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同月又当选为全国剧协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影协委员。1950年4月，曹禺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1956年7月曹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1966年至1976年“文革”时期，曹禺深受冲击。1988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曹禺当选为文联执行主席。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中国话剧史上，曹禺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家，他继承了话剧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艺术主张，广泛借鉴和吸收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演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作品，不仅提高了戏剧文学水平，对导、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17]。

---

(1) 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

(2)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1980年第2期。

(3) 赵景深：《忆曹禺》，《宇宙》月刊第1年第5期。

(4) 田本相著：《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

(5) 曹禺：《〈日出〉跋》，《日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

(6)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1980年第2期。

(7) 萧乾：《鱼饵·论坛·阵地》，《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年2月。

(8) 田本相访问马彦祥记录。

(9) 曹禺：《献给周总理八十诞辰》，《北京文艺》1978年第3期。

(10) 曹禺：《关于〈蜕变〉二字》，《蜕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

(11) 柳亚子：《〈北京人〉礼赞》，《新华日报》1941年12月3日。

(12)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84页。

(13) 茜萍：《关于〈北京人〉》，《新华日报》1942年2月6日。

(14)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15) 孙庆升：《曹禺论》，“曹禺（代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6) 孙庆升：《曹禺论》，“曹禺（代导言）”，第8页。

(17) 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见田本相《曹禺传》，第461页。

岑春煊

闻少华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1861年3月2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生于广西西林县。其父岑毓英是清朝云贵总督。岑幼时随父在昆明，1879年入居北京，与瑞澂、劳子乔有“京师三少”之称，是个有名的贵族公子。1885年中举人，1889年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1)]。

1894年中日战争发生，岑被派至钦差大臣刘坤一处差遣委用，时刘坤一节制关内外各军，不久岑被派总理烟台营务，并驻扎山东黄县。次年因病开缺回广西。1898年因送幼弟赴礼部试到北京，受光绪召见一次。当时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岑迎合光绪的心理，说了些“国势阽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的话，受到激赏。8月特授岑为广东布政使。两个月以后，又调任甘肃布政使。

1900年6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时岑正在兰州，闻讯后亲率马步兵二千余人，长途奔驰，赶到北京“勤王”[(2)]。7月抵北京。不久通州失陷，慈禧、光绪仓皇西逃，岑率所部赶到南口“护驾”，慈禧派他为前路粮台督办。由于这番“勋劳”，岑升任陕西巡抚。

1901年3月，八国联军侵入山西边境，岑春煊被调任山西巡抚。岑上任伊始，即下令撤走娘子关、固关守军，“以示讲和诚意”。他还迅速“清理”教案，预拨银两发给教堂教士，并以此配合主和派奕劻、李鸿章在北京的乞和活动[(3)]。

翌年，慈禧、光绪自西安回北京途中，特命岑春煊随同回京。7月岑奉调任广东巡抚，未及成行，又调署四川总督。他8月到成都，

即镇压了四川义和团余部及哥老会会众。

时广西官逼民反，群众纷起反抗贪官污吏，当时有五匪之称，即官匪、绅匪、兵匪、民匪、土匪，全省动荡。岑于1903年4月改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督师梧州，定剿抚兼施之计，选兵用将，后来成为两广军阀的龙济光、陆荣廷就是岑此时提拔起来的。次年，慈禧命岑兼任粤海关监督，他派员“认真整理”，一年中征得税银660万两，超过户部规定每年500万两的定额。

岑深得慈禧信任，比较“敢于言事和参劾官吏”，为当权的庆亲王奕劻所忌。时袁世凯正与奕劻结纳，力助奕劻排斥岑，二人合谋，于1906年9月调岑为云贵总督，以便攫取两广财富之区。岑知其谋，乞假往上海就医，延不赴任。1907年3月岑忽奉旨改调为四川总督，他知仍系奕劻与袁图谋，乃径入京，面见慈禧，密陈奕劻贪庸误国，自称愿为慈禧“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命岑为邮传部尚书，留京办事。

奕劻与袁必欲设法离间慈禧对岑的信任。1907年5月以钦州地方“扰乱”，广东请兵，再外调岑任两广总督。岑甫抵上海，即闻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政治上益感孤立，正在南下途中，奕劻与袁又伪造岑与梁启超合照，称岑与康、梁勾结，欲谋归政光绪，慈禧信以为实，遂将岑开缺。

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死去，岑在上海私寓闻讯，“举哀成服”。不久，他的政敌袁世凯也被罢斥，于是岑乃暂居上海，以观时局变化。

1911年，革命形势高涨，四川掀起保路风潮，清廷令岑立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他正准备前往，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又任他为四川总督。他还打算“征兵选将，筹集饷械”，取道陕西入川，对抗革命。但是眼见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于是电请清廷“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4)]。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1912年任岑为福建宣慰使。1913年袁又任岑为汉粤川铁路总办。“二次革命”发生前，岑适在上海，曾和王芝祥等人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和平解决南北冲突”，遭到袁世凯拒绝。于是，他便与黄兴、陈其美、章士钊等联系，随即加入倒袁行列，被推为大元帅。袁世凯把岑的汉粤川铁路总办免职。接着岑到广东去活动龙济光倒袁，无结果。国民党人反袁失败后，岑亦被袁通缉，乃逃亡南洋。

1915年底，蔡锷等在云南起义，揭开反袁序幕。时岑春煊尚寓居南洋，广西都督陆荣廷密谋反袁，派员迎岑回国。1916年1月岑由南洋抵沪，与梁启超等密商后，偕章士钊、张耀曾赴日本活动。时日本大隈内阁认为袁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日本应乘机确定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而“袁世凯在中国的统治已成日本达到上述目的的障碍，为执行帝国的方针，最好使袁退位，其继承人应远比袁世凯更有利于日本帝国”[(5)]。为贯彻上述方针，在日本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的直接策划下，用所谓“民间有志之士”的名义，由日本资本家出面给中国国内反袁势力以援助。在上述背景下，同年3月20日岑春煊与日商竹内维彦签订借款日金100万元合同，作为护国军行政费用[(6)]。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宣布“独立”。接着，龙济光也被迫宣布“独立”。岑春煊则于4月21日由上海绕道香港抵肇庆。他和梁启超等认为袁世凯“非退职无由息兵”。主张“南部各省应挟决心以为之后盾”[(7)]，策动南方各省独立，迫袁退位。5月1日陆荣廷率各将领通电拥岑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5月8日又在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军务院是进步党和一部分国民党与西南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岑恰是与三方面都有联系的人物，故军务院成立后，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抚军兼领政务委员长。唐不能远离云南，由岑摄行抚军长职权。6月6日袁世凯死，随着南北妥协，7月14日军务院用抚军全体名义宣告撤销。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

非常国会推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但陆、唐都没有宣誓就职。陆荣廷和政学会等国民党右翼分子相勾结，把岑春煊抬出来与孙中山对抗。

在桂系陆荣廷以武力作后盾的情况下，政学会等国民党右翼政客们就着手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把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借此排挤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于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8月21日经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为主席总裁。

岑春煊名义上是军政府的主席总裁，实际上不过是听命于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陆荣廷一贯主张反段联冯，南北妥协。岑则和直系头目吴佩孚通电倡和，响应吴的“停战呼吁”[8]。孙中山不愿和岑春煊沆瀣一气，1919年8月7日辞军政府总裁职。10月4日，唐绍仪也向军政府辞议和总代表职。10月27日，广东的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会议案，并有人对岑春煊提出不信任案。军政府已呈瓦解局面。

1920年3月，唐继尧公开揭露岑春煊与北方直系军阀接洽和平的内幕，国民党一致斥责岑出卖上海和会。留在广州的政务总裁之一的伍廷芳，于3月29日携带文件印信与关税余款离粤到香港，并声明对外交、财政两部仍负全责。伍廷芳的出走，使岑处境狼狈。

伍廷芳随后到上海，非常国会事实上分为沪、粤两方。岑与桂系军阀操纵广州的议员于5月4日补选熊克武、温宗尧等为总裁，支撑军政府门面。6月6日，广州军政府改任温宗尧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与北方军阀政府直接谈判。

7月中旬，直、皖战争爆发，8月桂系军阀乘机向驻闽南粤军进犯。粤军陈炯明部决心趁此打回广东。10月，陈炯明一举攻克潮安、汕头。岑春煊于是又打着军政府的招牌，劝告双方停战。粤军不听，10月下旬攻占惠州、石龙，迫近广州，桂军败退广西。岑见大势已去，于10月24日和陆荣廷等通电宣布撤销军政府，并于27日离开广

州，11月2日到上海。从此在上海租界作寓公。

岑春煊居上海期间，与杨永泰、李根源等政学会成员不断往还。1930年完成自述稿《乐斋漫笔》。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曾捐款3万元[(9)]，表现其爱国心。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病逝于上海。

---

(1) 1885年—1992年岑春煊履历，故宫档案《履历单》，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47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参阅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09页。

(3) 《有关义和团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神州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103页。

(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5)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东京：原书房1965年版，第418页。

(6)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S232，广东借款之部。

(7) 《岑春煊、梁启超致许世英等电》（1916年5月4日），《护国之役文电未刊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8) 岑春煊：《乐斋漫笔》，（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

(9) 沈琼楼：《岑春煊及其有关人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辑，1960年版，第123页。

常燕生

李义彬

常燕生，初名乃英，后改名乃悳，字燕生，以字行。山西省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人。1898年12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北京。其先辈是榆次县的著名望族，其父常运藻（字鉴堂）曾在北京詹事府任主簿，1903年到河南任知县。常燕生随其父迁居河南开封。

常燕生从七岁起在开封从关雁秋师就读。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家迁回原籍。1913年入山西阳兴十二县立小学，1916年毕业于阳兴公学，同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五四”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常燕生深受震动和影响，并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在《新青年》三卷一号上发表《我之孔道观》，反对康有为提出的把孔教定为国教、把孔教列入宪法的主张。他在1916年和1917年多次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通信，讨论对孔教和道德问题的看法。陈独秀在1917年4月1日的复信中，称赞他说：“平论孔教，渐近真相，进步之速，至可钦也！”[(1)] 同年3月17日，陈独秀在北京高师作关于道德问题的讲演，常燕生将记录加以整理并在文末附上自己的感受，投寄《新青年》，该刊三卷三号予以发表。常称赞陈独秀的这个讲演“于道德之真相，可谓发挥尽致矣”。他还以陈独秀阐述的资产阶级道德观为武器，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和“道德为不可变易之物”、“天不变道亦不变”[(2)] 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常燕生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学生运动中的一名骨干分子。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他被推选担任该会教育组主任。他还是进步社团“国民社”的成员，与黄日葵、孟寿椿等一起编辑《国民》杂志，在该刊上发表了论文《爱国——为什么？》（二卷一

号）、《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和文艺作品《夜半》、《睡起对月》（均刊于二卷三号）。

1920年夏，常燕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到北京高师附中任教。1921年，曾去日本旅行。归国后，迁居上海，在吴淞公学中学部执教。1923年辞去吴淞公学教职，居家未出。1924年春，前往北京，执教于北京高师附中。同年秋，应聘到燕京大学讲授历史。在这期间，他联络山西在京学界同乡，组织“青年山西学会”，主编该会刊物《山西周报》。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知识分子亦随之分化。在五四爱国热潮推动下曾经风云一时的常燕生，对国共合作实现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感到恐惧，急剧右转，日趋反动。1925年11月，常燕生经陈启天介绍，参加了曾琦等人创办的中国青年党，党号仲安，成为该党的重要领导骨干和“理论权威”。

1926年3月10日，北京一些国家主义派分子在北京大学召开“反俄援侨”大会，常燕生出席会议并作了讲演。当年夏季，他辞去燕京大学教职，创办爱国中学，自任校长，并兼办《学园周刊》，参与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的编辑工作。在7月份召开的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常燕生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7年初，常燕生辞去爱国中学校长职务，到上海专门从事青年党的党务活动。他主编青年党的机关报《醒狮》，常用惠之、平子、平生、萍之、凡民等笔名在该报发表文章，进行反苏、反共宣传。青年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多出自他的手笔。

同年3月，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这时，常燕生鼓动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他声称“军阀官僚已到末路，势力并不可畏，可畏者乃新兴的专制主义者俄国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共产党”，“现时应当集中力量先打倒背后有

俄国势力的共产党”。他号召各种势力“应当全体加入国家主义青年团，绝对服从他们的指挥，和共产党作战”[3]。他对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工农群众运动，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他说：“自共党得势，乃煽动工团农会，日为罢工械斗，互相残杀，社会秩序为之大紊，国民生计因而破裂。”[4]他把集中目标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诬之为“是一个瞄准错误的运动”，说五卅运动没反对苏联，没抓住日本，“而集中目标对英国瞄准，这实在是一种最大的错误”[5]。

“四一二”政变后，在反共、反革命这个根本点上，青年党和蒋介石已没有分歧；但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没有完全合流起来。青年党昔日的靠山孙传芳、吴佩孚已被打垮，张作霖危在旦夕，于是便急欲投靠刚刚在南京建立起政权的蒋介石。为此，“四一二”后，常燕生立即收起了他们一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实面孔，谎称“数年以来，吾人抱定‘反共不反国’之态度始终不变”。声称“吾人始终认定共产党人为祸国之巨魁，应全力扑灭之，而共产党所依附之国民党则不在此例”[6]。他哀求“国民党人对于比较可以携手的友党（即青年党——引者注）应该将狭隘的态度稍稍放弃”[7]，并肩携手，共同反共。尽管如此殷勤献媚，并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青睐，青年党仍不能公开活动。于是常燕生哀叹地说：“现今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似乎还是太少。它且不论，即以约法上规定之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十六年来未尝有一时实行。”[8]他在坚决反共的同时，对蒋介石的“党治”也时有牢骚。

在“四一二”后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常燕生也是满腹杀机。他不仅主张将所有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甚至叫嚣：“如有为共产党工具者，杀无赦；如有为共产党辩护者，杀无赦。”[9]他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无比恐惧，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很特殊的策略，不仅世界上各普通政党无此策略，就是世界上的共产党也无此策略”。他也感到“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战略却不

失为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可以有成功的希望的”。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政策不仅没有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相反共产党创建了工农红军，开创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严酷的事实使常燕生开始认识到：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南北政府今日所用的屠杀政略”，是制止不了“共产之祸”的。他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新的“抵御共产之祸的方法”，这就是“一面联合中产阶级筑成防御的阵线，以民团抵御流寇，一面赶紧采用保护政策和中山的开发实业计划，使全国人民都变为有产阶级”，这样“则祸乱自然停止”[(10)]。

1928年和1929年，常燕生除在上海外，大部分时间在山西。在沪期间曾在大夏大学授课，并担任青年党创办的知行学院教授。1930年，他辞去知行学院教授，赴北平专门负责整理和主持华北地区青年党的党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青年党提出“政党休战”口号，期望乘机投靠蒋介石国民党。蒋介石在决定召开国难会议时，邀请出席者名单中有九名青年党人，常燕生是其中之一。由于双方对会议的内容、地点、仪式等问题主张不一，常燕生等没有出席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常燕生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他说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只能叫做奉送江山的降表”。他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诉诸国际联盟解决日本入侵问题的主张，他认为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国际联盟“不过是几个强国把持欺骗弱国的工具，一切唯强国之命是听”。他主张“野战抗日”，实际上就是游击战争，具体办法是中国国民，尤其被占领地的东北国民，自动地结合起来，30人、50人，零碎组成队伍，在日人占领的区域内，向横暴的日本驻军施行个别的攻击。凡遇有日本兵士或武装人员的地方，只要人少，立刻实行攻击，对于日人所把持的铁路工业及其他机关尽情地加以破坏，日本大队人马来时，立即退开避免牺牲。他认为“这样一来，可使日本驻军昼夜不能安枕，所占领的地方，完全不能利用，持久下去，敌人必然悔悟而自动退让”[(11)]。

1934年，常燕生从北平到太原，担任山西大学教授。193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党的理论刊物《国论》月刊，并常为该刊撰文。他在1935年10月出版的《国论》上发表的《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运动应有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他在文中断言："解决中国问题不但不能依靠共产党，而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反成了中国解放问题的大障碍。"常燕生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有效的抵抗共产党运动的方案"，其要点包括三个方面，即"建设系统的理论"、"建设严密纪律的救国组织"、"确定激进彻底的行动原则"。当年，常燕生再次返回太原，投靠阎锡山，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成了为阎锡山出谋划策的幕僚。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逐步形成。此时，常燕生一再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再次与共产党合作，主张把共产党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他攻击说："若许共产党加入联合阵线，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与救国之目的根本相违。"(12)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常燕生于10月离开太原，经武汉进入四川。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滞留成都。1938年任四川大学教授，在历史系讲授历史哲学。同年，《国论》复刊，改为周刊；并创办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任总主笔。

1938年4月21日，左舜生代表青年党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称颂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决定设立国民参政机关和声言保障国民自由，是"异日宪政实施之端绪"，"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公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表示"同人等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4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复函左舜生，表示要"集中全国贤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日之艰危，而谋国家久远之福利"(13)。从此，青年党正式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常燕生作为青年党代表被聘为参政员。

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加紧制造“和平”空气，为其投敌叛国作舆论准备。这时，常燕生发表文章，要求国民党当局“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说”，“迅速发动全国舆论，请政府立即宣布既定国策不变，非到日军完全退出占领区域，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决不言和”[14]。与此同时，也多次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单独组成某路军”，并把此“作一个招牌来替自己特别宣传”[15]。

1939年“五一”前后，常燕生作为青年党代表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参观考察。他会见了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参观了机关、学校，和各方面人士进行了接触。他承认延安“人人保持原始的精力，不腐化，不偷懒，能够苦干”，但又无端指责“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是见小而不见大，见近而不见远，小处近处非常精明，但大者远者则未免有看不到之处”[16]。

1941年，常燕生在川康农工学院和华西大学任教。1944年，执教于齐鲁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召开第十届代表大会，常燕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他作为青年党的五名代表之一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该会议之宪法审议委员会工作。在政协会议上，他与曾琦等人联名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和“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常燕生作为青年党代表之一参加会议。1947年4月，青年党正式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常燕生初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不久又改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就职后于6月17日从上海去成都料理私事，在成都突患脑病，7月26日病故于华西大学医院。

(1) 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2) 《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3) 《时局将来之推移与吾人之责任》，《醒狮》周报第126期，1927年3月19日。

(4) 《吾人所希望于实行清党以后之国民党者》，《醒狮》周报第134期，1927年5月21日。

(5) 《五卅运动的再检讨》，《国论》周刊第1卷第12期，1938年5月7日。

(6) 《醒狮》周报第134期，1927年5月21日。

(7) 《国民党之统一与分裂》，《醒狮》周报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8) 《吾人对于自由之意见》，《醒狮》周报第161期，1927年11月5日。

(9) 《戡定红乱的方略和国家主义者的当前责任》，《醒狮》周报第167期，1927年12月17日。

(10) 《三民主义批判》（六续），《新国家》2卷5期，1928年5月1日。

(11) 《野战抗日》，原载《醒狮》1932年1月号，引自《常燕生先生遗集》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页。

(12) 《对于全民救国联合阵线的意见》，《常燕生先生遗集》第3册，第127页。

(13) 《抗战建国中之中国青年党》，成都国魂书店1939年版，第13—16页。

(14) 《新中国日报》，1938年12月31日。

(15) 《国论》周刊，第1卷第8期，1938年4月7日。

(16) 《追记延安之行》，《常燕生先生遗集》第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09页。

常荫槐

张学继

常荫槐，字瀚襄，亦写作翰香、汉香、汉湘、翰襄，祖籍山东寿光，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吉林梨树，是山东移民的后代，兄弟四人，常荫槐排行第四。常荫槐1910年从奉天法政学堂第二期毕业后不久，由大哥常荫廷带至黑龙江谋职。经常荫廷推荐，常荫槐首先担任黑龙江都督府军需科额外科员，后转入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师部任少校军法官、军法处长，常荫槐办事果断、不讲情面、敢作敢为的风格深得该师参谋长李景林的赏识。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常荫槐任镇威军骑兵司令部参谋长，战前镇威军总司令部对这支骑兵寄予厚望，希望它在战场上发挥特殊作用，但由于骑兵司令许兰洲“不长于骑兵”，而身为参谋长的常荫槐又是“不晓军务之人”，不了解骑兵的特点及作战样式，以致战斗打响后，骑兵几“成无用之物”[(1)]，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战至5月初，张景惠指挥的西路奉军首先溃退，该路奉军三万余人全部被直军缴械。接着，张作相指挥的中路奉军与张学良、郭松龄等指挥的东路奉军也相继溃败，纷纷向关外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奉军军纪荡然无存，沿途打劫勒索老百姓财物，行同土匪，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张作霖想起常荫槐办事有魄力、不讲情面，当即宣布任命他为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长。常荫槐走马上任，对不遵守纪律的溃兵实行严厉弹压，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使奉军有序地撤退到关外。

奉军撤退到关外不久，各地胡匪又猖獗起来。1923年3月14日，经杨宇霆推荐，张作霖任命常荫槐兼任洮昌道清乡督办事宜，调集重兵以十分残酷的手段将各股土匪镇压下去。时任奉天省长的王永江私下向杨宇霆揭发，常荫槐在剿匪过程中也有包庇窝藏土匪以及污良为

匪的殃民行为，强烈要求将常荫槐撤职交法庭惩办[2]。但杨宇霆并没有向张作霖报告，暗中保护了常荫槐。

1925年春，常荫槐任京奉铁路局局长。京奉铁路是连接关内外交通的最重要的通道，第二次直奉大战结束后，奉系控制了这条铁路，但当时交通秩序十分混乱，特别是奉系官兵无票搭霸王车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且无人敢管，奉系官兵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妈拉巴子是月票，后脑勺是护照。"常荫槐就任局长后，依然以铁腕手段整顿乘车秩序，不徇私情，不怕得罪上司与同僚。他主持厘定了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严格稽查，按规章制度办事，在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大车站还加派得力武装检查。对于违反禁令的，一律实行严惩。奉军某团长无票乘车，被稽查员查到后不仅拒绝补票，而且破口大骂，甚至拿出手枪来准备行凶，稽查员当场夺下手枪，将其赶下火车。常荫槐随即报请张作霖同意，就在车站站台上将该团长枪决，这一事件在奉军上下引起强烈震动。从此以后，奉系官兵搭霸王车的现象急剧减少。还有一次，张作霖五夫人（即寿夫人）的厨师无票强占头等包厢，被稽查员查到后当即被赶下了火车，该厨师依仗其主子是大帅最宠爱的夫人，大为不服，常荫槐命令执法队在站台对该厨师予以杖责，打得他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事后，该厨师向五夫人哭诉，要五夫人为他做主。五夫人向张作霖倾诉后，张作霖不但没有处罚常荫槐的意思，反而称赞说："这小子，真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呢！"经过常荫槐的铁腕整顿，京奉铁路的乘车和运输秩序迅速好转。

1926年，常荫槐兼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政务处长、交通司令。从1927年6月起，常荫槐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总长职务，1928年间还一度兼任奉（天）海（龙）铁路局督办。

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张作霖采取"卸磨杀驴"或者使其完全傀儡化的对策，日本派出公开与秘密两路人马，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向张作霖索取"满蒙"权益的交涉，要

求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秘密外交由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中日实业公司”董事长江藤丰二负责，与张作霖直接接洽；公开外交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负责与中国外交当局乃至张作霖公开谈判。在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和软硬兼施下，张作霖与日本于1927年10月15日取得了满蒙五路的谅解，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根据这个协约，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敦（化）图（们江岸）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延（吉）海（林）线。“协约”还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须派两国代表正式签字”，方能生效。1928年5月7日，田中义一再次派山本条太郎到北京，逼张作霖签订修建满蒙新五路的正式合同，张作霖命交通部代总长常荫槐在合同上签字。但常荫槐不想当卖国贼，自谈判以来一直表现出强硬态度，不惜违背张作霖的意志，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张作霖无奈便命令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赵镇以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身份与日本签订了吉敦延长线和长（春）大（赉）线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另由张作霖本人与日本签订延（吉）海（林）线、洮（南）索（伦）线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吉（林）五（常）路合同，因吉林省各界强烈反对，张作霖决定留待以后再签。

在中日谈判期间，常荫槐根据张作霖的指示，主持修筑了打通（打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

1928年6月3日，常荫槐与张作霖等同车返回东北。4日，在皇姑屯京奉、南满铁路交汇处遇炸，张作霖与吴俊陞被炸死，常荫槐也受了轻伤。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日本人要求东北当局承认和履行张作霖生前与日本人签署的密约，但常荫槐答复说：“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3)] 常荫槐的强硬态度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敌视，为此日本人有意散布谣言，挑拨常荫槐等人与张学良的关系，制造混乱，成为“杨常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

张作霖死后，常荫槐与杨宇霆结成死党，对少帅张学良采取极端轻视的态度，在私邸与家人谈话时动辄说："小六子（张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即使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倨傲无礼，目无长官。1928年五六月间奉军从北京撤退时，常荫槐下令将在京奉铁路上行驶的车辆全部拖到关外，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的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向张学良交涉，要求放回车辆以恢复关内外的交通，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常荫槐拒不执行，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管不了我！"

1928年7月，常荫槐升任黑龙江省省长。他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借助其大哥常荫廷在黑龙江省任道尹时创编游击队的经验与人事关系，以及沈阳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在枪械弹药方面的支持，擅自动用铁路资金，编练约二十个营的山林警备队。张学良对此坚决不同意，而且存有戒心，他说：黑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常荫槐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军练兵，因此引起东北当局的怀疑和关注，更使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感到极大的威胁和不安。

常荫槐与杨宇霆沆瀣一气，反对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倒不如在东北搞独立。张学良排除重重阻力，毅然宣布东北三省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杨、常两家公馆拒绝挂旗，以示反对。

在"杨常事件"发生数日前，常荫槐自黑龙江抵沈阳面见张学良，要挟张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职务，提出让刘哲继任，并且手持纸笔，胁迫张学良立即批准，气焰嚣张，使张学良十分恼火。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加上种种媒孽，使张学良产生了以非常手段处决常荫槐及其后台杨宇霆的念头。

1929年1月10日下午5时左右，常荫槐随杨宇霆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此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坚决要求立刻决定，并取出事先写好的便条，让张学良签字批准。张推托说现在已到晚饭时间，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他们共进晚餐。杨称临来时已告家人回去用饭，表示饭后再来。于是，杨、常相率辞去。至此，张学良忍无可忍，决定先发制人，即召警务处长高纪毅、侍卫副官长谭海在老虎厅会客室准备行动。两小时后，晚上7时左右，杨、常如约而来，径入老虎厅就座。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持枪卫士一拥而入，高纪毅当场宣布："奉长官命令：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即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即分别被两名卫士抓住，一名卫士开枪，当场毙命，陈尸老虎厅。

当晚，张学良电召臧式毅、刘鸣九、米春霖等亲信到大帅府，研究起草《枪毙杨宇霆、常荫槐通电》、《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布告》、《致三省父老电》、《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文件，处理善后事宜。《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给杨、常定的罪名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政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这些罪状多有不实，有的是莫须有，有的属政见分歧，有的则虽有嫌疑，但无确证。其实，张学良杀杨、常的真实原因，在他于12日致杨宇霆夫人的亲笔信中，已表露无遗："……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奉天省长王永江于1926年2月因反对张作霖再度入关，愤而辞职。张作霖曾谓郭松龄以枪杆子造反，王永江以笔杆子造反。）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

处决杨、常后，张学良根据罪不及妻孥的原则，立即派人到杨、

常家慰问，并各送一万元慰问金。张学良还给常荫槐写了一副挽联：“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

(1)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2)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第128页。

(3) 胡玉海、张伟：《奉系人物》，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陈宝琛

陈贞寿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48年10月19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家“世代簪缨”，曾祖父陈若霖做过刑部尚书，祖父陈景亮曾任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进士出身，候选郎中，曾分发刑部浙江司行走。

陈宝琛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一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曾两次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1879年任甘肃乡试正考官。1880年7月，陈升翰林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8月授右春坊右庶子，以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功臣馆协修、纂修。1881年授侍讲学士，参与草拟诏书、敕令等中枢机要事宜。1882年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不久转任江西学政，1883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陈宝琛自入翰林院后，与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侍讲张佩纶、宗室侍郎宝廷交谊甚厚。他们四人崖岸自高，不避权贵，敢言敢谏，被称为“清流党”，又称“枢廷四谏官”。陈以敢于上谏慈禧太后出名。他对边防、御侮、进退大臣等曾先后上疏数十章，甚得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宠信，其奏章往往不交部议，即蒙饬令迅办。

19世纪70年代前后，列强各国疯狂掠夺我国领土，沙俄占领我国新疆伊犁九城；日本派兵侵扰台湾，公然吞并琉球；法国大规模侵略越南，矛头亦指向我国。这时，清廷内部曾有过一场关于“海防”（防日）和“塞防”（防俄）的争论，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作为“清流党”健将的陈宝琛，当时对内主张弹劾权贵，对外则力主抗战。1879年，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擅自签订丧失领

土和主权的《里瓦几亚条约》，引起舆论的谴责。陈与张之洞等交章论劾，请诛崇厚、毁俄约。但清廷在沙俄的压力下，将崇厚开释。陈上疏主张将崇厚“服人臣不赦之极刑”[(1)]。对于总理衙门采纳主和派提出“联日防俄”，拟允许日本商民在中国内地通商，陈上疏指出，“联日交即以分俄势”之说是“懵于事理”，其流弊必“祸延于朝鲜，而中国之边患更亟矣”[(2)]。他认为俄国屯兵数千于喀什噶尔西南之阿来，是沙俄的“恫吓要挟”，其劳师在远，不足害怕，应海防与塞防并重，“俄事既可以坚持，日事益无庸迁就”[(3)]。

1882年4月法国侵略者再陷河内后，步步北侵，直窥云南。陈宝琛认为中越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腹心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他一再上疏奏陈，主张“举义师以平其难”。陈认为清廷对于和战所采取的“旋战旋和”策略是招祸之源，上疏指出，“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他建议“以云南之兵复山西，以广西之兵谋河内，以广东之兵扰海阳”，使法国侵略者“兵分力单，顾此失彼”，并表示“敌忾同仇，不敢自同局外”[(4)]。1884年5月清廷下旨派陈宝琛为钦差会办南洋大臣，并授他“专折奏事”之权。

7月，在江西典试的陈宝琛奉旨后，启程赴抗法前线。行抵南康之时，一日之间接到三道谕旨，要他北上天津会同李鸿章妥筹中法和议细目。原来，当法兵于3月间进犯山西、北宁我军驻地时，慈禧太后恐战争将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曾授权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F．E．Fournier）议订了简明和约五款（即《天津专约》）。当时陈宝琛曾上疏对所拟五款和约加以驳斥。后因法军不遵定约，于6月23日进犯谅山，被清军击败。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调停下，清廷允将条约重议，适见到陈宝琛的奏折，就派他会同李鸿章详细妥筹。7月18日，陈赶抵上海，正拟附轮北上，恰遇祖父病故，按例报请在行馆持服二十一日。此时，法使巴德诺（Jules Patenotre）逗留上海不肯赴津。清廷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

臣，在沪与法使议约，并派陈宝琛为和谈会办。陈不愿参与议和，乃以“拙于辞令，不习洋情，筹防义不容辞，议和才实不逮”[5]电辞，但未获准。由于奕劻与李鸿章总想力保“和局”，以致清廷和战不定，陈在和谈中进退两难。但他认为拖延不是办法，会使“和战两误”，曾密电要求或战或和“此时宜决”[6]。不久，法将孤拔（Anatole Courbet）率法国舰队占据台北基隆，清政府乃于8月17日电陈“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并令“即回江宁办防”[7]。陈遂离沪至南京。23日法国侵略者聚泊在马江的舰队突然向我发动袭击，福建水师战败，陈宝琛请旨“派江西援军速进”，清廷即电令曾国荃拨江西振武五营进援，但曾复电拒援。陈宝琛奏请准他自己募勇教练，并称：如“成效毫无，将臣从重治罪”[8]。但清廷只复他“就现在各军设法整顿”[9]。陈悻悻而罢。

陈宝琛练兵不成，遂沿江出巡。10月他将巡阅情形上奏，弹劾曾国荃“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南琛”、“开济”管带玩忽职守，各军总统陈湜“虚额蚀饷”[10]。清廷下旨曾国荃整饬处理。但曾国荃原是湘军名将，挟功骄傲，对陈宝琛纸上谈兵瞧不起，反于10月29日上疏指责陈在沪时“不顾议约之难，好为高远之论，事事与臣龃龉，臣以其言难行，恐与外人在沪决裂，贻误大局，委曲斡旋”；并说陈弹劾陈湜等纯是“蜚语中伤”[11]。后清廷派人查明陈湜确有“游宴妓馆情事”，“有玷官箴”，著“交（吏）部严加议处”[12]。然而，陈宝琛已失欢于主帅曾国荃。10月陈母病逝，奔丧回籍。

1885年2月，陈宝琛因前力荐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堪任军事，而唐、徐相率溃败，已核定斩监候，遂以“荐人失察”之过，被降五级调用处分。自是以后，陈闲居林下二十余年之久。

陈宝琛罢官归里后，于1895年出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1900年创设东文学堂。1902年鳌峰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翌年11月又改称福建高等学堂，陈曾任该学堂监督；东文学堂改为全闽师范学堂，陈亦任该学堂监督。

1905年，光禄寺卿张亨嘉等发起设立福建铁路公司，陈宝琛被举为总理。1906年11月，陈赴南洋各埠募股一百七十余万元，拟先筑漳厦之间90华里，次年7月开工，1909年5月嵩屿与江东桥间76里铁轨铺成。后因经营不善，无法维持，终于连路轨也被拆除殆尽。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溥仪登极，“清流党”“四谏”之一的张之洞任军机大臣。经张推荐，陈宝琛1909年3月赴京，4月被派为总理礼学馆事宜。次年4月开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原官，6月以硕学通儒充资政院钦选议员。在资政院首发请昭雪杨锐等提案文，要皇帝降谕旨“将杨庆昶（杨锐之子）所缴德宗皇帝所诏，宣布中外，昭示万世臣民，并纂入实录以成信史”，还提议对“杨锐等竭忠致身沈（沉）冤未白”应“降旨昭雪”，“授照许景澄等开复原官加恩赠印以慰幽魂而餍众论”。此提案震动朝野[13]。

1911年1月，陈宝琛以原衔充补汉经筵讲官、实录馆副总裁。6月清廷补授他为山西巡抚，未上任又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他在毓庆宫任皇帝授读，并赐在紫禁城骑马。8月改补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和奕劻内阁的弼德顾问大臣，授读如故。

辛亥武昌首义，民国成立，溥仪根据“优待条约”保留帝号。六十五岁的陈宝琛效忠清室，仍在故宫就任“帝师”。陈宝琛在溥仪眼中是“最忠于大清”、“最称稳健谨慎”[14]的人。陈宝琛经常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的复辟思想。1913年小朝廷给陈赏戴花翎，次年又赏给他文职头品顶戴。袁世凯复辟帝制，陈宝琛骂袁是“元凶大憝，自作孽，必不得善终”，但又为溥仪安全忧虑，暗中为溥仪求神问卜。1916年底，他撰《德宗本纪》完稿，晋升“太保”。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陈出任“内阁议政大臣”，位同首辅。他劝溥仪禁止亲贵干政。不过十几天，复辟濒临失败，陈和张勋等商议拟了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张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未成事实，希望破灭。从此，陈对复辟之举十分谨慎。

1922年1月，陈宝琛撰成《德宗实录》，溥仪又赏以“太傅”衔，次年升“实录馆正总裁”。在他七十五岁生日时，溥仪赠送“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的“御书”对联。

1923年夏，陈宝琛引荐郑孝胥、罗振玉入宫任职。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北府。罗振玉主张溥仪溜出北府，借外力谋取“复辟”；陈则主张争取恢复优待条件，“还宫复原”。后来，罗振玉和庄士敦说冯军将对废帝有不利的行动，陈着了慌，同意罗、庄等人的主张，在他和庄的陪同下，溥仪移住日本使馆“避难”。次年2月，溥仪又出走天津，居日租界“静园”，陈等亦随往。

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北京政府由直奉两系联合当权，陈宝琛曾于7月间亲自到京活动，企图使废帝“复原还宫”。后由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吴佩孚自顾不暇，“还宫”的希望再次破灭。陈主张“静待观变”。当时有人主张向张宗昌军队支援饷银，以换取代为“规复京津”；也有人主张向白俄将军谢米诺夫提供活动费，以换取由溥仪统治满蒙地区，陈一概反对。当时郑孝胥和这些人往来，并送钱给他们，陈对郑极为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罗振玉带着日本关东军坂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到天津引溥仪去东北，陈宝琛斥责罗振玉“鲁莽乖戾”。溥仪不以为然，他便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15)] 溥仪格于种种因素“暂不出行”，但不久又背着陈采纳郑孝胥的意见派人去日本活动。后来关东军派土肥贤二原至津诱引溥仪去东北，陈适在北平，见报立即赶回天津。在“静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和郑孝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溥仪去东北。溥仪虽未对他斥责，但已认为陈“忠心可嘉，迂腐不堪”[(16)]，不足与图大事。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潜去东北。陈虽不满，但他仍于两个月后赶到大连，在旅顺肃王府再三劝告溥仪“等候时机”，“不要轻信郑

孝胥的欺罔之言”[17]。当时日本关东军与郑孝胥等拟让溥仪出任伪满蒙共和国“总统”，陈劝溥仪复辟就要复“大清帝国”之辟，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18] 当他知道溥仪在郑孝胥等人的挟持之下，已成为日本关东军笼中之鸟，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之时，这个梦寐恢复“大清帝国”的八十四岁的“帝师”，最后向溥仪洒泪告别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19] 陈匆匆回到天津，随后迁回北平，离开了相随二十三年的废帝。1932年秋和1933年9月虽两度至长春见溥仪，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皇帝”后，陈始终未在伪满任职。晚年常哀叹“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

1935年3月5日，陈宝琛在北平寓所病逝。

---

(1)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闽县陈氏1940年版，第28页。

(2)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上，第8页。

(3)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23，1933年铅印本，第23页。

(4)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22页。

(5)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42，第21页。

(6)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2页。

(7)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503页。

(8)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50页。

(9)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55页。

(10)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56页。

(11)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第15页。

(1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1852页。

(13) 陈宝琛：《沧趣楼文存》卷上，海澄陈氏读我书斋1958年版。

(14)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15)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16)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3页。

(17) 周君适：《伪满宫廷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18)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0页。

(19)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0页。

陈璧君

闻少华

陈璧君，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1891年11月5日（清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四）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其先辈在南洋槟榔屿经营橡胶业，渐成富商，至其父陈耕基时，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人，与陈耕基结婚后同去南洋。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之后派人到国内各地及海外华侨中建立同盟会分会。1906年9月，孙中山来到槟城，建立起槟城同盟会分会，以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1907年，汪精卫等为进行反清革命前来槟城，与陈璧君相识于蕊兰园吴世荣家，陈被汪的口才和仪表所倾倒。1908年，陈因活动积极，遂秘密加入同盟会。卫月朗同情革命，并随陈璧君前往新加坡会见孙中山，自己亦加入同盟会。陈璧君后来回忆说：“吾自与精卫相见于吴世荣君之蕊兰园，数往还，谈革命，遂加入同盟会。至新加坡谒总理孙先生。其初虑祸及家门，密不敢以告父母，既而察吾母明识有志节，且事不可终秘，乃具以告，备受谴责，而吾母乃欣然竟偕余复至新加坡谒总理，且毅然加盟焉。”(1)

由于1907年至1908年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均告失败，汪精卫决心回国进行暗杀活动。1909年，汪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组成暗杀团，赴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1910年4月事泄，汪精卫、黄复生被捕，汪被判处终身监禁。5月，陈璧君与黎仲实赴南洋筹款，还在香港成立营救汪的机关。

辛亥革命于1911年10月爆发。11月，汪精卫被释出狱。1912年初，汪精卫、陈璧君在上海宣布结婚，4月底到广州正式举行婚礼。8

月，汪精卫偕陈璧君前往法国求学。次年，移住于都鲁士，蔡元培、李石曾亦住在该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陈璧君前往巴黎，作为法国红十字会成员，从事救护伤员工作。1915年4月，汪精卫、陈璧君由法返国，汪去南洋进行声讨袁世凯活动，陈则到广州省亲。不久，又都回到法国。

1917年，孙中山电召汪精卫回国参加护法运动，陈璧君随后携全家回国。次年，陈在上海与汪一起从事党务政治工作。

1923年，陈璧君以恢复执信学校名义，奉命去美洲筹款，她不负众望，途经美国檀香山、三藩市等地及古巴、加拿大等国，耗时半年多，筹得款项三十多万元，缓解了国民党的经费困难，也为自己提高了声望。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年底，汪精卫、陈璧君随孙中山北上抵北京。

1925年初，由于孙中山身患重病，在京国民党中央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处理日常事务，陈璧君则协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召开于广州，陈璧君再次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委。2月，陈去汕头为执信学校募款十余万元。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不安于位，陈璧君陪汪于5月去法国养病。

1927年，国内“迎汪复职”声浪甚高，陈璧君随汪精卫于4月1日由法国返抵上海，因与蒋介石等意见不合，于6日乘船赴武汉。

是年，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分共政变，陈璧君从此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11月，陈公博、黄琪翔策划广州驱李（李济深）事件。12月，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由于这两件事，汪精卫等在国民党内受到责难，汪、陈被迫悄然离国赴法。

1929年，汪精卫、陈璧君旅居法国，陈公博亦往法国小住，并向汪精卫汇报改组派情况。陈璧君一再动员陈公博回国进行反蒋活动。3月，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等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抨击蒋介石包办国民党“三大”，指出：“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2)] 从而否定“三大”的合法性。

1929至1930年，陈璧君随同汪精卫、陈公博等先后策动张发奎、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发动军事行动倒蒋，均以失败告终。陈璧君陪同汪精卫寓居香港，静观形势发展。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的冲突，引发了反蒋派的又一次大联合，陈璧君随汪精卫赴沪参加会议。蒋介石利用“非常会议”各派矛盾，对汪进行拉拢。陈璧君、顾孟馀等则去南京，与蒋密商汪、蒋合作条件。陈璧君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又一次当选中央监察委员。

1934年1月，陈璧君任党务审查组委员。11月，汪精卫、吴稚晖与陈璧君等为在南京郊区建筑平民住宅事，发起募捐。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陈璧君怀疑刺客系蒋介石的特务所为，对蒋大加指责，从而增加了汪、蒋矛盾。同月23日，国民党五全大会闭幕，陈璧君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陈璧君在汪精卫出国疗伤期间，留在国内注意政治风云变幻，随时向汪通风报信。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陈、汪之间一时函电交驰。陈敦促汪：“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汪回电称：“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3)] 当汪于1937年1月回到上海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汪、陈打算落空。

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汪精卫、陈璧君寓重庆上清寺。此

前，汪精卫与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成员互通声气。汪还通过周佛海先后派遣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香港与日方特务秘密勾结，并在上海重光堂（土肥原公馆）与日方签订卖国密约。11月，当梅思平携密约返回重庆，经过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等连日讨论，陈璧君力主外逃降日。

此前，陈璧君为了汪精卫出逃方便，以视察锡矿为名来到昆明对龙云进行拉拢，谋借路外逃。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等伺机逃出重庆赴昆明。19日，这一伙人又乘龙云专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开昆明，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发出近卫首相的招降声明（即《调整对华外交方针》）。29日，汪精卫则发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1939年3月21日，河内汪精卫寓所发生了军统特务枪杀曾仲鸣（目标系针对汪精卫）的事件。汪精卫、陈璧君等感到危机四伏。日本政府即派影佐祯昭、犬养健等营救汪精卫等人。4月29日，汪精卫、陈璧君一伙终于登上日本派去的“北光丸”轮船。5月6日抵上海，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随后，汪、陈等又搬进愚园路1136弄的一所豪华公寓。

7月13日，重庆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璧君等人党籍，并下令通缉。8月，汪精卫盗用国民党名义，召开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陈璧君被选为伪中央监委常务委员。

1940年1月，高宗武、陶希圣从上海逃往香港，宣布脱离汪伪。其时，汪精卫正在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商讨汉奸合流问题。在上海留守的陈璧君，命令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辟谣”的谈话。陈璧君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3月初，陈璧君亲自跑到香港，对汪精卫的老搭档陈公博连骂带劝，拉到上海筹组伪政府。

1943年，陈璧君以伪中监委常委名义“视察清乡”。她率领伪内政部长陈群、陆军部长叶蓬、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及曾醒、方君璧等男女随员多名，包了一节专车，从上海到杭州。沿途欢迎标语一律用“陈委员”而不用“汪夫人”字样。在杭州大吃大喝一通之后，就忙于逛商店，买特产，车厢几被物品塞满。

汪伪时期，广东成为陈璧君的独立王国。她作为伪中央代表坐镇广东，名义是“广东政治指导员”。1941年，在陈璧君的策划下，陈耀祖任广东省主席。陈璧君在广东肆意搜刮，还为汪精卫歌功颂德，1942年5月，汪精卫六十虚岁，陈璧君特意指示陈耀祖为汪举行祝寿典礼。

1944年3月，陈璧君陪同汪精卫去日本治病。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病死，陈护送汪的遗体返回南京。其时在广东的陈耀祖已被刺身亡。1945年3月，陈璧君逼着伪府代主席陈公博同意褚民谊去广东主持粤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5日，陈璧君、褚民谊被军统局在广州诱捕入狱。翌年2月，陈璧君等又经南京转送苏州狮子口监狱。

1946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以“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4)]。宣判后，陈璧君对法官说：“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要上诉，因为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5)]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陈璧君由苏州监狱移往上海提篮桥监狱拘押。陈体弱多病，人民政府在注意其思想改造的同时，对其生活予以适当改善和及时治疗。1951年，陈璧君写下《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的交待材料。1955年，陈璧君主动要求到苏北劳改农场劳动，鉴于她的身体状况，未予批准。1959年3月，陈璧君

病情加重，移送监狱医院住院疗治。6月17日，陈璧君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

---

(1) 陈璧君：《我的母亲》，张江裁等撰：《汪精卫先生行实录》，东莞张氏拜袁堂丛书1943年版，第3页。

(2)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3) 蔡德金辑：《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近代史资料》总60号。

(4)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5) 转引自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4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1年版，第90页。

陈炳焜

刘立道

陈炳焜，字舜琴，1868年11月11日（清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广西马平县（现柳州市）一个破落仕宦家庭。因生活困难，陈炳焜幼年随母到陈团村刘姓地主家帮工，伴地主之子在私塾读书四五年。长大后，听说边关谋事较易，于1885年前往龙州，在广西提督衙门当戈什哈（满语，即卫士）。因稍通文字，聪明能干，为提督苏元春所赏识。陈在提督衙门五六年，学到了很多官场礼节和公务处理知识。先后认识了马盛治、陆荣廷、谭浩明、林俊廷等人，并与陆结为把兄弟。1891年，陈因事被提督苏元春斥责，愤而离去，投靠统领马盛治，被委为镇南营哨长。由于对部队的整顿训练有成绩，不过三数年，得越级升充管带。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清政府将镇南营、熙字营和健字营合编为荣字营，以陆荣廷为统领，统兵十营，陈炳焜擢升营务处（略等于助理帮统）兼附中营管带，深得陆的信任。陈精明强干善交游，与荣字营的管带如谭浩明、林俊廷、韦荣昌等关系极为亲密。

这年5月，柳州附近会党游勇推陆亚发为领袖举行起义，藩司王芝祥急调陆荣廷率部镇压，陆荣廷将附中营及附左营、附右营共三营交陈炳焜指挥，防守镇南关（今友谊关）、龙州、水口一带边区重地，营务处设在关前隘。翌年，起义军及所属游勇会党先后被平定，陆荣廷调任左江镇总兵，回驻龙州，陈仍驻守关前隘。

1907年12月，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占领了右辅山炮台，守炮台的正是陈炳焜的附中营前哨哨长。清廷限令陈炳焜克日夺回炮台，否则即予严办。陈炳焜等疯狂反扑，终于从革命军手中把炮台夺回，清廷遂免治其罪。

1908年春，清政府在龙州开办广西陆军讲武堂和学兵营，陆保送陈进讲武堂受训。毕业后，适值广西新军成立，陆又保荐陈为新军第二标标统。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西于11月7日宣布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为广西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和陆荣廷为副都督。不久，沈、王辞职离桂，陈炳焜等乘机拥陆荣廷为都督。1912年2月，陆委陈为都督府军政司司长。1913年4月，北京政府特任陆荣廷为广西都督兼广西民政长，他将全省军队改编为两个陆军师，任陈炳焜为第一师师长，驻桂林，谭浩明为第二师师长，驻龙州。

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陈炳焜帮助陆荣廷逮捕过境的革命党人，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1914年7月，陈炳焜以第一师师长兼任桂林镇守使，主持桂林军民两政。

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在各省培植私人势力，9月派其亲信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对陆荣廷进行监视。陆一面联合王祖同上书劝进，表示拥戴袁，一面称病回武鸣原籍休养，暗中进行倒袁活动，而调陈炳焜来督署暂代行代拆。1916年3月15日陆通电广西独立讨袁，亲率武卫军进军湖南，派莫荣新等进军广东，以陈炳焜留守南宁。5月，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陆荣廷、陈炳焜均为抚军。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黎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陈任督军后，认为政局变动莫测，决心整军经武，于1917年5月创办了学兵模范营，以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马晓军为中校营长、马子骏为少校营副，陆军大学毕业生朱为珍、曾致沂、黄旭初、苏端分任一、二、三、四连连长[(1)]。

1917年春，陆荣廷受任两广巡阅使，陈炳焜调任广东督军，谭浩明接任广西督军。不久北京府院之争加剧，陆荣廷以总统黎元洪受到威胁，遂于6月20日授意陈炳焜、谭浩明宣布两广自主。7月，孙中山率领部分海军军舰南下广州护法，陈炳焜秉承陆荣廷的意旨，口头上

欢迎护法，实则多方进行破坏。如广东警卫军是广东省长朱庆澜收编龙济光余部扩编而成，共有40营，朱欲交孙中山作北伐使用，陈炳焜借口军权须统一于督军，企图吞并以扩大私人势力。后经林虎等人斡旋，陈炳焜始允拨20营交陈炯明组成援闽粤军。又如朱庆澜出走后，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陈不予承认。广东各项税收，均为陈所垄断把持，他拒绝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企图从经济上扼杀军政府。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力量所不能容忍的。加之陈炳焜任广东督军期间，与其参谋长秦一民在广州包烟包赌，贪污掠夺，大饱私囊，深为粤人所痛恨，陆荣廷为缓和矛盾，不得不于1917年11月调陈回桂会办广西军务，1918年6月又委他为广西省长。但因陈刚愎自用，不大听陆的话，做事操切，不得人心，任省长一年即辞职，回柳州家中闲住。

1920年8月，桂系通过军政府下令进攻援闽粤军，孙中山命令在闽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在粤势力，桂军败退回桂。陆荣廷等不甘心在广东的失败，1921年4月欲再次进攻广东，陆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护军使，在梧州组织护军使署策划东进。以韦荣昌、刘震寰等部为攻粤中路军，驻贺县一带的沈鸿英部为左路军，驻玉林一带的黄业兴部为右路军，其余部队统为谭浩明指挥，策应各路，作进攻广东的准备。6月，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分三路进攻广西。陈炳焜的中路军在梧州首先失败，粤军水陆并进，长驱直入，桂军左、右两路军接踵溃退。陈见大势已去，无法挽救，匆匆跑回柳州，携带家属经湖南逃往天津。以后在香港、天津过寓公生活。1926年，返柳州原籍。1927年9月1日在柳州病死。

主要参考资料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1960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辛亥革命资料》，1962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1964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重印本）、《广西文史资料》第16辑（1983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黄绍竑：《五十回忆》。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

---

(1) 黄绍竑：《五十回忆》（上），云风出版社1945年版，第37页。

陈布雷

严如平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浙江慈溪西乡宫桥（今属余姚）人，1890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生。先世务农，祖父陈克介以经营茶业往来于赣浙间，置有田产。父亲陈依仁继承祖业，生有子女七人，陈布雷居长。

陈布雷五岁入塾，兼受父亲及从兄陈训正（屺怀）启蒙之教，读《诗经》、《论语》等经传，备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在邻村蒙馆兼习数学，又爱读译本新书。十三岁时入县应童子试，继应府试、院试，次年成县学生。不久，清廷废科举，普设新学，陈于1904年入慈溪县中学堂，除学文、史外，并习普泛之科学文化知识。他在从兄和进步教师的启迪下，披览倡导维新自强的新书报，试与同学秘密组织“覆满同志社”，成为后来革新思想之滥觞。

1906年初，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数月后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陈布雷受到爱国师生民族革命思想影响，并阅读《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新书报，救亡图存的思想益增，初任校友会书记；后因清政府借英款将沪杭甬路“收归国有”，浙江各界组织浙路拒款会反对，陈被推为学生代表之一，奔走呼号甚力。但居常仍潜心学习与作文。

1911年初，陈布雷在假期由慈溪赴杭州时途经上海，寄寓陈训正主政之《天铎报》社，曾代戴季陶在该报撰述言论数篇，以“布雷”[(1)]署名。是年夏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即应聘为《天铎报》撰述记者，开始了记者生涯。他与当时在上海主办《民立报》的宋教仁、于右任等有过从。10月武昌首义爆发，上海尚在混沌之时，各报多未敢

公开谈论革命，陈以《谈鄂》为题连撰十篇，按日载于《天铎报》，初露锋芒。嗣后又写数篇反清专制与反封建的时论，鼓吹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写有《告友邦人士书》，陈以流畅的文笔译出，经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校阅，于《天铎报》首次刊出，蜚声一时。当时他年少气盛，锋芒显露，为《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所忌，乃辞职归里，至宁波效实中学执教。他课余好读英、法文书报，遂应《申报》聘为特约译述员，译文多署名“彦”。是年3月同盟会浙甬支部成立，陈加入为会员。

1914年7月，陈布雷遭父丧，因弟妹众多，皆未成年，家族乡里诸事又俱待规划、处理，乃辞去教职，归里主持家务，克尽孝悌之道；并经管义田会等宗族款产及本村水利、治安、施舍等公益事务。为此，他熟习珠算及权量等术，整理田册账目，甚至巡行田亩间，按图对照，悉心管理达五年余。后期复在效实中学兼任教职，并任校长一年。1920年6月，他应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参加《韦氏英汉大辞典》编译工作。

1921年1月，陈布雷至新创刊之《商报》，任编辑主任，重新开始了报人生涯。他勤奋笔耕，夙夜孜孜不倦，每周撰社论五篇，星期日撰一短评。其论评先重政治，渐及文化、工商、社会、国际时事等，文笔犀利而富有情感，为时人及报坛所称重。他诛伐曹锟贿选，刚健有力；为鲁案对日直接交涉事，与《中华新报》笔战旬日；哀悼孙中山逝世，撰《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驳《时事新报》之谬论；“五卅”惨案起，更每日撰论鼓吹呼号。《商报》声誉渐增，颇为广大知识分子及青年所喜爱，发行量日增，社会影响甚大。《国闻周报》特约陈每周撰一“时评”；中共中央主办之《向导》周刊也曾转载陈撰之时论并加评注。但是他于曹锟被逐后，一时曾产生政局已趋向改良的错觉，对段祺瑞执政府之政策措施，多以善意之辞述论，其政治上之短视与言论上之不彻底时有反映。

1926年7月国共合作兴师北伐，陈布雷在《商报》详加报道，鼓

吹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打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国民革命之旗帜颇为鲜明。其时蒋介石四处罗致人才，郭沫若和李一氓乃推荐陈布雷，以期对蒋施加民主进步的影响而减少对革命的损害。1927年1月，陈与《商报》编辑潘公展同赴南昌见蒋介石。蒋对于温和谦恭、博学多才、文笔犀利、又是浙甬同乡的陈布雷极表器重，与陈多次晤谈，意欲留他在自己身边工作；并亲自与陈果夫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陈布雷感激其知遇之情油然而生，欣然承命代拟《告黄埔同学书》等文稿，深得蒋的嘉许。但陈表述自己的志趣是做报人，乃于3月返沪。此时上海已为工人武装起义成功所解放，但未逾一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风云骤变，陈布雷4月先被张静江延揽至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一月后又被蒋介石召至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他进入国民党中枢后，耳闻目睹，“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2)]。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之下被迫下野，陈布雷在为蒋拟就《辞职宣言》后，亦离南京返里。10月到上海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重操报业。

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欲任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陈坚辞不就，在南京住一个月后回到上海，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并与戴季陶、周佛海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但每当蒋要发表重要文告、讲词时，他常被召去南京拟撰。是年7月及次年6月，还随蒋北行，代拟《祭告总理文》等文告及讲词多篇。

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被蒋介石安排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陈多次上书力辞，未果。8月，陈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屡辞不获，乃离开新闻界步入国民党政坛。翌年12月，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命陈至南京为常务次长，嗣后又改任政务次长，并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虽兼任要职，事务繁冗，但其大量精力仍耗于为蒋代撰各种文字。他认为仕途多舛，自己

性格不近于从政，故在南京没有安家，只在旅馆租一室暂住，以待机会辞离而去；他亦阻止子女报考中央政治学校进入政界，而鼓励选择农、医、理、工等专业攻读，告诫他们："人贵自主，但求一艺随身，即可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3)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不战而侵占我东北全境，全国人民极为愤慨，反蒋派系乘机倒蒋，蒋介石被迫于12月宣告下野。陈布雷本欲乘此机会引退，但被国民政府再度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重回杭州任职两年余。陈力谋促进本省教育事业，先后创设温州师范和金华农业实验学校，推广乡村小学，推行师资进修，发展民众教育，充实省图书馆等。但仍常被蒋召去佐笔札之役。

1934年5月，陈布雷被蒋介石调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一批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从事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审议，以及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从此，陈布雷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或议事、或撰文、或咨询、或承命特办某事，朝夕相随于蒋之左右。他抱着"扶助明君安邦治国"的幻想，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意旨。

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东北后进而染指华北，民族危机严重，但蒋介石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集兵力大举"剿共"，而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面对侵略野心不可遏制的日本帝国主义，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于1934年10月去奉化溪口住了十天，助蒋撰一题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劝说日本军阀改变侵略的妄念。该文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徐树铮之子）署名，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引起中日朝野及舆论界之广泛注意和种种猜测。

1935年2月起，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掌管秘书（第四）和研究（第五）两组；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已集全

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日夜丛集的机要文件、函电往来，除军事方面归侍从室第一处外，其余均经陈之手办理。是年蒋去川、滇、黔整顿军政，翌年又出巡两广，陈皆随往，受命联络地方行政官员归附蒋氏。惟其主要职责仍在撰拟蒋之重要文稿，就连蒋介石五十岁时的“感言”《报国与思亲》，也是陈代为构思与执笔。

1936年12月，蒋介石去西安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陈布雷因病未随行。12日张、杨兵谏，蒋被拘，陈自以“近臣”而未共患难，怅惘若失，在南京扶病奔走，力主事变和平解决。由于中共的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之后，于26日返回南京。陈立即奉命将蒋被迫承诺条件的口述伪撰成《对张杨之训词》发表，之后又向壁虚构蒋在事变中被扣与得释经过之《西安半月记》。虽奉命勉强写出，但内心痛苦不堪。他曾在对其知友的信上，写过这样充满郁愤的话：“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4)] 他慑于蒋命，一再违心撰文，沉溺于苦闷矛盾之深渊，只能发狂暴之愤怒于文案，以致一度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昼则畏烦。

陈布雷跻身国民党统治中枢，日益洞悉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之种种内幕，很是失望。他洁身自好，忧郁寡欢，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竭力回避派系之争。陈立夫曾于1935年胁迫他入CC系，他当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决不参加[(5)]。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国民党蒋介石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陈布雷受命拟撰之《自卫抗战声明书》、《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等，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抗御的意志。此时，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回国投身抗战，陈力劝蒋以抗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撤销过去的通缉令，并委郭以重任。抗日战争前期，陈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嗣后又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但他所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之职一直未变，负责上下行文的承转和处理，对各方条陈或

请示裁决之件，则先加签拟，供蒋介石最后审择决定。他仍在蒋身边供笔札之役，承命起草重要的文告和讲词；同时对重大问题搜集材料，分类研究，供蒋咨询。1938年3月，蒋介石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陈奉命撰改《宣言》、《告青年书》等，并参与修改章则规制，事后被指定为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

陈布雷虽已成为蒋介石的幕僚翊赞左右而不能自立，但他仍怀恋文士生涯书生心境。194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动重庆文化界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陈布雷欣然应允签名为发起人，除给郭写贺信外，还赋诗相贺，有“文士心情金石通”[(6)] 句。他虽身居显要，惟砥节砺行，除邵力子、张治中等知己外，很少与政界军界人士往还，然与报人、学士有较多联络。他对浙江大学的西迁、治理以及经费、设备等，常加以关心，尽力支持校长竺可桢任事。他曾委婉地向蒋介石建言抗战建国要有清明的政治，并想自己也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

陈布雷居官廉洁淡泊，生活简朴俭约。他对于国民党官僚权贵搜刮民脂民膏，十分痛心，曾在人前贬责陈果夫、陈立夫：“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7)] 他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披肝沥胆，日复一日唯命是从地为蒋撰写一篇又一篇文告、讲词，殚思竭虑，心力交瘁。对此，蒋介石是有所知的，除在陈体力不支时给予休假外，还投其所好，使陈得到他人所得不到的尊重。当陈五十岁生日时，蒋揣度陈之性情与好尚，在一信笺上亲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以为褒奖，而作羁縻。这更使陈增加感激图报之念。当时驻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曾托陈的外甥翁泽永转言陈：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闻言感叹不已，为“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而哀伤，曾云：“我不过是一个记

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8]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悍然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全面内战。陈布雷奉命负责筹组和主持“中央戡乱宣传小组”，定期召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防部政工局长等人开会，共同研讨宣传方针，策划各种舆论，指挥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戡乱建国”的宣传，被国民党众人视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他还常以国民党发言人身份发布重要新闻和声明，并协同有关方面改组《申报》、《新闻报》等许多大报，以加强对新闻舆论的箝制。

陈布雷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逐渐由幕后被推到前台。1946年11月，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陈布雷衔蒋之命，与青年党、民社党首领左舜生、陈启天、张君劢等往来商议，予以拉拢。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28人任国民政府委员，陈列名其中。1948年3月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陈被委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并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枢各重要会议，并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参与运筹党政大事。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溃败，反动统治岌岌可危。陈布雷虽然身居辅翼权臣之职，但丝毫拿不出经邦济世的方案来，只是疲于奔命地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各种差事。他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期的种种腐败状况，耳闻目睹，饱受刺激，“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9]，“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10]，觉得自己“脑筋已油尽灯枯了”[11]。1948年8月，蒋介石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和外币，激起了更大的民愤；9月辽沈决战展开，虽经蒋介石三飞沈阳亲临督战，但至11月2日仍以国民党军47万人被歼而告终。11月6日，以逼近南京的徐州、蚌埠地区为战场的淮海决战又揭开战幕，国民党统治面临朝不保夕之势。敏于时局变幻的陈布雷，心情极度沮丧，对于蒋介石交办之事无力承受，神志恍惚，进退无措，“常诵‘瓶之罄兮，维罍之耻’之句，抑

抑不可终日”[12]。他痛感自己已经不能自拔，终于在写了十几篇遗书后，于11月13日凌晨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南京，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陈布雷一生撰述之政论、时文及代拟之文稿难以数计，死后有其1936年和1940年手写之《回忆录》一、二两集于1949年初合成一册由上海廿世纪出版社影印出版。台湾于1984年出版《陈布雷文集》，辑有他在《天铎报》、《商报》、《时事新报》发表之部分社论、短评，1930、1934年八篇讲演、部分函牍、遗书及诗等。

---

(1) 陈布雷原名训恩，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因脸型圆如面包，被同学戏呼为bread。陈乃以bread之谐音布雷。署名撰文于是时始。后以布雷之名为世人知，训恩、彦及、畏垒等名、字反为所掩。

(2) 陈布雷：《回忆录》（二）（1940年6月），《陈布雷回忆录》后半册，上海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1月影印版，第12页。

(3) 陈过：《我的父亲陈布雷》，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4) 陈布雷致董桢柯函（1937年初），陈训慈藏。

(5) 据陈布雷之弟陈训慈告笔者，陈布雷生前曾对其亲友、部属谈起：1935年某日，陈立夫以小轿车接他去南京郊游，车至一偏巷楼房，走进中厅，即强迫他对设有香烛供设之祭坛行礼，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并迫其在一誓书上签字。回到市寓，他即对陈立夫说：“这样强迫是无效的。”陈布雷当日即将此事详细经过报告蒋介石，并云：“在你左右，只有不偏不倚，才可做事。陈立夫这样逼我做，我不承认。”蒋介石即表同意，并批评了陈立夫。

陈布雷与CC无关一点，并参见《张治中回忆录》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6) 陈诗共四绝，此为第四绝第二句，但陈芷町代书在立轴上时，改变“相惜文心脉脉通”。全诗为：“滟澦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低徊海

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徵起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刻骨辛酸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长空雁阵振秋风，文士心情金石通；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手稿翁泽永藏。

(7) 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陈布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8) 转引自植耘（翁泽永）：《陈布雷的笔》，《新观察》1981年第9期。

(9) 陈布雷致陈训慈、训悆、叔同之遗书（1948年11月），《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0日。

(10) 陈布雷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之遗书（1948年11月），《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0日。

(11) 陈布雷自杀前两天手写的一篇“杂记”（1948年11月11日），《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

(12) 陈布雷致蒋介石之遗书（1948年11月），《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

陈策

陈开科

陈策，原名陈明唐，字筹硕，国民党海军上将，生于1893年，海南文昌县白延区沙港村人[(1)]。

陈策自幼聪慧，三岁随父至新加坡，八岁回国。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广州“广东海军学校”[(2)]，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参与成立“海校同志会”反对袁世凯，事败出走香港。1916年，陈策毕业于广东海军学校第15期，旋入粤海军服役。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浪潮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及护国军等讨袁力量，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和续开国会的主张，获得各方政治势力的赞同。8月1日，国会复开，南北出现暂时的政治“调合”局面。1917年夏，北京政府围绕“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黎、段分裂，安徽督军张勋趁机率“辫子军”入京复辟，迫黎下台。段祺瑞则在天津马厂誓师，打着“再造民国”的旗号把张勋赶走，拥冯国璋为总统，自任国务总理，声称既然已“再造民国”，便用不着恢复过去的《临时约法》及续开过去的国会。在此背景下，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发起“护法运动”。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率第一舰队林葆怿等南下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8月25日，部分至粤议员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随即，孙中山筹建粤军。1918年初，以陈炯明为司令的援闽粤军誓师进攻福建北洋军阀，开始了护法军事行动。

1919年，援闽粤军决定回师广东讨逆，孙中山派孙科到澳门以特

派员身份成立办事处，号召粤海陆军起义响应。孙科的办事处设在澳门峨嵋街十号，广泛接触各类人物，委李绮庵为讨贼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委陈策为副总司令。陈策就职后，与李绮庵、周之贞等常在澳门谋划广东海军起义。陈策主张利用海军系统内部派系纷争的局面，充分依靠广东海军学校14、15期的毕业生约九十二人，促成海军起义。在陈策的串联下，不久即引同学丁培龙、李福游二人来澳门与孙科接触，孙科委丁为广东舰队司令、委李为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并派丁、李回广州动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丁、李共动员了广东海校14、15期同学共十五人、另水兵十余人。但是，进展非常缓慢，直到6月份，广东海军仍然没有举动，孙中山非常焦急，曾从上海专门发电催促。孙科便召集陈策、丁培龙等人开会，传达指示，要求尽快动员海军起义。于是，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陈策等人决定于7月15日仓促起义。结果，由于举行起义的江大、江固等舰措施不周、大部分官兵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用人不当等种种复杂原因，导致起义最终失败。败兵逃至澳门，又遭到葡萄牙殖民政府的镇压，陈策被俘，经孙科交涉，以5000元担保出狱，其余起义官兵约有十六人遇难。1921年，陈策、丁培龙等将十六个殉难烈士的遗骸由澳门运回广州，迁葬于沙河海军坟场，竖“江大舰殉难烈士之墓”碑，以资纪念[(3)]。

1920年8月，援闽粤军誓师回粤讨伐旧桂系。收复汕头后，孙科又召集陈策、丁培龙等商议动员粤海军起义响应。但此时广州的局势非比寻常，更趋复杂，原护国军第五军司令兼广东全省警务处长、广东省会警察厅长魏邦平与广惠镇守使李福林等相勾结，亦在准备利用粤海军起义响应。因此，陈策、丁培龙实际上已经无法插手粤海军事务了。9月27日，魏、李联名宣布独立，成立魏、李联军司令部，下设舰务处，魏邦平的亲信龙荣轩被委任为处长，统一指挥粤海军各舰。10月28日，桂系莫荣新率残部退出广州，陈炯明立即任命周天禄为广东江防司令。此时，孙科率陈策、李绮庵等亦达广州，由于海军方面已插不上手，为表彰陈策等有功人员，孙科只好建议安排陈策为抚河船务管理局局长。

1920年12月初，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陈策先被任命为长洲要塞司令，后又被任命为广东省江海防司令[4]。

1921年4月7日，国会召开非常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并于5月5日宣誓就职。陈炯明被委任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然此时陈炯明却热衷“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组织民国政府。1921年8月初，粤军击溃桂军，统一两广。8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北伐，以谋国家统一，但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曾多次得助于海军，但此时的海军情况却很复杂。自海军司令程璧光被刺后，南属的北洋舰队为福建籍官兵掌握，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甚至与其他军阀勾结，为此，孙中山决定对海军进行整改。1922年春，孙中山召见广东江海防司令陈策、北洋舰队同安舰舰长温树德、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等，共同商议海军内部整改。具体计划为：“（1）提拔山东、广东和各省籍的官兵，清除福建籍官兵；（2）由广东江海防司令部的各舰以武力解决北洋舰队，同时各舰内非福建籍官兵，在舰内发动和内应；（3）由长洲炮台以各炮威迫海圻、海琛、肇和三主力舰，和监视其就编。”[5] 可见，此次统一海军的整改行动，实质就是依靠陈策的广东江海防舰队武力解决福建系掌握的北洋舰队。4月27日，趁福建系官兵假日照例上岸娱乐的机会，在陈策等指挥下，江海防各舰立即袭击北洋舰队，舰内非福建系的官兵也群起内应，夺取军械，封锁炮位。于是，江海防各舰官兵遂顺利占领北洋各舰，整改行动成功。同日，海军护法舰队全体官兵发表通电，声讨林葆怿等闽系人物，宣言拥护孙大总统，候命北伐。4月29日，孙中山任命温树德为海军司令，陈策为海军陆战队司令，马伯麟继陈策为长洲要塞司令，并重新任命各舰舰长。但是，整改后的粤海军仍然不脱地域派系之争。主力三舰海圻、海琛、肇和的舰长都由海军司令温树德推荐，且均为其旧识，而永翔、永丰、楚豫、福安、舞凤五舰的舰长则由陈策推荐，均

为其江海防旧部。尤其是海军司令温树德，坚持各舰人事由其直接控制，遂大肆安插其旧友同事。旧派系消除了，新派系却又诞生了。

1922年6月，北伐军大举攻入江西，取得巨大胜利。谁知，陈炯明及其部下叶举等人却准备叛变革命。1922年6月1日，孙中山从韶关返回广州，车抵黄沙后，陈策即派小舰迎孙中山直达天字码头，安全回抵总统府。6月14日—15日，陈炯明布置叛乱，计划进攻总统府。这个消息为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及陈少白所获，陈策遂进言孙中山，提醒防止陈炯明的叛变[(6)]，并多次敦请孙中山暂离总统府，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仍坐镇总统府。于是，陈策便在宝璧舰上召集各舰长秘密开会，要求各舰严加戒备，防止事变。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革命。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的帮助下逃出总统府，登上陈策坐镇的宝璧舰。上舰后，孙中山亲拟讨陈电文，交陈策拍发。随后，海军司令温树德赶到，将孙中山迎上停泊白鹅潭芳村附近的永翔舰。但陈策等人信不过温树德，于是，陈策召集永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长招桂章、永翔舰长丁培龙等人聚集永丰舰开会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孙中山在永翔舰上不安全，决定迎孙中山驻永丰舰。但直接迎候会引起温树德等怀疑，于是，永丰舰开近永翔舰，全体官兵大声请战，要求开炮还击叛军，并请孙中山过舰训话。就这样，孙中山被不着痕迹地转移到了永丰舰。17日，孙中山率领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舰艇由黄埔经车歪炮台直驶白鹅潭，向占据沙河、大沙头、观音山的叛军炮轰竟日，但没取得什么效果，于是，舰队经中流砥柱炮台折返黄埔。此时，陈炯明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分化海军，经孙中山同意，海军司令温树德率“永翔”、“同安”二舰驶入省河，温和海军总长汤廷光与陈炯明的代表叶举签订《粤中海陆军之议和条件》[(7)]；另一方面，陈炯明唆使部下多次组织谋害孙中山的阴谋活动[(8)]，但由于陈策的坚定勇敢，阴谋始终未能得逞。7月底，由江西回师广东的北伐军平叛失败，不得已，孙中山于8月初乘英轮经香港转赴

上海，粤境全部沦入陈炯明之手。

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3月14日，委陈策为广东海防司令。陈策上任时，却遭到滇军委任的海防司令麦胜广的抵制。陈策遂率领江大、江汉、广亨、龙骧、东江等大小军舰廿余艘离开广州，到新会县的北街集中，设司令部于北街，在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领导下与陈炯明军对垒，协同讨陈军防守西江一带，与广州滇军所委任的海防司令部互相对峙。8月中旬，陈策所属江防舰队出动，配合黄绍竑所部歼灭盘踞广西梧州的反动自治军。当时，军费紧张，部分需要自筹，为此，陈策常派舰艇为商人护航。有一次，护航舰艇与中山县长朱卓文发生冲突。一气之下，陈策派军队赶走了朱卓文。朱卓文到大元帅府告状，中山先生认为陈策不对，遂下令免陈策海防司令职[(9)]。

在此期间，孙中山接受苏共代表越飞和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林伯渠等人的帮助，吸取陈炯明叛变的教训，决心“以俄为师”，重新探索中国革命。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主张，改组国民党，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创立黄埔军校，试图建立有别于旧军阀的“党军”。1924年8月后，广东海防司令部改组为建国粤军总司令部舰务处，由招桂章任处长。1928年，李济深主粤，将广东舰队改编为海防、江防、运输三个舰队，委任陈策为广东海军司令。

在大革命时期，陈策始终站在国民党右派势力一边，坚持反共，瞅准时机，杀害了前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乘坐法国邮轮经香港秘密回到广州，准备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当晚深夜，特务包围了李之龙在豪贤路136号的住所，李之龙被捕。次日，蒋介石得知消息，立即打电报给主持广州“清党”的李济深，命令将李之龙解往南京。李济深接电后，打电话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陈策，命将李之龙押到司令部来。然而，陈策却

于2月8日擅自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判处李之龙死刑，当即在红花岗处决。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陈策等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和编遣会议。李济深被蒋介石囚于汤山，陈策等人则接受蒋介石的密令，支持陈济棠任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主粤。陈策先行回粤，派海虎舰赴香港迎陈济棠入广州。随后，广东海军被改编为国民政府海军第四舰队，陈策任司令。这个时期，陈策坚决支持陈济棠，曾派舰队赴西江，阻止桂军入粤，但遭到部下的普遍反对。桂军失败后，陈济棠在广东站稳脚跟，陈策也跟着扩张军力。1930年夏，鉴于广东海军学校已经停办九年，海军初级军官后继乏人，陈策呈请南京中央政府海军部，拟复办广东海军学校，但未获批准。于是，陈策便从缉私款中挪用经费举办第四舰队服务员训练班，招收高中毕业生为学员，集训一年，教授英美海军学校课程，学员结业后充任舰队初级军官[(10)]。

1931年，蒋介石囚胡汉民于汤山。古应芬回粤，策动各方反蒋势力在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宣布另立“国民政府”（12月3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另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蒋对抗。陈济棠被委任为陆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司令。随后，陈济棠将广东海军改编为海军第一舰队，仍以陈策为司令。当时，陈策、张惠长（空军司令）、陈庆云（虎门要塞司令）三人交往甚密，都属于“太子派”，仗势孙科，飞扬跋扈，对陈济棠不假辞色。陈济棠为了独霸广东，常怀去陈、张之心，双方遂发生矛盾。次年初，陈策再次请求恢复海军学校，获西南政务委员会批准，校名为“黄埔海军学校”，陈策出任校长，三个月后，由刘永诰任校长，学制改为四五年，为粤海军培养了不少人才。

1932年，陈济棠趁张惠长离粤去南京之际，撤销其空军司令职务。随即，又撤销陈庆云虎门要塞司令职务，树其亲信。陈策为了保存势力，遂命中山、坚如、执信等数十艘舰艇集中到虎门外的赤湾、

伶仃洋一带；并令飞鹰、福安、海瑞、海强等舰及陆战队赴海南，交陈庆云率领盘踞琼崖，宣布成立“海军行营”，对抗陈济棠。陈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滞留香港。是年7月，陈济棠在调停无效之后出动空军轰炸，结果，海军主力舰“飞鹰”被炸沉，陈策的舰队遂星散，大部分舰艇归顺陈济棠，海军陆战队则为福建19路军谭启秀部收编，陈策赴欧洲考察海军。至此，陈济棠终于一统粤境。1932年7月，陈济棠将广东海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舰队，任命张之英为舰队司令[11]。

不久，陈策从国外回到南京，任军委会海军军令处长，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从外部分化瓦解陈济棠的海军。1935年6月，在陈策及军统特务的运作下，粤海军的“海圻”、“海琛”两舰倒陈投蒋。当时，两舰逃走匆忙，来不及添足燃料，只好先停在赤湾附近，然后派人到香港请求曾任“中山”舰长的陈滌出面帮助。陈滌是陈策的叔叔，他马上将此事电告陈策，陈策赶紧从军令处汇款给两舰，并亲自到香港将两舰引至南京。1936年，蒋介石再次派陈策坐镇香港继续分化陈济棠的海军。陈策到香港后，利用黄埔海军学校的关系进行渗透。5月初，陈策派私人代表袁良骅、李英杰两人到广州活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陈策决定对四艘雷舰下手，遂联络四位舰长，约定5月底起事。可是，临起事时，2、3号雷舰的舰长未能及时到舰，只有1、4号雷舰成功逃到香港[12]。

1936年7月，陈济棠垮台，陈策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将要塞守备营扩充为守备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策负责广东沿海防卫。鉴于广东海军战力较弱，陈策决定全力防守虎门，以炮舰海周、巡洋舰肇和为辅助，与虎门炮台互为犄角，构成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1937年9月14日，日海军来犯：“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向我虎门进攻，当即发炮迎击，肇和、海圻（周）两舰随即开炮助战，剧战至六时四十二分，我要塞炮击伤敌舰一艘，即相率向外逃，现我机追踪轰炸。”[13] 是役炮舰海周尾部中三弹，舰机损坏，死士兵二名，伤数名，日旗舰“夕张”号被击中，逃至伶仃洋

沉没，开抗战以来中国海军首次击沉日本军舰之记录[14]。此后，直到1938年3月份，在陈策的指挥下，虎门海军连续击退日海、空军大小数十次进攻。此时，陈策足疾严重，旋截左腿，此后人们便称他为“独脚将军”。

1939年，陈策被国民政府派到香港任军事代表并兼国民党港澳支部委员。当时，港英当局对日寇实行绥靖政策，不允许中国政府的两个驻港机构“中国军事代表团”、“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以官方身份公开活动，只能分别以“华记行”和“荣记行”的名称秘密活动。陈策利用他在香港的各种社会关系，配合主任委员吴铁城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工作：包括建立地下抗日武装力量、使用各种合法及非法手段组织运送物资到中国后方、帮助国民党要员转移重庆等。此外，陈策还与滞留香港的军令部副厅长郑介民一道，就香港英军作战计划及未来中英的军事合作等问题积极与港英政府联系。港英政府曾与陈策商讨万一日军进攻香港，中国军队加以援手的问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深圳河以北的日军亦同时发动对香港的进攻。10日，中国驻港各机构代表集会，成立“中国各机关驻港临时联合代表处”，统一港战中的指挥调度事宜，陈策被推举为主任委员。“联合代表处”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器重，特派港督代表麦道高（MacDougall，D．M．）、军部代表博若、警司代表米耶、华民司代表那夫等五位港英政府官员每天与中方交换情报，密切合作。11日，九龙半岛的英军仓促撤退，当时潜伏的日伪汉奸高呼“胜利”口号，大肆抢窃商店、仓库及居民住宅，一片混乱。港英当局急忙向陈策求援。陈策当即发动爱国的社团群众约一万五千多人，配合港英警察，巡逻街道，维持秩序，使九龙居民免遭荼毒。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Young，Mark）决定投降。投降前杨慕琦电话通知陈策，但陈策声称决不投降，准备突围。他的勇气和决心感染了英军，不久，英军远东情报局长麦道高、助理罗斯（Ross，Ted）、海军中将满地高、陆军作战课长高录、警察督察长鲁宾逊（Robinson，Bill）、陆

军上尉李美廉等十多名军官及部分士兵陆续来找陈策，要求与他一道突围。为此，英军拨给陈策六艘鱼雷快艇。

12月25日下午，陈策指挥着由72人组成的突围分队乘一艘小艇突围。他们在渡过香港岛与鸭脷州之间的海峡时，被日军发现。日军组织炮火对这支小分队进行猛烈的阻击。小艇很快被击毁了，陈策也在炮火中左手腕负伤，但陈策毫不退缩，他把假肢抛掉，带着艇上的官兵勇敢地跳入大海，奋力向对岸游去。经过一番努力，陈策在副官徐亨的帮助下，带着大队人马终于登上了鸭脷洲，接着乘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鱼雷快艇北上，到达平洲。陈策凭着多年的作战经验，带着突围分队找到了威震南粤的中共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游击队的帮助下，突围分队穿过日军封锁线，冒着炮火经惠州、增城，顺利到达韶关，受到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等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时，陈策因左手中弹，需要动手术，就留在韶关休养。至于突围分队中的英军包括3名军官、28名士兵则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后经贵阳、昆明，穿过缅甸到达印度，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1942年2月初，陈策在韶关河西医院养伤渐愈，国民政府电召陈策去陪都述职，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国民政府为了表彰陈策的功勋，特授予陈策一等干城勋章。而英国政府也没有忘记陈策。二战结束后，鉴于陈策在战前曾协力助战，战时又领导英军成功突围，为表彰陈策的功绩，英国政府以英国女皇的名义特授予陈策“帝国骑士司令勋章”（K．B．E．）[15]，盟军报纸则称陈策为中国的“纳尔逊”[16]。

1946年夏，陈策以广州军事特派员、广州市长、盟军联络官、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港澳区党务督导员等显赫身份[17]，由重庆率大批亲信到广州上任。据有关资料记载，陈策到广州后，虽然安插过一些亲信担任关键部门如房产局、交通局的长官，但未闻其有贪赃枉法的行为，有别于四大家族及其亲信贪官[18]。由于战后广州政事日繁，混乱不堪，陈策劳心日甚，致使胃病复发，加上足疾趋

烈，遂辞去市长职务，简任国府顾问，专事调养身体。1948年冬，余汉谋力邀陈策出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共同防卫华南。陈策苦辞不果，遂于1949年初就职。是年夏，陈策发妻去世，他悲痛过甚，加之忧劳过度，遂于8月31日在广州海军联谊社寓所突然去世，死后葬于广州市郊海军坟场，追赠“海军上将”衔。

---

(1) 李达生：《我对陈策的记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文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编《文昌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政协广东省文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1984年，第11页。

(2)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陆军武备学堂及实学馆，后改名为广东水陆师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水、陆分开，陆军设速成学堂，水军设广东水师学堂。1912年，广州军政府将之改名为广东海军学校，不久之后停办。1932年，陈策任海军舰队司令时复校，改名“黄埔海军学校”，1938年，迁至柳州，旋即停办。关公健：《广东海军学校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第36—45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年。

(3) 胡应球：《孙中山驱逐桂系莫荣新发动江大等舰起义的计划和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5—176页。

(4) 黄雄、高鸿藩：《辛亥革命后广东海军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第8页。

(5) 胡应球：《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1965年，第3页。

(6) 林廷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粤军史实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7) 《粤中海陆军之议和条件》，《晨报》1922年6月25日；《粤海军条约签字后之况》，《申报》，1922年7月1日。

(8) 《陈炯明叛变和割据东江、潮梅及滇桂军祸粤时期》，《广东文史

资料》第43辑，1984年，第167页。

(9) 黄雄、高鸿藩：《辛亥革命后广东海军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第10页。

(10) 何炳材：《黄埔海军学校沿革及校友业绩》，《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第138页。

(11) 高晓星：《南京政府“统一”全国海军及其军事行动》，《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81页。

(12) 许燿震：《陈济棠统治时期的广东海军》，《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1964年，第80—82页。

(13) 夏军选辑：《陈策致蒋介石等密电》，《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第35—36页。

(14) 饶品良：《广东海军对日作战研究述略》，《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第78页。

(15) 詹德能：《陈策和徐亨香港突围记》，《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1985年，第105—119页。

(16) 张园：《陈策香港突围记》，《湖北档案》2008年第8期，第42页。

(17) 《民国人物专辑》（一），《文昌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第19页。

(18) 何崇校：《陈策二三事》，《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第122页。

陈长捷

汪仁泽

陈长捷，字介山，1897年6月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生于福建闽侯。陈家世代务农，父亲陈大焜早年曾任地方小吏，中年病故，家境贫寒。陈长捷七岁入本村私塾就读，后受乡亲资助进福州师范学堂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参加学生军。1917年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学习，其间与第五期同学傅作义、李生达、王靖国等结为知友。

1919年陈长捷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应傅作义之邀，到太原任晋军步兵第七团见习官，后逐级提升为排长、连长、团附、代理团长、旅参谋长等职。

1927年6月，阎锡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9月率部向奉军发起进攻。时陈长捷已升任晋军第十五旅旅长，在天镇一带布防。不久晋军张荫梧部在宣化被奉军击败受追击，陈率部阻击奉军营救张部，以战功受阎传令嘉奖。翌年3月，陈长捷率部向河北涞源进发，击败奉军，与晋军李生达、李服膺等部会合，5月下旬共同攻克保定，6月初进入北京。由于陈在对奉作战中战绩卓著，被升为第九师师长，驻天津小站。

1928年12月，陈长捷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少将师长，归属李生达的第四军。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陈部奉命沿津浦线南进，6月攻占济南，继而进攻泰安，与蒋方马鸿逵、夏斗寅部激战于兖州、曲阜一带。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冯、阎军腹背受敌，不战自溃，陈部随晋军撤回山西。嗣后晋军受张学良整编，第十二师缩编为第二〇八旅，陈任旅长，移驻晋中

地区。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江西苏区工农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陈长捷奉命率部开抵江西吉安前线，广筑碉堡，向苏区推进。红军长征后，陈部移驻遂川、万安地区。1935年初，阎锡山将晋军全部撤回山西，调第二〇八旅等五个旅入陕增防。陈率部在绥德境内筑堡推进，在虎儿坞一带曾遭红军伏击，激战后到达义合镇，此后严守碉堡线，不敢轻动。

1936年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陈长捷率第二〇八旅撤回山西柳林进行阻击。后又西进石楼，并在隰县一带修筑碉堡。7月，第二〇八旅扩编为第七十二师，陈升任师长。其后该师曾拨归第十三军汤恩伯指挥入陕与红军作战，沿黄河北进占领米脂、葭县（今佳县）等地。1937年春，陈师南移山西浑源、应县间，修筑恒山、雁门关以北的国防工事。

是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晋绥两省为第二战区，陈长捷第七十二师归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8月，日军进攻由汤恩伯部扼守的南口地区，陈师奉命往援，激战数昼夜后南口失陷，陈率部突围而出，伤亡惨重。9月，敌攻破晋北门户天镇长驱而入。陈长捷受命以第七十二师为主体与新编第二旅合组为预备第一军，后改为第六十一军，陈升任军长兼第七十二师师长，驻守代县御敌。24日，敌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夜袭团城口，晋军失守。陈长捷奉傅作义命率部急赴平型关西侧，与敌激战于鹞子涧一带，配合八路军伏击日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日军倾力西进，其一部从团城南进，夹攻鹞子涧，战至28日陈部损失过重，傅作义调第三十五军董其武、孙兰峰两旅驰援，归陈指挥，收复团城口。正在进击敌军时，敌东条纵队忽从茹越口突破防线，占领繁峙，晋军遂全线撤回。第六十一军奉命退往砂河，南入五台山守备。

10月初，日军调集两个机械化师团共五万人进攻忻口。第二战区

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领第十四集团军所属郝梦龄第九军和李默庵第十四军迎战。不久，右翼外围据点南怀化失守，卫急调第六十一军增援，陈率部兼程赶往，11日抵达前线，激战半天夺回官村等地，阻击强攻忻口南怀化之敌。此后敌不断增兵猛攻，飞机轮番轰炸，陈指挥所部在奋战中坚守阵地，并组织小分队夜袭敌军阵地，迫使敌三次更换作战联队。正在日军渐告不支时，平汉线刘峙、宋哲元部溃败，晋东告急，阎锡山急调傅作义部退守太原。日军乘机再度增兵，攻陷官村，陈赴前线组织反击，收复官村。双方在南怀化一带展开拉锯战达半月之久，第六十一军损失甚重，而日军伤亡更重，被消灭逾三个联队。10月31日，日军被迫退至南怀化西麓[(1)]。陈所指挥的第六十一军成为忻口战役中的一支主力部队，歼敌众多。此后日军突破娘子关西进，太原告急，陈奉命撤出战斗，向阳曲转移，担任太原北线防务，由王靖国和他分任北线正副总指挥。11月5日，陈在阳曲的指挥部被敌包围，抵抗至深夜，掘开寨墙突围而出。

太原失守后，晋绥军整编为三个军，陈长捷仍任第六十一军中将军长，附辖警卫师共约三万人，率部转移至吕梁山乡宁一带休整。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南下攻占临汾，陈部驰援阻击追击之敌，掩护阎锡山总部安全撤至河西宜川。1939年3月陈升任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5月又升任第六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驻乡宁县。

阎锡山为了严密控制所属各级干部，在1938年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任陈长捷为该组织核心成员——常务委员。但陈不满阎的封建统治，又受蒋介石的拉拢，对阎的离心倾向为阎所侦知。1940年初，阎解除了陈的军职，陈愤而带一警卫营投向绥远第八战区副长官傅作义，随傅投向蒋介石。经傅推荐，蒋任命陈为内蒙伊克昭盟（下辖七个旗）守备军总司令，配备第三、二十六、三十四等三个师。陈设总司令部于伊盟桃力民地区，组织所部屯垦。1943年初，陈将总部移到东胜县，计划扩展屯垦区域，受到蒙盟上层人士的抵制。陈诱杀

扎萨旗首领，激起蒙民愤怒，杀死亲陈的蒙汉官员三十多人；其他各旗也相继发生类似流血事件。陈派兵进击扎萨旗王府，造成更大的伤亡。5月，重庆派员会同傅作义等与该旗首领会谈，达成和平协议，陈长捷受到撤职查办处分。不久陈进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受训。1943年底被重新起用，任兰州补给区司令、军事参议等职。1946年调往安徽，任第二十军军官总队总队长。1947年6月调往兰州任国防部第八补给司令部司令。

蒋介石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后，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仅过两年即被歼灭两百多万人，整个华北仅剩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几个据点。当时在北平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因天津是华北战略重镇，特向蒋介石保荐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司令。1948年6月陈到职后赶修城防工事，10月会同天津市长杜建时强征壮丁近万名充实天津警备旅，加紧训练。其间蒋介石曾两度路过天津，对陈的认真备战表示赞许。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时值隆冬，陈估计东北解放军至少需三个月至半年后始能入关在华北作战，各项战备工作均不紧不慢地进行。出乎他的意料，11月下旬东北解放军迅速入关，12月2日两个纵队已从宝坻向天津疾进。匆促间陈将所部划为三个城防区布防；又从数万名东北涌入天津的溃兵中选拔精壮编为部队；改警备司令部为城防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实行宵禁。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12日天津即在包围之中。15日蒋介石派副参谋长李及兰飞抵天津，将亲笔信带给陈，嘱其坚守，并示意陈等集中兵力守住海口，以备放弃天津时南遁。但此时津塘间的军粮城已为解放军占领，通道被阻断。20日解放军攻占津郊张贵庄机场，外围激战开始。1949年元旦过后，天津东局子、西营发生激烈战斗。市内不断发现中共地下人员发射的信号弹，陈急令组织“统一纠察小组”，清查捕杀中共地下成员。1月5日东北野战军指挥部致函陈长捷嘱其放下武器；10日陈被迫同意天津市参议会派代表出城谈判，受到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的接见，提出放下武器的劝降条件。11日中共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等发出给陈长捷等人“和平放下武

器”的通牒，限次日答复，否则13日起将全线攻城。陈召集杜建时和林伟俦、刘云翰两军长商议，复信称愿接受和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处”[(2)]，实际上拒绝了最后通牒。13日拂晓，解放军全线猛攻，经过29小时的激烈巷战，天津全城解放。15日晨，陈长捷在地下指挥室被俘。

陈长捷最初被关押在河北井陉，后迁北平劳动改造。1959年12月，陈长捷作为首批被特赦的十人之一获释。其后陈迁居上海与家人团聚。1961年4月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撰写个人亲历的文史资料十余篇，约三十万字。

1968年4月7日，陈长捷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陈长捷撰写的有关文史资料，上海市政协藏。

全国政协《晋绥抗战》编写组编：《晋绥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平津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

---

(1) 陈长捷：《忻口战役追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陈长捷：《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陈诚

严如平

陈诚，字辞修，号石叟，1898年1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浙江青田县人。父陈希文，清末诸生，任青田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陈诚九岁入小学，1912年赴丽水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后转读第十一师范。1918年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由其父执、众议院议员杜持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八期炮科生。

陈诚于保定军校卒业后，被分发在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当见习官，驻绍兴，旋补为排长。1922年，陈到上海投考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入粤军第一师，在邓的第三团任连长。1924年5月黄埔军官学校创立，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陈诚被派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旋任第二期炮兵区队长，第三、四期炮兵队长。1925年两次东征，陈诚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战，任炮兵营连长，在淡水之战、棉湖之战与攻惠州城诸役中，均立战功。战后，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诚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前进；旋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1月预一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陈团编为第六十三团，在师长严重（立三）率领下，由韶关经赣州、南昌、上饶入浙至常山、衢州。1927年1月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发生遭遇战；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后，又与孟昭月部苦战数日，后夜袭孙军司令部，迫使孙军后撤。2月15日，第二十一师克复新登，继入杭州，陈诚被擢升为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嗣后攻平望，薄苏州，下松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第二

十一师师长严重不满蒋介石所为，挂冠而去，陈诚继任师长。嗣后，陈先后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军务署长、军政厅副厅长，翌年初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出征奉张时任第一集团军炮兵集团指挥，与蒋介石关系日趋密切。

1928年9月，陈诚率两个警卫团与曹万顺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一师，曹任师长，陈副，兼代第三十一旅旅长；翌年7月，升充师长。陈诚将第十一师重要人员全部调换，代以清一色的“黄埔生”，成为蒋介石的一支嫡系部队。1929年蒋先后与李宗仁、唐生智交战，陈效命甚力。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被蒋派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沿陇海路西进，守归德附近阵地。时阎锡山军沿津浦线南下，入济南，占泰安，徐州吃紧。陈诚奉命东调，率十一师以日行一百二十华里之速度昼夜趱行，赶到兖州，协同第十九路军解曲阜之围，继又抢先攻入济南城。8月，不足三十三岁的陈诚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十一师师长。嗣后，陈诚又奉调转赴平汉线，自济南抵周家口，率部向中牟推进，直趋郑州，蒋介石奖给十八军三十万元。

陈诚效仿邓演达严格治军，以“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宗旨，注重军规；对蒋介石则唯命是从，每战皆敢打敢拼，坚定、苦干，日益取得蒋的宠信。宋美龄将自己的干女儿谭祥（谭延闿之三女）许陈。1932年元旦，陈与谭在上海结婚。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结成“翁婿”关系，更成为蒋之心腹。

在蒋介石1931年8月发动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中，陈诚被派为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率第十四、十一师作为主力，长驱直入，先后侵占黎川、广昌、雩都（今于都）等革命根据地，然后转向西北直奔赣江，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未果，劳师辗转，疲于奔命。在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率十二个师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广昌进攻。他自恃兵多将广，指挥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深入宜黄东南的东黄陂地区，被红军大兵团伏击，两师

师长李明和陈时骥均被生擒。接着，第十一师和第九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又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陈诚于丧师之后回到南昌，羞愧交加，不敢见蒋。但蒋介石未予责备，反为其补充兵械，仍加重用。1933年7月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蒋命陈任教育长，负责训练“围剿”将领。在第五次“围剿”时，陈又被任为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五纵队总指挥。他奉行蒋介石的新战术，提出一套“封锁围进、配合迫进、稳步稳进、乘虚突进”[(1)]的战法，向红军江西中央根据地步步逼近。他利用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采用阵地战的错误，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于9月27日占黎川，为蒋介石打赢了第一仗；次年4月又以优势兵力攻占广昌；接着分兵六路向兴国、古龙岗、石城步步推进，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损失。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诚所部先后进占石城、宁都、长汀、瑞金。他历年在江西收集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大量文件资料，时与红军“之行动措施相质证，以验其说之是否可行，其法之是否有当，其言行表里之是否一致”[(2)]，并于1935年6月编印了六册《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作为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国民党军官中，算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是“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3)]。

此后，陈诚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35年春蒋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兼任处长；6月蒋又下令全国骑兵、炮兵、工兵均归陈督导整理；7月蒋开办峨嵋军官训练班，又命陈实际负责。1936年3月，陈奉派去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渡越黄河，被任命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6月又在太原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此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宣称抗日反蒋。陈诚被蒋介石临时召回，以武昌行营参谋长名义，急调所部三个师进占衡阳，防御两广。不久，两广事件平息。陈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为蒋介石控制两广局势。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扣捕蒋介石的同时，扣押了蒋之部属，陈诚亦在其中。后来事变在各方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

但是蒋介石扣留了张学良，还组织五个集团军进逼陕、甘，陈诚被派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经洛阳出潼关，屯兵渭南，奉行“剿抚并举”方针，震慑和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全国军民奋起抗日。陈诚奉命到上海视察后，主张在上海利用碉堡和水网地障，牵制住日军主力对华北的攻势。蒋介石采纳陈诚意见，组织淞沪会战，亲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调集大量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打大规模的消耗战。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激励下，参战军队英勇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只是陈在指挥上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4)]。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金山卫后，我国军队被迫全线撤退，淞沪遂告陷落。但淞沪战役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部队，使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破产，“转变了敌‘沿平汉线南下’之原定计划”[(5)]。陈诚在淞沪战场上的指挥被视为“战术战斗之败北，而得政略战略之成功”[(6)]。

1938年1月，陈诚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6月，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自为团长，任陈诚为中央团部书记长。6月14日蒋介石下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次日又任命陈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遂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担负保卫当时我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地武汉之全责。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于8月以38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分五路西侵，并以海军溯江而上，目标在夺取武汉。陈诚指挥第九战区所属各军，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各部一道，以3倍于敌的兵力展开武汉保卫战。陈遵照蒋介石指令，以“战而不决”的消耗战术御敌，与李宗仁协同指挥抗日军队先后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在星子、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辛潭铺、大冶等地与日军激烈战斗。10月，日军次第侵占信阳、大冶、鄂城和黄陂，25日汉

口弃守。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中，在蒋介石的指挥下，陈诚和李宗仁组织百余万我国军队迎战日军12个师团，杀伤日本侵略军逾十万人，对于抗战全局组织战略退却和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撤守后，陈诚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交严重代，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交薛岳代，自己去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之职。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威胁四川。为加强重庆外围的防御，陈诚于9月奉蒋介石命赴鄂西恩施，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再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他以“建设新湖北”、推行“新政”相号召，实行“二五减租”[7]、田赋改征稻谷、用物物交换来对付通货膨胀、凭证分配日用品等措施。但在执行中许多官吏贪污中饱，湖北人民仍难免于沉重的负担。1943年2月陈诚奉派为指挥滇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5月又奉命回恩施，指挥所部抗御日军西犯。翌年7月，陈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2月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进一步重用陈诚，任命他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名位在国防部长白崇禧之下，但扬言“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8]，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招致白崇禧等人的嫉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陈诚跟着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辅佐蒋调兵遣将，并先后去郑州、徐州、济南、北平、张家口及苏北等地督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即被歼灭112万人，陈受到各方责难。蒋介石被迫自己出面指挥战局，命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

1947年9月，陈诚飞抵沈阳就职。此时，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在辽南新开岭地区、临江地区、四平地区大量被歼，已被迫困守在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几座城市。陈诚到职后声言“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9]。为此他大力扩充部队，把在东

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由9个军增加到14个军，又新增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陈诚指挥频频失误，50天内被歼六万九千余人，不得不把主力部队收缩在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为安定军心，他仍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10]。翌年1月6日，他下令新五军向沈阳集结，结果这支国民党精锐部队于7日一个晚上即被全歼，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均被俘。陈诚闻讯，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第二天亲飞沈阳，陈向蒋承认“自己指挥无方”[11]，表示“决心同沈阳共存亡”[12]。但眼看形势严峻，他让谭祥去南京求宋美龄，要蒋介石将他调离东北。2月5日陈诚悄然飞回南京，旋因胃疾去上海求医。4月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许多人对陈诚群起责难，“声色俱厉”，有些人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13]。陈诚闻讯，急忙住进陆军医院。5月20日，他请辞参谋总长本兼各职。

此后，国民党统治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打击下摇摇欲坠，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被迫发出求和声明；在退居幕后之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于1月5日到台湾就职，锐意经营。7月9日，陈又被委兼“东南军政长官”，名义上辖台、苏、浙、闽四省和潮、汕沿海区域。

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更加倚重陈诚。1950年3月，陈诚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翌年1月兼“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3月任“副总统”，11月兼“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0月任国民党“副总裁”。1963年12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副总统”、“副总裁”。陈诚在台湾主政期间，注意吸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努力缓和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推行“三七五减租”和以工商企业股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14]。他还主持兴建了石门水库。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在台北逝世。

(1) 《陈故副总统纪念集》，见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218页。

(2) 陈诚：《赤匪反动文件汇编序》（1935年5月），1935年版，第1页。

(3) 周恩来1936年7月9日在陕西白家坪接见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美］埃德加·斯诺，*Random Note on Red China*，*1936—1945*，张岭华译文稿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4) 这是张发奎及前线伤员指责陈诚的语句，见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7页。

(5) 陈诚对抗日战争的回忆资料，国民政府国防部总长办公室记录，国防部资料室编，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25）28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 《陈故副总统纪念集》，见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224页。

(7) 陈诚的“二五减租”，是规定农民佃租为37.5%。其计算方法是：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从年总收获量中先提留二成五，偿付种子、肥料等，其余七成五和地主对分，即三七五交地主。

(8)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55页。

(9)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页。

(10) 陈诚：《告东北军民书》，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第4页。

(12)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第6页。

(13) 朱克勤：《出席国民大会记》，第50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

(14) 沈宗瀚：《陈故副总统与农业》，台湾《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第31页。

陈楚楠

陈民

陈楚楠，原名连才，别号“思明州之少年”[1]，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新加坡，是第一代侨生[2]，他祖籍福建厦门，父亲陈泰早年到新加坡，开办“合春号”，经营木材和罐头、杂货。因主动把靠近新加坡河畔的房地产转让给当地政府建设码头、仓库，政府将该地区命名为“陈泰坊”以资纪念，现已成为新加坡市中心的繁华地区。

陈楚楠童年除进学校学习当地应用的英语与马来语外，还在家中补习中文，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二十一岁时，与兄陈连亩共同经营“合春园”种植橡胶，同林文庆的武林园、洛阳园、陈嘉庚的福山园齐名，成为早期推动新、马橡胶种植业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同新加坡维新派领袖邱菽园交往，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刊物，深受影响，一时对康有为颇为崇敬，并参加林文庆、邱菽园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保皇立宪活动。曾以“思明州之少年”署名，投稿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和香港《中国日报》。1900年，维新派的武装自立军以“勤王”为号召，预定8月9日在湘鄂皖起义。因康梁的汇款未到而改期，后被清吏发觉，致使起义失败。当时传闻康有为盗用华侨捐款，这使陈楚楠大为失望。从此，他的思想开始转向革命。促使其思想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苏报》、《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书刊的影响。他经常与林义顺等人议论中国政局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逐步成为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1902年，新加坡华人牧师郑聘庭创办青年文化团体基督青年会。陈楚楠加以赞助，并在青年会中增设书报社，陈列多种报刊，任人阅览；自己也经常到青年会去讲演，结合宣传革命思想。是为南洋革命党人办书报社之始。

1903年夏，上海发生“苏报案”，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等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请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拒将章炳麟、邹容引渡给清政府，以重人权。不久，他们又集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数千册，改名《图存篇》，由黄乃裳、林义顺携带回国，散发于闽南、粤东一带。

同年，陈楚楠通过《天南新报》编辑黄伯耀的介绍，与革命党人尤列交往。在尤的影响下，陈楚楠与张永福合资创办《图南日报》，自任报社经理，聘尤列为名誉编辑。创刊时尤列写发刊词，鼓吹反清革命，成为南洋华侨最早的革命喉舌。当时南洋革命风气未开，一般商人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多禁止其子弟及店员阅读《图南日报》。因此，该报的长期订户只有三十几份，平日销售量也只有一千份。为了打开局面，《图南日报》在迎接1905年元旦时，特印制精美月份牌分赠读者。月份牌上印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写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以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形式新颖，又富有爱国思想，颇受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界以及群众团体的欢迎，报纸的销售量也一度增至两千多份。这种月份牌流传到檀香山，孙中山见了大为赞赏，汇美元二十元给《图南日报》，购买月份脾，同时写信殷殷嘉勉，表示愿意与他们相会。

1905年6月，孙中山由欧洲取道新加坡赴日本，致电尤列约《图南日报》主持人相会。轮船停泊新加坡时，尤列便介绍陈楚楠、张永福等登船相见。当时因孙中山受当地政府限令离境5年的期限未满[(3)]，经陈楚楠等往警厅担保，孙中山始得上岸聚会于小桃源俱乐部，商谈组织革命团体事宜。由于事前林文庆与黄乃裳的介绍，陈楚楠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已有初步了解，这次相会，对孙中山的革命气概和渊博学识，又获得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心悦诚服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第二年6月，孙中山

再次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4]召开大会，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基本会员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李竹痴、尤列等14人，陈楚楠被推选为分会会长。以后陆续加入同盟会的有丘灿文、黄乃裳、许雪湫、陈武烈、林文庆、陈嘉庚等四百多人。同盟会还先后派员分赴英、荷两属各埠设立分会。陈楚楠也受孙中山委派，与林义顺、李竹痴等到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和缅甸的仰光等地，设立了同盟会分会，在华侨中播下革命的种子。

1907年8月，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筹办的南洋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发刊。不久，即与保皇党控制的《南洋总汇报》展开革命论与君宪论的大论战。翌年3月，孙中山自河内移居槟榔屿路过新加坡，东京《民报》记者也群集南洋，一起参加论战，痛斥保皇谬论。《中兴日报》发行量猛增至四千多份，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在华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1907和1908这两年中，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发动多次起义，陈楚楠遵照孙中山的函电，积极筹款助饷，黄冈起义首领余既成败退香港，被清吏诬告入狱，陈楚楠曾为之筹集诉讼费用，汇交香港《中国日报》代聘律师为余辩护，后获胜出狱。云南河口之役失败，义军将士韦云卿等六百多人被越南政府遣送出境，前来新加坡。当地政府借口乱民入境有违殖民地禁例，不许登岸。几经交涉，由陈楚楠等出面担保，才得到入境许可。当时义军将士给养极为困难，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陈楚楠在郊区蔡厝港开设“中兴石山”（采石厂）予以安置；有不愿在石山工作的，则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吡叻（又称霹雳）各埠的工厂、农场、矿山去就业。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陈楚楠欣喜不已。当时福建由于省库空虚，积欠军饷，地方不安，民心浮动，任福建筹饷局总办的同盟会员黄乃裳通电南洋要求支援。陈楚楠以新加坡同盟会老会长身份，和福建会馆共同召开大会，决议组织保安会，在一个月内筹得新币二十多万元，用保安会长陈嘉庚的名义汇回福建，安定危局。后陈回国，主

持上海“华侨联合会”领导事宜，积极开展工作，开设华侨公寓，代办华侨所需事务，迎来送往，便利华侨归国探亲、扫墓；同时在《国民新闻》辟专栏，报道海外华侨动态，增进国内人民对海外侨胞的了解。

1917年，陈楚楠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受聘为军政府参议。1928年至1933年，陈任福建省政府委员，一度兼任实业厅长。他曾计划在闽创办银行，开发矿业和水产资源。但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把福建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处处加以掣肘，使陈无法施展其抱负。陈于1933年返回新加坡，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息影家园，不闻外事。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新加坡老同盟会员张永福被拉下水，出任伪政权的“国府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并奉命出使南洋。张永福与陈楚楠本为知交，关系密切，想罗致陈去南京，以壮伪政权声势。但陈不为所动，并晓以民族大义。

1971年9月21日，陈楚楠因病在新加坡逝世。著有《晚晴园与革命史略》，为南洋同盟会的早期文献。

---

(1) 明末郑成功据守厦门反清，改厦门为“思明”，矢志光复明祚。据此，陈楚楠取别号“思明州之少年”。

(2) 习惯上华侨在南洋所生子女统称“侨生”。英殖民地政府根据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规定：凡在当地出生的华侨子女（Straitsborn Chinese）即获得英国国籍，成为英籍华人。

(3) 1900年6月，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由广州赴新加坡，拟说服康有为同孙中山合作。康党疑其受清吏指使谋刺康，控告于当地政府。宫崎遭逮捕。孙中山闻讯后，即从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也遭逮捕。幸赖旧友林文庆等营救，方获释。但孙被判出境五年，宫崎则被判永远出境。

(4) 别墅“晚晴园”地处新加坡郊区，环境僻静，原为某富商所建，名

曰“明珍园”，张永福买下后改名“晚晴园”，取“人间爱晚晴”意思，供他的母亲晚年养老。1905年张永福闻讯孙中山即将来新加坡，特将该园修葺一新，用作招待孙中山及革命同志聚会的场所。

陈春圃

黄美真　张云

陈春圃，1900年3月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八）出生于广东新会，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远房侄辈，家境清寒。青年时求学于广州圣心书院，1919年因病辍学。此后即投靠汪氏夫妇。1920年，汪精卫出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陈任该会图书馆主任兼编辑主任。1923年由陈璧君推荐，任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自那时起才开始有了政治关系和活动”[(1)]。

1924年初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陈春圃随任该部秘书。1925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华招生，陈由汪提名，成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保送的八名留学生之一，并被汪指定与林柏生同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留学生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络人。陈春圃于次年9月回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分裂。汪精卫任武汉政府党、政、军要职，陈春圃即于5月至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汪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宁汉趋于合流，陈赴粤就任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

宁汉合流不久，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因分赃不匀，又告分裂，1928年初汪精卫赴法。同年10月，陈春圃追随去法。旋衔汪命去美国纽约创办《民气日报》，任总编辑，进行反蒋宣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打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幌子重新合作，汪于1932年1月底出任行政院院长，陈由美回国，被任命为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陈春圃追随汪精卫，鼓吹“亡国论”，在华侨中散播“抗战没有胜利的希望”等民族投降主义谬

论[2]。1938年底，汪准备逃出重庆投敌叛国，事先指派陈前往昆明打前站。陈即向侨委会请假，把汪的幼子、幼女连同贵重财物带到昆明，随后将汪的子女送上飞机逃往香港，自己仍留昆明，为汪的叛逃作联络。以后又赶到河内，再转香港，担任联络和交通工作，是汪投敌的一名得力的马前卒。

1939年夏，陈春圃随汪精卫逃到上海，在汪左右处理重要机密。1940年1月，汪精卫集团内部倾轧，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开上海拆伙而去，并在香港公开披露了1939年冬汪精卫与日本秘密谈判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全部内容。这时，汪精卫等人正在青岛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头目王克敏、梁鸿志举行分赃会议，为了稳住阵脚，陈春圃秉承陈璧君的意旨，以汪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声明辩解说："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之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中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妄图抵赖。同时吹捧汪精卫"本于国民之需要与期望，不避艰险，毅然决然以领导和平运动，凡非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又凭空吹嘘"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3]，为汪投敌卖国诡辩。

1940年3月下旬，汪精卫在南京召开汪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筹备组织伪政府，陈春圃任"中政会"副秘书长。汪伪行政院成立后，陈任秘书长，并先后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等要职。在此期间，又以汪私人秘书的身份，处理行政院内各种重要文件，编列行政院会议及"中政会"会议之议事日程及各种决议。同年8月，汪、日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披上条约的外衣。其后，又于11月30日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对于这些卖国条约、协定的签订及所有布告、宣言的发布，陈

春圃均“参与谋议”[4]。

1943年9月，陈春圃调任汪伪南京政府建设部长，主管铁路、邮电、航政、都市建设及水利等。同时，兼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掌管人事大权。1944年4月，伪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刺殒命，陈春圃由陈公博、周佛海推荐，赴粤继任伪广东省省长兼伪广州绥靖主任。其间因陈为强化日伪的统治卖力，曾被派往日本参拜伊势及热田两神宫，公然无耻地为日本“祈祷大东亚战争的胜利”[5]。

陈春圃是汪精卫集团中所谓“公馆派”的主要成员之一。1944年11月10日，汪在东京病死，陈公博就任“代国府主席”，陈春圃追随陈璧君表示消极。其后，陈公博虽数次委以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文官长及司法院副院长等职，他均予拒绝，而赋闲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抗战胜利后，陈春圃自知“无所逃避”，于1945年9月17日在上海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驻沪特派员办事处投案。经军统局解送国民党上海市高等法院，于1946年10月4日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6]。陈不服，请求复判。1947年12月被判为无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春圃留押于监狱，表示认罪服罪，“确认自己是汉奸，只有服罪认过之一途，此外别无生路”[7]。

1966年3月19日，陈病死于上海市监狱。

---

(1) 陈春圃：《蒋介石、汪精卫争当“儿皇帝”的内幕和汪精卫傀儡戏班底的拼凑与灭亡》（未刊）。

(2) 陈春圃：《自白书补充材料》（1951年8月18日）。

(3) 陈春圃：《驳斥高、陶在港造谣》，《中华日报》1940年1月21日。

(4) 《上海市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度特字第三二〇号。

(5) 《上海市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度特字第三二〇号。

(6) 《上海市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度特字第三二〇号。

(7) 陈春圃：《解放后我思想上转变情况》（1951年8月18日）。

陈达

汪仁泽

陈达，字通夫，1892年4月30日（清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四）出生在浙江余杭县的一普通农民家中，父母都不识字。陈达七岁时，在村里私塾就读，十四岁进余杭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勤奋，三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学（后来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

1911年，陈达在杭州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备班。次年赴北京，在该班学习四年，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二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鉴于我国人口众多而国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他抱着谋求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愿望，选择了该系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专业。1919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深造。其间他发表了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多篇，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并得到好评。1923年，该校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此时曾有人以优越的待遇请他在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他本着“人口救国”、学以致用的初衷，决定回国。

1923年秋陈达回国后，任教于母校清华学校，讲授《社会学原理》。他宣传国人应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以摆脱贫困的现状。他调查了清华园内校工的生活状况，在校刊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为文科的研究方法作出了良好的先例。1925年美国学者发起筹组“太平洋学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召开成立大会，陈达以个人会员的身份出席，会后赴福建、广东调查劳工问题。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陈达就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聘了著名学者潘光旦等人到系任教，以加强该系的师资力量。1929年春，再次到闽粤等地搜集劳工问题资料，著《中国劳工问题》一书出

版。同年冬，被邀往夏威夷大学讲学，回国途经日本、朝鲜，曾考察当地劳工状况。1931年5至8月，陈达在上海、无锡调查工人的生活概况，并研究工厂法。次年他与友好数人在北平组织妇婴保健会，成立节育指导所，在报刊上创办“人口副刊”，加强了节制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宣传。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任命陈达为内政部户政司司长，陈达视事数月，以官场人事关系复杂悄然离去，仍回清华执教。

1934年冬，陈达去爪哇、邦加岛、马来亚、新加坡、暹罗、柬埔寨等地，从事南洋华侨问题的研究达半年。1935年夏，他趁休假一年之机，先至苏联、后又去西欧诸国考察，特别注意调查了德、意等国的劳工状况，以及苏联的国营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农劳动情况。他在参观苏联教育委员会所属的中研院后，曾在纪念簿上题词：“关于苏联的教育工作，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苏联的教育家无疑的要陶冶（年青一代的）新人格，应付新生活。”[(1)] 其后又去印度，调查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经过这一年的考察，他发表了多种调查报告和有关专论。

陈达在人口和劳工问题上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学说是不移的定律。他以之运用于我国，提出了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的理论，认为只有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才能进一步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反之，如果能够取得成绩竞争的胜利，一般讲，也就更容易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状况，他认为要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对人口的增长加以控制：“生存竞争与人口数量有密切关系，因人口有大量的增加，或增加率太快时，对于人民的谋生，当然要发生恶劣的影响。”[(2)] 对于劳工的就业问题，他也认为如此，因此“人口的数量务求减少”[(3)]。他主张实行“对等的更替”，即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不超过二个。同时他还主张不断提高人口的质量，人口品质愈提高，社会的经济、文化也就能愈加发展。他这时的人口、劳工理论，还远没有认识到与社会制度、国家性质的关系，因此他的“人口救国论”在当时也和“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

论”一样，是无法实现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11月陈达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组的临时大学继续任教社会学。1938年初，又随校绕道广州、香港，经海防迁到云南。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蒙自上课，陈达除任教社会学外，又兼任清华大学所属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直至抗战胜利。该所设在离昆明20公里的呈贡县城内的文庙里，陈达携眷住在该庙的后院。该所从1939年初成立后，曾在呈贡县先后举办人口普查试验、人事登记、农业普查（逐户调查耕地面积、灌溉方式、作物种类，然后再选样调查使用肥料、农具及收获物市价等）、户籍及人事登记调查等多项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工作。每次调查，从拟订调查计划、与各方联系洽谈、训练调查员、巡视、检查工作，直到统计、总结等，陈达都亲自参加。当时交通不便，有些地区尚须骑马代步，有时他一天要骑行八个多小时；同时每周还需上课一二天，因此备极辛劳，曾因劳累过度，在工作途中昏倒两次[(4)]。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作为学术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又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云南环湖市县户籍的调查工作，动员了工作人员达千余人，调查对象涉及一市三县的60万居民。

抗战胜利后，陈达进行大规模的工人生活现状的调查。1946年，他在上海选择沪南、闸北等五个区，先普查了一千五百多家工厂、十四万多工人；然后进一步深入调查了纺织、面粉、卷烟等40种工业的240家工厂。调查的项目包括工人实际收入、计件和计时工资、工人生活史等十二个方面。

陈达治学谨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坚持实际调查的科学态度。他对所有调查资料，都要经过审核、复查、订正等步骤，然后再分类统计、列表。他为了弄清旧中国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查阅了十几种古书典籍和近代资料，包括《图书集成》、《通志》、《通典》以及海关报告、华洋义赈会会刊、各种报刊杂志等，从而取得了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到抗战前共计二千多年来水、旱灾的发生次数，并

得出比例数越往后越严重的规律性资料。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专一。他自从留美时选定社会学中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后，半个多世纪锲而不舍，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此。他曾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5] 1947年初，他应邀往美国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校庆，事后至芝加哥大学讲学。他在国际学术界中具有一定声誉，先后担任国际人口学会副会长、太平洋学会东南亚负责人、中国分会研究干事等职。

陈达长期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纯学术研究，是"清高"的工作，可以不问政治，因此常常自称："我真是一个道地的无党无派者。"但是1946年7月15日，昆明发生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闻一多是他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在昆明的住所仅是一墙之隔。那天下午，两人同时出门，3小时后陈达回家不久，闻一多已被暗杀，陈达悲愤填膺。从此他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不论在平时或课堂里讲到国内现状时，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是不行！"1947年2月，他参加了清华、北大13位名教授联合签名的抗议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宣言[6]。1948年6月，他又参加了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抗议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对开封平民滥施轰炸残杀师生的暴行[7]。1948年底，他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用飞机接他南下的企图，坚持留在清华园，迎接北平的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达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社会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为指导，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好的一部分应加吸收，不好的部分要加以批判"[8]。1952年他改任中央财经学院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一年后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次年又改任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刊《教学与研究》及其他杂志上发表了《上海工人的生活费（1929—1948

年）》、《上海的劳资争议与罢工（1937—1947）》、《如何进行专题调查与研究》等多篇调查报告和专论，提出在大专院校恢复社会学系科的建议，并多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主张，后者与马寅初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1957年5月，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再度论述推行节育和晚婚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附列了“二十个国家最近出生率”、“日本出生率的下降”、“云南呈贡结婚年龄”等国内外各种统计表十八张以资说明[9]。1957年以后，陈达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继续从事人口和劳工问题研究，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资料和撰写著作，完成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解放区的工人生活状况》等多种著作。1975年1月26日，他在家沐浴时突然病逝。

陈达一生培植了许多社会学人才，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已发表的著作有*Chinese Migration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Washington D．C．1923），《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New York 1940），《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6），《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新建设》1957年第5期）。其他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约三十余篇用中、英文发表，散见国内外有关刊物上。

---

(1)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39页。

(2) 陈达：《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02页。

(3) 陈达：《人口问题》，第430—431页。

(4) 陈达：《浪迹十年》，第301页。

(5) 全慰天：《记陈达教授》，《观察》杂志第2卷第8期（1947年4月19日），第19—20页。

(6) 《观察》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

(7) 北平《新民报》1948年6月29日。

(8) 《关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座谈记录摘要中所记陈达的发言，《新建设》1957年第7期，第40页。

(9) 陈达：《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新建设》1957年第5期，第1—15页。

陈蝶仙

江绍贞

陈蝶仙，原名寿嵩，字昆叔；后改名栩，别字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人，生于1879年7月22日（清光绪五年六月初四）。他的父亲陈福元，以行医和相命为业，并擅长音律[(1)]。蝶仙为庶出，7岁丧母。其嫡母喜爱说部弹词，常让他为之诵读。加之塾师也经常教作五七言诗，因此少年时对小说诗词以及音律等非常爱好。十余岁时已能吟咏，曾将自己的习作刊印，题名《惜红精舍诗》。后又将所著辑为《粟园丛书》。他原来也想以科举进身，曾得优附贡生。后放弃科举，悉心著述，以惜红生笔名写一些诗词，在上海《同文沪报》副刊《消闲录》上发表。1895年主杭州《大观报》笔政，曾著《潇湘影弹词》等作品印行出版。当时写情小说兴起，他受其影响，于1898年著长篇写情小说《泪珠缘》，在文坛上初露头角。

1901年，陈蝶仙在杭州开设萃利公司，次年又开设石印局，规模都不大。萃利公司主要销售书籍文具纸张，偶而贩卖一些欧美的化学仪器以及留声机、无声影片等，曾引起守旧亲友们的讪笑和反对。不久，萃利公司收歇，石印局亦因火灾被焚。1907年，陈前往上海办著作林社，出版文艺杂志《著作林》，至二十余期停刊。他撰写了《花木兰传奇》、《自由花传奇》等小说在该刊发表。

1909年起，陈蝶仙在江浙一带的绍兴、靖江、淮安等县当幕僚和小官吏。民国元年，代理镇海县知事时，往邻县慈溪访友，见遍地乌贼骨，认为用来制作牙粉原料，可不费分文，而取给无穷。便与其四弟蓉轩（名华同，时任镇海警察局长兼罪犯研艺所所长）商议，由研艺所制造牙粉，并呈文上司要求拨款2000元作制造经费，结果遭到训斥，遂愤而辞职，寓居上海，重操文字生涯。

当时，正是鸳鸯蝴蝶派兴盛时期，陈蝶仙是代表人物之一。1913年主编《游戏杂志》，次年又主编《女子世界》，同时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申报》副刊《自由谈》作特约撰述。1916年任该副刊的主编。他先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玉田恨史》、《黄金祟》等长篇小说。还在鸳鸯蝴蝶派所主编的《礼拜六》等许多杂志上大量投稿，先后发表了《琼花劫》、《井底鸳鸯》等长篇小说。此外还与人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外国小说。他前后所著小说数量达百余篇之多，内容大半都是描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所说“良家女子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2)]。陈蝶仙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当作游戏和消闲。他主编的《游戏杂志》，即以游戏文字著称。他的人生观充满了颓废思想，曾说：“人生于世，实在梦中”，“李白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实虚诞耳。”[(3)] 他署名天虚我生，号蝶仙，其意皆源于此。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多以鸳、蝶等取名，也自陈氏始。1916年5月陈加入“南社”。

陈蝶仙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却抱着比较积极的态度。在他主编《申报·自由谈》时，特辟“常识”栏，撰述小工艺日用品制造法，颇得社会人士之欢迎[(4)]，后汇集为《家庭常识》八集，印行出版。同时，亲自试制牙粉，由其子小蝶和时任中学教员的李常觉（字新甫，鸳鸯蝴蝶派作家）协助，以他们共同的稿费收入为试制费用。此时他发现乌贼骨作牙粉原料有伤牙齿，便往舟山群岛岱山一带，向盐场收购制盐中废弃的苦卤，提炼制作牙粉的基本原料碳酸镁。试制成功，每百斤碳酸镁的成本不过十二元左右，仅及日货碳酸镁售价的一半。1917年制成牙粉，定名“无敌牙粉”（蝴蝶之谐音，并以蝴蝶为其商标图案），在农商部登记立案。开始时没有正规的厂房，雇工很少，家人亲友也参加制作，产品委托烟纸店代售，是为家庭工业社之伊始。

自无敌牙粉问世后，销路很好，获利丰厚。1918年7月，正式成立家庭工业社股份公司，资本一万元，陈蝶仙自任经理，小蝶任副

理。这时，盐商们见苦卤制粉有利可图，遂趁机抬高卤价。陈为保持廉价的原料，便转而向散户盐民收购，同时将无敌牙粉批发给这些盐民销售。这样，既保持了廉价的原料，又扩大了产品的销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抵制日货的热情高涨，充斥中国市场的日制牙粉大受打击，家庭工业社的业务更是蒸蒸日上。这年增资5万元，次年又增资10万元，并建厂房于上海江阴街。1922年资本额达到20万元，在梅雪路购地11亩建总厂，附设印刷、玻璃、制盒等辅助厂。为了取得原料的方便和廉价的劳力，又在无锡、宁波、海宁设制镁厂，在镇江设蛤油、蚊香厂，在太仓设薄荷油厂等。为解决产品包装所需要的用纸，1929年陈蝶仙让李常觉担任经理，自己改任监理，脱身到无锡研究造纸，建成利用造纸厂。之后，又到杭州创建浙江改良手工造纸厂。这样，形成了一个以制粉为中心的包括原料、包装和副产品制造在内的生产体系。陈蝶仙虽然对现代科学技术很热心，但各厂的机器设备能力都很低，他以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手工操作来取得高额利润。截至抗日战争前，家庭工业社的资本已达50万元，工人达2000人，产品四百多种。开办二十年间，资本增长50倍。

陈蝶仙自创办家庭工业社后，创作活动大为减少，但仍然在《半月》、《红玫瑰》等杂志上投稿，多系一些短篇小说和杂文。1924年，将他13岁以来所著诗词曲稿等汇集为《栩园丛稿》刊行。1930年，他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并主编《机联会刊》，宣传提倡国货，并自撰一些介绍化学日用品制造法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杂文。该刊于抗战前停刊。

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开始，陈蝶仙时在杭州。他考虑到上海必遭袭击，便派小蝶向上海市商会提出组织迁厂的建议，并具体安排家庭工业社的迁移。由于李常觉不以为然，只将上海厂的半数资财运往汉口。陈由杭到汉，以汉口为中心，暂行总社业务。“八一三”后，上海总厂和无锡利用造纸厂均被日机炸毁。年底，国民政府西迁，陈亦

溯江而上，将汉口厂分别迁设于湖北宜昌和四川重庆（后亦遭日机炸毁）。他还到四川铜梁作改良川纸的试验，生产了四川连纸。又到自流井，利用盐井的便利，制造碳酸镁，到巫陵制造碳酸钙。之后，前往云南昆明，筹建制粉厂。1939年冬，陈蝶仙在昆明得病，由小蝶护送回上海，于次年3月24日去世。

---

(1) 陈寿嵩：《先府君行状》，《栩园丛稿》二编。

(2)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转引自《浙江商务》第1卷第3期（1936年3月）。

(4) 郑逸梅：《天虚我生往事》，《永安》第13期（1940年5月）。

陈朵如

郑叔屏

陈朵如，名选珍，浙江萧山县人，1888年10月16日（清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二日）生。父陈子祥，有祖遗田产三百余亩，并在萧山临浦镇开设乾余钱庄、乾泰米行、乾元电厂及义号什货店，这些厂店后来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毁。

陈朵如幼年就读于表兄钟宾文家，后又从李禹九学。1907年，与堂兄陈允如相偕东渡日本，先习日文一年，然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银行等科。在东京，陈结识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的李铭，志同道合，引为知交。

1912年9月，陈朵如奉父命辍学归国，旋进杭州“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任协理。翌年，陈朵如受聘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银行学、银行簿记、银行实践及商业算术等课程。1916年离开商校，任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行长。

1917年3月，陈朵如应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邀请，回杭州任该行总管理处总书记职，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为官商合办，其业务方向、经营方法以及组织制度、账务核算等，全是钱庄格式，十分落后，连年终年初送迎财神习俗亦未革除。官商董事有鉴于此，邀陈朵如来整顿改革，不久之后，该行面目一新。与此同时，陈提出一种“零存整付”的储蓄方法，客户每月存入1元，15年到期可支取本息504.66元。这一种每月节约1元的储蓄方法，一般人都易办到，因此受到各界人士欢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创办这种存款方法，吸收了不少社会闲散资金，其他银行亦竞相仿效，“零存整付”风靡一时。

1923年3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股东由于增资意见不一，协议官商股分家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原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划归商股，海门分行、兰溪分行仍归官股。浙江实业银行以李铭为总经理，设总管理处于上海，另设杭州分行。陈朵如在拆股分家及建行过程中，为浙江实业银行悉心规划，颇多建树。在杭州建行初期，陈并以上海分行副经理身份暂兼杭州分行经理。1927年陈升任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3月参加浙江实业银行董事会任常务董事。陈与李铭配合，相处无间。李着重于外面活动，陈着重在内部擘划，共同决策。1936年，浙江实业银行计划买进一笔地产，李颇属意于上海南京路德义大楼，陈不以为然，未成事实。后来李听取陈的主张，向西班牙天主教会买进了上海旧跑马厅对面大光明一带房地产，连同大光明、国泰、卡尔登三家电影院的营业权在内，因而使浙江实业银行的声誉大增。

陈朵如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章乃器在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期间，曾创办《新评论》杂志，鞭挞时政，鼓吹民主政治，后又参加救国会活动，奔走呼号，日以为常。陈朵如对章乃器的爱国热忱表示同情和赞许，一面在精神上给予支持，一面有意识地减轻他的工作，使他有充分时间进行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朵如对国民党政府不能抵御外来侵略，十分愤懑，眼看一些党国要人依然热衷于谋求个人发财致富，夺利争权，常自感叹：“国之不存，何来个人幸福！”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复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抗击，陈大为感奋，连夜聚集家人赶制棉背心慰劳前线爱国将士。浙江实业银行往来客商中颇多日商，如东华纱厂、裕繁公司、山下株式会社、多田洋行等，都与他关系密切，收付频繁。1937年“七七”事变发展成为全国抗战以后，陈朵如即收缩银行业务，与日商疏远，以至停止往来。1941年3月，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出国，将行务托付于陈，陈紧缩业务，谨慎行事。11月陈在归家途中，汉奸特务突予绑架，除勒索巨款外，还图诱陈担任伪职。陈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匝月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侵入租界，

陈更加紧缩业务，消极抵制。当时，汪伪储备银行行长戴蔼庐为了笼络商业银行，宴请部分商业银行经理，陈拒不赴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江实业银行业务逐渐恢复正常，翌年，将原来的总管理处制改为总行制，以上海分行为总行，设业务、储蓄、信托、国外汇兑四部及稽核、总务二处，各部、处设专人负责，李铭任董事长，陈朵如为总经理。陈以他一贯稳重踏实的作风扩展业务，开创了该行的全盛时期。1948年，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陈朵如经营浙江实业银行，善于用人，每一职工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情况，他均了如指掌。对能力较强、工作勤奋的职工，陈及时鼓励，予以提升重用；对能力较差的职工，则妥善安排适当的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并鼓励上进。他认为必须使每一职工有安定的生活，才能安心工作。1937年冬至1941年冬的四年间，上海租界形同孤岛，很多职工生活困难，陈拨出专款，办理行员贷金及子女教育费贷金。随后通货膨胀，物价昂贵，职工生活更趋困难，他通过劳资协商，再次拨出资金让工会举办职工消费合作社，以减轻物价上涨对职工生活的威胁。

陈朵如早在抗战以前就参加徐锡骥（徐锡麟的胞弟）主持的聚餐会。他在聚餐会活动中，受到陈叔通、叶揆初的启发、影响和推动，曾在1945至1949年这段时期里，几次从浙江实业银行暗账中拨出款项，通过陈叔通捐献给中共地下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决策人曾商议是否去港的问题，陈坚决主张留在上海，并且决意要把已开工兴建的大厦建筑工程加速进行。他说："这也是我心上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房屋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私营银钱业由联营逐步走向合并，为金融业改造准备条件。陈朵如初时对此不无疑虑，但很快就认识到

集中经营是必然趋势，并积极说服李铭。当时李旅居香港，对大陆情况十分隔阂。陈与李多次通信，讲明形势，晓以大义，劝李不可迟疑。1950年11月，陈又亲自去港见李进行劝说。回上海后陈决定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于1951年11月1日参加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4日，公私合营银行成立，陈朵如任副董事长、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和董事会上海办事处主任。1957年2月，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在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交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暗账资金美金500万元。

陈朵如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等。陈平素生活不尚奢华，不讲排场。1948年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庆祝建行40周年时，董事会决议买一所花园住宅给他居住，陈坚辞不受。

1961年8月31日陈朵如患癌症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沈鸣山：《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中国人民政治资料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陈公博

闻少华

陈公博，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生于1892年10月19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从六岁起，即开始阅读《水浒传》、《封神榜》等旧小说，并涉猎《唐诗三百首》，到九岁时开始读四书；家中雇有拳师教习棍棒。幼年即“淘气不过”。

陈父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1897年解职后住广州。陈致美早岁从军，曾结交会党，受会党的反清思想影响。1907年春陈致美在革命党人支持下，联络会党和旧部，筹划在广东乐昌举行反清起义。陈公博受其父影响也参与起义活动。起义遭到失败后，陈致美被判处永远监禁。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又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做校对工作。1908年回广州，考入育才书社，学习英文，1911年毕业。

1911年11月广东光复，陈致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兼都督府军事顾问。陈公博靠了他父亲的名气，也成为乳源县的挂名议员。但陈致美认为陈公博的年龄小，阅历不够，让他辞去县议员，投入广州的北伐学生军。1912年2月学生军解散，陈致美又要他弃武习文。9月陈致美病死。陈公博回育才书社任教。两年后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还为香港的一家报馆写通讯。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在北大三年，自称“养心性，寡交游”[(1)]，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不积极参加。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新旧思想采“兼容并包”的方针。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下，陈公博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曾给他“一些思想上的影响”[(2)]。在北大，他和谭平山、谭植棠等广东同学过从甚密。

1920年陈公博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任法政专门学校教员，这时他已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受陈独秀委托，在广州主办宣传员养成所，又和谭平山、谭植棠一起筹办《群报》，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年底陈独秀到广州，找到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次年3月，他们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陈公博负责宣传工作，还参与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参加。在会议过程中发生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情况，他遂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不等大会开完就到杭州度蜜月去了。是年，汪精卫在广州任广东教育会会长，陈受到汪的赏识，任教育会评议员。

1922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上海中共党组织认为陈公博与陈炯明有勾结嫌疑，需要审查，陈大为不满，于是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先是准备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他坚持己见，后来陈被开除党籍。是年11月陈公博去日本，翌年2月由日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在这里，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确”，“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的观察”[(3)]，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1月，陈公博完成了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

1925年2月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国，4月到革命高潮中的广州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对他寄予期望，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由于汪、廖的信任，陈公博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廖仲恺被刺身亡，他又继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陈公博主持总司令部政务局。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陈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又任外交部湖北交涉员兼江汉关监督。11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蒋介石将总司令部设于南昌，把陈调去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在湖北和江西任职期间，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十分不满。

1926年12月，蒋介石企图迁都到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但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却在武汉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议迁都武汉。陈公博见蒋介石政治上处于劣势，他向蒋献计说：“共党虽然在武汉气势很盛，而军队毕竟附和者不多，若果总司令部能够迁汉，必然可以镇压下去，未来的祸害必然可以预先无形消弭。”[(4)] 1927年3月，他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4月上旬，汪精卫到了武汉，陈公博成为汪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7月，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分共，宁汉合流。9月，宁、汉两派加上西山会议派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分赃不均，汪精卫又回到武汉组织政治分会，与特委会对立，宁、汉再度分裂。陈公博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结合，打起反对特委会的旗帜，电请汪回粤共商大计。11月，汪率领顾孟馀、王法勤等不满南京特委会的中央委员到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通电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这时广东在桂系控制之下，汪精卫、陈公博利用张、黄与桂系争夺广东地盘的矛盾，策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桂系，控制广州。陈公博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2月11日，共产党趁广州空虚之际发动起义，陈公博与张发奎、李福林等调动部队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口广州起义对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激烈攻

击，汪被迫于1927年12月出走法国，陈则于次年1月到上海。2月，蒋介石利用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机会，排除了汪精卫，拉拢胡汉民为他支撑政治门面。陈公博、顾孟馀等汪派人物不甘心失败，麇集上海，以拥汪为旗帜，从事反蒋活动。是年5月、6月，他们先后办起了两个刊物：一个是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另一个是顾孟馀主办的《前进》。《革命评论》以恢复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相标榜，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有所抨击。由于人民厌恶蒋介石反动独裁，《革命评论》在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曾发生过一些影响。经《革命评论》鼓吹，各地有些刊物起而响应，形成了一股反蒋思想浪潮。1928年冬，反蒋派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为实际负责人。

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会前几天，陈公博和汪精卫（汪领衔，时在国外）等公开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圈定指派代表，抨击南京国民政府。各地改组派分子也随着进行抗议活动。蒋介石控制的三全大会五次会议旋即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停止顾孟馀党籍3年，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的决定，还以武力镇压各地改组派的抗议运动。此后，改组派便转而策动地方军阀进行军事反蒋。

在陈公博等的策动下，张发奎于是年9月在湖北宜昌起兵通电拥汪讨蒋。是年年底，桂系李宗仁与张发奎在广西组织护党救国军。12月改组派又任命驻郑州的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驻蚌埠的石友三为第五路军总司令，起兵反蒋。蒋介石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则击败唐生智于河南；接着收买石友三倒戈，改组派发动的这次军事倒蒋完全失败。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酝酿反蒋军事大联合。3月，陈公博、王法勤奉汪精卫之命赴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并和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捐弃前嫌，就党务问题进行反复协商。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7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反蒋各派在

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9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但反蒋军事不利，9月18日，东北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阎、冯军失败。扩大会议很快就散伙了。陈公博“心灰意冷”，于11月赴香港，“改组同志会”也无形解体。1931年1月汪精卫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复电赞成。接着陈由香港赴欧洲。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国民党各派被迫暂时妥协。陈公博回国后，国民党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在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各派成立了所谓“统一合作”政府，形成了蒋、合作局面，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

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受伤，出国就医；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极力排挤汪派势力，陈公博不得不辞职，旋赴欧洲游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1938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后，陈又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

1938年12月汪精卫已背叛祖国，率其党羽离开重庆逃到越南河内，陈亦尾随至河内并携汪投敌声明（即“艳电”）到香港公开发表。

陈公博并不完全赞同汪精卫离开重庆和建立伪政权的做法，所以1939年他仍在香港“徘徊观望”了一个时期，并完成《苦笑录》一书。1940年1月，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携走日、汪密约在香港公布，并宣告与汪精卫叛国集团拆伙的事件，汪精卫处境狼狈。陈公博以其和汪精卫的深厚关系，决心追随汪精卫。不久，陈璧君亲自到香港邀他参加伪政权，他回答：“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我随后就到便是。”[(5)] 到上海后，他又对汪精卫表白：“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6)]

同年3月17日，汪精卫偕陈公博等到达南京。汪伪政权于3月30日正式粉墨登场，陈公博任伪立法院院长兼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政治训练部长。嗣后他又兼任伪上海市长、上海市保安司令。

陈公博自参加伪政权后，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汉奸头目。1940年5月，为了争取日本尽快承认伪政权，汪精卫组织了“赴日答礼使节团”，派陈公博为专使，行前陈发表谈话说，当前对内是如何使全国“共同归趋于建国旗帜之下”，对外则“在于谋中日两国朝野深切之相互了解”，共同“建设东亚”。12月陈公博为日、汪《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订发表广播讲话，他向日本侵略者献媚说：“我们的态度，首先为中国打算，更为日本打算，最终还为东亚全盘打算。”[(7)] 1943年4月，汪精卫再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他到日本后，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好，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8)]。9月陈公博又陪同汪精卫秘密访日。10月，汪精卫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同年11月汪死，陈公博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继汪之后的第一号汉奸头目。他在就职时信誓旦旦地叫嚷：要奉行汪精卫“手定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决不动摇”[(9)]。当有人问到汪精卫已死，他代理死人行使职权，势必贻笑中外时，陈公博仍坚持己见。他私下对人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的一种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是办理收场的，不是继续演出的。”[(10)] 为此，陈公博在就职讲话中提出了讨好蒋介石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11)] 的口号，作为逐步结束伪政权的方针。他要求重整党务，召开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来结束伪政权，但未来得及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前夕，他调整军事部署，积极反共。除了和国民党军统进行联系外，又和国民党地方军事当局有过相当接触。所有这些，都是为他自己和汉奸们留下一条后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8月25日，陈公博乘混乱之机，偕其妻李励庄及林柏生、周隆庠等人，在日本顾问小川带领下，乘飞机逃到日本。经国民党政府交涉，10月13日陈公博等六人被引渡回国受审。

陈公博在监狱中写了《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为汪精卫和他自己开脱罪行。他迎合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心理，想以一贯反共的自白获取蒋的谅解，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12)] 1946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将陈判处死刑。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被枪决。

主要参考资料

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年上海版。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册、第四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1960、1961年版。

《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943年4月、1944年11月。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陈公博：《四年从政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67年版。

---

(1)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年上海版，甲196页。

(2) 陈公博：《少年时代的回忆》，《寒风集》，甲13页。

(3)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年上海版，甲231—232页。

(4) 陈公博：《军中琐记》，《寒风集》，甲153页。

(5) 陈伯衡：《我所知道的陈公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1961年版，第186页。

(6)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0年版，第46页。

(7) 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2月4日。

(8) 上海《中华日报》1943年4月8日。

(9) 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11月21日。

(10) 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见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11) 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见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第335页。

(12)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205页。

陈光甫

江绍贞

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1892年，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他随父到该行学徒，工余跟随比利时人狄来学习英语。1898年应考汉口海关职员被录取，先到邮局工作，后调江汉关税务司。1902年到汉阳兵工厂当译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和景的女儿结了婚。1904年，通过景维行的活动，陈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年回国后即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到江苏省银行任督察，1914年离职，转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顾问。

1915年6月，陈光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的时机，与信义洋行经理庄得之等人集资七万余元，又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应允，由中国银行向该行存款相助，在沪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陈任总经理。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1)]，面向社会中下层，以经营小额储蓄存款和小额工商贷款为主，一元即给开储，银元与银两并用。还以“礼券储蓄”、“教育储蓄”、“零存整取”等办法广泛开辟存款来源。为适应当时新兴工商业发展的形势，又倡办货物抵押贷款，并在业务手续上尽量方便顾客。在银行内部，他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行训。这样，上海银行的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资本即增达三十万元。1917年增办国外汇兑。1919年资本增至一百万元，1922年资本达二百五十万元。1923年创办旅行部，后扩充

为“中国旅行社”，是我国自办旅行业之始。1925年，陈光甫受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邀请，出席善后会议；同时与国民党方面孔祥熙、宋子文等交往密切。

1926年6月，美国垄断企业——金属公司董事长霍却特在上海逗留时，曾向陈刺探南方革命阵营的动向。1927年初，霍却特写信给陈光甫，表示如果蒋介石建立政府，美国是会承认的。于是陈光甫与江浙资产阶级一起，决定以财力支持蒋介石。3月底，蒋由南昌到达上海，与虞洽卿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通过他从上海的银行、钱庄两业中，为蒋垫借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陈又为蒋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效力。从此，他得到蒋的赏识，曾畀予财政部次长等职。他顾虑与政界靠得太紧，会影响银行的信誉，辞未就。1928年，中央银行建立起，他担任该行理事。11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时，他又分别担任这两行的常务董事和董事。

1929年2月，陈光甫赴英国与英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并顺道在欧洲一些国家考察金融、商业。6月，受国民政府委派，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0年他回国后，极力宣扬“劳资合作”。这年上海银行增资，他将新增资本股票的一半派给职员认购，“使行员皆成股东”[(2)]。

1931年前后，水旱灾荒遍于全国，陈光甫在上海银行设农村贷款部，与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合办农村贷款。1932年他就任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帮助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筹措反共内战经费，还顺从政府的意旨，将内债延本减息。这个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上海市临时参议员等职。他向官僚权贵靠拢，把上海银行的股票送给孔祥熙，让孔担任银行董事。同时，他还极力向国外活动，以“打通欧美各银行与本行发生直接往来”，视为上海银行“新生命的寄托”[(3)]。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华北，逼迫国民政府恢复北宁路通车。蒋介石通过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谋划，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

1936年3月，陈光甫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并被委派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到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他以中国货币固定对美元的汇率为条件，换取美国收购中国白银，缓解了中国币制改革初期出现的危机。到1936年底止，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五百万元，较开办时增加六十多倍，公积金七百五十多万元，存款总额一亿五千余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十处左右[(4)]。这时，上海银行已由原来一家小银行发展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成为“南四行”之一。

“七七”事变后，陈光甫对内战停止、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感到鼓舞，号召行员的抗战精神。他将总行管理机构迁到香港，上海改称分行，同时把江浙等地一些行处撤销，在西南内地组设新的行处，在重庆设总经理驻渝办事处。1938年，陈光甫由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又由政府派遣到美国借债，签订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为财政部在国内设复兴公司，在美国设世界贸易公司，由这两个公司负责购销桐油偿还债务。1939年10月陈又奉命以滇锡作抵押，签订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1940年4月，又以国内钨矿作抵押，签订2500万美元的钨矿借款。这几项缓解中国政府抗战初期财政困难的借款，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目。他为保全沦陷区的产业，将“上行”总经理一职改由杨介眉代理。

1940年6月，陈光甫由美回国。是年他与章乃器在四川合组上川实业公司。以后陈退出，另组上川工业公司。1941年8月，美、英各自从对华贷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平衡外汇的基金，建立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陈任该会主席。上海银行被指定经营外汇特许银行，从中获得利益。陈又通过上海银行在汉口建立的大业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也获得了厚利。

1944年春，陈光甫遵照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将上海银行总行迁至重庆。这时，他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便派员去美国订购设备，希望在战后大办工业。同年10月，陈由国民政府派遣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各国对中国战后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投资。会后又与张嘉璈、李铭等亲自同美国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

抗战胜利后，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国两家投资公司合办的中国投资公司在纽约开业。该公司资本额500万美元，为中国工商企业在美国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原计划在上海设分公司，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仅分公司未能成立，其纽约公司的业务也未能真正开展。1946年，陈又在美国纽约设立上海银行通讯处，加强与美国银行界的联系。此后他将大量外汇转移到美国，上海银行并代理美国一些银行在华的收付事务。他由于在经济上与美关系更加密切，上海银行最初宣扬的“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行训”，至此就一变而为“促进国际贸易”了。

1947年4月，张群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光甫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了国府委员。为协助张群、张嘉璈（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管理财政，陈出任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输出推广会副主任委员、美金公债监理会委员等职，参与政府有关财经措施的策划。这一年，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资本家合办的国家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陈光甫将上海银行的部分资金移往香港分行。1948年，他去曼谷筹设上海银行分行。天津解放后，他曾以“协助解放区经营进出口业务”为名，拨了10万美元给天津分行，借此试探人民政府的政策。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邀请他与颜惠庆、章士钊等人为其私人代表赴北平和谈，陈以“不愿陷入政治漩涡”而没有接受。上海解放前夕，他借去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到了香港。

1951年，陈光甫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他必须取得台湾当局的证明，才能解冻存美资金，1954年去台湾，在台北市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营业，并在台北定居，1976年7月1日病逝。

---

(1) 陈光甫：与济南分行经理吴祥霖的谈话（1920年12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版，第34页。

(2) 陈光甫：《第一区武汉同人欢迎总经理开会记录》（1931年1月18日），《海光》月刊第3卷第2期。

(3) 陈光甫：《在管理会上致辞》（1933年1月28日），见《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7页。

(4)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上海1937年版。

陈光远

陈德军

陈光远，字秀峰，河北武清崔黄口人。1873年10月8日（清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七日）生。早年在北京玉器铺为学徒，因与掌柜不睦被辞退。1892年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分至小站，任新军督操，后任南洋自强军营务帮办、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总务处总办，因体格魁梧，嗓音洪亮，善于恭维逢迎，颇得袁世凯赏识。1904年，任第二镇第四协统领官。1910年，任第四镇第七协协统。1911年署理第四镇统制。辛亥武昌革命爆发，陈光远随冯国璋率部与革命军在湖北黄陂作战，攻陷汉口、汉阳，进取龟山，获赐清廷头品顶戴，以提督记名。1912年1月1日，与清将领姜桂题等十四人联电反对共和；26日，又与姜桂题等四十六人联电请旨立定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后，因在广水处决部属激起兵变，被段祺瑞革职，经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从中缓颊，1913年7月调任热河巡防营统领及赤峰镇守使。

段祺瑞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时，职掌全国军队。然袁世凯自为团长、所创练的模范团，却直属大总统，不归陆军部节制。1914年10月袁世凯任命陈光远为模范团团附及新军督练处督练，以团附代行团长职权。12月又册封陈光远为一等子爵。模范团后改编为陆军第十二师，1916年1月陈光远署第十二师师长。9月，北京政府特加陈光远陆军上将衔。

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帝制时，陈光远充任第十一、十二两师督练，驻防南苑。陈光远与张勋之间本有联系，原准备做龙旗响应，后参与段祺瑞等的马厂誓师，参加讨伐，任讨逆中路军司令。张勋复辟失败后，陈光远晋为勋二位，任绥远都统，不久又接办新编陆军督办事宜。

1917年9月，陈光远与其九弟陈光逵率第十二师以及随从前往江西，接替李纯出任江西督军。陈光远与李纯本为北洋武备学堂同学，结盟为把兄弟，但是到江西后，将李纯所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第九混成旅旅长丁效兰及其以下团营长纷纷调换。

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后，积极实行武力统一。而冯国璋不欲用兵，主张和平统一。陈光远局促于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对于西南用兵消极敷衍，因而屡遭段祺瑞弹劾。1918年2月，北京政府夺其陆军上将衔，但仍任江西督军。1918年徐世昌出任总统。徐自小站练兵以来与北洋军关系密切，对陈光远亦表示好感。为加强与徐世昌的关系，陈光远曾亲赴北京三个月，觐见徐世昌；又通过江西督军公署驻京办公处处长齐协民，与徐保持联络。故在徐的任内，陈光远的督军地位大体上不致动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江西学生举行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进行声援。陈光远起初秉承北京政府旨意，对学生运动严加防范。当看到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时，陈光远深感民气迥非从前可比。5月12日，陈光远与省长戚扬联衔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力争青岛，并劝告北京当局毋过摧残士气民心。5月底6月初，南昌商人为反对议员加薪，发动罢市。陈光远一面督饬军警极力维持地方秩序，一面会同省长召集省会议长、商会会长和公民代表至督军署劝导告诫。经其调处，南昌商民很快就照常开市。为应付军费开支，陈光远决定开弛米禁，从中抽税以部分补充财政费用。这遭到省内外各界人士的纷纷指责，还一度激起了学生的退学风潮。结果陈光远被迫改为有条件开弛米禁，并由省议会担保实施。

1919年秋，陈光远与直督曹锟、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等结成七省反皖同盟。1920年冬，江西鄱阳县农民反对煤矿占地击毙矿警，聚众抗官，陈光远向北京政府告急。时张宗昌为中央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密令，以保护鄱阳煤矿为由，由湖南东进江西，企图驱逐陈光远离赣，

结果为陈光远击溃。陈光远的九弟陈光逵趁机将张部缴械。

靳云鹏任国务总理时，各省提倡自治。江西省长戚扬是浙江绍兴人，不安于位，江西人赵从蕃在靳云鹏那里夤缘获得江西省长一职。事前陈光远毫无所知，明令发表后，陈光远表示难以接受，授意其手下的军法处长潘毓桂、九江道尹傅春官等消极抵制。赵从蕃刚到九江走马上任的路上，已意识到陈光远对他不欢迎的安排布置，遂称病暂缓就职。陈光远趁机建议靳云鹏由江西省财政厅长杨庆鋆代理省长。经过一番活动，杨庆鋆如愿以偿。

直皖战争以及后来的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陈光远多以两面手法，见风使舵，敷衍各方。1921年南方各省高唱联省自治。蒋作宾以鄂人治鄂为由，企图赶走湖北督军王占元。王自知力不能敌，乃与陈光远密订军事同盟。迨鄂战发生，王占元节节败退，急催陈光远出兵醴陵，进攻长沙，以抄敌军后路，而陈光远观望不前，并派其军法科长潘毓桂赴洛阳向吴佩孚请示机宜。吴密嘱陈暂勿出兵，候王占元离鄂，直军到达前线，再行会师。及至吴佩孚率兵南下，陈光远又按兵不动，以谎言搪塞吴佩孚。未几，吴攻占岳州，长沙动摇，陈光远始令所部急出醴陵。这令曹锟、吴佩孚很不满意。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独霸中央政坛，而陈光远在徐世昌的授意下，却对张作霖大烧冷灶，曹、吴又大为不满。

1922年夏，孙中山北伐，江西首当其冲。此前，李烈钧的代表徐元诰来到江西，会见陈光远，对江西的学生运动公开表示关注。陈光远惶恐不安，担心李烈钧在“赣人治赣”的口号下发起驱陈运动。于是，他一面连连急催北京政府筹拨饷械，并严饬赣省沿边军队妥为警戒，一面利用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失和，密派督署秘书长夏同和与陈炯明联络。当时陈光远在赣南布置的兵力，计有第十二师之第二十三、二十四两旅，又第二旅、第九旅及第三旅一部，另有野炮三个营、工兵两个营、辎重两个营，大约两万人。及至北伐军进入江西，陈光远以赣南镇守使岳兆麟为前线指挥官进行抵御。岳昏聩无能，竟

至连战失利。早在1922年2月的时候，曹锟、吴佩孚曾因赣防紧急，以绥远都统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所部第一师前往应援。又由常德盛率豫省改编一师同往支援。常德盛师军纪不整，不堪一战。而蔡成勋效陈光远故伎，行至与南昌一江之隔的牛行车站，即按兵不动。待北伐军攻克赣州，前锋抵达万安之际，陈光远发表拥黎废督裁兵宣言。1922年6月15日，陈光远向北京政府呈请辞职，随即离开江西，寓居天津租界。

1924年7月，北京政府授陈光远为鉴威将军。9月，第二次直奉之战，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陈光远任职司令部军法处。10月，北京政变，曹锟被囚，陈光远自此未再涉足政界。

陈光远一生巧于算计，对于投资营利孜孜以求。从1917年秋到1922年夏江西督军五年任内，每年借陆军部不能如期拨发军队服装费之机，从省财政中每月领取十五万元。据估计，陈光远在赣刮地皮即达六百余万元，当时江西全省税收每年也不过七百余万元。陈光远又通过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龚心湛的姻娅关系，将聚敛所得大量投资北洋实业。举凡华欣纺纱厂、耀华玻璃厂、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原公司等企业，陈光远均有股份。卸任后，陈光远心不外鹜，时时关注黄金行情涨落，以为消遣。在天津等地广置房产、地皮，开设银号当铺多处。在家乡武清也占有一万余亩土地。

陈光远有子女八人。其元配赵氏无所出。次配蒋氏，生有四子一女，其女排行第二。三太太生三子。另外他的一个团长作战阵亡，陈光远笃念袍泽，收其独子为义子，抚养成人，并给以一部分遗产。陈光远拥有巨资，他的儿子姻联阀阅，因此家门鼎盛。1939年8月16日，陈光远在天津英租界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四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刘善庆：《陈光远与江西五四运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齐协民：《我所知道的陈光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任启圣：《陈光远事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

武清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著：《武清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大公报》（天津）1919年5月15日。

《申报》1919年5月17日。

《民国日报》1919年12月17日。

《晨报》1919年12月24日。

陈果夫

严如平

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1926年起以字行。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家原为吴兴世族，其祖父陈延祐经商；父亲陈其业，字勤士，为清末府学廪生，在乡里授业，后为国民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叔父陈其美（字英士）、陈其采（字蔼士）。

陈果夫幼年从父亲及大姑识字，1899年入塾。1905年随叔父陈其采往长沙，入明德学堂就读。1907年初，陈其采调往南京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亦至南京，考入浙江旅宁公学预科。是年夏，浙江创办陆军小学堂，陈投考录取，遂习陆军。其时陈其美已留学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给他影响甚多，曾寄宣传品嘱其在校散发，传播革命思想。1910年陈果夫与同学共办油印小报《励言》，并组织“襄义社”以结合同志。嗣后，陈其美命其填具誓书，入同盟会。1911年夏，陈果夫在浙江陆军小学堂毕业后，继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在校成立同盟会分部，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陈果夫与陆军第四中学同志前往武汉从军，先守卫汉阳兵工厂，旋调在军政分府军政科办事；嗣后东下上海，跟随陈其美在沪办事，与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以叔侄相称。1912年秋，拟赴法求学，因肺病咯血未果。次年3月去日本调治了3个月。二次革命起，他奉陈其美命在上海招集陆军学堂同学，组织“奋勇军”约二百人，任副司令长。7月18日晚，奋勇军奉派攻击龙华，旋进攻高昌庙制造局，占领西炮台。卒以海军被袁世凯收买，突从右侧发炮轰击奋勇军，加以后援不继，奋勇军退至闸北，被英租界当局缴械而散。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果夫想去德国留学，在上海学习德文近两年。1915年12月初，陈其美率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秘密进行军事反袁活动，陈果夫参与联络通讯、内部抄写等事宜。肇和舰举义未成，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退集渔阳里五号总机关部谋议再举，突遭法租界巡捕搜捕，陈果夫与之周旋，使其他人得以越屋逃逸。翌年5月，陈其美被袁党刺杀，陈果夫顿失依恃，返回吴兴。

1918年5月，陈果夫经岳父介绍，至上海入晋安钱庄为助理信房，三个月后代理信房，月薪只有八元。他于次年春天“做了一笔洋钿生意”，十几天就赚了六百余两银子[(1)]；此后继续做证券买卖。这期间，他与蒋介石往还甚多。1920年秋，和蒋介石等人合伙从事棉花和证券的买卖。年底，陈又入股张静江、蒋介石等开办的“恒泰号”。翌年5月，复组织“鼎新号”，做棉纱与金银证券生意，佣金收入达二十余万元，直至1922年交易所风潮中垮台。以后陈又开一家纱号，继续从事期货买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应蒋之邀，陈果夫在上海代为军校采办学生的制服和用品。是年底，被委为黄埔军校招兵委员，在苏、浙、皖一带招募教导队新兵。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陈果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5月初陈自沪抵穗，参与蒋介石、张静江等人之谋议，于5月15日向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党务整理案”，规定跨党者不得任中央党部各部长等，以排斥共产党人。6月1日，蒋介石兼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被派为组织部秘书；7月蒋介石率师北伐，陈即任代部长职。陈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组织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在广州协同张静江把持中央党部。蒋介石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2)]。陈不仅从谭平山等人手中获得了主持中央党部的权力，还把在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大批撤换。接着，他把

广州市党部和广东省党部控制在手，并派出亲信去赣、浙、沪、滇、黔等地，以及电令湘、鄂、皖、苏来人面授机宜，竭力控制这些地方党部的领导权。陈在广州开办“党政训练所”，自兼所长，加紧训练部属。

陈果夫反对国共合作，于1927年初向蒋介石“建议召集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因为执行委员多数同情于共党”[(3)]。这个主张被蒋介石等人采纳。4月2日，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在上海举行，但到会的监委连同候补监委共只八人[(4)]。吴稚晖提出了“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陈果夫、张静江等人即予通过，并发出了“护党救国”通电，成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依据。蒋介石随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与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对峙。陈果夫到南京主持中央党部秘书处，并筹办中央党务学校。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会议上，蒋介石和陈果夫提出了一个“国民党党务整理计划案”，要对国民党员重新进行登记，登记后进行审查、训练，以清除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反对派系。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仍由陈“代理”。陈即全力“整理党务”，下令各级党部一律停止活动重行“整理”，各省市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改名为“党务改组委员会”，由中央派往各地的“党务指导委员”代行各地执行委员会职权，把各地党部控制在自己的亲信部属手中。此时，他的弟弟陈立夫已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等职。兄弟二人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中，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党务大权，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其他派系对蒋介石指定或包办“选举”代表[(5)]的做法以及操纵中央执监委员名额极为不满，有的大闹会场愤然退席，陈果夫竭力协助蒋介石控制选举；自己也获得了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会议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等多种职衔。旋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部长，与陈立夫

共同为蒋介石掌管国民党党务，遂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同时，陈果夫、陈立夫把原先在广州组织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逐渐形成了以二陈为首的CC系。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扩大成为一个特务机构，并在各省市党部指定专人任“肃反委员”，从事破坏共产党组织、迫害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活动。嗣后又秘密组织“青天白日团”和“国民党忠实同志会”，成为CC的实体组织，参加者必须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拥护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务调查科后来扩大为调查处，以后又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特务分子遍及全国，长期为陈果夫、陈立夫所实际控制。

陈果夫在国民党第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和第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是国民党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除继续主管国民党党务外，还分掌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中政会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曾拟订了一个《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二十二条，宣称为“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要“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之项目，以礼义廉耻为国民生活之规律”。他很注意利用广播和电影“宣传党义，普及教育”[(6)]，认为这是十分重要而有效的宣传工具，于1928年和1932年创办了两个广播电台。他在1931年就主张国民党要办电影，说将来教育必须借重电影，才易普及而收效迅速。1933年6月，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指导筹办“中央电影摄影场”和制片厂。他在主政江苏时督促拍摄“政治教育”影片多本，宣传他的保甲制和警政等。1936年春他命江苏教育厅装置一辆“巡回施教车”开到农村去，白天放广播，夜间放电影，进行政治宣传。他自己还编写过《移风易俗》等“教育电影”脚本。在蒋介石发动“重整国民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中，陈果夫担任促进总会指导员。

他组织一批人编制《中华国民生活历》，对人民的生活起居都有他的设想。他还编了一本《通礼新编》，规定了各种通用礼节。

陈果夫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蒋介石在1928年10月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时，陈为16名国民政府委员之一，并任监察院副院长，因蔡元培坚不就院长职，陈实主院事。1932年8月，陈出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挂名委员长），主持导淮工程。陈以上下游兼治之策，拟订疏导淮水入海入江的计划，派沿淮12个县片集大量农民从事导淮入海工程——中山河，多时达24万人，3年挖土方工程六千余万立方，河长一百六十余公里；同时兴建活动坝、船闸等。迨至抗战爆发，许多工程不得不半途而废，淮河淤塞溃溢之患仍未能解除。

1933年10月起，陈果夫当了四年江苏省政府主席。他到镇江就任，大量任用CC系的人。他在全省普遍实施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强化统治。他把各县的“保卫团”与警察队合并为“保卫队”，由省保安处统一训练和指挥，自任省保安司令；还推行“壮丁训练”，先后集训60万人。他下令开办土地呈报，大规模清丈整理地籍，整顿田赋，征收地价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他秉承蒋介石“提倡国民劳动服务”的旨意，开办一批职业学校和“女子生活学校”，还办了一所“医政学院”[(7)]。在各大中学校，推行“军训制度”、“训导制度”以及“立志宣誓”、“始业教育”。1934年4月，他订了一个以四年为期禁绝鸦片的“禁烟大纲”，声言不以筹款为目的，不搞“寓禁于征”。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不了了之。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竭力发展官僚资本，成立中央银行和攫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陈果夫也利用政治特权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8)]，共同垄断全国金融。农民银行在各地遍设分支行，发行公债、货币和收存储蓄等，并以投资和债务关系，取得一批民营银行和厂矿的管理权。陈果夫逐渐成为大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果夫热心倡导“合作运动”。早在20年代，他就以孙中山“民生主义”为号召，推行“合作运动”，说这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1928年2月他起草了一个“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和蒋介石、李煜瀛、张静江联名提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同年12月成立“中国合作社”，自任理事长。他派干部去各地办“合作社”，于1929至1931年间在苏、浙等省办起了信用（储蓄与放贷）、消费（贩售日用品）、运销、保险、生产（养蚕、养鱼、养猪等）等各种“合作社”三千个左右。1936年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增设合作学院，并开办中央合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植人才。嗣后于1940年成立中国合作事业协会，任名誉会长；以后，又任中央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果夫始终是蒋介石的忠实部属。他认为“任何组织必须定于一尊”，提出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的口号。1936年9月，他发起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祝寿，发动各界“捐献”飞机。他在江苏到处“募集”，连小学生也“捐献”了一架。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共“募集”了一千二百余万元，命名五十余架。以后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又发起募建“中正堂”、“介寿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离任撤退，经汉口至长沙，翌年2月赴湘西芷江任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训练学生“忠党爱国”、“服从领袖”、“反对共产”[(9)]。政校学生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分配到各机关，陈果夫要他们定期写材料或口头汇报，以“毕业生指导部”及“同学会”名义加以控制，自成一体。

武汉失守、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陈果夫积极支持蒋介石制定和实行《异党活动限制规定》、《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并授意“中统”加紧特务活动，竭力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以后对于国共重庆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他皆持消极和反对态度，甚至担心蒋介石会履行政协决议，写信给蒋陈言：“共产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

主张撕毁协议。

1939年7月，陈果夫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为蒋介石掌理全国党、政、军、文各部门高级人事的调查、登记、考核、分配、监督大权。其间又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办公厅主任等要职。此时陈立夫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二陈控制下的“中统”更是笼罩整个国民党；在全国的民政、教育系统以及部分建设、交通、财政税收机关和银行（如交通银行和某些私人银行）以及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也都有“中统”的触角。

抗战期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官僚资本获得发展。农民银行和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共同成为国民党的金融统治机构，在抗战头四年的存款总额激增，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80％以上。陈果夫还兼任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们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开办大华企业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等多种企业，并利用农民银行向几十家私营企业投资，获取控制权。

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果夫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这次大会提出要“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陈乃向大会提出要建立“党营生产事业”、自行筹措国民党经费、“巩固党的经济基础”，“以党养党”。11月，陈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以其主要精力用于“党营生产事业”方面，迅猛发展CC系官僚资本。他派出大批亲信骨干去各地，插手接收敌伪物资和企业，改为“党营”，陆续开办了太平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以及银行、工厂等达七八十家。他以中国农民银行为核心，控制了一批农业公司，垄断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他还把国民党的新闻、文化、电影、广播等机构一一企业化，收入全归为“党费”。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等职，是“CC”系官僚资本的首领人物。不过他虽然掌控亿万财富，却并不侵占贪污、聚敛私财。

陈果夫自幼体弱，1911年参加武汉保卫战时，在蛇山推大炮因用力过猛，致使肺血管破裂，留下终生不愈的肺疾。他曾几次因病情严重，离职休养。在求医问药之余，他研习医药，撰有《医政漫谈》等。他重视中医中药，主张用中药治疗流行疾病。后期他患肋膜炎日重，曾三次手术，1948年7月卧床不起，肺与肋膜腔已相通。其时，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陈先渡海去台湾。翌年8月起，他因喉结核症发音嘶哑而不能言语。蒋介石于1950年7月在台湾“改造”国民党时，他被列名为“中央评议委员”。1951年8月25日病故。

陈果夫一生写了各种体裁的文字共一百九十余万字，后被编成《陈果夫先生全集》十册在台湾出版。

---

(1)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2)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3) 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回忆录》。

(4)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16日选出中央监察委员十二名，候补监察委员八名，共二十名，他们是：吴敬恒（稚晖）、张人杰（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煜瀛（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高语罕、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黄绍竑、李宗仁、江浩、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出席1927年4月2日会议的是吴、张、蔡、古、李煜瀛、陈果夫、黄绍竑、李宗仁八人。

(5) 国民党中央规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半数由各省市党部选举，半数由国民党中央指定；党员未办登记或未正式成立党部的省市，其代表亦由国民党中央指定。结果366名代表，由国民党中央指定的计289名，占80%；由省市党部“选举”的77名代表，许多也是由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操纵产生的。

(6) 《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1935年11月16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汇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

(7) 陈果夫：《苏政四年之回忆》，《小意思集》（增订本），正中书局1947年4月版，第12页。

(8) 蒋介石为筹措“围剿”工农红军的经费，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该处扩建为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

(9) 陈果夫1938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陈鹤琴

严如平

陈鹤琴，浙江上虞县人，1892年3月5日（清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七）生。父亲陈松年，在本县百官镇开小杂货店为生。陈鹤琴六岁丧父后，家境困顿，帮助母亲张氏替人洗衣补助生活。七岁起入塾六载，攻读四书五经。他自幼深受母亲的教诲和传统美德的熏陶，虽然境遇贫困，但他性格开朗，凡事乐观，意志坚强。1906年得姐夫陆锦川资助，至杭州入蕙兰中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1911年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秋，转考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被录取。

陈鹤琴负笈北上，进入清华学堂。他得知清华学堂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自己得到如此优厚的学习条件，实是千百万人民脂膏的栽培，萌发了救国爱民的思想。他与几名同学创办青年会，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先后开办了校役补习夜校和城府村义务小学，兼任两校校长。在义务教学的实践中，他逐渐树立起热爱儿童与热爱教育的观念。

1914年，陈鹤琴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庚款留美，8月与陶行知等同船出洋。他原选择学医，在旅途中反复思考，想到自己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而“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乃确定了学习教育和献身教育事业的人生目标。他抵美入霍普金斯大学，除学本科及英、德、法几种外文外，还选学政治学、市政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假期还先后到康奈尔大学、阿默斯特大学的暑期学校兼读心理学、园艺学等自己喜爱的课程，打下了广泛的知识基础，获得了重视实验研究的方法和精神。1917年夏，陈在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对启发式教育和黑人教育的自立精

神深感受益。翌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又转入心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陈鹤琴，为爱国青年奋起救国的精神和“民主”、“科学”的口号所激励。他接受了回国任教之聘约，中断了博士研究论文，于当年8月回国。他先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任教授；1923年又任东南大学教务主任。他大力倡导有生气、有活力的校风，介绍美国教育思想有关学生自治的学说及其实施效果，鼓励学生广泛开展课外活动。

陈鹤琴热爱儿童，他在南京执教期间，即开始了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的实验与研究。1920年初，他与俞雅琴结婚，年底得子一鸣。他就以一鸣为研究对象，对一个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进行跟踪观察和文字、摄影记录，前后达808天。他以此为实验的基础，经过归纳与系统的研究，写出《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计二十四章，作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一种，分上下两卷于1925年出版。同年，陈的另一本专著《家庭教育》，作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出版。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发表《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一文，认为《家庭教育》“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该书融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于一体，以生动具体的事例和深入浅出的道理，提出家庭教育的理论和101条教导原则，受到广泛欢迎。先后再版十余次，直到20世纪80、90年代还多次重版，开我国近现代幼儿家庭教育科学研究之先河。

陈鹤琴于1923年在自己寓所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自任园长；翌年又在宅旁购地扩建新园舍。他对幼稚园的课程、教学方法、设备、玩具、教具等进行实验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及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幼稚教育。1925年该园被定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为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此后陈鹤琴继续进行儿童教育的科学实验与研究，撰写了大量论文。他还撰著《好朋友丛书》14册，主编《少年儿童图画诗歌》12册，与丁柱中共同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又与陈选善共同主编《小学自然故事》40册、《中国历史故事》40

册。他对少年儿童的教学测验进行了实验研究，编制了中小学各科实验，与廖世承合编《智力测验法》和《测验概要》两书，推进了我国的教育测验。

为推动全国教育界开展幼儿教育的科学研究，陈鹤琴于1927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发起组织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月刊（后改名《儿童教育》）任主编。翌年他与张宗麟合编《幼稚教育丛刊》出版。他还受国民政府大学院之聘，负责拟订《全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29年7月他创办中华儿童教育社，任主席。至抗战爆发时，各地成立了六十余个分社，社员逾四千人，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教育学术团体。

陈鹤琴积极支持陶行知等教育界先进人士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新教育活动。他试验和推广陶行知提倡的“辅导考试自学法”和“连环教学法”，教贫民识字，还动员自己的母亲进行试验。1927年，他支持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并任该校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还与陶等合力创办樱花村幼稚园，开辟了乡村幼稚教育的实验基地。1931年他在上海协助陶创办“自然学园”；1934年支持陶创办“劳工幼儿园”。

陈鹤琴于1927年6月出任南京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长，着力整顿中小学，创办幼稚教育，推行新教育，提倡实验和研究风气，编写和研究教材、教具等。翌年夏，在国人收回教育权的声浪中，陈赴上海主持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工作，为中国青少年办学。他在任华人教育处处长11年间，先后创办8所小学（附设幼稚园）、1所女子中学，并开办4所职工学校。他竭力维护国家尊严，经过斗争赢得在工部局学校升中国国旗的权利，并使华童公学得以增设中国籍的校长和副校长，而不再只限外国人；还争取到给145所私立中小学以经费补助。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猖狂入侵上海，百万难

民涌入租界。陈鹤琴以对难民和难童的一片爱心，投入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为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上海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主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开展难民中的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他发起成立儿童保育会，设儿童保育院收容流浪儿童，创办10所报童学校和2个报贩成人班，组织文化知识学习。他还在难民中推广汉字拉丁化，编写拉丁化新文字的《民众课本》2册和新文字与汉字对照的通俗读物15册，以3.5万难民作试教对象，实验新文字教学两个月脱盲。

身居上海租界孤岛的陈鹤琴，心系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参加了共产党人秘密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星五聚餐会”和“民社”，定期集会讨论抗日形势，商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包括募集药品物资支援新四军，营救被捕的爱国人士等。陈的爱国行动为日伪统治者所不容，被列入暗杀名单。1939年10月，陈离沪去宁波暂避。

1940年初，陈鹤琴潜往抗战后方江西，在泰和县文江村的大岭山上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及附属小学、幼稚园、婴儿园，以“荒山辟乐园”的创业精神率领师生披荆斩棘，边劳动边教学。他组织师生潜心进行建设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理论研究，并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活教育”的主张，认为要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进行教育；还于1941年创办了《活教育》月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鹤琴返回上海，先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负责接管外国人开办的三十余所中小学，并于1945年12月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后改名市立女子师范）。他还到南京重建遭战火毁坏的鼓楼幼稚园，仍兼园长。为解决难童教养问题，他于1947年创立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任理事长；同时又创办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兼任院长，对聋哑儿童、伤残儿童、问题儿童进行综合性研究和教育。他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加紧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在坚持办教育的同时，支持并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提倡民主办学，主持尊师运动，担任上海市教师福利促进会和市中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顾问

及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理事长。陶行知逝世后，他被推选为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支持教师和学生的进步活动，保护和营救遭迫害的进步师生，受到反动当局的恐吓和威胁，于上海解放前夕两次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上海6所大学的校长作保才获释。

1949年9月，陈鹤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继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他先被聘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和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他大力推动新中国的幼儿教育和师范教育事业，致力于教育科学的研究，1981年在《家庭教育》一书重版序言中说，“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我虽然年已九旬，但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之心十分炽烈”。

陈鹤琴一生教育论著甚丰，超过400万字，编有《陈鹤琴教育文集》（二卷）和《陈鹤琴全集》（六卷）出版。

陈鹤琴于1982年12月30日在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陈鹤琴：《我的半生》，江西教育用品厂1941年版。

陈鹤琴：《儿童心理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收入《陈鹤琴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陈鹤琴：《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陈鹤琴生平年表》，《陈鹤琴全集》第6卷附录。

《儿童教育》第1—7卷；《活教育》第1—7卷；《心理》第1—3卷及《新教育》、《教育杂志》等。

陈焕章

郑则民

陈焕章字重远，广东省高要县砚洲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陈锦泉，是清朝的候补巡检[(1)]。

陈焕章幼年在当地书院读书。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他投入康的门下受业。康有为曾主张仿照基督教的形式建立孔教，并用孔子“诞辰”纪年；陈十分赞成这个主张。1899年陈焕章在家乡设立“昌教会”，于陈氏家祠供起孔子牌位，“合一族之男女老少悉入会中”[(2)]。

1904年他到北京应特科考试，中了进士。1907年被选派赴美国留学，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这时，陈焕章同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有所联系。他为了对抗孙中山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扩大旅美华侨中的保皇势力，在纽约创办“昌教会”并筹款建立孔教义学，自任校董。此后，他以当时美国社会上流行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等理论来附会中国的孔孟学说，用英文撰写了一本《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全书数十万言，分36卷，“就理财以谈孔教”，企图“使天下之人，知孔教之切实可行，殆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也”[(3)]。哥伦比亚大学于1911年初授陈焕章以博士学位，并将此书编入该校法政丛书之内，在世界各地广为推销。

辛亥革命前夕，陈焕章回国，寓居上海。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经过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虽然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去了，但在革命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阶级提倡的尊孔读经遭受了一次打击，再也推行不下去了。陈焕章对于这

种状况很不满意。他受康有为的密信指示，提出创立全国孔教会的主张，并四处奔走，寻求支持。美国人李佳白立刻予以帮助，把在上海经营多年的文化侵略机构“尚贤堂”给他作为一个基地。1912年7月陈焕章写了《论孔教是一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文章，作为建立孔教会的纲领，在“尚贤堂”集会进行讲演，制造舆论，说什么“孔教之为宗教也，数千年于兹矣”[(4)]。“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统中国之历史，亦不过孔教之历史而已”[(5)]。提倡在全国各地“遍立孔教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特设教旗……为黑白赤三色”，“以孔子纪年”，“讲经”，“发愤传教”[(6)]等等。

接着，陈焕章纠合了群集在上海的沈曾植、梁鼎芬，姚丙然，麦孟华等发起组织全国孔教总会。1912年10月在上海山东会馆开成立大会，不久在上海设立干事会和总会事务所，由陈焕章当主任干事，总揽会务。孔教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立案批准，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支会和分会。1913年2月起发行了《孔教会杂志》，又由他当总编辑。

1913年夏，陈焕章到了北京。8月，他联合梁启超等人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曾得到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和以张勋为首的一些军阀的通电支持，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其他宗教团体的不满，结果该案遭到否决。与此同时，陈焕章与孔丘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相勾结，于1913年秋“大成节”（孔丘的生日），在山东曲阜阙里召开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祀孔典礼。决定“每年大成节，开全国大会于阙里”，并正式确定将孔教总会从上海迁往北京，又在曲阜设立孔教总会事务所。同年冬，陈焕章被袁世凯聘为总统顾问。他与袁的外籍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有贺长雄等一度来往密切，共同利用孔教鼓吹帝制。

1913年11月，康有为从日本回国，被陈焕章等推为孔教总会

长，军阀张勋也被推为曲阜孔教总会“名誉会长”。康等早有扶植清废帝复辟的企图，他们把争定孔教为国教作为孔教会活动的中心目标，妄图以此敲开复辟之门。1915年袁世凯在称帝前夕，对孔教会头目们有所疑忌。陈焕章赶快“韬光养晦”，关起门来，写他的《孔教经世法》[(7)]。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洋政府总统，国会重新召开。陈焕章等又于1916年9月再次向国会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说什么“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8)] 同时还联合国会议员组织国教维持会，由于人民的反对，再次失败。

1917年夏，张勋与康有为等一起导演的复辟丑剧中，孔教会的头目们也被加官晋爵，封为“大臣”或“尚书”。陈焕章一面对这次复辟阴谋暗地支持，另方面却没有轻露马脚，以备见风使舵。复辟失败后，康有为逃走，陈焕章投靠了重新当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被推为孔教总会长的继承人。当年12月他改《北京时报》为《经世报》，作为孔教会机关报，自任总编辑。1918年，在皖系军阀的操纵下，北京召开了御用的“安福国会”，陈焕章当上了“安福国会”的议员。

1919年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随后，马列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新文化运动更深入发展。陈焕章等对此极端敌视，5月29日，他向国会提出一个“尊孔法案”，大叫如不尊孔读经，则“俄国过激派之祸，将遍于中国矣”[(9)]。1920年他又抛出《孔教会教规》，说：“孔教不明，则祸机四伏”，“惟孔教然后足以保社会之秩序，身家之平安。”[(10)] 为了争夺青年，他四处奔走，募款修建北京孔教大学，叫喊“今欲应时势之需要，则不得不速开孔教大学，以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辞而承孔圣”[(11)]。这一着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赏识，除拨地捐款外，还聘陈焕章为总统府顾问，又授予文虎勋章。20年代初期，陈焕章还加入了“政学会”，担任该会的财政、交际股委员。

1922年夏，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陈焕章为迎合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急忙抛出《非联省》一文，叫嚷“今夫各省之当服从中央，此法理之公也”[12]。次年1月他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获得了“大绶宝光嘉禾”勋章。1923年9月，北京孔教大学（校址在北京西城甘石桥）正式开学，陈焕章任校长。他标榜“以昌明孔教，培养通儒”[13]为该校宗旨。他禁止学生谈论爱国，不准阅读一切新文化报刊，对学生思想禁锢极严。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北洋政府的总统，陈焕章仍被聘为顾问。当年12月，陈在《请曹大总统祀天书》中说：“大总统躬膺天眷，新正大位，不知者以为议员选之，焕章则以为天选之。”[14]

此后，陈焕章依旧以北京孔教总会和孔教大学为基地，鼓吹尊孔读经。1928年山东曲阜发生了反孔府事件，他与孔德成通信密商对策，并联合一些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保持孔德成的“衍圣公”封号和孔府的封建特权呼吁[15]。但是，由于陈焕章与孔教会在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北洋军阀垮台之后，未能博得国民政府的欢心，陈焕章不得不居留香港。1931年，他开始从事修订《宣统高要县志》。1933年12月病死于香港。

---

(1) 马呈图等纂修：《宣统高要县志》，肇庆和发自动机印务局1938年本。

(2) 《经世报》，第1卷第1号。

(3)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见陈焕章讲《孔教论》附录，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4) 陈焕章：《论孔教是一宗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1页。

(5) 《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31页。

(6) 《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59—62

页。

(7) 陈焕章：《孔救经世法序》，《经世报》，1917年12月25日。

(8) 《经世报》第2卷第3号。

(9) 《宗圣学报》第2卷第10册（1920年2月）。

(10) 柯璜等编：《孔教十年大事》第2卷，1923年山西宗圣会版，第102页。

(11) 陈焕章等：《筹建孔教总会堂以办孔教大学启》，《经世报》，第2卷第1号。

(12) 《经世报》，第1卷第6号。

(13) 《孔教大学校章程》，《经世报》，第2卷第6号。

(14) 《经世报》，第2卷第7号。

(15) 《孔府档案》卷号0008437，及1929年《陈焕章致孔德成信》。

陈济棠

李静之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890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生。父亲陈谦受，务农为业。

陈济棠幼年在私塾读书，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次年春，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广东光复，成立广东陆军速成学校，陈入该校学习。1913年毕业，在广东军队充任下级军官。1915年参加讨袁（世凯）倒龙（济光）活动失败，辗转到肇庆投护国军林虎部，任连、营长。1920年粤桂战争期间，脱离了林虎部。11月，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政府，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应邓邀在该师任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第一营营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陈济棠继陈铭枢任第四团团长，曾表示支持孙中山。年底，孙中山联络杨希闵、刘震寰率滇桂军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与邓演达（第一师工兵营长）、张发奎（第一师第二团营长）等配合滇桂军于1923年1月重新占领广州。不久，陈升任第二旅旅长。

4月，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这时，广西青年军官黄绍竑从旧桂系分裂出来，与第一师合作，夹击沈军，攻下了梧州。7月，两广革命势力在梧州会师，成立西江督办公署。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任善后督办，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以后，应李宗仁、黄绍竑之请，陈的第二旅由李济深派驻梧州，协助李、黄统一了广西。1925年5月，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陈旅参加了解决驻西江刘部桂军的战斗。

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济棠升为第十一师师长。这年秋冬，他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一直打到海南岛。1926年北伐时，陈师留粤，负责南路绥靖工作，驻防高、雷、钦、廉地区，陈并兼钦廉警备司令。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很有抵触，曾建议蒋介石举行清党。因时机未到，蒋没有采纳。陈利用权势，支持其兄陈维周在钦廉地区承办各项捐税，牟取暴利，引起各方人士的不满。因此，陈济棠不得不暂时引退，于1927年春到苏联考察。入夏，他返回南京，向蒋介石呈报反苏意见。又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苏反共报告。宁汉分裂后，他回到广州，继续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还促李济深、黄绍竑通电讨伐武汉政府。不久，复任第十一师师长。

同年9月，由贺龙、叶挺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入粤，陈济棠积极参加阻击，在汤坑与贺、叶主力激战。11月，发生张发奎和李济深（时任广东省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争夺广东地盘的事变。陈济棠站在李济深一边，对张部作战。1928年1月，李济深重回广州，将驻粤各军整编为三个军，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兼西区（包括广州市及西区等地）绥靖委员，移驻广州。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裁兵建设为名，削弱非嫡系武力，引起各派新军阀强烈不满。3月，蒋、桂酝酿战争。李济深因亲桂系，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陈济棠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古应芬、胡汉民向蒋介石推荐，被任命为广东编遣特派员。陈就职后，立刻通电拥蒋，并下令裁撤第八路军总部，限驻粤桂军24小时内离境。不久，蒋介石又加委他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掌握了广东的军权，与省主席陈铭枢分治广东。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济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了表示拥蒋，他以9500元购青翠玉石送往南京，供刻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印章。

同年4月，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利，败回广西。不久，和驻

粤东拥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秘密联系，声言讨蒋，进兵广东，5月上旬席卷了西江各县。陈济棠全力迎击，在花县赤坭、白坭将桂军击败，乘胜追至广西边境；6月，又在东江打败了徐景唐的军队，从而博得蒋介石的信任。他乘机将广东部队改编为五个师，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分任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三师师长，成为他的嫡系部队。又将陈铭枢的旧部编为六十、六十一两师，以蔡廷锴、蒋光鼐为师长。

同年秋，张发奎在湖北宜昌举兵反蒋，并转入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会合，进攻广东。张、桂军连陷三水、花县，广州岌岌可危。陈济棠受蒋命迎击，12月中旬在花县一带激战，击败了张、桂军。又长驱直追，占领了广西梧州，向广西腹地进攻。

1930年5月初，中原大战爆发。张、桂军为了策应阎锡山、冯玉祥，倾巢入湘，于5月下旬攻下衡阳、宝庆（今邵阳）。6月初占领长沙、岳阳，拟乘胜直下武汉。蒋介石急调粤军救援，陈济棠将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个师从梧州船运至广州，再沿粤汉路进入湘南，从桂军手里夺取了衡州（阳）。桂军怕后路被截断，放弃长沙、岳阳，于7月初退回广西。接着，蒋介石又令粤军北上增援。陈济棠乘机将陈铭枢的嫡系蒋、蔡两师调往津浦线，参加对阎、冯作战，以削弱陈铭枢在粤实力，使广东的军队成为他独家的势力。

陈济棠掌握广东军事大权以后，不断扩充军事实力。他借攻打广西为名，增加了两个独立旅、三个独立团、五个师属教导团，十个旅属特务营。他又秘密向德国、捷克购买了大批军火，但他自知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被蒋吃掉。蒋支持的省主席陈铭枢又同他明争暗斗，使他控制广东的野心受到牵制。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求陈济棠裁减军队，削减军费，更引起陈的不满。

1931年2月，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被蒋软禁在南京汤山。国民党粤系中央委员及西南实力派议论纷纷。亲胡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

秘密跑到广州，策动陈济棠反蒋。陈济棠一向受到胡、古支持，正欲乘机独霸一方，当即答应，并与古联合驱走了陈铭枢，把广东政权也拿到手中，树起了反蒋旗帜。

为了壮大反蒋力量，陈济棠迅速和桂系军阀达成妥协，把粤军撤回广东，组成粤桂联合阵线，又以巨款供给古应芬联络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企图在西南组织反蒋政府。4月30日，国民党粤方四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以陈济棠领衔的广东将领十人通电表示拥护。25日，陈济棠等二十余人又联衔通电请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国民党各派政客、粤桂军阀麇集广州，于27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党政府。粤桂军改编为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陈济棠担任广州国民党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事实上，他和古应芬是非常会议的真正主持人。接着，粤桂军向湘赣进兵。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准备堵截，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宁粤双方举行谈判。通过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调停，达成了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11月，双方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各自增选中央执监委，进行政治分赃。1932年元旦成立了以林森为主席的“统一”政府。非常会议撤销后，根据粤方四全大会的决议，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仍维持半独立局面。表面上拥戴胡汉民为西南领袖，实际上是陈济棠、李宗仁分掌实权，陈济棠则成了独霸广东的“南天王”。

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首先着手扩编军队，使兵力达到15万人以上。又将西南政务委员会所属的空海军用武力接受过来，独揽了广东陆海空军大权。他把军官教导队扩充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自成系统。在政治方面，他利用元老派林云陔为省主席，派其亲

信林翼中等分别控制省党部和民、财、教各厅，掌握实权。在财政上，陈济棠拼命搜刮民财，开放烟赌禁，大肆征收苛捐杂税，用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1933年广东颁布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后，兴办蔗糖、纺织、造纸、水泥等工业，又获取了巨额利润。为了便利军事行动，他还扩展全省交通网，修建海港，发展广州市政建设。在文化思想上，陈济棠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宣传“四维八德”，要求部下对他举行效忠宣誓。他迷信星相风水，任命重要部属时，有的先要由术士相面。他还不惜耗费大量钱财，设法把他母亲的坟墓迁到花县洪秀全祖坟处。说那里风水好，子孙可永享荣华富贵。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暂时对西南半独立状态采取了容忍的态度。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陈派余汉谋负责赣南“清剿”。1933年10月，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陈又担任南路军总司令。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的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运动。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陈济棠获悉后，便和桂系联合起来，以抗日为名，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

5月27日，两广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呈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领导抗日。2日，通电全国。4日，陈济棠、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西南将领三十名通电响应。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全国震动，不少人表示同情。

这时西南方面兵力共约三十万，并有飞机一百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他们将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由陈、李分任总司令和副司令，声称要北上抗日。6月8日进入湘南，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

汉。蒋介石一面电陈济棠迅速撤兵，一面急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向西南调集军队，并分化和收买陈济棠的部下。7月6日，陈济棠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离职赴港。9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径飞南京。13日，国民党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同时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派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二中全会决议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及一、四集团军名义。18日，被陈济棠视为王牌的广东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体驾机投蒋而去。这对陈是个沉重打击。他当日逃往香港。8月30日出国到欧洲。

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发起为蒋介石“献机祝寿”。陈济棠当时在国外，为了与蒋修好，特此献金购机。1937年9月陈济棠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蒋又提名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任命他担任农林部长。他意态消沉，于次年辞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济棠受任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1946年后，回广东从事教育事业，同一些旧部一起创办了珠海大学，后来迁到香港改为珠海学院。

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4月，改海南岛为特区，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南京解放后，他反对议和，建议蒋介石复出，一度在广州奔走斡旋。6月赴海南岛，极力强化统治，想把它造成为“反共根据地”。他命各县市编练保安部队，“进剿”人民游击队。又编练两个美械装备的陆军师，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

广州解放前夕，伪广东绥靖公署、广东省政府向海南岛撤退，薛岳、余汉谋分任琼崖防御总司令和副司令，陈大权旁落。年底，李宗

仁赴美，陈又与薛、余联电请蒋介石复职。

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海南岛，陈济棠逃往台湾，任伪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

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在台北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李洁之：《陈济棠治粤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陈家鼎

许进

陈家鼎，字汉元（汗园），又名陈曾，故自号半僧。1876年6月18日（清光绪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狮顾镇。祖辈务农，到祖父陈玉华始为读书人。父亲陈悔叟以诗礼教化闻名乡里。

陈家鼎少年读书聪敏坚毅，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1898年，入两湖书院，与同窗黄兴、白逾桓等相识，后转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常读王夫之（船山）和南明学者遗著，遂萌发民族思想。八国联军迫订《辛丑条约》后，眼看大好河山日益破碎，痛恨清政腐败，有振兴中华之志。1903年初，与新入文普通学堂的宋教仁相识。同年秋，陈以成绩优异获保送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益肆力于政治学，于西籍无所不窥，尤博通共和宪法原理原则，阐究民生学，注意于社会国家主义”[(1)]，曾获法学士学位[(2)]。

留日期间，陈家鼎积极参与黄兴主盟的华兴会活动。1904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后逃往上海，同年11月7日，陈家鼎在上海参加黄兴召集的余庆里集会，图谋再举事，因万福华谋刺清吏王之春案突发，与黄兴等先后逃亡日本，继续学业。在日本，与湖南同学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姚洪业等联络留学生，鼓吹反清革命，宣传民主共和。

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陈家鼎率先加入，并任同盟会总部评议员。是年秋，同盟会总部决定在长江沿线创设机关，陈家鼎奉孙中山命回国筹划，他先后在上海、武汉、长沙参与建立同盟会分会机关。在上海，当时曾由在阜丰公司任职的孙毓

筠捐资作经费，先在虹口三元里，后迁往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夏昕藁家设立同盟会机关，门外挂“夏寓”的牌子，由陈家鼎驻会负责。上海同盟会机关成为当时海内外革命党人活动联络“通消息之大本营”[3]。

陈家鼎还在长江一带积极活动。在武昌与“日知会”的刘静庵、朱松坪、时功璧等结交，感情甚深，在高升巷圣公会内建立同盟会湖北机关。以后，陈家鼎曾写过《哭刘敬（静）庵、朱松坪两烈士》诗三首，有“何当寻得刘朱墓，大哭当年两鬼雄”、“不堪再过高升巷，宿草斜阳独闭门”[4]等句。

陈的胞弟家鼐也是同盟会员，1906年毕业于湖北陆军学堂，充新军教练官，在军内积极联络同志，从事革命。陈家鼎还结识一些长江会党头领，如杨恢、成亚龙、郑先声、马福益等，开展活动。陈家鼎当时担任长江沿岸七省同盟会机关视察，他不避艰险，为创设革命机关和开展革命斗争而努力。

陈天华忧国愤时在日本蹈海自杀殉国后，同盟会公推宋教仁作传，由陈家鼎和苏鹏护送烈士灵榇回国。不久，姚洪业又因筹建“中国公学”受挫，在上海愤投黄浦江而死。湘籍人士原拟将陈天华烈士遗榇归葬新化原籍，陈家鼎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号召人心的好机会，提议公葬。经电商湖南各界，建议公葬烈士于长沙岳麓山。1906年5月23日，二烈士灵柩运抵长沙。陈家鼎和禹之谟领导群众冲破官绅阻挠，举行了葬礼，万余人参加，轰动一时。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这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5]。

在湘期间，陈家鼎和禹之谟还在长沙创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初设天心阁，后移至北正街湘利乾织布公司禹之谟家中。当时青年军人和学生，尊奉禹、陈二人为泰山北斗，一致推举二人为湖南学会会长。邵阳中学堂和唯一学校是他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两个据点，一时全省人心更加趋向革命。

公葬陈、姚后，陈家鼎、禹之谟拟利用民气进一步发动，组织起义。事泄，禹被捕，陈家鼎翻墙逃入圣公会，得一牧师保护才幸免于难。刘静庵闻讯，自武汉密电告知，湖北官府正亟谋抓捕他，嘱出逃时切不可走武汉。于是陈家鼎化装清吏，由这位牧师护送从小路奔江西萍乡逃亡。清政府命令沿江官府严缉陈家鼎，又迁怒其家，其父陈悔叟经地方乡绅杨翌如等极力保得免[(6)]。

陈家鼎潜抵上海后，得到党人高天梅、柳亚卢（即柳亚子）等人掩护，立即与宁调元、杨守仁筹备出版《洞庭波》杂志，这是和《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云南》、《四川》等杂志一样，同由本省留日学生创办，以本省为刊名的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洞庭波》刊出陈家鼎所撰《二十世纪之湖南》一文，对在湘人中存在的“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外性之误看”等谬误，进行了剖析；他针对性地提出“速行悔过”、“首倡起义”、“力讲外交”、“公约自治”和“预备革命”等五法，以为“医治湖南的药石”[(7)]。此外，陈还撰写了《禹狱之构成》、《哭亡友姚君洪业》等文。

清吏端方、铁良、瑞澂对陈家鼎等人的革命活动恨之入骨，通令悬赏缉拿。由于无法在沪久留，陈家鼎与宁调元于10月29日同船再逃往日本。宁调元在舟中曾有诗云：“心绪如焚赋七哀，同舟共济几人才，祖鞭应许君先着，东亚雄飞大舞台。”“须知安乐交人易，漫说狂澜砥柱难。唯有使君唯有我，头颅练好铁相看。”诗共八首，题名为《渡黑水洋有作兼赠汉援》[(8)]。

那时，孙中山住在东京筑土八幡町，门外写着“高野长雄寓”。陈家鼎向孙中山详细谈了国内情况，并设法营救禹之谟。但不久，禹在狱中被害。继之，萍浏澧起义爆发，宁调元奉派回国策应。陈家鼎等将《洞庭波》改名《汉帜》在东京出版，宣称“此报宗旨，在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20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最大要

素”[9]。陈家鼎在《汉帜》第一期上发表了《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等文章，声援萍浏澧起义。《汉帜》曾被认为是当时鼓吹革命最有力的刊物之一。这些杂志散布各省，流入萍浏澧等处尤多，知识青年和青年军人争相阅读，影响甚广。萍浏澧起义失败后，陈家鼎、宋教仁等在东京为此役牺牲的烈士开会悼念。在主编《汉帜》的同时，陈家鼎在东京曾任同盟会总部鼓吹部部长和文学部部长等职[10]。

陈家鼎通过在内地的革命实践，深知革命必须重视军事方能成功。在东京，他积极联络同盟会中学过军事任过军职的同志，如李烈钧、黄郛、王天培、仇亮等和一些重要党人，每星期天都相约在桑原、城西寓所聚商革命方法。陈又去联络留学东京的振武和士官学校的学员，发现其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士甚多，就介绍他们陆续加入同盟会。以后辛亥革命时，各地武装起义的领导骨干，有不少就是和陈家鼎来往的人。

萍浏澧起义失败，湖北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等被捕，革命运动一时受挫，国内形势更险恶。陈家鼎告诫隐伏在湖北新军中的胞弟家鼐，外表上装得糊涂没出息的样子，不引人注意，以便暗中活动。

陈家鼎还在东京寓居的荒井家中，和乔宜斋、仇亮、王延祉、杜羲等组织一极秘密的小团体“血党”，专门对付清廷派来日本追踪诱捕革命党人的侦探。一次，端方派一个名叫刘祝三的来东京，化名金寿山。陈家鼎查清他的来历行为后，派“血党”成员唐声海向日本警署报告，说刘祝三犯“烟禁罪”（吸毒贩毒），使被捕入狱。还有一个朱孟廉，端方叫他先迷惑住陈家鼎、刘揆一。陈立即察觉这是个奸细，就给“血党”同志下了“诛奸状”，以后用了“反间计”将此人剪除。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被派去协助、最后一同殉难者之一的陈墨峰烈士，也是“血党”之一员[11]。

1908年夏，陈家鼎和宋教仁奉孙中山派遣，带领小组分两路潜回

国内，发动起义。宋去台湾转奔大连、沈阳；陈去胶州湾、青岛、山东沿海。临行相约，前后夹击，直捣北京，结果都失败了。陈家鼎在山东的活动，被德国人和清政府侦知，被逼得和几个同志潜入山区僻径赶路。没有吃的，只能嚼几粒生花生维持生命，而气不稍馁[12]。回东京后，宋教仁一夜到陈寄住的桑原馆寓所，相对饮泣，为失败而痛心。但后来证明，他们的努力还是结出了良果的[13]。

辛亥革命爆发，江苏独立后，陈家鼎奔走上海南京间，协助宋教仁筹组南京新政府，草拟创制法度。1911年冬，陈家鼎与杜羲等去大连、沈阳，招募人马组织“胡子队”，准备给清王朝最后一击。布置就绪后，因和议定局而作罢[14]。

1912年3月，孙中山因陈家鼎是首创上海同盟会的老同志，委任他和于右任、姚勇忱、黄郛、褚民谊五人重组光复后的上海同盟会。这是上海同盟会第三次组建，后即为国民党上海交通部[15]。

同年4月7日，陈家鼎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景耀月、孙科兄妹、章士钊等，随孙中山同乘“联鲸”号兵舰自南京去武汉[16]，9日到达，参加与黎元洪会晤。

南京临时参议院随政府北迁后，陈家鼎作为湖南省议会选出的参议员，勤劳国事，为人民代言议政，在议院常批评权贵，正气凛然[17]，曾以铜砚击桌，怒斥宵小，满座皆惊，宋教仁赠以“陈惊座”美名。在北京，80多家新闻单位联合组成北京新闻团，陈以很高的威望当选为团长。民国初建，舆论十分重要。陈经常和东西方各国新闻记者和各界名流来往，发表很多言论。对于化除国际误解，开展国民外交，争取国际上对民国的承认，做了不少工作[18]。

同年8月，武汉革命将领张振武、方维被袁世凯、黎元洪勾结在北京非法拘捕枪杀，全国愤慨。陈家鼎在参议院中力主弹劾与查办此案，但由于共和党籍议员阻挠而未果。

10月，陈家鼎在北京主持中央共和纪念会，连续三天盛大庆祝辛亥起义一周年，并向应邀参加的蒙古，西藏活佛热情宣传五族共和的意义[19]。

1912年冬，陈家鼎因竞选首届国会议员回到湖南，次年初，宋教仁也回到长沙。1月19日，他俩同往岳麓山吊念革命烈士并联句作诗，全诗是：

十载有家归不得，而今随尔入黄门。（陈）
更无多泪流知己，别有伤心哭国魂。（宋）
死友已经垂竹帛，生朋无分住桃源。（陈）
元龙豪气今犹在，百尺楼头一汉元。（宋）[20]

此次陈家鼎经湖南省选为众议院议员。

宋教仁遇刺后，陈家鼎在临时参议院向袁政府提出严厉质询。覃振等17名议员联署此案。陈并以发言人身份接见中外记者，发动舆论，声讨袁党罪行[21]。

首届国会开幕后，袁世凯遣亲信贿陈50万元“炭敬”，嘱“勿为民党所用”。陈当面厉声呵斥说：“我头可断，义不帝秦！”璧还其金。陈组“癸丑同志会”，联合两院忠贞的国民党议员合力抗袁。曾写诗寄友人明志：“自从建国出门行，为罪为功百未成，公等应为香案吏，政余犹比玉堂卿；一樽兴到歌还饮，万物春来息又生，为报昔年诸共事，长安虽朔不称臣。”[22]

“二次革命”失败，陈出亡日本，积极参加护国讨袁。袁世凯死，国会重开，陈再回议院，并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不一年，护法南下，参加广州非常国会，联络协调各派系矛盾，孙中山深为倚重[23]。1918年初，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议[24]。在护法的整个历史时期，陈始终和孙中山在一起。1920年11月，陈发表《关于西南大计之通电》，全面阐述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政见，颇

具影响[25]。

1922年4月，陈炯明叛变。陈家鼎冒险只身入叛将洪兆麟兵营，责以大义，使洪感愧，乃令士兵缓进。陈遂急入总统府报告孙中山，为孙脱险赢得了时间[26]。

陈家鼎诗文造诣均深，早期加入“南社”，并介绍其弟和三个妹妹入社，一家五兄妹均为“南社”社友，一时传为佳话。

护法斗争失败后，陈家鼎深愤党人不求进取，国事不可为。孙中山逝世后，他伤惋之余，决心不问政事，退隐深居，整理著述。著有政治专著数卷，诗四卷，文六卷，均未及出版。辑印之《百尺楼诗集》、《半僧斋诗文集》后亦散帙。

陈家鼎毕生致力国民革命，“秉性刚直，与人落落难合，而大节凛然，人不敢干以非义”[27]。1928年1月8日，陈家鼎在北京寓所书斋因煤气中毒猝逝，年仅五十二岁。居正、胡汉民、于右任、戴传贤、张继、吴敬恒、商震等为其卜葬于北京西山四王府[28]。

---

(1) 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影印版，第82页。

(2)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193页。

(3)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1页。

(4) 柳亚子编：《南社诗集》第四册，中学生书局1936年版，第367页。

(5) 刘泱泱：《简论禹之谟》，《益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

(6) 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88

页。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1页。

(7) 《洞庭波》第1期，第3—21页。

(8) 《汉帜》第1号，第75页。

(9) 1907年3月30日《复报》刊的《汉帜》广告。

(10) 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94页。

(11) 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91页。

(12)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1页。

(13) 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91、95、96页。

(14) 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92页。

(15)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92页。

(16)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第266页。

(17)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1页。

(18) 《民国之精华》，第219页；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95页。

(19) 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姜泣群编《朝野新谭》，第93页。

(20)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21)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4、297页。

(22)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1、193页。

(23)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2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页。

(25) 《陈家鼎关于西南大计之通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6)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2页。

(27)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3页。

(28)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194页。

陈嘉庚

熊尚厚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父亲陈如松为南洋新加坡侨商。1882年陈嘉庚就学于家乡南轩私塾。1890年秋去新加坡随父习商。1892年经管其父所开设的顺安米号，任经理。1893年回到家乡完婚，次年在家从师补习。1895年再去新加坡主持顺安店务，其间营业有所发展，除营米业外，还兼营黄梨（即菠萝）罐头和房产业。1900年冬，为了母葬回集美，曾留厦门营建房屋。1903年7月再去新加坡时，顺安号等厂店因管理不善发生巨大亏损，不得不清理收束。

1904年春，陈嘉庚自立门户，先后在新加坡开设新利川和日新黄梨罐头厂、福山黄梨园和谦益米店。1905年秋增设日春黄梨罐头厂。1906年得知种植橡胶树可获厚利，就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种在福山园，开始橡胶种植业。同年冬，与人合办恒美熟米厂，1908年改为独资经营。1911年在泰国设谦泰黄厂。次年秋回到集美创办海产罐头蚝厂失败，即与人在厦门伙设大同罐头厂。1913年秋，陈嘉庚复去新加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看到橡胶业和航运业利润丰厚，于1915年秋，一面将部分黄梨厂改作橡胶厂，一面租轮和购轮经营航运业，同时兼营白铁买卖，总计在大战时期的四五年内，获纯利达四百五十余万元之多[(1)]。1919年到1922年间，陈嘉庚在南洋又增设橡胶厂十余处，并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业，在国内大城市则设立分店。1924年他扩充树胶制造厂，制造各种车胎、胶鞋、医生用具及各种日用品；又于马来亚及荷属印度各埠自设分店十余处。此外，还在国内厦门开办百货公司、酱油厂及同安、同溪、溪安等公路公司。从1922

年到1925年间，陈氏的企业发展到顶峰。他把橡胶厂扩建到爪哇等地，有橡胶园和黄梨园一万五千英亩，各种工厂三十余所，国内外分店百余家，职工二万余人，拥有资产一千二百余万元，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资本家。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1931年橡胶价格一再下跌，由每担叻币二百多元猛跌至每担七八元。在这种情况之下，加以日货激烈竞争，陈嘉庚公司受到重大打击。1929年—1931年卖出橡胶园一万一千英亩，公司负债日多。银行团乘机以债权人资格派代表加入陈嘉庚公司，1931年8月他将陈嘉庚公司改组成有限股份公司。此时陈嘉庚的资产仅剩二百余万元充作股本。其后，又因英、美、日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国内货币与新加坡货币之汇率，由1：1顿成1.5：1，致使国内数十家分店无法继续营业，1934年1月即相继收歇。此时，新加坡总公司的营业仍继续亏损，业务上则受到银行董事的无理干涉。对此，他宁愿歇业也不愿再受银行团的欺压，乃于2月21日宣告结束了陈嘉庚总公司。

陈嘉庚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还热心于教育文化事业。致力教育的动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在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2)]。从1913年起，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

在集美，他创办的初级学校有：男女小学和幼儿园；中等学校有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学校；高等学校有国学专门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另外还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和教育推广部等。

在厦门，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闽南，他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1924到1932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

在新加坡，先后创办了道南小学、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师范及水产航海等校。

陈嘉庚把他个人的收入用于办学的约有一千万元之多，而自己一生却是生活朴素、自奉甚薄，即使在他的企业陷入困境时，也不愿停办学校。其后，企业失败闭歇，才迫不得已于1937年把厦大移交给当时的政府接办，但仍多方筹措经费维持集美各校。抗战胜利后，他筹款修复校舍。解放后，仍然继续关心集美和厦大的教学和建设。

陈嘉庚一向热爱祖国，曾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进步而不断奋斗。1910年春，目睹清政府腐败，毅然剪掉发辫，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新加坡闽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闽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时，他被新加坡华侨举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款赈济受难同胞，积极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新加坡华侨大会发出的通电中表示，“任何人应抱牺牲之决心，以与暴日抗”[(3)]，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于8月15日发动华侨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以进行持久和多量的筹款，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被举为该会主席。次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爱国团体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又被举为主席。华侨总会在陈嘉庚领导下进行筹款，宣传抵制日货及动员华侨司机和机器工人回国服务，极大地推动了广大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10月，当汪精卫发表卖国投降言论时，他紧急发电质问，痛斥汪精卫卖国求荣，是秦桧，并以参政员名义致电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在“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的严正主张，他的这一提案获得参政会通过，表达出广大华侨反对投降、要求抗战到底的民族革命精神。1939年春，汪精

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他再次声讨汪的卖国行径，要求通缉汪精卫“以正国法”[4]。

1940年是陈嘉庚政治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此以前，他曾寄希望于那个标榜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南京蒋介石政府。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时，陈嘉庚曾为《南洋商报》手订规则，其中有“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的条文，并把它张贴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办公处，以示拥护[5]。其后，在国内发生的地方势力多次反蒋斗争中，他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6]为理由，劝阻他们不要反蒋。对于中国共产党，因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信疑参半而“难辨其黑白”。1940年3月，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视察。此行先到重庆，经过亲身的观察，“见蒋介石狡诈独裁”，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专横，残民以逞”[7]，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事实，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真面目。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拉他入国民党，予以拒绝。他鉴于“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国共摩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故决意亲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8]。5月，陈嘉庚不顾国民党的阻挠到达延安。在延安，他亲眼看到那里的军政人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辛苦合作，同仇敌忾”[9]，又了解到八路军在敌后奋战的结果，“使敌人在华北势力，仅占交通线及若干大城市而已”[10]。于是他开始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公忠爱国”者，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生聚教训，发愤图强”的场所，从而产生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思想[11]。这次延安之行，使他转忧为喜，“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12]。7月返回重庆，他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讲演“西北之观感”，如实讲述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抗日，兴利除弊，实现民主化等种种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这时国民党当局对陈嘉庚的言行极为不满，对他施展恐吓手段。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声称“陈嘉庚受了共产党的包围”。陈嘉庚对国民党的造谣恐吓全不理会，表示仍要说实话，“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13]。在他

前往云、贵、桂、湘、闽等省视察时，蒋介石曾派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以陪伴视察为名进行监视；当这个花招被识破遭到拒绝后，又命何应钦通令西南各省军政官员对陈暗中监视；并电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活动新加坡当局禁阻陈嘉庚回新加坡。之后还派其海外部长吴铁城去南洋破坏陈嘉庚的威信。陈嘉庚回新加坡后，和蒋介石的党徒高凌百、王泉笙、吴铁城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广大华侨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投降和独裁，积极推动南洋华侨抗日爱国运动前进。

1941年4月，为了反对国民党福建省当局的祸闽罪行[(14)]，他领导福建华侨组织了“闽侨总会”，多次致电重庆参政会及蒋介石吁请改善闽政，撤惩祸闽魁首。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负责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总会”，发动新加坡华侨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时，他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躲过了日军的搜捕，避居印度尼西亚爪哇泗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在此期间，他写了《南侨回忆录》一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陈嘉庚听到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不得收缴敌军枪械的消息，无比气愤。9月，蒋介石采取政治欺骗手腕举行重庆谈判，他识破蒋介石的花招，认为革命人民与反动派“断无合作成功之可能”，争取民主只能靠流血斗争[(15)]。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9月，陈嘉庚致电美总统及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助贪污独裁的蒋政权，勿助长中国内战，撤退全部驻华美军。警告“如不停止援蒋”，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16)]。并揭露“蒋政府独裁腐败，任用小人，致民生惨苦，……无改善希望”；而赞扬“延安政治实行民主化，已获多数民众拥护”，“任何外来金钱武器，不能消灭”[(17)]。对此，国民党则利用其在南洋各地控制的报刊、商会和会馆向陈嘉庚进行百般攻击。为了斗争的需要，他领导“南侨总会”创刊了《南侨

日报》。在广大华侨支持下，与国民党的诬蔑展开了论战。从1946到1949年，陈嘉庚在《南侨日报》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各地作报告、讲演，揭露美蒋的种种罪行，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他谴责蒋介石“一党专政，一夫独裁”，“媚外卖国，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声明“不承认蒋政府之各项卖国条约和伪总统伪宪法”[18]。他号召南洋华侨投入国内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独裁专制卖国殃民的蒋政府，联合各党各派开展民主运动制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19]。1947年5月，他领导新加坡华侨组成“星州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同时，还领导南洋华侨向英、荷殖民当局展开了反帝反殖斗争。

1949年6月，陈嘉庚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邀请到了北京，9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被选为常委。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返新加坡刊行所著《新中国观感集》一书，向广大华侨宣扬祖国的新面貌，促进华侨热爱新中国。1953年1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到1961年，曾任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陈嘉庚在团结海外华侨与关怀家乡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他临终时还殷切关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盼望“尽早解放台湾”。

---

(1) 当时新加坡币值与国币汇率为1：1，币值相等。

(2) 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陈嘉庚先生纪念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1961年版，第13页。

(3) 郑良：《陈嘉庚》，香港新潮出版社1952年版，第35页。

(4) 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页。

(5)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26页。

(6)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第41—42页。

(7)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弁言”第3页；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1949年再版，第13页。

(8) 《陈嘉庚言论集》，第31、36页。

(9)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弁言”第3页；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1949年再版，第13页。

(10) 《陈嘉庚言论集》，“自序”。

(11) 《陈嘉庚言论集》，第13页；陈嘉庚：《新中国观感集》“弁言”，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总会1950年版。

(12) 《陈嘉庚言论集》，“自序”。

(13)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191页。

(14) 时国民党福建当局以战时统制为名，施行种种苛政，并利用特权组织贸易公司、公沽局、旅运社等机构，残酷压榨福建人民。

(15)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南侨正论集》“弁言”，1947年印本。

(16) 《陈嘉庚言论集》“自序”，第103页。

(17)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南侨正论集》“弁言”。

(18) 《陈嘉庚言论集》，第99页。

(19) 《南侨正论集》，第160—161页。

陈锦涛

汪乾明

陈锦涛，字澜生，1871年6月12日生，广东南海人。早年入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转入北洋大学任教习，1900年因北方义和团运动爆发，率学生至上海的南洋公学，任数学教习[(1)]。

青年时代的陈锦涛忧心国事，主张变革，颇有爱国赤诚。与改良派诸公如梁启超、康广仁、汪康年，甚至早期革命家谢缵泰[(2)]等都过往甚密。1896年2月21日，当时仍在皇仁书院任教的他曾促成了谢缵泰与康广仁和康党其他成员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中，他们讨论了“维新须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3)]。1898年3月，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25年。稍后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续约》。听到这一信息，陈锦涛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俄人现欲租旅顺，先入而后论租，则租之必矣。租实据之，文言也。不知英、日其如之何耳。”认为俄国人名义上是租借旅顺、大连，但事实上是想永久据为己有。“悲我同种，戮处烹割”，喟叹国人在列强的侵凌面前，束手无策，毫无还手之力。陈锦涛认为，要救国，重在选拔真才实学。现在朝廷虽然已经颁布上谕，改革科举制度，开经济特科以选拔人才，“然科未举行，辑录西学之皮毛，便于抄拾之书，如《时务通考》等已出，则鱼目杂乱，侥幸门开，则人材将不可得矣”。经济特科才刚刚提出，就有专用于应试的、仅有非常肤浅西学知识的应试指南。如果按照这些读物进行考试，显然是不可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的。之所以如此，陈认为这是科举考试的性质所决定的：“盖中国所考实学之策论，多是问其名目耳。若有名目之书查检，则曾学者与未学者不大可分矣。”[(4)]这番议论，可谓是切中时弊的。

1901年6月，由公学总理张元济与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推荐并经盛宣怀批准，陈锦涛与其他几个北洋大学堂毕业生和头等学堂学生王宠惠、王宠佑、张煌全、胡栋朝等八人，由傅兰雅[5]带领赴美留学。陈锦涛入贝克莱大学（即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铁厂工艺，他因年长，又是教员，被指派为领班生，协助傅兰雅管理一同赴美的其他学生。1902年初，时年三十一岁的陈锦涛觉得自己在留学生中年龄偏大而且身体又弱，继续学铁厂工艺难有成就，于是他向盛宣怀请求转学教育理财，同时主动要求停支薪水，且不再领取学费。盛宣怀照会南洋公学总办汪凤藻，表示同意照此办理[6]。9月，由于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留美中国学生人数渐多，陈锦涛等决定发起成立旧金山中国学生会，并当选为首任总理[7]。同年，以《中国数学史——一个比较研究》（*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a comparative study*）论文，陈锦涛取得了加州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赴美东，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在没有薪水和北洋官费的资助之后，陈锦涛在耶鲁的留学生活不久就陷入了困境，雪上加霜的是，1903年4月7日，他接到南洋公学司账来函，要他归还以前预支给他翻译格致一书的酬劳，陈锦涛不得不回信请求通融。后来盛宣怀发文，同意这笔欠款从陈学成回国后谋职所得薪水中扣除[8]。陈锦涛留学美国，受惠于盛宣怀之处颇多。同年，粤督岑春煊调他回国效力，盛宣怀也曾替他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陈锦涛来年六月即可考得博士，北洋大学派出了一百多名学生留洋，从未有一人获得博士学位的，“瓜不待熟而生摘，殊属可惜”[9]。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陈锦涛最终还是于1903年年底取道欧洲回国。

回国后，岑春煊任命陈锦涛为两广学务委员，负责两广教育方面事务。1904年6月22日，他带领十六名学生搭乘印度皇后号取道加拿大再次赴美[10]，其中温诚、陈廷麒经引荐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学习陆军，成为最早在该校学习的中国人。与此同时，他本人也得以有机会能够继续学业，师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数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社会流通的测算》博

士学位论文，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也使得欧文·费雪对他这位优秀的中国学生印象非常深刻，二十年后他仍然十分关心陈锦涛以及他的博士论文[11]。

1906年1月24日，陈锦涛前往华盛顿拜见正在美国考察政治的“出洋大臣”戴鸿慈。戴此时正需熟悉美国的留学生帮助他考察美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留领暂助数旬”[12]。

在襄助戴鸿慈完成在美国考察之后，陈锦涛回到国内，正好赶上清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回国游学毕业生考试。这是清政府为奖励留学而采取的新政。凡是留学归国人员，如能通过考试，便可赐给相应的功名，授予不同的职位。1906年10月，陈锦涛参加了回国游学毕业生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试官是唐绍仪，严复、詹天佑为副试官。四十二人应试，合格的有三十二人，陈锦涛名列榜首，为最优等第一名，获赐法政科进士出身。同期参加考试的颜惠庆名列第二[13]。此后陈锦涛历任广东视学、京兆视学、大清银行监察、度支部预算司司长、统计局局长、度支部印刷局帮办、大清银行的副监督等职。

在这一时期，陈锦涛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一、引进先进印钞设备与人才。1908年，为解决白银严重外流，整顿金融体系，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决定成立度支部印刷局，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印刷中国自己的纸币。陈锦涛受命担任印刷局帮办，赴美、英、法、德等国考察印钞术，他认为美国所使用的技术最先进，于是从美国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高薪聘请了美国著名的钢版雕刻技师海趣，并于1910年印制出了中国第一张用钢版雕刻凹印技术印制的纸币——“大清银行兑换券”。这在中国货币史、印刷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二、推进中国币制改革。清末以降，由于外币流入，国内币制混

乱以及世界金价大跌，而且当时清政府还要还巨额的赔款，导致中国损失巨大，因此币制改革势在必行。清政府认为要进行币制改革，必须要有巨额资金，于是派载泽、盛宣怀、陈锦涛等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进行币制实业借款的谈判。在谈判中，陈锦涛等坚决拒绝与四国分别签约，只同意与美国单独重约；拒绝聘用一个美籍顾问来“帮助”中国。由于陈锦涛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流畅英语表达能力，这使得中方在谈判桌上拥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他向载泽等力陈聘用外国顾问的利害关系，认为如果中国任用一位美国顾问，那么其他列强就会援例提出同样的要求。陈在谈判桌上的活跃表现让他的谈判对手非常恼火。银行团主要代表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说他：“此人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数学专家，能谈论外汇、公债、股票、自然增值、市场以及货币历史等，他一肚子宝学，像个未熟的汤团在锅里乱滚而暴噪横蛮。”[14] 虽然后来清政府由于内外交困，不得不作了妥协，但陈锦涛在这次谈判中的表现，给国人留下了比较深刻印象。

此外，陈锦涛还作为中国政府委派的金融专家赴伦敦参加了中、英、美、法、德五国专家、代表共同参加的币制会议，在会上陈锦涛向清政府请示可否乘此机会，与各国专家讨论金汇兑本位制度[15]。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宣布“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要袁世凯组织他的内阁，11月9日，袁世凯内阁组成，陈锦涛被任命为度支部副大臣，陈曾推辞但未获准[16]。

陈锦涛由“洋学状元”入仕，在短短的五年内，就升任度支部副大臣，可谓仕途坦荡，深得当局的器重。不仅如此，在国际上，他也有着不错的口碑。时任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的朱尔典称“他是由美返国的最著名的留学生之一，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有真正才能的人”[17]。

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陈锦涛为人可

靠，“且曾为清廷定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18]。后来成为袁世凯总统顾问的莫里循当时也认为陈锦涛是中国人中金融学识最为渊博的人[19]。于是他被孙中山特别指定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财政总长。

一个新政府成立之后，最为急切的任务是筹措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这个政府机构的运转，加之当时革命军兴，又要负担数目庞大的军费开支。所以陈锦涛上任伊始的要务便是为革命政府筹钱。由于当时各省纷纷独立，税收系统崩溃，海关关税又掌握在列强手中，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极度匮乏。面对这样一个困局，陈锦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勉力维持：

一、对外借款

陈锦涛作为经济学博士，当然知道举借外债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20]，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唯一一个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援助的途径——这也是他能成为民国首任财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有相关的经验，“有信用”。虽然陈锦涛在借款一事上尽心竭力，甚至亲自坐镇上海，四处活动，但由于当时政局混乱，西方列强对南京临时政府持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借贷到处碰壁。1912年2月21日，财政总长陈锦涛与俄国道胜银行订立一百五十万镑借款草约，但因各方反对，未成立。临时政府最后不得不以极其苛刻的条件，用重要企业如沪杭甬铁路、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做抵押，向居心不良的日本借款。但最终也仅得八百多万元，而且大部分还是南北和谈结束之后才到手[21]。

二、发行公债

除了借款，临时政府还决定发行公债以缓解财政危机。1912年1月8日，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一亿元。但同样也由于政局不稳，中外商民也大多持观望态度，认购并不踊跃，发行公债实际收入仅一百七十三万元左右[22]。

三、整理财政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现代经济体，必须要有一整套现代财政金融体系才能运作。而现代财政金融体系的核心则无外乎是以央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无论是对外借款还是发行公债都必须通过银行之类的金融机关。因此，陈锦涛把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作为整理财政的首要任务。1912年1月24日，他在咨临时参议院文中，提出设大清银行清理处，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并以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在陈的积极运作之下，1912年2月5日，原大清银行正式改组为中国银行，并继承大清银行作为央行的权利与职责。陈锦涛认为这是“盖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产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该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23)]。中国银行成立后，陈锦涛认为西方国家的央行都有专门的条例来规范央行运作，便于政府的监察。“中国银行事同一律，允宜详定条例，以资法司而利推行。”因此他“参酌各国之成规，体察我邦之旧贯”，拟订了《中国银行条例》三十条，旨在“严定政府监督之中寓郑重股东之意，总期利国利民不失中央银行之责分，有条有绪以固财政统一之根基”。条例呈送给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将此呈咨送参议院，但因临时政府即将结束，参议院忙于北迁，此事不了了之[(24)]。此外，陈锦涛还先后呈请筹设兴农银行、农业银行、殖边银行、海外汇业银行、惠工银行、储蓄银行、庶民银行，试图建立以中国银行为核心，以众多专业银行为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

与银行系统密切相关的是币制体系。晚清的币制改革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没来得及实施而中断了。陈锦涛试图继续进行币制改革，整理中国当时极其混乱的币制系统。1912年3月9日，他在呈临时大总统文中提出“民国肇兴，革新庶政，而改良币制，尤属要图”。但基于当时的财政状况，陈锦涛也认识到彻底的统一币制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暂时发行一批大总统肖像的纪念币，以“新吾民之耳目”。真正整顿币制，只能等到时局大定之后才能进行[(25)]。

陈锦涛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努力，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阻力。由于他坚持把大清银行改组为央行，得罪了陈其美等其他银行的支持者，于是他们就极力从中阻挠。时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因为没有能把他所成立的中华华业储蓄银行改组为央行，对陈锦涛耿耿于怀，图谋报复。1912年3月24日，他找借口逮捕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宋汉章，试图借此打击陈锦涛的金融整理计划，在陈锦涛等人的四处奔走之下，陈其美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宋汉章。

此外，陈锦涛也曾试图收回中央政府税权，要求地方各省把应缴中央的税收，如田赋、关税等上交中央。但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始终对各地军政府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下达的公文自然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缺乏正常的、稳定的财政收入，作为财政总长的陈锦涛虽竭力维持，但仍是“彷徨仰屋，莫展一筹，上无以副公民委托之知，下无以报兆庶疮痍之痛，内之不见谅于部院，外之则重指乎舆情，肺腑无可掬之诚，神明皆负疚之地，抚心五夜，忧来自煎”。他在提交给孙中山的辞呈中痛陈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财政困难情形：

首先是行政上不统一，“省自为政，人自为谋，号令纷歧，无所取则”。中央财政一直无法管束地方。

其次是地方赋税不能上缴中央，致使“中央孤悬，势同疣赘”。

其三，滥发军用钞票，其害无穷，但中央政府无法予以管束。

其四，各地滥发债券，除了上海、湖北两地接受中央财政的整理外，其他各省都置中央财政于不顾。

其五，利益集团的纷争致使币制与银行的整理举步维艰。

其六，无法确立一个合理的预算制度，“盈虚酌剂，无所准绳，

出入相衡，难明适合”。

其七，对外借债，也是阻力重重，往往事败于垂成。

显然，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财政能力的政府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三个月后，南京临时政府失败，孙中山辞去了大总统职务，袁世凯成为新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锦涛也于三月底辞去了财政总长职务。

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问题虽然比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稍有缓和，但对外债的倚赖却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此时英、德、法、美、日、俄六国组织了六国银行团，意图垄断对华借款权。在对华借款的谈判中，六国银行团提出了非常苛刻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为打破这种霸道的垄断，北京政府决定向其他独立财团借款。从1912年5月底开始，北京政府就与英国姜克生万国财政社商洽借款事宜，8月陈锦涛受民国政府委托，到伦敦协助驻英公使刘玉麟进行姜克生借款的谈判[26]。8月30日，双方签订了借款一千万镑的正式合同。1912年10月，以财政部驻外财政员驻于伦敦。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进行组阁。6月30日，陈锦涛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唐绍仪未到任以前暂时兼任外交总长。

随着袁世凯统治的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初步形成，原先依靠袁世凯威权而勉强建构起来的财政体系也随之动摇。加上连年内战，国库空虚，由之而引发的金融恐慌又导致了停兑风潮。因此陈锦涛此次再任财长如同他首任财长时一样，都是中央财政处于极度困顿之时，可谓均为临危受命。英文《京报》评论称，“陈锦涛博士之任命为财政总长也中外两界之评论无不同声赞成，并望将来遴选其他阁僚一如遴选陈博士之宗旨，即为地择人之意是也”[27]。尽管明知民国政府的财政前途维艰，“已不可问”，但陈锦涛认为“投艰遗大，责无可辞”

[28] 。有了第一次担任财长的经验，同时又经过多年的思索，陈锦涛此次受任财长可以说是充满信心有所准备的。他就提出了较为详细的财政计划，提出民国政府的财政整理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要完成近期目标——“恢复旧状”，也就是说要起码恢复到袁氏当政时期的财政状况。要完成这一目标，陈锦涛提出了四项办法：一、是“整理军费政费”，即裁减军事方面和政府行政方面的开支。二、是“现在各省征收赋税暂照旧办理”，即现行地方赋税征收不变。三、“现在各省认解中央专款解款暂照旧办理”，即地方需解送先前所认的款项给中央。四、“暂借外债一万万元”。地方解款仍是杯水车薪，中央财政的大头仍需举借外债。

第二步要达成的远期目标是重新整理财政体系。其中包括建立统一的国家税收体系；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建立统一的金库系统；整理发行公债；确定货币政策；实行烟酒专卖；改革地方各级财税管理体系；整理中央金融机关八项办法。陈锦涛认为“以上所拟计划，以实行预算、统一金库为入手办法；以整理税制、实行烟酒公卖、推行公债、改良税厅为巩固财政基础之中坚；而以整理货币、巩固金融为枢纽” [29] 。

尽管陈锦涛踌躇满志，计划深远，意欲有所作为，但在当时中央政府府院纷争，争权夺利，地方军阀各据一方，纷纷对中央宣布独立的纷乱局势下，他的抱负与计划不可能得到施展的机会。从他1916年6月就职到1917年4月被免职，陈锦涛唯一有所成就的，也许只是举借外债这一方面了。1916年9月10日，陈锦涛与农商总长谷钟秀，以中日合办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矿作抵押，向日本兴亚公司借款八千万元。但这项借款因国会反对而未能成立。11月16日，陈锦涛又通过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向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借款五百万美元借款。这些款项名义上是用来发展交通和实业，但实际上都是维持北京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 [30] 。

在北京政府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与官场倾轧中，陈锦涛以入狱三年的代价，结束了他第二任财长任期。1917年4月18日，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因炼铜厂事受贿被免职，交法庭审理。6月27日，北京地方审判所判决财政部受贿案，陈锦涛、贾士毅等均处徒刑，并褫夺官吏权终身。10月30日，京师高等审判厅维持地方审判所判决，仍处陈锦涛以徒刑三年，褫夺为官员之资格终身[31]。虽然这一判决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次年2月，陈锦涛便为总统冯国璋特赦，回广东老家休养，但毕竟给陈锦涛的政治声誉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陈锦涛既不得志于北方，乃于1920年5月就任岑春煊广东军政府的财政总长。1920年8月，因岑力主南北议和，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孙命令驻闽粤军陈炯明率部回广东，驱逐岑春煊、陆荣廷，爆发粤桂战争。结果桂系失败，岑春煊通电全国，宣布辞职，撤销军政府。身为岑春煊一派的陈锦涛也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1925年，冯玉祥坐镇张家口，经营西北时，陈锦涛被聘为西北银行的总理。1925年12月，任段祺瑞执政府之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同年底，再任许世英责任内阁之财政总长，但其财政政策失败，1926年1月去天津。1930年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任经济系教授，兼财政部币制研究会主席。1932年1月，应聘为国难会议委员。1935年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

1938年3月28日，日寇将南京、上海及华中地区诸省伪组织合编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三院，行政院下设七部及议政委员会。陈锦涛出任“财政部”部长兼兴华银行总裁。

1939年6月12日陈锦涛病死于上海。著有《均富》等书。

---

(1)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2) 谢缵泰（1872年5月16日—1938年4月4日），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清末革命家，实业家，中国航空业先驱。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3页。

(5) 英国传教士，曾旅居中国三十余年，当时任美国加州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

(6) 《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第32页。

(7) 《美洲留学报告》（光绪三十五年五月），第18页。

(8) 《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第39页。

(9) 《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第42页。

(10) 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271页。

(11) 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12) 戴鸿慈为“出洋五大臣”之一，奉命出使美、英、法、德和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此时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考察。参见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第一书局1906年版，第63页。

(13)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14)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15) 石抗鼎：《民初之币制问题及其设施》，《商学研究》1942年第1期。

(16) 《清代野史》第5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2页。

(17)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129页。

(18)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9) Morrison to Braham，5 January 1912，*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 I 1895-19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690．

(20) 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渤海堂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5页。

(21) 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22) 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第55-56页。

(23)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1912-1949）》上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24)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1912-1949）》上编，第61-65页。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26)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27) 张黎辉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28)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93页。

(29)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第210页。

(30) 据《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8页说："袁世凯之死与黎元洪仓促继任，使国家陷入混乱，国库空虚。北京行政当局必须有钱才能行使职权。陈锦涛作为财政总长急于想从海外获得贷款。"

(31)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398，429页。

陈炯明

丁身尊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县人。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父亲名曦廷，是个商人。

陈炯明于1898年中戊戌科秀才。1906年入广东法政学堂就读。1908年以成绩优等毕业。1909年被海丰县推选为省谘议局议员。在谘议局的会议上，陈炯明以“仗义执言”，“建议独多”，博得一些社会声誉。

陈炯明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在同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中参加了一些联络工作。起义失败后，到香港参加党人刘思复等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陈担任统筹部（起义领导机关）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负责率领一路敢死队进攻巡警教练所。在筹备起义过程中，他借口改变起义日期，妄图取消起义。起义那天，黄兴等人率领一路敢死队冲进两广总督署，同敌人浴血搏斗时，他竟置众于不顾，单独逃跑出城。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南方支部决定在广州和东江、西江、北江和韩江等地区，组织五路武装起义。陈炯明和邓铿被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他们组织了一支民军叫“循军”。旬日之内，参加者达数千人。另外，同盟会员王和顺也在东江组织民军“惠军”，拥众数千人。起义民军直扑惠州城，声势浩大。仅半月间，惠州所属各县即先后光复。

11月9日广州光复。胡汉民任广东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旋胡随孙中山赴南京，陈炯明即为代理都督。他以“裁减”民军为名，强行解散和镇压当时光复广州的其他民军，枪决了老同盟会员、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和民军首领石锦泉等，然后把自己所属民军改编为两师一

旅的正规军。又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但对清廷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龙济光所统率的“济军”，则“优礼有加”，并委任龙为副绥靖经略。

宋教仁被袁世凯遣人暗杀后，孙中山策划反袁，密电陈炯明做好出兵准备。陈回电以“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为借口，拒绝出兵。袁世凯因广东鞭长莫及，不便直接用兵，利用陈炯明和胡汉民不和，改用分化瓦解的手段。6月14日宣布撤销胡汉民的都督职务，任命陈炯明继任都督。孙中山和黄兴主张陈炯明乘此把就任都督和讨袁结合起来，在广东举起讨袁旗帜。陈炯明就任广东都督后，致电孙中山说：“广东兵力薄弱，不能首先发难”，实则仍采取拖延之计。

7月12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讨袁。15日，黄兴跟着在南京举兵讨袁。这一天，陈炯明还致电袁世凯，希望调停“北赣两军冲突”，要袁“使赣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铤而走险，贻患大局”[(1)]。直至18日，他才被迫宣布广东独立。8月4日，他手下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炮轰都督府，自立为广东都督。他一闻炮声，立即携带巨款乘法国炮艇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举起讨袁的革命旗帜。陈炯明这时在南洋，孙中山再三去信劝其入党，他都加以拒绝。以后，他联合了一批人，在新加坡组织所谓“中华水利促成社”，拥前清大官僚岑春煊为首领，在南洋一带与孙中山唱对台戏。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旗帜，各省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陈炯明见袁世凯大势已去，回到广东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活动。1916年春在惠州附近的马鞍成立了“讨逆共和军”，自任总司令。

6月6日袁世凯暴卒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派朱庆澜任广东省长，陈炳焜任广东督军。陈炯明随即宣布拥护北京政

府，声明“军人拥兵自重为国之弊”，自愿把他的军队交中央派员改编。北京政府立即对他的声明表示“欢迎”，并派张天骥来惠州改编军队，编为二十营。以后这二十营军队又编入朱庆澜的省长亲军。

陈炯明交出军队后，即上北京谒见黎元洪和段祺瑞，深得黎、段的嘉许。黎元洪授予他“定威将军”的称号。但这只是一个空衔头，没有什么实际职权。陈炯明失望之余，转而拟竞选粤省或华侨议员，但均为他人捷足先登。1917年夏天到上海，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随后回到广东。

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于广州。但当时统治两广的桂系军阀，并不真心拥护护法运动。对孙中山的活动，遇事加以掣肘。孙中山极想建立一支陆军。值北洋军阀主战派派兵从福建进攻潮汕，粤省告急。孙中山派人同朱庆澜商量，要他拨还上年陈炯明部被改编为省长亲军的二十营粤军，由陈炯明率领“援闽”。朱同意拨出。

12月2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并派许崇智、邓铿等相助。1918年1月下旬，陈炯明率部屯驻粤东，兼任惠潮梅军务督办。他把部队扩充至五个支队和两个预备队，约一万人左右。但徘徊不敢前进。为此，孙中山曾多次电（函）陈炯明，催促他从速援闽。

在孙中山的多次催促和全党人力物力的支持下，陈炯明始决心“援闽”。全军举着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将士用命，勇敢作战。经过十个月的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了闽西南二十多个县，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并利用北洋军阀中的直皖矛盾，与皖系的李厚基达成停战协定。

粤军利用停战机会，在漳州扩编整训，发展至二万余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

为总部参谋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标榜“刷新政治”。如创办《闽星报》，鼓吹所谓“建设新社会”，提倡“新文化”，以附会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还派遣留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又开公路，辟公园，办学校，设书局，革除一些陈规陋习，等等。漳州一时出现了某些新气象，吸引不少人前来参观。

1920年6月，孙中山从上海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促陈炯明回师广东。同时，许崇智、邓铿等也主张粤军回粤。陈炯明一直犹豫不决。8月11日，桂系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分兵三路进攻粤军，陈炯明才最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粤军发出的回粤通电中宣称：“粤军今日是为家为国而战，凡一切党派及其他问题，均非所知。”[(2)] 表示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的暧昧态度。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这时粤桂两方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桂军占优势。但粤军举着孙中山的旗帜，士气高昂。陈炯明又以“粤人治粤”和“实行民主政治”相号召，因而得到广东人民的拥护。桂系军阀处于政治上十分不利而且四面受敌的地位，士无斗志。10月28日，粤军攻克广州。陈炯明随即回到广州。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1月下旬，孙中山再到广州组织护法政府。陈炯明曾以种种借口阻止孙中山返粤和国会南迁。如主张军政府暂留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粤省财政困难，不能负担国会经费，等等。后因迫于舆论，孙中山又坚决表示要返粤，他才不得不表示“欢迎”。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时，反对孙中山任大总统的，除南北军阀和各种反动势力外，陈炯明则是从内部反对最力的一人。未选举前，他恐吓说，孙中山想当总统，会树敌于全国，连广东这块地盘也将保不住。后来他连孙中山的就职典礼也不参加。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这样，连同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二职，陈炯明便一身兼四要职了。孙中山还以连拉带劝的办法，说服了陈炯明加入国民党，并任命

他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使他更加飞扬跋扈，政治野心越发膨胀。当时孙中山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北伐，统一全国。首先是要肃清桂系军阀，以免它为患广东。而陈炯明则以高唱“保境息民”、“联省自治”来同孙中山相对抗。他派出代表，联系了南北各实力派军阀，很快发展成为反对孙中山的反革命联盟。他还在省内挂出“民治”的招牌，于1921年4月公布所谓《广东自治条例》，并举行所谓“民选”县长。之后，又进一步炮制了《广东省宪法草案》，威迫利诱省议会通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广东为中国的普鲁士，把中国变成德意志式的联邦。”[(3)] 这个草案一出笼，立即遭到廖仲恺等人的反对。同时，叫嚷“联省自治”的几个军阀，也存在着不同利害的矛盾，所以始终没能达成协议。《广东省宪法》因而未能施行。

桂系军阀自退出广东后，无时不思卷土重来。同年6月，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分兵三路攻粤。至此，原想与桂系“各守边防，毋相侵犯”的陈炯明，才被迫进行反击。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分兵三路进攻桂军。当时粤桂双方在力量对比上，粤方占优势。粤军于6月25日攻占梧州，长驱直入，仅三个多月，大获全胜。

粤军攻下广西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陈拒不接受。孙中山因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12月在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拟于明年春天取道湖南，大举北伐。这时，陈炯明已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1922年3月，留守广州和坚定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为陈炯明的亲信部属所暗杀。4月，孙中山决定改道北伐，大本营迁粤。回师途中，孙中山曾于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会晤，想促他表明态度。他不但不来，反以辞去本兼各职相要挟。孙中山于21日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广州政府内务部长三职，仍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希望他能醒悟。陈炯明离开广州赴惠州，同时又令其在广州的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又密令在广西的叶举率兵迅速回师广州，对抗孙中山。

孙中山于6月初回到广州。为避免引起内战，派人到惠州劝陈炯

明返回广州。陈炯明则积极策划武装叛乱，并暗中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反孙协议：由陈破坏孙中山北伐，吴则畀陈以两广巡阅使之职。陈公开对孙中山表示，愿意留任陆军部长之职，并一再声称，“已催促叶举等部迅速回防，叶等必无不轨行动，愿以生命人格担保”云云。

6月14日，陈炯明密令叶举等布置武装叛乱。16日凌晨，叛军以大炮轰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住所粤秀楼，妄图一举置孙中山于死地。幸好孙中山于事先得到消息脱险，避于楚豫舰，后转永丰舰。陈见孙中山威武不屈，乃大耍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派兵阻击北伐军回师广东，一面又托人送亲笔信给孙中山，称：“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还要孙中山“恳开示一途，俾得遵行”[(4)]。当即遭到孙中山的严词痛斥。

陈炯明叛变后，北伐军立即回师广东，援救孙中山未能成功。8月9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经香港赴上海。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自任粤军总司令。他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彻底破产，从此一步步走向失败和灭亡。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陈，组成西路讨贼军和东路讨贼军。粤军第一、三两师及第四师一部起义响应。陈炯明叛军迅速土崩瓦解。16日，讨贼军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逃到惠州。叛军三四万人退到东江、潮梅一带。不久，陈炯明住到香港，继续进行反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切齿痛恨。盘踞东江、潮梅一带的叛军，先后对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进行多次进攻，均遭失败。1925年2月和10月，革命军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彻底打垮了陈炯明叛军。

陈炯明在军事彻底失败后，蛰居香港，鼓吹反共反革命。他拉拢

一些人组织致公党，自任总理，提出建国、建亚、建世的所谓“三建主义”，对抗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敬告国人书》，说：“目前心腹大患，尤非较轻于日寇，共产党遍布南方各省，随时皆可乘机爆发。”[5] 他还向国民党建议“宁（南京政府）任外交，收复失地，粤任剿共，巩固后方”[6]，和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互相呼应。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死于香港。

---

(1) 《赣案续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总26号）。

(2) 吴幼彭：《陈炯明率粤军回粤、援桂及叛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1961年版。

(3) 林志钧等：《陈炯明叛孙、联省自治及民选县长》，《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1963年版。

(4) 林廷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前后的片断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3辑，1962年版。

(5) 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有关陈炯明资料》，1965年油印本。

(6) 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有关陈炯明资料》。

陈立夫

严如平

陈立夫，名祖燕，字立夫，以字行，浙江吴兴人，1900年8月21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生。陈家原为吴兴世族，后家道中落，改经商。父亲陈其业，字勤士，清末府学廪生，授业乡里，后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等职。陈其美（英士）、陈其采（蔼士）为其二叔、三叔；陈果夫（名祖焘）为其兄长。

陈立夫幼年受父亲启蒙，七岁入塾，读小学、《幼学琼林》及“四书”、“五经”，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1914年到上海考入路矿学堂中学部，有志于工矿开采；1917年以第一名毕业后，考取北洋大学采矿科，负笈北上，刻苦攻读，学业优秀。1923年赴美留学，入匹茨堡大学，一年即以论文《如何使中国工业化》获采矿学硕士学位。他先后在烟煤层厚薄不同的三个矿区实习，再去斯克拉顿做矿工。他读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在旧金山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底陈立夫自美回国，应山东中兴煤矿公司之聘，拟赴鲁出任采矿工程师；但被蒋介石电召至广州，要他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在广州的东山公馆处理机要。陈立夫对于与二叔陈其美以昆仲相称的蒋介石难以违抗，乃勉强留粤。其时蒋介石处理廖案和东征奏捷后，已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但他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及中共人士之间的龃龉日增。1926年3月中旬，蒋介石猜疑苏联顾问的某些举措，打算用以退为进的办法，出国去苏考察，要陈立夫同行。在赴长堤码头的途中，陈说：“校长，我们为什么要走？我们有军权在手，可以干啊！”蒋采纳此议，返回东山公馆，决意“干了！”[(1)] 陈立即与蒋精心策划“中山舰事件”，排挤了汪精卫，

打击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为后来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打开了通道。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骨干，其聪敏机灵深获蒋之赞许。1926年7月蒋任北伐军总司令，陈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未及半年又升任秘书处代处长。他不仅精心处理总司令部内外事宜，还组织机要科人员潜心研究敌方密电码而破译成功，同时自编密码，使他人无法破译，被蒋夸奖为“等于十万大军”[(2)]。在蒋介石授意下，陈立夫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代部长的陈果夫把党务调查科改变成为一个专事研究和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以陈立夫为主任，为蒋介石“清党”反共效力。后将该科交其表弟徐恩曾掌管，但仍负主管之责。1935年5月，他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统辖国民党系统和军队系统的特务活动，权势更大。

蒋介石攫取国民党军政大权后，面临各个派系的争斗和倾轧，虽有黄埔系在手，但在国民党内和政界还缺乏一支听命于己的力量，以至于1927年8月在桂系和汪精卫的逼迫下被迫下野。他懊丧之余，授意陈果夫、陈立夫把原先在广州建立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联络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党政机构的亲信部属，逐渐形成以二陈为首的CC系[(3)]。后来他们还秘密组织起了“青天白日团”和“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以“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的信徒为成员，成了CC系的实体组织。他们在“党员登记”和“整理”中央党部及地方各级党部中，大量派出和重用CC系的亲信力量，逐步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大权，使得蒋介石能够在1929年3月一手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操纵中央执、监委员的选举。

1929年，二十九岁的陈立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旋又任中政会委员兼秘书长。在这个“以党治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陈为蒋襄赞党国军政大计，还经常“列席”中政会下设之军政、内政、财政、经济、教育、外交等专门委员

会的会议，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承上启下，权势显赫。他与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共同直接控制党务，因此国民党内外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立夫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后，于1932年起继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着力于国民党组织的扩展，自称在1930年6月至1945年4月的15年间，“协助扩大征求党员至五百余万人”[(4)]；同时进一步发展CC系势力，加强对全国党务系统和教育、文化系统的控制，并向政府机关和警务、司法界扩张。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CC系控制中央执监委员的选举达到巅峰，陈立夫的选票比蒋介石还多了四票；陈为此十分窘迫，仓皇之中在统计票数的黑板上擦去了一个正字，以比蒋少一票过场。“权重震主”，后经多人向蒋说项转寰，陈虽被选为中常委，但没有再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和秘书长的要职。

陈立夫在为蒋介石重用于中央党部担任要职近十年间，仍向往用其所学，在经济建设方面一展才华，曾于1928年兼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常委及秘书长，谋划良多；以后终因党务繁重，无力兼顾而辞去经济委员会职务。但他认为自己“既无机会开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5)]，先于1928年在南京发起创办《京报》，一年半后又创办《时事日报》，后又与陈果夫创办一份《政治评论》月刊，以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为宗旨。1930年，他又联络友好开办正中书局“为本党宣传主义”，任董事长达20年。他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古籍也兴致甚浓，研读《易经》后提出“唯生论”，谓宇宙内一切生命的生存条件有四：物质、精神、时间、空间，“生”是宇宙的本体，“生生不已”又是“生生不灭”[(6)]，人类之求共生共存共进化是历史的根本原动力。他自称“唯生论”超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先后写出《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两书出版。

陈立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深为忧虑，认为中日之战不可幸免，于1935年间几次向蒋介石建言：应与中共接触，

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扩展。1935年12月，陈奉蒋之命，化名李融清秘密赴苏谈判，先至马赛再抵柏林；但随后蒋又认为时机未到，命陈自德回国。1936年3月，陈在南京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Vasilievitch Bogomoloff）秘密谈判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事，得到苏方“决不帮助中共”[(7)]的保证，即与蒋介石商议“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8)]。他秉承蒋的意旨，交给当时担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负责打通与中共的关系。5月，他向曾口授了与中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以选择一个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9)]。陈布置曾养甫在同中共北平市委和中共长江局代表分别接触的同时，还与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潘汉年建立了联系。经过几个月的磋商，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秘密会见潘汉年，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代表蒋介石答复说：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再按才录用。后来陈与潘又进行两次谈判，答应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0000，但坚持一种收编招降的立场和态度。西安事变爆发后，陈于次日要求潘汉年致电共产国际斯大林，促请中共协助释蒋。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直接主持与中共周恩来进行谈判，陈立夫参与幕后谋划。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立夫表示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对中外记者说：“民心之向背，才是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我们鉴于士气民意之旺盛，全国上下一心一德，才有此坚决之信心，抗战到底，不到胜利不止。”[(10)]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负责民众动员和组训；并兼军事工程团团长。

1938年1月起，陈立夫任教育部长达七年之久，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他担任部长后，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业业，勤勉处事。他主持拟订《战时教育纲要》及实施要点，作为该部

各司工作的大纲，各负其责。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为推动教育事业纳入正规，陈邀请教育专家拟订了全国统一的大学课程标准，并创议实行全国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以改变过去各大专学校课程设置不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接着，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学课程的教学课目、时数和课程标准作了统一修订和规定。他还推动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在各地增设国民中学及中心国民学校，于1944年公布了《国民学校法》。

1944年11月，陈立夫再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负责筹备已有十年未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凭借根基深厚的CC系，陈力图控制选举，但是遭到三青团系、黄埔系等诸多派系的攻击和抵制，闹得不可开交，后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大会才开了下来。陈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确定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集合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陈立夫不以为然，认为："凡一会议多数通过，而参与者不服从多数而拒绝执行之，此种会议有何意义？"(11)后经蒋说服，才勉强作为国民党八代表之一参加政协会议。他认为国共两党难以合作，认为美国派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来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也是徒劳无益的。

其时，蒋经国主持的三青团，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有制约、监督甚至改造、替代国民党之势，在1946年9月于庐山举行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出现了"三青团独立组党"的呼声。陈立夫闻讯后，星夜兼程赶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谏力加阻止。1947年2月，陈被蒋任命为中央组织党团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受命调整党团双方的关

系。但在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过程中，党团两方激烈争斗，加剧了对立之势。蒋介石于无奈之中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结果名曰统一实则内部争斗更加激烈，陈立夫与蒋经国的矛盾日深。

嗣后，陈立夫重任中政会秘书长，又兼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全力以赴，但无补于蒋介石发动内战造成的困顿之局。1948年5月任立法院副院长，年末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但对濒于崩溃的国民党统治更无回天之术。

陈立夫于1949年追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后，支持蒋介石整顿党务、政务，重新出山主政。但蒋在“改造”国民党时，倚重陈诚、蒋经国等人，而把陈立夫排斥在“改造委员会”之外。陈于1950年8月离开台湾，旋去美国，在新泽西州林湖城定居，与友人合办了一个养鸡场；经营之余，潜心研读中国古籍，编成《四书道贯》在美国出版。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协助该校建立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直到1969年4月，在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再三劝说下，偕眷属回台湾定居，一再表示希望平平静静度过余年。他挂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头衔，但表示自己“已不懂政治”[(12)]。他读书自娱，一时热衷于中医药，对推动文化学术的发展也表现得颇为热心。研读古籍之余，又撰著出版《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国父道德言论类辑》、《儒家研究言论集》、《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中国文化概论》等。晚年还撰著出版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成败之鉴》。

晚年的陈立夫虽然不再过问政治，但蒋介石还是给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虚衔，蒋经国及国民党的一些人也尊他为元老。两岸关系缓和以后，他对于海峡两岸文化、学术和民间来往的交流活动，表现得十分热心。他为早年与自己政见迥异的张西曼的家属题字云：“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忍小异而争大同则无争，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13)]表达他捐弃前嫌、期盼“和平统一”的愿望。2002年2月8日，陈立夫病逝于台北。

(1) 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第31页。

(2) 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3) 陈立夫和陈果夫坚决否认有CC系，说这是“弄假成真不胫而走之称谓”。其实CC是一个有实体、有活动的庞大派系，为国民党内外所公认。参见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 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5) 陈立夫：《一个用非所学的采矿工程师的自述》，《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第7页。

(6) 陈立夫：《唯生论》，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29页。

(7)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第45页。

(8)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300页。

(9)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5页。谌当时任铁道部劳工科长，受曾养甫派遣，直接联系中共代表，并曾秘密去陕北，参与国共双方的谈判活动。

(10) 《吴鼎昌回忆录》，台湾1969年版，第226—227页。

(11) 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12) 孙彻：《蒋陈世家》，台湾群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13) 《张西曼纪念文集》插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陈廉伯

熊尚厚

陈廉伯，字朴庵，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广东南海人。其祖父陈启源在家乡创办广东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在广州开设昌栈丝庄。父亲陈蒲轩，继承祖业，是个丝业富商，与外国商人交往甚多。陈廉伯幼入私塾读书，十二岁时，秉承祖父之命跟外国人学英语，其后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并入英籍。十六岁时，入英商广州汇丰银行工作，为人机灵，受到重用，后升为买办。与此同时，他还兼本家丝庄的司理。1905年起，陈以广州昌栈丝庄司理身份，相继加入广东商会、广州商务总会，成为当地商会中的活跃人物。1908年，与南洋巨商张弼士等，发起创办广东保险公司，担任公司协理佐理财务。与此同时，他扩大昌栈丝庄的生丝收购，联络广州几家大丝商统一购销，垄断当地的生丝买卖。次年，因广州银号发生金融危机，银根奇紧。他利用汇丰银行贷款从中渔利，还大做炒卖银砖的投机生意；之后又依靠汇丰银行，私铸银币，操纵金银市场。

由于陈廉伯能从汇丰银行得到借支，又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且联合数家丝商形成垄断，对产丝、用丝、收购及丝绸商店进行控制，所以在十年左右获利达数百万。除丝业外，他还经营航业、矿业、纸业，以及茶叶、桐油、猪鬃，烟草、竹制品、草席等土特产品，成为广州的出口巨商。在清朝末年，陈廉伯已是一个买办巨商。

民国初年龙济光盘据广东时期，陈廉伯通过英商汇丰银行帮助龙发行新币，在经手造币厂铸造银毫中获利甚巨。1915年，他任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广东出口协会总理、广州出口洋庄商会总理、赴美实业团团员；后任广东丝绢公会、矿业公会、输出业协会等会长；还曾被袁世凯授以二等嘉禾章。1917到1920年旧桂系统治广东时期，他与

两广巡阅使兼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海军上将萨镇冰等交往频繁，借以抬高身价。同时，还多方捐资医院、赈济会、慈善会；在家乡创办克勤义学、女子职业学校，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

陈廉伯以其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和广东丝绸公会、广东输出业协会等会长身份，长期活跃于广州商界，早有组织武装商团从事政治活动的企图。清末他曾向广东巡抚张鸣岐请求组织商团未获允。1912年广州商团组成后，他一再从事商团的组织工作，利用担任广州粤商公安维持会（清末名商团公所）理财课主任之机，支垫商团经费，并借款数万元购置枪械武装商团。1915年，他当上了广东总商会会长后，于1917年任粤商公安维持会代理评议长，更加极力武装商团。1919年8月，正式当上了粤省商团军总团长，从而完全掌握了商团的实权，次年于各地扩充商团，设立分团。

广东历年驻有客军甚多，他们四出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及各种名目的摊派层出不穷，商人受害甚大。具有政治野心并受英国帝国主义指使的陈廉伯，利用商人的此种怨恨心理武装商团，并别有用心地将怨恨转嫁到广东革命政府头上。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借机煽动各地民团与商团一起，向广东革命政府示威，同时秘密纠集各地商团召开联防会议，筹组联防总部自任总长，以佛山大绅商陈恭受和邓介石为副总长。随即利用商团加强商界武装，暗中向香港的德商顺金隆洋行购买枪支弹药，密谋进行叛乱。有些英国人唆使陈买军火练军队，用以反对广东政府。其在香港的报纸表示愿帮助他“组织商人政府”，甚至说要让陈廉伯做“中国的华盛顿”，煽动陈等反对广东革命政府。7月下旬，陈等派出大批商团巡查队日夜出巡，并定于8月13日发动叛乱，暗中派遣刘渔北上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议定一俟推翻广东政府后，陈廉伯即上台任广东督军。8月上旬，陈等加紧其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又向英商南利洋行密谋购买大批军火。广东政府获悉此等严重情况后，于8月9日扣留了陈等利用挪威商船私运的军火。8月13日，陈指挥商团举行示

威，竟用“训令”、“指令”行文，强迫商人罢市，“请孙（中山）下野”，要求“发还枪械”。次日，商团千余人前往大本营请愿，广东政府立即下令通缉陈廉伯。陈逃到沙面租界，一面暗中派人与盘踞在粤东的陈炯明勾结，由陈炯明的心腹马育航于港、汕之间进行联络；一面煽动商人再次请愿，要求发还枪械，18日广州银钱业在商团胁迫下罢市。嗣后由陈恭受出面将商团总部改设佛山，各地商团迫令商人罢市，并再次要求发还枪械、允准商团总部成立及取销对陈廉伯的通缉令等。广州的工农和革命士兵，主张坚决反击。8月29日，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决定对商团的叛乱采取镇压政策，下令对商团发动攻击。但驻在广东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和福军李福林等不听从孙中山的命令，站在“中间”立场进行调解，要求与商团妥协。9月上旬，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迫辞省长职，改由胡汉民接任。胡答应依手续发还商团的枪械，之后商团的叛乱气焰愈狂。孙中山感到在广州的处境十分危险，乃于9月下旬以反直北伐为出路，率兵开往韶关。陈廉伯趁机加紧叛乱活动，10月4日在佛山召开地方豪绅代表会，组成“全省临时大会”，向广东政府提出发还扣械等六项要求，并以电文、传单攻击广东政府，宣称将于10月10日举行第二次罢市，再次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

10月10日，在广州各界庆祝“双十节”并游行之际，陈廉伯以商团名义发出“罢业宣言”，强迫商人罢市，贴出“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等标语，同时派出商团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工团军和学生多人。广州驻英总领事此时亦向广州大元帅府提出“最后通牒”，停泊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还把炮口对准广东政府，并扬言如果广东政府镇压商团，英舰将炮击广州市区。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和广大工农、革命士兵再次支持孙中山。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坚决主张镇压叛乱。

10月14日，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组设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武装广大工农，调回在韶关的北伐军，

再次下令通缉陈廉伯，次日由蒋介石率部将商团的武装叛乱镇压下去。陈廉伯急忙组织反扑，要求港英政府支持，但港督见势不妙不作表示；陈又请军阀洪兆麟、叶举以武力援助，结果是洪无兵可调，叶指挥不动桂军，江门驻军梁鸿楷改取中立态度；原同情和支持商团的范石生、廖行超经孙中山劝告后改变态度；此时，在各地的商团，有的有言论而不敢行动，有的与当地驻军冲突自顾不暇；它如先施、大新、真光等大公司，银业界的梁朗秋、洋行的罗雪甫和关国士等早就不赞成商团叛乱。陈廉伯发动的武装叛乱，到头来成了孤家寡人，顿即遭到彻底失败，只好于17日逃亡香港。

陈廉伯逃到香港后，开设宝元银号，主要靠经营投机炒卖牟利。1928年起，他担任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公司监理。在陈铭枢任广东省长的时候，他组成香港观光团到广州活动，后于广州设宝元银号分号。1931年，他升任南洋烟草公司香港公司督理，并与该公司简英甫等合办大用橡皮公司。他从南洋公司得到大笔交际费，和军阀、官僚、买办等密切交往。与此同时，还以竞捐手段，先后当上了香港东华医院副总理、总理。一时在香港的商人中，陈仍被视为殷商巨富，一些外国商人愿委托其做代理人。但此时的陈廉伯实际外强中干，除做投机买卖外，主要是挪用南洋烟草公司巨款，款额达数百万元。1934年夏，陈滥用南洋公司巨款事被人检举，公司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罢免其督理职务，同时决定组成股东团彻查，并向港督提起控告，悬奖捉拿其归案。陈廉伯被港警逮捕，旋经人保释后逃往广西。他在广西与旧官僚龚政等经营华林、裕华两金矿，假名陈朴园任公司总经理。经办两三年无利可获，于是返回香港做假古董生意牟利。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廉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暗中往来。抗战爆发后，他在香港为日军侵华张目，替日军的侵华做宣传。日军侵占香港的前夕，他竟然上书港督，要求将香港“和平”转让给日本，为此被香港警方逮捕。日军侵占香港后，他从监狱获释。1942年2月，日本在香港成立占领部总督部，3月组设“华民代表会”为其咨询机构，

他被日军指定为四成员之一，高唱“中日亲善”、“共荣”、“提携”。在日军侵占香港的时期，他仰仗日本侵略势力继续做投机买卖。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陈廉伯感到留在香港不会有好下场，遂与日本高级官佐乘日轮“白银丸”去日本。船刚离港即在铜鼓湾触雷沉没，陈廉伯和日轮“白银丸”一起葬身海底。

主要参考资料

《广东扣械潮》，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

周康燮主编：《一九二四年广州商团事件》，香港存萃学社1974年版。

陈果：《广州商团叛变后的陈廉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65年版。

陈箓

刘清涛

陈箓，字任先，号止室，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77年5月5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望族之家。十五岁时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法语。十七岁考入武昌自强方言学堂学习，于二十三岁毕业后，留校任法文教习。1901年湖北创设译书局，陈箓为译员，后奉派留学法国，入巴黎法律大学。1903年毕业，清政府派五大臣赴欧洲考察宪政时，调充译员，游历各国。1906年，获巴黎大学法律学士学位，是第一位在法国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后曾在海牙万国保和会和荷兰使馆任职。回国后，陈箓在外务部、法部、北京大学等机构任职，并参加清政府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被授予法政科进士，后又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曾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外务部考工司掌印郎中等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陈箓被任命为外交部政务司司长。1913年12月，陈箓被任命为中国驻墨西哥全权公使。1914年，中俄决定就外蒙问题进行交涉，鉴于陈箓任政务司长期间曾经手外蒙古问题的中俄交涉，对此较为熟悉，北京政府任命他为“会议全权专使”。但由于会议延期，此期间陈箓又赴澳门处理水陆界务，当年9月回京后，才赴恰克图谈判。

辛亥革命后，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并于1913年11月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规定了沙俄在外蒙古的广泛权利。《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迫于俄国的压力，于1913年12月与俄国签署了《中俄声明文件》，实际上追认了《俄蒙协约》的内容，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仍留下一些遗留问题待决。

自1914年9月8日始，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开议谈判，至1915年6月7日，费时达9个月，会谈四十余次，才最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22条。恰克图《协约》重申了前“声明”的内容，使中国保持了名义上的宗主权，却失去了在外蒙的实际统治权。不过，陈箓也使得外蒙古放弃“国号”与“皇帝”称号，由中央政府册封，宣布撤销“独立”，并获得由中央政府派遣大员驻守库伦等权利。

恰克图《协约》签订后，1915年陈箓被任命为驻扎库伦都护使加陆军中将衔，次年又兼外蒙册封使之命。自1915年10月赴任，1917年5月回京，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在任期间，陈箓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对哲布尊丹巴的册封仪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促进了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陈箓还积极维护在外蒙古的内地商人与居民的权益，显示了其才略。在库伦期间，陈箓坚持写日记，记录每日的公私活动以及外蒙古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状况，留下了《蒙事随笔》、汉译《蒙古逸史》等著作，成为研究该时期外蒙古地区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

1917年陈箓回京，任战时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次年，在和议筹备处、参战事务处任职，7月出任外交部次长。12月，外交总长陆徵祥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陈箓遂以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总长职位。巴黎和会期间，中国正当权益遭到践踏，激起国内民众空前的爱国热情。担任代行总长的陈箓无能为力，可谓备受煎熬。终于1920年2月中旬，陈箓辞去外交部次长一职，9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法国全权公使。

然而，陈箓在驻法公使任上，正值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生存权益和国家利益而斗争的运动。但是，由于其性格的软弱，陈箓未能鼎力维护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权益，并陷入学生斗争的漩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受到重创，加上随之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此时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多失去了工作，面临着退学和生计无法保障的绝境。而此刻的留学组织者

法华教育会中的一些人员中饱私囊，侵吞给予学生的生活费用。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学生请愿不成，陈箓又接到北京政府训令，将经济无法自给的学生遣送回国，这无疑是对广大勤工俭学学生下了最后通牒。被逼迫到最后境地的学生终于发起运动，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来到使馆前进行请愿，让陈箓向北京政府转达求学权的要求。陈箓一方面召来法国警察将学生驱散，另一方面又向学生妥协，部分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每人给三个月生活费，尽量帮助学生向学校交涉，允许他们暂时留校学习。但陈箓仍然动员学生回国。此时的学生运动引起各界的同情，法国政府亦想拉拢讨好这些留法学生，随之法国政府出面暂时解决无工、无学学生们的生活费用问题。然而随之而来的一起事件，却让法国政府很快翻脸。1921年6月，法国报纸传出法国将向中国政府贷款三亿法郎，以中国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此举引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与旅法各界华人的拒款斗争，陈箓被要求说明真相，但其却不敢出席反对借款的集会。其秘书在代其出席集会时被愤怒的旅法华人痛打一通，在学生与旅法华人的斗争下，最终由秘书代表陈箓签字反对借款。留法学生此举使得法国政府迅速变脸，法国外交部很快通知中国驻法使馆，称法国政府已订好1400个船位，要使馆分两批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遣送回国。陈箓怕这一计划引起更大的反抗，没敢执行。但接下来勤工俭学学生又掀起了返回中法里昂大学的运动。中法里昂大学本为勤工俭学学生设立，但此刻该学校却抛弃勤工俭学学生，另从中国招收一批官费生和自费生来入学就读。此举引起学生们的抗议，陈箓开始表示赞同学生运动，但当学生到达里昂大学时，却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逮捕，随后法国分批将一些学生押送回国。此事件使陈箓受到了批评，成为合谋遣返学生的“公敌”。1922年3月20日，一名留法学生枪击陈箓座车，所幸没有击中。陈箓做驻法大使一直到1928年7月，在此期间还曾充任北京政府的国联代表。这位素有“法国通”美称的公使，在驻法8年的时间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光辉的篇章。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便解除了陈箓驻法公使职位。回国后，陈箓先住在北京，1929年曾受华洋义赈会委托赴南洋募捐。1934年移居上海，11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聘其担任顾问。1936年，改聘为条约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上海、南京沦陷后，陈箓留在了上海。此时，已经年逾六十岁而不甘寂寞的陈箓，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并很快下水，出任1938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他的儿子陈友涛也担任了伪外交部的总务司司长。陈箓还凭借以前在北方任职时的关系，斡旋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和北京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极力说服南、北合流，以扩大伪政权的力量。

由于陈箓地位显赫，他的投敌产生了恶劣影响，这促使军统决定除掉他。由军统上海局局长王天目策动，王天目手下行动组组长刘戈青组织实施。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行动，在透过陈箓两名保镖处获得情报之后，于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之夜，刘戈青带领军统人员进入位于上海愚园路668弄25号的陈箓家中，开枪将正在客厅会客的陈箓刺杀，并当场留下写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灭奸贼，永保华夏”大字的纸条。陈箓被刺，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主要参考资料

陈箓等著：《止室（任先）先生年谱·诗存》，沈云龙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0辑（796），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

樊明方：《陈箓在库伦》，《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美］魏斐德著、芮传明译：《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张允侯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石建国：《陈箓：从外交精英到汉奸外长》，《世界知识》2008年第4期。

陈明仁

萧栋梁

陈明仁，字子良，湖南醴陵人。1903年4月7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十）生于地主家庭。幼读私塾，1914年读高中一年级，1920年入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小学教书。在长沙时曾受讲武学校友人的影响，羡慕军校生活。1924年初，携族叔引荐信南下广州，经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醴陵同乡李明灏批准，破例录入该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同年9月，孙中山赴韶关准备北伐，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任攻鄂军总司令，不能兼顾校务，讲武学校三、四队学生转入黄埔军校，一、二队学生提前毕业充当赣军干部，学生对此不满，推陈明仁、李默庵等为代表，面见蒋介石要求到黄埔军校学习，获蒋支持，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1925年初毕业后，编入教导二团第五营任见习排长，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之役。围攻淡水时，陈作战英勇，被提升为少尉排长。7月，转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三连任中尉排长；9月参加第二次东征，带病指挥全排攻打东莞东门，抢占高地，缴敌一个营的枪械，为全团攻入东莞立下战功，升任连长。10月，在攻打惠州战斗中，组织奋勇队率先攻城，当团长刘尧宸牺牲后，他受命组织队伍于次日冲上惠州城，为全军攻克惠州又立战功。在庆功会上蒋介石亲发口令：吹军号三遍向陈明仁敬礼，并任命陈明仁为第四团第三营营长。

惠州一役获蒋赏识，陈从此步步高升。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入伍生中校营长、上校大队长、陆军第十师二十八旅五十六团上校团长。1929年4月及10月先后参加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1930年任陆军第十师二十八旅少将旅长。1931年任第三独立旅旅长，7月参加蒋介石与石友三之战，率部在河北巨鹿击溃石友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次年升任陆军第八十师副师长兼步兵第二三八旅旅长；8月率部参加

对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红军击溃。1933年11月率部进攻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后移驻延平参加对工农红军闽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5月任陆军第八十师中将师长。同年夏，该师二三八旅被红军击溃，后被军长蒋鼎文以“大量吃缺、不服调遣”而免职，调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任第一大队副兼中队长。不久，任驻赣第四绥靖司令部参议、陆军第二师参谋长等职。1935年春被调到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9月兼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8年春，陈明仁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政部部附及第六补训处处长。6月改任预备二师师长，加紧督练官兵，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在九江与来犯之敌猛打硬拼，坚持完成战斗任务，受到蒋介石的嘉奖。预二师番号曾一度被取消，部队拨给第八军建制。后从四川调入三个团，重组预二师，陈仍任师长。1939年3月，所部移驻湖南后，陈先后兼任芷江、潭湘、衡耒等地的警备司令。1940年春参加桂南会战；在广西昆仑关战斗中，在第三十八集团军十四个师大溃败的情况下，陈率预二师孤军苦战六昼夜，所部死伤七千余人，最后亲自指挥输送营官兵丢下辎重尽数取出手榴弹，用肩挑背负冲上山头，对逼进指挥所的日军投掷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获得了蒋介石的进一步信任。

1940年夏，该师奉命入川，陈以政治手腕与不听国民党中央节制的川军周成虎结为“知己”，接管了周的防区，统一了川南八县，任川南清乡司令官。1941年冬率部开往云南昆明附近修筑工事，因供应困难，部队着装破烂，遭前往视察的蒋介石指责，陈不服，与蒋顶撞，被改任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副军长，明升暗降，陈拒不赴任。后经蒋“慰勉”，陈才走马上任。1942年冬，中国远征军成立，七十一军是首先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十二个军之一，划归远征军系列。陈与军长钟彬率部进驻云南保山，部署两师建立江防阵地，坚守怒江3个险要渡口，与日军隔江对峙达两年之久，使日军未能越怒江一步。在

此期间，曾兼任驻滇干训团大队长、将官研究班主任副教育长等职，并率七十一军高级将领到印度蓝姆伽美国步兵战术学校受训。1944年5月，率部越过怒江，进攻龙陵方面日军，参加打通滇缅路的战斗。陈指挥八十七师围攻松山要塞日军时，撤换了作战不力的师长，督率所部全歼敌守军，扭转了战局，号称“战争之花”的日军旅团长松井少将战败剖腹自杀。日军曾调兵妄图解龙陵之围，陈则率部乘胜从攀枝花、惠通桥渡过怒江，从滇缅路主攻龙陵。他令各师组织敢死队历八昼夜轮番攻击，在友军全力支援下歼敌千余人，俘敌百余，攻克龙陵。1945年1月，又率部攻击坚守畹町门户——回龙山的日军，在指挥炮兵猛轰回龙山日军主阵地的同时，猛击日军后方三台山，断其机动增援。又令航空兵轮番俯冲扫射回龙山高地，掩护步兵冲锋，攻占了友军围攻一周未下的回龙山主峰，歼敌八百余人。随后与友军配合，攻击中缅边界的畹町。旋即任七十一军代军长，率部与驻印远征军新一军等在中国畹町和缅甸芒友胜利会师，打通了被日军切断的滇缅公路。1945年6月，正式升任七十一军军长。陈以能打硬仗驰名。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陈奉命率部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兼任东北第五绥靖区司令官。1947年4月15日，七十一军从永吉向长春沈阳之间的战略要点四平进发，途经金家屯以北大洼地区时，八十七师被解放军歼灭一个团，后续部队被截成数段，全师溃散。陈率七十一军直属队及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残部共两万余人退守四平。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七个师约十万兵力围攻四平，陈破釜沉舟，拼死抵抗，坚守四十余日，与解放军巷战十余昼夜，最后核心阵地被突破，其胞弟、辎重团长陈明信被俘，四平大部被占领，连警卫团也被歼4/5。后蒋介石急调五十三军增援，东北野战军方撤四平之围。陈因坚守四平博得蒋介石的青睐，升任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颁给“青天白日”勋章。旋因美国顾问对以美援粮食构筑工事提出抗议，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亦因守城问题与陈意见相左，四平工商界对死守造成损失也有控告，陈被撤销第七兵团司令官。1948年3月5日，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闲职，陈明仁从此与蒋介石产生隔阂。

陈闲居南京期间，思想苦闷，七十一军高级将领纷纷致信劝他不要白为蒋介石卖命；一些同乡好友鼓励他抓一点实力作“资本”另谋出路，胞弟陈明信亦从东北被释回到南京转告同乡李立三寄语陈明仁“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老友温汰沫更是朝夕劝他团结朋友另谋出路。这些都给陈明仁以重大影响，他感到“人民需要和平”，“军人应该靠拢人民”。1948年10月他在南京明孝陵与友人秘密集会，表示了不愿再跟蒋介石走下去的愿望。随着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蒋军节节败退，南京政府摇摇欲坠。陈对蒋政权绝望，终日以酒浇愁，先后拒绝了胡宗南、刘峙等请他出任兵团司令的邀请。10月下旬，陈被任命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协助总司令白崇禧筹组华中“剿总”长官部，兼任武汉警备司令及第二十九军军长。不久，国民党恢复七十一军，加上二十九军，成立第一兵团，陈兼兵团司令官。陈口喊“坚决保卫武汉，战至最后一人”，暗中却与湖南程潜遥相默契，倾向和平。

随着解放军发动的淮海、平津战役胜利进行，蒋军主力大部被歼，白崇禧利用和平幌子倒蒋，陈明仁预感自己不宜在白崇禧手下久留，更增长了另谋出路的思想。1948年底，正与中共合作谋和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采纳程星龄建议，派刘斐赴武汉建议白崇禧将第一兵团调往湖南整训，既可控制三湘又可作为广西的屏障，获白崇禧批准。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二十九军、七十一军来湖南整训，并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与省主席程潜来往密切；经程潜、程星龄开导，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派其亲信李君九、温汰沫等解释中共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政策，特别是7月章士钊从香港写给程潜的信中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陈明仁守四平一事“会谅解”，绝不追究，“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的话，使陈明仁消除了顾虑，受到了鼓舞。同时，陈明仁继担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之后，又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后因白崇禧逼程潜去邵阳，陈又奉程潜之命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7月30日被广州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总司令及省保安司令。陈明仁则

派程星龄去平江邀请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谈判代表李明灏到长沙商谈起义事宜。8月1日，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携亲笔信到长沙叫陈珍惜“光荣历史”，死守长沙，“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陈亦虚与委蛇，表示要“与共军血战到底”，博得黄、邓连声称赞。陈送走黄、邓后即召集省政府官员表示：“决不违背人民（要求和平的）意愿，我一定要使大家在长沙市内听不到枪声！”传出了湖南和平解放的信息。8月2日，陈明仁按照人民解放军要求，将第一兵团和保安部队撤出长沙市区及交通要道。次日与汪士楷、温汰沫等草拟告第一兵团官兵及蒋介石、阎锡山、顾祝同、白崇禧等的起义电文，并以陈明仁个人名义发出。8月4日，与程潜领衔发出起义通电，指责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遗教，破坏和谈等罪行，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之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独裁、官僚资本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当晚派人将长沙附近驻军地图送往长沙春华山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代表驻地，洽商和平接管长沙事宜。随即率所部官兵七万七千余人归附人民，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朱德复电嘉勉，称赞“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并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兼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旋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和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9月3日，应毛泽东邀请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还分别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接见。10月，部队整编为两个军和六个师，接着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陈任兵团司令。并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12月率部由浏阳移驻醴陵集中整训。12月率部开赴广西参加剿匪，历时五个月在广西南部小瑶山及其周围的同正、隆

安、万承、钦廉、百色、天峨地区歼匪三万余名，缴枪37716支，完成了剿匪任务。1952年春，第二十一兵团改组为水利工程队司令部，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圆满完成任务。同年10月，该部与其他部队合并，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陈任军长，率部从桂林开赴湛江，担负防卫任务。1955年9月，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他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72年陈患癌症，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第35辑（湖南和平解放专辑），1989年版。

陈铭枢

邱涛

陈铭枢，字真如，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生于1889年10月15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父陈均镕出身秀才，以教书为生。陈铭枢七岁启蒙，十五岁入公馆文治高等小学读书。

1906年8月，陈铭枢考取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不久，经陈汉柱介绍加入同盟会。其时，陈从谭嗣同的《仁学》中知晓“‘真如’的名词”[(1)]，以之作为自己的字号。1909年夏，陈在陆小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

辛亥武昌首义后，南京起义受阻，陈铭枢偕蒋光鼐、陈果夫等军校同学十余人赴武昌，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在汉口参战，嗣后任黄兴卫士，随黄兴回到上海。不久，陈到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任连长。南北和议告成后，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陈铭枢南下广州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陈与方声涛等人亡命日本。1914年他在日本东京黄兴主持的军事学校“大森浩然庐”学习军事，后又入革命党人创办的政法学校学习。1915年陈铭枢从日本回国，在南京从欧阳竟无学佛。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参加方声涛部云南护国军，任连长。1918年，陈脱离方声涛部，任肇军游击营营长。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陈在阳江起义，被陈炯明委为陆军游击第四十三营营长。1921年，在邓演达等帮助下，陈铭枢所部接受改编为新建的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四团，任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在孙、陈矛盾中，陈铭枢保守中立。不久即脱离部队，到南京再度向欧阳竟无学佛。

陈铭枢在南京学佛期间，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孙中山与苏俄合作，改组国民党，国民革命运动兴起，而陈炯明只能盘踞东江地区。在好友邓演达等劝说下，陈铭枢决定归附孙中山。1924年10月，陈铭枢策动陈炯明系机关报香港《新闻报》社长兼总编辑陈秋霖归附孙中山，震动很大。回到广州后，陈出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1925年2月东征陈炯明，陈旅立下战功。6月，刘震寰、杨希闵滇桂军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蒋介石和陈分任右、左翼指挥。平定刘、杨之乱后，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任该军参谋长兼第十师师长。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陈在南路平定陈炯明部，进驻廉州、北海。

1926年春，广东国民政府筹议北伐。3月9日，陈铭枢和白崇禧到长沙争取唐生智服从国民政府，获得成功[(2)]。5月，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出兵入湘援唐，北伐战争序幕揭开。6月下旬，陈铭枢所部第四军第十师集结于湘南前线，8月19日与叶挺独立团等获平江大捷。8月26日，担任主攻的第四军向粤汉铁路重镇汀泗桥发起攻击，陈铭枢指挥第十师血战汀泗桥，于翌日击溃吴佩孚部。随后又乘胜攻克贺胜桥。陈铭枢以卓著战功成为北伐名将，第四军以英勇善战被誉为“铁军”。

10月10日武昌光复，陈铭枢出任武汉卫戍司令；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此后，国民党领导内部发生迁都之争，武汉方面反蒋情绪日趋激烈，陈铭枢不愿反蒋，于1927年3月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转赴南昌，依附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陈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部务，负实际责任。在宁汉分立时期，陈铭枢成为蒋介石的宁方要员。随着“七一五”武汉“分共”和宁汉合流，陈辞职并随下野的蒋介石赴日。11月2日，应蒋光鼐、蔡廷锴之请，陈铭枢从日本回到福州，重任第十一军军长。

12月，广东政局动荡，张发奎和黄琪翔发动政变。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陈铭枢任东路总指挥，回师广东，与张发奎部血战东江获胜。1928年2月，陈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12月，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与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分掌粤省政军。他提倡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由欧阳予倩任所长；又以巨资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创办《读书杂志》，并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和大剧院等。

陈铭枢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全力拥护和支持。在1929年1月南京编遣会议前夕，他响应蒋介石号召，主动裁军缩编，把第十一军三个师缩为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并按自己先已表示的“军民分治、党政合作”[(3)] 原则，将第十一军军部撤销，本人亦辞去军职，蒋光鼐、蔡廷锴两部归陈济棠节制。是年3月，李济深在南京被蒋介石囚于汤山，陈电蒋要求释李；但他反对粤军将领谋议起兵反蒋。他亦反对桂系反蒋，拥护中央的“统一”。11月，陈铭枢助陈济棠部署军事，在花县一带击败张发奎和桂系联军，结束了广东境内的粤桂战争。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指示旧部蒋光鼐、蔡廷锴听从蒋介石号令。6月，他与陈济棠击溃来犯的张发奎部和桂系联军。战事刚结束，蒋、蔡两部即调到津浦线与阎军作战，克济南，并正式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

1931年1月，陈铭枢发表《广东民国二十年行政计划之旨趣》，在民政、自治、财政、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计划。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反蒋声浪骤涨，陈反对粤军将领起兵反蒋，并与在江西的蒋光鼐、蔡廷锴达成拥蒋的一致意见。4月，陈济棠与胡汉民派同汪精卫结合，筹谋召开“非常会议”反蒋，他因不附和，被迫卸粤省主席职，离穗赴港，旋往日本。6月初陈铭枢回国，蒋介石命他到江西重领第十九路军，并委任他为“剿赤”右翼军总指挥官，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陈到赣州，即同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联名发出通电，拥护中央“统一”。随着十九路军在与红军作战中失利，

兵力渐感疲惫；同时陈在战斗中深感蒋的军事指挥能力差，且赏罚不公，对陈部这样的非嫡系部队处处压制。十九路军在广东方面断绝军饷供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未予补给；且蒋调拨给陈统率指挥的各军，实际上仍由蒋直接下令，陈只能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队。这使陈对蒋的专权独裁产生不满，不得不考虑十九路军摆脱窘境的问题。8月，陈铭枢在吉安军中与邓演达建立联系，对反蒋问题进行密商，并通过杨杏佛与蔡元培联系反蒋，确定反蒋计划：决定利用蒋介石要陈铭枢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俟军队进入粤北，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4)]。

9月中旬，十九路军集中于赣，正在陈密令蔡廷锴准备按反蒋计划行动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陈感到国势危殆，蒋介石又请他出来调停与广东之争，乃打消反蒋计划。9月28日，陈与蔡元培等赴港，调停宁粤分裂；30日，陈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所部十九路军调防宁沪一线，成为拱卫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10月，陈作为南京五代表之一出席宁粤上海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由于新选出的粤方中央委员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到京的先决条件，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决议蒋介石辞职，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选孙科为行政院长，陈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由于蒋、汪对孙科政府均采取拆台态度，孙科、陈铭枢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于1932年1月14日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特别委员会，规定除重要方针由中政会决定外，紧急政务皆由特委会处理[(5)]。但是孙科和陈铭枢均无力解决外交和财政方面的重重困难。1月18日，蒋、汪等在杭州西湖举行“烟霞洞会议”，决定蒋主军、汪主政，重掌国民政府大权，陈铭枢被迫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

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国东北全境，又蓄意进行挑衅。十九路军于1月23日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陈铭枢派人指示十九路军“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6)]。1月28日深夜，日军在闸北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突袭，我十九路军就地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9日，陈密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光荣传统，并表示即来沪共赴国难。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抗日意志高昂，不畏牺牲，奋勇作战，并在张治中第五军的增援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不断增兵，并三易主帅。只因蒋、汪和何应钦等军政首脑一味主张避战，依赖国联调停，拒不再发援军，使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第五军孤立无援，被迫于3月1日开始退出淞沪，最后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陈铭枢对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使淞沪抗战以妥协求和告终，深为不满；而蒋、汪联袂出山后又迫使陈陆续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及军委常委等职；蒋还下令免去陈铭枢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之职，并于6月裁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半年间局势的跌宕起伏和连遭挫折，使陈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加深。10月下旬，陈铭枢被迫赴欧洲游历。欧洲之行使他对共和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对蒋的独裁专制更加不满。

1933年5月，陈铭枢由欧洲返抵香港，一面与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络，一面派人和中共建立联系，筹划反蒋事宜。10月26日，陈派徐名鸿作为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与中共及红军代表潘汉年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陈铭枢联合李济深、冯玉祥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告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决裂。陈铭枢任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又组织“生产人民党”，任总书记。但是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进攻下，十九路军难以抵御，陈与李济深等被迫离开福州，亡命香港，坚持近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即告失

败。

1935年7月下旬，陈铭枢联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香港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推动抗日反蒋运动。1936年9月3日，陈以团长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布鲁塞尔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即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当选总会理事。会后访苏，并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陈铭枢等人的通缉。陈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抗战。9月21日，被蒋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为表达团结抗战的诚意和拥蒋抗日的决心，他主张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积极向蒋介石进言，以求能对抗战作出贡献。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由陈铭枢主持，大会呼吁世界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大会推举陈等为分会理事。他还担任国民外交协会主席。在此期间，陈为抗战奔走呐喊，与中共方面也广泛接触，频繁会见王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固执成见，使陈铭枢对蒋完全失望。1938年8月17日，他致书蒋介石表示“不愿陷入党政派别斗争的漩涡，现决潜修学问，访教逸贤”。随即入川隐居于重庆北碚“作养晦之计”[(7)]。但他仍时刻关注着抗战时局。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1943年2月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座谈会，定期举行。8月陈与李济深、谭平山等着手筹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一系列活动，陈都在幕后进行，以防蒋破坏。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陈铭枢在兴奋之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持批评和反对态度，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更进一步参与民主运动。10月28日，“民联”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陈铭枢当选常务干事。1946年2月，陈与李济深等在重庆秘密聚会，策划反蒋民主运动，任军事策反小组成员。6月，全面内战爆发，“民联”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

民党决裂，转入地下活动，陈更多地从事幕后工作。11月，蒋介石召开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陈坚决拒绝参加，并断言“这是蒋介石最后唱的一出热闹戏，是回光返照罢了[8]。此后陈参与国民党各民主派组织的联合活动。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陈任中央执行委员。民革成立后，“民联”仍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继续活动，陈铭枢以其在国民党军政两界中的特殊地位，积极从事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中吴化文部起义，1949年初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反汤恩伯（未成），1949年5月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弃暗投明，1949年8月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等等，他都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陈铭枢至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联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1月，任民革常委。1950年9月，他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不久升任部长。1953年1月，他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翌年初，陈铭枢调京工作，任民革理论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2月，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6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补选为人大常委会常委。1957年10月，陈铭枢被定为“右派分子”（1962年4月摘除“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平反），只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委职务。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参加座谈会时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

---

(1)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 参见：《湘省输诚国民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4日。亦见：贾廷诗等访问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上册第39、40页，下册第796、797页。

(3) 《陈主席在联合纪念周中报告》，《广东省政府公报》第138期，第149页。

(4)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5)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

(6)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7)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8) ”霍实子：《我所知道陈铭枢的若干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陈其美

黄德昭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生于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祖父陈绚是个乡绅。父亲陈延祐在本地经商。陈其美六岁入塾读书，十四岁至崇德县石门镇善长典当铺当学徒，1903年春转到上海同康泰丝栈当助理会计。在当时民族危机十分严重，革命思潮广为传播的影响下，陈也表示了对现状的苦闷，尤不满于自己的职业，另找出路。1906年夏，陈到了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在这里他认识了留日学生中的一些革命青年，也结交了后来与他有密切关系的蒋介石。同年冬加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次年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1908年春，陈奉派归国。往来浙沪及京津各地，联络党人。1909年到上海接办作为革命机关的天宝栈，策动江浙一带的革命运动。同年夏，同盟会员身兼浙江龙华会首领的张恭等拟发动浙江起义，邀陈共同策划，因叛徒刘师培向江督端方告密，机关遭破坏，张恭被捕，起义被迫停止。其后，陈又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还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进行革命宣传。并在上海加入青帮，以青帮大头目身份，设秘密机关，负责联络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1911年4月，黄兴、赵声等发动广州起义，陈应邀到香港参加。当起义失败，他以上海新闻记者的名义，独自跑到广州活动，险及于难。随后，陈经香港回到上海，继续谋在长江起事。同年7月，与宋教仁、谭仁凤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他被推为庶务部长。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接着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相继独立。因清廷派重兵南下，武汉方面的战局出现了对民军不利

的情况，武汉党人“亟望各处响应”。陈其美往南京、杭州谋响应，而两地党人希望上海先发动。陈联系的青帮、商团和士绅，到这时已集聚了一定力量；同时奉黄兴之命来沪的光复会员李燮和（时任上海光复会总干事），对驻沪湘籍防军也已运动成熟。11月1日，陈与党人集议，正式决定先在上海起事。2日又分别与上海立宪派人物李平书（清末任上海自治公所董事兼江南制造局提调）及李燮和商讨，决定次日发动起义。11月3日，上海民军起义爆发。上午，闸北民军率先起义，占领巡警总局。下午，陈派敢死队进击清军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局内守军赞拒各半，总办张楚宝又负隅顽抗，一时未能攻克。陈令暂停攻击，自己冒险闯进制造局，试图用口舌劝说敌军放下武器，结果为敌军所拘禁。李燮和闻讯，急令民军进攻，市内群众纷纷前往支援，经过激战，第二日晨制造局被攻克，陈得救出险，上海也随之光复。11月6日，他由上海绅商及会党代表拥戴为沪军都督。

上海光复后，杭州、苏州、镇江也次第宣布独立；但南京仍为清军张勋部盘踞。时陈其美以沪军都督身份与苏、浙、镇各军首领共同组织联军，推新军将领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会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克复。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抵上海，陈参加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议定设立临时政府。同时，联络立宪派首领张謇等人组织共和统一会，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上海、南京的光复，稳定了辛亥革命胜利的基础，后来孙中山对陈其美所起作用曾予高度评价：“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其美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其美能以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其美一木之所支者，较他者尤多也。”

陈其美早先在德福里秘密工作时，他就“纵情声色”[(1)]；在都督府中“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2)]。并与意气相投的蒋介石及黄郛三人结成异姓兄弟。陈在上海光复之初，就立即排挤走了光复会总干事李燮和，特别是到1912年初，为了派系权力之争，竟秘密

刺杀了当时在江浙一带具有较大影响的同盟会及光复会的著名领袖陶成章。为了杀陶，他暗嘱蒋介石设计，由蒋收买了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于1月14日凌晨，将陶刺死于上海广慈医院[3]。此外他还曾多次派兵镇压上海周围的青浦、南汇、昆山、崇明等地农民的抗租斗争，并禁止上海制造局工人反抗虐待的斗争，严禁工人参加“制造工人同盟会”的组织活动。

1912年2月，清帝退位，陈其美认为革命已成过去，“此后共和巩固，已无冒险者可为之事”[4]，幻想从事“实边”（指开辟边地）建设。3月，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为了解除陈的兵权，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陈以结束沪军事迟未就任，后乘唐内阁倒台，于7月1日辞工商总长职。7月31日，被袁解去沪军都督职务。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密谋杀害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党人，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陈其美与另一些党人表示反对，以为民国已经成立，主张依据法律求得解决。6月，袁世凯明令将江西、安徽及广东民党三都督免职，国民党人被迫于7月举行反袁的“二次革命”。陈在江西、南京等地党人发难后在上海起兵；7月16日，陈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9日宣告上海独立。上海讨袁军几次攻打制造局。都不能得手。吴淞方面的讨袁军，也相继失败。9月，各省讨袁军完全失败，党人纷纷逃亡海外。陈仍留上海租界活动，11月间，应孙中山电召前往日本。

陈其美到日本时，孙中山正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准备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陈其美完全赞同入党者都要立誓约，打手模，绝对服从孙中山的规定。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他被任为总务部长。

在此时期，陈其美为反袁进行过多次军事活动。1914年1月，他潜入大连，成立奉天革命党机关部，联络东北党人，进行东三省革命。由于袁世凯警探的阻挠和日本官厅的压迫。没有活动机会，不得

已于3月返东京。同年夏，欧战起，日、德在我国胶州湾开战，陈以袁世凯在江浙一带兵力少，有隙可乘，又请孙中山经营长江方面，委派夏尔屿、范光启及吴藻华分别负责浙、沪和江苏的军事发动。不久，各地都陆续失败。

1915年2月，陈其美回上海主持长江方面的军事。经营半年，仍未得手。是年秋，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暴露，陈又至东京，与孙中山计议在敌人比较空虚的西南起兵，并以广东作为发难目的地。10月，陈返国经过上海，党人以上海敌海陆军归附日众，留他在上海主持。经电请孙中山表示赞同，并派他为淞沪司令长官。于是，他即取消西南之行，改在上海组织总机关部。陈认定如不将当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除掉，就不能有所作为，于是在11月10日，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将郑刺死于外白渡桥。12月5日，他和杨虎等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动用了中华革命党的绝大部分力量，但未获成功。

云南护国讨袁军兴以后，陈其美继续策动过一些零星的反袁军事行动。1916年4月，曾计划在上海发动海陆军起事，未果。同时另派杨虎到江阴、夏尔屿到浙江举事，杨因孤立无援失败，夏以谋泄被害，江浙军事陷于停顿。而陈其美的反袁活动，颇为袁世凯所忌恨，曾悬重赏募人刺杀。陈屡起屡败后，经费困难。袁探得知，假设鸿丰煤矿公司，利用民党叛徒李海秋见陈，伪称鸿丰拟把一块矿地向外商典押借款，如陈能从中介绍，事成愿以借款四成助作军费。陈未察觉是计，允为介绍。到约定的签字日——5月18日，被袁所收买的张宗昌派程国瑞按计将陈刺杀于萨坡赛路14号寓所[5]。

---

(1) 何仲箫：《陈其美年谱初稿》，《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一，1930年版，第5页。

(2) 龙浩池：《致陈其美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

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版，第961页。

(3)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7年版）第一册载：陈“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蒋“以陶案之故……避往日本”。另可参看马叙伦：《石屋续沈》（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版），第74页；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0—91页。

(4) 陈其美：《与共和建设会等团体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二。

(5) 蔡寅：《英公被刺案情概要》，《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一；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陈其尤

吴仁

陈其尤，别号定思，又名丽江。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广东海丰县东笏社。1903年，入海丰县高等小学堂甲班就读，四年后毕业。1908年，十六岁的陈其尤入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于此始接触到革命党人，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暗号为恢字辈。其时，同盟会正组织广州起义，革命指挥机关派陈其尤与其同乡陈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等住在广州旗下街，任务是当广州起义打响时，纵火烧毁旗人聚居的旗下街，以动摇敌之军心，乱其阵脚。

1911年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于省城被温生才刺杀毙命，广州当局紧急戒严，军警大肆搜捕，陈其尤因无眷属掩护，被强令迁出旗下街。遂与胡佩源、何少卿一起被派往另一个起义的秘密据点，总督署右侧的莲塘街，以姐弟关系为掩护。起义前数日，陈又被调到仙湖街始平书院，看管一秘密储藏军械弹药处。

4月23日，起义总指挥黄兴自香港秘密抵达广州，在小东营五号设立指挥部，部署武装起义。旋因内奸告密，起义计划被泄露，“乱党准备起事”消息已见诸报端。仙湖街、始平书院一带突然有巡警日夜巡逻，陈其尤见状立刻往司后街陈炯明公馆报告一切，适黄兴也在座。陈其尤谓：起义尚无确期，万一巡警闯入书院，后果不堪设想。建议给该处守卫人员发放利刃数把，以应付突变，得到黄兴、陈炯明首肯。

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广州全城戒严，起义计划被打乱，原定兵分十路进攻改为兵分四路，在准备不周的情况下，起义指挥部仓促下令于4月27日5时20分发难。陈其尤与同乡陈某因懂得广东话且熟悉道

路，被派到陈炯明率领的“选锋”督队这一路，约定当日4时在司后街陈公馆集合，而后进攻军警教练所，夺取枪械，争取学员反正。然因机关被破坏，陈其尤等迅速撤离，躲进广府中学宿舍青云书屋同乡处藏身。翌日清晨，一队巡警搜到陈其尤住处，将其揪住盘问搜查，幸陈留有发辫，巡警将其放过，得以逃往香港。不久，清政府派凤山为广州将军，同盟会探知后决定除掉之，遂派陈其尤和能制造炸弹的革命党人李熙斌两人主其事。行刺人是经陈其尤推荐的志愿者广州两粤医学堂的女学生周惠普。广州将军衙门位于惠爱中路。历来清廷将军到任都是从长堤上岸，尔后乘轿取道归德门转惠爱路抵将军署。故此，陈其尤等将狙击点选在归德门。但凤山赴任广州，另选僻静的仓前街抵将军署，虽侥幸躲过陈等的设伏狙击，但为在此设伏的另一组革命党人李沛基等炸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10月下旬，陈其尤参加了由同乡陈炯明、邓铿领导的惠阳淡水起义。11月，陈其尤随起义军攻占了惠州城，迫使广州都督府宣布独立。

民国建立后，广东都督胡汉民以陈其尤有功于民国，派其留学日本。陈入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深造，1916年归国，任职北京政府财政部。1917年7月，陈其尤辞去公职，南下追随孙中山护法革命。12月，孙中山于广州组织援闽军，陈其尤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1918年5月，援闽军向福建发展，陈其尤还先后出任闽省东山、云霄两县县长，并负责筹办《闽南日报》。1919年，陈作为粤军驻厦门鼓浪屿代表，负责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与粤军之间的联系工作。同年，陈代表粤军赴上海与孙中山洽商回广东事宜。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派代表来华，陈其尤在漳州参加了接待代表的工作。

1920年8月，孙中山令援闽粤军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10月28日，粤军攻克广州。陈其尤出任潮梅、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旋即赴香港，陈其尤也随之到香港。

1931年，陈其尤加入致公党，参加在香港召开的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炯明被推为该党总理，陈其尤为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1933年9月，陈炯明死后，致公党中央的实际工作均由陈其尤、陈演生负责。

早年陈其尤任职粤军时，与蒋介石交厚。抗战伊始，陈其尤是国民政府驻香港特派员。香港是南京政府对外购买军火的重要渠道，负责军火采购的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从军火交易中捞取巨额回扣。陈其尤对此无法容忍，遂于1938年初向南京国民政府揭发孔的行为，要求严惩。然陈的举报反见异于蒋介石，蒋要陈其尤飞武汉向其汇报工作，结果被军统戴笠逮捕，囚于贵州息烽，1941年移至重庆，才获得市区范围内的自由。

1941年，陈其尤获释转居重庆，但仍处处受到刁难。1942年初，陈于重庆与少年时的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邂逅，由此开始接触到中共人士。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等给予陈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1944年，中共南方局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应尽快恢复起来，以便为战后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等的支持下，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及广大民主进步力量团结一致，掀起了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陈其尤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启发和帮助下，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引上光明的道路。陈其尤和在重庆的一些致公党的同志，认为有必要恢复致公党的组织生活，以便通过这个组织发动海外侨胞，特别是洪门人士，使他们参加到争取中国民主建国的运动中来。

1946年初，陈其尤摆脱特务的监视，和黄鼎臣等先后来到香港，与在香港的老致公党员陈演生等酝酿恢复致公党的活动，提出整顿致

公党务，并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1946年11月1日，陈其尤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其助长中国内战的错误对华政策，停止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11月2日，发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11月19日再次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政协会议决议和全国人民的意愿，擅自召开伪国民大会，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径将引起全国分裂的危险，国民党应对此负全部责任。致公党愿同其他爱国党派一道为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并再次呼吁美国政府应停止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干涉。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这次大会一致议决加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修改党章，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中央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致公党“三大”发表《大会宣言》，揭露蒋介石集团加紧勾结美国实行独裁统治的罪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物质援助，指出中国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无须外国人干涉。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致公党主席。5月5日，陈代表致公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于香港联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6日，中国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公开批驳了某些民主人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11月23日，陈其尤接受中共的邀请，离开香港北上，于12月19日抵达沈阳，随即致电中共中央负责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成员向中共中央致敬。陈进入东北解放区后，除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之外，还到各地进行参观，目睹了解放后城乡的新气象。1949年1月22日，陈其尤与李济深等五十五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早日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月

28日，致公党发表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声明的通电。2月25日，陈其尤从东北抵达北平。6月15日，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首次筹备会议，担负起草政府组织大纲，以及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和纪年方案等的审查工作。

1949年9月21日，陈其尤作为致公党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大会发言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举。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剥削，是到了极点，“民不聊生”四个字也不足以形容这种惨状。要使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从上述三种压迫之下完全获得解放，除了通过像人民政协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进行长期斗争是无法取得的。陈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表示称道。他认为，“这样非常明显地把我们的团体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规定出来，实是很适合于中国的客观环境。政府的组织形式，不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以没有什么三权相互制约的那些叠床架屋的机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政府将是极有效率的，而不是官僚形式的。我们惟盼大会迅速依照这个组织法，选出中央政府，以进行全国的建设”。陈其尤认为，《共同纲领》是三个文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百余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和牺牲生命换来的，可以说它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1)]。

1950年、1952年，1956年的致公党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陈其尤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召集人或中央主席。解放后，陈其尤还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0年12月10日，陈其尤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王培智：《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韩信夫等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广东政协文史委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致公通讯》1987年第2号。

---

(1) 《中国致公党首席代表陈其尤发言》，新华书店编辑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讲话、报告、发言》，新华书局，1949年版。

陈启天

李义彬

陈启天，乳名翊林，谱名声翊，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学名国权，辛亥革命时从军改名春森，1912年入大学后又改名启天，字修平，笔名明志、致远。湖北省黄陂县陈牌楼村人。生于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其父陈子俊经营榨油业兼地主。

陈启天1900年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1905年下半年进入新式学堂，就读于武昌湖北高等农务学堂附属高等小学，翌年秋转入新设的黄陂县道明小学，1910年春考入湖北高等农务学堂附中农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启天投考北伐第二军宪兵队，从军半年，后退伍还乡。1912年秋，入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经济特科，攻读政治、经济、法律等课程，对宪法课用功尤多；同时从名儒刘文卿修习“阳明学”，坚持每星期日参加刘举办的“文会”，听讲经学和理学；1915年夏于该校毕业。1917年到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时中学部主任为恽代英。陈从教学中“渐觉未学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乃于1920年投考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录取后未立即入学，先应聘赴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任教，1921年春才去南京高师（后改名东南大学）报到。在五四运动推动下，1919年秋，陈启天经王光祈介绍，与恽代英、余家菊等一起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于1923年至1924年间担任该会执行部主任。“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知识分子队伍出现分化。这时，陈启天接受了国家主义，在政治上急剧右转。1922年，少年中国学会通过在杭州举行的年会和《少年中国》杂志，讨论学会方针问题。陈启天等主张学会只从事社会活动，反对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提出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主张。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这场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论，实际上是“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论战的延续。1923年，陈启天撰《何谓

新国家主义》一文，宣扬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该文先在同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宣读，后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

1924年6月，陈启天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即赴上海，就任中华书局新书部编辑，主编月刊《中华教育界》。同年9月，中国青年党的首脑曾琦、李璜等从欧洲归国，将该党活动中心从法国移到国内。陈启天与曾、李既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又都主张国家主义，他们于10月10日在上海共同创办《醒狮》周报，以鼓吹国家主义，进行反共、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宣传。陈启天是该报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醒狮》第4号上发表《醒狮运动发端》一文，鼓吹“国家主义是目前中国拨乱救亡的唯一良药”，说它可以“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感情，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他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倡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说“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否则阶级划分，争斗益烈。国内混乱的局面无由廓清，而国际干涉的惨祸终难幸免”。

1925年7月，陈启天经曾琦介绍，参加中国青年党，党号无生。同年8月，陈去山西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结识常燕生，介绍其参加中国青年党。在陈的建议下，青年党于10月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作为外围组织。他还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冀以影响教育界人士。1926年7月，他在上海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训练部主任。此后，长期从事青年党的宣传、训练工作，接连不断地到处讲演，并在《醒狮》周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国家主义”的宣传。

1925年的五卅运动推动了全国规模革命高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迅速扩大。陈启天害怕广大青年将接受和信仰共产主义，即在《醒狮》周报第44号上撰文，对那些“热心救国而又无确定的主义的青年”们说：“解决目前中国的国事，不是共产主义，便是国家主义。”他在分析了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三大分歧点后，断定“共产主义……处处不及国家主义”，所以他“毅然决然主张国家主义，反对共

产主义”。早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宣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待这一革命成功后，才能转入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陈启天和当时的其他反共分子一样，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行的最高纲领歪曲成现时的行动纲领，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就要实行共产主义，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实现的。若要勉强实现，必招共管之祸”[(1)]。以此来恐吓广大青年不要信仰共产主义，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

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青年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起着先锋作用。有的学校当局（如上海同济大学），为了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竟强迫学生填写誓约书。陈启天看到“这种高压的手段”，“不但不能制止学生爱国运动，而且足以增加学生反抗”，于是他就向那些学校当局建议：对于学生“与其一味压制不如相机指导”，其主要内容是让学生“认清爱国运动的正当方向只有国家主义。凡与国家主义相反的主义如共产主义、赤化的三民主义……都是亡国主义”，“防止共产党和赤化的国民党员闯入教育界”，“要根据国家主义的目的手段与政策，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以代替共产党的亡国运动指导”[(2)]。由此可见，陈启天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攻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不只是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企图把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纳入青年党的轨道。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所向披靡，迅速击溃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革命的迅猛发展，在革命区域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广泛展开，使陈启天极为恐慌。同年11月，他辞去中华书局职务，从上海乘船前往重庆。他入川后，恰逢刘湘等在四川“易帜”，摘下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在此形势下，他无法在四川公开活动，便于1927年1月悄悄返回上海。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陈启天和曾琦先后去北京，并暂将《醒狮》周报移至北京出版，由陈启天代编。陈在北京还主办党务训

练班，主讲国家主义、政党与政治运动等课程。7月，他又潜回上海，参加青年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一二”政变后，陈启天一再呼吁蒋介石放弃北上进攻孙传芳、张作霖的行动，劝蒋不要“汲汲于争鸡虫之得失”而“放松共产党”，希望蒋和北洋军阀、青年党结成联合阵线，共同反共。他声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目前大敌，不是北方实力派，而是共产党”，“我们对于国民党倒共的工作，可在联合战线上充分予以援助。”[(3)] 陈还鼓动全国的“各种反共的军事势力（蒋军包括在内）”“克期会攻武汉”，消灭武汉革命政权，否则必“同归于尽”[(4)]。陈启天的公然献策未被蒋介石采纳，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公开投靠北洋军阀。8月，经同党余家菊介绍，化名陈止韬，前往败退到济南辛庄的金陵军官学校任教，为孙传芳培养军队骨干（还在南京时，陈启天就曾接受该校总办万鸿图之约，去讲演过国家主义）。1928年4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北伐逼近济南，该校被迫再次北迁，在滦州与奉系军阀的东北讲武堂合并，这时陈启天方离去，于同年6月从海路返回上海。8月，在上海参加青年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训练部主任。同年，以明志笔名出版《反俄与反共》一书，对中国共产党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

1929年初，陈启天再次入川。他一面以陈修平名义在张澜主持的成都大学讲授社会学、中国近代教育史，一面从事青年党的党务活动。同年5月，又离川返沪。8月，接替李璜主办青年党的党务学校“知行学院”，担任院长并亲自讲授课程，直到1930年6月。

1930年8月青年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检审委员会，以监督中央执行委员会，陈启天被选为该会委员长。7月27日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占长沙，青年党为了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相对抗，由陈启天提议成立了“湘鄂赣反共救民会”。该会在宣言中申明它的三项任务是：“联合全国反共分子使立于同一战线之下”；“领导社会民众，使为扑灭共匪之主力”；“研究反共具体方

略，示国人以准绳。”[5] 陈启天在上海创办了以攻击污蔑工农红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宗旨的《铲共半月刊》，并以“湘鄂赣三省党务特派员”名义到九江、南昌、武汉等地，会见国民党军政学界头目，搜集“匪况和剿匪状况”[6]。之后，他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恶毒攻击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献计献策。在一篇题为《怎样才能彻底肃清共匪？》的文章中，针对蒋介石几次派兵“围剿”红军连遭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七条“确实有效剿匪办法”，这就是：“在政治上彻底革新”，“在吏治上须彻底整饬”，“在清乡上须实行保甲”，“在教育上须积极灌输救国的思想于青年脑中”，“在党务上须暂时取消各县党部”，“在外交上须继续与俄绝交”，“在军事上不急于进剿。”他同时也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认为“中国当前的大患，不仅在共匪，而且在执有政权与军权的人们绝少公心与真心”。他说：“当权者不拿出真心和公心来想办法，是自己要塌台，任何人也不能维持他。”[7]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甘愿投效而未获青睐的怨望心情。1931年他把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全集中有关镇压太平天国的内容摘录出来，先在《铲共半月刊》上发表，后汇编成册出版，书名为《胡曾左平乱要旨》，供“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参考。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报》，提出“政党休战”口号，想与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党争，握手言和。这时，他一面主张抗日，一面继续持反共反苏立场。1932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国难会议，陈启天是被邀会员之一，但他未出席会议。1932年夏，青年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内部派系矛盾，陈启天与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均未选入中央担任职务。1933年，他仍在上海办《民声周报》和《铲共半月刊》。1934年9月，陈在武昌家中曾被国民党逮捕，解往南昌，10月即被释放。1935年初由上海去日本东京养病五个月。回国后在上海参加青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训练部主任。会后，在上海接替常燕生主编《国论》月刊，并在这个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在《夹攻中的奋斗》一文中，他污蔑共产党“是用抗日的幌子来骗

人”，反对国民党再次“联俄容共”。他主张要在“夹攻中奋斗”：“一面积极准备抗日，一面彻底肃清匪患”[8]。

“七七”事变后，陈启天从上海迁居武汉。1938年4月，青年党通过和国民党交换公开信，正式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6月，陈启天担任教育部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7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陈启天作为参政员出席会议。8月，由武汉迁居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滞留四川，担任历届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还在中华大学文学系讲授“韩非子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启天被选举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协助主席曾琦主持青年党的党务。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启天作为青年党的五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与曾琦、余家菊等联名提出“关于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和“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在1月16日的会议上，陈对青年党的后一提案作了说明，强调“促进民主也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9]，为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伴唱。会议期间，他参加宪法草案审议组工作。在讨论宪草时，尽力替国民党帮腔，后来他写道：“讨论宪草原则时，我与慕韩先生出席说明自治法须以宪法及立法院通过的‘省县自治通则’为依据。同时出席该小组委员会的王若飞、秦邦宪，以我们的主张大不利于共产党的割据，起而无礼谩骂。”[10]

1946年5月5日，青年党中央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还都，迁往上海。先一日，陈启天由重庆飞往上海，又转赴南京，设立青年党南京办事处。同年11月，蒋介石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陈启天和曾琦、左舜生一道提出了青年党出席伪国大名单，陈也出席了伪国大，是大会的四十八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兼任会议副秘书长。

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青年党正式参加南京国民政府，陈

启天先任“国民政府委员”，5月18日改任经济部长。同年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陈启天被选为中央常委。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时，陈启天作为上海市代表出席，是会议主席团成员。4月13日他向会议作经济部施政概况报告。会后，行政院改组，经济部改名工商部，陈启天仍任部长。同年12月，辞去部长职务，移居上海。1949年4月，曾亲往浙江奉化溪口，劝已经“引退”的蒋介石复出，收拾败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陈启天逃离上海，经广州飞往台湾。

陈启天到台后，1950年复任青年党秘书长兼代主席及伪总统府“国策顾问”、台北“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同年10月他辞去青年党的职务，随后主编《新中国评论》月刊。1969年夏，又当选青年党主席，直至1984年8月10日病逝于台北。

---

(1) 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醒狮》周报第44号（1925年8月8日）。

(2) 陈启天：《为北京惨案再告全国教职员》，《醒狮》周报第78号（1926年4月10日）。

(3) 陈启天：《救国的联合战线与国家主义者的态度》，《醒狮》周报第129期（1927年4月23日）。

(4) 陈启天：《苏俄不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与中国的前途》，《醒狮》周报第134期（1927年5月21日）。

(5) 《铲共半月刊》第4期（1930年11月10日）。

(6) 《由江西到湖北》，《民声周报》第25期（1932年5月21日）。

(7) 《铲共半月刊》第26、27期合刊（1932年9月10日）。

(8) 《国论》月刊第1卷第11期（1936年5月20日）。

(9)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10)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86页。

陈渠珍

张永攀

陈渠珍，原名陈开琼，1882年9月22日（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生于湖南凤凰厅镇竿城（今凤凰县），祖籍江西德安县。明末清初其先祖迁徙至湖南浏阳，后又迁徙于麻阳龙家堡，在祖父陈宏文时期，迁徙到湘西凤凰的镇竿城。陈渠珍的祖父陈宏文曾中秀才，在镇竿城的茶叶坡开设一家药铺，生意兴隆后迁至岩脑坡，原配郭氏于1809年去世，续弦许氏，生二子，次子名陈茂林。陈茂林早年在镇竿衙门当差役。咸丰年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陈茂林随清军征讨，在援驰长沙、防守南京等历次战役中，均立下军功，职务由守备、游击、副将，到总兵、重庆镇使，授三品武功将军。同治末年，陈茂林回到湘西苗疆，任凤凰营都司，常驻黄丝桥镇守边关。陈茂林有一妻二妾，小妾南川金氏，陈茂林五十四岁时生陈渠珍。

陈渠珍为陈茂林独子，故得到家人的珍爱。1888年，陈渠珍六岁，入黄丝桥蒙童馆读书。1894年9月11日，陈渠珍十二岁，其生母金氏病故。1897年陈茂林去世，陈渠珍随大娘李氏、二娘邵氏返回镇竿，在西门坡学馆学习“四书”、“五经”。少年的陈渠珍学习颇为刻苦，每日勤学不辍，1901年以“品学兼优”被选送到沅州（今芷江）府著名的“沅水校经堂”学习，名人熊希龄、谭凤章均出于此经堂。1903年湖南省筹办长沙武备学堂，时年二十一岁的陈渠珍报名参试，但未被选中，该年秋，再次应试，终于进入长沙武备学堂附设的兵目学堂。陈渠珍入武备学堂后，认为原名“开琼”不好，遂改名为“渠珍”，意为“沟渠中的珍宝”，希望自己的才能早日被人发现。1904年，以與地、算学等科目优异而升入武备学堂将弁班学习。1906年，陈渠珍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宁乡任见习军官，约半年后，调回长沙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队官。在此，他萌发反清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但

不久便辞去标队官职务，回到凤凰，坐观形势变化。

在家乡居住一年后，其友人约他去湖北见总督赵尔巽，以谋求出路，赵尔巽看到陈颇有才能，将其推荐给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陈渠珍在长沙小住几日后，便与好友林修梅等五人乘船至宜昌，进入三峡，至成都拜见了赵尔丰，但赵疑心陈渠珍等五人为同盟会成员，“不即擢用”，陈渠珍遂滞留在成都等候差命。不久，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恰好，湖南凤凰的老乡田应诏，在四川任讲武堂监督，与赵尔巽时任新军协统的钟颖等人素有私交。陈渠珍于是以老乡身份拜访田应诏，述入川苦闷之境，遂得到田的引荐面见钟颖。于是，陈渠珍前往新军协统钟颖所部任第六十五标队官，驻防百丈邑，并将妻子刘次湘接到成都。

陈渠珍驻防的百丈邑是连接川藏的重要通道。陈渠珍在闲暇之余，对西藏很感兴趣，询问西藏的山川风俗，参考图籍，恰好此时西藏局势多变，清宣统元年中央政府决定派遣钟颖率领川军2000人赴藏，陈渠珍给钟颖及时呈上了西征计划书，“对于藏事规划颇详尽”，钟颖对此大加赞赏，立刻召他回到成都，委任他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并给予了一些生活资助。

1909年7月，陈渠珍随钟颖正式挥师进藏，行军途中颇为艰难，据其在1936年撰的《艽野尘梦》记载，劳役四处逃亡，虽出重金，但难于雇佣到役夫，此后，过雅安、泸定、大相岭、打箭炉，50天后到达昌都。此后，又经过恩达、类乌齐、三十九族地方，年底到达拉里。

陈渠珍等人至工布江达后，在脚木宗驻扎半月。得知珞瑜产大米，遂绕行到墨脱县一带考察。在工布的彭措家聚会时，遇到了彭措的侄女西原。西原从此成为陈渠珍的姬妾，跟随其在西藏活动。其后陈渠珍驻防卡拖。此时，内地的辛亥革命爆发，陈渠珍准备率领湘西子弟百余人回内地。按照原计划，陈渠珍与爱侣西原本来准备取道昌

都返回湘西，但在路过工布江达时，友人孟林认为，赵尔丰知晓藏军叛变后，派三营前往拉萨防堵。陈渠珍遂率领湘西籍军士115人从藏北前往青海绕道而行。随后误入羌塘高原，冰雪无边、黄沙漫天，人员不断死亡，经过通天河，进入青海境内，粮辎全尽，到达柴达木时仅剩下七人。羌塘之旅因为迷路绕行，历时二百余天，期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境。到达西安后，又贫困交加，万里相随的伴侣西原不幸染天花而殁，陈对之感情深厚，“号哭几经皆绝”。

西原在西安去世时，已是1912年2月，陈渠珍在西安滞留了一月，下葬西原后，盘缠全无，依靠亲友接济才凑齐回凤凰的路费，该年3月，陈渠珍回到家乡。此时，田应诏已是湘西镇守使，接见了陈渠珍，不久便任命陈为湘西军官团教练，该军官团有青年军官一百多名，仿北洋武备学堂而建，学员基本都为凤凰人，每期半年，共为两期。

随着袁世凯称帝的步伐日益加紧，全国人民的反袁呼声也越来越高，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也准备策划反袁，陈渠珍反对，但中营游击滕代春却认为陈渠珍“小小参谋，参是参非”，从此二人交恶。陈于是离开镇竿，出奔四川，投靠四川酉阳张子青，当时革命党人石青阳正在四川发动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张子青便将陈渠珍贵推荐给石青阳，从此陈以税务局长的名义，在川东招募护国军。但田应诏旋又来电酉阳，邀请陈渠珍回到凤凰。陈渠珍回到凤凰后，建议田应诏“北看袁项城，南观孙中山”，审时度势。从此，陈渠珍成为田应诏的高参，负责训练军队。1916年蔡锷、李烈钧发动护国运动后，陈渠珍建议湘西暂守中立，北通北京政府，但在暗中交往黔军。1915年12月护国军向麻阳进攻，陈渠珍率领一个团兵力驻扎风、麻交界的村寨，配合护国军乘势掩杀北军。北军失败后，陈渠珍又报北京政府说，湘西军队因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无法及时协助北军，于是袁世凯又援助田应诏枪支千余，此后，田应诏和陈渠珍的湘西军在北军和护国军的拉锯战中大发横财，北军丢失的枪支弹药大多落入湘西军之手。陈

渠珍也越发得到田应诏的欣赏。

1916年5月，湖南宣布护国独立，5月24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湘西独立，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渠珍任护国军参谋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9月，孙中山号召的护法战争开始。

当时，田应诏的势力范围是凤凰、乾城、麻阳、泸溪等县，而张学济以湖南辰沅道尹，兼守备司令身份，盘踞沅陵、古丈、辰溪等县，绥靖镇守使谢重光盘踞永绥、保靖、永顺、龙山等县。护法运动开始后，张学济立即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在湘西响应护法，孙中山于是任命张学济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1月10日，田应诏在凤凰也宣布护法独立。12月张学济挥师常德，与北军陈复初作战，田应诏采纳陈渠珍的意见，前往援助。1918年9月，吴佩孚通电南北议和后，湘西出现了短暂的偏安局面。陈渠珍利用这一时机，把自己在湘西军官团的学生、亲朋安插到各团、营任要职，逐渐控制了田应诏所部护法第一军的权利。恰好此时，田应诏看到军政界斗争变幻莫测，逐生去意，去长沙安住。于是，陈渠珍计划逐渐驱逐湘西的其他地方势力，便带部队至麻阳，一方面派部下田共阶至永绥与永绥茶峒协台宋海涛联络，唆使他夺取屯租占有权，用兵赶走谢重光，占领永绥城。结果，谢重光出走云南，退出了湘西政治军事舞台。同时，陈渠珍在原防区抓紧剿匪，争取得到湖南省长谭延闿的信任。不久，陈渠珍被谭延闿任命为湘西剿匪总指挥，指挥部设立在麻阳，随后陈又担任湖南十三区清乡四路长官、湘西巡防各军统领兼十县剿匪总指挥，并命令龙山驻军与地方武装在湘鄂接境一带，“严防堵剿入境之任何部队”。

1920年陈渠珍从麻阳来到保靖，认为该地是割据称雄的好佳地，便将湘西巡防各军统领部和剿匪司令部迁到保靖，并召开十县长会议，认为湘西应该施行“保境安民”的方针，剿匪应该“招大股，吃小

股”，“招老股，灭新股”，启用包轸等人剿匪，经过两年剿抚的活动，北河流域的土匪均已肃清，湘西十县从此安定。经过剿匪，陈渠珍的军队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当时，谭延闿派兵图湘西，进取辰州，其他各军纷纷倒向谭延闿，张学济依然反谭，遂处于孤立境地，于是割据湘西南芷江、黔阳一带的四川军阀周则范派部将蔡钜猷、刘叙彝，出兵赶走张学济，占领沅陵。1920年12月，张学济遭北洋军湖北督军王占元所收买的“神兵”的猛烈进攻，阵亡于来凤城外的中坝垅。陈渠珍收编了张学济的部属一千多人。至此，陈渠珍成为湘西境内最大的一股势力，逐渐控制湘西全境，开始了积极的地方治理。

1921年开始，陈渠珍派参军长刘伯齐等二十余人前往山西考察学习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并聘请留日学生策划湘西自治，发展教育，改进旧学，增设新学。在经济建设方面，主持制定《湘西十县乡自治联合筹办实业案》，包括开垦荒地，改良种子、勘察土质，建立农业试验场、开办工厂和矿业等十八大端，尤其重视湘西发展桑麻、桐油、茶叶等，禁烟土。使得湘西经济迅速发展，而陈渠珍本人却生活极为简朴。

1922年春，广州军政府令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入川组建军队，路过湘西，欲借陈渠珍兵马，因陈渠珍与他在四川之旧情颇深，遂派第二支队长贺龙随石青阳前往四川，贺龙入川后成为川东边防军旅长，此后战功不断，直至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1924年9月，唐继尧、熊克武假道湘西出师北进，但不久孙中山逝世，熊克武放弃了北伐的计划，准备经过黔、桂入粤，陈渠珍暗中受到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密令向熊克武进攻，但遭到惨败。熊克武胜利后，经过凤凰，进入镇竿城。此时，久居长沙的田应诏突然又想从陈渠珍手中取回湘西的控制权力。陈渠珍于是请辞，居于木江坪的猫儿口。

田应诏重新上台后，原投奔于熊克武的陈渠珍部属田义卿又扬言要进攻凤凰，派三千兵马前往活捉陈渠珍，但未能成功，湘西于是大乱，民众怨声载道，要求田应诏下台。田应诏于是再请陈渠珍出山，

自己遥领湘西镇守使返回长沙居住。在田闲居凤凰时期，陈渠珍仍然每日请安拜访，可见为人之周全。

1925年夏，陈渠珍回到镇竿，重新整编部队，将八千人编为三个团、两个营，并争取湘西周边的其他势力援助。此时，贺龙已任澧州镇守使，陈渠珍通过桑植人陈慕素与贺龙取得联系，贺龙主动让出绥保、永各县防地。此后，陈渠珍集中兵力攻打田义卿。田义卿此人在湘西口碑不佳，1917年，田义卿驻守龙山时，实行征收鸦片税，牟取私利，还命令百姓普遍种植，所以湘西百姓普遍痛恨之。1919年被陈渠珍委任为保靖营参将兼保靖巡防司令不久，便对陈渠珍生二心。1925年7月24日，湘西善后都督叶开鑫在沅陵设宴伏击，刺杀了田义卿。

1926年起，澧州镇守使贺龙等人成为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排挤对象，赵恒惕命陈渠珍讨伐贺龙。陈渠珍表面上发表了一道讨贺通电，并派兵驻守永顺，让贺龙顺利通过永顺而入四川。1926年，陈渠珍消灭了凤凰岗水洞著名的“三五八”土匪集团，擒杀土匪二百余人。1926年2月，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改称湘西屯边使。3月，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原支持田应诏的赵恒惕下台，陈渠珍遂任湘西镇守使，兼屯边使。

陈渠珍早在北洋军阀占领长沙，废弃“宪制”时，因担心被革命洪流所席卷，急电省政府表示参加北伐。时任贵州省省长、川黔边防督办等袁祖铭也背离吴佩孚而投向北伐军，担任北伐左翼军前敌总指挥，进入黔东铜仁。陈渠珍为避免与之冲突，率部退避龙山。8月，袁与陈达成联合协议，陈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左翼军前敌副总指挥，设部沅陵，袁给陈渠珍军部分军械子弹。陈的实力进一步增强。然而袁参加北伐，实为投机行为，并不督军北进，而屯军常德，该举引起唐生智的不满，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密令唐生智等人处决袁，1927年1月31日，袁在常德赴宴时被部将周斓设伏兵枪杀。陈渠珍本来属于袁祖铭的一个阵营，但因不久唐生智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准备东征讨

伐蒋介石，所以并未对陈渠珍用兵攻击，反而积极拉拢陈渠珍。

1927年1月16日，陈渠珍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独立师师长，编制为四个团。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武汉开始“分共”。在此之前，陈渠珍虽然身为地方军阀，却能尚能热情对待湘西的共产党员，甚至支持工作。但是，马日事变发生后，陈渠珍的政治风向转向国民党右派，“严饬所属，缉办共党”，一个月内杀害了不少革命志士，导致了“辰州惨案”。1928年4月，湖南清乡督办公署成立，全省分为11个区，每个区兵力是一个师。陈渠珍以第十九师长兼任第八区司令，负责麻阳等九县的“清乡”任务。

1928年4月，蒋桂战争结束，陈渠珍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被委任为武长萍铁路警备队第一警备军司令，仍驻守湘西。1929年6月底，陈渠珍为恢复其对桑植的统治，进攻桑植，贺龙红四军先在南岔歼灭陈部向子云旅一部，缴枪数百支，后在赤溪渡口全歼该旅，缴枪千余支。贺龙红四军因此获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巩固了根据地，部队迅速扩大到近四千人。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湘西远离战区，民生安宁，俨然是陈渠珍的一个独立王国，甚至连何键也无法在湘西插足，陈渠珍也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陈渠珍在南京蒋介石侍从室任主任的同乡贺耀组帮助下，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师长一职，月薪3万元，并从南京政府处补充了部分武器装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牵制何键。1931年，三十四师的编制已经扩充到6个旅和16个团，又将7个县的屯务军大队改编为5个独立营。此时，陈渠珍已有兵力两万五千多人，并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积极展开活动，反对何键。

1931年开始，陈渠珍开始狠抓军队建设，写出《军人良心论》一书，作为官兵必读的科教书和行动指南，施行“精神与技术并重”，兼采黄埔军校、湖南讲武堂、贵州崇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方法之所长，建立了军官教育堂、经武学堂、模范营、特火大队、卫士大

队，建立修械所和军用皮革制服厂，举办无线电台培训班，建立一千三百多人的“军事督查大队”，归自己直接指挥，到1934年陈渠珍的军队已增加到三万多人。

为了控制湘西农村全部，陈渠珍以加强农村建设和“防共”、“剿贺”为名，制定《农村建设方案》，于1933年建立了“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分会”和“农村建设研究所”，培养了乡村镇长和民团骨干一千多人，并且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中医学校。1931年陈渠珍为了增加地方财政，与何键联合在沅陵秘密开办吗啡厂，年生产一千余担烟土，大发民财。

1934年1月，何键勾结贵州王家烈的黔军，唆使黔军东伐铜仁，得逞后，直取湘西陈渠珍，但遭到陈的猛烈反抗。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负、僵持不下，王家烈的部队也伤亡极大，1934年2月王家烈决定与陈渠珍和解，并赔款20万元，此次混战中，黔军降附陈渠珍的有五个师的四千余人，波及湘西十个县城，作为战争后方的凤凰、麻阳等地，民穷财尽，“湘西农村银行”也被迫倒闭。

1933年贺龙攻占鹤峰后，陈渠珍曾经派人暗中联络贺龙，希望与贺龙合作，但遭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的拒绝未能成功。1934年11月，红军占领永顺县后，何键令陈渠珍全力“堵剿”红军，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陈渠珍不得已受命后，成立“湘、川、黔联合办事处”，陈为主任，组成“湘、黔、川剿匪指挥部”，11月13日，陈渠珍收复永顺，但四天后，陈部中红军埋伏，被红军围歼千余人，并重新失去永顺县城。1934年底，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发展到二万一千多人，而陈部多次遭到惨败，湖南省长何键于是找借口欲拔掉陈，于1934年12月给蒋介石呈报，认为湖南“剿共”失败，主要责任在于陈渠珍，并且收买了陈渠珍的重要将领顾家齐，以师长职位拉拢顾家齐投向何键。

1935年元月，何键移驻常德，以“追缴”红军为名，调遣大批军

队，进入湘西，布防在陈渠珍防区的周围，对陈部进行了分割，当时陈部因为奉命“剿灭”红军，分驻于永绥县、保靖县、龙山等地，陈渠珍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被迫举行军事对策会议，但顾家齐等人已投向何键。元月24日，何键发布了八项命令，要求陈部三十四师按乙种师三旅六团编制改编，遣散缴外人员，收缴枪支和地方散枪，由于陈的部队从三万多人被压缩到五千多人，行政权力也被削减掉。陈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被迫接受命令，将部队调到乾城、所里一带集中，进行整编改制。从此，三十四师归二十八军指挥，陈虽然名义上是师长，但具体事务由顾家齐代理，陈不能过问部队事宜，被指定在乾州办理屯务。从此，陈对湘西的军事控制消失。其苦心经营多年的三十四师不久也被调离湘西，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被调到浙江进行集训，在著名的嘉善抗日战役中，伤亡官兵3000人，其中凤凰的陈渠珍部下就八百余人。

陈渠珍被何键摘下“湘西王”的桂冠后，并不甘于受制于人，利用自己的屯务处长身份，组织屯务军，将24个屯务大队发展到二千多人，不久缩编为三个营、三个直属大队、11个县大队，共千余人。1936年春，屯务军整编结束后，陈又开展剿匪工作，湘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此外，陈还亲自抓审核屯租事宜，准备在永绥县和凤凰县进行催缴屯租，但遭到七县屯务指挥宋濂泉组织的民团反抗。1936年6月，爆发了陈渠珍与宋濂泉之间斗争的永绥事变，双方各有伤亡，但湖南省政府有意偏袒宋濂泉部，陈渠珍愤然辞去屯务处处长一职。1936年9月，陈渠珍携带家眷，从乾城至沅陵，乘船至长沙，就任省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

在长沙闲居期间，陈渠珍追忆约三十年前赴西藏、与西原结为情侣、征讨波密、误入羌塘高原的事迹，写成《艽野尘梦》。抗战爆发后，敌机不断轰炸长沙，陈渠珍迁往南岳避居。不久，蒋介石让何键离开湖南，调任内政部长。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后，素为欣赏陈渠珍的才能，暂委任他为湖南民救处处长。1938年3月，张治中为了进一

步安定湘西，开发湘西，决定撤销湘西绥靖处，设置湖南省政府沅陵办行署、行署主任暂由陈渠珍担任。1938年4月，陈渠珍回到湘西就任，当地有万人前来相迎，陈做了抗日宣传大会。陈渠珍就任后，开始收编各种游杂部队，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在收编游杂部队中，共收编233个大小武装集团二万余人，从而结束湘西“革屯”运动，得到张治中的高度信任和赞许。

1938年11月，因为长沙突发“文夕大火”，全城付之一炬，陈渠珍将湘西绥靖公署机关迁至乾城，沅陵设置绥靖公署办事处。不久，陈在得到张治中的推荐后，前往重庆拜见蒋介石和陈诚，但遭到冷遇。在遭到陈诚等人的谗言后，蒋介石准备扣留陈渠珍，但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的担保下，陈渠珍前往四川南川居住。在滞留重庆期间，周佛海还拢陈渠珍投靠日本，陈严词拒绝之。陈渠珍住在南川，一家十多口人，衣食费用都感到困难，于是开办了一所“三一棉毛纺织厂”，不久由于抗战日益紧张、物价飞涨，工厂被迫关门。1944年，通过张治中等人活动，陈渠珍被允许迁居贵州印江。

抗战胜利后，陈渠珍于1945年11月回到凤凰。因生活所困，他变卖了田地房产，在北门外安装四部水力轧花弹花机和小型的棉花混合纺纱厂。但因生意萧条而倒闭，其小女儿也因病夭折。1949年1月，湖南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准备进行爱国自救活动，陈渠珍任副主任委员。

但是，1949年3月，陈渠珍利用湘西各派武装力量内部斗争的机会，在凤凰县长田名瑜的委托下，成立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自任委员。不久，陈渠珍开始招募兵丁，收罗旧部，成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自卫军政委员会，自任主任。兵力达到二千多人，并召开湘西善后会议，企图重新割据湘西。1949年7月，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常德等15县，湖南宣布和平解放，9月初，陈渠珍携家眷避居于凤凰县黄丝桥天王庙坐观局势变化。

沅陵解放后，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解放军四十七军非常重视对陈渠珍的争取，先后派出多人前往湘西做陈渠珍的统战工作。1949年10月下旬，陈渠珍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后，召集了凤凰的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和平起义，11月9日，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向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湘西军区发出了《凤凰县和平解放代电》，当天，解放军进入凤凰县城，就此湘西全境正式解放。

1950年6月，陈渠珍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受到毛泽东和贺龙等人的接见，并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介绍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0年10月，陈渠珍还送两个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并且协助湘西军区剿匪。1952年，陈渠珍患喉癌，于2月8日去世。

陈渠珍的主要著作有《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廖天一庐日记》、《湘西教育曙光》、《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方案》等。

主要参考资料

陈渠珍：《艽野尘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陈同初：《回忆先父陈渠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

鲁岚：《陈渠珍》，湖南省人民出版社，1989年。

袁家春：《陈渠珍长期统治湘西的原因》，《怀化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

廖报白：《湘西简史》，湖南省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陈去病

杨天石

陈去病，原名庆林，字佩忍，又字巢南、病倩，别号垂虹亭长，笔名有季子、醒狮、大哀、南史氏、有妫血胤、东阳令史子孙等。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1874年8月12日（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一日）生。祖上世代经营榨油业。

陈去病是遗腹子，自幼靠母亲教养。七岁入塾，二十二岁考中秀才。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陈去病感怀时事，诗中已有“北海血千里，腥风吼石鲸”之语[(1)]。1898年，在同里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参加者有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等四十余人，“鸡鸣风雨，磨砺一堂”[(2)]，活动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1902年，参加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教育会，组织同里支部。次年2月赴日本留学。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渐次兴起，陈去病到日本不久，风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出卖利权，邀请法军镇压会党，东京中国留学生为此掀起拒法运动。陈去病致书同里教育会，引证西汉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名言激励众人，他在信里写道：“时值沦胥，强俄瞰北，英啖于西，法、日图南，德据东海。匪我族类，实逼处此。瓜分之惨，行将实验。使霍氏当此，不知其当若何痛心，拼于一决！”[(3)]自此，便以去病为名。

拒法运动波澜未平，为反对沙俄吞噬中国东北的“拒俄”运动又高潮陡起。陈去病报名加入拒俄义勇队，申请开赴东北杀敌。清政府不仅拒绝学生们的爱国要求，而且蛮横地下令镇压，陈去病愤而立志反清。他在同乡会刊物《江苏》杂志上撰文，力陈革命必不可免，表示

只要有陈涉一人首倡，他就要“仗剑相从”[4]。夏秋间归国，任教于上海爱国女学。课余辑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为《陆沉丛书》，绘图加批，作为反清宣传品，曾流行一时。

1904年3月，陈去病在吴江县周庄创办东江国民学校，以“保存国粹，阐发旧学，养成武健之风”为宗旨[5]。同年夏，著《清秘史》。暑假后学校因经费短缺停办，陈去病到上海任《警钟日报》编辑，宣传民族危机，呼唤同胞亟起救国。当时，京剧艺人汪笑侬正在编演改良新戏，陈去病认为这是“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的好办法[6]，积极为之鼓吹。九月，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发表传奇、班本、艺人传记及小说等。陈去病也亲自撰稿，以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事为题材，写了“时事壮剧”《金谷香》。因内容激烈，故刊物出版第二期后即被禁止发行。不久，《警钟日报》也被封闭。陈去病躲到客栈里，同一群清朝官吏酬酢往还，虚与委蛇，得以免祸。

陈去病因在上海无法立足，于1905年春至镇江承志中学任教。他写诗自励：“吾舌尚存笔尚健，阳秋著述未嫌烦”[7]。7月，开始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诗文。自《陆沉丛书》出版之后，陈去病一直潜心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并大量收集明末抗清英雄吴易[8]、夏允彝、夏完淳及东林、复社诸人的著作和手迹。1906年，他应徽州府中学堂之聘，途经芜湖，由刘师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到校后，为纪念黄宗羲，与教员黄宾虹等组织黄社，盟词为：“遵梨洲之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其间，曾经皖南入浙，放舟新安江上，探寻宋遗民谢翱西台痛哭遗址。10月5日，在江上为张煌言作就义二百二十六年周祭。所至之处，一一作诗志慨，磨砺反清意志。11月，苏、浙两省掀起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拒绝英款，收回自办的运动，陈去病参与组织江苏铁路协会，积极动员苏州人士认股办路，自保利权[9]。

1907年4月，陈去病在苏州偕高旭、朱少屏等凭吊明抗清英雄张

国维祠。同月，写成《明遗民录》。该书是一部专题传记总集，凡例规定：入清后“隐居不仕，长为农夫以没世者，皆为搜罗，入之录中；其或曾叨一第及身受一职者，如侯朝宗之伦，虽文学彬彬，亦概所屏斥”[10]。5月，到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会务，参与编辑《国粹学报》。8月15日，与吴梅、刘三等十一人组织神交社。在《神交社雅集小启》中，陈去病盛赞明末结社之风，公开指斥清朝统治者的文网，表示要联络天下志士，“轩眉扬觯，把臂入林，欢然上下其议论”[11]。同年冬，与柳亚子、高旭、黄节等在上海酒楼小饮，决定成立南社，借文学鼓吹革命。“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12]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遇难后，陈去病不胜哀悼，1908年2月，他在杭州与徐自华等会葬秋瑾于西湖岳飞墓东侧，建议组织秋社。事后赴绍兴，任教于绍兴府中学堂，又与学生宋琳联络越中革命党人组织匡社。4月25日为南明永历皇帝被清军杀害之日，陈去病再到杭州，祭扫张煌言墓，并“南向哀号”，哭吊永历。当日写成《永明皇帝殉国实纪》，文中称：“爰纪确闻，以告同志，庶几勖勉，用报大仇，则吾皇天上帝、社稷神祇，洎我高祖、列宗、永明诸皇在天之灵，必阴相佑之，以策成功。”[13] 7月4日，发起举行秋瑾遇难周年祭，革命党人因之聚集西湖，清朝地方官吏以为即将起义，逻骑四出。陈去病不得已逃往汕头，任《中华新报》编辑。同年冬，清政府勒令迁移秋瑾墓，徐自华发电告急，陈去病仓促北返。但秋瑾灵柩仍被迫迁往绍兴。

1909年春，陈去病因腿疾住院，治疗半年，自此一足跛瘸。出院后到苏州张家授馆，积极从事建立南社的准备。他先期发表《南社诗文词选序》、《南社雅集小启》等文，表明主旨，公开号召。11月13日，与柳亚子等十九人聚会于虎丘张国维祠，正式成立南社，陈去病被选为文选编辑员。此后，社务迅速发展，活动前后延续三十年，社员总数达一千一百八十余人。1910年，陈去病任教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次年3月，宋琳、周树人（鲁迅）等在绍兴组织越社，陈去病为

该社作叙，鼓励同人以百折不回之志，力挽狂澜，拯救祖国，同时希望南社由越而闽而粤，不断发展[14]。

武昌起义的爆发使陈去病无比振奋。11月21日，他在苏州发刊《大汉报》，反对与清廷议和，主张北伐。1912年1月，至绍兴主编越社机关报《越铎日报》。不久，改任杭州《平民日报》编辑。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期间，陈去病任江苏讨袁军秘书。1918年，赴广州参加护法，先后担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等职。护法失败后，陈去病郁郁返里，筑浩歌堂，吟咏其中。1922年再赴广东，随孙中山北伐，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6月，陈炯明叛变，陈去病被迫离粤，到南京任东南大学讲师。1924年，出任江苏临时省党部委员。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宫，陈去病于11月随孙中山北上，任清理清宫古物委员。

孙中山逝世后，右派势力逐渐抬头。1925年12月，陈去病与人联名通电支持西山会议派。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陈曾任江苏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分会主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后，他对国民党统治渐生不满。1931年，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各项职务。1932年，在苏州报恩寺受戒。10月4日病逝。

陈去病作诗推尊“唐风”，反对清末以模拟宋诗为主的“同光体”，尤其反对“闽派”的代表郑孝胥；作文则推崇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家，反对桐城派。

著有《浩歌堂诗钞》等，其他文章杂著散见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上。2009年其外甥张夷等编有比较完备的《陈去病全集》。

主要参考资料

陈去病：《浩歌堂诗钞》，1924年版。

陈绵祥：《先考佩忍府君行略》政协吴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华夏兴亡在匹夫——纪念陈去病诞辰120周年》（《吴江文史资料》第14辑），1994年版。

金世德：《陈去病先生年谱》，青浦金世德律师事务所1935年印行。

---

(1) 陈去病：《谒师吉庐，谈□竟日，谨呈两律》，《浩歌堂诗钞》卷1，1924年版。

(2) 陈去病：《革命闲话》，《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6期。

(3) 《日本留学陈君去病致友人书》，《苏报》1903年4月30日。

(4) 陈去病：《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4期。

(5) 《东江国民学校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4月10日。

(6) 《〈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组织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10月3日。

(7) 《国粹学报》第6期。

(8) 易，一作昜，此据柳亚子考证，见柳亚子著《怀旧集》，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第179页。

(9) 王伯敏：《黄宾虹二三事》，《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国粹学报》第28期。

(11) 《神州日报》1907年7月29日。

(12) 《南社长沙雅集记事》，《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

(13) 《民报》第23号。

(14) 发表在《南社》第4集上的《越社叙》未署年月，此据陈津门录送全国政协的抄件，但“辛亥”误作“辛丑”。

陈群

朱佩禧

陈群，字人鹤，乳名荣福，又号中之。189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商人的家庭。其父陈炳麟在福州霞浦街经营美昌纸号，其母林莲花原是烟花中人，后被其父纳为侧室。陈群初读私塾，后考入福建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又进入私立福建法政学校。1911年底福建光复后，陈群参加了福建学生北伐军，随军驻于福州东门外的东岳庙。学生军裁撤后，积极从事宣传演讲，开始立志从政。

1913年，陈群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获法学士、文学士学位[(1)]。留学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办《福建群报》。1916年回到上海，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华革命党总部充干事，与徐苏中、彭素民、刘纪文、林焕廷等共事。护法战争期间，奉孙中山之命准备前往漳州从事秘密活动，不料行前被控制上海的皖系军阀卢永祥逮捕。陈拒绝卢永祥的招降，险些被其处决，后因南北议和而脱险。1917年9月起，历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军政府秘书、大本营宣传委员、大本营国民党党务筹备委员、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委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19年11月1日在《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发表了《欧洲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一瞥》，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2)]。陈群的一生带着不少文人雅士的色彩。他多才多艺，尤擅诙谐之作。有一次在吃饭时，梁寒操发言谓“简又文”可对“烛之武”，陈自谓“陈人鹤”，可对“老狗熊”，可谓双绝[(3)]。

陈群作为早期的国民党党员之一，深得孙中山信任。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陈任总统府秘书。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他追随孙中山上了永丰舰。1922年11月，林森任福建省长时，陈奉上海总部之命回福建活动，半年后与黄展云先后

离闽赴沪。1923年，陈群担任广东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国民党党务筹备委员、党务处处长。黄埔军校成立后，陈群担任军校三民主义教员，并结交胡汉民、古应芬、蒋介石等实力派人物，由此得以在政界崭露头角。谷应芬执掌广东省政务厅时，陈群充该厅民政科科长。该厅举办警官学校和课吏馆，谷即令陈充校长和馆长。

1926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陈群担任北伐军东路军白崇禧部队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27年，前敌总指挥部派员检查稿件时，和记者之间发生了纠纷。为此，4月8日，陈群代表政治部招待新闻界四十余名记者，缓和与舆论界的关系。在会上，他表示：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容纳共产党加入，是加入后实行三民主义；如果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遵守三民主义，专实行共产主义，则国民党不能容纳。他要求记者勿载反三民主义、诬蔑或离间国民党领袖、或动摇国民革命军、抵触革命军所属之各机关的稿件。同时谓国民党仍尊重农工组织，惟农会应由真正农人组织，工会应由工人组织等[(4)]。

1927年3月下旬，奉蒋介石密命，陈群、杨虎、王柏龄三人与上海黑社会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三大亨”以及结拜兄弟刘志陆等取得联系，秘密实施“清党”。4月11日晚，陈群、杨虎等三人与上海三大亨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4月12日凌晨2时开始攻击上海总工会，占领了总工会下属各工人纠察队据点和总工会办事处。13日，陈群、杨虎主持成立“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特派董福开、袁逸、费公侠、唐尧卿、程致、蔡公时、李子峰、刘公畏、王次宾等为专员[(5)]。1927年4月18日，陈群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外还担任上海军法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驻沪办事处主任。4月19日，陈群在《申报》上发表给上海县商会公函，为稳定上海秩序，保障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得以实行，不准资本家滋生事端[(6)]。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任命他为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分会委员兼任执行委员，其

中陈群、潘宜之、吴倚巷为常务委员，陈布雷任中央执委会书记长。陈群还担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7]。此时他俨然是上海国民党党部要人。4月下旬，陈群、杨虎、杜月笙率领一支二百多人的“清党”流氓队伍，在芮庆荣指挥下，乘“新江天”轮前往宁波帮助蒋鼎文“清党”。大肆捕杀三天，公然悬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命令军警“严密查缉”，制造了“宁波一城腥风血雨”。

5月1日，陈群和杨虎、潘宜之联名发三份电报质问武汉国民政府：一、汪精卫何时到宁（南京）；二、忠告孙科到宁；三、促中山夫人宋庆龄离汉（武汉）。他积极从事“驱逐共产党”、“打倒武汉派”的清党运动。5月10日，他对福建省福州市党部清党运动给予回函，要铲除破坏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同时应扫除土豪劣绅等旧势力，不要任意筹张、扩大清党运动等[8]。5月11日，蒋介石抵沪，命陈群主持上海政治工作，任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陈手下成员有张秉辉（任秘书）、李公朴（主宣传）、杨键（主总务）等人。他与杨虎组织大刀队，不数日即杀四百余人[9]。杨虎曾一日枪杀十人，其中六人是共产党员[10]。可见“清党”时所用手段至为酷虐，被时人讥为“狼虎成群”[11]。另外，1927年5月，杨虎和陈群在上海成立总指挥，由政治分会负责，主张淞沪一带严禁彩票，清算公赌的陋风[12]。

“四一二”事件，陈群帮助蒋介石取缔了共产党，可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削弱了陈群的权力，这是因为陈群是党内游离分子，他更接近胡汉民、孙科。胡汉民南下前后与陈群建立了联系，陈群此时坚定地反蒋，奉胡汉民为领袖，服膺其领导，是胡所能依靠的主要力量，多次被派往各地办理“新国民党”党务与宣传工作。5月8日，蒋介石取消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专办上海前敌政治部事务、上海群众运动与工人训练事宜[13]。1927年5月20日，陈群辞去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职务，仅担任政治分会和东路军前敌政

治部主任。6月3日，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成立，陈群发表了攻击共产党的训辞[14]。

1927年6月15日，经政治部主任陈群核准，拨款给“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常费每月两千元，半月领取经费一千元[15]。7月18日，陈群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暑期讲学所举行学生开学典礼，他担任联合会名誉主任，与主任胡越、市党部黄惠平等三百五十人参加并发表训词，要求学生重视研究学问，关注政治变迁等[16]。此时北伐进行如火如荼，南北局势复杂，政治部主任陈群设法支持和控制上海学生运动及舆论宣传[17]。1928年8月起，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但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政见不一而将胡汉民软禁起来，陈群与蒋介石之间遂成敌对关系。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陈群、何思毅（又名世桢）等人即迎胡汉民来沪，并租马思南路二幢楼房给胡居住。

1931年，孙科组阁，陈群被委任南京警察厅厅长，1932年1月任内政部政务次长。1月24日，孙科内阁倒台，陈辞去内政部次长和警察厅长职返沪。1932年1月28日，日本向驻扎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淞沪会战爆发。在沪战之际，日本制定“以华制华”的策略，于2月9日唆使陈群、陈中孚、王亚樵、陈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动，由日本军部发给枪支一万支、机枪两百挺，以驱逐吴铁城，夺取上海市政权，造成傀儡地方政府。日本政府甚至决定如果吴铁城率保警抵抗，即将其枪毙或逮捕。据马超俊回忆，当夜12时，有人向他报告，马立即密报孙科，孙科马上电话邀请陈群、陈中孚、陈友仁等前来，严加责询，随后劝说他们：不可因个人之权力，与一时之意气，做万世之罪人。陈等表示服从，取消前议；到天亮，陈等返回，将所集人员解散[18]。

1932年1月胡汉民回粤，但间有到沪与何思毅、吴洗戈、柯筱庭、陈群等会议倒蒋，陈群在宝建路十七号的私邸被用作机关，在沪响应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在两广的活动。直到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病逝后，陈群等在上海机关才告结束。此后，

陈群先后出任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浦东中学校长。1933年12月开始担任国华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法律顾问，获得的报酬是每年银币五百元[19]。他在上海购置群贤别墅群（三十八幢）；开办上海华通书局；创办正始中学；组建联合律师事务所。然而，他所办的这些“实业”不能维持他日常的生活开支，群贤别墅也因押款而全部易主。所以陈群寻找时机，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冈田尚、冈田清兄弟先后来沪，拉拢陈群投日，陈群遂开始与梁鸿志商讨投敌附逆、组织伪政府之事。上海《文汇报》披露此事后，一些有识之士联名电告陈群，劝其悬崖勒马，速到内地共同抗日，但陈群以眷属均在沪狡言辩解，示不能从[20]。1938年3月27日，在上海新亚酒店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温宗尧分任行政院、立法院院长。陈群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任内政部长，负责维持上海治安工作，表现活跃。4月9日至7月6日间又兼代教育部长。

伪维新政府设于上海期间，陈群携妾住在新亚酒店，虽每日三餐享用十元一桌的饭菜，但出入酒店均须向日军岗警出示出入证。陈群身边还有日本人派的宪兵、便衣各一人跟随左右，以“保护”陈群。后来，陈群发现这两个人经常在汽车里偷看他与梁鸿志的会议记录，以后就索性每次将会议记录分送给日本各部门。1939年9月12日，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下令，陈群、缪斌、褚民谊、何世桢、梅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和李圣五九人先后附逆降敌，全国军政机关一体严缉归案，全国最高法院给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下达通缉令，除高宗武撤销通令外，其余都成了“汉奸”[21]。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之际，陈群担任“还都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褚民谊任秘书长。“还都筹备委员会”内设总务、接收、布置、运输、招待、警卫六个组，陈群担任招待组组长。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出台，伪维新政府寿终正寝。在权力中枢的伪行政院各部长人选中，原维新政府的人中只留了陈群一人做内政部部长。当时

曾有人议论说："陈老八外表吊儿郎当，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与佛海等也敷衍得很好，汪政权中人也深怕他在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其为'内长'，正所以示羁縻也。"1940年1月8日，《周佛海日记》记载："晚访陈人鹤，谈中央政府组织三步骤及办法甚详。此人将来必须设法拉拢，否则阻碍必多；惟本晚余所言者仍嫌太多，以后当慎之。"[22] 1940年4月6日，"晚赴人鹤处，谈治安费问题。人鹤主暂从现状，勿与日地方军人冲突。查其意甚善，外传渠（陈）取旁观，幸灾乐祸，殊不对也"[23]。可见，周佛海是设法利用陈在维新政府中的人事脉络和资源。

1942年，汪精卫主张行政简单化，各部只设一次长，但各部次长均不愿辞职，矛盾迭起。在这种情况下，汪又力主王敏中为伪内政部次长，陈群只好"委屈求全"，让自己手下人辞职，用了汪派人。1943年9月，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被暗杀后，汪精卫征得日本方面同意，调陈群出任伪江苏省省长，伪内政部部长一职由梅思平接替。1944年3月12日，伪国民党中常会八十七次会议决定改组江苏省党部，任命陈群为主任委员[24]。1944年8月，汪精卫临死前对伪政府人事重新做了安排，陈群调任有职无权的伪考试院院长。期间，他担任过"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陈群是个大收藏家，抗战期间收集了不少善本。1941年3月，陈群开始在南京颐和路修建书库，1942年2月完工。楼建成后，陈群请汪精卫题写了"泽存书库"的匾名。泽存书库建成后，收集旧图书达四十余万册之多，其中善本四千四百余册。库中还收有汪精卫寄存的五千多册书，其他汪伪政府官员，也在这里寄存了一大批图书。其后，"泽存书库"被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成为该馆北城阅览室。解放战争后期，被运送到台湾的那些珍籍，就出自这里。那些没来得及运走的泽存藏书，后来都收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部，共约万余种。陈群自杀前，写信给私交甚笃的马超俊（当时担任南京市市长），信中大意说："平生为革命奋斗，至今为功为罪，希望在九泉之下，请总

理评断。自己一生不聚私财，仅存图书数万册，全部捐赠南京市立图书馆。”马超俊不禁感叹：“可惜他走错一步，实在令人惋惜！”[25]

1945年5月，陈群听到纳粹德国投降的消息，他知道，德国的下场就是日本的下场，也是他的下场。在日本投降前夕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反平日玩世不恭的常态，常常与众妾回忆往事，哀叹道：“事蒋难，投敌较此更难。”1945年8月12日，陈公博、周佛海等电召在上海的陈群赴南京商议。陈群劝陈公博以伪军实力足可与蒋介石政府相抗，自立一方，可是周佛海反对，陈公博最后也不同意。陈群因感无望，下了自杀的决心。8月16日深夜，陈群预先立下遗嘱，并附上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谓：行者、居者各因其时，君行能远走高飞，我既不能行飞，只有居于失地，时也，命也。望君勿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前者指日伪，后者指共产党）。又请求蒋介石一切由他负责，勿株连附和者。

8月17日，陈群服毒自杀。

---

(1)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26页注释。

(2) 《欧洲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一瞥》（1919年11月1日），D2-0-1384-179，上海市档案馆。

(3)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民国世说》，《论语·选萃·札记》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版。

(4) 《东路军前敌政治部招待报界》，《申报》1927年4月9日。

(5) 《总指挥部政治部命令》，《申报》1927年4月13日。

(6) 《总指挥部政治部保障劳工之通函》，《申报》1927年4月19日。

(7) 《市党部临时执委员就职记》，《申报》1927年5月4日。

(8) 《陈群对闽省清党运动之复电》，《申报》1927年5月10日。

(9) 李文滨：《陈群其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4辑，1986年版，第164页。

(10) 《一周大事日记》（1928年7月7日），《国闻周报》第4卷。

(11) 李文滨：《陈群其人》，第164页。

(12) 《杨虎陈群主张严禁彩票》，《申报》1927年5月10日。

(13) 《陈群专办上海前敌政治部》，《申报》1927年5月8日“兹录蒋总司令来电如下：‘陈人鹤兄鉴，东路军现改为第一路，兄在沪日多，不能并兼，兄应在沪专办理前敌政治部及上海群众与工人训练，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另行派人，以分兄之劳苦，中正虞’”。

(14) 《陈群对于工会统一会训辞》，《申报》1927年6月6日。

(15) 《陈群准拨学联会经常费》，《申报》1927年6月15日。

(16) 《上海学生联合会暑期讲学所举行开学典礼》，《申报》1927年7月18日。

(17) 《陈主任致李秘书长电》，《申报》1927年7月26日。电文内容如下：上海第二路总指挥部政治训练部李秘书长鉴，现据《申报》载有何澄俞应麓电：“请派代表往北京。又有奉天希望以何成濬或李石曾代表前去之新闻。查我方并未派人赴北京或奉天，接洽任何事项除饬各报对于此项类似之消息禁止登刊外，应切实办理，以免混淆听闻，是为至要。”

(18) 马超俊、傅秉常口述，刘凤翰等整理：《傅秉常、马超俊口述自传》，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19) 《国华商业银行总行聘请陈群为法律顾问的文书及法律顾问契约》，Q278-1-165-1，1935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

(20) 李文滨：《陈群其人》，第167页。

(21)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最高检察官令通缉附逆陈群等九名的文件》，Q181-2-701，1939年，上海市档案馆。

(22)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第226页。

(23)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第276页。

(24)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编，第871页注释。

(25) 郭廷以、王聿均访问，刘凤翰记录：《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第120页。

陈三立

杨天石

陈三立，字伯严，一字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53年（清咸丰三年）生。1882年在参加乡试时被陈宝琛从落第卷中选拔中举。1886年中进士，任吏部主事。其父陈宝箴，历官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等职，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是旧官僚中推行“新政”较积极的一个。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的过程中，陈三立曾尽过一些力量。因此，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等被合称为“维新四公子”。但在当时，陈三立就不喜欢梁启超等津津乐道的“民权”说，认为它会带来“后灾余患”[(1)]。变法失败，陈三立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和他父亲一起革职[(2)]。于是回到江西南昌，筑室西山。一年后。迁居南京。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入侵，陈三立曾动员张之洞、刘坤一等勤王互保，“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3)]。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4)]。1900年以后，清政府开复了陈三立的原职，但他不肯出来任事，专力于诗、古文辞的写作。1904年起，与罢职官僚李有棻共同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兴建南浔铁路，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1908年，与汤寿潜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5)]。同年，鼓吹“提倡佛教，当视凡百事业为尤急”[(6)]，和沈曾植等倡立祇垣精舍，捐金给佛教居士杨仁山，计划选送人员赴印度学习大乘佛教。

1909年，陈三立以诗稿交给郑孝胥，请他删定。晚清诗坛，有所谓“同光体”，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不专宗盛唐，而以模仿宋诗为主。陈三立是其重要代表。“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7)]。他的诗模仿

唐代的韩愈、孟郊和宋代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以生涩硬拗的风格写枯寂萧瑟的感伤情怀。表达上，要求隐晦深微，像橄榄似的耐于咀嚼；用词上，则避熟恶俗，“语必惊人，字忌习见[8]。对于陈三立的诗，郑孝胥大为捧场，说是：“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戛之意态，非可列之西江社里。”[9] 当时，革命派中也有人誉之为“吏部诗名满海内”[10]。

辛亥革命后，陈三立迁居上海，曾列名于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他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遗老组织超社、逸社，经常在作品中指责革命，倾吐对清王朝的留恋之情，因此，受到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的抨击。

1915年，陈三立迁还南京。1923年至1924年一度住在杭州，此后住在南京或庐山，长期过着隐逸生活。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忧愤时事，日夜不安，曾于梦中大呼杀敌。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不赴。1933年迁居北平，时已年过八十岁，白发盈头，在见到年轻时的座师、同为遗老的陈宝琛时，却仍然坚持行三跪九叩礼。其后，郑孝胥、罗振玉曾拉他到伪满洲国去当汉奸，被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再次派人拉他，多方游说，他都不理睬；侦探每天在门前窥伺，气得他让仆人拿着扫帚驱赶[11]。同年9月14日，尿闭症复发，陈三立拒不服药，绝食5日死。

生前著有《散原精舍诗集》、《散原精舍文集》。

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历史学家。

---

(1) 陈三立：《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散原精舍文集》卷5。

(2) 《湘报》第174号（1898年10月12日）。

(3) 《陈三立致梁鼎芬密札》，香港《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

(4) 梁启超：《诗中八贤歌》注引，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第5册，第13页。

(5) 《神州日报》，1908年7月14日。

(6) 《神州日报》，1908年8月5日。

(7) 陈三立：《为濮青士观察丈题山谷老人尺牍卷子》，《散原精舍诗集》。

(8) ”陈衍：《石遗室诗话》。

(9) 《散原精舍诗序》。

(10) 《无生诗话》，《民呼报》，1909年6月7日。

(11) 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陈少白

娄献阁

陈少白，原名闻韶，号夔石。1869年8月27日（清同治八年七月二十日）生于广东新会县。其父陈子桥是个乡绅，晚年加入基督教。四叔梦南亦为基督教徒，曾翻译西书供陈少白阅读，对他的影响较大。

陈少白六岁起在家课读，1884年以后从族兄心夔、翰周及陈源泉等人读经书，学做八股文。1888年入广州格致书院学习。他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但度量偏狭，出语尖刻，不易与人共事。

1889年底，陈少白因事赴香港，得区凤墀介绍，结识孙中山，时孙肄业于雅丽士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翌年1月，孙推荐陈亦入该书院学习。两人交谊甚深，曾拜盟为兄弟。孙居长，写信给陈时皆以“吾弟”称呼。1892年孙中山毕业离校，陈因不喜医术也辍学。当时与他们同道的还有尤列、杨鹤龄。四人常在一起谈论反清革命，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称为“四大寇”。

陈少白离校后，随同孙中山一道从事革命活动。孙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和开设药局，陈奔走其间，助孙维持店务。他们寻找救国道路，有民族民主思想，但也受了当时风行的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1894年1月，孙中出写了《上李鸿章书》，经与陈少白商酌修改后，于6月携至天津求见李鸿章，想对朝政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李不予理睬。孙失望之余，便出走檀香山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陈帮助孙结束了药局事务。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革命团体兴中会。随即致书

陈少白，要他在香港开展革命活动。翌年初，孙抵香港，陈少白及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均入兴中会，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同时吸收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赞泰等人参加。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对外称“乾亨行”以掩人耳目。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孙中山赴广州担任军务，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等佐助，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济及财政。孙、陈等在广州以农学会的名义设总机关，展开了各项筹备工作，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军，决定在10月26日（阴历九月初九）起义。结果因谋事不密，走漏了消息，致使这次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捕牺牲。陈少白脱险，与孙中山、郑士良等东渡日本。

在日本横滨，孙、陈、郑结识侨商冯镜如等，成为同志；并建立起兴中会分会，以冯为分会长。不久孙、郑离日，陈少白在日本剪辫易服，取名服部次郎，助冯镜如编纂《英华字典》及办理兴中会分会事务。同时先后活动于横滨、东京等地，与日本志士曾根俊虎、宫崎寅藏等相识。

1897年秋孙中山复至日本，陈少白与孙中山、尤列、杨衢云等人常以横滨三余轩和修竹寄庐为游息议事之所，商议扩大革命力量。陈少白曾赴台湾活动，组织兴中会分会；但会员不多。翌年他再去台湾，筹得了一些捐款。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至日本。日本志士热心促进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康梁改良派的合作，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与康梁等人多次会谈。陈指出：“清政府已不可救药……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2)]，劝康等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但因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而未果。

1899年秋，陈少白奉孙中山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他在香港租定报馆发行所，由日本购来机器、铅字，经过数月筹备，于年底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报纸，陈为报社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发表《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

途》等文章，影响较大；针对保皇派报刊上的一些谬论进行批驳，在理论上展开了交锋。该报首次改变从前中文报纸直排长行的惯例，采用横排短行的版式，后来为国内报纸效法。陈少白还主持出版十日刊《中国旬报》。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对兴中会初期的革命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陈少白还积极从事联络会党工作，为革命积聚力量。他首先加入粤三合会，被封为白扇[(3)]；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4)]。同年冬，陈少白促成哥老会首领杨洪钧、张尧卿、李云彪到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领导人会晤。并于翌年春在港召开联合大会，决定共同组成兴汉会，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陈为实际主持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东南各省督抚谋求互保。英国政府香港当局有意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自主”，派人与陈少白秘商，希望孙中山的革命党与李合作组织“独立”政府。孙、陈等赞同此策，致函港督提出平治章程。结果因李鸿章北上，合作尝试落空。此后，革命党便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同年夏，孙中山两次乘船至港，召集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人在船上开军事会议决定在惠州和广州同时发难，由陈等在港负责接济。《中国日报》社遂成为起义的大本营，党人出入络绎不绝。后起义失败，不少义士逃到香港，陈设法予以安置。

由于起义和善后用款较多，《中国日报》社的开支十分困窘。1903年《中国日报》并入李纪堂办的文裕堂印务公司，陈为公司经理之一，仍负责报务。1904年，陈针对保皇派徐勤在香港出版《商报》散布保皇扶清谬论，以《中国日报》为阵地与之斗争，发论十数篇进行批判。

陈少白在主持《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的同时，与程子仪等创办天演公司，开办彩南歌戏班，招收青少年学员加以训练，排演

《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此后，陈同戏剧界继续保持联系。辛亥革命前夕帮助黄咏台等组成香港振天声白话剧社，亲自为剧社编写《自由花》、《赌世界》、《鸣不平》等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内容的剧本演出。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即派冯自由、李自重赴香港，与陈少白等共同商量组织香港同盟会分会。他们以兴中会为基础进行改组，吸收新同志参加，于秋冬间正式成立，会所设于《中国日报》社。众举陈少白为分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香港分会一向兼管西南各省党务军务以及联系海外交通等，分会长一职责任重大。

这一时期，陈少白的革命活动相当广泛。他在反对美国取缔华工苛约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任香港各界拒约会的顾问和谈判代表。他支持港商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等人组织的粤路股东维护路权会，反对粤督岑春煊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的决定，在《中国日报》上仗义执言。并常常亲自为该会撰写计划、文电，备受赞佩。

1906年8月，文裕堂印务公司破产，《中国日报》社改组，陈少白辞社长职，由新股东推冯自由为社长，陈仍负监督之责。陈同时辞同盟会分会长职，亦由冯继任。

陈少白此后热衷于经营企业。1908年他因维护粤汉路权获得酬金9000元，便以此款在九龙牛池湾购置田产十余亩建农场，并筑房屋移家居住。1910年他又任香港商工局顾问及四邑轮船公司司理。1911年武昌首义，广东独立，胡汉民为都督，任陈少白为外交司长，但他几个月后即辞去。不久，他发起组织粤航公司，被推为总司理，收回外人所租码头一座，购买法轮两艘，航行于广州香港之间。1915年他又与李煜堂设立上海保险公司，任主席。1919年粤航公司停办，他买下了该公司联兴街口之大码头。后来他到广州时，多居于码头事务所。

孙中山于1921年5月重返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聘陈少白为总统府顾问，同时应聘的还有尤列、杨鹤龄。孙中山令广东当局重修广州越秀山文澜阁，供陈、尤、杨居住，称“三老楼”。同年10月，孙赴广西准备督师北伐，陈随行襄助有关事务，但不久即辞职回乡。

1922年以后，陈少白在故乡新会县外海乡任民团保甲局长、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兼新会第四区区长等职，热心于整理乡政、兴修公路、筹办中小学等乡事建设。他曾遍游南北各地名胜，吟诗撰文，1929年著述《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

1934年秋因病至北平休养，12月23日去世。

---

(1) 郑东梦主编：《檀山华侨》，檀香山1929年出版，第30页。

(2)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第86页。

(3) 白扇是三合会要职之一，为该会的军师，有设计指挥之权。

(4) 龙头是哥老会山堂的首领，龙头之龙头即首领的首领。

陈绍宽

陈贞寿

陈绍宽，字厚甫，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89年10月7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父陈伊黎，在晚清海军中任中士管轮。陈绍宽童年在乡劳动，十岁入私塾读书，十五岁考入福州格致书院，十七岁入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平日以勤学见称，成绩优异，深得教习器重。

1908年，陈绍宽在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通济”舰见习，授海军少尉。1911年任“联鲸”炮艇二副兼教习，升海军中尉。民国成立后，充“镜清”练习舰驾驶大副，授海军上尉。1913年，他先后任“江亨”舰副长、“肇和”舰驾驶大副、“应瑞”舰航海正、“湖鹏”鱼雷艇艇长等职。翌年，调任海军总司令部副官，升海军少校。

1915年春，陈绍宽被派往美国学习，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发生。次年他被派赴欧洲观战。1917年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后，他奉派赴英调查英国战时实用飞机、潜艇状况。次年春，又赴法、意调查海军。5月，他参加英国海军潜艇队作战，受到英国海军当局的赞赏，战后英政府特赠予欧战纪念勋章。

1918年秋，陈绍宽任驻英使馆中校海军武官兼留学生监督。翌年2月兼任巴黎和议中国代表团海军委员，4月参加伦敦国际海道会议。10月，陈卸任回国，就任“通济”练习舰舰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陈绍宽以助直有功，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晋授海军上校。次年调任“应瑞”舰长，升海军少将。1926年9月升任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驻泊南京，指挥长江各舰艇。不久，北伐军推进至江西，陈曾派舰溯江而上，协助孙传

芳与北伐军作战，并派舰供孙传芳设统帅部之用。北伐军迫近上海时，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已暗中联络北伐军，曾征求陈的意见，陈表示反对。后来，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在福建首先发难，陈迫于形势，才跟随倒戈。1927年4月10日，他率舰截击孙传芳部，将渡江孙部两团悉数歼灭，为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立了一功。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6月，唐生智回师武汉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令陈绍宽率舰封锁长江上游马当等处，昼夜梭巡。8月底，投靠奉系的孙传芳部渡江反扑，先后占栖霞山、龙潭，陈绍宽率舰在龙潭、栖霞山间沿江防守，配合守军力捣孙部阵地，并率舰截断其归路。10月，李宗仁等下令讨伐唐生智，陈绍宽奉派率“楚有”等舰西进攻击唐军，于次年1月攻克城陵矶，占领岳州，收降“楚振”舰，为奠定湖南的局面立了功。

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设立海军署，委陈绍宽为署长，晋升中将。次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缩编会议，成立编遣委员会，3月设海军编遣办事处，陈为编遣委员会委员。他秉承蒋的意旨提出海军收支统一，人事统一。后来蒋介石奉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只做到形式上统一了番号，原属奉系的第三舰队（原称渤海舰队）和粤系的第四舰队仍雄踞一方，各自为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陈绍宽率“楚有”、“咸宁”两舰护送蒋介石赴武穴，先后攻破郝穴、马家寨、观音寺三道防线。蒋占领两湖后，任命陈兼湘鄂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湖南省政府委员。

同年4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成立海军部，陈绍宽任政务次长兼代部务，次年又兼任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1932年1月，就任海军部长，晋升海军上将。1935年7月，陈兼任国防会议委员，1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3月作为副使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

陈绍宽在出任海军要职的几年中，对建设海军，作出了一定贡

献。旧中国从晚清到北洋军阀的覆灭，海军总吨位仅有三万多吨，陈任内新造和改造大小舰艇30艘，吨位增至五万多吨，添造了“宁海”、“平海”等新舰。他派军舰分段测绘我国江海领域，编绘出版出海图、航海指南等，不再向英国控制的海关购买出海图。1930年海军部正式接管淞澄水道测务，争回测量权，还接收东沙群岛灯塔等。对于引港业务，陈认为事关国家主权和军事机密，遂创设引港传习所，培植引水人才，逐步收回了引水权。

陈绍宽主持海军部工作后，把我国西沙群岛划为海军军事区域，派出海军人员管理。1931年底，法国殖民主义者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机，公然向我国照会声称七洲岛属越南政府，应注意越南对该岛之“先有权”。1932年3月，我国海军部会同外交部严词驳斥，严正指出“七洲岛即华语所称西沙群岛，确属我国领土”[(1)]，并指出：“民国二十年四月，香港远东气象会议开议时，安南观象台台长法人勃鲁逊（E．Bruzon）及徐家汇法国天文台主任劳积勋（L．Froc）亦向我国代表声请，由中国建筑西沙观象台，依法律上之解释，该地为我国领土，毫无疑义。”[(2)] 陈指示海军部着手筹建气象台，于1936年在该岛建成，进一步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海陆空三军协同行动的立体战进攻上海，陈绍宽秉承蒋介石意旨，密令各舰队“应守镇静”[(3)]。2月3日日舰炮击吴淞各地，中国海军均奉命“不准还击”。一艘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三日之久，陈也未派舰前往轰击。高昌庙海军哨所在执行戒严任务时，对强闯我江防警界线的一艘日船下令停航未果，开枪击中其船长福田（重伤而死），日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向我方提出最后通牒，经双方秘密谈判，我国海军承诺赔偿抚恤费二万元了结。由于陈在淞沪抗战中按兵不动，受到了各方爱国人士的责难。1932年4月，李根源等42人在“国难会议”上指责海军各舰“除鸣礼炮外，别无其他效用”[(4)]，要求把海军部及所属海军机关学校工厂一律取消，把海军高级负责人员一律罢斥，并要求冻结海军经费。陈对

提案人反唇相讥，一时纷呶不休。后来，又由于他打算聘请日本教官创办海军大学，遭到“应瑞”舰长林元铨等人的联名控告，指控其把海军军事教育权委诸敌人。陈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自堕声誉。

“七七”事变时，陈绍宽正在欧洲考察海军。中国抗战形势既定，他立即迅速回国。由于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单薄，无法向优势的日本海军进行主动出击，他执行防御战略，下令破除航行目标后，即以军舰、商轮、趸船以及民船、盐船等堵塞港道，配合要塞阻遏敌舰深入，以拱卫京畿。日本侵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因江阴封锁，军舰暂时受阻，不能一鼓而下南京。但日军一面由陆路迂回，一面派大批飞机向守卫江阴封锁线的我国舰艇轰炸，不久就突破江阴阻塞线。南京沦陷后，陈又在马当构筑第二道阻塞线，以保卫武汉。这时，已没有什么军舰和商船可资阻塞，只能在江流湍急的马当用“投石填江”的办法垒成一个个石塔，并施放水雷800枚，添设武汉区炮队，安装拆下的舰炮十尊，以黄陵矶白浒山为阵地，阻碍敌舰前进。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迂回前进，迫近马当，要塞司令传令毁除炮件退却，第二道阻塞线拆除。敌攫取九江后，又窥伺田家镇，陈遂决定利用长江水流下趋之势，布放漂流水雷向敌舰展开游击战，并亲临葛店督战，但力量有限，收效不大。不久武汉陷落，陈随即撤至长沙，奉命负责构筑湘阴阻塞线。1940年6月，敌避开我雷区，迂回攻击宜昌，荆宜失陷，我残存的舰艇无法西上，相继被炸沉没。陈绍宽惨淡经营的海军大部被毁。

1938年1月，蒋介石下令撤销海军部，改组为海军总司令部，陈绍宽为海军总司令，隶属军政部。何应钦、陈诚相继任军政部部长时，对海军在经费、人事等方面多加掣肘，使陈奈何不得。1945年4月，陈奉命随宋子文赴纽约参加筹组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海军顾问。此时军委会下令撤销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及第二旅第三团番号，人员就地由军管区收编。陈回国后呈请恢复，蒋介石非但不准，又令撤销第二旅番号。7月，陈绍宽以抗战胜利在望，请求拨款整修留在

后方的舰艇，蒋介石亦未予批准。

日本投降后，陈绍宽被派赴南京参加9月3日受降典礼，但委派的海军总接收员却不是陈绍宽而是曾以鼎。陈气愤之余，自行命令曾国晟为接收海军大员。当时，日本长江舰队旗舰“安宅”号乘隙偷驶出吴淞口，被美国第七舰队截获押驶返沪，陈亲自接收，改名“安东”号；并接收日本“宇治”炮舰，改名为“长治”号。这时，八路军从烟台渡向辽东半岛，蒋介石命陈率“长治”号前往渤海堵截，陈借口舰只需要修理，拒不奉命，蒋遂决心去陈，于同年12月26日下令裁撤海军总司令部，免去陈海军总司令职，在军政部下设立海军处，由陈诚兼处长，负责接收海军总司令部，还派陆军中将冷欣为监交员，派陆军警卫连代替海军警卫站岗，迫陈去职。1946年1月31日，陈被迫交接。2月，陈闻蒋来南京的当日，决然离宁，归隐福建家乡。

居官廉洁自守的陈绍宽解甲归田后，既无妻室，又无家产，孑然一身。虽然他有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虚衔，但从未就职。他在乡种植蔬菜、花果，粗衣淡饭，悠游林下。解放战争后期，陈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况，并策动海军一部分官兵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福州解放前夕，他不顾蒋介石的胁迫，断然拒绝前往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绍宽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1969年7月30日，陈绍宽在福州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曾国晟口述、林勋贻笔记：《我所知道的陈绍宽的资料》，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池仲祜：《海军大事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0—512页。

张日章：《旧海军的时代有关陈绍宽的一些轶事》，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

(1) 《海军大事记》，福建省政协翻印本，第73页。

(2) 《海军大事记》，福建省政协翻印本，第99页。

(3)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4236，目录号1，机关代号二。

陈树藩

张学继

陈树藩，字柏森，亦作柏生、伯生，祖籍湖南宁乡，后落籍陕西安康，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七岁开始随叔父在家塾读书。1905年，陈树藩入西安陕西陆军小学堂第一期学习。1908年，陈树藩与同学张钫等三十人被保送到直隶保定的陆军速成学堂深造，陈树藩入炮科。1910年，陈树藩毕业返回陕西，被分发到陕西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某标任军械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陕西，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张凤翙、钱鼎、朱彝铭、常仲昭、张钫等联合哥老会及“刀客”首领张云山、万炳南、刘世杰、陈殿卿、马玉贵等密谋发动起义。西安将军文瑞、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等极度恐慌，为了防止新军起义，一方面调可靠的巡防营进城担任防守任务，一方面将革命力量较强的新军部队调离西安，分散革命力量，收缴新军官兵手中的武器弹药，派出侦骑四处捉拿革命党人，西安城内空气紧张。新军起义前夕，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亲自约陈树藩密谈，劝他加入革命阵营。陈树藩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欣然同意加入同盟会。

10月22日上午11时，起义爆发，陈树藩领着起义新军及时冲进军装局弹药库，取出急需的子弹和炸弹，分头占领陕西巡抚衙门等机关。陕甘总督升允在混乱中出城逃往甘肃，西安将军文瑞逃进满城顽抗，钱能训与其他官吏逃进老百姓家中躲避，钱能训后来被拿获，六营巡防兵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当天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全城。第二天黎明，起义军猛攻满城，文瑞指挥满籍旗兵拼死抵抗，战至下午3时，满城被攻破，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宣告光复。

西安光复后，哥老会控制了局面，同盟会处于边缘化地位，光复后推举的军政领导人，除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翙为同盟会员外，两个副大统领及六个大都督都是哥老会头目[(1)]。自认为在起义中立了大功的陈树藩没有得到相应的职务，陈一怒之下跑到渭北投井勿幕，自任陕西东路招讨使。1912年，陕军陆军编为两个师又四个独立旅，陈树藩所部被编为独立混成第四旅，陈树藩任旅长。

白朗起义军因受到北洋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在中原无法立足，于1914年3月中旬攻克豫陕门户荆紫关进入陕南，一路攻占商南、武关、龙驹寨、商县、孝义等地，随时可能进攻西安，陕西都督张凤翙眼见省城难保，连连向袁世凯告急，并请求邻省出兵协剿，这就为袁世凯控制陕西提供了机会。袁世凯立即任命其心腹将领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毅军将领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陆军第七师和毅军由潼关进入陕西，为袁世凯撤换张凤翙埋下了伏笔。白朗起义军越过秦岭后，乘渭南一带空虚，挥师西进，一路势如破竹。4月，陈树藩所部独立混成第四旅在醴泉县境内与白朗起义军展开激战，致使白朗起义军损失近千人。接着，陈树藩所部又在邠县境内与回师的白朗起义军展开激战，再度重创白朗起义军。白朗痛心地说：“吾率数千之众，纵横皖、鄂、陕三省两年之久，从未损好兄弟如此之多。”[(2)]

1916年6月，袁世凯调张凤翙、张钫入京任职。随即任命陆建章为陕西都督（不久改为陕西将军）。陆建章为人心狠手毒，杀人如麻，人称“陆屠户”。陆建章上台后，第一大事就是改编和吞并陕军。陈树藩为了保全自己，给陆建章及其子陆承武献上一批上等烟土和古玩珠宝，还和陆承武结拜为兄弟，取得了陆氏父子的欢心，结果，陈树藩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得以保存，而其他的两个师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均被陆建章裁减吞并。

1915年5月，陈树藩升任陕南镇守使。陈树藩表面依附陆建章，但同时也秘密收留了一些被陆建章裁下来的民党官兵，掩护一些被陆建章追捕的民党人士。陆建章得报后，密令陈树藩逮捕军中的民党分

子。陈树藩权衡得失，将王飞虎、郭坚等军官暗中放跑，然后谎报王等已潜逃。

1916年1月，陈树藩调任陕北镇守使。陆建章因为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伯爵。5月初，陕西模范监狱犯人越狱，陆建章派军警沿途搜捕逃犯，就地正法，许多行人、乞丐亦被误杀，西安城内尸横街头，血水四流，惨不忍睹。陕西人民怒不可遏，发起“反袁逐陆”运动，渭北各县声势尤其浩大。陆建章命陈树藩率部由同州、蒲城向西，命陆承武率“中坚团”由西安往北，南北夹攻渭北郭坚、曹世英等反陆武装。陈树藩已经意识到陆建章倒台是迟早的事，因此，决定倒向民党一边。陈树藩部下胡景翼在富平发动夜袭，将“中坚团”缴械，并活捉了陆承武。在胡景翼、郭坚等人的拥戴下，陈树藩于5月9日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陆建章见大势已去，决定和平解决。经过谈判，最后达成两项交易：陆建章向北京政府保荐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则负责释放陆承武，保护陆家生命财产安全，并安全送出潼关。随后，陈树藩亲自护送陆承武回西安，又亲自护送陆家老少出潼关，但他等不及北京政府的委任，便于5月18日自任陕西督军，通电全国。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6月7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7月，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自此，陈树藩投靠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为皖系军阀集团的一员干将。

1916年7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推行“军民分治”，任命老同盟会员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段祺瑞暗中授意陈树藩发动陕西人反对李根源到任，但是没有成功。李根源就任省长后，陈树藩处处与李根源作对，并派亲信监视李根源的行动。1917年5月29日，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国务总理，陈树藩当即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脱离中央。6月，陈树藩将李根源强行赶出陕西。7月，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重新组阁，陈树藩以督军兼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陈树藩把持陕西军政大权后，积极扶植个人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他把同学、老乡刘

世珑、曾继贤、张宝麟、张飞生、张丹屏等提升为旅长、团长，而民党及刀客出身的将领普遍受到压制，引起他们的严重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在陕西建立靖国军，开展以驱逐陈树藩为目标的军事斗争。

1917年11月25日，焦子静等在白水县通电宣布自立，建立陕西护法军，并发表讨伐陈树藩的檄文。12月4日，龙驹寨驻军王明敏打起护法旗帜。12月11日，陕西警备军分统领耿直趁西安城空虚，发动倒陈军事政变，首先派骑兵排长行刺陈树藩，没有成功。接着，耿直率六百人的警卫军与陈树藩三千之众激战一昼夜后，主动退出西安。21日，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告独立，就任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1918年1月25日，张义安在三原宣布独立。1月27日，曹世英、胡景翼在三原发表檄文，斥责陈树藩“实为共和之蟊贼”，随后组织陕西靖国军，曹世英、胡景翼分任陕西靖国军左、右翼总司令。

陕西靖国军蜂起，陈树藩的宝座岌岌可危。为解燃眉之急，陈树藩以陕西省长为饵，引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入陕，虽然暂时解除了靖国军对西安之包围。但是，陕西靖国军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1918年8月8日，于右任、张钫被靖国军将领曹世英、胡景翼、郭坚、卢占魁、高峻、樊钟秀等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和副司令。靖国军占领了三原、兴平、周至等广大地区，迫使陈树藩退出渭南。

1919年春，南北和会在上海召开，陕西问题成为和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南方代表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撤销陈树藩的职务，以解除陕西老百姓的痛苦，北方代表团团长也认为陈树藩“不洽舆情”[(3)]，对此也表示同情，但因为段祺瑞在幕后替他撑腰，北京政府也奈何不得。

1920年7月中旬，直皖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皖系彻底战败，段祺瑞下台，陈树藩失去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门下，改投直、奉军阀。同时，为了讨好靖国军，将1918年9月诱捕囚禁的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释放。陈树藩

为改变困境，于1921年3月率部袭击靖国军，结果遭到失败，驱陈斗争更加高涨。陕西旅京、旅沪学生纷纷集会，决心铲除陕西祸根陈树藩。4月，陕西靖国军各路将领通电北京政府，痛斥陈树藩祸陕罪行，呼吁各界“共剪凶顽”。把持北京政府的直、奉军阀也决定不再保陈树藩。5月25日，直系军阀操纵北京政府宣布免去陈树藩的督军职务，调至北京任将军府将军，同时任命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署理陕西督军。

对于北京政府的任免令，陈树藩拒不接受。曹锟、吴佩孚大怒，让阎相文带领第二十师及吴新田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入陕以武力驱逐陈树藩。当时，陈树藩认为自己手下有三个师，加上刘镇华的镇嵩军三个师以及地方军队，总兵力有十几万，足以抵挡入陕的直军。然而，他未料到，一直和他称兄道弟的省长刘镇华早已暗中投靠了曹锟、吴佩孚。当直军一进潼关，刘镇华便引导直军直逼西安，由于刘镇华部将张治公网开一面，陈树藩才得以逃出西安。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陈树藩还想指挥部队反扑，然而，驻守咸阳的刘世珑师和驻守兴平的张金印师很快战败投降，陈树藩只得率卫队骑兵连逃往汉中，投奔陕南镇守使张宝麟。

8月23日，生性优柔寡断的阎相文因为应付不了陕西的复杂局面，在做了不到三个月的署理督军便吞服鸦片烟自杀，两天后由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署理陕西督军职务。为人果断的冯玉祥随即派第十一、第七师由宝鸡、安康两路夹攻汉中，陈树藩仓皇逃往四川。最后，陈树藩撇下跟随的残部，经万县到汉口，再转上海当寓公。

此后，陈树藩凭借在陕西任上搜括来的巨额钱财，在津、沪、杭等地当寓公。抗日战争开始后，拒绝当汉奸，避走四川。抗战胜利后回杭州居住，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1949年11月2日，陈树藩在杭州病死。

(1) 两个副大统领是万炳南、钱鼎。六个大都督是：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粮饷大都督马玉贵，军令大都督刘世杰，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西路征讨右翼大都督万炳南兼，西路征讨左翼大都督张云山兼。

(2) 杜春和等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3)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页。

陈叔通

万江红

陈叔通，名敬第，字叔通，1876年8月7日（清光绪二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他的父亲陈豪，字蓝洲，号止庵，是清朝同治年代优贡出身，工诗善画，颇有文名，曾先后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和汉川的知县。陈叔通幼年启蒙于家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七岁考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翌年中进士，点了翰林，并授翰林院编修。

1904年，陈叔通由进士馆资送东渡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并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1906年夏陈叔通回国，在杭州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学堂，用以提倡妇女教育，并参与创办杭州《白话报》。

1910年，陈叔通担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在资政院，他目睹清政府的腐朽，开始逐步倾向于革命党。他曾入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后参加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其间，陈从事过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并根据日本法政大学的讲义，编写成《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后于1914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署名陈敬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同时他还担任《北京日报》经理，为共和奔走四方。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职权，尤其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使陈叔通受到很大震动。他发起成立民国公会，其政纲为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民国之进步，保证国民之权利，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等。与此同时，他还加入国民协进会。同年4月，民国公会与共和协进会及民社合并，组成统一党。1913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4月，共和、民

主、统一三党又合并组成进步党，为国民党外的第一大党。翌年，袁世凯设政事堂，陈叔通任政事处礼制官，并为《国民公报》主笔。袁世凯图谋称帝利用进步党为其服务，但陈叔通等人联络各方人士积极反袁。

1915年冬，袁世凯以高薪收买陈叔通，陈坚决拒绝，并参与讨袁活动。是年12月，梁启超居住上海，策划反袁，陈叔通担任了梁与各方人士联系的任务。梁在上海停留七十多天，陈叔通等人起着“参谋本部”的作用。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仍想保住大总统职权，并呼吁停战议和。陈叔通在上海立即指出，袁的求和是阴谋诡计，要求国人切勿轻信。为此，陈向梁启超建议：袁世凯必须退位，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起义各省尽早建立联合机关，统一军事指挥。梁启超到广西后，陈叔通又起着“后勤总部”的作用。他对“出征”在外的“党人”十分关心，多次写信给梁，谓“先生左右不可无一人，各方面均宜小心”，“北京以重金购公甚急，千万慎重”[(1)]。他对前方的战事也十分关注，时刻关心着前方的粮饷军械。他在给梁的信中提到：“松坡（蔡锷）前敌军械必不足，有何法以济之？”说“逆料前途尚有大战事，请时以此告滇黔，此时筹饷筹械仍为甚急，万不可稍懈”[(2)]。

袁世凯死后，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陈叔通非常失望。他应挚友张元济的邀请，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看到该馆的下属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互不相关，无一个统一机构，于是提议设立总务处，负责三个所的联系工作。他自荐任总务处的工作，规定三所所长定期会谈，协商制订统一执行的年度计划和规则、办法。1922年，陈叔通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不久离去。为酬其对商务的贡献，董事会于1924年赠陈6000银元。

1927年陈叔通在上海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董事，负责经理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多次派吴鼎昌等人请陈

到南京任职，他均予拒绝。在咏严子陵的诗中有“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之句，表示不愿与蒋介石等人同流合污。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击，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与张元济、项揆一等在上海积极支援抗敌，发起募捐；11月上海沦陷，他困居租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他终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日伪认为他是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企图要他出任伪上海维持会会长，陈叔通坚守民族气节，拒不事敌，四处躲藏，匿居于友人家。后来，陈秘密参与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陈叔通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他在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家中，定期举行双周聚餐会，讨论时局，传递消息。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马寅初、马叙伦、周建人、包达三、胡子婴等人，周恩来也曾到聚餐会讲话。以后，中共上海负责人张执一派李正文以大学教授名义，常来参加这个聚餐会，给大家分析、介绍形势。陈叔通在聚餐会上发言激昂，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表示拥护共产党。此时，他虽靠出卖字画补贴家用，但尽力向友人募捐，用以接济青年学生，并资送进步青年学生前往解放区。

1947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声援南京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结果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陈叔通与唐文治、张元济、叶景揆、陈汉第、李拔可、张乾若、胡藻青、钱自严、项兰生十位老人发起了营救活动。6月3日，陈叔通亲自起草了抗议书，由十人署名后分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市警备司令宣铁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是为著名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8月初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面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很多民主人士潜赴香港，陈叔通仍留在上海，但经常同香港的友人秘密通讯，与马叙伦通信更多，

研究对时局的对策。当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强令人民兑换时，他在给马叙伦的信中说，这一掠夺，只是为渊驱鱼，有利于加速解放的进程。蒋介石几次欲加害陈叔通。陈布雷以同乡关系告诉陈叔通说："今后你若再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一笑置之，反而托人捎口信答复陈布雷说："我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否则将无好下场。"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一些御用文人政客发起了所谓"千人通电"，要求停止战争，并请陈叔通签名，他严词拒绝。陈叔通作诗说："姑息终贻他日患。"

1949年1月，陈叔通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临行前对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说："你要把银行保护好，并联络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2月28日，陈叔通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乘船离港北上赴解放区。在石家庄，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和接见。从此，积极投身到建立新中国的活动中。5月11日，陈叔通作为产业界代表人在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首次预备会议。15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了话。次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被推选为二十一人的常委之一。当日晚，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被推选为筹备会副主任。不久上海解放，陈叔通被聘为上海市顾问，向上海人民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6月他又和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筹集物资，慰劳解放军。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陈叔通于23日下午代表全国工商界发了言。27日陈叔通担任大会五人执行主席之一，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四个决议案：定都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叔通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

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叔通一生喜好收藏图书字画和金石文物。解放后，他把全部珍藏都捐献给了国家，包括他多年努力收集并影印出版的《百梅集》。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岁。

主要参考资料

蔡端：《陈叔通在护国运动中》，《人民政协报》1984年6月20日。

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著《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方行：《十位爱国老人营救被捕学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郑逸梅：《陈叔通与张叔通》，《团结报》1985年4月27日。

胡子昂等：《怀念爱国老人陈叔通先生》，《人民日报》1984年8月12日。

---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778页。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7—778页。

陈树人

陈民

陈树人，原名政，又名韶，字树人，以字行。别号二山山樵、葭外渔子、得安老人等。广东番禺人，生于1884年2月9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十三日），出身于较富裕的书香门第。早年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十七岁师从广东著名国画家居廉学画。二十岁与居廉的侄孙女居若文喜结连理，与居家关系极深。陈树人酷爱大自然，提倡到大自然中去写生作画，号其画室为“美自然室”。后与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共同创立岭南画派。该派注重实景写生，吸取西画技法，强调表现时代精神，不受传统观念束缚，树立起改革国画的旗帜。

陈树人热爱绘画艺术，也关心政治时局，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深为不满，自1900年开始就支持反清斗争。1904年在香港先后出任革命党人刘师复等人创办报纸《广东日报》以及《有所谓报》、《时事画报》主笔，用文字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宣传革命主张。

1905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横滨赴越南河内，途经香港，由于港府禁令，不能登岸。陈树人和陈少白等人秘密登船拜访，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同盟会宣誓式，令陈树人等一一举手加盟。不久，他与高剑父同赴日本留学，进京都美术学校，期间，受校长冈仓觉三的影响，仿效他倡导的新日本画，在传统画的基础上，引入西洋画技法，进而形成自己的“新国画”的理论和画风。1911年毕业回国，出任广东优级师范和广东高等学堂国画教员。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树人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立教大学文科，获文学士学位。此后，曾任同盟会所办的横滨华侨学校教员，并参与编辑《国民杂志》，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6年，陈树人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驻加拿大党务负责人，负责在加拿大和美国华侨中展开宣传联络工作，为武装起义筹募经费。翌年，担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城国民党海外党报《新民国报》主编。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驻永丰舰。是时，陈树人刚回到香港，闻讯后，随即赶赴永丰舰，誓与孙中山共生死。旋即奉命返港，对叛乱真相进行宣传。孙中山脱险在上海召开商讨改组国民党会议，陈树人奉命出席，并参加九人改进案起草委员会。翌年，出任国民党党务部长，被孙中山指定为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九人之一。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时“他反对右派，并努力帮助廖仲恺工作”[(1)]。此后至1927年，陈树人在广州四任民政厅长，二次代理广东省主席并兼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他为人耿直，温文儒雅，虽身居高官，却始终保持洁身自好的文人画家风度，清廉自守；繁忙的政务，也未能转移他对绘画艺术的爱好，喜结交画家文人，常忙里偷闲，组织清游会，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由于他与高剑父兄弟早年都参加同盟会的反清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在革命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的画作，广受欢迎，他们又创办美术院校，广收弟子，多所成就，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树人与何香凝、经亨颐共同组织“寒之友社”，以岁寒三友共勉。

1928年后，陈树人参加国民党改组派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与汪精卫私交甚好。1930年出席在北平召开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是时，汪精卫联合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军事上公开与蒋介石对抗。

1931年12月，陈树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自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兼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长。至1940年，海外部长一职由吴铁城取代，自己留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长至1947年，但因本人身为广东人，又与汪精卫的关系，以及与国民党内西南派的胡汉民、陈济棠等人交往甚密，故而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1939年汪精卫投敌时，陈树人不徇私情，拒绝汪的拉拢，坚持民

族气节。抗日战争期间，陈树人一直在重庆，曾作长江三峡之游并写生作画，《夔门秋色》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他以单纯的线条，使山形轮廓多成方形，钩出山石的奇危峻伟，整幅画面清新而富有诗意。这期间，他也写了不少诗，抒发诗人的爱国情怀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当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全城死伤累累的惨状，激起诗人无比的悲愤，有“此景铭心兼刻骨，毋忘代仇告儿孙”，日寇“蘖由己人何能活，不义多行必自亡”[(2)] 的诗句。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树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1947年秋，陈树人脱离政界，返回广东，专心绘画。当年10月4日病逝于广州。

陈树人的美术作品誉满中外，他1931年创作的《岭南春色》获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优等奖。巴黎博物馆、柏林博物馆、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博物馆，也都购藏其画作。遗作有《陈树人画集》（4辑）、《陈树人近作》、《陈树人国画选集》等，以及《寒绿吟草》、《专爱集》、《战尘集》、《自然美讴歌集》等诗集。

主要参考资料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第287页。

李铸晋，万青力著：《中国现代绘画史·民国之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

---

(1) 何香凝：《陈树人先生小记》，《人民日报》1957年6月30日。

(2) 陈汉平：《抗战诗史》，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443页。

陈天华

周天度

陈天华，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人。1875年（光绪元年）生。母亲很早去世，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陈天华幼年替人放牛，或卖些零碎东西，藉资糊口，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十五岁才入蒙塾。他喜爱当时民间流行的弹词小说，这是他稍后成为通俗宣传家的重要原因之一。1896到1897年间，他随父到新化县城居住谋生，仍以做小贩维持生活。后经人帮助，得入资江书院就学，不久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求实学堂。当时正值维新运动在湖南迅速开展，新学广泛流传，陈天华“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1)]。1903年初，由所在学堂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当年4月，沙俄违约不撤走它在1900年侵入中国东北的军队，企图永远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陈天华十分悲恸，曾啮指写血书表示抗议。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随后转变为“排满革命”的军国民教育会，他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黄兴一道被举为归国革命运动员。当年冬，陈天华回国。

1904年2月，他随同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参与谋划在湖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领响应起义，并与刘揆一等从事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的活动。起义事泄失败后，复逃往日本。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会章起草员，并参与了《革命方略》的拟定工作。《民报》创刊，他任撰述员。同盟会成立和《民报》发刊后，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清政府便

要求日本政府镇压中国日学生的革命运动。是年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界群起反对，陈天华愤而于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想以他的死来激励人们的觉悟。临死前，他写了一篇“绝命辞”，勉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2)]，并留有给留日学生总会的一封信，要求他们坚持斗争。

陈天华是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青少年时代即以光复祖国为志，“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3)]，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廷的反动统治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给他以很大刺激。在留日期间，他看到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4)]。于是作书报以警世，积极从事爱国革命的宣传活动，以唤起国民共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在《猛回头》结尾的一首诗中沉痛地写道：“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同胞的期望。他的著述除散见于《民报》等报刊上的一些短文外，出版行于世的尚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最近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等书。其中《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写于1903年，通俗易懂，流行广泛，在革命宣传中发生的作用最大。在这两本小册子中，他陈述了帝国主义瓜分和灭亡中国的灾祸，指出清朝的腐朽黑暗统治及其所奉行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投降卖国方针，是造成这种危险局势的根源。他历数清朝专制政府的罪恶。并一再申述，清朝的统治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守土官长”，完全是按帝国主义旨意办事的，只有把它推翻，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遂立刻奉行。”[(5)]“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的叛逆杀

了。”[6] 因此，“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7]。爱国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两者不可分，他把这个思想说得最为透彻明白。

陈天华不仅论证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无情地鞭挞了“拱手降洋”、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指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是能够打败的。他说：“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8] 他号召全国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9]。

陈天华当时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当然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他着重从政治上去揭露清朝政府的反动卖国，指明革命的必要性，但未能摆脱种族主义的偏见。此外，他把“中等社会”作为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力量认识不足，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由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深为群众所喜爱，清朝官府曾严厉查禁，不准阅读，但他的小册子仍然在长江流域广泛流行，传诵一时。

1906年，陈天华的灵柩运回湖南，长沙学生及其他各界万余人，手执白旗，高唱哀歌，送葬于岳麓山。

---

(1) 徐佛苏：《对于陈烈士蹈海之感叹》，《新民丛报》1906年第2号。

(2) 《陈天华绝命辞》，刘晴波等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页。

(3) 宋教仁：《烈士陈星台小传》，《民报》第2期插图背页。

(4) 《陈天华绝命辞》，刘晴波等编《陈天华集》，第154页。

(5) 《警世钟》，《陈天华集》，第70页。

(6) 《猛回头》，《陈天华集》，第38页。

(7) 《警世钟》，《陈天华集》，第70页。

(8) 《警世钟》，《陈天华集》，第66—67页。

(9) 《警世钟》，《陈天华集》，第66页。

陈调元

侯鸿绪

陈调元，字雪暄，直隶（今河北）安新县人，1886年11月12日（清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七日）生。1904年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后赴武昌任陆军第三中学堂教习，1909年任保定陆军通国速成学堂地理教官。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7月，孙中山在上海宣布武力讨袁。袁世凯坐镇北京指挥北洋军分三路南下，委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所部沿津浦路狙击讨袁军；陈调元在冯军任职。9月初，冯军与张勋“辫军”攻占南京，烧杀抢掠，纵兵所欲。12月，冯继张勋任江苏都督后，南京依然兵乱不止，骚扰地方，商绅诉状督府，遂组建宪兵营，委派陈调元为宪兵营营长。从此，陈开始握有兵权。当时，有在徐州率众投降的原光复军团长张宗昌，不甘雌伏，见陈得势，遂曲意逢迎。不久，冯国璋在江苏扩军，陈向冯进言：“张宗昌虽出身绿林，但豪爽过人，具猛将之才，颇堪重用，不宜久置等闲之职。”[(1)] 经陈推荐，冯派张宗昌主招兵事，后委张任江苏新编第一旅旅长。张深感陈荐引之情，跪邀陈结拜金兰之交。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皖系首领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掌握北洋政府大权，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仍兼江苏督军，任命陈调元为北洋军第七十四混成旅旅长，驻兵徐州。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野，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控制北京政府。其时皖系和直系在长江中下游各省争夺激烈，江苏督军李纯于1920年9月任命陈调元兼

任徐海镇守使，为江苏收回了徐州。

1920年10月，直系军阀齐燮元继李纯任江苏督军。陈调元与齐曾为北洋武备学堂同学，遂攀附靠拢，而齐也想收揽人心，拥兵自重，故荐举陈为苏鲁豫皖四省“剿匪总司令”。陈受命后，以“清乡”为名，对四省农民暴动和大刀会组织进行了残酷镇压。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11月17日，陈调元拥护齐燮元领衔通电称：“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不承认冯玉祥回北京后所发命令。”[(2)] 此时，奉军乘机大举入关，张宗昌的第二军为先锋部队南下。陈调元见直系势蹶，江苏政局难支，自己孤守徐州势难招架，即派员暗通张宗昌。有人报知齐燮元，齐半信半疑，即电陈赴宁开会。陈见齐生疑，便伪称辞职：“调元承巡帅知遇，畀以重任，矢志不辞劳怨，忠于巡帅，忠于团体。奈自愧愚直，不善逢迎权贵，致遭嫉视，只有退位避职，另让贤能。”[(3)] 声泪俱下。齐半疑之心顿释，备加劝慰，促其速返徐州坐镇。

1925年春，张宗昌军抵达徐州边境，陈调元当即率部撤出徐州，退至砀山、萧县一带。5月，陈降奉军，所部扩编为第六师，陈任师长。7月，张作霖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委陈为军务帮办。但奉军高级军官对陈多有歧视，苏督杨宇霆曾下令陈的车子不准直入督署，陈“必须在门口下车”[(4)]。陈羞愧难忍，对友人哭诉：“我小名也是帮办，这种态度叫人何以忍受！”[(5)] 9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密派幕僚杨文恺赴南京，说陈反奉，“许于战胜之后优予酬报”[(6)]。陈与杨文恺一拍即合。10月初，孙传芳举兵向松江、上海进攻，奉军邢士廉师一触即溃。陈闻孙在上海得手，立即在南京动作策应。一日，陈设宴召请督署参谋长臧式毅和奉军师长丁喜春以及团营长们，正在酒酣之时，陈的部队突然冲入，不废一弹，俘获臧式毅、丁喜春及所有在场的军官。16日，陈迎孙军进入南京，孙传芳委陈调元为第八军军长，率兵过江进击奉军，相持在宿县一带。11月5日，孙传芳在南京

宣布成立浙赣闽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陈为皖军总司令。陈调元把皖系倪（嗣冲）军的五个旅逐步并为己有，军势大增，一时成为直系军阀中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进占湘、鄂，挺进江西。孙传芳急命陈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出兵赣西堵击北伐军。陈在蚌埠接任新职，于出兵前夕，将新近逮捕的共产党员杨兆成绑赴军前杀害“祭旗”。11月，驻合肥北乡的一部分地方军队举行武装起义；接着，六安、霍邱、太湖的民军暴动；防守九江的周凤岐第三师又哗变倒戈。陈调元急忙撤军，分兵镇压。与此同时，陈以“讨赤”为名，派兵镇压开展革命活动的省教育会和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封闭安庆政法专科学校，捣毁《通俗教育报》社。不久，江西的孙军全军覆没，福建亦为北伐军所占，浙江告急，孙传芳投奔张作霖，亲赴天津密商抗御北伐军事宜。12月6日，陈调元迎张宗昌率直鲁军南下，并向张表示，愿将津浦路南段收入、浦徐货捐、凤阳关税、正阳关与芜湖港盐厘、两淮盐款等悉交鲁军筹饷。同日，安庆数万人聚会，声讨“孙传芳擅委皖军总司令、省长，实行征服政策，宰割安徽，蹂躏皖人”，并决议“电告陈调元、王普（省长），请勿轻率从事”[(7)]。陈调元通令缉拿大会组织者王亚樵等，镇压“闹事”者，把大批进步工人、学生投进监狱。21日，孙传芳、陈调元与张宗昌在南京会商，决定以陈调元部在皖境沿江防御国民革命军东下，直鲁军由皖进攻九江，孙传芳以全力对浙[(8)]。议毕，陈返安庆布置。

此时，北伐军分路进击，迫近皖南地区，孙传芳频频电令陈调元急速出兵皖南。陈看到北伐军势不可挡，孙军已是强弩之末，奉鲁军不可信赖，乃暗派师长范熙绩去武汉向北伐军输诚。孙见陈不听号令，疑其有变，派人送去20万元，以为笼络，并召陈赴南京议事。陈到达南京后，孙一面笑脸款待，一面电令驻大通的第十一旅旅长孙东云接替陈职。陈调元早有戒备，知情后立即潜赴下关，乘兵舰直驶安庆。1927年3月5日，陈调元乘舰行至芜湖，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

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9]。3月9日，陈乘舰至安庆，但所部第一混成旅哗变，陈闻讯不敢登岸，即赴九江与蒋介石会商军事。蒋派王天培率第十军协助陈攻入安庆。不久，陈统兵三个师由芜湖渡江袭击津浦路鲁军侧面。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政变，随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陈调元奉行蒋介石“清党”反共的命令，在安庆等地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安徽。

8月，孙传芳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分裂的混乱局面，分兵三路渡江，在栖霞、龙潭一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陈调元伏兵乌衣，狙击孙军。11月，陈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1928年4月，蒋介石会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兵力，向以张作霖为首的旧军阀发动总攻击，陈调元任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担任津浦路正面攻击。陈部先是扼守青山关、莱芜口，击溃鲁军杜凤举部后，乘胜追击，沿吴桥、南皮、沧州一线前进。蒋介石到北京后，即宣布要实行“裁军建设”，召开编遣会议，以削弱其他派系的军队，扩充自己的实力，与冯玉祥等人出现新的矛盾。陈调元唯蒋之马首是瞻，欣然奉命把所部缩编成第四十六师，驻兵安徽，渐得蒋之信任。

1929年4月，日本在济南一线的驻军定期撤回，冯军孙良诚部前往接防。蒋介石唯恐冯军占有青岛海口，与己不利，抢先宣布陈调元为接收青岛之中央特派员，同时“密电日军，暂缓撤退”[10]。5月，蒋任命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10月，冯玉祥誓师讨蒋，兵分八路南下。蒋介石调兵遣将抗拒冯军，委陈调元为“总预备队军团总指挥”。翌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一线，共誓讨蒋，中原大战揭开战幕。初战，冯军连克数城，攻势猛烈。蒋介石在柳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退却，陈调元却在会上力主反攻，并自告奋勇，愿从右翼攻冯，以分陇海线晋军兵力。蒋立即任命陈为右翼军总指挥，参与鲁西考城战役，击退石友三部；接着，孙殿英军溃退，梁冠英、张印湘等通电附和，蒋军颓势得以扭转。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率兵进关，战局急

转直下。11月，蒋再次任命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

蒋介石在战胜冯、阎之后，即向工农红军接连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陈调元竭力奉行蒋的“剿共”部署，不断派兵进攻鄂豫皖红军根据地。1930年12月，陈派兵从六安、苏家埠、霍山三路出击，对红军根据地发动“围剿”。1931年2月，陈再次调集军队，进攻苏区，直扑金家寨（即今金寨县），“枪杀群众一万七千多人”[(11)]，然后占领麻埠、独山、诸佛庵。与此同时，陈加强在安徽全境的反动统治。同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代理书记王步文等13名共产党人被捕，陈下令组织特别法庭，亲自审讯，先以高官厚禄劝降，继而施加电刑、火烙等种种酷刑，最后下令将王步文等在安庆杀害。

陈调元在安徽为弥补军费之不足，强行勒征米盐捐税，公开贩卖鸦片，遭到安徽人民的反对。1931年春，安徽各界民众组织请愿团，赴南京向当局控诉，列举陈在安徽强征米盐捐、勒民种烟公开买卖的事实，呼吁：“请免陈职，以苏民困。”[(12)] 5月31日，陈被迫电蒋“请求辞职”，承认自己“政治无办法”[(13)]。6月，蒋任刘镇华为安徽省主席，以平息安徽民愤；另委陈以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衔。1934年1月，蒋在第五次“围剿”工农红军时，任命陈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预备军总司令。同年12月，陈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陈调元到南京后，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36年秋，随蒋去西安视察。西安事变时，陈调元与陈诚等同被拘禁。此后，陈调元长期患病，抗战时随政府内迁，辗转至武汉、重庆，未再担任实职。1943年12月18日，病死在重庆北碚寓中。

---

(1) 谭昆山：《陈调元反动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

(2) 《辛亥革命以来大事录》“1924年11月17日”，载《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编：《中国百科年鉴，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版。

(3) 谭昆山：《陈调元反动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

(4) 刘翼飞：《杨宇霆督苏被逐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8页。

(5) 刘翼飞：《杨宇霆督苏被逐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118页。

(6)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105页。

(7) 邹义开编《安徽大事记资料》上册，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印行，第208页。

(8) 《申报》1926年12月23、25日。

(9)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4页。

(10) 宋哲元：《西北军志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辑。

(11) 《1931年5月23日沈泽民给中央的报告》，存安徽省档案馆第34卷。

(12)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第669卷，5471页。

(13) 谭昆山：《陈调元反动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

陈万运

张志

陈万运，浙江慈溪人，1885年9月15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七），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幼时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十五岁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陈为人稳健、机智，善于辞令。在学徒期间，工作勤奋，对珠算和心算都有过人本领。

清朝末年，大批洋货倾销我国市场，其中洋烛也是重要商品之一。以后英美商人在我国设厂制造，我国各地对洋烛逐渐采用，销路日广。棉线烛芯，一名洋烛芯，系制造洋烛的主要原料之一，英美制造商须从海外购进。当时日商中桐洋行经营烛芯，供不应求，营业颇佳。陈万运和沈九成、沈启涌[(1)]三人，认为制造洋烛芯不失为一条生财之道，而且是中国手工业可以做到的。于是他们各出资本150元，于1912年4月在上海士庆路，开办一所烛芯手工作坊。小屋一椽，艰苦创业，不断改进，遂使“金星牌”国产烛芯问世。不久这种国产烛芯逐渐在市场上能与舶来品相抗衡。因为是三人合伙经营，当时的“实业救国”论正很时髦，所以就取名为“三友实业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绵延，英商洋行进口烛芯中断，亚细亚火油公司及美孚洋行等所属在华洋烛制造厂向日商进货，日商居奇抬价。当时“三友”社所产国货烛芯质地较好，售价仅及日货之半，且在国内市场已有相当声誉，英美洋行所属工厂转向该社大笔定货，并透支资金，俾能扩大生产。虽然三友实业社生产的烛芯，仍是供洋商在华工厂，然而这对日货烛芯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陈万运在此期间努力经营，营业兴旺。三友实业社于1915年3月增资至8400元，改组为无限公司；同年12月再增资至3万元，并改组

为股份有限公司。1917年该社在引翔港（今属上海市杨浦区）购地三十多亩，建造规模较大的工厂，增添机器。除生产烛芯外，并生产毛巾、被单等其他棉织品，进一步与日货“铁锚牌”毛巾在市场上开展竞争。该社所产“三角牌”毛巾，终以产品精良，质胜舶来，遍销中外，盛名历久不衰，而日货“铁锚牌”毛巾在我国市场上卒告绝迹。“三友”的产品有力地冲击了日货的销路，招致日本侵略者对它的仇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该社引翔港工厂首当其冲，惨遭焚掠，不是无因的。

陈万运在“三友”担任经理，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民族轻工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但该社生产烛芯原料，一度采用日货棉纱；该社所需一部分高级棉纱，如32支纱和42支线，因当时国产稀少，也一度仍采用日货，暴露了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对外依赖性的一面。

陈万运为了办好企业，经常住在厂内，和工人同桌吃饭，常去车间与工人、技师研究生产业务，有时工作到深夜。几十年来，他为办好企业摸索了一整套经验，如发行所门市部的安排，新设备的添置，经营方法的更新，会计制度的改革，新产品的试制，广告宣传的利用，工厂管理的加强，得力店员的培养等。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陈万运经营管理得法，使企业得到很大发展。从1912年到1931年的20年间，该社资本额从450元激增到200万元，即增加4400多倍，发行所遍设全国各大中城市。自1920年起，陆续增制各种日用棉织品。如全幅被单、透凉罗蚊帐及不褪色布匹等，皆为该社首创产品。有的产品还畅销南洋市场。

“三友”招收职工注意吸收知识青年。在设厂之初，“三友”曾向杭州中学一次选取毕业生十余人，其中有后来成为陈得力助手的李道发。李在1924年研制回纹浴毯织造成功，使毛巾业获得重大进步，对国产毛巾的革新作出了贡献[(2)]。青年进厂后，陈安排他们业余学习语文、数学、技术课程，并提倡正当娱乐，提倡书法。因此早期的三

友实业社给上海毛巾业造就了不少人才，如该社继任经理王家珍，太平洋织造厂李道发、赵才生，民光织造厂项立民，大赉被单厂吴骏声，源康祥毛巾厂黄葆康，萃众毛巾厂范家骏、阮树敏，大生被单厂高成源等，都是上海毛巾被单业掌握技术的佼佼者。陈还多次招收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充实三友实业社，使他们担任管理职务。

“三友”在发展过程中，曾向安徽及江苏泰兴农村雇佣了大量女工和童工，发给的工薪很低。在引翔港厂内，来自农村的童工最多时达五百多人，约占全厂工人半数。当时摇纱女工每日工资4角5分，而童工只有2角左右。“三友”在雇佣童工一项上，每年多获利四五万银元。

“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引翔港厂被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焚掠，“三友”把生产集中于杭州“三友”纺织印染厂，陈万运带同李道发去杭主持。原杭厂因管理不善，一度质量下降，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经陈等整顿、改进后，新产品不断出厂，名闻全国的“西湖”毛巾、“2323”永不褪色细布及彩色印花被单等相继问世，产销两旺，从而使杭厂经营获得好转。

陈万运在经营“三友”期间，与五洲药房、家庭工业社、中华珐琅厂等共同发起组织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并参与主持《机联会刊》的发行工作，对宣传提倡与推销国货作过一定贡献。

“七七”事变后，杭州沦陷，“三友”杭厂亦被日军强占管理，其后日方一再逼迫该社“合作”，均为陈所拒绝。陈万运一度避居杨梅岭，后潜行返沪，深居简出。他情愿放弃杭厂，也不与敌人合作。

在沪宁沦陷后，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之际，“三友”因生产停顿，存货渐少，难以维持职工生活。陈等决定制销中药，权且过渡。所制成药主要有三友补丸、马宝、救苦丸、方便丸等；以后并代销他厂部分棉织品[(3)]，惨淡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趁机占领上

海公共租界，实行经济统制，进行残酷掠夺，“三友”更趋困境，终以生产停滞，入不敷出，资金几乎耗尽。1943年底，“三友”杭州染织厂因无力经营，出盘给国华投资公司和新亚建业公司。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友”企业恢复，陈辞去经理职务，改由王云甫及王家珍分任正副经理，但因资金不足，周转困难，已无恢复当年魄力。“三友”虽称恢复旧业，实徒具虚名而已。这反映了在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遭遇。

陈万运一生自奉俭朴，经常短褐布衣，五十岁以后茹素，不饮酒，不出入游逸场所。1950年10月17日在沪去世。身后无长物，棺椁墓葬都由“三友”实业社为之安排。

---

(1) 陈万运和沈启涌是烟纸店伙友，沈九成原是上海市高裕兴蜡烛店学徒。见朱梦华：《记三友实业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2页。

(2) 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编：《上海市百货工业产销概况》，1950年10月版，第22页。

(3) 据李道发回忆，“三友”当时代销太平洋织造厂及民光织造厂部分棉织品。

陈望道

邓明以

陈望道，原名参一、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18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腊月初九）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父亲主要务农，同时兼营靛青的制作和买卖。他六岁入私塾，攻读儒书，并在课余帮助耕种，直到十六岁。

1906年，陈望道入县立绣湖书院学习博物与算术。其时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深感忧虑与愤懑。以后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在1907年回到故乡分水塘，随同乡间先进青年一起兴办村学。次年，他考入金华府中学堂，专攻理科。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后来，他认为“要实现救国的理想，必须借助欧美的科学”[(1)]。为此，于1913年先后在上海某补习学校及杭州之江大学学习英语。1915年初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继而进东京物理夜校，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

留日期间，陈望道非常关心国内政治。激于爱国热忱，与留日同学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的斗争。课余，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和钻研，接触了新思潮，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在留日学生中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时，他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和他们一起开展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回国，受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聘请，任语文教员。这时“五四”的浪潮已冲击到了浙江，他立即投

身于新文化运动，和其他进步师生一起，对封建文化和旧的习惯势力，进行勇猛的冲击。他们还积极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改革国文教授，却遭到了顽固势力的反对。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进步教员被目为“四大金刚”。不久，第一师范的一个学生施存统在他的指导下，发表了《非孝》一文，从而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省教育厅以所谓“非孝、废孔”的罪名，并以“公妻、共产”等骇人听闻的诽谤，强加在该校进步师生的头上，下令将“四大金刚”撤职查办。这一反动措施遭到校长经亨颐等人的抵制和抗拒，浙江省当局竟悍然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制造了流血事件，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由于得到全国声援，最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撤职查办的成命”，但陈望道等也不得不因此离开学校。

陈望道经历了“浙江一师”这场风潮，受到一次深刻的锻炼和教育，“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3)]。于是，他就在这一年年底回到故乡分水塘，潜心研究新思潮，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1920年4月，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的邀请到上海担任编辑。旋该刊因故停办，又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年的5月至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此之前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陈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同年11月，他又参与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随即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首先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中文全译本。8月15日创刊《劳动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11月7日，创刊党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通过该刊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共产党知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期间，陈望道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

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劳动运动通论》等文章，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0年12月，陈独秀赴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望道和李汉俊负责。陈独秀离沪时，把《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新青年》自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改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其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方向，遭到胡适等的反对。陈望道在李大钊和鲁迅的支持下，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期间，陈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在共产主义小组内出任劳工部长一职。先后协助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纺织、邮电工会。1920年5月1日，他参加了在澄衷公学举行的上海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后又连续数年参加“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他还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参与开办职工补习夜校和平民女学。

为了扩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阵地，陈望道取得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支持，后来他担任了《觉悟》的编辑，在该刊上增加了介绍苏俄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此外，他还主办《民国日报》另一副刊《妇女评论》，鼓吹妇女解放，提倡叛逆精神，指出妇女解放必须走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陈独秀与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并牵涉到陈望道。对此，陈望道十分气愤，他坚持要求陈独秀予以澄清并公开道歉。陈独秀不允，陈望道就请求脱离组织，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代表会议。当时他以为不参加组织同样也可以革命。

1921年11月间党的“一大”召开后，上海、广东等地相继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

1923年至1927年，陈望道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被英国租界当局武装占领，学校被迫转

移。邓中夏去广东领导工人运动，陈接任了上海大学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领导全校师生继续投入反帝斗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上海大学被查封。在革命斗争激烈的时刻，上海大学能够屡仆屡起，陈望道是作出一定贡献的。

陈望道还积极从事高等文化教育工作，他从1920年9月起就在复旦大学任教。1927年上海大学停办后，他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29至1930年，他在中共的领导下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在他任职期间，“左联”在此召开了成立大会。

由于陈望道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在关于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许多进步见解。他是我国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1923年，他发表了《作文法讲义》，系统地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都很有研究，著有《美学概论》、《因明学》等书。他还努力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学说和新兴的文艺理论，作为宣传新道德、发展新文学的借鉴，译有《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社会意识学大纲》、《苏俄文学理论》等重要著作。

他在192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和友人汪馥泉等创办“大江书铺”出版进步书刊，成为当时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据点。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大江书铺出版了陈望道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发行了《大江月刊》和《文艺研究》季刊。

1931年，陈望道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时积极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密令加以暗害，他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因得避地专心从事《修辞学发凡》的著作。该书于1932年由大江书铺正式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汉语文的修辞学专著。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人民成立各界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2月3日，陈望道与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2月8日，上海“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成立，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这是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1933年7月，陈望道应聘赴安徽大学讲授“文艺理论”课，半年后又因当地特务控制森严难以继续任教而离职。于1934年2月回到上海，担任左联《文学》杂志的编委工作。

陈望道与乐嗣炳、胡愈之、陈子展、叶绍钧、曹聚仁等12人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他写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文学和大众语》、《建立大众语文学》等多篇文章，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1934年9月他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太白》与林语堂等为迎合保守势力而鼓吹的所谓“化沉痛为悠闲”的幽默小品及提倡半文不白语录体而创办的《论语》、《人间世》等相抗衡，把小品文作为武器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太白》半月刊办得很有生气，首倡在刊物上用民间的“手头字”，首创“科学小品”，开辟“掂斤簸两”的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鲁迅曾赞扬这个刊物说：“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4)] 《太白》仅战斗了一个年头，就被迫停刊了。

《太白》终刊后，陈望道在1935年8月来到桂林良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并担任该校中文科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抗战初期，他留在上海，推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组

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等组织。他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39年11月，敌伪势力已侵入租界，他不顾敌人的威胁，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举办“中国语文展览会”，不仅是对青年宣传文字改革，实际也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期间他还编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实为中国文法革新研究方法讨论的集结。

1940年秋，陈望道为避免汪伪汉奸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战后方，回到当时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3年起任新闻系主任，前后长达八年之久，他为了进一步“充实新闻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亲自在重庆募捐筹建了一座“新闻馆”。馆内设有编辑室、印刷室、图书资料室、会议室以及收音广播室共十余间。“新闻馆”的建立是新闻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为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新闻馆”落成于1944年，4月5日开馆时于右任特地发来“新闻自由万岁”的演讲词。《新华日报》为复旦新闻馆开幕专发了“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这时，他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给进步学生以支持和帮助，营救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学生。为此国民党学校当局不断对他施加压力，校长扬言要把他赶走。

抗战胜利后，他随复旦大学复员回上海。在当时学校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十分激烈的斗争中，他继续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开展活动。1947年，他首批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1948年他被推选为上海国立大学赴南京请愿代表团的成员。上海解放前夕，“大教联”理事会改选，他出任理事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望道历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文化部部长，复旦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

员会高教局局长等职。他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他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57年6月，陈望道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还担负着许多学术职务，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等职，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工作。后来，他在复旦大学筹建了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室的工作，以促进语言科学研究的开展。1960年，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197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两个单印本。1976年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1980年第1辑。

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同上。

陈望道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时的小结。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党史资料》

1980年第1辑。

---

(1) 陈望道自述。

(2) 陈望道自述。

(3) 陈望道：《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文艺月报》1959年5月号。

(4) 鲁迅：《致吴渤》（1935年2月14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陈仪

严如平

陈仪，字公侠、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1883年5月3日（清光绪九年三月廿七日）生。父陈炳镛，商人。陈仪幼年好学，随叔父陈荪阶在杭州，勤读经史典籍。稍长，在绍兴怡丰钱庄学徒，三年后再去杭州，入浙江求是书院读书。他目睹清廷窳败，国势日衰，思以学军报效国家。1902年获官费留学东渡，先入成城学校，随即转入陆军测量学校学习，190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炮科，后又转为炮兵射击学校第四期生。他在日本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加入光复会，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等人结识。经过五年的留学生涯，陈于1907年学成回国，在清政府陆军部任二等科员。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浙江于11月光复，1912年1月蒋尊簋继汤寿潜为中华民国浙江都督，陈仪应蒋之邀南下，出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主持后勤事宜，处世谨慎，工作负责。1914年陈应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翌年袁世凯筹谋称帝，参政院参政蔡锷潜离北京经天津去云南举义护国，袁派陈出京追蔡。陈至天津小作逗留，以“追不到”回京了事。不久陈辞职归里。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不同派系纷争迭起，陈仪大失所望，于翌年携带眷属再去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计三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政局更呈纷乱，陈一时无所适从，乃定居上海，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任经理，并接办丝绸商业银行和钱庄。

1924年9月，孙传芳在江浙战争中率军自闽入浙，陈仪被推为地方代表劝孙息兵，以免战火祸民。孙敬慕陈留日学军多年，学识高深，乃请陈出任浙江第一师师长，率部驻宁波，不久移驻杭州。陈着

力训练队伍，整肃风纪，提高素质，增强战斗力。在翌年11月固镇和宿县的战役中，陈率浙一师打垮了张宗昌部鲁军，被孙传芳任命为徐州总司令。1926年10月，孙传芳镇压了浙江省省长夏超的独立，任命陈仪为浙江省省长。陈期盼桑梓能免于战祸，谋求浙江自治甚力。其时北伐军已次第光复了湘、鄂、赣、闽，正向皖、浙推进，陈仪派员先至奉新向蒋介石输诚，后于12月17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孙传芳获悉后，迅即解除了陈仪的军权，将其扣押至南京软禁。后得孙传芳的高级军事参谋蒋方震等人营救，陈始获释潜至上海。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江北宣慰使，以收拾孙传芳军残部，陈未赴任。

蒋介石在南京掌握军政大权后，陈仪于1928年3月被任命为考察委员长，率代表团赴德国考察军事，并洽购军械；兼至奥、法、意、荷等国考察政治、军事，11月回国。1929年4月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1年1月起任军政部政务次长。

福建事变后的1934年1月，陈仪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10月兼全省保安司令，1939年3月并兼驻闽的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他主闽近八载，竭力革除官场积弊，建立新的人事制度，规定县、区公务人员和警察都需经过训练的人员充任，提出一套格言："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闲空是堕落，懒惰是罪恶。"[(1)] 他逐渐增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推行粮食"公沽"政策，田赋征实，规定粮食公卖，禁止自由流通，城市居民食粮计口供应，以期保证军民对粮食的基本需要；在抗战时期进一步实行"统制经济"，从生产、销售到运输，全部由省"统制"，增加财政收入。他努力兴办教育，新建了医、法、农、师范、音乐等高等院校，还在全省推行国语运动。他虽然勤于政事，清正廉洁，洁身自好，但不能遏止许多官吏的贪污腐化。有些官员在执行"公沽"政策和"统制经济"等政策时，横征暴敛，欺压民众；米商则乘机囤积居奇，百姓叫苦不迭。1940年，旅居南洋的侨领陈嘉庚在福建考察访问时，对陈仪的许多政策措施严加抨

击，一些乡绅也乘机向重庆控告。中统、军统等派系首领亦因其部属在福建受到遏制而对陈仪物议不迭。惟蒋介石赏识陈仪之勤政与廉正，于1941年11月，将陈仪调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并兼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后因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龃龉不断，于1942年底改任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兼中央训练团教育长。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通过《开罗宣言》，确定战后台湾归还中国。国民政府于翌年4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被任命为主任委员，主持关于接收台湾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他在中央训练团设置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从各机关在职人员中选调120人培训4个月，期满仍回原机关工作，听候召唤。他对未来的接收工作多有规划，主张应有特殊的行政体制，以应付台湾这个被日本侵占实行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行政省的特殊环境，实行“行政长官制”，并向蒋介石建议：一、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二、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三、无需在台湾驻扎重兵[(2)]。得到蒋的核准。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宣言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应予执行。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9日国民政府特派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部司令，接管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台湾，并负责台湾日军受降事宜。

陈仪接受任命后，于10月24日飞抵台北。他在机场向中外人士发表讲话说，自己来台湾，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对台湾的建设抱有信心，决心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一切弊政；要求台湾同胞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台湾[(3)]。次日，他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庄严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4)]

陈仪主政台湾，一时集行政、军政、司法大权于一身，而且有权

办理中央行政[5]。他主张台湾实行自治，草拟了《三年自治计划》，准备较快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在接收了占全省90%的工商企业、70%的土地后，在固有的金融独占体系和专卖制度基础上，他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省外贸易由贸易局进行，特产品及烟、酒等由政府专卖，并大量开设国营公司，推行国有化。他重视文化教育，竭力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力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奴化意识，大力推广国语，并计划增设农、商、法、师范等专科学院。他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公务，期求把台湾建成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但是他独居高位，刚愎自用，对台湾的社情、民情之复杂性认识不足，尤其是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难如人意，不能体察民间的舆论与疾苦；随同他来台的部属，大都是闽地官吏，许多人以胜利者、大恩人自居，盛气凌人，贪婪腐败，作威作福，欺压民众。还由于蒋介石在大陆发动了全面内战，军需开支巨大，台湾的粮食蔗糖等大枇运往大陆，本岛物价飞涨。所有这些，均使台湾本省人民大失所望，由欢欣而不满而愤怒。

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湾省专卖局的武装缉私人员在台北延平路殴打一女烟贩，激起围观市民的公愤，在争执中一市民被开枪打死；翌日数千人至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要求撤销专卖局，惩办凶手，结果因守卫军警开枪，引发全市暴动，蓄积的愤怒顿即迸发，并迅即波及全省各市镇，广大民众纷纷起义，反抗国民党暴政。陈仪对这一突发事件手足无措，广播讲话中强调和平解决，并表示迅速改革行政制度。随着各地动乱的迅猛发展，民众包围政府殴打公务人员，直指国民党统治，陈仪担心有“其他政治背景”[6]，于3月2日致电蒋介石“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7]。蒋介石立即复电“照准”，下令驻扎在江苏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二十一师，“全部开台平乱”[8]；并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权宜处理”。整编二十一师由美国军舰和飞机运送至基隆、高雄，立即分赴各地血腥镇压民众。他们“展开了广泛的毫无区别的屠杀行动”，“任何被认为想躲避或逃跑的人，都被射倒；任何地方士兵只要看到有可以要的东西，就开始掠夺”[9]。血腥镇压持续了一个

多月，“无辜民众横被枪杀，将尸首抛入海中或抛弃田野”[10]，为数甚众。国民党以屠杀维护了对台湾的统治，身为台湾的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难辞其咎。

台湾“二二八”事件后，陈仪被解除台湾行政长官等本兼各职，至南京被聘为国民政府顾问，其后回到上海。时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频频失利，全国人民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此起彼伏。陈仪赋闲在家，深居简出，广泛阅览书籍报刊，密切关注时局。在反省自己主政台湾失败的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也有若干思考。

1948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此时年已六十有五，又经台湾风波，先被蒋介石召去南京受命之时，即以体力衰弱、不胜繁剧相辞，建议起用壮年人士；但蒋以浙江情况复杂，形势日紧，需要老成等词相勉。陈仪谋划与汤恩伯联手掌控军队，避免战祸，加惠家乡父老，乃承允任之，走马上任之时，即对人明言：“既有倦鸟归林之感，又想在有生之年为桑梓办一些好事。”[11] 他草拟了《浙江建设十年计划》，提出了兴建铁路、开发矿产、实行“二五减租”、开垦三门海涂、发展渔业整顿渔市、开办农民学校等多项改革措施。他毅然释放了被特务机关非法逮捕的十位爱国民主人士，否决了“枪决”百余名政治犯的呈签，训示各县长和警保人员要尊重爱护教师和青年学生，不得任意扣人捕人；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等爱国活动给予支持。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事必躬亲。

陈仪重主浙政只半年余，国民党统治已濒临崩溃之势。三大战役的结果，人民解放军已饮马长江。蒋介石眼看京沪杭等地均已危在旦夕，特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在长江下游地区部署庞大兵力以图抵抗。陈仪默察时局趋势和人心向背，担心富庶的江南毁于战火，并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朱蕴山、陈铭枢等人及中共方面的推动下，决定策动汤恩伯起义。汤早年受过陈之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和提携，曾跪拜称陈为“恩师”，誓言“生死与共”[12]。陈于1949年1月28日派外甥丁名楠携其亲笔信赴上海面见汤恩伯，向汤提出五项条

件："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二、保护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乙：一、约定X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X月内改编原有部队，改编所属部队；三、取消XXX（按指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并提出"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13]。汤假意表示不日赴杭面谈，却把陈仪的亲笔信向蒋介石告密。时已下野在奉化的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杭州试探虚实，陈仪坦诚地对蒋说："你父亲最好暂时到南美去休养，等形势的变化；如果将来对他作出适当的安排，再请他回来。"[14] 已经撤移到广州的国民政府遂遵照蒋介石的密令，于2月17日改组浙江省政府，免去陈职。23日，陈在上海寓所被捕。他慨然对家人说："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15]

陈仪被捕后，被押往衢州拘禁，阅读进步书刊不辍。写信给他的女儿说："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我现在仍觉得时间不够，因为要补充我的不足，需要读的书很多，总是读不了。"[16] 4月28日被解送至台北，后转移至基隆。1950年6月9日，蒋介石在台湾组织特别法庭加以审讯，定罪名为"勾结共产，阴谋叛乱"。6月18日，陈仪自谓"人死，精神不死"，慷慨就义。

---

(1) 高垲：《陈仪与福建省人事制度》，《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 葛敬恩：《接收台湾纪略》，《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13页。

(3) 杨鹏：《台湾受降与"二二八"事件》，《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90页。

(4) 《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6日。

(5) 国民政府1945年9月21日公布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第三条规定：湾省行台政长官公署受中央之托，得办理中央行政。台湾省行

政长官对于在台湾之中央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国民政府公报》第862期，台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

(6)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00页。

(7) 《陈仪致蒋介石电》（1947年3月2日），见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蒋介石致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电》（1947年3月2日），见何聘儒：《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9) 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出的《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1947年4月18日），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44页。

(10) 台湾旅京沪七团体给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呈文（1947年4月1日），国民政府监察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按："二二八事件"中死亡人数，诸说不一，数百、数千、数万之说皆有。

(11) 陈文瑛：《和父亲最后相处的日子》，《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70页。1948年7月初，陈仪接见《东南日报》记者时也说过这样的话。

(12) [美]包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册第9页。

(13) 丁名楠：《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59页。

(14) 杜伟：《浙江解放前夜的陈仪》，《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57页。

(15) 郑文蔚：《陈仪之死》，《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84页。

(16) 陈仪致陈文瑛信（1949年3月15日），陈文瑛藏，第185页。

陈宦

马宣伟

陈宦，名宽培，字养钿，号二庵，湖北省安陆县人，1870年3月（清同治九年二月）生。陈自幼聪明好学，勤奋机智，中清拔贡并考取中书。但他恃才好事，行为不检，引起乡人的厌弃，不能在家乡立足，乃离家到武汉另谋出路。

1897年，陈宦考入湖北省武备学堂，毕业后分发北京任武卫前军管带。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陈宦游说各方，乘机率领部队与清军右翼翼长姜桂题取得联系，奉命“拱卫京师”，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调陈宦任帮统入川训练新军。1906年，陈宦练成常备军六个营、工程兵一个营后，出任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领兼四川武备学堂会办。次年3月，锡良调任云贵总督，陈宦随同调任云南新军协统兼云南讲武堂堂长。1909年2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陈宦任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次年初任东北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官，驻防奉天。他与吴禄贞、蓝天蔚同领兵关外，有“湖北三杰”之称。同年4月12日，清廷谕“陆军员外郎陈宦，着以四品京堂候补，仍回奉天充当统制差使”[(1)]。1911年他奉命赴德国考察军事，回国后因锡良已病辞东三省总督，由赵尔巽接任，他遂退而蛰居北京。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大总统，陈宦经锡良推荐，任总统府参议官。其时袁世凯派陶云鹤去解散驻烟台的蓝天蔚部队，耗费十万元无结果，乃改派陈宦前往。陈宦与蓝天蔚商定：不许假手各级长官，直接召集士兵谈话。后仅由烟台商会拨三万元，便将蓝部资遣完毕。袁世凯赞叹地对左右说：“北洋军中竟无此人才！”[(2)] 自此陈宦受到袁世凯的重视。当时参谋总长一职由副总统黎元洪遥领，黎欲推荐一位次长代理部务，先后保荐哈汉章、万廷献、刘一清皆未获袁准许，直

至黎会意保荐陈宦，袁世凯立即任命，这使鄂籍军人甚妒之。不几天，黎元洪忽又电保哈汉章任次长，袁世凯将黎之电报给陈宦看。陈不知所措地说："我下去就准备交代！"袁世凯笑道："为什么要交代？民国初创，不许无故更动大员！"[3] 陈宦代黎元洪执行总长权，成为袁世凯心腹军事幕僚长，被授陆军中将衔。他利用历官川、滇等省的关系，拉拢云南都督蔡锷、广东都督龙济光、四川都督胡景伊等，因而更受袁世凯的器重。1914年5月，袁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陈宦以参谋部代理总长的身份任办事员，负责西南组，凡是云、贵、川等省的有关军事问题，都由陈负责研究并提出意见，供袁选择。他为袁世凯谋划甚多，颇得赏识。1915年初，袁世凯欲称帝，为取得西南的赞同，决定派陈入川，2月正式任命陈宦为毅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并拨三个旅随陈入川。袁面谕说："二庵，西南半壁山河从今天起，我算托付给你了！"袁还让长子袁克定与陈宦拜为把兄弟，并给陈200万元[4]。5月21日，陈宦抵重庆才两天，袁世凯任命陈兼四川巡按使。6月22日，袁世凯又下令：特任陈宦署四川巡按使、成武将军兼行督理四川军务。至此，陈宦迅速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

陈宦上任后，竭力排除异己，首先将四川财政厅长、代理巡按使刘莹泽拘押起来；继又下令逮捕了国民党人董修武、唐宗尧，共和党人黄云鸿、印焕门，进步党人彭兰村及林冰骨、邓孝可等。他对督署、川军的长官进行部分撤换，从而迅速控制了四川的军政大权。陈宦还宣布治川方针：一、整顿吏治；二、恢复交通；三、清乡剿匪；四、收回滥发的军用票。

1915年冬，陈宦在全川实行"大清乡"，名为剿匪，实际上是对二次革命失败后潜伏在川的革命队伍进行清剿。他将川军分发到川东、川南；将北洋军派到川北和下川东水路一线。他部署川军打头阵，北洋军当监军，借以分化、削弱川军。他为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效力，在四川成立筹安分会，并自兼四川国民会议选举监督。在11月16日全

省146名代表投票决定国体之日，他派出大批军警进行警戒，并亲自到场监视，强迫代表们投票“一致赞成帝制”。31日，他上袁世凯劝进电，并发出拥袁称帝的通告，还宣布成都戒严令。袁世凯当上皇帝后，他于1916年1月12日发出拥袁称帝电，袁世凯特封他为一等侯。与此同时，陈宦又审时度势，暗中与蔡锷有密使密信往来。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声讨袁世凯，随即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1916年1月，护国军攻克叙府，蔡锷连电陈宦，力劝采取一致行动反袁。陈宦派督军署顾问刘一清、副官长邓汉祥、旅长雷飙等暗中与蔡锷通气，“以血诚约滇军，不相侵犯”[(5)]，还汇去60万元，以助护国军之军饷；同时，又派督军署参谋长张联棻与驻重庆的长江上游总司令曹锟联络，左右逢源，以求自保。

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还竭力想要保留大总统宝座，多次通过陈宦致电蔡锷，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均遭到蔡锷严词拒绝。3月底，陈宦一面与蔡锷签订局部停战协议，一面静观事态的发展。4月16日，冯国璋发出劝袁世凯退位的铣电，四川省议会70名议员5月1日联名上书陈宦促其表态。陈宦身边的刘一清、邓汉祥等人都主张独立；随陈入川的冯玉祥率全旅表示不愿作战。同时，号称“十八路诸侯”的温江、郫县、崇庆、灌县等地的民军已向成都附近发起攻势。在这种情势下，陈宦于5月3日、12日连电劝袁世凯退位；5月22日发出宣布四川独立电，改称都督，成为宣布独立的第六个省。

袁世凯视陈宦为心腹，当接到四川独立的通电后，大为意外。5月24日，袁世凯下令陈宦开缺入京筹商善后，同时特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益武将军署理四川军务，周骏立即率部向成都进攻。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忧愤中死去，7日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8日陈宦电黎元洪表示拥护，并通电取消四川独立。24日，北京政府宣布蔡锷督理四川军务兼署民政长，命陈宦、周骏来京另候任用。陈宦26日退出成都，经重庆到达武汉。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陈宦为湖南督

军兼署省长。由于湖南人民强烈反对，陈宦不敢入湘，躲进汉口租界，嗣后回到北京被黎元洪授予将军府将军闲职。1925年4月任北京政府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

此后，陈宦闲居北京、天津，以读书自遣。著有《念园文钞》、《念园诗钞》十余册[6]。他常参加燕京大学教授洪煨莲等组织的藤花会，赏花赋诗。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不久即告沦陷，陈宦拒绝日伪的拉拢，保持了晚节。1939年10月24日在北平病逝。

---

(1) 彭惠中：《回忆陈宦》，原件藏全国政协文史办。

(2) 吕建之：《陈宦入川》，原件藏全国政协文史办。

(3) 吕建之：《陈宦入川》，原件藏全国政协文史办。

(4) 吕建之：《陈宦入川》，原件藏全国政协文史办。

(5) 转引自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6) 田子渝等主编：《中国近代军阀史词典》，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陈友仁

陈民

陈友仁，英文名Eugene Chen，1878年（清光绪四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兴梅地区。父亲陈阿金[(1)]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海外，辗转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先是当剃头匠，后开杂货铺，成为小康之家。陈友仁从小在特立尼达受英国教育，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

1899年，二十一岁的陈友仁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律师。因得到华侨和印度侨民的信任，律师业务进展顺利，不久便自设律师事务所。由于收入丰厚，他曾投资于可可种植园和油田，但仍以律师工作为主。他业余多在家中读书、写文章，常向当地报纸投稿。平日颇为关心国际政治和中国局势，曾研读有关日俄战争史料。他虽然只受过西方教育，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国话，但民族意识强烈。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英国度假，激于爱国热情，毅然与马来亚华侨伍连德（1879—1960，著名防疫专家）等结伴回国。

1912年春，陈友仁到达北京，被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施卸任，由于赏识陈的英文水平，转介绍他担任新创办的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总编辑。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各报不敢登载，唯有《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陈友仁的胆识也为人们所称道。1917年5月，他因撰写《出卖中国》一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借款一亿元的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捕下狱，判处徒刑4个月。虽不久便获释，但《京报》被封闭。陈友仁遂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为孙中山的一名亲密助手。1919年，陈参加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并游历西欧各国。第二

年夏天回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在上海创办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继承《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不久，为筹措办报经费，他出国到伦敦，嘱其夫人[(2)]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其全部产业，倾囊办报。

1922年至1923年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并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和寻求国际革命力量援助的愿望。这次会谈对陈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同北上。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陈在孙的病榻前，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以及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决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3)]。

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中英文对照的《民报》（*People Tribune*）主编。由于刊载了不利于张作霖的消息，陈于1925年8月又被捕解送天津监禁，至当年12月冯部进驻天津时才获释。陈随即南下广东，参加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他继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反殖的外交方针，在大革命高潮中，先后主持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开国民外交的新纪元。陈友仁以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革命立场而著称，被时人誉为革命外交家，并称赞其铁腕外交。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

月，武汉的汪精卫也分共、清共，宁汉趋于合流。在14日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陈友仁极力反对“分共”，并代表宋庆龄发言，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4)]。因反对无效，他便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名，离开武汉至上海，与宋庆龄等同乘苏联轮船至海参崴，转乘苏联政府特派列车抵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陈友仁的名字同宋庆龄、邓演达一起，被列于革命委员会名单。这年冬天，他和宋庆龄、邓演达在莫斯科联名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行径，倡议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

1931年2月，陈友仁游历欧洲后回到香港。5月，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另组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议和于上海，陈友仁与汪精卫、孙科等作为粤方代表出席会议。同年12月，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任外交部部长。但不到一个月，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支持，便辞职赴上海。

1933年底，陈友仁支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联共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陈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国外，定居法国。此后，他虽身居巴黎，仍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而积极活动，通过他的儿子陈丕士同国内多方联系，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赞助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1938年春天，陈友仁离开巴黎，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同年10月，他在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建议四项抗战方针：（一）加强中枢政治机构；（二）遵守总理所定外交政策；（三）发动全国民众力量；（四）迅速起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5)]。由于蒋介石的忌恨，陈终于未能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工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陈友仁被拘捕并转押至上海。日方曾多次劝诱他参加南京汪伪政权，都遭到他断然拒绝；他还严正地斥责汪精卫的“和平政策”为傀儡的和平。从此，他被软禁在上海。

1944年5月20日，陈友仁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特将陈友仁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以示尊崇。

---

(1) 据陈友仁之子陈丕士在其所著《中国召唤我》（*China Called Me*：*My Life Inside of Chinese Revolution*，by Percy Chen．，Boston：Brown and Co．，1979）一书中说，其祖父阿金系移民时所用名，真名已不得而知。（见该书第3—4页）。

(2) 陈友仁之原配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县，1926年5月病故。1930年，陈与张静江之女张荔英在巴黎结婚。

(3)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1925年3月1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22页。

(4)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5) 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8日。

陈裕光

钱益民

陈裕光，1893年3月8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廿日）生于南京。父亲陈烈明，是浙江宁波迁到南京的移民，先后生有九个孩子，陈裕光是长子。陈烈明在南京开办了“陈明记营造厂”，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口碑，不少外国侨民、传教士都乐于将工程交给陈烈明建造，当时南京大多数外国人居住的楼房，包括著名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就是由陈烈明的营造厂建造的。

陈裕光天资聪慧，七岁即能流利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1901年入蒙馆，师从陈省三，陈对陈裕光赞赏有加，有“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的评语。1905年陈裕光入南京干河沿汇文书院成美馆（即附属中学），取别号“景唐”。成美馆俊彦云集，同学有谢家声、徐养秋、戚寿南、吕彦直、陶行知等，日后均成为各界英才。1911年陈裕光入金陵大学。在校期间，任《金陵光》首席经理员，挚友陶行知任中文主笔。

1915年陈裕光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时获美国纽约大学毕业证书。在文怀恩（Dr．John Elias Williams）副校长的推荐下，陈裕光于1916年9月赴美留学。先入克司工业大学（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修读化学工程。1917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一年后获硕士学位。接下来四年，专修有机化学，于1922年6月毕业，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有机化学荣誉学会奖状和自然科学学会奖状各一张”，并获“金钥匙”奖，同时被吸收为美国化学会成员。留学期间，陈裕光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金陵大学留美同学会会长、全美中国留学生会刊《中国学生月刊》总干事、中国妇女救济会主席。

1922年8月，应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邀请，陈裕光到该校任有机化学教授兼理化系主任。期间，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科学教育组，主持编译了柯尔威（Otis．W．Caldwell）和史罗荪（Edwin．E．Slosson）《科学与世界改造》一书。1924年1月，陈裕光任总务长，不久又被推举为学校评议会主席。9月，校长范源廉因政府欠薪辞职，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黄郛委任陈裕光为代理校长，恰好金陵大学来函商聘他，遂决定离开北京回母校金陵大学任教。

1925年秋，陈裕光出任金陵大学化学教授，同时兼任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南京，发生“南京事件”，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被流弹击中，不幸身亡。美籍教职员在惊恐中纷纷离开南京，校长包文（A．J．Bowen）也辞职回美国。校园被军队占领，学生离校，学校陷于停顿。陈裕光和农林科科长过探先、图书馆馆长刘国均、附中校长刘靖夫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过探先为主席，陈裕光为副主席，负责处理乱局。

11月30日，金陵大学成立新的董事会，陈裕光因为出身金大，与金大渊源较深，且学识经验均受人钦佩，对教会情况也比较了解，被董事们推为校长。陈裕光因此成为金大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从1927年连任到1951年，时间长达25年之久。

担任校长后，陈裕光首先处理的棘手问题，是使金陵大学更加中国化。1928年到1936年，陈裕光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整理校务，“使学校大步地或逐步地适应国情”[(1)]。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各教会大学取消宗教系。而当时教会大学则规定宗教课是必修的，学生必须参加宗教礼拜。因此，这项政令受到教会方面的巨大阻力。陈裕光认为，“宗教的立足点是信仰自由”[(2)]，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强制参加礼拜，这都是“不合近代国家信仰自由原则的”[(3)]。因此他提出，不设宗教系，改设哲学系，“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宗教问题”[(4)]的解决办法，被董事会所接受。董事会决定，“停止宗教系的

排课，将宗教方面的课程分到有关的系里去”，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仪式也改为自由参加，使金大“在淡化其教会大学色彩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5]。陈裕光在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动荡时期，以高度理性的开明的态度，折冲樽俎，妥善地协调了国内外宗教势力与政府和民意的关系，使金陵大学成为把宗教课改为选修课的第一所教会大学[6]，为其他教会大学树立了榜样，使教会大学在办学中国化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顺利地渡过了反基督教浪潮的考验。

教会大学由各海外传道团创办，经费、师资概由海外传道团提供，在国内教育界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向来“不大关心国家的教育法令”[7]，游离于国家主权之外。陈裕光上任伊始，即着手向政府立案，改变此前教会大学藐视国家教育主权的状况，“确定教育主权是中国的”[8]。1928年9月20日，大学院第668号训令，批准金大立案。金大成为第一所获得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9]，也是继厦门大学后成功立案的第二所私立大学。此举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步收回教育主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陈裕光对金大的人事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将原由外国人担任的各系主任、院长改由中国人担任，但外籍教授仍可任教。柯象峰、李小缘、刘国钧、过探先、魏学仁、陈纳逊、胡小石、徐养秋、刘继宣、蔡乐生、王绳祖、李方训、戴安邦、沈宗瀚、章之汶、焦启源、戴芳澜、俞大绂等大批华人知名教授被陈裕光委以系主任、院长等重要职务，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民主治校，校务蒸蒸日上。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金陵大学董事长的杭立武曾说：“中国职员中，人才济济，类多杰出之士，尤其几位院长中间，论能力，论学识，颇多可以脱颖而出、更上层楼者，但景唐先生（指陈裕光——笔者注）以其雍容之度，能够笼罩群雄，和睦相处，合力并进，就这一项而言，成功便非偶然。”[10] 学校重要的职务中，只有会计主任仍由美国人担任，中国人仅担任副主任，因为学校经费的大部分来自美国的教会和私人资助。因此，学校的经济权仍然操纵在美国人手里。

1930年陈裕光按照教育部规章，把金陵大学文理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理学院设立电机、化工两个工科专业；改农林科为农学院，形成了“三院嵯峨”的局面。同年又成立以研究和弘扬中国文化，培养和造就研究中国文化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种以文、理为综合大学之基础，以农学为特色，理中有工的学科结构，不求全，“小而精”[11]，形成了金大鲜明的办学特色。1934年11月，美国纽约州大学院向金大颁发毕业学位永久认可公文，此后，可由金大直接授予国际认可的证书和学位。

陈裕光把教育视为“建国的工具”，民众应受完满的教育，主张“中华民国应以教育为第一大事”[12]，把教育摆到了至高的地位。在他的教育理想中，教育应学问、修养、服务三者并重，教导学识与陶养品格并重，不可或缺，教育还应培养、锻炼服务人才。“为学问而致力，为修养而淬砺，为服务而尽力。”[13]

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金大在更加“中国化”的道路上形成了“教学、科研、服务与推广”三位一体的基本办学模式[14]。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推广。“推广是服务的一种特殊形态”[15]。服务与推广，成为金大办学极为鲜明的特色之一。服务与推广既表现在学科建设上，也表现在面向基层，直接服务社会中。这两方面，金大都有突出表现，尤其以金大农学院最为杰出。农学院组织师生参加农村社会调查，开展种子改良与技术推广，培育作物新品种，进行农业人员培训等系统的实际工作，使农学院师生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6]。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例如台湾经济的起飞起步于农业，金大校友在其中起的作用常被人们称道[17]。除农学院外，文学院、理学院也在服务和推广工作中有不俗的表现。

陈裕光的办学思想以沟通中西为职志，他对中国固有文化极端重视。在他的不懈劝说下，1934年，金大首任校长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将生平所藏的千余件稀世珍品文物，悉数捐赠给金陵大学，以供研究之用。这些文物包括铜器168件，玉器37件，瓷器

48件，陶器64件，书画140件，碑帖20件，金石及其他拓本五百余件，其中的周公鼎、宋人手札、王齐瀚掏耳图、宋拓王右军大观帖、欧阳询草书，均为极品文物[18]。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福开森赠品基础上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商承祚整理和研究福开森赠品中的彝器、铭文和拓片，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考释》、《殷墟佚存考释》、《十二家吉金图录》、《浑源彝器图》等著作[19]。

1936年夏，陈裕光担任校长已经十年，在校董会授权下，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考察高等教育，为金陵大学募集经费。期间，应邀出席了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大会。原拟回国时顺路考察苏联的集体制度和合作社制度，因故未能成行。1937年1月回校。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各学校纷纷解散或迁往他处，金陵大学和附属中学继续开学。直到南京即将沦陷的前夕，金陵大学各部分才开始西迁四川。1938年春到1946年夏，金陵大学在四川办学达八年。1939年6月11日，日机轰炸成都，在华西坝投下四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陈裕光住宅附近，陈裕光夫妇和家人受轻伤。

1944年6月，应美国教育委员会邀请，陈裕光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等六人赴美国讲学。从1944年8月到次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陈裕光先后参观考察了东部的史密斯学院、马萨诸塞州学院、阿姆斯特学院、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大学、中西部城市的学院、西部沿海的学院以及部分文化公司和机构，向美方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私立学校艰苦维持办学的情况，争取美方在资金、图书资料等方面的支持，同时着力介绍“经整理后的中国文化遗产和西方文化配合之可能性”。1945年1月，美国南加州大学盛赞陈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教育家之一”，授予他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5月，陈裕光在纽约出席中国基督教董事会联合会第13届

年会，全面报告了金陵大学的办学情况。年会决定，在中国13所教会大学中选定2所成绩优秀的大学，重点资助其办好研究院，以提高中国教会大学的办学水平。结果，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以高票当选。金陵大学被中国基督教董事会联合会所高度认可，成为陈裕光平生最为得意的一件事。

1945年6月，陈裕光回到成都。不久抗战胜利，陈裕光为金陵大学复员穿梭于南京与成都之间。1946年4月，金陵大学开始迁回南京，9月在原址顺利复课。

作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和代表，陈裕光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兼任了政府的职务。1938年7月7日，他作为南京市代表，在汉口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五组文化教育组）。汉口沦陷后，国民参政会移到重庆开会。1946年春，陈裕光当选为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兼议长。6月，蒋介石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召见南京临时参议会陈裕光等人，要求多方协助调查。事后，陈裕光在参议会内设立“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并多次主持调查工作。12月1日，又被推举为南京市参议会议长。1947年8月，陈裕光当选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首届委员。12月，当选国民大会当然代表。次年3月，国民大会召开，当选主席团成员。

1948年11月，金陵大学举行60周年庆典，各界人士对金陵大学的办学成就表示充分赞同，英美两国电台还开办了专题节目，李约瑟等发表了电台讲话。

1948年底，国民党军事上败局已定。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疏散，金陵大学接到准备搬迁的命令。学校内部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十分激烈，而且三个学院的主要负责人相继离职，陈裕光经受了巨大的压力。陈裕光与王绳祖、高觉敷等人坚决反对迁校台湾，经过全体教职员会议和校务委员会的多次讨论，最终作出了“本校在任何情势之下，决不迁台”的决定。1949年春，金陵大学如期开学，陈裕光在进

步师生的支持下，组成“金陵大学安全委员会”，负责守护学校。

4月22日下午，教育部长杭立武（陈裕光胞妹陈越梅的丈夫）去飞机场之前，最后一次苦劝陈裕光一道赴台湾。陈裕光拒绝了妹婿的好意，留在了大陆，并出任“南京维持会”副会长，在鼎革之际，维持南京的秩序，稳定人心。23日，南京解放，陈裕光以议长身份，代表南京市民到下关与解放军联系，表示希望解放军尽早接收南京。金陵大学在次日便恢复上课。陈裕光仍任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裕光“从头学起”[20]。1950年9月，陈裕光申请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高级政治研究院学习。离校期间，金陵大学由李方训代理校务。1951年2月，学习结束。3月3日，陈裕光向校董会提出报告，请求辞去金陵大学校长职务，“在另一岗位上为人民服务”[21]，对人民政府领导金陵大学充满信心，在辞职报告中写道“现在华东教育部通知来请李（方训）先生继任校长，这是我衷诚赞同的，也是我原来就想这样向各位建议的。我谨请各位一致拥护这个指示。嗣后在教育部领导之下，本校改为公立，前途是很光明的”[22]。同日，私立金陵大学校董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陈裕光辞职一案。会议决定，准予陈裕光辞职，拥护华东教育部关于金陵大学行政人员调整的指示；各校董对陈裕光“苦心孤诣服务”金陵大学二十多年作出高度评价，决议称“陈校长在本校苦心孤诣服务二十余年，曾经若干次之艰危局面，不但从未气馁，且竭力扩展，内部如文理工农若干学系之添设，使理论与实际得有结合。抗战军兴，迁校成都。胜利后，领导复员，节节困难，均能奋力克服。本校所以能有今日之发展，实陈校长领导有方之所致”[23]。

李方训任代理校长后，拥护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积极向政府办理学校登记手续。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和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遵照政府决定合并，改为公立金陵大学，李方训、吴贻芳任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一年后，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公立金陵大学主体并入南京大

学，相关系科分别并入南京、上海的高校，拥有64年办学历史的金陵大学宣告结束。

辞去校长职务后，陈裕光离开了服务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金陵大学，脱离了心爱的教育岗位，开始“从头做起”[24]。1951年5月，陈裕光出任华东教育图书仪器清理处副处长。同年11月，又申请参加皖北凤台县古沟区胡集乡辛西村、老胡村、大郅村、孙岗村的土改工作。1952年3月，图书仪器清理工作结束。陈裕光开始考虑今后经常性的工作。由于早年研究高级有机化学，对塑胶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的试验和应用有一定的研究[25]，他向领导上提出从事科技工作的愿望。4月，陈裕光被派往上海私营工商贸易行担任化学顾问，直到1956年2月。1956年3月，又被派往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担任塑料室化学顾问。同年，陈裕光当选徐汇区政协委员、常委（直到1960年）。

在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期间，陈裕光参与了聚氯乙烯人造革及泡沫塑料的研制，获得成功并投产。不久，化工部提出由酒精制乙烯，力争人工合成聚氯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三大树脂。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承担了该项任务。陈裕光与同事一起积极讨论技术路径，收集和翻译国外相关资料，下厂调研，使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26]。1972年12月，陈裕光从轻工业研究所退休。

1980年，87岁的陈裕光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发愿要在有生之年为“促进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发挥最后的余热。为了动员海内外金陵校友参加国家的统一和建设事业，他登高一呼，发起组织了金陵大学校友会。1982年6月，九十岁高龄的陈裕光只身赴美国，看望了散布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各城市的三百多位金陵校友。告诉校友“祖国安定统一的局面前所未有，各行各业的发展异常迅猛”，希望他们回国观光和旅游。还将自己的照片写上16个字“金陵校友，携手前进。振兴中华，造福人群”，赠送校友。

两个月后，陈裕光回南京参加中国化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学会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同年，他又向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负责人Dr．Paul Lauby提出资助中国教育的愿望。

1986年5月，政府将南京市汉口路71号宅第归还陈裕光。同月，陈裕光由上海迁回南京旧宅定居。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代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看望陈裕光。11月16日，民国元勋黄兴之女黄德华与丈夫薛君度前来拜访，陈裕光嘱咐他们要为中华统一作出新贡献。此间，他表示愿意身后捐献自己的住房，以供金陵大学培养人才之用。1996年5月，子女将该楼出售，将所得500万元人民币捐给“金陵研究院”。

1987年陈裕光出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建议校务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并且加以制度化，确保决策民主化和运行高效率。1988年5月27日，陈裕光倡议、组织并主持的“纪念金陵大学建校百周年大会”隆重召开，七百多位海内外校友及相关人士参加了庆典大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来贺电。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极大地凝聚了金陵大学校友的人心，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同年，陈裕光当选江苏省第六届政协委员。1989年3月14日，各地校友代表以及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领导在鼓楼医院为陈裕光举行了97岁祝寿会。一个月后的4月19日，陈裕光在南京鼓楼医院安详辞世。临终前，惦念着要“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拨款，继续支持中国办高等教育”。陈裕光去世后，埋葬于南京迈皋桥基督教公墓。

陈裕光是中国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学会的创立和初期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1920年留学美国期间，就与吴承洛、侯德榜等留学生倡议过组织中国化学会。1932年8月，中华化学会成立，陈裕光任首任会长，并连任第二、三、四届会长。中国化学会成立之初，经费短缺，开会、活动也没有固定的会所，陈裕光就把自己的住

宅当做临时会所，他和吴承洛、侯德榜、任鸿隽密切合作，使学会“有高度的民主气味”，为化学会将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精神基础。1941年陈裕光筹备了第九届年会，并为《化学通讯》第九届年会指南专号撰写了《中国化学会第九届年会在蓉举行之意义》，回顾学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提出了学会在抗战期间的历史任务[27]。担任校长后，繁重的行政工作使陈裕光不得不放弃化学教学和研究，对此他遗憾终身。陈裕光的译述有《化学与食物经济学》、《我们日用的食物与生活素》，著作有《中国饮食与卫生》、《硒的高级有机化学与研究》、《硒与现代的物质进化》等[28]。

主要参考文献

陈裕光：《自传》（手写稿），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陈裕光自填干部履历表，1960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1)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2)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3)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4)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5) 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

(6)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7)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8)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9)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10) 杭立武：《念校长陈裕光先生》，转引自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11) 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陈裕光：《民国20年》，《金陵大学校刊》第12号，1931年1月16日。转引自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13) 陈裕光：《在金大举行6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节录），《金陵大学60周年纪念专号》，转引自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14) 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7) 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 《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收藏和保管福开森博士捐赠文物的指令（土字第126号）》，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0页。

(19)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20)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21) 陈校长向校董会提出的报告，1951年3月3日，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22) 陈校长向校董会提出的报告，1951年3月3日，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第76页。

(23) 私立金陵大学校董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1951年3月3日，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24) 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25) 陈裕光：《干部履历表》，1960年。

(26) 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27) 《中国化学会第一任会长——陈裕光》，转引自《化学通报》，1982年第8期，第21页。

(28) 陈裕光《干部履历表》，1960年。

陈垣

陈智超

陈垣，字援庵，号励耘，1880年11月12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生于广东新会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五岁随父至广州，次年入私塾。十二岁时，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打开了眼界。越年进而反复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学会按着目录选买自己需要的书看，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7年，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不愿受八股文程式的约束，放笔为文，没有考中。回到广东，以教蒙馆为生，同时继续自学。

1904年，陈垣参加了广州《时事画报》的筹办工作。画报有图有文，画者为高剑父等人，陈负责文字部分。他用“谦益”（与“满招损”相对）、“钱罂”（储钱罐“扑满”的别名）等含有反清意义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许多文章运用元朝历史及清帝上谕等历史题材，影射现实。如《释奴才》一文，巧妙地引用乾隆帝的几份上谕，从他的自相矛盾中，尖锐指出“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除了进行反清的文字宣传外，陈垣还参加了转运枪支等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同盟会。

1907年，陈垣的父亲患肾结石病，中医久治无效，后来经西医手术治疗得到痊愈，陈深受刺激，决心学习西医，乃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由于学校当局歧视中国员生，他愤而退学，与梁慎余等人发起创办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这是第一所私立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西医学校，他也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并在课余义务行医。在《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他发表了《孔子之卫生学》、《中国解剖学史料》等大量宣传医药卫生知识和医学史的文章。1911年，又主编《震旦日报》兼副

刊《鸡鸣录》主笔，继续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后，陈垣当选为众议员，于1913年赴北京任职，参与政治活动，结识了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翌年，他先后在梁主持的全国税务处、国内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总长黄炎培未到职）。他在北京结交文友，阅读图书，研究史学。承德避暑山庄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到京师图书馆后，他在10年中，用相当多的时间研读了这部8亿多字的大丛书。

陈垣自1917年春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收集资料时，结识了两位爱国天主教徒马良（相伯）和英华（敛之）。当年5月，他写成《元也里可温考》。这是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由此他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研究生涯。

1922年，陈垣在脱离了政界之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1924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6年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1928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专心致力于教育和治史。这一时期他的史学研究和教学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他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对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主要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摩尼教、火祆教、犹太教等，都作了深入研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论述元代色目人的汉化，日本学者称他为“现在中国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1)]。他对历史文献学的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学科，作了总结性的研究，《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是这些领域的重要著作。

陈垣在历史学的教学中也有许多创新，其开设的“史学名著选

读”和“史学名著评论”课，就是今天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的“历史文选”和“中国史学要籍介绍”课的前身。他的“史源学实习”课，由于采用实习的方法，让学生从史学名著中找出错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他们终生受益。陈垣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35年他当选为中研院评议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由于辅仁大学受德国教会提供经费，因此成了沦陷期间北平唯一不向日伪当局注册的学校。陈垣留在学校尽力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保持民族气节。他坚决拒绝担任沦陷区最高文化团体“东亚文化协会”的会长。

陈垣在抗战八年中，除了教学之外，还满怀抗日爱国热忱写成专著七种，即《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寓民族气节于著作中。他的这些著作在材料运用上有很大特色。《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出在很多常见的书中未为人在意的佛教史料，充分运用了许多从未被人利用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宫发现了一部《嘉兴藏》。藏书处所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打开这座沉霾了300年的史料宝库，他带领助手，每次事先服用奎宁丸，在一年多时间里将全藏阅读一遍，搜集了许多清初僧人的语录，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充分加以运用。他在该书重印后记中说：“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

陈垣在撰著这些史著期间，学术思想有重大变化。1943年11月，他在给友人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九一八’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 他认为不仅仅要在学术上超过日本，还应当将自己的史学教学与研究直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因此以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日知录》作为教材。他认为史学的经世致用，最主要的就是要激发知识

分子热爱祖国、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气节。他这一时期的所有著作都围绕这个主题。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的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总结，在后记中称之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这部书的最后完成和出版已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所以在《通鉴胡注表微》中补充了一些内容，指出“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等等。

陈垣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北平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几次派飞机接他及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都被他拒绝。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陈垣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思想发生剧变。4月底，他在给胡适写的公开信中表示，今后要“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3)

1950年，由于教会停发经费，辅仁大学由教育部接办，陈垣继续担任校长。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还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195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担任繁重的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仍从事教学和写作，并将旧著陆续整理出版。

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陈乐素：《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刘乃和：《陈垣老师勤奋的一生》，《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

4辑，国家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1983年版。

---

(1) 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日本《史林》第9卷第4号（1924年）。

(2)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3) 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程璧光

郭烙

程璧光，字恒启，号玉堂，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父亲程培芳在美洲经商，1871年殁于檀香山，程璧光扶柩归里。营葬后，迫于生计，往福建依靠姐夫陆云山生活。陆时任靖远舰管带，命习航海术。程璧光十五岁入马江船政局的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被派扬武舰当见习生，后历任超武舰帮带，元凯舰管带、福建水师学堂教习、广甲舰帮带、广丙舰管带等职。

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属广东水师。1894年，广东水师派程璧光为粤舰领队，率领三舰北上会操。会操毕，中日战争将爆发，粤舰被留作后备力量。程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率领粤舰赴前线作战。李鸿章许之，于是三舰编入北洋舰队参战。程璧光奉命率舰护陆军东行，在大东沟洋面与敌舰接仗。一次，立广丙舰上指挥作战，腹部受伤。

黄海大战后，李鸿章即采取“保船避战”的方针，命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港内，不准出海作战。1895年1月，日军进犯威海卫，月底，威海卫南北炮台均沦入敌手。日海军堵塞威海卫东西港口，由海陆发炮夹攻，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遂陷于绝境。提督丁汝昌下令各舰管带沉船殉国，或冒死突围，士兵哗噪抗命，各管带亦拒绝执行。丁汝昌不得已，2月11日服毒自杀。丁死后，海军副提督英人马格禄（Mclure），伙同美国顾问浩威（Howie）[(1)]，借丁汝昌名义作降书，派程璧光向日本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投递。这是他一生对人讳言的事。

甲午战争后，程璧光被解除官职返里。

在这以前，孙中山在广州策划革命时，经常与陆皓东、郑士良等聚谈时事，程璧光与其弟奎光因与孙中山同乡关系，时常参加聚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次年春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程奎光（时任镇涛舰管带）入会为会员。程璧光解职返里后，孙中山着奎光约他见面，劝他入会。程璧光初表现犹豫，经其弟力劝，才答应入会。同年10月，兴中会起义的计划泄露，孙中山出走，程奎光与陆皓东等被捕牺牲。程璧光惧牵连，逃到南洋槟榔屿，久久不与革命党人发生关系。

1896年春，李鸿章出使赴欧，路过槟榔屿，程璧光请见。李问程何故南来，程答："甲午之役全军覆没，朝廷方降罪矣。"李说："此大事于一人何尤，且归，吾当为君电解之。"[(2)] 于是程璧光回国，复职于海军衙门。

同年5月，李鸿章推荐程璧光为监造军舰专员赴英。1899年，程璧光率海天、海圻二舰回国，担任海容、海圻等舰管带。以后又调任北洋营务处会办。1907年，陆军部内设海军处，程被任为船政司司长。1909年，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南北洋海军统一分为巡洋、长江两舰队，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1910年冬，清廷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程璧光任第二司司长。载洵对程相当倚重。

1911年6月，英皇乔治第五行加冕礼，清廷派贝子载振为大使，程璧光为副使聘英致贺。事毕，程又奉命率舰前往墨西哥、古巴慰问华侨，道经美国，曾入谒美总统。这时，清廷在英订造的肇和、应瑞两舰造成，程奉命从古巴再到英国，率领两舰回国。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程璧光尚在英未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有使其主持海军之议。伍廷芳等电促他速回。但他延宕到1912年夏才回到上海，袁世凯早已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了。程见此情况，遂辞去一切职务，闲住在上海。但袁对他住在南方很不放心。1913年春，派员邀他入京，聘为海军高等顾问。继又任他为陆海军大元帅统

率办事处参议。其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迹渐显露，程璧光内心很郁闷。1915年秋，他曾给朋友写信说："惟时势不佳，实足令人厌世，恨不得早死为快也。"(3)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黎元洪早年供职水师时，曾在广甲舰任管轮，为程璧光属下。此时，极力推荐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得国会通过。程在以后的"府院相争"中，站在"府"的一边，成为黎元洪的支持者。

1917年4月，在对德宣战问题上，黎、段之间的矛盾白热化。为了向总统和国会施加压力，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入京，于25日举行军事会议。海军总长程璧光与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被邀出席。段宣布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后，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张"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的签名单塞给出席者，让大家签名。各省区督军或代表，皆仰承段的意旨，签署"赞成"。惟程璧光写："如国会一致，当服从多数民意"(4)，使段很不高兴。其后，参战案经国务院提交众议院审查时，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演出"公民团"包围议会，殴辱议员的闹剧。一时群情激愤，舆论大哗。程璧光与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等向段建议内阁引咎总辞职，被段拒绝。于是当天晚上，程璧光等四人分别向总统提出辞呈，使原来就残缺不全的段内阁只剩下"总理"一人。到5月23日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总理职务后，北洋系各省督军在段的唆使下，纷纷宣布独立，并准备以武力逐黎。程璧光见事机危迫，即电饬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驻扎大沽，表示对黎的支持。6月初，程曾请黎离京南下，愿率舰队护送，黎不同意。程不得已先行出京，9日抵沪。当日即召集各舰舰长开会，研究对付叛督办法。

自段祺瑞当国，挟督军团乱政以来，西南各省及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都站在同情黎的方面。程到沪后，与当时在沪的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三人有所接触，研究共同拥黎反段的办法。孙中山曾为海军筹措军费，鼓励程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6月，张勋北上，国会被迫解散。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程璧光在沪闻讯，派军舰三艘北上秦皇岛，想迎接黎元洪南下，未成功。3日，程与松沪护军使卢永祥联衔发表了声讨复辟、拥护共和的檄文。

当段祺瑞在北方布置圈套，引张勋上钩，又以讨逆英雄自居，拒绝恢复约法时，孙中山在南方酝酿的护法局面略有头绪。7月上旬，孙中山、章太炎等乘海军军舰先行赴粤。21日，程璧光与林葆怿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州，翌日，海军自主宣言自沪发出。宣言否认国会解散后的非法政府，提出三项主张：（一）拥护约法，（二）恢复国会，（三）惩办祸首。这是程璧光在孙中山示意下发出护法的第一声。当时海军第一舰队拥有较大的巡洋舰，是海军主力。南下护法的第一舰队军舰先后有海琛、海圻、永丰等八舰，连同原驻广州的楚豫、永翔二舰共计十舰。舰队南下途中，段祺瑞着萨镇冰、刘冠雄来电劝诱北归，程、林未予理会。海军的这一行动，使护法声势加大，也使北洋军阀大为震惊。第一舰队抵粤后，受到各界的欢迎。同时国会议员即纷纷南下。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10日，军政府宣告成立，程璧光任海军总长。

广东当时是桂系军阀的势力范围，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陈炳焜为广东督军。但又有李耀汉、李福林、魏邦平等广东地方势力。桂系对军政府采取表面不干涉，实际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在这几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程璧光由于兼有广东人、国民党元老和桂系的朋友三种身份，受到各方面的拉拢，成为调和派。

先是，广东省长朱庆澜（当时倾向孙中山）有警卫军二十营，称“省长亲军”，由陈炯明任“亲军”司令。8月中旬（海军抵粤不久），朱庆澜忿桂系排挤，邀请程璧光、李烈钧、陈炯明密谈，打算把“亲军”改编为由程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免为桂系吞并。8月26日，朱被排斥下台，“亲军”二十营被陈炳焜强行接收了去。与此同时，段祺瑞以中央政府名义派傅良佐代谭延闿为湖南督军。9月9日傅良佐到

长沙，湖南形势日急。到这时，陆荣廷才感到北军南犯，有侵犯桂系地盘的危险，必须调整与孙中山军政府的关系。10月2日，陆邀请程璧光到南宁举行会谈。决定了两广当局联名讨段、援湘的计划。由程璧光、陈炳焜、谭浩明、李耀汉通电声讨段祺瑞的罪行，提出迎黎复职、恢复国会等主张，并任谭浩明为援湘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通过程璧光这条渠道，11月陆荣廷又邀军政府大元帅代表举行梧州军事会议。陆同意了把二十营省长亲军交由程璧光节制、陈炯明指挥，去福建开辟进攻北洋政府的第二战场。

两次会议后，桂系表面与军政府合作，暗中却玩弄联冯制段的花招，向北方伸手求和，并处处与孙中山为难。孙中山气极了，想用海军驱逐粤督陈炳焜。因程璧光不主张与桂系决裂而未实现。1918年1月3日，孙中山直接密令豫章、同安二舰舰长炮击观音山督军署。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电请程璧光调处。程急忙命令两舰停止炮击，并将两舰舰长撤职。

军政府与桂系之间的矛盾，虽到了几乎决裂的程度，但1月下旬，湖南方面的桂湘联军进攻北军，收复了岳州；同时在广东方面，桂军林虎、沈鸿英等部对受段祺瑞驱使的龙济光也展开了进攻，这是孙中山系国民党人所欢迎的，于是矛盾又暂时缓和。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命陈炯明率粤军进驻汕头，方声涛率滇军进驻潮州，准备开辟福建战场，以与湖南战场相配合。程璧光原决定率各舰出发，协助征闽，及闻讨龙战争开始，遂调遣军舰游弋北海、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海军的活动，使从琼崖登陆的龙军与其根据地失去联系而败退。

孙中山的军政府在法理上应是护法各省的最高权力机关，但事实上两广、滇、黔、湘皆是自主的独立王国，各省军阀自行其是，使军政府形同虚设。而程璧光虽名义上为军政府海军总长，但他更多地迁就地方军阀，与孙中山精神很不协调。1917年冬，唐继尧、岑春煊、李烈钧等有组织西南各省联合会以谋护法各省之统一的倡议。岑、唐

以及陆荣廷是想以联合会取代军政府的职权，并准备与北京政府妥协谋和。1918年1月，公布了条例，并开了成立会。对此会的成立，程璧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条例一经宣布，就遭到国民党人的反对和章太炎的痛骂，被称之为“李完用第二”。

联合会议搁浅，滇、桂军阀又与政学系议员、益友社员相勾结，策动以联合会与军政府合并，把军政府改组为合议制，以削弱大元帅的权力。程璧光为此向孙中山疏通，并于2月2日邀请孙中山、莫荣新等在海珠开会商讨，使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同意。

当军政府酝酿改组期间，广东军人李福林、魏邦平、翟汪等人，借口龙济光部尚未荡平，电请陆荣廷以莫荣新专任讨龙军总司令，而以程璧光兼任粤督。这是广东地方势力以“粤人治粤”的口号，排斥桂系势力的表示。正当酝酿改组军政府及呼吁广东易督之际，2月26日下午8时，程璧光被人刺杀于广州海珠（海军办事处所在地）对岸，弹中胸部，即时殒命。当时一般疑此案系桂系军阀所为，实则刺客肖觉民、李汉斌系朱执信所派遣[(5)]。军政府大元帅追念程璧光护法之功，在广州海珠公园建立铜像，以资纪念。遗体于1919年1月葬于江苏宝山。

---

(1) 据《甲午中日战争纪要》（参谋总部第二厅第六处编，1935年印）说，浩威为英国人，而据《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张荫麟译，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所载，浩威为美国人。

(2) 章炳麟：《程璧光》及附录《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234页。

(3)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二章，第2页。

(4)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三章，第1页。

(5) 据罗翼群所撰《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1964年版）中记载，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有些同志仍主张在革命低潮时期采取暗杀手段。1918年1月3日，孙中山直接密令豫章、同安二舰舰长炮击观音山督军署后，程璧光曾将二舰长撤职查办。中华革命党同志对程此举极为不满，且怀疑程与陆荣廷已有默契，不久即将叛变护法政府，故朱执信派人将程暗杀。

程德全

朱宗震

程德全，字纯如，号雪楼，四川云阳人，生于1860年7月22日（清咸丰十年六月初五）。其父程大观为附贡生，靠教书为生。程幼年随父读书，1878年完婚后，因家贫无以自给，出外教书。程本人为廪贡生出身，1890年出川游历，至京入国子监肄业。

当时，东北边防形势紧张，程留心搜集有关东北的资料，并拜晤在京的黑龙江旗人寿山，询问东北情形，两人遂订交。1891年，程一度入瑷珲黑龙江副都统文全幕。1894年中日战起，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电召程德全由京到九连参与军幕。翌年，程由依克唐阿奏保，以知县分省补用，旋分发安徽。1898年经黑龙江将军恩泽、副都统寿山奏调，程于1899年底到瑷珲入寿山幕。1900年2月初，寿山赴齐齐哈尔署理黑龙江将军，任程为黑龙江银元局总董兼办将军文案。

1900年7月沙俄军队借口义和团运动排外，准备入侵，程德全由寿山任为行营营务处总理，负责筹划防务，联络前敌各军。8月1日夜，俄军在瑷珲一线发动进攻，清军节节抵抗。因军情紧急，程于8月15日从齐齐哈尔出发，赴前敌视察。8月17日程行至博尔多（今讷河县），墨尔根（今嫩江县）已失守，发现清军“颓靡不可整顿”[(1)]。为此，程函致寿山，主张向俄军“请和”[(2)]，并镇压义和团。旋奉寿山命，与俄军洽谈议和。俄军不允。由于程以死相求，俄军同意不攻省城，不杀无辜，不掠财产。程遂回齐齐哈尔，撤出军队及军火粮饷，准备和平让城。8月28日，俄军进抵齐齐哈尔郊外，疑程设计诱敌，拟即攻城。程急出城与俄军相见，以身挡炮口，恳求俄军停止进攻，俄军遂停止炮击。翌日，俄军大驱入城，将军寿山自尽。俄军欲强立程德全为黑龙江将军，程坚决拒绝，并投江自尽，为俄军救起。

不久，程被挟赴赤塔，途经呼伦布雨尔（今海拉尔），因天寒患病，由俄国红十字会治疗后释回，于11月7日返抵齐齐哈尔。1901年2月，程德全被清廷擢升以直隶州知州用，赏戴花翎加三品衔。1902年9月，吉林将军长顺委程任三姓（今依兰县）办理善后交涉兼办筹饷缉捕事务。

程德全于1900年与俄军斡旋的行动，在朝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黑龙江、吉林将军也一再要求清廷破格重用程德全。1903年冬，沙俄拖延在东北撤兵，日俄战争正在酝酿中。1903年12月28日慈禧在京召见程德全，垂询江省事，程奏对称旨，被擢道员，翌日又加副都统衔、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并专任垦荒事务。按清制，东北实行旗制，用旗人，清廷对程德全的任命，既是越级提拔，又打破了东北歧视汉人的惯例。程于1904年1月22日出京，克服了俄国人的阻挠，于3月26日抵达齐齐哈尔上任。

程德全在京时曾向清政府力陈治理江省政策：外交上，对领土主权“宜据理力争”；内政上，认为“急须殖民实边”，“招户垦荒”[(3)]。

1905年5月15日，清廷委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将军，程遂全权处理黑龙江军政事务。在程赴任之前，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周冕，就铁路用材和占地问题与东清铁路总公司签订合同，将黑龙江产木之区大半划给俄国人，并让铁路展地达二十万垧。程上任后，即以废约另订为对俄交涉目标，以求“争得一分便算一分”[(4)]。俄人拒绝废约另订，周冕又阻挠程德全派员接收交涉局，因而废约另订的谈判迟迟难于开议。直至日俄战后，程为周冕弥补了欠款，才得以接管交涉局事务，并于1906年9月初派宋小濂与俄人开议，至1907年8月结案，将伐木地段缩减十分之九，铁路展地减去七万余垧。

在内政方面，程德全从改革旗制入手，增设垦务总局、善后局，并增设地方官，让旗署各员专理旗务，为设立行省作准备。当时，黑龙江无兵无饷，“大似以江省为已弃之物”，程不得不“以迂缓之荒政冀

为救急之要图”[5]。他向官僚、士绅、商人卖荒获得四五百万两的收入，用来编练军队，增设官制，开办学校，并拨款“由官中为之提倡”[6]，以振兴实业。他先后开办了煤矿，设立了广信公司（银行），创设了瑞丰垦务公司，并购置磨面机和轮船等等。

但是，程德全的放荒政策，使相当多的商业资本转移为呆滞的封建地产，而放出的荒地，开垦的还不到十之二三。程的新政又把收入消耗殆尽。待放荒接近完成，不再有大宗荒价收入时，程德全面临着财政竭蹶的困难，市面银根紧张。1907年春夏间，“省城数百号铺商咸同涸辙之鱼，立可待毙”，“报关闭者已六十四家”[7]。为此，他一再向清廷呼吁拨发巨款，但都遭到冷遇。1907年初，清廷将东北改设行省，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程则于5月7日被任为署理黑龙江巡抚。程从此须事事听命于总督，职权削弱。于是，程德全被迫一再称病奏请开缺。1908年3月初，夹袋中另有人物的徐世昌，以程“腿疾未痊”，建议军机处“赏假数月，回籍就医”[8]。是月19日，清廷遂将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一职开缺。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将徐世昌内调，命锡良出任东三省总督。于是，程德全复被起用，于5月23日任为署理奉天巡抚，旋实授。但奉抚一职，因与总督同城，遂于翌年4月28日裁撤，程被调任江苏巡抚。

程德全抚苏，以革新自命，与立宪派人士如张謇等过从甚密。他一再支持立宪派的主张，与其他督抚一起，要求设立责任内阁，从速召开国会。但实际上这是他对清廷的统治已经丧失信心的表现。

武昌起义爆发后，程德全镇静如常。时张謇适由鄂返宁，程于是约张赴苏州。张于10月16日抵苏以后，即连夜为程代草挽救时局的奏疏。程经征求各省意见后，于10月22日入奏。这一奏折，要求清廷“解免亲贵内阁，钦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并请下诏罪己……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9]。清

廷留中不发。11月4日，上海独立。苏属士绅纷纷劝程谋自保，得到程的同意，并与革命党人进行了联系。是夜，上海民军50人到苏州与驻枫桥新军汇合，翌日拂晓整队入城，宣布苏州独立，推程德全为苏军都督。

程德全以前清大吏宣布反正，开始是受到革命党人怀疑的。他不得不请张謇前来镇抚。同时，他致电各省都督，“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10)]。11月20日，张謇再到苏州，时苏浙联军正会攻南京，程遂请张驻苏坐镇，自己于11月23日亲至高资视师，发布誓师词，27日又随军进驻尧化门。程一向多病，扶病视师，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好感。12月1日，南京光复在即，程遂由前线回沪，会商军政。翌日，南京克复。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12月6日，程至南京组织都督府，旋因各军纷争，组府未成而返沪。15日程偕汤寿潜、陈其美至宁，调和诸军，组织政府。18日，程复因南京秩序紊乱，愤愤离宁赴沪，称病不出。1912年1月1日，江苏省议会推庄蕴宽代理都督。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于1月3日任命程德全为内务总长，程遂卸苏督职，但仍在上海租界卧病。不过，程并未停止政治活动，他正与章太炎一起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于1月3日宣布成立，旋改统一党。至5月间，统一党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后程因与章太炎政见不合，遂宣布脱离共和党。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经苏属士绅推举，袁世凯于1912年4月13日令程德全复任江苏都督。程于4月下旬至苏扶病视事，通电表示“首宜以恢复秩序为唯一之方针”[(11)]。程视事三日后，因病告假赴宁疗养。5月间，南京留守黄兴受总统袁世凯和财政总长熊希龄的箝制，军饷无着，被迫提出辞职。袁电程商议接收留守府办法。时苏州军界自阊门兵变后风潮未靖，程德全被迫回苏坐镇，难以兼顾。但他恐黄兴过早离职，引起变故，遂密电袁世凯，请对黄表示抚慰赞助，这样，“一面可以促事实之进行（指解散留守府），一面可以释军心之

猜虑”[12]。袁复电表示赞同。当时，同盟会的一些人，曾要求袁世凯任命黄兴为江苏都督；而沪军都督陈其美更支持柳承烈等在苏州组织“洗程会”，准备武装暴动推倒程德全，拥陈其美为江苏都督。当时北京方面接到了陈其美暗中增兵的情报，电程严加防范。5月31日夜，在洗程会预定发动的前夕，程抢先出动军队弹压，并于翌日将洗程会骨干蒯佐同、蒯际同等捕获，并将蒯氏兄弟枪杀。事后，他将各项证据焚毁，不事声张。随后，程又将洗程会控制的先锋营全部遣散。在苏州平静之后，程德全就于6月14日前往南京接收黄兴的南京留守府，江苏都督府也移驻南京。是年7月底，陈其美被迫撤销沪督一职，由程接收。

程德全在民初的政治激流中，一再表示拥护中央，袁世凯也在政治上、财政上予程以照顾，利用程在江苏士绅中的威信以维持对江苏的控制。但是江苏是革命党人力量较强的地区，程乃依违于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充当一个调和派的角色。1912年6月1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为袁世凯所迫，弃职离京，社会上谣言蜂起。为此，程发布通电，力主调和，以“精诚相孚，腹心相示，泯南北之畛域，捐新旧之猜嫌”相号召[13]。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程奉袁世凯的命令，亦应黄兴等人的请求，于3月25日赴上海处理宋案，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进行了会议。由于革命党人的要求和压力，程于4月间曾一再向袁世凯请求组织特别法庭以审理宋案，但未获允准。程德全与江苏民政长应德闳遂于4月25日夜12点公布了由革命党人参与整理的宋案证据，使宋案内幕大白。袁世凯政府的善后大借款成立后，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已面临着决裂的局面。为此，程又一次呼吁调和，他拍着胸脯说：“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锓。”[14] 但是，他一再强调的“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在起着抑止革命的作用。

1913年7月12日湖口起义，“二次革命”爆发。14日晚黄兴抵达南京，15日晨驻南京第八师包围都督府，黄兴偕驻南京高级将领谒见程

德全，迫程宣布江苏独立。16日夜，程托病离宁赴沪。程至沪即发布模棱两可的通电说："本月15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支持，本日来沪调治。"[15] 推卸了对独立的责任。袁获电后，命令程德全、应德闳就近设立机关，"迅图恢复"[16]。旋二次革命战事失利，程德全看到大局已定，遂于苏州设立行署，并于7月25日通电宣布，南京独立时"一切文电，假用德全名义号召，亦非口舌所能抗争。因于16日夜冒死离宁赴沪，召集苏属水陆军警，议图恢复"[17]。翌日又致电黄兴，要求黄"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18]。7月27日，程电令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翥捉拿黄兴，张向黄作了报告，黄兴遂于28日夜只身离宁出走，南京即宣布取消独立。此后，南京及苏属各界吁请程德全莅宁收拾残局，但他仅派杜淮川任江苏第一师师长，赴宁料理，本人则迟迟其行，并向袁世凯请求辞职。旋何海鸣在南京发动二次、三次独立，据城与袁军死战，至9月1日失守。9月3日，袁世凯遂准许程德全辞职，任命首先攻进南京的张勋为江苏都督。

自此，程德全退出了政界，寓居上海、苏州，闭门诵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拟聘程德全为政治顾问，程以老病辞谢，不愿再入政治漩涡。他晚年在工商业方面的投资几乎完全失败，但仍拥有大量的房地产。1926年，程德全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1930年5月29日病逝于上海。

---

(1) 《驻博尔多营次上眉帅书》，李逊编《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1910年铅印本，第5页。

(2) 《驻博尔多营次上眉帅书》，李逊编《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1910年铅印本，第4页。

(3) 《纪入觐及之齐齐哈尔署任概略》，宋小濂等辑：《赐福楼笔记》，光绪间印本，第18页。

(4) 《致徐菊人督部论创办新政之困难》，徐鼐霖等编：《赐福楼启事》，卷3，1907年版，第63页。

(5) 《复李尧琴太史论筹边事宜》，同上，卷1，第22页。

(6) 《提用荒价遵行新政折》，程德全撰：《程中丞奏稿》，卷8，1910年版，第13页。

(7) 《致徐菊人督部筹维补救市面之法》，《赐福楼启事》卷4，第1页。

(8) 《徐世昌致军机处电》，《程中丞奏稿》附录3，第20页。

(9)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

(10) 《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沪军都督陈其美提议在上上海组织临时议事机关电》，载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重印本，第1辑，第4页。

(11) 《致大总统及地方议会宣告就任书》，汪德轩编：《程雪楼先生书牍》，卷上，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编辑，第1页。

(12) 《程德全密电稿》（未刊）1912年5月22日电。

(13) 《民立报》1912年6月27日。

(14) 《民立报》1913年5月20日。

(15) 《时报》1913年7月18日。

(16) 《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

(17) 《时报》1913年7月26日。

(18) 锋镝余生编：《南北恶感新文牍》卷3，1913年版。

程家柽

潘荣

程家柽，字韵荪，又作润生、润森或韵笙。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出生于安徽休宁县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程牧园，系光绪初年举人，母早亡。程家柽少年时在家乡跟随徽州著名学者胡卓峰读书，1897年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他愤于清政府丧权辱国，屡与同学谈论“满汉种族之别”[(1)]，产生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情绪。

1899年，程家柽被两湖书院选送去日本留学，考入日本帝国大学农科。他到东京后，即到处寻访孙中山。时孙中山主要在横滨华侨中秘密活动，行踪不定，程“百计求之，不克一见”[(2)]。后经侨居东京的广东香山人郑可平介绍，始得晤见。第一次见面，程家柽聆听了孙中山关于革命纲领和目标的讲述，深受鼓舞，表示要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树党全国，以传播之”[(3)]。以后，程家柽就经常带领留学生去见孙中山。钮永键、刘道仁、万廷献等都是经他引见，与孙中山相晤，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程家柽积极参加中国革命者在日本的各项革命活动。1901年，他协助秦力山、戢翼翚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宣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次年，他赞助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4月，拒俄运动爆发，程家柽被留日学生推举为拒俄学生军（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归国运动员。清政府获悉程在日本的活动，将其从两湖书院除名。1905年宋教仁创办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程任编辑长，专司事务工作。

革命运动的高涨，迫切要求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程家柽为实现革命派的联合，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多次向宋教仁等阐述孙中山

的革命主张，以促成其与孙中山合作。是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抵日本，程专程从东京赶往横滨迎接。随后，又将此消息遍告东京留学生。孙中山至东京后，程即邀集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晤见，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孙中山向宋教仁、程家柽等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4)]。30日，孙中山、黄兴召集在东京的各省革命人士共同协商，决定成立同盟会，程家柽应邀参加。当天，程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程并与孙中山、黄兴等七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等演说之后，程家柽倡议设革命本部于东京，并设分部于国内各通商口岸，得到与会者的赞同。20日，同盟会成立后选举了领导机构，程家柽被推选为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

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中日反动当局的恐惧。11月日本文部省徇清政府要求，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对留学生的活动进行限制。在如何对待《取缔规则》问题上，留学生一时分成两派：以胡瑛、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人，成立“联合会”，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一部分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另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面对两派的对立，程家柽唯恐引起更大的分裂，力主调和，组织“学界调停会”，终于使两派互相谅解。

程家柽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准备回国开展活动，曾规划三策：一、运动清政府和军队大员，“一举推倒政府”；二、在国内各地普遍发展革命党人，“以期一地发难，首尾相顾”；三、在粤滇边境起义，震动腹地，振奋人心[(5)]。为此，1906年2月，他应京师大学堂之聘回国，任农科教授。程到北京后，利用担任肃亲王善耆家庭教师的机会，一面秘密进行革命宣传，一面多次掩护和营救革命党人。1907年，胡瑛在武汉被捕，经程说项，得免死刑；白逾桓在沈阳谋举事被徐世昌拘捕，程也大力营救。为避清政府迫害，不久，程再度赴日。

此时，正值同盟会经费告急，以至《民报》无法刊行。程家柽曾设法找清政府陆军部尚书铁良拿到一万两银子充作经费。但是，程的这一举动却为许多革命党人所误解。刘师培见有机可乘，通过日人北一辉等策动程家柽，许“以十万金鬻孙文之首”[(6)]。程未为所动，并即以此情报告刘揆一、宋教仁等，使刘师培的阴谋未能得逞，程家柽因此遭到刘师培所策动的日人殴打。

1909年程家柽复返北京活动。时熊成基、孙竹丹企图将所获日本秘密图籍售与俄国，以充革命经费，得到程家柽的支持。不幸事泄，程家柽冒险掩护孙竹丹走避[(7)]。次年，汪精卫、黄复生因谋杀摄政王载沣被捕，程又通过善耆向载沣进言，使汪、黄得免于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张绍曾与蓝天蔚秘密策划围攻北京，程家柽居中联络，并准备在北京城内接应。后因吴禄贞被暗杀，计划落空。嗣后，他协助白逾桓、汪精卫等人创京津同盟会于天津。他与白逾桓等人不顾经费匮乏和保皇党恐吓，坚持印行《国风日报》，大力鼓吹民主共和。程的革命党人身份公开后，善耆、铁良极为恼恨，曾派人行刺，但未得逞。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程家柽为幽燕招讨使。程婉辞未就。后应安徽军政府之召，充该省高等顾问。由于程家柽长期在北京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经常出入于善耆门下，南京革命党人多对其表示怀疑，有人甚至视其为变节分子，不准他出席革命先烈追悼会。黄兴、宋教仁为其多方辩白，宋还特地撰写近万字长文，历述程家柽的革命活动。宋就任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后，拟以程为次长，程婉言谢绝。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程家柽一度返回家乡休宁，“欲效黄梨洲之隐南雷，收辑故人之遗迹，尽力表彰，以付后世”[(8)]。1913年3月，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程闻耗痛哭，发誓报仇。嗣后，他奉黄兴之命赴皖赣两省，协助柏文蔚、李烈钧布置讨袁军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海外，但程家柽决心留在国内，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并表示“不能屠彼，则为彼屠耳”[9]。为揭露袁世凯称帝阴谋，程撰写了《袁世凯黄粱梦》一文，公开揭诸报端，痛斥袁世凯的狼子野心。1914年初，程与熊世贞等人组织“铁血团”，图谋暗杀袁世凯。不久熊世贞在津被捕，计划泄露，程也被捕。审讯时，程家柽大义凛然，历数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致使“问官失色”[10]。9月23日，终被袁世凯政府以“逆谋”罪名，杀害于北京，终年四十二岁。

主要参考资料

吴彩玉（程家柽儿媳）口述记录（1983年1月）。

---

(1)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4页。

(2)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34页。

(3)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35页。

(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院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5)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38页。

(6) 白逾桓：《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记跋》，《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中央文物供社”1969年版，第225页。

(7) 冯自由：《孙竹丹事略》，《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并参见《熊成基被捕案》（《录呈熊成基供词》），《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

(8)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45页。

(9) 景定成：《程家柽革命事略书后》，《革命人物志》第6集，第221页。

(10) 景定成：《程家柽革命事略书后》，《革命人物志》第6集，第221页。

程潜

沈荆唐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882年3月31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三日）生。父亲程若凤，世代耕读。程潜九岁入塾，习读“四书”、“五经”，曾从工诗词的塾师学得五言古诗，因此终生酷爱五古。他十六岁考取秀才，翌年进长沙城南书院学习，1900年考取岳麓书院正课生。他爱国救民心切，毅然弃文从武，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翌年夏留学日本，进入振武学校。他在东京结识黄兴、宋教仁、李根源和李烈钧等人，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于12月加入革命同志会。翌年8月，加入同盟会，谒见孙中山，衷心服膺三民主义。1906年，程在振武学校结业后，分派在姬路野炮兵第十联队实习一年，于1907年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与李烈钧、唐继尧等同席。

1909年2月，程潜学成回国，至四川成都任朱庆澜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参与编练新军工作。1910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成立，朱庆澜任统制，程任正参谋官。

辛亥武昌首义，正请假回里奔父丧的程潜闻讯后即赴汉口，在黄兴统率下担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参加汉阳战役。后回湘，任湖南都督府参谋部长。1913年3月任湖南省军事厅长。7月，他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讨袁，组成讨袁军援鄂；后又接应江西李烈钧讨袁军入湘。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离湘去沪，10月潜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在东京与李烈钧、李根源等组织欧事研究会联络革命同志，任该会干事。1915年11月，他奉孙中山之命与李根源回国推动反袁斗争。翌年1月至昆明，加入蔡锷护国运动，任护国军湖南招抚使，率一营部队经贵州至湖南讨袁、驱汤（芗铭——湖南督军），4

月5日一举攻克靖县，建立护国政权，集合旧部，编成三旅队伍，任护国军湘军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誓师讨袁。5月初，他率部沿邵潭公路向长沙方向进军，22日抵邵阳。6月6日袁世凯死去，程率部征讨汤芗铭，于7月6日进入长沙。但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程愤而辞职，离湘赴沪，所部交谭改编。

1917年8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程潜奉孙之命至湖南边境策动旧部响应护法，推动衡阳、永州于9月18日宣布独立，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他率实力单薄的护法军迎战段祺瑞派出的“援湘军”，在萱州河激战八昼夜，挫败了北军的攻势，凭险相持；后得护法桂军支援，收复邵阳，并推进到湘潭、株洲一线，11月16日进占长沙，1918年1月27日又克复岳州。段祺瑞调集直皖两系兵马合力攻湘，程终因兵寡力弱，械弹匮乏，步步退却，直至郴州。1919年6月离郴州至韶关，次年赴沪。

1920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程潜被任命为陆军次长。程悉心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于1921年10月在桂林任大本营陆军总长。翌年6月陈炯明叛变，程率千余人在沙基、韶关等地抗击叛军。不久，程任讨逆军总司令，同李烈钧等人指挥粤滇湘桂各军合力讨伐陈炯明。1923年2月，程任大本营军政部长，再为孙中山筹划北伐，并任东江讨逆总指挥，征讨陈炯明叛军。是年冬，在广州创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任校长。1924年11月，任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翌年6月回师广州参与平定刘、杨叛乱；7月大本营改组成立国民政府，程为国民政府十六名委员之一。9月东征陈炯明，他任左路（第三）纵队长，指挥攻鄂军和樊钟秀建国豫军、李明扬赣军，由龙门向河源进击，克河源，占老隆，下兴宁，占梅县，11月9日至大埔，直追残敌入闽。

1926年1月，程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程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任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辖邓彦华第十七师、胡廉第十八师、杨源濬第

十九师共九团及两个炮兵营。北伐开始后，第六军作为总预备队北上。9月初，程任中路总指挥，率第六军和第一军王柏龄第一师入赣，从通城出发，与孙传芳军主力谢鸿勋部血战八昼夜，力克修水、武宁；又与反攻的卢香亭部作战十余日。他获悉省城南昌守敌不多、防务空虚，工人、学生又愿起义内应，乃率部于19日进占南昌。孙传芳大惊失色，急命郑俊彦、邓如琢等部回师猛攻。程督战坚守，但腹背受敌，兵疲弹尽，援军朱培德部又未赶至，乃于23日下令撤退；但遭敌围攻甚紧，将士拼死突围，程化装易袍剃须泅水渡过赣江，抵达万寿宫。是役第六军牺牲过半，第一师几近全师覆没。程重整旧部，又攻建昌、修水，歼灭企图西犯的刘凤阁、毕化东两混成旅。11月初，程指挥所部参加总攻江西之役，亲自率领军部全体参谋、副官赴前线督战，向守敌猛攻，3日攻占芦坑车站，4日再夺乐化车站，5日占领军事要地涂家埠。8日，北伐军进占南昌，江西底定，第六军移驻高安、奉新一带休整。

1927年1月，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率第六军及鲁涤平第二军、贺耀组独立第二师，由赣东北沿长江南岸东进直趋南京。江右军3月6日占芜湖，23日先头部队攻下雨花台，进入南京城，缴获枪械三万余。其时，直鲁军大刀队在溃退时沿途砍杀无辜市民；败兵逃至下关渡江未成，折回城内大肆抢劫；入城的江右军中某些违纪乱兵则于24日乘机抢劫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及外国教堂、商店等。24日下午3时许，泊于长江的英美兵舰炮轰南京，中国军民死三十余人，伤数十人，酿成南京事件。程潜24日入城后，兼管南京卫戍事宜，迅即平息骚乱，同时同英美领馆交涉，阻止事态扩大。27日，他赴沪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会议，察知蒋将发难，急赴汉口报告。在蒋介石派员追踪下，程化装舍舟登陆，逃至湖口避险。但所部第六军被蒋遣散改编，后程在汉口重新编组第六军。

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党”反共和“分共”后，国民党宁、汉双方协商合作，程潜至九江参加会谈。宁、汉两方联合沪方西山会议派于

9月16日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程潜被汉方推为特别委员，并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0月19日，李宗仁与程潜分任西征军第三、第四路总指挥，率师沿大江两岸并进，讨伐以“护党”之名反对中央特委会的唐生智。11月15日进占武汉后，程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又进兵湖南，剿抚兼施，下岳阳，占长沙，2月连克湘南各地，程任湖南省主席。3月，李宗仁至武汉任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旋以程不尊其领导、不向其上缴税收，而于5月21日以“跋扈飞扬，把持湘政”的罪名加以拘禁，免除程之本兼各职，其第六军则被遣散。程被拘禁半年之久，于11月28日始被解除“监视”。之后他寓居上海，聊以诗词自娱。1931年12月，程重新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2月任参谋总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程潜奉命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坐镇邢台。1938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三十余师兵力；2月又兼河南省主席。5月指挥兰封会战，部署薛岳、商震两部三面围攻土肥原第十四师团。6月6日敌陷开封，郑州危急，蒋介石下令花园口决堤，以黄河之水遏止敌军西进，程指挥所部乘势反击，相继收复豫北、豫东、鲁西许多失地。11月，程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统筹北方抗日事宜。1940年5月，调任副参谋总长，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5年12月，程潜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翌年7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1948年春，程在部属劝说下参加竞选副总统，但是他不敌桂系首领李宗仁和得到蒋介石竭力支持的孙科，在第四轮投票时退出竞选。6月，回湖南任省主席，8月，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同时还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他在湘境竭力扩充军队，编练新兵，不数月即掌握有近十万兵员。此时国民党统治已濒临崩溃，程潜乃派人与中共秘密联系。他对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认为除“战犯”一条外，其他各条均可

接受。此后他下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又相继分批释放监禁已久的“政治犯”；但仍对列名于“战犯”心存疑虑。1949年3月，他在南京遇见章士钊。章转告了毛泽东对程的期望，程疑虑顿消。此后程与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密议共谋和平，取得共识。5月，他签署《起义备忘录》，7月11日得到毛泽东亲笔复信。他拒绝去广州出任考试院长，也推辞了白崇禧请其去广西之邀约，而率绥署和警卫团队去邵阳，加紧筹备起义。8月4日，他与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长沙和平解放，所部一个兵团和三个军共七万多人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9月，程应毛泽东之邀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1968年4月5日，程潜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二编第一、二、五卷，中华书局1981—1996年版。

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

萧作霖：《追随程潜起义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版。

程星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程潜最近言论》，1948年3月印行。

程砚秋

林印

程砚秋，原名艳秋，字玉霜，满族。1904年12月20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他幼年丧父。六岁时，因家贫给京剧演员荣蝶仙立契为徒，学青衣，合同八年。学徒期间，程砚秋经常要为荣家做日常生活琐事，还挨打骂。十一岁开始登台演唱，十三岁倒嗓，声带音哑。这时荣蝶仙与上海戏院订立一个月的合同，要程去上海演出。先是，罗惇曧（字瘿公）曾看过程的演出，发现程很有培养前途；得知程在倒嗓期间将去上海演出，很着急，即向银行借七百元给荣蝶仙解除合同，让程提前出师。

程砚秋离开荣家后，十四岁到十六岁期间，由于罗的帮助，得到了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为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罗给程砚秋订下每日课程表：上午练声、练武功，下午学昆曲，夜间到王瑶卿家学京剧。每星期一、三、五罗还亲自陪程去看电影，让程学习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

京剧教育家王瑶卿教戏有个习惯，不到夜间十二点以后精神不来，王家客人又特别多，有时程砚秋接连几夜到王家去，也未必学到一点东西。但他仍然毕恭毕敬地等到天亮才回家。程这样兢兢业业，终于感动了王瑶卿，他看出程砚秋真心求学，从此每夜必教他一些东西。后来，罗又介绍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梅每次演出都为程留座，程从梅兰芳的演唱中也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程砚秋十七岁那年，嗓音渐渐恢复，开始独立成班，成立鸣和剧社。他聘请罗为他编剧，由王瑶卿导演配唱腔。程倒嗓期过后，嗓音未能全变，也没有全倒，出现了一种立音，即所谓“脑后音”。王瑶卿

启发和鼓励他利用自己“脑后音”的条件，创出一种独特的唱腔。程在传统的青衣唱腔基础上，吸收了各种地方戏以及外国音乐中优美的唱腔，融会贯通地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形成广大听众欢迎的“程腔”。他的唱腔，能深刻表达剧中那些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妇女的思想感情，于幽咽婉转、曲折低徊之中蕴涵着一种刚劲清新的力量。这是“程腔”最可贵的特色。

程砚秋幼年学艺受到的种种折磨，加上他生长的时代，对他的艺术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黑暗势力深恶痛绝，对受压迫的妇女深为同情。罗根据程砚秋的艺术思想，创作出合乎程个性的剧目。他们共同创作排演了十个剧目，大部分是反映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鸳鸯冢》被誉为“伟大性爱的悲剧”。以除奸反霸为主题的《青霜剑》，后来成为程派重要剧目之一。

1925年秋，罗惇曧因病去世后，金仲荪为程砚秋创作剧本。程和金合作编写排演的《荒山泪》、《春闺梦》，表达了广大人民反对内战的愤激情绪和抵御外侮的迫切愿望，使程派京剧艺术达到新的高峰。《荒山泪》一剧，程砚秋通过女主角张慧珠发出正义的呼声：“我不如拼一死，向天乞请，愿国家从此永久和平。”反映了广大人民遭受战乱、掠夺、流离失所的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愿望。《春闺梦》则是把杜甫的《新婚别》、《兵车行》和陈陶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意境，再现于京剧舞台。

除了罗惇曧和金仲荪以外，和程砚秋合作编写剧本的还有翁偶虹。《亡蜀鉴》和《锁麟囊》是程和翁合作创演的代表作。

1930年后，程砚秋接触了较多的进步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统治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1931年12月25日，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戏剧观时说：“一则从意义上去认识戏剧的可演不可演，二则从观众的感情上认识戏剧的宜演不宜演，守着这两个原则去演剧，演剧才不会倒坏。”程派二十多个保留剧目中，大多数是具有

对封建社会的反抗精神的。陈叔通曾说，程砚秋为人刚正，观其剧如观其人。

程砚秋不仅在剧目、唱腔方面有优异成就，在创造人物形象上如表情、动作、身段、特别是水袖工夫等方面，都达到精确完美、炉火纯青的境界。程喜好太极拳，经过长时间的艺术实践，他把太极拳的进退转运运用在舞台动作上，使他的表演动作更加优美。

1932年1月，程砚秋去西欧考察德、法等国家的戏曲音乐艺术，于1933年回国。他回国后发表《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对改革我国的戏曲音乐提出一些建议。程还与焦菊隐、金仲荪合作，参照欧洲戏剧教育经验，开办了北平中国戏曲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

程砚秋为人富于正义感，不满旧社会的种种黑暗，曾于1932年元旦改艳秋名为砚秋，改字玉霜为御霜，表明他的态度。北平沦陷后，有一次在北平车站碰见伪军“警务团”欺压同胞，他路见不平，立即挥拳向汉奸还击。以后他虽然多次受到日伪的威胁，但他仍拒绝为日伪演戏。他隐居到市郊青龙桥董四墓村务农，直到抗战胜利。

北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程砚秋欣庆旧社会的丧钟已响，新时代即将降临，特画梅花一幅寄意，并题诗云：“料得喜神将莅止，毫端先放几分春。”

1949年初，周恩来去程家探访，未遇。程到怀仁堂演出时，周又到后台慰问，使程深为感动。是年4月，程参加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同年秋，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0年以后，程砚秋曾到重庆、昆明、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喀什等地作巡回演出。同时对民间戏曲艺术作调查研究。1951年4月他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1957年10月，周恩来亲自介绍程砚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3月9日程砚秋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程砚秋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田汉等著：《程砚秋舞台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

成舍我

熊尚厚

成舍我，原名希箕，后改名平、汉勋，以笔名舍我行。祖籍湖南湘乡，1898年8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生于南京。父亲成壁（字心白）为安徽候补道，在安徽舒城充典史，清末任凤台县警察局长。成舍我幼年随父读书识字，1910年入安庆湖南旅皖第四公学。不久学校因经费支绌停办，他便辍学在家，辛亥革命后入安庆青年军当兵。

成舍我十岁时，其父因所管囚犯越狱逃跑被撤职，后经上海《神州日报》记者协助调查，举证该案系县令反诬，使其父得以平反，此事使他对记者非常敬慕。1912年春，成舍我闲居在家，即为安庆《民嵒报》撰稿。同年，他加入国民党，次年秋任《民嵒报》外勤记者。在二次革命反袁斗争中，他为了避祸前往奉天（今沈阳），任《健报》校对，不久任副刊编辑。1916年春，成舍我回到安庆办报反袁，被安武军倪嗣冲拘捕，后托人保释去上海。他以卖文为生，以笔名舍我写小说，并与陈独秀及《民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叶楚伧结识，未几入《民国日报》工作，先后任校对、副刊助理编辑，还与王纯根等组织上海记者俱乐部。与此同时，他加入南社，后因南社发生唐宋诗词之争，柳亚子驱逐社员朱鸳雏，成对之大为不满，与柳大开笔战，也被逐出南社。成愤而离沪去北京。

1918年春，成舍我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要求入校学习，被准为国文系旁听生，一学期后升为正式生。他一面读书。一面任北京《益世报》编辑，后升采访主任、主笔。在北大学习期间，他曾组织新知编译社翻译西方名著，并成立新知书社，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21年他在北大毕业，次年任《益世报》代理总编辑。1923年任北

京联合通讯社编辑，不久接管社务。

成舍我主持北京联合通讯社时，结识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及议员陈策等人，曾挂名为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总长秘书，得干薪数百元，由此积累了办报的经费。1924年4月，他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集经理、编辑、主笔、采访于一身，日出四开一张。翌年2月，又得当时财政总长贺得霖资助，再办《世界日报》，自任社长，以龚德柏为总编辑，由张恨水主编副刊《明珠》。同年秋又增出《世界画报》。

成舍我以办《世界日报》成功而开始闻名于报界。初期因受段祺瑞政府的资助，在言论上有所袒段，但仍能时常刊登独家新闻，也敢于替民众说话，加上副刊连载张恨水的小说，日销上万份。1926年春，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入关占据北京。为了钳制舆论，于4月封闭《京报》，杀害邵飘萍；8月，又杀《社会日报》林白水。成舍我忍无可忍，敢冒杀身之祸，独家在《世界日报》就林白水被杀发出哀悼和抗议，也被张宗昌逮捕。后经其妻杨璠托人，向曾任过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求救。经孙出面说情获释，成遂离北京去沪。翌年4月，他在南京创办《民生报》，得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等支持，自任社长。时值“四·一二”政变之后，南京国民党市党部通令党员登记，他以办报不受任何党派约束而自动放弃党籍。1928年1月，成舍我兼任司法部秘书。为了照顾《世界日报》，他常往来于南京、北平两地。1930年4月，成舍我借赴欧美交流学术文化之机考察欧美各国新闻事业，回国后锐意改革《世界日报》的经营管理。他改进版面，自设短波电台，每日撰写特讯，对报社人员严格管理，奖惩分明。两年后，他聘张友渔任主笔，大张抗日言论，一时成为北方有影响的大报之一。

1932年，成舍我被聘为国难会议议员。翌年为了培养德智兼备、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他在北平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分设初高两级，自任校长，热心于新闻教育事业。

成舍我在南京主办的《民生报》为一小型报，内容充实生动，言论富有锐气，敢于揭露当政者的腐败现象，发行量超过南京《中央日报》。1934年5月，该报揭露行政院政训处长彭学沛贪污案，引发一场官司。彭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求援，7月南京宪兵司令部竟以“泄露军事秘密”罪名将成逮捕。成坚持斗争，被汪精卫下令逐出南京。成乃前往上海，与萧同兹等筹办《立报》，以外抗强敌、内惩贪污相号召，于9月创刊。成舍我任社长，张友鸾、萨空了、恽逸群、张恨水、严谔声等先后任编辑，是一份具有独特风格的四开小型报纸，被称为“大报中的小报，小报中的大报”，1936年下半年日销逾二十万份。《立报》的成功，使成舍我的声名大噪。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北平沦陷，正在北平的成舍我被日本侵略者列名北平维持会成员。为了摆脱日军的魔掌，他于9月化装逃到上海。11月上海亦沦陷，《立报》被迫停刊，他撤至武汉，不久去了香港。1938年4月，陈诚等出资创办《香港立报》，他任陈诚的驻港代表，帮助主持《香港立报》的出版。是年7月国民党参政会成立，成为参政员。

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沦陷，成舍我于1942年春撤至桂林，再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1944年夏，新闻专科学校遭日机轰炸，他乃迁居重庆。之后，他复得陈诚等人支持，在重庆组织中国新闻公司，任常务董事兼社长，于1945年5月创办重庆《世界日报》，其副刊《明珠》常刊一些进步作家的稿件；同时复刊《世界画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成舍我到上海接收《立报》财产，将其出卖给陆京士等，然后回到北平复刊《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他在《世界日报》上宣传“第三条道路”，一面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一面要求共产党还军于国，鼓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他先后任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北平市参议会议员。1948年9月，成在南京筹备复刊《民生报》。不久，蒋介石在三大战略决战中遭到惨败，

南京政权摇摇欲坠，成南下至广州，于1949年末去香港。

成舍我到香港后，先是在一些报刊发表文章，1950年冬与王云五等创办《自由人》三日刊，任副总编辑，后任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冬，他去台湾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1956年与王云五等开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更名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任董事长兼校长。此外还任台北市报业评议会委员、主任委员及世界书局董事长。1987年成右眼失明，但仍从事新闻事业。次年1月台湾当局解除报禁，成于7月12日在台北出版《台湾立报》。

1991年4月11日，成舍我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成舍我：《由小型报谈到立报的创立》，台北《报学》第1卷第7期。

关国煊：《锲而不舍的新闻老兵成舍我》，台北《传记文学》第58卷第5期。

叶明勋：《成舍我传》，台北《国史馆馆刊》第13期。

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

褚辅成

王娟

褚辅成，字慧僧，1873年5月27日生于浙江省嘉兴南门梅湾盐井弄。父子仙，母殳氏。兄弟八人，排行居六[(1)]。五岁跟随兄长在家读书，十三岁跟曹焕章开笔，继从学于沈安甫。1894年，与沈安甫次女结婚，同年，入邑庠，然志不在科第。

1904年，褚辅成去日本求学，入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后转入法政大学[(2)]。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同年，受命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

回国后，褚辅成在嘉兴设立了南湖学堂，一方面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以学校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广泛联络同志，积极谋划革命。不少革命志士都曾来此筹划磋商，秋瑾也几次前来。因美国压迫华工，1905年—1906年全国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在家乡奔走呼喊，劝告邑人不用美国货。1906年，王琬青女士在梅湾街创立开明女校，并在道前街设立嘉秀女校，开嘉兴女学先河。褚辅成任两校校董。1907年，褚辅成与陈连江、沈稚岩等组织了禁烟局，宣传鸦片的危害，开展禁烟工作。又组织了不吸烟会，褚辅成被推为会长[(3)]。秋瑾就义后，褚辅成赴杭参加秘密安葬秋瑾，并与前来送葬的同志商议革命策略，议定将注全力于军队方面。

1909年，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溥仪继位。浙江旅沪的同志以为有机可乘，邀请浙江各地选派代表到上海开会，谋划起义，褚辅成、蒋志新代表嘉兴赴沪开会，但因刘师培告密，会议被破坏。1909年，杭州开谘议研究会，成立浙江谘议局，褚辅成被嘉兴推为议员。11月，赴上海参加七省谘议局代表召开的预备立宪公会，上书朝

廷，要求速开国会[4]。1910年，在西米棚下开设协源丝行。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8月，以商会会长名义，率领由吴兰圃、陈佑民等七十多人组成的嘉兴代表团，到江宁（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1911年秋，嘉兴大水，褚辅成与沈曾植等组织赈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主持上海同盟会活动的陈其美来到杭州，约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等在白云庵秘密议事，因意见不一，决定分头准备，七日后再议。在城隍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陈其美派姚勇忱来杭参加，会议决定发动浙东同志组织敢死队到杭州做先锋，分派王金发、姚勇忱、吕公望等分别前往绍兴、宁波、台州、金华等地组织同志来杭。同月，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光复会。10月下旬，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在城站召开会议，决定加紧准备，并公推褚辅成去上海与陈其美接洽军火、印信以及经费等革命事宜。陈其美让褚辅成先回去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随即送来。陈其美派庄之盘送来发难费3600元，吴文禧送来浙江都督印信，而革命同志数百人也已陆续抵杭，浙江革命党人商定11月5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顾乃斌等负责。在商量都督人选时，褚辅成考虑到威望和号召力，推荐了汤寿潜[5]。因上海于11月3日起义，浙江就提前一天即11月4日采取行动，到11月5日，杭州光复，成立了浙江军政府，汤寿潜被推为都督。在革命军各军官及参加光复杭州之各地领袖举行的会议上，王金发提议改选都督，废除汤寿潜。不少人也随声附和，褚辅成力排众议，力主汤为都督。于是议决都督暂不更动[6]。都督以下，设政事和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荧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任警察局长。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临时政府，汤寿潜任交通部长，蒋百器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以政治部所管事务过于繁重，提省议会对政治部进行改组，分设民政、财政、教育、提法四司，褚辅成任民政长。

褚辅成在主浙江政事时期，非常重视新政权的政治建设，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组织了临时省议会和主持制定《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7]。拆除了杭州驻防旗营的城墙，使杭州城与西湖合而为一。拆除旗城的同时，在菩提寺路建造了两百间平房，将旗人集中于此。将旗营土地，全部改建为新兴市场。同时开辟马路，修建六个湖滨公园，种植花草，修建座椅等[8]。他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点，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的烟土过境浙江，也予以扣留。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遭到褚辅成的严词拒绝。面对恫吓之言，他表示：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绝不动摇。浙江的禁运禁售政策，得到很好的执行[9]。1913年，朱瑞任都督，不久，褚辅成被免职。免职背景，一是褚辅成主持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辅成厉行禁止鸦片贸易[10]。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此前的3月20日，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遭暗杀，引起舆论大哗。褚辅成联合议会的同志，反对袁世凯大借款一案，还领衔提出弹劾袁世凯，成为袁的眼中钉。袁世凯下令将他逮捕，关押在安庆狱中。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褚辅成获释。

褚辅成获释后，立刻到上海去谒见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总统后，恢复了临时约法，继续召开国会，褚辅成又到北京。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南下广州护法，8月，褚辅成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组成了非常国会，并继病故的陈国祥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11]。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国军政府大元帅。1918年5月，孙中山辞大元帅职。褚辅成离穗回沪。

1921初，在上海发起组织全浙公会，致力于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倡导地方自治，并倡联省自治。任浙江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后任省宪法会议副议长（议长王正廷）。曹锟以重贿当选总统时，褚辅成是拒贿议员之一。1924年8月，齐燮元、卢永祥发生战争，褚辅成在上海设立救济灾民会。10月，与吕公望等在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失败。1925年冬，发起“五省废督运动”。1926年，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主张三省为民治区域，一切军政、民政均由人民推举委员会处理。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后的决议，设立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张静江为主席，未到任前由蔡元培代理，下设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财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由张静江为主任委员，未到任前由褚辅成代理，并由褚兼任民治科长。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派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褚辅成和沈钧儒因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而被捕。4月20日，二人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但也因此被蒋介石视为异己分子而遭到排挤。

1926年夏，褚辅成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来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潘力山被特务暗杀，董康辞职。褚辅成以董事长兼任校长，沈钧儒任教务长。1928年1月，校董事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褚辅成兼任校长为正式校长，选钱新之为董事长。褚辅成厘定章则，增设合作银行及实习法庭，供学生实习；改本校图书馆为“力山图书馆”，以纪念潘力山副校长。自1930年起，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褚辅成担任院长一职长达二十一年。上海法学院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有王造时、楚图南、史良、沙千里等著名人士。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蔡廷锴、蒋光鼐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3月3日，日军攻占上海，战事结束。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生日，日本驻沪部队在虹口公园举行大会庆祝“天长节”，实际上是为了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朝

鲜独立党员尹奉吉将炸弹投到会场，成功炸死侵沪日军最高司令白川义则、日本居留民团团长河端，重伤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等人。朝鲜志士金九参与其事，被日军通缉，褚辅成设法护送金九到嘉兴避难。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咨询性质的机构，参加者是全国各抗日党派领袖及无党派知名人士。褚辅成是国民参政会中代表浙江的参政员，浙江代表人数几经变动，褚辅成均连续当选，且连续九次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褚辅成在参政会的提案涉及征兵、严禁壮丁吸食鸦片、粮食、物价、救济等多个方面。

在此期间，褚辅成先后参加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并任万县办事处主任。1940年7月，褚辅成来到万县，9月，办事处正式成立。在万县，褚兼任川东禁烟督导团团长，任用一批督察员，分赴区乡进行禁烟。查处了陈昌儒（万县第四区长）、张伯仁（第六区长）、郑佐（第五区长）等人的烟毒贪污案。褚辅成关心民众生活，对地下党员进行保护。1942年还创办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1943年，褚辅成被任命为参政会全国经济建设策进会滇黔区主任，离开万县，赴云南昆明。

由于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共的7名参政员拒不参加第四届参政会，褚辅成等参政员对此深表焦虑。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1945年7月1日，褚辅成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欢迎。六参政员与中共举行了会谈，并起草了《延安会谈纪要》。褚辅成年纪大，长途劳顿及会谈使其疲惫不堪，第二天就身体不适，除参加正式会谈外，没有什么个人活动。

1944年5月4日，与许德珩、税西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呼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并与许德珩同被选为理事。1946年1月，以褚辅成、许德珩、梁希等为委员组成了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召开。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褚辅成致开会词，许德珩报告筹备过程，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项目。褚辅成、许德珩等被选为常务理事。1947年，在上海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掀起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在上海病逝。

---

(1) 庄一拂：《褚辅成先生年谱（修订稿）》，嘉兴市文史委员会编《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162页。

(2) 褚律元：《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纪念祖父褚辅成先生》，《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1页。

(3) 庄一拂：《褚辅成先生年谱（修订稿）》，《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167页。

(4) 关国煊：《褚辅成（1873—1948）》，《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148页。

(5) 关国煊：《褚辅成（1873—1948）》，《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149页。

(6) 关国煊：《褚辅成（1873—1948）》，《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152页。

(7) 范展：《辛亥革命时期的褚辅成》，《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33—35页。

(8) 阮毅成：《记褚辅成先生》，《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54页。

(9) 庄一拂：《褚辅成先生年谱（修订稿）》，《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175页。

(10) 褚律元：《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纪念祖父褚辅成先生》，《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5页。

(11) 关国煊：《褚辅成（1873—1948）》，《嘉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153页。

褚民谊

黄美真　张云

褚民谊，原名明遗，字重行，浙江吴兴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其父褚吉田是当地名医，教子甚严，令其幼年时读“四书”、“五经”，受儒家思想熏陶。1898年，又让他到苏州天赐庄传习医院向美国人柏乐文学习英语。1900年，褚回乡入浔经公学，开始阅读中西文学书籍，并接触数理化等科学知识通俗读物。

1903年，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先入高中，后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阔了视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是热血青年，他们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示强烈不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怀着极大的义愤。褚民谊受反清思潮影响，也参加过留学生的某些政治活动。

1906年，褚民谊随同乡张静江去法国，途经新加坡时，由同盟会会员尤列、陈楚楠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抵法国巴黎后，即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世界画报》等刊物，出版各种小册子，“鼓吹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主张民族解放、教育平等、思想自由”[(1)]，宣传反清思想。

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初上海亦告光复，褚民谊回国到上海。经黄兴介绍，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后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褚民谊赴南京任职。仅三个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落入袁世凯之手。已经十分松散的同盟会亟谋健全和扩大组织，以与一时纷起的党团争逐，于1912年4月24日在上

海成立总机关部，5月4日改名“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2)]，举姚勇忱、吕天民为正副部长，褚民谊为总务长。但是同盟会的组织继续涣散，8月又与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许多革命党人表示消沉，褚民谊也不例外。同年9月，他再次赴欧，求读于比京自由大学，重过学校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褚民谊离开欧洲，经地中海抵达槟榔屿，“橐笔报界，致力于实际革命工作”[(3)]。这时，国内政局更加动荡，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日益暴露，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懑。1915年春，褚民谊随张静江回国，在上海参与倒袁活动。9月褚第三次赴欧，在法国与蔡元培、汪精卫等组织“华法教育会”，办理华侨及留法学生诸公益事。期间褚信仰无政府主义，宣传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学说。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该校副校长。同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专攻组织学。1924年，以“兔阴期变论”毕业论文，得医学博士学位。

其时，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1924年底褚民谊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并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1926年1月，褚民谊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褚民谊于10月辞去广东大学及广东医学院所兼各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广州负责后方医务。11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在粤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先后取道湘、赣前往武汉。褚民谊随第二批出发，与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等人于12月底到达南昌。这时蒋介石欲以南昌为都，将他们截留在南昌。不久，褚民谊乘蒋介石派他前往北京苏俄大使馆交涉“驱逐鲍罗廷”的机会跑到上海，但他没有北上，直接前往武汉，参与“迎汪复职”活动。

1927年4月初，汪精卫回国，经上海去武汉。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公开分裂。褚民谊追随汪精卫，参加武汉南民政府的反蒋活动。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促成宁汉合流。9月，褚民谊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汪精卫因未能掌握到主要权力，出走九江，策动唐生智另组武汉政治分会；又南下赴粤联合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地盘。汪精卫的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内各方责难，处境孤立，不得不于年底出国赴欧。追随汪精卫的褚民谊则跑到上海，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褚民谊为了保持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此后很少与汪精卫公开联系。1928年2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褚民谊仍列名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卫生事宜，先后访问了瑞士、德、法、比等国，在各大学讲演国民党历史及国民党政府之政策。归国后，历任国民政府卫生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褚民谊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后任中比庚款委员会中国委员长、上海医师公会执行监察委员等职。在国民党内争的年代里，褚民谊表面上不偏不倚，声称“本党同志对于反共之主张已渐趋一致”，因此“在理宜互相团结，无复异议”，“虽政见各有不同，意志容有参差，要当顾全党德，遵守党纪，不宜各逞意志，互走极端，致失友谊，而分党力”[(4)]。但实际上，他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和“军阀主义”的主张相呼应，提出“政策统一、权限分明、分工合作、事实求是”，要求“武装同志本佳兵不祥之遗训，而止戈为武，实行化兵为工政策”[(5)]，为汪精卫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在“共赴国难”的幌子下实行暂时的“和平统一”，形成所谓“蒋汪合作”的政治局面。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联袂入京”，汪任行政院院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褚民谊应汪精卫之邀，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34年又兼任国民党

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所谓“国术”的研究，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并改传统的太极拳为太极操。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注重于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实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6)]。1934年国民政府正式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的官方纪念日，褚民谊对此有极浓的兴趣，亲赴山东曲阜主持纪念活动。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受伤，辞行政院长职出国治疗，褚民谊也同时辞职，后来在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文化教育。

1937年11月10日上海沦陷前夕，褚民谊由南京返上海，因中法国立工学院事，未随国民政府西撤。次年七八月间，曾两次赴汉、渝，对汪精卫通过高宗武与日本接洽“和平”事未曾与闻。12月汪精卫逃出重庆，于29日发表《艳电》。褚民谊为了表明“清白”，于1939年春召集中法国立工学院师生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并于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表示对汪的“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7)]。

1939年5月上旬，汪精卫潜赴上海，即秘密召见褚民谊。经汪的“启发”、“诱导”，褚决定参加“和平运动”。由于褚民谊在国民党内原来就享有较高的地位，同时又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因而落水后，就成了汪伪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同年8月底，汪精卫一伙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褚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并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褚于9月6日发表对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劝降电，对蒋介石改变十年内战期间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表示“痛苦”，鼓吹抗战不能持久，“长此相持，国不成国，民无噍类”，因此“当和则和”。他美化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无领土野心，不割地、不

赔款，不妨害吾之独立自由，是吾人抗战之目的已达”。要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毅然决然，打开僵局，从速结束战事。依据近卫之所声明，以为直接谈判之基础”。“推派代表来沪，共商国是”[8]。一派汉奸论调，不以为耻。

此后，褚民谊追随汪精卫积极筹组傀儡政府。1940年1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组织还都筹备委员会，褚民谊任委员长，负“筹备还都”之责，到南京“着手修葺府院会各部、各衙门”[9]。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褚民谊副之，并兼任伪外交部部长。

褚民谊走马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即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对日广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感谢”，要中日两国“扫除过去之误解与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各出赤诚，共成其事”[10]，建设东亚新秩序。

同年7月，汪日“调整国交”谈判在南京举行，褚民谊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谈判。11月30日，汪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汪政权获得日本的公开承认，日本则从汪政权那里获得了在沦陷区内所想获得的一切。为了掩盖卖国罪行，12月10日，汪伪召开“庆祝大会”，褚民谊代表汪精卫发表演说，声称日汪条约的签订，“扫除过去纷扰之原因，确立将来亲善之关系”[11]。接着，褚民谊被派为“驻日大使”，其“行政院”副院长职由周佛海兼任，“外交部长”则由徐良代替。褚赴日后不仅为实施“基本关系条约”谋取汪日间的“根本协调”，还四出奔走联络，先后与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签订条约，取得这些国家对伪政权的承认。

1941年10月，褚民谊回国复任“外交部长”，继续秉承汪精卫意旨，为日本侵略战争政策效劳。12月8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挑起太平洋战争，伪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宣布对于与日交战的各国外交官、领事官今后概不承认其职务之执行。翌年5月下旬褚任访日特

使，将汪伪“与日本同甘共苦”、“争取最后胜利之决心，传达于日本皇室”[12]。1943年初，汪伪政府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褚民谊声明“我们和友邦日本处于同生共死的同一命运之中，我们决定齐奋步伐，携手迈进，争取我们共同的胜利”[13]。同年10月，褚民谊又参与“中日同盟条约”的签订。期间，褚民谊还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德文化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扩大侵略战争摇旗呐喊。褚的所作所为，深获日本军国主义欢心，日本天皇特赠褚民谊一等旭日大绶章一枚。

褚民谊为汪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老人，一切听命于汪精卫夫妇指挥。1944年11月汪死后，陈公博任代主席，褚民谊认为凡事不使之预闻，让他跑龙套，毫无意义，要求辞职。后经周佛海等人从中斡旋，才同意暂留南京。1945年7月，褚民谊秉承陈璧君意旨，辞去外交部长职，去广州任伪广东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和广州绥靖主任，企图加强对广东的控制，做垂死挣扎。

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褚民谊梦想逃脱对他的惩处，立即向蒋介石大献殷勤，表示“负责治安”，并积极组织“警备司令部”，亲兼司令，“严令各师长、各县长，各守本位”，等待蒋介石“派员接收”[14]。10月14日，褚民谊在广州被国民政府军统局诱捕。次年4月经江苏最高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行，判处褚民谊死刑，同年8月23日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处决。

---

(1) 萧瑜：《褚民谊博士小传》（1929年7月20日），《文华》1929年第5期。

(2) 《民立报》1912年5月5日、6日。

(3) 萧瑜：《褚民谊博士小传》（1929年7月20日），《文华》1929年第5期。

(4) 褚民谊：《北伐以来之回顾与希望》（1928年11月），《褚民谊最近言论集》，大东书局1929年版。

(5) 褚民谊：《北伐以来之回顾与希望》（1928年11月），《褚民谊最近言论集》。

(6) 吴稚晖：《国术源流考序》（1936年5月），载褚民谊编《国术源流考》，正中书局1936年版。

(7) 《褚民谊自述》（1945年11月11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信汉奸笔录》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90页。

(8) 褚民谊：《致重庆中央执监委员电》（1939年9月5日），建高编辑部编《褚民谊先生最近言论集》，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9) 褚民谊：《对于苏高院检察官起诉书之答辩》，《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第301—317页。

(10) 褚民谊：《对日广播》（1940年5月4日）。

(11) 《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1日。

(12) 《中华日报》1942年5月30日。

(13) 《中华日报》1943年1月12日。

(14) 《褚民谊自述》（1945年11月11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信汉奸笔录》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90页。

褚玉璞

张学继

褚玉璞，字蕴山，山东汶上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其曾祖曾任都司、守备等武职，其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家道中落。褚玉璞早年两次投考保定军校均未被录取，一怒之下投身绿林，纠集一批赌徒、恶棍打家劫舍，在众多匪徒中以凶悍暴戾著称。有一年，褚玉璞率领一批匪众救出被清朝官府关押在监狱的刘姓土匪首领。该匪首因受刑太重，被救出后仅两个月死去，临死前将其子刘振邦托付给褚玉璞做义子，他手下的一百多名匪徒也悉归褚玉璞节制指挥。从此，褚玉璞声势更大，成为横行于山东、江苏边境一带的著名匪首。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在北洋军进攻徐州时，出身于胡匪的江苏讨袁军第三师骑兵团长张宗昌在部队被打散后，摇身一变投靠了北洋将领冯国璋。冯国璋随即命张宗昌重组队伍，他除收编残部外，还收编了二三百人的褚玉璞匪帮，编成一个团，随即率领这个团南下，担负攻打南京西门的任务。9月1日，北洋军攻克南京。12月，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次年被授予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为了加强对江苏境内军队的控制，决定成立江苏军官教育团，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1916年5月，张宗昌根据冯国璋的旨意，主持暗杀原沪军都督、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张宗昌令程国瑞与褚玉璞执行，但在暗杀行动当天，褚玉璞借故逃避，实际由程国瑞完成 (1) 。

1918年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将侍卫武官长张宗昌外放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随即前往南京编组部队，褚玉璞奉派到当年为匪首时经常活动的鲁、皖、苏边境招募新兵，将一批土匪招入了部队。江苏第六混成旅共三个团，约六千名官兵，褚玉璞任营长。改旅

成军后未经训练即编入张怀芝统帅的北洋援湘军第二路军开入湖南与南方护法军作战。因战功突出，冯国璋下令将江苏第六混成旅扩编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张宗昌任师长，褚玉璞任该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故，张宗昌失去唯一靠山，所部孤悬南方，处境艰难。1921年3月，张宗昌所部被直系江西督军陈光远约五个旅的重兵包围于宜春，张宗昌见大势已去，只身一人化装逃出重围跑到北京，褚玉璞按照事先的约定投降了陈光远，但不久还是被陈光远缴械。褚玉璞遂重返鲁、苏交界的丰县、沛县一带，继续土匪生涯。

1922年春，褚玉璞听说张宗昌已投奔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立即赶往东北面见张宗昌请罪，表示愿意继续追随。是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指挥褚玉璞、程国瑞、王万金三个支队司令，他们召集了五六百人的队伍潜入山东，准备在原山东督军张树元的内应下，推翻山东督军田中玉。当他们潜入山东时，才发现田中玉已经为他们布下天罗地网，结果除褚玉璞、张宗昌等少数几个人逃回东北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当褚玉璞等逃回东北时，奉军也在直奉战争中战败，张作霖将其司令部撤退至山海关，自封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宣布东北“独立”。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对峙之际，张作霖后院起火，原吉林师长高士傧受吴佩孚的策动，自封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在黑龙江五站一带拉起一支近两万人的队伍，准备颠覆张作霖的老巢。张作霖在腹背受敌之际，紧急起用张宗昌去平叛。张宗昌带着褚玉璞等亲信及张作霖拨给他的一营宪兵从沈阳北上，一路上招兵买马，到达哈尔滨后，又得到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的枪支弹药补给，张宗昌以少胜多，击败高士傧，张作霖喜出望外，立即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芬河）（东）宁镇守使，所部第三混成旅下辖三个团又两个营四个连，褚玉璞任该旅第五十五团团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李景林、张宗昌任镇威军第二军正、副军长，李、张各率所部分两路自奉天进攻

直系占领的热河，热河都统米振标指挥的毅军是北洋杂牌部队，战斗力低下，一触即溃，李景林很快进驻承德，抢到热河都统的宝座后，所部不再前进，以后的作战由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来担任，在玉麟山一线先后与直军主力董政国、时全胜、阎绍堂等部接触，战斗中，褚玉璞发挥其凶悍作风，率领部队猛打猛冲，血战数日，击溃直军精锐时全胜部，击退董政国、阎绍堂等部，突破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冷口，然后经过二十四小时急行军，进抵直隶滦州车站，切断直军退路。当直军主力六七万人从山海关像潮水般溃退下来的时候，被张宗昌全部截住，并全部予以收编，张宗昌所部一下子拥有了十万上下的兵力，战后，论功行赏，张宗昌升任第一军军长，褚玉璞因为“功劳最大”[(2)]，升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三旅旅长，成为张宗昌手下的第一大将。

张宗昌、褚玉璞随即率领大军南下，赶走江苏军务督办齐燮元，唾手取得江苏（包括上海）地盘。1925年初，张作霖授意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4月24日改任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到济南走马上任，又收编了前任督军郑士琦的部队，所部扩编为十余个军，褚玉璞任第六军军长。不久，著名匪首孙殿英投奔张宗昌，张宗昌将孙殿英的土匪武装全部编入第六军。从此，褚玉璞、孙殿英这两个土匪军阀惺惺相惜，朋比为奸。

1925年10月，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起兵反奉，深入江苏、上海、安徽的奉军未做多大的抵抗即北撤，张宗昌为保住山东地盘，指挥所部与孙传芳部在徐州一带展开激战，结果张宗昌吃了败仗，不得不退到徐州以北。这一仗，张宗昌所部官兵折损一万余人，其中第四十七旅全军覆灭，旅长施从滨被孙传芳枪杀，孙宗先的第五师损失过半。

一直觊觎山东地盘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见张宗昌在徐州吃了败仗，便于1925年11月兵分两路进攻山东：一路是岳维峻收编的原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个师，经由徐州进攻鲁南，后加派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另一路是岳维峻的嫡系李纪

才第九师，由河南兰封、归德进攻鲁西。战争首先在鲁南打响，战斗异常激烈。12月初，张宗昌向鲁南增兵三四万人，由褚玉璞任总指挥，经过艰苦作战，击败了靳云鹗指挥的南路，生俘靳云鹗等将领。解决南路后，张宗昌集中兵力反攻李纪才等部，将其赶回河南境内。

12月下旬，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击败，李景林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并请求将其残部撤退至鲁北。经过商讨，决定李景林的直军与张宗昌的鲁军合组直鲁联军，张宗昌任联军总司令，李景林任联军副司令，褚玉璞任前敌总司令。从1926年3月中旬起，直鲁联军分三路向国民军发起反攻，褚玉璞率领的西路率先攻入天津，根据事先约定，北京政府于3月21日任命褚玉璞署理直隶军务督办，从此开始了褚玉璞对直隶近两年的黑暗统治，褚玉璞搜括钱财，滥杀无辜，其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直隶人民开展了反对褚玉璞反动统治的斗争，正定人民抗捐，玉田、遵化农民反抗“旗地变民”，直隶南部红枪会的斗争等。

1926年8月，褚玉璞破坏了中共设在英租界里的天津地委机关，杀害了地委书记季达等人。1926年11月25日，褚玉璞通过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包抄了设立在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的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天津市党部，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了江震寰等十五人，然后引渡到天津警察厅关押，并于1927年4月18日在天津南开广场将江震寰等四名中共党员及十一名国民党党员杀害。1927年1月，褚玉璞又破坏了设在法租界普爱里七十二号的中共领导机关，傅茂公（即彭真）等三十多名革命者被捕，后经中共天津地委营救出狱。

1926年5月10日，直鲁联军将领及已经下台的李景林联名发表通电，公推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副总司令。12月，张作霖在天津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任安国军副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根据张作霖的统一指挥，张宗昌、褚玉璞再次率领军队南下，支援孙传芳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下游一带作战。

1927年春，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中路军从浙江、安徽分数路向南京、上海挺进，坐镇南京的孙传芳见形势危急，经与张宗昌协商后，将其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撤退至扬州，褚玉璞指挥直鲁联军十余万人及白俄兵一团守卫南京。从3月20日起，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与中路军的江右军向南京发起进攻，经过三天战斗，相继扫清南京外围据点，褚玉璞令直鲁联军收缩到南京城内。3月23日，程潜指挥江右军三个纵队对南京城发起攻击，第二纵队第四师进攻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向武定门、通济门进攻；第一纵队进攻中华门。龟缩在南京城内的褚玉璞，为避免全军覆灭的命运，决定主动放弃南京，23日中午，褚玉璞命令直鲁联军从下关渡过长江，撤退到江北的浦口，旋即退往徐州。

直鲁联军全线败退，张宗昌沮丧万分，这时他又得到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淞沪防守司令毕庶澄在上海驻扎期间与蒋介石有通款的嫌疑，不禁恼羞成怒，起了杀机。张宗昌将褚玉璞从徐州召到济南，让其执行处决毕庶澄的任务。褚玉璞与毕庶澄本是金兰兄弟，但迫于张宗昌之严命，又不得不执行，褚玉璞将毕庶澄召到济南，即将毕庶澄与随他来的旅长马文龙一起捆绑，褚即宣布毕庶澄通敌谋叛的罪状，并出示张宗昌的手令，将二人枪决后向张宗昌复命。

1927年6月16日，褚玉璞与孙传芳、张宗昌等发表通电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所有部队统编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方面军，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兼第二军军长，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军团长兼第十五军军长。第二、七方面军与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共同负责津浦铁路线作战。

7月上旬，第一、二、七方面军在津浦铁路线上对南京方面北伐军发起反攻，身为前敌总指挥的褚玉璞手持张宗昌密令，在前线督战，令官兵有进无退，凡敢后退者，一律立即正法。7月24日，第一、二、七方面军从北伐军手中夺回徐州。8月1日，蒋介石亲赴前线督师严令各路反攻徐州，结果中了张宗昌的诱敌深入之诡计，不仅没

有能够夺回徐州，反而全线败退，从徐州向南溃退数百里一直退到长江以北才停下来。

8月21日，张宗昌到北京与张作霖会商后决定，津浦线作战完全交由孙传芳主持，第二、七方面军则专注于陇海线上对付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从10月上旬开始，第二、七方面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以陇海线为中心的豫东进行了马牧集之役、兰封附近两次大战及徐州争夺战。马牧集之役，第二、七方面军小胜。随后的两次兰封大战，第二、七方面军均由褚玉璞担任前敌总指挥，这是两次大规模的会战，双方出动的兵力达万人以上，双方官兵往往白刃肉搏，战斗异常激烈。两次大战均以第二、七方面军失败告终，前后两次会战损失兵力在五万以上。其后展开的徐州争夺战，第二、七方面军虽然暂时守住了徐州，但很快有出现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从津浦、陇海两面夹击徐州的战略态势，12月15日，张宗昌下令放弃徐州，分路防守鲁南，各路统归褚玉璞指挥，张宗昌则坐镇济南[(3)]。

1928年1月24日，褚玉璞与张宗昌、孙传芳以庆贺春节为名到北京，与张作霖讨论政治军事形势，针对宁汉合流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再度北伐的局势，决定以张宗昌、褚玉璞为津浦线作战的正、副总指挥，褚玉璞并兼大名方面总指挥，孙传芳则调为鲁西总指挥。此时的直鲁联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的打击下，接连败退。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下令放弃济南。褚玉璞率残部困守天津，所部将领徐源泉、何绍南等相继投奔蒋介石，最后仅剩下卫队，已成光杆的褚玉璞只好逃出天津前往冀东滦州与张宗昌会合。张、褚一再要求张学良允许他们开往关外，但遭到严厉拒绝。走投无路的直鲁军残部官兵五万余人在滦州全部被缴械，张、褚化装后乘坐小船出滦河口经渤海湾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大连。

褚玉璞与张宗昌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直野心不死。1929年2

月，褚玉璞、张宗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潜入胶东策动旧部准备赶走刘珍年夺取胶东地盘，结果遭到失败，张宗昌狼狈逃回大连。4月22日，褚玉璞在福山县城被刘珍年活捉，刘珍年将褚玉璞软禁牟平县城，在逼迫褚之家属交出四十万元（也有说五十万、三十万元者，其说不一）赎身费后，于1929年8月20日在牟平将褚玉璞枪决。

---

(1) 张用宾等：《褚玉璞的发迹与殒命》，《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2) 张用宾等：《褚玉璞的发迹与殒命》，《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上册。

(3) 吕伟俊：《张宗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5页。

慈禧

周衍发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又称“西太后”，1835年11月29日（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生于满族镶蓝旗贵族家庭，曾祖父吉朗阿任户部员外郎，祖父景瑞做过刑部员外郎，其父惠徵为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

1851年（咸丰元年），那拉氏以秀女入选进宫，次年被咸丰帝封为兰贵人，1854年由贵人晋封为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载淳，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从此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钮钴禄氏。她得到咸丰帝的宠信，时常批览奏章，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携带后妃、子女和一批官员逃往热河承德行宫，留下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䜣 与英法侵略军进行谈判。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在承德病危，遗诏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赞襄一切政务；与此同时，咸丰又赐给皇后和载淳各一颗印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为符信。慈禧则以载淳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次日咸丰帝病死，六岁的载淳继帝位，年号祺祥。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别加上徽号，称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俗称东太后和西太后。

其时，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了独揽朝政，凭借咸丰遗诏和清皇室祖宗家法紧握实权，规定赞襄政务王大臣管理政务，代表皇帝拟定上谕；章奏不呈内览。内外臣工呈递的折报只写“皇上”，不准书

写“皇太后”字样，不愿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以限制她们的权力。慈禧对此非常不满，为了从载垣、肃顺等人手中夺取大权，慈禧在取得慈安的赞同下先利用恭亲王奕䜣到热河叩谒咸丰的梓宫时给予召见，密谋策划政变的计划。随后，由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召载垣面谕照所请传旨，而载垣等则以祖宗旧制向无垂帘之礼为由予以拒绝，由于争执激烈，吓得小皇帝直哭。当10月30日咸丰的梓宫由热河运回北京时，慈禧趁机把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载垣、端华和肃顺分割开，由肃顺护送梓宫由大路回京，令载垣、端华随两宫从小路先回北京。当慈禧一行抵京时，又获得握有兵权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的支持，他奏请皇太后亲理朝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次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四人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维纪纲而防流弊。慈禧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不久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等五人均被革职，改年号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1861年12月2日（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载淳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䜣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慈禧登上了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宝座。1861年是农历的“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或“祺祥政变”。英国人卜鲁斯（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当时评论这次政变说：“宣示太后听政，任恭亲王为首撰，桂良、文祥等人并有任命，总之大家认为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1)

慈禧“垂帘”后采用奕䜣提出的“借洋兵助剿”的政策，勾结英、美、法侵略者组织“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并借用俄国的武器和士兵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组织湘军、淮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以及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苗民、回民起义。

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因染天花病死，慈禧选中醇亲王奕谟 的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即光绪皇帝，仍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19世纪60至90年代，慈禧太后支持奕䜣 、曾国藩、李鸿章等依赖外国的支持，开办了近代的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编练新式陆海军，进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在中国胜利的形势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授权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使法国势力侵入我国云南省和广西省。

1886年9月2日，光绪帝年满十六岁，已到执政年龄，慈禧太后同意奕谟 所奏，在皇帝亲政后请慈禧太后再行训政数年。1889年3月4日，慈禧虽然撤帘“归政”，但仍牢牢控制着清廷的实权。

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虽然中国人民及爱国将领左宝贵、邓世昌等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指挥无能，清军先后在平壤和中国东北、山东的作战中失败。日本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朝鲜完全“自主”，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以及赔款、开商埠，同时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等内容。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加深了中国半殖地化和民族危机。

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1898年（戊戌年）4月，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引见维新人士，从6月至9月颁发了一系列维新变法诏书，推行新政，从而也触动统治阶级中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

慈禧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反对变法，于是年6月15日将支持变法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罢职回籍，借以孤立光绪。同时

又下令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慈禧已经归政，这一违反常例规定的目的，是仍把人事任命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日，慈禧还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北洋三军。9月21日凌晨，慈禧携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重新临朝训政；同时大肆搜捕维新人士，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林旭等六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罢斥，废除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使变法失败，史称“戊戌政变”。

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废弃光绪帝由溥儁代之，这就是“己亥建储”。由于未获得英、日等国公使和一些地方督抚的支持，废立计划未能得逞。

1900年，在山东爆发了以农民为主的自发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不久义和团发展到京津地区。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是年6月英、俄、美、法、德、日、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进攻中国。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发泄所传外国要她“归政”给光绪帝的愤恨，于6月21日向各国“宣战”；但她又企图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慈禧命令京津等地区的官员指使义和团在第一线进攻使馆、教堂；但没有几天她下令停止围攻使馆并派官员送蔬菜水果粮食冰块到使馆、教堂表示慰问；29日慈禧命令驻外使馆向各国说明“宣战”系被迫，“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乞求谅解，并表示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2)]。慈禧还默认东南地区的督抚大员们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条款》，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阻止义和团向南方发展。

慈禧尽管采取对外妥协、对内屠杀义和团的方针，八国联军还是加紧向北京进犯。慈禧和光绪帝等于8月15日凌晨被迫逃离北京；同

时命令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为议和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当慈禧一行逃抵山西崞县后，便正式颁旨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赔款四亿五千万海关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各国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不得在界内居住；外国有权在北京到山海关沿线十二个据点驻兵，拆毁大沽和京津沿线的炮台；惩办开罪外国的官员；禁止成立反帝组织等条款。这个条约使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但是慈禧却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并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3)]。

《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帝国主义急切要求下，1901年10月，慈禧挟光绪帝，带“行李车”三千辆，离西安出潼关经河南、直隶，于1902年1月回到北京。慈禧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为了讨好各国和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欺骗人民，抵制革命，她表示要参照“西法”，改弦更张，切实整顿政事。在给各国的国书里，慈禧特意表白说：“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异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4)]

1901年4月，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以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主持“新政”的施行。随后在新政的名义下，陆续颁布了一些目的在于稳定清朝统治的法令，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以及准许满汉通婚等。

慈禧为了更有效地抵制革命，便拉拢资产阶级上层，欺骗广大民众；同时企图通过改革官制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1905年，慈禧表示：如果宪政能使“清朝基础永远巩固”，“民间革命之说自归消灭”，经过考察“确无弊窦”，便决议仿行立宪。同年，

慈禧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去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1906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准备从改革官制着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立宪的“预备”。

1906年11月，慈禧公布中央官制，行政中枢军机处照旧不变，并增至11部。次年清政府又公布地方官制，将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陆军部和度支部。同时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地方督抚中最有权势的大官僚袁世凯和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

1908年8月，在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和立宪派请愿活动高涨的形势下，慈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这个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保留君主专制特权，皇统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法律议案须经皇帝核准施行，人民自由可由诏令限制，宣战、媾和由皇帝决定，用人司法由皇帝总揽，人民没有真正的权利。同时，还颁布了《议院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明定是年至1916年共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

慈禧年事已高，但却“万机待理，心力俱殚”。当她度过七十四岁生日之后，病情加重。1908年11月14日被囚禁的光绪在瀛台含恨死去，慈禧为了继续把持最高权力，将光绪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的继承人，年号宣统。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授载沣为摄政王，一切军国政事，秉承慈禧的“训示”，“裁度施行”。就在第二天即11月15日，这个掌握同治、光绪两朝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的统治者在宫中病死。1909年11月16日葬于定陵东菩陀峪，称定东陵。

---

(1) 《卜鲁斯致英外交大臣罗素的信》，《历史教学》1952年第4期。

(2) 《有关义和团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28页。

(3) 《有关义和团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88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3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二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二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D

达浦生　陆琢成　朱正谊
戴安澜　严如平
戴季陶　郑则民
戴戡　马宣伟
戴笠　江绍贞
邓宝珊　王劲
邓初民　江绍贞
邓铿　严如平
邓锡侯　林松柏
邓演达　周天度
邓荫南　陈民
邓泽如　娄献阁
丁超五　李锡贵
丁福保　陆柏年
丁贵堂　任嘉尧
丁默邨　朱佩禧
丁惟汾　娄献阁
丁文江　耿云志
丁西林　张奇林
董康　宗清元
董其武　李倩　邢宇
董显光　任嘉尧
董作宾　王世民　冯时
都锦生　徐和雍
杜斌丞　李敬谦　宋新勇

杜定友　张洁
杜锡珪　陈贞寿　刘传标
杜聿明　王俯民
杜月笙　江绍贞
杜重远　陈宁生
端方　董方奎
端纳　汪仁泽
段祺瑞　李宗一

F

樊钟秀　胡金福
范光启　史全生
范汉杰　夏军
范绍增　陈章文
范旭东　熊尚厚
范源濂　熊尚厚
范筑先　姜克夫
方鼎英　段荫南
方椒伯　汪仁泽
方声洞　范启龙
方声涛　陈孝华
方液仙　任嘉尧
方振武　颜平
费巩　王玉如　毛正棠
费孝通　杨清媚
丰子恺　林印
冯德麟　武育文
冯国璋　李宗一
冯玉祥　陈民
冯占海　霍燎原
冯治安　吕乃澄

冯自由　陈民
傅抱石　倪波　沈道初
傅东华　王震
傅斯年　熊尚厚
傅筱庵　汪仁泽
傅作义　李仲明

G

盖叫天　李仲明
冈村宁次　沈荆唐
高崇民　丘琴　姜克夫
高凌霨　张树勇
高星桥　熊尚厚
高旭　郭长海
戈公振　熊尚厚
龚心湛　马陵合
辜鸿铭　陈民
古应芬　萧栋梁
谷正伦　熊宗仁
顾颉刚　王煦华
顾品珍　李希泌
顾维钧　何小清
顾毓琇　王娟
顾祝同　颜平
关麟徵　沈荆唐
关伟林　汪仁泽
光绪帝　周衍发
桂永清　颜平
郭乐　江绍贞
郭琳爽　徐鼎新
郭松龄　任松　武育文

郭泰祺　邵桂花

H

憨玉琨　庞守信

韩复榘　沈庆生

韩麟春　武育文　苏燕

韩永清　徐凯希

郝鹏举　王家鼎

何北衡　袁嘉新

何成濬　江绍贞

何键　李静之

何廉　徐凯希

何香凝　尚明轩

何应钦　李仲明

贺衡夫　徐凯希

贺耀组　刘世善

贺衷寒　刘敬坤

洪深　查建瑜

洪式闾　叶炳南

侯德榜　熊尚厚

侯镜如　戚如高

侯西反　陈民

返回总目录

达浦生

陆琢成　朱正谊

达浦生，名凤轩，字浦生，以字行，经名努尔·穆罕默德，江苏六合人。他是中国伊斯兰教知名的大阿訇，也是回族中有影响的爱国教育家。1875年5月14日（清光绪元年四月初十）出生于一个研究回文的家庭。

达氏一姓是在元朝时期由新疆来至内地的，他们的祖先达布台是元朝的一名将军，曾官居台州路（今浙江省浙东地区），元亡后他的一支子孙定居六合，以达为姓。

达浦生的父亲达象乾，是六合县伊斯兰清真寺的阿訇。达浦生青少年时代跟父亲学习经文和阿拉伯文，1893年他自肩行李，长途跋涉来到北京，以求深造。

北京的回民很多，其中心清真寺是历史悠久的牛街清真寺。这里的教长是对古兰经义和阿拉伯文、伊朗文造诣很高的王浩然阿訇。达浦生就是慕名北上拜王阿訇为师的。达氏抵京的第二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事的结果不仅迫使中国忍受割地赔款的痛苦，而且造成中国面临瓜分的危机。失败的耻辱深刻地激发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爱国心，也激发了青年达浦生的爱国思想。他师事王阿訇时，还时常听到老师讲述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关陕甘和云贵等地的回民起义的故事，他感叹时艰，更坚定了爱国思想。当时大多数回民只学习阿拉伯文，念诵经文，不重视汉文学习，尤其西北边远地区，甚至有反对读汉文书本的。这就造成回民的文化水平与汉民有一定差距。王浩然认为应举办回民学校，提高回民文化，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达浦生赞同这一主张，并决心为其实现而尽力。

1899年，达浦生完成学业后，北京的教友们曾邀他留京担任阿訇，他没有接受，抱着为回民做些切实的基础工作的决心回到家乡，六合县的教众就请他担任本县清真寺的教长。在此期间，达浦生在城内创办了一所广益启蒙学堂，招收回民子弟入学就读。它是六合县最早成立的学校之一。他在推行新的教育内容时，耐心地向教众宣传不应囿于经堂教学，而应让子弟学习汉文和数学等新的内容。他勇于任事、辛勤办学，颇得当地回族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1907年，王浩然阿訇从土耳其回国时邀来两名土耳其籍教师，把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回文学堂扩充为回文大学。教学内容除了原有的经义、回文之外，增加汉文、数学及一些时务知识课。达浦生应王阿訇的邀请再度来到北京，因王阿訇年事较高，由达主持校务。这所大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知名的马松亭阿訇，即是该校毕业生。

1912年民国成立，是年秋马邻翼（字振五）任甘肃提学使（后改称教育司长、厅长），邀达浦生担任省视学兼回民劝学所所长。达去兰州赴任，在职六年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当时宁夏、青海均为甘肃省辖地）各地，辅导各县开办学校，有些地方需留驻在那里一两个月，直至学校开学上课，才转往别处。达浦生辛勤而踏实地推动回民教育，为地方作育人才，使他在甘肃回族民众中享有声望。回民中发生纠葛，也常请他出来排难解纷。

1918年，他自甘肃返回六合，再次从事家乡的回民教育工作。20年代初，上海福佑路清真寺邀请达浦生去沪任教长。为了筹集兴办回民教育的经费，上海的几位从事国际贸易和交通界的教友，合组了一个进行对外贸易的商号——协兴公司，准备以经商盈利所得资助教育。达浦生有意于出国，作游学考察，于是就作为协兴公司的一员代表于1921年出国，先至麦加朝圣，游历中东，回途畅游印度、马来亚、槟榔屿、新加坡，并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住了相当时期。他在考察各地穆斯林居民的教育情形的同时，也结识了不少伊斯兰教界领袖和名流。

1928年，达浦生从南洋回到上海，福佑路清真寺的教众再三恳切地邀请他担任教长。达浦生借主麻日礼拜的机会，作了一次演说，讲述国外见闻，并建议在上海办一所伊斯兰师范学校。教众踊跃认捐，次年于西门内方浜路青莲街建成一座三层大楼，一、二层为敦化小学，三层为伊斯兰师范校舍，秋季开学上课。小学部大多数为伊斯兰教众子女，师范部招收回族青年培养师资和研究古兰经义，毕业生选优资送前往阿拉伯国家留学深造。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阿拉伯语学者马坚教授，就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岁末福佑路清真寺被日军占领，伊斯兰师范也被迫停办，该校学生不少人奔赴后方参加抗战工作。达浦生在上海租界内安置完毕清真寺和伊斯兰师范各项事务之后，目击日军野蛮暴行，为坚持抗战尽一己之力，认为有必要向国外宣传抗战，向伊斯兰教国家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唤起国际舆论共申正义，援助中国抗战。他在上海组成一个中国回教抗日宣讲团，得到教众及校董的赞助，乃于1937年9月由沪出发，一路经香港、新加坡、南洋各埠至巴基斯坦，与当地伊斯兰教领袖真纳会见，得到真纳的热情接待。再由巴基斯坦西行至开罗，在开罗埃兹哈大学作多次公开讲演，声讨并宣传日军侵华的种种罪行，呼吁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共申正义援助中国抗战。他发出要为拔掉插在祖国土地上的日本旗子而竭尽全力的誓言。他以阿拉伯文写了一册《告世界同胞书》。埃及国王法鲁克及皇后特为接见他，并设筵款待。此行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向中东各国的反宣传被一扫而清，中东各国的报纸纷纷刊载谴责日军暴行的文章、图片与新闻消息。

1939年夏，达浦生回国前往重庆。当时《新华日报》记者专程采访，发表报导，誉为爱国阿訇。后方社会各界及政府也对达的国外宣传抗战表示赞扬。为了给抗战作育人才，经过达浦生的多方努力，把上海伊斯兰师范迁移后方，择定在甘肃平凉复校，校名定为平凉伊斯兰师范，于1939年10月开学。学生除战区西来的回族青年外，亦就

地招收回民青年。校长一席仍由达浦生担任。其后由于“法币”贬值，学校经费困难，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乘机于1941年将平凉伊斯兰师范改名国立陇东师范，并由教育部直接管辖。1943年教育部另派校长，达浦生改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住西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达浦生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常债台高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总理的邀约来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与伊斯兰教界人士发起筹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并任该会副主任。他还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1958年起任院长。达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加强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52年率领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去麦加朝觐。1955年他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任代表团的顾问。1954年起，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宗教组长，第三、四届常委。他又受聘为最高人民法院顾问。

1965年6月21日，达浦生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达浦生：《自传手稿》，未刊。

陆廷珏辑：《达浦生年谱资料》，未刊。

戴安澜

严如平

戴安澜，原名衍功，学名炳阳，号海鸥，1904年11月21日（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生，安徽无为人。父亲戴礼明，在乡务农，生活贫困。戴安澜六岁入塾，学习勤勉，十二载不辍。1922年9月，考入南京安徽公学高中部就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年后辍学回乡当塾师，向村童传授文化知识。

其时，戴安澜的远房叔祖父戴端甫在粤军第四师任团长，写信回乡说孙中山将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戴安澜即和本乡一批热血青年于1924年春奔赴广州。他报考军校，虽成绩优良，但体质瘦弱，未被录取，便投入粤军安身，注重锻炼体格。1924年末再考，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入伍生队，翌年7月升入学生队。他在军校学习刻苦，追求进步，参加了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事，受到战火洗礼。192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副官，不久升为排长。

戴安澜1927年春被派至东莞，担任黄埔入伍生第二团第八连第三排排长，带领入伍生担任东江防守任务。翌年，他调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参加北伐奉系的战事。1929年，他调至中央军校担任区队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他被派往教导二师任迫击炮连连长，在兰封附近作战时右臂负伤，旋因战功升任营长、团附；战后升任第四师补充团团长。

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戴安澜部由蚌埠经正阳关进入皖西，在霍邱、金家寨、阜阳等地作战。战后戴调任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五团团长。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1933年3月初侵占热河，逼进长城，全国震惊，同声谴责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调集黄杰第二师、关麟徵第二十五师、刘戡第二十三师北上，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戴团从蚌埠出发，北上进抵通县集结。此时敌军已分兵攻击长城各口，我抗日将士奋力抗击。3月10日第一四五、一四六团等在古北口与敌军第十六旅团展开激战。虽然伤亡惨重，但士气高昂，经过三昼夜恶战，连续三次击退敌人进攻，毙敌二千，戴也在战斗中负伤。稍后戴团迂回退守到南天门高地。战后戴获五等云麾勋章。长城抗战后，部队经过整训，又转战陇绥、天水、平地泉、定远营等地，戴因战功获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七七”抗战爆发后，戴安澜率部从陕西醴泉出发，沿陇海路东进，驻防河北定县。8月，戴升任第十三军第七十三旅旅长。9月下旬所部在保定漕河与南下的敌军交战，抗日将士奋勇抗御，敌军增兵重围，猛烈炮击，七十三旅伤亡严重，被迫撤出阵地。嗣后戴率部奔赴漳河一线，阻击南犯之敌。11月初，戴旅进驻磁县彭城镇。

在日军疯狂进攻占城掠地的恶劣形势下，戴安澜注重对广大官兵的思想教育，鼓励大家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坚定抗日救国信念。他带领大家总结作战的成败得失，制订了作战要诀：长兵短用，短兵长用；高兵低用，低兵高用；势险节短，战无不胜，守无不固。

1938年3月，戴安澜七十三旅随第十三军编入第五战区序列，参加台儿庄战役。戴率部在向城、洪山镇阻击北面之敌，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坚守中艾山，四个昼夜击退了敌军数十次进攻。战后，戴升任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并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干部训练班教育长。他采用新式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典范令，辅以战场实际经验，提高各级干部的指挥作战能力。嗣后在武汉会战中，戴率部进抵瑞昌、阳新一线。8月初敌主力第九师团自九江溯江而上，在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戴指挥所部诱敌进入山区，利用有利的隐蔽地势

步步阻击敌军西进，大量毙伤敌人。

1939年1月，戴安澜升任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二〇〇师是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两个战车兵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还有汽车兵团、工兵团、炮兵团、搜索装甲兵团各一，装备精良，官兵素质较高。戴就任后，率师移防广西全州，进行整训。他着手改进军事教育，手编《磨励集》两部，阐述班排连之攻防与射击，并作《战场行》一歌，教全师学唱。11月，二〇〇师挺进桂南，参加昆仑关之战。戴先指挥一个团赶到南宁北郊二塘三塘，阻击从钦州湾登陆进犯南宁的敌军。敌第五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强攻前进，于11月24日侵占南宁，12月4日又攻占了昆仑关。12月18日起，杜聿明指挥第五军各师为收复昆仑关全面出击，与敌猛烈交火。敌我双方均用步兵、战车、大炮、飞机协同作战，炮火连天，杀声四起。戴指挥高炮还击敌机之空袭，指挥五九八团击毁敌军坦克、火炮，坚守阵地。经过与敌军反复争夺，昆仑关三失三得，艰苦异常，终于12月31日完全收复；接着又于四天后攻克九塘。戴在巡视前线阵地指挥战斗时，被敌人炮弹击伤，后至柳州治疗。在南岳会议总结时，他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在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12月16日蒋介石决定派遣第五、六、六十三等三个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开赴缅甸，协同英军抗击日军，戴安澜率领二〇〇师先至保山集训待命。1942年3月2日，戴至缅甸腊戍接受蒋介石召见，奉命将摩托化骑兵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到腊戍，以策应英印军在缅甸展开保卫战，掩护第五军主力集中；其余各团进驻平满纳、同古。其时日本侵略军第三十三、五十五、十八、五十六等师团分三路向北推进，8日占领仰光。戴安澜为阻敌军继续北犯，派出摩托化骑兵团和步兵团第一连在皮尤河南岸接替英军前哨阵地，于3月19日拂晓伏击日军，炸毁大桥，敌几辆军用汽车尽覆。我埋伏的机枪反复扫射，击毙日军三十余名。首

战告捷后，戴即指挥所部构筑工事，固守阵地。敌军旋即配置强大火力猛烈进攻，而我第五军第九十六师、新二十二师等部未能按计划集中。戴师孤军奋战，退守同古城。戴在3月22日的家书中说："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敌军炮空配合以猛烈炮火整日轰击，戴指挥我抗日将士勇猛还击，以集束手榴弹、汽油瓶等与敌军坦克展开搏斗。在敌军24日占领克容网机场，切断公路，以重兵三面包围同古之时，戴召集全师团营长会议，勉励大家固守同古，为国家民族争光。并宣布：若我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他部署三个步兵团留在同古城内坚持战斗，自己带领师部至桥东指挥战斗。为阻止敌军进犯同古，他指挥官兵火烧森林。被阻之敌27日又施放糜烂性毒气，我抗日将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坚守阵地，抗御四倍于我又火力极猛之敌。只因援军隔阻，补给中断，经过连日苦战，于29日夜奉命撤离同古。戴率部突围成功，向叶达西转移。

同古之役，戴安澜率二〇〇师苦战十二天，歼敌五千余，延缓了日军北进的步伐，掩护了七千余英军的顺利撤退，声震中外。蒋介石驰电嘉奖，颁发奖金一百万元，并于4月6日在梅苗召见戴安澜说：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美国军方也称赞同古之战是缅甸保卫战中坚持最长的防卫行动，应该赢得巨大的荣誉。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4月5日到叶达西说：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4月11日，戴安澜率师到达平满纳，21日由乔克巴当调回梅克拉提，向棠吉推进，24日攻克棠吉城。此时，敌第五十六师团北进，次第侵占腊戍（29日）、畹町（5月3日）等地，侵入我国国境百余公里，进至怒江畔惠通桥。5月5日，戴师奉命向伊洛瓦底江以西八莫、密支那方向转移，但敌于8日抢占八莫、密支那，转移计划无法实现；乃改从罗列姆经南盘江、梅苗、南坝以西归国。二〇〇师在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原始森林和丛草藤蔓中艰难跋涉，古树遮

天，毒蛇猛兽和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而沿途可行之道多被敌人封锁，敌机又低空轰炸不止，我抗日将士只能曲折迂回地摸索前进，常常在雨水中行军和露宿，染患疟疾者甚众。5月18日夜，二〇〇师在郎科地区通过细包——摩谷公路时，与敌第五十六师团两个大队遭遇。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所部与敌激战，伤亡惨重。在夜间混战中，戴胸部、腹部各中一弹，伤势甚重，用担架抬回师部指挥所。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继续指挥所部突围，勉励部属奋力杀敌。戴因伤重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于5月26日随二〇〇师突围至缅北芳邦村时逝世。遗体于29日火化后，遗骸于6月17日随部队运回到云南腾冲，后在全州安葬。

戴安澜逝世后，国民政府于1942年10月6日颁令追晋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29日颁授戴安澜懋绩勋章。1943年4月1日为其在全州隆重举行全国性的追悼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1956年9月21日追认戴为革命烈士。

主要参考资料

《戴安澜将军传》，重庆《扫荡报》1943年11月26日。

《戴安澜将军之死》、《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将军日记》、《戴故将军传略及殉国经过》，贵阳中央日报社编印，1942年版。

戴蔚文：《戴安澜先生传略》，台北“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十二卷，“国史馆”1994年版。

郑洞国、郑庭笈：《昆仑关攻坚亲历记》，崔贤文：《昆仑关战斗》，《粤桂黔谈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郑庭笈：《第二〇〇师入缅抗战经过》，黄志超：《转战同古、棠吉和过野人山经

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远征印缅抗战》编审组编《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戴安澜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戴季陶

郑则民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湖州，其先人入川经商，定居广汉。父戴小轩，出租土地，兼业中医。

戴季陶六岁入塾读书，并读过一些西洋史。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到业师徐炯的影响，倾向反满。1905年秋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秋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会长。戴季陶在留日期间与蒋介石相识。

1909年夏，戴季陶自日本毕业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习。翌年春往上海，先入《中外日报》谋职，后在《天铎报》任主编，以天仇为笔名撰写社论，抨击清廷腐败，言论激越。1911年春被官府通缉，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戴季陶回到上海参与反清武装起义，继而创办《民权报》。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戴以新闻记者身份晋见，并随孙中山往南京。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专制野心日渐暴露，戴曾在《民权报》上著文揭露。6月，当唐绍仪内阁辞职时，他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1)] 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1913年2月，随孙中山访问日本。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讨伐袁世凯，戴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参加了《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返回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嗣后，军政府改组，戴与孙中山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吴兴（即湖州），与张静江多所交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戴季陶同情工人运动，在他和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讨论劳动问题，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情况。但他主张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6月在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戴季陶说：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不从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2)]。在一段时间内，他还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由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于同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出。他在这些文章中虽然运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然而他说“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3)]，“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4)]。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不必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5)]。1920年夏前后，他与陈独秀等人颇多接触，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过一些活动，但后来却以某种借口拒绝参加组织。

戴季陶在1920年研读《资本论》的同时，和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经营证券买卖等生意[(6)]，颇有所获。他们以所得之部分利润资助粤军回粤讨桂。翌年经营失败，信用上出现危机，乃退出了交易所。

孙中山在遭到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后，仍谋恢复广东，1922年10月底命戴季陶入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当戴所乘的船驶向宜昌的途中，得悉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无法下手，顿觉“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7)]，便趁夜投江自杀，幸为渔民救起未死，从

此他便信仰起佛教来了。

戴季陶在四川住了一年，没有完成孙中山交付他的任务。1923年12月上旬，他从四川回到上海。当他得知孙中山已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时，表示“根本怀疑”。他写信给廖仲恺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做为正菜的。”[8]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随后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他对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气氛非常不安，曾几次离粤返沪。直到同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离粤北上，路过上海时，他才又随同绕道日本北行。到天津后，他以“国内政治之事，非我所能胜”为借口又折回上海。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危，戴到了北京，赶上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遗嘱，时为1925年3月11日。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原来以拥戴孙中山面目出现的一些人，开始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戴季陶这时也就无所顾忌了。他以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封，“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9]。在他的鼓动下，1925年4月24日，黄埔军校内一些人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5月，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反对国共合作。他在上海设立了“季陶办事处”，一段时间内，专门从事反共的“著述”。6、7月间，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以建立“纯正三民主义”为己任，阉割新三民主义精神，被人称为“戴季陶主义”。其基本要点是：（一）用“道统”论把三民主义解释为渊源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仁爱”学说，是两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10]。（二）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1]。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的性

能”，来解除被剥削者的痛苦。（三）以团体的“排拒与独占性”主张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说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是“癌肿”，应当在适当时机加以割除。

戴季陶的这些论说，歪曲了孙中山的基本思想，是在当时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右翼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戴季陶的两本书出版后，受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批判，也受到进步群众的谴责，广州、北京、武汉等地群众愤怒地把他的小册子烧掉，斥责他是“新右派”的头目。后来戴季陶承认，自己受到“很大的攻击”[(12)]。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人，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戴季陶同邵元冲、沈定一等也前往赴会。会议前夕，有人认为戴、沈曾与中共发生过关系，把他们绑架出去并痛殴一顿，威胁他们不准与会。戴返回上海，但仍然留下书面声明，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给予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以开除党籍处分。对于戴季陶因其“未曾与会”为理由，只在关于弹劾“决议”中，“促其反省，不可再误”，“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13)]，并仍选他为中央执委。会后，戴季陶来广州负责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的改组工作，10月戴任中山大学委员长。在“改组”工作中，戴通过学生停课复试和教员停职另任的办法，排斥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后，戴季陶离开广州到江西去，追随在蒋介石的左右。戴同张静江、黄郛等一起参与密谋策划，共同为蒋介石确定了一个“谋略纲要”，其核心内容是：“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等的“谅解”等等。1927年2月，戴受蒋介石的派遣赴日本活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进行

会谈，寻求日本对蒋的“谅解”、“合作”，为蒋清党反共做准备。3月底，戴从日本回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就很快发生了。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5月，戴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为蒋介石政权“建立纪纲”呼号[(14)]。接着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自任校长，戴任教务主任。6月，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他多次向师生发表讲演，宣传他的一套理论思想，第二年汇集为《青年之路》出版。

1928年2月，戴季陶重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戴任院长后，即着手制定考试法。1931年7月15日起，在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戴任主考。其后，戴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统治的人才。在独裁政治体制下，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许多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因此考试院实际上徒有其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民政府设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戴季陶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立即成为国民政府的国策。11月，戴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提出“诵经护国”的主张。在生活上，戴常标榜“舍己为群”、“清廉寡欲”，实际上始终得到蒋介石的特殊关照。他在南京汤山、上海觉园等多处住宅别墅都相当豪华。他自己信佛，同时主张用宗教手段，对内蒙、西藏王公喇嘛，上层宗教人士实行怀柔政策。

1932年4月，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戴季陶奉命“视察西北”。他此行并没有对西北应兴应革提出积极可行的计划，而是沿途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进行辩解，说什么“外交顺利”，“东北失了不要紧”[(15)]。4月25日，戴在西安民乐园向两千多名学生发表讲演，其反共媚外谬论当场遭到爱国学生的斥责，所乘汽车被焚毁。

戴季陶身居高位，以“元老”身份，为国民党独裁统治效力，蒋介石在1934年提倡“新生活运动”，戴以考试院院长的名义发表“尊孔读经”，“恢复固有文化”的谈话。但他不是粹然儒者，而是越来越像一个皈依佛门的僧侣。1935年11月，戴参与国民党五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宣言中提出了“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一些方针政策[16]，也反映了他已开始逐步向抗日方面转变的趋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戴声色俱厉，力主对西安发动讨伐，声称应“以国家纲纪为重，以个人安危为轻”，引起宋美龄等的不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和重庆，1938年4月，他曾代表国民政府赴甘孜等地，与宗教界的上层分子进行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又奉命到缅甸和印度访问，拜谒了不少著名的佛教圣地。1943年10月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起“制礼”问题的讨论，11月由他写成了《礼制通议》。次年3月，把《礼制通议》和他的《读礼札记》汇印成为《学礼录》出版。

抗日战争结束时，戴季陶已体弱多病，但仍在1947年6月改组的国民政府中维持着考试院院长的名义。其后，他要求免去其院长职务。1948年6月，他改任为“国史馆”馆长。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已处于大崩溃的前夕。戴季陶应宋子文之邀，携眷飞往广州。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他对前途绝望，遂于1949年2月11日夜间吞服大量安眠药身亡。

---

(1) 戴季陶：《戴天仇文集》，民权报发行部1912年版，第115页。

(2) 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

(3) 《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

(4) 《孝慈》，《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

(5) 《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

(6) 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7) 戴季陶：《戴季陶集》上卷，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版，第13页。

(8) 何香凝：《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7日。

(9)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10) 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会1945年版。

(11)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海季陶办事处1925年版。

(12)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序言》，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广益书局1929年版，第205—208页。

(13)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载《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第84页。

(14) 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5月29日。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212页。

(16)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5年11月23日），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戴戡

马宣伟

戴戡，原名桂龄，字循若，号锡九。贵州省贵定县人，生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早年以县学附生留学日本，学手工业。在日期间与梁启超、蔡锷相识。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戴戡便参加该社。1908年戴毕业回国后，在河南法政学校任庶务，与该校监督（校长）陈国祥、教务长熊铁崖是贵州同乡，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前夕，熊铁崖去云南参加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幕府，戴戡随同前往，被委为云南个旧锡矿公司经理。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派戴戡回贵州办理盐务。他回贵州后便与立宪派混在一起，准备先打入贵州革命政府，合谋篡夺革命政权。

1911年12月，贵州宪政派、地方团练和封建官绅等势力，假借贵州枢密院名义致电蔡锷，声称贵州“公口横行”要求滇军乘北伐之机，“代定黔乱”。贵州立宪派还发觉仅发电报不足以表达对滇军的期望，又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密谋，派戴戡回云南，假借贵州父老名义，效申包胥故事，连续向蔡锷作“秦廷哭”，详说贵州“公口林立，竟成匪国”。戴戡还与唐继尧“结约五条，请滇军代黔组织军政府另举都督；擒杀革命党首领张百麟等”。戴戡代表贵州三派保守势力，向云南的蔡锷、唐继尧活动取得成效。由唐继尧任司令率3000北伐军于1912年1月27日誓师入黔，戴戡为唐继尧军带路。滇军到达贵阳，由戴戡牵线让唐继尧与贵州宪政派、耆老会及刘显世等阴谋策划，于3月3日清晨向贵州革命政府发动进攻，使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贵州军政府遂告覆灭。

按照戴戡等人与云南签订的密约，由贵州耆老会、宪政派及地方团体头目郭重光、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出面重组贵州军政府，推

唐继尧为贵州都督。这就开创了民国以来一省以武装夺取另一省政权的恶劣先例。4月，唐继尧又转任命戴为贵州都督府参赞。1913年1月戴戡任贵州实业司司长，4月任黔中观察使，6月改任贵州民政长并加入进步党任理事，1914年5月任贵州巡按使。1915年袁世凯为控制贵州，推行帝制，任命其爪牙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调戴入京任参政院参政。戴戡受袁世凯排挤，便常与蔡锷商讨反袁。当袁世凯加紧推行帝制，筹安会出笼后，戴戡、蔡锷常去天津与梁启超秘商护国讨袁。1915年12月初决定蔡锷返回昆明发动护国运动，戴戡随蔡锷去昆明。12月18、19两日，袁世凯两次急电唐继尧，指出“蔡锷、戴戡结同乱党入滇谋乱，应请严密查访”。1915年12月21日，戴戡参加了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次日又参加了庄严隆重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成立云南都督府，唐继尧任都督，委戴戡为左参赞。12月31日，戴戡参加唐继尧、蔡锷等九人发出的《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的通电》。云南通电护国讨袁，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却不表示态度。1916年1月，戴戡奉蔡锷派遣，率部前往贵州策应独立，24日抵贵阳。他向刘显世进一步陈述全国反袁的形势和胜利的必然性。刘显世才于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改称都督，以戴戡任护国军右翼总司令，以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熊其勋率部归戴戡统率，出松坎攻四川綦江，与北洋军曹锟部作战。5月8日，作为南方统一政府的军务院在广东肇庆建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戴戡、蔡锷等十一人任抚军。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7日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至此，护国战争事实上就结束了。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不久蔡锷因喉疾严重辞职，向北京政府保荐护国军总参谋长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四川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而实力最强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只得了一个军长的头衔。罗佩金以暂代督军的身份，独揽全川军政大权，不欢迎戴戡从重庆来省会成都就省长职。

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自认在护国战争中立有大功，又是川

人，理应出任督军或省长，可是两个职务都被罗、戴夺走，心中不满。而戴戡知罗佩金反对他来成都就任省长，他既不敢贸然动身来成都，但又不愿坐失良机，遂于11月14日电成都各县，提出安民、财政、金融的施政纲领作试探。罗佩金在11月14、16两日令督署、省署文武官员改着便服，参加公民大会反对戴戡。远在北京的梁启超为戴戡顺利接任四川省长，派川籍进步党人黄大暹来重庆联络川中各界人士，襄助戴戡。经黄大暹向嘉陵道尹张澜、刘存厚及罗佩金疏通后，戴戡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第一混成旅及省署卫队两营抵达成都履任。15日他主动拜会罗佩金，16日才正式视事。戴戡到成都就本兼各职迫罗佩金交出政权，实行军民分治，双方矛盾尖锐。戴戡借罗佩金大肆裁军伤害川军利益，从中挑拨川滇军的关系，暗中与拥有实力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密商倒罗，并许事成之后保刘出任会办军务之职。

1917年3月27日，罗佩金下令裁减川军第四师，使川、滇军矛盾尖锐化。4月18日，罗佩金与刘存厚在成都爆发巷战。19日下午，刘军将大炮推至三桥架设，向皇城督军署轰击。驻成都的日、英、法领事请戴戡一同出面调停。戴戡唯恐罗、刘不能打得两败俱伤，另找借口不参加调停。20日，梁启超在北京策动17名川籍议员向大总统黎元洪提出：立即免罗佩金、刘存厚职，任命戴戡兼代四川督军。取得黎元洪照准。刘存厚与戴戡原约定，共同攻打罗佩金，但战事爆发后，戴戡坐视不理，尽收渔人之利，刘存厚自然痛恨戴戡。刘存厚为泄私愤，21日凌晨刘军再攻罗佩金。戴戡答应支援罗佩金再战，结果罗军战败，罗佩金含泪将督军印信移交戴戡，离开成都。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见戴戡身兼四川督军、省长、会办军务，为进步党夺得四川地盘，对戴戡大加赞扬。张澜见戴戡身兼三职恐引起不良后果。劝戴戡实践诺言，让出会办军务一职给刘存厚，以平其愤。戴戡拒绝了张澜的建议。5月1日，戴戡就任督军后，刘存厚便提出补发40万欠饷。戴戡不理，反下令刘存厚撤退驻城内的部队。

刘存厚抗拒不办，双方形成僵局。戴戡又与罗佩金密商：滇黔联合解决刘存厚部。7月5日晚，戴戡与刘存厚两军战争在成都爆发。刘军将戴戡及黔军围在皇城内，戴戡急电罗佩金驰援。罗佩金派出的滇军在途中遭川军阻击。刘军开始炮轰皇城，戴戡困居皇城内，眼看弹尽粮绝，援军又无踪影。16日，戴戡派邹宪章为代表要求省参议会出面调停，条件为：黔军定于7月17日午前4时开始撤退，至同日午前撤退完毕。黔军在刘军中留下人质，使两军做到黔军沿途不劫掠，川军不追击。

刘戴战争期间，川黔两军共焚烧民房三千余家，死伤居民达六千余人，数以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

戴戡暗自计划退出成都，再联合滇军卷土重来。17日，戴戡及旅长熊其勋化装夹杂在黔军士兵中出了成都。黔军一出城，刘存厚即将黔军人质放回，以解除戴戡对刘军追击的顾虑，哪知川军士兵化装成老百姓为黔军当向导，引黔军走迂回往复的小路，到晚才走出30华里。途中黔军士兵不断逃散。18日，戴戡准备经籍田铺到仁寿县与滇军会合，黔军刚出发就被埋伏在那里的川军吴庆熙部队包围。黔军在突围时被川军击溃，戴戡和川西道尹周铭久走到仁寿秦皇寺，躲进了一户农民家里。川军跟踪追来，戴戡知不能逃脱，便拔枪自戕而亡。同年7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8月8日又电令刘存厚、罗佩金遵照前发查办令，进京听候发落，所部军队悉由周道刚统驭，四川又重新落入北洋军阀控制之中。后经梁启超多次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吵闹，北京政府才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给银一万两治丧。

主要参考资料

肖波、马宣伟著：《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一至三卷），贵州人民

出版社1991、1996年版。

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肖先治等主编：《辛亥革命在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戴笠

江绍贞

戴笠，字雨农，原名春风、徵兰，浙江江山人。1897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四岁丧父，靠母亲蓝月喜以祖遗田产为生。1903年，戴笠入塾，四年后入仙霞国民初级小学。他天资聪颖，只是生性贪玩，又爱惹是生非，虽受到母亲的严加管教，总是习性难改。1910年往江山县城文溪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报考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作文试题《试各言其志》中，抒发自己的抱负，在文章结尾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但他并不知道怎样才算圣贤豪杰，入学不到一年，就因捉弄管理寄宿生的舍监被开除学籍。回家后与一些意气相投的人混迹于花会赌博、设坛开乩、求神问卜的场所。其间曾于1917年入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当了几个月学兵，1920年往沪杭一带找发迹的捷径，未得机遇而返。1924年江浙战争时，在乡组团练充当团总。

1926年，戴笠改用是名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与蒋介石派回军校活动的胡靖安、陈超等人秘密交往，监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的言行。1927年4月军校“清党”时表现特别积极，受到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人的赏识。旋被选入骑兵营第一连，并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开往苏州受训。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戴笠被推选为骑兵营代表之一往奉化溪口向蒋介石表示慰问和拥戴。他以一番忠贞的言词给蒋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由于蒋介石下野，骑兵营教学停顿，戴笠往上海加入由胡靖安领导的联络组为蒋介石收集情报。他和青帮头目、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搭上关系，由杨引荐又结识了海上闻人杜月笙，进而与杜、

杨“在杭州西湖之滨杜庄，结为异姓兄弟”[1]。因而他获得的情报最多。同年11月，军校令骑兵营学员返校继续完成学业时，他认定为蒋做情报工作是个人发迹的最好途径，便留了下来。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戴接替胡靖安主持情报工作，被任命为总司令部联络参谋，直接受蒋介石的调遣，在二次“北伐”及以后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常出入前线，搜集军事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戴笠与一些黄埔少壮军官在蒋介石指使下，组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当选为候补干事，并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他担任特务处处长（即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长）。1934年7月，接替邓文仪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随后他将调查课归并于特务处，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建立区、站、组各级特务组织，并渗入到军宪警及铁路等各个部门。又先后在南京开办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浙江警校内开设特训班，培养出一批具有暗杀绑架和电讯技能的特工。1935年担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

戴笠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在1933年5月指挥平津组织在北平六国饭店击毙汉奸张敬尧外，把破坏中共组织，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作为基本任务。1933年6月由他亲自指挥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次年11月，又将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他布置平津特务组织对著名爱国抗日将领、中共秘密党员吉鸿昌进行暗杀未遂，便交由北平军分会将其杀害。1935年11月1日，晨光通讯社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南京中央党部刺杀蒋介石未成，将汪精卫击伤，孙当场死难。案发后戴笠立即调动大批特工搜捕晨光通讯社所有成员，并连及不少无辜，由他亲自严刑审讯。他误认为此案主谋是王亚樵，派员往香港将与王有过交往以及与王素不相识的人加以逮捕、引渡，并派特工追踪王亚樵，到广西梧州将其暗杀。

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连发生反蒋事件。1933年11月，福建当局和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

廷锴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宣言抗日反蒋。戴笠亲自赶往厦门、漳州等地，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十九路军将领进行分化收买，致使一些将领倒戈，促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两广“六一事变”，戴笠对广东空军将领及飞行员多方收买，使实力雄厚的广东空军投蒋。

同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戴笠肩负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受到一些黄埔军人的追究，他自知难辞其咎，为“实践君辱臣死之义”，随同宋美龄、端纳等前往西安，即被张学良软禁。他自忖凶多吉少，写下一纸“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况，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2)] 由此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护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被拘押后，一直由他负责监管。1937年12月，戴又将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日的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等诱捕监禁。

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赶到上海，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建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一支上万人的别动队武装。11月初别动队掩护淞沪守军撤退，除遭受较大伤亡外，一部分退入租界被解除了武装，戴将不足两千人的残部撤退到安徽祁门、浙江遂安，整编为教导总团部，戴亲自兼任总团长，后经收编散兵游勇，人数又达万人，于1938年5月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戴自任总指挥。

1938年蒋介石迫于党内外强烈要求取消秘密小团体的呼声，将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复兴社一并解散，戴笠担任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军统局成立前后，戴在湖南临澧开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招收失学失业流亡青年千余人施以特工训练（后迁贵州黔阳、息烽）。在武汉、浙江等地开设译电、电讯训练班。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由长沙迁往重庆，又陆续开设兰州特警训练班、重庆谍报参谋训练班、外事训练班等等，特务队伍迅速扩大，除

大力扩充各级特务机构外，陆续在东南亚各国建立海外组织。至1942年，基本特工达四五万人。1940年春，戴笠派军统人员协助各战区编组和训练便衣混城队六千七百余人。1942年戴呈准蒋介石将混城队划归军统，改编为别动军。

戴笠凭借宠大的军统组织和蒋介石的宠信，不断把权势伸向各个部门。1941年夏，先后当上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和财政部缉私署署长。1943年又兼任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及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局长，主管邮电航空检查的军委会特检处，也由他派军统骨干刘璠任处长。还掌握了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数万人的缉私武装。

为了使军统能忠实地为蒋介石效力，戴笠以“秉承领袖意旨，体会领袖苦心”作为军统局的指导方针。他要求所有人员“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必须始终如一，至死不变。他对军统人员的思想行动实行严格的监督，建立了各种名目的督察监督网，以他制定和宣布的各种规定、禁令，作为军统内一套不成文的“家法”，惩罚标准全凭他个人的意旨。“家法”的残忍，致使不少人走上自杀的道路。军统局帮办唐纵深有感触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其惧。这是他事功成就的两大法宝。”(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海军部发现军统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侦译出日本空军发动这次偷袭动向的情报准确无误，于1942年5月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ton Edward Miles）来华寻求建立基地。戴笠陪同梅乐斯往东南沿海地区考察，除提供这些地区的地理水域、敌情等方面的资料外，要求美方给予帮助。经梅乐斯向美国海军部极力主张，双方建立起电讯侦译、气象测量、水雷爆破等方面的合作关系。1943年4月，正式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合作范围扩大到由美方帮助训练军统武装，并提供武器弹药装备，供给交通工具和医疗设备。1943年6月起，先后开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班，一律由戴笠任主

任，由美方特工任教官、总教官，分期分批训练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和专门与中共抗日武装制造摩擦的国民党杂牌军。1944年秋，戴又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William J．Donovan）签订补充协定，确定由美联邦调查局派员帮助训练高级特务，在重庆开办了特警训练班，并由美方配备诸如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等各种现代化刑具。

自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共产党。戴笠秉承蒋的旨意，除布置军统西北区对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侠父秘密杀害外，围绕陕甘宁边区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在重庆，戴笠更是亲自布置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并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1940年2月，他发现军统电讯处长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即将张、冯等六人及中共南方局担任联络的张露萍一并逮捕，亲自严刑审讯，企图一举破获重庆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未能达到目的，便将张等囚禁在息烽集中营，于抗战胜利前夕将他们杀害。1940年3月，借成都饥民发生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戴笠亲自赶至成都审讯，妄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的目的未能达到，便令特务将洪希宗等多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重庆监禁在“白公馆”看守所，于1945年8月18日将其枪杀。在江南一带则令忠义救国军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戴笠也曾指挥军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等活动。1938年3月，戴笠密令天津站长陈恭澍对伪华北政权首要王克敏相机刺杀（未遂）。同年12月，汪精卫叛逃越南河内，戴组织行动组，往河内对汪精卫追踪监视和暗杀，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1940年相继在上海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1938年9月，他令上海区将与日方有过接触、并

未投敌的唐绍仪砍死，在国民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940年戴令上海区“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予以破坏性打击”，先后暗杀了几个中级职员，并在伪储备银行内设置爆炸物，引起敌伪血腥屠杀我方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驻上海的职员，酿成耸人听闻的“银行血案”。

与此同时，戴笠也指挥军统直接对日军采取过一些行动。1940年戴笠批准上海军统组织拟定的刺杀日本军人的方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行动五十余次，毙伤日军六十余人，大多是一般士兵。同时对敌方的交通桥梁、物资仓库以及各种军事设施也进行过一些破坏。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披露，此种行为达2101次[(4)]。军统与敌伪的斗争虽影响有限，但还是属于抗日民族战争的范畴。

戴笠执行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路线，担当了与敌伪勾结的重要角色。1939年底至1940年9月，他指挥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冒名宋子良与日方主管“桐”工作的今井武夫等人在港澳进行多次密谈，达成中日停战，共同防共的初步协议，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未能付诸实现。1940年3月他派唐生明往京沪与敌伪头目挂钩。唐的真实身份暴露后，充当起日方与重庆政府间沟通关系的桥梁。此后，戴又陆续派军统人员与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伪陆军部长鲍文樾、伪海军部长任援道、伪社会部长丁默邨、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等人联络，虽说是“策反”，但也是企图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1945年初，派员往河南、江苏等地勾结伪军，得到孙殿英、张岚峰等伪军头目“惟蒋委员长和戴先生之命是从，绝对不同共产党妥协”[(5)]的许诺。

1945年7月，戴笠为策应美海军陆战队在东南沿海登陆及抢夺胜利果实，偕同梅乐斯、杜月笙等赶往浙江淳安指挥。正当他们加紧筹划时，日本发出乞降照会，戴即令各地军统武装分别抢占上海、南京、杭州、漳州、厦门、武汉、长沙、徐州等城市及京沪、沪杭、粤汉等铁路干线。同时对所勾结的伪军，分别给予国民党军的名义。还派员往南京勾结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冈村“将京沪杭地区保

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收”，保证冈村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政府必将优予厚遇”[6]。9月上旬，戴笠由淳安到沪，成立军统及中美合作所上海办事处。他一面指挥军统抢先劫收敌伪产业，一面向蒋介石要求取得了肃奸大权。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对全国各方强烈要求取消特务组织的形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除将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改编成18个交警总队外，与李士珍、宣铁吾等人争夺全国警察权。1946年3月上旬，戴在北平盛情款待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要求美国扶持他在战后中国海军中取得权位。此时他得到蒋介石召他返渝的电报，于3月15日乘专机离平，17日上午从青岛飞往上海途中，因气候恶劣，在江宁板桥镇附近岱山坠机殒命。国民党政府“着追赠陆军中将”[7]。

---

(1) 万墨林：《沪上往事》，台北《中外杂志》第11卷第2期。

(2) 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朱传誉主编：《戴笠传记资料》（八），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

(3)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4) 《中央日报》1946年4月3日。

(5) 乔家才：《抗日情报战》（七），《戴笠传记资料》（二）。

(6) 乔家才：《胜利前后的奇事奇闻》，台北《中外杂志》第28卷第4期。

(7) 《国民政府公报》第2543号。

邓宝珊

王劲

邓宝珊，名瑜，甘肃天水人，生于1894年11月10日（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父亲邓尚贤原是一名穷书生，后改习商。邓宝珊童年读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父母先后去世，生活贫困，即辍学到兰州谋生，在一家制造水烟的烟房当学徒约一年半。时值湖北新军标统杨缵绪部调驻新疆伊犁，途经兰州招募新兵，邓报名应募入伍，旋被提升为司书。他业余拜师，发奋读书，打下了自学的基础。后来戎马之间不废读书，被人称为“儒将”。

1910年，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邓的同乡）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于7月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在新疆，11月28日发生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因准备仓促旋遭失败。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推冯特民、李辅黄等为指挥。时已升任署协统的杨缵绪这时也参加起义。邓宝珊当时在李辅黄率领下，参加了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整个伊犁地区的局面，1月10日正式组成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2月初，邓又随杨缵绪所率部队开往伊犁以东，在精河、沙泉子一带与清军激战，战斗中指挥不幸阵亡，邓宝珊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坚守住了阵地。接着他又率队绕道包抄敌左翼后路，终将敌军一举击溃。此役结束，邓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被送到将弁学堂学习。

新疆光复后，原清政府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1913年，杨增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邓宝珊亦在被通缉之列。邓潜往宁远的俄国领事馆，取得

护照，假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1914年邓宝珊前往陕西，与同盟会会员刘蔼如等人相聚于华山，组成“共学团”，结识了孙岳、何遂、续西峰、李岐山、续范亭、井勿幕、刘守中、胡景翼等人。他们以“讲学”为名，共同策划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行动，时人称之为“华山聚义”。袁世凯称帝后，“华山聚义”的成员组织了护国队伍，一度进攻山西，遭到失败。1916年5月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取代陆建章就任陕西督军，邓宝珊在陈部胡景翼团为连长。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总理，掌握大权，陈树藩投靠段祺瑞，陕西进步力量又发动“反段倒陈”运动。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陕西民党起而响应。9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建立靖国军，与陈树藩相对抗。靖国军分为六路，邓宝珊隶属胡景翼第四路之下。

1921年11月，胡景翼部接受北京政府的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宝珊任该师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邓对胡接受改编是不赞成的，1922年3、4月间，他曾派人向孙中山反映陕西靖国军情况。孙中山致函邓宝珊，批评胡的行动是“受奸人蒙蔽”，希望邓“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1)]。

同年4月直奉之战爆发，胡景翼奉命出潼关攻打与奉系有联系的河南军阀赵倜。6月，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李纪才、弓富魁两个团大破赵倜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为胡景翼联络冯玉祥、孙岳。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成立“国民军”，接着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与此同时，经李大钊介绍，并依据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冯要求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人帮助训练国民军。邓宝珊对此皆极表赞成。这时他任国民军二军七师师长。

1925年初，胡景翼到河南任督办，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在河南击溃陕西督军刘镇华之憨玉琨部。此后，

邓在驻地陕县开办军官传习所，以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部担任秘书长，另外聘用了三位苏联顾问。不久，奉系与国民军之间发生矛盾。8月，邓宝珊部北上与奉军作战，占保定，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邓参加国民军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任总指挥。邓于12月13日在马厂附近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2)]。邓率国民军二军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二旅，并高桂滋一个团，会同国民军三军一部，攻占了马厂，迫使奉系李景林放弃天津，由海路逃往山东。在激战中，邓亦负伤。战后，孙岳被任命为直隶军务督办，邓为帮办。

1926年春，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次第放弃开封、郑州、天津、北京等地，退往西北。由岳维峻统率的国民二军[(3)]，在河南被吴佩孚军战败，溃退陕西。邓宝珊间道返回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了二军余部。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广东北伐军。邓宝珊与国民军其他将领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国民军采纳了李大钊来函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主张[(4)]，挥师入陕。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国民军联军援陕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邓在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10月下旬，援陕部队将领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邓建议以迂回战术切断刘镇华军退路。结果刘军在内外夹击下溃败，被围八个月的西安于11月27日解围。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战时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干部学校，即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学校领导。邓宝珊对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合作和支持，与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5)]。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所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邓宝珊时为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属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第二集团军经商洛、荆紫关，于5月底到达河南。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联合发表通电反共，岳维峻率南路军也投靠了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率部撤至驻马店。后迫于形势，不得不离开部队往上海暂住，并于此时由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邓宝珊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了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热心予以掩护和帮助。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4月，邓宝珊应冯玉祥之邀回河南，被派往许昌协助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樊于作战中被蒋军飞机炸死，邓接任总司令。10月，冯、阎讨蒋失败，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投蒋，挟持邓宝珊由许昌南行，准备押解给蒋介石。邓于途中寻机脱身，11月抵上海住法租界，声言隐退，秘密从事反蒋活动。国民党特务曾勾结租界巡捕房将邓逮捕，拟引渡解往南京，后经友人保释出狱。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邓宝珊于1932年3月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当时甘肃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数年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邓与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协力整顿省政，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任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悉力整编省内武装，协调与邻省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主席，邓宝珊代理甘肃省主席一年多，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抚流亡。1934年，驻甘行署撤销，邓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宝珊由衷拥护，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恳劝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又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晤谈。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域时，邓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消极敷衍，新一军所部始终未与红军接火。

1937年抗战军兴，邓宝珊驰赴前线，始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

新一军军长，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陕西榆林，直至抗战胜利。整个抗战时期，邓与延安往还频繁。在蒋介石发动的历次反共高潮中，邓均表示沉默。其间他还数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晤谈。1943年3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奉蒋电召去重庆。经过延安时，毛泽东与邓晤谈，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希望邓给予合作。7月，邓经过西安时遇周恩来，又进行了晤谈。邓到重庆，看到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深感忧虑，在最后一次见蒋时直率进言："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6) 邓返回榆林再经过延安时，毛泽东等对他此行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努力，至为赞扬。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致邓信中又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7)

1946年2月，邓宝珊参加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即住在三原家中，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避免卷入内战漩涡。后在胡宗南再三催促下返回。邓到榆林后，相继发生一系列事件：所部曹又参旅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二十二军李含芳团在高家堡被解放军歼灭。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调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两个团于1947年4月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众多的特务，对邓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至榆林见邓(8)，要邓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复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9)

1948年8月，时已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邀邓宝珊以"副总司令"的名义驻包头，舒彼后顾之忧。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为了及早达成协议，傅作义于12月下旬派董其武到绥远陕坝接邓到北平主持会谈。1949年1月13日，邓代表傅作义至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经过五天的协商，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全权代表傅作义在协议上签了字。当时北平的一家报纸称邓为"北平和平解

放的一把钥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病在北京逝世。

---

(1) 原信影印件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插页，1962年版。

(2) 通电全文见《国民军革命史》第88页。

(3) 胡景翼1925年4月病逝于开封，国民二军由岳维峻继任军长。

(4) 见《创业三秦》，《陕西日报》1981年6月15日。

(5) 见刘伯坚：《家书》，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6) 石佩久：《邓宝珊在榆林》，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存稿。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8) 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曾任井岳秀的参议，抗战时为邓宝珊派驻绥德的办事处主任，同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刘经常往返于延安、榆林之间，传达信件和意见。

(9) 甄载明：《榆林两次战役及和平解放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邓初民

江绍贞

邓初民，原名经喜，字昌权，1889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北石首县。祖父为佃农，父亲教村塾兼行中医。

邓初民五岁时就在他父亲的私塾里受启蒙教育。他对古代历史故事很感兴趣，仰慕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投考石首县高等小学时，便改名希禹。辛亥革命前他入荆南中学读书，耳闻目睹穷苦农民的悲惨遭遇，产生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同盟会的纲领。

1911年武昌起义后，邓初民“曾得到一时的振奋，认为国家可望从此好起来”[(1)]，便离乡到武汉，考入由宋教仁任校长的江汉大学。他接触到社会发展史的书籍，“很希望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人”[(2)]，便又改名初民。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江汉大学停办，邓初民于5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往帝国大学听河上肇讲授《资本论》，并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1915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开展反袁斗争。邓初民担任总会评议会会长，兼任会刊《民彝》的编辑。

1917年，邓初民由日本毕业回国到武汉，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己连工作也找不到，在苦闷彷徨中回到石首老家。1919年6月，应友人的邀请去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到太原后，教职因故未成，他在进退维谷之中写了一篇《旅晋一星期有感》的短文，发表在

《山西日报》上。山西督军阎锡山看上了他的文采，留他在督军署担任秘书为其草拟《山西政治纲要》等文告。1922年，邓到进山中学任教。此时，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已进入新的阶段，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思想大为开阔，与几位老师合办工人夜校，并与张友渔等创办《新觉路》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怎样改造中国》一文，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邓初民离晋到汉，受聘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教务长，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负责人董必武介绍加入国民党。1925年，邓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以后又兼任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长及宣传部长，在宣传新三民主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邓初民担任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后改为省政府）委员，先后在湖北党务训练班、文官养成所以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课，还参加当地的民众运动。他还与孔文轩等为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拟订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担任审判委员会审判长，亲自审处了一些土豪劣绅。

北伐军攻克南昌不久，邓初民率湖北各界慰问江西军民代表团前往南昌，在蒋介石主持的招待会上呼吁团结对敌，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在武汉实行“分共”。邓初民的省府委员职务被解除，他在武汉难以立足，于年底到上海。

邓初民到上海不久，便和李达、许德珩、黄松龄等取得联系。随后，他参加章伯钧等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1929年退出）。1928年和李达等创办《双十》月刊。1930年与李一氓等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担任主席。通过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小组等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

想，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在此期间，邓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政治学和哲学。1928年出版《政治科学大纲》，1932年出版《政治学》。

邓初民在沪期间，还先后在暨南大学、上海艺术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邓初民到处演讲，唤起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3年暑假，他被暨南大学解聘后，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他仍然利用讲坛及其他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和全民抗日的主张。1935年响应“一二九”运动，与爱国学生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支持中大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被迫离穗到香港暂避。

1936年2月，邓初民任教于广西大学。6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派他往山西，动员阎锡山参与支持两广事变，阎未作肯定的回答。邓返回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已与蒋介石妥协。1937年，广西大学停止了他的教职。正当他处境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张云逸与他取得联系，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使他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1937年9月，邓初民离开广西到武汉，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他联络孔庚、马哲民、孟宪章等几位友人，创办《民族战线》周刊。1938年1月和共产党员黄松龄等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2月到沙市，任朝阳学院（原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主任，数月后随朝阳学院迁往成都。他与马哲民、黄松龄用“邓马黄”笔名合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和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一时，“邓马黄”之文在成都很有影响。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对他们的活动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经车的安排，邓初民还对川康地方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做了大量团结抗日的工作。在成都期间，他以自己的教案为基础，撰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一书（1940年11月生活书店出

版）。1940年春，车耀先等被捕，邓被迫离开成都到重庆。

1941年，邓初民与王昆仑、许宝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3)]，还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他是积极活动者之一。1944年10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他以个人身份加入，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时，邓初民受到毛泽东两次接见。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他以顾问的身份参加民盟代表团的工作，并与文化界进步人士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被推为理事。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他和文化界人士一百五十余人签名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运动的行径。国民党特务于7月间公然在昆明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并放出消息，要在上海暗杀沈钧儒、陶行知，在重庆暗杀邓初民。他听到这个消息，毫不畏缩，毅然在重庆参加筹备和出席李、闻追悼大会，并在大会上演说，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邓初民在重庆的几年中，担任民盟重庆市支部机关报《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的主编，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等方面的宣传。并经常给《新华日报》写文章。他还撰写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世界民主运动新趋势》等著作，提出“新型的民主政治”的论点。

1947年1月，邓初民因参加民盟二中全会到了上海。在纪念“一二八”十五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内战演说，田汉当场赋诗，把他喻作“铁人”。他还深入到永安公司、劝工大楼以及一些大学，向职工、学生发表演说。2月，蒋介石限令中共驻上海、南京代表团撤走，白色恐怖笼罩沪宁。邓初民于3月中旬出走香港。

邓初民到港后，任教于达德学院。同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解散，许多领导人先后到港。邓积极参加沈钧

儒等人在香港重建民盟领导机构的活动，出席了1948年1月在港召开的民盟三中全会。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邓与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通电拥护，中共中央立即回电表示欢迎。是年底，邓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他庆幸“一个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4)]。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初民由沈阳到北平。4月往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邓初民先后担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西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以及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他还先后写了《阶级·阶级斗争概论》、《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著作。1962年，他以73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2月4日，邓初民在北京病逝。

---

(1) 邓初民：《九十述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版。

(2) 邓初民：《沧桑九十年》，《战地》1980年第4期。

(3) 成立时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后来为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相区别，通称为“小民革”。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秘密政治团体，1949年9月解散。

(4) 史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人民日报》1981年3月20日。

邓铿

严如平

邓铿，名士元，字仲元，1886年1月31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父邓薰玉、父邓丽川，世在归善（今惠阳）淡水行商，邓铿从七岁起随父住在淡水。

邓铿九岁就学于归善，稍长肄业于崇雅学堂。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愤懑不平，亲见亲闻孙中山领导的1900年惠州起义，为之慨叹不已，与友人辄以革命相勉励。1905年，他考入广州将弁学堂，列步兵科第三班。翌年春卒业，留学堂充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法政学堂体操教习。1907年充学兵营排长，代理左队队官。1909年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常以革命思想教人。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同盟会筹划再举。是年冬，邓铿去香港见赵声等人，赞成再在广州举义。不久，同盟会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为在广州先期租屋设立秘密机关，邓铿慨然以其父所营米店署保，表示即有不虞，毁家不顾。不幸1911年4月27日的起义没有成功，邓铿出走匿居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决定广东迅速响应。除由胡汉民、朱执信负责在广州起义外，另于各江成立四个军分别行动。以陈炯明为首的东江第一军担负攻略清陆路提督所在地惠州的任务，邓铿任第一军参谋长。10月30日，陈、邓等潜入淡水，以民团发难，收缴巡防营的枪械，进攻归善城。当时第一军面临敌众我寡、枪械不足的形势，激战数日，几濒于危。邓铿身先士卒，率众冲锋，在民团配合下，终于击溃清军，进驻归善城。清提督秦炳直投降，所属

巡防营洪兆麟等四营被收编为一团。惠州之捷先声夺人，北江、西江、韩江诸路义军亦起，全省大震，11月9日广州即告光复。

广州光复后，胡汉民被举为广东都督。当时各路民军云集广州，秩序很乱。陈炯明被举为副都督，任邓铿为陆军混成协协统，负广州卫戍之责。12月下旬，胡汉民离穗北上南京，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胡任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乃以副都督代理都督职，邓铿任都督府陆军司司长兼稽勋局局长。他协助陈炯明编遣民军，建立正规的陆军两个师和一个旅以及警卫军数十营。1912年5月，胡汉民自南京回任，邓铿仍任都督府陆军司长，整军除盗，多所擘划。不久，都督府改制，裁陆军司，邓改任都督府参谋长。他斡旋于胡汉民、陈炯明之间，调解他们之间的龃龉矛盾，成为胡陈合作的纽带。

海南岛为我国防要地，帝国主义多方觊觎。胡汉民特派邓铿为琼崖镇守使兼办琼崖民政事宜。1913年3月邓到海南岛后，鼎新革故，遣散旧防营、师船，致力于交通垦殖、开发利源、移兵为工、建设国防。当时有贩卖人口出洋的“猪仔头”，在帝国主义领事唆使下拐骗了五百多人，邓将四个“猪仔头”捕获枪决，受到民众赞扬。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赣、苏先后宣告独立。这时陈炯明已任广东都督，奉孙中山命于7月18日宣告独立。龙济光受袁世凯命为广东都督，率部自西江入粤，迫近三水河口，广州危急。邓铿奉命回省，即赴三水督战。但因驻广州燕塘的炮兵团突然炮击都督府，8月4日陈炯明仓皇出走，局势急转直下，广州被龙济光占据，讨袁军事失败。邓铿被通缉，避往香港。

是年冬，邓铿经上海去东京，谒见孙中山。1914年春，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党，严格吸收党员，立誓约、按指模、严密组织纪律，要求绝对服从总理领导。当时，袁世凯四处捕杀革命党人，革命处于低潮。邓铿置身家于不顾，坚决信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毅然加

入中华革命党。孙因此而对邓倍加亲信，任为军务部副部长，佐许崇智筹划军事。邓即赴香港，负责开展广东方面的讨袁军事活动。同年夏，率陈可钰、李杰夫、罗翼群等策动陆军团长邓承昉在饶平、黄冈举义，另命洪兆麟在惠阳发难，并遣布耀庭到广州运动龙济光军某部，但均未成功。继以军费无着，无力再举。在此期间，邓曾遣怡保归侨钟明光刺龙济光，事败而钟牺牲。1915年10月，邓奉孙中山命赴新加坡筹募讨袁军费。次年4月，从香港潜入广东增城，策动旧部防军统领徐连胜反正，因受徐部下阻挠未果。5月中，再入增城，促徐连胜部反正成功，旋攻占石龙、博罗。邓出任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与广州、惠州、东莞三面来敌苦战月余，以机智勇敢击溃敌人。6月袁世凯死，讨袁军事结束。邓铿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被留下赞划党务和军务。

1917年春，邓铿赴日本养病，考察军事政治。夏，奔父丧，经沪回粤。7月，孙中山率驻沪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邓铿葬父毕，即应命到广州参与护法。冬，军政府成立粤军，准备援闽，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邓深感护法不止援闽，还要问鼎中原，直捣北洋军阀巢穴。他征得孙中山、陈炯明同意，广招军事人才，电邀蒋介石、吴忠信等来粤参赞军机，任粤军总部参谋等职。粤军当时为20营，仅有枪5000支，器械窳败，糈饷支绌。邓在潮汕增募和集训，扩得10营，力量渐见充实。1918年5月17日，粤军全线向福建进攻，进展顺利，连克闽西南二十余县，8月，粤军总部进驻漳州。邓铿进一步协助陈炯明整训扩充队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粤军发展到两万余人，正式编为两个军，陈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仍任总部参谋长。

1920年6月，孙中山电令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铿坚决响应，并敦促犹豫观望的陈炯明服从命令，挥戈返粤。邓亲赴福州，与福建督军李厚基接洽合作办法，商定将闽南交李，由李接济粤军军费，并巩固粤军后方。8月，邓铿统率第一军洪兆麟、熊略、

梁鸿楷等部为左翼，直趋韩江下游，从云霄、诏安攻汕头，不旬日即克黄冈、澄海而攻潮安。接着与右翼许崇智等各路会攻惠州，由龙门、平湖直攻石龙进取广州。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桂系军阀败走。

11月，孙中山自沪返粤，重组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决定建立粤军第一师，任命邓铿兼任师长。粤军这时已扩充达八万多人，品类复杂；又因援闽、回粤接连胜利而渐渐骄悍、腐化。孙中山嘱咐邓铿选择素质较优者编建第一师，严格训练，以为全军模范。邓励精图治，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培养成具有政治觉悟、坚强意志、英勇善战的部队。邓重视军官的选拔和训练，设军官教育班、军士教导班，予以严格训练。尝谓“有强将无弱兵”，“要强兵必先强将”。他选配陈可钰、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叶挺、李章达、陈铭枢、蔡廷锴、薛岳、蒋光鼐、陈济棠、缪培南、余汉谋等人分任第一师的参谋长、团长、参谋处长、营长、连长等职。

邓铿治军严谨，廉正不阿，嫉恶如仇。对军中不肖分子包庇烟赌的行径，毫不徇情，迭次派出宪兵缉拿。—次在广州晏公街缉获烟土二百多担，查明系陈炯明部属洪兆麟、陈炯光、陈觉民等人伙同所为。邓不予宽容，召集各界代表和各国驻穗领事共同监视烧毁。时人赞颂为林则徐后第二次焚烧鸦片。自此陈炯明亲旧对邓畏惮，含恨在心。

1921年4月，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为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统一全国。6月，桂系军阀在直系支持下集重兵分三路窥粤，孙中山决定组成援桂军予以讨伐。邓铿率第一师奉命留驻广州，击溃突由北江来袭之沈鸿英部，收复连阳等县。援桂军于6月25日占梧州后长驱直入，三个多月即底定广西。孙中山拥有两广后，决心全力北伐，12月10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邓铿由第一师抽调叶挺、薛岳、张发奎三个营组成大本营警卫团，派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率领前往。陈炯明以种

种借口反对北伐，拒不参加大本营会议。孙中山约陈到梧州、肇州会晤，他也不理会。邓铿虽多次劝说、催促，他只敷衍。邓为弥合孙、陈嫌隙，几年来斡旋转圜不遗余力。遇有分歧矛盾，纵或一时未能解决，亦必善为延待；若受令转达，每每婉转其词以曲达其意。他曾对人说过：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1922年3月，前广东将弁学堂总办周善培来广州“观光粤政”，邓铿执弟子礼亲赴香港迎接。21日傍晚回到大沙头广九车站，突遭奸徒手枪袭击，腹中两弹。邓负创奋力追踪凶手，不获；急登车回省长公署，随入韬美医院救治，23日凌晨逝世。广州及桂林袍泽闻讯，无不恸哭。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追赠邓铿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并为他亲书墓碣。

主要参考资料

胡汉民：《陆军上将邓仲元墓表》，《革命先烈先进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5年版，第464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邓铿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

《邓仲元先生革命史事节略》，《革命先烈先进传》，第460页。

罗翼群：《追记邓仲元先生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辑，1962年版。

王宇高：《邓铿传》，《国史馆馆刊》第2卷第1期。

黄任潮：《粤军名将邓仲元》，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近代广东名人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邓锡侯

林松柏

邓锡侯，字晋康，生于1889年5月24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四川营山县人。其父经营土陶为业。邓十岁前后双亲俱丧，赖舅母抚养成人。少年时拜本县廪生李铁樵为蒙师，颇受器重。稍长受维新思想影响，弃学从军。

1906年邓锡侯赴成都考入陆军小学堂第一期，1909年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1910年四川保路运动事起，邓辍学返川，先在营山县城关负责训练团丁，旋即投入川军第四师师长刘存厚部下，初任副官，后升任连长、营长、团长。1916年护国之役中，邓参加反袁战争，作战勇猛，屡建战功，深受蔡锷赏识。

护国之役后，罗佩金、戴戡各率滇黔军入川，分任督军、省长。不久，滇黔客军与以川军第一军军长刘存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发生矛盾。1917年4月和7月，先后在成都发生“刘罗”、“刘戴”之战，邓锡侯在战争中屡立战功，被新任四川督军刘存厚晋升为旅长。不久，川军师长熊克武在唐继尧支持下，会同滇黔军向刘存厚进攻。1918年2月，刘存厚败退陕南。邓锡侯等因不满刘依附北京政府，转而拥戴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被任为第二师旅长。

1920年春，唐继尧因见熊克武不能成为他控制四川的工具，乃联合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倒熊。第二师师长向传义持骑墙态度，以邓锡侯旅拥熊，另一部拥吕。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川军击败滇黔军，推刘湘主持四川军民两政。邓锡侯升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

刘湘主持川政后，实力不断扩大，1922年7月终于爆发了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和刘湘、杨森的第二军之战。邓锡侯站在熊克武

一方，任四川省军副总指挥，率部进攻第二军。不久第二军全线败退，刘湘下野，刘成勋取而代之。8月，邓锡侯的第三师随同其他川军开入重庆。11月，刘成勋宣布改编部队，取消军级编制。邓锡侯因不能晋升军长，与陈国栋、田颂尧、刘斌等起而反对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刘下令解除邓的第三师师长职务。1923年2月中旬，邓率部西进，在江津、永川、隆昌、内江一带，与第一、三军展开拉锯战，19日开始围攻成都。21日赖心辉部攻占简阳，解了成都之围，邓部退守新都、广汉一带。

这时，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援助杨森与邓锡侯等联合进攻第一、三军。4月5日邓部占领成都，6日杨森率部占领重庆。邓等随即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组织省联军，邓被推为联军总司令，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并分兵左右两翼，以田颂尧为左翼总指挥，陈国栋为右翼总指挥，在成都附近与第一军展开激战。5月中旬，熊、但攻入成都。10月，熊军攻占重庆。12月，杨森与刘湘联合分五路反攻熊军，邓锡侯任第一路总指挥。邓军与杨军于13日会师江北，合攻重庆告捷。1924年5月，北京政府“论功行赏”，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并加骠威将军头衔。邓因杨森的督军署设在成都，怕引起矛盾，将省长行署设在重庆。杨森野心勃勃，梦想统一四川，大搞扩军备战。邓锡侯力图自保，对省政无所建树。

1924年11月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后，因赖心辉曾通电拥护北京政府，于1925年2月任赖为四川省长，邓锡侯专任陆军第三十师师长，驻重庆。邓创办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教育团按军官、士兵分设三个班，每期训练四个月，作为发展部队的基本力量。4月，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刘湘一面联络黔军袁祖铭部，一面拉拢邓锡侯、刘文辉，组成川黔联军，与杨森对抗。7月，邓部和袁部集结铜梁、大足、璧山地区，在大足城郊击溃杨军，杨森向嘉定撤退，邓锡侯率部尾追，于9月初占领嘉定。杨森兵败离川，刘湘任四川督办，邓锡侯

任四川清乡督办。

邓锡侯在这次战争中夺得大量防地，踌躇满志，扬言要赶走四川省长赖心辉，对刘湘大量收编杨森残部也颇为不满。此时吴佩孚已打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帜，委杨森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三路总司令。邓乃与杨森、袁祖铭互通声气，无形中结成反刘湘的三角同盟。在此情形下，刘湘也谋求与杨森合作。杨森身价陡增，于1926年3月回师万县，以“兵多地狭”为由，电请邓锡侯让出广安、邻水，邓不允。5月刘湘与杨森联合驱袁（祖铭），邓乃依附刘、杨，出兵驱袁。

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四川军阀纷纷表示愿意参加北伐。邓锡侯派代表到南昌活动后，被蒋介石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邓通电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川军易帜后，四川形成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的局面。二刘所部各有十余万人，田部约四万人，邓部约六万人，都有自己的防区。省会成都为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所共管，为了协调关系，同年12月成立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任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1928年夏，四巨头集会，推刘湘为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邓、田为省府委员，邓兼财政厅长，田兼民政厅长，并联名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予以任命。南京方面没有据此发表任命，邓、田极为不满。邓拉拢和策动杨森、赖心辉等，组织反对刘湘的同盟军，发出讨伐刘湘的通电，但被刘湘击败。

此后川境战局纷争，多在拥有重兵的刘文辉和刘湘叔侄之间展开，邓锡侯难以跻身匹敌，只能归附刘湘麾下。1932年10月刘文辉、田颂尧之间爆发成都巷战，邓锡侯口头上宣布中立，实际上暗中助田。11月刘文辉、刘湘在荣县、威远之间展开大战，正当胜负难分之际，邓锡侯、田颂尧向刘文辉发起进攻，刘文辉被迫与刘湘讲和。

1933年初刘文辉回驻成都，与邓锡侯形同水火，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初邓赴新都防地，下令集中兵力，从灌县起沿毗河构筑防御工事。5月中旬刘文辉部向毗河邓部出击，因毗河水流湍急无法强渡，双方隔岸对峙两月之久。8月刘湘与刘文辉又展开岷江之战，刘湘大胜。邓锡侯虽然也在获胜者一方，实际上成了刘湘的附庸。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锡侯率师出川，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驻山西洪洞县。驻地与八路军驻地相距十余里，朱德曾到邓部向军官讲解游击战术，八路军文工团也常来演出，对邓部官兵产生过影响。1937年底邓部被调往徐州作战，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防守津浦铁路。国民政府迁重庆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邓锡侯与张关系较深，1938年10月被任命为川康绥靖主任，以便从中斡旋。1946年张群到美国治病，推荐邓代理四川省长，1947年正式任职。

1948年初蒋介石为继续内战的需要，电令邓锡侯预征壮丁，并征购军粮10万石，置于水陆交通要道。这时，邓见蒋军士气低落，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心，对征兵征粮任务迟迟未办。3月下旬，蒋电令邓到南京面谈。邓向蒋陈述四川困难，要求暂缓征丁征粮，并上书呈辞，蒋立即批准，并发表王陵基继任四川省主席的决定。

不久，邓锡侯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民盟主席张澜接触频繁。张劝导邓回四川团结地方上的力量迎接解放。6月邓返回四川，与刘文辉、潘文华联系反蒋，准备应变。9月，蒋介石任命邓为川陕边区绥靖主任，驻节汉中，协同胡宗南防守西南。邓借故拖延未去就职。1949年4月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建议蒋改任邓为副长官。不久，邓到重庆就任新职。他与刘文辉、潘文华利用四川省参议会及地方势力，在成都组成“川康渝国大代表、立委、监委、省市参议员联谊会”，矛头对准为蒋介石效命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撤换王。王则声言联谊会为“非法组织”，要予以取缔。于是，邓等又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要求保境安民，不久又被蒋下令取缔。

1949年八九月间，解放战争重心开始转移到西南，蒋介石到重庆坐镇指挥。这时，共产党和解放军派出秘密工作人员到成都向邓锡侯转述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曾通过刘文辉设置的雅安电台，指示他们要团结力量，待时机成熟及时发动。邓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与刘文辉、潘文华相约，待解放军进入川西时，采取配合行动。此时，胡宗南部已溃窜川西平原。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飞到成都，逼令邓锡侯、刘文辉和胡宗南合作“固守川西”。邓锡侯应付到12月7日，与刘文辉相约，当日分别潜出成都北门，相偕出走。9日他们到达彭县，10日联名发表起义通电。

四川解放后，邓锡侯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及水利部部长、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他还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四川省副主任委员。

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因病在成都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邓锡侯：《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邓演达

周天度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1)]。先世务农，兼做船夫。父亲邓镜仁是个秀才，在惠阳县城教书。邓演达幼年随父学习，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是年级中最年幼的学生，他的勇敢引起了老师邓铿的注意。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以陆小学生参加了姚雨平的革命军。1914年进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于1916年升入保定军校。在这里，他除学习军事外，并研讨社会科学。1919年军校毕业后，被派往西北边防军见习。这时，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援闽粤军，作为国民党基本武装力量，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1920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到福建漳州，统率宪兵。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

同年夏，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旧桂系。11月，粤军第一师在广州成立，邓铿任师长，邓演达任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随后又调任工兵营长。1922年3月，邓铿被暗杀。5月，孙中山调第一师参加北伐，邓演达拥护北伐主张，并从中进行了策动，使部队得以迅速出动。北伐军经始兴、南雄向北推进，他指挥的工兵营勇敢作战，首先进入赣州。6月，陈炯明所部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调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在向信丰途中，一师上层分子发生动摇，邓演达表示拥护孙中山到底。孙中山脱险到上海后，邓由一师革命军官推派，秘密到上海会见他，请示以后行动计划。12月，孙中山调广西的滇桂军东下，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各部，在西江策应，配合滇桂军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年2月，第一师工兵营扩充为第三团，邓升任团长。他率领第三团参加了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随后被派负责大本营警卫工作。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拥护者。国共合作后，他是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的七人筹委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他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在军校初创阶段，他积极工作，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训练，受到学生的拥护。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是蒋介石的心腹，对邓演达进行排挤。1925年春，他被迫辞职，前往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济。在那里，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并结识了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11月国民党右派召集了西山会议。邓演达鉴于“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危险”[(2)]，于同年冬回国。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右派进行反击，他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蒋介石3月20日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3)]，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被调离黄埔军校，任潮州军分校教育长。

1926年7月初，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随军出发，8月初到达长沙，参与第四军军部指挥工作。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数万人后，进迫武昌城，他任攻城司令，亲临前线督战。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兼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迅猛地发展起来。邓演达生长于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对农民革命运动显示出来的力量也有所领悟，因此，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采取赞助与支持的态度。邓演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民问题解决了，即解决中国问题80%[(4)]。在北伐途中，他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努力调查沿途的农民生活状况及土地分配情形，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支援北伐。占领武昌的第二天，他就把政治部的工作

转向农民运动方面[5]。1927年初，他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目前的农民运动，不过是民主主义的初期表现，农民自然要进一步和工人联合，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联合，把目前的盘剥的社会秩序推翻，造成新的社会。"他还指出"农民问题是我们的量尺"，赞成农民运动的，"便是革命的朋友；自己觉悟起来，参加这个工作者，便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反对这个工作的，便是反革命"[6]。

正当革命在迅速发展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蒋介石已经准备分裂，破坏革命。1926年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安下他的总司令部，把南昌作为右派中心，以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相对抗。接着，就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开会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邓演达和徐谦等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未迁来前代行其职权。蒋介石为了把革命政府置于他个人的独裁控制下，以达到其反革命目的，1927年初，他擅自决定迁都南昌，扣留到达南昌的中央委员，不让他们前往武汉。邓演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反动阴谋。2月9日，他和吴玉章、徐谦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斗争的领导机关。随即发表宣言，要求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并决定在3月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2月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员大会，邓演达发表演说，指责蒋介石左右完全是些"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他提出"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7]。他是当时武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3月10日，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使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由于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全会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此外，他还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负责人。

邓演达在农民部长任内，在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当国民党右派叫嚷“农民运动过火”，肆意攻击农民运动时，他对农民运动仍然表示支持。他主张农民要有武装自卫的力量，并主张替农民解决土地问题[(8)]。

邓演达在武汉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因而蒋对他怀恨在心。“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之一，下令通缉，并封闭总政治部驻沪机关，另成立以吴稚晖为首的总政治部[(9)]。面对蒋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

1927年4月下旬，武汉政府为了击退张作霖的奉军从北面来的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北伐。邓演达随第四军出发。5月末，在河南临颍大战中，他亲临前线，往来于炮火中，与士兵同战斗，博得军士的爱戴。临颍之战击溃了奉军主力，接着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6月中旬，武汉政府中的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反对革命的会议后，形势进一步恶化，邓演达在愤怒和忧虑中从河南回到武汉。这时武汉已处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反动派的气焰嚣张，武汉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也迅速转向公开反对革命，准备和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邓演达看到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大革命已面临无可挽救的失败，6月30日，他写了一篇《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对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行径表示谴责，随后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查电线杆工人，沿平汉路步行到郑州，转至陕西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汽车队，于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

同年11月1日，他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一项宣言，指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虽然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其

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0]。他们提出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随后他往欧洲去游历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和压迫人民。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起革命大旗，英勇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在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优势，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刻，一部分不愿意同蒋介石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分子，在上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表示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并与在国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创办了《革命行动》月刊，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为总干事。随后，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组织。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寻找出第三条道路来。邓演达标榜要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其实是幻想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人们称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

邓演达所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狱”[11]。只有推翻南京反革命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国家和人民才能得到拯救。但同时他又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前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可能领导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他武断地说“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2]，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声

称只有他所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完成民族及平民解放的任务”。邓演达虽然属于国民党左翼，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也重视农民的力量，要求解决农民的问题，但他的思想仍跳不出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他不了解，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但是，邓演达始终把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认定要革命就必须首先反蒋。他除了政治上进行反蒋宣传外，在军事方面也进行了策划。蒋介石是以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为其反革命武装基干的。邓演达与黄埔学生，也有历史的渊源。1930年夏秋间，邓演达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黄埔系军人，策动他们起来反蒋。同时，他与国民党内的反蒋军事集团如杨虎城、冯玉祥、阎锡山等，也有联系，企图与他们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1931年“宁粤分裂”期间，他与陈铭枢、蔡元培等商定，利用蒋介石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的机会，准备在军队开进广东后，急入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邓演达、蔡元培、陈铭枢等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分裂的办法，建立第三种势力和第三种政权[13]。

邓演达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忌恨，特别是他的军事策划被蒋察觉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即四处搜捕他，必欲置之死地。1931年8月19日，行动委员会各地受训干部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结业式。邓演达出席了这一结业典礼，由于叛徒告密被逮捕，并被解送南京关押。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

(1) 根据李洁之提供的材料说，1923年阴历二月初五日邓升任团长的日子，恰好是他的生日。邓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应是1895年3月1日。

(2) 杨逸棠：《邓演达先生传略》，《邓演达先生遗著》，香港永发印务有限公司1949年版，第10页。

(3) 毛思诚辑：《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5册，1937年版，第2页。

(4) 杨逸棠：《邓演达先生传略》，《邓演达先生遗著》，香港永发印务有限公司1949年版，第14页。

(5) 郭沫若：《革命春秋》，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6) 以上引文均见邓演达：《现在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7) 《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8) 邓演达：《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27年3月15日），《农民生活》第14期。

(9) 《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纪略》，《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10) 邓演达：《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邓演达先生遗著》，第198页。

(11) 邓演达：《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对时局宣言》，《邓演达先生遗著》，第203—207页。

(12) 邓演达：《中国到哪里去？》，《邓演达先生遗著》，第10页。

(13)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九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邓荫南

陈民

邓荫南，广东开平县人，生于1843年9月27日（清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四），名松盛，字荫南，以字行，又字有相。行三，故又称邓三，时人以其年事较高，多称他三伯。父亲邓善昆，世代务农。其兄邓灿，早年赴檀香山经商。

邓荫南少时在家乡读书；稍长，目睹当时官吏种种贪赃枉法行为，极为愤慨，对政府当局常加抨击，终为官吏所不容，险遭逆党罪被捕，幸得乡人密告，连夜乔装潜逃香港，转赴檀香山，投奔其兄邓灿。其后，得其兄资助经营农场。因年景调顺，颇有所获，在茂宜岛（Mauiland，即为：Mauiland又译毛伊岛，为夏威夷五大群岛之一）投资种植甘蔗，并开设糖厂，先后从国内招工数千人前往该岛垦殖。由于经营管理得法，又与当地土著居民相处融洽，事业得以顺利发展，不数年便成为当地著名殷商。邓为人豪爽，疏财重义，乐善好施，凡同乡有所求，必尽力资助；对地方公益事业，也无不首倡捐助，故颇得侨胞和当地人民的敬重。他平常爱好打猎，练得一手好枪法，能从背后反射击鸟，又能自制炸药，装置炸弹，诚属多才多艺，后来在革命活动中，得以显其身手。当时孙中山的胞兄孙眉，也在茂宜岛垦殖，与邓荫南志趣相投，交谊甚笃。

1894年冬，孙中山至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由于孙眉的介绍，邓荫南得与孙中山会晤，畅谈救亡大计，对孙的革命理想与政治主张，衷心折服。孙中山对邓荫南的热心公益而又多能，甚为钦佩。是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由于邓氏兄弟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三合会会员，笃信民族主义，孙中山便吸

收他们率先参加兴中会，邓荫南被推为值理（八名轮流任事的理事之一）。当时，孙中山因革命初起，处处需要用钱，便提议发行“革命军债”（亦称科股银），分头向侨胞推销。邓荫南主动表示，推销革命债券为数有限，且迫不及待，自己愿以全部资产赞助革命，作为倡导。孙中山对其倾家为革命的义举，深为感动，从而对开展革命活动也更具有信心。

1895年春，邓荫南为表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变卖其全部产业，得数万元，潜回香港，协助孙中山筹划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后来这些钱在历次起义中用尽，邓重陷贫困，但他仍然坚毅地从事革命活动。他这种倾家为革命的壮举，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连其政敌也为之叹服。梁启超曾对康有为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中山，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1) 同年2月，兴中会总机关在香港成立，用“乾亨行”招牌作掩护。接着，陆皓东、郑士良等也奉命赴广州建立兴中会组织。邓荫南则往来于香港与广州之间，协助筹划在广州的武装起义，并出巨款购买军械。各方部署略定，订于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举事，但起义机密为叛徒出卖，清吏戒备，陆皓东等被捕（后壮烈牺牲），第一次广州起义未及发难即遭失败。兴中会会员纷纷逃亡海外，邓荫南匿居港、澳，一方面联络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在广州作清军的策反工作；另一方面和陈少白、李纪堂等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作为革命喉舌，由陈少白负责主编，报社所需款项，多由邓荫南设法筹措。

1900年10月，郑士良、黄福等发动惠州起义，为清兵所包围，情势危急。邓荫南与史坚如等拟在广州发难响应，以解惠州之围，但因原先联络的会党队伍不能如期响应，便改变办法，决定暗杀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以吸引敌人兵力。史坚如曾跟邓荫南学制炸药及引爆技术，愿独自担任轰炸督署的任务。邓荫南遂派苏焯南、练达成等人，协助史坚如挖地道埋炸药。10月28日晨，炸药引爆，但只炸坍督署后墙，德寿并未受伤，史坚如被捕牺牲。邓荫南以清兵搜捕

甚严，暂时不易下手，遂逃出广州，匿居九龙屯门，以经营农场做掩护，继续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与胡汉民、黄兴等密议，策划再次起义。1909年，汪精卫、黎仲实曾来屯门，并假农场做试验炸弹引爆等技术，为谋炸清摄政王载沣等作准备。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邓荫南率黄大汉、江恭喜等攻打新安（今宝安县），但出师不利，死伤甚重，邓荫南所骑的马也中弹倒地，于危急中从小道逃脱。

民国成立后，邓荫南出任新安民军总监督，1913年改任开平县民团总长。不久，即引退隐居于屯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邓荫南编练义军，参加讨伐。后移居广州，先后出任石龙厘厂总办、孙中山总统府谘议、护法政府内政部农业局局长等职。后以民选县长出任开平县，政绩卓著。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蒙难于永丰舰，饷尽援绝。邓荫南闻讯，独以万元接济，并举兵开平，以为声援。8月9日孙中山离粤赴沪，邓荫南奉命赴澳门组织军事机关，相机讨逆。

1923年2月5日，邓荫南因病逝世。孙中山亲撰悼词，以“爱国以命，爱党以诚，家不遑顾，老而弥贞”为其一生的评价[(2)]，并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追赠邓荫南为陆军上将。第二年，邓的棺槨移葬于广州东郊七宝岗。

主要参考资料

胡汉民：《邓上将荫南先生墓表》，《革命先烈先进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5年版，第514页。

《邓三伯略历》，郑东梦编辑：《檀山华侨》，檀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第70页。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2) 《邓三伯略历》，郑东梦编辑：《檀山华侨》，檀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第70页。

邓泽如

娄献阁

邓泽如，名文恩，字远秋，号泽如，以号行。广东新会县人，1869年3月19日（清同治八年二月初七）生。祖辈务农，父亲邓传谋经商多年。邓泽如六岁入塾，十一岁随父至阳春习商，业余坚持自学。十八岁时由堂伯邓传合带往南洋谋生，初抵英属马来半岛吡叻州，在悦生店做出纳；不久往来于金宝、芙蓉等地开采锡矿；后长住挂罗庇㓝（即瓜拉比剌），以种树胶营商，逐渐积资致富。识富商陆佑，曾为陆的代理人。

邓泽如侨居国外，亲身体会到侨胞受歧视和压迫的痛苦，希望祖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一度对康有为的保皇党有所同情。1906年7月，孙中山到南洋进行革命活动，自吉隆坡至芙蓉，邓慕名前往谒见。孙与当地华侨开谈话会，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并批驳了保皇党散布的“革命可遭瓜分”的谬论。邓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从此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运动。

1907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挂罗庇㓝 分会会长。翌年，邓与爱国华侨李月池设立麻六甲（今马六甲）中华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庇能（即槟榔屿），胡汉民为支部长，胡因在香港无暇兼顾，该支部事务遂由邓泽如主持。邓对同盟会的工作认真负责，无论是在筹款方面，还是在发展会员、联络同志方面，都能尽力而为。这时同盟会在英属南洋办有《中兴日报》和《阳明日报》，邓作为一个商人，虽不大过问宣传文字，但却热心为报纸从事招股、经营等事宜。

邓泽如自加入同盟会后，即承担筹款任务，诸如钦廉、防城、镇

南关、河口及广州新军起义各役军费的募集，他无不力任艰巨，接济军需，支持革命。当时在华侨中募捐起义经费困难很多，经常碰壁受阻，但他能任劳任怨，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筹措款项，邓泽如与孙中山通信数十次，凡孙提出的要求，邓总能全力办好，因此受到孙的称赞。孙曾赞誉邓等“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1)]。

孙中山于1910年秋在庇能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邓泽如等人开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惟需筹款10万元以上，商定由邓负责在英属南洋筹办5万元。会后，邓即奔走各埠进行劝募，历时四十余日，虽逢长子出生，亦全然不顾，“尽力国事，急公忘家”[(2)]；又偕黄兴同赴各处游说，结果圆满完成任务，为1911年4月广州起义提供了大量经费。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后，邓继续在南洋募集经费支援新政权。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邓泽如应召回国。到南京后，孙拟任邓为广东省都督，邓以“泽本商人，素无政治军事之学识……自度才力不胜”而谢绝[(3)]。后胡汉民督粤，劝邓出任实业司长及官钱局总办，他也没有应允。邓为谋国家建设，力主开办银行，振兴实业，曾在广东调查矿藏，准备偕华侨投资经营。1913年，邓与国民党广东省支部订立了承办英德、花县灰石矿合同，但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中止，他仍回南洋重理旧业。

孙中山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函邓泽如在南洋创立支部并筹款，邓得信后立即奔赴各埠开展工作。部分国民党人反对孙建立新党，邓坚决支持孙中山，受邓影响的南洋多数同志亦均站在孙中山一边。1914年底，中华革命党在南洋设立筹饷局，邓任英、荷两属各埠筹款委员长。1915年，孙中山先后派许崇智、邓铿到南洋宣传党义及办理筹饷事宜，邓泽如在许等协助下，以中华实业公司名义招股数十万元，后将此款源源汇交东京总部和广东朱执信、上海陈其美等，作讨袁活动经费，为废除袁氏帝制做出了贡献。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掌握中央政权。1917年，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邓泽如依孙的指示在南洋经营“军事内国公债”，收银三万余元。1920年11月底，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邓应召归国，任内政部矿务局长兼广东矿务处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邓泽如脱险避往香港，很快同孙中山取得联系，并筹款助孙讨逆。8月，邓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即以支部长名义发表讨陈宣言。10月，又与古应芬、林直勉等组织讨陈办事处，邓为第三科主任，负责“关于经济之运动及收支各业务”[(4)]。同月，孙中山派邹鲁任驻港讨逆办事机关特派员，派邓任理财员。他们齐心协力，数月之内筹得军饷四十余万元，大部用来联络滇、桂军东下讨伐陈炯明。

此后，邓泽如进一步得到孙中山的器重，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建设部长、两广盐运使、大本营参议等职，经常列席政务会议，参与商讨大事。同时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迅速恢复了被陈炯明破坏的支部工作。

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于1923年决定改组国民党，委派廖仲恺、邓泽如等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廖、邓并为特别会议召集人，共同负责筹备改组事宜。但是，邓泽如反对国共合作，他与林直勉等11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说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改组的机会“施行阴谋”，“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5)]，谓国民党将被无形消灭。他们还拟定了一个限制跨党办法。由于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邓泽如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他并未改变反共立场。同年6月，他与张继、谢持一起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谓“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

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希即从速严重处分”[(6)]。孙中山、廖仲恺等不为所动。7月，国民党中执会决议发表宣言，表明坚持“一大”路线，“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仍望我诸同志在此时期中继续努力，……屏除疑惑”[(7)]。

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后，胡汉民暂时代行大元帅职权，邓泽如及国民党内一部分右翼分子聚集在胡的周围，常假座胡寓、“文华堂”、“慰庐”俱乐部进行活动。他们先是反对改组大本营、成立国民政府的决定，想要把持中央，贯彻其排斥共产党的主张，为此邓出面上书“弹劾政治委员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而发表政府改组”，被廖仲恺等人驳回；以后他们又多次策划“清党”，以排斥共产党人，并谋划对付左派人物的办法。他们尤恨廖仲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不惜采取暗杀手段，由胡毅生、朱卓文等收买凶手，于8月间将廖仲恺杀害。

廖仲恺遇害后，胡汉民、林直勉等与廖案有关或有重大嫌疑的人多出走、逃跑、被捕或被软禁，惟邓泽如没有受到触动，且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他心怀畏惧，很快离开广州。同年11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邓虽未到会，却出钱资助。1926年1月，邓泽如再次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

1927年4月初，吴稚晖等人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对共产党首要人员进行非常处置，邓泽如从日本赶回，表示完全赞同，并领衔通电，称国民党三中全会和武汉联席会议为共产党所操纵，否认会议所采取的坚持革命、反对独裁的各项措施的合法性，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依据。嗣后，邓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部分执监委员会议，支持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5月，宁方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各部长会议决定组织“清党委员会”，邓泽如被推为七委员之一。9月，宁汉沪合流成立特别委员会，邓被任为海外部长、政府委员和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但因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争

夺激烈，他随胡汉民滞留上海未去就职，不久特委会无形解体。

这时的政局极为动荡。张发奎、黄琪翔等于同年11月在广州兵变，拥护汪精卫，反对桂系。12月又爆发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邓泽如自上海急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责汪精卫等对于张、黄兵变“不独参预逆谋，实为发纵指示”，又说广州公社起义“则为养奸成祸”，乃是“主谋正犯”[(8)]，要求派兵去粤镇压。以后邓与古应芬奉派赴粤调查，共同炮制了一个报告书，说汪等“罪过丛积，已非朝夕”，应“通缉归案，依律从严处办”[(9)]。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仍以邓泽如为国民政府委员。但邓对蒋有所不满，曾谓：“四次全会全操于个人之手……余不愿同流合污”，因此既不到会，也不就职，并通电否认四中全会名称，认为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不合法，说蒋等已被武汉的中央指为反革命开除党籍，如果“以为有效，则蒋等既丧失党员资格，何能出席于四次全会；以为无效，则何得有四次全会之名？”[(10)]

1929年，邓泽如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委，但他态度消极，很少过问政事。此后数年，他除游山玩水、看书写字外，曾把从前所经历及搜集的有关国民党历史的材料编成八册初稿，于1930年交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后以《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为书名出版。

1931年2月，胡汉民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蒋所扣，邓泽如支持胡，于同年4月联合古应芬、萧佛成、林森以四监委名义对蒋提出弹劾。随后国民党反蒋各派和西南军事实力派在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与蒋对立，邓为该政府委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于11月召开国民党四大，粤方“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撤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邓仍被推选为第四届监委、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及西南政务委

员会委员。

1934年12月27日邓泽如病故于广州。

---

(1) 孙中山：《致邓泽如等函》（1917年10月8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7页。

(2) 黄兴：《为邓泽如子命名贺词》（1910年12月31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3) 邓泽如：《护送总理瀛眷由南洋赴宁》，《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正书局1948年版，第84页。

(4) 邓泽如：《驻港讨陈之进行》，《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正书局1948年版，第271页。

(5) 邓泽如：《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1923年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正书局1948年版，第312—313页。

(6) 邓泽如等：《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1924年6月18日），《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正书局1948年版，第315—316页。

(7) 《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1924年7月7日），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宣言汇刊》，卿云图书公司1928年版，第76—77页。

(8) 《邓泽如请拿办汪精卫等》（1927年12月13日致中央委员会函），《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6日。

(9) 《邓、古查办汪兆铭等之呈覆》（1927年12月31日），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35页。

(10) 转引自《邓委员事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编印：《追悼邓公泽如专刊》，1935年版，第5—6页。

丁超五

李锡贵

丁超五，名得心，号立夫，福建邵武县人，生于1883年12月16日（清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其父丁德生，以出租土地和经商为业。丁超五幼年入塾，1889年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益发潜心攻读，1905年入基督教会在邵武创办的汉美书院就读，旋因与美籍教师不合，在乡绅和亲戚的资助下，转入福州格致书院续学，受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熏陶，扩大了视野，1910年毕业。

1911年，丁超五受任邵武中学堂教员，由新任邵武县知事林扬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与筹组邵武文会，吸收李云程、姚时叙、陈福怡、朱柏、邓畿、邓城等亲友为会员。1912年8月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以后，丁超五先后当选为福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众议院议员。

丁超五1913年3月赴京出席国会，途经上海时，在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以建设共和事业、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1)]。至北京后，闻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沪遇刺身亡，案情与最高当局有瓜葛，义愤填膺，在国会内提出质询，抨击袁世凯肆虐和阴谋毒辣伎俩。丁超五在国会反对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虽威胁利诱终不屈。11月3日，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取消了丁超五等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令交地方严加管束。丁超五“仍与各省同志暗中联络”[(2)]，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民元约法，继续召集国会，丁超五仍为众议院议员。他遵循孙中山的电示，反对当局加入协约国和对德宣战。1917年，段祺瑞利用北洋系军人解散国会并毁弃约法后，丁超五响应孙中山“讨逆救国”的号召，追随孙南下护法。9

月，他在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0月4日，孙中山任命丁超五为大元帅府参议。是年底至翌年初，孙中山组织援闽粤军，闽籍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丁超五力排异议，支持孙中山派粤军进军福建。

此后，丁超五奔走于闽、粤、沪间，为粤军在闽发展、维护共和事业而努力。1921年5月，他至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福建主盟人。次年，他奉命北上出席国会，反对黎元洪非法复职，拒不接受黎氏所授的官职、勋章。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大总统，丁超五严正拒绝曹氏以5000元贿买他的选票。旋南下津、沪、穗，继续反对贿选。孙中山指定丁超五和李执中、董耕耘、黄元白、邵力子等五人为委员，审查国民党议员参加贿选案。嗣后，他奉命去北京，仍在国会中坚持斗争。

同年冬。中国国民党召开改组会议，孙中山指定丁超五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福建代表之一。1924年1月，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超五因在北京活动，未能与会。7月4日，孙中山任命丁超五为大本营谘议。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继、林森等人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丁与林森既是闽籍同乡，又是国会同事，交情颇厚，但丁坚持三大政策，拒绝林的拉拢，两人从此失交。

1926年1月，丁超五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赞成大会重申三大政策、“一大”宣言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正确性以及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潜至厦门进行秘密活动。12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福州后，丁超五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兼任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暨政务委员会委员。

1927年3月，丁超五到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大会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下，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从组织上给予一定限制，丁超五表示赞同。在福州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三”清党，攻击丁超五是“左派分子”、“恶化分子”，张贴标语要打倒他。会后，丁超五乘轮船自汉口东下，途中为流弹所伤。此时，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他到上海就医，同时观望形势。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掌握了党政军大权，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其时国民党内有些人逐步腐化，丁超五对于蒋介石的“清党”主张抱有幻想，认为可以整肃一下，但对狂捕滥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则不以为然，主张采用感化的办法对待共产党。在此期间，福建派系斗争异常激烈，南京当局派张群、李烈钧和丁超五等至闽，“会查闽省纠纷，秉公处理”[(3)]。

7月，福建省政府正式成立，丁超五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他招纳人才，在建设厅内部和所属机关实行财政公开和会计统一，以身作则倡导廉洁、民主风尚，想为福建建设尽力。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政治腐败，财政拮据，难以建树。丁超五怏然去职，将建设厅剩余经费数万元悉数移交，以表清白。宁汉合流后，丁超五主张极力维护党纪，提高党权。

1928年2月，国民党举行二届四中全会，丁超五任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3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特种刑事临时法庭”，丁超五被任命为庭长。这个法庭设立不到一年即被撤销。蒋介石改任他为中央编遣委员会山西编遣委员。丁超五对蒋介石不满，还被CC分子监视，愤懑于怀，托病到上海疗养。

丁超五到上海后，先是与中国生产革命党陈嘉锡、张圣才以及中华革命党陈琢等人发起组织“福建自治协会”；继而阅读了中华革命党组织者谭平山撰著的《科学的三民主义》，甚表赞同，与谭秘密会

晤，交换政见。1930年春，邓演达从国外回来，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丁超五早年认识邓演达，对邓的为人及其政治主张衷心钦佩和赞赏。他认为邓以工农为中心联合广大平民群众，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符合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他与邓会见，履行了加入第三党的手续，并遵照邓的嘱咐，在闽籍华侨中开展联系和发展工作。

丁超五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翌年3月在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上，因汪精卫被开除党籍，丁超五依次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他对蒋介石统治多有不满。其时，邓演达利用侨资创办华东大学，请丁超五担任校长。丁超五欣然允诺，并筹组机构，广告招生。国民党当局却以该校“主要教职员多系不纯分子，希图赤化青年”为由[(4)]，勒令停办。嗣后，国民党中央电召丁超五晋京，派他去四川视察党务。他于1931年春奉命入川，调解川军刘湘和刘文辉之争。从四川返回南京后，被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副部长，未去就任。旋受命赴南洋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视察侨务，慰问华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菲律宾华侨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励华侨捐款支援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密电国民党中央，请迅谋国内团结，联络苏联，共同抗日。返国后于11月间出席胡汉民、孙科、汪精卫派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赞成谴责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并电促蒋介石下野，改组国民政府。他闻悉邓演达惨遭蒋介石杀害，深表惋惜和悼念，并向第三党领导人表示，只要力所能及，愿一如既往，为党工作。

1931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后，丁超五受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此后，丁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他先在上海与吴山、许翼公、褚辅成、薛笃弼等人组织中韩民众大同盟，曾派朝鲜人金仲文（原名奎植）赴美国组织团体，鼓励朝中人民联合抗日；继派曹励恒去苏联，要求苏方准许我国东北抗日游击队进入苏境，并售给枪支弹药。1933年，丁超五与台湾同胞谢南光创办华联通讯社，以发布日本动态和我国抗日斗

争消息、鼓励人民抗日救国为主旨，任董事长。1934年丁奉派任江西省党务指导专员，整顿全省党务，但不能合蒋介石的心意，不到一年即去职。1935年出任监察院江苏区（含南京、上海两特别市）监察使。他认为国难当头，应以抗日为第一义，必须裁减机关和冗员，节省开支，充实抗战经费。是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超五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超五随国民政府机关撤至重庆。他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以及政治腐败的现实甚为不满，于1938年辞去政职，离开重庆，闲居昆明，以研究《易经》自遣。他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为主要线索，用数学方法加以推演，发现卦图乃是算术的约数，撰写了《科学的易》一书，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研究奖。

国民党中央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是曾任福建民政长和巡按使的许世英，丁超五亦在该会挂名。许世英于1938年秋拨款10万元，请丁超五返闽举办赈济事宜。丁携款返回邵武，开办赈济会第十四厂，以生产连史纸为主，任董事长。为办好救济难民的公益事业，改良纸的质量，适于钢笔书写，丁悉心经营，曾到永安向省政府建设厅索取制纸配方及明矾、松香等原料。1941年福建发生严重灾荒，丁超五到南平主持赈济事务。

抗战后期，丁超五两次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有关会议，曾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王若飞等接触，并与朱蕴山、柳亚子、邓初民等民主人士深谈，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从而站到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一边。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丁超五经陈铭枢等介绍，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出席成立会。

1946年3月，丁超五当选为福建省参议会议长。是年底，他到南京开会，再次与董必武会晤，十分赞成中共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并

表示要用各种机会揭露和反对国民党扩大内战的罪恶行径。他回闽后，联络参议会内的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呼吁恢复和平，实行民主。是年冬，丁超五以参议会议长身份出任民主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努力使《民主报》朝着民主、进步的方向发展。

1947年4月，丁超五接受李济深、朱蕴山的指示，酝酿在福建筹建民联。以后，丁超五先后接纳中共地下党员刘朝缙、林鉴修为省参议会秘书，并掩护民主党派活动，策划在参议会内外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内战的合法斗争。在此期间，刘通回闽参加立法委员竞选，发展民联成员，发挥福建民联的作用，使民联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派员潜回内地，委任丁超五、刘通二人负责福建民革工作。福建的民联成员经过研究，决定“民革”、“民联”两个组织名义同时使用。嗣后，丁和刘通被民革中央委派为民革福建领导组召集人。

是年2月，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训令的规定，福建省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丁超五任主任委员。但他不愿做危害人民的坏事，4月，丁超五通过省参议会为民请命，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求将“赋谷留闽接济民食”[(5)]。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丁超五即对福州《星闽日报》发表书面谈话，希望国民政府真正停止内战，同中共谈判，实现真正和平。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国民党反动派加紧白色恐怖，丁超五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秘密电台，通过“民联”联系国民党军、政、警、特等中上层人士，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策动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起义、投诚，同时发展民联成员，推进地下民主活动，支持教师、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动员保护财产、档案、枪支、弹药、粮食、经费，迎接解放。他和福州市参议会议长史家麟等联名通电，谓福建民穷财尽，不堪负担，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劝阻汤恩伯部队不要入闽；还反对国党当局在福建招募志愿兵。福州解放前夕，他拒绝反

动分子促他携全家去台湾的胁迫，匿居不出。8月17日晨，当解放军兵临城下时，丁超五和萨镇冰、刘通、陈培锟、史家麟、何震、卢金山等七人联名发布安民布告，表示拥护共产党，迎接解放军，希望市民各安生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超五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嗣后兼任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后，丁超五因病居住上海，任民革上海分部筹委会召集人、上海市民革主委，并任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1954年后，丁超五任福建省副省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1967年12月5日，丁超五因患脑血栓病在上海逝世。

---

(1) 《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记》，《民立报》1913年3月19日。

(2) 秦振夫、张灿修，朱书田等纂：《邵武县志》第26卷列传，邵武永生堂1937年版，第20页。

(3) 《福建省政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纪录》，福建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藏。

(4) 丁日初：《记先父丁超五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9辑，1988年版，第60页。

(5) 《福建时报》1948年4月7日。

丁福保

陆柏年

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别署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1874年8月4日（清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生。父亲丁承祥是个塾师。丁福保六岁入私塾，十三岁以后听哥哥丁宝书讲解经史诗赋，学业大进。

1895年丁福保在江阴南菁书院肄业，成绩优异，次年考取秀才。1897年秋，他去南京应乡试未中，次年再入南菁书院，跟随近代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学习数学，肄业后在无锡竢实学堂担任算学教习。

丁福保自幼体弱，任教习后又患肺病，经华蘅芳介绍其表弟赵元益诊治。丁福保由此广泛阅读医学书籍，并向赵元益求教。1901年丁福保辞去竢实学堂算学教习的职务，往上海住在赵元益家中养病、学医。这时西医输入中国日盛，赵乃当时名医，曾译述过一些西方医学著作。丁福保认为通过日译医书学习西医，更易奏效，遂于同年考入盛宣怀在虹口创设的东文学堂，精心学习日语，课余曾编写《日本文典译释》等书，为以后编译日文医书打下良好的基础。

1903年夏，丁福保赴北京，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算学及生理学教习。两年后他不愿继续任教，于1905年暑假辞去教职回到无锡。他在无锡与友人共同组织译书公会，原计划刊印医书，未能如愿，只编印了《代数备旨》等数学教科书，后因亏损过巨而结束。

丁福保于1908年春前往上海，先在自新医院任监院，同年秋开始为人治病，但求医者不多。次年6月，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举行“南洋医科考试”，丁往应试，取得最优等开业证书，受派为考察日本医学

专员；同时盛宣怀也要他调查日本办理医科学校、孤儿养育院的情况，并购买医药图书。7月，丁东渡日本，参观了千叶医学校、帝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东京小石川养育院等处，了解日本在医药方面的先进技术。8月回国后，继续行医，名声日盛。

丁福保行医已采用近代西方医学的诊断方法，运用理化检验、X光、显微镜等器械，以确诊病因，对症下药。他认为中国古代医学在生理解剖、诊断、药物等方面，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干扰，“谬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他主张借鉴西医改良中国医学，又主张“假道日本，较欧美为便”。日本古代医学，深受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输入西方医学，加以吸取与传播，发展显著。丁依据日文的医药图书，先后编译出版七八十种医疗基础理论、内外诸科、诊断护理、药物等书籍，合称为《丁氏医学丛书》，后来在南京及罗马等国内外展览获奖。在此之前，近代西方医书汉译本在我国仅二十余种，丁福保大量转译日文西方医书，在我国介绍近代西方医药科学上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丁福保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开展医药学术的探讨，有会员数百人，出版发行了《中西医学报》。他配制的“精制补血丸”、“半夏消痰丸”，曾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奖。1913年他在上海开设了丁氏医院。

丁福保原有国学基础，热心收集整理古籍。早在南菁书院时，他就立志广罗图书；辞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的动机，也有实现他编印古籍的志向在其中。经过多年行医之后，他有了丰裕的收入，陆续购藏了各类图书，其中有不少善本古籍。他创办了医学书局，除刊印医书外，先后编辑印行了《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书。

丁福保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时，曾读过一些佛教书籍，深受影响。1916年起，他开始信奉佛教，吃斋茹素、宣扬佛学，编写了《佛学指南》、《佛学初阶》等读物，笺注了《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多种佛教典籍。他又参考日本出版的几种佛教辞典，编成《佛

学大辞典》于1921年出版。他早年在日本曾购得国内已经失传的《一切经音义》（唐释慧琳编）和《续一切经音义》（辽释希麟编），这时乃以笔画为序，将此两书另行编排，出版了《一切经音义汇编》。他在浏览道教图书后，见道教典籍浩繁，信徒难以通读，于是选辑道教经籍100种，1922年编为《道藏精华录》出版，以带有道教色彩的“守一子”署名。后来他又撰写了《老子道德经笺注》于1927年印行。

丁福保认为他编印的医学、算学书籍虽有几十种，但都时过境迁，不足流传；所刊宗教书籍，则稍有可存的价值。他还专心致力于钻研《说文解字》一书，汇集了182种注释和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以许慎的原书次序为纲，编辑成《说文解字诂林》，俾查阅一字而各家论说齐备，使用方便，于1928年出版，获得各界好评。次年，他翻造上海大通路瑞德里的旧居后，取名“诂林精舍”，用以读书著述。他继续汇集有关《说文解字》的其他46种论述，于1932年又编印了《说文解字诂林补遗》。此外，他又编写了《六书正义》、《说文钥》等数种文字学的著作。丁收藏了不少古代钱币，1938年编印了《古钱大辞典》，同时出版了《古泉学纲要》等有关古钱的著作。丁福保整理古籍二十余年，印行多种大型图书，使他的名声在学术文化界比医药界更为人所知晓。

为了集中精力编书，丁福保1931年起曾停止行医，但不时仍有病人求诊。几年后他又恢复行医，每天上午为人治病。同时他又编译了《民众新医学丛书》二十余种，宣传医药卫生知识。他发起组织了中国肺病学会，并支持儿子创立上海虹桥肺病疗养院。他晚年信佛更笃，迷信于轮回报应之说，宣扬戒杀放生。由于他的社会声望，曾先后在上海佛教医院、上海福幼院、世界提倡素食会、上海卫生教育社、中国医学杂志社、古钱学会等慈善机关、学术团体担任过职务。

丁福保于1952年11月28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他自1926年起就主持编辑《四部总录》，广辑经史子集，是一部备载前人序跋、解题的

书目，编成而未及出版。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周云青整理其遗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医药编”、“天文编”、“算学编”、“艺术编”四种。

主要参考资料

丁福保编：《畴隐居士自订年谱》，上海医学书局1925年版。

丁福保撰：《畴隐居士自传》，上海诂林精舍出版社1948年印。

丁福保著：《畴隐居士学术史》，上海诂林精舍出版社1949年印。

丁贵堂

任嘉尧

丁贵堂，字荣阶，1891年12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祖籍山东黄县，先辈闯关东，在辽宁海城丁家堡子落户。祖父丁有柏为大车夫；父亲丁希官以自做自卖豆腐为业，并租佃土地耕种。丁贵堂童年帮助父兄务农，牧牛放猪。由于家中三代文盲，其父下决心送他求学。丁十岁入塾，继在本县三育学堂、两等小学堂就读，敏而好学。他亲身感受到日本、俄国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逐渐形成爱国思想，具有正义感。1910年他在奉天高等学堂毕业后，曾在奉天东关两等小学堂执教，其时周恩来在该校求学[(1)]。1912年春，他考入奉天法政学堂；两月后，转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苦读4年。毕业后于1916年7月被派到安东海关任见习，翌年8月经过考核升为最末级帮办，开始了他整整46年在海关工作的生涯。

1919年秋，丁贵堂调到北京，在总税务司署做打字工作，四年后为汉文科帮办。我国海关自鸦片战争后，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收支权等，均被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陆续攫夺，统管全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及各关税务司、副税务司皆由这些国家派遣的外籍人员担任，我国海关大权完全被垄断了，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员，备受外籍人员的歧视和欺凌。丁贵堂到海关工作后，不堪忍受他们蔑视我国主权的跋扈行径，几次与之争吵。丁曾联合总税务司署的中国人员与外国人交涉，据理力争，方获得了房租及煤贴。

1927年春，丁贵堂调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是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英美为支持国民党统治，声称将海关行政权逐步交还我国，总税务司署隶属财政部关务署。但是，总税务司仍由英人梅乐和（Frederick William Maze）“代理”，税务司、

副税务司等高级职务亦仍由外人充任。这年，江海关中国员工发起组织海关华员联合会，以“提高职权，改良待遇”相号召，开展争取中外关员平等待遇的斗争，丁为该会组织部员。在斗争中，丁主张用和平说理的办法，而不用罢工或其他暴动手段，认为那些手段既为国民政府所不容，若失败，会使洋员更加凶残。在广大员工坚持斗争下，海关当局被迫提升数名华员为“代理副税务司”以资敷衍，丁贵堂升为江海关代理副税务司，仍做汉文秘书工作。

1929年初，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在南京举行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丁贵堂和其他爱国人士为挽回海关行政管理权及提高华员地位待遇，在会上据理力争，取得了中国关员和外籍关员原则上的平等待遇和地位，并规定以后海关行政部门停止招收外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削弱外国人的垄断权势。同年，梅乐和实任总税务司，丁贵堂在总税务司署任汉文科代理税务司，次年初实任汉文科税务司。他对海关一切事务，力争必须由关务署同意后方可执行，避免外员多头干预，以维护海关主权；同时，他对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均加列汉文，打破了单用英文的惯例。

1934年4月，丁贵堂升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相当于秘书长）。这项职务历来由英、美人充任，“九一八”事变前夕始由日籍关员岸本广吉充任。“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岸本返国，丁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中继任总务科税务司。但是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日本政府一再要求岸本复职。是年底，丁贵堂被迫改任不管科税务司。1935年春，丁被派为考察欧美关政特派员，出国7个月。9月返国后，任总税务司署汉文科税务司。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丁贵堂爱国热情高昂。他对家乡东北的沦亡十分痛心，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非常敬佩。他曾联合在上海的海关高级华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号召全国海关员工向抗日军队捐献慰劳金。在他们的倡议下，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自1933年起，按月捐献薪金的5%，慰劳和

援助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宋哲元在华北的抗日部队；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主持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也得到了资助。丁同情和支持东北进步人士和流亡学生的爱国活动，常予慷慨资助，并热情接待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住在自己家中。丁贵堂对宋庆龄和斯诺、艾黎等创导的“工合”运动，亦予以赞助和支持。以后他还带动海关员工开展捐献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丁请阎宝航交1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拨款两万元支援新四军。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租界成为孤岛。丁贵堂筹划将总税务司署内迁重庆，但为日本侵略者所阻。总税务司署曾把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电报告重庆国民政府。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进占租界，在天津海关发现此项密电副本，认定是间谍行为，于1942年3月逮捕丁贵堂及副税务司张勇年等人。虽遭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始终表示系按政府明令办理，拒不承认是间谍行为。一个月后释出。是年底，丁佯称患病告假去东北老家养病，毅然离别妻室子女离沪，在河南商丘穿越日伪封锁线，辗转抵达重庆。

1943年3月，丁贵堂在重庆任总税务司署秘书长。6月，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丁被派为代理总税务司，是为中国关员第一次执掌海关领导权。但为时只2个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即派美国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为总税务司，任丁为副总税务司。10月，丁到新疆筹设海关，于翌年2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迪化关，丁兼该关税务司；嗣后并在中苏边境塔城、伊宁、霍城、和阗等地设立了关卡。

抗战胜利后，丁贵堂被派为上海财经接收委员，并兼江海关税务司及上海浚浦局局长，负责接收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他洁身自守，与当时众多之国民党“劫收”大员截然不同。1946年冬，李度调丁回总税务司署，而另派英国人白立查（E．A．Pritchard）为江海关税务司，以控制这个东方和中国第一大口岸。丁贵堂力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应由中国关员担任，但李度得到宋子文和国民党政府关务

署长张福运的支持，独断专行，仍命丁向白立查交卸。白立查不久患肺癌死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始由中国关员充任。

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仰仗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盘踞在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盛气凌人，肆意凌辱和欺压我国员工，上海区海关员工会曾先后五次发动怠工、罢工，丁贵堂始终表示同情，但劝说罢工工人“应当适可而止，不可弄的太大了难以收拾”[(2)]。李度曾调来国民党特务、军警企图武力镇压，丁贵堂等从中斡旋、阻止，力免酿成流血事件。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广州、台湾；海关许多人员亦惶惶不安，以丁贵堂之行动定去留。丁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团结、教育下，决心留守江海关，设法保护关产和档案，期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实现自己收回关权的愿望。1949年春，丁毅然宣布决定留沪，敦促李度电令各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集团从广州、台北几次电令丁将当时远东最大的挖泥船“建设号”开往台湾；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又下令征调海关和浚浦局的数十艘缉私艇和挖泥船。丁贵堂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和海关广大员工的支持下，托词“船只要修理”、“人员要补充”、“材料要添置”而予以拖延，尽力保护关产。汤恩伯十分恼怒，曾下令逮捕丁贵堂；由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仓促逃跑，丁得免于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均被取消，海关实现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丁贵堂无限兴奋。他积极协助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1949年9月，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主持人民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由于丁贵堂熟谙海关事务，毛泽东曾直呼他为“丁海关”。他还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11月21日丁贵堂病逝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丁耀珍、丁耀璞、丁耀瑛、丁耀琳：《纪念父亲丁贵堂》，《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9日。

《丁贵堂》，戚再玉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版。

---

(1) 据辽宁大学教授、丁贵堂之同学张镜玄回忆以及与周恩来同学之卢广绩口述。丁贵堂生前曾多次对其子女说过："周总理是位胸怀大略的政治家，想当年我只教过他短短几个月英语，他至今还没忘记。"

(2) 丁贵堂：《自传》（1951年7月1日），手稿打字本第16页。

丁默邨

朱佩禧

丁默邨，原名丁聚川，又名勒生、时政、竹倩。1901年生于湖南常德市大高山街。其父略通文墨，以缝纫为生，兼裱字画，家道小康。丁幼时就读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未能考入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丁默邨只身来到上海，通过学生会开始参与政治。1921年秋，在上海受施存统赏识，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

1922年春，丁默邨持团组织介绍信回长沙，与中共湖南支部取得联系后，被派往常德省立二师组建团组织。他首先邀请蒋希清、严正谊等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后又筹建常德团组织，丁默邨自任组长。1922年6月，团员发展到三十五人，小组扩大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2年10月13日，丁默邨担任团书记。1923年4月，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选，丁默邨失去书记一职，为此愤愤不平，后出走到上海[(1)]。1924年加入国民党。

1924年，丁默邨担任广东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训练工作，后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政治部主任秘书、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参事。1930年，转任特工，表面是明光中学校长，实际上直接领导一个直属情报小组，出版《社会新闻》，攻击共产党人和汪精卫。1934年，受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举荐，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即邮电检查）处长，陈立夫任局长，丁当时地位与戴笠（二处处长）、徐恩曾（一处处长）并驾齐驱。

1938年8月第三处被撤并，原综合性之调查统计局裁撤，该局第一处改组为日后之中统局，第二处改为日后之军统局。在中统与军统分离过程中，丁默邨未获新工作，仅在“军委会”中挂了个少将参议的

空衔，气恼之下，1938年秋，以“治病”为借口赴香港。1938年底由香港逃往上海日占区投奔日伪。1939年1月，丁默邨参加了李士群组织的特务机构。1939年2月，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原肥贤二为扑灭上海抗日力量——“蓝衣社”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表示要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邨丰富的特工经验被日本人选中，与李士群合作组建“特工总部”。

1939年3月，“特工总部”搬到沪西地区的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七十六号。土肥原贤二及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2)]派晴气庆胤[(3)]给予指导，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特工总部”逮捕和杀戮重庆方面爱国同志，是压制民众组织的抗日活动的日伪秘密机关，其中住有大量日本宪兵和警察。警卫总队长由李士群的亲信吴士宝担任。日本人每月给丁默邨三十万法币，因此他仍然直接受日本宪兵指挥[(4)]。1939年8月，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默邨被推选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丁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七十六号有“魔窟”之称号，丁默邨被国人称为“丁屠夫”。

1939年8月，中统陈立夫派赵冰谷到上海，劝说丁默邨向中央输诚不成功，赵冰谷反被李士群扣留，两个月后被放回重庆。1939年底，国民党中统为了暗杀丁默邨，派出女间谍郑苹如，实施“美人计”[(5)]。第一次行动，郑苹如引丁默邨到她家做客，并安排狙击手等候。丁突然改变主意，掉头离去。第二次行动，郑引丁到预先已埋伏好杀手的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伯利亚皮货店。不料被丁默邨看出破绽，乘车逃脱。第三次，郑苹如不甘心失败，驱车到七十六号，被丁的亲信扣押，后被杀害。1939年，上海因租界关系，前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仍然执行国民政府法令，拒绝参加汪伪的“和平运动”，汪伪特工总部杀害了该院刑庭庭长郁华和钱鸿业等国民党法院职员，“杀鸡儆猴”，以示警戒，而与担任副主任的丁默邨脱不了关系[(6)]

。1940年1月，周佛海和丁默邨谈特务发展问题，认为目前缺乏者不在经济而在人才；局面日益发展，人才更不敷支配。丁默邨向周佛海提议江北各路司令人选[(7)]。1月27日，汪精卫、梅思平和周佛海商组“国民政府还都筹备委员会”，丁默邨作为十一个委员之一，担任运输组组长[(8)]。

1940年2月，丁默邨和李士群两人围绕人事任命问题矛盾重重，关系极不融洽，最后矛盾爆发在警政部长的任命上。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签订了《关于中日新关系调整协定书》，其中《秘密谅解事项》第一条规定：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伪维新政府将予取消，但主要人物的面子和地位，须加以考虑[(9)]。汪精卫、周佛海内定由丁默邨担任伪警政部长，李士群任次长。李士群立即找到周佛海，公开反对丁默邨任警政部长，自己要求任该职务。后来周佛海提议，警察和特务分开管理，特务由他直接负责，丁默邨表示同意，可是李士群不同意。其中日本的晴气庆胤和塚本支持李士群，最后汪精卫无奈之下，由周佛海任警政部部长，邓祖禹任常务次长，李士群任政务次长，丁默邨另行安排，至此埋下了周佛海和李士群、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矛盾的隐患。1940年3月，丁默邨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社会部部长，掌管社会福利工作。1940年12月28日，周佛海将警政部事务移交给李士群。

丁默邨与周佛海是湖南同乡，与中统关系密切，面对李士群与丁默邨的矛盾，周佛海常常找丁默邨谈话，希望社会部与特工总部紧密合作。1940年12月1日，周佛海告诫丁默邨，以气量宽宏……第一须泯除所谓改组派及CC之畛域，第二CC之中尤不宜分门立户等。实际上，周佛海是站在丁默邨一边，对于李士群则很不满。“默邨对余（周佛海）忠实，余非不知，惟因器小多疑，致同志中对渠（丁默邨）不谅解者极多，如听其自然，实对默邨不住。”“晚士群来谈问题甚多，觉其政治上认识不清；就明大义、识大体一点观之，尚觉不够，殊为憾事。”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摩擦，离不开日本特工的支持，

其中川本芳太郎支持丁，晴气庆胤支持李，而影佐祯昭苦于应付两人的争执[10]。1941年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和伪江苏省省长等要职，周佛海接到军统的除奸令，制定了利用日本人除掉李士群的计划。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帮忙，1943年9月6日毒杀了李士群。

1940年夏和1941年夏，丁默邨先后在南京成立社会事业协会和农村福利协会，进行社会和农村福利工作，救济贫民和难民的生活，调查民运情形。1941年2月1日，丁默邨出席南京的伪东亚联盟总会创立会，并担任社会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此时上海工潮不断、租界华董改选、上海总商会改选，问题层出，影佐祯昭对丁默邨渐感不满，下令停止川本芳太郎与丁的联系[11]。1941年8月，丁默邨担任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委，周佛海任委员长。1941年9月，调任伪交通部部长，任职期内，收回了一些铁道、轮船、航空等日方公司，保全邮局，维持通邮通汇，改进公路、革除交通行业的腐败。

1942年夏，赵冰谷再次来上海，与丁默邨联络。丁默邨在1942年1月给重庆政府写了自首书，开始向重庆靠拢。之后，丁默邨受陈立夫指示，离间汪精卫和李士群、汪精卫和日本人的关系。1943年、1944年陆续派赵冰谷来上海，要求丁默邨和周佛海掩护协助，在南京、上海设立电台，以与中统局联络、提供情报之用。

1943年2月，丁默邨改任伪社会福利部部长。任内发表《岁首感言》一文，主张惟有大东亚战争胜利，东亚民族才得解放，夸大日寇战功，鼓吹整军建军，加紧训练青年等通敌行为暴露无遗，成为日后罪证[12]。1943年5月1日，丁默邨和南京市长周雪昌为救济华北四省灾荒，在南京联欢社召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代表等商讨并组织华北急救会，决定在苏州、上海、杭州、蚌埠及其他各重要地区设办事处。在运输赈灾用品方面，要求日本各驻华机关给予协助[13]。5月19日，丁默邨呼吁上海各界尽力筹赈，通过京戏大会串、

足球义赛和跑马义赛来筹募款项，并向上海市民提倡“节约”和“救灾”[14]。6月，丁默邨对《申报》上“节宴公约”表示赞成，并发表“简单朴实为荣，奢侈虚靡为辱”等谈话[15]。担任社会福利部长后，丁默邨在新国民运动公务人员及青少年团暑期集训营上，发表了《战时社会政策》，认为战时社会政策重要，设立社会部，由政府和民间分别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提出“民间之力，造福民间”、“地方之力，造福地方”[16]。后在《申报》上发表了《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17]。

1944年12月27日，汪精卫死亡，汪伪政府人事大调整。1945年1月，丁默邨担任汪伪国防会议秘书长兼任伪政治保卫部副总监，其中总监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陈公博担任，副主席由周佛海担任。

1945年5月底，丁默邨调任伪浙江省省长兼党部主任委员，伪杭州绥靖主任及伪浙江省保安司令等职。他担任“浙江省省长”后，取消了清乡机构，分期分区取消了浙江各区的封锁线，撤除了所有各地封锁用的竹篱笆；统制物资，组织物资运销管理处，把民财供给日军。在杭州市各城门，夏季每日6时即行锁闭，丁默邨改杭州市城门关闭为8时，入西湖游览者展至夜间11时，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市民。另外，平抑物价，原来杭州米价涨至每石伪币九十万以至百万元，丁默邨到浙江后，设法输运物资，平抑物价至每石伪币四十万元以内，较附近其他地方低[18]。在浙江省省长任内，每周以伪省党部名义，印制大量宣传品，如“大东亚主义”、“轴心国必胜”等口号，分发各伪市县党部[19]。

日本投降后，因其战时曾向重庆国民党政府输诚，因此被任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丁默邨委托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赵冰谷、第三战区联络专员萧伯威携同“反共剿匪”（匪在本文中是指浙江的中共游击队）计划，专程去见顾祝同，投靠国民政府。1945年春，丁默邨在浙东扫荡了茅山中共游击队，6月又进剿浙西地区，肃清吴兴、德清一带的中共游击队，恢复浙江地方的水陆交通，维持浙江沦陷区及沪杭沿线一带之治安。协助中央接收伪军方面，他交出其所属全部兵权

——有五个师、五个团和十五个直属大队，合计兵力共约二十五个团，使江浙东南方为国民党军队控制[20]。1945年夏，丁默邨曾计划勾结日寇特工中岛信一，计划组织突击总队，等国民党军队在浙东一带登陆时，实行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军队。后接受国民党中央指示，前往浙江控制伪军做内应，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反攻及美军登陆。

1945年9月30日，丁默邨和周佛海等人由军统戴笠陪同，从上海飞往重庆，被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待遇。可惜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撞机殒命。9月16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开始“审讯汉奸”。先用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由重庆押解到南京，关在宁海路军统局看守所，后又移至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老虎桥监狱。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开始侦讯。25日，丁默邨递交了万余字的《自白书》，详细叙述了他自首经过，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逃避惩罚。可是，在经过四次侦讯和调查，11月11日高等法院检察处对他提起公诉。

1947年2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作出了判决：丁默邨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21]。1947年7月5日，丁默邨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执行枪决。

---

(1) 易建设：《从青年团到铁杆汉奸——丁默邨其人其事》，《湖南党史》1998年第2期，第139页。

(2) 影佐祯昭（1893年3月7日—1948年9月10日）日本陆军中将，上海梅机关负责人，日军驻汪伪政府最高代表，第七炮兵司令，第三十八师师团长。

(3) 晴气庆胤（1901年—1959年）日本特务。1931年日本陆军大学毕

业。1934年任职日本参谋本部期间，被派到中国九江收集情报。1938年6月任土肥原贤二的助手，从事特务活动。1939年2月10日，根据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的“训令”，帮助汉奸丁默邨、李士群建立特工组织，成为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后台。后参加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1940年11月，任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1942年4月，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在华期间，为汪伪政权出谋划策，屠杀中国爱国军民。1943年回日本，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

(4) 高宗武著，陶恒生译：《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据1946年10月首都高等法院统计，在丁默邨担任特工期间，国民政府特工许克、王祥生、卜玉琳、李楚琛、陈兆庆、徐寿新、余延智、周希良、徐阿梅、郭效泉、张焕文、彭福林等十二名。见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3页。

(5) 梅子：《刺杀汉奸丁默邨的美女特工郑苹如》，《名人传记》2008年第4期。

(6)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第847页。

(7)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1940年1月6日、14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8)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1940年1月26日，第237页。

(9)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1940年2月6日，第241页注释。

(10)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1940年7月30日、12月1日、12月8日、1941年12月26日、1月11日、5月25日、2月1日条。

(11)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编，1941年3月22日，第439-440页。

(12)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第848页。

(13) 《丁默邨等发起救济华北灾黎》，《申报》1943年5月2日。

(14) 《陈丁两长官吁请各界尽力筹赈（华北灾民待援手）》，《申报》1943年5月20日。

(15) 《社会福利部长丁部长谈“节约”与“救灾”》，《申报》1943年6月2日。

(16) 《战时社会政策——公务员青少年暑期集训营演讲词》，《申报》

1943年7月25日。

(17) 《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申报》1943年9月17日。

(18)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第681页。

(19)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第848页。

(20)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第808页。

(21) 陈娟：《阴险狡猾的丁默邨》，华东七省政协文史工作会议编《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342页。

丁惟汾

娄献阁

丁惟汾，字鼎丞，晚号诂雅堂主人。祖籍江苏省海州（今属连云港市），1874年11月6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山东省日照县涛雒镇。丁家迁至日照已有很久的历史，且为当地望族。其父丁以此，字竹筠，为清末名儒，有《毛诗正韵》、《尔雅声类》等书行世。

丁惟汾幼年在家课读，听父讲论，专心音韵，而厌弃帖括。后入保定师范学堂学习。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法学系。因受进步思想影响，经张继介绍，于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留日期间，曾与蒋衍升等在东京创办《晨钟》周刊，宣传反满复汉等革命主张。丁不善言词，但肯实干，为孙中山、黄兴所器重。1907年春，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徐镜心离日，分会长一职即由丁继任。

1908年丁惟汾曾回山东，联络本省同人先后在济南、烟台、青岛等地设山左、东华、震旦各公学，以学校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所招学员均入同盟会，引起当局的注意，学校相继遭破坏。1911年春留日学生发起军国民会，准备大举，总会设上海，丁亦返鲁组织分会，同年10月武昌首义后，山东立即响应。丁惟汾与谢鸿焘等密商，迅速在省垣济南改组各界联合保安会，同时发动当地驻军第五镇官兵参加，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都督，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但袁世凯得讯即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至济南，串通孙宝琦及第五镇协统张树元取消独立，并对革命进行镇压，党人逃往各地继续活动，丁则南下请援。同年12月12日烟台起义，举舞凤兵舰舰长王传炯为司令，而王暗结袁世凯，妄想把党人一网打尽。丁在上海与黄兴、陈其美晤商，陈急派沪军三千，以刘基炎统帅北上；南京政府并委胡瑛为山东都督，

因胡一时不能成行，乃由杜潜代理都督领兵先行，迫使王传炯慌忙逃窜。

1912年丁惟汾任山东省议会议员兼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被选为山东省党部理事。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他作为山东省籍议员，出席会议。时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唆使心腹暗杀宋教仁，不经国会同意擅签善后大借款合同，无理罢免江西省都督李烈钧等，引起国会议员的不满，丁等曾在议会提出质问书。“二次革命”失败，袁于同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并有加害丁之意。丁早有警觉，事前已出京，再度赴日，旋返回山东，在家乡以农耕为韬晦之计。1915年袁世凯帝制活动日炽，8月筹安会起，不久丁潜赴上海，翌年春与十七省议员通电讨袁。旋返山东，助居正在潍县、周村分途发难，积极参加护国运动。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丁惟汾抵北京出席会议。1917年7月，孙中山在南方高举护法旗帜，9月1日丁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次年孙受西南军阀排挤辞职赴沪，丁奉命留粤。1919年春应孙中山之召至上海。丁在沪发行《北方周刊》，联络各地青年。余暇从事声韵及经学研究，同年草成《毛诗韵例》、《箕裘录》各若干卷。1920年秋，孙中山回粤重整军政府，丁随孙至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于1921年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时孙决心出师北伐，派丁赴上海联络北方党员，并兼国民党山东支部长，以备接应北伐军。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丁惟汾竭力赞助孙中山讨陈，曾列名旅沪各省同志讨陈宣言。孙接受失败教训，重新整顿国民党，同年9月指定丁等九人为规划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但因旧国会再次复会，他前往北京出席会议，未能始终其起草工作。1923年1月，孙中山任命丁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同年夏，为反对直系军阀逼迫黎元洪离职和酝酿贿选总统，丁与王乐平、覃振等21人在天津发表离京宣言，声讨曹

锟违法丑行，旋赴上海，百多名议员先后抵沪。在沪丁曾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同年冬，他奉孙中山命在北京设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后改为北京执行部，仍由丁负责主持），秘密开展工作，并于青岛创办胶澳中学，以培养青年。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被推为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议，9月曾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参与讨论北伐大计。同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丁正在北方，不久鉴于冯已拥段祺瑞为大元帅，曾电劝孙中山缓来北京，因段派毫无诚意，想用釜底抽薪之计使西南各省脱离孙。迨孙抱病北来抵天津后，丁与随侍孙留津的汪精卫、邵元冲等举行会议，讨论并决定北方局势及应付对策。12月底孙中山入北京，病势加剧，遂成立国民党临时政治委员会处理有关问题，丁亦为参与者之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丁即在政治会议上提议：每届集会必须宣读孙之遗嘱，以示不忘与警惕，被采纳。此后他仍留北京，对西山会议派颇有同情，但并未参加活动。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出席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复返北京。自北伐开始参加国民党中央工作，同年7月丁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常委，并任青年部部长兼政治会议委员。10月广州中山大学实行委员制，他是委员之一。稍后国民党内发生迁都之争，1927年1月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而蒋介石操纵滞留南昌的张静江、丁惟汾等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暂驻南昌。3月他虽赴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改选结果失去中央常委、青年部长等职。旋离武汉去九江，并追随蒋介石到南京，暗中策划“清党”反共活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丁复任宁方中央常委、青年部长，一度改任宣传部长，同时兼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校务委员及训育主任。同年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

三方合流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他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不久特委会解体，于1928年2月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丁再次当选为中央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后又被任命为中央训练部部长、山东省政府委员。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仍选丁惟汾任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已萌退意，同年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中央政治学校，丁继续任校务委员，并兼教育长，曾主持校政。1931年短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有《齐东语》一文发表。同年12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至1935年末去职。此后专心从事著述，1936年复有《毛诗双声通转韵徵》一文发表。同期他请得“中央”同意明令褒扬山东革命先烈，并成立山东烈士公葬筹备委员会，建烈士公墓于济南千佛山。同时组成山东革命党史编纂委员会，自任主编，着手编撰《山东革命党史稿》，从1933年开始，到1937年完成初稿，后经其追随者王仲裕集资交由铭华制版印刷公司影印出版。全书共20卷。

丁惟汾与蒋介石关系密切，1936年西安事变时，丁感情用事，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他正在山东扫墓，立即返回南京，后随国民党政府入川，住重庆近郊，被任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兼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重返南京旧居，1946年11月出席“制宪国大”，参与所谓制宪活动，不久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同时任国民党本部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不久辞去）等。1948年秋前往台湾，仍任监察委员，继续从事著述。丁惟汾晚年患有肾病，1951年曾去日本治疗，1954年1月病发，医治无效，于5月12日卒于台北，终年八十岁。

丁惟汾在学术上继承父业，用心于朴学及经学达六十余年，曾与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相互切磋，有一定造诣，被章誉为“研经怀孔壁，论韵识齐东”[(1)]。丁善古韵古读，“任举一字，即知其古隶何部，读何音”[(2)]。他对古韵部类认真加以考订，合各家之言审慎定其音读，重新进行分合，初分22部，后减为17部。又辨析支、脂、之三

韵，使其一一廓清分界，添补了以往分类的不足。丁尤精《毛诗》、《尔雅》、《方言》诸书，多所创获。前人（包括其父）读诗分韵详者定为73例，他曾增介错韵、递转韵、连续递转韵、交错韵、交错转韵、双声通读韵等6例，使毛诗韵读更加完备。他还用俚语作为探求古代经传文字的工具，也就是“以方言上溯古读，以古语下通今语”[(3)]，“为训释古籍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4)]。丁成书上百万言，生前已定稿的主要有《毛诗韵聿》、《诗毛氏传解故》、《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等，后以《诂雅堂丛著六种》出版。尚有《诂雅堂读左笔记》、《诂雅堂读〈国语〉笔记》、《诂雅堂读孟笔记》、《诂雅堂读荀笔记》、《诂雅堂读庄笔记》、《〈释名〉译证》等，是他去世后由他人代为整理成册者，未印行。

---

(1) 章太炎赠丁惟汾诗句，见屈万里：《章太炎赠丁鼎丞先生诗卷后记》，台北《传记文学》第23卷，第4期，第54页。

(2) 王献唐：《诂雅堂主治学记》，见丁惟汾《毛诗韵聿》，齐鲁书社1984年印行，第1—6页。

(3) 屈万里：《丁鼎丞先生对于学术之贡献》，见朱传誉主编《丁惟汾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6页。

(4) “《俚语证古》出版说明”，丁惟汾著《俚语证古》，齐鲁书社1983年版。

丁文江

耿云志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887年4月13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生在一个富绅的家庭里。五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得到泰兴知县龙璋的赏识，拜龙为师，在龙的鼓励下，去日本留学。但他在日本一年多，没进什么正式学校，曾一度参与《江苏》杂志的编辑工作。由于受到同乡，当时在欧洲游学的吴稚晖等人的劝促，于1904年3月，离开日本到英国去留学。他先在英国东部一个名叫司保尔丁的村镇读中学；两年后，考入剑桥大学，但只住半年就因故辍学了。他趁此机会到欧洲大陆游历了一番。1908年，他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动物学和地质学。

1911年4月，丁文江毕业回国。他为了游历和考察内地情形，从越南海防上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经黔、湘、鄂等省，7月才回到家乡。这次穿越西南的旅行，为他后来做西南地质考察工作积累了经验。他在家没有待多久，就赶往北京去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清廷赏给他“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的家乡颇有震动，他“倡编地方保卫团”[(1)] 以维持地方秩序。

1912年，丁文江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写了一本作为“民国新教科书”《动物学》，于1914年出版。

1913年2月，他到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当时地质工作还不被人们重视，地质科几乎无事可办。北京大学原有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了。丁文江便把北大地质门的图书标本等借过来，为工商部办了个地质研究班，次年，改称地质研究所，由地质学家章鸿钊任所长。丁文江和稍后回国的翁文灏都在该所讲课，丁

担任讲授古生物学。1913年至1914年，丁奉派先后到山西和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云南除调查锡、铜等矿产外，还调查了金沙江水道，并注意搜集人类学的材料。1916年，北京大学从地质研究所收回自己的图书标本，续办地质系。这时，丁文江又为农商部（原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创办了个地质调查所，他自任所长。

1918年底，他随梁启超、蒋百里等，以半官方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战后形势，兼充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1920年初，他经由美国回国。在美国时，他为北京大学聘请了葛利普（A．W．Grabau）作地质系教授。此人来华后，除任北大教授外，长期兼为地质调查所主持古生物的研究工作，一直到他病逝为止，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1922年，丁文江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是年，他与翁文灏合著的《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一书出版。不久，因家累太重，丁文江不得已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就任官商合办的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他作为地质调查所的顾问，仍参与该所的工作，他一直是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

丁文江自欧游归国后，与胡适等英美派知识分子，紧密地联在一起。由于他们都在海外留学多年，都深受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的熏染，所以同气相求。1921年5月，胡适、丁文江等集议成立性质秘密的“努力会”。1922年5月，他们在北京办起《努力周报》，以“学者”的身份发表政治言论，大力鼓吹“好人政府”等和平改革的政治主张。丁用“宗淹”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篇政治论文。1923年8月，他在《少数人的责任》这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2)这里充分表现了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改革思想以及他们自我夸张的

高傲态度和强烈的干预政治的欲望。

1923年2月，丁文江与张君劢掀起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这场持续半年多的论战中，丁文江以马赫主义的经验论来反对张的直觉主义的唯心论，并斥张为“玄学鬼”。虽未能彻底“克敌制胜”，但在世界性的保守主义回潮的情势下，在中国维护了科学的地位。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丁文江与梁启超等发表了一个宣言，反对持续罢工、罢课、罢市，主张与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由他主稿的一篇英文文件，专门向英国人介绍“五卅”的经过和中国人的基本要求，在英国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势力伸张到苏、皖和上海，引起江苏大资产阶级的反感。丁文江参与他们“驱奉救苏”的秘密运动。1925年7月，他到上海与刘厚生等细谈奉军入苏后的情形，然后到岳州去见吴佩孚。回到上海后，又应邀到杭州去见孙传芳，商量驱奉问题。10月，孙在杭州组织五省联军，分五路出兵讨奉，一个月就把奉军赶走，从而据有了东南五省的地盘。丁认为孙的军事实力可为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凭借，于是决定靠近孙。1926年初，他辞去了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的职务。2月，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丁文江是中国委员之一）的事南下。当时，孙传芳为了一面讨好帝国主义，一面笼络江浙资产阶级，设立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自任督办，要搞什么“大上海”的计划，便请很受外国人欣赏的丁文江出来干这件事。是年5月，孙正式委任他为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在他任总办的半年多时间内，孙传芳数次封闭上海总工会、学生总会及其他许多进步机关，禁止群众爱国运动，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残酷镇压了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丁文江就任总办一个月，国民革命军就从广东开始北伐了。当北伐军席卷长江一带时，丁见势不妙，赶紧于1926年年底辞职，次年避居到大连。丁文江在总办任内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收回“会审公廨”。

丁文江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与胡适一起，陪同来华的英国委员卫灵顿（V．Willingdon）等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调查，为时两个多月。他出任孙传芳的总办，曾与卫灵顿详细商量过。由于就任总办，他没有参加全部调查活动，也没有赴英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但由于他与胡适等长期担任此职，并且还在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过董事和秘书等职务，所以能在文化教育界发挥重大的影响。

丁文江在匿居大连期间，编写了《徐霞客年谱》，整理了《徐霞客游记》，于1928年合在一起出版。是年夏，丁到广西去作地质考察。当时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托他踏勘计划中的川广铁路线，广西地方政府也请他帮助探察矿产。11月他到上海，不久，回到北平。1929年，由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质调查，丁任总指挥，他接受铁道部资助，一面探察矿产，一面继续调查川广铁道的路线，至1930年夏，才结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他为地质系研究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与胡适、蒋廷黻等一起专事研究对日妥协的问题，准备向蒋介石统治集团献策。1932年，丁与胡适邀集蒋廷黻、傅斯年等，决定创办政治刊物《独立评论》。该杂志于1932年5月在北平出版。丁先后发表政论文章二十多篇。他主张“遇有机会”就赶紧“与日本妥协”[(3)]；他认为中国没有抗日的可能，“对日宣战，完全是等于自杀”[(4)]。他歪曲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所采取的保护革命的策略，提出“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5)] 他在《独立评论》上曾极力宣扬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反共文章。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这篇文章中，他攻击马克思主义，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

丁文江的拥蒋反共立场和对日妥协的主张，很投合蒋介石的胃口。1933年3月，长城抗战紧急，蒋亲自跑到保定布置退却。3月13

日，蒋特邀胡适、丁文江等会见。之后，胡、丁等回北平又与何应钦会见，密商对日妥协问题，5月，便出现了“塘沽协定”。

是年8月，丁文江和葛利普（A．W．Grabau）、德日进（T．De Chardin，法籍学者）去美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回国时，途经苏联，作了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回国后，曾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苏俄旅行记》。其中除了记述他参观经历和一般印象外，也表明了他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1933年，丁文江与翁文灏、曾世英主编的《中国分省新图》由申报馆出版，次年他们又合编了《中华民国新地图》，也由申报馆出版。

1934年6月，丁文江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接任中研院总干事。1935年12月初，他受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委托，前往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并为准备内迁的北方学校寻觅校址。当时国民党政府曾酝酿请丁文江出任铁道部长，丁尚在犹豫未决时，于12月8日夜在衡阳煤气中毒，并发生脑中枢血管破坏，遂移往长沙救治。1936年1月5日于湘雅医院逝世。

---

(1) 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独立评论》第188号。

(2)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号。

(3)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

(4)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

(5) 丁文江：《苏俄革命史的一页及其教训》，《大公报》1935年7月21日《星期论文》。

丁西林

张奇林

丁西林，原名燮林，字巽甫，笔名西林，1893年9月29日（清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思想开明，重视子女教育。丁西林自幼受家庭影响，爱好科学。

1905年，丁西林入江苏省南通州中学读书。五年后考入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学习，1913年毕业。翌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曾到伦敦大学做物理研究工作，研究炽热物体的电子发射。在英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喜爱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易卜生的作品和富有幽默色彩的英国喜剧、独幕剧。许多作品对时弊的嘲讽，以及奇妙的构思，精巧的结构，讥俏、精辟的对话，惊人之笔的运用和余音袅袅的结尾处理等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0年，丁西林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主讲物理学等课程。他思想开明、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爱戴。后出任理预科主任和物理系主任。他曾和李四光、唐钺等七位新近回国的北大教授一起在吉祥大院租房居住，时人戏称其为“吉祥八君子”。

丁西林兴趣十分广泛，除执教物理、数学外，爱好文学、戏剧、音乐、曲艺和语言文字。其创作活动始于戏剧。1923年，他的处女作独幕剧《一只马蜂》发表于《太平洋》第四卷第三号。由于这个剧作具有幽默的风格，机智的对话以及反封建的主题，一时广泛上演。接着，他又写成《亲爱的丈夫》、《酒后》。1925年5月，现代评论社将其三个剧本结集出版了《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剧》。1926年至

1930年，丁又陆续发表了《压迫》、《瞎了一只眼》、《北京的空气》等独幕剧，以北京为背景，反映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生活。《压迫》选取日常生活的事件，以轻松的喜剧形式，表现了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是他前期创作的代表作，亦“可算那时期的创作喜剧中的唯一杰作”[(1)]。1926年，中国戏剧社成立，丁为该社社员，并与邓以蛰、闻一多等负责出版委员会工作。

1928年5月，丁西林应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之邀，赴上海筹建物理研究所，11月任该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物理研究所的20年间，丁孜孜不倦，潜心钻研物理科学，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创设许多实验室，培养出一批科研人才。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学术论著《初级物理学实验讲义》。1932年，物理研究所印行其英文著作《绝对测定地心吸力之新摆及其用法》。鉴于地磁的研究和测定工作在当时国内还是空白，他主持建立了南京紫金山地磁台。

丁西林一向认为，要培养建设人才，必须把大专院校办好，而中学教育的加强又是办好大专院校的前提。为了向中学提供精良的物理仪器以提高中学物理教学的质量，他把物理研究所的金木工车厂，扩大成一座拥有百余工人的专门生产物理教学仪器的工场，1935年—1937年间制造了600套高中物理实验仪器和3000套初中物理实验仪器，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购买转发各地中学使用。这两套仪器的设计和相应的物理实验讲义的编写，均由丁亲自负责，在全国中等学校使用数十年不衰。1935年，丁对中国传统乐器笛子进行改革，由仪器工场制出新笛，把原来的六孔七声音阶，改为十一孔平均十二律，扩大了乐器的音域，他专门撰写《新笛》一文，为之介绍。

丁西林受蔡元培的影响颇深，亦深得蔡之器重，故对蔡十分敬重。1936年9月，丁与蒋梦麟、胡适、罗家伦等五人发起联同蔡氏朋友、学生，共同赠送一所房屋，作为蔡七十岁之寿礼，为蔡所谦谢。1940年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丁扼腕痛惜道：“在蔡先生直接领导

下工作了二十年，从未厌倦，从此失去良师”[(2)]，并赴港为蔡治丧。

抗战期间，丁西林为了保存研究机构和实验工场，多方奔走，历尽艰辛。1939年冬，物理所约同李四光的地质所搬迁到桂林。1941年初，应英国政府的邀请，他赴香港筹建中英合办的军用光学工厂。刚刚就绪，即遇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丁西林携家人返回内地，途经广州，遭汪伪特务软禁。丁拒绝为汪伪政权服务，只身化装逃出魔掌，到达桂林，家属则被敌伪关押达数年之久。丁西林在桂林继续主持物理所工作，1944年桂林沦陷前，随物理所迁往重庆。

与此同时，丁西林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友人的鼓励下，坚持业余戏剧创作，先后写出了独幕剧《三块钱国币》（1939年）、多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39年）和《妙峰山》（1940年）。这些作品除了坚持他一贯的喜剧风格外，在题材的现实性和主题的深刻性方面，较前期作品有了明显的进展；在结构的完整和语言的风趣等方面，也显示了作者技巧的娴熟和进步。四幕喜剧《妙峰山》，系为纪念蔡元培逝世所作，热情歌颂了抗日爱国的英雄行为，写得清新别致，寓庄于谐，富有情趣，受到了普遍好评。

1945年6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丁西林与郭沫若等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庆典。1947年，丁辞去中研院物理所职务，赴青岛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旋又兼任理学院院长。是年，《西林独幕剧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有此前所作的七出独幕剧。1948年4月，应台湾大学之聘，赴台任该校理学院院长。9月，返回山东大学原任。

1949年9月，丁西林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等职，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参加领导科学普及、文字改革等项工作。他还兼任中印友协会长、中非友协副会长、全国文联委员、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

等职，并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王震东：《科学家、喜剧家、多面手——记著名的幽默喜剧家丁西林》，《剧本》1983年第9期。

---

(1) 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 王书庄：《怀念丁西林老师》，《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1期。

董康

宗清元

董康，原名寿金，字授经[(1)]，号诵芬主人，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1867年4月26日（清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生。其父董介贵为县学生。董康从小过继给曾任广西新宁州吏目的叔叔董莲芳为嗣，因嗣父早故，他从六岁起，仍由生父授课识字，后进江阴南菁书院读书。二十二岁中举人，1898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戊戌政变后任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

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董康在城绅推举下，与翰林院侍讲恽毓鼎、刑部主事乔树枏创设“协巡公所”[(2)]，维持京城治安。和议结束后，被“钦派”跸路工程、堂子工程监督[(3)]。不久，晋升刑部员外郎、郎中。1901年2月参与监斩启秀、徐承煜。

1902年起，董康以候选道资格，先后任法律馆提调兼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宪政编查馆科员、大理院刑庭推事、大理院推丞等。期间，曾参考日本律师冈田拟订的《新定法律草案》和薛允升所撰《历朝法律沿革》稿本，编修了一部《宪法大纲》[(4)]，于1908年由清廷颁布试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

1914年2月董康回国，20日署大理院院长，5月14日充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同时兼任中央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7月11日，开去兼任，国务院派周树模兼任。8月1日，大理院长改实任。1915年，被袁世凯授为少卿，旋兼法典编纂会副会长。11月，又任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1917年11月12日，中央在大理院内设置地方捕获审检厅，董康兼任厅长。次年7月15日，与王宠惠又被调任修订法律馆总裁，曾与徐世昌总统磋商领事裁判权等事宜。

1920年，皖系段祺瑞被直系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打败，靳云鹏在张作霖推荐下，于8月再任国务总理。11日，董康被靳云鹏任为司法总长。上任后，他为确保司法内部官吏清正廉洁，对湖北夏口地方审判厅厅长邵箴，原在直隶、天津地方检察厅厅长任内，“挪欠公款，屡催未缴”，“藏匿簿册”等枉法行为[5]，予以免职追究，并申令对在逃的邵箴通缉惩办。1921年5月14日，靳内阁改组，董康仍连任司法总长。7月22日，他鉴于“民事诉讼关系綦重，东省法院，甫经收回，需用尤亟”[6]，将修订法律馆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呈总统同意，提前公布，于9月1日先在东省特别法院区域执行。嗣后，靳内阁倒台，由梁士诒以张作霖为后援，于12月24日出面组阁，因司法总长王宠惠未肯到任，仍由董康署理。并于30日兼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次年4月22日，辞司法总长，由次长罗文幹代理。

1922年1月26日，财政部发行八厘债券，共9600万元，以偿还内外短期公债。公布后遭长江各督反对，尤其是吴佩孚抨击最力。代总理颜惠庆鉴于各督压力，于2月17日设偿还内外短期公债审查委员会，派董康兼任委员长。接着，董针对“近年财政紊乱”情况，公布对八种不合财政规定弊端进行审查。前任财政总长张弧见势不妙，即于3月7日公布查究方案的当天，逃离北京。经过董康等十余天的紧张查核，结果发现八年公债票内，有重号三百余万；空白债票三百余万，董认为此案皆与前掌财要人有关，一面以查债委员会名义，请地方检察厅预备传票，传审潘复、张弧、张仁普、张训钦、钮传善、陈威等到案[7]，同时将案交检察厅复审，并于3月22日，将债案公布。历任财政要人李士伟、高凌霨、卢学溥、潘复等，纷纷通电声辩。4月5日，偿还内外短期公债审查委员会开会，对审查中发现的各项债款进行公决，当场通过三十余款，即日由董康将审查情况和通过各案上呈总统。5月13日，审查短债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将潘复任内不明用途的款项移交审核用途委员会处理。16日，代理财部的钟世铭，把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经过实情全部公布。董康随即于18日提出五条整顿财部的意见：一、财政纷乱宜清理；二、财政人员宜加淘汰；三、借

款宜按适中利率；四、国库制度与发行纸币宜统一；五、中交两行宜合并。24日，徐世昌总统命董继钟世铭署财政总长，并于27日兼任盐务署、币制局督办。

董康出任财政总长后，为取信于民，他“首持财政公开，以节减费用为前提”，用“不轻率主张举债”做法[(8)]，来博得各方的支持。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独占优势，迫使总统徐世昌去职。6月11日，直系迎黎元洪复总统位。接着，黎命颜惠庆重新组阁，董康继任财政总长，并兼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16日，他召集主管总税务司的英人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史国伦等在外交部大楼，召开救济财政会议。议决从关盐抵债中，每月合助政府100万元。7月7日，董康又与颜惠庆、顾维钧一起，与使团商量延长庚子赔款付款时间。7月15日，由陆军、内务、财政、农商等部职员组成的八百余人索薪团到国务院索取欠薪，当时阁员正在开会，阁员们见势不妙，相继离去，董康因避走不及被愤怒的索薪者殴伤。董对这种“暴力劫持，施于个人”的行为非常愤慨，除要求惩办为首者曹元森等外，同时三上辞呈，坚请黎元洪总统“另择贤能”[(9)]。8月5日，黎令唐绍仪出面组阁，同日董康辞财政总长。

1922年8月12日，阁议决定派董康与周自齐赴欧美考察商务实业。24日，他以调查商务、实业的工商专使身份前赴欧美等国考察。在法国期间，他曾到国家图书馆“敦煌室”研究，并抄录了有关我国唐代的法律史料，收获甚丰。1923年初回国后，接代理大理院长余棨昌职。2月3日，黎元洪委他出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所遗院长由余棨昌继任。同年秋董移居上海。

1924年春，上海总商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等团体，以租界居民受制于会审公廨的不良司法现状，推董康、李祖虞、赵锡恩、陈霆锐四人，于5月23日赴京，会谒外交司法两部，主张对会审公廨无条件收回。8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将所拟收回公廨办法方案，送达美驻华公使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随后派董康任上海各法

团运动收回公廨代表，到上海负责磋商事宜，筹设上海特别法庭等。他空暇研究法律，在《法学季刊》上发表《前清法制概要》等文章。是年，与王宠惠同被东吴大学校长刘伯穆赠予该校法科法律博士学位。以后即在东吴大学授法律课。

1925年，江苏省部分省议员，因对省库积亏三千余万元产生不满，组织监算交代委员会，推董康为执行部长，负责审查韩国钧任内的财政开支。翌年夏，王开疆在法租界蒲柏路发起创办上海法科大学，董与章太炎被推任校长。旋章太炎辞职，王开疆因故他去，董康鉴于“校务重大，独力难支”等因[10]，邀王正廷、于右任、陈陶遗、褚辅成、钱新之等组织董事会，谋求学校发展，由褚辅成任董事长。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与孙传芳部发生激战。奉鲁军决定南下援孙，董康坚决反对。他以江浙和平代表的身份，于10月20日前往江西，向孙传芳“陈述人民希望息战”的愿望，并“力劝早日回宁坐镇”[11]。31日，董康回到上海后，为了联合更多的人来阻止战争，与张一麐草拟和平电文，送达天津请黎元洪、张绍曾，北京王士珍、赵尔巽等数十人署名发表，劝孙等“勿以外力酿内争，勿以内争召外侮，勿以军民为草芥，勿以国土为棋局”[12]，希望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各派全权代表，协商解决收束军事时局。

同年11月初，孙传芳在江西战败，秘密潜往天津向张作霖求援。董康为阻止奉鲁军南下，与朱叔源、王绍鏊等发起成立新苏公会，划苏省为“民治区域”[13]。随后与全浙公会、全赣公会接洽联络，于28日召开三省联合会委员会议，董被推为主席，会上一致通过了反对奉鲁军南下议案，致电张作霖，“严令鲁军撤回原防”[14]，并通电三省，痛斥“军阀以驻防形式占领地盘”，是“民治前途之最大障碍”，指出这种“武力割据现象”，不根本铲除，“必使民国统一，破坏殆尽”[15]。12月2日，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针对上海市民“组织上海特别市，划淞沪为永不驻兵区域”的要求，推董康、袁希濂、沈钧儒等为特别市制大纲起草委员。19日，新苏公会向江苏各银行宣布“孙传芳勾引

暴军、蹂躏吾省”罪状，警告各银行不可“再予贷款”，并对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指明“自孙传芳投奉之日始，以后如发现尊处有订结银行借款，及包出各业认税等项，勾结拍卖种种行为”[16]，皆由李个人负责。23日，孙传芳下令上海戒严司令李宝章、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新苏公会、全浙公会、全赣公会，并有“缉拿委员，格杀不论”[17]密令，董康避居日本。

董康在日本曾冒名书贾沈玉声，往来京都、东京之间，访求古书，凡遇贮藏旧刊孤本及旧本小说，仔细地记录了其版式内容[18]，后结合平时日常应酬，著成《书舶庸谭》（又名《东游日记》，1930年5月大东书局石印本）四卷。

1927年5月董回国，继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数月后辞职，由褚辅成继任校长。接着，董康在上海担任律师职务，兼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31年罗文幹任司法部长期间，先后聘董康任国民党法官第二、三届训练所教务主任、所长。同年2月22日及9月10日江苏保卫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法官初试典试委员会成立时，又担任委员。后应日本法学界的邀请，曾前往日本主讲中国古代刑法。由于日本法学界的推崇，董被誉为当时中国法学界的权威。在参加法官训练所第二届人员中，“莫不以出其门墙为荣”[19]。自1932年7月第三届法官训练班起，开始增设《中国古代刑法研究》，由他主讲。1933年冬，董康重返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法科、国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前清法制制度》、《追记前清考试制度》、《民法亲属继承两篇修正案》、《中国法制小史》、《秋审制度》（第一编）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物色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北洋要员出来组织华北伪政权未成的情况下，去上海找王克敏北上作傀儡。王克敏即纠集他熟稔的董康参加伪政权。是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居仁堂成立，董康任常务委员，并于1938年1月1日出任伪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3月29日，伪临时政府

并入汪精卫组织的汪伪国民政府，董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6月7日，王克敏辞职，董康随即亦辞任。嗣后，董因病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治疗。抗战胜利后，戴笠指挥军统局于10月6日，在原伪政权任经济总署督办的汪时璟家中，以宴请华北高级汉奸的名义，将出席者逮捕。董康因病未能前往，以后他屡持医院证明，一直未收审处理，直至1947年在医院病卒。

董康除从政活动外，对古剧、词及版本目录学颇精。平时，他随处留意搜集古剧书籍。先在北京买得《乐府考略》抄本四函，后在上海盛宣怀藏书处借抄了32册《考略》抄本，再加在日本避祸期间抄得的八十余篇《考略》，参考《扬州画舫录》所载黄文旸《曲海总目》，相互勘正，排比校订，纂录了一部《曲海总目提要》（46卷）。此书被誉为中国所有记载剧本书中最详细的一部。他还著有《课花庵词》、《曲目韵编》、《嘉业堂书目提要稿本》；辑有《千秋绝艳图》、《读曲丛刊》（七种）等。除此，董康刻书甚多，且都为海内孤本。刻有《诵芬室丛刊》（初编、二编共100册）、《石巢传奇》（1919年刻）、《五代史平话》、《吴梅村年谱》、《铁琴铜剑楼书目》（十卷）、《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光绪丁未刻）、《盛明杂剧》（60种）及毛西河详本《西厢记》等，都为学界所倚重。

---

(1) 除《董氏家乘》、《当代中国名人录》（樊荫南编纂，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等外，还用过“绶经”。

(2) 《书舶庸谭》（1930年大东书局版），又称《东游日记》。

(3) 董康主修：《董氏家乘》，1928年刻。

(4) 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荣孟源、章伯锋主编：《我国宪法小史》，向前《历史知识》1982年第6辑。

(5) 《东方杂志》18卷8号。

(6) 《东方杂志》18卷16号。

(7) 《东方杂志》19卷7号。

(8) 《新武进报》1922年7月22日（二）。

(9) 《新武进报》1922年7月18日（二），《东方杂志》19卷15号。

(10) 《上海法科大学三周年纪念特刊》，《法科月刊》，1929年10月第6期。

(11) 《董绶经氏回里》、《和平代表董康回沪后谈话》，《申报》1926年11月1日、11月5日。

(12) 《南北名流之呼吁和平电》，《申报》1926年11月4日。

(13) 《新苏公会第二次理事会纪》，《申报》1926年11月9日。

(14) 《三省联合会通电反对奉鲁军南下》，《申报》1926年11月29日。

(15) 《致三省各界通电》，《申报》1926年11月29日。

(16) 《新苏公会致财厅各银行电》，《申报》1926年12月20日。

(17) 《孙传芳密令拿办团体领袖》，《申报》1926年12月25、31日。

(18) ［日］桥川时雄编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览》，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10月版。

(19) 金沛仁：《国民党法官的训练、使用与司法党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董其武

李倩　邢宇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董多见为别人帮工，运送煤炭，入不敷出。他的外祖父因发动当地义和团起义被杀害，外祖母因此异常愁苦寂寞，便把幼年的外孙董其武接到身边抚养。董其武六岁时随其大舅父范必英读书，稍长并参加农活。十六岁时，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幼学琼林》和《史鉴节要》等书。十七岁时入河津县高小。他目睹国家贫弱，外侮频仍，民不聊生。遂生投笔从戎、救国救民之志。1918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军事性质的中学——斌业中学到河津县招生，董报名应试，以第一名被录取。

斌业中学又名学兵团，学制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名为学兵团，学的是普通中学一、二年级的课程，也学军事，两年期满。第二阶段，名为斌业中学，学期两年，学的是普通中学三、四年级的课程，同时也学军事。斌业中学毕业后，学习优秀的可以根据个人志愿，继续深造。这便是第三阶段——斌业专门学校。第一阶段结业时，董其武的军事课和文学课都是第一，顺利升入斌业中学，学习成绩仍名列前茅，被保送斌业专门学校。

不料董在离毕业不到半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意外事件。那时董任班长，带领同学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较远，却靠近阎锡山的体育馆，为给树浇水，他去找体育馆长请求在该馆挑水，得到馆长同意。在一次挑水时，小同学曹扬被督军府的一个副官训斥，且被打破头，董上前讲理，那副官却伸手就打，董愤而招呼同学，把那副官狠狠揍了一顿，从而惹起祸端。督军府派人到校追查，校长答应查明惩处肇

事者。董其武主动承担被禁闭一周，并写悔过书。但他却写了一篇揭露副官蛮不讲理、自己无过可悔的信，送呈校长。校长对董的倔强很生气，佯言要开除他，董脱口而出："好，我走！"对此老师和同学们都为董婉惜，纷纷说情挽留他，但他一一谢绝。从此，脱离了学校生活。

董离开斌业后，于1924年参加了胡景翼所部国民二军，开始了戎马生涯。董在国民二军第九混成旅，由排长而后升任连长、营长和旅部中校副官长。他对队伍训练严格，作战勇敢，听命令守纪律。一次，在郑州附近作战，很多连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而他那个连伤亡不大，旅长郑思成马上把该连扩编为营，由董任营长。1927年董其武随部队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支队长，转战豫皖各地，屡立战功，后升任中校副团长，因该部不是蒋介石嫡系，竟遭编遣。当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正在扩编军队，董一向景仰傅将军，遂变卖衣物作路费，于1928年秋到天津投效，被傅作义委任为额外上尉参谋。他不嫌官小、军衔低，工作尽职尽责，得到傅的赞赏，不久升为少校参谋，后任干部政治训练所队长。在傅的统率下，董其武带兵有方，1930年4月起，他先后任中校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中原大战，接着又随傅返回绥远。当时土匪猖獗，危害民众，回到绥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乡剿匪。董在肃清匪患中，不为赃官巨款贿赂而徇情枉法，不为美人计所腐蚀，坚决严惩匪首、秉公执法，使绥东五县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1931年任傅部第35军的团长，移驻绥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董其武致函傅作义，请求派往东北抗击日寇。他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时刻做好杀敌准备。1933年5月中旬长城抗战中，董率部在怀柔、石场一线狙击来犯之敌，打退日军十多次猖狂进攻，直至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才被迫撤出阵地。随后，董升任第二一八旅旅长。1936年董再次参加震动中外的绥远抗战。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部星夜行动，出敌不意，分路抄袭，一举将

红格尔图的日伪军歼灭，为百灵庙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绥远抗战大捷，全国欢欣鼓舞，振奋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情，毛泽东主席对“绥远抗战”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并派南汉宸携带其亲笔信及绣有“为国御侮”四字的锦旗，赴绥远表示亲切慰问。

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开始后，董其武始终战斗在抗日最前线，身经百战，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抗战开始，他以凌厉攻势，一举收复敌占区察北重镇商都。接着率部转战平绥一线。其间，与八路军密切配合，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及忻口会战。是役他率3000精兵，深入日军腹地，虽身负重伤还亲自指挥袭击了板垣前线指挥所，取得了辉煌战果，大寒敌胆而壮我军威。同年11月董以战功升任一〇一师师长。1938年转战晋西北后，结识了贺龙、程子华等八路军领导人，坚定了国共合作的信念。不久又率部参加绥南战役。1939年初，随傅作义将军回到绥远河套地区，整训部队。1939年冬到1940年3月间，接连进行奇袭包头，攻打绥西，收复五原三个著名战役。三战三捷，开抗战以来国民党防区收复失地之先河。由于战功显赫，1940年8月董升为暂编第四军军长。

此后董其武着手大力整训部队，使部队的战斗技术和军风军纪有了明显提高。1941年夏，暂编第四军改为骑兵第四军，董仍任军长。1942年，他又调任第三十五军军长。旋奉命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毕业后仍回绥远。1945年7月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改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董其武则由第三十五军军长改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命挥军东进，抢占地盘。董其武虽然希望国家进行建设，不愿再有内战发生，可是事与愿违，竟被驱使走了一段错误曲折的道路。

1945年11月董兼任包头城防司令，1946年夏接任暂编第三军军长，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参加了绥包、集宁、张家口等三次

战役，同八路军作战，受到国民党政府褒奖。同年10月15日董其武被任命为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省保安司令。后又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傅作义的帮助下，审时度势，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冲破重重阻力，于1949年9月19日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迅速解放全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其武作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在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的指导下，积极团结军政人员，认真整顿社会治安，平息残匪叛乱，严惩不法分子，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稳定绥远局势竭尽全力。1951年，他率部赴朝作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指挥部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军事工程修建任务，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有突出表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授予他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董其武由朝鲜回国后，于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军长，致力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1955年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他为部队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63年河北省遭受特大洪灾，他亲自指挥部队抗洪抢险。1966年“文革”开始，董其武申请离职，1968年9月获中央军委批准。此外，他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四、五届常委会委员，第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三、四届常委会委员。1978年人民政协恢复工作，他继续被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后又增选为第五届政协副主席，连任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并为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曾多次坡度四川、江苏、福建、广东、天津、等省市视察。1980年1月，董其武终于实现

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入党后，他对党和国事更加关心。1984年底，他与其他政协委员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参观，深受鼓舞，并满腔热情的就特区科研、教育、精神文明等方面提出了十条建设性的意见。他尤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发表过不少有关文章和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1988年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1989年3月3日，董其武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版。

马洪武等：《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人民日报》1989年3月18日第4版和3月19日第6版。

《人民政协报》1989年3月7日第1版和3月21日第3版。

张荣耀整理：《董其武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版。

董显光

任嘉尧

董显光，1887年11月9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宁波东南一个小镇上，世代务农。父母信仰基督教，为邻里侧目。董七岁时入私塾读书，十岁时开始务农，农忙时插秧，力不胜任，重返私塾，遂发愤学习。其父因不甘坐守家园，借内地会教友的关系到上海等地承包与教会有关的房屋建筑，并于1899年举家迁沪。

董显光到上海后，入中西书院求学。因家境清苦，次年转入收费较廉的清心中学读书。1905年，上海发生会审公堂美国法官殴打中国审判官事件，清心中学学生罢课，并拒购美国货，董与部分同学愤而离校。董转学到民立中学读了一年。中学毕业之际，其父病逝，不得不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接受浙江奉化龙津中学堂的邀请，担任英文和数学教员。其时，与董同岁的蒋介石为龙津中学的学生。

1907年，董显光辞去中学教职，返沪和赵荫芗结婚，婚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协助经理写英文信兼主管承制铜版等。因夫妇都是基督教徒，认识长老会的孟德高莫莱牧师，遂向他进一步学习英文和拉丁文。

在牧师孟德高莫莱的建议下，董显光筹措旅费，于1909年1月赴美国留学，到密苏里州肯萨斯城入巴克学院。他半工半读，做过司炉、印刷工人、园丁以及埋装水管、学校杂务、送牛奶、餐馆打杂和农活等工作。在一次背诵圣经竞赛中，董背诵全部《旧约箴言》，获得第一名。一天，他在报上看见密苏里大学筹办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的报道，虽然已在巴克学院读了二年多，仍申请转学到密苏里专攻新闻。辅修国际史与法律，一年后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董到纽约新

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继续深造。在学习的同时，在《独立》杂志撰写书评，并在当地报纸兼任记者。一次，西奥多·罗斯福到纽约[(1)]，董前往采访，罗斯福向董表示："不问世界局势有任何变动，美国和中国应该永远做朋友。"[(2)] 1913年春，董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等不及夏季取得硕士学位就匆忙取道日本返国。在横滨到上海的海轮上，见到卸任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董作了一次访问，还把谈话的内容写成报道，寄给纽约的一家报纸[(3)]。

董显光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后经孙中山介绍，在英文日报《中国共和报》担任副编辑。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中国共和报》显著报道并揭露袁世凯主使行刺的真相，立即卷进了政治漩涡。董被邀参加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孙中山寓所召开的一连串会议，密商推翻袁世凯政权的运动。孙中山亲自派董显光代表上海几家国民党报纸的记者，到北京采访这场政治搏斗。但反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10月，袁世凯利用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这时，董受聘为英文《北京日报》主笔。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董撰文揭露袁日勾结的阴谋。旋因《北京日报》新任社长与董意见不合，董去职。接着，董在全国煤油矿事务总署督办熊希龄处任秘书，后来随熊转入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并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4)]。其间，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向熊商请借调董赴美工作，以设法阻止美国借款给日本"开发"东北，董乃在华盛顿逗留十个月，同时兼任《北京日报》驻华盛顿记者。

1925年，董显光用历年积蓄在天津办《庸报》，因人手甚少。自任发行人、主笔、编辑、记者并兼广告经理。次年，当北伐军到达长沙时，董访问了总司令蒋介石。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事件，董在报上公开揭露日本当局是炸死张作霖的凶手。

1929年夏，董显光受聘到上海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是年11月，海军上将杜锡珪出国考察各国海军状况，董应邀任考察团秘书长，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意等国家，历时三个月。

访问归来，董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被蒋认出曾是龙津中学的老师。接着，董应蒋的邀请，与《申报》主笔陈景韩在奉化溪口和蒋介石夫妇一起盘桓了半个月。1934年董经蒋介石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1935年冬，董显光因病辞去《大陆报》的职务。嗣后，他接受蒋介石的客籍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的劝促[(5)]，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持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的任命，在上海成立了检查外电的机构，除了日本记者用自己的电台拍发电讯外，英、俄、法文的电讯都得经过检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董显光出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负责国际宣传。不久，宣传业务并入党务系统，董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随着战局的推移，董的工作重心由上海转移到南京、武汉，1938年底到达重庆。董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内设立了国际宣传处，由曾虚白任处长，发行了英文《战时中国》月刊。国际宣传处先后在香港、纽约、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伦敦、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巴黎、蒙特雷以及国内昆明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规模最大的纽约办事处还组成了发布新闻的中国新闻社，发行英文《现代中国》半月刊，设立广播电台，并组织中国问题讲演处。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董显光曾随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和缅甸。1942年11月，董又陪同宋美龄赴美就医；次年2月，宋出院后作全美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战，董亦陪同。开罗会议举行时，董又作为蒋介石的随员之一。

这期间，外国记者云集重庆，多次要求准许访问延安，均遭蒋介石的拒绝。直到1943年10月，董显光奉命解禁，但经官方批准的只有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斯坦因（Gunther Stein）和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爱金生（Brooks Atkinson）两批记者前往。董对进步、正直的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诺（Edgar Snow）、斯特朗（AnnaLouise

Strong）、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即海伦·斯诺）等所写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斗争的通讯、报道，感到难于处理。

1947年5月，董显光在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局长，曾虚白和邓友德为副局长。新闻局对外国记者电讯的检查，一再受到了外国舆论的指责。《华盛顿邮报》1947年12月26日社评说："这种检查，控制了消息的来源，是世界上最严紧的检查。"1948年12月20日，董辞卸了新闻局局长的职务。1949年偕其妻赵荫芗迁居台北，担任了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北《中央日报》董事长。

1949年8月，蒋介石密遣董显光去香港，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海军上将会晤，要求美国政府作如中共攻台愿予台湾以军事和经济支援的保证。白吉尔则建议台湾方面考虑反攻大陆。此后两年间，董经常作为蒋介石的使者往来欧美及日本，进行频繁的游说活动。1952年5月，台湾当局派董出任驻日本"大使"，1956年5月，又调任驻美国"大使"两年多。1971年1月10日董显光在美国病逝[(6)]。

董显光留有英文手稿《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后在台湾以《董显光自传》为名译成中文出版。董的其他英文著作还有《蒋介石传》、《中国和世界报刊》等。

---

(1) 西奥多·罗斯福，于1901年—1907年任美国总统。后来又有一位弗兰克林·罗斯福，于1932年—1945年任美国总统。

(2) 见《董显光自传》，台湾《新生报》1974年版，第26页。

(3) 见《董显光自传》，台湾《新生报》第26页。

(4) 当时《密勒氏评论报》主编为美国记者鲍威尔（J．B．PoWell），是董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同班同学。

(5) 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1913年与董在北京

相识。时端纳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兼《远东评论》月刊编辑。后来任张学良的顾问，1928年起任蒋介石的顾问。

(6) 日本三省堂编修所编：《简明人名辞典》（外国篇），1976年版，第553页。

董作宾

王世民　冯时

董作宾，原名作仁，字彦堂（一作雁堂），别号平庐，河南南阳人。生于1895年3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其父董士魁，经商为业。董作宾六岁入塾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以至四书五经。他勤劳刻苦，聪颖异常。稍长，即在课余助父营生，印衣袖，刻印章，鬻春联。十六岁入本县元宗小学高小肄业，一度承父命弃学经商，又以余暇设馆授徒，但仍坚持自学进修。1915年进入县立师范讲习所学习，翌年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18年前往省城开封求学，考入河南育才馆。当时，有早期甲骨收藏家时经训授以所著《商简》，于是开始对甲骨文发生兴趣。

1922年，董作宾前往北京，晋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同乡前辈学者徐炳昶（字旭生），受到徐炳昶的赏识，留他做家庭教师。董作宾1923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正式着手研读甲骨文；且兴之所至，兼及方言、考古、民俗、歌谣、档案等学会工作；曾任《歌谣》周刊编校，进行民间歌谣的搜集和整理。1925年—1926年，先后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师，河南中州大学文学院讲师。1927年，返回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干事，负责管理该所方言室，进行方言调查工作。不久，南下广州，在傅斯年为院长的中山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

1928年4月，中研院在广州聘请傅斯年等筹备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被该所聘任为通讯员，奉派前往河南安阳殷墟，调查甲骨文出土的实际情况，为开展考古发掘进行准备。同年秋该所正式成立后，董被聘为编辑员。1932年改聘为专任研究员。董作宾在此期间，先后八次主持或参加安阳小屯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又曾参加山东历城

县龙山镇城子崖、滕县安上村等遗址的发掘以及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江苏苏州木渎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等项调查。随后，董作宾集中主要精力，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研究。1947年—1948年，应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考古学客座教授，讲授甲骨文和金文。1948年被选为中研院院士。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董作宾随该所前往台湾后，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古文字学、殷商史和古史年代学；又创办《大陆杂志》，为该刊发行人。1950年冬，傅斯年逝世后，董继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5年去韩国讲学，汉城大学研究院曾授予董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董作宾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务，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及香港大学荣誉史学教授，并曾兼任崇基、新亚、珠海等书院教授。1956年被聘任为台湾中研院评议会人文组评议员，1958年返回台湾，任史语所甲骨文研究室主任。1960年任台湾大学甲骨学研究讲座教授。1963年11月23日在台北逝世。

董作宾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致力于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的整理研究，创造性地提出甲骨文断代学说。他主编的《殷墟文字甲编》（1948年）、《殷墟文字乙编》（1948年—1953年）一书，收录抗日战争前殷墟历次发掘出土的甲骨文13，047片，是甲骨文研究中最重要的科学资料。1931年，他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最早认定甲骨卜辞中的“贞人”，首倡根据“贞人”推断甲骨文所属时代，提出甲骨文断代的八项标准。1933年，发表名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更加全面地阐述甲骨文断代学说，将断代标准进一步发展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系、称谓、贞人三项）；并且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①武丁（及其以前的盘庚、小辛、小乙）；②祖庚、祖甲；③廪辛、康丁；④武乙、文丁；⑤帝乙、帝辛。其说得到国内外甲骨学者的普遍赞同，对甲骨学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影响深远，

沿袭至今。

董作宾从40年代起致力于古史年代学研究。1940年发表《殷代月食考》，试图利用甲骨文中的月食资料推考殷商年代。1945年，出版名著《殷历谱》一书，将其殷商甲骨文和年代学研究更加系统化。他在该书序言中自谓："此书虽名《殷历谱》，实则应用'断代研究'更进一步之方法，试作甲骨文字分期、分类、分派研究之书也。余之目的一为藉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之纪录，以解决殷周年代之问题；一为揭示用新法研究甲骨文字之结果，以供治斯学者之参考；前者在历，后者在谱。"董作宾对甲骨学研究的一系列突出贡献，例如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殷代礼制的新旧两派，殷代地理的考证，殷代天文气象的探究，晚殷征人方日程的缀连，殷代周祭系统的揭示以及一系列殷代历谱的编排，都在该书中得到体现。董作宾建立的甲骨文研究体系，为甲骨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董作宾的殷历研究留有某些遗憾，但他的开创精神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不限于一字一义的考定，而更注重卜辞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最终求得在分期分派的基础上重建殷商历史。因此，在《殷历谱》中，谱的价值比历重要得多。

董作宾学养深厚，涉猎广泛，治学严谨，除甲骨学和殷代历法外，又曾进行西周历法的研究，据西周纪年铭铜器撰著《西周年历谱》（1952年），后扩充为《中国年历总谱》（1960年），为中国天文年代学研究早期的一部自成系统的著作。董作宾毕生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内容涉及甲骨学、古文字学、先秦史、科技史、民族学、语言学、文学史等诸多方面。他在学术研究之余，书法篆刻有深湛的造诣。

董作宾的学术论著，曾由台北的世界书局和艺文印书馆出版为《董作宾学术论著》（1962年）和《平庐文存》（1963年）。1978年，艺文印书局又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甲、乙编共12册。

主要参考资料

董作宾：《平庐文存》（上、下），台北艺文印书馆1963年出版。

董作宾：《董作宾学术论著》，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出版。

《董作宾先生事略》，《大陆杂志》第28卷第3期附录。

石璋如：《董作宾》，《中华民国名人传》（一），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出版。

都锦生

徐和雍

都锦生，号鲁滨，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生于杭州西子湖畔茅家埠，以首创丝织风景工艺，创办都锦生丝织厂而负盛名。父亲都宗祁，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先后在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中任下级军官。都锦生自幼受湖光山色的熏陶，喜爱艺术，善画风景，也爱摄影。1919年，他在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后，留校任乙种工业学校（艺徒班）的织制工场管理员兼图案课教师。在此期间，他与宋剑虹小姐结为夫妇。宋氏湖州进德女子中学毕业，眼界比较开阔，理解并全力支持丈夫的理想和抱负。都锦生在教学实践中，很快掌握了从设计到织造的丝织工艺全过程，并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力谋“本科学化艺术”，把织锦技术用来织造丝织工艺品。他亲自拍摄西湖景色，试织西湖风景画。经过半年多的反复钻研和不断改进，终于织出了第一幅丝织风景画——5″×7″（英寸）的“九溪十八涧”。此前有人虽曾在织锦时，采用人物、山水乃至西湖某些景色作图案，但作为特殊的工艺品——丝织风景画，则创自都锦生。

丝织风景画试织成功，都锦生决心办厂织造。他得到叔岳丈宋春源、绸庄老板宋锡九的赞许和支持，借得500元，购置了一台手拉机，雇了拉机师傅林传莲和轧花工胡杏初，亲自制绘了五幅“西湖十景”的意匠图，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于1922年5月15日在茅家埠家里正式开业。

都锦生丝织厂最初是一个家庭作坊，织造的丝织风景画以“西湖十景”为题材。茅家埠是西湖游客过往之地，都锦生在家门口展出样品，挂起“都锦生丝织厂”的招牌，招揽游客。虽然当时丝织风景画仅

有一种规格的几幅黑白“西湖十景”，由于它新颖、别致、价格不高，颇受游客们的赞赏和欢迎，购去作游览西湖的纪念品。这样丝织风景画，在西湖游客中初步打开了销路。

随着营业的发展，翌年都锦生辞去学校的工作，全力经营丝织厂，聘请了本校机织科毕业的高材生胡邦汉等两人，从事设计和绘制意匠图，产品的规格和数量激增。为了扩大销路，他先在西湖孤山摆摊销售，后在杭城花市街（今邮电路）以及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地陆续开设门市部。东北、华北不少旅社、饭店采用丝织风景画作装饰品，大批订购，都锦生丝织厂迅速发展。1926年，都锦生将产品送往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展出，其中丝织唐伯虎名画《宫妃夜游图》尤为脍炙人口，西方人士誉之为“东方艺术之花”。博览会授予这些丝织工艺品金质奖章，顿时扬名世界，产品也逐渐远销南洋和欧美。1927年，茅家埠的工场已不敷应用，于是都锦生在艮山门外火车站旁购地建造厂房，并搬迁到新厂房生产。这时都锦生丝织厂已拥有手拉机68台，轧花机5台，意匠8人，职工一百三四十人，是名副其实的工厂了。

都锦生深知要发展生产，扩大经营，使富有民族特色的丝织工艺品能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必须不断创新，努力开发新产品。1926年，都锦生丝织厂试织五彩丝织画，织造出第一幅五彩丝织花卉——“蜻蜓荷叶”。它以黑白丝为经，五彩丝为纬织成，在技术上比黑白织锦大大前进了一步，在题材上也突破了“西湖十景”的范围，生动地表现了我国传统国画的民族风格。为了吸取国外先进的织造技术，1928、1929年间都锦生东渡日本考察。而后，都锦生从留法友人处，获得一台法国制造的最新全铁电力机，又购买了法国织造的棉织风景油画作样品，以重金聘请了专攻丝织的留日学生莫济之，与厂内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解剖分析，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36年试织出经纬均用彩线的“北京北海白塔”等四幅五彩棉织风景油画。由于当时抗日烽火已燃起，局势动荡，该产品未能及时投产。与此同时，都锦

生根据社会需求，还陆续开发绸伞、领带、翻领衫、内衣料、织锦旗袍衣料等日用品，即使这些日用品的生产中，也处处洋溢着都锦生的爱国思想和创新精神。例如绸伞，都锦生日本之行时，从日本钢骨阳伞中得到启示，但是他不是亦步亦趋去仿效，而是用本地盛产的竹子制成的竹骨取代钢骨，加上本厂生产的饰以西湖景色的丝绸的伞面，制成别具一格的“西湖绸伞”。由于它制作精良，伞面美观，价格低廉，深受人们欢迎，畅销国内外，连日本街头也出现了“西湖绸伞”。都锦生丝织厂产品的品种和规格越来越多，几年间增至数百种。

都锦生丝织厂能突飞猛进地发展，与都锦生一贯重视延揽和培养人才也是分不开的。他不仅不惜重金，聘用学有专长的丝织技术人员。在厂内还建立起一套考核制度：在意匠、轧版、织造、染色诸工种中，按技术高低，分甲乙丙三级，成绩优良者可以随时升级。技术人员兼采固定工资，给以较高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鼓励他们钻研技术，因而造就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丝织技术人员。织工则实行计件工资加奖励的制度。该厂年薪按十八个月计算，四个月作奖励金，两个月作升级工资，无论职员、工人，待遇比其他丝织企业都要高一些。后来都锦生丝织厂还办起职工夜校，一切费用由厂方支付，鼓励职工参加学习，藉以提高他们的素质。

都锦生丝织厂的产品利润优厚，通常在200％左右。1931年，该厂生产丝织风景50，400米，营业额达15万元，盈利约十万元。都锦生以独特的丝织风景画开辟了民族丝织工业的一条新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本人也从一个穷教员变成了富有资产的民族资本家。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它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生产原料——生丝、人造丝的价格，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操纵，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种因素也是都锦生丝织厂发展的桎梏；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蛮掠夺和疯狂破坏，更使都锦生丝织厂陷入绝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地区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几乎占都锦生丝织厂产品销路一半的东北、华北市场遭破坏。1937年

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攻陷平津之后，大举进攻上海。8月，杭州遭日机轰炸，都锦生丝织厂被迫停产。都锦生将12台手拉机转移到上海法租界，维持小规模生产。同年12月，杭州沦陷，日本侵略者企图拉都锦生参加筹组杭州伪市政府。一天报载日伪委任都锦生为杭州市政府科长，他急忙带领全家逃离杭州，避居上海，并想方设法从杭州运去20台手拉机和大部分花版，与在上海法租界的12台手拉机合并一起，恢复生产。日本侵略者素知都锦生丝织厂，是日本丝织业在国际上的有力竞争者，见都锦生不为己用，于是在1939年将都锦生丝织厂在杭州艮山门外的主要厂房及所有的机器设备纵火焚毁。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占领了上海租界。都锦生丝织厂在上海的生产无法继续，这时重庆等地的门市部也先后被日机炸毁，都锦生悲愤交集，终日处于忧虑之中。1943年3月，都锦生突发脑溢血症，5月26日在上海与世长辞。都锦生去世后，家人遵照他弥留之际的遗言，归葬家乡茅家埠旁小兔儿山上。1996年清明，移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主要参考资料

《都锦生丝织厂产品介绍》1930年印制。内收有由都锦生具名的《创业经过》一文，这是目前仅见的都锦生自传。

宋永基：《都锦生丝织厂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10辑，1978年版。

中共都锦生丝织厂委员会、杭州大学历史系编：《都锦生丝织厂厂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杜斌丞

李敬谦　宋新勇

杜斌丞，原名丕功，以字行，自署秉诚，1888年5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三月三十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户破落地主家庭。1895年入塾读书。1905年，随姨夫高又尼到绥德中学堂读书。其时高任绥德中学堂监督，杜在这里接受了爱国思想的启迪。

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该校是陕西当时唯一的讲授新学的著名学府，教师中有留日学生、国内知名学者和同盟会会员。在校期间，杜斌丞阅读了《民报》、《夏声》等刊物[(1)]，爱国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启发和提高。他学习刻苦，结交进步同学，与王复初、张奚若等结为挚友，互勉互进。一次日本教官认为他们不遵守校规，要处分他们。杜斌丞和张奚若等据理相争，迫使校方辞退了日本教官。

1913年夏，杜斌丞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部。他把自己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志全部凝聚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书刊，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探索救国之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认为法国的革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革命。

1917年夏，杜斌丞在北京师大毕业，回到陕西，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翌年升任校长。榆林中学的前身是五县中学堂，1915年改为陕北23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当时陕北文化落后，交通不便，23县仅有这所中学。创建伊始，沿袭旧制，加之经费困难，校舍狭小，设备简陋。杜斌丞任校长后，锐意革新。他采用蔡元培在北

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开创陕北教育的一代新风。他十分重视选聘教师，不顾学校内外旧势力的反对，不仅聘请杜斗垣、李鼎铭等学识渊博、颇有名望的人士任教，而且还邀请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及进步人士王森然、朱横秋来校任教。他教育学生要有“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自强报国抱负，了解和掌握现代先进知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他重视体育，提倡劳动，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时学校没有体育教师，他亲自给学生上体育课。

杜斌丞除办好榆林中学外，还先后倡议、协助开办了米脂完全小学、米脂三民中学、榆林女子师范、绥德师范、延安中学等。他在陕北从事教育10年，培育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如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宜、李力果等。因此，周恩来称他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2)]。

1922年冬，杨虎城率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到陕北时，因对纷乱的时局难以理解而异常苦闷，杜斌丞便把魏野畴介绍给他。杨听了魏的许多讲述后，请魏在军中办学，训练军官，教育部队。从此，杨、杜、魏结为挚友，杜成为参与杨幕内的重要决策人物。

1926年11月底，杨虎城与陕西督办李虎臣带领军民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取得胜利，接着与国民军联军会师，准备参加北伐战争。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于1927年2月赴西安参加庆祝活动，会晤了国民军联军领导人冯玉祥、于右任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并将他带去的几十名陕北青年学生送进了中国共产党倡议和支持的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6月，杜斌丞离开西安，经洛阳、武汉、南京、上海考察社会，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寓居北京，潜心读书，研究国内政局，结交侯外庐、李仪祉等学者。

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回陕参

政。杜到西安后，被杨虎城任命为高级参议和省政府参议，后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任职期间，杜建议聘请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长，兴修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他还利用合法地位，多方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设法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等，后又资助过陕甘红军游击队枪弹、军服等物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剿共”，并要在“剿共”中消灭杂牌军。杜斌丞指出：“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3] 他还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方针：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杨虎城对杜的建议深表赞同，立即派杜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杜与各自为政的各派地方势力广泛晤谈；说服了陈珪璋、鲁大昌等部接受改编，后又随十七师孙蔚如部进军甘肃，击溃雷中田部，占领兰州。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宣慰使，杜斌丞为宣慰使署秘书长掌管政务。在此期间，杜斌丞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1932年4月，蒋介石迫使杨虎城、孙蔚如部退出兰州，使杜斌丞提出的“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

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孙蔚如部被派到汉中“剿共”前线，企图使红军和杨虎城部两败俱伤。杜斌丞看破了蒋的阴谋，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了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接着，杜斌丞经过多方面努力，沟通了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取得默契，互不侵犯、迂回避战。将近两年间，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部基本上未发生冲突，红军并从陕南得到了许多医药和物资，使蒋介石的阴谋没有得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的亲笔信来到西安，争取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共同抗日。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4] 杜斌丞非常激动，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1936年初，杨虎城派杜斌丞与共产党方面联络，表示愿与共产党联系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杜把杨的意思转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携毛泽东给杜斌丞的信，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毛在信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5] 杜斌丞乃向杨建议委任张文彬为省政府秘书，顺利建立起了红军联络站。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杜斌丞积极参与了这次事变。事变当天，张、杨发布训令，任命杜斌丞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当时省政府代理主席王一山尚未到职，事变后繁重的政务都落在杜的肩上。他迅速恢复了省政府的职能，整顿了市容，签发了宣布张、杨八项主张的陕西省政府训令。为了正确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杜斌丞邀请来到西安和平调停事变的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给省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作报告，并要求大家回去广为宣传。

1937年2月，孙蔚如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续任省政府秘书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在此形势下，杜斌丞积极协助孙蔚如主持陕政。他按杨虎城的意思，同中共磋商，选派马豫章、苗紫芹、王正身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分别到边区或接近边区的10个县当县长。当国共两党代表会谈陕甘宁边区管辖的范围界线时，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多占地盘，处处刁难，杜斌丞利用他的合法地位，提出以洛河为界，将洛川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此议虽未实现，但争得了以界子河为界把富县划归边区范围。

抗日战争初期，大批平、津流亡学生来到西安。杜斌丞对此十分关心，以省政府名义，指派专人热情招待，安排食宿，资助路费，并

根据各人志愿分别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西南联大学习深造或赴敌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秋，蒋介石排除异己，解除了杜斌丞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派胡宗南登门拜访，并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加以拉拢，杜斌丞严词拒绝。国民党省党部两次派人送来国民党员登记表，杜均当场撕毁。他辞官不做，闭门潜心研读林伯渠送给的马列著作。他还把自己身边唯一的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自己则决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民主活动。

1941年春，杜斌丞先后到湖南全州、广西桂林，与两广的反蒋爱国人士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等联络，并去云南做争取杜聿明的工作。同年秋到重庆，经屈武、王炳南介绍加入了秘密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被选为陕西组负责人。

杜斌丞于1943年初再去云南，继续做在云南掌握兵权的关麟徵、杜聿明的争取工作。关、杜二人虽对杜斌丞优礼相待，却不肯接受他的忠告。同年冬，杜先后到成都、重庆会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建言民主党派要警惕青年党，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函在西安的杜斌丞，邀请他加入民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即与杨明轩、王菊人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筹委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斌丞从西安来到重庆，出席1945年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在此期间，他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会晤，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政协闭幕后，许多好友约他到上海等地开展民主运动，杜表示：自己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了，西北需要人。他对章伯钧、韩兆鹗

说："你们为其易，我为其难，这是斗争的分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6]

杜斌丞1946年2月回陕后，正式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兼任主任委员。他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西北总支机关报）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制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也招致了蒋介石、胡宗南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在杜斌丞住宅周围布满了特务，加强了对杜的监视、跟踪。中共负责人和许多好友人士多次劝他去陕北或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他镇定地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到底，何必远走？"他还说："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走了岂不是便宜了敌人？！陕西当局决不许我走，我在危难时，决不求一身之安全，置诸同志不顾。"[7]

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于1946年四五月间，公然杀害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法律顾问王任，绑架了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李敷仁，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的"西安血案"。面对这种血雨腥风的形势，杜斌丞对朋友说："今日莫杀头，今日且干一天。"[8] 是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9] 他临危不惧，竭力支持西北大学进步师生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他机智地把信和文件装在上学的小孙子的书包里带出传递，继续领导民盟的工作。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攻占延安后，为配合这一所谓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和陕西省戒严总司令祝绍周，以"吸大烟"和"策反起义"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杜斌丞。杜身陷囹圄，但不忘革命。他教育争取过来了一名狱卒，和外边取得联系，写信鼓励民盟同志，不要被敌人的反动气焰吓倒，要坚持斗争直到胜

利。当他听到人民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高兴得彻夜不眠，写下了七言绝句和五言律诗各一首[10]，抒怀言志。他于就义前两天，给表弟高建白写信说："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遭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唯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11]

1947年10月7日凌晨，杜斌丞在西安英勇就义。

---

(1) 《夏声》为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宣传革命的刊物。

(2)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3)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4)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5) 毛泽东：《致杜斌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6) 李健生：《杜斌丞先生在重庆》，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等编《杜斌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7)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秋风长安市，万户泪暗垂》，见《杜斌丞》，第305页。

(8) 刘杰诚等：《杜斌丞传》，见《杜斌丞》，第86页。

(9) 赵燕南、徐景星：《杜斌丞与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见《杜斌丞》，第86—87页。

(10) 杜斌丞的两首遗诗据王菊人回忆，七绝只留三句："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五言是："人惧秦暴虐，群望汉旌旗。我有擎天手，与子以为期。"见《杜斌丞》，第91—92页。

(11) 《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杜定友

张洁

杜定友，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南海。祖父是个鞋匠，父亲青年时在上海一家照相馆当学徒，后来开了一家夫妻照相馆。杜定友1907年在上海免费进了敬业小学，后来转入广东同乡会办的广肇公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又热心公益，深得学校和同学的好评。

辛亥革命前一两年，杜定友在学校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萌发反对清王朝的思想。他十三岁时，不顾祖母和父亲的劝阻，剪去辫子。不久，他随父母离沪赴汉口谋生，进了益智学校。由于成绩优秀，获得免费。他在学校接触到不少革命青年，反清思想进一步增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随着一群大学生到李鸿章家的花园，向李的铜像掷石子，并用绳子套在铜像的脖子上，把铜像拉倒。

1912年杜定友小学毕业后，考进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1918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学校选派到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

杜定友留学期间，担任中国留菲学生会会长，曾出面要求菲律宾当局免除中国留学生的学费。那时学生宿舍都是教会办的，每天早上要祈祷念经。杜不信教，对这种宗教仪式深为不满。有一次，因为三天没有祈祷，被教士赶出宿舍，只好搬到一家小旅馆去住。为了付房租，他每天省下一餐饭，饿着肚子去上课。这样过了三个月，才在中国领事馆找到一份文书工作，半工半读。

1921年杜定友在菲律宾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教育学士和图书馆学士三个学位。当时菲律宾有的部门出高薪聘请他工作，但他立志

要为祖国的图书馆事业服务，一一谢绝，毅然回国。9月到广州，初为市民大学教授，继任广州市立师范校长，1922年任广东图书馆馆长兼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曾创办图书馆管理人员养成所，造就了我国第一批图书馆管理人才。他有志于在图书馆事业上进行一些改革，提出新的图书分类法，主张图书馆公开开放等，但他的这些主张得不到支持，还有人认为是糟蹋图书。他提议把孔庙改为图书馆，有人竟扬言要杀他。广东省教育厅长向省长呈文控告他，要求撤免他的馆长职务。

1923年春，杜定友辞职赴沪，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曾发起成立全国图书馆学研究会。同年因该校校长李登辉被孙传芳手下的人逼走，他看不起派来的新校长，辞职而去。不久任上海图书馆协会委员长，曾创“图书馆”三字的简字“圖”。1925年7月，应南京东南大学之聘，在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讲课，协助培养了三百余名图书馆管理人员。9月回上海，与友人创办国民大学，建立图书馆学系，为国内大学有图书馆学系之始。此后至1936年，他两度到母校交通大学工作。他厌恶官场应酬，常与青年学生和爱国进步人士交往，交大校长因此对他不满，曾声色俱厉地说他包庇共产党。

1936年，杜定友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图书馆馆长。他下决心要把这个图书馆建成为南方图书馆的典范。抗日战争开始后，广州空袭频繁，他常冒险觅地藏书。1938年夏秋之间，菲律宾大学聘他赴菲讲学。当时广州正在疏散，但他没有从个人利益和安全出发，毅然拒绝了邀请。他说：“眼见国家多难，如我只身逃避海外，苟存性命于乱世，而同胞在国内吃苦，于心何忍？我爱中大，我爱中国！”同年10月11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危急。学校决定迁往罗定县。图书馆职工在杜的带动下转移图书，迟迟未能启程，因为交通工具没有着落。结果他自行设法雇拖船五只，将妻子的积蓄五百元付了船费，让抢救图书的职工安全撤退。以后学校又数次迁移，杜为了图书的迁运，备尝艰辛。这时，他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方针深恶痛绝，

写有《谁在残戕青年？》、《人类应快觉醒》、《低能政治的由来》等文，呼吁改革政治，曾受到政府当局的警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定友回到广州。为了收回中山大学寄存在各处的图书，他四处奔走。1948年他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但是广州一片混乱，无法开展工作。他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图书事业的发展没有希望。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命令他运送珍贵图书前往台湾，他推辞不去。他在香港的亲属也来信要他赴港，他断然表示："我决不走。"他见各机关团体纷纷疏散逃走，书物狼藉，便通知各单位将图书送省图书馆。一时，各单位送来几百箱图书。他又带领全馆员工到各单位打扫，捡拾到图书数万册。临近解放前夕，他与职工轮流值班守护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定友任广东省人民图书馆馆长，兼广东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广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57年曾参加"中国图书馆工作者代表团"出国访问。

1967年3月13日，杜定友因病在广州逝世。杜的主要著作有《图书分类法问题》和《图书馆建筑设计》。他对汉字有一定的研究，发表过《字根研究》、《中国新形声字母商榷》，赞同文字改革。

主要参考资料

《杜定友回忆录》（未刊稿）和访问资料。

杜锡珪

陈贞寿　刘传标

杜锡珪，字慎臣，号石钟，福建省闽侯县人，1874年11月1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四）生。父亲杜吉甫，母亲王氏。杜锡珪幼年家境贫困，九岁到当铺充当学徒。后其兄杜逢时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鱼雷班第一届毕业后，鼓励杜锡珪树立大志。杜乃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届驾驶班，勤奋学习，1902年3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经见习后，派往“海圻”巡洋舰，初任哨官，后次第升任驾驶三副、二副、枪炮大副及“建安”舰代理管带，1908年升为“辰”字鱼雷艇管带。时值美国舰队约期游历厦门，海军制储水船为“甘泉”号，杜锡珪奉命由上海开赴厦门，负责供应美国海军的淡水补充工作。杜不畏“甘泉”舰小而路遥，战险风斗恶浪安抵厦门，并圆满完成任务。嗣后杜调任海军警卫队管带。1911年7月，以海军副参领充“江贞”兵舰管带，深受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器重。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攻打武汉，并电海军协同水陆夹攻。杜锡珪驾“江贞”舰至汉口刘家庙附近江面停泊，负责给养。清军攻下武昌后又占领汉阳，放火焚烧，滥杀无辜。海军官兵对此暴行极为愤慨，杜锡珪等转而同情革命，并与海军中有识之士加强联络，决定分途进行活动，开展策反工作。杜利用“江贞”舰代为各舰艇收发邮件和购买菜蔬之便，四处联络，会聚意见；同时，以其与海军统制萨镇冰私交甚好不断向萨劝说，希望萨出面率舰队易帜起义。杜还利用其朋友、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之兄汤化龙在武昌革命政权中任政事部长的关系，与革命军取得联系。萨镇冰在杜锡珪和汤芗铭的劝说下，虽不愿率部起义，但也不愿继续为清廷效力，于是以“年老有病需到上海医治”为辞离职，在杜护送下登上英轮“太古”号赴沪。萨镇冰离舰队后，杜立即与毗邻停泊的“楚豫”、“江

利”、“湖鹏”等舰艇管带聚会，商议行动方略，并确定“各行所愿”原则。杜把“江贞”舰龙旗降下，宣布起义，开赴九江。杜在海军起义中功绩卓著，被公举为“海容”巡洋舰管带，连升两级。

为配合革命军收复汉口，截断清军向南的运兵线，新上任的“海容”管带杜锡珪，积极主张兴师北上，协助革命军保卫武汉。11月19日黎明，杜与“海琛”管带林永谟督领“海容”、“海琛”两舰率先驰援武汉，打响了易帜海军直接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两舰到达武汉下游之青山后，泊在阳逻、刘家庙一带，截击清军增运援兵，每天炮击京汉铁路刘家庙的第一、二、三道桥梁或车辆，使清军无法增援武汉地区。时值深秋，上游水位下降，两舰无法驶近武汉助战，偶遇上游下雨而水涨，杜锡珪毅然冒险驱舰孤军突入，炮轰江岸清军炮台，并缓缓驶进武昌鲇鱼套抵黄鹤楼下，将舰上之机关枪等武器用舰舢板运入武昌，以援助城内的革命军。不日，“湖鹏”号鱼雷艇随后而来，被江岸上清军炮击而中弹起火。杜锡珪即驾“海容”舰下驶予以掩护，顿时清军炮火全力倾注于“海容”舰，杜锡珪临危不惧，令舰冒炮火冲驶而过，同时指挥全舰官兵协力发炮，猛击江岸清军炮兵阵地。11月27日，清军攻入汉阳后，革命军仍坚持抵抗，杜锡珪又驾“海容”舰配合革命军分数路袭击清军左翼、后路，用舰上炮火猛轰清军阵地。“海容”舰在战火中虽被击伤多处，死伤官兵多人，但杜锡珪继续带领全舰官兵英勇作战。嗣后长江水位下降，南北酝酿议和，战事暂停。“海容”等舰征得武昌革命军政府同意，除留“江贞”舰在武昌附近江面担任警戒外，其余开往上海待命，杜锡珪的“海容”舰因阳逻之战中受伤多处而进入上海高昌庙修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即采纳杜锡珪等人的主张，组成海军北伐队，以协助光复沿海各地。汤芗铭为北伐舰队司令，杜锡珪的“海容”为旗舰，率“海筹”、“南琛”、“通济”共四舰由南京下关出发经上海开赴烟台。抵达时，烟台已宣布光复，杜锡珪等奉派督带舰艇到鸭绿江口、营口、秦皇岛、大沽口、登州等地游弋

示威，截击由海外运来接济清军的军火给养等，并协助光复了登州等沿海一些地方。

同年3月南北议和，袁世凯派刘冠雄到“海容”舰，请汤芗铭、杜锡珪二人到北京议事，参与海军统一问题商讨。嗣后，北伐舰队完成使命南返，杜锡珪仍任“海容”舰舰长，12月30日授海军上校，驻泊于马尾，并兼闽江要塞司令和福建省防军代理司令。1913年7月爆发二次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北洋舰队前往协同弹压，杜锡珪奉命督率“海容”舰参战。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杜随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和前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宣告海军独立，加入西南护法军。1917年8月，杜锡珪升任北京政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当时海军粮饷匮缺，杜分配各舰必均，是以士卒归心，为之效命。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宣布加入协约国，下令海军扣押在长江流域的德奥战舰与商船。杜奉命俘虏敌舰，巡视海防，居功甚多。

此后北洋军阀内部诸派系战火不断，杜锡珪效忠于直系。1918年3月，吴佩孚用兵江南，杜锡珪派遣第二舰队“楚有”、“江鲲”、“江利”、“江犀”、“江贞”五舰助吴作战。1920年直皖两系矛盾激烈，杜派遣舰艇驻泊江淮与长江各埠，监视皖系与南方革命政府的行动。1921年7月“湘鄂之战”爆发，吴佩孚趁机派兵援鄂，杜锡珪督率六艘战舰由武汉直逼岳阳，冒险冲过火力网发炮攻城，协助吴佩孚部队占领岳阳，旋即驰援宜昌。8月杜因战功被直系掌握的北京政府授勋四位，10月被授海军中将。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杜锡珪部署第二舰队攻奉。但依附于皖系的第一舰队司令林建章以中立自居，号召海军各舰队不参战，与杜对峙。杜为扩大参战海军力量，先派杨砥中为说客，到第一舰队策动“海筹”、“海容”、“永绩”等主力舰参战；游说未成，又以闽系“海军不能再分裂”、“大局为重”为词说动萨镇冰。在萨镇冰的鼓动下，三舰终脱离第一舰队归杜锡珪指挥。5月2日杜即派“楚观”、“楚有”、“楚泰”等舰协同三舰北上，开赴秦皇岛炮轰山海关之奉军阵线，切断奉

军供应补给线，加速了奉系的失败。杜因助战有功，于1922年6月升任海军总司令，并被授将军府“瀛威将军”。

此时，被北京政府免去第一舰队司令的林建章，在皖系资助下，利用海军将士对北洋政府拖欠粮饷的不满，以4．5万元策动“海筹”、“永绩”两舰离青岛南下上海，与正在江南造船所修理的“建康”号舰长及造船所所长等联名发出通电反对“武力统一”，反对杜锡珪，拥护林建章为海军领袖，号召各舰来沪会集，并宣布上海“海军领袖处”和海军沪队成立。杜锡珪闻悉即谋对策。其时正值江浙“齐卢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杜命令第二舰队沿江而下，并命驻闽厦的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率舰队北上入吴淞口，以监视林建章海军沪队；同时直接派陆战队协助齐燮元攻击卢永样，命令舰队炮轰浏河前线卢永祥部阵地，加速了皖系卢永祥部溃败。9月21日，又借“海筹”、“永绩”两舰长离舰上岸之际，发动夺舰行动，控制了沪队主力战舰，进而重新夺取“靖安”、“建安”、“辰”、“列”等沪队舰艇，迫使林建章“领袖处”解散，闽系海军重归统一。杜锡珪为缓解海军粮饷、给养不足之困难，亲自赴闽与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商讨在福建建立厦门要港事宜，使长乐、连江、东山、平潭、金门等成为独立的势力范围。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在北京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杜锡珪任“讨逆军”海军总司令，但他没有及时把留于长江攻击卢永祥的海军主力北调。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反戈讨吴，直系溃败。吴佩孚四面楚歌，从大沽口乘船南下，段祺瑞密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许建廷就近将吴拘留，杜锡珪获讯后密电告吴，使吴急避得免。11月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组成北京政府，由林建章任海军总长，杨树庄出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通电辞职。1925年12月，北京政府改组，杜锡珪在直系的支持下东山再起，为海军总长。1926年6月，在奉系压力下，颜惠庆辞职，杜锡珪以海军总长代国务总理，并兼摄行大总统职。杜锡珪自知乃奉直各派争执不下风云际会之事，自称此为过渡的“搭浮桥”内阁。杜主政北京政府百余天，备受奉系将领

颐指气使之辱。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并发动其亲信宪兵司令王琦率军警数百人包围国务院及财政总长顾维钧住宅索饷，杜与顾东拼西凑筹得七八十万元始获解围。10月1日杜锡珪辞去国务总理职。1927年1月12日顾维钧组阁，杜锡珪再任海军总长。

杜锡珪任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时，正值南方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之时。北伐军相继攻克湖南、湖北等省后，东路军直逼福建，海军陈季良所部首当其冲。为保存闽系海军实力，杜锡珪前往上海与杨树庄商讨对策，并决定各舰队“自由行动”，支持驻闽厦的海军舰队在陈季良率领下易帜起义。随后在长江的第一、第二舰队也于1927年3月4日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另组军政府，顾维钧辞去阁揆职务，杜锡珪随之下台。他宣布归隐，寓居天津，终日以读书、下棋自娱。1928年从天津迁居上海。国民政府曾多次以要职请杜出山，杜坚辞不就。杜与冯玉祥私交甚好，曾暗中与陈季良密议准备策动海军支持冯玉祥反对蒋介石，事为杨树庄所察觉，不得不于1929年10月接受国民政府委派为考察日本及欧美各国海军专员，于11月初由以“秘书”名义的董显光等陪同从上海出洋，历时一年余，撰《考察欧美、日本海军报告书》数十万字，对海军的整顿与发展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此后，杜锡珪出任福州海军学校校长兼海军部高等顾问。1932年2月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

1933年12月28日，杜锡珪因病医治无效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杜锡珪褒扬、传记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萨镇冰：《慎臣杜公行实》、郑礼桐：《海军上将杜公传》、杨熊祥：《“瀛威将军”海军上将、勋四位、国务院总理闽侯杜公墓志

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杨志本等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杨立：《福建军阀内讧与闽系海军派别的暗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设点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第2辑，1983年版。

杜聿明

王俯民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省米脂县人，1904年11月28日（清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本省榆林城内[(1)]。其父杜良奎，字斗垣，清末举人，先后执教于西安大学堂和榆林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率众驱逐本地清政府官吏[(2)]。

杜聿明在本县成家岔子小学毕业后，十六岁时始入榆林中学读书。课余喜爱体育活动，爱读《青年杂志》等进步刊物，加之其父常讲孙中山革命事迹，遂对孙的革命思想产生了一定信仰。1923年杜中学毕业。翌年，杜与阎揆要、杨跃、雷云孚等十一人同去广东，考入黄埔军校一期，编入第三队，时名杜聿昌[(3)]。于军校学习期间，加入国民党。

1924年11月底军校毕业后，杜被派赴教导一团一营三连见习，曾任军需上士、排副等职。1925年1月任宣传员，参加东征陈炯明之役。同年奉廖仲恺之命到北京，代表黄埔军校学生慰问孙中山，时孙已病危，由汪精卫代见；当晚，杜即将孙的病况报告广州。翌日，与苏联顾问同赴开封，协助国民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创办开封军校。4月中旬，杜赴陕北，投靠国民二军补充第十团团长高桂滋，任该团上尉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1926年春，补充团改编为毅军第五混成旅，杜随军移驻北京西山碧云寺护灵，任特务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同年秋，杜因偶尔违命被高桂滋免职，乃留北京做国民党党务工作。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杜绕道赴鄂。翌年1月，经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张治中介绍，在该校任中校服务

员，后任学兵团一营三连中校连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武汉分校声讨蒋介石，杜则一言不发，被关禁闭两个月。杜因不赞成联共，决心投蒋，便乘大雨之夜，从禁闭室逃出[(4)]，抵宁后被蒋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中校校阅委员。10月，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中校副员兼教导大队教官。1928年至1930年，先后任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中校队长、参谋主任、中队长、教导第二师中校营长、上校团长、第四师上校团长[(5)]。1931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并亲往武汉指挥。蒋军徐庭瑶部第十旅奉命进攻安徽霍邱，被红四军击败，徐复命杜率第二十四团反攻。杜于7月13日晨攻陷霍邱县城，伤红四军军长邝继勋[(6)]，受到徐庭瑶的赏识，晋升少将。

1933年1月1日，杜担任徐庭瑶部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3月中旬，杜随军参加古北口抗日战役。是役战斗激烈，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负伤，杜升任副师长，代关指挥战斗。不久，该师移驻河南洛阳，杜又奉命率部追剿河南悍匪崔邦杰，予以全歼，受到刘峙和何应钦的重视，却为关麟徵所猜忌，被迫离开二十五师。9月，杜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学习期间加入“复兴社”，希望以此找到升官捷径。1935年11月，杜任机械化学校学员队少将队长，1937年8月，任装甲兵团少将团长。1938年1月，任第二〇〇师中将师长。

杜很重视部队的教育和训练，曾组织人员编成《教育纪实》和《军队训练教案》等，下发所部参考或实施。在练兵中，特别注意沙盘作业与作战演习相结合。11月，二〇〇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任副军长兼二〇〇师师长，代徐主持军务[(7)]。1939年2月，新编第十一军又改编为第五军，徐庭瑶兼任军长，杜仍任副军长，4月升任军长，驻军全州。该部五万余众，人员装备均为蒋军之冠。

同年11月，日军第五师团侵占南宁。12月再侵占昆仑关。12月

17日，杜奉命主攻昆仑关，经几度反复争夺后，于31日收复昆仑关，歼敌一个旅团，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获誉中外[8]。此役为我国抗战以来第一次使用步兵、战车、大炮和飞机协同作战。

1942年3月12日，杜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兼第五军军长，统率第五、六、六十六等三个军由滇入缅作战。中英军分三路抵抗日军北犯。但3月18日，英军已全部后撤；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则跟踪追击至皮尤河南岸十二公里处。19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骑兵团于皮尤河南岸伏击日军先头部队，歼敌第一一二联队一个小队，首战告捷。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称赞杜“计谋周详，斗志旺盛”[9]。20日，为收复仰光，部署同古作战。次日毙伤敌三百余名。23日，敌增兵至两个联队，激战连日。至29日，敌以一部绕到同古后侧背，企图围歼中国远征军第二〇〇师。次日，二〇〇师突围成功。此役该师独自阻击敌军达十二日之久，颇有战绩。3月31日至4月16日，杜又以新二十二师进行了逐次抵抗之斯瓦战斗，击破敌第五十五师团的进攻，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17日，英军第一师、装甲第七旅共七千余人，于撤退途中被日军近万人包围于仁安羌地区，其中日军一个大队在仁安羌以北大桥地区将英军唯一退路截断，陷英军于束手无策，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中英联军最高指挥官）和史迪威急命中国远征军援救。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刘放吾奉命率部驰援，经三日激战，破敌解围，使英军安全撤退。是役轰动英伦三岛，英国政府为此颁给孙立人、刘放吾和营长多人勋章。

此时，新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于4月25日连下四道急令，逼杜放弃棠吉，令其改向瓦城集结，准备曼德勒会战。但此时英军已全部撤至伊江以西，向印度急退。28日，腊戍失守（腊戍位于瓦城东北），曼德勒已成孤城，形势危殆。30日，罗始急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同时令中路远征军撤往伊江以西和八莫、密支那地区。此时，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已侵占八莫、密支那，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

路。从此开始，中国远征军便于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后，使自身陷于极为悲惨的大溃退之中。史迪威、罗卓英于5月5日丢下部队逃往印度；远征军各军也分途回撤，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在作战中重伤后殉国；第五军新二十二师和军直属队由杜亲率亦自缅北大森林和山地向国内撤退，后因雨季来临，道路被阻，又改撤印度。7月底，远征军各部先后到达印度或滇西。经此仓促和极为艰险的撤退，加之雨淋、虫咬、饥饿和疾病，部队伤亡极大，原十万之师，归来只四万余人，撤退时的伤亡人数比作战时伤亡人数高出一倍。8月初，杜奉命由印度返国。

1943年3月，杜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3月，杜专任昆明防守司令。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令卢汉率第一方面军（滇军主力）赴越南受降。10月2日蒋密令杜撤销昆明行营，改组云南省政府。次日，杜即派第五军包围五华山省府，宣布免除龙云本兼各职，改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迫龙赴渝。随后蒋为敷衍龙云，于当月16日明令将杜“撤职查办”[(10)]。

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辖八个正规军抢占东北。为了迅速扩充实力，杜大力收编东北伪军和地主武装，令凡能为国民党保住一乡、一区、一县、一市者，即委为乡长或区、县、市长。

同年11月上中旬，美国军舰先后运输蒋军第十三军（石觉部）和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于秦皇岛登陆。15日，杜即率军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接连占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各城。26日占领锦州。12月30日占领阜新。1946年2月18日，杜因肾结核症赴北平医治，荐郑洞国代理军务。3月12日，苏联红军自沈阳撤走，蒋军进入沈阳。

4月16日，杜出院返任，立即调集四个军展开攻势，一个月中，连占本溪、抚顺、鞍山、四平、长春、丰满、梅河口、海龙、双阳、

盘石、九台、吉林、德惠、农安、桦甸、拉法等大中小城市。此时解放军主力在给蒋军以严重打击后，主动撤往松花江北，待机反攻。蒋军遂占据东北大部地区，北沿松花江与解放军对峙。杜继而制订“南攻北守”方针，企图一举把解放军主力挤出南满，然后再回师北攻解放军。10月，解放军展开务在歼灭蒋军主力的运动战。11月12日，首歼蒋军第二十五师于宽甸，复攻德惠，杜亲往指挥固守，几乎被俘。1946年12月中旬至1947年4月上旬，东北解放军采用“南打北拉”之策：南则进行“四保临江”战役，歼蒋军一万九千余人，打破杜聿明“南攻”计划；同时（1947年1月7日至3月10日），以解放军主力，发动“三下江南”战役，于松花江以南长春以北地区，歼蒋军一万五千余人，杜之“北守”计划亦复落空，反处于解放军南北夹击之中。5月中旬，东北解放军乘胜发动夏季攻势，经五十余天战斗，歼蒋军八万余人，收复大小城市四十余座[(11)]。至7月初，东北蒋军已被压入吉林、长春、四平、沈阳、锦州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其间铁路交通亦被先后切断，东北蒋军实已被分割围困于一些大中城市地区。杜见东北大势已去，遂于7月8日赴沪治病，由郑洞国继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1948年春，蒋军由战略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在全国设立二十个“绥靖”区。分区防御的重点，是集重兵于各战略要点和其交通线上，亦称“总体战”。当此之际，杜于上海向蒋献计二策：一是集中强大“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主力于某一地区，进行胶着战，待机进而决战，以歼灭之；二是以“机动大兵团”乘解放军主力未发之时，歼其一部，继歼解放军主力[(12)]。8月4日，蒋于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正式采纳杜策，决定裁并“绥靖”区，进行重点防御，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加强战略城市防御，企图以此扭转战局。8月初，杜接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后又兼郑州前进指挥部主任。

杜到徐州后，即实行上述战略方针，草拟华东决战方案，准备分别围歼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于鲁西南、豫东或苏北某个选定地区，

进而“收复”泰安、济南。但恰在此时，锦州告急，蒋急命杜停止执行华东决战方案，即日飞沈，商讨东北对策。10月15日晚，锦州解放。17日，长春曾泽生率部（第六十军）起义。越一日，郑洞国亦率部投诚。18日，蒋飞沈阳，力主放弃沈阳，自葫芦岛大虎山、黑山两面合攻锦州，企图“收复”锦州，向关内靠拢。但卫立煌、杜聿明均不同意此策；卫则主张坚守沈阳，等待时机。是日下午，蒋复于北平圆恩寺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杜向蒋献策，略谓：如欲放弃东北，应从营口撤军；或以营口为后方，留一部守沈阳，而由廖耀湘率主力兵团急攻锦州，如攻锦顺利，可进而“收复”锦州，如攻锦失败，即迅速转自营口撤军；为此，应令五十二军立即占领营口。蒋采纳杜策。19日晚，杜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20日，杜下达口头作战命令，廖兵团始则猛攻大虎山、黑山地区解放军十纵防线，受挫而不撤；继则因通往营口路线被截断，欲退而不能，遂被迫向沈阳回缩。至26日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大、黑和新民地区。28日晨，廖部12个美械师被全歼，廖耀湘被活捉。11月2日沈阳解放，卫立煌乘飞机逃出。同日营口解放。3日，蒋闻讯决定放弃徐州，退守淮南，并令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即日飞葫芦岛，向杜出示亲笔信和“徐蚌会战计划”，促杜速返徐州，指挥撤退与徐蚌会战。杜虽同意此方案，但怕负丢失徐州之责，遂表示要等葫芦岛蒋军撤毕再赴任所。8日，葫芦岛蒋军撤毕，10日锦西解放，辽沈战役全部结束。此役共歼蒋军四十七万余人。

11月10日晚，杜自南京飞徐州，再就“剿总”副总司令职。12日，杜派兵援救被解放军围困于徐州之东碾庄地区之黄百韬兵团，同时以主力固守徐州。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黄自戕。11月30日，杜自徐州撤军，12月4日即被解放军围困于永城东北孟集、李石林、王伯楼、陈官庄地区，不能前进。7日，孙元良兵团突围被歼，孙仅只身逃脱。15日，黄维兵团亦相继被歼，黄被生俘；所余杜部两个兵团也成瓮中之物。

12月17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给杜聿明去信，促其弃暗投明，杜不从。12月底，陈毅、粟裕又给杜两信，再促其降，杜仍不降。12月29日，蒋特意向杜空投战犯名单，杜见后更决心顽抗到底。1949年1月6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在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等前委领导指挥下，发起总攻，杜聿明于10日晨在陈官庄地区被俘，曾自杀未遂。李弥只身逃脱；邱清泉战死。是役全歼蒋军精华22个军，五十五万余人。

杜聿明被俘后，先关押山东战犯管理所，再转北京功德林监狱战犯改造所。在接受改造期间，他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关注，而且为他治好了久治未愈的结核病。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获首批特赦，定居北京，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先后撰写文史资料多篇，颇有史料价值。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杜妻曹秀清离沪去台，后去美国依靠子女。1963年，曹自美归国，与杜团聚，见杜生活条件甚佳，喜出望外。当曹提到台湾有人骂杜是“叛徒”时，杜聿明笑着回答说：“我投降的是人民，追随的是时代，只要我没有背叛真理，我就不是叛徒。”[13] 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杜聿明夫妇，并建议他们到祖国各地参观。1964年11月，杜被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当他受到邀请时，心情极为激动，立即向周恩来写信，表示愿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1979年，杜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五届常委。长期以来，杜聿明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争取台湾回归，完成统一大业，竭尽心力。1981年，杜病中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深有感触地说：“希望我们一定要把祖国统一大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14] 杜于病危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呼吁台湾同僚“早日促成和平统一，为子孙万代造福”[15]。5月7日，杜聿明病逝北京。

(1) 曹秀清：《曹秀清访问记》，作者笔录，1983年1月8日。

(2) 曹福谦（杜聿明内侄）：《我所了解的杜聿明》（未刊稿，现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资料室），第5页。

(3)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526页。

(4) 曹福谦（杜聿明内侄）：《我所了解的杜聿明》（未刊稿，现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资料室），第23页。

(5) 《覃异之访问记》，作者笔录，1983年1月22日。

(6) 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7月14日第2版。

(7) 《郑洞国访问记》，作者笔录，1983年1月20日。

(8) 李世义：《血战昆仑关》，见萧铁编《血战昆仑关》第六部分，民族出版社1942年重庆版。

(9) ［美］包华德编，沈自敏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

(10) 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0月4日第2版、10月16日第2版。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军事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379—380、385页。另有记录为克城36座，歼敌10万，见《人民日报》1947年7月11日第1版。本文采访者记录。

(12)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5页。

(13) 黄济人：《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文史通讯》1981年5月号，第37页。

(14) 黄济人：《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文史通讯》1981年5月号，第37页。

(15) 黄济人：《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文史通讯》1981年5月号，第37页。

杜月笙

江绍贞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来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一个商人家庭里。

杜幼时父母双亡，寄居舅家，从小嗜赌，将父亲遗产当卖净光。后因偷了舅父的钱，被赶出门外，流浪于高桥镇上。1903年，他到上海一家水果行当学徒，不久也因偷窃、聚赌，被老板驱逐。此后他就在上海鬼混，偶然做小贩生意，但基本上是靠盗窃诈骗为生。在这期间，他拜了一个妓院老鸨做干娘，又在妓院里结识了青帮头目陈世昌，拜陈为老头子。自此与一些青帮分子在黄浦江轮船码头上干敲诈勒索和劫夺的勾当。1911年加入了专为毒贩提运黑货的“八股党”，同时还被上海法租界捕房的包探雇用做包打听伙计。

当时，上海著名帮会头目黄金荣任法租界捕房督察长。杜任包打听伙计后，有机会出入黄的家门。他极力向黄献媚讨好，由起初给黄拿拿衣包，到后来参加捕房探目的聚会，逐渐得到黄的赏识与信任。经黄的介绍，他与上海最大的潮州帮烟土商发生关系，把持鸦片的提运，进而武装抢劫，成为黄浦江码头一霸。一次，黄金荣触犯了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遭监禁，杜与另一个帮会头目张啸林出力营救，使黄获释。黄感其“恩义”，三人结拜为把兄弟，是为著名的海上闻人三大亨。

1925年，杜与黄、张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策划下，伙同一些潮州帮土商开设“三鑫公司”运销鸦片。这项罪恶事业给法租界当局以巨大的经济收入，由此杜被任为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杜与黄、张接受

蒋介石的指使，纠合上海青红帮头子，盗用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政变。他们向蒋介石领取经费、武器，在蒋派遣的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协助下，将帮会党徒编成队伍，自称“投袂奋起……甘作前驱”[1]。4月11日夜，杜月笙指使其总管万墨林将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至杜公馆杀害。同时指使党徒，臂缠“工”字符号，由租界冲出，向在北伐中立有极大功勋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凶残的进攻和屠杀，并由蒋介石以军队配合，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紧接着，杜又率领党徒随同杨虎到宁波“清党”，逮捕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杜月笙被蒋任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法租界当局也任命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蒋介石下野期间，杜月笙帮助戴笠在上海为蒋收集情报，进而和戴笠、杨虎三人结为把兄弟。他除继续经销鸦片外，还在法租界开设五大赌台。1929年伙同大买办徐懋棠等开设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先后在上海纱布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当上董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杜和上海民众组织救国会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杜和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上海市地方协会”，任副会长。他在学界和文艺界组织战地服务团，并往前线运送物资、捐款支援十九路军。

随着杜的权势增大，不少买办、官僚、党棍之类的投机分子投拜在他的门下，向他递帖称徒。他为了运用这帮人，于1932年11月建立了一个“恒社”的组织，打着所谓“进德修业”、“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等幌子，以公开社团面目从事政治活动[2]。

1933年，蒋介石为了筹募内战经费，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杜与戴笠专门组织“大运公司”为经销奖券机构，将其部分盈余供戴做特务活动经费。1934年11月，“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史量才被特务暗杀后，杜担任会长职位，同时又担任了“红十字会”副会长。1935年4月，他又当上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一二九”运动时，他协助上

海市长吴铁城破坏学生的游行示威，阻挠学生去南京请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名义急电张学良，要求保全蒋介石的性命。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杜月笙帮助戴笠在上海组建民众抗日武装，于10月间建立“江浙行动委员会”，杜和戴任常委，在其属下建立起一支上万人的别动武装，杜派“恒社”分子充当骨干。1938年，经戴笠把这支武装改编为“忠义救国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杜月笙拒绝日伪拉拢，避居香港。12月初，他专程到武汉面见蒋介石，经蒋简派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他领命返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兼主任。同时，还在港挂出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牌子。1938年1月，杜得悉日本侵略者企图拉拢在沪原北京政府要人组建伪政权时，安排他在沪时的门徒将章士钊、曾毓隽、颜惠庆、吴光新等先后接到香港。

1939年夏，CC分子吴开先奉“二陈”之命到上海整顿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其成员已大批投敌），建立了“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吴任书记长，聘杜当主任委员。杜请黄金荣协助吴在上海活动。是年冬天，戴笠召杜到重庆，让他协助把各地流亡到大后方的青红帮、袍哥分子收罗起来，建立了“人民动员委员会”。该会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指挥在沦陷区的党徒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收集共产党的情报。

自1941年冬，香港陷落，杜即留居重庆。他在重庆建立起“恒社”总社，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建立了分社。1942年3月，他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长。该公司得到戴笠在交通、检查方面提供的方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同时，他又将中国通商银行迁到重庆，自兼总经理。这年秋天，他亲自往内江、成都、宝鸡、西安、洛阳、兰州等地设通商银行分行，各分行内都成立起“恒社”分社。从此，他有了一条自重庆经西北到洛阳的政治经济通道。到1943年，杜与戴笠合伙在重庆设立“通济公司”，又在河南商

丘、界首设分公司，经由西安、洛阳这条交通道，直接与上海日寇特务机关开设的“民华公司”搞物资交换。民华主持人就是杜的留沪代表、充当汉奸的徐采丞（其他参加者有汉奸汪曼云以及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等）。

1945年6月，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在望，蒋介石指派杜月笙随同戴笠到浙江淳安，与美国梅乐斯（Milton Edward Miles）一起策划如何让美军在沿海登陆。但是，他们的策划未定，日寇即宣布投降了。9月初，杜回到上海，除首先在劫（接）收中大捞一把外，他还想谋取上海市长一职，因而与吴绍澍发生了矛盾。后来蒋介石指示他继续保持“在野之身”来为其效劳。于是，他在1945年10月即着手整顿和扩大上海的“恒社”组织，除将原有的“恒社”分子通通收罗起来之外，又在党政军头目中，军统、中统特务中以及工商企业、新闻文化等部门的代表人物中发展一批成员。接着又在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中发展“恒社”组织。与此同时，他极力在金融工商企业中渗透其势力，先后当上了七十多个部门的董事长、理事长，还挂了二百多个“董事”和“理事”的头衔。1946年4月，上海市参议会进行选举，他经多方活动，当选为议长。这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他立即抬出十八个商业同业公会和六个工业同业公会的招牌，响应蒋介石挑起的内战。10月，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派徐亮到上海，与杜一起将原“人民动员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让杜任常务理事。

1948年，杜在上海操纵选举，当上了“国大代表”。年底，眼看上海快要解放，杜受美国唆使，企图搞上海“国际化”。他与潘公展在上海会见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打算在上海搞一个类似租界时代万国商团的组织。为此，他发起成立了“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成立自卫保安团，准备先以此配合美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然后实现其“国际化”的阴谋。但是，他们的阴谋还来不及实现，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解放了南京。杜没有

遵从蒋介石的安排去台湾，而于1949年4月底去了香港。杜在港疾病缠身，于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编：《大流氓杜月笙》，196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

《杜月笙六十年大事记》，《商报》1947年8月27日。

---

(1) 《申报》1927年4月8日。

(2)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杜重远

陈宁生

杜重远，吉林省怀德县杨大城子人。生于1899年3月15月（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父亲杜辉，务农，家境清贫。杜于小学毕业后，经亲友资助，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因学业成绩优异，享官费待遇，直至毕业。

1917年杜重远考取官费留日，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意愿”负笈东渡，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他认为要想振兴实业，可效法日人的“创造和努力精神”，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常于课后参观、实习，期望“就实地工作获得真切的经验”[(1)]。

1923年春[(2)]杜重远毕业归国，决心经营瓷业，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他求亲告友，凑集了六千元，在沈阳北门外买地盖房，掘井筑窑，开始办起了小型砖厂。经过三年奋斗，他创办的肇兴窑业公司成为奉天省第一个新式砖窑。

杜重远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他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功，继续借资、筹款，准备扩大企业。1927年，他借资三十万元，在原有砖瓦厂的基础上又建成瓷器厂。他从大连等地聘请技师和技术工人，共同研究改进技术；从外国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法烧制陶瓷。该厂出产的瓷器色泽优美，花纹新颖，销路遍于东北各地。到1930年，该厂职工已达六百余人，年产各种陶瓷器约六百万件，价值四十万元。在沈阳，它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个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

杜重远热心社会活动，1927年被推选为奉天省总商会的副会长。为了求得当局的保护，他在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里挂一个秘书头衔。1926年为抗议日本要求在东北各县增设领事馆，杜发动和组织了

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日领事冈村企图以高官相诱惑，杜愤怒地拒绝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3] 1929年他与阎宝航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外交协会，附设于总商会内。经常邀集各界人士研究国内外形势，响应关内各地的爱国运动。1930年，他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倡言发展国货，抵制日货。其间，他和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从此，他逐渐成为各界所熟知的有影响的爱国人士。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沈阳。日本关东军视杜重远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杜不得不忍痛舍弃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实业，投进抗日救亡的事业中去。他的实业救国计划遂成泡影。

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它的宗旨是"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4]。杜重远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同年11月，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各界群众掀起了援马抗日的热潮。杜在上海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民众给马部募捐，从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予黑龙江省爱国将士以极大的援助和鼓励。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发表了六十余次讲演，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发愤图强，抵御外侮。每到一地，他都把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诚挚地向邹表示："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5] 为了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他积极支持邹创办一份日报。1932年春，以邹韬奋为主，有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参加，共同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设置重重障碍，未能如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进逼热河。杜重远率领救国会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和学生宣传大队，于2月中旬，赶到热河前线。他们不畏艰险负囊担袋，翻山越岭，深入军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那时，杜重远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抱有幻想，指望他们领导人民一道抗日，但不久，热河又成为“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杜目睹“国土日失，权利日丧”，开始认识到不能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官僚买办”、“豪富大亨”；真正“救国的志士”是中国广大的劳苦百姓。因此，首先必须使大多数民众“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6)]。

杜重远把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当作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积极参加上海厂商自保图存的活动。1933年至1934年间，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又在陕西组织国货公司，以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他原打算在上海办一个大规模的新式瓷厂，正在筹办时，江西省政府邀请他赴江西改革瓷业。1934年9月，他赴江西景德镇考察，目睹在我国享有盛名的瓷器产地，因“技术陈旧，组织不良”而陷入衰败的绝境，十分痛心，遂改变计划，发起筹办江西光大瓷厂。同年12月，江西省政府拟设立江西陶业管理局，聘杜为局长。同时，在该局之下，附设一个“陶业人员养成所”以培养技术人才。杜重远主张教育要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教育要结合生产劳动，学生边学习，边劳动，既可补充学校的经费和学生的生活费，又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德。“陶业人员养成所”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培养学生。后来，这个所实际上成为培训抗日爱国青年的学校。与此同时，杜又与马相伯、卢作孚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助成会”，主张办流动学校，实行半工半读以普及教育。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生活周刊》为此发表了一篇胡愈之写的《民众自己起来吧！》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以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查禁了《生活周刊》。当时，邹韬奋还在国外，大家都为这份抗日救亡刊物的夭折忧心如焚。杜重远不怕困难，挺身而出，于1934年

2月，创办《新生周刊》，继承《生活周刊》的精神，在黑暗中继续战斗。他自任该刊的发行人和总编辑。在发刊词上，他明确宣布：本刊一向站在反帝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7] 他在每期的首页上特意开辟了《老实话》专栏，勇敢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他尖锐地指出：“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的掩饰，我们这国土，是老早就在一块一块地零星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气，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8] 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动一场“自卫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9]。他相信中国人民“会有一天，冲决樊篱，激成澎湃的怒潮，比五四、五九、五卅更汹涌的怒潮”[10]。他的文章短小精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表现了对人民的期望和信赖。

《新生周刊》深受群众欢迎，每期发行量达到十万份，居全国杂志界第一位[11]。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严重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编者和作者。杜重远不畏强暴，挺身出庭。国民党当局仰承日本帝国主义的鼻息，悍然判处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公开宣布抗日非法，救国有罪。杜重远在法庭上，满腔怒火，愤激地喊出了“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12]

“新生事件”轰动了全国。当“新生案”在法庭审判时，愤怒的群众挤满了旁听席，高喊抗日救亡口号。上海各界群众组织了“新生事件后援会”。杜重远勇气倍增，意志更坚，他在6月30日给《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写的《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中，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与读者共勉，号召群众“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13]

杜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监狱，虽身陷囹圄，仍关心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为杜单独开辟一处特别牢房。杜趁此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据点。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络绎不绝地到监狱探望。同年10月11日，杜利用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探监的机会，与高崇民等共同研讨了国内政治形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为了加强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杜把经常与他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即孙达生）以及左派民主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介绍给高崇民。10月下旬，杜托高崇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通过杜斌丞，先访杨虎城，后访张学良，促进了张、杨的联合。“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杜重远异常兴奋，立即写了一篇题为《青年的爱国义愤》的文章，热情讴歌这一伟大的抗日民主运动。他认为“这次学生的运动表面上像激于目前的华北自治，而骨子里确是蕴藏已久的抑郁愤懑啊！”他鼓励青年们结成“民族联合战线”，“鼓起民族的战争”，共同奋斗[(14)]！

1936年春，杜因病转到虹桥疗养院就医。他通过高崇民联络张学良，坚定其抗日反蒋的决心。同年春，张去南京开会结束后，经过周密的布置，与杜在上海郊外秘密约会，对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年8月，杨虎城因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和杜重远经常在一起商讨抗日救国问题。杨和杜的这一段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合作。

1936年9月8日，杜重远出狱。把在狱中写的文章辑成《狱中杂感》一书，于同年11月出版。

杜出狱后，不顾身患疾病，于10月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双十二事变”，逼蒋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杜于12月19日致函黄炎培、杜月笙，主张各派团结、拥蒋抗日，认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

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15]。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热心地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东北救亡总会”[16]推定杜重远为该会主席团成员。他活动于上海、武汉、西北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造成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十分高兴。他热情宣传八路军抗日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说：八路军“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17]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需要建设巩固的后方，因此，新疆的地位日益重要。1937年9月底，杜重远受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委托，赴新疆商洽沟通西北交通问题。当时，新疆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下。盛在取得新疆政权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对内地去新疆工作的人士取欢迎态度。杜与盛系同乡同学关系，到新疆颇受款待。杜自新疆返回内地后，把沿途写的通讯辑成《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对新疆的形势“作了很扼要而饶有趣味的论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同时，由于他对盛世才的军阀本质未能认清，作了一些言过其实的宣传。因此，盛一再邀请他去新工作。从1937年至1938年，杜曾三次去新疆，第三次返回内地后，又写了一本《三度天山》。

1938年2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但他却于5月17日辞却了这一足以使他“高升”的职务。同年6月，被聘为国民参政员；7月，参加于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发表了对参政会的意见，杜指出，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各党各派集团的团体，所以应该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摈除私见，各尽所长，加强抗战的力量”，“必须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到对外抗争上去”

[18]。

1938年1月2日，杜重远抱着“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欣然同意盛世才的聘请，去新疆工作。为了发展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从内地带了三卡车书，其中有张仲实、艾思奇、沈志远等人的译著，还有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他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杜到新疆后，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抗战业绩。他还延请了一批文化人如沈志远、赵丹、石家姐妹（石良、石华）等到新疆讲学或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对繁荣新疆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冬，杜重远在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悉心致力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面对新疆民族和语言的复杂情况，他特别努力为各少数民族提供与汉族相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他动员内地著名学者茅盾等人去该院任教。他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还在学院里创办了一份宣传新思想名叫《兴芒》的刊物。他在暑假里还带领一批文化人和学生到伊犁进行社会考察。不料，杜重远光明正大的活动竟遭到盛世才的猜疑，盛在杜的住宅周围布置特务岗哨，严密监视杜的行动。杜被迫于1940年冬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职务，在家养病。

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德苏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德、意、日法西斯表面的强大，迅速向右转，进行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暴虐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杜重远过于看重旧日情谊，难以看清盛的反动本质，仍多次对盛直言相劝。盛更忌恨在心。1941年冬，盛恶毒地制造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逮捕了杜重远，给杜加上“系受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主要使命，企图破坏后方工作”[19]的罪名。由杜介绍到新疆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亦多被罗织入狱，全案牵连数千人。盛别有用心地命周彬（毛泽民）主审。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揭露盛的阴谋。审判结束后，周彬据理说明所谓杜的阴谋暴动案完全是捏造的。不久，周彬等人亦被逮捕。杜在狱中受尽折磨，几度诬服，又几

度翻供。盛为了置杜于死地又自相矛盾地给杜扣以“苏联间谍”、“共产党”等罪名。1943年10月中秋节后，杜重远终被盛世才毒死在特别监狱里。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于1945年才传入内地。7月24日，在重庆的各党派爱国人士，为邹韬奋和杜重远的逝世举行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称誉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

(1) 杜重远：《狱中杂感》，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293页。

(2) 杜重远：《狱中杂感》，第293页。

(3) 《新生周刊》1934年2月24日。

(4)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载李剑白主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杜重远：《狱中杂感》，第193页。

(6) 《新生周刊》创刊号发刊词。

(7) 《新生周刊》创刊号发刊词。

(8) 《零卖与批发》，载《新生周刊》一卷十七期。

(9) 《“九一八”三周年》，载《新生周刊》一卷三十一期。

(10) 《民族精神不死》，载《新生周刊》一卷十三期。

(11) 据1934年底统计，全国杂志共有2068种。

(12) 引自《新华日报》1945年7月24日第四版《纪念邹杜两先生》。

(13) 杜重远：《狱中杂感》，第180页。

(14) 杜重远：《狱中杂感》，第32页。

(15) 杜重远给黄炎培、杜月笙的亲笔信原件。

(16) 成立于1937年6月，是关内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

(17) 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2页。

(18) 《新华日报》1938年7月6日第二版。

(19) 周东郊：《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统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端方

董方奎

端方，字午桥，号陶斋，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1861年4月20日（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清军入关后，由关外入直隶浭阳（今河北丰润县）定居，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出身于门阀贵族[(1)]。青少年时从儒师在家中就读。1879年桂清死后，端方以荫生由指选六部员外郎报捐分发行走，被派往工部，在满洲候补员外上行走。1882年中举。

1889年，端方因筹办光绪帝婚事有功，加四品衔，到工部就职。1891年4月放张家口监督，管理该地税收。1893年补工部郎中，在工部都水师任职。从1896年4月起，兼任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监督监修办事官，负责龙华县定东陵慈禧太后陵墓的修造，又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与重用。1897年11月保加三品衔。

1898年1月，经翁同龢及刚毅保荐，3月18日引见，以御史用，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端方。4月，又经会典馆保奏，请俟升道员后赏加二品衔。4月，补授直隶霸昌道，未任。

戊戌变法开始后，端方参与维新，8月，督理农工商总局，上书请设农务学堂，参用西法，购买机器，聘美、日农师，整理农务。戊戌政变后，端方几被治罪，托古董商投荣禄门下，且贿李莲英乞助，并得到刚毅的担保，本人又著《劝善歌》，歌颂慈禧的“圣德”。因此，他不仅免戍新疆，而且补授陕西按察使。此后，他避开宫廷的斗争，一意谋求外任。1899年10月，任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时值陕西“被灾州县至六十余处之多，遍野哀鸿，嗷嗷待哺”[(2)]，端方对受灾州县，豁缓钱粮、劝捐散赈，安抚

饥民，生产自救。又严禁义和团入陕西，对内“多为文告，反复晓譬，用是士民无惑，境内宴然”。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逃至陕西，进驻抚署期间，端方将行宫布置一新，慈禧“颇喜端办差之安妥”[3]。当时，外交急迫，全权大臣暨东南各疆臣电奏，皆径递陕西抚署转达，端方以一人而兼治外台内省之寄，从此声名鹊起，慈禧亦视若股肱。1901年5月，调升湖北巡抚，赏头品顶戴，兼兵部尚书衔。1902年11月，兼署湖广总督。

端方到湖北后，积极推行“新政”：将新军由一千人扩充至九千五百人；把兴学作为最急之务，在两湖地区派遣二百七十二名学生，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学习实业；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扩建师范学堂、五路高等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防营将弁学堂等。增设了幼稚园，省城内外设初等小学堂五十六所，道府师范学堂、各府师范学堂，南省中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创立省立图书馆一所。整顿了各级八旗子弟学校。

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端方鉴于该刊宗旨在唤起国民精神，曾寄去三千元，给予支持。但张之洞认为学生擅刊报章，流弊无穷，要求端方迅电饬禁。该刊在张之洞、端方联合压迫下，仅出八期即停办。

同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本应由两江总督魏光焘处理，而慈禧却对魏不予信任，授端方处理该案之全权。将处理“苏报案”之一切电文致端方，再由端方电转上海、两江。于是，他又派了一班人马去上海，通过美国参赞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与工部局联系。初欲引渡章炳麟、邹容处以极刑，并“株连同党”。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反对，不得不改判监禁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徒刑。1904年5月，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并署理两江总督，控制了革命势力活跃的长江下游地区。端方在江苏任职半年，即练得新军六营，并规定非能教操者不许充将，非能识字者不许充兵。在省城设立学务处，统管全省教育，在江宁及苏州各设小学四十所，无论旗、汉、回民，不分畛

域，均准一律入学。在苏州省城设立两级师范学堂，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高等学堂，设立实业学堂等。

1904年11月，黄兴、陈天华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准备在长沙起义，虽然事泄未发，却震惊了清廷。12月13日，调端方任湖南巡抚。次年春，端方抵湖南后，即派员追捕马福益，4月杀马福益于长沙浏阳门外。又派监督至各学堂，对学生思想进行控制。

1905年四五月间，英商贝纳赐违背在长沙城外开埠的规定，三次将货物运进城内，拒绝交纳厘金，企图把租界扩展到城内。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端方抵制了英人的无理要求。同时，他提出常德、湘潭自开商埠，以抵制各国增开商埠之要求。同年，因赫德（Robert Hart）自请回国，端方建议清廷收回海关及邮政管理权。

同年7月，清政府特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并带随员四十余人，分赴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戴鸿慈、端方经日本赴美、德、俄等国考察，游历了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等。端方在五大臣中居于实际上的首领地位，他考察了诸国政治后得出结论说："大抵美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不适合于中国，认为德国的君主立宪及军事制度对中国"最为相近"，应当"急于师仿、不容刻缓者也"[(4)]。在游历考察中他与梁启超秘密联系，嘱其代草奏稿"逾二十余万言"[(5)]。端方于1906年7月回国后，根据梁启超代拟的奏稿和他自己的考察所得，参酌删定，向清廷呈递了八份重要奏折，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军政重要取法各国以图进步折》、《请设编制局以资筹议折》、《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并与载泽合奏《奏请宣布预备立宪密折》。慈禧与光绪三次召见端方"垂问周详"，对端方的陈奏十分重视。端方与戴鸿慈又合辑《列国政要》、《列国政要续辑》二百二十五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卷。上述奏折及著作奠定了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的基础。

1906年9月，清廷任命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促其迅速赴任。当时，两江地区自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6年江、浙等地遭灾后群众性的抢米风潮，以及同盟会成立后更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等，使该区成为革命的中心。端方看到革命党“煽动之言”、“一唱百和，如饮狂泉”[(6)]，“各帮枭匪，游勇居多，大半与营兵相识，一闻剿办，往往得信远避”[(7)]。对此，端方采取了安抚与镇压相互为用的反革命两手。当时，江苏、安徽发生大水灾，遍及八府一州，灾民约二百五十万，“饿殍在途，流亡满邑”。端方为了防止革命党“勾结饥民，别酿巨患”，通过向农工商部息借、上海绅士义捐及发动督抚官吏捐款等办法，共筹集并发放赈款三百八十五万两，济灾民七百三十万口。又令农民领荒耕种，任其栽种五谷、桑麻、果树、竹、茶等。这样，有效地阻止了流民的暴动。

鉴于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日本、上海等地十分活跃，端方密派特务到日本等地监视留学生及革命党人的活动。1906年，同盟会员孙毓筠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被端方派人逮捕。同盟会员杨卓林去扬州谋刺端方，事泄被捕，被杀害于南京城外。又逮捕了由孙中山按年接济经费的会党头目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等，并就地“正法”。1907年2月，山东滕县一带会党卞其为、陈振等四五百人被逼至江苏沛县，端方派标统石佳华领兵剿灭。

1907年7月，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并拟杀端方、铁良等人，但失败被俘。端方急电安徽布政使冯煦，将徐锡麟“剖心致祭”，残酷杀害。接着，端方又电浙江巡抚张曾敭，搜查绍兴大通学校，捕杀秋瑾，通缉陶成章等人。徐锡麟安庆起事后，端方感到长江一带人心不靖，应当早防“隐患”，会商湖广、安徽、湖南、广西、云南等省督抚，联合制定《长江巡缉总章》，把东自江阴西至岳州的长江江面划分为六段，分区分段防守，严密查拿，防止革命党自日本东归，并企图将革命势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同年8月，端方吁请慈禧迅速颁布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扶

助”地方议会之实现，以“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消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8]。他再三强调，化除满汉畛域是消弭革命的重要手段，并代安徽旌德县廪贡生李鸿才条陈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9月，又代江西副贡徐敬熙上奏，要求清廷按日本立宪政体进行调整，改军机处、政务处为内阁，设议院以组织立法机关，收回治外法权，改良刑律，使司法独立，按三权分立办法建设国家政权。1908年元月，端方在省城江宁设立地方自治总局。7月清廷颁布谘议局章程，10月端方在地方自治总局内设谘议局，又令江苏学生回籍讲演自治法理，筹办自治学社。江苏地方自治之筹办，走在各省的前面。

1908年9月21日，清廷任命荫昌、端方为秋操阅兵大臣。12月，派端方赴沪参加“万国禁烟会”，该会由美国发起，有英、法、德等十二国代表参加，次年2月开会。会后，端方在江苏等地推行戒烟，创设戒烟官局，实行官膏专卖试行章程，规定洋烟进口数量，分年递减，又用加价抽税的办法禁烟。

端方在两江期间，支持与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之发展。为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上海日辉织呢厂奏请清廷援照上海织布局成案，完纳海关值百抽五的正税后，运销各处，免纳内地厘金，提倡公司的发展，以免利权外溢。又发展官办企业，设江南矿务总局，开办阜宁煤矿，创办南洋印刷官厂等。1908年12月，端方倡议在江宁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自任会长，官商各二十五万两合资经营，搜集各省农产、工艺、美术、教育诸物品展出，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了筹办这次博览会，端方派人与各省及本省各属广为联系，演说中外实业竞争之理由，各地商民咸知感奋[9]。又订立《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事务所简章》、《南洋劝业会事务所代订各省出品协会章程草案》等规章制度。先由本省设立物产会，外埠设立出品协会，进行物产展览奖评，并选出最佳商品至南洋劝业会展出。此后，苏属各埠及外省天津、汉口、广州等地都举行了物产会。南洋第一次劝业会设在南京城以钟鼓楼为中心方圆十里的新辟市场之内，于1910年6月5日开幕，

参观者日五千人，有公议厅、事务所、美术馆、教育馆、武备馆、医药馆、工艺馆、机械馆、通运馆、水产馆、华侨出品馆、东方参考馆、西方参考馆，有二十多丈高的电梯。各馆又有详细之分类，如工业又分为冶金、采矿、化学、染织、制造等，十多个省市参加展出，各省建筑别馆十五座，参加赛会产品达六十万件以上，资金不下三百万。交易兴隆，热闹非常。展出约半年，11月闭幕。

端方出国考察带回一台电影放映机，为我国电影机入口之始。他在两江期间，创办许多学校。1906年筹办南洋大学堂，在江宁设立卫生学堂，1907年创暨南学堂，专门收录华侨子弟归国学习，以坚爱国“内向之心”。在江宁驻防所设立开通学堂一所、清文学堂一所、高等小学堂八所、习艺局一所。派马相伯、严复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以培养赴欧留学生为宗旨。1907年7月，派宋庆龄等十五人赴美留学。8月，在江苏省城创设南洋方言学堂，学习法、德语言。在江宁成立法政学堂。1908年春，在上海设贫儿院、南洋高等商业学堂各一所。创建南京图书馆，在江南实业学堂附设农业试验场。主张汉字简化。1909年改江阴南菁书院为文科高等学堂，推行不缠足政策等。

自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死去，年仅二十五岁的摄政王载沣执政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为复杂激烈。1909年3月，清政府三载考绩，认为端方是“规模宏远，应变有方”，“共济时艰，劳绩最著者”。6月25日，御史胡思敬奏劾端方“罔利行私”、“侵吞赈款”、“公行贿赂”等十罪二十二款。6月28日，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8月接任。

当时，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各省谘议局成立后，江苏谘议局长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端方在抵天津之前，就上奏载沣，说明“今日天下一至艰至危之局也，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建议延揽硕德通才为“禁中顾问官”，派“在位大臣齿德兼隆者”为领袖，要求载沣与禁中顾问官“从容坐论，

虚心延访”，以谋治国之道[10]。端方所建议的以“在位大臣齿德兼隆者”为领袖，显然指的是他这位“应变有方”的老一辈通才。同时，端方站在立宪派一边，亦奏请速开国会。并说“监国摄政王受先帝之付托”，不能“孤立于庙堂之上”，有攻击载沣之意[11]。因此，载沣对端方的建议，不仅拖延不纳，反而忌恨在心。

1909年元月，清廷指定端方负责光绪皇帝的安葬，5月1日将光绪“梓宫奉移西陵暂安”。11月，清廷又令端方负责慈禧“梓宫奉移山陵”的一切事宜。13日，将慈禧梓宫送抵菩陀峪东陵隆恩殿。端方既负责慈禧梓宫奉移之一切事宜，当然有权布置沿途照相等区区小事，但就在此小事上，一发不可收拾。11月20日发布上谕，说端方在慈禧奉安时，“沿途派人照相，初三日举行迁移奠礼焚化冠服时，该督乘舆横冲神路而过，又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实属恣意任性，不知大礼”，将端方革职。

端方笃嗜金石书画，青年时代“遂访琉璃厂肆精于碑版者，得李从云，购宋明拓本及碑碣，相与朝夕讨论”[12]。海内孤本精拓，宋明以来名迹，闻风纵萃，悉归储藏。他被革职后，在北京西山筑“归来庵”隐居，整理撰写《匋斋古玉图》二册、《匋斋藏名画集》一册、《匋斋藏瘗鹤铭两种合册》（墨拓孤本），《匋斋藏石记》四十四卷，《匋斋吉金录》八卷、续录二卷。

1911年5月，端方以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受命平息保路风潮。7月3日，端方带着胞弟端锦等仆从离京南下，7月8日抵武昌。端方到湖北后，“惟日与鄂绅酬酢，以期联络一气”，又向汉口商界“劝导”，以期“消弭风潮于无形”[13]。当时，鄂路股款仅百余万，铁路股东要求退还路款，端方拟定退股章程。不久，湘省代表至鄂，端方答应自必和平解决。当时，四川人民亦要求退还股款。6月1日，端方会同盛宣怀致电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遭到四川人民的坚决反对，促使四川保路运动进一步发展。成都每街均设保路协会，以保路废约为宗旨，推蒲殿俊、罗伦为

正副会长，全省各地纷纷响应，参加者达数十万。端方、盛宣怀收买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强迫接管川汉路宜万段，使川汉路权丧失，路款无归，民众更加怒不可遏。8月24日，成都开保路大会，议定全省罢市、罢课、停纳捐税，并举代表刘声元等去北京请愿。8月30日，川督赵尔丰等奏请铁路暂归商办，俟资政院开会议决，清廷不许。端方连续急电内阁和盛宣怀，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说赵“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清廷再行简派重臣赴川查办。9月2日，清廷根据端方的参奏，严令赵尔丰“倘或养痈贻患，致滋事端，定治该督以应得之罪”。同时，清廷派端方率兵入川查办。赵尔丰为形势所迫，放弃铁路“暂归商办”的主张，9月7日逮捕了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十一人，群众齐集督署门前，为川绅请命。赵尔丰竟令军队开枪，残酷杀害请愿群众三十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此后，四川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斗争，数万团民包围了成都。端方自知川局水火之势已成，难以查办，不肯前往，而清廷和盛宣怀等人认为只有端方前往才能挽回大局。端方在得到朝廷准其带兵入川、有权随时调遣川省水陆新旧各军的保证后，才于9月7日表示：时局艰难至此，惟有奉命即行，吉凶祸福，度外置之。不得不硬着头皮准备赴川。

9月11日，端方从武昌带精兵一营，乘“楚豫”轮溯江而上，15日行抵宜昌上岸时，有人抛掷炸弹，炸死随从护兵七名，又闻成都被围，全川糜乱，使端方心寒胆战，逗留不进，自称才不足以驭众，吁请清廷另简大员入川。清廷一面严令端方兼程前往，又令瑞澂加派劲旅一标随端方入川。在各方面压力下，端方不得不继续前进，10月6日过巫山，17日抵夔府，11月3日抵重庆，18日抵资州（今资中）。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所带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七日）下午7时，杀端方及其弟端锦于资州天上宫。端方在被杀之前说，他的祖先原系汉人，姓陶。端方之首级由革命新军带至武昌，后由黎元洪交给端方长子陶遗。端方之身部始埋资州狮子洞，后来迁葬于河南辉县温泉。

端方之奏折函电甚多，已刊者有《端忠敏公奏稿》十六卷，并散见于《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等处。未刊者藏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

---

(1) 桂清，咸丰二年进士，内阁学士，慈禧的亲信，同治的老师。同治年间两任工部侍郎，光绪年间任内务府大臣。《八旗奉直宦豫同乡录》（王梦熊编，1909年）上卷载，端方之祖父文雅，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曾祖父为郑亲王乌尔棍布，曾任九门提督。

(2) 宋伯鲁纂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65，名宦二，西安1934年版。

(3) 《万国公报》卷150（1901年7月），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第20291页。

(4)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6，1918年，第15—18页。

(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6) 端方：《请平满汉轸域密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41页。

(7) 《端忠敏公奏稿》卷4，第30页。

(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47页。

(9) 《端忠敏公奏稿》，卷14，第41—43页。

(10) 《端忠敏公奏稿》，卷16，第4页。

(11) 《端档杂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 徐珂编：《清稗类钞·鉴赏类》稗七十二。

(13) 上海《神州日报》宣统三年六月十九日。

端纳

汪仁泽

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祖籍苏格兰。1875年6月22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东部的利斯莫城。父亲是铁路工人[(1)]，对子女管教严格。端纳自幼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端纳少年时不慎跌伤手臂，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十五岁时在当地一家报馆的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业余泛读书报杂志，学识渐增，遂多次在报刊上发表短文。1894年，在美国十五万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澳洲铁路工人也展开了罢工斗争，端纳的父亲积极参加，使他对罢工工人深表同情。1897年澳洲各省召开联邦代表大会后，展开了广泛的制宪宣传，次年公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法，端纳研读条文，印象颇为深刻，从而形成了他的民主思想和民治观点。

1901年，端纳应约赴悉尼市，在《每日电讯报》社任实习新闻记者，初露才华，深受发行人的器重。不久被越级提升为该报副主编。1902年，受墨尔本《百眼巨人报》社聘为副主笔。他结识该地《纪事报》驻日记者英人威尔逊，受他的影响，对日本统治者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有深刻的印象。此后，终其一生，对日本政府抱不信任、不合作态度，在新闻报道中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1903年，端纳经威尔逊的介绍，前往香港任《中国邮报》（*The China Mail* 亦译《德臣报》）社副主笔，开始关心中国政局。他到香港不久，曾赴广州访谒清政府两广总督岑春煊，由于他通晓西欧各国政情，博得岑的好感，不久应聘为岑的私人顾问[(2)]。1904年他升任《中国邮报》主笔，在他主持下，该报消息灵通，报道翔实，成为当时香港著名大报之一。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展开，端纳接受《纽约论坛报》社聘为战地记者，前赴东北采访，结识了时任新民府清军马队营官的张作霖。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在国内外影响不断扩大，引起端纳的关注并深切同情，常撰文作有利于革命方面的新闻报道。1908年，经友人介绍，特地去香港拜访孙中山，因孙在国外，由胡汉民代为接见，受到热情接待。胡鼓励端纳继续支持中国革命。由于他与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上层人物都有往来，因此报道消息迅捷，所撰评论有独到之处，在新闻界中卓有声誉，成为当代名记者之一。这时他常驻在上海，与沪上政商各界头面人物王宠惠、伍廷芳、虞洽卿等甚为相知。又结识宋嘉树（耀如），常至宋家，宋的子女亲昵地称他为“端纳叔叔”。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次月，宣告独立的各省都督代表集议上海，公认武昌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推举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代表。伍廷芳接受端纳的建议，为了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发表保护各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继续承担前政府所订国际条约义务的文告。是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端纳再度往访，畅谈数小时，不久即被聘为孙的私人顾问、外文秘书。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受托起草对外宣言《告友邦书》，经孙审定后，于1912年1月5日发布，成为民国外交方面的第一个文件。3月，袁世凯继孙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多次与之接触，对其浓厚的封建意识、好弄权术，极为反感。是年9月，孙中山被袁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全国铁路，在端纳、王宠惠等陪同下，巡视北方铁路设施。端纳为孙陈述各国现代化铁路近况，并沿途对铁路建设提供颇多有益的建议，深得孙的嘉许。此时端纳已就任《纽约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及上海《远东时报》月刊部编辑，后又兼任伦敦《泰晤士报》社驻北京通讯员，常往来于京沪两地。

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秘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作为支持袁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报界已有所闻，但条款内容，当局和

日本政府均守口如瓶。端纳多方采访，终于从袁的政治顾问美国人莫理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处获得原文译本，即在报纸上首先全文刊出，引起国内外震动，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浪潮。同年8月，端纳在北京结识了蔡锷，12月蔡锷在云南宣告独立，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端纳闻讯后率先在报刊上撰文表示支持。袁死后段祺瑞当权，主张对德宣战，北洋军阀各派对此意见分歧，端纳为此而多方奔走劝说，力促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宣布对德奥宣战。1920年，北洋政府成立经济讨论处，端纳就任该处新闻处长兼代理讨论处处务，负责调查和发布经济情报。由于《远东时报》月刊部发行人逐渐亲日，端纳不愿改变反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初衷，毅然辞去编辑职务。

1922年端纳接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聘请，任其私人顾问，成为张沟通英、美各国关系的中间人。是年9月，张接受端纳的建议，派人赴粤联络孙中山，共同反对直系军阀。1926年张作霖入关控制北京政权后，采纳端纳的建议，认为不能单靠日本的支持，更不能事事接受日本的“劝告”，应力争取得英、美西方国家的支援，以达借助西方力量抵制日本的目的。是年10月，经端纳的介绍，张在天津接见英国驻华公使兰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讨论与武汉革命政府“南北议和”等问题。与此同时，在端纳的谋划下，张所办的企业开始吸收英美的投资；向英美借款二千万元，修建葫芦岛港，以谋与日本控制的大连港竞争；又在奉海（奉天到海龙）铁路的修筑中，向英美购买钢轨和车辆。张的上述措施，引起了日本的愤慨和抗议。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毙后，其子张学良续聘端纳为其私人顾问，并以师事之。在端纳的影响下，张学良戒除了烟瘾甚重的鸦片吗啡，积极进行骑马、游泳等体育运动，体质大为增强，精神焕发，前后判若两人。

1934年，端纳陪同张学良考察西欧六国后归来，受到蒋介石夫妇的邀请，到杭州游览。在杭期间，由宋美龄亲任翻译，蒋介石单独与

端纳就国内外形势长谈达四小时，端纳的见解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端纳随张学良至武汉、洛阳等地，继续与蒋介石保持书信联系，提出各方面的施政建议，受到蒋的赞许，不久蒋正式聘他为私人顾问，从此他常住南京以备咨询，与蒋氏夫妇关系十分融洽。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消息传到上海，宋美龄急召宋子文、端纳等人在孔祥熙寓所商讨对策，决定先派端纳至西安探听实情。端纳也愿以客卿的身份，利用与蒋、张都有着深厚友谊的特殊关系，甘冒危险，在双方无法直接谈判的情况下，穿梭效劳，转达各方意见和提供保证，谋求事变能化险为夷，得到各方都较满意的和平解决。此时亲日派何应钦已下令陆、空军向西安进攻，并准备进行轰炸。宋美龄一面制止空军轰炸西安，一面排除种种阻挠使端纳于13日搭机飞离南京至洛阳，次日得到张学良回电同意后飞抵西安。当夜端纳会晤张学良，张表示为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发动兵谏，并无伤害蒋介石之意，要端纳向蒋转达此意，随后端纳探视并慰藉了蒋介石。15日，端纳在报端发表有关电文[(3)]。午后飞返洛阳，与南京宋氏兄妹多次通电商议。16日下午，端纳应宋美龄要求，告诉蒋事变是“戏中有戏”，再飞西安，并向张学良表示：如能恢复蒋介石自由，保证对张、杨等人“一切皆可不究”。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应邀搭乘张学良专机从陕北到达西安。20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经多方磋商后，次日中午，与端纳同机飞返南京，将西安磋商结果向宋美龄汇报后，22日中午，端纳与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等分乘两机飞抵西安。端纳参与宋氏兄妹、张、杨和中共代表团的谈判，达成和平解决事变的协议。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东返，端纳和宋氏兄妹等同机回到南京。其后蒋介石嘉奖事变中的有功人员，端纳获得大绶采玉勋章一枚。但张学良却被蒋介石扣押，使端纳深感不安。他一面劝慰张学良切勿因而消沉[(4)]，一面多次向蒋氏夫妇要求信守诺言，履行保证，使张学良早日恢复自由，但未见成效。后又转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代为恳求，也是石沉大海，毫无结果，但他却因此而遭蒋氏夫妇的反感。在此难以继续相处的情

况下，1940年夏，端纳被迫辞职，飞离重庆，到达香港。

1941年2月，端纳经过长期准备后，开始他晚年的旅游生涯。先在南太平洋法属社会群岛东部的塔希提岛旅居一段时间，后经新西兰转赴夏威夷。是年冬，当他从夏威夷返回香港时，适值太平洋战争爆发，航路中断，中途改赴菲律宾马尼拉。不久菲被日军攻占，端纳和其他英美籍的西方人被日军作为俘虏关押在集中营，端纳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始终未被日军发觉。1944年，他被菲抗日游击队营救出狱。1945年2月盟军收复马尼拉后，蒋介石派人将端纳护送到夏威夷。由于他长期在集中营中受尽折磨，衰病不堪，经美国海军医院诊治后，于10月再次前往塔希提岛疗养。

1946年初，年已古稀的端纳渐感体力不济，转赴檀香山，经诊断已患肺癌，其中一叶且已坏死。他自知在世时日已不多，但他时刻思念着第二故乡中国，表示“我要回到中国去，我要死在中国！”[(5)] 是年3月18日，在蒋氏夫妇的安排下，端纳从檀香山被接到上海，住进宏恩医院。当记者访问他时，他面对窗外新春和煦的阳光，喃喃地述说自己生平的意愿：“人们不仅要知道真理，而且要寻求真理，更要为真理而奋斗。”[(6)] 在住院期间，端纳忍着病痛，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速度，将近四十年来在华的经历写成回忆录，但因顾及书中披露了一些内情，会使某些“中国朋友丧失尊严”而迟迟未能付印[(7)]。11月9日他病情突然恶化，遽离人间。他没有留下其他遗物，只有一枚孙中山赠给的勋章，被端纳看做是真理的化身，也遂成为他身后最珍贵的纪念物。

---

(1) 《毕生尽瘁中国的端纳》，《申报》1946年11月10日。

(2) 1907年岑春煊调任邮传部尚书，由于与奕劻、袁世凯争权，不久被解职。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清廷重新起用为四川总督，岑接受端纳的劝告，

并鉴于清廷大势已去，未赴任。

(3) 路透社所发端纳的电文如下："余今日会晤张学良时，张与其左右均向余保证决无伤害蒋委员长之意。张氏乃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苟无意外困难发生，或倔强态度之影响大局，则可于数日内获一解决。端纳印，15日。"刊于1936年12月17日《申报》。

(4) 张学良在1938年10月从湖南转押贵州途中，曾给端纳一复信中称："我是何种人？我想你对我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我希望你尽力协助贫困的中国。至于我个人从不消沉，请你不必为之过分忧虑。"

(5) 《毕生尽瘁中国的端纳》，《申报》1946年11月10日。

(6) 《毕生尽瘁中国的端纳》，《申报》1946年11月10日。

(7) 端纳的回忆录原稿，在他死后曾由他的好友、英国记者田汲强保管，但田死后，原稿已下落不明。

段祺瑞

李宗一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生于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他是北洋军阀皖系的首领。

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父早丧，自幼随祖父读书。1885年他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1889年毕业，由李鸿章派赴德国学军事，在克虏伯炮厂实习。1890年回国，先后任北洋军械局委员、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1896年初，被袁世凯调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担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1899年，随袁军赴山东，镇压义和团。1901年，由袁保奏“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1)]。

1901年底，袁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他又随袁到保定。次年6月担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不久升为补用道员。他带兵到广宗县，镇压景廷宾起义。因镇压起义农民“有功”，被赏戴花翎，加“勇”号。1903年12月，清廷成立练兵处，袁为会办大臣。由于袁的保荐，他当上了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并加副都统衔，成为袁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后来，人们把他与冯国璋、王士珍合称北洋三杰，又被人称为袁的龙、虎、狗。1904年，他兼署常备军第三镇翼长，次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又担任河间秋操北军总统。1906年初，调署第三镇统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月，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充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此后他又任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官差。因此，北洋军官多半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袁世凯被罢官后，他于1909年12月被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12月调任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起用袁世凯，同时召段入京，任以第二军军统，令往湖北镇压革命。段先到彰德见袁，请示机宜，然后入京请训，转赴湖北前线。袁于11月到北京组阁后，派他署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驻孝感。12月，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召开，他以军事实力支持袁窃夺民国总统，对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和会上南方代表坚持以清帝退位作为让袁做总统的交换条件，这正是袁世凯所梦寐以求的；但当时清室皇族对“让位”问题迟疑不决，少壮亲贵尤坚决反对。于是段受袁指使，于1912年初率北洋将领四十六人两次致电清廷，“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请利害”[(2)]。迫使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3月10日袁窃据民国总统，任命段为陆军总长。

1913年，他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遣将，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调集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军队数万人，血腥镇压白朗军，竭力为袁的独裁统一效劳。但是，由于他总揽军权，为袁所忌。1914年5月，袁创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陆军部的权力收归自己直接掌握。因此段大为不满，遂把部务交给其心腹徐树铮（陆军次长），不再到部办事，而袁在当时，也有心把他打入“冷宫”。次年5月，他又称病辞职，实际是在袁的帝制活动中，他有自己的想法，从而采取消极态度。1916年3月22日，袁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和护国军兴起的形势下，被迫取消了“洪宪”帝制，才又不得不把段请出来，帮助他收拾这一破碎局面。段接受袁的请求，于23日出任参谋总长，4月又代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他一面与护国军打交道；一面迫使袁交出实权，恢复国务院，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于6月6日病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当时，日本寺内政府成立，提出所谓经济“援华”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它看准了段政府正是一个可以“援助”的对象[(3)]，而段也决心依靠日本的“援

助”，树党营私。12月24日，他亲自与寺内派来的代表西原龟三密谈，商讨所谓“中日亲善”问题[(4)]。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皖两系。段是皖系的首领。这时，他大权在手，又俨然以北洋派正统首领自居，对非北洋派出身的总统黎元洪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黎、段上台不久，他们之间就各以不同的国际势力为背景，争夺权力，演成了“（总统）府、（国务）院之争”。后经徐世昌调解，他们的矛盾一度和缓，但到1917年春，“参战”问题又成了双方的主要争执。段希望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实力支持，坚决主张对德宣战[(5)]；而依靠国会支持的黎元洪以美国为奥援，表示反对。4月，段召集附己督军来北京，组成“督军团”，向黎和国会施加压力。当国会讨论“参战”案时，他唆使军警和雇用流氓，打着“公民团”旗号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希图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遭到国会和大部分阁员的抵制，造成僵局。

段祺瑞不甘罢休，暗中指使徐树铮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鼓动复辟派张勋，用武力驱逐黎元洪并解散国会。5月23日，黎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他愤然离京至天津，发表通电，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煽动“督军团”倒黎。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独立”，奉、鲁、闽、豫、浙、直隶各省军阀相继响应，以武力威胁黎元洪。张勋遂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进京，乘机演了一出清帝复辟丑剧。段祺瑞见自己倒黎的目的已达到，即借助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威，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打垮了张勋后，他于14日入京，重掌政权。黎元洪被迫去职，段迎直系首领冯国璋（原为副总统）为总统，自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

段祺瑞竭力主张“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借债。从1916年底起，他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官僚，放手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6)]。这些卖国借款表面上是用作“经济开发”或“参加欧

战”；实则几乎都用于打内战、组织“安福俱乐部”和编练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

段祺瑞打败张勋以后，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命，蛮横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采纳研究系梁启超的“改造国会”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企图另组新国会，以排斥旧国会中反对他的国民党议员。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率海军军舰两艘南下。联合滇、桂等省实力派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对抗。段抄袭袁世凯的老谱，立即决定对南方用兵，1917年8月初，派其党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代替了与护法政府有联系的湘督谭延闿。谭指使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于9月18日护法“独立”，以示反抗。段即任命王汝贤、范国璋为北军湘南军正副司令，率军南下作战，10月6日开始，相继攻占衡山、宝庆。段兴高采烈，指望由湖南进攻两广，由四川进攻云贵，想在三五个月内平定西南，大做其“武力统一”的美梦。

皖系军阀的行动，引起直系的不满。在英美的怂恿下，冯国璋对向南方用兵的决策，采取了表面敷衍，实际掣肘的办法。王、范受冯使指，突然于10月14日从前方来电请求停战议和，并自动退守岳阳。傅良佐得讯于惊惶中弃长沙而逃。同时，入川的皖系北洋军吴光新部也溃败。段对于这些情况的发生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被迫于11月16日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这时日本政府见段内阁倒台，即派人见冯，表示对中国内阁变动的“关怀”，同时仍认段“为政局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7)]。段于辞职后，鼓动“督军团”主战，向冯施加压力。冯在内外逼迫下，只得于12月18日又任命段为“参战督办”。1918年2月，徐树铮又到奉天，引张作霖带兵入关助段。在“督军团”的要挟下，冯除被迫下令对南方继续作战外，又于3月23日请段复任国务总理。4月，段亲往武汉等地，催促北洋军对南方发动攻势，并暗中拉拢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进行分化。但不料善于辨认风向的前方主将吴佩孚于占领衡阳后，和参加“护法”的南方军阀秘密妥

协，从8月初接连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而痛斥段政府的亲日卖国政策，使段的“武力统一”计划全成泡影。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的地位，敢于出头反对段祺瑞，是由于这时国内外出现了不利于段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正是段祺瑞一系列倒行逆施所促成的。与对南方用兵的同时，段与日本加紧了勾结。他依靠日本的顾问和装备，编练自己的嫡系队伍“参战军”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作为镇压人民、消灭异己的基本武力。他又派靳云鹏和徐树铮，于同年5月间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8)]。根据这项协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兵，并可指挥中国军队。另外段又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利用卖国借款，收买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制造皖系把持的新国会（“安福国会”）。8月20日“安福国会”正式开张，9月4日，把老官僚徐世昌推为总统，供其利用。段的亲日卖国政策，在国际上引起英美的嫉视；在国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和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消息一经传出，留日学生与国内学生纷纷成立救亡团体，采取行动；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当权人物，也都纷纷通电责问。全国上下的反段气氛，把本已存在的直皖矛盾，进一步推向尖锐化。这时，冯国璋虽已任满下台，但直系势力仍在。曹锟、吴佩孚继冯而成为直系领袖。段为缓和直、皖矛盾，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但是，他只是退居幕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北京政府。

1919年，我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引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段控制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受到北京学生的惩罚。段公然袒护曹、章、陆，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并主张在巴黎和约上签字[(9)]，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把“参战军”改称边防军，用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把“参战督办”改称边防督办，在“国防”的幌子下，继续使用卖国借款，扩充皖系实力，仍然准备内战。

欧战结束后，英美帝国主义有了更多的力量干涉中国的政局。在

英美的支持下，曹锟、吴佩孚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情绪，积极部署反段。1920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带兵北撤，并联合奉系张作霖，提出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徐树铮等条件，向皖系挑战。徐世昌于7月2日被曹、吴所迫，下令免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职。段对此大发雷霆，立刻以边防军为主组成“定国军”，自为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参谋总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胁迫徐世昌于7月9日又下令免曹、吴职。于是，直皖战争于14日打响，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碑店和杨村。奉军从东线助直攻皖，不过四天，战局即急转直下，皖军一败涂地。曲同丰被俘，徐树铮、段芝贵都丧师逃走。段只得通电辞边防督办。“安福俱乐部”也被解散。除浙江督军卢永祥外，皖系军阀全部垮台。从此，直、奉两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

段失败后，于第二年移居天津日租界，窥测动向，等待时机。随着直、奉矛盾的发生，他暗中勾结张作霖，并联络坚持反对直系军阀的孙中山，图谋再起。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了直系统治。冯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组织政府，段和张作霖也虚伪地附和。这时，孙中山已改组了国民党，结成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孙北上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段祺瑞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他一面和张、冯在天津会晤，密谋成立政府；一面与盘踞在江苏、湖北等省的直系残存势力拉关系，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还企图依靠日本的支持，重新集结皖系势力。末后，在冯、张妥协和直系残存势力的拥戴下，他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在京就职，组成了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名义上“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10)]，实际上，是奉系军阀和国民军两大势力暂时妥协的产物，因此，段只能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外崇国信”[(11)]，表示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

既得利益，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截然相反。他又独断地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12]，和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性质完全不同。次年2月，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遭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抵制。孙中山怀着对段此举的极大愤慨病逝于北京。

段祺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极为仇视，诬为“赤化之祸”，鼓吹用孔孟的“道德仁义”，来对抗共产主义思想[13]。

1925年冬，国民军已靠拢到革命方面来，并趁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的时机，占领了天津。奉系和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以及于武汉再起的吴佩孚，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撮合下，连成一气，于1926年初向国民军展开进攻。日本等八国为阻止国民军在天津布防，帮助奉鲁军阀，炮轰大沽口，又发出蛮横通牒。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竟唆使卫队开枪射击，死伤至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4]。事后他反诬爱国群众是“暴徒”，通缉群众领袖，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

1926年4月，国民军放弃天津，退守北京。段及其党羽又图谋作奉军内应。但他的阴谋被国民军鹿钟麟所觉察，鹿遂派兵包围执政府。段仓皇逃入东交民巷。到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他又回执政府，通电复职，并向逼近北京的张作霖、吴佩孚乞怜告哀。但吴佩孚宿怨未消，随即命令京畿驻军监视他，并逮捕其党羽。他又企图联奉拒吴，奉张也没理他。于是，他自知已到穷途末路，难于再有所施展，延至20日，狼狈下台，逃往天津，从此做租界寓公，自号正道居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1933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迎段南下”，他即移居上海。1935年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职。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症转剧，在沪病故。

(1) 《段祺瑞呈报三代出身详细履历清册》（光绪三十三年），故宫军机处清册1668号。

(2) 《段祺瑞致内阁代奏电》（1月26日、2月5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173、179页。

(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件》上册，1955年版，第424—427页。

(4) 西原亀三：《梦の 七十余年》，1949年版，第170页。

(5) 《1917年美日拉拢中国参战密报》，《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6) 西原亀三：《梦の 七十余年》，第271—274页。

(7)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

(8) 龚古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1—49页。

(9) 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10)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东方杂志》第21卷第24号（1924年12月）。

(11) 《段执政就职宣言》，《时报》1924年11月25日。

(12) 《善后会议条例》，《政府公报》1925年1月7日。

(13) 《政府公报》1925年9月18日。

(14) 《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樊钟秀

胡金福

樊钟秀，字醒民，河南宝丰县人，生于1888年5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其父樊道隆是清末庠生，在农村教过私塾，当过医生。樊钟秀自幼随父耕读，喜欢看小说。十三岁到登封县少林寺拜恒林和尚为师，苦学三年拳棒，练就一身武功。

1912年，樊家为豫西土匪所迫，逃往陕西宜川县霍家沟开荒种地。但当时宜川一带也是土匪横行。1914年，风传占据“黄龙山”为王的土匪头子黄某要强娶樊钟秀的妹妹为妻。樊忍无可忍，伙同乡亲数人，杀死匪首黄某及其党羽，得长短快枪十余支，子弹数千发；樊钟秀受到陕北客户敬佩，被推组织武装自卫。但也因此引起当地官绅的敌视，谣传客户要造反。樊眼看父母弟妹在宜川住不下去，便将他们送回河南老家，自己只身返回陕北，聚众二百余人，以抗官匪、保地方为号召。他当众宣布三项禁令：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抢劫良民财物；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平等看待。从此，声势日渐壮大。

1915年，樊钟秀被陕西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兼陕北镇守使陈树藩收编，先后任骑兵连长、营长等职。1916年5月，陈树藩任陕西督军，在民党的压力下，宣布陕西独立。不久，袁世凯死，陈宣布撤销独立，并表示一切悉听北京政府处分[(1)]。因此引起关中民党公愤，纷纷表示“反段讨陈”。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陈树藩部民党高峻、郭坚、胡景翼、曹世英等，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先后树起“靖国军”旗帜，起兵讨陈。时樊率部驻扎西安西南之鱼化寨一带，在民党影响下，于1918年2月脱离陈树藩，至蓝田易帜归靖国军。3月，樊钟秀率所部抄小道突袭潼关陈树藩部，击溃其新兵一旅，得步枪数百支，子弹百万发，实力大增。后退至商县、雒

南（今洛南）一带整顿。

靖国军起义后，胡景翼、曹世英等先后派人赴粤，请孙中山派人入陕领导。同年6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入陕，被起义各军共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统领各军。樊钟秀受任靖国军第二路司令。樊率部离雒南进至蓝田，轻骑跃兵灞上，伏击东下之陈树藩军。旋又围攻刘镇华之镇嵩军于零口，转战临潼、渭南之间，截断陈军东路。后转师西进，攻占盩厔（今周至）等地。时段祺瑞调奉军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陈树藩及所谓八省援军对靖国军各路同时进攻。樊坚守盩厔五十三日，后因外无援军，内无粮草，于1919年1月13日突围退至凤翔。这时奉、直酝酿联合反对皖系段祺瑞，许兰洲对靖国军采取分化政策，靖国军也有“联许倒陈”之意。同年3月，樊征得于右任和张钫的同意，暂附奉许。樊部被许收编为第一支队，樊任司令。

1920年四五月间，直皖战云密布，许部向河南移动，以策应直军。樊钟秀率部随许回到豫西。樊回河南后，一面招选家乡子弟，扩充军额；一面托人向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代陈仰慕之忱。不久许师北调，樊部留豫，被编为豫督赵倜“宏威军”的一个团，驻防豫西。

1921年7月，湘鄂战争爆发，吴佩孚调宏威军“援鄂”，樊团与湘军激战于咸宁、岳阳等地。湘鄂战争结束，樊部调归河南后，扩编成旅，属河南暂编第一师，驻防豫东。

1922年4月，吴佩孚为阻止孙中山北伐，配合陈炯明颠覆广州政府，派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所部第一师及河南暂编第一师开往江西，樊旅驻防吉安。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回广州任海陆军大元帅，继续倡导北伐。这时樊旅已进驻赣州，密派李肖亭去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北伐时愿效前驱。同年4月，桂系军阀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吴佩孚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琢及樊钟秀部援沈。樊乃乘机由赣州向广东北江移动，秘密与孙中山取得联系。8

月，樊钟秀行至江西大庾时，通电就任孙中山委任的豫军讨贼军总司令职。接着击败方本仁，率部七千余人进入北江。恰在这时陈炯明叛军倾巢而出，企图夺取广州。樊受孙中山之命由北江驰援广州。樊军11月12日抵广州时，陈炯明叛军已占石龙、石滩等地，截断广九铁路，并由白云山瘦狗岭炮击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形势非常危急。樊部将士一下火车就投入激烈的战斗，迅速击溃进入郊区之敌，乘胜收复九龙车站，迫敌放弃石滩、石龙等地，败退惠州，使广州转危为安。孙中山在《勉樊钟秀讨贼电》中嘉许道："豫军讨贼军总司令樊钟秀，精诚爱国，首义赣南，诸部将官士卒，俱能深明大义，戮力同心，据览敷陈，至堪嘉许！"[(2)] 并命他整练部队，准备北伐。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樊钟秀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同年9月，江浙战起，孙中山一方面令许崇智等率粤、滇各军肃清东江；一方面令谭延闿、樊钟秀等率湘、豫各军取道江西北伐，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接着下令北伐军一律改称"建国军"，并委任樊钟秀为"建国豫军总司令"。11月，谭延闿至赣州后，因受方本仁和陈炯明夹击，退回广州。这时曹锟、吴佩孚已倒，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并应邀北上商讨时局。樊钟秀决定北返，号召地方武装听从孙中山的指挥，以增强北伐力量。12月，樊率部由赣经鄂入豫，长驱数千里，几经艰难险阻，到达潢川、商城一带。这时吴佩孚正逃匿于鸡公山。孙中山从北京向樊钟秀发出电令，命他派兵上山，"歼此渠魁"[(3)]，以免留为后患。但这时吴佩孚已经离山南逃。

樊钟秀回到河南以后，以孙中山命名的建国豫军为号召，地方团队、绿林豪杰纷纷携械来投，不过数月，发展到三四万人。时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兼省长，对樊部回豫极表欢迎，指定豫西南各县为樊部防地。

1925年二三月间，陕西督办刘镇华率憨玉琨部攻豫，胡景翼军迎击于巩县、偃师一带。樊钟秀部则由禹县、登封出洛水南岸，协助国

民二军侧击憨玉琨。憨军战败，樊部进驻洛阳。“胡憨之战”结束后，胡景翼病死，岳维峻接任国民第二军军长，出任豫督，收编河南境内的杂牌军，唯建国豫军例外。樊钟秀常说：“建国豫军是孙大元帅委派的，谁敢更换我的旗帜！”

1926年2月，吴佩孚和奉系军阀联合，分三路出兵河南，进攻国民二军，吴军相继攻占了开封、郑州等地，在陕县、灵宝一带将国民二军击溃，再次控制河南。樊率部退守豫西南山区。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9月攻克汉阳、汉口，追敌至武胜关，吴佩孚率残部退至信阳。早已与北伐军取得联系的樊钟秀部奋勇袭击，吴站不住脚，狼狈逃到郑州。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率部沿京汉线继续北伐，同时派人与樊钟秀联系，拟委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樊仍以孙中山命名的建国豫军为旗号，发动旧部参加北伐，6月，樊追击吴佩孚残部于南阳、邓县一带。

吴佩孚在河南失败以后，冯玉祥先后收编了吴的残部和刘镇华的镇嵩军，并派人与樊钟秀联络。蒋介石也派人来豫见樊，意在收编。樊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行为极为不满，对冯玉祥支持蒋介石也很不以为然，仍坚持建国豫军的旗帜不改。这样，他从各方面都得不到军饷和装备的接济，并不断与冯军摩擦。1928年冬，樊被迫通电下野，旅居上海。

1929年6月，孙中山的遗体由北平运往南京紫金山安葬时，寓居上海的樊钟秀因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通知，甚为愤慨，不邀而至，反蒋情绪溢于言表。时汪精卫等人秘密进行反蒋活动，樊曾与之联系。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正在酝酿发动反蒋大战之际，樊钟秀回到河南，召集旧部孙世贵等人重整队伍，曾被蒋介石收编的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亦自蚌埠率部来归。樊以孙世贵、任应岐为军长，自任总司令。4月，阎锡山、冯玉祥通电反蒋，派邓宝珊与樊连络。邓、樊相

见后一言而定，樊即宣言反蒋，设司令部于许昌。

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欲拉樊钟秀抄冯军后路，曾派张继到许昌见樊，并以重金收买，要樊让出许昌，以便蒋军通过平汉线直取郑州的冯军大本营。樊坚决拒绝，并印发告官兵书，历数蒋背叛革命的罪行，表示反蒋决心。5月25日下午，樊视察阵地返回司令部时，行至许昌南门外吊桥，适逢蒋军飞机低空侦察。随从人员劝他快步避入城门洞中，他反而立定桥头，仰首大骂。飞机恰在这时投弹，樊受重伤，当晚去世，遗体运到北平，葬于西山。

---

(1)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页。

(2)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4页。

(3)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第125页。

范光启

史全生

范光启，字鸿仙，笔名孤鸿，1882年6月20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五）出生于安徽合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范彦达，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回乡务农。范光启小时候常常听他父亲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入学读书后，即立志长大为贫苦人办事，每天早起晚睡，刻苦攻读，深受邻里称道。稍长，为生活所迫，辍学随父务农，然仍手不释书，笃学不倦。

20世纪初年，为反抗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统治，各地革命潮流风起云涌，范光启于1909年春毅然离家去上海，与章太炎、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人密切往还，加入了同盟会。5月，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他应邀参加，初时从事校对，不久即为主编及撰稿人。从此，范便以“孤鸿”为笔名，不断在报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激昂慷慨，“读之者无不激扬”[(1)]。由于《民呼日报》不断在报端揭露清朝官僚的腐败黑暗，被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等人指控。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将于右任拘捕，查封了报纸。范光启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并挺身入会审公廨对簿，自承文责，使于右任获赎释放。

10月3日，于右任、范光启等又在《民呼日报》的基础上创办《民吁日报》。这时于右任不能公开出面，由范光启任《民吁日报》社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

《民吁日报》创办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与沙皇俄国勾结，阴谋共同攫取我国的景齐铁路。10月下旬，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在访问俄国途中，窜到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26日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范光启等立即以此为题材，在《民吁日报》上掀起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高潮，对伊藤博文的来华和被刺，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报上著文说："汉族不幸，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铄诸夏，惧将倾覆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2)] 号召人们奋起革命。

《民吁日报》的揭发批判，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恼怒，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松冈以《民吁日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邦交"[(3)] 为词，向清政府上海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上海当局于11月19日查封了《民吁日报》，拘捕了范光启，经过几次审讯，判定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结案。

范光启等获释后，又与于右任积极筹办新的报刊。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办了《民立报》；于任社长，范为总理。范继续著文，为革命奔走呐喊。

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总结了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在长江流域筹谋起义，于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部，主持长江各省的革命运动。范光启参与了同盟会中部总部的创建工作，被举为总部候补文事部长和安徽分部的主持人。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来，范光启立即在《民立报》发表短评，热情歌颂，把辛亥这一年称之为"诞生革命之岁"，"诚有史以来所未有"，敦促清朝政府缴械投降。同时，他积极策划长江下游各省起义响应，先后参与安徽、上海、江苏的独立光复运动。上海、苏州光复以后，张勋率领清军江防营顽敌盘踞南京，严重威胁着苏州、上海的安全。为了巩固苏、沪，光复南京，范光启积极策动驻扎在南京城郊秣陵关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阵前起义。他对徐绍桢分析当时形势说："满清无道，百姓分崩，今义师奋起，海内响应，此天亡

之时。将军明德英才，总兹戎重，苟动枪鼓，扶义正伐，孰敢不从？以此诛钼　胡虏，匡济华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4]　并进而指出：今“张勋兵临阵前，倘不奋起杀敌，必然被他宰制。当今之时，只有召将士，众擎协力，击败江防军，才能顺人心，振士气，而为天下之倡”[5]。徐绍桢闻言大受鼓舞，立即动员士兵进攻雨花台江防营营地，终因缺乏弹械，败退镇江。

新军第九镇秣陵关起义失败以后，范光启继续奔走于上海、镇江之间，组织江浙联军，力谋光复南京；并以大义说服联军各将领，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使军事复振。徐绍桢在新败之余，得范光启和众人如此推重，十分感激，率领联军全体将士奋勇杀敌，终于击败张勋江防营顽敌，光复南京。

张勋刚退出南京，联军内部就出现一场权力之争。镇军司令林述庆首先入城，自恃功高，占驻两江总督衙门，遍贴布告，自称苏军都督。各友军对林颇为不满，公推徐绍桢为苏军都督，与之对抗，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范光启闻讯，即与宋教仁等奔赴南京，向联军各将领会商调解。后经多方协商，一致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林述庆为北伐军总司令，使联军内部避免了一场内讧。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党各领袖也都拥居高位，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继续进行中断了的南北谈判。范光启认为，清廷仍在，大局未定，不可轻敌，乃呈请孙中山允准，亲赴皖北招募民军。他计划招募四个整师，然后出师北伐，扫荡中原，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江淮少年热情报名，纷纷应征，不多时即募集五千余人，编为两个支队，号称铁血军，范被任为铁血军总司令。队伍随即开往南京，进行整训。就在这时，南北和议告成，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由袁世凯继任。范竭力反对，指出：“伪孽虽去，袁贼未枭，北庭诸将，各仗强兵，跨州连郡，人自为守，而无降心。今度一时之势，以安易危，共和之政，不三稔矣。”[6]然而势无可挽，范流涕叹息，慨然辞

去铁血军总司令职，将五千余人改编为民军第三十五步兵旅，由龚振鹏任旅长。他返回上海，复主《民立报》笔政兼总理之职。袁世凯曾多次征聘范光启北上任职，范均拒绝。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以后，为了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不断杀害革命党人，遣散民军队伍，并于1913年3月20日指使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在孙中山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范光启积极参加了这场反袁斗争。7月上旬，范光启回安徽策动反袁，邀约管鹏、郑芳荪、张汇韬、凌毅、袁家声等在正阳关举行军事会议，商讨组织讨袁军，因彼此意见不合未成。范回家，生了一场重病。病未愈，他就约同管鹏赴芜湖发动讨袁运动，以驻芜湖旅长龚振鹏名义宣布讨袁。各界公推范为安徽都督，管为民政长[7]，两人均辞而不就。范认为，皖督一职仍应由柏文蔚继任，以资号召。他一面命令龚振鹏潜师袭取颍州，北定淮上诸郡，一面发兵进攻大通，控制要隘。范发出通电，邀请被袁世凯免职而在南京赋闲的原安徽都督柏文蔚返任皖督主政，敦促被新任命为皖督的孙多森和被袁收买了的师长胡万泰认清形势，顺从大义，服从柏文蔚领导，共同讨袁。

7月下旬，柏文蔚回皖就职，范光启从芜湖赶赴安庆，协同柏文蔚并力进据淮上诸郡。这时，南京方面由于北洋军阀冯国璋部和张勋部大军压境，连战失利，黄兴出走。安徽亦受到倪嗣冲部的进攻，讨袁形势急剧变化。胡万泰叛投袁世凯，围攻安庆，逼迫柏文蔚交出范光启等人。范挺身而出，从容陈词道：“吾党知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义，使吾得遂横草之烈，幸也。”[8] 毅然驰马赴义，幸被人拦阻。

范光启潜至上海，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袁世凯四出通缉革命党人，悬赏十万元缉捕范光启。范在上海不能立足，便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孙中山在日本筹备组织中华革命党，范光启被列名为流亡日本的各省重要党人之一。

1914年2月，范光启接受孙中山指令，回上海联络革命力量发动反袁斗争。这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派遣爪牙四出活动，捕杀革命党人。范在嵩山路设立机关部，组织革命志士，积极准备进攻设在上海制造局的镇守使署，同时运动北洋军内一些同情革命的将士做内应。为筹集经费，他把自己珍藏的数千卷珍本图书悉数变卖，又典当衣服、被褥、首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奔走，终于准备就绪。不幸，范光启运动北洋军将士一举，已为郑汝成侦悉，郑收买四名凶手对范跟踪行刺。1914年3月20日凌晨4时许，正当范光启在嵩山路机关部寓所起草军书时，四名凶手闯入寓所将其刺死。孙中山在日本闻讯，极为痛悼，派员至上海致祭抚恤。1933年范被追赠为陆军上将，1936年移葬于中山陵东侧马群，为中山陵“附葬”。

---

(1) 刘文典：《范烈士鸿仙先生行状》，《学风》第5卷第10期。

(2) 《故陆军上将范烈士（光启）墓表》，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范鸿仙》，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时报》，1909年12月30日。

(4) 刘文典：《范烈士鸿仙先生行状》，《学风》第5卷第10期。

(5) 毛北屏：《范鸿仙与铁血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王气钟：《范鸿仙传》，《学风》第5卷第10期。

(7) 柏文蔚在《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中说芜湖各界公推管鹏为都督，范光启为民政长。管鹏在《安徽讨袁军始末》中记：范光启为都督，管鹏为民政长。管鹏为当事人，柏文蔚当时则闲居南京。故以管鹏之说为准。柏、管二文均见黄陆季主编《革命文献》第44辑《二次革命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年版，第268、276页。

(8) 《故陆军上将范烈士（光启）墓表》，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范鸿仙》，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范汉杰

夏军

范汉杰，名其迭，字汉杰，广东大埔县人，1896年10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生。其父范之准，曾与乡人倡办梓里公学，为全县首倡，任校长多年。其母邓氏，为印尼侨领邓本初长女。

范汉杰幼年随父就读于西翰轩（今仰文小学），稍长入梓里公学。1910年至广州，入优级师范附属理科学习；次年夏考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1913年毕业后，任广东陆军测量局三角课课员，曾在东江、广州及潮州一带从事测量工作。

1918年护法战争起，范汉杰任职于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翌年任福建漳厦公路测量队长。1920年冬任盐运使署缉私总稽九江缉私船管带，后调至江平舰任舰长。1923年曾任刘震寰桂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作战课长、第三路支队长、第六路司令等职。

1924年范汉杰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第四队，毕业后先后担任教导第一团第二营第五连排长、第二团副连长。1925年调任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少校参谋，旋又升为该师第一旅中校主任参谋。不久，随军回广州，参加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是年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范汉杰任该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并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南路的邓本殷。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范汉杰升任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为黄埔军校学生最早升为团长的三人之一。北伐鄂、赣期间，范汉杰率部参加汀泗桥战役和德安马迴岭战役。同年10月升任第十师副师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后宁汉分裂，第十一军军

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蒋光鼐等离汉出走，范汉杰亦去职离汉，转赴南京，深受蒋介石宠信，被派为浙江警备师师长，是为黄埔一期学生中最早升为师长者。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浙江警备师被改编，范汉杰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中将高参。不久，范被保送去日本考察政治、军事及经济；接着又转赴德国，在德国军事学校见习，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才回国。

1932年初，范汉杰任第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参加淞沪抗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嗣后，范汉杰随十九路军进驻福建，就任驻闽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次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等率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时将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范汉杰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范汉杰被蔡廷锴派往厦门，寻找第三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商洽和平改编事宜。由于范汉杰曾向蒋介石密报过十九路军军事部署，得到蒋之信任，事变平定后，被委为南昌行营中将高参。

1934年春，范汉杰被蒋介石派赴鲁、冀、察、绥、晋、陕、苏等省视察国防状况；后又奉派至庐山军官训练团，任第三期第一营第四连连长。1935年1月，范汉杰任第二师参谋长。翌年胡宗南的陆军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范汉杰经胡宗南推荐被任命为副军长，赴陕甘宁边区“剿共”。范与胡宗南共事甚为融洽。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胡宗南、范汉杰率第一军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11月，范率部撤至河南归德、开封、信阳等地。1938年4月，范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5月改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负责战时军事干部的培训。是年秋，改任第二十七军军长，下辖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师及预备第八师，率部在豫、晋一带与日军作战。其间，二十七军一度归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指挥，参加了对长治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作战。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范部与八路军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嗣后该军改隶第一战区蒋鼎文

指挥，转至太行山区进行游击战，军部设于山西陵川县安阳村。10月，范汉杰被任命为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但因在晋东南前线作战，未能前往就职。

1941年夏，日军为切断陇海干线，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范汉杰率部参战，配合卫立煌主力，在纵深五十公里的中条山区与日军激战，以阻日军南进，于5月中旬突围至河南。1942年1月，范调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驻三原，负封锁陕甘宁边区之责；6月升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周体仁第三军、杨德亮第四十二军、丁德隆第五十七军驻陇东平凉。1945年初，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范汉杰被调至第一战区任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同年3月，被授予陆军中将衔；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6年4月，蒋介石加紧部署全面内战，范汉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副主任，5月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6月调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兼任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主任，6月调往山东接任第一兵团司令官，率部进攻沂蒙山一带解放区。是年秋，兼任胶东兵团司令官，指挥整编第八、第九、第二十五、第五十四师及整编第五十七旅等，对胶东解放军发动“九月攻势”，凭借优势兵力攻占解放区十余座县城。但不久，范部第四十五、六十四师共一万二千余人被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山东兵团）歼灭于胶河以西之饮马、山阳庄地区。11至12月，解放军又相继发起胶（县）高（密）追击战和莱阳战役，再歼范部三万余人，范被解除第一兵团司令官职。

1948年1月，东北战局吃紧，蒋介石改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范汉杰被派任冀热辽边区司令长官，驻节秦皇岛。当时，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队被迫退守锦州、沈阳和长春。范汉杰与卫立煌格格不入，乃向蒋介石请假辞职，蒋不准，范回粤探亲一月后，飞返沈阳。7月，范奉命将驻锦州、山海关的国民党部队重

新整编成新八军和新五军；9月被蒋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担负确保北宁线的重任。

其时，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向锦州等地发起猛烈进攻，以六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及一个坦克营，将锦州包围。范汉杰部防线硝烟弥漫，四处告急。10月2日，蒋介石派机飞往锦州，向范汉杰空投一信，询问范是否能将军队撤至锦西，范汉杰复电表示坚守锦州，认为如能在锦州吸引住解放军的主力，以便从关内和沈阳抽两个兵团，则可与解放军作一决战。10月6日，锦州形势趋于危急，而准备从关内及沈阳抽调的两个兵团才刚刚集结，行动甚缓。范汉杰眼看锦州难以支撑，主张将部队撤至锦西再作打算，但遭卫立煌反对，未能实施。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个小时激战，全歼范汉杰部十万军队，锦州解放。范率残部突围出逃，16日在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的公路边上，与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一起被俘。

范汉杰被拘禁十二年，于1960年11月获特赦。1962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曾撰写了《锦州战役回忆》等文。1964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6年1月16日，范汉杰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粤风：《原国民党将领范汉杰先生简历》，广东大埔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大埔文史》第3辑，1985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沈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王瑞堂：《东北“剿总”副司令被俘记》，《纵横》1985年第11

期。

范绍增

陈章文

范绍增，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大竹人。1894年3月7日（清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一）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不爱读书，常到茶馆听说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整日在外游荡。1911年春四川保路同志军兴，大竹、渠县一带袍哥首领、同盟会员张作霖聚众而起，范随他们摇旗呐喊，受到张赏识，收为袍哥小兄弟，并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3年胡景伊任四川都督后，借口整编军队，勒令解散同盟会领导的民军，诛杀甚众，张作霖被迫率部为匪。范这时己任张的总管事。

1916年护国之役中，范绍增在张作霖率领下参加反袁战争。张在邻水一带活动时，不幸被亲袁的川军袭杀；范被公推为袍哥首领，率部继续进行反袁战争。1918年4月受滇川黔靖国联军援陕第二路总司令颜德基收编，任模范营营长，不久升为团长。

1920年10月，颜德基参加唐继尧发动的倒熊（克武）之战失败，范绍增改编在熊系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任团长，驻扎云阳。不久因受排挤不愿再干，听说驻夔府的第二军唐式遵部兵少械多，乘风雨之夜前往袭击，夺得一部分枪械，集结二千多人，活动于酉阳、黔江一带。

1923年3月，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援助杨森回四川。范绍增受杨收编，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1924年2月杨任四川省长后，又委范为第九混成旅旅长。次年10月，杨企图以武力统一四川，失败后下野离川，临行时将一部分人交范照看。1926年3月，杨森又受吴佩孚委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再由湖北回到万县，范率部来

归。9月北伐军进军武汉时，杨表示愿意参加北伐，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范绍增任该军第七师师长。10月杨森以援鄂为名，派范与北洋军合谋武汉，受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的痛击，范受伤回川。

范绍增出身袍哥，颇重江湖义气。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曾收留与他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王维舟在军中避难。是年底，杨森因范发展袍哥势力，不为己用，欲借口杀之，范得讯后于夜间潜乘汽艇逃命。旋在长寿约集杨部师长郭汝栋等，利用杨森因庇护吴佩孚受到蒋介石撤职处分的机会，通电讨杨。蒋乃任命郭汝栋为二十军军长，范绍增为川鄂边防军司令。不久范等讨杨失败，范部防地尽失，范转而依附刘湘，编属刘部第四师师长。

1931年2月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后，与刘湘争夺四川霸权。范绍增与刘文辉素有交往，刘文辉想收买他，一次就送了他五十万元。刘湘对他们的关系心存疑虑，范就对刘湘直言不讳地承认刘文辉送给他巨款的事，问刘湘如何处理。刘湘叫他把钱拿到上海去玩，范将钱在重庆修建一所华丽的范庄，并挟巨款到上海冶游。范在上海受到青帮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盛大欢迎，被破格收为弟子。从此四川袍哥与上海青帮互相勾结，在长江走私运毒，贩卖军火，无所不为。杜月笙送给范一个营的英国装备，以加强范的势力。

1937年何应钦去四川整军，刘湘借机改编范绍增的军队，免去范的师长职务，名义上升为第二十一军副军长，实际上不准到职。因此范对刘湘十分痛恨。抗日战争爆发后，范只身赶到上海前线指挥作战。上海沦陷后随军撤退到汉口。这时刘湘正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病，范受戴笠之托，负责监视刘湘与韩复榘的函电及代表联系情况，一一向戴报告。

1938年2月5日，范绍增任第八十八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他很快在四川合川编成四个团，以三个团编成新二十一师，一个团属军

补充团。武器破旧不堪，范找到老部下、某武器修理厂厂长李文彬修理，修理费半数以上是范自己拿出来的。他对官兵说；“过去打内战，都是害老百姓，这回抵抗日本侵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命也要同你们一起，把日本赶跑！”

1940年夏，范绍增部参加浙西一带作战，冬天又调太湖地区张渚一带担任防守。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敌伪二万多人进犯，在宜兴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1941年春节时，老百姓带上慰问品沿百余华里的防线慰劳范部。范在张渚各界劳军会上讲话说：“这回打日本人，我们虽然伤亡官兵一千多，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的口水！”

范绍增部打败日军后，顾祝同接见范，表示要扩编他的部队，后来扩编的命令迟迟未发表，只于1942年3月将范调任空头的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一气之下，回到重庆．

范绍增回到四川后，交游甚广，与张澜、熊克武、陈铭枢来往密切，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日益不满，思想上逐渐倾向反蒋。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找顾祝同要求把他原来的部队调去搞屯垦，顾示意还要准备与共产党打仗。范不愿打内战，旋去上海。他凭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借口为四川人办事，在上海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该社利用经商与中共地下党员联系，运销解放区的棉花，又将药物、纸张运往苏北解放区，打破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范还参加了一些掩护共产党人的活动，并在经济上资助过民盟。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当选为国大代表。选举副总统前，蒋介石召见范绍增等人，要他们联系一部分代表，支持孙科任副总统。范直说他们已经答应支持李宗仁，不好失信于朋友。蒋对范当面抗命非常恼火，不久又得知范和杨啸天等人进行不利于国民党的活动，立即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将范等逮捕。范得讯后逃脱。

1949年春范绍增回到重庆，看到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一面派人回大竹、渠县组织力量迎接解放，一面在重庆联络民革成员准备应变。八九月间战争重心开始转移到西南后，蒋介石坐镇重庆指挥，委任范为挺进军总司令，派特务杨良任副总司令，对范进行监视。范早有准备，躲开杨良，在大竹、渠县成立了八个纵队。12月，范在渠县通电起义。

解放后，范绍增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调任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978年3月5日，范绍增因病在郑州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范绍增：《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高兴亚：《冯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64年版。

范旭东

熊尚厚

范旭东名锐，字旭东，以字行，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湖南湘阴县人。其父范琛，以教书为业。范旭东六岁入塾，是年丧父，靠母亲做针线活糊口，家境贫寒。他的长兄范源濂1897年冬入长沙时务学堂读书，受梁启超思想影响，范旭东也受到熏陶。翌年春，他在范源濂帮助下也进时务学堂就读，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摈弃了“当时做官发财的旧套，立志要做救国救民的大事”[(1)]。

1900年秋，范旭东随其兄范源濂赴日留学，初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后考取东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1902年末，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在东京创办《游学译编》月刊，范参与编辑地理一栏；同时因学习费用受到梁启超的帮助，和康梁派颇接近，曾向梁主编的《清议报》投稿。1910年在东京都帝大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返回祖国。

1912年春，范旭东在天津制币局任总稽核，负责检验银元成色，两个月后辞职，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石墨坩锅制造厂。1913年7月，范源濂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经其兄推荐在农商部任职，不久被派往欧洲考察盐务。他在西欧兼考察化工制碱，但在比利时考察苏维尔制碱法时处处碰壁，参观英国卜内门公司也只让看了锅炉房。这次考察给他很大刺激，立志从制盐业着手，自己钻研创办化工制碱业。

1914年春范旭东回国，针对当时外盐输入及国内引岸[(2)]的垄断，向当局条陈改革盐政建议。3月，他根据《盐业特许条例》，与在北京办《盐政杂志》的景本白共同集资五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次年6月在塘沽设厂，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盐。1916年

8月久大正式投产，在天津设久大盐业总公司，上海设发行所，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不久，又有黎元洪等投资，资本扩大为一百万元，规模逐年增大，产量逐年上升。1918年秋增设第二、第三两厂，年产精盐三万担，获利丰厚。范旭东在工商界初露头角。以后，久大获得更大发展。

范旭东在创办制盐业的同时，即开始筹谋创办制碱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民族工业大量兴起，而一向依赖进口的酸、碱等产品奇缺。范旭东与景本白、盐务署长张弧、长芦盐运使李穆等人，于1916年7月筹办永利碱厂。翌年10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盐免税（此为中国盐政史上的首举），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厂。永利在塘沽设厂，资金四十万元，于天津设永利制碱公司，范任总经理。范从金城银行透支数十万元，派人在美国订购机器设备，企望引进技术。那时各国用盐制碱的技术都保守秘密，外国资本家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范旭东根据苏维尔制碱法自行装置一套小型设备，经过反复试验，仅制成了几公斤的产品。由于缺乏建造大厂设计所需的数据与资料，技术上未能完全解决，以至安装和设计一改再改，长期不能正常运转。范坚持不懈，不惜以高价购买机器和技术。由于耗用大量资金，引起部分股东不满，景本白甚至在董事会上对范弹劾，终以相持不下，景本白退出久大、永利。经过改组，久大、永利改董事会制为总经理负责制，范旭东以总经理掌管两公司全权。

范旭东在创办永利碱厂过程中，越来越认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断然以高薪聘请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Gilmer T．Lee）来厂指导，经过数年的钻研，终于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永利碱产量由日产五吨增至一百吨，质量也赶上了卜内门公司。在1928年美国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博览会上，永利碱品获奖，从而打开了国外的销路。1929年永利获利甚巨，资金积至五百万元。

永利公司的崛起，使英商卜内门公司十分嫉恨。他们千方百计企

图吞并永利，曾提出合办、技术协助、高价收买等要求，均为范旭东断然拒绝；他们又使用削价倾销和收买间谍打入永利等手段，也被范采取措施击破。当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前来中国要求会见范时，范避而不见，只让来人参观了永利的锅炉房了事。

1930年，范旭东又进一步扩建碱厂，新建日产三十吨的烧碱车间。1932年，设立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加强管理，扩充资金，又于南京、汉口、长沙、广州、香港分设营业机构，于芜湖、南昌、重庆增设经理处，在全国各地设三十一家特约分销处，并用赊销办法争取用户。这一年永利日产量增至九百余吨，职工近千人，次年获纯利二百万元。永利成了全国著名的制碱公司，范旭东与上海天原化工厂吴蕴初齐名，为全国最著名的化工资本家，时称“北范南吴”。

范旭东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早在1922年8月，他不顾重重困难，以久大实验室为基础，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国内私人企业的第一家化工研究机构。他聘博士孙颖川任社长，并先后将久大、永利两公司提给自己的“创办人酬劳金”全部移作科研经费。该社主要协助久大、永利进行技术研究，并调查和分析资源，试验长芦盐卤的利用；还研究轻重金属之于国防工业、肥料之于农作物、菌学之于农产制造，水溶性盐类之于化工医药等。该社科研设备完善，为久大、永利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也帮助国内一些工业部门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1928年9月，范创办了《海王》旬刊，时常刊布久大、永利和黄海的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科技界重视。

1934年3月，范旭东将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合组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添招股本二百万元，资本总额达一千一百万元，于上海设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同年10月，范获准硫酸产品三十年免税，并可发行公司债，五年内保息七厘。范获得这一奖掖后，在金融界通过周作民、吴鼎昌、陈光甫、徐新六、张嘉璈、钱新之等人帮助，发行了五百五十万元公司债券（以永利全部固定资产作抵押）；同时又自筹资金三百万元，合计八百五十万元，在南京北面六合县卸甲甸筹

办永利硫酸铔厂。范旭东与侯德榜吸取创办永利碱厂的经验教训，决定引进美国设备和技术，组织国内人力、物力施工安装配套设备。1937年2月建成投产，日产硫酸铔一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填补了国内化工工业一大空白，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新型的化肥，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硫酸铔厂。

范旭东的声誉日隆，除任金城银行董事、四行储蓄会监察、中华书局董事、全华化学工业社常务董事、中华造船厂董事、中国工业服务社社长、中研院评议员、中国化学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及南开大学校董等职外，还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但他热心于“实业救国”，全力倾注于自己的事业，无意做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京先后沦陷，久大、永利受到很大摧残，但范旭东坚决表示宁可工厂被炸毁，也决不屈身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与敌合作。由于范在事前已有内迁准备，先已派李烛尘在重庆设下了永利、久大华西办事处，永利公司各厂均得顺利撤迁。

1938年，范旭东赴汉口。途经香港时，拒绝了日本资本家和汉奸的引诱。到汉口后他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为迁川工厂联谊会发起人。是年秋，他进入四川，在华西建立新的化工基地，先后在自流井复建久大盐厂，在犍为县五通桥复建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于重庆设立永利铁工厂和全华酒精厂；同时还计划在湖南创办永利株洲厂。久大以自流井卤水炼制精盐及硼酸，长年运销湘西；永利在五通桥除碱厂外，尚有炼油厂、翻砂厂、机械厂、陶器厂、动力厂、煤矿、侯氏试验工厂及土木工程处、深井工程处等企业，总计工人一千二百余人，为战时民族工业规模最大的联合企业。此外，范还于1941年3月与金城银行合资一百万元创办中国化学企业公司，分别在重庆和五通桥设厂，制造食盐副产品和颜料；1943年6月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名义，与孙颖川等创设三一化学制品公司，资本额一百万元，在自贡设厂，从卤水中提炼氯化钾和硼酸。

范旭东在抗战期间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其“实业救国”的抱负而艰苦奋斗，但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却一再以援助为名，用贷款作诱饵，企图变贷款为官股，打入永利公司进行控制。1938年4月财政部拨款四十万元“帮助”建设株洲厂，不久财政部和经济部给“补助费”三百万元在五通桥建厂，1939年冬，中、中、交、农四行以“复兴化学工业专款”名义贷款二千万元，“协助”建立铔、焦两厂，但国民政府要求把这些“补助费”贷款变为官股，都为范旭东所拒绝。永利公司虽然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但在官僚资本压迫下负债甚重，加之战时机械设备的添置、更新及原料采购、市场销售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只能惨淡经营。

战时的范旭东，仍然十分重视科研与技术。他说：在工厂方面开支“必负责俭省，在学术方面，应多用几文”[(3)]，视科研技术为工业发展的“生命”。1938年，他派侯德榜等在美国纽约设一小型化验室研究联碱法，一年后迁香港继续实验。1941年11月，他亲自前往美国考察，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雇一美国人到四川传授技术。随后他将香港的小型化验室迁入四川扩大试验，设一联碱法试验中心，由侯德榜主持，前后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获得成功，成为驰名国际的侯氏制碱法，进入了世界化工技术先进行列。1944年初，联碱法工业性中间试验投产，深井勘探也发现了天然气和黑卤，辛勤科研结出了硕果。

1944年9月，范旭东赴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美商洽订了一系列技术设备进口合同，并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美元。但是国民政府因官僚资本不能插足而加以刁难，使他极为失望。

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曾对其姨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4)] 其后，与共产党人龚饮冰（化名龚再僧）结识，在重庆共同开办建业银行。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有志“担起创造中国化工新生命

的责任”，“为祖国争光”[5]。当他正准备派员分赴天津、南京接管久大、永利企业之际，突然患了急性肝炎，于10月4日病逝于重庆。

---

(1) 《范旭东先生及所经营的三大事业》，《新世界》1944年7月号。

(2) 古时制盐以引计（如清时淮盐大引为栈秤六百斤，小引为岸秤六百斤），引盐商认缴某一定地带的引税，而获得该地区专卖权，其地谓之引岸，亦称引地。辛亥革命后仍袭用。

(3) 《海王》旬刊第20年第17期（1948年3月）。

(4) 章执中：《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范旭东先生及所经营的三大事业》，《新世界》1944年7月号。

范源濂

熊尚厚

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县人，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父范琛以教书为业，范源濂少时在父亲亲自教导下课读。十五岁时父亲病故，只遗下几箱书，别无其他财产，家境贫寒，全家靠母亲做些针线活糊口，他和弟弟范旭东也做些杂活以添补家用。由于贫困所迫，范源濂愤世嫉俗，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十七岁时在舅父资助下，入清泉学校学习，两年后回到家乡任塾师。

1898年，范源濂辞去教职，至省城长沙，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的时务学堂学习。时梁启超任学堂总教习，范很快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拥护变法，成了梁启超的得意门徒。“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停办，他也被官厅追捕，遂与唐才常一起逃往上海，在唐的帮助下入南洋公学学习。1899年秋，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开办大同学校，继续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翌年范和蔡锷一起应梁函邀东渡。范源濂到东京先入大同学校补习日语，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不久，范参加了林述唐和蔡锷在东京创办的私人留学团体。同年秋，唐才常在汉口以自立军举义反清，范回长沙准备参加，不幸唐在汉口被捕，范在危急之时偕其弟范旭东潜去东京，随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学习。

1903年，范源濂与曹汝霖等在东京开办速成法政科和师范班，分别担任两校的译员。次年，他回到长沙倡导女青年赴日留学，得十二人同往东京入实践女校学习。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范回国为学部员外郎。同年北京法政学堂开办，他任学部主事佐理办学。次年与人在北京创办殖边学堂，有学生一百余人，授以蒙、藏语及殖边等学科。与此同时，还创办优级师范学堂。1909年6月，清政府以美国退还的庚予赔款设游美留学服务处，他代表学部担任会办。1911年2

月，清华学堂正式成立，范兼任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1]。在此期间他发起创办尚志学会。同年冬，范升为学部参事，参与制定学制和学校章程。

民国成立后，各种政党蜂起，群以通过议会进行政治活动，范源濂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会同梁启超在清末组成的秘密组织宪友会成员籍忠寅、黄远庸，联合京津各团体发起组织国民协进会，为袁世凯所用。1912年春南北和议时，孙中山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北上，范被袁世凯派为招待员，与蔡结谊。之后，范等筹组的国民协进会于3月在天津正式成立，未设会长，共推常务干事十八人，范任常务干事，随后将会址迁北京。5月，国民协进会与民社、国民公会、共和实进会等合组共和党，以黎元洪为党魁，范和汤化龙等任干事。翌年5月，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以梁启超、汤化龙为核心[2]。范紧跟梁及进步党，日后也是研究系的重要成员。

范源濂在清末民初政界有一定的地位，又是一位教育家。1912年1月蔡元培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范应邀出任教育部次长。蔡很看重他办教育的能力，说他很重视实践，重视普及教育，请他摒弃党派之见放手工作。范辅助蔡派员先接收了清廷的学部，然后制定颁布《普通教育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教科书编纂办法》及《学生学业成绩考查规程》等，厉行教育改革。由于蔡重视高等教育，范重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人在合作共事短短半年里办了很多实事。7月，他和蔡元培一起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商议重订学制。范在会上提出“发挥国民固有精神”和“提倡个人职业独立”[3]，强调工业教育和职业训练的重要。临时教育会议开会期间，因唐绍仪内阁垮台，蔡元培辞职，范遂代理教育总长。不久。陆徵祥组阁，范正式担任教育总长，一切萧规曹随，仍本与蔡元培共同制定的方针，逐步实施其教育计划，相继公布了《学制令》、《小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女子中学章程》（实行男女分校）、《中

学校施行规则》及《大学令》、《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时各省积极筹办学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竞出新教科书，教育事业颇有欣欣向荣之势。范源濂特别重视法政教育和师范教育，允许私人开办法政学校以及讲习所、养成所，使职业教育蔚然成风。本来属高等教育旁系的专门教育，一时成了高等教育的重心。1913年2月，范源濂因病辞去教育总长职，至天津养疴。

1913年秋，范源濂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前往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长。所任工作正符合他的教育实践志趣，乃积极为中华书局扩充编辑部，主持编辑初小、高小教科书，并编辑出版了《中华新学制中学教科书》和《中华师范教科书》。1915年，中华书局改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他与梁启超、唐绍仪等同为董事。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进步党逐渐为袁所抛弃；袁在复辟帝制时，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纷纷挂冠而去。一时全国反袁斗争风起云涌，梁与蔡锷联合西南势力反袁，范源濂站在梁启超一边共同反袁。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权，1916年7月，范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再次主持教育部工作。他为办好北京大学，于9月电邀在欧洲考察的蔡元培回国担任校长。10月，他修正国民学校令，恢复单轨学制，继续贯彻民元时与蔡共订的教育改革方针。1917年1月，范源濂兼代内务总长。是年春，在对德绝交问题上段、黎二人意见分歧，范和许世英一起反对黎元洪，支持段祺瑞的对德绝交。5月北京发生“公民团”请愿围攻议会事件，他被段派往劝说，“公民团”不肯离去，最后由军警加以驱散，事后范于6月请假。7月，段祺瑞借粉碎张勋复辟之机东山再起，重掌北京政权，范源濂重回教育部任职，直到11月30日辞职。1918年春，他赴欧洲考察教育，历时两年余。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徐世昌任总统，8月靳云鹏组阁，范源濂第三次出任教育总长。他仍本过去的教育方针，规定分年筹办义务教育，致力于普通教育。次年6月，北京国立八校为索取教育经费请愿，并酿成“六三事件”罢课，他和汪大燮出面调解使之复课。1921年

12月，靳云鹏内阁垮台，范亦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是月，他以实际教育调查社名义，邀请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来华调查教育，同蔡元培等七十余人召开教育讨论会三天，会后出版了《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之后，范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并因庚子赔款事转赴英国，在欧洲各国考察教育。

当范源濂在欧洲考察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2年11月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他被推为校长。192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后，师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回国。范于11月到任就职，对学校大力进行整顿。以“造就师范与中等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并研究专门学术”为宗旨[(4)]，提倡人格教育，主持修订学校组织大纲及各种规程，主张严格考试学生成绩，并多方筹措办学经费，还聘请吴承仕、陈垣、黄侃等知名学者任教，邀请梁启超、蒋百里、黄郛等名人兼任讲座。他自己每周给学生作一次报告，还经常到学生中去交谈，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为人刚正，作风廉洁，办公守时，有病也坚持上班；提倡教师以身作则，认为办教育的人要对国家教育事业做贡献，而不应该计较待遇多少，因为教育是一种清高神圣的事业。他把全部薪水都捐给了学校。在当时教育经费竭蹶的情况下，师大在其主持下很快改观，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教学设备不断添设，校园花木葱茏。1924年1月，孙宝琦组阁，邀请他再任教育总长，范表示要留在师大同师生共甘苦而加以推辞，从而获得了师大师生更大的敬佩。然而在当时内乱日亟，国是日非之时，教育经费短缺，经常发不出教职工的工薪，范源濂痛感自己力薄，无法挽救师大，于同年9月辞去师大校长之职[(5)]。

此后，范源濂先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长、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但仍心系北京师大。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中，师大学生范士荣惨遭杀害，范源濂特送一幅挽屏以示哀悼。

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病逝于天津。

(1)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1页。

(2)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48页。

(3) 《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1913年）“特别纪事”。

(4)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72页。

(5) 经容若：《记范静生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范筑先

姜克夫

范筑先，原名金标，字夺魁。1881年12月12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山东馆陶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九岁入私塾读书。十三岁父亲病故，辍学在家务农。壮年曾为脚夫，推独轮车为地主家运粮，来往于鲁西及冀南各县。

1904年卫河泛滥，范筑先无法谋生，适清廷扩编北洋军来鲁西招兵，范遂弃农到马厂投军，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当“备补兵”，不久升为“副兵”。由于他有一定文化，被选拔入第四镇随营学校学习，回队后升为正目。以后又选调到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深造，结业后回部队升为哨官。民国成立后，北洋陆军第四镇改为中央陆军第四师，范任炮兵连长，仍驻防马厂一带。

1913年“二次革命”后，杨善德率第四师进驻沪杭铁路沿线，范筑先在这个部队中逐步提升为炮兵营长、补充团团长、师参谋长、第八旅旅长等职。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第四师隶属于浙江督军卢永祥。孙传芳出兵抄袭了沪浙联军后路，卢永祥失败下野。孙传芳拟收编第四师，范拒绝收编，尽发军中公积金给士兵，将部队遣散，改名为“竹仙”隐居，后遂以“筑先”为名。

1927年冯玉祥配合北伐，师出潼关。范受冯部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范的同村人）的邀请参加西北军，任参赞。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范任张维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赞，协助张指挥本军与蒋介石所属何成濬第三军团激战于京汉路漯河、北舞渡一线。后阎、冯失败。张维玺率南路军六七万人集结在新郑，正待往陕甘退却，不料孙良诚

第二路军的梁冠英、吉鸿昌两个军被蒋收买倒戈，蒋介石军队通过梁、吉两军阵地，直插张维玺军后方，将张部包围缴械。张和范遂离军去天津。

1931年范筑先由张维玺介绍回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参议，并先后任沂水、临沂县县长。由于范为官清廉，断狱公平，为地方所称颂。1936年冬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我东北，范目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深为愤懑，积极寻找救亡图存道路。一度寄希望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但很快发现“乡建”并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正在苦闷徬徨之际，“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给范思想上很大震动。西安事变后，彭雪枫奉周恩来命到华北联络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共同抗日。1937年春，彭到了聊城，利用原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同学的关系，与范的亲信张维翰、牛连文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向范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与范建立了统战关系。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大批中共党员和抗日救亡团体成员流亡到济南。为了开展山东抗战局面，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以华北救国会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在济南收容平津流亡学生和当地爱国青年，开办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作动员民众准备。10月初，日军进入鲁境。范筑先希望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通过原在专署任职的共产党员选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学员二百四十名为政训服务员，到聊城开展工作。但当这批青年于16日傍晚到达聊城时，范筑先已接到了韩复榘要他率部向黄河南撤退的命令。他决定遵令撤退。当时有张承先、陈中民等四十二名服务员坚持要求留下抗战，范表示同意。发给他们枪支和生活费，于17日拂晓撤出了聊城。范在撤退途中目睹自己家乡遭受败兵抢劫，人民流离失所的凄惨景象，内心深为痛苦。经过跟随撤退的中共党员的争取，范决定暂停留齐河官庄一带观望形势。这时，南京统帅部命令宋哲元率第一集团军渡河配合

太原会战反攻邢台。范又返回聊城。

范筑先10月21日从官庄回师，一面命令政训处长张维翰和参谋长王金祥率政训处与专署人员回聊城安民，一面自率保安营追剿裹走服务员、抢劫聊城的溃兵齐子修部，在武城将齐部包围，收编为保安第三营。随后，范回到聊城，逐步恢复各县政权。同时在中共山东省委驻聊城代表张霖之和鲁西特委协助下，派政训干事率服务员去各县设立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办事处，作动员民众工作。

11月中旬，宋哲元军反攻邢台失利，经鲁西北南撤，日军跟踪追抵临清、馆陶，人心惶惶。韩复榘又令范筑先退守黄河南岸。范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于19日在博平韩官屯发出了“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拒绝了韩的乱命。

当年冬天，日军分别由临清、高唐向聊城进攻。范筑先亲率部队截击于梁水、柳林、南镇等地，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委派的旧县长纷纷拐款潜逃；CC派和乡建派的一些官僚、政客，携家带眷逃向黄河南，国民党统治顿告瓦解，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在此危急时期，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组建游击队；绿林武装乘机蜂起，打着义勇军旗号围攻地主围砦；地主民团为保护财产又纷起自卫。范筑先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把这些力量集聚在抗日旗帜下，收编为抗日游击支队。同时，委派坚决抗日的政训处驻县干事为县长和支队司令，以建设抗日政权和武装。

1938年春夏之交，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雏形。当年春，鲁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三次对濮县、范县的进攻，驱逐了堂邑、高唐的伪军。6月间，范筑先与率部东来的徐向前、宋任穷在威县会晤，达成了互相支援的协议。从此，范部获得了八路军的援助，不再是孤军抗战了。这时范的抗日武装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约计五万余人，控制了鲁西黄河两岸，建立起二十多个抗日县政权。

当年夏，日军溯长江西上，开始围攻武汉。范筑先积极执行武汉统帅部命令，亲率十几个游击支队，于8月13日和9月18日两度进攻济南，破击宁阳至德州的津浦铁路。范之次子、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8月28日于齐河坡赵庄之战牺牲。

正当鲁西北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也日益加剧。继韩复榘之后，沈鸿烈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设省政府于曹县，不断寻找借口，撤换范委派的进步青年县长。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未能支持范对沈的反动措施坚决予以抵制。徐州失守后，沈鸿烈把省政府迁到东阿。6月间日军陷东阿，沈败逃到黄河边，走投无路。共产党人从团结抗战出发，建议迎沈来黄河北。范亲率部渡河，在东阿黄庄打败日军，迎接沈来聊城。沈将省政府设于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交界的张秋镇。他凭借其省主席的地位，向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如要求范取消“游击司令”名义，要求改组政治部，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支队、政治干部学校等等，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沈成立以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为首的鲁西部队整编委员会，妄图将范的部队改编为省属保安旅，遭到范的拒绝。在公开要求碰壁后，沈通过他的参谋长廖安邦和李树椿施展阴谋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收买了王金祥，王背着范于10月初在鄄城解散了中共直南特委组建的游击队第十三支队，枪杀了中共党员十三支队副司令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中共鲁西特委为此提出抗议。范本已决定撤销王金祥的参谋长职务，但由于李树椿出面向范请求，范一时犹豫，准许王立功赎罪。

鲁西北地区经济落后，民智未开，有些土豪劣绅愚弄农民组织红枪会等封建迷信武装，名为防匪，实则背后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操纵。沈鸿烈和李树椿也利用这类组织，串通敌伪破坏抗战。8月上旬发生长清县旦镇黄沙会暴动，10月中旬发生阳谷七级镇“忠孝团”暴动。虽经范亲自去当地说服平息，但10月下旬长清赵官镇又发生了以邱作成为首的黄沙会大暴动。邱自称九县“剿共司令”，公开提出“打倒范筑

先，驱逐共产党”的口号，范派了四个支队进剿，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团结国共两党的力量坚持冀鲁两省敌后的抗战，派朱瑞来南宫，于9月23日举行冀鲁两省联席会议。会上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与山东沈鸿烈企图制造分裂，联合反共。范筑先义正词严地抨击了他们破坏抗战的滥言，表示欢迎八路军入鲁。他抛开沈、鹿，与徐向前签订了冀南、鲁西北两抗日根据地的联防协定。为了贯彻南宫会议精神，他回聊城后于10月4日召开军政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鲁西特委以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提出的《山东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作为今后鲁西北地区的施政准则。会上决定把三十多个支队整编为四个纵队，齐子修部编为第一纵队，范自兼第四纵队，另由袁仲贤、张维翰分任二、三纵队司令。

军政联席会议的成功，表明范筑先公开和国民党顽固派摊牌。沈鸿烈等气急败坏，竟不惜勾结日伪，准备对范下毒手。他们派兼任鲁西行辕参议的阳谷“忠孝团”总团长赵长衔去济南，与日本驻济南特务机关联系，商定了发动会道门暴动、配合日军进攻聊城的计划。赵回阳谷后，由李树椿亲自召开“忠孝团”团长会议，于11月中旬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掀起了数万人的“忠孝团”大暴动。他们阴谋请范筑先前往安乐镇对会徒作宣抚讲话，就地将范刺死。恰巧范由于部署军务，临时派曾任四区专员的韩多峰代他前去，结果韩替范挨了一枪，范侥幸免遭毒手。

差不多在寿、阳、阿会道门暴动的同时，驻济南日军末松师团派平田大队发动了对聊城的进攻，驻禹城、大名的敌人也配合进攻。11月13日下午，平田大队步、骑、炮兵三百余人从东阿鱼山渡过了黄河，由于沿途未遭到驻军的抵抗，14日上午九时即到达距聊城十八里的明王官屯。范正要出城指挥作战，李树椿突然坐汽车来到聊城，借口谈问题把范缠住。延至中午，敌机来聊城上空侦察。不一会儿，城外枪炮声大作，敌人已经来到。原来部署防守东关和运河渡口的王来

贤民军一路放弃阵地逃走了。王金祥趁机提出由他出城追赶部队，溜出了聊城。接着，李树椿也上汽车从北门溜走。这时已是下午三时，范要出城，四门已被敌军封锁。他不得不亲自指挥守城，以待黄昏后再设法突围。黄昏前，敌人对东、南两门猛烈攻击。由于范亲自指挥，守城部队勇敢抵抗，敌均被击退。但守军力量毕竟单薄，必须突围方可脱险。如城外有部队接应，突围还是有希望的。无奈范部的主力第二支队去东平扩军，特委的主力第十支队在汶上、宁阳协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均赶不回来；济南前线和黄河各口的十几个支队又被红枪会暴动所阻拦；鲁北驻军也被日军攻击；而堂邑、博平的两个支队系民团改编，不敢对日军开仗。王金祥出城后也不积极组织城外部队反攻。这样，破城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15日黎明，日军对聊城东门守军发起了猛攻，并以飞机沿城墙扫射。范筑先和姚第鸿率执法队亲自督战，范左臂负伤。上午九时东城门被炮火击毁，敌人蜂拥入城。范裹创退至市中心光岳楼，继续抵抗。但被日机扫射，打断腿骨。在抬送天主堂医院路上，范不愿被敌人俘获，勇敢地举枪自戕。随后守城部队陷入混乱状态，一部分部队散在城内和敌人巷战；大部分部队退聚西城门内瓮城，企图夺路突围不得，均跳河而死，无一人投降。至下午四时，敌人完全占领了聊城。范筑先和僚属张郁光、赵佩川、崔芳德、姚第鸿及守城军民七百人壮烈殉国。

主要参考资料

企程：《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8月13 日。

姜克夫：《我所知道的范筑先将军》，武汉《全民抗战》1938年8月27日。

李士钊：《范筑先将军血战聊城》，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

月11日。

姜克夫：《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地区》，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7月版。

齐鲁（燕铭）：《纪念鲁西北的大星——范筑先先生》，重庆《反攻》半月刊，1940年11月30日。

高衡：《鲁西北抗日英雄是谁谋杀的》，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

徐运北：《国民党如何破坏鲁西北根据地》，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3日。

张维翰：《回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鲁西北革命斗争回忆录》，聊城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1980年编印。

方鼎英

段荫南

方鼎英，字伯雄，号同春，　湖南新化县人，1888年4月7日（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生。父亲是一个以教书为业的穷秀才。方鼎英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龚氏勤俭抚孤，教子成材。他童年从其堂兄诵读四书五经，参加过童子试。时值甲午战败、庚子八国联军蹂躏之后，清政府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在民族觉醒思潮的影响下，方鼎英立志反清救国。他十三岁时冒称成年投考武备学堂，然以身体检查不合格而落选，随又考入实业学堂学习。1902年，湖南巡抚饬由各校选举学生五十名赴日本留学实业，方鼎英由实业学堂选送考试被录取，遂去日本东京。初入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兼补习普通学科。不久迁神田区，在新化同乡会事务所与陈天华同住。后由陈天华介绍加入同盟会，结识不少革命人士。

方鼎英觉得反清革命，须从武装入手，1905年考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在国府台野战炮兵第十六联队入伍，为士官候补生。1909年，复进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他又参加同盟会的小组“求知社”，与蔡锷、唐继尧、宋教仁等人为同志。

1911年春方鼎英毕业回国，被派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入伍生总队任炮兵教官。武昌起义，他约士官学校同学三十余人南下，在起义军炮兵司令部参加对汉阳作战。嗣后在湖南岳阳镇守府司令部任参谋处长兼教练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调陆军部任科员，负责编纂炮兵典范令和军学教程，编著有《炮兵操典》、《射击教范》和军士兵卒教科书等，以部令颁行全国。

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排斥国民党人，实行专制统治，方鼎英对

袁氏言行甚为不满。1913年10月，袁世凯将云南都督蔡锷调京，任以陆军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会办等职，实为羁留蔡锷于身边。蔡察觉袁之阴谋与野心后，暗中与朋友同道密谋倒袁， 方鼎英极表支持。蔡派石陶钧赴美国联络黄兴，筹措军饷，所有往来信件，均由方密转。

1916年6月袁死后，方鼎英于翌年春再次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普通科、高等科及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学习三年，又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潜心于军事学研究。

1921年春，方鼎英应湘督赵恒惕等人联名电邀回湘，被赵派任援鄂总指挥部参谋长，率部在赵李桥、羊楼洞击溃王占元主力孙传芳部。旋吴佩孚炮击援鄂军退路，迫使赵恒惕签城下之盟，方鼎英悻悻而返长沙。

1922年方鼎英由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派赴日本观看秋操，归途过沪晤谭延闿，告赵恒惕已经降吴，湘局非由广东方面来根本解决不可，劝谭随孙中山革命。1923年7月，孙中山任谭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出兵湖南讨赵。谭委宋鹤庚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宋未就职，委方鼎英全权代理。方赴衡阳晤谭后，率第一军各部转战于昭陵、朱亭之间，9月1日袭击长沙。11月下旬，陈炯明部围攻广州，并勾结江西军阀方本仁攻北江。谭延闿奉孙中山电令，即率所部驰解广州之围，讨赵之战遂中止。在部队南撤入粤途中，方鼎英率部狙击方本仁部，并收降了赣军第九旅高风桂部，受到孙中山的嘉奖， 正式受任湘军第一军军长兼代第一师师长。

1924年9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率在粤各军由江西北进，方鼎英卧病于广州，未随军出征。在北进途中，方本仁一退再退，诱谭军入吉安时突然反击，北伐军顿陷困境。方闻讯后扶病赶赴前方，在南康与谭延闿会晤。谭以兵败无颜回粤，加以部属不和，非常苦恼。方建议“整理”之策，乃成立“湘军整理处”，谭延闿

任总监，各军长任副总监， 方鼎英任副监。还另设讲武堂一所，以陈嘉佑为堂长，方鼎英兼任教育长，把编余军官都送讲武堂受训。经过一兵一枪的点验，编成七个团带一个营，军容整肃，焕然一新。

这时，方鼎英病体尚未复原，而所部第一师有枪五千余支、上万人，由宋鹤庚率领驻守湘粤边区汝城县。因与滇军不睦，处在滇军与赵恒惕军的夹击之下，进退两难， 迭派代表来请方鼎英前往领导。适值国民军第二军司令岳维峻自河南来电，约谭再度出师北伐，会师武汉， 共同解决北洋军阀余孽萧耀南。广州大本营乃委方鼎英为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由总参谋长方声涛函赵恒惕，请许方率部假道湘西赴鄂会师，并许诺把盘踞湘西的川军一起调去北伐， 交还湘西于赵。赵佯允方鼎英赴长沙面洽，俟方离开部队赴长沙之际，突派兵将方部解散。方星夜逃离长沙，潜往武汉。

1925年春，方鼎英在汉口养病，见报载奉军姜登选督皖、杨宇霆督苏，即到蚌埠晤姜，又到南京晤杨。方察知北方力量虽厚，但皆军阀习气，感到要革命，还是南走的好，乃应谭延闿之邀于9月至广州，出席国民革命军各军统一军事教育会议， 旋任谭延闿第二军之军官学校教育长。是年冬，各军军官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方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主持军官候补生教育。

1926年4月，已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 委方鼎英代理黄埔军校教育长， 并将学校全权交方代行。方利用其在军学界的地位，广揽军事教育人才，依靠共产党人， 积极进行校政建设，黄埔盛极一时。他编纂军事典范令及有关教材，使军官教育水平与学生接受能力大为提高。他编纂了不少文集，还主持编纂了《黄埔丛书》。他在军校的讲演，后来汇编成《方教育长言论集》出版。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政变。5月，留守广东的李济深、朱家骅、钱大钧等，把方鼎英邀去留守总部，向方出示清党密令， 并说黄埔是广州共产党的大本营 ， 责令方负责清除在黄埔的全

部共产党员。方力主“和平清党”，并要求假以时日。在李等允诺下，方回到黄埔， 与政治部主任共产党负责人熊雄恳切商谈，私下告知广州要逮捕共产党人，寻求应付事变的妥善办法。同时，还赠送路费，劝熊雄赶快离开广州。在方的主持和安排下，黄埔的共产党员师生以“自动请假”名义离校，三天之后黄埔才公开组织清党委员会办理清党事宜。方保护了一批革命力量，后来被周恩来称赞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但清党委员会的右派分子， 对黄埔学生滥捕滥杀， 并控告方鼎英庇护和放走共产党员，方愤然离职。

是年秋， 方鼎英改任暂编第十三军军长。翌年春， 蒋介石部署兵力讨伐张作霖，调方部往津浦线南段。方改任第四十六军军长， 5月兼津浦路运输总指挥。时济南惨案发生，蒋问计于谭延闿，谭又问方。方建议由外交途径解决，大军绕开济南北上。蒋命方接替贺耀组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与第二、第四军团沿津浦路并肩北上，击溃张宗昌、孙传芳与白宝山等部，进出于德州、沧州地区。

方鼎英对于“全国统一”满怀希望，曾向蒋介石建议，今后应加紧经济建设，不要再在国内用兵；对东北问题，希以和平方式解决，将来可以东北一个地区的力量战胜日本，则国威一立，不平等各约即可顺利废除。蒋表面不置可否，而把方调往江淮地区。此后，方鼎英被蒋介石拴在与各军事实力派混战的战车上，东奔西走。1929年3月，蒋桂战争前夕，方鼎英部被调到安庆待命，蒋召方到湖口的兵舰上，面授讨桂机宜。战后方部推进到沙市、监利一带。方躭心内战一起，将蹈北洋军阀混战之覆辙， 茫茫无了时，甚为惆怅。时不数月，方又奉蒋之命从鄂西调至扬州，解决安徽方振武的部队。嗣后又受命为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率部开往河南， 于临汝击溃宋哲元部，尾追至潼关，11月进驻洛阳。12月唐生智又在郑州发出讨蒋通电，方鼎英身临前敌， 但他想到自己身受孙中山教导，矢志革命救国，实不甘再作国内军事实力派混战的工具，遂化装离部避居上海。他希望蒋介石能有回心之意，共同实现和平统一建设国家的愿望。无奈接着发生了更大

规模的中原大战，之后蒋又坚持“安内攘外”的方针，对工农红军作战不止。方鼎英痛心疾首，对蒋介石完全失望。

“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方鼎英秘密组织了一个革命同志社，不久又和徐谦、朱蕴山联系组成抗日会， 广泛联合朝野各界人士，以团结抗日为宗旨。徐谦负责政治方面， 方负责军事方面，朱蕴山则负责与中共及有关社会团体的联系。原来追随邓演达的黄埔师生， 在邓牺牲后，也转而参加抗日会。抗日会秘密发行了《晨曦》、《怒潮》等刊物。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组建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方鼎英参与其事，被推专返湘西去组织湖南抗日政府，领导湖南的抗日运动，与粤、黔、桂诸省联合行动。方由广西赶到湘西时，由于与福建方面失去联系，加之计划泄漏，被蒋介石饬何键派的特务监视，不能行动。不久，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镇压而告失败， 方几经艰险经广西退到香港。此后，方继续在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日会改称抗日联合会，移到香港。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方鼎英由香港返回抗日前线， 积极请缨抗日，共赴国难，1938年9月，复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其后，出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方鼎英为国共重庆谈判所鼓舞，拥护“双十协定”所确定的和平建国方针。但是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方决心不与为伍，退居湖南，被推选为湖南省参议员，赋闲在家，他与李济深、章士钊取得联系，秘密从事反内战活动。在中共地下党员帮助下，他与唐生智合作发动湖南人民团结自救运动。同时，在湖南开展秘密活动，积极联系和推动军政界人士，策动他们认清大势走向光明，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方鼎英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政协湖南省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和湖南省副主任等职。1976年6月2日，方鼎英病逝于长沙。

主要参考资料

《方鼎英回忆录》（手稿）。

方鼎英：《方教育长言论集》，1927年9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行。

方鼎英：《黄埔军校“清党”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方椒伯

汪仁泽

方椒伯，名积蕃，浙江镇海人。生于1885年11月25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祖父方性斋，上海开埠后即来沪，由经商起家。其父方崇年，是清末举人。方椒伯六岁时入私塾就读，八岁丧父，十七岁时应科举考试未中。1903年，方到沪习商，后与叔父方樵苓共同经营祖传钱庄延康、五康等数家，并在北市创办庶康钱庄，又在家乡参加地方自治工作，经常往来沪甬两地。1905年，他集资在家乡创办培玉两等小学堂，自任校长；后又任宁波溪海公学校长及宁波教育参事会参事[(1)]。在此期间，沪地发生钱庄倒闭风潮，他所经营的钱庄相继歇业，又涉及讼事，损失至巨，成为他后来决心学习法律的契机。

辛亥革命期间，方椒伯参加“革命军饷征募队”、“中华民军协济会”，为民军协筹军饷。辛亥革命后，方椒伯一度当选为镇海参议会参议员。上海光复后，他进上海民国法律学校攻读法律，后转学至神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领得律师证书。但当时并未开业，复从事商业活动。1918年受北京东陆银行聘请，任该行上海分行经理。与此同时，方椒伯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兼商事公断处处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常务理事兼会务主任等，又与蒉延芳创办四明医院，任董事。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5月9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徇上海日本商会会长之请，用总商会名义发出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通电。由于违反民意，舆论大哗。方椒伯等发起组织上海各业同业公会及各地旅沪同乡会等七十余团体的“各公团联合会”。他被推为会长，发表措词激烈的通电，反对上海总商会违

反民意的主张，朱葆三、沈联芳被迫引咎辞职。方的名声遂闻于沪上各界[2]。

1920年，方椒伯参加筹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任董事，是年并任银行公会会董。1922年方椒伯与秦润卿等集资三十万元，创办大有余榨油厂，任董事长。次年在宁绍轮船公司股东大会上，被推为董事长，直至1936年。

方椒伯自1922年起，连任上海总商会两届副会长（每届二年），而前届的正会长宋汉章常因病休假，后届正会长虞洽卿又时往北京活动，因此实际会务常由方主持。在此期间曾发生多起事件：（一）1923年5月6日从津浦线北上的一列火车，在山东临城附近被孙美瑶匪帮劫持，车内中外旅客三百余人被绑为“肉票”，沪上遇险人员家属纷纷要求上海总商会设法营救。方主持组织了救护队，并派代表前往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当局与匪方谈判，促使全部被绑旅客安然脱险归来；（二） 内河航行要道吴淞江（苏州河）年久失浚，交通阻滞，地方当局因经费无着，欲委托外人代浚。方以国家主权攸关，于1924年发起组织吴淞江水利协会，任会长，召集沿江之宝山、嘉定、青浦、昆山、吴江、太仓、吴县、上海八县代表，自筹巨款疏浚；（三）1924年江浙两省军阀为争夺上海地盘，发生“齐卢之战”，继而奉军南下，全市骚动。他和总商会正会长多方奔走，并筹款遣散溃兵，以恢复秩序；（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一面急电在京的会长虞洽卿回沪主持会务，一面在工人学生代表及烈士家属的再三呼吁和强烈要求下，通告全市罢市。但事后即往工部局声明称：“由于被学生强迫，不得已在全面罢市之声明上签字，此举并非本意。”[3] 虞洽卿兼程回沪后，负责内外交涉事宜，方则办理救济罢工工人的劝募筹款工作[4]，此时他并任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第四届理事长。

由于方椒伯早年参加地方自治，后又在法律学校接受民主法治思想，因此在总商会副会长任内，多次领导上海工商界反对军阀统治，向北京政府抗争民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立意识和民治观。

1922年10月，发出由他起草的上海总商会通电，要求全国各金融企业一致拒绝为北京政府承募任何公债。11月又通电，吁请当局和各地军阀分期裁兵。12月通电各地商会，“请一致努力，检查裁兵、公开财政、速制国宪三项措施”。继之由总商会发起组织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公推宋汉章、方椒伯为正副会长。1923年1月，方又起草总商会通电，请各省银行、钱业公会转告各有关方面，不再承担募集政治借款。2月，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4月30日前公开财政。同月又电吴佩孚，劝其停止内战，不再干涉政治。7月总商会下设的民治委员会正式成立，会上方椒伯致词，谓“本会以民治为标帜，则政权自不容垄断于少数人之手，势必结合全国人民为一大团体，非此断不足以挽已倒之狂澜”[(5)]。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次日上海总商会等召开市民大会，并通电声讨。10日曹锟就职之日，他又联合百余团体发起组织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沿途散发传单，提出“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受贿议员），惩政客”等口号。

1922年起。方椒伯受傅筱庵所聘，就任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十六铺分行经理，辞去东陆银行职务。1932年他辞去通商分行经理后，开始执行开业律师业务，直至1948年，曾任多处厂商的法律顾问。他在执行律师业务中专办非讼案件，遇事常劝当事人相互退让，使之归于和解，因此从未出席法庭。此时他兼任复旦大学校董、中华职业教育社监理事、上海市商会执行监察委员、宁波通运长途汽车公司董事、上海渔市场商股常务理事等职。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后，上海租界难民麇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他任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经募救济金一千余万元。1939年傅筱庵投敌充任伪上海市长后曾多次强邀他出任市府秘书长等伪职，但都被他坚拒，并对傅予以忠告。抗战胜利后，他除执行律师业务外，还致力于经营大有余榨油厂及办理同乡会事务。1949年宁波在国民党军队溃退后，遭蒋机轰炸，损失颇重，他任同乡会劝募组长，与蒉延芳等募集巨款汇甬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起方椒伯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12月，他以古稀之年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委员[6]。1968年5月24日因病在沪逝世。

---

(1) 《方椒伯自传》："……溪海仅设两年而停办，培玉则办至1956年始由政府接办，主持该校达五十年，颇费心力。"（1956年12月10日手稿，现存民革上海市委档案室）

(2) 孙筹成：《我所知道的方椒伯》。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总字第241号。

(3) 黄逸峰：《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4) 引自当时《申报》。

(5) 《宁波旅沪同乡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卷117—4—660。

(6) 《方椒伯自传》："……当此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自应努力为群众谋福利，尽人民一分子的力量，椒年虽已迈，不敢后人，因此不辞老朽，参加民主党派，一致团结，以求前进。"

方声洞

范启龙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1886年6月（清光绪十二年五月）。他的父亲方家湜（字芝亭），是位经营运输货栈的商人，在汉口设有转运公司。由于他经常往来于京汉、粤汉铁路沿线各地，眼见清政府对内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而十分不满。他的开明思想对子女的影响颇深，他把自己的子女甚至媳妇都先后送进“洋学堂”读书，接着又陆续送去日本留学，他（她）们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1)]。

方声洞姿貌魁秀，体格壮健，信守诺言，爽直有气节，待人真诚，见朋友有错，能当面指出，又能急人之所急，热情帮助，因此受到大家的尊敬。他生活艰苦朴素，看不惯豪华奢侈，常步行外出，吃粗米饭，有人笑问时，他说：“劳则习苦，俭则不匮，吾辈忘吞逆胡，来日艰难，正未有艾，今而不自勖励，他日何能与士卒忍饥劳涉险阻乎？”[(2)] 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识。他对现实不满的思想不断发展。1902年，他随兄、姊东渡日本留学，进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当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后沙俄妄图霸占我国东北、不肯按照协议撤军的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非常愤慨，于1903年4月29日召开了“拒俄”大会，方声洞与兄方声涛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准备必要时出发抗俄。1904年，日本和沙俄为争夺在华权益，在我东北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方声洞因恨清廷庸懦，异常悲愤，逢人便大谈国事，认为不彻底推翻腐朽的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国人便没有安枕的日子。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建立同盟会，方声洞和哥哥方声涛、姊姊方君瑛及两位嫂嫂曾醒、郑萌[(3)] 都先后参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成为民主革命的勇敢战士。

不久，方声洞因母亲去世而回福州。他不忘革命事业，争取先作些开通社会风气的工作，便把家中所藏各种书籍、刊物统统拿出来，创办了一间书报阅览室，供人阅读。

1906年，方声洞再到日本，拟继续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但清政府害怕革命党人的活动，竟同日本政府交涉，禁止自费留学生学习陆军，此时成城学校也已改为普通中学了。他一度大失所望，但感到革命的志向不能变更，只要学会一种专长，对国家总会有所贡献，便考入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志在研求化学以制造炸弹[(4)]。

1907年暑假，方声洞至汉口探亲，与王颖订婚，次年暑假结婚。婚后十天，偕王颖东渡，同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介绍王颖也参加同盟会，并经常将国内政局和世界形势以及革命救国的道理讲给她听。1910年春，生下了儿子贤旭，方声洞对他非常珍爱。但方声洞对王颖往往无缘无故地说出“真对不起你”这样的话来，原来他早已下定献身革命的决心，随时准备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5)]。

方声洞一面在千叶学医，一面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同志们都拥戴他，选他担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代表、同乡会议事部长及归国代表、同盟会福建支部长等职务，“以一人而兼四职，其才望可想而知”[(6)]。他常常托词向学校请假，回国联络党人，秘密运送军火，往返奔波，非常辛劳。

1911年初，同盟会准备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闽省旅日同盟会员最初决定由林文等人去参加广州起义，林觉民等人回福建准备响应，留下方声洞在日本接替林文的工作。声洞对同志们说：“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已学医几年，相信有些心得，起义发动后，不能够没有军医。何况我早已立志献身革命，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怎么可以不让我参加呢？如果事败不成，你们都为国牺牲，我还能单独活下去吗？”同志们劝说他不要误会，因为大家若同归于尽，不考虑后继的人，会对革命不利。经过再三解释，方声洞才悻悻然与大家挥泪

而别[7]。

方声洞即将于这年7月毕业。由于香港不断传来准备起义的消息，他便放弃功课，日夜为广州起义的筹备事宜操劳。他写信给友人说："警电纷至，中国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党此举耳。"[8]

3月中旬，方声洞忽然接到吴永珊（玉章）来电，便立即赶去东京会面。第二天回家告诉王颖说，起义即将发动，因军火不足，须马上密运一批回国接济，并且很沉着地对她说，两周以内一定回来。他在动身前夕，预先写好了十几封家信，嘱咐王颖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回，以使家中安心，免生疑虑。临行前，方声洞又向学校办了请假手续，并辞去同乡会议事部长等职务，于3月28日先把军火运到横滨港，31日乘船离开日本。告别时，他微笑着对好友郑烈说："昔年秘密开会，追悼吴樾、徐锡麟诸烈士时，君所撰祭文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衔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9] 抵达香港，见同志甚多，姊姊方君瑛、哥哥方声涛也参与协助密运军火入广州，非常高兴[10]。

方声洞胜利完成密运军火的任务后，不顾先来香港从事准备工作的姊姊方君瑛和闽籍同志的劝阻，决心参加起义壮举。4月25日晚上，方声洞在香港写绝命书给侄儿和生，希望他为祖国尽力，并担起照料诸弟妹、善事祖父的责任。第二天清晨到达广州后，又匆促留书给父亲和王颖。对父亲说："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保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给妻子的信里则说："来港时，已决志捐躯于沙场，为祖国报仇，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11]

4月27日（即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举义的螺角呜

鸣齐鸣，方声洞在黄兴率领下荷枪实弹猛攻督署，遍搜总督张鸣岐等不见，知道张等早已逃匿。他马上和黄兴等十多人离开督署，出大南门，打算和防营接应，转攻督练公所。黄兴与方声洞走在最前面，至双门底遇见起义的防营数百人，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臂缠预先相约的白布符号，以致发生了双方互射；方声洞竟在这种不幸的误会中中弹倒地，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六岁。后与其他起义烈士合葬于黄花岗。

---

(1) 据方声洞之子方贤旭1981年6月13日来信；并据方声洞之继母访问记录。

(2) 郑烈（天啸生）：《黄花岗福建十杰纪实》，新中国图书局1913年再版。

(3) 据方声洞继母的口述，方声洞共有四个兄弟，七个姊妹。曾醒是大哥方声濂的夫人，郑萌是二哥方声涛的夫人，方声洞居三，他的弟弟方声钟已在美国定居。

(4) 吴适、林家泩：《黄花岗纪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5) 王颖：《忆声洞》，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6) 吴适、林家泩：《黄花岗纪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7) 朱执信、邹鲁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1923年版。

(8) 郑烈（天啸生）：《黄花岗福建十杰纪实》，新中国图书局1913年再版。

(9) 朱执信、邹鲁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1923年版。

(10) 方贤旭：《黄花英烈，光照千秋——纪念先父方声洞殉国七十周年》，《人民日报》1981年3月29日第三版。

(11) 据方声洞烈士遗墨影印照片，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方声涛

陈孝华

方声涛，字韵松，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85年8月15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六）生。其父方家湜经营运输货栈，在汉口设转运公司，时常往来京广各地，思想比较开明，陆续把子女送往日本留学[(1)]。方声涛自幼读书习武，少年时曾习海军于天津，1902年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1903年，留日学生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方声涛热心参加，并负责教练军事。

1904年方声涛回国与郑孟勤结婚。其间曾受聘到侯官高等小学堂任教，对学生以革命相淬砺。之后，方声涛偕郑孟勤再东渡日本。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方声涛与妻郑孟勤、弟方声洞、姐方君瑛、嫂曾醒均次第加入。12月，方声涛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骑兵科学习，与李烈钧、唐继尧等过从甚密。

1907年5月，方声涛毕业于士官学校，回国后先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任教习，因暗中发展同盟会员，引起当局怀疑，被迫离去。1909年到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教习，次年改任广西兵备处帮办，并兼学兵营管带，罗致青年，灌输革命思想。

1911年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准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时方声涛正在广西训练新军，密谋约期响应，未果。广州起义失败后，方声涛几为广西巡抚沈秉堃所陷，后经按察使王芝祥庇护，受免职处分[(2)]，离开广西。随后到四川成都，任新军第十七镇正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方声涛参与了成都独立活动。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方声涛应黄兴电邀，前往赞襄军政，于途

中发病，遂去上海养病[3]。

同年，李烈钧任江西都督，方声涛被任命为江西混成旅旅长，驻九江。次年3月，袁世凯密谋杀害了宋教仁，6月又下令免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三都督职，方声涛亦因之离赣抵沪。7月初，方声涛随李烈钧到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李烈钧就任总司令，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部与北洋军苦战于湖口。终因众寡悬殊，援助断绝，25日湖口被袁军攻陷。方声涛率部退守吴城，又遭袭击，被迫向广信方面退却，转到仙霞关，图入闽整军再战，为福建都督孙道仁所拒，部队瓦解，方声涛脱险到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遂流亡日本，在东京与一些原同盟会员策划反袁活动[4]。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方声涛是最早到云南密谋举事反袁的人[5]，他自日本经上海、香港、越南于9月间到达昆明，利用与唐继尧等云南军人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进行策动工作，秘密会商讨袁。11月初返回上海，与海外归来的反袁人士联络。12月中旬，方又潜抵昆明。在此先后，李烈钧、蔡锷等也抵昆明，于12月25日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向四川、两广、贵州三路出兵讨袁，方声涛任第二军第二梯团团长。1916年2月，方声涛率第二梯团从昆明出发，3月初抵广南。这时袁世凯派龙觐光率兵经广西进入滇境，方声涛率部于广南附近抗击。由于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并潜师围攻百色一带龙觐光军，歼灭了滇桂边的龙部，方声涛梯团即顺利进入广西。方率部经西林、凌云直下百色，接着乘船到南宁，5月抵广东肇庆；然后经三水沿粤汉路北上，向芦苞、清远、琶江口推进，与龙济光部相持于花城、从化一带达两个多月。后云南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方声涛任第四师师长，辖朱培德第七旅、伍毓瑞第八旅，驻扎广州市区。由于广东为桂系陆荣廷所统治，方声涛的滇军第四师备受排斥。

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闹复辟，方声涛与李烈钧等通电宣布愿率军往讨。旋段祺瑞重新上台，孙中山南下护法，方声涛所率的驻粤

滇军成为护法的一支力量。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方声涛派军队在码头布置警卫，迎接孙中山。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方声涛任元帅府卫戍司令。

同年11月，南方护法政府组织征闽陆海联军，李烈钧任靖国军征闽总指挥，以方声涛代理。1918年5月，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向福建北洋军发起进攻后，方声涛从广州到汕头，率靖国军向福建诏安方面出动。方声涛还利用张贞在福建的社会关系，联络许卓然、秦望山等，收编闽南一带民军，组织福建靖国军，活动于泉属各地。是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驻在漳州等地，同福建靖国军在收编民军问题上冲突甚烈；又由于靖国军内部斗争，杜起云部叛变，1919年底，方声涛只得离开仙游去上海[6]。翌年8月，福建靖国军在陈炯明和李厚基夹击下失败，李厚基重新统治福建全境。在这以后，方声涛、黄展云与张贞等十余人在上海组织福建自治会，鼓吹福建“地方自治”，号召驱逐李厚基，并派人潜回福建，组织自治军[7]。1924年春，方声涛回福建联络各地民军，在大田成立闽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9月，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设大本营筹划北伐，方声涛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赣，方声涛到上海，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商定响应北伐。后何应钦的东路军进占福建，方声涛于12月15日抵福州。翌年1月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成立，先是何应钦任代主席，何率东路军向浙江进发后，由方声涛代主席。方声涛主持下的临时政治会议，经常袒护国民党右派。4月3日，福州一伙右派举行“拥蒋护党大会”，方声涛批给经费，派人参加，予以支持。方曾对其僚属表示“必须诚心诚意，听从介公指导”[8]。7月初，福建省政府成立，杨树庄任主席，方声涛任省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由于各地土著军阀割据，政令几乎不能下达于省会之外，杨树庄愤而赴沪。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方声涛代理省政府主席。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进驻福州。方声涛通过十一军驱逐了谭曙卿，遣散新编军，企图统一政令。与此同时，方声涛把陈国辉等部民军收编为福

建省防军，让其驻在闽西镇压工农运动，以巩固自己在福建的实力地位。翌年二三月间，张贞率部从南京开回福建，方声涛为了拉拢张部作为自己统治福建的支柱，便让张贞控制了漳、泉、永等地的军政大权。

方声涛就任福建省政府代主席后不久，发生了枪杀国民党中央党务指导员谢瘦秋案，受到了指斥；同时，卢兴邦等地方军阀依然盘踞一方，全省财政也无法统一。方声涛遭到各方攻击，被迫于1928年5月提出辞职[(9)]。9月，福建省政府改组，方声涛挂名省府委员。

1930年1月6日，卢兴邦在福州扣押福建省政府六名委员，酿成轰动一时的“绑架六委”事件。久居上海的方声涛被国民政府委以福建军事特派员名义前往泉州。8月，刘和鼎部和卢兴邦部爆发战争，方声涛即率部从永春、德化袭击卢部。他运动卢部团长钱玉光刺杀卢的旅长陈荣标，卢部迅速崩溃，被押“六委”于10月获释，一场政治风波才告平息。事后，国民政府委任方声涛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处长，代理省政府主席。在1931年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方声涛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组成东路军举行东征，向闽西南进军，20日解放漳州，威震全省。当时正在南京谋改组省政府的方声涛，闻讯后急忙返闽。他前往同安设立行营[(10)]，招抚被红军击溃的各地民军余部，以及零星散匪，冀图与红军顽抗。

6月，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在泉州登陆。由于陈铭枢、蒋光鼐等与方声涛颇有历史渊源，方令陈国辉部让出大部分驻地给十九路军。当蒋光鼐要改组福建省政府时，邀请方声涛为省府委员。方声涛认为十九路军志在打倒蒋介石，不会长久驻闽，一心希望他们发动讨蒋后，仍能把福建政权交给他，因此表示乐与合作[(11)]。但是，十九路军入闽不久即着手消灭霸踞各地的民军，而且首先解决闽南地区实力最大的陈国辉部；12月，十九路军改组福建省政府，蒋光鼐任省政府

主席，结束了杨树庄、方声涛延续五年多的“闽人治闽”局面。至此，方声涛不得不离开福建，同杨树庄一起去“虔修佛法”了。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在汉口请教方声涛，并在出兵攻闽时，指派方声涛为行营军事特派员、福建省党务审核委员会委员。不久，福建事变失败，南京国民政府将所有任命的民军司令、军事特派员、党务审核委员会等取消，方声涛也随之赋闲。

1934年6月1日方声涛在上海寓所病故[12]。

---

(1) 方贤旭：《辛亥英豪，万古留芳》，《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2日。

(2) 严骥：《方声涛先生传略》，福建私立光复中学编《福建辛亥光复史料》，建国出版社1940年版。

(3) 严骥：《方声涛先生传略》。

(4)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5)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2页。

(6) 许显时：《福建地方派系的倾轧与“一六事件”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6页。

(7) 秦望山：《我与自治军及讨贼军的关系》（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7辑，1962年版，第2页。

(8) 严骥：《方声涛先生传略》。

(9) 《民钟报》1928年5月29日。

(10) 福州《民国日报》1932年5月26日。

(11) 秦望山：《陈国辉暨旧部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2页。

(12) 严骥：《方声涛先生传略》。

方液仙

任嘉尧

方液仙，字传沆，小名阿揆，浙江镇海柏墅人，1893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上海。方家世代经商，在沪杭甬及南浔等地经营钱庄、典当、银楼、糖行、南货店、药材店等，仅开设的钱庄就有“九裕”（安裕、赓裕、敦裕、承裕等）、“十三康”（安康、瑞康、益康等）计二十二家之多[(1)]，并拥有大量土地。其父方选青因不善经商，家道逐渐中落。

方液仙少年时，初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中西书院读书。拜德国人窦伯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L．W．Dupre）为师，学习化学，同学有吴蕴初（后来经营天厨味精厂）、李润田（后来主持鉴臣香料厂）。方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寓所设立化学实验室，继续钻研。早年曾与友人合资开办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以及硫酸厂、橡胶厂等，大都是国人首创的企业，但均因经营不善，产品销路滞塞而中辍。

辛亥革命那年，方液仙才十九岁，他在上海独资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下称中化社），资金一万元，小量生产牙粉、雪花膏等日用品，雇人挑货郎担上街叫卖，初时颇多亏损。

五四运动激励人民的爱国思想，共谋抵制洋货，振兴国货。中化社产品的销路从此打开。1920年，其叔父方季扬（钱庄资本家）见中化社有利可图，乃参加投资，总资本增加到五万元。中化社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在河南路设总公司，延聘胡士浩为经理，于广东路设发行所。初在重庆路租屋三间作为工场，后购置槟榔路（今安远路）地基建立厂房，即后来的第一厂，制造化妆品及“三星”牙膏。1923年续

建第二厂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专门制造调味粉（“观音粉”、“味生”、“味母”）及酱油精（“三星牌”）。与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逐渐将日本货“味之素”挤出中国市场。

1928年，方液仙于槟榔路再建第三厂[(2)]，专门制造“三星蚊香”，附带生产淀粉、酱色等。为了解决蚊香主要原料除虫菊的自给（本来用日货），方在浙江余杭瓶窑镇及上海北新泾安浪渡设农场试种，聘留日农学专家俞诚如主其事。试种除虫菊成功后，又在浙江临平、温州和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农村推广种植，解决了蚊香主要原料的供应。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三星蚊香”颇受欢迎，一向独占中国市场的日货“野猪牌蚊香”终于败北。

1931年，中化社增资到四十万元；1935年，再次增资到一百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方季扬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以表弟李祖范为经理。1938年，中化社增资到二百万元。

到了1939年，中化社又在第一厂附近建立第四厂。这是中化社设备最新、规模较大的一个分厂，制造箭刀牌肥皂。后来还制造甘油、薄荷素油、十二醇硫酸钠、山梨醇等原料，并设立了成品仓库。在此期间，方液仙投资兴办了一批直接为中化社服务的工厂。有生产玻璃瓶的晶明玻璃厂，生产牙膏软管的中国制管厂等。至此，中化社产品大致齐备，原材料基本自给，经营管理有所改善，生产成本相应降低，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旧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工厂。

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社设总管理处，董事长由总经理方液仙兼，经理李祖范。下设六部三室九科，职员多达二百多人，而工人不过四百多人。在国内各大都市设立了发行所，南洋各地则设有专职推销员[(3)]。

方液仙是化学技术里手，自己懂得分析化验，改良产品，不断钻研创新。在技术制造及管理制度方面不故步自封，曾经数度派人去美

国、日本考察，引进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学会不少管理及技术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重视培养。如王修荫、孙瑞耕、黄劼英原来文化程度都不高，后来被培养成为总化学师、副厂长、技术室主任。他在经营方法上，对大批发商采取分级累进的经销特约制：一年销货一万元以上的，给以百分之三的酬劳；二万以上的百分之四；三万元以上的百分之五。这样鼓励多销多得，利之所在，批发商甘于效劳。对职工薪给采取低薪、分红制，月薪较低，年终分红数额较大。这个制度，资方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可将花红暂作周转资金，有利于扩大再生产。

方液仙在经营中化社的同时，还主持中国国货公司，“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中化社总务科李康年向厂方建议，集合部分国货工厂筹办联合商场。方遂委李康年主持其事，由中化社联络美亚织绸厂等九家较大的工厂，选出十八种商品，在南京东路绮华公司原址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在1932年“九一八”周年纪日开幕。由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以及国货商品本身的质量能与日货抗衡，国货商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方液仙乃萌发创办中国国货公司之志，由中国化学工业社、亚美织绸厂、五和织造厂、鸿新布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等几家大工厂，筹集资本十万元，于1933年2月，在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开设中国国货公司。由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为经理。他们对经销厂商货物采取寄售方式，每月25日结帐，月底付款，一般开的是五天期票。这样，经常的流动资金周转增多了。因为国货公司商品众多，服务周到，广告宣传有方，又采取薄利多销、商品寄售等方式，有利于供需双方。加之人心向往抗日救国，绝大多数人把买用国货作为爱国行动，所以营业鼎盛。甚至促使当时一向经售舶来品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也不得不销售国货商品，以应顾客需要。半年后，国货公司又增资十万元，并扩充二楼南部商场，营业获得不断发展[(4)]。

联合创办国货公司的各厂商，为了进一步向外地扩展业务，于

1937年5月推方液仙和吴鼎昌、蔡声白、吴蕴初、王志莘、王性尧等为创办人，又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联营公司集中原中华产销协会会员厂商的货物，向外地推销，在国内各大城市先后设立中国国货公司，对发展弱小的民族工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5]。

方液仙主持的中化社及国货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对决心独占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心腹之患，也是对华经济侵略的绊脚石；再加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全民抗战时，方液仙先后在厂内及胶州路“申园”，办了两次伤兵医院（后一次由著名外科医生倪葆春主持），也深为日本侵略者所忌恨[6]。于是，威胁利诱纷至沓来，有来谈“合作”的，有来商议租用出让机器设备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汪精卫傀儡政府袍笏登场前夕，大汉奸陈公博派傅筱庵前来游说方液仙，希望他与伪政府合作。说什么“日本人知道你很关心政治，记得你在战争中还办过两次伤兵医院，因此很器重你”，并以伪实业部长相许。方当即严正拒绝：“我是开厂做生意的，当不来大官。”[7]他并规劝傅还是继续搞实业的好，不要和汉奸们同流合污，否则将身败名裂。日伪见引诱不成，转而加强威胁。一时来自敌伪的恐吓信、警告信日有数起，方不为所动。

1940年夏，孤岛上海局势日益混乱，恐怖气氛日甚一日，方液仙深居简出。7月25日，方因蛰居多时，耳目闭塞，打算去附近几个工厂看看，便于上午9时从星加坡路寓所驱车外出。甫出门，就遭埋伏在附近的四名暴徒突然袭击，先打坏汽车轮胎，枪伤保镖一人，再打伤了方，又把方强行挟持到预先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向越界筑路方向仓皇驶去。事发后，方氏家属起初当作强盗绑票，要勒索一笔巨款，过了好几天，仍然音讯全无，下落不明[8]。直到该帮匪徒因犯他案被捕受审时，才明白这是日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害案[9]。

1992年12月，其女方之雄、子方曾泽、方曾规编纂《爱国实业家方液仙》一书，纪念方液仙百岁诞辰（1893—1993），期能激励国人爱国之心。

(1) 据原中化社襄理林汝康口述。

(2) 中化三厂设在租界越界筑路地段。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后，设在越界筑路地段的三厂，租界当局力量达不到，方液仙将中化厂向美国注册，挂上“美商美联实业公司”的招牌，以保护产权。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挂过“美商”招牌的中化社被敌伪军管。

(3) 据原中化社经理李祖范、襄理林汝康口述。

(4) 据原中国国货公司会计主任叶子渐口述。

(5) 据叶子渐及原国货联营公司周锡洪口述。

(6) 据李祖范撰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初稿）。

(7) 据方液仙爱人钱彬英及其子方曾泽、女方之雄口述。

(8) 据方液仙爱人钱彬英及其子方曾泽、女方之雄口述。

(9) 李祖范：《中国化学工业社简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2辑（总第3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方振武

颜平

方振武，原名运策，字叔平，安徽寿县人，1885年2月26日（清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生。祖辈世代务农，父亲方椿良在本镇兼授私塾，继开小油坊，但贫困难以度日，方振武少年时要靠挑水到镇上去挣点小钱。方振武个性倔强好斗，爱打抱不平，因得罪富家子弟，导致父亲坐狱三年。

1905年，方振武离乡远行，徒步到徐州，投奔北洋军队辎重营，后到安庆考入武备练军学校。他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夜晚用衣服把小油灯遮挡起来苦读不辍。受革命思潮影响，与同志潜去广东，秘密参加了同盟会。1907年他被派回安庆，筹划策应徐锡麟、熊成基举义，事败被捕。后贿赂狱卒得以逃脱，潜赴南京，改名换姓进入第三镇当兵，旋升为排长、连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方振武所部亦举兵攻城。方作战英勇，升任第三师辎重营营长。1913年7月“二次革命”起，方部加入江苏讨袁军，听命总司令黄兴指挥，同张勋、冯国璋部激战于徐州，他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二次革命”失败后方东渡日本，入日本浩然庐学校。随后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

1917年，方振武从日本回国。时孙中山南下护法组建军政府，方乃到广州，被委为海军陆战队大队长。1921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任团长，率部出征，经江西入皖南。奈因陈炯明叛乱，北伐夭折，方率部退往浙江，遣散士兵，只身潜往上海，匿居于烟纸店。

1924年9月，江浙齐卢战争爆发，方振武投奔卢永祥，被任为别动队司令，隶属杨化昭部，在浏河、嘉定一带策应。10月，卢永祥失

败去日本，方振武遣散所部，北去天津另谋出路。其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奉系“镇威军”第二军张宗昌部进驻沧州、马厂一线，方与张在江苏时同属第三师，乃得援，任镇威军先遣梯队司令。旋张宗昌部南下，方奉命率队先行，直抵浦口，齐燮元率部撤往镇江，派卫队旅在十里长山设防狙击。方指挥两千多人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天鏖战，攻破齐军防线后又连夜追击，拂晓即达镇江。方之战功深得张宗昌赞赏。1925年4月张宗昌督鲁，方部进入济南，任补充第六旅旅长，后扩编为师，方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驻德州。此后方率师在曹州抵抗了国民二军李纪才部之进攻，击垮了马吉第、李鸿翥两个旅，稳住了张宗昌统治山东的局面。方因战功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第二十四师师长兼兖州镇守使。

方振武虽然受到重任，但是他对奉系军阀之亲日政策颇为不满，对张宗昌亦有嫌隙，而对冯玉祥领导之国民军颇为向往。经过一段谋划，他于1925年12月在肥城举事，率部渡河到曹州，集合全师将士宣布加入国民军，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所部为国民第五军，自任军长。随即率部向豫冀边界挺进，在河南濮阳整训。方振武在白鱼镇战胜阎锡山部后北上，至1926年1月26日被任命为直鲁豫边防剿匪司令，所部于3月北上抵达长辛店。

其时北方时局骤变，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晋系阎锡山等联手，向冯玉祥之国民军发动进攻；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又制造大沽口事件。国民军四面楚歌，被迫于3月22日退出天津，4月15日又退出北京，方振武率国民五军掩护大军撤至南口，兼口北镇守使和第二军司令官。嗣后率部在晋北与阎锡山军作战，进攻天镇、阳高、大同等地。但此时国民军士气不振，韩复榘、石友三等部投奔阎锡山。8月南口大战后国民军总退却，方振武部撤至五原。9月17日，从苏联回来的冯玉祥重整国民军，举行五原誓师，方振武被委任为国民联军第二军军长。全军加入国民党后，方当选为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旋被冯玉祥任命为援陕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

司令，率师日夜兼程赴陕，援救被围困在西安的杨虎城、李虎臣部。方部在猴儿寨大败刘镇华军后，向西安古城北部包抄，进驻灞桥，配合孙良诚部战胜了刘镇华军，使被围困八个月之久的古城西安得以解围。

1927年5月，冯玉祥率领国民联军宣布加入北伐阵线，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方振武于6月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出师潼关，沿陇海路东进，接连攻占灵宝、陕州、新安、洛阳、郑州，所部不断扩充，达五万余人。10月，方任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协同鲁涤平第二军、李荣第四十三军西征讨伐唐生智军，后驻襄阳、樊城。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路总指挥，领阮玄武第三十四军、苏宗辙第四十一军、马文德第四十二军。

1928年4月，方振武所部改编为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任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二次北伐讨奉之战，经郑州入鲁，走济宁，占肥城，4月30日会合各路向济南发起总攻。次日方指挥所部率先攻入济南城，乃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5月3日日军进攻中国驻军，酿成济南惨案，方部奋力抵抗，5月奉命退出济南，以苏宗辙代济南卫戍司令。方指挥所部绕道北上，沿津浦线直抵天津。奉军退往关外后，方部驻防通州、怀柔、密云一带。此后蒋介石指挥各路兵力肃清北洋军阀残余部队，方振武于7月任左路军总指挥，领鲍刚第四十四军、阮玄武第四十五军、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徐源泉第六军，在白崇禧统率下进兵滦河，向直鲁联军进攻。12月又进军热河。

北伐结束后，蒋介石编遣整理全国军队。按照《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进行程序大纲》，方振武所部缩编为第四十四、四十五两个师，方任第四十五师师长。由于各派系对蒋介石编遣之举严重不满，战事频起。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委的方振武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兼讨逆军第十军军长、津浦北段警备司令。接着又发生蒋冯之战，蒋为防备方振武重归冯营，任命方为安徽省主席，但不准方的队伍入皖；蒋还指派了省府各厅厅

长，使方孤掌难鸣，难有作为。方甚为不满，乃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等故旧联络，谋议策应冯玉祥反蒋。但他写给马鸿逵的密信落入蒋介石手中，9月25日蒋以电召开会为辞将方诱至南京软禁，10月下令免去其安徽省主席职。12月初石友三奉调率部赴闽，途经南京时去看望了方。当晚石部在浦口哗变，蒋认定石、方同谋，乃派宪兵将方押赴军法处准备处决；后因石部未过江入城，又经戴季陶等人说项，方得免死，被囚禁在汤山陆军监狱。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在粤方各将领坚决要求下，方振武得与李济深等一同释出。11月，方振武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并任国民政府委员，出国去欧洲考察。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气焰嚣张。方振武于1932年从欧洲归国后，全力以赴于抗日救亡大业。他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极为不满，四处奔走呼号，联络部属故旧，鼓励抗日救国。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他毁家纾难，奔赴山西，率领鲍刚、张人杰两个师成立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誓言“以驱除暴日为目的，以收复国土为职志”。方并与吉鸿昌联系，起兵晋南，北上抗日。蒋介石派何应钦阻挠，命方在邯郸候令。方坚持北上，不顾铁路交通部门的阻拒，率全军步行到定县，继续前进到张家口。他在张家口会见了冯玉祥等故旧，经过酝酿，于5月26日揭櫫组建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兵力达十万之众，推冯玉祥为总司令，方任北路前敌总司令，他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师抗击日本侵略军，先后收复康保（6月22日）、宝昌、沽源（7月1日）、多伦（7月12日）等察东失地，察哈尔全省光复，全国群情振奋。

7月22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方振武为委员，决心继续攻击日本侵略军，“还我河山”。但是蒋介石、汪精卫固执推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以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的软硬兼施手段对付抗日同盟军。8月9日冯玉祥被迫辞职下野，但方振武与吉鸿昌等人坚持继续抗日，声言“为国家雪奇耻，为民族争生

存”，“正义所在，不辞汤火”。他于8月16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率部一万五千余人撤往张家口以北，在独石口与吉鸿昌部会师后，易帜为抗日讨贼军，由张北、万全、独石口分三路入长城至怀柔，继进至顺义牛栏山、高丽营，与蒋介石的军队展开激战。10月，抗日讨贼军陷入重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亦日夜轰炸。部队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难以为继。方振武与吉鸿昌商定被迫接受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和北平慈善团体代表的敦促，缴械接受收编。10月16日，方与吉赴三十二军驻地顺义马家营谈判，竟然被扣。方连夜出逃，得当地民众掩护，潜往天津。随后逃亡香港，再亡欧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方振武从意大利归国，经香港到桂林，10月抵南京。但率师抗日之志不能遂愿，只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南京失守前夕，方随同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至汉口，又去重庆。1938年7月随同李济深至桂林，筹办一所垦牧场，收容皖籍难民和流亡学生，但为蒋介石所忌。10月，方迁居香港，宣传抗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方振武将眷属托付友人照料，独自潜回广东。不料在途中遭遇匪徒杀害，被投尸海中灭迹。

主要参考资料

安徽省政协：《纪念方振武将军》，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

阮玄武：《方振武的生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4年。

傅华昌：《抗日爱国将领方振武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2年。

鲍汝津：《方振武的起义和失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9），军政人物卷（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楚明善：《我们知道的方振武》，《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9），军政人物卷（上）。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

费巩

王玉如　毛正棠

费巩，原名福熊，字寒铁、香曾，1905年9月1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其父费树蔚，曾任北京政府肃政厅肃政史，后因不满袁世凯称帝，退隐苏州，与其甥柳亚子常一起写诗[(1)]。

费巩七岁在苏州就学，十三岁到上海入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入复旦大学，以成绩优异，乐于助人，任复旦学生会评议委员会主席和复旦附属义务小学董事长。1925年“五卅”惨案后，费巩发动义务小学师生上街演讲、游行，配合罢工、罢课斗争。是年，他从文学专业改为政治学专业。1926年6月提前取得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学系毕业文凭，为文学士。他自学外语两年后，自费出国求学，先至法国巴黎，翌年转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研究英国及西欧各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他学习勤奋，整天埋头在图书馆中，1931年以优等成绩获荣誉毕业证书。他的导师方讷劝他在牛津大学继续考博士学位，但费巩自筹的学费已用尽，不能继续学业。

费巩回国后，先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继由陈望道推荐进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他在沪结识了邹韬奋，常为《生活周报》撰文，并主编《复旦同学会会刊》一年。1932年秋，进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国政治制度。先是，他已写成《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一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是年，又写成《英国政治组织》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2)]。他不愿在经济界、法学界任职或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决心献身教育事业。1933年秋，他应聘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兼注册课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同年，著大学用书《比较宪

法》，由世界书局出版，列为“世界法学丛书”。他在书中除对英美等西欧各国的宪法进行分析和评价外，还抨击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制度。1935年，他反对浙大校长郭任远以卑劣手法开除胡乔木等人，支持进步学生开展的“驱郭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辗转西迁。费巩经香港转广州湾到达广西宜山，继续在浙大任教。1939年1月，他撰写《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一文，阐述了试行导师制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办法。他还对学校的教务行政提出《奏议》，“列举五端：一为健康之应注意，二为功课宜略减轻，三为贷金应宽大，四为行政应改进，五为会议宜自由讨论，勿专寻章摘句”[(3)]，充满了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之情。是年11月费巩随浙大再迁贵州遵义，1940年7月，浙大师生把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台，校长竺可桢邀请费巩继任，费以不加入国民党和不拿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8月12日他发表《就职宣言》，声明：“吾要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用感化，不用压力”，“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他说：“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4)] 费巩任训导长后，积极推行和改进导师制，支持学生自治会办好《生活壁报》，设法改善学生的伙食、居住和学习条件。他关心贫苦学生，竭力争取扩大贷金，并提倡工读。为解决学生夜间自习的照明问题，他亲自设计，并用节省下来的薪金，到遵义街头白铁铺定制了八百五十盏植物油灯，代替灯光暗弱而又冒浓烟的油盏（以后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以志纪念）。他待人慷慨热情，常倾囊相助，对己则克勤克俭，朴素无华。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统治。费巩被指为“纵容共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被迫去职，学生们以明镜作纪念品相赠。费在浙大继续执教，1943年编撰《中国政理》，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

治，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仍然不顾自身处境，嫉恶如仇，以笔当戈，于1944年2月起，先后写成《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论政权治权之分配》、《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等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腐败，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赞成成立联合政府。3月，他在浙大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兼及时弊。以后，他又为报刊撰写了《论政治风气之转移》、《论制宪之原则》、《人民自由与国民大会》、《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等文章，以对英国和西欧各国政治、法律和“宪政”的阐述，剖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假施“宪政”。他指出，民主与独裁不两立，取其一必弃其他，不容犹豫两可。“民主国家之当政者以政绩博取人民信任，保持政权。盖在民主国家，政权谁属，决于人民，政府不能抑压异己，禁锢舆论，只能以政绩博舆论赞许，以竞选与敌党角逐。”(5)

1945年1月，费巩因在浙大任教已十年，获得休假一年。他应复旦大学邀请，前往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计划讲授“英国政府”、“现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政理”三门课。他决定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作一番调查，就人事制度方面作进一步考察，连日进出重庆国民政府的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考试院、教育部。各方特务密报了费巩的行踪，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2月7日，费巩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要求国民党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惩治贪污。这篇《进言》引起很大反响，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特务们奉命对《进言》签名者进行各种威胁、恐吓、利诱。费巩对反动派的卑鄙行为极为气愤，撰文痛斥。这更引起特务们的恼怒，视之为眼中钉。

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北碚复旦大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费巩失踪事件”震动了整个重庆，浙大、复旦及社会各界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非常关

切，设法营救。在1946年1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提出八项要求中，把“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列入第七项。1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再次提到要求释放费巩。

费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先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随后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特务们软硬兼施，用尽酷刑，费巩毫不屈服，天天高声痛骂反动派。社会上反对迫害民主教授，反对特务横行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尽快秘密杀害费巩。特务们把费巩杀害后，将他的尸体丢入杨家山附近的硝镪水池里，毁尸灭迹。为追求民主和进步而牺牲的民主教授费巩，那时还只有四十岁。

---

(1) 费树蔚（1883—1935）生前写有大量诗词，1950年经柳亚子倡议，集三千余首，编印成《费韦斋集》四册。

(2) 费福熊：《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版。

(3) 《费巩烈士日记摘抄》（1939年6月14日日记），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印：《费巩烈士纪念文集》卷三，1980年版。

(4) 费巩：《就职宣言》（1940年8月12日），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费巩烈士纪念文集》卷四《费巩烈士论文选》，1980年版。

(5) 费巩：《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1939年手稿），转引自正棠、玉茹著《费巩传——一个民主教授的生与死》（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费巩烈士纪念文集》卷二），1980年版，第110页。

费孝通

杨清媚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城富家桥弄的一个没落士绅家庭，祖上号称“江夏费”，据称原自山东而来，二百多年前即定居于此，累世望族。其父费璞安曾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资格，后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参与吴江光复事件，被选为县议会议长，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其母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重视教育，创办吴江县第一个蒙养院。费孝通幼年时即和哥哥、姐姐一起在这个蒙养院里接受启蒙[(1)]。

1924年，费孝通从振华女校附中转到位于苏州的东吴附中念书，入学不满一年即跳级升入初中三年级，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多为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2)]。这段时期在哥哥费振东和费青影响下，他也参与一些学生运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费青去了上海，费孝通留下继续念书，次年进入美国耶稣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医预科，在校期间曾担任校学生会秘书，校刊通讯秘书。1930年，费孝通因参加反教会学潮被勒令转学，于是北上北平，转入另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读书；时任校务长的是美国长老会牧师司徒雷登。

从1930年到1933年，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正式的学术生涯。在这里，费孝通遇到了1929年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吴文藻，并选听他的社会学课程。社会学自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中国以来，三十年间已有一批社会学家，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但主要是教会学校设立专业，且各校授课教材均以外文为主。吴文藻是国内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的第一人，并终身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费孝通后来的学术道路与吴文藻有密切关系。

除此之外，费孝通还跟着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来的博士杨开道学习过社会学调查方法和农村社会学。1932年9月—12月，时任燕大人类学系主任的吴文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Park）来华讲学。派克开设“集合行为”和“研究指导”两门课程，大力提倡以人类学方法进行社会实地调查，还亲访北平市井、监狱和妓院。社会学要做深入的实地调查以探查社会关系变迁的原则，这一点深为吴文藻所赞同。早在1930年，燕京大学就在北平清河镇建立了社会学研究实验区，吴文藻曾主持过工作[(3)]。派克讲学期间，他和一些学生包括林耀华、杨庆堃等人，翻译和介绍了派克的社会学、人文区位学、人性论、社会历程分析等理论观点[(4)]。在他们的讨论当中，始把“community”译为“社区”，由此“社区研究”之名逐渐响亮。同一时期或先于此时，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社会调查运动、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开展，他们纷纷号召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到乡村。1933年，针对乡村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费孝通写作《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一文，以姐姐费达生在苏州参与创办的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基于原有的城乡联系，在农村开展工业化的实验，以舒缓社会变革的痛苦[(5)]。并针对“乡村运动”，又撰文《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表明“中国问题”不是一个“乡村问题”，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都市和乡村同样重要；研究乡村应以民族学研究部落的方法进行[(6)]。同时，他开始介绍以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文化”概念及研究方法。在这一年夏天，费孝通从燕大毕业，并在吴文藻的推荐下，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跟随俄国学者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学习人类学，成为当时在清华学习人类学唯一的学生。

史禄国原来设计让费孝通在清华学习六年，每两年分别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但因后来史禄国要离开清华，费孝通只完成了体质人类学部分。1935年夏，费孝通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史禄国让他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一年，之后申请公费出国进修。经张

君劢帮助联系，李宗仁同意由广西省政府提供调查经费。1935年9月，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南下，赴广西进行“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他们选择大藤瑶山的瑶人为研究对象，费孝通负责体质测量，王同惠负责社会组织风俗调查，途中纪行以《桂行通讯》为题登载在京津报刊上。同年12月16日，在从花篮瑶转向坳瑶村寨调查途中，向导失引，费孝通误踏虎陷，身受重伤，王同惠寻救溺亡，调查中断。消息传出，社会震惊。费孝通扶棺出山，在悲痛中以惊人毅力开始写作《花篮瑶社会组织》，以完成亡妻遗志。这本书是费孝通第一本社会实地调查的成果，吴文藻称之为在非汉族团进行“社区研究”的首个实例[(7)]。在费孝通瑶山调查期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结构—功能学派代表拉德克利夫·布朗应邀到燕京大学演讲，提倡比较社会学，建议以乡村为单位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8)]。费孝通认为，布朗的比较社会学与社区研究的理论基础直接相关，影响了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所主持的云南魁阁工作[(9)]。

1936年6月，费孝通从北平返乡休养。吴文藻已帮他联系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马林诺夫斯基门下读博，9月出发。出发前这段时间，费达生带费孝通到开弦弓参观他参与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费孝通根据在村子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材料写了一个提纲，连同《花篮瑶社会组织》的书稿一并带到了伦敦。马林诺夫斯基看中了这份提纲，决定亲自指导费孝通完成这篇博士论文。伦敦求学期间，费孝通和他的燕大师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保持着他边行边写的习惯，为天津《益世报》专栏“伦市寄言”写连载。1938年夏，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通过答辩，交付出版时改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曾多次重印。马林诺夫斯基盛赞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0)]。

1938年秋，费孝通离英返国，因广州沦陷改往云南。他参加吴文藻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由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在社会学系下

设一个由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后因战火迁到呈贡魁阁。从1940年—1945年，魁阁工作站存在期间，其成员共有十多人，包括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胡庆钧、瞿同祖、张宗颖、王康等[(11)]。作为这个小团队最早的头儿，费孝通沿袭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席明纳”制度而来的学风，组织实地调查、学术讨论和再调查、再讨论。在这段时局最为紧张、研究经费短缺、物质生活条件恶劣的时期，“魁阁”成员创造出不少成果，如费孝通《禄村农田》，张之毅《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昆厂劳工》，胡庆钧《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聚焦乡土社会，进行社区类型比较研究与理论探讨。除了“魁阁”的工作，费孝通还在云大和西南联大兼课，并继续在报刊杂志发表时评、政论和学术论文，包括《益世报》、《今日评论》、《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一度与顾颉刚就“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问题进行争鸣。1943年，费孝通接受邀请赴美国访问，临行前与潘光旦等教授赴大理讲学，写《鸡足朝山记》纪行。赴美后，继续写《旅美寄言》在《生活导报》连载。“魁阁”的主持工作则由许烺光接手。访美期间，费孝通一方面根据禄村、易村和玉村的研究编译出*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即中译本《云南三村》）一书，一方面设法筹措研究经费，同时多方接触美国社会科学界，争取留学机会，想促成中美合作计划（后因客观原因未成）[(12)]。1944年夏，费孝通回国，继续在云南农村调查。

1945年，抗战胜利，接着内战爆发，费孝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写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文。1946年，因“李、闻事件”受暗杀恐吓，由友人协助到英国避难。次年2月回国，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一直到1949年。这三年间他的两本外访文集《重访英伦》和《美国人的性格》出版；同时继续“魁阁”时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索，进行理论总结，写作了《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等著作，并先后有《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杂话乡土社会》、《炉边天下》、《乡土复员论》等文论系列，刊载于《观

察》、《大公报》等著名报刊，成为他写作“丰收期”[13]。

1949年初清华大学已经先于北平解放，毛泽东邀请费孝通、雷洁琼、严景耀等访问西柏坡。同年，参加北平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费孝通在《我这一年》中写下：“1949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14] 他撰文讨论大学改革和社会学系改革问题，又接受任命带领中央访问团第三分团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写作《贵州少数民族情况记民族工作》、《兄弟民族在贵州》系列文章。继而又到中南地区访问，担任广西分团副团长，写作《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及有关民族政策和民族民主建政的文章。1951年费孝通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开始取消社会学系。国务院从燕大、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辅仁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抽调了一批原来从事社会学、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研究的知名学者，组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为开展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打下基础[15]。研究部最初由费孝通负责，师友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等人各任研究室主任。此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全面开展，费孝通一边写检讨，一边工作。1954年，他访问呼伦贝尔草原后写作的《话说呼伦贝尔草原》一文，在《新观察》发表。

1956年，中共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台，国务院成立专家局专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任命费孝通为副局长。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期间，同时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并于次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随着“鸣放”开展，恢复社会学的呼声也渐渐大起来。在旧同学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William Geddes）到访江村之后，费孝通也再访江村，并在《新观察》上发表了调查报告。旋即又在《光明日报》发表《“早春”前后》一文，剖白他写作《早春天气》时的心态。两个月后，反右斗争开始，费孝通被打成右派。此后，他的江村研究、士绅研究、知识分子

研究以及学科建制讨论均受到系统的批判。期间被摘掉右派帽子，进行翻译工作，1962年还随政协考察团视察内蒙古，写作“留英记”一文。“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1972年因接待随尼克松访华而来的老朋友费正清夫妇，调回北京。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十几年内，除了编译资料，未发表任何文章。

1978年，胡乔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将费孝通调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同年费孝通出席在日本京都举办的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演讲题目为《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体会》，还重访广西大瑶山。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从这一年开始，他恢复了边行边写的实地调查，也恢复了和国际学界朋友的联系，多次出访不同国家和地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对他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

受中共中央委托，1979年，社会学重建工作在费孝通的主持下开展，首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会，他被推选为会长。费孝通一边组织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部分高校的社会学系，一边组织进行教师人员的培训、开办讲习班、编写教材、试办社会调查基地等基础工作。关于学科重建设想，在1980年3月，他赴美国丹佛接受本届国际应用人类学年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所作的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1982年的《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1985年的《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等文章中，曾多次得到申明。1981年，费孝通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赫胥黎奖章的通知，他在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师弗思（Raymond Firth）建议他谈谈江村1949年以来的变化。这促成了费孝通三访江村，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在他晚年，又多次回到江村，总共26次[16]。这项社区研究的特点，在于跟随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从江村扩大到吴江七镇，然后一年一步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区[17]。根据不同的条件下社区发展的不同道路，应用比较的观点区分不同模式，从城乡结合的基础上升到经济区域概念，逐步看到

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位格局[18]。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收录在《行行重行行》（1993年）一书中。国际学界不仅对这二十多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变化感到好奇，也对费孝通这段沉寂的时间里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感到好奇。早在70年代费孝通返京不久，就收到过美国历史学家阿古什（David Arkush）以他为题材写的《费孝通传》初稿；80年代初费孝通访美也曾和阿古什见面，这本传记引起国际学界多方关注，为此，费孝通写了《我看人看我》一文作为回应。

1985年，费孝通调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北京大学组建社会学研究所（1992年4月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所长，并开课、培养研究生；1986年，在费孝通提议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了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从建所开始，费孝通承担了多项“六五”到“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包括“小城镇研究”、“小城镇与新型城乡关系综合研究”、“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19]。在这些课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各地考察上，访问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广东、浙江等地的经济开发区，广西、甘肃、内蒙古、四川、吉林等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1988年，他到联合国接受当年大英百科全书奖；下半年又赴香港在泰纳（Tanner）讲座主讲，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点》。同年出版了《山水·人物》散文集，纪念《新观察》主编储安平；并写文章纪念梁漱溟；还在《瞭望》杂志上发表《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提出要重视东西部发展的相互关系[20]。这一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接待的第一位来访的国外人类学家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对他1949年以来的人生经历进行的英文访谈，发表在美国《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上。

进入90年代，费孝通年已八十岁，几乎每月都在全国各地进行频繁的考察，但同时也开始更多地撰写回忆和反思文章，这些涉及他早年学术经历的文章也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重建密切相关。1990年他写作《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回应利奇（Edmund Leach）对他的

社区研究的批评。1993年赴日本接受亚洲文化大奖，并在日本九州大学作题为《关于人类学在中国》的演讲，谈及自己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又赴香港参加第四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宣讲《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长篇论文；接着又赴印度出席第四届英·甘地会议，作题为《重释美好社会》的演讲。同年出版《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和《人的研究在中国》文集。1994年，费孝通访问菲律宾，接受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4 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Community Leadership），发表题为《社会科学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的演讲。农村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仍然是他关注的重点，如《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一文，他讨论了小城镇发展与自然人文生态之间的问题。同时，他还接连发表《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两篇纪念文章，并出版外访文集《芳草天涯》。1995年6月，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召开，费孝通作为学术指导出席，并作长篇演讲《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同年年底，为庆祝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和纪念吴文藻逝世十周年，他发表演讲《开风气　育人才》，回忆吴文藻师。1996年9月，“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学术研讨会暨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在吴江举办，费孝通应邀参加，并为会议带来三本新出版的文集：《爱我家乡》、《学术自述与反思》及《费孝通选集》。同年发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的经历和思考》一文，对自己一生学术工作的重点之一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年底，费孝通辞去民盟中央主席的申请获准通过；一年后他在人大常委的任期也将届满。1997年1月，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提交长篇讲稿《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对自己在20世纪30、40年代所进行的农村微型研究和类型比较研究进行反思，并提出人类学社会学应进一步探讨人文世界研究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根据他的会场发言整理出《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总结他晚年学术反思的心态，并正式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同年5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五

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费孝通作了题为《人文价值再思考》的发言，再度提出对马林诺夫斯基和利奇的重新思考及回应。次年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他提交《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一文，继续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反思和学习。同时，开始动笔写《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完成后近八万言），意在重新“补课”。就在这一年年初，费孝通刚刚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公职。他与前妻王同惠合作翻译的旧稿《甘肃土人婚姻》也于同年出版。1999年，《费孝通文集》出版，到2004年已出16卷，大致收录了费孝通一生公开发表的著述。

从1999年跨入2000年，费孝通的写作在回忆个人与师友、城市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学补课等内容中展开。他开始谈论“精神”、“灵”与“慧”、“境界”、“我”与“心”等问题，阅读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人的作品。2003年他写作《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指出深入挖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将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做出贡献的领域[21]。在同年发表的《暮年自述》中，他谈到自己一生在社会当中应该如何定位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想起20世纪40年代末我写过的一本书《中国的士绅》。这本书里讨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批特殊的人群……我们所谓的绅士也叫士大夫。……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22]。2003年末，费孝通因病住院，不得不停止写作。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因病在北京去世。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老人，用他一生的足迹和笔迹，留下了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历程的光影。

---

(1) 本文所涉及费孝通生平事迹的线索，主要对比参照以下三本书——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之“费孝通先生大事年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3)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10页。

(6) 费孝通：《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见《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第1卷，第113—115页。

(7) 吴文藻：《导言》，见《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第1卷，第116页。

(8) 派克：《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第304页。

(9)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见其《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10) 马林诺夫斯基：《序》，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页。

(11) 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73—74页、90页。

(12) 阿古什：《费孝通传》，第79—85页。

(13)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第114页。

(14) 费孝通：《我这一年》，见《费孝通文集》第6卷，1999年，第103页。

(15) 杨圣敏：《研究部之灵》，见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第116—128页。

(16) 刘豪兴：《费孝通江村研究70年——兼述开展“江村学”研究》，见李友梅主编《江村调查与新农村建设》，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17)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第117页。

(18)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第117页。

(19) 周星：《当代我国人类学界的一件盛事：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总结》，见周星、王铭铭《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8页。

(20) 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下卷之附录“费孝通学术历程与著作提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8—1626页。

(21) 费孝通：《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见《费孝通文集》第16卷，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22)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丰子恺

林印

丰子恺，原名丰润，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1898年11月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人。他的父亲丰镈　是清代末科举人，后因废科举在家设塾授徒。丰子恺六岁跟父亲诵读《千家诗》、《三字经》。九岁时，他父亲病故，由他母亲钟氏抚育成人。

丰子恺自幼对绘画有兴趣，十岁影描芥子园画谱人像。1914年十六岁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丰子恺在校图画成绩优异，受到美术教师李叔同的赞赏。李叔同是著名的艺术家，丰子恺决心追随李叔同学艺，终生从事艺术事业。他又在业余时间向李叔同学习日文。

第一师范的语文教师是著名文学家夏丏尊。由于夏丏尊的指导和鼓励，丰子恺开始学习写作，培养了日后写作散文的兴趣。

1919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因家境贫困，未能继续升学。同年秋，他和同学刘质子、吴梦非一起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该校美术教师。

1921年春，丰子恺得到亲友的资助去日本游学。起初他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和提琴，同时补习英文和日文。后来曾到横滨等地去参观画展。他在日本只学习了十个月即因经济困难不得已回国，复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师。

1922年夏，丰子恺应夏丏尊邀请去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同时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执教两年多期间

内，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宣纸作画；所作画或借用古诗词的意境，或反映儿童生活。他的画风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也受中国画家陈师曾的启发。丰子恺在《太平洋画报》上看到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作品，感到寥寥数笔，余趣无穷，为之心折。

丰子恺的画稿，融会各家之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同在春晖中学任教的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等对他的画都非常赞赏。1924年丰在朱自清和俞平伯合办的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4年春晖中学同人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集体辞职。丰子恺和其他教师一起带了一部分学生到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称立达学园），主张用“爱的教育”教育学生。1925年秋，他的《子恺漫画》在郑振铎编辑的《文学周报》上发表。1926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子恺漫画》。朱自清曾为它作序。序中写道：丰的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1)]。

丰子恺观察儿童生活细致入微，如他画的《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瞻瞻的脚踏车》等，使观众久久难忘。丰子恺作的某些社会现象漫画，寓意也很深刻。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由于无力喂养自己初生的婴儿，不得不把他舍送到育婴堂去，路旁的母狗反而能哺育自己的小狗，于是画出《最后的吻》。

丰子恺说他自己的漫画创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2)]

丰子恺既作漫画，又写随笔。他写的若干篇短小的散文，集结为

《缘缘堂随笔》印行。

丰子恺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他的画和散文有不少是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说明他有“为人生而艺术”的一面；但也有一部分反映了他出世的佛家思想。他所尊重的老师李叔同于1918年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出家，法名弘一。这件事对年青的丰子恺思想影响极深。十年以后，丰子恺三十岁生日那天，他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宿舍竟然出人意料地举行仪式，宣称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并取法名婴行。1928年为祝弘一法师五十寿，丰子恺绘成“护生画”五十幅出版，由弘一法师题字。以后每隔几年出版一集《护生画集》，直至第六集。1931年他又由弘一法师介绍，为厦门南普陀寺广洽法师绘释迦牟尼佛像。

自1925年至1929年，丰子恺在立达学园负责美术教学。这期间，还先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澄衷中学及淞江女子中学兼课。

1929年丰子恺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1930年他和夏丏尊、章锡琛等合作编辑《中学生》杂志。自1933年开始，他长住故乡石门湾“缘缘堂”，专门从事绘画和译著。他时常往来于上海、杭州、石门湾之间，直到抗战初期。在这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出版了许多漫画集和译著，如《子恺漫画选》、《儿童生活漫画》以及散文集《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等。另外，他还写作和翻译了一些美术理论和音乐方面的书籍。他的艺术理论著作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

1936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丰子恺也参加了文艺界团结御侮的活动，在鲁迅、巴金等拟定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1937年11月6日，丰子恺正在“缘缘堂”作画，石门湾突遭日机空袭，当晚他携全家老小十人在潇潇暮雨中与“缘缘堂”匆匆告别，走上流亡的旅途。途中几经波折，全家于1938年到达桂林，他遂在桂林师

范任教。1938年底，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约，往广西宜山浙大讲学。1940年南宁失守，他又随浙大迁往贵州遵义。1941年秋，在浙大升任副教授。丰在遵义时应开明书店要求，重绘在抗战期间散失的漫画，共四百二十四幅，分编成：一、 古诗新画；二、儿童相；三、学生相；四、民间相；五、都市相；六、战时相。总名《子恺漫画全集》，于1945年出版。1940年，他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译成日文，在日本创元社出版。

1941年11月，丰子恺带领全家去重庆，就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任教务主任。1942年暑假后，他辞去艺专职，在重庆沙坪坝自建“沙坪小屋”，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抗战后期，他曾到泸县、自流井、乐山、长寿、涪陵、南充、内江等地旅行，并开画展。1946年7月3日他率全家离开重庆，取道成都越秦岭，于9月25日抵达上海。由于他的“缘缘堂”旧居早已在沦陷期间被毁，全家迁居杭州西子湖畔。1948年9月，他和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结伴同游台湾阿里山、日月潭，11月回到厦门短住。1949年3月，丰子恺闻解放大军即将南下，于4月令家属先回上海，他自己则因事绕道香港，再由香港飞回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丰子恺作了《百年难逢开口笑》的画幅，以志庆祝。1950年出版了他所作的《绘画鲁迅小说》4册。他从事翻译，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

1952年，丰子恺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54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就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1962年被选为上海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

晚年丰子恺仍坚持作画和翻译工作，1975年9月15日患肺癌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丰子恺：《丰子恺漫画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陈古海、葛子厚：《丰子恺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0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潘文彦、胡治均、丰陈宝、丰宛音、丰元草、丰一吟合写：《丰子恺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3期。

丰华瞻：《丰子恺传略》，《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

---

(1) 朱自清：《〈子恺漫画〉序》，载丰子恺《子恺漫画》，开明书店1926年版。

(2) 丰子恺：《我的漫画》，《缘缘堂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冯德麟

武育文

冯德麟，原名玉麒，字麟閣，奉天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人，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少年家贫，以强悍闻名乡里。青年时当过海城县衙役。1894年甲午战争后，东北成为日本与俄国两大势力角逐之地。清政府的统治陷于瘫痪，地方秩序一片混乱，散兵游勇，到处抢掠，为害地方；强悍青年铤而走险，打家劫舍，落草为寇。冯德麟认为有机可乘，便打起了“杀富济贫，行侠仗义”的旗号，招募无业青年和散兵游勇，在辽西一带成立乡团，啸聚徒众数百人。这是盘踞辽西一带势力最大、资格最老的绿林帮伙，张作霖和杜立山都算是他的晚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军队入侵东北。冯德麟于辽阳界的高家坨子成立民团，号称“保境安民”，极力抗击俄军，深得民心。他的民团由数百人增至千余人。他经常派出骑兵破坏东清铁路筑路工程，并扬言：“除非俄国拿出巨大代价，绝不停止扒路活动。”[(1)] 帝俄军队侦知这是冯部所为，派便衣队将冯德麟逮捕，押赴西伯利亚监狱。但为时不久，冯德麟乘隙逃回，仍旧当乡团的首领。从此，他同帝俄结下深仇，而同日本间谍拉上了关系。

1904年，冯德麟率所部参加了日本特务机关招募的“东亚忠义军”，成为日军的一支别动队，日俄战争中的首山战役，日军遭到俄军顽强抵抗，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日军利用冯德麟、金万福等部数千骑兵组成的“忠义军”帮助日军侧袭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决定了整个日俄战局的胜负。日本军事当局为此奏请天皇奖赏冯德麟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其收编重用。日俄战争后，他就被清政府收编为奉军后路帮统，后又升任奉天巡防营左路统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德麟和张作霖充当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鹰犬，无情地镇压奉天革命党人，他亲率巡防队赴辽中、彰武等地围剿革命党人。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将地方巡防营改编为陆军，张作霖任第二十七师长，冯德麟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张部驻防省城，冯部驻扎北镇。冯德麟看到张作霖的势力日益壮大，心怀不平，张、冯之间为了争权夺势，展开一场明争暗斗的较量。

1912年10月，袁世凯调任张锡銮为奉天将军，因为张锡銮曾是张作霖和冯德麟任奉天巡防营统领时代的老上级，张锡銮能使张、冯二人俯首听命。可是冯德麟却感到虽然与张作霖在军事实力上和职务上是同等的，但在政治上张作霖却凌驾自己之上。连镇安上将军张锡銮要任命一个将军公署的军务课长都要征求张作霖的意见。张锡銮日感有职无权，对张作霖和冯德麟二员悍将难以控制，怀有隐退之意。这时，袁世凯欲推行帝制，派人到奉天游说，询问张锡銮对帝制的意见，张锡銮说："今天不论在人民的心理上和整个形势上，都不能办这种事。"[(2)] 袁世凯得知张锡銮这种态度，很不放心，便派他的心腹段芝贵坐镇奉天。

1915年8月段芝贵接替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张作霖和冯德麟对段来奉，心中虽有不满，但也只好曲意逢迎。

段芝贵到奉天上任之后，热衷于复辟帝制，积极拢络张作霖、冯德麟等组织奉省各界代表赴北京，捧呈劝进书，要求袁世凯速登大宝当皇帝。张、冯也不断上书向袁表示忠心，以图封官晋爵，掌握统治奉天的权力。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订于翌年元旦正式登基。12月23日论功行赏，因段芝贵劝进袁称帝活动中最卖力气，是武人向袁称臣的"第一名"，为此，袁封段为一等公爵。袁封第二十七师

师长张作霖为二等子爵，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为二等男爵。张、冯二人认为他们被段芝贵愚弄了，非常气愤。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反对，在强大的反复辟的呼声中，袁世凯在1916年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用大总统名义号令全国。段芝贵督奉后，把冯德麟保荐的将军公署副官处处长白运昌撤掉，由其带来的人接替。冯德麟对此事极为不满，表示“早晚必报复”，约张作霖密商驱段之策。冯德麟说：“段芝贵是清末官吏败类，秽史劣迹人所共知，今为东三省帝制祸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辈绝不甘心，应该驱逐他。”[(3)] 张作霖问冯德麟如何驱逐之？冯德麟答：“这个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演黑脸，和他作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演白脸，用‘吓’字诀逼他畏罪逃走，这样演一幕不费一兵一文的滑稽剧，岂不妙哉！”张作霖拍手称赞说：“让各方面的人也知道奉天人是不好惹的。”[(4)] 张、冯二人密商后，便分头布置一切。张作霖在奉天召集重要军官开会，传达与冯德麟联合驱段之策。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字赞尧）建议以人民团体名义驱段不失为正大光明。张表示同意，立即通告冯德麟做好准备。

张作霖依计面谒段芝贵报告说：“外边二十八师军官联结奉天各界团体及二十七师部分官兵有所密谋，以惩办帝制祸首为名，拟不日发动，于上将军自身安全上有所不利。”[(5)] 段芝贵闻报大为惊慌，向张作霖请教对策，张在桌上大书一个“走”字。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赴津养病，又下令调用京奉铁路局专车一列，同时提取东三省官银号库存官款贰佰万元和库存军火若干。张、冯对此装作不知，并派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率一营卫队护送。当段芝贵的专车行抵沟帮子车站时，照例停车上水加煤。段芝贵的左右向他报告说，东站附近约有军队一团，做战斗式排列，机枪口斜对车站。段芝贵以卸任官不便过问，叫部下不予理会。其实段芝贵从奉天出走后，张作霖立即给冯德麟打电报，叫冯德麟把车截住检查。冯德麟见了电报，把兵埋伏在沟帮子到锦州的铁路两侧。段芝贵的专车到了沟帮子，冯德麟派二十八师的一

个团长邱恩荣持旅长汲金纯的名片上车检查，声称欢送段将军，被段芝贵的部下挡驾谢绝。于是，邱团长拿出两份电报，一是以奉天各界法团名义；一是以省议会和二十八师全体军官名义。电报内容是："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贰佰万元之巨及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回沈阳依法处理。"[(6)] 段芝贵看到电报惊慌失措，把电报交给孙烈臣旅长看，孙旅长大声说，岂有此理，等我下车问问。孙旅长下车同邱团长商谈很久，然后回到车上对段芝贵说："沈阳各界人情汹汹，一定截留专车押回沈阳，经张代督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7)] 专车继续西行。段芝贵十分感谢张作霖的关怀，心情稍稍平静下来。车到了锦州，冯德麟亲自率兵上车检查，把段芝贵由北京带来的两营卫队的武器全部缴械，又把他携带的巨款都截留下来。段芝贵问这是什么意思，冯德麟含糊其辞，只是把段芝贵扣押在候车室里。冯德麟给张作霖去电报，问如何处置？张作霖回电说，既达到目的，可以放行。冯德麟才叫段芝贵西行，由孙烈臣旅长率一营兵护送到天津。至此，由冯、张演出的驱段趣剧落下帷幕。

段芝贵到北京后，说冯德麟军队是化装土匪，劫掠财物，致使他宦囊如洗，仅存生命，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不再回奉天为官。北京政府派谁去接替，很费脑筋，如果再派一位外省籍人员，定遭地方实力派反对，不仅丧失政府威信，还可能发生意外，形势所迫，只好在奉天本省有实力的人中挑选一人。当时只能就张作霖和冯德麟中选出一人。征询段芝贵的意见，段芝贵对冯德麟恨入骨髓，极力推荐张作霖继任。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次日又任命张作霖暂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奉天巡按使。张作霖接到任命，一喜一忧。喜的是当了奉天军政首长，升官的目的实现了；忧的是如何对付冯德麟。张作霖立即召集结拜兄弟们开会，痛哭流涕，大骂段芝贵使用离间手段，挑拨弟兄感情。即向北京发电，坚辞这项任命，极力推

荐冯德麟做督军，说奉天局面非冯不能领导。北京复电不准。张作霖再次请辞，仍不准。最后汤玉麟说："你一定坚辞，北京要是另派一位外省人来，我们怎么办？我看还是就了罢。"[8] 其他人也同意汤玉麟的看法，劝说张作霖不要再辞了，对冯大爷可以另想办法。张作霖又电北京政府，必须任命冯德麟为军务帮办，他才肯就职，北京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冯德麟为奉天军务帮办。但冯德麟不甘心居张之下，心里很不痛快，认为自己和张作霖身价相等，设谋驱段芝贵是他的首倡，结果只得到一个空头的军务帮办头衔，赌气不肯就职。张作霖就将军职，冯德麟也不去祝贺。张作霖很扫兴，开始尝到了他的上司如何应付桀傲不驯的部下那种苦果。张作霖叫吴俊陞、马龙潭两位镇守使去疏通，冯德麟知他们是替张说情，竟予拒绝。张作霖见此局面，只得亲自登门拜访，低声下气地说了许多患难与共、有福同享之类的好话。冯德麟提出就职的条件，要另设立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机构和军务督办公署一样，设参谋长及四课，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张作霖只得让步，遂向北京政府请示，得到的答复说，另设帮办公署，于体制不符，不便照准，但每月可拨十五万元办公费。张作霖带了十五万元和由袁世凯签署的电报去见冯德麟。不料冯德麟拒不接受，并直接给袁世凯去电报，请求辞职。其态度越来越强硬，大有向张作霖发难之势，张作霖还是委曲求全，又派旅长孙烈臣携礼品和现款三十万元，到冯德麟的驻地广宁，恭请冯德麟回省就职。5月20日，冯德麟率马、步、炮兵五营，浩浩荡荡开进省城，迳赴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张作霖即亲自到冯的办事处拜访，极力表示好感，冯德麟仍然态度傲慢，不去回拜。张作霖设酒席为其接风，冯德麟拒不赴宴。张作霖只好把酒席送到冯的办事处，并召歌妓为他助兴。

冯德麟此次来省，直接拍电报给北京，说二十八师要扩充军队，请准招七营新兵，并指定北镇为军务帮办公署所在地，经费和所需饷械，应如数照发。冯德麟下令给奉天财政厅拨五十万元为编练空军的经费。他在省城只住了一天，第二天即回北镇驻地。张作霖用软工夫，以柔克刚，雇了大批工匠，装修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把冯德麟

的办公室装修得和自己完全一样，然后派参谋长杨宇霆赴北镇恭迎冯德麟来省就职。

6月6日，冯德麟又带大队人马进省，提出三个条件：一、帮办的权限和盛京将军完全相等；二、全省用人行政彼此互相咨询；三、财政厅指拨二十万元为二十八师购飞机用。是日下午，张作霖又去会见冯德麟，冯德麟拒不见面。张作霖为防止意外，在将军署后院修筑炮台一座，炮口对准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冯德麟得到消息，立即提出严重抗议，限当天答复。张作霖再请吴俊陞代为说和，解除误会。吴俊陞刚刚提到“张将军”，冯便出口大骂：“什么将军！妈的！”吴俊陞谦恭地代张作霖赔了不是，说了许多好话。冯德麟提出四项和解条件：一、即日拆除炮台；二、一切用人行政，必须征求同意；三、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四、张作霖应率二十七师营以上军官到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赔礼道歉。张作霖怕打起来没有取胜的把握，还可能引起日本干涉，两败俱伤，只好忍气吞声，满脸堆笑，率所部军官到二十八师办事处向冯德麟道歉，并答应冯德麟提出全部条件。不久，冯德麟又发出通电，率全师将士辞职，提出要兼省长。这次张作霖坚决拒绝了。此时，袁世凯已经死了，北京政权动荡不定，无暇顾及奉天的内讧。

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后，环顾关外两虎相争，难分上下，便想调冯德麟入京，冯德麟不接受。奉天各界人士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万勿走极端，张作霖表示不诉诸武力，但奉天全省气氛紧张，双方戒备森严，夜无行人，很有一触即发之势。

1917年2月28日，段祺瑞请出一位德高望重的调停人，是张、冯两人的老上司，曾任奉天最高首长的赵尔巽。赵到奉天进行调解，未能成功。3月6日，冯德麟又回到广宁驻地，待机行事。

当张作霖和冯德麟闹纠纷正剧之时，张作霖的亲信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与张作霖闹翻了。原因是奉天警务处长王永江与汤部军官发

生摩擦，张作霖没有护短，支持王永江严惩滋事官兵，激怒了汤玉麟。汤玉麟一怒之下，带领所部两营，投奔到冯德麟门下。

在奉天局势未定之时，张作霖走段祺瑞路线，冯德麟便投靠黎元洪，并派参谋长白运昌赴京控告张作霖，说他不得人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元洪速派大员接替，并秘告段祺瑞偏袒张作霖。恰逢此时，向以督军团盟主自居的张勋，在徐州召开会议，酝酿复辟帝制。冯德麟不甘落后，派汤玉麟到徐州，任张勋的营务处长，又派二十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带二百名官兵到北京做内应，随后又亲率卫队进京，谒见溥仪，宣誓效忠。不料张勋的辫子兵被段祺瑞的“讨逆军”一击即溃。张勋复辟帝制仅十二天就彻底失败了。冯德麟见势不妙，于1917年7月10日，从北京返回北镇，途经天津时被“讨逆军”逮捕。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称：冯德麟背叛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交法院依法严惩。张作霖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容大度，请求段祺瑞政府予以释放，奉天绅商也联名向北京政府请求宽大处理。冯德麟被释放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不久，冯德麟回到奉天，任“三陵督统”，看守永陵、福陵、昭陵。从此二十八师的实权落在张作霖手中，奉天内讧宣告平息。冯德麟于1926年8月11日病死。其长子冯庸，字振雄，于1926年弃武从文，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抗战时期，冯庸大学学生流亡关内，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曾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

(1) 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8月出版，第139页。

(2) 秦诚至、陶迺文：《张作霖集团形成概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第28页。

(3) 王克承：《张作霖驱逐段芝贵的密谋和经过》，《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1—92 页。

(4) 王克承：《张作霖驱逐段芝贵的密谋和经过》，《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1—92 页。

(5) 王克承：《张作霖驱逐段芝贵的密谋和经过》，《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1—92 页。

(6) 王克承：《张作霖驱逐段芝贵的密谋和经过》，《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1—92 页。

(7) 王克承：《张作霖驱逐段芝贵的密谋和经过》，《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1—92 页。

(8) 王化一：《张作霖二三事》，《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5页。

冯国璋

李宗一

冯国璋，字华甫（符），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人，生于1859年1月7日（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其父冯春棠务农，家境不很宽裕，荒年常不能自给。冯国璋在家乡读私塾度过童年，青年时代到保定莲池书院求学，一边读书，一边谋生计，后因贫困辍学。

1884年，年已二十五岁的冯国璋，经其族叔介绍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挑选淮军各营兵弁入学。由统领刘祺保荐，冯考入武备学堂第一期。在学堂学习期间，曾于1888年回原籍应科举。时功令特设数学附生额，冯以通晓算术补诸生。嗣后，又应顺天乡试落第，仍返原校继续攻读。1890年毕业，考试名列前茅，留堂充当教习。

当时淮军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轻视武备学堂学生，学生毕业得不到重用。冯国璋为谋升迁，急于想取得军功，于1893年入淮军将领聂士成幕，奉命赴山海关外考察地形，甲午战争中又随聂军转战于东北前线。战后被派管理军械局。不久，由聂推荐担任中国驻日本使臣裕庚的军事随员。在日本，他与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和青木宣纯等结识，留心考察日本军事，　日积月累，编成兵书数册。1896年初回国，先呈送聂士成，未被重视；又转呈袁世凯。袁大喜，视为“鸿宝”，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1)] 袁当时在小站创办新建陆军，遂留他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他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

1899年，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武卫右军开往山东，仍由袁世凯统率。冯国璋随军前往。到济南后，他奉命

改编山东旧军，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因参与镇压义和团有“功”，次年由袁奏保以补用知州升为补用知府。1901年底，李鸿章病危，袁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编练北洋常备军，袁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和教练三处。冯为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将弁学堂、武师范学堂及测绘学堂等。当时，李纯担任教练处提调，是他的得力助手。

清政府于1903年底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作为督练考察全国新军的机关，经袁世凯举荐，冯国璋担任练兵处军学司司长，仍常驻保定，督理北洋各武备学堂，兼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师范学堂督办。经他之手，培养了一大批有浓厚北洋派系观念的军官，被输送到北洋六镇及北方各省新军中，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2)]。

1906年，冯国璋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堂专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并附设王公讲习所，听讲者皆世爵懿亲。在此期间，冯国璋和满族亲贵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这是他后来能够掌握禁卫军的重要原因。从1907年7月至1911年，他一直担任军谘使，负责办理军谘处（后改为军谘府）的日常事务。这期间，封建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1908年底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三岁的宣统继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的名义监国，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壮亲贵集团企图削弱北洋集团的势力。为了分化北洋集团，载沣对冯极力加以笼络，然而冯却始终效忠袁世凯。1909年初，载沣以袁“患足疾”为借口，命他开缺“回籍养疴”，冯亦惴惴不安，便以坠马受伤和原配吴氏病丧为理由，屡次请假，均未得准。此后遂“箝口结舌，随声画诺，不复言天下事矣”[(3)]。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第一军南下镇压革命，派冯国璋组织第二军增援。但冯国璋和北洋各镇将领不愿服从荫昌指挥，心里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催令“火速”，而冯国璋的动作却很缓慢。清廷迫不得已，

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以“足疾未痊”为借口，作势不出，而要求清廷给他军政大权。10月23日，冯国璋到彰德见袁世凯。袁世凯奏请他接替荫昌担任第一军总统，并对他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4] 他到湖北前线后，按照袁世凯的指示布置第一军“暂作守势”[5]。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以后，袁世凯由彰德南下督师，命冯国璋进攻汉口。第一军协统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都是冯国璋的亲信。在其指挥下，第一军与革命军激战四昼夜，于11月1日攻陷汉口。冯国璋纵兵烧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繁盛之区变为一片瓦砾，居民死伤甚多。北洋军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各阶层人民纷纷通电声讨冯国璋及北洋军的罪行。

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袁世凯派人向革命党人提出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和平了结”，遭到革命党人的拒绝。为迫使革命党人就范，袁世凯命令冯军进攻汉阳，冯指挥第一军由蔡甸和驼罗口渡过汉水，于11月27日陷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使新成立的武昌革命政府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为酬其“战功”，赏给二等男爵。当时他欲乘胜渡江攻取武昌，袁世凯亲以电话阻止。这时，革命军虽在武汉暂时失利，但在南方各省进展迅速，江浙联军光复南京，长江海军也宣告起义，一时成相持局势。袁世凯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攀请帝国主义出来“斡旋和平”，企图通过“南北议和”绞杀革命，攘夺政权。11月30日，冯国璋奉命与革命军商洽停战，很快达成暂时停战协议，规定12月2日至5日停战三天，以后又不断延长。然而，此时冯国璋对袁世凯的真正意图，尚未完全了解，所以仍不时致电内阁请派援军，鼓吹继续使用反革命武力，扑灭革命火焰。于是，袁世凯便命令段祺瑞代替他统率湖北各军，而调他为察哈尔都统。12月15日冯国璋离汉口北上。抵京后，奉命留京统筹近畿防务，兼充禁卫军总统。

禁卫军是满族少壮亲贵载涛控制的一支重要武力，官兵共一万二千人，大都反对清廷退位。冯国璋以支持清廷的姿态出现，顺利地掌握了这支武力。此后他便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对满族少壮派军官进行

恫吓和利诱，终于使禁卫军官兵大都同意清廷取得优待条件后“逊位”，而由袁世凯组织所谓“临时政府”。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后，一步一步地实行独裁统治。冯国璋仍统领禁卫军，兼充总统府军事处处长，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次年3月，由于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激起了南方各省革命党人的愤慨和反抗。冯国璋秉承袁世凯的意旨，串通各省军阀发表通电，攻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危害民国”，“破坏共和”，叫嚣武力解决[(6)]。当袁世凯所派北洋军第六师攻入江西境内时，孙中山被迫发动“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讨袁。7月23日，冯国璋奉命担任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指挥北洋军沿津浦路南下，他从兖州韩庄出发，连陷宿县、蚌埠、滁县，8月16日到达浦口。在南京参加讨袁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冯的女婿）过江向他投降。他得悉南京讨袁军陷入群龙无首的紊乱状态后，于25日挥军渡江，猛扑下关，与张勋所部辫子兵一起于9月2日攻陷南京。扑灭了“二次革命”以后，冯国璋于9月10日返回北京。袁世凯为酬劳他，特地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与他订婚[(7)]。12月16日，袁世凯命冯国璋接替张勋担任江苏都督，次年又授以宣武上将军，仍坐镇南京，督理江苏军务。这时，冯国璋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军队共二万余人，成为雄踞东南的北洋集团的实力人物。

从1913年底至1915年初，冯国璋发出许多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攻击责任内阁制，主张实行总统制，使袁“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8)]。然而，当中外盛传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时，他却感觉到了政局动荡的危险，担心袁世凯将失败，而且即使帝制能成功，皇位将由袁世凯的子孙去世袭，妨碍自己的继承希望。因此，1915年6月他进京打听内幕，22日谒见袁世凯时试探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世凯矢口否认自己想当皇帝。冯国璋又进一步说：南方对于改革国体并非不赞成，只是时间问题，将来“天与人归”，“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世凯勃然变色道：“这是什么话？假如有人用这等事逼

我，我只有远走国外了。”[9]

经此番试探，冯国璋以为帝制暂不会发生。7月9日他回南京，可是8月14日北京就成立了筹安会，敲响了帝制的锣鼓。开始他尚不敢相信，密电总统府机要局长张一麐探询，得到的回答是“事出有因”。不久，段芝贵、张镇芳等帝制干将纷纷派人到南京来游说，他始恍然大悟，深感自己受了欺骗，从此，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而引起了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的“廑虑”[10]。后来，为了和缓矛盾，他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11]；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 尽管如此，袁世凯仍放心不下，于12月18日下令调他担任参谋总长，表面上说是让他进京主持军事全局，实则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他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世凯只得让他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12]。

云南护国军于12月25日发动讨袁以后，贵州、广西等省相继响应。冯国璋眼看袁世凯的大势已去，出于自身利害考虑，遂暗中串通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联名请求袁“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13]。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五将军密电”。在全国人民反帝制运动的压力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过仍想回过头来做大总统。但南方独立各省非要袁世凯退位不可。袁世凯便派人赴南京示意冯国璋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发一通电，挽留他继续做大总统。冯国璋认为此刻通电已无济于事，反而会引起南方独立各省的反感，不利于“和平解决”。他婉言加以拒绝，表示愿意从中调停。4月18日，他提出“和平解决”八条，其第一条即为承认袁世凯“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14]。这种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南方独立各省的严词拒绝。于是，他即致电徐世昌、段祺瑞和王士珍，说明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要求他们劝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15]。同时，他将八条略加修改，于5月1日通电各

方，其第一条改为：暂时承认袁为大总统，另组新国会，由袁提出辞职，再选举继任大总统[16]。结果，南方独立各省仍然反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主张是“名为保袁，阴实自重”[17]。与此同时，袁世凯又要求他对南方“说强硬的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18]。冯国璋一面应付袁世凯，一面与南方独立各省周旋，信使往还不断[19]。同时，又极力主张未独立各省将军“结成团体”，“贯通一气”，以实力调解“四省和中央”冲突[20]。他企图趁人民反袁怒潮高涨的时机，独树一帜，操纵南北政局，使自己成为时局的重心。这正和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玩弄的手法一模一样。

5月5日，冯国璋赴蚌埠约同倪嗣冲，6日至徐州会晤张勋。11日，这三个地方实力派联名通电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18日，十五省区将军、巡按使代表齐集南京开会，会议一开始就遇到袁退位的问题。一派主张让袁退位，一派则坚决反对，双方争持不下。冯国璋将其5月1日通电中提出的八条稍作修改后提交会议讨论，作为折中方案，仍不能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会议开了五天，毫无结果。

6月6日，袁世凯病亡，南北各方关于他退位的争执随之烟消云散。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掌握北洋政府的大权。10月30日国会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冯国璋不愿意放弃地盘，乃于11月8日在南京就职，仍兼江苏督军。1917年2月间他曾一度到北京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7月张勋复辟失败以后，黎元洪下野，冯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组成新内阁，阁员大都是段的亲信。冯、段本来各有自己的派系，“关系始终未融洽”[21]，冯国璋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把持北洋政府，本不想进京就职，后来经过多方疏通，段祺瑞又派其亲信靳云鹏到南京“欢迎”，他才答应北上。但为了维持以他为首的直系军阀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实力地位，入京前他断然拒绝属于皖系的倪嗣冲接任江苏督军，而安排自己的心腹李纯担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并通过李纯、

南京交涉署交涉员兼督署顾问温世珍与英国驻南京领事馆和广西陆荣廷等保持联系。

冯国璋于8月1日抵京就职，不久和段祺瑞的矛盾便尖锐起来。当时，段祺瑞拒绝恢复民国初年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依靠日本的援助，派兵攻入川、湘，决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而冯国璋由于受英美策动，主张以维持西南军阀的地位和地盘，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美其名曰“和平统一”，并暗中指示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10月，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在湖南通电主和，并自动撤兵，段祺瑞的亲信湘督傅良佐仓皇失措，弃长沙出走。同时，入川的北洋军吴光新部也损兵折将，败退下来。紧接着，直隶曹锟、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等督军相继发表主和通电。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严重受挫，乃于11月先后辞去陆军总长和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派王士珍继任。但是段祺瑞不甘罢休，唆使皖系督军团要挟冯国璋继续对南方作战，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兵入关，支持皖系。冯国璋见势不妙，即托词至南方巡阅，于1918年1月26日南下，当他的专车于次日行抵蚌埠时，却被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截住，逼他返京，下令作战。冯国璋不得已折回北京，在内外形势的压迫下，只得派曹锟兼两湖宣抚使，率第三师等北洋军主力进攻湖南，并准王士珍辞职，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1918年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武力统一”叫得更响。冯国璋表面支持段的政策，暗中却唆使李纯、曹锟等与西南军阀接洽和谈。8月，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首先发难，公开通电主张罢战息兵，并对皖系人物徐树铮等进行斥责。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以冯国璋代理期满为由，于10月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实际是把冯国璋撵下了台。冯国璋遂通电全国，以报告代理总统一年经过情形为名，发泄自己对皖系的怨怼，他说：“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政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

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人非木石，宁不痛心？”并表示今后“绝无希望出山之意”[22]。冯国璋失去政治地位，同时段祺瑞也自动辞去国务总理，直皖两系的利害冲突表面似乎缓和下来，实际上却日趋剧烈。为了平息其不满，徐世昌特准他仍节制北洋十五、十六两师。这两个师是由禁卫军改编的，冯国璋代理总统时一直担任公府警卫。师长刘询、王廷桢都是他的亲信。

1919年春，冯国璋归河间故里，由十六师的两个连更番随护驻守。这时，他已变成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兼大官僚资本家，在诗经村一带就有土地千余亩，在苏北又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七十万亩，在北京、天津和南京拥有几个钱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华通银行、华充银号。此外在开滦煤矿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还有大量投资。当人们指责他“善自封殖”时，他还口说：“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用骗人的鬼话来掩饰自己的贪欲[23]。

同年10月，冯国璋由河间抵北京，表面说是为十五、十六两师争陆军部所欠月饷，实则是联络直系，企图东山再起。但12月初“忽感风寒，医治不愈”，于28日病故于北京帽儿胡同冯宅。临危召张一麐等口授遗言给徐世昌，仍希望“和平统一”早日完成。1920年2月2日葬于河间诗经村。

---

(1) 《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4，1947年。

(2) 见冯国璋治丧处辑：《河间冯公荣哀录》第一册，1920年，第20页。

(3) 《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4，

1947年。

(4) 《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见清政府陆军部档。

(5) 《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

(6)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第70页。

(7) 周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天津女子师范教习，袁世凯的家庭教师，1914年初与冯国璋结婚。

(8) 《爱国报》，1914年2月8日。

(9) 《申报》，1915年7月9日。

(10)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

(11)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

(12)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2月21日。

(13)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1946年，第320页。

(14) 《东方杂志》第13卷，第9号，第29页。

(15) 志恢编：《再造共和新文牍》，1916年6月，第44页。

(16)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149页。

(17)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152页。

(18)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6年5月4日。

(19) 详见《唐绍仪、赵凤昌、汤化龙致冯国璋函》，1916年4月26日，见《近代史料书札》，第8册。

(20)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148页。

(21) 《张君劢致梁启超函》，1917年7月13日，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下册，第521页。

(22) 《申报》，1918年10月1日。

(23) 王树楠：《陶庐文内集》卷3；又《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4，1947年。

冯玉祥

陈民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11月6日（清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青县兴集镇一个下级军官的家庭。父亲冯有茂原为泥瓦匠，后投身军籍，隶淮军刘铭传部为哨官。因父母均抽鸦片烟，资财耗竭，冯玉祥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1)]，从小参加劳动，仅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

1893年，十二岁的冯玉祥便在父亲的军营中挂名领饷，以补家用。十五岁正式入营当兵，由于长得魁伟健壮，有“冯大个儿”之称。在军营中，他勤奋好学，操练之余埋头读书写字，读过一些兵书和操典，懂得洋操，又无不良嗜好，所以升迁较快。第三营标统陆建章对他很是器重，并将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他[(2)]。1906年，他又被提升为二营后队队官。翌年调任三营后队督队官，移驻奉天新民府。1910年，升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这时，清朝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席卷全国。在这之前，冯玉祥已仔细阅读过至友孙谏声秘密给他的《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在滦州第二十镇组织了“武学研究会”，以读书为名联络同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冯玉祥和王金铭、施从云等参加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在滦州举兵响应，宣布成立北方军政府，通电南北主张共和，公推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

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北上联络的革命党人白雅雨被推为参谋长。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王、施、白等十四人遇难，冯在海阳镇被捕，后被革职，递解回籍[3]。

清王朝覆亡后，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北京政府。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编练左路备补军，重新起用冯玉祥，委任为第二营营长，并令其赴河北景县招兵，这是冯玉祥建立自己队伍的开始。他自定招兵标准，只收农村质朴精壮的青年，凡当过兵的一概不要。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冯治安、过之纲等便是这次被招收入伍的，原二十镇旧属来投效的有李鸣钟、韩复榘等，成为他后来建立西北军的骨干。1913年，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晋升为左翼一团团长，又赴河南郾城一带招募新兵。这次招收的有田金凯、吉鸿昌、梁冠英等人。在北京任京卫军团长期间，冯常到崇文门教堂听牧师讲道，对基督教耶稣“博爱利他”之说深为敬佩，遂于当年由牧师刘芳施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从此，冯部官兵一律受洗入教，并在兵营中设立礼拜堂，每逢星期日都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故时人称其为“基督将军”。

1914年春，陆建章奉命为“剿匪督办”，率五旅兵力赴陕追剿白朗，冯团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

当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冯玉祥毅然参加倒袁的革命活动。1915年底，由北洋元老王士珍领衔，全国旅长以上将领联名通电拥袁称帝，冯玉祥拒绝签名，并对其部下说：“我武装先烈以许多热血染成民国，今为袁贼篡窃，很可恨。我辈军人若保不住民国，将何以对死去的先烈？”[4] 当冯部奉命进川讨伐反袁的护国军时，他便派人同蔡锷的护国军暗中联络，实现局部停战，又趁机率部进入成都，促使四川将军兼巡按使陈宦宣布四川独立，脱离袁世凯的北京政府，给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以沉重打击。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控制了北京政

权。1916年7月，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移驻河北廊坊。翌年春，冯玉祥因受到段祺瑞、傅良佐的排斥而被免去旅长职，贬为正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他称病离职，赴京西天台山休养。7月张勋拥宣统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进行讨伐，他被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奉命率部开赴北京。7月12日冯部由丰台攻入北京，张勋逃入东交民巷，复辟军被包围缴械。

护法战争期间，南北对峙，企图“武力统一”的段祺瑞，下令冯玉祥进攻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1918年2月，冯率部抵达湖北武穴，即按兵不动，于2月14日、18日连发两电，主张“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国会早开，民气早申”[(5)]，因此触怒了段祺瑞而被免职，后由曹锟调解，准予留任。3月下旬，冯玉祥被迫进军湘西。6月，兼任湘西镇守使，驻常德。

1920年春，直皖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率部撤离常德，进驻汉口谌家矶。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的结合，固已有日。”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6)]。孙中山接信后，立即密遣徐谦、钮永键到谌家矶与冯玉祥联络，向他宣传国民革命的理论与策略。

1921年，在直皖战争中取胜的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下令免去依附皖系军阀的陈树藩陕西督军职，而以直系将领阎相文继任。5月，冯玉祥奉命率第十六混成旅随阎相文入陕，大败陈树藩于临潼，进驻西安、咸阳。直系因冯玉祥的战功，令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兼陕西西区剿匪总司令。8月，因陕督阎相文自杀，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率部出陕，于郑州、开封击败河南督军赵倜，底定河南。5月9日，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但不久即被吴佩孚排斥，免去河南督军职。10月底，北京政府任他为陆军检阅使。他颇

愤慨，经曹锟多方劝说，方允就职，将所部移驻北京南苑。这时，冯部兵力为一师（即第十一师）三混成旅（即张之江的第七旅、李鸣钟的第八旅及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旅），共约三万人，在南苑加紧练兵。次年5月，冯玉祥被北京政府特派为西北边防督办。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首领曹锟以高价收买一批议员，贿选当上总统，全国哗然。孙中山随即通电全国，宣言声讨。在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经过徐谦、黄郛等人的工作，冯玉祥决心推倒曹、吴。他首先同原武学研究会成员、第十五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孙岳秘密联络。再由孙岳联络驻彰德（今河南安阳）、顺德（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久，胡景翼亲自到南苑与冯玉祥面议，并约定将来举事成功，必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指挥奉军向山海关进攻。冯玉祥被吴佩孚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奉命出兵古北口，直趋热河；胡景翼任援军第二路司令，驻通州待命。冯玉祥开拔前，以北京防务空虚为由，推荐孙岳入京担任警备副司令，以为政变内应。10月上旬，山海关一线直军失利，吴佩孚率驻丰台的主力第三师赶赴前线督战。冯玉祥于10月19日在热河滦平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议决班师回京，发动政变。21日，冯率部星夜回师北京，并令驻通州的胡景翼部占领军粮城一带，切断京奉铁路，阻截吴佩孚的退路；命令李鸣钟旅攻占长辛店，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上援军。22日夜，冯军先头部队鹿钟麟部开抵安定门，由孙岳部徐永昌接应入城，分区警戒，并解除了总统卫队及曹士杰部的武装，囚禁了曹锟。23日清晨，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袖章的冯军遍布全城交通要道。随后，冯玉祥决定修正优待清室条件，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北京政变”。

10月24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以及各部将领，在北苑举行会议。为服膺国民革命，决议将参加政变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暂定编为三个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

岳为副司令，分兼第二、三军军长。会后，电请孙中山北上，解决历年南北纠纷，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冯玉祥的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

冯玉祥在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同时，为了笼络皖系借以阻截长江流域直系援军北上，避免军事上的孤立，又把皖系首领段祺瑞请了出来。这个政治上的失策，导致北京政变后的政权仍落入北洋军阀之手[(7)]。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而张作霖也背弃了曾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不仅大军入关，而且亲自进入北京，企图从冯手中夺取对首都的控制权。对此，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提出辞职以为抵制，随即避居京西天台山。段祺瑞为了利用冯玉祥来牵制张作霖，当天退还辞呈，并派人前往挽留。1925年1月3日，段祺瑞下令裁撤陆军检阅使一职，着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哈尔、绥远、甘肃和京兆地区作为国民军第一军的地盘。胡景翼、孙岳则扫荡河南直军残部，向京汉路发展。3月，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并将国民军第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习称“西北军”。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服膺国民革命之举，使吴佩孚恼恨至极。1926年初，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同张作霖取得“谅解”，并伙同山东的张宗昌、李景林直鲁联军，组织了“讨赤联军”，把国民军分割包围起来。冯玉祥为保存西北军的实力，以退为进，于是年元旦宣布下野，把军权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人。但吴佩孚仍与张作霖联盟反冯，奉、直、鲁联合进攻冯军，阎锡山的晋军亦随后加入。3月，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挫败，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均被吴佩孚占领；国民军第三军也被迫撤出天津，退守京畿。4月15日，国民军第一军又被迫放弃北京，退守南口。接着，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向西北的绥远、陕西一带溃退。

冯玉祥下野后，于3月由平地泉动身赴苏联考察，寻求“出路”，同行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及刘骥等人。顾孟馀、于右任以及

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到库伦相会，共同商讨救国救民的方略以及国民军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冯玉祥拥护三民主义及广东国民政府，抵莫斯科的第二天（5月10日）宣布正式加入国民党，并为国民军全体官兵履行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冯玉祥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会见了许多军政要人，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苏联决定给予有力的援助，使他大受鼓舞。

1926年8月，冯玉祥得到国民军南口失利的消息后，立刻从苏联回到国民军驻地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随他同来的有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数人和中国共产党员刘伯坚等。这时，北伐战争正胜利发展，冯玉祥完全接受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主张，他被国民军各将领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于9月17日宣誓就职，史称“五原誓师”。嗣后，他即对国民军进行整顿，加强政治训练。联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部，各军设立政治处，聘请乌斯马诺夫为军事、政治顾问，任命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部长为与西北军各方面有较深关系的原参谋长石敬亭，不久石随参观团赴苏，政治部工作即委托刘伯坚代理一切），邓希贤（邓小平）为中山军事学校教育长，还任用宣侠父、刘志丹、安子文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经过整顿和政治训练，国民军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士气高昂，军事装备上也获得苏联的大量援助。在军事上，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于11月出师，一举击退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部队，军心为之大振，扭转了被动局面。

1927年初，冯玉祥眼看北伐战争已经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以期会师中原。这时，国民政府决定编国民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国民军有较明确的政治目标，纪律严明，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所以进军迅速。5月26日攻克洛阳，30日进占郑州，第二天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

其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并另立“国民政府”于南京，与武汉对峙。而有着夺取更多地盘和更大权力欲望的冯玉祥，这时也迅速倒退了。他巧妙地利用宁汉之争，于6月10日、11日同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又到徐州，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举行会议，决定“清党”、去鲍（罗廷）和宁汉合作、共同北伐两大方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敦促汪精卫等立即驱逐鲍罗廷，彻底反共。他并率先在第二集团军中实行“清党”，“礼送”共产党人离开他的军队，遣送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回国[(8)]。此后，冯玉祥拥戴蒋介石，并于1928年2月互相换帖结拜为兄弟。接着他与蒋、桂、阎三个军事实力派合作，于4月大举北伐攻奉。冯玉祥指挥的部队奋勇北上，不顾重大牺牲，先后攻占山东、河北及北京、天津地区的许多地方，迫使奉军退出关外。但是蒋介石贬抑冯玉祥，除将冯部排斥出山东，还将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军政大权划给了阎锡山，冯玉祥悻悻不平。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冯玉祥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这时，他的第二集团军已发展到拥有三十四个师、二十个旅和十五个团共约三十万人，统辖陕、甘、宁、青、豫、鲁六省，实力强大。蒋介石以裁军建设为号召，召开编遣会议，谋议裁减全国军队。冯玉祥眼看自己的第二集团军将被大量裁减，愤然称病离开南京，到河南辉县百泉村隐居，命令部属加紧整备，以防蒋介石的武力压迫。

1929年春，蒋介石出兵讨伐桂系，力图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和配合，曾许诺以行政院长职和两湖地盘给他。但蒋介石食言自肥，冯玉祥愤懑不已，蒋冯矛盾激化。5月，李宗仁又在梧州通电反蒋，分兵两路进攻广东。冯玉祥决计乘机反蒋，于5月中旬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尽撤鲁西、豫东之兵集中于陕西，以期阎锡山与之合作，会同李宗仁部对蒋实行“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计。同时，第二集团军将领二十八人也联名通电，要求蒋介

石下野。对此，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将李宗仁的桂军击败；另一方面重金收买冯部主将韩复榘、石友三，破坏冯军集结计划；又策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先后叛冯，使西北军发生激烈的分化。5月23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常会作出永远开除冯玉祥党籍、革除一切职务的决议，国民政府又下令查办。面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冯玉祥力薄势单，为保存实力，被迫于5月27日通电下野，息影华山。他权衡再三，不惜冒险，于6月24日偕妻女亲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以谋联手反蒋。但阎锡山却在蒋介石委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衔和二千万重金的收买下，于7月初将冯诱骗到五台县建安村加以软禁。冯玉祥的第一次反蒋，就这样失败了。

同年8月，蒋介石挟战胜桂系、挫败西北军的余威，在南京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强行削减各个地方实力派兵力。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失策，乃于中秋之夜前往建安村亲自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冯玉祥也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双方达成反蒋协议，约定先由西北军发难，晋军随即响应。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于10月10日通电反蒋，兵分三路直指河南。翌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派定五路军出征。就在蒋、冯双方鏖战之际，阎锡山不仅违背诺言按兵不动。还将西北军的军事机密向蒋方报告，且宣布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西北军孤立无援，总司令宋哲元在军事指挥上又有失误，乃于12月1日被迫退回陕西。冯玉祥的第二次反蒋又遭失败。

冯玉祥对蒋介石独揽大权、消灭异己的行径深恶痛绝，甘忍阎锡山的再次背信弃义，于1930年2月又应阎之请入晋共商反蒋之计。阎锡山此时已成蒋的最后目标，为求自保，便极力拉拢各派系反蒋势力。3月9日，冯玉祥由晋返陕，部署兵力，决定调集所有人马分七路出击。3月15日，冯、阎、桂系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领衔发出通电，历数蒋的十大罪状，促蒋自省引退；并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领导反蒋。阎、冯、李4月1日分别通电就职，随即晋军二十万人分六路投入津浦线战

场和陇海线战场；西北军三十万由陕西入豫后，分赴陇海线和平汉线战场作战；桂军和张发奎军三万人分三路进攻湘、鄂，南北呼应。5月1日，蒋介石下令讨伐。于是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是为“中原大战”。大战初期，冯玉祥指挥所部与晋军协同作战，在陇海线打退了刘峙第二军团的进攻；在平汉线，冯军击败了何成濬第六军团；在津浦线，晋军轻取济南。三个战场上都打了胜仗，促成汪精卫等人在北平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另立“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但随之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就加剧起来。

蒋介石在战事一开始，就用尽心计利用冯阎之间的矛盾，先于6月中旬策划了一个“和平运动”，让张学良出面“调停”，在军事上则采取对晋军打垮、对冯军拖垮的方针，并委张钫为招抚使，派出一批人从内部瓦解晋军和西北军。冯玉祥曾欲长驱东进，袭击蚌埠和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但因得不到阎锡山的给养而作罢。后又发动以徐州为目标的“8月攻势”，也因配合作战的晋军行动迟缓而失利。冯玉祥将平汉、陇海两线防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以挽回颓势，但阎锡山却令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以保存实力，冯军难以支持，只得退向豫北。此时，蒋介石对举足轻重的张学良以国家前途相劝说，以高官厚禄相引诱[(9)]，终于使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入关，使得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反蒋战争无法继续下去。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以冯阎的败北而告终。冯玉祥10月15日与阎锡山宣布联袂下野后，寄居晋南汾阳的峪道河，不久息影泰山。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此后，冯玉祥不再直接参加军事反蒋的混战，逐步走上民主派的新历程。

1933年春，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热河全省，接着分兵入侵平、津，5月并进占察哈尔的多伦，深入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华北局势危急，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更为强烈。冯玉祥

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从泰山到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5月26日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与团体的拥护和声援，同盟军迅速发展到八万人左右。6月下旬起，抗日同盟军连战皆捷，先后克服康保、宝昌、沽源三城，并与敌军血战五昼夜后收复察哈尔东北重镇多伦，震动中外。冯的声威大振，继而于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忌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十六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威逼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并于7月28日与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名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兵土匪”、“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31日，北平当局命令断绝平绥铁路交通，同盟军处于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粮弹断绝，军费开支无法筹措，伤兵不能外运医治，加上内部有一部分将领发生动摇，有的被蒋介石收买。冯玉祥一筹莫展，处境十分困难，被迫于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

冯玉祥重返泰山后，继续努力读书，聘请李达、邓初民、陈豹隐、范明枢等著名学者、教授，先后到泰山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中国社会问题等。他学习非常认真，每天保证七个小时读书，听讲都做笔记。此外他每日还苦学英文。

1935年，日军加紧侵略华北，策划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运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冯玉祥为团结抗日力量，抵制不抵抗主义，拟定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十三条意见电告南京，并出席11月举行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与李烈钧等二十余人提出一个《救亡大计案》，获得通过。该提案包括：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大赦政治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起用抗日将领，充实军备等九条。同年12月，冯玉祥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衔，但有较高的名位，冯玉祥利用这个身份到处演讲，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救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冯玉祥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获得通过。此后，国民党逐步转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冯玉祥旧部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冯玉祥通电旧部将领，努力“抗敌守土”，“以保千万年之光荣历史”[(10)]。“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冯玉祥受命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淞沪抗战。但是蒋介石独揽大权，常常直接向前线各军以至师团下达命令，前方将领多不服从冯玉祥的命令。冯玉祥十分气恼，未及两月即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交由蒋介石担任，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蒋介石同时又任命萧振瀛为第一集团军总参议，唆使萧振瀛在前线挑拨宋哲元、韩复榘、冯治安等将领与冯玉祥的关系，使他无所作为。10月冯玉祥被调回南京，第六战区亦被撤销，此后仅挂有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等空衔。冯玉祥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消极，曾动员旧部将领回乡组织地方抗日武装[(11)]，自己也利用视察国防工事机会，亲自到河南各地宣传抗日，号召青年参军支援前线。在武汉时，他和共产党人经常接触，赞成中共的抗日主张，赞许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抗日精神；约请作家老舍、画家赵望云等二十多位著名文化人士住在自己的办事处，创办《抗到底》半月刊和《抗战画报》，大力宣传抗战。他自己出资创办“三户图书社”，出版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三户”是引用《史记·项羽本纪》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表示抗战必胜的信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冯玉祥住在重庆，对于国民党内的悲观失败主义和妥协求和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满腔热情地到处演讲，鼓励人民团结抗战，还到各处巡视军人生活，检阅新兵，视察军事设施等等。当蒋介石等人制造一次又一次反共摩擦时，冯玉祥则呼吁“精诚团结，抗战到底”。他借古说今，讲“桃园三结义”力量

大，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

冯玉祥坚持团结抗战的言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力量的高度赞扬。1941年11月，冯玉祥六十寿辰，重庆《新华日报》为其出祝寿专刊，进步文化人士纷纷撰写诗文，周恩来也亲自撰文誉冯玉祥“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冯玉祥在政治上遭到蒋介石的排挤，决定到国外去开辟反蒋的新战场，乃接受蒋介石所委“考察水利专使”名义，于1946年9月去美国，定居旧金山附近的柏克莱镇。他在旧金山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发动华侨在美国人民中开展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宣传活动。

1947年10月，冯玉祥应邀去纽约，在王昆仑、赖亚力等人协助下，于11月9日正式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被推选为主席。“联盟”为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而开展积极的活动。针对国民党特务的造谣破坏，冯玉祥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到各大学和团体去讲演，发表文章，甚至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从各方面揭露蒋介石政府贪污腐败、反动独裁的种种罪行，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的“援华”贷款及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同年12月，美国国会拟通过一项紧急“援华”六千万美元的议案，拨款委员会调查小组请冯玉祥出席作证。冯以大量具体事实列举蒋介石统治集团贪污舞弊的种种手法。结果，拨款委员会将六千万美元削减为一千八百万美元。冯的活动激怒了蒋介石，12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其“考察水利专使”职务，限令回国，并断绝他的经费拨付。冯玉祥当即召开记者招待会，予以揭露斥责；并决定以“政治难民”身份留居美国，继续坚持斗争。

1948年元旦，李济深等人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

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驻美代表。蒋介石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冯玉祥进行政治迫害，继罢官、停薪后，又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串通美国政府吊销其护照。美国政府对他也屡加威迫和利诱。有一美国官员向他说：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决不能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助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又说："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冯玉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断然拒绝美国政府的利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此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冯玉祥决定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于7月底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开美国。9月1日，轮船在敖德萨附近的黑海上突然起火，冯玉祥不幸遇难。

周恩来在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会上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高度概括了冯六十六年的复杂经历。

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的骨灰安葬于泰山脚下。

---

(1)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2) 冯的原配夫人刘德贞于1923年12月病故。1924年2月，经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砥泉介绍，与李德全在北京南苑结婚。

(3) 滦州起义失败，冯玉祥在海阳被监禁了四天后，被递解回籍，途经北京时，在京防营务处任职的陆建章便将他留下。

(4) 孙嘉会：《冯玉祥小传》，北平戊辰学社1933年版，第50页。

(5)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北平版，第29、31页。

(6)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45页。

(7) 冯玉祥后来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说：一时只看见了军事上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上的后果。……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即如由于这个临时动议（指请段祺瑞出山），竟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我的生活》，第406页）

(8) 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之前，基本上是倾向革命的，特别是在他从苏联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他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军控制的陕甘地区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一部分军官向他反映：农民拒绝交租，农民协会在共产党支持下，未经地方军政长官准许，擅自捕人、杀人等等，引起他的不满。对此，刘伯坚等曾向冯作过解释工作。郑州会议期间，经过国民党右派的煽动，勾引起他对共产党的不满。这时，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工农运动，认为："中国为产业落后之国家，全民族皆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之下，……全国并无阶级可分，斗争者何？"（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他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9页）。冯历来受军阀思想的影响，从"军事第一"出发，此时为了解除奉鲁的军事压力，保住西北军在华北的地盘，便极力撮成宁汉合流，共同"北伐"。不过，他在"清党"时，并不像蒋介石、汪精卫那样欲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而是"礼送"出境；对待苏联顾问，也留有余地，希望能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

(9) 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特任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把收编华北反蒋部队的权利给了他，又把天津、河北、青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他，并引进东北军集团的成员到南京中央机构去当官，如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次长等。

(10) 冯玉祥：《冯在南京第二年》，三户图书社，1937年版，第142页。

(11) 如介绍给河南省主席程潜的魏风楼、宋子贤，即被委为豫中支队司令和豫东支队司令。其旧部军长田金凯则在原籍漯河开展地方抗日武装活动。再如介绍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孟昭进，回山东章丘原籍任支队司令。他们都有地方武装基础，又和共产党很好合作，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有力的打击。

冯占海

霍燎原

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11月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四）生于辽宁省义县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村内读私塾八个月后即给人家放猪。1917年参加东北军当兵，1919年到沈阳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的排长、连长、团部副官、营长等职。1925年升任东北陆军六八二团（即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东北易帜后，于1930年加入国民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广大东北人民及其所部官兵纷纷要求抗日的推动下，他基于爱国思想，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率队奋起抗日。9月下旬，日军占领吉林后，汉奸熙洽以师生关系[(1)]三次派专人持亲笔函劝冯占海降日，诱以高官厚赏，胁以抄家进剿，均被他严词拒绝。他痛斥劝降人说：“占海身为中国军人，只知效命政府，生命当早置之度外，况身外浮物之家产乎！本人只知有国，凡有反抗政府者，决以全力周旋，虽亲友均不顾。”[(2)]随即向吉林省各县发出抗日通电，声讨日寇“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和熙洽“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罪行，表达“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战到底”，“克尽保卫国土”的决心[(3)]。他率队从永吉出发，绕经桦甸、蛟河、舒兰，进入五常。11月，接受吉林省临时政府的委任，宣布就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职务，并将所部卫队团和沿途吸收的爱国群众及绿林出身的宫长海、姚秉乾等抗日义勇军，共一万五千余人，编成吉林省警备军。此后，冯部转战于哈尔滨、方正、榆树、五常、吉林、长春等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歼灭了大批日伪军，收复了一些失地。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援。

1932年1月，日伪军进犯哈尔滨，冯占海会同东北陆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联合驻守在哈尔滨及其附近的丁超、邢占清、赵毅等部，共同守卫哈尔滨。1月下旬，各部抗日军在上号、三棵树、南岗等地保卫战中获胜，歼灭大量敌人，迫使伪军于琛澂部向阿城败退。随即，各部抗日军组成吉林自卫军，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2月初，冯占海所部宫长海、姚秉乾二旅向榆树方向进军，行至双城团山子时，遇到了日伪军的截击与包围，损失很重，情况危急。冯占海率大队赶来助战，予敌军以反包围，毙伤敌军千余人，使战局转败为胜。正拟乘胜进取，不料友军失利，双城、哈尔滨相继失守，冯部腹背受敌，遂向方正一带撤退。

3月末至4月初，冯占海率队在方正、会发恒等地与敌军展开争夺战，在击溃伪军于琛澂部后遭到日伪军的联合围攻，乃退守大罗勒密。4月中旬，吉林自卫军总部在依兰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会后，冯占海挥师西进，连克方正、会发恒、宾县等处，进逼哈尔滨东郊，前后共毙俘敌人四千余，击落敌机两架，大大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抗战热情，队伍猛增至三万余人。但另两路收效不大。

6月，冯占海部自卫军在宾县召开会议，决定脱离吉林自卫军系统，改名为吉林抗日救国军，推冯占海为总指挥，制定了“坚持抗战到底”、“收复吉长、捉拿卖国贼熙洽”、“不扰民”、“至死不投敌”等七条“抗战公约”[(4)]，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激发斗志。会后，冯占海率队向哈尔滨反攻，在香坊附近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因伤亡较大，转向榆树、五常进军。经过多次战斗，于七八月间连续收复了拉林、榆树、五常等集镇。其中双榆、青山堡一役，采取迂回战术，一举突破伪军防线。直捣日军旅团指挥所，毙俘日伪军一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收复榆树、五常后，队伍又有很大补充，人员增至四万余名，并在山河屯建立了五常县临时政府，帮助当地发展了大刀会等群众抗日力量。

同年秋，吉林抗日救国军又乘胜进逼吉林、长春。9月中旬，宫长海等旅围攻吉林，一度攻至吉林西郊温德河、小白山附近，使日伪宣布吉林全城戒严。与此同时，赵维斌等旅也攻至长春北的布海、米沙子等地。这些军事活动，震动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使正在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的日伪头目们受到了直接威胁。在他们心目中，冯占海率领的吉林抗日救国军是一支“强有力的反满军”[(5)]。

由于蒋介石继续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压制的错误政策，日寇得以全力放手进扑；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本身也有各自为政、胜骄败馁等错误，因而自1932年冬季开始，东北的抗日战局趋向低潮。冯占海感到兵力疲惫，弹药缺乏，给养困难，孤立无援，产生率队进关的想法。在日军节节进逼下，他未能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而想取得国民党政府接济以扩充实力，遂于当年冬率队撤离了抗战第一线，向热河方向退却。退兵途中，由于得到沿途爱国群众和其他抗日义勇军的支援，一度攻克了长岭县城，击毁了四洮线上的一列日军装甲车。但沿途因受到日伪军的堵截和袭击，使部队遭到相当损失，当1933年1月到达开鲁时，部队只剩下两万人。

到热河时，冯占海被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委任为第六十三军军长兼九十一师师长，并于1933年二三月间，率队参加了保卫热河的战斗。失利后，经赤峰、围场等地，辗转退入关内。但冯部救国军被蒋介石、何应钦视为土匪不予收容，于是他转投主张抗日的冯玉祥[(6)]。

1933年5月27日，冯占海在张家口就任冯玉祥所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四路总指挥职，次日发出通电称：“痛国家之阽危，愤强敌之凭陵，矢志救国，义无所顾。”[(7)] 所部驻守蔚县、怀来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的压迫加剧，6月3日国民党中政会责成华北军事当局对此就近查察。接着国民党一些省市党部纷纷通电反对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面对这种形势，冯占海接受了张作相的建议，率队脱离抗日同盟

军，转投何应钦，6月5日致电北平军分会表示服从国民党当局的指挥。旋奉命移驻河北高邑、内丘、元氏、临城等县。冯部改编后，国民党在该军内设置军训处，加强控制，打击军队内部的爱国进步力量，不准冯占海扩充实力。对1933年初张学良委任的第六十三军军长兼九十一师师长的任命，国民党政府拖了一年之久才正式发表，到1936年又撤销了六十三军的番号，只保留其九十一师建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冯占海率部奉命调去防守河北永定河一线，在固安、雄县等地与日军对峙。后战线被日军突破，兵力损失近半，遂退至河南尉氏、郑州、开封等地进行整编。不久，调到漯河、确山一带驻防。这时冯占海兼任漯河警备司令与平汉铁路郑州信阳段的护路司令。

1938年秋，冯部被调至江西永修、马回岭、星子等地，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下对日作战。冯部在德安战役中，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伤亡惨重，二七一旅旅长王锡山也不幸阵亡。战后，冯占海被解除军权，只挂名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冯占海大失所望，于1939年春携眷到云南昆明，经营旅店业。抗战胜利后，冯占海由云南迁居北平，继续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任北平兴业公司董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占海热爱祖国，积极认购公债，带头捐款支援抗美援朝，于1950年被选为北京西城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同年8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9月被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冯占海迁居长春，相继被选为吉林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8年10月，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病逝于长春。

主要参考资料

冯占海：《吉林省抗日义勇军成立后的战斗》，《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

李树棠：《冯占海部在“七七事变”后抗日战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刘化南：《吉林抗日自卫军义勇军的兴起与瓦解》（未刊稿）。

高品三、高尊三等人访问记录。

---

(1) 冯占海在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期间，熙洽曾为该讲武堂的教育长。

(2) 冯占海：《吉林军抗日简略战史》，见暨南影片公司电影画报“东北义勇军专号”，1932年12月版。

(3) 冯占海：《“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抗日作战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版，第24页。

(4)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33页。

(5) ［日］“满洲国史编纂发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年出版，第314页。

(6)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71年出版，第164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9辑，中华书局，1981年8月出版，第97页。

冯治安

吕乃澄

冯治安，字仰之，直隶（今河北）故城县人，生于1896年12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其父冯元玺，热心兴学办塾。冯治安自幼随父就读，勤谨好学。他深感祖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慨然叹曰："大丈夫当效班定远、岳武穆之立功报国，挥戈救民，岂能逸居乡里哉！"(1) 立志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改名治安，志在治国安邦。

1912年3月，左路备补军第二营营长冯玉祥到河北景县一带招募新兵，冯治安前往投效，先为伙夫。翌年冯玉祥部扩编为京卫军第一团，他编在该团第二营为哨兵。他勤勉好学，待人宽厚，肯多做事，不辞劳苦，常对人说："多做，多学，多见闻也。"(2)

1914年冯玉祥部调入陕西后，扩编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在全旅中选拔优秀青年一百三十人组成模范连，冯治安入选。他学习努力，训练刻苦，不久被提升为排长。1916年，他又在护国战争中立功，被提升为连长。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治安提升为学兵营营长。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事中发动北京政变，建立国民军，冯治安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卫队旅旅长，驻兵于丰台附近。其时英国侵略军闯入挑衅，冯治安严密防范。英军见中国军队警戒严密，无隙可乘，不战而退。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控制北京政权，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在张家口成立督办公署。冯治安卫队旅随冯进驻张家口后，奉命与张自忠部共同建筑模范新村。新村占地五顷，有贫民图书馆、高级军官

补习所、大操场、俱乐部等，还有五座西式小平房，围着一座大讲堂和大饭厅，成为冯玉祥培训军政干部的重要场所。

1926年春，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以“反赤”为名围攻国民军，4月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8月南口大战又失利，被直军追击到宣化南面的山地上。冯治安卫队旅扼守一座小庙，与敌激战三昼夜，直军迫其缴械，冯治安坚定地回答：“冯玉祥的队伍没有缴械的。”[(3)] 后来乘夜突围退走。随后，冯治安率部与国民五军配合，攻克阳高、大白登，歼灭了晋军两个混成营，再分路围攻浑源、应县之敌，占领雁门关以北地区。

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重整军备，扩大编制，卫队旅扩编为师，冯治安升任为师长。不久，该师由五原移驻平凉，12月上旬又进驻西安。其时北伐军在湘、鄂、赣、闽大捷，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节节溃退，形势骤变。1927年5月1日，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治安升任第十四军军长，率部移驻河南确山，后又开赴信阳。同年9月，叛吴投冯的靳云鹗，又与张宗昌策划夹攻第二集团军。冯治安与孙良诚、韩德元等各部配合，击败靳云鹗部。冯玉祥应第二十三军军长秦德纯的请求，把冯治安与秦对调，秦德纯任第十四军军长，冯治安任第二十三军军长。

1929年1月南京编遣会议以后，冯治安进入陆军大学学习。他回部队后，正值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爆发，冯治安部先在郑州以南的平汉线上作战，后调去增援张维岳部。蒋介石部队占领济南后，重点进攻平汉线，发起郑州会战，首先袭击西北军的后方，致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冯治安及田金凯、任应岐等部在新乡一带被重重包围，战斗失利，最后被迫向蒋军缴械。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的残部接受张学良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由宋哲元出任军长，冯治安任第三十七师师长。第二十九军在晋南驻地，克服缺饷缺枪械的困难，坚持刻苦训练，“九一八”事变后更以日

本侵略军为演习的攻击目标，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又进攻热河。第二十九军奉命到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布防。3月初，日军继续攻击我长城各要塞。第二十九军编为第三路军，以张自忠为前敌总指挥，冯治安为副总指挥，星夜奔赴喜峰口、罗文峪一带迎击敌军。冯部第三十七师于3月9日夜抵达喜峰口，奋勇冲杀敌军，暂时稳定了战局。10日和11日黎明，日本侵略军又以步、炮、空军配合向我军猛攻，冯治安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坚守了阵地。11日午后，冯治安和张自忠、秦德纯等商讨作战部署时，冯治安主张抽调两个团绕道出关，夜袭日军阵地，乃决定当天黑夜行动。旅长赵登禹率两个团分别出潘家口和董家口，绕到敌人左右背后，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高地上的炮兵阵地，正在酣睡的敌人被我军大刀砍得鬼哭狼嚎，抱头鼠窜。结果杀敌千余人，缴获的坦克、大炮等无法运回，一律焚毁。敌之增援部队又被我军阻击，伤亡惨重。此后日军多次反扑，终未得逞，至16日被迫退去。喜峰口的胜利，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赞誉，冯治安等第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获得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

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治安表示拥戴。当时何应钦命令庞炳勋率部进攻同盟军，宋哲元召集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秦德纯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如果庞炳勋胆敢进攻冯先生，第二十九军即以全力消灭庞炳勋部。"[(4)] 会后，冯治安与秦德纯去见庞炳勋予以警告，迫使庞部停止了进攻。8月同盟军在蒋介石压迫下解散，冯玉祥引退，宋哲元接任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进驻察省，冯治安率第三十七师屯驻张家口一带。

1935年夏，冯治安率部到北平城内外驻防，派何基沣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以防日军和汉奸的袭击。是年冬，何基沣旅击溃刘桂堂匪部的窜扰，1937年2月又剿灭了企图西窜的冀东"民团"三千余人，并活捉了三个日本人。

当日本加紧策划“华北自治”阴谋之际，宋哲元于1935年12月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冯治安于1936年11月接任河北省主席，仍兼第三十七师师长，第三十七师的防务责任加重。1937年5月，宋哲元为抵制日本的逼迫，避往山东乐陵原籍，行前把军事交给冯治安指挥，军长公事也由冯代管。其时，驻丰台的日本侵略军加紧演习，企图制造事端。冀察当局对日军实弹射击毁我民房的行径，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冯治安命令驻守官兵严加防范，并在卢沟桥一带增配兵力，北平各城门也增派流动岗哨，以防日军的突然袭击。

7月7日夜10时许，从日军演习地方发出一阵枪声后，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二一九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我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办法，冯当即指示：“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5) 8日凌晨4时50分，正当中日双方代表在宛平城里谈判时，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日军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冯治安与秦德纯、张自忠等紧急会议，冯积极主战，获得全体的赞同。8日下午，宋哲元从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冯治安于当晚下反攻命令，午夜，第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从长辛店调来第二营，与第三营配合，首先截断日军的后路，并组织大刀队夜袭龙王庙和铁路桥上的日本侵略军，大获全胜，坚守了阵地。当时日军兵力单薄，害怕被歼，立即派人疏通，答应撤兵，因而全面反攻命令没有执行。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当天又致电南京何应钦，除报告反击日军战况外，还表明决心：“彼方要求须我方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现仍在对峙中，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6) 冯治安还下令北平各城门紧闭，派兵扼守，各重要路口都堆

积沙包，随时准备消灭入侵之敌。

冯治安指挥第三十七师奋勇抗日，获得全国广大军民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援。中共中央7月8日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热烈赞扬"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7)]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战地服务团，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救护伤员。在全国同胞的声援下，第三十七师一一〇旅的全旅官兵，在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亲临前线指挥下，浴血奋战，以劣势的装备多次粉碎日军猛烈炮火的进攻。在二十多天的战斗中，死伤官兵千余人，仍然固守宛平城。

但是，日本侵略者提出所谓"就地解决"和"不扩大方针"的缓兵之计，愚弄和欺骗了第二十九军的某些高级将领，贻误了战机，致使全军没有主动出击，陷于被动挨打，坐待日军调集优势兵力对北平城实行包围。直到日军发动全面攻击时，才仓皇应战，虽曾在廊坊、丰台等地一度获胜，随即又被日军击退。7月28日，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南苑，继以坦克和炮兵配合进攻，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同一天日军又攻占了清河镇等地。宋哲元见大势已去，星夜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离开北平赴保定。第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于29日奉命从卢沟桥、宛平、西苑等地撤退，开往涿州、良乡一带布防。

7月30日，宋哲元在保定致电蒋介石，托病请假，并荐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旋即获准。冯治安即率第二十九军开往唐官屯、马厂一带集结，军部移驻河间，担任津浦线上的防务。8月中旬，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和第七十七军军长。

9月初，日本侵略军向津浦北段发动进攻，第七十七军在冯治安的直接指挥下，以阵地战配合游击战打击敌人。第三十七师二十五旅

在静海县周围阻击日军，其中第六五七团与日军激战五昼夜，在争夺阵地中四出四进，全团二千四百多人只剩下七百多人，退到县城以南，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开展游击战争；第一一一旅向闸口和流河镇的敌军发动猛烈进攻，夺取了日军两个重要阵地，痛击日本侵略军。第一三二师的官兵组织大刀队，夜袭日本侵略军。9月中旬宋哲元请假赴泰山休养，由冯治安代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与日军苦战一个月，以重大的牺牲阻止日军南进。10月中旬，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撤至大名，冯治安被任命为第十九军团军团长。

10月下旬，宋哲元回到大名总司令部，调动主力部队进攻邢台，冯治安对宋哲元的指挥不满，愤而托病请假前往开封疗养。直到1938年3月，宋哲元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冯治安才回部队，率第十九军团在黄河北岸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不久，冯治安率第七十七军开往徐州附近，编入第五战区，与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防守沿津浦铁路临城至台儿庄一线。3月底至4月初，孙部在友军配合下，与日军激战获胜，反攻时把敌军驱逐到峄县、枣庄一带，固守待援。5月间，冯治安率部向青町、蒙城间攻击，断敌后路。徐州会战后，冯治安率部撤退到平汉线上，阻击日军西犯，掩护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在武汉保卫战时，冯治安率第七十七军参加大别山北麓的正面战斗，在向侵占六安、霍山的日军扰袭两星期后，于9月中旬开往油坊店、鲢鱼山一带，构筑阵地，阻敌前进。武汉保卫战后，冯治安第七十七军、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和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合编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任总司令，冯治安任副总司令。

日本侵略军为了解除随县、枣阳地区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困扰，于1939年5月发动随枣战役。中国军队采取机动灵活的积极防御，张自忠的右翼集团军部署于襄河一带，阻击日军北上和渡河。5月1日，日军以第十六师团为主力，沿大洪山、襄河地区向枣阳推进，当天夜晚，冯治安指挥襄河两岸部队，及时调整部署，命令第一三二师承担

河防任务，其余部队立即渡河修筑第二线阵地。从2日起，日军第十六师团调动装甲战车，以空军配合，向第七十七军防御阵地进攻，轮番轰炸，中国军队虽然奋勇抵抗，但因伤亡惨重，未能阻止日军前进，致使枣阳于8日陷落。张自忠、冯治安率部发起反攻，9日，第三十七师克复丰乐河、清水桥一线，第三十八师击退耗子岗附近日军的进攻，第一三二师切断了长寿店以南的通道。日军怕后方的补给线被切断，立即把主力部队撤回，使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得以撤出日军的包围圈，由内线转为外线，对日军实行反包围。从15日起，我军不断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至20日先后收复了新野、唐河、枣阳、桐柏等地区，迫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地。这次随枣会战以日军的败退而结束。

同年冬，第五战区发动冬季攻势，袭击襄河东岸的日本侵略军，张自忠、冯治安指挥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是主力部队之一。他们利用近战、夜战、肉搏战，攻占了罗家陡坡敌人的阵地，夜袭观头敌人的驻点，绕道三十里外偷袭敌军驻钟祥县的总指挥部，都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沉重打击了襄河东岸的日本侵略军。

1940年5月，第三十三集团军在枣宜会战中，承担襄河河防的重要任务，前沿阵地伸延到襄河东岸。2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由钟祥北进，向我河东阵地发动猛烈的攻击，我军虽然奋勇抵抗，阵地仍先后被日军攻破。6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奉命渡河督战，行前致书冯治安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人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8)] 把襄河西岸的部队交给冯治安指挥。张自忠率部渡河后英勇奋战，于16日以身殉国。冯治安接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在保卫宜昌的战斗中，于6月3日率部向敌军反攻。

此后，冯治安统率第三十三集团军将士转战鄂西地区，奋勇抗击

日本侵略军。1944年冬国民政府重划战区，冯治安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担任长江沿岸的防守任务，守卫抗战大后方的大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6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治安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由于冯治安和第三十三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原系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蒋介石并没有因为他们英勇抗战而予以重用，反而加以排挤和压制。早在1940年，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三个军被缩编为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1944年冬，又把每军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骑兵师也取消了。因此，将士们普遍感到军队越编越少，前途暗淡。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治安率第三十三集团军奉命开赴徐州，不久编为第三绥靖区，冯任司令官。设指挥所于贾汪，由副司令官何基沣指挥，驻守韩庄至台儿庄的运河地区。冯治安为了保存实力，利用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与共产党的关系，尽量避免与人民解放军正面冲突，以致在徐州东北一带相安三年之久。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节节败退，到1948年秋，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又被人民解放军击破。蒋介石为保卫南京外围，将有限兵力集中在徐蚌地区，部署战略决战。冯治安甚为恐惧，他对何基沣说：“‘剿总’要以四十万大军沿津浦路北上，要我们打头阵，这不很清楚吗？不论谁胜谁败，反正我们先完蛋！”[(9)] 他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可是又怕丧失既得利益而拒绝起义，只是对张克侠、何基沣的策反未及早告发，也没有断然处置部队中倾向进步的官兵，这样，在第三绥靖区内部经过一番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两种势力终于分道扬镳了。在淮海战役开始之际，张克侠和何基沣于11月8日在贾汪的运河前线上，统率约二万人起义，为解放大军长驱直入开辟通道；旋即向曹八集方向前进，切断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西撤的退路，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冯治安获知部队起义后，痛哭流涕，只身坐上吉普车，向“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请罪，遭到软禁，旋被押送南京。蒋介石为稳定他的残余部队，未予惩办。1949年1月，冯被任命为京沪

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他如履薄冰，一切听从总司令汤恩伯的摆布。

冯治安撤至台湾后，先后任“国民大会”代表、“战略顾问”和“大陆光复设计委员”等闲散官职。

1954年1月9日，冯治安病逝于台湾。

---

(1) 王国栋：《陆军上将冯治安将军事略》，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第188页。

(2)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3) 秦德纯著：《秦德纯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41页。

(4) 张俊声：《宋哲元与抗日同盟军》，《“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页。

(5) 蒋星德：《冯治安将军关于“七七”事变的回忆》，《团结报》1984年7月7日。

(6) 《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致何应钦电》，见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142页。

(7) 《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致何应钦电》，见《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235—236页。

(8) 党德信、杨玉文编：《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9) 何基沣：《运河前线起义》，《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冯自由

陈民

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建华，广东南海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1] 生于日本横滨。父亲冯镜如早年侨居横滨，开设“文经商店”，经营外国文具兼印刷业。冯自由幼时曾被送回国受教育，十三岁又返回横滨。

1895年9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东渡日本，抵达横滨访问冯镜如，聚同志十余人，商议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推举冯镜如为会长。冯自由获准加入兴中会，时方十三岁[2]，以其年少勤快，负责各国同志之通讯。

冯自由于1896年就读于东京天主教办的晓星学校，学生多为欧美籍，他受到种族主义的欺凌，一个学期未完即自动退学。1897年进入冯镜如与横滨中华会馆同人创办的华侨小学。这所华侨小学，初被孙中山命名为“中西学校”，聘徐勤为校长。徐系康有为弟子，以其师素倡大同之说，遂改校名为大同学校，倡言变法，也重视爱国观念的启迪。冯自由在两年里颇受影响，曾自撰楹联：“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悬挂于书房；又作《爱国歌》申述抱负；“懋龙少年多奇气，折矢誓拯神州弱。每闻时事怒冲冠，要把强夷一撄缚。”[3]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日本，造访冯镜如，倡言保皇，冯镜如遂由革命转为保皇，但冯自由不为所动。翌年，冯自由转入东京大同学校。此校为梁启超创办，康有为对该校多加干预，并排斥“平等、自由、独立、自主”等新名词。冯自由愤愤不平，毅然将原名懋龙改名“自由”。1900年初，与同学郑贯一等合作创办《开智录》旬刊，阐扬自由、平等新思想。该刊风格独特，立论新颖，文字浅显，

颇受各地华侨欢迎。冯自由曾撰长篇爱国小说《贞德传》，在该刊连载。因该刊随保皇派的《清议报》发行，在保皇派的压力下半年后即被迫停刊。

冯自由在1901年转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政治科。是年春，报载清廷割让广东给法国的传言，冯自由与广东留日学生王宠惠、李自重、郑贯一等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倡言广东当局向清廷宣布独立。对此，孙中山表示支持与鼓励。广东留学生从此开始了与兴中会的合作。5月，冯自由又与留日学生秦力山、张继、王宠惠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宣传反清革命。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倡言革命的最早刊物，惜因资金不足，只出版了四期，即告停刊。

1902年冬，冯自由回广东与香港富商李煜堂之女李自平结婚。翌年，夫妇一起返日，冯受聘为香港《中国日报》驻日记者。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赴檀香山，命冯自由负责兴中会在日本的各项活动。1904年，他经孙中山介绍任三藩市（即旧金山）《大同日报》驻日通讯员。

当孙中山由欧美抵达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时，冯自由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1905年8月，孙中山以香港地位重要，命冯自由赴港，负责组织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为陈少白，冯自由任书记兼《中国日报》记者。次年，《中国日报》陷入经济困境，冯自由请其岳父李煜堂出资五千元，预购该报发行权，以免被拍卖；然后再由李煜堂与李纪堂、吴东启等投资入股，全面改组，采取独立经营方式，继续发行，冯自由被举为社长兼总编辑。1906年冬，同盟会香港分会改组，冯自由继陈少白任会长，直接策动与间接参与西南历次武装起义、筹划暗杀清吏以及购运枪械弹药等重要活动，并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

1910年夏，冯自由赴加拿大温哥华，应聘主持《大汉日报》笔政。当时，保皇党在域多利（即维多利亚）办有《日新报》，鼓吹保

皇。冯自由主持《大汉日报》后，致力驳斥保皇谬论，鼓吹反清的革命宗旨，与《日新报》展开论战。同时，他还兼三藩市《大同日报》撰述。

1911年初，孙中山赴美洲筹款抵达温哥华，受到洪门及华侨的热烈欢迎。冯自由与孙中山相继讲解洪门历史及其宗旨，他还乘机提议设立洪门筹饷局，又商得孙中山同意，建议各地洪门变卖房产支援革命。同年4月，同盟会加拿大支部成立，他被举为支部长。10月，武昌起义，冯自由受同盟会、致公堂、洪门筹饷局三大团体之推举，以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身份，于11月回国参加革命政府的组织工作。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冯自由任总统府机要秘书。不久，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冯自由经孙中山、黄兴推荐，任临时稽勋局局长，北上就职。

1913年春，北京政府参议院选举议员，海外华侨各团体所派代表一百八十多人齐集北京，冯自由奉国民党总部之命出面接待，并组织华侨联合会，被推举为会长。7月，二次革命在南方爆发，冯自由将稽勋局的表册、档案全部秘密运往上海，保护了这批宝贵的革命文献资料，后来他撰写革命史即多取材于此。冯自由随即被袁世凯逮捕入狱，五日后获释，南下上海到香港。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冯自由拥护孙中山之主张。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冯自由任党务部副部长（部长为居正）。不久，他奉命赴美洲联络同志推进党务，筹募讨袁经费。翌年，任国民党美洲支部长兼办《民治杂志》。同时还任中华民国公会（原为致公堂）总会长。

1916年，冯自由应孙中山电召，赴日襄助党务协调工作。是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国会，冯自由以华侨身份，当选参议院议员。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倡导护法。9月，冯自由出席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的非常会议，建立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他于出席非常会议外，兼出入元帅府及党部，参与军政大计。

1918年，桂系军阀莫荣新与国会议长吴景濂等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辞职去沪，冯自由于次年去香港闭门教子女诗书。1922年北京国会恢复，他北上揭露杨永泰贿选。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冯自由拒当“猪仔议员”，回到广州，设民治通讯社，进行反对北京政府的宣传。10月，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冯任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冯自由与张继、邹鲁等反对与共产党合作，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冯自由坚持己见，离粤赴沪，并联络同好。1925年3月8日，他伙同张继、朱卓文等在北京组织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坚持反对国共合作，从组织上分裂国民党。3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开除冯自由党籍[(4)]。

之后，冯自由从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的撰著，半年后由其自设于上海的“革命史编辑社”出版。1928年，以李煜堂为董事长的上海新新公司开张，冯自由受聘为该公司总经理，从事商业活动。

1933年，冯自由被聘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重返政坛。1935年，由立法院长孙科等提议，国民党恢复冯自由的党籍。此后，他并未参与政务，主要从事辛亥前后革命历史之撰述。1936年至1938年间，在《逸经》、《大风》杂志发表《革命逸史》连载。抗战期间，冯自由先后迁居香港、重庆，1943年列名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返上海，续撰《革命逸史》。1948年冬迁居香港，续编国民党的《革命史》。1951年前往台北，翌年被蒋介石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8年4月6日，冯自由因脑溢血于台北逝世[(5)]。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史话》、《华侨革命组织史话》等。

---

(1) 关于冯自由的出生日期，诸多记载不一：简又文在《冯自由》传中记为“光绪八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西历1882年11月13日”（《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1971年版，第162页）。按清光绪八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换算西历应是1883年1月31日；而西历1882年11月13日，则应是清光绪壬午十月初三。二者换等均不对。台湾学者蒋永敬记冯的生日“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三日（1882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二册，台北1988年版，第506页）。按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应是西历1882年12月22日。［美］包华德主编《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二卷第30页，记冯自由出生于“1881年6月”。台北《中央日报》根据报社资料，记冯自由生于“民前三十年”，即1882年（《中央日报》1985年4月7日第一版刊载冯自由逝世新闻报道）。查阅冯自由本人多处自述，他生于1882年，具体月、日则未见记载。本文从他本人自述。

(2) 冯自由多处自述：“余时年十四”、“余年甫十四耳”，系循习按虚岁算。

(3) 简又文：《冯自由》，载《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1971年版，第163页。

(4) 戴均良：《开除冯自由党籍时间的订正》，《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318页。

(5) 台湾《中央日报》1958年4月7日第一版。

傅抱石

倪波　沈道初

傅抱石，字瑞麟，1904年10月5日（清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于江西南昌，原籍江西新喻。父亲以补伞为生，家境贫苦。七岁时他父亲去世，母亲靠帮人洗衣、补伞，过着清贫的生活。傅抱石少时天资聪敏，在南昌公立模范小学读书时，成绩优异。1919年小学毕业，被保送进了江西第一师范学校。傅抱石从童年时代起就爱好雕刻、书画。他家附近的街上有雕刻店、裱画店、小书店，他常去观看，增添了对绘画、雕刻的浓厚兴趣，开阔了眼界。小书店的主人看到他刻苦、勤奋，便借书给他看。傅在第一师范上学时，为了求得篆刻上的技艺指导，课余常去刻字店观摩学习。因为生活贫苦，他在上学期间即以刻图章谋生。他刻的图章数量多，功夫坚实，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些声誉；1923年毕业时，已刻成几本《印存》。学校因他篆刻和绘画成绩优秀，留他当美术教师。

此后，傅抱石致力于国画传统技法的学习和探究，对石涛、石谿及宋、元、明、清名家画本反复临摹。但他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分析，有所选择，有所追求。他的艺术才能很快提高。1932年徐悲鸿到南昌游览时，看到了他的习作，非常赞赏，认为他很有艺术才能。从此，他得到了徐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其最早作品创作于1933年，就是钤有“新喻傅瑞麟”印的四幅条屏：《竹下骑驴》、《松崖对饮》、《秋林水阁》、《策杖携琴》。这个阶段是他广泛学习祖国艺术传统的时期。

在江西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傅抱石在一枚手指头大小的图章上面，刻了一千多字。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得知此事后，很器重他，1933年以公费送他去日本留学。他进入日本帝国美术学校，刻苦

努力，成绩卓著，画法和风格受到日本画家竹内栖风等人的影响，开始追求画面的气氛，泼墨和烘染的手法也多起来，在他前期钩、划、皴、点为主的画法中融合了新机。他在东京举行过金石书画创作展览，并在创作之余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1935年傅抱石学成回国，经徐悲鸿推荐，进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随校入川，住重庆郊区歌乐山金刚坡，与郭沫若为邻。由于境变情迁，勤于创作，并受到郭沫若诗词和书法的影响，此时他的山水画艺大进。他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授课之余，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举行画展，为国内外人士所推崇。

1937年至1946年这十年，是傅抱石的山水画进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他的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他学习石涛技法，力求写生与意境、情与景的结合，追求洒脱苍茫的境界。他十分尊崇石涛，先后发表了《苦瓜和尚年表》、《石涛生卒考》、《石涛丛考》、《石涛再考》、《石涛三考》和《石涛上人年谱》。1942年春，他在重庆作了一幅《大涤草堂图》，表示对石涛的崇仰。此画受徐悲鸿的影响，并参用新法，带有西洋水彩的影子。徐悲鸿为此画题句："元气淋漓，真宰上诉。"1945年夏，他在金刚坡所作的《潇潇暮雨图》，以乱柴、乱麻二皴为主，钩、擦、揉、点、泼墨、刷、烘染多法并用，使画面效果既洒脱自然又丰富苍茫。他所作的《初夏之雾》、《蜀江烟雨》等写生画，浓重的用墨、挺峭的行笔，使人有触景生情之感。

1946年，傅抱石随校返回南京，仍执教于中央大学。他在课堂上热心讲解，循循善诱，深得学生敬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抱石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他努力用自己的画笔描绘新时代，作品日趋壮阔，焕发新貌。1957年赴东欧罗马尼亚等国访问，以国画写生。1958年后，他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等职。他倡导"行万里路"、"笔墨当随时代"，以传统国画艺术魅力，

更高地再现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他与齐白石有“南石”、“北石”之称，蜚声艺苑。他与国画家们合作从事研究与创作，并招收了一批青年，为国家培养了国画的新生力量。1959年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为首都人民大会堂创作了《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山水画，毛泽东在画上亲笔题了字。

上世纪60年代初，傅抱石几次赴祖国各地写生实践，使他的山水画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他以深厚的国画传统作基础，吸收了日本和西欧的技法，表现了浑穆的气宇。晚年，他的许多山水写生画泼辣奔放，精钩密勒，丝丝入扣；停墨积水，淋漓湿润；干笔枯毫，飞白遒劲；设色沉静，意境浩瀚。

1965年9月27日，傅抱石因脑溢血症于南京去世。

傅抱石已出版的著作和画集主要有：《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山水人物技法》、《中国绘画理论》、《傅抱石画集》、《罗马尼亚访问写生画集》、《中国美术年表》、《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石涛上人年谱》等。

主要参考资料

傅抱石：《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

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南京书店1931年版。

傅抱石：《中国美术年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日］高岛北海著、傅抱石编译：《写山要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

傅抱石作：《傅抱石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

傅抱石编：《石涛上人年谱》，京沪周刊社1948年版。

傅东华

王震

傅东华，姓黄，因过继外祖父家，改姓傅，又名傅则黄。笔名有冻蔭、冻华、伍实、郭定一、黄约斋、约斋水、陆若水、独活等。生于1893年4月21日（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六），浙江金华人。其父曾在金华城内教私塾，家境清寒。傅从小随父读书，成绩优异。191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即中学部），于1912年毕业。因经济困难，未能继续升学。1913年他考进中华书局做练习生，因古汉语和英文均佳，不久即改任编译员。主要翻译由正式编辑在外文期刊上选定的短篇小说，有《白羽冠》、《美人丹》、《黄金魔力》、《穷命贼》、《偷吻》、《大石面》等，在《中华小说界》等刊物上发表。

1916年秋，《中华小说界》因故停刊，傅东华离开中华书局，随后到浙江东阳县立中学教英文。后由同乡邵飘萍介绍，于1919年到北京，曾在平民大学附中、北京高等师范教授英语。1920年，在北京加入“文学研究会”，是年译《青鸟》一书，又与金兆梓合译文艺理论著作《诗之研究》。在京期间还著有《语体文欧化的讨论》、《四十年来之英国诗坛》、《西万提司评传》等。

1924年傅东华由京返沪，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业余译著投稿，译有短篇小说《致某妇人》、《曼佛罗特》和《桃园过客》等，著有《非战文学萃锦》、《中国今后的韵文》、《中国今后的韵文讨论问题》等，1925年译有短篇《参情梦》、《迂士录》、《社会的文学批判论》。1926年译有短篇小说《奇事的天使》，出版有译作文学理论集《诗学》、《社会的文学评论》等。

1929年至1932年，傅东华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吴淞中国公学任

教，并著有《两个青年的悲剧》、《人生鉴》等。还译了《饥饿及其他》、《文学之社会的批评》两书和《恫吓》、《资本家》、《革命的女儿》、《珍异的片屑》、《南风》等短篇。此外还撰有《诗的唯物与唯心》、《鉴赏与批评》、《古代艺术之社会意义》、《风格论》、《般生百年诞》、《二十年来的英国诗坛》、《风格与人生》等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傅东华又与胡愈之、周建人、丁玲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反帝联盟，并任常委。

1933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大型文艺期刊《文学》创刊。傅东华与郁达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徐调孚、叶圣陶、郑振铎为编委，他与郑振铎任主编。郑振铎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傅东华为执行编委。

傅东华在主编《文学》期间，曾联系了一批左翼作家，发表了许多“左联”成员的作品，但也引起两场风波，成为30年代以来文艺界两桩公案。一是在《文学》第一卷第二期上，他化名“伍实”，发表了《休士在中国》一文，诬称鲁迅看不起美国黑人作家休士。鲁迅非常生气，写了《给文学社信》，提出抗议，并说明了事实真相[(1)]。二是在《文学》第五卷第六期上，任意删改周文的小说《山坡上》，并在同期的论坛上，发表了《一个小小的实验》一文，用教训的口吻，说周文的小说“写人物的动作过分繁琐”，“牢牢抓住一个无甚关系的断片来细磨细琢”。周文立即给《文学》写信，要求将“砍杀”的部分与信，一同刊于《文学》第六卷第一期上，傅东华在发表周文的《我怎样写〈山坡上〉的》同时，又发表了自己的《经验理论和实践》反驳周文。邵洵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撰文支持周文。亦有多人围攻周文。

傅东华在主编《文学》的同时，还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基本初中国文》（六册）、《复兴初中国文》（六册）、《复兴高中国文》（六册）。此三套教科书曾风行全国，为开创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新体系作了有意义的尝试。

1934年“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开展起来之后，傅东华站在支持者一边，并撰有《大众语跟作文》、《大众文学解》、《关于“大众语文学解”的一点疑问》、《大众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及以后》等文，主张应创立群众语言为基础的新文体。同年9月，陈望道创办了以小品文为主的文艺性刊物《太白》半月刊，傅东华是编委之一。是年，他还编著出版了《选注杜甫诗》、《欧洲文艺复兴》等书，翻译有《赛珍珠女士短作集》等书。1935年6月，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分专辑和单行本两种形式出版，傅东华是编委之一。7月，他主编了《文学百题》一书，约请全国著名作家撰著。

1936年春，傅东华在沪参与发起组织“文艺作家协会”，为“左联”解散后文艺界出现的联合战线性质的文艺团体。其宗旨在谋求文艺工作者之大团结，保障文艺作家的利益，号召在国难临头之时，文艺家应认清目标一致努力。6月7日文艺作家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傅东华被推为理事和章程起草人之一。

1936年10月1日，鲁迅、茅盾、巴金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提出：“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2)] 傅东华也在宣言上列名。

1937年1月27日，傅东华在沪出席由潘公展主持召开的文艺作家座谈会，在会上他提倡推进文艺复兴和文艺界大团结的主张。并说：“过去文艺界曾有数度团结组织，但派别纷歧，团结徒托空言。故我人应谋其真正的团结运动。”又说：“文艺复兴之必然条件，为社会安定，社会安定之道，莫过于统一，今日统一之局面，粗告完成，我人应爱护而巩固之。”[(3)] 会上与洪深、邵洵美等被推修改《上海文艺界对于统一救国运动宣言》。“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傅东华参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为该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编委之一。

上海沦陷后，傅东华留在上海，除编辑出版“孤岛闲书”和继续译

书外，把精力转向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去。1939年发表《文法稽古篇》。1940年发表《一个国文法新体系的提议》、《书同文考》等文。1941年发表了《汉语声纽变转之定律》。

抗战前傅东华原在上海兼任暨南大学国文教授。1942年，受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之邀，于7月携全家赴福建建阳暨大任教，路经浙江金华时，全家被日军所虏，并被押往杭州特工总部。9月由汪伪浙江省长傅式说保释。放出后，即随傅式说在汪伪特工总部“闽浙皖赣四省行营总指挥部”任主任秘书、教育处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伪职。并主编敌伪刊物《东南》月刊。1943年傅脱离敌伪机关，隐居上海，从事翻译和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出版著译《创作与模仿》、《琥珀》、《慈母泪》、《天下太平》等书。

1955年，傅被邀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在把字的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上，有独到的见解。他著有《北京音异读字的初步探讨》、《汉字——汉字知识讲话》、《字义的演变》、《汉字变迁》、《字源》、《现代汉语的演变》等书，并编写了《汉语拼音词汇》初稿等，为推广普通话和改革汉字作出了贡献。同时，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任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社联语文学会理事。1956年被聘为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在古籍整理工作方面，他参加了《资治通鉴》清样校读和《汉书》标点，并参与加工整理《后汉书》、《三国志》的标点本。

1959年底，傅东华进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工作，担任编审及《辞海》语词学科主编、辞海编委会委员。1965年又参与了《汉语大字典》的筹备、编纂工作。

傅东华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一生翻译作品颇多，除上面提到的外，尚有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诗》和《奥德赛》，英国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我们的世界》、《美学原理》、《夏伯阳》、

《红字》、《难兄难弟》、《失恋复恋》、《返老还童》、《参情梦及其他》、《欧洲哲学史》、《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生火》、《一个士兵的国家》、《吉诃德先生传》、《文学概论》、《化外人》、《猩红文》、《美国短篇小说集》、《珍妮姑娘》、《飘》等。另著有《诗歌原理ABC》、《文学批评ABC》、《李清照》、《诗歌与批评》、《创作与模仿》、《文学常识》、《山胡桃集》等书。1971年9月10日，傅东华在上海病逝。

---

(1) 鲁迅：《给文学社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1页。

(2) 见《文学》第七卷，第四期，第744页。

(3) 《文艺家座谈会》，载《辛报》1931年1月30日。

傅斯年

熊尚厚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山东聊城。父亲傅旭安1894年中顺天府举人，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傅六岁入塾，九岁失怙，曾随母姓，取名李永，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

1908年冬，傅斯年随同乡进士侯延塽（雪舫）去天津。侯原为傅旭安的学生，傅斯年得侯的帮助，于次年春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于1913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1916年秋升入本科国文门。时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中新旧各流派并存，傅斯年先服膺章太炎，后转向胡适。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傅斯年读后十分钦慕，即撰写《文学革新申义》投刊《新青年》以响应。同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传播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傅斯年对之心折，从而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

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等人在北大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请胡适任顾问。《新潮》月刊在筹办中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支持，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刊，傅斯年任主任编辑。该刊追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是当时全国主张文学革命的著名刊物之一，影响颇广。他在该刊连续发表了《新潮发刊趣旨书》、《人生问题发端》、《去兵》、《万恶之源》、《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以及《怎样做白话文》等文，同时也在《新青年》发表文

章，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学术，赞扬西方学术思想，声称愿引中国学术“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以“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2)]；甚至一度认为“将来无穷的希望”，都要靠“俄国式的革命”“做引子”，“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3)]。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5月4日那天，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细心策划”，力求使这一行动成为“有纪律的抗议”[(4)]。他随同学生队伍前往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递交了声明书，当愤怒的群众高呼着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家去”的口号，欲前往外交部和赵家楼之后，他认为群众行动“过急”，竟出面进行劝阻[(5)]。群众不顾他的阻拦，直奔外交部，并火烧了赵家楼，他感到无法控制，愈加怏怏不乐。随后，他不断受到激进同学的反对，曾与同学发生互殴，因之就不再进北大学生会了。5月底，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见学生们仍在坚持罢课，即对傅斯年、罗家伦说：“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6)]，希望傅斯年等在同学中发生影响，劝导学生复课。傅斯年与罗家伦等遂在北大学生中发起签名运动，主张将北大迁往上海，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制止北大学生的爱国活动[(7)]，结果无效。从此，傅斯年政治热情冷却便回到书斋，专心准备毕业考试去了。

同年夏天，傅斯年在北大毕业后，返回山东参加官费的留学考试。9月，他于出国留学的前夕，在《新潮》月刊发表了《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赞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新潮社员应专心读书，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8)]。

1920年1月，傅斯年得山东省官费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习数学、物理等课程，以求获得科学方法的训练。1923年秋转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等著作，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了兴趣。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翌年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4月，又接替鲁迅兼中文系主任。他在历史系和中文系讲授《尚书》、古代文学史等课。同年秋，该校创设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他兼所长及《周刊》主编。历史研究范围是：文籍校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所研究范围是：汉语、西南语、中亚西亚语、语言学。他提出："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9)] 把历史语言所办成一个科学性而又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脚的研究所。他在《周刊》上发表了《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傅斯年与朱家骅联名写信给李石曾、吴稚晖，赞扬他们的"清党"反共[(10)]。

翌年春，蔡元培奉派筹办中研院，邀傅斯年协助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11月，该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他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延揽了一批国内第一流人才，一时称盛。在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中，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一分货"等口号[(11)]，主张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他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规定的任务是："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12)] 他的这些治学观点与方法，是承袭德国流行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传统，认定"历史学就是史料处置学"，引导治史者专注史料的发现与考订。他认为考古要去田野工作；语言学要调查方言；其后对民族学也相当重视。傅反对"国故"，反对疏证，主张只要把材料整顿好就行了。这期间，他发表了《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周颂说》等研究古代史的论文。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抵

平。是年秋，他兼北大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同时还多次前往安阳指导和视察殷墟的发掘工作。安阳殷墟经过十年的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性命古训辩证》两部著作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傅斯年在“国事讨论会”上，主张借编著史书以唤起国际的重视。他和蒋廷黻、萧一山、方壮猷、徐中舒共同编写了《东北史纲》，用历史材料证明东北自古属于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曾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参考。同时还和钱穆等编写《中国通史》。

1932年，胡适组织独立评论社，傅斯年、蒋廷黻被邀参加。5月《独立评论》周刊出版，傅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拥护蒋介石。但在“拥蒋”的前提下，在对日侵华问题上，他却与胡适有某些差别，表示赞成抗日。1933年6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他对胡适此文不满，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13)]。1935年冬，萧振瀛召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开会，兜售对日妥协的主张，傅斯年在会上斥责萧振瀛间接替日本招降，严正表示反对“华北特殊化”。1934年3月至1935年12月，他先后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了《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睡觉与外交》、《中日亲善？》、《一夕杂谈》、《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加以揭露，也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要求南京当局“应当严定不可再让的界线以对国家”[(14)]。对汪精卫实行的“对日经济提携”，他指出“乃是中国灭亡的速路”，要求认清“日本的广田外交，不要再上大当”[(15)]。

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南迁，但傅斯年仍留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并照顾其他兼职，时常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1936年春，他辞去北大及其他兼职，举家移居南京，全力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

务。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对张、杨进行讨伐。翌年春，傅斯年兼代中研院总干事。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傅斯年应蒋介石电召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和国防参议会，对和战问题提出了一份《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书》[16]，主张坚决抗战。翌年4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他以无党派代表被聘任参政员。其后，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期间，他写成《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一书，论述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特性，强调中国民族复兴的关键在“政治有方，领导得人”[17]。同年，傅斯年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等人生活奢侈，任用亲信，身兼多职，皆不胜任[18]。

1940年以后，傅斯年一再表示要“遁入学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但他仍时时跳出书斋表示政见。他曾在参政会上多次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并就财政问题质询财政部长孔祥熙，建议蒋介石整刷政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大成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不久，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傅往南京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复员工作。

傅斯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经著文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19]。1946年2月，他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支持国民党的反苏运动。3月，蒋介石请他任“国府委员”，他表示愿以“在野之身，为国努力”，予以谢辞。1948年，他又在美国进行反共游说，同时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非将共产党打垮不可。”[20] 是年8月，他从美国回到南京，眼见蒋介石在军事上接连惨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陈布雷、段锡朋相继服毒自杀，自己也悲观绝望，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时常准备蓄安眠药。曾对陶希圣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21] 同年，他任中研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图书文物迁台，并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李宗仁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前往北平举行国共和谈时，他致书李宗仁反对，谓“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22]。在台大校长任内，傅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为校训，以“平淡无奇”为教育理想。在施教上重视基本学科，于大学一年级设国文、英文、数学三委员会，聘请真才实学者任教授，自己常到课堂听课。还充实台大图书馆等，力图实现改革高等教育的理想，将台大办成一个学术中心。

1950年4月，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傅斯年反对军警进校抓人，谓“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他拼命”。当时台湾社会大动荡、大混乱，人心浮动，许多人纷纷想离开台湾。傅斯年决心与海岛共存亡，表示“台湾是我们复兴的基地”，要“归骨于田横之岛”[23]。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突发脑溢血病逝。

---

(1) 当时北大的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偏重数学及自然科学，乙部偏重文史。

(2) 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

(3) 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号。

(4)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5) 周予同：《火烧赵家楼》，《人民教师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编印，第74页。

(6) 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的希望》，《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

(7) 马叙伦：《五四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1—282页。

(8) 傅斯年：《新潮的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

(9) 傅斯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周刊》第1集第1期。

(10) 李宗侗：《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6期。

(1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份。

(12) 傅斯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十七年度报告书》，转引自傅乐成著《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13)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

(14) 傅斯年：《一夕杂谈》，《大公报》1935年8月11日星期论文。

(15) 傅斯年：《中日亲善？》，《独立评论》第140号（1935年3月）。

(16) 见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4册，1966年版。

(17)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下），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6期，第27页。

(18) 傅斯年等：《上蒋介石书（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4-613页。

(19)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0卷第1期。

(20) 陈文迈：《关于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

(21) 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13日。

(22) 汪漱：《关于傅孟真致李宗仁书》，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3期。

(23) 于衡：《在那风雨飘摇的时候》，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1

期；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页。

傅筱庵

汪仁泽

傅筱庵名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人。1872年12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出生在镇海小港镇。幼年在私塾就读。其父傅晓春，是当地的帆船主，专为源茂木行运输木材，经常行驶于浙江和福建沿海。

1892年，傅筱庵由其父托人介绍，进上海浦东英商耶松船厂做工。进厂不久，入夜校补习英文。由于他能用简单英语会话，因此博得该厂大班英人潘特斯的青睐，四五年后被派充为冷作间的“拿摩温”[(1)]。此后，傅一方面以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压低工人工资继续取得大班的好感；另一方面又用虚报工人名额、浮领工资等手段，积攒了一些钱。

当时，耶松船厂职工多在该厂附近赁屋居住，这些房产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所有。严家每月派人摆渡到浦东收租，因工人生活困苦，拖欠者甚多，为此颇感棘手。傅筱庵得知此事，认为是结识豪门严家的良机，乃毛遂自荐，在该厂每月发放工资时，由他逐户代扣，汇集后亲自送到浦西三元宫严家。不久严家上下与之相熟，都以“小傅”称之。傅筱庵呼严信厚之妾杨氏为干娘，并经严信厚之子严子均介绍，结识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等人。傅又常随严妾杨氏到官僚、大买办盛宣怀家，与盛妻庄氏作方城之戏，逐渐与庄氏及盛子重颐等相熟，不久又被庄氏收为义子，遂成为盛家的心腹。

1909年，傅筱庵经严子均介绍，进招商局所属的华兴保险公司当副总经理，辞离耶松船厂。不久华兴公司总经理病死，即由傅筱庵继

任。1911年盛宣怀利用邮传部大臣职权，为清政府办理出卖汉冶萍公司产权、收铁路归“国有”等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股东及四川旅沪同乡，为反对盛宣怀丧权辱国，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开会，盛重颐由傅筱庵陪同到会。会上群情激愤，纷纷主张将盛家产业充公赔偿。此时，傅筱庵竟当众跪地叩求，在一片扰攘中，使盛重颐得脱重围，从此益为盛家所信用。

辛亥武昌起义后，盛宣怀率全家逃往青岛躲避，在沪财产托傅筱庵代管。上海光复后不久，朱葆三继沈缦云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筹措军饷。傅筱庵通过朱葆三的关系，认缴饷款后，被都督府委为财政部总参议 (2) 及沪关清理处长，并承认他在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三大企业内盛家股权的代表身份。1914年4月，盛宣怀重掌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职权后，任傅筱庵兼招商局经理各地栈租之缺，以酬其保产之功。此时傅筱庵已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并任上海总商会第一届议董，负责对外交涉事务 (3) 。

傅筱庵的社会活动有了扩大，更助长了他个人追逐名利的欲望。1916年与严子均、虞洽卿、朱葆三等人集资创办祥大源五金号，自任总经理，包揽了招商局等企业的五金进货业务，利润逐年增加。同时他又先后充当了专营五金等洋货进口的美商美兴洋行和英商长利洋行的买办，独占了上海市场的五金进口贸易，成为富豪。1916年盛宣怀病死，傅筱庵这时已是招商局董事，并任该局积余产业经理、内河轮船公司经理兼主船课长。由于他执掌各轮买办及职工的任免大权，得以勾结某些买办，走私鸦片，坐地分肥；又勾结鄱乐煤矿公司谢蘅牕，包办招商局各轮燃料，受贿营私。1921年4月，招商局股东大会上，股东孙铁舟提议要求彻查帐目，并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傅筱庵的董事和积余产业经理职务。傅筱庵恼羞成怒，指使流氓混入股东会，推翻议案，并勾结法驻沪总领事，指控孙铁舟诋毁其名誉，告于法租界公堂。后经施肇基出面调解，恢复了傅的董事职务，才算结束了诉讼案。此后，傅筱庵的气焰更甚，总经理盛重颐愤而离职，他遂独揽局

务。但是股东反傅筱庵的浪潮仍不断发生。1922年秋，股东张某向北洋政府交通部控告傅筱庵败坏航政，营私舞弊，侵占公产。交通部派员来沪彻查。傅筱庵与友人朱葆三、陈炳谦等十一人，先行组成股东自查检查会，阻挡部员检查[(4)]；同时又请出张謇领衔，江浙豪绅联名致电交通部，为他疏通，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24年傅筱庵争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位，因名声不好而落选。1926年再选时，傅筱庵早作准备，依靠军阀孙传芳作后台，玩弄各种手法，终于当选为会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东路军攻入江西孙传芳地盘。傅筱庵调来招商局轮船九条，供北军孙传芳作军运。9月9日，江永轮因装运弹药发生爆炸，船员八十八人罹难[(5)]。招商局海员纷起罢工，反对军运。傅筱庵勾结孙传芳的爪牙，封闭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捕去职员多人，对罢工工人横加镇压[(6)]。不久，上海工人纷纷响应北伐军，一再起义。傅筱庵以商会会长名义除勾结军阀进行武力镇压外，并收买流氓，谋从内部破坏工运，并于12月召集招商局机器厂、祥生船厂等三十多家大厂，筹备成立“上海机业劳资总联合会”，自任委员长，玩弄“劳资联合”的骗局[(7)]。

孙传芳穷途末路，联合张作霖，组成安国军。1927年3月孙传芳、张宗昌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作为其最后顽抗之军费。傅筱庵召集上海银钱业摊认，遭到反对，无一应者。傅筱庵为表示对孙传芳的报效，特从中国通商银行准备金中拨款捐赠二百万元。

不久，北伐军进抵嘉兴，傅筱庵见风使舵，派亲信持函往见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表示欢迎；同时又在孙传芳离沪时，亲往送别。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孙军溃逃。3月22日，白崇禧进入龙华，派人持函往晤傅筱庵，称其为“商界领袖，群流景仰”。傅筱庵接函后喜出望外，邀同方椒伯等往访，对白崇禧恭维备至，并筹办大批慰劳品送往犒军。次晨，复邀集英、法、美等国驻沪总领事，亲自陪同往晤白崇禧。此后。国民政府于4月26日下令通缉傅筱庵。傅筱庵在租界得到消息，躲避数日后，携眷搭轮逃往日占之大连。傅筱庵潜

居大连四年余，经常与日本海军特务小松、石井等人往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撤销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于10月16日重返上海，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后转任董事长），以及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造船厂董事等职[8]。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图谋华北，傅筱庵应黄郛之邀曾赴华北一行。回沪后，鉴于抗日气氛日趋高涨，不敢妄动，深居简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傅筱庵不甘蛰居，与日本政客、浪人往来频繁。并和日本侵略军搭上关系，于1939年10月16日叛国投敌，继上海伪“大道市政府”市长苏锡文之后，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任伪职期间，日本侵略者派甲斐弥次郎为顾问，从旁监视，用人行事绝无自由。傅筱庵想捞钱也无法下手。做了半年“市长”后，他自己哀叹说：“我每月薪水公费收入为两千元，只够用来敷衍日本海、陆军军官和浪人，有时还得赔本，这是一笔蚀本生意，非始料所及。”“现在是骑上虎背，由不得自己作主了。”[9]

1939年，汪精卫到南京谋组伪政权，蒋介石指使戴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等人来沪谋刺汪精卫。通过策划，由与傅筱庵有私交的开滦煤矿沪经理许天民前去联系傅筱庵，拟待汪精卫来沪时由其设宴诱杀。傅筱庵一面佯允，一面向汪精卫告密，许天民等因此被捕。蒋介石得报后，以傅筱庵不为己用，即命戴笠将其干掉。戴令军统沪二区区长陈恭澍组织多次狙击未果。傅筱庵有个他所信任的老佣人朱升源嗜酒成性，沪军统人员遂在虹口斯高塔路（今山阴路）傅宅附近开设酒店，借以与朱升源交好。朱升源少时在日人工厂当过童工，曾受日人的欺压虐待，故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曾劝傅筱庵不要再当汉奸。此时在军统特务人员的劝诱下，朱升源亦愿为民族除奸，当个好汉。1940年10月10日深夜，趁其宴游归来倦极熟睡之际，朱升源用切菜刀向傅筱庵头部猛砍三刀，将其杀死后逸去[10]。

(1) 英文“第一”的音译，即工头或领班之意。

(2) 1940年10月13日《中华日报》。

(3) 1912年《上海总商会会员录》（上海市档案馆档案）。

(4) 《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年编印。

(5) 《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年编印。

(6) 《申报》1926年12月1日。

(7) 《时报》1927年1月3日。

(8) 1940年10月13日《中华日报》。

(9) 《汪伪汉奸傅筱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48卷。

(10) 郭旭：《傅筱庵之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五辑（总第3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35页。

傅作义

李仲明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县（今属临猗县）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五日）。祖父是农民，父庆泰以在黄河边背人过河、摆渡和运煤为生，后家境渐殷实，成为当地富户。他六岁入私塾，十三岁入运城河东中学堂，喜骑烈马，游黄河，课余常读《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书。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参加太原起义，任起义学生军排长。

1912年，傅作义被保送到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课余对古代著名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城皋之战深感兴趣。他在外读书花费较大，又不太注意节俭，向人借了二十两银子，寒假回家告诉父亲，父亲没有责备，带他到黄河边，一同脱掉鞋袜，跳入冰冷的水中，告诉他："我的钱是这样挣来的。"[(1)] 他深感内疚，此后一生俭朴，被誉为"布衣将军"。

1915年傅作义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他学习努力，步兵课程及典范令、射击、马术均获优异成绩，射击名列全校第一。1918年毕业后，分配到阎锡山晋军独立炮兵第十团任见习官，后任排长、连长、营长。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傅作义营在担任石家庄警戒任务中布置得当，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赞许，旋升任第四旅第八团团长。1926年，晋军与直奉军合攻冯玉祥国民军，国民军宋哲元部在西线击败晋军第五旅，晋军转守雁门关，留傅作义团固守平绥铁路要点天镇，国民军自5月起，屡攻天镇不克，三个月后撤兵，傅作义因功升为第四旅旅长，翌年晋军扩编，再升第四师师长。

1927年6月，阎锡山附蒋反奉；10月，阎分兵三路出京汉、京绥

线攻打奉军，傅作义第四师利用奉军在河北涿州换防的机会，于10月11日突然奔袭并占领涿州，14日晨，傅作义率师司令部和炮兵团进入涿州。张学良闻讯，调奉军第十五师、第二十三师、炮兵第六旅等部三万多人，增援王以哲卫队旅围攻涿州。自10月15日至11月20日，奉军七次总攻皆告失败。时晋军各主力部队先后失利，撤离京汉、京绥线，涿州被奉军四面包围，守城近三个月，城内弹尽粮绝，百姓饿毙者渐多，傅不忍人民涂炭，决定“独我一身赴敌军为质，要解其围，幸而得允，……吾死亦为不虚矣”[(2)]。乃于1928年1月5日赴保定议和，所部接受奉军改编，涿州之围方解。涿州一战，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保卫战的著名战例，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事才干也得到军事界公认。

1928年4月25日，傅作义得友人侯少白等帮助，潜逃天津。6月奉军撤往关外，阎锡山接管平津，傅作义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傅任阎锡山部第四路军指挥官，占领济南后任济南行营主任，10月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告终，晋军归张学良节制。1931年1月，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8月，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傅于22日、28日两次与徐永昌、宋哲元等将领联名通电坚决抗日。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1月5日，傅作义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月15日，他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军民奋起抗战，救国御侮。2月上旬，傅出任改组的第七军团总指挥。4月30日，傅奉命驰援昌平，乃亲率五十九军从张家口急行军，仅用二十小时，行军二百余里，于5月1日下午4时到达昌平。14日部队开至怀柔、牛栏山一线，准备阻敌。5月23日晨4时，日军第八师团一部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开始进攻，战至7时，傅作义指挥部队奋勇杀敌，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双方伤亡惨重。傍晚，傅部正拟组成敢死队夜袭日军，忽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的停战撤退命令，傅作义指挥部队又打退日军一次进攻后始撤出阵地。6月末，傅作义率部返绥，后将牺牲官兵遗骸运

绥，在大青山下建立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将烈士名字刻在纪念碑上（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将墓碑重新修葺）。

傅作义主政绥远后，制定了治绥的具体规划，重点抓了剿匪清乡，安缉地方；建设农村基层政权；稳定社会，整顿市容；整顿金融，开源节流；城乡建设和发展教育六方面工作。短短二三年，工作颇见成效，绥远地区的经济、教育均有较大发展，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地区面貌一新。1935年4月，傅作义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6年春，日本在察绥扶植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及伪军李守信、王英等，成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剑拔弩张，蠢蠢欲动。同年10月，抱着“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决心的傅作义，前往太原、洛阳向阎锡山、蒋介石慷慨陈词，请求御侮，得到阎、蒋的支持。11月8日晚傅作义得知德王准备进犯绥远的消息，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慷慨激昂地说：“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3)] 又鼓励大家：“绥远为西北门户，歼灭犯绥之敌，就是保卫西北。全体官兵必须全力以赴，只能打胜，不得打败。”[(4)] 11月14日、15日，伪军王英部开始进攻红格尔图；15日伪军又增加李守信伪军骑兵、步兵共计五千余人进攻，傅部守军仅三百人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16日傅作义到集宁指挥，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于17日夜到达红格尔图西面的丹岱沟，另派五个团一个营火速增援；18日凌晨2时，傅军发起总攻，包抄敌指挥部，至上午7时，敌军溃败。傅作义决定乘胜追击，消灭盘踞百灵庙之敌，令孙长胜、孙兰峰指挥部队，先在归绥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迷惑敌军，然后派人摸清百灵庙情况，令部队向庙北、庙东、庙南秘密集结，并于24日凌晨发起进攻。经7小时激战，收复百灵庙。12月4日，傅军打败敌军的反攻后，又乘胜收复了锡拉木伦庙（大庙），绥远抗战取得胜利。

1937年—1945年全面抗战期间，傅作义历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等职，指挥部队

参加了察北与平绥争夺战、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卫战、绥南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和五原战役，其中，忻口会战、太原守卫战、五原战役最为惨烈。

在历时二十三天的忻口战役中，中日两军呈战斗胶着状态时，傅作义令董其武袭击日军坂垣前线指挥所，摧毁其炮兵阵地，并鼓励董其武说："这次袭击任务，事关大局，必须保持三十五军的抗日传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5] 董其武率部于10月18日凌晨3时向日军发起袭击，摧毁了敌军指挥部和山炮阵地。战斗中董其武受伤，傅作义又令孙兰峰接替指挥战斗，部队与敌军激战三昼夜，营、连、排长牺牲十四人，士兵伤亡大半。傅部以极大的牺牲，配合了其他部队作战，迟滞了日军南犯。

忻口会战后期，娘子关失守，阎锡山决定放弃忻口，防守太原，准备倚城野战，于10月下旬召集将领开紧急会议，在讨论哪支部队守城的问题时，阎锡山的亲信将领面面相觑，无人表态，傅作义乃坚定地表示要守卫太原。他在临战前夜给家人信中写道："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与家人矣！"[6] 。其时，晋军各部队迅速溃败南逃，使傅部守城困难增大，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亦临阵脱逃。11月6日，日军炮击太原守城工事，7日拂晓，日军开始进攻。傅部与日军血战两昼夜，官兵伤亡过半，根据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相机撤退"的手令，和周恩来"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背城死守，焦土抗战的主张，都是错误的，不足为训"[7] 的告诫，傅作义率部坚持到8日晚弃守突围，保存了这支抗日的部队。

1939年12月，傅作义率部成功地奇袭包头。日军不甘心失败，从张家口、大同、太原等地抽调日军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进犯绥西，于次年2月3日侵入五原，很快又侵占临河、陕坝。蒋介石接到绥西战报，主观认为败局已不可挽回，命令傅

作义到兰州代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职务，部队后撤，另派专人指挥。傅作义拒绝命令，回电表示："将不离兵，兵不离土；将不离兵兵有主，兵不离土土能存。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与敌周旋到底。"[8] 傅作义召开部队干部会议，他镇定、客观地分析了绥西战局，分析了部队作战暂时处于困难环境的原因，决定以不足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反攻五原。3月20日夜，傅作义率部进攻五原，经两昼夜激战，胜利收复五原。是役击毙敌水川中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等三百余日军，歼灭伪蒙军两个师。傅部亦付出重大伤亡，终于取得绥西战役的胜利。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于4月17日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第一枚授予蒋介石）授予傅作义。傅作义5月23日呈文政府，说明"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敌的功绩，个人不应该领此勋奖"[9]。

抗战期间，傅作义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与八路军一二〇师建立联防，交换情报，并通过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琪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三十五军输送了许多优秀学员，对傅作义的抗战整军起到积极作用。傅作义十分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钦佩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的品格和才干。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并亲兼主任，派中共党员周北峰任委员兼秘书，部队各级政治机构负责人有许多由延安来的干部担任，傅作义还制定了《北路军工作守则》和《十项纪律》，参照八路军的规章、纪律，加强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经济纪律，受到民众的称赞。阎锡山闻讯，讽刺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三十五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要求撤换傅作义。1939年秋，国民政府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到傅部，要他排除共产党，傅作义无奈只得将各部队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1945年7月，绥远、宁夏划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任司令长官。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令傅作义代表国民政府到热河、察哈

尔、绥远三省接受日军投降。10月至11月，傅部与解放军部队在归绥、包头展开争夺战，12月中旬，解放军撤围。傅作义内心极不愿打内战，于是年终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未获准。1946年9月，傅作义部进攻张家口。当月先后攻占卓资山、济宁、丰镇；10月，傅部利用解放军指挥失误，占领张家口。1947年1月15日，傅作义就任察哈尔省主席。16日，傅作义就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时即席发言指出：“今后政务，重在稳定人心，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经济有办法，一切就有办法。”[(10)] 12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年末，“剿总”由张垣迁到北平西郊。

1948年1月，傅部两个军奉命南下增援，其新三十二师在涞水以东山地被解放军歼灭，师长李铭鼎被击毙，军长鲁英麟自杀。此事对傅作义打击甚大，他内心更不愿打内战，并在3月的华北军政工作检讨会上，指出当前主要任务乃“安定地方，改善民生”；在与董其武谈话中语意双关地指出：“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11)] 11月初，傅作义飞南京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会前，何应钦、蒋介石曾向傅作义提出关于华北的两项腹案：一、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国民党部队；二、平津主力全部南撤，或一部撤江南，一部西撤绥远。傅作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固守平津塘倚海作战”的主战主张，认为：“固守华北是全局，退保江南是偏安。”反对南撤[(12)]。11月中旬，傅作义秘密转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愿望，并请求南汉宸赴北平商谈有关事宜。12月，傅部在张家口、新保安的失利使傅作义十分震动。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更加紧了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各界进步人士和傅的部下，亦积极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女儿被特务炸死，何思源亦不退缩，为和平解放奔走、联络。12月末，傅作义在挚友邓宝珊的劝说下，终于决心走北平和平起义的道路，并派邓宝珊为全权代表，于1949年1月14日赴通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并达成协议。1月22日，傅作义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并令二十余万国民政府军队

移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9月，在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的努力合作下，又实现了绥远起义。

1949年9月，傅作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逝世。

---

(1) 傅作信：《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傅作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2)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493页。

(3) 董其武：《傅作义生平概述》，《傅作义生平》，第5页。

(4)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5)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6)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493页。

(7)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第103页。

(8)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第155页。

(9) 南京国民政府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稿》（1940年4月、5月），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0) 《傅作义生平大事纪要》（1895—1974），《傅作义生平》，第459页。

(11) 董其武：《傅作义生平概述》，《傅作义生平》，第16页。

(12) 《傅作义生平大事纪要》（1895—1974），《傅作义生平》，第460页。

盖叫天

李仲明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高阳县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童年入天津隆庆和京剧科班学艺，初学武生，以“小金豆子”艺名登台，演出《昊天关》等戏。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戏班解散，英杰与四哥英俊自天津辗转到上海，投奔大哥英甫，乃改学老生。因慕谭鑫培（谭艺名“小叫天”）演技，取名“小小叫天”，受人讥讽，遂立志超过谭。十三岁时以艺名盖叫天在杭州天仙戏馆搭班演出，四天打炮戏连演《天水关》、《翠屏山》、《断后龙袍》等老生、武生、老旦戏，因样样精彩而唱红。此后他常以老生、老旦戏在汉口和苏、杭等地演出，《定军山》一剧尤受观众欢迎。1901年他在杭州演出时偶过九里松，见凉亭上刻着“学到老”的牌坊，深受启发，一生以此自勉。

盖叫天十六岁时嗓音倒仓，乃以武生戏为主，常演《白水滩》、《伐子都》等戏。1904年，清廷拟召他入宫内供奉，盖叫天拒不奉召；同年，盖叫天在杭州演出《花蝴蝶》时，不幸折断左臂。为维持生活，他一面疗伤，一面在沪宁沿线各县镇贴演文戏，伤愈即与武术界人士切磋，学习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并把武术糅进戏曲表演程式中，逐步创造了丰富多样的京剧武打刀枪把子。

1912年民国建立，南派武生宗师李春来在上海颇有名声，李武功扎实，开打利落，以《白水滩》、《郑州庙》、《界牌关》等戏见长。此时盖叫天虽小有名气，其功夫尚不及李春来，盖叫天乃认真观摩李春来的演出，琢磨他如何塑造人物并学其代表剧的“绝活”。李春来得罪了地方官僚入狱时，盖叫天常探监送饭，关怀备至。李春来到

晚年气力技艺已不如前，盖叫天仍毕恭毕敬请他合作演出，自己甘当配角，李春来感盖叫天之真诚，教了盖叫天许多东西。

盖叫天学习李派的精华，同时注重刻画角色，并吸取京、昆及地方戏中各派武生和其他行当的表演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继黄月山、李春来后江南最著名的武生。有一次，盖叫天与何月山合演《年羹尧》，何月山在先上场时抢先把盖叫天创造的三节棍、二头刀等都表演了，在舞台上折腾近一个小时；盖叫天出场了，观众一面喊好鼓励他，一面猜想盖叫天的玩意都被何月山演了，今儿怎么办？“只见盖叫天手一扬，一道寒光，在灯光下亮出一根四五尺长的白链，上下翻腾，左右飞舞，舞到快时，只见一片白光”[(1)]。原来盖叫天舞动的是九节鞭，这种武术软兵器挥舞起来难度很大，使不好会伤了自己。盖叫天出奇制胜，十五分钟左右的九节鞭，舞得张弛有致、简洁明快，赢得观众热烈喝彩。

1912年，盖叫天第一次去北京演出，受到北派武生宗师杨小楼、俞振庭的赞赏；杨小楼后来两次赴沪，与盖叫天合演《莲花湖》与《义旗令》；俞振庭在北京与盖叫天合演《曾头市》、《艳阳楼》；盖叫天亦十分钦佩杨、俞等北派武生的功夫，当时有“北杨南盖”之誉。京剧大师梅兰芳回忆：“他的短打是干净利落，谁也比不上的。……有人说他学李春来，其实讲到功夫，恐怕有过之无不及呢。”[(2)]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在看过盖叫天的《三岔口》后这样评价：“他的形体动作我难以形容……刚劲有如百炼钢，也可以柔软得像根绸带子。快起来如飞燕掠波，舒缓之处像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走玉盘，戛然静止就像奇峰迎面。”[(3)]

此后十余年，盖叫天创演了《劈山救母》、《乾元山》、《七擒孟获》、《楚汉相争》等戏，他设计的红绸舞、乾坤圈舞、孟获的唱腔、霸王枪等皆有独到之处。1923年，盖叫天在上海共舞台创排《西游记》，他在《水帘洞》里的耍双鞭堪称绝活：把左手鞭的鞭尾朝下，立在左脚脚尖上，然后拿右手鞭的鞭尾摁着左脚上立鞭的鞭头，

抬左脚，把鞭顶起来，两条鞭成为一条直线，在脚尖上转动；他在《闹天宫》中饰孙悟空，打败第四位金刚后，夺下琵琶，又与哪吒对打，只见他夺过哪吒手中的乾坤圈，一面用琵琶迎击哪吒的长枪，一面用脚变换姿式舞弄着乾坤圈，形象俏皮可爱。

盖叫天戏越演越好，但因他性格刚强，艺术上自有主张，不愿随波逐流，又不肯趋炎附势，因此常受大都市剧场老板的排斥，多在江浙一带的小码头短期演出，他并不悲观，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练功与排戏。

1934年5月，盖叫天与上海大舞台定约演出一个时期，他以《恶虎村》、《一箭仇》、《武松》作为头三天的戏码。在《恶虎村》的“走边”中，他创造了一个优美的身段叫“鹰展翅”，表现黄天霸于夜行中，俯身透过树丛仰望天色的姿态；在《一箭仇》中，他饰演的史文恭与卢俊义、林冲的“对枪”、“剑枪”及对打间隙的“枪架子”，身段、功架优美、稳健。而《武松》更是盖叫天的拿手戏，当时南方舞台尤重布景以吸引观众，当盖叫天与陈鹤峰演到《狮子楼》一场时，本来从“酒楼”到下面地方不大。西门庆跳下去未及时闪开，武松从“酒楼”窗口跳下时，发现西门庆躺在原地未动，为了不砸伤陈鹤峰，盖叫天在半空中将身体用力往外一偏，躲过陈的身体，却落在舞台外端的水泥地上，他的小腿骨当时就折了，断骨露出靴子，疼痛难忍，盖叫天大汗淋漓，但他想到演的是英雄武松，不能躺下，便咬牙坚持，以金鸡独立式亮相，直到落下大幕。

岂料为他接骨的庸医把他断骨的位置接歪，盖叫天急问还有无办法，庸医说除非断了重接。盖一咬牙将腿向床杆上一砸，刚接上的腿又断了，庸医目瞪口呆。经找名医治疗和休养，八个月后愈合。盖叫天又休息了一年多，终于重登舞台。

有“江南活武松”之誉的盖叫天，对武松的六出戏《打虎》、《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等下了很大工夫，在突出人物性

格、塑造人物形象上精益求精，他曾说：“我把武松的事儿，当作自己的事儿，不是我在演武松，是武松的‘灵魂’附在我身上。我一上台，身不由己，但是有己。”(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年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盖叫天带领全家自绍兴、宁波回到上海，不久染肺病休息八个月，为维持生活，他每年只做短期演出。

1942年，有人向日军献媚，组织一次十大武生会演《铁公鸡》的演出，事先并未通知盖叫天，便将他的名字列入名单上，盖叫天听说后很生气，临演出前躲出去，事后日本宪兵队一头目来到他家，他说明四十七岁时曾断过腿，不能演出《铁公鸡》这样火爆的武戏，况且组织者事先没有通知，日本人无奈而退。约一年后，汪伪上海统税局长邵式军为庆祝三十岁生日，邀请名角唱堂会，派人来请盖叫天，他避而不见，来人往桌上堆了许多洋钱，盖夫人严词拒绝。盖叫天宁肯挨饿，也不为日伪演出，表现了中国京剧艺人的民族气节。

从抗战中期至1948年，盖叫天在上海曾与俞振飞、吴素秋、叶盛章、金素琴、高盛麟、李万春等合作演出，为扶持中青年演员，他打破陈规，常让叶盛章、高盛麟、班世超等演头牌，他甘当配角，在上海京剧界传为佳话。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盖叫天与梅兰芳、周信芳、姜妙香、赵如泉等合作，为救助皖北水灾演出《甘露寺》；同年他参加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后在怀仁堂为毛泽东等演出《一箭仇》。1952年10月，盖叫天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了《武松打店》，获文化部颁发的荣誉奖。曾被陈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1956年11月，文化部在上海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他演出了《恶虎村》；同年，他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61年盖叫天到北京演出，李少春、张云溪拜他为师。1964年，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起，他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于

1971年1月15日逝世。1978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为他平反昭雪。生前摄制戏曲影片有《盖叫天的舞台艺术》、《武松》，出版谈艺录《粉墨春秋》。传人有子张翼鹏、二鹏、剑鸣（小盖叫天）。

---

(1) 龚义江：《盖叫天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2)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3) 欧阳予倩：《戏曲艺术的斗士盖叫天先生》，见盖叫天口述，何慢、龚义江整理《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4) 龚义江：《盖叫天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冈村宁次

沈荆唐

冈村宁次，日本东京人，1884年5月15日生。少时就读于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三期，开始了习军从武生涯。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十六期生。1904年毕业后，以少尉军衔分派到步兵第一联队补充队任队副，翌年参加日俄战争。1907年晋升为步兵中尉，回陆军士官学校任学生队副队长；又任中国学生队区队长，学生有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1910年底，冈村升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五期，于1913年毕业后，以步兵大尉留校，任步兵第一联队中队长。翌年8月调任陆军参谋本部部员，1917年升任部副，曾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19年升任步兵少佐，调至兵器厂任厂副；不久调至陆军省新闻班、军务局军事课工作。

1921年7月，冈村宁次升任步兵第十四联队队副。10月去欧时，与驻瑞士的永田铁山、驻苏俄的小烟敏四郎结成“三杰盟约”，以革新陆军积弊为己任。冈村回国后，即召集士官学校第十五至十八期毕业生成立“一夕会”，在日本陆军中形成一支实力派系。1922年2月，冈村升任步兵第十四联队大队长，翌年又调至参谋本部任部员。

1923年12月，冈村宁次被派来中国，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其时，孙传芳已是福建军务督理，亟谋向江浙发展。冈村给孙出谋划策，使孙在1924年9月齐（燮元）卢（永祥）战争中由闽出兵攻浙，直捣杭州，收编卢军近五师兵力。孙出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后，正式聘请冈村为高等军事顾问。冈村进一步协助孙传芳策划进攻占据苏、皖的奉军和对抗北伐军；同时利用孙传芳的信任，大量搜集长江下游地区的情报，还得到了一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详细的中国绝密地图，获得日本参谋本部的巨额奖金。

1927年6月，冈村宁次奉调回国，任日军步兵第六联队长，随即率部开赴山东青岛。翌年4月北伐军进攻奉张，5月1日进占济南，冈村奉命率部西进入侵济南，擅捕北伐军士兵蓄意寻衅，5月3日又参加向中国驻军营地的攻击，是酿成“济南惨案”的凶犯之一。1929年8月回国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佐课长。

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后，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冈村宁次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指挥侵略上海的战争，战后升任陆军少将。8月，他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以“解决治安问题”扫荡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首要职责”。他竭力鼓吹关东军出兵占有热河和“突破长城线”。1933年5月，他代表日本政府同国民政府代表熊斌进行谈判，于31日拿出一份不容更改一字的最后方案，迫使中方代表签订《塘沽协定》，以苛刻的条文，迫使国民政府默认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使中国政府失去了对河北十九个县和两个设治区的完全统治权。1935年3月，冈村回国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一年后升任第二师团中将师团长，率部占驻哈尔滨一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冈村宁次率第二师团入关，在侵占华北的战事中屡屡得手。翌年6月，他任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所部进攻武汉；嗣后又指挥进攻南昌、长沙、宜昌、枣阳等战。他指挥作战，惯于调集精锐的机动兵力，运用袭击、包围等战术机动作战。1940年3月他回国任军事参议官，翌年4月晋升为大将。7月，他被派任华北方军司令官，在华北地区连续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他将华北各地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分别实行“清乡”、“蚕食”、“扫荡”政策；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驻屯清剿”的“大扫荡”，实施极其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纵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44年6月，他被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所部投入“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

先后攻占桂林、柳州、南宁，打通了粤汉、湘桂铁路线，直达中越边境，以挽救孤立于南亚的日本侵略军。是年11月22日，冈村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统率二十六个师团和二十二个旅团约七十六万日本侵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深谙中国的国共两党分歧，下令属下只向国民党军投降，拒绝八路军、新四军的接收。9月9日，冈村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冈村宁次是侵华日军的首要战争罪犯。他自己也认为“死刑在所难免”，但是战后他受到国民政府的特殊庇护，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他向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有关八路军和苏联的情报资料，并且把一大批“征用者”、“留用者”、“潜在者”输送给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冈村被秘密任用为军事顾问，经常向蒋介石、何应钦提交“文件”，为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战略战术出谋划策。经过1948年8月的一次“审讯”后，冈村于翌年1月26日被宣判“无罪”释放，他承认“实非始料所及”。

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后，于1950年又被撤到台湾的蒋介石聘为台北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幻想效力。1954年 11月，他参与组织“日本樱星会筹备会”，任理事长。“樱星会”是一个统一全日本旧军人的组织，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翌年6月，他担任日本旧军人全国性组织“战友联”（后改名为“乡友联盟”）副会长，1957年任会长。

1969年10月16日，冈村宁次病死于东京。

主要参考资料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 1981年

版。

《现代史资料·满洲事变》，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

《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高崇民

丘琴　姜克夫

高崇民，名恩濬，字健国，号崇民，以号行。奉天（今辽宁）开原人，1891年11月14日（清光绪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其父高葆如以教书为业，对子女“常以儒家躬行实践相训勉”[(1)]。

高崇民自幼在家乡读私塾，从《幼学琼林》起，直到“四书”、“五经”均在诵读之列。1909年考入奉天农林学堂。1911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191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留日中国学生奋起声讨。在讨袁斗争中，高崇民满怀义愤，慷慨陈词，痛斥袁世凯，深受留学生拥护，被推选为代表到上海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倒袁活动。事毕，于当年返回日本。他对“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2)]的旅途，深有感触。鉴于强邻觊觎，国势日危，决心不做功名利禄之徒，誓为民族独立、祖国富强而奋斗。

1919年毕业后回国，投身新闻界，在北京《正言报》任编辑。他博学多才，思想敏锐，长于论辩，文笔隽永，深受读者欢迎。次年，与友人合办《正俗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

1922年高崇民回籍，在奉天府（今沈阳）与赵锄非、洪敬民等建立东三省民治俱进会。1923年3月，他们不顾地方当局禁令，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被驱逐出奉天省境，到了哈尔滨。1925年，在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任督学兼教育科长，

后又兼东省特别区教育会会长。同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协助孙中山派往东北工作的朱霁青发起组织启明学社，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在哈尔滨期间，他对旧官场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现象不满，经常发表反对言论。由于他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苏子元等人，1927年，特别区当局借口他是共产党，将其逮捕。后查无实据， 将他押解回籍。

1928年，高崇民出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兼《商工日报》社长。为保护商民合法利益，反对苛捐杂税，他和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杜重远等人组织商民数万人罢市游行表示抗议，引起各方极大震惊。同年底，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毅然实行易帜。时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高压手段，逼张学良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高崇民作为省农民会会长懔于国难日亟，与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等先后发起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团体，广泛开展反日爱国活动。

1929年起，高崇民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高崇民去北平当面质问张学良为何不进行抵抗。后又上书批评张学良说：“公一向用人，以庸懦无能者为上选。”[(3)] 张学良十分重视高崇民敢于直言进谏，将他视为畏友。高崇民得知丢掉东北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乃坚决辞去张学良秘书职务，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同年9月27日，高崇民和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积极筹集资金，支援关外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11月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一次请愿斗争，由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和学生组成请愿团，高崇民为领队之一。请愿团抵达南京后，蒋介石被迫在中央军校礼堂接见。蒋介石避而不谈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却侈言“中央没有什么对不起东北人的地方”。高崇民针锋相对地反驳：“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一卒，不作明确抗日表态，一味依赖国联，使敌人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

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4] 使蒋介石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参加者除进步人士外，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国社党人。在一次执委会上，国民党CC派东北头面人物梅公任（字佛光）对常委的工作进行无理指责。高崇民当即拍案而起，愤然斥责：“你也是一名执委，从救国会成立以来，没见你出席过会，你既不到会，又不了解情况，有什么资格来挑剔？你算什么东西！到底你是来抗日还是来捣乱呢？！……我不能与你这样的人共事。”[5] 说罢拂袖而去。高崇民的仗义执言，博得与会者的钦佩。事后，梅公任想拉高崇民加入CC派，高崇民复信中有言：“鸣蝉洁饥，不羡螳螂秽饱”[6]，表示决不与梅等为伍。

1933年，高崇民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是《三民主义的真谛》，揭露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的假三民主义；另一本是《东北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的罪行；表明东北人民绝不甘心做亡国奴，东北人民一定要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同年春，蒋介石把丢失东北和热河的责任完全推到张学良头上，逼其下野出洋，派何应钦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一到任，即下令取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此，救国会的某些领导人曾产生消极情绪，想坐待张学良归来。而高崇民却斗志不衰，他对卢广绩说：“不能等着，公开的活动不能搞，我们可以搞秘密的活动嘛！ 不管怎么样，抗日救国工作不能停。”[7] 于是，他便和阎宝航、陈先舟、杜超杰、王化一等于1933年9月18日秘密成立了复东会，为秘书长，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复东会的成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担心它会影响“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执行。1934年张学良归国后，蒋介石指使军统头子戴笠打出蒋张合作的牌子成立四维学会，以取代复东会。高崇民强烈反对解散复东会，拒绝加入四维学会，后经张学良反复劝说方勉强同意加

入。他对四维学会不抱任何幻想，认为这个组织是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1935年6月，四维学会主要成员集会讨论抗日问题，会上，高崇民说："敌人如此猖狂，得寸进尺，实在忍无可忍，希望我们的领袖（指蒋介石）马上领导抗日……一定会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否则，全国民众对领袖的拥护和信仰将发生动摇。"[(8)] 他还指出，学会不能只是坐而论道，不搞实际的抗日工作。军统头目贺衷寒听到高崇民主张抗日又批评蒋介石，十分不满，便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像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能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放狗屁！"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们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力量。"贺衷寒不待高崇民言毕即插言质问："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崇民立即答道："那是当然，否则，我们怎么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9)] 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以"辱骂领袖"的罪名下令通缉高崇民。

1935年10月，孙达生向高崇民转达了中共的希望：请他去西安促进张杨合作，实行联合抗日。高崇民与杜重远及阎宝航商议后决定接受这一任务，同时，三人又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退出内战，联共抗日。高崇民到西安后，即向张学良进言，指出蒋介石要东北军"剿共"是在搞"一箭双雕"的阴谋，企图使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他劝张"不要用旧眼光视红军为流寇，今天的共产党决非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可比，须知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所以百姓欢迎。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为一家人，如鱼得水。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剿'不完，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应权衡轻重，斟酌利害，是保存东北军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10)] 张学良善其言，嘱他沟通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关系，并说，解除误会方能成大事。高崇民往见杨虎城，"披肝沥胆，痛切陈述张的深谋远虑，绝无对西北有取而代之的意图。杨听毕极为高兴"[(11)]。此后，张杨之间的误会因此冰

释。

1936年上半年，高崇民与栗又文、孙达生合写了一本题为《活路》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反动政策的本质及其危害；指出东北人民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呼吁停止内战，联苏联共，共同抗日；提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三位一体”的主张。《活路》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深受欢迎，其中高崇民撰写的“抗日问答”成为对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活路》后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下令通缉高崇民，张学良乃令王以哲派人将他护送至天津租界暂避。

同年8月，蒋张矛盾加剧，张、杨派人将避居天津的高崇民接回西安，参加筹划逼蒋抗日大计。西安事变爆发后，高崇民被任命为张、杨两将军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参与起草张、杨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崇民始终遵循中共关于顾全抗日大局，坚持和平解决，维护“三位一体”的方针，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囚禁。1937年，在上海的高崇民与栗又文曾往访宋子文，要求宋子文履行诺言，营救张学良。同年2月，高崇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刘澜波、栗又文、阎宝航等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任主席团委员兼管组织部工作。“七七”事变后，高崇民到了西安，参与“东总”陕西分会的领导工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输送许多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

1940年秋，高崇民拟去新疆见盛世才，营救其好友杜重远。当时，去新疆机票均须重庆批准方能购买，为购机票事被戴笠骗至重庆，加以软禁。在重庆，由于“东总”领导成员于炳然、于毅夫先后被迫撤离，高崇民乃奉周恩来之命接替他们的工作。1942年，蒋介石下令取消“东总”，高崇民便在猫儿石住所挂起《反攻》半月刊社的牌子（《反攻》半月刊原为“东总”的机关刊），继续坚持“东总”的工作。

他发现其住所附近经常有三五特务轮流监视，房东也被查问，愤而致函戴笠质问："余一介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12] 戴矢口否认。此后，监视方式有所改变，但终未解除。高崇民身处虎穴，毫无畏惧，他公开主张联苏联共；他常出入苏联大使馆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他曾对戴笠说："任何省的人不主张联共抗日都可以，惟东北人不能不主张联共抗日。"[13] 他光明磊落，戴笠也对其无可奈何。当时，高崇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戴笠想拉拢他，许以待遇优厚的设计委员职务，他则婉言加以谢绝。1945年，高崇民秘密潜回东北，为此遭到蒋介石第三次通缉。

高崇民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历任安东省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第一、二、三届人大常委，第二、三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高崇民无限怀念张学良。1960年曾致函张学良祝寿，信中写道："自别旌旃，廿有四载，缅怀心情，时萦梦寐……今者祖国更新，洗涤百年之耻辱，树立万代之鸿基，六亿五千万人民，群情欢娱，欣欣向荣。""公今年六十大寿，远隔海疆，不得奉觞称庆，益引为憾。遥祝我公寿如松柏，坚如金石。……"[14] 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高赋诗感怀张学良："兵谏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转话凌烟。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15]

高崇民曾多次参加人大代表团出访印、朝、苏、捷、罗、保、南、芬、阿尔巴尼亚等国；在国内，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到处都留下他视察的足迹。1965年，更以七十四岁高龄进藏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其后，高崇民被诬陷为"东北叛党集团"成员，被捕入狱。1971年7月29日冤死于秦城狱中，1979年获得彻底平反[16]。

(1) 高崇民：《上半生简述》，《高崇民诗文选集》，沈阳出版社1991年，第373—386页。

(2) “高崇民自传”，现存高存信处。

(3)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复土的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页。

(4)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集，1981年6月内部发行，第87页。

(5)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集，第88页。

(6)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集，第91页。

(7)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集，第88页。

(8)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集，第93页。

(9)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集，第93页。

(10) 《高崇民自传》，第6页。

(11) 《高崇民自传》，第6页。

(12) 高崇民：《重庆软禁琐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4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8页。

(13) 《重庆软禁琐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4集，第16页。

(14) 高存信：《雪泥鸿爪》第64—65页，（1982年5月，未发表）。

(15) 高崇民：《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有怀张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3辑，第5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 1979年4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政协礼堂举行“高崇民同志

平反昭雪大会”，对其作了彻底平反。

高凌霨

张树勇

高凌霨，字泽畬，号苍松，直隶省天津县（今属天津市）人。生于1870年9月12日（清同治九年八月十七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举人。1900年后，以捐班知府分发湖北候补，初充启新书院中学副监督，继升湖北武备学堂监督，后改任湖北省立造币厂总办。1908年2月，经湖广总督张之洞保奏，出任湖北提学使。1910年（清宣统二年）9月，又经张之洞鼎力推荐为湖北布政使。同年底，因丁忧辞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避居上海。

1912年民国成立，高凌霨加入共和党并为该党干事。1913年3月，奉北京政府之命督办改组各省银行、推行纸币及开办金库等事宜。同年7月底，熊希龄继赵秉钧之后出任国务总理组阁，8月推荐高凌霨署直隶省财政司司长兼直隶省征税调查处及国税筹备处处长。时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驻防保定，高凌霨以曹为北洋派中实权人物，便与其深相结纳，并在拨付军费时予方便，以此获曹锟之欢心，日后成为知己。1914年4月，高凌霨在免去直隶省财政司长后，受奉天省都督张锡銮之聘，为高等顾问。

1917年11月，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等人为反对恢复旧国会而操办成立临时参议院，以为日后创立由他们控制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预作准备，时高凌霨以直隶籍被推选为参议院议员。1920年8月，高凌霨出任靳云鹏内阁农商部次长。1921年1月获二等大绶嘉禾章。同年7月任农商银行协理。10月，财政总长李士伟被免职，由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大力推荐，高凌霨继任财政总长。同月获一等大绶嘉禾章。11月初兼任盐务署督办。12月又兼任币制局督办。时北京政府财政拮据，而军政各部门索款日急，高凌霨因筹款无着，不敢到部

视事。不久，在颜惠庆临时内阁里改任内务总长。1922年1月，梁士诒组阁，高继任内务总长，兼任赈灾事务督办、京师市政督办和长江水利讨论委员会会长等职。3月，获一等文虎章。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军阀执掌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将倾向奉系军阀的交通系要人如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免职，改由高凌霨兼代交通总长。其时，直系内部矛盾重重，分“津保派”（因曹锟、曹锐兄弟驻节保定、天津而得名）与“洛派”（因吴佩孚驻节洛阳而得名）。而事先吴佩孚已面允“洛派”骨干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所以几经周折才说服属于“津保派”的高凌霨辞去兼职，同月又改由高恩洪署交通总长。6月初，直系军阀首领曹、吴藉战胜余威迫使皖系军阀操办的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辞职，以为曹锟日后跻登总统职位扫清障碍，并于11日以“法统重光”为名，拉出卸任总统黎元洪暂时代行大总统职权，由颜惠庆署内阁总理，改任谭延闿为内务总长（未就职）。时直隶省长曹锐辞职，18日北京政府特任高凌霨继任，然而，仅一周他即辞职改由王承斌出任省长。8月，高凌霨署财政总长。不久，唐绍仪被黎元洪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并在唐未到任前由教育总长王宠惠兼代，高凌霨仍被任为财政总长。9月，王宠惠正式组阁，高凌霨改任为农商总长。10月，获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11月底，汪大燮继王宠惠之后出组内阁，高凌霨又被任命为内务总长。

1923年1月，张绍曾正式组阁出任国务总理，高凌霨蝉联内务总长。2月，又兼任长江水利讨论委员会委员长。是年春，直系首领曹锟急于爬上总统高位，唆使津保派阁员（内务总长高凌霨及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进行倒阁活动，以迫使总统黎元洪因阁潮频繁而辞职。6月6日，当张绍曾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高凌霨秉承曹锟的旨意，联合交通总长吴毓麟、新任财政总长张英华、司法总长程克等人抨击总统黎元洪侵越内阁职权，胁迫总理张绍曾一同辞职。随后，这几位总长联合发表通电，迫使张绍曾、黎元洪相继离京出走。实际上在内外交攻之下，北京政府已无法运转，最后张绍曾内阁只好总辞职。14日，高凌霨便以内务总长暂代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

8月24日又被摄政内阁推为主席。随即他便串通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以及追随曹锟的直系军政要员紧锣密鼓地为曹锟操办总统选举事宜。10月，贿选告成，终于将曹锟捧上大总统宝座。10日，曹锟急忙从保定奔赴北京，就任贿选总统职。12日，高凌霨因贿选有功，被曹锟任命为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1月，曹锟发布大总统令，宣布改选国会。对此，议员认为曹锟过河拆桥，而且探知是高凌霨在暗中捣鬼为曹锟出的主意，遂群起而攻之，加上他在代行内阁总理期间的丑恶行径，也引起各方面的普遍不满。12日，曹锟为平息各方面的意见，遂免去高凌霨兼代总理一职，同时任命孙宝琦为国务总理进行组阁。至此，高凌霨梦寐以求取消“代”字正式受任组阁登上总理宝座的打算告吹，最后连个总长的职位也未能保住，而只落个税务处督办。9月14日，曹锟又任命颜惠庆进行组阁，颜因出任国务总理而辞去农商总长，其职位空缺，一度又由高凌霨暂时署理，但为时很短，仅月余而已。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软禁，北京政府实际上已被冯玉祥控制，同月冯玉祥推举黄郛组成摄政内阁，而以奉系王廼斌出任农商总长。至此，高凌霨深感大势已去，便远离北京而奔赴上海，以便静观时局的发展，再作进取。

1926年，高凌霨由沪北上抵津，隐居日租界桃山街。然而，他仍不甘寂寞，与亲日派往来密切，并加入日本驻军控制的“中日同道会”进行政治活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强占东三省的同时，又接连向华北扩张，派日本僧人吉井芳纯来华，在天津设立“中日密教研究会”，推举皖系首领、亲日派头目段祺瑞为会长，高凌霨与王揖唐任副会长，以研究宗教为名，藉此进行政治活动。同时，高凌霨与清末著名大臣张之洞之子、时任伪满洲国外交大臣的张燕卿交往频繁，暗通声息，进一步投靠敌伪政权。1932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省重修省志，高凌霨任河北省通志馆馆长。时日本侵略者正策动汉奸制造“华北特殊化”，以便侵占华北，于是唆使一些亲日分子在政治上大肆活动，又网罗一些商人、政

客组织各种公司、协会进行经济侵略活动。1935年9月高凌霨等人秉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满铁株式会社”以及中日实业公司的旨意，由东京国际银公司天津分公司出资，发起成立“救济华北经济委员会”。10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在津的一批旧军阀、政客又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并于10日开成立大会，高凌霨等十五人被举为理事。同年底，国民政府设置的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高凌霨被举为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被日寇侵占，8月初，高凌霨在日本侵略军的扶持下，组织“天津治安维持会”，并出任会长。至此，高凌霨公开露出其汉奸面目。该会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拨款十万元，向河北省银行及其他银行借款并用芦盐税收作担保向日本兴中公司借一百万元作维持经费，设立总务、财政、社会、教育、警察、卫生、盐务管理、商品检验八局及法院等部门进行活动。维持会事无巨细，均需请示日本驻津陆军特务机关裁定，方可行事。同年12月7日，日本驻沪武官根本博偕同汉奸王克敏抵平，在日本占领军的操纵下，10日，高凌霨同王克敏、江朝宗、汤尔和、朱深、董康、王揖唐、齐燮元等八名汉奸经数次会商，决定成立伪政权。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的中南海居仁堂宣告成立，并将北平改称北京，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为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临时政府下设以汤尔和为委员长的议政委员会，以王克敏为委员长的行政委员会，以董康为委员长的司法委员会。时高凌霨为议政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数日后，市长一职由另一个汉奸潘毓桂接任）。20日，国民政府发出宣言，斥责日寇非法组织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无效，又明令凡在沦陷区域甘心附敌参加伪组织者，决按汉奸治罪条例查明通缉严办。1938年1月，高凌霨甘心附敌，竟宣誓就任河北省伪省长职，5月，高凌霨因出任伪职而遇刺。1939年被免去河北省伪省长职位后，避居北平。

高凌霨为人机警而善于权变，在清末仅以一举人步入政坛并得权要之赏识而步步高升；入民国后，由于攀附直系首领曹锟而飞黄腾达；晚年因出任伪职，甘心附敌，而遭国人唾弃。1943年2月病亡。

主要参考资料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57年3月三联书店版。

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寒霄编述：《六月十三日》，中华印刷局1924年版。

Who's who in China：*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5th ed．，Shanghai：*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6．

《国闻周报》，上海国闻周报社。

高星桥

熊尚厚

高星桥，名文奎，字星桥，以字行，1875年8月24日（清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天津。高家世代以铁匠为业，先在南京，后迁天津开设“高记三挺刀”铁匠铺，给武场练功的人制造各种武器。其中三挺刀被清政府指定为武场专用，因而营业鼎盛。高星桥七岁入塾，读了几年四书五经，后考文昌阁童子试不中，父亲就叫他入了自家的铁匠铺学艺。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内地，反帝斗争连绵不绝。1900年春，兴起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清皇室令高星桥的大哥高文祥赶制金眼毛瑟枪五十支以备急用，制成后曾受到载漪嘉奖。接着又让高家移至北京炮厂制炮。高星桥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协助其大哥仿制成功了转轮手枪和快炮，技术日益增进。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高文祥遇难死去，他父亲相继病故，年青的高星桥担起了一家九口的生计。因在北京生活困难，遂搬回天津，靠外出作零活养家糊口，生活艰难。1904年底，他给英商济安自来水厂制造铁罐水箱的铆钉，生活略有好转。1907年，他与衙门小吏及脚行头目等结拜把兄弟，合伙用大车到火车站偷煤。后铁路管理制度渐严，他另谋出路，与人合伙开设毓记煤球厂，但未及一年即亏损歇业。嗣后，高入天津煤栈为推销员，一年后因煤栈待遇菲薄而辞职。随后他又设法凑集资本开设坤记煤球厂，未几又把资本蚀光。

1908年，津浦铁路北段开工，高星桥经人介绍，为铁路加工枕木、铆钉，后改任火车司炉。他见外国司机、司炉瞧不起中国人，心里很不服气。当时开长途火车的司机、司炉全是外国人，他支持中国司机开长途，自任司炉。他们的车也能正点安全到达终点，外国人开

始对他另眼相看。不久，经德商德义洋行跑街尹献亭介绍，他入德商泰来洋行任跑街。

1910年，高星桥从泰来洋行转到井陉矿务局任司磅，收发煤炭工作勤恳、吃苦耐劳，业余时间还向矿上的德人学会了一些德语。次年夏，一次因煤炭差了一百吨。该局洋总办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前来查问，高星桥以半通不通的德语作了回答，汉纳根十分高兴，又见他精明能干，就调他到华帐房工作。那时，井陉煤炭销路不好，汉纳根很想找个推销员。他亲自主持考试后，发现高星桥不但熟悉各种煤的性能，而且对如何打开井陉煤的销路也有一些办法，便决心加以重用。但其职位低，拿不出大笔保证金，起用受到障碍。汉纳根决心既定，便通过自己的岳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之妻）出面担保十万银两保证金，于1911年9月指派高星桥担任井陉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

高星桥当上总经理后，在天津、上海、汉口分设经理处，北京、保定、石家庄设分销处。他亲自前往山西矿区了解情况，对技术管理及交通运输提出改进意见；还到火车站、轮船码头及租界电灯房去实验井陉煤的耐火力，证明超过开滦煤两倍。从此，他到处宣传，为井陉煤打开了销路。1912年，他把井陉煤推销到了上海。数年间。高星桥从推销井陉煤中发了财，与上海开滦煤矿买办刘鸿生齐名。

1914年，高星桥在汉纳根支持下，接办了石家庄小型焦炭窑十余座。除加以扩充外，又新建焦炭窑二百余座，所出清水焦炭经天津运销日本，获利甚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星桥感情上亲德，认购德国“爱国公债”一百五十万马克，并给德军代办军需，赶制冬季御寒高统毛皮马靴两万双，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嘉许，赏赐他以德国贵族“冯（VON）”的称号。之后，德皇又赐给他中国全国铁路待筑计划蓝图，以示德国在大战胜利后将委他包建中国铁路。然而，1917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根据农商部《处置敌国矿商条例》，收回了井陉煤矿产权；次年汉纳根被遣回国，井陉矿务局收归直隶省长督办，高星

桥亦随之离去。

1919年，高星桥开始投资经营房地产业，以四十多万银两在天津河东建筑平房千余间出租或出售。又在北戴河增建一座占地十二亩的别墅，专供结交社会闻人。1920年他以三万余元在天津北马路买下大观察院旧址，兴建天津商场。次年正式开业，经营百货业务；并在商场的屋顶辟“天晴茶园”（后改名大观楼）出租。这时，高星桥加入了天津行商分所，成了天津闻名的殷商名流。

1922年9月，中德再订契约合营井陉矿务局，汉纳根重来中国，授意高星桥建筑从娘子关到井陉矿的铁路支线。次年6月，正当其着手筹备之际，直隶省长王承斌在直系支持下，利用外交途径接收了井陉矿局，并以武力没收了高星桥所经营的三百多座焦炭窑，还下令通缉他。高星桥被迫逃往上海。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赶下台，王承斌去职，高星桥回到天津，盖了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楼供自家居住。1925年汉纳根在天津病死，高星桥送丧仪银十万两。

高星桥脱离买办职业后，继续以其资财在天津经营房地产业，兴建大量房屋出租。1926年他出资筹建规模宏大的百货大楼以及旅馆、澡堂等。次年百货大楼建成，取名“劝业场”。除将商场出租外，他并在此开设茶园、戏院、影院等六七处。1928年正式开业，营业一直很好，每年获利数十万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但高星桥的商场、房产地处租界，十分得利。1938年天津周围发生大水灾，住进租界的人很多，商业畸形繁荣，高星桥获利更多。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占领租界，多次迫使高星桥出面为其效劳，邀他出任新民会长，又叫他去塘沽承建新港，高星桥推卸未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星桥经营的劝业场、戏院及旅馆等曾兴盛一时。但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通货

膨胀，贪官污吏横行。高星桥极为不满，常发牢骚。1947年某天，他在澡堂洗澡，与人议论国民党政府官吏敲诈勒索时，大声嚷着说："国民党这些三十六友真可恼！我愿把全部财产送给共产党也不给这些龟孙子！"[1] 正巧被国民党特务听见，天津警备司令白时伟即派人把他抓去拷问。高家托人行贿，花了五百两黄金才把他救出。高星桥被迫南下，寓居上海，所营事业由其子高渤海主管。

1949年2月3日，高星桥在上海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高渤海：《天津买办高星桥发家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44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大凡：《天津高星桥轶事》，［日］《太平洋经济月刊》第14卷第10期，转引自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6期。

张高荣：《劝业场一带的变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河北省井陉矿务局编：《河北省井陉矿务局改办第十四届年报》（1935年10月—1936年9月），河北省井陉矿务局，1937年。

---

(1) 高渤海：《谈高星桥生平》（访问记录稿）。

高旭

郭长海

高旭，名堪，字天梅，号剑公，别号钝剑、汉剑，又署名慧云、哀蝉等[(1)]。1877年出生于江苏松江府金山县张堰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便在家庭中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七岁学诗文，十七岁即以诗名噪乡里，后来又从顾莲芳和庄瘦岑先生受教，诗益猛进，旧学基础益深厚。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清政府的惨败使高旭深受刺激，他开始关心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前途。1898年，他倾向维新变法，很快就成了康、梁的积极拥护者。“南海真吾师”，是他早期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信条。1898年“六君子”的殉难和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使高旭由单纯地拥有一腔爱国热情转向如饥似渴地读《清议报》等维新报刊，从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并且试图用自己的诗作和它们建立联系。他写了《唤国魂》、《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吊烈士唐才常》等诗，歌颂那些把生命贡献给改革事业的政治家们。

1903年是国内形势迅速变化的一年，也是高旭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炳麟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都给了高旭以新的认识。6月末，苏报案发生，他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康有为保皇派的本来面目。他的立场开始转变，逐步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9月，《国民日日报》创刊，他经常在该报发表充满强烈的革命思想的诗作，例如《海上风潮起放歌》就是一首强烈的反清革命的战歌，在当时诗坛上有划时代的意义。10月，他又和叔父高燮、弟弟高增一起组织觉民社，发行《觉民》杂志，以唤起

国民之魂。1904年初，他频繁地赴上海，经常出入《警钟日报》社，和陈去病、刘光汉以及《中国白话报》的主编林白水等论交。这时，他又接触到一些更富有反清革命思想的书籍，如王船山的《黄书》、刘光汉的《攘书》、陈去病的《陆沉丛书》、章士钊的《孙逸仙》等书，明确地形成了他的反清革命思想。从此，他与康梁一派断然决裂。在《中国八大奴隶歌》一诗中，他把康、梁二人定为第七、第八号奴隶，与洪（承畴）、吴（三桂）、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并列，而在《光复歌》、《逐满歌》、《大汉纪念歌》中极力阐述反清革命的主张。1904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科。这时他开始系统地接触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的《独立宣言》、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对他的影响极大。他的思想由单纯的华夷之辨，进而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年末他又结识了在国内革命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天华等，并经常与田桐、程家柽等人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探讨与寻找反清救国的道路。他决心接手已经休刊的《觉民》和《江苏》两份杂志，再办一个振聋发聩、催人猛醒的刊物，定名《醒狮》。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之前，《醒狮》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个刊物。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横滨，着手组织革命团体。8月中旬，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高旭是第一批入会的盟员之一，并且担任了江苏省的主盟人。年末，东京留学界为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全体罢课，继而停学，最后罢学归国。1906年初，高旭与各省归国学生代表一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因不满于中国公学管理上的混乱，遂宣布退出，另组健行公学于上海西门宁康里，作为培养革命青年的场所，同时也作为同盟会江苏支部的活动机关。其间，发展了柳亚子、陈道一、张家珍等多人加入同盟会，并坚留柳亚子担任健行公学的国文教席。他们以《黄帝魂》做教材，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柳亚子把黎里的学生自治会转来健行公学，改称青年自治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柳亚子又把黎里的

《复报》也迁到上海，在健行公学编辑，寄往日本印刷，然后秘密运回国内发行。《复报》和《民报》步调相同，一时被誉为《民报》的“卫星”。健行公学是上海革命气氛最浓的学校之一，有第二爱国学社之称。在健行公学的后面，有健行公学教员夏听蕖的一所住宅，榜其门曰“夏寓”，这是同盟会江苏支部的秘密机关。上海地区的许多革命会议，都是由高旭主持在这举行的。高旭还通过马君武、傅君剑等，和中国公学的革命党人相联系；通过湘学社的陈汉元、宁太一等，和湖南的革命党人联系；通过陈志群，和蠡城学社的秋瑾、陈伯平等江浙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健行公学一时成了上海及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如果说1902年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心是在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社和国民日日报社，1904年在警钟日报社，1905年在国粹学报社，1906年则在健行公学。1906年7月下旬，孙中山从东京乘法国邮船赴越南，途经上海，召集高旭、朱少屏、陈道一、柳亚子四人前来，垂询上海革命活动的进展。通过健行公学，孙中山很快见到滞留沪上的各地革命党人代表，如秋瑾、熊克武等。1906年秋天，健行公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高旭不得已在年末将健行公学解散，关闭“夏寓”，回到金山乡下，暂避矰缴。不久，又迁居留溪，并创办了钦明女校，与妻子何亚希同任教职。

1907年春天，高旭赴上海，约陈去病、朱少屏、沈道非、刘季平同赴苏州游览。他们一路上流连山光水色，凭吊历史遗迹，过七里山塘，经五人墓，来到虎丘，在明末抗清英雄张国维祠饮酒赋诗，追慕先烈，大有几复风流余韵犹在之气概。虎丘之行，已经埋下了日后举办南社雅集的种子。七八月间，高旭和柳亚子等都参加了陈去病发起的神交社。参加神交社雅集的十八个人，后来差不多都入了南社，故而神交社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南社的预备会。1908年1月，留学日本的刘师培、何震夫妇由日本归国。途经沪上时，陈去病在酒楼设宴招待，高旭、柳亚子及神交社部分同人再次雅集。会上出现了南社的名称，会后摄影一帧，高旭和柳亚子都分别保存了一张，即题为“南社雅集写真”，并题诗其上。

1909年5月，高旭与正在上海养病的陈去病联系，商讨南社的一些问题，“要我结南社，谓可张一军”。9月初，陈道一自南京出狱，与柳亚子相偕赴留溪访问高旭。这次三人相聚，回忆了两年以来诸友的分合聚散，又得知陈去病已在苏州张家任教席，柳亚子动了再在虎丘雅集之兴，相约各自通知社员，冬日在吴门相会。10月17日，高旭所撰《南社启》在《民吁日报》上刊出，声称“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庐有南社之结”。10月27日，柳亚子撰《南社条例十八条》在《民吁日报》上刊出，宣称“品行文学兼优者，可得入会”。11月6日，陈去病发出《南社雅集小启》，通知各地社员“孟冬十月，朔日丁丑”“爰集鸥侣”、“幸勿忽诸”。11月13日，在虎丘张国维祠举行了南社的第一次雅集。南社这一有光辉意义的名称，遂正式出现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不过，高旭因为儿子生病，未得躬逢胜会。会后，他曾赋诗填词，分寄社友，表示“来春再做虎阜游”。此时高旭已经填了南社入社书，为第二号。1910年秋（重阳），高旭偕妻何亚希，约叔父高燮、友人蔡哲夫等人来到南京，共作白门之游。他们一路诗歌酬唱，抒发江山故国之思，后来由周实结集为《白门悲秋集》。这是南社成立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活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金山时，正在家居侍父病的高旭闻之欣喜万分：“日吉早时论北伐，便应一战决戎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更使他备受鼓舞：“炸弹声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花红！”他是在激动和欢呼声中跨进了中华民国的新纪元。1912年春，高旭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次年即赴北京。但袁世凯恣意破坏民主制度，在国会选举其为总统后，即以“增修约法”为名向国会进攻，随后于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月下一凭栏，浩荡江山，坏何容易造何难！”高旭怀着满腹悲愤离开北京。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了两院和国会的活动。随后因参战问题而引发“府院之争”，在段祺瑞、张勋的威逼下，黎元洪于1917年再次解散国会。“大千龙战玄黄血，残局猧翻黑白棋。”无奈之下，高旭再次离开了北京。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高旭应召赶去参加。1918年2月，军政府改组，桂系军阀掌握实权，孙中山离粤赴沪。“龙战玄黄此正时，漫天妖雾忽迷离。”高旭初来广州之时抱有“安得长剑倚崆峒，扫尽豺狼四海一”的雄心，而此时“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髯苏窜岭南”，遂回家隐居。随后，高旭三上北京。1923年夏，曹锟的野心日益显露，高旭的家乡人士颇关心他的进止，曾发公函给劝他早日离京，“不要违法助逆”，而高旭也有一封回信，态度颇为坚决，信中说：“诵来电，敬悉。政变陡兴，是非淆乱。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操诸我，旭之铁腕尚在也。所以迟迟未即南行者，特以此之倡国会南迁论者，乃竟合全国唾弃之安福、政学两系为一气，深恐故态复作，遗毒无穷。故郑重考量耳，非绝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沪定之，要非探本之论矣。辱承教惠，敢布区区。”10月4日，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为“大总统”。10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公布了参加贿选议员名单，共五百五十人，高旭名列其中，故此被称作“贿选议员”[(2)]。

柳亚子听说高旭参与贿选时，立即驰电相责：“骇闻被卖，请从此割席。廿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二十三名南社旧友也立即发表声明，不再承认高旭等社友资格。1924年冬，高旭抱病南归，避居张堰乡下。1925年8月25日（农历七夕）病逝。

高旭一生写作极勤，著述亦丰，其中尤以诗为最突出。高旭早期的诗作，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呼唤革新政治。随着高旭在政治上转变为反清革命的志士，在诗歌创作以鼓吹反清的种族革命为主题，《海上大风潮起放歌》可以看作高旭诗风乃至思想的转变标志。1906年在健行公学时，高旭以一夕之功，伪造了石达开遗诗二十余首，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时大江南北，都争传其诗。高旭的文章也有可称道之处，其诗文结集为《天梅遗集》，今人辑有《高旭集》。

主要参考资料

高缪：《高天梅先生行述》，《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1月）。

陈去病：《高柳两君子传》，《民立报》1913年7月21日。

郑逸梅：《南社社友事略·高天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 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06—708页。

(2) 《申报》与《民国日报》的这份名单并未举出根据。同时，名单也包括了未投曹锟的票一百一十人。因此，这份名单的人数，和北京方面公布的数字并不相同。仅凭这份名单来确认贿选议员的身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根据高旭在贿选前的表现，特别是《致金山教育公会信》的发现，对高旭的“贿选议员”问题有重新进行审视的必要。参看郭长海《高旭参加曹锟贿选之探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戈公振

熊尚厚

戈公振，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生于1890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江苏东台人。其父戈铭烈是个监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家境清贫。戈公振六岁入弢庵学塾读书，三年后转入同里的杜晴波学塾，并在求智学社学算术，对美术图画甚为爱好。十四岁考入东台高等学堂。戈十年的刻苦攻读奠定了国学基础，对黄山谷、赵子昂的字帖下过一定工夫，字写得工整。他在东台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时，其伯父戈铭猷在江西铜鼓任知县，即随之去铜鼓的县署学习。

1911年秋辛亥革命后，因伯父卸职，戈公振回到家乡，一边在一个乡绅家当家庭教师，一边去淮南法政专门学堂听课。翌年，他得人介绍入《东台日报》，担任编辑和管理图书的工作，公余入神州法政学堂学习法律和历史。1913年，得同乡绅士夏寅官介绍，前往上海入《时报》主人狄楚青所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白天在书局工作，夜晚上英文夜校，工作和学习均勤奋刻苦。他由于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替书局编了一本可供学生用的字帖和一本图案集，受到素爱书画碑帖的狄楚青器重，被提升为书局出版部主任。1914年，狄又鉴于他文字写作也颇出色，将戈调入《时报》工作。

戈公振入《时报》编辑部工作后，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很快提高了自己在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半年间由校对升为编辑，先后任本埠新闻版编辑、地方新闻版编辑，并撰写时评。在评论中，他不断揭露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在编辑工作中，他不断提高新闻学的素养，同时追求进步，对于取材和编辑都力求新颖。尤其是对副刊的编辑，他主张办一种讨论文学、指导生活、具有文学兴趣的副刊。在

五四运动前后，他在《时报》上创办了多种副刊，受到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欢迎。他为《时报》首创图画附张，增出《图画时报》，内容以中外大事为主，使报纸图文并茂，用道林纸铜版精印，为我国画报步入铜版之先河。《时报》的销路大增，狄楚青让他担任总编辑，主持该报的实际工作。

戈公振在《时报》工作期间，对新闻学的研究下了一番工夫，开始著述有关新闻学的书籍，从1925年起还从事新闻教育事业。他根据美国克拉克（F．N．Clark．Jr．）所著*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一书，编译成《新闻学撮要》，于1925年2月由上海新闻记者联谊会出版，立即受到新闻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他很重实用，附录多实用文，插图让人易于理解而生兴趣，其新闻观点主张新闻要新，要向民众开放。与此同时，他还研究新闻史，以其对中国报学史的研究所得，于1926年6月写成《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在1927年11月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新闻史专著。在新闻教学方面，他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报学系（或新闻学系）系主任和教授，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他发起组织上海报学社，出版刊物《言论自由》，提倡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去报馆参观实习。

1924年，《时报》主人狄楚青因多年积劳成疾，无心继续办报，将其主权出售给黄伯惠，戈公振仍留在《时报》工作。1927年初，戈将《时报》多余的照片转给办《上海画报》的友人钱芥光，黄伯惠对此大有意见，戈遂愤而辞职。他以其多年的积蓄自费去欧美游历，对法、瑞士、比、德、意、英、美及日本等国的报业进行考察。他对德国和瑞士街头的卖报亭、自动卖报机，对美国读者自费买报，对日本街头的新闻图片窗橱展等都产生很大兴趣，尤其欣赏美、欧等国的剪报室，认为对报馆储存资料很有益处。同年8月，他受国际联盟邀请，以中央社特派员身份在瑞士参加了日内瓦国际报界专家会议，作了题为《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发言。他经常将所见所得写成

通讯寄回国内报刊发表。

1928年底戈公振回国后，应史量才之聘进入《申报》工作，担任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兼摄影新闻社主任。设计部主任黄炎培忙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故设计部工作实际由戈主持；1932年起戈任设计部主任。他以欧美考察所得，对《申报》实施科学管理，使之逐步进入企业化轨道。他亲自进行报纸的剪辑工作，以备编辑记者参考，还就《申报》的新闻内容、销售及资料室的建立、创办画刊等等，经常向史量才提出改进意见。在戈建议下，《申报》于1930年5月增出大张影印版《星期画刊》，以铜版印刷照片、图画，由戈担任主编。同年8月，他在《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报界应有之觉悟》，主张各报应协力合作，呼吁言论自由，各自发挥一定的宗旨与特色，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与此同时，他在上海大夏、复旦和南京中央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和报刊史，担任中央大学新闻系主任，并去杭州等地讲学。他还担任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出版的《记者周刊》编辑。

“九一八”事变后，戈公振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奋不顾身地前往东北及淞沪前线采访新闻。他在随同国联调查团中国代表去东北时，不畏日本的恐吓、拘捕，冒险三进沈阳城及北大营等地。在撰写的东北通讯中，热情赞扬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发表《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境地。”之后，他又随团前往日内瓦，参加国联召开的讨论日本侵华问题特别大会。1933年3月，戈公振在中苏交涉复交之际，随外交官颜惠庆去苏联访问。他在苏联各地参观访问，搜集图片，撰写通讯，寄回国内刊登在《大公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上。同时，著有《从东北到庶（苏）联》一书。同年10月，他前往西班牙，出席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国际新闻会议，呼吁国际社会以平等对待中国。会后以记者身份，再次在德、法、意、奥、捷等国考察报业，撰著《世界报业考察记》一书（未完成）。

1935年10月中旬，戈公振回国准备与邹韬奋一起办《生活日报》，不幸因患腹膜炎于是月22日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戈宝权：《回忆我的叔父戈公振》，《人物》1980年第4期，1981年第1、2期。

徐心芹：《名记者戈公振之追忆》，《良友》1935年11月第111期。

李瞻：《戈公振》，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7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版。

龚心湛

马陵合

龚心湛，原名瀛，字仙舟，安徽合肥人，生于1868年6月2日。龚家祖籍江西临川，明中叶迁入江淮地区。祖父龚鼎孳曾任康熙朝礼部尚书，有文名，卒谥端毅，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其父龚照璧，无功名。1877年，龚心湛由合肥至上海，投奔时任上海道台的叔父龚照瑗，随同堂兄心铭、心钊入国学为监生。后龚心湛仰慕新学，转入金陵同文馆，改学英语。金陵同文馆毕业后，适薛福成出任驻英特命钦差大臣，被奉派为随员。1893年后龚照瑗接任钦差大臣，龚心湛继续留英，前后有八年之久。由于他年轻好学，办事干练，很得两任使臣薛福成、龚照瑗的赏识，并被提为参赞。为组建北洋舰队，清政府曾托驻英使馆交涉订船和借款事宜，薛福成、龚照瑗均交由龚心湛承办。他多次随龚照瑗出访诸国，包括递交国书、参加盛典、贸易往来以及游历欧洲等，对欧洲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颇多了解[(1)]。

在驻英公使随员任上，龚心湛还参与了密谋诱捕孙中山的事件。1896年9月25日夜，龚照瑗接到杨儒关于孙中山已从纽约来英国的密电，立即派二等参赞马格里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前往英国外交部婉言试探，可否依照香港、缅甸引渡条款，协助缉拿孙中山。英国外交部以香港、缅甸引渡条款不适用于英国本土加以拒绝。龚心湛献策道：“由马格里委托司赖特侦探社窥探孙中山行踪，然后再作决定如何。”[(2)] 龚照瑗采纳了这个办法。孙中山到英国后，就被英国的侦探盯梢，之后即被秘密绑架。孙中山被捕后，康德黎（James Cantlie）挺身而出向伦敦的地段警署报警，并向报界揭露清使馆在英国本土滥抓中国公民并欲偷运回国的消息，一时间社会舆论大哗。英国外交部迅速会同内务部联合介入调查。10月23日，马格里告以英国

外交大臣定要中方释放孙中山之意，龚照瑗觉得，再囚禁下去使馆方面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只好决定放人。但他不愿走到前台，而派龚心湛出面处理。当天下午4点半，龚心湛出面宣布恢复孙中山的自由，来接孙中山离开使馆的英国外交部特派专员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和康德黎先生应龚心湛“给我公使一个面子”的请求，未走正门，而是从侧门悄然步出清使馆。清廷随后又收到照会，英政府认为如果这种行为重演，“将证明必须利用任何可能需要的办法来解放囚犯，并使负责监禁行为的人员，尽速离开英国，相信中国政府将因此而严厉地谕令其在伦敦的公使，将来小心地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898年，龚心湛随龚照瑗任满回国，以保荐知府进京陛见，分发广东省任命。时李鸿章督两广，龚家与李家同为合肥望族，有世交。因此，他被派任广州知府兼洋务局会办。任内有两件事使其名播遐迩：按广州府旧规，赌税收入项下五万至十万两白银可由知府私自处理，但龚心湛却不取分文而移作地方公益。另一件事是汪兆镛、汪兆铭（精卫）兄弟应广州府试皆入选，循旧例应兄先弟后，而龚心湛认为“论文不分长幼”，破例置兆铭第一，兆镛第二。此两件事一时传为美谈。1901年李鸿章死后，谭钟麟任两广总督。谭钟麟出身翰林，讲究公文辞藻。龚心湛每有呈文均苦心磨炼，细心推敲，深得赏识。1906年，周馥任两广总督，委龚心湛督办边防，署钦廉兵备道。1909年李经羲督云贵，奏调龚心湛任临安开广道兼蒙自关监督。蒙自关为滇越铁路要冲，龚心湛到任后，竭力维护主权，旋擢升云南提法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龚心湛逃出云南，蛰居青岛，生计支绌，景况困顿。同在青岛做寓公的周馥建议善于理财的龚心湛找在北京政府当财政总长的其子周学熙，以其长为新政权效力。周学熙推荐龚心湛到汉口开办中国银行分行。此后一段时间，龚心湛基本上都专注于金融界和实业界，但在北洋军阀的纷争中，作为皖系的一员，很快又重回政坛。

1913年龚被推举为安徽省议员、赈抚局督办、安徽国税筹备处处长。1914年经安徽都督倪嗣冲举荐为安徽财政厅厅长。龚心湛督办安徽赈务时，曾视察灾情，认为水利不修是致灾的原因，提议创设水利局，每年拨省税20万元充浚治经费。1915年1月，调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即转任采金局总办，均未就。同年周学熙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15年6月23日，龚心湛被委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督办。7月29日，龚心湛代表中国政府向丁恩（Sir Richard Morris Dane）声明中国政府盐政方针："所有盐斤于未由场坨起运之先，一律抽收统一直接税。凡在现无官运之地点，不再举行官运，至现行官运办法之各处，其所收税款数目，如不及施行直接税法所收税款之多，亦必将官运办法取消……"[(3)] 此一承诺，再次确立了"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中国盐务改革的方向。同时被推选为参议院参政。袁世凯筹谋帝制时，任全国经界局总办的蔡锷潜赴云南，发动"护国起义"，遗缺由龚心湛兼代。

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龚心湛辞职，寓居天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龚心湛又被推为参议院议员。皖系为提高龚心湛的资望，在1917年底简放其为安徽省省长，以后龚心湛成为皖系主要骨干之一。1918年1月初，龚心湛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擅自决定增加本省田租，受到安徽人民的激烈反对，安徽旅居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人士群起攻之，并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二人。1月11日，龚心湛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龚心湛任安徽省省长虽不足两个月，但却为他涉足北京政权，成为皖系重要骨干奠定了基础。

1918年9月，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由钱能训组阁，龚心湛任财政总长兼币制局督办。段祺瑞心腹参战军参谋长徐树铮与陆军总长靳云鹏二人相互争权，每以财政总长为冲击对象。斯时，北京政府财政极为困难，龚心湛终日为索饷索薪者包围，穷于应付。1918年除夕，靳云鹏逼迫龚心湛一次付给军饷300万元，因龚心湛无法筹措，遂与靳云鹏发生激烈口角，几致动武，龚心湛负气出走天津，后

经段祺瑞出面劝说始返任。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广州军政府的护法斗争也日益发展，徐世昌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皖系的倒阁活动遂乘机而起。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内阁总理钱能训提出辞职，徐世昌提出曾任平政院院长的周树模组阁，段祺瑞有异议，皖系提出王揖唐组阁，徐世昌亦不同意。在徐树铮与靳云鹏难分上下之际，龚心湛成为缓冲一时的人选。龚心湛虽属段系，但与徐世昌有雅谊旧情，办事井然，具有理财的能力。1919年6月13日，徐世昌宣布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

龚心湛上任之际正值“五四”以后各阶层人士游行请愿活动处于高潮阶段。6月21日，山东代表在滂沱大雨中齐跪于新华门，坚决要求收回山东权益，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大总统徐世昌拒绝出来接见，代表也坚决不撤离。龚心湛只好勉强出来应付，双方对话一直延至次日凌晨。龚心湛最后答应，山东主权不能收回，就拒绝签字，山东省内顺济、高徐路力图收回，但对惩办卖国贼未便允行。

6月11日，陈独秀与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等人在北京新世界娱乐中心散发传单，被警察逮捕。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陈独秀是安徽人，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就是皖系军阀，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纷起营救。据6月16、24日的《申报》，由旅沪皖人组成的安徽协会几次致电北京安徽会馆，要求以同乡关系，“望速起营救”、“竭力设法营救”。在为陈独秀获释而奔走的同乡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余棐山致函安徽协

会，称陈“为革新思想之先导，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他在写给《时事新报》张东荪的信中说：“我和陈君并靡有一面之交，但不过我觉得他这样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4] 甚至还有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5] 9月16日，陈独秀在具结后终于被释放。

龚心湛主政期间，实际大权为安福系所操纵，徐树铮控制内阁，颐指气使。龚心湛不得不请徐树铮每日到国务院协助办理公务，甚至不避外间风言风语，在院内为其设立办公室。徐树铮则乘机引进丁士源、梁鸿志为其助手。陆军总长靳云鹏负气不到部办公，以示不予合作。龚心湛兼代总理期间，在外交、内政、南北和谈等问题上不得不面对各派势力相互倾轧和尖锐矛盾，勉力为之。

当时东北吉奉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徐树铮在东北各派中偏向于张作霖，于是，他让龚心湛利用代总理的权力，通过国务会议，调任吉林督军孟恩远为惠威将军，令其来京供职。孟恩远以种种借口拒不入京，还假以“各民众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吉林六十营军队派员坚留，余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于是，张作霖干脆扯下假面具动用武力。龚心湛只得主持国务会议，采纳鲍贵卿建议，以孟恩远以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孟恩远虽失去地盘，仍保有兵权，只得同意。张作霖独占东北的野心得以开始逐步实现。

与此同时，围绕南北议和问题，北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南北议和之前，北方政权由谁出任总代表一直未定，至龚心湛内阁，在段祺瑞、徐世昌支持下，决定由王揖唐充任北方代表，原因是“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确能负责，业经指定，刻日成行”。龚心湛还手书全权证书给王揖唐，让其合理合法就任。殊料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南下上海后，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拒不见他。当时沪上

报界刊出的标题很诙谐：“王揖唐，唐不揖王。”

龚心湛面对各方尖锐矛盾，处理政务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皖系扩军，已使财政收支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各方诋毁、威胁纷沓而来，龚心湛负气提出辞呈。在辞职书中云：“张良借箸愿有补于一时，傅说和羹本难调众口。”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心情及处境。1919年9月24日，徐世昌同意龚心湛辞去本兼各职。

龚心湛此后去天津长期定居，从事经济活动。周学熙主动把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之职让于龚心湛充任，并准其参与周学熙经营的各项企业。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段祺瑞入京任临时执政，龚心湛再次进入政坛，任内务总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不治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3月19日，其灵柩移至社稷坛，各界人士瞻仰致祭，几天中吊唁签名者达74万人。在公祭的最后一天，段祺瑞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他和执政府前往吊唁。因龚心湛是当年在伦敦抓捕孙中山的主要人物，守灵的学生们坚持要龚心湛走旁道入灵堂，不准他踏正中的台阶，龚心湛只好委曲求全，签了名代读完段祺瑞的祭文后即悄然退去。

1925年12月，段祺瑞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条例，恢复国务院，特命许世英组阁，龚心湛改任交通总长。1926年2月，陆军总长贾德耀组阁，龚心湛仍任交通总长。1926年5月，贾德耀内阁倒台，龚心湛亦随同去职，再度回到天津做寓公，从此结束其从政生涯。

龚心湛返津后，再度与周学熙合作，先后担任通益味精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大陆银行、中孚银行、永宁水火保险公司董事、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等职。周学熙所以重用龚心湛，主要是因为龚性情温和、善于理财，有人望又不专擅，可以代其出面缓冲各种争端。当时，周学熙企业集团的股东多为北洋军

阀、官僚和盐商、地方官绅，企业内部关系复杂，如启新洋灰公司董事会中存在着河南系和安徽系的派系斗争，本是安徽人的龚心湛进入董事会中，却很好地调和了两派的矛盾。龚心湛的超然立场使周学熙在1926年任命其为公司经理。龚心湛遂成为天津实业界具有实力的人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网罗北洋军政人员组织汉奸政权，龚心湛也在敌人属意之中。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原设在北京的伪临时政府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任委员长，龚心湛曾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这样一个虚衔。

在抗战时期，龚心湛致力于社会福利及救济事业。当时有大批难民进入天津，龚心湛积极筹款赈济，并组织伤病难民救济会，招集医士进行治疗。1939年，天津遭水灾，龚心湛又假开滦矿务局成立临时医院，收治急症。当时在日伪统治下，沦陷区粮价日昂，民不聊生，龚心湛遂发起成立急赈会，募款数百万元，以资救济。

龚心湛晚年还致力于教育事业，曾任南开大学、工商学院及耀华中学等的董事或董事长。其中工商学院系教会所办，抗战中期，该校与罗马教廷失去联系，财源告竭，行将停办，龚心湛挺身出任董事长，捐赠巨款，并多方募集巨款，以资维持。启新洋灰公司总秘书徐蔚如系当时著名的佛教学者，龚心湛在启新总理和董事长任上与其朝夕相处，受其影响，也对佛教产生兴趣。晚年寓居天津，信奉尤专，日有常课，常以“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偈语自励。徐蔚如在津创办刻经处及佛教功德林，举办甲戌讲经法会，重修天津大答禅院等，龚心湛皆竭诚赞助，并任功德林首届林长。倡办赈济时，功德林诸善信率先响应，并成立佛教赈济机构[(6)]。1943年，龚心湛和知名居士周叔迦发起重修大悲院，礼请天津籍高僧炎虚法师任会长，新修大悲院东院和两厢配殿。

日伪统治时期，周学熙、龚心湛经营的各项工商企业，成为日军吞并并强占的主要对象。如江南水泥厂的电机、钢磨被日本轻工业株式会社拆走，龚心湛为维护企业，奔走各方要求发还，终未有成。1943年12月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孙家骥：《龚心湛》，载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理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观瀑主人著：《人鉴》，北京复报社1924年版。

张朴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列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周军主编：《皖系北洋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1) 戴健：《声名煊赫的“合肥龚”》（二），《江淮文史》2004年第5期。

(2) 李联海、马庆忠著：《一代天骄孙中山记》（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3) 丁恩：《改革中国盐政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477—2478页。

(4) 《章行严请释陈独秀》、《旅沪皖人营救陈独秀》、《安徽协会请营救陈独秀》、《余裴山为请释陈独秀事致安徽协会书》、《余裴山致张东荪书》，见强重华、杨淑娟、王树棣、李学文等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64、34、60、49—50页。

(5)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

(6) 龚安芸：《龚心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发委员会编《合肥文史资料》第5辑（合肥人物），1988年版，第3页。

辜鸿铭

陈民

辜鸿铭，名汤生，以字行，别号汉滨读易者，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1)]。1857年（清咸丰七年）出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是第四代侨生，祖籍福建厦门。曾祖辜礼欢曾任槟榔屿华人“甲必丹”[(2)]，父亲辜紫云任英人勃朗（F．Scott Brown）橡胶种植园经理。辜鸿铭小时聪明伶俐，被勃朗收为养子，十岁时即被送往英国的苏格兰，与勃朗家族一同生活，并入学读书。1877年以优异成绩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赴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工科，获土木工程科文凭，然后留居巴黎。辜精通英、法、德及拉丁、希腊等语。

1880年，辜鸿铭返回马来亚，在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任职。这一年，马建忠赴欧洲途经新加坡，辜鸿铭与之交谈，得悉中土文物盛况，以及留学生之人尽其才，报效祖国，较之自己在殖民地屈居人下，无从施展抱负，不啻天渊之别，遂倾心景仰中华文化，开始研读中国经史等古籍，并从此脱下西装，换上长袍，剃发留辫，终身不移并引为自豪。

1881年至1882年，辜鸿铭一度担任英国马哈与科尔圭洪勘探队译员，后离职留居香港，继续潜修中国经典。

1885年，经杨汝澍推荐，辜鸿铭参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洋文案（相当于英文秘书、翻译兼礼宾诸务），一直到1905年，长达二十年之久，颇得张之洞的器重，辜自称“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3)]。1891年，俄国皇储游历中国至湖北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宴于“晴川阁”，辜为通译，席间，法语、俄语、希腊语均应对如流，俄皇储大为惊讶，叹为奇才，

并以镂皇冠之金表相赠。

1900年义和团兴，中外震动。辜鸿铭秉承张之洞意旨，连续写了几篇英文专论，刊登横滨《日本邮报》，指出教案激民愤，各国应反躬自省，运用智慧、道德，公正从事。这几篇文章后来汇集成册，书名《总督衙门来信》。同时还撰写《尊王篇释疑解惑论》，载上海《字林西报》等报刊，针对康有为对慈禧的抨击，力予辩驳，并吹捧慈禧说："惟皇太后不偏不倚，允执厥中。"(4)

辜鸿铭为人耿直、倔强，好作惊人语。有一天，张之洞吩咐辜鸿铭择译西报，以供施政参考。辜不以为然，说西报造谣无凭，虽上谕，我亦不译。张只好另使他人为之。1902年"万寿节"（慈禧生日）官府照例开宴庆贺，并奉旨唱新编爱国歌。辜向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怎么没有爱民歌？梁答：试请编之。辜略加思索，便说，已得四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5) 话音未落，举座哗然，故有"辜疯子"的绰号。

1905年9月，上海道台自海关总税务司收回主权，设立黄浦江浚治局，聘辜鸿铭为督办。辜在职共三年，期间因查获两名西人舞弊挖泥工费，辜力主惩罚，但外国领事袒护西人，会商时借口说我们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恐尚待考。辜鸿铭遂出示早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所获土木工程科文凭，各领事失色无言，不得不呈报上级。时江督惮于交涉，因循不追究，辜乃将案件原委及证据加以公开登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08年，辜鸿铭至北京任外务部员外郎，后擢升为郎中、左丞。他对办理外务，力主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在他看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是由于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1910年1月（清宣统二年），清廷赏辜文科进士，同榜有严复；著名铁道工程师詹天佑被赏为工科进士。

辜鸿铭曾相随张之洞二十年之久，在张去世周年之际，他缅怀故人，遂摭拾旧闻，整理成《张文襄幕府纪闻》二卷。内容虽属幕僚个人纪闻，但文中不少愤世嫉俗之笔，行文亦庄亦谐，对晚清权贵颇多嬉笑怒骂，对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也诸多贬辞。如“人谓我大帅（张之洞）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6)]。对袁世凯更斥之为“贱种”，指出“宫保（袁）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然彼此不相顾救，如此，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亦瓜分矣”[(7)]。他本着促使外国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一贯主张，又将《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译为英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季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同时，他还用英文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以红衣主教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故事，同张之洞对维新的攻击加以比较，痛惜纽曼与张之洞的失败，恐惧“邪恶势力”将在欧洲与中国取得胜利。1911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Wilhelm）将该书译为德文，书名改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哥廷根大学之新康德学派极为推崇，列为该大学哲学系师生必读之参考书。

1910年，辜鸿铭辞卸外务部职务，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各省纷纷独立，辜鸿铭却公开宣称仍效忠于清廷，依然拖着长辫子，以“老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自诩[(8)]。他曾自我辩解说：“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9)]

1913年，辜鸿铭一度担任五国银行团翻译。张勋复辟时，辜也被列名丑剧中的外务部职务。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聘辜鸿铭为该校教授，讲授英国诗歌及希腊文等课程。他在课堂上经常大谈孔孟之道，因深谙西方文化，精通西方多种语文，又研读中国儒家经

典，能够比较中西文化，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其英语文字风格之典雅，发音之纯正流畅，更为学生所倾倒。五四运动时，他与林琴南等反对白话文运动，他用英文撰写文章刊登于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说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比现代流行的英语更为华丽一样，中国经典也是比市井白话典雅、华丽。

1924年至1927年，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东渡讲学。他自诩学贯中西，独尊儒术，对西方文化多所非议，而对周公、孔孟之道阐扬不遗余力。德国学者曾将辜有关文章集刊译为《怒吼之声》，并组织“辜鸿铭研究会”。辜从日本讲学归国后，被张作霖聘为顾问；不久，又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未到任）。当时访华的外国作家、记者，多以一见辜鸿铭为荣；有的甚至说，到北京可以不参观紫禁城，但不可不见辜鸿铭。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病故于北京。

辜鸿铭的主要著作有《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读易草堂文集》等。译作有《中庸》、《论语》（中译英）以及《痴汉骑马歌》（英译中）[10] 等。

---

(1) 辜鸿铭出生于南洋的槟榔屿，受教育于西欧，讲学于东京，又娶古田贞子为妻，晚年隐居于北京，故自称“东西南北老人”。

(2) 英国统治马来亚初期，曾沿袭荷兰统治东印度殖民地的甲必丹（Kapitan）制。甲必丹意为民族首领，其职责为协助殖民地行政当局，做本民族人民的工作。

(3) 汉滨读易者（辜鸿铭）撰：《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1910年铅印本。

(4) 辜汤生撰：《读易草堂文集》内篇，1922年刻本，第10页。

(5) 汉滨读易者（辜鸿铭）撰：《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第23页。

(6) 汉滨读易者（辜鸿铭）撰：《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第24页。

(7) 汉滨读易者（辜鸿铭）撰：《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第6—7页。

(8) 英国作家毛姆（W．Somerset Maugham）：《辜鸿铭访问记》（嘉音译），载《人间世》杂志1934年第12期。

(9) 林语堂：《有不为斋随笔》，载《人间世》杂志1934年第12期。

(10) 《痴汉骑马歌》系英国作家考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所著，原书名为*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古应芬

萧栋梁

古应芬，字勷勤，别字湘勤，广东番禺（今广州）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于殷实的商人家庭。受其父喜读书尤好交接士大夫影响，从小爱好读书。1902年以“经古”第一名考中秀才。1904年经两广总督岑春煊考选，派古应芬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四十余人去日本留学，古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1905年秋，与胡汉民等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们反对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罢学回国的做法，坚持学习至1906年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并升入专门部肄业。1907年毕业回国，执教广东法政学堂，任广东谘议局秘书等职，开展秘密反清活动。

1911年到香港协助黄兴、胡汉民策划广州起义。辛亥武昌首义后，广东都督府成立，胡汉民任都督，古应芬历任都督府秘书长、核计院院长、琼崖绥靖署总办等职。1913年奔走广州、香港等地，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4年至1917年协助朱执信回广东开展反袁和护法活动，曾三次赴南洋与邓泽如联络华侨筹募善款，接济反袁讨龙（济光）各路义军。

1918年11月至1920年10月协助陈炯明进军福建，回师广州讨伐桂系，1920年任广东省政务厅长。1922年3月邓铿被刺，古应芬推荐李济深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协调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陈不听，古乃辞职前往上海。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古应芬到香港组织接应孙中山，任驻港讨陈办事处成员，开展筹款和联络工作，策动滇、粤、桂等省联合驱逐陈炯明出广州。1923年2月，任大本营江门办事处主任，组织梁鸿楷、陈可钰、李济深、邓演达等各方力量讨伐企图谋害胡汉民的桂军沈鸿英，从此博得孙中山

和胡汉民的器重。3月任广州大本营法制局局长，后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秘书长。8月随孙中山东征陈炯明，逐日记载孙中山活动情况，后来出版了《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一卷。1924年9月继廖仲恺之后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并兼军需总监，努力统一广东财政。1925年7月，大本营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廖仲恺任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古任政府常务委员兼广东省政务厅长，8月廖仲恺被刺身亡，古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及广东省财政厅长。

这时，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古应芬深感不安，企图组织力量加以阻止。他利用在警官学校讲课和其他宣传阵地，竭力宣传反共言论，得到蒋介石等人赏识。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北伐军胜利进军，他奉命代表国民党政府前往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慰劳军队，目睹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更为不满。1927年亲赴江西、上海密谋反共清党，接受蒋介石旨意，4月5日与邓泽如、张静江、吴稚晖等中央执监委员在上海策划进行清党，回广州又参与策动“四一五”政变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

1927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古应芬任政府常务委员兼代财政部长，为筹措“二次北伐”军需，发行二五库券三千万元，并逐步对国民政府财政进行了整顿，在民国史上第一次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标准，改革中央与地方收支性质不分、权责混淆的流弊。同时明令各省不得截留税款，宣布1927年9月1日起实现关税自主，取消国内通过税，取一物一税原则，改铸纪念币，这对统一财政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加剧了人民的负担。

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古应芬卸本兼各职，短期赴日本考察后回国，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2月16日，

古奉命查办汪精卫涉嫌广州事变案。1928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古任文官长。1929年3月继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1930年冬，因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古应芬心灰意冷，即以割治背部瘤患为由，不顾友人劝阻，毅然返回广州。1931年2月，胡汉民因与蒋介石“约法”问题矛盾激化，在南京汤山被蒋软禁。古应芬即与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萧佛成等通电支持胡汉民，弹劾蒋介石。5月28日，古与汪精卫、孙科、唐绍仪等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古是这个政府五名常委之一，且得到陈济棠支持，故权势甚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政府试图合作，古应芬提出胡汉民应立即出京，李宗仁也请释放李济深，从而促成胡汉民获得自由，并到上海参加蒋汪合作会议。古应芬则因患牙床肿胀转为牙瘫重症，于10月28日在广州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古应芬》，《革命人物志》第1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1月出版。

吴相湘：《古应芬整理财政》，《民国百人传》（二），台北传记出版社1971年1月版。

吴相湘：《古应芬其人其事》，台北《传记文学》第9卷第2期，1966年8月版。

谷正伦

熊宗仁

谷正伦，字纪常，贵州安顺（今安顺市）人，1890年9月23日（清光绪十六年八月初十）生。其父谷用进系清季举人。谷正伦五岁入安顺府学发蒙，自幼好舞剑弄刀。1906年考入贵州陆军小学，次年加入该校革命团体历史研究会。1908年秋肄业，被选送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深造。同年冬与何应钦、朱绍良等被清政府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就读，不久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爆发后，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参加革命，谷正伦亦回国至武汉，任汉阳总指挥部少校副官，参加汉阳保卫战。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谷被任命为陆军部少校科员。临时政府北迁后，谷调任南京留守府中校科员。翌年“二次革命”爆发后，谷追随黄兴，在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任职。讨袁失败后，谷复去日本继续学业，旋分发至陆军实习，期满转升士官学校炮科，1916年秋毕业。

谷正伦学成归国，适值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及黔军首脑王文华筹组贵州陆军第一师，遂被延聘入黔军任职，为贵州陆军第一师炮兵团长。1917年10月，黔军入川“护法”，谷改任步兵第七团团长，参加了驱逐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之战，随即又卷入川、滇黔军阀在四川的混战。1918年2月，在以驱逐四川军阀刘存厚为目标的“靖国之役”中，谷正伦率部参加了攻克成都之战，并进占遂宁。1919年谷正伦调任黔军精锐步一团团长。1920年8月，黔军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谷升任第二混成旅旅长。10月，川军联合驱逐滇黔军，谷被迫与黔军各部退回黔北。

退出四川前，王文华召集谷正伦、卢焘、胡瑛等黔军将领密谋，

以回省就饷、“清君侧”为名，向刘显世夺权。因王文华是刘的外甥、侄女婿，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遂取回避态度，借口治病而赴上海，以卢焘代黔军总司令，并任命胡瑛、谷正伦为黔军回黔行动的正、副总指挥，谷还兼代参谋长。万余黔军回驻黔北遵义一带，伺机入省城发动政变。11月10日，黔军将游击军及刘显世的卫队缴械，并杀掉刘显世的亲信、省府秘书长熊范舆和耆老会会长郭重光，迫使刘显世通电辞去所兼军政职务。王文华集团攫取了贵州大权，谷正伦以参与策划、指挥夺权有功而声望日著。

1921年3月16日，受北京政府收买并得到流亡昆明的刘显世支持，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袁祖铭收买刺客，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黔军陷于群龙无首境地，其内部的权力之争骤然激化。卢焘虽被推为总司令，但实权操在五个旅长手中。何应钦因系王文华的妹夫，又身兼旅长、警察厅长、黔军警务处长、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等要职，还从谷正伦手中夺取了黔军参谋长之职，自诩为王文华的当然继承人。谷则认为何“靠裙带起家，毫无战绩”[(1)]，且又以自己拥有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彭汉章第一团、王天培第二团，决与何争高下，由是演出了以谷、何为中心的黔军五旅纷争。但因何早已控制省城为中心的防区，新近又收编了部分游击军，谷一时难以与之抗衡。4月，谷只得率部进驻黔南，任贵州南路卫戍司令。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为消灭桂系陆荣廷势力，号召西南护法各省出兵讨桂。谷正伦因与何应钦争衡暂时受挫，“极思出外立功，扩张部队，再图回黔执政”[(2)]；还企图借讨桂之机，控制由黔南入广西的通路，既可夹带鸦片走私，又可勒索“保商费”扩充饷源，于是主动向卢焘请缨援桂。

6月，黔军两个混成旅分兵入桂。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黔军援桂联军第四路军司令，隶属滇黔赣讨桂军司令李烈钧之下。谷正伦离黔前夕，已做好倒何（应钦）的布置，并与省长任可澄秘密约定：倒何成功后，“谷主军，任主政”[(3)]。安顺是滇、黔鸦片的重要集散

地，谷正伦知悉西路烟土行情，乘机大做烟土生意；并派军需官陈子良来安顺押运烟帮，收取护运费及烟税。谷部与滇军李友勋部配合，于6月30日攻下柳州，谷纵其部属及绿林大肆掳掠，残杀无辜，并以卢焘招抚使的名义，出示招纳陆荣廷的溃军。其所部王天培团扩军至人枪两千余，实力超过普通一旅；彭汉章团亦扩充至人枪一千五百余。1922年1月19日，谷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下辖彭汉章第一独立旅、王天培第二混成旅。

1922年底，黔军内部纷争发展到相互火并，谷正伦联合黔军警卫团长孙剑锋和第四混成旅的张行伟团，赶走何应钦；得吴佩孚、刘显世支持的袁祖铭则打着“定黔军”旗号，由湘西进逼黔东，早与袁暗通声息、支持“定黔军”的王天培拉拢彭汉章，此时通电拥袁。贵州政局一片混乱。卢焘无力维持残局，电召谷正伦率部回黔，许以总司令一职相让。谷带着自己的警卫连兼程回黔，不意王天培亦拔队跟进。4月初，谷正伦到达贵阳，原先拥谷的张行伟团，此时也倒戈拥袁。“定黔军”里应外合攻占贵阳，逐走卢焘，迎刘显世复职，刘即在云南通电就任贵州省长。谷匆忙逃往遵义，依附第四混成旅旅长张春浦，在黔北收罗人马，辗转流落湘西。

谷正伦得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贺耀组安置，于1925年7月出任湖南陆军第一师顾问兼军官讲习所所长。谷十分努力，颇获贺的倚重，从而获得了东山再起之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贺耀组于9月归附北伐军，被委为独立第二师师长，谷正伦升任副师长，旋又兼该师第一旅旅长，随北伐军出征江西。谷率部参与攻克九江后，升任独立第二师师长。随后又继续东进，于1927年3月23日攻占南京城外的雨花台，为江右军第二、六军攻克南京创造了条件。4月初，蒋介石加紧筹谋发动政变，下令驻南京的独立第二师扩编为第四十军，并任命谷正伦代理南京戒严司令。谷于4月9日与何应钦配合，将第六军留守南京的三个主力团缴械，并解散南京城里的江苏省总工会，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揭开了序幕。

1928年2月10日，谷正伦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5月3日，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身兼南京卫戍司令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因有抗击日军之举，在日方要挟下被蒋免去本兼各职，5月14日谷正伦接任卫戍司令职，直接担负首都的警卫重任。

1930年冬，谷正伦着手扩大宪兵武装，由首都卫戍司令部统一指挥。他在苏州设立宪兵军官讲习所及宪兵教练所，亲自训练宪兵骨干，订立制度，“使警察一元化，党务与特务一元化，处常与备变一元化”[(4)]。“九一八”事变后，谷奉命筹设宪兵司令部。在原有宪兵武装基础上，于1932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了宪兵司令部，隶属军政部，谷任司令，统辖全国宪兵。宪兵职责，系为国民党军警“本身的内部保障”，自诩“凡是国家存亡，革命成败，领袖生死，完全在宪兵身上”[(5)]。当时，谷所指挥的宪兵有六个团。1934年，为扩大宪兵组织，谷负责创办宪兵学校，蒋介石兼校长，谷为教育长。谷以严刑竣法和绝对效忠蒋介石为宪兵教育的规范，使宪兵组织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警察兼特工组织。1935年11月1日，谷正伦亲自组织侦破了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案，声望倍增；宪兵也因之被国民党各派系刮目相看。在同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前，谷统率的宪兵遍布全国，防范和镇压爱国运动，也成为国民党派系倾轧中维护蒋介石统治的有效工具。

“七七”事变后，谷正伦于9月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副监。11月，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告急，谷正伦率宪兵司令部西迁，宪兵学校亦迁至湖南常德，嗣因武汉陷落又迁至芷江。其时，谷又兼任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竭力扩大宪兵队伍，到1940年宪兵已扩充至三十个团。

1940年12月，蒋介石任命谷正伦为甘肃省主席，在其赴任之前，特面赠亲笔签名的《左文襄公全集》一部，以示优宠。谷乃以效左宗棠经营西北自励，以“在进步中求安定”为施政总方针，竭力整顿全省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他还四处活动，笼络青海的马步

青和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马鸿宾及新疆的盛世才，以切断陕甘宁边区与青、宁、新三省的联系，而使甘肃成为反共后方基地。他扩大甘肃省的财政预算，由原先的一千七百多万增至二千八百余万元。由于竭泽而渔式的征收，当年收入即达四千三百余万元，财政节余一千一百多万。1941年春，谷正伦成立了“甘肃物价管制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以曾系宪兵特务的余仲篪为经济纠察队大队长。谷还创办了“甘肃省贸易公司”，由省政府独家经营，逐渐操纵了全省贸易。不唯商人叫苦不迭，就是以官僚资本为后台的一些企业也啧有烦言。但蒋介石认为谷治甘有方，下达手令：谷不仅有全省的人事权，而且“驻甘肃所有中央机构，悉受谷主席正伦监督”[(6)]。

谷正伦在甘肃大力推行“新县制”。他配合国民党西北训练团，首先在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十九县选派一批骨干，经过集训后充任乡、镇长或干事。在推行“新县制”的地区，严密保甲，编查户籍，强制推行战时征兵、征工、征粮办法。其后，谷将这一套“整顿”地方的措施推广全省。为配合“新县制”的实施，谷选派谙熟军事者充任县长，并对全省保安团队实行整顿和扩充。从1943年开始，谷部署对陇南和兰州以西各地群众的反蒋反封建斗争实行“清剿”。对于曾在1938年11月和1939年4月先后两次起事，反抗国民党当局民族压迫政策的海原、固源、隆德一带聚居的回民，谷在继续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同时，“剿”“抚”并施，在回民聚居区培训师资，增设学校，提倡职业教育。谷还在海原、固源、隆德三县交界地区新设西吉县，委派亲信任县长，加强控制。

谷正伦治甘，积极提倡水利建设与繁荣农牧业，认为“足食始可足兵”[(7)]。他倡设西北水利林牧公司，聘水利专家沈怡任总经理，请宋子文任董事长。1942年，谷从省府财政收入中划拨部分款项修筑湟惠渠，拟定了《湟惠渠灌溉区土地整理办法》，将灌区受益土地约三万亩划分为若干“农场”，标定地价，要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十五年内还清，则所耕土地便归耕者所有。谷谓此乃“耕者有其田法令”，也是

国民党在西北搞“土改”的先声。继湟惠渠开通后，谷又主持修筑渭惠渠和泾惠渠，以谋进一步扩大水利灌溉范围。1942年10月，谷正伦兼任甘（肃）新（疆）公路督办，加紧修筑兰州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公路，并极力建议国民政府继续修筑天（水）宝（鸡）铁路，以改善西北交通。谷还实行全省性的“凭票兑粮”制度，以减少粮食交售或调拨上的周折，并节省运费。谷利用西北水利林牧公司主持在兰州北山造林，挖平行沟，截留雨雪水，做水土保持试验，获得一定成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 Henry Agard）来华访问期间在兰州逗留时曾前往参观，大加赞赏，谓可在美国推广。

由于谷正伦主甘颇有政绩，且善办“粮政”，1947年5月被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

1948年5月，谷正伦接替杨森为贵州省政府主席。谷衣锦荣归，初时颇雄心勃勃，以“黔人治黔”、“为桑梓服务”为号召，并竭力调和各派系。其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谷正伦确立了“边地重于腹地，防匪重于剿匪”的方针，与周邻各省密切联系，广结外援，以便稳定贵州。不久，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贵州国民党当局人心惶惶。谷正伦兼任全省保安司令，加强和扩充保安团队、保警队和地方民卫队，形成了省、专区、县三级体制的军警宪特一元化的统治网。11月，谷正伦与滇、湘共筹三省边区联防指挥部，并在省内一部分县设立“清剿”、“剿匪”机关，加紧防范和镇压人民武装游击队和群众的反抗斗争。由于国民党统治的颓势难挽，四川部分国民党军将领暗中酝酿起义，“湖南的程潜又有异动，云南的卢汉态度暧昧，即黔省的部分军队也有不奉指挥的怪事”，谷因此“特别小心谨慎，思前想后，常有横不好竖也不好而有举棋不定之慨”[(8)]。

1949年元旦，蒋介石电召谷正伦至南京面授机宜，同意谷在贵州增建三个保安团，并允补拨原欠贵州的保安费。1月6日，谷以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名义宣布全省戒严，禁止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自由。不久，谷将贵州全省的保安团队改编为第一〇一军，以自

己的亲信、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为军长。此后他在全省开放烟禁，密令边远各县大种鸦片，并成立特货稽征处，一次就向广西运出鸦片十二万五千两牟取暴利。谷自行在贵州发行“辅币券”三十万元，还擅自从省银行提取大量银元、黄金。6月，谷成立了“贵州省反共保民委员会”，令各县成立分支机构。他要求所属人员“精诚团结，群策群力，保卫贵州”[9]。7月，谷正伦制定了以《贵州省自卫纲要》为中心的一整套应变方案，请中央补充弹械，控制贵州粮食出境，扩充地方武装力量，由城市转入偏僻农村打游击，选择根据地，储备粮食弹药，配置电台，起用一批军人补充专署以下政权等。10月，解放大军挺进西南，谷正伦加紧对贵州的控制，下令军警宪特屠杀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

11月1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距贵阳仅六十公里的龙里，谷正伦率军政机关仓皇逃离贵阳，到达黔西南的晴隆。谷于此时胃溃疡复发，请蒋介石准其“易地疗养”。谷指使第一〇一军军长韩文焕在晴隆将骚扰滇东民怨极大的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诱杀，以“克扣军饷，紊乱军政，纵兵殃民，擅杀无辜”[10]呈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随后谷逃到昆明乘飞机转赴台湾。

谷正伦至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3日病死于台北。

---

(1) 丁宜中：《我所亲见的袁祖铭和“定黔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2) 刘莘园：《第五路黔军援桂纪略》，未刊稿。

(3) 王天锡：《王天培倒谷（正伦）拥袁（祖铭）及与袁的矛盾》，《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4) 吴相湘：《谷氏兄弟各有建树》，《民国百人传》（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49页。

(5) 何辑五：《追念谷大哥正伦》，《贵州政坛忆往》，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428、433—444页。

(6) 王新潮：《蒋帮朱绍良、谷正伦主甘时的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7) 何辑五：《追念谷大哥正伦》，《贵州政坛忆往》，第411、428、433—444页。

(8) 何辑五：《追念谷大哥正伦》，《贵州政坛忆往》，第411、428、433—444页。

(9) 蒋相浦：《贵州省参议会亲历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10) 肖开训：《谷正伦杀刘伯龙的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14页。

顾颉刚

王煦华

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垄、武兴国等。1893年5月8日（清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在“幼时所读的‘四书’，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标”，《纲鉴易知录》上，也“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1年为胡适《红楼梦考证》搜集补充材料，并与胡适、俞平伯讨论《红楼梦》。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同年12月回北京，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在编辑室和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诸会工作，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至1949年间，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暨人文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的“传”、“记”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用历史进化论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来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钱玄同，用古器物考出的真古史以破坏伪古史则受王国维的影响，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集

整理歌谣、孟姜女故事资料。1909年，他读了《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后，就有志于考辨伪古史。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1916年作《清代著作考》初稿二十册（后来马太玄、陈槃协助他整理了一部分，刊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周报》上），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写《最早的上古史传说》时，比较《诗》、《书》和《论语》三书中的上古史传说，发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他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他又提出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扼要地论述了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由来，他说：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是最古的人王。古史传说中的帝王，东周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所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献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这封信就这样揭示了历来公认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

地造成的。此文在1923年《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公开发表后，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他将自己和他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从1926年至1941年，共出了七册，其中第一至第三及第五册是他自己编的，第四、第六册是罗根泽编的，第七册是吕思勉、童书业编的。这部书不仅在当时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震动，而且今后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顾颉刚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的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顾颉刚把考定古书的著作时代作为研究古史传说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古书的著作时代作了大量的考订。他认为《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可以约略地推定在西周初叶，著作人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史巫，著作地当在西周的都邑中。《易传》（《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的总名）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今文《尚书》的著作时代，其中《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十三篇都可信为真；《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

子》、《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和《顾命》十二篇，或是后世伪作，或是史官追记，或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但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三篇是战国、秦、汉间的作品，《尧典》出于武帝中年以后。《禹贡》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在秦始皇统一前约六十年，作者是西北人。《逸周书·世俘》篇，作于殷、周之际。《诗经》是一部入乐诗的总集，是西周至东周的作品，辑集于战国中期。《周礼》是战国时的法家著作，出于齐国以及别国的法家，在散亡之余，为汉代的儒家所获得，加以补苴增损而成。《仪礼》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的作品。《礼记》大部分是西汉人所作。《春秋经》是未经笔削的《鲁春秋》。《左传》是纪元前三百年间所著。《公羊传》是战国时所作。《穀梁传》是汉代中叶所作。《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战国初期的作品。《孝经》出于西汉初。《老子》一书的编成在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其发展则在公元前二世纪。《庄子》是一部“道家丛书”，各篇的著作时代，从战国中期起，到西汉末年止，约经过三四百年。《山海经》为战国时书，其中的《山经》则作在战国前。《穆天子传》作于战国初赵武灵王末年。

顾颉刚在观看各种戏剧、搜集整理歌谣及孟姜女资料时，注意到小说、戏剧、歌谣中故事的随时随地变化，认为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印证古史说的变迁。为此，他对吴歌、孟姜女故事、妙峰山香会及庙宇、神道、婚丧礼节等进行调查、搜集材料和分析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24年至1926年间，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吴歌甲集》和《妙峰山》先在报刊上发表，随着结集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如刘复说他的《孟姜女》一文“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又如《吴歌甲集》出版后，胡适说：“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妙峰山》的调查报告出版后，更受到广泛的赞美，如江绍原把它视作“调查的样板”，“这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而且说不定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有所贡献”。傅彦长则说它

的“功绩在《古史辨》之上”，“在研究民族的艺术文化方面，其伟大的力量，在现代中国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何思敬则称誉他“是一个时代的所谓时代精神，而他便是这个精神的代表选手”。这些称誉说明他在民俗学、民间文艺上开创性的调查研究作出了为学术界所公认的首屈一指的贡献。他又热心于创办民俗研究的团体和刊物，1926年在厦门大学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顾颉刚又是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热爱祖国的学者。他做过大量的反帝宣传工作。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学界起来声援，推他做宣传文字，他即写了《伤心歌》和《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两张传单，铅印散发、张贴，并在《京报副刊》上的《上海惨剧特刊》上发表。北大成立救国团后，他又与孙伏园联系，在《京报副刊》上出《救国特刊》，由他编辑，他在《发刊词》中提出“要把这次奋兴的感情变为持久的意志，要把一时的群众运动，变为永久的救国运动”。从这年6月到10月，共出版了十六期，每期他都写“篇首语”，又写了《上海的租界》等揭露帝国主义侵华史实的文章十五篇，可见其爱国心的强烈和坚定，办事的认真不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他不仅参加了燕大的“抗日十人团”和“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还为《中学生》作《贡献给今日的青年》一文，激励青年在国难日急的时刻，要下定决心到民间去，真正去唤醒民众，以挽救危亡。1933年他又创办三户书社（意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出版抗日大鼓词和剧本，以求深入民间宣传抗日。后来三户书社改名通俗读物出版社，把工作的范围“由抗日的一义，扩大为民众教育的全面”，增出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并创办《民众周报》和《大众知识》两个通俗刊物，以全面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另外还成立“大鼓书训练班”，聘请著名鼓书艺人翟少屏培养了一个五女四男的演唱队到民间去进行宣传。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共出版通俗读物近五百种，五千万册，对团结全民奋起抗战起了巨大的作用。1934年8月，他去百灵庙，住在蒙古地方自

治政务委员会的蒙古包里，与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知道“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察、绥二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便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出版了西北、东北、南洋、康藏、察绥等专号，又编印了《边疆丛书》。1936年11月，他与李书华、徐炳昶赴西安出席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办的陕西考古会第三届年会，此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夕，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访问了张学良，劝说张学良抗日，向张灌输“促蒋抗日”，争取全面团结抗战。西安事变后，顾颉刚又为燕大中国教职员会作《致国民政府电》，电文中说：“同人敢宣言曰：凡有利于我民族国家之统一生存者，皆拥护之。”又与马荫良约会徐炳昶等人为《申报》办《星期论坛》，他首先作《中华民族的团结》，提出“对帝国主义用欺骗手段进行分化，要防微杜渐，预遏隐忧，认为应该在物质、精神和行政三方努力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又为《大公报·星期论文》作《回教的文化运动》，强调“回教徒与非回教徒间的隔膜必须竭力打开”，“愿就自己所长，在文化上做些沟通”。可见“九一八”事变后这六七年间，他一直在做唤醒大众、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又与徐炳昶、吴文藻等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坚决抗日。又致电宋哲元，勉其抵抗日寇。签名者二十余人。由于顾颉刚积极宣传抗日，日人列为欲捕者名单，他被迫离开北平。抗战期间他又在兰州创办《老百姓》旬刊，在临洮、渭源等地办小学教员讲习班，做抗战的宣传和提高民众的文化工作。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抗战期间极困难的条件下，还编写出版了一百余种通俗读物。1938年为昆明《益世报》编《边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创立中国边疆学会。在宣传救国的同时，他也不放弃倡导学术研究，先后主编学术刊物《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文史杂志》。其中《文史杂志》影响尤大。他认为“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意识的利器”。因此，它虽是纯学术刊物，但内容力求通俗，讨论的问题亦能和时代相联系，受到读者的欢迎。

抗战胜利后，顾颉刚希望恢复他以前创办的事业。1946年3月，禹贡学会在北平召开复员第一次会议。会上所作的一些研究和出版方面决定等，都因“物价奇昂”，大都未能实现，只办了一种《禹贡周刊》，在《国民新报》刊出十期，以后又在《经世日报》刊出十六期。1946年9月，他为续办通俗读物社，与马荫良等筹商组织民众读物社，次年5月，《民众周报》创刊，但受经济崩溃之影响而销路不佳。《文史杂志》于1947年复刊后，出了三期，到六卷三期就停刊了。此时他深深感到事业的苦闷。

1950年他在《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一文中提出：中国正统文化，实在都从羌戎区域里发源，及至传进了中原然后大大地扩展的。昆仑是他们的宗教中心，这些宗教的仪式传进了中原，于是有“封禅”的大典礼，这些宗教的故事传进了中原，于是有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中国古史。中国古史人物是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而这些神话人物则由羌戎的宗教故事而来。因此，羌戎的宗教转变成了中国的古史。这是他对中国古史由来的最后的系统的简单说明。1954年后，他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大诰译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在北京病逝。

顾颉刚一生著述宏富，约有二千万字，已编为《顾颉刚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顾颉刚：《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肃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顾颉刚辑：《吴歌甲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6年版，民俗学会1928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3册，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版），后辑入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东方文化》第1—6期，1993年—1995年。

顾品珍

李希泌

顾品珍，字筱斋，云南昆明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出生。1904年，云南省考送留日学生，学军事者有三十名，顾应试被录取，同年9月抵东京，进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升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1908年冬毕业。回国后，适顾之士官同期同学李根源奉命筹办云南讲武堂，顾被聘任该校兵学教官，当时同任教官者尚有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沈汪度、刘祖武等人。

在云南讲武堂中，革命党人常向学员传播革命思想，如李根源、顾品珍曾带领学员去凭吊明末反清义士薛尔望之墓，乘机宣传反清主张。讲武堂成为革命党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之所，朱德就是在云南讲武堂当学员时加入同盟会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迅即传遍滇省，30日，云南革命党人在昆明起而响应，顾品珍参加了武装起义行列，次日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云南军政府，推蔡锷为都督，顾被任为参谋部第三部长。1912年初，云南军政府决定北伐援川，顾品珍参加援川军第一梯团。其后滇、川两省关系紧张，经蔡锷等努力，援川滇军分道撤回。顾仍在滇军工作，曾任团长、讲武堂堂长，1913年秋代理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1914年3月改任第一师师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云南督军唐继尧与蔡锷等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表讨袁檄文，反对袁世凯称帝，遂组成护国军和护国军政府。当时护国军编为三个军，第一军出四川为护国军主力，担任主攻任务，总司令为蔡锷，下设三个梯团，顾品珍任第三梯团长；第二军出广西转战湘粤，牵制北洋军入川，总司令为李烈钧；第三军

留守云南，总司令由唐继尧兼任。

第一军分兵三路出川，中路由赵又新的第二梯团和顾品珍的第三梯团组成，归蔡锷亲自指挥，该部于1916年1月中旬由昆明出发，目标直取泸州。该军第一梯团刘云峰奉命于1月18日攻入横江镇，取得初战告捷，20日攻取安边重镇，21日进占叙府。在随后保卫叙府的战斗中又打败北军第十六混成旅的进攻，从而加速了川军的分化，1月31日，川军师长刘存厚以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在纳溪宣布独立。2月4日，护国军第三支队董鸿勋部抵达纳溪，会同起义的川军进攻泸州，与袁世凯的北军战于纳溪城泸州对岸的兰田坝。8日，北军战败，渡江而逃。董支队乘胜渡江追击，迂回袭击泸州之背，经过一夜战斗，眼看就要攻下泸州，突然接获情报，敌军偷渡过江，兰田坝守军陈礼门战败自戕。兰田坝月亮岩等阵地尽失，董鸿勋支队腹背受敌，只好由原路渡江撤退。敌军由兰田坝向纳溪城进击，护国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由后方赶到，于是第三、四两支队在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高地与敌军激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蔡锷命令顾品珍率第三梯团赶往增援，朱德率领第六支队急行军于2月17日赶到纳溪前线，立即投入战斗，该部成为与北军鏖战棉花坡的英雄支队，从而使危殆的战局稳定下来。

蔡锷于2月23日亲临纳溪前线视察阵地，重新做了部署，调第一梯团金汉鼎支队由叙府赶到棉花坡增援，撤去董鸿勋第三支队长的职务改由朱德担任，第六支队长职务由第三梯团参谋长王秉钧补任。2月28日蔡锷组织了一次反攻，激战四五日，虽有斩获，但因敌军占据险要阵地并筑有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而护国军后勤供应不足补给困难，有被胶着拖垮的危险。到3月2日，叙府方面由于抽调主力到纳溪前线，兵力空虚致被北军攻占。防守纳溪的护国军处于腹背受敌之境。于是蔡锷决定作战略转移，计划退到纳溪县属龙头铺、白节滩一带高地，占据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再图反攻。

全军战略转移的任务，交由顾品珍执行，规定在午夜12时开始撤

退。但未到撤退时间，已有小部队擅自行动，顾亲上浮桥堵截，他手持短枪目光如炬，大声告诫士兵说：“撤退的时间未到，不准退。你们不要怕，我在这里，要死大家死在一起，你们仍要回到自己的阵地去警戒。”到了深夜12时，全军开始撤退。这时敌军屡放照明弹，探察护国军虚实，但不敢前往一步，深怕中了蔡锷的诱敌之计。顾品珍严格执行全军撤退计划，次日拂晓前全军撤毕将浮桥破坏，顾和随从士兵断后起行。上午8时左右，顾品珍到达蔡锷所在总部，汇报撤退任务完成情况，蔡不见朱德回来，责问：“何以不见朱支队长，是否没有撤退出来？如有不测，那就死在你们手上了。”一时气氛颇为紧张，不久接到报告，朱支队已撤到安全地带，气氛才缓和下来。顾在这次战略转移中，表现了英武刚毅、灵活机智的指挥才能。护国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由于前一阶段英勇作战，轰动了全国，影响国内进步势力起来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同时，袁世凯的北洋军由于受到护国军的多次打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不敢主动向前进攻。3月15日，蔡锷制定了反攻计划，反击的战斗于17日打响，朱德率领三支队所部两个营由白节滩出发，星夜行军，经过一夜战斗取得了反攻第一战的胜利。按照原定作战方案分头进击观音榜、兔子岩、南寿山、三块石等地之敌军，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3月20日晚在正面阵地的顾品珍率领王、聂两支队夜袭敌军，毙伤敌军五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护国军的反攻作战获得全面胜利。护国军一举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22日北洋军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顾品珍在这次反攻中表现突出，立了大功。

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全国，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他的军事独裁统治已到了全面崩溃的最后时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护国战争告一段落。护国军改编，顾品珍任驻川滇军第六师师长，同年12月晋升陆军中将。

1917年4月，川督罗佩金因裁撤川军第四师陈泽霖部，被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指为裁兵不公，随后两军发生激烈冲突。4月28日，

黎元洪任命驻川滇军顾品珍部为陆军第十四师师长。滇督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组织靖国军，8月任命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任命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

1918年10月，四川督军刘存厚发兵驱逐驻川滇军，嗣后川滇两军之间内战频仍，持续两年半之久。1920年9月。顾品珍所部靖国一军在成都之战中为川军所败。10月上旬，靖国二军军长赵又新在泸州之役中阵亡。滇军损兵折将，残部由顾品珍率领南撤，初退黔西毕节，继退云南，受唐继尧委为滇东边防督办。1921年1月下旬，靖国第八军军长叶荃不满唐继尧，在宜良起兵反唐。唐继尧出兵讨叶，省城空虚，2月9日顾品珍率所部回到昆明，赶走唐继尧，被推为滇军总司令，维持秩序。顾氏就任后，即着手整理军民政务，提倡廉洁，严禁贪污，纠正奢侈之风。同年12月下旬电告广州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将于下月率部参加北伐。1922年1月，孙中山特任顾品珍为云南讨贼军总司令，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

唐继尧被赶出云南后仍朝夕谋划回滇主政，1922年2月下旬，唐继尧率所部占广南，3月占文山、蒙自，并勾结云南土匪普小洪等扰乱地方治安。顾品珍率部到宜良剿匪，3月20日在宜良天生关的顾军司令部被围，司令部人员伤亡殆尽，顾品珍用手枪自戕。罗佩金闻讯出走楚雄，被害于苴却。24日，唐继尧率部占昆明，再度统治云南。

1923年4月9日，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明令褒扬前云南总司令顾品珍，追赠为陆军上将。

主要参考资料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于翔麟：《顾品珍》，《传记文学》第57卷第4期。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顾维钧

何小清

顾维钧，字少川，英文名V．K．Wellington Koo，江苏嘉定人。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上海。父顾溶，字晴川，曾任大清银行总裁。

顾维钧自幼读私塾，十一岁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三年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还担任学生会创办的《龙》报文学编辑。1904年自费旅美，在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库克学院读大学预科。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普通文科，后攻读政治学研究生。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顾维钧在校期间非常活跃，是语言社、学生辩论团的成员，并获得语言文学奖金和哥伦比亚、康奈尔辩论奖。他还担任《哥伦比亚每日旁观者》编辑和总编、《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和《哥伦比亚人》年鉴经办人。在中国留学生中也颇有影响，曾担任全美中国同学会会长，主编过《中国学生月刊》和《中国学生年刊》。

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早在1908年唐绍仪任清朝特使出使美国时，就认识了顾维钧，当时在一次会上，顾作为受邀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发言，给唐绍仪留下深刻的印象。顾维钧在博士论文尚未完成之时，即被唐绍仪推荐，回国就任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英文秘书。唐绍仪因善后借款及任命王芝祥等事，与袁世凯产生矛盾，于6月16日辞职。顾维钧也随之辞去两秘书职务，去上海同唐绍仪三女唐梅结婚。不久，顾开始在外交部工作，10月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7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未到任即调往华盛顿，任驻美兼驻古巴公使，开始了他半个世纪的职业外交官生涯。在美国任职期间，顾维钧还不满三十岁，因他仪表堂堂，善于辞令，颇受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各国驻美使团人员赏识。为肯定他的外交才干，1916年授予他耶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政府敦促参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顾维钧因妻子唐梅患流感在华盛顿去世，先于10月请假回国。北京政府随即派他出席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他因丧妻原拟请辞，但为争取国家权益毅然赴任。因团长陆徵祥身患重病，顾维钧实际上负责主要工作，并被推选为发言人。北京政府忌讳触犯列强，没有准备在这次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但国内知识界对和会寄予希望，期望争得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顾维钧以这种爱国热潮为后盾，在1月28日的会议上与日方代表牧野展开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舌战，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认为青岛、胶州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附属财产，都应交还中国。顾维钧的论点在会上引起广泛同情，而日本代表的强词夺理却受到普遍的谴责。但是，操纵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为了平衡列强之间的利益，对山东问题竟然作出了违反公理的决定，在凡尔赛和约上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后，人民群众义愤填膺，从而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北京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大总统徐世昌于6月23日电谕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顾维钧与陆徵祥商议决定，断然不顾政府训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脱颖而出，被誉为“青年外交家”，受到许多国家首脑及代表的敬重和钦佩。

巴黎和会决定发起成立国际联盟，顾维钧当选为五国代表之一，参与拟订国际联盟公约。与此同时，他改任驻英国公使。1920年11

月14日，国联第一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顾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该会。就在前一天，他与印尼华侨、新加坡“糖业大王”黄仲涵之次女黄惠兰结婚。自此，这对夫妇开始了在外交场合多彩而显赫的社交生活。在国联大会上，顾维钧以其外交和政治的广闻博识，阐述了按地区出代表的原则。从此这条原则被所有国际组织公认，也使中国选入了国联理事会，顾成为理事会第一名中国代表，并当选为非常任理事。1921年他当选为第十四届理事会主席。

1922年5月顾维钧奉召回国，至1928年一直在国内任职。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以美英为依附的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内阁几经更迭。顾维钧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军事集团，但他在外交上是亲美派人物，因此于1922年8月开始被直系任命为外交总长。其后，在频繁更换内阁人选的“阁潮”中，由于顾维钧亦学亦仕的职业外交家身份，及他个人与直、奉两系军阀首领均无冲突的和善关系，使他一直得以在内阁任职。除1924年10月至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一年半的间断外，他在八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其中两届由他本人组阁，出任总理，还两度出任财长。

这一阶段，顾维钧的主要外交活动是与苏联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1922年8月，苏俄派遣特使全权代表越飞来中国。顾维钧主张以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进行中苏谈判，并缔结新邦交，苏俄对此没有异议。顾维钧要求在谈判前苏俄红军撤出外蒙，并认为1919年苏俄宣言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权利，因此东北的中东铁路应无条件归还中国。但越飞声明他没有承担履行1919年和1920年宣言的任务，并对中东铁路的中苏共同管理办法表示反对。双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1923年9月，苏联派加拉罕来华，担任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全权代表。顾维钧任命王正廷为中苏交涉督办，全权处理中苏建交谈判。但王正廷处事不力，被顾解职，由外交部直接处理对苏交涉事宜。当时各界人士不清楚内情，使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极大压力，甚至家中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但他坚

持最初的原则，迫使苏联方面做了让步，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署了“中苏协定”。这个协定废除了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了租界地和庚子赔款，取消了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协定。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解散了内阁。在颜惠庆内阁任外长的顾维钧离开北京，在天津小住，不久即去上海。

1926年初，在日、英帝国主义策划下，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共同目标，将冯玉祥逐出北京，不久段祺瑞的执政府也垮台。北京政府自此不再有“总统”、“执政”，而以内阁总理“摄政”。5月，原颜惠庆内阁在吴佩孚怂恿和支持下复职，引退一年半的顾维钧也在吴佩孚劝说下出任财政总长。颜阁因奉张的反对而很快倒台，7月由杜锡珪组阁，顾维钧留任原职。10月，顾维钧在奉张的延请下继杜锡珪任代理国务总理“摄政”，并兼外长。1927年6月，张作霖另组军政府，由潘复组阁，顾维钧遂退隐于北京西山，但仍常接受张作霖咨询。

1928年6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共同北伐的大军即将进占北京时，张作霖等撤往关外，顾维钧专程送他们到天津。国民政府因顾维钧支持奉张，又历任北京政府要职而下令通缉。顾于年底出国去欧洲，后去加拿大旅行。1929年冬应张学良邀请回国到达沈阳，任张的高级顾问。张学良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蒋准张所请，并派张群、方本仁等向顾解释。1931年夏，顾维钧曾劝告张学良注意对日政策，并提示他要小心日本对东三省的垂涎，但没有引起张学良的重视。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蒋介石对日本采取妥协让步的误国政策，急需外交人才为其效劳，特派飞机接顾维钧去南京。从此，顾维钧转入国民政府任职，先任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专事应付对日本

交涉；11月继王正廷、施肇基为外交部长。时日军又逼向锦州，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国联，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驻军退入山海关为条件，希望日军不要继续进逼。这个划锦州为“缓冲区”的方案于27日公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初，南北各地学生纷纷赴外交部质问，顾维钧于12月21日辞去外交部长职。

1932年1月，国联组织“李顿调查团”调查中日争端，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该调查团。顾维钧不顾日本方面的威胁，坚持至东北调查，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并在10月的国联理事会上，坚持中国立场。

顾维钧于1932年8月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但在1936年前几乎未去巴黎履职，一直忙于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顾维钧在欧洲及国联频繁活动，但终因绥靖空气笼罩西方，国联事实上已经失去作用，顾的一再努力没有获得具体成果。

中国希望西方国家用武力制裁日本的幻想破灭后，转向努力争取列强给予物资援助。193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莫根索（Henry Morgenthau，Jr．）访问巴黎，顾维钧与之长谈经济援华问题，得知美方愿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洽谈。顾将此意电达国内，以后果然使中国政府获益。1939年—1941年间，美国对华借款一亿二千万美元，信用贷款五亿美元。驻法期间，他极力谋求法国援华，经多次商谈，法国同意开放滇越铁路，使国外援助物资得以源源流入。

1941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大使。同年10月，顾回国与蒋介石商讨对英外交方针，他主张先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其他双边问题留待日后计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英两国分

别在华盛顿和重庆正式签订“取消治外法权并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继苏联之后开其他各国相继放弃对华治外法权之先河。

1944年秋，中、美、英、苏四国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商讨创立联合国的会议，顾维钧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参加该会。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第二代表，并任大会区域办法审查委员会报告员。6月10日，宋子文回国，顾任代理首席代表，在6月25日制宪会议第九次大会上，他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1月，顾维钧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

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6月，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兼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发动了内战，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也大多是为争取美援而奔波。1948年间，顾为国民政府要求美国三年内提供三十亿美援进行了一系列努力。1949年1月，顾争取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和平解决内战，但其努力毫无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维钧继续留任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为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而奔走，并继续为台湾争取美援。1954年12月，顾维钧协同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求得美国帮助蒋介石当局维护对台湾、金门、马祖及澎湖列岛的统治。

1956年3月，年近七十的顾维钧打算退休，回台湾请求辞职。5月，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驻美高级谘议，即赴纽约定居，他与黄惠兰协议离婚，不久和严幼韵结婚。

1956年6月，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徐谟病逝，顾维钧于1957年1月被联合国安理会选举继徐谟任期。10月顾再度当选，连任九年，其中后四年任国际法庭副庭长。1967年2月5日任满退休，获终身国际法官的荣誉称号。此后复定居于纽约。

顾维钧自1912年起，一生从事外交政治活动超过半个世纪，在民国外交史上地位卓著，在西方外交界享有声誉。他曾先后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许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获得许多国家授予的各种荣誉勋章。

顾维钧多年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另外凡是接见或拜会外国政界要人后，他一定马上把交谈内容说给打字员记录下来。他退休后，把自己积累的珍贵外交史料，以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的三十五册日记，全部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等人邀请顾维钧口述回忆录，回忆录口述时间五百小时，编纂历时十七年。由于顾维钧亲身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他的回忆录记录了不少为外人所不及知的内幕情况，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1976年5月，顾维钧将这部长达八卷、共一万一千页的英文回忆录原稿赠予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后由纽约时报附设美国微卷公司制成缩微胶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1982年起翻译这部回忆录，将长达五百万字的中文译本分十三册陆续出版。

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5日上午（纽约时间11月14日晚），在他的纽约曼哈顿寓所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1994年版。

董霖：《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关国煊：《顾维钧博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1985年。

顾毓瑞：《顾维钧博士生平重要事迹》，台北《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1985年。

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版。

顾毓琇

王娟

顾毓琇，字一樵，1902年12月24日生于江苏无锡虹桥湾，排行老二。祖母秦太夫人，出身书香世家，有一定文学基础。父亲顾庚明，字晦农，保定政法学堂毕业，有六子一女，其中五位博士，1916年染猩红热去世，年仅三十五岁。母亲王镜苏，出身望族，秉性仁慈，勤于治家，教子有方。顾毓琇幼时由祖母抚养、启蒙。五岁入私塾，十二岁考入俟实学堂补习班。

1915年，顾毓琇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6月17日毕业。求学清华之时，恰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大大开拓了眼界，开始科学与文学兼而爱之。1920年12月11日，与同级的梁实秋、翟桓、吴文藻等七人组织了清华小说研究社，后听从闻一多的建议，改为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清华文学社，顾毓琇任小说组组员兼戏剧组主席。1920年，他业余开始用白话文翻译短篇小说《亡妻》、《胜利》等；1922年开始写《回家》、《他们》等短文。1922年3月，他完成戏剧处女作《孤鸿》四幕剧，并由清华1923级进行了公演，顾自任导演，赵敏恒担任男主角，梁实秋和吴文藻反串担任女主角。1923年，为纪念祖母，创作了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1923年6月18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翻译了哈姆生的《牧羊神》，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清华毕业后，顾毓琇考取了官费留学美国。1923年8月17日，顾毓琇从上海黄浦滩码头登上美国邮船杰克逊号赴美深造，同船的有梁实秋、吴文藻、翟桓、孙立人以及冰心、许地山等人。为消磨时间，排遣寂寞，他们在船上创办了名为“海啸”的壁报。到美国后，顾毓琇进入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1925年6月，获麻省

理工学院电机学士学位。1926年6月，获电机硕士学位。1928年6月，取得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扩充应用海佛仙（Heaviside）的运算微积分以分析电机瞬变现象。他所用的变换由固定坐标移至转动坐标为一突破 (1) 。后来，此种变数被称为“顾氏变数”或“顾氏变换”。继而，他又发表了“顾氏图解法”及“顾氏定则”，从而奠定了他在国际电机界的崇高地位。从50年代开始，他与美国科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等人开创了现代自动控制理论体系，后来在航天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被公认为自动控制领域的国际先驱。他既是电机工程专家，也是自动控制专家。正是因为“顾氏变数”等杰出成果，1972年，IEEE（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授予顾毓琇先生兰姆金质奖章。同年，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也赠其金质奖章。1999年12月10日，IEEE的电路及系统学会（CASS）为庆祝成立50周年，授予顾毓琇金禧奖章；2000年1月24日，IEEE授予顾毓琇千禧奖章。

顾毓琇在美国留学期间，以我国古代名人为主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如《国手》、《荆轲》、《项羽》、《苏武》、《岳飞》、《西施》等。1925年，顾毓琇编剧并导演了话剧《琵琶记》，由梁实秋译成英文，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闻一多负责布景，赵太侔负责灯光，梁实秋、冰心、谢文秋等参加演出，博得一致好评。1930年，他完成了神话剧《白娘娘》，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1990年，上海戏剧学院在上海公演此剧，获得成功。1937年，顾毓琇创作了抗日话剧《古城烽火》，次年在重庆市的国泰大戏院连续上演四个晚场，场场观众爆满。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顾毓琇将1932年写成的《岳飞》改编为话剧，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演出，借古讽今，并表明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决心。1990年，商务出版社发行了《顾毓琇戏剧选》，该选集由江泽民题签，曹禺作序。

1929年，顾毓琇学成归国，赴杭州就任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科主任。1929年4月1日，在无锡老家与王婉靖结婚。王婉靖出身书香门

第，擅长书法和绘画。1931年1月，顾毓琇应聘到中央大学任工学院院长，并在金陵大学理学院兼课。1932年，顾毓琇到清华大学任电机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33年1月，改任工学院院长，直到1938年。1934年10月14日，与李熙谋、恽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李熙谋为第一任会长，顾毓琇为第二任会长，恽震为第三任会长。

抗战爆发后，顾毓琇在江西九江参加了教育界的“庐山谈话会”。1938年1月，以非国民党党员身份在汉口参加抗战政府，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同时兼任教育部“战时教育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战时教育做了一系列有益的工作，对抗日胜利后中国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表彰了顾毓琇，授予他三等景星勋章。1944年8月，顾毓琇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主张“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空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提出“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学术上的成就”、“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机关”等。他力谋扩充和发展学校规模，改善学校环境，对系科的增设和调整，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还亲自上课和指导实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顾毓琇为了去上海侍奉阔别八年的母亲，请辞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国民政府派他出任上海教育局局长，他还选择到上海交通大学上电机及运算积分两课。顾毓琇还受命为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参加了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1945年12月，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顾毓琇，与著名戏剧家李健吾、顾仲彝、黄佐临等创立了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1947年9月，顾毓琇改任由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干校合并而成的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并兼课。顾毓琇任政治大学校长后，废除了军训制和训导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同时邀请曹禺、胡适等人到校演讲，活跃学校氛围。

从1940年开始，顾毓琇的业余兴趣由戏剧转向诗歌。他共创作新旧体诗词、诗歌六千余首，词曲一千余，首先后出版《蕉舍集》、《海外集》、《樵歌集》以及译诗《海滨集》等二十多种。1995年

1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顾毓琇诗歌集》，共收诗歌二千余首。199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顾毓琇词曲集》，共8卷1001首。

顾毓琇还擅长音乐，是一个音乐家。在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时，两度兼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还任国立交响乐团团长。顾毓琇在音乐上的突出贡献，是建议以348频率作为黄钟标准音[(2)]。此外，顾毓琇还将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的明末魏皓乐谱进行整理，改为五线谱，共整理出50调。又将姜白石之自度曲谱翻成五线谱，后整理成25调，并译成英文。此后将魏皓和姜白石的两套乐谱，填入词调，编成《唐宋歌谱二十五调》及《宋词歌谱四十五调》两书。顾毓琇还是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1991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顾毓琇作品音乐会”。

顾毓琇对禅宗也有研究，1976年7月，出版了《禅宗师承记》；1977年5月，出版了《日本禅僧师承记》；1979年，用英文撰写出版《禅史》，分上下两部，分别介绍中日两国禅史。

1950年9月，顾毓琇携眷赴美，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1952年底，移居费城，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54年9月，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正教授，终身职。1972年1月1日，正式宣布退休，为电机系和系统工程系终身荣休教授。1959年7月1日，顾毓琇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72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73年8月初到9月中旬，顾毓琇携夫人王婉靖和女儿顾惠民回国探亲访友，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后多次回国访友、讲学，并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会面，为中美关系发展和中国的建设建言献策。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医疗中心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万国雄：《顾毓琇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顾毓琇：《百龄自述》，《顾毓琇全集》第11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顾毓琇：《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顾毓琇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顾毓琇：《一樵自订年谱》，《顾毓琇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

(1)　顾毓琇：《百龄自述》，《顾毓琇全集》第11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3页。

(2)　顾毓琇：《百龄自述》，《顾毓琇全集》第11卷，第130页。

顾祝同

颜平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安东（今涟水）人，1893年1月9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父亲早逝，家政由祖母主持，将百余亩田地分佃乡人耕种。顾祝同六岁入塾，计七年，深受传统文化和伦理熏陶。1906年入养正小学，两年后考入本县高等小学，1908年入南京陆军小学，为第五期生。他勤奋好学，对各门课程和军事科目无不认真学习。

辛亥武昌首义，陆军小学停课，顾祝同在镇江参加北伐军先遣支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所部编为陆军第九师第十八旅第三十六团，顾任排长，驻徐州云龙山。不久南北议和告成，顾返南京陆军小学继续学业。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袁，黄兴在南京设立讨袁军总司令部，顾祝同任总部参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顾潜回家乡。

1914年8月，顾祝同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9年初毕业，分至长江上游陆军总部，任暂编第四旅七团三营九连连长。1920年7月至湖南清乡司令部任副官、卫队营营附，后因病脱离湘军。

1921年底，顾祝同到桂林参加孙中山发动的北伐战争，遇保定军校校友蒋介石，得推荐在粤军许崇智部任副官兼军士教导队区队长；旋奉派至赣军总部任联络参谋；年底任东路讨贼军总部副官长。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顾参加军校筹建工作，开学后任教授部战术教官，10月兼管理部代主任。军校组建教导团，顾兼教导二团第一营营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1925年8月起，他先后

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二团团附、第三师参谋长、第三师副师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何应钦于1926年10月率领东路军谭曙卿第三师、冯轶裴第十四师、张贞独立第四师攻闽。第三师战溪南、破永定、攻松口，连战皆捷，11月次第攻克漳州、泉州、莆田、永泰，12月进驻福州，顾祝同升任第三师师长。接着顾率师溯闽江上行入浙，乘胜前进，于1927年2月18日进占杭州，底定浙江；3月又向江苏进发，25日进驻南京。嗣后顾率师渡江北上，予张宗昌、孙传芳军以重创，因战功升任第二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7月末，顾奉命率部回驻上海。不久，孙传芳、张宗昌乘北伐军内部矛盾、蒋介石下野之际反扑南下，袭占龙潭、栖霞，顾祝同第三师从上海西上参加龙潭战役。战后顾升任第九军军长，辖涂思宗第三师、黄国梁第十四师、陈诚第二十一师，各级军官均为出身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1928年春，复职后的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北伐奉系张作霖，顾祝同第九军列入第一军团北上，4月10日攻克台儿庄，19日占邹县，5月1日入济南。日本制造“五三”惨案，顾奉命率部撤出济南，退守徐州东南地区。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着手“整军”“编遣”，顾祝同部被编为第一军第二师，辖三个旅。顾统率部队，唯求上下和睦，作战勇敢，而不注重纪律和管理，对士兵不禁嫖赌，对军官允许“吃空额”肥私囊，对伤残官兵则多发些抚恤金，对退伍老兵尽力安置，还办军人子弟学校等，以此来维系队伍的战斗力。在蒋介石与桂、冯、阎等军事实力派兵戎相见之时，顾部均被蒋倚若干城，在内战的疆场充任主力。顾因战功于1929年10月任第一军军长，翌年10月任统率八个师的第十六路军总指挥，不久又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洛阳行营主任。1931年5月又被蒋介石调回南京任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以德国武器装备全军，按德国操典进行训练，军、师、团三级均配有德国顾问，是蒋的近卫军。

1931年11月，顾祝同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顾主管苏政两年，督饬地方清查户口，并组建保卫委员会，以加强统治。期间发生了民政厅长卖官鬻缺和县长被非常拘捕等事件，受到舆论强烈抨击。

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连续四次失败后，于1933年9月又调集百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顾祝同被任命为北路军总司令，指挥陈诚、薛岳、蒋鼎文等部共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由北向南实施主攻。他执行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筑碉修路”战术，利用红军在“左”倾盲动错误战略指挥之下的一再失误，指挥所部先后攻占黎川、广昌、兴国、宁都等地。继后他又奉蒋之命对西进长征的红军进行“追剿”，1934年11月被蒋任命为四川行营主任。1936年6月，顾任贵州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12月西安事变发生，顾被任命为“讨逆军”副总司令，协同何应钦部署军事，但他支持孔祥熙和宋子文、宋美龄的和平营救活动。事变和平解决后，顾被蒋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他下力整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他们调离陕西；同时在西安代表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祝同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顾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辅佐司令长官冯玉祥（后蒋介石）指挥上海会战。由于蒋介石自始至终直接部署各军进行每个战役，顾只是秉承蒋的旨意，做些具体指挥事宜。11月上海会战结束后，他指挥一部退守南京，其余往芜湖、宣城方向集结。翌年1月起，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统辖苏、浙、闽和皖南地区的抗战军队，并兼江苏省主席。嗣后由于汪精卫伪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活动于南京、上海及苏浙地区，第三战区的军队长时间处在日伪军包围之下，顾以稳定内部、持久防御、保存实力为基本方针，与日伪军交战不多；在1942年的衢州会战中，因没有部署重兵进行有力抵抗而丢失大片国土。但是他执行蒋介石限共反共的指令十分卖力。1940年10月，蒋

介石指令何应钦、白崇禧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撤往黄河以北之时，亦密令顾祝同部署兵力伏击皖南新四军军部。顾即指挥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周密布防，埋下伏兵，于1941年初对北移的新四军进行围歼。顾还下令将前来谈判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悍然扣押，解往重庆送交蒋介石囚禁。顾是皖南事变的三大祸首之一，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只是蒋介石十分夸赞顾的忠顺和得力，于1945年1月擢升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赣州行辕主任。除仍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外，并节制第七、第九战区；1946年5月又升为国防部陆军总司令。

在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中，顾祝同是蒋的股肱之臣。顾于1946年6月受命兼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直接指挥三十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他采用“活动碉堡”、“分区隔离”、“竭泽而渔”、“分进合击”的战术，但未能奏效，受到蒋的责备。在1947年3月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顾受命指挥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四十五万兵员，以“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向沂蒙山区发动进攻。历经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和南麻临朐战役，这次重点进攻亦告失败。1948年秋，顾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竭力辅佐蒋介石挽回败局。他主张改攻为守，东北、华北稳住战略要点，中原加固江淮防线，并加紧编组若干机动兵团和组建二线兵团，以期夺回战略主动权。但是局势发展迅猛，解放军次第发动三大战略决战，顾无力挽回颓势。他奉蒋介石之命，先去沈阳督战，想调重兵解锦州之围以打通北宁线，但遭到东北诸将领的抵制，悄然离沈回宁；再至徐州坐镇，力求守住淮河一线，确保徐州这扇北大门，以护卫南京、上海，但是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和围割打援，使得蒋介石的精锐兵团一一被歼。顾祝同的指挥无济于事，只能乘坐飞机到前线上空用无线电传达“总统命令”，空喊“坚守”。

三大战役结束后，顾祝同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竭力部署长江防务，企图阻挡解放军渡江南下。然而解放军于1949年4月21日一举渡

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顾撤往广州，又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组织粤桂防线。粤桂防线被击碎后，于12月7日任西南军政长官，未及一月，所指挥之川贵云桂军队大部被歼，乃飞海南岛，再去台北。1950年初奉蒋介石之命潜至蒙自部署建立滇西“游击基地”，又至西康督饬胡宗南最后一战。

此后，顾祝同在台湾被蒋介石任命为“参谋总长”兼代“国防部长”，195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顾改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87年1月17日，顾祝同因脑血管病于台北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顾祝同：《顾祝同回忆录》，台北《中外杂志》1989年第1期。

顾祝同：《顾墨三九十自述》，台北《传记文学》第50卷第2-3期（1987年2月-3月）。

《顾祝同墨三先生大事年表》，台湾《江苏文献》第28-34期。

方暾：《我所知道的顾祝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选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沈战役亲历记》编审组：《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编审组：《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解放军国防大学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关麟徵

沈荆唐

关麟徵，原名志道，字雨东，陕西鄠县（今户县）人，1905年4月18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生。其父关树铭，在本村务农。关麟徵幼年在本村启蒙，九岁入邻村苍溪小学，生性顽皮好动，但学习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后因家贫而辍学，向往从戎当个连长。

1924年初，关麟徵闻悉陕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募新生，得友人帮助，改名麟徵前往上海投考。后至广州，被录取为军校第一期生，编入步科第三队。关勤勉朴实，训练刻苦，颇得总教官何应钦之青睐。年底毕业后，被编入教导一团，任第二营五连二排少尉排长。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军校教导团与粤军编为右路。关在攻克淡水之役中作战英勇，不幸膝盖骨关节受伤，被送到广东公立医院治疗，医生要锯掉其左腿，关说以后还要上战场，请求医生不锯。来探望伤员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赞其斗志，乃经与医院多方研究，精心治疗，保住了左腿。

关麟徵伤愈出院后，回到黄埔军校，任第四期入伍生团连长、学生队队长等职。他进一步研习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条令及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教程，提高自己的军事学识水平。他在军校参加了陈诚等人发起的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关麟徵调任宪兵团第三营营长，随总司令部开赴北伐前线。11月到南昌后，升任宪兵团代理团长。不久改任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1928年5月关任南京警备司令部警卫第二团团长。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军队实行编遣，关任第十

一师三十一旅六十一团团长，不久升任第三十二旅旅长。1929年5月，关至襄樊任新编第五师副师长，年仅二十四岁。

1930年5月，关麟徵率部编入张治中第二教导师任第一团团长，参加中原大战。关指挥所部在豫东高辛集坚守阵地历月余；在杞县以一个团兵力机智作战，掩护全师安全撤退；在商丘柳河防守阵地隐蔽分散在玉米高粱地零星射击，以虚攻实，以少制多，阻滞阎、冯军进攻，均取得战功，升任第二旅旅长。不久，又调任第四师第十一旅旅长，奉命讨伐盘踞南宫的石友三军。关安排队伍在远处宿营以麻痹石军戒备，而以一营兵力在夜间隐蔽在城垣附近，乘虚夺城，大军随即赶至，一举攻占南宫，全歼石军一个旅。1932年春，关奉调参加“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在霍邱的砖化寺遭红军袭击，伤亡甚重，关虽顽强指挥作战，但难敌红军之进攻，战马也被击毙。是年末，独立旅扩编为第二十五师，辖杜聿明第七十三旅和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关升任师长。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进犯之时，关麟徵率领第二十五师于1933年3月初开赴古北口作战。他怀着御敌卫国、为国雪耻的激情，不顾何应钦“停止前进就地待命”的命令，率部到达前线接防，亲自率领第一四九团与日军争夺潮河支流对岸的战略高地，英勇杀敌，虽受伤五处浑身是血仍力战不懈。他对5月底签订的“塘沽协定”中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满，认为如此不战而撤，必将丧失民心，乃向何应钦恳切陈词，还曾电请蒋介石予以制止。嗣后，关部被调往山西。1936年曾任“剿匪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官，率领第二十五师及王耀武师、李及兰师、沈久成师进入陕甘。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关麟徵任第五十二军军长，辖郑洞国第二师和张耀明第二十五师，在平汉路北段抗御日军。9月参加保定战役，多次击退敌军进攻；10月在漳河南岸与日军进行攻防

战，不惜重大伤亡，迫使敌军往邯郸、武安一带退却；并夜袭邯郸机场，炸毁汽油库，烧毁敌机十余架。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先在向城阻击北来之敌，继即担负攻击任务，在台枣支线及兰陵、洪山一带袭击日军；至决战阶段，对台儿庄日军发起猛烈攻势，与王仲廉第八十五军相继收复台儿庄南面的几个据点，后又从北面包围敌人。4月6日的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随后，又指挥所部向枣庄、峄县方向追击日军。台儿庄战役后，关升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说，关麟徵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蒋介石在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讲话中赞扬第五十二军战斗力强。8月，关麟徵率部开赴湖北参加武汉会战，在瑞昌、阳新的亭子山、磨山、虾蟆洞一带阻击敌军。他部署各部依山地形势构筑工事，组成互为呼应的攻防阵地，日军连续进攻十几天，付出重大伤亡仍不能得手。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关麟徵升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他指挥张耀明第五十二军、陈沛第三十七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和游击纵队，在湘北构筑坚固工事，利用河道、湖沼和山林地势节节抗击来犯之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在日军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辎重行动不便、后勤补给困难之时，关指挥各军分路发动强大攻势，歼灭敌人，全部收复失陷城镇。关因功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时年三十四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第一个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人。1940年，关部调防广西，继而移驻云南，担负滇越路以东之边防任务，所部番号改为第九集团军，关仍任总司令。1944年底，关任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官，仍守备云南。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关麟徵在国民党军事将领中属黄埔系，屡建战功，亦颇得蒋介石之赞誉与器重，但关与陈诚等人交恶，而与何应钦较为亲近，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亦受牵连。在陈诚日益受到蒋介石宠信重用而执掌国民党军事大权之时，关之升迁受到遏制。抗战胜利后，关先被任命为东

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但未能就任，于10月改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昆明“一二一”惨案后，全国声讨国民党特务暴行，蒋介石为平息民愤，将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连同关麟徵“停职议处”。翌年7月，关至成都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兼校长，关实际主持校务。1947年10月蒋去兼职，关升任校长。他主持军校，竭力改革教学；排除派系成见，力求人事任用公正合理；惩处贪污行为，实行经济公开；对部属、学员之奖惩则“赏由下起，罚自上先”，废除体罚，尊重人格等，颇获好评。

1948年8月，在何应钦被蒋介石重新起用之时，关麟徵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军校校长。其时国民党军在内战中节节败北，关手无兵权，也无意在此战局垂败之时出来效力。蒋介石有意要关出任陆军总司令或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以挽颓局，但是受到其他势力的阻挡而未成；直到何应钦任行政院院长时，关才被正式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但是他指挥不动各成派系的国民党军队，更无力抵御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1949年5月30日，何应钦辞职下野，关不久亦毅然辞职，退出军界。他看到国民党统治已难以为继，乃把家人送到香港安置。11月，他在成都搭乘去台湾的飞机途经香港小憩时，借口要探望病中的父亲而不再去台，在香港定居。

关麟徵在香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以读书写字自娱，不参加任何政治性活动，不与国民党军界袍泽联系。1975年4月去台参加蒋介石葬礼，谢绝蒋经国高官厚禄之挽留，仍回香港过隐居生活。

1980年8月1日，关麟徵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全国政协陕西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关麟徵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2年版。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关伟林

汪仁泽

关伟林，字崇昌，广东开平人，生于1872年3月16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家境贫困，十八岁时随叔父去美国谋生。初时在纽约学做裁缝，二十五岁在纽约唐人街开设小饭馆。

20世纪初，美国盛行自来水钢笔，但华侨中常用毛笔书写信件，不少商人、手工业者仍习惯使用毛笔记账，而毛笔在美国不易买到。关伟林偶然同亲友谈起此事，得到启发，设想从国内购得毛笔笔头，装上自来水笔杆，必会受消费者欢迎。为了学到制笔技术，1920年他毅然将饭馆出盘，经人介绍进美国最大的制造自来水笔的华脱门（Waterman's Fountain Pen Co．）公司，当了三年半的工人[(1)]。然后筹集资金，正式在纽约创设生产自来水毛笔的工场，用他的儿子关勒铭的名字，命名为“关勒铭自来水毛笔光滑墨汁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厂长。除从国内邮购狼毫毛笔笔头，制成自来水毛笔外，还兼售用美国原料配制的专用墨汁。1925年向美国政府注册，取得专利权。初时生意尚好，但不久因华侨中使用毛笔的人毕竟不多，且买后一时也不易用坏，因此销路逐渐呆滞。在亲友们的劝说和鼓励下，他决心回国设厂。

1928年，年满五十六岁的关伟林，携眷及全套制笔设备、原材料等迁到上海，租得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五百八十弄房屋数间，聘请刚从复旦大学商科毕业的同乡甘翰辉为助手，雇用职工三十余人，仍用原名，开始生产关勒铭自来水毛笔。但不久从美国带回的墨汁原料用罄，使用中国传统烟灰墨汁后，因胶质太多，笔头容易胶结，出水不畅，影响书写，因此不受国内消费者的欢迎，销售发生困难，资金亏蚀得所余无几。这时市上自来水钢笔销路日畅，只有外国进口货而

无国产品。关感到如能改产自来水钢笔，设备现成，可望成功，遂于1929年再度去美国集资，又在沪招股，得资金数万元，商请广东银行总经理梁冠榴任董事长，大安保险公司总经理陈巳生以及甘翰辉等任董事，改产自来水钢笔及少量金笔，笔尖向英国、日本进口，装上笔杆出售，并取得工商部门批准的专利权。

这时，上海各大百货公司和文具商店大都经销美国“华脱门”、“犀飞利”、“派克”、“爱弗释”等名牌高档自来水金笔。关勒铭厂上门推销时，受到冷遇，有的干脆回绝；有的只允寄售代销，卖出付款。而一般的文具店架上则摆满了日商低价劣质的自来水钢笔，每支只售五六角，甚至二三角，关勒铭自来水钢笔成本每支在五角左右，再加上零售店的销售费用（当时关勒铭钢笔的批发价是零售价的七折双九扣，即厂方收入仅是零售价的57%），售价须定在一元以上，因此很难与日货竞争。销路不畅，亏损累累，甚至连职工工资也发不出。后来只能降低售价，在中国国货公司的九九商场里，以一支关勒铭钢笔和一瓶国产墨水作为一组商品，合售九角九分。幸亏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群众爱国热情高涨，一再展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关勒铭厂由此受益，终于勉强维持下来。为了降低成本，关勒铭厂向德国购买不锈钢，自制笔尖。点铱工艺，起初请日本技师来厂辟专室秘密加工，后来甘翰辉学到了这项技术，降低了成本；并应用了笔尖镀黄工艺，增加了美观。1936年关伟林派甘翰辉秘密去日本考察制笔技术。甘在日商笔厂车间参加实际操作，又学到了用赛璐珞原料热模压制笔杆的技术，回国后自制笔杆，降低成本。生产价廉物美的50号型自来水钢笔，销路逐渐打开。同时重视广告宣传，报纸杂志登载大幅广告[(2)]，戏院剧场、车站码头以及闹市街头树立广告。奖励商店营业员，凡售出钢笔一打，赠毛巾或香皂半打。并在各大城市设立发行所、经销处或办事处，扩大经销。除行销国内各地外，还远及东南亚一带。

关伟林平时生活俭朴，不善对外交际，因此对外业务全由当时任

厂长的甘翰辉负责联系。关办厂时用他儿子命名，原想传之后代，为子孙创基立业。但其子勒铭毫无事业心，不善经营，使关十分痛心，后来就把厂里的一切业务都交给甘翰辉经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虽厂址在租界内未受战火波及，但上海市面萧条，关勒铭厂曾经一度停业。不久战事内移，沪地与内地逐步恢复货运，内地人口众多，工业品匮乏，文教用品大多需向上海采购。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对自来水笔的需要量甚大，全向沪地购办。因此1938年起关勒铭厂开始复工，生产迅速发展。1939年雇用工人数增加到五十多人，月产自来水等约二百罗（每罗十二打，共一百四十四支），其中少数是彩杆金笔。日、美商人曾一再要投资“合作”，都为关伟林拒绝。此时自来水笔笔尖、笔胆等零件进口困难，该厂又自行生产。关勒铭厂产品运销内地时，也标榜“完全国货”、“采用国产原料制造”，以迎合群众爱国心理，争取扩大销路。但实际上笔杆的原料不论是胶木粉还是赛璐珞，仍是向日本进口。为了避免被外人察觉和本厂职工的反对，进料时不敢直接送到厂里，而是经过另设的收货处，进行改装后再送到厂里应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加紧对上海的控制，上海与内地的交通日趋困难；加上抗战后期，敌伪穷途末路，滥发伪中储券，物价飞涨，工厂售出产品后，补不进原材料，关勒铭厂又陷入困境。1945年关伟林因其子勒铭患病去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健康也大受影响。

抗战胜利后不久，关勒铭厂董事陈巳生介绍美德文具公司宁思宏参加投资，同时还吸收一些实业界人士参加。1946年完成增资后改组董事会，梁冠榴仍任董事长，陈巳生、宁思宏、甘翰辉等为董事，并分任经理、厂长等职，负责关勒铭厂的经营管理。并改以生产金笔为主，扩大经营。此时，关伟林因年老多病不大管事，未安排具体职务。次年关回广东原籍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勒铭厂于1950年成为上海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关伟林被聘为该厂顾问。

1953年10月28日，关伟林在家乡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宁思宏口述，徐正元整理：《关勒铭金笔厂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6辑（总第3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宁思宏、甘翰辉提供之有关史料。

关中爱：《关于先父关伟林生卒年、月、日期的订正》，1983年12月9日。

---

(1) 《关勒铭》，上海商报社主编《现代企业家》，1934年版，第195页。

(2) 《关勒铭》，上海商报社主编《现代企业家》，1934年版，第210页广告。

光绪帝

周衍发

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满族，1871年8月14日（清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醇王府。清朝入关后第九代皇帝，年号光绪，庙号德宗。

载湉是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谳之子，生母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载淳病死，无子，立四岁的载湉承继帝位。同年2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年幼，再度垂帘听政。

1887年2月7日，光绪帝成年亲政，“颁诏天下”，实仍由慈禧太后“训政”。1889年2月25日，光绪帝与慈禧的侄女成婚，皇后的徽号隆裕。同年3月4日，慈禧太后归政，住颐和园，但仍掌握最高实权，控制光绪皇帝。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起，光绪帝和其师傅翁同龢等帝党官僚主战，企图通过一战而胜来摆脱慈禧的控制，反对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等后党官僚的退让求和主张。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898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为求得皇帝的支持，从1894年起曾数次上书给光绪皇帝，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当康有为给皇帝第三次上书，光绪帝方才看到，认为康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民族危机，上谕命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

光绪帝为了推行变法，还驳斥了后党官僚对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和变法的攻击。御史文悌说：“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驳斥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因而革了文悌之职。恭亲王奕□在宫廷中声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光绪斥称：“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光绪帝还通过庆亲王奕劻向太后传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1)

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呈进康有为所编《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同时，还花了两个月时间阅读了李提摩太译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同一天，光绪帝还令康有为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五大臣询问变法事宜。这次“问话”中，康有为驳斥了荣禄、廖寿恒、李鸿章的诘问和刁难，受到翁同龢的赞赏。光绪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应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1898年上半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权斗争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心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摆脱自己的傀儡地位，他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详细地谈到了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召见后，光绪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先后发布的有关改革的各种诏令计有一百八十条左右(2)。诏令的主要内容有：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

文教方面：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

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

军事方面：整建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

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光绪帝在政治上给予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定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文教方面提倡新学等，都有利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们思想上的解放。

光绪帝当时没有实权，所颁布的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执行一些外，其他中央到地方都进行阻挠。关于废除八股，后党官僚刚毅就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光绪帝质问说：“汝欲阻挠我耶？”刚毅提议部议。光绪说：“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3)] 由于光绪帝的决断，1898年6月23日，发布了废八股、改革科举制的上谕。当时，顽固派还阻止“制度局”的成立，1898年7月13日，在光绪帝震怒之下，曾亲以朱笔书上谕令两衙门再议。变法期间，光绪帝还颁布上谕致各地的督、抚以及各省道、府、州、县官“均得上书言事”。至于士民上书言事，径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则经发觉，定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处。

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从光绪帝推行变法起，就布置力量，准备发动政变，破坏变法。1898年6月15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下令免除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勒令回籍，借以孤立光绪。同一天，慈禧下令，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要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同时，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不久荣禄便统帅了北洋三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把军

权掌握在顽固派手中。

光绪帝对慈禧的阻挠很不满，曾进行反抗。9月4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4]。9月5日，光绪帝又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加紧推行变法。紧接着，光绪帝又在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人从总理衙门赶走。

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变法措施更加仇恨，加紧策划政变，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京津一带盛传10月间慈禧偕光绪去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除光绪帝。

光绪帝和维新派面临危急，光绪帝仍向朝廷诸臣表示：“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他在给康有为的密诏中说：“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5] 而维新派由于脱离群众，又没有可以依仗的武装力量，只好求助曾经参加过强学会、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所以他们向光绪帝推荐了袁世凯。

9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势已如在弦之箭。光绪帝因而非常紧张，于9月14日叫杨锐带出密诏，要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6]；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9月17日，光绪又叫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让康有为赶快逃离北京。维新派看了密诏后，相对痛哭，拿不出有效对策。最后，他们只好去拉拢袁世凯，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列强的支持，以挽救危局。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单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劝袁世凯拥护光绪帝除掉荣禄。袁世凯当时表示对光绪“忠诚”，并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7] 但又借口时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9月20日，光绪

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希望日本能支持变法、指导变法。康有为向英、日等驻华使馆活动，但得到的仅是对光绪帝的“同情”表示而已。

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当晚，袁急忙赶回天津，随后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禀慈禧。

9月21日凌晨，慈禧携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垂帘听政”，继而屠杀了维新派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至此，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成为阶下囚，受到慈禧训斥。但他仍能不改变法初衷说：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

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为了发泄对所传帝国主义要她“归政”光绪的愤恨，以及企图借帝国主义力量屠杀义和团，她于1900年6月21日，正式向列强“宣战”。光绪是反对慈禧对外宣战的。光绪在1900年6月19日慈禧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侃侃而谈，他不反对一般的对外打仗，而是反对“同时与外国开衅”的战争，理由是“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8)]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光绪被慈禧挟持逃往西安，在《辛丑条约》签订后，1902年1月光绪又被慈禧挟带回京。但慈禧对光绪的监视仍严，并命其属下严戒外人“跟皇帝说话”[(9)]。

处于长期软禁中的光绪帝，于1908年11月14日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因砷中毒饮恨而逝，终年三十七岁[(10)]。

---

(1)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

143页。

(2) 孙孝恩：《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3)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二），第25页。

(4)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17—18页。

(5)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二），第92页。

(6)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二），第92页。

(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8页。

(8)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一），第339—340页。

(9) 德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第10卷6号，第6页。

(10) 据最新研究表明光绪死于砷中毒。详见包振远：《光绪死亡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钟里满等：《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成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这二份成果的关系，参看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政治处等的说明，《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桂永清

颜平

桂永清，字率真，江西贵溪河潭镇（今鹰潭市）人，1901年3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生。父亲桂京山（字鹄仁）为菜农。育五子，桂永清居长。桂永清少时入贵溪县第二小学，因在课堂打瞌睡被同学戏称“宰予”，以“宰予昼寝”，孔子语“朽木不可雕也”讥之。桂小学毕业后，到南昌心远中学求读，后转入江西第一师范学校。桂永清从第一师范毕业后，难以觅得生计，乃决心学武从军，南下广州，先在赣军司令部协助处理文书，后为军政部军官入伍生。1924年与本县黄维、何基一同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生，编入学生第二队。黄埔军校管理严格，教学、训练均有优秀教官，桂严守校规，勤学苦练，尊敬师长，一改懒散习性，还参加孙文主义学会活动，颇受总教官何应钦之青睐，在编组教导团时被派任代理排长。1925年3月，教导团参加东征，桂被何任为连党代表、代理连长，率队作战颇为英勇。同年8月，编组建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桂任第一师特务连连长。10月第二次东征，桂任特务营营长，率部连战皆捷，率敢死队五十余人攀竹梯攻入惠州城，为此而踌躇满志。因不能严格治军，连排官兵出现违犯军纪掠夺财物的扰民事例，蒋介石接到民众告发后，当即下令将桂撤职。后经何应钦缓颊，改为降级处分。桂悔恨不及，感悟到身先士卒，仗好打；不以身作则，兵难带。从此不敢懈怠。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桂永清编入东路军，在何应钦所部恢复营长职。11月东路军进军福建告捷，继续北上进入浙江，对孙传芳军作战奏捷，桂永清升任第五十八团团长。底定浙江后，桂团继续前进，驻高资、龙潭间。1927年8月下旬，孙传芳军反扑，分三路强渡长江南下，抢占龙潭车站。桂团首当其冲，迅即投入战斗，鏖战七个昼夜。后孙传芳军在第一军、第七军的奋战下，终于溃退，

南京转危为安，桂永清之战功亦受到表彰。嗣后，桂永清升任第三十一旅旅长，隶属警卫师。

1930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中原大战爆发，桂永清第三十一旅隶属陈诚第十一师出战。桂竭力推荐邱清泉为副旅长，蒋介石未予批准，而另任李默庵为副旅长。桂不悦，对前来上任的李默庵傲慢冷待，没有放下手中的麻将。李乃向蒋介石控告桂拒不执行校长命令，骄横自大，成天打牌等等，被惹怒的蒋介石当即下令将桂撤职。桂去南京求见老首长何应钦说项，何乃得蒋之允准，派桂去德国留学。1931年春，桂进入德国陆军军官学校。他除努力研学德军的战术和军事训练方法外，还秉承蒋介石旨意，关注德国政局及国社党活动情况，广泛结识德国军界人物，与戈林（Herman Wilhelm Goering）、巴德、海德等高级将领也有交往，了解到不少国社党的内情。从德国归来后，桂向蒋介石汇报了在德的观感，接着参加了蒋介石于1932年3月召开的复兴社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央干事。蒋指定桂为复兴社训练处处长，意在推行德国的军事训练方法。桂还在南京创办“青年骑射会”，以骑马射击、发给枪支吸引大学生入会，先后办了三期，大多数会员后来都参加了复兴社。

桂永清留学德国之得，很受蒋介石重视。1933年秋，桂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是陆军的精锐部队，亦是蒋介石的禁卫军。桂以德国军事教育体系为依准，采用德国军队的训练方法严格训练全体官兵，讲授的都是德军的战略战术，自己还常常到操练场施训，做示范动作。他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更不允许顶撞上级；规定全队官兵严格做到不抽烟、不赌博、不宿娼、不饮茶（只喝白开水）、不用热水洗脸洗澡，有违犯“五不”之一的就开除出队。他规定各级军官都要参加复兴社，绝对忠于蒋介石；每天都要写日记，逐级检查批阅。他的办公室里，并排悬挂蒋介石和希特勒的照片，平日念念不停地宣讲“蒋校长诏示的‘不成功便成仁’乃是吾军人的信条”，编写《领袖歌》、《军人魂》歌颂蒋介石；还说希特勒的法西

斯主义使德国得到复兴。桂永清得到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中央军校总教官佛采尔（C． Georg Wetzell）和继任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的支持和配合。教导总队迅速发展为步兵团十二个，骑、炮、工兵、通讯、汽车团各一个，独立营四个，官兵总数达三万七千余人，超过一个军的编制，全部配备德国枪械，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担负首都南京的卫戍任务。1935年桂兼任第七十八师师长，并兼首都警备副司令。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桂永清正奉命作为特使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大典。9月回国后，即请缨参加正在激烈展开的淞沪会战，编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桂即率教导总队赶赴上海前线，接替胡宗南第一军的防线，进入苏州河八字桥，阻止日军强渡登陆。面对日军疯狂进攻，教导总队顽强抗御，战斗十分激烈，伤亡逾万，直至日军增援部队在金山卫大举登陆，教导总队始作战略撤退，11月12日至向鹤港，继退至苏州。接着参加南京保卫战，桂指挥所部据守紫金山、天堡城、光华门等阵地御敌，亲至前线督战。南京失守后，桂率部辗转至开封整训补充，于1938年4月改建为第二十七军，桂任军长，辖龙慕韩第三十六师、李良荣第四十六师、沈克第一〇六师及炮兵第四师，奉命在开封、兰考之间布防阻敌西进。旋即奉命进攻兰封，守城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顽强固守，桂亲至第一线督战，第二十七军官兵奋勇杀敌，十余天苦战不懈，逾五千抗日将士伤亡，桂仍指挥所部继续攻击不止，日军终于不支，从南门突围向考城逃窜。但蒋介石仍嫌第二十七军攻击兰封不力，桂永清及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等遭撤职处分，第三十六师师长龙慕韩还被加“放走敌人”之罪名遭枪决。

桂永清被撤去第二十七军军长后，奉命调任战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战干团1938年成立于武汉，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团长蒋介石自兼，陈诚兼副团长，教育长实主其事。战干团招收一批从沦陷区逃出、志愿参军抗日的青年学生加以训练，然后分派到各军去从事政

治宣传工作。随着战局的变化，战干团先迁至湖南沅陵、桃源，后迁至四川綦江。1939年秋，有数百名受训青年不满国民党限共反共政策和反动统治，呼吁团结抗日，要求民主管理。特务向桂永清密报称有“共党活动”，桂即下令清查，于是一批青年被戴上“异党”或“异党嫌疑”的帽子，被关押、刑讯，结果二百余人被杀害，四十余人遭伤残，三百余人被监视，还有几十人不知下落。事情暴露后舆论哗然。蒋介石、陈诚为平息民愤，于1941年1月停办战干团，桂永清仅受免职处分。

嗣后，桂永清奉派出国，担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但仅数月重庆国民政府即因德国于1941年7月1日承认南京汪伪政府而宣布与德国断交，驻德使馆闭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等国结成同盟国协同作战，正式对德宣战。桂永清奉命移驻瑞士，从事对外联络事务。1943年开罗会议后，为加强国民政府军事上同英、美等盟国的联络，中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驻英国伦敦。经何应钦推荐，蒋介石以桂永清为团长于11月30日赴任。桂在伦敦同英美联合参谋部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互通情况。他与英国军方高层人士广泛接触，对英国海军建设和教育训练方面尤有较多了解，因为其时中国政府派遣一批年轻海军军官到英国培训，桂受命对这批青年军官就近加以管理。

1945年5月，同盟国军队攻克柏林，桂永清受命兼任同盟国驻德国联军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英国政府将几艘超龄的老军舰送给中国，桂永清代表中国政府接受这批赠舰。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调整中央军事机构，参谋总长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经陈推荐，桂永清为海军副总司令。不久，桂任海军代总司令，以后又于1948年8月被正式任命为海军总司令。

桂永清执掌海军重职后，力谋扩大和加强海军实力。他选派一批中老年海军军官分赴英、美培训，提高技战术水平；同时他从原教导总队的部属中选调一批人才进入海军服役，担任舰艇的督训官或政训

员；并在青岛创办海军学校，自行培训海军人才，以求摆脱闽系等旧有派系之羁绊；撤销海军江阴教导总队，改组为地面警卫总队，加强地面管制；还将海军修械所扩大为修理厂、江南造船厂改为海军造船所等。由于我国海军舰船在抗日战争初期损失殆尽，此时桂永清虽竭力恢复和扩大海军实力，但拥有舰艇只三万多吨位，其中巡洋舰三、驱逐舰五、炮舰十余、登陆艇九十。

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节节败北，为维持战局，他频频调动海军协同作战。1948年10月，东北辽沈战役已无可挽回，蒋介石为将残余部队调回关内，乃命桂永清率舰船开赴营口掩护接应。刘玉章第五十二军官兵争先恐后抢登舰船。有些官兵逃到海边时，桂误认为是解放军追来，下令开炮轰击，演出了一幕自相残杀的悲剧。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按照蒋介石利用长江天堑阻止解放军南下的部署，桂永清奉命调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共一百三十艘舰艇在湖口至上海的沿江布防。桂还电求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郎特（Admiral Sir Patrick Brind）“伸出友谊之手”。

国民党统治在大陆濒临崩溃之际，桂永清亦厄运临头。1949年2月25日，桂永清麾下最大的一艘巡洋舰“重庆号”在舰长邓兆祥率领下于上海吴淞口外宣布“起义”，开往解放区烟台，蒋介石责怪桂管束不严，骂他是“败家子”，一些“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也抨击他“治军无能，贻误军机”，应付“军法审判”。桂慌乱之余，乃令空军出动轰炸机多架，于3月19日将“重庆号”炸沉在葫芦岛附近，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4月21日，解放军飞渡长江之时，桂永清悍然指挥舰艇配合英国侵入我长江内河之“紫石英号”等四舰向解放军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二百五十二人。4月23日南京解放之日，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二十五艘舰艇起义，镇江方面也有二十七艘舰艇挂起了白旗。桂永清无法阻拦，只能令空军进行狂轰滥炸以泄愤。不久，他以巡视督战之名到了台湾。

1952年4月，桂永清被蒋介石特任为“总统府”参谋长；1954年6

月升任为参谋总长。同年8月12日在台北病亡。

主要参考资料

吴幼元：《桂永清其人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南昌，1987年。

蔡孟坚：《忆桂永清将军》，台北《传记文学》第19卷第6期。

王振中：《从桂永清谈到国民党海军派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第20辑，南昌，1986年。

成运：《桂永清永世及少年时代》，政协鹰潭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鹰潭文史资料》第1辑，鹰潭，1988年。

刘健群：《两个难忘的同志桂永清与郑介民》，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1期。

汪渡：《桂永清的戎马生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溪县文史资料》第3辑，贵溪，1987年。

郭乐

江绍贞

郭乐，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在一个自耕农的家庭，少年时协助父亲务农。1892年郭乐十八岁时，因家乡遭受水灾，出国到澳洲的悉尼（旧译雪梨）谋生。在那里，他先后做过佣工、小贩和店员。1897年他与旅居该埠的几个同乡，共同筹集资金一千四百澳元，盘进了一家侨商果栏（店），改名“永安果栏”，郭乐任司理，是为郭氏兴办企业之始。

郭乐为了开拓业务，经常前往盛产香蕉的斐济廉价收购产品。同时他联合另外两家侨商果栏“永生”与“泰生”号，与贩运商订立代销合同，垄断货源。1905年前后，三家在斐济组织了以永安为主体的“生安泰”公司，在当地自辟蕉园，雇佣廉价的侨工与当地居民生产。最盛时，拥有蕉园十八处，雇工一千余人。此外，郭乐还兼营中国和澳洲间的一些土特产进出口生意，并以永安果栏兼营对华侨的存、汇款。他对来自广东谋生的贫苦农民代领入境证，贷给旅费，抵澳后转往斐济以充当他所属蕉园的佣工来抵偿债务。这样，郭乐便由商业资本家兼为农场主，并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

随着经营的发展，郭乐先后将他四个弟弟：郭泉、郭葵、郭浩、郭顺招来海外相助。1907年，为寻求更大利润，他将经营重心逐渐移往国内，在香港创设了永安百货公司（并附设银业部），资本港币十六万元，派郭泉任司理。1909年郭乐由澳回港，自任总监督[(1)]，增添资本，扩大规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次年在中山石岐设永安公司银业部，经营储蓄、侨汇。1914年在广州开设大东酒家，次年又在香港开设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此外还兼营房地产，把商业和金融业结合经营，对永安资本的扩大，起了重要作用。

1915年，郭乐又开始筹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有资本港币二百五十万元。香港永安企业和悉尼永安果栏入股六十七万元，其余在华侨中招股。为求得英国的保护，他向香港英当局注册。1918年9月正式开业，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兼营旅馆、酒楼、茶室、舞厅、游乐场、银业部等业务，这种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经营格局，适应了顾客的需要，到1936年盈利共达港币二千三百九十六万元，资本利润率（即纯益占资本额）平均每年达百分之五十点四，十九年的盈利近于原始资本的十倍。

五四运动后，中国纺织业仍有发展的空隙，郭乐兄弟于1920年底发起招股筹办上海永安纱厂，这是郭氏企业由商业推销转向工业生产的开端，得到许多侨胞的支持。原订资本额为三百万元，但招股很快达到六百万元，1922年9月正式投产，拥有纱锭三万余枚，布机五百台。郭乐自任董事长和总监督，郭顺任总经理。永安纱厂开工时，正面临民族棉纺业萧条时期，若干同业在外国资本卷土重来的打击下被迫停工或出让，永安依靠经营高利放款、套汇套息、花纱倒手等活动来弥补亏损。同时它资金较厚，有联号支援，以及设备新、效率高等条件，加强了它的竞争能力，不仅支持了局面，而且于1925年初还用低价购进了设备较好的大中华纱厂，改名为永安二厂。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因实行银本位，物价反见上升，棉纺业出现一时表面的繁荣。于是棉纺实业家便认为“否极泰来”，纷纷要求扩张。郭乐也表示对“实业前途应抱有无限希望”[(2)]。他雄心勃勃地打算扩充永纱老厂，增设新厂，发展成为一个有百万纱锭，包括纺织、印染和纺织机器制造的综合企业。除在1928年春，他收买鸿裕纱厂改名为永安三厂外，1930年又增建永安四厂，还在上海筹建永安银行。到1931年，永安纺织系统发展到拥有纺织厂四个，合股厂一个（纬通纱厂），共计纱锭二十四万余枚，布机一千五百多台，工业资本总额达三千六百多万元。其规模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为当时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

但是，好景不长，从1931年下半年后，在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交互影响下，加以国民政府征收“棉纱统税”的打击，民族棉纺业出现了一蹶不振的局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永安二、四两厂遭受日军炮火的严重破坏，永安企业也就结束了它发展的黄金时代。直到抗战前夕止，只建得一个大华印染厂，其他扩充计划均告流产。1934年，国民政府公布储蓄银行法，不仅使筹设中的上海永安银行无法建立，连原永安百货公司银业部也被迫改为商业部。在业务逐年下降、资金渐形枯竭的情况下，从1933年起郭乐除向外商银行大量借款外，及时改变经销高档洋货的宗旨，作出扩大国货销售比重的经营决策，并与国货厂商订立产销关系。1934年度，国货进货额即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五，1936年达百分之六十五点一。这样虽然使永安百货公司的营业状况大为改观，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工商业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困境。1936年，郭乐以非常苛刻的条件为代价，得到宋子文批准，由永安百货公司发行了五百万元公司债。但是这样一来，永安企业不仅依附官僚资本，还被乘机攫取了股额二十余万元。

抗日战争的前一年，郭乐鉴于形势紧张，预将永安二、四两厂向美国慎昌洋行做假抵押，并向美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企图一旦战争发生，可依靠美国的保护。但“八一三”战起，永安一、二、四厂及印染厂均为日军侵占，在租界内的三厂也遭到轰炸。郭乐曾企图假借英、美、意等国的力量来掩护、保全财产，均未达目的，大量物资遭到日寇掠夺。

日军方面曾多次向郭乐提出“合办”永安二、四两厂。郭以两厂与美慎昌洋行有抵押关系加以推托。1937年冬，郭乐又与德商美最时洋行签订了一项转让一厂和大华印染厂的虚假合同，分别由慎昌和美最时出面，向日军部交涉收回一、二、四各厂和印染厂的产权，但日军军部置之不理，依旧作为战利品加以霸占。郭乐在日寇的强力面前，乃于1938年3月将永纱各厂与美慎昌洋行合组大美企业公司，把永纱

股票更换为大美股票，假装中美合股的企业，向美国注册，由原慎昌美籍经理吉利兰担任总裁，郭乐任副总裁。同时，并将上海永安百货公司也改向美国注册。然后由吉利兰出面以美商名义向日军部交涉收回产权。但日军军部非但不予接受，而且指名要郭乐出面。郭派代表前往应付，竟遭日军部扣留。他见不能以美国的势力抵制日寇，便避居法租界，并于4月底出走香港。

郭乐出走后，永纱资本家在日军的胁迫下，以大美企业公司的名义与日本裕丰纱厂签订了合办合约。1939年郭乐虽一度返沪，但不久就以参加旧金山金门博览会为名，带了一批货物去美国，从此在美留居。

郭乐去美后，仍保留他国内企业中的职务，他先后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设立了永安分公司，为上海、香港永安公司负责采购和经销。而上海永安公司自郭乐赴美后，实际上已改由郭顺主持。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永纱各厂连同大美在内，皆作“敌产”遭日军军管。在此情况下，郭顺被迫将一、二、四厂及大华印染厂分别与日本企业组成合营公司。

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永安二、四等厂曾与日本合作为由，将其查封。后经永安负责人向宋子文等人进行疏通，得到发还，随后郭顺也去美国。上海永安公司（包括永纱、永百）又交给郭棣活与郭琳爽主管。1946年，由于美棉压价倾销，永安各厂运用郭乐在美采购的低价美棉获得厚利。但从194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加紧推行，民族工业遭受管制和勒索，永安企业不但始终未能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而且直线下降转入衰败的境地。上海解放前夕，永纱各厂生产处于全面瘫痪状态，直到解放后才获得改造新生。

郭乐于1956年在美国病逝。

(1) 总监督是凌驾在总经理之上，直接控制企业，掌握实权的职务。

(2) 1929年1月16日郭乐在永安公司第36次董事会议上的发言。引自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2页。

郭琳爽

徐鼎新

郭琳爽，又名启棠，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6年3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生。其二伯父郭乐、父亲郭泉都是澳洲华侨，永安资本集团的主要资本家。郭琳爽在青年时期即受到郭乐、郭泉的培育和影响，有志于商业。

1921年，郭琳爽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为当时担任永安各联号企业总监督的郭乐所赏识。不久，即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商情，回国后于1922年正式担任香港永安公司监督，协助其父郭泉（时任香港永安公司司理）管理企业。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郭琳爽又先后赴英、美、德、日等国采购商品，学习国外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了解国际市场动向。他在香港永安公司任职七年，积累了不少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显示了一定的组织才能，因而在1929年被郭乐指名调到上海永安公司担任副司理（即副总经理），1933年又擢升为总经理。

上海永安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闻名国内外。1931年是它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年利润额高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郭琳爽担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的初期，我国正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亦已波及国内，民族工商业普遍陷入不景气状态。永安公司也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郭琳爽尽力协助坐镇上海的郭乐，充分发挥永安各联号企业“同号相联”、“同舟共济”的作用，竭力摆脱困境，挣扎图存。他们为永安公司开辟新的货源，打开新的局面，在百货商场内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以适应日益激烈的抵制日货的社会要求。在1931年前，永安公司经销的商品多半是进口洋货，高档商品占很大比重，国货工业品在商品总额中仅占百分之二，连同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在内，也不过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由于郭

乐、郭琳爽等大幅度地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1934年度国货进货额已占到全年进货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五，1935年又进一步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一，1936年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点一[(1)]，使一向洋货充斥、国货工业品几无立足之地的上海永安公司的商品结构大为改观。

郭琳爽曾先后两次在上海永安公司筹设国货商场。第一次在1934年秋季，辟四楼为国货商场，但因规模不大，营业很不理想，因此不到半年便告结束；第二次在1935年至1936年间，当时各界提倡国货的呼声很高，国货公司、国货商场、国货展览会等相继倡办，风靡一时。为了与同业展开竞争，郭乐、郭琳爽准备利用即将落成的永安新厦开设规模宏大的国货商场。在筹备期间，专门在报上刊登“征求国货启事”，强调其宗旨在于“扩充国货范围”，“提高国货地位”，“鼓励国货事业，并收产销合作之宏效”，一时间先后前来应征的厂商累计在一千家以上[(2)]。这一国货商场原定于1937年9月1日正式开幕，可是“八一三”战事爆发，使它等不到和消费者见面就被迫流产了。

上海永安公司创办时曾向英国当局注册，无非是为了求得必要时的“保护”。可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永安公司遭到日机轰炸，英国驻沪总领事馆非但不愿出面同日方交涉，反以种种借口撤销了永安公司的“英商”注册。于是郭乐、郭琳爽不得不转而请求美国政府准予注册为“美商”企业，寻求新的保护。但“美商”名义同样不能使永安企业免遭蹂躏。当时，坐落于租界外的永纱二、四两厂的产业，尽管也曾向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仍然被日本侵略者当做“胜利品”而占领，甚至连郭乐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1939年，郭乐携带几名助手和一批货物去美国，从此留美不返。郭乐走后，上海永安公司名义上由副总监督郭顺主持，但郭顺当时又担任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精力主要贯注在永纱方面，所以上海永安公司的实际掌权者为总经理郭琳爽。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郭琳爽也萌发了民族感情，同情和支持上海永安公司职工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同意

在商场内播放抗日救亡歌曲，曾拨出两辆运货汽车供战地使用，并捐献现金和实物。但是他对于职工改善生活待遇的合理要求则拒不接受，曾激起1939年底的大罢工[3]。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永安公司也被日本占领当局视为“敌产”，而列为“军管理”的对象。1942年3月25日，日本侵华经济机构“兴亚院”派遣“会计监督官”进驻永安公司，控制了该公司经营管理的一切重要权力。郭顺、郭琳爽为苟安计，于1943年4月撤销原来的“美商”注册，6月改向汪伪政权实业部申请注册。

抗战胜利后，郭顺因在日伪统治时期曾任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监事等职务，并有参与向日本侵略者献机献铁等行为，被人以“汉奸嫌疑”的罪名告发。于是他以出国治病为名，仓皇离沪赴美。此后，上海永安公司便全由郭琳爽主管。

抗战胜利后初期，上海市面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景象，使郭琳爽对卷土重来的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产生幻想。他迫不及待地恢复上海永安公司的“美商”注册，同时又竭力靠近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权贵。他急切地希望早日恢复“环球百货”的商业经营，敦促郭乐主持的美国办庄尽力搜购各种高档美国商品，认为美货“一经到达，利益可获数倍以上”[4]。1946年度上海永安公司美货的进货额，占从国外进货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与此同时，公司股东大会还根据郭琳爽的提议，决定把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法币十亿元[5]。同时，他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元美金的高价，向哈同洋行买下商场大楼及土地的产权，积极为扩充公司营业做好准备[6]。

但是事与愿违，抗战胜利后初期的虚假繁荣转瞬即逝，随着美国对华经济侵略加深和国民党官僚资本日甚一日的压迫，郭琳爽复兴企业的美梦也逐渐破灭。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规定外汇限额和限制货物进口，使上海永安公司直接从国外进货的渠道几乎全被堵塞，

1947年内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进口合适销售之货物几等于零”[7]。郭琳爽望洋兴叹，对国民党政府的外汇政策深为不满。

在美货倾销、民族工商企业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况下，上海百货业职工联合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于1947年2月发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获得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郭琳爽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爱用国货”对公司营业有利，他很赞成；“抵制美货”又同他渴求经销美货、牟取高利的方针有抵触，所以态度暧昧。当这一正义斗争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残酷镇压，永安职工梁仁达被害惨死，大批职工被殴致伤，酿成“二九”惨案后，群情共愤，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或游行，表示声援。郭琳爽慑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不敢公开表态支持，但对职工们在永安公司内设立烈士灵堂，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则始终未加干涉。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银元、美钞，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进一步对蒋管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强制限价引起消费者的抢购，永安公司“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8]。国民党政府持续七十四天的限价政策，使历来备货充盈的上海永安公司被摧残得库存空虚，元气大伤。据郭琳爽估计：经过这场“限价”，永安公司流动资金损失达百分之八十，相当于四万两黄金的总值[9]。郭琳爽一向自诩经营有方，但面对这副衰败景象，也发出“未来局面不堪设想”的哀叹。同1931年相比，1948年的进货额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六点一，销货额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这一年的流动资金只及1931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一，利润总额相当于1931年的百分之六点六，成为一具徒有固定资产支撑的空架子了[10]。

当国民党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侨居在美国的郭乐和主持香港永安公司的郭泉，曾先后七次写信催促郭琳爽及早离沪赴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获悉这一情况后，通过各种途径向郭琳爽反复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争取他留沪维持企业。郭琳爽同当时主持永安纺织印染

公司的郭棣活反复磋商，决定留在上海。他们两人于1949年5月12日联名复信给郭乐，陈述留去的得失，认为维持企业是本身职责所在，而如果他们贸然离沪赴港，“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利，已先见其害”；表示要“为股东权益”和“事业之前途”，“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从而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同广大永安职工一起，保卫企业，迎接解放。

解放后，郭琳爽切身体会到中共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和帮助，认识逐步提高。在上海永安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后，郭琳爽继续担任总经理，在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54年起，郭琳爽先后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三届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文革”期间，郭琳爽受到冲击。1974年10月27日在上海去世。1978年11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1) 。

---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第136页。

(3) 《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3期，第11页。

(4)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1946年2月9日郭琳爽致郭乐函。

(5)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第204、207页。

(6) 上海永安公司商场大楼，是在1916年间向哈同洋行租地建造的，租期为三十年，到1946年3月期满。按合约规定，期满后地面上的商场大楼须一起交还哈同。为扩展营业需要，郭琳爽决定向哈同洋行高价买了这块地产

和商场大楼的产权。

(7)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上海美商永安公司股东临时会决议案》。

(8)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1948年10月28日郭琳爽致郭泉函。

(9) 郭琳爽：《歌颂十年》，《新闻日报》1959年9月29日；郭琳爽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5年12月27日。

(10)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第221—223页。所列1948年同1931年比较的数字，是统一按1931年币值，剔除价物上涨因素以后的实际进货销货额、流动资金总额、利润总额互相比较而计算出来的。

(11) 《解放日报》1978年12月2日。

郭松龄

任松　武育文

郭松龄，字茂宸，祖籍山西汾阳，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于盛京（今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其父郭复兴，县学廪生，曾在乡村设塾馆授徒。郭松龄幼年随父读书，后因家贫辍学，为人帮工或在家自耕。郭天资聪明，虽昼耕陇亩，仍不忘读书。十五岁时，家境稍有改善，始受业于同乡朱举人。

日俄战争爆发后，郭松龄目睹日、俄在东北的野蛮侵略暴行，萌发了“驱敌寇、复国土”的思想[(1)]，毅然选择了军事救国道路。1905年秋，郭松龄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次年以优异成绩被荐入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以优等第一毕业，由学堂选送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调回奉天，升充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郭带兵有方，勤于职守，受到巡防营统制朱庆澜的赏识，擢升卫队哨官，倚为亲兵。

1909年，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不久升任卫队管带。郭在新军中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27日川督赵尔丰被迫在成都宣告自治，随即组成军政府，推蒲殿俊为都督，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被选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不久，川军将领鼓动地方军队发动兵变，朱与客籍将领被迫撤离四川。郭遂辞职潜回奉天，在韩淑秀家中设立机关，密谋武装起义。张作霖奉总督赵尔巽之命在省城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郭松龄因剪发易服，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被巡防队逮捕入狱，后经武备学堂同学高纪毅和韩淑秀等人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获释。”[(2)]

郭松龄经过几次挫折，逐渐认识到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

学识的道理，于1912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以成绩优异拔充区队长。结业后调回奉天，任都督府少校参谋。1913年秋，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深造班第三期。郭除学习军事课程外，还广泛涉猎新书刊，“对世界大局，社会潮流，鲜不洞明而详识焉”[3]。1916年末，郭陆大毕业，调任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7月，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护法，郭受感召，只身南下投奔护法军政府，通过老上级广东省长朱庆澜的介绍，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中校教官。郭松龄对桂系军阀跋扈行为深为忧虑，亲赴广州拜谒孙中山，向孙献策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4]中山深韪其言。1918年5月，桂系军阀伙同政学系分子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去沪，郭松龄失去依靠，乃于同年秋重返奉天，矢志开创新局面。

郭抵奉天后，经督军署参谋长秦华（郭陆大同学）的推荐，充任奉天督军署中校参谋。1919年2月，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干部，遂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聘任郭为战术教官。其时，恰逢张学良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张对郭讲授的战术学深感兴趣，并见郭工作认真，学识丰富，为人正派，因而崇拜有加，遂有罗为己用之意。1920年春，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接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向乃父推荐郭松龄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5]。

郭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军队的训练、教育和纪律的整顿，不足一年，卫队旅面貌大为改观，成为奉军一支劲旅。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染指中原率兵入关，郭松龄充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击溃皖军两旅。战后，郭随张学良赴佳木斯一带清除匪患，迅速安定了地方。因此，郭松龄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不但为张学良所倚重，而且取得张作霖的信任。1921年5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乘机将奉天陆军扩编为十个混成旅，改任张学良为第三旅旅长，擢升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两旅

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称三·八旅。因张学良常在总司令部参赞帷幄，部队行政、训练均由郭负实际责任。郭松龄意欲建成一支保国为民的优良军队，获得张学良的支持，对部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定期轮训军事骨干，出缺择优升补；实行精兵主义，整饬军队纪律；革除旧军陋习，实行军需独立；注意对官兵的爱国思想教育等，从而大大提高了所部奉军素质。当时所谓东三省新军，盖指郭松龄所训练的军队。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之战，由于奉军素质太差，将领指挥无能，交战未及一周，奉军全线大败。惟有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完整撤退，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数倍追兵抗衡；粉碎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直捣关东的计划，最后达成奉直和议，为张作霖立下了“战功”。

张作霖败退出关，随即宣布东三省“独立”，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并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下，大事整军战备，准备夺回失掉的权力和地盘。同年7月，张作霖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任命孙烈臣为总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总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负责整训部队。

郭松龄几次参加军阀混战，目睹兵连祸结，经济残破，民不聊生，特别是强邻日本乘机侵逼，痛切感到“内战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郭松龄代表所部将领向张作霖上书，强烈要求“罢兵息争，保境安民，闭关图治，改良内政，移兵开垦，巩固国防”；并且提出“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等改革方案[(6)]。随后，郭又通过张学良向张作霖提出请求赴洮南屯垦，寓兵于农，均未获张作霖的允准。郭因“屡谏不从”，遂产生打倒张作霖的决心。1924年9月，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对抗直系的武力兼并，发生了江浙战争。张作霖抓到了向关内出兵的借口，立即向曹锟、吴佩孚宣战。9月15日，张作霖在奉天组织镇威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杨宇霆任总参谋长，将东三省陆军编成六个军，以四个军约十五万兵力向山海关与热河方面进发。杨宇霆久怀总揽奉军兵权的野心，以郭松龄为最大障碍，“纠结小集团密谋排斥、打击、削

弱郭的力量”[7]。在整编军队时，限制张、郭二、六旅（即原三、八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供应。在此次军队编组时，以姜登选、韩麟春所统第一军，与张、郭第三军组成联合军，抽调二、六旅一部归姜、韩指挥，以削弱郭的实力。同时又命令郭担当山海关主战场，与扼守坚固阵地的直军主力对垒，使之陷入攻守两难的境地。对此，郭松龄以“军阀不倒，内战不止”，与所部将领再议败吴倒张之策，并派乃弟郭大鸣及顾问李坚白入京，与冯玉祥接洽合作。此时，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全线崩溃。张势坐大，而郭倒张之计遂不果行。

张作霖打败曹、吴后，背弃了与冯玉祥约定“奉军不入关”的诺言，将大批奉军开进关内。以张学良、郭松龄为京榆驻军司令，威逼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李景林、张宗昌占领直、鲁要地，扼控津浦路北段，待机进犯江南。1925年3月，张作霖因扩张需要，将奉军扩编为二十个师，冠以“东北陆军”番号。5月，张作霖部署就绪，派遣两师一旅奉军开进苏、皖，占领了上海、南京、蚌埠等地，并且准备进取东南各省，以混一宇内。8月末，张作霖依照杨宇霆的要求，任命杨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

奉军大肆扩张，引起江南各省直系旧部的严重不安，为了抵制奉系武力兼并，东南、华中各省建立了联合反奉同盟。浙江督办孙传芳利用江南人民的反奉情绪，打着浙、苏、皖、赣、闽五省联军的旗号，于10月25日向驻上海、南京的奉军突然发起进攻。杨宇霆仓皇弃师逃回奉天，姜登选被迫撤离蚌埠，撤退不及的奉军被联军缴械，苏、皖两省地盘相继丢失。张作霖不甘失败，执意要夺回江南失地，任命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将奉军编为六个方面军，以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和姜登选第四方面军反攻江南，以张学良第三方面军和李景林第一方面军进攻冯玉祥。

郭松龄一贯反对张、杨的武力扩张政策，曾向总司令部强烈提出“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并且“坚辞不就”安徽督办[8]。张作霖被

武力统一迷住心窍，拒不采纳郭的建议，并对郭产生疑忌。10月上旬，郭借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暂时避居日本，以抵制国内战争。郭在日本获知奉军江浙战败消息和张作霖派特使与日本订立密约等内情，十分愤慨，遂将张作霖乞求日本出兵、酿乱祸国行为，全部告知同行赴日的国民军首席代表韩复榘，表示愿与冯合作倒张之意[(9)]。10月24日，郭松龄从日本返回奉天，接受张学良的委托径去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由三个军（辖六个整编师）所组成，总兵员约七万余人，为奉军精锐部队。张学良任军团长，于珍任副军团长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任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任第十军军长。由于郭松龄及部将的坚决抵制，杨宇霆的亲信于、韩二人均未敢到任。郭利用临时指挥之权，彻底改组了部队结构，以为应变准备。11月13日，张学良抵天津与国民军谈判和平，同时向郭松龄、李景林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并代表李景林陈述了“不可再战之理由，主张撤兵出关，保境安民”[(10)]。张学良赞同郭的和平主张，允回奉劝乃父“罢兵言和”，但张作霖执意不纳，严令郭、李调兵备战。郭知战事不可避免，遂称病入天津意大利医院，暗中进行反奉部署。

11月17日，河南国民军第二军因接防直隶保大地区，与奉军发生武装冲突。张作霖闻讯大怒，急电李景林即日夺回保大逐去豫军以自赎；“令郭调所部集中滦州，回奉听候面令”[(11)]。郭知回奉必定问罪，以患重病为遁词，拒不奉命。张学良劝郭回奉直接陈述意见，他愿保护郭的安全。郭遂乘机讲述了张作霖、杨宇霆的种种酿乱祸国行为，建议“由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他愿竭诚予以拥护”[(12)]。张学良也很不满乃父和杨宇霆一帮人的所作所为，赞成郭的和平主张和改革方略；但不同意郭的做法，临行时“嘱勿轻动”。

郭松龄见机密已经泄露，于11月19日在天津国民饭店召开将领会议，“密议进行方略”，一致认为时机紧迫，刻不容缓，决定提前发难，“反奉之举乃定”[(13)]。同日，郭派乃弟郭大鸣及顾问李坚白持其

草拟的联合反张密约，赴包头与冯玉祥商洽合作。

11月20日，郭松龄采取军事行动，仍以张学良军团长名义，下令部队东撤。22日司令部专用列车抵达滦州，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郭偕夫人韩淑秀出席，发表即席讲话，列数张、杨勾结日本、酿乱祸国害民之罪。宣布班师回奉，主张移兵开垦，不参加内战；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在反奉宣言、通电中阐述了内政、外交方针。郭松龄意欲建立民主政治，促进内政改革，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民富国强，以达到排除日本侵略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当夜，郭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官兵臂部一律佩带书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布徽章。七万军队分编为五个军，以步兵旅长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分任军长，以炮兵旅长邹作华任参谋长，郭任总司令，出关前仍以张学良名义发号施令。23日，郭松龄派魏益三率一旅乘火车潜行出关，准备一举袭取奉天。及至魏旅开抵山海关后，遭到张作相第五方面军阻击，偷袭计划失败。25日，郭遂下令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分途向山海关方向进发。

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事前一无所知，不免惊慌失措。首先派张学良与郭疏通，以谋取和平。又使被指为奸贼的杨宇霆引咎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举兵的口实。26日，张学良搭乘军舰抵达秦皇岛，邀郭面谈，郭未与会见，写两封信作答。郭在信中首先陈述举兵理由，并表示“拥戴张学良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劝诫张“应忠于国家人民”，共同举事[(14)]。张学良复信予以拒绝。与张学良一同到达秦皇岛的日本关东军浦澄江参谋带来了白川司令官对郭的警告，要求郭“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郭不为所动，“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要支持任何一方”[(15)]。11月28日，郭军攻占山海关，依次夺取绥中、兴城。张作相军退据连山（今锦西）。

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部门，很不满意张作霖，原有换马之意，起初取静观态度，但见郭松龄反奉反日意志坚定，背后且有“赤化党”与

苏联的支持，遂决定实行“援张排郭”方针。由关东军出面与张作霖代表杨宇霆商妥：日本出兵四万助张，张作霖则承认“二十一条”[16]。随后，日本政府声明“派兵保护日侨”，关东军奉命向南满铁路及奉天增派驻军、护路队，阻止郭军袭取奉天[17]。张作霖获得日本的有力保证，遂于11月30日发布“讨伐令”，命张作相、张学良在连山备战筑垒，企图在此一役击败郭军。

郭松龄对日本干涉行为极为愤慨，连续发表声明并提出抗议。声明“不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所订立之新约”，“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并且声言：“此次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以讨伐。”[18] 此刻，李景林已被张作霖收买，向冯玉祥宣战，并威胁郭军后路，使郭军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郭为防李军偷袭，命第五军扼守山海关；同时决定采取速决战，突破奉军辽西防线，然后直指奉天。12月4日夜，郭松龄利用大风雪作掩护，趁守军不备下达总攻击令，于5日晨夺取连山，7日攻占锦州。

张作霖惊闻连山败讯后，预备下野逃亡。日本政府认为“东三省一旦落入赤化党郭松龄之手，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将有全部丧失之虞”[19]。决定对郭松龄实行武力干涉，把张作霖从危境中解救出来。12月8日，日本政府命关东军司令官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通过南满铁道或在附属地二十华里以内作战[20]。关东军进驻奉天省城，接替奉军固守城防。随后，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及朝鲜调遣两个师团兵力进入奉天。日本政府还向张作霖提供了一千万元贷款和大批军械弹药。张作霖获得日本的全力援助，改变了下野逃亡的念头，决定进行最后抵抗，调集三省六七万军队，在辽河东岸建立防线。

郭松龄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因大凌河铁桥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不得不改变战略，以主力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结果营口一路被日本守备队所阻，不得前进。延误了攻奉时间。郭军主力长途跋涉，又加天气严寒，冷冻患病

的日渐增多，但广大官兵斗志依然很顽强，以凌厉攻势冲破奉军几道防线。12月18日占领白旗堡，19日占领柳河沟，20日攻占辽河西岸战略要地新民。奉军全部被迫退回辽河东岸据守。郭松龄意欲速战取胜，急躁冒进，不待主力集中，于22日发动总攻击。初战时，刘伟第二军、霁云第四军攻击最猛烈。第四军进至奉军前线指挥部兴隆店，距奉天仅六十里，终以刘文清旅弹药耗尽，转胜为败。继之，吴俊陞率黑龙江骑兵夜袭白旗堡，扰乱了郭军后方，致使全线震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暗中通奉，秘密下令炮兵停止攻击，并断绝供应前线弹药，郭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郭松龄不知内部变化，23日夜亲临阵地组织反击，终因弹尽而未成功。郭见大势已去，委托霁云收容余部向锦州撤退。24日晨，郭自率卫队二百余人及夫人韩淑秀等人乘大车出走，拟退至榆关，徐图再举。行抵新民县西南苏家窝棚地方，被黑龙江王永清骑兵团追上。郭氏夫妇藏于农家菜窖中，后被追兵搜出，解往辽中县老达房吴俊陞司令部看押。25日，张作霖、杨宇霆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21]。

---

(1)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2年版，第110页。

(2) 赵承绪：《郭松龄事略》，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征集稿存稿，第2页；另参见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

(3)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69页。

(4) 郭任生：《郭松龄传略》，自刊稿，第3页。

(5)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6) 《郭松龄敬告东北耆宿电》，《盛京时报》1925年12月8日。

(7)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12页。

(8) 池井优编：《船津辰一郎前奉天总领事出差满洲、中国于现地致出渊外务次官的报告书简》，庆应大学《法学研究》第36—37期，第83页。

(9)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

(10) 《奉天突内变之京讯》，《京报》1925年12月2日。

(11) 《时局突变之索隐》，《北京日报》1925年11月26日。

(1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本，第213页。

(13) 《时局突变之索隐》，《北京日报》1925年11月26日。

(14) 《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书》，《北京日报》1925年12月1日。

(15) 关东军参谋部：《郭松龄与浦参谋会谈要旨》，M．T，627，第14页。

(16) 《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0日。

(17) 日本政府声明：《准备派兵护侨》，《满洲报》1925年11月30日。

(18) 《郭松龄对日使芳泽之宣言》，《京时报》1925年12月2日。

(19)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东京原书房1972年版，第259页。

(20) 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0页。

(21) 辽宁档案馆藏：《张作霖处决郭松龄夫妇电》（1925年12月25日）。

郭泰祺

邵桂花

郭泰祺，字保元，号复初，1888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二）[1] 生于今湖北省广济县郭家冲垸，家有自耕薄田少许。父郭锡谷系清同治末年秀才，在本乡设馆教学，家道寒微。郭泰祺之弟郭泰祯民国时期亦跻身政界。

郭泰祺自幼随父攻读“四书”、“五经”，兼放牧等农事劳动。稍长，与刘文岛在武穴东岳庙从小颠和尚读书。1902年，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武昌湖北省五路高等小学堂，与李四光同学。郭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得张之洞赏识。一次，张问：“出洋留学敢不敢？”郭回答：“只要有梯，天都敢上！”[2] 张之洞赞叹郭有气魄、有胆识，故于1904年选送他赴美留学，除全部公费外，还按月发给他二十五两白银，作为家庭补贴。

郭泰祺到美国，先入马萨诸塞州伊斯坦普中学、威里斯顿神学校，后于1908年进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政治学。1911年3月，获得美国优秀大学生的荣誉称号。同年6月，获得奖学金，进研究生院攻读社会学。他在费城学习期间，参加了文艺爱好会和宇宙俱乐部等团体，曾担任《费城新闻》记者，后又任《宾夕法尼亚学生报》编辑、记者。

郭泰祺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胜利消息后，即于1912年3月回国，经同乡并有戚谊关系时任湖北军政府秘书长饶汉祥的介绍，担任湖北军政府的外交股长，是为郭步入外交界的开始。同年8月，国民党成立，他加入该党。1913年12月，黎元洪入京就任副总统，郭随黎同往任英文秘书。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阴谋称帝，12月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郭泰祺极力劝阻黎接受封赏。1916年6月，袁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病亡，黎继任总统，郭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兼外交部参事。1917年7月，张勋演出复辟丑剧，黎元洪被逐，郭离京返鄂，曾在武昌创办湖北方言学校（外语学校）出任校长，后又任武昌国立外语学校校长、武昌商科大学校长，“惟办理教育非其素志”[(3)]。

1918年初，郭泰祺南下广州，与留学美国的孔祥熙、宋子文交往密切。复经饶汉祥介绍拜见孙中山，被派为护法军政府参事及外交次长。是年夏，郭与陈友仁、王正廷被派赴美，争取美国政府对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支持，但未获成功。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护法军政府力争派代表参加会议。郭与陈友仁以护法军政府代表名义前往巴黎。途经美国在华盛顿滞留多日，进行反对北洋政府的活动，故晚于另一护法军政府代表王正廷抵达巴黎，结果王被列为出席和会正式代表，郭、陈则对中国代表团予以监视[(4)]。和会在英、美等帝国主义操纵下，竟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特权交给日本继承，郭极力阻止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偕伍廷芳、唐绍仪由上海至广州，再次揭起护法大旗，重整军政府，郭泰祺任军政府参事兼宣传局局长。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郭任总统府参事。1922年4月，伍廷芳继任广东省省长，郭泰祺任省政务厅厅长。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郭逃离广州，赴京途经上海，谒见孙中山与之谈话。抵京后，将谈话内容向某议员转达，并在9月28日北京出版的《益世报》上披露。1923年，郭复返回广州，在伍朝枢手下任外交部次长，是年6月，黎元洪再次被迫辞去总统职，在广州和上海的国会议员邀黎南下，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上海迎黎，郭亦随汪同行。

1924年，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学生闹学潮，驱逐校长屈佩兰，学生代表请愿，要求教育部派一名威望较高的湖北人任校长，郭泰祺被选中。郭到任后，聘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为教务长，胡伟为斋务长，又

请北大教授胡适、周鲠生、马寅初来校讲学，赢得学生的拥护。当时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与孙中山有联系，极力拉拢郭，对学校所需经费力予支持。1926年，北伐军进抵武汉，该校并入武昌中山大学。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迁都武汉。3月，北伐军到达沪、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派郭泰祺去沪了解情况，为外交工作做准备。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另立政府，形成宁、汉对立局面。陈友仁告诫郭泰祺勿任意在沪活动，而郭趋炎附势，在沪投靠蒋介石，出任江苏省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分会委员，替蒋介石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永远开除郭泰祺党籍，明令通缉。后来宁汉合流，此案遂成罢论，郭仍在伍朝枢手下任外交部次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办事处国际组主任。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府发生危机，白崇禧在上海交际署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郭泰祺、周凤岐、虞洽卿等百余人到会。

1928年2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黄郛继任外交部长，免去了郭泰祺的党政职务。1929年2月，郭被任为驻意大利公使，他因故未及赴任，继被推为立法委员、约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翌年5月复被免职。

1930年3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7月，阎锡山等联合改组派汪精卫、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共同反蒋。郭泰祺参加了冯、阎的北方联盟，出席扩大会议。8月，汪精卫派郭与覃振、陈公博去北戴河与张学良会谈，劝张学良联合反蒋，共同组织政府，而张权衡得失，通电拥蒋，并派东北军入关。扩大会议先后移往石家庄、太原，草草收场。郭泰祺复去南方，1931年，加入汪精卫、唐绍仪、陈济棠等人所组织的广州反蒋政府。这年郭的家乡发生水灾，郭泰祺对村民有所周济。

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罗文幹任外交

部长，郭泰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同月“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率部奋起抗战。3月，中日停战会议在英驻上海领事署进行，郭为中方首席代表参加谈判，达成妥协的《淞沪停战协定》，遭到上海各救国团体、学联代表及广大市民的坚决反对，愤怒的群众向郭投掷铜元，击伤头部入院。5月5日，他于医院在“协定”上签字。

同年6月，郭泰祺被任命为驻英国公使，于9月赴任，任内曾三次代表中国出席国联会议，屡次提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坚决反对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5月，郭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货币会议，重申对日本的控告，呼吁英美联合行动支援中国。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郭一改反苏态度，欢迎苏联加入国联。他认为中国是“亚洲基石”，而苏联则是欧亚之间的桥梁，中苏应友好相处，加强合作，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5月，中英使节升格，郭为中华民国首任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7月9日，他入白金汉宫谒见英皇，“照大使例派御车三辆，每辆以栗色马两匹曳之，御者与马丁皆衣赤色制服，戴羽冠，载以入宫”[(5)]，向英皇亲递国书，英皇欣然迎之，并与谈话数分钟。同年，郭获得伦敦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作为国联理事会中国首席代表，多次出席会议。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于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开始。郭泰祺多次照会国联，要求制止日本侵略，声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同年华盛顿条约国的布鲁塞尔会议上，他要求对日本经济制裁，但未有反响。当时英国并不完全同情中国，1938年5月，英日双方签订有关在日本占领区口岸海关税款交付的协定，郭泰祺对此提出抗议。是年6月，郭为互换“中爱（爱沙尼亚）友好条约”全权代表。1939年8月，郭泰祺再次抗议天津英国当局允将4月9日刺杀一名银行经理的四名嫌疑犯引渡给日本。1940年，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他为未能阻止而感到遗憾。因经费缺乏，郭在英国很少会客宴请活动，仍从英国取得了几项贷款和军火接

济。他与汪精卫的过从较密切，汪的儿子汪孟晋在伦敦留学，便是由郭给予照料的。

1941年4月，郭泰祺被蒋介石召回，委以外交部长。郭不是蒋的亲信，蒋本意要王世杰出掌外长，但陈果夫与王世杰嫌隙很深，遂上签呈，提出外长人选应必备的三个条件：（一）与国民政府有悠久历史；（二）职业外交家；（三）须与英美有渊源者。郭正符合这三项条件，遂坐收渔利。郭于6月末在重庆正式就职，并兼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时汪精卫已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郭竭力阻止外国在外交上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断然与已承认汪伪政权的国家断交。他曾发表《加强国际反侵略战线》的讲话，就中美战后措施同美国国务卿换文，并支持大西洋公约，与捷克流亡政府建交。

不久，郭调任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郭调职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因在对美交涉中没有顺应蒋介石的意图”[(6)]；也有人说，郭在国难当头大修部长官邸，受到舆论界指责。当年《大公报》评论文章曾批评“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后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7)]，即指郭泰祺。蒋介石意在将郭免职，后采纳孙科的建议，而改为调任他职，以避免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影响。

抗战胜利后，郭泰祺被派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任中国首席代表。此后，一直侨居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欢迎郭泰祺回国工作，郭亦极愿回国，但因病未能成行。1952年2月29日病逝于美国加州医院。

---

(1) 据湖北省广济县地方志办公室编《郭泰祺小传》（未刊稿），而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说郭泰祺的生年是1890年。

(2) 湖北省广济县地方志办公室编：《郭泰祺小传》（未刊稿）。

(3) 湖北省广济县地方志办公室编：《郭泰祺小传》（未刊稿）。

(4)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页。

(5) 《大公报》1935年7月10日第3版。

(6) 胡进：《职业外交家郭泰祺》，《武汉人物选录》（《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增刊），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187页。

(7) 王芸生等：1926年至1949年《大公报》（续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中华书局1962年3月版，第243页。

憨玉琨

庞守信

憨玉琨，号润卿，河南嵩县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生。其父憨振做长工，憨玉琨兄弟五人皆为雇工，生活很苦，未上过学，不识字。

清光绪末年，憨玉琨的大哥憨同生被恶霸地主郭八仙诬告为盗，遭官府逮捕，“坐木笼”致死。憨玉琨愤世道不平，誓为兄报仇。十六岁时，他用铡刀砍死郭八仙。因官府缉拿，被迫投奔绿林，开始了“刀客”的生涯。

当时，豫西有王天纵和关老九（宗汉）两股著名的绿林武装，活动在嵩山一带。王、关为结拜兄弟，聚众五六百人，盘踞羊山（嵩山最险山区），揭橥“打富济贫”，反抗官府和地主豪绅。憨玉琨投身在关老九部下，为关的“二架杆”，经常出没于嵩县一带。王、关两股合作，屡败清南阳镇总兵谢宝胜部。后来，由于清军的离间，王天纵对关老九渐生猜忌，竟暗派其亲信将关诱杀，吞并了关部，憨对此深为不满。

辛亥革命时，豫西革命党人暗中与王天纵联络，游说其参加反清革命。11月，王天纵按照革命党人的部署，率千余武装由嵩县出发，会攻洛阳。憨玉琨跟随王天纵在田湖、白杨等地连败清军，扩大新兵、马匹数百，补充了大量枪支弹药，乘胜前进，直抵龙门附近。他们准备与“在园会”武装会合，攻打洛阳城，但因清兵骤增，力量悬殊，遭到失败，退至宜阳县。12月，王天纵、憨玉琨等率所部三千余人到达潼关，加入革命党人张钫所统率的“秦陇复汉东征军”。张钫任命王天纵为东征军先锋官，憨玉琨等为标统，出潼关东征河南。次年

1月初，东征军进抵灵宝，激战四昼夜，清军大败东逃。憨玉琨等率部猛追二百余里，直抵渑池县，中原为之震动。袁世凯急调重兵堵击，东征军败退，憨玉琨部经潼关撤至雒南、商州一带。王天纵率部走南阳。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兵。憨玉琨等部四千余人被张钫编为一标一营，开回豫西“剿匪”，分驻于河南府、汝州、陕州所属之二十二县，豫西观察使刘镇华兼该军统领。因其靠近嵩山，故名为“镇嵩军”。憨玉琨任镇嵩军第三标标统，所部六百余人，有马二百余匹，称为马标。

1913年初，镇嵩军在豫西饷项无着，处境困难。豫督张镇芳因其部多系“刀客”出身，欲相机消灭之。刘镇华遂率部积极为张“剿匪”，以取得信任。憨玉琨有胞弟憨玉林，系一“杆首”，横行乡里，民愤极大，憨玉琨回到家乡亲将其杀死；张治公、柴云升也将自己的堂兄或亲信“杆匪”处决。因此得到张镇芳的鼓励，表扬他们“大义灭亲”。镇嵩军采取“剿抚兼施”的手法，将豫西一带大股绿林武装剿除，自身得以保存。

不久，白朗军开到豫西，高举反袁旗帜，声势浩大。袁世凯下令刘镇华镇嵩军配合赵倜“毅军”等会剿白朗军。憨玉琨奉命率队在豫陕边境追剿，屡立“战功”，得到了袁世凯的嘉奖，1915年任骑兵团团长。袁世凯复辟称帝，憨玉琨追随刘镇华竭诚拥护。

憨玉琨以骁勇善战著称，是镇嵩军的一员悍将。1918年2月，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曹世英、郭坚、张义安等带领靖国军围攻西安，皖系陕督陈树藩不支，急电刘镇华入陕相助。刘率所部三千余人攻下潼关后，命憨玉琨为先锋，向西安急进。憨部经渭南、零口、临潼、灞桥、十里铺几次战斗，击溃了靖国军，直抵西安城下。不久，镇嵩军扩编为七路，达万余人，憨玉琨升任第三路统领，驻防商州、山阳一带，深得陈树藩的垂青。

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为直系所控制，陕督陈树藩被撤职。镇嵩军投靠直系，憨玉琨由陕南积极接应直军入陕，为直系立下了功劳，被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头衔。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憨玉琨被任命为援直镇嵩军前方总司令，率部进出豫西。他的任务是以剿匪、维持地方治安来稳定直系的后方。憨玉琨借此机会招匪扩军，他先招抚了王振部千余人，编为补充团；后又收编了豫西绿林万选才、孙殿英等部数千人。同时，憨玉琨使用放、收“外队”[1]的惯技，“迭次将豫西土匪、流氓一律招来，月有数起”[2]，并收编陈树藩旧部及民间武力，因之实力扩展甚速，到1923年冬他的部队达三四万人。

憨玉琨自己虽少文化，但他颇注意“招贤纳士”。他请陕西知名人士谢阴南为高等顾问，学者党晴帆为秘书长，同时对部众严加整训。因之所部的教育、训练、军纪方面，在镇嵩军中算是首屈一指，得到了吴佩孚的重视，于1923年冬被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十五师，憨任师长。憨向吴表示，仍愿归老长官刘镇华指挥，吴予以批准。

1924年春夏间，憨玉琨奉令征剿渭东郃阳、澄城、白水、朝邑、大荔、蒲城六县的非直系武装以及靖国军高峻残部有功，得到吴佩孚的嘉奖，被北京政府授为肇威将军。刘镇华还电请北京政府给憨加上将军衔，酬其劳绩。

憨玉琨随着实力的增长，野心益大。他目睹刘镇华靠武力扶摇直上，便产生了“有为者亦若是”的思想。同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成立了国民军。刘镇华一面通电拥护国民军，拥护段祺瑞执政府，一面密电憨玉琨：“段可捧，吴不能背，冯、胡要讨。”[3]并令憨玉琨率部东出潼关，阻止南下中原的国民军。憨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后，采取“捧段、背吴”之策，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先到洛阳逼走铩羽归来的吴佩孚，进兵郑、汴，然后出兵豫北，准备抗拒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南下，夺取河南地盘。此亦

符合刘镇华统一豫陕的谋划，因而得到刘的暗中支持。不久，北京政府任命胡景翼督豫。胡率部进入河南，憨大失所望，被迫暂时撤至荥阳、巩县、洛阳、陕县一带，控制豫西地盘。

憨玉琨盘踞豫西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他为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国民三军军长孙岳为总司令）。但他决心以武力驱胡，夺取河南督军地位，在刘镇华的指使、协助下，憨玉琨广收直系旧部，强编民团、武警，广招溃兵、土匪及其外队，迅速扩大至三十六旅之众。同时，他截留田赋、厘税，擅自任免道尹、知事、局长等，扩展其势力至二十余县。

1925年1月23日，憨玉琨指使所部王振暗中支持民间武装突然袭击驻禹县之国民二军曹士英旅，国民二军反击，禹城居民牵连被杀者二三千人。憨反诬“陕人擅杀豫人”，借机煽动驱胡。从此胡、憨两军矛盾日趋尖锐。

二三月间，胡景翼所部国民二军与憨玉琨所部镇嵩军共约二十余万，在豫西展开大战。两军精锐部队集结于陇海线荥阳、巩县之间，猛烈厮杀。憨军不支，节节败退。驻陕西之镇嵩军倾巢出动入豫驰援，张治公师亦来参战，刘镇华并亲自到洛阳直接指挥，但终不能扭转战局。在胡军正面勇猛进攻、侧面不断奇袭下，憨军内部混乱，前线倒戈，后方哗变，腹背受敌。憨不得不逃出洛阳，后又组织渑东之役，仍然遭到惨败。至此，祸陕七年，犹豫数载，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六万多人缴械投降。憨玉琨逃回嵩县老家，企图收拾残部，进行反攻，但大势已去，连他的亲信旅长杨景荣也闭门不见他。憨玉琨羞愤、懊丧至极，于当年4月2日服毒自杀。

主要参考资料

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版。

张钫：《辛亥革命中潼关的三次攻守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辑，1961年版。

吴沧洲：《胡憨战争前后的回忆》（1963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1辑（总第45辑），1993年版。

尹文堂：《镇嵩军始末》（1962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

陕西《新秦日报》1922年8月、9月、12月；1923年1月；1924年1月；1925年3月。

---

(1) 外队：系被收抚后又被暗放的土匪。官军让其继续拉杆为匪，二者互相为用。外队给抚军暗送金钱，抚军给外队暗送枪弹。抚军不能自安时，则有所归；外队不能自安时，则有所靠。此为招抚土匪以来暗行之惯例。许多官军亦循此例，放出外队，等到杆子拉大了，予以招抚，借以扩大实力。

(2) 陕西《新秦日报》1925年3月26日。

(3) 吴沧洲：《胡憨战争回忆录》。

韩复榘

沈庆生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父韩静原，在本村私塾当教师。韩随父在塾读书。1910年，因家庭困难，他辍学投军，入陆军二十镇冯玉祥营，为司书生。1911年11月，韩在冯玉祥营当队官，随冯等参加滦州起义，事败后被递解回籍。

1912年春，冯玉祥任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韩复榘再投入冯部。以后随着冯的升迁，韩也得到不断的提拔，自排长、连长至营长。当时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十余人都是冯的亲信，有“十三太保”之称。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韩由团长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5年春，升任第一师师长。1926年5月，当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大战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韩复榘任前敌总指挥，和石友三等率部往援晋北，韩在大同、天镇一带积极同晋军作战。8月，国民军在南口失败，退向绥远，并拟续向甘肃撤退。韩复榘、石友三见军心散乱，乃与晋军将领商震联系，接受晋军收编。

1926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到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召韩归来。韩初不敢归，经解释后，率部回到冯处。9月下旬，冯玉祥出师甘、陕，任韩为援陕第六路总指挥。1927年6月，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韩任第六军军长。7月，韩代方振武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出潼关，在豫东一带打垮奉、鲁军各部。1928年4月，蒋、桂、冯、阎四派联合“北伐”，韩复榘奉令率部沿京汉线北上，6月6日首先进抵南苑。7月，河北省政府成立。韩自认为战功不小，但仅得一河

北省政府委员职，很不高兴。10月，第二集团军缩编，韩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不久，韩部又改编为第二十师，韩任师长，回驻郑州。12月，冯玉祥荐韩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把他兼任的二十师师长开了缺，改由与韩素有矛盾的石敬亭接任，使韩深受刺激。他常觉得自己过去有“投晋”的一件事，怕冯对他有怀疑。现在韩丢了二十师的实力，只当一名空头主席，越认定冯对他不信任，对冯渐怀不满。

蒋桂战争于1929年3月爆发，蒋介石以中央名义任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令其率部讨桂。而冯玉祥则令韩屯兵信阳，暂不进兵，以观时局变化。4月，桂系失败，冯玉祥急电促韩率部向武汉推进。行至孝感，蒋介石立即电韩停止进兵，并派人携款至孝感，借劳军之名，对韩进行收买。韩又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至汉口见蒋，蒋以优礼相待，极表亲切。这与冯有时对他粗鲁的责骂对照起来，大不一样。韩遂对蒋抱有好感。5月，冯玉祥在华阴开会，策划反蒋。冯将原驻山东、河南之西北军撤至陕西和河南西部。韩复榘反对冯的西撤计划，被冯痛斥，遂召集他的二十师旧部将领密议，率部东去，叛冯投蒋。5月22日，韩在洛阳发出“养”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23日，又连发两电，表示拥蒋。

1930年4月，中原大战正式揭开。韩复榘向蒋介石要求，把所部调往山东抵挡晋军。4月15日，蒋任韩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境内与晋军作战。9月，冯、阎失败后，韩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6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1月，被任命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8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从1930年9月至1938年1月，韩复榘统治山东近八年之久。他在山东的统治与以前督鲁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同样是土皇帝式的，但外表上不一样。他摆出一副“急于求治”的架势：严禁部下穿丝绸衣服，不准士兵上街游荡，他常到各地“巡察”或“私访”，随个人喜怒滥用赏罚。他可以把彻夜赌博的小职员误认为“能早起”而提升为县长，也可

以据一封匿名诬告信而惩办他的僚属。他喜欢自己审案，当时流传着他判案的笑话：“左立者开释，右立者枪毙。”人们戏称他为“韩青天”，他很高兴。他成百地诱杀降俘，手段非常残暴。从1932年至1933年期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捕共队三次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山东省委员会，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共产党人发动益都、博兴、诸城、日照、荣城、海阳等地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和韩复榘的残暴统治。这些暴动都先后被韩复榘所镇压。

与此同时，韩复榘又利用梁漱溟在邹平、菏泽等专区推行旨在维护当局利益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用欺骗的手法来强化其封建统治。

1932年9月，韩复榘指使山东省府参议郑继成（郑借口为他叔父报仇）刺杀了应邀回到山东来的前山东督军张宗昌。

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对蒋介石的“中央”保持半独立关系，韩与蒋之间矛盾重重，韩复榘害怕蒋介石向山东插手，两次截留“中央”税收；有时也明里暗里打击国民党党部，甚至暗杀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因之，韩又暗向张学良拉拢合作。1932年九十月间，韩复榘在张学良的炮兵援助下，向盘踞在胶东的第十七军刘珍年部进攻，迫使蒋把刘部调往浙江。1935年后，随着华北形势的变化，韩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力求自保。为此，他一方面取缔反日宣传，解散抗日组织，竭力讨好日本，与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交往密切，挟日本势力不让蒋介石的部队进驻山东；另方面，他也不完全听日本摆布。1935年后，日本几次诱使他参加“华北自治”时，他怕被人骂作“汉奸”而不肯干。日本驻济领事怕他“蛮干”（一次，日领事邀他“赴宴”，他调炮队巡守在使馆外），也不敢过分胁迫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12月21日韩复榘发出“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并准备派兵袭击由何应钦率领攻陕的“中央军”的后路。韩的这一举动，深为蒋介石所痛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韩一方面表示对日“决绝”，限令日领事与日侨即日撤走；同时在其第三路军政训处内，容纳进步青年，做出要对日抵抗的姿态，但实际上他对抗战持观望态度，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8月，蒋介石把韩的第三路军和东北军于学忠部编为第三集团军，任韩为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要韩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韩认定蒋介石借抗日为名，意在消灭异己部队，故只派少数部队过黄河与日军周旋，遂即撤退。1937年12月22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接着放弃泰安和济宁，径自退到鲁西南巨野、曹县一带。

1937年冬，蒋介石退出南京，到达武汉，准备入川。韩复榘与刘湘密谋，企图由刘湘封闭入川道路，不让蒋介石入川；韩则准备向南阳、襄樊、汉中一带撤退，并派人联络宋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然后由刘、韩、宋联合倒蒋。蒋介石接到了这一策划的密报，遂决心杀韩。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借口在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韩到会，将他逮捕，押解至汉口。24日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将韩处决。

主要参考资料

《申报》1929年5月25日、26日。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10月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初稿。

高步瀛：《韩静原先生墓表》，《霸县新志》第7卷，文竹斋1934年版。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所历史研究所：《山东省志资料》第1期、第3期，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韩麟春

武育文　苏燕

韩麟春，字芳辰，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1)]，奉天（今辽宁）辽阳人。出身于富裕农家，其父韩继武思想开明，为了供给子弟求学，不惜变卖大量地产，韩麟春和胞弟韩麟生均得以出国留学。

韩麟春青少年时期，刻苦好学，成绩优良。1904年，韩十八岁时经清政府练兵处考选留学日本，初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留日期间，他始知东北军事教育较关内更为落后，遂立志勤学，为东北争光。

1907年，韩麟春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后任清政府陆军部军械司科员，后升为军械司司长、陆军讲武堂教务长等职。

中华民国建立后，韩麟春在北洋政府陆军部先后任科长、参事数年，因研制“韩麟春式”步枪有功，被授勋五位。1916年6月升任陆军部参事。1919年，奉北洋政府派遣赴欧洲考察军事，并代表陆军部任巴黎和会军事委员。

1921年12月，梁士诒内阁成立，鲍贵卿任陆军总长，韩与鲍为同省关系，而得任陆军次长。旋梁内阁倒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1922年5月2日，韩被免去陆军次长职务。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经杨宇霆推荐，韩麟春被张作霖任命为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当时，张作霖积极进行整军经武，准备对直再战，以巨款扩建兵工厂。兵工厂的扩建计划和管理办法多出自韩的意见。几年后，东三省兵工厂“规模宏伟，设备完善，蔚为全国之冠”[(2)]。工厂机器设备多从日本、德国购置，还不惜重金招聘外国工程师和技术

员。每年消耗经费一百余万元。该厂从1923年起，每年能制造大炮（包括山炮、野炮、重炮）约一百五十门，追击炮数百门，步枪六万余支，机关枪一千挺以上，炮弹二十余万发，枪弹六十余万发。

1922年7月，张作霖采纳杨宇霆的建议，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编奉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由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统监。他们都是奉军中的士官系，孙烈臣经常不到任，实权主要操于姜、韩之手。他们既排斥旧派，也排斥新派之陆大系，而竭力提拔重用士官系，一时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诸人在奉系军事集团中居于重要地位。杨等对旧军官“向不看在眼里，送客及门而不出户”[(3)]，对新派郭松龄（陆大系）的崛起尤为嫉视。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派遣六个军入关，以姜登选、韩麟春为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为第三军正、副军长，组成一、三联合军团，从山海关正面攻击直军主力。战争开始，直奉两军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展开激烈争夺，双方伤亡惨重，一时难分胜负。为了突破直军防线，张学良、郭松龄二人决定乘敌不备，由山海关方面抽出步兵八个团和炮兵两旅，在郭松龄率领下，增援在石门寨的奉军，加强九门口方面的攻势，迫使直军一度后撤，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才稳住阵脚。但是，姜登选、韩麟春对此却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郭在山海关毫无进展，想到这里邀功。与此同时，姜、韩还把原属郭部的两个炮兵营长阎宗周、关全斌撤职。郭松龄得知后，亲书命令把原姜、韩所属的炮兵团长陈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撤职，并令阎、关复职。姜、韩除将此事电告奉军总部外，韩还亲回奉天向张作霖告状，说郭跋扈难制，要求以军法论处。张作霖鉴于前线正在激战，百般调和，下令陈琛、阎宗周、关全斌三人各复原职。事虽平息，郭松龄与韩麟春、姜登选之间的裂痕却日益加深，后来郭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曾说：“韩最暴烈，不能相处。”[(4)]

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直系一败涂地，奉系势力迅速伸展到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一带。张作霖论功行赏，任李

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有功将领中只有郭松龄、韩麟春未得到地盘，韩不久再次接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这一要职，唯独郭松龄始终遭受冷遇，郭忿忿不平地对高纪毅说："东北的事都让杨宇霆这帮留学生弄坏了"，"要想东北挽回颓势，非'清君侧不可'。"(5)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痛陈张作霖、杨宇霆穷兵黩武的罪行，并将自皖撤退路经滦州返奉的姜登选枪杀。这时韩麟春患病在奉，得以幸免。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命韩麟春任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两军联合作战，又称三、四方面联合军团，从此，张学良与韩麟春共事多年。

1926年1月，郭松龄余部魏益三旅归附冯玉祥，改称国民军第四军。奉军出兵攻魏，魏军由榆关撤往昌黎、滦县，冯军派兵援魏，双方隔滦河相持。3月间，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撤离津、滦，退守北京，张学良、韩麟春率领三、四方面军团挺进到京畿地区。4月15日，国民军复放弃北京，退守南口。从7月中旬起，奉、鲁、直各军联合向南口进攻，8月1日开始总攻，张学良、韩麟春亲赴前线督战，奉军调动所有炮兵与数万步兵，一直以猛烈炮火压倒对方，但未能攻克。韩建议速派吴俊陞、汤玉麟部由热河攻多伦，在国民军背后迂回。后因吴俊陞、汤玉麟在沽源、独石口一线击败国民军宋哲元部，进而率军长驱直入，直扑国民军的大本营张家口，国民军才于14日由南口撤退。次日，奉军占领南口。韩麟春对此役颇有贡献，更为张氏父子所见重。

南口战役期间，吴俊陞部穆春的骑兵师纪律败坏，土匪出身的王永清（绰号"天下好"）骑兵旅攻下多伦时，肆意抢劫，竟把喇嘛庙供奉的金佛抢走，引起当地民众的愤慨。庙里的喇嘛向三、四方面军团部控告，张学良、韩麟春亲自率一营卫队，由北京乘专车至张家口，首先由卫队队长姜化南在车站附近把王部集中起来加以包围，进行严密监视，然后由姜代替张、韩训话，不料姜化南被场内一名军官击

毙，于是卫兵立即以重机枪扫射，场内乱作一团，张学良、韩麟春在车内制止无效，在场的官兵死亡众多，王永清当场被捕，押往奉天监狱。专车被枪弹打得遍体鳞伤，张、韩二人虽受惊恐，却安全无事。

同年夏，国民革命军由广东出师北伐，进展迅速。北军吴佩孚、孙传芳难于招架，奉系成了北洋军阀的重心。11月，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鲁军将领会议，讨论“讨赤”、“援孙”、“援吴”问题，吴、孙亦有代表列席。会上决定以鲁军“援孙”，以奉军“援吴”，并组织统帅办事处。会后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陞、张作相、韩麟春等出面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随即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韩麟春升任陆军上将。

1927年2月，张作霖借“讨赤”、“援鄂”对抗北伐军之名，两路进兵河南，一路由褚玉璞部鲁军沿陇海线进攻开封，另一路由张学良率奉军第三、四方面军沿京汉线进攻郑州。其时，从两湖败退到河南的吴佩孚深知奉系是明援暗取，竭力阻止无效，吴部以靳云鹗为首的反奉派被迫进行反击。3月5日，张学良、韩麟春赴前线督战，于珍、荣臻诸部迅速攻占阳武（今原阳）、中牟、荥阳、郑州等地。奉军对直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消耗了不少力量。

在入豫作战的同时，张作霖还派韩麟春赴山西运动阎锡山与奉军合作，没有成功，韩电告张：阎锡山已与蒋介石、冯玉祥、靳云鹗串通一气，请以重兵驻石家庄，以防晋军出娘子关。同年4月下旬，北伐军进入豫南，5月上旬，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豫西，不久阎锡山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威胁奉军后路。6月1日，北伐军与冯军会师郑州，奉军只得向北总退却，张学良、韩麟春的三、四方面军军团部撤至汲县。黄河以南地方尽被北伐军和冯军占领。张学良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韩麟春。当初张打算兵进河南至磁县为止，而韩却按照杨宇霆的旨意极力南进，张以为韩这是为了抢地盘，急功冒进，韩拒不认错，为此张学良很生气，曾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茂宸（即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6)]

面对大军压境的严重局势，奉系内有和战两派意见。张作相、吴俊陞等主张退守关外，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等则希望与蒋介石停战议和。他们尤强调团结北方，统一军政大权的重要，韩早就提出拥张作霖为国家元首，这时再次与其他将领一起发表通电，请张出任安国军大元帅。张于6月18日宣誓就职，同时将北方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韩仍任第四军团军团长。在此前后，南方因宁、汉分裂，北伐军事处于暂停状态，只有冯军继续坚持向鲁西、直南发动攻势，虽然迫使奉军再度由汲县向河北省退却，但不能根本动摇张作霖的统治。

同年8月，蒋介石派何成濬赴山西联络阎锡山。何路经北京时曾会晤韩麟春，韩与何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交情很深，时韩正卧病在家，他们便在床头洽谈。韩问："闻兄在徐州作战，如何又到此间？"何答："将有山西之行，路经此间，特来拜访老友。"韩又谓："兄此行任务，我知之矣，大概是奉命去运动阎百川（阎锡山字）吧？"何坦率直言："正是去运动百川，设若得手，将来平津发生战事，可以与党军相呼应，贵军难免腹背受敌，彼此至交，才敢奉告。"韩麟春说："阎可运动，未必张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并且可做共产党。"[(7)] 此后，蒋介石派何成濬等与张学良秘密谈判即源于此。

1928年春，韩麟春病势加重，回奉天治疗，其军团长职务由杨宇霆接任。1930年1月18日，韩因病在沈阳去世[(8)]。

---

(1) 韩的生年，一说生于1888年，本传根据武南阳编《东北人物志》，满洲报社1931年版。

(2) 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纂：《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312页。

(3)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轶事》，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辽宁省文史研究馆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192页。

(4) 《郭松龄致书张学良》（1925年11月28日），《京报》1925年11月30日。

(5)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130页。

(6) 刘鸣九先生口述史料。

(7) 何成濬：《八十自述》，第28—29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8—29页。

(8) 韩去世日期还有1929年12月29日和1930年3月2日两说，本传据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纂《东北年鉴》。

韩永清

徐凯希

韩永清，字世昌，别号福航。1884年4月26日（清光绪十年四月初二）生于湖北汉阳乌金山乡。其父韩德湘曾考中秀才，因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年早逝。母亲朱氏携韩永清流落至汉口，靠给人缝补浆洗的微薄收入生活，母子相依为命。

1899年，韩永清到永兴洋行牛皮厂做零工。同年夏，汉口连日暴雨不停，大水淹没住房，韩氏母子在河堤搭棚安身。不久，韩母返回乡里，韩永清独守破屋，一夜燃烛酣睡引起大火，慌乱中他跌入襄河，水火相交，大病一场。朱氏闻讯赶来，请医生诊治，经悉心照料，韩死里逃生。嗣后，朱氏百般节俭，送韩进学堂读书。少年时代艰辛经历，养成他坚忍耐劳的毅力，学习刻苦用功，受到同乡英商和记洋行买办杨坤山悉心指导，十八岁时已能使用英语会话。

1903年，韩永清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结识。张喜其聪明伶俐、熟谙英语，派任巡警道署通译。韩逐渐学会同各色人等应酬交际，并洞悉经商之道。他办事干练，深得中外商人信任，不久经杨坤山举荐，被和记洋行季大班所录用，派往长沙任分庄经理。在任数年，韩悉心经营，使分庄生意日见兴隆。经杨坤山荐引，调回汉口，改任总行稽查。

1910年，和记洋行确定在芜湖开办新厂，为购地建厂方便，任命当地人王春山充任买办，派韩永清为副买办，前往协助，主持建厂事宜。王背着韩私下与地方官绅勾结，在地价中回扣白银五千余两，中饱私囊。此事被稽查程韩玉、李寿同所悉，转告韩永清，韩未动声色。不久，季大班由汉来芜湖巡视，韩将此事如实报告。季查证后命

王自行辞职，任命韩永清为和记全权代表，升为正职。韩经过再三考虑，提出在芜湖办厂诸多不利：冬季枯水江轮不能靠岸，陆路交通不甚方便，建议改在南京建厂更为适宜。季经过反复权衡，表示同意，从此对韩更为器重。韩永清留程韩玉、李寿同驻芜湖处理善后，自己与季同返汉口，详商南京建厂事宜。他向总办杨坤山提出，希望介绍一位得力副买办，后聘请武昌文华书院毕业生罗步洲充任。

1911年春，韩永清偕罗步洲同往南京。时因南京未设租界，外商建厂购地手续颇费周折。韩、罗两人分别拜见当地士绅及帮会组织，广为结交，求得支持。经周汇川等人帮助，很快以低价购得下关宝塔桥附近土地，立即动工建厂，三年建成颇具规模的南京和记洋行。内设冷藏、制蛋、屠宰鸡鸭、猪鬃、制革等各分厂，备有专用码头和拖轮，凭借趸船可停靠万吨海轮。收购范围遍布苏、皖、鲁、冀及赣北各地，每年收购鲜蛋五万余篓、鸡鸭十六万笼、生猪五万余头。出口贸易额占和记总出口额的百分之六十。韩永清任职期间，广交各方人士，打通关节，广收广卖，加快资金周转，使南京和记迅速兴盛起来，每年获利几千万两。除去官场交际花费，韩本人所得丰厚。

同年，胡汉民为筹措广州起义经费，奉孙中山命来到南京，经人荐引，将孙中山筹资起义意图转告韩永清，希望他能在经费上给予支持。此时，韩正主持和记洋行建厂事宜，手中并无多少积蓄。他利用外商结汇之便，慨然捐助巨款。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回到国内，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专程前往韩家拜访，促膝而谈，对韩资助革命一事表示谢忱。孙亲书“博爱”横幅相赠。嗣又委任韩永清为总统府顾问。韩建议“赈济灾民”，“改革教育”，均为孙中山接受，纳入临时政府三十条法令之中。

民国甫定，韩永清以历年所收佣金，先后投资天津永利久大化学公司、上海厚生、新生纱厂、武汉桐油公司、南京大同面粉厂、唐山开滦煤矿、镇扬长途汽车公司以及大陆银行、盐业银行等，一跃而为闻名全国的工商巨子。

1913年，韩永清出资在南京下关创办小学两所，专门招收贫苦子弟入学。学生毕业成绩优异者，韩资助学费转入中学，再升入大学。不久，韩永清被推选为国立民国大学副总董。该校总董历来由大总统兼任，各省军政长官列为董事，韩非军非政却得此殊荣。

韩永清正式经办南京和记后，就在下关商埠街兴建新式住宅一栋，接来母亲同住。1916年，他与杨坤山的外甥女杨素婵结为秦晋。为了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谋求发展，韩缔交重信义广为联络各方面有影响的人物，以求保护。通过周汇川、余家谟等人，他与江苏省警务处长王桂林结识。通过王又与南京宪兵营司令陈调元及驻军的师旅长拉上关系，往来频繁。不久，韩与南京上层社会甚为熟识，与江苏督军冯国璋之子结为拜把兄弟。同年5月，十五省区将军巡按使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各省代表多由冯公子领至韩公馆进行联络活动，和记在各省的购运业务也相应得到照顾。

1917年，张勋复辟，其部将吴捷巨率六个团驻防浦口。吴获悉张勋北上已遭挫败，准备孤注一掷，炮击南京。冯国璋部与吴军隔江对峙，一触即发，南京全城危在旦夕。韩永清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只身前往吴军驻地，陈说利害，晓以大义，许以重金，并乘坐汽艇往返两军之间，吁请不要开火。吴捷巨终被韩的义举所打动，接受冯国璋的改编。韩永清因此被黎元洪、冯国璋及江苏军民两长，皖、鄂两省长官礼聘为顾问，相继荣膺二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嗣又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1918年，国会改选，韩永清以江苏省总代表资格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来往于南京、北京之间。时值皖系首领段祺瑞以实力为后盾，意欲用武力解决南北纷争。韩则就南北政见问题在国会发表意见，极力倡言南北必须统一，但应以和平谈判为前提，主张先决国是，然后选举总统。他力陈国家累遭战祸，民不聊生，不能再战，若南北诉诸武力，再开战端，生灵必遭涂炭。韩曾直言，南北隔阂、皖直交讧是由徐世昌一手造成，对徐提出弹劾，引起全场轰动。国会内部因意见分

歧，难于形成决议，韩永清愤而辞职，离京南下。

1919年，韩永清经人介绍，从经营破产的沔阳商人孙华堂手中，买下汉口华景街地产。嗣又购得永清里、永贵里、世昌里、华清里等处地产，破土兴建商业铺面九十余栋及菜场一座。1924年全部落成，改名为华清街，成为汉口著名的高档食品集中销售街区。

韩永清自幼贫寒，受母亲教诲，功成名就不忘根本，广施慈善，平日常书“博爱”二字以自勉。南京和记开张后，所用工人大多住在工厂四周草棚中，时有火灾发生。韩组成“和记同仁慈善会”和“救火会”，无论厂内工人或附近居民出现火警，他都带头前去抢救，并施以救济。1920年，南京城内瘟疫流行，死者日见增多。韩永清出资开办贫民医院六所，分设城内各处，为穷苦人家义务施诊施药，救活者甚众。韩历任下关商会会长、湖北旅宁同乡会会长和华洋义赈会董事，热心社会公益活动。韩施财好善，远近闻名，下关当时除仪凤门大街为官方修筑外，其余道路坎坷不平，每逢下雨泥泞不堪，韩慨然捐出巨资，一律平治。各省若有天灾人祸，他总是率先解囊相助。每遇客死异域者，他便派人料理后事，送回原籍。

1921年，韩母朱氏去世，韩永清扶柩返回汉阳安葬，并请蔡元培、王珊分别撰写墓志铭和墓表。遵照母亲遗训，韩出资十万元，在汉阳、汉口开设贫民通俗学校五所，对穷苦百姓施财施药。又借为其母所建“贤母祠”多余房屋，在故里开办小学，招收四邻子弟读书。

1923年，和记总行季大班退职回国，韩永清因与继任洋人大班失和，辞去南京和记洋行职务，回到汉口，接任英商安利英洋行买办。时值大战后，洋行林立，竞争激烈。韩任职二年，便推荐由王霭臣继任，自己重返南京，接手行将停业的和记洋行。

1930年，韩永清再次辞去和记洋行买办职务，隐退上海定居，专心从事慈善事业，被推举为“旅沪湖北同乡会”会长，加入国际慈善机

构红十字会组织，担任东南主会总办事处监理。嗣又兼任上海红十字会会长，代表总会前往苏、鲁、闽、浙、赣、湘各省视察会务，在长沙创设新道院，恢复武汉、福州等地旧院。

1931年长江大水，韩永清率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与南京分会陶遵开同赴武汉，协助汉口分会救济灾民，济赈饥荒，协同汉口基督教会将部分灾民迁至黄陂横店。事后，他商请汉口市商会贺衡夫等人筹办医院，向富商巨贾募集经费，连同红十字会各地分会赠款，购得两层楼房一栋，开办红十字会医院，为贫苦市民诊治。

1932年，江西苏区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韩永清带领救护队亲临战场，高举红十字会标志，往返双方战区，指挥抢救伤员，一律实行人道。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汉口市商会负责人贺衡夫、陈经畲等相继撤往重庆，汉口红十字会从铭新街迁至天津路，韩永清主动将四明街私人住宅让出，得以继续收治病人。汪伪政权头目陈公博曾派专人多次邀请韩永清出任伪湖北省长，他予以婉拒。

1948年，韩永清因病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晴川近代名人小传》，《武汉文史资料》总第34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

[美] 柏脱等编，勃德译：《中华今代名人传》，上海传记出版社1925年版。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武汉人物选录》，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版。

郝鹏举

王家鼎

郝鹏举，幼名勉，字腾霄，河南阌乡县城郝家巷（今属灵宝县）人。1903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一）出生于县公署衙门一个衙役家庭。其父郝福嗜吸鸦片，家境穷蹙。郝鹏举八岁丧母后流浪、乞讨，做过学塾杂役，继投华山学道。后得同乡帮助，进阌乡高等小学卒业，又到洛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至毕业。

1922年5月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大批扩军，郝鹏举投入冯部，在学兵团第二营炮兵连当学兵。是年秋，冯调任陆军检阅使，由河南移驻北京南苑练兵。冯见郝鹏举身材短小干练，聪明机警，刻苦操练，甚为赏识，乃选拔其充传令员，随侍左右。1925年1月，冯任西北边防督办，为培养初级军官，创办西北军干部学校于张家口，郝被选入该校受训，任学员第一大队长。同年夏，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援助冯部西北军，选派基层军官二十四名赴苏学习军事，郝列名其中。11月，郝被分配在基辅红军各兵种混成干部学校第一期炮科。郝学习成绩优异，但心存升官发财欲望，思想上抵制学校的革命教育，嫉视同学接受马列主义。1927年夏毕业归国后，仍回西北军，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独立炮兵团团长，驻开封，暂归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自忠）指挥。1928年春，国民党继续北伐，郝部转战河南，北上进抵北京。5月，升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军参谋长。郝居功自傲，为西北军同僚所侧目。

1929年春，蒋介石讨伐冯玉祥，西北军主力西撤，韩复榘叛冯投蒋，郝鹏举见形势动荡，难断鹿死谁手，遂脱离部队，赋闲郑州。他经营澡堂，兼营旅馆业，甚至不惜道德沦丧，去豫西灾区骗买良家少女卖淫。此时郝吃喝嫖赌无恶不作。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

发动反蒋，中原大战爆发，郝见反蒋联军声势浩大，曾欲再投旧部，但自感无颜见冯，暂守未动。及至10月，冯、阎联军失败，梁冠英部投降蒋介石，被编为第二十五路军，驻守苏北淮阴“剿共”，郝鹏举凭借昔日部属关系，乘时钻进梁部，任独立第一旅旅长，旋调任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他与黄埔同学会头目、留苏同学贺衷寒勾搭，加入复兴社，为蒋介石搜集、提供军内情报。他常擅违军纪，不听梁的劝阻，竟至无理殴打一个老中医，因拒不认错，被梁革职。后由贺衷寒引荐，去湖北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参议。1933年8月15日，蒋介石任郝鹏举为第三十军参谋长。1934年3月兼任该军第三十师副师长、代理师长。1936年春，郝受何应钦、贺衷寒派遣，携款秘密赴合肥第二十五路军总部，暗中诱惑梁冠英部旅、团长迫梁下台或要求脱离梁部。梁察觉后，5月赴南京向蒋告发郝鹏举，并呈请“辞职”。蒋佯示要严办郝，又批示梁“辞职照准”，将第二十五路军缩编为第三十二师[(1)]。郝曾极力活动任该师师长，未成，仍回原任。郝目中无人，为所欲为，第三十军军长孙连仲感到难以约束，遂送郝进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受训。

抗战开始后，胡宗南在西安设立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训练政工人员。1938年4月，郝鹏举由贺衷寒引荐，任战干第四团总队长。1939年6月，调任第二十七军参谋长，隶属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序列。后因郝散布不满胡的言论，且在私生活上行为不端，被胡扣押。郝买通监押人员潜逃，跑到绥远西部投奔傅作义部，任暂编第五军副军长兼民众动员总指挥，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进行反共摩擦。其间，郝于1940年3月赴南京与周佛海密商[(2)]，准备伺机投敌。

1941年，郝鹏举公开到南京投靠汪伪政权。他通过留苏同学林柏生，得到陈璧君垂青，7月29日被汪伪行政院任命为第一集团军（李长江为总司令）参谋长，驻苏北泰州。9月15日，汪伪军事委员会在泰县设苏北行营，以郝为行营参谋长兼第一集团军参谋长。1942年6

月，他积极参与、策划在南通、海门地区的“清乡”运动，摧残这个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8月11日，郝调任南京汪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致力训练汉奸军事骨干，叫嚷“坚定一个信仰，结成一条生命，紧跟着团长（指汪精卫）来完成复兴中国保卫东亚的伟大使命”[(3)]。10月，汪伪政权调整战时机构，郝鹏举调任伪军事委员会参赞武官公署武官长。稍后复任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1943年9月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调派郝鹏举取代郝鹏任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当地人民讽之曰：“去郝鹏，来郝鹏（举），何必多此一‘举’。”表达对汪伪黑暗统治的厌恶和不满。11月25日，汪伪军事委员会设徐州绥靖公署，以郝为主任。

郝鹏举就苏淮行政长官后，于同年冬连续召开行政、治安、教育等会议，全力确立所谓战时体制，强化行政机构和军警实力，推行“新国民运动”奴化教育，贯彻汪伪卖国协约，实践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方针不遗余力。

1944年1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划分省区案，首设淮海省，任郝鹏举为省长兼驻徐绥靖公署主任[(4)]。他一上台就“整饬吏治”[(5)]，继续强化统治机构；又创办《大陆新报》、《淮海月刊》，成立淮海学院、中央青年干部分校等，灌输亲日奴化教育。为建立反共经济基础，他又主持成立淮海省银行，组织开发协会，吸引投资，妄图以此“示范各省，全面对共”[(6)]。郝尤着力扩大军事实力，编练伪军，当时拥有第十五、第二十八两师和第七十一和第十二两旅正规部队，同时收容杂牌部队，编为省、县保安队。是年春、夏，郝部不断进扰泗阳、淮阴、睢宁等地新四军，与第三师（黄克诚部）、第四师（彭雪枫部）作战。进扰受挫后，郝诬称抗日根据地“民匪不分”，承认“专赖讨伐”“殊不足取”，提出要用“抚缉流亡”的怀柔策略[(7)]。郝为巩固其权位，积极投靠汪伪实力派林柏生，伙同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黄自强，在南京秘密组织、宣传情报机构“政治工作局”，搜集、提供苏北地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编印反共宣传品，鼓动其部属的

反共斗志。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汪伪统治覆灭，郝鹏举转而投靠国民党蒋介石。郝先经黄百韬拉拢，投第三战区顾祝同部。10月，率所部汪伪第七方面军接受第十战区改编为第六路军，仍驻防苏北徐海地区。旋奉蒋介石指令为反共前锋，率部进攻鲁南解放区。12月，郝会同冯治安、陈大庆等部占领贾庄、韩庄，分三路北犯鲁南[(8)]。1946年1月，郝部划归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指挥，奉令从左翼进出运河，掩护冯部北进。郝深恐被歼，为保存实力而消极避战。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借视察郝部之机，劝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郝为形势所迫，1月5日夜访新四军军长陈毅于峄县。9日，郝发表“退出内战、拥护民主”通电，并率所部四个师、一个特务团共两万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举行战地起义，更名为“中国民主联盟军”[(9)]。郝此举受到中共中央、延安边区政府的欢迎，新四军暨山东军区给予其礼遇和优厚粮饷，旋调郝部移防后方莒县整训。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派朱克靖为郝部政治委员，陈毅亲赴莒县慰问、检阅郝部官兵，并向郝提出根据民主自愿原则逐步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方针。

郝鹏举起义后，继续视军队为私产和政治投机工具，拒不接受逐步改造的方针。是年6月，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后，徐州绥靖公署加紧了对郝的诱降活动，于8月先后派李克昌、李笠雨到郝部策反。郝取两面派态度，他对中共表面应付，连续发表通电、诗文[(10)]，佯示不为蒋介石利诱阴谋所动；暗中却勾结蒋方，待机叛变。先是，陈毅已洞察其奸，于6月亲赴莒县晤郝，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规劝其坚定民主和进步立场；继而又调遣郝部移防东海赣榆县境，不变其优厚待遇，任其抉择出路。12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陈毅多次函电并派员向郝重申“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原则；同时郑重希望其脱离内战战场，勿向解放区进攻以加重人民痛苦。

1947年1月9日，郝鹏举借起义一周年纪念活动，一面致电延安

毛泽东、朱德，伪善地表示“万分地感激与兴奋”[11]，一面加紧其叛变投蒋步伐。他集中军队，准备军需辎重，接走莒县中楼村的眷属等等。他还“邀请”陈毅出席纪念会，企图加以诱捕，陈未赴会，阴谋未逞。1月23日，郝暗中接受国民党鲁南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职。26日晚，郝一举诱捕朱克靖及中共联络人员康宁等四人，当夜率部撤往海州城下蒋管区，27日晨发表反共通电，宣称“还军于国”，公开叛变投蒋。29日，郝飞徐州面见陈诚、薛岳，接受“进剿”解放区反共使命，并竭力诬蔑、诽谤解放区党政军民。2月6日，郝鹏举率部向陇海路东段白塔埠、大新集、蒜庄湖地区解放区进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第二纵队四、九两旅发起自卫反击，经6日夜和7日全天激战，攻占白塔埠郝的司令部据点，全歼郝部主力，郝鹏举被生俘。13日，郝被押解至临沂河湾村，要求面见陈毅。陈见他后，严词斥责其背信弃义的罪行，说不料“人之无良心到了这种地步”[12]。

1947年4月，蒋介石在发动全面进攻受到挫败后，转而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鲁东南解放区党政机关陆续向渤海区后方转移，郝鹏举被押解随行。夏初某日，撤至小清河某地正欲渡河，遇蒋军飞机轰炸，郝乘机逃遁，被押送警卫人员击毙。

---

(1) 梁冠英：《二十五路军受蒋介石收编和被消灭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6年版。

(3) 汪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毕业同学录》，1943年。

(4) 当时淮海省辖徐州市和铜山、东海、邳县、砀山、肖县、睢宁、宿县、淮安、涟水等二十一县。

(5) 汪伪《民国日报》1944年2月22日。

(6) 《淮海省施政概况》，汪伪《民国日报》1944年7月4日。

(7) 《郝鹏举在南京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汪伪《民国日报》1944年7月25日。

(8) 冯治安，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北犯鲁南解放区的除郝部外，尚有冯部五十九军三十八师、陈大庆部一一七师、骑八师、翁文庆纵队等十个师。

(9) 《中国民主联盟军退出内战、拥护民主宣言》，《大众日报》1946年1月14日。同年9月1日，再更名为“华中民主联军”。

(10) 1946年9月5日，郝鹏举发表通电，对中央社关于郝已“率部反正，与共军激战”的广播和传单，表示斥责，并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此心如冰洁，此志如玉坚”，决不为高官厚禄而背叛人民。其诗文，见同年9月16日、20日、21日《大众日报》。

(11)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郝鹏举事件的教训》，见《大众日报》1947年2月22日。

(12) 张剑：《陈毅将军和郝逆鹏举的谈话》，香港《正报周刊》第27期，1947年2月28日出版。

何北衡

袁嘉新

何北衡，名恩枢，四川罗江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何庆联，系光绪年间候补同知，民初任过罗江县团练局长。

何北衡早年就读于绵阳中学堂，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常在四川会馆与同乡聚会，结识了四川军阀刘湘的驻京代表乔毅夫、张斯可，并参加了北京各大学一些川籍学生组织的“诚学会”。1920年他还未毕业，便经乔、张介绍，与北大同学范崇实、陈学池等相继进入刘湘戎幕。1924年又回北大学习一年，毕业后返川，在政界、商界活动。

1926年，何北衡任巴县知事，并在川东川南团务总监部兼任处长。北伐战争开始后，刘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何北衡为该军政治部科长。

1928年，刘湘打败杨森，防区扩大到下川东二十余县。为加强对川江的控制，刘湘设置川江航务管理处，任命经营航业已见成效的卢作孚为处长，何北衡为副处长。半年后，何北衡升任处长。何主持航务处期间，除查阻他军运输军火外，还迫使以往横行川江的外轮，凡进出港口也必须向海关和航务处结关。航务处可派兵到中外轮船上检查，开中国兵登外轮检查之先河。

1936年春，何北衡接任重庆警察局长职，次年又接掌四川省建设厅，并兼省水利局长。1939年交卸建设厅长职。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卢作孚出任局长，何北衡任副局长。1944年再次出任建设厅长，继续兼任水利局长，直至解放。

何北衡任四川省水利局长之初，往灌县瞻仰李冰太守遗迹，羡其利溥人群，千年永生，于是有志推广李法于全省，普建水利工程。他在西南实业协会发表《四川水利建设概况及其对工矿业之关系》的专题讲演，主张“建设四川，首在水利”，“四川河流，计百四十，可发电二百万匹马力”，吁请实业界协助建设。为筹集工程费用，他经常去农民银行洽办水利贷款，曾叹说“农民银行的门槛都被我踏断了”。经多方延揽技术人才，在川西、川北及川东等地先后修堰开渠。他在1942年所著《建设四川水利复兴中华民族》一书中说：“自民国二十七年迄今，川省采用现代技术，运用大量资金，开辟及改良之自流渠堰三十余处，新建堵水坝二百三十处，可灌田土约七十万亩。根据此五年之艰苦经验，吾人对现代技术之效用，益具信心，对大量资金之贷放，益感必需。”他提出，为迅速推广水利工程，应准备大批技术人才，筹集大量资金，确立政策，规定制度，认为：“应引导人类与自然争无穷无尽之利，建设水利，即人类与自然争利之伟大而显著事例。”他主张利用外资外技，曾邀美国农复会的贝克博士一道去川西北参观水利工程。

何北衡与重庆工商经济界的关系颇为密切，由他担任董事长、董事、监察等的官办、商办企业不下数十。他与卢作孚早为莫逆之交，很敬重卢，遇事常以卢居前，而自处于辅助地位。1926年卢创办民生公司，开办重庆至合川轮船客运。航线必经之北碚，居于第二十一、二十八两军防区交接之间，土匪出没，航行经常受阻。经何北衡与人奔走联络，促成两军在北碚地区的谅解，设峡防局于北碚，并推荐卢作孚任局长。卢乃组织武装，消除匪患，使航行畅通无阻，同时将北碚建成为风景区。

何北衡在民生公司有投资，并任董事。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称何是“始终帮助公司最多的董事”。在民生公司业务发展中，卢每有重大主张，遇有不同意见，何皆尽力调和，助其实现。当民生公司航线伸展到长江下游后，何联络

友好，组成由他担任董事长的华懋公司（初名华通），将经营有年在申、汉、宜、万已设有机构的大川通报关行并入，对内称华懋运输部，对外仍用原名，使原为外商日清公司等招揽货运的大川通，从此改为民生公司服务。

何北衡接掌四川省建设厅后，即与卢作孚、财政厅长刘航琛支持范崇实从事蚕桑业，将四川省政府投有资金的四川生丝公司改组为四川丝业公司，何任董事长，范崇实任总经理。由于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及农本局等在增资中投入了资本，三行一局的负责人进入了董事会，宋子文当上了常董，大有进而占有丝业公司之势；接着张群任董事长的川康兴业公司也大量投入资金，并以母公司自居，准备派人接替总经理职。何北衡、范崇实急谋应付，决定由何北衡让出席位，请张群兼任董事长，范崇实的总经理才得以保留不动。后张群离川，何北衡又回任董事长。

抗战军兴，需要输出商品，换取军用物资。1937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四川贸易局亦相继设立，叶元龙（代表重庆行营）任局长，何北衡（代表省政府）任副局长。何北衡督促原经营猪鬃、桐油等的出口行号，按行业合并组织公司，先后组成了四川畜产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四川药材公司，化零为整，以增强实力，有利经营。桐油、药材因绕道运输费时，资金周转发生问题，他协助向中国银行洽办贷款。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沿海工厂纷纷迁至武汉，何北衡去汉敦劝各厂迁川，申述四川急需纺织、炼钢、机器、玻璃、制革、造纸、酸碱及其他化学工厂。何北衡的辞令，当时很能感动厂家。接着他与愿迁四川的厂家代表，就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市场、金融、捐税等问题，一一详加研究。

重庆的长江和嘉陵江原以木船为渡江工具，1937年冬筹组轮渡公司，以适应战时后方的需要。何北衡至渝召集有关方面商讨决定，省

政府先拨给十万元资金，由建设厅所属的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即日着手筹备。不久，便租妥民生公司两只小轮，于次年元旦行驶储奇门至海棠溪航线。一面先行营业，一面招募商股。7月，重庆轮渡公司正式成立。10月，何北衡具呈省政府："筹备轮渡，旨在提倡，原非为利，拟请将筹备期间所有盈利，除提缴省府资金月息一分外，余利提作备用金移让公司，以期挹注，而示奖掖。"由于优惠鼓励，轮渡公司陆续添购船只，增辟航线，使两江交通得到改善。1939年底，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在重庆成立，张群任理事长，何北衡任总干事。该会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常邀请中外名流、实业界头面人物作专题讲演，或就经济事业有关的问题进行座谈讨论。何北衡在星五聚餐会上作过专题讲演，并参加一些座谈讨论。1942年5月两次讨论纳税问题，有国民政府主管税收的刘振东、高秉坊参加。何北衡在会上几度发言，说："吾人对于税捐，非不拥护，仅求得一合理之规定。在今日病态复杂之环境下，应求税收之增加而病不增加，若税收数字增加而病益严重，则危险殊甚。"他指出："因沿途关卡林立，所予吾人痛苦之大，不可言喻。""人民不怕苛而怕扰，深望今后一切杂卡均予取消。"1945年9月，何北衡主持工业座谈会，讨论解救工业危机问题。他首先发言说："今天在后方的工厂都是随政府西迁的，用尽了劳力财力人力，维持了七八年，为的是要求胜利，现在胜利得到了，工业界自己倒濒于绝境。不但工业界如此，农村亦受其影响，粮食跌价，平均跌落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此情况，社会如何能安定？因此，我们的座谈会虽然偏重于工业，我们也应该顾到整个社会安定的问题。"他在座谈会最后指出："这个危机，是由于政府用通货膨胀的方法以后，而又紧缩通货的结果，所以政府应负维持的责任，我们有权要求维持。"

何北衡常为人排难解纷，友朋对他多有好感。1946年他五十岁生日时，畜产、丝业等几家公司约同送给他一笔礼金，他将此款转赠予公益事业。四川畜产公司成立时，贸易委员会所属富华公司等投有资金。抗战胜利后，畜产公司业务迅速扩展到国内外，商请何北衡代为

洽退官股，他因此几次去南京。事成之后，畜产公司酬谢他相当数额的股票，他谢绝未受。

在解放战争时期，何北衡曾为掩护和营救中共地下党人出力。1948年4月，其亲戚刘国志住在他家被人出卖，特务去他家诱捕，刘请出何妻吴静淑与之周旋，而趁机脱险。绥署参谋长肖毅肃立即下令包围何宅，严密搜查；一面打电话去成都找何北衡，指责其妻窝藏、放跑共产党，并威胁说："如果抓不到刘国志，只好请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说："我太太是个妇道人家，她懂什么？要坐班房嘛，我辞职回重庆抵案好了！"加以抵制。不久，刘国志在荣昌被捕，何北衡又多方设法营救。但国民党当局假意敷衍，于重庆解放前夕，将刘杀害于渣滓洞。

四川解放前夕，何北衡去香港，拒绝张群游说，不去台湾。1950年全家回到北京。何北衡曾任水利电力部参事室参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童少生：《回忆民生轮船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17辑，1983年版。

王世均：《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曾紫霞：《刘国志》，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西南实业通讯》1942年第5卷第6期、第6卷第5期；1945年第12卷第1、2期。

何成濬

江绍贞

何成濬，字雪竹，湖北随县人，1882年6月20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五）生，家庭“薄有资产，自幼生活裕如”[(1)]。何五岁延师就读，十四岁时赴武昌投考武备学堂，因年小体弱未被录取。十九岁时，参加县学考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受到湖北学政蒋式棻的赏识，被保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不久经心书院合并于两湖书院，后改称两湖高等学堂），受黄兴宣传反清革命影响，倾向革命。

1904年3月，何成濬得官费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翌年，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7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初在湖北督练公所任职，年余后在陆军部军制司任科员。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革命，何成濬被任为一等参谋，率领第一镇第一标及第六镇第二十四标先行，屯驻湖北祁家湾。湖广总督瑞澂令其自阳逻渡江进攻武昌，何为暗助起义军，以受荫昌节制为词拒绝；后又因私释被清军逮捕的农民，引起荫昌对他的怀疑。不久，袁世凯取代荫昌，何返北京。旋离京到沪投奔黄兴，被派往南京进行建立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何先后随黄兴出任陆军部副官长、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及汉粤川铁路督办驻北京代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后，何离京到沪，帮助黄兴做“二次革命”的发动工作，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二次革命”失败后，何随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

1914年夏，何成濬奉黄兴之命改名换姓潜回上海，做再次讨袁的

准备。他通过与陈其美的交往，结识了一些帮会人物。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邀黄兴共商大计，何受黄派遣先行到北京察看形势。在京二月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2)]，即离京南下。

1917年，何成濬随孙中山由沪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旋奉命回湖北联络军队。何到沙市策动驻军石星川师独立，但为鄂督王占元派兵夹击，石弃部逃走，队伍溃散。何将溃兵收集率往湖南常德，编成两团，以夏斗寅、张笃伦分任团长，交湘西督办、革命党人李书城接管，何自任高等顾问襄助。翌年3月，北洋军进逼岳阳，何受湘西军总司令程潜吁请，率夏、张两团驰援。初期在汨罗江设防守御，但在北洋军张敬尧部攻击下，败退长沙、永丰，后在乐亭又陷重围。何率部趁大雨突围脱险，在郴县将残部略加整理后交李书城，只身往广州，旋赴上海谒孙中山。

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广州再组军政府，何成濬被孙派赴湖南，兼负联络川、鄂两省之责。他动员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支持护法；旋因湘军内争，谭被迫辞职，何不得已回沪。翌年夏，复到湖南参加赵恒惕、李书城援鄂驱逐王占元的战争，虽然驱王目的达到，却被吴佩孚收了渔人之利，何仍不能回湖北活动。旋由孙中山派往云南游说唐继尧拥护军政府，在滇三月，未能取得唐的支持。回沪时，闻陈炯明公然叛变，立即到广州谒孙中山于永丰舰。当时许崇智由江西回师靖难遇挫，退向闽边，处境十分困难。何奉孙中山之命往福建游说延平镇守使王永泉。王不仅供给许部军火，并于10月间共同攻克福州，王担任了福建总抚，何亦膺任兴泉永前敌总指挥，在福建取得了一席之地。1923年2月，许崇智回师广东，何仍留守闽南，改任中央直辖福建各军总指挥，是年夏，受命率部夹击潮汕陈炯明叛部，屡战不利，孤军难支，退回闽省时王永泉又倒戈相向，不得已转进厦门。1924年5月遵孙中山之命由汀州绕赣边回粤，10月被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总司令谭延闿入赣北

伐。但进占吉安后，左右翼皆失利，全部退返广东。何因屡次战败，解甲回沪休养。

1925年9月，何成濬为蒋介石起用，任东征军总部总参议。1926年7月北伐开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蒋介石以他与孙传芳在日本同学的关系，派为驻沪代表，竭力游说孙传芳与北伐军一致进攻吴佩孚，但没有达到目的。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何受蒋命赴湖北，任鄂北绥靖主任。蒋介石原本指望他到湖北对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但何在武汉革命声势的压力下，无所作为，不久便至南昌。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何成濬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他秉承蒋介石之意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向阎转达蒋反共北进的决心。

1928年4月，蒋介石指挥第一集团军北伐奉系张作霖，何成濬任徐州行营主任。“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一再派何与日方谈判，5月9日曾派何与日军师团长福田交涉解决办法，日军淫威施压，何坚定不屈，拒绝在福田提交的屈辱条款上签字。后蒋介石改道北进，何先往京津游说奉军东撤，由阎锡山部接收北京各机关并维持治安。后又留驻北京做一些善后工作，收编了张宗昌直鲁联军徐源泉部和孙传芳的残部郑俊彦等部。10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何被任为参军长。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何被派为北平行营主任，取代桂系白崇禧。何取得唐生智合作，拔掉了桂系在北方的据点。蒋桂战争结束后，何于5月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何没有立即到湖北上任，而继续衔蒋之命往山西联络阎锡山。10月，蒋（介石）、冯（玉祥）战争爆发，何奉蒋命率第九军攻冯。12月，唐生智讨蒋，何在鄂被任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并奉命入晋襄助阎锡山，到郑州对徐源泉、王金钰等做争取工作，瓦解了唐生智的后路。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何成濬奉蒋命兼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率九、十两军在平汉线许昌各地布防，阻冯军南下。

中原大战结束后，何成濬奉命回任湖北省主席职，并兼任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地区红军的“围剿”。他调集九个多师的兵力参加第一次“围剿”，结果第三十四师全师覆灭，副师长岳维峻被俘。在第二次“围剿”中，何增加兵力达十一个师，结果六千余人被歼。第三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把主力置于江西中央苏区，对鄂豫皖暂取守势。各路红军威逼黄梅、武穴，向武汉包围。何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并派徐源泉第十军解武汉之围。在这次“围剿”中，何部又被红军歼灭七团之众。1932年3月，何卸湖北省政府主席职，6月被派任左路军司令官，负责湘鄂西地区的“围剿”。此外，他还部署在城市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他安排红帮头目徐朗西、杨庆山配合CC系特务、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于1931年4月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逮捕。顾被捕后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何还随蒋介石到重庆参加部署对红军的追击。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何成濬于11月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仅半年即被陈诚取代。1938年武汉会战前何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他看到国民党军队扰害民众，高级将领骄横跋扈，贪污舞弊，深感国民党统治“政治黑暗，古今中外绝未闻有如今日之甚者”，发出了“不胜为中华民国危惧”[(3)] 的感慨。他在处理一些案件时，看到各级官吏“皆有特别背景，不问如何作奸犯科，中央因多所顾虑，不能予以相当制裁”，他也就“置若罔闻，以不了了之”[(4)]。

何成濬自1929年3月担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来，以后第四、五届继续连任，1945年5月又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军法执行总监部撤销，何成濬回到武汉，出任省参议会议长。他在湖北最后三年次第在一些银行、商号、报社兼任董事长。他趁汉口第一纱厂董事们争权夺利之机，坐收渔利，当上了该厂的董事长。何遭到各方的非议甚多，处事亦多龃龉，以至他感叹“备

位三载，历尽酸辛”[5]。

1949年春何成濬潜往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担任过蒋介石的“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61年5月7日于台北去世。

---

(1) 何成濬：《八十回忆》，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8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另参看何成濬《八十自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2) 何成濬：《八十回忆》，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8集；另参看何成濬《八十自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

(3) 何成濬著，沈云龙校注：《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何成濬著，沈云龙校注：《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

(5) 何成濬：《八十回忆》，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8集；另参看何成濬：《八十自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

何键

李静之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3月11日（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生。父亲何其善，务农为业。何键幼时读私塾，1903年入县立朱子祠小学，后入渌江书院。1906年起，就读于王先谦主办的崇古学堂和湖南公立法政学堂。

辛亥革命后，何键一度在湖南都督府民政司做办事员。不久弃职进培养下级军官的湖南将校养成所，以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分配到湘军第一师第一旅见习。旋补少尉排长。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后，段祺瑞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企图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1918年3月，派北洋军大举犯湘，湘桂联军败退湘南。何键回到醴陵，与滞留家乡的第一师排长张国威收集溃兵散枪，分别拉起了游击队，不断袭扰北军后方。不久，北军张怀芝部在湘东溃败，游击队在当地农民配合下，缴获了数百支枪，又屡次挫败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进剿。游击队的活动引起湘军总部的注意，湘军总司令程潜分别委任何、张为游击队的正副司令。

1919年春夏间，湘军总司令部将游击队调往湘南，准备扩编成独立旅。这时，湘军发生内变，在桂系支持下重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联合赵恒惕逼走了程潜，继任湘军总司令。何键被认为是程派，不受倚重，队伍留资兴待命。不久，张国威从游击队分化出去，何键实力大为削弱，由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改编为该部骑兵营，何任营长。1920年，湖南军民驱逐张敬尧成功后，何部进驻岳阳、桃源等地。

驱张后，湘军内部又发生权力斗争。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接任湘军总司令、省长。为缓和内争，赵于1921年7月率领湘军援鄂，何键的骑兵营奉令开到湘鄂西，在沙市对岸沿江警戒。援鄂之役结束后，何得唐生智（时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保举，升任骑兵团团长，从此他便追随唐生智。1923年8月，谭延闿就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职，入湘讨赵，爆发了谭赵战争。何随唐部参加赵的“护宪军”，击溃了谭派蔡巨猷。谭赵战争结束后，唐生智升第四师师长，何键亦升任该师第九旅旅长。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何键随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并加入了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湖南后继续向武汉进攻，第八军担任沿长江两岸前进的任务。何键被委江左军司令，率部直趋汉阳，占领了龟山和汉阳兵工厂。武汉攻克后，第八军扩编为第八、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军，留驻两湖，何键因功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驻汉口。1927年4月，武汉政府继续北伐，三十五军进兵河南。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两湖工农运动蓬勃高涨，被革命潮流卷入的一些旧军官，逐渐露出了他们反对革命的本来面目。何键是这些反动军官中首举逆旗的中心人物。同年4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何键在会上公开攻击农民运动，反对没收地主的土地，斥责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搞得不像样子”[(1)]。“四一二”政变后，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何又利用驻武汉反共军官的反动情绪，推波助澜，在汉口召集部分高级将领会议，密谋策划发动两湖反共的军事叛变[(2)]。在何幕后策动下，5月21日（马日）晚，许克祥、王东原、陶柳等在长沙发动事变，猖狂进攻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3)]。从此，湖南进入反革命恐怖时期。

6月中旬，何键又和武汉卫戍司令、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紧密配合，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组织开刀。6月28日，李品仙收缴了湖北省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何键的三十五军则占据了汉阳、汉

口一些重要行业工会的房屋。29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4]，为汪蒋合流充当急先锋。

汪蒋合流后，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统治权，很快又对立起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依仗实力，企图占有东南。8月中旬派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分别率领第三十五、三十六军夹长江东下，占领了芜湖、安庆，进窥南京。唐并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下令何键兼代安徽省主席。

11月，桂系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派西征军讨伐唐生智。唐因战事失利，于11月12日通电下野，令何键、刘兴退入湖南，以保存实力。15日，西征军占领武汉。1928年1月占领长沙，组织了以程潜为主席的“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持湘政。3月4日，何键发出求和通电，表示“谨率所部，集结湘西，听候命令，移师北伐”[5]。6日，双方停火，宁汉战争结束，唐部大部被桂系改编。何键由于多方向桂系靠拢，改编时该部得以保留三十五军建制。从此何脱离唐生智，开创自己的局面。桂系军阀入湘后，为了镇压工农运动，成立了“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程潜兼清乡督办，何键兼任会办。

5月，鲁涤平担任湖南省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仍兼会办。鲁对何以会办掌握“清乡督办署”的实权十分不满，乘南京政府设立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会剿”湘赣边区红军）之机，请准蒋介石任命何代他为“会剿”总指挥，把何挤出了湖南。从此，何、鲁矛盾日益加深。何便进一步勾结桂系，策划倒鲁。1929年2月，桂系操纵的武汉政治分会以“铲共不力”等由，免去鲁涤平的省主席职务，以何键继任。蒋介石对桂系擅自任免湘省主席、控制湖南政权十分不满，调动军队西上。何键一面对桂系表示感恩，一面暗中派人向蒋疏通，想取得蒋的谅解和承认。蒋为了分化对方，表示只要何接受改编，受命讨桂，许他归顺效力。2月27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代理湖南省主席，他于3月2日就职。

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键见形势对桂系不利，改变了两面周旋的态度，表示拥蒋反桂。蒋委何为讨逆军第四军军长和湖南编遣特派员。4月初，桂系败回广西，蒋军占领武汉。何键亲到武汉见蒋，表示竭诚拥戴。蒋任命他为湖南省主席，接着，又任命他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辖三师两旅，约四万多人，南下讨桂。4月末，他分兵三路入桂。直到7月李宗仁、白崇禧宣告下野，湘军才陆续退回湖南。

9月，张发奎在宜昌举兵反对蒋介石，拟取道湘西入桂，与桂系合作。何键奉蒋令集中湘军堵击，亲赴宝庆督师。10月底，张部突破了蒋军和湘军的截击，进到湘粤桂边境，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络，组织张桂联军，占领了广西。12月唐生智也在郑州通电反蒋，电文上并列有何键的名字。因此，蒋很注意何的动向。何原想中立于蒋唐之间，曾通电全国主张双方息兵。蒋派武汉市长刘文岛到长沙当面诘责，何只好补发通电，声言“拥护中央，维持统一”[(6)]。唐生智反蒋迅速失败。1930年1月底，蒋介石命何键的第四路军入桂讨伐张桂联军。

同年春，西北、西南军阀和国民党反蒋派别酝酿反蒋大联合。湖南枢纽南北，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对何键极不放心，派刘文岛往来湘汉之间，观察何的动静。何虽表示拥蒋，但仍想保持同桂系的联系。这时，江西的红军日益发展壮大，有进攻长沙之势。何键便将讨桂的四路军撤回湖南，集中湘东以防御红军的袭击。5月，中原大战爆发。为了策应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军事行动，张桂联军趁何分防湘赣边区之机，倾巢进攻湖南。6月5日，长沙被张桂军占领，何率文武官员逃至岳阳。8日桂军攻占平江，何键又退到常德。不久援湘粤军进入湘南，何键督师反攻，于17日收复长沙，并亲率主力追赶张桂军至湘桂边境。这时，从赣南进入平、浏一带活动的红三军团乘虚占领了平江，进攻长沙。何键又急忙赶回长沙坐镇，从衡、永急调部队回来增援。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在27日攻入长沙，何键狼狈逃窜到

沅江。

长沙在两月之内两度失守，不满何键的人纷纷指责，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既需要利用湖南作为同两广之间的缓冲地带，又需要何键这支坚决反共的武力牵制红军。因此，替何承担责任，声明长沙失守，“中正应负其咎”[(7)]。何键感激涕零，从此便完全倒向蒋介石了。

8月5日，何键部向据守长沙的红军反扑，红三军团失利撤离长沙，月末红军再次进攻，旋又撤退。此后何键在长沙疯狂进行大屠杀，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口号下杀害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

早在1928年12月，何键担任湘、赣两省“会剿”代总指挥时，曾率二十个团左右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何部在修水、铜鼓一带协助“进剿”。1931年4、5月，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何部在湘东南堵击红军。自1930年冬至1932年间，何部还参加了对湘赣、湘鄂赣红军根据地的反复扫荡。1933年5月，何键被任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又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7月，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从江西永新、遂川进入湖南。蒋介石急调何键部追击，何的西路军基本队伍第十九师（原三十五军改编）一直尾追至贵州石阡。10月，中央红军撤离瑞金，突围到赣湘粤边。蒋把何键的西路军主力调湖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11月上旬，蒋任命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率五路“追剿”军，妄图把红军主力消灭在湖南。12月，红军突破封锁线，击败何键部阻击，进入贵州。何键继续尾追。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滇东，蒋介石撤销了“追剿”军总司令部，以何键为“剿匪”军第一路司令，专任对红二方面军的反复“围剿”。11月，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突围北上，何键部继续尾追到贵州、云南。何键不仅参加了“围剿”，还把“铲共”“清乡”作为全省的中心任务，自兼清乡司令部

司令。他把原叫“挨户团”的地方团队改名为“铲共义勇队”，说“用这个响亮名词，可以大大激发民众铲共的决心”。他又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指挥一人，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8] 他在全省严密保甲组织，办理“十家联结”，清乡队、挨户团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靠近苏区的地方更是血洗火烧，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何键统治湖南期间，竭力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侈谈“八德”、“五经”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9]，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何键统治湖南期间，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开办银行，滥发纸币，操纵金融，用各种名义发行公债，苛征田赋，恢复厘金，加征盐税；和贵州军阀勾结贩运鸦片，将湖南所产锰砂盗卖给日本。用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长沙、汉口、庐山、上海、香港等地购置了大量房地产。

何键取得湖南政权后，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兵力最盛时达到十万人左右。红军北上抗日，“剿共”局面缓和后，蒋介石不再允许他依仗实力进行地方割据，逼他辞去四路军总指挥职务，将该部主力调赴江、浙。以后又以抗日为名，将该部（包括地方保安队）陆续调离湖南，使何的军事实力彻底瓦解。1936年6月，粤桂军阀联合反蒋。事变前夕，陈济棠、李宗仁派代表到湖南与何密商合作。何大耍两面手法，一面作出响应西南的姿态；一面却派人向蒋告密，使蒋抢先控制了衡阳，桂粤进军湖南的计划未能实现。他想两面讨好，结果既招怨桂粤，也得罪了蒋介石，成为蒋想拔除他的一个因素。西安事变时，何键企图乘机将四路军主力从浙江调回湖南，没有成功。又企图把保安团扩编为正规军，也落了空。这加深了蒋对他的猜疑。1937年11月，调他为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

1938年夏，湖南政界倒何分子组织“湖南各界清算委员会”，对何九年囊括湖南财政进行清算，拥何派将主持清算最力的国民党监察委员罗介夫刺死，清算风波遂停。

1939年春，何键调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任主任委员。抗战胜利时因病辞职，以后长期住南岳休养。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他迁居香港，1950年夏到台湾，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6年4月25日，何键因脑溢血殁于台北。

---

(1) 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7辑，1964年版；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

(2) 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3) 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3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54页。

(4) 何键反共宣言，见《武汉反共之重要文件》，《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

(5)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版，第549页。

(6) 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重印本。

(7) 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8) 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7辑。

(9) 何键：《请命令学校读经以发扬民族精神而实现总理遗教案》，《船山学刊》1937年第1期。

何廉

徐凯希

何廉，字淬廉。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湖南宝庆硖石口村一乡绅家庭。其父除在家乡经营田产，并与同乡合股开办杂货店于广西桂林。何自幼入家馆、族馆读书，1909年9月插班长沙邵阳中学。同年寒假，为报考陆军小学前往桂林，因错过报名时间，暂在圣公会所办走读学校学习英语。

1911年春，何廉考入桂林初级陆军学堂。武昌起义爆发，军校停办，何与同学准备前去湖北，投奔革命军，后经家人力劝返回乡里。1913年12月考入长沙雅礼中学，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19年7月，何廉赴美留学，就读加州波姆那学院，边做工，边读书，主修经济学。1922年毕业，转入耶鲁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兼做阅卷助教，曾在著名经济学教授埃文·费暄（Irving Fisher）所设指数研究所工作，参加编制物价指数、股票周期等课题的调查。1926年毕业，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何廉学成回国，途经日本，收到南开大学聘书，改赴天津，任南开大学商学院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

1927年，何廉创办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任委员会主任。整理出版《南开中国经济文集》，编制、分析经济统计资料，从事社会经济调查研究，结合实际进行经济学科教学改革。同年，接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研究项目，从事对山东、河北人口向东北迁移运动的研究，前往东北等地进行实地考查。1929年，何与张伯苓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

1930年，经何廉建议，南开大学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任院长兼商学院院

长，主持教学、研究工作。同年，何受聘为上海贸易局统计顾问。1931年，何主持编写的大学财政学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刊印。

1934年，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改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何廉任所长，积极从事华北地区农村经济、农村手工业和地方行政与财政三个专题的调查。1935年，为培养农村复兴运动人才，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联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组织，何廉被推选为会长，主要任务是促进对农村复兴运动的研究，培养研究生。每校各有分工，南开经济研究所负责培养地方政府和财政、合作组织、土地管理方面的人才。同年秋，按照教育部核定的科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经济学科硕士研究生，开办研究生班，先后九期毕业生，共五十余人，散布于国内经济事业单位和学术界。抗战爆发后，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迁至贵州，改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仍任会长。

何廉在南开执教十年，得到校长张伯苓的大力支持。他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改革商、经两院课程设置，编写出版教科书，编制、发表物价指数，先后出版《大公报》统计副刊专栏、《南开统计周刊》（1928年—1933年）、《经济统计季刊》（1932年—1934年）、《中国经济日报》、《南开社会与经济季刊》（1935年—1937年）、《南开指数》年刊等统计类专业刊物，并在各有关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推动国内统计学科的教学研究与应用，蜚声海内外。

1934年夏天，何廉、蒋廷黻曾应蒋介石邀请前往庐山，对经济建设计划发表意见。何就浙江等地农村建设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建设中国经济，应侧重于农业方面，务必倍加关注。1936年6月，何廉接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来函转达蒋介石请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愿望，经过再三考虑，并与范旭东、张伯苓等商议，何廉决定接受，张伯苓特准其请长假。7月赴南京就职，负责协调行政院各部之间，以及各省市与行政院财务、建设、军务部门之间的工作。同年9月，何

廉奉命研究现有政府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职能，以及财政收支等问题，深感国民党政府机构重叠，责任重复，官僚积习甚深，主管人员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10月，何前往洛阳，每隔一天，向蒋介石等军政要员讲授美英两国财政体制、德苏经济等专题，介绍社会经济调查见闻。此间，何与同在洛阳的陈诚、陈布雷交往密切。12月初，何廉因事赴宁，准备前往西安时，西安事变发生，未能成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进行缩编改组，宣布迁都重庆。何廉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兼任农产调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接手实业部下属农本局总经理职务。11月，何带领农本局部分人员到达长沙，借用福湘女子中学校舍办公。其间邀请随校迁抵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各校经济学教授，讨论农本局和农产调整委员会战时工作方案，确定农本局战时主要任务应是促进农业信用流通和农产运销。

1938年初，国民政府进一步改组，由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合并组成经济部。何廉任经济部次长兼任农本局总经理，主持战时农业方面的行政工作。他先后部署在河南、陕西等地抢购剩余农产品，运至后方，分设招收站于汉口、长沙，招聘流落后方的专业技术人员。同年2月，农本局迁抵重庆渔村。为适应战时购储棉花，解决后方军需民用，何廉主持建立福生庄，投资一千万元，负责抢购战区棉花、棉纱，经营向后方运输花纱布等业务。随着系统业务全面展开，农本局相继在重庆、桂林、长沙、鄂西、贵阳、西安设立办事处，在大后方各主要县份设立农业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三百余处，分别管理各省农贷和农业仓储业务，先后开展柑橘储藏试验、兴修水利、推广分发良种等工作。为解决缺乏专业人员的困难，开设训练班于重庆，对农本局录用的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授以实际工作经验及基本急救、保健方法后，派往各地分支机构。训练班由方显廷主持，何廉任主任，陆续培训了七百余名大学毕业生。

4月，陈诚受命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邀请何廉兼任三青

团经济处处长。何廉曾邀请有关经济学专家讨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问题，因到会国民党籍人士作梗，会议最后拿出两份主张不同的报告送交陈诚，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同年11月，中共代表、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携夫人邓颖超抵达重庆，一时未能找到合适住房，何廉以周系张伯苓的学生，主动腾出渔村住房二间，请周恩来夫妇暂住。

何廉以学者身份从政，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一直是“局外人”。陈布雷等有意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但被何以各种理由推托。迁至重庆后，朱家骅、康泽等多次找他谈话，希望在农本局系统内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他都婉拒。1939年2月，陈诚辞去三青团书记长，由张治中继任。何廉在征求陈诚意见后，谢绝张的挽留，辞去所兼三青团职务，同年7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何廉与卢作孚、刘鸿生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1940年初，何廉从重庆前往昆明，沿途视察贵州境内几处农村合作金库。同年春夏，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米价暴涨，库存即将告罄，负责控制粮食分配的农本局受到各方责难。经何廉等人一再促请，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粮食管理局，接办原属农本局的粮食管理工作。卢作孚、何廉被任命为负责人。卢负责对外采购、运输，何负责分配及经营管理。7月，粮食危机渐得缓解，何廉由于对成立“农产促进会”问题坚持己见，引起孔祥熙的不快，被迫辞去经济部次长职务。他又当众提出米价暴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触怒财政部次长徐堪等人。

1941年2月，国民政府主计处在戴笠、徐堪授意下，突然对农本局大举查账，拘禁员工，清查凭证账册。何廉闻讯，立刻前往化龙桥秘密警察学校要求放人，遭到拒绝。他又前往翁文灏、孔祥熙、张嘉璈等人处询问，方知罪名是分配食米偏袒不公，分配给学校的多于给党政机关的；利用推广储存柑橘之便，在家中存放自用，戴笠为此将农本局全部账册调走核查，派人前往与何廉关系密切的南开中学检查

存米的数量和质量。后查无重大问题，便以理解蒋介石命令有误，释放在押员工。但解除何在农本局和粮食管理局最后两项职务。不久，蒋介石派任何廉为军事委员会参事，何表示除农本局工作，不想接手其他事务。他随即受到特务人员跟踪、监视。经友人多方劝告，讲明利害，何勉强就职，除领取薪水及配给日用品外，从未正式出席会议。

同年6月，何廉恢复研究工作，每周三天前往重庆沙坪坝南开经济研究所。8月，为经济研究所寻求资助事计划前往香港，不料寓所遭日机轰炸，他的大儿子遇难，其他人被压在楼梯下幸免。9月，重庆警察局敲诈裕华纱厂，捕去公司董事黄师让、营业部主任何文翰二人，几经疏通不成，裕大华公司董事长苏汰余求助于何廉，何廉找到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用蒋介石名义下一“无罪开释”条子，黄、何二人方得释放。同年11月，经蒋介石特准，何廉终于成行，会见南开经济研究所在港董事颜惠庆、范旭东、陈光甫等人，聚会讨论有关国内经济建设和未来规划问题。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何廉等人被困，避住金城银行大楼。1942年1月，他与范旭东等化装成平民，舟船步行，历时十天，回到大后方。

1943年10月，由金城银行等几家银行提供经费，何廉一行六人前往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四省考察私营银行开发西北地区的可能性，历时两个多月。考察后的结论，必需首先发展灌溉农业、发展运输和交通，只有政府下决心去推进，否则私营企业将无力承担开发西北的任务。这对他过后负责战后经济设计产生一定影响。其间，何廉还参与范旭东创办的建业银行的筹建工作，并担任总顾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注意战后经济的规划设计。1944年1月，何廉出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具体负责战后经济规划工作。同年夏天，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的制订，确定战后采取国营与私营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10月，何廉再次被任命为经济部政务次长。12月，在蒋介石主持下，经济事业总

原则草案被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批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何廉依据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提出政府应立即将接收的轻工业交私营企业经营。一俟工业接收工作完成，政府除保有并经营钢铁矿产及东北水力发电设施等重工业外，轻工业应以公平价格卖给华商私营企业，尤其反对收复区内全部棉纺织工业全部由政府接收和经营。因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何廉的建议未被采纳。

1945年冬，中央设计局完成业务，撤销在案。不久，经济部重新改组，成立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由行政院长宋子文兼任主席。蒋介石安排何廉任该委员会副秘书长，何因不愿与宋共事而婉拒。嗣后，蒋任命何为经济建设特别助理，在国民政府文官长办公室供职。何廉再三推辞，前往上海，结束了十年宦海生涯。

1946年6月，何廉担任上海金城银行常务董事兼任民生实业公司、大成棉纺织染公司、通成公司和太平洋轮船公司的干股董事。嗣又被永利化学公司和久大精盐公司聘为高级顾问。1947年1月，他主持创办的独立学术刊物《世纪评论》正式出刊，该刊在政治上崇尚民主，经济上主张综合体制的、有计划的发展，既反对政府拥有并经营轻工业，又反对类似19世纪早期西欧盛行的私营企业完全自由放任的制度。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巫宝三等为撰稿人，傅斯年曾在该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同年春，何廉着手创办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以方显廷为所长，人员多是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成员，创刊《经济评论》，以研究中国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为宗旨，经费主要由金城银行及所属中国协进企业公司捐助。

同年夏天，原农本局协理蔡承新、福生庄经理吴味经等人发起建立联谊性组织“晨社”于上海，何廉在农本局任职时的旧属和南开大学的门生故旧，闻讯纷纷前来参加、畅谈难忘之情，公推何廉为社长。另在天津等地设立分社，创刊《晨讯》。不久，何廉出面让“晨南企

业公司”集资五千万元，股东以晨社社员和建业银行同事为主，何廉任董事长，规定公司经营获利，全体职工得以劳力股分红，并始终得到贯彻执行。

1947年7月，何廉作为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经济与就业委员会和人口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前往美国，8月抵达旧金山，在波姆那学院做客并安顿好家人后，赴纽约出席两个会议。会后遍访美国各大学和著名经济学专家。经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部安排，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同意他作为1948年—1949年度的访问学者。

1948年6月，张伯苓因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电召何廉急速回国，接任南开大学校长。何于8月回国，9月代理南开大学校长。同时，辞去金城银行常务董事职。同年12月，何为接洽学校经费，前往上海、南京，在上海机场偶遇张伯苓，张嘱其不要再回天津。

1949年1月，何廉以出席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名义再度举家赴美，同年秋被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在该校东亚学院讲授中国经济结构课程。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改聘何为保有任期的经济学教授，先后开设“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土地制度”、“日本的经济结构”等课程，其间，曾参加联合国工作，取得美国罗氏基金会资助，组织“远东亚洲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国口述现代史》丛书联合主编人。1961年退休后继续指导学位论文，1966年8月完成“口述回忆录”。

1975年7月5日，何廉因病在美国纽约去世。生前著有《财政学》、《华北公共财政、物价与生活指数》、《何廉回忆录》等。

主要参考资料

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版。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何廉：《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黄肇兴、王文均：《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何香凝

尚明轩

何香凝是著名的女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南海棉村乡人。1879年7月16日（清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香港。何香凝父亲何炳桓，早年在香港药材店当店员，后为茶商，并经营地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家。

何香凝童年时爱好读书，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设法学习文化，尤其喜听人们讲述反清的革命故事。她从小就以太平天国的女战士为榜样，反对缠足，曾多次剪掉母亲强给她裹的缠足布，表现了反抗封建束缚的精神。

1897年10月底，何香凝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他俩志趣相同，感情很好。1902年秋，廖仲恺为了寻找救国真理，拟赴日本留学，何香凝变卖妆奁，为之筹集费用，以成其志。同年冬，她也东渡日本，于1903年初进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06年秋，再次考进目白女子大学，攻读博物科。1908年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在高等科学习绘画，并向当时的名画家田中赖章学画动物。1910年秋，在美术学校毕业。

1903年春，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人往来密切，加上受到当时革命思潮的推动，勃发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思想。1905年8月7日，经孙中山、黎仲实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加盟的女会员，从此积极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她的东京寓所是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孙中山经常和党人在那里集会，商议和策划革命工作。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如收转信件、看守门户、照料

茶饭、掩护同志等等。同时，还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廖仲恺等向海外华侨宣传反清革命，驳斥康、梁的谬论，和保皇派进行斗争。她热情洋溢，不辞劳苦，踏实工作，深受孙中山以及留日革命学生的敬重和信赖，被亲切地称为“奥巴桑”（日语，意为老管家、老太婆）。

1911年2月，何香凝在“黄花岗之役”前不久回到香港。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在广东省军政府工作，何香凝随同到了广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她离开广州，亡命日本。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即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和护法运动，她在东京留日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联络活动。为了动员北洋海军参加护法，1917年她又在上海从事海军家属的发动工作。

1921年夏，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时，何香凝同宋庆龄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宋为会长，何担任总干事，带领慰劳队亲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变前夕，廖仲恺于14日应陈电邀前往惠州，甫抵石龙即遭扣留，旋被囚于石井兵工厂。何香凝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廖仲恺于8月19日脱险后，两人设法离开广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失败以后，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毅然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何香凝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忠实执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国民党改组后，她被选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省妇运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她积极推进妇女群众运动，一面开办劳工妇女日校、夜校及贫民妇女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一面又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出版《妇女之声》旬刊，大力向妇女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民主革命，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同年秋，英帝国主义代理人陈廉伯发动商团武装暴乱，在平乱斗争中，她组织人民救护队，赴广州西关区救护伤员；并筹措经费，抚恤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家属和慰问受伤的工人。

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何香凝闻讯，兼程入京护理。孙中山病危时，她含着眼泪表示："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1)] 孙中山当时紧紧握着她的手，以断续的声音向她道谢。孙中山临终口授遗嘱，她是当时在场的证明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于同年5月回到广州，和廖仲恺一起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6月，为了镇压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阴谋叛乱，她奔走各地，筹募经费，慰问战斗中受伤的士兵。广州沙基"六二三"惨案发生后，她领导广州妇女组织救伤团及慰问队，亲往现场救护和慰问伤员；还组织讲演团，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7月，她专为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女工和工人家属创办了"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日做工，夜学习，既保证了生活，又提高了政治思想。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坚决贯彻三大革命政策的廖仲恺等极端仇恨。这年8月20日，何香凝伴同廖仲恺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反革命暴徒的狙击，廖仲恺当场遇难。何香凝目击一切，悲愤已极，"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2)]，立志要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3)]。

廖仲恺牺牲以后，何香凝更加坚决地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实现孙中山遗志而勤奋工作。她引用廖仲恺的话向大家宣布："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4)] 并明确指出："国内民众，十分之九既是工农，不求工农解放，焉能有巩固之国家，安能把帝国主义之压迫根本推翻？"[(5)] 1925年10月，她发起组成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大力支援农民运动；又创办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积极进行对东征军人的救护工作，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12月，她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以期集中全国妇女力量，致力于民主革命。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后继续担任妇女部部长。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她特别强调知识妇女，“必定要与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联合起来……同立于一条战线之上”，才能求得解放；并指出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6)]，号召妇女努力投身于国民革命工作。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地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何香凝积极地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她组织慰劳队和救护队，随同北伐军出发，先到南昌进行慰问与救护活动；年底转赴汉口，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她同共产党人邓颖超等共同制订了妇女运动的规约，并经过共产党人和大家的努力，把规约中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及男女都有遗产继承权等项，在汉口地区一度付诸实行。此外，她还同宋庆龄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早在北伐战争以前，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就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等。何香凝听到消息，立即冲过重重阻挠找到蒋介石，当面指责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7)] 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何香凝严正地斥责蒋介石的叛变活动，指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她和彭泽民、柳亚子等向右派分子提出强烈抗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之后，何继续坚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明确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共同奋斗，向敌进攻，完成国民革命”[(8)]。她把切实贯彻“扶助农工”政策，视为当时“刻不容缓之要图”，指出：“农工占我国人口十分之八九，其所受之压迫与痛苦独深，如农工之痛苦一日不解除，即革命一日无成功之望。”[(9)] 她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香凝的思想一度处于矛盾状态，但时间很短，她很快就走上同中共携手合作的道路。这期间她先是回到广州，专心创办仲恺农工学校，“思树立解放劳动群众运动之基础”[(10)]

；并曾在1928年亲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以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随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并于1929年离开广州出国，先赴伦敦，后到法国，居留于巴黎郊区的里拉顿岛，天天作画自娱，“亦以备将来为换米之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于同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斥责蒋介石专制政策的罪恶统治，提出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及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并郑重宣布：此后坚决辞去中央委员职守，努力尽国民一份应尽的责任。她和几个不肯为国民党政府效劳的战友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组成了“寒之友社”，经常在一起作画题诗，抒发积愤。她还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将原为办理仲恺农工学校而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11)]。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何香凝兴奋得热泪满衿，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抗日战争。她不顾身体多病，积极向市民宣传抗战；致电海外爱国华侨呼吁援助；亲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给抗日将士发军饷；四处奔走，为十九路军征募军用品和慰问品；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伤兵医院，并经常到医院去进行慰问。

经过“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何香凝更清楚地认识了蒋介石的丑恶面目。1935年，她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如下的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12)] 强烈地鞭挞了蒋的退让妥协行径。

何香凝始终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忠诚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数千人签名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

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13]，要求开展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1937年2月，又同宋庆龄、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14]。同年春，何热诚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了救国会的理事。这年6月，还同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并在所发表的宣言中严正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从此“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5]。1939年3月，何在香港著文明确指出：只有切实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精神，并要不折不扣做去”，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16]。此时，她常对人说自己是“民国十三年的国民党员”，表示她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而不是反动的国民党员。1942年在桂林的一次民主人士集会上，与会者约定每人留言纪念，她写的一句话是：“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17]

何香凝爱国情深，抗战信心坚定不移，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制造分裂的活动。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国，就在汪发出艳电的次日，何香凝立即写文怒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对汪严加惩办。她认为汪投敌后，“敌友之界线既明，抗战之信念益坚”[18]，并指明汪的所谓“防共”，“就是灭华……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请人灭华”，与此同时，她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启发下，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不仅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决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同宋庆龄等联名通电，严厉斥责破坏团结抗战的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9]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何香凝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行为，坚决拒绝到重庆去。1937年冬，她为了避开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从上海迁居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2月离港经海丰登陆，转赴韶关；同年7月，迁居桂林；1944年夏，再转移到平乐县的八步。不论流亡到何处，她总是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并为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及款项。她带着一家妇孺，靠卖画度日，备尝艰苦。尽管如此，她从不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任何馈赠。1942年，蒋介石派人到桂林，送去一百万元支票和请她到重庆去的信，她在信封后面写上“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批语，原封交来人退回[20]。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何香凝从1942年定居桂林起，就经常与李济深、李章达、柳亚子、蔡廷锴、李任仁、陈此生等人接触，要把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起来。1944年移居八步后，仍继续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问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对蒋介石坚持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更加积极地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并和陈此生等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11月，何从八步东下，经梧州抵广州，沿途与有关人士进一步会商，随即着手筹备建立组织的工作。1946年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正式成立。不久，为避开蒋介石的迫害，何香凝随该会中央机构迁至香港。这时，何香凝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她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就不干了。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主促进会的组织。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场所。1947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何香凝在大会开幕的讲演中，宣布奋斗的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并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948年1月，她终于和其他反蒋的国民党员及组织联合一致，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

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她由香港到达北平。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何香凝能作旧体诗，擅长国画，尤工画虎和松、梅。她写诗、作画，署名“双清楼主”。她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她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她的诗词和绘画作品，有相当多的数量反映历史的重大事件。

全国解放以后，何香凝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职。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因病在北京逝世。遗体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侧，与廖仲恺合墓。著作编为《双清文集》下卷。

---

(1) 何香凝：《我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页。

(2) 何香凝：《我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9页。

(3) 《廖夫人香凝女士在粤军追悼廖陈二公大会演说词》，《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三民出版部1925年版，第49页。

(4) 《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演说》，《省港罢工工人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记》（1925年8月27日），《工人之路特号》第65期。

(5) 《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演说》，《省港罢工工人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记》（1925年8月27日），《工人之路特号》，第65期。

(6) 何香凝：《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的生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编《妇女之声汇刊》，1926年版，第20页。

(7) 陈此生：《回忆香凝老人》（稿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8) 《廖夫人训话》，黄埔同学会1926年8月印《黄埔潮周刊》第3期。

(9) 《何香凝提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文华印务局1928年版，第160页。

(10) 《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11) 《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12) 《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1935年），《何香凝诗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13) 《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261页。

(14)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页。

(15) 《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页。

(16) 何香凝：《“三八”我要说的话》，香港《大公报》1939年3月8日。

(17) 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广西日报》1962年11月8日。

(18) 何香凝：《斥汪兆铭》，香港《星岛日报》元旦增刊，1939年1月1日。

(19) 《为皖南事变电斥蒋介石》，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20) 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广西日报》1962年11月8日。

何应钦

李仲明

何应钦，字敬之，1890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生于贵州兴义。父亲何其敏承继祖业，经营一家染织作坊。何应钦九岁入小学，1906年被保送贵阳陆军小学堂，1909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冬，被选送日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旋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何应钦回国至上海，翌年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江苏陆军连长、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回日本继续学习军事，从步兵第五十九联队转入日本士官学校，1916年毕业后回国。何受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延聘帮助训练贵州陆军，被任命为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次年春，何应钦与王文华之妹王文湘结婚后成为贵州“新派”骨干，历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少年贵州会”主任、贵州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等职。他参与贵阳“民九事变”，支持谷正伦部出兵，杀耆老会会长郭重光、省府秘书长熊范舆等人，逼走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1921年春，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袁祖铭派刺客在3月16日刺杀王文华于上海，黔军分裂，何应钦的第五旅缺乏实力，敌不过谷正伦等人的逼迫，以不愿“萁豆相煎”为辞，于1922年底辞职出走云南，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不久，刘显世旧部刘敦吾收买刺客谋刺何应钦，何身中两弹，胸、腿受伤，经抢救脱险，离滇赴沪养伤。

1924年初，孙中山令蒋介石筹办陆军军官学校。蒋经其部下王柏龄推荐，电召何应钦至广州，推荐给孙中山，任命其为大本营军事参议，参加筹建黄埔军校。5月军校开学，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校少将总教官，负责军事教学、训练。何性格内向，对待学生、部下比较谦和，办事严谨、负责，因此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密切，得到蒋的赏

识，很快升任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1925年2月，何应钦率教导团参加东征军右路，在淡水、平山、棉湖等战役中，与陈炯明叛军的洪兆麟、林虎、李易标等部队激战。3月13日棉湖一战，林虎部包围了蒋介石的指挥部，教导一团伤亡惨重。何在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下，亲自督队冲锋，后又得粤军配合夹击，终于击溃七八倍于己的敌军。此仗加深了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信任，何因战功升任党军第一旅旅长。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何升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周恩来兼第一师党代表。10月，何应钦参加指挥第二次东征，攻破惠州。11月，东征军全歼陈炯明叛军，收复东江。

两次东征，何应钦深为蒋介石信赖和器重。1926年1月，蒋介石任命何应钦继己为第一军军长，使何备受鼓舞。何在汕头支持“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抗衡；并支持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解除了第一军内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职务。事后，何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主力入湘，何应钦奉命留粤防闽。9月，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进军福建。10月初进攻永定奏捷，继于松口击溃周荫人部主力，12月进占福州。1927年1月又率部北进入浙，会同由赣入浙的北伐军战胜孙传芳军，2月18日攻下杭州。

1927年初，蒋介石筹谋反共清党，于2月电杭州征询何应钦意见，何回电表示坚决拥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何应钦被列名为国民政府委员。5月何应钦被任命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渡江北进。7月末，孙传芳部反扑，蒋介石亲临徐州督战失利，军心涣散。蒋恼羞成怒，除嫁祸于第十军军长王天培[(1)]，还责怪何应钦指挥无能。何不无怨愤，在桂系及武汉政府方面对蒋施加压力之时保持沉默，使蒋在嫡系部队中处于无人支持的窘境，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布下野。8月下旬，孙传芳军强渡长江，占领龙潭车站。何应钦与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率部阻击，在龙

潭、栖霞一带大战孙传芳军，歼敌三万余人。

1928年1月，蒋介石回南京复职后，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而任何应钦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削去他的总指挥实权。从此，何对蒋加倍小心，事事察言观色，唯命是从。

蒋介石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力图削减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力，引起冯、阎、李等人强烈不满，遂酿成1929年3月至1930年10月连续不断的混战。何应钦听命蒋介石，调兵遣将，与各军事实力派作战，颇得蒋之倚重。1929年3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何被提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春，何出任军政部部长。

在蒋介石接连发动五次“围剿”工农红军的战事中，何应钦在第二、三、四次“围剿”时先后出任湘、鄂、赣、闽四省“剿共”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虽效力甚勤，但不敌红军之战略战术，均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次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十九路军奋勇抗敌，何应钦却多次传达蒋介石电令加以阻挠。他曾面示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2)] 同时迭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战争期间，又有“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和下令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3)] 等密令，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又于1933年初进犯热河，华北局势恶化。蒋介石力图通过和谈妥协的方式缓冲中日矛盾，派何应钦、黄郛去北平周旋。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其时日军扩大侵略，次第侵占喜峰口、秦皇岛、昌黎。4月18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求施“一暂时缓兵之处置”；5

月6日又电南京要求速定妥协方案，谓若“一旦平津既失，大军后撤，财政枯竭，兵怨民困，外援不至，赤匪披猖，将何以善其后”[(4)]。蒋介石回电同意何的看法，指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相机行事，设法缓和华北局势。黄郛与日方频繁接触，拟定停战协议案，何应钦表示同意。此时日军继续进犯，连续侵占密云、唐山等冀东二十二县，平津危急。何应钦惊慌失措，5月25日派北平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诒向日军正式提议停战；31日又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到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5年5月，日本方面以天津《国权报》和《振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亲日分子）被杀事及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驻滦东“非武装区”事进行要挟，于5月29日向何应钦提出“责问”和无理要求，并调动日军入关。6月9日，又向何应钦递交一份“备忘录”，提出五项苛刻要求：（一）取消河北省的国民党党部；（二）撤退在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三）解散若干机关；（四）撤换一批军政官吏；（五）取缔反日团体及活动。何请示行政院长汪精卫后表示承诺。但日方坚持要有书面保证，何执拗不过，经过汪精卫的同意，于7月6日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史称“何梅协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6日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改任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12月，何回南京继任军政部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一片混乱，何应钦支持贺衷寒等人“讨伐”的主张，大骂张学良、杨虎城是“叛逆”，力主“部署兵力对西安形成包围形势，看情况的发展再作决定”[(5)]。他不顾宋美龄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甚至斥宋为“妇道人家”之见，于12月16日出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集结部队开赴潼关，准备进攻西安；又命令空军轰炸渭南、富

平、三原等地。蒋介石在西安闻讯后权衡再三，下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但何称蒋此令是在陕被迫下的，拒不执行；直到18日蒋鼎文携带了蒋的亲笔手令给何，何的讨伐行动才停顿下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何应钦“讨伐”未成，事后一再向蒋表白，取得了蒋的“谅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9日，何应钦应蒋之电召，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抗御日本侵略军。8月20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第四、第十二集团军镇守两广。淞沪会战后，日军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何应钦忧心忡忡。但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推动下，蒋介石坚持对日抗战，何应钦也只能跟蒋走。1938年1月，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何受蒋之命，以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之职，判处不战而退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死刑。此后，何应钦对抗战的消极态度略有转变。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何应钦执行蒋介石反共的方针甚力。1940年，何应钦会同白崇禧于10月19日、12月8日两次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先后发出“皓电”、“齐电”，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一律撤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袭击北撤的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6)

1944年12月，何应钦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曾至贵州指挥独山一战，击退了强弩之末的日军。翌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15日，蒋介石派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20日，何至湖南芷江，与日军在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谈判日军投降事宜。9月8日，何从芷江飞

抵南京前进指挥所，第二天在南京接受冈村宁次递交的降书。何根据蒋介石“以德报怨”的精神，竟让冈村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并无视国际准则的规定，允许每名日俘携带超过规定十五公斤一倍的行李归国。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即加紧准备发动内战。何应钦亦步亦趋，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编写的“剿匪手册”。随着何应钦的位高权重，声望日隆，蒋介石疑惧之心陡生。1946年5月，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而将军事委员会及陆军总司令部撤销，何的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自然被解除。7月，何应钦被派赴美国，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

1948年3月，何应钦由美回国。其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屡遭败北，乃重新起用何应钦，5月任何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期望他能扭转战局。但是蒋并未将军事指挥实权授何，仍是自己直接控制和指挥各个战役。在7月末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中，大量列举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使与会者感到“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和陈诚的泄愤与报复”[(7)]。但何应钦既无指挥实权，更无扭转败局的回天之术，各条战线的国民党军队仍是节节溃败。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代理，但仍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3月，在蒋允准下，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蒋致函嘱其“以中（正）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8)]。何应钦听命于蒋介石的指挥，一面加紧编组军队布防长江，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攻势；一面与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团北上与中共进行谈判，以图通过“和谈”达到“隔江而治”、南北对峙的目的，将来东山再起。何应钦秉承蒋介石“和谈必然先订停战协定”，“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9)]的指令，于4月6日飞往广州，与国民党中常委商定“和谈”的五项原则[(10)]，使国共谈判困难重重，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何应钦随同李宗仁于22日飞往杭州，与蒋介石秘密会议，决定何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指挥国民党

陆海空三军。但解放军攻势凌厉，23日即解放南京，向江南广袤地区节节推进。而此时国民党军队仍不听从何应钦的指挥，或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或起义自救，或各自逃命。何见大势已去，又无实权，乃于5月21日在广州辞行政院长职，8月去台湾。

何应钦到台湾后，已无军政实权。蒋介石于1950年5月任其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此后何应钦虽然很少参与政事，但频繁来往于台湾、日本之间，为蒋介石加强同日本的联系奔波，有时亦到美国和东南亚国家。1955年后，何热衷于推进“道德重整运动”，在台湾兼任该会会长达七年之久。1972年7月，“战略顾问委员会”撤销，何改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鼓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2年12月，何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1987年10月21日，何应钦因心脏衰竭逝世于台北。主要著作有《八年抗战之经过》等。

---

(1) 王天锡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与军长王天培之死》一文中指出，王天培于8月10日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后押往浙江省防指挥部，9月2日深夜被枪杀于杭州拱宸桥下丛冢中。见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1987年版，第204页。

(2) 蔡廷锴著：《蔡廷锴自传》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3) 《何应钦为空军不得轰炸日本海军致蔡廷锴等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

(4)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4年版，上册第303页、下册第990页。

(5)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版，第109、269页。

(6) 李世平等：《周恩来和统一战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7)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109、269页。

(8)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303页、下册第990页。

(9)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72页。

(10) 何应钦等人商定的“和谈”五项原则是：“（一）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政府应即召回代表。（二）对于向以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之精神，应予维持。（三）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约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贺衡夫

徐凯希

贺衡夫，原名良铨，湖北黄冈人。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汉口。祖籍江西，其祖父贺章琫系清末秀才，曾在汉口益昌永盐仓做职员，举家迁居汉阳县黄陵矶。其父贺勉卿任武昌维新当铺保管。贺衡夫在兄姐七人中排行第六，自幼在私塾读书，勤奋好学，被认为是兄弟中最可造就之才。因家境艰难，十六岁时被送到汉口荣昌油行做学徒，勤奋机敏，得到店主和经理的赏识。三年学徒期满，升为跑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汉口市场遭清军焚掠，荣昌油行停业。贺衡夫与家人前往汉阳蒲潭避乱。同年12月，贺经友人介绍，向沙市某钱铺息借二千四百串钱，购淮盐五十引，又向荣昌油行赊购所存食油，运至黄陵矶，由摆摊而租店，牌名衡昌仁记油盐零售店。兄弟同心协力，生意日渐兴隆。

1912年，贺氏兄弟六人合股，在汉口花楼正街开设衡昌义记油盐零售店。翌年又在老河口设立分庄，专门收购桐油、麻油和木油，下运汉口。几年中经营顺利，资本日增，扩大经营规模，改名为衡昌油行，店前仍零售油盐，店后则专营桐油生意。另在汉阳分设油库和炼油工厂。贺衡夫总揽全盘，其四哥五哥分管仓库和财务。另聘朱显庭、熊魁庭先后为经理，办理具体购销业务。1916年，贺收歇黄陵矶分店，抽回资本，相继在汉口开设分店两处，各设经理，资金由衡昌油行账房统为调度。衡昌油行营业从此蒸蒸日上，很快发展为武汉桐油贸易行业首屈一指的油行。贺本人也因而成为武汉工商界的知名人物。

汉口是国内桐油输出的重要集散地，外商利用独占检验仪器，每每借口次货任意杀价，常使中国油商、油农蒙受损失。贺衡夫不惜代价，从某洋行拍卖物品中，购得一架报废折光镜。他在与德商争执桐油等级时，又设法套出检验方法和规格标准。贺衡夫借担任汉口油行同业公会理事长之便，乃将其秘密遍告同业，以免再吃暗亏。又购置折光镜多部，寄往各桐油产地。

汉口市场经营桐油出口贸易的多为旧式商人，缺乏专业知识。贺衡夫结识聚兴诚银行职员李锐，发现李才智过人，精通外语，熟悉外贸业务，有意扶植他。当李锐另组义瑞行，准备代施美洋行收购桐油，而又苦于资金短绌之际，贺慨然从衡昌油行借出桐油九百吨，言明待李收到施美货款后再行归还[(1)]。义瑞行从此奠定在汉口桐油市场上的地位，最终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桐油大王”。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各行业工人相继成立工会，纷纷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工商业主则以工人的某些要求过高而不愿接受，劳资纠纷不断增多。11月，经省总工会倡议，相继成立省、市劳资仲裁委员会。贺衡夫作为汉口总商会代表，被推定为委员[(2)]。劳资仲裁委员会既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又注意纠正某些基层工会过高的要求和自由行动，为维持社会安定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末，武汉财政当局宣布开征“桐油统税”，各有关行庄共同具名请愿，在汉口总商会帮助下，经贺衡夫、朱有孚等多方奔走，此事方才作罢。

20年代末，新军阀混战不休，贺衡夫看到油行业务带有投机性，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过深。他于1929年将衡昌油行与老河口分庄收歇，把资产以租让方式交给职工合股经营，改名为亦昌油行，与贺家脱离关系。另将汉口三家油盐零售店合为一家，改名乾昌。贺则将全部精力和资金转向工矿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先后担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裕大华纺织公司、武汉第一纱厂、上海新生纱厂、大冶源华煤矿公司、山东大兴煤矿公司以及汉口商业银行、永利银行、汉阳县银行的董事或常务董事，并兼任中华大学校董。

从1923年起，贺衡夫历任汉口总商会会董及委员。1931年2月，汉口总商会依令改组为汉口市商会，贺当选为主席。4月，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汉，召见贺衡夫等工商界人士。贺当面请求免征“桐油统税”，代为转交汉口油帮公会的呼吁书。宋回南京后批复予以免征[(3)]。

同年7月，汉口遭遇特大洪水袭击，全市淹没殆尽。各界成立急赈会，贺被推为会长，积极参加和主持赈济难民工作。不久，湖北全省水灾急赈会成立，汉口急赈会并入，他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筹赈股主任，负责筹措经费、发放救济金，施粥和收容难民，不辞劳瘁。汉口银行界所允三十万元借款未交付前，贺先自行垫借五万元，做赈灾临时急需。为筹集赈款物资，贺衡夫以市商会名义首先向各面粉厂、油厂借到麻袋十万条，继而又向汉口各同业公会募捐一百余万元，交由水灾急赈会应用。他又通电全国及海外吁请救助，相继得到上海工商界运来面粉一万袋、湖北旅沪同乡会汇款一万元，以及其他捐款捐物。不久，贺衡夫应美国驻汉领事邀请，前往领署商谈灾情及救济事宜。美领事表示愿意尽量协助，很快收到美国红十字会汇助美金十万元，以为武汉急赈之用。

大水过后，汉口市场不振，进出口贸易停滞，商业资金周转不灵。贺衡夫一面商请银行团放宽贷款办法，一面提出私人存款二十万两，交钱业公会投入各钱庄转贷放出，力促商业市场恢复生气。贺衡夫还推广以工代赈方法，修补武汉及附近县乡防洪大堤。筑堤救灾，两相得宜。为了收容水灾中失去父母的儿童，贺衡夫与陈经畲共同创办汉口孤儿院，贺任董事长，陈为院长。一面施以文化教育，一面教以生产技术，大批无家可归的儿童，得到救济和帮助。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查团于1932年来到汉口，分别约见日本侨民和各界代表。贺衡夫代表商界向调查团陈述意见，驳斥日方“九一八”是中国人宣传反日、对日经济绝交所惹起来的荒谬宣传。为端正视听，他又将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呈递国联调查团。1933年，

他主持汉口商会捐款，订购高射炮两尊、装甲车二辆，送交汉口地方部队。1936年，又发起捐款二十九万余元，转解中国航空协会购买飞机两架，命名为汉口市一号和二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贺衡夫代理汉口市商会主席，主持发动各业捐输，慰劳前方抗敌将士。通电全国各地商会，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他动员汉口商界认购救国公债一百五十万元，如期交清，并亲自参加查禁仇货运动。为了帮助流入武汉三镇的大批难民，贺以汉口慈善会会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责任会长身份，联合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大规模救济活动，积极筹募捐款。同时，在红十字会汉口分会内，分设遣送、医疗、掩埋、救济、财务各组，由工商各界人士担任组长，计收容安置难民逾万人。

1938年武汉撤守前夕，贺衡夫将大量现款、粮食，通过外国教会转交未撤走的慈善团体，以继续救济难民。撤离武汉当天，突然有一伙人在凌晨找到贺家，转告有人劝他留在武汉，希望过后能出面维持商务。贺表示："决到四川，不问后果。"[(4)] 当即乘机飞渝。1939年，他获悉武汉红十字会经费发生困难，亲自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自捐和劝募巨款，通过汉口大孚银行留守处襄理龚献利汇至汉口。

抗战期间，贺衡夫在重庆担任汉口市商会驻渝办事处主任、湖北省商会联合会监事等职，还兼任重庆庆华颜料公司董事长。1944年，贺衡夫代表湖北全省商联会参加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大会。

1945年抗战胜利，贺衡夫回到武汉，再次被推选为汉口市商会理事长。1947年10月，为融通市场资金，贺参与发起成立"汉口市银行"，兼任董事。该行虽系官商合办，但商股约占九成，主要经营存放款、汇兑和调剂资本，并代理市库。同时利用拆放同业业务，获取"拆息"收入。1948年，贺衡夫被湖北工商界推选为出席"国大"的代表。他自喻"是个凑数的"[(5)]，不及两周，即借故由南京返回武汉。

贺衡夫在汉经商数十年，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立志不做官，不入党。在主持和参加商会活动期间，他注意维护广大工商业者的权益，深得武汉工商各界的信赖。1949年冬，武汉临近解放，第一纱厂负责人将全部存纱暗中调往香港。上千名持有纱单的债权人闻讯哗然，纷纷前往索债，酿成纠纷。持单人请贺出面主持公道，并做担保，贺慨然应诺。不料，该厂总经理程某脱身后便去了香港。持单人相约找到贺家，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贺扶病慷慨陈词，表示决不推卸担保的责任，拿出自家的契约股票作抵。在场债主受到感动，纷纷离去，事态得以逐渐平息。不久，第一纱厂因负责人逃遁而停工，六千余名工人生活无法维持，遂派代表找贺衡夫设法解决。贺请代表留在家中，自己前往市政府，请求予以协助。当局表示无法解决，贺衡夫便以私人关系筹款一万银元，暂时解决工人生活问题。

同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撤离武汉前夕，准备拆迁工厂，爆破重要设施，贺衡夫出面在汉口天津路家中，宴请省内知名耆老张难先、李书城以及工商各界代表五十余人，就如何保全武汉问题，共同商议对策，决定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着手进行“反撤迁、反破坏”和迎接解放的工作。“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获悉，视贺为“亲共”分子。5月8日深夜，数十名武装暴徒突然破门搜捕，满屋翻抄，刑逼其家人说出贺的行踪，其子在躲避中跌成骨折。暴徒们未抓到人，便将细软财物搜刮一空离去。次日，张难先、陈经畲往见白崇禧，就贺家所发生的事进行质问，白竟推说“毫无所知”，并警告：“贺衡夫必须即日离开武汉，否则后果自负。”[(6)] 贺被迫于当晚乘车南下，避居香港。

武汉解放后，1950年贺衡夫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他从香港报纸上得知此事，心情激动。旋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武汉市委统战部派员前往香港与他联系，贺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毅然回国。先后担任武汉市人民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财经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

主任委员，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50年至1951年，贺衡夫主持武汉市工商联筹备工作，动员工商各界购销胜利折实公债，捐助社会救济经费旧币三十五亿元，为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做了许多工作。抗美援朝中，他发动武汉各界捐献慰问金，超额捐献战斗机四十四架。1952年“五反”运动中，贺因冤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获释，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6年任武汉市第一商业局顾问。

1968年1月1日，贺衡夫因病在汉口去世。

---

(1) 李景文：《桐油买办商义瑞行的经营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6页。

(2)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武汉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3) 余怀远：《汉口桐油业杂谈》，萧志华主编《汉口忆旧》（《武汉文史资料》总65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6年版，第134—135页。

(4) 李兴煜主编：《武汉人物选录》（《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增刊），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版，第308页。

(5) 陈义伯：《武汉工商界巨子贺衡夫的一生》，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第30辑，1987年版，第72页。

(6) 陈义伯：《武汉工商界巨子贺衡夫的一生》，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第30辑，1987年版，第72页。

贺耀组

刘世善

贺耀组，号贵严，1889年5月8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九）生，湖南宁乡人。父贺穆生以幕僚及教书为业，家境清贫。贺耀组童年随族兄伴读数载。1905年湖南编练新军，贺应招入长沙第二十五混成协，在第四十九标三营左队当兵。其后被选入湖南陆军小学学习。1909年毕业后又被送到武昌陆军中学，继而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1911年被选送日本振武学校。同年7月，他经刘揆一介绍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贺耀组回到上海，旋去苏州，在江苏起义军中工作，并曾至湖北在曾继梧炮兵指挥部当联络员。1914年夏，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入东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一期，与何应钦、朱绍良等同学，至1916年毕业回国。

贺耀组回国后至湖南，于1917年8月入湘军赵恒惕第一师，任第一旅第一团中校团附。9月，北京政府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入湘任督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宣告独立”附傅。赵恒惕派参谋长蒋锄欧传达密令，命第一团开往衡山进攻林部。但团长梅焯敏不听指挥，率部返回长沙，少数队伍奔投林修梅部。当第一团处于分裂危急之时，贺耀组在所部连长欧冠、郑鸿海等拥戴下接替团长职，仍驻衡山石湾听命于赵，等待广东“护法军”的支援。不久，湘军总司令程潜奉广东护法军政府之命，联络桂军谭浩明部，指挥湘军从湘南进攻，以赵恒惕任前敌总指挥，合力驱逐傅良佐出湘，并向湖北挺进。1918年2月初，贺耀组受命督率第三营欧冠部，与鄂军第一旅激战，因兵力众寡悬殊而败，官兵伤亡过半，乃被迫撤回长沙。3月，北京政府派张敬尧入湘，担任督军兼省长，桂军谭浩明撤回广西，程潜率湘军退

零陵、郴州整训，贺亦率部退驻永兴，1920年接替宋鹤庚任第一旅旅长。同年6月，护法军驱走张敬尧。

湖南驱张之后，全省军权操在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手中，不久赵又任省长，于1921年公布“省宪法”。随后以“援鄂自治”为名派兵进攻湖北，贺耀组奉命率第一旅参战，但被直军吴佩孚部阻击，败退回湘。1923年7月，孙中山派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入湘讨伐赵恒惕，赵组“护宪军”迎战，贺耀组与唐生智、叶开鑫等旅，在吴佩孚直系军队的支持下击败谭军。嗣后，赵恒惕将所部扩编成四个师，贺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驻兵湘西常德。

1926年春，唐生智在湖南人民掀起的讨吴驱赵运动中，于3月将赵恒惕驱走，在长沙任代理省长，将赵部第二师师长刘铦诱捕，并免第三师师长叶开鑫职，贺耀组驻常德观望。4月，叶开鑫得吴佩孚支持任“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反唐，唐生智部由长沙退守衡阳。6月，贺趁机会同刘铦的残部组织“护湘军”与叶部相呼应，任前敌总指挥，由宁乡向湘乡进攻。时广东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唐生智接受委任，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与北伐军配合向叶开鑫部等大举反攻。

北伐军声势浩大，湘军叶开鑫部在长沙败退，贺耀组部两个团及叶部之一部在湘潭附近被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包围缴械。贺乃率部退回常德，随后又退到石门、澧州。经同乡中共党员谢觉哉的动员，他托毛炳文与第七军联系，请准其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独立第二师师长，将所部六个旅缩编成四个旅。贺耀组立即率部北伐，从南县经岳阳、修水，与北伐军第二、六两军配合会攻江西。10月，贺奉命调往赣北前线，沿庐山牯岭攻占马回岭，向孙传芳部后方重镇九江进攻，在友军的配合下将敌周凤岐部击败，11月4日攻克九江。时蒋介石顾忌九江城的外国领事及洋行，下令北伐军不许入城。但在当时士气锐盛之下，贺率部入九江追敌，得军械、物资甚夥，并率兵力一个团占领九江英租界，随任九江卫戍司令。江西底定后，北伐军分江左、江右两路，沿长江东下进攻皖、苏，贺部隶属江右军程潜部，任

第三纵队司令，进击兰陵、太平、桃花镇直至南京雨花台。

1927年3月，英国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侵害”，纠合日、法、意等国军舰炮击南京。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任命贺耀组为第四十军军长，所部扩编成三旅九团，与何应钦、鲁涤平、程潜共同负责南京治安，受到蒋的信任。“四一二”政变后，贺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政务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当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六两军途经安徽开往武汉，蒋曾命贺部追逼，他未认真执行蒋命。蒋介石8月下野后不久又复出，贺观察时局，表示全力支持蒋介石复任总司令职。1928年1月，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

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挥师北上讨伐奉张。3月在编组第一集团军时，任命贺耀组为第三纵队总指挥，旋改任第三军团总指挥，辖第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及本部第四十军，由鲁西会同第一、二两军团进攻山东。贺率部在鱼台、济宁两大战役中告捷，于4月底攻入济南。此时济南商埠街已为日军侵占，不准北伐军进入。5月初，日军悍然炮击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方诬指贺耀组为“支那暴将”，威逼蒋介石予以严惩。蒋忍辱退让，下令免去贺的第三军团总指挥及南京卫戍司令等职。11月，贺改任训练总监部副总监。

1929年4月，贺耀组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未到职。5月任代理国民政府参军长，翌年2月，贺被正式任命为参军长。中原大战时，调任徐州行营主任。他助蒋招纳韩复榘、孙连仲、石友三诸部，对蒋战败冯、阎作用颇大。1931年11月，贺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甘宁青宣慰使、甘肃省政府委员。翌年4月，他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代行部务。贺向蒋建议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关系，为蒋采纳。1934年11月至1937年春，他任驻土耳其公使。其间，曾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回国后，于1937年4月代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建设厅长，

6月兼西安行营副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农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设办事处于兰州，由谢觉哉任办事处主任。谢与贺耀组有旧谊，又是同乡，两人常有会晤。谢向贺介绍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加之贺的夫人倪斐君很富抗日热忱，冲出家门投入抗日爱国活动，时常向其讲述中共抗日主张的正确，对贺的思想开始产生影响。1938年初，贺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晋加陆军上将军衔，不久随蒋介石到了重庆。1938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42年秋又兼国家总动员会秘书长，负责防止走私和统制物资，成为蒋介石身边亲信的属僚之一。

贺耀组长期跟随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受到重用。但他的夫人倪斐君不仅热忱抗日，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委员，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红十字会工作，并且进而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贺、倪两人在家里常为政治上的歧见发生争论。贺耀组天长日久终于接受了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许多细微的影响；加之受到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鼓舞，虽然担任政职仍忠于蒋介石及国民党，但却开始改变了过去的恐共仇共心理，对中共的抗日主张亦渐渐地表示同情和支持。1942年11月，一架苏联运输机载运药物、纸张飞往延安途中被扣，当地军事机关电蒋请示，贺未经蒋同意即复电放行。对于抗日爱国的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他指示军委会的黄锡恭发给证明放行；其他被扣押的青年亦多得他的营救。蒋介石得知后十分气恼，下令撤去其侍从室职务，于是年12月改派贺为重庆市市长，从此开始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在其重庆市长任内，常遭蒋无理训斥。一天外交部门前，有附近老百姓的猪在觅食，蒋在车内瞥见，随即召见贺拍案詈骂。事后，贺虽仍就其职，但与蒋的关系日趋恶化。他对其亲信说，蒋行同流氓，统治中国实为四亿人民之羞。1945年5月，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到

重庆，贺耀组不顾蒋的猜忌，在私宅范庄设宴招待，向毛面致崇敬之意。1945年11月，贺耀组辞卸重庆市长职务，移居上海。之后在南京同王芃生等组织新亚洲协会，出版《新亚洲月刊》，常分析亚洲的国际形势，认为中国应在亚洲作美苏两国的桥梁。他对蒋介石蓄意制造内战深为不满，决心不与为伍，乃筹办太一实业公司从事商业。此后，贺耀组虽在1947年5月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均属挂名虚职。他赞同人民解放事业，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频繁接触。

1949年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疯狂镇压革命人士，贺耀组处境甚危，乃潜赴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领导成员之一。8月在港与黄绍竑等44人通电起义，不久绕道前往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并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1961年7月16日，贺耀组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谢德铭：《爱国将领贺耀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第48辑，湖南文史杂志社1992年12月版，第153—166页。

《人大代表贺贵严逝世》，《光明日报》1961年7月17日第1版。

［日］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一），明立印刷株式会社1935年2月再版，第75页。

贺衷寒

刘敬坤

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巴陵（今岳阳市）人，1900年1月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生。其父为地方士绅，对衷寒幼年读书督促甚严。贺入塾读完“四书”、“五经”后，即阅读诸子书及《资治通鉴》。

1916年，贺衷寒与兄贺醒汉至武昌，入湖南旅鄂中学就读，获得湘省公费。时袁世凯帝制自为，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贺在校发表演说，痛斥袁的倒行逆施与卖国行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贺被推为武汉学生会代表，于1920年冬参加董用威（必武）、包惠僧等在武汉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后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张国焘率领的代表团，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同年底，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由季诺维耶夫主持。在大会前后，贺对苏俄进行了参观考察，看到苏俄当时的残破景象，认为苏俄的政治虽比中国进步，但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提出中国革命不应采取苏俄的方式来进行，并公开发表此种言论。张国焘将贺开除出社会主义青年团。

贺衷寒自苏俄回国后，先在武昌一中学任教，曾参加恽代英创办的共存社，旋以两人意见不合即行退出；继后办理人民通讯社，发表反对军阀与鼓吹革命文章，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贺至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抨击时政，联络失学失业青年举行示威，颇得社会各界的同情与舆论的支持。1923年，贺衷寒受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并兼长沙青年社教部主任，继续宣传革命与鼓吹爱国。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因领导长沙工人罢工，遭湖南督军赵恒惕杀害，贺衷寒撰文《黄、庞案之真相》对赵进行抨击。贺被赵恒惕下令逮捕系

狱三月，后经两位省议员具保获释。

贺衷寒出狱回乡后，于1924年去广州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被录取。贺衷寒入学后，即集体加入国民党。贺在同学中表现出很有组织能力，受到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邵元冲与校长蒋介石的重视。同年11月，贺毕业后，留在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后调任党军炮兵第一营党代表，兼第一连党代表；后又调任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后，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

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成立，蒋先云、徐向前、贺衷寒、陈赓及教职员金佛庄、胡公冕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贺任该会秘书。但贺衷寒本来就不赞成采取苏俄方式进行中国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煽动和拉拢下，不断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发生龃龉乃至冲突。同年4月，在戴季陶与王柏龄支持下，贺衷寒与陈诚、缪斌等人在梅县筹组中山主义学会，宣扬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理论，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9月，贺衷寒等主编《国民革命》周刊出版，成为广州中山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12月29日，中山主义学会更名孙文主义学会，在广州补行成立典礼，选出王柏龄、陈诚及贺衷寒、缪斌、胡宗南等为主要负责人，公开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下令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同时解散，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人筹备成立黄埔同学会，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

1926年5月，贺衷寒被选到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贺学习成绩优异，悉心研究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认为值得中国学习。贺自称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像苏联那样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认为通过国家权力，在三民主义范围内即可实现社会主义。贺曾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邓文仪、萧赞育、康泽、郑介民等人发起成立国民党旅莫斯科支部，遭到校方当局制止，遂组织孙文主义

学会莫斯科分会进行活动。

1928年1月，贺衷寒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第七期学生总队长；3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和黄埔同学会书记。

1928年9月，贺衷寒与邓文仪约中央通讯社副主任聂绀弩等人组织“党基社”，出版《党基》半月刊，以“阐明三民主义，批驳共产主义，加强国民党理论基础”为宗旨，贺任社长，聂任主编。蒋介石此时正加紧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圈定和指派方式产生代表。聂绀弩在《党基》上撰文为此种专断的代表产生办法辩白，遭到许多国民党内人士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党基》只出版四期即难以为继。贺衷寒为此受到蒋介石严厉申斥，赶忙撰写《改组派之检讨》、《汪精卫理论的批判》等文章，以取悦于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的不满，蒋介石于1929年春派贺衷寒赴日本明治大学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

此后，蒋介石在战胜国民党内各派对抗力量后，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贺衷寒奉召自日本回国，至南昌任“剿匪”总司令部宣传处长，兼党政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剿总”宣传处改组为训练总监部“剿匪”军队政治处，贺仍任处长。此时，陆海军总司令部侍从室侍从秘书邓文仪在该室组织秘密小组约贺衷寒参加，并由贺为之取名“力行社”。同年12月，贺复兼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1932年2月，贺又先后调任鄂、豫、皖三省“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及其后改组的武昌行营政治训练处处长，并在南昌创办《扫荡报》；1933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厅政治训练处处长；1935年4月，任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兼军委会政训班主任。贺衷寒任职政工工作长达三四年之久，网罗政工人员达数万人之多，将他们派到部队及各军事学校设立政训处，或任各军事机关派驻政工人员，形成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系

统。

1933年，贺衷寒把国民党中先后留苏的学生二百余人组成留俄同学会，以蒋介石为名誉会长，贺任理事长，把许多留苏学生都拉入到军队的党务和政训工作中，以加强政工系统。

贺衷寒秉蒋介石的意旨，联络康泽、滕杰、酆悌、萧赞育、周复、桂永清、郑介民等人，曾于1932年3月在南京组建半公开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或“中华复兴社”），以“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为宗旨，由蒋介石任社长，贺衷寒等九人被推选为总社干事；蒋介石指定贺衷寒、滕杰、酆悌三人为常务干事。复兴社在全国重要城市先后建立分社，积极发展社员；同时，扩大中央军校毕业调查科为调查处，作为复兴社的掩护和活动机关；以中央军校、陆军大学为活动基地，建立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以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为活动基地，建立另一个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根据蒋介石提出的保密要求，贺衷寒提出把“力行社”作为复兴社的内层组织；其成员须由复兴社社员中提升，并须经蒋介石批准。复兴社总社设有组织、宣传、训练及特务四个处，但总社只能管前面三个处；特务处是由处长戴笠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一个独立机构，其一切计划、行动以及经费，贺衷寒等总社负责人均“不得与闻”。贺衷寒对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建立与发展，对该社宣传理论形成，所起的作用甚大，并曾任复兴社第三任书记长。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

与此同时，贺衷寒积极参与组建“中国文化学会”，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的最高准则，标榜以中国固有文化为立足点，去吸收各国进步文化，用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后，贺衷寒撰写《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对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诠释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发奋谓之耻。”贺又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称：“一个国家的统一，

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提出：“要求中国军事的统一，便要做到军权、军令和军政的统一；要求政治上的统一，便是要做到政权、政令和政制的统一。”贺衷寒的结论是，统一的力量来源于信仰，而信仰在于主义，在于领袖，因此，“只有信仰领袖，才能达到统一”。贺衷寒认为，政训工作的重心是统一，统一的重心是主义，主义的重心是领袖。贺衷寒的这套三“重心”理论，后来演变为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三个“一个”的口号；他也因此被称为是黄埔系的理论家。

贺衷寒为了使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化与规范化，精心制定了《政工典范》，提出政训工作三项原则：“巩固革命力量，取消敌对势力，整理同情力量。”要求政工人员除进行反共宣传外，不论在何种部队，均须侦察和监视各部队长；并规定各部队的政训处在其驻防地区，可以实行军事管制，清查“异党”活动，得用“军法从事”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纠纷。此外，政训处还可以办理各种训练班训练干部，并得自设电台。《政工典范》规定，军事学校的政训处在学生队中派出指导员。凡指导员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纯（即不信奉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学生，政训处得通过学校予以禁闭，或开除出校，或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贺衷寒与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训练处商定，由蒋介石于1933年3月命令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在国立与省立大学以及省立中学高中部实行军训制度，每周设军训课两学时。军训教官除对学生进行军事教学与训练外，并侦察学生的思想言论与行动。时国难日亟，贺衷寒策划由军委会与训练总监部咨请行政院转饬教育部，于1934年1月通令全国公、私立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须于当年4月集中省城，实行军训三个月。学生在受训期间，须一律参加中华民族复兴社。

贺衷寒虽在黄埔系中甚有人望，但蒋介石认为贺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直不让贺掌握军队，只许其做政训工作。1935年夏，贺衷寒

任峨眉训练团政治组主任；同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新闻检查处处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贺衷寒与复兴社第四任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员两千余人开会，通过“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决议，并在南京进行掌握军队的活动，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责“讨逆”。贺并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主要社员名单呈报给何应钦，要求由贺负责组建三个师的兵力；同时发动一百七十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伐张学良。贺与邓文仪在南京收编失业的军校毕业生三百余人，组成“讨逆赴难团”，提出“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宋美龄了解武力讨伐内情，明白对贺、邓二人说：“这是一个阴谋。”但贺仍继续活动不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得知贺衷寒在事变期间的一切行动，认为贺居心叵测，在杭州当面怒斥贺衷寒说：“我还没有死，你就另找人投靠了。”立即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贺衷寒于1937年初出版《一得集》，以“救国”、“统一”、“复兴民族”为辞，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示对蒋的忠诚。

1937年3月，国民党派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三人为代表，在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周恩来3月8日提出提案十五条，贺对周的提案擅自加以修改，改“承认”为“服从”，改“陕甘宁行政区”为“陕甘宁地方行政区”，改“服从统一指挥”为“服从一切命令”；取消提案中的“民选制度”，裁减红军定员为每师一万人，共三万人。3月12日，中共中央电知周恩来称，“贺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完全不能承认”；周恩来也认为“贺衷寒横生枝节”。3月15日，张冲通知周恩来，贺衷寒修改案作废。国共两党西安谈判至此结束，贺衷寒亦自此退出谈判。6月，贺衷寒被军委会派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贺衷寒刚行至德国，即奉命返国，回任军委会政训处长。同年8月，军委会对内改组为大本营，对外仍称军委会，陈立夫任大本营第六部部长，贺任第六部第一组组长，主

管军队政训工作。1938年1月，军委会再次改组，将原军委会第六部、军委会政训处、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训练处合组为政治部，贺衷寒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主管部队政训工作。三民主义青年团7月在武汉成立时，中华民族复兴社成员多半转入三青团，贺衷寒任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及临时常务干事会干事。10月，贺辞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闲居在重庆家中读书习字。1939年夏，贺奉蒋介石之命，任军委会西北慰问团团长，曾赴延安与毛泽东晤谈。1942年2月贺被任命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人力组主任，9月改署社会部劳动局局长，1943年2月当选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并任人事甄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8月日本投降后，贺衷寒被派为“还都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对抗战时数十万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复员安排。1946年9月，贺当选为三青团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及常务干事。1947年5月任社会部政务次长，6月赴西北宣慰与调解胡宗南与马鸿逵、马步芳之间的关系。同年7月，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主任。1949年1月，辞去社会部政务次长职，迁居台湾。

贺衷寒去台湾后，于1950年3月任台湾“交通部长”，提出资金与劳力作最有利的运行与发挥，使各项事业的经营企业化，逐渐转亏为盈，免除再拨公款补助。1954年5月，贺辞去“交通部长”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2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9年3月当选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1971年贺退休。1972年5月10日，因腹膜炎病逝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洪深

查建瑜

洪深，字伯骏，号浅哉，我国著名的戏剧家。1894年12月31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五）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的一个官僚世家。1900年入塾读书。1906年至1907年先后在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院读书。1912年下半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实科。他从小酷爱戏剧，进清华后曾多次参加“新戏”的演出，并从事文艺创作。

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流行的话剧大都是即兴演出，并无固定台词。1915年，洪深年二十一岁，开始创作剧本，写了《卖梨人》和《贫民惨剧》，以后长期从事话剧活动，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1916年夏天，洪深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想当个实业家来拯救中国，但同时，爱好仍驱使他学了一些文学与戏剧课程。当时，美国正在上演熊适逸所译的京剧《王宝钏》，但译本有损原著，而且就是原著故事的本身，也足以启外人对华的轻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洪深，看后很苦闷，极想改变美国舆论对中国人民的观感。是年底，他组织了话剧《花木兰》的演出，受到华侨和美国人民的欢迎。《王宝钏》事件使洪深从反面领悟到戏剧能唤起民族觉醒，他决心改学戏剧。

1919年秋，洪深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同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获硕士学位。是年，他以中国题材用英文创作了话剧《牛郎织女》、《虹》，并积极组织同学到美国各

地作巡回演出。他的老师、美国著名戏剧学家贝克教授十分欣赏他的组织才能和创作。

1920年至1921年，洪深参加职业剧团，在纽约附近各城市巡回演出。这时，为了筹款救济中国华北的水灾，他与张彭春合写英文剧《木兰从军》，在纽约多次演出，自任导演和演员。

1922年春，洪深回国，任职商界，先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材料总管理处任理事，兼任总经理简照南的私人英文秘书。嗣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英文教授。是年冬，他采用了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的剧本形式，写成反封建反内战的舞台剧《赵阎王》。把20年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黑暗集中在赵阎王身上，塑造了一个旧社会逼人为恶的典型。这时，洪深还曾为中国影片制造股份公司代拟征求影片、剧本的广告，文中规定诲淫、诲盗、神怪、表情迂腐等几条不予录取，反映了他急于改进社会风气的思想。

1923年，经欧阳予倩、汪仲贤介绍，洪深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并和欧阳予倩、应云卫等主持该社工作。是年9月，他在“戏剧协社”第一次导演《泼妇》（欧阳予倩编剧）和《终身大事》（胡适编剧）。当时，“戏剧协社”仅有两名女演员，有些女角由男角扮演。洪深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男演男，女演女。他把《泼妇》和《终身大事》两剧同台先后演出。前者男扮女装，后者男女合演，让观众去鉴别。观众看了男女合演的《终身大事》，觉得自然得体，拍手叫好，对男扮女装的《泼妇》则感到可笑。通过这次演出，话剧舞台上男扮女装的积习结束了。

1924年初，洪深将英国王尔德著《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并自任导演。王尔德原著对于英国资产阶级的伪善作了强烈的讽刺，洪改编时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并使之更适合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4月，“戏剧协社”在上海公演《少奶奶的扇

子》。这次演出建立了严肃认真的话剧舞台作风（包括导演以及舞台艺术各个方面），树立了话剧舞台演出的楷模，表演也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许多剧团争相学习，洪深因此成名。同年，他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导，并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自1924年至1937年，洪深共编导了《早生贵子》、《冯大少爷》、《爱情与黄金》、《风雨同舟》、《夜长梦多》等十余部电影，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排演《苏州夜话》和《名优之死》。这两出戏都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现实，洪深观后思想受到启发，曾对马彦祥说：“我演出《少奶奶的扇子》，观众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田汉演出的戏，观众主要是知识青年，我觉得他这条路走对了。”不久他就参加了“南国社”。从此，洪深和田汉在戏剧上一直是很密切的合作者。

1928年，洪深在明星电影公司编导《女书记》、《一脚踢出去》等无声片，并积极致力于电影事业的革新工作。他曾赴美买回第一部有声电影机，为我国首次引进了好莱坞有声电影技术，并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剧本《歌女红牡丹》。

1929年，洪深结识了夏衍，同中共地下组织发生了联系，思想开始靠拢共产党。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由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脱离革命，而洪深则在党的影响下从事进步的戏剧和电影活动。是年，美国侮华影片《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在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演，洪深看后，非常气愤，决心制止这部影片演出。他与田汉商议后，找好了辩护律师，带领三名南国社的社员到了大光明影院。他在那里上台演讲，激发了观众的民族义愤，观众纷纷退票，剧场秩序大乱。大光明洋经理高水清扭住洪深进行殴辱，他毫不屈服。后来，在上海舆论界的一致支持下，法院不得不开庭公审高水清。“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的新闻，一时传遍上海。他这种无畏的爱国行动，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3月，洪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任英文秘书，从事进步文艺运动。4月，洪深和马彦祥合译和改编德国雷马克著名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由艺术剧社在上海租界公演，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当局的刁难和镇压。4月29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派出百余名武装警察包围了艺术剧社，捕去社员多人，其中四人惨遭杀害。

同年8月1日，洪深与田汉、郑君里等发起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改组为“左翼剧作者联盟”），洪任总书记。

1931年，洪深到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33年，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反帝大同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洪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洪深到青岛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在这里写了十几个宣传抗日的优秀独幕剧，如《走私》、《女奴》、《劫后桃花》、《黑旋风》等，对宣传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洪深因不断做抗日宣传，引起了青岛日本人的注意，不得已仍回上海，与夏衍等合办《光明》半月刊，洪任发行人及主编。这时期，他写了许多有关戏剧的论文，后收入《洪深戏剧论文集》，他又写成《电影戏剧表演术》、《现代戏剧导演》、《电影术语词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等著作。

1935年，田汉等在南京成立“中国舞台协会”，洪深应邀从上海专程到南京导演了《械斗》（田汉、马彦祥合编）、《卢沟桥》（田汉编剧）两出戏。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洪深参加了《保卫卢沟桥》活报剧的创作。剧本歌颂了英勇抗战的士兵和人民，洋溢着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战斗激情，8月7日在上海正式演出，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不久，“上海文化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夏衍等人提议成立上海救亡演剧队，洪深积极响应，立即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参加“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队员有冼星海等

十余人。他们从南京到徐州，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徐州的西乡与北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五个剧，用以激发观众的抗日热情。一周后，洪深率队赴开封、洛阳演出，观众逾数万人。后经郑州抵汉口，一路上，没有活动经费，衣食住行全靠自理。11月12日，《飞将军》（洪深编剧）与《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剧）在汉口上演，《飞将军》批判了对抗战胜利信心不足的失败主义情绪，在国民党空军中引起了轰动，不少空军飞行员观剧后紧握洪深的手说："洪导演，你注意看报吧！要是有这么一条消息：'空军中尉×××击落日寇飞机一架……'那就是你们这出戏给我的力量。"(1)

由于国共合作抗日，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洪深被任为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一科科长，负责戏剧、音乐方面的宣传工作。当时洪深正在湖北随县一带农村演出，得讯后便奔赴武汉就职。

洪深在武汉与田汉一起，将各地"救亡演剧队"召回武汉，正式列入第三厅编制，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分配到十个战区的前线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在部队和民间进行演出，唤醒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激励了无数战士的抗日斗争情绪，也为后方戏剧运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戏剧骨干力量。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第三厅撤退至长沙。11月10日，岳阳失守，长沙震动，周恩来指示洪深负责安排第三厅工作人员的撤退工作。11月13日凌晨，长沙大火，周恩来派洪深为善后委员会总指挥，负责灾民救济金的发放工作。洪深指挥队员们掩埋尸体，抚慰灾民，安插伤员，恢复交通，发放灾款，历时三昼夜，办得井井有条，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并受到周恩来的赞许。

1939年12月，洪深随第三厅经衡阳、桂林疏散至重庆。1942年寒假，赴桂林"新中国剧社"导演抗日话剧《再会吧！香港》（夏衍、田汉、洪深合编），遭到桂林反动当局的强行禁演。

1943年洪深担任“中央青年剧社”编导委员，为该社编导了《鸡鸣早看天》，并导演了《黄花岗》（集体创作）。是年底至1946年，洪深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兼任军委会政治部文化研究班戏剧系教官，创办了教导团，自任团长，到各地巡回演出四川方言戏《包得行》等。这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文化战线上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于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在重庆有计划地组织了大规模雾季公演高潮。洪深积极参与，先后导演了《法西斯细菌》（夏衍编剧）、《祖国在召唤》、《春寒》、《草莽英雄》（阳翰笙编剧）、《黄金时代》（田汉编剧）、《黄白丹青》（洪深编剧）等剧。

1946年3月2日，重庆复旦大学《谷风》壁报主持人因刊登学生游行文章，横遭反动学生围攻殴打，洪深仗义前往劝阻，亦遭殴击。不久洪深住所四周出现武装宪警，对洪作精神上的迫害，几及一月，洪乃愤然辞职。全校职工激起公愤，五十余名教授集会，声言罢教；学生会也紧急集会，决议罢课，这才迫使校方同意留任洪深。同年8月，洪深回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1947年5月6日，洪深积极参加上海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并组织复旦教授罢教，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旋被释放。复旦当局趁机将他解聘。洪深被解聘后，生活较困难，他心爱的三岁小儿子不幸此时得了脑膜炎，因无钱医治而死亡。不久，洪深至厦门大学外文系任教。

1948年12月，洪深离厦门经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到北平，受到周恩来的接见。3月，洪深代表我国参加世界第一届和平代表大会。6月，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代表。9月，出席全国政协代表大会。这年，洪深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兼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

1953年，洪深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4年，洪深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兼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是年冬，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先后签订了中德、中匈、中波《文化合作协定1955年执行计划》。

1955年2月，洪深患肺癌，临危，周恩来总理曾亲到医院探望。8月29日，洪深在北京病逝。其平生著作汇集为《洪深文集》（共四册）及《洪深选集》。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戏剧家协会编：《洪深文集》（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关于演剧队的一些事实》，《人民戏剧》1978年第3期。

沙新主编：《中国话剧史纲》（油印本）。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

---

(1)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3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4月版，第184页。

洪式闾

叶炳南

洪式闾，字百容，浙江乐清人，1894年5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生，祖父和父亲都是晚清的秀才。

洪式闾少年时先在浙江温州中学肄业，后随父至河南开封，进开封中学堂，于1911年毕业。1913年至1917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0年7月至1922年3月，以进修员身份被派赴德国柏林市立医院进修，初修病理学；后决心以扑灭寄生虫病作为终身努力目标，改而专攻寄生虫学。1923年洪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并曾一度代理校长。经他倡议，把寄生虫学从病理学中分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他又被学校派遣赴德、美等国，以进修员身份进行考察。

洪式闾早期研究寄生虫卓有成绩，1922年他曾用德文发表《基础膜染色法》的论文；1926年又用德文发表关于他所发现猴体内两种新线虫的论文，为纪念其德国老师弗来朋（Fuel borne）教授六十诞辰，把其中的一种线虫以弗氏之名命名。同年，他创造了钩虫卵定量计算法，解决了防治钩虫病的基础技术问题，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此期间，他还先后编著出版了《病理学总论》和《病理学各论》两书，这是国内最早的也是当时最完整的病理学专著。

在北伐军进占浙江后，杭州发生了一起“广济医院事件”。1926年冬，开办广济医院的英国人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慑于大革命的风暴，担心自己受到冲击，借口年老匆匆回国，他的代理人谭信也仓皇离开。为此，杭州市十六个群众团体召开市民大会，请求临时省政府派员接收自办，先由姜卿云等人接收，不久，洪式闾应浙江省

民政厅长马叙伦的邀请，到杭州担任广济医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增聘了不少著名的内外科医师，并对医院业务进行了有效的整顿，使各方面的工作显著改善，在社会上迅速树立起由中国人接办的新广济医院的声誉。但至翌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悦于英国政府，勒令将广济医院交还给英国人。杭州市民闻讯，群情激愤，纷致函电，要求南京政府改变此决定，但未能成功。洪式闾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并一一将医院全部财产清点列册，送交浙江省民政厅，而不愿直接交还给英国人。同年7月，洪与盛佩葱等共同发起，自筹基金，创办杭州医院，与之抗衡。此一义举，给当时社会民心以很大振奋。医院创办伊始，经费支绌，在最困难时，洪将妻子的首饰等拿去变卖，赖以维持。当时洪等曾印有《青白之广济》和《筹组杭州医院宣言》等宣传品，痛斥政府当局“劫（怯）于强国之大势，率不免于屈从”；宣称“有生之日，誓与异族以周旋，未死寸心，愿为国家而奋斗”[(1)]，表达了反帝爱国、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同年，洪式闾还创办了杭州热带病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从事寄生虫学的实验研究。11月，由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推荐，被任命为教育部编审处主任。一年后，洪以宁、杭两地工作不能兼顾为由，辞去这一职务。1929年9月，他应日本九州医学会的邀请，前往日本作关于萧山姜片虫病问题的学术讲演，提出了姜片虫只有一个种别，仅因年龄不同而形态有所变异的独立见解，否定了认为姜片虫有许多种别的传统错误看法，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回国后不久，日本九州大学即给他寄赠了医学博士的学位证书。

1936年8月，洪式闾应聘去江苏，任南通学院教授兼医科主任，他所主持的杭州医院随即停办。抗日战争爆发后，洪组织南通学院医科师生，代办“军医署第七重伤医院”，辗转扬州、衡阳等地，救护抗日伤员。1938年10月，南通学院与江苏医政学院在湖南沅陵合并，成立国立江苏医学院，洪任该院教授兼寄生虫学部主任。以后洪随学院迁贵州和四川北碚，对当地农村严重流行的钩虫病开展了研究和防

治工作。1945年，他与杨复曦合作，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蜡制蠕虫模型制作法》一文。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洪式闾常饮酒以解苦闷悲思，赋诗抒发忧国情怀。在所写的《端午诗》中，他咏述："关怀时局费周章，尤憾强权反擅场。蓦地罡风来直北，漫天烽火过端阳。九州义士非秦帝，七泽词人念楚王。一样忠诚为爱国，几忘身世与家乡。"另一首《中秋诗》说："远离浙水已三年，走遍西南亦偶然；自恨于时无补益，更嗟所学忒拘牵。书生爱国唯憔悴，志士捐躯藐瓦全；惭愧嘉陵江畔住，中秋望月两回圆。"[(2)] 显示出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赤忱之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洪式闾随江苏医学院回到镇江，任教授及寄生虫研究所主任。这个学院为陈立夫所控制，院长即为陈的亲信，洪觉得难以共事，于次年11月应聘去台北，兼任台湾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1948年3月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无理电令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辞职，洪对此极感气愤，认为"乱命"不能从，遂自动辞去兼职，仍回镇江江苏医学院执教，以示抗议[(3)]。后因高血压引起鼻腔大量出血，请假到杭州休养。

1949年春，镇江、杭州相继解放，洪式闾兴奋得抱病回镇江继续任教。7月，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工作。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底，洪到杭州参加筹办浙江卫生实验院，任院长。1950年9月，他代表我国医学科学界去捷克斯洛伐克出席第六次国际微生物会议，宣读了寄生虫学方面的论文，并被邀请去斯洛伐克大学作学术演讲。11月，他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院长；1951年又被任命为浙江省卫生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他还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和担任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等职务。1954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4月15日，洪式闾亲自主持召开浙江省肺吸虫病治疗研究学术

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台湾肺吸虫病流行情况》的学术报告。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高血压症复发，于4月24日去世。

洪式闾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寄生虫学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重要论文有四十多篇，并有十多本著作出版。他对于疟原虫的形态学和疟疾的流行病学，阿米巴痢疾的病理解剖，姜片虫的种别问题，毛圆线虫的人体寄生问题以及钩虫问题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成就。他和李非白、胡旭庚、范学理合作编著的《钩虫病和毛圆线虫病》一书，为防治我国四大寄生虫病之一的钩虫病，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他并为培养我国寄生虫学的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人才，作出了贡献。

---

(1) 崔志干、翁楚望：《英帝国主义“英雄”梅藤更在杭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版，第134—153页。李肃遐：《接收杭州圣公会广济医院前后经过概略》（未刊稿），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

(2) 李非白：《怀念崇敬的老师洪式闾教授》，载洪式闾、李非白等编著《钩虫病及毛圆线虫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第95页。

(3) 洪式闾：《誓竭全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浙江日报》1954年12月29日第3版。

侯德榜

熊尚厚

侯德榜，字致本，1890年8月9日（清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生，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其父务农，家境贫寒。他七岁入塾读书，课余帮助家里做些农活，从小养成刻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两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在家帮助父亲种田。嗣后得开药店的姑母资助，于1904年考入福州英华书院。他聪敏好学，成绩门门优秀，尤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最浓。1906年他在英华书院毕业，升入上海闽皖两省铁路学堂，学习铁路土木建筑专业。1909年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符离集津浦路工务段工作。那时，铁路大权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中国人受其任意摆布。具有爱国心的侯德榜在民主革命运动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暗下决心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913年他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翌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赴美，入马萨诸塞州（即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1917年毕业，随后入普郎特专科学院深造，专修制革，取得制革化学师证书。翌年，又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为研究生。1921年撰著《盐铁鞣皮法》论文，获博士学位。

当时，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正在塘沽开办永利碱厂，由于不能掌握长期为外国碱业垄断集团所控制的苏尔维制碱法，建厂中困难重重，遂派永利碱厂筹办人之一陈调甫前往美国考察碱业，并物色技术人才。陈到美国后，经湖南钨矿出口商李国钦的介绍，与侯德榜结识。侯倾听了陈调甫讲述永利在建厂中的困难，激起了他长期抱有的“科学救国”的夙愿，毅然接受永利公司的聘请，由制革转而从事制碱业。他同徐允钟等人参照美国工程师孟德（W．D．Mount）提供的制碱厂蓝图，结合国内的实际，先在美国完成永利碱厂的设计，并向英、美等国订购碳酸气压缩机等设备，随后即回国参加安

装。范旭东请他担任永利碱厂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兼制造部部长。从此，侯德榜以永利碱厂为基地，为祖国的化学工业辛勤奋斗了一生。

侯德榜到永利碱厂后，立即废寝忘食地工作。面对故障重重而无法正常运转的制碱设备，他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日以继夜地调试各种机器，寻找种种故障。对碳酸氢钠堵塞在碳酸塔内，或是湿碱在干燥锅里结疤等现象，一一探究其原因。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对机器的许多部件加以改进或重新设计制作，反复试验，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

永利碱厂于1923年首次投产，但质量仍未过关。经过侯德榜等继续努力试验和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永利红三角牌纯碱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冲破了英商卜内门公司的垄断，出口日本。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随后又在美国建国一百五十周年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得奖。永利制碱的成功，振奋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奠定了我国民族化学工业发展的基础。

侯德榜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后，又在塘沽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和数据的整理，将制碱各方面的化学问题详加分析研究，决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全人类，遂写出书稿。1931年，他去美国考察与进修，翌年在纽约以英文出版了这部科学专著，书名是*Manufacture of Soda*（《纯碱之制造》）。他系统地将制碱技术公诸于世，轰动了国际化工界，为世界的创举。美国化学家E．O．威尔逊称："这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1)]

1932年，侯德榜从美国考察回国，又为永利设计和主持新建了苛性碱厂和机械厂。苛性碱用永利所出纯碱和石灰石为原料，初因缺乏经验，产品质量欠佳；他同几位技师日夜研究改进，结果所出产品大受国内市场的欢迎。在这期间，侯德榜曾在天津北洋大学兼课。

1934年3月，永利、久大等扩充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决定在南京卸甲甸兴建硫酸铔厂。为此，侯德榜等一行六人于4月赴美。他与美国氨气工程公司反复商讨硫酸厂的设计方案，又购运器材设备，安排人员实习培训，还亲至美国各地硫酸铔厂考察，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时。在谈判设计合同时，凡有损自主权的苛刻条件，侯德榜均加拒绝，力求技术设备上的自主与学术上的独立；在采购机器与器材时，对于国内能自制的机械均不订购，非买不可者，则细心比较，择其质地优良而又适合国内需要者购取之；凡秘密的专利，又为工程所必需者，则不惜高价收买。直至1936年3月，始将此项任务完成。他被永利公司同人赞为工程师的“祭酒”[(2)]。中国工程师学会1935年在广西南宁开会时，决定授予他荣誉金牌；翌年该会又授予他工程金质奖章。

侯德榜回国后，专任南京硫酸铔厂建厂指挥之责，工程进行极度紧张，他组织国内外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奋战，对已安装的机器逐一亲自检查。1936年底，主要工程顺利竣工，翌年2月开始试车投产，日产硫酸铔二百吨，硝酸四十吨。这座东方最大的第一流现代化联合化工企业的建成，对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

南京硫酸铔厂开工未及半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1937年冬，铔厂三次遭到日机的低空轰炸。当时，南京金陵兵工厂急需硝酸铵制造炸药，侯德榜立即在技术上解决难题，转产硝酸铵以供抗战军需。他时常在敌机空袭警报未解除时，冒着生命危险进厂，工厂被炸后又立即指挥员工进行抢修，坚持生产。上海沦陷后，南京告急，他组织技术人员将图纸资料及重要仪表、小型设备及器材赶运内地，将工厂蓝图埋在厂内团山下。直到南京陷落前夕，他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厂，撤往四川。

1938年初，侯德榜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在四川五通桥等地筹建新的化工基地。在战时人力、物力、财力均感困难的条件下，他含辛茹苦，以艰难的步履开始了新的历程。在四川，制盐的原料是卤水，成

本比塘沽的海水高许多倍，如果沿用苏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为了寻找新的制碱工艺，提高盐的利用率，他与几位工程师随同范旭东一起先往德国考察，旋又去美。他在美国进行合成氨工业和制碱工业联合成一体的实验与研究，首先从实验入手，根据德国察安法的要点逐一进行实验，复核其数据，进行新的探索。1939年，他派人在香港设立实验室开展工作，自己仍在纽约埋头于研究。经过五百多次的反复实验，分析了二千多个样品，大致确定了这种联合制碱技术的新工艺；翌年又在纽约和上海租界进行扩大实验。1941年终于完成了联合制碱技术的研究工作，随即聘请美国氨气工程公司（N．E．C）进行川厂合成氨及氨气加工等车间的设计，在四川五通桥建厂。他与在纽约的工程师一起，共同做了大量设计、采购等工作。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学识，他还前往美国机械工程学会（A．S．M．E）的夜校去进修机械学、电气及结构工程学。

侯德榜发明和首创的联合制碱技术，是把合成氨工业和制碱工业合成一体，把间断生产改成连续生产，缩短了工艺流程，提高了原料利用率，能同时生产出纯碱和氯化铵，降低了生产成本，是世界化学工业的一项重大发明，使苏尔维法和察安法皆相形见绌。1943年3月，永利厂务会议决定将这项联合制碱技术命名“侯氏制碱法”。同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会员的头衔。以后他又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学会荣誉会员、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等称号。1944年，巴西政府聘请他前往指导建设碱厂，其后印度塔塔公司制碱厂也聘请他去解决重大技术难题。他还为南非建设纯碱厂进行勘察与设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德榜急往南京察看硫酸铔厂，又去塘沽碱厂视察。面对惨遭日本侵略者摧残的各厂，他决心加倍努力恢复和重建我国的化学工业。10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在重庆病逝，他接任该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

翌年，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得

到恢复又陷入战争境地。侯德榜领导永利职工惨淡经营，备尝艰辛，费了两年时间，才使各厂先后开工生产，但产量未能达到战前水平。南京铔厂经过他和副总经理李烛尘—再催促国民政府，才向日方索回被劫往九州的成套设备；但由于焦炭和电力的不足，产量仅及原设计的一半，在此艰难处境之下，他仍力图实现范旭东建立十大化工厂的遗愿。1946年3月，他再度赴美，一面争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一面为新建湖南株洲等十大化工厂进行设计和采购。由于美方对贷款及技术设备的蓄意刁难，使他在美国的奔波收效甚微。

侯德榜对美国的资金、技术及物资设备所抱希望落空后，决心立足于自身的力量，恢复和发展永利的事业。1948年7月，他回到国内，以年初同李烛尘等发起成立的“久大永利黄海永裕协进会”为枢纽，对企业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在南京铔厂扩建化学试验室，成立致本化学馆，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于总管理处设置事务管理委员会，加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充实塘沽、长沙、青岛、南京等地企业的设备和技术。8月底，他前往四川指导川厂的生产及深井工程，对犍为的深井工程寄予希望，以为只要再打几口井，进口的机器运到，就可用侯氏制碱法大踏步前进了。他表示：“若今日中国尚有一枝可栖，宜应如何埋头苦干，以求生存于万一，得自助以苏生。”[(3)] 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于1948年8月实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发行金圆券，公开搜刮全国人民的资金，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民族工业处于毁灭的境地，侯德榜“自助以苏生”的愿望亦同样落空。他“瞻望前途，长此兵争不息，通货膨胀无穷极，有何工业可言？欲求国家强盛，人民生计充裕，尤缘木求鱼”[(4)]。

1949年春，侯德榜应印度塔塔公司的邀请，再次前往印度指导制碱技术。当获悉南京解放的消息时，他感到无比兴奋和喜悦，6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派专人前往召请，他立即由印度起程回国，排除各种困难，经香港绕道韩国到达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德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继续为我国的化学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撰写了八十多万字巨著《制碱工学》，将其一生的制碱心得贡献给人民。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工部副部长；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委。他还先后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科学协会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等职。

1974年8月26日，侯德榜病逝于北京。

---

(1) 姜圣阶等：《化工先驱 功业永垂》，《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日第3版。

(2) 《范旭东先生所经营的三大事业》，《新世界》月刊1944年第7号。

(3) 侯德榜：《为李直卿先生加入本团体敬告同人书》，《海王》旬刊1948年第33期。

(4) 《海王》旬刊1948年第33期，第514页。

侯镜如

戚如高

侯镜如，原名心朗，1902年10月1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生，河南永城人。侯氏为永城名门，族人中入仕者颇多。侯镜如幼入塾馆，诵蒙求诗书。十五岁负笈开封，入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越五年，转入河南大学理科。

1924年2月，侯镜如毅然投笔从戎，取道上海、香港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被编在学生第三队。他学习刻苦，操练认真，表现优异。同年11月毕业后，任教导一团排长。19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之役，在棉湖战斗中身先士卒，左手中弹受伤。同年8月，黄埔学生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侯镜如升任第一师三团一营副营长，旋参加第二次东征，并经周恩来、郭俊介绍，于潮州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北伐开始，侯镜如升任第一军第十四师第四十八团参谋长，隶属何应钦东路军。同年底，东路军逼近福州，守军第十二师起义，旋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侯镜如调任该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未几，复调至东路军总部工作。

1927年2月，侯镜如接到中共密信，通知他即赴上海。他向何应钦请假后，经宁波至上海，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暴动总指挥部成员。他分管工人纠察队训练工作，日夜忙碌。3月21日，全市工人罢工，他奉周恩来之派，参加了攻打警察厅、高昌庙兵工厂、闸北车站等战斗，身先士卒，英勇机智。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在上海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侯镜如指挥守卫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英勇抵抗，左胸中弹，流血

不止，周恩来派人把他送到医院救治。月底，侯镜如赴武汉，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总队长。6月，赴鄂城任贺龙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7月底，随二十军赴江西，率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旋随贺部南下，8月底在会昌与钱大钧第二十二军激战中受伤，后由陈赓陪同，经汕头转赴香港医治。

1927年12月底，侯镜如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翌年4月，前往开封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旋被捕入狱一年余，1929年7月获狱外党组织营救脱险，前往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春，奉命取道上海前往苏区，适遇中央保卫局顾顺章叛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侯镜如自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此后，侯镜如经黄埔同学介绍前往开封，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所属之开封行营谘议。旋赴山西晋城，代表刘峙联络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后被孙殿英委派为第四十一军驻南京办事处代表。1932年，侯镜如调任第二十二路军第三十师参谋长，负责该师之整训。翌年春，第二十二路军并入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侯镜如改任第三十师第八十九旅旅长，奉命开入江西，参与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之役。

“七七”事变爆发后，侯镜如奉命率第八十九旅由江苏淮安出发，参加平津之役，于房山、周口店一带与日军激战，伤亡很大。平津沦陷后，第八十九旅转赴潼关，阻击南下之敌，配合忻口战役。1938年春，侯镜如调任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率部前往临沂，防守鲁南，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后，所部移防湘北、鄂西北。1940年5月，率部参加枣宜战役。翌年1月，率部开赴皖北，于涡阳、蒙城一带抗击日军。1942年5月，侯镜如升任第九十二军副军长，翌年1月，任军长。嗣后移驻湖南桃源一带，参加湘西会战。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侯镜如率九十二军开赴武汉，兼任武昌警备司令官，参与武汉受降，率部解除日军武装。10月，九十二军由美国空军空运至北平，侯镜如兼任北平警备司令官。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侯镜如奉命率部协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陈继承所部进袭冀东解放区。旋受命指挥第九十二军及第一〇四军，负责打通北宁线。1948年9月，侯镜如升任第十七兵团司令，指挥第六十二军、八十六军、九十二军，驻扎冀东，设司令部于唐山。辽沈战役打响后，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南下北宁线，重兵包围锦州，以割断关内与东北的联系，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为解锦州之围，蒋介石调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及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共计七个师，由海路驰援辽西，与原驻锦西、葫芦岛的五十四军、暂编六十二师等会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指挥，协同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倾力援救锦州。10月10日，“东进兵团”向塔山猛攻，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西进兵团”也进展迟缓。15日，解放军经过猛攻，占领锦州。蒋介石不甘失败，复督促侯镜如反攻锦州，企图打通北宁线，解救廖耀湘兵团。11月初，廖兵团在大虎山以东地区被解放军围歼，辽沈战役结束。侯镜如率残部撤至天津、塘沽一带，设十七兵团司令部于塘沽。

同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侯镜如以十七兵团司令兼津沽防守司令，指挥第六十二军、八十六军、八十七军、三一八师、三〇五师、四十三师、一八四师、三二六师、三三三师等防守津沽两地。12月中旬，侯部被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分割包围。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6日，侯镜如奉蒋介石“立即南撤”之命率残部三万六千人乘船南逃上海。

侯镜如的外甥李介人是中共党员，斯时受命与侯镜如洽谈率部起义事宜。侯镜如拟订了塘沽起义方案，但因遭到第九十五师师长段云的抵制和要挟未果，只有他的基本部队第九十二军在其暗中支持下，举行了和平起义。

侯镜如于南撤后兼任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副司令，率第十七兵团司令部移驻徽州。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于4

月21日发动渡江战役。23日侯镜如奉令指挥第一〇六军、九十六军、九十二军之三一八师及安徽省保安团等向福建转移。抵闽后，第十七兵团番号取消，所属残部并入第一〇六军，侯镜如改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并兼福州绥靖公署军官团团长。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全面崩溃之势已不可挽回，侯镜如于是年秋借口赴香港省亲脱离了国民党的统治体系。旋在李介人等人的协助下，推动亲信部属曹仁凤等于福州解放时率原第十七兵团直属部队第三一八师起义。此后，侯镜如留居香港，曾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劝降工作。

1952年，应周恩来、安子文、李克农之邀，侯镜如从香港返回大陆定居，任政务院参事。此后四十余年间，历任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及第七届副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等，致力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

1994年侯镜如于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侯镜如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城县委员会编：《永城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版。

第九十二军、第十七兵团整训日记、战斗详报等，国防部史政局战史资料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侯镜如、覃异之、廖运泽：《蒋家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黄翔：《九十二军在北平起义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侯镜如、染述哉、黄翔、刘春岭《平津战役蒋军被歼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侯西反

陈民

侯西反，福建南安人，生于1882年8月20日（清光绪八年七月初七）。童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二十六岁南渡新加坡，在商界当职员。由于早年辍学，入商界后深感文化水平低，常以报纸为课本自学，遇到佳句或新知识，随即写入笔记本，暇时经常温习，学识渐进。他工作勤勉，生活节俭。后稍有积蓄，与友人合资创办“振美树胶公司”，在当时同业中，有相当地位。但不久因胶业不景气而歇业。他的为人和才干，深为陈嘉庚所赏识，遂委他负责处理陈嘉庚树胶品制造公司业务收束工作，并兼任《南洋商报》总经理[(1)]。他不辞劳苦，力任艰巨。1936年经陈嘉庚引荐，又出任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历任同济医院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执委主任、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

侯西反为人直率，热心公益事业，陈嘉庚曾称誉他“身健口利，忠勇勤劳，排难解纷为其特长”。他了解工人，同情其疾苦，也颇得工人的信任，因此每遇劳资纠纷，常被请作调解人。他与陈嘉庚是同乡，又是同业，后又共事，情好素密，对陈嘉庚倾资兴学及其一贯的爱国立场，极为钦佩，凡陈嘉庚有所事于国家社会，他必竭尽其力，为之奔走呼号。特别是在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成为陈嘉庚在南侨筹赈总会的得力助手。侯西反“熟悉诸侨商吝啬慷慨，殷裕困穷，视力劝募，应付咸宜”，“为筹赈会最重要之职员”[(2)]。此外，如对1920年代陈嘉庚领导山东惨祸筹赈会[(3)]，1930年代推销救国公债，遣送南洋华侨汽车司机服务于滇缅公路等活动，侯无不积极参与，协助做好工作。他50岁时，因感开展社会活动的需要，还利用留声机唱片学习普通话，孜孜不倦，几不知老之将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洋的爱国华侨纷纷抵制日货，有些人对于私贩日货的奸商甚为痛恨，或浇沥青，或割其耳朵，以示惩戒。侯西反久为奸商怀恨，被他们寻机诬告于英殖民当局[4]。新加坡总督以侯有反英嫌疑及暗助非法社团之罪名[5]，于1939年12月28日限令他三天出境，并不得重返新加坡。陈嘉庚出面交涉无效。30日，侯西反原定上午乘飞机往仰光转重庆，有亲友及工人数千人为其送行。他们不顾军事当局的戒严令，愤怒冲进机场，几至发生流血事件。为了顾全大局，不影响南侨筹赈总会今后的活动，陈嘉庚与侯西反商量，改于当晚乘火车去槟榔屿，转乘飞机回国。行期虽然保密，但火车到达槟榔屿时，仍有华侨及当地各界人士二三千人到车站迎送，盛况空前。

侯西反回国后，孑然一身，但仍倾心于抗日救国，风尘仆仆奔走于重庆、昆明之间。他在昆明组织华侨互助会，救济华侨司机；创办华光学校，培养归国华侨子弟。1940年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问团回国进行慰问活动，侯西反陪同视察十余省，历时十个月。当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时，行动受监视，言论受钳制。侯西反以“国民外交协会”[6]常务委员身份，邀请陈嘉庚到该会作《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宣传了延安及边区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真相，引起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不满。侯西反陪同陈嘉庚视察福建古田县时，在欢迎大会上历数省主席陈仪祸闽苛政。到漳州时，又在各界欢迎会上慷慨激昂地宣称：“凡贪官污吏，害民惨苦者，立当驱逐出去！”[7]

侯西反在重庆历任国民党海外部青年团联系委员会委员、青年团海外团务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名誉顾问、赈济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谘议，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等职。

1944年11月10日，侯西反从成都飞昆明，因飞机失事，在昆明郊区遇难。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怡和轩1946年第3版，第91页。

(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91页。

(3) “山东惨祸”即“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我山东济南，先后杀害我外交官蔡公时及军民五千多人。新加坡华侨发起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举陈嘉庚为主席，积极募捐救济济南受难者。

(4) 当时南洋华侨多以为此项惩戒奸商的活动为“筹赈会”所组织。据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所说，此则别有组织机关，暗中有他人主持，“与侯（西反）君绝无关系”。陈嘉庚本人也不赞成这类个人恐怖手段。

(5) 当时新加坡各报均登载英殖民政府情报局关于侯西反出境命令，略谓：“非法社团‘先锋队’及‘抗敌后援会’，假借爱国名义，作非法之活动。总督经慎密之调查后，认为使星华筹赈会上述非法社团发生关系之责任，实在于侯西反君，以侯君亲自赞助及怂恿该社团之存在及活动……又‘抗敌后援会’原存在于星洲及马来亚各地，亦系马来亚共产党之机关，该党本身即系危险之组织，目的在于用公开革命推翻政府。”见《南洋商报》1939年12月29日。

(6) 国民外交协会系抗战期间设在重庆的群众性组织，主席为陈铭枢。

(7)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6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三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三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H

胡风　马蹄疾
胡汉民　周天度
胡景伊　吴嘉陵
胡景翼　徐辉琪
胡筠　汪仁泽
胡琏　徐乃杰　黄中岩
胡若愚　荆德新
胡适　耿云志
胡嗣瑗　张学继
胡文虎　陈民
胡毅生　周兴樑
胡瑛　齐霁
胡愈之　胡序文
胡政之　熊尚厚
胡宗南　沈荆唐
华之鸿　周春元　林国忠
黄百韬　王家鼎
黄宾虹　周衍发
黄楚九　汪仁泽　熊尚厚
黄郛　郑则民
黄复生　罗玉方
黄焕南　汪仁泽
黄季陆　吴嘉陵
黄杰　颜平
黄金荣　吴云乡

黄侃　　娄献阁
黄明堂　　邢凤麟
黄慕松　　周子琳
黄乃裳　　陈民
黄琪翔　　李静之
黄少谷　　陈志新
黄绍竑　　胡启望　项美珍
黄维　　严如平
黄锡滋　黄明安　　张钧陶
黄兴　　周天度
黄旭初　　林经华
黄炎培　　汪仁泽
黄奕住　　汪仁泽
黄远庸　　钟碧容
黄泽霖　　杜文铎
黄展云　　李锡贵
黄仲涵　　温广益
黄自　　陈志新
黄宗仰　　李安庆　李守静

J

吉鸿昌　　徐玉珍
贾德耀　　邵桂花
简照南　简玉阶　　熊尚厚
江朝宗　　侯鸿绪
江加走　　周海宇
江亢虎　　曾业英
江庸　　汪仁泽　陈光贻
姜得春　　陈志新
姜登选　　张学继
姜桂题　　钟碧容

姜立夫　　齐辉　李援朝
蒋鼎文　　余涉
蒋方震　　刘敬坤
蒋光慈　　娄献阁
蒋光鼐　　邱涛
蒋介石　　严如平
蒋梦麟　　宗志文
蒋廷黻　　陈宁生　熊尚厚
蒋维乔　　陈秉仁
蒋翊武　　殷文
蒋作宾　　江绍贞
焦达峰　　周天度
金宝善　　高秋萍
金润庠　　顾振仪　来可泓
金树仁　　张奇林
金岳霖　　王法周
金仲华　　汪仁泽
靳云鹏　　汪仁泽
井勿幕　　张应超
居正　　萧栋梁

K

阚朝玺　　汪恩郡　王凤琴
康宝忠　　王川　周茂江
康心如　　周本渊　熊尚厚
康有为　　耿云志
康泽　　刘敬坤
柯劭忞　　娄献阁
孔伯华　　寿祝衡
孔祥熙　　朱信泉　闫肃
寇遐　　张应超

黄延芳　　汪仁泽

L

赖心辉　　马宣伟

蓝天蔚　　张奇林

劳乃宣　　朱宗震

老舍　　王行之

老洋人　　李国强

冷欣　　张天政　成凯

冷遹　　史全生

黎锦熙　　白吉庵

黎烈文　　任嘉尧

黎元洪　　张振鹤

李纯　　张振鹤

李德全　　郭烙

李鼎铭　　李敬谦　熊宇良

李鼎新　　陈孝华

李杜　　颜平

李福林　　萧栋梁

李根源　　马子华

李更生　　萧致治

李公朴　　宗志文

李国杰　　侯鸿绪

李国钦　　萧栋梁

李汉魂　　周兴樑

李厚基　　李锡贵

李璜　　李义彬

李济　　李光谟

李济深　　周兴樑

李剑农　　萧致治

李经羲　　张树勇

李景林　　娄希彦
李康年　　汪仁泽
李苦禅　　姜克夫　李侃
李良荣　　李锡贵
李烈钧　　宗志文
李弥　　荆德新
李铭　　江绍贞
李鸣钟　　陈民
李品仙　　萧栋梁
李盛铎　　王川
李石岑　　娄献阁
李世甲　　李锡贵
李士群　　黄美真　石源华
李守信　　万江红
李书城　　李丹阳　刘建一
李叔同　　熊尚厚
李四光　　娄献阁
李燮和　　萧栋梁
李延年　　王家鼎
李仪祉　　娄献阁
李烛尘　　熊尚厚
李紫云　　徐凯希
李宗仁　　李静之
连横　　陈碧笙
良弼　　梁旭毅
梁鸿志　　涂上飙
梁墨缘　　伍锦　张鸣皋
梁启超　　耿云志
梁士诒　　郑则民
梁漱溟　　白吉庵

梁思成　　黄延复
梁希　　汪仁泽
廖磊　　莫凤欣
廖平　　汤志钧
廖耀湘　　杨焜
廖仲恺　　尚明轩

返回总目录

胡风

马蹄疾

胡风，原名张名桢，又名张光莹、张光人，笔名胡风、古因、谷音、谷非、张果、谷风、顾风、胡丰、孟林、秋明、陈乔、马荒、高荒、顾纷等，别名古斐、张因，化名中川。1902年11月1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二）生于湖北蕲春赤东乡中窑村。父张翊泰，母胡氏，家境贫寒，父母长年做豆腐以维持生计。胡风从五六岁起就帮助家里牧牛、砍柴、拾草、捡粪、看护庄稼。苦难的童年，虽然未能得到及时启蒙，学习文化知识，却目睹了旧中国农村黑暗悲惨的生活，饱尝了贫困儿童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抗和斗争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犟的性格。胡风的母亲是一位勤劳俭朴、善良贤惠的农家妇女，给胡风以深远的影响，后来为了继承和发扬母亲崇高而圣洁的风范，他起笔名胡风。

胡风十一岁时才上学，他的学习成绩十分出色，受到老师和同族长辈的称赞，父兄很希望胡风成为一个读书人，以振兴家族的声誉，决定让胡风继续升学。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胡风在村塾读了六年古文之后，考入了县城公立小学。1921年高小未毕业，跳级考入省城武昌启黄中学。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到武汉，《新青年》和《晨报副刊》给胡风影响很大。中学时代的胡风就开始新诗和小说的创作。1922年暑期，胡风和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胡缄三通过互相通信联系，发起成立“新蕲春学会”，编辑出版年刊《新蕲春》，揭露黑暗，抨击时弊，出至第三期（1925年）被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查禁。

1923年，胡风转学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文学作品。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湖畔诗社的《湖畔诗集》和《春之歌集》中潘漠华、冯雪峰和应修人的诗作，也给他许多启迪和教益。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胡风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24年在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胡风奔走于街头和工厂之间，积极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1925年夏，胡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春转入英语系，秋季又转入清华大学英语系，数月即退学，应同学方翰之邀请回到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中的故乡——蕲春，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蕲春县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参加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不久，国共分裂，白色恐怖笼罩蕲春，胡风无以立足，由武汉中学校长刘树仁介绍，去武昌省立第二女子中学任教，未果。后经友人介绍到武昌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参加《武汉评论》编辑工作，由于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即被禁停刊。是年秋天，胡风去南昌，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金汉鼎部，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上任二十八天即遭撤职。随后，胡风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编辑副刊《野火》和《长天》。因在刊物上经常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被怀疑为共产党而两次拘捕审查，幸得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周璧光保释，免遭厄难。这一期间，胡风创作了不少抒情诗，后收入他的第一本诗集《野花与箭》里。在一切理想濒于破灭之际，胡风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开辟新的途径。

1929年9月，胡风到达日本东京，先入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三个月，翌年1月改入奥平定世私立补习学校的“日语补习班”继续进修。为维持生活，同时在该校的“支那语补习班”任汉语教师。其间边学日语，边从日语转译苏联小说。1931年春，他考入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系，所学虽然是英文学科，但主要精力却放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加入了普罗文化联盟领导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学研究会，结识了日本著名普罗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等。是年秋，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读者小

组。后《赤旗报》读者小组被日本共产党组织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胡风集体加入日本共产党。不久，又和谢冰莹等一起加入中国“左联”东京支盟。1932年3月，在日共《赤旗报》读者小组和国内“左联”的双重领导下，胡风与中国留日学生方翰、聂绀弩、王承志、邢桐华等发起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胡风主持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出版《新兴文化》。1933年3月，因在聂绀弩住处被警察搜查出日本《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胡风连累被捕，经过严刑拷打，不屈不供，因警察当局得不到确凿的罪证，关押三个月后被宣布驱逐出境，勒令退学回国。

1933年夏，胡风由日本到上海，在鲁迅的领导下，投入“左联”的工作。8月接任“左联”宣传部长，领导成立了理论研究会、诗歌研究会和小说研究会，创办“左联”内部油印刊物《文学生活》。10月，任“左联”行政书记。在这同时，胡风为了维持生活，通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盟员陈彬龢的关系，到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任《时事类编》编译，每月翻译日文新闻资料两三篇，得月薪一百元。1934年10月，由于韩侍桁的告密，暴露了“左联”领导人的身份，胡风被迫同时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和“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业从事创作和评论，并应吴奚如邀请，担任中共中央特科和鲁迅之间联系工作的交通员。其间，他为鲁迅转递了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为鲁迅转递了中共高级将领方志敏在狱中给党中央的信等密件。1936年，在鲁迅的创议和支持下，胡风与萧军、聂绀弩、吴奚如等创办地下刊物《海燕》，仅出两期被禁停刊。同年5月，他和鲁迅、冯雪峰共同分析和讨论了文艺运动的形势，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以补救“国防文学”口号在政治上的不明了性和理论上的不科学性。同年10月鲁迅逝世，胡风为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参加值班守灵，负责接待记者采访等工作，并为扶柩起灵、抬棺入穴的几名青年作家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风全力投入抗日洪流，创办《七月》旬刊，以诗人的激情写下了《为祖国而歌》、《血誓》等鼓动抗战的爱国诗篇。在上海沦陷前，他撤退到武汉，将《七月》旬刊改为半月刊，继续出版。1938年初，胡风在武汉参加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二十一人组成的筹委之一。“文协”成立后，胡风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任“文协”下属研究股副主任、主任职务，多次主持召开小说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和诗歌座谈会，讨论和评述抗战期间的文学作品，推动抗战文艺创作。在抗战八年中，胡风辗转于武汉、重庆、香港、桂林之间，除主编《七月》外，后又创刊《希望》，成立南天出版社，编辑出版《七月文丛》、《七月诗丛》。他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下，以披荆斩棘的精神，为革命队伍和文学战线扶植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新人，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发展开拓疆域。后来成为文坛骁将的小说家张天翼、欧阳山、艾芜、端木蕻良、丘东平、罗俶，诗人艾青、田间，木刻家曹白、黄新波等，都是胡风独具慧眼加以扶植和奖掖的青年作家。抗战八年所出版的三十五期《七月》中，胡风先后发表了三十九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十之七八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作者。《七月》不仅团结了如萧军、萧红、田间、艾青、端木蕻良、欧阳山、吴组缃等一大批已在30年代中期成名的作家，而且扶植和培养了如贺敬之、邹荻帆、鲁藜、陈垅、绿原、冀汸、路翎、方然、天蓝等一群崛起于40年代的七月流派的作家。许多“新人”是来自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形成一条与时代洪流同一方向的潮流，冲破了文坛过去的陈腐浮嚣习气，向着开拓“新生的时代”的目标迈进。

1949年1月，胡风得到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通知，与周建人、许广平等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文化界人士，陆续北上，经大连、沈阳、天津、石家庄，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北平和平解放后，胡风进入北平。7月，出席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时的胡风，充满无限的欢乐，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五个乐篇。1950年，胡风列席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和

劳动模范大会，采访各条战线的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写成特写、报告文学集《和新人物在一起》。

自1936年胡风的第一个评论集《文艺笔谈》问世以后，到解放前夕，胡风先后出版了《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记》、《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即《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现实主义的路》等共九个评论集，为文艺理论建设、推动文艺创作、培养作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就我国文艺战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看法，写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就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改造和与工农兵相结合，艺术典型的塑造，创作方法和创作题材，民族形式等理论问题，以及文艺组织领导，文学运动，话剧和电影管理等实际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个报告于7月通过正常组织手续程序，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被错误地定为对党和政府的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在全国开展了错误的批判。1955年7月，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撤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和《人民文学》编委等职务，开除中国作协会籍；8月被批捕审理，1965年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后又于1970年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改判为无期徒刑。他的案件影响甚大，牵累了许多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一案得以平反，1979年1月15日胡风获得了自由。在与世隔绝的二十五年中，胡风在极其困难的生活环境下，如同他在《我的小传》中所云：“精神世界经过了身外的天崩地陷，也经过了身内的火烧冰冻，但总是在被对党的原则的信心引导下的感情劳动拯救了过来。”他仍坚持写作，二十五年中写出了很多

诗歌和回忆录。

1980年，胡风由四川成都迁回北京定居，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6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胡风：《我的小传》，《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鲍光前：《胡风传略》，《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

石丹：《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索引》，《文教资料简报》（江苏）1985年第6期。

绿原：《悼念为艺术真理而献身的胡风同志》，《人民文学》1985年第2期。

路翎：《哀悼胡风同志》，《文汇月刊》1985年第9期。

胡汉民

周天度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原籍江西庐陵延福乡青山村，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父胡文照，做过几处州县幕僚，主管刑名。胡汉民幼年从师学习，读了不少经史书籍。后来，父母相继去世，开始借教书维持生活。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

1903年，胡汉民与吴稚晖、钮永键等人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吴因保送私费陆军学生事与清公使蔡钧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汉民亦愤而退学回国，先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随后在广西梧州中学教书，兼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他再次赴日本留学，到东京后，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

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不久，胡汉民和廖仲恺同时入盟。在入盟前夕，他因对平均地权的口号表示怀疑，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提出，曾与孙中山辩论了一个晚上，经孙中山为他详加剖析，他才勉强同意加入[(1)]。入盟后，初任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民报》创刊，被推为编辑。他在《民报》上发表过一些政论文章，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很大的软弱性，特别表现在其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1906年4月他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在阐述同盟会的政纲时，宣称革命“不可有妨害外国之举动”，主张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应当承认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害”[(2)]。

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到河

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粤、桂、滇边境地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这些起义失败后，1909年5月，孙中山赴欧洲，委托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同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他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倪映典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后，11月，孙中山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在南洋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随后，胡汉民往南洋各地筹款。1911年1月，黄兴、赵声到香港设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他任秘书课课长。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胡汉民和赵声、宋教仁等次晨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他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被推为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孙中山让权于袁世凯后，胡汉民于4月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广东支部长。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接着，又向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准备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胡汉民是反袁的，但主张法律解决，小心翼翼地避免和袁世凯公开对抗。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他“以时机未至拒之”[(3)]。6月14日，袁世凯撤免他广东都督职务，调为西藏宣抚使，他复电遵令解职。随即将权力交与袁世凯任命的粤督陈炯明，悄然离广州去香港，后到上海。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到台湾，转去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举起反袁革命斗争旗帜，胡汉民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6年4月，他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筹划反袁活动。袁世凯死后，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

谈判，并进行扩充北方党务及联络原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工作。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为大元帅，任胡汉民为交通部长。不久，孙中山为桂系、滇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所排斥，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胡汉民随孙中山离广东到上海。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1919年8月，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胡汉民和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他写的文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一定的介绍。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参议，随同孙中山在两广进行活动。

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国民党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胡汉民的右派面目很快暴露，随着革命日益深入发展而越来越显著。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胡汉民本来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后来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不久，他即向孙中山提议建立民族国际来对抗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年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率领北伐军到韶关，由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10月初，广州发生商团反革命叛乱，危及广东革命政府，革命派要求坚决镇压，他主张“委曲迁就”，发还扣留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谋取妥协解决[(4)]。10月9日，孙中山为处理商团事变，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指出胡汉民“长于调和，不长于彻底解决”，并且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有济。”[(5)] 随后，胡汉民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举兵镇压，但叛乱平定不久，即向商团反革命头目陈廉伯表示认错，请陈“释前怨”[(6)]，暴露了他的妥协立场。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官僚政客认为他们的反共活动从此可以无所顾忌了，六七月间，胡汉民经常约集孙科、邓泽如、邹鲁、林直勉、胡毅生（胡汉民堂弟）、伍朝枢、吴铁城等在家中聚会，商量反共对策，攻击坚决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7)]。他和邹鲁等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谢持、戴季陶等取得联系，认定国民党非清党（清除共产党）不可，并秘密商定清党的步骤。8月10日，他们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于9月15日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来解决清党问题[(8)]，并分头通知右派分子齐集于广州。与此同时，胡毅生、朱卓文等结合粤军首领许崇智的部属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接受了香港政府赠送的二百万元，阴谋发动反共政变[(9)]。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主谋者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人的阴谋被揭露，胡汉民因与廖案有重大嫌疑，一度被拘留，后被释放，在汪精卫的支持下，9月间，以“出使苏俄”为名前往苏联。

1926年4月末，胡汉民从苏联回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充满着革命气氛，他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企图抵制和对抗革命。由于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胡汉民在广州待不下去，于5月中旬避往香港，后到上海。1927年春，当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刻，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蠖屈了一年的胡汉民，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赶忙由上海到南京，同蒋介石结合在一起，反共清党，绞杀革命。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与武汉革命政府公开对抗的反对革命的“国民政府”，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上台后制订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并开列了一百九十余人的名单，多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5月5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着手清党。6月20日，他参加了蒋介石和冯玉祥合作的徐州会议。他还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作”，他是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

一。他发表了许多反共、反苏、反对工农运动的文章和演说，打着宣传三民主义的旗号，实际是对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彻底背叛。

1928年1月，胡汉民和孙科、伍朝枢到欧洲考察政治。9月回国后，他提出了旨在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使蒋的南京政府合法化的《训政大纲》及《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通过公布。《训政纲领》（通过后改名）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10)]，把国民党中央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实行五院制。蒋介石于同年10月间“依法”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1929年到1930年，他坐镇南京，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先后打败了桂系、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等敌对的地方实力派，完成了“统一”。

但是胡汉民和蒋介石的结合，并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权力冲突。蒋介石为了加强他个人的独裁统治，1929年建立了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集团，以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同时提高黄埔系军官的地位，以控制军队，胡汉民被摆在“尊”而无权的地位，并逐渐被排挤。胡汉民则以国民党元老自居，高唱“党权高于一切”，鼓吹“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对蒋、陈侵犯他的权力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司令部便可以了。”[(11)] 蒋、胡间的权势之争，由于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公开化。1930年，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当选为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胡汉民强调召开国民会议“必须完全遵依总理遗教”[(12)]，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13)]，坚决不同意制定“约法”。其目的是反对在五院之上有一个集权的大总统，以保持党权高于政府权的形式，使自己的权位不致受

到削弱。蒋、胡的激烈冲突，加上当时省市代表推举中，支持胡汉民的占了多数，蒋不能容忍，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扣留，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由胡派核心人物古应芬、邓泽如、林森、萧佛成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委名义，于4月末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对蒋提出弹劾。接着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回到广州，开展了联合反蒋运动。5月27日，他们在广州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和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相对抗，形成宁、粤分裂的局面。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抗日运动高涨，蒋介石处境不利。在“团结御侮”的压力下，宁、粤双方被迫举行和谈。由于广州方面提出以恢复胡汉民的自由作为宁粤议和的先决条件，蒋介石不得不于10月14日将胡汉民释放。接着宁粤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此后，胡汉民回到广州，结合两广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

1933年2月，胡汉民在香港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作为自己的喉舌，连续发表文章，宣传他的政见。他在失意之余，也骂蒋介石，认为北伐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蒋是继承了北洋军阀余绪的“新兴军阀”[(14)]，“南京统治，只是反动的军阀统治”[(15)]。他忘了为虎作伥，帮助蒋介石建立新军阀统治的，正是他自己。

“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胡汉民要求对日抗战，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但在反共上面，他和蒋仍然是一致的，甚至认为蒋对共产党“始终剿办不力，遂使匪祸蔓延，至于此极”[(16)]。胡汉民鼓吹抗日“剿共”“并行不悖，以北方的军队抗日，以南方的军队剿共”[(17)]。他依托两广军阀势力，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共并重”的欺骗口号之下，和蒋介石对立。胡汉民把他所标榜的抗日、反蒋、反共和三民主义连在一起，称

之为三民主义的连环性。1934年4月，他在用宋庆龄等人名义公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了名。

1935年6月，胡汉民往德、意等国考察。12月，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的示意下，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又推他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1月，他回到广州。这时日本开始入侵华北，全国民众和国民党内要求抗日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邀胡汉民到南京重新合作。他也正准备进京打算再次和蒋共事[18]，未及成行，5月12日在广州因脑溢血病故。

---

(1) 何香凝：《我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页。

(2) 《民报》第3期。

(3) 黄远庸：《远生遗著》第3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21页。

(4) 蔡和森：《广州反革命之再起》，《向导》第87期；《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导》第92期。

(5) 毛思诚辑：《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册，1937年版，第7—8页。

(6) 《申报》1925年5月4日。

(7) 林直勉：《共产党入寇国民党后借词诬陷同志之概述》，《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另见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1页。

(8) 佚名：《清党实录》，第1—2页。

(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7页。

(10)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54页。

(11)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

(12)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册，民智书局1932年版，第758页。

(13) 《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14)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的补救》，《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33页。

(15) 胡汉民：《辟谬——法西斯蒂与立宪政治之检讨》，《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2期。

(16) 胡汉民：《为蒋日妥协正告友邦人士》，《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

(17) 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

(1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胡景伊

吴嘉陵

胡景伊，字文澜，四川巴县人，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父亲在县城经营盐业。1901年胡景伊作为近代四川首批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先入东京成城中学，两年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蒋方震等为该校步兵科第三期学生。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他同蓝天蔚、龚光明等在日本组织拒俄“学生军”，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

胡景伊在日本留学四年，于1904年回国，被川督锡良任命为四川陆军武备学堂管堂委员兼教习，为四川新军培训中下级军官。他办事认真，受到学堂总办沈炳堃、会办陈宦的器重。胡景伊从第一期学员中选拔尹昌衡、刘存厚、周骏等十人赴日本学习军事，是为民国初年四川形成武备系之由来。1907年锡良调任云贵总督，胡景伊随往筹办新军，任督练处参议官和云南陆军小学、云南讲武堂总办等职。次年锡良请奖胡景伊为陆军正参领衔。1909年沈炳堃升任广西巡抚，又调胡景伊到广西任新军协统。因广西新军只有一协（旅），胡景伊乃成为广西全省军事长官。

1911年秋，广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响应武昌起义，拟援湖北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的先例，举资历较深的胡景伊任广西都督。胡景伊惧怕革命，又怕成为清王朝叛逆，便逃往上海观望形势，后返回四川。清王朝覆灭，胡景伊后悔自己不该离开广西。其时，南北对立，熊克武等秉承孙中山之命筹组蜀军于上海准备北伐。胡景伊通过其弟胡南宾（同盟会员）与熊克武等周旋，欲取得蜀军领导权，未能如愿。1912年2月，滇军李鸿祥、谢汝翼两梯团进据泸州、自贡一带，与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军队对峙于资中、内江，形势紧张。蜀军政府为调停局势，共同北伐，乃电邀与滇军将领有旧谊的胡景伊到重

庆，委任为“联络北伐全权代表”，以刘声元为副代表，一同前往自流井，与滇军商订联合北伐条约。2月10日，胡景伊不顾刘声元反对和蜀军政府认可与否，就签约同意犒赠三十万元（银元）与滇军，作为出川北伐的条件。签约后，胡景伊应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之邀，径赴成都，成为都督府的上宾。尹昌衡倚重胡景伊之资望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并排斥孙中山一派的势力，故于2月27日特任胡景伊为全川陆军军团长，并通电全国，使其声望陡涨。随即胡景伊至成都，改原川军四镇为四个师，将驻渝的熊克武部改编为川军第五师，遇事多加挑剔指责，成渝两地遂成水火。其时，西藏藏军攻占巴塘、里塘等地，川西告警。6月14日，袁世凯令川督尹昌衡率兵入藏平乱，胡景伊力加怂恿。北京政府于7月12日应尹昌衡之请，以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以原副都督、同盟会员张培爵为四川民政长。胡景伊遣亲信胡忠亮携巨资赴京，走陈宦的门路，向袁世凯输诚效忠，并贿赂诸要员，竭力迎合袁世凯亟欲剪除革命势力的阴谋。9月，北京政府以“询边防民事”为由，调张培爵至北京，解除民政长职务，授胡景伊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兼摄民政长。胡景伊网罗一批旧军僚属、政客组织共和党四川支部，让其党羽控制政府重要部门；又发行借以搜刮民财的军用券，强迫民间通用。胡景伊独揽军民两政，倚川军武备系的第一师师长周骏、第四师师长刘存厚为嫡系，竟拒绝得胜返川的尹昌衡回任其职，并拒不与尹昌衡见面。

袁世凯选中胡景伊为统治四川的暂时代理人，于1913年6月13日正式任命他为四川都督，改任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成都部分同盟会员偕各界刊布传单，声讨胡景伊“卖官殃民，蹂躏议会”等十大罪状，发起拥尹逐胡运动，但在胡景伊的分化与镇压下，运动遭到失败。后来尹昌衡亦被胡景伊勾结袁世凯诱到北京监禁。

胡景伊得到袁世凯的宠信，更加积极策应袁世凯向国民党革命势力的全面进攻。1913年5月，他唆使部下发表通电，竭力替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大借款的丧权辱国行为和暗杀宋教仁的罪恶行径进行粉饰和

辩护，污蔑民众的抗议言论是“狂吠”，辱骂孙中山等是“奸徒”。他还在另一电文中，攻击李烈钧等国民党三都督反袁通电是违反“对中央政府有服从之义务”。同年8月“二次革命”起，熊克武等在重庆兴师讨袁，通电斥责胡景伊为袁世凯镇压人民的鹰犬。胡景伊迅速调周骏、刘存厚等部，与各路讨袁军激战于泸州、绵阳等地。9月，讨袁起义军在黔、鄂、陕、川、滇五省军队围攻下失败，遭到胡景伊的血腥镇压。熊克武、杨庶堪等千余名反袁人士，均被胡列名报袁世凯呈请抄家或处以极刑，全川阴云密布。10月15日，袁世凯特授胡景伊勋章。胡景伊仰承袁世凯鼻息，11月13日通电请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凡国民党员在两院者，悉勒令解职。他认为川军第二师彭光烈、第三师孙兆鸾有通熊克武之嫌疑，编散和撤销这两个师的部队。他的这些作为，更得袁世凯的赏识。

1914年6月30日，胡景伊被特任为威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然而他毕竟不是袁的心腹或北洋系统的将领，袁世凯并不放心将四川交他主持。1915年2月，袁世凯派参谋部代总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入川。胡景伊明白陈宦的背景，对陈十分恭顺，办移交时把将军署三年节余的三十余万元经费一律交给陈宦，未敢私吞。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交权出川的命运。6月22日，袁世凯改任陈宦为四川督军，调胡景伊入京给以毅威将军、参政院参政的空衔。

胡景伊寓居北京，不甘寂寞，在后来直、奉、皖诸系军阀混战期间，曾与在川的旧部勾结，返川争权，但未能得逞。此后长期闲居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胡景伊被国民政府作为地方名流遴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他曾受孔祥熙之托，到成都调查西康宁属矿产资源。

1950年，胡景伊病逝于重庆。

主要参考资料

《四川学报》第2期。

向楚：《杨庶堪传》，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12月印行。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胡景翼

徐辉琪

胡景翼，字励生，又作笠僧、立生，早年号中山，陕西富平庄里镇人。1892年6月20日（清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生[(1)]。祖父胡得鼎，1867年9月在家乡因阻击捻军身亡。父亲胡彦麟，初经商当学徒，后渐次升任“领本”（经理）。胡景翼七岁入塾，十三岁就学于三原举人赵如笃处。课暇喜读兵书及名人列传，并拜师学习武艺。

1908年，胡景翼考入西安健本学堂。该校为同盟会员创办，是当时陕西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他由此结识了井勿幕、焦子静等人，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10年春，经井勿幕、宋元恺介绍加入同盟会。

胡景翼入会后，积极赞助井勿幕联络会党、刀客共同反清的主张，自愿担任与新军中会党联络的任务。他为此参加了哥老会，与崔俊杰、雷贵、刘俊海等会党重要分子多次密谋于小雁塔寺。还利用假日到同州（今大荔县）、蒲城、华阴、华县、临潼等地运动刀客。胡景翼联络会党成绩显著，在陕西革命党人中很快崭露头角，成为一个重要骨干成员。是年7月9日，胡景翼与井勿幕、钱鼎等，和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三十余人在西安南郊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实现了同盟会、哥老会与新军的全面联合。

1911年6月，胡景翼于健本学堂毕业。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他决定“以奔走革命为职志”，不再继续求学[(2)]，随后来往于耀州（今耀县）、西安之间，进行广泛联络。随着革命形势高涨，同盟会陕西支部计划由井勿幕、胡景翼率刀客在渭北发难，钱鼎等人策动新军在西安响应。井、胡遂以耀州庙湾为基地，加紧准备。武昌起义爆发

后，清陕西当局颇为惊慌，密谋将新军第二标调离省城，并逮捕军中的革命党人。新军乃提前于10月22日举义。胡景翼得知消息，立即招集各方豪杰志士和刀客两千余人在药王山首先响应。不久，井勿幕在三原就任陕西北路安抚招讨使，他应召前往，被委为第一标统带。西路战事告急时，又奉命率部赶往支援，在三水张户原（今旬邑张洪原）大败清吏升允所率之甘军。

1912年3月，袁世凯窃权上台后，陕西都督张凤翙投靠北洋政府，打击革命派势力。秋天，胡景翼被迫离陕去日本，入成城学校读书。12月，外蒙古封建主在沙俄政府策动下宣布“独立”，留日学界群情激愤，公举胡景翼为代表，归国组织“征蒙军”。但袁世凯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味与沙俄妥协，胡景翼的使命未能实现。不久“二次革命”爆发，他便在上海投入了反袁斗争。期间，孙中山、黄兴曾派人约张凤翙举兵响应，张凤翙拒绝，胡景翼愤怒指斥这是“苟安一时，助长袁氏帝制自为之心”[(3)]。

1914年1月，胡景翼亡命日本，入革命党人创办的浩然学社学习军事。数月后毕业，决定回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离日前，曾由于右任引荐会见了孙中山。孙以“努力革命”相勉励，他毅然回答说：“俟破京后再迎先生！”[(4)]

胡景翼回陕后，经师子敬、侯笃等人斡旋，到陈树藩第三混成旅教导营军官连学习。不久相继升为差官连连长、备补连连长、游击营营长。与此同时，他与刘守中、岳维峻等人在三原开设大有公司，作为秘密革命机关，又与续西峰、续范亭、孙岳、邓宝珊等人相聚于华山下，密谋讨袁计划。

1915年12月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次年3月，郭坚、耿直等在渭北举事响应。陕西将军陆建章为镇压起义军，一面任命陈树藩署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一面派其子陕西第一混成旅旅长陆承武率精锐一团到渭北一带巡防。胡景翼此时驻防富平，他看到陕西反袁逐

陆斗争日益高涨，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将陆承武佯迎入富平县署，于5月7日晚发动兵变。经一昼夜激战，全歼陆部一团人，并生擒陆承武。事变后，武钧、刘守中、张义安等人要求乘时宣布独立，围攻西安，胡景翼却以“有旅长在”为理由，加以拒绝，将陆承武交给了陈树藩。陈见有利可图，遂于9日宣布独立，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并以陆承武为人质，与陆建章讨价还价，6月取得了陕西督军职位。

护国战争结束后，胡景翼部被编为陕西第一旅混成第二团，驻防陕南龙驹寨（今丹凤）。由于陈树藩对他并不十分倚重，且怀有猜忌之心，胡景翼这时将其所部编为十个连，致力于练兵活动。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揭起护法旗帜。陕西党人高峻、耿直、郭坚等人纷起响应。这时，胡景翼经一年多时间的练兵，有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但他却没有立即响应，而且还奉陈树藩之命直接加入了对高峻、耿直等起义军的围攻。胡景翼对人说：他攻打郭、耿、高是想把他们“剿灭掉”，“自己起来再干”[(5)]。因此，当耿直退守岐山派人与他联系，以至质问他“还革命不革命”时，他仍与耿军“激战八昼夜”；直到有了重大伤亡，才感到这是陈树藩施用“以毒攻毒”之计，遂与耿密约：耿部退出岐山，他以“夺城之功”向陈索取更多枪械，然后响应起义。但不料事为陈树藩探悉，不仅没有取得饷械，反而引起陈更大的猜疑。此后，胡景翼便以“追击”起义军为名，把部队开赴渭北蒲城、富平、三原等处，并派人与驻防耀州的曹世英取得联系。与此同时，陈树藩也一面调其亲信曾继贤、严锡龙率部进驻三原，一面委任胡景翼为“击匪司令”，命他继续东去攻打郭坚、高峻起义军。胡、陈矛盾自此日趋激化。

1918年1月25日，胡部补充营营长张义安愤于陈树藩步步紧逼，在三原宣布独立。27日，胡景翼与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州赶到三原，共同组成陕西靖国军，胡景翼任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任左翼总司令。2月2日发布讨陈檄文，宣言靖国军“志在上以靖国，下以救民”，以达“政治清明，共和巩固，奸雄无觊觎之心，政府有依归之望”[(6)]

。随后，从东、西两路进兵西安。2月中旬，靖国军在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兵临西安城下。陈树藩为挽救其败亡命运，在据城固守的同时，不惜以陕西省长为条件，与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加紧勾结。刘镇华率部入陕后，俨然以“调停人”的身份，诱迫靖国军退兵。胡景翼鉴于西安城屡攻不下，为“保存实力”，遂不顾前方将领张义安、邓宝珊、弓富魁等人反对，连函张等撤军。结果，陈树藩与刘镇华镇嵩军乘机反扑，张义安在组织反击时中弹阵亡。从此，靖国军被迫转入节节退守的困境。

此后，胡景翼与曹世英电请唐继尧“派劲旅，由川援助”，并推戴唐为“滇川黔陕靖国联军总司令”[(7)]，同时派代表赴上海请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8月9日，于右任经孙中山同意回到三原，被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胡景翼改任第四路司令。靖国军改组后，对陈树藩再度发动攻势。但不久，胡景翼到渭南固市劝说姜宏模所部投归靖国军，为姜扣留，旋被陈树藩软禁于西安。期间，陈树藩百般笼络，并屡次逼写劝降信，均遭到拒绝。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陈树藩为缓和人心，同时慑于靖国军以焚烧教堂相要挟，将胡景翼释放。胡景翼回到三原，即就任陕西靖国军副司令兼总指挥，宣布继续讨陈，并通电全国称：陕事“决由陕人自行收束，以纾民祸”[(8)]。为此，他在着手整饬军队的同时，还注意从事地方建设和振兴教育。在地方建设方面，曾聘请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查勘泾阳吊儿咀水利工程。在振兴教育方面，除继续维持原有学校外，陆续创办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中学和富平庄里立诚中学。胡景翼这种精神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孙中山称誉他“所历弥苦，所志弥坚，诚可为晚近军人之励”，并勉励他说：“陕西险据中原，为南军入北之冲要，幸善守之，以俟时局之变化。”[(9)]

1921年5月直军阎相文、冯玉祥等部入陕取代陈树藩，同时对靖国军大加分化拉拢。在此情况下，胡景翼为了保存实力，竟不顾于右任的反对，于9月21日宣布取消靖国军名义，接受直军改编。10月，

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暂编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在接受改编中，虽一再表白说是为了“通权达变”，是“依人”非“降人”，但靖国军多数将领对此是不满的，有的斥责这是“断送靖国军前途”[10]。孙中山也致函责备：“以堂堂护法之师，受伪廷督军之改编，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11]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胡景翼率部随冯玉祥开赴河南，在郑州、开封、彰德等地与豫督赵倜军作战。战后，所部被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驻防京汉铁路北段顺德、彰德、正定一带。期间，胡景翼去北京，经人介绍结识了李大钊。自后“每遇辄洽谈竟日”，给其思想以重要影响。

胡景翼依附直系原是借此谋求更大发展，但直奉战争后吴佩孚不仅从服装、枪械到饷需多方加以限制，并时刻企图收编其部队，这使他对直系日益产生了不满。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同声反对，胡景翼于是感到“有再度革命之必要”，“欲有所举动”[12]。随后，他派李仲三、刘允臣、张璧等与冯玉祥密谋，同时积极与孙岳取得联系。经频频密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遂结成反直联盟。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利用吴佩孚在山海关与张作霖作战之机，在胡景翼、孙岳的密切配合下，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通电主和。25日，宣布组成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北京政变发生后，吴佩孚率残部退至洛阳组织反扑。11月7日，北京政府免去张福来河南军务督理职，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24日胡景翼率国民第二军南下，与吴军战于彰德、道口、清化间。12月6日胡景翼被特任为河南军务督办，12日进抵开封，宣布正式就职。接着，与镇嵩军憨玉琨部连续作战，至次年3月取得最后胜利。

胡景翼就任河南督办后，广为延揽人才，希图“以豫省为始

基”，“期成清明之政治”，然后“推行主义于全国”。于是，国民党人李根源、李烈钧、柏文蔚等数十人纷纷前往，共产党人李大钊、王若飞等和苏联代表团、军事顾问，也曾先后应邀赴汴。但为时不久，胡景翼即于1925年4月10日病逝。

胡景翼病危之际，曾口授遗嘱谈及“胸中素蕴”，说：“余对世界观念，以人类互相亲善，永久和平，期臻大同郅治之隆为指归。而欲达此目的，非打倒世界强权不为功。”(13)

主要参考资料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1949年版。

《胡景翼将军生平事迹》，未刊稿。

笔者访问胡景翼三弟胡景铨笔记。

---

(1) 关于胡景翼生年，向无明确记载。据《胡景翼将军生平事迹》称，胡生于1892年6月20日（清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今采其说。

(2) 王儒卿等编：《陕西乡贤事略·胡景翼事略》，陕西教育厅编审室1935年版，第166页。

(3) 《陕西乡贤事略·胡景翼事略》，第169页。

(4) 于右任：《胡公笠僧墓志铭》，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949年版，第102页。

(5) 叶雨田：《靖国军末期高陵事变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3辑，1963年版，第242页。

(6) 《胡景翼、曹世英讨陈檄文》，见邓宝珊等撰《张义安三原起义》，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

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1961年版，第50页。

(7) 《唐继尧致李根源电》、《李根源致唐继尧电》，存云南省档案馆。

(8) 《胡景翼痛南北纷争不已并发表政见之通电》，存云南省档案馆。

(9)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3页。

(10) 张钫：《关于陕西靖国军的回忆》，《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第65页；孙蔚如：《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靖国军旗帜》，《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第85页；叶雨田：《靖国军末期高陵事变见闻》，《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3辑，第243页。

(11) 陕西靖国军时期孙中山给邓宝珊的一封信，见《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扉页。

(12)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上），桂林三户图书社1940年版，第155页。

(13) 《胡景翼遗嘱》，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300页。

胡筠

汪仁泽

胡筠，字笔江，1881年4月27日（清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江苏江都县，祖籍江苏镇江。父亲是当地钱庄店员。胡筠少年时就读私塾，学习勤奋，练得一手颜体好字。十七岁时，在江苏泰县姜堰镇一家小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后，到扬州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店员。1910年到北京公益银号任职员。不久，经人介绍进北京交通银行任行员。

1912年5月，身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胡筠由于工作干练，处事敏捷，善于应变，逐渐博得梁的赏识，不到两年便被逐级提升为总行稽核、分行副经理、经理之职。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仍然继续筹措军饷，通过梁士诒控制的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引起京津挤兑风潮。5月12日段祺瑞内阁悍然下令停止中、交两行纸币兑现，更引起慌乱。上海等地中国银行拒不奉行，照旧兑现付存。在此期间，胡筠消息灵通，曾与财政当局以及银号经理人等相互勾结，利用市面上兑换率的时高时低，从中获取暴利，使中小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受害匪浅。京、津金融界纷加指责，胡筠难以存身，遂辞去交通银行职务，挟资南下。

胡筠到上海后，经史量才、黄炎培介绍，结识了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富商黄奕住。当时，黄奕住旅外多年，备受当地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因此怀着振兴祖国实业的宏愿，拟在上海开办银行，经与胡筠晤谈十分投机，遂全权委托他代为筹组。黄奕住初拟出资一千万元独资经营，胡筠告以国内商业银行一般资金皆在五百万元以内，且以股份

有限公司责任有限为宜，黄奕住欣然同意，遂定资本额为五百万元。黄奕住认股三百五十万元，余股由胡筠招募，史量才等也参加投资。不久，向北京政府登记注册，因系中国金融、工商界人士与南洋华侨合营，故定名为“中南银行”。胡筠以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为辞，经多方疏通，使中南银行获得钞票发行权。1921年6月正式开业，总行设上海。黄奕住、胡筠、史量才等七人组成董事会，黄奕住任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掌握全行经营业务。翌年，增设天津分行及北京办事处，由胡筠在北京交通银行时的亲信旧友分任经理。为了吸收南洋一带华侨汇款及侨眷存款，中南银行又增设厦门、泉州、鼓浪屿分、支行，每年的盈利额竟超过了京、沪各行。胡筠又以高薪聘请法、德等外籍顾问，与外国银行建立关系，开办对外汇兑业务，盈利颇丰。此后中南银行在胡筠的筹划下，分别在汉口、广州、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重庆、香港等地增设分、支行。由于中南银行资力雄厚，且发行纸币，在胡筠的积极经营下，资金运用灵活，营业扶摇直上，声誉在私营商业银行中列于前茅。

胡筠经营行务，特别注重信用。为使中南银行扩大社会信誉，于1921年冬与金城、盐业、大陆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1)]。在第一次联营会议上，胡筠提出：“中南银行为慎重政府赋予发行权及维持社会上钞票流通之信用起见，兹拟将中南钞票规定为十足准备。”[(2)] 次年又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共同承担以中南名义发行钞票的兑现责任，因有华侨股东为后盾，中南发行的钞票深具社会信用。1923年，胡筠又发起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各投资二十五万元组成“四行储蓄会”，总会设上海，京、津等地设分会，以“保付利息”和“存储者得分红利”相号召，招揽储户存款，吸收社会游资，扩大业务。在四行联营机构中，由四行总经理胡筠、吴鼎昌、周作民、谈荔孙四人任执行董事，逐年轮值主持会务。为取信社会，四行准备库设特大水泥库房，存储每箱五千枚银元的大量现洋，供人参观，以示储备充足。后来还出资五百万元在上海市中心建造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为远东当时最高的大厦，很受国内外人士的瞩目。

1927年，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因贷给协和贸易公司的巨额贷款220万元发生倒账，原领总行的全部资金150万元亏赔尚不足数，谣诼随之而起，几濒于危。胡筠得讯后，急命沪、厦两行筹款接济，稳定了危局。但中南银行经此打击，一时声誉大落，沪总行及各地分、支行业务随之衰退。胡筠遂商请黄奕住增资250万元，并对外声称华侨股东尚有资金1250万元备用，董事会连续六年决定不发股息，从而使中南重振信誉，业务逐步得到恢复。

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胡筠曾参加江浙资产阶级一伙予蒋以财政支持。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胡筠设法结交党政大员，每遇财政要员来沪，即殷勤招待，盛情迎送。后经钱永铭等人介绍，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结识，凭其善于应酬、手腕灵活，关系渐趋密切。1931年，胡筠特意提拔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交谊甚笃的该行职员张质夫为汉口分行副经理，受到省方照顾，分行存款激增。1933年交通银行总行改组，胡筠得到宋子文的支持，兼任该行董事长。1936年4月，交通银行股东大会改订章程，将原章程规定总经理“商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改为“秉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一字之易，总经理权力削弱，董事长权力大为加强。从此，胡筠成为交通银行的当权人物。

此后，胡筠在金融界的地位日益显赫。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收回私营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胡筠在收回中南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时，串通财政大员，上下其手，获取厚利[(3)]。1936年宋子文系官僚资本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联合中国、交通、金城、上海等银行投资成立“中国棉业公司”，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地，控制花纱布的产销及储运。宋子文自任董事长，胡筠等人分任常务董事。此时他还兼任新华、金城、江苏典业等银行董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战事激烈，胡筠曾随财政部先赴汉口，后于1937年10月离汉去香港。1938年8月，胡筠接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电邀出席有关会议，24日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由港乘飞机赴

重庆。胡、徐所乘客机被日方误为孙科座机，起飞不久即在广东上空遭遇日本军用飞机截击，机坠人亡。

---

(1) 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家银行联营后，因属于北方金融集团，故被称为“北四行”。

(2) 刘效白：《侨商中南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3)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规定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外，其他银行已发行或已印未发行的钞票，统由财政部限期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停止流通；并饬各行将法定准备金按现金六成、公债券（或房地产）四成的比例上缴。由于后者系照市价计，胡筠在作价时买通财政当局大员，获取大笔钱财。

胡琏

徐乃杰　黄中岩

胡琏，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1907年11月16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生于陕西华县会同坊北会村农家。幼年入塾读书，十二岁入华县城读高等小学，1924年毕业。因家境无力升中学，乃与族人胡云龙同去河南投军，在国民二军冯子明旅任连文书。其后接到表兄高尚杰从广州来信，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经人介绍前往该校设在开封的秘密招生处报名，改名胡琏，经考试录取后于1925年秋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七连学习。不久，加入国民党和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10月，胡琏黄埔军校毕业，随后投入北伐作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上尉连长。1928年秋，陈诚任国民党陆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代三十一旅旅长，调关麟徵任该师第六十一团团长，胡琏随关前往第六十一团任连长。1930年中原大战时，陈诚率部在河南商丘阻击冯玉祥部，遭到冯军的猛烈攻击，第十一师官兵伤亡甚众，纷纷溃逃，唯有胡琏指挥的连队仍坚守阵地，因而受到陈诚的赏识。是役结束，胡琏升任营长。

1931年至1934年，胡琏追随陈诚参加国民党军对红军的第三、四、五次“围剿”。1932年，胡琏任第十八军特务营营长，翌年升任该军特务团团长，同年又调任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团长。1935年，该部开赴浙西南，继续进攻红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开始，罗卓英率第十八军参加此役，胡琏奉命率第六十六团在沪北罗店地区阻击日本侵略军，一昼夜打退敌军十几次进攻，战况激烈，敌我双方皆伤亡

惨重。由于我军英勇抗击，使日军在罗店地区的进攻受挫。9月初，日军不得不改从东北方的吴淞、宝山一带进攻上海市区。这年10月，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第一一九旅旅长。

1938年初，第六十七师开赴皖北休整。不久该师奉命进入苏南，扰乱敌人后方。胡琏率部在苏南开展游击战，屡创日军，该旅第四〇一团曾袭击宜兴、溧阳之敌，使南京、上海间的敌军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威胁。同年初夏，武汉会战开始，我军为了阻遏敌军利用长江水道进行军运，第六十七师奉命开赴皖南长江沿岸配合我国海军特种部队在长江水面布雷，以封锁江面，阻挠敌舰艇西进。胡琏率所部开赴皖南南陵、青阳一带执行此项任务。中国海军特种部队在陆军的配合下，1938年炸沉日军舰艇和船只六十余艘，打击了敌人的军运，为我军保卫武汉起了牵制和阻滞敌人前进的作用。

1939年，胡琏部开赴湖南参加了第一次湘北会战等战役，同年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副师长。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进攻鄂西重镇宜昌，第十一师奉命由长沙驰援宜昌北面的门户当阳。是役胡琏主张坚守当阳，并协助师长方靖指挥所部击退敌人的进攻，使由川东驰援的第十八军先敌进入宜昌，为保卫宜昌赢得了时间。1941年胡琏调福建，升任第七十军预备第九师师长。1942年，方靖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胡琏奉调回第十一师任师长。

1943年，胡琏率部参加鄂西石牌保卫战。这年5月，日军发动鄂西攻势，分两路进攻鄂西，矛头指向石牌。石牌位于长江南岸，处于宜昌南津关与莲沱之间，是当时中国军队扼守长江的第一道关口。胡琏奉命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石牌要塞。27日，胡琏率第三十一团尹钟岳部把来攻的日军吸引到要塞东南群山环抱的北斗冲谷地，将敌军包围并歼其大部，残敌逃遁，从而打退了敌人首次进攻。其后，胡琏采用攻守结合的战法顽强地坚守阵地，一再打退敌人的进攻。胡琏能临危不惧顽强作战坚守阵地，受到上级的嘉许。随后第七十九军、第六十六军等援军赶到，在宜都、聂家河、长阳一带猛烈击敌，进攻石

牌要塞的日军虑及后路被切断，乃于31日全线撤退，我军则跟踪追击，石牌要塞解围。鄂西之役获胜后，胡琏因功获“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1944年初，胡琏带职调往重庆“委员长侍从室”任参谋，以示蒋介石对胡琏的亲近并对他进行考察了解。这年8月，胡琏升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5年四五月间，在保卫湘西雪峰山的作战中，胡琏奉命率第十八军驰援湘西，协助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抗击日军。该军截断敌人进攻湘西的大动脉湘黔公路，会同第四方面军包围敌军，然后穿插攻击，将敌击溃。是役结束，胡琏因功授陆军少将军衔。

同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胡琏所部归王耀武指挥，主持长沙、岳阳地区的日军投降。9月，第十八军奉调开往武汉地区驻防。10月，胡琏获“忠勤勋章”和四等“宝鼎勋章”。

1946年初，第十八军整编为第十一师，胡琏改任师长。6月26日，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胡琏也紧跟蒋介石、陈诚投入反人民的战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琏在战场上一再败北。同年9月，胡琏所部整编第十一师、邱清泉第五军进攻鲁西解放区。第五军被阻于龙堌集不能前进，整编第十一师则在张凤集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一个团。是年冬，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及戴之奇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苏北解放区。12月17日，第六十九师被中原野战军包围于苏北宿迁县以北的仁和圩、嶂山镇一带，胡琏见势不妙，迅速龟缩宿迁地区固守。

1947年春，胡琏率部参加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3日，整编第十一师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于新泰地区。尔后，蒋军第三兵团赶来增援，华东野战军乃撤围而去，这样胡琏才逃脱被歼灭的命运。7月，整编第十一师在鲁中的临朐、南麻一带与华东野战军第二、三、七、九纵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胡琏因此曾获国民党一级“宝鼎勋章”。这年夏秋，胡琏奉命率部由华东转赴华中，驻兵平汉

路南段，并进攻鄂豫皖解放区。是年冬，蒋介石任命胡琏为整编第十八军军长并委以重任，经常要他指挥几个整编师联合作战，被称为“胡琏兵团”。蒋介石对胡琏所部寄予厚望，在内战爆发的两年间先后写了约十封亲笔信给胡琏，希望他能在战场上改观战局，创造“奇迹”。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一次解放洛阳战役、宛东战役和豫东战役，胡琏所部虽作战频繁，也未能挽回蒋军在这些战役中的失败。同年9月，整编第十八军番号被撤销，胡琏所率部队并入国民党第十二兵团，黄维任该兵团司令，胡琏任兵团副司令。南京国防部授予胡琏陆军中将衔。10月底，胡琏因患牙病以及其父病危离队去武汉。11月25日，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包围于皖北双堆集，胡琏曾两次由南京飞入重围，传达蒋介石的“指示”，为部队打气。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突围时被解放军全歼，胡琏因乘战车侥幸突出重围，逃回南京。

1949年2月，胡琏被南京国防部任命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招集国民党在长江北岸的溃散官兵及在江南补充新兵。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后，蒋军第二编练司令部改为第十二兵团，胡琏任兵团司令，他率兵团南窜，9月初撤至广东潮汕地区，尔后又由海上撤往金门。10月末，胡琏第十二兵团及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在金门岛西北古宁头村阻挠人民解放军登陆金门。12月，他又兼任“福建省主席”。1950年初，台湾当局将第十二兵团改为“金门防卫军”，胡琏任“金门防卫军司令”。1951年，他又兼“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1954年夏，胡琏调往台北改任蒋军“第一军团司令”。1957年，他去金门再次出任“金门防卫军司令”。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次日金门蒋军向福建大磴岛轰击，此次金门炮战持续46天。在人民解放军猛烈炮火轰击下，胡琏所部伤亡惨重。同年冬，胡琏被调往台北，任蒋军“陆军副总司令”。1964年至1972年台湾当局派胡琏为“驻越南大使”。1972年12月，胡琏返回台北，任“总统府”战

略顾问。1974年秋，他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专攻宋史和中国现代史。尔后，因患病曾赴日本、美国疗养和旅游。晚年爱好文史，喜读古书，著有《古宁头作战经过》、《泛述古宁头之战》、《金门忆旧》和《越南见闻》等书。1977年6月22日，胡琏因患心脏病在台北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刘毅夫：《我所知道的胡琏》，《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1977年。

徐友春等：《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胡若愚

荆德新

胡若愚，又名学礼，字子嘉，云南罗平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年时先入私塾就读，后转入罗平州两等小学堂毕业。

1910年7月，胡若愚考入云南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次年，云南同盟会组织新军等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他参加了此次起义。1912年初，胡若愚离滇前往江西，任江西都督府警卫连连长。“二次革命”前，因奔父丧回滇。1914年1月，胡若愚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将校班（后称该校第六期）。结业后曾任补充队中队长、营长。护国运动中，广东督军龙济光在袁世凯的指挥下，派兵经桂犯滇，一度占领个旧。胡若愚参加迎战，克复个旧，被擢升为步兵第十一团团长。

护国运动后，滞留四川境内的滇、黔军与川军矛盾重重。1917年，唐继尧借护法之名增兵四川，胡若愚团奉令入川增援，终于打败了川军刘存厚。1918年，胡若愚升任旅长。

1920年，滇、黔客军被川军熊克武等部战败，滇军在顾品珍指挥下离川回滇。1921年2月，顾品珍等起兵倒唐。驻扎云南大关县的胡若愚率兵援唐，军至昭通，为守备司令蒋光亮等部所阻。胡若愚乃乘机响应孙中山北伐定桂的号召经黔入桂，广东政府派他为先遣军司令，令所部往击在桂林的沈鸿英。胡部获胜，占领桂林。在桂林，胡若愚与出走至香港的唐继尧取得了联系。

1922年春，唐继尧率在桂滇军回滇逐顾，胡若愚任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副总指挥。不久升前敌总指挥，率张汝骥、龙云两个梯团。经唐事先收买了土匪，里应外合，遂将顾品珍击毙在陆良境内。唐继尧再

次督滇，胡若愚调任滇中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驻昆明，后改镇滇南，移防蒙自。1923年，川军发生内战，唐继尧支持熊克武一方，派胡若愚率部经黔东入川，配合川军占领重庆。同年12月，另一方的杨森等由涪陵反攻，川、滇军失败，同退贵州，胡若愚部西移毕节。

1925年初，唐继尧与广东的陈炯明并与驻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等相勾结，派出南北两路滇军向桂、粤出动，企图搞垮广州政府。南路滇军龙云于2月底占领南宁，旋为桂军黄绍竑和驻粤滇军范石生部所围困。胡若愚奉命解围，兼程由毕节赶至南宁。杨希闵等人的叛乱很快被平定，桂军向南聚集。7月，胡若愚等不得不放弃南宁回云南。

由于唐继尧排斥胡若愚等非嫡系势力，广西战败后又以裁军为名削弱他们的实力。1926年秋，在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的形势下，时任蒙自镇守使的胡若愚，与昭通镇守使张汝骥、昆明镇守使龙云、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达成了反唐协议。1927年2月6日，胡若愚等四镇守使在蒙自发出讨唐通电，并齐集宜良，准备进兵昆明，唐继尧被迫下台。3月8日，胡若愚就任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会主席。

“二六”政变后，胡若愚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军长，但拒绝广州国民政府派人到云南任职。唐继尧倒台后，四镇守使因权力之争矛盾十分尖锐。胡、张等联合，于同年6月14日夜突向驻昆龙云部发起攻击，龙部不敌，辗转退至下关。龙云在住所受困，被缴械囚禁。7月23日，龙部卢汉等师反攻获胜，胡若愚只得弃城挟龙云退出昆明。行至昆明以东二十公里的大板桥，胡若愚为了摆脱龙部的追击，与龙云签订了《板桥协定》[(1)]，将龙云释放回昆明。

但是，双方并不打算实行这个协定。胡若愚率部退到昭通，急欲卷土重来，乃通过与四川的刘文辉和贵州的周西成签订的《金沙密约》[(2)]，共同组成滇川黔讨龙军。10月，胡、张两部与周西成派出

的中路黔军在陆良会合。12月，龙云在打败并收编了唐继尧余部后，迎击并将胡、张部和周西成部黔军围困在曲靖城中。1928年1月，胡若愚等突围，溃不成军。黔军左路也失败于陆良马街，川军一旅进至寻甸中途退回。胡、张在云南不能立足，胡若愚前往川南依附刘文辉，张汝骥东至贵州投靠周西成。

1929年春，蒋、桂战争发生。为了夹击桂系，蒋介石通过刘文辉、刘湘，劝说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化除前嫌，入黔合击附桂的周西成，并委胡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二师师长，张为第十三师师长。但胡、张却在川南会合了戍守昭通且已叛龙的师长孟坤，以胡为靖滇军司令进攻昆明。7月，靖滇军与龙部在昆明西郊的碧鸡关发生大战，双方伤亡各在数千人以上。胡若愚等失败，西撤至滇、康结合部一带。

1930年初，胡若愚率部分文武官员经康定到成都，随刘文辉积极响应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讨蒋行动。刘文辉给胡若愚一个旅的编制，以其所带军官为基础招兵成军。9月，反蒋活动失败，胡若愚被通缉，乃潜往上海租界。他托人向蒋介石疏通，获准出国。蒋要胡至京晤面。胡恐自投罗网，思虑再三，终不敢前往。

1931年，粤、桂等各方借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为由，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通电反蒋。胡若愚取道香港至穗，参与反蒋。李宗仁令胡恢复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的番号，驻防百色。1932年，龙云多次借口胡部在百色对云南有威胁，要求将他调走，否则云南大烟将不经广西出口。李宗仁乃改胡部为独立师，移防梧州。不久，胡师并入桂军，胡若愚接受李宗仁所给出国费，于1933年赴德学习军事。云南人杨杰率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代表团到欧洲，经杨杰请准，胡若愚以随员身份去过法、苏等国。

1936年夏，胡若愚经日本回国，在香港编写出版过《大军统帅》、《现代陆军的编制》等书。1937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

部任中将参谋。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若愚被派往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代理参谋长。1938年1月，调任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鲁南参加过对日作战。此后，在程潜的第一战区任过高参。1939年后，改任参谋部所属军训部部附、军委会校阅委员会第二组组长。1942年，出任兰州军官学校校长。

抗战胜利后，胡若愚退役。1948年4月，他作为罗平县的国民大会代表，极力在云南代表中奔走活动，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争取选票。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仍不断拼凑新兵团。1949年2月，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升为第十一兵团司令，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鲁荐胡若愚为该兵团副司令。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鲁兵团南逃衡阳。9月，白崇禧的桂系主力在衡宝战役中被歼，鲁兵团奉令改为左右两个纵队向广西撤退，鲁道源为右纵队司令，领兵三个师，继任第五十八军军长；鲁元为左纵队司令，领兵六个师。后鲁元患病住院，胡若愚接任其职。10月中，广州解放，人民解放军疾速西进，围歼国民党军残部，桂系余部纷纷夺路南窜。11月下旬，胡若愚率部逃至桂东南的岑溪、容县一带，26日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胡若愚中弹身亡。

---

(1) 据曾在胡部任职多年的彭稚如（秘书长）说，《板桥协定》的主要内容为：（1）胡若愚放弃云南政权，由龙云接管；（2）胡、张二部出师北伐；（3）龙云接济胡、张外出部队的饷弹和补充兵员；（4）龙部不得派兵追击胡、张二部。

(2) 据胡若愚一方参与签订《金沙密约》的谭善洋说，该密约订于1926年夏，主要内容有“互相援助，各自夺取本省政权”等。上述内容载《谭友佛

诗文集·稿存·云南内部情形》，未刊。友佛为谭善洋的字。

胡适

耿云志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原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上海。他的父亲胡传曾做过淞沪厘卡总巡和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

胡适四岁丧父，由母亲送他入乡塾读书。约在八岁时，偶然读到《水浒传》，从此对白话小说特别着迷。这给了他最初的白话文学的熏陶。

1904年，胡适离开绩溪到上海入梅溪学堂，次年转入澄衷学堂。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西方思想。严复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成了他最喜欢的读物。而梁启超的论著尤其令他倾倒。

胡适在澄衷学堂就读一年半，于1906年暑期考入中国公学。这个学校是上年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则”愤而归国自办的学校。学生中有一个组织叫做“竞业学会”，骨干分子多是革命党人。会长钟文恢恰与胡适同住一室。在他的邀请下，胡适为该会办的《竞业旬报》担任撰稿，从第二十四期起又接任编辑。因而使他得到早期的文字训练。

1908年夏秋间，中国公学为修改校章事发生激烈风潮，有数百名学生集体退学另外创办起中国新公学。胡适在新公学里担任低年级的英文课。1909年秋冬，在各方调停之下，新公学复与旧公学合并，胡适不屑回旧公学去，开始自谋职业。

1910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考取了“庚款奖学金”留美。8月16日，

他与同被录取的学生共七十人从上海登轮赴美。9月，进入美国绮色佳（今译依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读农科。1912年初改学文科。从此，胡适对文、史、哲诸科均极用功，复以余力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运动，讲演尤为所好。他经常给当地报纸写稿，曾在一次征文中获奖，受到当地舆论赞扬。其风头之健，可见一斑。

1914年夏，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继续留校研读。次年9月始离开康奈尔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杜威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对哲学方法的高度重视。杜威对于有系统的思想过程的分析，使胡适对中国古典史学的考证方法有了崭新的理解。此外，杜威的和平改革的政治哲学也成了对胡适有终生影响的一个方面。但在哥大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为其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由于早年受过白话文学的熏陶，到美国之后又受到西方写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胡适对中国文学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凡属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而那些古奥晦涩的作品却大多是徒具文辞而缺乏真实的内容。由此他提出，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他主张，写诗作文都应尽量用白话，使人明白易懂。在他看来，这正是文学革命的起手功夫。他的这些见解没有获得同学诸友的赞同，其中有个梅光迪更是激烈反对。但朋友们的反对没有使胡适泄气，相反，却加速引发了他文学革命的自觉心，并逐渐形成有系统的主张。

当胡适在美国与朋友们辩论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他的同乡陈独秀正在国内主编《青年》杂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向旧文化发起挑战。陈独秀曾多次托人向胡适邀稿。1916年8月21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他关于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陈独秀复信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杂志。于是，胡适便以八项主张为纲，逐条发挥，作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青年》自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上。其八项主张

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方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陈独秀趁热打铁，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激烈的革命宣言。于是震动全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此揭幕。

1917年5月，胡适交上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进行了答辩。因主考导师们多对汉语、汉学很隔膜，致使论文未获圆满通过。胡适期之数年的博士学位未能到手，但由他“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时在国内已如春潮澎湃。胡适感到，他的事业，他的未来，已经在向他招手，遂决计束装回国。

7月，胡适回到国内，当即受到北京大学的聘请，在家小住月余便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便与《新青年》主编、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共事，并很快结识了北京的一派新人物，年高德劭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他们共同拥戴的长者。是年12月，回里与江冬秀女士完婚，实践了悬隔十四年的婚约，既安慰了寡母，又邀得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

1918年初，《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他们以此为阵地，复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将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全国。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人物。

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斗争最集中、最激烈、最牵动社会注意力的是白话与文言之争。白话文因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受到衷心的欢迎。反对文学革命的人，无力与白话文相匹敌。遂杜撰出一个堂皇的“理由”，声称，文学革命只应革其内容，不当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为文学内容的变革创造条件。“只有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

运输品。”[1] 胡适看到，要真正解决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这个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论述了创造国语的新文学的方法。此文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2]。

胡适还大力提倡短篇小说和戏剧改革，并自己创作了一篇新式独幕剧《终身大事》。但胡适对新文学的创造贡献最大的是新诗的尝试。1919年10月，他发表《谈新诗》，文中提出关于新诗音韵的崭新见解，打破了传统成见，为新诗的成立提出了可靠的理论根据。著名新诗人朱自清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了新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3]。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文学史家陈炳堃评论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于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4]《尝试集》受到了包括从梁启超到鲁迅，知识界绝大多数稍具新思想的人们的欢迎，但却遭到学衡派的激烈攻击。反对派的攻击没有阻止新诗的发展。《尝试集》不久即再版，而且跟着有一大批年轻的新诗人出现。胡适热情撰文向世人评介他们的作品，孤独的“尝试者”有了战友和伙伴。

胡适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主要的缺点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后来他竟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创造新文学的条件。他过分低估了中国文学的价值，低估了新文学发展的巨大潜力。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为之激动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解放个性，发展个人才能的主张。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彻底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虽不能实

现，终不失为一种正义的抗争。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所鼓吹的“重新评定一切价值”的口号，是“五四”时期在思想原则上所表现的真正激进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可以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乃至政治、教育制度等等的看法。胡适对“孝”的传统观念的否定，对女子贞操问题的异议，以及关于女子解放、节制生育的鼓吹等等，都有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

胡适还积极致力于教育改革。他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创办了哲学研究所，开创大学的研究风气。他提议组织各科教授会管理教学，树立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倡议实行选科制，鼓励青年学子的主动精神。他还参与创办其他研究机构，鼓励、赞助出版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等等。这些对于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学生的思想进取，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都有不容抹杀的意义。此外，他对于全国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新学制的确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1919年2月，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这本书以其观点和方法的新颖而引起学界的极大注意。他以哲学方法为中心线索，阐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演进。蔡元培指出此书有四大优点，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5)]。此书出版两个月即再版，以后又多次重版，足见它是深受欢迎的。它为胡适在学术上奠立了不拔之基。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于中国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他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7月）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以追迹古史传说演变的方法，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开创了新史学的一个流派。胡适的另一篇《〈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则第一次打破清末以来的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的迷雾，把《红楼梦》的研究引导到正当的学术范围内。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了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颇有跃登龙门之概，一时都成了畅销书。而这些书的畅销

也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

胡适对小说考证的兴趣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联系的，这个目标就是整理国故。胡适认为，整理国故是创造新文化的一种必要工作。所谓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6)]。

胡适在倡导整理国故时，提出疑古的口号。他鼓励青年学者们以怀疑的态度去辩证古史。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7)]。他这种怀疑与批判地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受到了复古派与国粹派的攻击。

自从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表《欧游心影录》以后，守旧派又有抬头之势。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发表《人生观》的讲演，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戒惧心理。胡适发表《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氏的主观主义与非历史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别，最基本的是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同，中国将来也终必要走上“科学化与民治化”的路。胡适又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长篇序言，批评梁启超与张君劢，认为他们的言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倒车。他的文章所采用的是实验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难免有其局限性，但对于抵制思想界的复古逆流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胡适是实验主义（亦即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自己从不讳言，他做学问、谈政治，乃至做人做事，都是实行实验主义。1919年春，胡适发表长篇论文介绍和发挥实验主义，以后又多次在各地发表演讲，加以鼓吹。在五四时期，实验主义的客观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它的怀疑的倾向、大胆尝试的精神、重视逻辑的思想方法等等，在当时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否认客观实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这种主

观唯心主义倾向则无疑地会发生某些负面影响。

胡适刚回国的时候，曾暗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8)]。但五四运动把尖锐的政治问题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看到李大钊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革命制造舆论；一大批青年愤激于军阀专制，国家昏暗而醉心无政府主义。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1919年7月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中国的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不可能凭借某种主义一下子“根本解决”。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而用主义来团结群众向一个总目标做去，是改造国家的正确途径。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派别的初次交锋。

1921年6月，胡适同其好友丁文江、蒋梦麟等组织了一个叫“努力会”的小团体。次年5月办起《努力周报》。1922年5月13日，胡适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由蔡元培、李大钊等十六位大学教授署名，提出以“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的起首目标，曾引起广泛的讨论。10月，胡适又发表《国际的中国》，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声称，中国此刻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9)]。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针对时局提出过许多改革的主张，对北洋政府的举措也有一些很激烈的批评，但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效果的。1923年10月，《努力周报》停刊。

1925年1月，胡适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遭到进步舆论的激烈批评。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曾与罗文幹联名致信当时的外交总长沈瑞麟，提出两步交涉的主张：第一步，先解决惨案本身，即惩凶、道歉、赔偿等。第二步，修改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而他反对罢课的言论则受到进步学生的激烈批

评。

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参观访问了三天，对苏俄产生颇为积极的印象。在英国停留半年，年底离英去美国。在那里，他补领了被拖十年的博士学位，于1927年4月乘轮回国，并卜居上海。这年6月，他被推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由中美双方派员组成，简称中基会）的董事。从此，除短暂的间断之外，胡适一直在这个董事会任职，这使他在教育学术文化界得以发挥很大的影响。8月，胡适受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次年4月，受任中国公学校长。

胡适在欧期间，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卷子，得到一些禅宗史的材料，回国后便陆续整理研究，相继写成几篇禅宗史的论文，并于1930年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

胡适由美回国时，恰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尽管胡适路过日本时作了拥蒋的表示，但回国后，国民党当局并不很信任他。1929年春，因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有人准备提出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的问题，胡适以其严重蔑视法律与人权，遂接连写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文中直接牵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引起当局的大不满，特饬教育部对胡适发出警告；又组织国民党人写文章回击，出版专辑《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并在报刊上发表消息、宣言之类，大攻胡适。最后且下令查禁胡适的文章。

其实，胡适并不想与国民党当局作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国民党“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10)]。

1930年11月下旬，胡适携眷北上，重返北大任教，后来并担任

北大文学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成了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谅解与结合。那时，蒋介石集团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正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政治上很被动。而在这个问题上，却得到了胡适的充分理解与支持。1932年5月，胡适邀集友人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等创办《独立评论》（周刊），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内外方针，宣扬对日妥协、对内“统一”。所以，《独立评论》的创刊，是胡适在思想政治上与蒋介石集团靠近的一个重要标志。次年2月，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决裂，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原来，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带有反蒋性质的民权保障同盟。胡适亦加入，并于1933年初创立北平分会，自任主席。2月初，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得同盟总部同意，发表了一份揭露北平反省院酷刑虐待的材料。胡适认为这个材料是伪造的，要求总部负责更正。总部当然不能同意。于是，胡适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公开反对总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接着又对《字林西报》发表谈话，继续批评同盟总部的宗旨。宋庆龄不得不发电给胡适，请其“自由出会”。此事过后仅一个月，汪精卫就致信专诚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经过数日踌躇之后，胡适回答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并表示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1)]。

1933年6月，胡适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10月回国，11月间，发生反蒋的“福建事变”。胡适发表文章批评事变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有危害国家的嫌疑”。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影响迅速推及全国。胡适表示有限度地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罢课。他手拟《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指责学生罢课荒废学业，滋生事端，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胡适致电李、白，指责他们是“掀动内战，危害国家”。

这年7月，胡适再度出国赴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12月初回到国内。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本其一贯拥蒋的立场，打电报给张学良说：“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指蒋介石——引者）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2)] 随后，又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成为国民党当局的主要宣传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中国。次日，胡适南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谈话会。会间曾与蒋、汪面谈多次，仍主张做“最大的和平努力”。9月，受蒋介石之托，胡适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活动。

从1932年到1937年，胡适除在北大任教，主要精力用于编辑《独立评论》。在这个刊物上，他共发表论文一百一十八篇（不包括《编辑后记》及游记等文字），其主要内容一是宣扬对日妥协，二是主张效法英美政制。此外还发表了几篇讨论中西文化的文章。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认为十教授的《宣言》“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是以折中论反对西化论。他主张中西文化应“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这显然又同他宣布赞成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有矛盾。所以，不久他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而以“充分世界化”代替之。自然，这个提法仍不够精准。

1936年11月间，《独立评论》以文字触犯宋哲元被勒令停刊。时胡适尚在国外。回国后，经一番活动并正式向宋哲元道歉后，于

1937年4月复刊，至“七七”事变停刊。

由于办刊物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些年胡适的学术成绩不佳。长篇著述完全没有，稍可足述者只有几篇论文。1934年5月写成的《说儒》一文可算是这一时期胡适治学的代表作。文中对孔子及初期儒家的历史地位做了较高的评价，受到郭沫若、江绍原等人的批评。

胡适于1937年9月到美国，1938年7月离美赴欧洲。不久，在蒋介石敦促下，决定出任驻美大使。9月离欧，10月初到华盛顿赴任，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他任大使四年，至1942年9月8日卸任。以后继续留居美国，曾断续地在大学和图书馆担任过工作。

1945年9月，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聘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胡适回国就任。1946年11月，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12月24日夜，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引起师生及各界极大愤慨。学生罢课示威，抗议美兵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12月30日，胡适赶回北平，在接见记者时，一方面表示理解学生、教授们的愤慨，同时却强调“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力图掩盖美国对华侵略的政治问题 (13) 。

1947年初，蒋介石托傅斯年转达，拟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2月6日，胡适写信给傅斯年说，他“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因为只有处于在野的地位，才容易帮政府的忙，“替他说公平话”来支持他。若加入政府，便“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了 (14) 。

5月间，胡适邀同北大、清华等校一些教授组织“独立时论社”，针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各人撰写文章交全国各地有关系的报纸发表。陆续入社的有四十多人，建立联系的报纸有三十八家。胡适以此在舆论上帮蒋介石的忙。8月下旬，胡适到南京筹备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曾面见蒋介石，向他提出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11月，胡适被推

为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2月中旬，为出席中基会的会议再到南京。蒋介石托王世杰劝他“改行”从政。胡适与王世杰长谈多次，终于婉辞。

1948年3月下旬，胡适到南京出席中研院评议会会议，当选为第一届院士。接着出席“国民大会”，选举所谓“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其时，蒋介石为应付政治困境，曾敦劝胡适参加竞选总统。胡曾略为所动，但国民党内一些有影响的人持反对意见，事遂寝。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向前发展，国民党的统治面临彻底崩溃。胡适在北平电台发表反共讲演，然后又到武汉、杭州等地讲演。他回到北平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包围了这座城市。12月15日，蒋介石派专机将胡适接到南京。

1949年4月，胡适受蒋介石之托，启程赴美活动“美援”。在海轮上，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为拟议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篇是为将要出版的陈独秀晚年论文与书信写的序言。

1949年4月21日，胡适到达美国旧金山。两天后，南京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垮台。一年后他在给沈怡的信里写道：“这十几年中，只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只有他们比较地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15] 他认为杜鲁门、蒋介石们没有想清楚他们要做什么和该怎样做，糊里糊涂地输给了共产党。

1952年12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次年1月17日离台去美。1954年2月，为参加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胡适再度回台，4月5日复去美国。1955年12月，胡适着手撰写《丁文江的传记》，这是胡适一生所写的四十多篇传记性文字中最长的一篇。

1957年11月，胡适被任为中研院院长。次年4月，回台就任。1959年，又出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是年7月，他前往夏威夷大学参加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发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讲演。会后，他接受该大学颁赠的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得到的第三十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7月，为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赴美。在这次会议上，胡适发表《中国传统与将来》的讲演。大意说，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这个核心是永不会消失的。他并宣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这个核心是不能相容的。

1961年11月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对传统文化又有激烈的批评，引起不少人的反对。不久，以心脏病复发入台大医院治疗。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休养，但在2月24日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心脏病再次猝发，不及救治而死。

---

(1)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1，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279页。

(2)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页。

(3)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页。

(4) 陈炳堃（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27页。

(5)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3页。

(6)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4，第162页。

(7)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23页。

(8)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3，第96页。

(9) 《胡适文存》二集卷3，第128页。

(10)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据手稿）。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8页。

(12)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45页。

(13) 《申报》1946年12月31日。

(14)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73页。

(15) 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39页。

胡嗣瑗

张学继

胡嗣瑗，字晴初（亦作琴初），又字愔仲。贵州贵阳人。1869年（清同治八年）生。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以候补道员身份出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胡嗣瑗以清朝遗老自居，他寓居天津租界，与陈宝琛、杨寿枏、陈曾寿、郭则沄等遗老组织“须社”，诗酒唱和，排遣时日的同时，也是以此等待复辟机会的到来。

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都督。冯国璋虽然是袁世凯手下“北洋三杰”之一，但他依恋故主，具有强烈的复辟情结。他出任直隶都督，成为坐镇一方的诸侯后，先后将清朝遗老胡嗣瑗与保皇党骨干麦孟华、潘若海等延揽到自己幕府中，为他奔走四方，策划复辟活动。康有为后来写信给冯国璋说：“公自克汉阳，而功不得竟，乃心皇室，日谋复辟。吾门人麦孺博（孟华）、潘若海入公幕府以来，偕胡愔仲所日夕与公谋划者，复辟也。”[(1)]

1913年春，盘踞山东兖州的辫子军统帅张勋在宗社党及清朝遗老的策动下，准备发动复辟行动。张勋在发动复辟前，曾派遗老温肃前往天津联络冯国璋。温肃到达天津后，胡嗣瑗介绍温肃晋见冯国璋，向冯传达宗社党首领、前恭亲王溥伟的意见以及张勋的行动计划，冯“允为赞助”[(2)]。但张勋的行动计划很快被人告发，袁世凯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了这次复辟行动，冯国璋在袁世凯施压下，也未敢公开表示响应。

1913年12月，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次年改为江苏将军）后，聘请胡嗣瑗为都督府咨议厅长，“冯事无大小，倚他如左右手”[(3)]。

袁世凯在帝制自为的过程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张勋与冯国璋。其时，张勋以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名义坐镇徐州，拥兵数万；而冯国璋则以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开府南京。徐州与南京同属江苏，两地相距不远，且张、冯两人宗旨相同，加之宗社党、保皇党、遗老的从中拉拢联络，形成张、冯联手反对洪宪帝制以及随时准备让宣统复辟的局面。

胡嗣瑗在南京整天唆使冯国璋拥护清朝复辟，一心想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对他恨之入骨，但袁世凯又不能对胡采取任何措施。最后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于1915年3月任命胡嗣瑗为江苏金陵道尹，其目的是想将胡从冯国璋身边调开。但是，冯国璋离不开胡嗣瑗，对袁世凯的调令一直拒绝执行。袁世凯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派阮忠枢南下“驱胡”。阮到南京后对冯国璋说：“胡嗣瑗既然已经调了金陵道尹，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下个手令，开去他的本缺（指咨议厅长）呢？”冯国璋对此笑而不答。胡嗣瑗在阮忠枢来了以后，既不去就金陵道尹，也不再在江苏将军府露面。这时，冯国璋的副官长何绍贤对胡嗣瑗说：“总统调你做道尹，你不就，可是又不辞。现在阮内史长又来了，你要是再不走的话，如果有人加害于你，我们可保护不了你。”在何绍贤的威胁下，胡嗣瑗只好暂时潜往上海躲避一下。阮忠枢见驱胡目的达到，也就回北京复命去了。阮忠枢的这次“驱胡”闹剧反而坚定了冯国璋反“洪宪”的决心。

陈冷汰在《丁巳复辟记》中对胡嗣瑗在洪宪帝制中的作为有如下的记载：“辛亥国变以后，遗老旧臣，志图兴复者，有升公允（字吉甫）、刘公廷琛（字幼云）、沈公曾植（字子培）、王公乃徵（字病山）、胡君思敬（字漱唐）、陈君毅（字贻重）、温君肃（字毅夫）及伯兄曾寿（字仁先）等。六年以来，奔走筹划，未尝一日懈其志，而诸将中可与谋者，唯张勋一人。……当袁氏盛时，力足控制一切，诸人虽怀兴复之志，苦于无隙可乘。及称帝议起，其腹心爪牙颇有携贰，复辟之机，遂动于此矣。刘公幼云等既常往来于徐州，而胡君晴

初在冯国璋幕，亦时以微辞动之，冯意颇为之移，其贰于袁氏，胡君盖有力焉。事为袁氏所闻，欲加害于胡君，胡遂出冯幕，迁居于沪，然犹时往冯住所也。袁氏既建号‘洪宪’，又为内外所逼，下令取消，威信全堕。胡君乘机以实行复辟，进言于冯，遂有劝袁退位之电。电中有顾全名义云云，实寓复辟之意。又亲笔致书于张勋及段祺瑞谋之。”(4)

在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洪宪帝制后，胡嗣瑗奉冯国璋之命前往徐州，与张勋及其周围的复辟分子商讨宣统复辟大计。然而，冯国璋在受到日本顾问青木宣纯关于复辟时机不成熟的警告后，立即放弃拥戴宣统复辟的念头，于4月17日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联名发表通电，提出调停时局大纲八条，主张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继续担任大总统。冯国璋态度急变，让正热衷于清室复辟的胡嗣瑗感到突兀，于4月22日给冯国璋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冯不要失信。信中说：“前在宁披沥愚忠，谬陈大计，承公毅然决议，促即往联徐州，郭汾阳、李西平再造王室之功，将于公复见之。……窃维今日情势，袁断不能复保地位，我公亦岂能与革党相合？革党本无实力，又岂能复盛以祸中国？如非复辟，安有救亡上策？此举既合天理人心之正，亦为天时人事所趋，早经洞鉴。瑗追随已久，窃闻高论，夙仰忠诚至矣。数年积愤，今日甫有获申之望，行将拨云雾而见青天，若以青木一言，即隳成谋，绝非我公本意。……鄙意事经议决，理无中止，且吉帅（升允字吉甫）款已到手，待公定议而后行，事关重大，务肯坚持前议办理。”(5) 4月26日，胡嗣瑗再次给冯国璋写信，要求他速联络张作霖与张勋等图谋复辟。

6月6日，袁世凯暴毙。复辟派兴奋异常，再次倾巢而出，游说手握重兵的张勋、冯国璋出来拥戴宣统复辟。胡思敬、商衍鎏等一批复辟分子纷纷相继来到南京，与冯国璋商讨复辟计划，冯欣然表示全力支持复辟。袁死后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在得到张、冯图谋复辟的情报后，立即派新任长江巡阅使倪嗣冲携带巨款至徐州、南京贿买张

勋、冯国璋的部属，致使被复辟分子视为大好机会的丙辰复辟计划再度被挫败。

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总理段祺瑞因为争权夺利产生严重冲突，时人称为“府院之争”。段祺瑞唆使北洋系各省督军组成督军团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忍无可忍的黎元洪孤注一掷，于1917年5月23日断然下令免去段的国务院总理职务，段随即出走天津策划以武力驱逐黎元洪，双方矛盾空前激化，复辟派决定利用这一政治危机再次推行复辟计划。张勋为了探询冯国璋对复辟的态度，写信说为了抵制西南，巩固北洋团体，不能不另筹解决时局的对策。胡嗣瑗看到这封信后，冒用冯国璋的名义给张勋写了一封回信，极力附和，请张勋大力主持，他愿追随其后。张勋得到冯的保证信后，认为冯再也不会反对复辟，这就更加坚定了复辟的决心。

5月28日，胡嗣瑗、刘廷琛来到徐州，与辫子军统帅张勋商谈复辟计划，张勋告诉他们：“此事必须入都举办，拟借调停之名而入。已示意于黎（元洪），若得一命令相召，尤便。然无令余亦决行也。”[(6)] 不出张勋所料，走投无路的黎元洪不得不于6月1日下令请求张勋前往北京调停他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6月7日，张勋率领辫子军四千三百余人北上，先至天津，在压迫黎元洪强行解散国会后，于6月14日入京。6月28日，康有为等复辟派分子也来到北京。康有为与张勋一文一武两个复辟派头子聚首北京，召集复辟分子开会后决定立即动手实施复辟计划。7月1日凌晨，溥仪在张勋、康有为、刘廷琛、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瑗等人的拥戴下宣布复辟，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并且大封功臣，胡嗣瑗因为奔走策划复辟有功，与万绳栻一起被授为内阁阁丞（相当于秘书长）。

然而，张勋复辟仅昙花一现，辫子军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张勋狼狈逃往荷兰使馆，辫子军全部缴械，其他复辟派分子作鸟兽散。胡嗣瑗与陈曾寿等一批复辟分子逃回上海租界，他们仍不死心，幻想

由张勋与桂系军阀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南北会师重振复辟大业，但以无果而终。

1924年4月，复辟分子金梁向废帝溥仪推举将来复辟时可以借重的四类“贤才”共计三十人，其中对胡嗣瑗的评语是：“血诚爱国，慷慨激昂，丁巳后寄食杭州，去秋一病几死，今始渐愈。”[7]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胡嗣瑗随溥仪进入日本占领下的东北，1932年至1933年任伪满洲国执政府秘书处处长，1933年3月至1939年4月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1945年病死。

---

(1) 康文佩（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2) 温肃：《温文节公年谱》，1947年版，第5页。

(3) 陆丹林：《革命史谭》，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67页。

(4)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110页。

(5) 《胡嗣瑗致冯国璋函》，《近代史资料》总第18号，第118—119页。

(6)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第18号，第111页。

(7) 《金梁列举贤才折》，《申报》1925年8月9日。

胡文虎

陈民

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县，1882年1月16日（清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 生于缅甸仰光。父亲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名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传统教育，胡文豹则留在缅甸接受英国教育。四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1908年，其父病故，胡氏兄弟继承父业，同心协力，永安堂业务日趋发达。1909年，胡文虎周游了祖国以及日本、暹罗（即今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第二年回仰光，扩充为永安堂虎豹行，聘请医师、药剂师多人，吸收中国传统膏丹丸散的优点，制成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成药。不久，虎标万金油等畅销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亚各地，胡氏兄弟由此发家致富。

1914年，由于业务发展，胡文虎将永安堂总行迁到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业务。他在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1932年，他又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制药厂，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以及澳门、台湾、菲律宾、越南、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等地设立分行。从此，虎标万金油等成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老少皆知的药品，胡家兄弟也成为东南亚华侨中著名的百万富翁，号称“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自称对政治无兴趣，热心于文化教育和医药慈善事业。他除在新加坡捐建十几所义务学校和中小学外，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夏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学院以及广州仲恺工业学

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第一中学、回澜小学、海口琼崖中学、福建大同中学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以及“虎豹亭”之类建筑物。抗日战争前夕，胡文虎还捐款350万港币，准备在中国兴建一千所小学。后因战争爆发，学校只建了一部分，但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用。他所捐建的医院，以南京的中央医院最为著名。他在国内外独资创办或捐助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有四十多所。香港大学也于1951年初设立“胡文虎妇产科病系奖学金”。他晚年在香港做寿时，常常施舍食品、日用品或赠送现金，济助穷苦老人和孤儿。

早在20世纪初，胡文虎便开始他的办报活动。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办《仰光日报》。他独资兴办的第一家报纸，是1929年1月在新加坡发刊的《星洲日报》。两年之后，他又在广东汕头创办《星华日报》。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的中文晚报《星中晚报》也正式发行。他还筹备在广州创办一份大型报纸《星粤日报》，并开始修建印刷厂，后因局势动乱，计划拖延了下来。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的《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聘请金仲华为总编辑。报纸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是胡文虎“星系”报业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的《星槟日报》出版，但在缅甸的《星仰日报》和在荷属东印度的《星巴日报》，则因战争爆发半途而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福州创刊《星闽日报》，在上海筹办《星沪日报》。1949年3月在香港创办英文《虎报》（TIGER STANDARD）。第二年，又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报》。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托拉斯，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胡文虎认为办报与建立学校、创办医院，都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他自称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自称“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政党政治，素不参加”[(2)]。

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曾任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庆出席参政会议，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返回香港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胡文虎被软禁了三天，获释后仍留在香港。1943年，胡文虎以港商身份，多次去上海会见南京伪政府的汪精卫；还曾去日本拜会日本首相东条，扬言是向东条陈说日本港督及其财务部长对华侨商人的暴敛[(3)]。1944年，胡文虎被推选为日本统治下的“香港华人协会”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文虎开始全面恢复他的商业活动，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恢复和扩充他的报业托拉斯，战前所办各报大多先后恢复出版。他还计划在北平、汉口、沈阳和台湾设立报馆，并打算恢复战时被日军拆毁的广州印刷厂，但都未能实现。

广州解放后，1950年当地人民政府接管了胡文虎在广州的产业。次年7月他发表谈话，对人民政府拒绝虎标药品在国内行销表示“费解”。星系报纸，尤其是香港的《星岛日报》开始激烈反共[(4)]。1953年，胡文虎访问台湾，表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

1954年8月，胡文虎因胃病去美国动手术。他在波士顿接见美国《环球报》记者时说：“对共产党决难妥协，非征服他们，就被他们征服。”[(5)] 回香港时途经檀香山，因心脏病发作，于9月4日去世。

---

(1) 胡文虎的出生说法不一。［美］包德华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说是“1893年1月16日”（第二卷第177页）；C．M．Turnbull：《新加坡史》也说是1893年（第131页）；Max Peyleberg：《现代中国名人录》记为“1883年”（1954年版，第94页）；香港《星岛日报》1954年9月16日刊登《胡文虎先生生平事略》一文中说是“1882年1月”。“事略”是胡文虎治丧期间发表的，故依此说。

(2) 《星洲日报》1950年4月10日。

(3) 《胡先生近年言论录》，《星岛日报》1954年9月6日。

(4) 当时金仲华等已辞职，《星岛日报》为反共分子所把持。美联社曾发电文说："胡氏所有之报纸其尚未被共党所封闭者，在东南亚实为反共最有力的报纸。"见《星岛日报》1954年8月11日。

(5) 《星岛日报》1954年9月6日。

胡毅生

周兴樑

胡毅生，名毅，字毅生，号隋斋，广东番禺人，1883年11月17日（清光绪九年十月十八日）生于广东电白，与胡汉民是堂兄弟。

胡毅生生性聪颖，七岁就外傅，九岁起从读于商殿臣及堂兄胡青瑞、胡汉民，十七岁考入广州广雅书院西学堂。1901年，他考取两广大学堂，次年因与学友梁孝肃一起倡言革命反清，被校方开除。1903年春赴日本东京留学。

1903年4月，沙俄违背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拒绝从金州、牛庄等撤走侵略军，企图永霸东北。消息传出，东京中国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由拒俄御侮转而进行反清革命，胡毅生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是年8月，他获悉孙中山已回横滨活动，乃偕伍嘉杰前往谒见，表示愿从驱驰。随后，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广为结交同志，并随孙中山往访日人犬养毅等，协助孙中山筹办东京青山军事训练班。军事训练班成立时，他与黎勇锡、李自重等十四人宣誓入班受训，并一度兼任数学教员[(1)]。青山军训班解散后，胡毅生于1904年受聘到横滨华侨学校任教习，加入当地的洪门会社；旋又返回东京法政大学速成部求学。1905年7月，孙中山到日本东京筹建同盟会，胡毅生向广东籍的官费法政速成留学生介绍孙中山之言行事迹，并积极协助孙中山开展筹组同盟会的活动。随后，他与黄兴、宋教仁、冯自由等人分头通知留学生及少数日本志士参加同盟会筹备大会，并在会上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后，他担任第一任广东省同盟会主盟人。不久，他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肄业。

1905年秋，胡毅生奉孙中山之命返上海，随孙中山一同赴越南西贡堤岸，协助组建堤岸同盟分会。其后，胡毅生又奉孙中山命归国，陪同法国军官布加卑（Paul Boucabeille）先后调查考察南京、九江、南昌，抵达广东。次年春再由粤启程，赴广西桂林联络郭人漳部和蔡锷部，后至贵阳、重庆、武汉考察与联络。他们沿途除与各军中同志会晤外，尤密查清廷军事实力及其布置。布加卑考察团通过考察活动，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留下很好的印象，主张法国政府应同情中国革命，但法殖民部和外交部对布氏的建议不予支持。

孙中山与同盟会本部从1907年开始，着力在南部地区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胡毅生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1907年他与朱执信大力开展了联络和游说陆军速成学堂、讲武堂及学兵营的工作，并亲自参加钦廉、镇南关两次起义。镇南关起义军占领炮台后，他随同孙中山、胡汉民等一同赴阵地慰勉义军。起义失败后他退居越南。1908年他由越南潜回广东，深入乡镇设立会社，密切联络和结交各地民军首领以壮大革命势力。

1909年，胡毅生至广东陆军小学任教习，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后因被人告发，被迫避居香港，仍不时化装往来省港间，与赵声、倪映典、朱执信等合力策动新军反正，约期发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他专任“农村会党联络工作”，并与朱执信负责届时“联络番禺、南海、顺德之民军为响应”[(2)]，后新军因与巡警冲突仓促起事而告失败，顺德乐从圩等地的民军来不及起义响应。

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孙中山于1910年11月在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胡毅生与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参加，决定筹集巨款，以党人及新军为骨干在广州起义。事后，胡毅生至暹罗筹办华侨中学，兼筹集革命经费。1911年初，他抵香港，协助黄兴建立统筹部于跑马地二十五号，并担任该部储备课课长，负责购买枪械，并深入广州近郊乡村联络民军。4月中下旬统筹部召开发难会议，确定胡毅生担任第十路（后改为第四

路）起义的队长之一，率部坚守大南门。不料4月27日下午黄兴发动起义时，他与姚雨平、陈炯明借口临时改变起义日期而未按计划参加起义，致使黄兴一路百余人孤军奋战，迅告失败。事后，黄兴和其他党人对他多有指责。胡毅生亡命香港，协助胡汉民等做了些抚慰伤亡的善后工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次第响应，广东各属民军也纷纷发动起义。当时，胡毅生与朱执信在顺德乐从圩发动民军起义，威逼广州。11月9日广东光复后，组成了以胡汉民为都督的粤省军政府，胡毅生先后担任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军务处长和海军司司长，统辖巡防营水师和民军。他指挥水师绥靖东江、北江与西江水道，使水上交通畅通。1912年3月，王和顺所部惠军因反对军政府裁遣民军而与代都督陈炯明所部循军发生流血冲突时，胡以海军司司长名义委托明字顺军统领黄明堂居中调解，劝陆梅等部服从政府；尔后他又令民军协助循军击溃败退虎门的王和顺残部。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毅生亡命日本，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后随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官朱执信潜赴香港，协助朱执信发动番禺、南海、三水等地民军起义，讨伐袁世凯及其在广东的爪牙龙济光。1916年初，胡毅生由香港去上海，代表朱执信接洽讨袁讨龙饷械事宜。袁世凯于6月死去后，他留沪协助孙中山办理党务。

1917年7月，孙中山率程璧光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州进行护法斗争，胡毅生追随抵达广州。9月1日，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设立大元帅府，胡毅生任士敏土厂总办，负责拱卫大元帅府。1920年粤军分三路由闽南西征回粤之际，胡毅生策动魏邦平、李福林等部在广州宣布独立，举兵驱桂。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督师北伐，胡毅生被委为大本营参军。翌年，被孙中山派为北伐大本营粮食处处长，担负饷糈粮草供应重责。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变，胡毅生由小北江

昼夜赶到广州，旋登永丰舰谒见孙中山。不久，因病赴香港就医。

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次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国民党内部的右翼势力对此极为不满，胡毅生也是其中之一。他于是年8月参加广州民选市长竞选，因舞弊案发未达目的，逐步沦为失意的政客，与朱卓文沆瀣一气，靠包揽捐务、沙田等自肥以供平日挥霍，并对国共联合战线进行中伤污蔑。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胡毅生与赵公璧、李秉硕等创办《国民新闻日报》于广州，宣传反共，并以“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论”为题，悬奖征文；他又纠合一些人组织一个俱乐部叫文华堂，从事破坏国民政府的活动[(3)]。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收买凶手刺杀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胡毅生是“廖案”的主谋者之一，于案发后潜逃出广州，后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他藏匿半年多，旋亡命至香港蛰居。

1926年，胡毅生由政治失意进而颓唐厌世，皈依中国佛教流派之一的密宗，以摆脱心灰意冷与烦闷不安之心境。他从岭东居士王宏愿、阿阇黎学习密宗多年，希冀靠“三密”即语密（口念真言）、身密（手结契印）、意密（心作观想）来脱出俗缘红尘，求得心灵上的暂时平静与满足。

抗日战争时期，胡毅生于1939年9月由广东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委员，1940年2月任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1943年10月再任国民政府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毅生回到广东。1946年11月他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4月他任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任总统府顾问。后赴香港治病。

1949年底，蒋介石退守台湾，胡毅生于1951年由香港去台湾，

旋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闲职。1957年11月26日，胡毅生患脑溢血症在台北病逝[4]。

---

(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1—292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36—37页。

(2) 参见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191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4)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313页。

胡瑛

齐霁

胡瑛，原名宗琬，字经武，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原籍浙江绍兴，其父以知县候补湖南，胡瑛随父兄至湘。幼年时，父兄先后去世，家境贫寒，靠母亲雷氏女红、浣洗为生；并依其兄之友鲁竹岩居桃源，故多称其为湖南桃源人。戊戌变法前夕，胡瑛去省垣读书，接触到维新思想。不久变法失败，他目睹民族危机严重的现实，产生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

1903年夏，黄兴从日本留学归国，在长沙明德、经正学堂执教，“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1)]。胡瑛以优异成绩考入经正学堂，受黄兴革命思想影响，亦常在校进行革命宣传。是年11月4日，黄兴邀集归国留日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胡瑛、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十余人以设觞祝三十岁寿为名，召开华兴会的准备会议。黄兴在会上提出“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并建议“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2)]。胡瑛等人均表赞同。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于长沙，黄兴被公推为会长，胡瑛是华兴会最早最年轻的骨干分子。

同年3月，胡瑛持黄兴介绍信去武昌吴禄贞处，组织华兴会鄂支部，胡任总理，负责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他结识了湖北革命志士刘静庵、曹亚伯、吕大森、张难先等，并与他们共商革命方略，一致主张“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3)]。于是胡瑛与张难先同入工程营当兵，在士兵中秘密散发《猛回头》、《革命军》、《孙逸仙》、《黄帝魂》等进步书籍，还通过饭后聚集在操场上讲历史故事的形式，激发士兵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

觉悟。“瑛年少英挺，善词说，闻者莫不感动。”[4] 5月，胡瑛与同营的朱子龙、陈从新、雷天壮等以及学界的吕大森、曹亚伯、欧阳瑞骅等，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集会，商议组织革命团体。7月3日，科学补习所在武昌多宝寺街成立，胡瑛因运动军队有功，又是科学补习所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被选为总干事。

科学补习所成立不久，黄兴由沪抵鄂，告以湖南拟于阴历十月初十（阳历十一月十六日）慈禧70岁生辰日起义。补习所会员一致表示赞成，当即约定由湖南发难，湖北响应。胡瑛等对响应长沙起义一事做了周密的部署，把华兴会分给湖北的枪支弹药从湖口运回武昌。不料长沙起义事泄，科学补习所受到牵连。幸亏事先得到黄兴密电，胡瑛与王汉及时把枪械转藏于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文件册据，张难先则通知其他同志远走避祸。但该所被封，同志星散，胡瑛与王汉则迁居鹦鹉洲。嗣后他们看到此案已经了结，又重新在暗中恢复活动，胡瑛任汉口《大江报》及《夏报》主笔。

1905年初，清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东南各省财赋，历经苏、浙、皖、赣而抵鄂，胡瑛、王汉等愤而密谋杀之，先拟在汉口大智门车站狙击，待他们赶到时火车已开走，又追至河南彰德，王汉用手枪连击数发不中，卫兵搜捕急，王汉耻于就刑清廷，毅然投井自殉。胡瑛伪装行商，设法收其尸殓葬。然后胡瑛又尾随追至北京，因铁良随从戒备森严无从下手，遂返回武汉。是年春，胡瑛东渡日本留学，先就读于东京士官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日本，胡瑛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被选为学生联合会会长。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胡瑛加盟，当选为评议员。《民报》创刊后，胡瑛常为之撰稿，并协助张继负责编辑工作。胡瑛与同乡宋教仁、覃振有名于当时，被誉为“桃源三杰”。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遭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胡瑛与陈天华、秋瑾等人曾提出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的主张。后经辩论，为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之便，继续留日学习。

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后，经孙中山选派胡瑛与梁钟汉、朱子龙等人回国，同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等在武汉谋议响应。但事为留日学生郭尧阶向巡警道冯启钧告密，胡瑛等八人于1907年1月8日被捕。胡瑛被捕后，宋教仁得信告知孙中山设法营救，于1月23日以留学生总会和湘、鄂两省名义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释放胡瑛。

胡瑛是湖北革命机关的中坚分子，被捕后官方亟谋杀害他，但又苦于没有证据，虽严刑逼供亦无济于事。奸人密报胡瑛与张难先关系极其密切，清吏乃对张施以毒刑，逼他吐露胡瑛的活动消息。张只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对胡瑛半字不提。胡瑛在狱中坚毅不屈，曾做绝命诗云："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竟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途苦茫茫。"(5) 此案一直拖到1909年夏才宣判，胡瑛被判永远监禁之刑。张难先于1907年5月因病保释出狱后，常到狱中探望胡瑛，饮酒画梅共抒情志。事后胡瑛曾赠张难先一诗，以志这一段同患难的历史："吾道消沉久，多君独苦行。穷交肝胆在，高义死生轻。忧患逢知己，艰难见世情。十年家国泪，今日共心倾。"(6)

胡瑛虽然被羁押在狱中，但有在北京的吴禄贞、程家柽的照应，在海外的黄兴、杨毓麟的关心，在武昌的詹大悲替他料理一切事务，所以还不算十分痛苦。典狱员谈国华看他一表人才，善言词、能诗文，就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对他特别优待。因此胡瑛在狱中，行动也比较自由，常与狱外的革命同志会晤交谈。1911年1月，蒋翊武等人在武昌组织文学社，胡瑛亦自狱中参加。文学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尧徵常到狱中同胡瑛商量大事，胡瑛成为文学社暗中的指导者。2月，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与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李长龄、罗良骏等人在武昌府狱胡瑛处聚会。初见面时，谭人凤看到蒋像田舍翁，李像老学究，罗像贵公子，心里不高兴。胡瑛解释道："子勿误，湖北党人具有百折不回志气，本社尤埋头苦干，不以

外观夸耀者也。”[7] 谭人凤才改变了态度。后来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过程中，胡瑛极力促进，当选为政治筹备员。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翌日胡瑛被迎出狱，12日被推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14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大悲受命为主任兼管军事处，邀请胡瑛渡江办理外交事务。胡瑛常与詹分访各国领事，并亲临前线指挥革命军抗击清军。12月中旬，胡瑛作为南北议和的特派代表去上海同唐绍仪等谈判，旋又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参加各省代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1日，胡瑛被任命为山东都督，于2月在烟台就职。但这时山东实权仍操在清巡抚张广建手中，不承认胡为都督，文电中只称“胡经武先生”或“胡经翁”。张广建为挤走胡瑛，向袁世凯建议：“胡瑛才气有名于时，与黄为至戚，其占据烟台，本以掣直、东之大势；只以共和宣布，不得显逞其雄图，其心恐有所未甘。如或优礼胡瑛，调京畀以要差，俾就钧座范围，则东省可纾，大局可定。”[8] 袁世凯采纳了这个建议，免去了胡瑛的都督职务，调他至北京，任新疆青海屯垦使。

是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胡瑛为二十九名参议之一。12月至翌年初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胡瑛当选为湖南参议员。“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加紧准备用武力讨伐国民党。胡瑛原是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简任名单上的议和参赞，又是国民党在北京的要人，为了避祸他只身潜往上海，与黄兴一起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随黄再次逃亡日本。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胡瑛、李根源、李烈钧等人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主张在欧战的形势下，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免妨害袁政府之对日外交，实行举国一致御侮。是年年底，胡瑛回到北京。其时袁世凯正加紧筹谋复辟帝制，召集总统府及

参议院中的亲信商讨改变国体进行程序。杨度等献策，“谓宜贿买当今失意穷困之老革命党员，使之上书劝进，以表示举国人一致拥戴之公意”[9]。袁深表赞同。1915年8月，杨度拉胡瑛及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等人成立筹安会，为袁登基制造舆论。1916年7月14日，总统黎元洪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胡瑛因被认为对辛亥革命有功，未在帝制祸首之列。

袁世凯死后，胡瑛恍然有悟，重新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1917年7月，孙中山从上海到广州，揭起护法的旗帜，各地护法势力纷纷响应。胡瑛与张学济等在湘西成立护法军政分府，胡任护法军湘西招抚使。后湘西护法军与唐继尧联系改称靖国军，胡任第三军军长。1919年8月，胡瑛去广州军政府运动军费，被任命为军政府顾问。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孙中山派胡瑛北上，联络直系将领胡景翼、冯玉祥。不久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等部协同发动北京政变，使直系曹锟、吴佩孚的统治迅速瓦解。1925年1月胡景翼督豫，胡瑛到开封任总参议。北伐战争前夕，胡瑛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国民政府驻山西代表。北伐军推进到河南后，胡瑛请阎锡山响应北伐，截奉军后路。

后来在蒋、冯、阎、桂四派混战时，阎锡山曾任命胡瑛为第十路总指挥，去上海运动蒋系第五师师长刘世钧倒戈反蒋。蒋介石发觉后，下令通缉胡瑛，胡遂逃往汉口。1931年夏长江大水，胡之寓所为水浸，迁居楼上数月，患水肿病。“九一八”事变后，覃振等向蒋介石建议取消对胡瑛的通缉，让他去日本游说在野党和反战人士，设法阻遏日本政府扩大侵华步骤。蒋认为胡可以利用，遂令其至南京。胡瑛拟病愈后再东渡日本，住进南京中央医院。但因手术不良，疮口溃烂，于1932年11月病故于医院。

---

(1) 龙绂瑞：《武溪杂忆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2页。

(2) 欧阳瑞骅：《武昌科学补习所革命运动大事记》，见《辛亥革命》（一）。

(3)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4)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5页。

(5) 张难先：《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页。

(6) 张难先：《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50页。

(7)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27年版，第14页。

(8) 《张广建电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页。

胡愈之

胡序文

胡愈之，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1896年9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三）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父为清末秀才，赞翊维新，热心创办新学，民国后曾任县教育会长和首届县参议会议长。在父亲影响下，他自幼就读了谭嗣同的《仁学》等书，关心时事，认真阅读新书报。父亲和家庭的关怀使胡愈之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从而打下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1910年，胡愈之从县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越级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时鲁迅先生在校任学监，因而结下师生之谊。但下半年因患伤寒至1912年大病始愈，他不愿降级回绍兴府中学堂，改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为考清华和留学欧美做准备。半年后学校因学生太少而停办，这时家境衰落，父亲要他学好中文，准备就业，于是跟随绍兴名宿薛朗轩学习中文，薛老师为人和治学都给胡愈之很大影响。1914年10月，胡愈之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是年十八岁。

练习生的工作十分艰苦，编排校印各种杂务都得干，胡愈之正是从什么都干中熟悉了出版工作的全过程。第二年，胡愈之专门从事《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东方杂志》还是一个资料性刊物，主要由编辑选译一些国外的政治、经济、学术、科技等资料，投稿很少。工作的需要，使胡愈之走上了刻苦自学的道路，他进夜校学习英语和世界语，并挤时间到商务的东方图书馆读书。1915年开始，他就用英语和世界语翻译资料，到1920年仅在《东方杂志》就发表了他著译的文章三百余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科技等多方面，这表明他结合工作自学，学识有极大的提高。他在1920年3月发表的《相对性原理和四度空间》一文，证明他是最早把“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人之一。他的翻译能力，曾得到胡适的赞赏。20

年代初，胡愈之已是一个出色的编辑、记者和著译者，成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主要编辑。

胡愈之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15年他在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就是宣传世界语的。他与许多国家世界语者建立了通讯联系，并担任了环球世界语会的上海代理员。他和上海的世界语者重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并任学会的领导，还与学会同人共同创办世界语函授学校和世界语刊物《绿光》。五四运动中，胡愈之作为商务编译所的职工代表，参加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五四前后，他还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和沈雁冰最早在商务提倡用白话文，促进商务革新。他还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与郑振铎共同编辑《文学》旬刊，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他还与同乡一起创办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在家乡传播新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愈之和商务同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创办了《公理日报》，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他负责出版的《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有他的《五卅事件纪实》长文，指出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商务工人是起义的重要力量，胡愈之积极支持工人的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作为上海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但这时却发生了“四一二”政变，4月13日，胡愈之在宝山路上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残酷屠杀工人群众的暴行，义愤填膺，当晚就写了一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信，邀请郑振铎等几位好友共同签名，即送《商报》公开发表。这一行动后来被周恩来同志赞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胡愈之的抗议信引来了反动派对他的忌恨，为免遭迫害，他不得不于1928年初流亡法国，进巴黎大学学国际法，还进新闻专科学校学新闻。在学习的同时，他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做深入调查，并曾到英国、比利时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当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经

济危机，胡愈之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促使他潜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欧洲现实的考察和深入理论探索，胡愈之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1930年底，由于法郎对中国银元比价上升，使留学经费难以为继，胡愈之决定从陆路经苏联回国，在苏联世界语学会的帮助下，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七天，参观了工厂、农场、学校、托儿所、商店等，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显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更坚定了他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信心。1931年2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不久就写下了《莫斯科印象记》。此书冲破国民党政府封锁，真实地报道了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步与成就，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一年之内就再版了五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胡愈之立即著文提出了绝交宣战的抗日主张，他在《生活》周刊上的文章，有预见地指出：“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商务被毁于战火而停业，胡愈之进了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在上海的远东分社，任该社中文部编辑和记者。8月商务复业，胡愈之以承包方式主编《东方杂志》，他在复刊词中指出：“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东方杂志》成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阵地，但却不见允于统治当局，仅半年胡愈之就被解雇而离开商务。

共同的抗日愿望，使胡愈之和邹韬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离开商务后，胡愈之就积极为《生活》周刊写稿，并帮助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1932年12月，由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反对专制统治和营救爱国政治犯，胡愈之和邹韬奋一起参加了“同盟”的活动，均被推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反动派对“同盟”的活动恨之入骨，7月，特务在租界杀害了“同盟”领导人杨杏佛，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同盟”被迫停止活动，邹韬奋也出国暂避，胡愈之因

有哈瓦斯通讯社的掩护，得以留在上海。在革命事业不断遭受挫折，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胡愈之经受了考验，1933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直接领导下，胡愈之全力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邹韬奋出国，胡愈之接替他担起了《生活》周刊编务和生活书店建设的工作。在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的情况下，他力图把生活书店建设成为坚强的革命文化堡垒，以更好地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他在《生活》周刊发表《民众自己起来吧！》赞扬福建人民政府，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因此，《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但他立即又请杜重远出面，登记出版《新生》周刊，以替代《生活》周刊。他又策划联络创办了《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等多种进步刊物在生活书店出版，也使鲁迅等一大批作家和生活书店建立了联系。他积极充实生活书店的编辑力量，编辑出版社会科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生活书店迅速发展。

1935年，日寇向华北进逼，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新生》周刊因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侵略者借机挑衅，声言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要国民党政府查办，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令《新生》停刊，还判主编杜重远十四个月徒刑。胡愈之在“新生事件”中进行了积极斗争，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他在文化界积极串联，与沈钧儒、邹韬奋共同商讨成立救国会，他还通过杜重远共同做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反蒋抗日。年底，上海文化界、妇女界等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也取得成效。“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国新高潮，也使救国会组织迅速推向全国，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胡愈之没有公开担任救国会的职务，但却是实际上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0月19日，鲁迅逝世，由救国会组织治丧，胡愈之是治丧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葬礼的具体组织者，使葬礼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抗日游行示威活

动，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强烈抗日的要求，也表现了救国会的力量。1936年11月，南京政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领袖，以镇压救国会的救国运动，这就是“七君子”事件。胡愈之是营救“七君子”的主要组织者。首先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抗议活动，利用一切可用的舆论工具，发表国内外声援“七君子”的函电，迫使当局不得不公开审判“七君子”。接着他又组织一批知名律师来为“七君子”辩护，在法庭内外都把反动派驳得理屈词穷。胡愈之还亲自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政府迫害爱国人士的丑恶面目。最后，胡愈之又请宋庆龄、何香凝牵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入狱运动。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释放了“七君子”，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七七”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上海也组织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胡愈之被推为协会常务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协会主要领导由国民党市党部的人担任，以控制协会的活动，但也为共产党和左派人士公开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造了条件。胡愈之参与创办了国共两党合办的《救亡日报》，他又以协会名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由他任主任，组织进步记者提供新闻，又通过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消息，编成新闻稿，向外国记者和华侨报刊发布，第一次为共产党八路军开辟了对外宣传的渠道。

胡愈之还把救国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组织起来，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形式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工作，这个聚餐会在上海陷落后发挥了重大作用，就是通过他在租界开展了救济难民的工作，创办《集纳》、《译报》等报刊继续开展抗日宣传，还办了社会科学讲习所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也是通过聚餐会筹集了启动资金，胡愈之成立“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后来又在这基础上，出版了二十卷巨著《鲁迅全集》，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8年4月，胡愈之为筹集《鲁迅全集》出版经费而离开上海到

武汉，周恩来同志要他留下参加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他任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工作很难展开，但胡愈之以上海国际宣传委员的经验，与范长江和青年记者学会研究策划，以合作社形式成立国际新闻社，这是继《新华日报》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又一重要新闻机构。武汉陷落，胡愈之离开军委会政治部，到桂林开展抗日文化工作。胡愈之作为救国会代表，和广西当局建立了良好关系，被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委员和该会文化部副主任。他又把在桂林的救国会核心人物组织起来，搞了一个聚餐会，共同商讨发展桂林抗日文化工作。这时国际新闻社也搬到桂林，胡愈之作为领导人之一，积极出谋划策，使国际新闻社迅速发展，发出的新闻专论稿被全国各地报刊采用，香港分社还向海外华侨报刊供稿，编印了英文的《远东通讯》发往国外。胡愈之又代表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作创办了文化供应社，担任编辑部主任，出版了《抗战建国辞典》，编了一套通俗百科知识的《国民必读》小型文库，文化供应社很快成了后方重要的抗日文化机构。胡愈之还为在桂林的生活书店和《救亡日报》做了许多工作。

因形势变化，1940年7月下旬，胡愈之离开桂林到香港，不久应《南洋商报》之聘，到新加坡任该报编辑主任。南洋侨胞是爱国的，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筹赈总会，为国内抗战筹集物资和人员作了很多贡献，《南洋商报》与陈嘉庚关系密切，胡愈之办报方针就是支持陈嘉庚和南侨筹赈总会，团结广大侨胞共同抗日。他到职后写的第一篇社论就指出：南洋和中国的敌人都是日本，广大南洋侨胞起来抗日，就是保卫中国，也是保卫南洋。胡愈之以爱国民主人士立场呼吁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澄清吏治，开放言论。胡愈之所撰多篇社论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使《南洋商报》销路大增，也推动了南洋华侨抗日民主运动发展，增进了胡愈之和陈嘉庚及广大侨胞的友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愈之邀集文化界人士成立了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办了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接着

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胡愈之是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在抗敌动员总会组织下，成立了数千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武装保卫新加坡。但英国殖民当局没有抗日决心，很快就向日军投降，1942年2月，胡愈之和文化界人士及爱国侨领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

胡愈之辗转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叫巴雅公务的小镇，郁达夫等一些文化界人士也集中到这里，他们隐姓埋名住了下来，以酿酒和制肥皂来维持生活。胡愈之还把文化界的难友组成一个同仁社，共同学习印尼语言，了解印尼社会和历史，分析战争形势，互相鼓舞斗志。1944年2月，郁达夫真实身份被日寇发觉并受到监视，郁达夫叫胡愈之赶快离开，胡愈之由苏西转到苏东，在棉兰附近的完达山上住下，一直到日本投降，而郁达夫却在日本投降时被杀害了。

1945年9月底，胡愈之回到了新加坡，国内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他决定留在新加坡，开辟文化宣传阵地，团结南洋侨胞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靠侨胞帮助，他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先是代销国内的进步书刊，12月由他主编出版了《风下》周刊，刊物成为青年学习和认识世界最好的精神食粮。他还利用刊物办起了自学辅导社，帮助有志青年自学成才，编写自学课本，并请名家为学员批改作业，使参加自学辅导社的学员提高文化和政治素质，成为华侨青年中重要进步力量。在胡愈之努力经营下，新南洋出版社迅速发展，成为进步文化宣传阵地。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救国会是“民盟”成员组织，胡愈之作为救国会创建者和领导者，受“民盟”中央委托，在南洋建立和发展民盟组织。胡愈之和华侨知识界人士及爱国侨领都有密切联系，在他积极动员下，很快把华侨中进步爱国人士吸引过来。1947年9月底“民盟”马来亚支部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民盟”马来亚支部，胡愈之任支部委员，马来亚“民盟”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重要力量。

国内全面内战爆发，南洋的爱国民主势力和独裁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仅有的新南洋出版社和《风下》周刊已难适应革命宣传舆论的需要，胡愈之与爱国侨领磋商，决定创办一张大报，作为华侨爱国民主派的喉舌，以扩大革命宣传阵地。1946年11月，日出八大版的《南侨日报》诞生，胡愈之是董事和社长，负责言论方针和编辑事务，《南侨日报》颇有战斗力和吸引力，很快在南洋华侨中产生巨大影响，被读者誉为“民主堡垒”、“公众喉舌”。

1948年4月，胡愈之到香港向党组织和民盟中央报告工作，这时英殖民当局颁布了“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非法，也取消了“民盟”，胡愈之已不能回新加坡了。中国共产党“五一”发出了召开不包括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胡愈之奉命回党中央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8年8月，胡愈之与沈兹九离港北上，经韩国到大连，进入解放区，9月底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党要他继续做统战工作，并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做最初的筹备工作。胡愈之和已到解放区的“民盟”成员共同成立了“民盟”华北解放区第一小组，为迎接大批民主人士到来做准备。北平解放后，“民盟”总部迁至北平，成立“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胡愈之是“临工委”委员，受命筹办“民盟”机关报，1949年6月，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光明日报》出版，胡愈之为主编。胡愈之还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和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副主席、代主席，一直是“民盟”担负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胡愈之还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历届全国政协，任常委和五届政协副主席。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六届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还担任过出版总署署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政府领导工作。他也是外交学会、对外友协、世界语协会等人民团体的领导者，为人民外交和世界语运动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费孝通等著：《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2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上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上虞文史资料》第6辑《纪念胡愈之专辑》，1991年版。

胡愈之著：《胡愈之文集》第1—6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

胡政之

熊尚厚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以字行，笔名冷观、静观，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市）人。是一位以“文人论政”，希望实现其振兴中华理想的爱国报人，著名报业企业家。其父胡登崧是举人，他幼年随父宦游安徽，少年时就读于安庆高等学堂，学习勤奋，打下了很好的古文根底。其父病逝后回到家乡，1905年赴日留学。在日本初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嗣入帝国大学法科，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

1911年，胡政之学成回国，先在上海为一家馆教英文，后通过律师考试，与友人共办律师事务所。嗣在河南淮阳任法庭刑事推事，不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庭长。1912年，他在上海服务于于右任的民立图书公司，并以“冷观”的笔名投稿于《民立报》。翌年，胡政之和张季鸾在《大共和报》工作，担任总编辑，还兼课于吴淞中国公学讲授法律。1914年他去北京，在某大学教法律，并兼《大共和报》驻京特派员。翌年前往东北吉林任法院推事，不久被吉林巡按使王揖唐选任秘书长。

1916年，胡政之随王揖唐回到北京，任内务部参事。与安福系军阀关系日益密切，与中外各界上层人物多有交往。10月，经徐树铮的推荐，入天津《大公报》任经理兼编辑。张勋复辟时，助安福系讨伐，销路大增。他审时度势，以“冷观”的笔名发表社评，又在《大公报》辟思想专栏介绍西方文化。天津《大公报》一时颇有起色。1919年1月，他被《大公报》派往法国采访巴黎和会，成为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撰写大量独家消息，发表文章及专电，刊载在《大公报》上，随后考察欧洲各国新闻事业，走访各国通讯社。皖系在直皖战争

中失败，《大公报》营业不振。1921年春回国后，胡政之离开《大公报》，应林白水之聘任北京《新社会报》总编辑。未几因与林意见不合离京去沪，经徐树铮保荐由卢永祥出资，办国闻通讯社。

胡政之主持国闻通讯社，力图办成全国最大的新闻通讯机构。当时国内许多通讯社只是挂名，且被一些人作为敲诈工具。胡政之在欧洲考察新闻事业时，即遍访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漫尔夫社、英国路透社及意大利司丹法社等，决心回国办好一家全国性的通讯社，以争取中国新闻报道的独立性。1924年秋，他设国闻通讯社总社于上海，此后陆续于天津、北京、奉天（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广州、贵阳等地设立分社，于各地聘请兼职通讯员，且有国外的美联社、哈瓦斯社、路透社、联合社等订稿，成为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大通讯社。

胡政之常往来于京、津、沪三地，广泛采访总统府、督军署、国会以至巡警岗亭、庙会、饭馆、澡堂、妓院等等。有时清晨四五点钟在北京崇文门看枪毙人的告示，等到电报局一开门就发电报，及时报道新闻。起初每天发稿六七千字，后来多至万余字，靠能力与交游以稿件赚得自给自足，一时生气勃勃，其个人的名声在新闻界鹊起。

但是好景不长，国闻通讯社因卢永祥战败，经济上失去支持，乃于1924年8月在叶楚伧、潘公展等国民党人的协助下，再创《国闻周报》作为附属事业。该刊内容有时论、专论、通讯、一周述评、掌故、文艺、诗海等。既有言论、新闻，又有文艺，每期发行达五万份。继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之后，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周刊。

1925年11月，天津《大公报》因经济困难而停刊。胡政之与张季鸾、吴鼎昌商议，决定扩充《国闻周报》以资助国闻通讯社；同时准备接办《大公报》，遂将《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迁天津。翌年6月，与吴、张共同组织新记公司接盘《大公报》，于9月1日正式复

刊，日出对开一张。他们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由胡政之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并参与社评言论，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他总管报社经营的全局，从发行、广告、会计到印刷事务，以及考查记者、编辑、地方通讯员的工作，各种具体事务无所不管；同时，除参与《大公报》社评的议论（有时也撰稿）外，还要为国闻通讯社发新闻稿。他每日七八点钟去报馆，着重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阅读报纸，下午督促编辑和访员工作。晚上与吴鼎昌研究社务及分担社评写作，每天要忙到半夜。他重视人才，善用人才。1928年9月，胡游访东三省，以“冷观”笔名发表游记数篇，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使国人引发对东北的关注。其后两年间，他再游东北，又发表通讯和游感文章多篇。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进入发展时期，为了扩充报纸的内容，胡政之力主运用社会力量办报。1933年9月，他与张季鸾去北平宴请文化教育界名人蔡元培、胡适等人，开辟《星期论文》专栏；之后又相继增出图书以及哲学、教育等各类周刊，充实报纸的版面。

在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高涨之初，胡政之认为我国国力薄弱，国内政局欠稳，主张对日暂缓抗战，赞成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言论偏袒蒋介石，为此《大公报》曾被投掷炸弹。胡政之不正视抗日，而积极于宣传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1933年起，他派画家赵望云赴河北农村，以写生画报道农民情况，并派人普遍调查农民状况，在报上宣传民生问题。“塘沽协定”之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他对抗日态度开始积极，在“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时，他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勉励国人要发奋自强。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他一面劝当局勿使其政治化，一面劝学生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不要妨碍学业。胡政之目睹日本侵略日亟，华北有不保之虞，与张季鸾等筹谋对策，于1936年4月在上海增出《大公报》沪版。与此同时，他将《国闻周报》迁沪；并拟于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增设《大公报》分馆，计划向全国发行《大公报》。为此，他到广州考察，并派员去汉口、西

安筹办，准备向工商界招股。在他赴日本考察报业回国后，还打算设立研究部，以适应《大公报》“注重国民经济”、“报道民生疾苦”及“科学实用”等要求。后均因抗战爆发而使计划落空。

“七七”事变后，胡政之誓言坚决抗日。上海在“八一三”抗战后于11月沦陷，胡政之与张季鸾等决定上海《大公报》停刊，将部分机器运往香港，出版香港《大公报》。1938年春，他离汉去港筹办香港版。8月《大公报》港版出版，胡政之在创刊号上说：“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受艰危，而一支秃笔始终在手不放。”表达了《大公报》同人“文章报国”的意念。之后他又筹办桂林版，还计划出版昆明版，而以香港作为其事业的基地。翌年3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发刊，他常去桂林主持工作。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后，他由桂林赶回重庆料理丧事和主持社务，设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任主任，总揽《大公报》全局，同时成立社评委员会，任委员。1941年12月香港被日本侵占，他撤至桂林，后去重庆，递补张季鸾遗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续任第四届参政员。1943年9月，他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仍以“不私、不盲”为社训。同年11月，入宪政实进协会为会员。是年冬，他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为中国访美团成员；翌年9月，参政会组织延安视察团，他亦为成员之一。胡政之着手制订《大公报》战后发展蓝图，计划将来在津、沪、渝、穗四地同时出版《大公报》。1945年4月，他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会后在美国洽购机器设备、纸张并延揽人才，还计划在美洲创办《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由加拿大回国，致力于《大公报》津、沪两版的复刊，并拟在广州设馆。1946年春，他到上海主持上海总馆的工作，改设大公报社总管理处，于台湾发行航空版，计划增设广州版，准备建立一个强大的报业集团。当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时，他以社会贤达身份为会议代表，在会议中与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交往甚多。

1947年11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逼胡政之参加。他感到左右为难，只去报个到，但未参加大会。胡政之在激烈的国共两党斗争中，主张站在中间立场，力求不偏不倚。国民党及蒋介石不满于《大公报》的这种态度，对《大公报》不断施加压力，经常无故逮捕记者，在言论上亦多加指责。胡政之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日益不满，而国民党当局更加加紧新闻控制。眼看《大公报》津、沪、渝三馆的业务无从发展，为了勉力维持下去，他在总管理处下设立营运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国闻出版社、购料委员会及海外部等机构，尽力在大动荡的局势中挣扎。嗣后，胡政之对国民党的统治绝望，认为“国民党政权已窳败到不可救药，新的局面必当出现”。但又认为自己将为共产党所不容，所以想在香港闯出一条生存之路，便于1948年1月去港复刊《大公报》港版，在美国创办《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一个月后，胡政之病倒，患肝硬化症。

不久胡政之到上海治病，1948年4月14日病逝于沪。

主要参考资料

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陈纪莹：《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

郑仁佳：《大公报三巨头之一胡霖》，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3期。

胡宗南

沈荆唐

胡宗南，原名琴斋，字寿山，浙江定海人，1896年5月1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四）生。父亲胡敷政（字际清）在孝丰经营药材业。胡宗南七岁至孝丰入塾；十二岁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学习。1912年考入湖州吴兴中学求学三年，毕业后回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执教，翌年受聘为私立王氏小学校高年级与补习班主任教员。

1924年春，胡宗南闻悉黄埔军官学校在上海秘密招生，乃赶去报考。去广州复试时因身高不足一米六而被淘汰；后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准方被录取，编入第一期二大队第四队。毕业后分派在教导一团第三营第八连任少尉见习，后任机枪连排长、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之役。1925年8月编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时，胡宗南任第一师第二营副营长；1926年6月升任第二团中校团附。

北伐战争开始后，胡宗南于8月升任第二团团长，出征江西。在攻打牛行车站时，他采用火攻战术，在浇有汽油的柴草上，撒了大量辣椒水，用烟熏得守军逃出工事四处乱窜，胡宗南乘势指挥机枪猛烈扫射并率部攻击前进，迅即攻占了强攻不下的敌军据点，一举打败了孙传芳军的一个精锐师，俘虏了军长李彦青及其所部八千余人。江西底定后，胡宗南率第二团随第一军第一师入浙，会同何应钦东路军击溃了孙传芳军卢香亭部，进占杭州。其后胡宗南第二团随同第一师作为进攻上海的先头部队北进，击败直鲁联军毕庶澄部的白俄雇佣军，进占莘庄、龙华。1927年5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团团长；11月攻打蚌埠的战役中，他以炮火掩护敢死队拆去铁轨，使白俄雇佣军铁甲车队不能动弹。他以战功升任第二十二师师长，军队整编后改为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驻防徐州，拱护南京的北大门。此后在蒋

介石与各军事实力派的交战中，胡宗南率部东奔西战，效力至勤；尤其在中原大战中，他任第一师代师长，与冯玉祥军凶猛拼杀，还曾杀出重围冒死卫护蒋介石撤至商丘，颇得蒋之夸赞。1931年冬，胡宗南正式担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32年春，蒋介石招揽亲信组建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胡宗南以其效忠于蒋的竭诚，列名为该组织核心骨干“十三太保”之一。

嗣后，胡宗南率第一师在蒋介石“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战事中，冲杀在前，先后攻占六安、霍山、麻城等县；并在红四方面军向西北转移时，紧紧追击直至陕南。此后，胡部在甘南徽县、城县、碧口一线布防，又往松潘一带活动，企图拦截、围歼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结果受到沉重打击，伤亡过半。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又于1936年9月晋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他曾指挥所部进犯陕甘宁边区，遭到彭德怀指挥的红军包围、歼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宗南率第一军参加了淞沪抗战，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战后撤回陕西整补后，于1938年5月开赴豫东抗御日军。武汉会战结束后，胡宗南奉命指挥所部固守陕州至宜川之黄河河防抗御日军，兼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他构筑了一条六百余公里的碉堡封锁线，力图隔绝陕甘宁边区与外面的联系，并拘捕大批奔向延安的热血青年。胡宗南卖力限共、反共，受到蒋介石的褒奖。第十七军团于1939年扩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胡任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并节制第七十六、新十二、骑三军；1942年7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7月，擢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辖第三十四、第三十八、第三十七、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及甘肃警备司令部的兵力，计有四十万之众，遍及西北各省，有“西北王”之称。他实行军事管制及联保连坐制度，还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并强化特务机构，进行严密统治，无辜拘捕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将他们关押在“西北特

种拘留所”和“西安青年劳动营”残酷折磨。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是蒋介石进行内战的一员干将。他于1946年5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向蒋介石提交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主张对陕甘宁边区“突发奇兵”，直捣延安。蒋认为时机未到，复电“暂缓”。1947年春，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对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命令胡宗南率领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他迅即制订《攻略延安方案》，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延安。3月11日，他指挥十五万兵力，分左右两个兵团，从宜川、洛川出发，以“蛇蜕皮”战术层层掩护前进，受到解放军的强烈阻击，进展迟滞乏力；而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撤离延安，军民实行坚壁清野。直到3月19日，胡的先头部队才进入这座空城，向蒋介石报功请赏。他还凭借其庞大兵力进行了四次“大扫荡”，想寻找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东奔西走遍寻无着，反而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中一再挫败，损兵折将，被歼众多。10月，他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所撤回西安，而将延安交刘戡第五兵团看管。1948年初春，人民解放军向宜川发动强大攻势，胡宗南令其主力整编二十七军由黄陵、洛川东援。3月3日解放军攻克宜川，歼敌约三万人，击毙军长刘戡；接着乘胜向西向南进攻。胡宗南所部溃不成军，驻守延安的整编第十七师惶惶不可终日。在解放军光复了洛川以南广大地区后，胡宗南只得下令延安守军于4月21日南撤。4月22日延安重新光复，胡宗南重点进攻延安之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此后，胡宗南在陕西实施“机动防御”战术，于1948年夏秋在陕东澄城、邵阳、蒲城等地抵抗解放军的攻势，结果被歼五万余人。1949年春，他将防线撤至泾河南岸，在三原等地构筑防御工事，企图固守西安。5月，解放军发起陕中战役，渡过泾河，胡部风声鹤唳，不断后撤，先后丢弃咸阳、兴平、武功，20日又撤出西安；继后又从凤翔、郿县、临潼、渭南、华阴、周至等地撤出，第五十七军等被全歼。7月丢失了宝鸡这个总兵站和后方主要供给基地后，他退据汉

中，想在陕南站住脚跟。蒋介石也命令他在秦岭构筑强固防线，阻挡解放军由陕入川。结果解放军迂回从南面进军，直插贵阳、遵义，同时在川东千里战线多路突击。胡宗南奉蒋之命率部南撤至四川作战，在掩护蒋介石从重庆撤到成都后，胡部李文第五兵团、李振第十八兵团在成都附近集中，但已陷入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之中。胡宗南丧失信心，想往西康、云南撤退，但蒋令其死守成都，还任命他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长官（顾祝同）职。此时解放军向成都快速推进，刘文辉等于12月9日毅然起义，蒋介石于同日飞离成都撤往台湾。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已溃不成军，他眼看局势已朝不保夕，于12月23日飞离成都潜往海南岛。后在蒋介石严令之下，于28日返回西昌，收集突围西逃的第五兵团残部。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昌，胡宗南仓皇去台湾，遭到四十六名“监察委员”的弹劾。后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于1951年夏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潜往大陈岛专事抢劫海船、骚扰破坏。1953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5年9月任澎湖列岛防守司令长官，1959年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2年2月14日，胡宗南病死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胡上将宗南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上将宗南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朱传誉主编：《胡宗南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图书公司1985年版。

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3辑，1984年版。

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李犹龙：《胡宗南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华之鸿

周春元　林国忠

华之鸿，字延仪，又作延宜，号延厘，1871年7月31日（清同治十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贵阳一个盐商家庭。其先祖系江西临川江右望族，清康熙末年以行医来到贵州，卜居遵义南乡团溪，咸丰、同治年间为躲避黔北号军起义，迁至贵阳。父华联辉，举人出身，以经营盐业致富，为贵阳巨商，曾任四川运盐局总办。

华之鸿幼年在家读书，十四岁丧父，受叔父华健庵训诲，刻苦好学，名列附贡生。华健庵为贵阳著名盐商，任四川运盐局总办时，华之鸿辍学管家，经营贵阳盐业。时虽年少，但“心思细密，事理通达，已有老成气度”[(1)]。1896年，华之鸿弃商离家，出任仁怀厅（驻赤水）儒学训导，在职六年，很受学生爱戴。

1902年，华之鸿因叔父年老，回到贵阳，接管永隆裕盐号。由于他家早先取得仁怀口岸盐业专卖权，盐号发展非常快，家产达百万，为贵州首富。每年端午、中秋、腊月底三个关期缴纳盐税时，银两少则几十挑，多则几百挑，沿途挑夫绵延数里，“华百万”的赞名传遍川、黔两省。他在商界颇有声望，1907年被推举为本省商务总会会长。

华之鸿曾说：“钱财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众人皆贫而我独富，夫何快哉。”[(2)] 早在1905年，华之鸿继承其父“亦商亦读”遗志，与唐尔镛、任可澄等创办了贵州最早的中学——贵阳通省公立中学堂，他兼任学校副监督。1907年他资助创办了贵州最早的报纸——《黔报》。同年还捐资创办遵义地区最早的中学——遵义中学堂、遵义最早的公立小学——团溪两等小学堂以及息烽

底寨文昌阁小学、贵阳优级师范、法政学堂，并兼任师范副监督。1909年兴办《贵州公报》，并创办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厂。清政府赏他为“分部郎中”。

随着立宪运动兴起，华之鸿也参与了当时的政界活动。1906年12月，贵州谘议局筹备处成立，华之鸿兼任议绅。1909年，他与唐尔镛、任可澄、徐天叙等成立贵州宪政预备会。他资助的《黔报》隶属该会，鼓吹立宪。在宪政预备会与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的斗争中，华经常出钱支持宪政会活动，被会众尊称为“四先生”。宪政预备会会长任可澄曾夸“四先生之力伟矣”[(3)]。

辛亥武昌首义后，云南起义对贵州震动很大，革命党人谋议行动。宪政预备会的上层分子建议贵州巡抚沈瑜庆急电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刘显世，率防军入贵阳镇压革命。华之鸿见防军未到，革命党人准备发动，乃于1911年11月3日，即贵州独立的前一天，出面与任可澄等商议，组织保安营，名为“保卫地方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实则准备对抗贵州革命。保安营缺款，华之鸿又捐数千金，作士兵购置服装和军饷费用。当晚，保安营参与了阻止贵州革命党人的起义活动。11月4日贵州独立，成立军政府，华之鸿被举为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当时库空如洗，市面金融恐慌，挤兑成风。为稳定金融市场，他出资五万银两，挑至官钱局，让民众兑换。华之鸿任副部长职四个月间，协助财政部长蔡岳整顿贵州财政，使军政府收入八十三万元，支撑了贵州革命政权的军政费用。1912年3月初唐继尧入黔后，华之鸿与任可澄等出面，拥戴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唐委任华之鸿为贵州都督府政务厅财政司司长、预算决算处处长兼贵州银行总理。后唐经费困难，华之鸿又为唐发行银元票三百万元。

清末民初，华之鸿将先辈创办的成义茅台酒厂扩大兴办，提高质量。1915年将酒送交美国政府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览，被评为世界第二名酒，荣获金质奖章一枚、奖状一张。从此茅台酒逐渐誉满神州，名扬全球。

茅台酒为贵州特产之一。早在1704年于仁怀县茅台村建厂，因而得名。前清时茅台村是川盐入黔集散地，盐商多为陕西、山西一带人。他们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仿汾酒酿造方法，设成义酒坊酿酒，用以自奉，并不外销。咸丰年间，秦晋商人歇业还乡，将所设盐号及酒坊售与华之鸿的祖父华柽坞。华家沿用成义酒坊名称，所酿之酒称华茅。光绪年间，茅台、贵阳、遵义和平越县相继建造茅台酒厂，所酿之酒称赖茅、荣茅、金茅、越茅、丁家醇茅等。各家酿造技术保密，互不传授；加之茅台泉水为他处所无，故茅台酒的质量不一。“以华茅居首，赖茅及荣和烧坊茅酒次之，金茅与越茅及丁家醇茅又次之。”(4)

在此期间，华之鸿为发展文化印刷事业，在贵阳创设永丰造纸厂，投资银六十万两。又筹银五万两，请省长刘显世派兵护送至上海，汇兑日本购买造纸机。结果被刘以借用为名，将银截走。华之鸿只好第二次再筹巨款，派人东渡日本，学习造纸技术，购买大型造纸机器，并聘请日本技师。永丰造纸厂于1919年建成投产，是为贵州第一家造纸厂。

1916年以后，华之鸿离开政界，研求佛典，诵读儒书，“自朝至暮，屹坐案前”(5)。所营企业，逐渐交其子华永源经营。他在贵阳东门修造大觉精舍，拟陈列佛经。又购得城西狮子山一带山地，招徕佃客数家，雇用几十名工人，兴办农场，名曰“自力”。场内种植果树、药材、苗圃，植树约20万株。

华之鸿对于地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颇为热心。四川赈灾，他捐银六万两；皖北赈灾，捐款六千两；华洋义赈、全黔义赈，他也予捐助。平时修桥补路，少则数十两，多则数千两。间或也施衣舍米，退还债券，组织义渡、义仓等。

1934年3月7日华之鸿病逝于贵阳。

主要参考资料

《故绅华之鸿事实清册》，贵州档案馆藏。

《华向渠档案材料》，贵阳档案馆藏。

---

(1) 杨恩元：《华君延仪墓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华树仁：《贵阳文通书局概述》（未刊稿）。

(3)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2页。

(4) 何辑五编著：《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南京印书局1947年版，第98页。

(5) 华永源、华怀仁：《先府君行述》，政协贵州怀仁市委员会学习文卫委编《怀仁文史资料》第22辑，2005年版。

黄百韬

王家鼎

黄百韬，原名新，字焕然，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1900年9月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生于天津。其父黄宗骏早年从军，曾为李鸿章淮军之统领，后流落天津。黄五岁时丧父，因家贫曾一度随母靠捡煤核度日，嗣后其母至当地苏姓富户做女仆，黄偕往充当少东书僮，以少年聪慧深得主人喜爱，遂得资助入学堂就读。1913年小学毕业后，入直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中学部，三年后毕业。他凭借苏家与江西督军李纯的世交关系，被荐往李纯处，得入陆军第九混成旅学兵营当学兵。

1917年8月，李纯转任江苏督军，黄百韬随至南京，任李纯的传达兵。李纯对黄百韬甚为赏识，以心爱的婢女金恕勤适黄为妻，并保送他入军官教育团第五期步科受训。1922年结业后，他被派往江苏省防军任排长、连长等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已投奔奉系的张宗昌乘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之机，进入关内，收编直军四个旅，继又协助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率兵攻打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防军一触即溃，黄百韬被俘。张宗昌念黄在军官教育团之师生情谊，予以接纳，后派他至徐源泉部，先后任团附、营长、参谋等职。1926年8月，褚玉璞任直隶军务督办，徐源泉为帮办，任黄百韬为督办公署参谋。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6月初进占北京、天津，张宗昌、褚玉璞率直鲁军残部退守滦河东岸。10日，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在天津易帜，接受改编。徐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团，黄百韬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张冠五）第八师参谋长。同年冬，国民党军编遣缩编，徐源泉第六军团缩编为陆军第四十八师，驻

防于昌平、南口一线，黄百韬调任该师第一四三旅二八八团团附。1929年3月，第四十八师奉命南下，在南京受阅后溯江移驻汉口。时值蒋桂战争爆发，第四十八师划归“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第九军（军长何成濬）序列，参加讨桂战役。旋黄又调任第一四二旅二八四团团附。同年10月，徐源泉第四十八师参加讨伐冯玉祥。12月第四十八师改编为第十军，黄百韬以原部团长兼第一四二旅副旅长。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第九、十军等非蒋嫡系部队属何成濬指挥的第三军团，第十军编为第十六路军为左翼军，黄百韬所在的第一四二旅参与在平汉线与冯、阎军的拉锯战。8月，蒋军反攻，第十军被编为平汉路第一纵队，第一四二旅参与攻打洛阳之役。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转而发动“围剿”工农红军，黄百韬在鄂中地区转战不停，甚为卖力。1931年2月，黄百韬所在的第一四二旅从沙市进驻公安，担负“分区联防清剿”的任务。3、4月，黄百韬率二八四团进攻藕池红二军段德昌部，先后侵占石首、调弦口、塔市驿等地并沿江东犯。5月，黄百韬升任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三旅旅长。1932年1月，鄂西红军攻取皂角市、陈家河等地，进逼武汉。黄百韬所在的第四十一师与第四十八师自东部攻入鄂西根据地。4月，黄百韬调任第四十八师一四四旅旅长，嗣后指挥该旅及一四二旅、新三旅等八个团，在皂市附近九真庙地区与贺龙、段德昌部工农红军激战中受重创。7月下旬，黄百韬旅率先攻占洪湖根据地腹地新堤蕉子渊，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3年初与红三军贺龙、关向应部交战于湘鄂边鹤峰、桑植地区，黄百韬旅猛攻邬阳关得手。1935年4月在进犯湘西大庸、永顺、桑植，建立三县边境封锁线的战役中，黄旅为先遣纵队，从黔江东移来凤县中堡、李家河一线，协击塔卧地区，并修筑四川境内具坝至濯河坝间的碉堡。此时红军移师包围宣恩，黄旅遂转白塔增援宣恩。是役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被俘，黄百韬乃被任命为第四十一师代理师长，率部驻来凤、咸丰间，“追剿”和堵击长征西进的红军。9月，任第三区司令官，修筑碉线网防守来凤至江岩堡一线。

黄百韬虽然作战甚为卖力，而从团附升任师长历经七年之久，盖因既非黄埔系、保定系，又没有什么靠山。但他升任师长后，却居功自傲，日益骄纵，为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所不容。12月，徐以“群情不洽”为由，免去黄的师长职。黄表示韬晦之意，从此改名为“百韬”。旋被任为鄂湘川黔边区“剿匪”总部总参议。同年底，黄被保送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进修，结识了鹿钟麟等人。1938年9月毕业后，正值冀察战区成立，鹿钟麟为总司令，黄任战区参谋长。1940年春，黄百韬调充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高级参谋，其间曾以撰写年终军事论文获奖，受到参谋总长何应钦赏识。

1941年夏，黄百韬受何应钦保荐，出任第三战区参谋长职，欲对战区机关颇多整顿，但因出身杂牌军，为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及其部属所鄙薄。黄遂竭力与顾的亲信结好，逐渐取得顾的支持和任用。1944年2月，被顾派往第二十五军任军长，隶属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序列，曾参加赣州战役对日作战；1945年5月又参与进犯浙西新四军苏浙军区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军事行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百韬率第二十五军跟随顾祝同进驻淞沪地区，1946年初划归汤恩伯第一绥靖区统辖。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一绥靖区十二万人进犯苏北解放区，驻扬州的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分兵进犯宜陵、樊川、邵伯、高邮等地。8月，黄部在邵伯被解放军第十纵队歼击，退回扬州。11月，黄部一个旅会同整编第八十三师、整编第六十五师四路进犯盐城，黄百韬率部在卞仓地区与解放军激战兼旬。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二十三个师发动“鲁南会战”，企图一举歼灭华东人民解放军，黄百韬师为“主要突击集团”的右路，北犯临沂。解放军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于2月10日放弃临沂北上莱芜，于是月下旬歼灭李仙洲集团共五万余人，黄百韬等欲北援已不及。5月，蒋介石调集汤恩伯、欧震、王敬久三个兵团共十三个整编师“重点进攻”沂蒙山区，黄百韬部属临沂汤恩伯第一兵团序列，与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同为这次进攻的主攻部队。5月12日，七十

四师抵达桃圩、蒙阴时，改归黄百韬指挥。黄原计划合整编第八十三、七十四、二十五、六十五师互相联结，固守天马岭、虾蟆岭，但张灵甫自恃嫡系精锐部队[(1)]，执意孤军深入，放弃天马岭，独自占领蒙阴东南六十里的险地孟良崮。人民解放军迅即以优势兵力割断其与黄百韬等部的联系，切断其后路，封闭合围圈。黄百韬在蒋介石严令之下率部去救七十四师，但在解放军阻击下一直未能与七十四师合拢。5月16日七十四师被全歼，骄狂的张灵甫被击毙。事后，蒋介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将战败责任归咎于黄百韬指挥失误、援救不力，欲治其罪；由于得到顾祝同等人回护，黄得以在会上详述作战经过，仅受“撤职留任”处分。

此后，黄百韬更加卖力地从事反共内战，甘当进攻解放军的主力。7月，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犯鲁中，黄百韬为右路指挥官，侵占东里店、南麻等地，并率部救援临朐第八军李弥部。8月至10月，国民党军进犯胶东地区，黄率部卖命死战，先后占潍县、昌邑、高密、平度、栖霞、福山、烟台等地。旋奉调移驻安徽。

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了豫东广大地区的基础上围攻开封，歼敌三十九万余人。蒋介石震惊不已，赶赴前线指挥，但调集驰援之区寿年兵团被围于睢县、杞县地区，邱清泉兵团亦受到阻击而无法前进。于是，蒋介石急调黄百韬率师车运豫东，并指挥第三快速纵队、交警军二总队，成立黄百韬兵团。黄百韬率部西进，赶到帝丘店地区时，被人民解放军五个纵队合围，遭到猛烈攻击。黄率部顽抗死战八昼夜，死伤无数，士气颓丧，黄亦负伤；直至胡琏第十八军和邱清泉兵团来援，黄百韬才得以突围而出。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授予青天白日勋章，黄感激涕零，表示今后当为蒋介石效命“万死不辞”。

豫东战役结束后，8月，蒋介石正式组建第七兵团，以黄百韬为司令官，辖第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军。9月中旬，按蒋介石的重点防御布局，黄率部移驻陇海线东段新安镇，担任海州至运河间防

务。其时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后，于10月中旬挥师南下。11月初，蒋介石慌忙部署徐海防务，收缩兵力集结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守备。黄百韬意识到第七兵团地处前沿，是解放军打击的首要目标，遂向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建言：仿效拿破仑团式集中法，集结各主力兵团于徐州四围，以图各个击破人民解放军。11月3日，他再向刘峙建议，速取各兵团相互衔接深沟高垒战术。当天深夜，蒋介石在南京批准退守徐州的方案，决定弃守海州、新安镇，命黄百韬率第七兵团由新安镇退守徐州以东地区。黄百韬对幕僚慨叹这一决策为时已晚，“恐怕撤退不及了”[(2)]。5日，黄又受命率部掩护海州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西撤。此时，第一〇〇军和第四十四军亦归黄百韬指挥，第七兵团扩至五个军，共约十二万人。

11月6日夜，华东人民解放军七个纵队从鲁南兼程南下，矛头直指黄百韬兵团，揭开淮海战役序幕。7日，双方发生局部战斗。当夜，黄得报李延年部业已转移，遂于8日凌晨率部沿陇海线仓皇西撤。五个军的官兵、辎重均须通过运河铁桥这个唯一通道，拥挤阻塞，行动迟滞。第六十三军从窑湾镇渡河，遭解放军苏北兵团的截击，随后被全歼。9日黄率部移抵碾庄地区，但碾庄至曹八集间的西撤通路迅即被人民解放军切断，黄奉命就地抵抗。四个军七个师被解放军十一个纵队全面包围于纵横不及十华里的碾庄地区。黄据守地堡工事，向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呼救，请求早派援军和补给粮草弹械。12日起，解放军展开猛烈攻击，重点突袭碾庄南部正面第四十四军阵地，至14日晨全部摧毁。黄百韬急调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一部增防碾庄车站，激战不止。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5日飞临碾庄上空，又空投蒋介石亲笔信，为黄百韬顽抗死守撑腰打气[(3)]。16日自晨至暮，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碾庄西部第一〇〇军阵地全部瓦解。至此，南、西两面阵地俱失，北、东两侧阵地亦多残破。徐州“剿总”先曾于11日午后命徐州以西邱清泉第二兵团东调，会同李弥第十三兵团以钳形攻势解黄百韬之围，但李部进到八义集、大浒家时，受到解放军增援部队的阻击，经七天多的逐村逐庄争夺苦战，仍无法前进。黄

百韬但闻大浒家炮声隆隆，终不见李弥兵团的援兵到来，只好唉声叹气地表示失望。17日起人民解放军日夜赶修迫近工事，于19日通过网状壕沟坑道逼近黄部阵地。黄百韬仍不觉悟，借空军掩护，集中营长以上官长训话，声称要“以死报国”。对于已经失去的阵地，他仍命炮兵轰击毁尽；对碾庄民众则任其饿死也不放出。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第四十四军和一〇〇军被全部歼灭，包围圈越缩越小。第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残部弹尽粮绝，士气沮丧。黄百韬于20日凌晨逃至大院上据点，午后又转往吴庄据点，准备向西北方向突围。但各据点均为解放军网状壕沟分割包围。黄见大势已去，绝望地对同僚表示：“天地虽大，吾将难以自容。”[(4)] 至22日黄昏，被围之国民党军残部被全部歼灭，黄百韬突围逃命未遂，举枪自戕而死。

主要参考资料

杨群奋：《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传记·黄百韬》（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327—340页。

《鄂湘川边剿匪总司令部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毛泽东军事文选》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1981年版。

李以勋：《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杨廷宴口述，黄福初笔记：《黄百韬司令官殉难经过》，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324—329页。

李世镜：《黄百韬上将逝世九周年纪念感言》，台北《中央日报》1957年11月22日。

(1) 当时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和整编第七十四师，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

(2) 陈士章：《黄百韬的起家和败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3) 蒋介石给黄百韬的亲笔信原件照片，见《新徐日报》1949年1月3日第2版。

(4) 《碾庄之战》，刊于台北《中外杂志》第39卷第1、2期。

黄宾虹 (1)

周衍发

黄宾虹，名质，字朴存，1865年1月27日（清同治四年正月初一）生于浙江金华。原籍安徽歙县潭渡村。因潭渡村有滨虹亭，中年更字宾虹。父黄定华，字鞠如，虽是商人出身，但长于书法和绘画。

黄宾虹五岁时，父亲延师教他读书。老师赵经田是个秀才，会画山水和兰竹。他在父亲和老师影响下，从小喜欢绘画和篆刻。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廷瑞（樗崖）山水册，后来又从画家倪逸甫学画和篆刻。十一岁时，他已能临刻邓石如印谱十多方。十二岁那年，黄宾虹随父去歙县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十四岁时，考取金华丽正、长山两书院。十九岁时为了写生，他游览了杭州西湖、金华北山、安徽黄山、九华山以及浙江的永康、缙云、诸暨等名胜地。为了画夜景，他曾借月光刻苦练习。

1886年，黄宾虹补廪贡生。同年去扬州，在两淮盐运使署任录事。盐运使程桓生的儿子程夔也喜欢书画，与黄意趣相投，经常共同习画，或去字画收藏家那里观摩。在这期间，他从画家郑珊学山水，也从陈若木学画花鸟。郑珊所画山水，笔意苍厚，善用积墨，颇得龚半千遗意，黄宾虹的画深受郑的熏染。黄宾虹在两淮盐运使署任职数年，以后他辞职回到家乡。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严重，维新派要求变法图强，黄宾虹深表同情。他的友人萧辰，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交往，黄宾虹常与萧辰谈论维新派的活动，并研读康的著作。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黄宾虹致函康、梁表示支持，并申述个人见地。同年夏天，谭嗣同到上海，黄宾虹得友人介绍与谭

订立文字交。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黄宾虹获悉谭嗣同被西太后杀害，悲痛不已。为了悼念他，曾写了一首挽诗，有“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句，表露了他对谭嗣同死难精神的赞佩。

1899年春，黄宾虹被人以维新派嫌疑控告，因事先闻讯，仓促出走，辗转到河南开封避居。到了冬天，又潜回歙县。翌年北上，途中闻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只得在南京住了一段时日，后郁郁而归，隐迹山村；与里人郑搢书筹办董理歙东的庆丰堨以利农耕。

1906年，许承尧在歙县创办新安中学堂，黄宾虹应聘任国文教员。他同陈去病、许承尧、江炜、汪律本等，为纪念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组织了“黄社”。“黄社”表面上以议论诗文为名，实际包含了反对清朝统治的用意。1907年，他为同盟会筹款，再度被告密，遭清政府通缉，在朋友帮助下，化装逃到上海躲避。

旧中国的上海，情况复杂，黄宾虹富有爱国心，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总想有所表现。1907年至1911年间，他曾协助邓实、黄节诸人编辑《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及《国粹丛书》等。这些书刊都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在此期间他和章太炎、刘师培等常有接触，进一步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黄宾虹年过四十以后，致力于学习我国传统画法。他大量临摹古人名作，一笔不苟，极似原作；或只取其意，得其大略，因而在技法上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这期间画的山水屏条皴法疏简，笔墨秀逸，深受新安画派的影响。1909年“南社”成立，他同陈去病赴苏州出席盛会。他还常去著名画家吴昌硕主持的“海上题襟馆”叙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商团响应起义，攻下沪南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黄宾虹兴奋不已，手制大白旗高悬，以示庆祝。他对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云南、龙门、敦煌等地盗窃文物，破坏古代文化艺术，非常愤慨，曾作漫画，投寄高奇峰、高剑父主办的《真相画

报》。

1915年，黄宾虹在《上海时报》工作。当时，袁世凯图谋称帝，筹安会成员谢连荪来诱说他北上共事，并以厚利相许，黄宾虹毅然拒绝，并对朋友说："助纣为虐，不是君子所为。"

民国以后黄宾虹长期居留上海，他除了从事绘画和篆刻外，还在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上海时报社等机构任编纂撰述工作前后达十三四年之久。他参加过编印《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历代名画家书画集》、《中国名画集》等画册；曾主编《艺观》双月刊，又兼《国画月刊》的编辑；还编纂了《美术丛书》和《金石书画编》。撰写的有《古画微》、《滨虹屠抹》，《匋钵合证》、《黄山画家源流考》、《画史编年表》、《虹庐画谈》等，以及《中国山水画今昔之变迁》、《滨虹论画》、《鉴古名画论》、《画法要旨》、《龙凤印谈》、《画学篇》等著作。1926年，他发起组织"金石书艺观学会"，积极推动艺术的交流活动。他还先后任暨南大学中国画研究会导师和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0年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成立时任校长，又任上海美专教授。

在五十岁以后，黄宾虹所绘山水画幅显示出他的独特风貌。他对祖国山川，观察仔细，冷静思考，身到心至，因而泼墨作画，立意奇，丘壑多。他在表现上，能陶融宋、元人的画法，或作干皴湿染，或用浓重积墨，行笔谨严而又纵逸奇峭，无不如意。《桂林山水册》、《北碚纪游》、《秋云堆里出重岗》、《霜容点碧岚》等皆是他的著名作品。

1937年5月，黄宾虹全家自上海迁居北平，在北平艺专教授中国文学和美术史。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黄宾虹欲南归，未成。为此，他杜门谢客，惟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1940年，北平伪文物研究会推举他为美术馆馆长，他坚辞不就。1941年，他写信给在福建的一个学生，勉励他为人要有骨气，不能消极，"风

雨摧残，蘩英秀萼亦不因之消歇”。八十岁时，侵华日人别有用心地想为他举行“庆寿会”，寿堂已设，他仍拒绝与会。

抗战胜利，他非常兴奋，致函诸友，说自己“无异脱阶下之囚”。1946年，他继续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48年秋，他应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聘南下讲学。徐悲鸿在他画的一块巨石上添画一只展翅雄鹰，送他留念。

黄宾虹晚年的山水画更加浑厚自然，臻于妙境。“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黑、密、厚、重”的特色十分显著，高燮评其山水说：“图写自然，千笔万笔无一笔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宾虹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曾出席浙江省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1955年黄宾虹九十寿辰时，获华东行政委员会颁发之荣誉奖，被称为“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同年3月25日，黄宾虹因胃癌逝世。生前所藏书籍、字画、金石、拓本以及自作书画、手稿等一万零一百余件，遗嘱全部捐献给国家。人民政府在西湖栖霞岭他的故居，建有“画家黄宾虹纪念室”。

主要参考资料

黄宾虹：《八十自叙》，载上海书画出版社、浙江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杂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王伯敏：《黄宾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王伯敏编：《黄宾虹画语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

张宗祥：《我对黄宾虹先生的看法》，《东海》月刊1962年第10期。

(1) 引文均见王伯敏著：《黄宾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黄楚九

汪仁泽　熊尚厚

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号磋玖，以字行，晚年自署知足庐主人。1872年4月9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二）生，浙江余姚人。少年时随父行医，略谙医术。十五岁时父死，偕母蒋氏迁居上海，入清心书院读书。不久辍学，初在茶肆酒楼叫卖眼药，后在旧城内开设诊所，取名“颐寿堂”（又名“异授堂”）。自炫为祖传眼科名医，兼制中成药发售，但限于资金，只能零星经营[(1)]。业余阅读中西医书，认为西药效速利厚，转而试图经营西药。当时缺乏资金，黄楚九向一富孀借贷，每次加息如期归还，因而取得信任[(2)]，后累借达数千元，聚为资金。1890年黄将颐寿堂迁至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改名为中法药房，除仍制销中成药外，兼售西药，营业甚佳，资本增为一万元。后几经搬迁，于1904年迁至汉口路，变独资为合伙。黄楚九利用股东间矛盾，以低价收买股东股本，资本愈滚愈多。

1905年，黄楚九从吴姓药剂师处，购得普通安神健脑滋补剂处方一份，针对时人崇洋心理，将药名洋化为“艾罗补脑汁”。“艾罗”本系英文yellow（黄色）的译音，但他却在药瓶贴上印有虚构的洋博士“Dr．T．C．Yale”商标，并附英文说明，宣称能治种种疾病，营业因此蒸蒸日上，日销达一千元。由于本轻利重，黄楚九从此发了大财。1906年，他将左邻茶园盘下，扩充为八开间门面，自备沪上尚属少见的汽车代步，成为商贾巨子。此时有一外国流氓，自称是艾罗博士之子，指控黄楚九盗用其父秘方，扬言将赴会审公廨诉之于法，蓄意敲诈。黄明知不值一驳，但怕露馅，竟将计就计，拿出数千元了事。1910年5月，黄楚九以中法药房名义开办“同征长寿园”，办理人寿与保险业务：并以劝人戒鸦片烟为名，制销以吗啡为原料的“天然戒烟丸”，仅此一项每年获利十万余元。

辛亥革命前夕，民众掀起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此时日货“仁丹”行销我国城乡，漏卮甚多。黄楚九以“挽回利权”为名，设一“龙虎公司”，研制国产“龙虎人丹”，因销路难以打开，两年后出盘给中华书局陆费逵，改名“中华制药公司”，继续制销。不到三年，该公司六万元资本也全部蚀光，1915年重新回盘给黄楚九，成为中法药房的附属企业。此时，日商以“仁丹”曾向中国官方登记注册为由，提起诉讼，黄楚九专聘律师据理抗争，逐级上诉至北京大理院，经内务部最后裁定，“名称不在专用范围内”，因而两药得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后乘抵制日货之机，经过改进质量的龙虎人丹销路大增。

黄楚九于1907年曾与夏粹芳等合资创设五洲药房，任董事。1915年他将中法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十万元，自任董事长，并出资向北洋政府捐得总统府谘议官衔[(3)]。次年，黄楚九盘入罗威药房，并创设公益玻璃厂，1923年又从顾松泉手中盘进中西药房，自任总经理。

是年黄楚九又新出开胃润肠药一种，定名“百灵机”。因系新药试销，怕影响中法药房信誉，改由虚设的“九福公司”出面，大做广告，宣称是“炼取百药之精华制成”，“可以补血补脑补肾”，“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其定价故意较贵，消费者信以为真，争相购买，销路不胫而走。1926年营业额高达一百二十万元，仅四五年间，以一家虚设字号而积累资金达几十万元。他添置机器设备，盘下大世界对面五开间门面，成为一家略具规模的药厂。后来又增出“补力多”补药和“乐口福麦乳精”，抵制市上旺销的同类产品美货“帕勒托”和瑞士“华福麦乳精”。1926至1927年间，黄楚九在福州路山东路口和北京路芝罘路口，分别建造中西药房绿色瓷砖五层新厦和中法药房黄色瓷砖五层新厦。1929年中法药房迁入新厦，资本也由十万元增至五十万元，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增设分支机构。中法、中西、九福三家协作推销，营业大增。

辛亥革命后，黄楚九同时经营新兴的娱乐事业。1912年在九江路

浙江路口开设新新舞台。1913年和上海地产商经润三在新新舞台楼上开辟“屋顶花园”，取名“楼外楼”。游客可登高凭眺上海景色，颇受游人欢迎，为上海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有说书、杂耍及地方戏曲等节目，常常日夜客满，颇获厚利。1915年，他又劝说经润三出资创设新业公司，在跑马厅附近租地建造三层楼的新世界游艺场，内有溜冰场、弹子房、文明戏、大鼓书、口技和南方戏剧等。观众入场，可任意选择观看玩乐，不受时间、场次限制，并附设中西酒菜馆，颇能吸引游客，营业发达。黄楚九担任经理，成为上海游乐场业中的著名人物。

1916年经润三病故，黄楚九与经妻意见相左，遂辞去经理职，与他人合组大发公司，集资八十万元，另办游艺场。在法租界爱多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口觅得地基，翌年年初破土，7月落成开幕，取名“大世界游艺场”，占地一万四千七百多平方米，较新世界大一倍，每天可接纳观众二万多人次。所设剧场、剧种较新世界倍增，并设一“共和厅”，引入海上名媛，排演所谓“群芳会唱”节目；又设“乾坤大剧场”，聘请坤角演出京剧；所设电影院则从美国进口“惊险格斗”影片，独家放映；又辟一露天娱乐场，置有高空飞船吸引儿童。可谓百戏杂陈，应有尽有。除在各报刊登广告外，还请人办一张《大世界报》，大加宣传。不久果然游客如云，卖座冠于各游乐场，附近市面也随之热闹起来。此后由于租界上的恶势力渗入，招引娼妓，设摊赌博，立坛扶乩，大世界遂成为藏垢纳污之地，周围赌场、妓院、燕子窝（鸦片烟馆）林立，形成以大世界为中心的罪恶蛛网地区。1918年黄楚九又设立共发公司，统一管理他所属的全部企业。此后他还同周炳臣开设了三星舞台及三星地产公司。并独资创办中华电影公司。

1919年，黄楚九又在云南路开设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日夜银行，大大方便了附近赌场的赌客[(4)]。该行又以附近职工、商贩、劳苦大众的零星积余为吸收存款的对象，采取利息较一般略高，开户不限存款多少，存取手续简便。凡一次存入百元以上者，赠送大世界入场券两

张等办法，以致该行存款不断增加，为扩展其他企业积累了资金。

1920年冬，黄楚九趁当时兴起的交易所投机风，与叶山涛、袁履登等人合伙在大世界底层创设别开生面的“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自居理事长，从事买空卖空活动。以其所经营企业的股票为主要对象，暗中哄抬，牟取暴利。但好景不长，次年夏，沪地银根紧缩，股票价格暴跌，交易所纷纷倒闭，酿成信交风潮。夜市交易所也被卷入，宣告停业，股票持有人拟组织财团对他进行控告索赔。黄楚九恐累及他的全部企业，乃遍延法租界会审公廨登记的外国律师十多人，每人赠送一千或五百两作为公费，贿赂他们不为持票人承办申诉案，从而避过困境[(5)]。

黄楚九除如上述经营西药、游乐等业外，还于1915年创办大昌烟公司。1917年某日上海申、新各大报第一版上，同时刊出一只套红的大红鸡蛋，既无标题，又无说明，引起人们的好奇，两天后始知是大昌烟公司，为了小囝牌香烟问世而大送红蛋。然后又随大世界门票，赠送小囝牌试吸香烟，游客人手一支，使小囝牌香烟立即风行一时。当时称霸烟业的英美烟草公司洋老板急商对策，以二十万元代价，向黄楚九买下小囝牌商标销毁了事。1919年5月，英美烟草公司针对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阴谋搞垮我国民族卷烟业中最大的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藉口南洋主人简照南曾入日本籍，出钱四十万元，唆使黄楚九到北京，向北洋政府诬告南洋“纯为日资”，应撤销其登记。黄楚九得款后中饱二十万元，其余二十万元向农商部人员行贿，北洋政府农商部遂饬令南洋停业[(6)]。后简去日本办理脱籍手续，并得到国内舆论支持，南洋始告复业。1925年“五卅”期间，黄楚九又接受英美烟草公司贿托，将洋货香烟改装为由他新设的福昌烟公司香烟，派人往汉口等地推销[(7)]。

20年代中期，上海房地产业租地造屋之风甚盛，获利丰厚。黄楚九将日夜银行部分存款移作投资，大兴土木。除于1927年前后，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等处分别建造九福制药厂

和中法药房制药厂厂房外，并在浙江路、宁波路一带租地造屋。但建成后正值沪地市面萧条，新屋店面一时乏人承租，他骑虎难下，遂延聘熟悉各业的人才，开设黄隆泰茶叶店、温泉浴室、萝春阁茶楼、黄九芝堂中药铺等各种商店。

1927年，西药业公会改组为新药业同业公会，黄楚九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他平时起居豪华，讲究个人享受[(8)]，但对公益事业，亦愿解囊认捐。是年他倡议筹建了上海急救时疫医院，又在龙门路开设黄楚九医院，向贫民施诊舍药。但1927年后其事业由盛转衰，原因之一固然由于当时市面不景气所影响，但更主要的是黄金荣等人急需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对他进行打击。黄楚九本人既不参加帮会组织，又无政治靠山，纯系一个商业资本家，而他所经营的大世界等企业树大招风，竟成为黄金荣等觊觎的对象。1930年，黄金荣等指使徒众中伤日夜银行信誉，引起存户惊恐，纷纷提存，致使黄楚九疲于应付，焦虑成疾。1930年底黄楚九赴杭州私寓九芝小筑休养，沪上小报上散布他已急得病死的假讯，提存之风益炽。次年初，黄抱病回沪调度，但终因企业众多，财力分散，一时移东补西，难以招架。黄金荣等趁火打劫，迫使黄楚九内外交困，病情恶化，终于1931年1月19日病死上海。

黄楚九死后，日夜银行等随之倒闭。原来黄楚九所遗大小企业数十家的资产尚足以抵付债务[(9)]。但法租界当局和黄金荣等人借口清理，上下其手，以致劳动人民在日夜银行的小额存款大部分未获清偿，成为实际的受害者。他们扶老携幼，聚集龙门路黄宅，呼天号地，发生吞金、投河者多起。大世界游艺场也经多方角逐，是年6月遂归黄金荣所有[(10)]。

---

(1) 曹厚哉：《黄楚九生平事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总第

110号。

(2) 戴桐秋：《黄楚九最初起家的根源》，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总第30—34号。

(3) 曹厚哉：《黄楚九生平事略》。

(4) 戴桐秋：《黄楚九最初起家的根源》。

(5) 陈星五：《黄楚九事迹片段之一》，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第30—251号。

(6) 陈子谦、平襟亚：《香烟小史》，《上海经济史话》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7) 《方椒伯回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总字第154号。

(8) 曹厚哉：《黄楚九生平事略》。

(9) 根据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所有史料记载：当时虞洽卿、方椒伯等人曾拟出面聘请徐永柞会计师为黄所遗企业进行全面清理，但因受法租界当局及黄金荣等人的阻挠而未果。

(10) 1931年5月29日上海《新闻报》，载有黄金荣的“荣记胜利公司承租大世界”和1931年6月1日起“接办大世界”的启事广告两则。

黄郛

郑则民

黄郛，原名绍麟，字膺白，1880年3月8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生于浙江绍兴百官镇。黄氏先代经商致富，后渐衰落。他父亲黄文治是个候补县官。黄幼年时随父母住杭州。六岁父殁，依靠母亲维持家计，进塾读书。1896年考取秀才，补钱塘县学生。1904年春入浙江武备学堂。不久，黄受清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相结识。次年转学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1910年毕业后归国，投入清廷军谘府任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陈其美在上海策划响应，黄郛赶往参加。上海光复之初局势混乱，黄郛提出迅速成立沪军都督府并推陈其美为都督的主张，受到了采纳。11月4日，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黄郛任参谋长。他们立即招募兵员，编练了一师陆军，称为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由黄郛兼任师长。这时沪、浙、苏、宁、镇、粤各军联合谋攻南京，陈、黄对此役有所策应。蒋介石也在这时从日本回国，投入斗争，陈、黄委他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基于共同的情趣和政治立场，陈、黄、蒋三人互相结托，订为“盟兄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黄郛兼任兵站总监，准备北伐。其后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解职，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沪军都督府撤销，并入江苏，黄郛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这时原准备北伐的各路民军多停留在津浦铁路沿线。黄郛被指派负责处理津浦路南段各军的善后工作。他首先主动解散了自己的陆军第二十三师，又依次遣散了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民军全部解散。这恰好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1913年4月，“宋案”发生，黄郛在北京得电，回到上海。当时革命党人分为“武力反袁”与“法律解

决”两派，黄郛认为“国家不堪有内战”，不主张武力解决。但是，袁世凯已准备好对南方的进攻。7月，国民党人在江西湖口和南京等地发动了反袁起义。这时陈其美在上海仓促起事，黄郛也参加了。他们向江南制造局进攻，结果失败，遂相偕逃往日本。稍后黄郛经南洋去美国。

1916年护国之役起，黄郛由美国返回上海，对浙江反袁军事有所策划。此役结束后，黄郛即移家天津，直到1921年。

黄郛住天津期间，声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曾写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书出版。但这期间他和一些北洋政客来往不断，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1918年10月，徐世昌上台后，英美政府曾提出南北议和的“劝告”。当时欧战即将结束，中国国内确也出现了要求和平的呼声。黄郛这时一度与张耀曾、张绍曾等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名，搞“和平运动”。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徐世昌的嘱托，代徐起草了《战后中国》一书。1921年初，他以考察战后经济为名出国游历。到美国时，恰值美国总统将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黄郛事先发表了有关会议问题的论文，被北洋政府聘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会后，于1922年初经欧洲回到北京。

1922年9月，黄郛受内阁总理王宠惠任命为督办全国财政会议事。1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当时，法国公使傅乐猷（A．J．de Fleuriau）到北京政府财政、外交两部交涉，无理要求中国政府以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经过激烈争议，北京政府被迫让步，授意黄郛于2月10日签署文件，接受法方要求。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黄郛被迫辞职。同年9月，他出任高凌霨代理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次年9月颜惠庆内阁复职，黄郛继续担任教育总长。在此期间，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扎北京南苑，经张绍曾的推荐，常邀黄郛到该部为将士讲授军事学，兼“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1)]。黄、冯二人从此联系日多，往返频繁，彼此引为知己，逐渐在政治上互相

结托。黄利用职务之便为冯探听政界消息[2]。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全部大权。他们沿用前任军阀的办法，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紧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压榨和屠杀，搞得民心丧尽。黄郛乘机鼓动受曹锟、吴佩孚排挤的冯玉祥推倒曹、吴的统治。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0月上旬，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吴佩孚于10月11日亲赴山海关督战。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司令，率军出古北口，挺进平泉，会攻热河奉军。冯离京前，已同黄郛密议推倒曹、吴政权问题，并留密电码一册给黄，互通情报。10月中旬，吴佩孚率领的一路军在山海关前线失利，下令把拱卫京畿的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前方。这就造成北京城兵力空虚，为冯部起事提供一个好时机。黄郛综观全局，当机立断，于1924年10月18日特发密电告冯：“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接电后也认为时机确已成熟，于是立即决定，于19日晚班师返京，令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率部先行。

黄郛在京，处境危险，孤身出城，于10月22日深夜赶至密云县高丽营与冯玉祥会晤，共同商议发动政变的最后部署，确定了方针步骤，黄郛立即代冯草拟主和通电。

10月23日，回师北京的鹿钟麟部拘禁大总统曹锟，冯部控制整个北京。随后奉系军队也乘机大举入关，直系吴佩孚率残部自塘沽登船南逃。2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在北苑召开军事会议，议决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请段祺瑞出山维持大局，另外还商议组织摄政内阁诸事。内阁的人选也初步商定。10月31日，摄政内阁成立，黄郛任代总理，兼交通、教育两部总长，王正廷为外交兼财政总长，李书城、杜锡珪、张耀曾、王永江、王乃斌、李烈钧分别任陆军、海军、司法、内务、商务、参谋各部总长。张作霖不承认摄政内阁，故奉系阁员未到任，由次长薛笃弼、刘治洲（属冯系）分别代理内务和

农商两部。李烈钧当时正在南方，得电后乘船北上（至途中摄政内阁已告终结）。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

鉴于当时北京局势混乱，少数保皇党人乘机活动，还有清帝将复辟的谣传。冯玉祥提出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的主张。11月4日，黄郛主持摄政内阁会议决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3)]。11月5日，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等向清室宣布了这些条件，限令立即实施，溥仪等不得不于当日移居什刹海醇王府。国务院拟将故宫一律开放，充当国立图书馆、博物院之用。

摄政内阁是过渡性临时的政治机构，任期长短，要视局势的发展而定。冯玉祥的倒直及其革命倾向，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深为北洋各实力派所忌，各外国势力也不断向其施加压力。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尤其不为奉系首领张作霖所认可。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出山，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摄政内阁被迫总辞职（11月25日告终）。黄郛下野后在北京香山和天津租界寓居两年，继续观察政局的变化。

1926年夏，北洋军阀已处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境地，而南方革命势力则蓬勃发展。在国共两党合作协力推动下，北伐战争胜利展开。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蒋介石除了约集在南方政权中任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到南昌密谋外，急切地延揽在北方任职或隐居的密友和盟兄弟来与自己共事。他召来了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张群，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主持南昌行营的事务。接着致函在天津蛰居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共谋大计。1926年12月18日蒋派张群持亲笔信赴津，催促黄郛起驾，“共底于成”[(4)]。当黄郛了解到革命营垒中的分化和蒋的意图后，于1927年1月初偕夫人沈亦云离津南下。他途经上海时，与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等商谈了资助蒋介石的

问题。

黄郛到达南昌后，成了蒋介石的上宾。他与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在设于旧江西督署的总司令部和牯岭岩旅馆行辕内连日反复密谋策划，终于确定了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共政变的行动纲要。其主要内容是黄郛建议而经蒋介石采纳的要点是：（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三）力争早日克复京、沪；（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5]。继而，黄郛受蒋指派，潜往武汉、上海等地与日本、英国外交代表联络，并纠集力量，为迎蒋入沪做准备。他还北上会见冯玉祥、阎锡山，拉拢冯、阎附蒋反共。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黄郛于7月被任为上海特别市市长。8月，蒋以退为进，宣布下野，黄与蒋同进退，宣布辞职。他利用自己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在日蒋之间牵线，替蒋介石出访日本做了准备。

1928年1月，蒋介石宣告复职。2月6日，蒋介石即推荐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秉承蒋的意旨，推行对外国势力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他就职伊始，就着手与美国公使马慕瑞（J．V．A．MacMurray）、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W．Lampson）谈判关于解决上年3月英美兵舰炮轰南京的事件。3月30日首先与美国公使签订解决南京事件的协定，将该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由南京政府“赔偿损失”和“惩办凶首”。这个协定居然认为美国军舰炮轰南京是“保护美侨生命”[6]，而对中国人民的严重伤亡和财产损失置之不理。随后，黄郛继续同英、法、日等国达成类似的协定。同年5月国民党军“北伐”途中，日本军队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黄郛与蒋介石都在济南。蒋下令撤军，黄郛陪同蒋介石逃出济南，任凭日军继续在济南逞凶，并将济南及胶济路占领。日军的罪行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黄郛为逃避舆论指责，不得不赶快引咎辞职，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生活

来。

黄郛退居莫干山，又一次声称不问政治，实则和国民党政客们来往频繁，他和张群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把他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为首的一帮政客称为“新政学系”。他山居期间（到1933年），接连发生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中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之下，民族危机日趋严重。1932年6月，黄郛到上海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声称研讨“学术救国方案”，发行《复兴月刊》，鼓吹“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他和张群等人都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广泛的关系，并被看做是“日本通”的人物。因此，他虽居山，蒋介石并没有忘了他。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4月底逼近通州，平津震动。蒋介石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5月初蒋介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起用黄郛为委员长，令他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带着殷同、袁良、殷汝耕、李择一等一批亲日分子于5月14日北上就职，车至天津近郊时，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弹，几乎丧命。

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5月31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非武装地带”，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日军侵占的危险。此后，华北与伪满洲国之间的交通和邮电一度处于封锁状态，日方强烈要求解决北平、沈阳间的通车问题及恢复关内外的通信。1934年，黄郛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派代表与日方谈判，先后于5月和12月达成关于通车通邮的协议，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1935年，黄郛在上海同日军侵华头目土肥原晤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应允满洲问题等待时机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京政府要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等。

黄郛在华北主持对日交涉所推行的屈辱外交，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1935年春，他以“身心劳瘁，旧病复发”为由，向蒋、汪辞职未准，遂将政务整理委员长一职交时任总参议的王克敏代理，本人返回莫干山养病。1936年8月，黄患病至上海治疗。病危之际，仍吹捧蒋介石“忠贞为国”，要人们“一致信任”、“全力协赞”。12月6日，黄郛因肝癌病死于上海寓所。

---

(1)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62、184页。

(2)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162、184页。

(3)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稿》1924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267页。

(5)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版，第252—253、260、354页。

(6) 《东方杂志》第25卷第7号，第105页。

黄复生

罗玉方

黄复生，初名位堂，字明玉，考学堂时易名树中，字理君，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1]，四川隆昌人。1901年入泸州川南经纬学堂，1904年毕业。是时清政窳败，国势阽危，黄复生因阅读《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等书刊而萌发革命思想，与同学黄方、邓洁、杨兆蓉等二十多人组织“输新学社”，以输入新学为宗旨，实则暗倡革命。

1904年秋，输新学社拟创办铅字印刷局，派黄复生赴日本学习印刷。初入宏文学院，旋进东京印刷株式会社。此时民主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中蓬勃发展，黄复生与学友邓家彦、陈道循等十余人结成团体，以革命为宗旨，并与国内建立联系。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横滨，同人推黄复生、邓家彦、康宝忠与孙中山联络。同盟会在东京创立，黄复生率先加入，并任同盟会本部总务部干事、四川分会会长兼经理《民报》社务。为进行武装革命，黄复生与熊克武等奉派到横滨随梁慕光学造炸弹。其后又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去日本小室兵工厂学造枪药。他曾与在东京留学的川人杨兆蓉、陈伯珩、陈少封、邓亚珍等，共商推动四川革命的具体步骤。当时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曾手持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在茶馆、酒店宣读，表现出反满革命思想。黄复生等“闻其声名，乃函招东渡”[2]。1906年7月底，佘英到了日本东京，由黄复生、熊克武介绍面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初，黄复生奉派回川进行革命活动，经成都府中学堂聘为日文翻译。在此期间，他经常与学校师生以及校外向往革命的人士联系，发展会员三百余人。为了谋划在四川举行起义，黄复生约集在成都的革命党人三十余人在草堂寺会议，决定于本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十）庆贺慈禧寿辰时，在成都、泸州、永宁等地起义。

因为武器弹药缺乏，黄复生与税况麟、杨兆蓉等人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中秘密制造炸弹。一天夜里，黄复生因收捡炸药入瓶失慎发生爆炸，受重创而鲜血满面。税况麟善武术，擅长治疗跌打损伤，立予救治，得以不死。黄以此次重创不死，就改名为复生。

至1909年，同盟会所组织的多次起义，先后均告失败，黄复生等一些人为此愤不欲生，决定从事暗杀活动，与“虏酋拼命”[(3)]。为了振作精神，企图“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4)]。同年9月，黄复生偕但懋辛赴北京，设立暗杀机关，他们在北京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设“守真照像馆”以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12月，汪精卫偕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入京，加入行动。岁末清廷派往欧洲考察海陆军的载洵、载涛两贝勒归国，黄复生偕汪精卫携皮包内藏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伺载洵、载涛下车时狙击之。由于火车到达车站时，已经入夜，因不识洵、涛，只“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泱泱而返”[(5)]。当时庆亲王奕劻最为专横，决定以此人为暗杀对象，因奕劻戒备森严，无间可乘，才改以摄政王载沣为暗杀目标。

摄政王府坐落在地安门外鸦儿胡同附近，黄复生等经过多次选择，最后确定在载沣上朝必经之地的银锭桥下埋藏地雷[(6)]。1910年3月31日夜里，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桥下工作，被多犬狂吠干扰未成，次夜又往埋设，由于所携带引爆电线太短，翌日添购后复于夜间前往布设。不巧被人发现，随后见此人带领警宪各一前来搜寻，黄复生以为秘密已暴露，匆忙赶回东北园住所，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决定由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黄复生、汪精卫仍留北京，等待炸药到后再谋进行。埋设地雷案暴露后，北京的警宪侦探悉数出动，谋求尽快破案。4月16日，黄、汪在京先后被捕。在被囚过程中，黄、汪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由于程家柽的营救，劝说清民政部尚书善耆，谓“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以告载沣，亦以为然，遂判“着交法部

永远监禁”[7]。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清政府一面起用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一面想以笼络手段缓和人心。10月15日宣统下罪己诏并大赦党人，直到11月6日，黄复生和汪精卫始获释放。黄复生被释后径赴天津，组织京津同盟会，以为中央革命之枢纽。不久，黄复生前往上海，联络南方党人，请求接济。在沪，他建议沪军都督陈其美利用江南制造厂的药料，制造炸弹，以济军需。

1912年1月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大总统派黄复生、熊克武接收川路股款，筹办蜀军回川。同月，黄复生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3月7日，又被委为总统府印铸局局长。为崇扬忠烈，黄复生等四十二人联名呈请南京政府抚恤为革命壮烈死难的邹容、谢奉琦、喻培伦和彭家珍四烈士。袁世凯继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黄复生随临时参议院北迁。他见袁世凯心怀叵测，乃南下去上海。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引起党人大愤。时徐宝山据扬州，其势猖獗，黄复生精心研制巧藏炸弹于古物之中，5月24日徐启匣触机爆炸而毙。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复生赴日本，创政法学校。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复生加入该党，旋被推为中华革命党四川支部长；1915年4月，因任满，改推龙光继任。同年，黄回国谋再举，在上海公共租界赁屋，秘密制造炸弹。6月，事泄入巡捕房，拘数月后为陈其美营救出狱，再去日本。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国家政权仍为北洋军阀所把持，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1917年秋，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移檄全国奋起护法，黄复生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四川国民军。10月，广州军政府任命黄复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国民军总司令，卢师谛为副司令。为协调广州军政府与云南唐继尧的关系，11月孙中山改任黄复生、卢师谛为四川靖国联军总、副司令。

1918年春，孙中山根据章太炎来自重庆的报告，以川中人心多归

熊（克武），因此改任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随后，改委黄复生为川滇黔援鄂联军第一路总司令，驻重庆并兼川东道尹。由于兵力不足，加之援鄂师出无功，黄复生解印东下，寓居上海。1920年，四川督军熊克武与省长杨庶堪失和，川战爆发。黄复生应杨之邀，偕卢师谛前往泸州，助杨组织北伐军。在熊克武和杨庶堪之争时，黄支持杨。5月，黄复生所部将熊系重庆镇守使余际唐的江防军解决。10月，刘湘助熊克武率军攻入重庆，黄部退往涪陵，穷蹙于夔、万之间。

1921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黄复生被派为财政科主任。1923年1月，孙中山委任黄复生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同年10月，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熊克武奉命讨曹锟，黄复生被任命为重庆关监督兼交涉员。1924年，熊克武在川战中败溃去粤，黄复生以父丧留成都。1925年国民党中央特派黄复生等九人为四川临时省党部筹备员。1926年1月，黄复生以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二大”后，被推为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伪“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10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1930年任北平“扩大会议”海外部委员，后返成都，专办国民党四川党务。1931年赴粤，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33年8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兼政务惩戒委员会委员。1936年黄因中风左身麻痹，不良于言，辞去惩戒委员职务。1943年被聘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同年10月1日，病逝于重庆鹤皋岩和湾27号[(8)]。

---

(1) 黄复生的生年，一说为1878年，现经查对应为1883年。参见向及之撰《黄复生先生行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等编《黄复生资料》，1988年版。

(2) 见《佘俊英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1965年版，第108页。

(3)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2页。

(4) 《黄但喻陈诸同志谋炸端方之经过》，《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649页。

(5) 黄复生：《谋炸清摄政王案始末》，《革命先烈先进传》，第807页。

(6) 据黄复生《庚戌纪实》及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埋设地雷的地点均作甘水桥。经张江裁考证应为甘水桥附近的小石桥，即银锭桥，今从此说。

(7) 《谋刺摄政王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662页。

(8) 一说黄复生病逝于八月二十九日，实将农历的日期误以为公历之故。关于黄病逝日期，可参见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第396—398页有关记载，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黄焕南

汪仁泽

黄焕南，名守珠，字绰辉，号焕南，以号行，1856年3月28日（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父亲黄冠千是私塾教师，子女众多，收入菲薄，家境贫困。黄焕南十六岁时在当地一家米铺当学徒，次年随乡亲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谋生，在新南威尔士州悉尼（旧译雪梨）苏兴隆杂货店当勤杂工，业余补习文化。黄工作勤劳，生活俭朴，十二年后积得少许资金，与人合伙开设广生和杂货店。由于经营得法，营业蒸蒸日上，广生和逐步扩展成为当地著名百货商店，他也成为当地有名的侨商。1900年秋，梁启超等人因自立军勤王运动失败逃亡澳洲，为保皇会从事募款活动，黄焕南曾予接待和资助。

1913年，久居海外的黄焕南思念故土，抱着回国投资实业的愿望，变卖了在澳洲的产业，携款回国。其时适值澳洲归国华侨马应彪、马永灿等人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先施百货公司，马永灿等与黄焕南在澳洲时即已相识，且知他善于经营百货业，熟悉市场，遂邀他投资参加先施公司任为董事，并聘任为广州先施公司司理[(1)]，与原司理马祖金共同负责经营。在黄、马共同筹划下，1914年广州先施公司增设设备华丽的东亚酒楼，附有旅社和中西餐厅。1915年又陆续兴办机器、五金、皮革、玻璃、木器、肥皂、制鞋、汽水、化妆品等十个工厂，均附属于先施公司，雇有职工千余人。广州先施公司1912年创办时资金四十万元，至1915年结算，获利已超过资金两倍。后又在广州十八甫和惠爱街等处增设分行。

先施公司既在港粤两地经营得手并取得信誉，马应彪、黄焕南等人遂谋在全国的商业中心上海开设沪行。1914年黄焕南两次到沪进行

调查和筹备，先由港行拨款占股[2]，继而募集股金共六十万元，租定闹市区南京路地基十亩余，建造五层钢骨水泥大楼。由于工程规模甚大，资金不敷应用，因此在1915年决定再行增资六十万元，消息传出不久即认股满额，而后继者仍纷至沓来。黄焕南与马应彪等商议，与其拒而不纳，不如再增资额至二百万元。经招股足额后，成立沪行董事会，推定马应彪为董事长兼监督，黄焕南为董事兼首任正司理。

1917年10月20日，上海先施公司正式开张，黄焕南针对当时沪地商业讨价还价的习气，规定明码实价划一不二的营业方针，拟就广告“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招徕顾客。由于资力雄厚，备货齐全充足，品种繁多，黄焕南重视进货质量，必求货真价实。百货营业部共分五层十九部，他选派干练职员担任各部部长，并亲自拟订了健全的销货记录表册和会计制度。与百货营业部同时开张的尚有设备完善，并辟有中西菜馆的东亚旅馆和百戏杂陈的先施屋顶乐园[3]。其时沪上已开设有专销洋货的外商惠罗、福利、泰兴三大百货商店，先施则为国人创办的首家大型百货公司，兼售中外百货，并仿效欧美资本主义企业，订有一套新式管理制度，服务质量远胜旧式商店，因此招徕顾客如云，营业兴盛。不久黄焕南又在闸北觅址开设先施附属工厂，下分铁工、木工、家具、油漆工程四部。

此时，先施公司港、粤、沪三行虽牌号相同，但各自集资独立经营，互不相关。为谋求事权统一，人才相互调用，商品相互调剂，经马应彪、黄焕南等倡议，三方股东大会同意，自1919年1月16日起实行统一，合订资本额为港币七百万元，以香港为总行，沪、粤两地为分行，向香港当局登记注册。马应彪任董事长兼总监督，黄焕南仍任董事兼沪行正司理。1922年起黄焕南升任先施公司沪行监督。当年他曾赴欧美各大城市考察商业，并在英国伦敦设立先施公司办庄。

随着先施沪行业务的扩展，黄焕南于1923年拨出资金十万余元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购置厂基二十余亩，自建厂房，扩大附属工厂的生产规模，雇有职工三百余人。产品计有车床、钻床、银箱、保险

柜、火炉、中西家具等，并承接定制大小机器及零件。附属工厂附设夜校，聘有教员，为职工业余补习文化。公司并雇用基督教牧师任人事科长，每星期日上午休业，举行宗教仪式，向职工传教。业余举办青年会（职工俱乐部），开展粤剧、京剧、话剧、围棋、球类等文体活动。

先施公司沪行在黄焕南擘划下，于1924年在百货大楼加筑两层楼，成为七层大厦。是年先施保险公司在沪设分公司。黄焕南原是该公司董事，此时兼任上海分公司参事[(4)]。在此前后又开设沪行支店两处。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先施公司参加全市罢市斗争，停业近一月。此后，黄焕南在时局的影响下逐步增加了国产商品在进货中的份额。

先施业务发展，但职工工资菲薄。1926年年关将届，职工因生活困难，多次推派代表，向黄焕南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组织的要求，但都遭到拒绝。1927年初全体职工团结一致，进行罢工斗争，持续六天六夜，终于迫使黄焕南作出让步，接受各项要求[(5)]。

1929年，黄焕南应先施总监督马应彪所召，与广州先施监督马永灿三人共同商议，并经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历年结余加派红股，每十股分派红股三股，另募新股九十万元，增资合计股本一千万元。

1932年先施沪行受到“一二八”事变后淞沪抗战的影响，营业骤降，一度陷于困境，黄焕南苦心筹划，在公司职工的支持下，节约开支，想方设法增加营业额[(6)]，始得渡过难关。此时黄焕南虽年逾古稀，但仍精神矍铄，专心先施的经营管理。他二十余年如一日，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公司办公，习以为常。他并兼任香港国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进出口银行、先施人寿保险公司、先施化妆品厂及广东旅沪同乡会、广东平民医院、粤东中学等处董事，并任广肇公所

理事、中山保育善会名誉会长等职。

1936年8月24日黄焕南在沪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黄祖康：《黄焕南传略》（未刊稿）。

《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先施公司编印，1925年版。

《先施公司七十五周年特刊》，香港先施公司编印，1975年香港版。

张子英：《先施公司职工运动史料》（讨论稿），1982年3月。

孙鸣岐主编：《现代实业家·黄焕南》，上海商报社1935年版，第23页。

黄祖康先生访问记录（1986年11月23日）。

黄祖贻先生访问记录（1987年2月19日）。

---

(1) 司理即经理。按先施公司的制度，其上尚设有掌握实权的监督，直接控制企业。当时的监督是马应彪。

(2) 上海先施公司创设时系独立招股，但香港先施公司先行拨款占股，作为倡办，然后再在沪、港、粤三地公开招募股款。

(3) 当时沪上名流陈蝶仙（别号天虚我生）曾为先施乐园题诗称："上界瑶台辟九层，云梯（电梯）无级自然升。琼楼玉宇知多少，如此高寒得未曾。""园亭台榭恰凌空，恍在璇玑织女宫。入夜华灯灿如锦，管弦声在半空中。"

(4) 该公司在总公司设董事会，分公司设参事会，参事会秉承董事会的

授权，辅助经理管理企业。

(5) 李华明、高蝶珍整理：《大革命时期先施职工运动片断情况》，1982年2月油印稿。

(6) 如与上海联合广告公司合办购货赠奖办法，凡购货满十元得一抽奖号码，每月初当众开奖，赠给奖品；又如购货附赠品，购热水瓶一只，赠茶叶一包等等。

黄季陆

吴嘉陵

黄季陆，学名学典，字季陆，笔名魂，1899年3月2日（清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四川叙永县。其父黄国琪在兴隆场开设磨坊和饼铺，有子女八人，黄季陆居幼。他未及两岁，母去世，由祖母及长嫂抚育成人。叙永是当时四川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其堂兄黄方的家是同盟会领导人集会之所。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黄方被捕入狱。翌年，黄季陆随大哥黄寿萱到成都读书，党人以黄季陆机智明敏，于是派他以探监为名出入狱中，传递消息。从此他受革命思潮影响投身革命。

1911年春，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在四川高等小学读书的黄季陆登台演说，表示坚决“破约保路”。会后，在革命党人黄方的暗中指导下，发起组织小学生保路同志会，黄被推为会长，参加请愿。

1913年春，十四岁的黄季陆乘轮东下至上海，由族人黄复生介绍，往谒孙中山，受到嘉勉，备受鼓舞。时李石曾、吴稚晖在北京发起赴法勤工俭学，黄季陆遂离上海赴北京，学习法文准备留学。同年秋，得陈炯明的资助，他随北京《民主日报》负责人雷铁崖等前往槟榔屿，继又移居芙蓉埠，入一所英国学校读书。课余以黄魂笔名在《光华日报》发表文章，鼓吹革命。

1914年夏，黄季陆自南洋返沪，入南洋公学就读，改名黄陆，课余秘密参加反袁活动。1915年12月，“肇和”舰起义讨袁，他在学校从窗口丢下坐凳袭击沿街疾行之袁军。袁军向学校索捕，他转学入复旦公学中学部，又改名黄季陆。1917年夏，他由复旦公学中学部毕业后，赴广州。这年冬天，他被孙中山派为军事特派员，衔命入滇、

川。黄到成都后，准备联络川军将领护法，当听说熊克武对孙中山出言不逊后，愤然离开成都去重庆，从此誓不与熊克武来往。

1918年，黄季陆与刘泗英等相偕留学日本，入东京庆应大学。次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中国公使馆开会纪念“五七”国耻日，中国代理公使勾结日方军警镇压，黄季陆因之被拘留，次日始获释。黄季陆愤日警欺凌中国留日爱国学生，数月后离开日本前往美国。1921年春初入加州大学，继改入威斯灵大学，学习政治，同时为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撰写评论。大学毕业后，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院进修，获硕士学位。1922年前往加拿大，入多伦多大学深造，并担任《醒华日报》主笔。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黄季陆代表国民党加拿大支部回广州参加会议，为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反帝问题上，他同负责起草宣言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发生争论。在大会上，他提出“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被搁置。随后又与方瑞麟等提出在党章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从而“首次公开引起反共之争辩”。他的提案最后被大会否决，但他固执己见，耿耿于怀。会后，黄季陆任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继任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大元帅府秘书兼广东大学（次年改名中山大学）教授、法政系主任。6月，他同孙科等共同向中央党部提出“制裁共产党”专案，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其后，他仍坚持己见，在广东大学创办《社会评论》反共。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一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公开活动。谢持、邹鲁等人于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结成“西山会议派”反共。12月，黄季陆辞职赴上海，与三十八名教授联名发表反共宣言，追随邹鲁、张继等人。他和孙科等抢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他任海外部部长。1926年初，他受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告处分，限期两个月悔过，但他仍坚持错误。3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非法召开“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黄任秘书长，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青年等部部长，赞助孙文主义学会反共。翌年1月，黄回四川任成都大学教授，继续进行反共活动。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公开反共、“分共”，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黄季陆于1927年秋任国民党四川清党委员，继改任整理委员。四川省党部改组成立时，当选为执行委员。1928年，他又赴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并担任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及广州《民国日报》社社长。1931年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决议设立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于广州，他又为委员，翌年他任立法委员。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久，他受聘赴广西，协助李宗仁、白崇禧办理“民众组训”工作，曾任抗敌军青年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爆发后，黄季陆由广西至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四部副部长。1938年夏，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他担任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不久至重庆任内政部常务次长。1939年2月，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3年1月，黄季陆接任四川大学校长。他把学校由峨眉山迁回成都后，多方筹集经费，号召地方捐资兴学，扩建校舍，礼聘名师，尊重专家，使四川大学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学府之一。学校设有文、理、法、农、师范五个学院二十三个系，学生千余人；到1947年，发展成六个学院四十个系，学生达七千多人。

黄季陆在1945年仍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国民大会召开，他以叙永原籍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翌年夏，国民党和三青团合并，黄季陆任四川党团统一委员会委员。1948年复任川康渝党务特派员。1949年4月，四川大学教职员为争取改善待遇举行罢教，学生起而支持，他出面调解无效后辞职。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完全崩溃的前夕，黄季陆于1949年12月由成都飞往香港，次年春由香港去台湾，先后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内政部”部长、“考试院”考选部部长、“教育部”部长，1965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季陆晚年在台湾主要从事国民党党史编纂工作。1968年11月，他接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嗣后又任台湾“国史馆”馆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84年6月，辞去“国史馆”馆长职后，受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5年4月24日，黄季陆因心肺衰竭去世。著有《民主典例与民主宪政》、《国父的伟大及其革命志业的继承》、《国父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我们的总理》等。

主要参考资料

《黄季陆先生怀往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

《黄季陆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4月编印。

李云汉：《哀悼黄季陆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46卷第5期。

黄杰

颜平

黄杰，字达云，湖南长沙人，1902年12月2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生。祖父黄国尊为曾国藩、左宗棠之湘军战将，被授予五品奉直大夫，随左氏至西北为官，五十岁时解甲归田。父亲黄德溥习儒术，兼擅岐黄，后从军北上，1904年赴新疆，先后在诺羌、轮台、皮山、于阗等县衙任职，秘密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后取道俄国回到家乡，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不辍，1924年曾任黄埔军校区党部书记等职。

黄杰幼年时得祖父启蒙，聪敏好学，喜文爱武。1920年8月在长沙省立中学毕业后在本乡执教。弱冠之年随父投入谭延闿所部湘军，1923年随谭南下广州。其时广东革命形势渐趋高涨，黄杰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翌年1月毕业后分发在教导一团任侦察队第一排排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英勇；接着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嗣后任侦察队长驻潮州。

1926年北伐战起，黄杰任第一军第十四师教导一团第三营营长，在何应钦指挥下于10月向福建进军。在芦下坝、松口的战役中，黄杰曾挂彩但不下火线，其后北上入湘。卫立煌第十四师于1927年4月进驻南京，黄杰升任第四十团团长，旋移师镇江。8月下旬孙传芳军反扑，分三路强渡长江南下，抢占龙潭东站。黄杰四十团在师长卫立煌率领下自镇江进占龙潭东站北侧之高地，鏖战六昼夜，与友军协力奋战，终于击溃孙传芳军。第十四师等乘胜渡江追击，直至蚌埠。

1928年8月，黄杰所部参加北伐奉张的战事。在滕县东山高地的战斗中，与张宗昌亲自督率的奉军交火，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奏捷。

随后进抵济南城。在日本侵略军制造“五三”惨案之时，黄杰护卫蒋介石于6日凌晨便装骑马潜出济南城，绕道至党家庄。嗣后，黄杰在蒋介石与其他军事实力派争斗的战事中，多有参与，军职至1929年末已升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中，黄杰率第二旅参加陇海线的战争。1930年5月下旬，占领兰封的第一师在刘峙指挥下向开封前进，双方在民权、睢县、太康一线对峙。7月11日夜，晋军孙楚部三个团向商丘东北之蒋庄、贾寨进攻，在距柳河二十公里的李坝车站突破蒋军的防线，时在商丘柳河车站督战的蒋介石处境危急。正在率部北进的黄杰闻讯轻装驰援，于深夜1时赶到李坝集车站，在菜油坊与敌激战奏捷，占领柳河车站南北之阵地，蒋介石得以安全脱身。中原大战后，黄杰获得蒋介石授予之宝鼎勋章。

1932年3月，黄杰奉命接任第二师师长，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战事。第二师先在商城战役中遭红军围歼，黄杰接任后率残部至豫鄂交界地大新店、宝化店一带着力整训，8月向湖北七里、黄安进犯，与鄂豫皖红军激战不已，双方伤亡均甚众。10月，黄杰率师到黄安、麻城堵截向西转移之红军，尾追不止。

日本侵略军自“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全境后，继续觊觎我神圣领土，于1933年1月进犯山海关。2月黄杰奉命率第二师北上参加长城抗战，在南天门阵地扼守黄土梁、南元门、八道楼子一线。4月被日军偷袭，八座碉堡均被占，遭军长徐庭瑶严厉斥责。此后黄杰亲临前线加强防范，四次击退日军的强攻，伤亡重大。随后所部转移至磨石山、香水岭一线与敌对峙。“塘沽协定”签字后，黄杰率师驻北平，对平津地区大中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日方发现后，胁迫国民党政府将黄师调离北平。黄师南归后驻海州、徐州一带，黄杰兼任徐（州）潼（关）地区警备司令，担负保卫所在地区、津浦、陇海两线交通安全之责。

黄杰之英勇善战，颇获好评。1936年3月，宋子文执掌之财政部成立税警总团，特调黄杰任中将总团长。1937年7月初，黄杰参加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一期训练，任队长。他听了8月2日蒋介石关于抗战已经开始，绝无与敌和谈余地的讲话，倍为激奋，即请缨杀敌。“八一三”淞沪抗战展开后，税警总团改编为第八军，黄杰任军长，率部于9月下旬奔赴上海南翔，编属朱绍良第九集团军，担任蕴藻浜南岸黑大黄宅缺口的守备。10月12日，日军藤田进第三师团和吉佐良辅第九师团在空军和炮兵的协同作战下向蕴藻浜进犯，第八军阵地受到猛烈攻击。丘之汜第五团奋勇抵抗，牺牲过半，团长阵亡，刘家宅失陷。黄杰即率孙立人第四团反击，与敌短兵相接进行逐屋逐室之争夺战，夺回了阵地。11月3日，第八军奉命转移至苏州河南岸防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黄杰率第八军守御惠山、西山、顾山一带，11月23日再转进至溧阳，扼守南京外围。南京保卫战结束后，黄杰率部转移至豫东补充整训。

1938年5月，黄杰率第八军参加兰封会战，担任堵击归德方面日军西犯之敌。黄杰部署柏辉率第一〇二师守砀山，罗历戎第四十师的一个团守永城，另两个团随军部驻夏邑。稍后薛岳第一兵团主力开赴兰封御敌，以第八军负责守备归德。6月2日黄杰指挥第一〇二师击毁敌军坦克七辆，打退日军快速部队的进攻。惟敌以双倍兵力猛攻夏邑，砀山亦被包围，守军难以支撑，先后退守归德。6日敌军进攻归德，黄杰率部奋勇抗御，坚持至12日突围，撤至柳河车站附近，后奉命撤至平顶山西之襄城整训。

黄杰因未能守住归德，被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到汉口述职。他得知蒋介石正为马当要塞之失守而震怒不已，不敢去见蒋，乃向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报到。何成濬要黄杰把归德作战的详细经过用图表和文字编成战斗详报，送给蒋介石、军令部和军法执行总监部；本人即去陆军监狱。后来上下都自请其责，黄杰被改为撤职而免于查办。他蹲了半个月的监狱，感悟颇多。

1938年9月，黄杰被任命为成才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1940年5月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桂林）主任。前后四年多的教学生涯，使他得以进一步研习战略战术的理论并总结实战的经验教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5月自缅甸侵入我国滇西，占领腾冲、龙陵以及怒江以西地区，使我国抗战的唯一对外运输通道滇缅路被切断。继1942年夏之缅甸战役失利后，蒋介石于1943年1月决定重新组建中国远征军。黄杰调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率部驻守滇西漕涧、腾北、永平、下关一带。中国远征军在司令长官卫立煌统率下，为消灭怒江以西的日本侵略军，打通中印公路，于1944年5月初部署以宋希濂、黄杰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军，担负怒江东岸守备任务，以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为右集团军，担负强渡怒江、攻击腾冲与进攻任务。5月11日拂晓，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军新三十九师与两个加强团首先由惠通桥胜利渡过怒江；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在栗紫堤亦强渡怒江成功。黄杰协同总司令宋希濂指挥所部王凌云第二军、黄杰第六军（预二师调归第二十集团军指挥）、钟彬第七十一军于6月1日起次第渡过怒江后奋勇向前，担负攻击龙陵、芒市的任务。由于日军凭借坚固工事死守阵地，我军虽一再发动攻势，但伤亡甚大，进展迟滞，久至胶着对峙状态。后得友军增援，以坑道作业迫近敌人阵地，宋希濂、黄杰指挥第十一集团军各部分别于6月4日攻克腊猛街，6月9日攻克缜安街，6月10日攻下龙陵，后退据龙陵东郊，6月24日攻克象达，8月上旬攻克放马桥。9月，黄杰率第六军截断敌人龙芒公路交通。嗣后，第七十一军主力及荣誉第一师、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及第二〇〇师合力进攻，并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轮番轰炸的协助下，于11月3日攻入敌阵，进行白刃格斗，逐个消灭敌人据点，终于攻克龙陵，歼日军逾万名。继而实施对芒市的围攻。在次第攻占敌外围据点后，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炮兵部队几个重炮团协同猛轰敌之阵地。11月20日黄杰率第六军进占芒市。接着第七十一军、第五十三军等协同作战，于12月1日攻克遮放，歼敌一千余；15日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攻占八莫；翌年1月20日

第二军第九师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攻克畹町，歼敌三千九百余人。黄杰与远征军数万抗日将士在卫立煌统率下不怕牺牲，八个多月始终在人迹罕至、蛮荒不毛的深山密林中，对依仗强固工事和凶猛火力的死硬日军进行顽强反攻，终于取得完全胜利。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会师，中印公路通车，恢复了对外交通运输线。战后，黄杰获三等云麾勋章和美国政府授予的自由勋章。

黄杰此前四年的军事教学业绩，给人印象深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调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主持复员、编委军官的转业训练工作；1947年4月又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调训作战部队团以上指挥官。军官训练团还设“戡乱建国训练班”，培训高级军官，蒋经国常来过问。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节节败退之时，黄杰先于1948年7月调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三陆军训练处处长；1949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兼陆军第五编练司令官，在衡阳负责编训第十四、二十三、一〇二军。4月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军渡江南下，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与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密议起义共谋和平，黄杰受命赶赴长沙加以阻挠，但见陈明仁决心已定，当日下午飞离长沙。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黄杰以衡阳、宝庆为依托重组省政府，被广州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主席、湘赣绥靖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他集结一些残部在衡宝一带布防。9月13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衡宝战役，黄杰指挥第一兵团协同白崇禧部队顽抗，想要依托湘江、资水阻击。但人民解放军四野和二野部队从东西两路在祁阳以北地区予以围攻，10月14日歼灭了白崇禧部四个主力师。黄杰乃率部抢渡资水向桃花坪、新宁南撤，从东安黄沙河渡过湘江撤入桂境，驻广西全县。他在白崇禧于11月5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张进入黔滇固守，但为多人反对。在11月下旬的广西战役中，黄杰率部撤至中越边境的明江，但在凭祥、宁明被解放军追击，大部被歼，残部三万两千人向云南方向逃窜，12月13日由

广西隘店逃入越南。

1953年5至6月，黄杰所率三万余残兵分七批运往台湾。8月1日，黄杰被蒋介石委为台北卫戍司令，翌年7月升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守司令。1962年转任台湾省主席，1969年7月升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72年转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此后他参加编印萧天石主编之《中国子学名著集成》（一百零二册）。

1995年1月14日黄杰在台北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黄杰：《黄杰自述》，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

黄杰：《抗日战争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黄杰：《回忆滇西反攻》，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

黄杰：《海外羁情》（1—10），台北《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至第11卷第5期。

江翠竹：《我所知道的黄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长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沙县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版。

李兵：《1949年冬黄杰入越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宋瑞珂：《关于黄杰和税警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第15册，1963年版。

陈训正著：《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1929年南京印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远征印缅抗战》编审组编：《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黄金荣

吴云乡

黄金荣，字锦镛，是旧上海显赫一时的“三大亨”之首[1]，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黄家祖籍浙江余姚，父黄炳泉原是余姚县衙门里一名颇有点名气的“捕快”。清同治年间被请到苏州破案，就此在苏州府任“捕快头”[2]，并娶当地邹氏女为妻。黄金荣为邹氏所生，乳名和尚，因脸上有几粒大麻子，人们呼之为“麻皮金荣”。

黄金荣幼时受父母溺爱，不爱读书。1873年黄家迁居上海南市，在三牌楼开设了小茶楼。不久其父去世，靠寡母帮人洗衣维持生活。稍长，混迹于地痞流氓、盗匪赌棍之间，手中稍有点钱就聚赌、抽鸦片或狎妓胡闹。后来竟结伙抢劫他在那儿学艺的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因此被店主开除。黄金荣乃通过他父亲生前的老相识徐安宝的关系，在上海县衙里谋到了一名差役、捕快的职务，其后于1892年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当上一名华捕。他的主要活动地点是郑家木桥附近的“聚宝茶楼”，每天上午他坐在固定的座位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通过码头上、租界里的大大小小流氓侦察、追索“案犯”，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这茶楼里策划走私、绑票等勾当，以聚敛钱财。

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后，黄金荣的“才干”渐为租界当局所赏识，称赞他是“租界治安的长城”。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樊菊丽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金荣设法营救，他与杜月笙等计议后，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3]。

黄金荣进法租界巡捕房后，由华捕、包探、探目、督察员直升到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与法捕房总巡费沃礼（Etienne Fiori）及公董局总办魏尔第（Henry Auguste Wilden）关系密切，深得法租界当局的倚重。法国东亚全权大臣安南总督为表彰他的功绩，三次授予他头等和二等金质、银质宝星[(4)]。法捕房里的许多高级华籍职员如总翻译金苗泉、严志超，刑事督察长金九妹，政治部督察长程子卿，探长李耀龙等都是他的门生。法租界巡捕房是他在上海称霸一方的支柱。

1927年黄金荣退休后，法租界当局继续聘他为警务处顾问。

30年代的上海，是买卖军火、收集情报、采办舶来品、运销鸦片的主要水陆码头，以致北洋官僚、各地军阀、响马匪帮或多或少都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有交往，黄金荣等也为他们在上海的起居安全提供方便。1917年7月，因“辅助护军使署办理重要事宜”颇为出力，经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呈请，北洋政府陆军部给黄金荣颁发二等银质奖章[(5)]；黎元洪在总统任内也曾授他陆军步兵上校侍从武官的头衔[(6)]。有一次福建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侯的六箱字画、瓷器等古董运抵上海码头时全部被窃，松沪护军使何丰林请黄金荣协助追索，黄金荣限其手下人六小时破案，结果仅用三小时就将原物如数追还[(7)]。1923年，黎元洪被迫退总统职位后，曾南下活动，到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跸”三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8)]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别制作了十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

1924年9月“齐卢战争”后，统治上海的军阀更迭频繁，但不管谁家当权，黄金荣等都是军阀们竞相结交的对象。更有一些人想借黄金荣的“牌头”广开财路或得到某种便利和保护，争相爬黄的山头。蒋介石早年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时，经虞洽卿介绍就曾拜黄金荣为师[(9)]。蒋介石后来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回到上海，位高权重，黄很知趣地主动把拜师名帖退还给蒋介石。

黄金荣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在租界当局的默许下，指挥他的流氓徒众给上海烟土商押运鸦片，从中获得巨利。后来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等联合潮州帮烟土商，办起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上海当地百姓称它为“黑货公司”。在法租界捕房的武装警卫下，包办法租界的烟土经销。其后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和军警头目俞叶封也相继入股，总资本约二百七十万银元[10]。为运输鸦片组织了飞龙汽车队，甚至发展到动用何丰林管辖下的高昌庙海军兵舰，担任烟土运输[11]。在军阀、租界当局和军警一体保护一下，三鑫公司的“事业”日趋“兴旺”，为黄金荣聚集了大量财富。当时法国驻扎上海法租界的一营军士，约五百多名的全部生活费用，也全由“三鑫公司”负责供给[12]。“三鑫公司”的赢利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仅当了两年经理的范回春就盖了洋房住宅，在嘉定买进千亩良田，戴上全上海最大的10克拉钻戒。

黄金荣聚财的另一途径是开赌局。早在1917年以前，他就和门生开设了新吉利赌台，后来发展到合股开设五六个大赌台，豢养五百余名年轻力壮的流氓当“抱台脚”，保护赌场。黄金荣除每月从各赌台分得盈余红利外，每个赌台每天要孝敬他一百元。另外，黄家数以百计的仆佣，不用黄金荣支薪，一律到赌台去拿“俸禄”。此外，他又先后开设日新浴室、逍遥浴室、大观园浴室、大利春酒家、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剧场、大世界游乐场等。黄金荣对这些游乐场的经营颇为霸道，如1921年共舞台演出连台京剧《莲花公主》，当演到《天宫盗宝》一幕，调换布景，舞台灯暗时，有一新昌五金店职工唐长根用手电筒对台上照了几下被黄金荣看见，便指使手下人把唐拉到账房间痛打一顿，尚不解气，还以捣乱场内秩序的罪名，送到嵩山路巡捕房罚款并拘押三天[13]。1924年间，黄金荣扩充共舞台的场地，仅以二担米钱的“搬场费”，强要邻近的一家五金杂货店在半月内迁出。店主叶庆祥不同意，黄金荣即破口大骂叶不识抬举，不出三天叶被捕房抓走。最后叶妻到“黄公馆”哭求“请罪”，答允迁出店堂给共舞台，叶庆祥方才获释。

黄金荣的“桃李门墙”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和行业。军人、政客、律师、巡捕、报人、商贾、戏子、舞女、侍役、车夫和地痞流氓，拜香入黄门的数以千计，甚至有人估计有两万多人[14]。但黄金荣早先并未正式加入清帮和洪帮。按照帮规，局外人用帮会名义纳名帖收徒弟是要受到严厉惩戒的。曾有人去函责问他为何冒充清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人，“博致虚名”。但他凭借在上海流氓群中的声势，并没有因此招致太大的麻烦。黄金荣迟至退休之时，才托杜月笙硬要张镜湖接受他的名帖和两万元的贽敬[15]。他这个“倥子”终于弄假成真，成了清帮“通”字辈的人[16]。

1927年3月底，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先后派杨虎、陈群、王柏龄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入“黄公馆”，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会晤，密商反共清党事宜，这时黄金荣虽已退休在家，仍把为蒋介石效力看成是“成龙修凤，得道升天”的大好机会，一再表示，“全力协助，义无反顾”。他们当即着手组织“中华共进会”[17]，以网罗党羽，同时委托洋行买办购置枪支弹药。黄金荣还“慷慨”地把他的“公馆”作为匿藏军火的仓库。4月11日晚，他们以有要事相商为借口，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住所，毒打后带到枫林桥附近加以杀害。当夜黄、杜、张和杨虎、陈群、王柏龄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4月12日凌晨，在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时，黄金荣等还亲临阵地督战。第二十六军则假借调解“纠纷”，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黄金荣还伙同杜月笙、张啸林联合印发十万份“警告男女工人书”；并在沪上各报发表所谓“真电”，对共产党大肆污蔑，颠倒是非，说“共产党流行病，势将传染于大江之南，不早歼灭，蔓草难图，噬脐莫及”[18]。为了表彰黄金荣等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随后什么军事委员会参议、行政院参议的头衔也接踵而来[19]，从而成了“地方政要”、“党国新贵”。

对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有功的黄金荣，法租界当局倍加优待，同

意他在租界内继续开设赌场。就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不久，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开设了上海最大最豪华的赌场。场中轮盘赌台、牌九麻将、梭哈摇缸、烟榻酒肴一应俱全，并有女招待在旁侍奉巾栉，挑土烧烟。这个销金窟开张以后，车水马龙，赌客云集，为黄金荣提供了又一个聚财的新来源。

黄金荣上述种种“营业”和产业，加上上海源成里、钧培里数十幢里弄房产，苏州唯宁乡下的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1931年，他在上海南郊漕河泾耗资三百五十万银元，建造了占地六十余亩楼台亭阁布局有致的黄家花园[20]，落成时蒋介石还特意手书“文行忠信”的刻石碑相赠。黄金荣从此深居简出，声言归隐退休，不过问外务，事实上他暗地指挥、坐地分赃的老行当，从未放弃过。

成了大闻人的黄金荣也经常办些“善事”，如早在齐卢战争期间，他就领衔联名发起“江浙善后义赈会”；相隔一年发起组织“联义善会”；1926年1月，又发起重建被火烧毁的上海城隍庙，同时还创办“上海乞丐收容所”。每年寒冬岁末，他总要散发一批“施米票”、“施米钱”和“度年钱”，他自夸“拯救了许多无法过年的穷人”。他的另一个“善举”就是常年散发贴有黄本人图像的“十滴水”[21]。

黄金荣常对他的门生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他一方面为法租界当局效劳，另一方面也接近革命党人，曾捐款给孙中山一千元并答应对此后来沪的孙中山的同志和朋友给予照顾。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为救济遣送难民，黄金荣等参加发起义演助赈筹款六万元。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一度把“大世界游乐场”借出作为难民收容所，也允许“上海救济协会”设在“大世界”里。

1938年夏，上海租界已成了“孤岛”，日本侵华海军驻沪武官府特派海军少将佐藤到黄家，邀请黄金荣筹备组织上海的汉奸政府，他托病不见，借口年老多病没文化而加以拒绝。黄常以岳飞传教育心腹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上海，但它不能把上

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22] 但佐藤再一次来访时，两人达成两条秘密协议：其一，黄金荣尽力支持汉奸政府，派遣徒众党羽参加汉奸组织；其二，黄金荣为日本侵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23]。八仙桥、龙门路钧培里黄家门，从此经常停着悬挂日本将级军旗的小汽车，一批黄门弟子也开始参加汉奸组织。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黄金荣派龚天健赶赴南京，代表他参加“盛典”。汪精卫做寿时黄金荣又派龚天健送去《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以示祝贺。1943年春，陈群就任汪伪政府江苏省省长时，黄金荣亲自率领若干门生，乘坐专车赶往苏州捧场。江苏省的一些汉奸机构里都有一些黄门弟子，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队长周阿富等。当了伪官的门人，每月都向黄孝敬厚礼。

除此以外，黄金荣在汪伪的“和平军”中也有很大影响。黄金荣的拜把兄弟太湖惯匪徐林诚任“和平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徒弟郝鹏举任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驻扎在苏北一带，专门对付新四军的一些“和平军”的将领，如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三十六师师长田铁夫、二十八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金荣的门下。在法租界巡捕房时的得意门生巡捕领班鲁锦臣，日伪统治时期是“和平军”三十六师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采办军用物资装备伪军。

黄金荣与日伪显要过从密切，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丁默邨、工商部长梅思平都是黄家的常客。1944年上海糖业公会从台湾私运大宗食糖来沪，被汪伪财政部税警团查获，以偷税逃卖论处。糖业公会会长史雨春托黄金荣设法疏通，黄金荣派人向财政部长周佛海说情，结果人员释放货物发还，糖业公会送给黄金荣二十根金条，以为酬谢[24]。一些汉奸说：麻皮金荣在“南京政府”里虽然没有公开头衔，但他的

权力不下于周佛海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翌年2月蒋介石首次到达光复后的上海，黄金荣又以当地绅耆的身份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

黄金荣到晚年热衷于佛事，上海市区、近郊乃至苏杭一带的寺庙庵堂里，经常能看到“弟子黄金荣敬奉”的匾额。1946年，他发起修建上海西郊龙华古寺。派人到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等佛门圣地进香布施，每年清明节则亲自领着一群人到郊县各庙宇，烧“十庙八寺”香。

1946年2月23日黄金荣组织起“荣社”，由其大徒弟邱子善、儿子黄源涛、外甥邹政之等分别担任理事、监事，并企图在杭州、苏州、南京、无锡等地设立分社，但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其计划未能实现。上海解放后，“荣社”被勒令停止活动。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帮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专门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亲自过问并有具体指示。通过传条子、带口信等方式先做黄金荣的工作，又经过章士钊夫人代表共产党专程看望他、动员他：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共产党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他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25)]。他终于下决心不出走香港、台湾。与此同时，他还在国民党政府逃离上海前的大屠杀中掩护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根据他掌握的材料把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财产造了报表连同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以示支持上海的解放。而大儿媳李志清掌管家庭内务，暗暗地将黄金荣的动产和企业中的资金变换成黄金、美钞连同地产证、企业执照等一并卷逃到香港等地购屋买房，致使解放后黄金荣只好借债度日。

解放初，黄金荣在上海仍有潜在势力，有些门徒也没完全停止危害社会的破坏活动。当时有人主张对黄金荣实行专政。上海市副市长

潘汉年则对黄金荣进行历史的分析，特别是考虑到他解放前夕的表现，认为以不作为专政对象为好。事后派人向黄讲明政策晓以利害；只要他不干涉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黄金荣表示同意，并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公开检讨自己的罪恶并号召徒子徒孙不要自绝于人民。“自白书”的发表引起很大反响，那些徒子徒孙大部分开始收敛起来，不敢再横行霸道了。

1953年，黄金荣又亲自到军管会向粟裕等作进一步坦白交代。粟裕肯定了他主动交代问题的态度并要求他今后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将功赎罪，重新做人。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偶受风寒发高烧，治疗无效，死于自己的寓所。

---

(1) 大亨，上海俗语，意指有权有势的阔佬。“三大亨”，在旧上海系指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又称“三闻人”。

(2) 多数资料采此说，但1931年出版的《海上名人传》第61页却说“父炳泉公江苏提标候补守备”。而《众家老板黄金荣》（章君毅著，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一书中则说：黄家原籍绍兴，太平天国军兴，黄家逃往苏州，经由朋友的介绍在苏州府衙门充任捕快。

(3)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会问题组编：《大流氓杜月笙》，北京群众出版社1965年版，第19页。

(4) 海上名人编辑部编：《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5月版，第61页。

(5) 《上海时报》1917年7月4日。

(6) 海上名人编辑部编：《海上名人传》，第61页。

(7)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会问题组编：《大流氓杜月

笙》，第18页。

(8) 据上海市公安局档案抄件。小八股党是指马祥生、叶焯山、顾嘉棠、杨俊棠、马汝祺、芮庆云、王家丰、高鑫宝。

(9)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又见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总第3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 1925年7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二张二版。

(11) 1925年7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二张二版。

(12) 邹政之：《黄金荣的一生》，上海市公安局档案抄件，第13页。

(13) 邹政之：《黄金荣的一生》，第6页。

(14) 关于黄金荣的徒弟到底有多少，各种说法差别很大，程锡文在《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一文中说二三千人；而薛耕莘在《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一文中说共收南北徒弟数万人。上述两文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 章君穀：《杜月笙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再版。又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总第31辑），1980年。

(16) 清帮有四十八字辈，分前后二十四。前二十四字："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觉）"；后二十四字："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度心回，普门开放，临持广泰，光照乾坤"。"通"字是第二十二辈。

(17) 有别于1907年8月焦达峰、杨任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

(18) 《申报》1927年4月13日、14日第七版。

(19) 邹政之：《黄金荣的一生》，第17页。

(20) 解放后辟为"上海桂林公园"。

(21) 邹政之：《黄金荣的一生》，第23页。

(22)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

(23) 邹政之：《黄金荣的一生》，第14页。

(24) 邹政之：《黄金荣的一生》，第11页。

(25) 尤一材：《黄金荣》，载陈祖恩等主编：《海上十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黄侃

娄献阁

黄侃，初名绪绌，谱名乔馨，又称乔鼐，字梅君，改名侃，字季刚，笔名有运甓、不佞、盛唐山民等，晚年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清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后迁江西洪州（今修水），明末清初移居湖北蕲州（今蕲春）。父黄云鹄，字翔云，咸丰年间进士，著名国学家，历任四川成都知府、盐茶道、按察使等，晚年为江宁（南京）尊经、湖北两湖、江汉、经心各书院山长，有数种著作问世。

黄侃幼承庭训，又得江叔海等名师指点，以其早慧被誉为“神童”。五岁随父返归蕲春，旋入家塾，学习勤奋，六岁能诗，九岁读完“四书”“五经”，以后继续攻读文史。十四岁阅王夫之的《黄书》，始知《春秋》大义，遂产生排满思想。1901年十五岁时考取秀才，1903年再入武昌文普通学堂，与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等同学，经宋教仁介绍还与在两湖书院学习的黄兴相识。时黄侃等经常在同学间传播推翻清室主张，并因多次讥讽学监被开除学籍。他以故人之子求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重其才，用官费资遣他留学日本。

1905年，黄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适宋教仁也亡命日本，两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1906年，章太炎主持《民报》时，黄侃作为《民报》撰稿人之一，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诸文，被章誉为“天下奇才”[(1)]。1907年，黄侃曾撰《讨满洲檄》，以军政府名义发表，并拜章太炎为师，学小学、经说，且赋诗相唱和。时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黄侃前往听讲，并与刘师培有往来。1908年春，黄侃因母病危归国，章太炎将所著《新

方言》相赠，勉其在学术上进一步发扬光大。黄侃在家为母守孝时仍不断笔耕，写成《春秋名字解诂补谊》等文。同年11月，为躲避清吏搜捕，黄侃再次奔赴日本，随章太炎从事革命及研究工作，促章太炎创作《文始》一书。黄侃请苏曼殊代绘梦谒母坟图，章太炎撰跋文予以品评。

1910年冬，黄侃应湖北革命党人之请返鄂共谋起事，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建议挚友发刊报纸进行宣传，自己则回家乡发动群众。黄侃走遍蕲春周围八县，借深山古刹讲演民族民主革命道理，听者达数万人次，最终组成孝义会。当时他还参与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活动，文学社社章就是由他与温楚珩审定的。

1911年春，河南布政使江叔海邀黄侃赴豫做幕客，并任豫河中学堂国文教员，不数月，因公开在课堂上鼓动革命被解职。同年7月，黄侃离豫回蕲，途经汉口，曾与《大江报》社长詹大悲议论国事，并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该文作为《大江报》时评刊出，引起极大反响，清吏将《大江报》查封，把詹大悲等判刑。10月武昌首义后，汉口克复，詹大悲出狱被推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黄侃也参与分府工作。清军冯国璋部围攻汉口，黄侃随黄兴等视察前线军事，见革命军力量不足，速返蕲春集结义师以捣敌背。孝义会成员两三千人纷纷响应，尚未成军，由于当地土劣告密，清田家镇总兵派兵前来镇压，黄侃辗转逃避上海。

1912年民国建立，但军阀势力仍根深蒂固，而同盟会渐形涣散，内乱危机实不可免，面对当前局势，黄侃感到茫然。1913年3月，黄侃与宋教仁再次见面于湖北，临别赠诗与宋，内有“嗟余遘幽忧，逍遥从所届”[(2)] 的话。同年8月，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黄侃两次前往探视，还致函教育总长加以营救。由章太炎的遭遇联想到自己的前程，他更坚定了离开政界、继承父师之业、以学报国的决心。12月，直隶都督赵秉钧强挽黄侃任秘书长，他无奈应允，但赴津两月便辞职南旋。这前后黄侃在上海反复精研《说文》、《尔雅》、《广

韵》诸书，综合前人成果，既重视师说，又有独创见解，提出了古声十九钮（类）、古韵二十八部的论断，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传统语音学（即文献语言学）体系，为阅读古籍开辟了门径，在近代语言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1914年秋，黄侃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讲授词章及中国文学史诸课，多编有讲义，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即其中之一。授课之外，继续从事文字、声韵、训诂学研究。课余常带门生孙世扬、曾缄等遍游京郊，一起吟诗唱和。1915年上半年，章太炎被移禁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某凶宅，黄侃曾迁入此宅相陪，共同切磋学问，但很快被警方逐出。同年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召黄侃等开会，劝其拥戴袁世凯称帝，黄侃不顾故友情面，毅然加以拒绝。不过黄侃并不因人废学，他很佩服刘师培的经学成就，于1917年引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稍后又同他发起编辑《国故月刊》，当刘师培病重之际更对刘执弟子之礼，以获取刘师培“三礼”等家传绝学。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北大教师陈独秀、胡适等反孔学，反读经，提倡白话文；黄侃争之无济于事，加上爱徒孙世扬因缺课被除名，慈母田氏思乡心切，故于1919年接受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聘请返鄂。

此后七年，黄侃除有两月应山西大学之聘去太原外，均居武昌、汉口，任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讲授《说文》、《尔雅》、声韵三略说及《尚书》、文选、宋词等课，讲解精辟透彻，有新意，很受学生欢迎。这期间他结合教学对语言及经学有进一步研究，文字学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曾发表《与人论治小学书》、《毛诗正韵评》等文。他为人正直，仍不参与政事，但关心国家民众命运。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董必武以北大暑假旅行团名义托他帮忙在上海找住房，他即致函好友时在法租界博文女学任校长的黄学梅，得以借用校舍数间，解决了代表住宿问题，客观上起了掩护革命活动的作用。1925年孙中山逝世，黄侃感慨万千，写下挽联：“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

古今同。”[3] 大革命时期进步学生李俊民被湖北军阀逮捕，黄侃亲至省长萧耀南处营救，使李得释。

1926年8月，北伐军进入湖北，武汉震动，学校停课，黄侃举家迁汉口。同年9月，应北京师范大学之聘，任教北师大，还兼授中国大学、民国大学课。翌年7月，长子早卒，他感伤至极。又因与同事吴承仕等不和，于9月赴奉天（今沈阳），暂充东北大学教师。一度与曾运乾等探讨语言学问题，心情稍安，但对东北的寒冷气候不太适应。

1928年初，黄侃接受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之邀，至南京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在职八年，先后开设声韵学、经学概论、礼学略说、三礼通论、训诂学讲词、唐七言诗式等课，并主办国学特别研究班，亲拟包罗多方面内容的讲目，可惜因过早离开人世而未能完全实现。他不仅重视教书，尤注意育人，常根据诸生特点具体指导攻读方向与书目，多次书联赠言给弟子，对他们的为人处世等均加关心。

在第四中山大学期间，黄侃以更大力量投入研究工作，有计划地系统研读有关古典文献，为将来著书积累资料。《经典释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治通鉴》、《史通》、《太平御览》、《汉书》、《宋书》、《南齐书》、《南唐书》、《魏书》、《明通鉴》、《清史稿》、《春秋繁露》、《樊南文集》、《癸巳类稿》、《唐文粹》、《桐江集》等，无不一一批点，“有所得，辄笺识其端，朱墨重沓，或涂剥至不可识”[4]。他读书总是从头读到尾，绝不杀书头（他讥讽那些读书不能终卷或跳跃式地选读部分句段的现象谓杀书头）。有的一读再读，以至十数遍，《说文》、《尔雅》、《广韵》则随时翻检，殆不能记遍数，有的参阅各家注疏，辗转比对，务求甚解。《清史稿》竟读二年之久，《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历经初校、重批、改订，标有九十四种符号，前后共用十余载时间，终于1930年完毕，解放后其子通过董必武呈送给毛主席，后由上海古籍出

版社影印发行。同期他还发表或撰有《日知录校记》、《中国文学概谈》、《略论汉书纲领》、《汉唐玄学论》等令人称道的文章。

黄侃晚年侧重训诂学研究，不仅钻研古代训诂学书籍，逐一概述与品评；还对训诂的定义、作用、范围、方式、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指出训诂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训诂即文法；有互训、义界（界说）、推因等方式，而互训、义界均为不完全之训诂，“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5)]，即于形、音、义都给予注意；应明了本有之训诂（本义），也要知道后起之训诂（引申义）；并要分清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即说字之训诂与解经之训诂的不同，小学家说字往往把一切义包括无遗，经学家解文则只取字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训诂不单为解经，还适用于文史等诸多方面，实有打破经学对小学束缚的思想。同时他又以大量训诂实例使一些深奥难懂的古代文献得以理解，救活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总之黄侃承前启后，贡献非凡，被推崇为“新训诂学的开拓者”[(6)]。

在对待甲骨文、金文的态度上，黄侃与他的老师章太炎不同，章太炎完全加以否定，黄侃承认金、甲“断缺之余，亦有瑰宝”[(7)]，主张进行研究，也劝弟子治文字学时拿金、甲作参考，但对当时从事甲骨文、金文工作的人多所非议。他曾搜集、看过一些有关金、甲的材料，同《说文》作了对照，由于对金、甲重视不够，又因材料未备，没有深入下去。

初到南京，黄侃的心情比较舒畅。时中大人才济济，中文系主任汪东是他的好友，此外他与知名教授陈伯弢、王晓湘、王伯沆、胡小石、汪辟疆等来往频繁。他们结成上巳诗社，每遇春秋佳日，即聚集北湖、青溪、钟山、栖霞、牛首诸地，饮酒欢歌，赋诗联句，相互唱和，尽性游乐。如此三年，由于各迁新居，距离较远，特别因为国难，社事乃止。当时南京政要中有黄侃不少熟人，他均疏而远之，唯独居正受软禁时，他屡次探访，后居正东山再起，出掌司法院，他竟不复往，以避攀附之嫌。不久汪东的弟弟（中共党员）被徐州驻军司

令刘峙逮捕，求黄侃营救，黄侃致函居正，得居正之助，汪弟才幸免于难。

黄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早有警惕，还在济南惨案时即作《勉国人歌》，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他又无比愤慨地写了《闻警》一首绝句，发出“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8]的正义呼声。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黄侃一度避战北平（今北京），逢农历春节，他极为沉痛，即兴创作两首七律，中有“杀节凋年惨惨过，惟将泪涕对关河”，“失巢伫吊依林燕，聚糁先怜在沼鱼”[9]数语，可见其“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10]。在北平曾组织兴芒社，从事讲学活动。同年夏重返南京，而忧郁的心态依然如故。

黄侃对时局过于悲观，精神上长期受到压抑，生活习惯不良，常熬夜少眠，纵酒无度，性情古怪，好斗气，爱骂人，有疯子之称。这样久而久之身体不堪承受，致患胃病，自1933年起胃痛时作。

1935年9月下旬，传华北有改编教科书之说，黄侃大愤，又受凉，胃病发作。此后胃痛不止，有时终夜难寐，但他仍坚持授课和钻研学问。同年10月6日农历重阳，上午他按常规挈子女甥婿到鸡鸣寺豁蒙楼小坐，并赋诗：“秋气侵怀兴不豪，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沾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西下阳乌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空自劳。”[11]突觉胃痛剧烈，急返寓卧床，晚饭照旧饮酒，入夜因胃穿孔吐血如注，医治无效，于10月8日去世。弥留之际还一再向家人询问河北近况，并叹曰：“岂国事果真不可为乎？”[12]

黄侃述而不作，不轻易著书，章太炎屡促他从事写作，他答以“年五十当著以纸笔矣”[13]。他所遗留文字甚多，除前述各篇外，仅《说文》、《尔雅》、《广韵》批语就达七十余万言，另有文稿百余篇、诗词一千四百余首、日记十余册，及散见报纸杂志者不计其

数，但较完整、系统、成熟、具代表性的著作却很少。他临终前五日曾言："余生前必不刻书，如有著述，身后门人为我成之。"[14] 1936年中央大学文艺副刊特辟纪念专号刊载黄侃授课讲义及影响较深广的文稿十九种，1964年由中华书局编为《黄侃论学杂著》出版。他的侄儿黄焯、子念田、女念容、婿潘重规均留心收集整理其遗篇，陆续辑成《说文笺识四种》、《尔雅音训》、《广韵校录》、《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古韵谱稿》、《音学九种》、《文选评点》、《黄侃论学杂著续编》、《量守庐群书笺识》、《量守居士遗墨》、《黄季刚先生遗书》、《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量守庐词钞》、《黄季刚诗文钞》等，绝大部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

(1) 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页。

(2) 陆敬：《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量守庐学记》，第18页。

(3) 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湖北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集》，1985年版，第171页。

(4) 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量守庐学记》，第2页。

(5) 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量守庐学记》，第70页。

(6) 罗邦柱、周大璞：《黄侃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集》，第19页。

(7) 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量守庐学记》，第122页。

(8) 程千帆：《忆黄季刚老师》，《量守庐学记》，第172页。

(9) 程千帆：《忆黄季刚老师》，第172页。

(10) 徐复：《师门忆语》，《量守庐学记》，第150页。

(11) 黄念平：《忆父亲》，《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纪

念集》，第161页。其他纪念文章讲到此诗内容略同，阳乌指日本侵略者。

(12) 殷孟伦：《忆量守师》，《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集》，第55页。

(13) 游寿：《敬业记学》，《量守庐学记》，第111页。

(14) 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量守庐学记》，第2页。

黄明堂

邢凤麟

黄明堂，字德新，广东钦州（现属广西）人，壮族，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于小康农家。年轻时怀大志，慨然以救国为己任，常与人议论时弊，抨击权贵，为当地政府所不容，遂逃往越南图谋生路。

黄明堂到越南后，加入洪门，纠集健儿组织义军，活动于滇桂与越南边境，长期坚持反清斗争，清边防大臣束手无策。他还常袭击侵越法军，法驻越总督也甚为头痛。

1907年3月，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派人联络黄明堂。黄明堂遂加入同盟会，在越南太原府左州设立机关，集合革命志士。

同年10月，孙中山委任黄明堂为中华革命军镇南关（今友谊关）都督，并从海外爱国华侨募集捐款购买数十支驳壳枪，给他组织一支手枪小分队。12月2日，黄明堂奉命带领一百多人从左州拔队入关，另有越南革命党人数十人、越南华侨革命党人数十人、筑路工友数十人、会党游勇约百人、内地前来者十余人，共约三百人，由他指挥，星夜绕道镇南关背后，疾趋石山顶炮台。当时清道台龙济光驻龙州，统领陆荣廷、营务陈炳焜扼凭祥隘口，帮带黄福廷守镇南关，哨长李福南带一排人凭险守石山顶炮台，镇南关及附近清兵共计数千人。李福南原为会党首领梁兰泉的部属，梁加入同盟会后，李已被梁策动反正。此时，李敞开山门竖起革命旗帜，黄明堂长驱直入，部分清兵稍事反抗即溃散，黄明堂占领石山顶三座炮台，缴获大小火炮十四门，步枪数百支。次日，孙中山偕黄兴赶来炮台祝捷和犒赏革命军，当地各民族群众也挑水送饭前来慰劳。这时，龙济光、陆荣廷统辖数千清

兵，从青山炮台南关闸、磨沙、南关口左辅山和四方岭等四路合围革命军。孙中山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五日，自己赶回河内筹募饷械接应。黄明堂指挥革命军多次击退来犯清军。经七昼夜激战，革命军牺牲十余人、伤三十多人，清兵伤亡数百人，帮带黄福廷大腿被打断。由于孙中山接济的饷械不能如期运抵镇南关，黄明堂粮尽援绝，只得退入越南文渊，进驻燕子大山待命。镇南关起义虽然失败，孙中山及广大同盟会员看到人心向着革命，清廷的垮台不可避免，革命的信心更足了。

1908年4月29日，黄明堂奉孙中山之命，率革命党一百多人发动云南河口起义。河口为边防重地，清边防督办带兵驻守。黄明堂派关仁甫率领部分队伍由越南老街进攻河口左侧的万侯，河口清军防营响应起义，迎接革命军入境。黄明堂亲督革命军主力猛攻清军汛营，清河口督办王玉藩负隅顽抗，为守备熊通击毙。汛营管带黄元桢在革命军政治攻势之下首先反正，清军六营六百余人相继投降。黄明堂率革命军迅速占领河口。随即扩编队伍，拟乘胜挥师北上，占昆明、出四川、控制长江上游。清云贵总督锡良忙派道员方宏纶、提督白全柱指挥十余营清兵反扑，并通电贵州、四川、广西三省派兵赴援，一时西南数省为之震动。孙中山急电黄兴赶赴河口指挥，声威更壮。由于战事意外迅速发展，弹药顿感缺乏。黄兴急返河内筹取接济，途经老街时遭法军警官无理扣留，被逐出境。黄明堂后援不继，指挥乏人。而清军四面包围河口，革命军前锋相继失利败退。黄明堂困守河口经月，浴血苦战，终于寡不敌众，率革命军六百多人退走越南。旋因法国殖民当局迫害，黄明堂退走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

1910年冬，黄明堂在新加坡接到孙中山的电报，要他到香港同盟会支部工作。黄花岗起义时，黄明堂负责秘密运送军火入内地。辛亥武昌起义，四方响应。黄明堂与党人潜入新会，以当地会党、绿林、游勇为基本力量，成立“明字顺军”，自任本军大都督（统制），队伍约六七百人。又派其妻欧阳丽文到阳春，运动防军统领黄辅文起义，

然后亲至黄辅文军队指挥作战，次第光复恩平、开平、台山、新会等地，于11月16日进驻江门，向三水推进，以期会师广州。适值两广总督张鸣岐挂印逃走，广东独立，由胡汉民任都督。胡汉民委派黄明堂为琼崖宣抚使，率所部二千余人移驻海南岛。黄明堂在海南整顿治安，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后，因感袁世凯反动逆流泛滥，萌发隐退的念头，将所部交给统领姚章甫指挥，携眷回乡省亲后闲居广州。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派龙济光率所部入粤。龙济光曾邀请黄明堂任参议，黄明堂不肯附逆，出走澳门，从事倒袁活动。1914年秋，龙济光侦知黄明堂在澳门的活动，诬为匪首，勾结葡萄牙殖民当局将他逮捕，欲引渡回广州杀害。黄明堂被监禁一年多，经两广都司令部出面与葡萄牙殖民当局交涉，始获释出狱。黄明堂至肇庆见护国军两广都司令岑春煊，被委任为讨贼军司令。他收编民军，会同桂军林虎、滇军李烈钧等分路讨伐龙济光。黄所部主攻广州北面鸦髻岭，与龙部展开激烈战斗，夺取石井兵工厂，攻入广州。龙济光撤退至雷州，黄明堂又率部收复雷州。龙济光败走琼崖。

1918年3月，段祺瑞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由琼崖派军扰粤桂边境。11月，黄明堂与桂军沈鸿英配合出兵琼崖，一举打败龙济光，收缴龙部枪支人马。沈鸿英被广州军政府任为琼崖镇守使，黄明堂任琼崖道尹，驻防海南。不久，桂系军阀陆荣廷统治广东，排斥异己，免去黄明堂本兼各职。黄明堂离琼崖到福建漳州，依陈炯明。1920年8月，孙中山命陈炯明率粤军入广东，驱逐桂系势力。黄明堂参加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战争。10月，桂军被逐出广东。

1921年6月，桂军分三路攻粤，陈炯明督粤军击退桂军并追入广西。黄明堂任西南路司令，由钦州发兵直薄龙州，大获全胜，被任为边防督办，驻防龙州。同年秋，粤军班师回粤，黄明堂奉命移驻钦廉。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驻跸永

丰舰指挥讨贼，分别委任许崇智、刘震寰、周之贞和黄明堂为东、西、中、南路的讨贼军司令。此前，陈炯明曾派其义母黎金庭携带巨款十五万元及钦廉绥靖处处长的印信收买黄明堂，被他严词拒绝。此时，黄明堂奉命讨贼，挺进廉江，生擒陈炯明部下的支队司令邹武，晓以大义，仍委邹武为南路讨贼军支队司令，随征陈炯明。黄明堂军次电白时，得悉孙中山安抵上海，便率部撤回廉江。途中，邹武叛变，陈炯明又派邓本殷、冯铭锴、黄业兴等部截击黄明堂。黄明堂与之对峙月余，为保存实力，退往广西邕宁五塘，派员向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请援粮械。林俊廷表面答允，暗中进行收编黄部工作。正当黄部岌岌可危之际，其妻欧阳丽文从上海持孙中山的手札到香港找孙科、刘纪文，领得港币五万元回来，黄明堂即分发军饷，偿还赊欠商户账目，宣告立即出师讨贼。黄部五千人在五塘虽被桂系军阀包围，但黄明堂指挥若定，率部突围出灵山。12月，黄部收复廉州（今合浦）北海，在廉州城内设立司令部，一直坚持斗争。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以黄部为革命基本力量之一，增拨军费，并对黄明堂予以嘉奖，亲书“礼义廉耻”等条幅赠他。

1924年初，桂军邓本殷等部围攻廉州阅月，黄明堂弹尽粮断，旅长杨壁臣投敌，形势危急。幸得孙中山所派永丰舰到北海接应，方获解围。黄明堂乘永丰舰前往琼崖驻防，因风大不能登陆，旋回安铺集中，经廉江、化州、电白、阳江到达台山。这时，黄明堂的南路讨贼军奉令改为中央直辖第二军，不久又改为建国第二军，黄明堂仍任军长，其妻欧阳丽文任该军第三旅旅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收编阳江陈章甫部为第二师，开往罗定围攻黄明堂。黄明堂猝不及防，败走连滩，被陈部包围缴械。从此黄明堂发誓不与蒋合作，其子女十多人没有一个人依附蒋介石的。在蒋介石的统治下，黄明堂不但长期在野，连孙中山规定发给他每月六百元的生活费也被取消了。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曾聘请黄明堂为参议，每月发生活费六百元。

黄明堂晚年闲居广州。抗战爆发后，1938年10月日本侵占广州，黄明堂夫妇避难回钦州大寺。此时，虽已年逾古稀，但他招集爱国志士，仍欲请缨抗战。唯因颈背两次重伤，加之年老体衰，出师未捷，旧伤复发，返回大寺时，半身不遂，忧愤卧病两个多月，于1939年逝世。弥留之际，仍频呼杀敌救国，浩气凛然。其妻欧阳丽文在全国解放后，历任广西政协委员，1973年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郑惠琪等：《镇南关起义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上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

邹鲁：《黄明堂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334—336页。

唐颂南：《我所知道的黄明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1965年版。

罗绶章：《黄明堂革命事略》（未刊稿）。

欧阳丽文：《回忆黄明堂》（未刊稿）。

黄明堂女儿黄曼薇访问记录。

黄慕松

周子琳

黄慕松，广东梅县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早年肄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后选派去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炮工学院。在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教官、校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广东民军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军咨府（后改参谋本部）第五局局长。1913年担任国防考察委员，曾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回京后，任陆军测量总局局长。

1918年冬，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1925年5月任军务善后委员会委员。同年南下广州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6月7日至7月29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1930年再度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不久被派往英国出席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26日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同年12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海外党务委员。1932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驱逐金树仁的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走上新疆政治舞台。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

慰及调查政变真相，人选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派马良去新疆宣慰，马良以年高推辞。4月28日，汪精卫又与蒋介石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九十九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在慎选贤能。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在决定人选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

黄慕松接到任命后，先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他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随后又精心挑选了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1日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等[(1)]，开始准备赴新宣慰。

蒋介石表面上对盛世才说，黄慕松去新疆“纯属宣慰性质，绝无他意”，但实际上由于蒋介石对盛世才有戒心[(2)]，根本不愿让盛世才主政新疆，派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由黄取代盛的地位。

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首先拉拢争取了一批军事力量。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五千人，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东北军其他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半数

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另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五千八百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非常不满。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培元最后表示受中央驱策。

其次黄慕松还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不在盛的控制下，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

再次，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世才不满，向黄氏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新疆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世才归附黄氏，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后，削弱盛世才的军权，这也是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黄慕松一到新疆就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他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慕松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黄慕松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这使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非常不满，认识到自己的危机之后，1934年6月26日，盛世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以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3] 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任命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相”。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碧澄去新疆调查事变真相。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4]。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

托。”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此，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达成妥协。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8月1日，行政院第一一八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

黄慕松离新后，由于他多年从事国防、边界方面的考察和谈判工作，又几次出使我国的边疆地区，积累了不少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经验。因此，国民政府将出使西藏的重任又交给了他。

1934年4月26日，黄慕松一行从南京乘专机飞抵成都，开始了他的使藏行程。5月21日，黄慕松到达康定，在这里备齐了所需的“乌拉”（即差役）后继续西行。6月26日到达川藏边界的德格，当地的驻军和汉藏同胞为黄慕松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两天后，黄慕松渡过了金沙江，进入西藏境内。

7月1日，黄慕松到达川藏交通枢纽——江达。黄慕松向当地军民传达了国民政府关于“五族共和”的精神及保护佛教、让藏民安居乐业

的政策，反复申明西藏只有依靠中央才能生存和汉藏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的道理。此后从昌都至拉萨，黄慕松每到一处，都受到了当地僧俗民众的欢迎，黄慕松则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

8月23日，黄慕松一行在经过艰难跋涉后到达了拉萨。黄慕松一行沿途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扩大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消除了部分藏族同胞心中的疑虑和误解，增强了藏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沿途人民向黄慕松“诉苦及盼中央派人治理藏地之请求，无日无之，无地无之”，便是例证。

1934年11月1日上午九时，致祭第十三世达赖大师的典礼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黄慕松代表中央政府致祭。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赴藏举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

黄慕松是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派往西藏的最高官员。他在西藏三个月，完成了出使西藏的各项任务。1934年11月28日，黄慕松在大雪封山中离开了拉萨，途经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于1935年2月返回南京述职。一个月后，黄慕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处理对藏的事务。

1934年4月4日，黄慕松晋升中将，同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7月29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委员。1937年3月20日黄慕松在广东去世，4月12日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宫碧澄：《国民党在新疆的活动点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王恩溶：《张培元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陈沣：《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失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

(1) 《新疆宣慰使黄慕松昨谒汪商谈》，《中央日报》1933年6月2日。

(2) 参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档案馆档案：政2—1—451。

(3) 《黄曾电保刘盛真除》，《中央日报》1933年7月7日。

(4) 《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中央日报》1933年7月12日。

黄乃裳

陈民

黄乃裳，名绂丞（一作“黻臣”），字乃裳，以字行，别号慕华。福建闽清人。生于1849年7月（清道光二十九年六月）。父亲黄庆波是木工，也兼务农。黄乃裳童年在家乡半耕半读。1866年十八岁时与族叔一同受洗入基督教，第二年开始实习传道。1869年后进福州年议会，被派在福音堂传教。1875年，与人合著革除缠足论五篇，除登报外，并印单张万余，广为散发。在传道过程中，他深感教会中因缺少文人学士受人蔑视，便于二十八岁那年（1876年），励志学习八股文。一年后，即以第二名考入县学。他还刻苦自学了英文，后曾协助牧师薛承恩等翻译《天文图说》、《美国史略》等书。1888年中举人，这时他已四十岁了。

1897年，黄乃裳带领大儿子黄景岱进京参加会试。第二年，遇上“戊戌变法”，维新谕旨一天一道，举国上下精神为之一振。黄乃裳留住北京，与康有为及“六君子”交往，讨论变法新政，曾八次上书，痛陈兴革。不久，变法失败，西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六君子”被捕，黄乃裳因参与维新而入案，幸得友人关照，逃避出京，返回福建。

维新失败，黄乃裳怅然若失。为避清廷暴政，并寻找可供开垦的新土地，安置无业同乡，实行基督教的“利他主义”理想，于1899年秋携带家眷南渡新加坡。经女婿林文庆推荐，任《星报》总编辑。他遍游英、荷属东南亚各地。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拉让河流域诗巫附近，找到适合垦殖的土地一处，改名新福州。由林文庆与邱菽园担保，同沙捞越土王订立农垦条约，主要条款有：“有待吾农人与英人一例（意即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华人），所垦之地享有九十九年之权利。……王家如需吾农已开垦之地，须按时价估买。吾农有往来自由，信仰自

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设立公司商业自由，购买枪械自由，航业自由等权利。无纳丁税，无服公役，无当兵义务。凡违犯民事在五元以下罚金之件，港主有自治之权。”[1] 1900年6月底，黄乃裳回福建招募贫苦农民，同时筹集资金，购置农具、种子，聘请医生及各类工匠。第一批共七十二人于同年底先期到达新福州。第二批五百三十五人则由他亲自率领于1901年3月到达新福州，开始进行大规模垦殖。经过三年惨淡经营，农产品逐年丰收。1903年1月，沙捞越英文报纸登载有关新福州的报道说：“拉让河流域之新福州垦场，继续发展之情形甚佳，其田园井井有条，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于世之中华农人之手。”[2] 当时南洋通例，称大农场为“港门”，称农场主为“港主”。凡是港主，都有包卖烟（鸦片）酒、开设赌场等特权，以牟厚利。黄乃裳是基督教徒，他认为贩卖鸦片及饮酒、聚赌，都有伤道德，违背垦场初衷，因此，毅然放弃此项特权。但沙捞越政府一向依靠上述专利作为主要财政收入，对黄乃裳在新福州抵制烟酒，禁止聚赌，大为不满，警告再三。由于黄乃裳不为所动，终于在1904年初下逐客令。垦场功败垂成，黄乃裳亏蚀了新币四万多元，郁闷离开了新福州，深感寄人篱下之苦。

同年7月，黄乃裳携眷去新加坡。当时该地《图南日报》创办人陈楚楠、张永福，因报纸销路不佳，乃约请黄乃裳切磋文字，进而议论国事，倡言革命。不久，《图南日报》翻印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黄乃裳自告奋勇，携带五千册回国宣传，并于1904年10月到潮州，假托办学，遍游潮州及福建漳州所属十余县，联络革命志士。潮州黄冈起义，黄乃裳就是发动者与组织者之一[3]。

早在1900年7月，黄乃裳回福建招募农工途经新加坡时，恰好孙中山为营救日本友人也来到新加坡。经林文庆介绍，黄乃裳特拜访了孙中山，两人谈得很投机，遂引为同志。1906年，孙中山又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邀请黄乃裳参加，他即成为南洋方面早期的同盟会员。

1911年，黄乃裳任福建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教务长，并着手组编三院学生炸弹队，为光复福建做准备。同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福建光复。当天清晨，黄乃裳亲举国旗，率领学生军进城，将国旗升在武备大学堂旗杆上。事后，他写信告诉南洋的同志说："裳生平最得意之事，实此十九日以后迄今，为最踌躇满志之时，虽死无憾矣！"[4] 福建光复后，他出任福建军政府交通司长兼筹饷局总办等职。因清廷积欠福建兵饷三个月，光复那个月又需发双饷，共积欠军饷五个月，财政极其困难。黄乃裳便以个人名义，通电南洋各埠，请求捐助，得华侨汇款七十多万元。由于"事务綦繁，擘画颇苦"，仅仅两个月，便鬓发皓白如雪。但黄乃裳年愈迈，愈精勤。1918年元旦，他已年近七十，听鞭炮声，有感于怀，自书一对联："问以往于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愿以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之外，再度余生。"[5] 见到这副对联的亲友，无不赞叹说，此老倔犟，一如往昔。

1920年10月，七十一岁高龄的黄乃裳，欣然接受孙中山邀请，到广州出任元帅府高等顾问，辅佐孙中山，为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鞠躬尽瘁。1921年6月，因病回福建休养。

1924年9月22日，黄乃裳病故。家乡人民为他营建了坟墓。1980年又兴建了"黄乃裳纪念馆"。

马来西亚人民为纪念其垦殖功绩，特将诗巫市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黄乃裳路"，作为中马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1961年3月16日，诗巫各界人士举行诗巫开埠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并为黄乃裳铸立了铜像，以志纪念。

---

(1)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见［马来西亚］刘子政《黄乃裳与新

福州》附录二，南洋学会1979年版。

(2) 黄仁琼：《黄公乃裳港主年谱》，载《黄乃裳与新福州》。

(3) 冯自由关于潮州黄冈起义事曾提到："1907年春，许雪湫、陈宏生等在潮州二度起义，乃裳与有力焉……乃裳认识总理在丙午年，时雪湫等均在新加坡，曾对将来举事地点进行讨论，乃裳力主在闽粤边区发动，然后与滇桂义师互相策应。总理深韪其议。其后雪湫之军事进行，即奉行此计划。"见冯著《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

(4) 黄乃裳：《致陈楚楠、张永福函》，《槟城新报》1911年12月4日，载《黄乃裳与新福州》，第213—214页。

(5) 黄丞：《绂丞七十自叙》，见［马来西亚］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附录二。

黄琪翔

李静之

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生于1898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家中世代务农，父亲黄富霖因家计困难，远赴南洋经商，以后家庭经济逐渐好转。

黄琪翔童年在私塾就读。1910至1911年，入梅县务本中学，广州优级师范附中学习。1912至1919年，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1919年毕业后，任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炮兵队队长。陈诚是他队上的学生。

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922年，黄琪翔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广东参加革命。到广州时，正值孙中山率师北伐，他在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任参谋。同年6月陈炯明叛变，黄琪翔改任第一师第一团副营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沈鸿英之战。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黄琪翔加入国民党。次年任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参加第一次东征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战后，第一团扩编为独立旅，黄琪翔任该旅第二团团长。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黄琪翔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三十六团团长。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同时又进行南征，一直打到琼崖，统一了广东根据地。战后，十二师留驻琼崖。

1926年5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湖南支援唐生智作战，7月正式誓师北伐。黄琪翔随第四军第十二师进入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平

江、汀泗桥、马回岭等战役中，击败直系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颇有战功。

第四军于8月中旬经醴陵、浏阳到达平江，19日开始攻打平江城。黄琪翔的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负责中路进攻。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在当地农民的支援和引导下，绕道城东，攻入北门，直捣直军指挥部。吴佩孚严令死守粤汉线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并亲率主力刘玉春等部南下增援。27日，第四军向汀泗桥发动进攻，叶挺独立团在最前面。直军凭借地形，据险顽抗。吴佩孚亲自督战，并以机关枪和大刀队组织“督战队”。大刀队连砍阵前退缩的旅、团、营长九人，阻止官兵退却。北伐军英勇进击，反复争夺，双方伤亡很大，战争一时处于胶着状态。黄琪翔建议采取迂回战术。他在附近港湾找到渔船数十艘，一夜之间将该团渡过河去。拂晓时，配合正面部队进攻，自敌后发动攻击，一举而克汀泗桥。

9月，蒋介石在江西被孙传芳打败，十二师又奉命赴援。黄琪翔采用声东击西、出敌不意的战术，在马回岭全歼孙部谢鸿勋师，又协同第七军击溃了德安之敌。11月，北伐军占领了九江、南昌。

江西战役后，十二师回武汉休整。1927年1月，扩编成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黄琪翔以战功卓著，升任第十二师师长，旋又任第四军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了“蒋记”国民政府，宁汉分裂。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黄琪翔率领第四军为前锋。5月21日，与奉军接触于上蔡，一战而击败富双英师。接着直趋临颍，配合兄弟部队，和奉军主力激战。28日克临颍。6月5日，打下了开封。不久奉命回师武汉。武汉政府升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

第四军回到武汉时，武汉政府已处于反对势力包围之中。冯玉祥

在取得河南地盘后，公开倒向蒋介石，反对共产党。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武汉政府解体。张发奎、黄琪翔仍继续拥汪。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移驻江西南昌（第十一、第二十军）、九江（第四军）一带，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29日，张、黄参加了汪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共”，严令贺龙（二十军军长）、叶挺（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8月1日，贺龙、叶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5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9月初，汪精卫因在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中没有掌握实权，企图据有广州，另组中央党部和政府与南京特委会对抗。于是勾结张发奎，命黄琪翔带领第四军回粤。这时，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八一起义军入粤威胁下，表示欢迎第四军回广东。9月中旬，黄琪翔部到达广东。李济深要黄琪翔出兵协助打贺、叶。黄琪翔提出交换条件是李济深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四次中执监委全会。李济深不同意，黄琪翔便不肯出兵。李济深因与贺、叶作战将广州的兵力抽调一空，广州便为黄琪翔所控制。

在汪精卫的策动下，11月17日凌晨，张发奎、黄琪翔发动政变，以“护党”为名，骗走李济深，计划捕捉桂系首领黄绍竑，将驻广州的桂军和李济深留守广州部队包围缴械。18日，张、黄接收了军事委员会，以张发奎为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李济深亦调动两广和福建军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广州。

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主力调到东江和西江布防。12月11日晨，共产党发动了广州起义。张、黄逃到广州河南李福林第五军军部，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调东江和西江的部队全部回师广州。13日拂晓，薛岳、黄镇球、李福林等部配合第四军进攻广州，起义被镇压下去。14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铭枢为东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为西路军总指挥，由李济深率领会攻广州。并下令查办张、黄。

张发奎为保存实力，决定将部队撤出广东，自己出国游历。黄琪翔也避往香港。1928年春到日本，7月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

这时，邓演达、叶挺、宋庆龄均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赞助邓演达在中国组织新党，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8月，行动委员会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琪翔被选参加干事会，并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琪翔主持该党中央工作，负起与各地联系的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防京沪一带。黄琪翔同蔡时相过从，在抗日、反蒋问题上获得默契。1932年“一二八”事变，黄琪翔曾到前线参加作战，并发动上海行动委员会的同志支援战争。淞沪抗战失败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攻打苏区，被红军击败。黄琪翔认识到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十九路军才有生存立足的可能。曾在上海奔走，推动十九路军与苏区发生联系。

1933年9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酝酿组织福建人民政府，联共抗日反蒋。黄琪翔应邀参与其事。11月中旬，他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筹备工作。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担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会议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黄琪翔是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下设参谋团主任。他为了协调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矛盾，表示第三党政纲与中华共和国的人民权利宣言之基本原则相同，无单独成立组织的必要，于12月11日宣布解散。

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大规模军事进攻下失败。黄琪翔于月底逃到香港。6月，再度赴德国。次年初，在柏林参加了进

步学生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与蒋介石派遣的留德学生展开斗争。

这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散在国内外各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决定恢复组织，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1月1日，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以抗日为中心任务的“临时行动纲领”，推选当时在德国的黄琪翔为总书记，并发表宣言，要求团结、民主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官僚政治和对日妥协政策。1936年以后，国内团结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10月，黄琪翔接陈诚电报要他迅速回国参加抗日。年底，他回到香港，与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等会晤。

1937年1月，黄琪翔在南京由陈诚引荐和蒋介石见了面。不久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炮兵监。同年爆发上海“八一三”抗战，他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和右翼军副总司令参加作战指挥。11月，上海抗战失败，全军西撤。冬，黄琪翔到达武汉。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为部长。蒋介石为了点缀“团结抗日”，又任命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琪翔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但是，政治部中反共势力日益嚣张。8月间，黄、周先后去职。之后，黄琪翔被调到军训部任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

1939年秋，黄琪翔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湖南邵阳，准备应付日本侵略军进攻长沙。不久又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设指挥所于湖北枣阳，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防守随、枣地区。1940年5月，日军向大洪山区进犯，企图占领宜昌。第五战区在随、枣、当阳、荆门一带布防，由黄琪翔和汤恩伯、张自忠分别担任正面和左右翼作战。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黄琪翔不得不撤至襄樊。张自忠被包围，在激战中牺牲。黄琪翔满腔

悲愤，撤退时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在办公室黑板上。撤退后他沉着指挥，积极反攻，7月收复了枣阳。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销，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

同年冬，黄琪翔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第六战区辖长江南岸鄂西、湘西地区。为了把湘西的粮食抢运到鄂西供应部队，战区成立了湘谷转运处，黄琪翔兼处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琪翔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

太平洋战争在这年12月爆发。1942年，中国组成远征军，准备协同盟军进攻缅甸日军的基地。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昆明，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负责油管警卫。1946年司令部撤销，黄琪翔回到重庆。

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黄琪翔不愿参加，又无挽救办法，便主动要求担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于1947年6月起程赴德。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胜利阶段。蒋介石政权濒临覆灭，寄希望于美苏冲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由于西柏林换新货币问题引起美苏矛盾扩大，形势颇为紧张。10月，黄琪翔接到蒋介石要他回国报告美苏关系的电报。他到南京见蒋介石，分析大战不可能发生的因素，劝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蒋大为失望。黄又劝他恢复和谈，蒋更为不满。这次会见，使黄琪翔对蒋的幻想最后破灭，便不愿再去柏林。年底，由上海转广州，潜赴香港，决心归附人民。

1949年8月，黄琪翔以特邀代表名义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参加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10日，黄琪翔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杨逸棠：《黄琪翔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1985年版。

黄少谷

陈志新

黄少谷，幼名亮。1901年7月24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生于湖南南县麻河口镇一个平民之家。黄少有大志，曾慕诸葛孔明而改名亮。初就读长沙妙高峰中学，1919年转长沙明德中学，后又以倾慕北宋诗人黄山谷而改名少谷。时值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是年12月，黄在长沙驱张（敬尧，时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学潮中崭露头角，俨然为学生领袖。

1922年底，黄少谷中学毕业，翌年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因教育经费不足，学业靠公费难得保证，黄遂在校外谋求生路，以半工半读自立。1925年，在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晚刊《世界晚报》求得一职，是与新闻界接触之始。不久，黄与成成莫逆，遂担任该晚报主编。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共商国是，推动了北方国民党组织的发展。1925年，黄少谷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张作霖在北京限制、镇压国共两党的活动，黄于是年末毕业，已无法容身北京，经李大钊介绍投到冯玉祥麾下。1927年5月，黄任冯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一度被委为豫、陕、甘三省宣传处长以及三省农民训练所所长。其后总司令部秘书长何其巩辞职，黄继任之。

1929年，冯玉祥联桂反蒋离宁北上，委黄少谷为其驻沪、宁代表。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改组派的汪精卫、陈公博以及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黄作为冯的全权代表出席会议，一切重要的文稿，大多出自

其手笔。黄的才华，也受到南京蒋介石政府的重视。1931年，黄少谷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1934年他决定出国深造，得到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馀的资助，黄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经济。行前，他曾与成舍我约定，计划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昆明等大城市建立起《世界日报》网，各地方社刊社论，全国性的由总社撰稿，地方性的由分社供稿。黄抵英后曾广为收集资料，因抗日战争爆发，计划未及实现。后来，他主持《扫荡报》，差堪贯彻初衷。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黄少谷由英返国，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黄为湘省第八专区行政督察员兼郴县县长。是年，粮食歉收，一些迷信很深的士绅，微词黄少谷，乃缺粮不祥之兆，故有此厄运，黄立即辞职离去。1938年夏，黄赴渝，被延聘到监察院任职。1939年，黄又兼任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1940年10月，张治中继陈诚出任军政部长，黄应张邀转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翌年，黄继郭沫若出任军政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军队中的宣传工作。1943年，黄出任国民党军队之喉舌《扫荡报》社长。到职后，对该报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革新，充实编辑部人员，并亲自兼总主笔，掌握言论。抗战胜利后，该报易名为《和平日报》。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和平日报》先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步，发表反共社论。黄少谷自称“这是和共产党作理论上的争论”，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反共制造舆论。

1945年3月，黄少谷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1946年，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开始同蒋经国接近。11月，黄少谷当上了制宪国大代表，1948年他又当上了立法委员。7月，黄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局已定，内部一片混乱，中央党部内更是闹得乌烟瘴气。蒋介石于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仍作最后挣扎，玩弄伪和谈的缓兵之计，引退幕后指挥，把副总统李宗仁推到前台。黄少谷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主战派的死硬分子，力言不可与

中共谈判，称“和谈是陷阱”，一经跌入，即难以自拔。他说：“我是主战的，是宣传打共产党的宣传部长，现在中央决策是主和的，主战的部长就应该下台。”虽然如此，他们仍守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李宗仁宣告代职。黄少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协助何应钦处理和谈事务。是时，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南京城下，南京城内一片狼藉，黄少谷与陶希圣谋划发出统一社论，鼓吹蒋“总统”虽然引退，但仍以中国国民党总裁地位领导“反共大业”。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复张治中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两千字电文训令也出自黄少谷的手笔。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撤往广州，总统府撤往上海。6月，阎锡山继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黄改任政务委员。蒋介石逃台后，于是年8月1日在台湾草山（阳明山）成立办公室，黄被委秘书主任，随倚蒋介石参加在碧瑶、镇海与菲、韩元首会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台之初组织中央改造委员会，力图振作革新。初拟名单中有黄少谷，而蒋经国未在其列。黄遂陈情蒋介石，愿将己名剔除，改为蒋经国。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陈诚“组阁”，黄少谷应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秘书长。黄在陈阁四年任职内，正是蒋介石推行经济改革时期，以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实行所谓“耕者有其田”政策。黄以和与忍从事斡旋，发挥幕僚长的最大作用，使若干不同政见、不同利害、甚至有所求、有所恃的反对者大都能谅解。陈诚的大幅度改革措施始能突破阻力。尤以周至柔任参谋总长时，因军费问题时常与陈诚龃龉，多由黄从中化解。黄少谷在蒋介石集团中素以老谋深算著称，“立法院”开会时，“立法委员”质询多有逾越，陈诚不便答复，但又不能不讲明，黄列席会议，以便条向陈提醒。

1952年，黄少谷被指为“改造”后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54

年6月，俞鸿钧任“行政院”院长，黄少谷副之。1956年，发生所谓郭建亮等人“共谍”案，牵涉到孙立人，震动岛内，蒋介石派陈诚主持调查委员会，黄是委员之一。黄少谷以此案涉及政治与国际影响，力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积极疏通各委员，结果卒如黄少谷所拟，以孙立人历戎行，抗战有功，特准辞去“总统府”参军长结案。

1957年，黄少谷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7月，陈诚再度“组阁”，黄继叶公超出任“外交部长”，曾语人曰：“昔日为外交舞台导演、舞台监督，今则为演员，方知各有其难处。”黄与叶相处甚洽，每遇所谓“外交”棘手问题，经常商谈至深夜，尔后将意见报蒋裁决。其间，黄少谷以“国民政府”特使身份参加阿根廷总统伦迪兹、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加冕和墨西哥总统马特俄斯就职典礼，并到美洲十一个国家进行游说，宣慰华侨。1960年，黄少谷出任台湾驻西班牙“大使”。

1963年，黄少谷卸任归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并应台北报业公会之聘，任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委员。1966年，黄应“行政院”院长严家淦之邀，再度充当副院长。1967年2月，蒋介石特任其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1969年6月，辞去副院长职。1976年4月，黄出任“总统府”资政，仍兼“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1979年7月，黄少谷出任“司法院”院长。黄少谷与蒋经国的关系密切，蒋经国掌权后，凡遇重要而敏感的党政大计，必先密谈问计于黄，然后通过黄向国民党元老们转达蒋的意见。因此，黄少谷不但被称为国民党元老中的“智多星”，又成为蒋经国政治班底中支撑力量的重要人物。

1996年10月16日，黄少谷病故于台湾。

主要参考资料

马齐彬等编：《中国国民党历史事件人物资料辑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张朝桅主编：《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1983年—1984年），中国名人传记中心1984年印行。

叶明：《政治人物的风度——黄少老百龄诞辰纪念》，台北《传记文学》第75卷第2期（1999年2月）。

漆高儒：《我所知道黄少谷二三事》，台北《传记文学》第69卷第6期（1996年6月）。

黄绍竑

胡启望　项美珍

黄绍竑，又名绍雄，字季宽，广西容县人。生于1895年12月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出身大地主家庭。其父黄玉梁系秀才，以教书为业。1903年黄绍竑入族立珊萃学堂学习，1908年至桂林入兑泽高等小学，1910年春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四期，与第三期李宗仁等同学。“陆小”为当时广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黄绍竑亦受到革命思想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小”组织学生军，黄绍竑加入学生军北伐敢死队任班长，到武昌增援，不久调南京。1912年春南北和议告成，学生军转入南京入伍生队。同年秋黄绍竑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冬毕业，分入北苑陆军第十师。次年6月，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兵科，与白崇禧、夏威等同学。1916年冬毕业，分回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见习排长，属旧桂系陆荣廷部。翌年夏，任广西新军模范营第三连连副，开始了他的带兵生涯。其时，陆荣廷新组模范营以安置军校毕业生，黄绍竑遂与白崇禧、夏威等凑集一起，是为奠定此后统一桂局合作精神之基础的开始。

在护法战争中，模范营改为护法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部卫队营。1919年冬，卫队营编入桂军第一师第二团，黄绍竑任连长。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桂军失败，他随部退回广西。翌年又发生粤军援桂战争，黄绍竑驻防百色。旧桂系陆荣廷部被粤军击溃后，7月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1921年8月，马晓军因拥护孙中山驱逐陆荣廷被委为广西田南道第十三属警备司令，将所部扩编为四个营，黄绍竑升任第一营营长。其时旧桂系余部纷纷树起自治军旗号，刘日福自称自治军第一军总司令，不久将马晓军部包围缴械，黄绍竑被俘后设

法脱逃。

黄绍竑脱身后，在凌云、西林等县豪绅支持下，搜罗杂枪二百余支组成两个营，与白崇禧所率残部汇合，联合粤军反攻百色。1922年春，复请马晓军任统带，改编为广西警备军第五路军，黄绍竑任第一统领，白崇禧为第二统领，各编三个营，共一千余人，由百色进至南宁。当陈炯明叛变，将粤军从广西撤走后，各地自治军又复起，第五路军在恩隆地带无法立足，马晓军离开南宁将部队交黄绍竑统率。黄绍竑率部暂归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部下，任第三支队司令，回家乡容县一带活动，周旋于自治军和粤军之间，两面敷衍俟机而动。

1923年春，黄绍竑为了求得发展，脱离李宗仁部投靠广东军务督理沈鸿英，被委为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同时又投靠粤军陈济棠部，任独立旅旅长，准备出师梧州；他还派代表与广州革命政府联络，8月任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后被委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当粤军攻占肇庆，桂军沈鸿英部溃退梧州之时，黄绍竑在粤军配合下占领梧州，打出讨贼军总指挥的旗号，下辖三个团，有人枪三千余，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

讨贼军成立后不久，李宗仁于1923年秋自称“定桂军总指挥”，黄绍竑与李配合先将“自治军”陆高云部击败。次年5月趁沈鸿英部包围陆荣廷部于桂林之际，他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先联沈将陆推倒，然后再击沈。黄、李分兵出师讨陆，6月占领南宁。之后陆荣廷被迫下野去上海，黄、李随即成立“定桂讨贼联军司令部”，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从组织上巩固了李、黄等的联合。到8月，定桂讨贼联军相继将陆荣廷余部韩采凤、陆福祥、谭浩清、谭浩澄等部击溃，消灭陆的余部二万余人，趁势攻占柳州、都安、龙州等地，占领了广西三分之二以上地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新桂系势力得以壮大。

1924年11月26日，黄绍竑应李济深的邀请前往广州，由廖仲恺、许崇智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任广西省党务特派员。他回广西后，与李宗仁等在浔州召开广西善后会议，以李任广西督办，他任会办。时广州大元帅府委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黄绍竑与李宗仁合力拒阻，为此他应邀赴穗与大本营商洽。12月1日，大本营改组联军总指挥部，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

1925年春，黄绍竑与李宗仁得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援助，将沈鸿英残部逐出湘粤边区，7月上旬将入侵广西的滇军逐回云南。9月新桂系终于统一了广西，黄绍竑任广西民政厅长，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新桂系的统治从此开始，他和李宗仁对广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如整顿部队、吏治，统一币制，改革税制，振兴教育，发展交通，以及兴办水利、垦荒植树等，成绩颇为显著，一时有“新广西”之称。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黄绍竑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月他去广州出席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议，经商定改由李宗仁任广西全省军务督办，改编广西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以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李宗仁率第七军的半数约二万余人，编成两个纵队参加北伐，其余部队由黄绍竑指挥，留守广西。同年夏，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省政府组织法，黄绍竑改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1927年2月，黄绍竑当选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兼训练部部长，同时兼广西政府军事厅厅长，随后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等职。4月蒋介石在上海策划清党反共，黄绍竑前往参加清党会议，会后立即电令黄旭初在广西清党反共。5月组织广西清党委员会并任主席，于梧州、南宁、桂林、柳州设立分会，积极进行清党反共。7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清党反共，背叛革命，中共于8月1日

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随后起义军南下向广东进发。黄绍竑接受李济深委任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亲率吕焕炎师进驻南雄，阻止起义军南下。10月，汪精卫到广州和张发奎策划，欲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乃决定先将李济深骗离广州，然后将黄绍竑诱捕杀害。11月16日夜，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兵变，黄绍竑闻讯化装潜逃，经香港、越南回到广西，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终于爆发了粤桂战争。此时，共产党在广州趁时起义，张发奎因此受到抨击而下野，李济深恢复了对广东的统治，黄绍竑再度将兵力伸入广东，于河源的潭下圩大败张发奎部，与武汉的李宗仁相呼应，成为新桂系的鼎盛时期。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监察委员。

蒋介石在继续北伐军事结束后，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亟谋削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及其他派系，遭到强烈反对。编遣会议破裂后，蒋介石囚禁李济深于南京汤山，黄绍竑力主军事救援，被推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军在武汉、平津失败，李宗仁回到广西策划攻粤反蒋，同时由黄出面与蒋交涉，蒋介石决心彻底消灭桂系，除分兵合围广西外，并以陈济棠为广西编遣区主任，迫令黄绍竑将李宗仁解送南京，随后又免去黄绍竑广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桂系被迫武力反抗，由黄绍竑和白崇禧率师入粤，以期先发制人，一举攻下广州。然以劳师远征又寡不敌众而败北，遂撤回广西，但广西已由蒋介石委派投靠南京的俞作柏和李明瑞掌握，他和白崇禧被迫经越南去香港。9月，改组派发动“护党救国”运动，策动俞作柏、李明瑞反蒋，俞、李的反蒋很快失败，黄绍竑和李宗仁趁时返回广西，于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省主席。12月，桂军会同张发奎部，分道进袭广州，被粤军在北流击败，嗣后双方对峙于西江两岸。黄绍竑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和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之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桂军加入阎、冯军反蒋

为第一方面军，全力出兵衡阳，进占长沙，黄绍竑留守广西。6月，桂军在衡阳被粤军腰击，遭到重大失败，于7月退回广西。时湘军进驻全州，滇军包围南宁，粤军占领梧州，桂军四面楚歌。黄绍竑意志消沉，萌生退意，于8月相继辞第十五军军长和广西省主席等职通电下野。当时，他认为桂系局面极为严重，同蒋介石争天下肯定争不过，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去混，决心离开广西脱离桂系。

同年冬，黄绍竑去香港，后经蒋介石派人迎往南京。1931年2月，他虽被蒋委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但只能在上海、香港两地活动。是年夏，他一度回到广西，李宗仁请其留下任广西经济督办，黄未允。嗣后他返回香港，再往菲律宾考察。“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于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10月黄绍竑被恢复国民党党籍。11月，黄绍竑参加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后，蒋介石通电下野，他闲住于香港静观局势的变化。

1932年1月下旬，南京的孙科内阁无法维持，蒋介石与汪精卫再次合作而重新登台，黄绍竑应邀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委员。5月出任内政部部长，实际替蒋介石奔走，撮合各派系，所以有人称之为“内交部长”。

1933年夏，陈铭枢与李济深密谋反蒋，黄绍竑认为第十九路军很有声誉和力量，在福建地区完全可以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于是乃暗中与之联络。可是当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又害怕起来，同年秋，黄以中央特派员、内蒙宣抚使身份去内蒙，与德王商谈改革蒙古地方自治方案。其时，黄绍竑感到追随蒋介石非常失意，于失望之余请假回到广西。蒋介石对他回到广西很不放心，于1934年12月委他为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保安司令。他上任后推行保甲制，划分九个督察区，设行政督察专员。

1936年，两广反蒋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为免除广西后患，7月又

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广西善后。同年12月，被调任湖北省主席。西安事变爆发，他一度被讨伐派何应钦任命为参谋长，为营救蒋介石曾去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停。1937年夏，他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任第二总队队长，参与集训全国中学校长和国民党高中级军官。

“七七”事变爆发后，黄绍竑赴南京出任军委会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的第一部部长，不久改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山西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山西娘子关、阳泉陷落后，黄回到南京。11月改任浙江省主席兼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他刚到任杭州陷落，后将省会先后迁往金华、永康、方岩、松阳、云和等地，浙江大部地区被日军侵占，但仍拟定“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并组织“浙江省战时工作队”，开办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和战时青年训练团，坚持开展抗日工作。战时，黄绍竑兼浙江国民抗日自卫团总司令，曾一度兼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到浙江访问过他，之后与中共人员有多方面的接触。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鉴于黄绍竑在战时与中共多有接触，且做事往往独断专行，于1946年3月免去他浙江省主席职务。从此他对蒋的戒心日重，到上海做寓公静观时局。次年他先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立法委员、监察院副院长，对这些毫无实权的闲职，他内心颇为不满。1948年1月，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黄绍竑参与活动，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同年4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他积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充当“参谋长”拉选票击败对手。翌年1月，蒋介石隐居幕后，由李宗仁代总统。黄绍竑受李宗仁、白崇禧之托，到香港邀请李济深共同出面做国共间的“调人”。4月，国共在北平举行“和谈”时，他和张治中等七人任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国共和谈拟定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共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黄绍竑携回南京，结果被国民党方面所拒，他只好只身去香港。在北平和谈期间，黄绍竑已看到全国解放是大势所趋，中国未来的希

望只能靠共产党，所以在港期间即向原桂系的人士畅谈北平见闻，表明自己拥护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策动他们弃暗投明。8月，黄绍竑等四十四人在港公开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脱离蒋介石集团及其国民党，不久离港去北平，参加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绍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全国人大一届常委，以及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1960年10月得到改正。1966年8月31日遭到迫害致死。1982年12月29日，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了追悼会黄绍竑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主要参考资料

黄绍竑著：《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版。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黄维

严如平

黄维，字悟我、培我，江西贵溪县人，1904年2月28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三日）生于一个农家。父亲早逝，由母亲抚育成人。清贫的童年生活，使他形成坚毅、勤朴的品质和内向的性格。少时在本乡读小学，1918年考入江西省立第四师范，苦读五年，学习勤奋，成绩优秀。1923年毕业后回家乡，在小学执教。

1924年春，黄维前往上海谋求出路，其时国民党决定开办陆军军官学校，在上海秘密招生，黄维得到上饶同乡方志敏的帮助，报考军校初试录取，到广州复试后，编入第二队。黄刻苦训练，遵守纪律，年末毕业后留校，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中尉区队长。1925年2月军校师生组成教导团和学生军参加东征，黄维任排长。经淡水、棉湖等战斗，东征奏捷。黄又随教导团改组成的党军第一旅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刘震寰、杨希闵滇桂军叛乱。8月，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黄维编在第一军第一师。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隶属何应钦第一纵队，因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战后升任连长。

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出师北伐，黄维任营长，隶属预备第一师第三团。队伍新兵多，黄维在师长严重和团长陈诚带领下，以身作则，边前进边训练边演习，战斗力逐渐提高。预一师第三团于11月由韶关进驻赣州，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东进浙江，攻打孙传芳军，在龙游、兰溪一带与敌卢香亭部激战；继而在桐庐浪石埠架桥渡江，与孟昭月部又苦战不止；终于在严重指挥下全师猛力进攻，于1927年2月18日克复杭州。第二十一师继又从嘉兴攻击前进，3月21日进据苏州，5月渡江北上，次第攻占邵伯、高邮、界首、宝应、淮安等地。黄维作战英勇，不畏艰苦，于6月升任第六十一团团长。8

月，孙传芳军先在徐州一战中击退了蒋介石指挥的进攻，继分三路渡江南下反扑，占领龙潭和栖霞山，危及南京。黄维率领第六十一团和李树森第六十二团在师长陈诚指挥下驰援进攻栖霞山，击退敌军，救出被围困的友军；继而向南北象山一再冲锋，与孙传芳的白俄敢死队展开肉搏战，至28日晨攻克；接着又疾进黄龙山，大举歼灭敌人，在龙潭战役中立下战功。1928年4月，黄维又率部北上，参加讨伐奉军的战争。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编遣军队，将第一集团军各部缩编为六个师，黄维所部编属曹万顺、陈诚第十一师，他仍任团长。1929年初，他被选送至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进修两年，大大提高了军事理论素养和文化科学知识。毕业后回第十一师，升任第三十一旅旅长。

在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工农红军的战争中，黄维率第三十一旅随同罗卓英第十一师全师，在第十八军军长陈诚的指挥下，驰援赣州。黄维率部经马家洲、云田墟到达赣州以西的河地，于1931年3月2日晚在赣水贡水汇合之地偷架浮桥渡河，3月7日由坑道出城追击向赣州以东以南地区转移的红军。7月，在参与进占黎川、广昌、鄠都（今于都）等战之后，又奔赣江，寻找红军主力终不得见，队伍被拖得疲惫不堪。1933年3月参加第四次“围剿”，编属“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军”中路军，在陈诚指挥下与红军主力在宜黄南部草台岗、东陵地区激战遭败。第十一师开往崇仁防守，黄维升任第十一师副师长。不久被调赴庐山参加“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训练团”受训，以去除惧怕心理。9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黄维升任第十一师师长，率部开往南丰地区。翌年3月在黎川附近的樟村、横村投入战斗，阻击红军的反攻；5月在取广昌的战役中任预备队；9月进抵宁都，继向鄠都进击。红军主力长征后，黄维率师至韶关、大庾岭一带担任“清剿”任务；1935年7月又入浙江，“清剿”浙西南地区的红军。

黄维在几次“围剿”红军的作战中，听从命令，勇猛顽强，深得蒋介石、陈诚的赞许，1937年初被选派赴德国学习考察。“七七”事变爆

发后，黄维提前于9月回国，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率部投入淞沪会战。先在罗店、浏河一带与日军恶战，罗店失而复得，三次易手，黄维率领抗日将士浴血奋战，不畏牺牲。嗣后在金家宅、沈家桥等地进行阵地战，伤亡惨重。11月初战局恶化，黄维奉命率部至沪西苏州河南岸防守八字桥、厅头镇，拼死抗击日军；继而开赴安亭车站掩护大军撤退。后经无锡、宜兴、长兴转移到皖南山地。1938年5月，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辖第十一、六十七师，参加武汉会战。7月调赴江西德安地区驻防，9月与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合力在马回岭截击敌第九师团一部，继又阻击敌第一〇六师团，在马回岭展开激战。战后转移至湘鄂地区。

1939年冬，黄维奉命调至滇越边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其时该军给养困难，军粮多霉变、掺沙，官兵食不果腹，士气低落。黄维到任后，决定增发口粮，并向军政部申报，请求解决。军政部派员来调查时，黄维态度强硬，又不给贿赂，致使问题拖延不得解决。他迭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语多愤激，并以请求辞职相胁。不久他被调回重庆，挂名军事委员会高参。黄维向蒋介石汇报了有关情况后，告假回到老家江西贵溪，息影林泉。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4年，蒋介石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入伍，编组精锐的青年军，特在重庆设立“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以罗卓英为总监，黄维为副总监。总监部在江西横峰县莲荷村成立东南分部，黄维兼任分部主任，并任军事委员会干训团副教育长兼东南分团主任。他在莲荷悉心从事培训青年军军事和政工干部，制订了一整套训练和教学计划，按照不同的培训目标实行不同内容的培训，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要求教官和职员以身作则，不准辱骂和体罚学员，并严厉惩治贪污违纪分子。抗战胜利后，青年军分编为三个军，黄维于1946年6月任第三十一军军长，辖第二〇八、二〇九师，在浙江杭州、绍兴地区实施预备军官训练。1947年春，黄维被调任国防部联合勤务总部副总司令；9月任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至武汉创办新制军官学校，

任校长，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学方式训练军官。

其时，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连连受挫，1948年8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实施“重点防御”战略，编配强大的机动兵团。黄维被任命为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辖杨伯涛第十八军、覃道善第十军、熊绶春第十四军、吴绍周第八十五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共十余万兵力，集结于确山、驻马店、遂平地区。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战幕，黄维接徐州“剿总”刘峙命令，指挥第十二兵团由驻马店出发，经正阳、新蔡于15日到阜阳；16日第十八军强渡涡河后，18日各军次第到达蒙城附近地区。黄维部署第十八军占领蒙城，第十军由酉阳集渡涡河向蒙城靠拢，第十四军在蒙城东南，形成掎角之势，构筑坚固工事，准备稳扎稳打。这时，黄百韬第七兵团在碾庄被围，蒋介石电命黄维兵团向宿县急进。黄维不得不放弃固守蒙城的打算，指挥所部向北攻击前进。他以第十八军及快速纵队为右路，沿蒙宿公路直趋宿县；以第十军为左路，进击宿县以西地区；兵团司令部及第十四军沿蒙宿公路推进。20日，各部先后到达浍河以南之南坪集、赵集一带，但沿浍河阵地均已被中原解放军占领；接着，蒙城又被解放军占领，断了黄维兵团的后路；而东、西、北三面都是解放军布下的重兵。22日，传来黄百韬兵团被歼的消息，而黄维兵团仍然被命令要向宿县前进。面对中原解放军不断增调兵力进行包围的严峻形势，黄维与兵团副司令官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等人反复商量对策，举棋不定，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向南坪集东南八十余里的铁路线固镇转移，以便沿津浦线南趋蚌埠，于24日下午开始行动。然而时机已失，解放军于25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蒋介石接报后命令黄维迅速率部向蚌埠方向突围，黄维立即挑选四个主力师突围而出，不料第十五军一一〇师廖运周于此时率部起义，突围未成。黄维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就地固守待援，不要轻举妄动”后，便督饬各军遵令固守，转入阵地防御。但中原解放军九个纵队不断发动逐点攻击，紧缩包围圈，兵团各部粮弹日缺，空投接济部分所获甚少，还常引起争抢，士气低落。蒋介石28日下令杜聿明率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

元良第十六兵团经永城南下涡阳、蒙城，解救黄维兵团。但是杜聿明指挥三个兵团未达永城，即于12月4日全部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于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不得前进。

12月7日，黄维派兵团副司令官胡琏飞去南京，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危急局面，蒋允可以突围。面对解放军的层层包围，黄维要求空军实施轰炸以掩护大部队突围，还寄望投放毒气弹以威慑解放军。这时，中原解放军继续紧缩包围圈，又得华东野战军之增援和配合，攻占了双堆集东侧和北端的据点，把十二兵团十万兵力压缩在双堆集、大小马庄、杨庄等东西不足三里的狭长地区内。13日晚，解放军各部发起最后攻击，十二兵团各部虽然顽强抵抗，但无法挽回颓局。15日，黄维部署各军分路冒死突围，自己乘坐战车于下午4时跟着第十一师冲出包围圈，但战车在途中发生故障，他不得不下车，混杂在溃兵中奔逃，在南坪集东南的周庄被解放军俘获。十二兵团十余万人至15日24时被全部歼灭。

黄维被俘后，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他虽患有肺、腹膜、淋巴、副囊、精囊五种结核病，但得到了人道主义的治疗长达四年，获得痊愈。他在管理所一心想发明创造一种“永动机”，耗费很大精力，虽未成功，但得到鼓励。

1975年12月，黄维获特赦，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被推举为常务委员，热心祖国统一大业。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陈训正编著：《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1929年南京版。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成

文出版社1967年版。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

黄维：《关于青年军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选》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1981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杨伯涛：《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文强：《黄维被赦前后》，《炎黄春秋》1989年第4—5期。

黄锡滋　黄明安

张钧陶

黄锡滋，名大福，原籍湖北黄陂，其祖上迁居重庆，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父亲黄道南，二伯黄道和无子，黄锡滋兼祧两房。黄道和经营匹头，家资富有。

黄锡滋幼入私塾，曾学国画。1895年黄道和去世，黄锡滋获遗产十多万银两。他将钱财先存放在岳父杨文光的商号生息，后自营商业，但颇有亏损。1911年他开设商号，以陈丽生为掌柜，集正副股本三万六千两，并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名为天锡生。嗣后扩充业务，以天锡生为母号，几年间陆续开设了天锡永、天锡公、天锡福、天厚祥、福兴玉等子号，经营匹头、棉纱、油糖、山货等。天锡生、福兴玉后以运销川盐为主，是重庆“四大盐商”中的两家。

1915年，黄锡滋的岳父家杨氏兄弟开办聚兴诚银行，黄锡滋投资，并任监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抬头。生丝外销增长，黄锡滋集资买进天福丝厂，又设立天诚丝厂，从商业资本逐渐移向工业资本，谋取更多的利润。

黄锡滋的“天字号”做的是上下货，当时靠川江水运。为了掌握交通工具，实现自购、自运、自销，他投资三十万两从事航运事业，创设了福记航业部。为要保证轮船燃料的自给，1921年他又投资开办了三才生煤矿。1924年起，复相继开办复兴钱庄、裕泰钱庄，还投资于三元祥钱庄，以便周转资金，调动头寸。

黄锡滋的经营活动，遍及工矿、航运、金融和商业，获利甚丰。天锡生、福兴玉一向经销楚岸，1927年春宁汉分裂，淮盐不能运鄂，盐价暴涨，天锡生、福兴玉运去的川盐，赚到银元四十多万，为其后

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黄锡滋的“天字号”亦受到影响。特别是日本蚕丝的冲击，川丝一落千丈。黄锡滋被迫关闭了天福、天诚两家丝厂。兼以四川军阀恣意加提盐税，阻碍了川盐外销，使天锡生、福兴玉处于困境，1931年至1932年赔出近百万元。黄锡滋被迫先后结束了天锡生和福兴玉，并收束了“天字号”各店。尔后，他全力从事于航运和煤矿的经营。

早在1907年，黄锡滋便已投资川江轮船公司。1920年他创办的福记航业部，初购一艘旧轮“嘉定号”，行驶川江上游的叙泸一线；旋即卖去旧轮，以五十多万两银子先后购买“福源”、“福来”、“福同”三轮，航行川江下游，获利丰厚，到1928年底盈利达三十一万多两。他为了对付军人强派兵差，1929年6月改组福记航业部独资经营，挂上“法商”名义的聚福洋行。该行表面上由法商吉利洋行投资三分之一，以法国人沙礼出任法方经理，声称是“中法合资”的公司；实则黄锡滋与吉利洋行暗签“密约”，订明中法合资是假的，只由聚福每年送给挂旗费三万两，并付给沙礼等人若干钱。遇有军人干扰或其他事件，由法国人出面交涉，小则由沙礼出面处理，大则把法国领事搬出来应付，动辄以“要惹动外交”相恫吓。聚福凭借外人势力庇护，十多年中，船未搭过兵差，也不完纳捐税，获取了难得的厚利。至抗战初期，聚福积累现金已逾三百万元。1939年，巴黎吉利洋行总行派吕丹来华，矢口否认“密约”，强要虚设的三分之一股权。黄锡滋生怕揭穿聚福的内幕，只好委曲求全，几经磋商，接受法商补交十三万元股本，而被夺去十倍于其投资的利权。

黄锡滋经营的三才生煤矿，在重庆江北静观场代家沟，1925年正式出煤。但一直是以土法开采，设备简陋，而且受地址邻接、同属一股炭脉的天府煤矿的排挤，无多大开展。

黄锡滋经商近三十年，拥有企业十几家，资金积累到四五百万银

元，成了重庆的一大富商。他精通生意，工于心计，善于选择有才干的人负责经营各个企业，每逢年终结算，在家宴请众伙友，总以盈利最多者居首席，以盈利少或无盈利的陪末座。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我国，黄锡滋赞助抗日。1938年9月，他献寒衣捐资二万元，获得国民政府银质奖章和“见义勇为”的匾额。1940年5月8日，黄锡滋因病在重庆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黄明安是黄锡滋的长子，1907年11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生。十岁入学，1927年夏入上海圣约翰青年中学，因惧遭绑票，不久回重庆。先入聚兴诚银行做练习生，约半年转入天锡生商号监督内账。1931年天锡生结束后，黄明安在父亲资助下办怡怡公司，开怡丰钱庄。1934年春，他随舅父杨粲三赴欧美考察实业。抗战初起，黄明安经营复华漂鬃公司，任董事长。1940年投资开办光华制革厂。是年其父去世，黄明安拟通过改组三才生煤矿，加以整顿。鉴于运输上以往仰仗天府煤矿代运受卡，亦拟自筑铁路以解决运煤的困难。后申请购买铁轨受阻，未能实现。复欲与天府煤矿合并，亦未达成协议。适逢孔祥熙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矿业部急于抓矿，黄明安为获得官僚资本的“保护”，同中国兴业公司达成协议，于1940年4月底签订合约，正式成立三才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黄明安以常务董事兼任协理。

三才生改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扩充、改建，产量有所提高，但运输更不能适应。1941年3月，乃开工兴建代黄铁路，翌年5月筑成。但设计欠周，管理不善，通车之后，仍未完全摆脱依靠天府煤矿代运的局面。

其时法币不断贬值，又由于兴修铁路所费不赀，三才生改组不久，资金即陷于困境，不得不一再增资，四处贷款。初改组时，额定资本法币二百万元，原三才生与中国兴业公司各占一半，1941年春增为总额四百万元，1942年再增为八百万元，都各按原股额比例增加。但资金仍有困难，乃由黄明安签字承兑，向各商业银行贷款，到1943

年下半年，信贷高达两三千万，债台越筑越高。在此危机下，黄明安走通了孔祥熙的门路，再演一场增资改组的把戏。孔祥熙派陈行为董事长，徐堪、郭景琨为常务董事，改组了三才生的董事会，定股本总额为二千万元，以原股本（八百万元）升值百分之五十，为一千二百万元，其余八百万都是假名虚股，以便应付场面。当年12月，三才生即编造一套虚假表报，申请贷款。孔祥熙批交四联总处，不到一月，就获得六千万元长期低利贷款。孔样熙还亲到天府煤矿视察，要两矿“很好合作”。但天府总经理孙越崎属经济部系统，不买孔祥熙的账。三才生得到这一大笔贷款后，照理应易于转圜，但1944年开始，法币贬值越发加快，大后方整个工业陷于停滞状态，而煤的限价又影响生产，三才生仍然难以支撑，月月亏累，到下半年已成瘫痪状态。黄明安无可奈何，从当年9月起，将三才生委托董事陈叔敬全权负责，利用陈叔敬和天府煤矿董事长卢作孚的关系，去和天府商洽合并。天府乃清偿其债务，把三才生合并过去。黄明安经营三才生陪蚀二三百万银元的巨款，受到惨重的损失。

1945年复兴钱庄改为复兴义银行，黄明安任董事长。重庆解放前夕，他又任强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明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强华公司与华中、合众两家轮船公司于1953年合并组成川江轮船公司，实行公私合营，黄明安被任命为副经理；1955年任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副局长。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选为第四、五、六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他业余喜好书法，工于摄影。

1968年3月11日黄明安在重庆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黄瑾莹：《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经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等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1辑，1962年版。

黄明安：《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资本的经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等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2辑，1962年版。

黄兴

周天度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重要领袖。当时人们把他和孙中山并称，号为“孙黄”。他原名轸，字廑午，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生。父亲黄筱村，是湘中名诸生。黄兴九岁入私塾，十五岁考入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岁参加县试，被录为县学生。1898年以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特别是明末王船山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矣。”[(1)] 进两湖书院后，正值戊戌变法之年，新学流行，他接触了一些西方政治学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日益关心。戊戌变法和1900年唐才常在武汉发动的自立军起事相继失败，他看到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开始倾向反清革命。

1901年夏，黄兴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考察学务。到达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幼年曾学习拳术，后来喜好军事，在弘文学院课余常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并参观兵操。每日晨起，必练习驰马射击，为他以后从事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他到日本后不久，和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科学文化。1903年，留日学界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后转变为“排满革命”的军国民教育会），他是积极参加者，曾慨然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2)] 随后

他被推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1903年夏，黄兴离日本回到长沙，在明德、修业等学堂任教，暗中进行革命活动。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他乘三十岁生日，邀集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二十余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次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黄兴被推为会长[(3)]。

华兴会根据黄兴提议，确定了由湖南首先发难，然后谋各省之响应，以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革命方略，并决定从联络会党入手。因此在华兴会外，另立一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随后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取得了密切联系。他们共同议定，于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在长沙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另派遣同志分赴上海、武昌等地与革命者联络，策应起义。黄兴为起义筹集经费，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这次起义由于事机泄漏，未经发动，即遭失败。黄兴于10月下旬潜离长沙，经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7月，孙中山到日本，经日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和孙中山见了面。孙中山主张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黄兴深表赞成。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黄兴被推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发展了一批革命分子入会，并从中选择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他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勒令出境后，到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机关，策动两广的革命工作。黄兴于同年夏由日本到河内，和孙中山共谋在南方起义。9月他们在广西发动了钦州、防城起义，

12月发动了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两次起义先后失败。1908年3月下旬，黄兴率领二百余人由安南再次进入广西，转战钦州、廉州、上思一带，为时月余，历经数十战，大破清兵，因而声名大著。后以弹尽援绝，不得不退回河内。

此时，同盟会由黄明堂带领的一支队伍于4月末攻占了云南河口，孙中山委任黄兴以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名义前往指挥，他于5月上旬赴河口督战。因河口部队人少弹缺，且不听约束，黄兴只好返回河内，拟调集人力再举。这时法国殖民政府将他扣留，强迫出境。黄兴离河内去新加坡，随后转去日本。河口起义不久亦归失败。

1909年秋，黄兴受孙中山委托到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和赵声等于11月13日在南洋槟榔屿集会，他们鉴于过去几次分散性的起义都遭失败，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组织一支以数百人为“选锋”（敢死队）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计划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进攻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向南京推进，会师长江，继续北伐。

1911年1月中旬，黄兴从槟榔屿到香港，与赵声等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他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23日，他由香港乘轮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大减，放弃了原定的十路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

4月27日晨，黄兴向党人写了绝命书：“本日当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4)] 表示他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

当日下午5时半，螺角一声，广州起义发动。黄兴带领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百余人，臂缠白巾，脚穿黑面胶鞋，手执枪械炸弹，由小东营指挥部出发，急攻总督衙门，攻入后

堂，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及至返出衙门，和水师提督李准调来的卫队遭遇，展开激战，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亦受伤，右手断了两指。他仍指挥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他用肩撞破一家小货店门板，进入门内，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敌兵七八人。后敌军退却，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后来他俩结成了夫妇。广州起义延续到第二天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由于革命事败，同志遭受重大牺牲，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以报死难烈士，为谭人凤等人所劝阻。同年7月31日，谭人凤和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极力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写信予以支持，并表示要和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调集重兵猛攻汉口。黄兴于10月28日由上海到汉口。次日即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11月2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民军退守汉阳。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他率领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27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军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时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了窃取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迫使革命党人向他让步。黄兴以为随着清朝政府的被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多年追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实现，革命已成过去，“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

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5]。因此，在南北和议中，他主张和袁妥协，认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助共和，即可举袁为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大权，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留守，主持南方各军之整编。其时南方各军兵多饷少，士兵生活困难，而袁世凯又不予接济，部分军队发生哗变。同时黄兴认为南北既已统一，没有必要再保留大批军队，因此大量裁减了南方革命军队，南京留守府亦于6月间自行撤销。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笼络和麻痹革命党人，加强其统治地位，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当时孙、黄等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都认识不清，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他受了袁世凯的欺骗，对袁深表信任，向人宣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6]。这时宋教仁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积极推行其政党政治的主张，黄兴也抱着要把北京政府改变为国民党政府的幻想，逢人便劝其加入国民党。据说他劝过北京政府所有的国务员，甚至劝过袁世凯，要他也来当国民党领袖。袁虽未加入，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其他大多数国务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10月，他出京到上海，随后回到湖南故乡。途中怀着功成身退的心情，写过下面的诗句：“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林园想落晖。”[7] 12月初，他接受了袁世凯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职。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其反革命面目完全暴露。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认为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革命军队力量薄弱，不堪作战，对武力讨袁缺乏信心，主张采取法律解决办法。但袁已积极准备发动对南方的战争，国民党人不得不起而应战。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4日黄兴由上海到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反袁战事开始后，黄兴派往徐州的讨袁军失败，

22日徐州失守，袁军将领冯国璋、张勋率大队南下。25日江西湖口又为袁军所攻占，李烈钧败走。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黄兴在南京饷械不支，声援复绝，面临三面受敌的危险。他认为败局已定，于7月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不久，南昌、南京相继失陷，其他各地讨袁军也被战败，南方各省国民党势力为袁世凯所摧毁，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迅速失败，黄兴和孙中山再一次逃亡日本。

孙中山到日本后，总结革命失败经验，把原因归结为党内精神涣散，党员不听话，对黄兴拖延了举兵的时间，丧失了有利时机，有所责难。因此提出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要立具严格誓约，并须在誓约上按印指模，以表示服从他的命令。黄兴不赞成重新组党，更反对写誓约按手印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由此他和孙中山一度不和，各行其是。1914年夏，他离日本去美国。

黄兴旅居美国期间，在美洲华侨中做了一些反袁宣传。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起义讨袁，他曾为护国军筹措军饷。1916年6月他由美国抵日本。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国，居住上海，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关系。10月31日，黄兴因病在上海逝世。

---

(1) 何伯言：《黄克强》第2页，青年出版社1945年版。

(2) 天忏生、冬山合编：《黄克强蔡松坡轶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7页。

(3)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8页。

(5)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6页。

(6) 《民立报》1912年9月4日。

(7)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黄旭初

林经华

黄旭初，广西容县人，1892年4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四月初一）生。父亲黄寅生，晚清秀才。黄旭初从小随父亲就读于乡村教馆，1906年7月至容县简易师范读书，两年后任教于十里乡黎读村刘家。嗣后又入苍梧县蚕业学堂，十九岁毕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黄旭初弃文从武，赴柳州参加革命军。1912年2月考入桂林陆军速成学校，1913年夏升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1916年学成回广西督军署任参谋、军务科长。1917年5月，广西督军谭浩明组织陆军模范营，以马晓军为营长，黄旭初调任该营第二连连长。其时，北京政府段祺瑞毁弃约法，孙中山主张讨段护法，得到西南各省响应，黄旭初随模范营参加北伐援湘。次年湘粤桂联军在湖北失败，黄旭初所部自长沙回师东湘桥驻防，年底被改编为护国军第一支队第一营，他任少校营副。1919年12月，被调任广西陆军第一步兵师第二团少校团副，驻防柳州。此时正值粤军驱逐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在粤势力，3月9日黄旭初奉命开赴广东肇庆，并兼任该团第一营营长，8月开赴广州。10月陈炯明从福建回师广东打败桂军，黄旭初部退回广西苍梧、桂平，次年开驻百色。不久黄旭初调任广西督军署中校参谋。

1921年，孙中山号召粤、滇、黔、赣各军讨伐陆荣廷。6月下旬，粤桂两军交战，桂军刘震寰倒戈，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分三路攻入广西。黄旭初随谭浩明出征玉林，桂军失败，粤军直逼南宁。7月16日陆荣廷宣布下野。此时，黄旭初在百色随团长马晓军宣布拥护孙中山，因而受到陆荣廷残部的攻击。8月，广西省政府改组，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黄旭初出任省长公署军政处总务科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调驻桂粤军回师进攻孙中山。陆荣廷、谭浩明残部趁机东山再起，占据南宁，广西局面混乱，各种名目的“自治军”四起，抢占地盘，互相吞并。黄旭初于7月29日被自治军蒙仁潜部以“通敌有据”扣留。后经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说项，黄旭初获保释，归顺李宗仁。10月，他由南宁赴玉林，任李宗仁的广西陆军第五旅旅长。

1923年夏，李宗仁部受孙中山之命改称“广西定桂军”，李宗仁任总指挥，黄旭初任参谋长。定桂军联合梧州以黄绍竑为总指挥的“广西讨贼军”会攻陆荣廷驻桂南的部队，6月攻占南宁。1924年7月16日李宗仁、黄绍竑在南宁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推举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黄旭初为副参谋长。接着，定桂讨贼联军分别消灭了陆荣廷在桂南、桂西的残部两万余人，占领桂西南广大地区。次年春，定桂讨贼联军在粤军李济深师的支援下，以万余人之众，消灭了军阀沈鸿英部两万余人，占领桂东、桂北。后又击退犯桂滇军唐继尧部五万人，从而统一了广西。

1926年3月，李宗仁等与广州国民政府联合，广西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黄旭初任第七军第四旅旅长。6月，李宗仁率第七军一部出征北伐，黄旭初随黄绍竑率第七军约十四个团留守广西。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所部兵围桂籍要员的住处及第七军驻粤办事处，黄旭初只身潜逃香港。23日黄旭初绕道回梧州，其部队亦由韶关拉回桂东。12月，黄旭初率部挥戈沿江东下，29日攻克广州，张发奎部退走东江。黄旭初部奉命追赶，于1928年1月28日在五华县潭下圩与张部激战，虽击败对方，但本部伤亡亦重。随后黄旭初部继续进击兴宁、五华、龙川、河源、紫金等县的败军，历时三个月。其间黄旭初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黄旭初奉命率部北上反蒋。将至湖

南郴州，桂军在武汉告败，又受命由湘回到平乐。此时，广东陈铭枢、陈济棠附蒋反桂，4月黄旭初奉命率第十五军攻粤，6月21日与粤军激战于白泥市，为粤军所败。是役黄旭初负伤，辞去副军长职，到香港治伤。翌年3月，他从香港回到南宁，4月任教导第二师师长。5月中原大战爆发，桂系和张发奎联合冯、阎反蒋，出兵湖南，企图攻略武汉。蒋介石一面命滇军龙云乘虚进攻南宁，一面命陈济棠派粤军入湘堵击。桂、张军在衡阳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9月，湘粤之蒋军尾追入境，桂军在滇军围攻下呈不支之势，南宁告急。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对湘粤取守势，由白崇禧率兵解救南宁。在援军到来的声势下，黄旭初率守城官兵击败滇军，于10月将滇军逐出桂境，恢复了南宁的省会地位，桂系的局面得以苦苦支撑。12月，黄绍竑脱离桂系归附蒋介石，广西军政改组，黄旭初升任护党救国军第十五军军长，1931年3月又兼国民革命军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1年5月，陈济棠等联合反蒋各派人士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粤桂双方捐弃前嫌联合反蒋，黄旭初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并兼广州“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年底，宁粤和解，广州“国民政府”取消，黄旭初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翌年又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

此后黄旭初主政广西，和李宗仁、白崇禧团结一致，臂助李、白贯彻新桂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方针和“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共同制订《广西施政方针及进行计划》。在军事方面，采取“寓兵于民团、寓将于学校、寓征于募集”的方针，以求“自卫”；政治方面，考选考核县长，集训乡村长，强化基层行政机构等，达到“自治”；经济方面，发展农工、交通事业，开发矿藏，达到“自给”；文化方面，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创立国民中学，扩大高等教育等。还广纳各地新闻界、文化界尤其是反蒋人士来

桂，参与政治、教育、文化等工作。在黄旭初开始主持省政的时候，李宗仁为了充实广西内部，巩固广西的割据局面，于1932年，改组原于1930年9月成立的“革命同志会”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1934年秋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黄旭初任政治委员会主任。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桂北时，黄旭初曾派军队和民团对红军进行堵截尾追，执行防共拒蒋之策，驱迫红军尽快过境。这年11月黄旭初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6月“两广事变”起，蒋介石调集重兵从湘、黔、粤三面包围广西。黄旭初协同李宗仁和白崇禧动员民团，扩充部队，决心以武力反蒋。后来蒋桂妥协，双方息兵罢战，黄旭初仍任广西省政府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白、黄请缨抗日。7月，黄旭初奉命前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庐山暑期训练团，被派为第二期团副（团长是蒋介石）兼第一纵队队长。9月2日，黄旭初被授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10月，李宗仁组织以“团结抗战、支持抗战”相号召的“广西建设研究会”，以推动广西建设的发展，黄旭初为副会长兼政治部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由常委李任仁、陈劭先鼎助。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桂林一时成了大西南的文化中心，广西建设研究会团结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黄旭初贯彻李宗仁、白崇禧依靠进步人士支撑广西局面的构想进行了许多工作。1939年11月日本侵略军从钦州、防城的龙门港登陆，南宁沦陷。12月中旬昆仑关大战打响，黄旭初号召广西民众支援抗战部队。1940年10月24日，日军败退，黄旭初赴重庆要求给予战灾赈款和农村贷款。

1941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以后，桂系也参与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活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强行撤销。翌年夏，黄旭初派警、特监视、破坏广西各地共产党的活动，桂林发生了中共广西省委被破坏的“七九”事件，南宁、玉林、梧州、柳州等地的共产党组织也相继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平汉

南线和湘桂线一溃千里，9月广西局势恶化，黄旭初将省会迁到宜山。翌年5月，黄旭初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旭初回到桂林重理广西省政。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桂系兵力被绑在内战战车上。1947年，黄旭初执行白崇禧的“总体战”策略，积极备战，力图守住新桂系几十年惨淡经营的家业。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黄旭初为李竞选筹资三百万元，愈益增加人民的负担。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代总统，但桂系想要“划江而治”的梦难圆。国共和谈未成，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所向披靡，白崇禧守不住长江防线节节败退。10月，衡宝一役，新桂系集团主力第七军被歼，人民解放军从湖南、广东分三路挥师入桂，迅速消灭了新桂系集团的部队以及从湖南退入广西的其他国民党部队，共五个兵团（含地方武装）十七万余人，广西解放在即。11月20日李宗仁飞抵香港，后去美国，新桂系失去首领，11月2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即下令免去黄旭初的广西省政府主席职，由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接替。黄旭初由桂林至南宁，12月3日飞往海南岛。新桂系统治广西二十五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黄旭初于1949年12月21日从海口到香港定居，参加张发奎等第三势力的活动，声言既反共又反蒋。李宗仁在美国曾命黄旭初利用香港广西银行的百万存款，在港招揽政客，对桂系留港人员招待食宿。蒋介石曾派洪兰友等到香港邀黄旭初去台湾“共赴国难”，黄旭初谢绝。他于1951年去日本居住，不到两年又回到香港。1968年10月，黄旭初从香港赴台北为蒋介石“祝寿”，蒋授以“总统府国策顾问”虚衔。

黄旭初晚年寓港时，撰著有《广西怀乡记》、《辛亥革命广西援鄂北伐军》等史料。

1975年11月18日，黄旭初病故于香港。

主要参考资料

莫乃群主编：《新桂系纪实》（上、中、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第29辑，1990年版。

《黄旭初先生事略》，台湾“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第12辑，台北“国史馆”1994年版，第442—443页。

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容县志》第34“人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黄炎培

汪仁泽

黄炎培，字楚南，旋改韧之，辛亥后改任之，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初六）生于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父亲黄叔才，考取秀才后曾入督抚幕府；母亲孟樾清，出身南汇书香门第。黄炎培少年时豪放不羁，不信鬼神[(1)]。十三岁丧母，十七岁失父，在外祖父家生活。他勤奋好学，常到富于藏书的姑父沈毓庆家博览群籍。

1897年，黄炎培在家乡设塾授徒。1899年应科举府试，为第一名秀才。两年后考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特别班，选读外交科，受知于总教习蔡元培。是年乡试，黄炎培考取举人，仍回校攻读。

黄炎培遵循蔡元培办学校来唤醒民众的教导，1903年在家乡创办川沙小学堂，后又创办开群女学，均受泥工出身的爱国商人杨斯盛的资助。任教之余，黄炎培常向民众宣讲时事，鼓吹反清，并请名流演讲中国积弱之由与救亡之道，听者甚众，影响逐渐扩大，并去邻县南汇开讲。旋受人告密谓诋毁清廷，即被南汇知县拘捕，报经督抚批示就地正法。幸在令到前一小时，黄炎培已由杨斯盛挽请上海慕尔堂总牧师、美国人步惠廉（William B．Burke）强行保释脱险，当即由杨资助离沪，东渡日本[(2)]。一年后返沪，在城东女校、丽泽小学任教；后受杨斯盛聘请，创办广明小学及附设的一年制师范讲习班。

1905年秋，黄炎培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蔡赴德国留学，所任同盟会上海分部盟主一职由黄炎培继任。同时，黄炎培再应杨斯盛之邀，创办浦东中学于六里桥。黄炎培悉心办学，课余时

常带领教师肩掮小黑板分赴附近村落，召集男女老幼教书识字，兼讲时事局势，学校也办得生气勃勃。各地参观者陆续于途，江苏提学使毛庆蕃也来视察，深表满意。次年有人向两江总督端方检举南汇旧案，端方饬毛庆蕃彻查。毛庆蕃传见黄炎培，听其陈述兴学旨趣、治学宗旨及经历，大为称许，随即发一长文，结语称："今后如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从此立案不准，以免冤枉拖累好人。"(3) 经此周折，黄炎培得以放手为同盟会从事各项活动。

1909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黄炎培当选为江苏省常驻议员，负责调查省政。他提议裁撤扰民困商的厘卡制度，得通过，从1911年起实行，剔除了一项弊政。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黄炎培等五人被推为代表，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到达苏州时，程已宣布独立并出任江苏都督。黄炎培被留下参与起草文书事宜，不久被任命为江苏省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次年12月升任教育司长。在他任职江苏近三年期间，全省创办师范学校九所、普通中学十一所，以及众多的工校、农校、商校，使江苏教育事业跃为全国之冠。

当时的普通教育严重脱离生活和劳动，学生所学"不实无用"。黄炎培探索改革途径，以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名义赴各地调查，并受聘为申报馆的旅行记者，为该报和《教育杂志》定期撰文，以稿酬作旅费，遍历苏、皖、赣、鲁、冀各省。1915年4月，被邀参加农商部组织的游美实业团，历时三月，遍及全美考察教育事业。美国教育的实用性，给他影响深刻。回国后继续在各地调查，并报告旅美观感，开始研究、提倡职业教育。1916年起，黄炎培在各地演说，宣传职业教育。1917年初再赴日本、菲律宾考察，详细了解两国注重职业教育的两所小学。

经过长期的调查和苦心的求索，黄炎培与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等人于1917年5月6日在沪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

称“职教社”）。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机构，其宗旨是改革教育，使之“适于生活之准备”，最终达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教社受到各方人士的支持，陈嘉庚等南洋华侨及聂云台、穆藕初、刘伯林等企业家慷慨捐赠，经费不虞匮乏。

为了实践职教社的主张，1918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提出“敬业乐群”的口号，以“劳工神圣”，“利居众后，责在人先”为校训，规定毕业后实习一年，成绩优良者，始发给证书。在实业界的配合下，历届毕业生都受到各厂商欢迎，竞相邀聘。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的新学制中，确定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在黄炎培的倡导下，兴办职业教育成为一时风尚，据统计全国职校1918年为五百三十一所，1921年为七百一十九所，1922年为一千二百〇九所，1926年增至一千六百九十五所。

黄炎培改革教育，着眼于劳苦民众。1925年5月他建议调查中等以下家庭子女的平民教育状况，并倡议在各地开展职业补习教育。是年10月，创办《生活周刊》，先后委托王志莘、邹韬奋为主编。与此同时，黄炎培强调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应重视农业教育。1926年5月，他在昆山徐公桥建立乡村促进试验区；并在职教社设立了“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对农村教育进行指导，被推为该会董事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当局以“学阀”的莫须有罪名通缉黄炎培，封闭江苏省教育会，捣毁职教社。他们逼令职教社工作人员在预置的“黄炎培反动证明书”上签名，但无一屈从，遂被全部押逐郊外。暴徒企图劫收中华职业学校及附属工厂，用枪威逼，全体师生职工不畏强暴，高呼“谁来接收向谁拼命”，斥退暴徒。是夜黄炎培得一青年报信有暗杀之虞，乃连夜避走，潜往大连隐居。客中天天去图书馆读杜甫诗集，辑成《杜诗尤》一书。一天有人闯入旅舍，自称：“我是日本特工，奉命来监视先生的。先生读书

写字这样认真，生活这样严肃清苦，今后我决不受残暴的日本使命，本我良心，做先生的警卫。”[4]

1928年，经蔡元培缓颊，并称黄炎培是可用之材，蒋介石表示对他不再追究。是年黄炎培回沪，继续从事职教工作。1931年1月，蒋介石意欲授以官职，黄炎培以即将赴日考察而辞之。东渡后发觉日本朝野侵华备战之声甚嚣尘上，他带着所购日本军阀鼓吹侵华的书刊和“日本必将侵华”的预感，于4月下旬回国，多方奔告。5月去南京面陈蒋介石，蒋默然，云可转告外交部长王正廷。黄炎培向王谈及，却反受讥讽[5]。数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黄炎培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表不满，受抗日救亡组织的推派，到南京向当局诘问。回沪后，他与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出版《救国通讯》。次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战起，黄炎培与史量才等发起组织维持地方秩序和支援前线军需供应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接着黄炎培与沈钧儒、荣宗敬等发起成立“国难会”，发表宣言主张一致对外抗日御敌；组织以研究国难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讲座，讨论救亡。

1935年春，黄炎培赴皖、豫、陕等地，考察职业教育。鉴于职业青年中失学情形严重，7月在职教社第十五届社员大会上提出，今后工作应以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三者为重，根据当时情况，犹应尽先推广职业补习教育。此后各地纷纷开设职业补习学校，上海先后开办七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继续步步入侵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黄炎培在1936年纪念“一二八”事变四周年时，撰文呼吁团结抗日。在四川考察职业教育时，多次演讲唤起民众抗日，并联络工商界名流，呼吁团结救亡。1936年5月他与蒋维乔、刘湛恩等人电请蒋介石：速定对外方针，一致御侮。11月偕颜福庆等赴绥远慰问收复百灵庙的傅作义部抗日将士。途经山西太原，与阎锡山会晤，继续呼吁团结御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黄炎培热烈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他受聘为国防会议参议员。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发起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被推为主席团主席，积极组织战区救护、难民救济、动员工厂内迁等工作。10月，募集棉衣一万余件，赴济南慰问军队，并劝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抗日。是年底上书蒋介石，力陈欲求抗战胜利，必须国共切实合作到底。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黄炎培被选为驻会委员。他到重庆后活动频繁，一面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联系，逐步了解中共政策，深受影响；一面常受蒋介石的接见、招餐，咨询政局。他与孙科、张群等人也接触频繁，私谊甚洽。黄炎培自定在国共两党之间力求保持“不偏右、不袒左”的立场。

武汉失守后，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共摩擦不断，国共纠纷成为参政会的主要议题。黄炎培与张澜、褚辅成、冷遹等一批民主人士成为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黄炎培认为，“我辈调解国共关系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要有自己的政党，因此与张君劢、梁漱溟等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1941年3月在渝秘密成立，黄炎培被推为常委会主席。事为蒋介石所悉，以事前未经报告擅组政党而大加责难，民盟被迫暂不发表政纲，主席一职后改由张澜继任。后黄炎培又表示不愿公开列名民盟组织[(6)]。10月，在港以第三者身份撰文对民盟的宣言及政纲表示支持，回到重庆后即遭国民党的攻讦。

1943年11月，黄炎培出任“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兼召集人，积极奔走，期望早日行宪，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次年9月，黄炎培联合张志让、杨卫玉、冷遹、吴蕴初、卢作孚、孙起孟等三十人，发表《民主胜利献言》，提出及早实现民主制度等九点主张，以求唤起社会响应，迫使国民党政府实行。

1945年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

主张，黄炎培表示拥护，并为之奔走。但蒋介石断然拒绝，使国共谈判陷于中断。国民党还多次指责民盟庇袒中共，黄炎培列举国民党破坏团结事实予以驳斥。是年春，连续发生民主人士费巩在重庆失踪、宪政座谈会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等事件，黄炎培十分气愤，在5月4日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提出质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黄炎培更厌恶独裁统治，思想逐步倾向人民。6月1日，黄炎培应蒋介石邀餐，商谈恢复国共谈判问题；次日黄炎培与褚辅成等致电延安。22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如果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则乐于商谈，并欢迎黄炎培等赴延安参观。7月1日，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等六人飞抵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各抒所见 (7) 。黄炎培目睹延安街道整洁，物价平稳，群众心情愉悦，中共各项施政甚得民心，虽为时仅五天，但获得很好印象，使他在生平探索中找到了救国之道，成为他立场转变的重大转折点。回渝后写成《延安归来》一书，以直笔实事揭穿了长期以来国民党的歪曲宣传。该书并在港、沪等地翻印出版，前后发行十余万册。

黄炎培鉴于战后建设急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于1943年9月与杨卫玉、江向渔等在重庆筹设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是为职教社系统的唯一大专职业院校 (8) 。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为集结工商界和文化界的力量，与杨卫玉、胡厥文等多次筹划，于12月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被推为常务理事。该会对国事力主和平、民主、统一。是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即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犯。黄炎培以民盟常委名义致函国共双方，呼吁“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11月被推为“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主席，强烈呼吁制止内战。12月国民党制造昆明“一二一”惨案，黄炎培等在渝公祭该案四烈士，并撰文主张国民党应开放政权、实行民主。他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言行，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1946年1月，他的寓所被国民党军警闯入搜查。他不为所动，仍参加政协会议，为调停国共关系奔走不懈。6月，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

内战，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后，不顾政协的决议，于当日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民盟、民建在黄炎培主持下先后作出决议，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蒋介石派杜月笙、陈立夫等人游说，许愿黄炎培如能脱离民盟参加国大，将以高官厚禄相酬，黄峻拒。他虽生活日艰，宁愿鬻书卖字济贫。12月黄炎培被推选为民建主席。

1947年7月5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决心内战到底，黄炎培在《国讯》上撰文指出：“从此中国正式陷于极不幸的状态里。”10月2日，国民党再次攻击民盟偏袒中共，黄炎培与张澜等发表谈话，明白表示：“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所以反对分裂和战争。”次日黄炎培在《国讯》上发表《国吊》一文，称双十将届，内战方酣，民穷财困，且受辱于美、日，因此并无国庆，只有国吊。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11月5日民盟总部在黄炎培主持下宣布停止活动。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宣告主张用革命方法反对国民党政府，并与中共合作。

黄炎培主持的《国讯》，由于发表了许多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文章，4月8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黄炎培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改办《展望》杂志，于4月30日出刊。他用“冰甫”的笔名撰文《我对民主并不灰心》，表示继续斗争的决心。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筹开人民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23日黄炎培主持民建常委会议决定响应，推派驻港代表与中共保持联系。

黄炎培追求政治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言行，为蒋介石所不容，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1949年2月，在中共人员护送下，黄炎培偕妻秘密离沪，搭轮抵达香港，3月14日北上，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共方面的热烈欢迎。此后，他代表民建参加了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出席了首届政协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第二、

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职教社社长等职。职教社成为人民的教育团体之一，所办的各种事业[9]都已纳入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轨道。黄炎培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他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灼热如火的爱国热忱，受到人民的尊重。垂暮之年，他将自己的藏书和日记全部捐献给国家。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病逝于北京。

黄炎培主要著作有《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上海支那翻译会社版），《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一、二集》、《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朝鲜》、《中国教育史要》、《机关管理一得》（以上商务印书馆版），《黄海环游记》、《之东》、《断肠集》（以上生活书店版），《蜀道》（开明书店版），《蜀南三种》、《中华复兴十讲》（以上国讯书店版），《黄炎培教育文选》（职教社版），以及诗集《苍桑集》、《天长集》、《红桑》等。

---

(1) 黄炎培少年时，家乡有一女巫，自称鬼神附身，一时求医者门庭若市。一天黄将其香案掀翻，大喊："如果有鬼，来找我。"

(2) 黄炎培原字楚南，此时改字韧之，辛亥后改任之。

(3) 董达哉：《黄炎培论》，《杂志》复刊第27号（1944年10月）。

(4)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5) 王正廷听后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打我吗？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黄答："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见黄炎培：《八十年来》，第91页。

(6) 此事未得到梁漱溟的谅解，梁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说："我在香港办《光明报》，要把民盟这一组织公开出来，黄正到香港，应当由他出面负责，他却推辞不干，怕得罪蒋、孔。他既要辞职，却不向内地

表示；我提醒他，他才声明辞去民盟主席。”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7) 7月4日，黄炎培等与毛泽东畅谈。黄炎培称：不少人和团体以至国家，“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初时聚精会神，艰苦奋斗，环境好转后往往“政怠宦成”，“人亡政息”，跳不出这种周期率，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不受此率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深以为然。见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8)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1946年9月迁至上海永嘉路蓉园，设工商管理、会计及银行三系。后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设分校，增办工科。至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共毕业八届，九百七十八人。

(9) 职教社解放前所办事业有：1918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历届毕业生八千余人；先后创办《教育与职业》、《生活》、《国讯》、《展望》等刊物；抗战期间在川、康、云、贵、湘、桂创办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平乐职业学校、灌县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多所；抗战胜利后，又在沪创办比尔中学。

黄奕住

汪仁泽

黄奕住，又名住，1868年12月7日（清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生，福建南安人。父亲黄则赏，务农。由于家境贫困，黄奕住自幼失学，稍长助父农耕，兼学剃头，聊补家计。

黄奕住二十岁时，为谋出路，只身随亲友渡海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三宝垄。初时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日间为码头华工剃头谋生，夜宿妈祖庙僧人处，逐渐学习当地方言，熟悉乡俗。22岁时得侨胞资助，改操肩挑小贩，深入土著村落，贩卖杂货。逾两年积有小本，在三宝垄美商花旗银行门前设一咖啡茶摊，兼售食品，起早落夜十分勤劳。1892年，他与华侨同乡合伙做糖栈生意。不久退伙，独资设立日兴行，专营蔗糖、土产买卖。由于苦心经营，营业渐盛，1907年已拥资十余万元，逐渐由零售转营批发趸销。在此前后，黄曾在爪哇接待孙中山，并几次资助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1910年，黄奕住随着营业扩展，将日兴行迁入三宝垄闹市中心的中街新址，雇佣中、英文书记，进行大宗批发业务。此后数年内，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泗水（今苏腊巴亚）、棉兰、巨港、北加浪岸以及新加坡等地遍设分行；并在纽约、伦敦等地设特约通讯机构，远及主要产糖国古巴等地，每日都有糖市行情报价专电。黄以儿子黄钦书做助手，由于消息灵通，运筹自如，经营得法，获利丰厚。至1914年估计，资产已在荷币300万盾以上。

1917年秋，爪哇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荷等国船只被征集回国，货运阻滞，糖价猛跌，加以日兴行在运输途中的货物遭到巨大损失，黄奕住一时陷于困境。有人劝黄匿居他地暂避，但黄坚守

信誉，力谋应付债款，将不动产抵押，并得银行的贷款和糖厂的支持，得以渡过难关。不久日本正金银行在该地设立分行，主动向黄放款，黄运用大量资金囤储蔗糖；大战结束后，货运畅通，糖价一日数涨，获利倍蓰。他又以低价标得当地大货仓失火后的蔗糖数万包。该批蔗糖外表虽遭水渍烟熏，内部质量未变，经整理改装后转销香港、新加坡等地，大获其利。此时估计其财产已超过3000万盾。

战后荷印殖民政府对华侨课征重税，黄奕住怀着振兴祖国实业的宏愿，将巨额资金约2300余万美元陆续汇回祖国，自己亦于1919年4月回国，定居厦门鼓浪屿。途经新加坡时，投资华侨银行，认股新加坡币40万元。1920年又应李清泉等邀，去菲律宾马尼拉合资创办中兴银行，投资菲币100万元，约占该行资本总额的1/5。其后又到上海，经友人黄炎培的介绍，结识《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商谈投资国内实业。史认为可先筹设银行，然后再投资其他实业，黄深以为然。又经史介绍结识前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筠，委托胡筹组中南银行，资本额500万元，黄认股350万元，占该行资本总额七成，自任董事长，胡任总经理。黄将银行经营权授予胡，并认为经营得法必须具备：勤劳、认真和恪守信用三个条件。1921年6月，中南银行在上海开业后，获得钞票发行权，业务迅速发展。不久，除在天津、汉口、厦门、南京、广州等地外，又在泉州、鼓浪屿及香港设分支行，收兑侨汇及吸收侨眷存款，营业收入一度超过京、沪各行。此时，黄并在厦门独资开设日兴钱庄。黄在印度尼西亚的日兴行，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向黄追缴税款1500余万盾而被迫全部收歇。当时荷印当局曾拉黄改入印尼国籍，表示既可减税，又能保存企业，日本领事也邀黄挂籍日本，但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表示即使放弃全部产业也不能改变国籍，均予断然拒绝。

黄奕住在厦门鼓浪屿定居后，鉴于厦门居民饮水皆靠运水船从九龙江运来，再由水贩肩挑供售，既不卫生又甚不便，遂于1920年与友人黄世金等发起筹办厦门自来水公司，出资40万元，邀请专家勘察水

源，选择厂址。1924年开始募股，1925年招商投标建造，到1926年7月开始供水，为当地居民解决了饮水这一大问题。与此同时，黄奕住于1921年以20万元独资承盘林菽庄办的厦门德律风公司，改名为厦门电话公司，增资至100万元，更新全部器材设施，并招工敷设厦门与鼓浪屿间的海底电线，次年厦、鼓通话。黄又于1925年创办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接通了厦、漳两地的电话线，方便了广大用户。此外黄奕住还投资上海普益纱厂、益中磁电厂、天津永利化工厂、南京肥皂厂等企业，在厦门开设黄日兴银号，在上海开设昌兴行经营土特产进出口贸易，还开发龙岩煤、铁矿。

黄奕住自幼失学，常引为终身憾事，因此甚为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20年，他在家乡南安兴办斗南小学，不久增设师范班，重金聘请名师为教员，免费供给师范生膳宿。1927年，黄为纪念其母，在鼓浪屿创办慈勤女子中学。此外多次捐资给岭南、南开、暨南、震旦、复旦、厦门等大学，厦门同文、英华中学，以及新加坡爱同、华侨中学等校。他并热心地方公益，除捐助慈善机构外，并独资助修泉州开元寺东塔古迹、泉州顺济桥等。北伐战争期间，曾资助在福建的国民革命军。

1927年，天津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因放款不慎，倒账损失达220万元，一时信誉大受影响，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就商于黄奕住。黄再向中南增资250万元，并对外宣称尚有1250万元资金做后备，恢复了中南的信誉。黄在董事会上提议由其三子黄浴沂担任该行协理，向胡筠学习经营管理。1931年，中南、大陆、交通、国华、金城五银行联合经营原由金城创办的太平保险公司，黄奕住被推为董事长。1938年，胡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黄浴沂任中南银行总经理，黄奕住及其家族开始掌握该行的总管理权。

黄奕住于1936年迁居香港，因已患中风而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其全部事业由黄钦书、黄浴沂继续经营。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厦门沦于敌手，日方派人赴港见黄，以没收黄的企业胁迫黄入日本国籍或

出任伪职。黄表示“宁可破产，决不事敌”，结果在厦门的企业被日方全部侵占。为避免日伪相扰，黄于年底移居上海法租界养病，杜门谢客。1945年6月5日在沪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黄奕住自叙归国后大事年记》（未刊稿）。

黄晓沧：《黄奕住先生》，《菲列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版，第157页。

黄则盘：《著名华侨黄奕住事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82年版。

［美］柏脱编辑，勃德译：《中华今代名人传·黄奕住》，上海传记出版公司1925年版，第117页。

杨固之、谈在唐：《中南银行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黄奕住在沪家属及部分亲友的访问记录。

黄远庸

钟碧容

黄远庸，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黄儒藻，在科举上很不得志，屡试不第。其母为名门闺秀，知书识字，习礼明诗。黄远庸多靠母亲教育。黄于1900年举秀才，1902年为家人促迫，应乡试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同榜的有蒲殿俊、谭延闿、汤化龙等。次年，黄远庸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留学期间，他刻苦钻研，勤奋学习；课余学日文、英文，也很留心时事。

1909年秋，黄远庸学成归国，邮传部尚书汪大燮派他在参议厅行走，任员外郎，兼编译局纂修官。此时，他的同乡李盛铎也从欧洲归来，与他同住一处，彼此经常在一起交谈。李见他擅长文学，文笔犀利，就对他说："吾见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1) 黄远庸听后颇为动心，乃想改行当新闻记者，工余时间常给报刊写稿。

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6月，各省谘议局联合对"皇族内阁"进行猛烈抨击，同时，决议成立"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黄远庸参与"宪友会"的政治活动，被选为代表，往见"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与他们协商草拟宪法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黄远庸决心"不做官，不做议员"，在北京开业做律师，并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约通讯员。他广为交游，自达官贵人以至政客、艺人，莫不结交。这些人实际上是他的新闻来源供给者，常常向他提供一些不可多得的资料。他写的通讯条理清

楚，判断明确，有分析，有评论。“行文流畅多趣，开印象派纪事之风，极为读者所喜”[2]，有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中国报纸之有通讯，是从黄远庸开始的。

1912年8月，袁世凯伙同黎元洪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对这件震惊一时的政治谋杀案，黄远庸接二连三地写报道，把事情的经过和原委一一披露。其后，宋教仁案、中日交涉、大借款等等，他无不详尽报道。他为了揭露袁世凯，写过《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袁世凯此后徘徊之径路》等，说袁“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自以阅历深，气魄伟，平生历史宏富复杂，举世无二，除左右驰驱效死力者外，皆以竖子视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无敢进言者”。他还暗示袁世凯妄图称帝，并逆料其终必归于失败。说袁世凯“不审大局之将不可救”，“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各党为扩张党势，专以利禄诱人入党。黄远庸目睹政党现状，愤慨之极，乃于1913年登报声明：“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般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3]他虽然表示不偏不倚，好像很超脱的样子，但他的政治态度，仍离不开共和党的观点。他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使用革命暴力，力求稳健、保守，以免开罪袁世凯。

1915年8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猖獗一时，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为袁张目。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文章，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袁的亲信爪牙为了虚张声势，想找些社会名流为袁支撑门面，由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出面，要黄远庸撰文赞成帝制。黄大为恐惧，他“不欲为，不敢不为”[4]，一连七八天拖延不写，而夏寿田天天来信催促，最后被迫写了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来敷衍搪塞。袁看了不满意，叫人示意黄另写一篇。黄看推脱不了，又怕招来横祸，于9月3日遁走上海。

黄远庸到上海后，在《时报》上向袁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日报》发表声明："远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故于贵报未曾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沪各报声明脱离关系。"[5] 这是他表示与鼓吹帝制者划清界限，也是公开宣布与袁世凯决裂，对袁的帝制活动，无疑是个打击。

黄远庸在上海逗留不久，就东渡日本，又转去美国旧金山游历。1915年12月27日，旧金山康梁宪政党宴请黄远庸于都坂街上海楼菜馆，忽有二人闯入，将黄刺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6]，但无疑是政治暗杀。他生平的著作，由友人林志钧汇集成册，编辑《远生遗著》共四卷。

---

(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423页。

(2)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47页。

(3) 黄远庸：《远生遗著》第1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32页。

(4) 《时报》1915年9月14日。

(5) 《远生遗著》第4卷，第190页。

(6) 黄远庸被暗杀，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说是袁世凯派人杀的；另一说是旧金山华侨误认黄为帝制派而误杀的。

黄泽霖

杜文铎

黄泽霖，字茀卿，号思明，原籍浙江会稽，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贵州。他的祖父曾在贵州任知府，父亦就幕于黔。青年时期的黄泽霖曾习刑名，义和团运动后，他愤于清廷的腐败，以为非从事根本改造不足以救危亡，乃改治法政，究心时务研究。黄泽霖同张百麟系戚谊，感情很好，往来密切。

1907年12月，张百麟等在贵阳成立自治学社，黄泽霖积极支持，为发起人之一。1908年，自治学社筹备出版报纸，黄泽霖及家属典衣质物入股资助，并与其叔亲赴上海购置印刷机等，使《西南日报》于1908年7月顺利出刊。1909年，他被聘为贵州法政学堂现行律教员。黄泽霖还支持其妻黄烈诚在贵阳创办光懿女子师范、光懿女子两等小学，在妇女界宣传反清爱国思想。1910年，黄泽霖入提法司署任科员，翌年又兼教职于法官养成所。不久，奉自治学社命，充新军标统袁义保的书记官。这样，黄泽霖与学界、政界、军界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1908年以来，黄泽霖因经常阅读《民报》及其他革命刊物，受到很大启发，逐渐成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对君主立宪主张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极为不满，常在授课时甚至公开集会场合上揭露其愚弄国民的诡计，“且指出政府既乏对外之能力，主张各省当组织乡兵预备武力，以为自卫之计。此外，则次第揭发国内政治腐败之证据，语多激烈”[(1)]。因此，贵州当道与立宪派对他十分忌恨。

辛亥武昌首义鼓舞了贵州革命党人，自治学社立即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总机关筹划起义，黄泽霖是总机关的成员之一，负责军事部和

争取袁义保的工作。他废寝忘食，日夜奔走于军界和学界。当时贵州有新军一标，陆军小学一所，士兵和学员中有不少人同情革命。此外，各州县的自治学社社员还以组织乡兵为名，招收会党（哥老会）分子，编制成军，待命而动。湖南光复后，黄泽霖、张百麟等宴请新军标统袁义保，劝其举义，为袁义保拒绝。事后，黄泽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主张发动新军和陆军小学克期起义，由于意见分歧，没有被采纳。与此同时，贵州巡抚沈瑜庆接受宪政预备会任可澄的建议，电召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刘显世率防军来贵阳镇压自治党人。接着又见新军不稳，下令收缴士兵子弹。黄泽霖认为情势紧迫，再不举义就要身临大祸，于是致书袁义保，晓以大义，劝其率众起事，但又为袁拒绝。10月底，云南起义消息传至贵阳，群情激动。自治学社决定在11月5日举义，并做了行动部署，指定黄泽霖的任务是率法政学生占领城内四军械局。会后黄泽霖派人贿买南药局守兵，得子弹数箱，秘密散发给新军。11月3日，黄泽霖获悉当局将加害自治党人，建议张百麟等提前行动。当天晚上陆军小学学员率先发难，新军闻声响应，黄泽霖等开城门迎新军入城。11月4日，巡抚沈瑜庆被迫交出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宣告成立。

贵州光复后，自治学社在各地召募的会党群众，陆续来到贵阳，其中除一小部分为军政府收编为新军外，大部分没有得到安置，人心浮动，黄泽霖奉命将他们收编为东、南、西、北、中五路新巡防营，并被任为五路巡防总统。12月，新军一、二、三标先后出省援川、援鄂，黄泽霖统率的五路巡防营便成了贵州军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

黄泽霖在军政府成立时，不同意张百麟同立宪派旧官僚采取“共执政权，尽驰敌意”[(2)] 的方针，反对宪政预备会的任可澄及土豪刘显世入枢密院任职。立宪派旧官僚对黄泽霖更怀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军政府成立不久，立宪派旧官僚就造谣说黄有野心，想取代都督；又组成所谓尚武社，宣称黄揽权营私，已由该社宣告死刑。原清道员、耆老会头目郭重光为瓦解巡防营，制造混乱，到处游说，鼓

动广开“公口”（哥老会），声称：“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3]。在他的煽动下，各地“公口”纷纷建立，社会秩序随之混乱。

其时，黄泽霖原准备率军援川，“公口”出现后，所部果然发生动摇。黄“恐难制驭，乃徇众请，开光汉公以约束之”[4]。可是这个办法并没有制止混乱，反而使“公口”愈来愈多。一贯杀人越货的遵义巨匪罗魁也乘机来贵阳，声称要当标统，否则将杀都督，人心更加不安。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黄下令严禁“公口”不法活动。12月15日，他在四川会馆设宴，机智果断地将罗魁擒获枪决。与此同时，对其部众也严加管束，规定扰民者刑于市，违抗长官命令者杀无赦。接着又将违反军纪，借端敲索的东路巡防营目兵七人绳之以法，社会秩序才暂时稳定下来。

黄泽霖对不法分子的严厉制裁，是对立宪派旧官僚利用“公口”制造混乱的有力回击，但也因此而与其部众产生了矛盾。东路巡防分统谭德骥平时对部众管束不严，深恐自身也受到处分。刘显世、郭重光趁机用重金收买谭德骥部下唐灿章等，唆其伺机杀害黄泽霖。

1912年1月30日，自治学社干部商讨改组军政府事，黄泽霖力主将任可澄、刘显世等清除出军政府。立宪派旧官僚深恐日后军政府改组时被踢开，决心对黄泽霖下毒手。当时有人提醒黄提高警觉，加强防范，他回答说：“刘如周（显世）一乡团首，敢尔耶？”[5] 2月2日上午10时左右，唐灿章指使部卒十余人到巡防总统署，谎称已捕获逃逸犯，请黄泽霖亲自审讯。黄泽霖刚进大堂，叛卒立即开枪将黄击倒，复一拥而上，断其头、手，将黄泽霖杀害。

---

(1) 张百麟：《黄泽霖传》，姜泣群编《民国野史》第4编，江苏广陵古

籍刻印社1995年影印本，第695页。

(2)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3) 周培艺等：《贵州血泪通告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4页。

(4) 黄烈诚：《贵州起义首功黄泽霖被害略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11页。

(5) 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黄泽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78页。

黄展云

李锡贵

黄展云，字鲁贻，1876年1月4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八）出生于福州，祖籍福建永福（今永泰）。父黄育韩，卒于广西融县县尹任上，家道中落。黄展云三岁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

1892年，黄展云入乡学[(1)]。越两年，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丧权辱国。黄忧于时局，发愤求进，自修新学，寻找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1896年，他考中廪生，向往政治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他深感清廷腐败，民智不开，认为必须普及教育，因而毅然抛弃科举仕途，研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以救国为己任。1899年，他与堂兄黄翼云、表兄林万里创办福州蒙学堂，并且联络会党进行反清革命活动。黄展云在蒙学堂除常设小学班外，还开特别班，设图书馆，辟运动场，置军体课，组织“励志社”、“阅报社”，举办讲演会，努力在青少年中启迪民族意识，灌输爱国反清的革命思想，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形势，学文尚武。

1902年，福州蒙学堂改为侯官县立两等小学堂，规模扩大。黄展云极力充实进步的图书报刊，并亲自掌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太平天国笔记》等书册，专供加入励志社的进步学生及革命同志阅读。是年暑期，他借远足的机会，向学生讲述清政府的政治腐败，痛陈遭受外国侵略奴役之苦，称颂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教育和启发下，程祖樵、黄光弼、高贻书、蒲开泰、陈与桑、严骥、张兆蓉、蔡世俊、陈更新、倪履新十名参加“励志社”的学生，商定都用“汉”字做自己别号的第一字，以铭推翻清朝还我汉族河山的决心。侯官小学堂成了当时福州联络青年、宣传革命的一个中心[(2)]。

1903年，拒俄运动掀起之际，黄展云集合同志，假侯官小学堂开会，成立“海滨公会”，以“研究学问，讨论国闻”为名，拟出刊杂志，编练义勇队，参与拒俄运动，后因遭到当局的阻止和破坏，未能成事。此时，邹燕庭、林斯琛在哥老会内创设“共和山堂”，黄率一批进步师生和所联络的革命同志加入这个反清的秘密组织。1904年春，他策动学生黄光弼等成立学生联合会。次年春，他与郑权、郑祖荫、林斯琛等组织“汉族独立会”，作为秘密反清革命活动的总机关[(3)]。

黄展云在开展革命活动中逐渐意识到，要推翻清政府，须用武力。是年夏，当侯官小学堂高等班第一期结业之时，他遴派优秀毕业生陈更新去日本，进东京九段体育会，学习马术和兵操，预备投考陆军学校；并派蒲开泰去上海科学仪器馆附设专科学校专攻理化，学习制造炸药；派严骥入闽口要塞炮科学堂肄习操炮。是年底，黄与表哥林万里共同编写《高等小学修身课本》八册。

1906年秋，黄展云与堂兄黄翼云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深造，并加入中国同盟会。黄展云因与会党素有联络，当1907年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他应邀参加，被推举为福建支部的负责人之一。1908年秋，黄卒业返回福州，主持益闻阅报社，即当时中国同盟会福建分会的机关工作，并在法政学堂任修身课教师，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是年9月，福建谘议局成立，黄为避免清政府瞩目，并便利革命活动，入该局充当记录员。次年，他又在省城参加考核，得中优贡。

1911年3月，同盟会谋在广州举义，黄展云激励学生陈与桑、陈更新、陈可钧、黄光弼等前往。4月27日，广州起义事败，陈等壮烈牺牲，葬于黄花岗。黄义愤填膺，坚信“黄花赍志策未毁，主义随风更披靡”。

武昌首义后，同盟会福建分会谋划响应。黄展云在分会总机关主持文书部工作[(4)]，加紧备制起义旗帜，拟就都督府宣言和章程。在

11月福州起义过程中，他参与部署军政，不遗余力。12月初，黄出任福建政务院教育部长。次年2月，改称教育司长。在此前后，黄展云拥护出师北伐，支持学生组织北伐队；主持学制改革，编写教科书，创办《福建民报》。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黄展云与许崇智等筹划响应，胁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失败后，黄被捕，后经林万里等人斡旋，得释。12月，袁世凯派刘冠雄率李厚基督闽，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黄辗转赴上海，再次亡命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黄展云竭诚拥护，宣誓参加该党，为孙中山所赏识，任秘书。他联络同志，宣传改组国民党、建立中华革命党的重要性，积极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2月15日，孙中山委任黄为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6月黄奉派与许崇智等人前往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霹雳等地视察党务，劝募“革命公债”，筹措讨袁军费[(5)]。

1916年底，黄展云由东京回国至上海，在中华革命党总事务所工作。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黄奉命留在上海筹办汇源公司，为护法斗争筹集经费和联络革命同志。9月，黄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再去菲律宾筹饷。

1919年10月，黄展云被孙中山委为国民党福建支部长。黄回福州创办《福建新报》，抨击北洋军阀统治，支持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策动驱逐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李厚基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罪名将黄拘捕，《福建新报》也被迫停刊。1921年夏，黄获释后，即前往上海晋谒孙中山，孙令黄仍然主持福建党务。其间，黄在沪与方声涛、许卓然、秦望山等人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并派秦望山先回闽收编民军，组织自治军。1922年，黄回闽，被各路自治军推举为总指挥。他戮力配合北伐军许崇智等部和北军王永泉部，于10月将李厚基赶走。嗣后，他抵制徐树铮将“建国军政制置府”移置福州的图谋，

并积极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博得孙中山的赞扬和鼓励。

是年11月，黄展云兼任福建盐运使，为东路讨贼军筹饷，深得孙中山的赞扬。1923年初，直系孙传芳、周荫人部入闽，黄命自治军第六路司令黄炳武在闽清截击，惟众寡悬殊，难于抵挡。黄展云遂避居上海。

1925年春，黄展云返回福州，筹办海滨中学，拟为宣传革命的据点。4月12日，黄出席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散发驱逐军阀周荫人的传单，被捕下狱，在狱中备受折磨。迨翌年12月，北伐军入闽之时，黄光荣出狱，声望俱增。黄即着手筹组国民党福州市党部。他赞赏共产党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品德，市党部的组织、工人、农民、青年等部，均交由共产党员负责，使市党部成为国共合作较好的一个机关。

12月25日，福建省政务委员会成立，越九日，又成立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黄展云均任常委，兼政务委员会教育科（厅）长。此时，黄创办独青小学，自任校长，旨在培养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青年。他还在城内组织“三五社”，以研究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名，抨击弊政，支持人民反抗土豪劣绅，指出为了“正政本”、“清乱源”，必须组织特别法庭，以管理人民对于土豪劣绅之控诉。

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活跃。1927年3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召开“各界拥护党权大会”，4月3日又举行“拥蒋护党大会”。由于黄展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想利用国民党内地方青年派的力量来清除土匪流氓、官僚政客、贪官污吏等“伪革命党”，所以他赞成“拥蒋护党”，处理“跨党分子”，以强化国民党。他在蒋介石嫡系与海军、地方青年派之间剧烈竞争的旋涡间，于4月7日出任福建省党部代主任的职位。是时，福建的党、政、警、财和“清党”大权皆操于东路军代总指挥、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及其参谋长赵启彔、政治部主

任李大超等“十人团”和“黄埔同学会”之手。黄展云依然致力于教育事务，忙于组设省教育改造委员会，改校长制为委员会制，支持学生向教会收回教育利权的斗争，划分学区，推广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幼儿教育，恢复农事试验场，建立通俗教育馆等等。

“四一二”政变后，福建于4月20日成立“处理共产分子特别委员会”，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展云不同意国民党右派狂捕滥杀的罪恶行径，曾救出了中共福州特委组织部长陈应中等人。7月，福建开始第二期“清党”，黄展云任清党委员会副主任。他登报声明谢绝私人酬酢，以昭清白。

8月，黄展云任福建省政府农工厅厅长。他对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分共”，而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夭折的原因归之于“有伟大的理想，没有接受的民众”，因而决定遵循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制”的建设方针，“向乡村去直接和民众接近”，去试验推行扶植农工的各项政策，企图走出一条改良政治、巩固民国的道路来[(6)]。黄以长乐县营前村为试点，拟订了《营前模范村暂行草案》，亲自兼营前模范村村长职务，并提请省政府设营前分县为模范县，划拨兵工营址扩建为劳工医院，发行水电公债，建造水力电厂。1928年3月初，黄展云率领一批人员进驻营前，设立农工银行，创办学校，清查田亩，整理警政，组建警卫队和民团编练处，捉拿土匪，打击土豪劣绅，紧缩费用，竭力想把村政府建成模范的廉洁政府。

黄展云改良政治的试验，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未及半年，即被以莫须有罪名遭通缉，被迫离闽去沪匿居。他面对“民国仅存名义，民命等于草芥”的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决心继续试验他的改良政治方案，于1929年9月又回到福建，专任营前模范村村长。他成立了营前乡自治筹备委员会，清丈土地，测绘地图，实行“清葬”，改善村路，修建自新工艺所，美化环境，提倡男女平权。他认为革命之根本在于教育，三民主义能否得以实现亦视国民教育之程度，所以特别重视教育。1930年5月，黄撰著《营前模范农村概况》一书出版发行。他期

望通过这本小册子的宣传，得到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使有志于国民革命的同志赶快改弦更辙，也像他那样深入农村，接近民众，致力于“村治”。但是，他所走的改良政治的道路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又与蒋介石独裁统治相悖，因而惨淡经营的模范村终于搞不下去了。

1932年10月以后，黄展云踯躅沪宁之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十分冷淡。第二年，经友人奔波，才挂上一个全国侨务委员会委员的虚名，寄居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流亡武汉。他曾想回福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后因患重病，于1938年7月16日在汉口去世。

---

(1) 蔡人奇：《藤山志》，福建出版社1948年版。

(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智书局1929年初版。

(3) 郑祖荫：《福建辛亥光复史料》，1940年10月铅印本。

(4) 郑权：《福建光复史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

(5) 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事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2年版。

(6) 营前模范农村办事处编著：《营前模范农村概况》，1930年版。

黄仲涵

温广益

黄仲涵，字泰源，祖籍福建同安。1866年11月1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垄。父亲黄志信曾参加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福建同安发生的小刀会起义。起义失败后，为躲避清兵的搜捕，于1856年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印尼三宝垄定居。经过几年的劳动后，黄志信积累了一些资本，于1863年创立了建源公司。开始时以经营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土产贸易为主，从中国贩运咸鱼、茶叶、丝绸和药材等到印尼，然后把印尼的糖与烟草等转贩中国。以后，他兼营典当业、邮信业、林业及鸦片等生意。由于黄志信善于钻营，又敢于聘用专门人才经营管理，该公司的业务一步步扩大，发展成为三宝垄屈指可数的华侨企业之一，拥有数十万荷盾家产，为以后黄仲涵继承并发展该公司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85年，未满二十岁的黄仲涵开始协助他父亲掌管建源公司的业务，并逐渐成为他父亲的得力助手。1890至1903年期间，黄仲涵利用时机，从事鸦片买卖，赚取了1800万荷盾，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打下基础。

黄仲涵经营的企业主要是糖厂。爪哇地区由于土地肥沃，气温适宜，且无台风侵袭，向为甘蔗种植的理想地区，出产的大晶粒白糖誉满全球。1901年，雄心勃勃的黄仲涵继承了他父亲的大笔遗产，将资金大量投入糖业的经营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建源公司已拥有两家大规模的糖厂，各雇用工人数千，积累的资金达三千余万荷盾。

由于糖业经营业务的扩大，资金流转和糖产品运输的需求增加，使黄仲涵感到需要向银行业和航运业领域扩展。1906年，印尼华侨最

早创办的银行——黄仲涵银行在三宝垄和泗水两地成立，资本额为400万荷盾。不久，黄仲涵又与友人联合经营三宝垄轮船公司。1912年他承顶了该公司的全部业务，改组为协荣茂轮船公司。开始时有轮船五艘，航行于爪哇与新加坡之间，以后又增购四艘，航行于印尼各地。一时间黄仲涵成了印尼航运业的巨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忙于打仗，许多工厂生产停顿，引起百物腾贵，糖价也暴涨数倍。黄仲涵此时倾全力经营糖业，这是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到战争结束时，已拥有糖厂九家，资产达四亿荷盾以上，富甲东南亚，是华侨中有数的头面人物。建源公司经营糖业高峰时期，每年糖产量达20万吨，除了供应印尼国内市场总消费区的60％以上之外，还供应世界各地白糖市场的需要，分行遍设世界各大城市。黄仲涵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成就，是因为他敢于突破华商因循守旧等陋习，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经营管理。他不惜重金聘用外籍技师以不断改进制糖方法，耗费巨资购买现代化的设备以提高糖的产量，同时采用种种办法使公司各级职员忠于职守。

黄仲涵在建源公司所获得的成就以及在华侨社会中的名望日益提高，使他为荷印殖民政府所器重。早在1885年，即当黄仲涵参加建源公司的经营管理时，就被荷印当局委任为“雷珍兰”（音译，为荷印殖民政府设立的一种职称，协助甲必丹管理华侨内部事务）；1895至1896年，他又担任了两年的“甲必丹”（音译，为管理华侨内部事务的华侨领袖）；1901年，他被委任为名义上的“玛腰”（音译，管理华侨事务的最高职务）。黄任三宝垄华侨的“玛腰”后，代表华侨商界利益的中华商会，遇到一些重大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中华商会自第六届以后索性推举他为名誉会长或特别会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印殖民政府规定对华侨分年收入要课以30％的重税。建源公司获利甚巨，每年需缴3000万盾“收入税”，而且还要追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收入税”。荷印当局对华侨的横征暴敛，对黄仲涵当然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在设法逃避了这

笔苛税后，举家迁居新加坡。黄仲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在日本人的诱说下，加入日本籍，以冀借助这个“东亚强国”保住自己偌大的私产。但是，荷印殖民政府并没有因为黄仲涵是“日本籍民”而手软，而日本领事馆也没有对他加以保护。所以，黄仲涵迁居新加坡后便放弃了日本国籍，转入英国籍。

黄仲涵对印尼和新加坡的华侨慈善教育事业都有过一定的支持和赞助。对国内革命也曾有所资助，资助辛亥革命5万荷盾，资助云南起义2.5万荷盾，以其4亿荷盾的资财来说，可谓微乎其微。

1924年6月6日，黄仲涵于新加坡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中华书局1924年版。

爪哇三宝垄中华总商会编：《三宝垄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册》，1937年版。

崔贵强：《印尼糖业大王黄仲涵先生生平》，香港《地平线》1979年第3期。

Leo Suryadinata：《印尼著名华人传略》“黄仲涵”条，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会，1978年版。

黄自

陈志新

黄自，字今吾，曾用名四由，1904年3月23日（清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七）生于江苏川沙县。父亲黄洪培，黄炎培之堂兄，清代的国学生，民国建立后为川沙县参议员；母亲陆梅先为川沙开群女校的创办人。黄自幼受庭训，喜唱歌。周岁时母教以民歌，很快就能背诵。1911年入上海初级小学，辛亥革命后转入浦东中学附属小学就读。1916年毕业后，考取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读书，开始接触到西方音乐。他参加学校童子军笛鼓队，在管弦乐队中演单簧管，在合唱队男高音部。从何林一夫人学习钢琴，师从王文星夫人习和声。

在旧中国学习音乐被视没出息，黄父望子成龙心切，力劝其勿以音乐活动而荒废学业，但黄自仍坚持音乐的执著，不肯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曾于1921年3月写长信给父亲，表白其坚持学习音乐的志向。1923年春，在学校举办的音乐会上，他以钢琴独奏帕德列夫斯的《古式小步舞曲》和夏米纳德的《林中仙女》而崭露头角，确定了以音乐事业为终身职志。

1924年，黄自由清华学校修业期间，官费赴美留学，因无音乐科名额，不得不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但仍以音乐为副科。1926年，黄自由欧柏林学院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因品学兼优被推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法·培德·嘉派（Phi Beta Kappa）的会员，并有机会入欧柏林音乐学院专攻乐理和作曲，两年后转到耶鲁大学音乐学校深造，1929年毕业，获得音乐学士学位。他的毕业作品《怀旧》交响序曲，于同年5月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出。《怀旧》是一首抒情交响序曲，黄为悼念早逝的欧柏林学院同学和女友胡永馥（1927年归国不久因心脏病猝发殁于上海）而作。在音

乐语言上，黄继承了19世纪中叶欧洲浪漫派的传统，又独创新意，不落俗套。这是中国作曲家所作的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演出获得美国报纸好评，黄自也因此获得了一笔英国奖金，得以取道欧洲，游历了英、法、德、荷、意等国后归国。此外，黄自在国外求学时，还写了数部包括卡农、赋格、创意曲在内的复调音乐作品。

1929年6月，黄自任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教授。翌年10月，应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之聘为该校专职教员并任教务主任。此外，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推荐，被聘为工部局音乐委员。音专是中国最早的音乐专业学校，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该校为萧友梅创办。但是学校具有一定规模与专业水平的提高还应该归功于黄自。他除担任学校行政工作，同时教授了理论作曲组的几乎全部专业课程，还担任《音乐史》和《音乐欣赏》两门必修课的教学。他教学严肃认真，学生都很敬重他，为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校培养了许多音乐人才，如作曲家江定仙、刘雪、贺绿汀、陈田鹤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同时黄自还进行音乐创作，以爱国歌曲和抒情歌曲为主。如《抗敌歌》，是在“九一八”国难发生后的两个月，黄自同音专爱国师生深入到浦东一带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义演时创作的。这是中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写作的合唱曲，原称《抗日歌》，因国民党当局讳提抗日而易名。这首歌曲表现了群众同仇敌忾的热烈场面，于“努力杀敌誓不饶”一句，出现高潮，锐不可当。11月9日，《抗敌歌》由音专学生在广播电台首次播唱，并由胜利公司灌成唱片。

1932年1月28日，日寇突然入侵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反击，重创日寇。4月24日，黄自为何香凝作词的《赠前敌将士》谱曲，献给十九路军官兵。不久，黄自又创作了四部混声合唱《旗正飘飘》（韦瀚章词），于10月8日由音专学生在广播电台首次播唱，并录制成唱片，还被当年大长城影片公司的有声故事片《还我山河》采用为插曲。与《抗敌歌》相较，增加了国亡家破、祸在眉睫的悲伤情绪。它的艺术构思和处理手法是严谨和富有创造性的。它与《抗敌歌》同

是黄自的代表作，也是“五四”以来中国音乐的优秀作品之一。

1933年3月底，音乐师生利用春假去杭州，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黄自被推为主席并亲自担任报幕。音乐会以《抗敌歌》、《旗正飘飘》为压轴曲目。上海《中华日报》的评论写道：“悲壮激昂，闻者奋起。鼓舞敌忾，可谓名副其实矣。”黄自创作的爱国歌曲还有《民谣》、《切记分明》、《九一八》、《军歌》、《学生国货年歌》、《睡狮》、《北望》等。

黄自特别喜欢写抒情歌曲。1933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春思曲》中的《思乡》、《春思曲》和《玫瑰三愿》尤有典型意义。《玫瑰三愿》的表现手法是直抒胸臆，不事渲染，就像一幅素描，其钢琴旋律只是起烘托作用。而在《思乡》和《春思曲》中某些意境，则是由钢琴用造型手法（如春雨潇潇、柳丝轻拂和杜鹃啼声的描绘）与和声手法（如描写陌头杨柳、分色上帘边的色彩性转调）表现出来。黄的抒情歌曲中，钢琴伴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去掉歌词，几乎就成了钢琴独奏曲。

1933年11月，在音专学生演奏会上首演了黄自于1932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清唱剧《长恨歌》（韦瀚章词），取材于白居易同名长诗，在情节结构和段落安排上参照洪昇的传奇《长生殿》，分十个乐章，他只完成七个乐章，基本上概括了白居易原诗的主要情节，在艺术上已相当完整。《长恨歌》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清唱剧，作品政治讽刺意味是很强烈的，如《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舞袖正翻翻……那管他社稷残。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再如《六军不发无奈何》中，可恨的杨贵妃、可杀的杨丞相，“怨君王没主张，宠信着杨丞相，堕落了温柔乡，好生生把山河让，把锦绣山河让，敌纷纷家散人亡”。反映了边关报警、军情险恶，而蒋介石集团仍在醉生梦死，其政治意含讽刺是明显的。《七月七日长生殿》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情二重唱。作者所完成的七个乐章依次抒写了骊宫的歌舞、爱情的盟誓、边关的警报、军士的怨、临死诀别、幻想的仙境和无边哀思，

黄自把《长恨歌》当做一部完整作品在演奏会上演奏。

黄自十分关心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从1932年起，先后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音乐教育委员会、音乐教育编订委员会委员，主持编订出版了中国当时质量最好的普通学校音乐教材——《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1—6册。为抵制20世纪30年代黄色歌曲对青少年的毒害，他于1933年—1935年间谱写了二十八首学生歌曲。1935年，他为联华公司的故事片《天伦》作了主题歌《天伦歌》。由于曲调优美，通俗易于上口，曾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同年，黄自又写了十五首儿童歌曲，其中《挖泥沙》、《不容易》、《春风》、《你可知道》、《互助》、《养蚕》等，发表于1938年出版的《音乐月刊》上。

黄自还致力于社会音乐教育。从1934年起，主编音乐艺文社的《音乐杂志》和《新夜报》的《音乐周刊》；还为上海、汉口等电台组织音乐节目，编写音乐欣赏广播稿，并创办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上海管弦乐团”。1935年下半年，与左翼音乐工作者合作，为电通公司的影片《都市风光》作的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揭露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殖民统治的罪恶。该幻想曲是按着画面即景配乐的，从中可以见其多方面的创作才华和驾驭大乐队的配器素养。

黄自自幼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他为白居易的《花非花》、李白的《峨眉山月歌》、王灼的《点绛唇·赋登楼》、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唐诗宋词谱曲，用不同的音乐语言来描写不同的诗词意境。作者用跌宕开阔的旋律来谱写《点绛唇》和《南乡子》这样慷慨沉雄之作；又用轻描淡写的笔触去勾画《花非花》和《卜算子》这两首诗词，通过抒情性旋律与色彩性和声表现出恬澹悠远的境界。

黄自还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以音乐史、音乐欣赏与和声学为其主要内容。1929年写出《西洋音乐进化史的鸟瞰》一文，而1934年完成的《勃拉姆斯》一文，则是对法国作曲家专题研究的力作。黄自

在生前的最后两年潜心研究并开始撰写《西洋音乐史》、《和声学》和《中国之古乐》三部著作。为《西洋音乐史》的写作，他辑录的史料有两万余件，还编订了世界史、中国史和音乐史的对照表以及重要音乐家的生卒年表和中外参考书目。初稿仅完成六章（“绪论”至“音乐之全盛”）。《和声学》初稿只写了三十八讲，该书是黄自多年教学实践的结晶。他为撰写《中国之古乐》，收集史料五百余页，还从周秦至唐宋重要文学作品中，选辑出有关乐论的文字约两百余条，定名《中国人心中之音乐》。

黄自倾向进步革新，不断地与学校的落后倾向作斗争，遂为学校当局所不容。他于1937年暑期辞去了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职务，以大部分时间从事著述。1938年5月9日，黄自因伤寒病逝于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年仅三十四岁。噩耗传至全国各地，汉口、长沙、重庆、延安和上海先后举行了悼念活动。

黄自逝世后，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厂把他的《花非花》、《玫瑰三愿》、《抗敌歌》、《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拍摄成电影《黄自教授遗作选集》在重庆公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他的《怀旧》序曲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演出。黄自遗作《长恨歌》、《黄自独唱歌曲选》、《怀旧曲》等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黄自歌曲选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贺绿汀：《黄自逝世20年祭》，《人民日报》1958年5月9日。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

钱仁唐：《黄自传略》，《音乐研究》1988年第3期。

戴鹏海：《让历史作证——写在〈黄自年谱〉前面》，《音乐艺

术——上海音乐学院院报》1982年第4期。

戴鹏海：《黄自年谱》，《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院报》1981年第2期。

黄宗仰

李安庆　李守静

黄宗仰，一名中央，字宗仰，别字楞伽小隐，自署乌目山僧，晚年又称印楞禅师。出家前原名黄浩舜，又名同仁，江苏常熟梅李乡人。生于1861年11月12日（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

黄宗仰的父亲黄长先有子女各三人，宗仰排行第二。宗仰自幼聪明颖悟，曾受业于常熟翁同龢门下，他勤奋攻读，文章写得辞茂义幽，不同凡响，深得翁的赞赏。黄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女，他受母亲的影响较深。十六岁时，其父兄曾逼他学掌店事，而他对此毫无兴趣，因此愤然离家出走，到当地三峰清凉寺削发为僧。1881年去镇江江天禅寺（俗称金山寺），受戒于显谛法师，赐名宗仰。宗仰开始为知客僧，后游方遍历北方各省，也曾循海到过越南。他每到一处，便把当地山川景色写入诗篇，绘成画幅。由于他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加之办事干练，不久被升为江天寺监院。

1892年，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妇到镇江游金山寺，哈同妻罗迦陵见到这位年轻监院一表人才，谈吐不俗，精通佛学经典又工诗擅画，很是赏识，乃礼聘黄宗仰去沪在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主持讲授佛经，宗仰应邀前往。

在爱俪园，宗仰对外自称“乌目山僧”（因他家乡有座山名乌目山）。他给罗迦陵等讲经，宣扬佛法并当上总管，深得哈同夫妇的信任。他还主持了爱俪园的营建设计，园中各处胜迹，如挹翠亭、大好湖山、梅园、文海阁等匾额题字多出自宗仰的手笔。

1899年，时仅十九岁的李叔同慕名到上海拜黄宗仰为师，从他学习金石书画。翌年黄宗仰与李叔同及上海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

之等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周出版一张书画报，精印古今名画书法，颇有声誉。

黄宗仰虽是出家人，却时刻关注国事，怀献身济世之志。1901年秋，《辛丑条约》订立，黄以为国耻，曾手绘“只记颓京城下盟”的《庚子纪念图》并广征友朋诗文，汇编成册，付梓流传，以期国民能“激奋忠爱，克臻强盛”[(1)]。次年春，他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蒋维乔等爱国志士结成好友，时相过从，认为挽救危亡，应从改造教育入手。4月，与蔡元培、邹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2)]，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公推蔡元培任会长与评议长，拟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以挽救危亡。中国教育会在蔡元培领导下，创办了不少的文化教育机构。由于黄宗仰出力甚多，中国教育会特在常熟设支部，并办有塔后小学。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第五班学生贝寿同等五十余人，因校方禁止谈论时政，以退学表示抗议，并要求中国教育会办学。黄宗仰遂向中国教育会建议集资自设学校，以收容南洋公学的进步学生。在他的劝说下，罗迦陵捐助了500两纹银。11月16日，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以蔡元培任总理，章太炎、黄炎培、蒋维乔等任义务教员。黄每周到爱国学社讲授一次佛学，他结合阐述平等大同等哲理，宣讲革命思想，每次讲学大教室都挤得水泄不通，从此“革命和尚”的雅号便传播学社内外[(3)]。

爱国学社还经常在张园举行演讲会，宣传革命。章太炎、吴稚晖等都来参加，黄宗仰每会必到，有时也发表演说，多慷慨激昂。同年，黄由于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

1903年春，因沙俄觊觎我国东北三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不久被日本政府强行解散，黄兴、陈天华、蔡锷等又在东京成立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也在国内组织义勇队，并成立军国民教育会，增设军训课，以备将来军事行动之需，黄宗仰毅然加

入，脱掉袈裟换上戎装，在集训操场上还练枪法和投弹，其爱国热忱有力地鼓舞了师生斗志。

爱国学社的爱国革命活动，在中国教育会内部引起争议。蔡元培支持这些活动，主张听由爱国学社脱离中国教育会，时中国教育会改选，黄宗仰被大家推为会长，他以中国教育会会长名义支持蔡元培的主张，并在《苏报》上撰文《贺爱国学社独立》[(4)]。

那一段时间，黄宗仰不断以“黄中央”署名，为《苏报》撰写稿件，大力宣传革命思想，还冒着危险将邹容的《革命军》小册子亲自出资出版，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于1903年5月在上海问世。它是上海最早出版宣传革命的单行本书籍。6月末发生了《苏报》案，《苏报》被封，黄宗仰也被缉捕，在罗迦陵资助下，避走日本。

当时适逢孙中山于安南、暹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后抵达日本横滨，黄宗仰谒见化名“高野长雄”的孙中山，表达了自己十分仰慕的心情。两人倾心交谈，相见恨晚，结为知己，黄长孙中山五岁，遂以兄弟相称。在孙中山教育影响下，黄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他在日本撰文、演说，大力进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宣传，同时尽力支持革命活动。同年9月，孙中山为了扫除保皇邪说、规复革命机关，离日本赴檀香山，黄慷慨资助旅费200元，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的宣传革命的刊物《江苏》杂志，因经费不继，一度中辍，黄宗仰募资助其复刊。

1908年，清帝光绪与太后慈禧相继去世，国内党禁稍弛，黄即由日本返沪，重返爱俪园。这年他接到孙中山从美国来函[(5)]。翌年，由黄宗仰主编的《商务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政策，深受读者欢迎。

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响应，黄宗仰也出力不少。后来，陈其美和李燮和在上海光复后争夺沪军都督一职，他从中

调停，代筹饷糈，消除各方阻力，使上海的革命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返回上海，黄宗仰首先得讯，特雇一小汽船出吴淞口外相迎，并热情邀请孙中山去爱俪园。孙中山在爱俪园接见了议和代表伍廷芳及其他来客三十多人[(6)]。

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宗仰与章太炎设想对佛教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民国的精神支柱，1912年3月成立了佛教会，并参与编辑《佛学丛报》。稍后，黄在爱俪园中组设和主持华严大学。由罗迦陵资助刊印的《频伽大藏经》也于1913年春全部印出，计经凡一千九百一〇余种，分为八千四百一〇余卷，历经五年耗资二十万两，黄宗仰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章太炎特为之作序，称赞黄“绍隆一乘，救兹来世，为晚明旭大师后三百年发扬胜义之第一人”[(7)]。

在热衷弘扬佛教的同时，黄宗仰并未减少他对民初政治局势的关注。针对当时革命党人分裂涣散状况，他曾发表《告同胞销除意见书》一文，呼吁“当以时局为念，泯私见，顾公益”，“万众一心”，拥戴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黄清醒地看到了“革命成功”的背后潜伏着危机：内有“袁贼之奸”，外有列强环伺，如“萧墙自讧，与人可乘之机，迨事已糜烂，悔嗟莫及”。果然，袁窃取大总统后，又于1913年3月派人刺杀宋教仁，黄乃作《宋案愤言》和《讨袁篇》坚决主张讨袁[(8)]。

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即由失望而陷入颓唐；加之在爱俪园也渐遭冷遇，大总管姬觉弥的排斥打击，使他看破红尘，决心廓然归山。

1914年，黄宗仰回到镇江江天禅寺，因资历深、才华卓著，被推为首座和尚。1916年黄宗仰开始闭关静修，遍览十二部经。至1919年6月出关，与扬州两位高僧同游南京栖霞寺。这座曾繁荣一时的六朝古刹，清咸丰年间毁于战火，仅剩下头道山门和断壁残垣，黄宗仰感慨万分。当时仅有一个法意和尚在此结茅侍奉香火。法意和尚恳请

黄宗仰留此担任住持，重振山门，黄当即允诺。此举曾获江天寺方丈青权法师的大力支持，将江天禅寺的部分佛像、用具迁往栖霞寺，因黄宗仰为金山法派，栖霞道场自此改为金山分宗，这就是金山寺分灯的由来。

1919年7月，黄宗仰就任栖霞寺方丈，众称印楞法师。他为复兴古寺含辛茹苦，煞费苦心，但重建资金不易解决，孙中山先生得知后亦曾捐赠万元资助。当栖霞寺部分修复后，举行方丈升座仪式，这一天各名山古刹的长老、僧人及居士们云集古寺庆祝，由于来宾众多，当天沪宁铁路局特地在栖霞山麓增设一个支站——后来称栖霞山火车站。由于黄宗仰的到来，栖霞镇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而变得日益繁荣起来。

黄宗仰为修复栖霞寺殚精竭虑，终因积劳成疾，未能等到古寺全面修复，即在1921年7月圆寂于僧舍，被誉为：复兴栖霞古寺第一祖。

---

(1) 乌目山僧编：《庚子纪念图》，辛亥上海刻本。

(2) 《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5日。

(3) 俞子夷：《蔡元培和光复会草创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学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08页。

(4) 冯自由：《黄宗仰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委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532页。

(5) 原件藏栖霞古寺。

(6)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二》，《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46页。

(7) 冯自由：《黄宗仰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委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533页。

(8) 袁鸿林：《黄宗仰》，《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页。

吉鸿昌

徐玉珍

吉鸿昌，原名恒立，别号世五。1895年10月1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生于河南扶沟吕潭镇一户贫苦农家。其父吉茂松，别号筠亭，曾在该镇开过茶馆，为人豪爽，急公好义。这给吉鸿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鸿昌六岁时母亲去世，家境更加困难，他除了在茶馆里帮着做生意，每逢农忙季节还随家人下地干活。由于交不起学费，吉鸿昌只能在当地私塾旁听了两年。他从小勤劳勇敢，憨厚胆大，深获镇上穷孩子们的喜欢和推崇。

1910年春，年仅十五岁的吉鸿昌到扶沟城“福庆楼”首饰店学徒，后因熔化银料时拒绝掺假，遭店主训斥愤而弃职。1911年前往周家口（今商水县城）“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学徒生活，1913年8月愤然前往郾城招兵站，投入冯玉祥所率领的左路备补军第二团当兵。

1914年，吉鸿昌随冯玉祥所率警卫军左翼第一旅追剿白朗起义军。同年9月，该部驻防西安，冯玉祥成立模范连，吉被选入该连当兵。由于吉鸿昌聪颖勇敢，胆识过人，曾有“吉大胆”的绰号。

1917年7月，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河北廊坊。在讨伐张勋“辫子军”得胜后，冯成立了一支手枪队。吉鸿昌被调到手枪队，并提升为排长。次年6月升任连长。吉鸿昌为人忠厚，遇事机敏，临阵勇猛。1921年5月吉随军入陕，参加攻克西安的战斗，因功晋升为营长。同年8月，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吉鸿昌营改隶李鸣钟旅孙良诚团。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之战爆发，吉鸿昌随军参加对奉作战，

迫使奉军退出关外。10月，冯玉祥出任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率部进驻南苑，一面练兵，一面扩充实力。1924年10月，冯趁第二次直奉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发动北京政变，直系败北，随后冯部改为“国民军”，吉营驻防西苑。年底吉营随补充第四旅调驻绥远归绥（今属呼和浩特），翌年春吉被任命绥远都统署副官处长，5月任绥远都统署警务处长兼骑兵团长。

1926年6月，冯部刘郁芬第二师在兰州告急，吉鸿昌奉命将绥远都统署手枪团及各地警察队组编为第十二师第三十六旅，担任旅长；并率部星夜驰援，吉相继打败了甘肃土顽张兆钾和孔繁锦等部，稳定了甘肃省的局面。同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响应北伐。10月，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兰州出发急进陕西，肃清了三原、咸阳地区的土顽军阀，又经四十多天艰苦作战，击溃镇嵩军，于11月27日使被围困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1927年4月，国民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该集团军第二军第十九师师长，进驻潼关。5月中旬，吉部受命东出潼关参加北伐，直指洛阳。吉派人前往说服守军让出，从而轻取洛阳，继克巩县。7月3日深夜趁敌军无戒备抢渡黄河成功，又换成奉军服装巧取新乡。吉部捷报频传，冯玉祥闻讯后复电嘉奖该部并誉为“铁军”。从此第十九师成为公认的西北军王牌部队。不久豫东发生战争，吉部奉命开赴许昌攻打北军马及第部，继赴漯河攻打靳云鄂部，所向披靡，河南局势暂告稳定，解除了北伐进军的后顾之忧。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久冯部第二集团军也开始“清党”，吉鸿昌对此虽然痛惜不已，但因尚未认清革命的方向，只是终日彷徨，心灰意冷，苦思无路可走。1928年吉对“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不准抵抗绕道北伐的屈辱行径颇感悲愤，曾暂离部队回乡省亲。归队后不久，冯玉祥整编部队，吉因与上司孙良诚不和，第十九师被编散，他被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深造”。同年冬，吉鸿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师师长。1929年春，吉鸿昌奉命率部进

驻宁夏，击溃了来犯的“马家军”，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同年5月，吉鸿昌升任第十军军长。原宁夏省主席、西北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不安于位，被迫辞职；7月，吉继任宁夏省主席。吉对宁夏有一套改革开发的主张，并反对再打内战。因此引起了西北军老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等人的误解和疑忌。

1929年10月，蒋冯之战开始，吉鸿昌奉命从宁夏前往增援。随后于1930年3月9日，在代总司令鹿钟麟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吉被视为搞“独立王国”者，被扣留在潼关司令部，将予严惩。正巧冯玉祥3月10日从山西赶回潼关，吉才幸免于难。冯旋将第十军整编为第十一师，派吉鸿昌仍任师长，率部开往豫东作战。蒋、冯、阎中原会战，尽管吉鸿昌率部连连获胜，重创蒋军；但其他部队不能紧密配合作战，加之蒋介石的收买、分化瓦解，冯、阎反蒋联军被搞得四分五裂。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大举入关，冯、阎终告失败。冯玉祥的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被蒋介石收编。蒋深知吉鸿昌是西北军的闯将，所部素称劲旅，便极力笼络他；同年9月，蒋委任吉鸿昌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任第三十军军长，下辖三个师，一个特务旅，指定该部开往淮阳进行整编。

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攻，命令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麻城、固始一带的红色区域。苏区红军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攻。1931年1月3日，吉鸿昌部的第三十师在商城二道河西南的四顾堆地区作战，被红军歼灭一个团。吉鸿昌经此惨败，以及与中共地下工作者交往中，思想颇受震动；从此他按兵不动，不再主动与红军打仗。期间，吉鸿昌托病离开部队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帮助下，吉渐渐悟出了革命道理。回到潢川后，通过联系，吉曾多次乔装进入苏区实地考察，目睹苏区劳动人民的实况及与红军负责人的会见长谈，思想上发生了更深一层的转变。回部队后，吉鸿昌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考虑部队

起义参加红军的可能性；3月1日，吉鸿昌挥笔书写了“国将不国，尔速醒悟。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十六个大字，令人镌刻在光山县县衙门前的一对石狮背上，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蒋介石发觉吉鸿昌的思想变化极为惊恐，星夜派郑州行营参议冷欣飞赴信阳监视吉鸿昌，并任命冷欣为吉部的高级参议。随同冷欣前来的特工人员则在吉部加紧活动，并用重金拉拢收买军官。3月中旬，蒋又策动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攻，总兵力由9个师增加到11个师。吉鸿昌以种种借口推诿不出兵，迫不得已才带着些“洋枪”、“洋面”，虚张声势出发攻打苏区。每当与红军相遇，空打一阵枪，沿途留下枪支、弹药、粮食，然后迅速离去。到了5月，红军已经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这更加速了吉鸿昌投奔红军的决心，他决定率部起义，用自己的行动赎“剿共”之过。由于吉部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的告密，军官被特务收买；随后蒋介石指派吉鸿昌的老上级李鸣钟赶到潢川，并力劝吉鸿昌出国考察，从而瓦解了起义队伍。吉鸿昌看到起义无望，蒋介石又派重兵逼近，9月被迫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准备出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吉鸿昌在沪闻讯立即致电蒋介石，请求准予北上抗日，以抒国难，但遭蒋介石的拒绝，在特务和说客的软硬兼施的劝说下，只好于9月23日偕妻胡洪霞被迫登上美轮“塔夫脱总统号”，由上海起程出洋。

吉鸿昌在海外游历了五个月之久，先后到了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多次接待记者并发表抗日演讲，此行他极想趁机去苏联参观，却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成行。蒋介石怕吉鸿昌回国后闹事，一面答应继续给予资助，一面对吉加强监视，阻拦他回国，想让吉鸿昌羁留海外，消磨其爱国意志。对此吉颇为愤慨，曾赋诗一首：“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1月29日，吉鸿昌与夫人密商后，摆脱特务跟踪，只身搭乘英轮由马赛启程返回上海。

淞沪事变后，吉鸿昌暂住上海，在与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表达了坚决抗日的决心。随即来到天津，并很快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接上关系。为了开展反蒋抗日斗争，他经常奔走于平、津两地，同时抓紧整理出国观感。同年5月，由北平东方学社出版了吉鸿昌著述的《环球视察记》。不久，吉鸿昌由津赴沪，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后援会工作，并与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广泛接触。8月，吉鸿昌冒险从上海潜往湖北宋埠，组织发动旧部起义，但旧部军官迟疑不决或避不相见，有的已被特务收买进行破坏阻挠。吉只得仓促率一个团起义，可是早已陷入蒋介石布置的包围之中，当突出重围到达苏区时人员已所剩无几。起义失败后，吉鸿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1932年秋，吉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间，吉鸿昌由沪至泰山，敦促冯玉祥下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一个月后，冯玉祥移居张家口，积极准备起兵抗日。吉鸿昌回到天津后继续联络旧部官兵，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山海关，又向热河进犯。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3月4日，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承德，并继续向华北进犯，长城抗战爆发。3月25日，吉鸿昌抵张家口，在土尔沟“爱吾庐”与冯玉祥促膝长谈。冯决定由吉鸿昌编一个军。中共华北特委则派出吴化之任吉部的政治部主任，帮助组军。5月26日清晨，张家口全城戒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佟麟阁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同日，抗日同盟军接管了察哈尔省政府，新组成的察哈尔省政府委任吉鸿昌为省垣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

6月15日，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61人，会议由冯玉祥主持，中共党员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参加了五天的会议，吉鸿昌等11人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吉率部北进，一连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察东地区，军威大振。7月5日，吉在沽源附近的大柳树村召开抗日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根据多伦及其周围地区的敌情报告，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日伪军。鏖战五昼夜，12日吉鸿昌暗遣副官刘亨香、马国栋等率领精兵四十余人乔装入城。入夜，吉亲率各部，袒臂冲锋，里应外合，光复了失守七十二天之多伦。多伦光复，震动中外，全国各地爱国抗日团体和知名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但遭到国民党蒋介石与汪精卫之流的反对。7月28日，蒋、汪在庐山会议上向抗日同盟军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四项意见，并电令何应钦调重兵围剿抗日同盟军，并对同盟军所在区域实行全面封锁。8月4日，冯玉祥被迫下野，并派邱小宁、佟麟阁与宋哲元等在沙城协商接交办法，同盟军面临被分化肢解的局面。8月16日，吉鸿昌、方振武召集所部将领在老君堂开会，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民众抗日同盟军”改称“抗日讨蒋军”。24日，吉鸿昌出席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的军事会议，并组成了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等七人的军委常务委员会。26日同盟军五师、十一师、骑兵三师、手枪队和二师的一部分共三千余人由驻地西进商都，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堵，同盟军又改为东进，9月9日到达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两支部队仍分左、右路军，预定在昌平北部集结，提出的战斗口号是：“打进北平过中秋。”9月20日，方振武部攻占怀柔，断后的吉鸿昌也浴血奋战杀进长城，与方部会合。9月23日，抗日军进占顺义县境内的牛栏山，26日攻占距离北平62里的高丽营，并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炮战，北平当晚全城戒严。10月以后，吉部转战于顺义、大小汤山。由于日、伪、蒋的三方夹击，四面围堵，同盟军伤亡惨重。吉鸿昌和方振武眼看突围无望，不忍心与同战斗的抗日弟兄遭受无谓的牺牲，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别谋抗日出路，遂于10月16日，应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和北平慈善团体代表之约，吉、方两将军亲往商震驻地（顺义县附近的马家营）谈判和平解决办法。随后吉、方被押解北平，当车行至河北时天已擦黑，吉鸿昌施计掩护方振武逃脱。吉舍生忘死、先人后己、

磊落大方的胸怀和抗日决心感动了押运人员，也得以中途获释。抗日同盟军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敢于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失地的勇气，大大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吉鸿昌摆脱险境后，化装成庄户人于11月辗转回到天津法租界家中隐居。1934年1月，吉鸿昌与共产党员宣侠父建立了联系。吉在其副官牛建中陪同下秘密前往上海，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特科组织的王世英同志，向组织汇报了察哈尔抗日斗争的经过，听取了党的指示，又肩负着新的使命返回天津。3月初，南汉宸夫妇到津，吉鸿昌和南汉宸、宣侠父等广泛联络反蒋抗日力量，暗中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在此期间，柯庆施、陈伯达和朱其文夫妇都在天津和吉鸿昌建立了联系。5月，吉鸿昌与南汉宸等在天津成立了包括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各派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被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南汉宸兼任秘书长。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吉鸿昌在自己家里设置了简易印刷所，创办出版了《民族战旗》刊物，向全国各地邮寄，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被敌人发现后，被迫停刊。

吉鸿昌频繁积极的反蒋抗日活动，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蒋介石派出复兴社的特务加强对吉的监视，还打进“同盟”组织内部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吉鸿昌转移了印刷所，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是年八九月间，吉派往安徽进行发动武装抗日工作的同志被捕，暴露了吉鸿昌在津工作的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惊恐。蒋介石严令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面临险境，吉鸿昌首先让南汉宸等先行撤离，自己坚守岗位。10月初，根据工作需要，吉鸿昌的家从天津法租界霞飞路搬迁到英租界牛津别墅3号居住。11月9日，吉鸿昌与任应岐等借打牌为名，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秘密开会，国民党特务跟踪而至，突然闯进45号房间开枪行刺，误将会谈代表王化南打死，吉鸿昌亦身负枪伤，随后吉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巡捕以嫌疑犯拘捕。消息传出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爱国知名人士曾多方营救未

果。11月14日，吉鸿昌、任应岐等被引渡给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在天津蔡家花园陆军监狱囚禁了九天。22日，吉鸿昌等又被国民党军警押解到北平军分会军法处审理。吉鸿昌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用抗日必反蒋的事实骂得审判长张口结舌，审理草草收场，按上一个“危害民国罪”。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令北平军分会将吉鸿昌“就地枪决”。临刑前，吉鸿昌从容执笔，给夫人和亲属留下了最后的遗嘱。在刑场上，他以手代笔，以地作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诗章：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坦然坐在特务搬来的椅子上，面对屠手的枪口，高呼口号，慷慨就义，英勇牺牲。

主要参考资料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吉鸿昌将军》（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穆欣：《吉鸿昌将军》，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

吉瑞芝、郑慈云：《华夏忠魂——吉鸿昌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天津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5月版。

《周口党史通讯》第4期，1984年版。

贾德耀

邵桂花

贾德耀，字昆庭，亦作焜亭，晚年自号俭斋，1880年（清光绪六年）生于安徽合肥城南贾大郢村一个官宦之家。其父贾芝玉，为晚清副榜举人。贾德耀兄弟五人，他行三。幼年因父投军小站，遂迁居天津。少年时，贾德耀入袁世凯新建陆军炮队随营学堂学习，后入保定速成学堂。1903年7月，贾德耀被清政府送往日本深造，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1904年12月毕业归国，曾任北洋兵备处提调、第二镇正参谋官、第六镇第二十一协马队第二标标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贾德耀随清军统制冯国璋南下镇压革命。翌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官，后任中路备补军团长，驻防河南。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将张敬尧部第三混成旅扩编为第七师，升贾德耀为第十三旅旅长。后调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1914年元月，白朗军入陕，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陕西将军，调贾德耀第十五混成旅归陆指挥援陕。驻陕时，贾与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结成异姓兄弟。

1915年，陆建章因积极拥袁复辟帝制而遭陕民反对，陆为排斥异己，1916年遂调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贾调任陕南镇守使。1916年5月，陕西兴起讨袁护国之役，陈树藩在蒲城宣布独立，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6月，袁世凯暴卒后，陆建章为陈所逐狼狈离陕，第十五混成旅被陈缴械，贾返回北京。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贾德耀任将军府参军、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17年1月，杨祖德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贾任教育长。1919年8月，杨因病去职，贾继任校长。贾上任后对校制有较

大的变动，校长军阶由少将改为中将，教育长为少将；原学生的混合编队也为单纯兵科队所取代。校部还接管了各队的伙房，实行官生同一伙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保定军校遭到战火洗劫，官生星散。贾德耀弃职回京，仍任军学司司长。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贾参与其事。11月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吴光新出任执政府陆军总长，贾与吴既是士官同学又有乡谊，得任次长职，授将军府宽威将军，兼执政府卫队司令。1925年12月1日，贾任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12月26日，许世英组阁，贾以与冯玉祥和国民党人士关系密切而留任。

1926年1月，冯玉祥宣布辞去西北边防督办，许内阁出现危机。阁议派贾持段祺瑞亲笔信赴平地泉调停转圜。无奈冯辞意已坚，贾德耀悻悻回京复命，徒劳往返。2月15日，许世英向段祺瑞呈递辞呈出走天津。段未允准，批假六日，期间由贾代国务总理。然而，贾迟迟不敢就任，后经各方劝说，贾德耀才勉为其难。2月22日，许世英6日假满，又再三托病辞呈。段坚不允诺，又批续假十天，贾德耀继续暂代国务总理。是时，严璩又请求辞去代理财政总长职，段祺瑞黔驴技穷，遂决定贾德耀署国务总理，并请鹿钟麟、刘骥从旁劝驾。3月5日，段才发出任免令。6日，贾德耀发表就职通电。一波三折的贾内阁总算产生。

段祺瑞本想利用与北洋各派关系密切的贾德耀打通各方面关节，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执政府得以维持不坠。然贾在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火并中，虽百般周旋，仍难奏效。

贾德耀自兼陆军总长，内阁成员仅内务屈映光、财政贺德霖、交通龚心湛、司法卢信四位总长到部视事外，其他均不就任，并提出辞呈。因此，贾德耀主持的始终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内阁，呈现出段派政权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掩护由毕庶澄率领的直鲁联军青岛舰队四艘军舰闯进大沽口，置国民军的警告于不顾并首先开枪射击，当即发生冲突，在中国京畿制造了“大沽口”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向段政府提出所谓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手段。17日，各帝国主义国家又出动二十余艘军舰，云集大沽口外示威。同一天，日本还单独提出“最后通牒”，向中国政府提谢罪、惩凶、赔款等无理要求。同日，北京政府国务院责令外交部答复各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得知这种卑躬屈膝的答复后，李大钊亲率百余人赴国务院请愿，要求执政府采取强硬态度，驳回最后通牒。贾德耀拒不接见代表，执政府卫队则刺伤请愿代表多人。

北京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屈膝妥协的行径及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国人的极大愤慨。当日午后1时，北京各团体代表在北大三院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筹备会。议决：翌日召开国民大会；一面派代表赴国务院及外交部请愿，提出严驳八国通牒意见。赴外交部代表80人于4时抵达，坐待至晚9时许，曾宗鉴次长方出面接见，但又推说不能完全负责。

至午夜12时，代表电话请求面见贾德耀。贾拖到翌晨1时半才在本宅面见代表三十余人。代表提出国民军与政府应尊重民意，慎重外交，并重解释民众对于驳复八国最后通牒的最低限度的两项条件。贾德耀与曾次长则遽称对八国通牒之驳复业已发出。代表索阅原稿，认为只能谓之屈服，不能视为驳复。同时，代表向贾德耀声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举行抗议示威，还将根据国民大会决议案，向通牒的八国公使提出严重抗议。贾德耀答应第二天召开国务会议先将最低限度的两项条件付诸讨论。而国民大会决议案俟送到后再交国务会议研究，以便慎重向八国公使提出抗议。代表们还就17日赴国务院请愿代表遭执政府卫队射击一事，要求贾于18日派代表向国民大会道歉，慰问伤者，供给医药，严惩肇事祸首。贾

德耀一一同意，当下许诺18日即撤换无知的执政府卫队，改易国民军。至凌晨4时许，代表们方离开贾宅。

3月18日下午，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及各界群众两千余人，到国务院要求面见总理。卫队将大门紧闭，不许代表入内。当请愿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段祺瑞突然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射击，顿时血流成河，横尸遍地，当场死亡47人，伤132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的元凶虽然是段祺瑞，但事事唯命是从的国务院总理贾德耀也难辞其咎。惨案发生后的当天午后3时，贾在段宅召开阁员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屈映光、贺德霖、龚心湛、卢信等五位阁员，其他为无发言权的次长。段称，此事应彻底根究，拿办首要，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与会的五位阁员又分强硬和温和两派，强硬派赞成段的意见，主张严惩到底；温和派则主张调停，只要所谓“群众领袖”应允不再煽动，即可不必深究。最后讨论一致认为，死伤如此之多，责任所在，非有一卸责方法无以自明。因此会议议决下令通缉民众领袖李大钊、徐谦等人。而当局所发通电则颠倒是非，诬陷请愿群众为暴徒，从而使全国舆论大哗，国人谴责之声愈炽。贾德耀于3月20日就惨案一事发表对记者谈话，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为揭穿贾的谎言，曾与贾对过话的请愿代表王一飞当即发表对贾的斥责信，予以揭露。

北京参政院也对贾德耀致质问书，痛斥贾屠杀无辜咎不能辞。贾在各方舆论谴责抨击、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提出内阁总辞呈。段祺瑞在贾的辞呈上批有：“呈悉，应即妥筹善后，所请辞职，着无庸议。”等十六个字以挽留。

对此滥杀无辜之凶手，民众是不能饶恕的。被害人家属联合起来，强烈要求诉诸法律。京师警察厅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出面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谓：此次学生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的侵害行为。就此卫队方面，查无必要开枪防卫。警察厅查

明，游行学生除持传单、标语、旗帜外，并没有携带武器。京师地方检察厅法医验明43具尸体时，并无卫兵尸首，证明所谓卫兵一人遭杀，纯系子虚。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的重大嫌疑。但依法地方无权审理，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处理外，其他案卷一并移送陆军部依法审理，以肃法纪。另外国务院下令通缉的社会知名人士中，仅李大钊是共产党人，其他四人均为教育界人士，所谓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纯系虚构。但京师警察厅慑于政府的威胁，不敢指明段祺瑞、贾德耀是惨案的祸首。

贾德耀在确凿事实面前，见罪责难逃，便于4月2日致电张作霖求助。电文略谓：京师治安关系重大，鹿钟麟警卫有方，正资依赖，盼张督兼筹并顾，勉为其难。

奉军进关进攻国民军，张、段已早有默契。当奉军逼近京师时，以鹿钟麟为首的国民军于4月9日出兵包围执政府，将卫队缴械。段事先得闻，遂率党徒遁入东交民巷桂乐第藏匿。贾德耀于4月10日通电全国及外国驻华使馆：在此扰乱时期，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4月17日，段祺瑞宣布复职，首先下令免鹿钟麟本兼各职。贾德麟呈请段为鹿说情，拟恳宽其既往，免于深究。同时致电冯玉祥称：4月9日，变起非常，事先既无所闻，临时又无法补救。我公平日主张，所以拥护执政者为甚，德耀之敢于任事者，亦即在此。喋血都门，倒戈内向，此等举动，明知绝非尊意，是以不敢随声附和，更背初衷，此中委曲，当荷鉴谅。之后，贾德耀向段辞呈，称：弭变无方，引咎自劾，请予罢斥。国民军退出北京后，直系吴佩孚欲入主北京，密令第九师师长兼北京警备副司令唐之道拘捕安福系人士，监视段祺瑞。至此，段氏政权已到山穷水尽境地。4月20日，段祺瑞终于在四面楚歌声中下野离京。行前令免贾德耀本兼各职，特任外交总长胡惟德署国务总理。

贾德耀下台后，随段祺瑞到天津当寓公，从此息影林泉，不问政

事，皖系军阀势力由此告终，贾德耀最终成了段执政垮台的牺牲品。

1928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基于贾在军事教育界的影响，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1935年12月，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贾德耀因与西北军的老关系被聘为委员，并一度担任该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多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冀东的伪政权，但均未奏效。华北沦陷前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网罗汉奸，贾也是日寇瞩目的对象。为避开日寇纠缠，贾称重病住进德国医院，后又化妆成农民潜往天津。寓居津门期间，日寇要强行租借其北京的房屋，被其严词拒绝。贾说："日本非法占领，我无法抵抗，租借绝对不行，我怎么能把房子租给侵略者使用呢？就是枪口对着我的脑袋，我也不签字！"日伪还派人动员贾出任伪职，均为贾德耀拒绝。他气愤地说："不要逼人太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贾德耀保持了晚节。1939年，贾移居上海法租界内，1940年12月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6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6月版。

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1—5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版。

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简照南　简玉阶

熊尚厚

简照南、简玉阶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名耀登，字肇章，号照南，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于广东南海。简照南幼读私塾，十三岁死去了父亲。十七岁时，他随叔父简铭石[(1)]去香港巨隆磁器店学做生意，其后驻日本为巨隆店收理账款。后来巨隆歇业，简照南在日本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经营海货布匹批发。简玉阶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1893年随简照南去日本学做生意。简玉阶学徒期满后，简氏兄弟在香港合开“怡兴泰”商号，贩运土洋杂货，在简玉阶主持下，几年间获利上万。同时，简照南独自经营航运业，创设了顺泰轮船公司，租船行驶越南、缅甸间，随后又购置“广东丸”一艘，向日本政府注册。1902年4月，简照南加入日本籍，取名松本照南。不久“广东丸”失事沉没，便放弃了航业。

简氏兄弟经营航业失败后，决心另谋出路。当时欧美及日本的香烟充斥国内市场，国产卷烟只有天津北洋烟厂等少数几家。1903年前后，简照南见卷烟利大，决意离日返港筹建烟厂。1905年3月，简氏兄弟与越南华侨曾星湖等在香港创设广东南洋烟草公司，资本额港币10万元。开办后，正值反美爱国运动高涨，美商上海老晋隆洋行产品受到抵制，南洋卷烟的销路日有进展。1907年初，南洋公司的工人增至二百余人，并增设仓库一所，谋求扩大经营。此时，英美烟公司急欲扼杀南洋公司于襁褓之中，接连诬称其侵权，依仗香港港督施以焚烟、禁售等手段，予以打击，加之南洋公司本身资金和技术都十分薄弱，致使债台高筑，负债达十余万元，1908年5月被迫宣告清理拍卖。

1909年3月，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得简铭石全力支持再度开业，更

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由简照南、简玉阶分任总副司理。简玉阶为了给公司积累资金并偿还旧债，即去马来亚一带经商，并在缅甸开设怡生公司，推销南洋香烟及洋杂商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做宣传，产品畅销华南，并远销南洋群岛，很受华侨欢迎。1911年起，公司由亏损转为盈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暂时放松，加上举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国内市场为南洋烟草公司推销产品提供了有利条件；广州、上海、武汉、沈阳、哈尔滨、张家口及印尼等地烟商竞相要求代售，产品畅销长江流域及京津地区，烟品供不应求，营业额不断增长。1914年资本额增至50万元，年营业额达20万元。次年7月，该公司正式向北洋政府立案，1916年冬在上海设立分厂，资本额增至100万元，工人达1100人，年赢利30万元。

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办以来，英美烟草公司不断以削价竞销、增出新牌、附加赠品、控制代理商号等手段与之竞争。又造谣说该公司产品系“日货”改装，以破坏商誉的卑劣手段予以打击。1914年，英美烟公司派买办邬挺生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提出倍价收买办法。1917年2月，又派邬挺生向该公司威逼利诱，提出合并条件在上海谈判，企图通过占股60％达到控制该公司的目的。简氏兄弟虽曾采取某些措施以资抵制，但态度软弱，尤以简照南为甚。在公司内部讨论关于是否合并问题时，简玉阶等主张“合政府与国人之力对抗”，“以先对外招股为对策”[(2)]，反对合并，把希望寄托于北洋政府的支持上；简照南则认为“国货不足恃，招股非良策”[(3)]，而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合并，并梦想从妥协中求得英美资本的“保护”。此项谈判几经挫折，简照南曾想亲赴美国与英美烟总公司直接谈判，以求达成协议。后因英美烟公司自动停止谈判，遂不了了之。同时，简氏兄弟还希求在“卷烟专卖”形式下与北洋政府合办，也因张勋复辟，政局变化而终止。在向英美和北洋政府谋取妥协都不成功的情况下，简氏兄弟趁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发展的有利时机，于1917年到1919年夏先后在镇江、青岛、营口、汕头等九处增设分局；北京、天津、汉口、昆明、广州、新加坡等十余城市设立分店；在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上极力改进，并运用通俗的广告，扣住国人的爱国心，提高其产品的知名度。南洋烟草公司此时得到了很大发展，年赢利额在港币100万元以上，数年间资本积累超过600万元。其间，简氏兄弟抓住大好时机，于1918年3月改组企业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500万元，再度向北洋政府注册。接着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两厂均添置机器进行扩建，自办印刷所。还投资50万元组设中美烟叶公司，以便解决生产的原料，力求更大发展。

1919年5月，英美烟草公司为了搞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再度施展阴谋。他们趁五四运动中，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机会，借口简照南曾入日本籍，指使上海商人黄楚九等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控告该公司为“日资”。北洋政府农商部竟然吊销该公司执照，饬令停业。为了对付这次打击，简照南即去日本办理脱离日籍手续，并发表公开辩驳声明。在这场斗争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得到国内重要商团等的赞助和国内舆论的支持。10月，简照南恢复国籍被批准，该公司得以恢复注册。

简照南、简玉阶等为了对付英美势力的压迫，于1919年8月登报招股，宣称“一家公司惧难持久，不如公诸国人”，并以“振兴国货”，“杜塞漏卮，挽回利权”[(4)]等口号进行宣传。随即将公司扩大改组，以劳敬修、陈炳谦[(5)]及简氏兄弟等为发起人，黎元洪、王占元等为股东，10月1日成立新公司，资本额港币1500万元。简氏兄弟以旧公司作股750万元，占股份1/2，为新公司最大股东。简照南被举为“永远总理”，规定“有权将其职务日后交与受托人”[(6)]，简玉阶任协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扩大改组后，资本实力增强，并与北洋权贵、上海金融工商业家加强了联系，为自己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即于上海、香港两地共设五厂，男女职工万余人。同时开办宝兴锡纸厂，

并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山东潍县及坊子等地设立烟草收购处，兴建和扩建焙叶厂，营业更加突飞猛进。新公司从创立至1923年，虽受捐税骤增，原料日昂，国内南北兵灾及同业跌价竞销等影响，仍获年利三四百万元，其中1920年达485万元，成为该公司发展的顶峰。1922年7月，简照南与刘晓齐等发起创办上海东亚银行，任该行董事。同年由公司举办储蓄以吸收资金，在新加坡分局代办华侨汇款，于九龙增设事务所兼理银行等业务，并一度拟自办银行和保险，颇具雄心。

简照南由一华侨商人，成了著名的民族卷烟业资本家，并以在实业界的声望，曾任广东实业团副团长、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董事等职。

1923年10月28日，简照南病逝于上海[(7)]。

简照南去世后，简玉阶接任公司总经理直至1936年。同时兼任上海康元五彩花铁印刷制罐厂、联合影业股份公司及中国油灯公司（属孔祥熙官僚资本）等董事。

简玉阶主持南洋烟公司的营业后，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继续压迫，国内军阀大举混战，北洋政府新增卷烟特税，以及烟价低落等原因，1924年公司赢利大大下降，上海总公司亏损七十余万元，总盈利额仅为1920年的百分之十弱。但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大批熟练工人进入南洋烟厂。在全国人民一致抵制英、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动下，南洋烟草公司的销量突增，产品再次供不应求，连库存的霉烟也销售一空，南洋烟草公司再次崛起。

简玉阶谋求扩大南洋烟草公司的雄心大振，为继续降低成本和扩大销售，先后在河南许昌和山东坊子增设收烟叶网点和坊子设烤烟厂，并从美国订购烟叶；投资香港永发印务公司；在汉口、上海增设

分厂，并从美国购买卷烟机50部。1926年，上海陆家嘴分厂建成，有美机25部、日本钢带改良机24部。聘请留学生陈其均任厂长，各部部长也是留学生，采用英美的经营方式，产品为上等烟。同年汉口分厂建于乔口仁寿路，还将香港的药水库也改建成工厂，并对中美烟业公司增加投资。南洋烟草公司进一步扩大，仅上海相连的五个厂，即有卷烟机160部，烟机数十部，日产香烟约15万支，公司营业额再次出现高峰。1925年盈利120余万元，1926年盈利230余万元。卷烟产量占全国烟产量20%，成为全国销路最广、利润最大的民族卷烟企业。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改收卷烟税并多次加增税率；英美烟公司加强销售与采购机构，并继续削价竞销。从1927年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生连年亏损现象。1928年停办上海宝兴锡纸厂，1929年停办上海浦东分厂，还被迫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至1930年亏损达575万元，资金周转不灵，财务支付困难。1931年1月宣布上海厂停工，总分公司一律缩小范围，以资勉力维持。处此衰退的逆境之下，简玉阶虽曾做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经营管理日益腐败，家族内部矛盾重重，感到束手无策，对南洋的前途丧失信心，甚至想出家到五台山当和尚，官僚资本则趁机侵入。

1936年冬，南洋烟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财务和经营管理困难，广东银行经理邓勉仁（宋子文的亲信）趁机打入，随后同意以低价让给宋子文股份14万股。同年12月，宋子文派员到南洋公司查账，于次年3月1日签订股份出让合同，并同意将未出卖的简氏家族所有股权交给宋代管。1937年5月1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改组，新公司改行董事长制，以宋子文为董事长，从而完全控制了该公司，简玉阶只任徒具空名的董事兼设计委员。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吞并后，简玉阶丧失了对事业的信心，在家潜心信奉佛教养志。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明知简玉阶对南洋公司已无实权，仍图利用他过去在实业界的地位和声望，拉他

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简玉阶以年老不再问事为由予以拒绝。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一直在家养老和以佛事自遣。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简玉阶重振爱国精神迎接新中国，抛弃了昔日的悲观厌世情绪，作为全国工商界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相继担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私合营后，他回到公司任副董事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代表。

1957年10月9日，简玉阶病逝于上海。

---

(1) 简铭石为简照南的叔父，初在香港巨隆瓷器店任职，常川驻日本收取帐款，后受“巨隆”委托至越南料理客户欠款。“巨隆”歇业后，曾独自在越南开办陶玉瓷器号，成为越南华侨商人，于1912年病故。

(2)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2页。

(3)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9页。

(4)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33—34、99页。

(5) 劳敬修，广东人，任英商泰和洋行买办三十余年，曾任通达企业公司及艺华工艺社董事长，华东民丰造纸公司、马宝山饼干公司、大同企业公司，以及长城、华业、大安等保险公司的董事。

陈炳谦，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入葡籍，久任英商祥茂洋行买办，曾任广东银行沪行及香港国民银行沪行参事、上海先施公司参事、新新公司董事以及怡和纱厂、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扬子银公司等董事。1938年8月病逝于澳门。

(6)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36页。

(7) 《简照南哀挽录》第1辑，1923年石印本。

江朝宗

侯鸿绪

江朝宗，号雨丞，民初改字为宇澄，安徽旌德人。1861年9月15日（清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生于六安西乡麻埠镇（今属金寨县）。父江绍荣，有二子，江朝宗居长。他幼年入塾启蒙，聪慧灵巧，十二岁时能写一手秀丽端庄的楷书，为乡人称赞。1874年，家中不幸遭灾，生活立时窘困，江乃弃学经商，入麻埠镇继勋典当学徒。

继勋典当为台湾巡抚刘铭传家产，委托旌德人吕宓堂总管其事。江朝宗手勤嘴甜，又写得一手好字，受到吕的夸奖，私下口允有机会将提拔江。但以后多次升迁加薪江朝宗均落空，他愤懑不已。其时刘铭传的巡捕蒋福奉命归乡为刘办理一桩家务。江遂萌远志，疏通关系，向蒋福投上门生拜帖，并随蒋一道去了台湾。经引见后，江便留在刘铭传的签押房当一名书办。台湾各州县地方官员视江朝宗为巡抚乡亲，多有巴结，江受贿中饱甚巨。1889年，他为获取某县重贿，竟透露一件机密案例，为刘铭传侦知，立即捕江入狱，欲加重判。适逢慈禧“撤帘归政”，对地方高官显宦“懿旨施恩”，加封刘铭传太子少保衔。蒋福趁刘欢庆之时为江说情，刘乃挥手下令把江逐出台湾(1)。

江朝宗回大陆后，投奔在天津做官的族亲江希曾，经举荐，为绿营一高姓参将充当帖写，月银十两。江为人乖巧，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深得高的信任，视为心腹。高有独女，有招江入赘之意，但闻江在家乡已有妻室，拟作罢；江探知高意，即假造家书一封，谎称发妻丁氏突然病亡，哀伤大恸。不久，江入赘参将府。高视若其子，连年为江捐输至五品衔。1902年高病死，所有遗产财物尽归江继承(2)。

1903年，江朝宗“衣锦还乡”拜祖。在家乡他又巴结刘铭传第三子、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妹夫刘春甫，讨得刘亲笔给袁的荐函一封。江返津持荐函见袁，果然生效，被袁口允委为署理正定府，只待挂牌上任。不料正定府为徐世昌所荐另一人占取，江无奈，只得以道员分发直隶候补，闲居天津。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为剥夺袁世凯兵权，逼令他返乡“养病”。江朝宗见袁大势已去，遂转而投靠为清廷重用的旗人将军铁良，并献策约束在近畿的袁氏旧部。江博得铁良青睐，被奏请委为近畿督练公所稽查处督理。不久，江又被委兼管紫禁城宿卫营务处。他入值掖庭，对清室亲贵多方夤缘，趋迎备至，极尽谄媚之态。1910年入值宿卫营撤销，江调升为陕西省汉中镇正二品总兵。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陕西宣告独立，江朝宗逃回北京，受到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冷遇。江攀袁不上，即寻机巴结袁的亲信民政部侍郎赵秉钧，成为赵的座上客。清帝退位，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职位。其时，禁卫军虽为袁的亲信冯国璋掌握，但步军统领权仍控制在满族将领乌珍手中，对此袁不放心，拟在自己的部属中物色一名军官，取代乌珍。但这一职务不为袁部师旅长们所看重，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赵秉钧即向袁推荐江朝宗，袁允可，但表示骤然撤免乌珍军权，恐引起意外，江去步军统领衙门只能委以参谋官之职。江不敢旁骛，领命上任。他一上任，即倚仗袁、赵势力，颐指气使，处处刁难乌珍，致使乌珍原有的精神分裂症加重，一日醉酒猝死。从此江继任步军统领，握京城治安大权，一切唯袁命是从。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与袁世凯会商内政问题，期间曾见载沣。袁对孙中山会见载沣疑忌重重，指派江朝宗“随同保护”，并在他们会晤时“陪同在座”。江详加禀报，使袁对孙在京的活动了如指掌[(3)]。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孙中山在上海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此时江朝宗在袁的授意下，派人盯梢、抓捕反袁的国民党人，从而得到袁的馈送达10万元之巨。同时，他还趁机对清室贵族中一批富有者，采用恐吓欺骗的手段，名为“保护”，实为夺取他们的珍宝财富。日积月累，江成为京中一大暴发富翁。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因“宋案”事被迫辞去总理的赵秉钧，为镇压“二次革命”再次出山，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江朝宗改任该衙门翼长，表示愿听从赵的指挥。实际上，赵并未躬行任事，一切大权仍操诸江手。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江朝宗任“大典筹备处”委员，并被册封为“二等男”。其时，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在袁面前说过“民国既建成，再复帝制，虑有未妥”的话，引起袁的不悦，遂命江警告张“勿持反对帝制论调”，要他“识大体，勿作书生之争”[(4)]。随后，江又向袁密告张不满劝告的举动，袁即下令免去张的机要局长职务。为了稳住清室亲贵，江在袁的授意下，亲自进宫充当说客，向载涛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转达袁有意将其第三女淑祯婚配逊帝溥仪的愿望。当时虽然“太妃们心里不愿意，可是也不得不从”[(5)]。因不久袁死，此事不了了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不久发生“府院之争”，黎于1917年5月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引起“督军团”通电抗议，表示要以武力威胁黎元洪。黎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同时召张勋率兵入京“调停”。但张勋抵天津后，提出以解散国会为入京之先决条件。黎被迫同意，但国务总理伍廷芳坚意辞职不署此令；江朝宗受命去劝伍，亦无济于事。黎一筹莫展，江朝宗乘机自荐。黎下令江代理国务总理，江遂以总理的名义副署解散国会令。他还下令北京军警在东西车站各处“严加搜查，不准放走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王正廷出京”[(6)]。

江朝宗出任代总理后，舆论强烈反对。一些国会议员指出江不是国务员怎能代理总理之职。6月14日张勋入京。次日江即与王士珍、张勋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表示拥护李经羲组阁。25日李经羲出任总理，江朝宗当了14天代总理即告卸任。

张勋入京后，于7月1日挟逊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江朝宗见风转舵，转而顺从张勋，并参加张召集的复辟会议。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江又摇身一变，与警察总监吴炳湘派人去天津暗中与段联络，表白自己本“不赞成复辟，不过为了北京治安，不能不与张勋虚与委蛇”[(7)] 等等。江还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张勋败兵进城。7月14日，段祺瑞入京后重握大权，江的步军统领一职被免去，后来被段授予“迪威将军”的称号，以示戏谑[(8)]。江自惭不安，闭门蛰居。

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北京政府总统，邀钱能训组阁并兼内务总长。江朝宗百无聊赖，企望再入官场，遂投钱门请委。适安徽、绥远等地鼠疫蔓延，钱便委江为防疫督办。江不嫌位卑，立即赴任，乃趁机大开报销，中饱私囊，受到舆论的抨击。1919年6月，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江也随之被免职。他虽四处钻营，但终因劣迹昭著，未能再入政坛，只当上三个月北京安徽会馆馆长。

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一时安徽形势混乱。江朝宗组织在京的一批皖籍官僚政客成立“皖事促进会”，出任会长，并以促进会名义具呈政府，举江主皖，未成；又吁请许世英主皖，许为答谢江的力荐，委江子泽春为安徽省造币厂厂长，使江发了一笔横财。

1932年初，寓居北平的吴佩孚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江朝宗积极参与活动，被吴邀聘为副教统。他们表面上扶乩唪经，而暗地里却在纠集北洋直系势力，趁时局动荡之际，借“抗日”之名，妄图东山再起，但此举受到蒋介石的指责，未能得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华北，北平沦陷。江朝宗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兼“特别市”市长。他得意忘形，附庸风雅，为许多大小商家题写店号门匾，落款处特加盖“曾秉国钧”印章，以示自己曾担任过国务总理而自命不凡。但他并无号召力，被嘲讽为“三定京师江宇老”，所以在同年12月13日以王克敏为“委员长”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江便被免去“特别市长”职，北平“维持会”也随之宣告解散，仅有一个伪政府委员的空头衔。江愤懑不已，在去职前夕，私自下一道命令，将全市商捐一律取消，企图从财政上给王的“临时政府”制造障碍。对此，王克敏报告日军部，拟追究江的责任，后经诸奸为江缓颊，并向商会追回原令，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此后，华北伪政权多次更迭，江朝宗只是一名挂名“委员”，未得再过问政事。后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聘他为军部顾问官，江感激涕零，积极筹办“华北经济对策协议会”，任副会长，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效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江朝宗以汉奸罪被捕，家产充公没收。是年冬，江病死狱中[(9)]。

---

(1) 王镜芙：《江朝宗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军阀祸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34页。

(2) 高参将死后，江之发妻丁氏携子泽春（苍葆）赴津，为此高氏哭闹不休。江朝宗承认丁、高二氏皆为正室，分寓而居，始平息。民国初，江又纳妾，生次子名泽深，早殇。

(3) 金友之（溥任）：《孙中山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第3版。

(4)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5)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93页。

(6) 吴叔班、张树勇：《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陈文运：《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8) 《尚书·大禹谟》释“迪”谓：“惠迪吉，从逆凶。”

(9) 江死亡时间无确切资料，此据《江朝宗史略》；另有1943年因病在北平去世说，存疑。

江加走

周海宇

江加走，字长清，福建泉州花园头村人，生于1871年11月12日（清同治十年九月三十日）。父亲江金榜，是个民间木偶神像、木偶头雕刻、粉彩作业师。江加走与哥哥江凹司（字雨水）幼时都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家，边种田，边学艺。

江加走随父学艺，学做木偶头坯的雕刻，哥哥江凹司做木偶头的粉彩。兄弟俩孜孜不倦，技艺上不断精进，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1888年江加走十八岁时父亲病逝，他与哥哥共同挑起生活的担子。他分析当地的行市，向他哥哥说："当今木偶头雕刻、粉彩业务繁荣，泉州涂门街周冕号黄家是名牌，产品常供不应求，所以买主跑到乡下来求购，只要我们兄弟俩同心协力，精研技术，信守交货时间，生意就会逐渐争取过来。"其兄深以为然。从此，兄弟俩经常切磋各种木偶头像传统造型的优缺点，在制作中不断地改进；至于交付订货的时间，更是钟点不误，赢得了木偶戏师傅的信任，业务逐渐兴旺起来。

由于他哥哥结婚时所欠债务一直没有还清，父亲去世时又添了不少债，江加走到三十二岁才独立成家。兄弟虽然分了家，可是在木偶头像的制作上，还是分工合作。1920年其兄去世后，江加走把木偶头像的粉彩工作也担当起来。为了保证绘画的质量，他日夜伏案练习，以自己的作品反复对照其兄的遗作，又常到涂门街周冕号向老师傅学习，观摩他们的作品，技术上越加提高。

1920年春末夏初，有一位掌中木偶戏老师傅要试演《封神演义》，需要很多表现神话小说人物的头像，来和江加走商量制作，并为江指出泉州地方大寺庙的菩萨都是古代雕塑家的名作，很值得学习

借鉴。江加走承应了这项富有独创性的制作，向那老师傅提出了两个要求：一、将《封神演义》的那些人物形象、性格逐一列出表来；二、经常来共同研究这些木偶头的造型和色彩。这时江加走虽已年近五十，但他身体健壮，精力旺盛，经验又丰富，跑遍了泉州的大寺庙，琢磨着木偶戏师傅送来的人物表进行构思，决心要将这套木偶头像制作得既有传统风格，又具有木偶头可以夸张的特点。他先从《封神演义》上的主角纣王入手。根据纣王沉溺酒色，荒淫无道，杀人不眨眼，宠信妲己，设“酒池肉林”这些特点，他把纣王的头刻得胖胖的，眼睛能够左顾右盼，一副奸气吓人的面孔。为了突出纣王的嗜杀，江加走运用了闽南民间的一句话：“眉中一撮毛，杀人不用刀。”在这个木偶头像的两眉中间，画些疏疏的眉中毛，并特加长了其中的一根。这个木偶头像创作出来，立刻博得木偶戏老师傅的赞许。三个月后，全部木偶头像完成，通过掌中木偶戏的演出，一时闻名遐迩。

江加走制作《封神演义》木偶头像的成功，使他声名大振。从此，掌中木偶戏师傅要演新戏，需要创作新的木偶头像，都来和他计议。那时涂门街周冕号的老艺人黄良司、黄才司先后染疫亡故，江加走就承揽了泉州、漳州、厦门、福州和南洋各地的提线、掌中木偶头的雕刻和粉彩业务。江加走在继承他父亲和泉州老艺人的传统技术的基础上，汲取和借鉴其他戏剧和民间艺术的精华，细心加以提炼，因而能够不断塑造出各种富有独特性格和色彩的木偶头像。他把父亲教给他的50多种头像发展到285种，其中250种都有称谓；发式由一两种梳“平髻”的发展到十多种头髻、发辫；把不会动的木偶头像的下巴、两腮、眼睛都变得会动了，使没有灵魂的木偶头在木偶戏师傅手中变得活了。当时，泉州的行商把江加走制作的木偶头像带去台湾，受到了台湾木偶戏艺人的欢迎，以致后来引起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妒忌，下令禁止入口。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来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侨汇中断，素在侨

乡流行的木偶戏无人雇演，木偶头像没有销路，江加走的业务受到很大影响。而伪乡保长以为江加走制作木偶头赚钱轻易，经常来抓丁、派款，敲诈勒索，使得江加走一度生意冷淡，生活困难。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侨汇开始恢复，略有人为酬神雇演木偶戏，但他制作木偶头像的业务仍不景气。

1949年9月1日泉州解放，江加走产生了新的希望。时已年近八十的江加走一有空闲便坐下来精心雕刻，并将他的卓越技艺传授给他的儿子江朝铉。1951年冬，泉州提线木偶戏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泉州木偶实验剧团，准备春节演出，江加走为他们粉彩了全部旧木偶头。翌年夏，又为新成立的泉州木偶艺术剧团制作了《小二黑结婚》全部新头像。他把“三仙姑”塑造得“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两片嘴巴笑眯眯，眼睛含有邪气。泉州木偶实验剧团同年11月到上海，与苏联木偶专家奥布拉兹卓夫进行艺术交流，1953年春又赴京演出，并拍摄《新潞安州》木偶剧影片。以后又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国际木偶节演出。江加走木偶头像的成就遂名闻国内外。

1954年，江加走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聘为会员，被华东美术家协会聘为理事，并被选为福建省文联委员、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同年10月11日，江加走病逝于泉州。

主要参考资料

周海宇、林建平：《木偶头雕刻家江加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江亢虎

曾业英

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原籍安徽旌德，1883年7月18日（清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生。祖父江澍昀，光绪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江德宣，光绪十二年进士，任工部主事。江亢虎十二岁时离开江西，到北京求学。1898年开始“研习西文与科学”[(1)]。

1901年春，江亢虎中止北京东文学社的学习，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半年后回国，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为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他随即上书袁，敷陈“经世之宏图，中兴之要略”，望其成为“全球万世之伟人”[(2)]。不到一年，江亢虎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其间，他在袁世凯、端方的资助下，首开北京女学风气，先后创立三所女子传习所。1910年前后，初识汪精卫，自称这年3月曾涉嫌汪精卫等人谋炸摄政王载沣案[(3)]。随后出国旅游，经日本而至欧洲各国。他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影响甚大，一路大讲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所谓“三无主义”。7月，在比利时写成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无家庭主义意见书》。次年春，其父病逝南京，虽然他当时正力倡“无家庭”，还是踏上了回国奔丧之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江亢虎由南京避居上海。11月5日，上海独立后仅仅两天，他自认欧美那种“政党政治”的时代即将来临，将两个多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并发表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专征地税、奖励劳动等八条党纲。江亢虎解释，这些纲领“多与三代井田、学校制度及孔子《礼运》所称道者先后一揆”[(4)]。该党吸收党员漫无限制，“无论何人，不须介绍”，“皆

得为党员”[5]，而且来去自便，漫无约束。至于江亢虎本人，他曾说“鄙人自闻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来，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两派极端之冲突，常妄思有以调和而折中之”[6]。

江亢虎有感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表示“赞同共和”[7]；但又以“社会主义家某君”名义在上海《天铎报》发表致武昌革命军公开信，攻击革命党人“多事以自扰”[8]，因而激起革命派的愤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对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一度十分“赞成”，并令国务总理赵秉钧加以“保护”[9]。江也利用中国社会党为袁服务，1912年夏，他到北京多次晋谒袁、赵，并秉承袁、赵旨意，“遍访各党各界，联络感情”[10]。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袁破坏共和制度的“二次革命”，江亢虎一面通电全国，要求李烈钧等“四督罢兵回防，停止二次革命”[11]；一面奔走运动，联络各省商会、教育会，“为釜底抽薪之计”。[12]

同年秋，袁世凯准备踢开一切政党、社团，大权独揽。他首先令中国社会党解散，以“假此立威，为解散一切党会之入手”[13]。江亢虎当即遵命照办，随后离国去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中国文化课讲师，并将家藏的八千多部图书捐赠该校。1917年夏，又回国为该校搜去中国地方志两千余部。

1920年夏，江亢虎回到中国。次年4月，去苏俄旅游。6月下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江初被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以“社会党代表名义”，确认为具有表决权的中国代表，但“出席二三日”后，即被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指控为中国政府的“侦探”，而被取消了资格[14]。1922年8月，经欧洲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因忧虑“赤化东渐”，影响“人心世道”[15]，发表《新俄游记》一书，攻击苏俄革命。与此同时，又从英国费边社那里拾来“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育普及”和“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等若干洋教条，拼凑成一个所谓“新社会主义”纲领，兜售于各派军阀之间，企图借此收“曲突徙薪”之功，抵消十月革命的

影响。

1924年1月，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与中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江亢虎如坐针毡，一面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接受苏俄援助；一面再三请托清室内务府大臣金梁“介见”溥仪，乞求这位清朝废帝站出来“救亡”[16]。他认为“逊帝英明，前途有望，宜广求知识，博采舆情，用非常之才，以应非常之变”[17]。6月15日，江再次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作为他投靠北洋军阀的敲门砖。他反复向军阀们申述：“唯有及早施行社会主义，乃可防止过激思想之蔓延，并可减免社会革命之危险。”[18] 由于中国社会党对投靠北洋军阀毫不掩饰，因此，其《中国社会党复活宣言》发表后，即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及进步舆论界的抨击。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统治。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决定召集御用善后会议。江亢虎马上代表中国社会党声明支持，并以所谓“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的资格出席了这一会议，成为段的制宪要员。1925年8月，他上年“请觐”溥仪的信函和同时期康有为、庄士敦（英人）等人与金梁的来往信函，被冯玉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查获，并公布于世。南方大学认为他参与“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案件”，掀起驱江风潮。江依仗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将反对他的教员及学生视为“赤化派”[19]，强行平息了这一风潮。

南大驱江风潮虽然平息，但由于“甲子复辟案件”的牵连，江亢虎已声名狼藉；加上北洋军阀并不理睬他的什么“社会主义”，江不得不在“环顾国中，无可共事”的哀叹中，“退而讲学”[20]，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主持南大校务，但他仍不忘为北洋军阀效力。这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反共分裂会议，江又代表“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宣言，声称“谨认”这些反共分子为“先辈友党”，并与他们“竭诚联络”，一致反共[21]。1926年上半年，直奉军阀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

威胁，在日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谋求合力对付革命运动。江上书吴佩孚，建议他们“扩而充之，以图政学各界、朝野上下大联合之实现”，“然后赤祸庶几可免”[22]。直到北伐战争的怒涛席卷大半个中国，江亢虎赖以生存的北洋军阀统治陷于土崩瓦解之时，他才不得不解散新社会民主党，于1927年夏前往美国。不久，去了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

1928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初步稳定下来，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远在海外的江亢虎不再留恋北洋军阀，转而讴歌蒋介石是时代“俊杰”，“丰功骏烈，近古所稀”[23]。此后，为巩固蒋的统治，他多次上书，建言献策。1930年7月，江“以海外旁观之身，念兴亡有责之义”，不远万里，向蒋提供“速立民宪”、以“免革命而促进化”的“根本大计”[24]。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目睹日本对东三省的疯狂侵略，又在所谓“绝交”、“死守”的幌子下，向蒋献上一条“不宣战”、“不进攻”、以求苟安于一时的所谓“治标之策”[25]。

1933年秋，江自美回国。1934年，蒋介石为配合他对中国工农红军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大力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江发现蒋的“新生活运动，其实就是旧道德，不过换了一个新名字”[26]。为配合蒋介石这一运动，江开始大做“旧道德”的文章。1934年12月至次年春，他在上海以《孔子的人生哲学》为题，举行每周一次的定期讲座，鼓吹忠君、孝悌、温良恭俭让等旧思想。倡言“现在君主虽不存在，应该忠于国家”[27]，“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28]，“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29]。等等。1935年2月，江特地重刊旧作《善生十箴》，宣扬节欲、习劳等一套说教。他自己也穿起粗布长衫，住进清凉寺，实行斋戒，决心做蒋的“模范新生活运动员”。4月21日，由江亢虎发起，以保存文言、反对白话文和汉字改革为宗旨的“存文会”在上海文庙成立，江被选为该会干事，并主编《讲坛》月刊。

1936年11月，江亢虎针对当时世界盛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两大对立思潮，特地发表《我们的出路》一文，认为“中道主义”才是“防止共产”和法西斯“独裁”的“正本清源之道”，“不但为中国之出路，实亦世界之出路”[30]。江亢虎多年来一直认为废科举、兴学校的结果，导致社会“师道荡然无存”。为了“宏化育”，“矫时风”，必须恢复封建书院，提倡私人讲学。1937年6月，他刊出《亢庐讲学征收弟子通启》，要青年“自行束修”，以“最敬礼（依今例三鞠躬）”和“终身归仰”、“决不反戈”的忠心，拜他为师，以培养自己的忠实信徒和社会的所谓“善人”[31]。

全面抗战爆发后，江亢虎避居香港。1939年9月，他接受从重庆抗日阵营叛逃至沪的汪精卫的邀请，由香港到达日军侵占的上海，参加所谓“中日共荣”、“和平建国”运动。10月，发表《双十节对时局宣言》，操着日本侵略者的腔调，表示要“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中心，建设东亚新秩序”[32]。同时，又一次打起中国社会党的旗号。之后，他为建立汪伪中央政府，奔走于南北伪政权和日汪之间。1940年3月29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江亢虎出任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代理院长（1940年7月）、院长（1942年3月）和伪国府委员（1944年11月）等职，总算实现了他半生奔走连做梦都想做官的宿愿。为掩盖叛国行径，他辩称投降日本并“非卖国而实爱国”[33]。6月1日，江亢虎向汪伪提出旨在压榨人民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获准“发财政、工商、农矿三部参考”[34]。9月3日，又献出两件“思想防共武器”，主张以佛教、道教、儒教为骨干的“固有的东方文化”和“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新的社会主义”作为日汪“思想上共同防共之绝大武器”[35]。10月，汪伪举行所谓“抡才大典”的高等考试，江受命为典试委员长。他“每早六时即起，夜十二时方睡，所有命题阅卷，大小事必躬亲”[36]。1944年10月16日，为适应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他发表《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主张以“孔子做中心”，建立“孔子的国际”[37]。

抗战胜利后，江亢虎潜藏南京清凉寺当和尚，后又逃往北京。

1945年10月被军统局捕获。虽有舆论为其开脱叛国罪责，说他“附逆之举，心理上属多矛盾”[38]，但1946年11月2日，还是被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无期徒刑。对此判决，无论首都高等法院的检察官还是江亢虎本人均表示不服，检察官认为原判“漫谓被告不过赞同附和，与一般激烈分子不同，仅判无期徒刑，似有失出之嫌”，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极刑”；而江本人即对他“历次辩诉有利各点”，法庭“不加调查，径予处断”，不平殊甚，而声请再审，“宣告无罪”。但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重审，均未采纳双方声请，而维持无期原判[39]。

新中国成立后，江亢虎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经过学习和改造，不再坚持当年南京受审时拒不认罪的顽固态度，写下《十大罪状自白书》[40]，1954年12月7日，病死狱中[41]。

---

(1) 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3），《华文每日》第10卷第1期。

(2)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1944年版，第21、26页。

(3) 《自白书》（1945年10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4) 《江亢虎致袁世凯信》，《社会世界》第2期，1912年5月15日。

(5)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17页。

(6)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00页。

(7)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14页。

(8) 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1925年版，第5页。

(9) 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第46页并参见①。

(10)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86页。

(11) 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中文《大阪每日》第9卷第12期。

(12)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21页。

(13)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21页。

(14) 游人：《新俄回想录》，军学编辑局1925年版，第92-93页。转引自［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15)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76页。

(16)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52页。

(17)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52页。

(18)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20页。

(19) 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第44页。

(20)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72页。

(21)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58页。

(22)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72页。

(23)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86、287页。

(24)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300页。

(25)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第310页。

(26) 《晨报》1935年1月9日。

(27) 《晨报》1935年2月27日。

(28) 《晨报》1935年1月13日。

(29) 《晨报》1935年2月22日。

(30) 《江亢虎最近言论集》，万国道德总会1937年版，第83页。

(31) 《江亢虎最近言论集》，第102页。

(32) 《中华日报》1939年10月11日。

(33) 《中华日报》1940年8月7日。

(3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油印本，第103册。

(35) 《中华日报》1940年9月3日。

(36) 《中华日报》1940年10月29日。

(37) 《申报月刊》复刊第2卷第10期。

(38) 《中央日报》1946年7月13日。

(39)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391页。

(40) 黄波：《江亢虎：从弄潮儿到落水者》，《博览群书》2008年4月7日。

(41) 据上海市劳改局档案材料。

江庸

汪仁泽　陈光贻

江庸，字翊云，号澹翁，福建长汀人，1878年4月29日（清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璧山县。祖父江怀廷，咸丰时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卒于南充任内。父江瀚，曾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文科学长和学部参事，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山西大学教授等职。江庸幼承家教，学有渊源，具有国学基础。二十一岁时入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

1900年，江庸进京应科举考试，适遇义和团反帝运动，遂经大同、西安折返四川。翌年，川督选派留学生赴日，江入选东渡，进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两年后毕业，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毕业前曾兼管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学务，并充任翻译、助教等职。留学期间，他结识了秋瑾、蔡锷、梁启超、蒋方震等人。1906年，清廷派遣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江被派充照料员。是年得法学士学位毕业回国，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教习，未到任即改由学部调普通司任职，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不久被修律大臣沈家本聘为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法律学堂教习。1907年又经大理院调任详谳处推事。次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奖给法政科举人。1909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1)]，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是年12月，唐绍仪充当袁内阁全权代表，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谈判南北议和。江庸为唐的随员，偕赴上海。1912年民国成立，江庸留任大理院推事；9月，简任高等审判厅厅长。次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掌司法，江任司法部次长。1915年冬，江自东北考察司法回京，晋见总统

袁世凯，时袁图谋帝制自为甚急，江对时政颇多评议，袁深感不悦。江退出后即呈一辞职书，语甚激切，抨击袁摧残国家元气。袁大怒，拟立免江职，袁的秘书长张一麐向袁进言："江的辞职乃是负气，自总统就任以来，无敢非议时政的，现在有个江庸，岂非好事？何不温语慰留，以示宽容虚怀。"袁怒稍息，着张拟一批令留之；但正色对幕僚王式通说："你去告诉江庸，以后但做官，少说话。"[(2)] 江仍坚辞而去。1917年5月，北洋政府李经羲继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李发表阁员名单，任命江庸为司法总长，江坚持不就，避往汤山。7月张勋复辟时，江避至天津。11月，王士珍组阁，江庸再度出掌司法。不久江因拒绝在赦免复辟要犯张镇芳的文件上副署，发生龃龉，愤而辞职，受到舆论的赞许。江在出掌司法任内，曾创立京师第一模范监狱，实行较人道的管理制度，附设监狱工厂，由犯人参加劳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创造条件[(3)]。

1918年4月，我国留日学生因要求发给归国旅费的借款及增加官费，与驻日公使馆官员发生冲突，数人遭拘押。广大留日学生抗议使馆的无理行径，事态扩大。公使章宗祥无法应付，各省所派监督亦多逃匿。江庸在教育总长傅增湘坚请下，出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赴日后，保释被捕学生，按月发放官费生学费，事遂平息[(4)]。1920年辞职回国，任法律编查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此后又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江庸代表北京政府去日慰问。同年10月贿选总统曹锟上台后，江庸辞去所任职务，在北京设立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并创办《法律评论》周刊，任法律评论社社长、尚志学会会长。江于1924年曾赴广东晋谒孙中山于广州士敏土厂，孙"嘱留广东八月为之帮忙"[(5)]，江婉辞。旋北返，受聘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7年起任朝阳大学校长。江历次办学，皆亲自执教，为培养我国司法人才出力甚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成立伪

满洲国。江庸著文登报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指名斥责其学生、出任伪职的赵欣伯叛国投敌、为虎作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1936年，江庸受聘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6月，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出席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律师协会世界会议。10月途经苏联莫斯科回国。此时日本侵略势力已威胁平津一带，江庸径赴上海，全家从北平迁沪定居。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不久江浙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在筹组伪政权时，汉奸温宗尧拟拉江庸出任伪职，江拒绝。不久，日军将领畑俊六携台湾人许丙（1929年江为西北地区大旱灾赴台募赈款时所识）来沪诱劝，复予严拒。1938年7月，江庸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后去重庆，在渝执行律师业务。1943年江被推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1946年江携眷返沪，继续执行律师业务。1948年国民政府提名江庸为“国大代表”候选人，江拒不参加竞选。不久国民政府公布“宪法”，宣布江庸为大法官，江力辞不就。自抗战军兴直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多次邀江出任行政职务，皆为江所固辞。他自号澹翁，以“澹荡阁”名其居所，以示澹荡明志之意。在执行律师业务期间，曾于1935年为历史学家侯外庐在北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事辩护；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中，江亦曾为被捕诸人义务出庭辩护。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以“代总统”主政，江庸应李宗仁之邀，与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赴北平试探求和。2月14日，江等北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22日在石家庄接见，表示：“你们为寻求和平途径，远道前来，共产党是爱和平的，可以商量，只是地点、时间、人选尚须考虑。”[(6)] 并曾问道：“你们看蒋介石为何失败？”江答：“我以为主要是不能用人，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才。”临行江并赠毛泽东诗数首[(7)]。江庸返抵南京后，与国民党当局晤谈，确知蒋介石对议和并无诚意，遂向李宗仁坚辞，不愿再北上和谈。是年秋，江庸得毛泽东手书邀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为特邀代表，并被选为全国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庸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馆长。江还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市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960年2月9日，因病在沪逝世。

江庸生平著作除《趋庭随笔》、《沪渎避兵记》等外，多为游记，已出版的有《欧航琐记》、《菲律宾游记》、《台湾半月记》等；诗集有《百花山诗草》、《南游诗草》、《甦生诗稿》、《积跬步斋诗稿》、《澹荡阁诗集》等多种；法律著述散见《法律评论》及其他杂志。解放后曾编撰《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劳动保险条例图说》等小册子多种。

---

(1) 《民国长汀县志》卷14《选举志》“留学生考试”条。

(2) 见江庸：《趋庭随笔》，朝阳书院出版部1934年版，第55页。又据《江庸自传》中称：此段经过，1939年在重庆时始闻知于张一麐，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3) 江庸在《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1921年版）中称：“各国既与我国订有俟司法改良即行撤废领事裁判权……必先自审司法改良之成绩何。”而“监狱之改良”亦属司法改良内容之一。

(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66—71页。

(5) 《江庸自传》中称：“赴广东游历，谒中山先生于士敏土厂，先生嘱留广东八月为之帮忙，因北京尚有要事婉辞，究未知所瞩何事，故以八个月为期。当时北返，后在京晤中山先生，亦竟未问及也。”

(6) 江庸：《和谈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

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总3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7) 江庸：《和谈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总32辑），第134页。江庸在赠诗中有“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两句。1957年5月8日陈毅病中致江庸函中曾提及：“先生诗留集太少，又宣言不复作诗，弟以为过矣。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将千篇大部或全部刊行；宜破戒多作诗，以反映人民新时代，大集中如：‘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此等奇句，何可以不作耶？”

姜得春

陈志新

姜得春，字雨田，1869年（清同治八年）生于奉天海城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其父姜文海兼做瓦匠。1877年春，八岁的姜得春入本村私塾启蒙，父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姜得春一边学习，一边帮助家里种地。姜机敏聪颖，勤奋好学，在学业上长进很快，不仅那些启蒙课本能背诵如流，而且“四书”、“五经”亦能熟读。后因父亲病故而辍学，回家务农。

1886年，姜得春离乡从商，入海城县郭之桢经营的“益泰当”为学徒。他受尽了东家、掌柜、师傅的种种管束，熬过三年多的徒工生涯，才当上领取薪金的伙计。姜熟练地掌握了“生意经”，成为店里伙计中的佼佼者，博得东家的好感，被提拔当上了“益泰当”的二掌柜（相当于副经理）。

1894年，姜得春被调到郭家在本城开设的粮店“复泰号”任二掌柜。适甲午中日战争发生，辽南横遭战乱之苦，粮号生意不景气，但姜里外折冲，“临难临财均无所苟”[(1)]，故而受到店东的器重。未几，掌柜出缺，他遂继其任。粮号日益兴隆，姜得春经商有方也随之远近闻名。

1906年，海城县商会创建，姜得春被推为总理（会长），知县管凤和“伟其才，深器之”[(2)]，彼此过从甚密。1907年，管升任新民知府，由于清理银行事务力不从心，遂调姜得春赴新民总其事。不久，姜又被推为新民商会会长。他主持商会，筹集地方资金，资助地方办学和巡防警察之补贴开支等用项。其时张作霖任巡防营管带驻防新民，为扩充势力招兵买马，筹措银饷，每每向商会借款，而且长期拖

欠不还。不久，张作霖升充巡防营统领，率队移防郑家屯时，姜得春于欢送队伍面前拦住张作霖的马头向其讨债，使张颇为难堪。张作霖毕竟老于世故，软硬兼施，终于脱身。辛亥武昌首义后，东北革命党人策动奉天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调张作霖巡防营入卫奉天城（今沈阳市），翌年被提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姜得春专程去奉天找张作霖再次追索欠款，对张说："你当师长了，你欠新民商会的钱还了吧！"[(3)] 姜得春这两次不寻常的举动，给张作霖留下了"性亢爽，有胆有识"[(4)] 的深刻印象。

1913年初，管凤和离新民府他调，姜得春重返家乡海城，复任该县商会会长。因经济窘迫，手提精制小木箱到本城"庆余当"，自恃声望高，想做信誉当（不管箱中装何物，不得开箱验看），但未成交。姜顿觉难堪，遂发誓一旦时来运转，定叫"庆余当"姓姜。为谋生计，姜得春在城内开了专卖虾米皮的店铺。不久，又与人合资开了"公合当"，他被举为经理，生意蒸蒸日上。

1916年4月，张作霖取得奉天军政大权，以整顿金融为急务，一面发行官制"奉票"，一面勒收私帖，但受到日本人的干扰破坏，市面金融紊乱。张作霖私人的兴业银行客户挤兑严重，而副经理刘鸣岐等人更是暗中投机倒把。张作霖为了稳定金融，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刘等五人抓起来杀头示众，又关押了一批嫌疑分子，金融挤兑风潮才稍有平息。在考虑兴业银行经理人选时，张作霖想起了姜得春。他对兴业银行董事孙百斛说："姜雨田在我当官时敢要钱，这个人好，要管钱一定能管好。"[(5)] 于是派人去找姜。姜得春不了解张作霖的意图，联想到当年逼债的往事，深怕张作霖伺机报复，未敢立即应命。张二次派人去请，姜得春才硬着头皮去省城。张作霖任命姜为兴业银行总稽核，并对他说："你大胆地干，我给你做主，不要害怕，你把在新民大街上拉我马缰绳的勇气拿出来。"[(6)] 姜得春深为感动，从此即由商界步入金融界。

姜得春上任后，秉承张作霖的旨意，将兴业银行先行停业整顿，

然后迅速开业。该行原发行的纸币业已失去信誉，他便发行新币，请官府担保信用。从1917年4月起，他又将民股由官府收买，将兴业银行转为官办，发行不兑换券200万元（即4厘债券，每元票券贴息4厘），用提高利率的办法，使银行的信誉很快恢复。姜对兴业银行的恢复和发展有突出贡献，遂由总稽核提升为会办、代理总办。1920年，他还与陈林格等人发起组织地方储蓄公会，并被选为名誉会长。

在金融界大显身手的同时，姜得春又在海城先后开了“庆余当”和“庆余得”、“庆余泉”等商店和酒厂。他不忘故里，从经营布匹的商号“庆余得”开张之日起就许愿：只要此号在，每年冬天要做棉衣200套施舍无衣者。此外，姜还在海城县城修建一处幼稚园，并在家乡西梁窝开粥厂恤贫及捐资兴办小学等，嘉惠乡里。每次返籍，他都微服简从，安步当车，且常去看望年长与贫弱者。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援直倒皖，得以控制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区。张有意让姜得春将奉票通行到这些地区。姜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战局莫测，一旦奉军退回东北，就要殃及当地百姓，所以一拖再拖，最终没有发行。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败北退守关外，决心整军经武，治理财政，以利再战，于1923年10月把奉天官银号、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合并，使长春以南地区的货币统一，由东三省官银号一家发行，以奉票为收付本位币；长春以北地区则以哈大洋为本位币。姜得春被聘为帅府财政顾问，兼任合并后的官银号会办，驻长春分号。同年，姜获得张作霖特颁的二等大绶嘉禾章一枚。

1924年秋，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接收了天津边业银行，委姜得春任总经理。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整顿，于1925年4月10日正式开业。该银行属张家私人银行，除在天津设总行外，还在关内外各重要城市设有分行。其组织机构采用总裁制，以彭贤挂名总裁遥领，不负业务具体责任，银行职员分别由彭贤、姜得春和协理

梁文彬三人推荐，姜推荐的有前兴业银行股长郭集珍。郭在三行合并后，曾被姜提升为官银号长春分号经理。

1925年11月，姜得春在奉天致电天津边业银行，命将库存钞票200万元及现洋30万元，随京奉火车运往奉天，派出纳股职员随车押运。当火车驶抵滦州车站时，郭松龄反奉兵变已发生，钱款被就地扣留。郭松龄派其军需处长鲁穆庭及参议谭家骏等将该款运回天津，现洋被郭军用光，钞票由于津行事前接到姜得春不予兑换的电令，得以保存。郭松龄失败后，鲁穆庭等只得将这批钞票原封运回奉天。

经过郭松龄兵变的打击，张作霖的力量受挫，被迫“暂息”东北，以待时机。天津一度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边业银行总行存放着大量资金，不够稳妥可靠，于是张作霖1926年初决定将奉天分行改为总行，天津总行变为分行，仍以姜得春为总经理。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在北京统治两年之久的张作霖于6月败退出关，途经皇姑屯时遭日本人暗算，被炸身亡。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积极振兴实业，奋发图强。姜得春深恐一朝天子一朝臣，主动向张学良提出辞呈。张不允，并半开玩笑似地说：“姜大爷，你现在发财了，要回家抱儿子去了！”(7) 姜不再推却，继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在边业银行工作。1929年5月，姜得春病故于沈阳。

---

(1) 廷瑞修、张辅相等：《海城县志·乡宦篇》，海城大同书局1924年版，第245页。

(2) 廷瑞修、张辅相等：《海城县志·乡宦篇》，第245页。

(3) 刘鸣九口述、武育文整理：《郭松龄反奉及其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1年

版，第30页。

(4) 廷瑞修、张辅相等：《海城县志·乡宦篇》，1924年版，第245页。

(5) 刘鸣九口述、武育文整理：《郭松龄反奉及其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30页。

(6) 栾贵田：《张作霖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第35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8页。

(7) 姜式芳：《回忆我的父亲》（未刊稿）。

姜登选

张学继

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1904年赴日留学，初入成城学校，结业后，以士官候补生分发日本陆军第十六师团伏见工兵第十六大队见习。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姜登选秘密加入成为同盟会员。当时，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认为，留日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员将来毕业回国后要打入清军内部掌握军事实力，为避免暴露身份，黄兴嘱咐他们不要到同盟会总部活动，授意留日军事学生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丈夫团”。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相砥砺。“丈夫团”成员除姜登选外，还有黄郛、李烈钧、赵恒惕、阎锡山、李根源、李书城等共三十余人。

1907年，姜登选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五期工兵科，1908年12月毕业回国后，与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五期同学王凯成以及第六期同学程潜、舒和钧受四川总督赵尔巽的邀请入川训练新军。入川后，赵尔巽委姜登选为工兵营管带（营长），程潜为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二等参谋，舒和钧、王凯成为督练公所提调，他们一面训练新军，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与四川籍同盟会员林修梅、杨瑾、季雨霖、梁达沅等取得了联系，共同策划在四川起义事宜。

1909年，朱庆澜入川担任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1910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成立，朱庆澜任统制，程潜任正参谋官，在配备干部时，程潜曾试图将姜登选升为步兵统带，但未能实现，姜登选改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

1911年，同盟会在四川的负责人程潜因奔父丧回湖南，将所担负的同盟会工作付托姜登选。当时正值川、粤、湘、鄂四省保路风潮风

起云涌之际，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离开四川时，程潜特地告诫前来送行的朱庆澜，千万不可动用第十七镇去镇压保路运动，并说："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如遇紧急情况，可与他商量！"从这时开始，姜登选与朱庆澜结下了不解之缘。

辛亥武昌起义后，四川各州县相继起义脱离清朝统治，久困成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避开革命的打击，勾结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表示愿让出政权。1911年11月27日，在成都成立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正都督，第十七镇统制、赵尔丰的亲信朱庆澜为副都督。这个军政府是赵尔丰的傀儡，革命党人极为不满。没过几天，四川巡防营和大部分新军索饷哗变，蒲、朱逃匿。川籍同盟会员、原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带领部分新军平定了兵变，杀掉赵尔丰，尹继任都督。

1912年2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在成都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姜登选等外省籍革命党人在四川无法立足，遂随朱庆澜离开了四川。1912年，姜登选赴保定任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13年8月，任贵州陆军第一师参谋长。1913年10月，朱庆澜任黑龙江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后，邀姜登选任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1916年7月，北京政府调朱庆澜为广东省省长，姜登选亦随之南下广东，任虎门长洲要塞司令。时人称朱庆澜与姜登选的关系"如父子密切"，形影不离。朱庆澜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退出广东，姜登选又随朱庆澜北上。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决定彻底整顿奉军，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起用在国内外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取代绿林和行伍出身的旧派将领，在这种背景下，姜登选与韩麟春、于珍、何柱国、邢士廉、臧式毅、沈鸿烈等一大批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将领相继投入张作霖幕府，成为奉系新派中势力最大的洋派。经士官同学杨宇霆推荐，张作霖于1922年7月任命姜登选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副监，总监孙烈臣、副监张作相都是挂名的老派人物，整编奉军的实际工作由姜登选、张学良、杨宇霆、韩麟春等人负责，姜登选成为核心人物之

一。

经过整编，奉军编成陆军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炮兵两个独立旅又一个团，同时保留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吴俊陞的二十九师，新增第十一师（李景林任师长），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经过这番整顿，奉军焕然一新，再也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已经成为颇有战斗力的军阀武装。姜登选从早年的著名革命党人，转而投身于大军阀张作霖，甘心情愿受其驱使，为他的霸业冲锋陷阵，已完全丧失了一个革命党人的进步性和革命意志。姜登选因张作霖的信用，自认为找到了用武之地。

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还施展纵横捭阖术，与段祺瑞、孙中山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以最大限度孤立直系。姜登选是革命党人出身，与国民党的高级干部程潜、方声涛等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姜登选在联络孙中山方面又发挥特殊作用。奉系骨干何柱国在《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一文中说："当时东北方面负责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是河北人，日本士官五期毕业。民国初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朱的参谋长，后来朱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缘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先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前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

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派汪精卫和程潜赴奉天面见张作霖进一步磋商合作反直事宜。姜登选与程潜是同学和同事，关系密切，汪、程到奉天后，姜登选参与了接待工作。据事后姜登选与张学良对何柱国透露，汪精卫和程潜到奉天后，提出讨伐曹、吴的军事、政治方案。军事方面，提出由广州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

京，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张作霖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10月14日，汪精卫、程潜从奉天返回上海。不久，姜登选又收到了孙中山亲信田桐写来的一封信，姜登选立即于10月31日转给杨宇霆，请他转交张作霖处理。

12月间，姜登选即奉张作霖之命，南下上海、杭州、广东，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孙中山等人见面。12月20日，姜登选抵达广东，“连日遍访故交”。姜登选的南方之行，进一步加强反直三角同盟。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当选为总统后，海内外舆论大哗。姜登选与汪精卫、杨毓珣、邓汉祥、王九龄、吕宓筹、李雁宾、赵铁桥、费竹简等在上海举行反直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并联名发表通电反对曹锟贿选。电报声称：“特代表东北、东南、西南各省之公共意思，郑重声明：举凡曹锟所盗窃之元首名义，及其部曲所盗窃之政府名义，附逆议员所盗窃之国会名义，一切否认。除彼凶残，惟力是视，呜呼！国本飘摇，乱人鸱张，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凡我国民，共奋起毋馁，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正义。请悬此言，以为左券。”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奉军改称镇威军，张作霖任总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出兵二十七个旅，二十万兵力，编成六个军，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辖裴春生的第四旅、赵恩臻的第十二旅、齐恩铭的第十六旅、高维岳的第十九旅。姜登选的第一军和张学良的第三军军长（副军长郭松龄）是奉军的主力部队，担任主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李景林、张宗昌任正副军长的第二军担任热河南路；张作相、汲金纯任正副军长的第四军，摆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吴俊陞、阚朝玺任正副军长的第五军与许兰洲、吴光新任正副军长的第六军担任进攻热河北路。

山海关与九门口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角山寺大山，因此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实际分成两个战场：一个是山海关正面，另一个是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奉军由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指挥第二、第六两个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指挥第四、第十六两个旅，共五个团，担任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第一、第三两军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姜登选，张学良坐镇统一指挥，并以第十二旅的三个团作为联军的预备队。联军指挥部设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

李景林、吴俊陞等部进攻热河得手后，坐镇沈阳指挥全局的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于9月24日致电姜登选、张学良两位军长，催山海关一线发起进攻。以这方面兵力配备最多，战斗最激烈，而伤亡也最大。结果反而是九门口以北约三千米的黄土岭口首先突破，而山海关正面的直军阵地则固若磐石，始终未能突破。突破黄土岭口的是奉军第一军第十六旅孙旭昌团。这个团原驻兴城、绥中一带山地，平时由姜登选亲自掌握，对山地战有很好的训练，加上步炮密切配合，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尤其善于山地攻坚战。孙旭昌团在突破黄土岭后，又接着攻破了九门口，这是一个事关全局成败的突破。一、三联军指挥部得到九门口被攻破的消息后，决定立即调动预备队继续扩大战果。姜登选最后点将，仍由孙旭昌团担任攻坚战。姜登选令孙旭昌团突破一个高地后，就让它回来休息，再遇到难攻的高地，又调它上去，攻克之后再休息，休息后又再用上。如此连续攻击前进，再加上全线配合，一鼓作气攻克了影响全局的战略要地石门寨。从此，直军一败而不可收拾。奉军攻克山海关后，大举入关，到1925年6月止，南下奉军占据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的大部分以及上海，奉系势力在这时达到顶峰。

奉军抢占这些地盘后，张作霖任命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并内定由姜登选为江苏军务督办、郭松龄为安徽军务督办。不料总参议杨宇霆也要个地盘，结果杨宇霆被任命为江苏

军务督办，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姜登选赴安徽就职时，随身只带了一个旅侍卫，计划到皖后再招两个旅以自卫，但未来得及实施，反奉战争就爆发了。

1925年10月7日，安徽、江西、江苏、福建、浙江五省代表在杭州开会，议决成立五省联盟，举孙传芳为总司令，树“拥段反奉”之帜，其战略由浙江长兴出宜兴，兵分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五路司令周凤岐，定名“浙闽苏皖赣联军”。10月10日，孙传芳以准备秋操为名，下达动员令，调动军队向苏、皖奉军进攻。当时奉天在江南的部队只有两个师又一个旅，其中第八师（师长丁喜春）驻南京，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驻上海，安徽只有一个旅，兵力相当空虚。姜登选在孙传芳起兵反奉后，致电孙传芳，表示大家均为同学，不应相迫，应尊重和平。词虽痛切，但孙传芳不予理睬。10月17日，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密电其第一师师长邓如琢出兵九江，乘姜登选在安徽兵力空虚之机，抄袭安庆。10月21日，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自泗县移驻临淮一带，电告姜登选，他将与孙传芳一致行动，请速将驻蚌埠的奉军解除武装，即日出境。驻寿县的皖军第四旅旅长高世续、驻颍上的第五旅旅长华毓庵，均联合与倪朝荣一致。22日，邓如琢在九江宣布就任皖赣联军总指挥，以赣军第三师师长冯绍闵为赣军副指挥，皖南镇守使王普为皖军副指挥，联合向安徽进军。皖赣军队联合行动，姜登选见敌我众寡悬殊，武力对抗毫无前途，遂于10月23日宣布辞职，并将驻安徽的一个旅的奉军全部撤退北上徐州集中。

1925年11月2日，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前敌总司令，姜登选为后援总司令，在徐州、德州间设置三道防线，以对抗孙传芳的五省联军。11月6日，张作霖为持久防御计，又任命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姜登选、张作相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分区分段防御，其中姜登选的第四方面军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张宗昌的第二方面军。

姜登选受命后，委戢翼翘、陈琛为旅长，先往东北着手建旅事宜。姜登选本人则率少数随员赴天津，准备稍事停留后再回奉天。10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生反奉通电，挥师出关。23日，姜登选的专车到达滦州车站，郭松龄派人到车站接姜登选，声称郭军长有事相商，请军团长到城内一谈。姜登选对郭松龄反奉之举毫无所闻，当即随来人入城，入城后即为郭部软禁，扣押在滦州火柴公司楼下的一个楼梯间。姜登选要求面见郭松龄，郭拒不见面，姜只好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郭，信中说："彼此共事多年，前在黑、粤两省，所以提携者甚至，并无相负之处，回思往事，当能谅其无他云云。"信交上去后，亦无回音，姜才知问题严重。

与姜登选一同扣押的，还有裴春生、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等奉军高级将领。11月26日，郭松龄下令将扣押在滦州的姜登选枪决，裴春生、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等师旅长十余人押送天津，交李景林看管。29日，郭松龄发表通电，宣布枪决姜登选的理由，其中有"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之句。

姜登选被枪决后，在滦州的友人张淦臣为其收拾遗体殓棺，李景林致电郭松龄索还尸体，郭允派人往领。方声涛与姜登选友谊最深，当时方正在冯玉祥幕府中，也参与郭、冯反奉联盟，闻讯后亲到滦州将姜的灵柩运至天津。

1926年春，由朱庆澜等友人将姜登选的灵柩运回河北冀县家乡安葬。张作霖为表彰姜登选的忠诚，在镇压郭松龄事变后，特在沈阳西南风雨坛为姜登选修建了一座"姜公祠"以示纪念。

姜桂题

钟碧容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生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父早丧。姜自小体格魁梧，乡里儿童望之生畏。他的家乡是太平军、捻军起义活动的地区，姜投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军营请“杀贼自效”[(1)]，充当僧格林沁的卫队官。1863年因镇压捻军立功，提升管带。

1865年，清毅军将领宋庆因姜桂题魁梧勇敢，招致麾下。姜“自此入毅军由偏裨而登统帅”[(2)]。他先从毅军追击捻军张宗禹部，转战皖、豫、直、鲁镇压起义军。1867年平息捻军后，又跟随宋庆西征秦陇，因功得总兵衔，加“长勇巴图鲁”勇号。不久，随毅军从左宗棠奔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攻肃州时身受重伤。是役得授总兵，换清字“巴图鲁”勇号。

1875年，姜桂题回皖省亲，料理母亲的丧事。不久，被河南巡抚李鹤年请去南阳练兵。1883年，姜仍回毅军，随宋庆驻防旅顺。清廷为防备帝国主义进犯，派姜守卫旅顺持续十余年。中日甲午之战时，姜桂题、卫汝成、徐邦道等六支队伍驻守旅顺，由龚照玙统率，但各部互不协调，各行其是。日军进攻旅顺时，守军不战而退，姜桂题弃甲而逃，被清政府革职。

袁世凯1895年受命编练新军，1896年姜桂题应袁世凯之召入新建陆军，任右翼翼长。1898年新建陆军改武卫右军，次年12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姜桂题奉命屯兵山东泰安、青州（今益都）、潍县等地。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主力转移，与直隶义和团会合，迅速向北

京、天津推进。6月，八国联军入侵、占领北京后，西太后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准备乞和。李召姜桂题入京“拱卫京师”。姜秉承李的旨意，参与镇压义和团，又迎护慈禧和光绪回京，因“功”加太子少保衔，授紫禁城及西苑门骑马，赏穿黄马褂。1902年宋庆死后，原毅军即归姜桂题统率。1905年姜办理长江防务，驻浦口编练江防军。1908年，继马玉昆任武卫左军总统官，1910年任直隶提督兼统武卫左军。

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借用革命声势威吓清廷，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6人通电清廷，要求“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迫使清帝退位。姜桂题参与通电。民国成立后，姜桂题在军界尚有相当大的势力，所部毅军号称10万。1912年7月，袁世凯提名陆徵祥组织内阁，陆所提阁员名单被临时参议院否决后，袁世凯怒不可遏，指使其党徒散发传单和信件，恐吓议员，威胁将以炸弹从事。姜桂题为袁世凯奔走效劳，大宴参议员和各党派领袖，进行疏通，迫其就范。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杀害辛亥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张振武时，张受骗到北京后，姜桂题受袁命配合行动，出面召集军界袍泽大会，假意对张表示热烈欢迎，诱张坠入彀中。

1913年8月1日，袁世凯任命姜桂题署热河都统。次年6月，姜正式受任为热河都统。1915年袁世凯进行帝制的活动公开后，姜领衔上劝进表。9月，他又伙同段芝贵、倪嗣冲等人以安徽“公民”的名义呈具请愿书，谓“今日之政体，非君主立宪，不足以定国是，安人心”[(3)]，劝袁世凯早正帝位。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8月1日，国会在北京开会，张勋竭力排斥国民党议员，提出将“二次革命”中反袁党人概予罢免，姜桂题随声附和。9月，姜桂题参与张勋、倪嗣冲等联名通电，要挟解散国会，公然声称“不辞武人干政之嫌”。21日，张勋、倪嗣冲召开第二次督军团徐州会议，正式组织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制定章程，以巩固北洋团体、反对南方国民党

势力为主旨，张勋为盟主，姜列名参加。10月，姜桂题和张勋、倪嗣冲等十三省区督军、省长致电黎元洪，请定孔教为国教，谓“提议于国会，照旧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4)]。

1917年3月间，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发生矛盾。5月22日，张勋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姜桂题附和张勋，6月4日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并宣称要赴京进行“调停”。12日黎元洪在张勋胁迫下下令解散国会。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不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12月31日，姜与督军团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等16人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并请大总统冯国璋敦促参议院，迅将政府提出的组织法与选举法立即施行，作为新国会的张本。姜还积极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讨伐南方。他致电北京政府，催促曹锟迅赴前方，“以期早收统一之效，勿令坐失时机”[(5)]。

1918年8月，大总统冯国璋因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尖锐，通电辞职，9月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姜桂题立即随声附和，请大总统徐世昌“早日就职”。

1920年直皖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姜桂题“接近皖派，而亦爱戴东海。直皖祸作，声言派兵入京，保护总统”[(6)]。他奉徐世昌之命与张怀芝调停直皖之争，前往天津、保定，向曹锟、吴佩孚疏通。但曹、吴拒绝调和。姜、张奔走数次，毫无结果。后决定找曹锟的弟弟曹锐接洽，曹锐拒而不见，姜、张扫兴而归。徐世昌又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调停直皖之争的问题。姜桂题列席会议，他向徐世昌声称“嗣后决不再作调人”[(7)]。

1920年7月29日，姜桂题被徐世昌派兼管将军府事务，此系闲职，徒具空名没有实权。在北洋派系纷争中，他“意态消极，不近任何党派，盖亦军界中之超然派”[(8)]。1921年，姜以年老多病，迭次呈请辞职，未获准。9月，姜被徐世昌特派为陆军检阅使。1922年1月

16日，姜桂题病死北京。

---

(1) 《昭武上将军勋一位姜公墓志铭》，姜瑞鑫等辑《荣哀录》。

(2) 《昭武上将军勋一位姜公墓志铭》，姜瑞鑫等辑《荣哀录》。

(3) 全国请愿联合会事务所编：《君宪纪实》第1册，1915年版，第37页。

(4) 柯璜编：《孔教十年大事记》第8卷，宗圣会1922年版，第104页。

(5) 《公言报》1918年7月12日。

(6) 张一麐：《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17页。

(7) 信史编辑社：《段祺瑞秘史》，神州书局1921年版，第52页。

(8) 《新社会日报》1922年1月18日。

姜立夫

齐辉　李援朝

姜立夫，谱名培珣，学名蒋佐，字立夫。浙江平阳县凤江乡麟头村人。1890年7月4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出生于一个耕读世家，其祖父是增贡生，父亲姜炳阊是监生。姜立夫自幼父母双亡，由兄嫂抚养成长。少年时受到姨父黄庆澄的影响，聪颖好学，学习成绩优异。蒙馆肄业后，由其兄送到杭州府中学堂学习，与徐志摩、郁达夫等同学。

1910年6月，姜立夫参加游美留学处第二批游美考试被录为备取生。1911年到北京“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前身）第一班高等预科补习英语四个月。当年夏，以中美庚款留学美国，入读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州立大学。1915年6月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9月，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数学，师从库立奇（J．L．Coolidge）教授。1919年姜立夫完成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德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旋因兄长病故，于1920回国。在美国留学期间，姜立夫还结识了赵元任、胡明复等近代科学家，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20年，姜立夫接受天津南开大学聘约，出任算学系主任，与随后来校的邱宗岳、饶毓泰等同事共同构成了南开理学学科的基础力量。当时南开大学还是刚成立的私立大学，校长是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在张的领导下艰难起步。姜立夫在此时组建南开数学系，是继北京大学之后中国第二个开办数学专业的高校。由于经费和人才不足，南开数学系筹办之初，面临很大的困难。姜立夫是该系唯一的教授，因此往往身兼数职，既要研究又要领导整个系的日常工作，同时还要担任专业课教师，教授高等微积分、立体几何、高等代数、投影几何

等多门课程。他曾回忆说："一个人包一个系，我感到吃力"，幸而学生不多，"我用全力对付他们"。这种一人独撑一个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24年他的学生刘晋年留校任教后才有所改变。姜立夫十分重视数学文献的搜集、保存和整理。他利用有限的资金，亲自采购与引进了成套的重要丛书、绝版书、期刊及具有前沿研究成果的书刊资料，使南开大学的数学文献藏书量居全国首位。这些文献资料在抗战期间转移到了西南联大，为战乱时期中国保存了数学研究的基础文献作出巨大贡献。

姜立夫授课逻辑严密，分析透彻，善于把严格的推导和几何形象相结合。他的数学知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因此深得学生的喜爱和信服。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批改学生作业一丝不苟。在教学中，他重视对学生基本功的培养，大量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使不同的学生有良好收获。他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其中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孙本旺、陈省身等都是他的得意弟子。1923年，他承担了出国留学考试的命题工作，选拔了大批合格人才出国深造。同年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会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席，负责规范数学领域的科学用语。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十五年，1938年在他主持下《算学名词汇编》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数学名词规范工具书。1945年，他还编写了《数学名词》一书，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行数学名词的基础，使得数学名词的使用和命名更加科学规范，促进了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926年，姜立夫到厦门大学讲学一年，姜的教学对学生影响很大。他的学生江泽涵1931年来到北京大学执教，按照姜立夫的教学模式，跟班授课从严要求学生，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江曾说：姜立夫导师在帮助北大数学系完成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4年，姜立夫赴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进修两年。1936年回国后，他出任《中国数学杂志》主编。1937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南开大学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同转移到西南后方合并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姜立夫随同学校一起南迁至昆明，而家属则留在了上海。当时的昆明学术气息浓厚，各大学的数学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数学学术团体——新中国数学学会，姜立夫被推举为会长，陈省身为文书，华罗庚任会计，陈建功、江泽涵、苏步青等人为理事会理事。该团体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数学家，对于抗战时期中国数学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姜立夫主持了中研院数学所的筹备工作。该所筹建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购置外文资料所急需的外汇更难弄到手。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1941年—1943年数学所筹备处延聘了六位兼任研究员，他们是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1944年该所又延聘许宝騄、李华宗为兼任研究员，在这一年度到1948年，国内最优秀的数学家，或专任、或兼任，尽最大可能延聘到所，共在国内外各主要数学刊物上发表了近二百篇论文，内容涉及级数论、自守函数、群论、微分几何、多元空间、曲线论、矩阵几何、拓扑学、数理统计等多个领域，某些研究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以国内原有的研究基础和力量而论，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1946年，姜立夫辞去了数学所筹备处的职务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进修。在他推荐下，陈省身进一步负责数学所的筹备工作。1947年7月，数学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姜立夫被任命为所长。该所是当时数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机构，其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数学界的最高水平，姜为它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筹备数学研究所的同时，姜立夫主要课题球素和圆素几何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他创造性用矩阵方法来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采用二阶对称方阵和埃米尔特方阵依次代表有向圆和球，研究在圆素平面和球素空间对应于射影群、仿射群及度量群的辛阵群及其子

群下的几何学，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使古老的圆素和球素几何学面貌焕然一新，展现了新的发展前景。他把这些研究成果撰写成《论圆素和球素的矩阵理论》一文，发表在1945年的《科学记录》上。

姜立夫的社会兼职很多，除担任中研院数学所所长外，他还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科学研究补助金委员会委员、北京图书馆图书购置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曾说："我是美国退还一部分庚款去留学的，那当然不是美国的钱，也不是清政府的钱，我应该为全国人民做一点好事。我决心把西洋的数学一起搬来，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所以也需要数学……我愿把一生献给数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执行的内外政策日益不得民心，姜立夫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1948年6月他从美国进修回来就辞去了数学所所长的职务，但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9月，他当选中研院院士。1949年，中研院迁往台湾，姜立夫被迫同行，随后在学生的帮助下，于同年7月返回广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姜立夫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邀请到该校任教，此前陈曾任南开大学教务长，与姜立夫早有交谊。姜立夫欣然应允出任该校数学系主任。岭南大学的前身是教会学校，而在当时中国的教会大学很少办有数学系的。对此，姜立夫认为这是外国人不想让中国拥有基础学科，决心在这里办起一个数学系来。到岭南大学后，姜马上投入到数学系的筹建工作中，由于他的领导，岭南大学数学系在很短时间就已初具规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姜立夫出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及数学筹备组委员，1959年以后又出任中山大学第一、第二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广州分会副主任，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广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备委员，为中山

大学的建立和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启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中山大学数学系姜立夫一直担任几何教研组组长，教授解析几何、微积几何、几何基础、高等几何等专业课。他虽年已六十，讲课却依然思路清晰，表达准确，把枯燥的几何学讲得引人入胜，深得学生的欢迎。在教学的同时，他的科研工作又有新的进展。1954年他在中山大学以《圆素几何的新面貌》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带领一批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一般圆列的微分分类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他在中山大学时十分关注国外学术动态，大力引进外国教材，组织并参与翻译出版了苏联数学家穆斯赫利什维利的《解析几何学教程》、诺尔金的《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基础》，还有法国E．嘉当的《黎曼几何学正交标架法》。

1978年2月3日，姜立夫因病在广州去世。为了纪念他对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贡献，南开大学设立姜立夫奖学金，并矗立了姜立夫的铜像。

主要参考资料

吴大任：《姜立夫先生的生平与贡献》，《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3期。

江泽涵：《回忆老夫子》，《南开教育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期。

吴大任：《姜立夫先生和中国现代数学》，《数学进展》第19卷第3期（1990年）。

吴大任：《从辛勤培植到春色满园——怀念姜立夫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姜立夫：《辛群几何鳞爪》，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刘洁民：《姜立夫先生和中研院数学所》，《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1年第3期。

姜淑雁：《回忆慈爱的先伯父姜立夫教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蒋鼎文

余涉

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1895年1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生。父亲蒋子朗，在乡务农，由于嗜赌，家境日渐破落。蒋鼎文十岁入象山私塾读书，十五岁转入浬浦镇翊忠书院求学。1912年考入绍兴大通学堂，下半年转入浙江讲武学堂。毕业后，分发浙江督署守备队见习，后升排长、连长。1915年蒋鼎文失职远走广东。以后依附于国民党人蒋尊簋（伯器）门下，曾任职于援闽浙军总司令部。1921年5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翌年1月至桂林任北伐滇黔赣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谋，1923年3月回粤任兵站总监部参谋。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蒋鼎文进入该校，初任区队长、教官。由于他有早起习惯，经常被校长蒋介石碰到，遂给蒋留下良好印象。一次，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蒋介石与外国军事顾问前来观操，向蒋鼎文发问战术上几个动作，他一一对答，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不到一年，他就被蒋介石派任教导团第一营副营长兼第二连连长。

1925年2月讨伐陈炯明之役，蒋鼎文率领的东征军第一团第一营，与陈炯明军战于棉湖西北山地，左肋受重伤。蒋介石得知后，犒赏他5000元，并在他医伤期间任他为第一团副团长。8月编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时，升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中，蒋鼎文率第五团强行收缴总工会的枪械，并监视苏联顾问及其眷属。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蒋鼎文所属部队参加总预备

队，随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推进。在攻打南昌的战役中，蒋鼎文又一次负伤，旋被调任总司令部直属伤兵团少将团长。1927年4月任南京警备团长，旋又调宁波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市公安局长。不久，蒋鼎文被派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先驻杭州，后移驻南京。1929年初第一师改番号为第九师，蒋鼎文仍任师长。蒋桂战争中，蒋鼎文奉命从浦口沿长江西进武汉，因桂系李明瑞部被蒋介石收买倒戈，蒋鼎文未发一弹即进占武汉，被擢升为第二军军长，辖有原第九师和赵观涛第十师、陈诚第十一师。同年冬，蒋鼎文率第二军沿平汉路北上讨伐唐生智。1930年又在陇海路东段参与中原大战。他奔走东西各战场，被夸为“飞将军”。由于蒋鼎文在连年混战中为蒋介石立下战功，中原大战结束后，被委兼任陇海路西段警备司令。

蒋介石战胜各军事实力派后，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围剿”。1931年8月，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中，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师、五十二师开入江西，从抚州、广昌、宁都进犯中央苏区。9月向泰和集结时，他的先头部队第九师二十七旅在老营盘遭红军奇袭被歼。于是蒋鼎文改道北窜吉安集结，又在方石岭受到红军袭击，第九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被歼；所辖第五十二师六个团全军覆灭，师长韩德勤落荒而逃。以后，蒋鼎文又率残部从吉安开赶赣东余江，进犯红军方志敏部，驻守上饶待机而动。1933年第五次“围剿”，他被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军总指挥，率第九、第八十九两师开到江西永丰布防，继续进犯红军。是年11月，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反蒋。蒋介石立即派蒋鼎文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向福建进攻。蒋鼎文受命后，率第三、第九两师，会同其他各路共15万兵力，集结于浙闽赣边区，向福建进攻。由于贿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在泉州倒戈，削弱了十九路军战斗力；又派人潜赴闽南，收买地方武装股匪、地痞流氓、日籍台湾浪人，在十九路军后方骚扰，蒋鼎文军入闽后，只在南平附近与十九路军做过短暂接触，即一路下福州。

福建问题解决后，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四路“围剿”红军，1934年2月委派蒋鼎文为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将总部由福州迁至漳州，分兵两路向闽西红军防地进犯。他先集大军于闽西，巩固原防；继用碉堡封锁苏区，断绝物资流通；还在苏区周围实行“联保切结”、“保甲管制”等措施，规定发现红军要密报，因密报而破获者“重赏”，知而不报者和藏匿者以同等论罪。他赶筑公路，指挥各师沿路向苏区猛扑。10月，红军主力从瑞金、长汀、雩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蒋鼎文率部随即侵占会昌等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瞿秋白即于此期间在福建长汀被捕，后由蒋鼎文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处决的。第五次“围剿”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成立“驻闽绥靖主任公署”，蒋鼎文任主任，严令各“绥靖”部队清剿各地“民军”，加紧清乡。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鼎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12月，蒋介石电召蒋鼎文等人赴西安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西北红军，任蒋鼎文为“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嘱即进驻甘肃平凉。是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蒋鼎文亦被扣。17日，张学良让他拿了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和给宋美龄的信去南京。当时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斗争激烈，蒋鼎文避开何应钦，先去面见宋美龄，报告蒋介石的情况。22日，他与宋美龄、宋子文、外籍顾问端纳一道，飞回西安营救蒋介石。西安事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25日晚蒋介石被释飞往洛阳，蒋鼎文等亦于27日被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鼎文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这时，他仍然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把部队布防在韩城、潼关一带，遏制八路军的活动；并曾亲自前往青海，策动马步芳、马步青反共，形成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包围。1938年6月，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程潜任主任，蒋鼎文改任陕西省主席。1941年冬，蒋鼎文又被派往洛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蒋鼎文掌握西北军政大权以后，曾操纵陕西省银行先后两次发行辅币550万元，对当地物价的直线上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他又在重庆设立经营黄金、美钞的办事处，专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运到西安抛售，获取高利。至于向陕西人民摊派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当地人民曾作诗讽刺："可怜民已无多肉，便作羹汤有几餐？"[(1)] 他当时积敛的私产，其数字之巨，十分惊人。他的私人账房陆怡霖说："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石凤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数。"[(2)] 蒋鼎文将贪污所得，用于挥霍，狂嫖滥赌，生活糜烂。当时日本侵略者在黄河北岸济源县一带，张贴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的宣传画。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攻势，进犯河南地区。蒋鼎文得知敌人的动向，曾于3月中旬召集所属军以上将领举行会议，结果不是研究如何对付敌人的办法，而是研究了各军军官眷属及行李、重要文件迅速向后方撤退的计划。因此，尽管洛阳地势险阻，配备的兵力亦不少，但由于蒋鼎文耽于宴乐，玩忽职守，未经重大战斗，即于5月26日弃守洛阳，狼狈西逃[(3)]。日本侵略军逼近潼关，关中震动，舆论哗然。7月，蒋鼎文不得不"引咎请辞本兼各职"，逃往重庆。蒋介石任他为国民党军事参议会参议。

抗战胜利后，蒋鼎文弃官经商。他东归上海，依仗巨额赃款，先后在南京和平门外开办宏业砖瓦厂，在上海开办轮船公司。1947年1月蒋鼎文乘轮游美，居留九个月，又遍游欧洲十国，1948年2月回抵上海。不久出席国民大会，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他眼看国民党政府危在旦夕，即派爱妾蔡文媛到美国经营橡胶园，派胞弟蒋鼎五到香港开办振华公司。

1949年3月，蒋鼎文逃往台湾，临走时对其亲友哀叹说："此后以天为盖，以地为底，未知葬身何所？"他在台湾曾一度出任蒋介石"东南区点编委员会"主任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及"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病死于台湾。

主要参考资料

文史：《蒋鼎文其人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吴相湘：《蒋鼎文平乱释疑》，《民国百人传》（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虞庸：《飞将军蒋鼎文上将》，台北《浙江月刊》第9卷第5、6、7期，1977年5、6、7月出版。

---

(1) 朱幻牲：《我所知道的蒋鼎文》，浙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第1985号，第10页。

(2) 朱幻牲：《我所知道的蒋鼎文》，浙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第1985号，第15页。

(3) 张仲雷：《记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洛阳的崩溃和李家钰在溃逃中遇敌牺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79年第2次印刷本，第48页。

蒋方震

刘敬坤

蒋方震，字百里，别号澹宁，1882年10月13日（清光绪八年九月初二）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父蒋恩精医术；母杨氏为海盐名医杨笛舟之女。蒋方震年幼时，由母授以唐诗及四子书。九岁入张氏私塾。后就读于同族人设立的私塾，攻读诗书。蒋方震年十三丧父，与母相依为命；十七岁中秀才，在本乡设塾授业。1899年得桐乡县令方雨亭（方声涛父）之助，至杭州求是书院就读。1901年春赴日本留学，初入成城学校习日语，结识蔡锷与梁启超，参加编辑《浙江潮》。以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抱定建军救国思想，决心弃文习武，于1903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与李烈钧、张澜、许崇智、蒋尊簋等同学。1905年，在士官学校步兵科以第一名毕业，即以少尉资格在联队实习。

1906年，蒋方震自日本回国，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府，任督练公所总参议；同年9月，为免受旧军排挤，得准经日本赴德深造，在德国第七军任见习连长。在此期间，蒋遍游德国及意大利各地，并购置军事书籍及英、德等国文学书籍。1910年，随清廷使德大臣荫昌返国，在良弼禁卫军第一协任管带，良弼倚之如股肱。1911年，赵尔巽由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奏调蒋为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与奉天谘议局长吴景濂及蓝天蔚等谋策动奉天独立，响应革命。赵尔巽以奉天形势不稳，急调张作霖的巡防营，蒋知形势有变，急经北京南下至杭州。

1912年初，蒋方震受浙江都督蒋尊簋之聘为都督府总参议。浙督寻为朱瑞所夺，蒋至北京陆军部任职。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要求撤换校长事迭起风潮，袁世凯下令任命蒋方震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

于1913年元月到校后，对军校大加整顿，誓言：“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奈因整顿军校所需经费受陆军部多方阻梗，蒋于6月18日晨集合全校员生，略作数语自责后，即举枪自杀，全校师生惊骇不已。袁世凯闻讯，即请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派使馆军医平户及护士佐藤前往抢救。经查子弹已经穿出体外，无生命危险，由护士佐藤在保定照料。蒋与佐藤日久生情，于1914年结为连理，改佐藤为左梅。

蒋方震伤愈后，调任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与蔡锷时相过从，同感北洋军阀与已建立现代化国防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一日蔡锷至蒋家中深夜密谈后，即微服离京至天津。袁世凯知蒋方震与蔡锷关系密切，即命其至天津劝蔡锷返京。蒋至天津复与蔡锷、梁启超三人密议，由梁氏在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论》一文，蔡、梁两人即离津南下。蒋返京回报袁世凯“在天津没找到蔡锷”，迅即换装南下上海。旋应梁启超之召，至广州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任蔡锷为四川省督军兼省长。蒋方震应蔡锷电邀入川任督军公署总参议。时蔡锷患结核病已侵入喉腔，语不成声，蒋遂陪蔡锷赴日本就医。11月8日，蔡锷自知病势垂危，执蒋手叹息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我不死于对外作战，死有余憾！”[(1)] 事后蒋护送蔡锷灵柩抵长沙安葬。1917年2月，蒋偕夫人左梅由长沙至北京，任总统府顾问。时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与《大中华杂志》上发表有关军事论文，被誉为军事学家而名噪一时。蒋另撰有《军事常识》两册，译有斯迈尔的《职分论》。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奉命组织欧洲考察团，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参考咨询，蒋方震任考察团军事咨询随员。梁启超约请法国名流讲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诸专题，蒋任记录，学术眼界亦因之大开。不久，五四运动发生，蒋将所记的名流讲演记录稿整理出版，书名《欧洲文艺复兴史》。蒋并主编《改造》杂志，且常在《直报》及《时事

新报》上发表文章，所撰《裁兵计划》及《精兵主义》两文甚有影响。

其时，联省自治之说甚盛，蒋方震应湖南当局之邀，至岳阳出席联省自治讲演会；会后，留湖南参加该省制宪工作。1921年蒋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员，回浙主持制宪工作。1922年1月，他在北京与周作人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次年又与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

1923年3月，蒋方震返浙奔母丧后，乘火车北上，路过徐州，忽然若有所感地对同行者说："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半壁河山都会沦于敌手。我们的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2)] 这是蒋第一次表明我国对未来的中日战争应采取的防御形势与战略态势观点。

1924年9月，孙传芳任浙江督理，聘蒋方震为督理公署总参议。次年9月，吴佩孚自任十四省讨贼军总司令，联合孙传芳共同讨伐张作霖，特邀蒋为参谋长。蒋建言吴佩孚与广州国民革命军联合，但不为吴佩孚所容，乃辞职，至长沙晤唐生智后，即由湘返沪。1926年春，唐生智推蒋与刘文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正、副党代表；蒋介石则希望蒋方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方震在上海闻悉后，觉得自己刚辞了吴佩孚的参谋长，现在又跑到广州去当北伐军的参谋长，是没有气节的行为，拒往广州任职。

其时，孙传芳在南京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请蒋方震任参谋长，蒋拒绝出任，但常至孙传芳幕府中参与机要，希望孙能与北伐军合作，共同对付奉军，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后发现孙传芳也是一个"不足与谋"的人，即与孙断绝关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请刘文岛接蒋方震至南京晤谈。蒋方震指出，国民革命军以后遇到的外交第一线在日本，北伐进军华北，日本会出来阻挠；宜对日采取缓兵之计，尽量避免发

生纠纷。蒋介石即请其前往日本会晤朝野人士，说明国民革命的政策，希望得到日本方面的理解。

1929年初，蒋方震受蒋介石之托，劝说唐生智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接收桂系在冀东的地盘，为蒋削减桂系实力立了功。蒋介石深为赞佩蒋方震的才干，于8月请他至南京，沿途高悬巨幅“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并设盛宴为之洗尘。宴后，蒋介石与其至密室私语，请其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部讨伐冯玉祥，蒋以“为师者不可夺门人之席”而拒之。

12月，唐生智在汪精卫等反蒋势力驱动下，以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领衔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请蒋方震劝阻唐生智，而以军政部长一职相许。蒋方震拒受职，但密电唐生智“东不如西”，意谓东下攻蒋介石不利，不如西攻冯玉祥进兵西安。但唐不听其劝。此时原与唐联袂反蒋的阎锡山突发通电讨唐，一些将领也都纷纷离唐而去，陷于孤立的唐生智指挥所部冒大雪发起攻势，终难支撑而败。唐化装逃逸，蒋方震遂陷入窘境。1930年元旦，上海市长张群突至其寓所，劝其出国；接着刘文岛也来，说当局允拨五万元旅费资助出国。蒋闻言大怒：“我没刮地皮，没钱出国；别人的钱，我不要。”此时，蒋已受监视，移住杭州后又被软禁于西湖蒋庄。特务在上海寓所搜出他与唐生智通信的电报密码。数日后，蒋被解到南京三元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待审。李根源与张一麐两人具保请求释放，蒋介石虽批“照准”二字，但久无下文。直到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被拘禁几近两年的蒋方震才获得自由，返回上海居住。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蒋方震勇于为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策划抗战事宜。此后他深居简出，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研究中国历代兴衰治乱的更迭与对外战争的国防形势及战略态势。经过数年的研究和对世界局势的观察，蒋方震开始由“建军救国”的思想框架中走了出来，认识到经济实力为一国战力的决定因素，近代的战争乃是国力与国力的对比，建设国防必须要

求“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先后撰著《孙子新识》、《孙子浅说》、《国防论》、《法西斯与民主》、《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等论著。他从我国国防形势与战略态势的研究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古代外患主要来自北方，而现代的外敌入侵则起于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认为建设国防，必须分析清楚世界大势，认定中国当前假想的敌国就是日本。他主张实行民兵制，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3)]。蒋说，国民知识水准普遍提高的国家才得以立国；主张所有师范以上中等学校学生，须经六个月的军事训练，方可毕业；无中等学校毕业证书者，不得任常备役军官。这些观点，构成了蒋方震军事理论与战略思想的精华。

1935年春，蒋方震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向蒋介石建言：“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八百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我）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战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并指出：“修筑西（安）汉（中）公路实为建设后方抗战核心的根本之举。”[(4)] 蒋介石深以为然，即于5月25日电令宋子文限期筑成这条公路。

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筹谋对日作战之准备工作，特任蒋方震为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派赴欧洲考察总动员法的制定与实施。行前，蒋介石邀其至南京参观军事演习，并进行密谈，征求其对中日战争应采取战略方针的意见。蒋方震指出，在对日作战中，我军在沿海进行抵抗后，即应转入内地，尽量拖住日军，以候国际形势对我有利的变化。他说，这场战争只要一打，我们一定要打到底，绝不可中途妥协；只要我们拼下去，国际形势的变化会对我们有利的。他向蒋介石郑重指出，战争打起来，我国沿海地方大部分都要

沦陷，在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为了持久抗战，大本营要设在湖南芷江以西[5]。他与蒋介石的这次密谈，把多年以来深思熟虑的国际形势及对日作战的战略态势作了阐述，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1936年初，蒋方震偕夫人、女儿由上海启程赴意大利。在与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同船畅谈国际局势时，断定英、法与德、意是两个对立的阵线，日本定然会加入德、意阵线，我国进行抗日战争必然要与英、法站在一边。蒋方震在意、捷、德、法、英、美等国考察将近一年，深感我国实行战时总动员，必须改募兵制为义务兵制，深感公路交通对于国防的重要。他12月1日返抵上海，11日应召至西安。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访蒋说："先君很敬重百里先生。"多次求教，蒋方震为张学良策划：请蒋介石派员携其亲笔函至南京，以促和平解决事变。回南京后，蒋方震向蒋介石面述出国观感，并提出加快修筑西南公路干线、设置最高国防会议以统筹一切等重要建议，蒋深以为是。

1937年初，蒋方震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视察南北各地防务，在福州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会晤，认为中日战争绝不能免，且战争亦非短时期所能结束，一旦开战，战局必将由海滨西移；在杭州遇老友钱均甫，谈及中日两国局势称："除了打以外，别的没有出路。"并预言："一旦打起来，我们就用拖的哲学，拖到东方亚洲的战争和西方欧洲的战争合成一条战线。"7月，蒋受聘为庐山暑期训练团教官，作"义务兵役制"讲演，称其有五大优点："一曰征之能来，二曰来之能教，三曰教之能归，四曰归之能安，五曰临战焉，一令之下，应声而即至。五者若贯珠然，一不备，不足以成今日之征兵制也。"[6]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方震由上海驱车至南京，建议设置国防研究所，为蒋介石所接受。对于对日作战部署，蒋方震与唐生智作较多讨论，勉唐努力作战，以赎前衍。9月9日，国防参议会成立，蒋受聘为委员。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多数委员主张各级学校一律实行军事教育，蒋方震痛切陈词，力言培养抗战国力，教育为

根本之途，不可因战而废缓。蒋介石深以为是，后来任陈立夫为教育部长，实施大学内迁及设立国立中学的政策，并实行公费制度。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争取国际援助，蒋方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使身份，于9月出使欧洲，访问德、意两国，希望他们对日关系不要涉及中日问题。经多方奔走活动，意大利同意一亿元的物物交换贸易，为我国购得飞机、弹药、战车、高射炮及机械设备等；德国同意售给军械和化工成套设备。在与德国戈林会晤时，戈林表示愿“劝告”中日双方息战，蒋表明中国立场说：“中日之战，乃是日本发动进攻，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7)]

嗣后，蒋方震在柏林郊外暂住，撰写《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把日本“民权与王权”、“暗杀与守法”、“文治与武功”、“国粹与洋化”、“双重外交”的双重国格统统揭露出来，指出“日本的政治家天天在火山上跳舞”；并借用一老者的赠语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8)] 蒋方震于1938年5月由欧洲回国后，在香港撰文《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认为抗战对于中华民族，除了考试作用外，还能排泄体内的“毒细胞（汉奸），使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接着，又发表了《抗战基本观念》一文，指出中国为一农业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并称：“战争的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蒋方震就中日两军的战略态势作出比较说：“彼（日军）利速战，我持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并指出，我国应以平汉铁路以西“为抗战的总根据地”。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方震应蒋介石之请出任陆军大学代校长，全权主持校务。他往贵州遵义就职途经桂林时，应邀对国事发表意见五点：（1）抗战兵力应集中使用，（2）尽

量利用人力、畜力等交通工具，（3）学习使用新武器，（4）部队需配有辎重兵，（5）宜求战志（士气）坚定，坚持抗战到底。11月4日晚，蒋方震行至宜山时，猝发心脏麻痹症逝世。1947年3月，国民政府明令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

(1) 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2) 陶菊隐：《蒋百里传》，第55页。

(3) 蒋方震：《国防论》，蒋百里著，蒋复璁、薛光前主编《蒋百里先生全集》第2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4) 王蓬：《护卫国宝，功在千秋——记著名公路专家张佐周》，《人物》杂志1997年第2期，第87页。

(5) 陶菊隐：《蒋百里传》，第96页。

(6) 蒋方震：《义务兵役制》，见《国防论》第4篇第2章，《蒋百里先生全集》第2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7页。

(7) 陶菊隐：《蒋百里传》，第148页。

(8) 蒋方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百里先生全集》第3辑，第206页。

蒋光慈

娄献阁

蒋光慈，原名儒恒，学名宜恒，自号侠生（侠僧），笔名蒋光赤，此外还有蒋铁生、华希里、华维素、魏克特、李铁郎、陈情等。1901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安徽霍邱，祖籍安徽六安。父亲蒋从甫当过学徒，后来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和米行。

蒋光慈天资聪颖，七岁入塾，十二岁能赋诗填词，有“神童”之称。1914年，进河南固始县立志成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916年，他参加了由国文教师詹谷堂组织的读书会，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此外，蒋还爱读游侠小说，因受影响，有时好打抱不平。

1916年夏，蒋光慈考取河南省立固始中学，但不到半载，因反对学校对待贫富学生不平等，与校长冲突，被开除学籍。翌年夏，经朋友介绍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他在五中学习四年，品学兼优，受到校长刘希平和国文教师高语罕的好评。在校期间，一度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曾在1918年参加秘密组织“安社”（安即“安那其”的简称，是无政府主义的译音），并出版油印刊物《自由之花》。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身任五中学生会副会长的蒋光慈，立即组织同学投入斗争。5月7日，芜湖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参与起草宣言，谴责曹汝霖等卖国贼，反对北洋政府镇压示威学生，表示与京、沪、宁、皖各校一致行动。他带头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建议在墨写的传单上插鸡毛，称之“鸡毛报”，每当罢市之前及时传送至各商店，警告商人。商会会长汤善福对学生所提禁止日货的要求置若罔闻，激起众怒，曾被学生代表殴伤。当时他还时常写作白话文和新诗，给《皖江日报》等刊物投稿。他又加入河南曹靖华等人

组织的青年学会，并在会刊《青年》上发表文章。

蒋光慈同情俄国十月革命，他经常出入进步书店芜湖科学图书社，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介绍十月革命的著作，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基础。1920年春，得五中教师蔡晓舟的推荐，和吴葆萼同赴上海，通过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的关系，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专攻俄语。该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选拔和培养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而举办的一所革命学校。先后来这里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二十余人，他们不仅学俄语，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并经常参加群众运动和社会调查。同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蒋光慈被批准为团员。

1921年夏，蒋被选派和刘少奇等去苏俄，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驻莫斯科，曾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他们接触日多，友谊日笃。1922年，蒋光慈读了瞿的《赤潮集》有感，遂作《西来意》一诗相唱和，诗中把革命的苏俄比作当年的印度，把自己和瞿秋白比作取经的唐僧，希望在俄国“得到一点真经，回转家乡做牧师”[(1)]。蒋处处上进，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二七”惨案时，蒋曾写《钢刀与肉头》的诗，痛斥军阀吴佩孚。不久，蒋还创作《中国劳动歌》，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推翻贪暴凶残的军阀，解放劳苦同胞的锁扣”；“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2)]，去激励罢工工人。同年又为从法国转到苏联学习的同学萧三、陈延年等当翻译。1924年夏，蒋光慈由苏回国。

留苏期间蒋光慈创作了很多富有革命朝气的诗，后辑成《新梦》一书出版，使不少青年读者受到鼓舞，“迈上了革命的第一步”[(3)]。同时，他还著译有《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唯物史观对于

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等文，登载于《新青年》等杂志上。尤其是1924年8月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比较早地阐述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蒋光慈回国后，受党的派遣到故乡从事建党工作，创建了皖西第一个党小组，随后去沪，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事。1925年4月，又受党组织派遣至北方，给冯玉祥处的苏联顾问当翻译，并一度任冯部张家口军官学校教员。但是，蒋对军事教育不感兴趣，亦“不愿做一个政治家，或做一个出风头的时髦客”，一心想要成为一个“东方诗人”，一心想“圆成文学家的梦”[(4)]。他过分强调自己的爱好，常为不能专心从事写作而苦恼；同年10月，他甚至没有得到党组织允许就返回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工作。

蒋在北上之前曾参加创造社的活动；又与沈泽民等人以春雷文学社名义，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出文学专号，刊登有《我们是无产者》等诗歌，还在该报上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论文。“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北方，得到消息后，马上作了《血花的爆裂》一诗，声讨帝国主义、哀悼革命烈士，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大暴动”[(5)]。他这一时期的诗，多半都是忧国忧民之作，后来大部分收在诗集《哀中国》里。

当时，蒋光慈还创作了若干篇描写工农和其他革命分子的斗争生活，颇有启蒙作用的小说。1926年1月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书中的主人公汪中，出身佃农家庭，几经周折，最后走向革命，“为广大青年指出了一条奔向光明的路”[(6)]。由于受到读者的欢迎，此书七年之内重版了十五次。此后他又用十个月的时间完成八个短篇，后以《鸭绿江上》的书名印行。

同年秋，蒋同女友宋若瑜结合，不久宋因肺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为纪念亡妻，于翌年将他俩的通信集，即《纪念碑》一书出版。

1926年冬到1927年春，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蒋与起义的领导者瞿秋白、赵世炎等很接近，按照瞿的授意，只用了半月的工夫便写出了带有报告文学性质的小说《短裤党》，热情歌颂这一斗争。出版后被敌人指为赤化的宣传品。此时蒋光慈已经看出伪装革命的蒋介石的狰狞面目，表示："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我且把我的一支秃笔当做我的武器，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7]

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上海大学遭到查封，蒋光慈抱着美好的希望奔赴武汉，不料武汉的汪精卫也于"七一五"公开反共，他又返回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仍然坚持革命的文艺方向，创作并编辑了《野祭》、《菊芬》（又名《汉江潮》）、《最后的微笑》和《俄罗斯文学》（下卷为瞿秋白原稿）等书籍，交创造社出版部或现代书局出版。并与钱杏邨、杨村人、孟超等积极筹备《太阳月刊》。

《太阳月刊》于1928年1月问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阵地，蒋光慈任该刊主编。他在"卷头语"中宣称："向太阳，向着光明走！""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8] 接连在该刊上发表《现代文学及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等评论以及小说、译文等。为便于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他们还成立了太阳社和春野书店。在国民党反动当局高压之下，《太阳月刊》只出了七号即被迫停刊，不久春野书店也不得不关门。此后二年，蒋先后参加编辑出版有《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海风周报》、《拓荒者》等进步刊物。

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文艺界的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以及受国内外"左"倾思潮和路线的影响，此时蒋光慈和太阳社的成员曾一度与创造社发生过争论，并否认鲁迅在革命文艺战线上的地位和作用。蒋这段时间作品的思想主流是好的，但存在某些悲观情绪。1929年4月写成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有较多的消极成分，出版后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对此他感到苦闷，加上身体多病，故于8月去日本东京疗养。

蒋在日本迅速完成了另一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创作，翻译了苏联小说《一周间》。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后来印成《异邦与故国》一书出版。他还同冯宪章、楼建南（适夷）等组成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与日本进步文学评论家藏原惟人常相往来。此时蒋集中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思想上获得较大的提高。由于怀念祖国，同年11月底回到上海。

这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为了加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党曾派蒋光慈负责联系田汉的南国社，又被指定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蒋当选为候补常委，同鲁迅、夏衍一起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不久，因抵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受到责备并被开除党籍（其党籍后已恢复）。

同年11月，蒋光慈最后也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脱稿。这部小说以土地革命为背景，通过张进德、李杰等典型人物的塑造，生动地描绘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地主、组织农会、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现实，比较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9)]，是他创作道路更趋成熟的标志。该书已打好书版，未及印行即被查禁，后由朋友改名《田野的风》出版。蒋的其他著作也多被列为禁书。由于敌人的追捕，弄得他到处转移，生活极为困难。

1931年6月，蒋光慈病重化名陈资川住院，同年8月31日，因肺病和肠结核去世，终年三十岁（墓碑刻的是蒋资川）。他短短的一生中，不仅对革命文学理论作出了贡献，而且努力运用革命观点从事创作，“开拓了中国文艺运动最先的路”[(10)]。他的著作共有一百多万字（不包括翻译），解放后出版有《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蒋光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蒋光慈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种。

(1) 蒋光慈：《战鼓》，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34页。

(2) 《蒋光慈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14页。

(3) 孟超：《蒋光赤选集序言》，《蒋光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版，第1页。

(4) 蒋光慈给宋若瑜的信，即《纪念碑》，亚东图书馆1927年11月版，第138、196、143页。

(5) 《蒋光慈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0页。

(6) 哈晓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烈士》，安徽省民政厅主编《江淮英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39页。

(7) 《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第2版，第86页。

(8) 蒋光慈：《太阳月刊》1月号《卷头语》，太阳社编辑1922年出版，第1页。

(9) 吴腾凰：《蒋光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10) 方英：《在发展的浪潮中生长，在发展的浪潮中死亡》，《文艺新闻》1931年9月15日第2版，追悼号。

蒋光鼐

邱涛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于广东东莞南栅乡新基村（今三蒋村）[(1)]。其祖父蒋理祥为清咸丰三年探花，官翰林院庶吉士。父亲蒋子敏，光绪年间举人出身，曾任景山官学教习。

1903年，蒋光鼐的父母相继病逝，临终嘱咐他“弃文从武，以异日为民族干城”[(2)]。1904年蒋考入东莞师范学堂。1906年入广州黄埔的陆军小学（第二期）学习，并经同学陈铭枢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毕业升入南京陆军中学，与陈铭枢一起，积极联络同学，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调派军队进攻武汉三镇，蒋光鼐等军校学生赴武昌参加起义，立即被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登陆和收复汉口战斗，经受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11月，湖北军政府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蒋光鼐、陈铭枢等一百余名南京陆军中学学生立即被编为直属总司令部的亲随骨干部队。汉阳失守后，黄兴辞职离汉东下，学生军解散。蒋光鼐参加姚雨平广东北伐军，历任排长、连长等职。

1912年南北议和，9月蒋光鼐进保定军校（第一期骑科）学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激起了“二次革命”。蒋光鼐与保定军校同学三十余人毅然离校前往江西参加湖口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入黄兴等人创办的军事学校“浩然庐”学习。

护国战争爆发后，1916年4月，蒋光鼐参加云南护国军方声涛

部，任少校参谋。讨袁胜利后，北洋段祺瑞政府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蒋光鼐在孙中山元帅府卫戍司令部任警卫营一连连长。1918年1月，他在援闽粤军参谋长邓铿手下任参谋，积极从事促陈炯明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现粤军回粤的活动。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粤军进行整编，孙中山委派邓铿挑选素质较好的士兵组建粤军第一师，严格训练为全军模范，蒋光鼐在师部任参谋。1921年9月，他转任孙中山大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少校团副，并与团长李章达一起组建警卫二团，任中校团副兼营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蒋光鼐率部参加保卫战。1923年初，孙中山策动驻闽许崇智部粤军讨伐陈炯明，蒋光鼐任重建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肇庆、梧州讨伐陈炯明之役。8月，升任军部补充团团长。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大革命时期。同年秋蒋光鼐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1925年3月，蒋光鼐率部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中参加并取得棉湖战役的胜利，随后又在兴宁神光山大破陈军林虎部。第一次东征胜利后，蒋光鼐部回师广州，参与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7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广东革命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原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任该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升任第十师副师长兼二十八团团长。9月，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铭枢为平定南路总指挥，蒋光鼐率部参与广东开平单水口战役，大破邓本殷部主力。11月东征结束，蒋光鼐部进驻北海钦州。

1926年春，北伐开始，蒋光鼐专任第十师副师长，二十八团由蔡廷锴接任。蒋光鼐第十师所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取得了汀泗桥、贺胜桥大捷，10月10日占领武昌。陈铭枢、蒋光鼐都成为北伐名将。为了适应战争区域扩大的需要，国民革命军各部进行扩编。蒋介石于

12月间委任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不久宁汉出现裂痕，1927年3月陈铭枢辞第十一军军长职，由副军长蒋光鼐主持。“四一二”政变后蒋光鼐离开武汉投向南京，旋出任第二十二师师长。八一南昌起义时，蔡廷锴曾率第十师参加，起义军南下时又率部离去，辗转进入福建。蒋光鼐、蔡廷锴将部队恢复第十一军番号并进抵福州，迎陈铭枢从日本到福州复职。宁、汉、沪合流改组国民党时排挤汪精卫，11月拥汪的第四军张发奎发动广东事变，南京政府下令讨伐。蒋光鼐与陈铭枢等率十一军回粤，1928年1月与张发奎军激战于东江老隆、岐岭一线，迫使第四军退入赣南。

1929年1月，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响应蒋介石编遣全国军队的主张，把第十一军缩编为一师一旅，以蒋光鼐为第三师师长，以蔡廷锴为独立旅旅长。这时蒋、桂矛盾激化，蒋光鼐与陈铭枢等通电拥护中央，5月奉命伐桂，蒋光鼐在战前训话中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为统一和平，我们当以铁血拥护之，不容任何人破坏。”[(3)] 是年秋，第三师番号改为六十一师，蒋光鼐仍任师长。由于蒋介石以强硬立场编遣全国军队，削弱地方实力派，激起各派强烈反抗。在改组派的策动下，张发奎和桂系组成联军反蒋，兵锋直指广州。蒋光鼐师在陈铭枢指挥下，开赴广东花县一带与张桂联军激战四昼夜，击溃张军。蒋光鼐部并追击进入广西境内。1930年2月他受命任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率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三师再败张桂联军于广西北流。5月，蒋光鼐任第一纵队司令，率六十、六十一、六十三师尾追张桂联军入湘，6、7月间，在七塘一线击溃张发奎部。中原大战爆发，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奉命开赴津浦线对冯、阎作战。8月15日，蒋、蔡所部攻入济南，奠定胜局。17日，蒋介石以粤军功高，任蒋光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晋升上将军衔，获二等宝鼎勋章。中原大战结束后，调十九路军到江西赣州“围剿”红军，蒋光鼐希望本部休整不得，加之被蒋介石挑起的与蔡廷锴的矛盾，遂称病离部赴沪就医。1931年，宁粤分裂。3月蒋光鼐由上海抵赣州十九路军总部，欲与粤方联合反蒋。6月，入粤反蒋计划为陈铭枢所阻，蒋光鼐遂再次称病

赴沪就医，虽经蒋介石屡召而不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合作，按照协议十九路军作为卫戍部队调驻京沪。1932年1月，蒋光鼐接替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这时，日军不断在上海挑衅，国难当头，蒋光鼐愤然抱病出院率部做抗战的准备。他在向各部发出准备抗战的第一道密令中说：“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4)] 当天，蒋光鼐与陈铭枢、蔡廷锴、戴戟联名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表示：“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迥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滴血，即挽回一分国运。”[(5)] 正如陈铭枢所言：“蒋光鼐……对于抗日则无比积极。”[(6)] 1月28日晚，日军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奋起还击。蒋光鼐在真如前线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作战。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严正宣告：“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7)] “一二八”淞沪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敌军三易主帅。但由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使十九路军腹背受敌，后援不继，奋战一个多月后，终因寡不敌众，3月1日蒋光鼐下令退守第二道防线。至此，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告一段落。5月28日，在苏州举行了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上群情悲壮，挽联如林，蒋光鼐曾撰挽联：“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8)] 挽联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抗日将军的壮烈情怀！

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逸出蒋介石的控制，为其所不能容忍。战后，蒋介石即提出将该军调离京沪核心地区，调往福建“剿共”。6月1

日，国民政府特任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并明令裁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蒋光鼐对时局不满，辞不就职，离沪回广东东莞老家休养，从事公益事业，后经蔡廷锴等力劝，方于9月抵闽就职。12月，国民政府改组福建省政府，蒋光鼐改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1933年1月，他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纪念淞沪抗战一周年，指出只有抗战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生存。同月，蒋介石任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凌驾于蒋光鼐之上，分化十九路军的图谋十分明显，蔡不便就职，蒋光鼐力劝蔡廷锴以事业大局为重，从速接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职。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生存维艰，6月，他与陈铭枢、蔡廷锴确定联共抗日反蒋密约，并同陈联袂抵港、穗策动两广当局反蒋抗日。经过与红军多方接触，10月26日，陈、蒋、蔡派徐名鸿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签署《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蒋光鼐从此走上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成为他一生的转折。同月下旬，陈铭枢、蒋光鼐与各反蒋势力举行香港会议，决定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经过秘密紧张的筹备，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拉开了帷幕。上午9时，在福州体育场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蒋光鼐发表演说，指出“蒋介石南京政府卖国殃民，既不能保障人民安全，又不能保障土地完整，所以我们要打倒”。并宣布“本人自本日起，已不是南京政府任命的省府主席，乃是一个人民”[(9)]。当晚，大会主席团着手组织政府，推荐蒋光鼐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人民革命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决定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蒋光鼐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及下设劳动委员会主任。24日，他参与发起“生产人民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极为重视两广的反应，事变发动前夜，蒋光鼐与陈铭枢等联名致电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说明：“今民族存亡，迫在眉睫，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主发动”，望“本历来主张，为一致之行动，不特西南之福，亦中国再造之机”[(10)]。12月中旬，蒋介石十万嫡系精锐部队入闽，决心扑灭“闽变”。由于国民党反蒋各派并未响应，中共中央又处于“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下，再加以蒋介石武力镇压与分化政策，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蒋光鼐等撤离福州抵香港，他一手缔造的十九路军被肢解。

1935年7月，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并任代主席，同盟主张抗日反蒋。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蒋光鼐积极响应，敦促各党派联合抗战。11月，他致电国民党五大，要求南京政府积极抗日。“一二九”运动爆发，蒋光鼐与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也向该同盟解释了自己的“逼蒋抗日方针”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致信蒋光鼐、蔡廷锴，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的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11)]。西安事变后，蒋光鼐等发表共同抗日救国宣言，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开始。蒋介石即打电报给蒋光鼐等，请他们“克日来京，共赴国难”。9日，蒋光鼐到达南京，被蒋介石特任为国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官。1938年，他受命为第四战区参谋长，“对调整训练部队，整顿后方，制定作战计划有很大建树”[(12)]，对粤北战役的胜利建功甚大。1940年，蒋光鼐受命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2月，他任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蒋光鼐与李济深等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4月15日“民促”正式成立，成立宣言中号召“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政治”[(13)]。1947年夏末，他接受中共所交策反余汉谋起义的任务。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蒋光鼐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7月，他作为民促代表抵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委会。9月5日，他被推为民促中央常务理事，17日，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10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蒋光鼐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1月，他当选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

委员。1951年4月起，蒋光鼐连续三届连任民革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8月7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1954年9月，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4月，他当选为政协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并连任四届。1956年和1958年他当选为民革中央第三、第四届常务会委员。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他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届政协第一次会议。

1967年6月8日下午4时，蒋光鼐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12日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悼词中称蒋光鼐将军是中国共产党“最可靠、最忠实的老朋友”[14]。

---

(1)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蒋光鼐生平大事年表》，《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2)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蒋光鼐生平大事年表》，《蒋光鼐将军》，第241页。

(3)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蒋光鼐生平大事年表》，《蒋光鼐将军》，第245页。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5) 蒋光鼐：《淞沪抗战中的密令、通电、文件选辑》，《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6)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7)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蒋光鼐将军》，第142页。

(8) 转引自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四），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00—501页。

(9)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蒋光鼐生平大事年表》，《蒋光鼐将军》，第250页。

(10) 存萃学社编：《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670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12) 李以匡：《追忆抗日名将蒋憬公》，《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13)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蒋光鼐将军》，第254页。

(14) 李以匡：《追忆抗日名将蒋憬公》，《蒋光鼐将军》，第45页。

蒋介石

严如平

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介石八岁时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1)]抚育成人。蒋介石对母亲颇为孝顺。

蒋介石五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2)]。他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十余年，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一些新知识。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窳败，民族危机严重，又因他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3)]，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冬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振武学校结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10月，蒋介石闻讯武昌起义的消息，即整装回到上海，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时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4)]。案发后避往日本，在东京办《军声》杂志，年底回国。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蒋介石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1914年春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先后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和攻夺官署、江阴要塞等。1916年5月陈其美被害后，蒋去山东潍县，在居正、许崇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职。

袁世凯死后不久，蒋介石回到上海，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蒋介石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大埔、永泰。因军事受挫及受粤军将领排挤，几度辞职回沪。1920年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

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之建议未被孙中山采纳，于4月返上海。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避往永丰舰，18日电蒋“盼速来”[(5)]。蒋于29日抵广州，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四十余日，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赞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6)]。蒋由此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也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10月，孙中山编组“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蒋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7)]，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三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俄没有同意他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向北京进攻的军事计划很失望，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俄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

心，因而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别有用心。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苏联之行加深了他对苏联的认识和疑虑。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并决定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通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一再表示自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8)]，获得苏俄顾问的好感和信任。同时他在军校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他把军校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一支武装力量，于当年10月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于翌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于6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南方政权的大元帅府于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与原粤军一部组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信任和支持的蒋介石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蒋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继而又将握有军权的许崇智迫离广州，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接着于10月任东征军总指挥，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

1926年1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此时他疑惧汪精卫和苏俄顾问的某些举措，以为将削弱自己的军权甚或被放逐苏俄，乃于3月20日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和

纠察队的枪支，还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妥协方针，蒋介石在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的《党务整理案》，并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一个月后，又接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八个军约十万人。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克长沙后的半个月，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于9月6日占汉阳、汉口。吴佩孚残部死守武昌城。蒋介石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9月17日他离鄂赴赣，指挥江西战事。他下令第一、二军强攻南昌，连攻三日未克，牺牲甚大。其时，攻打两湖的第四、第七、第八军于10月10日光复武昌，蒋介石乃调第四、第七军入赣助战。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8日克复南昌。

江西战事奏捷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还主张把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来南昌，反对迁都武汉。他拒不出席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无视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猛烈发展的工农运动亦疑惧日增。蒋介石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他先后纵容或唆使暴徒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了一连串暴行。对于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则表示：对南京之“排外暴行”，愿负全责。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取得谅解。英、美等国要蒋介石出来“维持秩序”、“镇压暴行”，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

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蒋介石取得了上海的买办豪绅和附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从他们那里得到1500万元经费，还获得再有5000万元的许诺。

蒋介石在上海，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等人商讨“反共问题”，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支持。他下令取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当时盛传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一面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9)] 4月6日还把亲笔题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一面又于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南京，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一群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则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4月18日，蒋介石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他虽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但“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10)]。

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24日陷徐州。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饬无效，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11)]，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

蒋介石回家乡住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了会谈，以谋取得支持和谅解。蒋还至神户拜访了在日本休养的宋美龄的母亲，获允娶宋美龄为妻[(12)]。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

在国民党各派系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28年1月返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举他为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他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蒋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下令部属“忍辱负重”，绕道北上。6月初，战胜了奉系，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13)]，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1929年1月，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要将全国82个军205万人改编为60个师（每师一万一千人），以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对各派军事首领委以高官，但夺掉了他们的兵权。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与冯、阎、桂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1929年3月、11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月）、蒋唐（生智）战争（1929年12月）等多起战争。蒋介石用重兵进攻、分化瓦解等办法，一一战胜了对手。1930年5月又爆发了与阎锡山、冯玉祥交火的“中原大战”。这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联合倒蒋，于8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软硬兼施之下，阎、冯军在陇海线、津浦线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扩大会议”则无疾而终。

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介石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五次向中共的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经过四年的鏖战，迫使红军退出赣、闽、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一面在各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大肆

屠杀工农民众，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长征的红军。他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把长期未能控制的云、贵、川三省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纷争，以及社会舆论要求民主、法治的强烈呼声，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蒋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反蒋各派系又一次联合行动，以“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相号召，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调兵遣将部署对粤进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的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掌权，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我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一味妥协退让，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侵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

其间，蒋介石督饬外交部分别与有关国家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批准财政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统一盐税，征收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1935年在英、美的帮助下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还在全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在1927年至1936年间，公开举借外债14笔，约4亿美元，国内发行公债25种，约26亿元。蒋介石还支持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建立金融体系开始，继而投资工

商企业，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他竭力强化统治，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清查户口、编练民团、抽取壮丁、检搜缉捕等活动，并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他还建立了以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为中心的“党方”和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方”两个特务系统，通称“中统”、“军统”，专事破坏共产党和民主运动，并防范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他于1930年9月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的书籍。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个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以“四维”“八德”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加以推动，但收效甚微。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遂着手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他在这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14)]。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15)] 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做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

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在北平、上海的地下组织乃至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

但是，蒋介石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剿共”受挫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遭拒，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扣押。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的努力下，达成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承认协议，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16)]。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迫于全国军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形势，蒋介石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划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乃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17)]；同时调集九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严正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

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8]

此时，蒋介石还企望卢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他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调停。他对宋哲元在北平与日方进行的谈判活动也“极度容忍”。但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增援部队进入平津地区，结果延误了战机，使得大批日军从容入关，轻易击溃二十九军而于7月29、30日侵占平、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蒋介石急于取得各党各派势力的合作和支持。他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进行多次会谈，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谋在上海发起进攻，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了各地各派的军事首领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被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会议并决定对日作战方针为：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部署一部分军队在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蒋13日即下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揭开淞沪抗战的序幕。18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19] 9月，他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抗战。他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迅速调集73个师约四十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的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顽强狙击敌人，杀死杀伤侵略军五万余。但是，他在战略指导上没有把军力

和民力结合起来，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战斗力；在战术指挥上多是消极抗御，被动应战，不能及时有力地主动出击敌人；在战局不利时，又未能组织及时有效的退却，以致造成抗日军队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战争，期待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加以制裁和干预，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坐视日本侵华。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后来还派志愿空军来华助战。日本在淞沪会战中被困后，展开了诱降活动。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听取了他转述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日本侵略军直指南京。蒋介石调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兵，连同教导总队和第二军团共15个师约十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这个易攻难守之城。他在亲自指挥了一段外围阵地战斗后，于12月7日飞离南京。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酷杀害我国军民30万人以上。蒋介石于12月16日在武汉发布文告宣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20] 而日本方面于12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21]。蒋介石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22]，乃中止了与日本谈判的活动。

为了制订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蒋介石于1938年3月底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演讲里，表示了持久抗战的决心。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200人组成。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蒋介石被举为总裁；还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各条战线发动猛烈攻势，力图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决定全力防守。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的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介石将韩处决。1938年3月至4月上旬，我抗日部队在台儿庄同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蒋介石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大捷，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嗣后日军增调兵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线西进，直扑中原要地郑州。为阻挡日军的锐利攻势，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术，下令于6月9日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将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趋稳定；但豫东和皖北、苏北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黄河决堤后，日军改变进犯武汉的路线，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推进。蒋介石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为主，配置了一百二十九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一百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前后达四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四十万人以上，军力遭到重大消耗。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于3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

此后，日本加强“政治谋略”攻势，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的行径，以及他们后来叛逃投敌，表示了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1939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继续抗战的指导方针和防共反共问题。对于今后的作战部署，他提出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说“回复了（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是胜利”[23]。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宣称要对共产党“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24]。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

会”，会后又发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多种秘密文件，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摩擦。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940年秋提出要取消边区政府，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强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抗战初期允诺的一点民主、自由皆名存实亡，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均已所存无几。他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军令、政令应统一于中央”，限制和吞并中国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他下令在各县切实整编保甲，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实行“联保连坐法”。他操纵“中统”、“军统”两支特务系统，囚禁和杀害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他还批准发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查禁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他于1943年3月发表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共产党是“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6月，蒋将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胡宗南三个集团军四十多万军队，分兵九路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在七八月间进行了数十次挑衅。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包围华北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

其间，蒋介石出于战略与政略的需要，曾与日本有和议活动，不过他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和议的底线。对于孔祥熙等人欲突破底线的和议活动，则坚决予以制止。

为抗御日本侵略军的进一步侵犯，蒋介石先后在衡阳、南岳、长沙、西安等地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部署对日作战。但他并未把主力部队配置在第一线，督饬军队进击敌人，致使日军得以继续蚕食乃至鲸吞我国大片领土。国民党军队日趋腐败，在豫、湘、桂等战役中更是一溃千里。

日本于1941年12月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同盟国在中国、泰国、

越南、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他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他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了取消他们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新约。他还请美国训练和装备了一批国民党军队。

1943年11月23至26日，蒋介石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lt）、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开罗会议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并决定了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的基本方案。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但是他对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想要获得指挥中国军队全权的要求予以拒绝，并迫使罗斯福改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对于美国政府派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介石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已在筹划发动内战，以消灭日益壮大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他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有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做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25] 大会闭幕后两天，他就调动10个师的军队向苏浙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竟然下令伪军“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任命一批汉奸为“先遣军总司令”、“绥靖司令”、“挺进司令”等，让他们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唆使伪军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26]，不准参加受降。他要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报复”，要“不念旧恶”[27]。

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蒋介石把长期分布在云、

贵、川、陕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个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文武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壮大官僚资本。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28] 要中共"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29]。经过43天断断续续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增加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修改宪法草案、军队整编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但是蒋介石盘算的是如何"消灭中共"，他秘密下令国民党80万军队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展开进攻。虽因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调停下，蒋被迫接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经过周密准备，他于6月密令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又调动50万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他还不顾政协会议的协议，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发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凭借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拥有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至12月的半年间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进入1947年，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19日占领延安，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30]。在山东战场上，他命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兵团25万多人进犯沂蒙山区，但3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三次进攻均被粉碎，美

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也被歼灭。此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战略主动权已转入中共手中，各个战场的解放军相继转入反攻。蒋介石1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建立中原防御体系，12月又制定“南北两线”“分区防御”的战略，重新调整了各大区军事指挥系统，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他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颓势。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遭到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军费的激增，使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47年发生了六次物价飞涨的风潮，一年间物价上涨二十倍左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蒋介石督饬国民党军、警、宪、特强化统治与镇压，国民党统治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当选为总统，并获得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九十，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这些高压措施，造成市场无货，黑市猖獗，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不断失败，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间，被歼灭264万，虽然不断招募，但总兵力已降至360万，而能用于前线的只有170余万。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扩编机动兵团和后备兵团，实行重点防御。但他的部署还没有定当，人民解放军于9月12日发动了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据点，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陷入重围。蒋介石力图打通北宁路夺取主动权，调集兵力由陆海路援救锦州；又三次飞临沈阳，亲自

指挥和督饬。但是他无力挽回颓势，辽沈决战最终以国民党军被歼47万余人而告终结。接着平津决战又起。蒋介石鉴于东北已失，平津势难再保，乃命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由海、陆两路迅速南撤，以图多保存一些部队，但傅不肯南撤，而于1949年1月21日接受离城改编的办法，使古城北平获得和平解放。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部署了60万重兵，打算在徐淮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固守徐州，保住南京。但战略战术的失误与军心的涣散，使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决战中不断受挫而被歼灭。此时他的亲信幕僚陈布雷、戴季陶又相继自杀身亡。财政经济的崩溃浪潮，更是扰动得他寝食难安。他一筹莫展，遂派宋美龄前往美国求援，又告失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在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慄。”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是要“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31)]。他还企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但被一一拒绝。他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大事。他先已把亲信安插为东南和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加紧征集和训练新兵，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渡江。他也做了撤出大陆的准备，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的277万余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力谋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团赴北平。但是蒋介石认为“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32)]。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的国共“隔江分治”的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固执坚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4月20日解放军大举渡江，直指南京。蒋介石于4月22日

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他24日离开溪口老家，乘军舰于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企望利用坚固工事挣扎的20万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蒋介石见形势无可挽回，先由上海去澎湖马公岛，后转台北，在那里遥控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7月他至广州，组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抵抗；并出访菲律宾和韩国，谋求声援。他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无奈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蒋介石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湾后，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他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事实，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于1950年3月宣布复职重任“总统”。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凭借台湾的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庇护，1954年12月并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在台湾总结在大陆垮台的教训，与“副总统”陈诚一道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领给佃农等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大力“改造”国民党，加强专权统治，严密控制全岛居民。他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的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33)]，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抵制美、日等国的侵略势力对台湾的觊觎。他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使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达22年之久；但终究抵挡不住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于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驱逐。

蒋介石自1972年起多病。他于这年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的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死于台北。

蒋介石一生言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国民党官

方曾出版过他的言论集多种。台湾于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都只是有选择地收录了他的一部分著述。

作者附记： 本文初稿系作者与宗志文、郑则民共同研究、撰写而成，并经李新等同志审阅指正，付梓征求各界意见。现作者在初稿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订正。

---

(1) 据《葛竹王氏重修宗谱》和《武岭蒋氏宗谱》载：王采玉（1864—1921）乃浙江嵊县葛竹村（今划归奉化县）王有则之女，初嫁曹家田俞氏，不久俞病故，王带发入庵修行。后经堂兄、玉泰盐铺伙计王贤东作伐，1886年嫁蒋肇聪为继室。除生蒋介石外，尚生二女一子。据作者在浙江奉化的实地考察并查阅有关史料，蒋的家世是清楚的。曾有传说蒋父是河南许昌县衙师爷，蒋母先前嫁给许昌郑氏，蒋介石是出生在许昌的郑三发子云云，不确。

(2) 蒋介石：《报国与思亲》（1936年10月3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以下简称《言论总集》）第3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63页。

(3)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下简称《蒋介石先生》，1937年版）第1册第3编第1页记："因受内外潮流之激荡，感痛国族之陵夷，家庭之茕弱，在校未三月即决计出洋，立志革命。"

(4) 马叙伦：《陶成章之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0页。另有资料记载是蒋介石亲手枪杀陶的。

(5) 孙中山：《致蒋纬国电》（1922年6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2页。时蒋介石在宁波，通讯联络以蒋纬国名代。

(6) 孙中山：《〈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1922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1页。

(7) 蒋介石：《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1969年3月），《言论总集》第29卷，第353页。

(8)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讲话（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先生》第10册，第12页。

(9) 《申报》1927年3月29日。

(10)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11)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1日），［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以下简称《秘录》第6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1978年版，第175页。

(12) 蒋介石原有妻妾。1901年在家乡同毛福梅（1882—1939）结婚，1910年生蒋经国；1912年在上海纳姚怡诚（1881—1966）为妾；1921年又在上海娶陈洁如（1906—1971）。宋美龄的母亲原不同意蒋宋婚事。其时蒋表示已与妻妾离异，并表示要遵守基督教义，宋母方予允准。

(13)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第99号。

(14) 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1935年11月19日），《言论总集》第13卷，第523页。

(15) 蒋介石：《救亡御侮之步骤与限度》（1936年7月15日），《言论总集》第14卷，第318页。

(16)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17) 蒋介石致宋哲元手令（1937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3—585页。

(19) 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二）》（1937年8月18日），《言论总集》第30卷，第233页。

(20) 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2月16日），《言论总集》第30卷，第250页。

(21) 《德驻日大使给德外交部密电》（1937年12月23日），《德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18—1945》汇编第1卷第540号，华盛顿1949年版。

(22)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日），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2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军事政治经济党务之现状与改进的途径》（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6) 蒋介石致朱德、彭德怀电（1945年8月11日），《秘录》第1册，第76页。

(27) 蒋介石发表的广播演说（1945年8月15日），《秘录》第1册，第25页。

(28)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8日），转引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册，第430页。

(29)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195页。

(30) 美国政府的评论，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1949年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8页。

(31) 蒋介石：《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49年1月1日）《言论总集》第32卷，第207页。

(32)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存亡危急之秋》，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年版，第154页。

(33) 蒋介石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谈话（1967年9月8日），《秘录》第14册，第162页。

蒋梦麟

宗志文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生于1886年1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的祖父和父亲在上海经营钱庄，乡间有几百亩良田[(1)]，家境富裕。他六岁入塾，十岁到绍兴进中西学堂。时蔡元培任该校监督，故二人有师生之谊。

1899年，蒋梦麟全家迁居上海，他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学习英语。1900年全家迁回余姚。次年他到杭州，先入一所教会学校，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1903年曾回绍兴参加院试，考取秀才。1904年暑假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为去美国上大学做准备”[(2)]。1908年春，他考公费留美落选，暑假后自费到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先入旧金山加州大学农学院，半年后转入该校社会科学学院，以学教育为主，旁及历史与哲学。这时，同盟会在旧金山办有《大同日报》，刘成禺任该报主笔。他约蒋梦麟为该报工作。二人轮流撰写社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10年2月孙中山抵旧金山，蒋曾随刘前往谒见。

1912年夏，蒋梦麟在加州大学毕业，获教育学士学位。不久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教育，是杜威的学生。1917年6月，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次年6月辞职，旋帮助孙中山校订《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的英文原稿，搜集资料，核对数据等。这时他还是江苏省教育会理事。

1919年初，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五个单位共同组成“新教育共进社”，目的是直接输入东西洋学术。该社出版《新教育》月刊，蒋梦麟任主编。该刊

论述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评介欧美（主要是美国）教育思想和制度，翻译欧美教育家的著作，报道欧美各国教育情况，不遗余力。还辟有“亚东问题”，“世界知识”、“世界大事”、“世界新知”专栏，议论国内外政治问题。同年4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是杜威专号，系统介绍了杜威的教育思想。蒋梦麟写《杜威之伦理学》一文，介绍杜威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新教育》行销全国，每期达一万份。蒋任主编直至1921年11月。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蒋梦麟开始是支持的。他参加过6月16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但要求学生服从学校领导。不久他写了《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将五四运动比作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说：“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3)]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采取镇压态度，于5月10日离京赴杭州，北大学生不断南下挽留。7月中旬，蔡委托三十三岁的蒋梦麟代表他到北京大学代理校务。23日，他在北大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讲演，说“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不是根本办法。又说青年若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只有研究学术，提高文化，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他代理校务后，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北大原有的秩序，力图把学生拉到“一心尽瘁学术”上面来。9月，蔡元培回北大主持校务后，蒋任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五四”一周年纪念时，蒋梦麟与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诱导学生脱离政治运动，说：“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效的学生运动”[(4)]。9月在北大开学式上，蒋引胡适的话指责学生，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他要青年“此后，总要立定志向，切

实读书”[5]。

这年10月，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再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12月，北大二十二周年校庆时，蒋发表演说，提出北大师生今后努力的三个方向：第一是要研究西学；第二是要整理国故；第三是要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腐败不堪，学校连经费都难以为继，他提出的三个努力方向，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幹，愤而辞职，蒋梦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北京八所国立大专学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学校经费九个月，成立索薪团，集体向政府索薪，遭军警武力压制，乃决议罢课对抗。蒋梦麟不同意罢课，北大在他主持下，仍勉强维持上课；他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说知识的本职是发展学术、科学、思想，仍然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大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不可遏止。蒋梦麟为了“维持北京大学生命不使中断”的原则，反对学生罢课，因而不断遭到学生反对。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蒋当时是北京八所国立大专学校校长联合会主席，他谴责“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支持各校师生的爱国行动，因而为段祺瑞政府和军阀所怀恨。4月26日《京报》主编邵飘萍被奉军逮捕杀害。当晚蒋得悉他已被列入黑名单，立即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在那里待了六个月，后来找到机会逃离北京，先到上海，随即转往杭州暂住。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方面试行大学区制，任命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不久改为浙江大学）校长，主持浙江大学区，兼管浙江省教育行政事宜。次年10月，他继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旋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

蒋梦麟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心对因战乱遭到很大破坏的教育事业

进行整顿。在他主持下，教育部设立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研究并提出了改进教育方案，还公布了《大学课程标准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章程》，成立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等。1930年11月，蒋辞教育部长职。据他自己说，“因为关于教育方针的问题与政界元老意见不一致，被迫辞职”[(6)]。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1931年1月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北大因为经费困难，以致师资不足，图书缺乏，设备陈旧，学术水平不高。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当时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都在北大任教，他们很支持蒋梦麟。经多方努力，北大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100万元，很快设立了研究院，并增加设备，购置图书，后来又兴建了图书馆、地质馆和学生宿舍等。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日益恶化。蒋梦麟渴望有个和平的环境建设北大，不愿中日冲突扩大。1933年3月，长城抗战紧急。4月19日，蒋梦麟与胡适、丁文江一起会见何应钦，密商对日妥协问题，议定由蒋往见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W．Lampson），请其斡旋中日停战。蒋曾多次与蓝浦生会见。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梦麟极力拉拢和威胁，蒋均未为所动。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蒋梦麟领衔发表了一个反对分裂中国领土的宣言。不久，他听说日本人已将他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被逮捕，但没有避走。29日，日本宪兵径至北京大学邀蒋到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蒋即前往。日本武官质问蒋为何反对“华北自治潮流”？为何纵容学生进行大规模反日宣传？他进行了辩解，该武官乃要他当晚赴大连，亲向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解释。蒋梦麟不愿去。他说：“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如果全世界，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就要成为笑柄了。”[(7)] 日本武

官通过电话请示后，放他回家。不久，日本使馆又向北平当局提出，因蒋梦麟煽动学生抗日，要他们强迫蒋离开北平。北平当局劝蒋离北平，他没有同意，继续主持北大校务。

1937年7月初，蒋梦麟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平津沦陷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临时大学，迁往长沙；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与梅贻琦、张伯苓同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1941年7月，蒋梦麟兼任红十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往贵阳、桂林、衡阳等地视察红十字会及壮丁收容所的工作。他看到大批壮丁遭虐待而死亡的种种情况，上书蒋介石揭发说："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二十。"

1945年6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长后，蒋梦麟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3月，宋子文辞职，他亦随之离去。不久，任国民政府委员及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处理联合国援助中国抗战后期所剩下来的款项和物资。1948年7月，蒋介石任他为中美共同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10月农复会迁台湾。蒋梦麟到台湾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1964年6月18日，蒋梦麟因病在台湾去世。

蒋梦麟著有《西潮》（英文版）和《新潮》行世。

---

(1) 蒋梦麟：《新潮》，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0页。

(2) Chiang Monlin：*Tides from the 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P．60．

(3) 蒋梦麟：《改变人生的态度》，《新教育》第1卷第5期，1919年8月。

(4) 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副刊》1920年5月4日。

(5) Chiang Monlin：*Tides from the 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p．135．

(6) Chiang Monlin：*Tides from the 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p．204—205．

(7) 蒋梦麟：《新潮》，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7—49页。

蒋廷黻

陈宁生　熊尚厚

蒋廷黻，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人，生于1895年12月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其父和二伯父在邵阳靖港镇共同经营两爿铁器店兼卖鸦片，邵阳乡间略有田产。其父晚年任靖港镇商会会长。

蒋廷黻六岁进私塾，1906年春，与其兄同去长沙，进入明德小学。是年秋，转入湘潭长老会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和西洋史等课程。他天资聪敏，学习勤奋，进步甚快，受到美籍英语女教师林格尔的赏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22日湖南新军起义响应，但蒋因担心革命后会有一段混乱时期，可能耽误他的学业，对革命表示失望和困惑，于是跟着林格尔去上海，准备赴美求学。在沪期间，他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1912年1月，蒋廷黻由教会介绍赴美求学，进入密苏里派克学堂预科半工半读（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次年，向湖南省当局申请到官费[(1)]。1914年秋，进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 Ohio）历史系。“二次革命”失败后，汤芗铭督湘，将湖南留美学生官费取消，蒋只好再半工半读，毕业时获文学士学位。

1918年，蒋廷黻前往法国，为被征募赴法担任兵工工作的华工服务。1919年夏，他重返美国，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起初专攻新闻，幻想将来成为中国的报业大亨以左右中国政治。不久，他认为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只了解其表面，常随波逐流，无补时艰，于是改习政治。最后，他又认为政治仅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只有从历史入手，

才能获得真正的实际政治知识，于是就转学历史。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在美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了“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敦促中国政府代表向会议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等项要求，监视会议的进行。他们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活动，蒋廷黻是英文刊物的主编之一。

1923年春，蒋廷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劳工、特别是劳工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简称《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该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春，蒋廷黻由美回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系教授，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5年，他与丁文江结识，由于志趣相投，从而结成了政治上的同伙。他除埋头钻研外交史外，还到各处去旅行调查，或晋见“政要”，进行游说。

1928年5月，山东“济南惨案”发生后，南开大学学生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成立了天津反日会，蒋廷黻参与活动。一个月后，反日会遭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勒令停办，蒋即前往东北考察，研究东北建设中所引起的对日外交问题。同年秋，他和他的学生共同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主张用“族国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和平主义[(2)]；并且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建议对东北问题早做准备，以备对付苏联[(3)]。1929年5月，他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任历史系主任。他注重收集整理史料工作，特别重视研究故宫档案，留心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收买清末权臣的公文、信札，他认为学者拘泥于版本考证的治学方法已经过时，强调对中国近代历史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做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后，蒋与傅斯年等编撰、出版《东北史纲》。他在清华任教五年，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蒋廷黻在清华任教期间，逐渐成了胡适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一起，从事研究对日妥协让步问题，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在北平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胡适任总编辑，蒋廷黻为编辑，打着“独立”的幌子，为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效力。蒋廷黻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三四十篇政论文章，散布对日妥协言论。

蒋廷黻的言行深获蒋介石的赏识。1933年夏，蒋介石约他到牯岭谈话。他向蒋介石建议：应“结合政策和武力统一中国，先建立核心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4)]。翌年，蒋廷黻再一次受蒋介石的召见，又进言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破坏工农革命，说“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共党的宣传无用武力之地了”，这“就是行了釜底抽薪之法”[(5)]。

1934年8月，蒋廷黻以收集中国近百年外交关系史料的名义赴苏联及欧洲访问，行前蒋介石在牯岭向他面授机宜，要他研究苏联政治和试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他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把和苏联外交当局商谈的情况及时电呈蒋介石，受到嘉许。随后，他去德国、英国考察和收集史料。1935年9月，他从国外回到清华教课，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主义”。

1935年冬，经翁文灏推荐，蒋廷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任职期间，他在行政院里成立了一个行政效率研究会，延聘甘乃光主持。该会聘请一些教授到各省考察地方行政，目的在于改革“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6)]。他比较注意档案的管理，曾责成研究会深入研究档案的科学管理方法。

蒋廷黻进入行政院之前，他的职业是教授、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编写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专著，还撰写了《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百年的外交》等论文。在这些著作中，有些论点也是正确的，如认

为“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始”[7]等等。但由于他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辩解，故观点颇多谬误。

30年代后期，蒋廷黻脱离文教界而跻身于官场。1936年10月，他辞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孔祥熙推荐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12月，发生西安事变，他按照南京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密电指示，立即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诬称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苏联政府就此莫须有的罪名，向南京外交部提出反抗议。外交部长张群十分狼狈，即向蒋廷黻电询原委。之后，张群电责蒋，谓今后对外交涉非经外交部许可，不得擅自行动[8]。他的这一拙劣行动，招致苏联外交界的冷遇，任职年余，于1938年1月以述职为由离苏回国，同年5月在武汉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1年7月16日，蒋廷黻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特约讲师及中训团党政班讲师。其间，曾一度兼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发言人。8月，孔祥熙主持成立外汇管理委员会，他任该会委员。12月免去行政院秘书长兼职。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华盛顿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总部设于华盛顿。联总设中央委员会，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组成，美国前纽约州长李门（Herbert H．Lehman）任署长，蒋任联总中国代表，兼中央委员会代表。他与联合国签订了一项对华善后救济基本协定，并把这个协定带回重庆，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为了执行联总在中国的计划，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1945年初，他任署长。

1944年7月，蒋廷黻作为中国代表成员之一，出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New Hampshire）举行的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两个机构。

1946年10月1日，因与宋子文不和，国民政府解除了蒋廷黻联总和行总的职务。他怏怏不乐，只好暂时接受出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职务。翌年4月，当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6月，联合国分别在上海和马尼拉召开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蒋廷黻出席，并任主席。

蒋廷黻参与南京政府同美国订立的有损我国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1947年11月开始，蒋即担任南京政府驻联合国首席常任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台湾当局代表身份窃据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1962年他专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时，才辞去在联合国的代表职务。

蒋廷黻顽固坚持反苏反共立场。他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迭次提出所谓“控苏案”，由美国操纵表决，在联大第六届大会上通过；同时还利用非法窃据的席位，一再阻挠和反对联大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65年5月，蒋廷黻辞职退休，暂居纽约。他原拟在9月参加在美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后，即返回台湾定居，10月9日，在纽约病故。

---

(1) 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

(2) 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

(3) 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

(4) 蒋廷黻：《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

(5) 蒋廷黻：《未失疆土是我们的出路》，《独立评论》第47号。

(6) 陈之迈：《蒋廷黻其人其事》，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

(7)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页。

(8) 袁道丰：《蒋廷黻驻苏大使任内的事绩》，台北《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

蒋维乔

陈秉仁

蒋维乔，字竹庄，别号因是子，1873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蒋树德，“年十三弃书习工”[(1)]，一人做工赡养全家九口，生活艰难拮据。

蒋维乔七岁入私塾就读，十六岁因病辍学，在家自学，并教两个弟弟读书，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他在自学中偶然接触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使他“眼界一新”，于是对天文、算学、舆地、物理、化学等书籍“没头没脑乱看一阵，有看得懂的，也有不甚懂的”[(2)]。这时，他不但抛弃了八股文，而且连以往比较喜爱的词章也不大注意了。此后，他曾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未中举。

1895年6月，蒋维乔在岁试中名列第三，入南菁书院肄业。次年春，他又考入刚创办的常州致用精舍。南菁书院设在江阴，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专门研究经史、词章等。致用精舍则是甲午战争后，由原常州龙城书院经过改良后的一所书院，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其中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蒋维乔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的六年中，同时攻读两院课程，按月参加考试，为他的古文及“新学”打下了较深的基础。

1901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开设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五门课。新聘的理化教习钟观光于授课之余，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心醉其说”，“思想乃为之剧变”[(3)]。时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蒋经钟介绍，参加了中国教育会。1902年9月，因总教习丁立钧生病回乡，南菁高等学堂于无形中停顿。蒋遂随钟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

并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活动。不久，他返回家乡武进，与何海樵等人组织了“以变法与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每周演说，“以期开通风气”[4]。此年冬，蒋维乔等人又组织了体育传习所，“提倡尚武精神”，并由他任队长，于第二年春节初一开操，训练后上街游行，“以动社会观感”。这是常州前所未有的举动，致使“人人惊异”，遭守旧者“大肆讥评”[5]。

1903年2月，蒋维乔应蔡元培之聘，到沪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与章炳麟分别讲授国文。不久，又转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他于授课之余，为中国教育会的宣传阵地——《苏报》翻译日本新闻，“月得译资十六元，供生活之费”[6]。在中国教育会当年春季大会上，蒋维乔被选为监察。同年5月，爱国学社积极配合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训练，蒋任分队教练。6月，“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前，将爱国女学委托给蒋维乔。8月，蒋与钟观光召集在沪的中国教育会会员十余人开会，决定继续开办爱国女学，由钟任经理，蒋任事务，从而为中国教育会保存了唯一的秘密联络站。次年7月，他们又将爱国女学交回蔡元培办理，蒋仍任该校义务教员。1909年10月蒋接任该校校长。

“苏报案”发生后，蒋维乔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7]，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在恢复爱国女学的同时，进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蒋维乔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三人，以日本人长尾槙太郎、小谷重为顾问，“团坐一桌，互相讨论”，“每成一课，必至无可指摘，始为定稿”[8]。半年后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销路大畅；接着继续编成十册，风行全国。自此，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形式方备”[9]。嗣后，蒋还编辑出版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

蒋维乔在编辑教科书的同时，始终亲自任教，“以增加经验，扩展思想”，并将“所有心得发挥于教科书”[10]。当时全国缺乏小学教

员，蒋维乔于1905年6月发起并主持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三届师范学生。其后，他还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他于1910年编著的《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11]。

辛亥革命后，蒋维乔经蔡元培介绍，于1912年1月初加入了由章炳麟发起并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此时，孙中山正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蒋应蔡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后不满三个月，蒋协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庶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致二目红肿”[12]。蒋起草的《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1月19日颁行，明文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科”等[13]。

南北和议达成协议后，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蒋维乔随蔡于5月初北上，任教育部参事，审议学校法令及学校规程。7月初，他提议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临时教育会议，议决要案23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草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等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

1913年10月，熊希龄内阁组成，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与之意见不合，遂辞职南归，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14]。这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连续发布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同年底，蒋维乔以“无始”的笔名，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教育大政方针私议》、《硬教育与软教育》两篇论文，抨击新内阁教育部篡改民国元年颁行的教育宗旨，指出所谓“尊崇孔学为道德教育之本”的说法，“不过饰一孔学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15]。同时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有人以“硬教育”为幌子，企图恢复小学读经。他大声疾呼：“‘硬教育’欲施诸小学则万不能

行！”[16]

1914年8月，蒋维乔根据他长期坚持练气功、治疾病的体会，撰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该书出版后，畅销各地，到1927年6月重版达21次之多。1917年1月，蒋维乔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月。回国后，在京、津、沪、宁四地演说考察结果，并由蒋总其成，汇编为《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纪实》一书出版。9月，蒋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17]。自此时起，蒋维乔沉溺于佛学研究之中。他不但阅读佛经，请居士讲佛学，而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以至“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18]。1918年3月，蒋还建议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我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蒋维乔为江西教育厅厅长，蒋不就，辞职而归，旋又北上任教育部编审员。

1922年7月，在“苏人治苏”的风潮下，由黄炎培等人推举，蒋维乔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他在任三年，排除了各派系议员的种种纠缠，先后视察了全省几十所学校，对江苏省教育作了一些整顿。1925年初，“齐卢战争”重启，段祺瑞政府以附齐嫌疑的罪名，将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职，蒋维乔也于2月被解职。他在离任前夕，与黄炎培、江苏财政厅长曾孟朴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中拨出，组织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教育经费收支独立。

与蒋维乔被解职的同时，南京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该校原任校长郭秉文被解职后去欧洲，全校师生罢课、游行，群起反对新校长胡敦复，风潮半年不息。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按照“行政决于教务会议，教学决于教授会议，财政公开”[19]三条原则，奔波于宁、沪二地[20]，将东南大学维持了两年。其间曾于1926年4月偕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一月。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沪上，不问外事”[21]，每年春秋二季外出游山，后将历年所写的游记整理成《因是子游记》一书出版。

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其后历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达20年之久。他的许多学术专著多完成于此时，计有《中国佛教史》、《佛教浅测》、《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并与杨大膺合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

自1938年8月起，蒋维乔又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1941年7月起，他受黄炎培委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后，他曾两次赴香港疗养，1958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

---

(1) 蒋维乔：《先考少颖府君事状》，稿本。

(2) 蒋维乔：《我的生平》，《宇宙风·乙刊》第23—25期。

(3)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4) 蒋维乔：《鹪居日记》，手稿本。

(5) 蒋维乔：《鹪居日记》，手稿本。

(6)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7)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8) 《庄百俞先生谥议》，1943年石印本。

(9) 陆费伯鸿：《论中国教科书史书》，见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11)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年版。

(12)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13) 《临时政府公报》第4期。

(14)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15) 《教育杂志》第5卷第8期。

(16) 《教育杂志》第5卷第9期。

(17)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18) 蒋维乔：《我的生平》，《宇宙风·乙刊》第23—25期。

(19)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20) 当时东南大学商科学院设于上海。

(21)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蒋翊武

殷文

蒋翊武，字伯夔，湖南澧州（今澧县）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激于民族灾难，胸怀大志。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国家危在旦夕，蒋翊武连日哭泣，说："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1)] 周围的人听了都十分惊骇。1902年，蒋翊武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考入常德师范学校。该校当时集中了许多贤哲志士，颇为当地士绅所侧目，蒋翊武在校时即与同乡同学黄贞元以及刘复基等密切往来，互诉抱负，并秘密与会党联络，开展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黄兴密谋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起事，派宋教仁前往联络湘西会党。宋抵常德后，即与蒋翊武联络，共同筹划起义事项，不料事机泄漏，起义夭折。

随后，蒋翊武因涉嫌参与长沙起义而被学校开除，遂与刘复基等人专事革命，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反清革命大义，并设立机关部于常德城内的祇园寺。后来由于清政府的侦缉越来越紧，他们无法继续活动，遂决定离开湖南东渡日本，1906年蒋翊武抵达上海，不料生了一场大病，只得留沪养病，暂时肄业中国公学。中国公学集中了许多革命志士，蒋翊武如鱼得水，积极参加秘密活动，还与杨卓霖一起加入了"竞业学会"的革命小团体。不久，他又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以"孙文党羽"的罪名逮捕并杀害了杨卓霖，蒋翊武得知后悲愤异常，为避免暴露，决定暂时归里隐蔽。这时他以诗言志，"时或仗剑高吟，旁若无人，人亦不测其为何也"[(2)]。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诏令筹办预备立宪以欺骗群众。蒋翊武闻之异常焦虑，担心群众受骗上当，决定复出开展革命活动。便前往刘复基处与其商量，"吾辈所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

图，迟益艰难，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且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3] 刘复基欣然同意。

1909年秋，蒋、刘两人抵达湖北，蒋翊武得知湖北有“群治学社”的革命组织，遂暗赴天门、溠江一带进行调查。通过调查，他发现群治学社组织完善，成分纯粹，且尽属现役军人，便主动与之接近，要求入伍，经黄贞元介绍，遂投入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二营左队当兵，并加入了群治学社，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10年春，群治学社社员李六如等准备响应长沙饥民暴动举行起义，不料事机泄露，许多社员被开除军籍，有的则逃往他省，群治学社为隐蔽起见乃改名为“振武学社”，以杨王鹏为社长。不久，队官施化龙以杨王鹏“秘密结社，图谋不轨”向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告密，黎下令将杨撤职，蒋翊武因入营较迟，办事缜密而未暴露，得以留下，并被振武学社奉派暗中主持社务。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等人商议，又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假借学术名义开展革命活动，蒋被推为社长，王宪章任副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设机关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新军和军事学校学生许多人加入了文学社，使文学社成为武汉地区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4]。1911年广州起义之前，文学社决定届时响应，后因黄花岗之役失败，武汉戒严，起义被迫取消。同年夏秋间，文学社在各新军标营普遍建立了代表制，组织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刘公、孙武所领导的共进会亦全力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一些文学社社员同时加入了共进会，出现了跨社籍、会籍的现象。为避免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内部摩擦，刘复基、彭楚藩、陈孝芬、李作栋等人提议双方合作，蒋翊武以革命利益为重，慨然应允。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决定联合起事，并由蒋担任联合后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任参谋长，时间定于农历八月十五日即公历10月6日。

然而，就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协商联合举事时，意外地发生了南湖炮队事件。原来炮队第八标的革命力量比较雄厚，第三营左队正目梅青福和兵士汪锡久一贯比较活跃，受到反动官长注意，为免遭陷害，他俩决定请长假暂时隐蔽一下。同营士兵设宴送别，在醉意中，大家慷慨悲歌，惊动了反动军官。队官出来制止无效，便怒气冲冲要责打他们，士兵们也不甘示弱，便拖炮轰击，欲乘机起义。不料炮针被卸，炮库被封锁，又事先未经联络，无人附和，几个人只得四散逃脱，而炮八标第三营的军官也害怕事情闹大会妨碍他们的前程，仅将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了事[(5)]。但此事后来还是传到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耳中，他知道武汉革命运动已经波及新军，便对新军严加防范，下令各标营军官收缴士兵的子弹，严密注意其动向。起义被迫推迟到农历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夜12时。

10月9日，亦即准备起义的当天，孙武等人在宝善里总机关部楼上赶制炸弹，准备起事，刘公之弟刘同站在一旁观看，不慎将手中纸烟火灰飘入炸药中，引起爆炸。孙武炸伤面部，被送往日人开设的同仁医院医治，刘同、刘燮卿、李淑卿等涉嫌被捕，屋内所有准备起义的炸药、旗帜、文告、袖章、名册、印信等件，均为捕房搜去，由俄人移交武昌江汉道解交督署。瑞澂等十分惊慌，立即实行江禁，并下令巡警道王履康根据名册闭城搜捕，各营官兵不准请假外出，一时间人心惶惶。革命党人聚集到武昌机关部商讨对策，蒋翊武亦已从岳州巡视赶回。由于他事先得知黄兴有建议推迟起义的电报，而中部同盟会总部又没有关于起义的明确指示，便力主推迟起义。可刘复基却拔出手枪指着他说："不可！君为总司令，今事势危迫如此，而独犹豫，岂畏死耶？"[(6)] 于是蒋翊武与大家商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蒋随即以总指挥名义发布命令，以当晚12时武昌中和门所驻炮队的炮声为号举行起义，各按原定的地点发动进攻，并派员将命令立即分送各部。不料清军防范森严，城门已闭，给炮队的命令无法及时送到。

离起义只剩半个小时了，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内，焦急而兴奋地等候起义信号的炮声。忽然，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刘复基断定是军警前来捕人，便拿起炸弹掩护其他同志逃避，军警破门而入，已经走到楼梯口了，刘复基立刻扔下炸弹，不料却误中楼梯，反而反弹过来炸伤了自己，当即倒在地上，乘着军警惊恐和稍许退却的时机，蒋、彭等越过后墙而逃，爬上了邻近屋顶，可是由于梁木塌陷，掉入邻家被捕。蒋翊武当时穿着一件枣红马褂，拖着一根大辫子，土头土脑的，没有引起军警的注意，便趁机逃出，隐蔽在京山[(7)]。

就在蒋翊武逃出武汉的那天，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第八镇工程营后队正目熊秉坤等面临军警大肆搜捕的险恶形势，先发制人，发动起义，各营纷纷响应。总督瑞澂等稍事抵抗就弃城逃跑，武昌随即光复。随后汉口、汉阳亦相继光复。起义军开始筹建政权，可当时孙武因受伤在医院就医，蒋翊武又逃亡在外不知去向，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家商议以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当蒋翊武得知武昌起义光复的消息于10月14日回到武昌时，军政府的组织已略具规模，蒋仅被黎元洪任命为军事顾问。这时，蒋翊武鉴于鄂军政府内改良派势力颇盛，便大力加强文学社革命组织，并加强军队建设。“将文学社一般同志，随便委派所有各军队内，中下级教官均参入有人，其他各机关亦参入之”[(8)]。当时文学社会员詹大悲在汉口主持军政分府，蒋就在汉口扩充民军组成两个支队。同时派遣大量文学社同志分赴汉川、京山，帮助梁钟汉、刘英建立地方部队。随后，军务部副部长蔡绍忠因故辞职，革命党人推荐蒋翊武补蔡之缺，可是实权却操纵在部长孙武和副部长张振武之手，蒋只是赖此以加强与文学社同志的联络，支持他们的工作。

11月2日，黄兴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至前线督师时，特任蒋翊武为经理部部长。11月26日，黄兴辞去战时总司令职，黎元洪命万廷献继任，并任命蒋翊武为监军。万就职不到几天，

就知难而退，由蒋出任战时总司令职。这时鄂军政府内文学社、共进会等派系之见日益加深，蒋所颁布的防守命令和作战部署，常被共进会成员说成是“乱命”，斥之为“糊涂竖子”。蒋翊武就任数日，深感无法施展，亦提出辞职，战时总司令一职也随之撤销。12月8日，黎元洪任他为北军招抚使，至汉口办理招抚工作。

1912年2月，南北议和期间，文学社成员竭力反对南北议和，主张拥戴孙中山、黄兴，反对袁世凯、黎元洪，因而接连发生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被黎元洪查封，一些文学社成员参与“将校团”、“义勇队”、“碧血会”等以“群英会”名义的暴动而被镇压的事件，使蒋翊武处境越来越困难。

1912年4月，蒋翊武被袁世凯政府授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蒋辞而不受。同月，同盟会鄂支部成立，他召来同志开会，提议并一致通过决议将文学社停止活动，社员一律加入同盟会。黎元洪认为这是蒋翊武扩张势力，再三致电袁世凯要求调蒋入京，委以高等顾问名义。蒋入京供职后，因对袁素无好感，不久就请假出京。

1913年春夏，因宋教仁被刺而爆发“二次革命”，7月25日，湖南都督谭延闿、长江巡阅使谭人凤宣布湖南独立，委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蒋发布公告，声言将取荆襄、捣武汉、直指河南。8月13日，湖南讨袁军失败，谭廷闿宣布取消独立，陈复初等均出走，蒋处境十分危险。原湖南省议会议员黄佑昌为他联络日本军舰，准备到日本暂避。但其幕僚易俊民建议他暂避广西，以作他图，说自己在广西多年，与广西军官交往甚密。9月2日蒋即趋避广西，不料行至全州兴安县唐家冲时，被统领秦步衢所部拘捕。其友人闻讯，立刻向桂军师长陈炳焜求情。陈表示秦步衢拘蒋后，除电报师部外，还同时电京报功，所以必须等候复电，再作处理。不过他根据常理推断，释放蒋已是不可能的了。等蒋被押到桂林时，陈命营长贲克昭负责看守，并派刘家正好好招待他。不久，黎元洪以副总统兼参谋总长的身份，通电袁世凯要求处决蒋翊武，袁乃电令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当刘家正将

袁世凯的电令给蒋翊武看时，“蒋神色自若，慷慨而谈，向刘痛论讨袁之必要，谓此獠不除，必为民国之害云”[9]。又问刘，天气太热，可否改在傍晚执行，刘表示同意。9日下午4时，刘家正备酒席款待，蒋饮酒食肉如常，饭毕赴丽泽门外行刑。行刑前，蒋仍向观众演讲国民大义，慷慨激昂，闻者无不感动。行刑兵士亦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排长见状害怕发生变故，拔出手枪即向蒋身后射击，蒋遂英勇就义。

蒋在就义前曾写绝命诗四首，其中一首为：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10]

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时，追念蒋翊武为国尽忠，特立纪念碑于蒋遇难处，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于碑上，并由胡汉民作碑记。

---

(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66页。

(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67页。

(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68页。

(4) 许和钧：《蒋翊武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106页。

(5)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20页。

(6)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7页。

(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72页。

(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81页。

(9) 万武：《蒋翊武死难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0) 万武：《蒋翊武死难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蒋作宾

江绍贞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生于1884年3月4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七），其父以“务农为生”[(1)]。蒋作宾幼时在家乡就塾，十五岁时考取秀才。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等同舍，经常议论时政，萌发革命思想。1905年毕业后被选拔为官费留日学生入东京振武学校。8月，加入同盟会。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翌年7月毕业返国，由清政府派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习，1909年参加清政府举行的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获优等第二名，调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他在为陆军部接管北洋六镇、排斥袁世凯的势力中发挥作用，受到陆军部大臣荫昌的信任，1911年擢升军衡司司长。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后，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电促清廷立宪，清政府大为震惊，急派蒋作宾等往滦州对张部进行所谓宣抚。蒋到滦州后极力策划张绍曾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趁清军大举南下之际，举兵夺取北京。事为清廷侦知，时任清廷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指派周符麟前往石家庄收买吴的卫队长马步周，11月17日吴禄贞遭马步周暗杀，张绍曾随之被调职，其计划夭折。蒋便往沈阳谋与蓝天蔚在奉天举兵独立，行至山海关，闻蓝已败。他感到在清政府势力强厚的北方不能有所成功，遂南下到了武昌。此时，革命军在汉阳作战受挫。蒋急往九江请援兵，到浔后被推为九江都督府代参谋长。蒋即派江西民军两队往湖北广济、黄冈一带牵制清军，诱其东移，缓和了武昌的局势。年底，蒋受黄兴电邀赴上海，参加临时政府筹备工作。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蒋作宾被任命为陆

军部次长。他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陆军部总长黄兴提出建立南京、武汉、北京三重点的计划，在此三处建立由革命党人切实掌握的军事力量。他的建议被采纳后，即在南京参与编练第八师的工作，同时收容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学生成立南京军官学校。他又往武昌向黎元洪建议多用同盟会员，改练湖北新军。

南北和议告成，唐绍仪组织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蒋随唐北上，仍任陆军部次长，总长为段祺瑞。蒋作宾打算在北京建立第二个军事重点，并计划将第八师调驻北京或热河，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防范，而未能实现。6月，唐绍仪辞国务总理职，袁命陆徵祥组阁，提名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但由于参议院中同盟会员的抵制，而未能通过。

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失败，蒋作宾在南京建立的军事基础遭瓦解。他在北京无所作为，于袁世凯酝酿帝制时称病离职，后被幽禁西山。至西南各省起而护国讨袁，袁世凯为利用蒋拉拢黎元洪帮助挽回危局，才将他解禁。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的实权则掌握在段祺瑞手里。段挽蒋作宾出任参谋本部次长。蒋在黎、段矛盾冲突中居间做了一些调和工作。由于黎、段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翌年张勋复辟，在危急中蒋作宾帮助黎元洪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不久段重任国务总理，为拉拢蒋作宾，授为翊威将军，派汤化龙前往挽留。蒋深知段难以共事，乃拒绝，于7月间南下到上海。9月经孙中山同意出国考察国际局势，先后到美国、法国、东欧巴尔干及土耳其、希腊等地。

1919年2月，蒋作宾由欧洲回国到广州。当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军阀把持下名存实亡。蒋为实现孙中山打倒桂系军阀、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的计划，与孔庚、何成濬、夏斗寅等人一起筹划先夺取武汉。当时武汉为湖北督军、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所盘踞，王在湖北的残酷统

治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懑。1921年7月，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联络湘军赵恒惕攻鄂，主张“湖北自治”，蒋作宾参与这一行动，并被推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兵至蒲圻，王占元弃职潜逃天津。王虽然被驱逐，但盘踞河南的吴佩孚以新任两湖巡阅使名义率北军南下，顺收渔人之利，使上述计划未能实现，蒋便偕孔庚返粤。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在桂林组织大本营，挥师入湘进行北伐。蒋作宾被任为大本营参议，参与军事计划的制订。年底，师次桂林，正待出兵之时，受到留守广东的陈炯明暗中掣肘。1922年孙回师广东，改道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蒋也随之前往。正当北伐军向江西胜利进展的时候，陈炯明公然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在叛军杨坤如部围困中逃出韶关，到广州时又遭叛军叶举围捕，蒋乘港轮脱逃，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旋奉孙中山之命，到沪联络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浙江督军卢永祥，酝酿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以打倒陈炯明勾结的直系军阀。蒋除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外，又往沈阳参加姜登选等人建立反直军事力量的活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电邀北上，蒋作宾到京随侍左右。翌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蒋滞留北京观察形势变化。是年冬至次年春先后往河南、江西动员岳维峻、方本仁等响应北伐，但因广州方面动作迟缓而未收效，蒋复返广州。

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被国民政府派为湖北宣抚使，8月11日随蒋介石到达长沙，对鄂赣境内的军阀部队做了一些争取工作。17日，又奉派往沈阳劝说张作霖不要帮助吴佩孚南下。南返时，武汉、南昌已为北伐军光复。

蒋作宾到达武汉后，被任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随着武汉革命阵营与蒋介石斗争的白热化，蒋作宾于1927年1月潜往南昌。他向蒋介石诬称“共产党在武汉另有企图，国民党同志变节者甚众”[(2)]，建议蒋介石招降孙传芳所部陈调元，先期夺取安徽，然后取南京。这一建议正合蒋介石的意图。他随即被蒋介石派往安庆，时陈调元已经易帜，便偕陈至南昌，与蒋介石筹划进取南京之策后，前往安庆组织省

政府。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蒋作宾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4月，蒋介石继续北伐，蒋作宾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随军北上。“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率军撤出济南。蒋作宾随后于5月9日从济南突围而出，随蒋介石绕道北进。6月，到达北京，不久战地政务委员会解散，蒋作宾转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

是年10月，蒋作宾由国民政府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兼驻奥地利公使，11月前往柏林赴任，首次与德外长斯特莱斯曼会晤时，提出德国应与中、苏连成一气的主张，颇受德国朝野的重视。他还取得德国同意，派前任参谋总长塞克特等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翌年3月，蒋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国联军缩会议，在大会上首次用中文发表演讲，引起震动，不少与会者视为中国的光荣。会议期间，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季维诺夫主动向蒋作宾提议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为将来复交行动铺路，蒋虽十分赞同，但未得国民政府的同意。1931年春，蒋辞公使职，途经苏联考察后回国。

蒋作宾回国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占中国东北，他力主对日直接交涉，向国民政府提出设立中日交涉委员会的建议。他的主张符合国民政府内一部分人的愿望，8月底遂被任为驻日公使。就在他赴任途中，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幻想国联制裁日本，避免与日直接谈判。蒋抵日后，迭电外交部不要寄希望于国联，并立即与日本外相币原谈判，条件是先由中国允许给予日人土地商租权以交换日本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然后再作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谈判。但他的这一建议，由于一方面受到国民政府的阻止，另方面亦因币原受军国主义分子的排挤去职而落了空。接踵而来的是日本侵略的进一步扩大，蒋作宾只能是遵照国民政府的训令，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些书面照会，在抑止其侵略上毫无作为。1933年3月上旬日军侵占热河后蒋被召回国。9月蒋介石召开牯岭谈话会，确定改善对日关系，10月蒋作宾以“携有解决中日问题之有效训令，当

以此尽力于中日友谊之改善”的“使命”返任。

1934年4月，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妄图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蒋作宾遵循国民政府的旨意，于4月26日访晤日本外相广田，向广田保证中国并没有准备任何行动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广田则得寸进尺地向蒋要挟：今后国际对华援助，中国必须事前商诸日本。

1935年1月，广田高唱“中日亲善”的调子，蒋介石、汪精卫采取了一系列讨好日本的措施。5月，中日双方公使馆升格，蒋作宾被任为首任驻日大使。6月，国民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蒋作宾再次回国，向蒋介石、汪精卫请示进一步“亲善”办法。他向记者表示不因当时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这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国交的政策”[(3)]。9月，蒋作宾返东京任所后立即会晤广田，提出中日亲善三条基本前提条件：（一）中日两国平等享有与遵守国际法规定之独立国家权利与义务；（二）中日两国对于一切非友谊行为不得再行发生；（三）中日邦交回复正轨，两国间一切事件循和平外交手段以求解决。并向广田说明中国虽然不能承认“满洲国”独立，但可以置之不问。10月7日广田召见蒋作宾反提三原则，大要为：（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中国事实上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4)]。声称这是中日提携的绝对必要条件，中国政府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就可逐步商议中国所提三原则。蒋向广田当面表示：取缔排日言行已有事实表现；承认伪满需请示政府再行答复；对共同防共的方法和地域可以研究。广田希望蒋作宾回国后能担任外交部长。

由于当时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达到高潮，全国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加之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演变，蒋与广田的谈判没有能继续发展。同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继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职，蒋作宾的驻日大使也随之被免职，改任内政部部长。

1936年12月初，蒋作宾往西安视察，适西安事变发生，被幽禁。迨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南京，担任国民大会全国代表总选举事务所主任。

“七七”抗战爆发后，蒋作宾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上任仅两个多月即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替。随后往重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0年冬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主任。1942年元旦，高血压发作，卸职休养。同年12月24日因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在重庆病故。1943年6月12日国民政府追赠蒋作宾为陆军上将。

---

(1) 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版，第3页。

(2) 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版，第44页。

(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08页。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页。

焦达峰

周天度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人，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家有土地五百余亩，父亲担任过地方上的团总[1]。焦达峰五岁入私塾，十五岁上浏阳高等小学，十八岁加入哥老会，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随后转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肄业，与禹之谟交好，受禹及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倾向革命。

1906年，焦达峰参加了萍、浏、醴起义，曾任起义将领李金奇的参谋。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不久加入同盟会。1907年任同盟会调查部长，专门从事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的工作。

这时，同盟会的活动正集中于华南地区，对长江流域各省注意不够。焦达峰认为同盟会的行动舒缓，革命应从“腹地”发动，于是联合四川张百祥、江西邓文翚、湖北刘公等共同组织秘密团体共进会，准备联络长江流域秘密会党，聚集力量，在中部省区发动起义。共进会1907年8月正式成立于东京，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宗旨与同盟会也基本相同，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易为会党所接受。

1909年初，焦达峰由共进会推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到汉口后，和孙武等研究了在两湖开展革命办法。4月，他们在汉口法租界设立了共进会总机关，并在武昌设了分机关。

同年8月，焦达峰化名左耀国回到湖南，在长沙设立了共进会机关部，并密赴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一带活动，联络会党。此后，他一面与杨任等在湖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往来于湘鄂之间，加强两湖革命党人的联系。半年后，组织起来的会众达一千数百人。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焦达峰到武汉。这时，谭人凤也从香港来到武汉，经与谭人凤以及当时在湖北的居正、孙武等商议决定，继续加紧两湖革命发动准备，“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2)]。10月，武昌首先起义胜利，给湖南革命党人以很大鼓舞。在湖北革命的推动下，焦达峰负责联络会党，陈作新运动新军，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10月22日晨，焦达峰和陈作新率领驻在长沙城外的新军革命士兵分两路攻入城内，与城里巡防营革命士兵会合，占领了谘议局、军装局和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闻变潜逃，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和几个清吏顽抗被杀，湖南起义迅速获得胜利。当晚，参与起义的各界代表在谘议局举行会议，在革命党人特别是新军代表的支持下，会议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建立了由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湖南军政府。军政府成立后，焦达峰把支援武汉战争作为首要任务。三日内，招募新兵六千人，并派遣了由王隆中率领的新编独立第一协出师援鄂。

湖南起义成功，军政府一成立，立宪派马上就发起了对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进攻。还在起义前，以湖南谘议局长谭延闿为首的一些立宪派人物，看到革命不可避免，分别表示“倾向”或“赞成”革命，混入革命营垒。他们提出“文明革命”，要求“勿扰乱秩序”。谭延闿宣称：“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3)] 立宪党人力图篡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维护旧的统治秩序。10月22日起义胜利的当晚。在谘议局举行的会议上，立宪党人即想推举谭延闿为都督，没有得逞。焦达峰、陈作新被选为正、副都督后，23日，他们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接受了成立一个参议院的要求，以谭延闿为院长，参议院议员大多数为原谘议局议员。它的职权规定，凡都督发布重要命令都要经参议院同意才能执行，参议院则可自行议决事项交都督执行。但立宪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要求按照湖北接受立宪党人参加政府的先例，于都督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由谭延闿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任军政部长，实行“军民分治”，以削弱都督职权。焦达峰等对立宪

派的篡权野心认识不清，一味妥协，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样，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已控制了湖南政权。

这时谭人凤回到湖南，看到都督大权旁落，焦达峰成了立宪派的“笼中之鸟”，主张取消参议院及两部，由都督掌握一切，采取果断措施，给立宪派以有力制裁，但不为焦达峰所采纳。焦达峰说：“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4)] 陈作新也持同样看法，认为大家都是汉族，“如家人聚首”，不必戒备。焦达峰、陈作新等对立宪派的进攻，完全失去了警惕性。他们思想上的弱点，加上当时新军革命队伍被调往湖北支援战争，失去了防御力量，就给立宪派以可乘之机。事先，立宪党人已暗中攻击焦达峰是“会匪”首领，制造谣言，挑拨新军与焦、陈的关系，鼓动旧军人为黄忠浩复仇。随后他们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由原新军五十标第二营管带梅馨策动一部分军队来发动谋杀焦、陈的流血政变。

1911年10月31日，立宪派先煽动一部分人到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闹事，制造了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与此同时，梅馨则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和丰公司附近，一队做围攻都督府的准备。和丰挤兑风潮发生后，立宪派诡请都督亲往弹压，焦达峰派副都督陈作新前往调处，遭到伏兵袭击，被乱刀砍死。随后，梅馨又指挥所部，声称为黄忠浩报仇，冲进都督府，将焦达峰杀害。焦、陈被害后，立宪派的首领谭延闿随即被拥戴当上了都督。接着湖南常德、湘潭、宝庆等地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反革命政变，许多革命党人被诱杀。革命派掌握的政权很快便落到了立宪派手里。

---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0页。

(2)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3)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铅印本，1914年。

(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4页。

金宝善

高秋萍

金宝善，字楚珍，1893年五月（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县。父亲为玉器行鉴别玉器，家境清贫。金宝善七岁时入读本村私塾，勤奋好学。19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绍兴中学堂。时值鲁迅在该校担任学监，金因学习成绩每每名列班首，受到鲁迅关注。在新文化运动思潮推动和鲁迅的直接影响下，金宝善积极参加了校内外的一些民主革命活动。1910年金毕业后考入南京水师学堂，不久转入杭州医科专门学校学习。

1911年，金宝善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先在千叶医科专科学校（今千叶医学院）学习了五年，主修内科学。1916年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深造，专攻传染病学与生物制品的制造技术。

1919年，金宝善回国。时值鼠疫瘟情严重，北京政府内务部建立中央防疫处，金任该处技师，从事生物制品的研制和鼠疫的防疫工作。他用日本带回的菌种制出白喉抗毒素、免疫血清、牛痘疫苗等生物制品，开拓了我国自制生物制品事业之始。1920年，我国东北又发生大规模鼠疫，金受命参加治疫。

1925年，北京政府创设公共卫生事务所，金宝善以中央防疫处技师身份兼任公共卫生事务所课长。同时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及军医学校讲授传染病学和防疫学，培训卫生防疫人才。他在《中国年鉴》上发表了有关鼠疫的论文，受到医学界的瞩目。1926年4月，经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美籍教授兰安生（John　B．Grant）推荐，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

1927年，金宝善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金宝善任保健司司长。是年6月，北伐军进取北京，金宝善奉命接管原北京政府中央防疫处的工作。后该处由北平迁至南京，金任处长，继续从事生物制品的研制工作。1929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海关新税则》，随之设立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委金宝善主持制定《全国海港检疫条例》，并参加接收上海江海关的海港检疫处。1931年，长江中游洪水为患，国民政府派金宝善组织医疗队前往救灾。翌年他在汉口设立检疫所，以后又在广州设立黄埔、南石头两个检疫所，为我国建立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和机构，做了大量工作。

1930年，金宝善代表中国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医学大会，作了题为《中国卫生事业状况》的报告。1931年春，金又出访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各国卫生制度，经过反复比较，拟定了我国医药卫生方面的一系列管理办法。

1932年，国民政府创建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由中央卫生署长刘瑞恒兼任处长，金宝善任副处长。金宝善为创设各项卫生事业进行大量的实验与研究工作，使实验处成为当时掌理全国卫生技术设施和检验、鉴定、制造、研究、专业人员培训等事项的实验、研究中心指导机构；又主持了各地区流行病、传染病、寄生虫病的调查与防治工作，并筹建了一些地区的卫生实验机构和卫生工程，制订了生命统计制度及卫生教育计划。

金宝善在创建中央卫生防疫机构的同时，也重视地方和乡村卫生机构的建立，为此奔走于全国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地方、乡村和边疆的卫生事业，试办了乡村卫生实验所，并提倡以县为单位试办推广。

1934年前后，金宝善先后在江西、云南、湖南、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设立卫生处或卫生实验处，在上海、南京、天津、北

平、广州、杭州、南昌等城市设立卫生局或卫生实验所。1935年又前往西北地区，在兰州主持建立西北蒙绥防疫处，制造各种人用、畜用的生物制品；同时从事传染病及寄生虫病的研究、调查和防治，从而推动了青、宁、甘、新及陕西、川北等地区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同期，金宝善还推动和协助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和定县、和县、萧县、盐城、句容、江宁、吴兴、武康等县设立了乡村卫生机构。

1936年起，金宝善被举任两届中华医学会会长，多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卫生会议，并承担了大量的卫生教育和人才培训工作。在《中国年鉴》、《中华医学杂志》等许多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卫生防疫、卫生事业管理以及医学教育等方面的论文，在国内外医学界颇有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卫生署迁重庆，卫生实验处迁贵阳。金宝善任副署长兼实验处长。为应战时急需，金宝善组织红十字会在长沙设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组织战时救护队，往来于湘、桂、黔、川交通线，组织办理伤兵救治及从沦陷区逃难到后方的难民医疗救护工作。同时主持设立汉渝宜检疫所，负责控制长江上游传染病的传播。

1941年，金宝善接任中央卫生署署长职，将主要精力投入组建各种卫生站、医疗队、抗疟队等。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大规模培养鼠疫、伤寒、霍乱、赤痢等细菌，扩大在中国的细菌战，致使无数中国军民染患恶疫而死。为此，金宝善在西南通往东南亚和印度半岛的公路上设立了许多防疫队和卫生站，又在黔桂、滇黔、川滇、川黔、成渝、川康、川陕等交通线上，设立了流动医疗防疫队和公路卫生站达七十余处，以防堵流行病入侵。后又协助军医署组建抗疟队和流动输血队，进行战地抗疟和输血救护工作。他并督促中央防疫处加紧制造各种生物制品，以供西南各省地方医疗卫生机关防疫传染病的使用；督促麻醉品经理处和卫生器材修造厂加紧制造医用麻醉药品和医疗器

材，供内地各省医疗机构的急需。

当时，由于沿海城市港口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后方药品匮乏，金宝善主持成立了战时医疗药品经理委员会，负责从国外输入药品。他多次亲赴边疆，组织从印度输入五十多种药品，平价供应给各医疗单位，应战时救护之需。还忙于接受由印度海关输入的国际援华的药品器材，及时分发给前线医疗机构。他正直清廉，秉公办事，对于某些高级官吏图谋利用国难走私药品牟取暴利者，均严词劝阻，拒不签发经营证书。

金宝善在主政中央卫生署期间，将所属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内部机构加以调整和扩大，除原有的卫生工程系、环境卫生系、妇婴卫生系、卫生教育系外，又增设流行病研究所和营养研究所；还将卫生人员训练所并入实验院，继续开办专业人员训练工作，培养大批公共卫生工作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宝善潜心于全国各级各类卫生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同时对署属机构加以扩大和调整：中央卫生实验院在兰州、北平及东北等地增设分院，分别办理各该地区的卫生事务、生物制品的实验研究以及有关卫生措施的推行；中央防疫处改称中央防疫实验处，成为全国药品及制药总机构，除继续研制各种痘苗、疫苗等生物制品外，还研究若干种新药，以促进国内西药自制；原战时医疗药品经理委员会改组为中央药品供应处；同时增设药品管理局，负责管理药品的进口和新药厂的筹建事项。

1947年4月，国民政府将中央卫生署改组为中央卫生部，金宝善任卫生部政务次长。他再次被派往欧美考察战后各国卫生发展状况。当时联合国在日内瓦酝酿成立世界卫生组织，金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回国后，他又积极从事建立地方各级卫生医疗组织的工作，但因经费不足和卫生技术人员缺乏，大多数县的卫生院并未按规定建制，下属机构更不完备，设备简

陋，不足以实施医疗卫生业务。金虽多方呼号，但收效甚微。金宝善痛感当局政治日趋腐败，于1948年春毅然辞去卫生部次长职，赴上海医学院卫生学系任教授。同年9月，携家眷赴美，应聘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儿童急救基金会医务总顾问。1949年初，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任金宝善为卫生部部长，金退回委任令，坚不回国就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宝善欣感祖国复兴有望，在美国积极奔走，为新中国筹集捐款。1950年，他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儿童救济基金会医务总顾问的名义，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王兆俊一起，为新中国儿童申请了一笔700万美元的救济款。由于当时涉及国际关系上的政治原因，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这笔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回祖国为人民工作。他接信后立即毅然辞去在联合国的一切职务，准备回国。在美的朋友们挽留、劝阻他，聘请他到母校霍普金斯大学任终身客座教授，他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于1951年2月22日携眷取道香港回国。

金宝善回国后，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技术室主任、参事室主任等职。1954年4月调任北京医学院卫生学系主任兼保健组织学教研室主任，为一级教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中华卫生杂志》主编。他主持筹建中华医学会卫生学会，任该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国科普协会委员等职。1957年，金宝善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11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在北京医学院担任培养青年教师进修英语、日语的教学工作及文献资料的研究工作。1962年应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邀请，参加世界各国卫生情报资料的编译工作，编译了二百余万字的《世界卫生年鉴》，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上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卫生状况。

“文革”中，金宝善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和伤害。直到1970年底，才逐渐恢复工作。1972年，他还编写了《查阅医学外文期刊的经验简

介》一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宝善得到彻底平反，又重新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任命为北京医学院卫生系名誉主任。1978年，年逾八旬的金宝善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约请，撰写了《中华民国医药卫生史料》，同期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分卷撰写了《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等部分专著。晚年仍抱病主编《英汉预防医学名词词汇》，至1983年6月完成这部为期8年的巨著。

1984年11月11日金宝善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金宝善：《中华民国医药卫生史料》，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编《金宝善文集》（样本），1991年版，第9—21页。

金宝善：《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的回顾与前瞻》，《中华医学杂志》第32卷第1期，1946年版。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历届大会简介》，《中国医史杂志》1985年第4期。

国民政府档案：《抗战六年来防疫工作概况》，1943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金宝善追悼会悼词，1984年11月24日，北京医科大学藏。

金润庠

顾振仪　来可泓

金润庠，浙江镇海人，生于1890年7月31日（清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其父系清朝举人，于金润庠八岁时去世。母沙完珍，出身于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兼通医理，曾在宁波举办女塾，开浙东女学之先。

金润庠有弟妹三人，以家中食指繁多，于1904年小学毕业后，即到汉口立昌生海味号当学徒，业余自学英语。几年后，经其母舅沙咏源介绍，至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当办事员。金博闻敏慧，工于心计，颇得经理青睐，1909年升任华通烟台分公司经理，后改任华通杭州分公司经理。不久进上海美商德泰洋行当买办，又任英商光耀桅灯厂中方经理。与此同时，金以私资开设润丰恒商行，并在英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

1911年，上海发生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风潮，金润庠与竺梅先两人分别代表自己的商行，参加五洲交易所财产清理案件，显示了各自的才能，互相钦佩，渐成知交。在1925年张宗昌盘踞山东时，金润庠协助竺梅先在上海为张宗昌军采办面粉。以后，两人继续合作，积资日丰。金与竺于1927年冬，鉴于造纸工业有利可图，以28万元之代价，盘进嘉兴禾丰造纸厂；1931年又以29.05万元的标价，购进杭州武林造纸厂。他们将两厂改名民丰、华丰，设立董事会，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任协理，开始经营造纸工业。

30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造纸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不到二十家纸厂，外国纸品充斥市场。竺、金两人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卷烟、胶鞋等轻工业发展较快，包装的纸版用量必然会随之增加，而

纸版运输时吨位较多，外商无意经营，于是他们便从事纸版生产。

在试制薄白纸版的过程中，竺、金两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亲自下车间，督率技术人员、工人共同钻研。这种纸版的技术要求是正面平滑有光泽，反面宽松，即所谓“单面光”。当时既无技术资料，又无专家指导，竺、金光凭热情，闭门造车，几经试验，未获成功。但竺、金两人仍不惜工本，坚持试制。1933年聘总工程师褚凤章、造纸工程师陈晓岚先后进厂，并邀请浙江大学教授潘光圻协助，于次年试制成功，以“船牌”为商标经销。

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地位脆弱，同业之间又互相倾轧，削弱了对抗外资的力量。金润庠乃与各纸厂协商，筹组“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使各厂生产纸版纳入产、销垄断机构，调和矛盾，增强实力。结果与苏州大丰厂、盛华厂、天津振华厂共五家，各推一人组成理事会，推选金润庠任联营所所长。规定各厂产品一律交由联营所出售，定价划一，天津振华产品不南运，南方各厂产品不北上。上海竟成纸厂不愿参加联营，以每吨纸版低于联营二元的价格抛售。金润庠大量收购，以压缩纸版的上市量，迫使竟成纸厂就范。

1935年前后，全国有卷烟厂四五十家。而本轻利重的卷烟纸却仍依靠外国进口，大量金钱被外商赚走。竺、金两人便着手试制卷烟纸。除了重用褚凤章、陈晓岚等工程师外，并用重金聘请奥国工程师恩槎来厂辅导技术，向德国买进新机器，“船牌”卷烟纸迅速试制投产。1936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东南五省、两特别市的卷烟纸制造专利权。竺、金为了打开销路与舶来品抗衡，派人到处游说，一时南洋、华成、福新等烟厂相继采用；其后，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也开始订货。自此，民丰造纸厂生产的“船牌”卷烟纸在东南五省享有声誉，对于抵制外货，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一定作用。

1937年上半年，民丰、华丰两厂同时扩充；民丰再增资175万元，连同原有资本共计300万元。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润庠

曾任上海市抗战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供应委员会副主委，劝募物资，支援抗日军队作战。以后杭州、嘉兴相继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金润庠拒绝与日商合作，撤退到汉口，又转赴香港，与其子跑单帮做运销生意。不久，金在香港与官僚资本中茶公司挂钩，从宁波贩运茶叶出口，获利甚巨。他常往返于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并曾秘密潜入上海劝募抗日美金公债。1941年5月竺梅先在宁波病故后，民丰、华丰两厂均由金润庠掌握。

在1939年时，日商“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通过日本侵华机构“兴亚院”和“大使馆”强占民丰设备，盗用民丰名义，生产太阳牌卷烟纸。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为收揽人心，宣布“发还”华东地区一百四十余家大工厂，企图胁迫原厂主“合作”办厂。金润庠由重庆回到上海，与董事们商定对策，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谈妥由日方签约承租民丰、华丰两厂。金润庠以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公司，经营地产、股票和黄金等投机买卖和卷烟纸贩运业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润庠从日人手中收回了民丰、华丰两厂。纸厂复工后，当时舶来品未及赶到，上海各烟厂均用民丰、华丰出产的卷烟纸，一时销路甚广。但好景不长，美国剩余物资大量运到，孔祥熙的扬子公司经销大批美制卷烟纸，以低于民丰成本的价格涌进市场。民丰产品无人问津，有的烟厂原装退回，存货一时积压至六千余箱。金润庠面临危局，终日忧惧。只好暂时转变方向，改制部分文化用纸和手工卷烟用的连史纸支撑局面。

1946年秋，金润庠任民丰、华丰总经理后，将两厂厂长职务分别由原工程师陈晓岚、吴贤哲担任。两厂总工程师为褚凤章，副总工程师为陈晓岚。两厂并多次开办技术员工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金润庠活跃于上海工商界，任全国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等职，与国民党官员翁文灏、张群等拉关系甚力。对杜月

笙执礼甚恭，依为靠山。他还让上海的“大亨”陆京士、骆清华、王先青等人在厂里兼职、领薪。1948年，金当上了“国大代表”。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不断打击，使金润庠难以招架，孔祥熙的扬子公司从香港大批运进美制卷烟纸倾销，民丰卷烟纸至1948年冬积压已达八千余箱，相当于一百六十万美元，濒临无法周转资金的绝境，出现复厂后第二次危机。金润庠通过贿赂国民党官吏的办法，向中央银行乞求钞票纸订货任务，以济眉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妄图拉金润庠去台湾，金拒之。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副官把飞机票送到金的手中，金怕受宪兵迫行，遂秘密避居圣保罗公寓。一个星期后，上海解放，金才回工厂。

解放后，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华丰、民丰开工生产，积压的八千多箱卷烟纸亦迅速售出。1950年2月，美蒋飞机轰炸上海电厂，各烟厂因之停产。4月初，华丰、民丰两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金润庠不明人民政府政策，害怕职工斗争，偕家属及副总经理竺培农避居香港。经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争取，推举他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派人赴港劝促，金乃于7月初返回上海。此后，经金润庠多次申请，民丰、华丰两厂于1953年11月起改为公私合营。

金润庠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1958年起患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于1961年6月13日在上海去世。其子女根据金“为人民办些福利事业”的遗愿，集其部分遗产二十余万元，捐献给浙江省工商联，供举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之用。

主要参考资料

金志朗、沙咏原：《民丰、华丰两造纸厂简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16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魏桥等：《金润庠》，浙江社会科学院编著《浙江人物志》（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金志朗：《金润庠生平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7辑，1986年版。

访问金润庠亲属记录材料。

金树仁

张奇林

金树仁，字德庵，甘肃导河（今临夏）人，生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1893年开始求学，翌年入杨增新创办的河州书院。1900年杨升任甘肃提学使兼甘肃高等学堂总办，金树仁由河州进省，就读并毕业于甘肃高等学堂，与杨增新有师生之谊。清宣统己酉（1909年）拔贡。

杨增新于1912年主政新疆，1914年金树仁应召入疆，供职幕府，长于笔札。1916年，金在省政治研究所学习，曾考列第一，颇得杨增新的青睐。金在杨面前表现得十分恭顺，极得杨的欢心。1919年，沙俄将军阿年科夫溃败，窜入塔城、伊犁等地，占据阿尔泰山特区，金树仁协助杨增新将其军队瓦解，并计诱阿年科夫到省被擒。是年，金考取一等县知事，先后任阿克苏、疏府（今喀什市）、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等县知事。1926年升任省长公署政务厅长。

1928年7月7日，新疆省军务厅长兼交涉署署长樊耀南，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的宴会上发动政变，刺死新疆省主席杨增新，闯入省署，企图控制新疆政局。金树仁迅即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等率军包围省署，敉平了樊耀南政变，并于当晚将樊处决。7月8日，金树仁以民政厅长兼新疆省临时主席、总司令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平叛经过，强调边情紧急，自己正在统率军民极力维持，意在促使国民政府早日明令他执掌省政。同时，他还通电各镇道说明政变经过，并且说他已经控制全局，促使各地文武官员予以承认。金树仁的平乱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喀什、哈密、阿山、伊犁各重要地区文武官员及蒙、哈、回各王公的拥戴，并由各王公联名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南京国

民政府虽有意统制新疆，但是鞭长莫及，乃于8月20日以金树仁平乱有功，任命他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但迟迟不授其军职。直至1932年秋，才任命金树仁兼边防督办。

金树仁认为杨增新之所以未得善终，就是身边没有亲人。因此，他上台以后，特别注重以乡土集团来巩固政权。在用人方面，一些实权要职都尽量用其家族亲戚、同乡亲友和亲信。在省城，首先任命其同乡同学又同事多年的鲁效祖为省政府秘书处秘书长，以监视各厅处的异己分子；接着任命其同乡阎毓善继任他的民政厅长职；同时委派其五弟金树信任军务厅长，迨新疆军官学校成立，更兼任校长；其他各厅处负责人，凡有异动，大都以其亲信或甘肃同乡充任。在地方，喀什为南疆首善之区，乃任命其四弟金树智为驻军师长；伊犁为北疆重镇，则以其同乡张培元为镇守使；哈密为通往内地要津，任命其同乡刘希曾为驻军师长。此外，金树仁的马弁崔肇基，先被擢升为省府警卫队长，继而提拔为旅长。

1930年3月，哈密贵族沙木胡苏特亲王病故，其子聂滋耳袭爵。希望废除王制的维吾尔农民向省府提出了改土归流的要求；驻哈密的师长刘希曾也向金树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金采纳了刘的建议，先将聂滋耳羁縻于省城，并于1931年1月正式宣布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宣禾三个县，同时还公布了土地开垦和田赋征收的办法。由于地方政府措置乖张，引起了维吾尔农民的极大不满，终于酿成民变。金树仁发现哈密情况严重，遂将刘希曾撤换，改派朱瑞樨和熊发友到哈密进行镇压。由于省军实力雄厚，哈密义军邀请回族青年军人马仲英前来支援。5月18日，马仲英部攻入哈密东的黄卢冈，不久又击溃哈密外围的省军，将哈密新旧两城包围起来。金树仁接到哈密告急的电报后，委派鲁效祖为援哈总司令，率杜治国旅东下，以盛世才为参谋长，参赞戎机。鲁效祖遭到溃败后，金树仁忙调伊犁的张培元进省，出任前敌剿匪总司令，率部东下。马仲英部无心恋战，自动东撤。张培元部进抵哈密，解了哈密之围。

哈密事变后，金树仁对各地的政治、经济统制愈益加深，各地农民纷纷举事，鄯善、托克逊等地农村都出现了反对省政府的武装游击队。1931年岁末，马仲英的部下马世明率部进袭达坂城，随后驰赴省城迪化。1933年2月22日夜，马部主力袭击省城西大桥，金树仁令守军焚烧西大桥街，攻城部队失掉掩蔽，向西北方向撤退，省城局势稍趋平缓。4月12日下午1时，负责守城的二百余名归化军发生哗变，金树仁在卫队的掩护下，携家眷仓皇逃到第一公安分局，后移至城外。当晚，东路军指挥杨正中率队反攻，但由于郑润成的东北军参战，杨部被击退。13日，杨正中保护金树仁西去昌吉，后再退绥来、乌苏。金树仁想去伊犁，遭张培元婉拒，乃改道到达塔城。塔城行政长鲁效祖劝其引退，并将准备购买汽车的黄金交给金树仁充作旅费。金树仁见大势已去，于4月24日通电下野。之后，他假道苏联转往内地。

金树仁治新期间，对南京是“只拜庙宇不问何神”。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汪精卫等人电请金树仁表明态度。他回电说新疆一向信赖中央，如果汪将来到了中央，新疆当竭诚拥护，但目前未敢妄作主张。尽管金树仁表示服从中央，却极力防止国民党势力渗入新疆。南京曾发表过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名单，遭到金的拒绝。后来建立的省、县党部，都是由金派去的人主持，摆个样子而已。哈密事变后，金在军事上、财政上感到十分棘手。他曾电请国民政府发给飞机、坦克、重武器，南京方面未予理会。马仲英部入疆后，金又几次致电南京，“请令邻省派兵兜剿”也无结果。因此，金只好求助于苏联。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苏断交，但新疆、苏联间的贸易依旧进行。1931年10月，金在没有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任何汇报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当时金正向英国、德国洽购军火和机械，希望借助该协定将这些东西假道苏联运入新疆。后来金在南京被押、判刑的唯一罪名就是擅与苏联签订这一协定。

1933年10月，金树仁由天津去南昌谒见蒋介石，后赴南京，幻想国民政府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不料曾遭金通缉的艾沙伯克已在

行政院将其告下。金树仁甫至南京，即遭拘捕，连同控状一并送交江宁地方法院，管押讯办。法院据艾沙伯克的控告起诉，并函请新疆省政府查复。盛世才于1933年12月30日函复江宁地方法院云："被控各节，或为时势需要，或为行政处分，均属正当行为，依律不能为罪。"替金树仁解脱。同时，甘肃省军政要人赖世俊、马鸿宾等多人亦纷纷致电南京，代为说项；青海省主席马麟还面见蒋介石替金求情。直至1935年5月江宁地方法院才开庭审理，最终将金判刑三年六个月。193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颁令特赦，谓金树仁商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是为了维护地方，应付环境，因公致罪，情有可原，应予特赦，以示宽典。

金树仁出狱后移居天津，后转兰州。抗战时息影于兰州，以书画自娱。

1941年9月12日金树仁病故于兰州。

主要参考资料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

尧乐博斯：《樊耀南·金树仁·哈密亲王》，台北《传记文学》第20卷第3期。

金岳霖

王法周

金岳霖，字龙荪。浙江诸暨人。他是现代中国声望最高的逻辑学家，也是现代中国哲学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被知识界称之为新实在论派的“首领”，“中国的穆尔”。1895年7月14日，金岳霖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洋务官僚家庭。父亲金珍，字聘之，以绍兴师爷进身为三品知府，追随洋务派首领盛宣怀，曾在黑龙江、湖南等地做官办洋务。母亲唐淑贤，清代理学家唐鉴之孙女。金岳霖兄弟七人，他排行最小。六岁入小学，十一岁进入教会办的长沙雅礼学校读中学。在雅礼学校，金岳霖以记忆力惊人，成绩突出连续跳级。金岳霖从小熟读“四书”，对传统对联兴味十足，少小年龄已显露出不寻常的逻辑天赋，曾从民谚“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中推出“朋友如粪土”的逻辑结论。

1911年，金岳霖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商业。清华学堂素以培养留美预备生为特色，毕业前后，金岳霖获得了留美官费生资格，在这所充满了美式教育气氛的校园里学习、生活了三年时间。

1914年底，青年金岳霖赴美入宾州大学学习商科，两年后毕业并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虽然大学学的是商科，但金岳霖对商学并不满意，认为商学不过是“雕虫之策”。大学毕业后，金岳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转学政治学，期望通过政治学掌握平治天下之策。在研究院，金岳霖对政治学说史发生了很大的兴趣。1920年，博士论文《T．H．格林的政治学说》通过答辩，金岳霖获得了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金岳霖也颇为关心国事。在哥大的前两年，他曾与张奚若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后又与徐志摩等创办了《政治学报》，表达了对袁世凯政府的不满。博士毕业后，金岳霖曾有过一段华盛顿

乔治大学中文教授的经历。

在哥大研究院，金岳霖在研究格林的政治思想时，触发了对哲学的兴趣，开始萌生到欧洲游学的念头。1921年，金岳霖离开美国，到英国伦敦大学研修哲学，开始为期四年的欧洲游学生活。先在英国，后在德、法、意游学。在英国，金岳霖被休谟的哲学思想吸引，深感休谟的《人性论》有“洋洋大观的味道”。对金岳霖影响最大的是罗素。金岳霖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之后，明白了哲学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概念进行精深的分析，使得日后金岳霖的哲学著述烙上了深刻的逻辑分析的印记。1925年底，金岳霖离欧回国。

1926年，金岳霖到清华大学就职，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在清华的十多年，是金岳霖生活最为优裕而稳定的时期。在课堂上，他用流利的英语讲课，采用与学生自由讨论的方式，所讲授的知识论、逻辑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课堂之外，晚间还常有活泼自由的哲学讨论会。金岳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逻辑和哲学的研究撰述。金岳霖也很关心学校的健康发展。1931年，因不满吴南轩的跋扈，在清华“驱吴运动”中，金岳霖参与了向教育部起草呈文的七人委员会，后来，还与朱自清等人联名发表声援驱吴的主张。在教学中，金岳霖感到自己逻辑学知识的不足，于是在1932年利用教授休假，到美国哈佛大学研修逻辑，为时一年。1935年，金岳霖被推为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也是在这一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被列为“清华大学丛书”出版。《逻辑》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现代数理逻辑的著作。金岳霖认为，逻辑在本质上是“先天的”和“必然的”。由此出发，《逻辑》一书把归纳法剔出“逻辑”的范围。（1950年代，金岳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始把归纳纳入逻辑的范围。）该书的主要篇幅是论述数理逻辑并以数理逻辑系统批评传统逻辑。按照作者对“逻辑”本质的理解，该书重点论述了几个重要的逻辑范畴，包括必然和先天、蕴含和推论以及统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逻辑》出版后，颇受学者的推崇，被称为“国内惟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贺麟），“中国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殷福生）。

抗战爆发后，金岳霖随清华大学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除1943年受邀赴美访学一年之外，从1937年秋到1946年5月，金岳霖始终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教授职上。这是一个战时流亡时代。在联大，生活是艰难而又很不稳定的，金岳霖住过简陋的中学宿舍，也住过戏台的包厢。越往后，局势和环境也越恶化，除了生计艰难，还要时时躲避空袭，屡受精神折磨。但联大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学术空气十分浓郁的地方。这里名家云集，既有冯友兰、汤用彤、贺麟等哲学同人，还有梁思成、林徽因、朱自清等好友，交流十分方便。金岳霖时常与同人好友探研哲学，或茶话社会人生，颇为欢愉自得。

联大时期是金岳霖哲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教课之外，他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与撰述之中。他的两本重要著述，《论道》和《知识论》主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约在《逻辑》一书的出版前后，金岳霖即始沉入于《论道》的构思。1936年始，金岳霖在《清华学报》、《哲学评论》等期刊上陆续发表相关文章。1940年，《论道》出版。《论道》是一部关于本体论或形上学的著述。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现代哲学表现出强烈的对形上学的拒斥。《论道》的主旨，就是要在哲学上为形上学保住地盘，同时使生命的意义世界获得一个形上学基础。《论道》一书中，“道”是核心范畴，也是最高范畴。“道”是本体也是实体，是绝对性的存在。“道是式——能”[(1)]，“道”的基本内容是“式”和“能”。能总是与式在一起，没有能的式只是可能，能与式结合，可能才变为现实。道体是静的，但道是大全，“道”内在地具有世界存在与演化的过程与规律。“居式由能”（《论道》，第37页），能总是自为地不间断地出入于式，也就是道的大化流行，亦即世界万物生生不息的演化和发展。道还是最高境界，“由无极而太极”，事物的演化总指向最完善的境界。在《论道》一书中，金岳霖自觉运用了“旧瓶装新酒”方法

（《论道·绪论》），试图融合中西哲学，以构建一种有逻辑或知识支撑的中国现代哲学形上学系统。该书中有道、体、用、几、数、无极、太极等极富中国味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有共相、殊相、可能、现实等西方哲学概念。举凡中西哲学的范畴概念都统一在严密的形式系统中，经逻辑的分析、推论，最终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形上学体系。同时，诸多概念也在这个新的体系中获得了新的意蕴。对于缺乏知识论的中国传统哲学而言，《论道》构建体系的方法论更具启示的意义。此书的主要缺陷在于过分注重逻辑方法与元学思想，中西哲学范畴之间未能很好地融合，“往往增加理解的困难”[(2)]。

《知识论》的撰写，始于1938年。此书的思想背景是缘于西方现代哲学对于建立知识的可靠基础的迫切要求，同时也缘于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对知识论的热切尊崇。此书于1940年完成，却因躲避空袭而遗失了原稿。在痛苦与无奈之中，金岳霖只得重新写起。这时，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在写作中，金岳霖甚至连稿纸也严重缺乏。经过八年时间，至1948年，这部七十万字的巨著才告完成。（因历史原因，《知识论》一书在过了三十多年时间之后才得以问世，于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金岳霖创作此书的直接动机则是有感于西方哲学的自我中心主义认识论，仅从主观出发去寻求知识，从而陷入了缺失对知识对象客观性的理论困局。由此，《知识论》一书运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对正觉、意念等概念的纯粹逻辑的分析和论证，系统地论述了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形成以及知识的真假等问题，构造了一整套具有客观性支撑的知识论体系。金岳霖自称，《知识论》“始于正觉终于正觉”[(3)]。为了把感觉内容和外物同一起来，他提出了正觉说。正觉指正常的感觉，正觉的呈现是客观的，亦即感觉对外物的反映是正确的，金岳霖称之为“所与”。正觉说揭示了知识形成的基础，但仅有感觉还不能形成知识，知识的形成还必须有联想、抽象等高级思维活动。由此，金岳霖进一步提出了意念论。意念论是《知识论》一书的核心内容，

金岳霖称“本书的主旨实在是把得自所与者还治所与”[4]。所谓得自所与者还治所与，是指把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就是用来自于感觉经验中的意念再反过来整理其他的感觉经验。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意念具有最核心的作用。《知识论》围绕意念这一核心概念，继续对类型、规律、事实、命题、真假等概念进行严格的分析和推论，系统地论证了什么是知识以及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具有完整的理论形态的知识论体系。《知识论》一书思路明晰，推论严密，逻辑结构相当严谨，其高度的技术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罕见其匹。

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等校复员，金岳霖也随之返回北平，仍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3月，金岳霖被推选为中研院院士。在政治动荡的时代，素常不热衷政治活动的金岳霖，曾先后与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等人联名，数次发表了针对国民政府当局的抗议声明。

北平解放前后，金岳霖弃置了数所国外大学的聘书，抱着对新中国的期望，留在了国内，继续在清华的教职生活。1950年夏天，金岳霖作为常务委员参与了中国哲学会的筹备活动，同年还担了任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主编。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金岳霖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6年，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50年代以后，金岳霖在学术上主要从事逻辑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50年代，曾主持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此后，金岳霖对逻辑的推广与普及工作一直保持了很高的热情。1960年代，参与主持了《形式逻辑》，这本书作为教材后来被全国多所大学选用。在1950年代，金岳霖曾两次作为学术文化代表团成员赴欧作学术交流。

50年代以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逐渐升级。在50年代的前后十年间，金岳霖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对自己所著的《论道》、《逻辑》等书作了深刻的反思。在自我批判的同时，他也对梁漱溟、费孝

通、杜威、胡适、罗素等人的旧哲学进行了批判。1956年，金岳霖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金岳霖完成了《罗素哲学》。此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罗素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的。此外，金岳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翻译工作。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金岳霖曾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在这个时代，金岳霖的也享受到了一些并不寻常的待遇，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谈或宴请。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金岳霖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晚年的金岳霖，先后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任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10月19日在北京逝世。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设了“金岳霖学术基金会”、“金岳霖学术奖” 以表彰他在逻辑和哲学方面的卓越成就。

---

(1)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页。

(2)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3)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3页。

(4) 《知识论》，第285页。

金仲华

汪仁泽

金仲华，幼名翰如，笔名孟如、经纬、高弼、仰山等，浙江桐乡人，生于1907年4月1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父亲金汇芳，晚清秀才，以教书为业。金仲华七岁入县立崇实小学，十三岁进嘉兴第一中学（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与共产党员萧项平等同学结为知己。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嘉兴、桐乡，金仲华参加各项庆祝活动，并与同学在家乡组织北伐宣传队，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上海美的书店，因志趣不合旋即辞职回家。翌年受聘上海商务印书馆，助编《妇女杂志》，后升任主编。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杂志停办，人员解散。金仲华经萧项平介绍进苏联塔斯通讯社上海分社任翻译，开始接触国际问题资料，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5月，淞沪停战，《东方杂志》复刊，由胡愈之主编，专辟《妇女与家庭》栏目，仍请金仲华任馆外编辑。此时金仲华经常撰写国际问题评论，在《申报》等报刊上发表。同年，金仲华与胡愈之、钱俊瑞、钱亦石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苏联之友社”，共同探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1933年，金仲华受开明书店约请，编辑《中学生》杂志，辞去塔斯社的工作。此时，“苏联之友社”为了正确引导民众认识国内外形势，于1934年9月创刊国际问题半月刊《世界知识》，胡愈之任主编，金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文章资料翔实、逻辑性强、通俗易懂，并善于运用图文配合或图解的方式表达国际时事动态，有时还配以高质量的漫画，使读者更易接受和理解文字表达的内涵，因此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1935年，金仲华离开开明书店，受聘生活书店专职编辑。该店不

仅出版《世界知识》，还出版发行《文学》、《妇女生活》、《译文》等进步书刊。他与店内同人共同研究提高书刊质量，开拓经营业务，使书刊销路激增，工作人员也从二十多人增加到六十多人。8月，该书店创办人邹韬奋从海外流亡两年后回沪，见该店发展迅速无比欣慰，与金仲华志同道合，结成莫逆。10月，聘金为编辑部主任、理事会理事。11月，由邹、金分任主编和编辑的《大众生活》半月刊在沪创刊，积极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大众生活》言人所不敢言，深为民众喜爱，发行量最高时每期达二十万份，创我国杂志发行的纪录，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该刊连续报道运动发展情况，鼓动学生再接再厉，继续开展救亡运动。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该刊发表二百八十三位爱国人士联合签名的宣言。金为该会倡议人之一，负责文字宣传工作。国民党当局对爱国运动的迅猛发展感到十分恐慌，1936年2月以该刊鼓动学潮、毁谤政府为由，命令邮局停止邮递该刊，月底该刊出至十六期被迫停刊。时隔一旬后的3月7日，生活书店又创刊了金仲华主编的《永生》周刊，继续以精辟言词评论政治形势。

此时，邹韬奋已先行赴香港筹办《生活日报》。5月底，金仲华也去香港协助邹筹备。6月7日《生活日报》在香港创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后改名《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也随日报同时出版发行。邹任该报社长，金仲华任“国际新闻”版编辑，每天配合国际要闻，撰写《国际新闻漫谈》，讲述重大国际事件的来龙去脉。该报的出版在香港引起轰动，也引起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等的重视。鉴于形势的发展，8月23日《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发行沪版。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是为“七君子”事件，并勒令《生活星期刊》立即停刊，经全体同人抵制，出至第二十八期被当局强行封禁。

1937年5月，生活书店创刊了由金仲华任编辑人和主要撰稿人的

《国民》周刊。不到三个月时间内，他用不同笔名为该刊撰文二十六篇。“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及时筹备出版了《抗战三日刊》（后改名《抵抗》、《全民抗战》）。此时，金仲华一面主编《世界知识》，一面为《抗战三日刊》每期撰写《战局一览》，为《国民》周刊编制最新抗战形势图和《时事图解》。《世界知识》还和《国民》周刊、《妇女生活》、《中华公论》等杂志联合出版了四期《战时联合旬刊》，其中第四期刊登的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原文是宋用英文撰成，经金仲华译成中文刊出。金的中英文俱佳，这一时期宋庆龄的许多重要声明和文章大都是由金译成中文，在《大众生活》、《抗战》、《救亡情报》、《救亡日报》和《抵抗》等报刊上发表的，经过长期合作，金成为宋可信赖的助手。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金仲华与邹韬奋等辗转到武汉。金继续主编《世界知识》杂志，并为《抗战三日刊》撰稿。1938年1月起，金兼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副主席。6月底在日军进攻下武汉吃紧，生活书店决定疏散。《世界知识》由金仲华带领编辑部人员去香港出版。与此同时，金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任执委会执委，负责华语通讯。“保盟”宣传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又以募集到的药品和其他物资援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金仲华“曾为此而呕心沥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到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外国朋友的赞助”[(1)]。

此时，华侨富商胡文虎在香港独资创办的中文报刊《星岛日报》销路不佳，经廖承志推荐，聘请金仲华接任该报总编辑。金邀请邵宗汉、羊枣、郁风、叶启芳等担任各版编辑，不但版面新颖生动，且立场鲜明，消息量大，积极报道当前抗战和国际形势，逐渐打开销路，日销数万份，在香港、东南亚一带发行，对当地华侨具有广泛影响。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在港掩盖真相，封锁消息，金仲华将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手迹制成锌版在《星岛日报》刊出，并连续报道揭露事实真

相。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不断向胡文虎施加压力，6月1日金仲华被迫辞去《星岛日报》总编辑职务。在《告别读者》的启事中重申：我们今后虽将转换工作岗位，但我们努力的目标，仍是坚定不移的：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继续奋斗。其后金曾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从事新闻实践和教学工作。当时香港进步报刊相继被查封，周恩来指示香港党组织急需再办一份统战性质的进步报刊。经廖承志同宋庆龄商量，决定由“保盟”拨款邀请该盟三执委金仲华、邹韬奋、邓文钊筹办，由夏衍、范长江等组成编委。不久中文晚报《华商报》创刊，宋庆龄为之题词，并经常亲自撰稿。同时，宋庆龄为了让海外人士了解中国抗战的现状和物质需求，介绍“保盟”的工作和目标，决定出版《保盟通讯》中文版，金仲华和邹韬奋承担了从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的全部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通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金仲华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被营救到东江纵队游击区，后又历尽艰辛到达桂林，准备复刊《世界知识》，但国民党当局正在迫害各地进步书店和刊物，执意不准该杂志复刊。金仲华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广西日报》总主笔，随后转赴重庆。1944年12月经中共党员田价人的介绍进入美国新闻处，任译报部主任。他利用这个特殊岗位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传播进步舆论。中共“七大”后，他及时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译成英文，向世界播放。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30日，金仲华陪同宋庆龄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9月6日，宋以“保盟”主席名义，由金陪同设宴招待毛泽东等。是月金仲华从重庆抵达上海，一面依旧主持美国新闻处译报部工作，着重选译上海学生和民主人士的爱国、反蒋运动，同时主持《世界知识》的复刊工作[(2)]；另一方面继续协助宋庆龄的“保盟”工作（12月“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将争取到的物资支援解放区。同时当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中央委员[(3)]。

1946年7月国民党挑起内战后，加紧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多种进步刊物遭查禁，编辑人员惨遭杀害。金仲华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受到中共中央的关心，周恩来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写信给予勉励。1948年4月，美国新闻处得到报告，开明书店出版的《英文月刊》刊有反美文章，而金是该刊的主编之一，因此受到查问，金遂辞职离开该处。是月，金仲华和图表绘制者朱育莲共同合作的《世界现势图解》出版，用文字、地图、图表三者综合一体，详细解释战后世界政治问题，读者争相购阅。7月，金仲华接到中共通知离沪赴香港，主编《世界知识》和香港《文汇报》，并接受中共的委托，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对外宣传刊物《远东通讯》（英文）。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中共中央还发电指示在香港的刘晓等："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4) 金及时将电、信送给宋庆龄。3月，中共安排金仲华离港进入解放区。5月26日，随同解放军进入解放后的上海，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和《新闻日报》、《文汇报》的社长。9月北上参加新政协，当选政协委员。1950年7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中国福利会，金任执委。受宋庆龄委托筹备编辑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次年12月首期出版，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并任专对海外发稿的中国新闻社社长。

1952年12月，金仲华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其时，金仲华还兼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市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并是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和上海分会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金仲华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代中期期间，金仲华受到冲击，于1968年4月3日逝世。中共上海市委于1978年8月为其平反，1989年4月在宋庆龄墓区西侧的万国公墓名人墓区内，为

金仲华的新墓举行了落成仪式。

---

(1) 宋庆龄：《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建设》1981年2月。

(2) 当时金仲华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出版登记时遇到了阻挠，金即利用1934年创刊的登记证复刊，国民党因不可能否认，不得不换给新证。

(3)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1年成立于重庆，1943年金仲华在桂林时经狄超白介绍参加。1945年盟员大会上金被选为中央委员。该盟成立后，不少盟员利用关系，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做了不少有益的革命工作。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曾亲自接见该盟领导成员，建国后该盟宣告结束。

(4) 《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电》，重载于《人民日报》1983年3月2日。

靳云鹏

汪仁泽

靳云鹏，字翼青，1877年（清光绪三年）出生于山东邹县，后因久居济宁，落籍该地。父早亡，靳有两弟（云鹗、云鹤）及三个姊妹，皆依靠母邱氏卖煎饼为生，靳氏兄弟幼时也上街叫卖。邱氏曾在富户潘家帮佣，当过后来成为北洋要人潘复的乳母。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主持训练新建陆军，靳云鹏应募入营当兵，不久升至排长，1898年4月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该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同学有曲同丰、傅良佐、吴光新、张树元、马良等人，靳毕业后留任教习。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参谋处总办为段祺瑞，靳与段朝夕相处，关系渐密。

1909年，云贵总督李经羲请段祺瑞推荐军事人才，段举荐靳云鹏，靳遂赴昆明任第十九镇总参议。靳不断将云南边情向袁世凯、段祺瑞密报。1911年武昌起义后，10月30日夜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举兵发难。靳云鹏随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抗拒革命，在昆明五华山战败，靳化装轿夫逃出，经越南北返，投奔段祺瑞。此时段任第二军军统，在湖北镇压革命，保荐靳赴京向袁世凯面陈滇中局势，并特电袁称："靳能生还，不禁狂喜。已令上谒崇阶，面陈一切。钧处如无驱策，千乞饬赴前敌。"[(1)] 靳返鄂后，受段重用，参与机要。

1913年春，靳云鹏经段祺瑞保荐，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8月代理、9月署理山东都督，1914年6月晋升将军。靳在鲁秉承袁、段旨意，镇压革命力量，并搜括资财，在济宁、济南等地广置田宅。他与人合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在临清设分厂，共有纱绽三万余枚；又

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厂、面粉厂等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扩张在华势力，强占胶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山东首当其冲，靳大多依顺日本的要求。袁世凯帝制自为，靳参加十四省将军联名电请袁“登基”，袁授以伯爵。同时，靳对鲁地反袁民军势力也虚与委蛇。1916年3月初，袁称帝败局已定，靳在冯国璋策动下，与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一起，拟联名各省通电迫袁取消帝制，密电征求各地将军意见。直隶将军朱家宝接电后，向袁告密。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职位。各地反袁怒潮继续高涨，鲁境反袁民军力量逐渐逼近济南，靳在强大压力之下，4月29日通电劝袁辞职。5月29日袁佯召靳入京议事，突然将其撤职，派察哈尔都统张怀芝继任山东将军。靳虽丢官，却博得“反对帝制”的虚名。

袁世凯暴卒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控制政府大权，靳云鹏受段重用，任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职，忠实执行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被段倚之为股肱，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成为段手下四大金刚，靳居之首。府、院之争兴起后，段与靳等密谋对策；1917年7月，在讨伐复辟之役中段自任总司令，靳任总参议，打垮了张勋。段祺瑞重掌政权后，借参战之名扩建“边防军”（即“参战军”），靳与徐树铮同主其事，但靳与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开始。徐年少气盛，常仗势凌人，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段从中调和无效，转而利用靳是曹锟的把兄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与冯国璋是老同学、老同事等各方面的关系，派他至各处联络，借以减少靳、徐之间的摩擦。11月被北京政府派往日本，为观操大员，由曲同丰等人随行。

1918年靳云鹏任参战督办公署的参谋长。其时，日本为干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并图谋侵占我东北边境，以防德、奥为名，要求与北京政府“合作”。经章宗祥按段祺瑞的旨意，多次与日方密谈后，5月靳会同徐树铮、曲同丰等人，衔段命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

日军在对外作战期间驻兵我国，并向日方供应军需物资等；后又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这三个卖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北洋军阀内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与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矛盾日益尖锐。9月，皖系以冯代理总统期满为由，指使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亦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徐上台后，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主张南北停战议和，与段（在幕后操纵）扩充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相左。靳云鹏因妒忌段宠信主战的徐树铮，转而倾向徐世昌，于1919年初被任命为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徐世昌进一步谋将段的“参战军”置于靳云鹏主掌的陆军部管辖之下，遭到段和徐树铮的强硬抵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替各军索讨欠饷，与段的另一亲信、财政部长龚心湛发生龃龉，在互讦中泄露了“参战军”军费的秘密来源，段闻讯大怒，对靳严厉训斥，靳与段的裂痕加深。6月段指使徐树铮倒阁，并进而逼靳退出内阁。靳暗中联络直、奉两系，谋组新阁。此时徐世昌采纳张志潭的献策：“利用徐（树铮）、靳仇嫉心理，以靳组阁，表面上推崇段（祺瑞），由靳挟段以制徐，平衡势力，以巩固总统之地位。”[(2)] 9月24日靳云鹏代署国务总理。11月，在直、奉通电支持下，经众、参两院通过，靳正式受命组阁，并兼陆军总长。徐树铮阻挠靳云鹏组阁的企图失败。

靳云鹏上台后不甘寄人篱下，很想有所作为，站住脚跟。他借机撤换了山东督军张树元[(3)]，还想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等人，以表示力图摆脱段祺瑞的羁縻而独树一帜。段的御用工具安福系曾拉靳加入，靳以“军人不入党”而拒之。但他对段仍不敢怠慢，表面上十分恭顺，而段则以老上司自居，段的属员常在行文上直书“奉督（段时任边防督办）谕交总理办理”，不将靳放在眼里。靳阁阁员中，已有皖系人物田文烈、陆徵祥、曾毓隽、朱深分掌内务、外交、交通、司法等部，但段尚不满足，又增李思浩掌财政。这些总长处处与靳为难，内阁会议往往因人数不足而流产。加以段的亲信从中挑拨，段动辄对

靳训斥申饬，警告靳“不要挟外援以自重”[(4)]，甚至暗中加以监视，使靳极为难堪，愤懑不平。

靳云鹏在段祺瑞的控制之下极力挣扎，力图自主政局。在南北和议问题上，他打算撇开上海和会，召集南北“名流”组成“和平联席会议”，直接达成协议，但因遭到段的反对而成画饼。在外交问题上，日本公使于1920年4月27日提出照会，胁迫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靳内阁原拟予以回绝，但安福系阻挠，致被搁置。在财政问题上，由于列强外交使团声明在中国未统一前停止一切对华贷款，也使其面临困境。此时直奉与皖系矛盾日趋激化，靳在徐（世昌）段之间、直皖之间周旋，与段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遭到安福系的激烈攻击。靳处境困难，遂于5月上旬辞职。

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败北，引咎辞去边防督办等职，安福系也散了伙。8月，靳云鹏在直系曹锟支持和张作霖向徐世昌推荐下再度受命组阁。他根据事前与直、奉在天津的协议，先后办了取消安福国会、撤销“中日军事协定”和“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等几件大事，又提出了促进南北议和、裁兵、整饬纲纪、整理财政四点主张。但他主张的议和是南北军阀之间的议和，背地里却用饷械支持广西军阀陆荣廷反对孙中山。他打算勾结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等地方势力，以形成独立于各系之外的军事力量。他派自己的亲信潘复打入财政部为次长，并想任用张弧、李士伟等人组成新的财政班底，以谋取代一贯控制北洋财政的交通系人物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等。1921年4月25日，靳邀集曹锟、张作霖及各省督军、护军使二十余人在天津开会，逼使财政总长周自齐辞职；5月14日又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重新组阁，将交通总长叶恭绰排挤出阁，因而与交通系结了怨恨。交通系人物向张作霖、徐世昌挑拨、攻击，离间靳与各派系的关系。

当初张作霖支持靳云鹏组阁，原是希望靳能为己用，但靳对张的企求多不能满足。直奉两系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等方面奉系常处劣

势，张因而归罪于靳，逐渐萌念倒阁。靳云鹏与徐世昌的关系，也由于双方亲信为了争夺财税及人事等问题时生矛盾，而渐趋对立以至恶化。靳在奉系、徐世昌和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下内外交困，终于12月17日辞职下野。

靳云鹏下野后，寓居天津日租界，从事经济活动。他代表中方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出任理事长兼总经理，实际上他仅出面顶名，公司权益全被日方控制[(5)]。同时他又担任济南鲁丰纱厂董事长职务。此时有人估计靳的私人财产约有两千万元[(6)]。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控制北京政权后，靳云鹏自恃与张为儿女亲家，其弟靳云鹗又系吴手下的一员大将，意图再次组阁，张亦有此意；但吴坚持要恢复颜惠庆摄政内阁，使靳的梦想成了泡影。12月，张作霖召集亲信商议组阁人选，曾内定靳为内阁总理。靳闻讯兴高采烈，连夜赶至北京，草拟就职宣言。但吴佩孚因靳云鹗心怀异志，以“贻误戎机”罪名而免去其军职，仍反对靳云鹏组阁。靳再度组阁不成，颓然返津，意志消沉，从此参加佛教徒的“居士林”活动，诵经念佛，并先后加入日方控制的“中日同道会”、“中华佛教会”等佛教团体[(7)]。但是他并不安于古佛青灯下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关内，华北局势日趋严重。1933年靳到南京与蒋介石密谈数次，回津后为蒋拟了一个以华北作为“中日经济合作”基地的方案，企图重新出山主持华北政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即占据平津，靳云鹏又活跃起来，他和下台闲居的徐世昌商量，又拟就一个“议和”方案，前提为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军撤出华北。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不同意，靳的梦想又一次落空。1945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到北平，曾派戴笠接靳到平，面询华北政局。但此时靳已年迈体衰，无能为力。1951年1月30日病死于天津。

---

(1) 电文原件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卷》。

(2)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207页。张志潭因曾受徐树铮侮辱，思图报复，故作此举。

(3) 张树元曾是靳云鹏1916年督鲁时所属第五师师长，驻潍县。民军进逼济南时，靳曾迭电张驰援，张见危不救。后靳被袁世凯撤职时，张又先受袁的收买。靳当总理后，借济南戒严司令马良枪杀“回教爱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的惨案，将张撤换。

(4) 谭志清：《我所知道的靳云鹏和靳云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5) 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嫉视日本独占山东特权，联英、法等国，强迫日本归还青岛及胶东一带特权，并规定由中日协商成立“鲁案协定”。根据该协定，双方合资设立鲁大矿业公司，中国方面由靳云鹏任理事长兼总经理，表面上中日合营胶东矿业，实际上全由日本大仓系财阀控制。靳徒有虚名，仅支高薪。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鲁大总管理处的招牌始终悬挂在天津日租界靳宅门旁。

(6) 《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统计》，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纪念汇刊，1926年10月10日。

(7) “中日同道会”是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部操纵的，同时参加的尚有王克敏、齐燮元等人。（孙主民、辛公显：《天津日租界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中华佛教会”也是日方控制的，靳云鹏、江朝宗、高凌霨等人兼任该会执行委员。（翟王路：《日本扶植下的中华佛教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井勿幕

张应超

井勿幕，字文渊，1888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一）生于陕西蒲城。父亲井永汲，开明地主兼商人，1891年逝世。井勿幕少年时代在家中读书，同时随其胞兄井岳秀练武，长于拳术和击剑。甲午战争以后，他的家庭经济日趋衰败；社会的黑暗尤使他深为不满，常和井岳秀“纵论天下大势，对于清政多所斥议”[(1)]。

1902年，分家时分给井勿幕以为生计来源的“义源永”杂货店破产。为了摆脱债务，继续求学，他到重庆去依附父亲的朋友川东道张铎。得张铎帮助，入重庆正蒙公塾读书，在这里结识了杨庶堪、朱之洪等进步青年。1903年冬，他不顾张铎反对，“以数金冒险从蜀人士赴日本”[(2)]，入东京大成中学读书，是陕西早期的留日学生。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井勿幕立即加入。他书写了“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的对联挂于书案旁；又在《舞剑词》中写道：“英雄不学时势装，匹马单枪论短长。拔剑斩蛟叱沧海，看他盗寇与侯王。龙蛇走，岁月忙，健儿卅六会跳梁。中原风景凄凉，身在水云乡。”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同年冬，奉孙中山命回陕西建立同盟会组织，任支部长。他克服各种困难，奔走于西安及渭北各县，数月之间，就发展会员三十多人。

1906年春，井勿幕在三原县召开的陕西支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联络会党、刀客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等重要意见。但因同盟会员多系读书人，对会党持有偏见，对此坚决反对，使井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会后，井勿幕带领同盟会骨干邹子良、王守身等人赴宜君、黄陵等地勘察地形、筹备建立根据地，并指示负责当地实际工

作的同盟会员注意“与一般工农人联络”[3]。

1906年夏，井勿幕二次赴日本，入经纬学堂读书，同时和赵世钰等人积极活动，筹备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同年秋，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同年12月，井勿幕再度离日本回国从事反清斗争，回国时作《孤愤词》赠在日本的同盟会友人，词中写道：“大丈夫生当斯世，宜效死疆场。否则当轰轰烈烈，如荆卿剑、博浪椎诸伟举，壮山河之色，为祖先留生气，为民族续命脉，安肯伈伈俔俔，忍辱事仇，俯首于异族统治之下哉！”1907年，井勿幕又回陕西。他针对陕西同盟会员多属文人，缺乏武装力量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孙中山、黄兴联络会党的经验，决心联合会党、刀客。他经同盟会员高又明介绍，结识了会党首领吴虚白，而且结合陕西实际情况，把会党的某些组织形式用于同盟会员中。同年10月15日，井勿幕、吴虚白等二十余人在祭黄陵的誓文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4]的奋斗纲领。不久，井勿幕第三次赴日本。

从1906年到1908年几年间，由于孙中山和黄兴不常在日本，同盟会总部出现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5]的情况。井勿幕和吴玉章等同盟会中的积极分子经常联系，不断集会，坚持工作。同时，井勿幕又学制炸药为在国内进行武装斗争做准备。1908年2月，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井勿幕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以“侠魔”的笔名在《夏声》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的阴谋。在《二十世纪新思潮》的连载长文中，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说作了简要介绍。孙中山和黄兴对井勿幕十分器重，“呼为后起之英，招为指臂之助”[6]，“誉为西北革命巨柱”[7]。

1908年10月，井勿幕第三次由日本回陕，立即参加并领导了席卷全省的反清学生运动——蒲案[8]。又组织陕西支部的骨干多次集会，学习讨论同盟会的纲领，批判康、梁君主立宪的主张，使会员的思想认识逐渐统一。同年冬，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本地成立，并通过了

联合会党、刀客和新军中的进步力量，共同进行反清斗争的决议。因井勿幕奔走各地，行踪不定，故选李仲特为陕西分会会长，而实际仍以井勿幕为领袖[9]。

1910年4月，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从上海回陕西，在泾阳县召集同盟会领导人和会党、刀客代表会议，传达了总部对陕西起义的指示，详细讨论了在陕西起义的进行方法，会议历时二十余天。会后，立即紧张行动，购制军火、制造炸弹，并大大加速了和会党、刀客的联络行动。7月9日，井勿幕、钱鼎等同盟会领导人和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三十余人在西安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10]。从此，陕西同盟会员和会党的全面联合正式形成，使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斗争走上新的阶段。为了更好地联合会党，井勿幕加入了哥老会。同年秋，井勿幕和吴玉章、熊克武等人赴香港，与黄兴共同筹划广州起义，不久返陕。

1911年4月广州起义爆发，井勿幕“由陕赴之不及，得免于难”[11]，乃返回陕西，立即布置陕西同盟会员分头行动准备起义。他把家中珍藏的名人字画选出两箱，托同盟会员张奚若带到外地变卖，并赴日本购买起义所用的军火。井勿幕还亲自赴西安城中的满族军队居住区“满城”侦察清军防务情况，又派同盟会员邹子良、王荣镇等人分赴陕西渭北、四川、山西联络刀客和哥老会武装。不久，井勿幕得到同盟会总部决定于农历八九月间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义的通知，遂决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在西安起义。但因西安清军得知消息，防范甚严，难以举事。又改定由井勿幕、胡景翼率刀客在渭北发难，钱鼎等人策动新军在西安响应[12]。议定井勿幕赶赴渭北布置，并在黄龙山组织骑兵。武昌起义后，陕西当局密谋把新军调离西安后逮捕其中的革命党人。新军乃在张凤翙、钱鼎、张钫等人领导下，于10月22日提前起义。井勿幕在渭北得知起义消息，立即赴三原招集武装十余营响应西安起义。陕西军政府成立时，因时间仓促，推张凤翙为大统领，负责军事，不少革命党人暗中拥戴井勿幕，拟举其为大都督，

总揽全局。井勿幕在耀州（今耀县）派人转告他们，临时换主帅，只能造成革命军内部混乱，从而增强了革命军内部的团结。10月31日，陕西军政府委任井勿幕为北路宣慰安抚招讨使，负责渭北各县军务[13]。12月，他奉陕西军政府命令赴山西增援，攻克运城，解山西革命军之围。不久，陕西西路告急，又率部增援西路并和宋元恺、王一山等组织炸弹队，在西路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委任井勿幕为中央稽勋局副局长，他因陕西战事紧张辞未赴任。

陕西起义成功以后，陕西都督张凤翙打击哥老会，井勿幕也支持了张凤翙的做法。1912年2月，井勿幕亲自致函黄兴和黎元洪，请求湖北派兵来陕驱除哥老会势力，因湖北无兵可派而未实现。

袁世凯窃国以后，张凤翙向北洋政府妥协，打击革命派势力。1912年4月井勿幕所部军队绝大部分被解散。6月25日同盟会陕西分会根据总会指示改为陕西支部，大会选举井勿幕为陕西支部长，张凤翙为副支部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井勿幕被选为陕西支部长。但因张凤翙阻挠，遂改张凤翙为支部长，井为副支部长。9月，井勿幕被迫离开陕西，赴上海随章太炎读书。“二次革命”爆发，井勿幕约刘允臣赴汉口和曹印侯共谋讨袁，因曹被捕入狱，计划未能实现。“二次革命”失败后，井勿幕避居日本。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井勿幕在上海和康宝忠、李根源、但懋辛等密谋反袁。11月，井勿幕和熊克武等人经越南赴云南参加护国反袁斗争，先后任刘一峰部参谋和熊克武部参谋长，奔走于蔡锷和熊克武军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再称大总统。井勿幕又联合民党进步人士，以十九省“公民”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再称总统，宣言中尖锐地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14]，并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扑杀此獠”[15]。为了策动陕西民党反袁，他于同年4月从四川步行回陕。

井勿幕回陕西后，袁世凯已死。督军陈树藩背叛民党，投靠皖系。井勿幕又离陕去上海读书。1916年7月，李根源任陕西省长，力

请井勿幕协助。井勿幕希图借李根源的力量来对付陈树藩，遂于次年3月回陕就任关中道尹。在任职期间，“以禁烟闻于军民，财政、教育各端屡有建议”[16]，均因陈树藩阻挠而难以实施。5月，李根源被迫辞职；8月，井勿幕亦去职在西安闲住。

1917年12月，郭坚、耿直等在周至县树靖国军旗帜，反段倒陈。不久，张义安亦在三原县起义，民党人士遂云集靖国军大旗之下。陈树藩惧井勿幕投奔靖国军，乃软禁井于西安。井勿幕表面“以篇籍自娱，研图注篆”[17]，暗中却和靖国军秘密联络。1918年9月，陈树藩诱捕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11月派井勿幕去三原，“欲借井之声望收拢胡各部，使靖国军解体”[18]。但因井勿幕在陕西民党中素孚众望，因而一到三原县，即被举为靖国军总指挥，反使靖国军声势大振。

井勿幕任总指挥后，以靖国军各部行动自由军纪不严为虑，随即着手整顿。因第一路郭坚部纪律最差，所以尤对郭部“多所箴规”[19]。不料郭坚的参谋长马凌甫却从小集团的私利出发，错误地认为井勿幕意在排除异己，“因起害井之心”[20]。乃于井勿幕赴凤翔县慰问援陕滇军叶荃部返三原路过兴平县时，设谋以郭坚名义致函井勿幕，请他于11月21日赴兴平县南仁村参加军事会议。井勿幕虽知赴会可能有危险，但为了顾全大局，仍以“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21]的气概如期前往，但到后即被杀害。嗣后，经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呈报广州护法军政府，追赠井勿幕为陆军中将。井勿幕著作和遗墨传世很少，除在《夏声》杂志发表的文章外，仅有《秋感》诗及少量书信及书法作品留存。

---

(1) 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井勿幕公葬纪念册》，1945年版。

(2)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君勿幕事略》，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949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7页。

(3) 赵其襄、高又明：《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1年版，第153页。

(4) 《陕西辛亥前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5页。

(5)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2页。

(6) 宋哲元、焦子静、李仲特等：《井先生纪念碑铭》，拓片存陕西省博物馆。

(7) 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井勿幕公葬纪念册》，1945年版。

(8) 1908年10月，蒲城县知事李体仁为了镇压学生的革命活动，捕蒲城县教育分会职员和县立商小学堂师生七十余人，酷刑审讯，致使学生原斯建伤重身死，造成轰动一时的惨案。

(9) 王儒卿、刘依仁等编：《陕西乡贤事略·井勿幕事略》，西安克兴印书馆1935年版。

(10) 《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32页。

(11)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君勿幕事略》，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949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7页。

(12) 《胡军长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立生将军事略》，《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9页。

(13) 章炳麟：《井勿幕墓志铭》，《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85页。

(14)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7—38页。

(15)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北洋军阀》，第37—38页。

(16) 宋哲元、焦子静、李仲特等：《井先生纪念碑铭》，拓片存陕西省博物馆。

(17)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君勿幕事略》，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

《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949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7页。

(18) 茹欲立：《陕西靖国军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版，第8页。

(19) 景梅九：《井勿幕先生事略》，《西京平报》1810号。

(20) 孙翰青：《井勿幕被害真相》，手稿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21) 熊克武：《我与井勿幕的交往》，手稿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居正

萧栋梁

居正，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1876年11月8日（清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湖北广济县一个塾师家庭。七岁启蒙接受传统教育，十五岁开始习作八股文，希图通过科举谋进身，却连年屡试不中，想去当兵又无门径，只能苦读奋进，终于在1899年以院试第一考取秀才。1901年入沧浪书院学习，次年参加乡试，以八股文改试策论，试题有“俄主专制，美主共和，英主立宪”等语，居正未曾学过，名落孙山。在省城曾结识陈乾、石瑛、田桐等，结为盟兄弟。

1905年夏，盟兄陈乾从日本回国，劝其远游觅出路，同年9月居正随陈乾东渡日本，在东京因田桐等帮助，剪掉发辫，改穿西服，考入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不久由陈乾介绍，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1906年参加张伯祥、焦达峰等组织的同盟会外围组织共进会，起草该会组织章程，劝阻湖北同乡加入汤化龙组织的保皇组织“地方自治会”。居正在东京法政大学预备部学习两年，于1907年秋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10月因赶赴云南河口革命党人起义而辍学。但从日本行抵香港时，得知起义已经失败，得孙中山长兄孙德彰帮助，乘船转赴新加坡，加入《中兴日报》助胡汉民、汪精卫、田桐与当地保皇派主办的《南洋总汇报》论战。他的杂文、专论文笔犀利，阐发革命大义，驳斥保皇谬论，令人折服，颇著赞誉。仰光革命党人慕名前来请其主办《光华日报》，居正即从槟榔屿乘船到仰光担任缅甸华侨办的《光华日报》总主笔。1908年吕志伊接任总主笔后，居正得暇遍游缅甸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计划，并在创建同盟会仰光支部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因而保皇党指控他宣传无政府主义，1910年春居正被缅甸法院驱逐出境。居正乘轮至槟榔屿，不准上岸，至新加坡又被监视，经担保后才获允转船至香港，于1910年夏初赴东京再入日本大学交费

补课复学。

同年暑假，居正受命回国，到达上海后沿路调查联络，至冬季回到家乡广济。1911年2月到汉口负责主持湖北省同盟会工作。他在武汉设酒馆作据点，联络新军，并与共进会、文学社领导人孙武等在湖北新军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发展同盟会员，秘密筹备武汉地区武装起义工作。9月中旬，受武汉革命党人之托，到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商量起义计划，并采购军火。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回鄂参与筹组湖北军政府活动，当发现黎元洪缺乏决心和措施时，即提议设坛场、行礼仪，促成黎元洪都督誓师盛典举行。并制定军政府组织条例，按条例组成都督府，研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等事宜，12月以湖北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居正任内务次长，代理总长，并负责同盟会总部财务工作。4月，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他随之去职。8月，任国民党上海联络处主任。1913年1月被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居正随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5月奉命南下上海密谋讨袁，7月在上海吴淞炮台收抚要塞官兵，并任要塞司令官，8月2日，指挥要塞炮击驶入吴淞口的北洋舰队，迫使两小舰投降，还收抚水上警察，坚守吴淞二十余日。“二次革命”失败后，居正于9月中携眷亡命日本京都。1914年6月在日本率先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并任《民国》杂志经理。1915年冬，奉孙中山命回国，到大连策动东三省革命党人讨袁。1916年5月到青岛组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亲率两师一旅兵力讨袁，沿胶济铁路张贴孙大元帅讨袁檄文，攻潍县，连克高密、诸城、昌乐、临淄、益都，向济南进击，威震山东。

1916年6月袁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国会，7月居正北上，在国会发表措词激烈的言论，表达中华革命党的呼声。1917年8

月，孙中山号召维护民国元年约法，居正联络各议员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并参与组织军政府活动。1918年5月，桂系勾结政学系，阴谋改组军政府，孙中山鉴于武人专权而辞大元帅职离粤，由居正留穗代办交代手续。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委居正为总务部主任兼军事委员。1920年11月，桂军被逐出广州。月底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政府，居正在国会提议将军政府总裁制改为总统制。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居正受命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曾利用日本资金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盈利100万元支持北伐。1922年3月到惠州协调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5月被任命为内务部长。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他电斥陈部此举，并帮助宋庆龄脱险，还到沙面办理军队供应达50天。

1923年初，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居正被指定为国民党本部参议，任改组筹备委员会委员，但态度模棱。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任常务委员。后来，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不满，突然离开广州，到上海闲居，并赴长沙访问赵恒惕，赴开封会晤胡景翼。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居正急赴京奔丧，5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三次执委会，因意见不合，中途退出，赴上海参加章炳麟组织“辛亥俱乐部”的活动，并到开封会见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等，为日后分裂活动做准备。同年11月与邹鲁、谢持、林森等人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年2月，再往长沙游说赵恒惕；同年3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该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组织部长，负责右派中央总部工作，创办《江南晚报》，鼓吹反共谬论。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后，居正等人赴庐山访汪精卫，往汉口晤唐生智，加上其他人员活动促成南京、汉口、上海三个“国民党中央”派

代表于9月在上海举行谈话会，决定组织国民党中央特委会，居正任特委会委员。11月22日，南京民众大会上出现枪杀民众的惨案，居正涉嫌为主使人之一。年底，国民党各派系矛盾激化，蒋介石为防止居正再行参加西山会议等派系的反蒋活动，将居正等10人停职监视。1928年春居正赴日访问，夏回上海撰文刊登在《江南晚报》，并编《清党实录》发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号召团结，国民党各派系于11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居正以第一届中央委员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被推为常务委员，任司法院副院长。1932年1月因院长伍朝枢辞职不就，居正代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5月任司法院院长。居正先后主持制定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使民国法规粗具体系；确立三级三审制度，改组全国省级法院，普设县级法院（或县司法处）及新式监狱，增加了法院、监狱数量；确定司法经费概由国库负担等等，为取消外国在华治外法权打下了基础。1935年任中华民国法制会会长，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南京与西南间的团结负责调停。

抗战后期，居正利用中国正式参加联合国共同作战的有利国际环境，为促使废除外国在华治外法权继续努力。1942年撰《收回法权之切要》一文，指出1926年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司法“民刑法典未臻完备”、“新式法院监狱为数过少”、“司法经费无保障”等四大缺点已经克服，“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应即时放弃”，至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英、美两国正式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1946年国民政府确定1月11日为“司法节”。

1948年1月居正辞司法院长职，被选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并与蒋介石参加了当年的“总统竞选”活动。1949年他随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广州，飞台湾，返广州，转重庆，妄图建立“根据地”继续反共，阻挠全国解放，至11月居正飞往台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51年11月23日，居正病逝于台北寓所。

居正著作有《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居觉生先生全集》等。

主要参考资料

《居公觉生行状》，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2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

吴相湘：《居正革新司法》，《民国百人传》（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胡春惠：《居正》，《中华民国名人传》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

《居正传记资料》第1册、第2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阚朝玺

汪恩郡　王凤琴

阚朝玺，又名朝洗，字子珍，辽宁盘山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盘蛇驿钱坨子村。其父阚连城有六子，阚朝玺居五。父死后，家境萧条，他十六岁时，弟兄分居，因尚未成年，故与四兄同住。当时，阚朝玺正在表爷卢五先生处读私塾，生活虽感困难，但他一心想去外地求学，其嫂张氏见他刻苦攻读，毅然解囊相助，于1903年考入锦州中学堂。阚学习勤奋，渴望将来科举成名，但1905年科考停止，又有感于辽西一带盗匪蜂起，民不聊生，决意放弃学业，投笔从戎，于1906年投奔奉天前路巡防队统领张作霖，任该部司书（文书）。张作霖年青为匪时曾出入阚家，看中了卢五先生之女，经阚父从中周旋成婚，这种关系是阚朝玺投奔张的重要原因。

1910年4月，阚朝玺随张作霖讨伐土匪陶克陶胡。此后军队里推行新文化，学习笔算。当时的军官不是绿林出身，就是行伍出身，多数目不识丁，而阚读过中学，会笔算，受到张作霖的器重，被提升为统领部的书记长。

1910年腊月，阚朝玺回老家过年，看到钱坨子及傅家庄等村住满了土匪，杀猪宰羊，闹得百姓不得安宁。各股匪首听说他回家省亲，纷纷向他表示愿投降效命，阚假意满口应允，但春节过后，急忙赶到盘山厅，向通判马俊显详细说了匪情，并与马联名致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奉天前路巡防队统领张作霖，请求派兵剿匪。张作霖复电命就近调驻二道沟的原张作孚部骑兵，由哨官陈国保率领，阚朝玺协同往剿。在傅家庄等待收编的各股匪首没想到阚会率兵围剿，仓皇接触，二百余土匪几乎全被打死。事后阚怕其他土匪报复，携家眷迁居奉天。为此他深得张作霖的赏识。

1912年春，张作霖送阚朝玺入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步兵科学习。次年春毕业，被任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少校参谋。他向张建议设立军事教育机构，培养人才，被张采纳，派阚创办二十七师军官团，后又让他办军士团，并兼任军官团的教育长。1914年秋，阚朝玺晋升为师部中校参谋，仍兼军官团以及军士团的教育长。1915年11月，改任二十七师炮兵二十七团二营营长。次年春，他创办了炮二营官兵子弟学校，办学经费由他出资一半，余者由该营军官共同负担。

1916年，张作霖驱逐段芝贵后，与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产生尖锐矛盾。汤外倚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旅长张海鹏的声援，内靠本旅官兵效命，企图拥兵倒张。阚朝玺积极在汤部军官中进行瓦解工作。他秘密联络汤部骑兵一营长郑殿升、三营长张荣、步兵营长邹芬等十二个营长，经阚晓以利害，都表示效忠张作霖，并焚香签名宣誓：绝不服从汤倒张的指挥。阚朝玺向张作霖详细报告，张嘉许说："今后你好好去做，有我在，就有你的饭吃，我们一定和老汤拼一下。"(1) 阚受宠若惊，进一步建议张把汤玉麟赶出奉天，并自告奋勇承担此任。阚先以师生关系给曾在二十七师军官团受过训的汤的次子佐辅打电话，让他劝其父和张作霖重归旧好。当汤佐辅表示为难时，阚又以恫吓的口吻说："二十七师的官兵都受过张大帅的恩惠，就连你父部下的十二个营长都表示愿为张效命，你父想起事是极其危险的，这边的炮口早已对准你家，你们趁早离开奉天，否则，我也爱莫能助了。"(2) 汤玉麟慌忙把全旅人马撤到新民县巨流河一带，使张的地位得到巩固。

汤玉麟离奉后，张作霖命阚朝玺率部驻防新民与汤部对峙，并提升其兄阚朝山为营长。阚朝玺驻防新民期间，属下贾连长因有机密报告，由于心情急迫而跑得满头大汗，当他掏手帕擦汗时，被阚弟朝俊拔枪击毙。阚朝玺为逃脱随意杀害部下的罪责，向张谎报贾受汤的指使行刺而掩饰过去。张欲任阚为督军署卫队混成团团长，遭到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等的激烈反对而作罢。1917年夏，阚朝玺继张作相之后

升任炮兵二十七团团长。1918年2月，张作霖编了三个混成旅，阚又升为奉军二十七师第二混成旅旅长。3月，阚奉命率部入关，驻防株洲、长沙之间。不久，即撤回东北。

1919年秋，黑龙江督军鲍贵卿转任吉林督军，阚朝玺奉命率本旅官兵进驻吉林、伊通、长春等地，12月接替裴其勋任吉长镇守使。1920年春，他兼一面坡剿匪司令，8月又兼东省铁路护路军司令。由于他在剿匪中嗜杀成性，中东路一带群众称他“阚铡刀”。阚所部有一团长王九江，驻防在七丈沟里一带，该团士兵多由土匪改编，阚怀疑该团不稳，派其表弟四团三营营长赵沛然率部驻于王团附近，监视王的行动。赵沛然常在阚面前说“王团想哗变”，加上该团营长赵国臣想取王而代之，极力拉拢阚的左右，阚朝玺对王九江就起了杀机。当王九江听到风声，亲自到一面坡向阚表示忠诚时，阚一面假意好言抚慰，让他不要听信谣言；一面暗中布置，将王及其所带一连卫兵全部枪杀。事后，阚又派副官处长程广文率赵沛然营及王团之营长赵国臣去王团，声称王九江事与该团无关，命该团官兵缴械，但该团九百余人除赵国臣等数人外都被屠杀。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七丈沟里事件”。

1921年春，阚朝玺率第二混成旅驻防双辽（郑家屯）、洮南一带。当时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的家眷住在郑家屯，阚对吴的家眷多方照顾，从而密切了与吴的关系。这时吴俊陞的亲信马龙潭由洮昌道尹调任四洮铁路督办，阚趁机将其副官处长程广文安插进四洮铁路工程局任警务科长，使他的势力扩张到该路沿线内。不久，阚部改番号为奉军暂编第一混成旅。同年7月，他被任为洮辽镇守使。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阚朝玺积极主战，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开战不久，阚奉命率第一混成旅进关，驻静海、独流、姚马渡一带，与直军彭寿莘部对峙。由于奉军张景惠、邹芬等部在廊坊、长辛店等处遭直军袭击惨败，阚旅也退出静海、独流，败退到滦州。张作霖命阚部退守九门口，当阚部退到此处，又被奉军败兵冲

击，失去九门口。他亲自在前线督战，枪毙数名败逃的军官，转退为守，继而转守为攻，重新夺回九门口，保存了本旅实力，受到张作霖的嘉奖。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阚朝玺部仍驻防郑家屯，鉴于奉军这场战争的教训，他深感加强军队训练和教育的重要，命参谋长王守中专门负责创办军官团和军士团，以提高军队的素质。

由于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的关系，阚朝玺的四兄阚朝山被聘为四洮铁路督办公署和铁路工程局的顾问，不干实事，而领高薪。当时四平在日本人设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附属地内有一个市场，范围较小，也不发达。因修四洮铁路骤集万余员工，原来的市场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阚朝玺接受梨树县县长尹寿松关于开辟新市场的建议，经与驻四洮铁路的日本顾问以及驻郑家屯的日本领事磋商同意，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四平领了许多地号，开辟了铁路东市场。这对繁荣当地经济有一定的作用。

1923年夏，山东人卢占魁得张作霖的许可，拉起一支四百余人的队伍，企图骚扰不属奉系势力范围的热河开鲁。但卢的队伍反被热河军队打得无法在当地立足，流窜到奉系所属通辽一带抢掠当地百姓，驻通辽的奉军骑兵旅长穆春感到很难应付。阚朝玺亲赴奉天向张作霖报告一切，张命阚率兵剿灭卢部。他回郑家屯后，召开一次幕僚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决定采取假招抚、真消灭的策略，并取得穆春配合。当卢部按阚要求将枪械交出封存，把队伍开到通辽等待改编时，阚却暗设伏兵将手无寸铁的卢部四百余官兵全都打死，卢本人也在穆春房内被击毙。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阚朝玺奉命率第一混成旅参战，该部未经大的战斗。战后，张作霖命阚朝玺率部接收直系控制的热河，同年12月11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任命阚为热河都统。次年，阚部第一混成旅奉命扩编为第三师，他任师长。阚朝玺大肆推行种植鸦片政策，以活跃当地经济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又派与其有裙带关系的夏魁一任热河兴业银行的经理，该行以滥发纸币、购销鸦片为主要业

务。阚还极力扩张个人实力，1925年夏，曾派他的驻京代表刘理中赴日本采购武器，拟扩编五个师军队，后因郭松龄反奉事件发生，只编成第五师。

1925年秋，张作霖电令阚朝玺调所部主力至热河西部边界防御西北军，郭松龄倒戈后，张又命阚火速率部援奉。他一面调回开往热西的军队，一面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派邱天培代表他赴锦县和郭松龄联系，在张与郭争斗中观望。阚朝玺带领第三师官兵连同在热河搜刮的480驮烟土离开承德，经凌源、建平、朝阳抵达义县。他亲自与郭松龄通电话，请求指示。郭深知阚朝玺系张作霖一手提拔起来的，不可靠，但有一定实力，所以便虚与委蛇，而暗中派旅长滦云奎率部进行袭击，阚部仓皇无备，损失很大，退到新民。阚怕与郭勾结之事引起张作霖的猜忌，派第五师师长姜向春去沈阳向张面报离热援奉及被郭松龄在义县袭击经过。不久，阚部由参谋长熊墨林率领开到郑家屯待命。阚弟率卫队押运烟土去昌图八面城，途中被常荫槐的交通执法队将烟土扣留，旋被阚弟抢回烟土并将执法队缴械。常荫槐向张作霖报告此事，引起张对阚的不满，当阚赴沈面陈经过时，张作霖大发雷霆。张作霖战胜郭松龄后，于是年12月免去阚朝玺的热河都统职。因怕被扣押，阚先后躲进奉天满铁附属地一楼内和大连日本人开设的大和旅馆里。1926年8月阚朝玺之母病故，经张作相、吴俊陞说情，才允其回奉奔丧。

1927年春，阚朝玺携罗振邦（伪满时任过驻意公使）赴日调查实业。后来阚又以参加中日美术展览的名义再去日本。6月，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经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疏通，阚朝玺被任为大元帅府军政执法处长，直至1928年6月张作霖遇害而解职。

阚朝玺两次去日本，见日本水力发电事业发达，他决定在黑龙江宁安县的镜泊湖建电站。1929年冬，带德国水电专家施乐雅、辽宁省建设厅电气科长尹介荪前后两次去该地勘察，并得到吉林省长张作相、辽宁省长翟文选的支持，但因工程投资太大，无法筹措，未能实

现。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阚朝玺受怂恿，于9月24日出任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副委员长，28日又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成立“四民临时维持会”。该会的参加者有穆春、姜向春等人。阚深知自己人望不高，故派姜向春赴锦县小岭子请在家居丧的张作相出面，遭到拒绝，遂自任该会委员长。阚与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委员长袁金铠互相猜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二人开会，要袁金铠成立政府，专管行政，让阚建立军队，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需以出卖东北主权为条件，让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议定书上签字。因事体重大，二人默然相视良久，终未敢签。日本于11月把押在宪兵队的前辽宁省长臧式毅放出，让他组织伪省政府，并以武力接收省维持会。因阚对此表示不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羁押43天，后由他出具一不进行政治活动的誓约书而获释，释放后他改名为阚朝洗。

1932年夏，伪满洲国政府没收张作霖创办的边业银行，阚朝玺在该行投资10万元，也属该行股东之一，没收该行时他的股金被退还。1933年春，阚被任为伪满中央银行监事，1937年，伪中央银行副总裁蔡运升调任伪经济部大臣，阚被任为该行副总裁。1940年秋，伪中央银行总裁日本人田中铁三郎任满，阚又充任总裁，直至1944年夏任满解职。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苏军在长春逮捕伪满战犯民生部大臣吕荣寰时，阚正在吕家，他看情形不好，贿买吕的随从，让吕的随从谎称他是来吕家讨债的，骗过苏军而逃回沈阳，匿于妻弟穆继多家中。国民党政府接收沈阳后，阚朝玺又追随国民党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阚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

主要参考资料

阚宇清：《阚朝玺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

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1) 熊维成：《阚朝玺的兴衰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盘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盘山文史资料》第2辑，1983年版，第20页。

(2) 熊维成：《阚朝玺的兴衰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盘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盘山文史资料》第2辑，第20页。

康宝忠

王川　周茂江

康宝忠，字蝶庵，又字心孚，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祖籍陕西汉中府城固县人。因其父康寿桐曾在四川彭县、绵阳、什邡等地任知县多年，故宝忠兄弟皆生长于四川。康宝忠幼受父亲钟爱，康父为其聘请多位名师，让他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902年和1903年，康宝忠两次赴陕西参加乡试，均得堂备。1904年夏，康宝忠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克服重重困难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康宝忠先后在同文书院和经纬学校补习日文和基础课程，并任陕西留日学生同乡会干事。康宝忠留日期间，正值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在日本鼓吹武装反满革命。1905年6月，康宝忠加入同盟会[(1)]，7月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第一、二次会议[(2)]，30日参加同盟会筹备大会[(3)]。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康宝忠任同盟会本部之评议部议员及陕西分会主盟人，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4)]，对同盟会发展多有贡献，井勿幕、于右任即由康宝忠介绍加入该会。于右任与康宝忠同是陕西人，1906年康宝忠引荐于右任会见孙中山，于右任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2月，康宝忠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担任留日学生会总干事一职。清政府下令逮捕留日学生斗争中的骨干人物，康宝忠亦名列其中，经人力保后才得以幸免。此后又任留学生总干事数月。

1906年初，同盟会派遣成员归国筹划反清革命斗争，康宝忠奉派与四川籍革命党人返川策动。甫抵成都，康宝忠即听说革命党人在上海、江苏、浙江、河北、安徽等省次第失败。康宝忠见四川形势不利于展开革命活动遂决定再赴日本。正当此时革命党人行踪暴露，事

泄，一些革命党人相继被捕，康宝忠因而暂避家中。四川总督锡良面责康父，并责令交出康宝忠。不久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康宝忠才免于被捕。当年，康宝忠再抵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专攻法政。同年，章太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革命刊物《民报》。12月2日，《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在日本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黄兴主持大会，孙中山在康宝忠、景梅九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并发表演讲，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在日期间，康宝忠还参加了章太炎开办的“国学讲习会”，成为经常听讲的十余人中最认真的一个，从而“学乃大进”被人视为章的高足。1908年康宝忠自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肄业[(5)]。1909年，康由日本回国，遵从父亲意愿参加清廷举办的留学生考试，得法政科举人，授七品京官，分发邮传部，充当大清银行学堂教习（教员）兼学监，旋代理教务长。

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等人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康宝忠亦被清廷怀疑跟踪，遂借年假以省亲为名返回四川成都。1911年元旦抵家，不久，其父去世，故居忧于家。此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党人就以康宝忠家为聚集地点，部署反清的具体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康宝忠偕友人东下至重庆，时革命党人张培爵已在重庆宣布独立，建立蜀军政府，请康宝忠担任政府内务部长，康宝忠坚辞不就，旋至南京，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直辖机关秘书处下设文牍科的科员[(6)]。经陕西省电举，康宝忠又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参议院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建都问题，康宝忠力主定都北京，与孙中山建都南京之主张相反。革命党人于右任（时任临时大总统府交通部次长）力劝康宝忠以大局为重，康同意放弃自己的主张，但未出席第二日的参议院会议。康宝忠既无力扭转政府意见，又对革命前途忧心忡忡，苦闷之中通电辞去议员职务，只身赴上海，发誓终生脱离政治，专力从事教育事业。

1912年7月，《东大陆报》在上海创刊，康宝忠任总编辑。9月章士钊在上海主办《独立周报》，康宝忠加入其中，撰写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康宝忠文笔犀利，语言流畅，其文章影响很大，因而上海各家报馆纷纷聘请他担任记者。1913年7月，章士钊投身“二次革命”后，《独立周报》为袁世凯政府怀疑，遂中止发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于右任到上海继续主持发行《民立报》，聘康宝忠兼任《民立报》记者。1913年9月4日，《民立报》被袁世凯政府查封。之后于右任为掩护自己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以康宝忠为总经理，张季鸾任编辑[7]。

1913年12月，康宝忠在上海创办《雅言》杂志，1915年停刊。该杂志包括论说、纪事、文艺、杂录等内容。康宝忠以“逵　　宦”“廖居”等笔名发表多篇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方面的文章、诗存、杂记、闻见录等。编辑《雅言》期间，1913年康宝忠还担任吴淞“中国公学”的教务长，当时公学经费支绌，教师薪资多不能按时发放，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康宝忠坚持办学，直到1915年学生毕业时方辞职。

1915年康宝忠赴北京出任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不久，北京大学聘其为讲师，旋改聘为教授，后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教师，讲授伦理学、社会学、中国法制史等。

1916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开办第一班社会学，由康宝忠担任教职，自编讲义，印发学生参考。据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回忆，此为中国人自己讲授社会学之始，由此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以前虽有浙江、广东、上海等地的大学开设有社会学课程，但无论哪种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教师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康宝忠所授课程，“讲解鲜明透彻，深得学生信仰，所编社会学讲义，文笔典雅，涵义湛深”，以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的理论为主，而“参以己见，卓然成一家言”[8]。康宝忠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社会学人才，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韵学源流》是清代贵州巨儒莫友芝撰写的一部声韵学史著作，1871年作者去世时该书尚未定稿。刘师培入蜀时，遵义人赵幼愚以自己所得的《韵学源流》校抄本赠予他。1918年康宝忠根据此校抄本加以印行，但流传不广。1929年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在广州任教时，对康宝忠印本进行校勘、圈点及分段，重新印行[(9)]。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在沈尹默等北大教授的提议下，决定组织教师评议会以共同治校。评议会会员在全体教授中产生，约每五人中选举一人，当时北大教授共八十余人，选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任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定均须评议会通过，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7月张勋复辟后，北大教员又商量组织教员会，推举政治法律系教员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监督康宝忠，同时由陈大齐和沈士远跟随左右，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10)]。

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私宅召开成立大会，刘师培、黄侃出任总编辑，康宝忠担任编辑兼总务主任[(11)]。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政府的卖国行为。会后爱国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大批军警出动进行镇压，逮捕示威学生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当时，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北京国立各校校长皆辞职，学生与政府互相对峙，势态蔓延几乎不可收拾。北京大学乃率先成立教职员干事会同情并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并维持秩序，康宝忠以其出色的活动能力被推为干事，“出与公私各校教职员相结集，于是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而君被推为总务干事，任主席，君慷慨不谢”。康宝忠办事认真，不辞辛劳，“每侵晨从事，讫深夜；事急时，走寒星烈日下，未尝自休。数月之间，中更大小变，君始终无所谈”[(12)]，致使心力交瘁。11月1日晨，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授课，课间休息时，康宝忠突发急病，猝然辞世。

康宝忠遗著有《社会与伦理》、《伦理学》、《社会学讲义》、

《社会政策》、《中国法制史略》、《逵君讲演录》、《廖居诗存》近10种，译著有《经济学研究》等。

主要参考资料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院专刊（32），1975年2月初版。

蔡元培：《康宝忠事略》，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第353—354页。

---

(1) 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05年），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75年8月20日，第580、583页。

(3)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院专刊（3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院发行，1975年2月初版，1982年8月再版，第309页。

(4)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22-323页。

(5)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26页。

(6) 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7) 刘延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20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页。

(8)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24页。

(9) （清）莫友芝著、罗常培校点：《韵学源流》，中华书局1962年版，前言第1页。

(10) 沈尹默：《我和北大》，选自《文史资料精选》第5册，中国文史

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页。

(11) 《国故》月刊第1期，1919年3月20日，第273页。

(12) 《康宝忠事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4页。

康心如

周本渊　熊尚厚

康心如，名宝恕，字心如，以字行，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1月生于四川绵阳。祖籍陕西城固县，祖辈世代做官。父亲康寿桐历任四川彭山、梓潼、什邡等县知事。

康心如幼年接受传统教育，十一二岁起，父亲就让他阅读新书新报。他的长兄康心孚因钦佩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时常向他讲述康、梁的事迹，介绍《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给他看。康心如不仅仔细阅读这些报刊，就连谈话和作文都模仿《新民丛报》的语调。1906年康心如到成都入中学堂，这时康心孚留学日本，已摆脱康、梁影响，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经常给他寄《民报》、《浙江潮》和《中国秘史》等书报。是年，康心孚从日本回国探亲，又向他介绍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谓中国要自强，非推翻清政府不可。康心如受其长兄的影响，不再读《新民丛报》，转而热心阅读《民报》和《国粹学报》，思想开始倾向革命。1907年，康心孚从日本寄回《民报》、《革命军》、《黄帝魂》及《三十三年落花梦》等宣传革命的书报，叫他推销。康心如就退学在成都鼓楼北街开办了一家书铺，取名“粹记书庄”，后又于重庆设了分庄。在宣传革命思想及秘密联络革命党人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1911年春，康心如离开四川前往上海，经康心孚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去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科。他在课余编辑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参与革命活动。同年夏，因父亲病故回成都奔丧。不久，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初，康心如前往重庆联络蜀军政府，途中听说成都巡防军在赵尔丰等支持下哗变抢劫，即又折回成都准备反赵。旋兵变由各

路同志军及大汉四川军政府平定，他便在成都留下。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宋教仁、章太炎派康心如和同盟会员李哲夫、饶伯泰等，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次年春，康等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公论日报》，同时又与友人汪象孙、李澄波及胞弟康心之等，在成都创刊《国民公报》，宣传新合并成立的国民党主张。不久，他被《公论日报》派任京、沪特派访员，是为四川报界第一个专电访员。他在上海先后任民立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及上海浚川源银行经理，“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康心如接受其长兄建议，于1913年12月在上海创办《雅言》半月刊。初先刊载学术性文章以取得邮递行销内地的许可，出至11期刊登了四川张铮写的一篇抨击袁世凯擅改《约法》、“违宪叛国”的文章，《雅言》便被迫停刊。

1915年春，袁世凯为了收买革命党人及其舆论工具，托人函邀康心如来北京，欲利用他将于右任骗来北京。康到北京后虚与委蛇，随即很快回到上海。12月，他在于右任指导下，约集张季鸾、曾通一、朱镜宇等创办了《民信日报》，自任经理，公开进行反袁斗争。袁世凯败亡后，1916年8月该报迁往北京继续出刊，康心如也随之到了北京，并在北洋政府侨务局任佥事，同时给上海《新闻报》投寄特约通讯，又任重庆《新蜀报》访员。是年9月，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在北京发刊《中华新报》，康心如应邀任经理兼编辑，此报成为政学会在旧国会复会后的一个言论阵地。1918年9月，《中华新报》转载北京新闻社所发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一文，揭露段祺瑞政府签订卖国的满蒙五路大借款，报社被北京京师警察厅封闭，康心如和张季鸾一起被捕。康心如被关了将近一年，才被正式判处拘役二十日，缓期三年而释放。

康心如经过此次挫折，又因康心孚于1919年病逝，家庭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便产生了“不做官，不入党，不办报”的所谓超政治思想，决心弃文经商，寻求发财致富之道。1921年，他为重庆大盐商邓芝如

奔走，与美商上海美丰银行总理雷文（F．J．Raven）协议，创办四川美丰银行，资本额25万银元，美股占52%，华股占48%，于次年4月在重庆正式开业，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并发行兑换券（通称“美丰券”）。邓芝如借12000元给康心如作股本，康担任协理。开业后，初因搬用美国银行的经营方式，业绩惨淡。1923年春，康向雷文建议采用北京中外合营银行的经营方法，加以改革整顿，营业大有起色。同时，康大力扩大美丰券的发行，由重庆几家钱庄代销，大获厚利。美丰券发行额最高时达150万元，超过资本额5倍。

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四川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外国商人纷纷离开重庆，雷文调走了美丰银行的大量资金。眼见四川美丰银行行将垮台，康心如乃请四川军阀刘湘出面，筹集银元13万元将全部美股买下，又由重庆盐商认股5万元。次年3月，四川美丰银行改组完成，康任总经理。

从此，康心如紧紧依靠刘湘的庇护，发展美丰银行。经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和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公署会衔布告，美丰券受到特别保护，在刘湘军威所达之处通行无阻。四川美丰银行几年间，扩充分支机构达34处，并参与申汇和公债的投机买卖，大获其利。1935年8月，在重庆建成价值50万元的美丰大楼。抗战前夕，美丰银行资本额扩充至300万元，较创办时增长了11倍。同时，康心如尽力支持刘湘的“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政策，参加二十一军的各种金融活动，积极支持经营各种地方债券。他曾任二十一军顾问兼财政设计委员会委员、二十一军整理重庆金融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四川地方银行理事、地方银行发行准备库委员等职。

随着四川美丰银行的迅速发展，康心如在抗战前已成为四川金融和工商业界的显赫人物。美丰银行资本先后投资重庆电力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渝新纱厂、重庆国货公司等企业，康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或常务董事。1931年9月他任重庆银行公会常务委员，1937年秋任该会主席，并任重庆银行、钱业联合同业公会联合公

库常委。

康心如在经营银行和工商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像他说的那样“不办报”，而仍然兼及新闻事业。“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其弟康心之在重庆复刊《国民公报》，先后聘杜协民、姜公伟分任正副总经理。该报日销一万份，为当时重庆工商、金融界的民营报纸。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8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重庆顿时成了全国战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康心如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利用他与当时重庆市市长贺国光及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旧交关系，于翌年10月当上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并和国民党大官密切往还，十分得势。

康心如根据战时交通梗阻、货币贬值的情况，组设“丰”字号子公司扩展业务。从1939年起，陆续开设了德丰、华丰、宝丰、新丰、群丰、兆丰等公司，分别经营进出口、房地产及农产品贸易，并扩大对工矿、交通、金融、保险等业的投资。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营企业多达八九十家，形成美丰银行资本系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康心如为了谋取美丰银行的进一步发展，积极开拓市场，在长江南北各大中城市扩充分支机构达45处。他还前往美国、加拿大考察银行业务。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民生凋敝，百业萧条，金融紊乱，社会经济日趋崩溃。美丰银行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迭遭挫折，每况愈下。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借此收去美丰存金三千多两。同时，军阀退股，特务敲诈，明抢暗夺，使美丰损失惨重。次年7月，康心如虽大做银元存放、汇兑，企图挽回损失，但仍遭失败，美丰摇摇欲坠。重庆解放前夕，在康心如面前摆有三条路：一去香港，二去美国，三留重庆。他鉴于背离祖国寄人篱下之苦，乃决心留在重庆。

重庆解放后，康心如继续经营美丰银行。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

财经委员会委员，被选为重庆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还任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公私合营重庆投资公司经理。

1969年11月16日，康心如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康心如：《我与报》（未刊稿）。

康心如：《忆心孚兄》（未刊稿）。

《重庆第三届第九次工商联扩大联席会议汇刊》，第44—46页。

康有为

耿云志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康的曾祖做过福建按察使，祖父曾任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为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曾随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官至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广西巡抚。

康有为自幼读书，十八岁起，受学于朱九江。朱强调“经世致用”，对康很有影响。后来，康有为逐渐对传统儒学发生怀疑，认为“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并说“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1)]。1879年，他结识了在北京做翰林院编修的粤人张鼎华，从而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2)]。这一年，他开始读了一些西书，并初游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3)]。1882年，他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归途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4)]。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发下，康有为看到中国处于列强环逼之下，“兵弱财穷”、“人情偷惰”[(5)]，极感“忧愤迫切”，希望学习西方，赶紧变法图强。1888年，他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时，“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6)]。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但没得上达，反被视为“狂生”而遭到攻击。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离京回乡，“专意著述”，为变法维新建立理论基础。他受到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着手从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儒家“经典”中，寻求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来学者逐渐增多，著名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等。这年，刊出了他的第一部代表作《新学伪经考》。

1893年，康有为中举人。1895年春，他偕梁启超等入京会试，正好赶上清廷与日本媾和，即将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得讯，十分激愤，即同梁启超等鼓动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要求光绪帝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从此，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领袖，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不久，会试发榜，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到任，继续活动变法。5月末，他再次上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7]等改革主张。这次上书，光绪帝看到了，表示“嘉许”。一个月后，他在第四次上书中，更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建议。但此书又为守旧分子所阻止。书既不得上，他感到要变法，非先在上层制造舆论不可。8月，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称《中外纪闻》），命梁启超主笔，日印千余份，分送朝官。稍后，更创立强学会，组织维新派的力量。会务颇得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支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亦参与会事。10月，康有为离京去上海。11月，创上海强学会。他的弟子在次年初办起了《强学报》。但不久，北京强学会被劾解散，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也因难于支撑而自行解散。

1896年1月，康有为以母寿回广州，随即在万木草堂继续讲学。是年，写成《孔子改制考》，这本书和《新学伪经考》同是康有为建立维新理论的重要代表作。

1897年11月，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康有为看到外患日亟，赶忙到北京，再度上书，希望光绪帝能“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8]。这时，他在京一面为胶事奔走，一面积极联络同党，结成“粤学会”、“知耻会”等团体，为变法救国造声势。受此影响，“蜀学会”、“闽学会”、“陕学会”（又称“关学会”）等相继出现于北京。这时全国各地的学会、学堂、报馆也纷纷设立，风气为之一变，维新运动渐入高潮。

1898年1月，光绪帝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在问对中，康当面驳斥了荣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随后，他奉命上《统筹全局折》，指出，中国处于当时的形势下，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他要求光绪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大誓群臣，以定国是”[(10)]，立即着手变法。4月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组织保国会，标榜“保国、保种、保教”。这时，顽固派乘机散播流言，说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攻击康有为，但攻击者受到光绪帝的申斥。当时的清廷官僚中分化为“帝党”与“后党”。后党即依附于西太后的一群顽固守旧的大官僚，他们得到帝俄的实力支持，其势力远较帝党为雄厚。帝党虽也有英、美为背景，但得到的仅是表面的“同情”，缺乏实力。他们中一部分人支持变法，含有引进维新派，壮大帝党力量，以与后党夺权的意图，与康有为的维新观点和主张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康有为所赖以推行变法的上层势力，是极为脆弱的。更不消说，他们是完全脱离群众的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开始变法。16日，康有为受到召见，详陈变法要领。光绪帝本想重用康有为，但碍于“后党”阻挠，仅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来，为推动变法进行，光绪帝提拔了维新派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光绪帝的意旨通过他们转给康有为，康有为的奏议也通过他们上达到光绪帝。

康有为从1888年到1898年变法前夕，先后七次上书，在“百日维新”期间，又上了三十余道奏议。在这些上书和奏议中，他提出了一条在不根本改变现行帝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他指望用自上而下的改革办法来取得有限的民主权利；他幻想通过变法，使国家在列强面前取得平等独立的地位。这无疑表现了康有为及其所代表的维新派地主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思想。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脆弱：一方面，他们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不敢同卖国的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十

分害怕和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这就注定了变法必然失败的命运。变法开始之日，也正是顽固派开始部署政变之时。在变法进行期间，顽固派多次发动反攻。在斗争最紧急的时刻，康有为等去向握有兵权而又曾一度同情维新运动的袁世凯求救，结果被袁世凯出卖。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废除新法，重行听政。28日，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有为被迫逃亡日本，变法完全失败了。

戊戌变法前后，孙中山已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为反清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康有为初到日本，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热望和他联合起来进行反清革命。但他念念不忘他的“圣上知遇”之恩，拒绝孙中山建议，坚持改革立宪的主张，决心保皇。

1899年3月，康有为离日本去加拿大。7月，他在加拿大的千岛地方组织“保皇会”，仍寄望于光绪帝重新掌政，推行变法。1900年，国内发生义和团运动，康有为与梁启超乘机鼓动唐才常、林圭等建“自立军”，搞勤王运动。唐、林在国内主持军事，康、梁在海外募款。但康有为未能以充分的募款接济国内军事。对此，保皇会内颇多不满，指责康有为中饱私囊。是年8月，唐才常等以事泄被杀，勤王运动失败。此后，康、梁等放弃了暴力的尝试。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极力反对革命，并说什么，只要“皇上一复辟”就会“立予国民自由自主”[(11)]。他的这种宣传受到革命派章炳麟等人的有力批驳（见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是年，康有为在印度大吉岭完成了他的《大同书》。

康有为和他的门徒在海外的头几年，奔走于北美、南亚和南洋各地，积极经营保皇会，并在多处集资办报，散布他那套“满汉不分，

君民共治”的保皇主张，还颇能号召一部分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潮流日趋高涨。革命派认为，只有从思想上大力摧毁改革派的宣传，才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是年11月，《民报》在东京出版，集中地宣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当时正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便与《民报》展开论争。从而使前此数年在海外各地分散进行的两党的论战，这时集中于一个主战场，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

1906年9月，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下了一道所谓“预备立宪”的诏书。对此，康有为欢欣鼓舞，认为“预备立宪”是开始“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12)]。遂决定将他们的保皇会招牌换记，称为“宪政会”，继续其抵制革命和吁求实行宪政的政治活动。

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13)]，连写《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论》两篇文章，攻击革命，反对民主共和。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14)] 提出他的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想以“旧朝旧君”，或用孔丘嫡裔充当“虚君”，以收拾政局。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民国成立后，康有为以清室遗臣自居，念念不忘复辟清王朝。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极力丑诋共和政体，诬之为祸乱的根源。1912年秋，他指使门徒陈焕章等在上海组织孔教会，大搞尊孔复辟活动。1913年2月，又命其弟子在上海出版《不忍》杂志，一意鼓吹复辟。是年11月，康有为从日本回国，被门徒拥戴，当上孔教会长。他把定孔教为国教作为孔教会活动的中心目标，企图以此敲开复辟之门。1913年8月，他的弟子陈焕章等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1916年9月，康有为亲自上书北洋政府，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15)]。

康有为鼓吹孔教是直接与张勋的复辟阴谋活动相联系的。早在1913年春，他就与张勋沟通关系，密谋复辟，“因事泄，中道而废”[16]。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不久，康有为即致信张勋说：“挟旧君即以安中国，将军其有意乎？”[17]力劝张勋乘时搞复辟。

1917年6月，张勋乘北洋政府大闹府院之争的混乱时机，假“调停”为名，率五千辫子兵进北京。紧接着，康有为化装入京，与张勋一道策划。7月1日，他们拉出溥仪“登基”，宣布清朝复辟。康有为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躲进美使馆藏身近半年之久。这期间，他写了一本《共和平议》，攻击辛亥革命，诋毁民主共和，咒骂“中国若仍行民主……终遂灭亡”[18]。

1917年12月，康有为离开美使馆。这时的康有为已丧失了任何政治活动的资本，但他却如同生活在梦幻里，野心不死。此后数年，他游散于国内各地，作为亡清的孤臣孽子，与许多反动军阀政客来往，对“猛志除孙”（即反对孙中山）的吴佩孚更是特意联络逢迎。时代越前进，康有为的思想越僵化，政治立场越反动。到了1924年初，他还在给溥仪的师傅庄士敦的信中梦呓般地讲他的一套复辟清室的计划。

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抱着他那永远无法实现的复辟梦想病死于青岛。

---

(1)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113页。

(2)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4页。

(3)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5页。

(4)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6页。

(5)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13页。

(6)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20页。

(7)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71页。

(8)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94页。

(9)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197页。

(10)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199页。

(11) 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12页。

(12) 康有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见《民报》第13号。

(13) 康同璧：《续康南海自编年谱》（油印本）。

(14)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第6、13页。

(15) 《时报》1916年9月20日。

(16) 康有为：《与大隈侯书》，《不忍》第9、10合册。

(17) 赵丰田：《康长素年谱稿》，《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第232页。

(18) 康有为：《共和平议》，第43页。

康泽

刘敬坤

康泽，谱名代宾，字兆民，四川安岳人，1904年5月25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生。其父康历全，务农，有田数亩，每年可收谷数石。康泽七岁起就读私塾及本地小学，十五岁入安岳县高等小学校，一年后毕业，考入安岳县立中学。不久，其父病故，家中靠母亲何氏种地维持生计。康泽在校所需之学杂费、伙食费及衣服鞋袜等悉赖老师、同学接济和帮助。康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每学期均列全班第一。康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其中号召“打倒帝国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深表拥护。

1924年夏，康泽在安岳县中毕业，得悉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且全系公费，即联络同学姚光熙等八人，经熊克武介绍赴广州投考，于1925年2月经上海到广州，参加军校第三期补考被录取，编入入伍生队第三连。不久，康所在连参加平定刘、杨叛乱，防守虎门要塞。军校第三期开学后，康泽编入步兵第七队，后改为第三队，并集体加入国民党。康学习努力，对于军校左、右两派的争论，表示：“我不赞成左派，也不赞成右派，我要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国民党员，做一个国民党正统派。”[(1)] 这年10月，康泽被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去30人编成一个班，组成黄埔军校特别党部莫斯科支部，康泽等三人为支部执行委员。康泽此时完全赞成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所宣扬的观点，认为“这是国民党员应该有的认识和觉悟”[(2)]，因而成为中山大学中反苏、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分子。1927年6月，康泽等人被苏联遣送回国。康泽回到南京后，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到，经谷正纲介绍进入中央党务学校训导处任训导员。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把持的中央特别

委员会的风潮中，康泽是南京“救党运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秘书，在组织游行、抬尸请愿、联络各地响应、拥蒋复出等活动中十分活跃。1928年2月，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随即又改任中央警卫军政治部主任。康泽受到蒋介石青睐，不久又被调到徐州，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在蒋身边工作。康任事兢兢业业又机智能干，日益受到蒋的重用。同年年冬，康被蒋指定与蔡劲军等人组成侍从室管理委员会，负责训练事宜；又任黄埔同学会训练委员会委员，有时还代蒋批阅部分公文与起草文电。1929年2月，康泽被派至第二师任政治部主任，进行部队的政训工作，并编成《朝集问答》，由团、营训练员在朝集时向军官和士兵讲解军人的职责；又以此为内容编印士兵识字课本。康还在政治部设立职业训练班，抽调士兵轮流受训，使之学习掌握一门生产技术。

1930年3月，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宣传大队下辖三个队，每队有10名宣传员，队长由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员担任。此时中原大战爆发，康泽率宣传大队随军西进，驻归德，奉命调查豫东战区灾民损失情况，甚为细致周密和迅速准确，受到嘉奖。其时，蒋介石指挥战事，经常往返于归德至野鸡岗之间，宣传大队受命担负两地之间的护路任务。康泽定出奖惩办法，发给民间枪支弹药，规定铁路沿线两侧村庄和居民的护路职责，致使无需派出兵力，得以保证铁路的安全和畅通，并捕获了冯军破坏人员。康泽再获记功一次。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获胜后，筹划兵力“围剿”湘、赣等区的工农红军。1930年12月，康泽被派往湖南，率领第二宣传大队至长沙、平江、浏阳一带活动，并创办《剿匪军》半月刊，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共产党已变成流寇”等等。这份半月刊还发行到全国各地以扩大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康泽率领宣传大队回到南京。他接办亏损严重的《建邺日报》，向黄埔同学募捐集资，改组为《中国日报》，标榜

以“发扬民族精神，代表真正舆论”为宗旨，于1932年元旦创刊。同年3月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后，《中国日报》即成为复兴社的机关报。康泽此时在复兴社任宣传处长，又是复兴社内层组织“力行社”的成员和复兴社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书记。

1933年6月，康泽被蒋介石召去江西临川，受命筹备组建政治警察队伍。康立即拟定计划报蒋批准后，于7月将在南昌聚集的军校失业军官，施以短期训练，配备武装，分发到原来的苏区各地去“组训民众”，“清剿散匪”，“建立地方秩序”。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这支政治警察队伍取名为“别动队”。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别动队宣告成立，康泽为别动队总队长。总队下辖大队、中队、区队、分队。每个分队有队长、队员、队附各一，预备队员五至十名，配有左轮手枪、驳壳枪和步枪，还配有轻机枪一挺。每个中队配有一个分队为便衣队，队员持有特别证件，可任意搭乘一切公私车辆，自由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还有权调动当地一个连的兵力。别动队是一支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警察队伍，在赣、闽、皖三省原来的苏区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推行连坐法，训练壮丁，组织“剿共义勇队”，督率地方修建碉堡，有时还与红军游击队发生小规模战斗。至1935年夏，别动队发展至七个大队和一个巡逻队，队员总数超过500人。

在工农红军长征临近四川之时，刘湘向蒋介石告急求援。1935年3月，康泽奉派以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政训处长的身份率别动队入川，首先占据重庆战略据点浮图关。此后，康泽在四川先后兼任第二十一军政训处长、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省国民军训总指导员、省禁烟缉私处主任，权势日益显赫。在康泽主持下，四川全省保安处和各专区保安处设政训室；川军的团以上单位设政训处，营连设指导员，多由别动队员担任；又开办壮丁干部训练班、公民训练班，吸收受训者加入复兴社。康泽联络四川各界代表性人物，收编川东南土匪；撤销国民政府对青年党人的通缉令，与青年党联手进行反共；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蒋介石开办峨眉暑期军官训练

团，康泽任政治组副主任。1935年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成立，原驻川参谋团并入行营，康泽即任重庆行营政训处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的谈判。1937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赴延安考察团时，中共方面指名康泽不得参加该团。7月，蒋介石指派康泽与陈立夫、张冲三人为代表，与周恩来等进行国共谈判，几经折冲，蒋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三个师以上设政治部负责联络，并提名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康泽任副主任。中共方面拒绝接受此方案。8月12日，周恩来、朱德与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内容，康泽主张《宣言》中不必提民主，删去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提国共双方“获得谅解、共赴国难”。这些主张遭到周恩来、朱德的严辞驳斥[(3)]。9月中旬，康泽与秦邦宪商谈《宣言》修改事宜时，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竟至互拍桌子。直至9月21日晚，康泽才代表国民党方面在宣言上签字。此后，康泽被蒋介石提名参加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为委员，并负责国民党方面与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络。11月，蒋嘱康派人经营湖南，作为抗战的根据地，康泽说：“湖南不够做抗战根据地的条件，够条件的是四川。”[(4)] 深获蒋之赞许。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康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训及敌占区谍报活动；并兼财政部缉私室主任。同年4月，张国焘叛逃至武汉，康泽接到侍从室的通知，把张先接到自己家中住下，以后又安排秘密住处，每月给予生活费200元。

同年6月，国民党在筹备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时，蒋介石多次召集康泽等人谈话商讨。当时担任复兴社书记长的康泽向蒋请示：“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青团？”蒋说：“当然这么做！”康又建言三青团的组织应有一个核心，蒋答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5)] 康泽在参加起草三青团章程时，定三青团为组训全国青年的组织。是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康泽任中央团部组织处代处长（处长胡宗南），并兼武汉支团部主任。康泽把复兴社的骨干都转到

了三青团，在中央团部各处、组及组建各地支团筹备处时，都以复兴社成员为核心力量，又把一部分别动队员和中央军校特训班的人员也转移到三青团，终于使三青团成了实际听命于康泽的组织，有力地抵制了陈立夫CC派势力的进入。康泽还于1939年春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共同负责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的领导工作。1940年10月，康泽实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又任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大量训练三青团干部。1941年秋，康泽在重庆青木关附近农村设“战时青年训导团”，并自任主任，沿袭“反省院”的手法，对有“思想问题”或有共产党嫌疑的青年学生以及公务员、教员、自由职业者、商人、农民、军人等进行为期半年的严格的军事管理和训练。受训人员需写出详细的自传，交代社会关系及所读之书籍，听各种政治课，谈自己的思想转变；半年后如果被审核认为“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的，则继续留团“受训”。受训人员结业出去工作或学习，必须向当地三青团部报到，继续接受考察。至抗战结束，重庆本团共办七期，受训人员超过五千人。其他地方的豫皖分团、五战区分团（老河口）、衡阳分团、东南分团（上饶）统归当地的三青团部管理，康泽加以指导。在江西上饶的东南分团，就是专门关押新四军人员的上饶集中营，受训者经常被打骂，或罚重劳役，如同囚犯。

1943年3月，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康泽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及常务干事，仍兼任组织处长。大会决议青年干训班扩大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蒋调其子蒋经国从赣南来到重庆任该校教育长。康泽开始感到自己在三青团的地位受到威胁。

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战局严峻。康泽提出由三青团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主张，与各地三青团负责人商议均获赞同。康在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上提出关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标、发动步骤以及征集中的有关问题的报告。嗣后军事委员会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讨，康泽在会上作了详细阐述。10月，蒋介石召集各方面负

责人在中央党部举行会议，决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当即成立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以陈立夫、朱家骅、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五人为常务委员，康泽为秘书处主任秘书。蒋面嘱康泽说："要好好的去尽力，这是青年团的表现机会。"[(6)] 康泽积极布置各地三青团发动从军运动，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战报国。从军运动历时三个月，有十三万余名大中学生激于抗日爱国热忱报名应征。后经检验合格者七万余人，分别编为青年军第二〇一至二〇七师。

在青年军七个师组成后，蒋介石指定蒋经国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实际掌管了青年军的一切，康泽只得黯然离去。康泽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却被张治中召去谈话说："委员长骂你为什么把持青年团？是不是想造反？"[(7)] 康泽知道事出有因，立即写了请辞三青团中央干事、常务干事及组织处长的报告，要求准予出国考察。

1945年10月，康泽去西欧、美国考察。他于1946年在美国接到9月召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后，专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命康"明春回国"。于是蒋经国在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和常务干事，并任组织处长，康泽则在三青团内无任何职务，后来被安排为立法委员。1947年3月康泽回国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1月被派往襄阳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

随着国民党军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已成为战争前沿。康泽竭力想要固守所辖区域，但难以抵挡中原解放军的凌厉攻势。1948年7月的老（河口）襄（阳）战役中，康泽想凭借襄阳的险要地势和大量堡垒工事固守，但解放军攻城部队以小部队佯攻十字架山和虎头山加以钳制，主力部队攻占山脚下的琵琶山、真武山两个小山头，打开通道直逼襄阳城下。康泽向蒋介石发电求救，表示"决与城共存亡"。7月15日夜，解放军发动总攻，经一夜激战，第

十五绥靖司令部及第一〇四旅全旅和第一六三、一六四旅一部共二万余人被全歼。襄阳于7月16日解放，康泽被俘，当时报端误传康泽自杀。

康泽被俘后，接受学习和改造15年，1963年4月获特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在196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1967年11月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11月中旬因脑血管旧病复发去世[8]。

---

(1)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2)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12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6页。

(4)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44页。

(5) 袁南生编著：《十大特务秘史》上册，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6) 李以劻：《我所知道康泽将军之死》，《传记文学》第61卷第1期。

(7)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140页。

(8)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151页。

柯劭忞

娄献阁

柯劭忞，字凤荪，又字凤笙，晚号蓼园。山东胶州（今胶县）人，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生。父柯蘅是清末名儒，多年任教，通经史，长于诗。母李氏亦能诗文。

柯劭忞幼从父读，七岁会诗，稍长，广学经史、算术、天文、地理等常识。十六岁为生员，由于成绩优异，不久又被选入济南尚志书院学习。

1870年，柯劭忞得中乡举，受到名儒朱肯甫的赏识。不久，朱视学四川，柯随行并襄助科举事。此后他往来晋、粤、辽东等地，受聘担任书院主讲。

柯劭忞曾六次会试未中，仍刻苦攻读，1886年终于考取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从此长期居住北京，潜心学术。他曾与郑东父共同研究《春秋穀梁传》，又为吴汝纶订正《尚书故》四册，并着手广泛搜集元史材料。这期间，柯同国子监祭酒盛昱经常诗酒往还，和袁昶、沈曾植等亦有交谊。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柯劭忞追随到西安，同徐世昌一起被派为政务处行走。1901年，柯出任湖南学政。1904年离湘回京，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习和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撰文、侍讲、侍读。1906年，他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贵州提学使。1908年，柯再次调回北京，在学部任丞参上行走，一度署右参议并左丞；又由学部奏派充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

1910年，清政府迫于人民实行宪政的要求，成立资政院，柯为钦

选各部院议员之一。同年，莱阳发生民变，他作为议员和乡绅，极力调解官民矛盾。翌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清廷垂死挣扎，除起用袁世凯外，还派某些“声望夙著”的大员赴各省进行所谓宣抚，柯被派往山东，任宣慰使兼督办团练大臣。他带领同僚驻节兖州，在兖沂曹属各县活动。不久仍调回北京，为典礼院学士，派懋勤殿行走，赐紫禁城骑马。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被迫退位。面对清王朝的灭亡，柯劭忞痛哭流涕，此后一直“以孤忠自鸣”[(1)]，隐居不仕。1914年他被任命为约法会议议员及参政院参政，但均未就职。袁世凯曾几次劝其出山，柯甘为亡清遗老，不肯为官。后徐世昌做总统，柯和徐本是同年进士，关系较密，一时常出入总统府，并参加了由徐出面设立的“晚晴簃诗社”，但仍不愿问政。

1914年，清史馆成立，赵尔巽任馆长，柯应聘为总纂。他撰写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和部分传稿，又总纂纪稿；赵尔巽去世后，柯兼代馆长，主持馆务。柯与一百多人参加编写的《清史稿》，到1927年大体完成，翌年印行，共536卷。该书内容文字均有错误，但它比较系统地汇集了清史素材，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与此同时，柯劭忞更致力于重修《元史》的工作，被人推崇为著名的元史学家。明初宋濂等编撰的《元史》，仓促成书，且出于众手，芜杂疏漏，谬误百出，一直为后人所诟病。明、清两代六百年间，试图重修元史者不乏其人，有关的书也出过多种，但均未能令人满意。柯继诸家之后，积三十余年之力，从《永乐大典》、金石文字和外籍、秘集中广搜博采，细心研究，又吸取了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成果，“熔裁钩贯，校异订讹，衡其情事，按之时地，以定从违，补遗阙”[(2)]，对宋著《元史》作了大量的修订增删，于1922年完成了《新元史》的编撰工作。全书共257卷，一百五十多万字，受到不少学者的好评，一时被认为集元史研究之大成，“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洽’之二种长处”

[3]；但也有人指出其体例陈旧，某些事实不确、取舍失当、无序跋索引等缺点。徐世昌曾以大总统名义令将柯的《新元史》列入正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尤赞赏该书，特赠他以文学博士学位。

1925年5月，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柯劭忞出任委员长。他并主持撰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自己整理编撰经部易经类提要152则。

柯劭态晚年继续研读古籍，并以著述为职志。他希望用“春秋大义”针砭动乱的社会现实，精心纂注《穀梁传》，于1927年出版《春秋穀梁传注》十五卷，曾被人揄扬“足与左传杜注、公羊何解方驾矣”[4]。柯还努力校注其他经史书籍，出版的有《新元史考证》、《译史补》等，还有《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选补注》、《后汉书注》、《说经札记》、《蓼园文集》等，均未刊印。1931年，他搜采经注善本刻石，附以自己所著的《十三经考证》，打算存于曲阜孔庙，但未及完成。1933年8月31日因病逝于北平（今北京）。

柯劭忞除治经史外，诗亦有名，但多已失传，今存者有《蓼园诗钞》五卷，《蓼园诗续钞》二卷。

---

(1) 王森然：《柯劭忞先生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杏岩书屋1934年初版，第53页。

(2) 柳诒徵：《柯劭忞》，《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2号，第89页。

(3) 李思纯：《元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第3版，第76页。

(4) 牟润孙：《柯凤荪先生遗著三种》，《图书季刊》第2卷第4期，第237页。

孔伯华

寿祝衡

孔伯华，名繁棣，字伯华，以字行，号不龟手庐主人[1]，山东曲阜人，生于1885年6月5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父亲孔庆铣，清末曾在军谘府任职。

孔伯华六岁时开始在私塾就读。稍长，随其祖父宦游。因祖父善岐黄之术，他耳濡目染，便对中医发生浓厚兴趣。十六岁时，全家迁居到河北易县以南的白杨村，他随父亲读书的同时，向当地老中医蔡秋堂、梁纯仁学医。二十二岁时，孔伯华在易县正式行医。二十五岁时应聘到北京外城官医院任中医内科医官（即医师）。不久，他在京私人开业，全家迁北京定居。

1917年，孔伯华曾先后参加晋绥和廊坊地区的防疫工作，临床经验日益丰富。其后，他与同事曹巽轩、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陈企董、赵云卿等合编《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一书，共十卷。

孔伯华在广为患者诊治过程中，注意医理的研究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善于汲取各家之长，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声誉日隆，成为驰名全国的中医师，与萧龙友等同为北京四大名医。他擅长内、外、妇、儿各科，尤精于医治温热病。由于他善于灵活施用生石膏，曾有“石膏孔”的雅誉[2]。

孔伯华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热心中医界的社会活动。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会议”，西医余云岫等人在会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等。此案竟然得到通过，中医被明令取消。广大群众和中医药界闻讯莫不

愤慨，纷纷抗议，于3月17日汇集于上海，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并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他率领请愿团前往南京，与政府当局据理力争，强烈要求取消这项荒诞的决定。在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援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

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合办北平国医学院，共任院长[(3)]。1944年北平的日伪当局曾企图接管国医学院，孔伯华毅然将该院停办以为抵制。北平国医学院自开创到停办十四年间，共毕业学员七百余人，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培育了一批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又蓄意阻挠中医事业，南京考试院于1946年10月通知北平全体新照中医师，均须重新通过考试而定取舍。这一以考试为名而行取缔中医之实的阴谋，为北平中医师所识破，他们奋而组织起“北平中医师新照同仁福利促进会”进行反抗。孔伯华任该会顾问。他们四处请愿，进行说理斗争，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当局取消了这次所谓新照中医考试。

在医理方面，孔伯华坚决主张辨证论治。他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辨证施治，参、术、硝、黄，并能起死；苓、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症。故主张先议病，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症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症，而又不惑于症，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症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4)] 孔伯华的精当、明快、果断的医疗风格，为世人所称颂。

孔伯华一贯关怀患者的疾苦，以济世活人为宗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外城官医院供职时，虽所入不丰，仍常解囊资助贫苦患者药费，及至成名之后，更不计锱铢，对有困难的故旧一直坚持义务施治。晚年因求诊者众多，常应接不暇。他左右虽有不少生徒侍诊，但对危重患者一定亲自悉心诊断，不辞辛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伯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新老中西医，互相学习的方针政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认为："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仅其理法不同耳。今逢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以教育人才始。"他建议大力发展祖国医药事业，培养中医工作者，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

孔伯华深以应诊过忙无暇著述为憾，晚年经常深夜执笔著书立说，著有《脏象发挥》、《时斋医话》等。他以古稀之年既忙于诊务，又勤于著述，终以体力难支，猝然卧病。他自知不起，遗嘱亲属说："儿和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务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尽之志。"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在京逝世。

---

(1) 不龟手，出自《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孔伯华取其造福黎庶，有裨家邦之意，以明志自励。

(2) 孔伯华深通药性，对生石膏的功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因而除以生石膏用于镇热外，往往通过灵活的佐使，发挥生石膏的解表功能，为一般医师所不及，故有"石膏孔"之称。

(3) 北平国医学院开办时，孔伯华、萧龙友二人皆为院长；1940年萧告

老引退，孔仍任院长职，直至最后决定停办该院。

(4) 孔嗣伯：《孔伯华先生学术经验简介》，《中医杂志》1962年第7期。

孔祥熙

朱信泉　闫肃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开于明代万历年间到晋任职，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任过文案。清末票号式微，孔家亦渐衰落[(1)]。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为减轻丧偶后的伤感，到太谷城西南张村设私塾授读。孔祥熙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1889年，孔祥熙患痄腮，中医治疗未见功效，投太谷南街基督教所设仁术医院，经精心治疗，不久痊愈。治病期间，孔与医院的一些外国人处得很熟，曾被邀去参观教堂、医院、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

1890年春，教会所办太谷华美公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同意，但为族人反对，最后以承诺“只准在教会学校读书，不准信奉洋教”才获允入学[(3)]。1894年底，孔在华美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计，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1895年孔祥熙经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George Louis Williams）推荐，入直隶通州美国公理会所设之潞河书院。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与耶稣教义掺和起来以增加宣传效果，从而受到书院的重视。孔受潞河女传教士麦美德（S．Luella Miner）的影响最多，终于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由于接受教会所宣传的“自由、平

等”观念的影响，他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产生不满。在闻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革命宗旨后，孔和同学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遥为响应。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亦被迫停课，孔祥熙暂回山西。在太谷他以重金买通看守人员，使被拘的公理会女教士麦纳等三人获释逃生。由于太谷捕索教民日亟，孔祥熙自身则依靠担任榆次知县的叔父孔繁杏的掩护，才得逃离险境。孔到北京后，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叶守贞（E．H．Edwards）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悉，曾先后来访，探问山西情形。孔认为山西教案应由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民众无涉，并提出“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新文明教育”方能收效的意见[(4)]，为来访者所赞同，从而促进了山西教案的单独解决。此事旋为时任全权议和大臣的李鸿章所闻知，曾两次约见孔祥熙，并允诺孔去美国留学时发给护照，并修函驻美公使伍廷芳给以照拂。当孔从北京回到潞河书院时，从太谷逃出的女传教士麦纳等人已先抵达，孔祥熙于是被目为冒险援救教士的“英雄”，受到潞河师生们赞扬。不久，经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书院资送孔祥熙赴美留学。

1901年秋，孔祥熙在学校派人护送下去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 in Ohio），前三年主修理化，后二年改修社会科学，毕业后于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孔在耶鲁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5)]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太谷弘扬教会事业。孔离美返国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才其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即获得一致赞同。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来人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以寓纪念庚子死难教友之意。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其父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程。到1909年春，铭贤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遂将学校迁到太谷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

孔祥熙办学对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体育课本，他取材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颇受学生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太谷商会会长亲往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顾问，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

1911年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10月29日太原光复。其时太谷的清吏早已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出的大队士兵直趋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自率一队登上北门，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允给川资三千两，使溃兵绕城而去，太谷得以免遭劫掠。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长。附近各县闻知，纷纷仿效太谷办法，不久经榆次、徐沟、文水、交城、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等县士绅和地方当局集议，推举孔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当山西革命军与清军在娘子关作战时，铭贤有学生三十多人组成敢死队，奔赴前方参加抵抗清军，孔则维持地方秩序，直至南北和议告成。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除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1912年，孔以煤油为居民夜间燃灯所必需，有

大利可图，于是与五叔孔繁杏共同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一个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又于上年丧偶心情不佳，遂应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之邀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从事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其时，宋霭龄正为孙中山担任英文秘书，孔、宋接触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6)]；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7)]。由于彼此投契，孔祥熙与宋霭龄遂于1914年春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辞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之职，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外，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从日本回晋后不久，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为督军公署参议。对阎锡山在晋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六项“村政改革”，孔曾给以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返里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本人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8)]。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锡山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作晋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Crane）率领参赞、武官等来晋访问，阎再次面恳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欣

然从命。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外，还曾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若干县灾情严重，哀鸿遍野。其时北京政府欠饷欠薪自顾不暇，遑论赈济；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吝于拔毛。孔于是挺身代灾民请命，向华洋义赈会贷得赈款美金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全活灾民甚众，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耶鲁校友、时任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之邀，赴济南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此为孔从政之始。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应邀任驻奉天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斗争中，孔受命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谋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孔曾密携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欢迎孙中山北上，就与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3月12日，为国是北上的孙中山在京逝世。当孙中山病危时，孔祥熙亦随侍在侧，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之职。嗣以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赴美，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筹募增办大学部的基金，很快就募得基金150万美元[(9)]。

孔祥熙旅美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中共党员排斥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篡夺了军权；5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蒋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

的实权；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由美归国，抵粤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诩当“做大官”的“时会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10)]。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但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后，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衔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的联系，对外则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的投资，以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通过蒋介石这个握有军政大权的杠杆，可以轻而易举地保持他们在南京政权中的影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保证。

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因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曾被迫去职下野。其后在谋划蒋重新上台的活动中，孔祥熙曾衔命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间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11)]。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诸多贡献，于2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并选其为国民政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仍任部长。孔在就任之初，曾发表施政宣言，

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12)]。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百余种，其中较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必要性的。蒋介石于1928年将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在国内搞军事独裁，与各实力派一再兵戎相见，以致内战频仍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缺乏财力物力可供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祥熙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1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于敌，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对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是年底，行政院改组，为表示与蒋同进退，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改组后以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无力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蒋、汪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2年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三〇二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掌了军权。孔祥熙亦随之复出，于4月13日被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

孔祥熙此次赴欧考察实业之行，实际上是接受蒋介石的秘密委托，向德国和意大利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等事宜。孔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其发展较快，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将此意电告南京，为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时，为南京政府订购大批军械、聘请军事顾问。访问英国时，孔与

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在欧洲逗留将近一年，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其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造成东北沦丧税收减少，而对内加紧“剿共”大量扩军使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一千五百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二千二百万元，其中军费一项即达一千八百万元，每月不敷达七百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对此巨额的财政亏空，财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颇为忧虑和不满。同年9月宋子文出席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返国时，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六千万元新亏空，使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龃龉而坚决求去。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兼中央银行总裁[(14)]。

孔祥熙上任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理财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在抗战前的主要财政措施则为：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统一币制，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做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赴长江中游皖、赣、鄂、湘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15)]。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5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中央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至

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五千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六千七百万元[16]，客观上起了稍解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意外”[17]。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四千二百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二千万股本而言，其中一千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二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账，亦非现金”[18]。中央银行常因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接任财长后，就积极谋划如何去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5月，孔祥熙将中央银行资本由二千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纸二千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该行过半数的股权[19]。三日后，孔即对中国银行进行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将原任总经理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对交通银行，财政部则增加官股八百万元，占股份之半数。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业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20]，早为中央银行所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自己分得巨额债息。但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赤字庞大而心怀疑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化为硝烟或落入军阀、政客们的私囊，而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深为焦急。为了维护银行家自身的利益，对南京财政部的取求自不能“事事听命”[21]，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

的鼻息。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22]。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只凭借所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之际，江浙工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放出工商贷款二千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界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予合作的缘故。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中、交两行与中央银行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亦可降低。这个说法，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家所乐闻并盼早日实现。孔就这样轻易地使银行家在工商界陷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适时作出让步，从官股占百分之五十五，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商股资本家们之心。对总经理张嘉璈则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免其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同年12月复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为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在南京政府内部，孔以去就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抵制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汪因阻挠无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岛“养病”。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同时，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兼该行理事长，孔祥熙任董事长。至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以“国家”的幌子达成了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充分控制，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和控制整个金融界铺平了道路。

四行增资改组后，财政部对金融的控制力量较前虽大为增加，但

仍无“点石成金”之术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国内的币制仍为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信用膨胀发生挤兑，以致使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因之倒闭。因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以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而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财政部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外流中止；加之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形势更为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现象，沪、宁等地则发生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祥熙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23]，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日本威胁的矛盾，以及法币在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钉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支持。法币改革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并成为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的财政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新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加速膨胀的。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财政的重要进项之一。为了能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繁多的旧债进行整

理。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是年春，南京政府财政部与“债券持票人会”共同议定：本年由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共十四亿六千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而言，收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所欠外债，孔尤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之无确实担保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历久未付，债信日堕，已成为南京政府举借新债的障碍。孔与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信，为抗战期间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铺平了道路。

在抗战前，孔祥熙在财政上源源供给南京政府的大量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为蒋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结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并收买其重要将领，都和孔能源源不断地为蒋提供经费分不开。但蒋介石的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中，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坚持和平解决；孔祥熙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运用其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响应和平解决事变的人士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随后的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谈判开始进行，南京政府在对日战备方面也有所进步。1937年3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赴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孔此行，同时肩负着向外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时，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24]。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

时参观访问。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火武器，随即装船东运，以备抗战之用。6月中旬，孔由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华盛顿，与摩根银行的拉门特（Thomas William Lamont）等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协定，将太平洋建设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美金事解决。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次日会见罗斯福总统，就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交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7月19日孔自纽约再抵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建筑广梅铁路借款合约；8月4日签订建筑浦信铁路借款合约。此外，还与英方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三千万英镑。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25)] 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洽谈。随后，孔因病在德国疗养一个月，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旋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管财政金融的首脑。1939年11月，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孔改任行政院副院长。

抗战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国民党政府财政总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烟酒税等税源大都丧失。为坚持抗战，在财政上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方面都须给以支持，孔祥熙在完成战时财政，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持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9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四百五十二家（公营

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十二万余吨，随工矿内迁的员工约十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资金调剂等，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尤其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的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三千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26]。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就地取材，在后方各地发展小型工厂，到1941年计设立工业生产合作社近两千个，参加生产者达十五万人，月产值二千多万元[27]，颇具效益。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及农本局对农贷的大量增加，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而1941年度贷出的农业贷款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牧畜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约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八千九百七十余万市担[28]。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之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庄休业二日，随即于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资金逃避。又令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行、处。1942年7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

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加之对法币的增发持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客观上尚适应于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以无限制照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和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资金得以逃避或为敌伪套购而去。其后虽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请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很快又被套购一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29)]。

当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显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军政需用外，其不恤民生、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国家垄断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又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已往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如1941年1月，财政部接管原由各省市征收之营业税，加以整理，使本年度实征得税款五亿二千万元，较上年度省管时期实征一亿六千万元，超过数倍[(30)]。由于采用上述种种措施，虽税域日狭，税收总额却年有增加，而工商、民众税负之加重，亦可想而知。

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该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以祛除“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31)]。国库网则随公库法的实施而在各地陆续建立，至1944年计

已有总分支库及税款经收处一千零二十八个之多[32]。

二、田赋征实与举办专卖。1941年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第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得通过。随后于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改订财政收支系统的结果，是将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得以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公粮，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改为每元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地则经批准将“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便将农民的粮食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二千四百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六千五百余万石[33]。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国民政府战时的军粮、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法，将赋税负担尽量转嫁到佃农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至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之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日

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物品，以搜刮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34]。民族工业，政府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就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厂矿15个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35]。国民党政府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的，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政府当局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政府当局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

1944年6月，孔祥熙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并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曾提出归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汇率问题上与美方意见分歧，遭到美方的反对；在孔去美国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退，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被蒋介石、孔祥熙等顶了回去；其后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

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之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孔祥熙的命令。孔自受任财长到去职，在任长达十一年之久，可见受蒋介石宠信之专。1945年5月孔辞行政院副院长，7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至此仅剩下中国银行董事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集了巨额资财，在新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是旧中国的首富。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真正发达起来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孔利用所掌握的国家财政金融大权，在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起来的同时，也使自家的私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金融机构如山西裕华银行等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宋霭龄在抗战前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着蒋介石、宋美龄的庇护，终能无事。

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八百万英镑”[36]。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占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37]。孔的长子孔令侃在二十一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受到其父的夸奖[38]。孔的次女令伟为其父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时机，以及豪门权势，大搞走私、囤积等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又如1944年初，孔祥熙伙同央行国库局长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等。对此，社会舆论时有指摘。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不居高官，但认为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和压低外汇牌价，实在是买办事业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大规模

扩充商业资本。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异乎“祥记”而为现代化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并主要以推销美国货为职志。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如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7年7月29日南京《中央日报》曾透露孔宋家族利用特权，在1946年3月至11月间，共结汇三亿三千四百四十六万余美元用以进口商品谋利的丑闻[(39)]；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均曾受到舆论的抨击。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不佳。

孔祥熙去官后也曾进行一些活动，以谋东山再起，但遭到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赴美。1948年1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以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

(1) 山西票号在清末大清银行成立后，其存放和汇兑业务遂被银行和邮政部门所逐渐取代。辛亥革命发生后，票号放款无法收回，而存户则纷纷提款，票号因此搁浅倒闭时有发生，加之票号财东因循守旧不思变革，以及子弟们的奢侈淫佚，票号业因之迅速衰落。

(2) 孟天桢：《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8页。

(3)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1980年版，第10页。

(4)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22页。

(5) 孟天桢：《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第77页。

(6) 欧阳宗等辑：《中国内幕》第3集，新中国出版社1941年版，第62页。

(7) 孟天桢：《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第146页。

(8) 孟天桢：《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第171页。

(9) 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下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643页。

(10) 孟天桢：《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第173页。

(11)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66页。

(12) 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下册，第418页。

(13) 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下册，第430、450、420页。

(14) 孔祥熙就任财长的任命见《国民政府公报》1933年10月29日第1273号。孔任行政院副院长职，未见公报有正式任命，但《国民政府公报》11月7日第1280号内书有，“孔祥熙宣誓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字样照片一帧。

(15) 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上册，第182页。

(16) 孔祥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7)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1980年版，第89页。

(18) 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上册，第340页。

(19) 对中国银行进行增资改组，孔为缓和该行股东的不满，将原定官股占55%改为增资1500万，使官股只占半数。

(20) 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21) 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140页。

(22)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96页。

(23) 所谓“法币”即“法偿币”，是经国家规定的一种还偿工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1936年2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也列为“法币”。

(24)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124页。

(25)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134页。

(26) 谭煦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中华书局1948年，第

A18—19页。

(27)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144页。

(28) 谭煦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第A17—18页。

(29) 蒋介石1941年7月14日在中央纪念周上的演讲词，转引自谭煦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第A23页。

(30) 财政部直接税处编：《八年来之直接税》，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第16—17页。

(31) 财政部参事厅编：《十年来之财务法制》，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第6页。

(32)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212页。

(33) 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编：《三年来之田赋整理与征实》，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第17页。

(34) 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第213页。

(35)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69页。

(36) 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第84页。

(37)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1011页。

(38)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992、1016页。

(39) 漆敬尧：《小数点玄机化解一场政治风暴》，台北《传记文学》54卷第1期。

寇遐

张应超

寇遐，字胜孚，号玄疵，1884年11月18日（清光绪十年十月初一）生于陕西蒲城县。其父早逝，由寡母抚养长大，家境贫寒。1906年考入西安师范学堂选科。在师范学堂读书时即加入同盟会，是当时西安进步青年中的积极分子。

1908年10月，蒲城县知县李体仁为了镇压当地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在陕西提学使余堃的直接指使下，捣毁县教育分会、县立高小学堂和学生自办的“自治公学”，逮捕了县教育分会职员和县立高小学堂师生七十余人，酷刑审讯，致使年仅十七岁的学生、同盟会员原斯建伤重身死，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即“蒲案”）。“蒲案”发生以后，省城西安及陕西所属八十余州、县的青年学生掀起罢课斗争高潮，寇遐被选为西安师范学堂总代表和西安各界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起草了陕西各校学生请愿书，并到巡抚衙门交涉。在陕西各校学生的共同努力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援下，这场坚持了长达五个多月的学生运动终于取得胜利。

1909年，寇遐由师范学堂毕业，任同州中学堂监学。他和该校监督、同盟会员尚镇圭一起领导陕西东部各县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州中学遂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之一。1910年秋到1911年春，同盟会员李仲三曾多次去朝邑县联络渭北著名刀客严飞龙，寇遐曾给李仲三多方帮助。后来严飞龙所率领的刀客成为陕西辛亥革命中一支重要力量。

1912年4月，陕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寇遐当选为副议长。8月，井勿幕改组同盟会陕西分会为国民党陕西支部，寇遐任评议员。12

月，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反袁护国斗争中，他奔走各地，反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1917年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寇遐跟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1923年曹锟贿选，勾结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以重金收买议员。寇遐坚决反对贿选，并再次南下。1924年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寇遐积极参与政变活动，因而在新政府中担任过短期农商总长职务，卸任后即在北京住闲。

1931年，寇遐应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的邀请回到西安，任省政府委员、高等顾问等职。他擅长书法，尤精隶书。1934年在邵力子、杨虎城的支持下，寇遐等人在西安组织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寇遐任会长，编辑出版《西京金石书画集》。同年冬，根据他的建议，杨虎城命进步人士成柏仁创办《秦风周报》（后改名为《秦风日报》），寇遐为之书报头和报社牌匾，并参与其中工作。1935年夏，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入陕“剿共”，蒋介石分别密令张、杨互相监视。后来杨虎城有所觉察。因寇遐和张学良也有交往，他受杨虎城委托，居间联络。在张、杨的合作中，他曾起过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寇遐担任过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深为不满，主张取消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他和陕西的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王菊人、武梦名等人关系密切，并掩护过地下党员杨晓初。1947年，陕西国民党军头胡宗南、祝绍周杀害了杜斌丞，王菊人、武梦名等人也先后被捕。寇遐对胡宗南杀害杜斌丞的行径非常愤慨，当面怒斥胡宗南，对在狱中的王菊人、武梦名则赠送衣物，并照顾其家属。还多方设法，保护成柏仁的安全。

1948年冬，“国大”代表竞选时，陕西省当局中有人为了利用寇遐声望，请他参加竞选，并愿承担竞选活动经费，遭到寇遐严词拒绝。由于寇遐思想进步、敢于直言，胡宗南之流曾在他家门外安插特务监视他的活动。

1949年5月18日，胡宗南逃离西安时，以“保护安全”为名，把寇遐、张凤翙、马骧等人裹胁到汉中，准备经四川送往台湾。寇遐等人坚决拒绝去台，又被送往兰州。8月，兰州解放，彭德怀司令员特派专人慰问他和张、马二人。8月下旬，寇遐等三人返回西安，受到西安中共党政领导及各界人士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寇遐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出卖墨迹，把所得收入捐献国家作为抗美援朝经费。1953年9月6日，他因脑溢血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寇遐对书法、金石很有造诣，喜画兰草，但手迹很少。他在古书收藏方面也下过工夫。此外，他对秦腔也有一定的研究，曾修改过《辕门斩子》、《周仁回府》、《葫芦峪》等秦腔剧本。

主要参考资料

《寇遐传》，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上海书店1990年据1949年版影印。

原清月辑：《“蒲案”纪念册》。

寇妙言：《我父回西安后的片断回忆》，手稿，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粤办公室。

段绍岩：《省临时议会成立》，手稿，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粤办公室。

尚重十：《尚镇圭事略》，手稿，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粤办公室。

《群众日报》1953年9月10日。

笔者访问李宗祥、胡景通、寇若英笔记。

蒉延芳

汪仁泽

蒉延芳，1883年5月22日（清光绪九年四月十六日）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蒉柞德早年务农，后在上海某煤炭店当出店（送货杂务工）。蒉延芳少年时读书不多，十四岁时随表兄到山东胶州当行栈学徒。

1902年，蒉延芳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德商亨宝轮船公司当职员。由于他办事干练，恪守信用，深受客户直隶井陉矿务局负责人的赏识，1907年被聘为该局及北票煤矿驻沪经理。1910年蒉辞职，进入上海中华捷运公司任职，工作勤劳认真，1918年被提升为该公司总稽核。1920年经董事会推派，赴欧洲各国考察运输事业。他深感我国经济落后，其主要症结之一在于交通运输的阻塞。归国后升任该公司总经理，积极为发展国内铁路、轮船、长途汽车的客货联营业务而努力。

1925年，蒉延芳为使托运客户的货物免在途中受损，主张把保险业务与运输业务联结起来。他独资开设了信平保险公司，承接客户投保，然后再向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转保，这一经营方式，深受客户欢迎。此时蒉以经营运输业为主，兼谋其他事业的发展。1927年独资开设了源大行，经营进出口业务。适值苏联商务代表来沪，蒉与之签订合同，组织海轮三艘赴海参崴进口大批萨门咸鱼。货甫到沪入栈，即遭国民党官吏勾结商会败类，用“反日会”名义，诬指为日货，予以封存，谋图敲诈。蒉不为所屈，一面延请律师申辩，一面将苏联出口及中国海关进口的凭证，制版刊于报端。但待事实澄清启封后，货栈咸鱼已经大半霉烂，损失甚重。此后蒉继续经营萨门鱼的进口和国内销售业务，在16铺开设大成、源昌等8家鱼行，任上海鱼市场常务理

事、中国渔业公司董事等职。1929年蒉应友人所邀，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地产部经理。地产部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他一面吸收储蓄存款，进行分红；一面做了几笔大的房地产生意，获得厚利。此时蒉兼任上海市房地产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府土地估价委员会主席、公共租界工部局房租公断委员等职。

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战起，蒉延芳为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爱国行为所鼓舞，担任抗敌后援会工作，负责支援前线物资和在后方安排、遣返难民等事项。1933年，比利时国银公司派代表来华推销五金、钢材，他与该代表在旅欧时已相识，遂被聘任该公司顾问兼五金部华经理，代理比利时钢业联合社在华销售业务，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蒉接任新裕纱厂总经理。后因经营失当，亏损累累；又与杜月笙在业务上发生法律纠纷，经调解后蒉脱离了新裕纱厂。此后他又与人合伙开设捷成杂粮行；1937年起经销加拿大进口的咸青花鱼。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蒉延芳激于抗日爱国热情，与计健南等人共同建立第十一伤兵医院，热心救护抗日受伤的士兵。不久，日本侵占我江南大片国土，肆意烧杀掳掠，大量难民流入上海租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蒉投入难民救济协会工作，任总务组长；该会主任潘公展撤离上海后，蒉代理主任。难民救济协会开办了不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达四十余万人，蒉奔走安排难民衣、食、住宿等事，后又遣送部分难民回乡生产[(1)]，并设置留沪难民生产自救工场、难童学校等。直至1941年底日军进占租界，该会被迫解散，蒉仍将难胞妥善安置。1939年国际难民救济会成立，他是创办人之一。在此前后，他担任源大行总经理，光中造纸厂、中华毛纺织公司董事长，美伦毛纺织厂、中国国货公司等企业董事；并历任四明公所董事、四明医院及济民医院董事长、上海市商会副理事长兼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英协会常务理事、位育中小学校董会主席、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理事长等职。他慷慨豪爽，凡教育、慈善等事业，无

不奔走效劳，捐募垫款，悉尽义务。八年抗战期间，他留居上海，坚决不事敌伪，保持了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李铭、厉树雄等人以美金60万元买进英商汇德丰洋行的扬子江拖驳公司，聘蒉延芳任总经理，由浙江实业银行垫款美金5万元，作为蒉入股股金。他受任后，业务颇有起色。此后厉树雄将自己的很多企业交由蒉负责经营，蒉相继担任了和新纱厂总经理、云飞汽车公司董事长、四明电话公司董事长、宁穿（宁波到穿山）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等职。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纷起抗议。蒉延芳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亦经常参加民主人士集会，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是年6月，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和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三方面呼吁和平。工商界推选代表时，大家认为蒉延芳社会声誉甚好，推为代表，他慨然应允。此时有人以此去必有险阻，劝其取消此行。蒉说：“我既已答应人家，岂能食言。”[(2)] 并表示为万民求和平，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态度坚决。6月23日晚，代表们乘车到达南京时，发生“下关车站事件”，代表马叙伦等竟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蒉因在另一节车厢，未被殃及。后来蒋介石拒绝接见全体代表，只允蒉延芳一人往见。蒉见蒋时，表达了上海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但蒋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仅仅谈了几分钟，即告结束[(3)]。通过这次事件，使他受到一次现实教育。他回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亲自来访。蒉陪同他们参观了自己所办的事业，包括学校和医院，周对此甚予嘉勉。这件事对蒉延芳晚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此后他经常参加盛丕华等进步人士组织的红棉酒家叙餐会，进一步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反蒋、要求民主和靠拢进步势力的倾向。

1948年12月3日，满载三千多乘客的招商局江亚轮，从上海驶往宁波途中，突然爆炸沉没，招商局未能及时组织营救，致使二千多名

旅客遇难。事后招商局又未妥善处理后事，遇难家属自发组织示威游行，包围招商局，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弹压。此时宁波旅沪同乡会迅即组织以蒉延芳为主任的“江亚轮惨案善后处理委员会”，一面与招商局进行严正交涉，促使拨款救济，一面积极进行善后工作，处理遗留问题[4]。

由于蒉延芳一贯热心公益，主持正义，且敢于直言抨击时政，多次在公开场合痛斥蒋介石及国民党弊政，因而招致当局的忌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将其列入黑名单中，他被迫避居英国友人家中，直到解放。1949年秋，宁波解放后，国民党飞机对宁波轮番进行轰炸，造成大批房屋被毁，蒉延芳组成救济委员会，在沪发起义演等，募集巨款进行救济。

1949年9月，蒉延芳赴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内河航运局局长等职。他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常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灾区视察，了解生产救灾工作情况。此外，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扬子江拖驳公司经申请批准公私合营后，蒉任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董事长。

1957年8月8日，蒉延芳因病在沪逝世。

---

(1) 赵朴初：《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期（总第3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关于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1960年盛丕华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31—130）。

(3) 吴耀宗：《下关事件日记一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1978年第3期（总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 上海市档案馆存《宁波旅沪同乡会档案》全宗卷117—4—51、117—4—66。

赖心辉

马宣伟

赖心辉，字德祥，1884年8月（清光绪十年七月）生于四川三台县。父亲是小商人。赖心辉少时在家乡读私塾，后经他的岳父引荐，在曾伯和门下学习。曾伯和见赖心辉大可培养，1907年夏出任云南老鸦滩百货厘金局局长时，带他随同前往。到云南后，赖更加勤奋读书，1909年由曾伯和保送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11年春，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第十九镇见习。赖在第十九镇结识了任管带的四川同乡刘存厚，并参与第十九镇下级军官的秘密革命活动，加入了同盟会。武昌首义后，10月30日，以蔡锷、李根源为正副司令的云南革命军在昆明发动起义，赖在唐继尧、刘存厚的指挥下，参加攻打云南总督署。

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派韩建铎、刘存厚率滇军两个梯团援助四川起义军，赖心辉随军回到四川。1912年初刘存厚在成都招募新兵成立四川陆军第四镇，赖在第四镇任炮兵标统[(1)]。不久，四川陆军改镇为师，刘存厚任第二师师长，赖心辉在炮兵第二团任营长。1916年1月，赖随川军第二师在纳溪起义，参加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立有战功[(2)]，升任第二师炮兵第二团团长。

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护国军滇军总司令罗佩金、黔军总司令戴戡，于同年7月分任四川督军和省长，与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发生利害冲突。加之驻川滇、黔军军纪败坏，四川军民均十分痛恨。1917年4月，刘存厚通电反对罗佩金，赖心辉等数十名旅团长亦通电控告罗佩金九大罪状[(3)]，遂发展为刘、罗成都巷战。不久，罗败走。7月，又发生刘、戴（戡）成都巷战。黔军退入皇城督军署内，刘存厚率部屡攻不下，赖建议先炮轰皇城内的军装库（即弹械等

军用物资库）。刘同意，并命赖率部前往。赖率炮二团布阵于南门城墙上，亲自上炮，精心测量，第一炮即打中皇城的大门，接着命中军装库，顿时弹药爆炸，声响十里之外，守城黔军大为慌乱。戴戡弹尽粮绝，撤离成都。赖心辉从此得名“赖大炮”。

赖心辉在这场混战中立了大功，刘存厚补充赖部一批汉阳枪和大炮。11月12日，北京政府授予赖三等文虎章；1918年1月又授予少将军衔，委为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借机扩大了部队，占绵阳、梓潼、北川、罗江等县为防地。

滇黔军战败后，云南督军唐继尧以护法靖国之名，大力支持川军师长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率部进攻依附北洋军阀的四川督军刘存厚，迫使刘于2月20日退出成都，撤向陕南。赖心辉于4月28日率部退守绵阳。5月3日，熊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欲彻底打垮刘部，率部向绵阳一线的赖部进攻。赖寡不敌众，退到陕西与刘存厚会合，驻防汉中。7月5日北京政府委刘存厚为中央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赖心辉为第四十二旅旅长。12月上旬，吕超率部将汉中城四面包围。刘存厚部困守城内，不久弹尽粮绝，刘打算弃城逃命。此时，赖心辉从陕西督军陈树藩处借来大批枪械、粮饷，率部赶到，打退吕超，解了刘存厚之危。

1920年初，唐继尧见熊克武不能成为他控制四川的工具，遂令驻川滇黔军向熊进攻。熊败退川北。不久，熊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刘湘、邓锡侯及败退陕南的刘存厚等川军，分路进攻成、渝两地的滇黔军，10月将滇黔军全部驱逐出川。刘存厚部以赖心辉旅为前锋首先攻占成都。熊克武划什邡、金堂、广汉、德阳四县为赖部防地。什邡县有著名土匪头子张廷升，赖先派人去招抚，张不从，赖率部围剿，消灭了张部乌合之众。

1922年7月，四川爆发了以熊克武、但懋辛为一方的第一军和以刘湘、杨森为一方的第二军之战。赖心辉站在熊克武一边，任省军副

总指挥，率部向第二军进攻。8月上旬第二军溃败。这时，赖对四川的军民两政颇思染指，只因资望较浅，自知无望，很想推一个软弱者上台，以便操纵，乃向熊克武建议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领四川军民两政，得熊同意。刘成勋任川军总司令后，为酬谢赖心辉，委赖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驻防富饶的泸州一带。刘、赖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

第一、二军之战后，第一军内部由于分赃不均，又爆发了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同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之间的战争。1923年2月13日，刘成勋命赖心辉统率各军讨伐邓、陈，又电请川东边防督办但懋辛出师援助。两军混战到20日，邓、陈两师已前进到川西地界，开始围攻成都。刘成勋困守城内，正在恐慌之际，21日赖心辉率部攻占了简阳，24日前哨部队抵达成都，从侧背攻击邓、陈两师，遂解成都之围。赖心辉善战之名传扬一时，刘成勋对他更加倚重。

同年3月，吴佩孚见川军内讧，援助杨森回川。杨森于3月14日攻占万县，4月5日攻占重庆。与此同时，驻宜宾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进占成都，并自任成都卫戍司令。刘成勋在3月30日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职，赖心辉率部退往内江、资中、隆昌一带。

5月，熊克武率原第一军及赖心辉的四川边防军、刘成勋部，合力反攻杨森、刘湘等部。赖先攻入成都，熊、刘率部相继入城。6月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四川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讨伐北洋军。赖心辉的四川边防军这时已辖有六个旅和一个炮兵团及特务营、机炮营、骑兵营等部队，实力达万余人。赖令其部分别由乐山、宜宾、泸州攻重庆的侧背；并亲自攻资中、内江一线。赖攻占内江后，6月14日乘胜下令总攻，双方激战一日，赖部伤亡惨重，连预备队也用尽。他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赖指出，敌我双方同样伤亡惨重，敌军可能也在今晚撤退，应采用两全之计。遂抽选精锐一营，于当晚夜袭隆昌；再派一加强连向隆昌侧面搜索，以牵制敌人，然后缓缓撤退。

当夜初时，赖部前沿部队陆续撤下。时值6月中旬，大路两旁都是稻田，秧苗已有半人高，撤退下来的士兵互相争路吵骂。赖心辉坐在六人抬的大轿内听见士兵们骂："打了败仗还摆阔气，坐大轿子把路都挡完了。"他连忙招呼下轿，叫弁兵在路边坟地上铺好被褥，摆起鸦片烟盘子，躺下抽起烟来。退下来的士兵们见总指挥的轿子还放在路边，总指挥本人安闲地躺着烧烟，便回头向后面乱挤的官兵大声吼道："你们慌什么？往后传，总指挥还正在这里烧烟咧！"这一喊，果然军心大定，部队缓缓地撤退，秩序井然。待到拂晓，赖军侦击营传来捷报："杨森部与袁祖铭两部已向荣昌、永川方向遁去，经我先遣侦击连虚张声势地跟踪追击，已溃不成军，沿途丢弃物资不少，请总指挥派大军火速前进，以期一鼓歼灭敌人！"赖心辉烟枪一撂，哈哈大笑，下令大军掉头向永川、璧山方向火速前进。10月16日，赖军攻占重庆。

联军攻下重庆后，熊克武等人发生意见分歧，赖心辉对战事意存观望。结果杨森部得喘息机会，反而乘势反攻熊军，12月13日占领重庆，继率部直插潼川熊军总部，并于1924年2月9日攻下成都。赖心辉见风使舵，于10日通电拥护北京政府，4月28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四川边防军总指挥；9月10日被授予正威将军。1925年2月7日又被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是年初，杨森发动"统一之战"，赖心辉率边防军驻资中、内江一带防御。7月赖率部至永川、荣昌，击溃杨军东路王兆奎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连战皆捷，四川各军阀纷纷准备改换旗帜。赖心辉也向国民政府接洽，11月27日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但是他并未参加北伐，仍在四川境内与其他军阀互争雄长。1927年冬，他遭到刘湘与刘文辉的夹击，所属防地全被刘文辉部占领。赖耿耿于怀，1928年10月参加李家钰、罗泽洲和杨森等组成的同盟军，分路攻打刘湘、刘文辉两军。赖心辉率部独挡永川、重庆一线，击溃刘湘军的进攻，战事节节胜利。刘湘改变计划，集中

兵力于江北、巴县，先打退罗泽洲师及杨森部，又用重金收买了郭汝栋，然后联合刘文辉军向赖心辉进攻。赖部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弃江津、内江等县防地，退到合江、赤水之间。1929年1月，赖心辉因早年曾援助过当时的贵州省长周西成，乃与周商定：赖部退入贵州遵义，由周西成援助再打回四川。5月，周西成在滇黔之战中阵亡，黔军毛光翔乘机出兵堵截赖部，赖只得退入四川秀山县城。为重新组建队伍，他招纳酉阳、秀山、彭水各县的土匪，号称六师之众，盘踞在酉阳、秀山一带。

不久，刘湘令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以剿办土匪为名，出兵酉阳、秀山一线向赖部发动进攻。赖部粮弹两缺，士气不振，而招来的土匪又是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赖心辉被迫率部再退贵州边境，急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救。蒋介石于1930年6月19日委赖心辉为新十一师师长。赖率部集中黔江，拟取道鄂西恩施、巴东一带，转到汉口待命。但王陵基又出兵截击，赖部被迫折回贵州，经龙里、贵定、八面大山等地进入湖南安乡、澧县，后进驻江西永丰。新十一师后来被陈诚改编，将老弱官兵遣散回四川，赖心辉部彻底瓦解。

同年秋，赖心辉奉蒋介石电令取道宜昌赴汉口，洽商改编事宜。甫抵宜昌，被刘湘密令独立旅旅长郭勋祺将其扣留软禁。半月后，郭勋祺私自将赖放走。赖乘飞机逃到南京见蒋介石。后经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保荐，赖任国民政府上将参军，每月拿干薪八百元。不久，赖移住上海法租界，抽鸦片烟打发日子，入不敷出，久而久之借贷无门，当卖俱尽。1933年冬落魄还乡，在成都度其贫困生活。

1942年4月18日赖心辉病逝。死后他皮夹中仅余法币一元，尚有纸条一张，上书自挽一联：百战徒劳，愧对乡国；一事无成，负罪人民。

---

(1)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2)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71页。

(3)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台北四川文献研究室1974年版，第175页。

蓝天蔚

张奇林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七岁丧母，随父就读于汉阳，童年好问军旅之事，喜交侠义之人。成年后且读且教，以膏火及束修收入维持生活。时张之洞在鄂编练新军，招募文理通顺者入伍，蓝投入工程营当兵，被选入将弁学堂。1902年，由张之洞简派赴日，经成城学校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1903年春，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蓝天蔚为学生军队长，立即进行操练，准备强渡鸭绿江，助日攻俄。清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将义勇队强制解散，留日学生又组建军国民教育会继续反清。

1904年，蓝天蔚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第二期。归国后，任湖北督练公所提调，兼湖北将弁学堂教习。此时，蓝天蔚列名为长沙日知会会员。他以将弁学堂为基地，培育革命种子，将学员中“思想进步，谋革新而入日知会者”集中起来，“倡办学友会，使知同盟会之宗旨与发展情形”[(1)]。蓝改调第三十二标统带后，“经常利用操课时间对本标官兵讲述改革的重要”[(2)]。后有人向第八镇统制张彪进谗：“天蔚同谋革命，请杀之，不然或逐之。”[(3)] 遂为张氏所疑，使人监视其行动，蓝天蔚乃辞职北上。1907年4月，蓝天蔚至奉天，和吴禄贞、张绍曾一起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手下任军职。1910年春，经吴禄贞推荐，东三省总督锡良派蓝天蔚赴日考察军事。其后蓝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同年肄业归国，任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驻防奉天北大营。

1911年9月，清廷决定调集新军和禁卫军举行永平秋操，限10月

上旬集中滦州待命。蓝天蔚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所部均在调动之列。秋操尚未开始，武昌首义爆发。清廷于惊惶之余，下谕取消秋操，抽调新军开赴前线作战。蓝天蔚、张绍曾、第三镇第五协统领卢永祥等人密约商量对策，然后宣布："湖北之变，为除专制，主共和，以此倡义号召天下，凡属同胞，谅皆赞助。今吾辈所统各部队，半属北人，虽未预约同谋，应皆晓然斯义，倘贸然而往，胜则自残同类，负则死无指名"[(4)]。拒绝领兵南下。当时有人提出"由滦州即行反正"，但蓝天蔚极力阻止，"诚恐急则生变，事无成功"，主张"因利顺导以俟其机"[(5)]。10月29日，蓝天蔚约同张绍曾、卢永祥及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6)]，要求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30日，清帝被迫下诏"罪己"，11月3日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同时，清廷电令吴禄贞前往宣慰。吴禄贞驰抵滦州后，即密约蓝天蔚、张绍曾举兵反清。11月7日吴禄贞被刺身亡，9日张绍曾去职赴津，反清计划流产。

与此同时，东北革命党人积极策划成立关外革命军政府，拟推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大都督。11月6日，蓝与革命党人在北大营驻地秘密集会，准备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举蓝为关外都督，宣布奉天独立。次日，柏文蔚等举蓝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赵尔巽在得到蓝部营长李和祥的告密后，迅即撤掉蓝天蔚协统职，而以与蓝不和的标统聂汝清接充。11月14日，清廷准赵尔巽电奏，下谕撤蓝天蔚协统之职，"交赵尔巽差遣委用"[(7)]，"蓝到此才知道第二混成协已经不听他的调动了"[(8)]。但赵尔巽畏革命党势强，不敢加害蓝天蔚，乃以二千元暗赠予蓝，促其南行，并进行威胁。蓝天蔚被迫交出兵权，经大连赴上海。他在上海筹措军械，招募青年学生军，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民军中湘、鄂两派不和，蓝天蔚见之，痛哭流涕，警告说："清廷为最后之挣扎，已攻破汉阳，天下事，尚未可知。敌众我

寡，协力御侮，犹恐不济；今忽内讧，蹈太平天国之覆辙，庸有济乎！”[9] 言罢，欲以手枪自击，劝众人合力以御清军，其声望由此日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组织六路北伐军，委派蓝天蔚为关外军政府大都督，节制“北伐之沪军暨海容、海琛、南琛三舰”[10]，拟赴东三省攻略各地。蓝天蔚率北伐军千余人从海路进抵烟台后，即与驻烟台的关外民军会合，以关外大都督名义照会列强各国，不得以武力助清政府，否则以敌国相待。同时致电陆军总长黄兴，“力催北面招讨使谭人凤火速统兵前来，以维大局”[11]；还命“海军轮番游戈登州龙口各处”[12]，以壮声势。2月初，海军护送民军和沪军至辽东半岛，蓝天蔚到大连主持关外都督府工作。随后在尖山口登陆，先后占领瓦房店、庄河城等地。赵尔巽忙以大军顽抗，激战数日，双方互有进退，形成对峙状态。不久，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蓝天蔚部奉令停止进攻，原地待命。袁世凯“嘱段军统与蓝都督代表接洽”，谋求东北“和平”。蓝天蔚等发出通电，声明进军东北乃“为大局牺牲，非谋私人权利”[13]，并“业饬各路停攻”，以“顾全大局”[14]。然赵尔巽部“仍多违反行动，双方对抗，险象毕呈”[15]。3月7日，黄兴分别致电赵尔巽和蓝天蔚，恳请双方“通饬三省部属保持现状，对待一切，总期和平，勿令再启纷扰”[16]。东北罢战后，袁世凯派人将蓝部收编，蓝天蔚被迫辞职南返。

蓝天蔚回到南京后，在定都问题上与浙督蒋尊簋、湘督谭延闿、滇督蔡锷、桂督陆荣廷、浙军总司令朱瑞、粤军总司令姚雨平等人联名通电，反对临时参议院定都南京的决定。1912年10月，蓝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中将和上将衔，但未受重用。蓝天蔚悠游于西子湖畔，聊以自娱。1913年他受袁世凯资助出国游历，经日本转赴欧、美各国。此间，国内发生“二次革命”，蓝天蔚藏于上海新舞台的军械和军用钞票被军警搜出，1914年初返沪后因此坐罪。后得参谋次长陈宦说项，袁世凯任蓝为将军府参事，继授予将军府达威将军。

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蓝天蔚离京返鄂，据三县之地宣布独立。次年初，与王天纵等组织讨袁联军，失败后，于夔州举枪自戕，未中要害。翌年，蓝天蔚入辽沈，计划推翻奉天督军张作霖取而代之，事泄。10月6日，北京政府总统冯国璋徇张作霖之请，下令通缉蓝天蔚，并褫夺其军职荣典。蓝天蔚被迫南下广州，参加南方军政府的工作。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兴师北伐。蓝天蔚潜入湖北，于川鄂交界处组织鄂西联军，并任联军总司令，积极配合孙中山的部署。1922年1月，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直系军阀孙传芳所败，遁入四川，又为川军但懋辛部所获，随后被押往重庆。在被押解途中，蓝天蔚于3月11日以手枪自戕身亡。其遗体于1926年春葬于武昌卓刀泉。

---

(1) 许兆龙：《蓝天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2) 湖北省档案馆档案资料编辑室等编：《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资料选编》，1983年印，第20页。

(3) 罗正伟编：《滦州革命先烈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4页。

(4)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01页、198页、265页。

(5)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1页、198页、265页。

(6)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1页、198页、265页。

(7)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1页、198页、265页。

(8)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47页。

(9) 罗正伟编：《滦州革命先烈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64页。

(10) 孙中山：《致蓝天蔚电》（1912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页。

(11) 《黄兴致谭人凤电》（1912年1月30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1页。

(12)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3号。

(13) 《黄兴致赵尔巽电》（1912年3月7日），《黄兴集》，第138页。

(14) 《黄兴致赵尔巽电》（1912年3月7日），《黄兴集》，第138页。

(15) 《黄兴致赵尔巽电》（1912年3月7日），《黄兴集》，第138页。

(16) 《黄兴复蓝天蔚电》（1912年3月7日），《黄兴集》，第138页。

劳乃宣

朱宗震

劳乃宣，字季瑄，号玉初，1843年11月14日（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其先世籍贯山东。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江苏做过小官。他的祖父寓居苏州时，入籍浙江桐乡。

劳乃宣青少年时，随父母旅居苏州、南京一带。他的父亲劳勋成曾任江宁布政司仓大使，太平军进军江南一带后，于1856年在镇江投入清军刘存厚营。是年6月，劳勋成因清军溃败，投水自杀遇救，但不久即患病死去。劳乃宣因此得承荫监生。1863年，他到曲阜与孔悦庭之女结婚，成了孔门的乘龙快婿。

1871年，劳乃宣考中进士。1873年李鸿章主持编纂《畿辅通志》，延请劳乃宣入局。他在志局多年，深受总纂黄彭年的影响，笃信程朱理学。1879—1900年间，劳乃宣先后在河北临榆、南皮、完县、蠡县、吴桥、清苑等县做知县。他在任内极力强化封建礼教，镇压人民反抗斗争，曾三次考绩被上司评为“卓异”。在这二十多年间，劳乃宣还写下了《变法论》、《谈瀛漫录》等一系列文章，抵制改良主义思潮，鼓吹“古胜于今”的儒家复古思想[(1)]。

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劳乃宣正在吴桥县任知县。他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文，宣称义和团“实系邪教，久奉明禁”[(2)]。他颁发告示，严禁义和团在吴桥活动。劳乃宣深深地预感到义和团对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清朝当局把义和团扼杀在萌芽阶段。为此，他刊刻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奉禁义和拳汇录》等书，广为散发。是年底，袁世凯在出任山东巡抚的途中，召

见了他，对他提出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办法十分赞赏。1900年1月5日，义和团在吴桥县的辛集活动。劳立即派兵镇压，当场杀死了9名团员，逮捕了义和团骨干节小廷。节被严刑拷打后处死。八国联军入侵后，劳乃宣在给袁世凯的禀文中，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胡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是“迫于不得不然”，极力主张“剿拳和洋”[(3)]。清廷发布宣战上谕后，劳又向袁建议：“封疆诸帅似宜于将顺之中，隐寓匡救之意，在在预留转圜地步。”[(4)]

1900年6月，清廷按常例调劳乃宣进京引见。他看到清廷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对时局十分恐慌，因而乘机辞卸了吴桥知县的职务。他又以请修墓假为名，没有进京就跑到曲阜去了。是年秋，又跑到江浙一带。

1901年间，劳乃宣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学三个月。是年底至1903年，他又在杭州主持由求是书院改成的浙江求是大学堂。1904到1908年间，他连续充任三任两江总督（李兴锐、周馥、端方）的幕僚。

1908年初，清廷正在“筹备立宪”。劳乃宣经两江总督的推荐，前往北京，是年5月23日，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他向那拉氏建议推广汉语拼音字母（当时称简字）。他认为，这样做后，可以使“中国旧学更要昌明”[(5)]。他被召见后，晋升为四品京堂，当上了宪政编查馆的参议。1910年，又被清廷挑选为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他是资政院中顽固派分子组成的宪政实进会的骨干。是年，清廷草拟了新刑律。劳乃宣对这个新刑律很不满意，说：“新刑律有妨于父子之伦、长幼之序、男女之别者，吾不敢曲徇也。”[(6)]他坚决反对新刑律中违背封建礼教的无夫奸非罪等的规定，在资政院中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修改无夫奸非罪的提案以多数通过。从此，他自号“韧叟”，表示要为维护封建礼教顽固到底。

1911年，劳乃宣到南京任江宁提学使。不久即卸任回京。武昌起

义后，他在《民视报》上发表了《共和正解》一文，污蔑武昌起义是“为少数无知妄人所煽动，不轨军队所劫持”[7]，主张仿效周召“共和”故事，实行君主立宪，企图挽救即将灭亡的清朝。11月26日，清廷在风雨飘摇中任劳乃宣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又兼署学部副大臣。1912年1月，他见大势已去，辞职携家跑到河北涞水居住，以清朝遗老自命。

1912年—1913年间，劳乃宣三次到易县朝拜光绪的陵墓。他竭力宣扬孔孟之道，宣扬“道则古胜于今”的复古思想[8]。1913年7月，根据孔教会头目陈焕章的要求，他让正在身边的外孙孔祥珂回曲阜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他自己也替“衍圣公”孔令贻起草了一个演说词。是年秋，德国人尉礼贤（Richard Wilhelm）在青岛招集遗老搞了个尊孔文社，让周馥函招劳乃宣前来主持。劳应招移居青岛。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解散国会，设置参政院，极力网罗前清遗老。1914年五六月间，袁世凯函电交驰，请劳乃宣出任参政，又复派人敦促，劳复书辞谢不赴。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这个帝国主义卵翼下的遗老们的“桃源”，也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的战场。劳乃宣为避战乱，于是年8月22日迁居济南，不久迁居曲阜。当时，袁世凯正在进行帝制自为的阴谋活动，劳乃宜以为有机可乘。他认为“目前至要之计，在转移当世之耳目，鼓动大众之心思”[9]。因此，他在是年7—9月间，先后写下了《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两文，与前著《共和正解》一起刊印。他异想天开地要袁世凯制定宪法，十年后“还政”于“宣统皇帝”[10]。又分别写信给徐世昌、赵尔巽等人，要他们将他的著作转交给袁。劳乃宣的谬论，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谴责，正如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生指出的那样：“大抵复辟邪说，惟劳乃宣《续共和正解》一书为之厉阶。”[11]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劳乃宣并不甘心。清朝前期学者陈澧（东塾）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长白山》，是为满族统治中华服务的。这时，劳乃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书陈东塾先生说长白山篇后》，重

弹“使旧朝复兴”的老调[12]。1917年7月，张勋复辟，授劳乃宣为法部尚书。但这个狡猾的老官僚，因为“传闻纷杂”，不明“局中真相”[13]，未敢贸然进京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命令逮捕劳乃宣，劳又从曲阜逃到青岛，并再次和尉礼贤一起，主办礼贤书院，并协助尉礼贤将《论语》译成德文。

1918年间，劳乃宣看到北洋政府不再追查复辟分子的罪行，又猖狂起来。他扬言：“我辈于是年之事（指张勋复辟），当视为天经地义之举。”[14]他甚至置备了当时的迁秩品服，准备“存为身后殡殓之用”[15]。他动员遗老们“勿拘小节，期成大业”[16]，主张“出山”，也就是用到北洋政府里做官的办法，来逐步达到复辟的目的。当然，劳乃宣的种种倒行逆施，不过如当时的报纸所讥评的那样，“劳而无功”而已。

劳乃宣曾长期从事古代数学的研究，他对汉语拼音文字的提倡和推广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学术上是有成绩的。

1921年7月21日，劳乃宣在青岛病逝。

---

(1) 劳乃宣：《古筹算考释续编序》，《桐乡劳先生遗稿》卷2，桐乡卢氏1927年版。

(2)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桐乡劳先生遗稿》卷2。

(3) 劳乃宣：《禀山东抚宪袁》，《拳案杂存》卷下，《桐乡劳先生遗稿》卷2。

(4) 劳乃宣：《又禀山东抚宪袁》，《拳案杂存》卷下，《桐乡劳先生遗稿》卷2。

(5) 劳乃宣：《劳京堂乃宣召对笔记》，未刊手稿。

(6) 《诰授光禄大夫劳公墓志铭》，《桐乡劳先生遗稿》。

(7) 劳乃宣：《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

(8) 劳乃宣：《论古今新旧》，《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

(9) 劳乃宣：《致刘潜楼书》，《桐乡劳先生遗稿》卷4。

(10) 劳乃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

(11)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4，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04页。

(12) 劳乃宣：《书陈东塾先生说长白山篇后》，《桐乡劳先生遗稿》卷3。

(13) 劳乃宣：《致章一山函》，未刊手稿。

(14) 劳乃宣：《致柯凤荪、沈子封函》，未刊手稿。

(15) 劳乃宣：《致柯凤荪、沈子封函》，未刊手稿。

(16) 劳乃宣：《复章一山函》，未刊手稿。

老舍

王行之

老舍，原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满族（正红旗）人，1899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

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王朝皇城护军的一名士兵，月饷甚微，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在反抗侵略者的巷战中战死。当时老舍不满两岁。此后，一家数口的衣食用度，全靠母亲为人拆洗缝补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极为贫困。苦难的童年，勤劳的母亲，给老舍以很深的影响。他从小就刚强，好学，像母亲那样“愣挨饿也不肯求人”[(1)]，对穷人则充满了同情。

老舍最早上的是私塾，后来有机会读完了小学；1918年他毕业于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因“品第特优”，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从此开始了他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的将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

五四运动唤起了老舍对新文学的浓厚兴趣，他幼时所喜爱的桐城派和吴梅村等再也拦不住他对白话文学和新事物的喜爱与向往，自学英文和习写小说成为他教学之余的爱好。1923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期间，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习作《小铃儿》。同年夏，老舍回到北京，在顾孟馀主持的北京教育会当文书，兼任北京一中国文教员。工作之余，他去燕京大学旁听英文，认识了英籍教授艾温士（Robert Kenneth Evans）。

1924年秋，艾温士介绍老舍去英国，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在伦敦，老舍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但丁、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作品尤为喜爱。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社会

弊端，引起老舍的强烈共鸣，每每在读小说时忆及自己的过去。异乡孤客的故国之思，好像在眼前呈现出一幅幅清晰的图画。于是，老舍用笔把它们写了出来。1925年底，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伦敦脱稿了。老舍的这部长篇处女作，以幽默、辛辣的文笔，写了一个恶棍办学的故事，“老张”的种种卑劣行为，可作为旧中国学界的黑幕来读。《老张的哲学》写成后，老舍并未想到它可以发表，一直锁在抽屉内。后来，和老舍同住在伦敦的许地山看到了原稿，极为赞赏，鼓励老舍将该稿寄回国内。老舍将原稿投寄给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很快就发表了。此后，老舍在伦敦又接连写出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均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三部长篇的问世，使老舍一跃而为名作家；他那独树一帜的幽默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夏，老舍离英归国。途中因旅费不足，滞留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教国文约半年。新加坡中学生们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意识之强烈，使老舍“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2)]。为此，他毅然中止了爱情小说《大概如此》的写作，开始创作表现各被压迫民族儿童团结起来的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老舍回到上海，住在郑振铎家里写完《小坡的生日》后，即回到他的故乡北平。

旅居国外的老舍，饱尝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与歧视，他是怀着渴望祖国强盛的激情从海外归来的。不料，踏进国门，看到的却是笼罩全国的一片战乱，中国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中。黑暗中国的苦难现实，使老舍感到痛苦，激起他的义愤，也改变了他的创作风格。从1930年夏到1937年秋，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课余坚持写作，先后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老舍幽默诗文集》和创作经验文集《老牛破车》等。这些作品的题材，绝大部分都是表现中国北方

（特别是北平）穷苦人民的苦难，对旧中国提出了血泪的控诉；艺术创造方面也更加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品力求真实生动，语言简洁明快，善于刻画人物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独创性的老舍风格。其中，《骆驼祥子》、《离婚》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这部优秀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虎妞、刘四爷、小福子等异常生动的艺术形象；围绕着洋车夫祥子的坎坷遭遇，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面，控诉了军阀、特务、财主、恶霸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老舍通过祥子的悲剧，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发起了愤怒的挑战；同时，也向被侮辱与被迫害者深刻指出：幻想以个人奋斗来改变苦难命运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和艺术创造上的完整性与独创性，使这部作品不仅成为老舍个人的代表作之一，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骆驼祥子》被先后翻译为英、法、德、意、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捷、俄、丹麦、西班牙、瑞典等近二十种外文译本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逼近济南。当时，老舍因子女幼小，夫人体弱，势难举家迁徙。在危急的情势下，他于11月15日忍痛弃家出走，奔赴国难。经徐州、郑州辗转到达武汉，投身到抗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武汉，老舍与郭沫若、茅盾、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作家相识，在筹组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敌组织的工作中，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指导与帮助。

1938年3月27日，文艺界人士数百人集会于汉口，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后迁至重庆）。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此后连选连任，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在“文协”工作的七年间，广泛团结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作家、艺术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年底，《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宣称文艺“与抗战无关”，老舍代表“文协”写了致《中央日报》的

公开信，对这种不利抗战的言论提出抗议。公开信被国民党当局扣押而未能发表，却在爱国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老舍拥护、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义行为，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畏惧和仇恨，屡屡加以迫害，特务盯梢成为常事，同时兼以利诱。国民党的一个要人曾授意老舍写一部为蒋介石“颂圣”的小说，许以很可观的稿酬，老舍断然加以拒绝。1939年秋，老舍以文艺界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进入陕甘宁边区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1944年4月，由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人发起，重庆文化界集会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新华日报》以《作家的创作生命》为题专门发表短评，称赞老舍“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困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3)]。

整个抗战期间，老舍的文学创作均以爱国抗日、团结进步为主题，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来鼓舞人民的斗志，身体力行地实践“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1939年以前，他编写了许多抗战鼓词和抗战戏曲，大力普及通俗文艺，直接宣传抗战。1939年以后，开始创作话剧，先后写出《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著）、《王老虎》（又名《虎啸》，与萧亦五、赵清阁合著）。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与第二部《偷生》，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长诗《剑北篇》等，也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完成于美国），全书近百万字，不仅是老舍个人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大书，也是整个抗战文艺中首屈一指的长篇巨制。《四世同堂》以北平小羊圈胡同的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写出了沦陷时期北平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写出了中国

传统文化对人民的鼓舞与束缚。这部作品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主要是普通老百姓）寄予了崇敬与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则给以无情的鞭笞和揭露，全书洋溢着感人至深的爱国热情。《四世同堂》的艺术造诣较之《骆驼祥子》，有着大幅度的突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们纷纷飞向上海、南京等地“劫收”，老舍对此十分反感。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老舍朗诵《阿Q正传》。朗诵前，他致辞说：“阿Q参加了革命，他说革命也好，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今天，抗战胜利了，有人说胜利也好，到上海、南京发点胜利财，拿几只板鸭来吃。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惨胜比惨败还要惨。拿阿Q的精神来建国，国必会和阿Q一样是会死的。”[(4)] 老舍的一生都是这样嫉恶如仇。

1946年3月初，老舍与曹禺应邀赴美讲学。老舍在美国写出了《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分别帮助郭镜秋和艾达·普鲁伊特将《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译成英文，在美出版。

1949年10月，老舍在纽约收到了周恩来邀请他回国写作的信，他不顾疾病未愈，立即赶到旧金山乘船归国。12月12日，老舍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使贫苦出身的老舍感到欣喜万分。强烈的翻身感，激发了他空前的创作热情，从归国到逝世的十六年间，他在热心从事社会活动、帮助青年作家成长的同时，勤奋写作，创作出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被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他以创作戏剧作品为主，先后发表、出版了剧作《方珍珠》、《柳树井》、《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青霞丹雪》、《宝船》、《神拳》等，以及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未完）和《过新年》、《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等文集。

其中以话剧《龙须沟》、《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最为著名。话剧《龙须沟》通过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怀。这是解放初期我国话剧创作中的最佳剧作。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写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表现出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运用艺术形式宣判了旧中国的“死刑”，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华和热爱新中国的深厚感情，被评论界目为三十年间话剧创作中艺术性最为完美的优秀作品。1979年，文化部授予《茶馆》以“建国三十年话剧创作荣誉奖”。1980年秋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邀赴欧洲演出《茶馆》，受到德国、瑞士、法国观众的高度赞誉，开创了我国话剧出国演出的第一页。

老舍以其卓越的创作成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老舍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曾多次赴朝、苏、印、捷、日等国访问。

196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老舍因不堪侮辱，于1966年8月24日自杀身亡。

---

(1)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创刊号，1935年9月16日。

(2)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宇宙风》第4期，1935年11月1日。

(3) 《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新华日报》

1944年4月17日。

(4) 力扬：《纪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日》，《周报》第9期，1945年11月3日。

老洋人

李国强

老洋人，原名张庆，又名张廷献、张国信，河南临汝人，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张扬高，依靠耕种两亩岭地，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1896年，父母先后病故，他开始四处流浪，乞讨度日，农忙时帮长兄张林干些农活。艰苦的生活环境，被压迫的社会地位，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胆大、刚强、爱打抱不平的性格[(1)]。

1911年夏，豫西一带遭受严重的旱灾和雹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但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反而有增无减，逼得贫苦的农民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这年秋季，老洋人跟着张林一起投奔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转战豫、陕。1914年6月，张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不久白朗起义军失败，老洋人回到家乡。为避免官府捉拿，他将原名张庆改为张廷献，参加了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新建的宏威军，历任马兵、排长、连长，驻灵宝。他注意军纪，禁止部下抢掠百姓。因其身躯高大，黄头发、黄眼睛、深眼窝、高鼻子，貌似外国人，绰号“老洋人”[(2)]。

1922年5月，河南督军赵倜和当时驻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有矛盾，趁直奉战争之机联奉反吴，命赵杰率宏威军进攻郑州的直军，但被冯玉祥部打败，撤军至中牟，又逃往山东。老洋人“实恨军阀跋扈，思有以重创之”[(3)]，没有跟着赵杰逃跑，率宏威军散兵共三百多人，于6月20日打下扶沟县城，经许昌、襄城，回到宝丰县木中营、杨旗营一带进行休整，准备西进陕西，并提出口号：所到之地，不要银钱，不拉票。

同年7月12日，老洋人率众经鲁山、下汤、栾川、卢氏，直扑陕州（今陕县），守备陕州的丁保成率部缴械投降。丁保成曾充任灵宝县巡缉队副领官，老洋人与他相识，便留他充任参谋长。老洋人继续率众西进，围攻灵宝，逼近潼关。陕西督军刘镇华即令驻守潼关的憨玉琨部东进救援灵宝。为了避开憨部，老洋人放弃了西进的计划，于月底折向西南，过卢氏攻陷南原；复下商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他联络张得胜（德盛）、李明胜（鸣盛）、任应岐、崔二旦（邦杰）、李老莫、常建福、韦凤岐等大小三十余股，共约七八千人，被众人称为“老架子”（意为“总架杆”，即首领），声势日盛。

直系军阀吴佩孚为要剿灭老洋人部众，与河南督军冯玉祥制定了一个三路合剿的计划，由冯玉祥任总指挥。在冯军围剿下，老洋人率众于10月23日由豫西突围撤往豫东南，号称“建国军”，越鲁山、方城、叶县、舞阳、郾城，27日粉碎了靳云鹗陆军第十四师在京汉线的堵截，28日攻陷上蔡县城。老洋人进上蔡后，部众在四街高喊：“老百姓不要慌，俺们是打富济贫，替天行道！”[(4)] 并打开仓房，叫群众取粮拿物，不让空手出城。上蔡的三个大劣绅百尺镇团总葛培茂、县商会会长娄金鹏和陈海鹏被斩首示众。29日，老洋人率众离开上蔡，连陷项城、沈丘、新蔡等县城，直驱皖北重镇阜阳。

阜阳是原安徽督军兼省长倪嗣冲的老家，倪搜刮百姓，家财万贯，老洋人早已谋划袭取这个人们心自中的“金窟”。在攻打阜阳前，他预遣一部分人伪装成商贩，身藏武器，混入城内，俾作内应。11月2日晚，老洋人大队人马突至阜阳西门城下。守城士兵稍事抵抗即弃械奔逃，县长陈祖荫被活捉。老洋人破阜阳后，获得了倪家所存子弹二百余万发，步枪三千支，机枪十三挺，大炮数尊，以及很多金银细软；还劫走阜阳教堂神甫意大利人马福波。安徽督理马联甲令皖北镇守使殷恭先率二十五营刻日进剿。老洋人见殷兵甚众，放火焚烧阜阳后，于5日拂晓弃城撤回豫境，又连陷息县、正阳、遂平、郾城，拆毁了京汉铁路从明港至信阳之间的铁轨，并架走在息县的美国传教士

巴牧林牧师及其子诺尔和正阳伦敦会牧师贺尔门等。每当官兵进剿时，老洋人就将这些外国人置于前线，使得官兵不敢贸然开枪追击。

老洋人焚烧外国教堂，劫架外国人，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惶恐与干涉。他们威胁北京政府立即进剿老洋人，营救被掳外人。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乃令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为“豫省剿匪总司令”，指挥豫省各军进剿。

老洋人攻陷遂平、郾城后，11月14日在汝南与靳云鹗所部激战六小时之久，势渐不支，遂由上蔡一带向西退却。河南督军张福来派其第二十四师一部，由开封向西华前进，企图与靳云鹗部夹攻老洋人；吴佩孚也加派一团兵力，在豫鄂边境设防堵截；湖北督军萧耀南令湖北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潘守蒸自武胜关率两营进驻长台（属信阳），进行协剿。靳云鹗并发出布告，悬赏缉捕老洋人，谓凡能生擒者，赏洋一万元，击毙者赏洋七千元；如能救出外国人，从优给赏，加官晋级。

针对北洋军的四面围击，老洋人计划退入桐柏山中，再由南阳等处退回豫西。为此，老洋人将所部分为三路：一路由老洋人率领，进至方城、泌阳交界的母猪峡；一路由张得胜率领进入桐柏；一路由李鸣胜率领，退到光山、固始。各路互为犄角，忽东忽西，打乱了北洋军的围剿部署。正当北洋军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高叫三个月内“一律肃清”的时候，老洋人已于11月底率众会聚于鲁山、宝丰、郏县一带。

12月初，因洛阳一带已有北洋军重兵扼守，老洋人率众三千余人由鲁山、郏县交界的郭店进入襄城，拟赴黄河北岸河南、直隶交界地区，再图大举。但由于连日来东突西闯，枪械子弹已严重匮乏，只得又退回鲁山东北耿集、朱家店等地进行整编，自称“河南自治军”，老洋人为总司令，并制订了军歌，歌中有这样的词：“枪声镗镗，鼓声汪汪，老天不下雨，百姓去逃荒。枪声隆隆，鼓声通通，督军立大

功，百姓血流红。枪声熊熊，鼓声同同，督军三天成富翁，全省百姓个个穷。”[5]

12月下旬，吴佩孚、靳云鹗、胡景翼、张福来为了迅速将老洋人消灭在豫西，决定采用“总攻、分击、外围、内捣”之策。靳云鹗率其第十四师，配备飞机、大炮、骑兵、工兵，直捣鲁山、宝丰、郏县老洋人所据之地。到郏县后，由于老洋人扣押着七个外国人，靳云鹗怕攻之过急会造成伤害，就一面对老洋人进行恫吓，一面进行诱降。老洋人为了保存实力，派人向靳表示愿意投诚。双方经过几天磋商后议定：“（一）老洋人一股投诚，愿受改编；（二）改编之始，老洋人先将所掳外人释放，以示诚意；（三）双方约定各不相侵，不得无故放枪，以免误会；（四）由靳氏改编老洋人部众为十二营，一律先发一月粮米及全副军装，以示诚意；（五）改编后暂由老洋人、张得胜两人统带；（六）由靳氏酌给枪械，以便戴罪图功；（七）由靳氏代向曹、吴两使、张督理请求准所部改过自新，编为正式军队。”[6] 随后，老洋人释放了外国人，靳云鹗将老洋人所部改编为河南游击第一、二支队，由老洋人任第一支队长，张得胜任第二支队长，仍驻宝丰、郏县一带。靳云鹗还将两个支队中营长以上人员全部易名，以“国”字排列，老洋人改名张国信，张得胜改名张国威。

老洋人接受改编后，靳云鹗长期不给发饷。老洋人以“就地筹饷”为辞，积极扩充武装力量，收缴附近各县团防枪械，向地主官绅筹粮派饷，再度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吴佩孚在当地官绅“恳求移防”的呼吁下，以“赴豫东就食”为借口，令老洋人部离开鲁、宝、郏地区。

1923年四五月间，老洋人部由豫西移防豫东鹿邑、柘城、宁陵、永城、夏邑等县。老洋人率部到豫东后，释囚犯，筹军械，并联络苏、鲁、豫、皖边农民武装和绿林组织，“约期大举”。这不仅使当地豪绅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避，就是苏、皖等省的达官贵人，也感到极大的威胁，因而多次联电吴佩孚、张福来，请其“亟商良策，弥患

无形”[7]。

10月，吴佩孚想用调虎离山的手段，令老洋人南下援川，使其在军阀混战中被消灭。老洋人藉口饷械缺乏，部下蛮横难驯，抗不听命。吴佩孚恐老洋人被奉系或皖系军阀所运动，成为肘腋之患，便秘密计划调集苏、鲁、豫、皖、陕五省军力四万人将其包围解决。但因事机不密，被老洋人预先侦知，乃率其部于10月17、18、19日由永城、夏邑、宁陵、柘城、鹿邑分两支越京汉路突围回到豫西，活跃在宝丰、鲁山、南阳一带山中，声势复炽。

老洋人再起，使北京政府和军阀大为不安。贿选总统曹锟电令河南督军张福来速将老洋人“限期捕获，以绝根除”。吴佩孚、靳云鹗、张福来等也深感“不先行剿灭”，“难免燎原”，遂决定集中全力镇压。11月1日，张福来出驻许昌，亲自指挥各军进剿。老洋人派其部下姜明玉率二千余人向西北突围，借以牵制敌人兵力；自己率四千余人，谋向豫南进入鄂边。从11月4日起，经叶县、方城、南阳、泌阳，于11月14日进入豫鄂交界的湖阳镇。因受鄂军阻击，经桐柏入泌阳的母猪峡，联合当地民军，其势骤张。接着，西出唐河，经新野、邓县、内乡，于11月23日夜攻陷淅川县的李官桥，直驱荆紫关；因鄂军布防严密，又改向郧阳（郧县），拟由此进入四川，投靠四川反直派的熊炳琦、但懋辛。28日，老洋人所部被鄂军截回。陕军张治公、贾济川、吴新田也派大军在商洛山设防。老洋人部被围困在陕边龙驹寨一带山中，周旋多日，未能摆脱北洋军围击，于是树起“河南救国军”的大旗，决定第二次回击鄂边，以图扰乱直系的援川军后路而冲入川省。

12月26日夜，老洋人率众攻陷湖北重镇枣阳，焚烧县署，释放囚徒，并枪伤美国传教士贺福夫妇，架走女传教士吉伦，再次引起帝国主义的震惊。

老洋人虽然攻下了枣阳，但面对鄂、陕、豫各路北军前堵后剿，

苦战连日，人困马乏，已成了强弩之末，遂决计重回豫西恃险图存。豫南镇守使马志敏率军跟踪追击，豫西镇守使丁香玲严密设防，老洋人连战多败，部下逃跑甚众。1924年1月初，老洋人率残部二百余人退到郏县西北的老爷岭。北军层层包围，猛烈攻击。9日，老洋人在激战中饮弹身亡[8]。

主要参考资料

刘恺慈、施景伯、王慕韶、宝丰文化馆、枣阳文化馆：《老洋人拉杆片断》（未刊稿），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

(1) 临汝县文化馆：《关于老洋人的史料》（未刊稿），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2) 关于老洋人的绰号，还有一种说法：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洋人厉害，就气愤地说："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人们遂称其为"老洋人"。

(3) 《民国日报》1922年2月10日。

(4) 上蔡县政协：《关于老洋人攻占上蔡史料》（未刊稿），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5) 《晨报》1923年2月4日。

(6) 《大公报》（长沙）1922年12月29日。

(7) 《晨报》1923年5月25日。

(8) 《大公报》（长沙）1924年1月20日。关于老洋人的死，当时有的说系被其部下丁保成所杀，又有的说老洋人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此据追剿老洋人的南阳镇守使马志敏真（11日）电。

冷欣

张天政　成凯

冷欣，字容庵，世人尊称容公，江苏兴化人。1900年11月7日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里。冷欣出生时已经丧父，家中生活日渐贫困，其幼年是在两位哥哥帮助下，由母亲含辛茹苦养大的。因为幼年吃苦，懂得母亲的不易，所以冷欣对母亲极为孝顺。1907年，冷欣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年纪稍长后，转入兴化文正高等小学读书。1917年，冷欣顺利毕业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做了一名商栈学徒。从兴化水乡，步入十里洋场，年轻的冷欣眼界为之一开。为了使自己能适应这一新的生活，他广泛接触上海的知识青年，阅读各种新闻报纸。后来，又因受到五四新文化进步思想的熏陶，冷欣渐渐认识到，苦难深重的祖国亟待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以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对于自己从事的商业买卖，冷欣并不感兴趣。学徒期间，他坚持自学，准备离开商界。1918年，冷欣考进杭州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读书，后顺利毕业。

冷欣毕业时，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正在混战，兵连祸结，时局动荡。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并在上海秘密招生。江苏省国民党地下组织钮永键在上海主持黄埔军校招生工作。在钮的介绍和推荐下，冷欣决定投笔从戎，献身革命。接着，通过努力，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争取到家乡刘序堂给予的经济资助，赶赴千里之外的广州黄埔应考，并被录取，这成为其一生命运之转折点。冷欣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冷欣被分派到教导第一团（团长为何应钦）第三营第十二连任党代表（当时仿照苏联红军建制，连以上设党代表）。从此，冷欣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

冷欣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第一次东征中攻打淡水的战役。1925年

1月初，冷欣改任教导第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随军攻下淡水城。初战告捷，增强了冷欣从军救国的信心和决心。接下来，冷欣先后参加过棉湖战斗、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与桂系军阀刘震寰叛乱的战斗以及攻占陈炯明老巢惠州的战斗。在最后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冷欣不幸左腿中弹，被抬下火线。经过治疗，虽然痊愈，但从此留下了走路吃力的后遗症。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以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该会以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组织的眼中钉。于是在第一次东征时，贺衷寒、缪斌等人就组成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以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划上一道鸿沟。“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有：王柏龄、贺衷寒、缪斌、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胡宗南、吴铁城、冷欣、曾扩情、酆悌、桂永清、余程万等。1926年，冷欣出任“孙文主义学会”执行委员。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出任海军中山舰党代表。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何应钦担任东路军总指挥，冷欣被任命为东路军第三路指挥部政治训练部主任。1927年1月，他兼任新编第一军政治部主任。3月，在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北伐军兵不血刃进入上海，冷欣出任淞沪警察厅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实行清党，通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5月，冷欣兼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清党委员会”情报处长，以后又兼任上海特别市党部指导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训练部长以及上海市党部“清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审查处长等职。8月13日，蒋介石突然通电下野赴日，暂避各方反对势力锋芒。淞沪警察厅随之改制，冷欣也被免去警察厅政治部主任职，专事国民党党务工作。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宣布二次北伐。3月，冷欣兼任第一集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年底，张学良易帜，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北伐完成后，冷欣解除军职，从事上海及江

苏国民党党务工作。1929年，冷欣任教导第一师政治训练处主任。同年12月2日，石友三在浦口反蒋，炮轰南京。蒋任命冯轶裴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镇压石友三。冷欣被任命为该路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不久该部撤销。这一年，他回兴化探亲，亲自在城中租赁住房，安排母亲生活。不久，他买下兴化城内武安街口的一套房屋及配套的家具。在做了适当修理后，他让已经分开居住的兄长全部搬进新居重新团聚，照应老母，颐养天年。

1930年3月，何应钦任军政部部长兼任武汉行营主任，严防冯玉祥、阎锡山的异动。4月，冷欣任军政部参事兼任武汉行营参议、豫南行政委员。中原大战后，何应钦调任郑州行营主任，冷欣也跟随兼任郑州行营参议。1931年冬，冷欣当选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33年，冷欣调任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协助师长汤恩伯在湖北黄陂一带“围剿”红军。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以十九路军为基干，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蒋调集嫡系部队入闽讨伐，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经金谿、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集结。冷欣的第四师是该部先锋，第一个到达邵武；随后，汤恩伯指挥第八十九师和第四师组成第十纵队，经将乐、永安、华安，向闽南前进。1934年1月6日，“中央军第四师冷欣、第三十六师宋希濂、第五十六师刘和鼎攻克福建延平，守军司徒非师降”[(1)]。1934年2月，第四师先头部队到达泉州附近，截断了十九路军的退路；2月底，十九路军退集到泉州的部队完全被包围，卫立煌派人到泉州和谈，达成了十九路军接受改编的协议，福建政府旋即宣告失败。

1934年2月，汤恩伯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冷欣担任第十纵队指挥部参谋长。3月，升任该指挥部副指挥官。1935年，冷欣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3期深造。在校期间，一度兼任胡宗南部驻

京办事处主任。9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6年2月7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军衔。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正式投入对日作战。上海遭到日军进攻，南京受到冲击。9月，陆军大学从南京疏散迁往长沙。10月16日，冷欣被任命第三预备师师长。当年12月，他正式从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1938年4月，第三预备师奉命改为陆军五十二师，列入建制，于该年夏参加了武汉会战。1938年10月，冷欣调任军政部第二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辖四个团，驻浙江省江山县。1939年1月1日，因为与顾祝同是同乡，冷欣调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代行省政府职权，行署设于安徽屯溪附近的梅林。在军事方面，冷欣兼任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司令、江南攻击军左路军指挥官、江南野战军指挥官。在此期间，冷欣先后组织创设江南医院、江南日报、江南修械所；同时恢复辖区内各县各级学校，以教育和培养有志抗日的青年，并帮助从沦陷区逃出的青年。冷欣对教育十分重视，先后创办的学校有：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宜兴、溧阳、高淳县立临时中学，省立江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临时小学校，以及其他各县立中、小学。冷欣曾亲自兼任过省立第五临中校长，还在宜兴办念劬中学。

1939年6月，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到达江南，与粟裕的先遣部队会合。1939年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总部设于溧阳水西村，陈毅任司令，粟裕为副司令。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成立第二游击区，第三战区顾祝同兼任司令，冷欣任副总指挥，负责实际指挥。双方开始时还能保持颇为融洽的关系，到1940年3月国共摩擦加剧之时，顾祝同把五个师加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18个团的兵力部署在皖南，企图切断新四军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新四军、威逼苏南新四军之势。冷欣也指挥部队开始步步进逼。他们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进行反共宣传，并且不许新四军在金坛、溧阳、溧水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与组织群众抗战。实际上，是要将新四军孤

悬于狭小的危险地带，让敌人包围消灭。此外，还扣发新四军的经费、弹药、被服等，派遣特务武装到新四军活动地区破坏，制造摩擦事件。1942年1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发动皖南事变。冷欣的部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第二游击区兼总指挥上官云相、副总指挥冷欣”指挥所部，负责“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肃清防区内匪军匪党，并适当控制机动部队，防止该方面匪军为策应其皖南方面作战向我袭扰或暴动等行为”[(2)]，也就是负责监视并阻止新四军对其皖南军队的救援行动。所以，冷欣也是皖南事变的罪魁之一。

1944年，冷欣出任中国陆军总部军务处处长。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飞到湖南芷江，和国民政府要员举行无条件投降之前的受降会谈，这就是永载史册的“芷江受降”。下午3时20分，日军代表进入会场。会场正中桌旁就座的是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为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Smedley Butler）和翻译官王武上校，中国各战区长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环坐左右。会上，萧毅肃中将代表何应钦总司令，将第一号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指示日军投降应准备的事项。据当时在场的记者严怪愚回忆，“在会谈中，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身体晃动不已，人又瘦小，简直有一点像一只猴子”，因此“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3)]。22日上午11时，冷欣中将和美国巴特勒准将及王武上校前往今井武夫住处，就关于在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为监视日军执行中方命令）、接收军需物资、装备以及美国战俘现状、待遇等问题进行了40分钟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冷欣反复要求日军以誓约文书保证先期抵达南京开展工作的中国及美国人员的人身安全，致使今井武夫认为“有些滑稽”，并且给今井留下了“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有这类言行，总觉得有些不恰当”的感觉[(4)]。如果说今井武夫的回忆还有日本军人无法直面失败的心态在作祟的话，那么，中国记者的回忆就不应该有什么民族偏见的成分了。可见，冷欣的不严肃和胆小怕事，或多或少地给中国军人丢了脸面，使中国这个战胜国的形象打了

折扣。

27日上午9时20分，前进指挥所的全体官兵，带无线电台一部、指挥车两辆，分乘七架飞机，由芷江机场起飞。下午2时40分，飞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陆续降落。冷欣等人下飞机后，驱车前往华侨招待所。当晚，冷欣在华侨招待所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1945年8月28日上午8时，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率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一行，到南京萨家湾一号和冷欣见面。在会谈中，冷欣指示日军不论如何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广州及香港八大都市的治安[(5)]。此举也是为了预防共产党部队抢先接收地盘和装备。

冷欣受命组建的前进指挥所，从8月27日成立，到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结束，存在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却在与冈村宁次会谈、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以及筹备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9月9日9时受降典礼完成后，当天中午冷欣便奉何应钦之命，携带冈村宁次签字的受降书乘专机飞往重庆，代表总司令何应钦向委员长蒋介石（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呈递。于下午4时抵渝，先见侍从室主任周至柔，再访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经他们商量决定，第二日上午9时，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呈递仪式，与中枢纪念周及国父广州起义纪念同时举行，如此安排，颇具深远意义。呈递后，冷与蒋留影纪念。礼成后，蒋召见了冷欣。同年10月，冷欣获四等宝鼎勋章。1946年5月，获干城甲种一等勋章和胜利勋章。在原籍以高票当选制宪国民大会军队代表。军事机构改制后任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1月，任参谋本部空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南京支团监察。1947年8月，冷欣任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9月，获光华甲种一等奖章。同年并兼任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委员。

多年来，冷欣远在他乡，十分挂念家乡的老母亲。1939年，冷欣七十九岁的老母于沦陷区兴化武安街口家中病逝，因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不能回乡奔丧，就在驻地设灵以尽祭奠形式，陈毅还曾派人前去祭奠。为了表示永远不忘母亲养育之恩，冷欣首先在宜兴创办念劬小学一所。1947年春，他回故乡安葬亡母，在拜访老师的时候得知兴化教育落后，因此筹办兴化私立念劬中学，以造福当地。

1948年3月，冷欣又一次以高票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8月，当选第一任宪政督导委员会委员。同年冬，任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5月，前往台湾。

抵台后，1951年6月，冷欣担任了台湾“国防部”参议；1952年7月，任私立强恕中学董事；1954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主席；5月，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10月，任“国防部”高级参谋，兼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9年9月，冷欣以陆军中将衔退役。退役后的冷欣活跃在历史教育与研究领域。1964年后，先后应聘任“中央警官”学校、东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讲授近代史。冷欣曾著有《汉高祖之成功战略》、《明太祖成功的战略》等文，其中《明太祖成功的战略》一文于1968年8月，在国际华学会议上宣读。

冷欣退役后的业余爱好是藏书，他收藏的古今图书共计一万多册，其中也有许多善本、珍本。1987年2月6日，冷欣因心肌梗塞、肺衰竭于下午3时45分病逝于台北，遗体葬于台北县汐止五指山示范公墓。

---

(1) 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年版，第332页。

(2)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选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3) 严怪愚：《芷江受降侧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7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4) ［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230页。

(5) 《冈村宁次大将资料》，第24页，引自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9页。

冷遹

史全生

冷遹，字御秋，1882年6月2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七）生于江苏丹徒黄墟镇。六七岁时丧父，靠大哥在镇江开设小杂货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供给他上了几年私塾。他十分用功，常常在明瓦下面借月光读书，深得老师和邻居的喜爱。他曾与邻居江月清等三个少年结成异姓兄弟，号称梅、兰、菊、竹，以风格节操相勉励。由于生计所迫，冷遹十三岁辍学，到宝应县城的一家钱庄当学徒，饱受老板的苛待，未及满师，愤而辞归，在他大哥店里帮助做些买卖。1902年春，安徽武备学堂招生，他与邻居江谦吾同赴安庆，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营。

冷遹在安徽武备学堂读书期间，正值日俄战争前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众革命激情高涨。安徽的革命志士在柏文蔚和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冷遹在反清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与柏文蔚等人时相过从，关系密切。

1905年秋，冷遹从武备学堂毕业，分发在南京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任右队队官。第二营管带是后来升任三十三标标统的著名革命党人赵声，与冷遹是丹徒同乡。冷遹在赵声的带动下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如在明孝陵宣讲民族革命思想，在珍珠桥营部设立阅书报社，密谋发动武装起义等等。1906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派吴旸谷来长江流域发展同盟会组织，冷遹和柏文蔚等人均加入[(1)]。后来，三十三标的革命活动被两江总督端方侦悉，撤销了赵声的标统职务，并准备大兴党狱，赵声和柏文蔚等人相继潜逸。冷遹升任为第三营管带。冷遹通过赵声的兄弟、当时在南洋陆师学堂读书的赵驭六，继续与赵声秘密联系，掩护新军内的革命活动，保存了三十三标

的革命火种。

冷遹与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7年冬他被撤销管带职务。冷遹听说原三十三标管带顾忠琛已被友人推荐为安徽新军混成协协统，原三十三标的一些革命志士如倪映典、熊成基等人也都依附在他的麾下，于是亦往投效。冷遹先后被委任为督练公所教练处提调和六十一标三营管带。当时岳王会在安徽十分活跃。倪映典、熊成基等都参加了。因此，冷遹一到安徽，即与岳王会发生关系。1908年秋，清廷命令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集中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岳王会决定利用太湖秋操的机会发动起义，并在安庆三祖寺的杨氏试馆内设立了一个策划起义的指挥机关，冷遹平素作风稳健，又果断善谋，被公推为起义总指挥，六十二标二营管带薛哲为副指挥。他们设想，届时只要义旗一举，湖北第八镇、南洋第九镇和江西新军一齐响应，就能直捣北京，推翻清朝。不料范传甲在赴南京与第九镇新军联络时，走漏了风声，被两江总督端方侦知。端方遂派其心腹余大洪去安徽监视新军，并以调虎离山之计，令冷遹回南京任转运局提调，当他一到南京时，即予以逮捕，投入囹圄。冷遹被捕以后，在狱中多次被严刑审讯，受尽折磨，曾昏厥三次，未供一词。端方查无实据，恰又值调任直隶总督，亟待办理移交，在亲友的营救下，冷遹得于1909年春获释。

冷遹获释以后，得知岳王会发动的起义已失败，乃先回丹徒老家完婚。新婚后刚刚八天，他得知赵声正在香港组织新军起义，把家属托付给结义弟兄江月清照料，只身奔赴香港，追随赵声参加革命。冷遹到达香港以后，恰值王孝缜受广西巡抚张鸣岐委托，到北方延揽新军人才，正取道香港回广西。两人相遇，一见如故，遂邀冷遹于1909年底一道入桂。从此，冷遹又成为“广西革命最初发动”[(2)]人物之一。

冷遹到达广西后，先任陆军小学提调，不久即因革命嫌疑被撤职[(3)]。1910年3月，何遂、耿毅受军谘府命令前往中越边境调查，他应

邀同行，趁边境调查的机会，广泛联络了各地革命同志。其后，他又与何遂一起秘密转赴昆明，访问了云南革命党人李根源、方声涛等人，在云南讲武堂密谈，讨论了在起义中联合动作和协调作战的问题。密谈后，经香港回广西。1910年8月他和何遂、耿毅等一起创建了广西同盟会支部，统一领导广西的革命运动，并共同出资发行机关报《南报》（后改名为《南风报》），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春，黄兴和赵声等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时，曾多次派员与广西支部联系，策动响应。冷遹则为中间联系人。可是广州起义刚一发动，即被镇压，冷遹因此受到广西当局的严密监视。他于是不得不韬光养晦，佯与演员相结交，出入娱乐场中，以示消极，被呼为“冷大爷”[(4)]。

武昌起义爆发后，风声所播，举国震动。广西同盟会支部也决定于10月30日起义响应。临举事时，忽然暴雨如注，起义受挫。旧官僚和立宪派得知新军异动的消息，惊恐万状，为了抢夺政权，决定与同盟会支部举行谈判，实行和平光复。谈判中，冷遹被同盟会员举为副支部长，主持支部工作。广西光复后，新军改称民军，冷遹任民军混成协帮统，率军援鄂。他率军经湖南，从金口渡江，绕道汉阳敌后准备发动进攻，旋南北实行停战，谈判开始。桂军暂驻孝感，略事休整后遂顺流东下，开抵南京。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柏文蔚所率领的驻浦口的军队正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准备出师北伐。冷遹一到，即被委任为第一军第三师师长。接着，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由于受到军界排斥，乃电邀冷遹赴皖任军政府参谋部长。南北和议达成后，孙毓筠辞职，柏文蔚继任皖督，冷遹改任第九师师长，驻军徐州。

当时徐州恰遭到张勋的江防营从南京败退时的肆行抢掠之后，“四民失业，哀鸿遍野”[(5)]。冷遹到达徐州后，即着手整顿军队，解决贫民生计，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得到陆军部的通令嘉奖[(6)]。1913年3月，第九师改编为江苏陆军第三师，冷遹仍任师长，驻防徐州。

1913年3月发生“宋案”引起“二次革命”，部分国民党员反对孙中山武装讨袁，主张“依法处置”，冷遹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在徐州发表谈话说：“我这里是前线，敌人来了我就打。我的队伍虽不算强，对付张勋的辫子兵还是可以的。”[7] 第三师成为江苏讨袁军前锋，遭受北洋劲旅冯国璋军和张勋辫子军的联合进攻。冷遹率领全军与敌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最后由于部下张宗昌、褚玉璞的投敌而全军瓦解。失败以后，冷遹流亡日本。由于不同意孙中山所定加入中华革命党时须在誓辞上按指印的规定，乃与程潜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遥戴黄兴为领袖[8]。

1915年冬，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冷遹闻讯后立即返回上海，投入护国讨袁运动。次年5月，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部和军务院时，他任都司令部参谋处长。6月6日，袁世凯死去，冷于6月22日致电徐树铮，敦促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召集旧国会，组织合法内阁，罢黜帝制祸首”[9]。这时他对段祺瑞尚抱有幻想。当1917年7月段祺瑞击败张勋复辟，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建议，冷遹即投入孙中山所发动的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总参议和代理内政部长。

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冷遹对政治斗争表示厌弃，想专心致力于实业和教育，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1921年，他回到镇江，筹集股本创办了江北盐垦公司。1923年，又先后创办均益、三益蚕种场和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冷遹曾与黄炎培一起，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该社理事。

1925年初，奉军张宗昌部南下江苏。当时的江苏省长韩国钧深惧张宗昌部的蹂躏，特邀请冷遹出任江苏省水陆警备司令之职，以维持社会治安（因张宗昌曾是冷遹部下）。半年后冷辞职回到镇江，继续从事实业和教育活动，并在1936年担任镇江商会主席和江苏省商会执行委员。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抗日战争爆发，冷遹主张发动民众抗战。1938年春，他与黄炎培一起，向蒋介石面陈了发动民众的意见，随后又转赴徐州，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陈递发动民众意见书。12月，当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时，冷遹和黄炎培等于1939年1月30日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的罪行[(10)]。这时，国统区内抗日民主运动十分高涨，冷遹积极投入了抗日民主运动。自1940至1945年间，他与黄炎培、江恒源等先后成立了“国讯同志会”、“经济建设策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众团体和政党，宣传抗日救国，被举为国讯同志会副会长、经济建设策进会常务委员、民主建国会常务监事和常务理事。冷遹还利用他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赈济委员会委员的合法身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在1944年9月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了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冷遹在1945年5月与黄炎培等联名提出恢复国共谈判的主张，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6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继续商谈”，“促成团结”[(11)]，并于7月14日与黄炎培等一起飞赴延安，接洽国共谈判的具体事项，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热烈欢迎。7月14日，当国民党准备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时，他即与黄炎培、江恒源联名声明反对，指出国民大会“必须在全国和谐空气中进行”，否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12)]，并拒绝出席关于国民大会的讨论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冷遹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农民银行监理委员和蚕桑协会会长，利用他的合法身份继续从事民主活动。由于他不断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劣迹，还掩护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斗争，引起国民党特务的痛恨，1948年准备对他进行暗害，他不得不辞去议长职务，避居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企图对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冷遹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照，及时避往亲友家中，未遭国民党特务的

毒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冷遹历任江苏省副省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兼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兼江苏省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9年8月18日，冷遹在南京病逝。

---

(1)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41页。

(2) 黄绍竑：《五十回忆》上册，杭州云风出版社1945年版，第16页。

(3)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4)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5) 李炳之：《调查徐州军队情形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 李炳之：《调查徐州军队情形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记》。

(8)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9) 《冷遹致徐树铮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0) 《新蜀报》1939年1月4日。

(11)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2) 《新华日报》1945年7月15日。

黎锦熙

白吉庵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生于1890年2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其父黎培銮是位秀才，爱好篆刻和诗画；其母黄庚午也知书识字。黎锦熙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读书写字。四岁时延师启蒙，十二岁时已读过《十三经》。次年，自学算术、世界地理，阅读时务、洋务书籍。十六岁赴童子试，补诸生。

1906年冬，湖南浏阳一带的民众举行武装起义，屡败清军，声势浩大。黎深受其影响，来到长沙，与张平子发起组织“德育会”，以“致良知”为宗旨，号召“牺牲个人，努力救国”。旋被清政府侦悉，逃匿回乡，翌年7月，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他考入北京铁路专科学堂。不数月学校遭大火，转入湖北铁路学堂。不久，奉父命返乡，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辛亥革命前夕毕业，名列前茅。

1911年10月22日，湖南响应武昌起义，成立军政府。黎锦熙的老师颜昌嶢接办《长沙日报》，他被聘为报社主编。该报因持论常与湖南当局不合，次年1月被改组。此后他与朱让楠、任凯南等自创《湖南公报》，改推李抱一为主编。该报宗旨：主张“和平统一、绝对民主”[(1)]。黎常为该报撰写时评和社论。

1913年黎锦熙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的编译员，负责小学教科书的编辑。他曾将《西游记》的个别章节选入课文，是前所未有，为教育界所侧目。同年1月，被聘为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历史教员，次年“四师”并入“一师”。黎与同事杨怀中、徐特立等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以介绍欧美新书及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工作；同时办了《公言》

杂志，发表文章倡言“自由”、“民主”，提出进行学术研究，并批评了当时教育界的派别斗争。但为当局所忌，发行了两期就被迫停刊。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杨怀中为指导，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经常参加小组讨论活动。

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设编纂处，审定小学教科书，黎锦熙被聘为编纂员。同年9月他离开湖南，从此定居北京。翌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黎与教育部内的同事陈懋诒、彭清鹏等人，深感社会保守势力严重，想在教育上谋求几项根本改革来提高民众的认识，以适应共和政治的需要。当时他们“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是文字问题”[(2)]，因此主张“国语统一”（推广普通话）和“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并要求教育部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废除文言文。由于他们的鼓吹，各省学者来信赞成，在北京成立了国语研究会，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备教育界采用。1917年10月，国语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大会，举蔡元培为会长，黎为委员之一。这时他开始与钱玄同相识。1918年在他与吴稚晖等人的要求下，教育部公布了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注音字母。后来黎为此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黎锦熙等人认为须加强对国语运动的领导，于是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构。黎被教育部指派为该会会员兼教育部国语传习所导师。之后，他到各地讲学，并答复各方提出的有关注音字母的问题。这些答复，收入《国语学讲义》于同年出版，对当时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作用。第二年他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员，后来曾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教授；高师改为师范大学后，任国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长。这时新旧两派斗争激烈，“国粹派”声称，你们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等等。为了回答这种谬论，他在高师第一次开设“国语文法”这门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继此之后，他又

编著了一部《新著国语文法》，于1924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对学校的教学与研究均是一个贡献。此书后来印行竟达二十四版之多，足见其学术价值之大和影响之深远。

1922年由于黎锦熙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引起了用“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研究。翌年该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议定由黎锦熙与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为委员，负责研制国语罗马字。后来由在京的五位委员组成“数人会”，常聚会商讨有关改革汉字的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在《国语月刊》上组编了“汉字改革”专号，积极宣传以国语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在他的建议下，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还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后因经费短缺，只做了一部分收集资料的工作。

1925年4月，北京临时执政府任命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章到任后，提出复古读经的主张，并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黎锦熙对此十分不满，在教育部部务会议上讨论小学生读经问题时，他公开反对，但无效果。会后他又递上一道呈文，剖析读经“有百害而无一利”[(3)]。文章披露后甚得舆论界的好评。

这年，文言与白话之争十分激烈。章士钊利用《甲寅》周刊公开宣扬封建文化，在征文启事中宣称“不收白话”；而黎与钱玄同主办的《国语周刊》针锋相对提出“欢迎投稿，不取文言”。双方旗帜鲜明，展开了对垒战。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与鲁迅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正义斗争。

1926年1月，国语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黎在会上作了长篇讲演，指出今后国语运动的方针是国语统一和国语普及两件大事。他希望大家脚踏实地向前走去，目的是定能达到的。最后他作了一首《龟德颂》勉励大家，谓：“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的慢慢走！不睡！”话虽不多，寓意深刻。9月14日，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通过了他和赵元任等人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呈请教育部颁行，

但未获批准。后来他们利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自行刊布。同年他编撰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在美国费城世纪博览会上展出，曾获奖章、奖状。此图将我国语言文学发展的源流，以图解法勾画出来，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西方人士看后，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惊叹不已。

蔡元培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对汉字改革工作颇重视，特聘黎锦熙、钱玄同为国语统一会筹备员，并于1928年9月26日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对国语运动是个巨大的推动。年底，国语统一会定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黎被选为常委。是年他被委任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

由于形势的发展，黎锦熙认为，若要对中国文字进行根本改革，那就得将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学术文化等作一番详细的总结。因此他主张将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玄同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二人各处奔走，结果由政府拨给北平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为办公处。黎任总主任兼总编纂，钱为总编纂，下设五个部，预计出书十巨册，二十年完成。后来因为时局动荡、经费无着、人员星散等原因，书未能编出。但他们利用收集到的资料写出不少论著，当时称之为“副产品”。黎所撰写的《审音通说》、《论“将”》、《说“把”》及《比较文法》等论著，都是利用这里的资料写成的，影响较大。后来黎锦熙考虑到这部辞典工程浩大，一时不易编成，为了满足学校与社会需要，及时组织人力先后编纂了一些中小型字典，如1932年出版的《国音字典》，1936年开始出版的《国语辞典》等等。此外，黎还利用大辞典处的资料，编写了一部《国语运动史纲》于1934年出版，是书详细地记述了清末以来汉字改革、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等运动的始末，是一部研究我国文字改革历史的重要著作。

1934年，拉丁化新文字论者与国语罗马字论者，在上海就“大众语”中的阶级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黎锦熙连续撰写了《大众语

短论》等19篇文章分送报刊发表，他认为：“大众就是众人，不但阶级宗教种种限制都没有，并且也不必聚作一堆。”[(4)] 这些文章后来辑为《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一书，即《国语运动史纲序》。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向华北大肆扩张，北平已处在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为了唤起民众，挽救危亡，黎锦熙等人认为得先从扫除文盲做起，于是他和钱玄同约定停止“大众语”的争论，集中精力搞汉字改革和扫除文盲的工作。不久他设计了一副汉字带注音的字模，专程到上海请中华书局研制，计划以此来印识字课本和民众读物。同年8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黎锦熙被举为委员兼常务委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教育部决定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西迁，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时黎锦熙在长沙讲学，知道消息后，于当年冬赶到西安。次年春日军逼近潼关，“临大”师生以行军方式，从西安越秦岭迁往汉中城固县，此后学校改名为西北联大，黎锦熙任联大秘书处主任、国文系主任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1939年8月。国民党为了分化进步力量，教育部将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北师院。黎锦熙任师院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1940年7月黎赴重庆，出席教育部召开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如何制定注方音字母等问题，并成立了全国方音注音字母修订委员会，推黎锦熙、魏建功、卢前为委员，按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是书1942年出版，为民国以来第一部韵书。

黎锦熙自西安到汉中后，即主持了城固县志的编撰工作，后来他以修城固县志的经验写了《方志今议》一书，论述了新修方志的要旨及其方法，于1942年出版。之后他又参与了关中的洛川、铜川、黄陵、宜川等县县志的编撰工作。此外，每到假期，他常被各地举办的中小学教师讲习班邀去讲学，这些活动对当时的教育发展和国语运动

起了促进作用。

1943年3月，黎锦熙再次赴重庆，出席国语推行委员会与全国方音字母修订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注方音字母的草案，即《全国方音注音字母总表》。此次在渝停留期间，他看到战时重庆官僚资产阶级政治上专横、经济上垄断控制及民不聊生等现象后，很有感慨，于是在《蜀中杂咏》诗中写了“民主与科学，宗旨毋游离”[(5)] 的诗句，表达了当时的心绪和主张。

1944年10月，黎锦熙随西北师院搬迁到兰州。当时虽处在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他却充满必胜信心。他倡议在西北师范学院、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璧山社会教育学院创办国语专修科，为将来推行国语教育培养人才，并获有成效。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为了推行普通话，教育部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将三校国语班的师生派去工作。此后，“黎门弟子”从各方面集中于台湾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办《国语报》，出版普及读物等等，为国语运动做出了很大成绩。抗战胜利后，黎一度被任命为西北师院院长。

1945年冬，黎锦熙由黄国璋介绍加入“九三座谈会”，翌年5月前往重庆出席“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的成立大会，会上他被选为监事。7月他到南京亲辞西北师院院长职。不久，回到久别的北平，重整大辞典旧业。抗战时期，辞典处的工作没有发展，由汪怡等人留守，已迁出中南海。自黎返任后，才由西单迁回，改设在怀仁堂东四所。后来“九三学社”许多次重要会议曾在这里召开。1947年初，他曾多次会晤中共在北平军调部的代表。有一次徐冰告诉他“要追随全国人民”，他铭记在心并写在日记上，日期是2月3日。

1946年10月，西北师院迁回北平，但南京教育部不准复用“北师大”的校名，改称北平师范学院。次年7月黎锦熙被“复校委员会”推为代表，与袁敦礼、焦菊隐二代表一起，到南京与教育部进行交涉。但久候无结果，于是他便应湖南大学借聘一学期之约，到长沙任该校国

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8年4月黎锦熙离湘返平，继任师院国文系主任，后来师大校名恢复，他又兼任文学院院长。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皆取得巨大胜利，6月河南开封战役中，国民党飞机滥肆轰炸，“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呼吁停止轰炸开封古城，黎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拥护。同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当局想把一部分名教授劫走，给黎送来了飞机票，他拒绝离平。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北平师范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黎锦熙担任委员会主席，领导校务。不久他与吴玉章在师大邀集在平的语文工作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他被举为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会上他作了长篇讲话，以亲身经历论述了国语运动的历史，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个报告后来整理成《国语新文字论》一书，于次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除在师大任教，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外，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

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病逝于北京。

黎锦熙治学勤奋，持之以恒，研究和探索领域很广，除语言学外，哲学、佛学、文学史、近代语、目录学、图书馆学皆有较高造诣。著作极富，有论文三百多篇，专著三十余部。黎任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之一。

---

(1) 黎锦熙撰、黎泽渝编：《黎锦熙纪事诗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年版。

(2)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6页。

(3) 黎锦熙：《为反对设“读经科”及中学废止国语事上教育总长呈文》，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89页。

(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0页。

(5) 黎锦熙撰，黎泽渝编：《黎锦熙纪事诗存》。

黎烈文

任嘉尧

黎烈文，1904年5月18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生，湖南湘潭人。小名六曾，曾用笔名维克、林取、达伍、达六等。祖父曾任台湾知府，父亲也在福建做过官，是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

黎烈文小时在家乡读书。十八岁时到上海，报考录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助理编辑，旋参加文学研究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26年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又转道法国，进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四年，得文学硕士学位。黎在法半工半读，课余为上海《申报》特约撰稿，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法国文学名著。

1932年，黎烈文偕妻子严冰之（蕖影）回国，到达上海。先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翻译法文新闻稿兼编辑，因个性耿直矜持，与主持者意见不合，且对翻译新闻稿缺乏兴趣，乃拂袖而去。

其时，黎烈文的叔母黄渔仙为《申报》馆主持人史量才教授古琴[(1)]。经黄介绍，史获知黎曾留学法国，擅长文学，遂邀请他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助理编辑。

《自由谈》原系周瘦鹃主编了十多年的副刊，内容陈旧，与时代潮流大相径庭，而史量才当时意气豪迈，锐意革新《申报》，对《自由谈》确定“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的编辑方针[(2)]。黎烈文参与《自由谈》编辑工作一开始，就在1932年12月1日发表一篇《幕前致辞》，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中，都在近代化”，“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我们只认定生活的要素，文艺，是应该而又需进步的，近代化；同时却也不愿离观众太远。”[(3)]当天的《自由谈》还发表了叶圣陶道破“自由谈”本质的杂

文和冰莹祝贺《自由谈》新生的文章，以及严冰之翻译的法国梅里美的小说《托勒得的珍珠》等，面目为之一新。

黎烈文与周瘦鹃之间在编辑方针上立刻产生了矛盾。史量才支持黎烈文的革新行动，改任黎烈文为《自由谈》主编。为照顾老同事起见，史在《申报》上另辟一副刊，名曰《春秋》，由周任主编。

黎烈文主持《自由谈》伊始，即进一步表示：务使《自由谈》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绝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4)]。基于这一立场，黎在选稿上，往往偏重于描写现实生活而寓意深长的杂文。当时，许多左翼和进步作家欢迎《自由谈》的革新，都纷纷投稿。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许多进步作家，都是《自由谈》的撰稿人。

《自由谈》得到进步力量的赞助，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文化“围剿”猖獗的上海，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个呼吸清新空气的窗口。特别是鲁迅（笔名何家干等）、茅盾（笔名玄）等人的文章，像匕首和投枪，针砭时弊，切中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帮助读者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于万马齐喑中一新耳目，深受爱国人士及进步青年的欢迎。

另一方面，《自由谈》的革新，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特务机关刊物《社会新闻》的竭力反对。他们不惜恶意诽谤，造谣破坏。在黑暗势力的重重压迫下，主持《自由谈》编辑工作半年多之后，黎烈文在报上刊登了一则《编辑室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5)] 字里行间，表达了编者难言的苦衷。此后，《自由谈》在选稿方面，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较前多了些。但格调不变，左翼和进步作家仍源源投寄稿件，不过斗争策略有所改变，在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推行其文化“围剿”政策，对《自由谈》视为眼中钉，一再向《申报》当局施加压力。5月9日，《自由谈》上登出了《黎烈文启事》：“烈文现因事忙，对于本刊编辑事务无暇兼顾，自即日起，关于本刊一切事项由张梓生先生主持。”黎主编《自由谈》共一年五个月零八天。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全力贯注于《自由谈》的编辑工作，连他夫人临蓐也无暇照管，以致她独自死在医院里[(6)]。继他之后主编《自由谈》的张梓生，萧规曹随，风格依然，到1935年10月31日也被迫去职。

1935年，黎烈文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出版《译文丛刊》，介绍外国文艺作品。

1936年9月，黎烈文在上海创刊并主编《中流》文艺半月刊，着重刊登短篇作品，及反映当时政治斗争的文章。撰稿人大都是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5日的《中流》第1卷第5期刊出纪念专号，选登了许多人的纪念文章，黎以《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为题，追忆鲁迅的忘我劳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中流》出了抗敌专号。8月《中流》停刊，共出22期。

其间，1936年在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巴金和黎烈文起草过由鲁迅等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黎又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抗战开始后，黎烈文到了福州。由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推荐，于1938年担任福建省教育厅中等学校国文科视导员。1939年到永安，抱着“推重车上峻坡的雄心”，创办“改进出版社”，自任社长，并由杜俊东、陈范予、陈占元、许天虹等协助，编刊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和《改进文库》，出版了适应抗战需要的青少年学生通俗读物。

抗战胜利后，黎烈文于1946年初到了台湾，应台北《新生报》社

长李万居（留法同学）之邀，一度担任台北《新生报》社的副社长，仅20天即去职。“二二八”事变发生后，黎烈文到台湾大学文学院任外文系教授。50年代初，黎应《中华日报》台南部总编辑兼副刊主编于吉之约，撰写文艺专栏文章，题为《艺文谈片》，每周一篇，内容大抵为欧陆文坛掌故，如《名著的代价》、《华格纳访贝多芬》、《文豪的归宿》等。黎对外国文学研究有素，此时信手拈来，写得逸趣横生，颇为读者爱好[7]。

1972年10月31日，黎烈文在台湾病逝，身后萧条。

黎烈文逝世后，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怀念黎烈文》一文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黎烈文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小说集《舟中》、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标点《大唐三藏取经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译著有《冰岛渔夫》、《红与黑》、《脂肪球》等。

---

(1) 黄渔仙，名松，福建泉州人。与黎烈文叔父结婚，婚后到湘潭，生二女（曾昭、琼昭），丈夫逝世后携女到上海，为其同乡人中南银行总经理黄浴沂聘为家庭教师。史量才因黄浴沂之介绍，请黄渔仙教授操古琴。解放后，黄渔仙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擅绘画、弈棋，通昆曲。晚年归故里，1982年5月30日病逝。黎烈文原为黄渔仙之侄，因其叔无子，遂为黄之嗣子。（以上据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口述）

(2) 《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周年》，《申报》1932年11月30日。

(3) 《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4) 《编辑室启事》（一），《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2日。

(5) 《编辑室启事》，《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

(6)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曹聚仁：《我与黎烈文》，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黎元洪

张振鹤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生。他的祖籍原系安徽宿松，从祖父起即经商湖北，遂入籍黄陂，父名朝相，参加过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役，后又转直隶练军，由士卒升为游击。黎元洪十四岁时随家北来，先进私塾；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于1888年被派往海军服役。1890年，经水师提督丁汝昌调广东广甲兵船上充当三管轮，次年晋为二管轮。1893年，一度应调去湖北任炮厂监工，后又回广东。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他从广州北上增援威海卫，遇敌于渤海口，所乘战舰被击沉。黎漂流海上，后在大连附近得救。

战后，黎元洪脱离海军，往南京投靠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先奉命监修新式炮台，后为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习，深受器重。1896年1月，张回湖广总督本任，又把他带到湖北，委以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黎东渡日本考察军工生产。1899年秋，再次赴日考察陆军教育及军纪。第二年夏回国，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1901年，第三次去日本，参观陆军大操演习。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张之洞遵照练兵处新章，改编湖北常备军为两镇，黎元洪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1906年4月，练兵处将该镇拟定名称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黎任该协协统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同年秋，清政府于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分编南、北两军，南军由湖北第八镇和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黎元洪以第八镇统制官名义，率军参加了这次演习，获得“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评语[(1)]。

1909年，湖北人民为收回利权，发起粤汉铁路收回自办运动。各界推派代表组成“湖北铁路协会”，共谋筹款，黎元洪以军界代表参加。这一年，湖北水灾严重，遍地饥民，成群结队四处吃大户，抢夺地主富商存粮。黎元洪奉命派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官兵去江陵县驻扎，“随时认真弹压”[(2)]。1910年夏，他亲自带兵去沔阳州芦林湖，镇压饥民。同年，陆军将校讲习所改为讲武堂，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办，黎元洪和邓成拔任会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的领导者多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了扩大影响和提高革命军的声望，黎元洪被抬出来充当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其实，他对革命活动一贯惧怕和仇视，早在上年11月间，他即借故把倾向革命的队官潘康时撤职，而以亲信施化龙代替。施化龙秘密侦探军队内部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活动情况上报，黎据此下令开除了大批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的那天晚上，他还亲手杀死革命士兵。之后，他又惶惶不安，逃匿不见。

11日黎明，起义军的领导人群集武昌阅马厂谘议局，通过拥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派人赴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觅黎，黎已匿避；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穿短狭不适体的便服，默坐一室中。派去寻找他的人说：“请统领当都督！”黎瞪目而视，答道：“谁同你们造反？”即起身出走。后又逃往黄土坡他的参谋刘某家躲藏，并以身后事托付刘某。当起义军把他从刘家找出来时，他还忿忿地说：“这不是胡闹吗？谁同你们胡闹呢？事先既未与闻，事后又不通知，这不是儿戏，北洋兵一到，将如之何？”[(3)] 直到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他当都督，他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连喊“莫害我！莫害我”。等到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他才勉强就职。

黎元洪当上都督后，继续施展危害革命的伎俩，密派前大清银行监督黎大钧，暗中和清大臣柯逢时约定：如革命成功，黎保柯之身家；如革命失败，柯保黎之身家。11月，他又假湖南立宪派首领谭延

阎的手残害鄂军第一协统领宋锡全于长沙。宋系四十二标一营队官，早几年曾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平日对“文学社”的革命活动积极支持，革命后遂被推为协司令。黎和军务部长孙武忌“文学社”，对宋亦怀恨在心，故借刀杀人，从此埋下湖北各革命团体间互相仇视和分裂的种子。

革命军继在汉口失利之后，11月26日，汉阳又陷敌手。清军将领冯国璋坐镇指挥，自汉阳架炮轰击武昌，都督府曾中炮弹。黎元洪恐惧，私自乘所备垂帘小轿逃往距城六十里的王家店，一时城内秩序大乱。12月初，双方停战，他经多人劝驾，才返回武昌。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仍兼鄂督。2月，南北和议成功，改选临时总统和副总统，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黎又膺选连任。他为从事政党活动，参加竞选，组织“民社”，自任理事长。“民社”的主要成员多湖北人，如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他们鉴于南京临时政府部长、次长席位都被别人获得，心怀不满，大肆中伤孙中山，煽动武昌和南京分裂；又借口反对建都南京，以讨好袁世凯。黎元洪为向袁献媚，2月间，通电南京政府，叫嚷“共和国立，革命军消”。袁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乐得挟黎以对抗革命派。袁、黎之间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恢复旧秩序、维护封建统治是他们之间结合的基础。黎为加强实力，开始在湖北实行恐怖政策。文学、群治二社社员组织“群英会”，以反孙武为号召，于2月28日举行暴动，被黎镇压。事后，黎还发布停止集会结社的通电，以限制革命团体活动[(4)]。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势力遭受严重摧残。黎元洪借缩编军队，排除异己，将原来八个师的军队，改编为三个师。

黎元洪又借口汉口《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于8月8日派兵将该报查封，并下令缉拿该报主任何海鸣、编辑凌大同等。何等闻风先逃，凌大同被捕。14日，上海《民立》、《民权》、《民国新闻》等七报社联名致电黎元洪，抗议他“违背国宪，蔑视人权”[(5)]。黎不顾

舆论激烈反对，9月把凌大同处死。8月16日，他伙同袁世凯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先是，他以卑鄙的手段把张、方等人骗往北京。随后密电袁，诬称张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鄂中几次风潮，伊等均为主动”[(6)]。张、方遂被袁世凯逮捕并遭杀害。这是民国成立后，袁、黎合谋制造的一件著名的政治谋杀案。

与此同时，湖北境内不断爆发的革命斗争，也都被黎元洪镇压。报载他“妄诛无辜之人甚多，武汉间几日有杀人之事”[(7)]。

1913年，黎元洪投向袁世凯，成为袁扑灭“二次革命”的有力帮凶。在他的同意下，北洋系李纯部队得以早在革命爆发前预先进入湖北，为袁日后击溃江西湖口李烈钧的讨袁军提供了基地。他又勾结湖南立宪派官僚谭延闿等，分化了该省反袁的力量。当宋教仁被刺后，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准备发动讨袁战争时，他为袁世凯辩护，说袁世凯是“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8)]。

“二次革命”失败，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10月6日，袁世凯挟持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黎也当上副总统。随后，黎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破坏《临时约法》。

袁世凯对黎元洪继续留在湖北并不放心，于12月间，派段祺瑞以“磋商要政”为词[(9)]，把他从武昌“迎到”北京，住中南海瀛台，进而结成儿女姻亲，表示公谊私情都超过一般关系。从此，黎的行动都处于袁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无异政治俘虏，黎意志逐渐消极。

袁世凯为独揽大权，阴谋复辟帝制，1914年6月成立了御用参政院，任命黎元洪兼参政院院长，黎勉强就职。此后，黎请辞副总统未准。1915年，袁准备称帝时，黎由瀛台搬进东城东厂胡同寓所，这是袁特意为他购买的一处住宅。12月15日袁又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持不受，他对袁的帝制闹剧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

1916年6月6日，袁死，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是日晨，日、英、法、俄、比、意六国公使闻袁病危，共聚日本使馆策划继承人问题，一致同意由黎元洪任大总统。随后，将上述决定通告段祺瑞。在帝国主义的授意下，段于6日晚间表明了态度。7日，黎宣布就职，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29日，黎宣布遵行《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8月1日，国会复会，黎在会上正式宣誓就任。

黎、段之间的利害冲突很快趋向表面化。袁世凯当权时，大小事都听命于总统，当总理的毫无实权；段祺瑞当了总理，却把总统看成签字盖章的傀儡。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更不把总统看在眼里。黎元洪为此愤慨地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10) 他周围的重要成员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等人，联结反段派议员、政客共同对抗段、徐，由此演成"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1917年，因对德宣战案，导致双方的公开冲突。

赞成或反对对德宣战，不仅反映国内派系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日、美在中国的角逐。亲日的段祺瑞于4月25日召集各省督军到京开会，企图借督军团的势力，向黎施加压力，要他同意宣战。到会的各省督军及督军代表有曹锟、倪嗣冲、孟恩远、王占元、李纯、阎锡山、张怀芝等，陆海军总次长和参谋总长都列席会议。段祺瑞在会上提出对德宣战案后，经多数与会者赞成通过。5月1日，国务院也开会通过。段即率同阁员，面请黎元洪核准。黎则坚持等国会表决通过后，才能核准。安徽省长倪嗣冲偕督军团代表面见黎，要求对德宣战，黎当面加以训斥，责其擅离职守，干涉外交。

5月8日，众议院开始讨论对德宣战案。10日，段祺瑞的亲信率领自称"公民请愿团"的打手数千人到国会前示威，强迫议员通过参战案，并打伤议员十多人。暴行发生后，引起公愤，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内阁阁员相率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亦出京，以示抗议。19日，众议院以现内阁仅剩总理一人，不足信任，拒绝讨论宣战案。段祺瑞因而大怒，他唆使吉林督军孟恩远领

衔，联合各省督军呈文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黎不允，召见孟恩远、王占元，告以约法上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解决时局最好办法，唯有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

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的职务，任命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29日起，在段的授意下，安徽省长倪嗣冲、直隶督军曹锟等纷纷宣告脱离中央，造成“九省督军皆反，连名请解散国会”的混乱局面[11]。黎元洪束手无策，于6月初同意调长江巡阅使张勋来京调解。不料张率兵到天津后，突然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要挟他。此时黎已引狼入室，欲罢不能，遂于13日同意下令解散国会，并通电全国承认违法。张勋于国会解散后入京，7月1日导演了一幕“大清帝国”复辟的丑剧。3日，黎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并电请身居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

段祺瑞利用张勋解散了国会，又利用全国人民维护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在马厂起兵，迅速击败了张勋，重任国务总理。段于14日回到北京正式办公，并把黎元洪从日本使馆迎回，黎元洪表示不再回任。于是冯国璋担任了大总统。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寓所，开始段祺瑞不许他离开北京，怕被人利用。一天，黎宅突然发生了行刺案，在汤化龙等人的说合与保证下，8月27日，黎元洪始获准回天津英租界寓所。

1920年7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战胜了皖系军阀段祺瑞，1922年四五月间又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曹、吴控制了北京政府，他们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就在打败奉系不久，于6月间，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又把黎元洪拉出来复任大总统，并召集民国六年（1917年）旧国会，搞所谓“法统重光”的政治骗局。黎于11日到北京就职。

曹、吴拥黎元洪再次上台，目的是想借此恢复国会，通过国会正

式选曹锟当总统，又可用“法统”名义抵制南方的护法政府，统一全国；而黎及其周围的人物则是想分享政权。所以，黎复位不久，为了任期问题便和曹家党徒发生争论。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直接唆使他的弟弟曹锐出面收买议员，为“驱黎拥曹”做准备。1923年6月6日，他们迫使国务总理张绍曾辞职，陷政府于瘫痪；7日，又指使北京军警官佐数百人，向黎索饷请愿；10日以后，连日雇用流氓和便衣军警出动，游行示威，围困黎的寓所，割断电话，破坏水源并让警察罢岗罢哨。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又联名以辞职相威胁。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逼黎让位。

黎元洪这个总统实在混不下去了，13日下午，才偕陆军总长金永炎、美国顾问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等十余人，乘车赴津。他的专车抵达天津车站后，又出现一场夺印闹剧。直隶省长王承斌带着军队把他围困了十多个小时，向他索取总统印章。直到他用长途电话通知北京，把藏在法国医院的印章交出，才被允许下车回家。

黎回天津后，各派政治势力都想利用他当反直系的招牌。张作霖邀他去奉天，一部分聚集上海的议员邀他南下，皖系政客力促其行。9月11日，他偕陈宦、李根源、金永炎等人从天津秘密抵沪，但各反直派势力意见难以统一，使他组织政府的计划流产[(12)]。10月，曹锟在北京贿选为总统，粉墨登场。黎元洪感到已无再留上海的必要，便于11月买棹东渡，到日本别府养病。1924年5月，再返津门。

黎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黎家早在该矿有巨额投资，据1921年《山东矿业报告》公布的数字为60万元，占第一位。他在武昌油坊岭等地还购有大量田产出租。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患脑溢血在天津病故。

---

(1) 袁世凯撰，沈祖宪辑：《养寿园奏议辑要》卷41，1937年刻本。

(2) 《饬派陆军弹压灾区》，《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3)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44页。

(4) 天竺生：《武昌军队内哄详报》，《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有正书局1921年版，第31—36页；《时报》1912年3月3日、5日。

(5) 《民国新闻》1912年8月15日。

(6) 易国幹辑：《黎副总统政书》第13卷，武昌官印书局1914年版，第11页。

(7) 《民立报》1912年8月19日。

(8) 易国幹辑：《黎副总统政书》第20卷，第15页。

(9) 易国幹辑：《黎副总统政书》第34卷，第8页。

(10) 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1) 章炳麟：《黎公碑》，见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94页。

(12)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泰东图书局1924年版，第170页。

李纯

张振鹤

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人，1867年9月12日（清同治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生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里。幼读私塾，二十二岁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二期。1895年卒业后投袁世凯主持的新建陆军，任督队稽查先锋官。1902年5月，袁奏设军政司于保定以编练常备军，自兼督办，委令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派李纯在冯手下任提调。1903年，以铁良为翼长的京旗常备军（后改为陆军第一镇）也在保定编练，李纯由军政司调该军任管带，后升统带。1907年，李纯经铁良保举，由参将升副将，调任陆军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1)]，驻保定。1911年4月，清廷赏给他协都统衔。同年10月，武昌革命爆发，第十一协组成第二十一混成协，编入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李奉命率部南下，参与对革命军的战争。10月27日，冯国璋指挥清军猛攻汉口，李纯自孝感绕道蔡甸，偷袭革命军侧翼。11月6日，他继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并被授以陆军副都统衔[(2)]。李纯于提升之后，参加了27日冯军攻陷汉阳之战，加倍为清廷卖力。

民国成立后，镇改为师，李任第六师师长，驻河南信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袁命李部进驻湖北境内，伙同黎元洪严密监视南方革命党人，并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3)]。6月上旬，袁首先下令免国民党人李烈钧的江西都督，随后又接连免了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两省的都督，令李纯特别重视江西方面国民党人的动向。7月12日，李烈钧于湖口起义，宣布讨袁。袁立即任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催他火速向九江推进。沙河镇战役李纯击败了赣军林虎，25日占领了湖口。8月4日，李升任护军使。8月18日，他又攻陷南昌，27日，暂兼江西民政长[(4)]。9月29日，署江西都督。

李纯督江西后，采取极其严厉的高压政策：取缔国民党的各级组织，解散省议会，逮捕议员，严禁群众集会，查封报馆，钳制舆论，不准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任何批评[(5)]。他更以各种政治嫌疑为借口，拘捕无辜群众，严加拷打，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气氛[(6)]。袁对他信任日笃，恩宠有加，1914年6月，授为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全省军务。

李纯也是一个唯利是图、见风转舵的军阀。1915年，袁党酝酿帝制，他先是积极附和，9月由江西赴京，追随段芝贵等人，向袁密呈劝进电[(7)]；但是，到12月底，护国军崛起后，全国出现一片反帝制声浪，连袁的心腹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也露出了反对帝制的倾向，在此形势下，李纯又一变而附和冯国璋。1916年3月，他列名于冯国璋策动的五省将军联名密电（就取消帝制，征求各省意见）。4月16日，冯发出劝袁退位电前后，李纯暗中和段祺瑞、靳云鹏、陈宦等密电往返，与冯的活动相策应[(8)]。6月6日，袁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7月6日，改各省将军为督军，李纯被任为江西督军。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随着英、美、日在中国的角逐，日益明显地分化为以冯国璋和段祺瑞各自为首的直、皖两系。李纯原为冯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便成为直系的主要骨干。1917年8月，冯入京代理大总统，为防止皖系夺取江苏地盘，任李纯为江苏督军。同年秋，“护法”开始，孙中山联合桂、滇、湘、粤各省实力派在广州建立的军政府，同北京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时，以冯、段为首的直、皖两系，仍以帝国主义对华的利害矛盾为背景，在对护法各省和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李纯站在冯国璋一边，用“和平统一”的口号来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九十月间，他对段祺瑞借日款、购军械、准备发动内战的行为，多次表示反对。10月下旬，当段祺瑞决定派兵入湘时，他联络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形成所谓“长江三督”，提出停止征湘、改组内阁等主张，向段施加强大的压力。11月14日，进入湖南前线的北军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的示意下，通电撤兵。

李又联合王占元、陈光远并拉上曹锟于11月18日联衔通电主和。他们的这些活动使段祺瑞对南用兵的计划迭受挫折，乃不得不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由王士珍代理），退居幕后。李纯控制长江下游，一时成为被重视的风云人物。

当时，南方湘、桂军阀把李当做同盟者，极力拉拢他；北方主战的段派军阀、政客，则把他作为北洋派的“内奸”，纷纷责骂他。因为他的活动受到冯国璋的支持，所以他仍声称自己是北洋派的一员。于是，南北的许多军阀代表都相继到南京来，和他商讨时局[(9)]；他派亲信南下，访问陆荣廷等[(10)]，企图实现冯国璋与南方军阀妥协的“和平混一”。12月间，他利用驻浦口的冯玉祥旅，并策动地方团体出面，阻止北京派出征湘的第二路军过境，又一次引起了主战派的叫骂。他虽然扯住了主战派的后腿，但“和平混一”的企望，终由于南北军阀的利害不一致，短期内无法达成协议。

1918年1月下旬，南方的湘桂联军，乘北洋军阀内部的纷争，突然攻占了岳州。岳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军事要冲的易手，刺激了北洋派军人，主战派嚣张起来，形势顿时发生了变化。段的谋士徐树铮趁机分化直系，拉拢曹锟为皖系效力。同时又策动亲段派的各省督军，通电斥责主和政策，矛头更多地对准李纯。另外，徐又跑到关外去勾引张作霖。2月下旬，张作霖派大批奉军入关，一部分进驻北京近郊，向冯国璋施加压力，另一部分沿津浦铁路南伸，向李纯示威。随后，徐树铮与张作霖组织关内奉军司令部，由徐兼副司令。徐策动亲段军阀通电叫嚣：“欲求国事进步，非先更易阁王、苏李，万无着手之地。”[(11)] 要求罢免李纯并再起用段祺瑞组阁。3月中旬，曹锟部下吴佩孚部趁湘桂军主动撤军之际，进占岳州、长沙，“捷报”传来，主战派越发嚣张。到此，冯国璋不得不低下头来，请段再任阁揆。在几经邀约之后，3月23日，段祺瑞再次组阁。这时，以李纯为首的长江三督也不得不随着冯的软化而消沉下来。段祺瑞一时踌躇满志，悍然派亲信去湖南夺取曹、吴抢来的地盘，引起曹、吴的不满。

7月以后，吴佩孚忽从前线发动主和；有电致李纯痛诋段内阁的种种罪行。于是，李纯想利用时机，再度对时局有所主张。10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下台，李失去凭借，他高唱“和平”的调子才日趋于消沉。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李纯和曹锟代表了直系两大势力；然而李的实力远弱于曹。一时李虽被视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但鄂督王占元和赣督陈光远各有打算，并不完全信赖他，他的实力也局促江苏一省。上年吴佩孚从湖南前线发动向皖系的攻击后，李暗中和吴信使往还，引为同调。其后，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暗中酝酿反皖，他也参与其中。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奉两系八省反段的联盟会议时，李派代表参加。7月，直皖战争爆发，李纯因须防备浙江卢永祥，无力北上助战，仅能虚张声势，遥为呼应。到皖系战败后，曹、吴和奉张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在政治分赃中，李纯无力染指。然而，当时的北京政府表面上仍然不得不把他摆在各省督军的地位之上，以示对他的尊重，特别是战后继续留任的大总统徐世昌，还想借重李纯作为与南方谈判的“和平”掮客。8月4日，徐任命他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时北方曹、吴和奉张正欲借武力扩张势力，南北议和一时无从谈起，他力辞不受。9月16日，又任命他为长江巡阅使，但他知道这只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又坚辞。10月2日，北京政府改任他为苏皖赣巡阅使，10月10日又授以英威上将军的称号，他也不肯拜命。当时，江西督军陈光远早有不愿接受他节制的表示，对他是个极大的刺激。李纯本来患有精神失常症，时局的变化，又多次使他不如意，日益表现消极。这期间，江苏省各界又发动了反对财政厅长文和（他的干儿子）贪污的风潮，报纸连篇累牍地影射他任用非人，遗祸全省。在“内忧外患”中，他不时放声大哭，表示悲观绝望。10月12日晨，他写好遗书五封，于督署中自杀身死。

---

(1) 宣统三年清陆军部档案。

(2) 《镇协赏衔上谕》，《正宗爱国报》（北京）宣统三年三月十日。

(3) 易国幹等辑：《黎大总统政书》卷19，上海晋益书局1916年版，第1页；《民立报》1913年5月11日。

(4) 《民立报》1913年5月23日，6月5日，6月21日，6月25日，8月24日；《时报》1913年9月16日。

(5) 《时报》1914年4月18日。

(6) 《时报》1913年9月10日，10月16日；1914年1月1日。

(7) 《时报》1915年9月6日。

(8) 《民国日报》1916年5月2日、3日。

(9) 《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6日、27日。

(10) 白坚武著，杜春和、耿来金等整理：《白坚武日记》，1917年12月4日、8日、1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1) “阎王”指王士珍，“苏李”指李纯。《徐树铮致各省督军阳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页。

李德全

郭烙

李德全，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人，1896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出生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农民家庭。父亲当过运河码头工人。她出生三个月，即受洗礼入教。1904年由教会资助进通州私立富育小学，1911年升入北京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15年入北京私立协和女子大学（即燕京大学前身的一部分）。

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李德全都是学生领袖，曾被选为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会长，是校内外宗教团体的学生代表。她具有讲演的口才，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巴黎传来一句污辱中国人的话，说“中国不值二毛五”，她十分气愤，就和其他同学一起写了大幅抗议书：“中国不值二毛五，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值0.0000000005！”摊在美国校长的桌面上。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是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母校贝满女中，担任代数、西洋史等课程的教师。1922年1月，她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

1924年初，李德全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冯玉祥。当时，冯在京担任陆军检阅使职务，夫人刘氏于1923年12月病逝。一时军政界人物争欲为他做媒，大总统曹锟亦欲将女儿许配于冯，但他选择了李德全，两人于1924年2月24日按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婚后，李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兼顾冯玉祥所属西北军官佐眷属的教育及伤兵的慰劳等事宜。冯对部下要求极为严格，犯了错误的人必加严惩，李往往为之缓颊，所以冯部官兵很敬重她。李生活俭朴，平易近人。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

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并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当孙中山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时，冯玉祥因北京政局为奉皖军阀所把持，已辞去陆军检阅使职务，在京西天台山休养，由李德全代表冯到北京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时，李又带着冯玉祥的亲笔信前往看望。孙送冯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由李带回，发给国民军官兵当做教材。李曾亲自为国民军教导团讲解三民主义。

1926年初，奉、直、鲁、晋诸系军阀联合围攻国民军，冯玉祥下野出国赴苏联访问，李德全随往，于1926年5月9日抵莫斯科。这次访问，对李德全的思想影响很大，她对苏联男女平等、人人自食其力，很为赞佩。她随冯玉祥受到苏联领导人和第三国际负责人的接见，并看望了列宁的夫人和妹妹。她在苏联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冯玉祥于8月17日从莫斯科动身回国，李德全继续留在苏联参观访问，直到1927年7月才回国。有人说她“游俄归来，信仰忽移”[(1)]，“赤化”了冯玉祥。1929年冯反蒋失败后，带着李德全和女儿入晋，被阎锡山囚禁于五台县建安村。1930年阎联冯倒蒋，李德全被留在太原作为人质。

冯玉祥在1930年中原大战和1933年察哈尔抗日失败后，两度退隐泰山读书，邀请许多学者为他讲课，李德全经常随同听课，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并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

李德全早年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之一，是人民缺乏文化，竭力从事普及教育工作。1925年曾在北京创办求知中学，附设小学和幼儿园，自任董事长。在泰山期间，李德全变卖了结婚时的首饰，创办了十五所小学，使附近的农民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1936年1月，冯玉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德全随冯离泰山到南京，投身于妇女运动。5月2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中，没有规定妇女代表名额。李德全带头向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要求在按区域、职业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规定男女代表的比例，妇女至少应占三分之一。先曾持拒绝态度的张继等被迫答应代为转达[(2)]。李德全在一次会上演讲说："女子结婚以后，即从事家庭琐事；而男子仍在社会工作，时时有进步。这样女子如何能和男子竞争呢？"[(3)] 为了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她联络南京知识界妇女组织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并担任该会的常务委员。她们开展学习和研究活动，开办俄文补习班，举行演讲会，组织参观工厂、天文台，学习驾驶汽车和实弹射击等，促进了上层妇女的联系和团结。李德全还曾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救国会领袖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德全团结各界妇女，投入支援抗战前线的慰劳、救护和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后，李德全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副理事长。到重庆后，她与邓颖超、曹孟君、刘清扬等人时相往还，继续从事妇女和儿童工作。至1939年秋，战时儿童保育会已设有保育院四十六所，收容儿童两万余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李德全联络进步妇女，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被推选为主席。该会广泛团结各阶层妇女，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是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李德全代表冯玉祥到机场欢迎。她与刘王立明联名致电美国教会联合会主席波尔夫人，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李被选为军事考察团成员。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重庆各界人士和有关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李被选为理事。政协会议进行期间，协进会在沧白堂连续召集各界民众大会，经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但她不畏强暴，出席主持第五次民众大会，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怒揭露连日来特务逞凶破坏的罪行。2月10日，协进会与中国妇女联谊会等二十余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李德全为大会总主席。国民党特务又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李与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马寅

初等六十多人被打伤。李于当天下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在此期间，她与冯玉祥的行动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为此，她见到蒋介石时，当面提出了抗议。

1946年9月，冯玉祥以“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率考察小组赴美，李德全随行。在沪候船出国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登门看望他们，邓颖超并委托李代表她出席于10月中旬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李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愤怒控诉了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提出“联合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及“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提案。

李德全和冯玉祥在美国的两年中，到处公开演讲，谴责蒋介石集团屠杀人民的罪行，反对美国政府援蒋，要求撤退在华美军。蒋介石为此十分恼怒，下令冯玉祥回国。当时李德全在柏克莱写信给在纽约的冯玉祥说：“老蒋召你回国”，“证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高得使他怕极了，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4)] 蒋介石召冯回国不成，便以“冯玉祥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于1947年12月撤销冯的“考察水利专使”职务，断绝其经济来源，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境。李担任旅美华侨开办的国语班教员，以薪给补贴家用。在美国期间，由冯口述、李记录，写成《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寄给在香港的翦伯赞出版。

1948年7月31日，李德全随冯玉祥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美，绕道苏联回国。9月1日，当“胜利号”航行至黑海北岸敖德萨附近时，突然发生火灾，冯玉祥及其十九岁的女儿冯晓达遇难身亡。李受伤脱险后，强忍丧失丈夫和爱女的悲痛，抱着冯玉祥的骨灰盒，于11月回到祖国东北解放区。她在哈尔滨发表广播演说，敦促原西北军官兵弃暗投明，起义反蒋。

1949年2月，李德全到达北平，把冯玉祥遗留的房产无偿地交给国家。她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同年3月，她出席

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德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4年以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各项工作。1958年1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4月23日，李德全因病在北京逝世。

---

(1) 《张之江先生致冯玉祥夫人函》，《女铎》第18卷第5册（1929年10月）。

(2) 《世界日报》1936年7月17日。

(3) 《从群众中成长的——李德全女士》，《现代妇女》第7卷第1期（1946年1月）。

(4) 冯洪达、余华心：《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李鼎铭

李敬谦　熊宇良

李鼎铭，原名丰功，陕西米脂县桃镇人。1881年9月28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六）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是陕北著名的开明绅士。

李鼎铭幼年家贫，无力延师。1895年寄住舅父家中读书，学习勤奋，还兼习医学。1903年，赴绥德州应考，取为廪生。

1904年，李鼎铭在本地教私塾，1910年在绥德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曾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等。1913年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期间，他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1918年返乡，在家乡一带行医，并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他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颇有成绩，在教学中主张给学生讲些科学知识，受到群众的欢迎。

自1923年起，李鼎铭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返里，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例如当群众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下一个专门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所谓剧团发生冲突，并打死了一名坏头目时，李鼎铭挺身而出，站在群众一边，奔赴榆林找井岳秀交涉，终于使事态平息。他还经常为维护本乡群众某些利益，与官府及城内豪绅据理相争。1930年后，李鼎铭一直住米脂县城内，继续行医。尽管在这期间他经济拮据，但多次拒绝了杨家沟大地主马醒民等要他做总管家的邀请。李鼎铭为人公正，主持正义，因而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围剿。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米脂县长及反动军官孙绍山趁机镇压、破坏米脂县米东区共产党的组织，李鼎铭担任了米东区所谓“肃反”委员会主任。1936年他继续行医，还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由于中共政策的影响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李鼎铭的思想开始转变。同时，由于他的学生共产党员郭洪涛、艾楚南、张汉武、曹力如等对他多次争取，以及他早年参加革命二儿子李力果[(1)]的影响，他的思想有较大的转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鼎铭就逐步接受中共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是年冬在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2)]一文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诚恳的自我解剖。1944年12月边区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及1946年4月边区第三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均再次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自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以后，勇于负责，敢于大胆提出建设性的政见。1941年正当陕甘宁边区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封锁，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非常重视，说这个办法很好，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中共中央还把它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因而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

1942年至1943年，李鼎铭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陕北的特

点，提倡精耕细作、多种洋芋、推广养蚕、移民开荒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李鼎铭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2年7月，他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已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不疑。"[3] 1943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4]，同年7月在《七七专刊》上发表文章[5]，热情帮助和盛赞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同年11月，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赞扬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拥护军队。"[6] 1944年1月，他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成绩，兴奋地对记者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7] 同年12月，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他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8]的专题发言，对边区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习惯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李鼎铭对全国政局的变化也十分关心，每当重要时刻，他都发表文章或谈话。1943年，当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他义愤填膺地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9] 同年他还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一文[10]，有力地揭穿了敌人挑拨离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发动全面内战，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中国面临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李鼎铭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一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1946年3月在接见记者谈到关于中苏友谊问题时[11]，以及同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作的《关于选举工作报告》[12]中，他斥责蒋介石指友为敌，发动内战，欺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

参加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卑劣行径，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当蒋介石、胡宗南的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他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转战陕北。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极表赞同，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成功"[13]。

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突患脑溢血症病故。边区政府举行追悼会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都送了挽词。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的要求，决定将米脂县桃镇小学命名为"桃镇鼎铭学校"，以资纪念。

---

(1) 李力果是李鼎铭的二儿子，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于北京病故。

(2)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3)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2日。

(4) 《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5) 《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

(6) 《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9日。

(7) 《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

(8) 《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0日。

(9) 《解放日报》1943年7月10日。

(10) 《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11)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4日。

(12) 《解放日报》1946年4月12日。

(13)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生平事略》，《人民日报》1948年2月11日。

李鼎新

陈孝华

李鼎新，字承梅，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生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1881年（清光绪七年），李毕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局后学堂第四届驾驶班。同年，他作为船政第二批出洋学生，被派往英国留学，在格林威治海军学校专习驾驶，曾随英舰游历北海及西印度群岛。五年后学成归国，任北洋海军右翼中营游击，1889年升署“定远”舰副管驾。三年期满后，经李鸿章奏请，照章补授实缺[(1)]。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在9月间的黄海海战中，李鼎新所在的“定远”舰重创日本舰艇多艘。当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该舰指挥北洋舰队作战，不幸中弹受伤后，李鼎新和管驾刘步蟾曾代司督战。次年2月，在威海海战中，“定远”舰被日舰鱼雷击中，驶至刘公岛搁浅，只得做水上炮台使用。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全国震惊，李鼎新于翌年3月呈文清廷，陈述了北洋海军八个方面的弊端，诸如：“船不快”，“炮不快”；“军械多系旧式，军火储备不全，且多有不能自制者，以致临敌无以接济”；“南北洋各守一方，水陆各具一见，致军心不能划一”；“海军提督无统辖之权，船坞局厂皆调动不灵，且多方牵制，号令所以难行”等等，致使北洋海军惨败。在呈文中李还对整顿海军提出了二十多条建议，其中包括：“必须仿照西法，方为妥善”；“英国水师，欧西为最，中国要立海军，必用西人。须雇英国资深能干之大员”等[(2)]。但清廷在4月处分一批海军将官时，李鼎新亦被“暂行革职”“听候查办”[(3)]。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

在大力扩充北洋陆军的同时，也着力整顿恢复甲午战争后一蹶不振的北洋海军。他以“水师人才最为难”为由，奏请重新起用部分被革职的海军将领，李鼎新因此“开复原官”[(4)]，历任海圻舰管带、山海关舰队副司令。1911年春，清政府成立海军部，李鼎新被简授海军正参领，署理军法司司长，掌管军事司法惩罚等事宜。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于1912年4月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把中央政府设置在北京，李鼎新在北京政府海军部任职，先任部参事，旋升海军参谋长。8月被派往沿海各省检阅军舰，10月授海军少将。同年12月，海军总司令黄钟英病逝，经由海军总长刘冠雄荐举，李鼎新接任海军总司令，授海军中将，驻节上海高昌庙。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加紧摧残革命势力，于1913年3月暗杀了年轻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袁还先发制人，派兵南下进攻国民党人控制的江西等省。与此同时，袁世凯令李鼎新协同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共谋在上海镇压革命党人。李鼎新秉承袁的旨意，增调“楚泰”号炮舰、“海筹”号巡洋舰等到上海，加强驻沪海军力量。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兴兵讨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李鼎新闻讯后，立即传令驻泊在高昌庙的“肇和”、“应瑞”、“镜清”等舰及鱼雷艇加强警戒。7月18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并于23日率领讨袁军向江南制造局发动进攻。李鼎新将海军总司令部移到“海筹”舰上，指挥舰队开炮还击，致使讨袁军遭到惨重损失被迫撤退。李鼎新为袁世凯镇压上海地区革命势力，效力甚著，8月获海军上将衔。

正当袁世凯加紧称帝活动时，1915年12月5日，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策动驻泊在上海高昌庙的“肇和”舰海军官兵起义。是日为星期天例假，李鼎新及驻沪海军将领当晚正在宴请到沪视察的萨镇冰。李得悉“肇和”起义的消息后，午夜即与萨镇冰等赶到江南制造局商议对策。他奉袁世凯“将该舰击毁”的命令，以十万元贿款促使邻近的“应瑞”、“通济”两舰攻击“肇和”舰。翌日，“肇和”舰官兵反袁起义迅即失

败。事后，驻沪海军司令部裁撤，李鼎新则因“疏忽失职”受革职留用处分。在袁世凯称帝时，海军各舰队司令均受封晋爵，惟李鼎新向隅。

李鼎新受处分被冷落之后，深受刺激。这时，在上海护国讨袁人士张继等人的积极联络下，驻沪海军决定加入反袁行列，而且公举李鼎新为总司令。李既有怨于袁世凯，又见海军将士大多倾向反袁，便接受拥戴，并策划海军独立。他下令驻福州等地海军舰艇开赴上海吴淞口待命。不久北京传来袁世凯病死的消息，李鼎新当即取消前令，以静待大局和平解决。可是，继袁之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不肯重开国会，从而引起一场新旧约法和国会的争论。在此形势下，海军重新酝酿独立。李鼎新商承唐绍仪等人后，再次向各舰发出了集中吴淞口的命令。1916年6月24日，第一舰队的四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冲破福建督军李厚基的重重阻拦，由福州驶抵上海吴淞口外。25日，李鼎新亲率“海圻”、“通济”两巡洋舰和“飞鹰”、“永丰”两水雷舰自黄浦江开到吴淞口，与第一舰队会合。当天下午，李鼎新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并表示：“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接受。”[(5)] 随后立即成立了海军驻沪临时总司令部，李鼎新为总司令。李声称：“暂以临时总司令名义驻沪，维持海军现状。”[(6)] 26日，李鼎新电告西南各省联合设在广东肇庆的军务院，表示海军“此后一本军务院宗旨进行，相与终始”[(7)]。军务院立即回电表示支持海军的行动，并宣布任命李鼎新为军务院抚军。而与此同时，李鼎新又致函松沪护军使署，表示海军“对于陆军，则各不侵犯”，“决不为军务院之傀儡，使大局糜烂”[(8)]。

海军的独立，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在东南沿海各省的势力，直接给北京政府造成压力。6月29日，段祺瑞被迫接受南方要求，声明遵行《临时约法》，召开国会。于是，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布撤销。李

鼎新经与萨镇冰接洽达成协议，于15日宣布取消海军独立，驻沪海军临时总司令部也即日撤销，所有舰队仍交各司令管理，直接听候中央调遣。

此后李鼎新常作为北京政府大总统的代表，被派往各地处理有关海军的事务。1918年秋，他前往武汉、岳州、上海、厦门等地慰劳各舰队。1919年10月，李赴日本参观阅兵典礼。这期间，林葆怿率第一舰队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海军发生分化。李鼎新曾奉命两次赴厦门、汕头等地，为促成第一舰队北归、南北海军统一而奔走。

1921年5月，李鼎新出任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海军总长。在这以后，北京政府虽历经颜惠庆、梁士诒、张绍曾、孙宝琦等十五届内阁的交替，但李鼎新的海军总长职位一直未动。这固然是由于李在海军中的名望及能适应各方面的关系，更主要是他完全依附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因此在当时的各派军阀混争中，海军也成了直系军阀能够利用的力量。

1922年秋福建政局剧变，闽北镇守使王永泉在段祺瑞亲信徐树铮策动下，联合粤军许崇智部进兵福州，驱逐叛皖投直的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驻福州马尾的海军亦起而配合，将李厚基残部缴械，并扣留了李厚基。此事震动了北京政府，深恐海军要塞马尾港落入粤军之手，威胁直系在福建的地盘。总统黎元洪于10月15日和18日两次传见李鼎新，商讨福建事态的处置，并要求李随时入府对福建军务条陈一切意见。李鼎新急忙采取对策，派出以海军部司长林葆纶为首的调查组，前往福州马尾调查处理李厚基被扣一事；同时命令其亲信杨敬修在马尾设立海军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驻在马江的舰队和陆战队。李还急调第一舰队“海容”等舰由上海驶往闽江口，增援马尾海军基地；派海军陆战队统带杨砥中率部南下，协同第一舰队和驻马尾的陆战队，守卫马江和长门地区。李惟直系政权马首是瞻，可见一斑。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遭到惨败，直系军阀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局面亦随之告终，李鼎新顿即失去海军总长职务。从此，他再没有在政军界担任职务，息影在家。

1930年，李鼎新在上海病逝。

---

(1)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下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2)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412页。

(3)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582页。

(4)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585页。

(5) 《中华民国海军举义记》，《中华新报》1916年6月26日。

(6) 《申报》1916年6月26日。

(7) 《申报》1916年6月26日。

(8) 《1916年驻沪海军宣布独立》，《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李杜

颜平

李杜，原名荫培，字植初，奉天（今辽宁）义县人，1880年8月4日（清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生。父亲李万钟，半农半商。李杜在四个兄弟中居长，六岁入塾，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童子试名列前茅。十九岁时家道中落，辍学至烧酒作坊当学徒。

其时清政府窳败，国势日衰，李杜决心从军救国，于1901年告别双亲和新婚的妻子，投入清军第二十镇，充任司书。1905年李杜得以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不久担任连长、奉军左路教练官。他仍好学习，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武昌起义爆发后，李杜所部驻锦州，一切尚听命于清廷，但他倡议所部剪发辫，并保护革命党人不受损害。1912年李杜任奉天后路巡防管带。1918年任陆军第二十九师步兵十四团第三营营长，不久转任奉军总司令部第四输送大队长。翌年李至北京，任步军统领衙门谘议、将校研究所所长、军事科科长。

1920年，李杜被任命为黑龙江山林警察局局长，负责清剿林区匪患。1921年8月，李署吉长镇守使署参谋长。越年，兼吉林陆军补充队队长，后改任东三省陆军步兵第五十六团团长。其时“蒙匪”骚扰祸害民众，虽屡加清剿，其首领巴布扎布被击毙，但余部仍扰民不止。李杜单骑直赴“匪巢”，劝其归顺，不避危险，谈判二十余日，终获成功，深获同僚称颂。1923年起，李杜出任吉林警备队统领，翌年兼长春戒严司令，多次率部征剿土匪。

1925年，李杜任东北陆军第十五师步兵第十旅少将旅长。是年11月，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与国民军首领冯玉祥签订密约联袂倒奉，将所部改编为东北国民军，要求张作霖下野。12月5日郭

部占领锦州，进兵巨流河。李杜奉命率部在山海关一带狙击。万家屯一役，李力主双方息战，减少无谓牺牲。接着郭军抄袭奉军左翼，兵撤锦西连山的李杜所部处境危急，但他不忍焚毁连山，下令所部严明军纪，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嗣后张作霖得日本出兵援助，郭松龄兵败被杀。

1926年初，李杜转任东北陆军第九旅旅长，兼吉林依兰镇守使。由于李治军严明，爱民有加，甚受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之器重，乃以自兼之东北边防军第十五师师长一职委之。其时奉军与直军联手，以“讨赤”为名攻击国民军，但李杜不愿入关与国民军作战，认为国人自战，祸国害民。

李杜所兼依兰镇守使一职，管辖松花江下游十三个县。李杜力主地方宽柔于民，惩治邪恶；各级官吏各要奉公守法，对贪赃枉法分子严惩不贷，受到当地人民称颂。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李杜任松花江沿岸防俄军总指挥，率部开赴三江口防地抗击敌军，但力不敌众，连连失利。李深感国力贫弱，部队素质亦差，乃于战后着力训练整顿，设军官轮训班亲自讲授兵法，分析战例。1931年5月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全国统一番号，李杜任陆军独立第二十四旅长，下辖第六六七、第六六八、第六六九共三个团。

“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李杜深受刺激。他向全旅军官说：“日本人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我们也必须以武力将他们赶出去。守土抗战，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并表示：我李杜决不当汉奸叫国人唾骂，更不做亡国奴任人宰割。部属亦纷纷表示，要在李将军率领下抗击日军。

其时，东北三省即将沦于日军铁蹄之下，一些汉奸粉墨登场，原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李杜下令所属十三县：拒不附遵，坚决抗日。并立即封存永衡官银号、农业银行及财政、税收部门的款项，不再向省缴纳。召集各县官员、绅商和民众团

体代表，商议保境安民对策，请各界协助第二十四旅维持地方治安，并积蓄粮草和军用物资，以备抗日之需。熙洽等汉奸一再派员来游说，均为李杜竣拒，并及时处置投降分子。

为增强抗日力量，李杜在依兰成立自卫团督办处，派所部军官分赴各县，组织训练地方民团，并将地方武装团体编入战斗序列，以便与二十四旅协同作战。李杜还欢迎不愿附遵的富锦无线电台移来依兰，同时与抗日将领马占山、冯占海等取得联系，相约共同抗日。

1932年1月16日，附遵投敌的原吉军骑兵师师长于琛徵，督率五个旅人马向驻榆树的张作舟第二十五旅进犯；23日又在拉林击败邢占海部，前锋直逼宝县，兵临哈尔滨城下。李杜获悉后，于1月25日率主力部队出发，26日抵达哈尔滨市郊，与冯占海部协力对伪军实施突击奏捷。伪军在日机掩护下反扑，李部与冯部协同作战，将日伪军包围，并击落日机一架，击毙日军一大尉。日伪军迅即溃退。28日，李、冯两军进驻哈尔滨市区，在哈之外籍人士惊异抗日军队之用兵神速，称誉李、冯是飞将军。

哈尔滨为抗日军队克复，一时声威远播。日本侵略军派遣飞机到哈市上空来散发传单恐吓市民，还说要以武力保护侨民。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下令全市悬挂日本太阳旗，李杜则通令各部队和全市商民：为有撤换中国国旗者，以军法论处。1月31日，李杜在哈召集吉林省警务处长王之佑、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等军政要员，共商抗日卫土对策，会上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部队，公推李杜为总司令，王之佐为前敌总指挥。

日本侵略军必欲占哈尔滨而后快，乃派关东军多门第二师团长谷部第三步兵旅团协同五个旅的伪军以及满铁的四五百名武装人员向哈尔滨进犯；同时派混成第四旅团从齐齐哈尔东进，派第八旅团从长春北上，飞机、坦克、装甲部队亦齐上阵。面对敌人猖狂进攻之势，有

的将领主张让出哈城，但李杜认为哈尔滨为“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守住哈城是守住“北满”的重要屏障，发动军民齐心协力保卫哈尔滨。

1932年2月1日，哈尔滨西南的双城阻击战打响。李杜指挥守卫双城。自卫军赵毅第二十二旅于拂晓突击伪军刘宝林旅，迅速将其歼灭；当晚，赵指挥全旅展开阵势，阻击由长春北上的日军天野第十五旅团。夜晚，赵指挥所部用机枪、步枪突然发起猛烈射击，进驻双城车站的天野部队正架枪取暖用餐，猝不及防，在抗日官兵密集火力下死伤六七百人。翌日拂晓，敌第二师团主力田岛旅团由长春赶来增援，20架敌机在赵旅阵地轮番轰炸，困守车站的天野部队也伺机反扑，第二十二旅陷于苦战，团长、营长相继阵亡，余部不得不从双城退往哈市。日军在第二师团长多门指挥下，乘势进至哈市东郊，伪军五个旅也从哈市东南的阿城攻来。

2月3日，哈尔滨保卫战拉开帷幕，邢占海第二十六旅、赵毅第二十二旅、李杜第二十四旅、丁超第二十八旅共四个旅布防于哈市外围各据点；督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本部五个营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余部担任敌后迂回。李杜亲赴前线布置防线，号召爱国官兵严阵以待，保城卫国。4日晨，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哈尔滨市区进犯。抗日自卫军不顾敌人的疯狂和炮火的猛烈，以鲜血和生命奋勇抵御，歼击日军第二十九联队第七中队，击毙敌中队长以下百余人，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但时值隆冬，地冻三尺，无法构筑工事，只能利用民房和围墙作掩体与敌搏杀。自卫军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伤亡逾千，弹药几尽，又无增援，在5日日军总攻之下，各道防线均告危急。其时少数将领或临阵逃跑或阵前倒戈，使自卫军腹背受敌。李杜亲赴前线督战，激励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然而毕竟敌众我寡，几处防地相继失守，李率自卫军苦战至夜，不得不挥泪撤出哈尔滨退至宾县。嗣后，李、丁、邢三旅退往依兰，冯占海团退方正，赵旅退延寿。

李杜率第二十四旅经过一段休整后，与冯占海等部全力反攻哈尔滨。他在方正、珠河（今尚志）一线，指挥自卫军血战二十余役，全歼伪军一个旅，突破日伪军防线，进抵哈尔滨外围。日本侵略军施展缓兵之计，虚言“和议”；同时调遣大量兵力向延寿、方正、珠沙反扑，形势骤转。李杜乃率部撤回依兰。他苦心经营，整训队伍，并收编大刀会、红枪会等地方武装，在依兰及下江十三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2年4月，黑龙江将领马占山重举抗日大旗，倡议吉林、黑龙江两省抗日部队合力作战，反攻哈尔滨。4月3日在拜泉会商，李杜欣然赞成。他回到依兰，即主持召开自卫军总部会议，决定组织三路大军分别沿绥哈线、经方正、延寿和沿松花江向哈尔滨推进，相机夺取哈市。4月下旬，三路大军相继报捷，次第进抵哈尔滨郊外。日本侵略军急从日本本土调来重兵守城；同时由第十师团主力组成中村支队，在伪江防舰队协同下，沿松花江直下依兰。李杜指挥自卫军留守部队顽强抗御，终因寡不敌众，前方部队又回师不及，不得不于5月17日撤出依兰，经勃川退至梨树镇重整旧部。嗣后前方各部也难以抵御日军之凶猛攻势，先后失利。汉奸熙洽乘机四次派员劝降，均为李杜严正拒绝。李并电北平救国会表示：“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决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

7月1日，李杜被国民政府委为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学良正）。李备受鼓舞，即召集吉、黑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首领，筹建抗日联合军。吉林各地民间抗日武装经过一番整顿和扩充，迅速发展到四五万人，近十个旅。抗日联合军实际控制了勃利、林口、绥芬河、穆棱、密山、虎林、饶河、宁安、敦伦等广大地区。

日军在重兵击溃了马占山、苏炳文的“黑龙江救国军”后，于1932年11月下旬调集三个师团向吉东抗日联合军猛攻过来。李杜指挥联合军各部在穆棱下城子、磨刀石、勃利等地奋勇抵抗。时已入冬，天寒地冻，抗日勇士虽浴血奋战，但终不能扭转敌强我弱之阵势。穆棱河

东岸的李杜总司令部所在地梨树镇亦难以固守，李杜率总司令部北撤，在往密山途中遭到敌军截击，经过一场激战，部队溃散。李将余部留交团长陈东山，委其为代总司令，于1933年1月9日由虎林渡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域。4月抵莫斯科，5月由柏林赴罗马晤正在意大利治疗的张学良。

1933年7月初，李杜归国抵上海，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授予上将军衔。8月，李杜写出收复东北的意见书交国民政府，并登庐山谒见蒋介石。但蒋正倾力部署“剿共”内战，对于李杜请求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建言敷衍搪塞。李杜抗日之志不泯，通过多种渠道与在东北坚持抗日的爱国义士取得联系，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斗争。

此后，李杜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4月20日，他与宋庆龄、胡汉民等1779人签名于《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他参加宋庆龄、何香凝等倡议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武装部长。他办事认真负责，连日走访机关团体宣传抗日。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妥协退让，多方遏制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对武装自卫委员会也横加干涉和破坏。李杜深受刺激，破灭了期盼国民政府出兵收复东北的幻想，决心回到东北去重集旧部，训练民众，以抗击日寇，收复河山。张学良支持李杜之义举，派出亲信给予协助。1936年初，北平组建了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总会，并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李杜被举为总司令。李杜准备以出洋赴法考察的名义，借道苏联转回东北。中共地下党闻讯，即谋委托李把流亡在上海的毛泽东、杨开慧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带去苏联。李欣然允诺，即以亲属名义为他们领得了出国护照，4月登上法国邮轮离沪。但日本当局侦悉后即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李杜一行在巴黎羁留了两个多月，他对毛岸英兄弟细微照料，陪同下象棋、看电影、逛公园、参观展览、下中国餐馆，并让懂俄语的秘书教给俄语单词。后来苏联驻法使馆只签发了毛岸英兄弟的入苏护照，李杜等人被迫返回

上海。翌年，他北上隐居天津租界，秘密与东北抗日将领取得联系。日本军方买通汉奸派出凶手夜闯李宅企图行刺，结果错杀了他的侄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杜亟谋回到东北抗日。他去新疆准备假道苏联进入东北受阻后，又化装乘法轮抵巴黎再入苏境。但在莫斯科等了四十三天后又被国民政府召回。1938年春，李杜在重庆设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派员去香港、天津等地架设电台，沟通与东北抗日义士的联络。1939年3月，国民政府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李济深分任正副主任委员，李杜列名为十六位委员之一，但有职无权。1941年又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在重庆，他与中共人士频频交往，增加了对中国前途和未来的信心。1942年6月，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被诬为共党机关而遭查封，李杜的行踪亦受到特务监控。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沦丧十四年的东北亦告光复。阔别故乡十余年的李杜兴奋不已，准备回到东北重建家乡。但蒋介石筹谋内战正急，竟然下令军政要员欲返东北必须公开发表反苏反共声明。李杜愤怒至极，昂然表示："竹梅育精神，松柏知劲节；我怀全风心，岂为一官折。"甘愿留在重庆清贫度日。他不时撰文歌颂抗日将士在东北奋战的光辉业绩。

1946年4月，解放了的吉林省人民举行首届临时参政会，一致推举李杜为参议会议长。李杜不能去吉林解放区，只能在重庆投身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7月他被提举为三民主义促进会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合组的联席会议委员。他还参加红十字会从事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李杜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只因他曾任过的军政职务，于1951年3月被重庆市公安局拘留了三个月。后得到妥善安置，先后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

协委员等职。

1956年8月23日李杜因病逝世于重庆。

主要参考资料

刘化南：《吉林抗日自卫军的斗争与瓦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2卷第10章，中华书局1991年版。

谭译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李福林

萧栋梁

李福林，原名登同，因其手持灯筒故名，广东番禺大塘乡人。1874年（又说1876年）出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自幼轻财仗义，好打抱不平，常与江湖义侠之士游。清末番禺一带多盗，常事剽掠械斗，登同得物不归私有，而公平分给大家，故大塘乡草野之士，推其为头领。大塘附近各乡有失物者，登同能解囊相助。1899年曾率乡民六人持手枪进入广州协领衙门，将被旗人劫财后扣押在衙门内的商人李胜救出，并顺手掠走库银八万元。劫狱成功，震动全省，遭到当局悬赏万金通缉。1905年—1906年岑春煊督粤，惩办盗贼甚严，登同与各县头领避往南洋。旋组织民国忠义军，自任统领。孙中山倡导反清革命，于1907年发动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李福林与谭义等赴越南河内，由侨胞刘岐山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会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在广州发难时，号召数千绿林借械斗为名在城郊响应。孙中山即写信介绍他回广东与冯自由、朱执信等人商议进行办法。1907年12月2日与黄明堂等率绿林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一度攻占此关，后被清防军统领陆荣廷率众打败。李回广东在顺德龙冈设戏台演出“扬州七日”、“嘉定三屠”等排满故事，动员乡民数千人加入同盟会。1910年李福林与陆领、谭义等参与孙中山、黄兴等在新加坡召集的会议，决定募款在广州起义。1911年3月与朱执信、黄兴等焚烧广东都督署失败后，于10月25日与族人李沛基、李华暖等在广州城外厂前街用炸弹将清廷派来的广东将军凤山炸毙。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而粤督张鸣岐等顽抗，李福林联合谭义、陆领等各路统领，组织三万余人，攻打西江、三水等地，与清军连战十二日，陈炯明、邓铿等占领惠州，莫纪彭占领香山，迫使张鸣岐离粤。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李福林率所部福军进城维持

秩序，推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其后，李福林奉命率部围剿自称“广东大都督”的张承德部，迅即予以制服。嗣后“福军”奉命改编为二十个营分驻广州郊外各要地维持省河治安，李福林并任琼崖绥靖处副处长、广阳绥靖处副处长等职。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率部驻番禺、南海一带。1917年参与护法运动，负责拱卫孙中山大元帅府，10月任广惠镇守使。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因不堪桂系压迫，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莫荣新的督军署，李部曾捉获莫荣新派往电报局发报求援的副官，从而迫使莫荣新到大元帅府请罪。1920年陈炯明率粤军回粤，李福林与魏邦平宣布独立，阻止桂军援兵东下，驱逐莫荣新入桂。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

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平定广西后决定北伐，李福林亦奉命出师韶关北伐，后推进至赣州。同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25日孙中山密令粤军第二军、滇军、福军及粤军第一师返粤平乱。27日胡汉民自韶关抵赣州与北伐军各将领开会，决定班师回粤救难。经一个月的作战，北伐军在韶关失利，全线退却。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三部绕道江西退往闽边。9月7日自瑞金出发与王永泉部合作图闽。29日到达闽边。10月6日北伐军攻占古田。11日夜，李福林部猛攻福州，次日占福州，经一周激战，始将敌军肃清。10月18日孙中山将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任命李福林为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为暂解讨贼军冻馁之危，孙中山将上海环龙路私宅典质数万元，用备士兵冬衣。随后李福林奉命回粤重整旧部，不久便组成三个团，驻扎广州、河南。

1923年1月，讨贼联军驱逐陈炯明出广州，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李部仍负拱卫之职。后协同友军击退沈鸿英叛军后，粤军改编为“建国粤军”，李任建国粤军第三军军长，不久任广东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督办及广州市政厅厅长。1924年指挥所部参与削平广州商团与陈炯明勾结发动的叛乱。次年参与镇压杨希闵、

刘震寰叛乱。

1926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北伐战争开始后，李部第五军第十六师与程潜、许崇智一路，攻入南京，其余部队留在广东，拱卫后方。1927年12月，张发奎、黄琪翔受汪精卫指使，率部占据广州，李福林率部驻守河南。12月11日中共发动广州起义后，李率部进攻广州市，与李济深等将起义镇压下去。1928年李因屡患头痛，辞军长职，赴香港自建的康乐园隐居。

1938年，日本特务铃木等企图利用李福林取得广州，派汉奸多次试探李的意向。李将情况报告国民党当局，得到军统头子戴笠同意，将计就计并派人与日本特务周旋，李表面接受日本天皇特使在香港授予的“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头衔和可以调动陆海空三军的象牙图章“平尚三”，约定于农历正月初四进攻广州，李将日军与汉奸攻粤日期与兵力告知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由余汉谋派出部队于这天围剿汉奸机关十余处，抓获汉奸千余人，缴获一批日军文件及军用品等。事后李被国民党当局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中央监察委员。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强大攻势下迁往广州，李福林被任为广东游击总指挥，妄图阻挡解放军南下。海南岛解放后，李因病移居香港。中国共产党曾派人劝其回到广东，未成。1952年初，李赴台湾参加“反攻大陆”的活动，旋因病回香港。同年2月11日病逝。李曾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二、三、四、五届中央候补监委，遗有《李福林从事革命经过》及《李福林革命史料》等。

主要参考资料

冯自由：《民国前之李登同（福林）》，《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李福林从事革命经过》、《李福林革命史料》，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2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黄干甫：《我所知道的李福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1963年版。

王绍通：《李福林其人其事》，《广东文献》1981年11号第3期。

李根源

马子华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号“高黎贡山人”，1879年6月6日（清光绪五年四月十七日）生于云南腾越（今腾冲）九保乡。李家祖籍山东益都，其先祖在明朝初年随沐英远征而留居云南。他的父亲李大茂，以军功获都司衔，后得“尽先补用守备腾越镇中营千总”[(1)]。

李根源幼年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其后又得塾师认真教读经史，在“甲午之役”那年，他还是一个十五岁的青年，通过阅读上海《新闻报》，已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他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对当时英帝国主义者侵占缅甸以及不断侵犯我国边疆的种种罪恶深为痛恨。

1898年李根源参加永昌府试，中秀才。1900年春，英军侵略滇边小江地区，总兵刘万胜应负失地丧权罪，清政府派提督冯子材巡边到达腾越，李根源以一个弱冠的青年向冯上书，请奏参刘万胜，并要求另派贤能重勘国界，为冯子材所嘉许。

1903年6月李根源到昆明参加乡试，未中；他即考入新创办的“高等学堂”为备取生。次年6月考取留日官费生，11月5日到达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李即参加。同年冬，在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留学生规则”的运动中，李根源被推选为振武学校留学生代表。1906年春，李根源被举为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并担任《云南杂志》社经理。《云南杂志》出版后深得云南民众的称赞，起到了民报尖兵的作用[(2)]。

1906年夏，李根源于振武学校毕业后，受云南留学生同乡会的推

派，与吴琨、由宗龙等为代表回北京参加控告云贵总督丁振铎祸国误滇的罪行，清廷被迫将丁振铎调走。但清政府以为李根源是反丁风潮的首要分子，将要派警逮捕，他听到风声，急由天津乘轮潜返日本。

1907年1月，李根源被分配到日本第八师团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充士官候补生，实习一年。次年1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同年4月底，云南河口反清起义爆发，他在日本东京倡议设“云南独立会”以为声援。黄兴倡议在士官生中成立“丈夫团”，又倡议成立“大森体育会”，李根源参加了这些组织，并担任大森体育会的教员。这一年的12月，他由士官学校毕业，编在日本陆军第八师团青森步兵第五联队担任见习士官。1909年春，清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调他回云南任职。当他回到北京时，被同乡杨集祥告密是革命党人，经清吏寿勋、良弼传讯，不准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他趁监视松懈，潜往天津，经海道于8月底返抵昆明。

李根源回云南后，被委任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后任总办。1910年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通车，李根源率领全体学员到昆明的火车站外，向学员们讲述法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情况，以及国家积弱不振的原因，讲得声泪俱下，学员们也感愤得一起痛哭起来。讲武堂的学员在李根源等同盟会员教官的爱国思想教育下，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大都成为云南武装起义的军事骨干。关于他在维护讲武堂中的革命力量所起的作用，朱德曾在《辛亥回忆》一文中说道：“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对于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厉的，李根源先生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3)

1911年1月，英军侵入云南边境片马地区，云贵总督李经羲命李根源筹办片马边防外交事务。他曾为此遍历边境地区，并乔装少数民族，深入英侵略军驻地，绘制了“滇西兵要界务图”一百二十六幅，并向李经羲提出交涉中的上、中、下三策(4)。当时清政府只采用了他所建议的下策。

同年夏，蔡锷经李经羲奏调入滇，被任命为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受到李根源等滇省士官同学的欢迎，加强了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但李根源却因此遭到以靳云鹏、钟麟同等北洋派官员的疑忌和排挤。李根源被调离了云南讲武堂，改任云南督练处副参议官。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云南，李根源便和蔡锷、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等人密谋响应。其时清军第七十三标统带不肯附和这次革命行动，李根源率同李鸿祥、刘祖武等夺取了他的兵权，于10月30日从昆明城西北进攻。次晨9时唐继尧、刘祖武等攻占云贵总督署。10时李根源、李鸿祥、谢汝翼等占领五华山、圆通山等制高点和皇城角的军械局。随即占领全城，取得了胜利。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嗣因滇西武装起义以后大理起义军和永昌起义军发生武装冲突，11月30日蔡锷任命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改称总司令），节制滇西文武官吏，处理滇西善后。1912年4月起，西藏地方当局受英帝国主义的唆使，派兵进攻江孜等地时，李根源曾请求率领滇军入藏平乱，为袁世凯所阻止。8月李根源卸去滇西善后事务，回到昆明。其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李被举为云南支部长。12月初，李离昆明作京沪之行。1913年1月底，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2月中旬李到达北京，袁世凯曾用“高等顾问”的名义及高薪进行拉拢，他予以拒绝。嗣后袁世凯窃国阴谋愈加暴露，李根源参加了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当时孙中山决定另组中华革命党[(5)]，黄兴等人因意见相左而反对，李则调和于孙、黄之间。1914年7月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宣布对德作战，李根源、熊克武、章士钊等百余人起而组织“欧事研究会”，共同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成为当时国民党人组织的一翼。

1915年10月，李根源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反袁斗争，随后到香港，策动广西陆荣廷独立讨袁。年底云南宣布护国讨袁时，唐继尧任命李根源为护国军驻粤港代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5月初两广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部，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不

久，军务院成立，李任滇粤桂联合军都参谋。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不久实现了所谓南北“统一”，7月14日，黎元洪任命李根源为陕西省长。10月李到北京，以众议员的身份参加国会复会后的活动。当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对副总统人选意见分歧，李以吴景濂等人不守党纪、不能理喻，把一部分政见相同的议员，以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为基础组成“政学会”，进行政争。

1917年2月，李赴陕西省长任。4月，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因对德宣战问题矛盾尖锐化，黎则下令免段职，段祺瑞唆使督军团起而反黎宣布“独立”。5月底，陕西督军陈树藩强迫李根源通电附和督军团，遭到他的拒绝，陈将李根源软禁了七个月后才释放。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组成军政府，领导护法运动。1918年1月李根源应岑春煊等电邀到广东参加护法斗争，2月下旬被任命为驻粤滇军总司令。恰在此时，盘踞在海南岛的军阀首领龙济光率军进犯广东雷州半岛，占领阳江、恩平四邑，广州震动。李就职后于次日出师，反击龙济光军。3月初，收复恩平、阳江以及高州、化州等地。此时段祺瑞命赣南镇守使吴鸿昌率北军三万余人越大庾岭袭取南雄，滇军第三师败退，李即被任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星夜旋师，反攻南雄，击败北军。至此广州的形势虽稍趋稳定。这时政学系在非常国会中成了重心。政学系的存在是凭借桂系的力量和依靠李根源有深厚关系的滇军为支柱。由于政学系的活动和西南各实力派的联合，于是有同年5月改组军政府、易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会议制以排斥孙中山的事件发生。

1920年2月，驻粤滇军因云南督军唐继尧与桂系军阀争夺这部分军队的统率权而发生风潮。驻粤滇军分裂为两部分，大部分滇军投入李烈钧旗帜下；李根源率所余的一部分滇军移驻琼州与雷州，李改任督办广东海疆防务兼雷琼镇守使。同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命率所部粤军回师攻粤时，李根源则奉岑春煊命将所部调往东江与粤军作战。后又经莫荣新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当时桂系军阀在粤连遭败北，以

岑为首的军政府摇摇欲坠。10月24日，岑春煊被迫通电去职，李根源因和桂系的关系而遭到所部军官的反对，被迫离开滇军。旋即离广州去上海，以后移居苏州。

1922年夏，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派人到苏州邀李到北京任职，黎并亲书“关中贤相资王猛，天下苍生忆谢安”的对联相赠，李感为知遇，从此效忠黎元洪。李到京后，初任航空督办。不久，在汪大燮内阁中署理农商总长。次年1月张绍曾组阁，李仍任农商总长。6月曹锟窥伺总统位置，逼走黎元洪，李根源随同黎元洪出走天津。9月又随黎元洪去上海活动。10月曹锟贿选成功，黎出国去日本，李则在沪闭门读书。1924年6月李去苏州居住，常与章太炎、张一麐等相过从，成立“国学会”，并刻印《曲石丛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李根源激于爱国主义思想起而参加苏州人民群众的集会，发表反对投降政策的声明，又到各处作抗日救国的讲演。这些活动曾遭到国民政府的不满和特务的监视。“一二八”沪战发生，他和苏州爱国群众一道参加捐款和救护伤员等活动。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国抗战开始，李根源在苏州和马相伯、张一麐等人，创议组织“老子军”，号召老年人都来支持抗战。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苏州，李方才去武汉，通过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与朱德总司令取得联系。

国民党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原先是李根源在广东韶关开办的讲武堂的学生，此时电邀李去新疆。李曾为此电告朱德征询意见，朱德由临汾前线回电，赞成前往。当时蒋介石也想通过李与盛的师生关系，调和他和盛世才之间的关系，任李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李于1938年2月到乌鲁木齐晤盛，同年九十月间因患心脏病回昆明疗养。

1939年，国民政府任命李根源为云贵监察使，这是蒋介石政府安置元老的一种名誉职位。李利用这个机会，召集了一些旧耆宿儒整理

云南地方文献，编印了一部《永昌府文征》。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路经云南时，曾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鼓吹他的卖国主张。龙曾想通电主张中日媾和，并邀约李根源共同签名，李立予严拒，并劝说龙云不要上汪精卫的当，帮助龙云坚定了应持的立场[(6)]。1942年日军自缅甸侵入李的家乡云南腾冲一带，李根源发表了《告滇西父老书》，表示愿随滇西父老之后，保乡卫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辞去云贵监察使职务，被国民政府聘为国策顾问。他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十分不满，曾致电国共双方呼吁和平，并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重开政协会议。

1949年9月，李从腾冲来到昆明。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在蒋介石胁迫之下，纵容国民党的特务制造所谓“九九整肃”事件，查封报馆、学校、议会，并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三百多人，蒋介石已决定杀害张天放、杨青田等十人。11月，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重庆来到昆明，李根源面恳他下达了大赦令，使在“九九整肃事件”中被非法逮捕者获得自由[(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根源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委员。1965年7月6日李根源在北京逝世。李根源生前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和《雪生年录》等。

---

(1)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1，腾冲李氏曲石精庐1934年版，第1页。

(2) 李根源赋《云南杂志》诗中有“良报挺生谁拱卫，云南杂志是尖兵”之句。

(3) 朱德：《辛亥回忆》，《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4)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1，第19页。

(5)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第10页。

(6) 《雪生年录续编》（未刊稿）。

(7) 《雪生年录续编》（未刊稿）。

李更生

萧致治

李更生，原名荃，字亘孙，江苏淮阴人，1883年1月23日（清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后因落水得救，遂号更生。1902年入江北高等学堂肄业，1906年结业后，毕生从事中小学教育，是教育实干家，也是教育革新家。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认为："自清道咸来，欧化东渐，而造成无量之隐痛者，皆教育事业不能与人争故也。"[(1)] 因此，他决心献身教育事业。

1906年，他应皖中当局之聘，历任繁昌、宣城、太和等县高等小学主事（校长），以善于办学受到各地人士的敬重。1909年，他奉派"佐治亳州"，因其父促归里，没有赴任。继返淮阴，任江北师范附属小学主事。1911年淮阴光复后，兼任淮阴县学务科长。当时"城乡公私数十校，罣乱尽废，校具尽坏，几无着手地"。他"与诸校长缉理于颓败中，惨淡经营，比数月次第复业"[(2)]。次年秋，他又兼任省立第六师范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校长徐公美对他"虚己以听"，他则治校事如家事，因之校誉大起。一次，学校发生火灾，他深夜闻讯，冒火入室抢救图籍，几不得出。他对学生重视身教，认为"教师以言教人，不如以身教人"。他给自己订了八大戒条，即《更生八不箴》。这"八不箴"概括了李处世待人的一些基本准则，曾传诵一时。其中一条为"终身不吸烟、赌博"。先是，公教人员于公余时，每每以打麻将消遣。他也曾逢场作戏，但忽觉其非，遂召集学生训话，大书"李荃之恶德"五字于黑板，痛自贬责，并告诫学生勿犯赌博恶习，诸生心服，没有敢犯禁的[(3)]。

1917年秋，江苏省教育当局任命李更生为扬州省立八中校长。时扬州省立五师为先进学校，八中则事事落后。李到校后，于私室里悬

一横额，书“竖起脊梁担事”六字自勉。更备笔记本，题曰“更生思潮”，每有所思考，都记录下来，随后便付诸实施[(4)]。如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受教育，1919年他将单轨制改为双轨制，招生规模扩大一倍。又自二年级起分科授课，甲组偏重文科，乙组偏重理科，以利发挥学生所长。继之，又试行能力编级法，先对学生分课程进行测验，按其实际程度编入适当班级教学，这在当时江苏中等学校中是一种新尝试。他常亲自听课，并与教师共同研究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他还重视实验，为文科设历史参考室和地理参考室等；为理科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博物参考室等；为文、理两科共设的有中文图书室和英文图书室。为使学生全面发展，他对美育、体育也很重视。当时学校就设有国乐队、军乐队及油画小组，并请专家指导，油画小组成员的作品，还有参加国际画展的。此外，还建有或准备建设雨天操场及运动场、弹子房、健身房、浴室、游泳池，以至印刷所等等。由于勇于改革和认真建设，使得后进的八中于三四年间一跃而为全省最优秀的学校之一。八中毕业生考入沪、宁等地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人数之多，为全省各校之冠，为改组以后成为驰名全国的江苏扬州中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其时八中校舍系借自地方，李更生谋建设永久校舍，曾迭请省当局拨旧府署为校址，而该处为驻军占用，拖延不让，从1918年起，纠缠四年，驻军才全部迁出[(5)]。正当制定校舍建筑方案准备发展之际，不料他的妻子唐治英病故于淮阴，李匆匆回淮阴办理丧事；其时地方劣绅则勾结军人与李作难，他遂拂袖而去。学生闻风乃组织护校团，群起挽留[(6)]。

李回淮阴后，被任为省立六师附小主事。到职后他锐行新制，在不到四年时间中，就试行葛雷制、设计教学法、道尔敦制和特殊幼儿教育等等[(7)]。他曾经深入调查儿童习惯，为实施教育张本。他主张推行儿童本位教育，根据儿童特点进行教学。于是在读书外，还让儿童办《自治周报》校刊，举行足球比赛、风筝比赛、上海惨案募捐会等，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本领，增长学识。他还主张按照儿童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对聪颖儿童允许跳级，对顽劣儿童施行特殊教育。他

认为环境对儿童的成长有重大影响，教室庭院务使美化。他又为学校创办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经费不足，便捐献自己藏书数千册以充实之[8]。

当时淮阴小学较多，中学只有一所，远不敷青少年升学需要。邑人于1922年创办了一所私立成志中学，因多种因素影响，濒于闭歇，眼见莘莘学子行将失学。校董会上乃群推李更生继任校长。此时学校经费竭蹶，所租校舍简陋且居闹市，宿舍则赁于僧房，远在二三里外，教员则无专职，亦几无报酬可言。李不忍听其关闭，慨然允就，但提出三点声明：任校长而不受任何津贴；教员津贴于学期终了时视学校经费盈余多寡而定；租某校董之空地为操场，但缓付租金[9]。众校董及教员均赞同，李乃就职。上任后首先筹选校址，几经周折，始得长期承租劝棉场旧址为校址。但此处房舍已圮，更缺教室，于是又决定向社会募捐五千元进行修建。李为此“不惜卑躬屈己，沿门托钵，有一点办法可想，无不想到；有一点便宜可趁，无不去趁”[10]。但募集半年，仅得二千七百余元，不敷甚巨。而校舍已开工修建。不容中辍，李乃趁续弦之机，遍发请帖，说：“苟于不佞婚事欲有以贺之者，请悉移助成志。”[11]于是又得款约千元，新校舍始得以完成。成志为私立，按规定应向政府立案，但政府规定学校非拥有二万元基金不办。于是李又为筹措立案基金四处奔走。起先，他以自己承领的湖滩地二十五顷移赠学校，又为学校购皮家渡地二十六亩，但去立案的条件尚远；后又想出筹募公债券作基金的办法，惟所得亦不多，但他坚持不懈，继续劝募。他为培植“成志”，真是做到“筚路蓝缕，艰困毕经”[12]。在六师附小任职时，每日必去成志一次，凡事亲为主持。他对教育管理力主从严，尤其重视教学，学生成绩遂蒸蒸日上，其第一、二届毕业生升入高中者，达百分之八十。对经费开支力求节约，每月必公布收支于众。他对成志未来远景，规划亦颇周到。

淮安省立第九中学，在江苏素以难治著称，于1925年宣告停办。

1926年省教育当局徇苏北人士之请，委派李更生为校长加以整顿，李力辞不获而后就职。消息传出，推荐教师的信件多达四百多封。李概置不复，坚持聘用真才实学之人。他到校后对原有教职员一律解聘，择优者另发聘书。另于平时留意物色的人才，一一聘请。对原有学生一律重新考试，择优录取。开学后，九中气象一新，面貌顿改。是年起，为适应社会需要，李在高中一年级分设数理化和银行理财两科，更为全省的创举。为严肃学风，学生每晚必须在自修室自修两小时，虽走读生亦必到校。当时淮安尚无电灯，该校乃自备发电机为自修室照明。此外，如整顿食堂秩序及加强学校卫生，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他均有所措施。不到一年，九中声誉大起。李之雷厉风行作风，获得全校师生的拥戴[13]。

李更生虽未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他拥护革命，热爱祖国，并勇于接受新思潮。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淮阴城被民军包围，李“首倡反正议，偕代表十六人开门纳民军”[14]。到八中时，正值卖国的“二十一条”签订之后，他在校中竖石碑，刻“汝忘五月九日六时乎”，用以告诫学生不忘“二十一条”国耻。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他身体力行，在其《八不箴》中即订有“终身不买日货”一条。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他鼓吹科学与民主，提倡白话文，推行注音字母，提倡演话剧，并亲自登台。他提倡阅读杂志并鼓励学生自编刊物多种。他不仅对待同事平等，而且平等对待学生和校工，校内举行庆祝会，多要请学生和校工上台讲演。在他的影响下，“五四”以后的新思潮“随着扬子的高潮输灌到运河流域”，八中学生“无人不充满德谟克拉西的观念”[15]。1926年秋北伐开始后节节胜利，李极兴奋，曾订好计划积极准备欢迎北伐军。不幸，在北伐军到达淮阴前，李已遇害。

李更生性刚毅，不畏强暴，不阿权贵，为教育事业他不惜挺身斗争。1913年，他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在议会中担任教育审查员，力主增加教育经费。对于权贵人物的不法行径，他在议会上每每痛加

弹劾，以至“闻者咋舌”，被称为“不背民意”的省议员[16]。他为八中申请到新校址，而驻军旅长黄振魁不允迁出，甚至扬言要置李于死命。李毫无畏惧，仍据理力争。终于1922年春迫使驻军全部迁让。1924年为修建成志校舍募捐，李首先向淮扬镇守使马玉仁劝捐。马出身“盐枭”，嗜财如命，而李竟能设法使马捐款八百元。

李更生毕生从事教育，尤重身教，故律己甚严，对子弟亦要求严格。在《八不箴》中即有“教子女不分厚薄”及“遗产不必由子女继承”二则。其族弟李萃为无赖子，曾因强索遗产被他训斥，竟挟怨于1927年4月5日晨刺李于赴校途中，因伤重于7日晨去世[17]。

---

(1) 李更生：《赠六师本科毕业生序》，《李更生先生言行录》，扬州胜业印刷社1932年印，第22页。

(2) 徐庶侯：《李更生君别传》，《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6—7页。

(3) 张震南：《八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8、10、11页。

(4) 张震南：《八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8、10、11页。

(5) 张震南：《八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8、10、11页。

(6) 张通漠、张云谷致李崇淮信。

(7) 吴钊：《六师附小主事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1—13页。

(8) 李崇祜等：《先府君行状》，《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2页。

(9) 张震南：《成志初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3—17页。

(10) 张震南：《成志初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3—17页。

(11) 李更生：《为续娶沈夫人通启各界》，《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43页。

(12) 李更生：《成志初级中学校募集国省库公债票作基金启》，《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44页。

(13) 张震南：《李更生先生事略》，《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4页。

(14) 范绍曾：《九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7—18页。

(15) 张震南：《八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8、10、11页。

(16) 徐庶侯：《李更生君别传》，《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6—7页。

(17) 李有一个族弟李萃，不事生产，游荡成性。李屡加劝诫不听，反怀恨在心。1927年4月5日，在李赴六师途中，李萃怀利刃相随，乘不意刺之。李重伤不治，于两日后逝世。凶手逃逸，不知下落。

李公朴

宗志文

李公朴，江苏常州人，1902年11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生。家境穷困，父亲给人家当仆人。李公朴小时候只念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他的三兄李公愚在镇江合兴盛五洋商店做店员，他也跟随做学徒。学徒生活又苦又忙，但他总是挤出时间读一些新书报，借以增长自己的文化知识，从而也朦胧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公朴满师不久，他与许多青年店员一起，组织“爱国团”，上街演说，给报纸投稿，积极抵制日货，并揭发他的店老板贩卖日货的罪行，于是被解雇了。他失业后，幸得三哥的支持，于1920年秋季插班进入镇江润州中学念书。毕业后，1921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高中学习，但也只念了一年余，又因参加反对学校校医虐待学生的学潮被开除。

1922年李公朴转学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学习。高中毕业后，1924年升入沪江大学。因为他很穷，只能一面读书，一面在图书馆工作，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学生的罢课游行，代表沪江大学学生任上海学联的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并在这期间加入了国民党。通过这场斗争，他看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政府是一丘之貉。反帝爱国的激情，使他无法继续在课堂里待下去，1926年初，他毅然抛开学业，到广东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随军经过福建、浙江，1927年初他又回到上海。

“四一二”政变后，李公朴愤然离开了部队。他曾一度组织一个全

球通讯社，搞新闻工作，因为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干不下去了。1928年，美国雷德大学（Reed College）给中国学生设奖学金，吸收中国学生入学，培养青年会干事。李公朴通过青年会应征入选。8月到美国，进了雷德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来维持生活。美国的“民主政治”对李公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他也看到，“其政府之大权与政策，实际上仍操在资本地主阶级的掌握之中”[(1)]。他一方面希望“中国的政治，不要重蹈美国为资本家所把持的覆辙”[(2)]；另一方面，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认为当时“政治方面究竟已上了轨道，南北究竟已算统一……再过数年，社会现象自会逐渐进步，人民可以安居乐业”[(3)]。这种种想法，反映了当时一般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和幻想。1930年夏，李公朴在雷德大学毕业后，乘坐一艘货船离开波特兰德（Portland），靠在船上做工补偿船费，到纽约和欧洲进行了一次社会考察，到冬天才回到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开始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起初他对国民党的抗日宣传还有些相信，一度办起一个环球通讯社，自任社长，后来看到他们破坏“一二八”抗战，暗杀著名爱国人士邓演达等人，镇压爱国人民的抗日活动等一系列事实，就对国民党失望了。他决心开展社会教育，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1932年初，李公朴和邹韬奋、杜重远、戈公振等在上海发起筹办《生活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成功。12月，李得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创办了《申报》附设流通图书馆，“其目的在于辅助新闻教育之不及，而予社会大众以求得知识之机会”[(4)]。经常来图书馆借书的，多数是学徒、店员、职工等自修青年。这个图书馆还设立了读书指导部，指导大家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于读者来信中所提出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申报》的读书问答栏中公开给予回答。通过这些回答，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当时负责回答问题的，主要有艾思奇、廖庶谦、夏征农等人。

1933年2月，在流通图书馆阅览室，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6月，创办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8月，又增设补习学校分校。

1934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限制与刁难，“读书回答”无法在《申报》上继续办下去，李公朴和艾思奇等一起转而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这是一份通俗的理论性期刊，在上面开辟了各种学科的讲座，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夏征农的文学讲话，高士奇的科学小品，曹伯韩的算术讲话，以及“读书写作问答”等。许多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观点。1935年，《读书生活》半月刊扩充为读书生活出版社，印了很多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等。

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补习学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李公朴没有退缩，他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于1935年秋，把图书馆和补习学校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继续办下去并得到发展。到1936年底，图书馆的书籍由最初的两千册增加到三万册，补习学校增加到八个，学生人数由开始的二三百人增加到四千五六百人。其中许多学生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李公朴被选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的救亡群众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又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他参与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的起草，提出救国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的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

李公朴对鲁迅很崇敬。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十分悲痛。22日举行葬仪时，他参加了送葬的群众队伍。

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李公朴。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其他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之狱。12月4日，他们被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到了苏州，大家推李公朴向押送的人致“临别词”，说明当前国难的严重性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他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使那些押送的人大受感动。

“七君子”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团结一致，宣传“七个人是一个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十大罪状”，向七人提起公诉，要他们承认救国“有罪”。他们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5)]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进行了劝降活动。5月，由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和钱新之等，要七人写悔过书，进反省院后出狱，但被他们断然拒绝了。接着，蒋介石又以请七人去庐山“晤谈”为诱饵，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又被拒绝了。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人进行了两次正式开庭审理。在法庭上，他们严正地逐条驳回了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和企图强加的罪名，驳得审判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国民党政府对“七君子”的迫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各界人民纷纷发起援救运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前后，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一时响应者很多。宋、何等提出：“七君子”爱国无罪，应立即释放；如爱国有罪，则他们与七人同罪，也应该一起收押，并案处理。7月5日，宋、何等带头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请求入狱。这一援救运动，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接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国民党

政府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于7月31日被迫释放了“七君子”。

李公朴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8月底到山西抗日前线，担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12月他到武汉，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提出它的基本任务是：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李公朴还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大家“各尽所能，去做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6)]，“克服一切的艰苦，争取最后的胜利”[(7)]。7月，《全民》周刊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周刊。

抗战初期，阎锡山延揽进步人士到山西创办民族革命大学，约请李公朴任副校长。李于1938年初到山西后，看到学校的负责人全是阎的亲信，根本无意安排他负什么责任。而且在以后不久，阎锡山开始排斥李公朴和一些进步人士，李于是离开，再回到武汉。当时，武汉已有一些进步团体，如“蚁社”、“民先”等遭到解散。6月里，有一次李到汉阳兵工厂讲演，这个厂正在酝酿罢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诚抓了几个工人代表。李公朴去找陈诚，要他释放工人，两人发生了争辩。陈诚诬指李公朴是罢工煽动者，把他也扣留起来。经周恩来多次与陈诚力争，一个月后李始获释。

10月武汉沦陷，李公朴撤退到重庆，后与夫人张曼筠经成都转赴延安。11月24日到达延安，在这里，他们见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一些负责人，对边区的行政、生产、民众运动、教育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建议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从事抗战教育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的建议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赞助，抗战建国教学团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的十几名青年组成。1939年6月，李公朴率领他们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一带去活动。每到一个地方，就举办短期艺术训练队或短训班，培训抗日宣传人才。蒋介石知道后，密电河北游击总司令部鹿钟麟，嘱他对抗战建国教学团的活

动“严予查禁”。后来又密令国民党在敌后的反共将领朱怀冰，要他抓到李就地枪决，但在八路军的保护下，蒋介石的阴谋落了空。

1940年，李公朴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出版，如实地反映了他目睹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

同年12月，李公朴夫妇由解放区回到重庆。正反复考虑下一步去向时，皖南事变发生。他对当时的形势和工作环境进行分析后，决定把全家搬到昆明。在这里，他以青年会为活动基地，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还经常作公开演讲，呼吁团结抗日，宣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1942年底创办了北门书屋。1944年昆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把北门书屋扩大改组为北门出版社，在张光年、赵沨等人帮助下，邀请闻一多等组成编委会，出版进步书刊。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李公朴立即参加，并被推选为支部执行委员。从此，李公朴和闻一多经常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

民主运动的发展，遭到国民党的仇视。1945年春，特务头子刘健群找到李公朴，自称是蒋介石派来的，希望李到重庆去，可以在教育界委以“重任”，李公朴断然拒绝了。

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文件在《新华日报》上刊载以后，北门出版社立即协助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翻印了数千册，在各阶层中广泛传播。这时，李公朴还是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编委，因编辑部成员在编辑方针上意见不一致，他和闻一多等一部分编委商议，决定出版《民主》增刊，请中共地下党员担任编辑工作，贯彻了坚持抗战、扩大民主阵地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公朴赴重庆出席民盟临时全国

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李公朴被推为中央委员。他还和陶行知一起，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这个学校是参照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办起来的，没有固定教员，由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内和党外的一些著名学者轮流到学校讲课。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从借房子到请教员，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办的。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流血惨案，杀害学生。消息传到重庆后，李公朴多次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大会，庆祝会议成功。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是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当场殴打了主席团成员多人。李公朴头被打破，伤口宽两厘米多。住进医院后，周恩来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8)]

5月，李公朴回到昆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威胁，仍积极投入民主运动。6月以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接近完成，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李公朴说：“为了爱国，我们得随时准备死。”[(9)] 6月下旬，昆明各界人民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国民党特务们大肆散布谣言，说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要搞暴动”、“搞暗杀”，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民盟昆明支部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出面，于26日、28日、29日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决不搞暗杀暴动。但特务分子却加紧了对他们的暗害活动。7月初，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李公朴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暗杀，曾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10)] 他没有畏惧，仍然天天为和平奔走。

11日晚10时许，李公朴在昆明街上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至12日清晨逝世。

四天以后，15日，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不可遏止了。

---

(1) 李公朴：《值得我们注意的顾虑》，《生活》周刊第4卷第22期（1929年5月19日）。

(2) 李公朴：《值得我们注意的顾虑》，《生活》周刊第4卷第22期（1929年5月19日）。

(3) 李公朴：《五分钟的狂热与一夜天的高兴》，《生活》周刊第4卷第15期（1929年3月10日）。

(4) 李公朴主编：《读书问答集》第1集，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1934年版，第229页。

(5) 时代文献社编：《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1937年版，第27页。

(6) 李公朴：《民众动员论序言》，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

(7) 李公朴：《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黑白丛书社1938年版，第50页。

(8) 张曼筠：《回忆李公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4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

(9) 张曼筠：《回忆李公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4辑。

(10) 张曼筠：《回忆李公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4辑。

李国杰

侯鸿绪

李国杰，字伟侯，号元直，安徽合肥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出生在一个大官僚家庭中，祖父李鸿章为清末重臣，长期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父亲李经述有足疾，在合肥主管家产，坐拥厚赀，过着豪门奢侈的生活。

李国杰幼年在合肥家中聘师求学，七岁应祖父之命，移居天津，随侍身旁读书。1901年李鸿章死，李经述系长子[(1)]，得承袭一等侯爵位。翌年，经述亦病逝，由李国杰再袭一等侯爵勋位，时年仅十一岁。

1903年，慈禧太后念及旧臣情谊，召李国杰入宫，授二等侍卫。1906年，十五岁的李国杰被特旨授任广东汉军副都统，满朝震惊。翌年，调任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掌一旗户口、教养、训练大权。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载沣忌恨权势日益膨胀的袁世凯及与其有关系的人，罢斥袁世凯，集军政大权于皇族；李国杰也受牵连，被解除兵权，调农工商部任左丞。李因家族关系，素与清室亲贵来往密切，一日探知清廷将有不利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举措，而李的岳父张瑞荫正在徐左右任事[(2)]，恐受连累，遂急函密告："醇邸（指醇亲王载沣）深恶菊帅（徐世昌号菊人），大人最好竭力摆脱，早日回京为宜。"[(3)] 张得免一难，而徐也引起注意，随即施展各种手段，取得载沣的信任。

1910年，清廷派遣李国杰出使比利时王国钦差大臣。在比国，李大兴土木修建使馆，并常去柏林、巴黎游览，纵情声色，一掷千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召李国杰回国。但他积欠公款数万元无法向外务部交卸，便持天津李公祠契纸作押，向曾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首席买办的吴懋鼎借银三万两。吴说："我受中堂（指李鸿章）之恩甚重，这个东西（指契纸）我绝不敢要。"随后奉送李三万两银子[4]。

李国杰向外务部交卸完毕，即去晋见袁世凯。此时宣统已退位，袁正谋民国大总统位，李不识时务，在谈话中提出："我要进宫向隆裕太后和皇帝请安，事可行吗？"袁答道："太行啦！别人不行，你还不行么！"李随后便进宫，见到隆裕太后，跪伏地上，涕泪俱下，隆裕称："念及先臣鸿章，引用非人，以致如此，不知涕泪之何从也。"[5]　弦外之音，有责袁之意。但李不知此时袁已嘱接近清宫的徐世昌，在暗中监视清室行动，李的举止言行已为徐侦知，便召李谈话，说："设若你不是李文忠公嫡孙，咱们就不能有今日之会面了。"李惊恐不已，请教疏解之计。徐说："速走为宜。"[6]　当夜，李即离京赴沪隐居。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施展阴谋权术，极力拉拢各方。时李国杰堂叔李经羲应袁邀聘由沪赴京，任政治会议议长，不久又为袁氏高等顾问。他受袁之托，为袁的侄儿袁克义与李国杰之女婚配事张罗。从此，李国杰不安之心始定。

李国杰原继祖业任轮船招商局董事，至1918年被选任董事会会长。但他只知享受摆阔，在事业上并无作为，常邀聚众友在一起吟风弄月，终日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招商局加以整顿，委赵铁桥为总办，李国杰为董事会会长。赵一上任，即着手革新除弊，废除陈规陋习，公布"整理招商局暂行条例"。从此，董事会已非昔比，总局一切人事、财务和经营业务，统由总办一揽全责，而董事会会长不过一虚衔而已。为此李、赵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形如仇敌。1930年初，李买通徽

帮首领王亚樵，于同年7月24日将赵砍死。随后，交通部派次长李仲公赴沪暂行署理招商局事宜，将招商局改归国营，不久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李国杰除掉政敌，而自己并未得利，但又不敢贸然行动，只好对李仲公、郭外峰虚与委蛇，等待时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改组，陈铭枢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李国杰之族兄李国凤（少川）平日与许世英、黄居素颇多交往，乃通过他们的疏通，请陈免去郭外峰，而由自己接任总经理之职。李如愿以偿，特制一名片，其上刊印总经理衔外，又署“前清世袭一等侯爵”字样，令人匿笑不置。

李国杰接任后的招商局已是千疮百孔，负债累累。在与交通部政务次长兼招商局监督陈孚木、交通部航政司长蔡培、交通部参议黄居素等人共同密谋下，经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总经理沙得利（F．W．Sutterle）撮合，李以招商局在上海的金利源、北栈、华栈等几座码头作抵押，借款三千万元，租给美商大来轮船公司，并从中获得回扣佣金一百万元，折合白银七十万两。当时商定：“陈孚木得银二十万两，陈真如（铭枢）得银四十万两，其余十万两由经手人均分。”[(7)] 事后被人举发，国民政府委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俞飞鹏（此时陈铭枢已辞职出洋），上海市长吴铁城等组成中央调查组，约集黄金荣、杜月笙及银行界多人，在上海市政府开会，传李国杰到会备询，会后即将李扣押起来。此时，陈铭枢远在法国，“致电国府行政院，为招商局舞弊案声明”，表示“本人并不知道”[(8)]。经核查，所谓陈铭枢分得四十万两银子，均由黄居素用化名分存在上海各家银行，转汇香港。不久李国杰被移交上海地方法院。1933年4月，上海地方法院判处李有期徒刑八年；陈孚木、黄居素潜逃，被明令通缉。

李国杰被收监后，以患病为名，通过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林康侯出面担保，获保外就医，在董家渡上海医院包下几个大房间，携眷陪住，并自带厨佣，成为当时一大奇闻。1934年，客居上海的段祺瑞向蒋介石说项，李始获释。此后，他在新闸路寓中事佛念经，匿迹沪

上。

1937年冬上海沦陷，翌年3月，以汉奸梁鸿志为伪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头目多系原北京政府的一批旧官僚，李国杰与他们频繁往来，不甘寂寞，蠢蠢欲动。

1939年2月21日，李国杰在寓所被军统特务刺杀身亡[9]。

---

(1) 李鸿章长子经毓幼殇，由胞弟李昭庆之子过继，取名经方。1864年李鸿章继配夫人赵氏得子，名经述，立为长子。

(2) 张瑞荫系张之万之子，而徐世昌则是张之万门生，关系甚密。徐授任东三省总督后，曾向慈禧太后面奏，保举张瑞荫为督署一等秘书官兼宪政调查局总办。张瑞荫长女适李国杰，不久病死，李又娶清末御史杨崇伊之女为继配。

(3) 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 吴焕之：《关于我父吴调卿事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张达骧在《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一文说：“在南北议和时，李向袁请款弥补积欠，袁汇寄四万元，李即以余款作路费回国。”与吴焕之的说法不同。

(5) 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6) 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7) 刘叔模：《1931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8)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30卷第5号（1933年2月7日）。

(9)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弟弟、丈夫、亲友笔下的传奇》，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李国钦

萧栋梁

李国钦，字炳麟，湖南长沙人，1887年9月（清光绪十三年七月）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李月波以教书为业。李国钦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从小白天跟着长兄李希易在田间劳动，夜间在父亲督促下苦读“四书”、“五经”。后来希易自学数学，担任数学教员，李国钦才得以跟着入学读书。

1910年，李国钦以优异成绩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大学前身）矿科第一班毕业，为华昌炼锑公司董事长梁焕奎所赏识，被派赴英国伦敦皇家矿业学院留学。李在选矿专家楚斯克教授指导下，在康瓦邦雷德拉斯城担任磁力分离工作，在处理浓化锡时取得了百分之二至三的钨铁，获矿冶工程师职称。1914年毕业回国，任华昌炼锑公司业务部副经理。

华昌炼锑公司因购得法国人赫伦士米蒸馏炼锑法专利，并由杨度联络在京湘绅呈请北京政府批准专利十五年，业务迅速发展，所产纯锑成色超过英国杰克逊厂。但是，华昌纯锑的国外销售权却被英商所垄断。为了打破垄断，开拓国外销售局面，李国钦力主乘英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能按时付款之隙，取消英商包销，在纽约设立分公司。这一建议被董事长梁焕奎采纳而付诸实施。李于1915年底被派往美国，担任纽约分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掌握经营管理实权。他利用当时锑价因世界大战爆发而暴涨、美国急需这种战略物资的有利条件，勤奋工作，经常奔波于纽约与旧金山之间，广交美国企业界人士，谙熟美国行情。旋与一华侨巨商的女儿结婚，并加入美国国籍，使纽约分公司获得纽约市政当局承认，也使他很快成为左右美国锑产品市场的人物。不久，国内纯锑已全部集中于华昌，而华昌又全部以

寄售方式出口美国，从而形成了中国纯锑垄断世界锑产品市场的局面。李国钦运用掌握锑市的能力和中国纯锑垄断世界锑市的条件，使华昌出产的双环牌纯锑畅销世界各国，开创了中国有色冶金产品由出口初级产品变为出口成品的新局面。李国钦也利用锑市场价格多变的情况，套购得利甚厚，成为百万富翁。

1916年，李国钦向美国友人借款增资，将华昌炼锑公司纽约分公司改组为华昌贸易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并经纽约市政厅批准，在纽约伍尔沃思大厦第51层设立办公处。李国钦此举受到华昌炼锑公司股东杨度等人反对，并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企图将李引渡回国，但未成功。李事后约其连襟、梁焕奎的三弟梁焕均到日本会晤，赠以厚银而私了此案。国内华昌炼锑公司从此一蹶不振，终致破产倒闭，对李国钦追究之议也不了了之。

李国钦建立华昌贸易公司后，利用原有的国内外关系，全力开拓业务，为开发湖南矿业，沟通中美经贸往来建树甚多。他先受华昌炼锑公司梁焕彝委托，将瑶岗仙矿采掘的钨矿做了进一步化验，证明中国所产钨砂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钨，从而吸引美、英、日等国专家来华勘探开采。他与梁焕奎兄弟及章克恭等集资一百万元，合伙经营了一个专门经营钨砂出口贸易的钨矿公司，从湖南瑶岗仙和赣南大庾岭等地收购钨砂，运往美国由华昌贸易公司包销。同时，他推介老同事章克恭担任美华银行长沙分行经理，以利用美国金融资本开发湖南矿业。此后，李国钦在天津、上海、长沙、青岛等地广设华昌贸易公司分支机构，从中国各地收购钨、锑、锡等矿产品以及桐油、猪鬃、黄麻草等农副产品销往美国，使中国五金矿产品第一次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同时将美国的化工、采矿、纺织、炼钢机械和钢材等工业品输入中国，沟通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渠道。他所独资经营的华昌贸易公司，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逐步发展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国际实业界享有一定声誉和信用。李国钦不仅拥有伍尔沃恩大厦第51层整层作为办公处，还在纽约长岛地皮最昂贵的地方住家，

并出任美国中华协会董事兼副会长，成为当时华人在美国商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李国钦的商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经营中美贸易的同时，曾插手股票和债券等证券买卖，在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中，他几乎倾家荡产，在绝望中一度萌发轻生的念头。后为事业心所驱使，并得其岳父帮助，才渡过难关，重新发展起来。

1935年起，国内钨、锑等战略物资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在国内的钨、锑、锡来源一时受到影响。资源委员会在纽约设立办事处，想拉李国钦为其效劳，派了李在华昌炼锑公司的老同事、冶金专家王宠佑到美与李接洽。李向资委会要求承担包销，未获同意，即采取商业竞争手段予以抵制，迫使资委会就范，最后达成了由华昌贸易公司包销国内钨、锑、锡的协议，这为华昌贸易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对外贸易中断，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经营业务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钨和其他稀有金属成为重要的急需的战略物资，德、日法西斯与英、美争相抢购。日本勾结其轴心伙伴德国希特勒政府，指挥法国维希政府免去当时法属安南（今越南）的法国总督，而代之以愿与日本“合作”的德古担任总督，企图夺取中国政府储存在安南准备出口的巨量钨砂。李国钦于1940年6月得悉此举，即建议美国政府火速收购中国储存在安南的钨砂，并由美国海军军舰抢运到美国，击败日本抢购钨砂的阴谋。这时，德国通过日本从南美和墨西哥等国大量进口劣质钨砂，致使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钨砂的计划受到威胁。李国钦看到战争发展下去，将使中国对美国钨砂的供应完全中断，南美的钨、锑矿砂也将被德、日购去，乃建议美国复兴银公司（世界开发银行前身）向南美的钨、锑矿投资，就地设立炼厂，将矿砂炼成成品再运往美国。美国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由美官方投资，委托他管理。1940年8月，李又敦请美国政府买进南美所产的全部钨砂，而不管品质好坏。李国钦也应美国政府之请，赴

南美各国采购劣质钨砂，在纽约市斯泰登岛的国际贸易区，建成唯一能处理世界各地劣质钨砂的炼钨厂，既使南美劣质钨砂有了销路，又保证了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需要。为了摆脱美国战略物资短缺的严重威胁，李国钦又建议美国政府在国内寻找资源，在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发展和加强了贫矿的开采与冶炼。

李国钦在经营以上事业的同时，还在墨西哥索拉诺省诺加斯城设立墨西哥钨矿公司，采购和提炼钨砂；在巴西经营钨矿场和铌钽矿，后者是居于世界前列的大矿。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由于在折射金属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纽约建立了锆铪金属厂，在俄勒冈州的阿巴尼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锆厂，开展了钼、铪、钶、钳、钽等稀有金属的冶炼制造。他还取得了美国得克萨斯州冶炼锡的特许权，并将钛的冶炼技术引进到印度，以华昌名义在那里设厂，取得经营专利权。

李国钦在矿冶科学上，精研钨矿学，发明“炭化钨李氏冶炼法”，并与王宠佑合著《钨》一书，被列为美国化学学会专著第95种，成为该项研究的权威著作，在国际冶金学界有很大影响，曾多次再版。

李国钦的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不仅将原来经营的锑、钨矿产扩展到钛、钼、铪、铌、钽等稀有金属，而且经营活动遍及北美、南美、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更在折射金属、炼钨等技术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还为解决美国战略物资作出了贡献。他在国际和美国实业界以及冶金学界名声大噪，被聘为美国政府战备物资顾问，任纽约五金同业公会主席、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会员，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博士学位、巴西政府“南十学座”勋章、意大利“最高荣誉勋章”、泰国“王冠勋章”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国钦收购了上述美国政府所设冶炼厂，并在纽约长岛克林科维地区设立华昌钨厂（又名“李钨公司”），生产炭化钨等钨制品，使该地区一度有“世界钨都”之称。同时，李还向食品制造和房地产方面发展，1946年在泰国设立泰华公司作为华昌子公

司，年产20万吨玫瑰牌木薯淀粉、50万吨木薯粒、3000吨冬粉（亦称“奉用玻璃面”）；输出的黄麻草和木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李国钦作为美籍华人，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过合作与支持。他曾在20至30年代为中国十八家纺织厂、十二家化工厂、八家矿场、两家钢铁厂、两家造币厂、两家糖厂，共计四十四家工厂雇聘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协助购买和安装机器设备，引进技术和资金。其中为协助玉门石油的勘探和四川泸州化工厂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对范旭东创办天津永利碱厂、南京永利硫酸铵厂、永利川厂和湘厂等给予的多方面帮助，效果显著。李还资助过他的老师曹典球创办湖南文艺书院，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置“李国钦奖章”，奖励研究钨产品有成就的人才等。

已入美国籍的李国钦，关心中国民族解放事业，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帮助国民政府采购军工设备和军火，并多次充当中国向美国借款的中间人，使中国从美国得到大批贷款。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先后两次到美国洽商，以中国桐油和钨、锑作为抵债物资向美国金融机构借款，均因美国人不同意外国人用政府机构出面谈判，不得要领。李国钦洞悉美国内情，建议陈光甫在美国设立环球贸易公司作为代表国民政府的一方，与美国复兴银行为一方进行交易。李作为见证人，担保环球按时偿债，使借款成功。他曾于1939年10月捐款10万美元慰劳湘北前线抗日将士，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还出版中文《商情报导》寄回国内，介绍美国朝野同情中国抗日的友谊。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等，一度要他担任中央银行理事和中央信托局局长，他未受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国钦曾表示要回国观光访友，并向国家捐赠炼钨机械，但愿望未能实现其，于1961年3月病逝。其亲属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李氏基金会，为中国赴美留学人员提供奖学金，并与我国合资建立企美有限公司，继续经营华昌矿冶精炼公司。美国政府为表彰李国钦的功绩，将他的名字镌刻在纽约港口自由神像

的基石碑上，永志纪念。

主要参考资料

李国钦、王宠佑：《钨的发现小史》（英文），1955年第3版。

《华昌国际集团》（英文版）。

李汉魂

周兴樑

李汉魂，字伯豪，号南华，广东吴川人，1895年11月23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七）出生[(1)]。他的父亲李次颜是晚清秀才，母亲庞氏生有三子，汉魂居长。他少年时家境富有，十六岁丧父后家境渐趋贫穷，由母亲继续抚育成人。

李汉魂年少时从同邑老秀才李品珊求学，稍长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研习诗书，广涉经史子集。1911年，入广东大学堂专门部法科学习。这期间，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立志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经黄元贞介绍成为一名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会员。

1912年，李汉魂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与叶挺、张发奎、缪培南等人同学，三年后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继而考升湖北武昌南湖陆军第二预备学堂第二期学习。1917年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第六期深造，1919年毕业后到阎锡山的部队中任见习官，次年因病返家乡，病愈后进入粤军中任职。在以后的四五年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在国共合作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李汉魂能顺应革命潮流，加之能武善文，故在粤军中升职颇快，由排长而后升迁为连长、参谋、少校副官等职。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组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遂于9月间扩建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升任为该军第十二师中校参谋处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出师北伐，第四军作为进军两湖战场的主力首先由粤北上入湘。当时李汉魂任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参谋长随军北征。第十二师攻占醴陵、浏阳后，于8月19日进逼平江，在叶挺独立团和三十六团主攻平江城的战斗中，李汉魂亲率一营出击，

协同各部占领平江。8月25日，第四军以独立团为先锋进抵汀泗桥。26日第十师、独立团及三十五团、三十六团等环攻汀泗桥不果，形势危急。李汉魂与三十六团长黄琪翔，向第十师长陈铭枢提出在吴佩孚援兵到来前，不顾任何牺牲，夜袭合歼守敌的作战方案，并在夜战中率三十六团协同独立团及第十师二十九、三十五各团抢占高地，与守敌展开肉搏战，终将敌人击溃，于27日上午攻占汀泗桥。而后，三十六团紧随独立团占领咸宁直逼贺胜桥，是时吴佩孚亲率督战队扼守该桥作困兽斗。在攻打贺胜桥的战斗中，李汉魂指挥团机枪连猛扫敌群和压制桥北敌火力点，为各部队冲锋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30日第四军占领贺胜桥后，直逼武昌城下，李汉魂则协助团长黄琪翔部署三十六团攻打武昌宾阳门的战斗。10月10日，攻克武昌，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基本被歼殆尽。2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奉命东征援赣，参加消灭孙传芳主力的战斗。在11月初该师切断南浔路援助友军攻击南昌的战斗中，李汉魂指挥的三十六团先后在孤山、德安、马回岭、九江等地重创敌人。南昌克复后，第四军于11月19日从九江撤回武汉驻防，不久后李汉魂升任第四军干部教导队军官队上校队长，旋又奉调任第二十五师参谋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反共，随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部拟由河南南下袭击武汉国民政府。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召开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21日，武汉的北伐军开始沿京汉路北上。第十二师作为先遣队占领驻马店后，面临数倍强敌的不利局面。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主张退却待援。时任第三十六团团长的李汉魂力排众议，建议固守待援，掩护北伐军第一纵队各部迅速集结，当即决定第十二师各团急切布防，严阵以待，奉军不明底细也按兵郾城不动，从而使北伐军稳住了阵脚，赢得了机运。北伐军集结后，5月13日，第一集团军司令张发奎下令开始攻打西平与上蔡。李汉魂率三十六团在上蔡、唐按、西洪桥等地进攻和狙击敌人，俘获奉军旅长富双英；27日，李又率部参加围歼临颍奉军的战斗，经反复激

烈战斗：李亲率所部冲入临颍城南门，将北伐军旗插上城头。临颍战后，李之三十六团随第一纵队各部乘胜占新郑、克郑州、入开封，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胜利会师。是年6月，李汉魂积功升任第二方面军所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7月随军东征讨蒋进驻江西。

1927年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之后尘实行“分共”，国共合作完全破裂。8月1日，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在南昌发动起义。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时，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尾随追击，李汉魂奉命率二十五师经樟树、吉安沿赣江南下至广东，并固守惠州石龙，以阻遏叶、贺所部起义军南进。12月12日，张太雷、苏兆征、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张发奎急令李汉魂部会同教导第一师薛岳部前往广州，镇压了广州起义。1928年4月，李汉魂卸师长职东渡日本治疗耳疾，年底归国时蒋介石的后期北伐已告完成。后第四军奉命缩编为第四师，由缪培南、朱晖日任正、副师长，李汉魂任参谋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命张发奎任讨伐桂系的第一路右翼军司令兼陆军第四师师长，李汉魂时任第四师副师长协助张平息了武汉的桂系之乱。同年9月，蒋令在湖北宜昌休整的张部，克日移防陇海路沿线，实则准备途中将之缴械。张发奎在汪精卫支持下出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司令，通电反蒋，并率部经由湖南入广西，联合桂系于12月和次年3月两次合力攻打广东，力图重占广州以求发展，李汉魂当时率部参加攻粤；结果张、桂联军先后在广东花县和广西北流大败于陈济棠所部粤军，被迫退往广西休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发奎、李汉魂再与桂军联合入湘，占衡阳、长沙、岳阳等地，策应冯玉祥、阎锡山称兵反蒋。蒋急调粤军北上攻击张、桂军，张、桂军回师衡阳迎战失利，李汉魂于7月随军败退广西。其后，第四师经过整编归薛岳统领，李汉魂与薛不合而被迫离队避居香港赋闲。

1931年2月，蒋介石因约法问题与胡汉民矛盾激化，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由此引发宁、粤分裂。5月间，两广反蒋派人士汪精卫、

唐绍仪、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联名通电要蒋下野，并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方面对抗。8月，李汉魂经缪培南引介由港回穗，被广州国民政府委为中将军事参议，旋又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从此，开始了他在广东日趋显赫的军政生涯。是年冬宁粤复合，李汉魂乃继余汉谋接任粤西北区绥靖委员，旋又兼任广东陆军独立第三师师长，驻防粤北韶关，管辖广东西北区共二十五个县和一局。1935年独立第三师改编为陆军第二军第六师，李汉魂仍任师长，驻军汕头，并兼任广东东区绥靖委员，管辖粤东二十四县和市局的军政事宜，权重一方。他深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曾在汕头严惩过一些抗纳米税的日本不法商人。

1936年5月，陈济棠对李汉魂有所猜忌而将其明升暗降，免李之师长职，只给予第二军副军长的空头衔，引起李的不快。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请缨抗日为名通电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他们将两广的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并进军湖南。李汉魂对陈济棠这种以抗日为名、实打内仗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陈这是“要带我们走死路”，遂生倒陈之心，坚请余汉谋“负起领导倒陈的责任”[(2)]。7月6日，李汉魂发出“鱼电”敦劝陈济棠悬崖勒马，指出抗日之领导仍仰中央，广东不应在强邻虎视之际为兄弟阋墙之举，令日本坐收渔人之利，心耻陈之所为，故封金挂印拜还大命。他同时还通电粤中将校，望联合对陈进行劝谏。当天他在卫士和秘书等陪同下，避往香港九龙。7日，李汉魂令部属按计划发出“虞电”，向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林森表达拥护中央之诚意，并请蒋等“对西南之此举，因势利导，纳诸正轨，一分歧之军令，宏御侮之远谟”[(3)]。8日，李再电在韶关的第二军军长张达，望率部对陈氏实行“兵谏”。李之通电得到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孙科、程潜、王宠惠、唐生智等及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赞同响应，对陈济棠部起了很大的分化作用；加上此间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对粤中各将领及空军、海军进行收买瓦解，使陈氏处于众叛亲离之境。18日，陈被迫通电下野，离穗赴港，余汉

谋即由大庾回到广州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20日，国民党中央电令委派李汉魂为广东东区绥靖委员、第二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陈诚随即又转达蒋介石给李之嘉奖令，约李至广州面谈。于是李从香港返广州与陈诚恳谈粤局，并宣布就职。不久李汉魂任新番号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五五师师长，驻兵汕头市。是年底，李被授予三等云麾勋章。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9月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赴国难。这期间，李汉魂已升任第六十四军军长兼一五五师师长，驻防潮汕一带。他于8月30日宣布就任军长职后，积极扩军备战，轮训各级军官，并组织广东第五区战时民众训练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大力组建民众抗日后援组织，随时准备抗击日寇的侵犯。

1938年4月，李汉魂奉命亲率一五五、一八七两师北上增援，抵武汉亲谒蒋介石后，遵令于5月开赴河南开封归德，参加豫中战役。他旋任薛岳第一兵团的第一路总指挥，率部防守陇海线内黄、仪封、兰封一线，并指挥第六十四军主攻和夺取罗王寨。李部作战英勇，浴血奋战，于27日攻下罗王寨，给日军土肥原部以重创，国民党当局为此授予“华胄荣誉勋章”。6月15日，李汉魂军奉调赴武汉参加会战。当时李任陈诚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率部镇守江西九江、马头镇、马当等一线，负责狙击溯江西上之日军，以保卫武汉。李部从7月23日起在九江英勇抗击日军两师团兵力之进犯，三天后撤守南浔铁路一线；后在德安等地屡败日军，并顽强狙击沿铁路南下之敌，相持月余，日本侵略军竟未能前进一步。李汉魂因在武汉会战中卓有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忠勇无双”锦旗一面，并升任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他统率的第六十四军也受到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传令嘉奖，并授予“钢军”锦旗一面。

1938年10月21日，广东省会广州弃守，随李汉魂北征的粤籍将

校纷纷要求回师援救桑梓。12月23日，李被国民政府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后，率部南归广东。次年元旦，他在粤北连县宣誓就省府主席及民政厅长职，并兼广东省保安司令，以韶关为临时省会。25日，他发布《告广东省各界同胞书》，提出全省应造成人人抗战、处处抗敌的局面。

1939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李汉魂任省党部主任委员；11月，李又兼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六十三军、六十四军。至此，他已集广东的政、党、军权于一身。是年，占领了广东沿海一带的日寇以五万大军北犯粤北各地，李汉魂指挥所部协同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对日军实行各个击破，于1940年1月取得了粤北大捷，粉碎了日寇的北犯阴谋。此后，李汉魂辞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全力从事广东政务，广东军事则归余汉谋主持。

李汉魂在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建设厅长的六年半时间里，忠于职守，对广东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抗战等事业，颇多建树。他亲自制订《县长须知》，亲录《从政语范》等条规，勉励各级公务人员恪尽职守，清明吏治；他鼓励广大侨胞投资垦荒植林等事业，注重繁荣地方经济；他组织力行学会自兼会长，创办力行中学，并捐资建成毅慈医院；他于1943年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支部干事长后，组建了广东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积极动员青年抗日，并带头将三个儿子送入抗日军队之中。李汉魂的政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曾为此授予他忠勤勋章和二等景星勋章，并颁给他耕工竞赛第一名的奖状。1945年8月，国民政府升任李汉魂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改派罗卓英接替他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接令后发布《留别广东各界同胞书》，办好移交手续离开广州前往陪都重庆报到。抗战胜利后，他就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职。

1946年6月，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挑起了反共内战。为保障浙赣铁路安全运输，蒋曾委李汉魂兼任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对

蒋大打反共内战不满，遂于1947年1月辞去本兼各职并告假，在家属陪同下远赴美国纽约治疗耳疾。病愈后，李汉魂为避免参加内战，在南北美洲和欧洲二十四个国家游历了两年。

1949年1月，李汉魂独自由美归国。他抵达广州时，蒋介石已被迫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2月9日。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海南岛特别行政区长官兼海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未到职。旋又被任命为总统府参军长，并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参军长管辖总统府军务、总务、典礼三局及侍卫、机要二室，位置显要。李就任后不久，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后又撤往重庆。9月，李汉魂在重庆谒见蒋介石时力主死守大陆，表示不愿渡海去台湾，受到蒋的训斥，10月13日，李汉魂飞抵香港后，宣布辞参军长职，并谒见居港准备赴美的李宗仁，表示愿一同去美国。

1949年12月15日，李汉魂随李宗仁夫妇乘泛美公司的包机由香港直飞美国。从此开始了全家侨居美国的赋闲生活。

1982年5月，八十七岁高龄的李汉魂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邀请，偕夫人吴菊芳及儿女飞归大陆观光访问。

抵北京后，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随后，他一家人游历了北京、上海、广州、韶关等地后，返回美国。

李汉魂虽系一员武将，但却擅长诗文，一生笔耕勤而不辍，著书颇多，计有《吴川将军李汉魂》、《梦回集》、《我是沙场一过客——北伐战争回忆》、《东游散记》、《欧游散记》及《拉丁美洲游记》、《李汉魂将军日记》等。1987年6月30日，李汉魂在美国纽约市病逝。

---

(1) 关于李汉魂的生年尚有1894年、1896年两说。今根据《李汉魂将军日记》（朱振声编，香港1975年版）所记，其出生应为1895年11月23日。

(2) 胡铭藻：《李汉魂封印挂金与信息港汉谋回粤倒陈》，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7页。

(3) 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4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李厚基

李锡贵

李厚基，字培之，江苏铜山县人，生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其父曾任清军管带，于1900年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作战时阵亡。李厚基少时随父在营念书，1889年任李鸿章的亲兵。1890年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同年毕业，充当直隶总督署的卫队长。1896年在管带任内，作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的随员，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继而跟从李鸿章游历欧美六国[(1)]。1904年为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第二营管带。1909年擢调为新建陆军第四镇第七协第十四标标统，随第四镇统制吴凤岭在小站练兵。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李厚基随清军进攻武汉，升任第四镇第七协协统。民国建立，军队改制，李改任陆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驻马厂。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时，李厚基奉北京政府命率全旅由海道增兵上海。8月13日，李指挥本部人马与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的舰队协力攻占讨袁军据守的吴淞南北塘、狮子林各炮台，迫使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宝山讨袁军首领钮永键率部千余人退守嘉定。此后，袁世凯任命李为吴淞要塞司令。

同年11月间，袁世凯派刘冠雄兼南洋巡阅使，督率李厚基带兵入闽。李到福州后，首先赶跑了福建都督孙道仁，继又解散了国民党人许崇智率领的第十四师，捕杀了李烈钧的参议龚永图。此时，李的资望尚浅，对刘冠雄巴结奉承备至。于是，刘冠雄把福建原有的军队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一混成旅，以王麒为旅长，归李统辖，并向袁推荐，盛赞李忠贞能干。12月底，袁世凯派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第二年7月18日，又晋升李为福建护军使督理福建军务。李厚基从此独揽了福建全省的军权。

1915年袁世凯策划恢复帝制，李厚基积极追随附和，献款资助“筹安会”，与十四省将军联名密呈袁世凯“请速正大位”，并强迫省国民大会全体代表上推戴书。10月10日，袁世凯授李厚基加陆军上将衔，12月底，袁在准备“登基”之时，封李为一等子爵。李当即将福建政府的一切文告改用“洪宪”年号。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改任李厚基为建武将军，仍命督理福建军务。这时，李厚基添招了福建第一旅，派姚建屏为旅长。4月，李厚基撵走许世英，袁世凯任命他兼署福建巡按使，并且接管了以臧致平为旅长的中央第十四混成旅，以加强统治地方的力量。6月，袁世凯死去，李厚基在将军行署设灵堂，率文武官员默哀致祭。

袁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7月6日，段祺瑞特任李厚基为福建督军，暂兼省长。李厚基由旅长擢升至督军，历时不到三年。他在黎元洪与段祺瑞争权夺势期间，支持段祺瑞，在督军团中大肆活动。1917年4月，李厚基赴北京，参与段祺瑞召开的军事会议。他拥护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向协约国公使表示参战的决心，强行参加国务会议，要求国会议员们通过对德宣战案。5月23日，他专程前往徐州参加张勋召开的第四次徐州会议。会上，他既表示“倒黎拥段”，又赞成张勋复辟。但在同一天，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28日命令李经羲组阁。于是李厚基继皖、豫、浙、陕、鲁等省之后，于6月1日宣布福建独立，以示抗拒。

当时独立各省都趁机赶走北京政府任命的并无多少实力的省长，李厚基回到福州后，也于6月4日驱逐了福建省长胡瑞霖。这样，福建全省的军政大权终于全部落入李厚基的手中。

6月22日，张勋率兵入京，李厚基就赶紧宣布福建取消独立。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任命李厚基为福建巡抚。李命令在督军署大堂前后左右挂起龙凤宫灯，以示庆祝。他还向日本驻闽领事大谈恢

复帝制的必要性，说只有一统太平，中日邦交才会得到巩固。但不料当天晚上，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的消息突然传来，他临机应变，急令停葺万寿宫，停制黄龙旗，并通电各省，大骂张勋，吹捧段祺瑞，表示坚决拥护共和[(2)]。7月18日，即段祺瑞重新组阁的当天，段明令李厚基以督军兼省长。

此后，李厚基积极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加紧筹饷制械，扩军备战。他在福州黄店先后扩建了六个军事工厂，还在制造局内办了一个造币厂，仿铸广东毫洋。为讨好段祺瑞，李厚基不等准备就绪，就拉开闽粤战争的帷幕。10月24日，李厚基发电支持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叛变广东护法政府，并电令旅长兼汀漳镇守使臧致平饬队进援；还企图再联络龙济光和李耀汉，一鼓荡平粤境[(3)]。然而事与愿违，11月间，粤军、滇军攻闽节节胜利。李一面派兵增援兴（宁）、梅（县），一面电北京政府告急。当臧致平部被粤军紧逼包围在潮（州）、揭（阳）之时，李望援不至，急如热锅上的蚂蚁[(4)]。

1918年初，李厚基到天津参加十六省区的督军团会议，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南方政府。4月，段祺瑞命令李厚基与浙军师长童葆暄为援粤军正副总司令，李厚基到厦门设立援粤军总司令部，派臧致平、童葆暄、唐国谟为左中右三路司令，姚建屏为省防司令兼闽北防务总指挥，并将十八个补充营编为四个支队（团），派胡思光为援粤军预备队司令官，率队分赴各县填防，并协同各路作战。

6月，北京政府三路出兵南方，令李厚基、童葆暄率闽浙联军进兵广东。此时，驻闽南之北军营长朱德才、陶质彬联合宣布护法，粤军乘机占领龙溪，厦门危急。李厚基大为震惊，迭电北京政府请兵援救，并饬童葆暄部由饶平出击，向粤军发起反攻。正当双方争夺激烈之际，浙军第一支队司令陈肇英于8月在诏安前线倒戈，闽浙联军望风奔溃，粤军、滇军长驱直入，李厚基失地二十余县，丧师两万余众。9月22日，李厚基逃回福州，终日惶惶不安，深恐北京方面出现对己不利的局面。时新任参战督办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发“皓电”向

李劝释，并派参战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率部援闽[5]。李疑神疑鬼，唯恐他人取而代之。

是年10月，由于国际形势（欧战将结束）的影响，全国呼吁和平声浪日益高涨，新任大总统徐世昌按照事前的默契解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李厚基权衡利弊，选择了“和平统一”的道路，与粤军妥协，从11月1日起双方停战，12月6日与陈炯明达成停战协定。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扩展到福建之时，李厚基严禁学生集会，包庇奸商，逮捕《求是报》主笔王醒才，压制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11月16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州台江事件，李厚基慑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不仅不敢出面与日方交涉，而且于28日下令封闭福建学联及其机关刊物《学术周刊》，取缔民众爱国反帝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行动。

1920年秋，李厚基看到皖系已在直皖战争中失败，遂与陈炯明进一步订立了互为利用的协定，接收了粤军在福建所占的地盘。同时，试探着向直系靠近，于是年冬派胡思光为代表去向曹锟、吴佩孚输诚。1921年春，徐树铮又衔段祺瑞命秘密来到福州，劝李与卢永祥合作，共倒曹（锟）吴（佩孚）。李虚与委蛇，阳奉阴违。次年4月，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又获全胜，独掌了北京政府大权，李厚基更觉得有恃无恐，遂想借直系声势除掉异己的臧致平、王永泉两部。6月5日他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师长职务，嗣后又想调离王永泉。

1922年8月，徐树铮在上海策划孙（中山）皖（系）同盟，派人到福州与李厚基商洽。李因已弃皖投直，拒不接见来人。徐遂促王永泉联合北伐军许崇智等部驱李。9月上旬，在王永泉的掩护和牵引下，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顺利到达闽北，徐树铮也潜抵延平，李厚基还蒙在鼓中。9月18日王永泉用重兵在长汀将王献臣部缴械，李厚基才惊惶起来，向曹锟乞援饷械，急派唐国谟部到古田、水

口一带布防。10月6日，北伐军许崇智等部与王永泉部联合进攻水口的战斗发起后，李厚基倾省城的兵力增援水口，至白沙遭北伐军孙本戎旅拦江截击。11日夜，北伐军李福林、黄大伟部由古田绕过水口袭击福州，12日李厚基率卫队退至南台仓前山，突被海军扣留，软禁于马尾军舰上，要李付清积欠造船所的协款。24日，北京政府任命李厚基为“讨逆军司令”，但在此时，徐树铮、王永泉、许崇智等已进驻福州八天了，李厚基身陷马尾，一筹莫展。28日，李厚基交清海军协款后乘运输舰经沪到南京，与杜锡珪、齐燮元商讨反攻福州。11月5日，李携款及大批枪弹抵厦门，讵料臧致平已先达厦门，于11月7日夜发动兵变，李仓皇逃至鼓浪屿，托庇于日租界会审公廨。

李厚基仍不甘心失败，于11月11日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谋联合粤军反攻。虽然北京政府支持李厚基，派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并遣豫军常德盛师援闽，但是福建各界因仇李而拒刘入闽，臧致平与改为东路讨贼军的许崇智、张贞率领的自治军以及李的残部周永桂合作，在永安一带击溃了陈炯明的援闽粤军钟景棠师，又将李的残部张清汝旅在泉州围歼；常德盛师也被王永泉部赶出闽境。

至此，李厚基已是穷途末路，于1923年1月15日，带卫士三十余人取道汕头，遁逃南昌。李将随从的人枪馈赠赣督蔡成勋，蔡谢以程仪数千元。次年11月11日，北京政府特派李厚基为山西援军副司令；后为奖励齐燮元、孙传芳底定浙沪，于15日改派李厚基南下宣抚，妥筹善后[(6)]；24日又任李厚基为全威将军。然而，随着直系政权的倒台，段祺瑞窃踞了临时执政的职位，李遂心灰意冷，由沪转往天津，在日本租界定居，开木行谋生。1942年9月卒。

---

(1)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李厚基》，《支那现代人名鉴》，1924年版，第299页。

(2) 《李厚基支电》，《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99页。

(3) 《李厚基致北京国务院齐电》，《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107页。

(4) 《李厚基致冯国璋佳电》，《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118页。

(5) 徐树铮：《致李厚基童葆暄佳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7—348页。

(6) 《东方杂志》第21卷第21号，第149—150页。

李璜

李义彬

李璜，别名幼椿，号学钝，党号八千。祖籍陕西三原府泾阳县，后迁入四川成都。1895年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生。其父李春舫在成都开设庆协泰号，经销洋广杂货。李璜八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从十三岁起每日上午到英法文官学堂上课，下午仍在私塾念书。1913年离川赴沪，考入震旦学院，学习外文和科学知识，在此结识了曾琦、左舜生等人。1916年从震旦学院毕业后返回四川。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曾琦因反对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归国，他致函李璜约其在北京会面。李璜于1918年8月从成都赶到北京，在京结识了陈淯、王光祈等人。此时的北京已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站在潮流前头的先进青年纷纷成立各种社团，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9月，李璜参加了这个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12月，他离京赴沪，搭船赴欧留学。

离国前，李璜在上海写给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留别信中攻击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说近代欧洲工人运动“所用的手段，都过于猛烈，平民未获其利，先受其害”；对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更是放肆攻击，说它“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1)]。

1919年3月，李璜到法国，入巴黎大学文科就读。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凡尔赛召开和平会议。李璜与旅法的四川同乡周太玄合办“巴黎通讯社”，每周向上海《新闻报》等报刊投稿一次，报道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1919年10月至1921年秋，李璜曾两度离开巴黎，到外地学习。1921年秋重返巴黎大学，继续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

当时旅法共产党人周恩来、赵世炎、聂荣臻、邓小平等在留学生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而李璜、曾琦等则百般抵制和破坏，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李璜是该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胡国伟主办的巴黎《先声周报》上撰文，阐释他们所标榜的国家主义，进行反共反苏宣传。1924年李璜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同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选举领导机构，曾琦当选为委员长，李璜当选为外务部长。

1924年7月，李璜、曾琦、张梦九作为青年党代表一道离法回国。此前，李璜已收到武昌大学发来的教授聘书（由其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余家菊推荐）和三百元大洋的归国路费；曾琦见旅法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纷纷回国，国内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便急欲把青年党活动的重心移到国内，因而极力催促李璜回国。7月27日他们离开巴黎，到马赛乘船。在从马赛到上海的三十多天旅途中，李、曾“共商回国以后，宣传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组织青年党及其活动方针”，他俩还做了分工：曾“先行办报，从主义与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站稳脚跟，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李则“安心努力在国内有名的最高学府教书三年，以博得优秀大学生之信仰，然后宣传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2)]。李璜还在回国的船上撰写了长达三万余言的《释国家主义》一文，后由曾琦1924年10月创刊的《醒狮》周报分期刊载，并以《国家主义浅说》为名印制单行本。

1924年9月4日，李璜船抵上海，很快就转赴武汉，到武昌大学讲授西洋史。在武大，他一面教书，一面笼络学生中的右翼分子，扩充青年党的势力。他后来回忆说：对那些“不满于左派学生之夺去学生会领导权，打算结合同学与之相抗”的学生，“我便因势利导，指示他们先组织国家主义研究会，有十人以上，我便来为之讲演主义、政策以至活动方针”[(3)]。经过李璜一个多月策动，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李璜给它起名为“国铎社”，后来把它扩大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湖北团部。这是国内出现的第一个青年党的外围组织。

1925年暑假，李璜赴沪，与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会晤。鉴于成都、北京、上海、宁波等地也出现了标榜国家主义的团体，他们决定采取“扩大组织与声势”的方针，具体内容是：将设在巴黎的青年党中央党部迅速移到上海，在法国的骨干分子早日回国；在国内组织“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在联合活动中物色和吸收党员；扩大国家主义教育协会的组织。

1925年9月，李璜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兼职在中法大学讲授法文。讲课之余，他仍从事青年党的党务活动。他把北京标榜国家主义的小组织“国魂社”扩大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团部；纠集部分右翼分子，于1926年3月10日举行所谓“反俄援侨大会”，自任会议主席，进行反苏反共活动。

1926年9月，李璜到成都大学任教，并在成都高师兼课，主要讲授社会学与教育学。在成都，他仍一面教书，一面从事青年党的活动。李璜回川前，成都已出现了一个以高师学生为主的青年党外围组织——惕社。李璜到成都后，极力扩大这个组织，到处物色党徒，安插到重要部门，并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四川团部。为了使青年党能在四川立足，李璜与刘湘、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等川中军阀联络，企图以他们作为靠山。

北伐军挺进到长江流域后，鉴于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日益猖獗，中国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0月16日发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命令”，后又下令通缉国家主义派头目，有的地方出现了“捉拿李璜”的标语。面对这种形势，李璜被迫于1927年3月离开成都，经川北、重庆，于10月到达上海。此前，曾琦一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获释后出走日本，设在上海租界内的青年党总部无人负责。李璜到上海后，受曾琦委托，代理青年党主席职务。他在这里结识了张君劢，并与其合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29年春，他在上海创办“知行学院”，自任院长，聘请名流张君劢、张东荪、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任教，为青年党培训了一批骨干。同年秋，李璜将院务交给陈

启天，开始去外地视察党务。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到过华北、东北、广西等地，到处勾结地方实力派，发展党徒。在沈阳，曾会晤张学良、冯庸等人，经他们帮助，使青年党的势力在东北得以发展；在山西，先后会见赵戴文、阎锡山；在天津，专门拜访梁启超，极力拥戴并鼓动梁重新出山，组织新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衡；在广西，他周旋于马君武、白崇禧、黄绍竑之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张抗日。李璜于1932年4月离沪北上，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以东北军中的青年党员和东北讲武堂二百多名学员为骨干，组织学生队伍，出关抗日。他还把淞沪战役中的抗日名将、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引荐给张学良，使翁在长城抗战期间在冀东一带为抗日效力。

“塘沽协定”签订后，李璜于6月出走青岛，8月应曾琦要求回四川主持青年党党务。面对川陕红军力量的壮大，李璜主张用当年曾国藩、胡林翼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办法来围剿红军。在他的极力促使下，四川成立了“安抚委员会”，发动和组织土豪劣绅协助四川军阀进攻川陕红军。他作为“安抚会”委员曾亲自率队前往川北“剿共”前线，给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的“剿共”部队鼓气；并组织地方豪绅出钱出力支持军阀的“剿共”战争。

受“安抚会”委托，李璜于1934年9月19日乘机离开成都，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请求南京支持四川的“剿共”军事。在杨永泰的安排下，李璜9月23日在庐山晤蒋，提出了四川方面的请求。这正中蒋的下怀，因蒋可乘机将嫡系势力派入四川，所以对李的请求当即答应“即行办理”。几个月后，南京派出的参谋团进驻重庆，指挥四川的“剿共”军事。李璜这次庐山之行，应蒋邀请还到赣南的临川、广昌、黎川参观，返川后写了一本《江西纪游》并广为散发，称赞和传播蒋在“剿共”战争中所实行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谋略。

1935年10月，李璜从四川到达北平。他们从东北军内青年党员

的报告中得知，中共正在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情况，深为蒋在西安的安全担忧。1936年11月，李璜奉曾琦之命前往洛阳，以祝寿为名，向蒋进言。经陈布雷安排，于27日晤蒋，转告曾琦对西安现状的忧虑，劝蒋勿去西安，以防发生“肘腋之变”。蒋对此不以为然，对李说红军实力已大大削弱，用不了一两个月时间他即可将红军剿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一方面有感于曾琦的厚意，同时又考虑实现国内团结，便邀曾琦等到溪口一谈。1937年1月，曾琦、李璜和左舜生如约到达溪口，双方长谈甚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李璜与曾琦、左舜生一起，作为青年党方面的代表参加了7月15日的庐山谈话会，后又代表青年党参加国民参政会。1939年3月，李璜率队到川康各地视察，重点考察吏治、兵役、治安民生等方面的情况。

1942年10月，第三方面政治势力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民主同盟），李璜与曾琦、左舜生作为青年党代表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发起。1942年4月，李璜任国民参政会川西办事处主任，负责征兵、征粮等工作。

1945年4月，李璜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侨情，至12月15日才返回重庆。1946年10月，他作为第三方面代表到南京参与国共两党代表会谈的调解，调停未果。

1946年11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李璜作为青年党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青年党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李璜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但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未就。

1949年9月，在解放前夕，李璜自成都去香港，1951年移居东南亚的北婆罗洲达七年之久。同年5月，曾琦病死华盛顿后，在台湾的青年党发生分裂，直到1956年才又重新成立中央党部，设五名主席轮

流执政，李璜是五主席之一。1959年李璜重回香港，与左舜生等人合办《联合评论》杂志，并在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新亚研究所任教。

1978年末，李璜移居台湾。在1979年和1983年青年党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主席。1984年9月，受聘担任“总统府”资政。1991年11月15日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

《醒狮》周报（上海）。

陈正茂：《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李璜先生传》，台北《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

---

(1) 李璜：《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

(2)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2—115页。

(3) 《学钝室回忆录》上卷，第119—120页。

李济

李光谟

李济，字济之，1896年6月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北钟祥双眼井故里。李济天资敏慧，自幼在家塾由族叔启蒙，并由父亲课以诗史。稍长，进县立新制小学堂就读。

1907年李济随家迁至北京，先后就学于江汉学堂及五城中学，曾从林琴南学国文。1911年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当时以学英文为主，辅以各种知识之训练，亦有名师教读国文。李济曾参与组织以砥砺品德为宗旨之“仁友会”及演说、演剧等活动，但无心参加政治及宗教活动。1918年暑期毕业，随即由官费派送留美。

1918年9月，李济进入美国麻州克拉克大学三年级攻读心理学。一年后，他以第二名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受褒奖（第一名为读银行学之徐志摩）。翌年，李济作为研究生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以《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为题的论文获社会学硕士学位。

1920年暑期到1923年暑期，李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他选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在狄克森、虎藤等业师的指导和哈佛的环境影响下，决心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李济经过三年苦心钻研，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后经数年改定最终在1928年由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同时出版。

1923年暑期，李济获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回国到南开大学教社会学。他在南开两年，除任社会学教授外还担任了一年的文科主任。1925年夏，李济受聘回到清华，任国学研究院人类学特约讲师。当时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的头衔是教授，而李济则因为不是专任（校外另有工作），

不能聘为教授而只能任讲师（他也是初期受聘的唯一讲师），先后讲授“人文学”、“普通人类学”、“考古学”、“人体测量学”等课程。

从1924年开始，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驻北京的专门委员毕士博（C．W．Bishop）约请李济参加该馆的考古发掘队。经与丁文江磋商后，决定在保持本方发掘权、采集权、保管权和论文发表权，只向对方提供发掘报告英文本的条件下与之合作。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大学在1925年签订有上述内容的协议后，遂由李济主持并邀地质学家袁复礼参加，一道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作了一次调查和一次发掘（这即是上面所说的“校外工作”）。掘获出土遗物共计六十余木箱，内中大部分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小件陶制品，另有半个已腐蚀的、切割口平直的蚕茧（经几次鉴定确认为家蚕——Bombyx mori的祖先的茧壳）。据此，得以把中国蚕丝业之起源上推至有史以前。这次发掘的意义还在于：（一）它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二）它所用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虽然简单，但很精确。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对李济本人来说，这次发掘则是他从体质人类学研究转向考古研究的一个转折点。

1928年底，李济应蔡元培之聘担任新成立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此后李济大半生的主要活动都是跟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分不开的。随着李济进入中研院，他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也带了过去。

李济进入史语所伊始，就参观了董作宾领导的安阳试发掘（通称安阳第一次发掘）的成绩，并与董商量了今后的工作方案。自第二次发掘起，安阳的历次发掘都是在李济领导下进行的。在第三次发掘时（1929年冬），出土了刻满贞卜文字的大龟四版以及大宗陶器铜器，两万种什物中赫然出现了一片仰韶式彩陶。此片彩陶之发现，得力于终日亲手挖掘、亲眼目睹的结果，由此揭示了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之关系，完全证实了最初所悬的关于有文字之始期与史前文化相连贯的鹄的；这一发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学界。

1930年，因与河南有关方面意见不一，中研院考古发掘一度被迫中断。李济应早年学生吴金鼎之请，率考古团转至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乃有黑陶及供贞卜用之兽骨发现，此一发现足证山东在殷商文化之前有不同于仰韶而独具之文化体系存在。李济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

1931年，中研院恢复了在河南的发掘，系采取史语所与河南地方合作发掘之方式，此一方式一直延续用到1937年春季的第十五次发掘。1931年起，安阳殷墟发掘自小屯扩至后岗，发现了小屯、龙山、仰韶三期文化之叠压现象，足以见三期文化之沟通，并确定其存在顺序。

安阳发掘报告陆续发表后，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叶慈、高本汉、梅原末治等之极大关心，或著论介绍或追踪研究，蔚为风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之《东方学报》更刊发了殷墟专号以记其盛。李济于1932年为前六次发掘作一总体估计，指出：一、殷墟文化层是一长期的堆积，但也有明显的变迁（例如版筑）。二、殷墟文化是多元的，明确始于东方的有骨卜、龟卜、蚕桑、装饰艺术等，但也确有与中亚、西亚、南亚文化有关的重要成分，其结合已有一大段历史。三、殷墟文化是进步的，每一种出土物都表现有变化状态，很少固定样式。在李济此后的许多论著中，既根据事实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又从不无理地否定中国文化对外来影响的吸收和融合。在此前后，鉴于日人侵华野心益显，李济曾为傅斯年等所撰《东北史纲》写成英文节略，斥日人所谓满洲非中国领土之谬说，以正国际视听。1933年李济曾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主席为胡适）。

1933年，李济曾短期任史语所副所长兼社会科学所副所长，并筹划将所址南迁上海、南京事。1934年起，李济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至1947年）；1935年6月起，当选为中研院首届评议员（一直连选连任，直至逝世）。

自第七次安阳发掘（1932年秋季）以后，李济即因所中事务及编辑出版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的冗忙而无法具体领导田野工作，但每次发掘都要抽时间到现场视察和进行指导。殷墟多年发掘的成果，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为世界所瞩目，一时间安阳被称为远东考古圣地。殷墟出土之铜器于1936年春参加了伦敦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引起轰动。1936年冬至1937年夏，李济应邀赴英国14处学府作学术演讲，随后又应瑞典王储、考古学家阿道尔夫·古斯塔夫之邀赴瑞典及欧洲各地讲学并访问，后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荣誉称号。

安阳的第十五次发掘直至中日战争爆发前18天才收工。李济这时正从英国和欧陆讲学返回南京，他立即转入了史语所和中博搬迁西南后方的工作。抗战时期在昆明和四川李庄等地的流亡生活，打乱了学术研究的平静秩序。李济领导下的考古组和中博的学术工作只能维持一个较低水平，但他仍然带领同事努力工作，凡能做的室内工作都开展了。董作宾的巨著《殷历谱》即完成于此时。中博还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办起了石器、铜器展览，学术刊物只能出成很粗糙的本子，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根本印不出来。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条件下，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和四川当地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小规模的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四川彭山崖墓的挖掘，都是当时较好的成绩，其科学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

1946年抗战结束后，李济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为文化顾问，前去日本调查和接收被日本掠去的我国重要文物，收获颇大。他最觉遗憾的是：经过五次探寻，最终未能查明“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

1948年，李济当选为中研院首届院士（终身名誉职），同年年底，他随中研院迁去台湾。1949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同年8月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兼任主任10年。自1955年起，他担任史语所所长17年，并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1973年退休后，仍主持中国考古报告集的编纂工作，以及《中国上古史》文集的编写工作。

在台30年间，李济除教书和偶尔参加田野工作外，一直继续他的室内工作，尤其是殷墟陶器、铜器和石器的研究。他组织全组（一段时期包括全所）同人的研究工作和出版编辑工作。除抗战前后在大陆出版的由他主编的四册《安阳发掘报告》（1929—1933）、四册《田野考古报告》（又名《中国考古学报》）（1936—1949），以及《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的《城子崖》一巨册和之二的《小屯》两巨册外，在台期间由他主编出版或任总编辑的学术成果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和之三《侯家庄》共计二十三巨册，《古器物研究专刊》计五巨册，他担任主编的史语所集刊及台大考古人类学刊共三十五册左右，还有《中国上古史待定稿》（文集）第一册。这些成果反映出李济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此外前后出国讲学访问开会达十数次，但从不接受高薪聘请滞留国外，他认为自己最后的学术根据地还是在国内。

李济为开拓和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竭尽心力，他把中国历史当做全人类历史的部分，坚持在中国境内做现代学术工作，主张自己动手动脚，以真实材料为根据，“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从领导殷墟发掘开始，就与全体同事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人自己绝不收藏古物。”并身体力行，终生不渝，真正做到了把科学探求和无私奉献融为一体，实属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台北《传记文学》1967年第11卷第3期。

李济：《六十年前清华大学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1978年第32卷第6期。

《李济之先生行述》，台北《湖北文献》1979年第13期。

冯人：《考古学家李济传略》（附：专著、论文、杂著、翻译、书评介绍），《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

李济深

周兴樑

李济深，原名济琛，字任潮，广西苍梧县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祖父李炳光是秀才，父亲李均尚是廪生，均以教书为业。李济深六岁丧父后，随叔父李均良念书，十二岁入馆，习八股文和策论。1901年十六岁时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就读。

1904年，李济深入广州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两年后转入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先到广东新军中任见习官，后入学兵营当排长，与连长邓铿相交莫逆。不久，他入广东讲武堂继续学习。时逢清廷军咨府开设的保定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学员，李于1910年入保定军校（后改名为陆军大学）深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和军校部分师生投入反清斗争。1912年初，李从北京南下至上海，求见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旋被委任为作战参谋，参加固镇、宿县、徐州等战斗。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广东北伐军回南京接受编遣，该部被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二师，他升任师参谋长。1913年陆军大学由保定迁北京开学，李济深重返陆大第三期学习。毕业后，他留校担任教官五年，尔后不少陆军将校均出自他的门下。

1921年春，李济深回家探亲，在广州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挚友邓铿。时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进行第二次护法斗争，李被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挽留，先后任第一师副官长、师参谋长等职。从此，他笃信三民主义，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第一师为陈收买而倒戈，李愤然离开第一师。不久，孙中山派人到广州告诉他，千万不可消极而离开第一师，李乃返任师参谋长，与师长梁鸿楷率部驻防肇庆一带。12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东下讨伐陈炯明，李济深所部与滇桂联军合力克三水、下广

州，将陈炯明叛军逐至东江一带。李又率部进驻江门，收服了隶属于陈炯明的陈德春部，负责拱卫广州。

1923年3月，李济深升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一军参谋长。4月，驻西北江的桂军沈鸿英部发动叛乱，李即奉命率部平叛，7月被孙中山委任为西江善后督办处督办、梧州善后处处长。李积极绥靖地方，整顿税收，筹集饷款，减轻了广州大本营的财政负担。同时他又致力于整军经武，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培训两广军事干部，并努力支持中央讨贼军第五师黄绍竑联络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进行讨沈斗争，以收拾广西政局。他扶植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势力的壮大发展，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深。

1924年初，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委任为军校教练部主任，后升为副校长，对军校的创办及培养军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10月广州商团叛乱，李为平定这场叛乱出了力。

1925年1月，陈炯明叛军趁孙中山在北京重病之际阴谋反攻广州，革命政府军于2月初出师东征。李济深派所部陈铭枢第一旅参加东征右路军作战，自己则率陈济棠等部赴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集中全力大败沈鸿英部于桂林、柳州一带，从而为新桂系统一广西奠定了基础。是年6月，滇桂军在广州发动叛乱，李奉命率第一师会同湘军等由西北江回师戡乱，歼灭溃败之桂军残部。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后，李当机立断扣押了涉嫌“廖案”的粤军军长梁鸿楷，并接替其军长职务。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统一军政，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0月，广州国民政府第二次出兵东征陈炯明部，李任东征军第二纵队司令，率部协同第一、三纵队消灭了陈炯明叛军，收复东江全境。12月初，李出任南征军总指挥，讨伐邓本殷部，于1926年1月最后消灭了邓部残余，为广东全省的统一立下重大战功。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他于2月凯旋广州后，兼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

国民革命风云激荡之际，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李济深等对蒋的行径甚为不满，要其“自请处分”[1]。5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派兵入湘援救退守湘南的唐生智第八军，李派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师及叶挺独立团，会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钟祖培旅进军湘南，一路奏捷。7月，北伐军大举出师北上，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的身份留守广州，同时负责北伐各军的后勤补给工作，使北伐无后顾之忧。当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前，广东省政府改组，李又兼省主席及军事厅厅长。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广州分会，他任主席。

在北伐胜利的高潮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对中共的政策措施日益怀疑和不满，李济深对国共合作亦生芥蒂。李支持蒋发动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又追随蒋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清党，捕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并支持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后来李对自己参与清党反共的这段历史一直深感愧疚。

李济深在广东的领导权维持未久，1927年11月汪精卫利用张发奎等发动政变，使他多年经营的地盘毁于一旦。12月，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与陈铭枢等联合，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并将张发奎等赶出广州，重新夺回对两广的控制。1928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李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重设广州政治分会，李任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积极推动对奉张的北伐。同年10月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总参谋长。

1929年初，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等在“编遣”裁军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矛盾，蒋桂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3月下旬，李济深到南京调停蒋桂矛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他不同意政府下令讨伐桂系，触怒了蒋介石。蒋遂以蓄意勾结桂系对抗中央的罪名，将李扣押在汤山，并宣布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后又将他移南京鼓楼

软禁达两年半之久，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才获释恢复自由与党籍，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务厅长。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训练部训练总监。在国难当头之时，李曾要蒋发布“罪己诏”和在政策上改弦更张，蒋非但不听，还派人杀害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此，李济深逐步认识了蒋介石独裁误国面目，开始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李济深满怀一腔爱国热忱，建议蒋介石下令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参加抗日，并为此亲往北平劝说张学良。蒋表面上应诺，暗中却派人携信令张学良不要让义勇军进关。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5月委任李为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司令由蒋兼任），命其指挥进攻红军；同时蒋又命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攻红军。李反对蒋之所为，愤而辞职去香港。

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决定实行联共抗日反蒋方针，得到李济深的赞同。18日，李由香港返抵福州，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选李为人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在李济深的领导下，发动民众掀起抗日反蒋运动。可惜未及两月，即被蒋介石武力镇压，李因此被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开除党籍，并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再次被迫亡命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抗日斗争。

1935年夏，李济深得共产党人宣侠父等的支持，在香港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一起组建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任同盟主席兼组织部长，并出版《大众日报》宣传抗日反蒋。1936年6月，李积极支持陈济棠和李宗仁等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同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李通电呼吁一致对外，挽救国家危亡。次年3月，周恩来派人到梧州，向他转达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十点主张。李听后甚为振奋，表示赞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赴国难，李济深在蒋光鼐等陪同下由广西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布恢复其党籍，并派他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他曾到太原会见阎锡山，促阎努力实行抗战。南京沦陷后李到武汉，写信建议蒋介石实行政治民主和全民抗战，延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蒋介石对李的建议不予接纳，李遂离汉而去桂林。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蒋介石为缓和矛盾，请李济深赴重庆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自兼）。李向蒋提出大力起用抗日志士，同时延聘了一批共产党人到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职，并推荐不少进步人士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坚持团结抗战。李的这些做法引起蒋的不快。1940年4月，蒋改派李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

李济深在桂林期间，尽力影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发奎、薛岳、顾祝同等坚持抗战，大力保护民主力量在桂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桂林地区呈现的一片抗日民主景象，令蒋介石感到不安。蒋于1943年底下令撤销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调李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坚辞不就，留在广西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大举南下。李济深组织募款劳军活动以激励士气，还在桂林发表广播演说，呼吁消除失败主义，实行民主和依靠民众抗战到底。8月，李到贺县八步，与何香凝、柳亚子等共商如何坚持敌后抗战问题，向民众宣讲团结抗战的道理。桂林、梧州相继失守后，他回到苍梧大坡山，组织建立苍梧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等机构，指导桂东南人民进行抗日民主斗争。1945年初，他先后至岑溪、容县、北流、玉林等地，发动民众投身抗日保卫桂东南斗争。同时，他派人沟通与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及东江纵队的联络，协助中共进行争取张炎所部高雷人民抗日军的工作。3月间，李到广东罗定县找蔡廷锴，协同推动谭启秀等建立和扩充三罗地区的抗

日武装。在国民党“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抗战胜利前夕，李济深与何香凝商量组建民主派政党问题，分头进行筹备工作；1946年初到广州联络国民党内民主力量，于3月12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接着至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冯玉祥、黄炎培等多次商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派王葆真等人去北方联络爱国军人反对内战。他应蒋之邀登庐山，与蒋谈话两次，并写长信劝蒋实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建设中国，不打内战。但蒋敷衍应付。李看透蒋无意实行民主和停止内战，遂离开庐山避居上海。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陈诚暗中许诺李济深将来为副总统候选人，拉他出席会议。李不为所动，拒绝出席。次年2月，他以归乡扫墓为辞离开上海赴香港，在港多次发表反蒋言论，并发表对时局的七项主张，要求蒋介石结束独裁政治，实行和平民主建国方针，以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来改造国民党。他还与何香凝等致电苏、美、英三国政府，要国际社会不要支持南京的独裁政权，并在告海外同胞书中痛斥蒋氏误党祸国的种种罪行。李的这些言行引起各界强烈反响。蒋恼羞成怒，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以“勾结共党、诋毁政府”等罪名，第三次开除李的国民党党籍，李对此一笑置之。

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北，国民党统治加速走向崩溃。李济深与何香凝等在港进一步集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筹组新的民主派政党，以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经过周密紧张的筹备，李济深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决定由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民主派人士，联合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李济深当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同年春，蒋介石在南

京召开国民大会，李济深以“民革”主席名义发表声明，不承认南京“国大”选出的总统。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李热烈响应。5日，李与何香凝等致电毛泽东，谓中共的号召“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特通电海内外激励国人一致“共同策进”[(2)]。此后，民革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其成员分往各地，联络国民党的爱国将领，晓以大义及利害，进行策反工作。李本人除劝说桂系将领外，又派人去做卢汉的工作和策动刘昌义起义；他还嘱赖慧鹏辞去广东怀集县长职务，返广西组织力量，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活动。

1948年12月，李济深应中共中央邀请离港北上，于1949年1月10日抵达东北沈阳。旋发表《对时局之意见》，表示要在中共领导下贡献绵薄，共策进行，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参观东北解放区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选为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李济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此后，李还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等职。他晚年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大量参与国事活动。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患胃癌和脑血栓医治无效而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李济深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民革中央军事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资料选

编》，1985年版。

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

(1) 李济深口述，张克明笔录：《李济深的略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香港《华商报》1948年5月6日；何香凝著，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页。

李剑农

萧致治

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清光绪六年五月初三）生于湖南邵阳西乡滩头（今属隆回县苏塘乡）。早年在农村私塾念书，后就读于邵阳经正书院。戊戌变法时期，李剑农受到湖南著名维新派樊锥（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的影响，同情变法维新。1904年春，李剑农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专攻历史。1906年，由同学曾广缄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1908年秋师范毕业，留校任教，暗中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

1910年春，李剑农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曾参与同盟会的一些革命活动。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李停学回国，参加革命活动，曾撰写《武汉革命始末记》[(2)]一文，在上海《民国报》第一号上发表，热情赞扬武昌起义。

1912年初，李剑农应汉口《民国日报》发起人张秉文之邀，任新闻编辑。后来，该报由于反对袁世凯推行独裁统治，于1913年6月24日被查封，报社人员遭到通缉。李剑农在国内无法活动，同时感到要建立民主共和国，需要有欧美民主政治知识，乃于同年7月赴英，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留英期间，李对欧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政治史和宪法史，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1916年夏，李剑农由英返国。这时国内军阀割据，政治紊乱，国力凋敝，疮痍满目，他深感要求得国家富强，必须先使国家统一。他主张仿行联邦制，采取联省自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当时，曾经赞助过武力统一的进步党首领梁启超、熊希龄等人，亲睹武力统一无法实现，也在鼓吹由分省自治进而采用联邦制统一全国。李剑农的主张和

梁启超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回国后，他担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员，专写政论，揭露军阀暴行，鼓吹政治改良。不久，他又联合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等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自任编纂主任，介绍西方政法知识，积极宣传联省自治。

1917年冬，李剑农在《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八、九两期上连续发表以《民国统一问题》为题的政论文章，指出中国已到了地方势力增长、中央政府不能统驭的时候，不采取联邦制，不能恢复中央政府的实力，得到真正的统一，并发表《时局罪言》、《地方制之终极目的》等政论文多篇，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他的联省自治的观点和主张。

1919年8月至1922年冬，李剑农受聘担任汉口明德大学教授。1922年，李又在《太平洋》杂志第三卷第七期上再次以《民国统一问题》为题发表政论文章，指出根据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采用武力统一办法，“不惟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要中华民国真正的统一，只有采取联邦制的一个办法”，继续鼓吹联省自治。

在这前后，南北军阀混战不休，人民深受其害，联省自治的思潮风行一时。湖南政要谭延闿、赵恒惕利用湖南人民由于厌战而产生的自治要求，在境内推行制宪自治活动。1921年，湖南省长赵恒惕特聘李剑农等十三名省内外知名人士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由李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3)]。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按照省宪规定，省长以下设内务、财政等七司，由七司司长组成省务院，互选一人为院长，辅佐省长工作。同年12月，李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当时地方实力派不过是打着联省自治的幌子，实行割据自雄，并无自治诚意。赵恒惕也不例外。所以，李虽担任省务院长，其联省自治主张依然无法实行。后来李深有感触地说：“想在军阀混战中联结邻省保持苟安局面，脱离混战局面，妄想以此挽救国家危亡，事实证明，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4)] 1924年10月，赵恒惕修改省宪，由省长兼任省务院长。李于11月离职，从此不愿再写政论。

他渐悟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了解不深，决心研究中国历史，想当一名超政治的学者[5]。

1925年，李剑农和友人彭一湖在长沙办了一所晨光学校，以不介入政争相标榜。入学前，学生须保证不加入任何党派。入学以后，每人置一部《资治通鉴》，限一年读完，并做出笔记。晨光开办不到两年，北伐军进入湖南。校内早已渗入各种党派人物。彭、李等的设想被现实粉碎，感到办学宗旨无法贯彻，就停办了。李剑农继政治上失意，办学又受挫，对北伐持旁观态度。但他赞成国民党改组，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6]。

1927年夏初，李剑农离开湖南，再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这期间，除书刊编辑工作外，他专心于戊戌以来中国政治史的研究。

1930年秋，李剑农接受武汉大学聘请，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以后曾任武大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湖北，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他因家庭牵累不能入川，回到湖南老家。在家乡居留期间，李倡办松坡中学于隆回桃花坪，又发起编印蔡松坡遗集，并亲为之作序；还与友人倡议募资建立松坡图书馆。该馆与中山图书馆、船山图书馆为湖南三大图书馆。从1940年夏到1945年冬，李一直在蓝田（后迁溆浦）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主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课程。他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持明哲保身态度[7]。

1946年，李剑农借聘于湖南大学。1947年以后，一直在武汉大学执教。在这两校他仍讲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就接触过一些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真诚的爱国力量，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物价飞涨，人民愤懑，使他益加寄希望于共产党[8]。淮海战役后，他更断言“蒋党必垮

台，中共必胜利”[9]。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表示决不离开祖国大陆。湖南解放前夕，李回到邵阳，参加唐生智组织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和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7月，李剑农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至1963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1963年12月14日，李因患动脉粥样硬化症在武汉去世。

李剑农从1925年起，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28年，他以“半粟”笔名出版了《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1930年，写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太平洋书店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后又将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政治斗争补写了三章，由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合印成《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6年由启明书局出版。1947年，又由商务印书馆改排重版。解放以后，他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删去《导论》和第十二章《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解释和今后去路》，改名《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1979年重印。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1956年，《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由美籍学者邓嗣禹和Jeremy Ingalls依据商务版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先后印行三次，共发行五千二百册。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对该书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对西方的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记事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的价值”[10]。另一名中国近代史学者林伯格（G．C．Linebarger）则说：“李剑农的政治史对于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书。”[11]

李剑农的另一部著作是《政治学概论》，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大学丛书。该书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作了综合的通俗的介绍。

李剑农从1921年起就注意研究中国经济史。他在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时，对中国古代经济资料作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编成《中国经济史》讲义印行，1943年由蓝田中国书局出版。解放后重加整理，1957年至1959年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三册经济史稿出版。1962年后转由中华书局据原纸型重印。该书文字通畅，体裁严谨，对各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财政等方面均有清楚的讲述，勾勒了中国三千多年经济发展的概貌，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系统的中国经济史专著。李自认为此书较《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有保留价值。1990年—1991年，经彭雨新等校改，又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二、三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剑农治学态度谨严，言必有据。他为编写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三十年如一日，夜以继日，浏览古代文献，参考各家著述，勤学苦思，力求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探求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书中确有不少创见。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自学，常以“自学为主，勤奋努力”等语勉励后学。

主要参考资料

李剑农档案（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蓝田国立师院1942年版，蓝田启明书局1946年版，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

《政治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中国经济史》，蓝田中国书局1943年版。

《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重印。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

《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

李琮池、梁希杰等回忆录及访问刘寿祺记录等。

《明清史讲稿》（手稿）。

---

(1) 李剑农自填高等学校教师登记表（李剑农档案，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2) 《民国报》第一号，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一日。

(3) 李剑农：《我的社会关系》（李剑农档案，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4) 梁希杰：《有关李剑农先生的点滴事迹》（原稿存萧致治处）。

(5) 李剑农：《我的社会关系》（李剑农档案，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线装本，第4册，启明书局版，第35页。

(7) 梁希杰：《有关李剑农先生的点滴事迹》（原稿存萧致治处）。

(8) 梁希杰：《有关李剑农先生的点滴事迹》（原稿存萧致治处）。

(9) 《李剑农小传》（油印草稿，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10) *Am．Hist．R*（《美国历史评论》），AP，57．

(11) *Current History*（《现代历史杂志》），Jan，57．

李经羲

张树勇

李经羲，字密生，一字仲仙（仲轩），号悔庵，晚号蜕叟，1857年（清咸丰七年）生，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李文安中过进士，授刑部郎中，父亲李鹤章在家乡办过团练，官至甘肃凉州道员，和李鸿章是同胞兄弟。李经羲幼年和青年时攻读“四书”、“五经”，1879年由廪膳生考取优贡，之后参加朝考获一等以知县用。1885年，他报效海防经费，得以道员尽先选用，越二年授四川永宁（叙永）道。在其任职期内以镇压马边、屏山等地彝族起义有功加授二品衔。1891年顺直地区发生水灾，他赈灾有功，着服阙后以道员记名简放，1893年补授湖南盐法长宝道。1897年补授按察使，次年任福建布政使，1899年1月改任云南布政使。

1901年4月，李经羲升任广西巡抚，旋调云南巡抚，1902年奉旨开缺，返回合肥家乡，是年被赏给三品顶戴，年末接任贵州巡抚并兼贵州提督。1904年5月，再调任广西巡抚，赏给头品顶戴。在其任内整顿广西团练、保甲，稽查户口，实行治匪与治民合一；并招募新兵组建一个营，还开办随营速成学堂，以整顿兵制。次年10月以病免职，后任安徽铁路矿务总理。

1909年1月，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为了控制军权，他起用留日士官生，调原在广西任巡抚时的部属蔡锷、唐继尧等任新军的协统。任职期间，他提倡兴办实业，主张开矿产、筑铁路、办工厂，用以充实边区。为此提出试办滇矿公债，用以筹集办矿资金；还开办新式学堂；并计划修筑滇桂铁路。但他对云南人民掀起的第三次争回东川铜矿等七府矿产运动却奉命查禁，驳回云南人民的废约请愿书，允许英法的兴隆公司“依约开矿”。之后，兴隆公司准备以铁路投资换取废除

七府矿约，索取大量废约补偿时，他又立即赞成，准备以滇桂、滇蜀两铁路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收回矿权，结果是出卖了路权。当英国强占片马时，他指斥英方为非法，要求及时补立正式界碑，向英国进行了严正交涉。在全国立宪运动高涨之时，李经羲领衔各省督抚奏请朝廷，请开国会实行宪政，并请准予在云南提前筹办宪政。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李经羲命陆军小学堂总办李烈钧为赴北洋观操员，命第七十四标统罗佩金前往越南接运军械，将第七十三标之第三营裁并，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另调一部巡防营到省城防范，于总督衙门和五华山等要地构筑工事，甚至企图搜捕革命党人。是年10月27日腾越爆发起义，李等非常惶恐，于次日下令收缴新军枪械严加防范。29日晚，新军第七十三标李鸿祥部在北校场提前发动起义，他下令第三十七协统蔡锷进城救援，并以巡防营两个营及辎重营、宪兵营、机枪队等占领五华山以东的武侯祠、劳公祠等高地，向起义军反击，同时加强总督衙门的守卫兵力。蔡锷接李经羲命令后，得知起义军提前行动乃整队出发攻城，次日各路起义军攻占五华山、总督府，他逃往谘议局躲避，后经蔡锷让李根源放其出境，前往香港暂避，后赴上海。

1913年2月，王芝祥、于右任等在北京组织国事维持会，李经羲参加该会。同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建立其独裁统治，于11月另设政治会议代替国会，李任政治会议议员，随后被指定为议长。政治会议开会时，李秉承袁的旨意提出解散国会建议案。翌年1月袁世凯颁布约法会议条例，3月李又兼任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委员会委员长。5月袁世凯设参政院为大总统最高咨询机构，李被聘为参政，10月又任审计院院长。之后，袁公布《文官官秩令》，1915年1月授给他中卿加上卿衔。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12月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享有在袁面前免称臣免跪拜、赏乘朝舆、临朝时赐矮凳儿，以及赏特种朝服和岁费银二万元等特殊荣宠。1916年初，云南护

国军兴起，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各地更加强烈的反对，袁示意李前往云南对蔡锷实行宣抚，李不愿贸然前往，没有追随袁世凯。因此，当袁世凯病死后，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帝制祸首，李不但未受牵连，且还为严复、刘师培等出面说情。

1917年春，李经羲先后任段祺瑞和伍廷芳内阁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总办。当北京政府发生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邀请徐世昌、王士珍出来组阁未果时，李出任国务总理。原因是，黎元洪与李经羲和淮军将领张勋等有些瓜葛，由他组阁可望拉拢张勋和安定北洋派。黎元洪取得冯国璋、王士珍的同意后，由王向国会推荐李任国务总理。李经羲鉴于两派斗争激烈，局势十分复杂，待在北戴河一面打电报给张勋询问行止，一面给黎元洪打电报表示不能马上进京。5月28日，倪嗣冲在安徽宣布独立，继后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直隶、奉天、黑龙江、浙江、福建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而段祺瑞则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宣布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与北京的黎元洪分庭抗礼。在此严峻局势下，李经羲虽已到了天津，但也只能待在英租界里。黎元洪再三催他赴京上任，并派秘书夏寿康和军事顾问金永炎前往劝驾，李则请黎元洪让张勋进京调停并保驾，然后始可前往。6月上旬，张勋率辫子军进了北京，中旬李才在张勋伴随下赴任。李经羲到了北京，仍然遭到日本及各地督军的反对，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都劝他退职。张勋赶紧联合王士珍替李疏通，冯国璋亦出面调解。时督军团对内阁发生意见分歧，段祺瑞想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于6月下旬宣布撤销“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各省反对之声渐趋缓和。22日李经羲勉强上任，声明愿三个月即行让贤，随即宣布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谷钟秀为农商总长，龙建章为交通总长，而自兼财政总长。李内阁虽勉强凑成，但因有的人不愿入阁，以致阁员残缺不全。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帝制，李经羲内阁随之瓦解，

成为北京政府历届最短命的内阁。李趁张勋复辟混乱之际，化装成搬运煤炭的工人逃到天津。4日李经羲发出通电，历述张勋复辟经过，自认“躬与其事”应受“重诛”，张勋“造恶构乱”，“罪不容诛”，但要求网开一面，“容其穷蹙知归”。6日，代总统冯国璋宣布免去李经羲的职务，他从此离开政坛，嗣后由天津移居上海，长期做寓公。

1925年9月18日，李经羲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方裕谨：《李经羲》，郭汉民、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8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5页。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97页。

张朴民：《昙花一现——李经羲》，《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列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9页。

李景林

娄希彦

李景林，字芳宸，又字芳岑，直隶（今河北）枣强人。1885年3月28日（清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生。其父在乡务农，目不识丁。李景林少时任侠尚义，爱好击剑，受业于岳丈朱作哲门下，博涉群书，深得朱的器重。在县立高等小学就读时，正值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他投笔从戎，入北洋新军当兵。继而入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为“协和”头班学生。1907年毕业后充禁卫军下级军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李景林随禁卫军南下镇压，任清军第二敢死队队长，率队抢先占领汉阳龟山，得清廷赏穿黄马褂。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李景林应鲍贵卿之招，充黑龙江巡防队军官，隶许兰洲部下。1914年，许兰洲任黑龙江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擢升参谋长。镇守黑龙江期间，曾挫败沙俄侵犯阴谋，所部被誉为“东北长城”[(1)]。1917年秋，李随许兰洲投奉军，驻防奉天西安（今吉林东辽）县。1918年，任援陕奉军司令部参议。1919年1月，任皖系参战军曲同丰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任事未久，与徐树铮龃龉，转投曹锟，1920年直皖战役中攻徐甚力。事后潜往奉天投效。李练兵以善于“疾行军”著称，屡有战功，受到张作霖的重用。1921年，任奉天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兵三路与直军激战。李景林任奉军东路军第三梯队司令，在马厂旗开得胜，张作霖为其记大功一次，升任奉天陆军第一师师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李景林升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任副军长。李率部进入热河，占领朝阳。9月末，占领建

平、凌源，其先头部队抵冷口附近。在接连击败米振标的毅军、龚汉治的直军等部后，10月28日占领滦州，并向天津方向急进。由于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直军很快在主战场山海关溃败。李景林抢占天津，并在大名、保定一线布防。11月13日，直隶绅士边洁清、贺湘南等以各界代表名义，公推李为直隶保安司令。1925年1月17日，段祺瑞征得张作霖同意，发表李为直隶军务督办。李任督办后，力图自兼省长，以谋军政统一，经过与吉、黑榷运局局长阎廷瑞等激烈争夺，直至1925年6月30日才由段祺瑞明令发表李景林兼任直隶省长。

李景林督直后，恣意掠夺财富，在各部门安插亲信、同乡。当时天津民间流行顺口溜：“李景林坐天津卫，鸡狗都上税”，“会说枣强话，就把洋刀挎”，“沾着枣强边儿，大小坐个官儿”。李景林为筹付奉军军饷，聚敛财富，采取增捐加税，压榨盐商，没收、查抄某些人的所谓非法收入等各种手段进行敲诈勒索，各处勒索来的款项，均由李景林直接支配。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天津民众起来声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声势浩大。李景林连日召集军警、绅商商量对策，并派军队严加戒备，重点保护日商在津的各纱厂，镇压游行群众。8月11日，裕大纱厂两千多工人罢工，李景林派军警镇压，工人与军警冲突，当场被打死八人，伤数十人。裕大工人又联合其他纱厂工人前来声援，缴获一些军警的枪支，并将工事房和部分机器砸毁。当天李景林逮捕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和工人数百人，打死工人十余人，伤百余人。此后许多工人失业，缺衣少食，天津一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

当时张作霖一方面向南方扩展势力，但其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李景林虽然做了直隶督办兼省长，但仍受制于张作霖，如张不准他扩编军队，又屡索巨款等。还由于这时郭松龄部常驻天津附近，李误认为是奉张派来监视他的，随时会有夺取直隶地盘的可能，时常对其左右说：“我要扒掉胡子皮，不扒掉胡子皮，我是出

不了头的。”[2]

同年11月12日，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李景林、郭松龄部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李则坚持反对战争，力主和平。郭还秘密串通冯玉祥，联合倒奉，并要李景林参加。李态度犹豫，加之老母在奉，恐被加害，因此未在郭冯密约上列名，仅要求事成后黑龙江归他管辖。郭未置可否，只答应保证他的直隶地盘不动。郭松龄在赴滦部署倒奉前，曾到督署晤李，郭对李说：“这一回你要扒掉胡子皮了。”李答道：“你真行，我不如你，我一定跟着你走。”[3] 11月22日。郭冯正式签订密约，并把李列为丙方，规定胜利后，“直隶、热河归丙方治理”[4]。23日郭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李派代表参加。25日，李景林在郭松龄发出讨奉通电后，亦通电要张作霖下野，但言词缓和，劝张“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5]。李将所部军队暗改为北方国民军，自称总司令，印制了北方国民军的符号、证章和旗帜等；还令大名、保定防军让出防地集结天津附近。但是李军在保、大撤退时，忽然受到国民二军的袭击，李认为冯玉祥背信弃义；且郭冯密约中，有冯军可自由出入海口之辞，李怀疑冯有攻占天津、夺取直隶地盘的意图。与此同时，张作霖加紧了对李的拉拢，而李这时又探听到天津日本驻军司令官小泉转来关东军方面的电讯：“东三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郭冯的军队，决不能进入奉天。”[6] 于是李景林态度急剧变化，决心背郭阻冯，遂以荣臻为第一军军长，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在马厂、汉沟之线布防。

12月3日，李发出“力主和平通电”，云“只问赤不赤，不问敌不敌”[7]，正式与国民军开战。12月4日，李将郭松龄送来拘押的赵恩臻等四名师长放回奉天。战事开始后，冯玉祥指挥国民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李军；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为南路，于4日由保定攻马厂；国民一军张之江部为北路，于5日由落垡攻杨村；国民三军孙岳由陕西赴保定为一、二军声援。李景林于8日先到马厂击退邓部；10日回津又向杨村进兵。10至15日，李冯两军在杨村展开了极其猛烈的争夺战，京

津、京浦两路火车停驶。在这次争夺战中，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仅杨村一地就遗下尸体四千余具。李景林虽然竭尽全力拼杀，但是国民军调兵遣将于20日发起反攻，天津陷于半月形包围之中。22日，李打电报问吴佩孚应否死守天津，吴叫他保全实力，退往山东。李遂于24日放弃天津，先避入日租界，后于29日乘舰抵济南与张宗昌会合。

在这次冯李交战中，日本除增兵东北外，又调兵增援天津，日舰开到中国达二十七艘之多。李景林在避入租界后，曾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向司令官小泉详述战败经过。小泉说："目前尚有日军八百余人，可乔装李军模样，把国民军入津先头部队赶出天津。"李落泪说："谢谢盛意，但我大势已去，不必多此一举。惟要求退入租界的我部属，请予以保护。本人将赴济南，以后还望多予协助。"[(8)] 离津时，李顿足挥泪，不胜感伤。

李景林失败后，国民军势力不但控制了京、津，夺取了直隶、热河，而且逼近山东。在南方，广东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北伐战争正在准备之中。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日益引起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的惊慌。1926年初，在日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张作霖与吴佩孚打着"反赤"的旗号联合起来。他们的企图是："先扑灭北方的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以期实行全国的刷新。"[(9)] 张、吴联合后，立即会同李景林、张宗昌对国民军实行夹击。李景林虽然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实际上则两人都在为自己争夺直隶地盘。李景林急欲收复天津，回任直督及省长，即于同年2月指挥所部北攻，先后攻占了沧州、献县和青县，于2月23日到达马厂。李景林从德州赶到沧州，在车站办公。国民军以鹿钟麟为总指挥，猛烈反攻，李军不支，部分败军退到沧州。李景林急电张宗昌请援，但援军迟迟不到。李在车站办公室痛哭，对其左右说："什么都完了，张宗昌的军队先入天津，就没有我们的了。"[(10)] 张宗昌见李军已损失过半，即令徐源泉军北上，并派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大举反攻。此时日本军舰直抵大沽口，向国民军射击，国民军不得不解除对大沽口的封锁。奉军由张学良率领入

关，逼近天津，直鲁联军转败为胜。国民军见形势不利，于3月21日下令总退却，22日夜全部撤出天津。

张学良召开会议决定：一方面由直鲁联军追击国民军，一方面由李景林、张宗昌署名电请张作霖、吴佩孚来津共商国是。张作霖于3月29日车抵秦皇岛，在列车上召开会议，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人均前往参加。李心里明白，天津之战自己实力损失殆尽，此次反攻天津多赖鲁军，因此在会议上表示自己不再回直，推荐褚玉璞为代理直督，自己专负前线军事之责。李原想以此谦让取得张作霖的谅解，孰知张作霖顺水推舟，当即任命褚为直督。李景林无奈，但他未就张作霖任命之训练督办之职，仍以前敌总司令名义，指挥以荣臻为军长的所部，伺机而动。此时张作霖与吴佩孚、阎锡山联合打着“讨赤”的旗帜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李景林不甘心为奉张继续效命，遂密派参谋长潘敦与靳云鹗、孙传芳联系，秘密结成李、靳、孙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大联合，密谋共同讨伐张作霖，约定各个具体行动。正当这个秘密结合渐臻成熟之际，阎锡山截获了冯、靳磋商的密电，立即电知张作霖；李景林派潘敦联靳之事，亦被部下荣臻向张作霖告了密。张作霖于6月底令张学良第三军包围了李景林部，驻杨村李军之赵杰部由褚玉璞解除其武装；其余仍由荣臻统领，并任命荣臻为镇威军第十二军军长，李景林企图破灭，仍潜返天津，通电下野。

李景林下野后，寓居津门，伺机而动。1926年9月间，北伐军两湖奏捷，迫近江西，李景林见有机可乘，乃修书孙传芳建议北洋各派大联合，共同抗御北伐军，并表示自己可以亲赴九江。孙传芳夜郎自大，说北伐军没什么了不起，他的军队正在胜利前进。未理睬李的建议。1927年3月，北伐军次第占领南京、上海，李又派潘敦赴南京求见张群，商讨投蒋计划。潘敦回津报称：蒋介石“欢迎李芳辰即日南下”[(11)]。4月初，李秘密乘日轮“长安丸”离津。张作霖得知李出走的消息，急派褚玉璞检查“长安丸”，欲逮捕李景林。由于得到日人的掩护，李景林等安然离津，先至日本门司、长崎，随又换船到达上海，

由张群陪同前往南京，受到蒋介石的设宴招待。4月10日，李被任命为直鲁军招抚使，并成立招抚使署，收容旧部。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成了安国军元帅府，奉系势力盛极一时，直鲁军趋炎附势，李景林的招抚工作毫无进展。8月，蒋介石下野，李景林只好至沪当寓公。

1928年4月，李景林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国民政府成立国术研究馆，张之江被任命为馆长，李景林因精于剑术而任副馆长。1931年1月，李景林为调处韩（复榘）刘（珍年）对胶东之争夺，应韩复榘之邀，移居济南，成为韩的座上宾。同年11月13日[12]，因痢疾不治，病逝于济南。

---

(1) 贾恩绂纂修：《枣强县志》卷上、中，1935—1936年版。

(2)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4)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5) 《益世报》1925年12月30日。

(6)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7) 《益世报》1925年12月7日。

(8)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9) 《向导》第151期。

(10)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11)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12) 李景林的逝世日期，有1931年12月3日、1932年等说，现据《枣强县志》。

李康年

汪仁泽

李康年，1898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李国盘，清末秀才。李康年少年时由父教读，有较好的古文和书法基础。十五岁时，进宁波乾大昌纸号当学徒，满师后任该店司账，使用当时尚属罕见的改良中式账册，为当地商界所称道。1921年进宁波棉业交易所任秘书。1925年经人介绍，赴沪进方液仙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任总务科长，逐渐结识方的友好胡厥文、蔡声白、蒉延芳、徐永柞等工商界名流。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李康年为爱国心所驱策，亦为谋求推广国货厂商产品的销路，向方液仙建议：集合部分国货工厂，举办联合商场。方欣然采纳，交李主其事。李首先觅得上海市中心南京路、福建路原崎华公司旧址作为场地；复与各厂联系，共有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胜德织造厂、一心牙刷厂、章华毛呢厂、华福帽厂等九家参加，名为“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于1932年“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开幕。商场开办虽仅两个月，但营业一直很好，替各厂推销了不少产品。李康年由此看到长期、固定设置国货销售商场的可能性和发展前景，再次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划书，又得到方液仙等人的支持。集资十万元后，经李康年的积极筹划，租得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后改称慈淑大楼，即现今的东海大楼）的铺面和二楼北部。李亲书“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八个擘窠大字，于1933年2月正式开业。初由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任经理。不久方因忙于本身企业，辞去总经理兼职，由李全权负责经营。

上海的南京路上商店林立，大型百货商店有永安、先施、新新、

大新四大公司，还有丽华及洋商惠罗公司，都有较悠久的历史，以推销环球华洋百货相招徕。中国国货公司欲求立足其间，必须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李一面以专销国货、“国人请用国货”相号召，除现进畅销商品外，又吸收国货厂商的寄售商品，售后付款；另一方面采用科学管理，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采用复式簿记。百货业商品众多，进出频繁，他支持会计部门设立商品分户账册，每笔进销都有记录，库存与账面相符，一目了然。因此即使不盘存货，也能随时编造各种决算书，及时反映经营管理、业务盈亏情况。这样既可防止弊端，加强管理，同时也赢得了寄售厂商的信任，同业也纷来借鉴学习。李还严格要求营业人员熟悉本身业务，热情向顾客介绍商品知识，上柜佩挂编号的公司徽章，衣着整洁，礼貌对待顾客。此外，他还重视广告宣传和灵活的经营方式。专辟橱窗陈列各厂新产品，在报上刊登大幅广告，举办时装展览吸引顾客参观。又设“九九商场”，将几种小商品搭配成扎，售价仅九角九分。其中有的商品虽略有亏蚀，但可搭销一些冷背货，且给人以国货公司售价低廉的印象。后来他还开办一个规模颇大的饮食部，高薪聘请清宫御厨名师指导烹饪技术，售价只求保本，从而招徕大批顾客。此外，他还以送货上门、货到收款，发行礼券，代送婚丧礼仪等等办法以招徕顾客。这样，国货公司终于站稳了脚跟，李也成为沪上闻名的百货业巨子之一。抗战前夕，除在上海太平桥及新闸路设两支店外，并在湖南长沙增设分店。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三友实业社杭州织造厂遭日机炸毁，该社出品的“西湖毛巾”一时脱销。李康年看准市场需要，集资开设萃众织造厂，生产钟牌毛巾。他选用优质棉纱、染料，讲究工艺技术，使产品质量好，外形美观。钟牌毛巾的目标是，“柔软耐用，拔萃超众”，其中“414毛巾”成为畅销国内外的名牌货。

1939年间，生产狗头牌纱袜的鸿兴袜厂，因经营不善而搁浅。李康年应叔父、该厂经理李铭鼎之邀，集资接办，任董事长。后来该厂易名“上海针织厂”改产针织布，成为沪上大型针织厂之一，仍聘其叔

任经理。经整顿后，扭亏为盈，渐见起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日商强迫一贯抵制日货的中国国货公司代销日货，李康年以公司章程规定只售国货而拒之。此后，李为对付日人之步步进逼，在公司三楼辟一密室，约会知友及公司董事等人，聚餐商讨对策。其后约定每周五聚餐一次，遂名“星五聚餐会”（是抗战胜利后李与王性尧等合作，扩大为五百余人的大型“星五聚餐会”的前身）。中国国货公司在惊涛骇浪中勉力维持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量美国商品涌到上海市场倾销，使国货厂商受到严重威胁。1947年，李康年在继续维持国货公司的同时，另谋出路，与王宽城、毛式唐三人合资创办中国钟厂。李先任董事长，后兼总经理，聘工程师设计制造轴芯细、摩擦力小、上一次发条能走十五天的三五牌挂钟、台钟。这种钟用活摆装置，可以倒顺拨时，虽挂摆歪斜也能照走不停。李拟了两句广告用语：“挂歪摆歪虽歪不停，倒拨顺拨一拨就准。”三五牌钟问世后，博得社会好评，成为同类产品中的畅销名牌。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各界反蒋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李康年以“在商言商”自我标榜，“不问政治”。淮海战役后，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李康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教育和争取下，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对于中国国货公司职工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和出入苏北解放区等情事，曾给予掩护和资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康年主持的中国国货公司因长期资金枯竭，经申请批准于1952年夏歇业清理。萃众、鸿兴、中国三厂，经李申请，于1954年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是年，李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7年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3月24日因病去世。1979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职工运动回忆史料：《迎接上海解放》（未刊稿）。

林炳伟：《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史略》、《钟牌414毛巾是怎样创名牌的——略谈李康年经营思想》（未刊稿）。

原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职工胡志甫等人访问记录稿。

李苦禅

姜克夫　李侃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吾手，英也夺我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通过半个多世纪艺术实践，李苦禅在国画艺术上的造诣，完全证实了我国写意画大师齐白石的上述预言。

李苦禅，原名英杰，后改名英、超三，字励公。1922年考入北京“国立艺专”，时常在夜晚租洋车拉客挣钱，以购买绘画材料，每日仅以窝窝头和稀粥为生，穷且益坚，学习勤奋。同学林一庐怜其清苦，赠名“苦禅”。从此遂以“苦禅”为艺名。李苦禅1899年1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山东高唐县城西李奇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代，在偏僻的鲁西北农村无处娱乐，李奇庄前一座庙宇就成了他和小伙伴经常玩耍的地方。庙里有许多泥塑神像和壁画，是供村民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李苦禅一面听老年人讲述画上的故事，一面以树枝在地上画着英雄的形象。当时庙里住着一位穷困潦倒靠画庙宇壁画为生的远房爷爷李宾，他见李苦禅酷爱绘画艺术，经常把笔教习，这位农村老艺人成了苦禅习画的启蒙老师。

1906年，在乡亲们的援助下，李苦禅入本村私塾读书，经过五六年的苦读，打下国学和书法的基础。1913年苦禅考入高唐县城高等学堂，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李苦禅家境清寒，其父李名题仅有盐碱薄田二十余亩，丰年也只能以红薯高粱饼子维持一家生计，无余力供应子孙读书。故在李苦禅读私塾时，即欲令其与同龄长孙辍学务农，但因李苦禅系父亲的幼子，又特别聪慧，最后还是决心节衣缩食，供李苦禅进县城念洋学堂。

1916年，李苦禅在高等学堂毕业，向其父要求升中学。对此老父颇感为难，不允报考感觉委屈了孩子的优良成绩，让考则又财力不济。经李苦禅挽亲朋再三向父亲请求，始允许其去聊城投考，居然考取了官费的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其父从此持家更加俭省，并向亲朋借贷，维持李苦禅读完三年中学。东昌府在鲁西北素以文风盛而著称，李苦禅在此读了不少书，眼界大开；特别是当地的大戏、民间艺术、庙宇和古代建筑，给了李苦禅以极大的感染力。他课余经常前往临摹、写生，绘画才能初露头角。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李苦禅有绘画天才，鼓励他去杭州或北京报考艺专深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曾来我国招工，当时我国贫穷学生为追求知识，曾由国民党人李石曾组织勤工俭学会，介绍贫苦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立志学习绘画的李苦禅到处奔走借钱做路费，遂于1919年考取了北京大学附设的“勤工俭学会”，从此以半天时间学法语和绘画，以半天时间在铁工案子上干活，同时有机会在北大附设的“业余画法研究会”里，向比他年长两三岁的徐悲鸿学素描，有时还在北大中文系旁听，从而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功底和文学基础。

1922年春天，李苦禅考进了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艺专为欧化最深的学校，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穿着为西服革履，而李苦禅成年穿着家乡寄来的棉布长衫和布鞋。时值军阀混战，鲁西北饱受兵匪蹂躏，李名题更挤不出余钱供儿子读书。李苦禅仰仗其自幼习武锻炼成的结实身体，经常一晚拉四个小时的洋车挣钱维持生活，白天到校坚持学习。当时艺专学生除家居北京的同学走读外，外地学生大都寄宿在阔绰的公寓内。而李苦禅则借住古庙，长期过着夜晚拉车白天上课堂的苦行僧生活。故同学们以“苦禅”名之，他认为“名之固当”。

李苦禅来自民间，酷爱国画艺术，早年生活在古朴的鲁西北平原，熟悉农村的一草一木和花鸟鱼虫，尤其在秋冬之际农民架鹰猎兔的雄姿，和渔夫以小舟载鱼鹰在古运河潜水捕鱼的风采，给了他以很大的艺术感染。虽然他的油画人体与风景的成绩，得到艺专捷克教授

齐蒂尔、法国教授蒙日与克罗多的称赞，但他还是在第二年即欲转学国画。由于“四王”[1] 的模式长时期统治着国画界，陈陈相因，使艺术生命日趋枯萎，当时只有齐白石等极少数“非主流派”的画家不守旧，喜创新，爱画民间生活题材和自己的内心感受。然而齐白石当时在画坛地位一般，但李苦禅喜爱齐白石富有乡土生活气息的作品和不巴结权贵的高尚品德，遂于1923年登门拜齐白石为师。当年拜师要送为数可观的贽敬，而李苦禅身无长物，仅凭那深重的山东乡音和一片仰慕虔诚之心，却博得了白石先生的青睐，欣然纳于门下。此后，师生常在一起琢磨绘画艺术，李被齐视为门下第一位知音者。正如齐白石在李苦禅一幅画上题的那样：“余初来京时，绝无人知，陈师曾（字槐堂）已名声噪噪，独英也欲从余游。”李苦禅的绘画艺术由于不断受到白石的指点而颇得真传，再加上他的刻苦磨炼，在艺专将毕业时其作品已超越侪辈。1925年艺专校长林枫眠观看毕业生画展，忽然发现署名“苦禅”的几幅国画，惊奇地问：“我怎么不知道咱们艺专还有位苦和尚？”当陪同参观的教师告之“苦和尚”即穷学生李英杰时，林枫眠赞叹不已，展出的作品遂被参观者选购多幅。从此，李苦禅的画名即蜚声京城。

李苦禅于北京艺专毕业后，即于1925年开始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活，先后应聘在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和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1930年被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林枫眠聘任为国画系教授。李苦禅在山清水秀、柳堤荷浪的西子湖畔生活了将近四年，使其在艺术水平上获得进一步的提高。他在教授水墨花鸟与山水画时，多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在锻炼学生的基本功的同时，结合古代写意画大师和齐白石的笔墨，创作自己的画稿。李苦禅创作的雄鹰、鹭鸶和鱼鹰等，为其写意画的代表作。在国内美术界被誉为南潘（天寿）北李（苦禅），同为写意画的巨擘。

1935年冬，李苦禅因不同意杭州艺专开除进步学生沈福文，以及去“苏州反省院”保释被捕学生凌子风、张仃，被学校当局停聘而携眷

迁回北平，先后在私立华北美专和华北大学艺术系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学校多被日本侵略者控制。他激于民族义愤，宁肯饿死也不就任敌伪大学的教职，隐居于西城柳树井民居，以鬻画为生。当时敌伪亦有附庸风雅者，曾有一汉奸求画扇面，他即以狂草书“日月已沉海，蛟龙乱升天”以阴斥之。1940年李因“私通八路罪”被捕入狱后，一家生计更为拮据，长子李杭与小贩一道赴张家口趸菜，受尽伪警欺诈，家人常到寺里排队领取慈善团体舍施的救济粥。因为长期过着饥馑的生活，李苦禅身体日渐衰弱。1943年冬，李苦禅传染上斑疹伤寒和脑膜炎，被送进医院，病势沉重，经诊断“非注射德国进口药针不能挽救”，但此药价昂，因李苦禅平素为人豪爽能舍己助人，朋友闻讯纷纷解囊相助，始获药石转危为安。

日本投降后，徐悲鸿来北平接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与齐白石联名聘李苦禅为国画系花卉翎毛教授。他正振作精神投身教学之际，不料内战爆发，贪官污吏横行，物价飞涨，广大人民又处在饥饿线上。李苦禅在“戏丑官图”上题道：“千里来做官，意的在何焉？无非金钱与美女……”以表达对那些发国难财的“接收大员”的憎恨。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李苦禅以当年曾与毛泽东、徐特立等中央负责人在勤工俭学会有同窗之谊，上书反映美术界压制国画的情况。毛泽东曾亲笔致函中央美术学院为之关说。这时他虽已年逾五旬，仍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亲身投入四川省的土地改革运动。返校后仍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职。

李苦禅生长于农村，养成了农民的淳朴作风和爽直性格，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话必说。曾对1957年以后某些“左”的政策表示异议，故长期遭到不公平待遇。196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被目为“右派教授”、“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1970年被下放河北磁县农村劳动，1971年因病回北京。

1972年，周恩来总理为布置装饰我国驻外使馆和国内宾馆，指示

国务院请国内著名画家在北京饭店等处作画，同时借此机会为画家们恢复名誉。两年中，李苦禅为国家义务作画三百余件。李苦禅曾画有一幅荷塘巨制，江青等人把它说成攻击八出“样板戏”，组织美术界对李苦禅进行批斗，使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痛。

李苦禅勤奋劳动，一生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优美画卷，为海内外爱好者所珍藏。他的画磅礴大气，沉郁雄浑，笔墨豪放纵逸，及至晚年更加雄健苍劲，为民国以来花鸟写意画派继齐白石后又一最享盛名者。写意画鼻祖为宋代的石恪、梁楷、苏轼、法常等大师，经明代的徐渭，清代的石涛、“扬州八怪”与八大山人以及清末的任伯年、吴昌硕诸位大师弘扬光大。民国以来，齐白石以民间艺术家之身份，刻苦精进，集前人之精粹，奇峰峻立，成为一代写意派之宗师。而李苦禅亦崛起于民间，从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又投拜齐白石门下和师承历代大师，领悟先贤之美学精神、笔墨玄奥与自然意趣，融合自己的意匠创造，将写意花鸟画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苦禅于绘画之外，更关心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苦乐，他爱憎分明，抒发其情感于花鸟鱼虫之间。故其画很有时代色彩和富有人民性，因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被赞为写意画的一代大师。

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堪称双璧，李苦禅幼年时经塾师教导，已打下楷书的基础。及长，临摹沈曾植、黄道周、张瑞图、怀素、颜真卿、李北海、郑道昭以及汉魏名碑法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质朴浑厚而又风神婉转，和他的绘画互为表里，深受国内外书法家的推崇。李苦禅来自山东戏剧之乡，于绘画之余爱好京剧，并擅演武生。他认为“京戏是写意戏，是传统的综合艺术，要画好中国画一定要知京戏”。

李苦禅虽系国画艺术家，但能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五四运动时，他参加爱国演说、游行与火烧赵家楼的斗争。其后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早在20年代末期，现河北省妇联主任郝冠英（鲁伟）等在女师大读书，遭受军阀警宪追捕，即藏匿李家，并获赠

转移路费。30年代初期，现“北影”导演凌子风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李苦禅日夜仆仆平、沪道上奔走营救。抗日战争中，李苦禅与中共北平地下工作者黄浩有联系，曾掩护冀中抗日根据地来平治病的袁祥峰。后因被汉奸密报，李苦禅于1940年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沙滩北大红楼底层，受尽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文化部党组推翻196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中强加给艺术家们的诬蔑不实之词，认为苦禅一生无私无畏，高风亮节，长期支持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绘画艺术上，含辛茹苦，继往开来，精研邃思，继承传统，变革古法，扫除蹊径，另辟幽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从事绘画教学六十年，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桃李满天下，为艺苑大放异彩。1977年李苦禅被再次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80年被特邀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党和国家的关怀，更激发李苦禅为祖国的统一和为“四化”建设献身的积极性。1983年1月13日，首都美术界同人二百余人为他举行从事艺术教育六十年的纪念会上，李苦禅还豪迈地说：“虽然去年夏天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现在又和大家在一起啦！脑血栓它拴不住我，我想再画它二十年。”不料6月11日李苦禅旧病复发，与世长辞。

李苦禅一生绘画甚丰，代表作品为“山岳钟英”、“鱼鹰”、“松鹰”、“鱼”、“鸟语花香”、“红梅怒放”、“盛夏图”等。

出版著作有：《苦禅画册》（第一集）、《李苦禅画辑》、《李苦禅画集》（上海版）、《李苦禅画集》（山东版）与《苦禅画鹰》等。他一生的绘画技巧被拍成教学影片《苦禅写意》、《苦禅画鹰》与《中国花鸟画》。

主要参考资料

王森然：《苦禅画集序》，北平1936年版。

曹禺：《李苦禅画集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李嫦：《回忆父亲早年在家乡的生活》（1984年2月3日）。

李燕：《风雨砚边录：李苦禅及其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

范曾：《但留清气满乾坤》，《中国青年报》1983年6月。

黄奇南（天秀）：《回忆李苦禅老师在沦陷区》。

魏隐儒：《忆与先生同狱时》，《北京晚报》1983年7月20日。

蒋兆和：《悼我老友苦禅》，《人民日报》1983年7月18日。

许麟庐：《苦去甘来兄离去》，《北京晚报》1983年6月30日。

王朝闻：《领异标新》，《人民日报》1983年7月18日。

沈福文：《著名画家李苦禅教授》。

《李苦禅教授追悼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83年7月6日。

黎朗：《画不惊人死不休》，台北《雄狮美术》1984年6月。

---

(1) “四王”，系指明末清初传统派画家王时敏、王翚、王原祈、王鉴四人。

李良荣

李锡贵

李良荣，别号良安，福建同安县人，生于1909年1月6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原姓杨，父母早丧，由姑母抚养。稍长，随祖母生活，过继给邻里基督教长老李算为孙，遂改姓李，并受洗为基督教徒。

1916年，李良荣进同安圳头启悟小学读书。两年后，随继祖父李算乔居鼓浪屿，先后入养元小学和浔源中学攻读。李家在同安英村和兑山乡交接的渡口开一店铺。李良荣中学肄业后在小店铺管账，不时驾船到厦门办货。继母见他勤俭耿直办事有方，认其为婿。嗣因继祖父李算去世，家境日蹙，李良荣外出流浪，先以弹弓打鸟卖钱为生，后在厦门至集美的班船上卖报。

1922年，闽南一带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同安当地土匪叶定国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李良荣甚为愤恨，曾只身潜入莲花山匪窝窥探虚实，企望有朝一日扑灭这股土匪。翌年，原自治军领导人许卓然和秦望山，被孙中山委任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三路统领和泉州警备司令。许等为改造民军，举办干部训练所，李良荣毅然投军，入该所第一期受训。1924年夏季结业后，又由许卓然、秦望山等人保送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培养。李良荣此时尚不足十七岁，个子矮小，举止活泼，人们昵称李为“小孩子”[(1)]。

李良荣在黄埔军校于是年11月毕业，派在第二教导团任排长。1925年他参加第一、二次东征，讨伐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北伐开始，李良荣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先后任上尉参谋、连长、第一团第二营营长等职。1926年10月，该团在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与

北军孙传芳部作战，李良荣勇敢机智，负伤后又收容败兵，因功升任第一师第二团团附。江西敉平，他随师移驻上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李良荣目睹这场大屠杀，认为“国共合作乃有北伐的胜利，如今国共相争，北洋军阀就会卷土重来”[(2)]，愤然离开部队，返回闽南养伤。伤愈后，至晋江“宣传员养成所”任队长，与许卓然、秦望山等人过从甚密。他自感学识浅薄，萌志继续求学。是年冬，进上海劳动大学，半工半读，专攻政治、经济及英语。

1929年，李良荣于劳动大学毕业，返回原籍拟兴教办学。其时，被福建省政府编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陈国辉，竭力扩展其武装，在兴（化）泉（州）永（春）等地到处设关立卡，强取豪夺，烧杀抢掠。李目睹乡里受害，遂改变主意，应秦望山、郭其祥之邀，襄助办理泉永民团，防御陈国辉部骚扰。翌年随团编入张贞第四十九师，先后任少校参谋、营长、军士教导队大队长等职。其时，著匪叶定国在同安迫种鸦片，敲诈勒索，民怨沸腾。李良荣率一连士兵进驻同安，到匪患最为严重的莲花山和西山一带剿匪、铲烟。然而，号谓“闽南王”的张贞却与陈、叶之流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李良荣在与恶势力的冲突中，深感地方政治腐败，自己无能为力，决意另觅途径。1931年9月，李良荣部两个连的士兵发生“山城兵变”，投向工农红军，李之独立团第一营营长职务被撤。12月李前往南京，考入陆军步兵学校第一期。1933年2月毕业，调升为第八十八师补充团团长，旋编入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为二一团团长。是年秋末，第三十六师开赴江西抚州，参加对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李良荣团驻于距抚州二十公里的浒湾。10月，与红三军团一部血战三昼夜，保住了该师的前哨阵地，获蒋介石的嘉奖，并记功一次。

闽变事起，蒋介石调第三十六师等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1934年1月5日，在攻占延平（今南平）的战役中，李良荣率部夺取要地九峰山的制高点第八、第九两峰，使战局急转直下，获记大功一次。接着，李良荣奉命为先锋，进古田，抵白沙，迫

福州，趋福清、莆田、惠安、南安，追击第十九路军。1934年2月，李良荣部进驻莆田涵江，收缴第十九路军的枪械，旋即调驻泉州，升任第一〇六旅旅长兼城防司令。李良荣分兵永春，进剿著匪尤赐福，又在泉州逮捕了土匪头目卢贡，不久又奉调闽西“围剿”红军。后得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的推荐前往南京，充任蒋介石的侍从武官。1935年，调任航空特务警备团团长，驻于南昌，担任空军地面警卫任务。不久，调至中央军校任特务旅旅长。翌年冬，李良荣带职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进修。

“八一三”事变后，李良荣被派为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副师长，参加了保卫南京的战役。1938年春，晋升为师长。是年夏，李良荣师调至豫东战场，在兰封地区防堵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时，因孤战无援，遭到惨败，被撤职。李良荣再入陆大学习。嗣后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参谋，曾代表蒋介石赴两湖巡视各伤兵医院。武汉失守后，李良荣随同去重庆。

1939年，李良荣请求组训新兵，被任命为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未及一周，又奉调任福建南平新兵训练处处长。他精心组训壮丁，晓以抗日大义，训练出一批批能打仗的人补充部队。在此期间，有数百名爱国华侨青年亦回国来南平受训，成为后来南洋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

日本侵略军于1941年4月20日侵占福州后，企图进犯闽北。李良荣向福建绥靖主任陈仪请战，率一个补充团由邵武趋大湖，与敌周旋一个星期，击溃来犯之敌，古田、南平等闽北重镇赖以保全。9月，福州克复，李良荣被调任第八十师师长，并兼福州警备司令。这时，他执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甚力，对所属部队控制很严，对闽北武夷山区还采取了“清乡”及编组保甲等措施。

1944年10月，日军再度进犯福州，李良荣率第八十师奋力抗击，予敌重创。后撤入小北岭，继至闽东与敌周旋。翌年6月，日军

撤退，李良荣率部追击至霞浦，颇多斩获。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李良荣是接收福州日伪投降的中国代表。1946年春，李良荣奉令率部赴浙、皖接统第二十八军，升任军长。嗣后，李良荣部调至苏北，走上内战前线。国防部长白崇禧检阅李部时，誉其为蒋军“最优秀”的部队之一。翌年2月台湾“二二八”事变后，李良荣被委为台湾警备司令，但因陇海东路告急，未及赴任，又奉令进犯淮阴、淮安、涟水等处解放区。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改为重点进攻，在进犯延安的同时进犯沂蒙山区。李良荣率部由苏北进入鲁南。是年夏孟良崮战役中，任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第二纵队司令，辖整编二十八师（师长李自兼）、整编五十七师（师长段霖茂），后任整编二十三军军长。是年冬，李良荣奉令率部开赴鄂北进攻大别山革命根据地。1948年2月，奉命开回鲁南临沂，任第九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官，辖苏北、鲁南地区二十余县。8月，李良荣兼第十二兵团副司令。9月，升陆军中将，并加委为国防部第一训练处处长。

其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想要保持东南半壁，在10月13日委任李良荣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李良荣走马上任后，立即裁汰冗员腐吏，微行私访，整饬纪律，督征壮丁，扩充军队，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他拒绝酬酢，不讲情面，连蒋经国荐严灵峰为福建民政厅长、孙科介绍汪泮请予重用，也加抵制。然而，面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和重重的派系斗争，李良荣处处受到掣肘，一筹莫展。1949年1月20日李被免去福建省政府主席职，由朱绍良继任。2月，改任第一编练司令官、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并兼任厦门警备司令；5月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朱绍良兼）。8月，他率二十二兵团主力移驻金门，任金门防卫司令。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厦门后，于25日曾一度跨海在金门登陆，李良荣的部队在古宁头遭到沉重打击。

金门战后，李良荣被调到台湾，不再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仅

挂“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虚衔。1957年4月。被选为台湾省第三届临时省议会议员。是年7月，李良荣离台，前往马来亚吉隆坡，与华侨建筑学家林添良联合筹办马来亚工矿公司。1962年成立大石水泥公司，任常务理事兼总经理。1967年6月2日在马来西亚怡保因车祸身亡。

主要参考资料

宋希濂：《李良荣在三十六师时期》，《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

---

(1) 《新任福建省主席李良荣怎样红起来》，《厦门日报》1948年10月7日。

(2) 李以劻：《李良荣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李烈钧

宗志文

李烈钧，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人。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六日）生。其父骏兴曾投身太平军，事败后潜回故乡，耕种自给，后兼营茶叶运输，家境逐渐富裕。李烈钧自小读书习武，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到东京后先入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这时，他结识了在日本鼓吹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员张继、王侃等人，经常阅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6年12月，他听了孙中山在日本阐述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说，“倾服之念，油然而生”[(1)]。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又先后加入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武学社”、“丈夫团”等反清团体。

1908年，李烈钧在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因有向士兵宣传反清思想之嫌，被上级借故拘捕，经原江西武备学堂总教官吴介璋大力开脱，始获释放。于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道提调。不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仍兼兵备道提调。曾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夏，李烈钧奉派北上参观永平秋操。他从云南到上海，然后溯江西上，途经武汉时，武昌起义已三天。到北京后，吴禄贞邀集数十人宴请他，这些人都是支持武昌起义的。李烈钧也决心响应武昌起义。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又有电报促他速归，乃迅即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返回九江。这时，九江已光复，他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及马当炮台，

把长江拦腰截断。停泊在九江的北洋舰队主要舰艇仓皇下驶，企图逃往上海，被金鸡炮台截住。经李烈钧与林森等人联络动员，舰艇宣布起义。李烈钧又被都督府任命为海陆军总司令。这时，安徽、南京、武昌都先后来人或来电要求支援，李烈钧率舰队先往安徽，到安庆后被推为安徽都督。随后因北洋军攻武昌，武昌告急，乃率舰队西上。到武昌后，黎元洪任命他为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一面命舰艇防守长江江面，一面亲率陆军迎击北洋军，从而稳定了武昌的阵势。

1912年年初，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正式任命，李烈钧乃回江西赴任。他在江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改革。首先整编部队，扩充为两师一旅，并接办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军事干部。同时，改组都督府，罗致了许多同盟会会员担任各司、厅、处长。又整理财政，成立民国银行，活跃地方经济。此外，还处决了几个洪门会（地方封建势力）的首要。至此，江西秩序逐渐恢复。同年10月，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莅临南昌巡视，军民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袁世凯对此颇为嫉视，曾派大员邀李往北京面谈，并以二百万元和晋勋一级为诱饵，遭李拒绝。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4月初，孙中山派张继、邵元冲等到江西动员李烈钧发动反袁。5月5日，李烈钧与湘督谭延闿等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接着，又免除了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务。这月中旬，李烈钧赴上海见孙中山筹商反袁事宜。7月8日回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12日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斥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并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2)] 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入江西，交战后，讨袁军初战获胜，但终因力量悬殊，连连失利，两团长阵亡，援军不继，25日湖口被袁军攻陷。8月10日，李烈钧退守南

昌，不久转移丰城。8月底率千余人退驻临江，在此又与袁军激战数日，毙袁军数百。后以敌军大集，败局已成，退离江西。是役在民国史上称为“二次革命”。当时响应孙中山号召者，虽有湘、粤、皖、闽等五六省，而敢于兴兵举义者，除黄兴在南京有所动作外，只有江西一省。

同年9月李烈钧亡命日本。当时，因“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多约七八十人，李烈钧创办了一所法政学校及一所军事训练班——浩然庐，收容上述军官，加以军事训练，以备再起。

1914年春，李烈钧与张继、陈炯明赴欧洲。乘船经过南洋时，曾在槟榔屿小住，多次在欢迎会上演讲，鼓吹讨袁革命。抵巴黎后，与张继等寄寓巴黎郊外，学习法语。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之前，孙中山已要李烈钧赴云南策划反袁；这时，李烈钧遂决定回国，10月启行。船到西贡时，原拟假道入云南，为法国海关所阻，不得已转赴香港，又侨居新加坡。1915年2月，袁世凯与日本商谈“二十一条”时，李烈钧曾与黄兴等两次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独裁卖国。12月初，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即将开锣，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偕熊克武乘船至海防转河内，在老开等候入云南。时唐继尧尚怀犹豫，李电促唐继尧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3)] 唐继尧立即派其弟继虞迎李入昆明。随后，蔡锷亦到昆明。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旗帜，宣告云南独立，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二十条罪状，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主持后方。李烈钧于12月下旬率滇军从昆明向滇桂边境进发。1916年2月间，在广西百色附近击溃袁世凯派来的龙觐光部。3月15日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李烈钧部进入广西。5月，经南宁沿江直下广东肇庆。然后经三水、芦苞，沿粤汉路北上，6月初到韶关，与伪称独立

的广东都督龙济光部发生战斗，迫使龙部纳关投降。接着回师南下，指向广州，7月初在源潭附近又与龙部相遇，大败龙军。时桂军莫荣新部也乘机攻入粤境，龙被迫退回广州困守。

6月6日袁世凯死，段祺瑞继承了袁的家底，成为北洋派的首领，他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自任国务总理。为了收拾时局，除与护国军方面讨价还价外，段在处理广东滇粤军冲突问题上，故意压制李烈钧，甚至授意北洋军阀，叫嚣讨伐李烈钧。为分化西南实力派，他还故意委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陆早存觊觎广东地盘之念，立即带兵入粤。李烈钧感于形势压力，遂于8月通电解职，离广东转赴上海，其部队仍留粤北，成为后来孙中山南下护法的一支力量。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由于国务总理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联合滇、桂、粤各省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李烈钧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军政府成立后，南北对峙，从此进入护法战争时期。1918年3月，段祺瑞委退据琼崖的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命令他渡海进攻广州。李烈钧奉命率滇、桂、粤军迎战，大败龙军，迫使龙济光逃往香港。与此同时，段祺瑞复派兵从江西直下广东南雄。李烈钧又奉命移师抵御。李部5月3日自韶关出发，6月3日克南雄，正欲乘胜前进夺取赣南时，忽奉军政府召返回韶关。原来这时桂系军阀利用政学系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准备离开广州赴上海。在此情况下，前方战斗不得不收束。李烈钧回韶关后，为防止段祺瑞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着手兴建韶关要塞。1920年2月，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粤督莫荣新利用李根源争夺滇军领导权，与李烈钧在韶关、南雄之间打了一仗。4月，李烈钧赴港转沪，奉孙中山命往云南与唐继尧会商消灭桂系势力的办法。这时，李烈钧所属驻粤滇军数旅，已取道湖南到达四川边境，他从云南到四川与他们会合，原想驻扎四川，为四川军阀所拒，不得已移驻贵州镇远。

同年11月，陈炯明率粤军攻克广州，赶走了桂系军阀，孙中山再到广州。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李烈钧仍被任为参谋总长。7月，孙中山命粤、赣、滇、黔各军讨伐岑春煊与广西陆荣廷的联合势力，李烈钧率部出镇远到广西，8月下旬，击溃桂系沈鸿英部占据桂林。12月，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军大本营，部署北伐。李烈钧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积极做北伐准备。他原拟定的计划是从桂林出衡阳，先取江西，相机东下南京，西定武汉。但到1922年3月，传来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州被刺，陈炯明勾结北方军阀的消息，李烈钧遂不得不急率滇、桂两军回师广东。4月，他从桂林出发，经梧州，顺西江东下，抵广东三水，听说陈炯明要在那一带布防，急赴芦苞，转向韶关。5月6日，孙中山到韶关研究北伐步骤，决定改道韶关出发，继续执行北伐计划。李烈钧会同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分途北进。部队经南雄，出大庾，月余之间，前锋已达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势。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19日，孙中山电令李烈钧等入赣的北伐各军迅速回粤，讨伐叛逆。北伐军班师回粤，仅留赣军保持现有阵地，防止北军反击。李烈钧因病留在南雄。不久，陈炯明军向粤北推进，李烈钧率赣军退驻湖南，他本人随即转赴上海。

1923年1月，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李烈钧也回到广州，仍任参谋总长。当时，陈炯明部盘踞在东江惠州及潮汕一带。3月，许崇智从福建率东路讨贼军到达闽粤边境，陈炯明所部洪兆麟、赖世璜、林虎等亦通电宣布“独立”。孙中山以林、赖等过去是李烈钧的旧部，乃命李兼闽赣边防督办，赴潮汕收编洪兆麟等部，并与许崇智换防。6月，李烈钧收编完上述诸部赴闽驻防。许崇智回防广州时，在揭阳、兴宁一带突然遭洪兆麟等的袭击，损失很大。李烈钧救应不及，离闽去香港。7月，奉孙中山命仍回广州。11月，陈炯明对广州进行反扑，孙中山亲自指挥滇、桂、粤军进行抵御，李烈钧辅佐孙中山很快打败了陈炯明，守住了广州。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烈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表示拥护。会议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李烈钧极力推荐蒋介石任该校校长，向孙中山说：“校长一席，非蒋莫属。”[(4)] 9月，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筹备北伐，并设大本营于韶关，亲往督师，发表《北伐宣言》，举行誓师典礼。北伐军分两路向湘赣出发。这时，北方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军阀内部分化，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贿选总统曹锟被囚，段祺瑞任北京政府执政。接着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电邀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动身前派李烈钧往日本了解大局的演变情况，李于24日到达东京，与各方接谈后，11月中旬回到上海。下旬，又随孙中山经日本往天津。不久，北伐军已进入江西，孙中山乃命李烈钧南下部署军事。1925年1月下旬，李烈钧在上海闻孙中山病危，又复北上，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李参与主办丧事。不久，应冯玉祥邀请，往张家口晤冯，“彼此均有相见恨晚之慨”[(5)]，被冯聘为国民军总参议。年底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时，李亲往张家口指导。当时，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活动，李烈钧对他们的决议曾通电表示赞许。

1926年5月，国民军因受直奉军阀的压力，被迫准备离开北京，旋与直鲁联军大战于南口。8月国民军战败，李烈钧离开国民军南下。这时，北伐战争开始了，同年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1927年初，李烈钧到南昌见蒋介石，被蒋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从此李烈钧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右转，向蒋介石靠拢。接着国民党内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李烈钧与谭延闿由南昌赴武汉进行所谓“调解”。3月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大会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李烈钧对此大为不满，没等会议结束就回南昌向蒋汇报，指责武汉会议，并向蒋建议从速攻取南京，定为新都。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李烈钧任国民政府常务委

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底，北军孙传芳利用国民党新军阀蒋、桂矛盾发动攻势，在南京东面的龙潭一带渡江，李烈钧坐镇南京指挥联络，打败孙军。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在一致赞成“清党”“反共”的反对革命基础上统一起来，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三方各派六人参加，李烈钧是宁方代表之一。

1928年以后，李烈钧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长期住在上海养病，没有担负实际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李烈钧主张对日抗战，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尊重言论自由，改良政治，“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不到一个月，把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蒋介石、汪精卫大为恼火，调集十余万中央军包围抗日同盟军。李烈钧十分支持冯玉祥的举动，曾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冯委员玉祥，举义张垣，志在收复失地”，“请授大权，俾当大任”[(6)]。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李烈钧同情蒋介石，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主帅”，致电敦促他们“立送蒋委员长回京”，“并肉袒负荆请罪”。蒋被释返南京后，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烈钧被任为审判长，曾出席审判。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张继在提案上签了名，后来又要抹去。冯玉祥找李烈钧说了此事，李马上研墨提笔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并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7)]

卢沟桥事变后，李烈钧移居昆明，后迁居重庆，一直患病休养。1946年2月20日在重庆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卓仁机：《李烈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

(1) 李烈钧著：《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出版社1944年版，第6页。

(2) 《民立报》（上海）1913年7月18日，第10页。

(3) 李烈钧著：《李烈钧将军自传》，第38页。

(4) 李烈钧著：《李烈钧将军自传》，第81页。

(5) 李烈钧著：《李烈钧将军自传》，第90页。

(6) 《李烈钧之言论》，1935年版，第7页。

(7)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5年版，第55页。

李弥

荆德新

李弥，名炳仁，号文卿，云南盈江县人，1902年11月2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地主家庭。少年时就学于莲山太平镇两级小学堂，继去腾冲县城举人王承谟塾馆受业。

1924年，李弥离家去广州，在驻粤滇军第七师师长李根沄处当勤务兵。李见他精明能干，先提拔为副官，后又送去黄埔军校学习。李弥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分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任职。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李弥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排长，团长朱德多次劝导李认清大局，跟随起义，李执意不从，只身离赣去南京，任总司令部警卫团连长。不久被派入川，到第二十二军赖心辉部，先后任营特派员、营长、副团长等职，曾参与四川军阀混战。1930年后，李弥随第五十一师师长张英在鄂西、赣南多次参与“剿共”战争。1932年秋，陈诚以驻防江西永丰的张部“纪律太坏”[(1)]为辞，将该部包围缴械。李弥拒不受命，带领该团官兵冲出重围，到南昌见何应钦。蒋介石在庐山召见李弥，问他为何不服从陈诚的缴械命令，李弥答称，过去校长只教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故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李弥此举深得蒋的赏识，遂被编属熊式辉部周浑元第五师任团长，继续与红军作战。1936年，李弥到南昌江西省县政人员训练班受训一月，后出任江西瑞昌县长，继调宁都任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十六团团长。

1938年起，李弥先后任副旅长、旅长、副师长、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长。1941年4月，荣一师奉命增援宜昌，在天皇寺、雨台山一

线与日本侵略军对峙，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以山炮轰击日军宜昌机场，命中油库，击毁敌机二十一架。1942年，李弥升任第八军副军长兼湖南芷（江）绥（宁）师管区司令。同年，该军移防云南河口、马关。1944年，该军为增援滇缅战场，6月奉命开赴龙陵，渡过怒江，进至松山。该处层峦叠嶂，地势高耸，日军侵占此地后多次加强工事，因而易守难攻，曾反复争夺两月余。李弥亲临前线，针对日军的坚固工事，集中火炮近距离轰击，与美军飞机低空投弹配合，遂将敌人工事摧毁。10月克复松山，全歼守敌，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1945年1月，该军由于伤亡过重，调回滇东陆良、路南、师宗等地整补训练。8月日本投降，该军调往两广。

1945年11月，第八军由九龙船运青岛。在胶东，李弥指挥该军多次向胶济线的八路军进行挑衅，1946年1月侵占潍县、昌乐等地。国共停战协定于1月10日公布后，中共胶东军区代表会见李弥，义正词严地指出，胶东是八路军经过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回的，国民党军无权进入。但李弥拒不撤兵停战，还向部下示意："打打再说吧。"(2)

7月，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李弥指挥第八军先后向淄博、益都、平度、掖县等地进犯。在平度、掖县被解放军围歼两个营。

1947年5月，第八军改为整编第八师，李弥任师长。他将第八军到山东时收编的伪军编成独立旅、独立团。7月，国民党军发动"南麻战役"，李弥率六个团在临朐阻击解放军被围。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三次派人送信，促其弃暗投明，李弥拒不作答，负隅顽抗。这次战役，该师死伤五千余人，但蒋介石嘉奖李弥，授其"青天白日"勋章。李弥被蒋介石召见后，踌躇满志地说："这回算是通了天了。"(3) 9月，整编八师在昌邑、掖县又被解放军消灭两个团。11月，整编八师扩编为整编第八军（兵团编制），李弥再任军长。

1948年7月，整编第八军开往徐州，李弥升任第十三兵团司令。11月初，淮海战役开始，当黄百韬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被围之时，李弥、邱清泉两兵团受命解围。李指挥所部多次受阻而无法前进时，抱怨蒋介石不听他的建议，不在淮河而在徐州决战，是战略上的失策。他对战事丧失信心，经常大叫大吼："该死，该死！""完了，完了！"[(4)] 11月底，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李弥第十三兵团、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共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西南逃跑，12月4日被围于永城东北。6日孙元良兵团突围被解放军歼灭，1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于宿县双堆集，李、邱两兵团已成瓮中之鳖，但李弥仍然执迷不悟，再次拒绝陈毅派人送去的劝降信，杀害带信的蒋军排长，枪毙丢失阵地的团长，下令射杀向解放军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1949年1月10日，拒不投降的李、邱两兵团被全部歼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李弥只身化装潜逃。

李弥判断直接南逃可能凶多吉少，遂北走已获解放的徐州、济南，取道青岛南下。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召见他，决定重建第十三兵团，任李弥为司令兼第八军军长。该兵团调至衡阳时，改称第六编练司令部，奉令开云南。6月，李弥经广州到昆明，向云南地方当局和各界人士疏通，欲驻昆明，遭到拒绝，只得改移重庆。蒋介石为控制云南，又令第六编练司令部所辖第八军开入滇境。9月，李弥率领所部经泸州进入云南，驻沾益、曲靖，原驻滇东南的第二十六军亦拨归他指挥。

李弥依照蒋介石的意图，到滇后竭力笼络地方人士，借以站住脚跟。对于云南各界人士劝其投归人民的忠告，李弥充耳不闻，甚至公然叫嚣与共产党水火不容，"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5)]。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李弥等人在昆明被扣。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为争取在滇的国民党军队参加起义，特意安排李弥等人为委员。李弥在被扣留期间，经过多次劝导，被迫口头上表

示愿意参加起义。为了解除国民党军队对昆明的围困，卢汉将李弥放回。但李弥回部队后，即率残部逃到滇南。

1950年1月，李弥离部去台湾。9月，李弥奉蒋介石之命潜至缅甸北部，纠集外逃的国民党军残部和部分土顽武装，组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游击第一纵队”。12月，李弥被蒋派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51年5至7月，逃缅的国民党军残部两次窜扰云南边境，遭到解放军边防部队在耿马、沧源、孟连等地的迎头痛击。1953年1月，李弥残部改称“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活动于中缅边境一带。在缅甸政府的武装清剿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将逃缅国民党军改称“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于年底至1954年将残部主力陆续撤往台湾。

李弥到台湾后，先后充任“国民大会”代表、“中央评议会”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1973年12月8日在台湾故去。

---

(1) 李心武：《回忆叔父李弥》（未刊搞）。

(2) 李心武：《回忆叔父李弥》（未刊搞）。

(3) 李心武：《回忆叔父李弥》（未刊搞）。

(4) 淮海战役纪念馆编：《淮海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03页。

(5) 李镜天访问记录。

李铭

江绍贞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在一个经营银钱业的商人家庭。李铭幼时入私塾学习，1902年到杭州入美国浸礼会所办学校中读书，毕业后于1905年赴日本，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习银行学，于1910年毕业回国。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李铭受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派遣，参加接管浙江银行，开始进入银行界。先当练习生，后任稽核。该行原为1909年由浙江官钱局改组而成，官商合办，资本额一百万两，经理库款、发行钞票，为省银行性质。1915年7月，浙江银行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被派任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旋升经理。1916年5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上海中国、交通两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袁竟下令停止兑现，李铭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宋汉章、张嘉璈拒停兑令的活动。这一行动，提高了他在金融工商界的声誉。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李铭当选为董事。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权则操于浙江省当局之手，李铭等商股股东深感银行由官府把持，前途发展不易，便极力扩大商股。商股在该行的优势地位确立后，遂策动商股退出。嗣因增资问题，官商股东意见不一，李铭作为商股代表与官股进行谈判，乃于1923年3月达成协议，订约划分，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由李铭出任总经理，资本额为180万元，设总行于上海。他认为在政治不稳定的地区设立分行易于受累，而不易盈利，仅在汉口、杭州和上海设立三个分行。其经营方针着重外汇业务及投资股票、债券，同时也办理押放及信托业务。总行设有国外汇兑部，聘外国人为顾问，与上海的外商银行、外资企业建立广泛业务来

往，得到外商的大量存款。该行又先后投资外商经营的众业公所、沙逊公司等企业。不几年，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江浙财团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李铭在金融工商界的地位也就更加提高，1926年起连任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委员、主席等职务达九年之久。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李铭向蒋介石进言，以“取蛋必先养鸡”之喻，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工商业实行扶助政策，同时他们保证在财力上支持国民政府，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这年，国民政府为大量发行公债，建立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是金融工商界人士，李铭担任该会主任委员。这一内债基金保管权，正是金融资产阶级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所梦寐以求的，因而在内战期间，他们大力承销国民政府发行的巨额公债，浙江实业银行每年持有的有价证券（大部分为政府公债），数额均在五六百万元以上。国民党新军阀与江浙财阀的结合，使前者获得了打内战的资本，而后者则得到在内战期间的畸形繁荣。

1928年7月，李铭受国民政府财政部委派，任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处总清理员，并兼管上海分清理处事宜。10月，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李铭被派任为该行监事会主席。11月，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李铭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交通银行董事。

翌年，中美合资盘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之发电厂和电话公司，分别组成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李铭担任美方顾问。上海电力公司成立后，需要资金从事扩充，适值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国内筹资困难，李铭便在上海联合中外银行及英美在上海的投资经纪人组织银团，承销该公司所发行的优先股及公司债券，使上海电力公司的资金迅速得到扩充。

浙江实业银行自1927年该行董事长胡济生去世后，李铭即兼任董事长，掌握了该行的整个大权，这年增资到二百万元。在往后一个较

长的时期内，该行的固定资本虽然没有增加，但存放款数都有较大的增长。自1927年至1930年，存款增加零点八倍，放款增加一倍，每年都有大批款项存放国外，1931年持有的有价证券达一千万元左右。

“一二八”事变后，李铭与张嘉璈等人一起，推动各银行合组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用以巩固上海各商业银行的应变力量，李铭担任主席。同年李铭等人出面组织国民实业银团，收购杭州电厂，组成杭州电力公司，由李任董事长。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国民政府失掉东北关、盐税的大宗收入，财政支绌。李铭和张嘉璈等顺从国民政府旨意，制定公债展期还本、减低利息的办法，帮助国民政府解决财政困难。1933年，又在上银联合准备会属下成立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及票据承兑所。1934年，他又代表浙江实业银行投资创办上海鼎新纱厂。

1935年发生全国金融危机，国民党政府为垄断金融，乘机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增加中国银行的官股，修改该行章程，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负责制，派宋子文任董事长，李铭与总经理张嘉璈同被排挤。

到1937年抗战前夕止，浙江实业银行的资本虽然仍为二百万元，但公积金则达三百五十余万元，存放款均在四五千万元左右，连同它所投资的企业，资产总额达六千四百余万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铭曾再次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国民党军队放弃上海西撤后，李铭经财政部长孔祥熙指派，留在上海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一起，以民间金融业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的金融事业。李铭利用这个机会，将浙江实业银行的大批存款以及上海电话公司的往来款变换成外汇，作大量的外资逃避。汪伪政权建立后，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拉拢他与之合作，由于他与英美有较深的关系，拒绝了周佛海。1940年他被南京汪伪政府下令通缉，避往上海美国领事馆，于次年3月由美领事馆送往美国，与其家属一起居住在纽约。

李铭在美期间，继续担任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电力公司的职务，曾由国民政府派为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4年李铭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他与张嘉璈、陈光甫一起与美国资本家进行战后合办企业的商谈，筹建了中国投资公司。该公司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国两家投资公司共同投资五百万美元，从事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等业务。1945年8月20日该公司正式在纽约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铭由美回国，即向国民政府提出奖励发展私人企业等要求。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再次挑起内战，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样，连李铭等原已组成的中国投资公司，在国内投资办厂的计划，也未能真正实行。

1946年，李铭担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1947年，随着蒋介石对解放区进攻失败，军费浩大，通货膨胀，带来财政经济上不可克服的危机。这时，政学系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张嘉璈任中央银行总裁，采用各种办法企图挣扎挽救。其办法之一是由中央银行建立输入管理委员会来控制外汇和物资，李铭任主任委员（后改为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任副主委）。这个机构不但不能挽救危机，难以控制走私，且极易从开放的外汇市场牟利，因此招致CC系官僚的垂涎。李铭自知难敌CC系，便将副主任一职自动让给宋系官僚资本人物霍宝树担任。这年，由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与美国资本家合办的国泰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1948年，李铭将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随着法币极度贬值，国民政府于是年8月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金银外汇。李铭以全国银行公会理事长身份，担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维护民族金融工商业者的利益，与国民政府当局苦力周旋。为上缴金银外汇事，浙江第一商业银行险遭查封。他预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陆续将资金向国外转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铭前往香港。他到港后招募资本开

设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

1966年10月22日李铭在香港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李铭》，［美］《中国名人传辞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姚崧龄：《张公权与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结识及彼此合作经过》，台湾《传记文学》第33卷第5期。

戚再玉：《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第50页。

《李馥荪先生小传》，海上名人编辑部编《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版，第16页。

《李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李鸣钟

陈民

李鸣钟，字晓东，河南沈丘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一户贫寒人家。幼年失学，至十七八岁，投考冯玉祥所在的新建陆军第六镇当兵。1909年毕业于陆军随营学堂，任排长。1913年冯玉祥升任陆军第十六混战旅旅长时，李鸣钟被任命为学兵连连长，他对学兵认真训练，严格要求，为冯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如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等，当时都是李部学兵，李本人追随冯玉祥南征北战，成为冯玉祥军事集团的重要将领，与张之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并列为西北军“五虎上将”。

1917年，李鸣钟任第十六混战旅第三团团长。是年7月，张勋拥清宣统复辟，是时，已于当年4月被北京政府段祺瑞免去旅长职务的冯玉祥在北京西山疗养，李鸣钟与张之江、鹿钟麟等坚决反对张勋复辟，迎接冯玉祥回混成旅主持大计。7月12日，李鸣钟率部向天坛发起总攻，一举粉碎了复辟。

1920年，冯玉祥奉命与阎相文入陕，武力驱逐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李鸣钟率部进攻潼关，配合友军夺取西安，陈树藩败逃。第十六混战旅因功扩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李鸣钟升任第二十一旅旅长。

1922年，李鸣钟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因战功卓著，北京政府授予“刚威将军”，任豫东镇守使。是年10月，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所部扩充为第十一师及三个混成旅，即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第十一师包括两个旅，分别由鹿钟麟、刘郁芬任旅长。不久，冯部奉命驻防

北京南苑，从此开始为时两年的南苑练兵，使冯部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

1924年，李鸣钟参加冯玉祥发动的“首都革命”（亦称“北京政变”），翌年春，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一军第六师师长，兼绥远都统。李鸣钟主政绥远期间，得何其巩、邓哲熙、吉鸿昌、李兴中等人辅佐，励精图治，团结少数民族和蒙古族上层人士，剿灭土匪、查禁烟馆、修路植树、兴办学校，多有建树。1926年，升任甘肃军务督办（未到任）。1925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讨赤联军”，企图消灭冯玉祥部及南方革命势力，冯玉祥在北京及河北、河南两省的地盘，处于直系与奉系的大包围下，形势险恶，冯玉祥为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当时，李兴中等劝李鸣钟就任甘肃军务督办，李鸣钟回答说，“我随冯至久，患难与共。冯既去，岂能独留” (1) ，遂随冯赴苏联。是年8月，冯玉祥得悉西北军南口溃败，即动身由莫斯科回国。李鸣钟与刘骥代表西北军偕徐谦南下广东，与南方国民革命军商谈合作事宜。蒋介石极力拉拢李鸣钟，对他优礼有加。

1927年，冯部进军河南，与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会师郑州。不久，冯玉祥又赴徐州与蒋介石义结金兰，称兄道弟。李鸣钟出于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愿望，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又是北伐的中坚力量，遂抱定“联蒋拥蒋”的立场，被蒋介石特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李鸣钟出任郑州市市长，后又任西北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1929年蒋桂、蒋冯战争后，一场更大规模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即将爆发，李鸣钟既忠于冯玉祥，又依附于蒋介石，不赞成蒋、冯再战，而又劝阻无效，遂自费出国考察，游历欧美各国。

1930年底，李鸣钟回国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豫、皖、鄂三省边防绥靖督办，奉命率吉鸿昌的第二十二路军“围

剿”大别山区的红军。李不愿再打内战，借肺病留在上海疗养，由参谋长王同生代行其职，而吉鸿昌更不愿对红军作战，他暗访苏区，抵制“剿共”。蒋介石得密报后，欲对吉下毒手。李鸣钟为保护吉鸿昌，急派人劝吉交出兵权，暂避风头，其第二十二路军指挥职务，由李本人兼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加紧反共。至此，李鸣钟自知难医国是，于是辞去本兼各职，赴北平隐居养病。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李宅被日伪查封。日伪维持会会长汤尔和亲自出面，拉拢李鸣钟参加伪政权。李化装成商人，经天津乘船转烟台返回河南老家。此后，曾上书国民党中央政府，请缨杀敌。1939年9月，李鸣钟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委员，1948年，任南京政府行宪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及军事参议院参议等空衔。

1949年6月29日，李鸣钟因食道癌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沈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沈丘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1)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410页。

李品仙

萧栋梁

李品仙，字鹤令。1890年4月22日（清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四）生于广西苍梧县平乐乡一个望族之家。幼读“四书”、“五经”，赋诗属对。十三岁考入苍梧县高小，并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落榜。1907年考入蔡锷创办的广西陆军小学。1910年由广西保升湖北第三陆军中学第二期，次年参加武昌起义，后回家乡任广西梧州军械局委员。1913年1月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与白崇禧同学，1914年底毕业，回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一团见习。次年3月随第一团参加护国战争，从柳州向衡阳进击湖南督军汤芗铭部。1916年6月，经湘军独立营连长张湘砥引荐，从桂军转入湘军，任中尉排长，一月后升任连长。该连旋即编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唐生智任营长的督署卫队营，后改为湘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团第三营，李品仙紧随唐生智参加护法战争、湘直战争、护宪战争，屡建战功，升任营长、团长等职。1924年，任湘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

1926年6月2日，李品仙随唐生智转入北伐军序列，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率军参加克复衡阳、攸县、长沙等战役。8月23日李部第八、十五团攻克羊楼司，9月进占汉阳龟山和汉口，并追击吴佩孚部至豫鄂边境，击败援吴军田维勤部，攻克河南战略要地鸡公山。1927年2月升任扩编后的第八军副军长（唐生智兼军长），4月22日升任军长，后又兼任武汉三镇卫戍总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员。“四一二”政变后，1927年5月李品仙下属驻鄂西的部队即首先调转枪口，收缴农会枪支。7月李指挥警卫人员搜捕武汉地区的共产党员，查封中共机关，解散汉口总工会及农会，收缴湖北总工会纠察队武器，看管苏联顾问。同年秋随唐生智“东征”失败，退往湘西。1928年2月，在李宗仁新桂系包围下，李品仙返投桂系，发布通电表示接

受南京政府改编。4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参加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期北伐。9月率部在滦河前线解除直鲁联军残部三万余人武装，李部移驻唐山一带。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携巨款赴唐山收编旧部，李品仙即重投唐，通电讨伐白崇禧，唐将第十二路军改编为第五路军，任总指挥，李任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1930年1月因第八军随唐生智反蒋失败，该部被缴械，李只身去香港经营农庄。同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后，李被桂系起用，担任湖南善后督办。桂系兵败后，李退回广西，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参谋长。1930年底李品仙改任南宁军官学校校长，后被撤职，到龙州任广西边防对讯督办兼左江区行政监督及龙州区民团指挥官。1935年，李复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月23日授予中将衔，7月25日特派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1937年3月13日授予中将加上将衔。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2月李品仙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三十一、四十八三个军，所辖第四十八军曾奉命开赴淞沪战场，参加上海保卫战，其余两军由李品仙率领前往徐州，李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协助李宗仁、白崇禧部署徐州会战。12月下旬，日本以十个师团南北夹击徐州，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又三个联队沿津浦线北上，1938年1月向明光进攻。李品仙指挥三十一军及安徽境内于学忠、杨森、徐源泉等部，负责津浦路南段作战，阻敌于淮河南岸。2月，日军沿铁路两侧向蚌埠推进，李品仙令三十一军一部对沿铁路北进之敌侧面攻击，将敌截成两段；另一部则在张公岭、明光一带游击，拖延敌人前进的计划。旋令四十八军协同三十一军攻击侵入刘府、考城、蚌埠之日军，毙敌千余人，击毁战车十余辆，收复凤阳、考城，渡过淮河的日军主力害怕腹背受敌、后路被断，遂退回南岸，在津浦南段寻找中国军队决战，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3月初，津浦路北段日军攻击我界河阵地，李品仙将三十一军移至淮河北岸防守，十一集团军总部北上移驻安徽宿

县。日军为攻占徐州，于3月24日猛烈轰击台儿庄阵地。李品仙部在枣庄、峄县与敌激战，收复临城、枣庄、峄县、韩庄。李指挥三十一军多次击退北进之敌，稳住固镇南方一带阵地，拖住北上日军，延缓了日军南北对进会攻徐州的计划，为李宗仁集中第五战区主力在台儿庄围歼日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促成了台儿庄歼敌精锐矶谷、板垣两师团主力一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38年6月，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当月日军为夺取武汉，集中四个师团和大量装甲部队沿陇海路向西进犯。下旬，李品仙被任命为武汉防卫军第四兵团司令，即将兵团司令部移至湖北广济，担负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区防守任务。他不顾敌机轰炸，驱车上黄梅前线视察，座车被敌炸毁，本人幸免于难。8月初，李率部在潜山、太湖、黄梅、广济一带与日军反复激战；日军攻占宿松、黄梅后，李令八十四军与六十八军拖延日军西进；8月29日指挥十一军重创黄梅日军。30日，日军利用空军和海军优势，以重炮猛轰，用毒气攻击，李被迫退出广济，占据高地反攻。9月1日，李率部收复广济，并缴获大量辎重，还在潜山、太湖等地与敌展开反复争夺战。10月24日，武汉失守，李奉令率部驻湖北枣阳休整。

1939年4月，李部奉命参加随枣会战。当月底，日军集中四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十余万人发动随（县）枣（阳）会战，企图围歼第五战区主力。李亲率左集团军三个军防守桐柏山、大洪山一带，巩固这两个游击根据地，对日军逐次抵抗，打消耗战，诱敌深入，拖住敌人。4月底，李率部与从湖北安陆、应山正面攻击四十八军之日军第三师团激战，经过该军一七五、一七四两师在郝家店、徐家店一带昼夜争夺后，退往塔儿湾守卫。两天后，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攻塔儿湾，李部与敌反复争夺过七次，重挫日军攻势。后因日军施放毒气，塔儿湾于5月4日陷敌。5日以后，日军连续向天河口、白庙镇、江家河、庐山一带我军阵地展开猛攻，均被守军击退。5月6日，由钟祥北窜之日军切断了襄樊与随、枣间公路。7至9日日军进至湖阳镇、

枣阳附近，情况危急。李品仙指挥八十四军在唐河、南阳之间阻敌北进，并令十三军一部留驻桐柏山开展游击，其余部队在泌阳附近构筑工事，配合八十四军阻敌北进，总司令部亦随即移驻河南南阳。5月10日，日军攻占新野后继续北进。5月12日，李下令全线反攻，河南保安部队与民众武装协同正规军日夜袭敌，驻守桐柏山、大洪山的部队则从南、北两面切断日军后方补给线。第三十三集团军亦从汉水两岸向东猛击敌军。敌军在连遭攻击、补给线中断后，被迫于5月20日撤退。随枣一役，李品仙率部击退日军四个师团进攻，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此役李被授予“干城勋章”。

1939年11月，李品仙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又兼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安徽省保安司令、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祸皖事件。1940年1月8日，李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县上任后，即与CC派合流，指使杨绩荪等制造反共舆论，清除“异党分子”，撤换、通缉进步县长和专员，暗杀、活埋中共党员，下令取消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撤销与新四军合作抗日领导者职务，调动军队进攻新四军部队。同年3月7日，李派主力部队配合皖北部队进攻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被击退。11日派部队进驻皖中无为县，断绝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系。后又扣押并杀害新四军干部二十余人。4月，李部四千余人突袭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造成惨重伤亡。经新四军张云逸、李先念部有力反击，李部才被迫签订以淮南铁路为界的停战协定。同年9月，李部一三八师进攻皖东根据地。1940年11月至1941年初，李率部参加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参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0年5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随枣会战，从豫南、鄂北、鄂中三路向西进攻，李品仙率部在平汉线南段重创日军。1941年3月，李率部反击日军对皖系游击区的“扫荡”；以一三八师一部在内线依靠坚固工事吸引敌人，将主力迂回外线待敌；并令一七二师进击合肥一带，一七一师进击淮南铁路以东地区，配合一三八师作战。3月7日至8

日，日军在梁园附近受到内外夹攻，战斗激烈，伤亡惨重，被迫溃退。同年8月，李率部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牵制日军，取得胜利。1944年李率部在皖东围攻陈毅、张云逸所部新四军。年底李任安徽省军管区司令，1945年1月升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李品仙任徐州、蚌埠地区受降主官。1946年4月奉命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参加在九江召开的“剿共”军事会议，策划围剿刘伯承部队。同年李品仙兼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曾以安徽省地方银行的二百七十多亿元法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1948年6月辞安徽省政府主席，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9月先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和华中“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5月被代总统李宗仁任命为桂林绥靖公署主任，到广西负责反共作战，11月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1949年12月李品仙前往台湾，次年3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3年退休，任台北水源里邻长。1987年3月23日在台北病逝，著有《李品仙回忆录》。

主要参考资料

李品仙著：《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李盛铎

王川

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1859年（清咸丰九年）生。李盛铎出身于书宦之家，其曾祖父李恕，道光时贡生，喜藏书，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木犀轩，藏书有十多万卷。其父李明墀，曾任知县，后改授户部员外郎，简放湖南辰州府知府，升督粮道加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以后又调任湖北总办粮台加布政使衔。同李恕一样，李明墀“生平好聚书，廉俸所余辄购置小籍，所藏多至数十万卷”[(1)]。李盛铎受家庭影响，“五岁入学，过目成诵，十七岁名噪江西文坛，为世瞩目”[(2)]。

1889年（光绪十五年），李盛铎参加殿试，中进士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旋任国史馆协修。李盛铎曾一度住在大学士徐桐家里，深得信任。1891年7月在徐桐的推荐下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盛铎在督办军务处任文案。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对战争持消极态度、竭力求和，其妥协行径引起国内人民和部分清廷官员的不满和愤慨。翰林院三十余人联名奏参李鸿章。李盛铎时以侍读学士的身份也积极参与了弹劾李鸿章的活动。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维新救亡运动应运而起。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数千名举人上书清光绪皇帝，提出变法救亡主张，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同年10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呼吁官僚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希望。李盛铎曾参与强学会。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外患极为严重，国人痛感被瓜分危机已迫在眉睫。1898年3月，李盛铎赴江苏扬州任江南道监察御史。4月，乘各省举人会试于京城之机，和康有为“同谋开演说恳亲之

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宗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李盛铎是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保国会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上奏要求严禁保国会的活动。在恶劣的政治形势下，许多人纷纷退会。李盛铎在徐桐、荣禄等人的压力下“乃除名不与会”[(3)]，没参加以后的会议，甚至在5月3日上奏弹劾保国会。后来尽管保国会受到光绪帝的保护，但在成立两个月后仍被解散。

李盛铎对于教育改革十分重视，在1898他曾多次上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建议。作为戊戌变法“新政”措施之一的京师大学堂开办后，时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于8月21日保荐李盛铎接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一职，获朝廷允准。8月26日，孙家鼐再次奏请派李氏领队前往日本考察学务[(4)]。正当李盛铎积极筹划日本学务考察之际，清廷又于9月19日谕署原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为驻日公使，接替并未到任的黄遵宪。李于10月3日到任，1901年11月27日卸任。

李盛铎出使日本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留日中国学生中迅速传播。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在日本扩大了自己的宣传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关注。1899年6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即看到康、梁“每觊可乘之隙，思炀既烬之灰”，上书清廷弹劾李盛铎查防不力，请“将李盛铎撤回，毋使驻倭，以息奸慝之谋，而保太平之局，天下幸甚”[(5)]。戊戌变法失败后，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形成剿、抚两种意见。1900年6月，李盛铎自日本发电清廷，认为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将会带来巨大灾难，主张一面镇压义和团，一面与各国示好。1901年李盛铎驻日公使一职任满，旋即回国，被授予顺天府丞一职，1904年7月署太常寺卿。

清朝末年，外国科学技术传入中国，铁路的作用已被朝野上下所认识。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是年冬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向民

间资本开放路权。紧接着各省爱国人士纷纷创办本省铁路。1904年10月，李盛铎联合江西籍京官如内阁侍读学士蔡钧、户科给事中陈田、刑科给事中吴煦等110人上奏申请南浔（南昌—九江）铁路由江西本省自行修筑[(6)]，并倡议成立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推荐在籍头品顶戴前江宁布政使李有棻督办兴修铁路。10月12日，商部奏派李有棻为总办。

20世纪初年，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迭起，清王朝内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清廷迫于内外舆论的压力，于1905年决定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前往日、美、欧“考察政治”，为“仿行预备立宪”做准备。9月24日，正当五大臣准备启程的时候，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到革命党人吴樾谋刺，五大臣出洋被迫改期。为了防止再生不测，考察团重组人马，清廷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替代徐世昌、绍英，于1905年12月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使考察。李盛铎已于8月27日被清廷授命为驻比利时大使，赏给二品顶戴，行将赴任，此时兼负考察重任。考察团分两路进行，一路是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赴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考察；一路是戴鸿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考察。1906年6月，除李盛铎外其他考察大臣先后回国，李盛铎于6月17日赴任比利时大使[(7)]。5月李盛铎在英国考察期间，还接受牛津、剑桥大学博士名誉学位之赠[(8)]。

1909年三四月间驻比使馆随员王慕陶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海外通讯机关——远东通讯社。李盛铎虽未在创办人之列，但他给予王慕陶极大支持，赞助也最多。李盛铎本人也向外务部报告了这年“三月在比京捐廉创办远东通讯社”之事[(9)]。10月李盛铎从驻比利时公使位置上卸任归国后，继续回顺天府任府丞，并一直负责综理远东通信社在国内的事务，继续给予远东通信社支持和帮助，直到1911年2月被调任山西任职为止。

1911年3月24日，清政府改任李盛铎为山西提法使。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响应。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10月30日，李盛铎被推举为民政长[(10)]。

武昌起义后，11月袁世凯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命令张锡銮为山西巡抚，许世英为山西布政使，统率北洋精锐第三镇曹锟部及武卫军王汝贤部进攻山西。在清政府的反攻下，山西军政府崩溃，旧政权复辟，1911年12月21日，李盛铎被清政府任命为山西布政使、按察使，1912年2月1日署巡抚[(11)]。

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5日，袁世凯命阎锡山署理山西都督，李盛铎为民政长。李盛铎不久辞职，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政治顾问。1913年6月，袁世凯派李盛铎与孙宝琦同任特使，赴日进行经济外交活动。1914年1月，李盛铎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3月兼任约法会议议员。5月任参政院参政。7月因欧战爆发，奉命与孙宝琦、梁士诒等人草拟局外中立条规，次年8月公布。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李盛铎与熊希龄等人组织了“民彝社”。1917年5月，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因参战问题发生纠纷，李盛铎被黎元洪派赴徐州邀请张勋出面担任调停人。6月29日，李盛铎出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6月30日又被任命为全国水利局总裁。7月1日张勋复辟后，李盛铎被任命为农商部尚书，但他均未就任。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功臣重任国务总理，企图独揽政权推行其“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段祺瑞等人认为必须首先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才能操纵总统选举，进而把持政坛。于是便收买了一批官僚、政客，组织起“安福俱乐部”来策划选举等事宜。1918年3月7日，皖系政客在北京成立“安福俱乐部”，李盛铎担任

俱乐部政务研究会会长。8月，第二届国会开幕，安福议员占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完全由安福系把持。安福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又包揽了国会的事务，时人谓新国会为“安福国会”。李盛铎于1918年7月任参议院议员，12月任参议院议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解散安福国会，李盛铎从此退隐不问政事。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正义要求。2月11日，李盛铎、王揖唐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国际联盟协会”，声援中国代表。

1921年11月1日，李盛铎与叶恭绰、王树枏、罗振玉等人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并以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去挑选残存古卷。1925年9月，李盛铎出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事商榷会”会长。1927年听说外国人要高价收购罗振玉收藏的重达十二万斤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后，李盛铎立即以一万六千元把这批档案收买，此举对于这批内阁档案得以保存下来意义重大。

李盛铎不仅在政界颇有影响，还是近代很有名望的收藏家、藏书家。李盛铎藏书有着渊源的家世，其藏书堂“木犀轩”最早建于他的曾祖父李恕时期。李恕，字卉园，道光年间贡生，喜藏书，建“木犀轩”于江州（今九江）谭家畈，藏书凡十万卷，太平天国起义时，这些书籍被烧毁。他的祖父李文湜，字晓峰，又继续藏书。他的父亲李明墀，字玉楼，号晋斋，承兄难荫袭知县，后官至湖南、福建巡抚，他生平好藏书，所藏书籍至数十万卷。由于其父的努力，使“木犀轩”的藏书得以恢复旧观。木犀轩藏书到李盛铎已是四世藏书，李盛铎继续收藏敦煌所出写经等珍贵文献[(12)]，成为了名重海内外的巨藏。

李盛铎藏书是从二十岁未入官前开始的。其所藏之书除继承祖藏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光绪初年李盛铎随父宦游长沙时，尽得湘潭袁芳瑛“卧雪庐”的精华，奠定了李氏藏书的重要基础。其藏

书绝大部分为珍本。二是李盛铎出使日本期间，结识了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在岛田氏帮助下购买了不少书，其中有大量日本和朝鲜的古刻本、活字本和旧抄本；还有不少流传到日本的宋、明刊本和抄本。三是1923年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书散出后，为李盛铎收购不少。再加上李盛铎平日访书购书，使其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家。

20世纪30年代，“木犀轩”藏书陆续有些散出，或质于个人，或押于银行。等到李盛铎病逝后不久，日本书商欲以重金收购“木犀轩”，教育部得悉后为防国宝外流，计划以30万元归公，正在讨价还价之时抗战爆发，此事遂搁浅下来。后来在1939年，由伪临时政府以40万元整批收购，交北京大学文学院典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对这批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1946年开始，当时由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主编，到1950年基本完成。1955年由常芝英完成收尾工作，向达先生撰序，1956年印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上、中、下三册[(13)]。其藏书总计有9087种，58385册，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这批书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藏之一。

李盛铎不仅是收藏家，还是学者，尤其在版本学和校勘学方面有很深造诣，其藏书中很多都经他亲手校勘，每书后多有自写题跋，述记得书经过、介绍作者生平、考证版本源流、指出内容讹误，或对作品作出评价，日积月累所写题识多达十五万余字，学术研究价值极高[(14)]。

除藏书外，李盛铎还刊印过图书。近代自铅字排印、石版印书方法由西洋传入中国后，即有很多人设立石印书局刊印各类书籍。1887年，李盛铎向国外订购十余部石印机器，在上海开设“蜚英馆”印书局，专门石印“场屋用之夹袋书，所谓巾箱本之兔园册子”[(15)]。此外，李盛铎以传统木刻印过两部丛书：一部是《木犀轩丛书》二十六种，1883年至1889年刊行，以经、史两部占绝大部分，除一种外全是清代的著述；另一部虽称为《木犀轩丛书续刻》六种，其中却有早

自1882年刊印的[16]。

李盛铎晚年出于对桑梓热爱之情，独立编纂《德化备志稿》，辑存了一册很有价值的史料，还应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之请，参与编纂《续编四库全书提要》一书[17]。

1935年李盛铎病逝于天津。

主要参考资料

李传梓：《回忆祖父李盛铎》，江西省九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九江县文史资料汇编》第3辑，1993年版。

张玉范：《李盛铎与木犀轩藏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2期。

---

(1) 《德化李大中丞行状》，李传梓：《李盛铎爱书成癖》，鄢鹤龄主编、江西省文史研究馆编《豫章史撷》，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9—60页。

(2) 李传梓：《回忆祖父李盛铎》，江西省九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九江县文史资料汇编》第3辑，1993年版，第141页。

(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第269页。

(4)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92—93页。

(5)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07—508页。

(6) 《商部奏江西绅士筹筑铁路并请派员总办折》，《东方杂志》第2卷第1期，1905年1月。

(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16页。

(8) 《李盛铎木犀轩》，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9) 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宣统元年正月——三年十二月），《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2辑（1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0)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页。

(11) 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发行，第731、822、588页。

(12) 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载荣新江《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5—102页。

(13) 张玉范：《李盛铎与木犀轩藏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2期，第37页。

(14) 李传梓：《李盛铎爱书成癖》，鄢鹤龄主编、江西省文史研究馆编《豫章史撷》，第59—60页。

(15) 王汉章：《刊印总述》，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62页。

(16) 《李盛铎木犀轩》，载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第29页。

(17) 李传梓：《回忆祖父李盛铎》，《九江县文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41页。

李石岑

娄献阁

李石岑，名邦藩，字石岑。1892年12月（清光绪十八年十一月）生于湖南醴陵。五岁入塾，勤奋好学，读了中国古代典籍。稍长，入长沙湖南优级师范学校习理化科学，对几何产生了浓厚兴趣，自谓："余少时初习几何学，莫审所指；其后习论理学，始稍稍能言其故，仍未克举其内容，乃复重习几何学，如是者数岁，遂得略窥其义蕴，盖思想方法之达于绝诣者也。"(1)

1912年底，李石岑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初到日本，儒风犹存，被同学讥为"李圣人"、"假圣人"。但后来，他对西方哲学如饥似渴的钻研，并笃志佛家因明唯识之学。在日本求学六年间，李还积极参加各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活动。1915年李与潘培敏等在东京发起"学术研究会"，翌年6月编辑出版《民铎》杂志，因揭露日本侵华和国内军阀专制，被日本警方查封。1916年他参加"丙辰学社"，1918年参与"华瀛通讯社"事务，继续坚持斗争。同年，留日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日本警察镇压，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李亦回到国内。

自1918年起，李石岑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达十年之久，续编《民铎》杂志，以"阐平民精神，介绍现代思潮"为主旨。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时期，李石岑一方面对新文化运动持欢迎态度，认为运动使"自动之精神出焉"，"组织之能力合焉"，"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波焉"，"求新之欲望富焉"(2)。另一方面又觉运动思想浅薄，希望青年不去参加政治活动，而专心读书，努力提高学术水平。他没有直接加入新文化运动，只提出"第一，在督促国人注重学问生活；第二，在联络富有学识之人，共营翻译之事业"(3)，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

想。不久，《民铎》杂志出版了“尼采专号”，李发表了《尼采思想之批判》一文，同期还刊登有朱侣云、白山等介绍尼采的文章。李虽声明：“愚为尼采之说明者，而非尼采之主张者”，但又说：“细究尼采之思想，实未敢抹杀其真价”，“欲救济此种黏液质之顺氓，或即在国人所詈之骂之非议之尼采思想欤？”[(4)] 此后，他多次在讲演中鼓吹尼采学说，并在大学里开设尼采哲学课程，后来出版《超人哲学浅说》一书以宣传尼采思想。

1920年1月至1921年7月，李石岑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其间加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1920年10月，李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及章太炎、蔡元培、张东荪等到湖南讲学，历时一月，共讲五十多场。李建议杜威重点讲教育哲学，罗素重点讲社会哲学，李自己也讲了五场，内容庞杂，主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在《杜威与罗素之批评的介绍》中，他分析了二人优缺点后说：“我对他们两人的学说，都不十分赞成。我比较赞成且加佩服的，便是法国柏格森的哲学。……可谓取杜、罗两人的长处，去掉他们的短处”[(5)]。在李石岑看来，柏格森颇具独创精神，柏氏“仅凭洞识以建立一种有统系之哲学，皆为不及之天才。康德而外，吾仅见柏格森焉”，“柏氏哲学足以转移学术界，而为吾人所不可不精研之者”[(6)]。1921年，《民铎》杂志出“柏格森专号”，发表李特意撰写的长文《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等，系统介绍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旁及柏氏《物质与记忆》、《创造的进化》诸思想，使柏氏的学说逐渐流传于中国。后李又在《民铎》杂志出“康德专号”。

1922年1月到1928年夏，李石岑兼《教育杂志》主编，主张教育独立，提倡美育、体育及职业教育，研究设计教学法，智力测验、评论国内教育状况，介绍世界教育新潮。同年，又在中国公学讲演《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学说》，对梁著作内容、态度和生活进行了批评，尤针对梁尊孔复古思想，指出孔子到今日“只剩下一个‘糟粕形势

呆板教条'"，"孔家哲学，此时暂可不必提倡"[7]。当时李为了深入研究佛学，曾拜欧阳竟无为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李在讲演中提到要用因明唯识学来"订正"科学和哲学。

李石岑还在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民国大学、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兼任哲学、心理学教授，主要是介绍西方各派学说，除柏格森、尼采、康德等人外，还有黑格尔、贝克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尔文、克鲁泡特金、斯宾塞、孔德诸人的观点，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李把这些论文和讲演分别整理成册，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暑假，李石岑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前往讲演《人生哲学》，后经整理成《人生哲学》上卷一书，于1926年出版。李石岑的人生哲学比较全面系统，他认为"人生哲学是探求'人生的究竟'的一种学问"，以往人们讲人生只着眼于"人"，其实"生"才是根本问题。生有五个意思，一是"动"，二是"变"，三是"顿起顿灭"，四是"扩大"，五是"交通"，"这五个意思是一刹那同时有的"。"我的人生观就是表现生命，而其方法就是无为"，"无所为而为，即是大有为"，这需要四气即剑气、奇气、骨气、义气的修养。"生机如果顺着势……我们便帮助他增入顺境"，"生机如果被别的遏抑，我们便设法把遏抑东西弄开"。"对于善便助长，对于恶便利导"，"善和恶都是向善的方面走，走到至善的境界为止"[8]。李的人生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有唤起人们反抗精神的一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

李石岑是爱国有正义感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立即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悼三月十八日北京被杀学生》一文，声讨段祺瑞政府的罪行。大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李受他的几个进步学生的影响，对以往的信仰发生动摇。为解决思想上疑团，李决定去欧洲进行学术考察。李石岑留居法、德两年多时间里，埋首阅读各家哲学书籍，重点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拜会了柏格森，并有机会接近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者，同时还对两国的社会生活、教育、文化等进行全面考察。他亲身感受了当时欧洲的经济危机，体会

到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经过认真思考，逐渐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称为新唯物论）。

李石岑根据在欧洲的考察，对新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有较多认识，指出新唯物论同旧唯物论的根本区别，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旧唯物论机械地看一切事物，认为事物是不变的；而新唯物论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推翻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把辩证法用唯物观点填充起来，把一切事物看作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二）旧唯物论关于历史问题仍陷入唯心主义，新唯物论则发现了历史独有的规律：物质生产力。（三）旧唯物论至多只能解释世界，新唯物论还要改造世界，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李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里格尔、康德等持否定态度，对所谓的新浪漫派特别是对柏格森、尼采仍有留恋，甚至说应“在尼采哲学里加多唯物史观的成分”[(9)]。其时，李对德国哲学家朗格的《唯物主义史》一书甚有兴趣，曾用四年多时间与人合作翻译此书。

1930年底，李石岑回到上海，先后任大夏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讲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同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哲学浅说》、《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书。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暨南大学属于战区，他的居室财产毁于战火，加上陷于爱情纠纷，精神上受到打击。3月，暨南大学取得广州中山大学同意，在该校设立临时办事处，李应邀去中大担任哲学系教授。4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邀他参加，他以该会议掩饰安内攘外政策，拒绝与会。

1932年暑假，福建教育厅主办讲学会，邀李石岑讲演中国哲学史，历时两月，后整理成《中国哲学十讲》一书。他对中国哲学有所创见，阐明老庄思想富于辩证法思想，以诗的观点说明孔子学说，强调墨家的实践，尤对各时代的社会背景、阶级对立进行分析。1935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科学社会主义讲座上，李讲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同年暑假，上海教育会主

办的讲学会，邀请他在每周二、五两天讲人生问题，亦分十讲，从古典派、自然派、理想派、新理派、快乐派、功利派、实证派、唯识派讲到新唯物派。暑假后，他任暨南大学教育系行政组主任，主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辩证法史、西洋教育思想史等课。同年秋相继出版《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第一卷）等书，标志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

当时中国哲学界围绕哲学是否要消灭、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地位的论战正处高潮时期，李石岑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投入论战中，发表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未来的哲学》、《三十年来世界哲学之进展》、《世界思潮的动向》、《世界文化的前途》等多篇文章，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为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21日，李石岑因肾炎去世。

---

(1) 李石岑：《自序》，《李石岑论文集》第1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页。

(2) 田伏隆：《李石岑》，李振霞、付云龙主编《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 李石岑：《李石岑论文集》第1辑，第307页。

(4) 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李石岑论文集》第1辑，第21、58页。

(5) 李石岑：《杜威与罗素之批评的介绍》，《李石岑讲演集》第1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0页。

(6) 李石岑：《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李石岑论文集》第1辑，第89、59页。

(7)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李石岑论文集》第1辑，第

18、19页。

(8) 李石岑：《人生哲学大要》，《李石岑讲演集》第1辑，第65—66页。

(9) 田伏隆：《李石岑》，第337页。

李世甲

李锡贵

李世甲，又名渚藩、德声，字凯涛。1894年4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日）生于福建侯官，祖籍长乐。父亲李复礼在福州开设生花堂笔店，靠制笔为生。李世甲六岁入塾，1905年入自治学堂读书。越两年，赴沪投考海军，被选入烟台海军学校，习航海科，每试均列前茅。1911年6月毕业，派在“通济”练习舰见习。辛亥武昌首义，海军顺应潮流，李世甲加入革命阵线，随舰参加光复南京等战役。

1913年1月，李世甲入南京海军军官学校进修。12月以第一名毕业，补海军少尉，派为“海容”舰候补副官，随舰实习。1915年被派公费留学美国，在美国新伦敦电船制造厂研习驾驶潜水艇专科，对潜艇构造及潜航技术等均有心得。翌年10月毕业返国，派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差遣员，补海军中尉，旋充“海容”舰鱼雷副。

1917年春，李世甲升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中尉副官，在该舰队的上海办事处随办。在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后，李参与接收德国留在扬子江的军舰和停泊在上海的德奥商船，管理战俘，补海军上尉。1918年，苏俄对德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后，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为首，邀集十四个协约国组织干涉军，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段祺瑞内阁也派出“海容”舰及边防军一个团，由新擢海军代将林建章率赴海参崴，设海军代将处，李世甲以第一舰队上尉副官身份随从参与其事。10月，协约国干涉军组织参谋团西进，他以中国干涉军少校参谋身份随团行动。次年11月，德国投降，签订《凡尔赛和约》，中国干涉军由俄撤兵，海军代将处以“保护侨民”为名仍驻海参崴，李世甲留代将处任随办。

李世甲于1920年1月奉调回国，升海军练习舰队少校教练官，驻“通济”练习舰（舰长陈绍宽）。1922年充北京政府海军部中校副官，旋调海军马尾警备司令部参谋，兼警备队管带。

1923年，李世甲升为海军练习舰队司令部中校参谋，督导操练，纠察军纪。同时，兼代“豫章”驱逐舰、“华乙”运输舰舰长。1924年3月6日，孙传芳由延平（今南平）突然回军迫福州围缴王永泉部军械时，李则奉兼海军闽厦警备司令杨树庄之命，于3月9日率领海军警备一中队和要塞兵两连，驾“吉云”轮驶往乌龙江峡兜截击王永泉部，俘获其炮营官兵二百余人，山炮四尊，以及枪械弹药等。9月初苏浙之战开始后，厦门海军亦由杨树庄率领开向浙海及吴淞。10月苏浙之战告终，李世甲晋升“楚同”舰舰长，驻防东山。

1926年北伐军兴，湘、鄂相继为国民革命军所占，福建亦在革命军攻击之下。大势所趋，李世甲随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和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意欲归附北伐军。是年10月，何应钦率领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由广东潮、汕向福建进军，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张毅部节节败退，由厦门向福州退却，李世甲奉陈季良电令，率“楚同”舰向闽江口以南海域港湾搜索，以截留张毅部队及其辎重船只为目标。不久李世甲奉命星夜兼程开赴乌龙江，给尾追张毅部的北伐军和海军陆战队助战，促使张毅部向南港逃窜，全歼于瓜山。嗣后，引导北伐军向福州城区压进，并将“楚同”舰驶泊闽江大桥下，炮口朝向市内警戒，胁迫福宁镇守使兼省防司令李生春向国民革命军投降。

1927年2月，李世甲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电调，率“楚同”舰驶沪，在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的督率下，驶入长江扼要屯防。3月，李世甲参加杨树庄在上海吴淞口“海筹”舰上举行的军事会议，赞同海军易帜，正式归附国民革命军。会后，李世甲奉命率“楚同”舰与“楚谦”、“楚有”舰一同由吴淞口溯江上驶，以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络。三舰驶抵九江后，李世甲等人登岸乘车往南昌，在乐化晤见蒋介石，同车返九江。正欲东下的蒋介石，即乘坐李世甲的“楚同”舰顺

江而下。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美、英帝国主义悍然炮轰南京城，制造事端。“楚同”舰载蒋介石于3月25日中午抵达下关，但蒋害怕局势不稳，在“楚同”舰召程潜、何应钦等人商讨战局，于当晚7时即命李世甲指挥“楚同”舰载送他去上海。李在孙传芳军与北伐军于两岸严密布防、不时交火的险势下，驱舰猛冲疾驶，于26日抵达上海。

短短数日，李世甲初侍蒋介石，颇获蒋的青睐。4月李奉调至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任联络参谋，专为蒋介石联系海军，凡海军的煤炭、枪弹和饷糈等等，都由他接洽交办。蒋介石并委他为总司令部参议。5月，李世甲参加国民党。8月蒋介石下野，李返回“楚同”舰仍任舰长，参加了攻打孙传芳的龙潭战役和西征唐生智之役。1928年2月，李世甲升任“通济”练习舰舰长，补海军上校。4月，被选为海军国民党特别党部执委。

1929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李世甲升任海军部总务司司长，叙少将，兼海军江南造船所监造官。李选日本播磨造船厂代造“宁海”舰，兼任监造官，先后三次去日本。

1932年1月，李世甲以总务司长兼代海军部常务次长。“一二八”事变骤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李世甲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及与日本海军维持“友谊”的命令，竟与日军司令野村海军中将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2月初，江南造船所的哨兵为自卫，击毙日本商船船长福田，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蛮横提出惩凶、道歉、赔偿、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等强硬要求。李在上海秘密会晤日本海军武官北岗大佐，委曲求全，社会舆论哗然，纷纷指摘他为亲日分子。

1934年2月，李世甲调任海军马尾要港司令，兼福建省政府委员及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在马尾之海军学校、海军造船所、海军陆战队讲武堂、海军练营、海军医院、海军修械所、海军监狱，以及海军陆战队第一、第二两个独立旅，长门要塞，海军陆战队补充营

等，均归其节制指挥。次年，海军部长陈绍宽于马尾创办海军学校，派李世甲兼教育长。时值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略我国之际，李世甲却向日本海军省接洽聘请两名教官，来讲授军事学和国际公法，因而引起一部分舰长的强烈反对，拒绝入学。社会上对李的指责也相当激烈。但他却受到国民政府的安抚，于9月被正式补叙为海军少将。次年11月，又以“努力国民革命勋绩”，获得奖章和褒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李世甲改变亲日姿态，投身抗日战争。他奉行蒋介石的单纯防御战略，下令撤除闽江航道标志，征用大量商轮民船、警艇等，装满沙石沉没于长门港道，并在其他两个通航港道填筑石挡一百六十一挡，构筑起了闽江口阻塞封锁线，在阻塞线外沿又多布水雷，以阻遏敌舰深入。

1939年6月，占领金门、厦门的日本侵略军，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占闽江口的川石岛，与长门要塞相对峙，不时发生炮战。马尾要港迭遭敌机狂轰滥炸。李世甲一方面与陆军构成联合阵线，加强重要港道布雷设施，增设辅助封锁线，严加戒备；另一方面向闽江上游南平等地疏散非战斗人员，转移重要军需物资。

1941年春，日本陆海空军大举进攻福州，李世甲率驻闽海军部队扼守马（尾）长（门）地区，与敌战斗，周旋三月，颇多伤亡。福州陷落后，马、长孤立无援，李奉令弃守，转至鼓岭地区，被敌围困两昼夜，最后突围，移驻古田水口。5月，李任闽江江防司令，仍兼陆战队旅长。9月1日，侵占福州的日军开始撤退，李率队星夜向福州推进，于4、5两日先后收复马尾、长门，仍在马、长要港区域部署防务。

1944年9月，日军再度进犯福州，李世甲率部抗敌，在长门至岭头之间作战七昼夜，嗣后大北岭陆军主阵地被敌攻破，乃奉令撤退，布防桐口、白沙一带，以消耗战略与敌相持九个月之久，大小战斗达数十次，互有伤亡。1945年5月，陆战队与第八十师分三路进迫福

州，敌军撤退后，又收复马尾、长门地区。6月，李调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李世甲奉派兼任接收专员，负责接收厦门和台湾的日伪海军。9月下旬，李率队进入厦门，主持日本海军受降仪式。嗣后又率陆战队一团，前往台湾，接收台、澎日本海军，并负责遣俘一万八千余人。11月，李世甲调任海军台澎要港司令。

是年冬，国民政府改组军事机构，裁撤海军总司令部，在军政部下设海军处，军政部长陈诚自兼处长，还动用武力接管海军部。海军总司令陈绍宽被迫去职，李世甲深感海军处境窘困，亦于1946年5月辞职离台返榕，不久转赴上海休养。

李世甲卸却海军本职后，只挂名为福建省政府委员。1948年他出任福州市粮食配购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省“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委员、省经济管制督导委员会秘书长。在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申请辞职去厦门的短期间里，李曾被推举代拆代行省主席职务。1949年8月初，李赴厦门，让妻小先渡海去台湾。不久得知人民解放军已迫近福州，海军前辈萨镇冰、陈绍宽等拥护共产党，拒去台湾，迎接解放，并悉知长子李作健在沪策动海军之事已泄、被台湾电令指名追捕等内情，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垂死挣扎绝无希望，自己去台定无出路，遂于8月15日返回福州，等待解放。

1951年李世甲被判管制四年，在劳动中求改造，同时注意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1956年，李被安排为福建省政协委员，任省政协台湾工作组组员兼秘书，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70年4月11日李世甲去世。1979年福建省政协和民革召开追悼大会，肯定他解放以来的进步和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1962年版。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8辑（海军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海军大事记》（清同治元年至民国三十年），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1965年翻印本。

李士群

黄美真　石源华

李士群，浙江遂昌县人。生于1905年4月24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李早年丧父，依靠母亲种田为生。少时在本乡读私塾，20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曾游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值国内北伐军兴，投袂回国”[(1)]。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影响下，李士群经上海大学同学方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李士群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自己移交给国民党当局，李即向青帮大流氓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1932年，李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并与另外两个叛徒丁默邨、唐惠民在上海新光书局编《社会新闻》杂志，对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进行诬蔑诋毁。

1933年，李士群在特务内部的争斗中，因参与谋杀上海工作区首任区长马绍武，被逮捕押解南京受审，饱尝酷刑，险些丧命。后由他的妻子叶吉卿打通了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李士群才获释，但仍不准擅离南京。此后，李先后被委为党务调查科编译员、南京区侦察员，以及国民党办的“留俄同学会”理事、“留俄招待所”副主任，很不得志。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与另外两个特务石林森、夏仲高奉命“潜伏”。此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已在上海设立特务机关，派一女特务到南京活动，并与李姘居。具有强烈领袖欲和政治

野心的李士群感到自己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爬不上去，遂决心投靠日本侵略者。1938年夏秋之间，李士群趁中统委派他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的机会，席卷了全部特务经费，逃到香港，拜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把他介绍给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就这样，李士群由中共叛徒、中统特务又变为叛国投敌的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手下的鹰犬。以后，李常对人说：“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2)] 活露出一副无耻汉奸的嘴脸。

李士群到上海后，为了站稳脚跟，首先把手伸向国民党市党部等机构，将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章正范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刘坦公拉下水，一起搞情报。接着，又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杜月笙的“学生”汪曼云取得谅解，进而与当时已到香港的杜月笙接上头。同年底，军统派上海区行动股长于松乔谋刺李士群，汪曼云将此消息透露给李，使他免于丧命。

随着李士群在上海情报活动的开展，日特机关对他越来越重视。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不久公开发表投敌的“艳电”。日特机关示意李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以便策应汪的“和平运动”。李深知自己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的声望不足，便把原军统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从昆明邀来入伙，并允推戴他为首领。

1939年2月上旬，在清水董三的陪同下，李士群、丁默邨拜见了土肥原贤二，表示为了“收拾时局”，他们要“纠合国民党同志”“推进和平运动”，“希望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并强调说：“为对付重庆的恐怖活动，我们也有必要建立特工组织。如有日军援助，我们俩人组织特工。”[(3)] 3月20日，日本参谋总长给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发出训令，决定“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上海恐怖活动的对策的一部分”[(4)]。每月贷款30万元，出借手枪500支、子弹50000发以及炸药500公斤。李士群当即开始在上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一方

面，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四宝为首的大批地痞流氓和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作为特务打手；另一方面，利用丁默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以及失意军人，作为特务骨干，初步形成了一支特工队伍。李士群和丁默邨、唐惠明、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章正范为核心人员，即所谓“七人委员会”，对外以“中华扬子轮船公司”为掩护。

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开“局面”，李士群、丁默邨在日特机关的授意下，开始投靠汪精卫集团。1939年4月，当汪精卫还在河内时，他们就派汪曼云在香港和周佛海接上头，表示愿为汪的“和平运动”效忠。5月，汪精卫一伙抵达上海，进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经日特机关同意，李士群、丁默邨一伙便划归汪精卫集团领导，并正式成立了“特工总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任副主任。他们成立了警卫大队，负责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汉奸头目的安全保卫，成为汪精卫集团进行叛国活动的第一支武装力量。8月底，汪精卫集团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士群被指定为“中央委员”。9月5日，汪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丁默邨、李士群任副主任委员；“特工总部”成为它的下属机构，仍由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并兼“肃清委员会”副主任。

汪伪特工总部虽以丁默邨为首，但实权却操在李士群之手，丁、李为了争夺这支特工队伍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1939年底，李赴东京，与日方进行更加紧密的勾结，取得了日本参谋本部对他的信任。同时，他又向汪伪集团内实力派周佛海靠拢，获得了周的支持。1939年底，他先将唐惠民调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使自己与丁默邨并驾齐驱，继又架空了丁，独揽了“特工总部”的大权。

在日特机关的全力支持下，李士群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将“特工总部”的组织机构大加扩充，设立八个处（第一处专管军统，第二处专管中统、附设CP股对付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三处专

管“忠义救国军，第四处专管租界，另有机要、总务、电务、情报处）；四室（即督察、专员、审讯、化验室）；二所（招待、修械所）；又将特工武装队伍编组为一个行动总队（下辖六个行动大队）、一个警卫总队（下辖五个警卫大队），以及一些直属总部的警卫队、行动组；还建立了不少外围组织，如负责“学生运动”的“海社”，拉拢租界司法人员的“法院同仁会”，负责宣传舆论的“国民新闻社”，筹措特务经费的“立泰银行”、“上海实业银行”等，并先后在南京、杭州、青岛、武汉以及其他沦陷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完备、行动诡秘的特工机构，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凶恶鹰犬和汪伪政权的重要支柱。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成立伪国民政府时，李士群在周佛海的支持下，依靠手中的实力，将丁默邨排挤出“特工总部”，自己出任汪伪政府警政部政务次长兼“特工总部”主任。同年12月，周佛海辞去警政部长职，由李士群升任，权势更盛。

在李士群的直接指挥下，汪伪特务在上海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他们先后袭击了当时还保持抗日立场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等报馆，用浸过毒液的子弹暗杀了进行抗日义卖活动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负责人、共产党员茅丽英，还刺杀了不肯听命于汪伪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长郁华、“第一特区法院”刑庭长钱鸿业等。在大量血腥事件中，最为惨烈的要数“银行血案”。为了报复军统特务对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袭击，李士群不仅派特务炸了中央银行驻在租界的两个办事处，而且于1941午3月22日午夜，派遣大批特务包围了“中央银行别墅”，抓走中央银行职员一百九十余人，并从中提出三人枪决（其中一人未死）。同一天深夜，李士群又派另一批特务包围了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宿舍，用盒子枪扫射，致使六人死亡，五人重伤。至于绑票勒索，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如绑架杀害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勒索协大祥绸布店老板数十万元等均是。上海市民无不提心吊胆，不知何时横祸临头。沪西南一带的沦陷区，由汪伪特务开设的赌台、烟馆、妓院林立，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创上海开埠以来的最高纪录。总之，李士群指挥下的汪伪特务，依仗日本

侵略者的势力，横行不法，无恶不作，把上海搅得腥风血雨，乌烟瘴气。“特工总部”所在地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臭名远扬，附近沪西一带，被称为“歹土”。

1941年春，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在华中占领区实行“清乡”。李士群掌握的特工力量，再次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他被任命为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主持“清乡”工作。他将“警政部”、“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警察头目以及亲信爪牙，安插进“清乡委员会”，控制了各部门。李先后与日方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苏北地区“清乡”协定，规定由日方担任“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汪方担任“政治工作”；伪保安队和警察等“在清乡工作实施期间”由日方指挥调遣等等[(5)]。李士群利用“清乡”，从伪江苏省政府接管了“清乡区”的行政、赋税、教育、卫生等机构。

1941年8月，汪伪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成立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李士群任部长。12月李挤走了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自己继任。李一身兼任伪军委会部长、省政府主席、特工总部主任三要职，踌躇满志，频繁往返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权势发展到顶峰。但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引起了日本侵华当局的疑虑和反感，与汪伪集团中其他人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同周佛海、罗君强、林柏生等都发生激烈的权力冲突，而“特工总部”的一批骨干如丁默邨、苏成德、马啸天等也先后离他而去，有的甚至成了他的政敌。

1943年5月，蒋介石下达了除去李士群的命令，交周佛海执行。周“历四月之久，费了千多万”金钱[(6)]，终于在9月4日勾结日本驻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口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由冈村出面邀李、熊两人至上海百老汇大楼（今上海大厦）赴宴。冈村妻子于食物中投下毒药，殷勤请李品尝。第二天，李士群回到苏州开始发病，挣扎至19日毙命。

(1) 汪精卫：《李士群墓碑铭》，《中华日报》1943年10月14日。

(2) 马世淦：《我所知道的李士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日伪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3)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载《日中战争》（二）（《现代史资料》9），1965年版，第196页。

(4) ［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1946—1948），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200—201页。

(5)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1958年版，第100页。

(6)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南京市档案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5—110页。

李守信

万江红

李守信，原名李义，蒙古族。1892年7月11日（清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早年在热河北部“拉杆子”，纠集胡匪及马贼，创立“信”字号的“杆子”。1919年给土默特右旗的喇嘛旗官充当“炮手”（卫士），继后给热河游击队的统领张连同担任差官，并成为其马队中的骑兵连连长。1922年初，巴布扎布余党所率的匪部进犯热河开鲁（今属吉林省），李守信奉命出击，打散该匪部，升任营长。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热河地方部队驱赶奉军，李守信率部袭击奉军汲金纯部，歼灭了汲部的一团炮兵，夺获其新从德国买来的八门野炮。直系新任的热河都统米振标，将游击马队调驻开鲁，防守热河北部门户，李守信部驻开鲁正西九十里的爱根庙（现辽宁省的绍根）。1925年，李守信所在的独立第九旅旅长张连同被宋哲元击败俘走，独九旅由团长崔兴武与李守信带领，而以李部的人马最多最强。1928年，东北易帜，独立第九旅改称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崔兴武任旅长，李守信任第三十四团团长。

李守信任团长后，在其驻防的赤峰、经棚、开鲁等地，结交三教九流，经商牟利，投机倒把，走私贩毒，无所不为。对待人民革命，他心狠手辣。1930年前后，李带兵残酷地镇压了嘎达梅林的牧民起义。

“九一八”事变时，李守信驻防开鲁。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威胁热河边境，李守信部击落一架日本飞机。李为了获取枪炮弹药，把飞机上的机枪、电台以及被俘人员送到长春作为交换。日本关

东军小矶高兴地给他子弹22万发，手提机枪15挺，步枪25支，另外还送钱3万元，从此李守信和日军挂上了钩。日军侵犯热河，李守信于3月7日竟然迎日军和伪军开进林西。几天后，日军开往赤峰，他又甘愿为其指路。结果，田中玖犒赏李17000元。不久，日本关东军委派李为“热河游击师司令”，至此李守信完全投靠了日本。同年所部改编为察东警备军，李任司令。

1935年12月，李守信的伪军在日本飞机配合轰炸下，很快占领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八县，同时完全控制了察哈尔东部的正蓝、镶白、正白、镶黄、明安、太仆寺、商都等八旗，并在张北建立了李的伪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在察绥分治以后，日本关东军唆使李于1936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县城，将察北完全控制。

1936年2月12日，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领导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李守信参与其中，并被选为副总司令，兼任军务部长。德王为使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向着政权性的机构转化，4月24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第一次“蒙古大会”。李守信以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军政首脑资格参加了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议讨论了建立“蒙古国”、成立“蒙古军政府”以及与“满洲国”缔结互助协定等一系列问题。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德化市（化德县改称）宣告成立，李守信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谋部部长。同时，他兼任军政府总裁帮办，协助处理日常军政事务。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招兵买马，扩充军队。除李守信原有部队外，又从伪满东三盟各旗、锡察两盟的各旗招来一批新兵，编为两个军，第一军军长由李守信担任。伪蒙古军编成后，全都是骑兵，军费、武器多由日本关东军供给；从军部至连队，多配备有日本顾问、指导官、教官，对部队进行监督和指挥。

伪蒙古军编成后，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李守信等于1936年10月配合日本发起了侵犯绥远的计划。日本侵略军豢养的汉奸王英首

先率兵进攻绥东的红格尔图，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第一军进占南壕堑。11月中旬，由德王、李守信率领的伪蒙古军万余骑兵、王英率领伪大汉义军五千余人，在日本指挥官的直接督战下，向绥远的红格尔图发起了新的进攻。战争从14日开始，在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和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猛烈还击下，至17日以伪军的失败而告终。进攻绥远失败后，日本对伪蒙古军进行了整顿，在伪蒙古军政府之下，设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守信积极配合日军进攻。9月，当傅作义的部队从察绥东撤退时，德王、李守信便纠合伪蒙古军，配合东条带领的日本侵略军沿平绥线西犯。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作为日本侵略军的前驱，进占集宁、旗下营，很快迫近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10月14日，日伪军共同占领归绥城。

进占归绥后，伪蒙古军政府准备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0月27日，第二次“蒙古大会”在归绥市召开，东条亲临操纵，李守信被指定为“蒙古军”总司令。1938年7月1日第三次“蒙古大会”召开，李守信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同年秋天，李守信与德王、于品卿、夏恭等一起到日本参与筹划“蒙古建国”的活动。因为此计划违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蒙疆联合”愿望而未实现。1939年9月1日，经过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等精心策划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德王为主席、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李守信先后到南京、长春等地活动，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共荣”。1940年1月24日，在日本侵略军头目西尾寿造、板垣征四郎等操纵下，北平、南京两伪组织与汪精卫党羽在青岛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在沦陷区内组织全国“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府”等事，建立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操纵下的统一的伪政权。李守信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青岛，先于1月23日上午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举行了会谈，最后达成两点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疆

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力。3月，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为了确定伪蒙疆政权和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在青岛举行了伪蒙疆政权与南京汪伪政权缔结协定的秘密会议。最后，李守信作为伪蒙疆政权代表与汪伪代表周佛海达成协定：一、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承认汪伪南京政府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认重庆国民政府为地方政权；二、汪伪政府承认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自治。同时还有一个协定附件，内容有：汪伪政府承认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承认四色七条旗帜为其政权旗；承认其在长城各口的驻兵权。

李守信还积极到伪满从事联络活动。1942年春，适逢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李守信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各方要员计十四人，赴新京（长春）访问，参加庆祝活动。溥仪还单独召见了这名在东蒙“起家”的部下。1941年6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为伪蒙古自治邦，李守信在张家口召开的第五次“蒙古大会”上当选为伪蒙古自治邦副主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而李守信仍然想着升官发财。他先从日本驻蒙军那里得到11万两烟土后，派秘书唐成良带了3000两向达拉特旗的森盖林沁买了一部分药材运到天津套购黄金，再赴上海购买枪械弹药。8月15日，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李守信先把家眷财物运往北平。21日，李守信一行潜至北平，匿居在什锦花园。

抗战胜利后，李守信又投靠蒋介石。8月下旬，李守信陪同德王乘飞机先到西安，两天后再转机抵达重庆。在重庆，国民党军统特务首领戴笠与他们进行了会谈。德、李二人向戴报告了日本投降后伪蒙疆政权瓦解及张家口和各盟旗、县当前的情况；还向戴报告了有关伪蒙古军残存部队人数、防地、装备，以及是否容易集结掌握、可否进攻八路军等问题。会后，戴设宴招待了德王、李守信等人。随即李守信被任命为“热察先遣军总司令”。9月末，德王、李守信一行又去重

庆，蒋介石召见时询问了有关情况，并在其主席府官邸与他们共进了午餐。10月，李守信再次到重庆活动，又被蒋接见。经过一番活动，李守信终于获得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商震等人的任用。不久，李便被任命为第十路军总司令，负责集结散住各地的伪蒙、伪满的残存军警部队，扩大进攻八路军的实力。

1949年初，当国民党统治覆灭已成定局时，李守信逃往台湾。此时，一直妄想建立“蒙古王国”的德王，在4月初打电报给李守信，要他回阿拉善旗定远营参加各盟旗代表会议。李回来后，正值他的旧部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一旅要被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收编，李守信匆匆前往，整顿队伍，部署防务，并着手进行改编事宜。李守信随即前往阿拉善旗，出席8月5日所谓“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被选为九人主席团之一。会后，被任命为“蒙古自治政府”政务委员，兼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此时，宁夏已临近解放，李守信带领部队由宁夏石嘴山渡过黄河，北经磴口县，窜入阿拉善旗境。11月底，李部窜到该旗拐子湖一带时，宁夏以及甘肃的大部已经解放。李守信与德王在阿拉善旗北部图克木庙相会后，仍假借“蒙古自治政府”名义，继续向该旗西北部前进。德王不顾人民政府劝其投诚的期望，于12月下旬越界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李守信等二十余人随后也一起前往。

李守信于1950年9月从蒙古被引渡回国监禁。1964年受到人民政府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1970年5月在呼和浩特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李守信：《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都蒙旗社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李守信自述》，1985年版。

李守信：《我是怎样镇压嘎达梅林起义部队的》，《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0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刘映元：《李守信投敌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李守信：《伪蒙政权的回忆》，《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卢明辉著：《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

何兆麟：《“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

李书城

李丹阳　刘建一

李书城，字晓园，亦名小垣、筱垣，湖北潜江人。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五月九日）生。祖辈务农，父亲李风亭系秀才，在农乡做塾师。李书城自幼随父读书，十六岁时中秀才，经省学使王同愈保荐，于1899年入武昌经心书院学习，初步接触到新学知识[(1)]。次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才常和傅慈祥（李父的学生）被戮，使他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

1902年，李书城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两湖总督张之洞选送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他遍览中外书籍，常与同学讨论救国问题。是年秋，经兴中会会员程家柽、刘成禺介绍，李在东京竹枝园与孙中山会面，亲聆其反清革命主张，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2)] 他将这些革命思想传布给一些留日学生[(3)]。不久，李与刘成禺、蓝天蔚等人组织了湖北同乡会，并于次年1月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他在该刊发表了《学生之竞争》等文章，痛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局，抨击清政府"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认为学生是"下等社会之指向针"，应肩负起救国重任，内争自由民主权利，外与各国竞争。他还撰印《潜江李书城与鄂中友人书》，号召湖北学子"慨然发奋，无畏艰辛，献此身为中国用"。在日本，李与黄兴、蓝天蔚等"密结排满盟约"，准备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4)]。1903年春，留日学界为反对沙俄侵占东北而掀起拒俄运动，李参与发起拒俄大会，发表激烈演说，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

1903年夏，李书城归国，随即与吴禄贞等在武昌花园山设立一秘

密机关。他们议定投入新军，努力改换士兵脑筋，进而发动军队起义的革命方略。李负责秘密联络军队[5]，并介绍刘敬庵等有志青年参军。同年冬，李与吴禄贞、耿觐文应黄兴之邀到长沙，筹划在湖南发动起义。经过这段革命实践，李书城深感革命须靠武力，于是在翌年再次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学习陆军，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兵步科。

1905年夏初，李书城等接到在欧洲留学的原花园山机关同志通知，为孙中山来日本组织同盟会“预为筹划”[6]，遂与黄兴等人为迎接孙中山共组革命团体做准备。7月，李参加了同盟会的筹备工作，并于同盟会正式成立时化名李唐秘密入盟。遵黄兴之嘱，他在留日学军事的同盟会会员中组织“丈夫团”，以为将来回国掌握兵权培养骨干。

李书城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于1908年秋应邀前往桂林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次年任该学堂监督，并一度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他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革命情绪，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以期培植军事人才使广西成为反清起义的基地。他曾与同志策划乘陆军小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刺杀巡抚张鸣岐宣布起义，因事机不密而未成[7]。为掩护其他在桂同志，李辞职赴京。1910年初，李书城因好友吴禄贞推荐任军谘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他建议时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的吴禄贞谋任一省巡抚，后设法筹到两万两白银助吴贿通庆亲王谋得北洋第六镇统制之职。虽然吴请李为该镇标统或参谋长的呈文未获清政府准许，仍偕李赴任整顿军队。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李书城随吴禄贞再赴保定，企图举兵响应，并约张绍曾、蓝天蔚率部相机起义，合兵攻打北京。后李因军谘府命他与黄郛南下调停战事，遂乘机携眷出京前往南方。11月2日，李书城抵武昌，随即由黄兴提议出任湖北军政府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在设于汉阳的总司令部，他协助制定作战计划，训练新兵，准备迎战清军。因考虑到湘省援军赶到，汉口之敌不断增多，李建议乘民军士气方盛和敌兵力尚未充实之机收复汉口。总司令黄兴遂命令

6日晚渡江攻打汉口。终因敌强我弱汉口未克，民军复退守汉阳。虽然汉口、汉阳之役相继失败，但黄与李指挥民军与清军鏖战二十余日，为各省起义赢得了时间。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李书城出任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长兼陆军部顾问官，协调处理总统府和陆军部需办的军事事务。南北议和告成后，南京临时政府撤销，设立留守府，李任总参议，黄兴离宁时代行留守职权。其间，袁世凯为扼杀南方革命势力不给留守府拨汇军费，引起军队哗变。李边责北京政府的失信，边襄助黄兴缩编、裁遣南方军队。同年秋，李随黄兴到北京，被授予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军事处次长。次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李借送客之名离京南下。在上海，他参加了孙中山主持的布置各方起兵讨伐袁世凯的会议，随后被派赴南京策动第八师出兵。因在广东、湖南、南京拥有军队的国民党人都因兵力弱而未能起兵，李也赞同黄兴等人用法律解决“宋案”的意见。7月，当江西、南京等地举兵，李再赴南京参加讨袁之役。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书城被通缉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黄兴、李书城等因反对写誓约、按指印等效忠领袖的规定而未加入。为避免革命阵营分裂，黄偕李等于7月赴美。在美国，他们联络美国友人，在华侨中宣传反袁，还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黄、李参加了由聚集在东京的部分老同盟会员发起的“欧事研究会”。次年，袁世凯公然违背民意，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继而废共和，行帝制。李在替黄兴起草的函电中怒斥袁的倒行逆施，声言“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随革命军同事疆场”以“驱逐国贼”[(8)]。1916年，李随黄抵日后受托先期回国从事讨袁。6月，袁世凯毙命。李进京代黄兴与新任总统黎元洪商讨国是。黄兴病重期间，李在沪代其处理各种事宜。12月，迨黄丧事毕，李始到北京任总统府顾问。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10月，李书城弃职

赴南北军对峙的湖南前线，组建湖北护国军，并由孙中山任命为湘西防务督办，率部御敌。李后来到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遣送敌侨事务局督办等职。

1919年夏，李书城回到上海。这时他的胞弟李汉俊留日归国后正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书城因对民国以来“群雄扰攘，国困民蔽”[(9)]的状况深为不满，故认为救国之路不只一条，对其弟的活动从不反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他的寓所举行。其时，主张“废督裁兵”的李书城在湖北各界力邀下，回鄂主持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运动。以他任总司令的湖北自治军在援鄂湘军帮助下，于8月将王逐出湖北。他表白自己“既不恐惧威势，更不希冀权力，为争个人与全人类之生存，与恶魔奋斗所不辞也”[(10)]。“黄、庞惨案”发生后，李通电谴责湖南督军赵恒惕[(11)]，并不因赵曾派兵援鄂驱王而对之姑息。

1922年6月，黎元洪复任总统，李书城应邀再度进京任总统府顾问兼国务院参议。次年，他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出任冯玉祥的高等政治顾问。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率部进京囚禁曹锟，驱逐清逊帝溥仪出紫禁城，李均参与策划，并力促冯电孙中山北上共商国家大计。在新成立的临时摄政内阁中，李任陆军总长。段祺瑞当临时执政后，他避居天津。李曾向路过天津的孙中山汇报北京情况，并为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出谋划策。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接踵发生“汉口惨案”。在北京的“湖北旅京同乡会”同人在李书城组织下成立了“汉案后援会”。7月初，李冒酷暑到汉口支持工人学生们罢工、游行及要英方惩凶、赔款等反帝要求，面斥湖北督军萧耀南惧外压内的行径，要他取消禁令，“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12)]。他还亲率“汉口惨案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

1926年北伐前夕，李书城奉广东国民政府命前往湖南策动唐生智、夏斗寅率部投向革命阵营，随后出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

智的参议和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李参加武汉各界讨蒋大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清党，他拒不重新登记，自动脱离了国民党。李利用担任改组后的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建设厅长的职位，联合政府中的其他左翼人士竭力“保护共产党之身体自由，保护农工之生命财产的安全，防范反动派之乘机扰乱”[13]，先后逮捕反动军官刘佐龙等人，解散国民党右派组织“三民社”，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11月，南京方面的“西征军”开入武汉，大肆捕杀革命人士。李书城在其弟李汉俊被枪杀后，亦以“倾共”罪名被关押。因他在被押期间只准读佛经，加以在大革命失败后心灰意冷，遂研习佛学。

1928年春，李书城经多方营救获释。到上海后，他与邓初民、李伯刚等组织“湖北革命同志会”，支持许德珩、李达等创办《双十月刊》。他们站在中间立场，既抨击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又批评共产党的某些做法。1929年，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间矛盾日益激化，李希望借机打倒蒋介石。他应邀担任唐生智的总参议，随即前往联络阎锡山、冯玉祥共同反蒋。冯在太原遭阎软禁时，李陪同“坐监”。1930年春，阎、冯终于联手倒蒋，爆发中原大战，李任讨蒋军顾问。1932年，李返鄂重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以武汉市政建设，整顿省营企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后因他拒不批准修筑从武昌通往蒋介石青山行营的公路，1933年被撤去建设厅长职，改任民政厅长。不久又由于反对实行保甲制等因被免职，变成空头委员。1935年李被赋予省通志馆馆长闲职。是年湖北发大水，李率团赴灾区主持赈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书城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与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时相往来。他主张坚决保卫武汉。次年武汉撤守前，有人因李是留日生劝他不要走。李表示自己宁可去摆测字摊，也不会留下来给日本人做事。省政府迁恩施后，他以省银行监察人身份建议开办生产、贸易企业，发展了当地经济，提高了军力，使鄂西得以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1943年，李因不愿与陈诚共事，只身上峨眉山学

佛，但他仍常与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联系，促其积极领导抗战。

抗战胜利后，李书城回到武汉。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后他一度希望国共两党能真诚合作，共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内战的爆发打破了他的幻想。1946年初，中共南方局派他的侄子李声簧到武汉开展工作，随后武汉地下党负责人曾惇也与李书城建立了关系。在他们帮助下，李逐步认识到，中国人民要翻身，必须打倒美帝国主义扶持的蒋介石集团。是年春，潜江县选举李为省参议员，他拒不应选以抵制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劝一些老朋友不要当国大代表、为蒋介石抬轿子。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加速了国民党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在湖北握有重兵的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企图借打开和谈局面的时机达到逼蒋下台、拥李宗仁当总统的目的。在白的示意下，湖北发起和平运动。1949年1月，湖北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李书城被推举为总主席。李虽不愿为桂系效劳，但怀着普度众生使人民免于战火的愿望，积极促进和谈。他先到长沙劝说留日老同学程潜在湖南开展和平运动，联合倒蒋；不久又以湖北和促会代表身份，携白崇禧表示愿停战言和的手函同共产党员李伯刚冒严寒前往中原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会谈。虽然李的湘、豫之行未获结果，但刘、陈的谈话和在解放区的实地观察使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回武汉后，李不顾个人安危向各界报告他在解放区的见闻。4月，他与张难先等将和平促进会改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在国民党军队撤出武汉前后，为保护重要设施和物资、档案，维持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做了大量工作。5月16日武汉市解放，李被任命为市军管会高级参议。7月他应邀赴北平，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书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农业部部长，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

员，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65年8月26日，李书城因病在北京逝世。

---

(1) 甘鹏云：《潜江李府君墓表》，《潜庐类稿》卷11，《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3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影印1932年潜江甘氏崇雅堂版）；《李书城致觉明的一封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200页。

(2)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1页。

(3) 据宋教仁所撰《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黄兴、刘揆一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革命思想，君（指程）与李书城实开其牖，遂深中于其心”。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页。

(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湖北通志馆校刊委员会1947年版，第146页。

(5) 冯自由：《贺之才述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136页。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页注释。

(7) 李书城：《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8) 黄兴：《致美国驻华公使电》（1915年12月1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2页。

(9) 《李书城为黄兴的一封信所作的题跋》，《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52页。

(10) 《大公报》（湖南版）1921年8月21日。

(11) 《晨报》（副刊）1922年3月23日。

(12) 《大公报》1925年7月8日。

(13) 《民国日报》（汉口）1927年8月19日。

李叔同

熊尚厚

李叔同，名广侯，字叔同，号漱筒，以字行。别署甚多，可靠的即有七十余个[(1)]。他家祖籍浙江平湖，祖父寄居天津经营盐业，是天津的著名富商。父亲名筱楼，是进士，在清政府吏部做官，晚年笃信佛教。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五岁那年父亲去世，六岁跟着兄长受启蒙教育，七岁起从师学千家诗、唐诗和说文解字，习石鼓文篆字，打下了文学和书法的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更加腐败，民族危机愈趋深重。康有为等一再要求维新变法，联络同党在各地组织团体，开办学校、报馆，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李叔同积极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认为“老大帝国，非变法无以图存”[(2)]，并刻了个图章，文曰“南海康君是吾师”[(3)]。

1898年9月，康、梁戊戌变法失败，京津有人怀疑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10月，他随同母亲离津南下至上海。11月，加入许幻园、袁希濂等组织的城南文社，研讨宋儒理学与诗赋。许幻园是上海当时新学界的领袖，创办学会设奖征文。李叔同撰文应征三次都得了第一名，许十分钦佩他的文才。次年春，许邀请他把家迁入城南草堂，李叔同遂与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常在一起吟歌赋、作诗词，结下金兰盟谊，成为文坛好友。

1900年3月，李叔同与常熟乌目山僧黄宗仰、上海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之等，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每周出版一张书画报。同年，李叔同将其所藏名刻与自己刻的印章，编辑出版一本《李庐印谱》。冬天，又编辑出版了他的诗作集《李庐诗钟》。他的诗画、金

石出众一时，颇负声誉。

1901年，李叔同遵从母命入南洋公学肄业，改名成蹊，读经济特科，是蔡元培门下的高足；课余兼任一家报社编辑。1904年，李叔同毕业后，与穆恕斋等在上海南市组设“沪学会”，宣传讲究卫生和移风易俗、广开风气等，并提倡办学堂，培养人才，想以此使国家独立富强。

1905年秋，李叔同奉母携家眷回到天津，不久母亲病故。李叔同返回上海后以自费留日。至东京，进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欧油画，并去音乐学校兼习钢琴；又主编出版《音乐小杂志》，寄回上海发行。他学习十分用功，成绩优秀。对音乐用功最勤，认为“乐律与演奏皆非长期炼修，无由适度”[(4)]。

李叔同目击日本政治进步和国家复兴，受到强烈的刺激，决心投入革命，1906年加入了同盟会。同年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的帮助和指导下，与曾孝谷、李道衡、吴我尊等，发起组织“春柳社”，演出话剧。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据法国小仲马小说改编的话剧《茶花女》，李叔同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接着又演出根据美国斯托夫人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也是扮演女主角。他还扮演过一些独幕剧中的角色，名噪一时。“春柳社”的艺术作风十分严肃，开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新风。然而不久，他对戏剧的兴趣逐渐淡薄，不再参加“春柳社”的活动，而专心致力于钢琴与油画，尤善作图案画。

1910年，李叔同从日本毕业回国，在天津任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习。次年因家产为票号所倒，几乎破产。乃于春天至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习。3月，他加入“南社”，参加愚园雅集，与柳亚子、苏曼殊等用诗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举起反清革命文学的旗帜，提倡民族气节，以文学鼓吹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李叔同填《满江红》词：“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

颇好。”“从今看，一担好山河，英雄造。”[5] 字里行间可看出李叔同对中国的未来抱着无限希望。

1912年春，陈其美、叶楚伧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李叔同任文艺广告编辑，兼主编副刊画报。与此同时，他与柳亚子等创办“文美会”，并主编《文美杂志》，刊印会员所作书画及印章拓本在内部传观。数月后，《太平洋报》社因负债停刊，文美社杂志也随即解体。

《太平洋报》停刊后，李叔同于同年秋转至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与夏丏尊、姜丹书、马叙伦等同事。他在该校特设的图画手工专修科任教七年，对学生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批美术、音乐人才。他的画讲究整体，水彩画简笔雄健，油画擅长西欧奏比亚诺画，略带印象派色彩。他的音乐创作以作词配曲为主，歌词典雅，作有《春游》、《送别》等数十首。同时热情介绍西欧音乐，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洋音乐的人。对中国近代音乐、美术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6]。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又于1915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名东南大学）兼图画教师，假日组设“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

李叔同的家庭信奉佛教，家里常作佛事，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七八岁时，跟着家里的人背诵《大悲咒》和《往生咒》，常唱“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7]之句。成年后，他又叹息自己“堕地苦晚，又撄尘劳”，“言属心声，乃多哀怨”[8]。其母逝世后，“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9]，曾谓“眼界大千皆泪海”[10]。在北洋军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他更加苦闷，十分悲观。1915年开始阅读宋元理学和道家的书，信仰道教，从此更加多愁善感，产生了“众生无常”的思想。

1916年冬，李叔同经夏丏尊介绍，从日本杂志上看到“断食修养

法”，就于寒假去杭州虎跑大慈寺试验断食三星期。这时，李叔同受理学家马一浮的启发，舍道信佛。次年1月，李叔同入虎跑大慈寺拜老和尚了悟为皈依师，作为在家弟子，受居士戒。回到学校后他开始素食，带念珠，供佛像，读佛经，1918年8月，正式入虎跑大慈寺削发出家，从此结束了他前半生文艺家的生涯。他皈依法师了悟和尚为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马一浮赠他《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李叔同发愿学戒，9月，在灵隐寺受戒。

李叔同出家后，抛却了他爱好的文学艺术，常在杭州、永嘉、上虞等地佛寺学律，逢人赠法语，劝人念佛经。他自己一心学佛，崇奉佛教净土宗。1920年他居住新城贝山（新城一名新登，今属浙江富阳），借到《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得《南山戒疏》和《羯磨疏》等，便开始改修南山律宗，将其摘要列表编纂，1924年在永宁下寮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杭州。有人谣传革命政府要封闭寺院，驱逐僧众。正在杭州的李叔同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请当时在北伐军中的他的学生宣中华、徐白民等，交谈关于保护寺庙的问题。共产党员宣中华讲了革命政府对宗教的保护政策后，他的疑虑顿时冰释。事后，他还写信给蔡元培等，提出对佛教的改革建议。

1928年秋，李叔同由温州至上海，与丰子恺等商订《护生画集》的编辑工作。事后听说尤惜阴、谢国梁欲往暹罗（今泰国），遂结伴前往。行至福建厦门，为僧俗所阻，当即留居南普陀寺，常往来于泉州南安小雪峰。次年4月，他经福州云游杭州，在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疏论纂要》，到杭州后加以整理翻印，10月重返厦门南普陀。1930年4月，李叔同再去浙江上虞白马湖，圈点《南山钞记》，致力于对华严宗的研究。1931年2月，在白马湖法界寺发愿专学南山律。1932年11月，他重返厦门妙积寺，此后即芒鞋藜杖，游方于厦门、泉州各地讲律。1933年秋。他在泉州继续圈点《南山钞记》，编撰《南山道宣律祖略谱》，续编《戒本羯磨随讲别录》。次年，他在南

普陀创办佛教养正院，并在那里任教，培养青年佛徒。

1937年初夏，李叔同应邀去青岛湛山讲律。7月，卢沟桥事变后，他激于民族义愤，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支狗子"[(11)]。回到厦门后，他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12)]送人，勉励佛徒对宗教和国家二者应有同样深的爱护热忱，并表示"以护法故，不怕炮弹"。在所居处题"殉教堂"三字，决心以流血殉[(13)]。1938年5月厦门沦陷之后，他拒绝了朋友劝他去大后方的劝告，仍在泉州、惠安、漳州等地讲经说法。他的好友柳亚子针对他的消极态度赠诗道："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14)]李不以为忤，仍然继续讲经辑律，或闭关潜息。

李叔同出家后埋名遁世，专心从事佛学南山律的编撰宣讲活动。编撰有《寒茄集》、《四分律比丘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南山律宗传承史》及《南山律文集》等佛学著作十余种。在佛门宗下属净土兼律宗，对佛学律宗的贡献很大，为中国近代佛教律宗的代表人物，被佛门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1942年10月13日，李叔同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

---

(1) 李叔同因为害怕为名所累，出家后便随手签署，故此别署很多。

(2) 上海弘一大师周年纪念会：《弘一大师咏怀录》，弘化社1941年版，第8页。

(3) 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1944年版，第10页。

(4) 夏丏尊：《清凉歌集序》，《清凉歌集》，开明书店1936年版。

(5) 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1944年版，第

39页。

(6)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天津日报》1956年10月6日。

(7) 上海弘一大师周年纪念会：《弘一大师咏怀录》，第23—24页、94页。

(8) 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第13页。

(9) 容天圻：《弘一法师李叔同》，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5期，第59页。

(10) 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第18页。

(11) 上海弘一大师周年纪念会：《弘一大师咏怀录》，第251页。

(12) 上海弘一大师周年纪念会：《弘一大师咏怀录》，第53—54页。

(13) 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第166页。

(14) 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第189页。

李四光

娄献阁

李四光，原名仲揆，英文名J．S．Lee，1889年10月26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下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农村塾师家里。祖父库里为蒙古族人，祖母汉人，父亲改姓李，名卓侯，字康爵。祖父和父亲均为塾师。父亲同黄冈革命党人吴贡三、殷子衡来往密切，曾为吴写的反清小册子《孔孟心肝》润色过文字。1906年革命党人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受牵连而逃往安徽躲避。

1894年，五岁的李四光开始入私塾读书。1902年冬，十四岁的李四光考入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又称第二高等小学堂）。报名时因紧张错把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了一个“十四”发现后他机灵地改成李四光。第二小学学生全部寄宿，伙食、服装、用品等由学堂供给。李在这里学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几门功课，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04年7月，李四光因优异成绩被破格选送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学日文和数理化，1907年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船用机械）专业。虽然专业课程繁重，有数学、物理、无机化学、力学、材料强弱论、舶用机关、制图、冶金、造船、电气功等将近二十门功课，但他集中精力于主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留日期间，李四光关心政治，同革命党人宋教仁、马君武来往密切，并由孙中山监誓成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

1910年7月，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到武汉，被派往武昌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当教员，兼日籍理化教员的翻译、学校附设工场负责人。1911年9月，李在北京参加游日学生考试，结果被

列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四光迅速返回武昌，被委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在战事吃紧之际，李四光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送军火，支援前线。民国建立后，李四光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后又任同盟会湖北支部书记。2月，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实业部改为实业司，仍任司长，负责全省农林工商矿的一切行政事务。李四光拟订一个振兴实业的计划，设法使原有企业恢复生产和营业，并在实业司下分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全省模范林事试验所等十多个附属单位，使湖北各项出现生机。

1912年4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亦在湖北打击、排挤革命党人。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迭次提出辞职。1913年7月由临时稽勋局资送英国留学，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预科，补习英语和数理化，后转大学采矿科，1915年又转入地质系，在地质学家包尔顿（W．S．Boulton）教授指导下学习，并与威尔士（L．J．Wills）等教师来往密切。学习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李四光假期总到矿山去做临时工，赚取些生活费。1917年，通过了学士考试，1918年又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为获得更多英国矿山的实地知识，李四光到康卫尔锡矿工作，又去欧洲大陆做地质考察。1920年，李四光应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之邀作《现代繁荣与炭》的讲演，说明研究能源的重要，鼓励留法同学为祖国建设而努力。

1920年秋，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主讲岩石学、矿物学和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李四光讲课认真，还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采集标本，做地质调查。为解决实验和地质旅行费，他多次与校长蔡元培协商，通过了有关议案。在北大期间，李四光先后担任全校庶务、财务、聘任等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选为学校决策机构评议会评议员。同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副会长。

李四光结合教学大力进行科学研究。1920年秋，他带领学生到河北省六河沟煤矿实习，采集了很多石炭二叠纪含有的微体古生物科化石标本，对此做系统研究，于1923年1月提出了《筐蜗鉴定法》，一年后又写出《筐蜗的新名词描述》、《山西东北平定盆地之筐蜗》、《葛氏筐蜗及其在筐蜗族进化程序上之位置》三篇文章。通过对大量科化石的鉴定、研究，李四光创立了筐科鉴定十条标准，定出包尔顿、丁文江、翁文灏等二十多个新属，并解决含煤地层的时代划分问题。1927年，李四光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部之筐科》，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后伯明翰大学据此特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22年，在南北军阀的混战、国会及法统之争时，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等六位北大教授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指出时局的解决依靠的“仍是实力派”，提出“分治的统一”方案。1925年五卅运动中，北大成立沪案后援会，李四光被推选为委员及临时干事。9月，李四光作为北大的代表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纪念会。李四光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曾先后发表《黄种人还有生存的余地么？》、《国防与北防》等文，指出中国的“一线生机，还是在我们的民族，在家打起精神举起锄头向前挖去”。在此前后，李四光曾卷进北京女师大学潮，成为拥杨荫榆攻入女师大的“三勇士之一”，受到鲁迅的批评。

1927年冬，应蔡元培之邀，李四光南下上海筹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李四光提出，地质研究所“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以“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同时，重视实地调查，尽可能地完成各公司机关委托的有关问题。李四光为研究所的房屋、图书、仪器花费大量心血，又尽量发挥研究人员的专长，把他们分配在不同的专业岗位上。同年，李参加武汉大学的筹备工作，任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六次年会上，李四光被推选为会

长。这一时期他对东亚地质构造进行探讨，同年发表了《东亚一些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明确地提出了“构造型式”的概念，指出东亚地质构造共有七种型式，其中“山字形可能是发育最广泛，最容易认识，也是对地壳运动的研究最有用的”。

早在20年代，李四光就发现了河北沙河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冰川痕迹，并将考察结果发表于英国《地质杂志》，引起国内外专家的争论。30年代，李四光多次在庐山考察，发现许多冰川遗迹，确定庐山为“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1933年11月，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讲演，详细论述了庐山的地区冰川遗迹，使一些中外专家感到惊讶。1934年春，李四光与丁文江、翁文灏、巴尔博（C．B．Barbour）、诺林（E．Norin）、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等学者到庐山查看，李就冰川遗迹一一做了讲述，但一些外国学者仍然固持己见，认为这只是融冻泥流。后来李四光在江浙一带发现更多的冰川遗迹，1936年在黄山考察，发现了冰川的确凿证据，并写成《安徽黄山第四纪冰川现象》一文，得到外国冰川学家时在南京大学教书的费思曼（H．V．Wissinann）教授的肯定。1937年，李四光撰成专著《冰期之庐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庐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为我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研究作出了范例。

李四光富有正义感及爱国心，他对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十分佩服，1933年春曾参加捐款为其公葬。同年秋，又将新鉴定出来的一个筐科新属定名杨铨筐，以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杨铨。1934年，李四光在武汉大学作学术讲演，一次讲庐山冰川，另一次讲《东亚恐慌中中国煤铁供给问题》，开首就说“今天要谈的不是一般的供给问题，而是中国在日本人侵略之下，中国自身供给煤铁问题”，指出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倘山西一带煤田落入日本人之手，则吾国工业之前途，可想而知矣”，更指出日本人已实际控制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铁矿，呼吁“国人早日醒悟，急起图之”，表达了对国家前

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忧虑。1935年，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中国地质学》，为了回敬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主权的挑衅，第一讲就从西藏高原讲起。讲稿经整理修改后，在伦敦出版。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谈话会，李四光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的所作所为，拒绝参加。不久，地质研究所内迁桂林，决定今后以鄂西、湘西、广西为工作范围，除研究地质构造外，特别注重矿产资源的寻找和开发，并关心广西各个方面的开发建设。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所合办的桂林科学实验馆，作为“研究解决广西省建设上实际问题之实验及设计机关”，李四光参与筹备并任馆长；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成为该会经济部和文化部研究员，后又被推举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1939年9月，李四光发表了《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一文，检讨此前国民政府建设的方针上的错误，指出各种物质建设既没有使一般民众受益，也没有增强整个国家民族的力量，但“事到今天，怪甲怪乙，终无用处。我们只有一德一心，认清目标，往前干去”。李四光指出建设广西的重要性，而抗日战争期间广西的防御设施“决不可以地方建设事业看待”，而应该“当作整个国防上重大问题，作有效的处置”。同时，李四光在文章中，对广西建设的土壤保存、肥料供给问题、燃料和动力问题、粮食问题、教育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

1939年，李四光被任命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但他对此没甚兴趣，只主持1940年参议会的一半议程，便离会去湘西考查冰川遗迹，遂后力辞该职。1941年夏，李为躲日机轰炸和蒋介石抓他的传言，暂时避居架桥岭清平乡，在这里草拟了《山字型构造之实验理论和研究》等重要著作。同年秋，与孙殿卿等至赣西、闽西、粤北考察地质，1942年又与邓玉书等到资兴等地考查，取得了不少调查资料。3月，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八次年会和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公认李四光是“地质界的楷模”，授予他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

1944年夏，日军侵犯广西，李四光及地质研究所再次迁移，7月

在贵阳万松阁设所办事处，着手考察这一带地质及第四纪冰川遗迹。11月，地质研究所再迁重庆，用小龙坎四川地质调查所房屋安顿下来，由于事务繁忙，李四光请俞建章代理所长。1945年1月蔡元培诞辰纪念，李四光作《从地质力学观点看中国山脉之形成》的学术讲演。这年四五月间，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李四光系统地讲述了他二十多年来悉心研究的地质力学，1947年1月，中华书局作为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本书包括序言、概说、应变应力与弹性柔性等六大部分。这是李四光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对地质力学这门科学的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报告会后不久，李四光心脏病发作，卧床一段时间，后由夫人陪同去北碚休养。8月15日，日本投降，李非常高兴，决定派赵金科先回南京探看，准备把地质研究所迁回南京。11月，李四光离重庆，没在南京停留，在上海、杭州两地休养看病，期间撰写了《关于“震旦运动”及华夏式新华夏式构造线三个名词》一文。1948年2月，李四光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在8月下旬的正式会议上宣读论文《新华夏海的起源》，阐明了产生新华夏海的主要应力性质及构造运动的类型问题。会后，他继续留在英国静养并观察国际国内形势。1949年元旦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并令各机关南迁，地质研究所被通知迁到广州中山大学。由于李四光的力阻和地质研究所留京同人的努力，取得反搬迁斗争的胜利。4月初，郭沫若出席布拉格世界维护和平大会，给李四光带去一封信，希望他早日回国。接到郭沫若的来信后，李四光马上订好了回国的船票，因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阻挠，改道巴塞尔，于1950年4月回到国内。

1950年5月，李四光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党政领导的欢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第二次会议及第一次中国科学院院务扩大会议，在高教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李四光在组织地质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于9月组成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1952年8月又出任地质部部长。1954年12月，

李四光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12月，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李四光不懈坚持地质科学研究，接连发表《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1951年）、《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1953年）、《旋转构造与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及其他构造体系复合问题》（1954年）、《地壳运动问题（讨论提纲）》（1955年）等文章。1959年1月，李四光开始写《地质力学概论》，并于1962年初完成这部地质力学方面的代表作。

李四光十分重视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对新中国石油开发方面有极大的贡献。1953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请李四光谈石油问题，李四光不同意中国贫油论，认为中国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由李四光任主任的石油普查委员会，参加石油普查工作，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后又组织松辽平原石油踏勘组。1956年3月，由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他对石油普查有许多具体意见。1959年大庆油田、1962年胜利油田的发现，均和李四光的指导分不开。他还为新疆、西藏、四川、陕北、茂明、北部湾、东海石油远景规划指明方向。

李四光晚年还把地震预报台工作时时放在心上。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66年邢台地震后，他立即派出地震地质考查大队，并不顾身患重病亲赴震区指导工作。1969年渤海地震后，中央决定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任组长。他对地震预报充满信心，直到逝世前一天还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动脉肿瘤破裂，在北京医院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北大六教授：《分治与统一商榷书》，《太平洋》第3卷第7期（1922年）。

李四光：《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年谱》，地质出版社1999年版。

陈群等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李燮和

萧栋梁

李燮和，原名柱中，派号代钧，湖南安化蓝田镇（今属涟源市）人。1873年11月16日（清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一个小康之家。李燮和幼读私塾，继补县学生员，又就学长沙求实书院，受到维新和反清思潮影响，忿恨清政不纲，痛心外侮频仍，因而常与会党及忧时志士交游。1904年（光绪三十年），约集同志立“黄汉会”，由六人发展到省内各地，浸及赣西。旋参加黄兴、陈天华等组织的华兴会，黄汉会遂成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华兴会以运动军队为主，与谋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后，于1905年隐身于宝庆学堂任教员。又与谭人凤、刘德佩、唐鉴招集被湖南巡抚俞廉三镇压的贺金声余部，密谋在宝庆起事，进窥长沙，因事机泄露，以致百余人牺牲，李幸免于难。1906年任安化驻省师范学堂教员，招集党人谋在长沙起义，又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侦知，幸得友人告之才避走上海，结识陶成章，与谈天下事，极为投洽，加入光复会。不久，因国内无法立足而东渡日本，进警官学校学习，并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6年冬，姜守旦、龚春台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爆发，李燮和回国响应，刚到上海闻起义受挫，即潜入江宁，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以为声援。事败，端方悬赏购缉，李即遁入上海。后因追捕甚紧，乃由沪去香港，期与黄兴商量今后大计。因黄赴东京，未能晤面。得冯自由劝说，暂避海外，待机而动。1907年2月，经冯自由介绍，去南洋荷属爪哇岛榜甲（邦加）府槟港中华学堂和双溪、烈埠、启智学堂任教三年，深得华侨信任。在槟港创设中华会馆，建立同盟会分会。又周游爪哇全境及英属新加坡、缅甸，创设爪哇全境同盟会分会，招集国内志士前往担任报馆主笔和学校教员者百数十人。

1909年7月，李燮和与华侨林亚华结婚。同年9月，陶成章到南洋筹措经费，因与孙中山意见不洽，邀李燮和等共同上书同盟会东京总部，指责孙中山，要求改选黄兴为总理，受到总部黄兴等人抵制。于是李等商议恢复光复会。1910年1月，光复会总部在日本东京重新建立，推章炳麟、陶成章为正、副会长，李任南部执行员，负责南洋会务。后黄兴至南洋，力劝李“捐除意见，同任艰巨”，他示同意。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到槟榔屿庇能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及李燮和等南洋各埠代表会议，议定广州举义及筹款方法。会后，李向荷属侨胞积极筹款达三万余元。次年2月，李偕陈方度等到香港，与黄兴会商广州起义。旋与陈方度、柳聘农、胡国良、黄一欧等先入广州，准备参加起义。及起义失败，他得湘人夏寿华等协助，掩护脱险，到达香港。旋与陶成章赴上海，借教学进行反清活动，于锐进学社设立光复分会机关，李任总干事，联络淞沪各地湘籍防营官兵，准备起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李急电南洋捐输助饷银一万元，加紧联络军学各界响应武昌起义，完成上海起义准备工作。李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与同盟会陈其美等策划上海起义。他加紧联络防营，策动吴淞巡官湘乡人黄汉湘、上海闸北巡逻队队官陈汉钦、水师教练官龚泽第、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及江南制造局附近的炮兵弁卒等，在吴淞、闸北起义。李燮和还串通海盐巡捕营统领朱廷燎、巡警区长杨承溥、清济军统带黎天才等做光复军内应。11月3日，陈其美率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为守军所俘，李闻讯立即率闸北军警赴援，市民亦纷纷助战，遂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上海光复，李被各防军推为临时总司令，移驻制造局。时黄兴在武汉复函称：“沪事如何进取，乞酌裁主持。”未几，吴淞旋亦底定。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绅商各界多属意陈其美为都督。及吴淞军政分府成立，李任都督，将广东调来上海协防的济军黎天才部两千余人编为光复军，李任光复军总司令，黄汉湘为副司令，准备北伐和西征。

淞沪光复后，苏州、镇江、杭州等地相继反正，苏、浙共组联

军，推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南京。李燮和派黎天才劲旅驰援。10月12日攻克南京后，闻张勋逃遁，李即自吴淞率军北上，分兵截击张部于浦口。因武汉战事失利，黄兴至上海，促苏浙联军西援，李被推为援鄂军总司令，以黎天才为统制，克日西征。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欲谋北伐，李燮和被任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同年2月，南北和议达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李即向孙中山“自请辞职”，“栖息回里”，“枕书抱膝”，孙中山批复照准，温词慰勉。4月中旬，李被南京留守黄兴委为长江水师总司令，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水师，驻节安徽采石矶。未几，李举黄汉湘自代，辞职归里，妻子亦于是年归国与之团聚。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李燮和由湖南经上海、南京至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后闲居北京，失意穷困。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李在杨度巧言邀约下，与胡瑛等列名发起筹安会，暗中又帮助蔡锷潜出北京。1916年袁世凯死后，李愧见故人，退隐家园，不闻政事。1922年应岳父母之召，携全家去荷属榜甲（邦加）与岳父母相聚。1923年，单身返回故里。

1927年8月16日李燮和病殁。

主要参考资料

冯自由：《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237页。

余焕东：《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

李兴潇、李兴藻：《李燮和生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

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版。

李延年

王家鼎

李延年，字吉甫，山东广饶人。1904年3月11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李之权是个熟读孔孟经书的乡绅。李延年十岁入本村初等小学，继入邻村刘集振华高等小学堂就读，1920年9月，考入济南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附设甲种商业讲习科读书。此时，国民党人王乐平在济南创办“齐鲁书社”，宣传进步文化思想，李延年常与这个书社接近。

1924年春，王乐平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后，回济南为黄埔军校秘密招生。李延年闻讯，弃学潜赴上海应试，被录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11月结业，任教导团排长。1925年2月，李延年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充任教导团第八连连长；10月又参加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旋班师广州，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三营营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8月中旬，李延年所在的第二师紧随第八军唐生智部从长沙沿粤汉线北上，李延年营参加了汀泗桥战斗和武汉之役。9月下旬，北伐军三路攻入江西，李延年营属东路军左翼军序列。11月江西底定后，李升任第二师第四团中校团附。1927年1月，李部随东路军第三纵队进入浙江，李升任第五团团长。3月下旬，北伐军抵达南京、上海，第二师布防宁沪线上，李团驻守丹阳。

8月，孙传芳部强渡长江占据龙潭，威胁南京。李延年团奉调驰援，奋力堵击，全团兵员伤亡过半，仍坚持不退。11月，该团与直鲁联军鏖战于临淮关，受敌三面包围，死守三昼夜，终于突破重围，守

住阵地。李延年因战功晋升为少将团长。1928年4月底，蒋介石率第一集团军三十余万人北伐到达济南。日军出兵干涉，制造了“五三”惨案。蒋介石作出屈辱忍让的决策，令李延年团和邓殷藩团“留守”济南做掩护，大军则撤出绕道北上。李延年部扼守济南旧城，与攻城日军福田彦助第六师团激战逾三昼夜，伤亡几达三分之二，仍坚守旧城。5月11日，李奉令突围而出，掩护后撤的一个排全部殉难。李延年此举备受蒋介石赏识，战后晋升第二师副师长。

蒋介石占据平津后，实施军队“整编”，李延年任蒋鼎文第九师第二十六旅旅长，移驻江苏新安镇。翌年，他率部随蒋鼎文开赴武汉参加讨伐桂系的战争，后又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争。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部随第九师属平汉线何成濬第三军团，进抵杞县，攻取兰封。1931年初，李延年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攻城旅旅长。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成立警卫军，李调任警卫军第二师副师长。1932年初，警卫军第二师改编为八十八师，李任副师长，驻防沪杭线上。

是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李延年列名于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领衔发表的“团结御侮，请命杀敌”通电，赴沪参战，并于2月18日接替江湾、庙行一带的十九路军防务。20日拂晓，李部与来犯日军激战达两昼夜，大挫敌锋。22日，李部在友军支援下再次包围、击退来犯之敌，为沪战中的最佳战绩。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李延年由蒋鼎文保荐，接任第九师师长，驻浙江嘉善。嗣后李率第九师移防徐州，7月李就任徐州警备司令。

1933年2月，李延年第九师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编入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序列，与陈诚嫡系第十一师交相掩护，南犯广昌。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一举围歼了第十一师，李延年在东陂企图增援，遭到红军阻击，被歼一个团，仓皇北逃。同年秋，李又参加第五次“围剿”，衔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之命，率第九师第二十六旅前往大雄关地区与红军激战，于11月20日进占党口。

这时，十九路军在福建揭橥抗日反蒋旗帜，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急调嫡系部队十个师入闽“讨伐”。李延年第九师奉命由赣东开进闽北建阳、建瓯集结，旋会同第三师李玉堂部沿闽江北岸东进。李延年探知水口守军内部空虚，遂以一个团的兵力一举攻占水口。1934年2月初，李延年率第九师和第三师占领福州。

蒋介石镇压“闽变”后，又命所部转入对苏区继续“围剿”。3月，李延年任东路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辖第三、九、八十三、三十六各师，从漳州、龙岩向上杭、新泉、连城一带推进，半年间修筑大量碉堡、公路，准备进攻闽西苏区。9月1日，李延年令第三师第八旅自朋口进犯白衣洋岭山麓温坊地区，突被红军重重包围，全旅覆没。3日，李延年率第九师再举进犯，又被歼一个团，因而受到蒋介石申斥。27日，李指挥三十六师攻占白衣洋岭主阵地。10月上旬进占长汀。此时红军主力已撤离中央苏区北上，开始长征。

1935年春，“剿匪”东路军总司令部更名驻闽绥靖主任公署，李延年任驻闽绥靖第三区司令官兼第九师师长，驻泉州。他大量收编泉、漳两属地方武装，竭力推行“清乡”，镇压在闽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旋兼任驻闽绥靖第四区司令官，驻福州。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李延年率第九师开赴上海，参加左翼军刘行、罗店一线对日作战，隶属第十九集团军序列。11月10日，左翼军退守吴（县）福（山）防线。此时李延年已晋升为第二军长兼第九师长，率部撤往芜湖，旋开汉口整补。1938年5月，李延年第二军在台儿庄以东地区对日作战，中旬奉命突围，经亳州撤往漯河整训。6月初，李部担负郾城至漯河一带守备，开封失守后转赴湖北花园、孝感集结。8月，李延年升任第十一军团长兼第二军长。9月，率甘丽初军及第九、五十七、六十一各师在田家镇要塞与日军激战。11月，李率第二军调衡阳，是年底开赴四川秀山整训并绥靖地方。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越桂间国际交通线，自广西钦州、龙

门港登陆，占领南宁后以3万重兵守卫南宁北昆仑关要隘。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遂组织27个师的兵力，发动昆仑关战役。第二军奉命抵达迁江，在宾阳以东布防。12月18日，杜聿明第五军发起总攻，经旬日激战，所部郑洞国荣誉师伤亡殆尽。1940年1月7日，李延年率第九师奉命接替荣誉师投入一线战斗。李又指挥第二军猛攻侧翼九塘，击毙敌旅团长中村，在苏联空军十八架轰炸机配合下一举攻占昆仑关[(1)]。下旬，日军大举增援，昆仑关得而复失。2月2日宾阳失守，李延年率第二军移驻湖北宜昌。

同年5月，李延年任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指挥所属第二、九十四、十八各军攻占宜昌，6月14日西撤鄂西建始整训。9月下旬，为策应长沙会战，李部再次攻击宜昌，10月8日一部突入宜昌，因敌投放烈性毒气，遂退出。入冬后李部转移重庆附近永川，翌年春移防泸州。

1942年夏，李延年调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胡宗南），在大荔设陕东河防指挥部，布防大荔、朝邑、郃阳一带。1943年秋，李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迅占郑州、渑池，前锋到达陕州。李延年率部东出潼关对日作战，战地扩展到灵宝、卢氏、临汝一带。

嗣后，蒋介石任命李延年为山东挺进军总司令，辖山东境内国民党各挺进纵队，不断袭击八路军抗日武装。1945年2月李兼任山东省政府军事厅长，驻皖北阜阳。5月，李延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抗战胜利后，李延年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负责济南、青岛、德州等地受降、接收事宜。他命令济南等地日军“守备原防”[(2)]，一面接收、受降、整编地方游杂部队，一面与日伪合流向解放区进攻。他诬蔑说“鲁南‘奸匪’猖獗”，鼓动所部“早灭匪氛”[(3)]。10月25日，他指令新编第五路军吴化文部“集中兵力与日军

协同”予共军有力之打击[4]。11月3日，吴部自界河北犯。

国民政府于1946年2月任李延年为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挥部指挥官。内战全面爆发后，李延年8月会同鲁南冯治安部、豫东王敬久部三路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9月，李指挥七十四师等三个整编师经宿迁沿运河南犯两淮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在全歼其五个团之后，主动撤退。19日李延年进占淮阴。他沾沾自喜地吹嘘说：“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5] 12月中旬，李延年率部自两淮进犯涟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因全面进攻遭到挫败，转入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蒋介石调汤恩伯等三个兵团开进山东。李延年接任汤恩伯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驻临沂指挥七个整编师与人民解放军作战。5月11日，蒋军分三路北犯鲁中。李延年力主慎重，建议勿使精锐主力先头深入沂蒙山区，汤恩伯未纳此议，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又骄傲自负，率部冒进，深入蒙阴以东孟良崮地区，结果于16日被全部歼灭。同年秋，李延年任第二兵团司令官，兼任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副司令。

1948年春，国民党军被迫转入重点防御，李延年率部由豫东移驻徐州，旋改编为第九绥靖区，守备海州、连云港地区。6月，徐州“剿总”成立，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靖绥靖区司令官。

9月，人民解放军攻占济南后，蒋介石以徐州易攻难守，决定退守淮河，命李延年固守海州战略据点。11月2日令第一〇〇军增防海州。4日，蒋忽而改变决策，决定在徐州决战，第一〇〇军中途折回。李延年抱怨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6] 6日，李延年奉命放弃海州，西撤徐州，于10日就任徐州“剿总”蚌埠指挥所主任，指挥四个军和刘汝明第八兵团守备淮河。28日徐州“剿总”刘峙抵蚌后，李延年专任第六兵团司令官，奉命率部进出淮河，占领固镇以北地区，企图解救被围于宿县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但遭到解放军阻击，迁延

半月，仍无进展。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次日李延年兵团退守淮河南岸。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结束。李延年兵团于16日炸毁淮河铁路桥梁，南撤滁县、浦口一带。

蒋介石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加强长江防线，在下野前成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命李延年充任副总司令。李积极协助总司令汤恩伯部署湖口至上海间的长江防务，率第六兵团驻浦镇、浦口，守卫南京。李视察上海至南京一线江防，在江阴要塞督令构筑沿江营据点和申港团据点。他到处鼓吹打气说："等二线兵团建成，即可反攻"，要部下"放心固守"[(7)]。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直捣南京。23日，李延年逃离南京，率部南撤杭州，就任金华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第十七兵团（侯镜如部）、第七绥靖区（张世希部）、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第九编练司令部（张雪中部）等，企图沿浙赣线继续顽抗。但此时国民党军各部只顾仓皇南逃，早已溃不成军，李延年无法控制部队。李率残部在浙南丽水碧湖附近遭到解放军游击队阻击，丢弃全部辎重行李，舍车步行，于5月中旬到达福州，旋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六兵团司令官。

李延年在福州面对国民党战败残局，意气消沉，以吸鸦片、打麻将消磨时日。曾对人言：国民党"战也亡，不战也亡，这是中华民国国运问题"[(8)]。6月21日，蒋介石企图守住福建以固台湾外围，召开福州军事会议，令李延年死守福州并迅速攻占闽北重镇古田。李受命后，表示"死不足惜"。7月，李令所部向古田进攻，被解放军阻击。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分三路进军福州。17日全歼福州绥靖公署和第六兵团直属部队7万余人，解放福州。李延年只身乘飞机逃离，率残部防守平潭岛。9月16日解放军攻占平潭岛，李率残部撤往台湾。

李延年到台湾后，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受军法审判，被判刑十年，出狱后隐居于台北市郊新店，生活贫苦，常以告贷度日[(9)]。1974年11月17日，李因病在台北去世。

(1) 陆学藩：《昆仑关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78年版。

(2)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31号），1945年9月26日。

(3) 《李延年给王洪九的信》，引自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3日。

(4)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2日。

(5) 临沂行署出版办公室编：《孟良崮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6) 李以劻：《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7) 李子亮、邹彬等：《京沪地区蒋军的江防守备及崩溃实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8) 李以劻：《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5页。

(9) 台北《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香港《大公报》1975年7月22日。

李仪祉

娄献阁

李仪祉，原名协，字宜之，后以仪祉通行。1882年2月20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三）生于陕西蒲城县。祖业农，父亲桐轩是个廪生，曾任陕西谘议局副议长；伯父仲特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为关中有名学者。

李仪祉自幼在家读书，1889年入塾。以后数年，除在塾读“四书”、“五经”外，还从父亲和伯父学作文和数学等。1898年赴同州府院考，中第一名秀才。得督学叶尔阊赏识，被拔入崇实书院，和于右任同学。

崇实书院提倡新学，李在该院读过《天演论》等书，并撰写了《论权》、《神道设教辟》、《女子不缠足歌》等文。1902年崇实书院并入宏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新任督学沈卫令学堂加重科举文字，李认为无裨实际，尤反对教师令学生背书、打手心等，因而托词祖母有病退学。

1904年，于右任为商州中学堂总教习，荐李仪祉任教。当时清廷因于右任所作《半哭半笑楼诗草》有讽时政，下令捉拿。于闻讯避往上海，不久李亦辞职。

同年秋，李仪祉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德文班，1908年毕业。

1909年，李仪祉由西潼铁路局资遣德国留学，入柏林皇家工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他在校勤奋好学，深得同学好评。辛亥革命发生后，李闻讯赶回国内参加革命，抵沪时，南北和议已成。1912年返回陕西，与友人倡办三秦公学。翌年复往德国留学，进但泽工业大学专

攻水利。李早年即以献身水利事业自矢，这时得与德国水利学家、德莱斯登大学教授恩格尔斯（（H．Engels））交游，恩格尔斯常为李质难析疑，使李的学业更加猛进。

1915年，李仪祉由德回国。时值张謇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聘李任该校教授，主讲河工学、水文学、大坝设计等，后任校长。李在该校从事教育七年余，造就出一批水利工程人才。他对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曾对学生说："水利事业，关于国计民生，至深且巨……愿诸君努力奋进，抱人溺己溺之怀。有所疑，必尽所问，毋稍讳！余必尽我之职，倾我所知，莫隐乎尔。"[(1)] 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对黄河、长江间水土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1922年秋，李仪祉自南京返陕，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他一方面着手计划和测量泾惠渠工程，另一方面提倡民间开修小渠，同时还创立了水利道路专门学校，亲自授课。1923年李得陕西省长刘镇华同意，筹了少许工款，开始疏浚渭北泾阳之龙洞渠。1924年又派人到汉南办汉江水利工程。不久西北军阀战起，经费无着，渭北、汉南工程均停。他对此深有感慨，但寄希望于未来，继续为所属人员讲授河工原理，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以待时机。

当时，李还先后兼任陕西教育厅长和西北大学校长。为筹措引泾工程和扩充学校经费，1925年他曾奔走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虽多方设法，但毫无所获。1926年李一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入冬仍回陕任水利局长，曾勘察无定河水利，但因兵荒战乱，水利事业发展无望，遂辞职。1927年秋，李再至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不久赴川，应刘湘聘请，任重庆市政府工程顾问，设计成渝公路老鹰岩工程，构思精妙，后被誉为巧夺天工之杰作。

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任该会委员长。同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全国表面上暂时统一。国民党政府为标榜重视建

设和治水事宜，于翌年初组织导淮委员会，以蒋介石为挂名委员长，派李仪祉任委员兼工务处长及总工程师，李率队至江、淮、运、沂、沭、汶各处进行勘测，拟定了十七条导淮工程计划纲要。这时受聘来华协助李工作的德国水利专家方修斯（Otto Franzius），对李的品德学问也很佩服。

1929年上半年开始的新军阀战争，到1930年发展为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导淮计划根本无法实现。鉴于这种情况，同年李仪祉辞去导淮工作，回陕任建设厅厅长兼水利局局长。此前陕西连年大旱。他面对灾民死亡流离，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叹曰："移粟移民，非救灾之道，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也。"(2) 于是决心兴修泾惠渠，重审计划，奔走呼号，合陕省各方之力，又得华洋义赈会和檀香山华侨等方面的资助，终于开始兴工。泾惠渠工程以恢复郑国渠旧观为目标，在泾阳张家山谷口筑坝拦河。引泾水以灌溉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数县土地，但工程进度颇缓慢。

1931年夏，运河泛滥，苏、浙、皖等省受灾。李仪祉曾赴上海参加救灾工作。同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李被推为会长。1932年夏，李亲往汉南考察水利。秋间大病，辞建设厅长职，专主水利局事。为培养水利人才，曾呈准由西安高级中学代办水利专修班。

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仪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仍兼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8月黄河决口，有五省五十余县被淹，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李奔赴各处，求见权要，急谋救济，不只一次遭到冷遇。9月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他任委员兼总工程师，负责堵口工程。任职期间，曾视察黄河上游三省，并提出根治黄河的意见。在忙于治黄的同时，李仍时时关心陕西水利工程的进展。1934年曾组织引洛工程处，开始实测和兴建洛惠渠工程。同年夏，西安高中代办的水利专修班并入陕西武功农林专科学校，改名水利组，由他兼主任。1935年初，李进一步拟就《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期此十年内，使农田水利，普及全省成一模范农田水

利区，以为他省之倡，而后及航运、水力等他项水利工程之设施”[3]。接着李又指导渭惠渠兴工，同年4月泾惠渠也完成了。秋，李辞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专任陕西水利局局长，着手筹划梅惠渠工程，翌年秋兴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李仪祉对形势的发展极为忧虑，曾以和平解决方案上书南京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后事变得到解决，李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称“此次事变，系国家出净内毒之日”，表示“吾人更当振起精神，为增加西北生产事业而迈进”[4]。

1937年春，李仪祉作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的顾问，曾到江汉、巴蜀做短期调查，对长江的整治有所建言。同年夏参加庐山谈话会，为庐山暑假训练团讲农田水利之真义，又被聘为中研院评议员。“七七”事变后李仪祉回陕，领先参加了陕西抗敌后援会，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着信心，同时也有“作十年二十年长期抗战之准备”[5]，曾积极从事西安市的防空建设和募集救国捐款等项工作，还经常写文章作演说，宣传抗日思想。同年10月，李在一次对武功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同学的讲话中说道：“抗战期间，前方将士用枪炮去和敌人拼；后方人民的责任，就在尽量的供给粮食”，“旱灾水灾，学水利的更应设法防止”[6]。从此，他更抓紧水利事业的进行，迅速筹划并实施的有织女渠及怀宁河等灌溉工程，到本年底渭惠、梅惠两渠大部完工。

1938年2月，李仪祉病重卧床，仍不忘水利工程的进行，且手书“土坝”二字问渭惠渠土坝打桩情况。此后病势日危，至3月8日与世长辞。临终遗嘱有：愿国人“共赴国难，求最后之胜利”和“切望后起同仁，对于江河治导，本余之素志，继续致力”[7]等语。李把毕生精力用于治水，尤其对陕西水利作出了大贡献：他生前亲自筹划修建的有五渠，其中已完成的三渠灌溉面积共有78万多亩。3月15日李被安葬在社树泾惠渠上的两仪闸畔，附近各县群众纷纷赶来吊唁。

(1) 宋希尚：《李仪祉传》，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年版，第5页。

(2) 宋希尚：《李仪祉传》，第33页。

(3) 李仪祉：《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陕西水利月刊》第3卷第1期，第11页。

(4) 胡步川：《艮斋忆剩》，《李仪祉先生纪念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组1938年印行，第4页。

(5) 李仪祉：《勋水利组同学》，《李仪祉先生纪念刊》，第32页。

(6) 李仪祉：《勋水利组同学》，《李仪祉先生纪念刊》，第32页。

(7) 宋希尚：《李仪祉传》，第44、45页。

李烛尘

熊尚厚

李烛尘，原名华搢，湖南永顺人。1882年9月16日（清光绪八年八月初五）生。其父在县城开旅店，乡间略有田产。李烛尘生长在农村，从小受私塾教育，十二岁曾到县城，得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非常感叹。十五岁去县城参加童子试时，购得《盛世危言》一书，读后产生了“出乡窥见世情”[(1)] 的念头，想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但父母不愿他远离家乡，只好仍在家乡读“四书”、“五经”，二十岁考中秀才。

1902年，李烛尘在岳父及妻子的支持下，放弃旧学，去县城读书。翌年春，考入常德湘西优级师范学校理化科，在校加入湘江学会，与林祖涵（即林伯渠）等结识，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1909年，他在湘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出游北京，继而转往天津，乘轮去上海。沿途所见所闻，深感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是国家衰败之最大祸根，心里无限感伤，曾写下《在渤海湾中》一诗，抒发忧思。辛亥革命爆发，李烛尘非常高兴。1912年初，他留学日本，在东京补习功课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电化专业。

1918年，李烛尘毕业回国，经大连至北京，寄住湖南地方会馆谋求职业。他怀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将其在日本考察盐碱工业的收获，写成旅游日记向北京《盐政杂志》投稿。该刊主办人景本白对李甚为赏识，遂向天津久大盐业公司主持人范旭东推荐。

1918年8月，李烛尘入久大盐业公司任技师。他安装了第一部发电机，使久大开始用电力生产。当时，范旭东正着手经营永利碱厂，

派他去四川考察井盐，寻找生产氯化钾的原料。1919年春，他在自流井、五通桥、南充等地作了历时大半年的实地考察，受到范旭东的赞赏。1920年即被任命为永利碱厂经营部部长，之后又任厂长。1921年他又前往内蒙伊克昭盟等地探查天然的苍海碱资源，回厂后向范旭东建议创办一个专门的化工研究机构，开展对盐碱的研究。范采纳了他的建议，遂设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李烛尘长于管理，知人善任，深得范旭东的信赖，自1924年起，永利、久大两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人事任用等内部事务，均由他主管。当时永利碱厂仍在试验制碱阶段，资金、设备、技术等各方面困难重重。李烛尘肩负重任，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他竭力改善职工生活福利，改进食堂，兴建宿舍，设置医院，还兴办补习学校和子弟小学等，鼓励职工各守其职，共同支持对“苏尔维法”的试验。为了培养技术人才，他和永利化学技师陈调甫去各地职业学校和高中招收人才，开设艺徒班培养技工。当时一些盐滩的恶势力依仗军阀、官僚的支持，经常制造事端向永利、久大取闹，李从容应付，机智周旋，消除了不少纷争，维护了企业的权益。

1931年4月，李烛尘与津沽化工界人士沈舜卿等一行六人前往日本，参观东京第三次化工博览会，同时在一些化工厂进行考察，学习其经营管理经验。回国后曾在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考察报告，以推动我国化工事业的发展。1934年3月，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合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范旭东赠股5000元给他，使他当选为公司董事。11月李烛尘升任公司副经理，对永利公司的全面经营管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其后，范旭东和侯德榜为了兴建永利硫酸铵厂，主要精力用于南京，津沽地区则由李烛尘负责。李不顾日本侵略势力加紧侵略华北的恶劣环境，应付各种困难。1937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将向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局势日益严峻，李奉范旭东之命入川考察，在四川选定自流井、五通桥建厂，以备日后内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迅速沦陷。永利公司决定津沽地区

各厂首先内迁，绝不为日伪生产化工原料，李烛尘任永利公司内迁总负责人。他除调度一切可运物资、设备迅速内迁外，并将公司三百余名技术人员撤往武汉，自己则仍留天津处理善后。是年年底，日本侵略者提出“合作”，他不畏日人的恫吓，坚决拒绝，毅然于1938年初离津去川。3月，他在重庆设立了永利、久大公司华西办事处，妥善安排两公司来川人员及家属，随后在自贡市张家坝建立久大制盐厂。由于卤水原料不足，他组织开凿卤井，在自流井为久大建立起华西新的基地。接着，还推动黄海化工研究社对“枝条架晒卤法”进行科学研究，扩大受晒面积；又设计一种“塔炉”，充分发挥燃料的热力。他积极推进这些川盐生产设备的改革，对于久大的发展，对于具有千百年历史的川盐复兴，都作出了贡献。

1942年10月，李烛尘参加西北工业考察团，由重庆去兰州，经青海湖、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等地考察。嗣后著有《西北历程》一书，叙述考察经过。

李烛尘性格刚直，敢于直言。他对重庆政府将盐实行垄断式的专卖深为不满，谓“军阀政府能免盐税二十余年，但战时政府却改行专卖，这可谓盐政史上的倒行逆施”[(2)]，对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不顾民间疾苦的行径甚为愤慨。由于他热心公益，仗义执言，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成立时，即被推举为理事长；并任中国工业协进会总会常务理事、迁川工厂联合会监事；此外还是许涤新、沙千里等创办的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对外出面的负责人。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积极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抗战胜利前夕，他提倡“国农民工论”，主张战后由政府推进农业的发展，将工业交给民营，替广大的工商界人士讲话。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酝酿重庆谈判，李烛尘在《大公报》撰文欢迎毛泽东亲临重庆。9月，毛泽东在重庆佳园举行招待会，对范旭东和李烛尘等创办永利公司在化学工业方面的贡献予以赞扬，使他受到鼓舞，更加激发了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热忱。当

时，国民党接收大员四处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李烛尘十分气愤，要求当局将中纺公司全部转卖给民营，“分别标售，听任民主选择”[3]。12月，他参与民主建国会发起活动，任该会常务理事。

1946年1月，李烛尘以工商界代表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施政纲领组。他向会议正式提出了“国农民工论”主张，要求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组织“最高经济指导委员会”，推动全国经济事业的发展，做到工业由民间经营，农业由政府帮助发展，实行二五减租，使得耕者有其田，人民安居乐业。他指出：现在收复区的工厂都被政府当局拿去了，而把一些破烂厂子标卖给民营，这是大事放着不做，专与人民争小利[4]。这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以及对国民党统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满。政协代表在沧白堂举行讲演会，他再次阐述了这些主张。政协会议讨论修正“宪法草案”时，他说，“中国较多的企业是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真正的民族资本很微弱，对它应是扶植而不是节制”[5]，希望尊重并扶持民族资本，不必将“节制资本”一语笼统订入宪法。在闭幕会议上，他还提出了请求政府撤销硝石和硫磺管制的要求。指出硝磺管制“实不啻将重要原料全部封禁”，“致使一般化工无从发展，其关系实在太大”[6]。此案被载入会议议案的附件中，使他曾一时产生过错觉，感到满意。他在重庆文化艺术团体招待政协代表的谈话会上，听到洪深、曹靖华等人悲愤地控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独裁专政的暴行时，深受感动，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当即表示工商界与文化界一样，也要争取基本人权[7]。对于国民党特务公开制造“沧白堂事件”等恐怖行动，更是气愤。当冯玉祥、沈钧儒等人发起人民自由保障会时，他积极参加，出任发起人会议主席[8]。2月下旬，李烛尘离开重庆返回天津，任中国工业协会平津分会理事长。

李烛尘回到天津后，一如既往地悉心经营永利、久大。自永利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于1945年10月去世后，他任公司副总经理，全力支持和协助总经理侯德榜。他不仅急谋久大、永利生产的恢复，更致力于继承范旭东生前提出的“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计划，争取实现范旭东

与美国进出口银行所订1600万美元的贷款合同，以谋发展永利公司的事业。

1946年夏，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国内和平遭到破坏。6月下旬，李烛尘在国民政府经济部计划委员会的会上呼吁："目前当务之急，首在全国人民齐心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停止内战，才是解除目前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并指出："国内经济面临总崩溃，物价狂涨，生产缩减，外货涌入，政府不但熟视无睹，且在欢迎、奖励，实在是大错特错。"⑨　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李烛尘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代表人物，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同年8月，他组织天津工业界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经济部要求组织外货统销机关、保障工厂主权完整、改订关税、由国家银行给民营工业贷款、发起大规模提倡国货运动等，竭力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一些有利条件。翌年6月，他与杨天受、朱继圣等组织成立天津经济调查所，任该所评议会主席，他又组织天津工商金融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时，美国收购粗盐输往日本扶植日本碱业，对我国化学工业构成极大威胁，为此他主张中国的盐除本国自用外，所余者宁肯倒在大海也不能卖给美国输往日本，并要求将日本的部分碱厂作为战争赔偿拨给中国。1948年1月，他以平津工业协会理事长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工矿贷款和押汇以救济工商业；还组成华北工商请愿团往南京，要求奖励出口、增加棉粮生产、开放粮食运输、增加南粮北运和开放工贷等以救济北方工业。他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7月向立法院表示这是袒护豪门、摧残实业的行径。在上海发表《为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敬告立法院同人书》，指出：国民政府对工矿事业法人征收种种税金即为取卵，现又征收法人财产税，实不啻剥此生卵之鸡的肉，鸡萎卵竭，其势必至。8月，他强烈反对蒋介石"偏枯北方"工业的政策，要求规定禁止输出物资的品种，放宽管制，简化机构，主张城乡物资交流，由地方拟定具体办法，促进工商交流。为此，他联合北方部分立法委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又组织经济座谈会，奔走呼吁数十次，对平津工商界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1946年8月，

蒋介石于庐山发表“八一三”文告，声称将召开国民大会，李烛尘始初坚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则，对文告表示反对，但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未能抗争到底，被迫接受任“国大”代表，只是借故不出席会议。1948年夏，他出任立法委员。在全国反美扶日运动中，他虽然内心对蒋不满，但处于彷徨苦闷之下，也感到无可奈何。由于蒋介石的统治陷入全面崩溃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摧残日益加紧，全国民主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他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迎接解放。曾在《海王》旬刊赋诗道：“水面常被风生浪，天朗时为云覆晴。众口铄金金不毁，是非终局必分明。”⑧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李烛尘协同侯德榜大力整顿永利公司，努力恢复生产。4月，刘少奇去天津对工商界发表重要讲话，并和他作了三次长谈，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9月，他任天津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代表工商界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先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同时任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9月，久大公司公私合营，他任总经理。1955年1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第四届副主席。

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病逝于北京。

---

(1) 《海王》旬刊第8期（1934年11月），第161页。

(2)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李烛尘传》，中华书局1948年版。

(3) 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印：《民主建国会》，1949年版，第25—26页。

(4) 《划时代的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桂林时代出版社1946年版。

(5) 《划时代的会议——政治协商会议》。

(6)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李烛尘传》。

(7)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8日。

(8) 《海王》旬刊，1948年（第二十年）第35期，第560页。

李紫云

徐凯希

李紫云，原名凌，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于湖北武昌县永丰乡。少年时代在汉口商号中做学徒，满师后自立门户，经营匹头棉纱，兼营烟土。

1894年，李紫云接办汉口福康隆土膏店。初因资本不济，营业仍以门市零售为主。其后在上海、郑州、沙市、长沙四地开设分店，收购烟土。1906年，汉口最大的土号“祥丰厚”因存货过多，资金见绌，以赊购方式转让烟土1000担给“福康隆”，作价20万两。嗣后清廷下令禁种罂粟，烟土价格猛涨，福康隆从中获得厚利，自有资金已超过100万两，居汉口土业八大家之首。李紫云因此成为汉口商场上的知名人物，先后被推选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和汉口四官殿商防保安会会长。

1909年，保路运动兴起，李紫云参加“湖北商办铁路协会”，投身收回路权运动。湖北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他当选为十三名董事之一，积极动员各商家、商号踊跃认股。1910年初，第一次国会请愿失败，汤化龙、张国溶等发起组织汉口宪政同志会，集合研究宪政士绅，以促进实行君主立宪为宗旨。李紫云以汉口商务总会商董身份，列名三十六位基本会员之一。他目睹清廷种种倒行逆施，又受到反清宣传活动的影响，逐渐倾向革命，并极力促成将负责消防、商警事务的各地段商防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联合会。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李紫云闻风响应。10月12日汉口光复，流氓地痞乘机劫掠，湖北官钱局及各钱庄典当均遭洗劫。当晚，起义领导人詹大悲将李紫云、蔡辅卿等请去，商议维持社会治安，协助民

军等问题。“紫云侃侃陈论，愿负责协助”，当即决定将汉口各地段保安会加以充实，发给枪支，组成商团，配合革命军维持地方秩序。“于是由李召集商界人员，组织商团，担任巡缉匪徒，保卫全市治安”[1]。各商家每户出壮丁一人，无壮丁者出钱募役。划全市为十区，每区一组，各负专责。李紫云并于当天深夜送去馒头、酒肉数十担，慰劳枵腹终日的革命军。13日，由李紫云等人出面，号召维持市面，以安定人心。同时发动汉口各商团积极组织供应军食，动员全市蒸馍店，每日送馒头数百担上前线。

10月12日，汉口军政分府正式成立后，李紫云即捐送十万元以应急需，同时号召工商各界慷慨解囊，筹款拥军。为了巩固和扩大首义战果，湖北军政府下令于5日内扩军四协，筹集军费之任务甚急。李紫云竭力促成汉口商务总会筹措供招新军一镇之薪响，并以私人财产作抵，“代筹巨款数十万元”[2]。其后，他又与韦紫封、刘子敬等共同发起国民捐，募得款项十余万元。10月17日，革命军与南下清军在刘家庙一带激战，商团武装与革命军协同作战。李紫云带领四官殿保安会成员，“或荷枪助战，或资送军粮，或帮运炮弹”[3]。

同年11月，清军攻陷汉口，邀集地方绅商出来维持市面，李紫云因赞助民军，编组商团而走避租界，既为寻求安全，又表现对清军的不合作态度。南北议和达成，湖北军政府任命徐金声为夏口县知事兼警察总办，胡祖舜任帮办。徐、胡二人渡江后，密邀李紫云、蔡辅卿等计议，“商定以步兵一标，乘夜潜渡汉口，伪装商团，指定路线及敌军驻点而占领之”[4]。翌晚如议进行，在汉口商团协助下，清廷军警全被缴械。鄂军都督黎元洪题谢李紫云：“实力雄厚，协助共和；事理明通，赞同起义。”北京政府后授予李紫云二等“嘉禾章”。

1912年5月，李紫云被推选为汉口商务总会总理。上任后即会同汉口各自治会、善堂、会馆及各团体代表着手筹办地方警察与商团，竭力恢复汉口市场的正常秩序。同年，徐荣廷筹办楚兴公司，李紫云以同乡之谊，经徐介绍投资二万两，不到五年获利近十万两。

1915年9月，筹安会为助袁世凯恢复帝制，电催各大商埠华商选派赞成帝制代表，组成请愿团赴京。杨度派员来汉游说，协助梅宝矶等拼凑起武汉筹安分会，将三镇工商各界名流一一拉入名单，组成湖北请愿会。10月6日，李紫云、殷尔黎等公开登报声明，不承认参加湖北请愿会，对列名一事予以否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李紫云借武汉交通便利、棉花来源充足的有利条件兴办纱厂。适逢福康隆土号奉命收歇，烟土作价销毁，李紫云分到三十余万元。他邀集程栋臣、毛树裳、刘季五等，集资二百万元筹办纱厂，议决不收官股，定名为“商办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李紫云投资六十万元，被推为筹备负责人。

1915年正式成立股东会，李紫云被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汉口沿江一带地价高昂，李紫云选定厂址于武昌武胜门外江边，占地一万余平方米，每平方米50元的价格购入，开始建造厂房。在选定厂址的同时，李紫云于同年春即向汉口英商安利英洋行订购纺机设备。原计划成立四个厂，因筹资所限，先期购置一厂的设备，计纱锭44000枚，布机500台，价款180万元，合同规定英商应于1916年交货，计划最晚于1917年开工投产。

1916年春，第一纱厂所订购部分纱锭、布机运抵上海，此时国内兴建纱厂热潮方兴未艾，纺织机器现货价格走俏。第一纱厂向上海安利英总行提货时，英商借口合同期限未到，不肯交付，暗中则将这批纺机加价卖给上海鸿章纱厂。同年末，第一纱厂厂房落成，李紫云多次派员赴沪催交机器，均未有结果。由于英商屡次拖延交付机器设备，致使第一纱厂始终处于边建厂、边安装、边生产的状态。因所剩股款不敷使用，不得不向银行钱庄举借，又无法按期偿还，使信誉蒙受损失。至1919年8月，所订机器设备全部到齐，待安装完毕，已失去两年多的宝贵时光。

1920年初，第一纱厂正式开工投产，是时大战甫定，欧美各国忙于恢复本国经济，洋纱、洋布尚未大量进口。第一纱厂在原料采购和推销产品等方面均未遇到有力竞争，投产两年即盈利180万元。李紫云带头将红利转为股金。为了解决熟练技工严重不足问题，他特派徐凤传专程赴沪，以待遇从优，可携带家属为条件，广为延揽。建厂初期，从上海招来的技术工人，总计有数百名之多。

1921年，李紫云因病不能来厂主持，推荐原义康隆匹头号经理陆德泽代理总经理工作。是时棉贱纱贵，营业发达，惟厂内资金短绌。经股东大会决议，号召股东增资100万元，连同原有资金和两年的盈利，合计股本总额增至480万元。1922年第九届股东大会选举李紫云继任总经理，但厂内事务仍由陆德泽等人代理。

第一纱厂投产最初二年的盈利，使李紫云等人对市场形势作出错误判断，盲目扩大生产规模。1921年末，第一纱厂以全部固定资产作抵，向安利英洋行举借白银200万两，作为开设南厂之用。同时委托安利英洋行向英国阿萨里斯公司订购纱锭44，000枚、布机600台。英商利用厂方不熟悉机器性能的弱点，用美制低劣布机夹带充数。几经交涉，无法解决，只得将这些布机搁置在仓库中，挤占了大量的资金。

1923年南厂投产，第一纱厂已有纱锭88，000枚，布机1，000台，成为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厂。这时国内棉纱市场的有利形势已发生逆转，洋纱大量涌入，廉价倾销。第一纱厂产品货不如人，大量滞销，积压棉纱竟达上万件，资金无法周转，累计亏损1000万元。所欠安利英洋行第二次购机价款更无法偿还，不得不于1924年关厂停产。李紫云与董事会商议后，被迫决定将工厂交给安利英洋行管理，用全部厂房、设备作抵向该行借款，以维持开工。李紫云就此辞去总经理职务，很少再过问纱厂事务。

1926年，李紫云创办燧华火柴厂于汉口仁寿路，招收男女工人一

千五百余名，主要生产“醒狮”牌安全火柴。他还先后投资或独资经营德康、安康、承德、同德钱庄，华丰银行，德润康、义康隆匹头号，公济、福丰当铺，大生、福隆米厂，以及鸿彰永绸缎店、新凤祥银楼、裕泰隆木器号、仁寿堂药店、白康酒店等各类工贸企业，并拥有汉口同善里一百一十八栋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几十处。个人资本额最多时达二百万元左右。

李紫云热心公益慈善事业。1916年，他以汉口体仁里的房产作为基金，投资万余元，在家乡武昌永丰乡兴建小学六所。1917年，萧耀南督修武昌西北浒湖堤防，李紫云出资30万串，与官钱局各占工程费一半。工程完工，当地居民为他修建生祠。李还经常对汉口慈善会、汉口梅神甫医院予以捐助，多次受到官方和各界的表彰和褒奖。徐世昌曾为他资助辛亥首义，捐款兴学、修堤，赠送“正蒙有法”匾额。

李紫云经营企业过多，管理不善，用人失察，所办的工贸企业最后大多是资本亏尽。到1927年，燧华火柴厂已亏损20万两，德润康匹头号亏赔20万元，第一纱厂股票竟亏蚀八折，汉口同善里房产不得不押给中南银行，李氏家族的社会信誉蒙受严重损害，其他工贸企业因受到波及而相继停业。李紫云心情忧郁，积劳成疾，卧床不起。同年秋，李紫云在汉口去世[5]。

---

(1) 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刊本。关于《詹大悲先生事略》作者的考证，参看张宣沅《董必武的〈詹大悲先生事略〉》，《文物天地》1985年第3期。

(2) 卢智泉等撰：《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湖北革命实

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4)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辑：《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21页。

(5)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武汉人物选录》（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增刊），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

李宗仁

李静之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人。1891年8月13日（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九）出生在一个耕读人家，父亲李培英是位乡村塾师。李宗仁六岁从父读书，1908年入广西陆军小学堂（后改为陆军速成学校）。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秋毕业后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下级军官，曾随桂系陆荣廷所部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18年升任营长。1921年粤桂战争时，李宗仁与他的陆小同学黄绍竑从旧桂系中分化出来，另树一帜。1922年，广西各地自治军蜂起，互不统属。李宗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委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实力共3000人枪，与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两股势力争夺广西统治权。在革命潮流影响下，李于1923年同广州军政府建立了联系，并加入国民党，旋将所部改称“广西定桂军”，驻在桂平。李部占据广西最富庶的梧州、玉林和浔江一带，与占领桂林、柳州、南宁的陆荣廷和占领平乐、贺县、蒙山一带的沈鸿英成鼎足之势。李利用陆、沈矛盾，采取先联沈攻陆，再各个击破的策略，于1924年6月取得南宁，然后联合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李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消灭了陆荣廷所部2万余人，占据了左、右江至南宁以北四分之三地区，迫陆荣廷于9月23日通电下野，广西境内遂成李、黄与沈鸿英对峙局面。

1924年11月，孙中山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公署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所属军队改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军和第二军，李、黄分任军长。1925年2月到4月，他们在粤军李济深师协助下，集中全力讨伐沈鸿英，占领了桂林、柳州。5月至7月，又与粤军合作，将假道广西企图进攻广东的唐继尧部驱回云南。自是，李、黄、白统一了广西，“新桂系的统治，从此开始”[(1)]。

广西统一，结束了长期战乱，有利于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李宗仁等宣布将广西统一于广东革命政府。广西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1926年春，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参加驱赵，与吴部作战失利。5月，李宗仁应唐之请，派钟祖培旅入湘增援，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初，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李宗仁率第七军二万余众，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进入湖南，会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对直系北洋军发动正面进攻。第四、第七、第八军占领长沙、岳州后，又沿粤汉路北上攻取武汉。李宗仁指挥第七军先后参加了汨罗河之战、贺胜桥之战，并担任武昌攻城战总指挥。当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军相持不下，第七军在9月又被调去增援，击败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等部，扭转了江西战局。江西底定后，李宗仁任中路军江左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东下攻取安徽，1927年3月初进驻安庆。白崇禧也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到达上海。

李宗仁顺应潮流加入了国民革命行列，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运动，先制造了1926年1月的“东兰惨案”，下半年又迫害梧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宗仁对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视为“越轨闹事”。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对于武汉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斗争，认为是“同室操戈”，主张“顾全大局，尽量忍让”[(2)]。1927年3月下旬，李宗仁到南京，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心腹大患”，对上海高涨的革命气氛忧心忡忡，认为“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这时蒋介石正在布置“清党”，李建议“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3)]。3月底，他

应蒋介石之邀到上海，参加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紧急会议”；参与讨论通过“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又和白崇禧一起参加蒋介石召集的清党反共秘密会议，伙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叛变革命，蒋、汪虽然在反共上一致了，但互争正统，斗争仍十分激烈，武汉并布置东征讨蒋，要求蒋下野。这时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已将第七军扩充为第七、第十三、第十九三个军，在蒋、汪斗争中举足轻重。新桂系早有问鼎中原的野心，他们利用蒋在徐州作战失利和为武汉所憎恨，联合何应钦，以宁汉合作压蒋，责蒋“不宜用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4)]。蒋介石乃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这时北军孙传芳、张宗昌陈兵江北，随时准备南渡，武汉东征军仍在向下游移动，为摆脱困境，李宗仁作出拥汪姿态，要求武汉停止东征，李并亲赴庐山欢迎汪和武汉政府其他领导人赴宁“柄政”。在击败孙传芳部队，稳定了南京政权后，李等同“西山会议派”控制了9月15日组成的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使汪精卫通过宁汉合流攫取党政实权的企图落空。汪返回武汉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委会。李等又发动西征讨唐，乘胜收编了唐部，获得了两湖地盘。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伙同汪精卫进行复职活动，谋以汪、蒋合作打击桂系势力。由于蒋的复职还得到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支持，李宗仁不得不表示拥护。尔后经过1927年底到1928年初粤桂战争，新桂系黄绍竑的势力从广西伸展到广东。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从新桂系手中夺回了最高统治权，但桂系仍据有两湖和两广地盘。李、白担任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所属各军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蒋、李关系表面缓和。4月初，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李宗仁将收编的唐生智部编为第十三路军，交由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一直打到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李自己坐镇武汉，控制两湖。6月，北伐作战结束。10月，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

长。

北伐军事结束后，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引起各实力派强烈不满。李宗仁掌握的桂系军队，通过西征讨唐和继续北伐两仗，兵力扩充到20万人，地盘已由广西发展到冀东，南北遥相呼应。李设第四集团军总部于武汉，虎视长江下游，威胁着蒋的统治。1929年3月，因争夺湖南地盘，蒋、桂矛盾激化，双方调兵遣将，战云密布。蒋重新起用唐生智，令其策动在冀东的旧部叛离白崇禧，使桂系在平津的势力首先瓦解。蒋又以调停湘事将广东的李济深骗到南京，拘留在汤山，以此拆散粤桂联盟。对付武汉地区桂系主力则采取分化收买和武力进攻的两手。3月26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李宗仁，并免去李的本兼各职，又在次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4月，桂系在武汉的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受蒋收买倒戈，武汉为蒋军所占领。

李宗仁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回到广西，与改组派发起的“护党救国”运动结合，继续攻粤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响应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军事行动，率桂军倾巢入湘，企图与阎、冯会师中原。虽一度占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进入湖北，但在蒋军压迫、粤军尾追的情况下，全军溃败，退回广西。1931年5月，反蒋各派再度麇集广州，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桂系加入这个反蒋联盟，李宗仁重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呼吁团结御侮，才没有酿成大规模战争。经过协商，蒋介石下野，广州方面结束“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1月，李宗仁、白崇禧的国民党党籍被恢复，李并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由陈济棠和李宗仁分掌实权，形成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政府半独立局面。

以后数年，李宗仁锐意经营广西，准备应变。1934年李召开全

省“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了“广西建设纲领”，实行“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民、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以“振奋民众，效力国家”相号召，在各地遍设民团，对青壮年实行军事训练；整顿军队，充实军需，并用关余收入从外国购进大批枪炮弹药武装部队，并买了十余架飞机。李利用西南半独立局面，使广西休养生息，在普及国民教育、发展地方工农业、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曾获得“中国模范省”的声誉[(5)]。

这期间，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对西南半独立采取了容忍态度。李宗仁也曾派兵入赣，协助蒋“剿共”。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长征路经广西北部时，李宗仁曾派廖磊率第七军一直跟到贵州都匀。为保存实力，未同红军发生激烈战斗。

面对“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李宗仁主张奋起抵抗，认为“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6)]。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6月1日，李宗仁和陈济棠联合，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事变。他们通电请中央领导抗日，并将所属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总、副司令，出兵湘南，准备北上。蒋介石对陈济棠的部下实行分化、收买，使这次抗日反蒋行动在广东迅速失败；继后又在7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然后以大军围困广西，迫李、白离开广西。李、白拒不从命，准备另组抗日反蒋政府。蒋、桂双方秣马厉兵，战争一触即发，但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的形势下，蒋桂冲突最后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统率所部开赴抗日前线，受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线防御战，其辖区包括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大部。1938年1月李又受命兼任安徽省主席，直到10月由廖磊接任。

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急谋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第五战区首当其冲。1938年1月，敌板垣师团在青岛登陆，沿胶济线西进。李宗仁调庞炳勋军团与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在临沂与板垣师团激战五昼夜，打破了该师团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3月23日，矶谷师团自峄县循津浦线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在滕县遭到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的阻击。第一二二师王铭章师长率部死守滕县城，与敌血战三昼夜，迟滞了敌军的进展，为我军增援赢得宝贵时间。李宗仁亲自指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与敌在台儿庄血战两周，取得了歼敌万余的重大胜利。台儿庄之战，是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取得空前胜利的一次战役，大大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李宗仁也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抗战将领。此后，李宗仁还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及鄂北、豫南诸战役，并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了游击基地。

李宗仁在抗战中，直接指挥过近百万军队。除第十一、二十一两集团军约十万人为桂系部队，胡宗南、汤恩伯部为蒋的嫡系外，其余则为原西北军、东北军、直鲁军、川军、粤军等杂牌部队。他不同于蒋介石亲己薄彼的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爱国热诚。他指挥的部队中涌现了不少浴血奋战、效命疆场的爱国官兵，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战役中，在前线壮烈牺牲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便是突出的代表。

抗战期间，广西当局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以广西建设研究会名义，延聘了一些进步的学者、教授，参加广西经济、文化建设，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共产党员。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集中了许多进步文化机构，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1938年李宗仁兼主皖政期间，同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共事，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形成起了好的作用。但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桂系在安徽的部队挑起了同新四军的武装摩擦。“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7)]。

1943年9月，李宗仁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和第十战区。但汉中行营是个架空机构，并无实权。

抗战胜利后，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他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曾在1946年10月调傅作义部攻占了张家口。但他对北平的学生运动没有硬性镇压，和教育界人士关系较好。由于他“弭息学潮”、“礼遇贤士”[(8)]，被认为政治作风比较开明，“有儒将之风”。

国民党军队在发动内战一年后，已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美国对蒋介石已经失望，有意以李宗仁为“换马”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宗仁决定参加1948年3月“行宪国大”的副总统竞选。由于蒋、李关系二十多年一直处在矛盾之中，蒋介石把李参加竞选视为插向他心脏的“一把利刃”[(9)]，先是以国民党员参加竞选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迫李退出；后又发动CC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同他竞争。4月23日副总统选举正式开场，斗争更加激烈。李宗仁以退为进，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由，声明退出竞选，引起舆论大哗。蒋不得已，只好对李表示支持。29日，李以微弱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主力丧失殆尽，解放军饮马长江。美国再次策动“和平”谈判，企图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主持同共产党和谈。为逼蒋下台，1948年12月白崇禧电蒋主张恢复同共产党谈判。蒋介石在内外形势逼迫下，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说“只要和平果能早日实现”，他“不计个人进退”[(10)]。蒋介石的假求和被中国共产党戳穿后，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溪口操纵一切。李宗仁上台后，急于以“和谈”阻止解放军渡江，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条作为谈判基础。但此举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南京国民党政府四分五裂。2月14日，李宗仁派出一个“上海人

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试探共产党的反应。鉴于“南京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11)]，中共中央决定以李宗仁为和谈对象。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李蒸、章士钊、刘斐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行前李宗仁指示代表团要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即不要惩办战犯）等要求。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拒绝了南京代表上述要求，粉碎了李宗仁“隔江分治”的美梦。由于蒋介石幕后操纵和桂系实力派白崇禧的掣肘，李宗仁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李宗仁政府愿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以再给一次机会。但李宗仁在22日飞杭州同蒋介石商讨继续顽抗之策，由于他不满蒋介石背后牵制，没有随南京政府跑到广州，而径飞桂林。当时广西省内高级官员中的开明人士正在积极推动李补签“国内和平协定”，李也认为“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想请广西民主人士李任仁到北平为他斡旋，争取“重开和谈”[(12)]。但白崇禧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又作出了支持地方实力派反共及不再援蒋的表示，使李宗仁重新做起了组织粤桂联盟、抗蒋反共的旧梦。由于阎锡山等一再调解，蒋介石也作了不再干政的表示，李宗仁在5月8日飞广州，声言“戡乱”到底。

蒋介石并不兑现他的许诺，反而于7月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并瓦解了李的粤桂合作计划。这使李宗仁无法忍受，蒋、李关系更加紧张。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流窜到重庆，蒋介石紧锣密鼓地进行复任总统的活动，派人说服李宗仁参加“劝进”，李以蒋“欺人太甚”坚决拒绝，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然后于11月20日飞香港，12月5日再飞美国争取美援。1950年3月1日蒋在台北宣布“复职”，李不得不在纽约城郊长期留居。

1954年3月10日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的副总统职。

离开政坛后李宗仁跳出个人恩怨和集团私利，以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立场看待一切，承认“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13]。面对国内建设蒸蒸日上，世界威望与日俱增的新中国，他“私心弥觉可喜”，“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14]。1954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后，李宗仁于1955年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两党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1960年李宗仁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促他转变对华政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2年又撰文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谴责尼赫鲁政府的侵略和美国的反华活动。1963年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时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15]

李宗仁在1962年完成的《回忆录》中，对自己戎马生涯、宦海浮沉三十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未泯的理想和爱国之情使他终于作出了正确选择。1965年7月20日，他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写信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回到祖国后受到的关怀和照顾表示感激；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希望他们回到祖国怀抱[16]。

---

(1)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6辑，1964年版，第63页。

(2) 《李宗仁回忆录》（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437—438、449页。

(3) 《李宗仁回忆录》（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456页。

(4) 《晨报》1927年8月17、24日。

(5) 《广西日报》1937年5月25日，并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72页。

(6) 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

(7)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42页。

(8) 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亚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9) 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第6页。

(10)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207页。

(1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12) 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广西文史资料》第4辑，1963年版，第43—44页。

(13)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5页。

(14)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7页。

(15)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16)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日。

连横

陈碧笙

连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台湾台南人。1878年2月17日（清光绪四年正月十六日）生。父亲连永昌，是一个好读旧史、喜谈忠义故事的富裕商人[(1)]。连横自其祖上于明亡后从福建龙溪迁入台湾起，七世皆不应清廷科举，遗命以明代衣冠入殓。

连横幼时在家读书，孜孜不倦。乃父曾购《台湾府志》一部给他，说，“你是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他十三岁时即读毕，但嫌其疏陋。甲午战后，清廷割台湾于日本，连横甚为悲愤，家居终日手抄《杜甫全集》，学作旧体诗；并留心搜集台湾文献。因向往祖国，1897年曾到上海、南京求学，旋因婚事回台南，入日本报人富地近思所办之《台南新报》，为汉文部记者。1905年日俄战起，连重回大陆，在厦门同盟会员主办的《福建日日新报》任编辑。旋因该报鼓吹反清和攻击美国虐杀华工而被迫停刊，连仍回台，先后任《台南新报》和台中《台湾新闻》汉文部编辑、主笔。

当时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钳制下，台湾一部分不愿臣服日本殖民统治的知识分子多逃于诗，一倡百和，南北并起，盛时有诗社六七十所。连横于1897年与陈少痕等十人结浪吟诗社，后以社友零落，复与陈少痕、胡南溟等于1906年改组南社；1908年移家台中后，又被邀参加林痴仙所创的栎社。在诗社活动中，他纵情吟咏，痛写家国凄凉之感，所作诗篇骀荡雄壮，多能联系当时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热情歌颂抗日义士林昆岗和同盟会秋瑾、唐才常诸先烈的英勇献身精神，宣扬抵抗侵略、伸张人权、男女平等的爱国民主思想；而对于当时台湾诗界中“竞逐浮华”和“歌舞湖山、润色升平”，“而仅以诗人自命”[(2)]种种现象深感忧虑。其时，他计划编撰《台湾通史》。

辛亥革命胜利，连横在无限兴奋之余，于1912年托词医病，绕道日本回国，畅游南北各地。他在南京登雨花台，作诗吊洪秀全，有“民族精神在，重见国旗新”[3]之句。他初至上海时，曾由同盟会员陈楚楠介绍，为上海华侨联合会主编《华侨杂志》；旋北上入《新吉林报》及《边声报》社为编辑，入清史馆整理台湾建省资料，尽阅馆中所藏有关台湾之档案。1914年冬因母丧回台。

由于对国内政治失望日深，连横回台后，除一度重入《台南新报》社外，多家居致力于台湾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自谓“忍垢偷生……欲为此弃地遗民，稍留未灭之文献耳”[4]。连横潜心编著，历时十年，于1918年完成《台湾通史》，凡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共三十六卷，近六十万字。全书起自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迄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凡一千两百九十年之事，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档案、外书，资料丰富；而对于台湾同胞英勇顽强反抗外国侵略和艰苦奋斗战胜大自然的光辉事迹，尤详加叙述，以明台湾乃中国人筚路蓝缕所开辟。章太炎读后，许为“民族精神所附”的“必传之作”[5]。1921年，连就撰史中所得有关台湾历史、山川的诗篇近千首，编为《台湾诗乘》。1924年创刊《台湾诗荟》杂志，以载汉诗汉文笔记掌故为主，向读者灌输爱国思想甚力，每月一期，计二十二期。1925年，他搜集前人有关台湾的孤本三十八种，编定《雅堂丛刊》，自办雅堂书局出版。

1926年夏，连横移居浙江杭州，编定《宁南诗草》。旋以时局纷乱，于翌年春返台居住。所办之雅堂书局，专卖中国书籍，以抗议日本殖民当局之禁止中文。1931年遣其独子震东回大陆，写信与友人说：“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6]“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厉行所谓“皇民化”运动，禁止台湾同胞使用台语、汉文。连横忧虑台语日渐泯灭，乃殚思竭力，在旧作《台湾考释》的基础上，于1933年撰成《台湾语典》四卷，凡台湾日用方言，无不博引旁征，穷其来历，共得1176条。他说：“台湾之语传自漳

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7]，“其中既多古义，又有古音，有正音，有变音，有转音”；“所谓有音无字者，或为转借语，或为外来语，不过百分之一二耳”。故“台湾之语，无一语无字，无一字无来历”[8]，“且有出于周秦之际”[9]者。他还拟撰《台湾通史续编》，记载台湾沦陷以来史实，以明国耻，而扼于文网严密，未敢动笔。他后来抱恨说：“此愿未偿，徒呼咄咄……别有难言之余痛也。”[10]

连横晚年好佛，1933年春移家上海。1936年6月28日病逝，遗嘱说：中日终必一战，那时台湾光复就有希望了。

连横热烈眷怀祖国，毕生尽瘁于维系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之不堕，其著述除上述《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和《宁南诗草》外，尚有《剑花室文集》、《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大陆游记》、《台湾赘谈》、《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等。他编印前人有关台湾的三十八种著作为《雅堂丛刊》，使海内孤本得以流传于世。

---

(1) 连横：《雅堂文集》，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1册，1964年版，第87页。

(2) 《台湾诗荟发刊序》，《雅堂文集》第1册，第40页。

(3) 《至南京之翌日，登雨花台，吊太平天王，诗以侑之》，《剑花室诗集》，第1页。

(4) 《与林子超先生书》，《雅堂文集》第1册，第127页。

(5) 《连雅堂先生家传》，《台湾通史》下册，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48年版，第789页。

(6) 《与张溥泉书》，《台湾通史》上册，张继序。

(7) 《台湾语典自序一》，《台湾文献丛刊》，1953年版，第1页。

(8) 《雅言》，《台湾文献丛刊》，1953年版，第2页。

(9) 《台语考释序一》，《雅堂文集》第1册，第36页。

(10) 《与徐旭生书》，《雅堂文集》第1册，第132页。

良弼

梁旭毅

良弼，字赉臣，满族，爱新觉罗氏，镶黄旗人；系清宗室多尔衮之后，两广巡抚伊里布之孙。其父在四川做官，他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生于成都[(1)]。他少年丧父，对母亲很孝顺。后来他到了湖北，由该省官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期间，结识了张绍曾、吴禄贞等许多士官生。由于吴禄贞等倡言革命，他起来反驳，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当时吴禄贞便觉察到，将来二人一定会分道扬镳[(2)]。

1903年，良弼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回国，即投奔清室效劳。时值清廷采纳袁世凯的建议，于12月成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当时清廷派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办。良弼先被分配为练兵处调处差委，翌年又调升该处军学司监督。清政府本来是在“非练兵无以卫国”的幌子下，裁汰各省绿营，把军权集于中央，加强宗室对全国军队的控制，袁世凯却借有权势的庆亲王奕劻作掩护，把军权集中于自己手里。当时铁良、良弼对袁世凯怀有戒心，袁竭力拉拢他们为己所用，保奏铁良为兵部侍郎，破格提拔良弼为第六镇第二十三标标统。良弼拿着标统的薪俸，并不就职替袁办事。

1905年，良弼被提升为练兵处军学司副使，并历充考察迁安、保定、马厂陆军各镇大臣随员，掌校阅参议、太湖秋操中央审判官长、考试陆军游学毕业襄校官、提调官等职。这时，许多留日士官生陆续回国，被派往北洋新军中充任下级军官。士官生中的部分革命党人，为了取得军权，利用铁良、良弼和袁世凯的矛盾，参与铁良、良弼的排袁斗争。铁、良原是清皇族集权的捍卫者，他们站在排汉的立场

上，想利用汉人士官生以排挤北洋系，从而削弱汉人的势力来加强皇族的统治；因此，在表面上是士官生与北洋系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了。接着，清政府于1906年6月兴办贵胄学堂，培植宗室八旗子弟，以便日后输送到军队中充任高级将领，使皇族能够直接控制全国军权。良弼推荐士官生张绍曾担任贵胄学校的学监，因为皇族中无人能胜此重任。

同年秋，清廷议论改革官制时，在削减督抚权限的问题上，铁良与袁世凯争论激烈，清皇族排挤汉人的斗争也日益表面化。良弼曾主张杀掉袁世凯，但怕慈禧太后不允许，又怕北洋系军官起来造反，未敢下手。11月，奕劻等奏准把兵部改为陆军部，铁良任陆军部尚书，统辖各省新军，练兵处撤销，良弼的军学司并入陆军部。接着，袁世凯遭到朝中御史的公开弹劾，被迫交出了四个镇的兵权给铁良，这是皇族掌握军权的重要步骤。铁良、良弼为了利用士官生反对袁世凯而收渔人之利，不得不起用一批士官生为新军中的将领，这又为革命党人进入北洋六镇开启了方便之门。

1907年，良弼升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兼参议上行走，他积极协助铁良振兴清室武备，改革军制，训练新军，创立武备学堂等，“举凡陆军章制，教育规则，靡不悉心赞划，期收成效”[(3)]，竭力把军权集中于清廷皇族手中。此时良弼已成为陆军部出谋划策的核心人物了。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嗣位，载沣摄政，袁世凯被放逐“回籍养疴”。清廷为了加强皇族集权，总揽全国军权，于12月设立禁卫军，成立一支驾驭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武力，良弼任禁卫军第一协统领。

1909年7月，军谘处从陆军部分出，独立成为陆海军联合参谋总部性质的机构，清廷先委毓朗管理，后又派载涛接管。载涛是一个胆小又不懂军事的庸人，只有依靠良弼为他出谋划策。1910年2月，良弼随载涛赴欧美考察军政事务。回国以后，正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

际，军谘处拟订一切镇压革命运动的作战计划，都是出于良弼之手；一切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也由他规划拟订。他施行以“尽忠节”为中心的封建奴化教育，训练军队为清王朝卖命，自认为三年成效，稍有可观。

辛亥武昌革命爆发，各省相继响应。良弼于10月11日为军谘府制订了武装镇压的计划：“二、四两镇及六镇之一协，作为第一军，荫昌统之；二十镇及三、五两镇各一协，与驻奉之第二混成协，作为第二军，载涛统之。一、二两军赴前敌，第三军留守京城，以备后援。”[(4)] 他计划调动北洋新军攻打武汉革命军，遭到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及其他部队中革命势力的抵制，张绍曾在滦州按兵不动。良弼看到当时的立宪派一批一批靠近革命方面，便主张以立宪消弭革命。他利用与士官生的关系，和在滦州的张绍曾暗通声气。10月29日，张绍曾领衔联合四个统领署名，向清政府提出十二条立宪政纲的要求，在保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必要的立宪措施。在当时革命火焰猛烈发展的形势下，这是扑灭革命势力和挽救清王朝覆灭的阴谋手段。清廷中的顽固派也不得不答应实现这十二条立宪政纲的要求。

清政府为了瓦解革命势力，特派吴禄贞到滦州宣抚第二十镇，良弼则暗派军谘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秘密监视。吴到滦州以后，不但没有“宣抚”第二十镇，反而鼓吹革命，并与张绍曾秘密商定第二十镇与第六镇联合进攻北京的计划，准备第二十镇乘坐清廷派去的二百辆汽车直取北京。由于陈其采是汉人，又是留日的士官生，也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会后陈立即把这二百辆汽车调回北京，又向清廷密报吴、张进攻北京的计划，清廷马上扣发开往滦州的火车，阻止第二十镇向北京进军。嗣后，吴、张又秘密商定联合山西革命军进攻北京的计划，又被清廷探悉。良弼献呈诡计，清廷当即采纳：假意派吴接任山西巡抚，同时派人监视，若吴有与山西革命军联合进攻北京之行迹，则立即将吴杀掉。吴禄贞没有识破这个阴谋诡计，自滦州回到石家庄

后，即潜入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表示决不就任山西巡抚。吴被推举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后，回到石家庄，又发一电报给张绍曾，请张协同动作，以践前约。这些情况皆被良弼侦悉。此时，吴在石家庄又向清廷发一言词激烈的电报，弹劾荫昌督师无状，申斥清军“焚烧掠杀，惨无人道”的罪行，要求清廷对他们“严行治罪”，并请停战议和；否则，他就屯兵石家庄、堵塞南北交通，斩断第一军的后路，并截留了一列由北往南运送军火的列车。

吴禄贞的革命行动，不仅引起了清廷的极大慌乱，也使已出任湖广总督、镇压武昌革命的袁世凯异常忌恨。良弼与袁世凯从不同集团的利益出发，在暗杀吴禄贞的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行动。良弼派陈其采、袁世凯派周符麟分别赶到石家庄，合谋暗中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蕙田和夏文荣、吴豫章、苗得霖四人，于11月7日凌晨一时许，在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枪杀了吴禄贞，并把吴的头颅割下，逃到北京向良弼领得赏银3万两。

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袁世凯乘机要挟摇摇欲坠的清廷，促使奕劻皇族内阁垮台，袁则带着卫队赶到北京，于11月16日组成了袁氏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实权终于落入袁的手中。12月9日，袁派冯国璋接任禁卫军总统，良弼也被解除了禁卫军第一协统领的职务，调任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兼任军谘府军谘使，被剥夺了实际兵权。袁并没有就此罢休，又进一步施展诡计，密令冯国璋向良弼表示效忠清廷，愿与良弼、铁良等共生死，而不与袁合作。良弼信以为真，与冯联系密切，幻想利用冯去分化袁的势力。

袁世凯在列强各国和国内立宪派官绅的支持下，取得了当总统的确实保证后，采用多种手段逼迫清帝退位。对此，良弼、铁良等少壮亲贵再也无法忍受了。1912年1月12日，清廷王公亲贵秘密集会，奕劻提出清帝退位，良弼与铁良、载涛、毓朗等坚决反对。在18日御前会议后，铁良、良弼等便纠合三十余名皇族亲贵，齐赴庆亲王府包围奕劻，表示强烈反对清帝退位。19日，这些皇族亲贵以“君主立宪维

持会”的名义，发表反对清帝退位的宣言，正式成立宗社党。他们秘密计划乘袁世凯以内阁总辞职相要挟时，断然解散袁内阁，再由毓朗、载泽等出来组阁，由铁良统率清军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良弼也自请随军南下作战；如果战败，则迁都热河，退保东北，内联蒙古，外结列强，伺机卷土重来。良弼把宗社党这个秘密计划告诉冯国璋，冯立即向袁告密。袁确认了良弼是清帝退位的阻力，也是他谋权的主要障碍；但他又不敢贸然对良弼下手，于是把宗社党的计划向革命党人透露，以便借刀杀人。此时在北方主持暗杀的革命党人彭家珍，知道了良弼不仅是暗杀吴禄贞的主谋，又是阻止清帝退位的重要人物，奋然对人说：“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5)] 他决心挺身暗杀良弼，筹划十多天，设法获得了良弼的好友崇恭的名片，于1912年1月26日（十二月初八日）往红罗厂良弼私宅，待良弼归家下车刚进门时，乘其不备，投掷炸弹。良弼当即被炸断左股，晕绝卧地，同时毙命者还有良弼的卫兵八人、马弁一人。当时弹片触石反击彭家珍的头部，彭也英勇牺牲。2月1日，良弼伤势严重，自知命危旦夕，乃缮写遗折，上奏清廷，遗言：“尊重信条，实行宪政，以挽将倾之国势，而收已涣之人心。”[(6)] 两日后，良弼不治身死。

---

(1) 常顺：《赉臣被炸追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9页。

(2) 钱基博：《吴禄贞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0页。

(3) 良弼：《奏为身遭炸弹，医治无效，谨缮遗折，以示忠效》，农民运动类第1725号卷3号《军机处录付奏折》（清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

198页。

(5) 《烈士彭家珍绝命书》，王暨英、曾茂林纂修：《金堂县续志》卷十“传”，1921年版，第23—25页。

(6) 良弼：《奏为身遭炸弹，医治无效，谨缮遗折，以示忠效》，农民运动类第1725号卷3号《军机处录付奏折》（清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梁鸿志

涂上飙

梁鸿志，字众异，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福建长乐。六岁随其家人旅居日本，两年后回国，循科举之路读经诗书籍。1903年，他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校，梁鸿志未能遂殿试之愿，于是年秋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习。

1908年，梁鸿志学业期满，先被分到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任科长。次年被调到奉天优级师范学堂当教员，不久又至北京学部任职。辛亥革命爆发后，梁鸿志携家眷离开北京。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回到北京，在唐绍仪主持的国务院任职；并兼任袁世凯授意下创办的《亚细亚报》新闻编辑，写些政论文章。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实际控制北京政府大权。梁鸿志见段祺瑞声势显赫，便走访福建同乡、段祺瑞的亲信曾毓隽和在国务院任秘书的陈征宇。经曾、陈推荐，梁鸿志进入段祺瑞的幕府，凭借文才和灵敏的政治嗅觉，竭力攀援。在皖系势力极盛之时，梁当上了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段芝贵京畿卫戍总司令的秘书长。

梁鸿志与皖系其他政客一样，精神颓废，生活奢侈。每逢星期六，即早早下班，搭乘北宁路快车去天津度假，尽情享乐挥霍。一次他在火车上与王揖唐相遇，两人以诗文为媒，结成莫逆之交。梁得到王揖唐的提携，加入了“安福俱乐部”，并当上了参议院议员。

梁鸿志机警多智，处事圆滑灵通，文笔又雅，逐渐受到段祺瑞的赏识。他担任安福国会参议员、参议院秘书长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政

府奔波效劳。他在对日外交方面的许多献策，多为段所采纳，段乃酬梁为安福俱乐部会计副主任。他因会计主任王郅隆不常到俱乐部上班，乃与俱乐部交际部主任曾毓隽将交际部的公款朋比侵吞，数以万计[(1)]。

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梁鸿志因参与出谋划策而为直系所痛恨，大总统徐世昌于7月29日下令通缉，要求“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2)]。梁鸿志逃入日本兵营，不久又乘火车逃往天津，住进租界当了寓公。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统治迅即垮台。段祺瑞再度出山，梁鸿志立即当上了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秘书长，“常参与段氏的大计”[(3)]，并把家从天津迁往北京。可是好景不长，1925年11月，梁被迫辞去临时执政府秘书长职务。翌年4月，国民军将段祺瑞赶下台后，梁转赴天津依附日本人，任日人主办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委员。

梁鸿志蛰居天津，间或去青岛、南京、上海、庐山、哈尔滨等地游玩，以饮酒作诗自娱。期间还到过日本、朝鲜游历。1927年，他受日本的派遣前往东北，秘密策划反对张作霖，因被发觉无法活动而返。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北洋军阀余孽，梁亦被列其中。是年底，他移居大连，在大连海滨黑石礁筑临海小楼一幢，起名“爱居阁”。“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离开天津南下，梁也跟随南下，在上海赁屋而居。1936年11月段病死后，梁移居杭州西湖之畔。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梁鸿志从杭州跑到上海观战，以寻重返政坛的机会。12月，王克敏等一批北洋遗老在华北沦陷区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事敌，邀请梁北上共事，梁看到已没有合适的位置而婉言谢绝。随即他开始谋划在华中沦陷区组织一个独立的伪政权。他与到上海谋划组织汉奸政权的日本军部代表松泽

寿良等人勾搭，反复商议，终于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直接操纵下，于1938年3月28日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维新政府10月迁南京，梁任“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伪政府决定采用五色旗，建立伪军，实行“绥靖”，横征捐税，帮助日本“以战养战”，充当日本的侵华工具。但梁的汉奸行径均在日方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日军以照顾他的生活和安全为名，派遣女特务田中贞子作随员，又由一名叫园部的宪兵作警卫。

1938年9月，梁鸿志与华北汉奸王克敏合组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11月他去日本活动，回国后发表媚日卖国的《告国人书》。他与日本先后签订了铁矿、水电、铁道、通讯等一系列卖国密约；“合营”华中铁道、电气、通讯、盐业、轮船等公司，施行“统制统销”；设“戒烟局”，公卖鸦片；设“苏浙皖税务局”，替日本搜括钱财；与日合营“华兴银行”发行伪币，还招募伪绥靖军四个师，在江南一带专门骚扰抗日游击队等，犯下种种罪行。

当汪精卫从重庆叛逃经河内到上海，为建立伪国民政府而四处活动时，梁鸿志在日本方面的控制下响应汪的“和平运动”。1939年6月29日，梁与汪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就华中、华北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讨论。梁要求华中与华北一样，保持其特殊性，抵制汪的吞并企图。7月5日，双方在南京举行第二次会谈，梁要求新的“中央政府”以“维新政府”为基础，各部长维持原状，由他来担任“行政院长”。梁自恃投敌资历比汪早，并且“历尽艰辛”，不愿把政权交出来。9月19日，汪精卫再次将王克敏、梁鸿志请来开会，就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中央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经过一番激烈争吵，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20日梁无可奈何地在组织南京汪伪政权的协议上签字，向汪俯首称臣。21日，“维新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汪成立伪中央政府。1940年1月24日，梁出席青岛会议，参与了伪中央政府大纲、政纲及政策、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日期等问题的讨论。南京汪伪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成立，梁鸿志为“监察院”院长、汪伪中央政治委员

会委员。同日，伪维新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散。梁鸿志的汉奸地位下降，掌握实权的梦想破灭。

梁鸿志与汪精卫合流后，仍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1941年2月1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梁为总会的常务监事。1944年11月，陈公博在汪精卫死后任代“国民政府”主席，梁鸿志改任“立法院”院长。此后，梁鸿志眼看日本败局已定，为寻找后路，托靠伪江苏省长、已被重庆秘密任命为先遣军司令的任援道。因为他们有多年交往，且共事时间甚长。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梁鸿志卖国罪行昭著，被国民政府列入通缉名单。他因任援道在苏州掌管军事，乃举家去苏州匿居，但其妾在返回上海料理私事时被军统特务察觉，于是在苏州藏匿的住所暴露。10月19日，梁鸿志被捕，后被关进上海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楚园。

1946年4月3日，梁鸿志被押往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即上海高等法院）的临时看守所提篮桥监狱。6月5日、14日，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梁案。6月21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梁鸿志死刑。11月9日，梁被处决[(4)]。

---

(1) 刘冰天：《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3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

(3) 邓汉祥：《我所了解的段祺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4) 上海《新闻报》1946年6月6日、15日、22日、11月10日。

梁墨缘

伍锦　张鸣皋

梁墨缘，原名源，1893年9月（清光绪十九年）出生于广东顺德。父亲是当地一个酿酒小作坊主。因兄弟姊妹众多，生活困难，梁墨缘只读了两年私塾。

1910年，梁墨缘离家去三水源和安布店当学徒，因做事勤奋，能说会道，学徒期满后升为“行街”，开始与当地商人结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而广东又取消了封建势力的轮渡专利经营，实行自由经营。源和安布店老板和当地许多商家都认定航业大有可为，决定集资开办航业，派梁墨缘筹办招股。梁在清远—三水—广州沿途一些布业行家劝说集资，每股五元，开办了一家航业联商公司，自任经理。公司自装了几艘蒸汽机动力船，航行勒流至西南之间。不到一年，业务大有发展，又开辟“广州—三水—清远”一线。

当时，联商公司的蒸汽机船比一般民船已有进步，但装备仍很落后。鉴于北江水浅，秋冬以后必须改用“明车”汽轮。所谓“明车”，就是把蒸汽锅炉安装在船头，机器安装在船尾，车叶板（螺旋桨）半露出水面运转。船中间堆放柴煤燃料，一条四五十吨的船也只能用三分之一的地方载运客货，利用率很低，升火时间又长。为了进一步求得发展，梁墨缘锐意改革。1917年间，梁墨缘得悉广州协同和机器厂试制成功柴油内燃机，就到该厂参观。该厂经理陈拔廷介绍柴油机的好处，表示准备装置柴油内燃机电船，行走内河，并请梁参加，梁欣然答允。但联商公司的老板们墨守成规，不同意参加。梁乃退出联商公司，与陈拔廷筹组粤海轮船公司。

为筹建粤海公司，梁墨缘计划集资10万元，陈拔廷等认股3万元，其余由米机行业和其他机器行业的商人认股，也有一小部分是华侨资金。粤海公司自己造机器，自己装备船只，又有自己的货运，业务很快获得发展。仅仅1918年、1919年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已拥有柴油内燃机电船10艘，大的164匹马力，小的45匹马力，成为当时广东内河航业界一支新兴力量。梁墨缘经营出色，遂由主管业务升任经理，在同业中亦享有较高声望，1920年被选为广东内河商船总公会的董事，1928年被选为广东商船公会副会长。

粤海公司装置的十艘电船，航行于北江及珠江三角洲其他浅水河道，是经营客货运输的定期交通船，燃料省、员工少、成本低、航行快、远非旧式轮渡所能比拟。因此抢去了同业的不少生意，遭到保守势力的妒忌，十艘电船被咒骂为“十大害”。这些守旧航商初则勾结省航政局，以“从来没有停泊这种船的码头”为借口，不给码头停泊，继则企图用“单行船不能载货”的行规陋习来迫使粤海公司停航。粤海公司的电船虽然被迫停在河中心，要用小艇接驳人客往来，但搭客因为这种新船航速快，座位舒适，仍乐意乘搭。为了增强与同业的竞争力量，打破守旧航商在货运方面的排挤打击，梁墨缘与股东决定扩大对米业的投资。几年间，陆续开设了“公德成”、“晋德成”等“成”字号的米机（碾米厂）、米行十家之多，时人称为“十大成”。有此“十大成”的货源，粤海公司的船就不愁没有货运，也不受行规陋习的限制了。此外，梁为了保证船上需用的食品什项等供应，于1922年开办了德源行。至此粤海公司自成系统，除石油以外一切不需外求，业务发展得更快，1925年已拥有二十多艘船。梁为缓和同业之间的竞争，向同业公开介绍柴油内燃机电船的燃料成本仅及蒸汽机船烧柴煤费用的四分之一，至于航速快和利用率高这些优点，均属有目共睹。至此，其他航商逐步认识落后的设备是无法与新兴的电船竞争的，才心悦诚服地与梁合作，一部分加入粤海公司共同联营，一部分改装为柴油内燃机新船。粤海公司有了别的航商合作，不但码头和载货等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使全行业的面目焕然一新。1925年以后，广东内河上柴油

内燃机电船逐步代替了旧式的蒸汽机船，大大促进了广东航业的发展和进步。

旧社会的航运业从来都是官厅、土匪、恶霸、关卡、洋行敲诈的对象，为了“自卫”，梁墨缘想过很多办法，如请防军随船保护、悬挂外国旗帜、自备自卫枪支等。当时由李福林的军队特别组织一个“保商卫旅营”，专门“保护”船只。但军和匪相通，大股的土匪与李军有勾结，碍于李的情面，没有拦船抢劫；小股的则与驻船李军相勾结，由李军做引线，船只被劫，事后分赃，还诬陷船家通匪，勒索罚款。至于官厅封船劫骑，就更不是李军所能管辖的了。1923年滇军封了三十多艘内河船，其中包括粤海公司的多艘，内河商船总公会推梁墨缘去见孙中山请求解决，孙当即下令滇军二十天内放船，但滇军并没有切实执行。无奈之下，他们找外国人来“保护”，各船每月用150元港币买一面外国旗帜悬挂在船上。

当时中国的石油都靠外国洋行供应，粤海公司成立后，与亚细亚石油公司订下了供油合同，油价每吨30元，言明保证供应。待粤海公司有所发展后，亚细亚逐步抬高油价。至1925年亚细亚忽片面废约，提出取消供油合同，骤然把油价提到每吨80元，使燃料成本竟和烧柴煤的旧式蒸汽机船相差无几。这对粤海公司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梁墨缘一气之下转向美孚和德士古两公司请求供应，谁知这两家公司和亚细亚沆瀣一气，借口粤海公司与亚细亚已订合同，他们即使有油也不能供应。为了摆脱亚细亚的控制，梁墨缘于1933年开设“永源行”，代理德国孔士洋行销售机器和机油，后又开设“生源行”代理美孚公司销售柴油。从此购买亚细亚的油就一天天减少了。后来亚细亚也要求梁代为销售，梁用提高回佣的办法，油价表面上没有降，但各轮船公司的开支却因而降低。即使如此，航业成本仍高，一般只能维持现状，难以有大的发展。

梁墨缘为了摆脱亚细亚、德士古、美孚三大公司的控制，设法和美国旧金山一家没有参加柴油垄断集团的小公司洽商，另立商号与该

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供应柴油，在香港交货。第一批柴油运到广州后，每吨才30元。可是当第二批柴油运到广州时，三大公司串通海关，把船扣留起来，硬要这批柴油缴了2万余元税款，这样一来，柴油成本每吨达80元。而当这批柴油还未起岸入仓之前，亚细亚和美孚竟将他们的柴油价由每吨80元骤降至40元，大量抛售。梁遭此打击，深感关税不能自主，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更痛恨国民政府之无能。梁在同业中以善于经营著称，但在柴油问题上，仍然逃不出外国垄断资本的魔掌。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梁墨缘出于爱国热忱，不愿船只沦落敌手，亲自带领船员把十多艘船沉没江底，其余或被日机炸毁、或支援抗战军用，剩下在日伪统治之下能航行的已为数不多。他携眷逃难至南海官山时，又被匪徒掳去幼子，勒索了巨款。最后，他带着几艘船和部分员工逃到北江、清远一带。根据当时的航规，梁参加了撤至西江的轮渡行商召开的会议，组织成立了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的联营组织，惨淡经营，维持战时后方交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墨缘返回广州，打捞起沉没江底的十多艘船，加以修复，连行驶中的几艘，粤海公司的总船数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一。其时，用油厂商要向国民政府申请配给外汇才得进口柴油，而外汇管理全操在官僚资本之手。因此，内河船只多用国产松香油代替柴油，以蓖麻油、茶油代替润滑机油。

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物价暴涨，百业萧条，为应付政府当局对工商业的横征暴敛，1947年，梁墨缘特意聘请广州市公安局长何彤之弟何桥雨为公司经理，他自任董事长；后又改请前兵站总监、后任省参议员的简作祯继任经理，凭借他们与当局的关系，以庇护粤海公司的利益。

广州解放前夕，梁墨缘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先后将全部船只疏散往澳门，避开国民党的劫掠和毁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墨缘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最早把船只由澳门驶回广州。内河航船一时用不上柴油，但人民政府协助航商更改船机的部件，改用燃料油，梁高兴地同意采用。自此，航运事业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4年11月粤海公司参加公私合营，梁墨缘被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

1976年10月6日梁墨缘病逝于广州，终年八十三岁。

梁启超

耿云志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在一个乡绅的家庭里。他的祖父梁维清，太平天国时在乡中组织“保良会”，与农民军对抗。其父梁宝瑛，也曾长期主持乡政，在当地颇有势力。

梁启超幼时在家读书，1887年进广州学海堂就学，1889年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没有考中。在南归途中，于上海见到《瀛环志略》以及若干西书，他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回到广州后，他拜康有为为师，对康的维新思想异常倾倒。他曾参与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后来，他与康有为一起成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领袖。

1894年，梁启超旅游京师，恰逢甲午战败，“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1)]。第二年入京会试时，又适值中日议和，清政府割地赔款，激起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愤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一千三百多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向光绪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梁启超说这是“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2)]。

这次上书虽没有被接受，但起到了激励士气、开导舆论的作用。是年8月间，梁受康指示，主办《万国公报》（不久改称《中外纪闻》）。该报专主议论时政，鼓吹变法，每期印千份左右，分送朝贵，冀得其同情。在这同时，梁又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并担任该会书记。梁启超后来回顾说：“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3)] 强学会的活动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没有多久即被封禁，《中

外纪闻》亦随之停刊。

是年，梁启超在京师结识了许多同情变法的志士，其中最重要的是谭嗣同。梁对他非常敬佩，称誉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4)]。

1896年四五月间，梁启超离北京到上海。8月，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旬刊），担任主笔。他所发表的《变法通议》洋洋数万言，批评顽固派和洋务派，力倡维新变法。由于他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对全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影响。《时务报》成了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而梁启超则成为维新运动中最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后来，梁的言论渐为资助《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所不容，遂不得已离开报馆，并于1897年11月前往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甲午战败后，湖南的一批略通西学、倾向变法的志士如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以及在湖南任事的黄遵宪等，即积极谋划先在本省筹办新政。到1897年秋冬至1898年春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实力赞助下，湖南新政已粗具规模：《湘学报》、《湘报》作舆论的鼓吹；南学会类似省议会，可供咨询；而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则一意培植维新人才。梁在学堂中极力宣传变法救亡的思想，批评清廷失政，并不时发表赞誉民权的言论。这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反对。思想比较守旧的王先谦以及一向比较顽固的叶德辉等群起攻击维新派，甚至提出了驱梁出境的要求，新旧党争遂日渐激烈起来，为以后的戊戌政变预埋了一条伏线。

1898年1月，梁启超离湖南到上海，不久北上入京。当时，俄国强租旅大，梁随同康有为奔走呼吁，力图阻止清政府答应俄国的无理要求。梁还同麦孟华一起联络数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拒俄变法。但此书没有上达。随后，他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在会中发表过动人的救国演说。他说：“使我国四万万人者，命知我国

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救者，吾未之闻也。”[(5)] 这篇演说反映出了当时维新志士们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群众怀着某种朦胧的希望。

5月间，梁启超联合应试者百余人，上书请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当时有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光绪帝继6月16日召见了康有为之后，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赐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他还曾受军机大臣及总署的委派，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大学堂规则，但却受到顽固派的嫉视。

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力抵制，虽变法之诏屡下，而新政之实效却无所表现。梁启超在京颇知维新力量孤弱，难敌守旧势力的压迫，曾劝康有为适时出京。但历来革新志士终不肯示弱于人，况又有君臣之义，他们何忍抛下光绪帝不顾？康、梁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万分困难的局面下继续奋斗。但“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斗争日益表面化。9月21日，西太后猝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并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重行听政，撤废维新诏令，变法全归失败。康有为于政变前夕出京，得英人救护经香港逃日本；梁启超则在日人救助之下也逃到了日本。

康、梁逃日本后，正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主动提出与康、梁联合反清的诚恳建议。但康有为以“受皇帝知遇”为辞，拒绝合作。次年3月，康离日本去加拿大，随后在那里开始组织保皇会，幻想争取光绪帝重新执政，完成变法未竟之志。梁启超仍留在日本，办起《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该报于1898年12月创刊，十日一出，共出一百号，至1901年12月停刊。

康有为离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续有往来。1899年12月，梁

持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往檀香山，在取得当地兴中会骨干分子的信任的情况下，积极展开活动。他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相号召，几乎使孙中山亲手建立起来的檀香山革命组织为之瓦解，给兴中会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损失。

梁启超在檀岛活动半年多，一面竭力扩大保皇会的组织，一面为国内的“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1900年8月，临近预定的“自立军”起事日期，梁离檀香山回国。但他刚到上海，“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以事泄被杀，勤王计划失败。于是梁启超转赴南洋与澳洲，继续从事保皇会的募捐活动。次年五六月间，复去日本。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这时，梁启超放弃“斥后保皇”的口号，改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6)]，继续鼓吹和平改革。他宣称：“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并保证“不为危险激烈之言论”[(7)]。

《新民丛报》早期，梁启超曾着力介绍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对国内青年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而且由于对清廷腐败、改革无望而产生的愤懑，还曾一度高谈“破坏主义”，但其基本的和平改革的思想立场从未改变。《新民丛报》是梁自认一生办报最得意的时期，曾自诩“其文条理明晰，笔端常带情感”[(8)]，时人誉之为“新文体”，国内士子争相仿效，差不多影响了一代文风，也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随后发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批判康、梁保皇派和其他立宪派。这时，梁启超以全力同《民报》展开论战，使早已开始的两党的思想斗争达到高潮。论战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政治方面：革命党人坚持反满革命的立场，主张一定要实行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改行共和制度。梁启超认为满人亦中国人，中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改革

专制制度，而无须民族革命，无须暴力革命。他又认为中国国民程度不适合建立共和制度，而应循君主立宪途径，逐步达到改专制为民主的制度。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方面：革命党人要求实行某种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制度即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极力避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认为，中国正苦于资本不曾发展，所以无力抵御外资，无力摆脱贫困。中国应当毫不犹豫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社会状态下，而贸然实行民生主义，只能是“酿乱”，而绝不能达到富民的目的。

论战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梁启超的注意力转向实际的立宪运动，《新民丛报》停刊。而《民报》方面，因革命党内部分歧，严正的论战文字亦不再见于报端。多数革命党人亦将注意力转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上面，论战遂渐归于沉寂。

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下诏宣布所谓“预备立宪”。梁启超马上响应，宣称：“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9) 不久，他便与康有为决定，将他们惨淡经营的保皇会改名为宪政会。梁启超积极展开活动，与当时在日本的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等联络，筹划建立政党式的团体。后因杨度与蒋智由互不相能，且在策略上也略有分歧，杨遂别创宪政公会，梁启超则主使蒋智由、徐佛苏等出面做发起人，于1907年10月正式成立政闻社，并发刊《政论》杂志。在《政闻社宣言书》中，梁启超特别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10) 争取求得清廷的容纳。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他明确提出了斗争的方针。梁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1) 这既反映了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两条道路的对立，同时也反映了同以海外为基地，同以华侨为经济后援的这两党之间激烈争夺的情况。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内迁到上海，梁启超把徐佛苏、汤觉顿等

许多重要骨干都派回国内，与各地立宪派联络，参与策动国会请愿运动。有些政闻社社员则竭力钻营幕府，争取官僚的同情。

尽管梁启超向朝廷做了忠顺的表示，但统治集团对康、梁的活动却始终怀有疑忌。特别是戊戌政变以来，与康、梁结怨甚深的袁世凯，对康、梁的活动尤有戒心。1908年夏，曾出现一次国会请愿的高潮，当时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上朝廷一电，不但奏请三年召集国会，而且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这激怒了朝廷及所有守旧大臣。袁世凯乘机进言，陈景仁背后有康、梁操纵，要求对政闻社采取严厉措施。当时，清廷正苦于无计应付请愿运动，遂即下令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这一打击大出梁启超意外，他曾力谋挽救，终无效果，政闻社宣告解散。

但康、梁及其同党并未就此停止活动，他们在继续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特别加紧进行倒袁和谋求开放党禁（即赦还康、梁）的活动。为此，梁启超曾打算以重礼联络满人贵族和某些军机大臣，他还为某些朝廷大员代拟立宪奏折与说帖，借以加强同上层的联络。1910年2月，《国风报》创刊，梁启超又得以发挥其影响舆论的特殊作用。1910年秋，梁委派他最得力的助手汤觉顿以日本华侨商界国会请愿代表的名义进京，活动开放党禁。但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的“乞赦”要求始终未得清廷的许可。而袁世凯的一度被罢斥，也只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非只康、梁活动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在日本闻讯，惶惶然不可终日，他与康有为抛出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企图要革命党与清廷妥协，保住清廷的地位。他派遣人员在南北两方面进行活动，他本人也于11月间潜赴沈阳，等待时机，准备入京。后因时局对他不利，又折返日本，在一段时间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1912年2月，南北议和后，清帝退位，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的地位。袁氏希望得到梁启超一类名流的支持，曾向梁表示邀其回国

予以借重之意。这时，梁启超看到十几年前出卖维新运动的仇敌已成了控制时局的中心人物，遂不计宿怨，回书袁世凯，称颂他“功在社稷，名在天壤”，“率土归仁，群生托命”，表示“以逋越余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谀颂之辞，而不竭其驽骀，以图报称”[(12)]。信中详陈关于理财、治政、组党等项建议，并极力为其同党谋取地位。但那时同盟会的政治力量仍很大，许多革命党人反对梁启超回国。梁启超及其同党有所畏惧，许多人写信劝他暂缓回国。后来，同盟会的势力日趋散漫，而由一部分清末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团体所组成的党派纷纷出现，它们虽然互有矛盾，但在对付同盟会的问题上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的同党加紧活动，争取到各党派首脑对梁的同情，袁世凯也想利用这一情况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表示欢迎梁启超回国。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到京后，曾受到官僚政客及各种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相当热烈的欢迎，袁世凯也以优礼相待，梁启超十分得意。他积极着手组党，得到袁的慷慨资助。12月，梁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过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等方面的文章，实际很像给政府上的条陈。

梁启超在归国前，曾列名于汤化龙、林长民等人组织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回国后，他于1913年2月，又加入了以黎元洪、张謇等为首的共和党。5月，共和党与章炳麟的统一党、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组成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为理事。实际上，梁是该党的精神领袖。他直言不讳地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敌党，特别反对其左派，诋为“乱暴派”，时时加以攻击。

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一部分革命党人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这时，梁启超发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激烈地加以攻击。随后，就在镇压“二次革命”的硝烟未散之际，进步党人熊希龄为首的内阁出现了，梁当上了司法总长，从此更加频繁地出入总统府，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力求把袁世凯引上政

治轨道。10月，在进步党支持下，袁压迫国会举他为正式总统。11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议员资格。这时，袁自觉独裁总统的位置已经坐稳，接着便于1914年1月悍然下令解散了国会，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也就形同敝履，被抛到一边了，梁启超的政治幻想再度失败。2月，梁辞去司法总长职务，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至12月也辞职，于次年1月避居天津。

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阴谋复辟帝制。5月，袁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承认其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的绝大部分内容，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梁启超一方面不赞成变更国体，一方面对袁取敷衍态度。7月间，梁还参加了袁所指派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帝制活动态度尚不明朗。到8月间，复辟帝制的丑剧由隐蔽而公开，这时，梁启超看到袁世凯已经如坐火山口上，再不能持以暧昧态度。他在致其同党的一封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13) 于是他赶紧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竖起反袁的旗帜。紧接着，他邀蔡锷到天津密商反袁计划，决定借重蔡在云南旧部的势力，组织武力讨袁。梁启超打算在讨袁斗争中造成自己的武力和地盘，以便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蔡锷潜回云南时，梁启超也于12月离天津赴上海。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告独立，揭橥护国的旗帜，发兵讨袁。随后，贵州、广西等地相继响应。梁应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邀请，于1916年3月离开上海，在日本人帮助下历经艰险和困难，绕道越南进入广西，在陆的“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中任总参谋。广东“独立”后，5月1日于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梁任都参谋。在此期间，他协助陆荣廷与假独立的广东龙济光达成妥协。5月6日，西南各省联合组织的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梁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军务院初期所发的各种布告、文电等，大抵皆出梁启超之手。

5月中旬，梁启超离广东去上海，随即到南京与冯国璋协商迫袁退位等问题。不久，他以居父丧为名，辞去军务院本兼各职，留居上

海，等待时机。

是年6月，袁世凯帝制破产，忧愤而死，段祺瑞成了北洋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梁启超于袁死的第二天，就致电南方讨袁的各都督司令，声称："收拾北方，唯段是赖，南方似宜力予援助，毋使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即对袁，似不妨表相当之哀悼而揽同情。"[14] 为了取悦段祺瑞，他极力劝促西南军阀的首领唐继尧尽早解散军务院，免与北京国务院对立。

8月，旧国会在北京复会。这时进步党的骨干林长民等组织宪法研究会，随后与汤化龙等人的宪法讨论会合并，结成了以梁启超为首的所谓"研究系"政客集团，依附北洋军阀，从事政治活动。

1917年1月，梁启超到北京。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之间，正围绕着"参战"问题展开权力之争。梁启超积极支持段祺瑞，要挟黎元洪和国会批准对德宣战。在黎、段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引起段派督军的激烈反对。6月，长江巡阅使张勋借"调停"的名义，率领"辫子军"进北京，一手导演了清室复辟的丑剧。梁启超遂又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为他起草讨张檄文。在驱逐了张勋之后，冯国璋就任总统，段祺瑞重新组阁，拥段有功的梁启超乃出任财政总长兼任盐务总署督办。他曾献策，拒绝恢复在张勋武力胁迫下解散的旧国会，而召集便于段祺瑞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以便排斥国民党，为研究系谋取有利的地位。但后来在四川内战问题上，梁启超支持原蔡锷的部下戴戡，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发生矛盾。当戴戡被段所支持的川军打败身死之后，遂于是年11月辞职回天津私寓，深居不出。

1918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劢、蒋百里等，以半官方的身份（名义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去欧洲旅游，历时一年多，于1920年3月回国。那时，因五四运动而更加扩展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决心放弃实际政治活动，改而致力于文化

教育事业。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表现出批评欧洲文明和张扬中国固有文明的倾向。

梁启超回国后，立即与张君劢、蒋百里等着手组织以编译出书为主要业务的共学社，改组《解放与改造》杂志（1919年9月创刊，改组后，从1920年9月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又派人接办中国公学，并设法向南开大学等校推荐人员，梁本人则不遗余力地撰文著书和到处讲学，全力以赴地争夺文化教育阵地。1921年，他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1922年10月至年底，他在东南大学讲述《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后几年，他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处讲学，并发表了许多鼓吹尊孔读经的文章。但在这期间，他也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几本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1925年，他受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工作导师，培养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国学人才。

梁启超晚年，正值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梁启超对此既恐惧又敌视。

1925年12月，梁启超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次年春，又就任以美国退还庚款筹立的北京图书馆馆长；秋间，就任司法储才馆馆长。1927年6月，在北洋军阀行将覆灭的关头，梁启超仓皇出京，到天津匿居。1928年11月，以重病入北平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病死。

梁启超生平著述极多。他死后，其友人林志钧编辑出版了《饮冰室合集》，共一百四十八卷。

---

(1)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

1989年影印本，第16页。（以下《饮冰室合集》之引文皆简注《文集》或《专集》）

(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专集》之一，第114页。

(3)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专集》之二十九，第38页。

(4)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8页。

(5) 天津《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6)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文集》之二十九，第3页。

(7) 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

(9) 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12-213页。

(10) 《文集》之二十，第28页。

(11)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18页。

(12) 梁启超：《致袁项城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380页。

(13) 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厓、刘希陶书》，《专集》之三十三，第28页。

(14) 梁启超：《致各都督司令电》，《专集》之三十三，第54页。

梁士诒

郑则民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5月5日（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广东三水县冈头乡。其父梁知鉴，号保三，曾在三水、广州、香港等地书院讲学，晚年于廉州、钦州、北海出任商董。

梁士诒幼年随父读书，十六岁时，读于广州马鞍街青云书院，与梁启超同学，开始结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应乡试，考中举人。1890年和1892年两次赴京会试不中。当时中国已出现一些近代企业，资产阶级改良思潮也有所发展，西洋的近代科学、政治思想等逐渐传入，这些对他有影响。当他南归经过上海时，搜求购买了一批译本新书，返乡后认真攻读，并与友人共同研讨，特别留心于财政、河渠、道路方面的问题。1894年进北京考中进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继而告假南归，在家乡凤冈书院讲学。1897年又赴京任国史馆协修。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中战乱，还乡仍讲学于凤冈书院。这时，他感到内忧外患，力倡“学归实用”[(1)]。

1903年，梁士诒应清廷经济特科试，成绩名列前茅，在复试前，因他的名字和康有为（祖诒）、梁启超的姓名各同一字，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是“梁头康尾”，慈禧因而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不予录取。直隶总督袁世凯听说他通“时务”，经过唐绍仪介绍，当年10月聘他到天津，任北洋编书局总办。这是梁士诒投入袁世凯门下的开始。次年，他以参赞身份随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谈判。1905年冬，随唐回国，被任为管理铁路的总文案，由此走入了交通部门。1906年，梁士诒被调入外务部，以五品京堂候补，记名丞参。同年，清廷新设邮传部，总管轮、路、电、邮四大系统。1907年，他出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撤五路提调处提调。因上述铁路当时

经济效益良好，开辟了巨大的财源，梁也得了个“五路财神”的外号。同年11月，他向邮传部尚书陈璧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认为“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2)]。为此，梁预订了章程三十八条，奏准依议。当年交通银行成立，梁奉派为该行帮理。实际上这个银行由他一手操办而成。不久，邮传部裁撤五路提调处，改设铁路总局，由梁士诒出任局长。他利用实权在交通部门安插党羽，培植个人势力。

1908年，梁士诒筹款修筑京汉铁路，并同英国公司订立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还参加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的工作。同年底，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袁世凯被新上台主政的摄政王载沣以“患足疾”勒令回原籍养疴，陈璧、唐绍仪也相继去职。梁得新任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保护而继续任职。1909年（宣统元年），他补邮传部左参议。次年梁改组铁路总局，使其规模更加完备，还奉命查勘广九铁路全线。1911年初，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有意清除梁士诒的势力，借故有给事中和御史七人奏参梁把持路政，任用私人，虚靡公款等由，奏请清廷撤去梁的铁路总局局长之职，并派人对他进行清查。

1911年10月，以保路风潮为导火线的武昌起义发生后，盛宣怀成了众矢之的，被清廷革职；接着清廷又起用了袁世凯，这给了梁士诒再出头的绝好机会。果然不久袁派人到北京秘密告知他：“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即唐绍仪）预为布署。”[(3)] 于是，他秉承袁世凯意旨，积极活动和策划。11月16日袁内阁成立，梁先署理邮传部副大臣，后又署理大臣。为了配合袁世凯逼宫的需要，他同外务大臣胡维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等多次进宫，声称财源枯竭，大局难保。袁通过他们对清室软硬兼施，退位条件也代为传达商议。梁士诒还布置清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驻外使节及段祺瑞等四十七名北洋将领，电逼清帝退位。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受袁信任，参与机密，人们叫他“二总统”。5月，他兼任交

通银行总理，利用职权，使交通银行取得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1913年5月，他又署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8月24日，孙中山至北京，与袁会谈十三次，只有梁士诒列席。他还奉袁之命到孙中山住处，讨论过去铁路的历史及共同拟订未来的计划，并陪同孙中山游览明陵、居庸关等名胜。当袁世凯急于变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在国会中策动议员“先选总统、后制宪法”时，他奉命组织了御用的公民党，替袁活动。1914年起，袁世凯已由大权独揽逐步做着复辟帝制的安排，梁在这过程中，又大卖气力。3月，他以总统代表身份到孔庙祀孔，讲演“圣道”。到5月，他因与袁党皖派首领新任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之间的矛盾激化，调离了总统府，改任税务处督办，又任“参政院”参政。但他并不因外调而灰心，仍然积极向袁献媚争宠。7月他领衔向“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使袁世凯能任期十年，并可连选连任。同时，他凭借垄断的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和税务督办的职权，对外借款，对内搜刮，为袁世凯筹措帝制经费。8月他被任为内国公债总理，为袁政府发行民国三四年“国内公债”约5000万元；又在一年之内由他洽成了数笔对外借款，这就使袁世凯从财政上得到支持而可以放手地为帝制而加紧活动。

梁士诒是袁党中的粤派首领。粤派与皖派争宠，互相攻击。1915年6月，皖派策动肃政厅发动了“五路大参案”，矛头指向了梁士诒及其亲信叶恭绰。此案开始声势很大，但在袁世凯的庇护下，最后轻轻了结，但这毕竟是对粤派的一次打击。8月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打着“研究学术”的幌子，作为推行帝制的机关。9月梁士诒为向袁表示“忠心”，急忙发起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求变更国体，并准备借“国民”之名，把袁世凯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他的这一招，手续上较筹安会为简便，博得袁的欢心。1916年6月，袁世凯的帝制失败并死去后，梁士诒等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继任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政府的“通缉”。这种“通缉”是虚假的，令下之后，他从容地避往香港。

梁士诒在香港住了一年之后，应日本财阀涩泽和大仓的邀请，于1917年10月赴日本，受到盛大的接待。日人视梁为可供利用的人物，如涩泽以为“中国要人中，有经济的充分知识，而又了解日本者，北方推（梁士诒）先生，南则张季直（謇）也”[(4)]。梁在日本游历了将近三个月，参观各地工厂、商行，与日本财阀、政客如头山满、犬养毅等人广泛接触，并就在华合办银行、设企业等进行了秘密洽谈。

1918年初，正是北京政府中冯国璋、段祺瑞暗斗并在对南方问题上发生和战分歧的时候，经皖系政客们的活动、疏通，北京政府取消了对梁的通缉。2月梁回到北京。先是，为调解冯、段之争，徐世昌从河南原籍北来，进行一些游说活动，成为时局中瞩目的人物。梁进京前先去天津同徐世昌秘密商谈。接着，他奔走于北洋各派和南北各军政要员之间，以和事佬的姿态进行周旋。6月，交通银行开股东大会，梁被选为董事长。他原为交通系的首领，当受通缉外逃期间，曹汝霖在交通部门中，乘机安插私人，培植个人势力，形成了所谓“新交通系”。梁归国后，又纠集旧部，恢复了势力，人们称之为“旧交通系”。其实，新、旧交通系并无多大区别。当时，皖系政客组织了安福俱乐部，8月间召开了所谓新国会（亦称“安福国会”），新旧交通系在这个国会中占据了仅次于安福系的席位，梁士诒当上了国会参议院议长。9月4日，徐世昌在安福系和交通系共同支持下，当选为北京政府大总统。

徐世昌上台后不久，欧战结束。美、英等国为遏制日本支持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对中国政局倡导“和平”，徐世昌愿借南北妥协巩固自己的地位，南方军阀也想从和议中分得一定的地盘和权力，1919年春，南北和会在上海得以召开。在此之前，梁士诒为徐世昌暗中献策，其要点是：1．副总统让南方选出；2．内阁由北方组织；3．恢复旧约法，新旧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旧约法所定选举法选举总统，组织正式国会[(5)]。这样可以使北方选出的新国会不负违法的

名义，从而使新选出的总统不再是非法总统。徐世昌对此主意很赞赏，对梁便委以促进和谈的重任。因此徐、梁结合起来，“成为不可分离之局”，“梁得徐而胆益壮，徐得梁而志益坚”[(6)]。梁曾南下广州等地向西南各省疏通，又到香港同南方的总代表唐绍仪等接洽，竭力促进和谈的实现。但南北和会，双方代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终以无结果而破裂。在此期间，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的态度是和徐世昌一致的。

1918年12月梁士诒辞去参议院议长的职务。次年1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和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这时，中英银公司代表梅尔斯与交通部铁路会计顾问美国人贝克（John Earl Baker），向北京政府提出由美、日、英、法统一对中国铁路贷款，并由这四国和中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方案，引起我国各阶层人士的关注。梁士诒等对此表示反对，并采取了抵制措施。他出面募集资金一千余万元，成立中华银公司，出任董事长，以承修铁路为主要业务。又组织铁路救亡会，呼吁抵制列强夺占中国路权。同时发表了车、路分离的主张，提倡加速发展交通事业，促进交通辅助事业。

南北和议破裂后，北方直、皖两系以东西方帝国主义为背景发生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战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着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京政府。他们分别在美、英和日本的扶植下，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后的靳云鹏内阁是直、奉两系保持均衡的产物。梁士诒很想组阁，便策动交通系阁员叶恭绰、周自齐从财政上倒靳阁的台。又经叶恭绰的活动，他们的计划取得了张作霖的支持。1921年12月下旬，奉系与交通系迫使靳云鹏辞职，张作霖接着便推荐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梁内阁出现的背后，实际上又是日本策动的结果。日本为了与英、美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把奉系与新旧交通系拉在一道，以便供它利用。因此，梁士诒的组阁激化了英、美与日本的斗争，也激化了直、奉之间的矛盾。这时在美国控制下的华盛顿会议，正就山东问题进行争论。日本为保持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就派驻华公使小幡

见梁士诒，声称愿提供借款给北京政府，诱使梁士诒接受山东问题改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的主张。梁同意了借日本款赎回胶济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的条件。梁当即电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专使，接受日本要求。这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群众纷纷抗议，上海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这时，善于观看风向、利用民意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发动反奉的运动。他大骂梁士诒“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⑦。到1922年1月25日，梁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直系军阀的攻击下，不得不请假出京，躲往天津。

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打响，结果奉军失败。徐世昌赶快褫夺叶恭绰、梁士诒职务并下令通缉。但下令前，梁士诒已得到通知，5月7日，他和叶恭绰一同逃往日本，数月后回香港家居。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全部政权。1923年5月发生了津浦铁路上的临城劫车案，有国内外旅客三百余人被孙美瑶匪部劫持，带往抱犊崮山麓，作为人质，引起了美、英等国对直系的不满。直系政府借此攻击梁士诒说此案与交通系有关，曹锟电告国务院知照香港将梁等逐出香港，港方没有置理，梁等也通电反驳。9月间黎元洪在直系胁迫下被迫离京，曾从天津至上海，拟重新组织政府，派人请梁士诒协助，未被接受。

1924年3月5日，梁自香港起程到英、法、德、意、美、日等国漫游。此行名为实地考察，实际上是通过与有关国家政要人物和资本集团的接触，扩大影响，谋求东山再起的机会。五六月间他到德国，遭到柏林的部分中国留学生愤怒斥责。由于交通系主要人物对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反直三角同盟是支持的，而且同南方政府有某种合作，故当梁到达美国时受到国民党人的接待与保护。9月1日，他回抵香港。

1925年2月，梁士诒应临时执政段祺瑞的约请，赴北京参加善后

会议。5月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8月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委员。以后又任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再次任交通银行总理。随着临时执政府的终结，梁于次年回至香港。

1926年5月，梁士诒应张作霖的约请前往奉天（今沈阳），商讨救济金融的办法。1927年初任北京政府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委员，当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聘梁为“政治讨论会”会长。5月，他曾访英驻华公使兰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希望通过蓝氏促成奉张与蒋介石合流，但无结果。

1928年2月2日，梁士诒受命为北京政府税务处督办。4月，张作霖自北京退往奉天，在皇姑屯被日人预埋炸弹炸死。梁看到北洋军阀面临末日，遂返香港。不久国民政府以附奉罪名下令通缉梁士诒。6月1日，又用改选方式，使梁脱离交通银行。

1932年1月，蒋介石召开“国难会议”，梁也被邀参加，至沪后，因会议展期，返回香港。1933年2月，蒋介石邀段祺瑞南下，段氏函请梁前往面商大计。3月梁自港抵沪。他曾就抵抗日本侵略及后方给养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但不久病发，于4月9日在上海逝世。

---

(1)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版，第35页。

(2)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66页。

(3)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00页。

(4)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388页。

(5)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

(6)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4，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29页。

梁漱溟

白吉庵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塾师，后官至内阁中书等职。

梁漱溟五岁时，其父请一位姓孟的老师来家教他读《三字经》及《地球韵言》等书籍，1899年将他送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次年因爆发义和团运动，学校停办。1901年起梁先后入北京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江苏小学，一度在家课读。

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五年半的学习过程中，梁读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门课程，同时他对时事很有兴趣。那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都是他每天的读物。此外《新民丛报》也是他喜欢读的刊物。在政治上他主张走和平的道路，进行改良，反对排满与革命。

1911年秋，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武昌首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在此形势下，他与一些同学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并担任该部在天津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和外勤记者，常驻北京。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出入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与各方面人物交往，因此对官场中的丑行、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感到厌倦和憎恶。而他父亲对他的革命行为又不予支持，所以思想很苦闷，矛盾日益加剧而无法解决，故于是年冬及次年冬，两次自杀未遂，均被友人挽救回家。人虽得

救，可从此产生了皈依佛家的心愿。1913年春，他毅然辞去记者的工作，在家闭门读佛典，并从此戒荤吃素，同时还读过一些医书。

经过三四年的自学，梁漱溟对佛学有了较深的体会与认识，于是撰写了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发表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第6、7期上。该文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看了很感兴趣，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梁到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程。

1919年12月，他撰写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说，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站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1)]。

梁漱溟自进入北大之日起“就抱定一个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2)]而来的想法，是因那时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吴虞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社会上激怒了一些人，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一进北大就对蔡元培说了上述的话。在讲印度哲学课程外，又在校内创立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以研究孔子思想为题，在校内外进行演讲，并应邀到山东济南去讲座。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批判了三种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他认为正确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留情；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结论是：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是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办学，随行者有熊十力、陈亚三、黄艮庸等人，任务是主持曹州中学，并拟筹办曲阜大学。之前，梁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谈其教育主张。他认为，当时的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方针是“以青年为友”。后来因当地军阀内部纷争，学校办了不到半年便停办了。1925年梁等回到北京，他本人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闭门读书，整理父亲的遗著。同年，因有几位学生来到，所以在什刹海附近赁房而居，师生一起讲学共勉，心情倒也舒畅。

1926年春，梁漱溟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德国学者卫中（西琴，S．A．Westharp），之后双方结合在一起，搬到西郊大有庄住，共同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1927年5月，梁应老朋友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之邀到广州。时李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梁的帮助。梁建议李在广东推行“乡治”，指出：宪治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础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李表示同意，便请梁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春，梁漱溟到南京参观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晓庄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回广州后大力推行其“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方针；同时在一中内设立了“乡治讲习所”，听众达千余人之多。为提高举办“乡治”的能力，他获得广东政府的资助，于1929年2月偕冯炳奎等人，外出到一些举办乡治的省市去参观。他们先到上海，参观了黄炎培等人在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及一所小学。旋即北上，参观了河北定县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改进事业。之后又转向山西，参观沁源、汾阳等县乡村自治情况。梁参观后，原本想回广州大干一番“乡治”事业，但由于李济深不同意蒋介石讨桂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时局有变，梁因此未回广东而留在北平。

1929年秋，梁漱溟应彭禹廷、梁仲华之邀，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同时接办《村治》月刊，并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略谓：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基础就有了。这是梁第二次办“乡治”之始。因该院与冯（玉祥）有关，翌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村治学院被封闭，梁也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到北平。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文中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只有一条路，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作自觉的改革。梁漱溟即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其进行反驳。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1931年6月，前河南“村治学院”院长梁仲华在山东邹平又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被聘为该院研究部主任。是时他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该文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等问题，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而在乡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当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在其研究院下设立了三个部：一是研究部，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研究乡村建设理论；二是训练部，招收中等文化青年，训练为乡村服务人员；三是实验区，以邹平为实验区，该县的全部事务概由研究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等。教学方法，一般不取讲授办法，而采用个别谈话或集体讨论。课程设置，从农村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如农业常识，等等。

梁漱溟这套改良主义办法，虽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实验区从一个后来竟发展到了十三个；在各个区内又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乡民，但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广大农民对此反应冷淡。他的“乡治”在山东推行时间最长，大约六年多时间。这是他搞村治的第三阶段。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梁漱溟以乡治派代表身份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后为“国民参政会”）。会后返回山东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善后工作，号召同事、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此后，他便随着国民政府辗转迁往武汉后至重庆。

1938年1月，为了全国团结抗战，求国家之进步与统一，梁漱溟奔赴延安，进行考察和交换意见。他拜会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国事问题与之晤谈多次，并将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当时梁对抗日有悲观情绪，经毛泽东以《持久战论》示之以后，心情豁然开朗。后来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梁表示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中国贫富贵贱不明显，阶级对立不强烈。毛泽东说：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了。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社会发展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二人互不相让，争论没有结果。此行梁在延安待了十八天，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活条件差，但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

1939年，日军已深入我华中地区，但山东、河南敌占区仍有我游击队与之周旋，其中有不少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员。梁漱溟也想到敌后战区巡视一番。他征得国共双方领导人的同意与支持后，于是年2月率其同人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进入山东，在鲁、豫、苏、皖各游击区巡视。所到之处皆代表后方民众向前方战士表示敬意与慰问。此行前后八个月，艰苦备尝，同时梁也发现国共双方在敌后根据地内的驻军时常发生军事摩擦，这使他感到惊讶和苦恼。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即向各方呼吁和平，并在国民参政会议上提出

质问，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八路军的军事活动，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1941年又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梁深感忧虑，认为有必要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织一个党派，一起来反对内战。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商议，并决定将原先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组织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为“民盟”之前身）。同年3月1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为中央常委，黄为委员会主席（后因黄辞职，改由张澜继任）。因在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同年5月梁受组织委托到香港筹办报刊。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梁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该报作为中国政坛上第三方面势力出现，它要求民主、希望团结、坚持抗战，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可惜只办了八十天因香港沦陷而停刊。

1942年初，梁回到广西桂林，他在这里一边从事写作，一边主持民盟工作，配合李济深等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是年末，有人由重庆带来周恩来的密信，劝梁往苏北等地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他感到困难未往。次年，国民党方面邵力子邀梁往重庆共商国是，也被他拒绝。后来桂林失守，他避难到贺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的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梁漱溟为此甚为兴奋，认为国难已纾，团结在望。11月他从广州飞往重庆，当晚周恩来来访，谈及形势，才知国共两党虽然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但内战仍未停止。因此梁又不得不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行列。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参加“军事组”、“国民大会组”的工作。这次大会通过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方案。梁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宪政在清末时自己曾主张过，但入民国后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了，于是他在30日的闭幕会上宣布自己今后要退出现实政治，专门去搞文化研究。

同年3月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与同情。在延安他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等人进行了座谈，梁认为多党制政府在中国行不通，希望能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党派可以存在，但参政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等等。座谈没有结果，后来他说，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能在延安畅所欲言，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4月初梁漱溟回到重庆后，正是东北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越打越烈，后来在各方面奔走呼吁下，蒋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谈，但要价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民盟内的朋友都劝梁漱溟不要走，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听了这些话，梁改变主意，又鼓起勇气加入到政治行列，为和平奔走，担任“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民盟主席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盟内事务概由梁做主处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及西南联大教授（民盟成员）闻一多，妄想用恐怖手段镇压人民“反内战”要“民主”的声势，但适得其反，昆明学生及爱国人士不畏残暴，又发动了“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发生后，梁漱溟于7月18日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在读完书面谈话后，大声怒喝道：“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5)] 之后，“民盟”总部委托他与副秘书长周新民到昆明调查此事件真相。他们抵昆明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应付一下门面，就算了事了。梁对此深为不满，在昆明待了十六天，写出一份“李闻案调查报告”，公诸于众，要求将此案转交南京特别法庭处理。

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次日，蒋介石认为军事已取得优势，于是单方发出召开伪国大的命令，遭到中共断然拒绝，“民盟”也表示不愿参加，从此和谈彻底破裂。

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于1946年6月离开南京到重庆北碚，闭门著书，但他对国内政治问题还是关心的。1947年在《观察》上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略谓：在此广大社会中，遍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尤其政治上为甚，尤以政府当局为最甚。同年5月，曾到南京出席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议。

1948年梁漱溟在北碚创办了勉仁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次日，梁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指出：过去内战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希望今后各方共谋和平统一中国。

同年11月，梁漱溟所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由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序言里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不久重庆解放，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梁漱溟于1950年1月到北京。毛主席询问梁可否参加政府工作，梁漱溟答应愿在政府外效力。曾去东北、山东、河南等地参观，并一度赴四川合川县从事土改。1951年10月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翌年5月写了《我的努力与反省》一篇长文，对以前错误思想有所检讨。

1953年9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指责党和政府进城以后丢了农村，搞大工业城市损害农民，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对共产党依赖甚至还不如资本家对工商联依赖可靠。为此受到过批评，口诛之后又加笔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报刊共发表上百篇批判梁的文章，有的文章不够实事求是，乃至进行人身攻击。1966年“文革”中他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抄家，结果资料书籍损失殆尽。在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梁漱溟坚持批林而不批孔，他对当时流行的批孔意见多不同意，起初打算写成书面意见送统战部等领导看，后来为感情驱

使在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五小时的发言，全面讲述了自己的看法，遭到严厉批判。他始终不服，当会议召集人征询他的感想时，他答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6]。“文命”后，梁漱溟继续参加政协活动，更忙于著述，先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稿，1980年被推举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连任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

(1) 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6页。

(2)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3)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8页。

(4)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528页。

(5) 李渊庭、闫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6) 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

梁思成

黄延复

梁思成，祖籍广东新会。1901年4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二）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梁启超，是清末戊戌维新中的主要人物，变法失败后携家亡命日本，梁思成即出生在日本。

梁思成自幼受家学熏陶，国学根底较好。在日本读华侨小学，使他从小接触到近代文明思想。中国当时所处丧权辱国的地位，又使他幼小心灵中，深深埋下反帝爱国的种子。

辛亥革命后，梁思成于1912年随父回国，1915年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他学业优秀，课余爱好非常广泛，爱好体育，尤其擅长攀高。他有相当的音乐修养，不但能在校唱歌团里担任男中、男低两个声部的演唱，而且还在校铜管乐队里担任第一小号手和副队长。他尤爱美术，同学们赞扬他“长于传统风格，能在同一时间里绘出数种不同风格的画，以便从中获得新灵感”，曾多次被推选为校刊的美术编辑。他被同学们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参加宣传、游行和抵制日货等活动，是侪辈中很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之一。运动过后，学生要成立自治会，受到校长张煜全的阻挠，梁思成愤起高呼：“我们罢课！”群起响应，获得斗争的胜利，诞生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学生自治会。

1923年5月，梁思成即将毕业出国留学时，不慎在一次车祸中摔折了腿骨，不得不延至翌年春伤愈后才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习建筑学。还在五四运动期间，梁思成受新文化思想启迪，就“立志要在出国留学期间取得欧美建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以应用于中国”。他认为：“在当时中国建筑的技术和它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还都是当

时学术界所未注意的。”[1] 1927年宾大毕业后，他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建筑和美术。他对一些学术研究报告进行阅读和分析后，认为研究工作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必须去实地调查。他与在宾大时的同学林徽因结婚后，一同离开美国，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他参看了许多博物馆中所藏的中国石刻、壁画和古代文物，并参观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古建筑实物和当时正在开始出现的现代新建筑。他看到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古建筑都受到国家妥善保护，并有专门学者进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不仅有许多珍贵的古建筑荒凉、颓残，无人问津，而且许多珍贵的文物或被偷窃、盗卖，或被外国侵略者破坏、掠夺，摆在人家的陈列馆里作为奇物，我们中国人要研究自己祖先的遗产却要依靠他们编的资料，有的还被“保密”。梁思成深感这是一种民族耻辱，下决心要尽力研究我国古建筑遗产，写出中华民族的建筑史，洗雪民族的耻辱。

1928年秋，梁思成途经欧洲回国，先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自任主任，夫人林徽因则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另一位建筑学教师”。嗣后，陈植、童寯、蔡方荫等相继来校执教，同心协力为我国培养建筑人才。这期间，梁思成开始为将来深入研究中国建筑史做准备，逐步测量当地古典建筑，研究中国木匠的用书，向老木匠学习中国房屋的结构方法，并开始设计一些运用现代结构而保持中国特征的楼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大学被迫停顿，梁思成的研究工作也告中断。他入关到北平，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我国古建筑的广泛调查、研究、绘制和著述工作。他先以故宫为重点，对照清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选择一些建筑，从整体到局部，从构造到装饰，逐个进行观察、测量、记录，许多具体数字都能倒背如流。这期间，他还参加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工作，帮助修缮了许多古文物和古建筑。为了更广泛深入地进行研究，从这年起，他率领一支小分队，每年两次去各地调查古代建筑，包括庙宇、宫殿、住宅、佛塔、陵墓、桥梁、城堡，以及许多早期佛教造

像崖，其中有许多建筑物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都是初次被认识而介绍于学术界的。如1932年4月，他们对河北省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和寺内的观音阁进行了调查，经过测绘、查阅史料、抄录碑记、访问老者等等，他们考证出：由三层木结构组成的观音阁，建于公元984年（北宋雍熙元年），距调查的当时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在实地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梁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山门考》，对山门和观音阁的外观、平面、台基、柱子、平拱、梁架、椽、瓦、墙、门窗、彩画等结构和装饰的各部分，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分析；绘制了外形、结构、细部的全套图纸，摄制了大量照片。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自己的古建筑进行详细研究的成果。再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正殿，是一座木结构的佛殿，建于公元857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建筑，殿内还有同时代的塑像、壁画和题字。赵县的大石桥——赵州桥，是一座跨长37米的空券单孔券桥，建于7世纪初叶（隋代），是世界上最古的空券桥。这些宝贵的资料，都经梁思成和小分队摄影、测量、绘造成结构详图，再根据史料写成调查报告。从1931—1937年六年当中，他们的足迹遍及南北十六省二百余县，实地调查了两千余座古建筑；写出调查报告十八篇。他们还曾到山东曲阜对孔庙作了详细的测量，提出了修缮计划。

梁思成的这些工作，大都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多次外出实地调查，都是风餐露宿，仆仆风尘，常要随身携带几十斤重的仪器、用品等长途跋涉，有时为给一座古塔的刹顶拍照，须手握铁索、两脚悬空攀援而上；有时在室内测量，常常要盘柱登梁。正如他说的："蝙蝠见光（指摄影时用镁粉闪光灯）振翼惊飞，秽气难耐，工作至苦，同人等晨昏攀跻，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虱为伍，或登殿中构梁，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2)

1937年7月，正当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一行在调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时，抗日战争爆发，他们辗转返回北平。梁思成在北平教授联名信上签名，要求国民政府起来抗日。9月，他和几位研究人员

开始内撤，经天津到青岛，转汉口到长沙，11月到达昆明。1940年底又由昆明迁至四川南溪县的李庄。这期间，物价飞涨，营造学社的经费几遭断绝，常常只发半份工薪。夫人卧病，梁思成本人也因关节炎发作而行动艰难，生活异常艰苦，有时甚至得变卖衣物以贴补生活。美国有好几所大学和博物馆请他去美讲学，有的还允许他带夫人去治病。梁思成的态度是：国难当头，决不离开国土。他和他的同伴们坚持在困境中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他们在昆明至大理一带十余个县，在四川嘉陵江、岷江流域和川陕公路沿线的三十多个县又开展了古建筑和民居的调查；并为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印刷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他们出版了两期《营造学社会刊》。1944年，梁思成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这时，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穿着铁马甲工作。他在同伴的协助下，抱病著述，终于完成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国建筑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于1946年迁回北平，在梁思成的建议下，增设建筑学系，梁思成被聘为教授兼系主任。同年，美国耶鲁大学聘他为访问教授，讲授中国艺术史。在美期间，他担任了联合国新厦建筑设计团的中国代表，参加了六个月的设计工作。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贡献，授予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他在美国用心研究近代都市计划，参观了许多现代住宅区，也参观了许多大学的建筑学院。1947年9月，他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内创设了一个专教都市计划的组。在都市计划理论的研究中，他开始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理的都市计划是难以实现的。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天津。此时，有一名解放军干部秘密来到他的家里，请他绘制一张北平文化古迹的分布图，以便在迫不得已必须武力攻城时尽可能不使这些宝贵的遗产遭受毁坏。这件事在他思想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接着他耳闻目睹清华园解放时，解放军为了使清华这所高等学府避免炮火毁坏，宁可和敌人进行肉搏战，也不轻易发炮。他很快认识到人民革命的性质而

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5月，他被聘为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的建筑师。8月，被选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9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于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工程界的杰出代表。还在40年代末，他就提出，建筑工作者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在“住”的方面的需要。这一思想在他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办系宗旨”中有明确的表达：“现在的建筑学的潮流，已不仅仅是谈坚固实用美观，当然更不以造高楼大厦、标新立异为满足。因为任何一座建筑物，皆不能离开其所在的环境而论其实用与价值，现今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对象，不是少数富有者的享受，而是广大民众的福利。”(3) 在日常的教学和指导研究中，他不断向青年师生传输这种思想。他常说：“建筑是要为大众的福利。踏三轮的人也不应该露宿街头，必须有自己的家。”他认为当时的建筑工作者首要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当然，这些思想在当时还只能是一些善良的愿望，但仍是值得称颂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这些话指引了一个方向，给予了那些沉迷于‘琼楼大厦’的观念而不能自拔的人一个有力的警觉。”(4)

新时代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问题，也一直是梁思成注意探索的对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指出，中国建筑的古老传统形式，鸦片战争以后，已受到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在一些大的海港城市里，洋式建筑的不断出现，有人盲目地移植希腊、罗马的高直样式，形成了建筑界的混乱现象；而在南京、北京等城市，又出现了一批由外国人设计的非中非西的建筑，形同穿了笔挺的西服，却戴上一顶华丽的皇冠。梁思成认为：“这些建筑的通病，全在于对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

乏基本认识的一点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趣旨，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5)] 他认为这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梁思成担任了繁重的社会工作和教学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建筑样式和创作理论的探索。当他学习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文化的论述时，犹如茅塞顿开，兴奋地说：“新中国的建筑也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6)] 他接连写了《中国建筑的特征》（载《建筑学报》1954年第1期）、《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载《建筑学报》1954年第2期）、《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10月）等文章，并多次作报告，抒发自己的心得体会。但有一个时期，他过多地强调古形式在今天的应用，影响所及，当时出现了一些建筑脱离国家经济条件的倾向，因而受到了批评。他诚恳地接受这些批评，并很快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错误地把古代的法式和建筑特征神圣化和固定化了，把它们看做是“世代应遵守的永恒的东西”。他总结说：“继承遗产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一个认识——分析——批判——继承——革新——运用的过程，而其中关键的两环就在于批判和革新。”后来，他十分留意研究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地应用大屋顶和古建筑装饰的建筑，他也不认为是民族形式的理想之作，特别不应看做是建筑的方向。而当他看到农村有些住宅，用普通砖瓦砌出一些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时，他认为这里面有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的途径。

在近代建筑物的设计方面，梁思成自谓“所作不多”。20世纪30年代，他在奔波于古建筑的调查测绘之余，曾设计了北京大学宿舍、地质学馆和南京博物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指导北京的城市规划和校内青年教师的设计工作，在许多重大建筑和清华大学校舍的设计中，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梁思成对北京这座古老的文化古都和人民首都的文物保护、修缮

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主张。1950年初，梁思成同也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任职的陈占祥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指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的古城，应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也必须保持它的传统风格。他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文章中，建议把北京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它们不仅代表着古都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形体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还可以古为今用：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馆供群众活动，城墙上面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为此，他专门画了设计图。他还提出，应限制在旧城区内兴建建筑物的高度，以保证天安门城楼的雄伟壮观。有一个时期，关于北京的建设，流行的口号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梁思成认为，这样笼统的提法不应该加之于北京。他提出：北京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发展中应该限制城区工业发展，特别应该防止环境污染。50年代初，许多政府部门想在北京长安街上兴建办公大楼，梁思成为了保证这条主要干道的质量与风貌，维护北京城固有的民族传统风格，便写信给总理周恩来，要求这条干道的建筑必须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注意民族形式的互相配合。经过梁思成的坚持而基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北京古迹之一，是北海团城和“金鳌玉带桥”的一组胜景。在扩建北海大桥时，有一些人主张把团城拆掉，桥位北移以取直东西马路，梁思成坚决反对，并设计出改造方案，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1951年，梁思成为设计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除参加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外，还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参加设计。他抱病研究各种设计方案，提出不要与天安门城楼相雷同，避免使碑身显得太小，并画出修改参考图样，最后被接受。他还参加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梁思成一生所著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清式营造则例》等专著，十八篇古建筑调查报告，在国外讲学时写的文稿，以及关于建筑理论和建筑史的论文等，已编纂成《梁思成文集》四卷于北京出版。

---

(1) 《梁思成小传》（1950年自撰）。

(2)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期（1944年）。

(3)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建筑工程学系》，《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2期，1947年4月。

(4) 梁思成：《住者有其房的倡导者》，1948年《清华年刊》。

(5) 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集·序》，中国营造学社特刊，1935年11月。

(6) 梁思成：《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建筑学报》1960年第1期。

梁希

汪仁泽

梁希，字叔五，1883年11月（清光绪九年十月）出生在浙江吴兴一商人家庭。幼年就读私塾，少年时科举考试中试，成为清末秀才。鉴于外患频繁，国势危急，他抱着为国效力的志愿，投笔从戎。1906年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后，东渡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由于品学兼优，被选为学生班长。他认真职守，处分了犯纪的日本同学，竟遭到少数日籍学生的仇视和攻击，遂愤而退学。是年冬，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与陈英士等人同时加入同盟会。次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变更初衷改学森林专业。1910年春，奉同盟会派遣辍学回国，在江浙一带联络党人、乡亲，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倒行逆施，国事日非。1913年，梁希怀着悲愤的心情再次远渡重洋，留学德国，在萨克森州的格廷根森林学院从事森林学研究工作。1918年学成归国，受聘北京农学院任教，并与林业同道创立中华农学会，任理事长。1920年改任浙江大学森林学教授。1929年，该校农学院院长许叔矶因不满校长压制民主辞职，学校当局拟聘梁继任院长，梁深切同情许的严正立场，非但未就院长职，且亦随许离校。不久，梁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任为农学院院长，一年后梁辞去院长职务，专任森林系主任。森林学的研究需有一套庞大的科学实验设备，但森林学在我国历来不受重视，中央大学的实验设备也是极为缺少。在梁的多次申请催促下，该校始于1932年批准设立森林化学实验室，经过梁的长期努力，逐步汇集资料、图书和仪器设备，并自行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部木材防腐机和木材强度测验机，终于使该室成为我国第一个稍具规模的森林学专业实验室。

梁希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培养造就了我国近代早期一批森林业专门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处林场工作。在教学之余，他兼任中央林业实验所主任和浙江省建设厅技正。他深入林场，调查我国的森林资源和利用情况，足迹遍及十四个省区；并选择专题，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如木素定量的分析、木糖的制造、各种木材的干馏及其所得产品的分析，应用国际先进技术试验松脂的采集和利用，比较分析我国十四省区油桐种子的含油量和性质、樟脑的炼制及应用器具的改进，等等。梁希将研究心得写成论文，发表在中华农学会会刊、中央农学院农学丛刊、中央林业研究所年刊等杂志上，对林产品的制造、木材的应用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创立木材学和林产化学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南京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在日机轰炸的扰乱下，梁希将苦心经营的实验室仪器设备一一装箱内运。在重庆期间，他走遍了川西各地，对川西所产的各种木材进行了物理性质的分析，并着重研究了重庆附近重要的商用木材利用价值，对当地盛产的竹材也进行了物理和力学的性能试验。他还同资源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合作，研究飞机及枪托用的木材。经过深入调查，获得一种川西出产的与国外性质相近的飞机用木材，经试用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抗战初期，在日军大举进攻下，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先后失守，1938年5月弃守徐州，梁希关心祖国命运，感到抗战前途茫茫，颇为悲观。不久，梁读到《新华日报》刊载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深为折服，顿觉黑暗中见到灯塔。接着他几经辗转介绍，又得见中共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他兴奋地告诉友人说："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向往延安，曾准备了几双草鞋，打算从西安穿上草鞋徒步前往延安，后经友人劝阻。此后，梁经常为《新华日报》科学副刊组稿、撰文。1942年11月梁希六十岁生日，周恩来、董必武等特意在《新华日报》编辑部为他设宴祝寿。丧偶多年的

梁希无限感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他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曾以"一丁"的笔名，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的读书笔记，引起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周恩来誉之为"这是自然科学家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并称赞他是"一位实干家"。

在这时，梁希在森林专业方面除著有《木材学》、译述《木材工艺学》和《木材防腐学》等已出版外，还完成了篇幅巨大的《森林化学》和《森林利用学》等文稿，但他为了不断补充新的研究成果，增订内容，而迄未付印出版。

1944年，梁希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和"社会科学座谈会"，以学习哲学相号召，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知识分子的一个团体。潘梓年、章汉夫等经常来会参加辅导。在这基础上，1945年7月，梁希又邀集涂长望、金善宝、潘菽等科技界知名人士，组成"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次年又联合英国科协等团体，共同组成国际性的进步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梁也多次参加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

1945年2月，抗战胜利在望，但国民党当局力图恢复它在全国的独裁专制统治，发动内战成为它的既定政策。为此，重庆文化界人士发起了以反内战、反独裁为主旨的《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梁希在科学界中带头签名，随之签名的知名人士之多、社会威望之高，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陈立夫、朱家骅分别以同乡晚辈身份函劝梁希发表否认声明，梁复信拒绝。接着有人以农林部次长和浙江省参政会议长的官职利诱，梁又峻拒。随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带领武装便衣特务登门恫吓，要他登报否认，梁愤然反诘："名已签了，怎好反悔，设身处地你能这样做吗？"徐顿时语塞，怏怏而去。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台湾省的林野面积达228万公顷，占全

省总面积的64%，为全国之冠。林业资源丰富，具有热、暖、温、寒四种林带，立木总蓄积量达2亿多立方米。仅樟脑一项，年产能力达5000吨。但被国民政府接收后，各地山林管理所都划归各县管辖，受到恣意砍伐、盗伐，破坏严重。1946年9月，梁希接受台省当局的邀请，去台视察，发现这种情况后，连夜写成紧急报告，建议速将山林划归林务局统一管理，虽遇到省主席顾问等人的反对，争得面红耳赤，但梁仍力陈利弊，坚持原议，终于梁的建议被采纳，破坏现象得以制止。次年10月，梁希应台省林产管理局和林业实验所之邀，偕同朱惠方、周慧明等林业专家再次去台，不辞辛劳，跋涉千里，翻山越岭，深入林区。经过两个月的视察，梁希和朱惠方合写了3万多字的《台湾林业视察后之管见》，对台湾全省林业的经营管理、造林护林、采伐利用，提出了周密的建议，深受重视，由林业管理局刊印后发至所属各林场。在台视察途中，梁希对台湾同胞、尤其是高山族同胞的境遇，寄以深切的同情，在《台湾之行》的诗集中记有："廉吏吁嗟墨吏骄，纷纷搜括到青苗；伤心最是高山族，四壁萧然人未饶。"

梁希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爱国运动。1947年南京"五二〇"惨案发生后，他为营救被捕学生，日夜奔走。1948年"五四"之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毅然参加在中央大学的草坪上举行的营火晚会，站在高台上激励学生："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是年秋，梁希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保护下，绕道香港，于1949年春到达刚解放的北平。

1949年9月，梁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提名梁希为林垦部（后改为农林部）部长。梁闻后深感不安，递上纸条称："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当即回条："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见条后始欣然应命，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此后，梁兼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当

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以及九三学社副主席等职。

1958年12月10日，梁希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五岁。

主要参考资料

陈啸原：《梁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黎集：《中国森林学导师——梁希先生》，《科学时代》第3卷第5期，1948年9月20日版。

廖磊

莫凤欣

廖磊，字燕农，广西陆川人。生于1890年2月20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二）[(1)]。其父廖章甫，务农，农闲时帮人挑盐。廖磊幼年家贫，仅读过三年私塾。1906年，廖到桂林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二期，1911年毕业后即转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第二期学习。武昌起义爆发后，军校学生响应，廖磊曾参加与清军作战，上臂负伤不退。

廖磊1913年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秋升入保定军校步兵科第二期。1916年6月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三团三营（营长唐生智）三连任中尉连副。1917年，廖磊跟随唐生智到湖南醴陵一带参与护法战争，升为连长。1918年，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部进犯湖南，湘军反击，廖磊升为营长。1920年又升任第三团团长，率领全团从衡州（今衡阳）出兵，攻占宝庆、永丰等地，直达岳州，大败北洋军阀张敬尧部两旅之众。

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讨伐吴佩孚、驱逐赵恒惕运动，3月上旬赵通电辞职，以唐生智代理省长。6月初，唐生智接受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廖磊升任第八军第四师副师长。是年7月，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占领湖南长沙后，廖磊在唐生智指挥下，沿着粤汉铁路北进，与友军配合，在汉阳、武胜诸役击败北洋军。10月上旬攻占武汉后，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军，廖磊升任刘兴第三十六军的第一师师长。

1927年“四一二”后宁、汉分裂，唐生智于8月间组织东征军，从武汉沿江东进，9月初，廖磊的第一师在刘兴指挥下，进至安徽当涂县。10月中旬，南京方面的西征军向唐部进攻，双方在安徽交战，廖

部在兰溪地区被击败，退回湖北。唐生智于11月12日通电下野，所部由李品仙、何键、刘兴率领撤往湖南。1928年初，白崇禧指挥桂军攻占湖南后，刘兴辞去军职，由廖磊继任第三十六军军长。不久，廖磊也归附白崇禧，所部为桂系改编，开赴湖北整训。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廖磊三十六军隶属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上，5月进入河北。6月与友军配合进占北京，又在滦东一带击败直鲁军张宗昌残部。其后廖磊部驻防唐山。

1929年1月，国民党编遣军队，第三十六军缩编为第五十三师，廖磊改任师长，仍驻唐山。其时，白崇禧与廖磊常相来往，对廖比较信任。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派人策动廖磊叛离白崇禧。当时，从唐山到天津沿线，均为廖磊所属部队驻守。白崇禧得知情势危急，秘密去唐山找廖磊。随后，廖磊亲自护送白崇禧到塘沽港，乘搭日本轮船经香港潜回广西。廖磊也因同情白崇禧，不满蒋介石所为，辞去军职，到香港居住。

是年冬，俞作柏在广西反蒋失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重新回到广西，组织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廖磊应白崇禧邀请，从香港回广西，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0年2月，廖磊协助白崇禧将进犯平乐的朱绍良部击溃。这时，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通电响应。3月，护党救国军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廖磊任第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5月，中原大战爆发，第一方面军除留少数驻守南宁外，全部进入湖南。6月，桂军败退广西，在柳州整编，廖磊仍任第七军副军长兼二十一师长。不久滇军侵犯广西，围攻南宁，形势危急。廖磊乃建议先解南宁之围，然后安定全省，白崇禧采纳此议，指挥桂系各军驰援南宁，在长堽岭、高峰一带大败滇军。之后，又把进入广西的粤军驱逐出境，广西全境回到桂系控制之下。1931年1月，廖磊升任第七军军长，驻守柳州，积极训练军队和民

团。

1931年4月，廖磊奉白崇禧之命，率军围攻右江革命根据地东兰、凤山等地。根据地军民顽强战斗，迫使廖磊的部队退回柳州。1932年7月，廖磊第二次率领军队围攻东兰，将根据地西山附近纵横三四百里的弄场重重包围，逐山搜索[(2)]。红军机智灵活，化整为零，与敌周旋。廖部搜索了两个多月，毫无所得。9月，白崇禧、叶琪亲临东兰与廖磊计议，决定“悬赏东毫一万元缉拿韦拔群”[(3)]。因叛徒出卖，韦拔群为敌所获，壮烈牺牲，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

1933年2月19日，兴安、灌阳、全州、龙胜一带爆发了瑶民武装斗争，起义军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4)]。廖磊奉白崇禧之命，率军镇压，一方面命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和副师长陈恩元，先后领兵四万之众到兴安、全州、灌阳等地围攻起义军，同时还派桂林民团区参谋长虞世熙率领民团开进龙胜堵防；另一方面，请求派三架飞机散发传单，分化瓦解起义队伍。廖磊则坐镇桂林指挥。3月4日，廖磊亲临兴安督战，终将起义军镇压下去。

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廖磊奉命负责桂北全线的阻击。廖调周祖晃赴恭城龙虎关、灌阳永安关、雷公关一带及兴安、全州布防，并调桂北各县民团协助防守，防堵红军进入广西。9月，萧克率领红六军团从湖南进入广西清水关，击退周祖晃、陈恩元部桂军的阻截，进入灌阳文市，经石塘、界首，向兴安唐家市前进。廖磊急忙派兵到兴安唐家市阻击。红军机智灵活，很快就进入资源。廖磊部队尾追不舍，但红军已到达贵州。这时廖磊又亲自率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赶到贵州，企图截击红军，结果也落空了。11月，中央红军迫近湘桂边境，廖磊在贵州闻讯，立即出动十个团兵力，分别在桂林、兴安、灌阳等地防堵，均被红军击溃。红军很快越过广西，经湖南进入贵州，廖磊的堵击以失败而告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廖磊奉命北上抗日，9月16日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军军长，率领第七军、四十八军到达第五战区参战。10月19日，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八军军长，率部开赴淞沪战场，在陈家行、蕴藻浜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之后，大场危急，廖磊率部增援，与日军激战一星期，廖部伤亡惨重，奉命退往浙西，收容整顿。1938年春，奉命移师入皖。4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威逼徐州，廖磊奉命开赴淮北，驻守宿县，挫败南路来犯日军。日军进犯武汉，廖部又开赴湖北麻城一带，从侧面袭击敌人。廖磊奉命留守大别山地区，9月任安徽省主席，10月到职，并兼任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廖磊主皖之后，曾致力于本省战时的军政建设。11月，在立煌（今金寨）开办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廖自兼班主任，调省、县政府工作人员分期分批训练，以加强全省各级政权的掌握。还招收知识青年受训，每期两三个月，结业后派充县长、区长、乡长、联保主任等职。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廖磊与新四军曾一度合作，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干训班讲演，宣传抗日。当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廖磊受到国民党CC系和新桂系内一些高级将领的责难[(5)]。廖磊本已患有高血压症，加上受了各方面的刺激，竟至一病不起，于1939年10月23日因脑溢血去世。

---

(1) 《廖磊将军事略》，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编《廖主席言论集》，中原出版社1939年版。

(2) 《东兰痛史》，1962年广西区档案馆据民国间稿本铅印。

(3) 沈治：《1932年秋廖磊第二次率部进犯东兰、凤山和谋害韦拔群同志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78年版。

(4) 谢祖萃：《绥靖兴全灌龙瑶变始末》，民国广西省民政厅秘书处

印。

(5) 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63年版，第79—80页。

廖平

汤志钧

廖平，字季平，1852年3月29日（清咸丰二年二月初九）生。四川井研人。家贫，其父曾为人牧牛、佣力，后稍自给，在盐井湾设一磨坊，廖平始能读书，勤于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张之洞放四川学政，次年院试，张对廖平很是赏识，拔为第一，补为县学生。1876年（清光绪二年），调尊经书院肄业。不久，王闿运到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授《春秋公羊学》，谈今文经说，廖平受其影响，称“高第弟子”，与绵竹杨锐、汉川张祥龄齐名。1879年乡试，廖平考中第二十四名举人。1889年成进士，以知县用。廖平考虑亲老，不愿到远处做官，请求改就教职，选授龙安府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学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及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廖平早年研求宋学，后来逐渐专门分析经学中的今文与古文。他的学说以善变称，大体说来，从1883年到1902年的二十年间，学凡四变。第一变讲“今古”。初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认为今文学崇奉的《王制》和古文学尊崇的《周礼》可“同治中国”，分别周公和孔子的异同。这时虽平分今古，但已说“《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歆）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故，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1)]。已对古文经学的创始人刘歆表示不满，代表作是《今古学考》。

第二变讲“尊今抑古”。1884年，廖平以为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的伪品。自称：“当时分教尊经，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

究，析群言而定一尊，于是考究古文学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今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2) 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一时期，他尊奉孔子之“圣”，攻击刘歆之“篡”，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所本。

第三变讲“小大”。1898年说什么《周礼》是皇帝书，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代表作是《地球新义》、《王制集说》和《皇帝疆域图》。

第四变讲“天人”。1902年，廖平以《尚书》为“人学”，而《诗》、《易》则“遨游六合以外”，是《天学》。他把过去写的《诗》、《易》旧稿加以改正，专门讲天人之说的演进。代表作是《孔经哲学发微》。

戊戌政变后，因康有为援引今文经说，推演变法维新，受到廖平启发，于是廖平被劾为“离经叛道”、“逞臆说经”，被革职。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又以廖平讲左丘明实无其事，《春秋》三传都出于子夏，说是“穿凿附会”，命四川各学堂不得再延廖平讲学。1911年，辛亥革命起。次年，刘师培任四川国学馆长，聘廖讲经学。1913年廖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为四川代表，1914年，任四川国学学校（后改为公立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后兼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至1922年辞退。

民国以后，廖平的学说又有改变，先把“小大”融合在“天人”之内，讲“人学、天学”（第五变，1918年），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各有领域，《礼》、《春秋》、《尚书》三经为“人学”，以《周礼》、《王制》为之传；《易》、《诗》、《乐》三经为“天学”，以《灵素》、《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为之传，“各有

皇帝、五伯四等”。后来又想再变一下，但越变越离奇，终于没有变出来。

1932年6月5日，廖平由四川嘉定返里，途中病逝。廖平著书甚多，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

---

(1) 廖平：《今古学考》卷下，四川存古书局1923年重印版，第9页。

(2) 廖平：《经学四变记·二变记》，四川存古书局1923年重印版。

廖耀湘

杨焜

廖耀湘，别号建楚。湖南邵阳北乡酿溪镇（今新邵县县城）人。1906年5月16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务农，祖父廖光宦是名秀才，在乡教私塾。廖耀湘从小随祖父读书，1918年春考入县立高小，1920年冬毕业。1921年春又考入长沙私立岳云中学。由于受到广东革命浪潮的影响，1925年暑假前，与同学数人相约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未筹足旅费，未能成行。他无心再读书，到湖南陆军第三师叶开鑫部第三旅教导总队当学兵，训练期满，在该部任班长。1926年1月，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赵恒惕，拥赵的第三师败走湖北。5月，第三师回长沙，廖耀湘不愿再参与军阀混战，潜回家乡。7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不久，升为学生队班长，后编入骑兵队。

1928年廖耀湘在军校毕业。次年投考留学生预备班。1930年以上士军衔公费送法国留学。他为了学好法语，要求先进法国小学，与法国学生们在一起学习了三年，然后再入法国军校，学习机械化骑兵。1936年毕业，成绩优良。同年回国，在南京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骑兵连任少校连长。1937年，升旅部中校主任参谋。是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廖辗转前往武汉。其时南京政府迁至武汉，成立了一个军官训练总队，训练收容失散的中级军官，廖被任命为该军官总队上校大队长。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机械化师（番号二〇〇师），师长是杜聿明。该师需要一个学过机械化的人员任参谋长，军政部长何应钦遍查留学生学历，只有廖耀相学过机械化骑兵，于是便任命廖为该师的少将参谋长。廖在任参谋长期间，帮助杜聿明教育

训练部队，成绩卓著，得到杜的信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酝酿军事同盟，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为准备派军队入缅印作战，编组了一些新的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廖耀湘则升任该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全军被派担任赴缅作战任务，由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1942年3月，中国军队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个军组成远征军出发到缅甸，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继由罗卓英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

廖耀湘部入缅甸后，先后参加了同古、斯瓦等战斗。同古战斗中，我军二〇〇师遭敌五十五师团猛攻，激战数日，二〇〇师有被围歼的危险。廖受命指挥新二十二师解围，终于协助二〇〇师安全撤出。

斯瓦战斗中，新二十二师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集中。“我新二十二师以一师的兵力，自3月26日与敌接触以来，至4月16日，共与敌战斗二十一日之久，我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优势之敌（先后五个联队）连续激战达十二日，不但达成掩护主力集中的任务，而且消耗打击敌人，并引敌深入于我有利的决战地区。”(1)

1942年4月，日军分三路进攻盟军，进逼腊戍，英军撤往印度，中国远征军亦于下旬开始仓促撤退。新二十二师由曼德勒西北转达罗到新背阳，后又奉令改道入印度。7月底，到达印度利多。退却时正逢雨季，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森林蔽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加之森林地潮湿，雾气弥漫，蚊叮虫咬，各种疾病蔓延，官兵死亡累累，惨不忍睹。

8月初，新二十二师到达印度的迪布鲁加尔，此时，史迪威在兰姆珈设立训练中心，对撤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进行整训。新二十二师

参加整训后，并接受美械装备。

1943年10月底，新二十二师奉命参加对缅甸的反攻战。在胡康河谷战斗中，与敌十八师团的五十五和一一四联队接触，廖耀湘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全歼敌一个加强营，揭开打回缅北胜利的开端。新二十二师又与新三十八师配合向敌进攻，自1943年10月底至1944年3月底，南进一百五十余公里，予敌以沉重打击，缴获大炮十五门，步枪七百余支及其他装备弹药等。

在孟拱河谷战斗中，敌以一一四联队的主力和新增援的五十六师团一四六联队的全部布置在孟拱河谷，企图凭藉有利地势逐次抵抗，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经过15天的激战，陆续攻克敌阵地。杀伤敌军四五千人，俘敌大尉以下官兵八十九名，缴获各种火炮三十门，步枪数百支，汽车二百余辆。

1944年8月，在缅甸战役中，中国驻印军同新从国内空运来的部队编为新一军与新六军两个军。新一军军长为孙立人，辖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五十师三个师，新六军军长为廖耀湘，辖十四师、新二十二师两个师。

同年11月，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进窥贵阳，蒋介石急将新六军由缅甸战场空运到云南，不久再运到湖南芷江，作为战略预备队。该部在湖南黔阳地区曾与侵入湘西南的日军进行过几次不大的战斗。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新六军由湖南芷江空运到上海待命。

1945年9月，蒋介石任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令其抢占东北。10月，又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梁华盛、郑洞国为副长官，率两个军开进东北，向解放区进犯。1946年1月，新六军等五个军先后被运往东北增援。廖耀湘依仗新六军是美械装备，兵精、火力强，趾高气扬，看不起解放军的力量。2月中旬，先期到东北的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到达磐石后，在沙岭遭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当时称东北民主

联军）五个旅的猛攻，激战三日，受到严重打击。该军第十四师与第二师进攻本溪，也为解放军击败。经过这两次较量，他才不敢轻视解放军了。

1946年4月28日，蒋军分南北两路向本溪进攻。新六军为南路军，与北路军配合，经过六天的激战，于5月3日占领本溪。接着又分右、中、左三路进攻四平。廖耀湘军为右翼，于5月17、18两日先后占领叶赫站、塔子山迂回四平东北，企图封死解放军的退路。解放军依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在大量歼敌之后，于5月18日主动撤出四平。廖军得以于5月下旬逐次占领公主岭、长春、永吉、小丰满、桦甸等地。

6月，全面内战爆发。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了交通线和一些城市，集中主要力量歼灭可以歼灭的敌人。自是年冬季以后，蒋军处处挨打，不少部队被包围歼灭。新六军是蒋军中的一支王牌部队，为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哪里危急，就往哪里调用，在南北满两个战场疲于奔命，廖耀湘弄得手忙脚乱。

1947年8月初，蒋介石为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东北行辕，以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罗卓英、郑洞国为副主任。陈诚想打通北宁路，结果进击北宁路的一〇五师被消灭。陈诚感到兵力不足，除请求从各处抽调部队增援外，积极收编地方部队，大肆扩军。他将新三军、新六军编为第九兵团，以廖耀湘为兵团司令。又调来新一军、四十九军和新编的新五军等为机动部队，准备与解放军进行决战。

10月，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接着又发动冬季攻势，前后共歼灭蒋军六七万人。1948年1月，蒋军新五军在公主屯被歼，接着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和二十六师亦先后被歼。解放区不断扩大。陈诚在东北焦头烂额，无法再干下去，借病辞职。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

卫立煌到东北后，解放军冬季攻势尚在继续进行，陆续解放了沈阳外围一些城市。至1948年3月，东北全境的蒋军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其主力位于沈阳地区，廖耀湘兵团也龟缩在沈阳。蒋介石采纳美国顾问团建议，拟放弃沈阳，将主力撤往锦州。卫与廖坚决不同意，卫怕部队在撤离途中被歼，要求先由关内派出援军到锦州配合打通北宁路，然后再撤出。廖提出四点理由，反对放弃沈阳：一、沈阳有兵工厂，每月可制造装备一个师的武器和弹药，抚顺有煤，本溪有钢铁，可以长期固守。二、沈阳至锦州间，有三条横断的大河流，没有公路桥梁，机械化部队运动困难，容易被阻击。三、将沈阳地区让给解放军，如虎添翼，解放军经整补入关，华北和华中都将不保。四、放弃沈阳，置长春守军于不顾，于心不忍。于是卫派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及廖耀湘到南京见蒋，陈述意见。蒋仍坚持认为沈阳部队多，光靠空运补给，是自取灭亡；但表示派援军打通北宁路问题，可以考虑。蒋只同意沈阳主力撤退可稍推迟一些时日，指示卫、廖仍要做好将主力部队撤出的准备。蒋又指示将沈阳部队重新编组：以周福成的五十三军及二〇七师为防守兵团，担任防守沈阳的任务；其余各军组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卫立煌还是坚持要求与关内援军合力打通北宁路后撤出沈阳。廖耀湘则对于如果援军迟迟不来，解放军向沈阳发动攻势时，如何行动，有所考虑。他向卫建议，将沈阳主力秘密集中辽中及其以南地区，伺机袭营口，既可以进攻，又便于从水陆两路撤出；并建议将市区的机关、学校尽量疏散，以免像长春一样，造成被围后粮食极端困难的局面。但卫怕主力一出，沈阳不保，同时自己失去掌握，迟疑不决。

10月初，东北解放军主力开始进攻锦州外围，准备围歼锦州守军，以关门打狗的形势全歼东北蒋军。蒋介石下令新一、新三、新六、四十九、七十一各军共十万人组成辽西兵团，以廖为兵团司令，由沈阳出辽西，与葫芦岛方面的国民党军配合，东西夹击，以解锦州之围；并指示辽西兵团要沿北宁线从沈阳、新民向锦州前进。

关于援锦路线，廖耀湘主张，最好经辽阳、营口、盘山、沟邦子到锦州，以避开右侧据守法库、彰武解放军的威胁；而且如援锦不成，还可经营口从海路撤退。卫立煌支持廖的意见；但蒋介石决心在沈阳主力撤退前与解放军进行一次决战，他单独召见廖耀湘，强迫执行沈阳主力出辽西的命令。

10月8日，辽西兵团开始在新民地区集中。12日开始，分成两个梯队向新立屯、黑山方向前进。新一军在右，七十一军在左，新三军在右侧；新六军、四十九军为第二梯队。行进中，果如廖所料，主力右侧时时受到法库、彰武方面解放军的袭击，他只好分兵向法库和彰武进攻。同时，正面的部队由于需要遇河架桥，行动非常迟缓。葫芦岛方面的国民党军，9日起向塔山猛攻，受到解放军阻击，激战三日，毫无进展。廖耀湘兵团占领彰武后，廖恐锦州不守，有意拖延，不肯贸然前进。尽管蒋介石心急如焚，亲坐沈阳督催，他还是迟迟不进。他私下对部属说："快了会更麻烦，不如等锦州解放了，我们就可以退回，岂不省事得多。"[(2)] 后来蒋介石严令迅速西进，廖不得已，只好在14日下令整个兵团渡新开河西进，15日占领新立屯，并到达黑山外围。同日，锦州解放。廖耀湘以为可以撤退了，蒋介石却仍要辽西兵团和葫芦岛国民党军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后经卫立煌、杜聿明向蒋介石请示，廖耀湘坚决要求，才决定先进攻黑山，如夹击锦州不成，允许辽西兵团向营口方向撤退。

在等待蒋介石最后决策时，廖耀湘以为无论向锦州前进或向营口撤退，都必须先进攻黑山。因之，黑山的进攻部署早已完成。21日拂晓开始进攻黑山，打了三天，毫无进展。廖判断黑山解放军已得到增援，长春（已于19日解放）方面的解放军，亦可能南下，他怕陷入解放军合围圈内，不等攻下黑山，便征得卫立煌的同意，于24日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不料，向营口撤退之路已被截断。26日，解放军的穿插部队袭击了廖兵团及各军指挥所，一时各指挥所联络中断。通往沈阳的公路也被截断。廖令各军、各师设法掌握部队，就地抵抗，然后

逐渐靠拢，待命行动。此时卫立煌来了电报，令迅速退回沈阳。

27日拂晓，兵团指挥所率新二十二师一个团向辽中方向撤退，到处是枪声，各行军纵队被截成数段，各级指挥所无法指挥。廖耀湘等行进至辽中地区开阔地时，混杂的官兵约千余人，已不成队列，拥挤一团，东面枪响，涌向西跑，西面枪响，涌向东跑。廖大声呼喊："大家不要跑，组织起来，保护我们冲出去，要官升官，要钱奖钱。"然而，兵败如山倒，他再三呼号，也无人理睬，官兵纷纷作鸟兽散。至28日拂晓，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余众，全部被歼灭。

廖耀湘化装潜逃，在黑山以西地区，被解放军抓获。被俘后由沈阳转送到哈尔滨解放团，后迁往抚顺，再迁黑龙江省绥化县，1961年被特赦释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曾撰写过一些文史资料及对台宣传稿件。

1968年12月2日，廖耀湘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

---

(1)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页。

(2) 廖和作者的谈话。

廖仲恺

尚明轩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笔名屠富、渊实等。原籍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鸭仔步村。他是我国民主革命中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其父亲廖竹宾是归善客家人，早年赴美国，当华工，后来成为商人，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清光绪三年三月初十）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至1893年十六岁时，父亲病故，陪同母亲回到祖国。

廖仲恺回国后，原准备应科举考试，入家乡私塾，从梁缉嘏研读经史策论。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展开，他受到影响，遂放弃旧学，于1896年转赴香港，攻读英语，作为学习西方以救中国的手段。

1897年1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年秋，廖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廖仲恺在东京期间，结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孙中山从越南到达日本东京，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往中山寓所访问，聆听孙中山革命言论，极为钦佩，从此萌生了革命信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

1904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天津联络革命志士，筹设机关，进行秘密活动。1905年9月1日，经何香凝介绍，廖加入中国同

盟会，担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为配合宣传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学说，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他以“屠富”的笔名，翻译了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的部分译文。同年，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8至1909年初，受孙中山指派，先后潜回天津及吉林，从事发展革命势力的活动。

1909年夏，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返回广州。这时，他想借取得清政府功名的办法，“入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之工作”，便于同年偕同友人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之后，被清廷派赴东北，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翻译，并帮助边务督办大臣办理吉林省延吉地区归回祖国的交涉事宜。

1911年武昌首义后，廖仲恺脱离清幕僚身份，回到革命阵营。他返回广东，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不久，被南方革命政府派为南北议和会议的代表。在1911至1912年间，廖仲恺和他的哥哥廖凤书（恩焘，任清政府的外交官）都参与了南北议和，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袁世凯派。兄弟二人立场不同，双方对峙，谈判中形成鲜明的对照。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在上海车站暗杀宋教仁后，廖仲恺离广东去北京运动议员反袁，险些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同年，“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成，廖仲恺被任为党的财政部副部长。1916年4月，随孙中山回国。此后，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致力于筹措革命经费和组织革命力量的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8年夏，第一次“护法”失败，廖仲恺随孙中山离广州到上海。1919年8月，他和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此后两年内，他除把《进步与贫乏》继续译完外，又译了威尔科克斯（Delos F．Wilcox）的

《全民政治》，另外还发表了一些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政论文章。

廖仲恺在这时期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族主义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是民权与民生了，因此，他这期间的著述中主要是阐述民权、民生两主义。

在传播“民权主义”方面，他介绍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在他看来，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混乱现象，根源在于“国家权力失了他原本的位置”，“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全民政治”——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他认为，三大民权是欧美“政治上之防腐剂”，而中国“国民有了这三种的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1)]。他翻译《全民政治》一书的目的，也在于此。

在宣传民生主义方面，他探讨了许多问题，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交通建设、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把交通不发达看作“中国民穷财尽最普遍的原因”，认为：“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他说：“在一般政治问题，无论横的主张、竖的主张，都可以模模糊糊混得过去。但是这交通改良无论什么政治家，无论那种政论家，要是对于国家人民还有点诚心，替他们打算打算，是断不能抹煞的。”[(2)] 另外，他还研讨了货币改革、合作化运动等与民生问题的关系。

从上看出廖仲恺在此期间，尽管试图从各方面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但还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廖仲恺在接受历次革命失败深刻教训的同时，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逐渐看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最后终于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希望：“俄国革命以后，私有

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3]

1921年，孙中山回粤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廖仲恺担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囚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六十多天。经何香凝等营救，于8月19日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会合，重新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1922年秋至1923年春，在《孙文越飞宣言》签订过程中，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到日本东京与苏联代表继续会谈。通过这些会谈——特别是最后在日本温泉地伊豆山海岸“热海饭店”进行的会谈，是廖仲恺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他和越飞“住在一块，天天讨论，非常契合”，他在每次谈判后，“都是满面笑容，表示出很得意的样子”。正是通过同苏俄代表的相处恳谈，他接触到了不少革命知识，如对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和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的各项政策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开始明确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竭诚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主张。

1923年春，陈炯明败退后，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廖仲恺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这年10月，他受孙中山委托和李大钊等五人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从事改订党章等工作。同月下旬，按照孙中山要求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商讨改组问题。后又和许崇清等九人接受委派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着手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及制定召开代表大会议事纲要，分别召开党务会议，讨论筹备改组等问题。11月底，他奉命到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组织成立了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工作。

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经廖仲恺的积极筹划，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于1923年年底完成。1924

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廖仲恺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指出："以前本党之一再失败，而国家之乱源不能廓清，其故即在于认识目标之不清。现在我们已有了宣言，目标算是已定。"[(4)] "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实行打倒一切军阀官僚，铲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前进之标准，努力前进！"[(5)]

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政党。党内右派分子如冯自由、张继等公开反对孙中山改组的主张，抗拒三大政策，并使用一切手法进行阻挠和破坏。廖仲恺站在孙中山一边，同右派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毫不妥协和动摇，他宣称："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6)] 他针对以"稳健"自称的国民党右派说"实在他们口中的稳健派就是反革命派"。并指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7)]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除继续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国民党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迅速地成长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服膺到底，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

廖仲恺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认为全世界只有俄国解决了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他歌颂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他亲切地接待苏俄派来帮助中国革命工作的友人，诚恳地和他们共事，使苏俄友人们也都把廖仲恺视为"志同道合"的知己。

他又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排除了右派顽固势力的种种破坏，促成了这一政策的实行。他坚信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起死复生，成为“一个新生命”的重要因素。他明确指出：“要想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因此，他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军各单位中公开活动。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期间，凡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都虚心听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并且本着与共产党热诚合作的精神，把领导工会的事情都交给工人部秘书、中共党员冯菊坡处理。在黄埔军校任党代表时，他很敬佩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和周亲密地团结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问题，保持着真诚的合作关系。

他在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上，也是认真的。他认识到“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8)]。他以工人部长兼农民部长的身份，深入群众，积极地赞助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维护工农利益。1924年3月，他主持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广东工人国民党党员大会，作了鼓励推进工人运动的演说。5月，又主持了广东各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广州全市工人代表会开幕式。7月，他赞助广州工人团体筹组工团军的工作，于8月下旬开始训练第一期工团军。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中，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他为几十万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四处奔走，封闭烟、赌馆作为工人住所，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并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支援罢工工人。他也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因而主张：“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他曾经到中山、东海等县农村去访问农民，支持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告诉农民说：“如果农民想获得解放，必须同工人齐心合力奋斗。”

廖仲恺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从他的世界观与思想体

系上说，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自然是有差别的。但他是真实的革命者，其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前进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地肩负起孙中山未竟事业的责任，忠实地执行其遗言，更积极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斗争。是年3月，他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争，在东江前线上亲自鼓舞将士奋勇杀敌。6月，又参加了镇压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给了反革命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讲述廖仲恺当时的活动情况说："我们又亲目看见：为了东江战争，每天作十几点钟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杨刘作战的时候，晚上二时以后，单独一个人还要由黄埔回到广州去办事。"[9] 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赞扬廖仲恺为革命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曾感叹地说，像"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

正由于廖仲恺不屈不挠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战斗，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其极端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就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国民党右派所指使的暴徒的暗杀，为民主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廖仲恺牺牲后，遗体于同年9月1日安葬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左侧，1935年9月1日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他的著译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

(1) 廖仲恺：《三大民权》，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页。

(2) 《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廖仲恺集》，第28、29页。

(3) 《消费合作社概论》，《廖仲恺集》第258页。

(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事录》，广州大会秘书处1924年印本，第16页。

(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事录》，第44页。

(6) 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陈二公大会演说词》，《廖仲恺先生纪念册》，1927年版，第17页。

(7) 黄埔军校编：《革命军》第8期，1925年9月20日版。

(8)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廖仲恺集》，第243—244页。

(9) 《悼党代表告我党同志》，黄埔军校编《革命军》1925年第8期。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四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四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L

林白水　钟碧容
林柏生　黄美真　张云
林葆怿　刘传标
林虎　李微
林建章　陈贞寿　刘传标
林觉民　范启龙
林康侯　汪仁泽
林可胜　陈民
林砺儒　郭烙
林森　娄献阁
林述庆　王学庄
林文　闻少华
林文庆　陈民
林义顺　陈民
林纾　闻少华
林语堂　张梁
林长民　萧良
凌鸿勋　娄献阁
刘柏森　朱复康
刘半农　娄献阁
刘成勋　魏煜焜
刘存厚　邵桂花
刘道一　李静之
刘复基　周学舜
刘公　朱信泉

刘冠三　郭天佑
刘冠雄　陈贞寿　刘传标
刘桂棠　刘述和
刘国钧　史全生
刘海楼　邢汉三
刘海粟　陈祖恩
刘航琛　伍志安
刘鸿生　熊尚厚
刘积学　朱信泉
刘纪文　许小青
刘建绪　谌震
刘静庵　李乾三
刘开渠　王晓琄
刘揆一　李静之
刘芦隐　贺渊
刘茂恩　郭熙生　宋岑
刘师培　万仕国
刘天华　严如平
刘王立明　李援朝
刘文典　张文勋
刘文辉　黄道炫
刘仙洲　黄延复
刘显潜　熊宗仁
刘显世　李德芳
刘湘　黄道炫
刘湛恩　陈敏
刘镇华　林炯如
刘震寰　韦瑞霖
刘峙　颜平
刘子敬　徐凯希

柳亚子　张明观　殷安如
龙济光　吴显明
龙鸣剑　曾绍敏
龙云　邵献书
卢汉　邵献书
卢兴邦　陈孝华
卢永祥　朱杰仁
卢作孚　周凝华
鲁涤平　颜平
鲁迅　陈漱渝
陆伯鸿　熊尚厚
陆费逵　熊尚厚
陆皓东　江绍贞
陆建章　邵桂花
陆荣廷　李宗一
陆徵祥　郑则民
陆宗舆　郑则民
鹿钟麟　程舒伟　刘信君
栾贵田　邵桂花
罗常培　白吉庵
罗福星　林其泉
罗家伦　宗志文
罗君强　黄美真　张云
罗隆基　何碧辉
罗纶　周茂江
罗佩金　李希泌
罗文幹　邵桂花
罗振玉　耿云志
罗卓英　沈荆唐
吕超　马宣伟

吕公望　魏桥
吕思勉　汤志钧
吕彦直　王家鼎
吕志伊　叶祖荫

M

马步芳　王劲
马超俊　熊尚厚
马福祥　马启成
马福益　陈匡时
马衡　汪仁泽
马鸿宾　马启成
马鸿逵　王劲
马济　李微
马君武　曾诚
马麒　魏明章
马叙伦　宗志文
马师曾　张洁
马相伯　娄献阁
马星野　熊尚厚
马寅初　汪仁泽
马应彪　熊尚厚
马约翰　王维屏　黄延复
马占山　陈宁生
马宗汉　史月廷
毛健吾　王淮水
毛人凤　马振犊
茅盾　林印
茅以升　刘秋阳
梅兰芳　林印
梅思平　朱佩禧

梅贻琦　黄延复
孟恩远　张学继
孟目的　寿祝衡
苗杏村　王家鼎
缪培南　边篆
缪云台　熊尚厚
莫荣新　李伟中
莫觞清　蔡声白　张守愚
穆藕初　陈正书

返回总目录

林白水

钟碧容

林白水，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学者，中年自号白水。福建闽侯人。生于1874年1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祖先在贵州为吏，父剑泉是纨绔子弟。林白水少年从母读十三经及古诗文，十四岁随从舅家私塾读书，爱好古文，擅长写作，惟不屑于科举功名。他受塾师高啸桐及其友人影响，向往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恨清廷腐败，力求改革。

林白水二十岁时离开福建到杭州，在林伯颖家教家馆。同时阅读新书，博览报刊，眼界更加开阔。1898年，杭州知府林迪臣创办蚕桑学堂，聘林白水执教。知府幕府的知名之士，有林纾、高啸桐、高梦旦兄弟等，常与林白水交往，他们都很尊重他。林年假回闽，与表兄黄翼云、表弟黄展云创办福州蒙学堂，后又返回杭州。1901年林白水任求是书院总教席，经常夜间召集学生一二十人，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进行革命宣传。

同年6月，林白水在《杭州白话报》任主笔，撰写《论看报的好处》为发刊词，署名“宣樊子”。他说：“现在各省是什么风气，有了报看，自然一目了然”，“农工商三等的人，能多看报，都有好处”[(1)]。他倡导用白话文写社论和中外新闻，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使大家都看得明白。他在报上撰文，鼓吹民族主义，提倡办学校、立报社。这年冬天，林白水到了上海。1902年春，与蔡元培、蒋观云等成立中国教育会，以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为己任，并推动各地兴办教育。11月，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退学风潮，林与蔡元培、吴敬恒、黄宗仰等人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集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爱国青年于一堂；并出版《学生世界》杂志，鼓吹反清革命。

1903年初，林白水东渡日本。不久，俄国胁迫清政府允其独占东北。留日学生大愤，五百余人集合商讨应付方法，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公举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2]。5月2日，义勇队定名为学生军，分甲、乙、丙三区队，每区队分为四个分队，林白水任丙二分队队长。不久，拒俄义勇队被迫解散，他们随即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3]为宗旨，进行革命活动。林白水为会员，曾捐款。后因清使馆出面干涉，林白水愤而返国。

同年12月，林白水与蔡元培、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反对帝俄侵略中国东北，宣传俄国虚无主义。翌年改为《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林白水又创办《中国白话报》，对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白话报》分论说、历史、传记、实业、教育、新闻、小说等栏，以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为宗旨，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并鼓吹暗杀。林以“白话道人”署名，发表《论刺客的教育》一文，说可以把暗杀作为革命的过渡手段。1904年11月，上海发生万福华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案件，万被逮捕。林白水、蔡元培、刘师培等奔走营救，延请律师为万福华出庭辩护。林白水因此受清政府注视，离沪返闽。不久，他自费再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兼习新闻。

1905年12月，应清政府要求，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强烈抗议，八千人实行总罢课，二百余人离日回国。林白水也返回福建，与表弟黄展云共同编写《高等小学修身课本》八册。后来他去上海，以译著投稿度日。1908年翻译出版了《日本明治教育史》。

辛亥武昌起义后，11月9日福建独立，设军政府。林白水回闽，任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并任共和党福建支部长。1913年初，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林到北京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宣布停止

参、众两院议员职务，一律资遣回籍。林白水奉命回闽，帮办军务善后。不久，因与督办意见不合，辞职入京。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林白水的友人刘师培是“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公开鼓吹帝制。另几位朋友薛大可、梁鸿志等亦为帝制活动积极奔走。林白水受他们的影响，也随声附和，撰表劝进，成为帝制派。10月，林白水被袁世凯委任为参政院参政。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死去。8月，国会复会。林白水辞去议席，从事新闻工作。9月1日，与王士澄、黄秋岳、梁鸿志等创办《公言报》，充当安福系的言论机关，鼓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林任主笔。

1919年2月，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开幕的当天，林白水主持的《平和日刊》在上海创刊。该报代表北京政府，紧密配合会议的进行，积极鼓吹“和平”。当时有人评论林白水：“昔日白水，极力主张武力解决”，“今则一变而主张和平……朝三暮四，覆雨翻云，志在觅食耳”[(4)]。由于北京政府并无诚意，5月和平会议宣告破裂。林主办的《平和日刊》也就成了昙花一现的刊物。他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仍主持《公言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一败涂地，段祺瑞被迫下野。《公言报》于21日发表紧要启事，借口印刷机器损坏，暂行停刊，其实是“合肥败，公言报亦为战胜者所毁”[(5)]。

1921年春，林白水在财政总长周自齐的支持下，与胡政之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报》，林任社长，胡为总编辑。该报宣称愿“树改造报业之风声，作革新社会之前马”[(6)]。翌年2月10日，《新社会报》因刊登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及盐余公债黑幕等消息，被北京政府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5月1日复刊，改为《社会日报》。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撰文攻击议员受贿，报馆又遭封闭，林被禁三月余。待曹锟坐稳了总统宝座以后，始准《社会日报》继续出版。

《社会日报》的要闻、时评都是林白水撰述，每隔一日必有署名“白水”的文章。他写作的范围很广，文章“尖刻突兀，易于动人”，“喜议论个人长短，甚或揭人隐事”[7]，“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8]。他特别注意刊登社会新闻，该报的许多内容，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谈话资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林白水在《社会日报》连续发表《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林白水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在《社会日报》发表特别启事，拒绝刊登英、日两国的广告。

同年夏，林白水为《社会日报》增印副刊《生春红》，自称“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9]，“专以提倡风雅，导扬文化，发挥艺术为宗旨”[10]。副刊分有社会新评、人物月旦、都市新闻、近代艺文、金石见闻、白水读书日札等十二门类，每三日发行一小张，每刊必登《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希望社会人士资助。

1926年4月初，奉鲁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15日，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林白水对国民军寄予深切同情，在报道中赞扬国民军“秩序井井”、“态度从容”，几个钟头之内全行撤退，北京全城未受惊扰。这个报道遭到奉直军阀的忌恨，成了他们日后杀害林白水的“罪证”。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宣布下台。4月21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略述他与安福系的始末，宣布与段祺瑞决裂。此时，林白水对军阀的反动本质已有初步认识。他在《社会日报》撰文说：“军阀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11]还说，凡有天良的记者，应该替老百姓说话，哪有去献媚军阀的道理。在《代小百姓哀告》一文中，他指责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讨赤”为名，行向革命

人民进攻之实。他说："时至今日，若犹以讨赤为言，兵连祸结，则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12] 他抨击奉直军阀的倒行逆施，言语激烈，毫无顾忌。有的亲友劝告他，不要以言论招祸。他回答说："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为文字贾祸，也很值得。"[13]

奉鲁军阀张宗昌等人进入北京后，疯狂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钳制舆论，封闭报社，"立言稍不悯其意者，必扑杀之而后快"[14]。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下，新闻界人人自危，林白水没有惧怕，他用犀利的笔锋，揭露奉鲁军阀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罪行。

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讽刺一心想当财政总长的潘复和张宗昌。潘、张原是赌场中的朋友，由于潘复的介绍，张宗昌投奔了张作霖，从此才飞黄腾达起来。林白水在文中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喻为"肾囊之于睾丸"。潘复恼羞成怒，恨之入骨，要求张宗昌把林白水处死。

6日凌晨一时许，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带副官、弁兵数人，去《社会日报》社找林白水，诡称张邀请叙谈，由副官挟林上了汽车，直接开往宪兵第二营，并立即审讯，以"通敌有证"之罪名判处死刑。林挥笔遗书："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必佑我家也。"[15] 清晨四时许，林白水在北京天桥被杀害。

---

(1) 《杭州白话报》第1册，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

(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04页。

(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1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页。

(5) 《社会日报》1924年5月6日。

(6) 《新社会报》1921年3月1日。

(7) 《民国日报》1926年8月8日。

(8)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第98页。

(9) 《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1925年7月3日。

(10) 《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1925年7月12日。

(11) 《社会日报》1926年4月26日。

(12) 《社会日报》1926年5月17日。

(13) 《社会日报》1925年12月20日。

(14) 《民国日报》1926年8月10日。

(15) 《民国日报》1926年8月11日。

林柏生

黄美真　张云

林柏生，号石泉，广东信宜县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课余向一美国神甫学习英语。1920年赴广州，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

1923年初，林柏生在岭南大学因参加罢课活动，被学校开除。旋执教于广州执信中学。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次年7月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林由执信中学校长曾醒引荐，任汪精卫秘书。从此，他长期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亲信。

1925年10月，林柏生由汪精卫保荐，偕其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与陈春圃同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学员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联络人。1926年9月，林柏生离苏返穗，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

1927年12月，汪精卫因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被迫宣布“引退”去法国，林柏生随同前往。在旅法期间，林创办《留欧通讯》（后改称《欧美通讯》），这是他编办刊物之始。其时，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打出维护国民党“法统”的旗号，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林柏生于1928年5月在一封信中提出应当使国民党“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即非代表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1)]，深得汪精卫的赞赏，说这是“反共以后清厘本党理论的一篇重要文字”[(2)]。同年底，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所属之两大机关报——旧金山《美洲民国日报》与纽约《民气报》要求派人指导宣传，林柏生即衔汪精卫之命前往，在美洲华侨中宣传汪的政治主张。1929年冬，林柏

生奉汪精卫之命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又创办《南华日报》，林亲任社长，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的反蒋活动大造舆论，扩大其政治影响。

1932年1月，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拨款20万元交林柏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由于汪精卫的提携，1933年林柏生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华日报》被迫停刊。林柏生带了报社主要成员到香港，除主持《南华日报》外，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1938年2月，国民党内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艺文研究会”，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林柏生即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国际编译社”和一个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叛国降日的“艳电”，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林将电文在12月29日《南华日报》上刊出。接着，《南华日报》又连篇累牍发表社论，为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谬论张目，说“历史上无不和之战，否则双方须有一方灭亡”，汪之“艳电”是出于“爱护国家之苦心”[(3)]，是为中国“打出一条光明而充满希望之生路”[(4)]。林由于积极参加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活动，被汪指定为汪伪集团八个“首义”分子之一。

1939年5月9日，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开展所谓“和平运动”。不久，林柏生也带了《南华日报》、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的朱朴之、古咏今、胡兰成等一帮人到上海，为汪精卫摇旗呐喊。8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9月10日，上海《中华日报》复刊，林柏生仍任社长，并派穆时英出版《民族日报》、古咏今出版《国际晚报》，共同为汪精卫筹建伪中央政权制造舆论。然而，《中华日报》等一出版，立即为抗日民众所识破，报贩拒绝售卖，人们将这类报纸撕成碎片。连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也不得不哀叹：《中华日报》在市场上“陷入不能销售的境地”[(5)]。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拼凑伪中央政府班底，林任政治委员会委员。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林当上了伪行政院宣传部长。

林柏生上任后，接管了沦陷区文化宣传机构，先后成立了伪中央电讯社、“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局”等机构，钳制沦陷区舆论，鼓吹“抗战没有把握，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6)]，应“强化中日和平轴心”[(7)]，“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8)]，等等。林还创办“宣传干部讲习所”，诱骗青年学生受训。

1941年初，汪伪决定对其统治地区进行所谓政治、军事、思想三位一体的“清乡”运动，林柏生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随着“清乡”向苏、浙、皖等省展开，“清乡”宣传活动也逐步加紧。在林主持下，伪宣传部特设“清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采用流动剧团、电影队、书报流通队、歌咏队等组织形式向“清乡”地区民众进行欺骗宣传，“告以清乡必定成功”[(9)]。他曾多次到“清乡”地区“视察”，鼓吹强化汪伪政权是“现阶段和平运动的中心任务”，扬言要把“清乡”运动扩展到汪伪“力所能及的每一寸土地”[(10)]。

同年冬，汪伪发动了一个所谓“新国民运动”，颁布《新国民运动纲要》，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林柏生任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他向汪精卫献策：“新国民运动”应从青少年入手，然后推广到社会上去。在汪精卫支持下，林先后成立“模范青少年干部学校”，组织“青少年团”，举办“青少年集训营”，自任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汪精卫）、“青少年团”总监、集训营营长，把争夺和毒害青少年作为一个重要目标。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对英、美的《宣战布告》，并决定设最高国防会议，林柏生任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同年11月，林控制的伪宣传部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自此以后，林以广播、报刊、电影、戏剧等做工具，鼓吹在“大东亚战争”时期要加强“反共”、“反蒋”和“反

英美”的思想决战，“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11]，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12]。

林柏生是汪伪集团中以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的中坚人物，他凭借汪精卫夫妇的信任，极力在汪伪集团内部扩展自己的势力，特别想插手特工工作。他先是拉拢原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伪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办了一个“东方通讯社”，由苏任社长。该社表面上是一个新闻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特务机关。不久，林又勾结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黄自强，秘密组织一个“政治工作局”，以苏成德为局长，下设情报、组织、训练、侦查、行动各股，并设有看守所，与李士群为首的伪特工总部分庭抗礼。“政治工作局”以宣传、情报工作名义出现，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反共”。它假造共产党的《新路东报》，散发于苏北解放区；又编写《关于第三国际之解散》、《苏北黄桥事变》、《山子头事件》等十几种小册子，分发给汪伪政府各级军政伪官及各地党部，“以增加反共情绪”[13]。

1944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汪精卫又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南京伪政权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大小汉奸纷纷准备后路。林柏生于1945年1月辞去伪宣传部长之职，带了一批亲信出任伪安徽省长，兼任伪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企图占据一个实力地盘，待价而沽。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林柏生于19日发表《告全省父老书》，诡称“六年以来，吾人所含辛茹苦效命是间者，其本愿在真正永久之和平”，并令“全省军警保安队及公务人员，务必严守纪律，尽忠职务，确保防地，候命交替”[14]，欲向国民政府献殷勤。但是到了24日，林还是随陈公博等同机逃往日本，躲藏于京都金阁寺，妄图逃避历史的惩罚。这时，全国人民掀起了惩办汉奸的怒潮，林柏生于10月13日被解送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犯罪行为，判处林柏生死刑，同年10月8日处决。

(1) 《林柏生先生致汪精卫先生函》，《汪精卫文集》卷2。

(2) 《汪精卫先生复林柏生先生函》，《汪精卫文集》卷2。

(3) 《南华日报》社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南华日报》1939年1日3日。

(4) 《南华日报》社论《我们的立场》，《南华日报》1939年1月5日。

(5) [日]野村：《在上海的汪精卫一派的活动》，《日中战争（5）》（《现代史资料》13），第246页。

(6) 《林柏生谈话》，《中华日报》1941年7月21日。

(7) 林柏生：《对重庆广播》，《中华日报》1941年6月21日。

(8) 林柏生：《对日广播讲话》，《中华日报》1941年6月15日。

(9)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工作报告》1941年10月11日。

(10) 林柏生：《扫除复兴建设的障碍》，《中华日报》1941年10月11日。

(11) 《中华日报》1944年1月9日。

(12) 《中华日报》1943年11月23日。

(13) 苏成德：《自白书》（1945年9月）。

(14) 《中华日报》1945年8月19日。

林葆怿

刘传标

林葆怿，字悦卿，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63年（清同治二年）生。族叔林绍年是清末御史，曾上疏谏慈禧太后不要移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受“严行申饬”。1886年8月，林葆怿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第九届驾驶班，奉派威远舰见习。此后供职于北洋水师，历任二副、帮带、大副等职。

1894年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爆发，林葆怿随北洋舰队参战。1898年，清政府重建北洋海军，林奉召北上，旋奉派赴英国接驾海容等舰回国，充任海容舰大副。1910年3月被授海军副参领，升任海容号管带。同年12月，林调任新成立的海军部军法司司长，授海军正参领。翌年春奉派赴英任驻阿摩士庄船厂肇和舰监造官。

中华民国成立后，林葆怿于1912年9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海军部参事，12月授海军少将。翌年7月林被委任为练习舰队司令，负责训练海军。同年11月任第一舰队司令。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中，曾奉命率海圻、应瑞、海琛、海容、肇和等舰协同北洋陆军参加“南京之役”，协攻狮子山炮台等地。随后又奉命率舰队到广东、福建、山东烟台等地配合地方当局维持统治。1914年5月，林晋升海军中将。

1916年6月，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拒不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林葆怿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毅然通电全国，宣告海军独立，拥护《临时约法》。林葆怿宣称将率第一舰队加入“护国军”。6月29日，北京政府在各方面压力下，宣布恢复约法，召开国会。7月15日，李鼎新、林葆怿等率海军北归，宣布取消独立。

1917年春，北京政府在酝酿对德、奥宣战事宜时，段祺瑞利用手

中实权向国会及总统黎元洪施压。林葆怿对于段祺瑞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随同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拥护护法运动。他于7月8日派应瑞舰首先护送孙中山等到汕头，再转由海琛舰护送到广州，揭开了护法运动序幕。7月21日，林葆怿与程璧光等在上海发表《海军护法宣言》，宣布海军讨逆三大目标："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拥护国会；三曰惩办祸首。"宣称："我海军将士，既以铁血构造共和，即以铁血拥护之。"表示"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这是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之第一声。他们督率海圻等七舰向南进发，宣告海军独立，8月5日各舰全部抵达黄埔。林葆怿等人的行动沉重打击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7月26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林葆怿第一舰队司令职。

8月6日，林葆怿等参加广东各界数万人的欢迎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坚决拥护约法，反对国会解散后的北京政府。他说，海军要当共和的中流砥柱，决不做独裁的帮凶，"有破坏大局者，海军惟有准备武力对待"。孙中山在会上高度评价了林葆怿等人的行动："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项背。此次文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已操制海权矣。"9月1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程璧光任护法军政府海军总长，林葆怿任海军总司令兼舰队司令，授海军中将加授上将衔。至此，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政府、南北两个海军部。

护法战争起，11月成立"讨闽军陆海联军"以抗击福建督军李厚基，林葆怿兼任征闽海军总司令，协同征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征闽桂军总司令林虎、征闽滇军总司令方声涛，兵分四路向福建进逼。11月7日，林葆怿派护法海军海圻等五舰由广州向潮汕进发。这时，盘踞在琼州的龙济光，为北京政府所收买，出任"两广巡阅使"，趁粤防空虚之际，派兵占领了雷州半岛及沿海数县。林葆怿奉命率部回师广州进驻琼州海峡，海圻舰于19日进驻北海，海琛舰、永丰舰进驻闸坡，楚豫舰进驻崖门，堵截了龙济光部队的运输线，使龙军首尾不能

相顾。讨龙海陆联军迅速捣毁了龙济光老巢，龙军溃败，护法根据地粤省暂获稳定。

1918年2月26日，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于海珠码头，林葆怿继任护法军政府海军总长。5月，唐继尧等利用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废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制，选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孙中山、唐继尧、林葆怿七人为政务总裁，组成政务会议行使军政府行政权。但军政府实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孙中山愤而离粤；林葆怿虽列名七总裁之一，并无实权。此后，林葆怿虽千方百计想维持海军“独立性”传统，但因军饷受制而被迫依附于桂系。

由于海军军饷常被拖欠，林葆怿等怨声迭起。桂系军阀为将海军挤出广东，竭力鼓动林葆怿向福建地方扩张，并推林为福建省督军，而此时福建大部分地区仍为北洋军阀控制。为筹措军费，林葆怿也热心于这个“督军”的虚位。他先派方声涛为帮办军务、孙葆容为福建督署特派员，到仙游筹划。但陈炯明等不予合作，海军孤掌难鸣，林葆怿无法去闽主政。1919年9月，林葆怿与莫荣新领衔西南全体将领联名发出了“军人不干政”的通电，使护法军政府徒有其名。

此时，在粤之海军内部矛盾加剧，非闽籍将士支持孙中山，而闽籍中下层将士则获桂系的实惠转而支持桂系。林葆怿眼看闽系海军有被西南军阀吞并的可能，为“保住闽系海军之根本”，乃与北京政府海军协商“统一”的步伐，决心再率海军北归。林葆怿先于1919年2月派其参谋长饶鸣銮为全权代表赴上海协商。7月，他亲自率永丰舰到东山澳与北京政府派来的练习舰队司令蒋拯等面议“统一”事宜。后因护法舰队海军中下层军官坚决反对北归而未果。

自从孙中山离广东后，广东七总裁军政府在桂系军阀把持下，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已成为护法运动的严重障碍。孙中山决定回粤驱赶桂系。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出征援闽之陈炯明部回师广东讨伐。时林葆怿因军饷受制于桂系，不得不奉命率领海军往诏安配合

桂军作战。由于粤军节节胜利，林葆怿“决定中立”，并积极奔走调停粤桂战争。为避免战火肆虐广州，林上下奔走筹措50万元巨款作为桂系莫荣新所部“开拔费”，并联合岑春煊、陆荣廷等以四总裁名义宣布撤除军政府。面对广东局势动荡，加以各舰年久失修，林葆怿寻求海军南北“统一”之心更炽。10月，林葆怿与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蓝建杞等再次协商南北海军统一，但仍遭到海军官佐的反对。迫于海军形势不稳，群情责难，林葆怿愤将余存的税款悉数发给官兵，发表了一份“拥护中央”（指北京政府）的个人声明后离粤北返。11月由上海回广州的孙中山重组军政府，以汤廷光为海军总长。

林葆怿离粤后，因手无兵权而长期闲居上海。1930年因病医治无效卒于寓所。

主要参考资料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杨志本等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海军大事记》，福建省政协未刊本。

高子厚：《护法军政府海军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严寿华等：《海军南下护法和夺舰事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1984年版。

林虎

李微

林虎，原名荫清，字隐青，广西陆川县人。1887年10月1日（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生于广西万冈县（今巴马瑶族自治县）。其父林寿裳，汉族，1875年以秀才去百色厅（今百色县）充当驻军黄统领的文案。母亲系万冈县的壮族女子。林寿裳和刘永福为友好，时刘永福在台湾领兵抗击日军侵略，林寿裳去台助刘抗敌。林虎母亲在万冈县久久得不到寿裳的信息，便挈子东下寻夫，在广州遇到了寿裳。这时寿裳已报捐了县丞，被指派去江西省候补，乃挈同林虎母子一同去江西省南昌候差。

林虎十五岁时，在南昌考取了江西武备学堂，与李烈钧、李思广等同班同学。林十七岁将在武备学堂毕业时，某日晚饭后和同学李思广等四人同去南昌东湖散步，路遇恶少四人在东湖桥上调戏妇女，林虎等为鸣不平，双方动武，恶少不敌，抱头鼠窜。恶少中有一人是候补知县，又是武备学堂监督陈伯文的亲戚，当夜去武备学堂告了林虎等人的状。第二天武备学堂监督问明情况后，竟认定李思广等四人在外滋事，开除学籍，林虎以成绩特优，从轻记大过两次，打手心三十，留堂察看。林虎以打架是由自己带头，而自己反得留校，于心不安，乃决定和李思广等人一同离校。

李思广的族侄和江西常备中军统领郭人漳熟识，乃向郭请求介绍工作。郭任李思广四人为营见习官。因郭人漳只有四个营，无法安排林虎，乃转介绍林虎去九江找江西常备前军统领岳凤梧，岳委林虎为第二营见习官，不久接任该营哨官。

1905年，郭人漳被广西巡抚李经羲调往广西，郭以林虎是广西

人，调林虎同去广西。郭人漳任亲军四营和健字两营统领，林虎则任亲军四营督操官。稍后，由郭人漳兼任新练军营长，以林虎为队官，负责训练，六个月后经检阅合格，改任林虎为营长。

1906年，黄兴到桂林发展同盟会组织，林虎、蔡锷、赵声、郭人漳等九人入盟成为会员。黄兴以林名“荫清”，与同盟会的宗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格格不入，便对林说：你有虎相，不如改名林虎；虎隐青山，就以“隐青”为字，既避免“荫清”的恶名，更符合你个人的实际情况，岂不更好。林接受建议，就以“林虎、字隐青“的名号入会，“荫清”之名从此不用。

1907年，林虎随郭人漳调到广东供职。这时广东钦州三那（那黎、那思、那彭）地区发生抗税斗争，广东总督张人骏命令郭人漳率领林虎、赵声所部去进剿或招抚。事平后，郭人漳被任命为钦州边防督办，林虎为钦州边防前路四营督带，驻扎在防城县属那良圩。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响应，宣布独立。黄兴在武昌电请广东迅速出兵援鄂，广东派林虎率领两个步兵营、两个机关枪连，由海路至长江换船直到南京。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任陆军部长。林虎到南京后，黄兴把自己从武汉带来的卫队与林虎带来的部队合并为陆军部警卫混成团，林虎任团长。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临时政府北迁，黄兴留守南京。驻南京的军队一部分发生哗变，林虎带来的部队平息了南京兵变之后，所部并入新成立的第八师，但遭到第八师领导人的歧视，不发给粮饷。这时李烈钧任江西省都督，接林虎及其部队到了江西，任林虎为江西陆军第一师旅长。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江西、安徽、江苏、广东、湖南五省都督酝酿独立，起兵讨袁。林虎率所部在南昌至九江间的南浔路布防，并表示不怕牺牲，愿意做向窃国大盗袁世凯打第一枪的人，对安徽等五省的宣布独立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7月11日，李烈钧到湖口就任江西讨袁军司

令，并任命林虎为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方声涛为江西讨袁军右翼司令。12日拂晓，林虎率领所部向进入九江布防在辰子岭的袁军李纯部发起攻击，“二次革命”起。李纯的兵力为一个师，林虎的兵力仅为三个团，而进攻的部队仅为三个营。双方相持十日，袁世凯派段芝贵率兵八营增援李纯部，段芝贵的全部兵力和李纯的一部分兵力转而进攻右翼军方声涛部，方部一个旅，寡不敌众，湖口、姑塘、吴城相继失守，段芝贵、李纯直入南昌，李烈钧出走。李出走前，密电林虎，说南昌不能守，决定出走湘赣边境，令林虎相机向南方撤退。在撤退途中，李纯派一名参谋和林虎的内弟陈颂阁追来，传达李意：要林虎保存这支军队，编为一个混成旅，保林虎为中将旅长，林虎严词拒绝，把部队带到萍乡遣散，自己则化装潜往日本。

1913年11月，林虎在东京谒见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时黄兴与孙中山在组党等问题上意见分歧，林虎从中调解无效。在日期间，林虎和李烈钧、柏文蔚、黄郛等创立法政学校，请日本法学博士寺尾亨任校长，使“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到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学习的地方。林虎等人还在大森办“浩然庐”，收容亡命日本的军官。

1914年欧战爆发，林虎和章士钊等组织“欧事研究会”。1915年，林虎和熊克武等去新加坡，宣传反袁，参加黄兴在新组织的反袁秘密机关。林赴新途中曾写信给旧桂系广西都督陆荣廷，请他注意袁世凯的动向。陆接信后派曾彦去新加坡和林虎联系。同年下半年，袁世凯帝制运动起，林虎应陈炯明邀，和一些朋友回到香港，意图运动广西、云南两省讨袁。先由方声涛发动云南讨袁，云南因顾虑广西袭击其后方，未敢贸然行动。于是林虎和钮永键两次分头进入广西，陆荣廷派马济和林虎等联系，马对林等说：广西赞成云南的讨袁行动，但要在适当的时候才能响应。林、钮回香港将其结果告知云南。恰逢李烈钧、蔡锷分头到香港，林虎等将此情况告知二人，李烈钧与蔡锷乃先后取道越南入云南，12月25日宣告独立，出兵讨袁，护国战争开始。1916年3月，广西亦宣布独立。在此前后还有广东陈炯明惠州起

义及林虎接洽的潮、汕陈德明，江门、新会黄任寰起义，林并电促钦廉镇守使隆世储独立。4月岑春煊从日本借款二百万元，用该款一部分购买军械运到广东肇庆，组织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自称都司令，任林虎为护国军第六军军长。不久附袁并勾结段祺瑞的龙济光被桂系逐出广州，退往海南岛，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同年9月派林虎为高雷镇守使，带领所部防备龙济光，护国第六军的番号取消，缩编为十个营。

1917年下半年，桂系军阀为逼走广东省长朱庆澜，夺取朱所率领的警备军，又调林虎为警备军总参议，林虎原有部队编为广东陆军第二军，仍由林任军长。时西南军阀为维护地方割据势力，一方面与北方主和派勾结，一方面继续坚持“自主”立场，反对湖南易督，假“护法”援湘名义，于同年9月调林虎部一部分入衡山（林仍留广州，未入湘）。10月，南、北两军战于衡山、宝庆一带，互有胜负。翌年春，龙济光趁机从海南岛渡海进攻雷州半岛，高雷镇守使隆世储战死。林虎建议派李烈钧为讨龙总指挥，并率部会同沈鸿英部进行反击，血战八十一日，把龙济光军击败，复驻守高雷，后改任肇罗阳镇守使。

1918年5月，桂系操纵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选出政务总裁七人，以岑春煊为首席总裁，逼走孙中山。7月，总裁制军政府成立，林虎被任为陆军部次长。1920年，孙中山命在福建的陈炯明所部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在广东驻军，各地群众纷纷响应。粤军回师前，孙中山传语林虎：最好倒戈反击，至少也要做到不抵抗而撤退，林虎却反抗最力。孙中山曾说林虎是个将才，又说广西籍的同盟会员中，文以曾彦、武以林虎最可惜。在粤军攻势下，桂系的部队很快撤回广西。林虎退至玉林，部队由黄业兴代管，自己则离开部队他去。黄业兴是广东钦廉人，打算把部队开到钦廉去。广西籍军官如梁史、李宗仁、尹承纲等都反对跟黄业兴到钦廉，于是他们拥李宗仁为首，把部队开到六万大山去隐匿起来。李宗仁为林部营长，借此联合黄绍竑、白崇禧的部队，打败陆荣廷、谭浩明、沈鸿英、刘震寰

等旧桂系部队，统治广西达二十多年。

1921年，桂系取消护法旗帜，同北方妥协，反对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决定讨伐桂系，陆荣廷曾派林虎去湖南，请求赵恒惕援助广西，赵发起湘、川、滇、黔四省联合调停两广冲突，未成。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后，于1922年冬约林虎到香港会面，林受陈的嘱托，再去湖南和赵恒惕联络，推行联省自治。未几，陈炯明被拥护孙中山的滇、桂、粤联军打败。陈急电林虎回广东，并将林的旧部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拨归林虎率领，退往东江。陈任林为潮梅总指挥，会同副总指挥洪兆麟与许崇智部战于梅县、潮州、石龙、博罗等地，一度进入闽南，占漳州。林为解决给养，多次派人赴浙江、江苏请孙传芳、齐燮元接济饷械，所得无多，靠卖官鬻爵、抽捐度日，军纪极坏，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林因厌战，于1923年8月托病赴沪，陈炯明将林部调回攻增城、河原。1924年夏，惠州陈部再次被围，电林虎回粤，11月林曾率部入赣援助方本仁。1925年1月，陈下令攻广州，黄埔军校组织东征，林虎迅速赶回东江，同年3月在广东兴宁县被东征军打败，残部逃往赣边，林本人离开部队去上海居住。1926年夏，应吴佩孚邀前往汉口，吴有意新编一旅交林指挥，林没有接受。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曾去探望林虎。林虎认为蒋介石是眦睚必报的人，故问李：我前因与蒋在广东东江作战过，蒋会不会算旧账？李回答：旧账是不会算的，但是目前你在军政界露面还是不大适宜的。李宗仁劝林虎出国住一些时候，生活费用由李出面邀约在林虎部下工作过的旧人筹措，每月三两千元是不成问题的。林虎接受这个建议，去法国住了一年多。1929年蒋（介石）桂（新桂系李宗仁等）战争爆发，桂系失败，林虎恐生活来源断绝，乃急忙回国，有时住香港，有时居上海。1936年两广发生名为抗日实则反蒋的“六一”事变，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派人到香港找林虎，要林出面收买陈济棠的部队。其条件是：所任官职和名义，由林虎提出，蒋即发表；用款在300万元以内的，不必请示，电到蒋即如数将

款汇去。蒋介石认为，陈济棠属下的几个师长，如黄任寰、巫剑虹、杨鼎中等都是林虎的旧部，如林虎肯出面活动，容易收效。林虎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离开香港回到广西，以防遭蒋方特务暗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参政会”成立，林虎被聘为参政员。林虎原在广西柳州沙塘办了一所新式农场，除了国民参政会开会和参加国民党军风纪视察外，都在该农场居住。1947年林虎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广西解放，林仍留广西。1951年，林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作为广西省直属土地改革工作队第五中队队员之一，去北流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53年被任为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6年被推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虎仍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并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0年2月8日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林虎：《往事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一），1961年版。

林虎：《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林虎：《陆荣廷讨袁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84年版。

林虎：《西南事变时蒋介石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

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3年版。

魏继昌：《林虎所处的时代和他在当时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版。

林建章

陈贞寿　刘传标

林建章，字增荣，又名述瑞。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生于福建长乐县一个世代为民间郎中的家庭。父林继蒲，母任氏。林建章幼年就学于私塾，少怀壮志。中法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惨败，林建章愤慨万分，立志服务于海军。1891年他只身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五年后毕业，被派往舰艇见习。嗣后升为大副，继以其熟练的驾驶技术升为宿号鱼雷艇帮带。数年后调任飞鹰、通济等舰帮带、大副及宿号鱼雷艇管带，授海军副参领。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震惊，急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攻打武汉；同时电令海军统制萨镇冰率巡洋、长江两舰队二十余艘舰艇溯江而上，进逼武汉协助弹压，林建章督带的“宿”号鱼雷艇也在其列。由于清军占领汉口后，冯国璋下令纵火焚城，市民死伤无数。海军官兵目睹清军暴行极为愤慨，林建章等官兵乃于11月9日在上海高昌庙易帜起义。11日黎明“宿”字鱼雷艇等到达镇江，时值上游各起义的舰艇军火不继，而南京以上各要塞尚未光复，清军防御甚严，海军几次派舰艇输送均失败。林自告奋勇，督率南深舰装运军火给养冒险上驶，终于到达目的地，使上游各舰得以接济。因参加光复有功，林于11月29日升任南深舰管带。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海军组成北伐舰队，林建章的南深舰作为主力舰之一，从南京下关口出发，经上海向烟台北驶。北伐舰队协助光复登州等沿海重镇，到达烟台后，各舰艇轮番游弋于鸭绿江口、大沽口、秦皇岛等地，截击由海外运来接济清军的军火。清廷下诏退位后，林建章等率北伐舰队南返。1913年1月林被授予海军中校，8月晋为海军上校。1917年8月林调任海容巡洋舰舰

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其时西方列强组织“干涉军”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北京政府决定派海军和陆军参加。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节制参战的海军及陆军宋焕章团。1918年8月，林率领海容号及随行人员李世甲等抵达海参崴，设立中国驻沿海州海军代将处。此时，协约国海军齐集海参崴，俘夺俄国海军驻海参崴四艘驱逐舰后，继续向西进犯。林建章命令宋焕章陆军团暂驻中俄边界的五站、双城子，仅派两个营进驻海参崴、一个连分驻伯力。林对中国的“干涉军”严肃军纪，不许趁火打劫；还努力保护中国商民和侨民不受侵害。1919年德国战败投降，林建章率领海陆军撤回中国境内。1921年1月林建章任海军第一舰队代理司令。

在北洋军阀混战的旋涡中，林建章与安福系成员梁鸿志交往甚密，进而归附段祺瑞皖系。1922年第一次直奉之战爆发，依附于直系的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主张海军参战。但林建章听命于皖系，主张海军中立，两支舰队形成对峙，杜锡珪以“大局为重”等辞说服第一舰队主力舰海容、海筹、永绩三艘协同第二舰队北上至秦皇岛，炮轰驻山海关之奉系张作霖部，加速了奉败直胜的结局。杜锡珪因助直有功，升任海军总司令，而林建章则被免职。随着直、皖两系间矛盾激化，皖系军阀卢永祥以金钱与装备支持林建章东山再起。林利用北京政府拖欠海军粮饷数月而造成官兵的不满情绪，以45000元运动永绩、海筹两舰长，促使两舰于1923年4月8日自青岛南下到上海，与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修理的驱逐舰建康号及列字鱼雷艇四位舰长，以及江南造船所所长刘冠南等人联名发出“庚电”，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反对“武力统一”，拥护林建章为海军领袖，实行“闽人治闽”。林于4月9日发出通电，表示接受拥戴，并在海军总司令部旧址成立“海军领袖处”，宣告海军沪队成立。此后，林建章等人利用同学、同乡等关系或以金钱收买，先后策动靖安舰、辰字鱼雷艇及杜锡珪的副官张日章归附上海。林在海军中另树一帜，客观上有利于遏止直系势力的扩张。当时

孙中山曾致电林："文迭次宣言，标明主旨，凡赞成和平统一者皆吾友，反对和平统一者皆吾仇，如执事之明达与沪海军之彻悟，文当竭其绵薄，相与戮力同心，共纾国难。"

齐卢战争于1924年9月爆发，杜锡珪电令驻闽的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率舰队北上入吴淞口，同时令第二舰队沿江而下协同进击卢永祥部。林建章当即派辰字鱼雷艇赴吴淞口巡防，令海筹、永绩、建康三舰驻防于吴淞口。当战局不利于卢方时，沪队司令周兆瑞暗中与杨树庄联络，利用海筹、永绩两舰长离舰上岸之机，夺取两舰归附杜锡珪。齐卢战争以卢永祥惨败告终，沪队的靖安、建康、辰、列等舰艇先后脱离林建章而归附杜锡珪，林领导的沪队与"海军领袖处"随即解散，林失势而闲居上海。

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9月爆发后，冯玉祥于10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垮台。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组成北京政府。11月24日林建章被任命为海军总长，12月被授中将加授海军上将衔。林建章上任后，任命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李景曦为练习舰队司令、许建廷为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为第二舰队司令。林在主持海军大政期间，严惩海军在福建的恶势力——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旅长杨砥中，得到闽省百姓的赞扬。

1926年1月，北京政府改组，杜锡珪取代林建章海军总长之位，林再度闲居上海。此后，林潜心研读佛教经典，不愿再过问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成立后，特聘林为高等顾问。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林身陷敌区，屡受日伪威胁利诱；原安福系骨干分子梁鸿志投靠敌伪后，亦曾以同乡和朋友的旧谊，多次以高官厚禄相诱，竭力拉林下水出任汪伪政府海军部长。但林不为所动，严厉斥责梁等人的无耻行径，而宁以变卖家什为生。

1940年6月14日，林建章因肋膜炎复发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林天福（林建章次子）口述记录。

长乐县《六里志》。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杨志本等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海军大事记》，福建省政协未刊本。

林觉民

范启龙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南后街杨桥巷口[1]。他的生父林孝颉，字玉珩；叔父林孝颖，字可山。林觉民从小过继给叔父为子[2]。林孝颖是当时福建有名的学者，以诗赋著称。林觉民幼时体弱多病，八岁时，母亲病逝，从此吃睡和嗣父在一起，跟随嗣父学习语文。他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

林觉民少年时就厌恶科举，十三岁那年嗣父要他应考童生，他不愿违背父命，怏怏赴试。但等试卷到手，他挥笔写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头一个交卷出场[3]。

1902年，林觉民考入陈宝琛新办的全闽大学堂（后称全闽高等学堂）文科学习。那时，西方的新学说已传来中国，青年学生大都沉醉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林觉民便自号为抖飞。他在同学中颇具威信，学堂里闹过几次风潮，同学们都推举他出来领导。因为他具有不畏强暴的个性，又善于言谈，师生多爱同他攀谈。“总教习叶肖韩独爱其倜傥，尝优容之。[4]”曾对他的嗣父说过：“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5]

林觉民对官立学堂的腐败很不满，便和思想一致的朋友在城北创办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魁辅里谢氏宗祠内创设阅报所，既鼓吹革命，又是校外同志之集聚所。他又热心于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朋友如遇到困难，他都尽力帮助。课余他常和同学们议论时事，认为中国不走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自强，慷慨激昂，声望大著。他“好演说，语极动听，某晚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社演说，题为‘挽救垂亡

之中国’，说至沉痛时，痛哭流涕，拍案捶胸，闻者感动。适学校某学监在后窃听，归语其同侪曰：‘亡清国者必此辈也’”[6]。随着年岁的增长，林觉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志愿越来越坚决。

1905年，林觉民奉父命同陈意映结婚，婚后夫妻的感情很好。次年，生一个男孩，取名伯新，他俩非常珍爱。他曾写过一篇名为《原爱》的文章，阐述青年男女对爱情应有的态度，读过此文的人都赞成称好。有位朋友写信对他说：“读大著《原爱》，理义公正，才情高绝，乃知文学家自有真也。”[7]

林觉民在家庭中，也反对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禁锢，为了帮助她们的觉醒，他和堂兄在自己家院子里办了一所家庭女校，动员妻子意映参加，堂嫂谦修、堂妹孟瑜及部分亲友的家属也入学。他亲自授课，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他说妇女要解放就必须走出家门。在他的教育帮助下。秀琼、秀慧两个妹妹就没有缠足[8]。

那时，去东邻日本留学成为中国青年的时尚。1907年，林觉民在全闽高等学堂毕业以后，经嗣父同意，也自费去日本，先学习日语。一年后，带去的钱已用完，刚好有一位丁姓官费生蹈海死，觉民得以补上此缺额，进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同时兼修英语和德语。他孜孜力学，夙夜不懈。

当时，外国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的凶讯不时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常常聚在一起，互相流泪叹息。林觉民悲愤地说：“中国已处危险关头，大丈夫只有一死报国，为何要仿效古人那样相对哭泣呢？我们既然是革命志士，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争取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或许可以挽救危如累卵的局面。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谁还能忍受和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呢？”大家听完他的话，都肃然起敬。他对“于国文爱庄骚，逼肖其笔意，辞藻超逸，美词气，谈笑风生。每登坛演说，左顾右盼，久而弥壮”[9]。由于他和陈与燊齐名，人们称呼他们为“陈林”，又因为他和林文及族弟林尹民共住一房，被

人称为“三林”，按照年龄的顺序排列，他是“中林”。

林觉民早已加入同盟会，嗣父听说他在日本的要好朋友都是同盟会的成员，便写信提醒他多加留意。他复信说：“大人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得祸者？”[10] 以此来宽慰嗣父。

1911年初春，林文收读黄兴、赵声的香港来信，知在港同志正筹备广州起义。留日福建学生当即开会研究，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起义事宜；林觉民则回福建发动响应。他们两人于3月3日离开日本回国，同船赴香港。黄兴看见林觉民来到，高兴地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11] 于是决定暂时取消他在福州响应的计划。

接着，按照林文的意见，林觉民秘密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到广州参加起义。嗣父见他突然回家，感到很惊异，他解释说，学校正放樱花假，应邀陪几位日本同学去参观江南一带的山水风光。他也没有把真情告诉妻子，虽然他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诀别，但为了实现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理想，他极力控制自己，进行掩饰。他得到福建同志的大力支持，在家乡只停留十天，即邀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吴适等人同赴香港。

4月23日夜，林觉民和林文、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等人先入广州。第二天，听说林尹民和郑烈已从日本到香港，觉民又邀更新同回香港为林、郑作引导。这一天晚上，陈更新和郑烈入睡后，觉民独自点灯，为家中亲人写绝笔书，直到天快亮时才停笔。第二天早晨，他拿着所写的书信嘱托友人说：“我死后，幸为转达。”便偕同林尹民、郑烈重入广州。在船上，林觉民和郑烈同睡一房，他轻声地对郑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12]

林觉民抵广州后，因为26日还有同志从福州来到香港，需要引导。所以他于25日晚再度赶到香港，直至27日早晨，才同陈与燊、陈更新等人率领全部福建志士同行，和林文等在广州会合。故是役闽人就义之多，仅次于粤。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起义爆发，林觉民和全体福建来的同志随同黄兴往攻督署。原定分十路进攻，因故改为四路，结果只有黄兴所率百余人第一路贸然发动，他们人人臂缠白布，腰束炸药，手持刀枪，奋勇冲击。可是，在总督衙门内却找不着早已逃遁的总督张鸣岐等人，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觉民怒不可遏，横目奋击，所向披靡。这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亲兵卫队赶来督署围攻，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觉民不幸中弹，力竭倒地被俘。当时报纸上刊登消息称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指的就是林觉民。

林觉民被水师提督李准等人提讯于水师提督衙门内。他本来普通话讲得很好，可是在座的多是广东人，怕他们听不懂，而当时广东官吏一般都会英语，他便讲英语，问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他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的时事，宣传革命思想。敌人们专心倾听，也好似为之动容。林觉民起初坐在地上讲，这时敌人为他打开脚镣手铐，请他坐在椅子上谈。接着，又送上笔墨纸张让他书写，他走笔疾挥，立尽两纸洋洋数千言，大有文不加点之势。当他写到激烈的地方，便敞开上衣，用手捶胸，激动不已。他写满一张纸，李准马上郑重其事地取去，捧到张鸣岐面前，张随即阅读，故作叹息的姿态。当林觉民写第二纸时，临笔稍为停顿，状似欲呕，犹恐污地未遂吐，以早受文明教育，性嗜洁故也。李准亲持唾盂近前始吐[13]。他写完以后，又在堂上演讲，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便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并且劝诫清朝官吏们应该洗心革面，为自己的祖国献身，革除清朝暴政，建立共和民国。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那么，自己虽死也瞑目了。

林觉民被关押了几天，一勺一水都不肯入口。赴刑场的时候，他面不改色，泰然自若，从容就义，时年才二十五岁。后与广州起义死难烈士共七十二人合葬于黄花岗。

林觉民的岳父陈陶庵当时在广州供职，最先得到他牺牲的消息，星夜派人送噩耗回福州，林家立即迁移住处。一天早晨开门，发现门缝中已塞进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林觉民生前托友人带回家的亲笔信，也就是他4月24日深夜所写的绝笔书：一张给父亲，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另一张给爱妻陈意映，写在一大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一千多字，语句悲怆婉转，十分动人。他首先说："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忍悲为汝言之"，"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接着，他以生动感人的笔触回忆历年夫妻间的恩爱生活，"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虽然，眼前的小家庭是幸福的，但是，"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最后他说："汝幸而遇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象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14] 陈意映得知噩耗，几次昏死过去。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仲新[15]。

---

(1) 林家原宅的大门面朝南后街，由于宅北为杨桥庵已辟为宽阔的杨桥路，原来朝东的大门已被改建为商业大楼，现将大门改为朝北，是杨桥东路

十七号。近年已辟为“林觉民故居”，并定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是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 陈遵统等编：《福建编年史》第10辑（油印本），藏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3) 林秀慧：《碧血殷殷红，黄花岁岁香——忆大哥林觉民》，《福建日报》1981年9月24日第2版。

(4) 吴适、林家泩：《黄花岗纪事》，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页。

(5) 郑烈（天啸生）：《林觉民传》，朱执信、邹鲁等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1923年版。

(6) 吴适、林家泩：《黄花岗纪事》，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第17—18页。

(7) 郑烈（天啸生）：《林觉民传》，朱执信、邹鲁等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

(8) 林秀慧：《碧血殷殷红，黄花岁岁香——忆大哥林觉民》，《福建日报》1981年9月24日第2版。

(9)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2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第446页。

(10) 郑烈（天啸生）：《林觉民传》，朱执信、邹鲁等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

(11) 郑烈（天啸生）：《林觉民传》，朱执信、邹鲁等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

(12) 郑烈（天啸生）：《林觉民传》，朱执信、邹鲁等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

(13)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2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第446页。

(14) 林觉民给父亲和妻子的绝笔信，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15) 林仲新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曾任福建漳州市粮食局副局长，现已病逝。

林康侯

汪仁泽

林康侯，名祖溍，以字行。1876年12月10日（清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上海。父亲林景周，为上海著名绅商。林康侯少年时就读私塾，二十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898年戊戌变法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就读，两年后转任该校附属小学堂教习。1902年由南洋公学派赴日本考察教育事业半年，回国后向校方提出改革建议，受到重视。1904年提升为该校小学堂长。他仿效日本学制亟力改进增设训导教员，健全各项制度。后南洋公学又增设中学部，林改任中学部教习兼学堂总教习，对确立新式学校的制度颇多建树。

1911年辛亥革命后，林康侯辞去南洋教学职务，转而从事实业，与张謇共同创办江苏铁路公司（简称苏路公司），任该公司营业所长。1914年铁路收归国有，林康侯进入金融界。是年，中国、交通两银行拨款开办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在北京成立，林康侯参与了该行的筹备工作，随后任该行发行所主任。1919年4月该行增资扩展业务，在上海设立分行，林康侯任沪行首任经理。林经营手腕灵活，多方设法吸收存款，如设点代收高校学费；参酌国外有奖储蓄办法，创设公共储金等。是年末，全行储蓄总额达九百万元，几达上年末三百多万元的三倍[(1)]，因而蜚声沪地银行界。但次年因内部意见不合，林退出该行，1921年转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华方经理[(2)]。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后，上海总商会改组，林康侯任该会主席委员。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林被聘为财政会议委员、经济委员、二五库券保管基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坐办、交通会议委员、国定税则会委员、上海特别市政府参事会委员等职，为国民政府摊派二五库券、筹集款项奔走甚力。又经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

选举为工部局华董，并任教育及公用专门委员，曾力争增加华人教育经费补助额。是年9月，宁汉合流，国民政府改组，孙科任财政部长，林康侯平素与孙科友善，任财政部次长。次年2月，国民政府再度改组，孙科改任建设部长（未到任），林也随之离职。

此后，上海银行公会以林康侯在金融界卓有声望，推他为理事兼秘书长，主持该会日常业务。林善于交际，交友广阔。其时新闻记者欲得金融消息，辄群集银行公会，林接待应付，态度和蔼，从无忤色，颇获报界好感。他又善于调停同业间的争执，平息事端，排难解纷；且与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都有联系，乐于受人请托；并在商界广收门生。林逐渐在地方上形成一定势力，一时与袁履登和闻兰亭同为海上“三大闻人”。

1930年，林康侯发起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被推为该会主席。此时中华汇业银行已停业，林除投资与史量才等合资开设合记教育用品社，任董事长外，并在其友好、生徒所开设的众多企业中，如中法油脂化学制造厂、上海标准味粉厂、新一行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奶粉厂、上海灯泡公司、美龙酒精厂等先后任董事长；并兼任中国名人年鉴社社长，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经济研究会、中国航空公司、航空协会等理事，上海特别市商会常务监事，中央银行、东南信托公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监察人等职。林还是光华、震旦、圣约翰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侨光、南洋模范中学等校校董。1936年初，林曾以副团长身份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泰国。

1937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亟，全国人民积极准备抗战。林康侯应约在当时国内舆论界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中日问题》一文，称：“中日系同文同种和地理历史关系，必须提携”，“至于中日所以不能亲善，实系日本当局错认事实，意存侵赂为之障碍”。“倘使中日谈判，两国不能在平等互惠的精神下进行，如无英、美、苏等国持平的远东政策，那末前途是很悲观的。”[(3)] 不久，“八

一三”淞沪抗战起，上海军民奋起抗敌，林康侯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理事，参加抗日后援会，从事救济难民等工作。1938年初，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召开，林康侯以中国雇主代表身份，与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同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大会。继又赴英国伦敦，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世界红十字会第十六届大会。会后游历欧美各地，于年底返沪。此时日本侵略者谋组伪政权，林康侯成为物色对象之一，日方曾以伪财政部长相诱，并一度予以软禁，林佯言允予考虑得以脱身，匿居亲友处，致遭日方通缉。1939年初，林潜赴香港，任中国国货实业服务社理事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林康侯被日军搜获，次年4月被押解回沪，经短期羁押逼其就范。

1943年3月，林康侯出任敌伪时期最大的资敌机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兼秘书长。该会专门从事棉粮、日用品统购统销等工作，并为敌方搜集军用物资，控制战略资源。此时，林康侯继续在沪从事商业、金融业活动，1942年与友人在沪开设民丰银行和利工银行，并任该两行董事长。此外还任利民药房、新一行、华一工程及合群化学厂等董事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康侯以汉奸叛国罪于10月被捕。1948年10月，以其尚能在日本投降时保存大量物资，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又六个月。因已被押三年，乃于当庭开释。11月林康侯离沪赴香港定居，其后因肾病曾去台湾就医治疗。

1964年9月22日林康侯在香港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27号卷宗号122号。

乌崖琴：《关于海上三老》（1963年12月6日），上海市工商业

联合会史料第322号。

沈葆昌访问记录（1981年4月18日）；林之蕊访问记录（1986年4月10日）；陆允升访问记录（1986年7月20日）。

---

(1)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生活书店版。1934年9月第103页，据载：1918年末新华银行储蓄存款总额为3281417.41元，1919年末激增为8936322．68元。但此后数年又降为四五百万元间。

(2) 《中华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上海之部）》，上海兴信所昭和十五年（1949年）版（日文），第283页。中华汇业银行至1929年停业，林任华方经理达十年之久。

(3)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1937年1月版，第429页。

林可胜

陈民

林可胜，英文名Robert Lim，1897年10月15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县）。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母亲黄端琼是著名老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林可胜八岁时被送往英国，读完中学后即考进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印军医院当外科助理医生。战后复学，1919年以优异成绩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学士的学位，并留校当生理学讲师。1920年与1924年，又先后获得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的学位。1923年，曾以美国罗氏基金会研究员之衔，赴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5年，林可胜回祖国，应聘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为协和第一个华人教授，一直任教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几年间，他于教学研究之余，殚心著述，多次在英、美各国生理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蜚声国内外。1926年他创建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年又创刊《生理学杂志》并任主编。1928年至1930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他在消化生理学和痛觉生理学两方面都是先驱，是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

1937年“七七”事变，林可胜携带子女去新加坡[(1)]，安顿后又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后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除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及训练示范病房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材制造厂。当时的卫生人员训练所，实际上集中了医学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如荣独山、容启荣、张先林等协和早年毕业生，其规模之大，人才之众，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由于林的国际声望，救护总站得到国际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救护总

站先后派遣一百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五个战区设立分站。抗战初期，前线由于缺医少药，伤兵往往轻伤致重，重伤致死。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临时医院后，情况有所改进，伤兵运到后立即医治，轻者医至痊愈，重者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有一年圣诞节傍晚，一大批伤兵转来救护总站。工作人员因时间已晚，推说病房已满，不予收容。伤兵们只得瑟缩地躺在医院门口。时近半夜，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山探视，当场大发脾气，命令立即停止圣诞联欢晚会。全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打开训练示范病房，安置全部伤兵，并煮粥给他们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林的作风及其救死扶伤的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对林的专心任职及其“努力之精神”颇为赞许，并自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一万元给救护总站[(2)]。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的医药总监，多次得到我国政府的嘉奖和英、美政府的授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国防医院院长，创立军医中心教育制度，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同时还负责筹建中研院医学研究所。

1948年，林可胜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同年，蒋介石拟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林可胜坚辞不就。1949年5月林去美国，先后任伊利诺斯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雷顿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后，又受聘于印第安纳州迈尔斯实验所，负责生理、药理研究工作及医学科学研究指导。

林可胜一贯治学勤勉，作风严谨，于生理学与药理学方面贡献尤著。早在30年代他就因发现“肠抑胃素”[(3)]而著称于国际医学界。晚年在国外，对于疼痛及止痛机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世界各国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聘请他为名誉成员。1961年香港大学曾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

1969年8月7日，林可胜因食道癌逝世于牙买加的金斯敦。

---

(1) 林可胜的第一个夫人玛格丽特（苏格兰人），1936年在北平病故，遗下一子一女。1937年，林可胜把子女安置在新加坡林文庆家。一个月后，他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这一爱国行动，在新加坡华侨中颇得好评。1946年，他和张静江的女儿张蘅英在上海结婚。

(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211—212页。

(3) 肠抑胃素是一种胃肠激素，是由食进脂肪后在肠内引起的。林可胜发现了这个物质，并为它以英文命名“Enterogastrone”，至今仍被胃肠学家广泛引用。

林砺儒

郭烙

林砺儒，原名林绳直，广东信宜人。1889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成人。其叔教家馆，他童年随叔父读书。1905年至1911年在广东高州高郡中学堂学习。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3月回国。1919年4月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此后终其一生，一直坚守教育岗位，被誉为“最有恒心”[(1)] 的教育家。

五四运动时，他支持学生运动，曾指导北京高师学生举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等活动。1921年，他积极参加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罢课索薪斗争。

林砺儒对德国《威玛宪法》编列的教育章十分欣赏。北洋军阀时期，他于1922年和1925年两次向当时的国会提出教育章草案，想为教育事业争得宪法上的保障，但都没有结果。

我国学制从清末开始基本上是抄袭日本的。1922年，教育界提倡仿照欧美学制进行改革。改小学七年、中学四年为小学、中学各六年。一时学制改革成为教育界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一年，林砺儒开始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决定立即试行新学制。林砺儒组织各科优秀教师自编新教材，当年秋季即按新学制招生。许多中学纷纷向高师附中索取试行新学制的教材及经验。高师附中还在教育杂志上介绍试行新学制的情况，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学制改革开始后，关于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大学教育是目的地，普通教育不过是过渡到目的地的一道桥梁。林砺儒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教育应以生活为主，以学

生生活的环境为中心，而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他说：“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乃是要引导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譬如一株树，要他十分发育，就要让他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他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所以我认定理想中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2)] 林砺儒的教育思想，注重联系中国教育实践，博采众长，颇有独到之处。

1931年7月，林砺儒应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的邀请，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其后又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广东当局为纪念已故的国民党监委古应芬（字勷勤），创办勷勤大学，林砺儒参加筹办工作。勷勤大学成立后，他担任该校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高涨。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企图用繁重的功课、严格而频繁的考试来束缚学生。林砺儒发表《从批评中学新法令说到未来的改造》[(3)] 一文，对教育法令提出异议，主张废除中学毕业生的会考制度。1935年国民党提倡“尊孔读经”，他又提出反对，说办教育应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民众化，二是现代化，读经不符合这两个原则。与此同时，他还主张废除中学的军训课程。

抗日战争前，两广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勷勤大学是这个时期广东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相对抗的产物。抗战爆发后，勷勤大学改组，其教育学院于1937年9月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林砺儒任院长。该院先迁广西梧州，继迁藤县、融县和广东乳源县。1939年9月改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再迁连县。历经五度搬迁，图书仪器均完整无损地转移至粤北。而当时广东其他院校图书仪器在搬迁中

损失惨重。对比之下，该院声誉更高。林砺儒得到全院师生的爱戴，利用两广特殊的政治环境，担任院长达八年之久。他拒绝国民党特务插手学院。曾对学生说："国民党顺来，应付他，硬来，就对付他！"[(4)] 国民党政府规定高等院校要设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党部。1939年至1940年，他便在校内物色人选担任训导长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挂上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党部的牌子，以便"挡风"，拒绝国民党派人到校。

林砺儒的办学思想是"兼容并包"。教员只要学有专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都请来任教。郭大力、张栗原、尚仲衣、高觉敷、李平心等教授都曾先后到文理学院执教。皖南事变后，搬迁到桂林的江苏教育学院解聘了一些进步教师，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林砺儒欢迎他们到文理学院来任教和学习。在文理学院，教师可以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学生可以研究各种学术问题，组织各种进步社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文理学院的进步自由风气，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嫉恨。张栗原教授讲课时，特务学生竟将左轮枪摆在课桌上，进行威胁。特务对林砺儒更视为眼中钉，说文理学院是"红色学院"、"小延安"，要求改组，并以停发经费相威胁，迫使林砺儒不得不于1941年5月提出辞职，前往曲江。此时以地下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全院师生展开挽留林砺儒的斗争。他们召开全院"挽林"大会，发表通电，派出师生请愿代表团前往韶关向省政府请愿，使拟取代林砺儒的国民党CC派不敢上任。学生们还高唱林砺儒撰写的校歌寄托对他的怀念。一时，不少学生被捕、被开除，一些进步教师也被迫离校。林砺儒愤慨地写了一首诗："黄石出任乘小骥，闯入榴园杀桃李；三人贯耳七人鞭，园公闻讯心惘然。"[(5)] 心情极为沉痛。

1941年10月，林砺儒到桂林担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担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那时国民党特务也插手该院，他深为烦恼。在家门口写上一副对联："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此后他写了许多辛辣的文章，讽刺教育界的黑暗面。5

月，他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精神剃须论》一文，讽刺国民党对青年的训练和控制，轰动一时，导致该杂志被迫停刊。

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桂林师范学院于6月撤退到柳州。其后又沿桂黔边境转移到贵州省平越，继续上课。林砺儒随校转移，坚持讲课，并初步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教育哲学》一书。抗战胜利后，他随桂师回到桂林，积极参加民主活动。1946年他参加了民主同盟，收到不少匿名信。国民党特务恐吓他说："李公朴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后来CC派要把桂林师院迁往南宁，而他又患肾炎，遂提出辞职，回广州治病，因而脱离民盟。林砺儒在广州时生活贫困，用不起盘尼西林，桂师教授张毕来等汇了一笔款给他，他回信说："庄子有云：'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诸君盛情可感，亦复可哀，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来有人将这封信贴在桂师布告栏上，引出不少师生的热泪。

1947年8月，林砺儒到厦门大学担任教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国民教育、西洋教育史等课程，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之他学识渊博，立即成为该校教育系最受欢迎的教授。他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罢课、罢教、罢工的斗争。

1949年4月，林砺儒离开厦门，经香港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副部长等职。

林砺儒的著作有：《文化教育学》、《伦理学要领》、《教育哲学》、《教育危言》。他有一百多篇论文，散见于《教育杂志》、《教育丛刊》、《中华教育界》、《教育新时代》、《文理月刊》以及《新华月报》、《人民教育》等报刊上。

1977年1月20日，林砺儒因胃癌在北京逝世。

(1) 林砺儒：《我们的特约撰述》，《教育杂志》第24卷第4号，1934年12月。

(2) 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教育丛刊》第3卷第5集，1922年9月。

(3) 《教育杂志》第24卷第4号，1934年12月。

(4) 当时广东文理学院学生、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林敬文的回忆。

(5) 新任院长为教育厅长黄麟书兼任，训导主任为徐家翼，第一句指此二人。勷勤大学抗战前校址在广州郊区石榴岗，故称“榴园”。

林森

娄献阁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1867年3月16日（清同治六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商人家庭。三岁时随父林道炳移居福州，六岁开始读书。1877年入美国教会办的培元学校。1881年入鹤龄英华书院，1884年结业后离开福州，赴台北电报局工作。

1895年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林森返归大陆。1898年复去台湾，一度任台南法院嘉义支部通译。不久加入革命组织兴中会，1900年春仍回福州。

1902年，林森考入上海江海关工作。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与林述庆等组织福建学生会，传播反清反外国侵略的思想，被选为主席。不久，学生会同闽籍留日进步学生林文、方声洞等建立了联系，并在福州设立了学生分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林森与学生会会员均入同盟会。

1909年，林森由上海调九江关任职员，曾与吴铁城等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宣传革命，还着手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和进行联络新军的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即与上海的陈子范、湖北的詹大悲建立联系，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便立即策动九江的新军标统马毓宝于10月23日宣布独立。随后成立九江军政府，马为都督，林任民政长，吴任总参议官。他们曾联系海筹等海军舰艇起义，并共同商定了统一江西和援鄂、援皖等决策。

同年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先后在沪、汉、宁开会，林森为江西代表，曾参加上海、南京会议，同其他代表一起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林森是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会议，被选为议长。2月上旬开始制定《临时约法》的工作。不久清帝退位，袁世凯假意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被迫向参院提出辞呈，荐袁自代，但要求把首都设在南京，袁必须服从《临时约法》并到南京就职。参院很快选袁继任临时大总统，4月又在袁的要挟之下决定将临时政府和参院迁往北京。在迁都问题上，参院内有过激烈的斗争，林赞同孙中山的意见，反对北迁，因而辞职。是年秋，林回福建设立国民党支部。

袁世凯为加强独裁统治，1913年3月指使其爪牙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林又作为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参议院会议，被举为参议院全院委员长。面对袁世凯的种种反动行径，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少数国民党议员南下参加起义，多数人（特别是所谓法律派）仍留在国会中，林也是留在国会的一个。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国会进一步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10月选袁为正式总统。而袁世凯实行专制的野心仍不满足，11月竟下令解散国民党，取缔国民党议员，随之国会也停止活动。林取得了出国护照，随即东渡日本。

林森在日本东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4年春转赴美国旧金山，任民国维持会会长。该会是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为起兵讨袁而设立的筹饷机关。民国维持会曾派员巡游美洲各埠开展工作，林亲往古巴进行募捐。同年冬美洲总支部改选，林当选为支部长。在他任职的三年间，总支部在阻止袁世凯借款、召开全美国民党恳亲大会，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显著，被孙誉为“领袖支部”[(1)]。

1916年6月袁世凯恚恨成疾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8月，国会复开，林森自美赶回北京与会。在国会中张继等原国民党议员曾组织“宪政商榷会”，与原进步党议员即后来的研究系对立。研究系主张中央集权，拥护段内阁；商榷会则主张地方分权，

省长民选。国民党议员中除入阁的谷钟秀、张耀曾等人外，多对段内阁持反对态度。林属于商榷会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即“丙辰俱乐部”系。

1917年6月，黎元洪为张勋等所迫，再次解散国会，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东，揭举护法旗帜。林森和其他一些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号召，聚集广州，8月，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选孙为军政府大元帅。林曾一度任大元帅府外交部长。这时，西南军阀多借护法以自重，而非常国会则为实力派桂系军阀所操纵。1918年5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孙愤而辞职赴沪，专门从事著述。8月，护法国会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林是拥护孙的少数议员之一。稍后他又当选为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并以议长名义募捐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920年春，桂系军阀为了谋求同北洋军阀政府妥协，停发国会维持费，大部分议员离粤，林森亦于4月去上海。在赴沪途中，他写信给海外友人，谈到广州情况，谓今武人违法，南北皆然，桂系压迫国会更毒于袁氏，表现了对桂系的极端愤懑。11月，陈炯明率粤军回粤，孙中山再至广州重整军政府。1921年1月，国会复在广州开非常会议，林为议长。4月，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孙于5月5日就职，林代表国会授印并致词。10月，孙中山开始计议北伐，林曾为此致书海外筹款。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停止北伐。10月，许崇智回师入闽。11月，林森接任福建省长。1923年2月，许率军回粤，福建为北洋政府控制，林被迫辞职。同月，陈炯明退走惠州，孙中山返广州就大元帅职。7月，林被任命为大本营建设部长，兼治河督办。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林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却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11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

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党籍案”、“俄人包尔丁（鲍罗廷）顾问解雇案”、“中央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决议[(2)]。参加这次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林森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并多次担任会议主席，又被推举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1926年1月，“西山会议派”的一些成员受到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处分（林森受到警告处分）。但他们不承认广州大会，同年3月仍继续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林再次当选为所谓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在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林森是该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到11月底特委会无形解体。特委会成立前，蒋介石本已下野，1928年初重新上台，随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林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蒋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林任副院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林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6月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他是陵墓建筑的主持人和迎榇专使之一。

1931年2月下旬，胡汉民因同蒋介石发生矛盾被扣。3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由林森任立法院院长。事前他已出国考察，院长职务由邵元冲暂代。4月，邓泽如等四监委弹劾蒋介石，林列名四监委之内（当时他尚在国外）。5月，一些国民党政客与西南实力派在广州组成“非常会议”，同蒋分庭抗礼，由于林和粤方几个要人关系较密，粤方曾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10月林从国外回来，这时宁、粤双方正在和谈，他采取超然态度。“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粤方乘机倒蒋，12月，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林被推为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宁、粤联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林于1932年元旦就

职。

林森任主席不久，发生“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国民政府暂迁洛阳。同年3月，蒋介石东山再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国民党统治的党政军实权。林森本来就不具有实际职权，此后更形同虚设。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又迁往重庆，林于11月入川。

他连任主席长达十二年，安于“典守印信”、“垂拱而治”。1943年5月林森因车祸受伤卧病，于8月1日逝世。他性喜山水，尤好古玩。其言论文章多收入《林子超遗集》和《青芝老人遗墨》中。

---

(1) 石映泉：《林森》，胡适等撰《林森纪念集》，台北传记文学社1969年版，第92页。

(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清党实录》，江南晚报社1928年版，第51页。

林述庆

王学庄

林述庆，字颂亭，又作松亭，福建闽县人。1881年4月8日（清光绪七年三月初十）生。父亲林耀源是一个普通农民。他小时没有读过多少书，因家境困苦入营当兵。1902年被选拔进福建武备学堂，毕业后充长门练营督操官，常备军帮带。他在武备学堂读书时，就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曾加入革命团体福建学生会。

1906年春，林述庆到江宁（今南京）投入新军第九镇统制、原福建武备学堂总办徐绍桢部下，任第十七协三十三标三营管带。徐绍桢是貌似开明的官僚，他的部队，有革命党人渗入，三十三标统带就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赵声。林述庆积极参加了赵声组织的秘密革命活动。同年冬，调任第三十四标二营管带，奉命随徐绍桢开赴江西镇压萍浏醴起义。他与赵声等密谋率部响应起义，未成。1908年，参加南洋新军太湖秋操，中途被调到安庆，要他们去镇压熊成基起义。1909年，改任第十八协三十六标一营管带，驻江阴。这时，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三十六标被调到镇江与同协三十五标会合。官兵得到起义胜利的消息异常兴奋，纷纷试图响应，统领和统带都借故逃走。于是，林述庆便联络各营军官，秘密准备起义。他奔走于沪、宁之间，积极配合，得到同盟会上海机关的大力支持。同盟会派李竟成回镇江加紧活动，联络巡防营、会党和士绅。林与李取得联系，完成了起义的布置。当时，徐绍桢见革命虽已爆发，但清朝势力仍很顽固，立意观望，他派孙铭来镇江接任协统，企图控制部队，被林述庆顶了回去。11月7日，林述庆率新军在京岘山起义，次日入城，驻防旗兵被迫缴械。镇江光复，成立军政府，林述庆任都

督，李竟成任军务部长，绅士杨振声任民政长。随后，林派人劝说被阻截在镇江江面的清军舰队起义，得到海军官兵响应，全体投向革命。他还派部将臧在新到淮安镇压谋害起义领袖周实的反动官绅。他又和李竟成支持反正的清朝军官、盐枭徐宝山去光复扬州，徐宝山镇压了贫民孙天生起义后，成立了扬州军政分府。

随后，徐绍桢迫于形势，也率新军起义了，谋占江宁，但被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将张勋击败。江、浙、沪各革命军组织联军会攻江宁，上海都督陈其美推举徐绍桢为苏浙联军总司令。林述庆不满意徐在起义前后的表现，通电要求改推司令，后来经人调解，才勉强接受徐的指挥。镇军收容了第九镇溃兵和起义的部分海军，成了江浙地区革命军中较强的一支队伍。11月26日，林述庆自任镇军司令与许崇灏率镇军一支队出发攻江宁，柏文蔚、李竟成率二支队从江北包抄浦口，并派人策动沿江炮台起义。12月1日，林指挥镇军会同浙、沪军发起猛攻，占领钟山上的据点天堡城，从而控制了战局。张勋见大势已去，与两江总督张人骏等连夜率军北逃。次日，镇军从太平门首先入城。

林述庆初担任参谋长时，曾特聘他过去的上司、本地人陶骏保为他的参谋长。陶是个参加过反清活动，后来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任江宁宪兵司令的变节分子，到任后为林出了许多坏点子，并一再怂恿林自称江苏都督。进入江宁后，林述庆驻进两江督署，占领银行、电报局，用“临时江宁都督”名义安民，陶署临时参谋总长。结果，浙军方面认为林独霸战果，和镇军发生武装冲突，徐绍桢也借机公开表示不与林合作。林述庆感到处置失当，立即通电请江苏都督程德全来宁莅任，并宣布取消镇江都督名义，专心北伐。随后，镇军即撤出江宁，开赴浦口、临淮关一线，林述庆就任北伐临淮总司令。但徐绍桢却不肯罢休，跑到陈其美处诬告林述庆，说江宁起义失败是因为林扣押了上海支援的子弹。陈也认为林在通电中要求取消江苏几个都督并立状态是和他为难，就借林述庆赴沪与黄兴会商北伐事宜的机会准备对林下毒手，结果捣乱的陶骏保被陈诱杀，林述庆、柏文蔚脱险乘兵舰逃

回浦口军中。

林述庆激烈反对同袁世凯讲和，要求北伐，他将部队向北推进，监视清军行动。但是，因为得罪了陈其美等，得不到军费和军火，以致柏文蔚不肯开拔；他迫不得已赶到扬州向徐宝山求助，遭到冷遇；又到南京、镇江设法，也毫无结果。江北都督蒋雁行还不让镇军驻在他控制的地区里；镇江地方势力也阴谋驱逐留守的镇江军政使、老革命党人郑权。林述庆处处碰钉子，灰心丧气，只好于1912年1月8日通电下野，回乡闲居。归途中，写成了记叙起义和北伐经过的《江左用兵记》。

袁世凯上台后，看到林述庆在革命军内受过排挤，生活又很贫苦，便加意笼络，1912年9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当时，沙俄策动外蒙古王公叛乱，林述庆想劝袁出兵讨伐，于10月到北京，被推为各团体联合国防会副会长。这时，袁世凯任命他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国民党也推他为名誉理事。但他看到袁处心积虑镇压革命势力，对时局很担忧，却又找不到出路。次年2月，孙毓筠等发起国事维持会，以超越党派、调解纠纷为号召，林述庆应邀参加发起，出任理事。但该会实际上是袁的工具，处处以调解为名遏制反袁活动。

不久，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沪遇刺身死，案情披露，主凶就是袁世凯。林述庆对此非常激愤，不断当众拍案为宋鸣不平，表示要回南方号召旧部反袁复仇，因而遭到袁党的仇视。4月10日，袁世凯心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单独宴请林述庆，林归家后突然发病，满身浓痘，七窍流血，延至16日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林述庆：《江左用兵记》，郑权编《福建三烈士传》，1935年版。

林述庆：《林松亭遗诗》，郑权编《福建三烈士传》，1935年版。

郑权：《林烈士述庆传》，郑权编《福建三烈士传》，1935年版。

郑贞文：《闽贤事略初稿》，福建省政府教育厅1938年版。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

林文

闻少华

林文，黄花岗烈士之一，字广尘，初名时塽。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1)]。幼年丧母，靠姐姐抚育长大。父林晸是个举人，曾在浙江做过官。林文十五岁随父到浙江，进了学堂，能诗文，善书法。在校中和林尹民（黄花岗之役另一烈士）最友好，后林文赴日，使林尹民“有失侣之感”。

1905年，林文到日本留学，开始进成城学校学军事，后改学法科。他到日本后，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痛恨清廷的腐败，决心参加革命，挽救祖国的危亡。8月，同盟会成立，他参加同盟会，积极工作，担任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还参加《民报》的经理工作。林文自参加革命后，和黄兴、赵声等人往还密切。因他身材魁梧，力气过人，在革命党人中，大家都称之为“林大将军”。林文二十岁后，有人劝他娶亲，他曾说：亲爱的祖国就要遭到瓜分了，人民也快要当奴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追求小家庭的幸福！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林文多半参加了。他频繁地往返于南洋、香港之间，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深为孙中山所器重。

1909年，汪精卫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决计到北京冒险行刺摄政王载沣，林文不赞成这种行险侥幸的活动，曾“极力谏阻”，无效[(2)]。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林文住在香港，因经济来源断绝，和黄兴、赵声等人“佣耕自给”[(3)]。以后他同赵声等返回日本，日本警吏知道林文是革命党的重要分子，非常注意他的行动，但他满

不在意。同年夏，谭人凤、赵声、宋教仁等初步提出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组织中部同盟会进行革命的主张，林文很赞成这个意见，参加了酝酿。

同年11月，孙中山从美国到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黄兴、赵声等人开会，号召革命党人不怕失败，继续斗争。会上，决定筹集巨款，集中力量，挑选革命党五百人组织“选锋”（敢死队），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起义。当时，林文在日本正生病。第二年春接到黄兴、赵声等人来信，要他集合留日同志前往广州参加起义；林闻讯感奋，于3月5日同林觉民、陈可钧、陈更新等人一道赴香港。临行，他对同志们说：“我辈行军，志在‘吊民伐罪’，慎勿戮及无辜。”即使对满族人，他也主张“亦仅当歼其抗我者”[(4)]。

起义日期统筹部原定于4月13日，不料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署广州将军孚琦事件，敌人加强了戒备，加上起义准备工作也未就绪，急需的军械款项又未能完全运到，因而起义时间一再变动，林文等于4月23日才得以潜入广州。

原定起义队伍分十路进攻，临时又改成四路：第一路由黄兴亲自率领，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第二路，由姚雨平率领，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巡防营新军进城。第三路，由陈炯明率领，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则率领第四路起义军，把守南大门。由于种种原因，有三路起义队伍未能及时发动；所以，实际行动起来的只有黄兴领导的一百多人的队伍。4月27日下午5点20分，起义开始。林文随同黄兴率领队伍，自小东营出发，他左执号筒，右挟小枪，身怀炸弹，腰佩短剑，走在最前列，杀了路上的巡兵，攻到总督衙门，和战友们一起用炸弹炸死门前守卫数人，攻入督署。黄兴率领十余人也由侧门攻入，他们由投降的清兵引路，直入内院，总督张鸣岐已闻风逃遁，没有捉住。于是黄兴、林文等就放火烧总督衙门，又从里边冲杀出来。接着，起义军到了东辕门，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林文曾听赵声、姚雨平等人说过，李准的部下有很多是革命党人。他就上前去打招

呼，高喊：“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不要打，不要打！”[5] 不料话还没有喊完，头上已中了敌人的子弹。这位年青的革命党人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那时，他还不足二十五岁。

---

(1) 林文的生年没有直接记载，他死于1911年，《林文传》的作者天啸生说他这时二十五岁。据此推算，去掉虚岁，他应生于1887年。

(2)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0页。

(3) 天啸生：《林文传》，朱执信、邹鲁等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1923年版，第8页。

(4) 天啸生：《林文传》，朱执信、邹鲁等编《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1923年版，第8—9页。

(5) 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纪》，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1页。

林文庆

陈民

林文庆，字梦琴，原籍福建海澄，1869年9月5日（清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林天尧，当时是鸦片种植园的助理管理人员。林文庆童年入福建会馆附设书院，读“四书”、“五经”，后改入官立英文学校，不久升入莱福士学院学习。1887年，林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92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以后，香港大学又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林文庆虽受英国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的造诣，并熟谙闽、粤方言。他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这对他开展社会活动是很有帮助的。

1893年至1921年，林文庆在新加坡挂牌行医，并一度担任爱德华七世医学院讲师。这期间，他还积极热情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1897年与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合作创办了《海峡华人杂志》，与《天南新报》创办人邱菽园组织“好学会”等社团，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林文庆热心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人教育的改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排除众议，劝说一些友好剪掉辫子。1899年，他又是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的创办人之一。他的夫人黄端琼在女校任教。为了在华侨中推广汉语普通话，林文庆首先在自己的家里开办华裔普通话学习班。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创办新加坡华人商业银行和华侨保险有限公司，垦殖马来亚的橡胶园。他先后担任过新加坡市政局委员、立法院华人议员、内务部顾问，以及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鉴于他对这一英属殖民地的贡献，1918年，英皇特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

林文庆早年在英国就结识了孙中山，1900年6月，孙中山的日本

朋友宫崎寅藏到新加坡为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合作进行活动，被当地政府拘捕。孙中山特由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也遭逮捕，经林文庆等人代向英国当局疏通，使孙与宫崎很快获释出境。义和团运动后，列强搬出德皇威廉二世捏造的所谓“黄祸”论，作为侵略中国的口实。林文庆在《新加坡自由报》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白祸”，并以列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灾难论据，说明“白祸”比“黄祸”更为可怕。他援引英人托玛斯·杰克逊的话“条约只有平等，才能持久”，指出当外来者（指教会与洋行）终止享有特权，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也就随之过去，从而也就不会再有排外的暴动[(1)]。

1906年2月，孙中山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分会，林文庆欣然入会。

1911年，林文庆到欧洲游历考察了九个月，对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并作为中国代表，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人种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的卫生会议。在伦敦时，林一度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

1912年初，林文庆应孙中山的聘请，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政府北迁，林文庆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1921年4月，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聘请林文庆当校长。厦大开学后，林文庆亲自对学生进行英语口试，并通报全省各公私中学，对推动福建省外语教学起了积极作用。一直到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才辞职回新加坡。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学校经常组织尊孔祭孔活动，孔丘的生日被列为重要节日，全校放假，“以示恭视”。他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认为学生不应“为爱国运动而抛弃自己的职务”[(2)]。正如当时在厦大任教的鲁迅所指出的，“校长是尊孔的”，“这里是死气沉沉

的，也不能改革，学生也太沉静，数年前闹过一次，激烈的都走出，在上海另立大夏大学了”[3]。1926年，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4]。他除了主持日常校务之外，还从事儒家伦理的研究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著述活动。1929年，林完成屈原《离骚》的英译。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认为，该书是外国人研究汉学的佳作，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曾为之作序推荐。1930年，林文庆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编。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剧》[5]和《新的中国》等书。

林文庆又是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会通讯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林文庆已退休在新加坡。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年逾古稀的林文庆被迫出面组织了“维持会”——“华侨协会”，但他并不积极开展活动，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

由于晚节欠佳，林文庆孤寂落寞地度过余年，于1957年1月1日在新加坡病故。

---

(1) *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by Wen Ching，edited by G．M．Reith．，P294，London，G．Richards，1901．

(2) 林文庆1926年4月6日在厦大五周年校庆会上讲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第54页。

(3)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6、245页。

(4)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7页。

(5) 《民族周刊》（*The Chinese Nation*），1930年1月创刊，1931年12

月停刊。创刊时曾标副题“致力于中国进步的刊物”。《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是林文庆于1900年先后发表在英文《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的文章汇集，由里思（G．M．Reith）编辑并作序。文集分三部分，主要是介绍中国在西方文明影响下发生的改良运动，揭露以慈禧为首的清廷的反动性，阐述著者对中国今后对外关系的主张。《东方生活的悲剧》（*Tragedies of Eastern Life*，*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cial Psychology*，by Lim Boon Keng，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1927）是林文庆192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的一部介绍社会心理学问题的中篇小说。

林义顺

陈民

林义顺，字发初，号蔚华，又号其华，祖籍广东省澄海，1879年11月12日（清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生于新加坡，是当地第一代侨生。父亲林炳源，早年南渡谋生，在新加坡经营小杂货铺。林义顺八岁丧父，由外祖父张理（新加坡著名商人）抚养成人，从小得到较好的中英文教育，十七岁毕业于英人办的圣约瑟学校。经舅父张永福介绍，到陈楚楠经营的“合春号”任职，由于做事勤勉、谨慎，很得到陈楚楠的器重。张永福与陈楚楠私交甚笃，他们与新加坡名士邱菽园交往，受当时祖国维新思想的影响很深。林义顺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于1903年为陈楚楠、张永福筹办《图南日报》（南洋最早鼓吹革命的报纸）奔走出力。《图南日报》以《图存篇》为名，翻印邹容的《革命军》，林义顺曾携带千余册回潮州，沿途分送，广为宣传[(1)]。

1905年6月，孙中山由欧洲赴日本途经新加坡时，林义顺曾陪同陈楚楠、张永福到船上拜会孙中山。次年4月，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林义顺与陈楚楠、张永福同时首批加盟，林被推选为交际股主任。他精通英语、善于交际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07年7月，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创刊，林义顺任司理。翌年，受孙中山委派，先后与陈楚楠、李竹痴、许子麟等人，到马来半岛各埠及缅甸的仰光等地创设同盟会分会，并招募《中兴日报》股款，颇有成绩，深得孙中山赞赏。后来，孙中山在寓居新加坡期间，对外事务多交由林义顺办理。林义顺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思想水平，因受孙中山的直接指导，得到很大的提高。由于工作关系，林义顺也见知于著名社会活动家林文庆。1908年，林文庆集资创办三巴旺

树胶有限公司，从马来半岛引种橡胶树，聘请林义顺为第一任总经理（共任职五年）。

1911年，林义顺独立创办垦殖农场“林义顺公司”，吸收广东黄冈之役失败后逃亡新加坡的革命党人余通、陈涌波等为助手，廉价收购菠萝山，试行树胶与菠萝间种，双双获得丰收，事业蒸蒸日上。为了不断扩充农场，林义顺先后在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柔佛州购置园地。林义顺又开设菠萝罐头厂，自行加工，远销欧洲，成为名噪一时的“菠萝大王”。1913年，祖国南方各省讨袁失败，革命党人多逃往南洋，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邹鲁、黄兴、张继等人都先后到过新加坡，住在林义顺的“湛华别墅”，受到热诚款待，并以林义顺的“通美行”作为革命党人的秘密通讯处。林义顺迎来送往，毫无吝色，因此他的“菠萝大王”又多了一层“交际大王”的含义。南洋华侨称“交际”为“往来”，称菠萝为“旺莱”（黄梨），二者谐音，故“菠萝大王”又有“往来大王”的含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上的橡胶价格猛涨，“林义顺公司”除菠萝外，橡胶又获丰厚利润，林义顺也成为与黄仲涵（糖王）、陈嘉庚（橡胶王）等人齐名的百万富翁。

1917年8月，护法南下的孙中山在广东就任临时政府大元帅，委任林义顺为大本营参议。第二年，林义顺回国游历华北各地，先后拜会了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政要。当时正遇上华北大水灾，林义顺向南洋华侨募捐了十多万元赈济灾民。北京政府特授予嘉禾勋章，段祺瑞还聘他为高等谘议。

林义顺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1921年—1922年，1925年—1926年先后两届）、潮州八邑会馆主席、英殖民政府农林委员会委员、米粮限制局委员、鸦片限制委员会委员、和平审判官等职。他也热心于当地的文教卫生事业，曾任莱佛士学院和圣安德鲁医院的董事。1919年与陈嘉庚联合创办华侨中学，自任董事会财政。华侨中学在当时是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不少人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林义顺被聘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31年，林义顺再次回国，遍游西北各省，目睹祖国的西北地区宝藏满地而民生凋敝。为谋祖国的富强，他回到南京时，曾详具开发大西北的计划，呈献政府当局。次年1月，林义顺以华侨领袖身份，与陈嘉庚、胡文虎、张永福等人应聘为国难会议委员。同年4月，他抱病出席汪精卫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但会议并不商讨如何抗日救国，而是议论所谓安内攘外方案[(2)]。林义顺大失所望，忧心忡忡地返回新加坡。此后，林曾迭电国民政府，促请抗战图存。

1936年3月初，林义顺回上海疗养，因胃病复发，于21日逝世。国民政府追念其前功，在南京举行公葬，并发公报特予褒扬[(3)]。

主要参考资料

Song Ong Siang：*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London，J．Murray，1923，pp34、364、473、516—517、536。

冯自由：《革命逸史·林义顺事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

(1) 张永福：《南洋与创建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88页。

(2)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记》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83页。

(3) 公报称林义顺早年“参加革命，于宣传主义，筹集捐款，以及维护患难同志，靡不见义勇为，殚诚赞助，光复以后，关怀国事，素志弗谕”。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043号（1936年5月8日）。

林纾

闻少华

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以字行，晚年自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1852年11月8日（清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父亲林国铨客游台湾经商，因不善经营而亏本，家境贫困。林纾靠叔父资助得以上学，九岁入私塾，十一岁从薛则柯学古文辞和杜甫诗。他自幼喜读书，从叔父家藏书中寻到《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苦读不倦；又从旧书摊上买到《汉书》和一些子、史的残本，不几年即积藏书籍三柜，并立下“读书则生，不则入棺”的誓言。十三岁改从朱韦如习制艺，他很崇拜韩愈的文章，对桐城派的文章亦颇喜爱。

林纾十八岁与刘琼姿结婚。其岳父刘有棻是个科场失意的知识分子，但对道学源流等颇有见地，向林纾讲授甚多。翌年，林的祖父、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极度拮据。但林纾刻苦攻读之志不移，并开始作诗，渐有文名，被人目为“福州三狂生”之一。1872年开始在村塾授徒，其后从陈文台学习绘画，入门甚快，颇得陈的赏识。他自称“以画自娱”，数十年来未有间断。其花鸟画淡墨薄色，山水画浑厚淋漓，后者更受人们称颂和喜爱。

1882年秋，林纾在福州参加乡试，一举成名，得中举人。他还想考进士，苦读不辍，但六次入京赴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遂对仕途灰心绝望。

在此期间，林纾先后结识了李宗言、李宗祎兄弟。李家藏书甚富，林纾借阅不下三四万卷，广泛涉猎中国古代典籍。林又认识了高凤岐、高而谦、高凤谦兄弟们，遂与他们及陈衍、周长庚等十九人组

成诗社“福州支社”。诗社诸人以撰写七律互相唱酬探讨，延续达十年之久。林纾之诗以题画诗为上，陈遗石称他“寓意工切，隶事渊博”。林还于1885年向谢章铤学经学，研习汉、宋两代的儒家经典；继又对唐宋小说兴致很高，为他后来译述西方文学作品和自己创作小说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后，林纾对清廷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痛心疾首，在北京曾同陈衍、高凤岐等人联名上书清廷，抗议日本野蛮侵占我国领土的行为。他对海军将士为国牺牲的事迹十分敬佩，曾撰《徐景颜传》加以表扬。

林纾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屡试落第，难以进入政界，但他对光绪帝十分尊崇，视其为一位有为的君主，尤对他勇于戊戌维新变法倍加赞颂。他和友人畅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五十首，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学堂，宣传爱国思想，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只因他始终主张保皇、维新，不能跟随时代前进，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1897年3月，林纾的妻子刘琼姿病逝。中年丧偶，郁郁寡欢。其友人王寿昌精通法文，邀林纾合作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口述、林笔译，速度很快，“口授手追，声已笔止”。小说内容曲折感人，为国人所初见，加上林纾译笔凄婉而有情致，一时风行海内，备受赞扬。初译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继《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林纾又与魏易合作，翻译斯土活撰写的《黑奴吁天录》，记述美国农场主虐待黑奴的故事，震撼人心。此后，林纾又与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人合译法国文学作品，与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人合译美英文学作品，其中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计二十种。

由于林纾不懂外文，仅靠合作者的口述，他不能对原著进行比较选择，因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却译了不少西方二三流的作品，甚至将

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也译成了小说，还出现了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谬误。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属不知。"但是他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轻快明爽，多能传出原著之神韵。尤其是凭其深厚的文学素养，时时能补某些原作之不足，使其译作竟胜过某些原作。林纾一些成功的译作，至今仍具有生命力。惟其于1913年译完《离恨天》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

经过二十余年的辛勤笔译，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达一百八十余种二百七十余册，包括四十多种世界名著，多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被誉为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之嚆矢。他的有些译作，还蕴含着他的爱国热诚。例如他在《黑奴吁天录》的序言中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他又在《不如归序》中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林纾小说不仅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还使近代知识分子有机会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打开了眼界，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无影响。

1906年，林纾应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之聘，任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同时他还继续在五城中学堂任总教习。他取孙奇峰《理学家传》中诸理学家语录，诠释讲解，历时三年编成《修身讲义》两卷。他还应张菊生、高梦旦之请，编选《中国国文读本》，由近代上溯至古代共十卷，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古文选读本。他的古文造诣受到时人的推重，著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其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而另一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则称道林的古文比吴汝纶有过之而无不及，誉其为桐城派的古文大家、"老宿"。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清廷慌乱，林纾亦惶惶不安，于11月偕眷避居天津。翌年2月溥仪被迫退位，林黯然神伤。他对民国新政抵触甚大，对时局深表不满，在《畏庐诗存·自序》中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誓以清举人终其身。1913年4月，林纾往易县清西陵拜谒崇陵（光绪墓），

此后十年先后谒崇陵十次，并曾以半年时间绘成《谒陵图》，又撰《谒陵图纪》，表明他对光绪帝的尊崇和对清室的忠心。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曾征聘林纾为高等顾问和参政。林严词拒谢。他对“洪宪”人物多所不满，曾在“四谒崇陵”后赠梁鼎芬诗中叹息：“眼底可怜名士尽，那分遗臭与流芳。”

林纾对亡清的忠心，博得溥仪及遗老们的赞赏，溥仪曾于1913年岁末特地书“赐”春联一副给林。张勋上演复辟丑剧时，林纾认定“定武（张勋曾被袁世凯封为定武上将军）言尊王，心本异谋逆”，担心张勋此举“孤注一掷”而危及溥仪，故未贸然响应。1918年国会议员中有主张裁减优待皇室经费者，林纾赶紧给参、众两院议员上书，为溥仪分辩说：“少帝无罪，未尝趣召外兵；皇室奇穷，何可遽减经费。”他向议员们呼吁：“留他年皇子皇孙啖饭之地。百凡如旧，一切从优。”在溥仪结婚时，林纾特地精心绘画四镜屏作为贺礼。溥仪题写“贞不绝俗”匾额回赠，林纾受宠若惊，作《御书记》。

林纾的思想日趋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尤表现在崇尚古文、崇尚旧道德，反对新文化运动上。他于1913年5月为京师大学堂文科毕业学生送行作序中，特地勉励大家“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他也十分看重自己的古文成就，批评康有为的赠诗只称赞他的译文而未说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其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林纾以“复古派”自任，挺身而出连续撰文反对。他于1919年初在上海《新申报》上特辟“蠡叟丛谈”专栏，连载其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攻击陈独秀等人。在小说《荆生》中，林辱骂反对孔孟的人是“禽兽”，说他们的言论是“禽兽之言”，幻想有一个“伟丈夫荆生”将反对孔孟的人斩尽杀绝。在小说《妖梦》中，林纾强调纲理伦常的重要性，说“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他尤反对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写信给北京大学校

长蔡元培的信中，说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叛亲蔑伦之论”，被蔡元培逐点批驳。但他仍在《公言报》上发表《腐解》一文，坚持其“卫道”立场，表示愿“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全藏之剖其心肝”。1921年春，他在为其子写帖中仍云“新道德是盗贼的道德；旧学术是保种的学术”。1923年撰《续辨奸论》，继续表白他对新文化运动深恶痛绝，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概斥为“巨奸”。

1924年6月，林纾患病，体质日趋衰弱。他抱病往孔教大学讲最后一堂课，并撰《留别听讲诸子》一诗，诗中云：“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10月9日，林纾终因心力衰竭而逝世。

林纾在1921年七十寿辰时曾作自寿诗云“移译泰西过百种，传经门左已千人”，又说“余年七十，以画赡其家”。他把翻译、教书、作画看作自己一生的主要内容。其实林纾的著述甚丰，除前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主要参考资料

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字行谱记四种》，世界书局1949年版。

林纾：《畏庐文集》、《续集》、《三集》，商务印书馆1923、1922、1924年版。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版。

林语堂

张梁

林语堂，原名和乐，入大学时改名玉堂，又改名语堂。1895年10月1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福建龙溪板仔村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六岁在本村从师启蒙，十岁入鼓浪屿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小学就读。越三年，免费入厦门寻源书院（教会旧制中学）读书。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使林语堂从童年时代起就成为一个热忱的基督教徒。

1912年秋，林语堂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在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中，他除了学习一些中外语文、历史等课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和一些外籍教师的思想观点和生活态度，使林语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1)

1916年秋，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由校方荐举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并兼授圣经课。直到1919年的三年中，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偶尔也在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些关于汉字研究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科学与民主的影响下，他的宗教信念和热情，曾有所削弱和减退。

按照清华学校规定：凡任职期满三年以上的教员，可由校方资助出国深造。林语堂遂于1919年秋赴美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

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林语堂后因经济支绌，于1921年离美赴法，在巴黎华工青年会工作。稍有积蓄后，又于同年夏天赴德，入殷内大学，半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并潜心于中国古代语言学之研究，1923年取得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取道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回国。

林语堂回国后，仍在清华学校任教，并于1923年11月开始，为《晨报副镌》撰稿，发表一些汉语古音韵的研究文章和德国诗人海涅等诗歌的译作。1924年五六月间，还发表过诸如《幽默杂话》、《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等短评。

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林堂语被邀集为该刊长期撰稿人。1925年应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又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教务长。与鲁迅同事，并开始往来。

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以“女师大风潮”为中心的进步学生运动；5月，上海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和鲁迅等人的影响下，林语堂在政治、思想上倾向革命。在“女师大风潮”中，他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曾与反动警察搏斗。同时，在《语丝》、《京报副刊》和《莽原》等报刊上发表《谬论的谬论》、《咏名流》、《祝土匪》等短评、杂文，声援进步学生的斗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参加了对死难学生的吊唁、慰问，并在《语丝》第72期上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文章，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对镇压学生的军阀及其帮凶文人——“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揭露。

1925年11月间，全国范围内革命形势高涨，北京市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打倒段祺瑞执政府，张作霖的地位也发生动摇，“女师大风潮”随之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林语堂和岂明（周作人）倡和，在群众中宣扬西方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主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

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2)]。特别是林语堂把这种“费厄泼赖”精神当作“语丝派”的共同精神来提倡时，就不能不引起鲁迅的警惕。鲁迅曾及时地撰文予以纠正，这就是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发表。

由于鲁迅及时地针砭、教育，以及“三一八”惨案中死难者的血的教训，林语堂对他所宣扬的论调逐渐有所认识。惨案发生后一周，林语堂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不久，又在《打狗释疑》一文中不无内疚地承认：“……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3)]”并连续写了《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通信》、《“发微”与“告密”》等文，主张来一个“打狗运动”，表示要继续讨伐当局势力和“叭儿狗”们的决心。

“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受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即于当年5月携眷返闽，在厦门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秘书，并先后荐请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人至厦门大学文学系任教。年底，因国学院经费问题与校长林文庆意见相左，又因教职员中“现代评论”派势力不断膨胀，虽有鲁迅等进步教师的支持，但林语堂在教务、人事等方面的开展过程中，总感时被“掣肘”，1927年春，终因厦门大学发生学潮而被迫辞职离闽。3月，应陈友仁之请至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林语堂回到上海，应聘为开明书店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发行全国，因以致富。12月，鲁迅在上海接编《语丝》，不久又主编《奔流》、《朝花周刊》，林语堂为这些刊物撰稿。

1928年11月，林语堂写剧本《子见南子》，发表在《奔流》上，此剧对孔子作了嘲讽。同年12月，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鲁迅》一文，对鲁迅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战斗业绩，作了如实的评价。

“四一二”政变后，林语堂所希冀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难于实现，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4)]的政治愿望，也遭到破灭。1931年“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加紧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政策，把国家与民族带进了黑暗的深渊，濒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英勇斗争。但林语堂却游离于斗争之外，不敢正视现实，企图逃避、躲藏。他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涨，采取了“偏憎人家说普罗”[(5)]的态度；他慑于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采取了“胆小只评前年事，才疏偏学说胡卢”[(6)]的畏缩立场。

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杂志《论语》（半月刊）创刊。他在创刊号上明确宣布该刊以提倡“幽默”为宗旨；并宣扬所谓“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7)]的处世态度。

1933年1月，林语堂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对他采取了既团结又批评的态度。鲁迅应约为《论语》撰写过几篇文章，但同时声明，不赞成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严肃地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广大人民求生且不暇，所谓“幽默”文学，在政治上只能起到“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8)]的作用。另外，还多次写信进行规劝，希望林语堂做一些于人民于国家有益的文化工作[(9)]。对于鲁迅的严肃批评和忠告，林语堂漠然置之。

《论语》出至第27期时，林语堂辞去编辑职务（由陶亢德接编），于1934年4月另创刊《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9月又创刊《宇宙风》（半月刊，与陶亢德合编）。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林语堂提倡所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他吹捧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性灵”文学，鼓吹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攻击白话文，反对大众语；纠集周作人、邵洵美等人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后来，他更连篇累牍地发表一些公开反苏反共、攻击左翼文艺

运动的文章。《人间世》第25期上还译载了宋美龄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攻击工农红军“杀人放火”以及吹嘘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战绩”的文章。

《人间世》创刊后不久，鲁迅就与林语堂断绝了关系，并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林语堂进行了批判，揭穿了他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

1936年8月，当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刻，林语堂以著作为名，携家移居美国。就在这一年，林语堂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纽约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大讲所谓“八百年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和所谓“世故”、“忍耐”、“冷漠”、“老猾”是中国民族的“特性”，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作了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林语堂这一行径，受到了国内外革命作家和进步人士的谴责。其后，还在美国出版了一部以1900年后北京一个官僚家庭为题材的英文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并转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1964年，林语堂的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在美国出版。这本小说对中国革命持抵触的态度。

林语堂居美期间，曾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主持该校的“中国讲座”，大肆宣扬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

以后，林语堂长期定居美国。1943年林语堂曾一度回到抗战时期的重庆，曾在沙坪坝讲演，劝告青年学生读《易经》。郭沫若当时以《啼笑皆是》（见《沸羹集》）为题，撰文予以抨击和嘲讽，指出他对《易经》的根本无知与可笑。

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推荐他出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66年6月携家自美返台湾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1972年编成《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6年3月26日，林病故于香港。

---

(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二）》，工爻译，《逸经》第18期。

(2) 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语丝》第57期。

(3) 林语堂：《剪拂集》，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北新书店1928年版。

(4)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三）》，工爻译，《逸经》杂志第19期。

(5) 林语堂：《四十自叙》，《论语》第49期。

(6) 林语堂：《四十自叙》，《论语》第49期。

(7) 《论语》第50期封面题词。

(8) 鲁迅：《〈论语〉一年》，《南腔北调集》。

(9) 鲁迅：《致曹聚仁》，《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版，第615—616页。

林长民

萧良

林长民，幼名则泽，字宗孟，自号苣苳子，又号桂林一枝室主，晚年门栽双栝，亦称双栝庐主人，福建闽侯人。1876年9月16日（清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林孝恂系翰林，曾任官浙江金华、孝丰、仁和、石门诸州县，会医术、习技击，颇能接受西方思想，曾在杭州创办包括国学、西学两科的家塾，并延林纾（琴南）、林万里（白水）分别主讲，促成林长民师从林纾打下国学基础，并交万里为友。1897年林长民考中秀才后，请加拿大籍教师华惠德在家教授英文，延日人嵯峨峙教日文。1901年，林长民与林纾、魏易等人主编《译林》月刊。两年后译《西方东侵史》。1906年赴日本留学，旋回国，入杭州东文学校学习，毕业后再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专业，在日留学时曾获学士学位。林与日本名人中野正刚、风见章等人同班，并担任留日福建同乡会会长；与日本名流犬养毅、尾崎行雄及中国名流张謇、岑春煊、汤化龙、孙洪伊、刘崇佑、徐佛苏、杨度、宋教仁均有交往，为当时法学界知名之士。

1909年林长民学成回国，痛感清廷以伪宪蒙民，痛感国民教育程度低下，决心从事政治教育，以为根本之途，乃却四方之聘，就任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兼咨议局书记长。林厘定学规，革除积习，取得显著成绩。因年少锐进，革除对外县学生入学不平等的陋习，与学校监督意见不合，加上保守分子构谗被迫去职。随后林长民以福建咨议局书记长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各省谘议局会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被推为书记。吁请清廷召开国会，未成，即赴北京与徐佛苏等人组织宪友会，鼓吹宪政，迫使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这时，福建九州二府贤俊汇集闽垣，对林长民被免去法政学堂教务长一事不满，并认为官校腐败，不足以有为，乃决定创设私立法政专门学堂及附属

中学，推林长民为堂长，与官校对抗。一时闻风来学者达数百人。不久，该校升格为福建学院，办学成效显著，受到各方称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林长民在上海《申报》馆任职，被推选为福建代表，与浙江代表屈映光同赴南京，至下关车站遇刺未中。林参加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林长民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参事。

1912年1月，他与张謇、程德全等人组织统一党，任干事。5月共和党成立，亦任干事。1913年被选为众议员。5月兼任袁世凯支持的进步党政务部部长，后被选为众议院秘书长，兼宪法起草委员，参加宪法研究会，在天坛议宪。他在北京从事政务活动的同时，仍兼任福建私立法政学校校长，决策校中大事，筹集巨额资金，维持学校日常开销。

1914年，林长民任袁世凯总统府办事机构政事堂参议，为八名参议之一，参与审议法令等活动。同年5月任袁世凯立法机构参政院代理秘书长，协助院长黎元洪审议重要政务。1915年任徐世昌国务院参议，被袁世凯封为上大夫。同时任法制局局长，未几辞职，仍任众议院议员兼进步党政务部长。其间，林赴欧美考察政治教育，以考察所得，改造福建法政学院，力谋扩建为福建大学。

1917年7月，林长民任汪大燮内阁司法部总长，11月因内阁总辞，连带去职。1918年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1919年任国际联盟同志会理事，注视巴黎和会动态。当中国在和会上主张收回山东利权的交涉失败后，他撰《山东亡矣》一文刊于北平《晨报》，较早报道了这一令国人愤怒的消息，引起北京学界激愤，遂掀起五四运动，成为“民族觉醒的始基”。1920年到伦敦，与梁启超、汪大燮组织讲学社。1921年5月林被推为中国国联同志会首席代表，出席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并发表演说，10月回国。

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6月，补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3年反对曹锟贿选，避居上海。1924年撰《敬告日本人》小册子，批判日本军阀侵华谬论和黩武主义，并将私立法政学院改为私立福建大学，自任校长。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是年冬，林任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会员。1925年5月任段祺瑞执政府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1月，驻军京榆的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反奉密约”后，率七万大军倒戈反奉，郭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郭经李孟鲁之介绍，礼聘林长民为秘书长，出关相助。林应召于11月30日晚乘郭所派专车秘密离开北京赴锦州会见郭松龄，并随军至新民县苏家屯。12月24日，郭率部进攻白旗堡遭伏击，大败，全军尽溃，郭氏夫妇被俘后遇害，林长民在乱军中被流弹击中，遂遇难于小苏家屯，时年五十岁。

林长民在北京期间，曾任中国大学校长，创办亚洲文明协会；林死后其家属仰承遗愿，将所藏书万余册捐赠私立福建大学图书馆。林生前著有《铁路统一问题》、《敬告日本人》等著作。

主要参考资料

梁敬錞：《林长民先生传》，《传记文学》第7卷第2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5年8月版。

田子渝、刘德军主编：《中国近代军阀史词典》，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民国丛书》第1编第86辑，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

凌鸿勋

娄献阁

凌鸿勋，字竹铭，祖籍江苏常熟，1894年4月15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十）生于广州。凌家先祖中有数人为官。其父凌佩秋多年执教，擅长经史，曾得中乡举。凌鸿勋五岁起识字，稍后读“四书”、“五经”，尤爱好《孟子》、《左传》。他家贫寒，父亲曾书“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1)]，予以勉励。

1905年初，凌鸿勋考入广州府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其前身为越华书院，先后由名儒陆尔奎、丘逢甲等人任监督，学制五年，课程除国文外，还有英语、数学、地理、博物诸科。凌在班上年龄最小，开始尚不知用功，两年后学业猛进，跃为全班之冠，1909年毕业时，名列优等。翌年春参加复试（相当于全省会考），被奖以优贡。父亲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毕五年蛾术，起万里鹏程。”

1910年夏，凌鸿勋由广东省官费送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属邮传部，原名南洋公学）就学。先入附中四年级补习英文，一年后进土木科学习。民国成立后，上海高等实业学校改名南洋大学（一年后又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隶属交通部，监督（后称校长）唐文治比较开明，拥护辛亥革命与共和政体，并极力提倡各种新学。凌在该校读书五年，刻苦勤奋，从未请假缺课，成绩突出，每个学期均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时获第一名。此外，他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一度任学校体育会的书记；又两次参加国文会考，得银牌、金牌各一枚；并发起南洋学会，印行南洋学报，被推为总编辑。

1915年，凌鸿勋自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得校长唐文治推

荐，由交通部派往美国桥梁公司实习，一道赴美实习的还有同班同学陈体诚。他们先后在费城桥梁工厂和纽约总公司参与绘图、设计、厂内装配、工地建筑等项实际训练。工作之余，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两门功课。这期间，他还两次参加美东中国同学会年会，结识了黎照寰、胡适等不少中国留学生；又同张贻志、吴承洛诸人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学会（后迁回国内，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1918年6月，他因父亲病故归国。

同年7月，凌鸿勋抵北京，由交通部派任京奉路唐山段工务员。1919年，调回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不久补为技士，并署副科长。考工科主管各条铁路的工务、机务、电务及材料的购备等工作，凌在工作中开始接触全国铁路的技术事项。当时交通部为将先前向英、法、德、日等国借款修筑之各路的技术标准、运输规章及会计制度加以统一，特设一个铁路技术委员会，由交通部技监詹天佑任会长，凌奉派兼任该会委员。他在这项工作中得以窥知各路建设和运用的概况，同时常偕外国顾问赴各路实地视察，获益甚多。

1920年2月，凌鸿勋应唐文治之邀，南下至母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桥梁设计、混凝土学等数门课程。同年秋，唐因病告假，凌奉命代理校务。不久，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及交通传习所合并成立交通大学，他被任为筹备委员和沪校副主任。

翌年春，凌鸿勋复返北京，继续在交通部任职。5月出任京汉铁路桥梁工程师，专办加固桥梁事宜。由于京汉铁路黄河铁桥屡次出现险情，交通部决定重修，特设黄河新桥设计审查会，凌兼任该会工程师，协助美国顾问华特尔博士（Dr．J．A．L．Waddell）进行审核计算等项工作，后因经费无着而作罢。1922年3月，凌受交通部派荐任技正，仍为考工科副科长，并兼任铁路路线审查会会员，曾赴上海接洽修建沪杭甬铁路曹娥江桥及前往踏勘龙烟铁矿专用线，复勘京奉铁路锦朝支线。同年6月，鲁人高恩洪接掌交通部，部中凡广东籍者

均被免职，凌也是其中之一。凌鸿勋遂举家南移上海，帮助华侨办理实业与地方建设工作，同时着手编撰《市政工程学》和《铁路工程学》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3年9月，凌鸿勋再次至母校任教。时成立未满一年的交通大学又分为唐山、上海两校，沪校改称交通部南洋大学。他初任教授，自1924年12月起接任校长。他办学认真负责，力求保持学校固有传统，“程度维持日渐提高的水准”[(2)]。凌十分重视教学秩序，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严格考勤，按期考试；但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时，曾一再劝阻学生参加罢课和上街游行的运动。他对学校建设甚为热心，为筹措经费四处奔走，迅速建成新体育馆、游泳池和疗养室，并着手筹设工业研究所。1926年10月，为纪念建校三十周年，凌举办了一次工业展览会，除陈列各种机械仪器外，还铺设了一条小铁路。凌任南洋大学校长两年多，行政上隶属于北洋政府交通部，1927年北伐军进占上海前，他不愿为保持校长位置去与南方接洽，只想到时候再行引退，以全终始。5月，该校由李范一接收，凌交卸后即离校，在家从事编写《桥梁学》及《工厂设计学》等书。

同年秋，凌鸿勋应邀到广西梧州任市工务局长。此时桂省正值休养生息，颇着力地方建设。凌在梧州一年多期间，努力进行市政改良和建设：首先拆除全部旧城墙，开辟和扩展了几条主要马路，全铺柏油路面，同时建有下水道系统；其次是整顿电厂，安装了新发电机，由仅能夜间供电改为全日供电；再是着手兴办自来水厂，以电厂收入作抵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器材。同时，他很注意与学术界的联系。桂省在梧州筹设广西大学，凌被邀为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他还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工程师学会梧州分会。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新设铁道部，以孙科为部长，并聘华特尔博士任顾问。凌鸿勋应召于1929年春离梧州到南京，任铁道部技正，参加旧有线路的整理事宜。他奉命组织平汉路桥梁勘查队，逐一检验北平到保定间二百八十余座钢桥。7月，凌被派任为陇海铁路

工程局长，负责赶修灵（宝）潼（关）段工程和筹划潼（关）西（安）段工程。陇海路原系借比利时银行款项修筑的项目，因受战乱影响长期停工，此时政府利用比利时退还的庚款购买了一批材料，重新复工。凌到职后立即沿线视察，确定在潼关城下凿一千零七十米长的隧道，解决了铁路如何通过潼关的难题。10月，蒋（介石）冯（玉祥）冲突加深，西北军东进，唐生智亦在郑州通电反蒋，灵潼段工程难以进行。凌遂携带文件、账册暂回南京铁道部，在工务司代理工程科长职。

1930年7月，凌鸿勋奉铁道部与工商部派遣，偕铁道部工务司帮办孙谋等人赴欧洲，考察比利时、德国、英国有关机车车辆、钢轨、桥梁、号志等制造情况，并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三合土会议、工业教育会议和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应用力学会议。嗣后凌又去美国出席第六届国际道路会议，历时五个半月，于12月中旬回国。

凌鸿勋回国后，重返西北陇海线主持灵潼段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至1931年12月终于竣工通车，使陇海路进入了陕西的大门。前此铁道部已决定兴筑潼关至西安间的铁路，并另设潼西段工程局，任凌为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该段工程工款全部自筹，不受过去陇海铁路向比利时借款合同的约束，完全由中国人设计、修建，不雇用任何外国人。测定路线后，即于1932年上半年首先在潼关至华阴间开工，但因工款不济，工程进展迟缓。其时，凌对开发西北颇为热心，曾与陇海铁路管理局长钱宗泽一起发起陕西实业考察团，亲赴秦岭、安康、汉中、宝鸡等地察看农、林、矿产、交通的情形，筹谋铁路通达西安后如何进一步推动陕西建设的问题。

同年11月，凌鸿勋奉调任粤汉铁路株（洲）韶（州）段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粤汉路由广州至武汉全长近一千一百公里，早在清末即已开工，南北各修若干公里，而中间株洲到韶州共有四百五十六公里之遥，停工长达十三年之久。铁道部为了及早接通这一南北重要干线，决定借用英国退还的庚款作路费，遂于1933年7月正式同中英庚

款董事会达成协议，限期四年修成该段。凌鸿勋受此重任，很快赶到工地，先用半年时间修建了韶州至乐昌间五十公里路程，然后南北对向施工。为便于指挥，他把工程局由广州迁到衡阳，全力以赴，专心工事，并提出“一人做两人的事，一日做两日的事，一个钱做两个钱用”[(3)] 的口号。他对工程质量也很重视，始终严格按照颁布的技术标准之最新规定行事。株韶段在湘粤边界处有一百多公里为南岭山脉，系长江和珠江流域分水岭，地形复杂，经过技术人员细心选线，最后确认尚需开凿大小山洞十六座。凌主持株韶段有责有权，他带领全体工人和技术人员，想方设法以最好的技术、最快的速度、最经济的方法进行兴筑，终于提前一年于1936年4月完成铺轨任务，9月1日正式通车，对沟通湖广和促进沿线建设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军事运输都有重要作用。

1936年，粤汉全路管理局成立，凌鸿勋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他除进一步整理株韶段路基及补充有关设备外，又在广州将粤汉路和广九路接轨，使两路客货车可以直达通过。同时，凌还兼任湘桂铁路工程处处长，筹划修筑衡阳至桂林铁路，以便使广西与粤汉路相连。他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测量队，出发勘察路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对日全面抗战开始，日本侵占平津不久，又先后占领上海、南京。鉴于沿海港口已被敌人封锁，必须在内陆开辟国际交通线，铁道部决定将湘桂线由桂林延长到镇南关（今友谊关），分衡（阳）桂（林）、桂（林）柳（州）、柳（州）南（宁）、南（宁）镇（南关）四段加紧施工。凌鸿勋为南镇段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师，翌年夏又兼管柳南段，后桂柳、柳南两段合并为桂南工程局，仍由他任局长兼总工程师。正当工程顺利进展之际，不料广州、武汉于1938年10月相继沦陷，广西形势转急，日军不断派飞机至南宁、柳州一带骚扰。凌多次遭到空袭，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所属技术人员和工人日夜赶筑，南端至1939年10月在国境之内修竣八十公里抵达明江，北段到1939年12月迅速铺轨到柳州，使抗日军

队能沿新修之路源源南下迎敌。

1940年1月，凌鸿勋调至成都，任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在他主持下的六个测量队，经过一年勘测，最后定线由天水到成都全长为七百五十公里；同时并奉令勘测成都至康定以及至西昌的线路。但由于无法筹措巨额筑路经费，各种材料亦难以获得，因此未能兴工，大量资料皆束之高阁。

同年底，凌鸿勋被派兼任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移居天水。半年后改任西北公路工务局局长，统管陕、甘、宁、青四省四千余公里公路的修筑维护、行车监理与养路费的征收，凌曾走访西宁、宁夏、兰州、武威、哈密等地接洽有关事宜。为了减少夏季山洪暴发时交通被阻的状况，他还主持修筑了一些永久性的桥梁。

1942年1月，陇海线宝（鸡）天（水）铁路工程局成立，凌鸿勋仍任局长及总工程师，同时继续兼管西北公路事，稍后又被派为甘新公路会办。宝鸡至天水约一百五十公里，地处渭河狭谷，线路曲折弯绕，工程艰巨，须开凿山洞一百二十余座。时值抗战相持阶段，筑路的经费、材料和其他物质条件都十分困难。重庆政府当局不能如数拨出资金（甚至一度下令停建），只能“就款计工”。在人力物力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工程时断时续，一直拖延到1945年底才勉强通车。这期间，凌还派队测量天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兰州至宁夏的铁路线，并进一步勘测规划兰州到新疆乌苏的全线铁路，亲至中苏边界霍尔果斯（今霍城）进行视察。时以罗家伦为首的西北建设考察团组成，凌作为考察团一员陪罗等人到新疆、甘肃、宁夏许多地方，对发展西北交通提出了不少建议。

凌鸿勋自1929年至1945年从事筑路工作达十六年，经手兴建新路约一千公里，测量路线约四千公里，管办公路约五千公里，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公路建设，尤其是在开发西北、西南交通事业方面，成绩显著。他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程界享有相当声望，曾被选为

中研院评议员、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美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等。

1945年2月，凌鸿勋升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先后在部长俞飞鹏、俞大维手下分管铁路、公路、电讯等行政事务。抗战胜利前后，凌积极筹划修复铁路和恢复交通之事。在负责督修津浦路的过程中，他曾多次奔走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并亲自沿路查察。1946年上半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军事调处”，凌曾代表国民党政府方面参加有关交通问题的谈判；同年11月，他又当上了国大代表，涉足所谓制宪活动。

此后，凌鸿勋在交通部的职责逐渐加重，常代表部长出席行政院会议，曾去东北和台湾视察交通实况，以谋解决交通统一管理等问题；又赴欧出席在瑞士召开的国际铁路协会第十四届会议，被推选为大会副会长和第四组出席，会后并访问英、法、比、意诸国。1949年1月，他改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3月下旬，因国民党政府改组而辞职。

国民党统治集团自南京撤往广州后，凌鸿勋亦暂居广州，旋至九龙，一度在华侨工商学院任教。同时替王云五筹办的华国出版社翻译《科学与战争》、《现代武器与自由人》等书。1950年10月，应傅斯年之邀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又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1951年并充“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后改称“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凌转业石油，任台湾“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连任二十年之久。1971年退休，1982年8月15日病逝于台北。

凌鸿勋撰有中文著作十六种、英文著作两种及短文多篇，主要著作有《中国铁路志》、《中国铁路概论》、《詹天佑先生年谱》、《十六年筑路生涯》、《七十自述》等。

(1) 凌鸿勋：《七十自述》，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4页。

(2) 凌鸿勋：《交通大学十年忆旧》，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5期，第23页。

(3) 凌鸿勋：《十六年筑路生涯》，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40页。

刘柏森

朱复康

刘柏森，原名树森，字柏生，以字行，江苏武进人。1869年5月2日（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祖父刘养浩，是个秀才，教书乡里。父亲刘凤书经营商业。刘在兄弟六人中行四。长兄刘树屏，字葆良，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弟刘厚生（垣），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后随张謇办大生纱厂。从兄刘可毅，光绪壬辰会元，庚子义和团起事时，在河北通县被杀。

刘柏森十八岁时在家乡设馆授徒，二十五岁那年到上海，经人介绍在德商信义洋行工作。二十九岁入美商茂生洋行从事机器军械部门的贸易推销业务。1899年秋末，刘赴日本长崎、神户等地考察煤产运销。回国以后，欲自设煤号运销东瀛，未及实行。翌年受闽浙总督许应骙及福州将军善联的委托，向外国订购大炮二十门，价银三十余万两，赚到佣金数千两。接着善联又汇银三千两，托他在沪代办进呈慈禧太后的贡品多种，其中第一号贡品名“万年青”[(1)]。由于名称的吉祥，深合慈禧之意，刘也因此获得了善联的赏识。于是刘柏森怂恿善联和他合股投资，开设慎泰恒字号，经销烟煤和兼营进出口贸易，获利甚厚。刘旋即从事股票投机，先后获利二三十万两。

1904年，刘伯森与盛宣怀合资创设三星香烟公司。开业以后，因受英美烟草公司的排挤，勉强维持了四年多，终于宣告停业。1908年刘与粤商刘问刍、唐少义、夏瑞芳等人组织贸易集团，出资收买怡和轮船股票，意图将怡和轮船公司从英商手中收回自办，旋因粤商中途变计售出所收股票，事遂未果。刘柏森因此亏蚀三十余万两，以产相抵，尚有不敷，所设慎泰恒号因而宣告停业清理。

刘柏森于1909年重新集资设立宝兴长号，仍旧经营燃料、纱、布等业务，并在天津设立分号。1911年刘与张謇集资组织大维公司。通过湖广总督瑞澂的关系，租办湖北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在沪招来女工及机匠等数千人，先从纱、布两局着手。7月开车，刘任总经理[(2)]，不久，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刘将所带机工临时乘轮避往上海，纱、布局遂为前租办人粤商韦紫封以应昌公司名义接办。迨刘率领机工人员赶回武汉，已经来不及，官司打到北京，终于无法收回。

刘伯森返回上海，继续经营宝兴长号。1913年他与北洋政府交通部订立阳泉白煤经销合约，运沪销售给日本用户，仅三井洋行一家年销就达十万吨。通过这些经营，刘又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1915年至1918年间，刘先后租办了伦章造纸厂改名为宝源纸厂，租办了苏州苏纶纱厂改名为宝通纱厂，租办了裕通纱厂改名为宝丰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一些国家在战事期间生产缩减，刘柏森所办各厂连年获利颇丰。至1919年棉纺业盈利益厚，刘所经营的宝通、宝丰两纱厂日产纱百余件，每件可盈利四五十两，当时有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3)]。刘氏至此获利既多，更锐意力谋进取。

1919年4月，刘伯森又在上海创设宝成纱厂，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纱机四万锭，至下半年开工。同年12月又向慎昌续订纱机六万锭，创设宝成第二厂，1921年才全部开车。当时棉纱的盈利高峰已经过去。然而刘所经营的其他纱厂和纸厂，仅在1920年就获利达三百余万两。这使他热衷再建新厂，于是续向慎昌订购纱机五万锭，在天津设宝成三厂。又向日本三菱公司收买在上海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改名为宝源纸厂东厂，把原来的宝源纸厂改为宝源西厂。至此，刘主持经营的企业，已有五个棉纺织厂和两个造纸厂，成为上海颇有实力的资本家。他花十余万两购进了上海有名的“愚园”作为住宅，请名画家陆廉夫绘“愚园家庆图”以志其盛，又在北京香山建造“玉华山庄”，费银二万余两，作为别业。这一时期，可说是刘柏森的全盛时期。

20世纪初期，刘柏森就约集商业界人士发起过商学会，“欲合群

智群力与外侮相抵抗，勉为自存之计”[4]，继又发起改组了上海总商会。1917年他和祝大椿、荣宗敬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目的为联合同业抗御外资侵略。但是好景不长，刘所经营的企业灾祸沓至。宝丰纱厂和宝源东厂相继遇到火灾，厂房、机器、原材料等毁损颇重。刘在创办天津宝成三厂时，所订购之纺机五万锭，及向英商订购的两座发电机之价款，未曾结汇，战后镑值汇价在短期内大幅度回升[5]，因此损失达二百余万元。而英商通用公司却不守信用，以旧机充新，为此刘柏森向法院提出起诉，涉讼经七年之久，以致耗费不赀[6]。

1922年秋初，长江南北受到大风暴雨袭击，棉花歉收，棉价暴涨，形成了花贵纱贱的局面，上海纱价从1919年的每件银二百两跌落至一百二十四两[7]。影响所及，上海遂有宝成等十一家纱厂停开夜班，减缩生产。刘柏森等人为了维持纱价，通过“纱联会”决议，自1922年12月18日起各厂停止工作四分之一。这是中国棉纺工业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生产的集体行动。可是这个决议并无多大效果，因为外商纱厂根本不受这一决议约束，反可坐收其利。

在纱价不断下跌而原棉市价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刘柏森最先仿效日厂的办法，掺用印度棉花，但也无法挽回颓势，至1924年末，纱业萧条达于顶点，宝成营业愈感困难。刘柏森从经营商业起家，带有较大的投机性和冒进性，不重视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技术改进。更由于宝成连年扩展，营运资金早已不敷周转。早在1921年冬，刘就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举借厂产押款日金五百万元，经过几年的盘剥，负息越来越重。至1925年2月欠东亚兴业本息五百三十万日元，无力偿付，终于被迫将宝成第一、二两厂拍卖，为日商日华纺绩株式会社购去，改为喜和第一、二厂（1931年后又改称为日华第五、六、七厂）。

刘柏森在天津的宝成三厂，因为所欠慎昌借款未能清偿，开工后暂归镇昌洋行经理所有。刘所租办的苏州宝通纱厂，也因花纱比价采

算不利而停工，之后因无法筹集资金复工，只得于1926年退租。

至此，刘柏森所经营的棉纺工厂几乎完全丧失。他过去办厂，一再标榜为了抵御外货的侵入，而他所手创的几个纱厂企业，几乎全部为外商所吞并。经此失败后，晚年意志消沉。由于棉纺厂所需资金较巨，他已无力经营，只能经营造纸厂，先把宝源东西两厂改组为天章纸厂。1934年又租办了徐家汇的源泰纸厂，改名森记纸厂。

1931年9月，刘柏森另组大同公司，向中国、浙江兴业和上海三家银行借款，用以偿还宝成三厂的慎昌欠款，并亲自赴津解决，将厂收回自营。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市场丧失，天津纱销呆滞，营业困难，虽经勉力维持到1935年，仍被迫停工。宝成三厂所欠中国、浙江兴业、上海三银行的借款，利息滚利益重，终于由债权人拍卖，为日商东洋拓殖会社和大阪伊藤忠商务会社所合组的天津纺绩会社购去，1937年改名天津纱厂。上海天章纸厂受津厂影响，浙江兴业银行不允继续贷款维持，亦只得停工清理偿还债务。

刘柏森至此债务丛集，经济艰窘，仅赖森记纸厂盈余维持生活。

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刘柏森益感老境颓唐，常常回忆往事，不胜感慨。1940年5月患胃癌，12月4日病故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刘氏宗谱·刘柏生先生年谱》（1869年—1921年刘柏森自订，1922年—1940年其子刘卓勤补订）。

刘厚生：《先兄柏生公墓志铭》。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会议录》（1917年—1926年）。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版。

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访问谈话（1959年7月）。

《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张松樵回忆录》（1957年5月）。

前宝成三厂厂长兼工程师陆绍云访问谈话（1980年6月29日）。

---

(1) “万年青”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的草本植物，可供观赏，根茎可入药。

(2) 据《刘柏森年谱》，张謇任大维公司总经理，刘任其副。另据湖北纱布局协理张松樵的回忆和其他的文献，都说刘任总经理。

(3) 据1959年7月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访问谈话。

(4) 刘树森：《序六》，《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版。

(5) 中国银两对英镑的汇价，1920年2月最高价为九先令三便士，暗盘还可多结七至八便士，而同年12月银两的最低价为三先令一便士，高低差距颇大。时人称为“先令风潮”。

(6) 据前宝成三厂厂长兼工程师陆绍云访问谈话（1980年6月29日）。

(7) 据前华商纱厂联合会议董聂潞生访问谈话（1959年7月）。

刘半农

娄献阁

刘半农，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农，号曲庵，后以字行。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江阴县。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

刘半农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1904年入本城翰墨林小学，1907年入常州府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辍学。

刘半农离开学校后，江阴已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其弟天华入团进行革命活动，刘半农亦“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1)]，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

1912年刘半农去上海，先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1913至1916年又任中华书局编辑员。居沪期间他专心从事翻译和创作，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才子佳人小说。鲁迅说刘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也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人物，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之邀赴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此时陈和胡适等人发起了革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刘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夏，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了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符号等主张，尤其强调“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

学之窠臼”[2]。刘认为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脑，做小说要有“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或“就所见世界为绘一惟妙惟肖之小影”的本领；写诗“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3]。他斥责那些专讲声调格律、拘执平仄的诗为假诗，为虚伪文学，与虚伪道德相互推波助澜，在社会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1918年春，为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好地同旧派作战，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轮流编辑，由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旧派的各种谬论，再由刘写《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从正面逐条驳斥守旧顽固派的观点，尖锐地指名批判了林纾。另外，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称赞。鲁迅肯定刘的这种斗争勇气和首创精神，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4]。

当时刘半农在北大教授应用文，讲中国文法等课，颇重视实用及反对八股程式，发表有《应用文之教授》，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一书。他还努力创作新诗和进行征集歌谣的工作。他的白话诗、无韵诗写得很好，颇受群众的欢迎，如《学徒苦》、《卖萝卜人》和《叫我如何不想她》等，语言明快，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性，一度广为流传，后大部分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里。刘在征集歌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年内收到了几千首，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一百四十多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颇为人们所注意，后在北大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发表过许多首。

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活跃的，但作为小知识分子，也有局限性，1918年9月写作的《作揖主义》一文，就表现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消极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快便离开运动转向专搞学术方面去了。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为北大代表出席会议，被推选为会员。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意见。1920年5月国语会开第二次大会时，组织了一个国语辞典委员会，他是该会委员之一。

会后不久，刘半农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出国前他本想同时研习文学和语言学，但到了国外，觉得二者不可得兼，经过再三考虑后选定了实验语音学。由于他能刻苦攻读和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21年10月，刘写了《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文。那时国语学界有“国音”、“京音”两派，他主张“国音乡调”，即希望“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5)]。刘半农不同意以北京音调作统一的标准，认为只要达意，字调可以不管，任其带有家乡口音。

1922年冬，巴黎大学准许刘半农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1923年刘撰《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ㄗㄘㄓㄔㄙ四母之结果》两文。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作，除介绍有关语音知识和实验方法外，主要记录了他邀约侨居国外的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十二个地方的华人进行实验的结果，并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1925年春，刘又用法文写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两书当做论文提出。另外他还发明有“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所谓刘氏尺）等测算语音律的仪器，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刘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之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同年秋刘半农到北京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除在校讲授语音学外，同时更努力从事学术研究。他与魏建功商定了一个调查方言同音字的计划，着手收蓄方音等工作，并

发起“数人会”研究国语罗马字。

1926年刘半农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又兼任师范大学讲师。他曾拟定了一个精细周到的编纂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提交北大研究所，但由于经费短绌，根本无法实现。6月起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约半年时间。11月撰《打雅》一文，节录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此为他编写辞典的最初尝试。同年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来华，同中国学术团体订约，共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刘为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刘所译《茶花女》剧本也于这年出版。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为表示对教育部长刘哲的不满，刘半农辞掉了国立各校讲席。10月北新书局被反动当局封闭，《语丝》也被迫停刊。刘半农、周作人因与北新书局、《语丝》杂志有密切关系，曾一度避难于友人家。

1928年春，东方考古协会在日本东京开会，刘半农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出席。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还是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年底，原国语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刘与黎锦熙、钱玄同等人都是该会委员。翌年，刘又加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编纂员。

1929年春，刘半农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同年夏，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0年5月，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由于他渐据要津，“五四”时期的那种热情也已经消失。因此他对女院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不同意学生参加群众运动，反对学生互称“密斯”，并布告禁止学生入公共舞场，颇引起了社会上的非议，鲁迅也很反感，“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6)]。

1929年至1930年间，刘半农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在北大布

置起了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白涤洲等人协助下，用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做材料，记录了七十多处方言。1930年夏，他们又借河北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开办之便，记下了河北各地的读音。他们先后调查方音达二三百种，在此基础上由刘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音标总表》一册，同年还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刘又着手鉴定故宫所藏乐器的音律，并进一步把“刘氏音鼓甲种”和“声调推断尺”改良为“刘氏音鼓乙种”与“最简音高推断尺”，使研究测算大大节省时间，也更加准确。

1931年夏，刘辞去兼职，专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刘半农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一文，顺着官方意思，表示赞成反日救国，抵制日货，但反对游行示威呼口号，要人们照常进行所谓的正业，并说“所谓不抵抗，实在只是不能抵抗”[(7)]，主张暂时忍辱求全、卧薪尝胆，准备将来去和敌人拼死活。“一二八”抗战之后，他的态度略有改变，在《与张溥泉》一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行为有所批评。

在这前后，刘半农主要是搞语音学等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了《释吃》、《释来去》诸文，1932年写成的《“一”字稿本》达三百多页。此外又撰《北平方音析数表》一文，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用六位数字表示一个字的切音，这可说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

1933年5月，刘半农编成了一部《中小字典》，并附有他自己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后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暑假，他曾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乐舞造像。同年冬，刘立意给名妓赛金花作传，与商鸿逵一起邀赛聚谈十数夕，草稿写成一半，后经商续编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与此同时他还常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致使鲁迅为之长叹。

1934年，刘半农发表有《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瑞典地理学会为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岁生日，向刘征文，刘准备写一自己专门研究的东西来纪念斯氏，遂利用暑假时间，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北地区方言。刘与白涤洲等一行五人，自6月19日从北平出发，先往包头，中经归绥、百灵庙、大同，最后到张家口，7月10日回抵北平。他们在短短二十余日内，跑遍数十县，除记录方音，还收集了不少民歌，成绩很大。但刘不幸染上了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去世。刘在世时，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著作大部分收在里面。

---

(1)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印行，第300页。

(2)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 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第3卷第5号。

(4)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4、75页。

(5) 刘半农：《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半农杂文》第1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6月版，第139—140页。

(6)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6页。

(7) 刘半农：《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半农杂文二集》，第248页。

刘成勋

魏煜焜

刘成勋，字禹九，四川大邑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父刘朝玉（号荣庭），以经营纸张、蜡烛为业，家境小康。刘成勋在青少年时，入武备学堂速成班。四川总督锡良调任云贵总督时，刘成勋等一批武备生被带去担任军职。后锡良推荐刘成勋到东北赵尔巽幕下任职，因军功升至营长。辛亥革命时，刘成勋率全营官兵参加了奉天城（今沈阳）独立战斗。

1912年3月，刘成勋自东北回四川，被武备学堂同学第四镇统制刘存厚任为第四镇参谋长。7月，刘成勋随四川都督尹昌衡出征西藏，所率支队官兵左臂上都佩戴“勋”字袖章，称为“勋字营”。刘在边疆作战调度有方，战斗勇敢，收复失去各县，立功边陲。

1914年，刘成勋被川边镇守使张毅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他奉命围剿边军营长陈步三之叛乱，缴获枪数百支，大炮数门，军威大振。1915年初，刘成勋率部开往前方之际，陈步三复叛，挟忿戕官，袭占打箭炉，刘因此受到褫官、戴罪立功之处分。后得张毅谅解，复任讨贼军总司令，于3月13日率部与叛军鏖战一昼夜，擒毙陈步三部官兵二百余，夺获一批军械，打箭炉完全恢复。刘成勋受到嘉奖，得赏银二万两。嗣后刘会同陈遐龄部，在炉城一带全部肃清陈步三余部。

是年12月，讨袁护国军兴，刘成勋与谭创之、刘国孝等人在雅安响应。时刘成勋任刘存厚第二师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左翼总司令，率部随蔡锷、刘存厚转战于泸州、纳溪间，出力颇多。1916年10月，北京政府授予刘成勋三等文虎章，11月晋给二等文虎章。

1917年4月，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为争夺川省政权而诉诸武力，

刘成勋之第一混成旅驻彭山，奉刘存厚命对眉州激烈战事驰援急救，协同第三步兵旅旅长舒荣衢部，经数日激战将滇军击溃，即驻新津、双流。7月，刘存厚与黔军戴戡之战事又起，刘成勋率部进驻成都青羊宫、草堂寺一带，迫使黔军退出成都。在驱逐客军之刘罗、刘戴之战中，刘成勋率部奋勇作战，为刘存厚立下战功。

1918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兼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成勋得任第二十一师二十二混成旅旅长。但不久刘存厚被熊克武打败而撤向陕南，刘成勋率部留驻川中，观望局势。2月18日，他偕同刘湘等人通电共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进驻成都后，刘成勋接受熊所委之川军第四师师长，驻新津。

企图霸占四川的唐继尧，见到熊克武实力日益壮大，遂命令滇黔军联合部分川军，于1920年5月发动倒熊之战。同年秋，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委但懋辛、刘湘和刘成勋为第一、二、三军军长，分路向驻在成、渝两地的滇黔军进攻。但懋辛、刘湘两军作战甚力，终将滇黔军逐出川境，但刘成勋佯为拥熊，实则按兵不动，冀部队坐大，控制川局。是年7月，刘成勋接受广东军政府委任帮办四川军务。

嗣后，熊克武被联军打败，退出成都，倒熊各军推吕超为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未参加这次战事，只得事后对吕表示亲近，所部得以仍回原防新津驻扎，实力丝毫无损。8月，熊克武联合退驻陕南之刘存厚组织靖川军入川，反攻倒熊联军，几经战斗占领成都，刘成勋立即加入靖川军行列。刘成勋虽未参加倒熊战争，但熊克武仍任他为第三军军长兼成都卫戍司令。12月30日，刘又接到北京政府委任为建昌镇守使，未到职。

回川之刘存厚军驻成都附近东路一带，与熊克武军渐生龃龉，愈演愈烈。1921年2月，熊克武与刘成勋、刘湘联名通电刘存厚之罪状，川战又起。刘成勋奉命率部由西路进攻，但他虚张声势，只在新

津、双流至成都间布置重兵阻止刘存厚部西撤，并未接战。而在刘存厚被逐之后，他亦分享战胜者之利，可谓名利双收。由于在几次军阀之战中，刘成勋大多圆滑应付，坐观成败，壮大实力，在川军将领中绰号“水漩”，时人称之为“刘水公”。

1921年6月，四川各军将领集会共推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在这次会议中未被举任新职，郁郁不乐。8月，川军组织援鄂军，刘成勋以边防重要为由，未出一兵一卒。后援鄂军失败，刘未有任何损失。

1922年7月，第一军熊克武、第二军刘湘之战爆发。熊克武为增强实力，联合第三军共同作战，刘成勋被推举为临时总司令。刘就职后坐镇成都，通令邓锡侯、石青阳、赖心辉、田颂尧、刘斌各师，会攻第二军驻地泸州、重庆各地，将刘湘打得溃不成军。刘湘败后下野回籍，刘成勋表示绝不投井下石，通令沿途驻军妥予保护。10月，刘成勋被四川善后会议推为川军总司令，并以总司令名义暂摄民政。11月13日，刘又接受北京政府晋给一等文虎章。12月复被四川省议会推举为临时省长。其时刘曾派代表去上海谒见孙中山，与南方政府发生联系。孙中山复电、函勉其舍弃武力，趋向实业，为国家立不朽功业。但刘认为川中群雄竞长，势非有强大军力做后盾不可，进而谋政治权力，因而对孙中山忠告未予置理。

刘成勋虽然一时炙手可热，位高权重，但并不能控制全川各派军队，而军阀之间是莫能相安的。刘存厚之旧部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因收编何金鳌部引起纠纷，刘成勋不满陈之所为，以至于1923年1月演变成熊克武军、刘成勋军、赖心辉边防军联合对付刘存厚旧部第三师邓锡侯、第七师陈国栋和第二十一师田颂尧之战。战事初期，刘成勋方面势众力大，尤其是4月初赖心辉指挥之第六师重重围困邓、陈、田部，胜券在握。邓锡侯等部商定出奇兵偷袭成都，刘成勋指挥之部队受到威胁，成都又无可用之兵，乃被迫订立城下之盟，退保新津。5月，熊克武战胜邓、陈等部，进入成都，希望刘成勋出兵全歼邓、

陈、田各部，但刘以省城空虚为由，将主力留守成都不再参战，熊、刘、赖合作之势于是解体。刘成勋率部退到川南双流、新津、彭山等地。

1923年11月，刘湘在吴佩孚援助下东山再起，发动“倒熊”战争。刘成勋慑于吴、刘之势，与赖心辉中途背信，倒向刘湘。熊克武孤军失援，于1924年2月败退广东。刘成勋自知在川中角逐难敌各军，在受领北京政府任命之四川边防督办职后，即向川边发展。1924年3月，他出兵一举击败陈遐龄军孙涵部，夺占雅安、汉源、荥经各地，并以敖集生部攻占打箭炉。1925年2月刘成勋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西康屯垦使兼办民政事宜。时受吴佩孚扶持的杨森，在四川发动统一之战。杨先已派军袭击刘成勋部，刘不敌，败守雅安、打箭炉一带。杨森继于4月命何金鳌、白驹及边军孙涵、羊清泉等向雅安、荥经等地进攻，刘成勋节节败退。至6月，反对杨森之各将领云集重庆开会，组织反杨联军，刘成勋出兵东进，协同友军战败杨森，乘势夺回雅安、荥经各地，实力有所恢复。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兴师北伐，捷报频传。11月，刘成勋亦通电拥护北伐，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12月1日在雅安宣誓就职，并设政治部，对部队进行政治训练。

当时，四川各个军事实力派虽然先后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并不出征北伐，仍在四川境内你争我夺，割地称雄，刘成勋极力靠拢刘湘。被蒋介石倚为四川重心的刘湘，曾拟以其武力对抗刘文辉部，刘成勋乃电刘湘表示甚愿亲率全军将士加入前线，实行“革命”工作。但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关系，反而暂时形成合作，图谋夺取刘成勋的川南。1927年6月，刘文辉分兵三路向刘成勋部发动猛烈攻击。刘成勋之第二十三军虽然也做了一些抵抗，但终因实力悬殊，节节败退，仅半月时间，防区全失。刘成勋逃出雅安，率部仓皇退至距雅安四十里之青子岗时，又遇匪徒袭击，损失甚巨。他乘匪徒抢掠之际逃逸，脱险至荥经，但从此一蹶不振，残存将领亦不愿随行，被迫于6

月29日发出下野通电，第二十三军军长职务交第二师师长孙涵暂摄。

刘成勋从此脱离政坛，回原籍大邑息影林泉。1929年以其田百余亩辟为果园，雇人栽培柑橘、板栗等，并开设烧酒坊。1933年在大邑县城内开设戏院，并将本宅后院租赁别人开餐馆，前院留给自己作为公馆，每日车马盈门，阔绰一时。1944年12月，刘病死于大邑。

主要参考资料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2、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大邑县县志。

刘存厚

邵桂花

刘存厚，字积之，1885年1月24日（清光绪十年十二月九日）生于今四川省简阳县。先祖为盐商，父刘廷辅为光绪己丑恩科武举。

刘存厚幼入私塾启蒙，后读经，欲步入仕途。1902年应郡院试，榜上无名。1903年进新设立的四川武备学堂就读。1907年7月毕业，与周骏、尹昌衡等人被该学堂首批选送至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步兵科第六期，同期同学有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等人。1908年12月毕业归国，参加北京军谘府陆军部考试，授陆军科举人，旋被推荐给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昆明训练新军，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这期间，经罗佩金、李根源介绍，刘存厚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前，刘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唐继尧任同标第一营管带，雷飙任第三营管带。三十七协协统蔡锷有反清革命思想，刘存厚也附和进步潮流，但又不时与清军督练公所总参议靳云鹏相周旋。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刘存厚参加了蔡锷、李根源等人领导的28日云南昆明起义，攻下督署，众举蔡锷为云南都督，刘存厚任参谋部第一部部长。蔡锷令唐继尧进军贵州，唐派韩建铎为援川滇军司令，刘存厚为总参谋，率队进驻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11月，四川光复，尹昌衡继蒲殿俊任四川都督，决心以武力驱逐滇军，经蜀军政府与四川大汉军政府代表一起同滇军交涉，礼送滇军出境。刘存厚感到重返滇省仍无出路，密电尹昌衡表示愿意返蓉，尹复电表示欢迎，刘存厚遂以父命归川为由，于1912年3月初离开滇军返回成都。

同年4月27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宣告四川统一，成立四川军政府。尹昌衡已将川军扩编成三个镇，为安置刘存厚，特意增第四

镇，委刘任统制。不久，改镇为师，刘仍任第四师师长。1913年7月，尹昌衡出康定平叛，由胡景伊代理川督。胡是袁世凯的党羽，共和党四川支部常务理事，胡排挤和打击革命党人，但对刘存厚极拉拢，刘和周骏遂加入共和党，转而投胡拥袁。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和老同盟会员杨庶堪宣布独立，响应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分兵西进讨伐胡景伊，胡命令刘存厚迎击熊克武，熊军败退。9月，刘存厚署理重庆镇守使，“大肆搜捕国民党人，株连无辜，查抄财物，得银二十多万元，旋师成都”[(1)]。川军第二师师长彭光烈因与熊克武暗通，全师被解散，遂将第四师番号改为第二师，刘存厚仍为师长，晋陆军中将衔。

1915年初，陈宦受袁世凯之命，率北洋三个师入川会办军务，在全川实行大清乡，排除反袁力量，为袁称帝铺平道路。陈派刘存厚为川南清乡总司令，率兵两个团驻守泸州。袁阴谋称帝，于12月册封刘为二等男爵以笼络之。同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举兵讨袁，蔡自任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进兵四川叙永县。蔡、罗与刘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极力争取他反袁，刘手下第二旅旅长雷飙也赞成附蔡讨袁，但另一旅长拥袁。叙永县知事为刘二弟，同情护国军，刘父也支持其义举。护国军在争取雷飙的同时，授意四川人李宽文向刘存厚投递了一封匿名信，说：“我从北京方面得来一个秘密消息，袁世凯疑心你暗通蔡锷，将指示你的部下对你进行暗杀。[(2)]”刘便急忙同雷飙计议，派人与护国军联系，于1916年1月31日在纳溪以“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发表讨袁檄文，宣布独立。2月1日，护国军到达纳溪，刘率部配合护国军会攻泸州，占领益田县、月亮岩，与张敬尧的北洋先遣军和熊祥生部隔江对峙。3月7日，刘存厚的护国军在前线失利，他惊恐万状，认为弹尽兵疲，便不顾蔡锷反对，撤离纳溪退往安宁桥。当时川滇护国军仅有七千余人，而袁世凯的北洋军有五万多人。双方在泸州、纳溪西南棉花坡、大州驿一带的激战持续两个多月。继后各省纷纷响应护国军，袁被迫于3月取消帝制，陈宦也随之宣布四川独立。6月6日，袁世凯死去，刘存厚所部恢

复原番号，仍称四川陆军第二师，继续任师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7月20日，刘存厚率部进驻成都，摄行军、民两政。29日，蔡锷抱病入成都，刘率众迎接。8月，蔡锷电保刘存厚为第二师师长，权委川军第一军军长，请授陆军上将衔。9月，蔡锷赴日“养疴”，病逝异国。同月北京政府电令滇军将领罗佩金、黔军将领戴戡分别署四川督军与省长。刘存厚仍维持原职，10月授陆军中将衔、崇武将军、勋四位，12月加陆军上将衔。

1917年3月，刘存厚与四川督军罗佩金因裁军问题发生冲突，领衔通电指控罗调动滇军准备作战。4月18日，滇军与刘存厚的川军在成都城内展开巷战，死伤数百人。北京政府电令罗、刘立即停止战斗，来京供职，川督由戴戡暂兼，但罗、刘不遵令北上，分别率部退往仁寿、简阳和凤凰山。

戴戡利用刘、罗混战之机，通过进步党梁启超等人的关系，向段祺瑞靠拢，得以集省长、督军、会办三个头衔于一身。在戴、刘互相怨恨之时，张澜亦不甘心戴独占权位，遂与刘存厚合作。7月1日，张勋拥清逊帝溥仪复辟。同月3日，溥仪伪谕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存厚对溥仪谕旨并未立即表态，而是通过关系在京奔走于段、张之间，以观时变。4日，刘通电声讨张勋复辟，拥护共和，指责戴戡把持邮电以及陷害他人。5日，戴以讨伐“叛逆”为名对刘存厚用兵。当日夜，川、黔两军在成都北校场、西校场一带激战。8日，黔军败守皇城，戴戡求助罗佩金未果，粮弹告罄，不得不交出三颗大印，撤军出城。刘存厚深知戴意在与滇军会合后卷土重来，假意应允，暗中派队驰赴龙泉驿、山泉铺一带埋伏，阻击由资、简、荣、威西上的黔军。21日，戴戡在溃退途中遭伏击自戕，随行将领多被俘被杀。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上台，梁启超等人对戴之死表示悲痛，要求严办刘存厚，但段置之不理。北京政府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

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张澜暂行护理四川省长。刘存厚又与川军周道刚、钟体道等人为伍，集合一、二、三师兵力，在成都周围地区，同滇黔军进行更大规模的“资简阻击战”、“青眉攻防战”、“资内争夺战”[(3)]，再次打败滇、黔军。北京政府遂于11月任命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会办军务。12月刘升任督军，成为称雄地方的小军阀。

时熊克武借护法名义进兵四川，于1918年1月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受黔、滇、川军压力，刘存厚、张澜于2月19日退出成都，往绵阳与钟体道会合，不久又逃离绵阳，经广元、昭化，于6月进驻陕西宁羌（今宁强）。刘在绵阳暂住月余，竟预征一年田赋。7月，南方军政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发表刘存厚为二十一师师长，划汉中等七县为刘、钟两部防区，军械饷糈均由北京政府供给，刘还在汉中设四川督军行署。刘在陕南实行暴政，逼农民毁田种植鸦片，城乡遍设烟馆，遍摆赌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激起当地民众公愤。陕西省议会电告北京政府，公布刘祸陕罪状十二条，请求调刘离陕，严加惩处。1920年2月间，陕督陈树藩先后七次电控刘的暴行，要求将刘调离惩处。4月，陈终于对刘下了逐客令，限期离陕。

同年5月，熊克武在川、滇、黔战争中败北，被赶出成都，退守保宁。熊、刘同病相怜，弃嫌修好，共同组织靖川军，联合起来驱逐滇黔军，分别攻打重庆，收复成都，相约战事未了，二人均不用督军名义，公推刘湘护理川督。8月，刘存厚就任靖川军总司令。9月，刘、熊联合攻克成都。10月，熊又占领重庆，并在渝设川督公署。11月，刘返回成都也挂起四川督军公署招牌。一时南北政府分别任命的两个督军在成渝对峙，分庭抗礼。后经刘活动关节，北京政府于12月30日命令刘存厚督川，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企图把四川纳入北洋政府统治之下。

刘存厚虑及此次回川兵力不足以统驭全川，遂有北结陈树藩，南联黔、滇，以牵制川东南各军，复施其纵横捭阖之手腕，离间川中各

师旅，使其互相猜忌，辗转以就己范围之阴谋，然事与愿违，所定计划尽成画饼。1921年2月18日，川军二十三名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并公布了刘存厚阻挠自治的十条罪状。后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人联合起来，分路向刘存厚进攻，刘见势不妙，遂伪装自治，同时密电北京政府表明拥护中央之态度，说明迫于形势，不宜公开表态，请中央谅解。北京政府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骂他口是心非，是北京政府的走狗。刘被主子出卖无地自容，于3月22日通电，自动下野解除靖川军总司令职，复出灌县，重返宁羌。

1923年2月，四川再次发生内乱，吴佩孚乘机援助杨森回川，并令刘存厚由陕南进兵川北。刘于2月19日进驻绵阳，5月败走。1924年5月27日，北京政府令裁撤四川督军，刘改任川陕边防督办。川陕边防督办公署设于绥定（今达县），辖绥定、万源、宣汉、城口四县。刘存厚在绥定近十年，兵力由不足五千人，逐步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刘无休止地剥削搜刮，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共产党员李家俊曾领导四川农民抗租，建立抗租军及四川第一路红军，遭到残酷镇压。刘对在当地活动的国民党也同样进行压制。刘信奉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分子在绥定活动猖獗。

1928年10月底，国民党政府指定刘湘为川康裁缩军队委员会委员长，邓锡侯、刘存厚副之，负责川康军队缩编事宜。此前，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大势已去，不得不入夔门投杨森、刘存厚。刘不顾南京国民党政府“讨吴除杨”的通电，将吴一行安置在绥定与开江交界处檀木场陈济川的大院内居住。他对吴的供应、警戒甚是周到谨严。吴曾写诗赠刘：“方寸纠纷俗累萦，无端怅触笔花生。人间落魄寻知己，诗写牢怨见性情。孝水梦回千里曲，蜀山月挂一钩轻。枕边莫恼鸡声恶，催起刘郎趁早行。”[(4)] 抒发对刘的感激之情。同年末，刘又迎吴佩孚至距绥定三十里之河市坝居住，且为吴设“行辕”于绥定城内，要为吴招兵买马组织警卫旅。

1929年3月21日是吴佩孚五十七岁生日，时值蒋桂战争爆发的前夕，吴佩孚亟思乘机出山，刘存厚与吴合谋，事前发出通启，大摆寿宴，广为招徕。段祺瑞、曹锟、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纷纷派代表前来祝寿，川省各军阀也都馈赠厚礼，刘存厚赠寿银五千两。10月，段祺瑞派代表来河市坝促吴再起，各方军阀残余代表云集河市坝，与吴密商局势。刘存厚更与吴拟定了组建“兴国军”计划。刘还派代表赴南京谒蒋介石，请准许吴佩孚回籍山东，吴三次通电试探之后，于1930年6月4日由绥定起程赴蓉，刘存厚盛宴欢送，赠路费银二万元，后吴出川受阻，刘又劝吴移驻汉小镇下八庙。

1933年5月，蒋介石任命刘存厚为陆军二十三军军长（空头番号）。10月又任命刘为四川“剿共”军第六路总指挥，负责“围剿”川北红军，结果受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迎头痛击，损失甚众。10月20日刘弃城逃跑。翌日，红军正式入城，结束了刘在绥定近十年的统治。蒋介石于10月28日以“轻弃防地”的罪名，将刘撤职查办，其残部由刘的副军长刘邦俊改编。

此后刘存厚长期赋闲，他在成都置园林一处，修饰一新，名为“榆园”，又在故里简阳买下庄园一处，名为“桂里山庄”。1948年刘任国民党“行宪国大”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存厚被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阎锡山“接往”台湾，受聘伪总统府“国策顾问”，但刘生活潦倒。刘在诗中自况：“蹉跎容易又三春，一事无成唯虑贫。谁知路旁卖瓜客，曾为麟阁画图人。”[(5)] 刘存厚于1960年6月病逝在台北[(6)]。

刘喜书法，好吟诗，收藏图书、碑文、名画颇丰。著有《云南光复记》、《护国川军战纪》、《蜀军志》、《榆园诗存》等。

---

(1) 徐正唯：《刘存厚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简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编《简阳文史资料》第13辑，1987年版，第17、18页。

(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86页。

(3) 《晨报》1921年3月22日第3版。

(4) 徐正唯：《刘存厚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简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编《简阳文史资料》第13辑，1987年版，第17、18页。

(5) 徐正唯：《刘存厚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简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编《简阳文史资料》第13辑，第17、18页。

(6) 刘的卒年依据《刘存厚小传》，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2期。

刘道一

李静之

刘道一，字炳生，原籍湖南衡山，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湘潭县。父亲刘方尧原是农民，太平天国时被征募为湘军乡勇，因基于民族大义放走一个太平军俘虏，触犯军法，逃至湘潭乡间匿居，改名明远。后在湘潭县衙门担任差役，称籍湘潭[(1)]。刘道一早年就读于私塾，稍长入湘潭的一所教会中学，英语学得很好。由于受革命潮流和哥哥刘揆一的影响，思想激进。读《汉书·朱虚侯传》，中有“非其种者，锄而去之”的句子，便自号“锄非”。

1904年2月，黄兴、刘揆一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刘道一随哥哥参加。华兴会决定这年冬天发动长沙起义，刘道一曾参与起义的准备活动[(2)]。3月，他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3)]。由于反清的共同革命志趣，他结识了秋瑾，并与秋瑾、刘复权、王时泽等十人，组织秘密团体“十人会”，以反抗清政府、光复中华为宗旨。秋天，又参加冯自由等人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草鞋”（将军）[(4)]。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刘道一参加，被推任书记、干事等职[(5)]。他长于口才，又精通英语，同盟会对外交涉方面的事务，他很尽力，被黄兴认为是“将来外交绝好人物”[(6)]。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留日会员纷纷被派回国运动新军和会党，酝酿武装起义。刘道一因父亲年老多病，请求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秋，他和蔡绍南等人被派回湖南“运动湘军，重振会党”[(7)]，在湘赣边境开展活动，准备武装起义。他抵达长沙时，曾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在水陆洲的一只木船上秘密开会，传达黄兴意见：这次武装起

义，应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发动为上策。如若会党首先发难，军队立即响应。会议认为，为攻取省城长沙，须将会党集合在萍、浏、醴各县，和运动成熟的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如果这个方案实现不了，则由会党在浏、醴发难，直扑长沙，军队反戈相应，占领省城，会党再组织便衣敢死队，阻止敌人的后援部队。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起义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联系，蔡绍南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计划待军队运动成熟，在阴历年底清吏封印时举事。

同年12月4日，蔡绍南、龚春台、姜守旦等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了。起义声势浩大，参加者包括萍乡、醴陵、浏阳的会党、防营兵士和工人共三万余人。起义队伍很快占领了浏阳的高家头、金刚头及萍乡的高家台，进据萍乡上栗市，以及宜春、万载各县的一些地方，屡败清军。清政府急调湘、鄂、赣、苏等省驻军四五万人前往会剿，相持一月余，起义被镇压下去。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长沙做起事的最后部署，新军还没有运动成熟。他听到萍、浏、醴已经举事的消息，日夜加紧准备，以便起义队伍攻取长沙时，新军及防营能开城响应。不幸他的活动为清政府发觉而遭逮捕，12月3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刘道一牺牲后，其亲友被株连者很多，其父被捕，瘐死狱中。

萍浏醴起义失败和刘道一牺牲的凶耗传到日本后，留日同盟会员痛心疾首，纷纷请缨归国杀敌。黄兴悲愤不已，作诗哀悼："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8) 孙中山对刘道一的牺牲也深为悲痛，曾作挽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9)

刘道一就义后，遗体运回湘潭。1912年3月南京临时革命政府追

认他为烈士，迁葬于长沙岳麓山。

---

(1) 刘安鼐：《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78年版。

(2) 《革命先烈先进传》，《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1971年2月版，第436页。

(3)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编辑发行，光绪三十年十月，第127页。

(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书局1981年版，第177页。王时泽：《回忆秋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第225页。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09页。

(5) 《革命先烈先进传》，《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1971年2月版，第437页。

(6)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第28页。

(7)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84页。

(8)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8页。

(9) 《革命先烈先进传》，《革命人物志》第6集，第435页。

刘复基

周学舜

刘复基，字尧澂，后易名汝夔，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1]，湖南常德人。少年时曾就读于常德县立高等小学堂，成绩优异。他幼读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人书，感受民族主义思想，深恨清廷统治腐朽黑暗，慨然有推翻清廷之志。这时，他认识了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黄兴，两人常在一起议论反清革命事宜。

1904年秋，黄兴等人密谋于11月16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当天在长沙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举事，刘复基积极投入了这次行动。10月，他受黄兴的派遣，与宋教仁一道负责主持常德一路。他们在常德筹措经费，聚集同志，联络会党，颇著成效。不意事机泄漏，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刘复基匿于常德柳叶湖，幸免于难。

11月，参与起义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又潜回湘西洪江，图谋再举，刘复基毅然前往参加。不料起义前马福益被捕，于1905年4月就义于长沙。刘复基悲愤交集，但斗志弥坚。不久，他东渡日本探索革命道路，同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1906年春，刘复基受同盟会派遣，回湘开展工作。他在长沙筹设报刊代派所，运销《民报》及各种革命宣传书册，同时还负责湘、鄂两省的联络工作。同年夏，他积极参与禹之谟倡导公葬留日革命青年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的活动。事后，清吏竟将禹之谟逮捕下狱。刘复基无比愤懑，乃与蒋翊武奔走沅、澧之间，招纳会党，以民族大义相号召，得敢死之士数百人，准备起义。他们设革命机关于常德祇园寺，不料又被清吏侦破。刘复基避走上海，在那里与杨卓林创办《竞业旬报》，以通俗文体宣传反清革命。1907年3月，杨卓林被捕

下狱，《竞业旬报》被迫停刊。

1908年春，刘复基应胞兄刘星澂函召，与蒋翊武赴汉口办《商务报》。12月，他们得知武昌成立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便以报社采访员名义前往联络，结识了新军中的群治学社负责人蔡大辅。通过蔡的介绍，又与武昌群治学社负责人李六如取得了联系。此后，《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进行革命宣传，反清色彩十分鲜明，被视为“汉口报界革命之急先锋”[(2)]。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决定乘机发动起义，嗣因抢米风潮很快被镇压下去而作罢。但风声已经外露，《商务报》被清政府封闭。不久，群治学社改名振武学社。这时，刘复基深感革命的胜利非发动军队不易成功，便毅然投笔从戎，入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

1911年1月，振武学社因革命活动暴露，改名为文学社，刘复基被推为评议部长。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3)] 组织发展很快，3月15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社员达四百余人。7月，文学社社员猛增到近三千人。这时，该社的机关报《大江报》因连续发表激烈的反清言论，被湖北当局查封。刘复基不断奔赴各营报告情况，告诫同志加倍慎重，保守秘密，准备革命时机到来。

刘复基很重视文学社与湖北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问题，一再在代表会上提出。他说：“我们两团体宗旨、目的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有什么不可商议？”[(4)] 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集中讨论一起在武昌发难的计划，决定建立统一行动的机构，刘复基被推为军事筹备处常驻筹备员。

9月下旬，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24日，文学社、共进会

联合举行会议，预定10月6日（中秋节）起义，制订了总动员计划，推举了起义负责人。正在这时，传来了南湖炮八标士兵于前晚（23日）发生暴动的消息，暴动士兵要求立即起义。刘复基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说如果仓促起义，由于“百无一备”、“功亦难幸成”，反而打乱了原定起义的整个部署[5]。根据他的正确意见，会议坚持原来的起义计划。但原起义日期因准备不及，要往后推，一时又定不下来。

10月9日上午，孙武等人在汉口总机关制造炸弹失事，总机关被破获，党人名册被抄走，并有多人被捕。在严讯下，有人畏刑吐实，于是武昌革命机关及领导人均被暴露，军警大肆搜捕，形势十分危急。当天下午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正在武昌机关聚议发难日期，听说孙武失事的消息，刘复基愤然倡议：“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满奴铁血相拼的时候了。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6] 蒋翊武问：“炸弹制就否？”“地图若何？”“方略已定否？”刘复基说：“炸弹制就者，已分发各营。”[7] 他又将地图和方略交蒋翊武。蒋阅后，以总指挥名义，草命令一道，派人分送各标营，约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台鸣炮为号，各营同时并举。

9日晚10时，刘复基等正在机关等候南湖发动起义的炮声，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手持炸弹，下楼拒敌。他连掷数弹，仅第一枚爆炸，爆炸力不大。敌人一拥而进，将刘复基等人逮捕，漏夜提审。刘复基步入公堂时毫无惧色，敌人问他何故造反，他厉声道：“吾矢志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复扬州十日仇，雪嘉定三屠恨，何谓造反？今既被执，夫复何言，请速予死。”[8]

次日清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刘复基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外，年仅二十八岁。临刑前，群众闻讯拥至，填街塞巷，他向悲愤的群众大呼：“同胞呀！大家起来革命！”[9]

(1) 刘复基生年无准确记载，此系按其牺牲时的年龄推算的。

(2)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1页。

(3) 万鸣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5)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

(6)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55页。

(7)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32页。

(8)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册，第1405—1406页。

(9)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58页。

刘公

朱信泉

刘公，原名耀宾，又名湘，字仲文，革命时又号“非非子”，湖北襄阳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出生。刘有兄弟六人，他行二，故字仲文。刘家是襄阳三大富室之一，有土地万余亩，专对票号、钱庄、商店放款。

刘公素有远志，见清廷内政日非，外患日迫，慨然起革命之思。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课余则联络同志，鼓吹民族革命。其时关于革命之宣传品，如《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留日人士莫不人手一册，而国内则罕见。刘公于是出资翻印数万册，输入内地，申警国人。同文书院毕业后，入东斌学堂，攻军事学。

1905年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刘公率先加入。不久与孙中山等人议设民报社，鼓吹革命，刘慷慨出巨资，始得成立。《民报》出版，风行一时，自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便广为国人所知晓。

1906年萍浏醴起事，孙中山派他回国谋划响应，事败复回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学习。1907年8月，刘公和川人张百祥、湘人焦达峰以及赣、粤、苏、浙诸同志组织共进会，谋策动在长江流域起义，舍鼓吹而重实行。该会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采用同盟会的誓词，但将同盟会誓词中“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又以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另设会长和各部部长，张百祥任第一任会长，张回四川，由邓文辉继任，邓回江西则由刘公继任。

1909年，刘公于明治大学毕业，因奔走国事，积劳成疾，遂以返里调摄为名在本县疗养；他潜往豫西、鄂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吸收

同志入会，鼓吹青年当兵。刘在日本时常对人说：“君等努力革命，费用我想法子。”

1911年夏，武汉地区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共进会同志急盼有人领导革命并解决经费问题，刘公遂以捐官需款为名，从家中索得二万两银票，以一万两捐充革命活动经费，另一万两托表兄陶德琨保管。从而使共进会的活动更为积极，所有设置机关、分途部署、运动军队及制造旗帜、印刷钞票、制造炸弹、派代表赴沪迎黄兴、宋教仁来鄂的旅费等用途，方有着落。革命机关设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刘为了能就近照料，迁居同里一号。

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胭脂巷十一号第三次开联合大会，会议确定了起义计划、日期及起义后的军队领导机构，并初步定下10月6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及动员计划等。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刘公为军政府总理。但就在此次会议后的当日下午，南湖炮营发生了自发的暴动，引起清政府当局的戒备；起义总指挥部遂决定改期于10月11日（阴历八月二十日）起事。10月9日却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天孙武在宝善里十四号装配炸弹时受伤，虽得同志救护脱险，却被俄租界警察发觉前来搜查，刘公诳以他辞得免，避往汉口汉兴里，刘公之妻及刘弟却以嫌疑被捕；而党人名册及军器等项，尽遭搜去，驻汉俄国领事敖康夫随即将人员及证物立即引渡给湖广总督署，清总督瑞澂遂加紧搜索革命党机关，党人三十余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首先遇害。当此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之际，新军党人怀着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想法，决心冒险发难，遂于10月10日晚各营先后起事。

11日上午武昌为革命军占领，一江之隔的汉阳、汉口也在11日和12日相继光复。刘公没能参加战斗，黎元洪却被推为鄂军都督，直至10月13日刘公赶到武昌，被任命为都督府总监察处总监察，上以监察都督，下以监察群僚。由于得不到孙武等人的支持，难有作为。

11月27日，汉阳被清军攻陷，武昌危急，30日黎元洪出奔葛店，刘公以总监察名义守武昌，其后，对黎元洪弃城不守，仅提出一纸弹劾案了事。

武昌编组北伐军时，刘公被黎元洪任命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所部约为两千人，1912年3月20日刘率本部抵达襄阳，准备向北推进，黎元洪以为妨碍议和，来电阻止。南北议和成，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经黎元洪副总统保举，刘公被授勋二位并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刘不愿就职，后经黎元洪促迫于9月入京，所部左翼军被黎元洪的嫡系王安澜部收编。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7月湖口起兵，刘公借故离京赴沪。袁世凯称帝，他通电反对并在汉口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反袁。袁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任命刘公为高等顾问，刘未就，旋丁内忧回籍。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12月刘公回到襄阳，号召旧部组织护法军并敦促襄郧镇守使黎天才宣告自主，全鄂震动。后北军吴佩孚率部援鄂，黎天才部战败西退，刘公所部数百人亦随之西退。此时刘所患肺疾日重，犹辗转于秭归、巴东、巫山一带，草履徒步，军旅艰辛，后终因病体无法支持，才接受同志的劝告赴沪就医，卧床经年，医药罔效，竟于1920年4月12日在上海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胡汉民：《刘公》，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

贺觉非：《刘公》，《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冯自由：《共进会长刘公》，《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29年版。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刘冠三

郭天佑

刘冠三，名恩赐，字冠三，以字行。山东高密人，1872年2月16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八）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他幼年天资聪慧，家境虽贫困，其父仍将他送往县城塾学就读，十三岁即应童子试，得到家人器重，在乡里亦小有名声。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钜野教案”，派军舰侵占我胶州湾，霸占青岛，并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并享有在山东修筑铁路权，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899年6月，德国开始修筑胶济铁路，当路基经过高密时，因强占良田，挖掘坟墓，拆毁房屋，激起当地农民的不满，经多次交涉无效，遂酿成一场农民群众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武力斗争，年轻的刘冠三亦加入了这一斗争的行列。当地群众被枪杀三百余人，斗争失败。刘深感政府腐败和侵略者的凶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刘冠三赴济南在友人处寄住年余。1902年他考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仍然关心国事，阅读进步书刊，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05年夏，由留日学生谢鸿焘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早期的同盟会员之一。他集资创办了《白话报》报馆，开山东革命宣传之先河。

1906年春，刘冠三集资创办山左公学，收学生二百余人，除对学生进行一般文化教育外，大力宣传同盟会的主张，发展同盟会员，不久学生入盟者逾半数。他聘请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人到校讲课，聘留日学生齐树棠、左汝霖等人任教员，山左公学不断扩大，后来在校学生有四五千人之多，一时声名远播，清政府惊疑，山东巡抚杨士骧寻机将其查封。1908年春，刘冠三被迫离济南去青岛暂避，学生随同前往

者数十人。他与同盟会员陈幹等人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该校专门招收爱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成为宣传反清和储备革命力量的基地。同年秋，他与陈干等人联络全省各界，组织保矿会，反对德国侵吞山东矿权，抵制德货。由此，震旦公学引起清政府的嫉视，派人与青岛德当局交涉，引渡刘冠三等人并查封该校。

刘冠三在山东难以立足，遂决定环游各地宣传革命。为了避开清政府侦伺，他乔装成农夫，推一独轮车于1909年春由诸城出发，沿途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员。吴大洲、刘溥霖、隋理堂等人均经他介绍入盟，成了革命志士。他经临沂去曹州（今菏泽）然后到河南开封，经同盟会员杨勉斋介绍在中州公学演说，深受学生的欢迎。刘冠三游历河南后入陕西，再由陕徒步去山西，然后赴蒙古，饥寒交迫，幸遇山东老乡张某资助，才渡过难关。1911年夏由蒙古抵北京，此行历时两年，行程万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1)

刘冠三因长途跋涉，积劳成疾，抵京后养病于山东会馆。同年秋，山东同盟会推吕子人赴京问疾并结伴返鲁。不久，爆发武昌起义，在济南的同盟会员徐镜心、丁惟汾等人联络同志积极响应，并有清兵第五镇协统贾宾卿等军官从中活动，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其时，刘冠三正在家乡高密养病，当获知山东独立后虽感高兴，但预见到孙宝琦一类"官僚不足恃也"(2)。他病体稍有好转后，即前往青岛积极联络同志，购买武器，拟在胶东数县发动起义。由于孙宝琦与清廷仍暗通信息，十二天后又宣布撤销山东独立。袁世凯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来山东，大肆镇压，革命形势逆转。对此，刘冠三毫不气馁，他辗转去上海，谒见孙中山，报告山东情况并请示策略，经孙中山委以山东军事重任。

刘冠三由沪返青岛后，先后发动了青州、即墨、安邱、高密、诸城各县的独立活动，其中尤以诸城义举令人瞩目。同盟会员王永福率领山左公学学生为骨干的起义军六十人攻占诸城，宣告诸城独立，成

立了山东军政分府，推王永福为司令，臧汉臣为民政长。后因驻沂州之清军巡防营赶来镇压，虽经激烈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军遂失败，臧汉臣以下三百余人遭清军杀害[3]。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分会在济南成立，刘冠三任副会长，同时出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1912年9月，孙中山来山东视察，刘陪同视察了济南、青岛等地。同年冬，刘当选为国会议员。次年3月发生宋教仁被刺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逐渐暴露，刘冠三拒绝袁的重金贿赂，并劝导其他议员不要受骗上当。“二次革命”失败后，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袁下令通缉刘冠三，刘在友人的帮助下避往陕西，幸免于难。

1917年9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刘冠三、丁惟汾等人投入护法斗争[4]。刘被委为山东招讨使，遂赴沪组织招讨使办事处，以薄子明、孙楚云、陈成功、宫锡德、丁德金等人为各路司令，邓天乙为前敌总指挥，在山东收拢旧部，招募民军，很快组织起五万余人的队伍。其中以第一路司令薄子明的队伍战斗力最强，战绩可观，在鲁南、鲁西南一带屡次挫败北洋军。在邹县东南之两下店的作战中，山东护理督军张树元险些被俘。当山东护法军不断取得胜利之际，广东方面则发生了桂系军阀陆荣廷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的事件，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护法运动归于失败，山东的护法之役也遂告结束。

刘冠三长期为民主革命奔波，积劳成疾，以致经常咯血。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操纵国会进行贿选，刘虽发现内中有诈，却因身染重病未曾离京。贿选后刘心情更加抑郁，病情日益恶化，1925年7月1日病逝于北京。

---

(1) 台湾《山东文献》第12卷，第143页。

(2) 台湾《山东文献》第12卷，第143页。

(3)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396页。

(4) 丁惟汾：《山东革命史稿》卷13，山东党史编纂委员会1930年版。

刘冠雄

陈贞寿　刘传标

刘冠雄，字子英，又字资颖，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61年6月7日（清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生。父刘穆庵，以箍桶为业。1875年春，刘冠雄考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四届，四年后校课毕业，派登“扬武”练船见习枪炮、驾驶诸战术。次年舰课毕业，复入校习高等课程，不久被派充“镇南”炮舰驾驶官、管带。1883年调补“扬威”快船帮带。1884年8月中法马江海战，刘冠雄奉命驾“扬威”援闽，后因朝鲜东学党举事，中途改赴朝鲜，事平升尽先候补把总。1885年秋，调任“定远”铁甲舰大副。

中法马江海战后，清政府为加强海军建设，于1886年3月选派第三届出洋留学生，刘冠雄等二十人入选赴英，先入“抱士穆”军舰，后入武理炮厂学习枪炮等技术。翌年12月，刘冠雄奉命帮同英将琅威理（William M．Lang）驾驶在英定制之“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回国，任“靖远”舰佐，擢升千总。

刘冠雄有文才，善交际，足智多谋，人称既有大将风度，又肯尽忠效力。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他任“靖远”舰帮带，随军酣战。在大东沟战役中，“靖远”舰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火起，死伤十八人。为扑灭大火、修补漏洞并牵制敌人，刘冠雄协助管带叶祖珪驾“靖远”且战且退，转至大东沟西南的大鹿岛附近，背靠海滩，据有利地形。敌舰尾随而来。刘冠雄专用舰首重炮轰击敌舰，敌舰不敢逼近，“靖远”舰赢得扑灭大火及修补漏洞时间，并拖住敌舰队部分力量，减轻了敌舰对“定远”等舰的压力。下午5时，“靖远”舰抢修毕，带伤归队。旋见督船桅折断，无旗宣令变阵，指挥失灵，形势危急，刘冠雄当机立断，急请管带叶祖珪悬旗，统率余舰变阵，绕击日舰，

并号召港内诸舰艇出口助战。时日舰已受伤不少，及见我队散而复整，且惧有雷艇暗袭，即向东南退却。这场海战，北洋舰队虽损失惨重，但中国官兵英勇战斗，粉碎了敌人“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袁世凯后来在《奏萨镇冰请破格擢用折》中说“我国自甲午一役海军歼焉，然大东沟一战，胜负相当，以视陆路诸军犹有生色”，对刘评价亦高。

1895年1月，日军继续大举进犯威海卫，水陆并进，清陆军且战且退，“靖远”及四艘舰艇驶近南帮迎击。2月9日，“靖远”被敌炮击中沉没，刘冠雄等人获救脱险。

威海战败，清政府将北洋海军官兵全部罢遣。刘冠雄因在大东沟海战中建议“靖远”升帅旗，得以号召各舰继续再战反败为胜，获留营效力。6月，刘冠雄奉命赴德接带“飞鹰”猎舰回国，同年底顺利抵达。

1898年6月，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推行新政，上谕军机大臣“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同时下诏广求人才，破格录用。这时先后向德国购买的“海容”、“海筹”、“海琛”及向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两舰和“辰、宿、列、张”四雷艇先后到华，叶祖珪、萨镇冰等人都开复革职处分。刘冠雄先出任“飞鹰”管带，后调带“海琛”舰。及至“海天”、“海圻”两舰到华，时为中国最大的军舰，刘冠雄被袁世凯派为“海天”舰管带。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清廷调集军舰聚集于大沽口，时“海天”等九舰泊于山东庙岛。刘冠雄听从山东巡抚袁世凯之命，率舰驶入长江以避敌锋，并与盛宣怀、沈瑜庆及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炮制了《东南保护约款》。自此，刘冠雄更为袁世凯所器重。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刘冠雄奉令驾驶“海天”舰由秦皇岛赶赴江阴接运军械，途遇大雾，又遇大风，灯塔浮标一无所见，刘冠雄不听大副杜锡珪之建言，手转号针，连催速进，结果在吴淞口洋面顶

星岛触礁沉没。按照清律，刘冠雄当正法不赦，刘畏罪亦几欲轻生，后经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仅以革职了事，嗣后由两江总督周馥咨留江南筹备海军。1906年，刘被袁世凯任为德州兵工厂总办，从此成为袁氏亲信。1908年，刘冠雄被赏予工科举人出身，次年调充会办北洋海防营务处，1911年秋改任广东水师营务处总办。

辛亥革命后，刘冠雄由粤赴沪，被上海都督陈其美聘为沪军都督府海军高等顾问。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刘被聘为海军部顾问，协助海军总长黄钟瑛颁制军纪十二条。其时南京临时政府部署北伐，海军部派“海容”、“海琛”、“海筹”、“南琛”及练习舰“通济”等舰组成“北伐舰队”，以海军部次长汤芗铭为舰队总司令，以“海容”（舰长杜锡珪）为旗舰，由上海出发北上烟台。刘冠雄赶赴烟台，策动汤芗铭、杜锡珪赴北京，归附了袁世凯。

是年3月，唐绍仪内阁成立，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任海军次长。刘冠雄接收各地海军机构，集海军大权于己手，并制定了民国海军部体制、官制、海军司令处、舰队司令以及地方调用军舰等各种条例，还着手整顿海军教育，制定海军学生考选章程、海军留学生管理规章等等。6月，交通总长施肇基辞职，刘冠雄兼代交通总长。此后在陆徵祥、赵秉钧、熊希龄、徐世昌内阁中，刘冠雄均任海军总长。1912年11月被授海军上将。

在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反袁的斗争中，刘冠雄部署海军次长汤芗铭率“建安”、“飞霆”、“楚周”、“江利”、“江亨”、“湖鹏”等舰艇抵湖北镇压江西讨袁军；命令海军总司令李鼎新驻沪调度第一、第二舰队；自己则亲率舰队及陆军第七旅编为海军陆战队南下，参加攻打吴淞炮台之战。继后被袁任命兼南洋巡阅使，率各舰及海军陆战队会同陆军赴江苏镇压讨袁军。刘冠雄效忠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奖给一等文虎章、一等嘉禾章等奖章。

同年8月14日，刘冠雄又被袁世凯派往福建“裁兵”。他到福州

后，即以“编遣”为名，把曾宣告独立之许崇智第十四师解散；裁去“义勇”、“巡防”、“防卫”、“护卫”等营；同时把马尾船政局及长门各炮台收归海军部管辖。12月5日，福建都督孙道仁前往北京“请训”，都督一职由刘冠雄兼领。刘即令省会警察厅解散国民党福建支部、中华同盟会俱乐部、丙午俱乐部以及福州桥南社等进步组织，并追缴全省各地国民党员证书、证章等，国民党地方组织遂告中断。翌年2月刘奉袁之召回京。

1915年夏，袁世凯图谋帝制日急，全国人民公愤，赣、苏、浙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筹谋举事。刘冠雄奉袁之命巡视长江，招安反侧。他看到民心所向，帝制不可为，回到北京之时，筹安会等团体纷纷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有人问刘冠雄“何独不然”，刘说：“未可也，强而图之有三不利：一、强邻挟以求请，将穷于应付；二、党人怨毒方深，召之为乱，将不可治；三、军人推戴，所求必奢，且藩镇势成觖望，激变之局随时而有。兹事殆难苟同也。”不久，内务部请设大典筹备处，袁世凯以为海军必定赞成，派人示意刘冠雄。刘回答“余于元首自极爱敬，然不敢踞之著炉火上”。刘暗询国务总理陆徵祥问外交界意向，陆答“视为内政而已”，刘冠雄遂不再语。

12月12日，袁世凯在居仁堂粉墨登场，发表了大批授爵封王的命令，刘冠雄被封为“二等公”。对此封授，刘深感从之则祸在日后，不从则祸在目前，日夕忧虑，夜不成寐，须发顿白。1916年1月14日，刘冠雄离京南下，以加强对海军之控制。4月入闽，5月返京时袁世凯已病深，刘亦请病假，始终不与袁一面。直至袁世凯出殡，刘犹在假期中，迄未入府，旋即卸任居津。

段祺瑞在张勋复辟被粉碎后重任国务总理，遣使请刘冠雄再掌海军，刘一再以病躯难以负重相辞。但段在7月15日新阁员的任命中，已把刘冠雄的名字列在其中，刘坚请收回成命亦无效。此后在王士珍、钱能训内阁中，刘均任海军总长不变。直至1919年11月靳云鹏组阁，12月3日萨镇冰出任海军总长，刘冠雄才去职。刘冠雄在其任

内，力谋改变我国海防力量薄弱的现状，增添海军装备，并先后接管了各地与海军有关的造船机构，以更新和维修海军装备。他曾制订出“置舰计划”，强调发展海军的重要，认为中国是陆海交错之国，呼吁当局应当重视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他对海军建设规模的设想，认为以中国国土之大、海岸线之长，海军发展规模“最下亦须求与最近最强之邻国相埒，方能并列于强国之间”。他主张中国海军“应取攻守兼营主义”，但鉴于财力、人力之两难，目前着重做好“巡弋防御与守卫防御二端”。他从战略守势出发，制订了十年发展计划，第一期五年为“守防计划”，第二期五年为“巡防计划”。前者总计配置舰、艇、船二百一十九艘，营、库、厂、坞六十六所；后者拟设巡防舰队三队，总计配置战斗巡舰（每艘二万六千吨）、装甲巡舰（每艘一万吨）、穿甲巡舰（每艘五千吨或三千五百吨）共五十四艘。总艘数由现有五十艘增至三百二十三艘，总吨位由四万五千吨增加到四十万四千八百吨，并以日本为假想敌。由于北京政府热衷于内战，并不重视海防建设，刘的“置舰计划”连同后来的“理想扩张案”，都变成一纸空文。刘冠雄还将海军部卫队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并筹造飞机、潜艇，在马尾创办飞潜学校和飞机工厂，制成了中国第一架海军飞机，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飞行员，对中国海军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0年元旦，刘冠雄因赞助参加欧战有功，晋授勋一位。1921年6月至7月刘冠雄被北京政府委任为福建等省查勘烟禁大员。1922年11月，黎元洪特派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率舰入闽，冀图控制闽局。此时福建形势相当复杂，既有北京政府黎元洪委任的省长萨镇冰，又有为各界推选并受孙中山加委的省长林森和总司令王永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许崇智讨贼军。刘冠雄的临时镇抚使署刚设，国民党福建支部长兼福建盐运使、自治军总指挥黄展云与闽海道尹陈群等人即通过学生会首领等连日发动举行福建各界各团体大会，纷纷通电拒绝刘冠雄入主闽政。学生军还电刘提出警告。刘冠雄难在福州立足，遂乘“靖安”舰赴厦。

1923年1月，掌握北京政府的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派第五师师长孙传芳、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率部入闽，支持萨镇冰为省长主持闽政，下令萨镇冰、刘冠雄为办理福建善后事宜职，与孙传芳协商办理所有闽境主客各军善后事宜。不数日，北京政府即以“闽局已定”，明令刘冠雄“即日回京”，改任刘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是年11月刘请辞海疆防御使职。

此后，刘冠雄退居天津，终日以栽花植树自遣。1927年6月24日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刘懋勋等修、刘君翰等纂：《凤岗忠贤刘氏族谱》第2册，《敦诚公纪事》，1920年版。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5月版。

《海军大事记》，福建政协未刊本。

王家俭：《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

李鸿章：《海军要缺拣员补署折》（清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吴汝纶编录《李文忠公奏稿》第64卷。

刘桂棠

刘述和

刘桂棠，山东巨匪，平邑县南锅泉村人。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贫寒农家。其父刘相云以打更看青为生。刘桂棠没有念过书，从十二岁就给世绅家放羊，干了八年。1912年他曾去青岛做装卸工，一年之后仍回村为世绅放羊。1915年，他约本村两个恶少，弄了一把鬼头刀、一支小土枪，潜入山中，干起土匪勾当。不久，他们又联合当地流氓地痞夏兴德、李满、苏四等共八人烧香结盟。刘桂棠行七，肤色又黑，因而得了“刘黑七”的诨号。从此八匪以“刘黑七”为首，抢劫绑票，打家劫舍，日益猖獗。

民国以来，土匪蜂起，鲁南山区已成为土匪啸聚的场所，抱犊崮更以悍匪巢穴而闻名，刘桂棠就活动在这一带。袁世凯帝制自为破灭之后，军阀连年混战，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民不聊生。刘桂棠乘机扩大势力，1919年有了三百多人，武器换上了钢枪。1925年发展到一千多人，自封为“刘团”。

同年张宗昌派一个团官军到鲁南山区剿匪，名为剿匪实乃资匪，当时刘桂棠在蒙山上，官军打上山，土匪一个反击，官军丢下武器弹药便逃，土匪收缴了武器后，留下许多银元。官军再打上山，发现了银元，便胡乱打一阵枪，放下武器，带上银元，自动下山。土匪再收武器，再留银元。结果官军发财而归，刘桂棠则以这些武器大大装备了自己。

随着土匪势力的扩大，活动方式逐步发生了变化。起初，主要是抢劫绑票，后来发展为烧杀虏掠，土匪公然向所控制的农村派款、要粮、要枪，如抗拒缴纳，即残忍地进行烧杀。1925年至1928年，蒙

山前怀百里之内被土匪烧杀的竟有一千多村庄，烧毁房屋二十多万间，杀害群众一万二千多人。在土匪严重摧残下。这一带村落凋敝，田园荒芜，许多村庄绝了人烟。同时邹、滕、泗水、蒙阴、莱芜以及淄博也无不遭其蹂躏。1927年3月，刘桂棠率匪数千窜到莱芜，仅在红山寨一处就杀了一千三百多口，还有一批男女被虏。被虏的青壮男子除被逼入伙从匪外，其余则当做勒赎之肉票，从此土匪势力得以扩张，到1928年急剧扩展到一万多人。

刘桂棠人多势大，引起了国民党有关当局的重视。1928年初，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以银元一万七千元、面粉二千袋相赠，意欲收买这股势力，刘收其礼而不从其愿。同年国民党继续北伐，何应钦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鲁南，也看上了刘桂棠。刘羡慕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招牌，于是投靠何应钦，被编为新编第四师，做了师长。随后该部以北伐先遣军名义，从鲁南开往胶东。济南惨案以后，又开往河南禹县一带。

1929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何应钦命刘桂棠向冯玉祥部进攻，刘率部在禹县一带击溃了冯军一部，获得蒋介石电贺，电称该部为“铁四师”，这年冬刘奉命开往临汝一带。1930年4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派人以高官厚禄拉刘桂棠，刘在禹县战斗后，未得升官发财本已不满，经阎一拉，便倒蒋投阎。阎以大炮四门、重机枪十二挺、冲锋枪一百四十四支、现金二百万元为欢迎礼，把该部编为第二十六军，刘做了军长。10月阎、冯失败后，阎锡山怕东北军占其老巢，命所属各部开回山西。刘不听调动，脱离阎锡山，带兵北上。1931年7月到达河北大名，即派人与东北军联系，张学良将该部编为第六混成旅，刘任旅长，仍驻大名。

刘桂棠的朝秦暮楚，使蒋介石又恼又恨。刘部驻大名以后，蒋命刘峙指挥三个师、一个旅围攻，血战多日，匪大部被消灭。刘桂棠带残匪二千突围跑回山东，驻高唐一带。这时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派幕僚陈席之进行拉拢。陈、刘是同乡，老相识，经陈劝说，刘桂棠决

定投韩。同年12月，韩委刘桂棠为山东新编警备军副指挥，所部编为四个警备旅，仍驻高唐一带。但是，由于匪部不听调遣，不到半年就摩擦起来，韩停止了对匪部的供给，并密谋解除其武装。刘侦悉了韩的意图，于1932年6月从高唐一带撤出，再次北上，到河北霸县，挖了韩复榘的祖坟，即跨过河北，打败汤玉麟的防军，进入热河，并迫汤让出开鲁、林西一带地盘给刘匪驻扎。1933年春，当日本叫嚷长城是伪满国界的时候，刘派部下去东北联系投靠日伪，讨得了伪满“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下设三个军。刘部曾积极配合日军茂木骑兵旅团侵占沽源等地。5月下旬，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宋哲元的幕僚田家斌与刘桂棠联系，刘于6月26日通电参加同盟军。8月同盟军失败后，刘部为何（应钦）、宋（哲元）改编，刘任察东剿匪司令。不久，由于与汤玉麟部冲突，刘又率部南窜，一直窜至河南南阳地区，次年2月窜回山东。韩复榘派重兵袭击，曹州一战，大汶口又一战，刘匪大败，带残匪四千东窜，在诸城县境被包围。激战二十昼夜，残匪基本被消灭，刘只身逃亡天津，在日租界潜居下来。

刘桂棠寓天津一年，这时他的旧部刘德胜带残匪少许在宣化活动，1935年秋，刘桂棠从天津到了宣化，指挥残匪大力扩充，不到半年，有了三千多人。1936年初，刘匪窜到保定、石家庄等地活动。2月，窜到东光县境，遭宋哲元、商震两部袭击，三千土匪基本就歼。3月，刘再回天津，投靠日本侵略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刘桂棠联络潜居各地的散匪，于年底向日军讨得了“皇协军前进总司令”的头衔，带上喽啰，跟上日军到了山东。他从鲁北辗转到了胶东，1938年他在掖县、即墨等地扩充队伍，至年底又有了三千多人。刘有了势力，对其日本主子的调遣便不那么顺从了，日军因而要解除其武装，主奴之间动了干戈，刘率部撤出胶东，打着“反正抗日”的旗号开进鲁中山区，与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取得联系。于将该部收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刘重新做了国民党的师长，1939年春移驻平邑县——刘的老巢。

平邑广大地区自抗战爆发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建成抗日根据地。刘桂棠这时以“反正抗日”的名义进入鲁南，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取欢迎态度。但是刘的所谓“反正抗日”，不过是骗术，当他脚跟站稳以后，从1940年春便开始疯狂地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当年的柘沟战斗，刘匪袭击八路军津浦支队三团，二百多指战员牺牲。同年冬，刘匪曾纵火把费南六十多个村庄烧成灰烬，制造了蒙山无人区。1941年5月，刘匪又勾结日伪袭击费南[1]二区，区中队和工作干部五十多人牺牲。同年秋，刘匪再次配合日伪袭击抗日根据地一干校，鲁南三团为保卫干校安全转移，一百多人牺牲。刘匪对抗日人民极其残忍，凡被认为有共产党、八路军嫌疑的人，捉到必定活埋，仅大井村一处就活埋了二百多人。

刘桂棠匪徒的疯狂进攻受到了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1943年人民武装集中力量打击该匪。这年秋，刘见势不妙，破坏了老巢的一切军事设施，把家眷秘密送往天津，开始了流窜活动。人民武装跟踪追击，不断削弱其力量。11月，匪部窜到上下柱子（两个山村），八路军鲁南部队发起了歼灭刘匪的战斗，全歼残部，刘桂棠被击毙。

主要参考资料

李钟豫修，亓因培等纂：《续修莱芜县志》卷38“大事记”，济南善成印务局1935年版。

陈沂：《奔袭刘黑七》，《红旗飘飘》第6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

(1)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建有费南、费北两县，解放后合并为平邑县。

刘国钧

史全生

刘国钧，1887年4月2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九）出生于江苏靖江县一个塾师家庭。1893年，他父亲刘黻堂因科场失意，患了精神病，不能坐塾，靠他母亲给人家帮佣度日。刘国钧少时因得不到母亲的照管，常常踯躅街头，稍长后以贩卖水果、酒酿和拾柴辅助家计。十岁时曾进私塾读了一年书。1900年，刘到靖江县城一家糟坊当学徒，因不堪繁重的糟坊劳动，一年后即离去。1901年春，他去常州埠头镇谋生，7月入奔牛镇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次年中秋，刘吉升京货店倒闭，他又入元泰京货店当学徒。

常州奔牛镇地处大运河畔，后来沪宁铁路又经过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盛。刘国钧在元泰京货店三年满师后继续当伙计，常去附近各地批货，出入各家货栈，逐渐熟悉市场行情，萌发了自己开店的念头。为筹集资本，他一方面在外出批货时广拉生意，获取佣金；同时由其母亲和妻子编织辫须（清时男子扎辫子用的一种丝带），送到店里代销；又搭了一个互助会，筹集起六百元资本。1909年刘与人集资一千二百元，号称二千元，合伙开办了和丰京货店，并附设土染坊印染布匹。两年后，合伙者因负债，把股份让给了刘国钧。

1911年10月武昌举义，11月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相继光复。清廷江南提督张勋盘踞南京，扬言将东下镇压革命，一时人心惶惶，奔牛镇上各店家害怕战祸，纷纷关闭歇业。刘国钧原也准备歇业，但见其他各店歇业后，生意集中到和丰一家，便壮着胆子继续营业。不久，革命党人组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张勋率部退至徐州以北，社会秩序迅即安定，和丰京货店非但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反而赚了一大笔利润，到年底盈余五千余元。次年，刘又接盘了同丰京货

店。到1915年，他拥有资本二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忙于战事无力东顾。当时，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实业救国”呼声甚高。刘国钧见国货畅销，民族工业一时获得迅速发展，遂开始弃商从工，投资一万元，与蒋盘发等人共集资九万元，创办了大纶机器织布厂，蒋任经理、刘任协理。

1917年，刘国钧退出大纶织布厂，于次年独资开办了广益织布厂，拥有木机八十台，悉心经营。由于熟悉市场，又有经营大纶的经验，头年就盈余三千多元。1922年，刘又创办了广益二厂，拥有木机一百八十台、铁帽子布机三十六台，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织布厂。

刘国钧为求在纺织工业上有所成就，于1924年访问了日本。他发现日本厂商的经营管理讲求实效、节减工序、费用少、成本低。回国以后，便不断改进经营管理。首先采用了以筒子纱代替盘头纱的先进方法，节减了工序。同时，他根据市场需要改变经营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为主，改为以色布为主，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等。1927年，刘将设备陈旧的广益一厂停歇，全力经营广益二厂，淘汰旧式木机和铁帽子布机，购置了一百八十台电动式布机，改进技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其“征东牌”和“蝶球牌”色布远销海外，获利甚厚。到1930年，刘国钧除了广益厂固定资产以外，已拥有二十余万元流动资金。

刘国钧退出大纶布厂以后，蒋盘发在1921年集资六十二万元创办了大纶纺织厂[(1)]，拥有纱锭一万枚，布机二百六十台。但是，大纶纺织厂开办伊始，恰值欧洲各国回到亚洲市场，所以“开车未久，纱市败坏，连年亏损甚巨”[(2)]。1925年出盘给沪商顾吉生经营，改名为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同样连年亏本。1930年，刘国钧投资二十万元，招股二十万元，又向钱庄借款二十万元，以五十万元接盘大纶久记纱厂，以十万元用于修配和更新机器，将大纶久记改名为大成纺织染公

司，自任经理，刘靖基为副经理。随后，他又以厂基作抵押，向上海银行借款四十万元作流动资金，开工生产。

就在刘国钧经营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前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爆发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又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国产纱、布销路大增。因此，大成公司自1930年夏开工以后，半年即盈利十余万元，第二年又盈余五十余万元。1933年以后，纺纱业由于受欧美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始萧条，而织布、针织和整染各业，则因进口货锐减，反而呈现繁荣景象。刘国钧乃向织染方面发展，1932年将自己独资经营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公司，改名为大成二厂，使大成公司“实行自纺自织自染之一贯工程”，废除工头制度，“聘用专家管理，厂务日有起色”[(3)]，资本从1930年的五十万元（实收四十万元）增加到1931年的一百万元，1932年增为一百四十万元。

刘国钧1932年和1934年又两次东渡考察日本纺织工业，参观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程序。开始时，他以上海协祥批发号董事的名义出现，日本厂商为了招揽生意，争相延请。不久身份暴露，参观受阻，刘就改到盛产灯芯绒和丝绒的滨淞县，深入农村参观割绒技术。回国时，还从日本买回一套丝绒和灯芯绒生产工具设备，聘请一位日本工人来试制。

由于日本不断加快它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在我国沿海城市大量开办工厂企业，控制了当时我国最大的三个棉纱纺织中心上海、天津和青岛，刘国钧和其他纺织工业家纷纷向内地发展。1936年，刘国钧与已经亏本停产三年、急待出租的汉口震寰纱厂股东商定合作办厂：大成出资三十六万元，震寰以机器折价二十四万元，由大成公司经营，改为大成三厂，定期六年[(4)]。年底，大成公司增加资本至四百万元，订购了当时最负盛誉的瑞士里特纱锭三万二千枚、布机一千零八台，并将汉口大成三厂改名为大成四厂，另在常州东门外筹建大成三厂[(5)]。

1937年夏，常州大成三厂厂房已经建成，正在安装试车。“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形势险恶。刘国钧将大成三厂纱锭分批运往上海租界贮藏，二百台布机运至汉口。次年1月常州沦陷，大成公司遭受严重破坏，一厂所存物资被抢掠一空，二厂被炸成废墟，三厂被日军当做马厩。这时，上海租界成为“孤岛”，许多未及内迁的工厂纷纷移入租界，刘国钧亦于1938年将贮存在上海的资金设备，以英商名义注册，开办了安达纺织公司，自任总经理，刘靖基任经理。

这时，由于日本的疯狂进攻，武汉风声日紧，刘国钧提前结束了与震寰纱厂的合作关系，将四厂的二百台布机和从四厂分得的二百余万元物资运至四川，与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作，在重庆北碚创办了大明纺织染公司，月产布七千匹。他并先后在重庆开办了批发字号；在香港开办了经销原料的大孚商行；在重庆、昆明、河内、仰光等地设立了办事机构，经常来往于渝、沪、港之间，组织指挥生产和贸易。

1944年，中国棉纺织学会成立，刘国钧被推举为候补监事。这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刘写了一篇《扩充纱锭计划刍议》，设想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十五年内，全国纺织工业发展至一千五百万枚纱锭，并对筹集资本、织机制造、人才培训、原料供应、工厂布局和管理经营等等，都逐一作了全面规划和设想[(6)]。对于自己的企业，他计划十五年内发展至五十万枚纱锭，并向毛、麻纺织发展。为了做好准备，同年夏他赴美国访问，以后又转道加拿大参观棉、毛纺织厂，向美国订购了二万枚纱锭、三万担棉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刘国钧从美国回来，立即投入工厂的修复工作。经过三个月的整修，大成公司基本恢复，三个工厂拥有纱锭三万二千一百枚、线锭四千八百枚、布机七百五十六台，资本为一千五百万元[(7)]。他在国外订购的设备，结汇和分期付款需要银行担保，便在自己名下划出五万元给上海银行陈光甫，并聘陈任大成公司董事

长以取得上海银行担保。1946年，又与彭浩徐等人创办了中国纺织机械公司。由于刘锐意经营，大成公司迅速发展，到1949年，已拥有五万余枚纱锭、一千一百八十台布机和日产五千匹（二十万米）布的印染设备。

1948年8月，蒋介石下令实行“币制改革”，强迫收兑黄金、银元、外币，大成、安达两公司在上海所存的黄金、美钞被勒逼一空；再加上国民党政府“限价”失败，物价狂涨，两公司损失惨重。刘国钧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将私人存款和大成公司部分现金转移到香港储存。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全国新政权建立在望。刘国钧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共产”，便将大成公司二百台布机经台湾运往香港，又以转移到香港的存款购买了六千六百枚纱锭，在香港开办了一家东南纱厂。此外，他还在美国购买了十万美元的公债，储蓄二十万美元，在巴西投资橡胶园，以做退步之计。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携眷移居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常州大成公司所属各厂的生产也蒸蒸日上。刘国钧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开始把转移到香港的现金逐步汇回，支援祖国的建设。1950年春，他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返回祖国大陆，继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安达公司副经理兼副董事长。1954年6月1日，大成公司在江苏省棉纺织系统中，首先实行公私合营，刘任总经理兼副董事长。以后，刘国钧历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江苏省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江苏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1978年3月8日，刘国钧在南京病逝。

---

(1) 《新武进报》1922年3月13日。

(2) 《棉业月刊》第1卷第4期（1937年），第597页。

(3) 《棉业月刊》第1卷第4期（1937年），第597页。

(4) 刘寿生、刘梅生：《震寰纱厂遭受帝国主义掠夺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5) 《棉业月刊》第1卷第2期（1937年）。

(6) 《中棉纺织学会会刊》第2期（1944年）。

(7) 正平：《胜利后全国棉纺织业设备概况》，《纺织工程》第8卷第1期（1946年），又见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1月登记表，表存江苏省档案馆。

刘海楼

邢汉三

刘海楼，湖南长沙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其父是清代进士，在河南居官多年，宦囊充裕，在开封、武汉、长沙等地广置田产。刘海楼自幼苦读经史；稍长，目睹清王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加以受戊戌变法影响，遂不再留恋仕举，转而研读西学，醉心于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振兴实业、发展经济。1912年，他与当时在武汉电业公司任职的好友魏子祥合作，在开封创设普临电灯公司，由武汉电业公司分派技术人员，并调拨各种应用器材，作为股金，数额占全部股金三分之一，余额由魏、刘各出半数。魏子祥任经理，刘海楼任副经理，武汉电业公司派人任技术主任。普临电灯公司作为武汉电业公司的子公司在开封创设后，营业相当兴盛，为刘海楼以后成为河南实业界知名人物打下基础。

刘海楼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民初南北议和期间，为促成和议成功，北京有人组成国事共进会，呼吁南北团结，并号召各省成立分会。刘在河南组成分会，多方奔走，后被选为该会参议。他还创办了《开封实业日报》，以经济报道为主，面向商界，受到河南工商界的欢迎。报纸编写以白话文为主，曾受到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赏。

以后数年中，刘海楼相继在开封新创设的面粉厂、卷烟厂等企业中投入大量资金，同时独资创办大中火柴厂，自任总经理。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火柴厂，由于管理得法，工厂发展很快，利润倍增，他被选为开封商务会副会长及河南全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举国愤慨。河南全省各界人士迅速组成沪案后援会，反击英日侵略者，支援上海受难同胞。6月19日，开

封各界以学生为先导，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起募捐运动，接济上海受难同胞。各校青年学生推出代表二十余人，要求商会捐款五万元。刘海楼出面接待，对学生要求慷慨承诺，表示愿追随青年及各界人士之后，与敌人周旋到底，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官僚资本逐渐侵入河南。刘海楼因在开封经营多年，颇著成绩，在开封市商会及河南工商联组织中，仍能保有一定地位。普临电灯公司和大中火柴厂等虽均照常营业，但营业额及利润已大不如昔，他在工商界的发言权也不断削弱，已有形势日非之感。为另谋发展，他得悉西安火柴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量少，供不应求，乃派其亲信冯尚文到西安，筹建陕西中南火柴厂，投入大量资金，除由开封大中火柴厂调拨一部分器材外，又从上海、武汉等地购入不少新设备。中南火柴厂开业后，生产率及年产量均超过大中火柴厂，刘海楼经常往返于开封、西安间。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大举入侵，刘海楼为确保资产安全，设法将一部分资产转往长沙。时刘虽已年逾花甲，但对其在开封的部分资产，仍未忘情。1938年秋曾潜至开封，欲收回被日本军管的大中火柴厂，但不敢公开露面，经月不得要领，又秘密返回西安，勉维旧业。

刘海楼于1949年初返回长沙，在长沙病故于家中。

主要参考资料

河南《实业日报》。

《晨报》1925年6月21日。

开封市轻工业志总编室调查材料。

刘海粟

陈祖恩

刘海粟，原名槃，又名九，字季芳，江苏武进人，1896年3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三）生。其曾祖父刘镛、祖父刘清严曾是清末翰林学士。父亲刘家凤，字伯鸣。母亲是乾嘉时代著名诗文家洪亮吉的孙女，娴熟诗文，是刘海粟幼时的启蒙教师。刘海粟六岁入私塾读书，写字习画。他不愿受规矩束缚，常常信手作画，不久即被塾师借故退学。其母每天晚上花两小时教他，主要讲解洪亮吉的诗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影响。十岁时入刘家在常州义庄办的绳正书院学习，除子、史、经、歌赋外，还读了一些西方书籍。在一次书院游艺会上，他当众画了一幅画，并书写“逢源会委，勇智宏辩”的对联，笔力刚挺而有奇气，被称为“神童”。

1909年，刘海粟的母亲病逝，他异常悲痛，要求到日本去留学，但被父亲拒绝。为寻求知识，他到上海入“背景画传习所”学画。课余时间刘海粟大量阅读介绍欧洲文化的书籍，大大开阔了视野，还临摹欧洲名家画作，兴致很高。他还常到沧浪亭画会参加海上画家的诗画兴会。半年后，他回常州开办图画传习所。

刘海粟目睹中国美术的衰落，萌发了创办美术学校的志向，“冥想枯索，发愿一面尽力发掘吾国艺术史固有之宝藏，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艺术，求所以转旋历史之机运，拓将来之新局面”[(1)]。1912年11月，与乌始光、张聿光在上海乍浦路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前身）[(2)]，十七岁的刘海粟出任校长。他们提出的办学宗旨为：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尽宣传艺术的责任，谋中华艺术的复兴；有研究和宣传的诚心。是为我国近代第一所正规美术学校，揭开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序幕。该校于次

年7月在静安寺张园安垲第召开第一次作品展览会，引起中外人士的瞩目。1914年，刘改绘画科为西洋画科，次年3月在西洋画科三年级设置人体模特儿写生课，以锻炼学生的造型基本功。他让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师法自然，于1918年赴各地旅行写生。1920年，刘扩大学校规模，设中国画、西洋画、工艺图案、雕塑、高等师范及初等师范六科，同时兼收女生，是为上海学校男女同校之始。7月，为普及艺术教育，开办第一期暑期学校，来学者多为苏、宁、沪、杭各地担任艺术课的教师。1925年，刘海粟改订新学制，设造型美术院，分中国画系和西洋画系。师范院分图画音乐系和图画手工系，并设图音专修科和图工专修科。

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刘海粟创办这所新型学校得到多方面的支持。1918年4月，蔡元培书“闳约深美”四字匾额一方赠刘，以资鼓励[(3)]，并邀请刘到北京大学举行画展、演讲近代艺术思潮等课题，还撰文《介绍艺术家刘海粟》。1922年3月，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推蔡元培为校董会主席，蔡元培欣然答应，并委黄炎培为驻沪代表。鲁迅曾在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第一号（1918年12月）上发表题为《美术杂志第一期》的文章，对上海美专创办《美术》杂志表示关注和支持。

1919年9月，刘海粟与友人发起创立新美术团体“天马会”，定期举办画展，以期宣传艺术，谋求中华艺术之复兴。在一次天马会举办的画展上，刘海粟结识了康有为。不久，康出所藏书画，为刘口说指画，复与之议论书法，并授擘窠大字悬腕诀。刘海粟还与梁启超、章太炎、叶恭绰、吴昌硕、柳亚子、郭沫若、胡适等人交谊甚深，他的艺术才华和创新精神，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推重。

刘海粟崇尚“不饰不伪，向着本心要动的方向而动”，“既不能敷衍苟安，尤不能妥协因循”[(4)]，在绘画实践和艺术教育中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开拓了中国近代美术的新路，博得进步人士的盛赞，同时也引起社会守旧势力的顽强反对。早在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院选出学生

习作举行展览时，其中陈列的人体素描，就遭到某些思想顽固者的不满，斥责“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的蟊贼”，并上书江苏省教育厅下令取缔制裁。但刘海粟并不害怕，1919年8月又联合同好在静安寺展出人体油画，勇敢地向旧势力挑战。翌年7月，他开始雇用女模特用于教学。1925年，上海闸北市议会议员姜怀素等人又一次掀起取缔模特的浊浪。次年春，上海知县危道丰公然严禁美专裸体画。刘海粟在《申报》发表文章，强调美术学校设置人体实习课的必要性。时任五省联军司令的孙传芳写信给刘“去此模特儿”，但刘不畏强权，复信驳孙，说明人体模特写生为艺术学校绘画之必需，并符合政府所颁新学制的规定。孙传芳恼羞成怒，发出“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并指令封闭上海美专。上海知县危道丰还向上海法院控告刘海粟“侮辱人格，毁谤名誉”，要求赔偿损失。刘海粟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使那些卫道士十分狼狈。历时近十年的模特事件是艺术和礼教的冲突，刘海粟以“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无所顾惜”，“提倡艺术之志不能夺”[(5)]的态度慨然处之。

1927年4月，刘海粟东渡日本，受到画家们的热忱欢迎，数万人参观他的画展，日本天皇及许多著名人士购置他的作品，并赠予象征最高荣誉的银杯。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称他为“东方艺坛的狮子”。1928年12月，刘被蔡元培任院长的国民政府大学院委派赴欧洲各国考察美术。在法国，他组织美术界同行在卢浮宫摹绘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名画，以备将来开办国立美术馆之用；同时集合四十余人组织中华留欧艺术协会，“一方面宣扬吾国固有之艺学，一方面研究现代新兴之美术”[(6)]。刘在法国除考察美术外，还创作了大量绘画。1929年和1930年的法国秋季沙龙分别选中他的《北京前门》、《向日葵》、《休息》，被法国文豪赖鲁阿教授赞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大师”[(7)]。1931年6月，他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行旅欧个人画展，四十余幅作品受到众口称赞，《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藏。刘在欧洲期间，还往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国考察美术。1931年3月，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之聘，讲演中国画学。同年9月他旅欧回国，将考察所

及和研究所得致书教育部，建议建立博物馆，设立美术院，改善美术学校学制等，以复兴中国艺术；同时在上海美专增聘教授，改进校务，并开设绘画研究所。

1933年11月，刘海粟第二次赴欧，代表我国主持中国美术展览会。先在德国柏林，继后在汉堡、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及瑞士伯尔尼、日内瓦，荷兰阿姆斯特丹、海牙，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英国伦敦等十五个地方展出。每到一地，刘均作学术报告，如《中国画之变迁》、《何谓气韵》、《中国画家之思想与生活》、《中国画与诗书》、《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等，介绍中国传统绘画之精妙特点。同时他在各国写生和创作不辍。归国后，在上海举行“刘海粟二度欧游作品展览会”，展出了他的中国画和油画等三百幅。他将上海美专音乐系改为主副科制，并恢复雕塑系。上海美专还举办各省市初级中学劳作科教师暑期讲习会及劳作专修科，以推动全国中等学校美育教育。

卢沟桥事变后，刘海粟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战争。1939年1月，刘海粟组织上海美专师生举行接济难民书画展览会，捐画四百幅，得款悉数拨充上海难童教养院建筑经费。同年4月，又为上海医师公会主办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及吴昌硕遗作展览，展览先民遗迹，弘扬民族精神，两次收入都作为抗日医药救护经费。同年末，刘海粟应侨胞邀请，离上海赴雅加达、万隆、三宝垄、玛琅、新加坡等地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得款总计一千二百余万元，全部寄回祖国支援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刘海粟化名罗赫，避居爪哇，于1943年5月被日本侵略军俘回上海。日伪以“中日文化协会”之类的文化机构作招徕、劝诱他出任伪教育部长，刘海粟一一严正拒绝。刘闭门不出，埋头写字作画，曾写《落泊歌》曰：“懒向豪门作乞儿，闲来写幅丹青贶”，“素描写出家国悲，泼墨狂扫风云壮”，表达了坚守民族气节的决心。

刘海粟勤于绘画，创作丰硕。他主张在艺术上学习传统，学习生

活，兼收并蓄，大胆创新。他幼年学画，从“常州恽（南田）派”，印摹白描花卉，后来潜心探索传统，融会吸收，而又不拘一格，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因此，他的中国画上溯宋元，下至三石（沈石田、石涛、石溪）、梅清诸家，融会贯通，根据对自然的不同感受和思想境界的提高，不断有所创新。1924年作中国画《虞山言子墓》，使八十三岁高龄的吴昌硕极为赞赏，欣然题曰：“吴中文字传千古，海色天光扫古墓，云水高寒，天风瑟瑟，海粟画此，有神助耶。”郭沫若谓刘“别开蹊径作奇画”，“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刘海粟画油画是从青年时代在上海开始的。他受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影响，笔触奔放而凝练，色彩浓郁强烈，不加修饰，一气呵成。他认为类似后期印象派这样的艺术手法，是受东方造型艺术的启发，最适合于表现作者的豪迈性格和火热情感。从30年代后半期起，他的油画往往运用中国画的云气，表现空间层次，有时恰到好处地留出空白，令人感到意境无涯，耐人寻味。其晚年的油画，运用篆隶和行草笔意，注入中国画写意表现手法，线条凝练，色彩错综富有变化。

刘海粟在绘画理论和美术史方面的研究，有几百万字的著述，如《画学真诠》（1919年，商务印书馆版）、《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1921年，商务印书馆版）、《海粟丛刊》（1932-1936年，中华书局版）、《欧游随笔》（1935年，中华书局版）、《十九世纪法兰西的美术》（1935年，中华书局版）、《刘海粟艺术文选》（198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等十几种。他的画集出版有几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海粟历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和第六届常委。他多次登上黄山写生作画，耄耋之年仍登山作画不辍。他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书画展览，受到很高赞誉。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聘他为通讯院士，并授予他金质奖章。

1994年8月7日，刘海粟病逝于上海。

---

(1)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概况》，1946年上海美专自编，第1页。

(2) 创办于1912年11月的上海图画美术院，1915年改称为上海图画美术学院，1918年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1920年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起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被教育部定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见袁志煌、陈祖恩编《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

(3) 袁志煌等：《刘海粟年谱》，第14页。

(4) 刘海粟：《欧游随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20、129-130页。

(5) 《关于评刘海粟画展的总答复》，《申报》1936年7月16—23日。

(6) 刘海粟：《欧游随笔》，第120、129-130页。

(7) 《海粟艺术集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0页。

刘航琛

伍志安

刘航琛，四川泸县人，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其父刘子休系天主教徒，在泸县经营“爱仁堂”酒厂，酿造大曲酒。以教会关系，向法国人学得“花酒”酿造技术，取名“露酒”，并改罐装为玻璃瓶装。刘航琛19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22年毕业后回泸县任泸县中学校长。

1926年，四川烟酒税征收局把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课以重税。为此，刘航琛到重庆申诉，在呈文中讥诮局长王用九：“钧座所订规章，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若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为洋人，可乎？”王大怒，要查封“爱仁堂”重庆分号，逮捕刘航琛，后以说情送礼了事。刘航琛受此刺激，发誓要进入仕途。

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兼任重庆铜元局局长，因亏累不堪，束手无策，刘航琛由北大同学陈学池（时任王陵基所办《大中华日报》负责人）推荐，任铜元局事务所所长。刘到职后，把流通的二百文值铜元改铸为“新二百文”，缩小体积和重量；并拉拢上海巨商汤壶峤，由汤垫款在沪购铜，铸成铜元后交汤经营的字号包销，付还垫款。此举迅即扭转了铜元局的亏损局面，大获其利，刘因此深得王陵基的赏识。其时，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了扩充武力，争夺地盘，急需军费，经办财政的人员一筹莫展。王陵基乃把刘航琛推荐给军长刘湘，充任第二十一军财政处的科长，不久升为副处长、处长。

刘航琛承办第二十一军财政，一变过去军阀强索硬派的办法，从捐税、公债、发行钞票等方面广为搜括。他以“加重税捐，争取盐

税，整顿特税”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之计，成立重庆税捐总局，请刘湘兼总办，使第二十一军各部属不敢恣意截留税款；又把当时名目繁多、关卡林立的苛捐杂税合并稽征，做到他所谓的“苛而不扰”。四川盐税稳当可靠，向为军阀所垂涎，而川盐的产区与销区，时由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一军分别割据，两军为向两区轮流提取盐税，争论多寡，时生矛盾。1928年成立两军财务统筹处，刘航深代表第二十一军担任副处长，两军以“产运结合”的办法瓜分盐税。刘航琛所谓整顿特税，是以“寓禁于征”为名，广行搜括之实。对鸦片烟产区固然大抽烟税，对不产烟的地区，也一律派以烟苗捐。他还在各地成立禁烟查缉处或稽征所，名曰收缴税捐，实则办理烟土的外运内销。1930年，刘航琛建议成立了第二十一军总金库，自任收支官。刘以金库名义发行粮契税券，规定纳粮必用，实际上是变相的发行钞票，至1934年发行额达数百万元。金库还大量发行各种库券、公债，交由金融业推销。从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发行债券高达四千一百余万元。以上措施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刘湘，使刘湘得以打败第二十四军刘文辉，独霸全川。

刘航琛为了取悦于刘湘，早在1928年即从财政处按月拨出十万元存入刘湘账上，供其自由支用，既为刘湘提供了方便，又杜绝了第二十一军将官借刘湘名义向财政处任意索取。刘航琛又将购买武器所得回扣二十余万元，全数交账，不入私囊，以求取信于刘湘。刘湘对刘航琛聚敛有方，十分赞赏；但又认为他居心叵测，难以驾驭。1933年，刘湘受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主任，在筹组四川省政府时，财政厅长一席没有提刘航琛。这时，刘担任第二十一军的驻南京代表，千方百计结交国民政府的达官显贵，取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赏识。在宋的支持下，1935年2月他终于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

刘航琛就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后，兼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为整顿四川财政，他开办了“财训班”，培植一批亲信，派往省内各地财税机关。他亟力整顿田赋，当时各县的钱粮，全川每年共可以收得七百多

万元，加以从“统一田地买卖和典当税率”中的收益，征收验换契纸费，加重屠宰税附加，继续征收禁烟税等等，一年共搜括四五千万元。从1936年起，又征收营业税，按照各企业的营业额提取百分之三为省地方收入。其时，国民政府已推行法币政策，地方银行不得发行纸币。但刘航琛仍以四川省银行名义发行大量辅币，到1937年10月，实际发行额已近一千万元。从省政府成立到抗战开始，还先后发行了各种名称的公债达一亿四千五百余万元。刘航琛多方搜括，扭转了四川财政的困难局面，做到收支平衡，还有结余。

刘航琛力图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和扩张他的经济实力。初进第二十一军即对刘湘献策：搞财政不能不同金融业和商帮打交道，要利用他们的实力。1930年9月，他请准刘湘创立川康殖业银行，宣称资本额为四百万元，实则只是从禁烟款下拿出六十万，另加一点商股，不过一百万元。从此他亦官亦商，在金融界扩展实力，利用刘湘交付的军火款，在川康殖业银行经销公债，发行无息存票，攫取一般商业银行所不易得到的厚利。抗战爆发后，他又趁势合并了重庆平民银行和四川商业银行，改组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集股三百五十万元，资本额冠于川帮银行。他对重庆盐商组织的川盐银行早存觊觎之心，通过他与滇行董事长吴受彤的关系而入股为董事，1937年吴受彤病危，力荐刘航琛继任，刘如愿以偿，担任了该行董事长，逐步攫取了该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权。刘从此控制了川康、川盐两行，俨然成为重庆金融界的大亨，声势煊赫。

1935年，聚兴诚银行存户向财政厅控告该行舞弊，刘航琛也早想插手聚兴诚，借此事件即以财政厅长名义，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提走聚行账簿，迫使该行总经理杨粲三接纳刘航琛入股，担任了该行常务董事。1937年，重庆商业银行因赌公债失败，发生挤兑风潮，向川康、川盐告急。刘不但拒不借款应急，反要求有关当局下令关闭重庆商业银行。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金，大量投资工商企业，

几年中攫取了重庆金融工商界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七十多个头衔，控制了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和沅猪鬃公司、兴华保险公司等重要经济事业，还掌握着《商务日报》、《益世报》、《新民报》等新闻机构。

1938年1月刘湘死去，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对刘航琛素有恶感，下令彻查财政厅账目，并拟逮捕刘航琛，刘闻风逃往香港。次年王缵绪下台，刘航琛在杜月笙、顾嘉棠支持下回到重庆。他大力整顿川康、川盐两行人事，大搞黄金、棉纱、药材等投机买卖，不断壮大自己经济实力。

1941年，重庆粮食供应出现危机，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委刘航琛为粮食部特派员，去四川各地催调粮食。刘带领川康、川盐两行亲信，分路巡视各县，利用过去分布在各地的“财训班”人员和袍哥势力，筹集到了一批粮食，从而当上了陪都民食供应处长。1942年刘航琛升任粮食部常务次长，但不久受到排挤而下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航琛认为今后上海是金融业的前线，重庆是后方。他立即将川康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沅、电力公司等单位联合办事处。为了使“业务日臻现代化”，又在重庆以川康、川盐两行，联合宝沅、沱江、华西、电力等十八家银行、厂矿、公司，设立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拨资两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

1946年，刘航琛到上海，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杜月笙、顾嘉棠，筹组利济轮船公司，希图开办海运事业。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的一部分海船交给他，李宗仁也表示愿意把正在筹办的一家海运公司交与他经营。1948年4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刘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耗费颇巨。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6月，刘航琛在广州当上了经济部部长。他见该部所属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有

钨、锑、锡外销矿产品，总数约值美金五六百万元，遂见财起意，一面诱使该所所长郭子勋出国“考察”，一面组织商号，企图将全部矿产品收买过来，予以吞没。该所员工识破骗局，成立保护矿产品委员会进行抵制。刘航琛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经法院判决，该矿产品暂时冻结。以后由香港当局移交给了新中国。

不久，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利济轮船公司两艘旧船靡费甚多，而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不兑现。公司尚未组成，即告破产。刘航琛的老巢川康、川盐两行，由于投资多，亏空太大，特别是大量资金被抽到利济轮船公司，难以周转。刘曾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二百万元汇渝解救，亦无济于事。刘航琛后去重庆，10月中旬携眷去香港，以后又到了台湾。蒋介石借口刘航琛对经济部事务交代不清，下令逮捕惩办，后经何应钦、张群等人说情，取保释放。

1975年9月28日，刘航琛在台北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四川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刘航琛口述、章君谷执笔：《戎幕半生》（附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刘航琛》，戚再玉主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版，第204页。

邢世同：《我所知道的刘航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64年版。

宁藏村等：《亦官亦商的刘航琛》，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工商人物志》，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

刘鸿生

熊尚厚

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6月14日（清光绪十四年五月初五）生于上海。父亲刘克安原是招商局一艘客轮的总账房。他七岁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母亲做杂活供他继续求学。1901年，刘鸿生入上海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中学，1905年入圣约翰大学。他读书用功，头脑聪敏，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在校与宋子良同学。二年级时，校方决定把他培养成牧师，让其去美国留学，他没有答应，即被无理开除了学籍。刘离校后先在英租界老闸捕房当教员，两年后转到会审公廨做翻译，又半年改入意籍牧师穆安素（Giuseppe Domenio Musso）事务所工作。

1909年，刘鸿生经其父的挚执友周仰山介绍，进了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当跑街。当时，开平煤炭在南方销路不佳，他先后在上海及江浙地区的窑业中为开平煤打开了销路，1911年升为上海开平矿务局（次年改称开滦矿务局）买办。他在上海设立开平公司售品处，开设账房（后称刘鸿记账房），独家经销开滦煤炭，接着建设开平码头，设置煤炭堆栈，又与义泰兴号合作销售开滦煤斤，并组设义泰兴码头公司。未及三年，使长江下游成了开滦煤的重要销售区，刘鸿生备受开滦英商的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工商业得到发展机会，江浙地区对煤的需求大增。从1916年起，刘鸿生自租轮船由秦皇岛运煤销往江浙，两三年间赚银一百万两。为了扩展煤斤的经营，1917年他与义泰兴煤号投资十余万元，接办柳江煤矿；在浦东设义泰兴董家渡煤栈（即北栈）；接着又于南京下关筹办码头，于上海、苏州、南通等地与人合伙设煤号，从而在长江下游建立起煤炭供应网点。由于经销有术，到

大战结束前后，刘鸿生已成了拥资百万的煤业巨子。随后他被举为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长，加入了上海“洋人俱乐部”，闻名于上海工商界。但他感到自己虽发了财，可“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1)]。于是，他决心创办工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上海燮昌火柴厂总经理叶世恭是刘鸿生的岳父，因此他对火柴业早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市场对火柴的需求甚殷，经考察后刘鸿生认为火柴厂投资少，能赚钱，1920年，他与杜家坤等人集资十二万元，在苏州创办了鸿生火柴厂，自任总经理。该厂创办后，初因竞争激烈连年亏蚀，几濒于危。后经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减轻成本勉力竞争，情况才有好转。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高涨，日商猴子牌火柴遭到抵制，瑞典商凤凰牌火柴的销量也骤减，国产火柴获得暂时的优势。鸿生火柴趁机打开销路，转亏为盈。同年他收买了于上年倒闭的上海、苏州两家燮昌火柴厂。1926年鸿生火柴厂增资至五十万元，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翌年聘留美化学博士林天骥为工程师改进产品，生产安全火柴，年获利十万余元。鸿生火柴厂成了江苏第二家火柴大厂。

在创办鸿生火柴厂的同时，刘鸿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地区各行业大兴土木、市场上水泥供不应求的情况，1920年9月与朱葆三、李拔可等人集资一百二十万元，在龙华筹办华商上海水泥厂。为了掌握生产水泥的知识和经验，他亲自前往欧洲考察学习，1922年自兼水泥厂总经理。次年8月象牌水泥投产，当即碰到外货和北方启新洋灰的竞争，1925年6月与启新达成划分销区、稳定价格和联合对外的协议。1927年8月，他倡议扩大联营，邀请南京中国水泥公司参加，终于在1931年达成协议。上海水泥公司产量连年大增，产品行销江浙地区。由于同业联营和共同提价，获利颇厚。

随着鸿生火柴厂和上海水泥厂开办获利，刘鸿生展开了广泛投资活动。在煤业方面，有元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煤业公栈、镇江安丰煤业公司、南京煤业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华东煤矿公司；码头业有

中华码头公司；搪瓷业有华丰搪瓷公司；毛纺织业有章华毛绒纺织公司；金融业有中国企业银行、中国煤业银行、华东商业储蓄银行、惠工银团及义兴联记、志裕和五丰等钱庄；保险业有大华保险公司；航运业有崇明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以及英商美灵登公司、华贸外贸公司等等。至1931年投资总额即达七百四十余万元[(2)]，刘鸿生遂由买办起家的商人，转变为知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在这些企业中，章华毛绒纺织公司的投资尤为突出。

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开办于1930年，资本额八十万元，刘鸿生任总经理。初以生产粗呢为大宗，后以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加之上海“一二八”事变停工三个月，至1932年底，计亏蚀达二十五万元，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改善经营管理，刘鸿生经考察认为只有更新设备聘用专家，出产高级呢绒方可摆脱困境。于是，他辞去总经理改任董事长，聘请程年彭任总经理。章华在程的主持下改用电力马达，使梳纺间加开夜工，又用现存纱线多制细货及生产纱线驼绒，还改用进口毛纱织造精纺呢绒。从此章华产品质量堪与外货媲美，价格却比外货低廉。上海呢绒商人为迎合一般用户迷信洋货的心理，将章华标头剪去冒充洋货扩大销路。其后，刘又打通孔祥熙、宋子文及朱家骅等人的门路，取得供应蒋军军服用料及邮电部制服用料之权。1933年章华营业突飞猛进，产品行销长江流域，推及华南、华北，虽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翌年春在天津添设毛纺分厂。刘鸿生的毛纺织业办得生气勃勃，产品在国内享有盛誉，被称为“毛纺织业的权威”[(3)]。

火柴业方面，在外货倾销和国货贬价的激烈竞争下，刘鸿生发起一系列的联合行动。1928年联合上海萤昌火柴厂，成立江苏火柴同业联合会。翌年11月进而组成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任主席）。1933年7月以鸿生厂联合中华、萤昌合组大中华火柴公司，加强竞争力量，刘任总经理。“九一八”事变以后，大中华营业获得进展，先后合并了九江裕生火柴厂、杭州光华火柴厂，收买了汉口燮昌（改名炎昌）、芜湖大昌、扬州耀扬和其他一些小厂；并新建东沟梗片厂。大

中华公司以统一行动、划一价格等办法抵挡了一阵洋商火柴的倾销，使所属火柴企业得以维持不坠。1933年，大中华资本额增至三百六十五万元，年产火柴十五万箱，约占华中地区火柴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产品畅销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刘鸿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4)]。

刘鸿生办企业获得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办法。如重视创办新企业前的市场调查和对市场需求的了解；重视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任用，以及注重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等；在经营上，各企业实行独立自主、各负盈亏制度；在资金融通上，则把截余补缺作为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5)]的实际运用。1930年他在上海修建了企业大楼，计划设立中国企业经营公司组成托拉斯组织；翌年8月又设顾丽江采办事务所。

在北伐战争前后，刘鸿生一方面同情反军阀斗争，一方面又畏惧工人运动，尤怕共产革命；一度幻想美国会协助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对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持合作态度，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日趋接近。1929年工商部长孔祥熙邀他出掌招商局，蒋介石亦电孔促刘就任。1932年11月，当财政部长宋子文答应帮助他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后，刘始就招商局总经理职，对招商局进行了改革整顿。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等职。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日本侵华的加剧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等原因，民族工业大都陷入困境。刘所属各企业负债达五百六十万元以上，全部资产抵押殆尽，原拟设立中国企业经营公司搞托拉斯的计划也成泡影。刘鸿生为了渡过难关，曾分别向美国花旗银行和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请求借款；又同虞洽卿、荣宗敬等人联名呈请南京政府救济实业；并以全国火柴联合会名义呈请实行火柴统制等，但均无结果。山穷水尽，他只好另辟蹊径，从解决火柴同业间倾轧着手。1935年7月与汉口、上海等九家火柴厂，联合组成“国产火柴制造同业联合办事处”，厚集资力一致对外；接着再以“联办

处”同上海美商美光火柴公司等合组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联夷制夷对付日商；翌年3月与日本在华磷寸同业联合会谈判，迫使其妥协，组成“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从而维持了国产火柴的销售市场。至1936年下半年起，刘氏所属企业营业遂先后好转。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刘鸿生积极从事上海前线伤员的救护与物资的募集与调度工作，热情支持抗战。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时常出现对日妥协求和的暗潮，使他对抗战前途信心不足，在企业的牺牲与苟全的尖锐矛盾面前，曾一度踌躇观望。他曾提出在芜湖创设“自由港”的意见，并寄托外商洋行的庇护以保存自己在上海地区的企业。日本侵略者曾多次威胁利诱，要求刘与之“合作”；并要刘鸿生出任上海伪商会会长。1938年冬他迫于环境离沪去港，由次子刘念义、三子刘念礼留沪看管企业。到港后，经过调查以及和刘氏企业骨干人员的商议，随后计划在四川筹办火柴和毛纺厂，在香港和抗战后方创办其他新企业。

1939年4月，刘鸿生投资十四万元，与重庆华业合记公司合组大中国火柴公司，资本港币三十万元，宋子良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翁文灏任总工程师，生产氯酸钾、赤磷等火柴原料。9月，他以大中华火柴公司联合川黔火柴商，投资二百万元在重庆创办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聘林天骥为总经理，潘履洁为总工程师，在长寿设厂生产氯酸钾、磷、牛皮胶、脂肪酸等火柴原料。12月，蒋介石电邀他去重庆，并面允由政府赔偿其在沦陷区的财产损失一千多万元，如在内地办厂保证将予以支持[(6)]。刘鸿生颇受鼓舞，于是在重庆与宋子良、钱新之、翁文灏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毛纺织公司。翌年在李家沱设厂，资本额四百万元，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刘任总经理。此后他以华业合记公司名义，先后投资贵州火柴公司、洪泰火柴厂、裕丰火柴公司；在昆明创办磷厂；广西八步创办广西化学工厂；将杭州光华厂迁诸暨再迁龙游，改组成龙游火柴厂；在四川巴县创办四川水泥公司，并在贵州设第二厂、乐山投资嘉华水泥厂；与董

志卿在重庆合办永安电磁厂；由中国毛纺织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在兰州合办西北洗毛厂；与孔祥熙、杜月笙、胡宗南等人创办西北毛纺织公司等等。刘鸿生在抗战后方投资总额约一千万元，其中规模最大、生产发展很快的火柴原料公司和毛纺织厂，产品垄断了整个战时后方的市场，年获利甚丰，也引起官僚资本的觊觎之心。

战时，刘鸿生在西南、西北地区创办了大小十多家企业，而资金却十分短缺。为了获得长期贷款，他只好向国民党官僚资本求援，被迫接受了孔祥熙提出的苛刻条件：（一）由刘出任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替重庆政府每年增加几千万元的财政收入；（二）允许官僚资本投资中国火柴原料厂和中国毛纺织厂；（三）两厂改组为特种股份公司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四）两厂“各主要部门由孔、宋派员监督经营”；（五）两厂资产一律按账面价值计算，不得提价增值[(7)]。1942年4月，刘任火柴专卖总公司总经理（后改组成火柴烟草专卖事业管理局，仍任局长），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等单位，也先后向两厂投资。刘氏所持股份比例逐年下降，抗战胜利前夕仅占五分之一，他从大老板沦为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小伙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刘鸿生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11月再任招商局董事长，并为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主任、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全国工业协会和毛纺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是年秋，他在上海创设中国企业物产保险公司，任董事长。次年春收回了被日伪侵占的全部企业。他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企图利用蒋、宋及美国“盟友”的关系，加以自身拥有的经济力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企业，并开创新局面。但事与愿违，战后官僚资本的无情掠夺和美货的大量倾销，使他重整旗鼓谋求大发展的幻梦很快破灭；西南地区的企业因受“复员”影响，一直处于减工或停顿状态；上海水泥厂贷款复工后受美货倾销等影响，不久被迫停工，厂房改作仓库；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因受美货充斥市场的影响，销售困难；大中华

公司一度虽有发展，但因管制进口，原料供应不足而被迫减产；青岛火柴厂因产销两难而出让；中华码头公司营业一度尚称发达，然在进口和救济物资减少后，业务亦趋衰落。为了维持刘氏各企业的生存，他只好被迫去搞商业投机。当时整个时局，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通货恶性膨胀，民不聊生，民族工业纷纷破产。1948年8月蒋介石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和美钞，对蒋管区实行经济大掠夺。他被迫交出黄金八百条、美钞二百三十万元及大量银元兑成“金圆券”，刘氏企业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给多年幻想依靠官僚资本来发展自家企业的刘鸿生很大教训，开始对蒋帮不信任，但对共产党也有戒心，他踌躇彷徨。上海解放前夕，他决定留在上海，但蒋帮特务却逼迫他飞往广州，之后潜去香港。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派专人去港阐明共产党的政策，劝他和留港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回沪。同时，刘鸿生又看到党和政府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和生产得到恢复的情形，加之其子女由沪去港劝导，乃于1949年11月离港转经天津回沪。途中由津至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回到上海又受陈毅市长的邀请，希望他在上海工商界起带头示范作用。刘氏所属企业此后获得恢复与发展。他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并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常务委员。此外，还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刘鸿生艰苦奋斗一生，建立起一个规模可观的民族资本集团，被称为“中国的企业大王”[(8)]，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经营管理企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病逝于上海。

(1) 杨友：《民族资本家刘鸿生自述》，1957年《新华月报》第1号。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书报简讯社编：《上海概况》，1949年版，第442页。

(4) 倩华：《火柴大王刘鸿生》，1947年《经济导报》第13期。

(5)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第11页。

(6)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7)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第94—95页。

(8) 严谔声：《刘鸿生先生事略》，《上海工商》1956年第20期。

刘积学

朱信泉

刘积学，号群式，河南新蔡县人，1908年3月1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五）出生。刘幼年家境清贫，靠祖父刘拱宸设私塾课徒和父亲刘启模经营酱醋业微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刘七岁时从祖父读书，能刻苦学习，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岁补廪膳生。刘与胞兄刘芬佛均能课徒，收入渐多，家境渐宽裕。1903年刘积学中癸卯科举人。由于受新学影响，1902年他和车钺、王梅溪、王钟远、蒋立、朱奋武、安诏白等在开封成立了一个民办半日学堂，后来成为学会，除传授知识外，主要借以传播革命思想。1904年他考入河南武备学堂，学习军事，科目有战法学、步兵操典、野外演习、炮学、水旱雷学、绘图学等。

1906年2月，刘积学由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校，预备日语；原拟投考军事学校，以身体较弱，虑难录取，随改入小石川区实科学校理化专修班学习理化，毕业后考入东京法政大学专门部政治科，1911年6月毕业。

1906年2月，刘积学到东京后，即经同盟会总部书记曾昭文（字可楼）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公推曾昭文为支部长，刘积学为书记，掌握开会时记录及保管文件等。其时，河南同学曾以同乡会名义集资创办《豫报》，主持人有革命派也有改良派，故常发表不利于革命的文章。为此同盟会河南支部派曾绍文、刘积学调查了解后，决定停办《豫报》。1907年12月在河南旅日女志士刘青霞资助下创办《河南》杂志，张仲端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批驳改良主义；提出除以武力革命推翻清廷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别无他路可走。该刊行销国

内外，对辛亥革命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清政府则下令在国内严防查禁，并指示驻日使馆勾结日本警署封闭该杂志社并扣压了第十期，因此发行到国内的只有九期。辛亥革命前印发的《河南留日学生讨满清政府檄》，即为刘积学执笔。

1908年，同盟会河南支部为了在国内发展力量，派人在开封成立了同盟会河南分部，初设在中州公学，很快就发展了二百多名会员。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确定在长江流域准备起事的中策，并在南京、安徽、湖北、湖南等地设立分会。铁路风潮发生后，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乘机筹划武昌起义。为推动南北各省起而响应，豫、鲁、陕、甘在日本的同盟会员组织四省协会，筹划策动北方起义。

同盟会河南支部派刘积学回开封执行此项任务。刘到开封后，向同盟会河南分部党人传达总部的决策，经分部会议决定除在开封联络会社义士和策动新军外，并分派会员到省城外联络会社武装组织和绿林豪侠准备起义。会议还决定在开封、北京筹办《国是日报》和《国维日报》做舆论动员。会后刘积学即去北京。

武昌起义爆发后，刘积学从北京回到开封，被分配担任新郑、密县、叶县、南阳一带的起事联络工作。旋因策动新军失败和开封城外农民武装也被清军所击败，分会决定刘积学去上海向上海军政府请援。11月下旬刘到达上海，与河南同盟会员刘炎基、陈伯昂、贺升平等筹划组织河南北伐军，当即得到陈其美、黄兴等的积极支持，后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成立河南北伐军。以张国威为司令的北伐军经由长江西上，曾到达河南光州与阎子固、任芝铭的淮上军会合。南北议和，方才停止军事行动。

1912年2月，刘积学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参议员。1913年3月当选国会参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

党，刘积学率先参加。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护法，刘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虽几次受挫，刘始终忠实追随。

1921年，刘积学由广东返回上海休养一个时期，1923年被北洋政府河南省长张凤台邀至河南，任河南自治筹备处处长，制定河南县市自治条例。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则谓刘积学假借自治名义，树党营私，冀图颠覆，下令将刘扣押在巡阅使署参谋处，后被释出。同年底，省长张凤台亦被免职，改由吴的参谋长李济臣继任。

1925年春，国民二军胡景翼督豫，刘积学应邀担任河南省政务厅长。同年11月下旬，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后，居正、张继来到开封介绍刘加入西山会议派。1926年3月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刘遂回上海寓居。4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召开伪国民党二大，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后，曾任命刘积学为河南宣抚使，刘遂前往信阳南柳林设立宣抚使署，与驻扎该处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合作，进行北伐意义的宣传。翌年宣抚使名义被撤销，刘再次赴上海赋闲。9月刘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7日，刘积学等四十七人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一届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两年改选一次，五次改选刘积学都获得连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起，南京政府迁往武汉，再迁重庆，刘积学请假未去，随河南省政府移居南阳。1939年5月河南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刘被选为议长，并辞去立法委员，专任河南省参议会职务。1946年11月，刘当选南京国民党政府“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刘积学对河南国民党当局一些权要人物种种祸害地方、乱捕滥杀的罪行，虽无可奈何，但在思想上是愤恨不平的。如对1942年河南大旱灾，饿死民众以百万计，而国民党政府仍向河南征购粮食；1944年日军进犯中原，汤恩伯拥军殃民，临战望风而溃；又如军统特务赵理君活埋河南第十二区行政专员韦品方案，以及一些发国难财、贪污渎

职的官吏等，省参议会提出弹劾议案，刘积学都是支持的。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敌这样的事实，使刘积学渐寄希望于中共。刘曾对友人说：抗战胜利后国家将会长期陷于内战，最后共产党必将胜利，这是无疑的。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损兵折将，以及中共地下党对刘的教育争取，他决定靠拢共产党。1948年5月，中共派人去信阳策动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起义，刘曾为此写了亲笔信，促张轸早日起义；其后并曾多次劝张。在同年12月下旬，白崇禧召集豫、鄂、皖、湘、赣五省议长在汉口开会，让他们联名电蒋请暂回奉化，由李宗仁代行职权与中共议和时，刘坚决主张蒋介石必须引咎下台，以谢国人；由于白崇禧不支持这一主张，刘只得在返回信阳后于12月31日发出轰动一时的“亥世电”。信阳的国民党特务叫嚣要逮捕公审刘积学，幸赖张轸派兵保护，得免无事。其后，河南国民党党政军机构纷纷从信阳南撤，刘积学则率领省参议会留在信阳迎候解放。1949年4月1日信阳解放，刘将参议会的全部文卷档案交军管会接收。刘积学单独起义的愿望至此实现。5月15日，张轸率部二万余人在金口起义。

1949年6月，刘积学接到河南省人民政府通知去开封学习。9月，刘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1950年，刘积学当选为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被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政治学校校长。1958年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并为民革河南省筹备委员会召集人、民革河南省委副主任委员。

刘积学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曾多次写信和广播稿，对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宣传党的政策，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们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1960年11月12日，刘积学在河南逝世。生前著有《老子要义注释》、《程伊川实践哲学论》等。

主要参考资料

刘积学：《刘积学自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8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李静之：《刘积学传略》，《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1981年版。

夏一图：《刘积学事迹片段》，《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

刘纪文

许小青

刘纪文，原名兆镕，字兆铭，祖籍广东顺德，1890年10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初六日）生于广东东莞横沥镇下车岗村。

由于家境清贫，又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刘纪文二十岁就投身于革命到处奔走。1910年参与倪映典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后为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败，“失败后出走澳门，后赴香港”[(1)]。同年他加入同盟会，和邓铿一起从事秘密工作，“在中山故里的石岐果栏街，开了一家所谓‘庆利商店’，作掩护革命工作”[(2)]。黄花岗起义前，与郑岸义、刘作忠等人在香山以谋响应。1912年冬，刘纪文由临时稽勋局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志成学校。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该党对党员的吸收非常严格，要求立誓约，按指模，并要绝对服从总理的领导。刘纪文毅然参加，并担任总务部的干事。同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深造。1917年，刘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随后返国。在日本留学期间，刘纪文主要学习政治经济专业。

刘纪文回国后，“上海环龙路的四十四号革命党事务所的创立，他是总管事务兼司财政的一员”[(3)]。1917年9月，孙中山回驻广州，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刘纪文随孙中山到广州，被任为广东军政府财政部佥事，不久又任广东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处长。1920年任广州国民政府陆军部军需司司长。1923年3月2日，广州大本营设立五部三局，任审计局局长，9月27日辞职；同年又任大本营军需处处长。1923年，“由广东省政府派赴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状况，于伦敦经济研究学院研究两年，入剑桥大学研究一年，后奉派赴欧美考察市政”[(4)]。1926年底归国，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同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因北伐战事紧

急，刘纪文赴前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

1927年初国民政府定都南京。4月24日南京成立市政厅，6月1日改称市政府，6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暂行条例，正式规定南京为特别市，直隶行政院。“南京市政厅二十四日行开幕礼，市长刘纪文宣誓就职”[(5)]，具有且接受西方近代市政思想的刘纪文成为南京建市后的第一任市长。后来“由于受到冯玉祥的攻击，8月被迫辞去市长职务，由何民魂继任”[(6)]，刘纪文则任江海关监督。其时，由于蒋介石兵败徐州，又遭桂系逼宫等原因，被迫下野。回家乡后不久就往日本向宋美龄求婚，刘纪文于9月随蒋介石前往日本，11月返回。蒋介石复职后，1928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纪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一职。后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省政府委员与特别市市长不得由一人兼任，于是何民魂专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并辞去南京特别市市长职务。1928年7月20日，刘纪文就市长职，继任为第三任市长。在他任市长期间，还兼任了其他职务。1929年任南京特别市第一届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同年还历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秘书长，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赈灾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当选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

刘纪文担任南京市长的时间不长，总共两年左右，但在他任职期间，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刘纪文非常重视市政建设，一上任，就“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本厅招集各报新闻记者开谈话会，征求改良市政方法”[(7)]。在他的努力下，其在南京的建设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铺建中山大道。中山大道原名为“榇迎大道”，始建于1928年8月，长12千米，宽40米，铺有沥青路面。刘纪文就职不久，就批云“查南京马路之狭窄，不利于行，不特南京人知之，即各省人士亦知之……本市长奉令抵任，其责即改造南京，而改南京，自非先从修筑马路入手不可”[(8)]。但当时是南京设市之初，财政拮据，刘纪文就

抓住国民政府筹备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机会，谓“届时中外人士来京者必众，道途湫隘，有失首都观瞻”[9]，于是提出修筑榇迎大道的建议，得到采纳。在筑路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不仅施工条件恶劣，如道路闭塞、天气寒冷等，而且引起民众的不满，怨意四起。主要原因有二：“一为征收土地，二为拆卸房屋”[10]，因为沿路不仅有普通民众的房子，也有很多名公巨卿的房屋，这些房屋都要拆。面对困难，刘纪文不为所动摇，亲自向媒体发言解释，并坚持按时完工。为了起示范作用，“先拆蒋总司令的总司令部和官邸，一分为二使中山路从中通过”[11]。终于在1929年5月中山大道第一期竣工。刘纪文还从上海法租界购得第一批悬铃木（法国梧桐）数千株，种植在大道两旁，成为南京第一批行道树。中山大道至今仍为南京的主干道。

筹建自来水。针对南京市供水困难且水质量差的情况，7月20日才上任的刘纪文就在7月23日召集市各团体开茶话会，报告规划市政方针，“公共卫生，拟将大树城城墙拆去一部，以吸取清洁饮料”[12]。认识到“讲求卫生，是从兴办自来水始”，“自来水之创办刻不容缓”[13]。1929年8月，刘纪文下令组织自来水筹备处，负责筹备一切工程计划。1930年3月26日开工。刘纪文非常重视自来水的建设，他“亲自前往查勘，并令工人加紧工作”[14]。刘纪文对自来水的筹建为后来的南京自来水的供给奠定了重要基础。

保护城墙。南京城墙是历史留下的重要古迹，但自民国以来，一直就有不少人主张拆掉城墙。刘纪文则指出“自始即没有拆除的主张，并且预备作种种的作用”[15]。基于市政府的明确立场，南京城墙作为历史古迹一直保留至今。刘纪文还以保留下来的城门旧有名称含有守旧思想，不合革命时代为由，促请国民政府改城门名称，得到批准。于是朝阳门改为中山门，仪凤门改为兴中门，聚宝门改为中华门，神策门改为和平门，丰润门改为玄武门，洪武门改为光华门，海陵门改为挹江门。次年刘纪文还邀请蒋介石、于右任、蔡元培、谭组庵、胡展堂、戴季陶六人为新城门的名称题写匾额。

在城市建设方面还有其他表现。如1928年刘纪文下令将玄武湖正式辟为公园——五洲公园，并以世界五大洲的名称重新命名玄武湖上的五洲，分别陈列世界五大洲物产，使游人在半天的游程之内“可以晓五洲”。此外，还着手整理秦淮河、进行卫生宣传、装置时钟、开办市民银行等等城市建设。总体来说，南京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刘纪文在任南京市长期间完婚。1928年10月18日下午4点，刘纪文与许淑珍在市府大厅堂举行结婚礼。当时刘纪文身居要官，道贺的人既多亦非同一般，“蒋介石、胡展堂、谭组庵等为证婚人，各致箴词，到中央各委及各部长暨驻京各国领事夫妇各界来宾千余人”[16]，婚礼状况盛极一时。这时的刘纪文已三十九岁，他和汪精卫两人在国民党里都以礼姿伟俊为世所称。他本“乃是古应芬之准女婿，古婉仪自与纪文订婚后，卧病经年，未过门而溘逝”[17]，刘、许两人是后经张岳公、孙鹤介绍认识的。他们完婚后，“先至广州探扫古婉仪小姐的墓园，再到北平碧云寺祭奠孙总理灵寝”[18]。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设下圈套，以请宴为名，扣押胡汉民，3月1日胡被迫提出辞呈，且被蒋介石禁于汤山。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刘纪文认为由于自己“奉命赴粤迎胡北上，中央乃任胡氏为立法院长”[19]，于是深感歉疚，即辞职以谢罪。辞市长一职后，刘仍被任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江海关监督。在任期间，他奉命到山东视察，考察了青岛、济南、烟台等地的党务，并于1931年4月13日的会议上作关于山东党务的报告，并提出了募修孔林的意见。他和中央党部常务委员戴传贤“致教育厅长何思源并传全体省委一函修葺曲阜圣庙陵、邹县圣庙陵，增修嘉祥宗圣庙陵，并制定承祀官条例，以传久远”[20]。

在胡汉民被幽禁时，他的亲信古应芬就悄悄离开南京，4月30日古串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以国民党中央监委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5月27日，刘纪文辞江海关监督一职，南下广州与古应芬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发表反蒋宣言。次

日，组成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召开国务会议，汪精卫任主席，特任陈济棠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纪文、区芳浦、郭泰祺等人为广州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担任中央执监委委员。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当刘纪文离开江海关监督一职时，曾有报道称他亏空一事，“检查刘经手款项内，共有二百数十万无着落”[21]。后经记者调查，接任监督的唐海安秘书唐兆师称“对账款案卷，甚属清楚”，“至于亏款一事，更属不确”[22]，这才证实了刘的清白。

正当宁粤对峙，国民党内部纷争不休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形势迫使国民党各派系由纷争转为和平谈判。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接着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刘纪文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1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是日起，连日在广州开联系会议，刘参与会议，会议决定：‘（一）促中央履行三中全会决议，出兵抗日，收复国土。（二）拟西南大联合，筹组西南国防委员会’”。1933年7月20日，胡汉民、陈济棠、刘纪文等人电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速将入察之师，停止前进，如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这体现了刘纪文的抗日主张。但1933年10月9日，日驻粤领事迫刘纪文取缔抗日运动，并解散抗日会时，“刘命广州新闻检查员将各报‘暴日’、‘东夷’、‘灭日’等字样删去”。10月18日，广州抗日会被迫停止活动[23]。1932年3月28日，刘纪文接任广州市长一职，尽管当中有几度辞职，但遭拒绝并慰留，一直担任至1936年。在这期间，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上任初期，“即饬令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从事规划。经长期的研究，制定了全市的道路系统和交通规划，并绘成系统图，然后请专家进行讨论。方案确定后，报省政府批准并转西南政务委员会备案。于1932年向全市公布”[24]。此后市内道路建设逐年按规划进行。每年开辟一条新路，都要由工务局作具体测量和完成技术设计工作才能动工。在

陈济棠掌控广东期间，“及至刘任内，合计修建了马路三十九万英尺，连前所建共为四十二万余英尺。当中属于市内的是二十八万英尺，属于市郊的是十四万余英尺。从1932年至1935年内完成市内和郊区路线共计有三十余条”[25]。刘纪文还对市内在建工程采取多方筹措或追加经费的举措，督促加快工程进度。广州海珠桥是在1929年春，林云陔任广州市长时开始的建桥工作，刘纪文接手后督促赶工，终于在1933年建成。2月15日下午举行开幕仪式，当时“观礼者数万人，有刘纪文引导老人九十四名先行，来宾鱼贯而进”[26]。中山图书馆也在1929年开始兴建，但由于经费等原因一直没完成，于是由市政府呈请省府追加费用6万元，在1933年10月落成，10月19日举行开幕典礼。至1934年，中山图书馆“藏书共有九万八千五百余册，报章杂志共二百多种，成为一座规模完备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27]。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逝于广州，6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令褒扬国葬，特派居正、萧佛成、孙科、刘纪文等人为国葬典礼筹备委员，7月13日下葬。蒋介石借胡汉民之死，立即宣布五条建议，此五条建议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五条建议一出，立即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从而引发了两广事变。后因余汉谋、黄光锐等人投蒋，陈济棠失势，“林云陔、刘纪文闻切，认为大势已去，当即商决，秘密离省，不再供陈济棠傀儡”[28]。后来，广东归政中央，曾养甫就任广州市长。1936年7月29日，刘纪文改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次年2月6日调任审计部政务次长。

由于刘纪文卷入到国民党的派系纠纷中，仕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41年2月成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该会主要职责是促进陪都所在地重庆市区的地方建设，刘纪文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1942年1月奉行政院训令，该会宣告结束。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刘纪文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行宪国民大会代

表。1948年，升任审计部部长。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刘纪文为广州市代表。

1949年后刘纪文初居日本，后赴台湾定居，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54年7月16日，蒋介石依照“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予的法源，以“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组织纲要”行政命令宣布成立“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同日并任命副总统陈诚兼任该委员会主委，刘纪文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因患有肠癌，刘纪文由夫人许淑珍陪同赴美国医治，1957年4月12日，因病不治，于美国洛杉矶望城医院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童轩荪：《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6月号。

刘廷芳：《刘纪文（1890—1957）》，《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林克明：《广州市政建设几项重点工程忆述》，《南天岁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李源：《南京特别市第一任市长刘纪文》，《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5期。

佟银霞：《刘纪文与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建设及管理

（1927-1930）》，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

(1) 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页。

(2) 童轩荪：《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6月号。

(3) 童轩荪：《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6月号。

(4) 刘廷芳：《刘纪文（1890—1957）》，《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5) 《南京市政厅开幕》，《申报》1927年4月26日。

(6) 刘廷芳：《刘纪文（1890—1957）》，《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7) 《刘纪文征求南京市市政意见》，《申报》1927年5月2日。

(8) 《刘纪文整理南京市政之决心》，《申报》1927年7月10日。

(9) 《首都建筑迎榇大道破土典礼》，《申报》1928年8月30日。

(10) 《为兴筑中山大道告首都民众》，《申报》1928年9月3日。

(11) 童轩荪：《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6月号。

(12) 《刘纪文规划京市政》，《申报》1928年7月25日。

(13) 《建筑创办本市自来水为市民告》，《申报》1929年10月20日。

(14) 《自来水厂厂址开工》，《申报》1930年4月7日。

(15) 《南京拆城问题》，《申报》1929年2月4日。

(16) 《京市长刘纪文昨日结婚》，《申报》1928年10月19日。

(17) 刘廷芳：《刘纪文（1890—1957）》，《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第468页。

(18) 刘廷芳：《刘纪文（1890—1957）》，《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第469页。

(19) 童轩荪：《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6月号。

(20) 《戴林对募修孔林意见》，《申报》1931年4月17日。

(21) 《刘纪文交代未清》，《申报》1931年5月23日。

(22) 《谈刘纪文舞亏欵事》，《申报》1931年5月24日。

(23) 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8—450页。

(24) 林克明：《广州市政建设几项重点工程忆述》，《南天岁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25) 林克明：《广州市政建设几项重点工程忆述》，《南天岁月》，第217页。

(26) 《广州海珠桥已落成》，《申报》1933年2月16日。

(27) 林克明：《广州市政建设几项重点工程忆述》，《南天岁月》，第211页。

(28) 《刘纪文等到港访萧》，《申报》1936年7月18日。

刘建绪

谌震

刘建绪，字恢先，1892年10月3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生，湖南醴陵人。早年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辛亥革命后曾入伍湖南陆军第一师。嗣后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为第三期炮科，与何键为同乡同学。1916年，刘建绪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与何键一同回湘，分派在第一师第一旅见习。

其时，掌握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于1918年3月派北洋军大举南下，湘军败退。刘建绪随同何键回到老家醴陵，组织游击队抗击北军，并击溃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进剿。何键被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为浏醴游击队司令，刘建绪为营长。翌年，游击队被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收编，改为骑兵营，何任营长，刘为连长。在张敬尧被逐后，所部进驻岳阳、桃源等地。在参加了1921年7月湘军援鄂之役后，何键升任骑兵团团长，刘随之升为营长。1923年秋，骑兵团参加“护宪军”，在与赵恒惕、谭延闿之战中，击败了谭系蔡巨猷部。战后，何升任第九旅旅长，刘升任第二十七团团长，隶属于唐生智第四师。刘在历次战役中，听从何的指挥，率部奋勇作战，深为何所倚重。

1926年夏北伐战起，唐生智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何键升任该军第一师师长，刘建绪先任团长后升任旅长。收复湖南后向武汉进攻时，第一师隶属江左军直趋汉阳，在攻占龟山和汉阳兵工厂的战斗中，刘建绪身先士卒，立有战功。攻克武汉后，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刘建绪为该军第二师师长，后兼副军长，先驻汉口，后进兵河南。1927年8月唐生智东征讨蒋，何部与

刘兴第三十六军奉命夹长江东进，占取芜湖、安庆。何键被唐生智任命为安徽省主席，刘建绪率领三十五军为后盾。11月桂系讨唐，唐生智因战事失利通电下野。1928年3月4日，何键、刘建绪向桂系求和，得以退居湖南，保留第三十五军建制集结湘西。同年夏，刘任湖南清乡第三区代指挥官，负责邵阳、芷江、麻阳、晃县等十六个县的“清剿”任务。10月，第三十五军缩编为第十九师，刘为副师长。1929年1月，兼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第五路司令，进犯湘赣边区工农红军。

自上次与桂系交手失利后，何键、刘建绪认定今后只有跟蒋介石走才有出路。同年2月，何键虽经桂系任命为湖南省主席，刘建绪被提升为第十九师师长，但在同年4月发生的蒋、桂战争中，刘担任蒋介石的讨逆军第四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南下对桂系作战；9月率部去宝庆一带堵击张发奎军；翌年初又入桂参加讨伐张、桂联军。此后刘建绪率部参加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0年秋，刘升任第二十八军军长。同年12月第一次“围剿”时，刘率部在修水、铜鼓一带协助“进剿”；1931年四五月第二次“围剿”，则在湘东南堵击红军；嗣后参加了对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扫荡”；1933年7月任赣粤湘鄂“剿匪”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红六军团1934年7月从江西永新遂川进入湖南后，刘部奉命进击，一直尾追至贵州石阡。10月，中央红军退出瑞金西撤长征，突围至赣湘粤边，刘部奉命在湘江东岸堵击。11月，刘被任命为“追剿军”第一路司令，率章亮基第十六师、李觉第十九师、陶广第六十二师、陈光中第六十三师等部开赴贵州追击红军，直至云南。在何键主湘时期，刘还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保安副司令、省清乡会办等职衔。

1935年9月，蒋介石剥夺了何键军权，任命刘建绪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部调赴江浙，与湖南脱离关系。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翌年9月被授予陆军上将。是年冬兼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驻衢州，指挥所部“围剿”留在东南

坚持游击战争的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建绪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担负浙江海防。1937年9月下旬，奉命增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10月继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由于执行蒋介石的防御战、消耗战战略，虽然将士斗志高昂，英勇杀敌，但在敌人强大炮火轰击下伤亡甚众。加以守卫海防的兵力只剩陈光中第六十三师，第六十三师于11月5日拂晓奋力阻击强行登陆金山卫的日本侵略军，坚守竟日，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旅长李伯蛟阵亡。日军大举登陆，淞沪我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被迫全线撤退。刘率部撤往浙江，担负浙西防线，司令部驻衢州，12月并兼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所部最盛时达十八个师，为第三战区兵力最多之集团军，但自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刘部与日军接触甚少。1940年7月，刘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他驻江浙数年，与浙省主席黄绍竑相处融洽。黄在浙江曾重用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发动民众抗战，后被蒋抑制。刘对黄深表同情。1941年8月，刘建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改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所属仅一个军。翌年由李觉继任，刘仅保留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刘上任后，废除了前任省主席陈仪试行的“统制经济”政策，取消由“公沽局”专卖粮食及由“运输公司”包揽全省运输的做法。同时，他继续奉行陈仪推行的人事制度，省、县级公务人员均由省政府人事室统一管理，各县县长赴任时只带秘书、总务，不得随意更换其他人员。委任级公务员都须在省训练团受训，保证具有相当文化程度和业务能力。

刘建绪自知本人资历和经验均不如陈仪，和蒋介石的关系更不如陈仪，鉴于陈仪因侨领陈嘉庚的抨击而失败，他上任伊始，即以“清、慎、勤、实”自律，处事谨慎，谦和待人，力求俭朴。为节省财政开支，他将省保安团由八个团逐步编减成五个。他对于CC系、军统以及地方各派，也尽可能求得平衡。对于一些前来投奔的旧部，或在省政府任专员、参议等闲职，或安排到各县担任田粮处副处长、国民兵团副团长、军民合作站副站长（以上均由县长兼正职），负责征

粮、征兵、派伕工作。有些人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因此民间有“三副三腐”之说。但许多旧部还有“三寡”的怨言，说刘“优柔寡断、轻诺寡信、刻薄寡恩”。当时国民党和三青团之间的“摩擦”甚剧，各县参议员、乡镇长等职位以及屠宰税、渔业税等，均由党团瓜分，各县县长穷于应付，刘亦只能听之任之。1943年，刘任程星龄为秘书长，程星龄为程潜的族弟，曾以“战地党政委员会”专员名义访问华北敌后区，会见朱德、刘伯承，常向刘建绪谈到共产党在敌后抗战情况，并向刘建绪引荐王亚南、杨潮等学者。1945年7月，“永安大狱”发生，程星龄受牵累被押送重庆（1947年始释放，后参加湖南和平起义）[(1)]。

抗战胜利后，刘建绪满心希望能恢复侨汇和获取美援，在福建大兴建设，乃规划修建福州厦门公路，疏浚沙溪，结果皆因工款不济、人事不协而拖延无法完工。更为难堪的是全省财政收入告绌，省级各厅、处局机关仅千余人，但工薪常不能按月发给。各部门的行政经费奇缺，地方财政局的预算在1948年折成金圆券只抵五角。公教人员主要依靠每月配给的平价米维持生活。刘建绪虽然处处精打细算，压缩开支，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刘建绪在闽曾试行“保农社”，各保以佃农与自耕农为主体，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向世绅集体租地、纳租，按土地法规定，实行二五减租。这在龙岩（原闽西苏区）试行尚有效，后在全省推行，即受到地富豪绅的明顶暗抗，最后只办起了三百多个，平均每县不过四五个。

自1946年起，福建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学生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统治，集会、游行此起彼伏，刘建绪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力加疏导。1947年4月，福州中学师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刘令警察向师生道歉。翌年6月，福建农学院两学生被宪兵打伤，保安司令部发布新闻又错怪学生，刘为平息事态，由省府登报道歉，并批评了保安司令部。随后，协和大学学生进城请愿，刘命令军警徒手站岗，派总务科长招待茶水。同时调人送米到农学院，把前来响应的学生半途

劝阻回去。他在向学生讲话中说学生有参政权，但希望学生不要感情用事，不必和当局造成对立情势。有人说省府向学生道歉有失威信，刘说政府错了便已失了威信，再不认错岂不更失威信？！由于刘的疏导，福建没有发生捕人杀人等流血事件。

1948年秋，解放大军包围济南，刘建绪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如退守台湾，必不容他留在福建，因此向蒋辞职，并于9月9日任职七周年之际，在报端公开向福建人民告别，希望由此促成闽人治闽的愿望。蒋介石于1948年9月任命闽籍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李良荣继任，任命刘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李良荣任职不过数月，即为朱绍良所代。1949年初，刘建绪返回长沙，不久移居香港。同年8月13日，他与龙云、黄绍弦等四十四名国民党中委、立委在联名通电上签名，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1951年秋，刘携眷属赴巴西定居，即专心于子女的培养教育，彼等均学有所长。长子刘奇凯是地球物理博士、教授；次子奇立是电力专家；三子奇曙是电脑博士、教授；四子刘明是水利工程博士、教授；女儿友珍为著名妇科医生，曾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1978年3月22日，刘建绪病逝于巴西。

主要参考资料

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4年版。

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63年版。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

编：《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程星龄：《刘建绪主闽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版。

《福建时报》社论：《刘主席治闽七年》1949年9月9日。

《闽局将动》，《观察》第5卷第4期（1948年9月）。

潜乾：《从刘建绪到李良荣》，《时与文》杂志1948年9月号。

---

(1) 永安大狱：起因于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于1944冬派遣周璧，赴浙东游击区搜集敌后军民抗战资料，1945年春返闽时在浙江龙泉被扣，牵连到省政府参事杨潮、秘书谌震等二三十人被捕。1946年1月旧政协开会前夕，杨潮病死狱中，曾激起文化界抗议，以后被捕人员陆续释放。

刘静庵

李乾三

刘静庵，亦作敬庵、敬安，原名贞一，1875年（清光绪元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县。父刘淇，务农兼商，初通文墨，有子四人，刘静庵居长。刘少时随李凤亭（李书城父）就读。

1903年夏，同乡李书城偕黄兴从日本回国，到潜江省亲，向刘静庵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给他介绍日本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并赠给《湖北学生界》、《黄帝魂》和《革命军》等进步书刊，使刘静庵大开眼界，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加深了他对腐朽的清王朝的憎恨。嗣后他随李书城到武昌，认识了吴禄贞，又经吴推荐给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帮办文案。

1904年7月初，刘静庵与宋教仁、吕大森等人在武昌多宝寺街组织反清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会员共四十多人。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个文化补习学校，会员借研究科学为名，以革命反清为宗旨，开展反清政治宣传，不断输送知识青年加入新军。刘静庵在护军马队黎元洪属下任书记，正有利于做介绍入伍的工作。是年7月23日，黄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写信给刘静庵，要他在湖北响应，信被文案刘稚亭截获，送呈黎元洪。黎大惊失色，将刘开除军营。刘离开军营后，寓居武昌水陆街。同年10月黄兴准备在长沙起义之事泄，科学补习所受牵连，刘静庵等人得长沙日知会长黄吉亭预先通知，得以逃逸。

1904年秋至1905年初，清政府户部侍郎铁良至苏、浙、皖、赣、鄂等地活动，刘静庵与王汉等人密谋诛杀之，但因铁良随从严密戒备，虽尾随至河南，终未得下手机会。王汉愤而投井自杀，刘静庵

闻之悲痛不已。科学补习所的被封，王汉的自杀，更加坚定了刘静庵推翻清王朝的决心。

先是，刘静庵经常到武昌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设办的日知会读书看报，与日知会会长胡兰亭相识。科学补习所遭搜查时，刘曾避入圣公会中。刘离开军营后，被胡兰亭聘为日知会司理。刘同时还兼任武昌文华书院神学系中文教席。他更名贞一为静庵，并接受教会洗礼，取教名（道号）保罗。

刘静庵到日知会工作后，悉心整理书报，订立规则，应接尤为周至。数月之间，来日知会看书读报者日众，阅览室为之改观。刘静庵以日知会为阵地，积极宣传革命。他用教会名义，从上海及日本订购了大量革命书报，如《湖北学生界》、《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等，供人阅读，开导民智；每周末还举行演讲会，亲自登台讲演，历数清廷暴政，号召国人起来将它推翻。1906年春，胡厚斋在武昌听了刘静庵声泪俱下的演讲后，回到九江就创办了阅览室并附设平民学校，为革命呐喊鼓吹。日知会已由一个圣公会的阅览室，逐渐演变成反清革命活动的阵地。

由于来日知会看书报的人日益增多，登记入会的人也纷至沓来，有的还主动捐资充作经费。刘静庵一时忙不过来，筹议增设干事和评议员协助。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公推刘静庵为总干事，李亚东、辜天保等人为干事，陆费逵、冯特民等人为评议员。在刘静庵的领导和同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日知会从单纯的宗教宣传机构变成了宣传反清的革命团体。在这之前，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已经成立，不少日知会会员陆续参加了同盟会，日知会帮助转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辜天保、吴崑、冯特民、徐竹平、郝可权、梁耀汉等人在日知会十分活跃，革命思想不断增长。刘静庵还创办了江汉公学和东游预备科以训练革命人才。

1906年7月，法国人欧几罗由同盟会会员乔义生陪同来到武汉，

刘静庵亲自到江边迎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公开宣讲革命，引起清政府当局的注意。由于欧几罗是外国人，加之又在教会处演说，清吏自然不敢轻举妄动。然而清廷对日知会，尤其是对刘静庵，则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年10月，萍醴浏起义爆发，孙中山派朱子龙、梁钟汉、胡瑛等回鄂，与刘静庵商议，准备联络武昌革命党人响应。12月26日，他们在汉阳伯牙台开会筹划，留日学生郭尧阶亦与会。会后郭向湖北巡警道冯启钧告密，结果冯设陷先后捕捉了朱子龙、胡瑛、季雨霖、李亚东等人，刘静庵避居黄陂乡下学生家中，亦被叛徒郭尧阶带领军警前往捕获。当时，清廷正悬赏缉拿萍浏醴起义的党羽，其中有被称为湖北全省会首的哥老会首领刘家运。郭尧阶为了冒功领赏，诬告刘静庵即刘家运。

刘静庵被捕后，清吏组织会审，强迫他供认是刘家运。刘静庵承认自己革命属实，矢口否认自己是刘家运。清吏为逼供定罪，对刘鞭笞达一千四百下，打得他遍体鳞伤，皮开肉绽。湖北巡警道冯启钧为了冒功领赏，乃捏造供词七条，趁刘静庵不省人事之际，强行按捺指印，判处死刑上报。

刘静庵等人的被捕，为湖北庚子以后的一次大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革命同志竭力营救。基督教会中同情革命的主教吴德施等人也亲自出面交涉，并电请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施加压力，提出抗议。吴禄贞、程家柽向清肃王善琦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憎恶”。清廷慑于外人的压力，于1907年11月28日电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从缓办理”。因此此案久悬不决，直至1909年夏才重新宣判，刘静庵和胡瑛被判处长期监禁。

刘静庵在狱中，仍念念不忘革命，暗中组织“铁血军”，还预拟了起义檄文。他每日都作祈祷，常用古代哲学配合圣经上所讲的道理，来教育难友，连狱卒也被感化，拜他为师。他身陷囹圄，仍勤读书，广览经史、音韵、训诂和程朱理学，并一丝不苟地写下大量读书笔记，书法遒劲。在狱中他吟诗言志，字里行间充满革命激情和对清王

朝的刻骨仇恨。

恶劣的牢狱生活，加之伤病的无情折磨，1911年7月7日刘静庵瘐死于武昌模范监狱。

刘静庵死后，遗体由教会安葬。1928年，湖北省政府为了褒扬先烈的功绩，将其公葬于武昌优虎山麓。

主要参考资料

冯自由：《日知会首领刘敬安》，《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居正：《辛亥札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张难先：《新撰刘静庵烈士墓志并跋》、《新刻烈士刘静庵先生碑阴》，湖北省图书馆辑《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刘开渠

王晓琄

刘开渠，原名大田，1904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萧县（今淮北市杜集区）刘窑村一个薄有田产的农家，在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度过了自己悲苦的童年。

七八岁时，大田开始在家族办的私塾中启蒙。后来邻村远房伯父的孩子要到二十多里外新成立的王塞庄初小去读书，愿意代缴学费，让十三岁的大田伴读。上了新式小学后，老师为他改名为刘开渠。次年，刘开渠考入萧县高等小学，他的绘画天赋得到了美术老师王子云的赞赏，举荐他报考成立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并为他向县方申请了两年的“萧县学生留外贷金”。

1920年秋天，十六岁的刘开渠带着父亲典了两亩地凑够的单程路费来到了北京，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虽然先上的是中等部，但授课老师都是著名画家，他们的精心传授为刘开渠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第二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设大学部，并改称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刘开渠升入本科西画系，开始接受正规的西画训练。他潜心学习，进步很快。

十七岁的暑假，刘开渠回家探望祖母，才知母亲已为他定亲，与从没见过面的徐氏仓促成婚，这段婚姻到1936年才正式中止。开渠不满包办婚姻，假期未完就返回北京。此后不久，祖母病逝，扯断了他对故乡和家庭唯一的思念，开渠从此六十余年再没回过家乡。

刘开渠的求学生涯异常艰辛。因为得不到家里的任何资助，前两年还能靠县里的“贷金”生活，到了第三年，就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未满十八岁的刘开渠代刻蜡版，代教美术课，同时开始为报刊

写文章，靠卖文卖画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学业。

1923年，刘开渠与同学李有行、陈宗向等人组织“心琴画会”，反对守旧，提倡写生，每半年举行一次肖像、风景等创作展。这一年，刘开渠参与了抗议校方无理辞退五名教师而导致的学潮。

1925年，他的油画《孙中山先生遗像》在为孙中山开追悼会时悬挂在北京中央公园的祭坛前。1926年，刘开渠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个人画展，博得了观者的热烈好评，但他越来越感到画笔和画布、宣纸并不能承载自己全部的艺术憧憬。一个偶然的机会，开渠在书市上看到几张云冈石窟塑像的照片，爱不释手，从此萌发出学习雕塑的强烈愿望。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后期，刘开渠因亲身的遭遇对专制思想深恶痛绝，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写标语、刻传单，参加游行示威，在《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艺术评论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说、诗歌。在“三一八”惨案中，刘开渠的同学姚宗贤惨死。1927年4月28日，他最要好的朋友谭祖尧又与李大钊等人同时被绞刑处死在陶然亭，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收尸送葬。

1927年，刘开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辗转来到南京，在蔡元培所主持的南京大学院从事抄写和刻蜡版的工作。一天，他在庭院里与蔡邂逅，鼓起勇气说出自己想出国学习雕塑的心愿。蔡先生沉吟片刻，说：“你的想法很好，我国公派学绘画的人不少，而学雕塑的还没有，有机会可以考虑。”翌年，他随林风眠先生去杭州创办国立艺专，不想突然收到蔡元培先生的出国委派信，是以“驻外著作员”的身份派往巴黎，月薪八十元，还为他预支了部分薪金作为路费。

1928年8月，二十四岁的刘开渠从上海乘船赴法留学。到达巴黎后，他迫不及待地参观卢浮宫美术馆，流连在纪念馆、广场、街道上数不清的雕塑和各式各样的画廊中。补习法文后，刘开渠考入巴黎国

立美术学院雕塑系师从让·朴舍（Jean Boucher）先生，专攻雕塑。1929年，他把自己在国内画的《流民图》做成了浮雕，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成为刘开渠平生第一件雕塑作品的题材。刘开渠的同学中有马克思的外孙龙盖，按照他提供的照片，刘开渠于1930年塑成圆雕《马克思像》。同时与刘交往比较密切的共产党人林铁等人，刘帮助他们做了一些工作。

刘开渠在巴黎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常常给装修公司画水彩画，为印染公司设计图案。由于他出色的成绩，还被导师朴舍聘为助手，每日工作半天。开渠每天亲眼看着老师工作，得到的启发和提高是课堂上得不到的；而且工作之余，朴舍还会带着他参加巴黎艺术家的聚会。当时巴黎的咖啡馆是艺术家交流的场所，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在这里，开渠的视野日渐开阔。

正当他学业有成，离自己雕塑家的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刘开渠历经十年辛苦编著的《艺用解剖》一书，本已由蔡元培先生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却在“一二八”日军的炮火中灰飞烟灭。蔡先生在信中说国内发展雕塑事业需要人才，希望他回国担此重任。此后不久，开渠就收到了杭州艺专林风眠校长的信和聘书。

1933年1月，刘开渠和吕思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参加者有曾竹韶、王临乙、李韵笙、唐一禾、常书鸿等三十多人。他们把文章和美术作品寄给国内的《艺风》等杂志，介绍西方美术。刘开渠发表了《雕刻篇》和《布德尔的雕刻教学》。到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参观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雕刻、绘画之后，刘开渠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1933年6月初，一到上海，刘开渠就去看望蔡元培先生，在那里与鲁迅先生邂逅。鲁迅历来关心美术，说了许多勉励开渠的话：“过去中国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7月，开渠来到杭州艺

专，雕塑系师生一共只有十余人。由于患了伤寒病，他到年底才开始教学。学校无员工宿舍，他租赁西大街武林村1号居住，在仅有两平方米的小天井顶上装几块玻璃作为工作室，这里成为刘开渠雕塑事业的起点。

经郁达夫介绍，开渠为一位文人逝世的母亲做了浮雕像，郁达夫在像后面亲笔写了铭文，铸铜后交付主人，不想却是殉葬品，成为“被活埋的艺术”。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雕塑品就是指佛像、菩萨或死后做的寿像，人们愚昧地认为塑像会把活人的灵魂摄去。开渠被人们称为“做泥菩萨的”，甚至被当做耍手艺的人遭到警察的盘查。找不到模特、没有钱买材料、作品不被理解和欣赏、教学方法受到一些学生的诟病……尽管身陷困境，开渠还是利用教学之余在狭小的工作室里做了两女青年像、一男青年像和一裸女像。

1934年底，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牺牲的八十八师将士，刘开渠开始制作《淞沪杭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窄小的工作室里，他精心构思反复修改，完成了比真人大得多的一官一兵两位军人的立像和《纪念》、《冲锋》、《抵抗》、《继续杀敌》四块座上浮雕。这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是最早的由中国现代雕塑家创作的纪念碑，也是刘开渠的成名作。1935年，纪念碑建成，立于西湖边第六公园内，后于“文革”期间被毁。这一年，刘开渠还完成了《李朴园像》、《雷圭元像》、《蔡元培像》、《曹振声像》。还参加了几次扶轮社的聚餐会，向大家介绍雕塑艺术的历史和一件雕塑品完成的全过程。

1935年，在国立杭州艺专，刘开渠结识了聪明美丽、多才多艺、活泼可爱的绘画系学生程丽娜。程小姐出生于中国最早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的家庭。父亲程锡培，号贯如，广东香山县人，是北洋大学工程系第二届毕业生、詹天佑先生的高足，毕业后曾参与粤汉、川汉铁路的设计修建，后在杭州就任沪杭甬铁路总工程师。母亲杨秀姬女士也是名门闺秀。刘开渠与程丽娜历经坎坷，在战乱中的1938年结为伉

俪，从此终生相依，饱经磨难，不离不弃。

1936年，刘开渠编译《艺人伦勃朗》发表于杭州艺专校刊《亚波罗》第四期。创作孙中山先生像。《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战士头像和其他一些作品参加第二届美展，获得好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刘开渠随艺专内迁，由贵溪而长沙，1938年又迁往湖南沅陵。后来艺专决定迁往成都，中途却改迁昆明。开渠因妻子怀孕，先行到了成都，脱离了艺专。

经徐悲鸿和熊佛西介绍，1939年，承制王铭章骑马铜像。王铭章是在滕县保卫战中殉难的川军将领，雕像高三米多，是刘开渠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亲自翻砂铸铜完成的。3月8日，刘开渠得长女微娜。在成都遇旧友赵其文，进而结识萧军、陈翔鹤、周文、李劼人，组成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并任理事。抗敌分会活动场所多设在开渠的工作室。

1940年，二女儿米娜出生。因环境险恶，接生人员医术水平低并处理不当，落下残疾。9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到访，托刘开渠转递一封信，促膝而谈，希望他多为抗战做些工作。经刘开渠介绍的人，皆可去延安。

1941年，历尽磨难铸就的王铭章铜像立在成都少城公园，雕塑家已经一贫如洗。艺专由昆明迁重庆，刘开渠再次应聘任教。1942年，全家随校搬迁至重庆市沙坪坝区，小女儿出生，因地取名刘沙平。1943年，经友人介绍，开渠前往成都为纪念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做无名英雄铜像，制成后立于成都东门外广场。为生活所迫，接受几家富商订货，做伊仲熙、蓝文彬、邓锡侯肖像。1944年，完成孙中山先生铜质坐像立于成都春熙路，至今保存完好。1945年，刘开渠承包制作牺牲于洛阳的川军将领李家钰骑马铜像。同年，完成多年构思的大型浮雕《农工之家》，被誉为中国用浮雕形式表现工农生活的第一个

大型作品。

面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刘开渠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要求国民党结束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团结抗日。抗战胜利后刘回上海，因雕塑品太多太重无法带走，只得寄存，后多散失或被毁。

1946年，刘开渠任上海工务局园场管理处技正，负责园林和广场的美术设计工作。春天，与陈秋草、吴作人、丁聪、张乐平等进步画家组织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对抗国民党组织的“美术协会”。参加闻一多先生的追悼会。

1947年，刘开渠制作叶恭绰像、蔡元培像、鲁迅先生头像和一件女人体，做《春耕》、《秋收》浮雕草稿。

1948年，刘开渠积极投入上海人民反饥饿斗争中。接受了宋庆龄发起的对“贫病作家”的救济。承制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像，还创作了《劈山开路》、《篮球运动员》等作品。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员曾庶凡，刘开渠将他的进步书刊掩蔽在家中。

1949年5月，刘开渠受地下党员陈白尘之托，迎接上海解放。6月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美协常务委员。8月初返回上海，被推选为上海市美协主席。9月到杭州，任华东美术学院（即原杭州国立艺专）校长，全家随之迁往杭州。12月，被选为杭州美协主席。1950年，刘开渠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6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此后，刘开渠身兼杭州市副市长、浙江省文联筹备会主任、杭州市美协分会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华东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此时刘开渠个人创作较少，只完成了鲁迅浮雕像（1949）、《任弼时胸像》（1950）、毛主席大型立像和半身像

（1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封面马恩浮雕像和一件《工农红军》圆雕立像（1956）。

1953年2月，刘开渠奉调进京，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及美术组组长。除了整体设计和协调工作之外，他还亲自完成了《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胜利渡长江》三块大型浮雕。纪念碑于1957年完成，耸立于天安门广场中央。1959年4月刘开渠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主要负责雕塑系。1963年任中国美术馆第一任馆长。1976年后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还担任了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小组组长。1980年，七十六岁的刘开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3年6月25日，刘开渠逝世。遵照其遗愿，夫人程丽娜和女儿刘米娜将他的一百多件作品及手稿全部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刘开渠有句名言："人生是可以雕塑的。"他雕塑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主要参考资料

纪宇著：《青铜与白石——雕塑大师刘开渠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许良廷：《刘开渠的事业与家庭》，《江淮文史》2004年第6期。

刘揆一

李静之

刘揆一，字霖生，原籍湖南衡山，1878年12月3日（清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十）生。其父刘方尧务农，太平天国时被征募为湘军乡勇，后充湘潭县知事公署刑房差役，称籍湘潭。由于职务关系，他和会党常有接触，同情他们“反清复明”的宗旨。刘揆一也因此和哥老会早有交往。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湘潭附近活动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遭清政府搜捕。刘揆一奉父命向马报信，马得免于难，二人从此建立了友谊。刘也因而成为以后华兴会、同盟会和会党之间的一个联系人。

刘揆一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这里与黄兴结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反清活动，并一起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以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同年6月，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人回国运动起义。黄与刘揆一商量进行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1)] 并且介绍了马福益的情况。黄兴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决定由刘揆一与马联络，相约三个月后会于长沙。

黄兴、刘揆一相继回国后，11月4日在长沙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决定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了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了外围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1904年春，刘揆一、黄兴与马福益在湘潭秘密会晤，共同

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的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起义主力为省城武备学堂学生中的华兴会员及其联络的军队，同时发动各地会党分五路响应。会后，刘揆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人还变卖家产，充作这次起义活动的经费。他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9月24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浏阳普集市例开牛马交易大会，参加者达数万人，半数是哥老会员。哥老会把这天作为拜盟宣誓的日子。同仇会选定这一天为马福益举行少将授予仪式，由刘揆一代表黄兴给马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并监督宣誓。“仪式庄严，观者如堵”，“自是哥老会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2)]，革命声势大振。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不幸因事机不密，为湘抚陆元鼎侦知。黄兴和刘揆一被通缉，11月初相继逃亡上海，马福益亦逃往广西。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黄、刘抵沪后，在英租界余庆里十二号华兴会秘密联络机关，重新聚集党人，共谋再举。不料11月19日在上海发生了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余庆里机关遭破坏，黄、刘又被迫离沪，亡命日本。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在东京与黄兴会晤。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但东京的华兴会成员对合并有不同看法，黄兴在7月29日邀集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人商谈，刘“主张不入孙会”。由于意见不能统一，最后决定入会与否，听任个人自由[(3)]。刘揆一因持异议，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参加，直至1907年1月他才加入。2月，他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组织中国南方的武装起义，刘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留驻东

京，直到辛亥革命。其主要工作是筹划会务，发展会员，为前方武装起义调遣人员和购运枪械等。

这时，同盟会领导涣散，内部几次发生分裂，刘揆一为顾全大局，做了一些排难解纷的工作。1907年6月，章炳麟、张继等人在东京就孙中山离日前接受日人赠款及潮、惠起义失败等事攻击孙，要求刘召开会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刘揆一认为，孙中山“留给《民报》社维持费二千元，余悉以供潮惠党军急需，诚非得已”，而且孙、黄当时正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4)]。因而力排众议，没有同意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接着刘师培又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援引日本社会党员北辉次郎、和田三郎充本部干事，刘揆一又予以制止[(5)]。面对同盟会东京本部日益严重的混乱状况和倒孙风潮，刘揆一曾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请他们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道歉，遭孙拒绝[(6)]。这时，黄兴也给刘揆一等人写信，解释经费的用途，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同时拒任同盟会总理，倒孙风潮才暂平息。1909年9月，因经费问题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人发表“七省同盟会员匿名书”，列举孙中山“罪状”，进行攻击。11月，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联合致函李燮和，逐条为孙中山申辩，又以同盟会庶务名义，发表致各报社通函，否认陶等人函件的效力，使陶等人谋划未能得逞。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刘揆一从日本回国。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赶到汉口，亲赴前线督师，刘也到汉口前线任督战员。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中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的任务已完成。刘揆一也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主张把同盟会和各立宪派组织的名义“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7)]。1912年3月，同盟会转变为公开的、以从事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政党”，刘为十干事之一。同盟会阁员与袁系阁员一起，组成了民国第一任以唐绍仪为总理的“混合

内阁”。袁世凯就任临时总统后，公然违背《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宋教仁为了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辞去农林总长职，同盟会其他阁员也一齐退出内阁。刘揆一不同意这种做法，8月2日，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当了陆徵祥内阁的工商总长。为了不受同盟会关于会员不得参加非政党内阁的决定约束，他在8月8日登报脱离同盟会。启事称“此次置身国务员中，虽实行个人主张，亦以国势所趋，别有苦意。惟格于党议，只得自请脱党”[8]。25日，同盟会改名国民党，9月，陆徵祥辞职。国民党推举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组阁，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条件，力图组成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刘揆一继续留任工商总长。他又表示“我本系老同盟，若全体加入，我自然复党”[9]。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刘揆一南下上海吊唁，遭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员冷遇。返京后他另组“相友会”，表示不与国民党合作[10]。后来由于内阁改组，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到攻击，7月，袁世凯准他辞去工商总长职。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在云南发动，全国纷起讨袁，刘揆一也响应参加。1916年初，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刊登反帝制的言论。3月，报馆因此被查封[11]。

同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一曾一度担任国会议员，到1918年国会解散。此后便没有固定职务。

五四运动前后，刘揆一赋闲家中，但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北伐战争前夕，他曾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思想彷徨，莫知所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1929年出版了《黄兴传记》，记述了黄兴革命活动的历史。1932年他到南京，受聘为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

1933年，蒋介石邀请一些名流、学者参加政府工作，刘揆一被聘任行政院顾问。“九一八”以后，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常写诗词加以讽刺。1934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解除顾问职务。从此，他隐退家园，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绝少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

1950年11月1日，刘揆一在湘潭病故。

---

(1)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6页。

(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版，第165—166页。

(3) 《宋渔父遗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09页。

(4)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01—202页。

(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02页。

(6)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7) 荣朝申辑：《缔造共和之英雄尺牍》卷2，中华民国元年上海朝记书庄印行，第3页。

(8) 《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8日。

(9) 《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56页。

(10) 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

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3—594页。

(11) 《民国日报》1916年3月12日。

刘芦隐

贺渊

刘芦隐，江西永丰人，1894年。辛亥革命前后，刘芦隐就读于江西南昌省立第一中学。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游历全国，10月到达南昌，刘芦隐聆听孙中山先生的讲演后，主动前去拜访，开始投身革命。1915年刘芦隐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刘芦隐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22年毕业。刘芦隐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担任国民党美国支部总干事，经常给林直勉主编的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投稿，1921年林直勉离开美国，刘芦隐担任该报的主编。1923年刘芦隐与杨仙逸在美国开办飞机学校，同年5月刘芦隐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总干事。在北美洲的五年多时间里，刘芦隐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展现了政治宣传和组织才干。

1924年，刘芦隐作为美洲华侨的代表回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风华正茂的刘芦隐身兼数职，十分忙碌。他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秘书，在宣传部部长戴季陶麾下展开教育和宣传工作，他不但从事制定军校、农校的教育计划，审查宣传书籍的常规工作，还参与校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演讲稿。5月，刘芦隐作为广州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大本营组织条例，规划考试制度的性质范围，其中考试院实行院长制还是委员制，考试条例实施后现任官员的甄别这一类具体问题均属于考虑范围。6月，因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提议，刘芦隐出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曾经想请刘芦隐担任粤军总司令部秘书，但刘“以宣传部、市党部、高等师范等职务纷集，极少暇晷”[(1)] 为由婉言拒绝，这席话说明，刘芦隐除了服务于党政部门外还在高校任职。8月，三十岁的刘芦隐与奇女子最早的女同盟会员之一李佩书在广东结婚。

1924年9月底，刘芦隐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他和戴季陶、马超俊等国民党内的所谓反共“先进”十分接近，并与他们一道在沪开展国民党对青年工作，涉足工人运动。刘芦隐和戴季陶等人以调人的身份自居，穿梭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调解游说。1925年7月下旬，刘芦隐受吴稚晖、戴季陶等在沪国民党党员的派遣，前往广州磋商政治委员会议决方针实施办法。刘芦隐在广州时，发生廖仲恺遇刺身亡一案，以及胡汉民因廖案被迫出洋一事。回到上海后，对于广州的变故，刘芦隐向戴季陶等作了汇报，他认为整个事件是汪精卫为了排斥胡汉民，故意罗织各种罪名，其目的是取胡汉民之位而代之。刘芦隐同情胡汉民，愤恨汪精卫等人分裂国民党的行为。在上海期间，刘芦隐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教授，他出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上海大学教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刘芦隐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副部长，《中央半月刊》主编，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处长等职务。刘芦隐在《中央半月刊》上发表不少文章，其中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表达了当时他的基本政治态度。他把中国革命与法俄革命相比较，得出中国革命已经走入法国革命的坏路，同时兼有走入俄国革命的绝路的结论，他认为形成中国革命现状的原因是孙中山的逝世和共产党的渗入，他提出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就在于是否忠实于整个的三民主义。他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实现思想上的“分共”。

1928年1月，胡汉民率队出国游历，刘芦隐一路相随，前往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锡兰、印度、埃及、土耳其、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回国后，刘芦隐在《中央半月刊》连载《国际考察记》共计二十余篇。《国际考察记》介绍此次出游的动机在于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为实施训政寻找经验，并称有两个具体的考察目标：一是落后的但是新近发生过革命且革命后成绩斐然的国家，比如土耳其；二是欧洲文明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宪政议会。在旅

途中，胡汉民和孙科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该文对南京政府的建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伴随胡汉民左右的刘芦隐在其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从刘芦隐的考察文章可见，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引起了刘芦隐、胡汉民等人的注意，他们较早对于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本质进行了揭露。

1929年，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举行奉安大典，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由北京运往南京中山陵安葬。刘芦隐具体负责宣传部的工作，包括指导编纂出版孙中山的生平及《哀思录》，征集关于孙中山的史料，对内对外宣传奉安大典实况等。其中，《哀思录》封面上的三个字由刘芦隐题签。同年，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芦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刘芦隐发表《怀仁堂的扩大会议为阎逆筹安》等文章，对以汪精卫、阎锡山为首的反蒋势力口诛笔伐，这年刘芦隐正式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27—1930年，刘芦隐积极支持南京政权，并认真积极地投入工作。

1931年2月，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直接影响了刘芦隐以后的政治道路，他追随胡汉民而远离甚至反对蒋介石。事发后，由于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具有很高的威望，蒋介石尚未能够一手遮天，属于胡派的刘芦隐仍然担任一些重要的工作：1931年3月，国民党中央第一百三十次常务会议通过《国民会议应确立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遵守之约法案》，并推定十一人为约法起草委员，刘芦隐为起草委员之一，4月起草委员完成《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送交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交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讨论通过；5月刘芦隐出席国民会议；1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全会上刘芦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刘芦隐一度被任命为考试院代理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并继续担任宣传部长。

1931年10月胡汉民被释放，他联合西南的陈济棠和桂系地方实

力派，以两广为根据地，坐镇广州、香港，提出抗日、倒蒋、反共的政治口号，并展开积极活动，刘芦隐则是胡汉民的主要助手。1932年初，胡汉民等人为“使党成为真的革命党”，决定“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即“新国民党”。“新国民党”以西南执行部为中央机关，胡汉民为主席，邹鲁为书记长。为了扩大组织，在两广以外设立“部”、“分部”、“支部”等。1932年，刘芦隐辞去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赴香港，被推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担任“新国民党”长江交通部书记长，负责苏、浙、皖、赣、湘、鄂、川七省的党务工作，随后，他回上海从事工作。一直以来，刘芦隐并不赞成国民党内的分裂，他之所以参与西南的反蒋，除了亲近胡汉民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蒋的独断专行直接造成了国民党的分裂。

1933年1月，刘芦隐被胡汉民从上海召到广州，创办以胡汉民为主编的《三民主义月刊》，作为“新国民党”的机关刊物。刘芦隐在《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包括《不抵抗主义的末路》、《讨蒋救国》、《国际现势的演变与太平洋争霸的趋向》，以及《从三民主义批判法西斯蒂主义》等，旗帜鲜明地要求实现全民族的抗日，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的专制独裁统治。

1935年，刘芦隐担任广州市仲元中学校长一职，该校是胡汉民为了培养“新国民党”的干部而设，胡汉民让刘芦隐起草学校组织章程，并在校内办了一届政治经济讲习班，学员由拥有革命意志并有大学学历的青壮年组成，他们一般由西南各地及其他与西南有关系的人士秘密保送到广州，再经过考试甄别录取。1935年2月开学，学期为一年，以政治经济知识的学习为主，同时，接受军事训练。结业后回到原地，从事宣传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

1934年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蒋介石、胡汉民之间的矛盾略有缓和，刘芦隐等在上海与南京方面的戴季陶、叶楚伧等人接触，寻求蒋胡间的和解，观察国民党其他要人比如孙科等人的倾向，并将情况随时向胡汉民汇报。1935年11月，刘芦隐和其他一些西南方面的

人员一起到达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芦隐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1936年5月，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在广州去世。胡派人士，一时群龙无首，“新国民党”、仲元学校等渐渐消失，刘芦隐的政治命运再度发生变化。1936年9月《中央党务月刊》登载：“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迄未到部，以致部务无人主持，兹经第二十一次常会议决以副部长方治代理部长，积极整理。”[(2)] 然而，刘芦隐被罢免宣传部长一职，还只是噩运的开始。

1937年初，刘芦隐在上海突然被捕，其罪名是教唆刺杀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武昌遇刺身亡，凶手成燮超当场被抓，该案因蒋介石的震怒很快告破，挖出的背后指使人居然是刘芦隐。1937年6月，武汉地方法院判处刘芦隐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由于判决依据不可靠，所得供词有刑讯逼供之嫌，外加主要证人和作案关键之人没有找全，判决书所定之罪显然证据不足，刘芦隐当即不服上诉，后来始终否认犯有此罪。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刘芦隐被人陷害，陷害之人正是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特务。解放以后，沈醉的回忆肯定了上述猜测。但是，也有人认为杨永泰就是刘芦隐指使他人所为。于是，杨永泰被杀一案即成悬案。

刘芦隐上诉被驳回后，先后被关在武汉、成都，1938年日本飞机滥炸成都，他得到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关照，又被送到雅安。在雅安，刘芦隐敬佛诵经、作诗写字，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他的字刚柔相济，常有人来求字，刘芦隐将卖字得来的钱用于修缮古刹金凤寺。至今寺内还存有他的不少墨宝。1948年，刘芦隐回到成都，此时，蒋介石下野，李宗仁邀请他任国策顾问，他婉言拒绝。为躲避炮火，他回到雅安仍然过着逍遥的日子。

1950年春天，刘芦隐回到成都定居。1951年，刘芦隐被安排在四川省教育厅工作，后来由教育厅推荐到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当馆员，

编撰《杜甫年谱》一书。1953年，刘芦隐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1955年后当选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刘芦隐自称是一个失败的人，真诚地表示要彻底地改造自己，并对解放之初的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满怀感激。他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参加公私合营、增产节约等一系列社会运动。1969年刘芦隐因肺心病发作去世。

刘芦隐有勇有谋，正直不阿，学问字画造诣很深，生前以“诸葛亮”自诩，懊恼不遇“刘备”，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刘芦隐原配夫人李佩书因刘芦隐被判有罪，郁闷吐血而死。1947年，刘芦隐娶周佩芳女士为妻。刘芦隐育有四子。

---

(1)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2) 《中央党务月刊》第98期，第969页。

刘茂恩

郭熙生　宋岑

刘茂恩，字书霖，河南巩县人，生于1898年6月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父刘惟永是小商人，长兄刘镇华系民初军阀，曾任陕西督军、省长。刘茂恩幼读私塾，后入小学，1913年入洛阳河南省立第八中学。1915年10月被刘镇华保送到北京袁世凯办的混成模范团第二期辎重科受训，1917年7月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3月毕业，到陕西刘镇华军中，先在军官教育团执教，后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1925年4月胡、憨战争中，刘镇华支援憨玉琨，被胡景翼击败。刘茂恩参加了这次战争，战后随刘镇华逃到山西，投靠阎锡山。1926年春，刘镇华企图重返陕西，决定攻打西安。4月，刘茂恩参与刘镇华率领的镇嵩军，围攻西安八个月之久。11月被国民联军抄袭，败退河南陕州。1927年4月，刘镇华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被编为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辖五个军，刘茂恩任第四军军长。1928年5月，刘茂恩参与北伐，先后在山东、河北打败直鲁联军和奉军。6月，第八方面军改编为第十一路军，名义上直属中央，实际上归阎锡山节制，驻防豫西。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刘镇华出国游历，刘茂恩代理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受阎锡山令，到豫东参战。其时，第六路军总指挥万选才率部东进抵开封后，被阎锡山任为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与万选才有宿怨，8月，冯、阎军在陇海路失利后，万选才部向后退却经过刘的防地时，刘派人将万扣押，送交蒋介石，并在蒋重金收买下率部倒戈投蒋，使冯、阎军受到沉重打击。刘投蒋后，先后任陇海路左翼军第四守备区司令、平汉路左翼军第四纵

队指挥官。蒋介石战胜冯、阎后，对刘茂恩奖赏有加。

1933年5月，刘镇华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兼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刘茂恩任安徽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所率领的第十五军成为刘镇华部参加“围剿”红军的主力。1934年10月，方志敏率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皖南北上时，刘茂恩部进驻屯溪阻截，于1935年1月24日将方志敏俘获。以后，刘又率部入川追击工农红军。1936年刘兼任豫鄂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茂恩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由六安开往石家庄。9月入山西增援大同。师至怀仁，大同失陷，乃奉命掩护友军及兵站物资的转移，苦战五昼夜。旋在忻口战役中率部血战逾旬，重创日军板垣师团一部。10月受命守备汾河，掩护石家庄、太原以北地区友军的转移，刘率部力战，使友军得以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郭晓棠、杨章武等人参加刘茂恩部，晓以民族大义，增强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1938年3月临汾失守以后，刘部进抵晋西北。在这期间，他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常常见面，还资助一部分被服、弹药。同年夏，刘部进入中条山绛县以南地区，与日军对峙。八路军人员通过刘部防区时，皆能顺利过境。

1939年10月，刘茂恩晋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率部与日军鏖战于安泽、浮山、晋城、阳城一带，击退敌军多次进犯。1941年春夏，日军调集重兵猛攻中条山，刘部苦战近月，一时军饷供给困难，军中马匹都杀以为食，终被迫退渡黄河，守备豫西河防。

1944年春，刘茂恩率第十五军防守洛阳，兼任豫西警备司令。日军进犯中原时，刘部死守洛阳四十六天，孤军无援，后突围至卢氏、淅川一带休整。7月，刘茂恩任河南省主席，兼省警备总司令。1945年3月，日军再次西犯，刘率部进驻伏牛山区，阻敌入陕。5月，在国

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亟谋发动内战。1946年3月，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郑州召开绥靖会议，颁发“绥靖手册”，筹划编组地方反动武装，清查保甲户口、构筑工事、训练军警等，并计划使用优势兵力击溃晋冀鲁豫和豫鄂区解放军主力，分区隔离，逐步实行清乡。刘茂恩带领省辖保安团及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刘还成立了泛东“剿匪”指挥部和豫北办事处，就近指挥专员、县长构筑防御工事，严密保甲组织，建立还乡工作队。他的床头装有电话，日夜听取各地报告，进行指挥。

1948年3月，国民党军第二零六师被人民解放军围歼，洛阳解放。与此同时，刘茂恩所属第十五军也在鲁山被击溃，军长武庭麟被俘。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处于解放军包围中。6月17日，人民解放军开始进攻开封，20日下午攻入河南省政府大院，刘茂恩在卫兵护拥下由后侧门潜出，化装逃出开封城。26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开封后，刘随整编第五军进城，一面办理善后，一面电请辞职。7月27日，河南省政府改组，由张轸接任省主席。9月2日，刘茂恩离开封到南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又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委。

南京解放前夕，刘茂恩携眷前往台湾，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国策顾问”。1981年4月24日，病死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国军事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版。

米暂沉：《刘镇华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年

版。

刘师培

万仕国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884年6月24日（农历闰五月初二）生于扬州，小字闰郎。曾祖父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三世共疏《春秋左氏传》，并入《清史儒林传》。刘师培幼年由母亲李汝𤼈授《尔雅》、《说文解字》、《诗经》等，后随从兄刘师苍问学，八岁开始学习《周易》，十四岁开始研读《晏子春秋》等子部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柢。十八岁参加府试，以“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警句名噪一时。1902年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中第十三名经魁。并游历南京，与缪荃孙等交往。

刘师培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不断。他十分关心时局，写下了《湘汉吟》、《燕》、《宫怨》等诗作。1903年3月，刘师培赴开封参加会试，行前慨然于“苟安旦夕”、“墨守旧习”的学术风气，撰写《留别扬州人士书》寄给《苏报》，强调建立少学基础，实行欧化主义，革保守之旧习，生兼善之念，鼓励出洋留学，组织师范学会，广募教育经费，兴办新式女学。会试落第后，刘师培往来于南京、扬州，与缪荃孙、杨文会、桂蔚丞、方尔谦、方尔咸等名流交往，并接受王钟麒（郁仁）等进步人士的影响，筹办扬州师范学会，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以联合教师，改良教法，鼓励留学。针对清政府《密谕严拿留学生》，发表了《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强调：“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何尤？”“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在《黄帝纪年论》中，要求废除帝王纪年，改用黄帝纪年，公开提倡排满反清。秋，与王钟麒同赴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林獬、陈去病、汪允宗、林宗素等人，改名“光汉”。作《中国民族志》，详细论述汉族扩张、异族入侵和各族

融合的历史；编撰《攘书》，强调“夷夏之防”，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鼓吹民族革命。同时，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参与爱国学社工作，与蔡元培等人创刊《俄事警闻》，并积极为林獬创办的《中国白话报》撰稿，用白话文向普通民众宣传革命理论。写成《驳泰誓答问》、《小学发微》。

1904年2月，《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任编辑主任。2月29日，刘师培致信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劝其“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并参与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的工作。5月，刘师培因“苏报案”回扬州暂避，后赴南京等地。次月与何班结婚，不久夫妇同赴上海，何班改名何震，入爱国女校，接受革命思想，成为当时著名的革命夫妻。7月，所著《中国民约精义》出该书“举吾国前哲所言，凡有与西儒民约之旨相合者，悉加采录，而每条之后，悉加后案，以与《民约论》相印”，使“改革政治之阻力，亦无从而生”。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入会。此时，广西总督王之春来沪，刘师培与万福华等人策划暗杀王之春，行动失败后，万福华等人被捕。刘师培与林獬四处筹资，延聘律师为万福华辩护，最终万福华被判监禁十年。

1905年初，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附设藏书楼，发刊《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增强民族自信心。3月25日，清政府查封《警钟日报》，并通缉刘师培等报社人员。刘师培化名金少甫，逃往浙江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光复会温台处会馆事宜，同时从事中国学术史研究，发表《古学起原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两汉学术发微》、《汉宋学术异同论》、《理学字义通释》、《文说》等研究成果，综合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扬州学派的传统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经学、诸子学、文学等学术思想的起源、继承和发展关系。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刘师培以光复会会员身份加入上海分会。同时，刘师培先后编写了《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

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等教材，以近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按照种族革命的需要，以进化论的观点对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审视，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特别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方式，采用专题史的形式，突出了对古代社会生活的阐述，表现出新史学的生气和活力。

1906年春，刘师培由嘉兴赴上海，结识柳亚子等人，旋回扬州。应陈独秀之约，偕母亲李汝瑗、妻何震同赴安徽芜湖，任皖江中学、安徽公学、赭山学堂等校教师，与柏文蔚、陶成章、张通典、谢无量等同事，参与岳王会活动，并邀请苏曼殊、敖嘉熊、徐慕达等革命志士来芜湖，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宣传革命。秋，刘师培肺病发作，11月初，由芜湖经南京赴上海治病。由于刘师培在学校公开宣传反满革命，引起清吏关注。刘师培由上海返还芜湖后，托胡渭清将一百名新近吸收的同盟会会员名册送往上海交蔡元培，举家迁回扬州。不久，与何震再赴上海，筹建国粹学堂，未果。这期间，刘师培还发起编辑乡土教科书，并抱病编成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教材，激发爱乡爱国、保族保种的热情。同期完成的还有陈庆林、黄节等人编写的湖北、直隶、江西、广东等省乡土历史教材。

应章太炎的邀请，1907年2月13日刘师培夫妇与汪公权、苏曼殊同赴日本，参与《民报》编撰工作，并结识孙中山、胡汉民、宋教仁、黄侃、钱玄同等东京革命党人和宫崎滔天、幸德秋水、和田三郎、北辉次郎等日本志士，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以“韦裔”、“豕韦之裔”的笔名参与革命宣传，发表了《普告汉人》，强调排满不是革命的目的，“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中，详细考证了满人历史沿革，驳斥《新民丛报》关于明朝亡于清，“其国虽亡而不曰亡”的论调，当时

有“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的说法。这时，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因日商赠款问题发生矛盾，掀起“倒孙”风潮。刘师培介绍北辉一郎、和田三郎入同盟会，并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由于刘揆一的反对而中止，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并公开化，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

刘师培夫妇到东京后，很快看清了社会发展中民众生存危机的严峻现实，对民族主义革命产生了怀疑，开始接受当时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07年6月，何震与友人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出版机关刊物《天义报》，“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刘师培与张继、汪公权等人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后更名“齐民社”），先后举办十五次集会，与幸德秋水、堺利彦、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互通声气。

刘师培在《民报》发表《悲佃篇》，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在《天义报》上，提倡“人类均力说”，“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把中国固有的大同理想与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相联系，认为中国人民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统，中国政府的统治形同虚设，“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立宪派提出的“新政”，“虽名曰图强，实则利于上而不利于下。若今日中国之新政，则尤为病民之根”。刘师培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革命上，组织“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穷民俗谚”，反映农民生活状况，唤起大家对农民问题的关注。1908年6月还出版了《衡报》“农民专号”，胪陈中国田主之罪恶，认为“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之革命成矣。故欲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所谓农民革命者，即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及田主是也”。刘师培还组织翻译了克鲁泡特金《面包掠夺》、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作，刊载于《天义报》。

何震则集中宣传妇女革命，倡导男女平权，父母姓氏并重，提倡

妇女从事社会活动，摆脱对男子的经济、政治、人身的依附，投身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由于《天义报》发行一直靠捐款维持，经费十分紧张。1907年10月，李汝蒗　　东渡日本后，刘师培夫妇生活更加困难，何震于11月上旬回国筹款。此时，章太炎有赴印度研究佛教的意向，便托何震利用其兄与张之洞女婿卞纬昌的亲戚关系，向张之洞筹款，未果。12月上旬，刘师培也由日本回上海，参与柳亚子等人筹建南社的活动，并通过杨仁山关系，与貌似开明的端方联络，作《上端方书》，向端方输诚，提出“弭乱之策十条”，成为端方的侦探，而章太炎赴印度路费因支付方式上发分歧而未果。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再渡日本，出版《天义报》第16至19卷合册，刊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刘师培为之作序，称“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后该刊停刊。次月，社会主义讲习会改名齐民社，先后举行六次活动，研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4月，刘师培夫妇创办《衡报》，托名澳门出版，以“颠覆人治，提倡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为宗旨，继续提倡无政府主义，举办世界语讲习班，讲授世界语知识，吸引了景梅九等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参加。这时，刘师培与章太炎因学术名声之争而关系紧张，何震遂与一向与章太炎交恶的吴稚晖联系，提供章太炎运动张之洞的证据，希望刊布。上海《神州日报》登出伪造的《炳麟启事》，有人怀疑是刘氏夫妇所为。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公开反对刘师培正在从事的推广世界语工作，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章太炎即函请孙诒让从中调停，因孙逝世未果。

1908年6月中旬，何震再度回国筹措办报及生活经费，数月未有进展。应清政府的要求，8月21日和31日，日本警察两次传唤刘师培，要求补齐《衡报》发行的相关手续，并交纳足额保证金，方可发

行《衡报》。9月初，刘师培夫妇仅筹得一半费用。这时，日本警察注意到了《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而实际在日本出版的事实，进一步加强了监视活动。9月15日，刘师培筹足保证金，获得《衡报》的正式发行手续。但10月10日，该报仍然被日本政府查封，9天后，《民报》社也被查封。刘师培全家在日本无法继续生活，便迁回上海。刘师培将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五封信函拍成照片，广为散发，引起革命党人的混乱。同时，刘充当端方的暗探，出卖张恭，破坏江浙革命党人起义。王金发查得为刘师培、汪公权所为，将汪公权暗杀于上海。

刘师培背叛革命暴露后，往南京，任两江督辕文案兼三江师范学堂教习，为端方考订金石及伯希和送的敦煌卷子照片，称“甸斋师”；同时，从缪荃孙、李瑞清、樊樊山、陈庆年等人游，利用端方收藏的善本，专注于诸子校勘工作，先后完成了《老子》、《荀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鬼谷子》、《黄帝内经》、《素问》、《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等校辑专著和《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刘师培携何震随之北上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章太炎得知后，致信刘师培，希望他洁身远引，先迷后复。这时，《新世纪》、日本《日华新报》等刊载了刘师培揭发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信函，革命党人内部产生了巨大混乱。

1910年2月，刘师培得一女，不幸早夭，悲痛万分。11月，在北京白云观京师图书馆筹备处，潜心研读《道藏》，作《读道藏记》，为三十七种道藏撰写了提要。同时，刘为修正先人《春秋长律》中的错误，折节拜同幕徐绍桢为师，学习历法。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南下镇压，刘师培随行。何震由南桂馨推荐任山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并由南桂馨介绍，到阎锡山家做教师。

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在资州被杀，刘师培被拘押。章太炎、蔡元培先后发表宣言和《求刘申叔通信》，并致电大总统府，要求保释刘师培；安徽都督府秘书科邓艺孙、陈独秀等人也致电大总统府，保

释刘师培。临时大总统府即电令四川军政府，护送刘师培赴南京。而此时，刘师培已应谢无量邀请至成都，入四川存古学堂。民国改元，刘师培作《废旧历论》，坚决反对。四川都督尹昌衡改枢密院为四川国学院后，吴之英任院正，刘师培任院副，楼黎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谢无量、杨赞襄、圆乘为院员。刘师培兼任四川国学学校教员，讲授《春秋左氏传》，从学者十一人。同时，创办《四川国学杂志》（后改名《国学荟编》），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与吴虞、谢无量等人论学。何震得知刘师培滞留成都后，千里南下寻夫，并随之居蜀中近一年。1913年6月底，刘师培夫妇离开成都沿江东下，经扬州、转上海，11月至山西，由南桂馨介绍，刘师培任山西都督府顾问，何震做阎锡山家庭教师。1914年春，山西都督府改编为将军府，裁撤顾问，阎锡山推荐刘师培赴北京，经袁克定引觐袁世凯，任公府谘议。

1915年8月，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参与其中，并召集学者名流，为袁世凯称帝鼓吹，因黄侃反对而失败。8月18日和31日，黄节两次致信刘师培，希望“深察得失，速为罢止”。刘师培置之未复。同时，金永密告阎锡山反对帝制，引起袁世凯猜疑。阎遂派南桂馨赴京，刘师培即代为疏通。10月，袁世凯任命刘师培署参政院参政，旋授上大夫，刘师培上折谢恩，时人讥之为“莽大夫”。1916年1月，刘师培与杨度等人迎孔令贻入京，袭封衍圣公加郡王衔，并与康宝忠创办《中国学报》，发表《君政复古论》和《联邦驳议》，公开为帝制张目。帝制失败后，刘师培、严复列为帝制祸首，属严惩之列，因李经羲“爱惜人才”获得宽免，流落天津，生活无着。

1917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刘师培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先后担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古文学史等课程，并指导文、文学史、经、史传、中世文学、诸子等科目的研究。黄节鄙薄其为人，致书蔡元培，表示坚决反对。这时，北京大学文科中文选派与桐城派对立严重，刘师培作为文选派

大家，因肺病日益严重，置身事外，专心治学。1918年，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刘师培在该处兼职，负责文明史和政治史志的编辑工作。1919年1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与北大学生陈钟凡、张煊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这时，《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现状》，认为北大有新旧两派，《国故》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相对立，“纯以恶声相报复”。刘师培即致函《公言报》，称“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此时，黄侃仰慕刘师培学术，折节行师生礼，刘师培将《周礼古注集疏》等著作转交黄侃整理，并传治学心得。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已经卧病不起的刘师培联合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马叙伦等知名教授数十人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陈独秀交保省释”。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病在北京和平医院去世。

刘师培身后萧条，由蔡元培经纪其丧，次年2月由刘文典等抚棺归葬。其妻何震精神失常，后取名小器，削发为尼。1936年，钱玄同等人搜集其著作，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凡七十四种，其中有关经学小学的论著二十二种，讨论学术文辞的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札记五种，学校教科书六种。他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美学、历法、音乐、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文学史、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方志学等许多方面，而学术成就最大的，集中体现在《周礼》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正如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所指出：“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主要参考资料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267，儒林3，中华书局1977年版。

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77种，宁武南氏1936年版。

王森然：《刘师培评传》，《国风》半月刊第4卷第9期。

方光华：《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刘天华

严如平

刘天华，原名寿椿，江苏江阴人，1895年2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十）生。父亲刘宝珊，清末秀才，倡导新学，在本县与人合办翰墨林小学，刘天华幼年与兄刘半农均就读于该校。刘天华1909年入常州府中学堂。他为人朴实厚重，学习勤奋刻苦，为同学所尊重。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他辍学归里。时民主革命浪潮波及江阴，他基于爱国热情，曾加入本邑青年团体，参加抗清活动。

刘天华从小喜爱音乐。他十分爱听当时江阴民间和尚道士吹奏的乐曲，每遇寺院春秋丁祭和僧家佛事活动，或邻里婚丧喜庆演奏笙箫弦笛，他总是听得入神。在常州府中学求学时，他参加校内的军乐队，学习吹奏军笛军号。1912年春，他跟刘半农到上海，入开明剧社，在乐队工作，开始接触钢琴、小提琴和其他西洋乐器。他热情学习，坚毅专心，常常练到深夜，孜孜不倦。

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刘天华回到江阴，在华澄小学任教。他买了一把竹筒二胡，爱不释手，苦练不已。翌年春丧父，又失业，贫病交加。他每日拉奏二胡，表述自己内心的忧愤和抱负，逐渐形成《病中吟》的旋律。同年秋，刘受聘于常州母校（时已改为省立第五中学）为音乐教师。他组织学生成立军乐队和丝竹合奏团，热心训练和指导他们学习乐器。在授课之余，他走出学校，虚心向民间艺人求教，学习琵琶、二胡、箫、笛、唢呐等民族乐器。在常州五中执教的历年暑假，他不顾生活颠沛之苦，外出寻师学艺和采风。1917年暑期，他向本地著名的二胡能手周少梅学习二胡；翌年暑期，去南京向崇明派琵琶演奏家沈肇洲学琵琶《瀛洲古调》；1919年暑期，他去河南学古琴。1921年暑期，他回故乡江阴，联络同好和学生，组织暑期

国乐研究会，公开演奏，互相切磋，共同研讨江南丝竹和吹打乐。这一时期，他除了精心提高琵琶、二胡的演奏技艺外，并开始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二胡曲。

刘天华渴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十分向往北京，曾多次写信给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刘半农，“羡都中专家荟萃，思欲周旋揖让于其间”[(1)]。1922年，他应北京大学附设音乐研究会之聘，到北京执教。同年秋，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音乐传习所，刘为琵琶导师，并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6年又兼教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他高度评价我国民族音乐，曾说：“声音之纯正与精微，举世当推吾国音乐第一。他日西方乐师，必来吾国研究。吾人从事国乐者，毋自馁也！”[(2)] 他把二胡、琵琶纳入高等音乐院校器乐教学之中，引导学生学习掌握民族乐器。他说：“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上，七情俱能表演，胡琴又何能例外？”[(3)] 他编写二胡练习曲四十七首和琵琶练习曲十五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开创了民族器乐的科学的教学体系。他教学认真，严格要求，指导学生重视器乐的基本功练习。

刘天华在教授国乐的同时，又悉心钻研西洋音乐乐理及和声作曲法，开阔视野，提高音乐理论水平。1923年起他师从俄籍名家托诺夫学习小提琴，直到罹病去世，近十年从未间断。平时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练琴，学生、友人去他家访问，常是未进门而先闻琴声。由于他的小提琴造诣很深，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三校除了聘请他为琵琶、二胡导师外，还都聘他授小提琴课。他在音乐会上演奏小提琴，也得到很高的赞誉。

刘天华由于受到“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立志改进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他珍视我国古老的音乐传统，教学之余潜心于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研究和改革。经过长期的演奏实践，并参考西洋乐

器的构造原理，他和北京文兴斋乐器店老乐工合作，设计制作了新型的二胡，调整了琴弦的粗细，明确规定内弦定D调、外弦定A调，使之有固定音高定弦法则。他对已传世一千四五百年之久的四相八品琵琶，大胆进行改革，设计制作了六相十二品的十二平均律琵琶，采用了活动品位装置，既可按传统音律演奏，又可按十二平均律演奏。刘天华富于创造性的改革，为后来二胡、琵琶的定型奠定了基础。1927年，他与友人成立“国乐改进社”，翌年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积极倡导民族音乐的革新。

刘天华创作二胡和琵琶乐曲，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排斥西方文化的国粹主义，主张：“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4)] 他借鉴西洋音乐的理论及作曲法，表现我国音乐旋律的特征，丰富和发展了民族音乐艺术的表现手法，也表达了他振兴和改革我国民族音乐的实践和理想。1918年创作并于1928年定稿的二胡曲《空山鸟语》，既充分发挥了二胡的特性，又在很多地方大胆采用了小提琴的弓法和指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春创作的琵琶曲《歌舞引》，吸取了民族歌舞的旋律，借鉴西洋音乐的表现手法，充分表达了人们载歌载舞的生动情景。二胡独奏曲《除夜小唱》（一名《良宵》），是1928年1月22日除夕之夜，他与友人守岁时即兴创作的，乐曲轻快，旋律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表现手法上，圆阔的长弓和轻快的短弓相间而奏，精巧完美。1931年创作的《光明行》，则是一首冲破黑暗、向往未来，具有蓬勃朝气的进行曲调的二胡独奏曲。此曲旋律铿锵有力，感情热烈充沛，表现了作者勇敢向前的毅力，开创了二胡演奏雄壮乐器的新路，而大段落的颤音也是首创。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气派，给人强有力的鼓舞，一扫某些外国人说我国民族音乐萎靡不振的成见。刘天华一生创作的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和一首民乐合奏曲，出色地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人民不满现实黑暗和渴求光明进步的思想情感，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刘天华为了振兴和改革我国民族音乐，对于我国民间音乐、戏剧音乐以及宗教音乐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热心于民族音乐遗产的发掘和整理。他常常走出书斋向民众求教。到北京大学执教不久，就开始学习北方民间器乐三弦拉戏。在北京艺专兼教后，又与学生一道聘请老师学习昆曲。他还把街头流浪艺人请到家里，向他们学习民间锣鼓等艺术。他曾专门向民间艺人及和尚道士学艺，记录整理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和《佛曲谱》。1929年，他听写了梅兰芳演唱的十出皮簧戏和八出南北昆曲的曲谱，印行《梅兰芳曲谱》，开创了用五线谱记录整理戏剧音乐的先河，为梅赴美国演出和传播我国戏剧艺术作出了贡献。

为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刘天华主张“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他说：“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5)] 他不顾军阀混战、学校欠薪、生活拮据的困难，为普及民族音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倡议举办了暑期音乐学校，尽量少收学费，帮助那些经济困难而又爱好音乐的人学习，并且亲自向青年工人传授二胡演奏技巧。他组织音乐界同人和学生凑集了一笔钱，开设“乐友社”，直接从国外订购乐器和乐谱，平价销售，方便音乐爱好者学习，不遗余力地推动和普及音乐事业。

刘天华演奏二胡、琵琶的高超技艺，受到人们特殊的赞誉。他纯熟而精巧的拨弄弹挥，深刻地表达了人们病痛中的呻吟、苦难中的悲愤、欢聚时的喜悦以及向往未来的激情。对于月夜的清妙、林中的鸟语、舞姿的婆娑、兵刃的铿锵，也能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他在音乐会上的演奏，常常使中外听众对我国民族音乐获得新的认识。德国音乐家雷兴感叹地说：“人们总觉得他这演奏是生疏的但却又这样熟习，是别致的但却又能令我们完全了解。”[(6)] 有的外国听众说：“今天听了刘天华先生的演奏，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优美动人的音乐，这确实是没有语言文字的世界语，是心的语言。”[(7)] 1931年，他为高亭

唱片公司灌制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和琵琶曲《歌舞引》、《飞花点翠》等唱片；并应美国一音乐团体的邀请，准备赴美演出[8]。

1932年春末夏初，刘天华为了采集民间乐曲，进一步研究我国民族音乐，到天桥一带去搜集说书人、卖唱者的锣鼓点，回家整理编谱，日夜不休，不幸于5月31日染患了猩红热，6月8日即去世。

---

(1)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00页。

(2) 萧友梅：《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1932年），《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北平1933年版。

(3) 刘天华：《〈月夜〉及〈除夕小唱〉说明》，《音乐杂志》第1卷第2期，国乐改进社1928年2月刊行。

(4) 周宗汉：《国乐泰斗刘天华》，香港《镜报》1980年10月号。

(5) 刘天华：《〈月夜〉及〈除夕小唱〉说明》，《音乐杂志》第1卷第2期，国乐改进社1928年2月刊行。

(6) ［德］雷兴：《纪念刘天华先生》，《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7) 田柳、李晖：《江阴二刘》，江苏《群众》杂志1981年第1期。

(8) 陈振铎：《南胡说略》，《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刘王立明

李援朝

刘王立明，原名王立明，乳名扬顺，曾用名李梦梅、邝志洁，1897年1月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安徽太湖县。其父悬壶行医，家道殷实。王为长女。七岁从父读《本草纲目》、《汤头歌诀》等医典以习字。九岁时父得急病而逝，全靠母亲做针线活抚养。王幼小就在艰苦环境中磨炼，不但会做家务，还干上山砍柴和打猪草等粗活，养成坚忍不拔和刻苦耐劳的品格，亲邻皆交口称赞顺姑娘能干懂事。

1907年，教会于太湖县办起一所福音小学，免费接纳部分无力向学的男孩。王立明和同龄小姐妹很眼热，不时去找校长软磨硬缠，居然破例收录了她们。王立明幼小从父习字，天资聪颖又勤奋，连年考试皆中头名，屡受校方表扬。她接受新知识懂得妇女缠足是束缚女子的枷锁，毅然不顾母亲的责骂和邻里的讪笑，扯下裹脚布。十二岁的她竟然成了全县第一个放脚的女人。王立明知道只有认真读书学本领，闯出生路，才能摆脱妇女的悲惨命运，站起来做人。校长非常赏识这位品学兼优的女孩，学业期满，学校将其保送九江儒励书院继续学习。该书院是当时皖、鄂、赣三省交界方圆独一无二的女中，学生成绩优异者，可免交学杂费和膳食费；母亲为女儿继续学习，求助娘家支助得到允诺。

王立明入学后，发奋读书，考试连连夺冠。四年修业期满，名列全校榜首，留校任教。她第一次领到工资时，首先寄给母亲。王立明在儒励书院读书时，参加国际妇女运动组织——世界妇女节制会，并任职中华分会，开始从事妇女运动。1916年，王代表中华妇女节制分会赴美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议。同年，她考取公费赴美留学。

王立明入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攻读生物学，在校四年，除专注生物学外，还参加其他活动如讲演比赛，曾参赛得冠。在美期间，她与读女中时就相识的刘湛恩相遇，并订下终身，后于1923年结婚。

1920年，王立明以硕士学位毕业归国。经过深思熟虑，她没有从事生物学的研究，而全身心地投入妇女解放运动。留美时，她就被世界妇女节制会聘为远东区干事，并代表该会巡视过中国、日本、菲律宾、朝鲜及澳洲等地分会。实践使王认识到推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已刻不容缓。她担任的中华妇女节制会总干事时，跑遍国内十五省、市，帮助建立妇女节制分会，会员达一万多人，被推为会长。王反对堕落人格的烟、酒、赌、邪等不良嗜好，提倡使人生活幸福的慈、孝、贞、俭等美感。为此，她创办《节制》月刊，并著书立说，宣传妇女解放，打击封建礼教和专制。1924年，上海妇女界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成立了上海妇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王立明同向警予、杨之华、刘清扬等人共同领导了这次运动。王主持促进会的成立，并提出争回女权，同参国政的号召，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良好影响。

1928年，刘湛恩出任教会所办的上海沪江大学校长，王立明对刘的校务予以大力支持。1931年“九一八”国难发生后，全国兴起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领导与支持下，平、津、沪等大中城市各界人民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王立明夫妇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1935年12月24日，中华妇女节制会员集体加入上海妇女解放救国联合会。王负责该委员会救护工作。此后中华节制会成员更加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曾参加193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会后的游行以及声援“七君子”的活动。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王立明在上海设立的妇孺教养院，收容了数百名无家可归的妇孺、乞丐以及婢女、弃妇等，给予一定职业培训和文化教育。她还为职业妇女运动解放者解决公寓，组织“女声社”，发行《女声》半月刊，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开始全面进攻，王立明除日夜奔波募集衣物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并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安顿平津流亡学生外，还积极支持刘湛恩的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中华妇女节制会参加了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抗日自卫将士上海分会，王任该农村妇女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专门从事农村妇女投身救护工作。同年11月，上海陷落，她一家随沪江大学迁往租界。期间，王立明夫妇冒死保存的“南京大屠杀”照片。

1938年春，南京伪维新政府初定刘湛恩为伪政府的教育部长，遇到刘的断然拒绝，刘的行动得王立明的坚决支持。敌伪当局见利诱不成，随之以暴力相威胁。王的宅前屋后，经常有可疑之人徘徊，不时有电话辱骂和恐吓，还多次收到内装子弹的恐吓信。随着上海形势的恶化，王立明夫妇的处境更加险恶。亲朋故旧劝其离沪，王立明夫妇则表示决不临难离沪脱逃，后来刘同意将王及三个子女送走，未及成行，而刘湛恩于4月7日在沪被刺。

刘湛恩牺牲后王立明也被日伪列入黑名单，但她没有被吓倒，决心继承丈夫遗忘，写下了《先夫刘湛恩先生之死》（中英文），并在自己名字前冠以“刘”字，以示永远哀悼和纪念。由于日伪的不断迫害，王已无法于上海活动，只得携子女离沪转移。同年夏，王立明一家辗转武汉至重庆。她被选为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利用合法身份大力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分裂。直言不讳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祸国殃民罪行，一再指名打击国民党权贵的专制残暴和贪婪腐败，痛切陈述百姓的苦难生活，被当时中外记者称之为最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

1943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于重庆开会之时，正是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之日。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会场作报告，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中共代表董必武当即予以严词驳斥。话音刚落，王即登台责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及其他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却别有用心制造摩

擦，破坏团结？何被诘问得哑口无言，特务群起搅散会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记者纷纷来访，对其敢冒政治风险、仗义执言表示由衷敬佩。结果王硬是被挤出参政会。有人劝其言语谨慎，王不以为然地说：我为的是国家和人民，怕什么！大不了杀头坐牢就是了。期间，王立明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邓颖超以及进步人士来往密切，周公馆给她送来陕北红枣，小米和粗呢。

王立明在重庆期间，到叙府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收养从襄樊抢救出来的数百名难童；又在重庆李子坝为职业妇女专门设立胜利托儿所。1944年，王立明在重庆加入民主同盟，是最早的个人会员之一，并当选民盟中央委员。她同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她还担任宜宾难童教养院院长、华西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等职。她在各地所创办的妇女教育和福利事业机构坚决抵制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渗透。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她受民盟中央之托，出面于胜利托儿所宴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抗战胜利后，王立明返沪并恢复了华东妇女节制会，设立夜校，继续开展争取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同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于昆明遭特务暗杀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王立明与陶行知等爱国人士与民盟在沪中委召开紧急会议，抗议当局践踏人权，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并筹划追悼李、闻二烈士事宜。同时，积极参与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筹备工作。10月该会正式成立，推选李济深为主席，王立明为理事之一，兼任总干事，会址设在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办事处内。同年12月，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王立明立即以中华妇女节制会名义发表抗议书。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强令其解散。12月，王立明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潜行离沪赴港。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随着王立明的离沪而停止活动。同月22日，王立明同到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十一人举行会议，决定该会在港继续

开展活动以及吸收新会员，会址设在王立明领导华南妇女节制分会内，实际上该会的具体工作也是由华南妇女节制分会的工作人员担任。同时，王还参加了1948年初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否认伪令，主张取革命方法与中共合作，她被推为民盟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筹办进步刊物《远东通讯》（英文版），曾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揭露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镇压民主运动的文章。遭到香港警察的监视和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盯梢。

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于1948年6月举行在港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王立明作为总干事出席会议，会议决定该会在港继续开展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的一系列血案暴行，并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殖民政府迫害华侨的流血事件提出抗议。该会就国内外反动势力践踏人权的事实，先后致函联合国巴黎会议、联合国人权保障会，得到同情和支持。但王立明为此遭港警署两次传讯，警告其在港停止一切活动。11月，为纪念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成立两周年，王立明等不顾香港当局禁令，由李济深主持举行纪念会，并将该会搜集到历年国民党反动派蹂躏人权的罪行资料汇集成册，印行为该会纪念特刊《血赈》。后因该会理事相继到解放区，遂停止活动。

1949年初，王立明由港赴平，代表民盟主席张澜参加政协筹备会议，并被推为政协第一届代表参加开国大典。3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中华妇女节制会成为该会团体成员之一，王任全国妇联第一、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立明是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二届三次会议会选常委，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文革”期间王立明受到冲击。王立明于1974年4月15日逝世。1981年3月，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全国妇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肯定了她的爱国行动。

主要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第4版。

刘王立明：《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刘光华：《我的母亲刘王立明》，《人物》1981年第6期。

何鹏等：《杰出的当代妇女界战士——刘王立明传略》，金其恒、范泓编《统战群英》第7分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汪新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名人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刘文典

张文勋

刘文典，原名文骢，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89年12月（清光绪十五年）生。父亲刘南田，经商。刘文典幼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进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得到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1907年加入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激励下，刘文典于1909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曾追随章太炎听《说文》课。当时，东京是中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由于接触的师友多具有革命思想，刘文典的革命热情更趋高涨，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文典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到上海，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主办《民立报》，任编辑，并以刘天民的笔名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谋刺时，刘的手臂也中弹受伤[(1)]。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刘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在孙中山的秘书处任秘书[(2)]。

1916年，刘文典回到国内。他看到袁世凯死后仍然是北洋军阀统治，感到失望彷徨，决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教学和著述生涯。刘文典到北大时，正当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校内的学术思想很活跃，学术气氛也很浓厚。刘深感自己的学术根底不厚，因为在这名流萃集、学者成群的学府中从事教学工作，不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是不能立足的。于是，他发愤从事我国古籍校勘工作，重点放在诸

子著作，集中精力从《淮南子》入手。经数年勤奋钻研，终于在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为了校勘这部书，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这部著作问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胡适为之作序，称赞他治学“最精严有法”，对他的“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十分称道[3]。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还写了《三余札记》。这是他在学术上最有成就、著作丰收的时期。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北大带来了新鲜空气。在这社会激剧变革和新旧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刘文典不断地吸取新思想、新文化，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学术著作，如叔本华的哲学著作以及《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书。

1927年，刘文典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翌年，安徽大学发生罢课事件，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严办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他不知谁是共产党。蒋大为震怒，命卫士把刘押送公安局关禁起来，并威胁要枪毙他。此事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安庆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4]。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才以刘“即日离皖”为条件，把他释放[5]。关于此事，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也谈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6]刘文典离皖后，曾去拜访章太炎，章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特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7]”

不久，刘文典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继续校勘古籍，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校补》等书。陈寅恪在为《庄子补正》作的序中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这时，他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声望，师友都是学者名流，可惜后来由于国家多难、社会动荡、生活

不安定这些因素影响了他在学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儿子也积极参加，他对儿子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那时正是严寒季节，他的儿子因连夜在外受冻，患病死去。刘悲痛万分，同时也更激起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刘未能及时转移到后方。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因此，他的住所曾两次遭到搜查。当时，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宁死也不能当汉奸，不能失节。”他的日语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在日本宪兵面前，绝口不讲日语，以表示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维护民族尊严[(8)]。

刘文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1938年取道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国难当头，生活艰苦，面对严峻的现实，刘的精神消沉颓废，除教书之外，就以读旧诗词消磨时日，甚至吸鸦片以图麻醉。1943年刘曾一度离开西南联大，到磨黑中学（即普洱中学）任校长，引起学术界、教育界的非议。半年后返回昆明，刘被西南联大解聘，后又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文典仍留在云南大学执教。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刘置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外，为一些官僚士绅写墓志、撰寿序，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撰写蒋介石六十生辰贺表。虽然，刘文典决不与国民党合作，但他的上述表现，也曾引起人们的误解。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已替他找好去讲学的大学，并为他一家三口办好入境签证，买好了飞机票。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虽然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事业还缺乏认识，但爱国感情终于使他留在新生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起了根本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后来又加入九三学社，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在1957年全国政协二届第三次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说："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崇高理想，今天由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一一实现了。……我愿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9)] 1985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

---

(1) 何晋：《忆刘文典》，《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3期。

(2) 何晋：《忆刘文典》，《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3期；并见刘文典自传稿。

(3) 《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4) 李广涛：《补遗刘文典一事》，《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3期。

(5) 《皖省学潮之内幕》，《教育杂志》第21卷第1号（1929年1月12日）。

(6) 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4）。

(7) 此联现存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处。

(8) 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提供；何晋《忆刘文典》中也有类似记载。

(9) 刘文典：《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3），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782页。

刘文辉

黄道炫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病虞，法号玉猷。1895年1月10日出生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父亲刘公赞，一生务农，母亲高氏，生有六子，刘文辉最小。刘文辉长兄刘文渊是清末举人，曾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五兄刘文彩曾任川南税务总局总务兼川南清乡司令。四川“剿总”总司令兼省主席刘湘年长于他，叙辈分为其嫡堂侄。

刘文辉幼年读私塾，十四岁由刘文渊带到成都入四川陆军小学。1911年，赴陕西入西安陆军中学。武昌起义后辍学返里。次年，刘文辉赴北京考入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1914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四川，在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任上尉参谋。

1917年，刘文辉由时任川军旅长的刘湘介绍，到驻防乐山的陈洪范第八师当营长，不久升任第二十九团团长，参加川军联合驱逐滇军出川及熊克武、刘湘、刘成勋、赖心辉进攻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刘存厚之战。1921年，刘湘出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时，委任刘文辉为第一混成旅旅长，直属总司令部，率部移驻叙府（今宜宾），脱离陈洪范的控制。

1922年6月，为争夺川省霸权，熊克武联合第三军刘成勋和省联军赖心辉、邓锡侯等部，将以刘湘、杨森为首的第二军打败，刘湘被迫下野，刘成勋出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文辉没有参与战争，但在刘湘兵败后，取得刘成勋等人默许，率第一混成旅由宜宾开赴重庆，同时保护刘湘回大邑原籍。1923年初，川军内讧又起，第七师师长陈

国栋、第三师师长邓锡侯起兵进攻刘成勋，直逼成都。刘文辉因与邓锡侯为保定军校同学，遂调三个团兵力由宜宾来成都参加作战。同时通过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与刘成勋通融，任第九师师长兼成都卫戍总司令。当邓部进入成都后，刘文辉仍任成都卫戍司令，并接管成都兵工厂、造币厂及税收机关。4月初，熊克武部反击，攻入成都，刘成勋复职，刘文辉则率部返回宜宾。

1923年下半年，在吴佩孚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杨森率部由宜昌返川，刘湘东山再起，组织倒熊（克武）战争。1924年2月，熊率部败退广东。刘文辉虽未直接参战，但以大量金钱支援了刘湘，因此当刘湘获胜后，刘湘让刘文辉收编了熊克武的部分残部，并接管富顺、江安、屏山、雷波等地。从此，刘湘在川东、刘文辉在川南，互为声援，形成“二刘合作”的局面。在刘湘协助下，1925年刘文辉被北京政府任为四川军务帮办。7月，参加川军将领讨伐杨森的军事行动。9月改编杨部，收编杨春芳师，兼任第三十一师师长，并占领高县、长宁、兴文等六县，势力进一步扩充。1926年配合刘湘讨伐袁祖铭。

1926年秋北伐开始后，刘文辉与刘湘、赖心辉、刘成勋等人联名电讨吴佩孚，表示拥护北伐。11月，被蒋介石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及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此时，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二十余县，但从下川南至成都的通道，却被占据雅安、西昌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阻断。1927年6月中旬，刘文辉兵分三路对刘成勋部队发起猛烈攻击。一路由双流向新津进攻；一路由崇庆、大邑向邛崃进攻；一路由眉山、丹棱向名山、雅安进攻。刘成勋在猛攻之下，全线溃败，6月29日，被迫通电下野。其防区包括西康、宁远、邛雅地区全部为刘文辉兼并，部队为刘文辉收编。7月6日，南京政府特任刘文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刘文辉和刘湘合力将赖心辉部击溃，又占领了泸州、合江、江津、永川、纳溪、古蔺等地，迫使赖心辉退至滇境。

1928年初，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组织“八部同盟”，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下川东之战。刘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援助，将资中、内江、荣昌、隆昌等防地交第二十四军接防。刘文辉遂帮助刘湘击败了杨、李、罗等部，统一了川东。由此四川成为“四巨头”——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分割的局面，并逐渐形成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两大派系争斗的格局。1928年夏，刘文辉倡议在资中召开“四巨头”会议，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11月，任四川省主席及国军编遣委员会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刘文辉的势力得到发展。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刘文辉乘胜追击，直捣李、罗驻地，占据遂宁、南充、顺庆等县。经邓锡侯、田颂尧出面调停，上川东战事结束。同年3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

1930年代前后，刘文辉经十余年发展，部队迅速膨胀到十二万人，控制西康十几个县及上、下川南、上川东六十余县，防区内包括大片盛产盐糖的富庶地区。因此，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他首先支持贵州军阀王家烈回黔主政，与唐生智等人联名通电胁迫蒋介石下台，随后又支持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与阎

锡山、冯玉祥合作筹划成立新政府。刘文辉判断阎、冯势将获胜，派冷杰生为代表参加会议。9月6日，刘文辉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此时阎、冯军事形势已急转直下，刘文辉见势不妙，连忙向蒋介石疏通关系。蒋此时对川尚无力顾及，便顺水推舟，11月派曾扩情入川活动，向刘文辉示好。1931年2月，蒋介石再次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

刘文辉自主政四川以后，准备先解决邓锡侯、田颂尧，然后兼收刘湘，统一全川。刘湘当然不甘人下，遂联络田颂尧，孤立刘文辉。1931年秋，刘湘在川江入口处扣留刘文辉从国外购买的一批军火，二刘矛盾激化。1932年10月初，驻武胜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向南充李渡的刘文辉二十四军发动进攻，川北之战爆发，实际拉开“二刘之战”的序幕。上、中旬，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杨森、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兵一部投入川北战场，同刘文辉第二十四军作战。第二十四军分兵应战，陷于被动。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付刘湘，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双方成胶着状态。11月中旬，刘湘联军突破沱江防线，连克资中、内江、富顺。泸城守军因势孤发生动摇，刘湘进占泸县。

正当泸城战事激烈之际，同驻省城的刘文辉与田颂尧爆发成都之役，双方共出动兵力五十个团以上，经过煤山争夺战、东郊战斗、北门战斗，田颂尧部溃败。后经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调解，双方同意停战，战事结束。此后，刘文辉部专力对付刘湘部，集中七万兵力投入战场。刘湘调集五万兵力分四路迎击。12月10日，荣威之役全面开始，双方鏖战十一天，刘湘军全线失利。此时，邓锡侯、田颂尧出兵进攻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川西地区。刘文辉腹背受敌，不得不停止进攻。12月2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刘文辉失去近三十县防地。

刘文辉失败后，将原因归咎于邓锡侯帮助刘湘，决心集中十一万兵力的大部攻打邓锡侯部。1933年5月，刘邓“毗河之役”爆发。邓锡侯调集所部近三十个团，约四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刘文辉部攻击逾

月，伤亡数千人，无进展。6月25日，刘湘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人发出通电，讨伐刘文辉。7月初，刘湘以安川军名义，出动三路大军共一百一十余团，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8日，刘文辉部退出成都，将所部二十四军沿灌县至乐山岷江右岸布防。8月中旬，刘湘下令全线总攻，刘文辉守军在灌县、新津发生内变，安川军全面突破岷江防线，乘胜追击。第二十四军向西撤退，溃不成军，刘文辉部主要将领或投降或引退，刘文辉率残部万余退至汉源。9月中旬，二刘联合通电停战，二刘大战以刘湘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因西康土地贫瘠，兵源饷源缺乏，处境甚为困难。刘文辉首先将所属残部改编为八个旅二十个团，保持军事基干。政治上采取利用矛盾、广交朋友的策略，一面注意维护民族之间的团结，一面加强与藏族中上层人士及地方力量的联系，逐步摆脱了孤立的处境。1934年12月；刘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国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长征经云南突然挺进金沙江，蒋介石令刘文辉派重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阻截红军。他立即令刘元瑭率十二个团死守会理，接着派重兵守卫大渡河。红军于5月25日占领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接着勇夺泸定桥，突破了大渡河防线。

刘文辉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后，返回雅安，将第二十四军按南京国民政府规定的番号整编为第一三六师、第一三七师、第一三八师及驻康定的军直属旅。同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同时，国民党也在西康设置党部筹备委员会，由刘文辉兼任主任委员。红军主力到达松潘县的毛儿盖后，红四方面军又翻夹金山南下。蒋介石命令川军各部进行阻截，刘文辉将重兵摆在雅安、汉源两城，征调民工，构筑碉堡，阻止红军南下。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全线西撤，雅安才告解围。9月，刘文辉将原设在雅安的西康建省委员会移设康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刘文辉任第五军团军团长。1938年春，刘湘在武汉病故，蒋介石乘机撤销川康绥靖公署，提出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企图把四川政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及刘湘部几个主要将领联合，反对张群继任省主席，并赶走亲蒋的代理省主席王缵绪，迫使蒋介石亲兼四川省主席，由贺国光以省府秘书长身份代行职权。1938年4月，刘文辉到汉口面见蒋介石，蒋当面答应划宁、雅两属归西康，应允在西康省政府成立后，按省预算由国民政府与四川省政府补助西康不足的行政和建设经费，并拨款修筑川康公路。9月，最高国防会议批准，四川的宁、雅两属等自9月1日起，正式交西康接管。1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武汉召开国务会议，决议西康建省。12月，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第一任主席。翌年元旦，西康省政府宣告成立。蒋介石为控制西康，特在西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康行辕，委任张笃伦为主任，监视刘文辉和龙云。刘文辉则在西昌设立西康省屯垦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与之对抗。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南方局曾多次派出秘密使者华岗、田一平等人做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刘文辉处成功设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话，保持联系。1941年春，刘文辉和李相符、杨伯恺、黄宪章、马哲民等教授在成都组织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刘文辉被推为社长。先后办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民众时报》等，对推动后方民主运动起到一定作用。

1944年2月，蒋介石以西康烟禁废弛为名，令罗国熙率领数个缉私团前往西康。刘文辉派兵拦阻，蒋介石怕扩大事态，乃将缉私团撤回。1945年5月，刘文辉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9月，蒋介石为安抚刘文辉，秘密来到西昌，加委刘文辉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春，蒋介石通过张群向刘文辉转达，要刘文

辉去中央政府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认为这是蒋的调虎离山之计，坚决予以拒绝，继续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兼整编第二十四师师长。次年任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见刘拒不从命，蒋介石派特务朱静泉到西康发动“倒刘运动”，企图以重庆市长张笃伦取代刘文辉。1947年初，朱静泉指使西康籍中央军校学生朱世农、朱世正等人集结两千多人武装反刘，一度攻占天全、芦山两县，进迫雅安，刘文辉组织力量予以武力镇压。

1948年4月，王陵基继邓锡侯任四川省主席。王被认为亲近蒋介石，引起强烈反击。刘文辉和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联合发起“驱王运动”。1949年春，在四川省参议会第六次会议上否定王提出的田赋征实及在大巴山设防两个提案。6月，刘文辉又策动省参议会联合川、康、渝部分国大代表、立法、监委员和康、渝部分参议员，在成都组织川、康、渝民意联谊会，公开反对王陵基，推派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将王撤职查办。同时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策动民众自卫运动。

随着中共大军南下，西南问题列入中共解决议程。1949年4月下旬，中共南方局希望刘文辉派代表去香港商谈起义事项。刘文辉立即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香港，并派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参谋部，统一筹划川康起义。8月，刘文辉通过秘密电台向周恩来报告准备起义，周恩来指示待机行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在北校场军校召见张群、邓锡侯、刘文辉等军政要员，逼迫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作，进行“川西决战”。第二天，蒋介石突然到刘公馆，明示优遇，实则是观察刘文辉的动静。之后蒋介石又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到刘公馆开会，要刘、邓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家属先送往台湾，遭婉拒。12月7日，刘文辉和邓锡侯离开成都，到达彭县，筹备武装起义的事宜。9日，刘文辉通电起义，中共兵不血刃占领西康。10日，蒋介石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限刘文辉于12日率部

撤退到新津河西岸，刘文辉则坚守武侯祠，进行阻击。随后又在雅安、西昌等地阻击胡宗南军。1950年3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军康定，西康阻击战结束。

1950年春，刘文辉从成都抵达重庆，受到刘伯承、贺龙等人的高度评价和称赞。6月，刘文辉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合并，改编后，原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原第二十四军副军长刘元琮担任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刘文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被任命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是年秋，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人接见。1959年，刘文辉到北京，担任国家林业部部长，兼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被选为常委），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委，著有《军事哲学纲要》、《刘文辉讲演录》、《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等书。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彭迪先、舒国藩：《刘文辉史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刘文辉个人档”，台北“国史馆”藏。

刘仙洲

黄延复

刘仙洲，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付竹，1890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生于河北完县。父刘秉钧务农，懂中医，常为乡人配方施药。刘仙洲七岁时入本村私塾，1906年入县立高小，翌年秋考进保定崇实中学。他勤奋好学，富于爱国热情。

刘仙洲受《民报》、《天讨》、《革命军》等革命书刊的影响，于1908年秘密加入同盟会。同年秋，因发动和领导学潮，被崇实中学开除。后转入同盟会员主办的保定育德中学，曾与进步同学组织“共和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刘仙洲等人积极投入保定一带的革命运动。曾先后参加燕晋独立及蠡县、石家庄一带的武装暴动。他带领革命同志试制成一批炸弹，谋炸京汉铁路线上的唐河铁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军，但因炸弹力量太小而未成功。

1913年2月，刘仙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夏，考得直隶省官费，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攻读，1918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刘回到天津后，应聘担任直隶工业专门学校的教员。回到保定后，母校育德中学要求他担任机械学科教员，虽月薪只有工专的三分之一，但刘“因忠于母校，表示接受”[(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组织贫苦有志的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育德中学受华法教育会的委托，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并附设实习工厂，组织旅法青年学习法文和机械学科。刘仙洲任教三年，讲授机械学、蒸汽机、机械制图等课程。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人都曾是这个预备班第二班的学生。

1924年8月，刘仙洲到天津出任北洋大学校长。翌年，他提出扩充学校计划，决心“造就‘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2)]，先后聘请了留学归国的茅以升、石志仁、周承佑、侯德榜来校任教。当时，北洋军阀忙于混战，四年中仅发给两年的经费，学校经常发不出薪金。刘与全体爱国师生惨淡经营，学校取得相当成就。

1928年，刘仙洲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去东北大学任机械系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唐山工学院任总务长兼讲师约两个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后，他又回到东北大学任教。

1932年，清华大学创办机械系和工学院，刘仙洲应聘至清华大学任教。他每周担负十二小时的讲课任务，总是黎明即起，遇到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到教室画好。他讲课深入浅出，组织严密，条理分明，板书工整。他认为科学作风是一个工程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因而对学生作业的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位置、诸线条的颜色和粗细等都严格要求。他精湛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受到师生的爱戴和尊敬，被称为“工程界的老前辈”、“中国机械学的老学者”、“中国机械工程界先进”[(3)]。

刘仙洲除了一丝不苟地完成教学任务外，还不知疲倦地致力于学术论著。他编著了我国第一批自编的大学工科教科书。20世纪初，我国大学的工科校、系，多延聘外国教师，采用外文教材，中国教师讲课亦多用外语。刘仙洲认为，这种情况将“使我国工程学术永无独立之期”[(4)]，决心加以改变。1918年，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时，即坚持用汉语讲课，并编出《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中文教科书；1928—1931年在东北大学任教时，基本完成我国第一本大学工科教科书——《机械原理》的翻译工作；到清华后，他又编著新教材多种。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的有《机械原理》（1935年出版）、《热机学》（1936年11月出版）、《经验计划》（1935年8月出版）等，为中等工业学校采用为教材者有《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

刘仙洲对我国工程界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一书。早年，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许多概念、用语、名称多用外文，其中一些汉文译名则是五花八门，诸如“司不令”（弹簧）、“猪拱嘴”（排障器）、“吊死鬼”（月牙板）等等。又如现今已通用之“泵”（Pump）字，当时有“恒升车”、“运水器”、“邦浦”等十几种译法。1928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曾编印过一本《机械工程名词草案》，但仅两千余词。1932年秋，刘仙洲受中国工程师学会委托，在校内外青年教师的协助下，本着从宜、从熟、从简、从俗的原则，着手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共一万一千余词，初版于1934年7月印行，不数月即告售罄 (5) 。1936年5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在杭州开成立大会，把“审定机械工程名词”列为重要会务之一，委托刘再编订《机械工程名词》一书。他在校内外多人的协助下，当即以暑假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完成 (6) 。新版约有两万词，除对普通机械工程名词有相当的增补与订正外，对于机车及航空两类有关名词增加尤多。

刘仙洲还致力研究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有许多创见。他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依靠外国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国之利器’不以示人，能够卖与仿造者，已为他国之二三等产品，又何以能与之并驾齐驱？” (7) 他在教学之余，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1933年搜集并研究了大量文献，写出了《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1935年春，又整理发表了《中国机械工程史料》 (8) ，指出：早在公元725年，我国唐朝一行等人创造的水力天文仪，已经能够利用水轮转动机械，制造精密复杂的齿轮轮系。1937年6月，刘仙洲又在《清华机工》月刊第一卷发表了《三百年前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王端公传略》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王征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一文 (9) 。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从未间断过对我国机械工程发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与北大、南开南迁，初于长沙合

组“临时大学”，后于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刘仙洲初任教于长沙“临大”，1938年春“临大”结束后，他一度去梧州任教于广西大学，后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工学院。当时联大师生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但“尽笳吹，情弥切”。刘仙洲和大家一样，认真教书，严谨治学，一直坚守岗位。他除完成教学任务并开出“汽阀开关”等新课外，仍致力于教科书的编著。《热工学》、《画法几何》（与褚世荃合编）、《汽阀开关》（与曹国惠合编）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中国在热机历史上的地位》（发表于1943年《东方杂志》第39卷第18号）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机械工程》（与庄前鼎合著，发表于1946年8月出版之《三十年来的中国工程》）。

刘仙洲生长在农村，少年时曾参与农事，因此他非常关心农业的技术改造，长期从事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1920年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时，曾试制过两种小车。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研究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1942年，他在《中国农器改进问题》一文中，反对一味抄袭外国的大型农业机械，主张结合我国农村经济情况改良畜力机械，使机械部分符合机械学原理。1946年3月，他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曾在中国工程学会上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二十多万字的《农业机械》，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讲授。当时，国民政府要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他借口眷恋“清华学术风气浓厚”，力辞不就。他眼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私心以为在我的一生中，国家是没有改好的希望了，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仙洲历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等职。1955年10月，六十五岁的刘仙洲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刘仙洲虽然担负了繁重的教学领导重任和众多的社会职务，但仍勤奋不懈地进行我国机械工程史的学术研究，严谨笃实，一丝不苟。1953年和1954年先后发表《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中国在传动机件方面的发明》等文，论证公元2世纪后汉张衡即开始用水力作为天文仪器的原动力。1956年他又在《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中指出：当时张衡极可能采用了齿轮系和凸轮等较复杂的机械装置。他的这篇论文同年于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上宣读时，得到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赞同。1961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年会提出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的初稿，并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他又完成了专著《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1970年，刘仙洲提出一份《对我国工科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在八十诞辰那天，他拟定了一份《我今后的工作计划》，附有《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共十章的详细目录，准备尽快完稿。他勤奋不懈，直到逝世前还在医院的病床上用放大镜一字一句地阅读文件，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修改文章。1975年10月16日，因胰腺癌不治去世。

刘仙洲一生在教育界工作五十七年，教学之余著书二十种，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共约三百多万字，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很大。

主要参考资料

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的片断回忆》，《新清华》1961年10月19日第3版。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会会

刊》第4卷第1、2期（1935年4月、11月）。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1编初稿，清华大学1961年10月版。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6月版。

《刘仙洲部分论文汇集》，清华大学校史组集订。

黎诣远：《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刘仙洲》，《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

清华大学校史资料和档案材料。

---

(1) 刘仙洲：《自述》（未刊稿）。

(2) 刘仙洲：《自述》（未刊稿）。

(3) 庄前鼎为《机械工程名词》一书所作的序言及1935年《清华周刊副刊·教授介绍》。

(4) 刘仙洲：《中国的工程书籍述略》，《清华周刊》第39卷第10期，1933年5月。

(5) 刘仙洲：《自序》，刘仙洲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中国工程机械学会1936年版。

(6) 庄前鼎：《序》，刘仙洲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

(7) 黎诣远：《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刘仙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8) 本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会会刊》第4卷第1期（1935年4月）和第2期（1935年11月）上，1936年曾以单行本印行。

(9) 刘仙洲写成此文后，原拟在当年8月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年会上发表，因“七七”事变，年会未开成。1958年9月经过修订，发表在《机械工程学报》第6卷第3期上。

(10) 黎诣远：《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刘仙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并见《刘仙洲小传》（1959年）（未刊稿）。

刘显潜

熊宗仁

刘显潜，字如渊，别号井陆，贵州兴义县人。1865年1月25日（清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1885年他补县学生员，次年食廪，后屡试不中，居家赋闲，兼办团练。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分三路进攻贵州，攻陷兴义县城。刘显潜的叔父刘官礼奉命在滇、黔、桂边界一带集中武装，组织靖边团营，镇压起义军。刘显潜被委任为中哨，与其堂弟刘显世集结团防兵夺回县城，迫使会党起义军退回广西。刘显潜因功被清政府升为管带。

1911年春，刘显潜被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命为广西边防军管带，率兵驻防黔桂边界，先后镇压了上岩、基马、茶溪等地群众反抗清政府的斗争，被擢升为广西省防军统带。

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贵州、广西相继宣告独立。其堂弟刘显世当上了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军政股长，为对抗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他要刘显潜速返兴义，扩充团防，为自己经营后方。

1912年3月，唐继尧率滇军以“假道北伐”为名，颠覆了贵州的革命政权。刘显潜在兴义一带扩充民团，成立“保卫军”四个营，配合滇军镇压革命群众。不久，贵州革命派首领张百麟和贵州巡防军南防统领陈守廉被以刘显世为首的贵州势力追捕，由安顺退至兴仁、贞丰，刘显潜派保卫军前往包围，张百麟等人被迫退走广西。刘显潜在黔西南各县镇压革命党人，因此被唐继尧擢升为兴义总兵兼西防统领。他帮助唐继尧、刘显世稳定贵州局势，镇压汉、苗、回、彝各族人民的反抗，十分出力。当时威宁、水城一带有以安桂林、安鹤翔、安三妹

为首的彝、苗人民群起反抗滇军暴行，刘显潜“督饬军队，驰往剿办”[1]，俘获安三妹处死。唐继尧为了加强对与云南毗邻的黔西南地区的控制和便于征收丁粮，命令刘显潜在兴义府六属划拨插花地段，健全行政机构，委派官吏，使盘江一带成为唐、刘政权统治下最稳固的后方。

1914年5月23日，刘显潜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贵州黔西道尹兼上游清乡督办；7月29日被授予四等文虎章。唐继尧、刘显世认为刘显潜跟随自己“几乎无役不从”，“任劳任怨”，曾先后呈请北京政府授以陆军少将军职，只因“已授文秩，未便准补军官”[2]。1915年6月20日袁世凯又赏给他四等嘉禾章。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蔡锷和戴戡由天津向贵州发出策划武装反袁的密电。刘显潜见局势动荡，以省亲为名，由贵阳返回兴义募集旧部，又组成四个营，准备应付时局变化。其堂弟刘显治当时任刘显世的驻京代表，屡来函电，认为“滇黔如真反袁，十九无成”，要刘显潜“从速安顿家小”[3]，做好两手准备。蔡锷云南起义后，袁世凯于1916年1月15日提升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授予他男爵封号，设行署于兴义，企图利用他阻止贵州参加护国运动。当戴戡率领护国军由云南向贵州进发时，刘显潜函令游击军管带易荣黔率部阻止戴戡过境。易荣黔迫于各方讨袁压力，不敢遽行阻止，乃亲往会见戴戡协商，双方未交手，戴于1月24日率部进入贵阳。

1月27日，刘显世被迫宣布贵州独立，但刘显潜受刘显世密嘱，仍向袁世凯电密输诚，为自己留后路。到护国战争在川、湘境内激烈展开后，刘显潜才迫于大势所趋，开始反袁。他驻兵在南盘江一线，防堵由广西进攻滇、黔的北洋军。北洋军进攻云南丘北县时，刘显潜曾派兵威逼广西西隆，迫使北洋军溃退。2月下旬，刘显潜回驻兴义，着意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久护国军在四川战场告急，总司令部调刘显潜任护国军黔军援川总司令，但他有意迟滞，于3月中旬开始出师，5月下旬才到达四川边界，而四川已于5月22日宣布独立。刘

显潜在四川战场未放一枪，便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授予刘显潜陆军中将衔和一等文虎章。

护国战争前后，贵州军阀内部逐步形成了以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和以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为首的“旧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刘显世曾拟以刘显潜取代王文华，因黔军官兵反对，未能实现。护国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委刘显潜为全省游击军总司令。刘显世为牵制王文华的力量，令刘显潜回兴义扩大游击军，编成三路，共一万多人。

1920年11月，贵州发生“民九事变”，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取代了“旧派”的统治，刘显世被迫下野。刘显潜见大势已去，于12月宣布撤销游击军司令部，同刘显世一道赴云南，投靠唐继尧，游击军如鸟兽散。1921年初，刘显潜一度由昆明赴上海，再转至香港，先后与袁祖铭、唐继尧密谋回黔之策。时王文华已被暗杀，袁祖铭组织“定黔军”拟回黔夺权，袁与刘显潜约定“定黔”成功后，由刘显世任省长。刘显潜率两个连的武装，于1922年2月由昆明回黔，在兴义宣布成立定黔军西路总指挥部，抢夺黔西南和黔西北的地盘。为了扩充军队，霸占与滇、桂交界的南、北盘江流域，刘显潜和袁祖铭之父袁干臣不惜网罗广西土匪入黔，导致4月16日广西土匪洗劫南笼县（今安龙县），使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千多妇女被掳掠至广西，造成了贵州历史上罕见的匪祸。

袁祖铭“定黔”得手后，背弃前约，没有把省长一职让给刘显世，刘氏弟兄决定重整旗鼓，驱袁夺权，又乞助于云南军阀。同年11月，北京政府委任刘显潜为滇黔边防督办，他将军队扩充到四个团，设督办署于兴义，与袁祖铭分庭抗礼，并策应滇军入黔。1923年2月初，刘派两个团进据关岭。2月13日，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滇军一万余人侵入贵州。刘显潜在兴义与唐继虞秘密会议，宣布驱逐袁祖铭，拥护刘显世回黔主政。袁祖铭军败退走四川，刘显世重新当上了贵州省长，唐继虞任贵州军务督办，刘显潜为会办，安顺以西复为其所控

制。是年冬，刘显世病，刘显潜一度代理贵州省长。

1925年初，袁祖铭在川势大，有回黔意图。唐继尧一面向袁让步，自动从贵州撤退；一面趁孙中山在北方病重，向两广伸手。他派滇、黔“建国军”六万余人假道广西入粤。刘显潜被唐继尧委为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官，由黔东南入广西进攻柳州，结果被李宗仁所率桂军击败，退回贵州。不久，滇军侵桂失败退回云南，同时袁祖铭部回黔，在兴义、兴仁、安龙迫使刘显潜的武装大部缴械，小部溃散。刘显潜不得不宣布下野。从此，兴义刘氏武力全部瓦解。

刘显潜晚年赋闲兴义，仍以其权势及影响左右县政和地方公益事业，1938年因病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严池华：《滇军第二次侵黔实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周农风：《刘如渊先生事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0页。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贵州政报》。

---

(1) 《政府公报》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225号。

(2) 《政府公报》民国四年六月，第1111号、第1112号

(3)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续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刘显世

李德芳

刘显世，字如周，别号经硕，贵州兴义县下五屯人。1870年5月8日（清同治九年四月初八）出生在一个世绅家庭。祖父刘燕山，参加镇压1858年贵州回民起义，为当地有名的团绅。父亲刘官礼因率团丁夺回被起义军攻陷的兴义县城，以功保“同知”，总办兴义府五属县的团务。

刘显世幼读私塾，十四岁进县学，十五岁考取廪生。1898年，因广西会党起义军有入黔之举，“遂弃举业，助其父办理团务”，当上了兴义县团防总局局董[(1)]。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分三路攻进贵州，攻陷兴义县城。刘显世得其父保荐为靖边正营管带，参加镇压起义军。1904年，起义军退回广西。贵州巡抚林绍年统一全省巡防编制，撤销了靖边营成立五路巡防营，刘显世得任西路巡防二营管带。

在清朝统治者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中，贵州巡抚林绍年于1905年在黔赶办“新政”。刘显世得其父的支持，当上了兴义县劝学所总董，开办学校，设立阅报所，成立“天足会”劝说妇女不缠足等，还延聘贵阳知识界一些“名流”到兴义执教，选送一些乡绅子弟入学肄业和出国留学。1908年，刘显世又在兴义组织预备地方自治会，和一些宪政党人联上因缘，其弟刘显治此时留学日本，也和梁启超攀上关系。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高涨，川督赵尔丰急电贵州派兵“助剿”。贵州巡抚沈瑜庆命董福开、鲁为禧率驻筑（今贵阳）防军入川。这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贵州政局也有一触即发之势。沈瑜庆感到贵阳空虚，于是急调刘显世带兵五百兼程来筑，保卫面临垮台的贵州政权。

武昌首义，特别是云南光复后，贵州的革命党人大受鼓舞。11月3日晚，自治学社联合陆军小学堂学生、新军官兵和哥老会员发动起义。11月4日占领了贵阳，推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此时，刘显世正行军至安顺，听到贵阳光复，遂表示赞成共和。由于革命党人失去警惕，军政府不仅准其拥兵进驻贵阳，而且擢升为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军政股长和陆军第四标标统。刘显世进驻贵阳后，密结宪政党人熊范舆、任可澄、戴戡，勾结官僚郭重光，盗用民意，派人去云南乞师，请蔡锷派兵“援黔”。

蔡锷派唐继尧以借道北伐为借口，率滇军入黔。唐于1912年2月27日抵筑，分兵进驻螺丝山、照壁山、东山、观风台等制高点。3月3日，观风台滇军炮队炮击南厂新军，打响了武装颠覆贵州革命政权的第一炮，刘显世也率兵士进攻都督府。5月，唐继尧当上了贵州都督[(2)]，刘显世被任命为贵州省军务部长。

1913年10月，蔡锷奉调入京，唐继尧离黔回滇任云南都督。时值袁世凯改定省制，戴戡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当上了贵州护军使。此后，刘积极扩充实力，把全省陆军编为六个团。除任其外甥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外，其余各团分别以前清绿营的军官和唐继尧督黔时的旧部充任。

1913年底，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拟帝制自为。刘显世对袁唯命是从，对袁的所有倒行逆施，如解散国会、召开政治会议、废除约法等，都表示赞成，并和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一起导演了所谓“国体投票”的丑剧[(3)]，向袁发出“拥戴书”。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21日赐勋，刘显世拥戴有功，得授一等子爵。

年底，蔡锷秘密回到云南，策动唐继尧反袁。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起。刘显世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他一方面电请袁世凯对滇用兵时不假道贵州，另一方面又派人赴滇阻止护国军过境。

不久，在全国人民讨袁声中，刘显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也转而反袁，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同时自任都督。他派王文华率三个团的兵力入湘，熊其勋率两个团的兵力北进，归护国军第十军右翼总指挥戴戡节制，参加讨袁。另一面他又密令其从兄刘显潜（时任黔西道尹）通电拥袁，为自己留条后路。

在讨袁护国的革命浪潮面前，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6月6日病死，讨袁护国就此结束。刘显世因此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当上了贵州督军兼省长。他总揽全省军政大权，改组贵州政府，同时扩编贵州军队，把全省陆军编为一个师、一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团。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不久又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进而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因而于1917年7月率舰南下，揭起“护法”大旗。唐继尧、刘显世为了扩大势力，也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刘还任命王文华为黔军总司令，率六个团的兵力入川。黔军配合滇军和熊克武部川军，很快就大败北军吴光新部，进占了重庆。次年3月，又赶走了川军周道刚、刘存厚，攻克了成都。5月，唐继尧称滇黔川鄂豫靖国联军总司令，刘显世就任副总司令。他们置孙中山的一再劝告于不顾[(4)]，与北洋直系军阀停战言和，破坏“护法”，并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怒斥他们和北洋军阀“如一丘之貉”。

刘显世此时虽为贵州督军、省长，又是滇黔川鄂豫靖国联军副总司令，但黔省军权实为王文华掌握。刘显世不愿做空头司令，一方面离间王文华与其部将袁祖铭的关系，一方面和唐继尧勾结，密谋用唐的部将韩凤楼代替王文华。1920年11月，王文华从四川回师南下，派部将卢焘、谷正伦、孙剑峰、何应钦，以“清君侧”的名义，在贵阳发动了“民九事变”，杀了刘显世的亲信党羽郭重光、熊范舆，夺了刘显世的权，送他回兴义老家“养病”。

刘显世不甘被逐，回兴义后即刻逃往昆明，投奔唐继尧，希图东山再起。但此时云南政局也发生了变化，顾品珍赶走了唐继尧。刘显世于是漫游武汉、上海，召集旧部策划倒王。1921年3月，王文华在沪被袁祖铭派人刺死。王的部将卢焘、谷正伦、何应钦等人互不统属，黔局混乱。袁祖铭依靠北洋军阀靳云鹏、吴佩孚的支持，于1922年3月率“定黔军”回筑，被靳云鹏内阁任命为贵州省长。这时唐继尧也回滇赶走了顾品珍。刘显世得知袁祖铭不欢迎他回黔，再度入滇。1923年2月，唐继尧派其弟继虞偕刘显世拥兵入黔，赶走了袁祖铭。唐继虞自任贵州善后督办，刘显世才又重新当上了贵州省长。

1924年，孙中山联合段祺瑞、张作霖讨伐曹锟贿选。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表示愿与广东政府一致行动，承担出兵湘西进攻鄂西并与北伐军会师武汉的任务，再一次借孙中山的名声组成了滇黔川建国联军，唐任总司令，刘任副总司令，熊为前敌司令兼川军总司令。刘显世想借唐、熊的力量消除袁祖铭的威胁，然而，这时的贵州已是滇军的天下，刘显世已无左右黔省之力，仅一傀儡而已。相反，袁祖铭离黔后，帮助杨森、刘湘打败熊克武，势力大增。唐继尧怕袁回师南下于己不利，主动和袁修好，自请交还贵州，以袁军同滇军联合进攻鄂西为交换条件。1925年1月5日，唐继尧发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通电，声言“黔省内政，概由黔人自理”。23日，袁派部将彭汉章以贵州清乡总司令的名义回黔接收政权，并任命卢焘为行政委员长代行省长职权。刘显世自知众叛亲离，不得已引退家居。1927年10月14日病死。

---

(1) 兴义县志稿：《刘显世传》，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0页。

(2) 郭燮熙编纂、蔡锷订正：《云南光复纪要》“援黔篇”，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613页。

(3) 《贵州公报》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一号。

(4) “南方自不可误于和议之说，致懈战备。”孙中山：《复刘显世电》（1918年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页。

刘湘

黄道炫

刘湘（1890—1938），又名无勋，字甫澄，号玉宪，一级陆军上将。1890年7月1日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祖父刘公敬，系前清武举。父亲刘文刚屡试未第，经营贩谷生意。母亲乐氏，生有三子，刘湘居长。

刘湘早年就读于私塾、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弁目队、四川陆军讲习所、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夏，到建成不久的新军三十三混成协六十五标见习。1910年春，刘湘被保送到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1911年，调任第十七镇六十八标一营前队排长。不久，刘随队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

辛亥革命爆发后，第十七镇改为第一镇，刘湘任第二标张邦本支队的少校差官，随部进驻川北。1912年，第一镇改编为川军第一师，刘湘升为第二营营长，率部驻泸州。1913年8月，国民党人、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等人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号召，在重庆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总司令部，决定兵分三路，围攻泸州。刘湘率部坚守，保住泸州。抵御讨袁军一役，刘湘作战有功，被提升为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调驻重庆。

1915年8月，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刘湘得到第一师师长周骏保荐，留任团长，并兼任铜梁、璧山、大足清乡分司令。是年冬，护国战争爆发，刘湘率部防守泸州。当护国军迫近小市和五峰顶时，他奉命率领本团为先锋，在北洋军猛烈炮火掩护下，突过长江，反攻兰田坝，挫败蔡锷统率的护国军，受到袁世凯嘉奖，授三等嘉禾章。1916年5月，陈宦倒戈反袁，周骏督理四川军务，刘湘被任为陆军第十五

师步兵第二十九旅旅长，阻止护国军援助陈宦。刘湘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不愿与护国军硬战，主动放弃泸州。护国军攻占成都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委任刘湘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此时，四川群雄并起，省内省外势力盘根错节。刘湘利用川军与滇黔军的矛盾，带头挑起纷争。1918年1月，四川靖国战争爆发，刘湘所在的第一师支持刘存厚部，与滇黔靖国军激战于内江，靖国军大胜，占领成都。刘湘见形势不利，又立即倒向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任川军第一师师长。6月整军后，刘湘改任第二师师长，辖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七县，取得生存发展的地盘。

靖国战争后，滇黔军与四川督军熊克武的矛盾激化，熊与四川省长杨庶堪也因权力之争，互不相让。刘湘手握重兵，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杨庶堪亲赴合川，许以川军总司令职，邀刘湘倒熊。刘湘看重杨的声望，答应支持杨倒熊。熊克武派人争取刘湘，承诺让刘统率、团结川军，对付客军，刘湘也答应拥熊。刘湘周旋各方，两面得利，一方面将所部旅长廖廉与黔军勾结的情况密报熊；一方面请滇军第二军参谋长杨森协助接收廖部，巩固内部。既与投靠滇系唐继尧的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结盟倒熊，领取倒熊经费，听候唐继尧的命令；又暗中向熊输诚，获得大批经费和子弹。

1920年4月，唐继尧通电讨伐熊克武，任刘湘为川军副总司令。刘湘权衡形势，决定拥熊讨唐，任第二军军长、讨唐北路军总司令，奉令进攻重庆方面的黔军。刘湘出兵后，在合川遭遇败绩，被迫退守安岳，向熊克武建议联合第三军军长刘存厚驱唐，一则增强实力，二则防刘从中渔利。熊听从建议，与刘存厚结盟，共同推举刘湘为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8月下旬，刘湘指挥各军由阆中向三台地区进击，9月8日，攻占成都，随后在城郊击溃滇军主力，夺取了泸州、叙永等地，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攻占合川、铜梁、璧山、重庆，滇黔军败退贵州。此役，刘湘因指挥有方，功绩卓著，在川军中威望大振。

川军对滇黔军之战胜利后，熊克武与刘存厚之间围绕着对四川的控制权又发生激烈冲突。北洋政府委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则在重庆恢复广州军政府委任的四川督军职。在熊、刘之争中，刘湘支持熊克武，力主四川自治。1921年1月，刘湘联合川军将领发出通电，宣布四川自治。2月，刘存厚被逐出成都。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刘湘被推选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四川省省长。7月2日刘在重庆就职。此时，湖北地方军队图谋趁直奉战争之机，驱逐直系军阀，实行自治。鄂军总司令李书城、鄂西总司令潘正道电请川军支援。陕西督军陈树藩也电请川军阻止新任督军阎相文入陕。四川各军代表在重庆开会决定请刘湘带兵进攻湖北，熊克武带兵进攻陕西，而以杨森代理总司令，刘成勋代理省长。因直奉战争很快结束，直系大军南下，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川军出兵计划落空。

驱唐逐刘之役，刘湘均发挥重要作用，实力膨胀，声望大增，引起熊克武等人的警觉。加上刘湘图谋用整军手段控制第一军，遭川军多数将领反对。熊克武、但懋辛暗中策划刘湘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刘，被刘湘觉察，未获成功。随后，熊克武联合但懋辛的第一军、刘成勋的第三军及刘存厚旧属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刘斌等组织“同盟军”对抗刘湘的第二军。1922年5月14日，刘湘见形势不利，通电辞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职位，暗中积极准备战争。8月，刘湘的第二军被第一军和省联军打败，退向川鄂边境。刘湘回到大邑县安仁镇老家隐居，刘成勋被推举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

1923年春，第七师师长陈国栋、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等部起兵倒刘成勋。在吴佩孚支持下，杨森率领驻鄂西的第二军残部回四川，与刘存厚、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人通电讨伐熊克武、但懋辛。刘湘抓住时机集结旧部，联络各方势力，推动攻熊的战争。7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清乡督办。30日，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唐式遵、潘文华、陈洪范等川军将领联名推举刘湘为四川善后

督办，而熊克武也就任孙中山委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10月中旬，战争发动，邓锡侯、杨森、刘湘等部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发起全面进攻。初始刘湘部遭遇不利，放弃重庆，退往万县集结。随后刘湘一方面策动熊部刘成勋、赖心辉反熊，壮大反熊阵容；一方面组织反攻，攻占重庆，取得战场主动。1924年7月，杨森攻占熊总司令部所在地潼川城，熊克武势力被逐出川。1925年2月7日，段祺瑞任命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川军，杨森为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赖心辉取代邓锡侯任省长，刘文辉取代田颂尧任帮办，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四川形成多头共治局面。

倒熊成功，作为四川两强的刘湘与杨森迅速成为对手。刘湘一方面对杨虚与委蛇，使杨毫无防范；另方面暗中多方奔走，联络反杨，与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形成反杨的“三刘一赖”联盟。4月，杨森发动对赖心辉、刘成勋的战争，意在武力统一四川。刘湘策动杨森部师长王缵绪倒杨，争取袁祖铭、邓锡侯组织川黔联军抗杨。10月，杨森兵败出川，刘湘获得大批武装和地盘。1926年1月，袁祖铭黔军占领重庆，向下川东推进。刘湘权衡利弊，又转而与杨森合作，共同对付滞川的黔军。3月30日，川黔军之战爆发，刘湘、杨森联手应战，迫使袁祖铭败退湖南，刘湘占据重庆，杨森取得江北及下川东的二十四县。

北伐战争打响后，刘湘见北伐军进展迅猛，发表通电讨伐吴佩孚，拥护国民政府。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派人到南昌谒见蒋介石，表示拥戴。11月蒋委任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指定刘湘为主席。1927年2月，刘湘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迁都之争中，刘湘坚定支持蒋介石，参与蒋的反共行动。1927年3月底，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准备在重庆发动群众举行反帝大会以及示威游行。29日，刘湘召集其主要将领和亲信密商、策划镇压行动。31日，大会刚一开始，便遭到刘湘指派的王陵基、兰文彬的镇压，造成“三三一”惨案，大会主席漆南薰遭杀

害。随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人杨闇公等人也被捕遇害。

1927年5月初，蒋介石南京政府委任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进攻武汉。杨森率部与唐生智部在仙桃激战，遭遇大败，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杨森仓皇返川，准备退回万县，此时刘湘却乘杨森溃败之机，派兵进驻万县，欲将杨拒于夔门之外。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部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部的进袭。11月，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1928年1月，刘湘策动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四部倒杨”。4月底，蒋介石电示：川事全托刘湘，对杨森无主张，听凭刘处置。5月，刘湘支持倒杨军与杨森在开江任市铺附近决战，遭遇败绩。刘湘因未公开露面，不但未遭损失，反而借机接收战败的范绍曾师全部武装和江北一线防地。

随着自身势力不断壮大，刘湘开始谋划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人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下川东之战。刘湘处境不利，决定以政治、经济手段分化瓦解同盟军，以共同分割四川为诱

饵，引诱刘文辉合作。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击败孤军突进的罗泽洲部，接着大败杨森，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溃散后，刘湘、刘文辉成为四川最大的两支军阀武装。到1932年，刘湘据重庆及下川东二十八个县，控制夔门天险，扼长江咽喉，拥兵十万以上，加上结盟各军，总兵力达二十余万，政治上得到蒋介石支持。刘文辉防区遍及川康八十一县，多为富庶之区，拥兵十二万左右。四川呈现二刘对峙的局面。1931年夏，二刘谈判合作，但无结果，双方加紧备战，争取同盟。

1932年10月，刘湘发动对刘文辉的战争，被推举为川康绥靖总司令兼第四路总指挥，大部分川军将领都站在刘湘一边，通电讨伐刘文辉。10月1日，驻武胜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向南充刘文辉部防地进攻，川北之战爆发。10月上中旬，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杨森、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兵一部投入川北战场，同刘文辉第二十四军作战。第二十四军分兵应战，陷于被动。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刘湘军克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岩江、隆昌等地，刘文辉被迫收缩防线，全力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11月上旬，刘湘第二十一军和李、罗、杨三部在空军配合下，向内江、资中进攻，在泸县激烈争夺，激战半月，双方屡进屡退，伤亡均重。11月18日，联军突破沱江防线。22日，刘湘进占泸县。12月上旬，双方投入十余万大军，在荣县、威远地区决战，战斗历时十一天，刘湘军全线失利。此时，邓锡侯、田颂尧出兵进攻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川西地区。刘文辉腹背受敌，不得不停止进攻。12月2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刘湘控制川北、上川东、下川南等地区的三十多个县，收编了三个旅。

刘文辉失败后，将原因归咎于邓锡侯的背信弃义，集中十一万兵力的大部攻打邓锡侯部。1933年5月，刘文辉与邓锡侯在毗河决战。邓锡侯调集所部近三十个团，约四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刘文辉部攻

击逾月，伤亡数千人，无进展。刘湘乘机联合杨森、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川军将领，于7月发动安川战役，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刘文辉溃败，带残部退往雅安。9月中旬，二刘联合通电停战，二刘大战以刘湘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二刘之战结束后，刘湘开始集中全力对付川北的红四方面军。10月，刘湘将川军主力编为六路，围攻川北的红四方面军，被红军击败，损失惨重。1934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刘湘实行北守南拒的策略，北堵红四方面军南下、南守川黔边境，阻止中央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达到送走红军、避免消耗自身实力以及确保四川地盘的目的。

1934年12月，南京政府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确定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将省政府移往重庆，着手统一四川。1935年2月，刘湘通电就任省政府主席，要求各地方势力将防区内政权交给省政府，川军将领为形势所逼，纷纷交出防区，拥护统一，军队各自为政导致政局混乱的四川防区制被取消，四川省政基本实现统一。为加强省政府集权，刘湘严拒蒋系人员、川军系人员进入省政府，努力培植基层政权骨干，取缔哥老会，推行保甲制，实行联保连坐，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刘湘控制四川，正值蒋介石乘追剿红军之机，将势力向西南地区扩展之时。围绕着对四川的控制权，刘、蒋之间发生冲突。蒋极力要插手四川，派康泽的别动队入川，南京人员深入到川军军、师一级任政训工作人员，地方专区、县也分派人从事政训工作。1935年8月开办峨眉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刘湘为副团长，轮训川、滇、黔诸省军官上校以上、文职干部县长以上人员。为对抗南京中央的渗透，刘湘扩大军中原有的“武德学友会”，并成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作为团结、考核、控制军队的工具。同时广泛联络各地反蒋势力，与各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甚至想利用中共和红军对付蒋。中共党员黄子谷、张曙时在成都办报，刘湘每月给予400

元经费补助。刘湘派代表赴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商议合作事宜。派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桂系签订《川、桂、红协定》，约定反蒋抗日联共。又派绥署顾问王干青赴延安，商谈联合抗日事宜。1936年8月24日，“大川饭店事件”发生，成都人民打死打伤到成都考察设立领事馆的日本人，事后蒋介石指责刘湘防范不力，刘湘则反诘是中央人员领导。蒋、刘矛盾激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正在大邑养病的刘湘紧急赶回成都，商议应变之策。四川毗邻陕西，地位重要，西安和南京方面对刘都极力拉拢。12月17日，南京方面任命其为川康绥靖主任。作为对南京方面的回应，19日，刘湘通电主张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并希望恢复蒋介石的自由。私下刘湘则与西安方面电报往还，表达支持和同情张、杨的立场。

1937年春，蒋介石提出“川康整军”方案，6月任命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刘湘直辖的九十六个团被缩编为六十个团和二十四个保安团。“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湘电请抗战，被任命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他将川军编成两个纵队，出川抗日。10月15日，南京政府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两支川军被划拨到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分别在河南、山西作战，在河南作战的川军参加了保卫南京的外围战。刘湘认为川军应统一作战。11月12日，刘湘抱病抵达南京，向蒋陈述自己的主张，未获同意。因病情恶化，11月28日刘湘被送往汉口就医。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国民政府为刘湘举行国葬。蒋介石挽曰：“板荡认坚贞，心力竭时期尽瘁；鼓鼙思将帅，封疆危日见才难。”

主要参考资料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乔诚、杨续云：《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周开庆：《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年编印。

沈默士：《刘湘统一四川内幕》，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8年编印。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刘湘个人档，台北“国史馆”藏。

刘湛恩

陈敏

刘湛恩，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山区的一户贫苦农家。六岁时，其父贫病交迫去世。族人逼嫁遗孀，其母被迫带领他和尚在襁褓的妹妹，弃家步行百里，逃到举目无亲的汉阳，进汉阳医院当佣工。刘湛恩挎篮沿街叫卖烧饼油条，贴补家用。由于他母亲心灵手巧，在医院勤劳苦干，努力学习文化和护理技术，逐步从杂役升为护士而护士长，刘湛恩得以有上学的机会。

刘湛恩十二岁时从汉阳小学跳级到九江同文书院学习。五年后毕业，被保送进苏州东吴大学。1915年，刘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并获得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他于横渡重洋之际，心潮澎湃，反复思索国家民族的富强之道，并与关心国事的同伴讨论。他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认为救国首先要发展国民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抵美后，他放弃学医，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1918年毕业后，又进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院继续深造 (1) 。

刘湛恩在美留学期间，经常打零工，以维持日常开支。由于他自幼惯于艰苦劳动，不论打字或当家庭教师、佣工、饭店侍役，乃至农场季节工、洗衣擦鞋、修枝刈草，均不以为苦。他借在唐人街做工的机会，深入华侨社会，结交华侨朋友。他还积极参加留美学生运动，团结中国留学生进行爱国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和会上进行交易，竟将德国非法强占我国胶东半岛的权益转归日本。巴黎和会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华盛顿对公众发表演说，宣扬会议的成就和美国的“公正无私”立场。刘湛恩在人群中振臂用英语厉声责问：“我们的山东省怎样啦？”“我们决不同意！”他严正激烈的爱国行为，遭到美方特工人员的嫉恨，以致被捕。后经中国留学生及侨

胞联名抗议，始获释放。

1922年，刘湛恩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次年到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总干事，同时还在几个大学兼课。他鼓吹“教育救国”、“公民教育”，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2)]，提倡举办职业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并任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内，中国师生集会升半旗以示哀悼，美籍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竟当众撕毁中国国旗，全校爱国师生愤而退出该校，自行组织光华大学。刘湛恩虽身为基督教青年会领导成员，却毅然不顾教会的反对和阻挠，积极协助建校，并担任光华大学校董兼教授。

全国人民爱国运动不可遏止，迫使各教会学校不得不改革体制，调换外籍校长。1928年，三十二岁的刘湛恩接受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F．J．White），担任该校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刘就任后，立即对这所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宗教气息浓郁的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他竭力削弱宗教对学校的影响，强调教学工作的独立性，避免教会对教学的干预，改革陈旧的规章制度。他减少宗教课程，并改为选修课，且不计学分。每星期日的礼拜活动，亦改为自愿参加。他聘请涂羽卿、余日宣、徐作和、蔡尚思等专家学者任教。还增设了许多新的专业课程，如商科的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等专业；所设生物系，与协和医学院挂钩，协和承认沪江的学分，学生在沪江读几年后经考核及格，就可进协和医学院学习，实际上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刘湛恩多次出国考察、募款，在沪北扩建校舍，购置了第一流的实验仪器设备。当时沪江大学的经济大权仍掌握在代表教会利益的美国人手中，刘经常为学校购置设备等问题上与美籍财会人员力争。

刘湛恩认为学校不应专为中上层人士的子弟服务，也应面向贫寒子弟。他在沪江大学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助学金的名额，并大力提倡半工半读，以帮助家境贫困但学习勤奋的学生修完学业。有的学生因参加爱国民主活动，校方企图以不让毕业来阻挠。刘湛恩与校方进行说理斗争，保证这些爱国学生得以毕业。个别学生寒假期间因路费困难无法回家，他让学生住在自己家中。他还非常关心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为他们介绍工作。

刘湛恩特别重视课堂学习和实际工作的结合，注意加强商科各专业与上海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的联系，并建立自幼稚园到高中一整套教学实验体系，于杨树浦附近工厂区和农村设立社会服务和调查中心，以便于学生接触实际和进行社会调查。他力排众议，在接近上海市区商业中心的圆明园路创办“城中区商学院”。不久，又将杨树浦校本部的商学院迁并于城中区 (3) 。商学院除大学本科四个系外，并为在职青年设置大学专修科、普通科和单科训练的特科；还为照顾在职青年学生和兼课教师时间上的冲突，充分利用夜间业余时间授课。这种打破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的创举，实为以后我国夜大的发端。由于这些改革，沪江大学在当时私立大学中以学风纯朴闻名，较少教会气，更多中国化 (4) 。尤以商科和化学系，在教学水平上居上海各大学之首。

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的建立，受到在职青年的欢迎，入学人数迅速增加，第二学期即达五百多名，占沪江大学全校学生半数以上，超过了校本部。上海工商界徐寄廎、刘鸿生、吴蕴初、王志莘等著名人士也给予赞助和支持。他们捐资充作基金，提供师资、教材，鼓励自己企业中的青年职工报考，并设置奖学金。商学院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企业管理和财会人才，也扩大了沪江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在校内外各种讲坛上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在欧美各国和南洋各地揭露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径，呼吁侨胞团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

斗争。刘的演讲慷慨激昂，感人至深，在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刘还邀请力主抗日的冯玉祥以及陶行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沪江大学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等活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校本部并入城中区商学院，与东吴、圣约翰大学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刘湛恩除主持联大校政外，还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被全市人民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他广泛联系在沪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记者、作家，发起组织“国际联欢社”，积极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他主持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员以及困居于租界的难民救济工作。他还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负责安顿平、津等地流亡来沪学生的食宿。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暴徒横行无忌，暗杀、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刘湛恩置一己安危于度外，日夜为抗日工作而奔忙。翌年春，日伪酝酿在南京组织傀儡政权，汉奸温宗尧在准备粉墨登场之时，妄图拉刘湛恩落水担任伪教育部长。刘严词拒绝，并晓以大义，劝温悬崖勒马。他还一再劝阻另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重晚节，万勿事敌。刘的抗日爱国言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刘曾多次接到谩骂和威胁恫吓的电话和信件；住所周围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并被投掷手榴弹。他还收到一筐注入毒药的水果。这时，不少友人劝他离沪暂避，但他表示留在上海的抗日协会负责人已所剩无几，沪江大学行政也必须有人主持，决不能临危退离。他曾对他夫人刘王立明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如能带领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5)

1938年4月7日晨8时半，刘湛恩携子出门，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候车去圆明园路学校时，突遭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即牺牲。刘湛恩为国捐躯的噩耗传出，各界震惊。特别是在上海知识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数千人

不顾日伪威胁，毅然参加送葬，形成对日伪暴行的一次有力的抗议示威[6]。

---

(1) 《时人汇志·刘湛恩》，《国闻周报》第10卷第20期。

(2) 杜威，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教育学家。他的教育理论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学方法的原理是“从做中学”，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1919-1921年间曾来中国，他的学说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在中国有一定影响。

(3) 刘王立明：《沪江大学始末简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4) 徐铸成：《刘氏三杰》，香港《大公报》北美航空版1980年11月9日。

(5) 刘光华：《前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抗日殉难》，香港《新晚报》1981年11月20日。

(6) 《译报》1938年4月8日；《我的母亲刘王立明》，《人物》杂志1981年第6期；《国民政府公报》海字第42号。

刘镇华

林炯如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清末附生，后在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府法政专门学堂监狱科学习，毕业后，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的庶务长。辛亥革命时，他以河南省视学的身份奔走豫西一带，参加反清活动，结识了许多豫西地方帮会头目和所谓“游侠之士”。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陕西响应，成立了军政府。清政府派毅军赵倜部向潼关进攻。陕西军政府派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伯英）与清军在陕豫边境交战，刘镇华率领豫西一带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参加了张钫的秦陇复汉军。初任大都督府书记官，办理文案，后来升任参议，担任对外交涉事宜。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鉴于军队太多，系统复杂，地方财力不堪负担，同时认为清朝既已推翻，革命已经成功，用不着这么多的军队，因此决定裁兵减政。张钫部队需要裁减三四千人，他们多是豫西一带人，如果不给出路，势必影响到地方的治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陕西军政府就把裁减下来的这些人改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分驻豫西二十二个县，这一地区靠近嵩山，所以命名为镇嵩军。刘镇华和这些部队有历史渊源，张钫向袁世凯保荐他为豫西观察使（后改道尹），兼镇嵩军的统领。部队编为三个标，一个炮兵营，全部共计三千余人。刘镇华竭力整饬和扩充部队，加强实力，不久就成了一个小的军事集团，称霸豫西。

刘镇华善于投机钻营，谁的力量大他就投靠谁。当时袁世凯权重势大，他就竭力巴结袁。“二次革命”时，黄兴派杨体锐前往豫陕联络

民党，策划反袁。杨带了黄兴致刘镇华和张钫等人的信件，先见刘镇华，投交了信件，然后转往陕西。刘镇华竟派人赶到灵宝杀了杨体锐，把杨带给张钫等人的信件拿来向袁世凯告密，从而取得袁的信任。袁世凯败亡之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依附皖系军阀。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陕西国民党人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建立了靖国军，与安福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相对抗。1918年2月，靖国军围攻西安，陈树藩岌岌可危，急电刘镇华入陕相助。刘接到告急电后按兵不动，复电说豫西部队入陕是师出无名，暗示要有交换条件。陈知其意，表示可以把陕西省长位置让给他。刘镇华这才率部经潼关入陕，解西安之围。3月23日刘被任命为省长。不久段祺瑞政府又调动八省的军队到陕西，向靖国军发动攻击，使陕西长期陷入混战状态。刘镇华就在这连年混战中，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扩大个人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了皖系段祺瑞。曹、吴为了扩大直系势力，派遣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率部入陕，驱逐皖系残余势力陈树藩。刘镇华感到他的省长地位很不牢靠，一面对陈树藩虚与委蛇，表示支持；另一面又派人与阎相文接洽，表示愿意协助直军解决陈树藩的残余势力，为阎进陕扫清道路。在刘镇华的协助下，直军迅速占领了西安，陈树藩被赶下了台。刘镇华不但保住了省长地位，而且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军队。

阎相文当陕西督军不久即服毒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继任督军。刘镇华为了取得冯的信任，在冯面前尽力逢迎阿谀。如冯标榜艰苦朴素，刘也穿起布衣布鞋，一早就起来跟着部队上操。冯信仰基督教，刘就经常出入礼拜堂，甚至邀请一些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到他的部队讲话，因而逐渐获得冯的好感和信任，两个人成为互换兰谱的结拜兄弟。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曹锟、吴佩孚之命，率军赴豫与赵倜作战，把督军的职务交给刘镇华。从此刘镇华成为陕西督军兼省长，集军权、政权于一身。

刘镇华掌握陕西省军政大权后，搜刮民脂民膏，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除了把镇嵩军扩编为三个师外，又把其他杂牌队伍和靖国军残部编为六路镇嵩军及陕西部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刘镇华认为又是一个发展机会，即派第二师张治公部出陕对奉军作战，同时派憨玉琨为剿匪总司令驻潼关。憨玉琨就以潼关为中心，把势力伸展到河南陕州，待机而动。不料直奉战争一开始，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失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一、二、三军，拥皖系头子段祺瑞为执政。段任执政后即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率领国民第二军进攻河南。吴佩孚战败，由海道绕回洛阳，企图凭借控制在直系军阀手中的豫、鄂、苏、陕四省力量东山再起。刘镇华鉴于上述情况，指示憨玉琨“冯、胡要讨，段可捧，吴不能背”。憨玉琨颇感为难，认为“捧段就是背吴，讨冯、胡就不能捧段”。憨与幕僚一起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认为吴佩孚大势已去，决不能为吴出力。于是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佯令军队开赴郑州，突在洛阳下车，逼走吴佩孚，占据洛阳。刘镇华也通电拥护段祺瑞，表示与国民军合作。憨玉琨占领洛阳后，因争夺河南地盘，与胡景翼发生尖锐矛盾，1925年4月初爆发了胡、憨战争。打了半个月，憨玉琨所收的杂牌军发生内变，形势极为不利。刘镇华为支援憨玉琨，就把陕西督军职务交给陕西军务帮办吴新田，以出巡为名，亲到洛阳督战。经过几次激烈战斗，战事很快以刘、憨失败而结束。憨玉琨服毒自杀，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运城，投靠阎锡山，充当阎锡山反对国民军的工具。

1925年秋，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北方国民军，刘镇华通过阎锡山向张作霖、吴佩孚疏通，又回到了直系。吴佩孚给他以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名义，让他去新安重整旗鼓。刘镇华招集散在各地的镇嵩军旧部、土匪、红枪会、大刀会，很快编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大军，以阎锡山供给的枪支和弹药把这些乌合之众装备起来。此时，岳维峻率领的国民二军在河南受到直奉联军的攻击，退往陕西。经过豫西的时候，被刘镇华打得大败，岳维峻只身逃往山西。与此同

时，出关支援岳维峻的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和国民二军驻在洛阳的师长田玉洁也被刘镇华打垮。在此形势下，刘镇华派柴云升为前敌总指挥，乘胜西入潼关，演出了围攻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惨剧。

1926年4月初，刘镇华部兵临西安城下。守城部队是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所属第十师的一部分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兵力不到五千人。4月16日，国民军第三师杨虎城部进城，城内部队合计也不足一万人，而刘镇华包围西安的兵力约七万人，双方力量悬殊。5月中旬以后，西安与外县一切联系均被切断，成为孤城。

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县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即日率师援陕，策应当时正在两湖和江西等省胜利发展的北伐战争。冯派遣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等部经平凉东下。10月初，前锋到达陕西兴平。于右任也于10月12日随军到三原，组国民军第一、二、三联军总司令部。10月15日，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西军开始向刘镇华占领的咸阳地区发动总攻。经过四十余日的激烈战斗，到11月27日晚，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受到援陕军的抄袭和城内守军的袭击，被迫撤围，沿着西安至潼关大道向东溃退。途中又受到民间武装的袭击。刘镇华一气退到河南的陕州，才着手收容残部，分别驻在陕州、灵宝一带，从事休整。

1927年2月，冯玉祥到达西安，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整顿部队，准备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此时，刘镇华眼看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得一蹶不振，奉军已到郑州，于是又脱离直系，改投奉军。及至奉军也节节败退，刘镇华又决定脱离奉系，通过张钫的关系投向冯玉祥。1927年夏，刘到开封见冯，又施展其逢迎拍马的本领，对冯部将领大肆拉拢。

刘镇华投归冯玉祥后，冯把刘部编为第八方面军，归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指挥，驻开封以东的柳河。蒋、冯、阎联合进攻张作霖的所

谓北伐胜利后，刘部改驻杨村。当时蒋介石采取联阎制冯的策略，把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划给阎锡山。刘的驻地成为阎的势力范围。为了削弱冯的力量，蒋又把第八方面军改为第十一路军，序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实际上归阎锡山指挥。不久阎、冯酝酿联合反蒋，刘镇华采取观望态度。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刘镇华有意避开，出国游历，先到日本，后到德国。当时刘部尚有两个师，师长是万选才和刘茂恩（刘镇华的胞弟）。刘镇华临走时，把十一路军总指挥的职务让给刘茂恩，万选才对此甚为愤慨。蒋介石乘势拉拢万选才，任他为河南省主席，以加深刘、万之间的矛盾，并扩大刘茂恩对阎、冯的距离。当豫东战事激烈展开时，刘茂恩诱捕万选才，把他献给蒋介石，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刘茂恩这一举动，使阎、冯在军事上受到重大的打击。

刘镇华在柏林得知刘茂恩投靠蒋介石的消息后马上回国。抵达上海时，受到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的隆重招待。刘到南京后，蒋介石即发表他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驻新乡，军队分布在怀庆、卫辉各县，以防备阎锡山南进。

1932年，蒋介石对豫鄂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刘镇华被调任为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移驻南阳。1933年5月，刘镇华通过政学系杨永泰的关系，当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蒋又任命他为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到河南潢川就职，充当蒋介石反共的工具。

1934年秋，方志敏率领的红军抗日先遣队由赣东北苏区北上，进入浙西、皖南，震动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杭州一带。蒋介石赶忙纠集了在赣、浙、皖、闽边区的军队进行阻击，刘镇华也率其主力部队第十五军和安徽的保安团队进驻皖南屯溪。他深怕红军入皖，大肆构筑碉堡，加强封锁，严密保甲组织，进行政治控制，竭力与红军为敌。方志敏被俘后，刘镇华的军队由刘茂恩率领沿江入川，追击红军。

1936年10月，刘镇华神经失常。1937年5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刘尚清接任省主席，刘镇华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镇华与家人一起前往台湾，1952年3月死于台湾。

主要参考资料

米暂沉：《刘镇华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8页。

马浚甫：《我所知道的刘镇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1年重印本。

文直公：《最近卅年中国军事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版。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78年版。

刘震寰

韦瑞霖

刘震寰，原名瑞延，字显臣，广西柳州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其父是柳州郊区基隆村世绅，在柳州谷埠街又置有大量房产。刘震寰是独生子，父早故，受母钟爱，童年延师来家课读近十年。

1906年刘震寰考入马邑两等小学堂高级班，1909年毕业后去桂林考入广西优级师范学堂。他年幼时喜听太平天国故事，爱读侠义小说和《水浒传》，因其家财富庶，平日慷慨好客，交友甚广，常以及时雨宋江自诩。他的堂叔刘古香是晚清举人，毕业于广东将弁学堂，加入同盟会后于1907年回柳州，以办学为名进行革命活动，翌年在柳城太平圩武装起义失败，潜往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刘震寰仰慕刘古香，1911年初去广州，经刘古香介绍加入同盟会。旋奉命回柳州组织革命武装，变卖田产作为革命活动经费，秘密策动绿林中沈鸿英、陶四、曾超庭、蓝八等武装共二百余人参加革命。

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群情振奋，同盟会柳州支部长王冠三和刘震寰等人即调沈鸿英等人进攻柳州。在柳州的柳庆镇分统、帮统、管带等人，经过同盟会员的策动，愿意反正。11月9日，王冠三、刘震寰等人率领革命武装冲入柳州各军政机关，柳庆镇总兵、柳江道台、柳州知府、马平知县等官员不敢抵抗，柳州便宣告独立，刘震寰被众人推为民军支队司令。刘和王冠三等人电请在广东都督府任秘书长的刘古香回柳州主持军政事宜。1912年元旦刘古香回到柳州，任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兼统领，任刘震寰为帮统，负责编练民军。刘将民军整编为八个队，推荐沈鸿英、曾超廷为督带，李天民、蓝八、陶二为管带，韩彩风等人为教官，严兆丰为总教练。

1912年2月，陆荣廷任广西都督，3月1日下令取消军政分府，刘古香只任广西陆军第五统领，专管军事，驻扎柳州，刘震寰任第五统领部帮统。他和刘古香认为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是绿林或行伍出身，又曾是废清官员，因此瞧不起他们，对陆荣廷发来的命令，多拒不执行，积之既久，矛盾日深。1913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时，广东都督陈炯明8月来电，约刘古香在柳州起义讨袁。刘古香召集哨官以上军官开会，刘震寰和参谋周毅夫等人主张立即起义，但府长王狮灵反对。刘古香见南京、江西、广东、安徽等省起义先后失利，久久迟疑不决。刘震寰年少气盛，于9月11日晚暗中指使刘古香之卫队长刘麻六实行兵谏，迫刘古香下令讨袁。刘古香不明究竟，越墙逃逸，刘震寰于翌日召集各级军官宣布讨袁，自称讨袁军总司令。其时驻桂林之师长陈炳焜早已布置大军在洛容，14日到达柳州南岸占领马鞍山等高地，炮击柳州。此时刘震寰的心腹沈鸿英突然叛变，引诱管带蓝八、陶二、曾超廷拥袁反刘，又软禁刘古香。15日，刘震寰见大势已去，仓促率领亲兵数十人逃去香港，柳州的“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刘逃到香港后，奉孙中山之命去南洋活动，旋回上海继续反袁。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陈炳焜等人在全国反袁护国声中亦通电讨袁，并出兵湖南和广东。留守南宁的陈炳焜，以同乡之谊函邀刘震寰捐弃旧嫌回广西共事，刘乃回到广西，受命招抚绿林和民军得三百多人，被委为游击副司令兼营长。1918年2月，刘震寰奉命率部去广东南路参加讨伐龙济光部，扩充武装至五百多人。嗣后刘回师驻平乐，诱杀作恶多端之李蚂蚏匪帮，甚得平乐人士好感。

1921年初，被孙中山部队逐回广西的陆荣廷不甘心失败，命陈炳焜等部驻梧州，企图再扰广东。陈炳焜派刘震寰率部驻梧州左侧背木双。刘原是同盟会员，对陆荣廷、陈炳焜有宿怨，乃暗中与粤军通款，引粤军至木双击梧州侧背。陈炳焜部措手不及，部队沿漓江、浔江逃去。刘震寰引粤军占领梧州后，通电斥责陆荣廷统治广西的种种暴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刘反正有功，委刘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

长，命他率部沿漓江追击陈炳焜。刘震寰在平乐、桂林、柳州等处收编陈炳焜残部，拥有武装九千余人，扩编两个旅四个团三个游击队。这时广西局势很乱，陆荣廷残部林俊廷、刘日福、蒙仁潜、陆福祥、陆云高、韩彩凤、李白云等人各有武装一二千至五六千，自称自治军司令，分别盘踞桂西南山区，与粤军战斗不息。同时，土匪蜂起，打架劫舍，鸡犬不宁。而陈炯明统率之粤军到达桂南、桂西地区，又军纪很坏，掳掠民财，奸淫妇女，焚烧房屋。凡受粤军祸害者都迁怒刘震寰，斥责他不该引粤军入桂。陆荣廷残部则乘机咒骂刘震寰是“反骨仔”、“吴三桂第二”。

是年9月，陈炯明委刘震寰为广西清乡督办。刘率部追击陆荣廷残部，在隆山、都安、河池等地激战后占驻河池。不久孙中山到达桂林设大本营筹谋北伐，但唐继尧以重金收买准备北伐的驻桂滇军，返回云南为他夺取政权。孙中山电令刘震寰在河池阻止滇军回滇，但刘违背孙中山命令放纵滇军回滇，还赠银洋三十万元给唐继尧。

孙中山迫于形势，率师回粤，指挥北伐军向韶关前进。陈炯明调在桂西南之粤军回粤，电令刘震寰率部开驻南宁。1922年5月，刘率部到南宁，但难以抵御陆荣廷旧部陆福样、蒙仁潜、陆云高等“自治军”之进攻，率部经钦州、合浦、化县、信宜至藤县驻扎。

6月，陈炯明在广州公开叛变，孙中山派员策动驻粤桂边境之桂军刘震寰、沈鸿英和滇军杨希闵等部入粤讨伐陈炯明，12月分别委任沈鸿英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1923年1月上旬，讨贼军大举东下，势如破竹，陈炯明叛军纷纷败退，逃往惠州。于1月16日，三支讨贼军进占广州，刘震寰部占领广九车站、大沙头、东堤一带。他在所占地域把持税收，开烟开赌，并大肆扩充队伍，从东下时的七千余人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先后扩编为四个师和一个警卫团。

由于沈鸿英部在广州军纪太坏，与魏邦平的卫戍司令部官兵常有

冲突，刘震寰、杨希闵徇魏邦平之请求，联名邀请驻广州各军师将领，于1月26日晚上在滇军杨如轩师驻地江防司令部开会，讨论维护军纪等问题。沈鸿英、杨希闵未到会，会议由刘震寰主持。魏邦平提议各军在防地禁赌，并将所占学校、商店腾出，以便开学和商人开铺经营。沈部军长刘达庆当场辱骂魏邦平，并拔枪射击，会场秩序大乱。刘震寰急与胡汉民、邹鲁逃往沙面日本领事署，将所部从广州撤出，开往石龙、东莞、虎门一带布防。杨希闵亦公开表示不与沈鸿英合作。沈鸿英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表示："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中山）、岑（春煊）二公迅速回粤主持。"并派员去上海迎孙中山来粤，将所部开往北江驻扎。2月21日，孙中山到达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但是，沈鸿英暗中与北京政府勾结，于3月21日受北京政府任命督理广东军务。4月16日，沈鸿英在新街通电就职，并派师长李易标率部袭击广州。18日，刘震寰奉命率部赶到广州，协同滇军、粤军猛攻沈军李易标部，继又率部北进，次第攻克源潭、琶江、韶关，解除沈军对广州的威胁。

这时，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图谋袭击广州，5月9日进犯石龙、东莞，广州告急。刘震寰被孙中山任命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率所部及中央直属第七军陈天泰、龙小凤两个旅及滇军范石生部讨伐，在石龙击退叛军，使之退入惠州城死守。6月初刘在飞鹅岭督战时枪伤左足。这时孙中山正酝酿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刘震寰对革命政策不满，故作战不力，围攻惠州五个月不下。9月，刘在前线患肠热症，乃回广州就医。

刘震寰所部军纪废弛，大开烟赌，祸害市民。刘又无止境地向大元帅府索饷索械，却不听孙中山命令。孙中山十分愤怒，12月曾召刘当面申斥，但刘始终不改。

1924年7月，广西李宗仁、黄绍竑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支持下，率"定桂讨贼联军"先后肃清陆荣廷残部，占领南宁及桂南地区。12月，孙中山大元帅特任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

1925年初，联军又消灭沈鸿英部，占领桂北地区。李宗仁、黄绍竑统治了广西全省。刘震寰早已垂涎广西军务督办和省长职位，于1925年2月秘密赴昆明面请唐继尧派兵入犯广西，商定先夺取广西，再联合进攻广东，推翻大元帅府，以组织以唐继尧为首的南方政府。唐继尧立即派五万大军侵犯广西，于2月25日进占南宁。但是刘震寰与唐继尧的阴谋已被大元帅府查悉，驻西江之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奉大元帅府命，坚决阻止刘震寰部通过西江回桂。5月12日，唐继尧在昆明以副元帅名义委任刘震寰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刘即准备率部从北江入桂，又被驻北江之滇军军长朱培德奉大元帅府命加以阻止。这时刘震寰得悉侵入广西的滇军已被李宗仁、黄绍竑击溃，被迫放弃回桂夺权的计划。

刘震寰嗣后又在广州与杨希闵联盟，四处勾结在香港的英国当局、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东江叛军陈炯明、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不幸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刘震寰与杨希闵在广州更加跋扈。5月中旬，刘震寰与杨希闵在香港召开会议，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邓本殷、陈廉伯和香港英当局均派有代表参加，共同商讨叛乱计划。会后，刘、杨密令东征围攻惠州的部队撤回广州，于5月20日向驻在广州的李福林、吴铁城等部进攻，夺取狗头山、观音山等阵地。5月22日，刘、杨由香港到达广州，进一步部署进攻。6月5日，大元帅府宣布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罪行，下令免除二人职务，听候查办。刘震寰、杨希闵于6月9、10两日发动所部向广州大元帅府及所属军队进攻。11日，大元帅府命令粤军许崇智部和黄埔军校学生军向刘、杨叛军反攻，又发动广九、广三、粤汉等铁路工人拒绝为刘、杨叛军运兵运械，广东电力厂工人停止向刘、杨叛军地区发电。广州人民群众亦支援政府对刘、杨叛军坚决反击。刘、杨叛军纷纷弃械逃跑或缴械投降，仅一天时间便全部崩溃。刘震寰于12日挟带巨款乘小电轮逃到沙面，转乘外国轮船逃往香港。

刘震寰在香港吸鸦片、嗜嫖赌，挥霍数年，所携款项即全部花光。因与龙云有旧交，于1932年去云南，被聘为省政府顾问。他仍不改挥霍旧习，常向朋友请求接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震寰经龙云推荐，得挂名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其后，昆明成立中苏友协分会，龙云以刘震寰为会长。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在中苏友协广泛开展活动，设立图书馆陈列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经常举行演讲会、座谈会及各种活动。刘震寰与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罗隆基、李公朴、潘光旦等人有较多接触，在他们帮助下，刘曾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主张团结抗日，主张民主，主张联苏。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刘去做龙云的思想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地下党员将蒋介石迫害共产党的真相告知刘震寰，刘转告了龙云。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派戴笠、康泽来昆明压迫龙云反共，地下党员通过刘震寰去向龙云说云南没有共产党。龙云听刘震寰的话，把戴笠、康泽顶了回去。刘震寰主持中苏友协，开展一些进步活动，提高了他在昆明的政治地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派杜聿明在昆明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宣布免除龙云的云南省主席及本兼各职，迫龙去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在昆明一切依恃龙云的刘震寰，从此也站不住脚，便去香港居住。他在香港曾随顾孟馀、左舜生等人组织第三势力，写有《第三势力宗旨》小册子印发。但他在生活上仍难改旧习，1972年病故于香港。

主要参考资料

卜汉池：《桂军刘震寰的兴起及其覆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集》第15辑，1964年版。

莫雄：《“白马会盟”前后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集》第1辑，1961年版。

刘峙

颜平

刘峙，字经符，别号天岳，1892年6月30日（清光绪十八年六月初七）生，江西吉安人。父亲刘子善务农，在刘峙一岁时因农田用水与邻村恶霸发生争执被殴打致死。幼小的刘峙随母亲四处漂泊，寄人篱下，养成拘谨、畏缩及善于忍耐的性格。他七岁入塾，读书刻苦用功。十五岁到长沙，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第三期。1911年8月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堂第三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加入学生军守卫武昌，后来至南昌服役。1912年7月北上，进入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与同学秘密组织“辅仁社”反袁。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他曾请假南下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江西反袁斗争。

1914年6月，刘峙在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分至奉天新民府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七旅实习。12月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以“大智若愚”自律，与同学相处和睦。1916年5月毕业后，分配在冀东开平巡防营。旋即刘峙南下广东，在岑春煊的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后到滇军第四师七旅步兵三十八团任第六连连长，参加南路讨伐龙济光的战斗，继任援赣第四军第一梯团第四支队队副兼第一营营长。1920年秋，所部自闽回粤，翌年初他被陈炯明调至粤军总司令部任少校副官，加入了国民党；6月至粤军第二军任中校副官。继后刘峙任第七旅第十三团团副，参加反击桂系进攻广东之战。1922年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刘峙被任命为游击第一支队队长，作为北伐军先头部队入赣，直指吉安。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刘奉命率队回师，但遭沈鸿英部袭击，刘峙乃随许崇智粤军去闽，11月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兼卫队队长，后改任军事参议。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刘峙至军校任战术教官，旋调校本

部参谋处任科长。军校组建教导团，刘峙任教导一团第二营营长。他在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中建有战功，在1925年8月编组国民革命军时升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上校团长。在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后，刘峙于1926年2月升任第一军第二师副师长，不久升任师长。在“中山舰事件”中，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扣押了第二师及海军中的党代表和共产党员，同时派兵从黄埔乘舰在东堤登岸，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等机关，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及左派人士，对蒋极为效力。

1926年7月北伐战起，刘峙第二师为总预备队，跟随蒋介石入湘。9月参加攻武昌城不克，随即入赣，参加攻打永泰、樟树、丰城、南昌等战役。江西底定后，刘峙率师入浙，在桐庐击溃孙传芳军卢香亭部，于1927年2月进入杭州。刘率师继续北进，在松江一带击败毕庶澄部，攻克昆山、太仑、浏河，后驻防镇江、常熟。5月任第一路军第十三纵队指挥官，渡江北上，连克灌云、东海、涟水、淮阴。8月底刘峙参加龙潭战役，战后擢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率部移防上海。11月率部沿津浦线北上，越过临淮关，在长淮卫击溃孙传芳军，占领蚌埠。12月，刘峙又指挥第一军和顾祝同第九军一举攻克徐州。1928年初，刘升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辖第一军、缪培南第四军、顾祝同第九军、杨胜治第十军。4月，刘部会同各路大军北伐奉张，连克大汶口、界首、泰安，5月1日进占济南。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刘部乃奉命绕道北上至德州。北伐结束后部队缩编，刘峙改任第一师师长。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此后，刘峙在蒋介石与其他军事实力派系的争战中，一再被蒋派赴前线效命。1929年3月蒋桂战争起，任讨逆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辖顾祝同第二师、蒋鼎文第九师，溯江西上进攻武汉，奏捷后任武汉卫戍司令。不久刘又任编遣委员会直辖第二编遣分区主任，统

辖鄂境各部。1929年10月蒋冯战争起，刘统率顾祝同第一军与蒋鼎文第二军，编为第二路军，任总指挥，陈兵武汉，策应各路对冯军作战。年底在征讨唐生智、石友三的战争中，任前敌总指挥，率顾祝同第一军、蒋鼎文第二军、夏斗寅第十三军、杨虎城新编第十四师，沿平汉线北上向唐军猛攻、克确山、占驻马店、直逼漯河，迫唐军全部缴械。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军团总指挥，辖顾祝同第一军、王均第三军、叶开鑫第八军、陈诚第十一师、卫立煌第四十五师、熊式辉第五师、冯轶裴教导一师、张治中教导二师、杨杰第二炮兵集团、张砺生骑兵二师等，是蒋军精锐主力，在陇海线对阎锡山、冯玉祥两军主力作战。刘部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装备精良。初期冯、阎军进展迅速，蒋军伤亡甚众。蒋以重金收买豫籍将领刘茂恩之举，对战局产生很大影响。刘峙立即指挥第一军及教导二师由杞县、太康间突破冯军阵线，向开封挺进，但陷入冯军包围圈，死伤惨重。7月8日，刘峙任津浦路总指挥。他从陇海线调第三军等部占取亳州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乃将陈诚、冯轶裴、陈调元等部调至津浦线作战，于8月15日占领济南。9月初，刘指挥所部分向淮阴、周口进攻，顾祝同部直插郑州以南，在新郑围歼冯军七万余人。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和平息争”，指挥东北军入关，战局急转直下。刘峙任平汉线左翼军总指挥，率上官云相、刘茂恩、杨虎城等部于10月6日攻占郑州。刘峙所部在此次大战中伤亡重大，但最终算是胜利之师。11月，刘峙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主任。1931年7月，他又率部协同东北军对反蒋的石友三军加以南北夹击。接着，刘于1932年6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次“围剿”工农红军的中路军副司令官（蒋自兼司令官），指挥张钫、陈继承、马鸿逵、张印相、上官云相、卫立煌六个纵队计十六个师另两个旅的兵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受到蒋的嘉奖，后以刘的字命名新集为经符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峙于8月12日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驻防保定，指挥孙连仲、曾万钟、关麟徵等部防守平汉路沿线。9月中旬，日军第六、第四、第二十师团主力沿平汉

线两侧大举南犯，固安、琉璃河、涿州相继被占，24日保定沦陷。此后平汉线防守力量未得增援，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于10月间相继失陷。刘部一再溃退，最后刘峙把指挥权交给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悻悻回到开封。1938年3月刘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陆军第一区新兵督练公署主任，后调往宜昌，任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官。1939年春出任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1941年6月5日，日机分批连续轰炸重庆，市民涌入较场口公共防空隧道，防空司令部锁闭所有大门，又未打开通风设备，以致造成窒息惨案，死亡逾万人，刘峙被撤去防空司令职。直至1945年2月刘才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与中共进行和谈的同时，加紧准备内战，刘峙于1946年正月被派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管辖豫、陕两省及原第一、第五战区的部队。6月26日，他奉蒋介石命令，指挥三十万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进合击，进攻中原解放区。8月又调集十四个整编师分两路进攻冀鲁豫解放区。9月，赵锡田整编第三师进犯定陶、菏泽被歼，刘峙被陆军总司令部指责“指挥无方”而受撤职处分，后被蒋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赋闲在上海。直到1948年5月，刘峙被蒋任命为徐州“剿匪”总司令，统率八十万兵力，守卫以徐州为中心的东西陇海线，以阻解放军南下。9月底，刘峙与副司令杜聿明制订了一个佯攻济宁、收复济南的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批准。但此时杜聿明被蒋介石派往东北，刘峙即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杜聿明回来指挥，一直等了二十一天。11月6日，中原和华东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刘峙慌乱不知所措，急电南京告急。他先调部增防海州、连云港，两天后又决定集中兵力守卫徐州、放弃海州。接着他命令黄伯韬第七兵团向徐州集中，结果因行动迟缓而被阻困于碾庄地区。他又令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向徐州收缩。在蒋介石的督促下，他赴前线指挥邱清泉第二兵团与李弥兵团在大浒家会师以救黄伯韬兵团，但邱、李两兵团被解放军阻击而不能如期会合，而黄伯韬兵团于11月22日被围歼。25日，黄维

第十二兵团又被围困于双堆集附近。这时，蒋介石示意必要时可以放弃徐州，刘峙立即带领总部人员飞往蚌埠，而将徐州方面交杜聿明指挥。杜率邱、李、孙三个兵团奉蒋之命由徐州南下趋救黄维兵团，结果被围困于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刘峙只是乘坐飞机在上空下达命令、说打气话，直至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全歼。在整个战役中，刘峙指挥的队伍共被歼五十五万五千人。

战后，刘仅以“总统府”战略顾问之虚衔赋闲。1949年7月，刘由广州去九龙，1950年10月去印尼，1953年1月至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

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湾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刘峙：《我的回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

陈洲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1929年南京版。

周康经：《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7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淮海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刘子敬

徐凯希

刘子敬，原名义芳。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汉口。原籍山西。其祖父因家境贫寒，举家辗转来汉，经同乡荐引，在山西帮票号帮工。其父刘辅堂，曾设蒙馆授课，后入武昌圣公会仁济医院学医。不久，刘辅堂考入海关，任江汉关抄班。因结识俄籍洋员巴公，刘辅堂充任俄商新泰洋行采办茶叶的庄首，1894年升任买办，1901年改任俄商阜昌洋行买办。阜昌每年出口茶叶三十余万箱，居各洋行之首。1905年刘辅堂去世时已拥有资本二百万两，在汉口商界具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

刘子敬自幼在汉口读书，于夏口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读于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武昌文华书院。1906年，经阜昌洋行大班梯托夫提携，他继承父业，弃学充任阜昌洋行买办，成为外商在汉口扶植的第一个青年买办 (1) 。

汉口是清末国内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输出茶叶最多时每年达五百万担，价值一千余万两关税。作为汉口最大外商企业的买办，刘子敬从中分得的余利十分可观。每逢春茶上市，他从广昌和茶庄派出采买，携带巨款赴产区大量收茶，并于汉口增设协记茶行，专门从茶贩手中进货。茶贩来汉，通常先送货样到茶行作价。协记茶行为吸引货源，故意先将收价抬高，待客货送到，又暗将小样精选，剔出粗叶和茶末，然后提出大小样不符，要求茶贩按小样交货。茶贩被弄得莫名其妙，最后往往由经手人出面调停。茶贩除自认不是外，仍得依照小样货色比例减价成交，到付款时，除按“九八”扣佣外，还要按“九七六”扣现，卖方应得一百元茶叶价款，实落九十五元六角。

为了加强对经营活动的监督，刘子敬每日黎明即起，骑自行车到茶栈、砖茶厂等处巡视。稍有不满之处，轻则责斥，重则鞭笞。其经理室下设账房，任用大写、二写、三写数人，办理具体业务。另雇佣各类工头和监工，共计六十余人。接任阜昌洋行买办之初，刘子敬对其父生前所任老职工尚能优礼有加，虚心接受指正。但随着年龄增长，羽翼日见丰满，自满之情时常溢于言表。遇事苛求，对待所属非常刻薄。一次，广昌和总管戚受之将该庄当年采购茶叶所赚得利润二十九万两，开列清单，送刘核收，他不仅没有片言加以慰藉，反而质问为什么这样少。戚后又为茶庄职员分红事找刘，他竟呵斥道："我连收钱的工夫都没有，哪有时间分钱给他们！"[(2)] 戚只得鞠躬告退。

除充任阜昌洋行买办外，刘子敬同时兼任俄商道胜银行驻汉口买办，其弟刘端溪则为美商花旗银行和德商德太洋行买办。兄弟二人所获颇丰，到清末已有资本八百万两，成为长江流域的第一流大买办和茶业巨商，号称汉口"首富"。

1910年，湖北人民掀起拒款保路运动高潮，刘子敬以其雄厚财力参与其中，当选为湖北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董事[(3)]。武昌首义爆发，他倾向革命，与宋炜臣、韦紫封等人发起国民捐款，为革命军筹措军饷。汉口保卫战开始后，他与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会长王琴甫，会同革命党人李白贞组织红十字会[(4)]，出面与仁济、中西等医院联系，负责救护伤员，掩埋尸体。又组成临时野战医院，七十余日共收容伤病员一千余名，"所有医药用品均由同人捐助，不取公家一文，服务人员纯尽义务"[(5)]。刘为此被授予三等嘉禾章。

辛亥革命后，受到国际茶叶市场疲软的影响，刘子敬开始把资金投向工贸企业和房地产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其经营范围十分广泛。

1912年，刘子敬为调剂自办企业之间的资金周转以及活动银根，与人合办广大钱庄于汉口。一面吸收往来存款，同时利用道胜银行代

收中国盐税款项之便。由刘子敬出面，每月将二十万元左右的盐款存放广大钱庄，用以转贷市场，从中牟利。

同年6月，刘子敬通过对国内外蛋品市场前景的比较分析，感到国内蛋品来源充足，经营蛋品加工所需资金不多，有利可图。于是与德商礼和洋行蛋厂技工方山林合资，创办发华蛋厂于汉口两湖码头。当年即获厚利。为扩大经营规模，同年末，刘又独资开办发记蛋厂。1918年，他与王聘卿合开新华蛋厂于河南漯河。1919年，刘更独资创办颇具规模的郑州中华蛋厂，任命原广昌和茶庄总管戚受之为总经理。同年，在汉口成立中华制蛋公司，协调所属四个蛋厂的产销事宜，任命邱良荣为总经理。中华蛋厂每日分为两班生产，每班用工四百人，产品分为飞黄、炕白、水黄、含黄四种，日产四百篓。为采购蛋品，中华制蛋公司在北起新乡，南至信阳，西起灵宝，东至德州、徐州的广大地区，建立分庄八十余处。

从1912年起，刘子敬在武汉开始对房地产进行大规模投资。除拥有其父遗留下的辅堂里及鄱阳街豪华住宅外，他又陆续收购大小铺面房屋一百余栋以及相当数量的地皮。经过翻修改建，先后建成辅德里、辅仁里、辅义里、方正里等成片房产。适逢汉口市场受欧战影响呈现活跃，人口逐渐增加，市面房产供不应求，以致房租昂贵。刘家每月仅房租收入一项，即达三万余元。

1915年，刘子敬与王琴甫共同承租官办武昌白沙洲造纸厂。1919年，王因病无力顾及厂务，由刘子敬单独经营。因利润微薄，两年后即行停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纱、布市场因外货输入骤减，价格上扬。1919年，刘子敬与大棉商刘季五、刘逸行等人在武昌上新河创办震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刘子敬与刘氏兄弟各投资四十五万两，另招外股二十二万两，1922年5月开工，共有纱锭二万六千余枚，布机二百五十台，资本折合银元一百七十五万余元。以刘子敬为主任董事，

刘季五为总务董事兼理业务，刘逸行为专任董事兼理厂务。

1920年，刘子敬独资开设义隆公司，专营进出口业务，并代理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在汉埠的保险业务。不久，又创办汉口义隆油厂，用以配合义隆公司经营桐油出口业务。

刘毕业于教会学校，本人是基督教徒。由于财力雄厚，声名显赫，汉口各教堂竞相邀约他前去做礼拜，期望借助他的财力和声望来扩大影响。他曾担任汉口总商会第七届特别会董和第八届会董。为了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他以汉口华商跑马场董事长的身份，经常邀请包括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内的许多军政大员参观赛马。1913年，刘出资在汉口华清街创办辅德中学，自任校长[(6)]。该校依照武昌文华书院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尤其注重英语教学，被称作是“中国人办的洋学堂”。1914年，刘又在硚口开办惠民高等小学，专门招收平民子弟。同年，汉口红十字会成立，刘子敬当选为会长，赴上海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建立联系，继而又北上进京，向黎元洪募捐。1917年护法战起，荆襄宣布自主。汉口红十字会组织救护队，前往荆襄战区为伤员服务。战事平息后，刘又协助将伤病员运回武汉，分设伤兵医院三处。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汉口红十字会医院。

1918年2月，刘以汉口红十字会会长身份，与汉口总商会会长俞清澄、镇守使杜锡钧及各团体联合会代表集议，讨论湘鄂战争中，如何维持汉口治安事宜，吁请将武汉三镇划出战区之外。

为了巩固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刘子敬十分热衷于社交活动，生活上讲究排场。他自备有小火轮和汽车，经常利用周末邀约各国驻汉领事馆的负责人以及各银行、洋行和教会的高级职员等数人，乘小火轮到金口、沌口等地打猎。他在鄱阳街的住宅内辟有球场，雇佣养花、养鸟、养马、西宴等各种专艺人员和男女佣人三十余名。每年夏季，举家前往庐山私人别墅避暑，秋季则在汉口公馆举办菊花展览。1915年其母六十寿辰，他除在家中备办筵席招待亲友外，另假安徽太

平会馆招待宾客，由王琴甫代为操办。汉口工商各界纷纷前往祝贺，争与交往。

进入20年代，受到国际、国内市场形势迅速变化的影响，刘子敬所开办的各种企业相继受挫，连年亏空。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华俄商作为革命的对象，经营活动受到严重的影响。俄商阜昌、顺丰洋行及砖茶厂，由于茶叶无法运回国内而被迫停闭。刘的买办职务亦随而解除。他依赖阜昌所开办的茶庄茶行，因存货滞销，资金冻结，价格下落，相继宣告收歇。1927年9月，道胜银行宣告清理结束，刘依附道胜银行经营的广大钱庄，因失去凭借不得不宣告倒闭。这对刘氏家族所属的其他企业产生连锁反应，各企业资金周转日感困难。

刘子敬投下巨资的震寰纱厂在开工初期，曾年有盈余。但因战后日纱及上海、青岛等地棉纱大量涌入武汉市场，市面上棉纱供过于求，价格跌落。同时，震寰纱厂在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方面，只注意贱买贵卖，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水平很少有改进和提高，致使产品质次价高；且销售方式陈旧单一，仅有通过纱号代销一途，无形中受到行会的把持和限制。自1926年起，两年中即亏损二十九万余两，震寰纱厂股票价格随之贬落，最后仅相当于原面值的二至三成。迨至1927年末，刘派员调来该厂账簿过目，不仅所欠市面四十五万两分文未还，同时利息负累已高达七十余万两。

欧战期间，刘子敬曾伙同巴公经营大批锑矿沙出口，期望从中牟得暴利。不意该轮在途经大西洋时，被德国潜艇击沉，货物全部损失。1924年，酷爱赌博的刘端溪将中华制蛋公司价值三十余万两的蛋品运至上海销售后，在沪大赌标金，竟将所得贷款全部输光。刘子敬为保全商场信誉，对上述两项意外亏损严格保密。但刘氏家族为此已元气大伤，并不因为秘而不宣就有所减轻。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工农运动汹涌澎湃，武汉三镇租房住户组成房客联合会，向房地产主作斗争，一度掀起大规模的反对高额房租运

动。许多房客拒不交纳不合理的房租。拥有大量房地产的刘子敬因此收入锐减。同时，由于房地产价格的相应低落，冲击着刘家的不动产基础。过去那种以房地产作为抵押来融通资金的方式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更增加了刘氏家族在资金周转方面的困难。

刘氏父子在汉经商数十年，根基深厚。刘子敬如能适时变卖部分房地产，加以挹注，多少可以缓和所办企业连年亏空、资金短绌所造成的困难；但是他过分虚荣，死要面子，既要保全产业，又要弥补亏空，只好向银行和钱庄告贷。以致债台高筑，子母相权，半月十天一比，利上加利，愈陷愈深。债务最后累积达到七百万两之巨，市场信用完全破产。美商花旗银行不得不因此解除了他的买办职务，美亚保险公司也不再委托他继续代理保险业务。刘子敬从此一败涂地，不能自拔。

1928年秋，刘子敬卧疾庐山，卒致不起。

---

(1) 董明藏：《大买办刘子敬的兴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2辑，1984年版，第184—185页。

(2) 董明藏：《大买办刘子敬的兴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2辑，第184—185页。

(3) 《京津时报》庚戌（1910）八月十九日。

(4) 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5) 李白贞：《我所参加的辛亥革命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6) 《大买办刘子敬创办的汉口辅德中学》，武汉市工商联存稿。

柳亚子

张明观　殷安如

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号亚卢，再改名弃疾，字亚子，后以亚子为统一名号。1887年5月28日（清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六）生于江苏吴江分湖之滨北厍镇大胜村的书香门第，十二岁随家人迁居黎里镇。父亲柳念曾为廪生，母亲费漱芳亦略通文字。

柳亚子幼年由母亲教识字，并口授《唐诗三百首》，五岁起由塾师和父亲教读，经史之外，通读了《杜甫全集》。九岁开始学写五、七言诗，不久又试作长篇史论文章。

戊戌政变那年，柳亚子十二岁。受父亲影响，他一度赞成康、梁变法维新，十四岁时曾为此私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并开始在上海报纸发表诗作。1902年春，柳亚子十六岁，以父命赴考，中秀才。其时，柳亚子热心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龚自珍诗文集，热心诗界革命，因而诗风大变，文风亦大变，字里行间腾跃起救国的热情。因读汉译卢梭《民约论》，仰慕其天赋人权之说，自命“亚洲之卢梭”。

1903年初，柳亚子由陈去病、金松岑介绍，加入中国教育会，并与陶亚魂、蔡冶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创办《新黎里》油印月刊，每周登坛演说，以警聋振聩。于是乡里哗然，在家乡无法立足。四五月间，柳亚子与陶、蔡二人前往上海，就读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人。柳亚子和几个同学提供印费，出版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又和章、邹等合作，为《苏报》撰写《驳〈革命驳议〉》一文，针锋相对反击康有为等人的保皇派的论调。此后两年，柳亚子就读金松岑创办的同里自治

学社。由于受到章太炎、邹容的热情鼓励，他精神勃发，接连为《江苏》、《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刊物撰写鼓动文字，包括诗词、传记、史论、叙文，还有小说、戏曲等。

当时，许多革命者认为革命只有两途：暴动与暗杀。柳亚子血气方刚，不以文字鼓吹为满足，一心向往真刀真枪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为此，1905年暑期赴沪，入中国教育会所办通学所，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学催眠术，学而未成；1906年初又到上海入理化速成科，习实用化学，想学会制造炸弹以实行暗杀，亦因病未果；又与林力山相约东渡日本学陆军，却因林先走一步未能偕行。这时，正值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天梅和朱少屏自日本归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在上海筹建健行公学。2月16日，柳亚子由高天梅、朱少屏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又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此后留沪，在健行公学教国文，以激进革命读物《黄帝魂》为教材，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与田桐主编《复报》，配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积极投入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大论战，成为东南地区引人注目的革命刊物。这年秋天，风传两江总督封校禁报，他被迫返乡，于10月与同邑盛泽镇郑佩宜结婚。

1909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一），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共同发起的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正式成立，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首次雅集。次年8月以后，《南社丛刻》的编辑和其他社务，实际上就长期由柳亚子主持。

虎丘雅集之后，南社社务较为迅速的发展。辛亥正月（1911年2月）编印的《南社社员通讯录》已著录社员一百九十三人，其中有高天梅和何亚希、柳亚子和郑佩宜、朱少屏和岳麟书、姚石子和王粲君四对夫妇同隶社籍，一时传为佳话。

武昌起义爆发，柳亚子寓居上海，与朱少屏、胡寄尘创办《警报》，飞速报道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军战绩。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

府成立，柳亚子应邀赴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三日后称病辞职，返上海进《天铎报》任主笔，后转《民声》日报，再转《太平洋报》任文艺编辑。

此时，南北议和之声甚嚣尘上。面对举国滔滔的妥协潮流，柳亚子以《天铎报》为阵地，以青兕为笔名，发表大量时评，激烈反对袁世凯，坚决主张北伐，为此与南京临时政府主和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与此同时，南社社员周实丹、淮南社社员阮梦桃因领导淮安起义被清吏杀害。柳亚子联络许多南社社员，奔走呼号，坚决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昭雪冤狱，惩办凶手，愤怒谴责袁世凯包庇反革命杀人犯的罪行。在这两场斗争中，柳亚子率先打出了鲜明的反袁旗帜。

袁世凯当选总统后，柳亚子返回黎里。他撰写了大量沉痛悼念烈士，愤怒声讨民贼的诗篇，并陆续编印了几部烈士遗集。他主编的《南社丛刻》，公开发表了南社社员的许多作品，揭露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种种罪行。1917年，柳亚子与社友就同光体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柳亚子论诗，本质上是在论人。他反对郑孝胥等遗老，进而反对同光体，更进而反对宋诗。然而，南社内部亦不乏偏嗜同光体的社员。这年4月，《民国日报》发表了吴虞的《与柳亚子书》，对同光体有所批评。5月，社员闻野鹤著文反驳，嘲笑反对同光体的人是“执蝘蜓以嘲龟龙”。柳亚子愤然而起，连续著文反击。论战进行了一个多月，7月末，朱鸳雏发表《论诗斥柳亚子》，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盛怒之下，柳亚子宣布驱逐朱鸳雏出社。社员成舍我反对这一处置，柳亚子又宣布驱逐成舍我出社，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一场思想、艺术的论辩转变为柳亚子的处置是否合法的争论，不久又转变为南社改选争取选票的紧张活动。最后，柳亚子虽以多数票取胜，但是他已心灰意懒，于1918年辞去长期担任的南社主任职务。

当南社因同光体问题而分崩离析之际，新文化运动正大潮激荡。对于新文化运动，柳亚子曾有一个认识过程。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

女平权，打倒孔家店，这些都是他早先的主张。对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亦持欢迎态度。他所一时不能接受的，是文学革命。在《与杨杏佛论文学书》中，他说："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但是，对立和迷惘是暂时的。不久，柳亚子逐渐发现，做白话文写新体诗的人，所持的主张大都和他相合；而做文言文写旧体诗去攻击文学革命的人，其主张则和他相距甚远。同时他也感到，表达新思想必须有"新工具"。于是，柳亚子转而拥护文学革命。

1923年4月，柳亚子在家乡创办《新黎里》报，这是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大举措。该报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在该报影响下，吴江各地"新"字号报刊纷纷并起。柳亚子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大举措，是于同年5月在上海与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一道发起筹组新南社，和旧南社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分家"。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柳亚子当选为社长。他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宣称："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南社共发展社员约二百三十人，不仅有著名革命家廖仲恺、何香凝，还有新文学作家沈雁冰、田汉、刘大白等，一时俊彦云集。

1923年12月，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身份，由叶楚伧、陈去病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初，受委派在吴江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地方组织。8月，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成立，当选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是江苏最早组建的国民党县党部之一。9月前后，江浙战争爆发。这场军阀争斗深深教育了柳亚子，他认识到"运动军阀和掉书袋都没有用处，要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于是，毅然停顿了新南社社务，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柳亚子当选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面对党内右派的肆意挑衅，柳亚子当面责问蒋介石：“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会上，他与何香凝、彭泽民竭力反对排挤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并愤然于闭会前拂袖离粤。回到上海，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陈以其在国民党内作用更大未予同意，亦不同意其反蒋建议。他遂满腹郁闷返归故里，杜门不出。

1926年暑期，柳亚子埋头书斋，与儿子柳无忌开始从事持续十五年之久的苏曼殊研究。1928年12月起，煌煌五巨册《曼殊全集》由上海北新书局逐册出版。以后，着重进行苏曼殊身世的考证，改正了有关曼殊血统的错误。1933年，《曼殊全集》普及本由上海开华书局出版，收录了《苏曼殊传略》、《重订苏曼殊年表》两篇重要文章。1940年，又辑成《曼殊余集》稿本十二册，均为新发现的苏曼殊诗文遗作及有关研究文字，成为苏曼殊研究的资料宝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5月8日深夜派军警到黎里指名搜捕。柳亚子藏身复壁，得以幸免。数日后，化名唐隐芝携家流亡日本，寓居东京郊外乐天庐。次年4月归国，定居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亡。柳亚子积极投身救亡运动。他协助自巴黎归国的何香凝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创办国难救护队，援助东北义勇军，任后方理事会副主席兼经济部长。1932年7月，上海市通志馆成立，柳亚子被聘任馆长，直至1937年底上海沦陷被迫闭馆，历时六年。上海市通志最终未能完稿问世，但留下了一千多万字通志文稿，同时出版了《上海市年鉴》三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四期、《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二集、《上海掌故丛书》十册。在此期间，柳亚子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战士亲密交游。当许多共产党人、进步作家及知名人士遭受厄运之际，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奔走救援。应许多南社社员要求，为纪念南社和新南社的精神，于1935年发起成立了南社纪念会，被推为会

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柳亚子从历时年余的脑疾中振作起来。他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抗日救亡。一改杜门谢客的习惯，公开接见记者，发表政见，主张国共两党携手抗日。上海沦陷后，柳亚子自题寓庐为“活埋庵”，他给儿女们写下遗嘱，有云：“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

“活埋”三载，作为诗人的柳亚子诗思枯涸。然而，作为史学家的柳亚子，开始了终生不渝的南明史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果。他写成了《南明史纲》六卷的第二次稿本、《南明史纲历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和《南明人物志》四部重要著作。

1940年底，柳亚子南渡香港，定居九龙，以楚神话中“后羿射日”典故，言其居曰“羿楼”。在香港，他完成并发表了《南明史纲》八卷的第三次稿本，整理了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名发出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他复函重庆国民党中央，拒绝赴渝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严正表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薇，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他因而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香港沦陷后，柳亚子由东江纵队派员护送，历尽艰险到达桂林，在这个战时著名文化城住了两年多。他继续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了南明史料征纂社，并同时提倡“旧诗革命”。

1944年9月，日寇进逼桂林，柳亚子迁居重庆，从此和共产党人及进步文化人士更加接近。他在郭沫若为其举行的洗尘宴席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柳亚子和他数次畅谈，诗信往还，毛泽东并以旧作《沁园春·雪》相赠。柳亚子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增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参与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当选中

央常务干事。1945年底，柳亚子返回上海，1947年10月应何香凝、李济深密招，第二次前往香港，积极投身建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活动。同时组织扶余诗社，旨在海外推进民主运动。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柳亚子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全国解放在即，柳亚子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于1949年3月到达北平，满怀激情地投身新中国建国大业。由于对在胜利大局已定的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缺乏思想准备，他曾一度陷入困惑。3月28日夜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末云："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泽东于4月29日赠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有云："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读后，柳亚子次韵表示："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即有定居北京之意。1950年10月，柳亚子专程南返。他委派外甥徐孝穆返回家乡黎里，将黎、沪住所的家藏古籍、文献、书刊、信札等，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现分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回京后，他又将携京之文献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使这些珍贵文献得以遗惠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亚子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在此期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他积极主动对中共和政府工作提出许多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自1952年起，柳亚子长期患病。1954年9月，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11月，抱病出席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

柳亚子的著作今人辑为《柳亚子文集》，于1994年全部出版。这部文集包括《磨剑室诗词集》（上、下册）、《磨剑室文录》（上、下册）、《南社纪略》、《书信辑录》、《自传·年谱·日记》、《苏曼殊研究》、《南明史纲·史料》，七种九册，共计三百万字。

主要参考资料

杨天石：《柳亚子》，《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王晶垚：《柳亚子选集序》，《柳亚子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龙济光

吴显明

龙济光，字子诚，一作紫宸，彝族，云南蒙自县人，曾任蒙自县逢春岭（现属禄春县）纳更土司。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兄弟三人，长兄龙觐光，次兄龙裕光。

龙济光没有读过什么书，少时学过武术，喜欢舞刀弄枪，性气刚强，身体粗壮。光绪年间在蒙自、临安（今建水）、广南办团练，曾参与镇压滇南人民的反清斗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西爆发了游维翰、王和顺、陆亚发、陆亚宋领导的大规模的人民反清运动。1903年4月，清政府急忙把广西籍的署四川总督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调集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五省兵力共十余万人前往镇压。此时驻防云南广南县弄汪地区的续备营补用同知龙济光也被调去“会剿”。龙除了率领续备营的基本队伍外，还在文山、蒙自、建水、个旧、金平、屏边等地招募五千新兵，作为补充。

同年秋，这支队伍从广南、富州（今富宁）进入广西百色地区，由岑春煊装备一新，依为股肱。龙济光任边防军济字营统领，伙同滇军武威营王镇邦等部执行“剿抚兼施”的政策，捉住了百色地区游勇首领游维翰，加以杀害。龙并收编了凌云的游勇韦尚、林西，东兰的游勇容有元等。之后龙济光率部由滇桂边境的百色一直打到柳州。同年他升任广西省右江道，又会同荣字营统领陆荣廷在南宁、柳州一带剿抚“四十八弄”、“五十二峒”的游勇。1905年2月，在古板饭峒（属五十二峒）捉住了柳州地区游勇首领陆亚发，解送桂林，在岑春煊亲自指挥下，凌迟处死。

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攻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右辅山炮台，广西巡抚张鸣岐限令龙济光和陆荣廷部七日夺回。他们如期夺回后，对革命党人大肆杀戮。龙济光因屡立战功，受岑春煊的荐举，1908年署理广西提督，1909年补为实授。

1911年4月，广州革命党人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鉴于水师提督李准自成体系，挟功凌上，不易驾驭，遂奏调桂军入粤。不久，龙济光率广西军队调往广东，任陆路提督及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广东，全省沸腾，很多县都在革命党人领导下组织民军，发动起义。新军协统李万祥劝龙反正，被龙下令拉出衙门枪决。

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广东各地民军向广州进逼。11月8日，广州绅商联合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张鸣岐也派代表出席。会议商定广东次日独立，推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张鸣岐不敢就任，微服逃走。次日，绅商代表又举龙济光为都督，龙避不就职。各界代表重新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在胡未到广州前，由新军协统蒋尊簋代理都督，军政府乃成立。11月10日，胡汉民由港前来就任，各路民军纷纷入城。龙济光为形势所迫，不敢反抗。龙部十多个营，经过多方调停协商，开赴高雷各属驻扎。

同年12月下旬，孙中山自欧返国，就任临时总统，调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1912年2月，孙中山辞临时总统后，4月广东省议会推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龙济光副之。12月，袁世凯任命龙为广东副护军使。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通电讨袁。7月26日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督师倒陈。7月30日夜，龙率所部抵肇庆。8月3日，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

民政长。龙接袁命令后，率兵会同李耀汉部由西江直向广州，8月4日，陈炯明避往香港，广东取消独立。龙济光从此占据广东。

龙济光在广州防范革命党，甚于当年张鸣岐。各城门均有军警把守，进城的人须经搜检才放行。各名胜风景区，都筑有碉楼，有兵士防守。胡、陈掌权时的官吏，凡参加过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均避嫌离职。唯一留任的警察厅长陈景华，龙也不放过，于9月15日（农历中秋节）晚，以赏月为名，将陈景华骗入督署杀害。稍持正义的报馆皆被封闭。

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废除各省都督，特任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并准许在广东开府建衙。龙在观音山大兴土木，建筑振武楼夸耀战功，妄图把观音山扩建成可以长期坚守的“天堂”。

龙济光夺得广东这块富庶的地盘后，对广东人民肆意敲诈盘剥。他公开纵吸鸦片，大收烟捐、赌捐、花捐。云南蒙自“顺城号”周伯斋、周启斋弟兄，也随去广州为龙理财。

龙氏及其所属滇籍中上级军官和官僚们的钱财，都由“顺城号”汇回云南。龙济光私人还有一艘约两千吨的商船，往来于香港、广州、海南岛、越南海防之间做买卖，所得的利润储存在香港。

龙济光统率的振武军，系杂凑而成。这支队伍纪律很坏，龙济光又以“清乡”为名，纵容部队胡作非为，“济军所至，奸淫掳掠，井里为墟，商贾裹足。各属有绝粮之危，万家闻痛苦之声”[(1)]。

在袁世凯、龙济光的反动统治下，广东人民从未停止反袁反龙的斗争。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龙济光竟电袁请提灯庆祝。广东革命党人早已恨透他，亟欲得而甘心，龙因此戒备森严，深居简出。7月17日，龙济光从观音山驻地前往其兄龙觐光宅，当行至积厚街时，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向他

丢了一颗炸弹，伤龙左足，卫队死伤多人。钟当场被捕，次日遭凌迟处死于振武楼侧。

同年冬，袁世凯帝制自为，册封龙济光为一等公。1916年1月，龙济光派兵打退攻入惠州的陈炯明部讨袁军，袁世凯又加封龙郡王衔。

当蔡锷、唐继尧等人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时，袁世凯指示龙济光假道广西向云南出兵。1916年2月8日，任命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进袭滇南。当龙部先头部队进入滇境时，其大部还在广西，受到护国军和桂军马济部的夹击，3月12日在广西百色被迫缴械，龙觐光被扣留于南宁。陆荣廷在解决龙觐光部队后，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

4月6日，龙济光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民军压力下被迫宣布广东“独立”。他宣布独立时取得了袁的指示和谅解。同时密请袁派兵帮他“平乱”。4月12日，龙以广东各界代表的名义在海珠水警署召开会议，筹商反袁军与龙济光合作等事宜。会上因意见分歧，龙部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突然行凶，当场将陆荣廷的代表汤觉顿等人击毙。龙的假独立完全暴露，反袁各军决定以武力对付龙。龙感到危急，4月19日亲去肇庆同陆荣廷达成妥协，承认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等五项条件。

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5月8日，又在肇庆成立了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陈炳琨、刘显世、梁启超等人为抚军。龙参加反袁非其本意，视护国各军如仇敌，节节布防。6月6日袁死，他未得肇庆军务院同意，擅自于9日电北京取消广东独立，投靠段祺瑞政府。6月，李烈钧率领的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假道广东韶关北进，龙拒绝李军过境，令南韶连镇守使朱福全闭门不纳，两军发生冲突，龙军开炮轰击，护国军愤怒反击，攻破韶城，朱福全部

投降。接着护国滇军由源潭趋清远而攻兵工厂，桂军过三水而攻佛山，陈炯明旧部邓铿、钟景宁也向龙军包围压迫。龙军大败，退守广州。龙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段祺瑞提出的调停意见，10月14日，双方撤退军队，龙将督军印信交与省长朱庆澜转陆荣廷，赴琼崖任两广矿务督办。

1917年秋，护法战争开始，段祺瑞于11月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指使龙率领残部进攻广州。1918年1月，龙军占领雷州半岛及沿海各县，并进占阳江、恩平、化州等地。粤、桂、滇军等组成广东讨龙军，转入反攻。同年1月31日，讨龙军魏邦平部攻占阳江、恩平等县，龙军败走。4月18日，讨龙军攻占茂名。25日，讨龙军攻占化州。29日，广东督军署举行讨龙祝捷大会。海南岛琼东县龙部警卫营长杨锦龙也联络当地黎民宣布独立，反对琼崖镇守使龙裕光，并攻占了万宁、陵水等县。龙军被打得丢甲弃枪，连海南岛也不能立足。龙济光带领残部千人，在同年6月初泛海而北。到塘沽后，段祺瑞指定天津小站作为他屯兵之处。

1920年7月11日，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段祺瑞下野。奉军入关，进攻小站。龙军向东南撤退，溃不成军，派员向奉军求和。同年冬，全部官兵被奉军缴械遣散。

1921年1月，北京政府始免龙济光两广巡阅使职，入将军府为将军。1922年，龙患半身不遂，寓居北京朝阳门内私宅养病，1925年3月12日病死。

主要参考资料

罗峰南：《龙济光和振武军的兴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版。

李朗如、陆满：《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辑，1963年版。

杨家骆编：《民国名人图鉴》第1册。

普梅夫：《广东督军龙济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总第45号）。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编：《广州市沿革史略》第13章《济军时代的广州》，1989年版。

黄孟苍等：《覃老发、陆亚发等在四十八弄的反清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2年版。

林宝航：《广西游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

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军民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

苏镜川：《护国第二军在开化、广南、富州一带军事行动经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0年版。

陈润之：《护国第二军始末简记》，《云南文史资料》第13辑。

郜孔昭：《云南讨袁护国第二军入桂粤亲历记》，《云南文史资

料》第13辑。

陈良佐：《陆荣廷的讨袁护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13辑，1982年版。

《广东战事近闻》，《义声报》1916年7月25、29日。

---

(1) 《伍廷芳等致黎总统、段总理请罢除龙济光电》，《义声报》1916年3月12日。

龙鸣剑

曾绍敏

龙鸣剑，原名骨珊，字顾三、顾山，号雪眉，四川荣县人，生于1877年5月14日（清光绪三年四月初二）。父龙章，又名得江，在本县五宝镇经营油坊。龙鸣剑九岁丧父。其四伯龙沛然出仕云南，官至知府，是龙鸣剑入学读书的资助人。

龙鸣剑幼年在本乡读私塾，学习勤奋，深得塾师的嘉许和学友的钦佩。后游学嘉定（今乐山），年十九举秀才。1905年，龙鸣剑进入成都优级师范学堂读书。在这里，他接触到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思想日趋激进，因抨击时政，被学堂当局斥退。龙鸣剑愤然离开学堂，剪掉发辫，决心向旧势力挑战。

1906年，龙鸣剑去北京考察政俗，对清政府的腐败深有感触，亲书北京现象为“高墙丰上激下，水潦一至，倾败随之”[(1)]。旋即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他发奋钻研西方的政治法律学说，对革命的信念与日俱增，龙曾愤慨地说：“吾国不革命，不可与新命！”[(2)] 随即加入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发生纷争，会员刘师培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竟欲排斥孙中山，改组同盟会本部。龙鸣剑得知，怒不可遏，首揭其奸，指出“大行不顾细检，此本奸谋，旦夕当暴露”[(3)]，积极维护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

同年，川籍同盟会员王仰思、秦彝鼎等人回国到云南发动革命，四川革命同志于东京锦江春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龙鸣剑引吭高歌，慷慨悲壮，满座为之感动。事后王仰思写信给吴玉章说：“锦江春之宴，大有‘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之概，毕生难忘。”[(4)]

年末，《四川》杂志在东京创刊，它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为宗旨，是当时深受人们欢迎的刊物。龙鸣剑为《四川》杂志撰写《党祸论》一文，达七千余言，申革命大义，切中时弊。

1908年3月，河口起义失败后，龙鸣剑奉命回国开展革命工作。他远涉南洋，途经越南，于这年冬天进入云南。在归国途中书写“粗识轩辕奏乐章，九死南荒吾不恨”[(5)]的诗句，表达了他愿为革命献身的精神。龙到云南后，奔波于滇南的盘山小路上，备尝艰辛。1909年春，离滇回川，在成都以创办法政学堂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所法政学堂实际上是当时四川同盟会的秘密机关，是革命者和爱国人士聚会的一个重要据点。10月，四川谘议局成立，龙鸣剑被推选为谘议局议员。他和程莹度等同盟会员“奉有使命暗中活动，乘机在谘议局内鼓动甚力”[(6)]。清政府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全川人民愤慨异常，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龙鸣剑利用谘议局议员的合法地位，激烈地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立宪党人邓孝可为迎合清廷，力主铁路国有，在一次会上演说：“川民程度远不如湘鄂，湘鄂争可也，川人争不可也。”龙鸣剑驳斥说：“一般人民程度本不相远，蜀人能争与否，此视提倡者能力如何。吾蜀固亦人也。”[(7)]语毕，赞成之声满座。

龙鸣剑与同盟会员王天杰等人密切注视保路运动的发展，“知此事非文电所能争也”，采取了与立宪派“明同暗斗”的策略，“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8)]，主张将运动导向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龙鸣剑和其他革命党人，一面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一面联络会党，组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龙鸣剑接受在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委托，于1911年8月4日（农历闰六月初十）同王天杰、秦载赓等人在资州罗泉井召集会议，商定武装起义方案，会议决定组织保路同志军，派人到各地去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决议在农历七月间各地同时或前后起义。罗泉井会议结束后，龙鸣剑回成都，在四圣祠召开秘密会议，亲自作报告。尔后又冒着盛暑，奔走于成都与各地

间，做武装起义的动员组织工作。他在起义前写了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9] 表达了他对反清斗争的必胜信念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同年9月初，四川保路风潮越来越大，形成“万众附和”的罢市、罢课群众运动，使清朝统治者预感到“现在事机万分危迫，民气甚固”，“大局尤不堪设想”[10]。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7日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开枪屠杀和平请愿的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龙鸣剑认为革命时机已成熟，应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他四处奔走，驰檄飞笺，传递成都消息，号召各地起义。同时他疾驰成都城南农事实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商议，裁木板数百块，在上面书写“成都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响应，速来救援”的字样，涂以桐油，投入江中，人们称之为“水电报”。“水电报”顺江而下，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于是各地相继揭竿而起，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龙鸣剑发了“水电报”，就星夜兼程赶回荣县，数日内集结民军一千余人，同王天杰率民军北上攻打成都。临行，荣县人民张灯结彩，燃放鞭炮，热烈欢送这支反清义军。出荣县城北门时，龙鸣剑激昂慷慨，拔剑起誓：“此行不捷，吾不复入此门矣！”[11] 情气动人，大大鼓舞了民军的斗志。义军起程后，沿途参加者甚多，行至荣县双古镇已达三千余人。龙鸣剑同王天杰在双古镇对民军进行了整编。随后与秦载赓率领的起义民军会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众推秦载赓任东路民军统领，王天杰任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继续向成都进发。队伍在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铁庄堰、煎茶溪、秦皇寺等处，同清军进行了大小二十余次战斗。龙鸣剑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指挥作战，欲“拼一死以谢天下豪杰”[12]。在他的带领下，广大民军莫不英勇杀敌。后因军粮告罄，装备悬殊，战斗失利。于是东路军决定分兵向各州县发展。

龙鸣剑和王天杰率兵转战嘉定、宜宾一带，议定龙在嘉定建厂制造枪炮炸药，王天杰回荣县整理民团。王天杰率部分民军回荣县，荣县知县李燊春闻风而逃。王天杰等人同从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回川发动革命的吴玉章计议，决定建立革命政权，于1911年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龙鸣剑在嘉定闻讯，非常高兴，飞马回荣县。是时端方已至资州（今资中），命叙府（今宜宾）巡应军攻荣县。龙鸣剑认为“自流井属叙（府），叙防（军）去（自流）井必空，捣叙，防边必还救，荣（县）围必解”[13]。为了保卫荣县独立，民军决定行“捣叙救荣之计”。这时，龙鸣剑在戎马征战中已积劳成疾，身染重病，但他在家只小住了几天，即带病冒险突围至宜宾地界，聚集民团数千人，分前后两路向叙府进发，龙鸣剑自督后路。当前路军将抵叙府时，龙鸣剑得知清军攻下离荣县城六十里的程家场的消息，甚为忧愤，吐血数次。随后病情更加恶化，于11月26日在宜宾徐场杨湾赵家大院含恨而死。

龙鸣剑病危时，倚枕急书，表明自己“不愿苟生，愤而起与（清）政府宣战，理势迫之使然”[14]。他临死的那天早晨，倚栏小望，涕泪如流，为王天杰规划了求贤、筹饷、练兵、造械、保民、慎行六策。每条约三百余言，最后并书绝命诗一首。入葬那天，荣县、宜宾两地群众万余人自动前往悼念。

---

(1) 范遇鸿：《先烈龙君鸣剑事略》，见龙鸣剑著：《雪眉诗集》，第1页。

(2) 廖世英等修、赵熙等纂：《荣县志》人士第8，1929年刻本，第114页。

(3) 范遇鸿：《先烈龙君鸣剑事略》，见龙鸣剑著：《雪眉诗集》，第2页。

(4)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

(5) 龙鸣剑手稿。

(6) 唐宗尧：《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发生始末的片断回忆》，未刊稿，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7) 范遇鸿：《先烈龙君鸣剑事略》，见龙鸣剑著：《雪眉诗集》，第3页。

(8) 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1年，第102页。

(9) 原件已佚，据吴伯良、龙仕信口述。

(10) 《广益丛报》第9卷第17期（第273号，1911年9月）“纪闻”，第13页。

(11) 《荣县志》人士第8，第114页。

(12) 范遇鸿：《先烈龙君鸣剑事略》，见龙鸣剑著：《雪眉诗集》，第4页。

(13) 范遇鸿：《先烈龙君鸣剑事略》，见龙鸣剑著：《雪眉诗集》，第5页。

(14) 龙鸣剑：《最后家书》，见《雪眉诗集》，第34页。

龙云

邵献书

龙云，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燕山人。祖籍四川金阳。1884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年十月初十）生于黑彝纳吉家族中一个保有奴隶制残余的地主家庭。排行第四，小名毛老四，彝名纳吉岬岬。幼年丧父，在家乡读私塾，年轻时拜师学武术，打拳摔跤，在当地黑彝家族中以械斗英勇著称。1911年，龙因与四川金阳黑彝黑家的一次冤家械斗中失败，遂带了卢汉等人离乡外出投军。

他们先去永善，后裹胁了些人并带了些枪，自称“同志会”，逃到四川宜宾。适值辛亥革命后滇军入川，龙率众投靠了滇军梯团长谢汝翼。不久随军回滇，龙以少尉军衔与卢汉一起被保送考入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1914年毕业后，龙被分发到昭通独立营任中尉排长。未几，云南都督唐继尧听说龙在拳脚上颇有两下，调他回昆明任中尉侍从副官。以后由于获得唐的信任，先后任唐的近卫军二大队中队长、补充第一大队大队附、佽飞军大队长等职。

1921年2月，唐继尧被部下顾品珍逼迫下台，龙云以佽飞军大队长护送唐从昆明去滇南。唐旋即由蒙自出走香港，临行改委龙为近卫第十一团团长，与拥唐的第二卫戍区司令兼蒙自道尹李友勋同驻蒙自地区。同年秋天，李、龙恐不容于顾，借响应孙中山讨陆荣廷桂军之名进兵广西，龙被委为李友勋旅的梯团长，攻下柳州后任柳州警备司令。1922年1月，李、龙及在桂拥唐的滇军，在唐的策动下，拒绝随同孙中山北伐，拥唐反戈回滇讨伐顾品珍。时李任唐的靖国军第一军军长，龙为该军前敌司令。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唐委龙为该军代理军长。3月，讨顾品珍胜利，唐再度统治云南。此后龙被委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昆明。1925年初，唐借口讨伐顾

在广东之余部，企图染指两广，出兵广西，龙为一路，任总指挥。2月25日，龙部占领南宁，但后因其他各路滇军战事失利，龙等入桂滇军于是年秋撤兵回滇。1926年秋后，唐撤销了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龙任昆明镇守使。

1927年2月6日，龙云与唐继尧部下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因不满唐任用亲信，排斥异己，趁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之机，发动了倒唐政变。政变后四镇守使成立了云南省务委员会，推胡为主席兼军政厅长，龙为委员兼云南讲武学堂校长，唐则为有名无实的总裁。5月23日唐病死，四镇守使间矛盾加剧。先是胡、张等部联合攻龙，6月14日扣龙于昆明。由于胡、龙前此曾分别派人到当时广州国民政府活动，同日，蒋介石任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为第三十九军军长。7月1日，云南正式易帜。7月中下旬，因龙部卢汉由滇西反攻获胜，胡等人劫持龙退出昆明。后因胡得悉唐之余部拟勾结其内部将领趁虚占领昆明，在途中释放了龙云。月底，龙重占昆明。8月，代理省主席。1928年1月，在龙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蒋介石指定龙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后又改委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至1929年秋，龙先后击败了胡、张及支持他们的黔军和川军，同时也击败了唐的余部，统一了云南。

1930年夏，龙为扩张势力，就任蒋介石所委的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出兵广西，派卢汉为前敌总指挥。事先蒋许以攻下南宁后，广西地盘归龙统治，省政府主席由卢充任，后因卢久攻南宁不下而罢。1931年3月，卢汉等四师长因对龙在用人和安置遣散编余官兵等方面不满，向龙进行兵谏，为龙所瓦解。

龙云在逐步统一云南期间，曾对省内中共党人进行过镇压。为进一步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从1931年起，龙逐步整顿军队，设立军官学校，并通过法国商人向法、比、捷等国购买大批武器。到抗日战争前，已培植了一支完全由他指挥、给养也都由地方自给的正规滇军三万多人。在经济上，龙除直接通过省财政厅、富滇银行等机构榨取各

族人民外，还以“官商”和个人或集股名义在云南大力发展地方官僚资本。他极力扶植云南等地彝族中的统治阶级充当党、政、军各种要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龙、卢、陇、禄、陆、安彝族六姓家族为主体的地方实力集团。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黔滇时，蒋介石委龙云为中央“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龙既怕红军长驱直入，又恐蒋驱兵“假途灭虢”。他组织以孙渡为司令的第三纵队，在黔滇川边境极力阻堵红军，又组织兵力加强云南境内的防守。1936年3月，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黔滇时，蒋委任龙云为黔滇绥靖公署主任，龙仍派孙渡率第三纵队开往贵州尾随追击过滇红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以“抗日”之名，命龙云将云南军队编为第六十军，派卢汉为军长开赴前线。六十军将士抗战士气旺盛，对日作战英勇。1938年3、4月间，参加鲁南台儿庄对日战役，颇著战功。同年7月，龙请准了蒋，由云南补充士兵将第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卢任军团长。年底，又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辖三个军。初由龙兼总司令，卢为副并代总司令职，后由卢任总司令。在龙云趁抗日之机扩大自己实力的同时，蒋介石对抗日前线的滇军进行了多方拉拢与分化。

龙云对汪精卫一向很推崇。1938年12月18日，汪以“赴滇讲学”为名，逃离重庆。汪路过昆明时，曾与龙云密谈所谓“和平运动”。19日汪去越南河内，在河内曾遭特务暗杀未遂。1939年5月6日，汪潜抵上海，但龙未被汪拉下水，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0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河内。龙云为避免其第一集团军为蒋介石吞并，以防守滇南为由，要求蒋把其中的两个军调回云南。蒋只准调回第六十军，成立滇南作战军，派卢汉为总司令。同时借机陆续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队进入云南。年底，滇南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而原第一集团军总部改为副总部。以后这部分滇军，在蒋

的进一步拉拢与分化下逐渐脱离了龙、卢的控制。1945年初，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卢为总司令，名义上辖第一、第九两集团军，但龙、卢只能控制第一集团军，后者系蒋的嫡系关麟徵部，实际上起着监视滇军的作用。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给龙云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衔。名义上在滇的国民党中央部队统归龙云节制，事实上是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加紧控制。龙、蒋之间的矛盾由此加深。此时，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蓬勃开展。龙也有意开放一些民主运动，并与民盟等一些民主人士以至中共党人往来结交，借以自重。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当时昆明有“民主堡垒”之称。龙、蒋之间的矛盾也就更为加剧。

这时，蒋介石已决心要解决龙云，并做了些准备。抗战胜利后，蒋为全力投入内战，遂加快了倒龙的步伐以解除后顾之忧。1945年8月，蒋即命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全部离滇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又命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和在滇蒋的嫡系部队为倒龙做了周密布置。9月底，蒋亲自坐镇西昌，就近指挥。10月1日，蒋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去越南河内，利用龙、卢之间的矛盾，对卢进行威胁利诱。3日，蒋命杜聿明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宣布免除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云南省政府主席由卢汉继任，在卢未到任之前由新任省民政厅长蒋的亲信李宗黄代理。同日，蒋以同样的内容向卢宣布。6日，在兵临城下和入越滇军又不返滇“勤王”的形势下，龙云满怀愤懑被迫去重庆接任新职，从而结束了他对云南十八年的统治。

然而，龙云并不甘心这次失败，同年12月，滇军将领去重庆开会，龙曾秘密策动他们抛弃卢汉，反对蒋介石要调全部入越滇军去东北参加内战的决定。要他们保存实力，等待时机，返回云南，公开反蒋。1946年春，入越滇军被迫全部开往东北，龙最终失去了他企图赖

以东山再起的武装力量。5月下旬，龙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不久，军事参议院裁撤，成立战略顾问委员会，龙任副主任，代行何应钦的主任职。这年秋天，龙要去杭州游览，为蒋所拒。翌年夏天，他欲赴上海为其女儿出国留学送行，蒋亦不许。龙实际上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龙风闻蒋要挟持他去台湾，在“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大队”大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于12月8日逃离南京飞往香港。

龙云在重庆时，曾继续与民盟人士保持联系。当时罗隆基等人曾有让龙担任民盟主席之议。打算以云南为地盘，滇军为武力，成立特殊政权，扩大政治影响力。龙表示可在幕后支持。以后龙在南京和香港时，与民盟、三民主义同志会、民革都有广泛的接触，并曾出巨款予以资助。龙在香港参加了民革。1949年1月，当民革负责人李济深离港北上后，他曾主持过香港民革的工作。其间，他与共产党人也有联系。

龙云抵港后，先后通过旧部和派人去云南劝说卢汉尽早反蒋起义，并表示“滇事由弟（指卢汉）主持，外面接头由兄（龙自称）负责”。但由于他们都想以云南作为各自的政治资本，而当时卢对时局还存观望之心，两人步调始终难以一致。与此同时，龙还先后派其亲属、旧部等返滇直接组织武装队伍。当时滇东的所谓“西南人民革命军”、滇南的“中国人民自卫军”、滇西的“共革盟”军（即所谓中共、民革、民盟）等，都是在他直接或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但这些武装打着“革命”、“自卫”等旗号，招兵买马，危害地方，并未起到龙原来期望的扰乱国民党武装和促使卢汉起义的作用。8月底，龙为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企图利用桂系与蒋、卢之间的矛盾，派其次子到广州找广东省主席薛岳，托薛转告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希望他们能让他重返云南任滇康绥靖公署主任。4月初，他又派其长子到南京找李等人做进一步活动。但不久南京解放，龙终未如愿。

是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等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

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愿意脱离国民党集团。二十多年来，龙从拥蒋到反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此时公开表示彻底与蒋介石决裂。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龙被列为特邀代表。1950年1月，龙由香港来到北京。

1949年后，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等职。1957年，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2月被免去本兼各职，1959年复任人大主席团主席。1962年6月27日，龙云因病在北京去世。28日，摘去右派分子帽子。1980年7月，龙云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

主要参考资料

王昆仑、楚图南：《怀念龙云先生》，《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

龙福保：《回忆祖父龙云逝世前后》，《中国建设》1981年第6期。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8页。

卢汉

邵献书

卢汉，字永衡，原名邦汉，彝族，云南昭通燕山人。1895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生于黑彝吉迪家族中一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地主家庭。祖父曾捐过一个游击，卢汉排行居长，清末曾在昭通“考棚”读书。十六岁时，跟随龙云离乡外出投军。

龙、卢等先去永善，后裹胁了些人和枪，自称“同志会”，逃到四川宜宾，投靠了辛亥革命后入川的滇军梯团长谢汝翼。旋即随军返滇，以准尉军衔与龙云一起被保送考入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1914年毕业后，卢随滇军入川，历任排长、连长，至1917年任成都兵工厂营副营长。1920年滇军在川失败，1921年初卢随军返滇。2月，云南滇军总司令唐继尧被部下顾品珍逼迫下台，时卢任近卫第十一团（团长龙云）营长，驻蒙自地区。秋天，龙、卢等人恐不能立足于滇，乃借响应孙中山讨陆荣廷桂军之名，进兵广西柳州。1922年1月，卢随龙等人拥唐回滇讨顾。3月，唐再度统治云南，卢任唐的近卫第三团团长。1925年初，唐借讨伐顾在广东之余部为由，企图染指两广，卢团调属第五军军长龙云部进兵广西。2月，龙、卢等人攻下南宁，但因其他滇军在桂战事不利而撤回云南。卢回滇后任龙部的第七旅旅长（当时无师的编制）。

1927年2月6日，唐继尧部下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发动倒唐政变。5月，唐病死。6月，胡、张等部联合攻龙，并扣龙于昆明，卢汉等将龙的大部分部队带往滇西整编扩充。7月，卢等人率部反攻昆明获胜，迫使胡等人退出昆明并释放了龙。龙重占昆明，蒋介石遂即任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此后，在云南两年的混战中，卢为龙部的骨干第九十八师师长，帮助龙当上了云南省

政府主席，击败了各个反对势力，统一了云南。

1929年底，卢汉以军人身份兼省财政厅长，对云南财政有所整顿。1930年夏，蒋介石委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讨桂，龙派卢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进兵广西。事前蒋曾许龙于滇军攻下南宁后，即发表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地盘亦归龙统治。但卢久攻南宁不下，乃于1931年2月撤兵回滇。在由桂返滇途中，卢秉承龙的旨意，对庞杂腐败的滇军进行裁并。但龙对编余官兵不予安置，加之长时期来龙在用人等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卢等四师长的不满。四人于8月在宜良举行会议，以“清君侧、去馐壬”为名，向龙进行兵谏。但因内部发生分裂，被龙反过来扣押了他们。龙撤去了四人的职务，并废师改旅。未几卢等人获释，以后他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统兵。但云南的军政大计还是与闻，并曾任全省团务督办。省内的财政整顿，向法、比等国购买武器等，亦由卢主其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借“抗日”之名，命龙云将云南军队编为陆军第六十军，派卢汉为军长。卢于9月率部开赴前线，官兵抗战士气旺盛，长途跋涉四千余里，步行四十八日抵长沙。1938年春，第六十军驻武汉时，蒋曾调团长以上军官到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派卢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并多方对该军进行拉拢与分化。这时卢亦乘机活动，第六十军破格获得特种军的编制。三四月间，卢率部参加了鲁南台儿庄对日战役。全军将士作战甚勇，重创敌军，颇著战功。7月，由云南补充士兵，第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辖三个军，卢为军团长。10月，卢因病离开部队，先后在长沙、贵阳、昆明就医。12月，第三十军团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仍辖三个军，初由龙云兼总司令，卢为副，并代总司令职，后由卢任总司令。1939年间，蒋介石名为酬卢，许卢充贵州省政府主席。但当卢去重庆商谈就职事时，蒋又只允他带一个秘书长到任。他不愿当光杆主席，适值旧病复发而罢。卢的第二次省主席职又成画饼。

1940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占越南河内。蒋介石为敷衍龙云提出

的防守滇南要求，准将第一集团军的第六十军调回云南，成立滇南作战军，以卢汉为总司令，驻昆明。此后蒋亦借机派自己的嫡系部队陆续开进云南。年底，滇南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移驻蒙自；而湖南前线的原第一集团军总部改为副总部。这部分滇军，以后在蒋介石的进一步拉拢与分化下，逐步脱离了龙、卢在云南的遥控。1945年初，在滇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卢为总司令，移驻开远。第一方面军名义上辖第一、第九两集团军，但龙、卢只能控制前者，后者关麟徵部系蒋的嫡系，实际上起着监视滇军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全力投入内战，解除云南后顾之忧，必欲调空在云南的滇军，即命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开赴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受降。在此前后，蒋为解决龙云做了一系列的准备。10月1日，蒋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去越南河内坐镇，并利用龙、卢矛盾，对卢进行威胁利诱。3日，蒋命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宣布免除龙的云南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并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持蒋给卢的亲笔信见卢，宣布由卢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未接任前由蒋的亲信新任省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这时，卢在越按兵未动，不久还对滇军进行整顿，撤换了一批亲龙的将领。11月，卢去重庆参加蒋的复员整军会议，同意蒋命令入越滇军全部开往东北参加反共内战的决定，并回云南接任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等职。12月1日，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等人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屠杀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和教员。就在这一天，卢宣布任省主席职，并提出一个“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针。

1946年春，入越滇军被迫分两路先后开赴东北。5月31日，第六十军的第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给卢汉以很大震动。6月，卢开始在昆明组成省保安总司令部。但蒋介石仍保留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由其亲信霍揆彰充任。霍用保安总部的名称和经费，以警备总部的人员编成保安总队，由霍指挥，卢不得过问，只给卢留一个警卫营，

这又一次刺激了卢。7月中旬，蒋介石授意霍在昆明制造了“李、闻惨案”。8月，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云南警备总司令以何绍周继任，名义上归卢节制，但何依仗蒋势，气焰嚣张，卢无可奈何。与此同时，蒋介石安插在云南的其他亲信，亦多方与卢为难。1947年6月，在卢的主持下，把省经济委员会和省企业局等单位改组为“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卢任董事长，以抵制蒋介石攫取云南资财的行为。10月，卢受蒋命去东北第六十军进行抚慰，见军心涣散，东北已难支撑，深感前途险恶，更加大了他对蒋的离心力。

自1948年冬起，尤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卢汉趁蒋介石欲借重云南之机，先后向蒋请准了保安总队归保安总部建制、撤销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等要求，又继续鼓吹其“保境安民”、“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施政方针。同时，利用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等资财，大肆扩充保安总队，极力增强地方实力。这时由南京逃往香港的龙云先后派人与卢汉联络，策动他尽早反蒋起义。但卢此时对时局尚存观望之心，两人步调始终难以一致。1949年2月12日，昆明市民传闻部分金圆券为伪票，纷纷前往中央银行挤兑。卢不问青红皂白命宪警就地枪决了无辜市民二十一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惨案。5月，云南绥靖公署成立，卢为主任。

1949年秋初，卢汉眼看蒋介石政权朝不保夕，便进一步打算在政治上自谋出路。曾向美国请求帮助云南独立，遭到拒绝。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加强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的联络，又派人由香港到北平和中共联系。8月，卢还派人联络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并通过刘联络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约同他们在适当时机共同反蒋起义。与此同时，卢在不损害其统治地位的原则下，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对国民党政府也展开了反压制斗争，如拒绝桂军入滇，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卢汉的这些自谋出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密切注意。这

年秋天，以代总统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极力主张采用武力把云南纳入其势力范围，并派遣军队兼程入滇。但蒋介石集团不让桂系独占云南，抬出“和平解决”予以对抗。卢与桂系夙怨很深，自忖实力尚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远在湘鄂一带，在蒋与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再三催迫下，卢乃于9月6日去重庆就范。蒋允许云南的保安团编为两个军，卢也答应回云南后进行反共反民主的“整肃”。9日，在大批特务挟持下，卢在云南开始了全面的“整肃”，先后逮捕进步人士八百多人，布置“围剿”边纵，解散省参议会和部分进步大中学校，查封一些进步报刊，部分改组省政府，发布反共文件和进行反共宣传等。

不久，人民解放军向桂、黔、川等省进军，云南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边纵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蒋介石在云南的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已处于战略包围之中。这就促使卢汉认清了形势，决心投向人民，走上反蒋起义的道路。11月3日，李宗仁为实现桂系残部在桂、滇一带继续负隅顽抗的图谋，以代总统名义来到昆明巡视，对卢进行游说拉拢。此时卢已决心起义，李的企图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被卢利用他和蒋的矛盾，经他同意于是月中下旬先后全部释放了在“整肃”中被逮捕的进步人士，“整肃”工作无形停止。与此同时，卢宣布请病假两周，在家专心筹划起义。他先后派人去广州联系中共领导；又联络“边纵”牵制蒋军；拒绝蒋派张群来昆明建立反共基地；调整兵力部署，并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具体执行起义任务等。为适应新的环境，卢下决心戒除了多年的鸦片烟嗜好。12月9日，正当人民解放军三面包围成都，蒋介石将在云南实行新的反共阴谋时，卢通电全国宣布云南起义。11日，正如卢后来所说的，为给自己留有后路，他私自放走了在起义时被扣押的张群。16日到21日，在中共地下党和全市各族人民的支援下，以兼程援滇的人民解放军为后盾，卢主持了昆明保卫战，击退了蒋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对昆明的进攻。

解放后，卢汉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等职。多年来，他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对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4年5月13日，卢汉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卢汉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1974年5月19日。

林南园、孙代兴：《卢汉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卢兴邦

陈孝华

卢兴邦，原名良，号光国，福建尤溪人，生于1880年10月16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出身贫寒。

卢兴邦青年时以贩卖土纸为生。民国初年，因向本乡一家地主赎典竹林，与地主发生争吵，被指控通匪，遭官吏索捕。卢逃往德化，投奔土匪头目苏亿，并改名兴邦。后来他纠集卢兴明、卢兴荣等一伙人，在德化、尤溪交界处打家劫舍，不到一两年就发展到数百人。1915年、1916年，福建督军李厚基先后派兵进驻尤溪，对卢兴邦剿抚兼施，均无法将其歼灭。

1918年，“援闽粤军”许崇智部攻克永安时，派孙本戎与卢兴邦联络，卢归附。许崇智委卢为粤军第三师第五旅第九团团长。当时许部与李厚基军队相持于沙县、永安一带，数月不能决胜负，因得卢兴邦的援助，得以击败李军，卢被擢升为第五旅旅长。

1922年秋，许崇智率北伐军由赣入闽，联合王永泉进攻福州李厚基时，委卢兴邦为讨贼闽军第三路司令。卢出兵葫芦山，进占樟湖坂等地，协助许崇智进攻水口，将李厚基的一个团击败缴械。10月，孙中山令在闽的北伐军改称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以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任卢兴邦为东路讨贼军第一独立旅旅长。这时卢部地盘扩大到尤溪、大田、宁洋及永安县。1923年初，东路讨贼军回粤，卢改任东路讨贼军留闽第一师师长。

粤军回师广东之后，直系军阀孙传芳、周荫人相继率部入闽，卢兴邦与北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1924年春，方声涛回闽联络各地民军，以卢兴邦部为基础，在大田成立闽军总司令部。卢趁机扩充实

力，逼走方声涛，此举使这次对抗北洋军阀的计划受挫。

卢兴邦与盘踞沙县的民军郭凤鸣部常为争夺地盘而发生摩擦。1925年5月间，郭凤鸣得到福建督军周荫人的允准，由福州溯闽江北运一批枪械。卢兴邦获悉，派兵予以全部截劫。周荫人大为震怒，下令宣布卢兴邦罪状，撤职通缉，并大举进剿。卢部被迫退出尤溪县城，化整为零，除以一部主力留在尤溪山村外，其余则分股流窜闽北各县。在这以前，卢部曾改称为建国军，但未公开，这时则正式宣布将所部一律改换建国军旗帜[(1)]。10月，孙传芳调动军队向苏皖奉军进攻。周荫人为了支援孙军，把攻打尤溪的兵力全部调走。卢部乃于11月重新占据尤溪县城。后经樟湖坂基督教牧师吴銮仕出面调停，双方划界，互不侵犯，战事始息。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2月何应钦率东路军进入福建后，委卢兴邦为闽北指挥官兼福建政务委员会委员。卢部乘机进占南平，并在樟湖坂截击周荫人残部，缴获大批军火。他还派兵进攻沙县，把郭凤鸣残部卢新铭驱走。卢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独立师，卢兴邦任师长兼闽北绥靖委员，设闽北绥靖公署于南平，从此闽北各县尽为卢所占领。卢部发展迅速，分驻闽西北各县。北伐军离闽去浙时，何应钦把从周荫人手中接收下来的洪山桥兵工厂和造币厂交给卢兴邦。卢把工厂的设备、人员都搬迁到尤溪去，大量制造枪械弹药，加强装备。

1927年7月，杨树庄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卢兴邦任省政府委员。他以师长兼省府委员身份，带兵数千到福州参加就职典礼。这是卢兴邦第一次到省城，他为了替自己制造舆论，开展了一些社会慈善活动，如捐助私立开智学校基金、捐款给私立协和大学盖“光国楼”等。卢在福州逗留十几天就回南平，自此便一直躲在山城，再没有到福州去了。1928年9月，福建省政府改组，卢兴邦未再列名于其中。12月，卢部缩编为陆军暂编第二师，辖两旅，卢兴邦为师长。

自1926年至1930年，卢兴邦盘踞闽北达五年之久，独揽辖区内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各县县长都由卢委任，成为闽北的土皇帝。他在尤溪口等处设立税卡，抽收木排捐、上下水船捐、百货捐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卢将掠得的银元运到尤溪，秘密改铸为成色低劣的双毫小洋，通令所辖各县通用，从中掠取高利。同时还滥发钞票，先后发行过“华通券”、“广裕券”[(2)]，以此暴敛黄金与银元。另外，他还派人充当福建盐运使，控制重要的盐税收入。

这一时期，卢兴邦为了谋取更大发展，派部属杨愚谷等人携巨款前往南京、上海一带，多方钻营；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笼络国民党权要。

卢兴邦胸无点墨，却故作风雅，1929年10月五十岁生日之际，他在南平举行大规模寿庆，将收到的许多寿序、寿诗汇印成册，广为赠送。蒋介石从南京派专员前来祝寿，送他一幅寿匾[(3)]，卢引为无上光荣。

到1930年，卢兴邦所部除嫡系的卢兴明部、卢兴荣部外，还有归附他的闽西卢新铭、古田钱玉光、尤溪陈荣标等部，共达万人，管辖闽西北二十余县。卢兴邦欲凭此基础，进一步夺取全省权势。适阎锡山酝酿反蒋，卢派人潜往太原向阎输诚；同时派人赴南京探察情况，拟乘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政局动荡之际，推翻以杨树庄为主席的福建省政府。1月初，杨愚谷从南京打来电报说“蒋倒可行”，意为“蒋若倒，事可行”[(4)]。卢却以为蒋政权已经垮了，即下令于1月6日晚上在福州扣押省政府六名委员，送禁尤溪，造成轰动一时的“绑架六委事件”。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阎委卢兴邦为中华陆军第二十军军长，并允帮助卢扩充实力进攻福州，许卢事成后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卢兴邦大喜[(5)]。蒋介石为解决福建问题，除派张群至福州进行调解外，并调刘和鼎第五十六师驻福州，下令讨伐卢兴邦。卢则响应阎、冯进行反蒋，部署攻打福州。刘卢战争8月爆发。由于卢部团长钱玉光被方声涛收买，杀死了卢部旅长陈荣标，卢部迅速动摇。10

月，卢兴邦战败求和，通电悔过，释放了被扣的省府委员，嗣后又用金钱央托陈肇英出面疏通。于是蒋介石取消了对卢兴邦的讨伐令，并把卢部改编为陆军第五十二师，仍以卢为师长。经过这场战争，卢的势力大为削弱，地盘也缩小了，只剩下沙县、永安、尤溪三县。同时卢部薪饷规定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发给，而地方各项税收则归省府掌握。称霸一方的卢兴邦，从此一蹶不振。接着，蒋介石驱使卢部参加“剿共”，委卢兴邦为“闽西剿匪指挥官”，令其所部开往闽西，分驻沙县、永安、宁化、清流、归化各县。在永安、宁化等地，卢部时时挨红军攻打，损失实力不少。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反蒋前，为拉拢土著军队，曾与卢兴邦部联系过。卢派卢兴荣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商谈合作。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时，卢兴邦电贺蔡廷锴等人就任新职，表示“谨率所部，抱橐负弩，静候指挥”。后卢又通电接受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委任，就人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职，并为十九路军提供一些蒋军情报[(6)]。但与此同时，卢兴邦又派人去见蒋介石，接受讨伐十九路军和镇压“闽变”的任务。卢部为了阻止红军推进南平与十九路军联合，在沙县、尤溪死守两个星期，使入闽的蒋军能够迅速通过南平直驱福州，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7)]。卢部还为蒋军卫立煌部带路，直趋永泰，袭击十九路军。

1934年初，蒋介石在福建解决了十九路军后，即调动军队大举进攻闽西红军。卢兴邦第五十二师也被编入进攻序列。蒋军从南平、沙县向归化进攻，卢部则从永安向清流、归化推进，以牵制红军兵力。红军撤离闽西开始长征后，蒋军随即开进闽西地区，卢部也乘机进驻清流、归化一带。

这时，蒋介石乘势进而解决卢兴邦部。蒋以参加“会剿”为名，先把卢兴邦所有部队调离闽北老巢，开到龙岩地区，与蒋军混驻在一起；继而对卢部主要人事加以调整，改任卢兴荣为师长，派进黄埔系军人担任重要职务。1936年秋，卢部被全部调离福建，开往浙江。从

此，卢兴邦蛰居尤溪。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命令卢部从浙江开往上海前线参加作战，结果卢部在上海退却时几乎全部覆没。后卢虽在福建、安徽等地招募新兵，但经补充训练后又奉命开到安徽宁国，以连为单位被分别编入国民党第十八军所属第十一师、十三师。至此，卢兴邦的全部实力被蒋介石吞并了。

1945年10月29日，卢兴邦在尤溪病故[8]。

---

(1) 《奋兴报》1925年9月8日。

(2) 《江声报》1932年8月20日。

(3) 《卢光国五十寿言汇刊》。

(4) 许显时：《福建地方派系的倾轧与“一·六”事件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1页。

(5) 杨立等：《关于卢兴邦部琐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6)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7) 钟大钧：《闽北卢兴邦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90页。

(8) 《东南日报》1945年11月21日。

卢永祥

朱杰仁

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1867年10月22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五）出生于一个农村塾师家庭。1884年入山海关北洋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留任算学助教。此后在清朝军队中，历任新建陆军步队兵官学堂内堂教习，祥字营正哨长、充山东先锋队后路右营帮带、北洋新练左军右营管带、北洋常备军左镇马队第四营管带、第二镇步队第三标统带、陆军步队第二协统领、陆军步队第十一协统领。以军功荐保以提督、总兵记名简放，加墨尔庚额巴图鲁勇号，并加副都统衔，候补陆军副都统。1911年4月，卢永祥升任北洋第三镇（统制为曹锟）第五协协统，驻防奉天新民屯。其间曹锟丁忧，暂代统制职。10月，武昌起义爆发。10月27日，卢永祥参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领衔的联名电奏，提出立宪政纲十二条，要求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后又参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谋议组织的“立宪军”。但卢永祥忠于袁世凯，不理会张绍曾“集军滦州”的请求，而于11月率部第三镇第五混成协从东北去镇压山西革命军，并于12月初攻占山西门户娘子关，1912年1月初攻占太原。卢部军纪极坏，“纵掠太原，肆同狂寇”，山西赵城绅民铸卢永祥的铁跪像以示愤恨之情，其铭文称卢为“汉族之贼，满清之奴”、“山东巨盗，袁氏走狗”。当地人士曾上书袁世凯控诉其暴行，但袁世凯内阁于2月1日任命卢永祥会办山西军务。

1912年3月，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卢永祥任陆军第二十镇统制，驻防奉天，并授予陆军中将衔。10月，改镇为师，卢任第二十师师长，辖第三十九、四十两旅，并直属陆军部，但因张作霖、冯德麟的反对，卢调任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驻北苑。1914年5月，该旅扩充为陆军第十师，卢任师长，辖第十九、二十两

旅。同年，日本对德宣战，卢率部开赴济南，维持所谓“中立地位”。10月，第十九旅调防江苏松沪一带。1915年11月，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身亡，袁世凯为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将松江、上海两镇守使合并为松沪护军使，直隶中央，令卢永祥率部移防上海，任命杨善德为护军使，卢为第十师师长兼松沪护军副使，驻防吴淞。

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中，卢永祥虽未积极参与，但亦未加反对。但当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通电宣布独立，卢永祥于次日即与杨善德等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等立即“取消前电”，否则将“整率军旅，请旨声讨”。12月29日，又致电政事堂，劝袁速就帝位。待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卢永祥等又通电表示希望讨袁的滇、黔二省“捐除夙见，共济时艰”。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渐渐形成，卢永祥投向渐渐形成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1917年，杨善德升任浙江督军，卢永祥任松沪护军使。

1917年因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发生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的职务，段即发出一道教唆督军团起兵反抗的通电。卢永祥起而支持段祺瑞，一面在上海开会讨论“保护地方治安事宜”，又于6月1日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如不允所请，将“与独立各省一致行动”。6月3日，卢永祥在护军使署召开有关军事会议，议定“在沪军警行政各机关应取同一态度”，并将“中央文电暂行搁置”。4日，又电天津宪法研究会，再次表明解散国会的态度。同时，以护军使署的名义派代表参加天津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的特别会议。6月13日，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卢永祥于20日通电全国，表示今后“惟有力谋地方安宁，静候中央解决”。其时，应黎元洪之邀赴京调停“府院之争”的安徽督军张勋于7月1日复辟帝制，封卢为江南提督。7月2日，卢永祥召开紧急会议，表示反对复辟，但“要静观时局如何发展，以便决定进行”，并与海军将领程璧光联合通电，宣布参加讨逆。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通电宣告不再与闻政事，推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冯北上就职，

皖、直系对江苏地盘展开争夺。冯为保其江苏的地盘，于8月6日任命直系李纯继任江苏督军，皖派的卢永祥则于15日被委为会办江苏军务。段祺瑞执政北京政府后推动武力统一西南的政策，这又与冯国璋主和意见相左，卢对段的政策表示支持，11月中旬通电主张继续对南用兵。12月初，卢派代表参加了曹锟等人在天津举行的督军团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速颁明令，讨伐西南。当时直、皖对于新旧国会也意见相左，冯国璋主张同时取消旧国会和临时参议院。12月31日，卢永祥与主战派曹锟、张作霖等十督军联名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总统。

1919年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卢永祥一方面致电北京政府，称“民心向背实时局安危”，“国势虽弱，民心未死”，要求“请饬和会专使据理力争，坚持到底，以顺民意”，同时希望政府“力顾大局”，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免职。同时对于学生的罢课，认为于“治安学业两有关碍”，要求上海道尹设法消弭，又致电江苏教育会要求照常上课，其后又下令提前两星期放假。当上海的三罢运动开始后，卢永祥则宣布戒严。对于“五四”的新思潮，卢永祥极为反感，查禁《浙江新潮》、《新青年》等书刊，谓这些刊物“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贻害秩序，败坏风俗”。1919年8月，卢永祥任浙江督军，兼松沪护军使。巴黎和会后，日本多次催促中国与其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中国国内舆论强烈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补签对德和约。卢永祥一面对上海学生对于鲁案的罢课游行进行弹压戒严，一面于1920年2月多次致电北京政府，认为中国只有南北统一之后，“再行讨论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建议山东问题应交由国联解决。

1919年春开始的南北和会无果而终，1920年4月5日，卢永祥通电提出促进南北和议主张，称南北和议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根本解决者何？即法律问题是也”，“解决法律问题乃即为谋和之捷径，其他各问题均属善后之策”，认为取消中日密约解决军事协定等案并

不是国家根本问题，而只是外交上的事件。为此，卢指出“旧约法不适合国情”，“非从速制定宪法不可”，主张“从新、旧两国会中各选出若干人，协商组织宪法委员会”，速开制宪会议，以定国本而释纷争。4月23日，卢又通电倡议废除督军制度，指出督军制是“和议之梗”、“政治之害”，“共和政体之下，督军制似不相宜，是督军本非久存之物，亦非武人世袭之职”，“废除督军制实为今日切要之图”，为根本解决全国和平统一的途径。并表示愿意身体力行，“取消督军，请自永祥始”。5月，卢永祥发表《废除督军制度之商榷书》，对废督作了具体说明，废除手续“以六个月为最大限，入手之初，安置将校，次及裁兵，次及废除督军制”，设军事参议院安置高级将领，校官以下按军阶给予薪俸；士兵或充城镇乡警察，或改编警备队、工程队。而裁兵后“各省区地方治安之责，则有各行政长官担负”。

在直皖战争前，直系就密谋夺取皖系卢永祥、何丰林控制下的松沪地区。7月2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了由江苏督军李纯提出的沪、浙军政人事变动，以卢永祥为浙江督军，裁撤松沪护军使，改设镇守使，以第六七混成旅旅长何丰林为松沪沪镇守使，隶属江苏。卢、何拒不受命，由7月4日通电反对裁撤松沪护军使，谓“松沪沪地方重要，未便骤事更张”，要求“准予维持现状”。双方都调动军队，李纯调江苏第二师朱熙部进驻昆山，而卢永祥宣布上海地区特别戒严，派浙军开往南翔。然因驻沪领事团的强烈抗议及沪、浙各公团的奔走，苏、浙于7月12日进行和平谈判，达成《保境安民公约》，并将各自军队撤回原防。

1920年7月的直皖之战中，皖系战败，卢永祥成为皖系少数仅存有地盘的督军，在直系势力的包围下不自安。为此，对外卢永祥结奉系、粤方，谋组反直三角同盟，帮助困居福建漳州的粤军成功回粤，并向发起驱桂之役的粤军提供军火接济；对内，卢永祥提倡制宪自治以结地方势力，排拒直系进入浙江。1921年6月4日，卢永祥发出轰动全国的豪电，称中国由于各省分裂，造成南北对峙而不能统一，所

以中国只能由“分裂而进于分治，由分治而合成统一”，因此正本清源之道在于“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规”。同时，召集各省代表会议，商议办法交国民公决。6月5日，卢永祥致电徐世昌谓此为“欲求真正统一”的“根本补救之策”。豪电发表后，获得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赵恒惕、广东省长陈炯明、贵州督军卢焘、湖北督军王占元、川滇边防督办刘湘、安徽督军孙发绪等，以及各省法团和名流的支持。6月23日，卢永祥邀集浙江省长沈金鉴及浙江各军政主官在陆军袍泽社召开省宪意见沟通座谈会，称豪电“用意在分权自治”，而不是主张浙江独立。9月9日，浙江省宪会议通过省宪（“九九宪法”），又公布省宪实施法；9月22日又组成由卢永祥、蔡元培、黄郛等九人为委员的宪法执行委员会。虽卢一再表示制定省宪法“实为不可稍缓之事”，他本人“期望其早日有成”，但省宪公布后，卢恐实行省宪后要受约束，不能专擅自由，借口部分浙人对省宪内容的不满，终不愿实行。1922年浙江省议会又将“九九宪法”作草案的一种，另以其他草案三种，以红、黄、白三色识别（“三色宪法草案”）交由公民总投票，后亦未举行总投票程序。正如时人所说：“主张省宪，献媚浙人，及省宪议成，则授意私人，沮其行使。”

1921年，梁士诒内阁同意日本的要求，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引起国内反对鲁案的风潮。卢永祥于1922年一二月间连续致电总统徐世昌，称“胶济路案，关系吾国生死存亡”，应确定胶济路为民有“以管理权畀诸人民”。同时，梁士诒内阁经办鲁案真相不明查，“内则堕政府之尊严，外则启友邦之诽笑”。同时声称，现在救中国之良策不外乎“第一条即不借外债，第二条即财政公开”，卖路亡国系急性病，借款卖国系缓性病。

1922年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着手恢复民国初年之国会以“法统”对抗孙中山护法旗帜，又欲迎黎元洪复任总统以为曹锟做总统之过渡。6月2日，徐世昌以衰病辞去总统职务，6月3日，卢永祥发表通电反对法统之说，谓徐世昌去职，以政权付诸

现内阁摄行，内阁还诸国会无法律依据；黎元洪辞职“以后未满之法定任期已由冯河间（国璋）代理终了，已无职可复”，因此黎是“事实上的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5日，松江沪军使何丰林响应卢的通电，表示反对黎复职。6月6日黎元洪发出复职的“废督裁兵”条件的鱼电，6月10日黎元洪通电谓复职法律问题付诸国会解决，11日，黎元洪复任总统。卢永祥因黎元洪有“废督裁兵”的主张，便于6月16日宣布，“即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之职”，任浙江各法团公举之军务善后督办，颁布善后纲要，“以第十师师长名义，暂行维持原有防地，并协同省长及各镇守使、各师长共负地方治安之责”。6月20日，卢永祥通电称，“自废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实际上变相宣告浙江独立。

7月，卢永祥发表《与国人商榷国事书》，对解决时局提出较详细的意见。卢称直系“以己意代民意，仍是伪善”，虽“有异于暴乱，而其播革命种子则同”，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强“行使法律上之职权”，“徒种革命之恶因”。卢认为中国政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法律问题”、“自治问题”、“裁兵及善后问题”。法律问题，即是黎元洪复职问题，卢认为解决之道“一、须依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总统；二、由合法总统提出国务员经国会同意后组织内阁；三、国会迅速制定宪法”。对于“自治问题”，卢永祥认为，北京政府对自治有两大误解，其一“误认自治为西南革命之旗帜”，但实际上自治为民国“立法上之悬案”，“以自治权付诸各省，是谓分权自治”，“各省以独立之意味互相联结拥护其自治，是谓联省自治”；其二北京政府“误解自治妨碍统一”，实际上省宪自治完全实现，政治必臻统一，并提出分省自治有使“武人势难割据”、“免除立法困难”、“党派之势力”等十大利。对于“裁兵善后问题”，卢认为“欲裁兵必先废督乃为显著之事理”，分三步办理：“第一步，废除巡阅、督军，依次废除镇守各职事，缩小军事范围，专办善后。”“第二步，俟全国统一，军事改定，确定每省养兵之额。始能确定裁兵之数，资遣办法尤须划一。”“第三步，专办安置裁兵事宜。”其法为“改兵为工”、“移兵实边”等。7月，卢永祥又将

浙江电信收入归浙省支用。10月10日，通电各省，表示其废督旨在“保境安民，扶植民治”。这些都推动了浙江省的制宪自治运动。

面对直系的活动，皖、奉、粤三派加紧活动，一面谋破坏曹锟贿选之计划，一面加强联络，而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杭州成为反直三角同盟活动的主要地点。1922年下半年，孙、奉、段（卢）各派代表在上海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协同反直宣传活动，组织国闻通讯社，作为反直宣传机构，以卢的代表邓汉祥为社长。其时，受直系逼迫的黎元洪已不安于位，于1924年6月13日离京赴津，部分议员有南迁动议。卢即于6月23日通电，表示欢迎议员南迁上海制宪。26日又重申，“维护赞助之责，当与国民共之”，并资助部分南下议员之经费。其后又通电反对所谓大选，谓“民国元首地位，全赖法律保障，免相争攘，若根本产生于非法，则先播下革命种子”，现在选举“不外藉法律为面目，拥出制造革命之人”。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10日就任总统，12日卢永祥通电否认曹锟为总统，并宣布与北京政府停止公文往来，以示决裂。卢永祥反对曹锟贿选活动的表现，也使其“遂获美誉于东南”。其时，直系的江苏与皖系的浙江因松沪问题，战争之势已不可免，但因直系未解决福建的问题，吴佩孚不赞成江苏齐燮元督军武力对浙。1923年8月，在两省地方人士的调停下，齐燮元与卢永祥签订了“江浙和平公约”。10月，卢与皖督马联甲又签订“皖浙和平公约”。1924年1月，又应江、浙绅商之请，齐、卢发表和平声明书。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江浙战争是从福建问题引发的。1924年6月，被福建军务督理周荫人从闽逐出的皖系臧致平、杨昭化部经赣入浙，为卢所收编为浙江边防军。卢的扩军引起苏、赣、闽、皖四省的不安，要求卢解散臧、杨所部，卢永祥拒不受命。吴佩孚、齐燮元以此为藉口，通电声讨卢永祥，谓其“背叛国家”、“荼毒地方”，确定苏、皖、赣、闽四省合力攻浙计划，得到直系的将领江西督军蔡成勋、陆军巡阅使冯玉祥、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河南督军张

福来、湖北督军萧耀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安徽督军马联甲、甘肃督军陆洪涛、直隶督军王承斌、山东督军郑士琦、闽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及西南的川滇边防督办刘湘等的通电支持。为防止直系的进攻，卢永祥作了军事部署，成立浙沪联军，在龙华设司令部。9月2日，齐燮元下总动员令，苏军强占了安亭车站，战争爆发。3日，苏、浙两军正式接触，卢就任联军总司令，发出声讨曹锟通电，谓“已然贿选，国民蒙羞”。卢起兵后，反直联盟的粤方孙中山于4日决定北伐；奉方张作霖通电表示扫除民贼，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7日，曹锟下令免去卢永祥、何丰林本、兼各职，并令齐燮元督所部“相机剿办”。开战之初，浙军进展顺利，自孙传芳出兵由福建入浙后，战局直下。10月12日，卢永祥通电下野，与何丰林、臧致平避走日本。10月17日，曹锟下令通缉卢、何等人。第一次江浙战争以卢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古北口前线率部秘密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垮台。11月13日，天津会议召开，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等四十余人参加，讨论国会存废、战争善后等诸多问题，但与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则是“将来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张、冯、卢决定采取“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为过渡，得到段的首肯。11月15日，卢永祥与张作霖、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等通电，表示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决定对直系长江各省“护宪军政府”进行讨伐。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12月3日任命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旋改卢任苏皖宣抚使，免去齐燮元江苏督军职。12月16日，张作霖决定派奉军张宗昌、韩麟春，原皖系吴光新部为第一、二、三军南下护送卢永祥就任苏皖宣抚使，由卢永祥节制。12月18日，卢永祥在天津宣布就任苏皖宣抚使。1925年1月6日，卢致电江苏各军政官员，称其南下，系“为宣布中央德意，全无畛域之见，更不存恩怨之心”。10日，卢顺利入驻南京。但齐燮元不甘失败，于11日与孙传芳合组江浙联军。14日，卢正式在南京组建宣抚军，以张宗昌为总司令。16日，段下令查办齐

燮元，由卢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同时，为拉拢孙传芳，任命孙为督办浙江军务，使齐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卢军于17日发起攻击，至28日齐战败逃往日本，29日张宗昌部占领上海。奉系势力伸入长江流域。第二次江浙战争结束。奉系军队进入上海，引起孙传芳的不满，1月28日向北京政府通电，称齐燮元的军队败退，齐已不问军事，要求卢永祥所部还辕北上，辅弼中央，否则为自卫计，只能兵戎相向。1月31日，卢永祥宣布取消宣抚军名义，2月1日，卢永祥宣布来苏只为驱逐齐燮元，所部并未侵犯他省地境。孙传芳、卢永祥对松沪的争夺，经陆军总长吴光新的调停，达成上海兵工厂由上海总商会接管，松沪护军使一职由吴光新担任的协议。2月9日，孙传芳通电撤军，其后张宗昌通电表示听从卢永祥节制。

2月27日，卢永祥就江苏善后事宜致电执政府，提出“以一日不废督，则一日不能息兵”，要求请将其江苏军务善后督办一职明令永远废除，“以为各省倡”，同时开去宣抚使差以结束江苏的战事。废督之前，“大要者有二：曰定军制，曰划军区”，就江苏而论，“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徐州一带，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大江以南，永不再驻国军”。这一建议得到上海总商会和熊希龄、屈映光等的响应。但未被段采纳，卢仍兼江苏军务善后督办。3月3日，卢永祥再次谈及对时局意见，认为苏督一职志在必去，“非此不能永弭江浙之纠纷，且非此不能尽撤江南之兵”。就中国统一而言，卢仍主分权自治的意见，“中央政府只管外交，将财政、军事等概行任之各省自筹”，而宪法的起草“应该由各省分别起草，各提一案，而在北京设一审查委员会，汇集审议成一本，交各省举行总投票”。在善后会议期间，卢永祥多次致电段祺瑞，主张“废除督办，军驻军区，饷由部给，不干民政”以收束军事。

由于卢永祥是依靠奉系军队的力量取得江苏，因此“受制奉军，不能展布”，且奉系势力伸入长江流域后，不断侵食原属皖系的地盘，引起张作霖与段祺瑞的矛盾，卢曾参与调停，无果。5月，宣抚

使署正式撤销，8月11日，段祺瑞准予卢辞去苏皖宣抚使兼江苏军务善后督办。

此后，卢永祥去天津做寓公。1932年1月，卢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代表。1934年6月2日，病逝于天津。

主要参考资料

卢永祥：《废除督军制之商榷书》，1920年5月印本。

卢永祥：《与国人商榷国事书》，1922年7月印本。

卢久芳：《回忆我的父亲——浙江督军卢永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铁岭市银州区委会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银州文史资料》第4—5辑，1985年版。

陈益轩编：《浙江制宪史》，浙江制宪史发行所1921年版。

《卢永祥氏之时局谈》，《国闻周报》第2卷第8号（1925年）。

卢作孚

周凝华

卢作孚，又名卢思，四川合川人，1893年4月14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贩卖麻布的小贩家庭。少时就读于本县瑞山书院，后因家境困难辍学。十五岁时徒步赴成都，入文化补习学校，进修数学、语文和英语，一年后自学。他阅读了一些欧美社会学说的著作和孙中山的著作，结交有进步思想的同学，立志奋斗和爱国恤民的思想初露端倪。

1916年春，卢作孚经乃兄卢志林举荐，就职成都《群报》，继又入《川报》，任记者兼编辑（两报同属民间报纸）。1919年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是年冬，卢据往来拉萨的商人秦君安口述有关西藏情况，撰写述评《西藏往事的谈话》，在《川报》头版连载，引起人们瞩目。同时，卢以记者身份参加省议会旁听，在《川报》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评议省议会动态，在四川舆论界崭露头角。1920年，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邀卢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1921年初，他到泸州应职，并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恽代英及萧楚女等人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卢与他们过从甚密，齐心推行新文化运动。1922年，川省军阀混战，杨森败退，卢亦去职返回重庆。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聘卢任省教育厅长。他婉辞未就，改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一年后，卢辞职回桑梓合川。

卢作孚见我国经济落后，回合川后决心弃教经商，开办航运业，与朋辈商谈颇得支持。他对重庆所有轮船公司现状做了一番调查，于1925年10月11日发起开办航运公司的筹备会，同窗好友、地方商贾及知名人士共二十三人到会。卢提出“避实就虚”的方针，说：“办航运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

失败的同业竞争，而应经营嘉陵江重庆至合川间新开的航线。”[1] 他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商定集股二万元（银元），每股五百元，造一适于航行嘉陵江的小轮，经营合川至重庆间五十二里航运，月余得股资八千元。卢偕黄云龙自筹三百元路费，携款往上海购船。卢、黄与各船厂研讨两月后，向上海合兴机器厂订购一艘长七十五尺、宽十四尺、深五尺、载重量七十吨、吃水浅、专营客运的小轮，造价二万余元。这时，合川电告卢、黄，言募股维艰，勿订造船合同。卢考虑再三，得厂方同意分期付款后，毅然签署合同。

1926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川正式成立，公推卢作孚为总经理。8月初小轮造成，由上海驶回合川，取名“民生”，航行合川、重庆间，间日开航。航行三个月，盈利颇丰，股东见有利可图，纷纷认股，不久集足五万元。

一年后，民生公司盈利四万元，股本增至七万三千元。1928年初再购轮船一艘，取名“民用”。次年10月，与重庆顺庆轮船公司合并，改“顺庆”轮为“民望”轮。卢作孚把三艘轮船的航线做如下调整：“民用”航行渝合（合川）线，“民生”航行渝涪（涪陵）线，“民望”航行渝叙（宜宾）线。一年后，盈利九万余元，股本增至二十五万元。

1929年底，卢作孚应刘湘之聘，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一年，从而巩固了民生公司在川江航线上的地位。卢作孚为谋求民生公司的发展，针对外轮航运公司船多势强和压迫我国商轮航运的现状，向川江上的我国轮船公司提出，“集中财力人力以维持华商航业之生存”，“化零为整”的要求[2]，并言明“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增加资本，接受必须售卖的轮船，或合并可以并于民生的公司”[3]。其方式可以是购买，亦可折价入股，职员量才录用。自1930年10月合并福川轮船公司起，至1934年7月先后有二十三家华商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接收和收买轮船二十五艘。至此，民生公司基本统并了川江上的华商轮船公司，拥有轮船三十一艘，总吨位超过万吨，职工增加到两千人，股本增加到一百一十七万元。

民生公司随着船只的逐年增多，航线亦由短航向长航发展。1931年春开航渝宜（宜昌）线，1932年6月开航渝汉（汉口）线，不久开航渝宁（南京）、渝申（上海）线；又相继成立万县、宜昌分公司及汉口、上海、沙市等办事处；各埠口之趸船、仓库、货栈亦同期建成。

民生公司的崛起，引起在华外国轮船公司的惊恐，外商视民生为其牟取暴利的威胁，企图以雄厚资本将其压垮。1934年，航行川江的外商轮船公司较大者有十七家，实力最强者有日商日清，英商太古、怡和，美商捷江，法商聚福等公司。民生公司由于在内部废除了买办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了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民生制度”；能依恃本土社会环境，适应航运市场的需求；地方及中央政权某种程度的支持；以及卢作孚经营有方；更由于民生公司顺应了全国人民要求收回长江航运主权的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民生公司非但未被实力强大的外轮公司挤垮，反而有所发展。1936年，民生公司轮船增加到四十八艘，职工增加到三千八百余人，股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资产扩充到一千万元。在竞争最激烈的1934年盈利四十万元，1935年盈利四十四万元。相反，各外商轮船公司却受到不同程度打击，意商光耀公司竞争失败，其“光华”轮被民生公司收买；美商捷江公司于1935年倒闭，其轮船亦被民生公司收买；英商太古、怡和等公司，也先后被迫退出川江。至抗战爆发前夕，民生公司已成川江航运主力，卢作孚维护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

卢作孚在致力发展航运业的同时，还创办了与航运业发展配套的民生机器厂、三峡织布厂，投资合营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重庆公共汽车公司，捐资开发重庆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兴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地方医院、北碚图书馆、北碚温泉公园、兼善中学等诸多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卢创办实业的魄力和才干出众，1935年秋被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任命为省建设厅厅长。卢任职两年后，坚辞而去。

卢作孚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就主张武装反抗日军入侵，并把他于1930年考察东北三省的见闻，写成《东北游记》一书，公开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1933年，重庆各界召开纪念“九一八”血耻日两周年大会，卢在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日本侵华罪行，并提出“中国船不装外国货，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的主张，且率先在民生公司实行[(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积极动员民生公司职工参加抗战。他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5)] 8月，民生公司调配大小船只三十余艘，两周内运送四个师两个旅的川军开赴抗战前线。9月卢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卢出任政府资源、工矿、贸易三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转运长江中下游入川物资和人员。卢带领民生公司职工，不分昼夜，全力抢运。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二十余万吨待运进川的物资和十余万人员滞留宜昌，亟待中转四川。卢坐镇宜昌亲自调度指挥，并在川江采用“三段航行”和夜航来增加运力，四十余日内将主要物资和人员基本运完。为此，卢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1940年夏，卢作孚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其主要精力仍倾注于民生公司的航运业。他采用多种手段扩展民生公司实力，抵制官僚资本的控制。这时，民生公司航线虽回到川江及其支流，但运输量却有增无减，1945年年客运量由1938年八十万人增为五百万人（不含兵运），年货运量由十四万吨增到十七万吨。民生公司的轮船由战前的四十八艘增到一百一十六艘，投资业由战前的十八家扩展到五十六家，经营项目有矿产、冶金、机电、机械、建材、纺织、金融、贸易、保险、木材及新闻出版，资本由战前的三百五十五万元扩充到1944年的八千万元（银元）。

抗战后期，卢作孚为在长江航运获得优势，并发展东南亚海运，

想从外资找出路，频繁地与欧美国家外交和实业界人士接触。1944年11月，卢作孚作为民营交通界代表应邀出席纽约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他接踵拜访美国政府及实业、金融界上层人士，寻求贷款。次年春，卢访问加拿大，在原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仑（Victor W．Odlum）将军推荐和安排下，会见了加拿大议会两院领袖及政府总理、财政部长等。加财政部、商业部同意安排三家银行向民生公司贷款在加造船，但要双方政府出面担保。卢向国民政府申请“担保”，不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之搁置一年有余。卢急切之中两次面见蒋介石陈述理由，才取得同意。1946年10月，卢再度赴加拿大签订贷款造船合同，由该国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共同贷款一千二百七十五万加拿大元，分别由该国戴维造船公司、圣劳顿斯机械造船公司建造五千马力新型客货轮三艘和二千四百马力新型客货轮六艘。由于加方以材料涨价为由，一再提出加价，迫使民生公司加付现钞一百五十万美元。后来由于加方延宕交船期限和国内战局变化，这些船舶皆未投入运营。

卢作孚为加速开办海运，1946年成立民生公司上海总经理办公处，亲自坐镇上海，运筹指挥。是年8月，修葺一新的“民众”轮首航上海至台湾成功，为民生公司发展史之新起点。同年底及次年春，由卢任董事长的太平洋轮船公司（民生公司、金城银行各出资五十万元兴办）三艘“海”字号海轮，亦先后开辟由上海至天津、青岛及上海至广州、香港航线。1948年4月，民生公司“南海”轮自香港首航日本成功。1949年初，该公司从美国购买轮船五艘，经改装为货轮后，开航东南亚诸国，成为远东航业界一支崭露头角的新军。至此，卢早期设想的民生公司“由川江向长江、由长江向沿海、由沿海向东南亚和日本发展”的航业规划终于实现[(6)]。此时，民生公司拥有江、海客货轮一百一十七艘，职工万人，创我国近代民族航运业之冠。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卢作孚寓居香港。这时，台湾当局曾派俞鸿钧、叶公超等人游说他去台，卢婉言相拒。人民政府先后派

许涤新、张铁生等人与卢联系。卢在港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使民生公司二十余艘轮船，没有被台湾当局破坏或劫持。他积极做好率船回来的准备。1950年1月，周恩来电邀卢回北京共商国家建设大计，卢于6月中旬顺利回到北京，出席了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生公司滞留在港的二十余艘江海轮和物资，以及价值二千万美元的财产全部返回大陆。民生公司所欠加拿大贷款，均由人民政府还结一清。

卢作孚在新中国除继续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外，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于重庆去世。

卢作孚一生写有不少文章，编集成册的有《东北游记》、《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国的建设与人的训练》。

---

(1)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1946年版，第7页。

(2) 王余杞：《民生实业公司》，《交通杂志》第2卷第6期（1934年）。

(3)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1946年版，第17页。

(4) 《关于“九一八”纪念大会函件记录和决议案》，《新世界》第31期（1933年）。

(5) 卢作孚：《民生实业公司如何为抗战服务》，《新世界》1944年5月号。

(6) 王世均：《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1页。

鲁涤平

颜平

鲁涤平，字咏安，号无烦，湖南宁乡人，1887年11月3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生。父亲在晚清为州、县官府吏。鲁涤平幼年受父母家教甚严，入塾就读甚勤。后入玉潭书院，成绩优异。

1903年，鲁涤平得亲戚之助，入湖南兵目学堂习武，两年后继入速成高等科。1906年结业后，在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任见习官、排长、队长。他为人宽和达观，与士兵官佐相处甚洽。其时清廷窳败，年轻的鲁涤平受到革命思潮影响，谋求国富民强之途。经本乡亲戚周震鳞介绍，于1909年在长沙秘密加入同盟会。鲁涤平曾在第四十九标兵营中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应者甚众。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湖南革命党人受到鼓舞，积极准备起义。10月22日，鲁涤平与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兵分两路攻入长沙城内，与巡防营革命士兵会合，占领省谘议局、军装局和巡抚衙门，取得了起义的胜利。鲁等新军代表拥护焦达峰、陈作新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10月28日，鲁升任独立第一旅（第四十九标改编）第三营管带，开赴湖北支援武汉保卫战。11月17日，独一旅从武昌向清军冯国璋部占领的汉口展开攻势，战斗激烈。鲁英勇作战，身先士卒，不幸负伤，但仍坚守阵地指挥作战，打退了敌军对三营防线的进攻。鲁有伤不下火线且英勇作战，受到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黄兴的嘉奖。后因伤势日趋严重，回到武昌治疗。嗣后独一旅回到湖南，编为第四师，鲁涤平升任第六团团长。

1915年10月，谋以帝制自为的袁世凯，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取代谭延闿为湖南都督。12月，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反袁护国战争，湖

南立即掀起了激烈的反袁驱汤斗争，鲁涤平率所部参加湖南护国军。1916年7月，汤芗铭仓皇逃逸。8月，谭延闿复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随后湖南护国军改编为两个师，鲁涤平任第二师第六团团长。翌年9月，谭辞职离湘，北京政府派陆军次长傅良佐继任湘督。第二师奉命出击在衡阳与永州宣布独立的霍陵镇守使刘建藩、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但鲁涤平不满傅入湘主政，参加了第一师驱傅之战，将傅之北军悉数逐出湘境。但1918年3月，北京政府又任派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张劣迹昭著，湘人掀起驱张运动，鲁涤平在1920年5月与北军作战中又立新功，被升为独立第三旅旅长。1921年1月，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将湖南军队扩编为两个师和十个独立旅，鲁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随后赵恒惕援鄂“联省自治”，鲁被任命为援鄂军第二军司令，率师进入湖北，但在吴佩孚军的攻击下败退回湘。鲁黯然神伤，决心提高自己的指挥本领，以重振湘军声威。

1923年7月，谭延闿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北伐“讨贼军”入湘讨伐赵恒惕，并于8月8日任命鲁涤平等四人为军长。初时鲁不愿得罪赵，于8月27日通电称“两姑之间难为妇”。后双方开火，鲁则劝和停战。但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赵得北军支持，声势日盛，鲁部两个团均投赵，鲁则率一个团宣布效命于谭。11月，陈炯明叛军进攻广州，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回师救粤，鲁随谭赴粤，被任命为援粤湘军第二军军长。在粤北南雄、始兴等地，鲁率部堵截叛军告捷，使粤北转危为安，陈炯明叛军攻势受挫，解了穗城之围。

1924年10月，谭延闿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北伐军总司令，鲁涤平奉命率师入赣，但被方本仁军击败，残部返回北江。谭在南雄设立湘军整理处，以鲁为副总监，将收容所湘军缩编为六个团。1925年6月，鲁协同谭率部参加讨伐刘震寰、杨希闵在广州的叛乱。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各军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粤之湘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身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为副军长。第二军辖有张辉瓒第四

师、谭道源第五师、戴岳第六师和陈嘉祐教导师，另有直属的炮兵团，全军实由鲁涤平负责统率。在10月第二次东征中，鲁指挥第二军一举扫清了北江的叛军残部，收编遣散了连江一带的熊克武部。12月又渡海至海南岛，肃清了邓本殷残部，为广东的统一作出贡献。

1926年7月，北伐战启。8月，鲁涤平统率第二军由韶关开赴湘赣边界茶陵、醴陵一带，警戒江西孙传芳军，以掩护第一、第四军北进攻占湘、鄂。9月3日，北伐军右路总司令朱培德下令第二、第三、第六军攻赣，鲁率第二军进入赣西，先后攻占萍乡、宜春、分宜、清江、安福等县，接着沿赣江东岸前进，与赣军邓如琢部激战，终于在9月24日克吉安，29日渡赣江，10月2日占新淦，4日克永泰，5日进樟树潭，从莲塘向南昌靠拢。此时蒋介石下令鲁涤平率第二军会同第一军刘峙第二师、朱培德第三军围攻南昌。10月11日拂晓，北伐将士冒着敌军之猛烈炮火登云梯攀城，与守军展开白刃战，激战数日不止，伤亡枕藉。守军纵火以御，大火延烧数日，南昌城区尽成灰烬。北伐军伤亡过重，鲁涤平奉命撤围，退驻丰城和南昌南边一线休整，并监视赣东之敌。接着鲁指挥所部20日攻克抚州，23日占领进贤，再回师向南昌靠拢。此时，北伐军从湖北战场调来第四军张发奎第十二师和陈铭枢第十师，新编的贺耀组独立第二师也到达武宁。经过调整，南路由蒋介石指挥自亮安攻南昌，北路由白崇禧指挥自武宁攻德安。11月2日发起总攻后，孙传芳军难以抵御，南昌守军蒋镇臣部弃城出逃，遭到鲁涤平等围攻部队截击，悉数被歼。11月7日，南昌光复。

1927年3月，北伐军沿长江东下，鲁涤平率第二军编属程潜江右军，鲁兼任第二纵队司令，与程潜第六军、贺耀组独二师一道，由赣东北沿长江南岸疾进，3月6日占领芜湖，3月24日攻克南京，缴获直鲁军枪械三万余。嗣后，鲁率部离南京，辗转于湘、鄂一带。接着第二军扩编为第二、第十四两军，鲁正式担任第二军军长。

这年10月，鲁涤平率第二军参加了李宗仁、程潜的西征军讨伐唐

生智。翌年1月，西征军又入湘，下岳阳，占长沙，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鲁军继续由荆河进攻津县、澧县。3月2日攻入常德，继占桃源、大庸。但李宗仁与程潜发生冲突，于5月21日扣押了程潜。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即根据李宗仁为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的决定，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仍领第二军（编遣后改称第十八师）。

得到谭延闿信赖和支持的鲁涤平主湘后，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在湖南全境展开清乡“剿共”，层层设立“铲共”清乡机构，村村实行“大家联结”，挨户清查共产党员和红军家属，对于抗拒“联结”、“揭发”的，则血洗火烧。此时，蒋介石与桂系冲突加剧，湖南成了争夺焦点。1928年12月，蒋介石运送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入湘以备倒桂之需，不意被桂系截获了一批。1929年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以鲁涤平“铲共”军事不力为名，撤免其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职，另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继任湖南省主席。蒋介石即以此事发动讨桂，3月26日，国民政府发布讨桂令，由蒋介石任讨伐军总司令。蒋迅即调集三路大军进逼武汉，鲁涤平为第五军军长，冲锋在前。桂军李明瑞、杨腾辉两部阵前倒戈。胡宗铎、陶钧、夏威等部向鄂西败走，于4月21日通电听候改编。李宗仁、白崇禧只得败归广西，一时如日中天的第四集团军就此瓦解。鲁涤平除在国民党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军事委员外，此时还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8月17日，鲁又调驻江西省政府主席，其后又兼第九路军总指挥。

1930年12月，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赶到南昌，部署“围剿”江西工农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事，调集十一个师又三个旅共十万余人，任命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作战。蒋叮嘱鲁要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从吉安到建宁建立八百里的弧形围攻线。鲁将所部编为三个纵队，以主力从永丰、乐安前进，一部由广昌石城推进。12月16日起，鲁指挥主力部队向苏区中心地带进犯，至21日分别进至东固、草台岗、三坑等地后继续前进，28

日向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麻田等地实施总攻。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在白龙冈前进时，遭到埋伏在附近山中的工农红军袭击，激战一日，师部及第五十二、五十三旅均被歼，张本人被俘。谭道源第五十师闻讯后急从源头向东韶撤退，1931年1月3日被工农红军追歼一个多旅。鲁涤平指挥的这次“围剿”彻底失败，其第九路军的两个师又得到如此下场，甚为伤感，幸而未受到蒋介石的惩处，第十八师也准予重新建立。

此后，身为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对蒋介石更是唯命是从。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碉堡封锁”战术，在封锁线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在交通要道和制高点上的碉堡更是星罗棋布，以配合蒋介石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战争。为对付机动灵活打游击战的工农红军，鲁涤平还在全省划分若干个行政区，设立“行政督察专员”来加强对所辖各县的控制和封锁。但是“围剿”战事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参战将领为推诿罪责就指责鲁涤平治赣不力。当鲁原来倚为靠山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已于1930年9日病逝后，更感到孤单无援，乃向蒋引咎辞职。但蒋心知肚明，反认为鲁对自己还是忠顺不贰的，乃于第二次下野前夕的1931年11月15日，调鲁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的党政军各级班底，皆为蒋之嫡系所掌握，在政海沉浮有年的鲁涤平到任后，凡事谨慎从事，从不深加过问。更因1933年秋脑血管病加重，难以视事，一再说辞。1934年春，得蒋介石允准，调南京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闲职。

1935年1月24日，鲁涤平因脑溢血在南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1929年南京刊印。

周康燮：《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香港大学图书公司1987年版。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

鲁迅

陈漱渝

鲁迅，原名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败落的家庭。

鲁迅七岁进本宅私塾就读[(1)]，十二岁转入被称为绍兴全城最为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祖父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官府趁机敲诈勒索，父亲身患重病，鲁迅的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在家庭破落的过程中，少年鲁迅开始体会到上层社会的虚伪和腐败。鲁迅还一度寄居在城郊的外婆家。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为他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础。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派的“新政”彻底破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勃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激发了鲁迅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他决心不顾守旧人们的嘲笑奚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1898年5月，鲁迅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被编入管轮班。11月，鲁迅离开水师学堂，回乡省亲。年底，参加会稽县试。但鲁迅对“博取功名”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府试。次年1月重返南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所学校，鲁迅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并且在下矿实习过程中开始接触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人。1902年1月以一等第三名优异成绩毕业。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接触了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爱读《时务报》、《译学汇编》，卢梭、孟德斯鸠、斯宾

塞的著作，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等。他读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受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的深刻影响，惊怵于亡国的危险，决心奋起图存。《天演论》中关于发展变化的观点，又使他感到了斗争的意义，增强了前进的信心，从而初步形成了他早期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

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留学。1902年4月，抵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寿裳，此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分为反清与保皇两大营垒，鲁迅站在反清方面，毅然带头剪了辫子。课余他贪婪地阅读欧洲各国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迫切地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他还经常参加反清革命民主派的各种集会。为了抗议弘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苛待与侮辱，鲁迅跟五十多名同学一度退学。这期间，他编译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编写了论述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情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发表了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鈤》，翻译出版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同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后来在谈到学医的动机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3)

然而，鲁迅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一次，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他在幻灯片上看到中国人被日军砍头，围着看的一群中国人神情麻木。他感到了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从此改变了医学救国的思想，转而志向于文学，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告别了教学认真并没有民族偏见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06年3月重返东京，学籍列在东京德语学校，开始文学活动。

1907年夏，鲁迅计划筹办文艺杂志《新生》，作为从事文学活动

的第一步，但没有成功。此后，他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介绍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所谓“摩罗”诗人，大力进行思想启蒙工作。鲁迅还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一些短篇小说，这是他译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开端。这期间，鲁迅同革命党人陶成章等人时有过从，共谈时事，并参加光复会为会员[(4)]。他还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半年多。

1909年夏，鲁迅因家境困难，离日归国。他先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化学和生理学，并兼任博物课植物学的日文翻译。因为校长夏震武搞忠君尊孔，鲁迅和其他二十几名进步教师相率罢教，终于迫使这个保守顽固分子辞职。

一年后，鲁迅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原名绍郡中西学堂）监学，兼教生物学。课余辑录散见于类书中的唐以前的古小说，后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又辑录有关会稽的古代历史、地理逸文，后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革命军攻入杭州，绍兴人民欢欣鼓舞。在绍兴开元寺举行的迎接光复大会上，鲁迅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为了教育群众，稳定局势，戳穿惑乱人心的反革命政治谣言，鲁迅还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组成“武装演说队”，手持刀枪上街宣传。绍兴光复后，鲁迅被绍兴军政分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这年冬天，鲁迅创作了第一篇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曾经以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接这次革命的鲁迅，目睹绍兴光复后招牌虽换却骨子依旧的情景，陷入了深沉的失望。为了“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5)]，鲁迅积极支持南社在浙江的分社——越社创办了《越铎日报》。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公余，他往江南图书馆（后称江苏省国学图书楼）辑录唐宋短篇小说，后辑成《唐宋传奇集》。5月，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教育部前往北京。

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袁世凯掌控了国家政权，组成北洋军阀政府，国家形势日益险恶，鲁迅感到极其痛苦。他一度倾心于辑录、校勘古籍，研究佛学经典，搜集、研究金石拓片。他在孤独中思索着辛亥革命的教训，在尖锐的思想矛盾中探寻着国家和民族的新路。他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期间，在提倡美育、制定注音字母方案、开展通俗教育、筹创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鲁迅“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焕发出蛰伏已久的战斗热情，发出了勇猛的呐喊。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专制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他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发表了《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1923年8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与此同时，鲁迅又创作了大量文艺性的论文——杂文，以尖锐、泼辣、生动的战斗风格，批判了“节”、“烈”、“孝”等封建礼教，揭露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尊孔复古主义，表现出彻底反帝反专制的革命精神，保卫和发展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成果。这些杂文，大都收集在《热风》和《坟》里。后来，杂文这种文体成了鲁迅战斗的主要武器，在他一生的文学事业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从1920年秋季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后来他把讲义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公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我国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至

1926年止，鲁迅先后在北京八所大中学校兼课，成为广大革命青年景仰的导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群众运动逐渐高涨。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革命形势深入发展，促使“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6)]。在这次大分裂中，鲁迅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突破进化论观点的局限，曾一度感到“布不成阵”的苦闷和彷徨，但却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一边，坚持战斗，坚持探索，坚持前进，构成了鲁迅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倾向。他陆续写成了后来收集在《彷徨》中的十一篇小说，还写下了散文诗集《野草》等著作。在杂文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鲁迅对宣扬复古主义的“甲寅派”和以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为主体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坚定的韧战。

为了培育文艺新苗，广泛制造“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进步舆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发起并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和帮助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莽原》半月刊运作，编辑了《莽原》周刊、《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等。

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标志，革命运动在1925年至1926年迅猛发展。鲁迅受到鼓舞，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勇于站在斗争前列，“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7)]。他三次为“五卅”惨案捐款，热情参加了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同时，继续写作大量杂文及其他作品，包括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表现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革命精神。

鲁迅的英勇战斗，使北洋军阀政府十分忌恨。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通缉的名单。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并为新的战斗做准备，鲁迅在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前往福建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开设“小说选及小说

史”、“文学史纲要”等课程[8]。文学史讲稿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公开出版。在厦门大学期间，他继续写了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一本《两地书》以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等，共十七万余字。他还把1907年至1925年间写的二十三篇杂文编写为《坟》出版。此外，还鼓励和指导厦门大学学生组织文学团体和出版刊物。同年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设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等课程，后又被特聘为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广州期间，中共广东区委派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等人跟鲁迅联系，经常将《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党团刊物赠送给他。鲁迅对代表党团组织跟他联系的革命青年特别热情，多方面对党团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

通过在广州的实地观察和跟革命青年的接触交谈，鲁迅了解到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卖活动而造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深刻裂痕，觉察到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正在暗暗地加紧进行。1927年4月10日，在北伐军相继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庆锣鼓声中，鲁迅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写出了《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文章整段地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指导，要人们吸取历史教训，警惕革命的精神从浮华、稀落到消亡、复旧，力戒自高自满，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永远进击，彻底消灭敌人。两天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证实了鲁迅的科学预见。4月15日，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密令，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召集中山大学各主任开紧急会议，跟学校当局展开斗争，力主营救被捕学生。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继续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杂文，大都收集在《而已集》中。10月，鲁迅离广州赴上海。

鲁迅在广州虽然只度过了八个多月，但这一段斗争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

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9]

鲁迅到上海后，与许广平结为终身伴侣。他跟柔石等革命作家和中国济难会等革命团体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他决定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在上海定居不久，就跟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鲁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与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对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10] 在1928年和1929年，他用很大的精力翻译文艺理论著作，主持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以及俄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都曾编入这套丛书。他除曾一度主编由北京迁往上海出版的《语丝》周刊外，还跟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大力介绍外国的文艺创作和批评，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还帮助柔石等人组织朝花社，介绍苏联和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版画艺术，先后出版了《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和《艺苑朝华》。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杂文，编入了《三闲集》。

国民党当局在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发起进攻。1930年2月，鲁迅参加发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为纲领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及其他进步作家结合在一个革命文学阵营之内共同战斗。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

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向革命作家提出了战斗的要求，指明了当前战斗的方向。他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并亲自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文艺研究》等。他率领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对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学团体“新月派”、对国民党特务策划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将。9月，“左联”在上海为鲁迅举行五十寿辰庆祝会，祝贺他在开创和发展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光辉业绩。

左翼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的罪名通缉鲁迅。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传闻将搜捕鲁迅。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鲁迅被迫离开寓所去别处暂避。不久，他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在“左联”的秘密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战死者，并撰文在国外报刊上揭露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这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鲁迅撰写了一系列犀利的杂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这两年间的三十七篇杂文和一篇译文，收集在《二心集》中。

1932年初，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战。鲁迅和茅盾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同年，鲁迅会见从苏区来上海的红军将领陈赓，向他了解红军反“围剿”和苏区人民的生活及文化建设等情况，很受鼓舞。

1931年至1933年期间，鲁迅与瞿秋白从通信、见面到结为知己。瞿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以避敌人的追踪，得到鲁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许多关照。他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并肩战斗，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一道构思和写作了一批批判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杂文。瞿秋白高度评赞鲁迅的杂文，1933年4月亲自编选《鲁迅杂感选集》，选收鲁迅1918年至1932年间的杂文七十四篇，并撰写序言，深刻论述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向鲁迅学习，我们应当和他一同前进。”(11)

1933年1月，鲁迅担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他不顾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迫害，参加营救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共产党人的活动；并跟宋庆龄等人一道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6月18日，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鲁迅冒着极大的危险，亲赴万国殡仪馆为杨铨送殓。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会议，鲁迅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同年，鲁迅会见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并参与发起为被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遗族募捐活动。

在同形形色色的敌人和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鲁迅用各种笔名写作了大量战斗的杂文。这期间，鲁迅着重批判了鼓吹“文艺自由”论的“自由人”胡秋原和打着“第三种人”旗号而后来当了国民党书报审查官的苏汶（即杜衡），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在超阶级文艺观幌子下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进攻。鲁迅把1932年至1933年写的杂文，编集在《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蒋介石在1934年疯狂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又鼓吹以所谓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再次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文化教育界的尊孔复古派蠢蠢欲动，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于是文言与白话的争论复起，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大众语的论争，成为当时文化“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一个侧面。鲁迅坚持中国语文的改革和文艺大众化的方向，8月作《门外文谈》，对这场论争作了科学的总结。同时，鲁迅作《答国际文学社问》，先后发表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和苏联《真理报》，向全世界宣示了自己对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的坚强信念。他把这一年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写下的战斗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指出这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12)]。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号召。10月，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十分兴奋，请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托人经巴黎向中共中央拍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还冒着危险，保存了方志敏就义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和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手稿。这批珍贵的革命文物，后来由其他同志妥善转交给了中共中央。鲁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尊孔逆流，对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提倡所谓抒写"性灵"的闲逸小品以麻痹人民意志的行径，继续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这些战斗的杂文连同这一年的其他短文共四十八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出版。

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鲁迅还以很大的精力从事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的工作。苏联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是他在1931年8月译出的，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1935年至1936年最后战斗的时刻，还不知疲倦地翻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果戈理的《死魂灵》等名著。鲁迅寄无限深情和希望于革命文学青年，从各方面热忱关怀和积极培养他们。他到上海后虽然离开了教育岗位，但是仍然关心教育战线的斗争和青年学生的成长，多次应邀在上海、北京的大学讲演并热情接待来访的青年，回答青年们在数以千计的来信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鲁迅的周围，把鲁迅视为自己尊敬的良师益友。鲁迅十分热心地提倡战斗的木刻艺术，指导青年组织木刻团体从事创作。1931年8月，还曾举办木刻讲习班，请日本美术教员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自己亲自翻译。以后又陆续举办展览，编印画集，介绍外国优秀的版画艺术作品，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6年，鲁迅虽然身患重病，但仍以"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奋斗精神坚持战斗。2月，他转交了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接关系的信件。4月底，他会见了受党中央之命由陕北来上海的冯雪峰，兴奋地听取冯介绍红军长征的经过及中国共产党

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9日，他抱病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冯雪峰笔录），反击托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诬蔑。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13]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重申："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同时，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他赋予这一口号的含义是：一、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二、但在文学问题上仍可以互相批判；三、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14]。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切感情，他还托人将火腿等礼品赠送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

这一年，鲁迅还亲自编辑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苏联版画选集》等书籍。他满怀深情地将瞿秋白翻译的论文和文学作品编成《海上述林》，亲自为之作序出版，以此作为对亡友的纪念，并向敌人示威。他本年撰写的三十五篇杂文，后编为《且介亭杂文末编》出版。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本杂文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组成治丧委员会。上海各界人民纷纷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二万余人送殡。鲁迅遗体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战斗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加上日记和书信，约一千万字以上。其中包括杂文集十六本，小说集三本，散文诗集一本，回忆散文一本，辑录、校勘后公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中国古典文学史论著两本，现存书信一千四百余封，以及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其中1922年佚）。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从20世纪初年到30年代的斗争生

活。此外，他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近一百位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编印成三十三个单行本，总字数超过二百五十万，促进了中国跟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编印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的著作和译作，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以及《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出版，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重新注释的《鲁迅全集》（十六卷）也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全部出齐，新版《鲁迅全集》（十八卷）于2005年出版。北京、上海、绍兴、广州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在国家文物局、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等学校成立了研究鲁迅的专门机构。鲁迅的作品在全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国家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出版了他的作品，不少国家还出版了他的传记和研究论著。

---

(1) 《朝花夕拾·五猖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

(3)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

(4) 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见《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林辰：《鲁迅事迹考》，开明书店1949年版。

(5) 《集外集拾遗·〈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7卷。

(6)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

(7)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

(8) 《厦大周刊》第168期（1926年10月28日）。

(9) 《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

(10) 李霁野：《纪念鲁迅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1)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卷》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

(13)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

(14)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

陆伯鸿

熊尚厚

陆伯鸿，名熙顺，字伯鸿，以字行，祖籍四川，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上海。其祖父从四川到上海经商，父亲开办棉纺织厂。陆家信奉天主教，他幼年接受教会教育，在上海董家渡天主堂小学读书。之后又苦读“四书”、“五经”，1894年考中秀才。他的父亲很想让其走科举道路，但陆伯鸿两次赶考举人未中，遂改学法文，随后任一法籍律师的秘书。

陆伯鸿弱冠之年，于本家经营的工商业内习商，数年后开始主持家业。20世纪初叶，时值上海开始兴办水电业，他首先参与投资电灯业。1907年秋，陆和李平书、王一亭等人发起创办上海内地电灯公司，接办原上海马路工程局的电灯部，资本银十万两。内地电灯公司开办后，电灯数量日增。1911年，陆为了扩大经营，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抵押贷款十万银两，他担任公司总经理。至1918年装电灯达两万盏，营业颇为发达。

1912年春，陆伯鸿以电灯公司储有电机多台，另可用于行驶电车之用之由，经董事会同意，乃募集股本发起创办南市电车公司。资本额四十万元，实收半数，机车由求新机器厂制造，呈请上海市政厅批准立案。翌年8月1日开始试营，他任总经理。至1915年正式开车，公司名称增加“华商”二字，定名为上海华商南市电车公司。同年，与朱志尧等人合组大通地产公司，陆出资一万银两，同上海巡捐局订合同，租南市新马路的沿浦滩地及岸线地带，租期三十年。其后南京国民政府将该地段没收。几经交涉，得收回租权十五年，重新订约付租，陆损失金五万元，租地三分之一。

陆伯鸿主持经营的上海内地电灯公司和上海华商南市电车公司，数年间获利颇丰。但两公司在分别经营的情况下靡费之处甚多，在他的提议下，经两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于1918年1月合并，更名为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二百万元，董事长王一亭，他任总经理。其后营业发达，1934年为扩充水电建设和偿还债务，发行公司券六百万元。

在经营电气业获得成功之后，陆伯鸿于1918年春集股五十万银两，在浦东购地创办了和兴炼铁厂。置炼铁炉两座，日产生铁十余吨，陆任该厂经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营业甚为发达。惜大战结束后，外货倾销，炼铁厂不得不于1920年停办。然陆并未气馁，于1924年招收新股五十万银两恢复生产。1926年后，他改以炼钢为主，改名和兴钢铁厂，所出产品有机件浇钢、家具硬钢、竹节钢条等。经中国工程学会、上海同济大学和英租界工部局试验，发给产品合格证书，上海报纸称它“战胜洋货”，一时尚能获利。此时，他对国产钢铁业充满信心，热心提倡国货。1927年春，发表《中国之钢铁事业》一文于上海《商业杂志》第一卷第二期，认为中国钢铁多为洋货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信用外货之积习已深，其实中国之钢铁并不比外货差”；指出“上海和兴钢铁厂的产品即可与欧美并驾齐驱”，颇具民族自豪感。然而在外货充斥中国市场贱价倾销的情况下，和兴钢铁厂到头来还是陷入困境，于1928年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呈请救济维持。

陆伯鸿除经营以上企业外，还从事航运业，与人合办有大通仁记航业公司和大成内河轮船公司。1924年6月，他和朱志尧、杨在田等人集资四十万元，合办大通仁记航业公司，任总经理，于上海设总公司，拥有“隆大”、“鸿大”等轮船四艘，避开长江各主要口岸，行驶上海至通州、扬州航线。同年还创办了大成内河轮船公司，新建和兴码头埠栈。大通航业公司开业后，与南通的大达轮船公司互用降低运费及给回扣等手段展开激烈竞争。由于合伙人朱志尧拥有求新机器厂，

大通公司用改进轮机提高航速的办法占有优势，至1933年秋终于迫使大达与大通联营，设立办事处共同议价、统一会计等，竞争始告结束。

陆伯鸿在上海商界声名日隆，除任上海华商电气公司总经理、大通仁记航业公司总经理和和兴钢铁公司董事长等外，还先后担任过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第一任华董、法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市轮船公会监委、航业公会执委等职。

由于陆伯鸿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天主教，他从小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成年后积极从事宗教活动与社会慈善事业。清末民初，他先接收老普育堂，将其革新后更名新普育堂，相继在南市开办医院、养老院、福利工厂及学校，通过社会慈善事业捐款甚多。此后，他又陆续在北京开办中央医院，在上海开办圣心医院、普慈疗养院、时疫医院、施药局，并不断扩建医院、增加病房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同时，他还热心普及教育，开办男女中学五所及幼儿院。其在慈善事业方面的任职有：上海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华麻风救济会董事、中国防痨协会监事，是上海慈善事业方面的著名人物。

陆伯鸿在传播天主教活动方面也非常努力，在上海市区及其他一些地方经常深入民间传教，进行布道工作。他对于宗教十分虔诚，每天清晨必到教堂做弥撒茶礼，然后才去办理其他事务。1911年，他和天津的雷鸣远等人在京津地区筹组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两年后在上海成立上海公教进行会，担任会长。1928年，全国公教进行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他被推为总会长，成为全国天主教会的领袖人物。陆伯鸿曾于1926年前往罗马参加国际圣体大会，晋见了罗马教皇。后在1936年3月又被罗马教皇授以“袍剑爵士”勋位。在中国天主教界他与雷鸣远齐名。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沪地难民和伤兵甚多，陆伯鸿积极投身慈善救济工作，开放了他主持的医院、养老院。由于忙于救济工

作，直到上海被日军侵占，他还留在上海。之后，陆在家隐居未出。及至顾馨一等人出面组织伪市民协会，他被顾等人拉下水。

1938年12月30日，陆伯鸿被抗日志士暗杀于法租界。

主要参考资料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

张若谷：《陆伯鸿——人物与事业之九》，《人言周刊》第2卷第21期（1935年8月）。

申报年鉴社编辑：《申报年鉴：民国卅三年度》，上海申报社1944年版。

陆费逵

熊尚厚

陆费逵，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幼名沧生。祖籍浙江桐乡，后移居嘉兴，1886年9月17日（清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生于陕西汉中。其太高祖陆费墀为乾隆时四库全书总校官，父陆费芷沧曾在直隶、山东、河南、汉中等地做幕僚。陆费逵六岁时，父亲改入江西南昌府幕，遂移家南昌。其母吴幼堂，出身书香门第，颇识诗书，陆费逵从小由母亲教读。1898年戊戌变法时，他阅读《时务报》等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即弃旧学，改为自学史地、算术等新书。并入南昌英语学塾学英文，更常阅读新书新报，走自学成才的路。1902年，陆费逵在南昌与人合办正蒙学堂，八个月后因经费不继停办。次年春，他随老师吕星如去武汉，临行时母亲对他说“蓬矢四方，男儿之志”[(1)]，勉励他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武昌后，他任塾师，同时继续师从吕星如学日文。1904年，陆费逵在武昌与黄镇盘等人设新学界书店，担任经理。在店中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和其他新书。他自著《岳武穆传》，借以抒发反清革命思想，并积极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1905年春，革命党人刘静庵借圣公会附设之阅报室——日知会，为革命机关，并用日知会名义发展革命党人。陆参加日知会的革命活动，曾为日知会起草章程。日知会成立时，他任评议员。1905年秋，陆费逵辞去新学界书店经理职位，与张汉杰、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吴研人创办的《楚报》，任主笔，不时纵论时政。同年底，该报因著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陆费逵逃往上海，任昌明公司支店（书店）经理兼编辑，同时参加上海书业商会筹备工作，负责起草章程。该会正式成立后，陆任评议员兼书记，此后，陆费逵遂转到以教育、文化和出版事业救国的道路。

1906年6月，陆费逵主编《图书月报》（由上海书业商会主办，出至三期停刊）。同年冬，他到上海文明书局任职员兼文明小学校长和书业商会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在文明书局期间，他与俞复等人着手编辑一套新教科书，但因资金不足未能出齐。1908年秋，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及师范讲习社主任。他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重实利教育，并对小学堂章程提出改革意见，倡议改革旧教育制度[(2)]。其议论思想新颖，富有革新精神，在上海轰动一时。同时，陆费逵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并提倡白话文。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费逵曾为该会起草章程，同时，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次年秋，武昌首义胜利。陆看到革命定能成功，认为教科书应有大改革，也是另创书局的有利时机。当时，商务印书馆对教科书未做改革，陆费逵已与戴克敦、陈协恭等人筹集资金，暗中加紧编写新教科书，并进行新书局的筹备，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和“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注重实际教育”以“融和国粹与欧化”为宗旨，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办事及编辑人员十余人，陆费逵任局长，汪海秋（涛）任编辑长，陈协恭任事务长，最初只经营出版业务。该局开办后，陆费逵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以与同业竞争，并首先发行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教科书。同年又出版了《新制中华小学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刊出新国旗作封面。中华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赢得了教科书的大部分市场。1913年春，他去广州视察分局及考察广东等省教科书之发行事宜，沈知方进中华书局任副局长，陆费逵将中华书局资本增至一百万元（先收五十万元），编辑所设于上海东百老汇路，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与当地绅商协议，合资成立中华书局分局，共达十七处，总分局人员增达二百余人。又添办印

刷所，扩充编辑部，聘请范源濂任编辑长，编辑初小、高小教科书。他还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出版印刷业务，回国后大力加强出版，改进营业，改组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邀请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和梁启超任董事，陆连任局长。中华书局业务蒸蒸日上，年营业额达二十余万元。

1914年，中华书局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局，并出版中华新学制中学教科书，创办《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等刊物。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增设发行所，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3)]。1916年6月，陆又将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分局增至四十余处，印刷所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千余人，成为国内第二家民营大书局。

中华书局因扩充太快，与同业的竞争又十分激烈，加以副局长沈知方个人破产影响所累，以致资金周转不灵，1917年6月几至停业。在陆费逵主持下，董事会决议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经营，后因条件不合未成。当时，范源濂请他去教育部工作，汪汉溪请他去任《新闻报》总主笔，他都未应允，决心再把中华书局办好。嗣后，经各方设法，有吴镜渊、高欣木等人投资，资金得以周转。12月，董事会改选，推举吴镜渊为驻局董事，于右任、孔祥熙、康心如等十一人为董事。陆费逵被董事会免去局长职务，仍责成以司理名义处理业务。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担任总经理。中华书局在他主持下，创办《中华英文周报》，出版《新教育国语教科书》、“教育丛书”、“教育小丛书”，编印《新文化丛书》等。1922年到1926年，中华书局的编辑和印刷人才辈出，又出版《新学制师范教科书》、《新学制中学农业教科书》，出版了《心理》、《学衡》、《国语》、《少年中国》和《小朋友》等杂志，刊印《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及《儿童文学丛书》。自1925年起，陆费逵兼编辑所长，并在常德、衡阳、梧州、九江、芜湖、徐州、青

岛、张家口及兰州等地增设分局，资本增至二百万元。1927年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又在香港增设了分局。

1929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仪器兼产桅灯。次年孔祥熙担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董事会推举孔祥熙为中华书局董事长。193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扩充印刷所，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政府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中华书局营业进展更大，年营业额增至四百万元。1933年开始出版“国防丛书”和“国际丛书”。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1935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随之迁入，规模更加扩大。同时，中华书局投资保安实业公司，设厂制造国防用的橡皮登陆艇、防毒面具和桅灯等。该厂后移至香港，继续生产，专为抗日国防做准备。

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所，沪、港两厂职工共达三千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是中华书局的全盛时期。

同年夏，他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抗日战争时期，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发表过不少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1912年1月，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提出当务之急有四：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章程；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和规定行政权限[(4)]。这一主张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采纳。又与蒋维乔共拟《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同年1月19日经教育部审定公布。主要内容为初小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注重手工教育，中学师范改为四年及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此外，他还发表《民国普通学制

议》、《新学制之要求》和《国民教育当采实利主义》等文，阐述他的教育主张。他自称是“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的人[5]，主张效法欧美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提议减少课时，缩短在学年限及注重实利教育。对学制教育、妇女教育、家庭教育和国民教育等论题，论述甚多。

陆费逵还大力推行国语运动。早在1906年，即曾发表《论设字母学堂》一文，主张统一国语，统一读音，改革文字。辛亥革命后，他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读音统一会，会后在上海提倡国语运动[6]。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文。

陆费逵主张用宗教的学说和精神从事教育工作，“教育人的灵魂”[7]。1918年秋，他与人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主张“采宗教之学说为精神之训练”，以佛教为“精神教育”[8]。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月，陆费逵在《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备战》的文章，主张“一致对外”、“长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9]。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分职工遣散。他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主持港厂和南方分局业务，上海中华书局由常务董事舒新城和吴镜渊主持日常事务，将印刷厂改为“美商永宁公司”，借资掩护以维持营业。

三十余年来，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重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近二万种。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陆费逵的声名愈著，成为全国书业出版界的巨擘。他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温州造纸厂筹备委员、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九龙寓所。生前著有《教育文存》五卷，《世界之教育》、《青年修养杂谈》和《妇女问题杂谈》等书。

---

(1) 陆费逵：《教育文存》第5卷，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11页。

(2) 陆费逵：《教育文存》第1卷，第22—30、72、105页。

(3) 民立图书公司原为上海大资本家席子佩等创设的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厂。见张静庐辑注《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0页。

(4) 陆费逵：《敬告民国教育总长》，《教育杂志》第10期（1911年1月）。

(5) 陆费逵：《教育文存》第1卷，第72页。

(6) 陆曼炎：《时贤别纪》第2集，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版，第77—82页。

(7) 陆费逵：《教育文存》第1卷，第20页。

(8) 陆费逵：《教育文存》第1卷，第19—24页；第2卷，第24页。

(9) 《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

陆皓东

江绍贞

陆皓东，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68年9月30日（清同治七年八月初十）生。他父亲陆晓帆一向在上海经商。

陆皓东与孙中山是同乡，两家相距不远，两人年龄相若，从小交好。陆八岁入乡间私塾读书，因喜爱图画，遭到塾师责备，他理直气壮地反问："图画也是读书的事，为何禁止？"[(1)] 塾师无词以对。表现了他从小就能明辨事理和刚强的性格。

1883年秋，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国返里，陆皓东与孙的交往更加密切。他从孙中山那里接受了许多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孙在家乡宣传政治改革，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不良，也使陆十分赞佩。一天，他俩为破除迷信，将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砸毁，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是年11月被迫离开家乡，避往香港。

陆皓东与孙中山到香港后不久，一起加入基督教。之后，孙留在香港读书，陆到上海，入上海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译电员，后升任领班。

1890年，陆皓东由上海回籍完婚。其时，孙中山正在香港、广州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探求革命救国的途径，陆皓东遂留下参加他们的活动。1893年冬，孙中山召集陆皓东、尤列、郑士良、程奎光、程璧光等人在广州广雅书局抗风轩开会，筹划创设革命组织，决定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因人数不多，没有形成具体组织。

此时，陆皓东与孙中山等人虽然开始筹建革命组织，准备实行反清革命，但仍未放弃和平改良的希望。1894年初，陆随同孙回到故里，帮助孙草拟上李鸿章书稿，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求国家富强。2月，他随同孙中山一道北上投书。到达天津后，虽多方奔走，仍未得到李鸿章的接见，上书也未被理睬。他俩怏怏而返，从此放弃和平改良的幻想，一心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是年冬，孙中山往檀香山创建兴中会，陆皓东留在香港，与陈少白等人从事革命联络工作。

陆皓东等人在香港的工作为建立革命组织创造了条件，孙中山于1895年1月底回到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2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正式成立，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该会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把革命斗争的锋芒明确指向腐朽的清王朝政府，并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因此，香港兴中会总部一成立，立即策划武装起义。3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求和，民情激愤，兴中会总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动武装起义，袭取广州做革命根据地。陆皓东亲自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的军旗。

起义方针既定，陆皓东与郑士良等人随同孙中山到广州筹备，在双门底的王氏书舍设立革命总机关，对外用“农学会”名义作掩护，由陆负责主持这个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联络了三元里的团防，北江、西江、汕头、香山、顺德一带的会党，以及城内外防营、水师的部分官兵。至8月底，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遂择定10月26日（旧历九月初九）起事。他们想利用重九这天回乡群众结队祭扫祖墓的风俗，乘机运械聚合。革命总机关决定：由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协助孙中山在广州指挥调度；杨衢云在香港集合会党充当突击队，于起义当日清晨进攻广州城内各重要官署，其他各路分途响应。

10月2日清晨，各路首领均往总机关领取命令口号，唯独充当主力的香港队伍未到。等了两个小时，始得香港队伍不能按时出发的电

告，起义计划被全盘打乱。孙中山考虑到既失误了约定的日期，难免走漏风声，除通知香港队伍停止出发外，并命各路队伍回去候命。第二天，起义事机果然泄漏，两广总督谭钟麟急调兵千余名回城加强防卫，并派大批军警四处搜捕党人。陆皓东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安排机关的人员转移。他自己最后离开机关，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同志带走，决定返回王氏书舍察看处理。同行的同志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2)] 言毕毅然返回。到机关后，军警果然接踵而至，将机关严密包围。陆皓东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待军警破门而入时，名册已成灰烬，陆则从容就捕。

陆皓东被捕后，清吏对他严刑审讯，妄图从他口中得知同党名单。他坚贞不屈，当庭直书，痛斥"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复慷慨陈词："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3)] 清吏气急败坏，对他施以钉手足、凿牙齿等种种酷刑。他多次死而复苏，始终不屈，并严厉呵斥清吏："你们可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4)] 11月7日，陆皓东被杀害。

陆皓东为了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的第一人"[(5)]。

---

(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1965年版，第2页。

(2)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1965年版，第168页。

(3) 邹鲁：《乙未广州之役》，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9页。

(4)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第170页。

(5)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194页。

陆建章

邵桂花

陆建章，字朗斋，号八庚，1862年（清同治元年）生于今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集陆家瓦房庄的一个小康之家。陆幼时不爱读书，常逃学。稍长，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十七八岁时就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1881年冬，陆建章因图谋霸占农家孀妇之财产，以暴力逼其改嫁而被拘坐牢。数月后，陆趁黑夜越狱潜逃至蚌埠投淮军，先充伙夫，后当上司书。1885年6月，李鸿章于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陆是首批从淮军抽调入堂的百名士兵之一。1887年11月，李鸿章奏请清廷，择其屡考优异学生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等人留堂充任教职员。

甲午中日战后，清廷于1895年12月派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练兵，陆建章任新建陆军右翼第三营后队中哨哨官、稽查先锋官，后任练兵处提调。未几升任左翼步队一营帮统。1898年12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次年12月6日，陆建章随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所率武卫右军赴山东镇压义和团。1902年，袁世凯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开始在保定建立北洋常备军，并于次年成立练兵处，下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以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副之，从而被袁纳为心腹。1905年2月，近畿陆军第六镇建立，陆建章任该镇第十一协统领官。后调任山东曹州镇总兵，旋改任广东高州镇总兵、北海镇总兵。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陆建章弃职北返，被清廷革职。旋袁世凯东山再起，任内阁总理大臣，委陆建章为京防营务处总办，京畿执法处处长。1912年初，冯玉祥因滦州起义事败被执解往保定时，陆因冯为其内侄女婿从而援手，使冯得以获释。

同年2月下旬，北洋军曹锟的第三镇因闹饷在北京发生兵变，从而成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的口实，陆建章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之一。当兵变发生时，陆竟佯装不知，在其衙署前对骑兵队、步兵队部署防堵任务。午夜陆带领卫队晋谒袁世凯，主仆见面表演了一出双簧戏。袁假惺惺问计于陆，陆回答："这事请总统不要管，无非一些土匪捣乱。交给我和姜桂题去办好了。"[(1)] 又说：事出内部，抓，必扰军心，又损大总统威望。要学楚王绝缨之令，明言土匪捣乱，胡乱杀一批百姓，先安军心，以后再交徐阁查处。得袁世凯首肯。翌晨，北京各城门口和街衢遍贴陆建章与姜桂题会衔捉拿土匪严禁造谣的布告，以清查户口为名，抓捕一些捡拾变兵丢弃衣物布匹等的小贩及贫民，在东单和西四牌楼斩首"示众"。这样一场蓄意制造的兵变，硬是被偷天换日给掩盖过去。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1913年2月，陆建章、李经羲在袁的授意下，在北京组织了以调解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党与政党之间冲突为名的"国事维持会"。3月10日，登上正式总统宝座的袁世凯调陆建章为总统府禁卫军参谋官。袁编练备补军前、后、左、右、中五路，各路又分前、后、左、右、中五营，委陆建章任左路统领兼左路中营营长、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遂委冯玉祥为备补军左路前营营长，并应段芝贵之请将其护兵、马弁安排在备补军中。

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打击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授意陆建章于8月27日非法逮捕了褚辅成、丁象谦等八名议员，此事轰动全国，引起国会议员的无比愤慨。参、众两院议长多次派人去军政执法处交涉放人，要求面见陆建章，陆则托词拒而不见。当时白朗军在豫西发展顺利，战火遍及省境，豫督张镇芳举措失利，北洋军遭重创。袁世凯派段祺瑞代理豫督，纠集两万北洋军大肆"进剿"。白朗军采取流动作战、机动灵活，突破围追堵截，向川陕转进。袁又派陆建章率京卫军西上助剿。狡猾的陆建章只是派所部尾

随白朗军到潼关。1914年元月，白朗军入陕。3月底4月初，连克商南、商县、柞县，越秦岭直逼西安。袁遂调段回京，改派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改京卫军第一师为第七师，由陆建章兼任师长率部援陕。派赵倜为会办，率军五千协同作战。又训令川军第三师进驻汉中防堵白朗军入川。白朗军入川受阻，乃决计乘河南空虚返豫。“进剿”白朗军失利，使北洋军之间产生矛盾，相互指责。袁世凯在不满之余，于同年6月6日电令陆建章，将失职人员从严惩处，达到剪除异己之目的。陆对此心领神会，于6月20日演出了一场“夺帅印”的闹剧，取代了陕督张凤翙。继之，袁世凯以“纵寇殃民”为由将张凤翙免职调京，任命陆建章督陕，并将白朗军所过各县知事撤换，一律由北洋派取而代之。随后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授陆为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陆建章督陕后，首先裁减陕军张云山第一师和张钫第二师的兵员。唯独第三混成旅旅长陈树藩以两万两烟土为贽，拜陆为老师得以保住旅长之职，还当上了陕南镇守使。陈还同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结成盟兄弟。陆建章在排斥异己的同时，把第七师扩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任贾德耀和冯玉祥为旅长。陆在陕极力培植党羽、启用同乡。当时民谣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2)，陕西人统以“徽客”称之。他们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引起当地“刀客”们的仇视。在西安一些小街僻巷，“刀客”刺杀“徽客”的事时有发生。陆建章为人极贪婪，在陕大肆搜刮。他垂涎陕军第一师师长兼陕北镇守使张云山的巨额财富，绞尽脑汁攫为己有，即使张货尽财竭仍然相逼，致张忧愤咯血，于1915年6月死去。陆以治丧为名，又占有张云山的女儿，侵吞了张的“富泰银行”。又如陆在陕西以禁烟局为幌子，公开卖鸦片，导致民怨沸腾。

陆建章一向仇视革命，督陕伊始秉承袁世凯的旨意，捕杀陕西革命党人张深知、王绍文等十八人，激起革命党人极大愤慨。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陆建章以个人名义发出拥戴电，被袁封为一等伯。讨袁护国军兴，陕西人民积极响应，当时在渭北的国民党人纷纷参与讨袁逐陆之役。1916年1月，陆建章急调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

北“剿匪”总司令，挑拨陕西人民内部自相残杀。同时陆又暗中调商震团入陕，编在陆承武旅中，企图消灭在富平隶属陈树藩的游击营胡景翼部，不料为胡侦知，经过周密部署，竟以少胜多，生擒了陆承武。5月9日，陈树藩在蒲城宣布独立，率部围攻西安。陆建章闻报大惊失色，下令紧闭西安四门，实行戒严，并征集大量石油、笤帚准备纵火屠城。同日陕西省模范监狱在押囚徒三四百人，趁兵临城下之机越狱暴动，陆派队镇压，把抓回监狱的犯人一律斩首示众，并沿街搜捕，祸及无辜。陆并借筹饷之名，从中国银行西安分行强行支取现金五十万元，中饱私囊。而陈树藩部则于16日进据西安，以所俘陆承武为奇货，对陆建章进行要挟，几经讨价还价，陆与陈订约十二条，陆建章以陕督位置让给陈树藩换回陆承武，并通告市民解职出境，其生命财产安全由陈树藩负责保护。5月26日，陆建章出城东行，随行卫队一千五百人，大车一百二十余辆，陈树藩亦躬送出城。当队伍行抵西安东关，霹雳一声格斗大起，车辆财物悉被抢夺，陆的随行人员及眷属纷纷逃散，其四姨太死在混乱中，陆得英国传教士帮助，避居教堂而幸免。陆建章于7月6日狼狈逃回北京。

这时袁世凯已死，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系。陆属直系，为握有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段祺瑞所排斥，陆只好暗自活动于各派系间，与驻廊坊的冯玉祥保持密切联系。1917年4月，北京段政府以抗命为由免去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时，引起该旅官兵大哗。段的亲信徐树铮、傅良佐不得不请出陆建章为之调停。陆说服了冯玉祥，并向全旅官兵讲话。他说：“他们歧视我们，蓄意消灭我们，只是妄想。但我们此时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倒变成我们不是了。我们此时正好养精蓄锐，谁也别想消灭得掉。看他们这样胡闹，必定有大乱子出来。那时，我们自然有办法出来。”[(3)] 其时，陆建章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闲职，授炳威将军。同年7月，北京发生张勋拥溥仪复辟，陆电召冯玉祥赴天津共谋讨张大计。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直、皖两系在对南方态度上分歧日益严重。皖段主战，直系冯国璋主和，而陆建

章则是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与各省直系军阀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福建前线皖系势力告急时，冯玉祥奉命率部援闽。出发前，段祺瑞找冯谈话，告诫冯玉祥应与陆建章断绝来往，为冯婉言驳斥。

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于11月行抵浦口停兵不前，久蛰思起的陆建章乃前往就商，拟借冯玉祥主张和平来博得个人声誉，并因利乘便攫取皖省地盘，又可使冯援闽停兵有观望的余地。得冯认同，陆遂赴宁，在苏督李纯处进行活动，企图造成“长江三督”（即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一致拥护和平的声势，与主战的段祺瑞相抗衡。此时，在湖南战场上的北军失利，北洋政府陆军部电令冯玉祥率部援湘。1918年2月，冯玉祥率全旅溯江而上，师至武穴驻扎不前，先后通电罢战言和、恢复国会，这打乱了段祺瑞对湘用兵的计划，同时对湖南战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冯的行动因触怒段祺瑞而被北京政府再次免职。而全旅官兵则愤慨抗命，与政府僵持不下。这时滞留该旅军中的陆建章，一面与主和派策划打击主战派，一面积极实施驱逐倪嗣冲夺取皖省地盘的计划。因为陆的主张有背冯玉祥保存实力、不参加内战的初衷，陆虽用多种办法逼迫冯玉祥采取行动均未得逞，于是大骂冯玉祥忘恩负义。

陆建章主和倒向直系，惹恼了段祺瑞，段对陆产生杀机。1918年4月，段赴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张敬尧、曹锟等人向段祺瑞禀陈陆建章在沪图谋不轨，已报院要求究办。同年5月，徐树铮、曾毓雋联名致电卢永祥称：“陆建章、孙洪伊等前次勾结土匪，扰害地方，今复在沪密谋，希图煽惑，望速密悬重赏，设法缉捕，务获究办。”[(4)] 必欲除陆而后快。

督军团会议定于6月13日在天津召开，代总统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赴津，拉曹锟重新回到直系行列与李纯合作，使督军团会议变成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局面。与此同时，徐树铮也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的名义致电陆建章，约其赴津参加督军团会议并有要事相商来诳骗陆上套。陆建章见电匆匆北上，于6月13日抵天津英租

界私宅。14日清晨，徐树铮电话诳陆建章到云南会馆，旋被拘禁。陆、徐相见，辩论甚剧，势难相下，徐借口此间人多，殊属不便，请入密室再谈。当陆建章步入后花园时，见园中及门口有许多持枪而立的军人正怒目而视，知已陷于危境，遽言曰："我不意竟死于此。"(5)一语甫毕，而枪弹连发，陆当即殒命。1920年，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后，10月28日徐世昌以炳威将军陆建章"被陷冤死"明令昭雪，着即开复原官员勋位及勋章。

主要参考资料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上册）军事，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第69页。

田布衣：《段祺瑞三度组阁与陆建章被杀》，《春秋》1968年第9卷第1期。

叶雨田等：《陈树蕃杀害南雪亭的前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兴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兴平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版。

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吴景南：《冯玉祥武穴通电主和前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2页。

(2)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

175页。

(3)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243、244页。

(4) 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5) 《晨钟报》1918年6月16日。

陆荣廷

李宗一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人，1859年8日13日（清咸丰九年七月十五日）生。他出身于一个僮族的贫民家庭[(1)]，父母早故，幼年就成了孤儿，曾在县城当学徒。十六岁时流浪到龙州，后被水口村盐贩谭某收养，在龙河上操舟贩盐，并娶谭女为妻。中法战争爆发后，他投到唐景嵩部下当兵，驻防中越边界水口关一带。战后被裁，他便和“游勇”以及秘密会党成员结伙，入中越边界山林中活动。数年后，逐渐扩大成有数百人的绿林武装，他成了这支武装的首领。

1893年，陆荣廷被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所部编为一营，当上了管带。1904年至1905年，他奉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命令，镇压广西各州县人民起义，捕杀起义首领多人，升为巡防营统领。1906年，他率领“荣字军”十一营[(2)]驻扎在龙州、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地，陈炳焜、林俊廷、谭浩明（他的内弟）都在他手下充当管带。同年夏，他到日本考察军事，年底返回龙州。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指挥革命党人一举攻占镇南关右辅山炮台，广西巡抚张鸣岐奉清廷严旨，限令陆和边防军总统龙济光七日夺回。他们如期攻陷了炮台，乘机对革命党人大肆杀戮。事后，陆荣廷升为右江镇总兵，不久改任左江镇总兵。1911年6月，又升为广西提督，驻南宁。当时广西旧军巡防营三十二营，其中十营又称边防军，由陆直接指挥。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迅速瓦解。广西巡抚沈秉堃和布政使王芝祥于11月7日在桂林通电宣告“独立”。沈、王为正副都督，陆荣廷也被推为副都督。陆荣廷对于突然到来的革命浪潮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当他在南宁接到广西独立的通电时，十分震惊，不知所措。后来，在革命党人和新军的压力下他才顺

风转舵，不得不于9日做出“附和共和”的表示，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南宁军政分府。但当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识破了他假独立的阴谋，想继续发难，被他侦知，于是他就逮捕了革命党人谭昌等人，并“发兵包围新军，勒令缴械”[3]，从而巩固了他在南宁的权位。

不久，沈、王两督不安于位，扬言北上“援鄂”，先后率队离桂。陆荣廷便由安边道陈凤昭、标统陈炳焜等地方实力派推举为广西都督。他于1912年2月率军进入桂林就都督职，次年又兼任广西民政长，并把省会迁往南宁，从此独揽了广西的军政大权。他打着“桂人治桂”的旗号，把旧军中的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等人，以及广西籍旧官僚和立宪派豪绅陈树勋、唐钟元、韦锦恩等人网罗在自己的周围，逐渐形成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桂系军阀集团，他是这个集团的首领。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抗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血腥统治。陆荣廷支持袁世凯，逮捕境内革命党人，残酷地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4]。他还把军械供给于辛亥革命后退处在梧州的龙济光，促其向广东起义军进攻。“二次革命”平息后，袁世凯授他为耀武上将军（原为宁武将军），他的长子陆裕光也加少将衔。

但陆荣廷对袁世凯也有不满的一面：首先，袁对已升任广东都督的龙济光更为重视，给予龙比他更高的宠信，引起他的嫉恨；其次，袁又派王祖同到广西任巡按使，对他进行监视。因此，当1915年袁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他表面上附骥北洋，上书劝进，暗中却和各方面反袁势力互通声气。到12月下旬，云南蔡锷、唐继尧宣布独立讨袁以后，他见帝制丑剧遭到全国人民激烈反对，而且他的老上司岑春煊和进步党人梁启超以及政学系人物也都对他进行劝说，他终于秘密做出了反袁的决定。

1916年1月，贵州宣布独立讨袁。陆荣廷为了骗取饷械，向袁请求讨伐贵州。3月7日，袁果然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他即向袁索军费

百万元，枪五千支，带兵进驻柳州，做出征黔的姿态。先是，袁曾打算派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云南，陆指使民间团体呼吁，拒绝假道；袁不得已，又委派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令其带兵从广东出发，经广西攻云南。因为龙觐光和陆是儿女亲家，他不好再拒，便一面表示欢迎，一面派陆裕光与部将马济带兵“助龙”[(5)]。当龙军抵滇桂边界百色的时候，陆裕光和马济按照事先密令向龙军发动袭击，尽夺其饷械，并将龙觐光俘获。陆荣廷在柳州得讯后，即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讨袁，组成“武卫军”，以马济为司令，向湖南进军。

4月初，龙济光在广东民军的压力下，为求自保，也居然宣布“独立”。这时，陆荣廷偕同潜入广西的梁启超随军东下，进入肇庆。他们已预定推戴岑春煊为首领，以便驾驭龙济光，统一两广军权。4月19日，岑春煊带着刚从日本借来的一百万元（日币），抵达肇庆[(6)]。陆荣廷即率领各将领于27日通电拥戴岑为两广都司令。5月8日，又扩大组织，改称为军务院。为了照顾云南实力派的情绪，又改推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岑为副抚军长，摄行抚军长职权。按照军务院的《宣言》，他们遥尊黎元洪为总统，把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对内对外的中枢机关。当时陆荣廷虽只是九个“抚军”之一，但因他手握重兵，实际上是军务院的后台老板。

军务院成立后，岑、陆一方面令李烈钧率领滇军入广东，拟由粤北攻江西，一方面陆自己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率军进入湖南。这时，袁的忠实爪牙湖南将军汤芗铭已被迫宣布“独立”。陆兵不血刃，前锋就进入长沙。他自己于5月底也到达衡阳。6月6日，袁世凯病逝，北京政府以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名义掌握实权。龙济光闻讯，就宣布取消独立，投靠段祺瑞。因此，入粤的滇军在韶关与龙军发生战斗。陆荣廷遂令莫荣新率桂军入粤，与滇军夹攻龙军，迫使龙军退据广州。7月6日，段祺瑞政府被迫发表陆荣廷为广东督军，但不久又让他暂署湖南督军，准备把广东仍留给龙济光。陆深知湖南情况复杂，对湘督不感兴趣，而对于号称“财富之区”的广东

这块地盘早已垂涎三尺，于是，遂坚辞湘督不就，而自动率军回广东，迫使龙军退入海南岛，自己正式就任广东督军。在此之前，军务院向段政府索取了一批军费，也自行宣告取消，所谓“护国之役”就此结束。

1917年春，陆荣廷亲自到北京，争取段政府承认他对两广的统治权。当时黎、段都想拉他，根据他的示意，4月10日段政府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陈炳焜为广东督军，他升为两广巡阅使。从此，他操纵着两广的军政大权，把桂系军队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方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时人有“北张（作霖）南陆”之称。在此期间，他大借外债，加税开捐，滥发纸币，搜刮民财，又在原籍武鸣山中建起豪华的“宁武庄”，供其享乐。

同年夏，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所谓“府院之争”激化后，由此而演变出了张勋发动的复辟政变。段祺瑞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讨平张勋，迎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自己重任总理。为加强独裁统治，段拒绝恢复复辟期间被解散的国会，废弃了《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于7月中旬率领起义的海军由上海到广州，宣言护法。先是，陆荣廷于6月间，借口黎元洪被挟制，已宣布两广“自主”；其次，他为了借用孙中山的名望，以增加自主的声势，提高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的资本，也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8月底，广州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组成军政府。但陆对另组军政府，阴持异议，因而对元帅一职是否接受，不肯作明确表示。他仍深居武鸣山中，以“老帅”自命，发号施令，指挥陈炳焜、莫荣新（时任广惠镇守使，后又任广东督军）等桂系军阀，对孙中山明迎暗拒，处处掣肘，“假护法以行破法”[(7)]。这时，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积极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派北洋军入湖南，准备进攻两广。陆荣廷感受到段的威胁，即派谭浩明带领桂军“援湘”，但他寄希望于段祺瑞有矛盾的代总统冯国璋，企图联冯制段，“联直倒皖”[(8)]，以便对付在广东的孙中山及其他异己势力。因此，他接受美帝

国主义分子安德森等人策动，与江苏督军李纯及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不断勾搭。到1918年4月，与吴佩孚部在衡阳暗中妥协，湖南战场上暂时沉寂下来。这时，他便回过头来进行策划改组军政府，排斥坚持民主革命立场的孙中山。他串通了非常国会中政学系和益友社两系议员，通过“修改军政府组织法”，于5月20日把军政府改为总裁合议制，推选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陆荣廷、林葆怿、唐继尧、岑春煊七人为总裁，而以岑为主席。这样，军政府就完全成为桂系军阀控制下的工具。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在其辞大元帅职的通电中气愤地指出：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

1919年下半年，北方直系军阀已形成（七省后发展为八省）反皖同盟，直皖矛盾日趋激化。同时，南方在孙中山影响下的粤军陈炯明部在闽南一带，得到福建督军李厚基（皖系）的支援，大力扩充，准备回广东驱逐桂系势力。1920年春，陆荣廷根据上年与吴佩孚签订的反段军事同盟密约供给吴军六十万元“军饷”，敦促他撤军北上。到7月，北方发生直皖战争。结果，皖系大败，段祺瑞下台，直系和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当直皖战争发生时，陆荣廷在龙州召开军事会议，准备进攻闽南粤军。8月中旬，桂军攻闽开始，陈炯明立即出动反击，到10月下旬，桂军战败，广东督军莫荣新弃广州逃走，岑春煊和陆荣廷通电宣布撤销“护法军政府”并取消两广“自主”，公开投靠了直系军阀。11月底，孙中山又回到广州，着手重组正式政府，翌年5月，经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陆荣廷反对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妄图以直系军阀为奥援，重占广东地盘。1921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他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他陈兵于粤桂边界，伺机反扑。当时孙中山为准备北伐先肃清侧后敌人，乃号召粤、滇、黔、赣各军讨陆。粤桂两军于6月下旬接触，桂军刘震寰部首先倒戈，粤军遂顺利地占领梧州。握有桂军主力的沈鸿英见势不妙，宣布“自治”，逼陆下野。其他桂系军队也望风而逃。当

滇、粤各军分占南宁和桂林后，陆又于9月逃往上海。

1922年6月，由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发动叛乱，粤军从广西撤退。陆荣廷的旧部林俊廷、韩彩凤等人以“自治军”的名义占据城邑，电邀陆回广西。于是，他又返回龙州，于9月12日通电就广西边防督办职务，重温“广西王”的美梦。1923年12月，他到南宁就任北洋政府委派的“督理广西军务”。当时沈鸿英正调军进攻广东，他令其部下趁机夺取了沈军占据的桂林和柳州，表面上统一了全省。次年春，他又以“出巡”为名，带兵到桂林，秘密接受吴佩孚给他的军械。

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革命气氛弥漫广东，广西人民也不断掀起反军阀斗争。驻在梧州的桂军李宗仁部和黄绍竑部，已经分别接受了孙中山授予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和“定桂军总指挥”的名义，通电讨陆。李、黄又利用沈鸿英与陆的矛盾，把沈拉过来，共同进攻陆。1924年五六月间，李、黄袭取了陆的老巢南宁和左右江各县；沈则趁陆出巡到桂林时，突然用兵包围了桂林。陆困守桂林孤城达三月之久。后来，由于吴佩孚指使湖南军阀赵恒惕派湘军一旅入桂，以武力“调停”，沈始解围，让他撤至全州。陆到全州后，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遂于9月23日通电下野，经湖南前往上海，以后又移居苏州，1928年11月病死。

---

(1) 据《武鸣县志》（曾唯儒编，1915年版）记载：陆荣廷“家赤贫，世业农”。陆的生年参见陆君田编著《陆荣廷传》，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 《光绪三十二年夏季广西水陆防营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邕宁县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1960年版，第188页。

(4) 覃子权：《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2页。

(5) 马济（1886—1927），字慎堂，旧军官家庭出身，陆荣廷的义子。历任广西督军署副官、旅长、“武卫军”司令、广东兵工厂总办等。1924年陆下野后，他带领陆的队伍北上投靠吴佩孚，以后又投张宗昌，充“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5月在蚌埠作战被击毙。

(6) 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和月刊》第4卷第5期（1943年5月）。

(7) 《致林修梅函》（191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7页。

(8)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北洋军阀直皖两系混战史料》，1961年油印本。

陆徵祥

郑则民

陆徵祥，字子欣，又字子兴，1871年7月29日（清同治十年六月十二日）生于上海。其父陆诚安，字云峰，信奉基督教，是外国传教士所雇佣的传教员，“以助基督教牧师传教为生”[(1)]。由于父亲的引导，陆自幼加入了基督教。小时身体孱弱，十岁始入私塾，十二岁时进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广方言馆就学八年。继而前往北京，考入总理衙门所办的同文馆学法文。

1892年，陆徵祥被清政府派往彼得堡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的翻译。许对陆很赏识，勉励他要“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2)]，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陆不断受到许的指点和熏陶，为日后进行外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陆徵祥初到俄国时仅是学习员，数月后定为四等翻译，1896年升为二等翻译。同年冬，许景澄回国，杨儒继任驻俄、奥、荷公使，陆仍留使馆任翻译。

1899年2月12日，陆徵祥在俄京办了终身大事，他与比利时女士培德·斐结为伴侣。培德出生于比国将门，祖父、父亲皆为比国将军，与比国驻俄公使为至戚，在彼得堡做私人教师。陆对培德很敬慕，婚礼也按女方所信奉的天主教礼仪举行。

1902年，胡惟德继任驻俄公使，次年陆晋加参赞衔。陆徵祥在俄国首都彼得堡整整任职十四年，熟悉俄国情形，办理中俄交涉，处理谨慎细密，逐渐老练明快，颇得历任公使的器重。

1906年，陆徵祥被任命为驻荷兰公使。结束了以往驻荷公使由驻德或驻俄公使兼任的历史，陆为第一任特命驻荷全权公使，设中国公

使馆于海牙。在驻荷公使任内，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荷兰政府强制华侨加入荷国籍的问题。他在与荷兰订立中荷领事条约中，载明华人依荷法律加入荷兰国籍后，若返国仍为中国公民。关于领事的权利和义务，也参照荷兰与日本签订的协定为先例，经过协商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1907年，陆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在会上，他与南美等一些小国代表进行联络，共同反对英、德等国所提出的按国力强弱划分国家等级并以此作为选派国际捕获审判员的基础的议案，使这一提议未被通过。陆徵祥还积极支持按罗马字母的次序，排列各国先后的次序，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国际惯例。他还在海牙冒险接待过流亡国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关照康不要去俄国、避免被引渡回国的危险。

陆徵祥长住外国担任外交工作，娶外国女士为妻，能说流利的外语，讲究应酬交际，因此很受外国人的青睐，在本国外交界也是个知名人物。1908年，袁世凯出任清政府外务部尚书任内，对陆也很赏识，在奏保外交官中，曾说他“通达时务，虑事精详，上年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保和会派为专使，凡于国体有关事项，据理力争，曾不少诎，尤能洞察列强情势，剀切敷陈，确有见地”[(3)]。1911年（清宣统三年），陆奉调转任驻俄公使。当年10月，在其妻的动员下，在俄京改入天主教。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被清廷任为内阁总理。袁一面对南方起义的民军又打又拉，一面对清廷施加压力，促其退位。这时梁士诒受袁的委托出面联络各方，梁密电陆徵祥，授意他配合袁的活动[(4)]。1911年12月25日，陆徵祥联合了一些驻外使节致电清外务部，劝清帝退位，电文劝告清帝不要“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5)]。这一电报正好给袁世凯的逼宫活动助了一臂之力。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3月30日，任命陆徵祥为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陆当时仍在俄国，感到国内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外交局势，当外长担子很重，有些犹豫，回家与妻子培德商量，得到了鼓励，于是陆回国就职，陆的夫人也被任命为礼官处的

礼官长[6]。

陆徵祥在民国初年第一次外交总长的任内，曾努力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改组外交部。首先，他提出一个新的外交部组织法，提请国会批准，按规章切实遵照执行。其次，改驻外使、领馆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担任。第三，加强对驻外使领馆的管理，防止驻外公使在其所辖范围内独断专行，还建立预算和汇报制度、电报密码制度等[7]。陆本人也比较注意培养青年外交人才。

1912年6月，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而属意由陆徵祥继任。陆表面上无党派，常标榜“超然主义”，实际上只能听命于袁。

陆徵祥先出任代理总理，6月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祝贺。于是陆便奉命组阁。同盟会虽同意他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内阁”抱抵制态度。7月18日，陆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宣布行政方针，并按袁世凯的意向，提出补充六个阁员的名单。他在会上，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就好比“开菜单作生日”，致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柄。至于“政见”连一句话也没说，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内阁流产，并演变成全国性政治风波。后经袁世凯以武力威胁和收买拉拢的办法，使参议院通过另外提出的五名阁员的议案，但陆徵祥却因受到失职弹劾而称病不出。数月后陆改任赵秉钧内阁的外长，1913年4月参加了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为袁世凯筹集内战经费。5月，又与俄国公使议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定（草约六款）。因被参议院否决，不久便退出内阁，改当袁世凯的外交顾问。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又起用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陆与外交次长曹

汝霖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于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发表声明。声明除第五号五项“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

陆徵祥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于5月25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正式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亦称“民四条约”）和换文，计有关山东、南满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8)]。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总之，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26日，陆徵祥出席参议院会议，回答关于此次交涉的质问，详细陈述交涉始末和当时政府困难情形和苦衷，力图自圆其说，委曲求全，但对条约丧权辱国的事实，欲盖弥彰。“民四条约”签订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会未予批准，陆遂通电辞职，但未获批准。陆经手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心里也感到很大压力。

同年10月，由于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徐世昌预感到政局危机即将来临，托故辞去国务卿一职，袁命外交总长陆徵祥代理徐的职务。12月，正式任命陆为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次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再次起用徐世昌任国务卿，陆继续任外长，至袁于6月病逝时为止。

1917年初，当北京政府内“府院之争”白热化时期，陆徵祥被聘为段祺瑞内阁所设的外交最高委员会委员。他也主张中国对德奥宣战，加入到协约国方面。1917年12月起，陆徵祥在王士珍、段祺瑞、钱能训三届内阁中连任外交总长。

1919年1月，陆徵祥以外交总长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与顾维钧（当时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等其他代表，在人民的推动下曾向“和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有：（一）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二）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但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中国的要求全被与会列强所拒绝，

而日本夺取的山东权益却被明文载入对德和约。这就激起了我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在国内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共同斗争的推动下，陆徵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终于采取了近代外交史上的一项历史性行动："公共决定，不往签字。"[9] 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这一举动，使世界为之震惊，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开创了在国际舞台上敢于抗争的先例，对以后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陆徵祥一行回国时，受到各阶层人民盛大热烈的欢迎。

陆徵祥回国后仍任外交总长，至1920年8月辞职，从此离开内阁。他看到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痛打亲日派卖国贼的行动，对外交总长工作心有余悸，也对由于拒签和约受到人们的谅解感到欣慰。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驻瑞士公使，同年10月，兼任出席国际联盟代表。继又任驻荷兰及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在1924年以前，他曾以北京政府代表身份多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10]。

1926年春，陆徵祥妻培德在瑞士病故。次年5月，他送其妻的灵柩返比利时安葬。当时北京政府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面临土崩瓦解的困境。

1927年7月，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Bruges）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从此一直从事宗教职业，初为修士，1935年6月升为司铎（神父）。他刻苦钻研基督教神学，对天主的信奉也更加虔诚。

陆徵祥虽身居异国修道院仍不忘祖国的安危，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十分关心，也以实际行动加入抗战行列。曾负责编辑《益世报》海外通讯，用"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思想和行动，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6年5月，罗马教廷授陆徵祥为比利时圣伯铎禄修道院荣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他病逝于布鲁日圣安德修道院。

(1) 罗光著：《陆徵祥传》，香港真理学会1949年版，第10—11页。

(2) 徐一士：《陆徵祥与许景澄》，《近代稗海》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382页。

(3)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页。

(4)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1933年印行，第105页。

(5) 《宫中电报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6) 罗光著：《陆徵祥传》，第80—81页。

(7)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103页。

(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00—1114页。

(9)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1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10) 陆徵祥：《国际劳工大会报告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

陆宗舆

郑则民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1876年7月5日（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四日）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中，其父早年经营商业，至陆宗舆幼年时，家境逐渐破落。

陆宗舆幼年进私塾，1896年到南京文正书院“从南通张（謇）先生读书学文，旋赴武昌习方言理化者年余”[(1)]。1899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留日期间，陆宗舆结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章宗祥和曹汝霖，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表示崇拜梁启超，赞成中国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曾同表示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张继等人进行辩论，甚至发生冲突。1902年陆宗舆回国，被派在北京崇文门管理税务，继任进士馆和警官学堂教习。1905年10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陆宗舆调任巡警部主事。同年冬，陆随清朝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任二等参赞，经历日、美、英、法、德、俄等国。通过这次出洋考察，陆得到亲近徐世昌的机会并受到赏识。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世昌为首任总督，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由于采用疏通运道等措施，同时加强搜刮，盐课收入激增，每年课银从五十余万两（1906年）增至一百六十余万两（1909年）。清廷特意召见陆宗舆，表示对他的赞赏，1908年秋升为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徐世昌内调入京，陆随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陆宗舆于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陆宗舆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袁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陆一度担任总统府财

政顾问，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同年12月，受袁世凯特命为驻日全权公使。

1914年秋，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在龙口等地登陆。陆宗舆奉袁世凯政府之命，向日本表示中国守中立，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2)]，给日军的侵略活动提供了便利。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派陆徵祥和曹汝霖在北京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进行谈判，同时又命陆宗舆于东京同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等人多次密谈，探听日方的意图和动向。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最后通牒，5月2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3)]，并于同年6月8日由陆宗舆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4)]。这一条约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随后，陆宗舆奉袁世凯之命，企图争取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公开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为此，陆宗舆曾受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秘密召见，“乘机授意”，大隈并向陆宗舆耳语说：“吾闻袁总统欲改帝制，如有意相商，吾当有所贡献，且乐观其成，君试密告之。”[(5)] 次日，陆果然致密电告袁世凯。其后，日本看到中国内外形势不利于袁，见风使舵，又抢先“劝告”袁不要称帝。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死去。陆宗舆也很快卸任归国。

1916年秋，陆宗舆就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次年1月，曹汝霖任交通银行总理，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得五百万日元贷款。此时，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特派陆宗舆利用赴日兑款的机会，与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会见，秘密勾结。寺内通过陆宗舆和新任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嗾使段祺瑞对德宣战。后来陆宗舆透露说：“前年参战实系发源于合肥致日本之一电，时适舆在东京，为参战事往来电报甚多，因彼国之赞助，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

瑞）乃始定见。归国后，弟复奉东海命往徐州说少轩（张勋）。舆当时与仲和（章宗祥）、润田（曹汝霖）外内奔走颇力，日本因此而援助段内阁，其大原因实由于此。”[6]

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决定用借款等方式支持段祺瑞政府，派西原龟三多次来华活动。1917年8月10日，所谓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这家银行名义上是经营两国间的汇兑事业，而实际上是日本借款给北京政府的收支机关。“汇业银行者，不啻贩卖中华民国掮客总会。”[7] 陆宗舆任该行总理，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

段祺瑞以参战为名，出卖国家主权，大借日债，扩充军备，妄图“武力统一”全国。1918年4月30日与8月2日，陆宗舆在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授意下，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家银行，先后与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五千万日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及收益和吉黑两者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8]。这种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连陆宗舆自己也无法否认，曾说：“若所谓卖国者，实际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9]

1918年10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段在离职前夕，给陆宗舆安排了一个币制局总裁的肥缺。徐世昌当上北京政府大总统之后，钱能训任总理，陆宗舆留任币制局总裁。

1919年初，察哈尔龙烟铁矿（今属河北省）公司成立，为当时北方最大的铁矿公司。4月19日，徐世昌派陆宗舆任该公司督办。30日，陆往天津迎接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来北京。5月4日，徐世昌设午宴招待章，陆在座作陪。当天下午章在曹汝霖住宅遭到爱国学生痛打，陆宗舆躲藏在家，未被学生发现。在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陆宗舆被迫于5月9日提出辞呈，但仍极力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解。随后

徐世昌指令慰留，并颠倒是非，为其卖国行径开脱。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义愤。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免职。随后，陆宗舆家乡浙江海宁县召开公民大会，决定建立卖国贼陆宗舆石碑。“当场由众踊跃输金，饬匠赶办……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八年六月海宁公团立。一时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云。”[10] 陆闻讯后，重贿海宁县知事为其毁碑，北京政府内务部也令浙江督军卢永祥为陆撑腰，因而引起海宁县民众不服，奋起护碑。最后徐世昌亲自下令拆碑，但人民群众痛恨卖国贼的爱国心是压抑不住的。

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庇护，陆宗舆留任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年，段祺瑞再次上台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时，陆宗舆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其后继续担任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长期住在天津日租界。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后，陆宗舆移居北平。1940年3月，日本侵略者所扶植的南北傀儡政权合流，在南京成立以汉奸汪精卫为头子的伪政府，陆宗舆被聘为伪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陆病死于北平，生前著有《五十自述记》一册，1925年出版。

---

(1) 陆宗舆：《五十自述记》，北京日报社1925年版。

(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1933年版，第53—58页。

(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集》第2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00—1114页。

(4)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卷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6年版，第230页。

(5) 陆宗舆：《五十自述记》。

(6) 《陆宗舆密函》（1920年），《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78—179页。

(7) 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上海爱国社1919年再版，第4页。

(8) 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17—181页。

(9) 陆宗舆：《五十自述记》。

(10) 《内务部查办浙江海宁县人民竖立“卖国贼陆宗舆”石碑咨文》（1919年7月23日），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鹿钟麟

程舒伟　刘信君

鹿钟麟，字瑞伯，1884年3月12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定县北鹿庄，九岁时过继给叔父为嗣。鹿家为当地大族，设有文学、武学私塾，鹿钟麟在此学习达十年之久，“颖悟过人”，“喜治古史于家国盛衰民生休戚”[(1)]，后在其继母娘家罗庄铺村当教员。

时日俄交战东北，鹿钟麟深感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毅然弃笔从戎。1906年，鹿投奔新军第六镇，不久编入第一混成协，充当学兵，驻防新民府。在此，鹿钟麟“攻习兵学，于课程外旁征博采，凡兵家书，靡不研治，其鸿猷伟略早储于此际矣”[(2)]。

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1908年，冯玉祥等人组织武学研究会，从事反清活动，鹿钟麟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1910年，第一混成协与奉天巡防中路独立一、二标合编成第二十镇，鹿任该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副官。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他积极参与其事，被任命为右路司令。起义失败，冯玉祥在长官陆建章保荐下，于1912年任袁世凯编练的左路备补军第二营营长，1914年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鹿钟麟经直属长官车震疏通，仍留第二十镇。1912年，第二十镇改为第二十师，鹿为该师第三十九旅第二团副营长。1915年，第三十九旅扩编为第四混成旅，他仍任副营长。

同年5月，袁世凯任命亲信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并调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第四混成旅随同入川。不久，蔡锷等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开始，第十六混成旅和第四混成旅奉袁、陈之命共同担任泸州叙府的战斗任务。鹿钟麟与冯玉祥重新相见，鹿请求重归冯

部，得到应允。冯玉祥同情护国军，设法迫使陈宦反对帝制。鹿为冯出谋划策，获得了冯的赏识。1916年5月，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冯玉祥部改成护国军第五师，鹿任该师新扩编成立的第三团营长，从此鹿成为冯忠实的追随者。

同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段对冯玉祥反对帝制的活动不满，并于翌年4月免去冯的旅长职务，任命冯部第一团团长杨桂堂为旅长。这期间，鹿钟麟先后担任军械官、炮兵营长等职。1917年7月，张勋复辟，举国声讨，鹿等要求旅长杨桂堂出兵讨伐，杨却进京谒见张勋。鹿等坚决反对复辟，公推薛笃弼迎冯回旅。冯玉祥在廊坊率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张勋。

1918年1月，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调冯玉祥部进攻南方护法政府。2月，冯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8月，冯部进驻湖南常德，冯在湘西两年，曾兼任湘西镇守使。鹿钟麟为冯部炮兵团团长，冯成立教导大队，以鹿任大队长，系统地训练军队，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冯军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21年，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以冯玉祥为师长。8月，冯出任陕西督军。翌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奉命驱逐暗通奉系的河南督军赵倜，改任河南督军。鹿钟麟以团长被任命为河南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开封的警察厅厅长，“赞襄冯督规划井然，疏浚城河，大兴水利”[(3)]。1922年10月，冯部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鹿任冯部第十一师第二十二旅旅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奉皖两系倒直。10月19日，冯令鹿钟麟等由前线班师回京，发动政变。鹿率部以昼夜二百里的速度急行，于22日夜首先入城，同时入城的还有孙良诚等部，他们迅速占领电报局、电话局、车站及各主要街道，囚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使吴佩孚手足无措，一败涂地。如此重大行动，办得干净利落，井然有序，深得冯玉祥赞誉，称鹿“智勇稳

练，堪任繁剧……作战有作战的办法，作事有作事的办法，乃国家栋梁之才”[4]。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等将所部改为国民军，由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鹿钟麟被提升为第一军暂编第一师师长，成为国民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他又是北京警备司令（后改为京畿警卫司令，京畿警卫总司令），入公府“看守”总统印信，北京政权实际为冯系所控制。11月5日，鹿奉命驱逐溥仪出故宫，从而结束了清帝在紫禁城内制造国中之国的局面。后国务院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鹿为重要成员之一。

同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段于24日在北京宣誓就职，着手组织执政府。他们表面上保持团结，暗地里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北京政权很快落入张作霖、段祺瑞手中，冯玉祥被迫退居天台山，后移住张家口。此前，段、张、冯均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时局问题。12月31日，孙中山乘专车到达北京，冯玉祥派鹿钟麟负责接待，鹿以冯的代表及北京警卫总司令的身份上车问候，警卫事宜安排得十分周密，并经常到孙的住处巡视，以确保其安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由鹿钟麟襄助李烈钧办理丧事。在停灵公祭地点问题上，治丧处和执政府发生争执，双方僵持不下，鹿亲自去见段祺瑞，经过巧妙周旋，段被迫同意了治丧处的要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参加送殡的群众达三十余万人，鹿率部队警卫。

1926年1月初，冯玉祥不得不宣布下野，将职权交张之江代理，鹿钟麟仍负责驻守京畿一带。旋奉军和直鲁联军再次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推鹿为前敌总司令，鹿亲赴前线指挥军事。国民军先后在马厂、大沽给敌军以重创，但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无理干涉，领事团曾以国民军用水雷封锁港口向鹿钟麟提出抗议，日军更直接炮轰国民军。由于形势对国民军不利，冯玉祥于3月下旬出国赴苏考察，国民军退出天津，北京也很快处于被包围状态。“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发现段党有密谋联奉、赶走国民军的企图后，鹿

钟麟在4月9日派兵围攻执政府，段逃往东交民巷。国民军向张作霖、吴佩孚两面求和不成，只好于15日撤离北京，退守南口。经整编成立七个军，国民一军则以鹿钟麟、宋哲元分任东、北两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军东、西两路总司令。当时奉、鲁、直在军事上联合对付国民军。自5月起即将南口包围，至7月下旬才发生激烈战斗，奉、鲁、直联军于8月1日开始总攻击，国民军在鹿钟麟指挥下顽强抵抗，坚持到同月14日，主动放弃南口，往绥远、包头方向退走。

冯玉祥得知国民军在南口失败消息，迅速由苏联回国，于9月17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举行“五原誓师”。随后组织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任鹿钟麟为总参谋长。11月，鹿奉命赴苏寻求支持，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召见，取得了苏联政府对国民军武器弹药和财政方面的援助。

同期，冯玉祥派员至广州与国民党取得联系，并由五原、经陕西出潼关，挥师入豫，以配合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国民政府为争取冯部，接连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和河南省政府主席，但冯却站到蒋介石一边。这时鹿钟麟刚从苏联归国不久，即被任命为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后又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同年9月，第二集团军与直鲁联军展开豫东大战，鹿为第九方面军总指挥，积极参与争夺战略要地归德（今商丘）的战斗，在大败直鲁联军，取得两次兰封大捷中起了重要作用。12月14日，鹿钟麟改任右路总指挥，会同中路韩复榘、左路石友三会攻徐州，并于16日占领徐州后转入河北作战。1928年4月，鹿钟麟奉冯玉祥令任北路总司令，带领所部参加彰德大战。5月，指挥韩复榘等部向北京、天津进攻，进展甚速，但因京、津由阎锡山负责接收，鹿部抵河北望都后便停止待命。同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改组，以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鹿钟麟任军政部常务次长。

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1929年初的“国

军”编遣会议使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冯因蒋、阎（锡山）联合否定其裁军方案愤而离职，军政部长一职暂由鹿钟麟代理。同年4月，蒋介石为切断冯部的出海口，阻挠冯军接收山东。冯玉祥决心反蒋，于5月令所部撤往甘陕，以缩短战线，给蒋有力的回击，不料韩复榘、石友三被蒋介石收买而叛冯，冯玉祥宣布下野，冯部只好闭潼关自守。6月间，冯玉祥带着促使阎锡山反蒋的愿望应邀入晋，但阎却挟冯自重，把冯软禁在五台县建安村。此前，鹿钟麟先后离南京避上海转天津，10月，应冯玉祥电召来建安共商大计，被任命为西北军代理总司令。鉴于宋哲元、孙良诚出关讨蒋失败的形势，鹿在潼关就职后，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5)] 的口号，并派人与何应钦、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取得联系，准备合力讨阎。何、韩、石表示支持西北军的讨阎行动。同时，西北军鹿钟麟等高级将领联名电阎，请其从速送冯回陕，否则“师行在即，可南可北”[(6)] 。这时的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恶化，再加在太原的各方反蒋代表表示拥护他反蒋，阎决定联冯倒蒋，于是在1930年3月将冯送回。在营救冯玉祥出晋一事上，鹿再次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玉祥回西北军后，力主联阎反蒋，同年3月15日，鹿钟麟领衔发出了反蒋通电。由于这时蒋介石已把矛头对准了阎锡山，所以阎也愿意拉冯玉祥、李宗仁等一起对付蒋。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任反蒋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委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不久，又任命鹿为二、三两方面军前敌总司令。5月，蒋介石下达讨伐阎等人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7月，蒋军加强攻势，鹿钟麟派兵援助孙殿英，虽解除了亳州之围，而未能实现袭击蚌埠、宿县的计划，进入湖南的桂军被迫撤回广西；8月，平汉和陇海线上的冯军受挫，津浦线上的晋军接连失利；尤其是张学良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使反蒋军迅速失败。冯玉祥的西北军面临瓦解之势，为保存实力，冯拟将部队交鹿钟麟全权处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蒋坚持冯、鹿一起解职。10月23日，鹿在焦作通电下野，后到天津闲居。

1931年冬，鹿钟麟复起，被推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1932年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同年，日本加快侵略华北的步伐，鹿应宋哲元电邀北上，为其出谋划策。1937年5月，鹿奉命再次赴平津视察，积极鼓励二十九军将士与日军决一死战，由于宋哲元犹豫不决而未果。

同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为该战区参谋长。旋冯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鹿任副司令长官。1938年初，鹿一度充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负责审判韩复榘“抗命”不战案。11月，擢升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他遵照冯玉祥的旨意，坚持联共抗日，支持进步活动。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鹿去山西长治会见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当时，冯电嘱鹿“顾全大局，切勿与八路军发生矛盾”[(7)]。而蒋介石和反共分子则施加压力，进行挑拨，胁迫鹿参加反共摩擦。他遂于1940年愤而辞职，由河北去重庆。1943年3月，鹿钟麟六十寿辰之际，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前往祝寿。1944年鹿被任命为兵役部部长。1945年5月，继续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8月兵役部撤销，鹿转任华北宣抚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冯玉祥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于1946年积极联络旧部，并指定分区负责人，投入反蒋民主运动。鹿钟麟为华北分区负责人，为民主运动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全国解放后，鹿在天津做街道居民工作，曾积极捐献财物支援抗美援朝。1954年冬，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鹿钟麟，称他是“办街道工作的专家”[(8)]。此后，鹿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年1月11日，鹿因病去世。晚年他努力从事文史资料的撰写，先后写成《冯玉祥与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一九二六年访苏前后的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回忆》等文章，对有关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74页。

(2)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第174页。

(3)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第174页。

(4)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6页。

(5)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6) 高继高：《鹿钟麟逃离南京及中原大战的爆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7) 王倬如：《我对爱国将军冯玉祥的了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8) 王士苹：《鹿钟麟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43页。

栾贵田

邵桂花

栾贵田，字玉璞，1895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生于奉天海城县栾家堡子（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乡）的农民家庭。祖籍山东，后祖辈逃荒来到东北。祖父栾景春为海城县五乡乡勇，父亲栾鹏程从小娇生惯养，染上好吃懒做、放荡不羁的恶习，没有正当职业。

栾贵田八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受业三年便辍学回家务农，娶本地小边村杨氏女为妻。岳父杨福庆，为清季屡试不第的穷秀才，昔日有恩于张作霖，曾为张的蒙师。张作霖受抚升官后，杨被请到张家做家庭教师。栾贵田十九岁时，由其岳父推荐，进营口大高坎镇张家开的“三畲”粮栈习商。二十一岁时，从小扛、唱账提升到柜台管账的司账员。

1916年，张作霖执掌奉天军政大权后，其私人账房出缺，栾贵田离开大高坎镇，进奉天督军公署，替张家管账。栾管账认真负责，细心缜密，事无巨细都处理得有条有理，在人事关系上尤能左右逢源，因此赢得了督署上下的好感，成为张作霖的心腹。

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退守关外，整军经武，起用新人。新派人物之一的郭松龄主张军需独立，以防军需处长变成长官的私人账房。1923年，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军需处长钱作舟病故，张作霖不顾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异议，让栾贵田接任这一重要职务。

1924年，奉天商会会长张惠霖为其子张其先成立小银号，资金三万元，找金融界熟人筹股，发起人都是金融界之名流，发起人之一的

栾贵田被选为董事。

1925年11月，郭松龄举兵反奉，张作霖坐困帅府，伴驾的只有杨宇霆、韩麟春、王树常等少数亲随，栾贵田也寸步不离张的左右。张作霖准备弃城逃亡，栾伙同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曾为张提款八百万元做流亡经费。

张作霖平定郭松龄兵变，于1926年春复兴兵入关。以张学良为首的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团成立利商转运局，派军需处长栾贵田兼任总办，由北京到包头等地用火车往返运送货物，但因交通部干预仅营运七个月即被迫停止。

同年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不久进住北京顺承王府，栾贵田奉命出任安国军司令部会计司司长（少将军衔）。1927年6月，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栾贵田被任命为陆军部军需司长。同年，栾擢升军需总监，主管全盘军需事务，并获二等文虎章和二等嘉禾章。

1928年4月，国民军继续“北伐”，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和平息争”的通电，6月3日乘专车返奉，4日凌晨遭日军暗算被炸身亡。栾贵田同车遇险，身负轻伤，送回帅府。7月4日，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29日宣布东三省“易帜”。1929年1月，国民政府委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栾贵田被调任帅府事务处处长，主管张氏的家务、产业等事宜。

当时，张学良决定在家乡海城县驾掌寺创立新民小学，亲自确定以“公任强”（公，爱国主义之公德；任，对国民负责的责任；强，自强不息的精神）三个字为教育宗旨，委托栾贵田为承办人兼任首届董事长。栾在筹建新民小学过程中不遗余力，从1928年春破土动工，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七栋四十九间青砖瓦房。同时聘任教师，招收三百六十余名学生，1929年春即开始上课。他注意完善学校的教学体制

与规章制度，提高教学质量，严格进行管理。

1930年，栾贵田的父亲病故，耗巨资发丧，用房产地契为抵押向边业银行贷款，而后长期拖欠，不能还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栾贵田潜行入关，任张学良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参议，挂名领薪，无所事事。1933年3月，张学良为蒋介石所逼，通电下野，出国“考察”，临行前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留任栾为该会参议。栾生活潦倒，不问政事，仅靠每月支二百元薪金度日，经济拮据。

1935年6月，何应钦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北平军分会被迫撤销，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栾贵田被解职回家，先住北平，后迁天津，越年又搬回北平，以买旧房翻新出售赚钱谋生，变卖首饰衣物弥补不足。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平津相继沦陷，栾贵田困居北平，敌伪不时借机向他敲诈勒索。抗战期间，栾的生活艰难，常有断炊之虞，得到彭贤和换帖兄弟王继周的资助，才得以维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蒋介石允许，全部发还张学良在东北的财产，组成“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由张作相任主任委员，彭贤副之，栾贵田为委员之一。栾积极参与其事，把张家在沈阳的房地产均换新照，产权所有人都写上张学良的名字，并拍成照片，备函寄给张。

1949年沈阳解放，栾贵田同清理委员会其他成员，成立同合油粮栈，给粮食公司加工粮油，因入不敷出很快歇业。1950年，栾拿从前在老义和“永银”号中的股金五千元筹建新号，被推为董事长，发给车马费。年底，离沈阳到北京长住，不再工作，靠子女生活。1972年4月5日，于北京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廷瑞修、张辅相等撰：《海城县志》（人物志·乡宦篇），海城大同书局1924年版。

大洼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大洼县志通讯》，1983年总第2、3、4期；1984年总第10期；1985年总第13期。

政协大洼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洼文史资料选编》第1辑，1981年版；第2辑，1982年版；第3、4辑，1983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罗常培

白吉庵

罗常培，满族，姓萨克达氏，初字心田，后改莘田，又署辛田，号恬庵。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其父恩禄为清末宣武门的城门吏，是一个七品小官，辛亥革命后，改编为陆军小队官。

罗常培自幼入私塾，1907年进京师公立第二等小学堂，与老舍（舒庆春）同学。辛亥革命后学校停顿，他在家补习功课，兼学蒙语。1913年春入市立第三中学，1915年秋毕业。因家境困难，学习速记六个月，借以谋生。1916年罗父亲病故，迫于生计，罗常培入众议院秘书厅任速记科二等技士。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罗常培入学后，对钱玄同教的“音韵学”、刘师培教的“中古文学”较感兴趣，课堂笔记全用速记，回家后翻译成文言保存起来。由于他在学术上崇拜刘师培，曾参加《国故》杂志社，思想倾向保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旧文学论战激烈。他读了蔡元培给林纾的信及《新青年》的文章，思想开始变化，倾向于蔡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主张，后来便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1920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因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出国留学又没力量，因此决定在北大哲学系继续深造。当时该系很热门，教授有胡适、梁漱溟、蒋梦麟等，还有外籍学者杜威、罗素在此讲学。他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实验主义。1921年暑假，他随梁漱溟到济南讲学。梁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罗常培这次为他编录的。返京后众议院撤销，罗因此失业。为生活所迫，他辍学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

1922年，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拥戴下重新上台，恢复众议院，罗常培又到众议院秘书厅当速记，并在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兼课。后来该校校长出国，他被委派为代理校长。他上任后很想干一番事业，遂改革旧制，公开财务，延聘优秀教师，并将自己的薪水捐购图书。这样当了一年代校长，很受学生欢迎，次年原校长回国，罗被辞退。这时，适有陕西西北大学来京聘教师，罗便离京到西安，任该校国文专修科主任兼教授，讲授“文字音韵学”。当时的西安，因军阀混战，交通梗阻，不仅外地报刊进不去，就连书信也难以送到。罗精神上感到苦闷，1924年夏又返回北京，在临时执政府做速记工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罗看到无辜的爱国青年被杀害，十分愤慨，想离开北京。恰逢厦门大学在京聘请教授，他便随鲁迅、沈兼士等人于是年秋到厦大中文系教“中国音韵学沿革”。在这里他开始阅读外国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并试着用西方的音韵学原理来分析中国的语言问题，重新编写讲义授课，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课余罗又对厦门的方言进行调查，后来写成《厦门音系》公开出版，对语言学界研究汉语方言起了促进作用。不到一年，因为校内派系斗争激烈，罗无法继续待下去，转往浙江民政厅工作。时傅斯年刚由海外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因过去与罗有同学关系，故于1927年秋聘罗到广州，任中大文学系教授。是年冬，赵元任到广州调查两广方言，罗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讨论了一个多星期的方言问题，收获颇大。

1929年，傅斯年在广州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请罗常培兼任秘书。不久该所迁往南京，罗便辞去中大的工作，专任该所研究员，直至1934年。这期间，他先后写了《唐五代西北方音》、《厦门音系》、《国音字母演进史》、《十韵汇编》四部专著，以及《中原音韵声类考》、《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国方音研究小史》等十四篇论文。此外，他又与赵元任一起调查了徽州地方的方言，编写了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的长编，这些成果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4年秋，罗常培被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请到北大主持文科研究所语言乐律实验室的工作，1936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得知罗是满族人，又有一定学术地位，想在教育界培植他做傀儡，特请他去演说、赴宴。罗坚持一切活动须经校方允许，绝不做个人的交往，加以拒绝。是年7月底北平沦陷，北大南迁长沙，他于11月17日离开北平，从海道经香港到长沙。1938年2月26日又随校辗转到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这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迁到昆明。由于他的建议，该所与北大语音乐律研究所组织人力，从1939年起用五年多的时间，对云南全省方言进行调查。共调查九十八个县和一百二十三个单位，写出报告、论文四十余篇，为后来研究汉藏系语言的工作奠定了基石。罗常培曾先后三次到滇西大理，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后来写成《莲山摆彝语文初探》一书。

抗日战争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罗常培深受教育，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1944年，国民党当局要解聘一些进步教授，罗写信给重庆《新华日报》表示抗议。

同年，罗常培应美国朴茂纳（Pomona）大学之聘，以访问教授的名义出国讲学，在该校任教一年半。1946年夏，又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并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次年夏，到密西根大学的语言研究所讲学。

1948年罗常培回国，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兼文科研究所所长。这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比他出国之前更甚。他感到苦闷，于是埋头于学术，整理他过去散失在各地的书籍和稿件，写出了《语言和文化》、《中国人与中国文》，并重订《经典释文中的徐邈音》等书。平津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政府要用飞机接一批教授南下，其中有罗常培，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解放后，罗常培历任第一、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完成了《普通语言学纲要》、《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等著作。1958年12月13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罗常培：《罗常培自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傅懋勣：《深切怀念罗常培先生》，《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

罗常培：《中国音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版。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开明书店1947年版。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

罗福星

林其泉

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人，1884年2月25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南洋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其祖父罗超六（耀南）为南洋华侨，曾在南洋和祖国台湾修筑铁路。其父罗经邦，自幼跟罗超六到南洋，因体弱多病，没有固定职业。罗福星刚周岁时跟随父母迁回广东老家，六岁启蒙。十岁跟祖父再去巴达维亚，入当地华侨办的中华学校就读，1902年7月毕业。次年跟随祖父来到台湾。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罗福星到台后，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读书。他饱尝奴化教育的痛苦，目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虐，产生了反抗思想，萌发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台湾的志愿。由于不满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罗福星一家于1906年2月抛弃家产，内渡回广东。路经厦门时，罗福星遇见在巴达维亚中华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由老师介绍参加了同盟会。

罗福星回到广东老家后，在小学当体育教员。此时，曾于1895年在台湾倡建“民主国”开展反割台斗争的台湾绅士丘逢甲，任广东全省学务公所参议，得知同乡晚辈从台湾回来，十分高兴，乃聘罗福星为广东视学兼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并于1906年底1907年初派他到南洋爪哇等地考察华侨的教育工作。

罗福星到了南洋，受到当地侨胞的欢迎。1908年春被聘为新加坡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罗在那里向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华侨关心祖国革命事业。这期间，他以中华学校校长身份，经常来往于新加坡、缅甸和巴达维亚之间，并担任同盟会设在缅甸的“书报社”书记，

从事革命党的宣传活动。

1910年，罗福星从新加坡转到爪哇，担任巴达维亚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那时候，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等曾先后到南洋一带发动华侨参加革命工作。罗同他们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指导。

1911年春，同盟会组织领导广州起义，西荷印机关部集结十七人回国参加。罗福星毅然辞去中华学校校长职务，先到香港，后于4月27日上午潜回广州，参加这次起义。罗随黄兴袭击两广总督署衙门，奋勇杀敌。这次起义不幸失败，许多革命党人英勇牺牲。罗福星也为流弹所伤，后脱险潜离广州，经香港与胡汉民一起到暹罗，又去巴达维亚找黄兴，请求分配任务。

是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黄兴电嘱罗福星在南洋华侨中招募义军，作为革命后援力量。罗即在巴达维亚组织二千多华侨参加民军，启程回国。他们先到广州，向广东省都督胡汉民领取武器、弹药后，乘军舰北上，12月经上海到苏州。后因南北和议已成，新政府又财源不足，民军不得不奉命于1912年2月解散，陆续踏上归程。罗福星于3月6日离开苏州，经上海回广东老家，在家乡任大地学校校长。

辛亥革命后，祖国大陆人民更加怀念和关注台湾同胞。许多人主张去台湾发动同胞赶走日本占领者，福建都督府也计划派人去台湾活动。罗福星自告奋勇，于1912年12月再度来到台湾。

到台之前，罗福星于5月中旬会见孙中山，表示自己的决心。孙中山鼓励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要决心收复，但得讲求方法。到台后，罗注意贯彻孙中山的指示，打扮成商人模样，以台北大稻埕大瀛旅社等处为活动基地，寻访旧日同游，集结抗日同志，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的革命情形，宣传革命道理。罗对他们说，日本在台湾“蔑视及虐待本岛人民，课重税，夺产业，使失生计之途”，本岛人民“今尚

不觉醒，则前途将益形暗淡”，“台民系中国人，实无长久屈服于日本之理。应于岛内纠合同志，待机来临，蜂起于各地，杀退日人，驱逐于岛外，以脱离悲境”[1]。

罗福星联络抗日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支部，对外用“华民联络会馆”名义开展活动。他和刘士明、江亮能、彭云轩、邱维藩、林达荣等十二人被称为“十二志士”，在苗栗建立领导机关，以地势险要的大湖为根据地，并派出同志分赴南北各地，设立同盟会分部。他们还同当时在台组织“共和联络会馆”的吴颂贤等人密切配合，共谋大举。

在罗福星等人的努力下，台湾抗日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他们以同盟会为统摄，以华民会、三点会、革命会等组织为外围。为了避免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注意，各地的组织都用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兄弟会、老人会、同胞会等名义。不到一年时间，从台北到台南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同时，罗还派人与新竹的张火炉、台南的李阿齐、东势的赖来，以及南投的陈阿荣等人领导的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大陆沿海各省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同盟会组织联络，以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持。为了便于联络和传递消息，罗在同盟会会员和抗日同志之间使用了许多联络暗号，如以“君子”、“杂货”称十二志士，以“母氏”称孙中山，以“婶母”称黄兴，等等。

1913年4月21日，罗福星等人在苗栗召开了台湾同盟会支部的代表大会，动员革命同志做好准备，迎接抗日起义。会后他们以十二志士的名义发表了《大革命宣言书》，列举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血腥统治的各种事实，指出“自日本亡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其苛暴恶政，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人民，刻已翻然觉悟，均当以鲜血一洗前此之耻辱矣”[2]。《宣言书》特别提到，台湾同胞抗日复土的斗争，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的关怀，得到了大陆人民的支持与配合。《宣言书》秘密散发于台湾各地，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许多人捐资筹集革命经费，有些人组织了“决死队”。武装抗日起义的队伍逐步组织起来后，仿照祖国大陆革命党武装的组

织形式，设旅长、团长、排长等职，旅长统率千人，团长统率百人，排长带领十人。十二志士之一的江亮能担任司令军长，具体指挥起义的军事行动。

当时，广东都督府也派了革命党人吴觉民到台湾。吴会见罗福星后，决定互相配合共同斗争。是年七八月间，黄兴先后两次派人到台湾，了解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情况，转达了革命党和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和支持。

罗福星和台湾同胞的抗日活动日益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者于10月开始，在台湾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了大批同盟会成员和“可疑”的群众，对他们进行审讯和拷打。罗福星动员未遭逮捕的人继续进行抗日斗争。他认为，若停止活动，必致丧士气、乱人心，需要再接再厉，不屈不挠。10月22日晚，罗福星等人在旅馆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表示：“男子以名为重”，“名誉者，吾人事业之支柱也”，“今余即令粉身碎骨，意志仍不屈也”，“若我不幸被捕，我必出以坚强之意志，断不泄漏机密。为革命献身，慰三百余万之同胞，以留功绩于我（中国）政府之历史中”[(3)]。他一再表示，抱定坚强信念，为革命而献身。他给闽省都督孙道仁写报告，提出要在台湾组织临时联合会，以为大举之用，并请速出兵来台。

在这期间，罗福星加紧活动。他得知苗栗打入敌人机关中的革命同志全部被捕，立即冒险到台中、台南各地了解情况。敌人到处搜捕，一时无法开展工作，他又化装回到台北。12月间，罗在台北秘密召集同盟会成员会议，研究如何冲破敌人的恐怖封锁，举行全岛起义。但这时敌人正在发动大检举，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起义计划无法付诸实行。罗为“暂避其锋”，转到淡水躲在一户农民家里，但终为敌人侦悉，于12月18日深夜被捕。这前后被捕的革命党人及抗日群众共达一千多人。

在敌人狱中和法庭上，罗福星严正斥责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罪恶

行径。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机会，写了一篇“自白书”，分十一项，详细列举了日本官吏虐待台湾同胞的罪行。他还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信念的诗词，如“独飘彩色汉旗黄，十万横磨剑吐光；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阵堂堂。”“海外烟飞空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轻生爱自由。”“军乐扬扬列队过，天朗风清感慨多；男儿开口从军乐，同唱台疆报国歌。”他在《祝我民国词》中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沽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尚。”取首字寓语“中华民国，孙逸仙救”[(4)]，表现出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

1913年底1914年初，日本殖民统治者在苗栗设临时法庭，对罗福星和五百多位台湾抗日志士进行“审判”。3月3日，罗福星被处以绞刑，年仅三十。他视死如归，临刑前写了“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的字句，表现出他对祖国和台湾同胞的热爱。

---

(1) 《罗福星革命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5册。

(2) 汉人：《台湾革命史》第11章，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彭子明：《台湾近世史》第9章，福州鸣社1929年版。

(3) 《罗福星革命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

(4) 罗福星的遗诗，流传的几种文本互有参差。本文引自罗秋昭《大湖英烈——罗福星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版。据王惟英记，此是经于右任校正过的，见《于右任校正后之罗公福星遗诗》，载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革命先烈先进传》，

1965年版。

罗家伦

宗志文

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2月2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父罗传珍长期在江西做官，曾任进贤等县知县，同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罗家伦幼时受父母的启蒙教育，稍长入塾读书。1914年进上海复旦公学肄业。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同学傅斯年、段锡朋是莫逆之交。

罗家伦入北大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之际，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罗能言善辩，是出名的活跃人物。1919年1月，他与傅斯年、徐彦之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得到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校方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并同意由学校出版部发行和负担盈亏。《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组成，傅任主编。

《新潮》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宣扬文学革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供过意见。罗家伦在创刊号上写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他在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什么是文学》一文，不仅反对文言文，而且揭露专制制度下的文学的内容“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但是《新潮》从创刊起，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崇拜西方文明的倾向。罗家伦在上述那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流露出很害怕这个革命传到中国来的思想。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

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是个活动分子。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罗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巴黎和会。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早晨，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随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口，要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军警不许通行，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学生派代表四人往各使馆，罗家伦是代表之一。第二天，他又被派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进行联络，曾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新潮》因五四运动停刊。不久，傅斯年出国留学。10月，《新潮》复刊，罗家伦任主编。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展开，《新潮》在胡适引导下，改良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逐渐成了宣扬各色各样西方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讲坛。12月1日发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罗家伦发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一文，公然否定自己以前对十月革命的赞扬，说：“我从前说法国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他混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法国革命“含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根本否定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革命风暴，说“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参加了学生运动，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提出今后应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他所谓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一

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所以，他又提出“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就出国留学，走“专门研究学问”的道路去了。

同年秋，罗家伦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秋离开美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四年。留学期间，罗很注意搜集各国办大学的经验。

罗家伦于1926年回国后不久即参加北伐。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议，旋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他对蒋介石十分崇拜，加之会说善写，因此深得蒋的器重。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大文章，不少是由罗家伦执笔写成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家伦是积极支持者，撰写过一些宣扬反共的文章。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自任校长，由戴传贤、罗家伦任正副主任。8月初开学后不久，蒋被迫下野。下旬发生龙潭战役，孙传芳军渡江攻南京。罗家伦在师生中做了不少说服动员工作，才保住学校没有散伙。1928年1月，蒋介石又上台，进行所谓继续北伐的行动。3月，总司令部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罗家伦为委员之一，并兼任教育处处长，随军北进，6月到北平。

8月，国民党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三十一岁的罗家伦为该校校长。清华学校是1911年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学校的经费有专门设立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由外交部正副部长和美国驻华公使三人组成，基金完全操纵在外交部一些官僚手上，弊端甚多。罗担任校长后，多方活动，争取到清华基金转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并使清华脱离外交部，完全隶属教育部，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他还改变了过去清华毕业生全部派遣留美的办法，进行公开考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赴美留学。他曾提出：“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

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1] 清华自罗任校长后，开始招收女生。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幕后，清华大学出现“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担任了几个月的教授。年底蒋介石到武汉巡视，亲自召见罗，把他调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担任代教育长。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属短期训练班的性质。罗到校后，建立了四年制的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亦起而反蒋。1932年6月，中大被行政院下令解散，学生听候甄别。不久罗家伦被指定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8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到校后，极力把学生的反蒋抗日热情引导到所谓研究学问的道路上去，提出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说：“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2]

罗家伦办大学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重视罗致人才，延聘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曾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3] 他还采取增加图书设备、加强基础课等一系列措施。中央大学原仅有学生一千人，罗任校长后，抗日战争前已发展到两千人，并于1937年5月在南京郊外动工兴建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新校舍，为日后发展做准备。

同年7月初，罗家伦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回南京做迁校布置，决定迁校重庆，并面蒋陈述意见，立刻得到蒋的同意。迁校计划顺利而迅速地进行，10月即大致就绪，11月初，中央大学即在重庆沙坪坝正式上课。抗日战争期间，中大学生逐年增加，到1941年已增至三千余人。

罗家伦很注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重庆期间，他定期向学生作演说。当时大后方反蒋运动高涨，他竭力引导学生闭门读书，故意把教育说成是超阶级的，说“教育最高的目的，是要造就好人，造就好的国民”。他一面“希望以后各党各派，不要以青年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说“这样不但是害了青年，而且是害了国家、民族”；一面却“热忱的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能积极挽救现在青年体格和人格上的两种颓风”[(4)]。

1941年9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蒋介石先后委派他往西南、西北各地考察，一则视察边境各省情况，一则对各地军政人员进行游说。10月，罗任滇黔考察团团长，前往云南、贵州。当时蒋正组织远征军，准备开入滇缅边境，罗为蒋摸清了地方实力派的动态，宣扬了“中央德政”。1943年3月，罗受任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6月率各方面专家学者四十六人，组成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垦殖、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专家人员在内的考察团，先后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考察。事毕草成大西北建设计划及报告多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家伦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张继）。1947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罗家伦回到台北。旋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蒋政府“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部分《革命文献》。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的主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逝者如斯集》等。

(1)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6页。

(2) 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23页。

(3) 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3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再版，第465页。

(4) 罗家伦：《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抗战与文化》，独立出版社1939年版，第37页。

罗君强

黄美真　张云

罗君强，谱名光治，别号庸生、竹侯等，曾化名刘健生、李景祁。湖南湘乡人。1902年5月24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1917年，罗君强入长沙青年会日校读书。次年7月毕业后赴上海入大同学院。1919年1月因病辍学，8月赴法勤工俭学，旋因病回国，在湘乡陶龛小学任教。1920年8月，罗进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于1922年7月毕业。

罗君强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22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编《赤光周刊》，并兼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湖南分会书记。1922年夏，罗受湖南中国共产党组织委托，作为湘区及安源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春，罗父去世，他在丧事上大肆铺张，受到党组织的批评，便在长沙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1924年初，罗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经蔡和森的教育帮助，又恢复了共产党党籍，回湖南参加革命活动，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兼任中国共产党湖南训练委员会秘书。翌年春，罗患气管炎严重咯血，回湘乡家中休养，对革命丧失信心，意志消沉，终于第二次脱党。

1925年秋，罗君强再度赴沪，入大夏大学读书，旋即参加国民党。次年12月辍学到武汉，在张治中的学兵团任政治部上尉科员兼政治教官。不久即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部上尉科员，主编校内刊物《革命生活》。罗君强以同乡关系，与该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结交。此后，罗在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先后任少校交际股员、中校公报股股长等职。1927年9月宁汉合流，罗被派为南京中央

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政治教官。

1929年3月，蒋桂之战爆发。罗君强任陆军第六师政训处中校秘书，随军到汉，旋被“总司令行营政训部”主任周佛海推荐任该部秘书长。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罗君强于1932年7月任武汉行营秘书处上校秘书。在这期间，罗经常编印反共书刊、标语、图画，进行反共宣传[(1)]。10月，罗调任浙江海宁县县长，抽调壮丁成立保安基干队，加紧治安管理。1933年11月，又被调任南昌行营第二厅（政务）第四课课长，兼第二组（财经）副组长及行营办公厅上校秘书。1935年春，南昌行营撤销，另设重庆行营，罗仍任行营上校秘书。在红军长征途中，罗君强参与追截红军及“肃清”所谓“收复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等活动，并参与制订“剿匪时期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匪军投诚缴械给奖办法”等多种文件。

从1937年初开始，罗君强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秘书、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等职。“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之际，罗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与周佛海等人沆瀣一气，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唱高调”，鼓吹“亡国论”，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1938年2月，罗参加周佛海、陶希圣主办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任该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出版拥蒋反共书刊，继续散布投降主义论调。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逃出重庆，不久即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这时，罗君强由于生活糜烂、行为不检，被免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职务。罗于1939年2月以“治病休养”为名，由重庆飞往昆明，再经河内转香港。周佛海约其加入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罗认为自己在蒋介石幕下长期任秘书工作，“除了当过一年海宁县长外，未曾正式捏过印把子”，这次“逆取顺守，乘时乘势，有权有势有伙伴”，“可能搞出一点名堂来”[(2)]，于是满口答允，甘当汉奸。

罗君强是周佛海最亲信的助手，汪伪集团的重要骨干。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罗被指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党部”副秘书长。1940年初，汪伪组织“国府还都筹备委员会”，罗为该会委员兼布置组长。其后担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进行所谓“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树立南京新政权”的活动，及“整理中央政府必要之建筑物及其他用品与事务人员”等事项[(3)]。3月底，汪伪政权在南京开场，汪精卫自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罗君强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委员、“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他并任南京《中报》、上海《平报》社长，积极从事“和平反共”的宣传，吹嘘汪伪的“和平运动”是“负荷世界战略的新使命”，是“为了人类文明再造的种子”；诬蔑共产主义是“以思想理由杀人，以宗教情绪灭口者”，要坚决与之“反抗”[(4)]。他鼓吹与日本侵略者“携手共进”的所谓“东亚联盟”的“自觉运动的民族联盟”、“平衡发展的经济合作”、“除旧布新的军事同盟”、“亚洲中心的文化沟通”等四项卖国纲领，叫嚷中日两国要“声应气求”，要“与邻邦日本采取齐一的步调与共同的计划，自打破东亚的以至世界的旧秩序而建设新的秩序，自扫除欧美帝国主义留在东方的残余力量，以至杜绝赤化的根苗”，早日实现“东亚联盟”[(5)]。

1942年至1943年冬，罗君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部长、法官训练所所长、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财政部税警学校副校长（校长为周佛海）等职，大力强化司法手段，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他曾率税警数百人配合日本侵略军，在常熟、江阴、南汇、慈溪、余姚、上海等县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与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发生多次战斗，批准杀害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多人。1944年1月，罗就任伪安徽省省长，兼任蚌埠“绥靖”主任及省党部主任委员。他实施“田赋征实”等政策，进行疯狂搜刮，为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政策效劳。罗还推行毒化政策，抽鸦片亩捐税，收购烟浆，制造烟土毒害人民。

同年底，周佛海兼伪上海市市长，罗君强先后被任命为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代理警察局长、财政局长及市府公路委员会主席等职。他极力推行保甲法令，强化汪伪统治，同时增办新税，实行奴化教育，还为日本侵略军扩修公路桥梁，加修飞机场，以防御同盟军队在沿海登陆。他因此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中有着“良好印象和特殊声誉”[(6)]。

罗君强善于进行政治投机。早在1941年，便随周佛海与重庆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1945年5月，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罗在周的默许下，在上海秘密发起“建国社”，标榜其纲领为：“（一）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二）绝对拥护蒋主席；（三）绝力保卫京、沪、苏、浙地区的治安。”[(7)] 这一组织网罗了伪上海市军、政、警重要头目为干事，其成员遍布各警察分局、保安队及税警总团，是罗准备投靠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年7月，戴笠亲笔致函罗君强，指示他“联络各方有志之士，团结所能掌握的一切有用力量，适应时机，协同行动”，并委托他负责“此间（指上海）一切”[(8)]。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罗君强以代理警察局长名义向全市发布警令，声称“决不使任何不合法的势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侵入市内”，“必保护上海全市的生命财产直至安全地奉还中央（指重庆国民政府）而后已”。扬言“最后虽剩一兵一卒，亦必周旋到底”[(9)]，向重庆国民政府大献殷勤。当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进入上海，在日本一宣布投降之时，即电令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这两个汉奸头子摇身一变，顿即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人。8月19日，罗发布紧急命令称：“所属官警及市区全体保甲人员，自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并应听从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指挥”，“集中警力，强化治安”[(10)]，为国民党“接收”上海效力。罗君强本来罪大恶极，只因随周佛海搞“曲线救国”和“反共有功”，得以一时逍遥法外。但在广大民众“严惩汉奸”的强烈呼声面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9月30日将罗逮捕，并

于1947年3月6日判以无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君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抱有幻想，不承认自己的汉奸罪行。以后经过教育，态度才有所转变，承认自己“罪恶重大，几个头也都可杀，但共产党没有杀我”[11]，表示愿意向人民认罪。1970年2月22日，罗君强病死于上海市监狱。

---

(1) 罗君强：《补充交代的几个问题》（1960年7月12日）。

(2)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 《南京新报》1940年1月28日。

(4) 罗君强：《和平反共建国的迁都一年》，《中报》1941年3月30日。

(5) 罗君强：《欢迎日本众议院来华诸君》，见1940年度汪伪“国定教科书”初中国文第6册。

(6) 罗君强亲笔供词。

(7) 罗君强：《自白》（1946年9月18日）。

(8) 戴笠致罗君强亲笔函（1945年7月29日）。

(9) 罗君强亲笔供词。

(10) 罗君强：《紧急命令》，《中华日报》1945年8月20日。

(11) 《战争罪犯处理报告》（1959年9月11日）。

罗隆基

何碧辉

罗隆基，号鲁参，后改努生，江西安福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生。祖父经商，父亲罗调卿是前清秀才，教书为业。罗隆基九岁时生母病逝，由继母抚育成人。在江西吉安读小学时成绩优秀，1912年夏，南昌心远中学毕业后，以江西考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清华学堂。

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清华最早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员。他本人也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而自豪。

1921年秋，罗隆基清华毕业后，官费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去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政治学和近代史。留学期间，他继续参加学生活动，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与《中国学生季刊》编辑。他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组织大江社，出版《大江》杂志，鼓吹“族国主义”，主张国家独立自主，主权完整。

罗隆基1921年回国后，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兼教授，光华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他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批评国民党实行党治、个人独裁、践踏法制、侵犯人权，成为当时著名的人权派代表之一。1930年5月，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公布了训政时期“约法”。罗认为“约法”仍然规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表示“绝对不满”，因此冒犯了当局，11月4日被捕，直到审问时，罗才明白自己的罪名是“国家主义领袖，共党嫌疑”。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光华大学立即撤换罗，理由是“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后

得胡适、宋子文出面保释。罗隆基获释后，认为撤职“毕竟个人的损失”，“可以容忍下来的”，只是“言论谬妄”四个字，不可轻易放过。于是他把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的政论文章，编成《政治论文集》出版。在序言中说：“在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不彻底取消他们所谓的，并且经过五年试验而根本失败的党治，其他任何政局上的变换，都是换汤不换药。”

“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于9月20日发表《沈阳事变》一文，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批评国民党“兄弟阋墙之事，堂哉皇哉，有声有色；一旦对外，始而镇静，继而退步，终而缴械投降，气节扫地，国威荡然”。10月，他与张君劢等人组织“再生社”（国社党前身），出版《再生》杂志。“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发表了题为《可以战矣》的文章，坚决主张抗战。

1932年春，罗隆基应天津《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的邀请，离开上海到天津担任社论主撰。接着又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社长。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一系列主张抗战的社论。

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临时迁都洛阳，并决定召开“国难会议”。罗隆基是“国难会议”代表之一。他与沈钧儒、章士钊、王造时等六十二人，联名向会议提出《救济困难之具体主张》。对内主张举国一致，实行民主政治；对外主张领土主权之完全无缺，以武力自卫为主，国际折冲为辅。可是国民党规定“国难会议”不准谈政治，不准谈抗日。罗隆基等人愤而拒绝出席。

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罗隆基为《益世报》撰写社论，指责国民党对外屈辱，对内欺骗。11月，《福建事变》发生，《益世报》又发表社论，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联共抗日”主张。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罗隆基不屈不挠，继续坚持抗日立场。是年秋，罗去南开大学上课，乘车到达

校门附近时，迎面而来的卡车上四个特务举枪向他射杀。罗迅速卧倒，幸免于难，而坐车背后的玻璃窗顿时弹孔累累。

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侵华，7月30日，天津沦陷。《益世报》在总经理生宝堂的组织下继续出版。罗隆基撰写的社论，继续为抗战呼号。生宝堂不久被害，罗隆基在日本追捕下，逃离虎口，经青岛到上海。11月上海沦陷，罗隆基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请，出席省总动员会议。1938年初，熊以训练新县制工作人员的名义，成立江西政治讲习院。熊自兼院长，蒋经国兼大队长，任罗为研究处主任。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罗隆基被遴选为参政员，辞去讲习院工作，前往武汉，为驻会委员。10月随参政会内迁重庆。期间，南开大学南迁，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罗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方针，加紧专制统治。中共和各抗日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关于宪政问题的提案就有七个，在审案委员会讨论这些提案时，罗隆基多次发言，使宪政决议案获得通过，并组织宪政期成会，罗为委员。在宪政运动中，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发起组织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职志的“统一建国会”，罗以国社党代表身份参与组织。1941年初，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罗被推举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后来，他主持建立了“民盟”昆明支部，在知识界扩大民主力量，推动了昆明地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1944年7月，罗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主办的“民主系统讲演”中，发表了题为“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民主”的讲演，指出民主必须建立在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的法西斯统治。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仍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和宣传部长。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组为云南省支部，罗任主任委员。12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民主》周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盟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大会宣言》和《纲领》，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罗隆基是这个方案的制订者之一。他在会上再次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接着，他以民盟代表身份出席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他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在一个小组，相互配合，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民盟代表在会上提出的“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等修改宪法的原则，遭到国民党代表的反对，但是得到中共代表的支持，终于获得通过。罗隆基对政协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曾对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说：政协是共产党让步多，蒋介石苦恼大，民盟前途好。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罗隆基、史良等八十九人于1946年6月6日发表《告国人书》，呼吁和平，反对内战。6月2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遭到特务殴打，酿成“下关惨案”，罗隆基与梁漱溟等人即于25日以民盟政协代表的身份，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表示抗议。罗隆基认识到“蒋介石是不容许人民和平的，更不容许人做中间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民盟主席张澜被打伤，罗隆基等人再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们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使中国成了“黑暗世界”。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公然破坏政协协议，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彻底关闭和平大门。罗隆基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当局如此独裁其事，已将政协各党派平等协商国是之精神摧毁殆尽。9月31日，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等人致电蒋介石，拒绝参加国民党独裁分裂的“国民大会”。

1947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下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处人员限期撤退。3月6日，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表声明，承担保管中共在京、沪、渝等地财产之责任。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正式破裂，全面内战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罗隆基与民盟等各界民主人士共五十六人，

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发表严正声明，要求美、英、法、苏严守中立，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同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诬蔑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领导人立即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并派黄炎培、叶笃义到南京，会同在南京的罗隆基与国民党政府交涉。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罗隆基与中共的关系逐步密切，由朋友发展为战友、诤友，一些报刊曾把他与闻一多等人称为“亲共人士”。

民盟总部被解散后，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直到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才在中共营救下脱离虎口。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张澜、罗隆基等人发表声明，热烈欢迎上海解放，并向中共及其领导人毛泽东热诚庆贺。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欢迎他们到北平。张澜、罗隆基当即北上，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参与《共同纲领》的制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隆基任政务院委员。1956年5月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和第二、第三届常委。1949年12月他被选为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1956年2月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翌年春全国开展反右斗争，他与章伯钧被指为“章罗联盟”，被划成“右派”。1958年3月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在北京逝世。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举办罗隆基90周岁诞辰纪念会，他的革命贡献被肯定，罗隆基被称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

主要参考资料

黄昌勇、王海波：《安福才子罗隆基的一生》，《上海滩》1996年6月号。

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2—3期。

民盟中央编：《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罗纶

周茂江

罗纶，字梓卿，原名晋才，字康侯。四川西充群德场罗村沟人。1876年4月14日（清光绪二年三月二十日）生。其祖先世代务农。到其曾祖父、祖父辈时由农而商渐有积蓄。其父罗人文，号绍周，受业于西充名拔贡李培尧门下，考上秀才，乐于扶危济困，深得众乡亲赞誉。罗纶是家中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十三岁熟读十三经，对偶声律之文提笔而就。十四岁进入县学，旋考入成都尊经书院，跟随宋育仁、骆成骧学习，修业九年，“词章常冠其曹，文名籍甚”[(1)]。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分别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倡议维新变法。罗纶受维新思想影响，与蒲殿俊、胡骏、李蔚华等人在成都参加“强学会”、“蜀学会”，参与出版《蜀学报》。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地维新派人士皆遭到迫害，清廷命令川督在四川搜捕维新人士。学使吴郁生出于爱才起见要罗纶改名以免受株连，罗纶遂改原名晋才为纶，改原字康侯为梓卿，才得以脱身。

1902年，罗纶参加乡试，中举人。同年冬因父丧归里，过着贫苦的生活。1904年在同窗好友的推荐下，罗纶赴长寿知县唐我圻处工作。时值朝廷废科举办学校，唐我圻审时度势决定办一所高等小学堂，便聘罗纶为学堂监督。罗纶顺应时代潮流讲求新学，务期开发川东文化，大讲变法自强之道，培养了不少新人。罗纶任职两年开长寿风气之先，长寿名儒彭光远、李峙青等人对他十分推崇，赠以名号为“祖东”[(2)]。

1905年，张澜等人在南充创办顺庆府中学堂，函请罗纶回乡任职。罗纶于12月回到南充，担任顺庆府中学堂国文、历史教习兼斋务

长。张澜为修身教习兼教务长。当时清廷腐朽，罗纶等人就利用这个有利环境竭力宣传自强革新以及兴学救国的重要意义。当时发行的《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主张“排满”反清。罗纶兼任该报的发行宣传工作，常把《民报》给学生阅读以提高思想认识。在这期间罗纶也逐渐流露出革命排满的倾向，但他仍然想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打开一条出路。这反映在课堂上，他深入浅出地讲解激励了不少学生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罗纶的激进行为为顺庆知府潘凤瀛所不容，致使罗纶很快就被解聘辞退。1908年春，他到成都后被绅班学堂监督邵从恩聘为斋务长，并兼任王铭新为监督的游学预备学堂的国文教习。由于志趣相投，罗纶与张澜、刘行道、熊焘、徐炯、王铭新等人相处十分融洽，被人称为“六君子”。1908年，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清王朝电令各省督抚要严加防范各地的革命行为。当时，成都铁道学堂监督刘紫骥、优级师范学堂监督王章祜禁止学生参加立宪运动，并无理斥退学生。罗纶、张澜、刘行道、熊焘、徐炯、王铭新出面支持学生的行为，驳斥王、刘的所作所为。王章祜、刘紫骥竟密告护川总督赵尔丰，污蔑罗纶等六人收买学生，鼓吹革命。赵尔丰大怒，命令提学使方旭查办。方旭与学务公所议绅、高等学堂总理会同处理，对此六人予以免职。随后刘行道远走北京，张澜、熊焘赴南充，罗、徐、王三人停职，时人亦将此事件称为“六君子事件”[(3)]。

待风波平息之后，罗纶被邵从恩挽留复任绅班法政学堂原职。当时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清政府为挽救覆灭危机不得不做出预备立宪的姿态。1908年秋，为推动立宪，罗纶率领学生、绅、商、工、农各界两千余人赶赴督府请愿，面请总督赵尔丰代奏速开国会，罗纶也因此名声大振。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各省迅速举办有关事宜。罗纶被选为西充籍议员。

1909年10月14日，四川谘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蒲殿俊被选为正议长，萧湘、罗纶被选为副议长，他们共同领导川省的立宪运动。罗纶遇事热心负责，着意于民权作用的真正发挥，全川官僚多敬畏

他。他任副议长期间，曾弹劾纠举了一批贪官污吏，使其丢官撤职，甚得百姓的拥戴。

四川谘议局成立以来，立宪派人士为了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对清政府的某些卖国行为和明目张胆的掠夺行径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斗争。争夺路权就成为他们斗争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川汉铁路公司自1905年成立以来，即为官僚所把持，弊端甚多，成效不大。四川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士即把整顿川汉铁路公司事宜提上议事日程。在谘议局第一次会议期间，罗纶领衔将起草的《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提交会议讨论，最后议决通过组织董事局及选查账人、修改公司章程、清查账项、扫除锢习以昭商业信用、统一会计、亟筹募股之法等整顿措施[(4)]，对铁路公司的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谘议局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川汉铁路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开幕，到会股东代表六百余人，选举罗纶为临时会长主持会议。

1911年5月8日，清皇族内阁成立。9日，清政府即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规定从前所批之商办铁路一律取消。继又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负责收路事宜。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原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清政府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湘、鄂、粤、川等省的保路爱国运动迅速展开。

1911年5月10日，清邮政部、度支部致电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令其迅速查清川汉铁路公司的账目以备接收。5月12日，王人文召集铁路公司主席彭兰村、副主席都永和、驻川总理曾培等商议，未果。彭兰村即与蒲殿俊、罗纶商议，蒲、罗二人对铁路收归国有问题开始并未极端反对，仅以争路款为重，主张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议决处理。5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电呈邮传部，请求清政府仍维持川汉

铁路原案。5月22日，端方电令川省停收租股，使蒲、罗等人感到非常惶恐，不得不以谘议局和铁路公司的名义呈请护理总督王人文代奏，哀求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但清政府严厉申斥王人文，坚决拒绝川省人民的请求。6月1日，端方、盛宣怀电告王人文，要强行夺路夺款。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坚决反对。罗纶等人也感到希望幻灭，坚决主张“破约保路”，倡议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5)]。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大会，罗纶担任大会主席，讨论四国借款合同，与会者有绅、商、学、工农各界人士及股东、法团代表共二千余人。经过讨论，大会同意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蒲殿俊为同志会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兼交涉部长，号召“破约保路”、“文明争路”，并决定在全省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会后，罗纶等人齐到督院请护理总督王人文代奏清政府，请求废止借款合同，撤回收路成命。自此，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6月19日，四国借款合同发表。罗纶在领导保路同志会之外，亲自动笔对四国借款合同逐条签注，指斥盛宣怀等人卖国卖路的行为，痛斥四国掠夺中国国权的侵略行径。6月25日，罗纶率领成都各界绅民二千四百余人前往督署，将签注的四国借款合同的全文呈交王人文，请其代奏。但清政府拒不让步，坚持夺路卖国，将支持川省人民保路斗争的王人文撤职，派赵尔丰接任，想以高压政策制止保路运动。

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在成都召开，与会代表五百余人，罗纶被选为大会主席，颜楷、张澜出任股东大会正副会长。8月18日，端方等人上奏朝廷，要求责成赵尔丰镇压川省保路运动。8月24日，川路股东全体大会召开，公布了端方电文，群情哗然，愤怒的群众提出罢市、罢课的主张，罗纶表示支持。未待大会结束，顷刻之间“百业停闭，交易全无”[(6)]。随即罢市罢课在成都展开，并迅速波及全川。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再次召开，会上正式通过不纳粮以及不担任外债分厘等决议，并通告全省。四川保路运动进

入一个新阶段，清廷对此极为恐慌，急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川人。

9月5日，同盟会会员朱国琛等人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上将所拟的《川人自保商榷书》散发开来，《商榷书》“表面上虽无革命词句，实则为革命独立呐喊”[(7)]，此事引起清政府的恐慌。9月7日上午，赵尔丰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头面人物诱至督署而拘捕。消息一经传出，成都全城震动，群众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涌向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见势不妙，下令卫队开枪，当场打死请愿群众三十余人，伤者数百人，造成惨不忍睹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使全川人民迅速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把武装斗争提上了日程，四川保路爱国运动至此转化为反清革命，保路同志军起义遂全面爆发。

1911年9月25日，荣县独立，其他各县也相继独立建立军政府。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夕之将至。为缓和川省局势，清廷于10月26日下令释放蒲、罗等人，11月6日又令端方署理四川总督。为控制局势以及在赵尔丰的要求下，蒲、罗等人于释放后联名发布《哀告全川叔伯兄弟》文，要求人民停止战斗。然而“哀告”已不能阻止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赵尔丰鉴于清廷大势已去，为保全身家性命表示愿意将政权移交给蒲、罗等人。经与蒲、罗等人反复协商，最后订立《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罗纶任招抚局长。

大汉四川军政府虽然成立，但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等人在东较场阅兵时，士兵突然索饷哗变，蒲、朱仓皇而逃，乱兵四处抢劫，成都陷入混乱之中。兵变后，罗纶极力挽救危局，始终坐镇在军政府内指挥，号召同志军万余人入城，会同尹昌衡所率新军平叛。12月9日，省城军民代表集合于北较场，选举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兼安抚局长。10日，新的四川军政府建立，尹、罗等人随即通告坚决镇压破坏分子，从而稳定了成都的局

势。

1912年2月2日，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3月11日，尹昌衡、张培爵就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副都督，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罗纶很少过问军事，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于文化教育事业，在少城关帝庙创办“川剧改良科班”培养川剧人才，又创办《进化白话报》，成为新文化事业的开拓者。7月，尹昌衡率军西征平藏乱，胡景伊任代理都督。此时胡景伊已投靠袁世凯，罗纶处处受到胡的排挤，遂辞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回西充侍奉母亲。不久，罗纶与蒲殿俊均被选为国会议员，同赴北京就职。1915年，罗纶不满袁世凯称帝，离京回到故乡，任顺庆联合中学及南充中学教习。袁世凯称帝后，罗纶与张澜、钟体道等人于1916年3月发动顺庆起义，组织川北护国军，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罗纶任总参谋长，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后，罗纶辞去教学职务赴北京任国会议员。1921年，回乡办地方自治，任筹备处主任兼西充中学校长。1922年，罗纶应国会之召再赴北京，因不满曹锟贿选总统而辞去议员回到故乡。1925年，被选为四川善后会议代表，继选为审察长。

1930年罗纶在西充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何一民：《罗纶》，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人物编辑组《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110页。

黄绶：《保路运动中的罗纶》，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1卷（政治军事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9页。

(1) 黄绶：《保路运动中的罗纶》，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1卷（政治军事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2) 王瑞豪：《罗纶在长寿学堂》，四川省长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寿县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版，第5－6页。

(3) 黄绶：《保路同志会组织者罗纶》，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四川风雷》，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4)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47－449页。

(5) 何一民：《罗纶》，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人物编辑组《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页。

(7)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罗佩金

李希泌

罗佩金，字熔轩，又作榕轩。1878年6月4日（清光绪四年五月初四）生。云南澄江人。原籍四川华阳，明初迁居于此。祖父罗瑞图光绪丁丑年（1877年）举人，父罗森光绪甲午年（1894年）举人。罗佩金自幼聪颖过人，但喜交游，跅弛不羁。父亲对他严加管教，亲自课读。他1898年考中秀才，1903年考入昆明高等学堂。罗在校内经常与赵伸等人议论时政，为校方察知，驱逐出堂。罗不得已而去广州，投奔他祖父的学生两广总督岑春煊。岑以治两粤策命题面试，罗条陈十事，为岑赏识，派他在督署奏折处学习。次年，罗被送到日本学陆军。

罗佩金东渡后，考入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6月，罗偕杨振鸿、李根源谒孙中山于横滨。孙中山以“革命是艰苦事，要卖命”等大义勉励他们。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罗入盟。1906年5月，罗在振武学校毕业，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同年10月，他与杨振鸿、李根源、吕志伊、赵伸等创刊《云南杂志》，宣传革命。

1909年，罗佩金毕业于士官学校。他回国后，先到上海去见岑春煊，然后带着岑写给龙济光的荐函去南宁，龙委任他为随营学堂总办。不久，有人向龙密告罗佩金倡导革命，龙使人侦查罗的言行，罗不自安。同年返滇，任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兼云南讲武堂步兵科教官，后调任督练处参议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1911年初，他和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向云贵总督李经羲荐蔡锷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九协协统，他愿屈居蔡下，任该协第七十四标标统。罗处事以机警果决见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约集罗佩金、李根源等云南革命党人密谋响应。10月30日（阴历重阳节），云南光复军起，蔡锷担任总指挥，罗佩金率七十四标攻打总督署。起义军与守军激战数小时，始攻下总督署，全城光复。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罗佩金先后任南征总统官、南防总司令与军政部长等职，参与平定了迤南道龚心湛的骚扰，镇抚了蒙自兵变。1912年8月，罗奉命入京参加各省军事代表会议，补授陆军中将。1913年1月，罗返滇任民政长。10月，罗父病故，他辞去民政长职务，在家守制。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愈益暴露。罗佩金与吕志伊、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人密谋反袁。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发动讨袁护国运动。蔡锷与罗佩金分别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与总参谋长，第一军下辖三个梯团，刘云峰统率的第一梯团为先头部队，克日出发入川。时滇省财政支绌，罗佩金将他家几代积累的家产押于殖边银行，得银洋十二万元，拨给第一梯团作开拔费用。护国军第一军1916年1月21日攻克叙州，向泸州进攻。但北军偷袭后路成功，护国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形势危急。蔡锷命罗佩金率第三梯团和第二梯团一部，兼程赶赴纳溪增援，双方遭遇于纳溪前方之朝阳观、棉花坡一带。经过激烈争夺，泸州一度为护国军占领，旋又退出，直到2月底，战局才在纳溪稳定下来。3月初，蔡锷与罗佩金统筹战局，决定暂时分两翼撤退，引敌前进，再乘机反攻。罗被提升为左翼军总司令，指挥左翼撤退。蔡锷亲自指挥右翼，总司令部驻于大舟驿。至3月中，广西宣布独立讨袁，形势于护国军有利。3月17日，护国军开始反击，蔡、罗均亲临阵头督战。20日晚，右翼军在正面阵地发动夜袭，将敌阵突破，毙伤敌军五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饷。在全国纷起反袁的形势下，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向护国军提出停战的要求。四川前线停战。

同年5月，军务院于肇庆成立，罗佩金被推举为抚军之一。6月6

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加罗佩金陆军上将衔，授勋三位、二等大绶嘉禾章，补广西省长（未到任）。蔡锷则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喉病日益沉重，请假东渡日本就医，致电北京政府推荐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戴戡署四川省长。

1917年4月，川军与滇军因裁减军队之事发生矛盾，罗部滇军与川军刘存厚部在成都发生激烈战斗。北京政府借此免去罗四川督军之职，授罗“超威将军”的称号。罗令全军西撤川南，退出成都。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唐继尧通电响应，将入川滇军改名为靖国军第一军和第二军，以罗任总司令。唐声称：先平川乱，然后北伐。唐继尧对罗统率滇军驻川心存猜忌，不久又下令免去罗的总司令职，部队由顾品珍和赵又新统率，由唐亲自指挥。罗卸职回滇，闭门谢客，不问政事。

1920年冬，川军驱逐驻川滇军，赵又新战死。次年初，顾品珍率师回滇，驱逐了唐继尧，以滇军总司令名义主持滇政。唐继尧出走后，收买滇南匪魁吴学显等人，顾品珍因罗佩金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南防总司令，请罗出任迤南巡阅使，从事清剿。

1922年春，唐继尧利用吴学显等人的武装力量，自广西边境返回云南。3月下旬，顾品珍战殁于陆良天生关，唐继尧进入昆明。罗佩金率骑兵队仓促奔赴滇西楚雄，想依靠驻扎在那里的大理第九混成旅旅长华封歌，华不接纳，反将罗的卫兵携带的枪支全部缴械。罗逃往华坪，唐继尧指使匪首普小洪追捕。罗被捕后，5月3日，在苴却的双金坡被普小洪处死。罗死后三个月，他的灵柩运到了昆明，唐继尧不准进城，厝居于昆明城东小松山。直到1928年唐继尧死后，澄江县人民才公葬罗佩金于县城西十五里的朱家山。

主要参考资料

李根源：《护理四川督军广西省长罗君熔轩事状》，《曲石文

录》卷3，腾冲李氏曲石精庐1934年版。

《护国之役总司令部命令抄》，《文献》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年版。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报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曲石庐盖簪集·罗佩金致李根源书》（原件）。

蔡锷撰，刘达武辑：《蔡松坡先生遗集·军政文电》，蔡公遗集编印委员会1943年版。

罗文幹

邵桂花

罗文幹，字钧任，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生于今广东省番禺县。罗文幹接受完中学教育后，于1904年负笈赴英伦三岛留学，入牛津大学荣誉班，专攻法学，四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又经伦敦宫廷法学会试，获准执行律师业务资格。1909年学成回国，任广东审判厅厅长。1911年，应学部留学生考试，授法学科进士。1912年1月，民国建立，罗文幹服务于司法界，任广东都督府司法司司长，旋升广东高等检察厅厅长。同年，辞职北上，8月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15年11月，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下，与汤觉顿、徐勤动员广东督军龙济光倒袁未果。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殁，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罗文幹复职。同年修订法律馆成立，王宠惠任总裁，罗副之，在修订刑法法典过程中，两人成为挚友。1919年1月，罗文幹以考察法律名义赴欧洲，在英国获得大律师资格。归国后，罗兼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法官讲习所教授。1920年8月，皖系垮台，王宠惠任大理院院长，罗文幹副之。1921年10月，罗文幹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同年12月，梁士诒在张作霖支持下组阁，罗任梁内阁司法部次长兼大理院院长。1922年4月，罗以司法部次长代理部务。4月29日，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败北，直系控制北京政权，6月罗文幹去职。9月，罗任盐务署署长兼币制局总裁。同月19日，王宠惠组阁，罗文幹出任财政总长，此次任命使罗的前途发生了突然的变化。10月5日，罗文幹提出辞呈未获批准，不意罗莅任不久，于11月18日因对奥借款案被控入狱，陷入更为复杂的政治纠纷之中。

对奥借款案是指1914年北京政府向奥国订购炮舰四艘，作价英镑

六百万，订为借款年息六厘。后因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这个借款造船合同遂遭搁浅。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同德奥恢复邦交，奥国代表向北京交涉，要求年息加到九厘。对华借款佣金再增加八十万英镑，要求本利一次付清。经罗文幹与奥国代表交涉结果，原订的六百万镑，减为四百一十一万英镑，年息为九厘。佣金全部作为财政部同仁的福利金。合同于同年11月14日签字。时王宠惠在外交部大楼招待国会议员，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问起欠发国会经费事，未获满意答复，吴景濂遂以罗签订对奥借款合同案有受贿行为，密报黎元洪。黎贸然下令逮捕罗文幹入狱。为此事，内阁立刻召开会议，阁员多说黎元洪违法。此事应交法厅审理，如告发确实，则严办罗文幹；如是诬告，吴景濂应反坐。21日，王宠惠以责任内阁遭到破坏，待罗案解决后就辞职。11月22日，黎派孙宝琦到地方检察厅迎接罗文幹出狱，留在公府礼官处，但罗文幹表示愿意接受法律裁判，如有罪，自然应当守法；如果没有罪，进总统府也无此必要了。11月25日，阁员全体辞职，罗文幹仍回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1923年7月29日，罗文幹经法庭判决无罪释放，但司法总长程克受人怂恿，命令检察厅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又把罗文幹送进监狱。于是，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就此弹劾程克，并气愤地辞了职，一时全国司法界哗然。罗文幹被控案直到1924年春，检察厅才撤销了上诉，罗案才算结束。罗在京执业律师。

民国初年，罗文幹在司法界声誉颇隆，司法界人士出其门下者甚众。他以法律名家出而掌财政，遂受缧绁之苦，当非始料所及。然而，罗文幹自请侦查、愿受法律裁判的精神，却极得舆论界的好评。罗文幹出狱后，任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中方委员。1927年1月，出任顾维钧内阁司法总长，6月去职。1928年1月，南下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12月受聘出关，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顾问。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9月，罗文幹与沈瑞麟受派为调查中东路事件专员。

1931年11月，罗文幹任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委员。12月，罗文幹出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同月，任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外交部长陈友仁因更加不满意蒋介石对日屈辱妥协的外交政策而辞职。1932年1月28日，罗文幹兼任外交部长，受任国难当头之际。其时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在上海向闸北进攻开始，驻地的第十九路军全体官兵英勇抗敌。2月中旬，第五军也投入战斗，毙伤日军万余人，迫敌三易统帅。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把希望寄托于国联的调停上，罗文幹在外交上自然不会有所作为。

2月4日，南京外交部分别复照英、美、法、德、意五国接受关于停止中日冲突，在上海划中立区的照会。上述复照立即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对，指出此项主张为巧立名目，断送国土。后经英国调停，3月3日中日双方停火，4日开始谈判，至5月5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外交部训令中方代表在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

《淞沪协定》的签订引起举国上下强烈反响。6日，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登报郑重声明否认对日协定。5月9日，萧佛成、唐绍仪、邹鲁、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发出佳电，反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认为该协定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同为秘密卖国。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卖国的“淞沪协定”通电，号召群众进行民族战争来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罗遭到谴责后，于5月27日在外交部招待新闻界，说明淞沪停战协定真相，称协定之外绝无秘密记录及附件，为自己进行辩解。经此，罗文幹威信扫地。南京当局为了搪塞舆论，于6月25日将中方签字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免职改任驻英公使。

7月12日，宋庆龄到南京访汪精卫、罗文幹，磋商将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夫人保外就医一事，因罗文幹以辞职反对而未果。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以外交、财政问题诸多棘手，分别致电

中执委会、林森、蒋介石、各院部长，请辞行政院长职。次日，罗文幹亦紧随其后，呈行政院请辞司法、外交两部长职，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

同年8月29日，罗文幹在外交部纪念周上演说，对日外相内田于25日的侵华演说痛加驳斥，并阐明国民政府对目前时局所持之外交方针，表示："中国绝对不因武力之压迫而放弃尺土寸地或主权之一部；解决东北之办法，苟以东省伪组织为前提者，中国绝不同意。"解决东北之合理办法，必须以不背国联规约、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与中国主权，又能巩固远东永久和平为必要条件。

9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次日，南京外交部就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事向日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本应负违犯国际公法、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条约等责任。同日，外交部照会九国公约各当事国，请采取有效办法制止日本侵略。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推定罗文幹等人为外交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以案关重大，决定先交外交委员会详加研究，签注意见再行集议。

12月15日，国民党第四届三中全会于南京开幕。21日，罗文幹向三中全会报告中日问题及对日外交，历述日人侵华罪状，并申述解决东北事件始终坚持最重要二原则：一曰决不容维持东省伪组织为前提；一曰必不违背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条约之文字与精神。同月27日，罗文幹辞司法部部长兼职未获允准。

1933年1月1日，日军制造榆关（山海关）事件。1月3日，榆关失陷。3月，日寇进而侵占热河全省并继续向长城各口进攻。南京政府继续奉行妥协退让政策，一方面阻挠前线军民抗战，一方面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进行"谈判"。5月31日，双方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该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现状"，并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让敌，使华北门户洞开。

6月5日，罗文幹因反对中日直接谈判和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主张依赖国联调解，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职。蒋介石电罗，以外交紧急，请勉为其难，林森、汪精卫亦均促罗打消辞意。罗乃请“病假”，至20日销假视事。在此之前，2月24日，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对一票通过十九国特委会所提出的《报告书》，谴责日本在中日战争中为侵略者。日本代表团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并中途退席，置国联的决议于不顾。3月27日，日本政府宣告退出国联。对于国联的“报告书”，罗在一次谈话中称：我国既与国联合作，决根据国联报告书进行，无论如何亦不改变态度。仍然寄托于国联来解决中国问题。并称对日问题，不能专恃外交方式应付，除与之一拼外，实无其他妙法。

1933年5月2日，苏联政府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向日本正式提出出卖中苏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一事。5月8日，中国外交部电令驻苏大使颜惠庆，就此事向苏联提出抗议。同日，罗文幹召见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明中国政府对此事的严正立场。13日，罗文幹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交涉经过。经讨论，决定由外交部提出抗议书，当晚电驻苏大使颜惠庆致送苏人民外交委员会。但苏联无视中国政府的反对，仍于1935年3月23日单方将中东铁路及其一段支线以一亿四千万日元售给日本。

1933年8月下旬，国民党中政会议派罗文幹赴新疆视察司法、外交事宜。罗奉命宣抚西北，实为调解盛世才与马仲英之争。历时两月余折中调停，颇费口舌，然因新疆为南京政府实力所不及而未收调停之效。

罗文幹后经苏联新西伯利亚、乌苏里，到海参崴乘轮返回，11月11日抵达南京。16日，罗由京赴赣，向蒋介石报告新疆之行的详情及在京与各委晤商处理新疆问题之意见，罗文幹因反对对日妥协外交而见异于蒋介石，遂再提辞呈。同年12月2日，国民政府令准罗文幹辞去外交部长职。1934年10月3日，罗复请辞司法部长职。次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将司法行政部改属司法院。17日，中政会决定以居正

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氏为官持躬清正，没有官僚习气，在当时官场中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38年1月，罗任国防参议会议员，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同年6月，罗文幹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12月，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10月16日，罗文幹在粤北乐昌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张其勤：《述罗钧任先生生平》，《大公报》1941年12月20日。

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五）罗文幹》，《传记文学》1965年第6卷第2期。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下册）学术，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版，第101页。

罗振玉

耿云志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8月8日（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安。其父罗树勋，曾先后任江宁、清河县丞。

罗振玉四岁入塾读书，十五岁举秀才。1882年、1888年两次乡试落第，1890年至1895年在乡间做塾师。1896年与蒋黼（字伯斧）合作，在上海办农学社，从事搜集翻译外国农学著述，并于次年创刊《农学报》。由于缺乏翻译人才，乃于1898年6月创办东文学社，请日本人藤田丰八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人员在社中任教。社中只有六名学生，其中有王国维，罗振玉很欣赏他的才识，两人遂结下终生之交。

那时，正值戊戌变法运动进入高潮，罗振玉的政治态度十分保守，对康、梁一流的维新志士很反感，皆斥为“浮华少实”而“不与相征逐”[(1)]。因此，当戊戌政变后，清廷极力取缔报纸和查禁书刊时，《农学报》不但未遭封禁，反而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特命上海道拨款资助其继续出刊。自此，罗振玉和清朝一些重要官僚拉上关系，并颇受重视。

东文学社办了两年多，到1900年，罗振玉鉴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造成的形势动荡，加以经济支绌，遂于是年秋将学社解散。不久，罗振玉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去武昌就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请王国维到武昌任农务学堂译授。1901年夏，罗辞职。是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年底，由刘坤一和张之洞奏派，罗振玉去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政客小村寿太郎、近卫笃麿、

长冈护美等人探知罗与刘坤一、张之洞等清朝重要官员有密切的私人关系，遂频与之交往。长冈且邀罗密谈，向他提出劝诱清政府在东北另立“满蒙帝国”的计划。这个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后来虽未实现，但罗在归国后曾密招近卫来中国为此事奔走[(2)]。

1902年，罗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1903年冬，曾应邀入两广总督岑春煊幕中参议学务。1904年夏，受江苏巡抚端方委托，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1906年春，罗振玉被调入京，在学部充二等谘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当时，清朝统治者为抵制革命，着手所谓“预备立宪”，进行一些改制活动。罗振玉十分顽固，主张恪守旧制，反对任何改革。在此期间，罗振玉一度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并奏请学部购运敦煌石窟古文物。这些文物史料后来有相当部分转入他自己手里。宣统年间，罗振玉大力搜购安阳出土的甲骨，先后得三万余片，这是他以后从事古文字及古器物研究的重要条件。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同当时也在学部做官的王国维，于12月初携眷逃往日本京都，成了亡命遗臣。在日本期间，罗振玉利用他的大量收藏，先后著录《殷虚书契前编》、《后编》及《殷虚书契菁华》等书；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虚书契考释》与《流沙坠简考释》。罗振玉早年即留心于古器物的鉴别，几乎一生未断。他每搜购一批古文物，经过考校，出书之后便卖掉，然后再买一批，如此反复。所以鲁迅说他是“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3)]。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归国，住天津。一度举办京旗赈务，与柯劭忞等人组织京旗生计维持会。此后，纠合旧朝遗老，以保存古文化为宗旨，组织所谓东方学会。不久，即自行消散。1924年9月，罗振玉被清废帝所召，“入直南书房”[(4)]，与王国维一起检理宫中器物。是年11月，清室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罗振玉当时是清室善后委员之一。当他看到象征皇权的“御宝”被封时，痛不欲生。据他自己表白

曾“欲投御河自沉”，然而终觉“不可徒死”，只生了一场病[5]。病愈后，他与陈宝琛苦心策划，将废帝溥仪从醇王府偷偷地护送到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大使馆庇护下，罗振玉和他的儿子罗福葆于深夜将溥仪秘密送到天津，在日租界“张园”（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别墅）住下。罗振玉以此有功，被委为“顾问”，经常出入“张园”。后来，罗在遗老之间惹起怨忌，于1928年迁居旅顺。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这时，一向与日本政客有勾结的罗振玉，认为复辟帝制的时机已到。他对日本军部说：“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6]日本军部很欣赏他的献计。于是罗大肆活动，频频奔走于东北的汉奸与日本军部之间，秘密筹划，成为帮助日本分裂中国炮制成立伪满洲国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年11月，日本天津驻军司令部派武装士兵护持溥仪偷离天津，把他安置在旅顺。罗振玉一心指望溥仪一到东北就能重登皇帝宝座，自己则以“开国重臣”位居显要。但日本却决定暂不行帝制。1932年3月，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任罗振玉为伪参议府参议，罗不愿就职。改任伪临时赈务督办，不久亦辞职。1933年，任罗为伪监察院长。是年，伪满日文化协会成立，罗为常任理事，后任会长（1936年）。1933年底，日本与汉奸议决改行帝制，罗振玉是所谓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1934年3月，溥仪“登极”，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罗振玉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7年6月，罗振玉退休，此后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1940年6月19日病逝于旅顺。

---

(1) 罗振玉：《集蓼编》，《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上虞罗氏1941年版，第8页。

(2) 罗振玉：《集蓼编》，《贞松老人遗稿（甲集）》，第14—15页。

(3) 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21页。

(4) 罗振玉：《集蓼编》，《贞松老人遗稿（甲集）》，第37—38页。

(5) 罗振玉：《集蓼编》，《贞松老人遗稿（甲集）》，第39页。

(6) 罗振玉：《集蓼编》，《贞松老人遗稿（甲集）》，第44页。

罗卓英

沈荆唐

罗卓英，字龙青，号慈威。1896年5月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生，广东大埔人。父亲罗平材，务农。罗卓英幼年过继给叔父，由叔父抚育长大。七岁入塾启蒙，爱读诗词。后入本县官学堂，1914年毕业，翌年考入大埔中学。1918年北上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未被录取，留保定鸿文公寓攻读，撰文投稿北京各报刊，以稿酬为生计。翌年再考保定军校，录取为第八期炮科，与同学陈诚意气相投，结为好友。期间曾回乡任湖山官学校长。1922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广东家乡任大埔中学教务主任，并创办湖山中学。

其时，国民革命在广东兴起，罗卓英于1923年任潮梅军参谋。1925年8月经陈诚引荐，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一军第一师炮兵营第三连连长。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攻克惠州之役中，指挥炮兵轰毁城楼。随后由河婆入揭阳、黄冈，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受到嘉奖，战后升任炮兵营副营长。1926年7月，国民政府兴师北伐。罗卓英所在之第一师属总预备队留粤。10月调任第十四师炮兵营营长，在何应钦指挥下入闽作战，在松口战役中指挥炮兵猛击敌军阵地，奏捷。12月底定福建后北上入浙，战孙传芳军。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陈诚担任第二十一师师长，罗卓英应陈诚之邀至第二十一师，任参谋处长。5月全师渡江追击孙传芳军，次第攻克邵伯、高邮、界首、宝应、淮安。7月底8月初随同陈诚率部回师，8月底又参加龙潭之役。1928年春，陈诚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任警备师团长。

1928年6月，北伐讨奉结束后，蒋介石着手整编全国军队，将第一集团军各军整编为六个师，陈诚所部与曹万顺第十七军合编为陆军第十一师，曹、陈分任正副师长，罗卓英任师参谋长。翌年7月陈任

师长，罗任第三十三旅旅长，参加襄樊战役。不久升任副师长，协助陈诚锐意整理全师，中下级军官全部换成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使十一师成为蒋介石的亲信队伍。罗对部属甚重礼仪，和颜悦色，平易近人，要求官佐对士兵也应以“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态度进行管理教育，效法古人“扬善公庭，规劝私室”，以理服人，而力戒以力压人。罗还注重部队的治理，信奉“打仗不怕死，做事不贪财”，协助陈诚推行“三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使十一师的战斗力不断提高，在为蒋介石战胜各反对派的战斗中屡立战功。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罗卓英协同陈诚指挥第十一师全力以赴，先沿陇海路攻击前进，次第攻占马牧集、朱集站和归德，继占宁陵、睢宁等地；7月又快速赴援曲阜并与友军合力攻占济南；接着又率部快速突进，经周家口、中牟、新郑，在和尚桥、二里岗奏捷后，于10月6日傍晚跑步进入郑州城。大战结束后，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任军参谋长。翌年1月任第十一师代师长，几个月后被任命为师长。

1931年5月，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编属陈诚“第三路进击军”，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事。7月次第攻占黎川、广昌、雩都（今于都）后，又奔赣江，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但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拖得精疲力竭。8月中旬在空坑受到红军一部和农民自卫军的猛烈袭击，损伤惨重。罗恼怒之余放火烧山，枪杀逃出的无辜百姓以泄怨愤。罗还协同陈诚吞并杂牌部队，先后兼并、改编韩德勤五十二师残部、郭宗华四十三师、张英五十九师。在陈诚举荐下，罗卓英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兼第十一师师长。1933年初，罗又升任第五军军长，率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参加第四次“围剿”，向广昌前进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结果在黄陂遭到红军的围击，后得第十四师、第九师的救援，才得以逃脱。9月又参加第五次“围剿”，隶属陈诚之北路军第三路军，罗兼第五纵队副总指挥，协助陈诚指挥五个师的兵力，以“封锁固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逼近。他们利用红军被“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指导的错误，以数

倍于红军的兵力，依托碉堡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在中央红军1934年10月长征后，罗任驻赣绥靖预备军代总指挥，代陈诚指挥所部“清剿”红军及地方人民武装力量。1935年间他又率部入浙驻金华，对该地区的红军进行“围剿”。是年9月，罗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翌年两广事变中，罗被蒋介石任命为平定桂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陈兵于西江，以迫桂军就范。9月，罗任广州行营办公厅主任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为蒋介石控制两广局势效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卓英任第十六军团军团长，率第十八军参加淞沪会战，为左翼军，在罗店、浏河一带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三失复得，战斗艰苦激烈，抗日将士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继后在金家宅、沈家桥等地进行阵地战。会战末期，罗率部向吴县、福山一线撤退，后与日军激战于太仓、常熟、福山、兴隆桥，且战且退，撤向无锡、江阴一线。11月12日，罗被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当时蒋介石决心守卫南京，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署大军进行南京保卫战。但是南京是个易攻难守之地，守备部队多是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师，零乱不堪。罗协同唐生智指挥各部奋力抗御，终难抵挡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攻势。南京失守后，罗至苏皖浙边区，于1938年1月26日改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旋指挥所部在南浔线各地展开游击战。6月，罗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先在彭湖战场抗击日军，多次挫败企图在湖口一带登陆之日军，并指挥武胜关、贺胜桥、鄂南、湘北诸战役。9月12日，罗奉命接替陈诚任武汉卫戍司令，为保卫武汉加强各方面的管理。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罗卓英率第十九集团军于1939年3月参加南昌会战，任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他指挥第十九集团军的五个军兵力与冈村宁次指挥的四个师团激战于万家埠、安义一线。奉新、南昌失守后，罗指挥所部在修水以南、赣江以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4月21日和5月1日，罗指挥所部及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和卢汉、高荫槐第一集团军之一部，两次向南昌发起反攻，但敌军火力

凶猛，我军伤亡甚重而难克。罗乃改攻坚夺城战术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之游击战。同时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战役。1940年2月，罗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翌年3月，指挥所部在鄱阳湖地区抗击日伪军，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歼敌两万余，并收复要地万寿宫及安义外围重要据点。12月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任南方追击军总司令，追击敌人至桃林、忠场一带，粉碎了敌军的牵制战略。

罗卓英的指挥才能受到蒋介石的褒奖和赞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等国结盟，决定派遣远征军赴缅协同英军作战，蒋介石于1942年4月2日任命罗为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4月5日，罗随同蒋介石飞抵腊戍，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一道部署平满纳战役。旋因英军决定撤往印度，罗乃指挥所部驰援仁安羌被围之英缅军，接替英军防务。此时，侵缅之日本侵略军大举北进。罗计划之平满纳会战、曼德勒会战均未能实现。罗曾部署乔克巴当之战，调主力开赴乔克巴当而放弃梅苗、棠吉，致使腊戍门户洞开。日军攻占杂枝后又攻腊戍，罗部赴援不及。日军次第攻陷腊戍、畹町、密支那和腾冲，国民党十万远征军之归路亦被切断。罗部孤立无援，乃决定大撤退，丢弃辎重车辆，突破敌封锁线，进入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死伤甚众。经过艰苦跋涉，一部返回滇西，第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等进入印度。罗亦进至印度，于6月23日飞回重庆述职。10月，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取消，另行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为总指挥，罗为副总指挥。罗与史迪威格格不入，几个月后即离印返渝。1943年5月改任军令部次长。不久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担负反攻部队军官的训练任务。嗣后又兼军事委员会督训总处主任。1944年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罗被任命为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主管参军入伍的知识青年训练事宜。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卓英于1945年8月底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初次出任封疆大吏，主政粤省，颇想为桑梓建设效力。为安定战后社会秩序，他提出要妥善处理军队善后、抓紧救济抚恤、加强交通治安、平抑物价、安定金融等意见。不久，他发表了建设广东的施政方针：一、选贤任能，树立廉正风气；二、扶植工农，改善人民生活；三、健全县政，巩固宪政基础；四、奖励科学，促进现代文化；五、发展侨务，充实建设力量。针对政界多年积弊，他提出要以“勤、明、公”的精神，达到“新、速、实”的效果，扫除“怠、昏、私”的积习，改变“顽（旧）、散（漫）、伪（饰）”的风气。他曾三次越海到海南岛，进行接收西沙群岛工作，命名南沙最南端之岛为“南威岛”以振国威。1947年初，他又提出建设广东的五年计划。但是他难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积弊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带来的沉重负荷，一些方针措施和计划方案多流于纸上空谈、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1947年9月，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罗卓英也被调去沈阳任行辕副主任。罗竭力辅佐陈诚整顿和发展军事力量，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由九个军扩大到十四个军，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特种部队。但是东北民主联军养精蓄锐，于10月发动了强大的“秋季攻势”，罗卓英协同陈诚仓皇应战，一再失误，先后被歼六万九千人。翌年1月，主力部队新五军又被全歼。在一片责难声中，陈诚于2月离职，将大权交给卫立煌，罗卓英也随之离职南下，悄然隐居。

在全面内战败局已定，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的1948年12月29日，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负责经营远离大陆的孤岛，罗卓英应陈诚之邀亦去台湾，协助陈改编、整训陆续撤台的军队。1949年7月，已经撤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上是统辖台湾、江苏、浙江、福建诸省和潮汕沿海区域，以陈诚为军政长官，罗为副长官。这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除了骚扰大陆沿海地区和诸岛外，无有任何作为。

1950年3月后，罗卓英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等职。后常居屏东，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台南研究区主任。

1961年11月6日，罗卓英在台北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张开秀：《罗卓英生平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63辑，1990年版。

陈训正编著：《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南京1929年版。

刘泗水：《罗卓英抗日诗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梅州文史》第4辑，1990年版。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

康景濂：《罗卓英》，台湾《青年战士报》1961年11月13日。

吕超

马宣伟

吕超，字汉群，号平林，祖籍湖南，先世入川后在宜宾定居。父亲是塾师。吕超生于1890年3月9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九日），自幼在宜宾读私塾，后到成都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一期，1909年毕业，为优等生，继赴南京入陆军第四中学深造。他在南京结识革命志士，旋加入同盟会。从此，与同班同学陈铭枢、何克非、夏醉雄及军官万定雄等人，经常聚会讨论革命大事和联络校内外革命同志。

1910年春，吕超分配到保定军校入伍生队学习。革命党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禄贞派同盟会员到保定与吕超等人联络起义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下令大搜捕，吕超与同学数人先后离保定赴各地参加革命工作。吕到上海后，通过同盟会中部总会介绍，见到陈其美，议定回到北方进行革命活动。吕领得数千元后即赴天津，与彭家珍、黄复生、夏斗寅、赵铁桥等人进行策划革命的活动。后赴北京晤李石曾、汪精卫等人，成立了同盟会京津分会。吕先在军事部任事，后继蓝天蔚为军事部长。当时，清廷亲贵良弼等人极力反对清帝退位，1912年1月26日在军事部任事的彭家珍因暗杀良弼以身殉国，吕超深受感动，更加努力工作。他分工担任运动毅军及曹锟第三师官兵，迅速在排长、连长中发展同盟会员四十余人，士兵中发展千余人。吕晚间常在僻静处分班召集官兵，晓以革命大义，听者深受教育，表示愿为革命效力，请早发动。2月29日，袁世凯唆使北洋军第三镇在北京“兵变”，作为拒绝南下的借口，并假借镇压兵变，派兵捉拿革命党人。一天，吕超路经天安门，见袁军鸣枪抓人，便躲入一胡同内逃脱。之后，他立即通知军中的革命同志赶快隐蔽，并以军事部长名义签发证书，介绍他们加入革命队伍。不久，吕将京津同盟会的工作结束，离京南下。

吕超于5月返回四川，在宜昌与同盟会员冯中兴相遇。冯系奉黎元洪之命率兵护送步枪数千支入川，以偿付盐款。四川督军胡景伊和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均想获得这批武器。熊先派人找吕商议，愿以这批武器在夔府成立第五师第二团，委冯中兴为第二团团长，吕超为副团长。吕与冯商议后取得协议，成立了第五师第二团，移驻万县后又改编万县巡防军一营以充实实力，吕超任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1913年初任第二团团长，移驻重庆。

“二次革命”爆发后，8月4日，熊克武、杨庶堪通电讨袁，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吕超被派赴成都，联络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后又去乐山、宜宾、泸州联络各地驻军。吕回重庆后，被派到永川龙光旅担任第一支队队长，主攻隆昌、泸州、合江等地。不久黔军攻占重庆，熊克武、杨庶堪被迫出走。吕只身潜入重庆，劝黔军司令黄毓成重树反袁革命旗帜。黄也是同盟会员，当即表示同意。但入川陕军已达夔府，吕超冒险通过火线与陕军司令张钫会见，双方达成协议：川陕两军以万州桥至大江溪流为界，互不侵犯。吕决定再赴重庆联络黔军，但黔军已在川军进攻下败退离渝。胡景伊下令拘捕参与“二次革命”的“肇乱人犯”，吕超乃只身东下。

吕超逃亡上海后，得悉熊克武、杨庶堪、谢持等人已出国东渡，即赶到日本，受孙中山委派，到为逃亡日本的同志而设的“浩然庐”讲学。

这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吕超与杨庶堪、谢持、卢师谛、石青阳等人唯孙中山之命是从，一起加入。1914年秋，孙中山决定再次发动反袁斗争，委吕为中华革命军川南区司令。12月，吕奉命回国，由湘西至宜宾秘密布置任务，又到上海购置炸药手枪，乘船入川。船至涪陵码头，得同盟会员密告，重庆当局已探知自己的行踪，乃派其弟吕一峰运送枪弹，自己绕道回宜宾，秘密发展中华革命党党员，为成立讨袁起义军打下基础。

1915年12月，蔡锷等人在云南护国起义，率护国第一军入川，吕超以中华革命军川南司令名义举兵起义。他率部出发，沿途招募民团，夺得江防军步枪百余支，将部队进行整编。年底，吕超率部协同护国军攻宜宾。1916年1月，吕部编为两个支队，吕为第二支队长。2月，川军攻宜宾，吕率部激战于牛喜场西北高地，获得全胜，军威大振。3月，又率部攻克筠连，歼灭巡防军，枪杀附袁的县知事，川南六县附袁部队望风前来归顺。他乘胜前进，率部兵不血刃而占自贡。6月，袁世凯病逝。新任四川督军周骏继续与护国军对抗。护国军四川招讨使熊克武采纳吕超攻打隆昌的建议，下令分三路围攻隆昌，又获大胜。护国战争胜利结束后，吕超任第五师第十八团团长，驻忠州。

1918年初，川、滇、黔军组成三省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起兵讨伐依附北洋军阀的四川督军刘存厚。2月，吕超率部先攻进成都，赶走刘存厚。捷报传到广东，孙中山电委吕超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兼暂行代理四川督军。吕复电力辞，推熊克武担任，并率部追逐刘存厚部直至陕西宁羌（今宁强）。

川局既定，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杨庶堪任四川省长，吕超任第五师师长驻防绵阳。吕办军官教育团训练官佐，培植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干部，部队扩充为三个旅一个独立团。7月，刘存厚在汉中设四川督军署，吕超进兵汉中，于12月5日将汉中城包围，至21日城将攻破时，刘部赖心辉率援兵赶至，吕超部在粮弹两缺的情况下率部败退回川。

1919年，陈炯明、赵恒惕、熊克武主张联省自治之声甚嚣尘上，他们各据一省，政由己出，甚至国民党内亦有人借联省自治诋毁孙中山，嘲讽吕超等人为“孙大炮之信徒”。这时四川国民党内发生矛盾，唐继尧企图乘机控制四川，于1920年4月联合国民党人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等人，组成“倒熊联军”，自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吕超站在倒熊一边，出任副总司令。混战开始后，7月18日，吕

超率部攻入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率部败退后，又拉拢刘湘、邓锡侯及困居陕南的刘存厚一同攻打吕超和石、颜、卢、黄。吕部等被打垮，吕超出走上海。

1921年秋，吕超奉孙中山命赴粤，随孙中山至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冬，吕奉派赴湖南，在赵恒惕部队内发展国民党员。不久又到郑州联络胡景翼、岳维峻、樊钟秀，并赴大名联系孙岳等人，吸收他们加入国民党，与之密商策动北方革命的计划。接着，吕超赴北京联络冯玉祥，又取道上海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取得联系，直至1923年5月始返回广州，受到孙中山嘉许，被委为大元帅府参军长。

1923年2月，四川第一、第二军之战又起。吴佩孚图川，帮助杨森、刘湘等人率各路反熊军向第一军进攻。6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派吕超回川任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1924年3月，熊克武部战败退出四川，师长杨春芳投刘湘，将吕超扣在泸州，软禁了一段时日。1925年2月，四川督理杨森企图武力统一全川，刘湘、袁祖铭组织川黔联军攻打杨森。袁祖铭任总司令，邀吕超任总指挥。联军讨伐杨森取得胜利，吕超拥有一万人的队伍，分得宜宾、高县、珙县、长宁、兴文、筠连等县为防地。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吕超召集旅长、团长开会，主张出川。其他将领不愿出川，吕超只身来到广州。11月，吕被任命为四川宣慰使，回川策动各军易帜参加北伐。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权后，吕超欲凭借李宗仁的力量图谋四川未果，乃参与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斗争，一度遭到蒋的通缉，避居上海租界。1930年，吕超参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冯玉祥、阎锡山的联合反蒋活动。中原大战前夕，李、白拨兵一团及军械一部分交吕超，吕超在汉口招集旧部，成立后援军司令部。结果冯、阎大败，吕部也被收编。1931年12月，吕超经陈铭枢推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

参军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吕超坚持抗日立场。1939年10月，吕在重庆成立“中国抗建垦殖社”，得到陈铭枢、邓锡侯、孙震、潘文华等人的支持。该社出钱、出人对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进行开发，吕超悉心从事。1945年9月，吕超被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官。1948年1月，吕超被选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成都成立监察使署。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吕超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思想有所转变，参与策动四川国民党军队起义。

1950年，吕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7月20日，吕超在重庆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沈铸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赴武汉参加革命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版。

吕超儿媳刘蕊兰回忆资料。

吕公望

魏桥

吕公望，原名占鳌，字戴之。生于1879年2月28日（清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浙江永康县人。父吕春梧，在乡开肉店，兼务农，有屋五所，田一百二十亩。吕公望七岁入塾，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为廪生，曾在村里设馆授徒。

八国联军之役，清廷与侵略者签订《辛丑条约》，这一行径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吕公望也受到影响，思想上开始变化。1905年2月，他将廪生让人，到杭州入金衢严处四府公学求学，希望寻求新的知识。

1906年，吕公望经人介绍，结识了秋瑾，多次在西湖游艇或雷峰塔北面白云庵的小楼上讨论国事。同年，吕公望参加了光复会[(1)]。

同年12月，徐锡麟途经杭州，寓白云庵，与吕公望会晤，谈得很投机。临别时徐勉励吕说：他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希望大家为革命不惜流血[(2)]。吕很受感动。是年，他改名为公望。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与秋瑾商定，入浙江省巡抚衙门卫队营当兵，以便结纳志士，擒贼擒王。他向抚署具呈了申请，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敭的批准，即入抚署卫队当兵。吕利用同乡关系，在卫队中开展革命活动。

1907年3月，保定军官学校速成科招生，浙江选送五十名，吕公望被选在列，于5月12日离杭。14日到沪，吕介绍同被选送的青年张鸿翔、童葆暄、叶志龙、林竞雄等人至《上海女报》社访秋瑾，填写了参加光复会的志愿书。他们抵保定后，得到徐锡麟因诛恩铭为官府所戕和秋瑾被捕就义的消息，并闻革命党人名册已被绍兴知府贵福搜

去。童葆暄等人闻讯后惊惶不安，吕公望较有思想准备，做了一些稳定情绪的工作。后来因没发生什么事故，始渐安定。吕在保定军校习炮科，期满后分发回浙，由督练公所派到第八十二标第二营任见习官。

1909年，广西筹办新军，吕公望应招前往，12月初到达桂林，被委为兵备处考功科二等科员。为了鼓吹革命，吕公望与尹昌衡、覃鎏鑫、赵正平等人创办了《指南月刊》，因涉讥讽被查封；改出《南风报》，又被封闭；再改名《南报》，也受检查，被迫停刊。广西巡抚张鸣岐开始时对吕公望等人尚宽容，后来加强了控制，扣押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人。吕公望见势不妙，辞职转至香港，在港会见黄兴、胡汉民等人。1910年10月，吕仍回到浙江，在督练公所经理科从事财会及统计等项工作。次年升充第八十二标第二营督队官。

自从徐锡麟、秋瑾举义失败后，浙江光复会形同解体。朱瑞、顾乃斌、韩肇基、庄之盘、朱健哉、虞赓甫、吕公望等人认为光复会亟待重整，招收新会员，团结老会员，遂商定以吕公望在杭州紫阳山脚下太庙巷的住所作为秘密接洽点。吕受朱瑞委托，经常聚集革命党人于寓所，为重整光复会奔走。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吕公望正在北京办事，闻讯后立即赶回杭州，参加了光复会在杭州城隍山四景园召开的秘密会议，商讨浙江独立的部署，会上与朱瑞、顾乃斌、韩肇基、朱健哉等人研究决定：（一）浙江起义时拥汤寿潜为都督以资号召；（二）促王金发速返绍兴谋独立，并由吕公望赴缙云督促吕逢樵密运革命队伍往富阳独立，诱杭州驻军外援，以分其众，为我方减轻压力，便于发难；（三）定于11月9日为行动日期，吕公望于事前赶回杭州协助一切；（四）派褚辅成赴上海秘运手枪二百支来杭。会后，吕公望即离杭。11月4日，革命党人在杭州提前起事成功[(3)]，5日，吕闻讯后当即雇快船回杭。当时南京仍为清军盘踞。在7日举行的浙江省临时参议会上，吕公望提议浙江应即出兵进攻南京，奠定江南，以巩固浙江光复

后的局势。参议会通过这一提议，责成吕起草动员计划，旋即由朱瑞任浙军攻宁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与苏、沪各军共同组织联军进攻南京。联军士气高昂，经过乌龙山、幕府山、马群、孝陵卫和天保城多次作战，于12月2日攻克南京[(4)]。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吕公望任浙军第十一协协统。不久清帝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袁任命朱瑞为浙江都督，浙军改称第六师，朱瑞兼师长，后吕公望继朱为师长。1913年，吕公望任嘉湖戒严司令，驻嘉兴。1914年7月任嘉湖镇守使，驻湖州。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以反对帝制为名，于1916年4月赶走浙江都督朱瑞。可是屈映光出尔反尔，一时反袁，一时又反对独立，舆论哗然。5月5日，吕公望被公举为浙江督军，同时兼任省长。他公开声讨袁世凯，任周凤岐和童葆暄为师长，将浙军列入护国军。吕主持浙江军政后，裁撤骈枝机构，整理财政，恢复法院，很想做一番事业。但是，由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插手，内讧时起，难以驾驭，仅半年时间，只得辞职而去[(5)]。

1917年1月，吕公望被段祺瑞召至北京，授予将军府怀威将军衔。时段祺瑞与继袁任总统的黎元洪之间，争夺权势，演变成了激烈的“府院之争”。是年5月，黎下令免段职，段愤然离京赴津，挑动督军团倒黎。这时，吕公望站在段祺瑞一边。7月1日，张勋复辟，段祺瑞于7月3日组织“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吕公望亦追随段祺瑞，积极参与了讨伐张勋的活动。然而段祺瑞再度上台后，吕公望并未被重用，只在将军府挂名，仍闲居天津。

1918年护法战争期间，童葆暄站在北军一边，率浙军攻粤，进逼潮汕地区。护法军政府岑春煊鉴于吕公望与浙军有老关系，派秘书长章士钊到天津，邀吕赴粤共事。5月，吕公望到达潮州。7月，童葆暄部发动一次猛烈进攻，攻占大埔、饶平等县。吕公望得悉童葆暄驻饶平，其左路前敌指挥陈肇英驻飞鹅颈。浙军中不少军官是吕的老部

下，于是吕受命冒险赴前线。他带了几名护兵，手持白纸灯笼，外面写“吕公望”三字，用竹竿高举，闯进对方阵地直抵指挥部，说服陈肇英倒戈投南。童葆暄闻讯急忙下令退兵，粤军乘势追击，从8月上旬起，闽西南龙岩、漳平等十余县均入粤军之手[(6)]。护法军政府以吕公望有功，于8月29日授予护法军援闽浙军总司令职。

1919年，岑春煊把持下的军政府内部发生裂痕。吕公望因与岑春煊关系密切，1920年兼任军政府参谋部长，援闽浙军接受军政府号令。1921年四五月间，闽南群众暴动，将援闽浙军参谋长兼独立旅旅长苏伏波击毙于张林乡。同时陈肇英部在潮州被李厚基部包围，全部缴械遣散[(7)]。吕见大势已去，经上海到北京，不久又蛰居天津。

吕公望自从在闽失败后，对于政治活动渐觉乏味，试图在经济事业上谋求发展。1922年，吕公望与张绍曾、金兆桂、熊希龄等在天津筹办女子储蓄银行，吕任董事长，但银行开张只一年多即倒闭。1923年又与吴鼎昌、吴天民等人集股筹建跑马场，也告失败。北伐战启，吕公望离津南归。当北伐军1927年1月进入浙江后。吕公望又一度担任了江北宣抚使，招抚杂牌军队。但感到自己年近五十，政治上不顺利，决心弃军政而从事商业，不久去职。1928年，他在上海集资开设永豫纱厂，“一二八”事变后停闭。1934年，吕到浙江昌化开采锑矿，至日军占领时停办。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吕回到老家永康，担任浙江省赈济会委员，创办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工厂，担任总经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伪装民主，拉拢一批地方名士来装潢门面。1946年起，吕公望担任了浙江省参议会副议长。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岩曾邀吕公望去台湾。吕拒绝，托病躲入医院。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吕公望先后担任杭州劳军委员会和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政协浙江省委

员会委员。

1954年7月22日，吕公望患心脏病在杭州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吕德懿：《先严吕公望生平事迹》，1961年回忆稿，稿藏浙江省政协。

吴鼎元：《吕公望事迹概述》，未刊稿，稿藏浙江省政协。

---

(1) 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2) 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3) 邹鲁：《浙江光复》，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页。

(4) 《浙军攻取南京详情》，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163—165页。

(5) 李净通：《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时期的浙江政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版。

(6)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8页。

(7) 张性白：《“浙军援闽”与护法政府的“援闽浙军”》，夏达才：《浙江陆军第一师“援闽”回忆》，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3年版。

吕思勉

汤志钧

吕思勉，是近代我国知名的史学家。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吕思勉六岁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吕誉千亲自讲课，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母亲讲授《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因而他很早就对史部之书发生兴趣。其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经世文编》，让他“随意泛滥”。自称：“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其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余以之与原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原本。此为余能自读书之始。”(1)

甲午战后，他关心时事，开始读报，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是他当时最喜读的刊物，从而“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认为政治利弊，应“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于是“渐入史学一路”(2)。

1905年起，吕开始任教。190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1910年，经屠寄（敬山）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中学国文专修科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是他加入政界与否的关键。他说：“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余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余亦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3) 1912年，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旋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教授。1923年，在江苏省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上

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来光华大学增设历史系，吕任教授兼系主任。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1935年12月12日，与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蒋维乔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停办。吕思勉携眷归乡，闭户著作，恃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吕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并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认为自己的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尚不知考虑，这是第一期。十七岁以后，主张通过改革政治而走向大同，这是第二期。四十七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检查过去的史学思想，这是第三期。

吕思勉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早年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1922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四册，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中国通史，几经重版，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此后，在教学过程中，又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一、《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篆、隶、真、行、草的变迁，其中论汉代古文一段，有创见。二、《字例略说》（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六书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应别立。六书中只有象形是文，指事也是字。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三、《章句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为章句即今之标点符号，古代也有标点，后来抄写印刷时逐渐失之。四、《说文解字文考》（稿本，未刊），就《说文解字》检寻单体之文，稽考解释。五、《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读古书方法和考证古籍，并推论古代学术流派的源流。

六、《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不单从先秦哲学立论，还注意社会政治方面。七、《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宋代理学，中多新意。八、《史通评》，对刘知几《史通》进行平议、推论，附考据辩证。此外，尚有《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燕石札记》（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燕石续札》（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直到晚年，吕思勉仍然专心致志地想以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劳动，以及对二十四史的稔熟，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即用力十年之久。计划中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未能写出。

吕思勉所著断代史，一般都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贡献很大。

吕思勉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是：一、读书基础应广，读书要多，多读书就能发现问题。二、留心政治社会情况，将当世之事与史实互勘，使不为表面记载所囿。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它是史学的根基。历史的根基是社会，读历史单知道攻战相杀是不够的。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四、读本国史，也须研究外国史，于历史地理亦应知其大概。他治学的成就，在于“博、通”，是位史学专家，但他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入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只是

因为“治史”，而使经学、文字学成为“古史之工具”的。有人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是：“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就，尚核实而不涉于烦碎，此其为学之方也。……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如钱晓徵，论证似戴东原，辩述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4)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工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年轻时爱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也欣赏《十七史商榷》、《癸巳存稿》。后来看到有些人不屑考证，自以为搜辑精博，实际上这些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5)。他认为精力不应该完全耗费在枝节问题上的饾饤，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吕思勉晚年想将毕生治史独到之处，辑成专书。又感到道教包括“从古以来杂多之宗教”，与佛教既有交叉，与农民战争和反动道门也有联系，但乏人研究，几成空白。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亦未如愿。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他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出版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1957年10月9日，吕思勉因病逝世。

---

(1) 吕思勉：《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州市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4年版；另亦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1—757页。

(2) 吕思勉：《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5辑；另亦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吕思勉著），第741—757页。

(3) 吕思勉：《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5辑；另亦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吕思勉著），第741—757页。

(4) 徐哲东：《吕诚之先生六十寿序》，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69—470页。

(5) 吕思勉：《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5辑；另亦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吕思勉著），第741—757页。

吕彦直

王家鼎

吕彦直，字仲宜，又字古愚，祖籍山东东平。其先辈早迁出原籍，至其父时居无定处，后居天津，曾与安徽滁州吕氏通谱，故亦自称滁州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吕彦直生于天津。其父生平不详。吕八岁时父亲病故。翌年即随二姊迁居法国巴黎，得以接触卢浮宫绘画艺术宝库，从此酷爱绘画。每观看马戏团表演，归家后即默写狮子、老虎等形象，莫不栩栩如生。是时，孙宝琦出使法国巴黎，少年吕彦直常与孙氏相见，某日偶然兴起，为孙氏悄悄画一肖像，竟能几近逼真，表现出优异的艺术才能。

1906年前后，吕彦直随姊返国后，入北京五城学堂读书，从著名文学家林琴南习国文。他聪颖好学，作文颇富文采，在班内首屈一指。结业后入清华学堂中等科。辛亥革命后该校改名为清华学校，吕留校继续求学。1913年夏，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毕业，由北洋政府选派出洋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深造。初习电机科，由于志趣不合，旋改入建筑科。留学期间吕彦直刻苦自励，在专业学识方面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17年，吕彦直以优异的设计成绩毕业，受到指导教师的器重。后充任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的助手数年，同时游历各国，调查研究欧美建筑艺术，曾协助墨菲设计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等校的建筑设计事务。这二处建筑设计在吕彦直从事将中国古代传统建筑艺术与近代西方的先进建筑技艺相融合方面，跨出了第一步 (1) 。

1921年，吕彦直离美回国，在上海与过养默、黄锡霖组成东南建筑公司，独立从事建筑设计业务，较著名的有上海银行公会会所等大型建筑。先是，吕彦直早年在巴黎参观卢浮宫时曾与广东三台人黄檀

甫邂逅相识，后成挚友。黄后来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建筑科，20年代中期两人再度重逢于上海，吕遂脱离东南建筑公司，与黄檀甫另组真裕建筑事务所。不久，又经营彦记建筑事务所。此时他的设计成果多系住宅建筑，纯取西洋式，小巧精致，实用舒适；同时又致力于北京故宫和国内各省主要古典建筑的考察和研究，在中西建筑技艺的融合上达到很深的造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张静江、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等十二人组成的“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设筹备处于上海，并决定在南京紫金山南坡中茅山圈地建筑中山陵墓。接着，筹备处登报悬赏征求陵墓设计图案。吕彦直得知后即赶制设计图案参加应征。他潜心研究中国历朝皇陵、古罗马帝王陵寝及埃及金字塔等中外著名建筑，确定陵墓外型设计为警钟形，取振聋发聩、暮鼓晨钟之意。迄至同年9月15日，筹备处计收到应征图案三十余种。除家属宋庆龄、孙科及葬事筹备委员参加评阅外，复聘画家王一亭、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雕刻家李金发等为评判顾问。9月20日，经投票评选，吕彦直设计的图案被评为首奖，被选入采用[(2)]。10月初，吕被聘为陵墓建筑师，专负主持建筑工程设计。吕不辞辛劳，至12月初即完成工程详图的绘制，交付公开投标，征求建筑包工。12月30日与上海姚新记营造厂签订承包工程合同。

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动浙奉战争，进攻奉系江苏督办杨宇霆，沪宁线交通屡为战争所阻，吕彦直为进行现场勘测和绘制工程详图，常不避艰险地奔波于沪宁之间。为便于运输建筑材料，按吕的提议很快修建完成从宁沪线太平门车站经明孝陵至茅山脚下的轻便铁路和茅山向南九公里的简易公路。1926年1月正式开工，3月12日在紫金山举行工程奠基礼。当时南京仍处北洋政府管辖下，工程虽得到叶恭绰、熊希龄等人的维护，但因局势动荡，工程进展缓慢。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底定宁沪后，4月27日葬事筹备处迁至南京，与吕彦

直、姚新记营造厂进一步磋商竣工办法，工程俾得以加速进行。

与此同时，吕彦直还承担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设计。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在广州建筑永久性纪念物，定名中山纪念堂。堂址设越秀山南麓。1926年4月，筹建委员会登报悬奖征求建筑图案。5月中旬经南京评审会议决定，吕彦直的设计方案获首奖入选。这项设计打破了中国除宫殿、庙宇以外，一向无公众聚会设施的传统，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规模宏大的礼堂。场内可容六千人。藏入周围内墙的八根支柱，支撑着四个跨度约三十米的大型钢结构桁架，上面再支撑八个主桁架，构成八角形顶盖，从而造成宏大的空间，气魄雄伟。另有巨梯六座，通往挂楼。出口凡十一处，六千人可在数分钟内离场完毕。这处建筑还以其坚固性和色调的和谐著称[(3)]。由于广州炎热潮湿，白蚁危害严重，吕彦直采取了多种防治蚁害的措施。其中颇见功效者，为取柏油精填放地柱周围以防虫害的方法，据说得自访求民间建筑匠人[(4)]。

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为吕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后者于1928年4月26日动工兴建，1929年1月25日举行奠基礼，由上海馥记营造厂承包施工。惜此两大工程未能竣工，吕彦直病势日重，监造工作只得由建筑工程师黄檀甫、李锦沛继任。吕住院后得悉医治无望，遂亲书遗言，勉励同事继其建筑之志[(5)]。吕彦直知来日无多，在病中仍争取时间绘成“规划首都都市两区图案”，“国民政府五院建筑设计”等最后作品数种[(6)]。

1929年3月18日，吕彦直因患肠癌在上海病逝。

---

(1) 《故吕彦直建筑师传》，《中国建筑》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2) 关于中山陵建筑设计情况，孙科在1926年1月12日《总理葬事筹备经过》报告中说："现由委员会决定采用者，为首奖图案，式样采古制，以坚朴为主，墓与祭堂相连，墓式为穹窿式，祭堂在墓之前，堂前为石阶，阶两旁有大空地，足站立五万人。陵墓形势鸟瞰若木铎形。中外人士之评判者，咸推此图为第一。"

(3) 董大西：《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国建筑》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4) 黄建德：《吕彦直先生生平事迹补遗》，《风采》1981年第2期。

(5) 《良友》画报，第51期（1929年10月）。

(6) 《良友》画报，第51期。

吕志伊

叶祖荫

吕志伊，字天民，1881年5月17日（清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出生于云南思茅。其父吕佐侯“以耕读世其家”。吕志伊“幼承庭训，习闻春秋内夏外夷之大义”[(1)]，十五岁起先后就读于普洱宏远书院、昆明经正书院。1900年乡试中举。他曾赋诗立志：“愿合同胞铸新脑，生存廿纪抗强权。”[(2)]

1904年，吕志伊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后肄业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在日本学习研究近代各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接触到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又参加集会，讨论时事，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志同道合之士，民主革命思想日渐发展。1905年7月30日，吕志伊参加了同盟会筹备会议。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他被选为评议部评议。1906年初，被推举为同盟会云南分会主盟人，办理本省留学生的入会主盟事务。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增刊《天讨》中，他以“金马”的笔名发表了《云南讨满洲檄》一文。同年4月，他参与创办出版了《云南》杂志，以“侠少”为笔名陆续在该刊发表了《云南之将来》、《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滇缅疆界谈判》、《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国民主义》、《国民的国家》、《国会问题真相》等文章，介绍近代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学说，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及清政府腐败的内外政策，批驳宣扬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论调，鼓吹进行反清革命。

1908年以后，吕志伊的主要活动转入了同盟会所领导的一系列反清实际斗争中。当年4月，河口起义爆发，他即与杨振鸿、赵伸、李根源等在东京发起组织“云南独立大会”，揭露清政府密议借驻越法兵

镇压革命的阴谋，宣布全滇人民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并于会后派杨振鸿、黄毓英率一批滇籍同盟会员返滇助战。这次集会在当时颇有影响。清政府得知后，立即宣布取消他及杨振鸿、赵伸等人的官费，予以通缉。

年底，他离日赴新加坡谒孙中山，后抵仰光，与居正、杨振鸿等创办同盟会仰光分会机关报《光华日报》。他曾以光绪、慈禧驾崩，宣统及摄政王载沣上台，保皇党人为之欢欣鼓舞为内容，在该报撰一联语“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发起征对，一时轰动，连美洲华侨报刊也予以转载。他在对广大华侨进行宣传组织的同时，经常与在滇西坚持反清活动的黄毓英等革命党人联系，并积极购买武器，准备发动新的起义。1910年冬，他电约黄兴来缅商议滇西起义事宜。正在这时，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云南片马，革命党人从国外秘密运送武器入滇的行动受到挫折。黄兴随即和他商议决定，滇西起义暂缓，以便集中同盟会人力财力，先在广东发动大规模起义。不久，吕志伊赴香港。1911年4月，他参加广州起义，担任撰拟法令、檄文和保管印信、密件等工作。起义失败后，他到上海，担任《民立报》撰述，同时加入“南社”，进行革命的文学活动。

7月，吕志伊参加发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举为候补干事。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筹划在武汉地区发动起义，推吕志伊赴香港请黄兴回国主持其事。9月29日，他在香港和黄兴洽谈后，黄兴同意即赴武汉，并要南方各省同时发动，互为声援。吕又向云南的同志传达了黄兴的意见，嘱做好加速起义的准备。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赶赴云南。刚入滇境，昆明革命党人已于10月30日发动起义。

云南光复后，吕志伊担任都督府参议，旋即被推举为云南代表，赴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他被任命为司法部次长。当时，司法总长伍廷芳在上海担任议和代表，司法部事务悉由吕志伊代理主持。在短短三个月中，他协助孙

中山为临时政府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文告。4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吕志伊亦随同赴沪，任同盟会上海分会机关部副部长、《民国新闻》总编辑。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即奉孙中山之命，赴南洋及缅甸筹设国民党海外各支分部。由于他在海外华侨中有一定影响，蔡锷曾请他广劝华侨集资开发云南实业。1913年初，他被选为国会参议员，旋到北京。“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南下上海从事反袁活动，失败后流亡日本。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吕毅然誓盟加入。

1915年初，吕志伊取得孙中山同意，回云南运动军队，发动反袁斗争。这时，云南巡按使署已接到袁世凯“统率办事处”发来“拿办党首吕志伊就地正法”的密电，乃将他扣押，幸被滇军团长邓泰中、杨蓁救出。以后，他仍继续在滇军中进行反袁活动，与各级军官多次秘密集会，并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党员。9月，他与掌握滇军驻昆部队实际兵权的一部分中高级军官，商议在云南发动讨袁行动的领导、筹款、时机及出兵计划等重大问题，并积极开展争取云南都督唐继尧参与反袁的活动。唐被迫同意反袁后，10月派吕志伊赴南洋，约请逃居海外的革命党人入滇相助。吕在海外向华侨宣传反袁思想，并募集了十余万元。同时，寄函在日本的孙中山报告云南情况。不久，李烈钧、方声涛及蔡锷等先后到昆明，12月25日云南通电独立，发动“护国运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为总统，重开国会，吕志伊曾到北京参加会议。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树起护法旗帜。吕志伊随到广州，参加了国会非常会议。1918年8月，由于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回上海致力于整理党务，吕志伊到沪协助。1920年8月，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回粤，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吕志伊被任为司法部次长，并于次年1月与张继一起筹设了中国国民党驻粤特设办事处。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吕志伊又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1922年6

月，陈炯明叛变，8月孙中山再次离粤，9月在上海开始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吕志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会员，后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参议。1923年2月，滇桂联军驱逐了陈炯明，孙中山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4月，吕志伊被任命为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6月，曹锟贿选总统，吕志伊以国会参议员身份坚决反对，并受其他拒贿议员推举，与章士钊、褚辅成、田桐赴沪，筹备召开国会两院会议。以后，拒贿议员陆续南下，与在北京的受贿议员形成鲜明对立，得到了全国舆论的支持和赞扬。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吕志伊保持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追随于孙中山左右，协助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他憧憬在中国建立“劳力劳心工并读，互助互敬生不已；各尽所能取所需，不劳而食斯可耻”[(3)] 的崭新制度。他的民主革命思想，这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广州大元帅府由胡汉民等人主持。6月，吕志伊被免去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本兼各职，从此离开了政坛。1928年，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要他担任云南省党务指导员、省府委员、建设厅长等职，他均坚辞不就。同年冬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以病老疏散回到昆明。1940年3月4日，吕志伊因病在昆明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

李文汉：《云南护国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79年

版。

---

(1) 吕志伊：《偶得诗集》卷3，1941年版，第1页。

(2) 吕志伊：《偶得诗集》卷1，第1页。

(3) 吕志伊：《偶得诗集》卷4，第4页。

马步芳

王劲

马步芳，字子香，回族，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生[1]，隶籍甘河州乩藏乡[2]。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清军旗官，1900年病殁于宣化后，其父马麒由哨官提升接任了旗官职务。经多年苦心经营，马麒在西北回军中逐渐崛起，于1912年秋取得了西宁镇总兵要职。马步芳是马麒的次子，他的少年时代正是马麒的“创业”阶段。马步芳九岁跟随父亲到西宁，即被马麒安排入营从军，同时学习宗教，以便将来从军事和宗教两个方面发展和巩固家族势力。马步芳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当了几年满拉（学习经文的小学生），经名呼赛尼。稍长后看到已任宁海军马队管带的兄长马步青出入前呼后拥，十分张扬，与自己在清真寺的孤寂生活形成对照，遂不安心在寺学经，于1917年由其父安排给哥哥当帮带。旋升任宁海军步兵第十五营管带，1920年转任骑兵营营长。

其时，马麒为了巩固势力，打算把河州、西宁地区连成一片，马步芳奉命驻兵巴戎县（由马燕戎格厅改置，后改名化隆）。他利用宗教、民族关系，招兵买马，网罗部卒，一时附近逞强之徒纷纷投奔。后来在马步芳手下充任军长、师长的韩起功、马忠义等人，皆属此辈。马步芳仿照新式操兵法训练部队，又在甘都修建公馆，作为向循化、隆务寺（今黄南）、河州、拉卜楞寺等地联络的据点。对附近藏族部落，马步芳或加以笼络，或武力征伐，使之都归附自己。

1925年10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势力进入甘肃。代理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次第打败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马麒父子为了自存，向国民军表示拥护之意。1928年4月，马仲英带头闹起了“河州事变”[3]，马麒父子暗自欣喜，但慑于冯玉祥军之兵威，未

敢公开支持马仲英。同年秋，孙连仲率部挺进西宁，于12月出任新成立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马麒、马步芳父子一统青海的欲望受到严重打击，为保存实力以待后图，乃采取韬晦方略。其时，孙连仲为稳定西宁以外省内形势，派高树勋率部前往化隆、循化一带“清乡”，借以监视和控制这些地区的马步芳部队。高到达化隆后，马步芳曲意奉承，仅“进见礼”就送了银元十五万、骏马一百匹，对高的左右人员亦优礼款待。他残酷地杀害了一些无辜农民，诬之为“匪”，并将头颅悬挂在树上，说是自己的“清乡战果”。他还杀了曾派去与马仲英暗中联系的人员“大马营”（绰号），宣布其罪为“通匪”。这样，高树勋完全放弃了对马步芳的戒备，返回西宁后，在孙连仲面前对马大加赞许，孙连仲即把马步芳从团长升为旅长。马步芳乘机向高要求整顿自己的部队，经高疏通孙连仲，获得批准。马步芳遂在化隆、循化大事网罗，组编为三个团和两个独立营，增强了实力。

1929年下半年，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激化。冯玉祥为准备与蒋介石在中原的决战，于9月、10月两月相继调孙连仲、高树勋部东移。高树勋从西宁启行前，把马步芳调入西宁；及行，又把其代理青海省主席一职交马麒暂理（1930年初获正式任命）。马麒父子不仅恢复了他们在青海地区的统治，而且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单独掌握青海省的愿望。

中原大战爆发前后，马麒、马步芳一面暗中扩军，加强自身力量；一面积极搜集蒋与冯、阎双方的情报，准备伺机应变。大战前一阶段，谁胜谁败难以卜定，西北又尚在冯玉祥军队控制之下，所以马麒父子仍表示拥冯倒蒋，派马步青率骑兵旅随冯军进驻陕西，并以“前防接济费”名义向冯军每月解送五万银元；然而背地里马麒父子却派人同蒋介石联系，以备一旦蒋胜冯败之时取得蒋的谅解。1930年9月，冯、阎败北，马麒父子立即易帜拥蒋反冯，并请马福祥代为说项。蒋介石当时无力顾及西北，决定利用马麒父子，承认了他们在青

海的统治。

马步芳从此积极向蒋介石靠拢。他以在西宁组成的青海暂编第一师为资本，布置对冯玉祥军余部的进攻；又征得西北绥靖主任顾祝同的同意，参加了追剿马仲英的战斗，先以所属第九混成旅第一团由西宁开往凉州（今甘肃武威），1931年4月更亲率后继部队自西宁经门源、扁都口进占甘州（今甘肃张掖）和肃州（今甘肃酒泉）。马步芳节节进逼，马仲英退处敦煌、安西、玉门一带，不久进入新疆。马仲英于败退中曾派人要求马步芳缓攻。马步芳回答："这是公事，不能以我们是兄弟（二马系同一曾祖），以私废公。"[(4)] 至甘州时，原属冯玉祥部曾中田旅的雷振邦部仍驻该地，马步芳托词要训话，将该团官佐二百余人诱至原甘州提督衙署院内，令部下用大刀砍杀，无一幸免。

马步芳从河西返回西宁，蒋介石改其部为陆军新编第九师，马仍为师长。1931年8月，马麒病死，马步芳企图继承其青海省主席地位。不料青海官僚黎丹等人反对，推马麒之弟马麟继任。叔侄矛盾暴露时，有消息说蒋介石欲接受于右任建议让省民政厅厅长王玉堂暂代省主席。马步芳当即表示："先人创立的基业，岂能拱手让人？"[(5)] 遂与黎丹等人和解，共同以青海省政府委员名义，请蒋介石准许马麟继任省主席。同时电示驻南京办事处处长，以紫羔皮、鹿茸、麝香、红花等地方特产遍贿权要或其眷属。最后，蒋介石明令马麟为省主席，马步芳为省府委员。

1932年初，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胡获悉马家势力在青海扩张，有意剪除，乃派副师长彭进之到青海窥探虚实。机警的马步芳觉察到了胡宗南的打算，又自忖非胡的对手，于是挑起青藏战争[(6)]，转移蒋介石的视线。时四川刘文辉部队与藏军的武装冲突（即康藏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担心康、青、藏地区进一步陷入混乱，令马步芳出兵打退藏军。胡宗南进占青海的计划只好搁浅。青藏战争历时一年有余，作战地区人民受害弥深，马步芳却借此渡过了难关。

他令人编纂《玉树战事记》，铭其“武功”，炫耀于世。

1933年夏，孙殿英被蒋介石任命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率部西进。青海是马步芳家族的禁脔，岂容他人染指；同时宁夏马鸿逵与马鸿宾亦虑孙殿英假途灭虢，侵占自己的地盘。三马决定联合拒孙西来。时任甘肃省主席兼驻甘绥署主任的朱绍良认为，孙殿英乃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军阀，如来西北，势必难以节制。因此支持三马拒孙，向蒋介石陈情希望收回成命。马步芳亲自率兵前往宁夏，同马鸿逵、马鸿宾一起对孙殿英作战。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收回成命，挑起了三马与孙殿英在宁夏的一场恶战。直至1934年3月，孙殿英因师老兵惫，败于阵前。宁夏作战期间，马步芳在青海把原来以诱骗手段为主的募兵法改成了挨户征兵的强制办法，扩大了部队。在战胜了孙殿英后，他又派人在何应钦、陈立夫、朱绍良等处活动，使其新编第九师扩编为陆军新编第二军，下辖一个师和两个骑兵旅，兵力增加到二万五千人。

红军长征到达四川、西康时，蒋介石电令马步芳在青海和甘肃南部阻击。马步芳在青、甘之间布置了堵截红军的三道防线，又命令青海各县大规模拨丁派款，进行军事训练，打出了所谓“军事民众化、民众军事化”的旗号。他又深恐蒋介石借机派部队入青，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本省兵力尚足调遣，请勿远虑。”[(7)] 1935年8月底，在青海南麦仓之战中，马步芳部队阻挡住了红四方面军的西进。1936年7月，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时，为掩护主力前进，分兵数千人进军青海地区的班玛、久治一带，击溃了马步芳部队的两个团以及当地头人牧主的民团武装，完成任务后于8月退出果洛，赶往甘肃南部之岷县与主力会合。马步芳急忙命令马彪、马朴等旅向甘肃临洮、岷县一线截击红军。后在甘南临潭等地的战斗中，马步芳军遭到失败，退回青海同仁境内。

1936年10月，红军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时马步青的骑五军驻凉州，马步芳所属的韩起功旅驻甘州、肃州，整个河西地区被马步芳

家族视为第二基地。因此，马步芳不遗余力对付红军西路军。蒋介石也想利用马步芳消灭西路军，授其“西北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然而，在一条山、镇虏堡、大靖、土门等地的激战中，马步芳主力遭到红军痛歼。马步芳遂打出“保卫桑梓、安定西北”的旗号，大量征调民团。后为扩充部队，索性“并团入军”。红军突破马步芳设置的防线，进入了河西走廊腹地，但在古浪、良昌、临泽、高台等地的战斗中，由于力量悬殊，遭到重大损失。马步芳提出“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围追堵截，欲将红军西路军全部消灭。红军排除万难，于1937年4月从星星峡进入新疆，人数从渡黄河时的二万一千八百人锐减为七百多人。

马步芳藉河西之战进一步扩充兵力，但深恐蒋介石疑虑，一再声称他的武装是“国家的军队”，又假意恳辞所任军职，表示自己没有野心。蒋介石为要进一步利用马步芳，反而为其加官晋爵。1937年夏，新编第二军改为第八十二军，增加一个骑兵旅。1938年3月，又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结束了马麟、马步芳叔侄之间长达七年之久的争夺权力的斗争[(8)]。

抗战期间，马步芳消极抗日，一心坐大。他派往前线的骑兵师武器残缺不全，士兵缺乏训练。在安徽、河南的作战中，该师师长马彪受马步芳遥控，以保存实力为务，未能充分发挥抗日作用。相反，该部队秉承蒋介石反共旨意，屡与新四军摩擦。在消极抗日的同时，马步芳努力巩固他在青海的统治。他争取到了白崇禧、吴忠信等人的支持，改变了蒋介石将他调离青海的打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增兵中国战场。蒋介石到兰州召开会议布置军事，马步芳受到格外笼络。1942年8月，蒋介石到西宁视察，马步芳为迎蒋做了周密准备，整刷市容，反复练习礼仪，一心要给蒋留下一个好印象。他还亲自为蒋当值警卫，以示效忠。蒋介石离去前，马步芳向蒋与宋美龄献上大量鹿茸、麝香、紫羔皮等土特产以及军马。他事后对人说：“现在不是表现富贵的时候，礼当越简略、越实惠越好。穷了人

家不注意，军马、羔皮都是土产，既本分，又实在。”[9]

1943年7月，蒋介石把第八十二军与马步青的骑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任命马步芳为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次年春，马步芳以第八十二军军长一职交其子马继援，又说动其兄马步青：“我俩任总、副司令，担子够重，事情交给青年人去办省事得多。再说，你当军长与侄子处于一个地位也不好看。”这样，马步青的骑五军军长由马呈祥接任，马步青逐渐沦入无权和受冷落的境地。

马步芳掌握青海军政大权的十多年里，凭借庞大的军队，实行专制统治，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杀戮、迫害敢于反抗的民众。经济方面，除原有的土地剥削外，马步芳通过官僚资本所办的企业、银行、商号，大量搜刮社会财富。马步芳在“开发青海”旗号下搞的一些经济、文化建设，均是为了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的独裁统治。

马步芳早有觊觎新疆之意，1944年吴忠信入主新疆后，以中央军力量不足，提出让马步芳派一些部队进驻，马步芳即派马呈祥于1945年率骑五军入新。行前，马步芳授该军“跃马天山第一峰”锦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策划发动内战，马步芳乘机请求拨给军火，得到了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马还自行购买军械，进一步加强实力。此时，马步芳认为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已经牢固，踌躇满志，筹谋东进，以期在反共内战中攫取更大权势。1947年3月，马步芳的主力部队整编八十二师（由第八十二军缩编而成）由其子马继援率领，开往陇东平凉。为向蒋介石邀功，马步芳迭令其子向解放区发动攻势。马步芳个性自视甚高，指挥作战往往以正面攻击为主，这次仍令马继援率部猛进直入。但马继援先锋部队在由庆阳、盘克镇进攻合水县时，遭到失败。后经增派部队，在受到重大损失后才占领了合水县。马步芳父子志骄气矜，以西峰、合水、宁县为据点，调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然而适时人民解放军已作战略转移，马继援屡扑屡空，并无战绩。

为了鼓励马步芳父子反共，蒋介石不仅恢复了马继援部队的军级建制，又让马步芳扩建了两个军。这样，马步芳所属队伍由抗战胜利后的两个军、一个独立师（近十万人），增加为四个军一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加上保安师、团等，共有兵员约十五万人。1949年4月，马继援改变战术，命第二四八师以运动战方式向东推进，为占据泾、渭河谷开辟局面，并声援节节败退的胡宗南部队。结果耀县一战，该师师长马得胜被击毙。马继援乘马鸿逵部队攻乾县之机，令骑八旅马英攻打永寿注泔地区，企图打通已被解放军截断的西（安）兰（州）公路，又遭失败。马继援复派第二四八师新任师长韩得胜增援，在付出了重大伤亡后才占领了这一地区。其时，马家军骑十四旅马成贤在与解放军回民团交战中也略取小胜。马步芳一时自命不凡，自我吹擂为“西北支柱”，下令进军咸阳，攻克西安。人民解放军在咸阳凭借坚固工事守卫，又得增援，马步芳部队伤亡甚众，只好撤退。

国民党政权在陷入朝不保夕境地之时，一再为马步芳父子加官晋爵，换取他们为内战卖力。1949年5月，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继援升任青海兵团司令。马步芳得意忘形地说：“先人没办到的事（指统治西北），我们办到了。”[(10)] 6月，人民解放军由陕西挺进甘肃，马步芳的第一二九军（军长马步銮）和骑八旅、骑十四旅在陇东抵抗，遭到大败。固关战役，骑十四旅被歼。7月12日，人民解放军在扶风、郿县发动攻势，歼胡宗南主力四万余人，西北战场形势彻底改观。马步芳召开静宁军事会议，决定将国民党军队集结兰州，背黄河一战，企图扭转败局。7月底，马步芳被正式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为了促使马鸿逵增援兰州，当时已经逃到广州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电召马步芳、马鸿逵二人到广州，调解他们因争夺西北军政长官职位而激化的矛盾，并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但兰州战役前夕，马鸿逵为保存力量，并未及时出兵增援。

兰州襟山带河，为沟通西北各省之要冲，马步芳父子在此积极布置战守，北面集结骑八师和各步兵师之骑兵团扼守河防；河南城垣之

外层层设防，以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为三个主阵地，形成号称“兰州锁钥”的防御体系，分别由第八十二军的第一百师、二四八师、一九零师防守。8月20日，人民解放军在兰州城郊会合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25日发起总攻，首先占领沈家岭，继夺取营盘岭、古城岭、马架山、豆家山等马军阵地。午夜前，解放军攻入西关，控制了马军唯一退路黄河铁桥。26日凌晨，兰州解放。黄河北之敌向西逃窜。是役，马步芳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被歼。

兰州战役形势紧张之时，马步芳已于8月24日飞往西宁，第二天又逃往重庆。9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西宁。此前马步芳家族的重要成员马步青、马继援等人均乘飞机逃往重庆，后转赴台湾或国外。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马步芳派往新疆的原骑五军广大官兵参加了陶峙岳将军领导的起义，军长马呈祥不愿参加起义，由南疆出境。马步芳家族的武装至此全部瓦解。

马步芳到重庆后，国民党政府责其“擅离职守”，宣布“撤职议处”，后再无下文。马步芳离开大陆后辗转到埃及开罗，购置产业，做寓公。1957年，通过其在台湾的儿子马继援活动，台湾当局给了他“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头衔，1960年辞职后侨居该国。

1975年，马步芳病故于沙特阿拉伯。

---

(1) 关于马步芳的生年，目前一说为1903年，一说为1901年（《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本文从多数资料所执之前说，第122页。

(2) 甪藏乡前属甘肃省临夏县，1980年6月积石山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成立，划入该县。

(3) 是年，刘郁芬的师长赵席聘以镇守使名义驻河州，索需过甚，又干涉民族风俗习惯。在处理伊斯兰教新、老教争时任意杀人，激起群众反抗。4

月底，宁海军军官马仲英等人潜回河州，领头起事，称“黑虎吸冯军”。但这支队伍后来在流窜中给甘肃河西、宁夏、新疆人民造成严重骚扰。马仲英部最后于1937年瓦解于新疆喀什。

(4)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5) 陈少校：《西北军阀记》，香港致诚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6) 受西藏所派僧官主持的玉树昂欠尕旦寺，因货物价格问题与青海商人发生纠纷。马步芳授意马彪挑动商人坚持争执，迫使昂欠尕旦寺僧侣转请昌都藏军支援。马步芳进而设计诱藏军深入，酿成战争。

(7)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第130页。

(8) 1931年马麟任青海省主席后，马步芳即开始了倒台活动，如私印省钞造成通货膨胀，暗中支持教员索薪风潮等，迫使马麟于1936年以去麦加朝觐告假离职，马步芳代理了省主席职务。1937年马麟复职，争权斗争更趋炽烈。

(9)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第52—53页。

(10)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第99页。

马超俊

熊尚厚

马超俊，号星樵，曾名马麟，1886年9月20日（清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广东台山人。其父早逝，家境贫困。他八岁入塾，后因交不起学费时读时辍。两年后得到在加拿大打工的大哥资助，才勉强地读下去。他十五岁时中县童子试，但愤于帖括误人，决心放弃仕途之追求，经友人介绍前往香港，入九龙马宏记机器厂习艺，工余去夜校学英文。三年学徒满后，他于1902年随族人赴美，就读于旧金山庇利音机器专科学校。在读书期间，他加入洪门的致公堂，受到头人黄三穗的赏识，经黄推荐兼任《大同日报》记者。1904年夏，当孙中山途经旧金山时，马得黄三穗的介绍见到了孙中山，孙鼓励马好好学习，将来担起“革命救国的责任”。

1905年5月，马超俊为了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前往日本横滨，一边读书，一边去孙中山寓所做些杂事。同年秋，他考入明治大学政经科。不久，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翌年2月，同盟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他被派回香港，在九龙地区的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他以研究技术、交换知识为名组成华人机器工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

当时的广东机器工分布全国各地，马超俊以香港华人机器工会为基础，先后前往广州石井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的机器工会中进行工作，相继组织了香港研机书塾、广东机器研究公会等公开性的团体。之后，仍用研究机器技术的名义，先后在湖北、湖南、云南、天津、上海等地，以粤籍机工为主分别组织机器研究公会，暗中从事革命活动。马超俊在香港，为了掩护革命党人运送军火，化名马麟，与黄伯坚兄弟设立瑞兴公司，从事发网的生产与销

售，暗中研究和运输军火，经常来往于港、穗两地。1909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他参加先锋第三队攻击巡警教练所，起义失败后突围潜往香港。不久，他被黄兴派往武汉，在汉阳兵工厂的机工中进行活动。翌年，马超俊回到香港，为广州黄花岗之役制造炸弹。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马超俊由港经沪去汉向黄兴报到，其后率敢死队参加汉阳梅子山战斗，旋退守武昌。时清军的军舰炮口对准武昌，黎元洪写信给清军舰队司令萨镇冰劝其起义，马借英商怡和洋行小艇将信送到萨镇冰舰上，清军舰队遂撤往下游。

辛亥革命成功后，马超俊在汉口开设瑞兴分公司，同时兼任黎元洪都督府顾问。黎元洪投向袁世凯后，他和张振武等人组织铁血团反黎，被军警逮捕入狱八个月，经温宗尧、伍廷芳等人营救始获释。事后他回到广州，在广东机器总会黄焕廷的资助下，开办惠民织造公司作为革命机关，反对军阀龙济光祸粤。1914年，他派人刺杀了龙手下的干将马存发，后去日本在孙中山手下负责财务。1916年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人坂本的协助下，于日本滋贺县创办飞行学校，马超俊和夏全民入校受训，准备日后回国办航空学校。后飞行学校迁山东青岛，他奉命在山东潍县组织飞行队，偕刘季谋飞济南轰炸山东督军府。次年，他去北京筹办民间航空学校，嗣因张勋复辟而中止。

1917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马超俊再次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他向孙中山提出工运原则八项，以“劳资协调、互助合作、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充裕国力”为方针，作为国民党的工运原则。之后，他在上海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方的资助，组织南洋烟草公司职工同志会、粤侨工界联合会。在广州主持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欲以广东机器工团为主体，筹建全国机器总工会。1918年8月，马领导广东机器总工会反对桂系军阀莫荣新，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请以伍廷芳为省长。次年，马更提出打倒桂系军阀的口号，遭到莫的镇压，不得不潜往上海暂避。1920年4月，他发动广东机工支援香港工人罢工。之后，广东全省机器工人维持会改组，他任主任。与此同时，为了继

续反对莫荣新，他担任广东东路军第二路游击司令，不断袭击莫荣新部。翌年，他任广州市政府市政厅总稽查。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马超俊领导广州机工维持会予以支援。同年6月，陈炯明叛变占领广州，他发动广州市公用事业工人集体撤退。次年孙中山发动武力驱陈，组织工农游击队助战。驱陈胜利后，马超俊任广东兵工厂厂长。1924年，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

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马超俊辞去广东兵工厂厂长职，前往上海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担任总干事职务。次年前往南北美洲视察海外党务，鼓动华侨反共。“四一二”政变后，他回国任南京国民政府劳工局局长。1927年8月，马超俊在上海创办《劳工时报》，自任总编辑，以宣传劳资合作和反对赤色工会为主旨。1928年1月，他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同年秋改任建设厅厅长。翌年，改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宣传部长，5月任出席国际劳工会议代表。会后回到广州，因与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意见相左，他辞去了建设厅厅长职位。1930年8月到南京任立法委员，并为劳工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不久，被派为国民党华北党务特派员，前往津沽指导党务，并进行反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活动。同年冬回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民众训练处处长。后由宁粤双方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马得以任南京市市长。孙科内阁存在为时不过一个月，他亦连同去职，仍任立法委员。1934年12月任国民政府委员。翌年3月，再任南京市市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2月南京陷落，马超俊撤退到武汉。次年春任中国儿童救济总会理事长，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区抢救儿童。时陈诚在汉口组织全国慰劳总会，马任副会长。1938年4月，他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40年改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2年，在重庆协助吴铁城创立南洋华侨协会总会，次年任该会理事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超俊回到南京复任南京市市长，主持该市的

接收事宜。1946年12月，改任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部长。翌年9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分赴华北、东北、西南及台湾等地视察党务与工运。在其筹划下，1948年4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

1949年末，马超俊随蒋介石撤往台湾，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52年国民党“改造”后，任“中央”评议委员。之后，相继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华侨协会总会理事长、“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广东同乡会总会理事长及“总统府资政”等职。1955年，他任台湾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编撰《中国劳工运动史》出版。此外，撰有《中国劳工问题》、《三民主义劳工政策》和《比较劳工政策》等书。1965年，他协助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创立劳工研究所，担任理事长。1969年后，马超俊因病长期住院治疗，但仍任“总统府资政”。

1977年9月19日，马超俊病故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郭廷以、王聿均：《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4月版。

朱慧夫：《中国工运之父——马超俊》，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6月版。

《马超俊》，秦孝仪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7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

马福祥

马启成

马福祥，字云亭，回族，生于1876年2月4日（清光绪二年正月初十），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其父马千岭，早年以农商为业，清同治时由反清转向降清，曾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优厚赏赐，遂发展为河州韩家集一带的巨富。马福祥自幼在私塾读书。十六岁时学习弓马枪剑，寒暑不辍。越年与三兄马福寿同进兰州武备学堂。十九岁应试武闱，获中乡试第二。

马福祥的兵戎生涯，是从清末参加镇压甘肃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开始的。1894年，河州等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一时“烽火遍河湟”。时因甲午战争，甘军精锐多调防京畿，所剩“防军无多，且又未经训练”，官府准当地豪绅招兵买马，“练土勇以资防卫”[(1)]。马福祥与二兄马福禄即招募乡勇，组织团练，名“安宁军”，对起义者进行围剿。次年10月，他兄弟二人率队配合清军在河州外围攻打起义军，并向前来镇压起义的清军将领董福祥“力陈剿抚方略”。董福祥信赖马氏兄弟，“倚之若左右手”，授马福禄总兵之职，并将“安宁军”编入简练军，马福祥当了骑兵管带。

1898年春，马福祥和马福禄率部随董福祥的甘军奉调驻戍蓟州（今天津蓟县）、山海关一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氏兄弟又奉调入卫京都。这年7月，与敌军战于正阳门，马福禄力战阵亡，马福祥督战打败侵略军夺获城楼。8月14日，那拉氏和光绪帝逃奔西安时，他随扈警卫宫舆。《辛丑条约》缔结后，1902年那拉氏和光绪帝回京，以马福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勤劳，先后积功，得以提督记名”[(2)]。不久，补为甘肃靖远协副将。1904年升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陕西立即响应。时马福祥以巡防统领率部驻兰州，同陕甘总督长庚为首的地方官绅，视革命如洪水猛兽，力主派兵前往陕西“助剿”革命军。当长庚招募回军提督马安良率部前往陕西乾州镇压革命时，马福祥则留守省城遏制革命。但革命潮流已不可阻挡，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在大势所趋下，3月18日，马福祥与原甘肃布政使赵惟熙、谘议局议长张林焱三人联名通电袁世凯，代表全甘承认共和。北京政府任命赵惟熙为甘肃临时都督，马福祥为青海办事长官兼西宁镇总兵。马在西宁并无实力，迟迟没有赴任。

同年底，马福祥调任宁夏镇总兵。1915年，袁世凯令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马借机请准添练新军，以其侄马鸿宾为新军司令，下辖步、骑兵七营。1917年，大总统冯国璋又为马福祥授上将衔[(3)]。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马福祥站在直系一边。安福系垮台后，马福祥策动甘肃军人在银川召开大会，声讨皖系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并向北京政府发出“拥马督甘”的通电。但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也垂涎甘督一职，嗾使其部下张兆钾等人向北京政府发出“拒马督甘”的通电，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京甘绅秦望澜、水梓等人以陆洪涛在甘多年，势力较大为由，向徐世昌全力保荐，徐遂于1921年春发表陆洪涛为甘肃督军，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晋勋二位，“易督风潮”才暂告结束。

马福祥赴任绥远时，以其侄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将其嫡系“昭武军”编为第五混成旅，由其子马鸿逵为旅长，前往绥远。但该旅仅有五个营，马福祥又从西宁镇守使马麒那里拉来马步青一个骑兵团，从河州、民和等地拉来马斌一个步兵团及数股地主武装，共扩大兵额三四千人。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马福祥由于有曹锟作后台，又收编了绥远王英和苏雨生两部，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势力。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福祥站在直系一边，发出“讨

张”（作霖）通电，向曹锟、吴佩孚请缨出战，以马鸿逵为“讨逆军”独立骑兵前敌副总指挥，兼绥远援军司令，出兵热河对奉军作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吴失利，马福祥见风转舵，一度依附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第七师，由马鸿逵任师长，开往绥西磴口一带驻扎。1925年春，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为绥远都统，马福祥被段祺瑞执政府委以“西北边防会办”，退出了绥远地盘。

1928年春，北伐军队与张作霖的“安国军”相持于黄河南北之际，马福祥见张宗昌、褚玉璞节节败退，张作霖败北已成定局，乃秘密南下投靠蒋介石。他向蒋进言：“非团结各族无以立国，而团结民族在疏通意见，俾瞭然于主义之所在，乃可图功。”[(4)] 蒋介石正谋统一全国，遂任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笼络西北各军阀。

马福祥是个久经世故的官僚，为维护其地位，在各军事实力派系间，常以“调和者”的姿态出现。他自投靠蒋介石以后，曾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开封政治分会委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赈务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他身兼多职，奔走各方之间，一时被政界称为“和事佬”。

1929年4月，马福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青岛市特别市长。这一年西北各地大旱，饥民日死数千。马福祥拿出一部分钱连同向各方劝募的捐款共二三十万，陆续寄往西北各地救济。在这前后，他还以“振兴回民教育”为号召，在北平创办成达师范学校和西北公学，招收回族子弟免费入学，自兼董事长。

同年11月，马福祥赴青岛任职。这时，青岛工人群众正在为反对日本纱厂无理开除工人以及日本领事干涉中国内政而掀起罢工运动。他一面派员与日领事交涉谈判复工条件，一面向工人群众施加压力，将各厂二百五十多名罢工骨干无理开除。不到半月的时间，便将各厂工潮镇压下去。

1930年初，蒋介石升任马福祥为安徽省主席。七个月后，又改任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时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便将多年来写的书札及所著《观澜亭记并诗》、《龙珠山云亭记并诗》等书稿加以整理，由其妻录书，订正后刊出。1932年春，马因心脏病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北上天津休养。6月，他前往汉口见蒋介石，在武汉染疾。8月19日北上治疗时，病死途中。

---

(1)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24，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版。

(2) 《现代西北》第2卷第6期。

(3) 《朔方道志》卷首。

(4) 《现代西北》第2卷第6期。

马福益

陈匡时

马福益，一名马乾。1865（清同治四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世代为佃农。至其父马大良时，因受族人欺压退佃，生活无着，全家被迫迁至邻县醴陵西乡瓦子坪，租种当地傅姓地主田为生，遂改籍醴陵。

马福益幼时读书数年，能写作短文。曾“读王船山遗集，引起其革命思想”[(1)]，对清朝的统治不满。成年后，身体魁梧，有胆略，喜断里中不平事。有记载说他曾在当地“水师飞翰营做火头军目（管理炊事），因以营内粮糈接济徒众，致被开革”[(2)]。后全家迁居醴陵渌口镇（今株洲）。渌口处湘江边，为湘省南北要冲及湘赣水陆通道，五方杂处，人烟稠密，亦为醴陵会党的活动点。马福益在渌口逐渐成为当地会党的首领。渌口隔岸是湘潭雷打石，盛产石灰石，石灰窑林立，工人多为会党中人，窑主聘马福益至该处为总工头。马因此在雷打石大收徒众，各窑厂工人千余均听他调动。1891年，马福益“开堂放票，自称‘四路总统’，领有东、西、南、北四路头目，放票布约一万余张”[(3)]，即拥有徒众达万人。1897年又被两湖哥老会各地山堂推为龙头[(4)]。1900年8月，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湖南许多参与这一事件的会党首领或遭屠杀或被通缉。清政府亦下令湘潭县令逮捕马福益。此消息先为充任湘潭捕快头目的刘方尧所得，急令其子刘揆一通知马福益。马福益闻讯迅速逃离，对刘揆一极为感激，称他为“恩哥”[(5)]。事后马福益回来重整当地会党，“以信义结其徒众，称洪江会”[(6)]，成为20世纪初湖南哥老会中一支重要力量。

1904年2月，革命团体华兴会在湖南成立后，为联络会党之便，又另立了一个“同仇会”作为外围组织，以策动和组织会党参加革命。马福益在会党中素有声望，信从会众最多，因此他和当地洪江会会众

便首先成为华兴会联络的对象。这年春天，黄兴先派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和万武去见马福益。马福益被说服，同意和华兴会合作，表示只要“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7]。不久，黄兴、刘揆一便去湘潭茶园铺，和马福益在一旧矿洞中秘密会晤。三人围着篝火，坐地而谈，“共谋光复”。他们筹划在同年11月16日西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趁全省大吏齐集长沙玉皇殿参拜时，预埋炸药于玉皇殿下而聚歼之，乘机起义。拟议以长沙武备学堂学生和军队中革命分子为主力，同时由马福益督率附近各县会党，从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路同时进军长沙。黄兴担任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担任这次起义的正、副总指挥。会后，马福益积极组织会众，“散放同仇会、华兴会票”。他们又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军旅，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9月24日，湖南浏阳普迹市开传统的牛马交易大会，黄兴、刘揆一等又利用这一民间集市与马福益等会面。马福益介绍当地会党首领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等人与黄兴等人认识。同仇会同时在此举行授予马福益“少将”衔仪式，并赠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决定待大批武器陆续运到后，便举行起义。

1904年10月，华兴会起义计划被一武备学堂学生泄露，清政府接获密告，侦探立即四出，多处搜捕可疑人物。接着在长沙的马福益部下二人因酒后失言被密探侦出，立遭逮捕，供词涉及马福益和黄兴（当时称黄廑午）等人。黄兴这时已躲藏起来，马福益远在湘潭茶园铺矿山中，未知有变。幸有会党中专跑交通绰号“飞毛腿”的刘重知事已泄，飞速通知马福益，马暂时走避广西。华兴会长沙起义计划亦因而流产。

1905年春，马福益自广西潜返醴陵、萍乡湘赣交界地区活动。4月12日，因会党接应失去联系，马福益不幸在萍乡火车站被清军逮捕。清朝统治者害怕马福益武艺高强和在当地的威望，竟残酷地用刀洞穿马福益的锁骨，贯以铁链，械送至长沙。马福益受到极为残酷的刑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仍然毫不屈服。他“声言革异族命，为

汉族复仇，死何所憾”[8]。4月20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

---

(1) 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463页。

(2)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页。

(3)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5，1918年版，第31页。

(4)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00页。

(5) 刘安鼐：《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3—124页。

(6) 《马福益传》，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4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138页。

(7) 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5页。

(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10页。

马衡

汪仁泽

马衡，字叔平，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1881年6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鄞县。父亲马渔珊历任上海、宝山等县知县。马衡少时随父在沪就读私塾，后进上海南洋公学，1901年毕业。因病在家长期休养，但手不释卷，钻研经史、金石、篆刻、碑帖，能诗、善书、工篆刻。他与宁波巨商叶澄衷的女儿结婚后，家境富裕，广集文物、古籍，并与沪上名流吴昌硕、吴石潜、丁辅之、陆廉夫等人交游，切磋学问，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和金石的专业学识。

1917年，马衡受聘至北京清史馆任纂修。次年经其兄、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介绍，任该校新设的金石学讲师。1922年以后又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考古学教授。此后数十年，他一直从事历史文物的研究、搜集、整理、保管、展览，以及文物图录的刊印等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和钱玄同、王国维等结为知友，交往甚密。他继承了乾嘉学派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朴学传统[(1)]，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2)]。

1923年，马衡发表了授课讲义《中国金石学概要》，在古器文物不断出土的情况下，扩大了宋朝以来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兼及甲骨、竹木、陶玉、砖瓦等方面，对古代金石学作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导向专业考古学，郭沫若誉马衡“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3)]。《概要》发表后，日本、美国等专业杂志相继转载[(4)]。马还发表论文《石鼓为秦刻石考》，对石鼓作了考证。石鼓之制作年代与国别，历来众说纷纭，马衡经多方引证，就其文字演变和秦刻遗文互证，判定

为东周时秦刻为我国石刻中最古者，受到学术界和许多专家的确认。1929年春，马衡应西湖博览会之请，就石鼓原物摄像十帧，连同该文制版付梓，分发中外学术界，受到国际考古界的普遍重视，影响甚广。沈尹默称该文“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马衡治学谨严，不满足于仅在书斋中对古物拓片的研究，更重视野外的实物勘察和科学的考古发掘。每闻新发现文物古器，常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参加发掘整理工作，以亲睹为快。马于1923年9月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委托，赴河南新郑青铜器出土地点调查，随后发表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1924年赴洛阳朱圪档村汉魏石经出土之太学遗址调查；又率领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学员赴北京西郊大觉寺、大宫山、碧云寺、圆明园文源阁等处遗址调查。他主张“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5)]。同年11月，北京政府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马衡参与其事。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古物馆由马衡主持。1926年，马衡研究了近世出土的汉代简牍及有关古代书籍资料，发表了《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对我国历代书籍材质、形式和装帧的演变，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次年他又发表了《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一文，推算出唐以前十五种古尺的实际长度，连同其他有关论文，提供了关于度量衡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1927年初，马衡应日本学术界的邀请，东渡讲学半年，曾在东京帝国、九州、庆应等大学作《中国之铜器时代》等专题讲演。

同年6月，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他的一些未刊著作，生前为罗振玉攫去。王死后，马衡赴天津向罗振玉索回未发表的遗稿，交还王的遗属，后来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出版。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于1927年10月，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马衡为古物馆副馆长。是年，马参加辽东半岛“貔子窝”的发掘工作，并于11月发表发掘报告。

1928年7月，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驻防河北蓟县一带，悍然盗掘遵化清东陵的乾隆和慈禧陵墓，掠去大批珍宝文物，一时中外轰动。马衡闻讯，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严惩盗宝者。后来国民党当局枪毙了孙的两名部下敷衍了事，但马衡却因此遭到孙殿英的忌恨。1930年夏，孙指使其部属借故缉捕马衡，这时马正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幸得当时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的报信，连夜经天津到上海暂避。此期间他曾至杭州小住，因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已经去世，马被推继任该社社长。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宁夏额济纳河东岸两汉烽燧遗址中掘得竹木简牍万余枚，次年夏，马衡、刘复、傅振伦等开始整理研究。后马衡、向达等作释文成稿，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刊印，惜未及印就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原稿下落不明。

1933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诬盗宝离职[(6)]，次年9月，马衡继任院长。此时日本侵华势力逐渐南犯，华北形势日趋严重，在马衡组织下，故宫所藏珍贵文物二万箱陆续从北平南运上海。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存储南运文物。1935年4月，马衡主持保存库的监造工作，并在该地基上发掘得古迹两处。是年6月，为筹集建库经费，将南运文物由沪起运至英国伦敦，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展出。次年6月又在南京展出。1936年该库建成后，即将文物入库存储。

1937年抗战爆发，马衡赴西南寻觅储藏文物的安全处所，筹建仓库。11月沪地守军撤退后，南京战事吃紧，在运输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南京当局抢运了精品文物一万七千箱。运抵武汉后，由马衡组织人力分两路全部安全运到贵州安顺和四川峨眉、乐山三处山洞仓库中储藏。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再由马衡筹组力量全部运回南京。留宁不及运走的三千箱文物，曾被运往日本，经多次交涉，亦全部运回我国。郭沫若称马衡“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

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7]

1948年末，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曾邀集一批学者名流座谈，征询和战意见。马衡继徐悲鸿诸人之后在会上发言，强烈希望以北平人民的安全为重，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务使文化古城免遭战火摧毁。此后他又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动员他“应变南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兼任全国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曾奉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命，与王冶秋同赴广州鉴定和收购流失在香港的王献之手迹《中秋帖》。

1953年以后，年逾古稀的马衡因病在家休养，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他平生对汉魏石经的研究用力最深，曾发表《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等论文十余篇。他抱病每天工作至深夜，将东汉以来先后发现的汉石经遗字，分别各经，依其篇章汇录成多卷，制就影印图版，并作《汉石经集存原序》，付梓印行。

1955年3月26日，马衡在北京因病去世。所遗文稿数十万言，以及历年所藏万余册图书、古董文物等，全部由其子马太龙、马彦祥捐献给国家。其遗稿由王冶秋、夏鼐、唐兰、胡厚宣、傅振伦等人整理、编辑，分金石学概要、铜器、度量衡制度、石刻、石经和书籍形制等八卷，定名《凡将斋金石丛稿》，于1965年出版，反映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郭沫若为之作序，文末曰：“凡德业之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8]

主要参考资料

马太龙先生访问记录。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1) 清乾嘉年间（1736—1820年），某些学者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形成所谓“朴学”。

(2) 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1963年8月25日），《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3) 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1963年8月25日），《凡将斋金石丛稿》。

(4) 《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部分章节，曾由日本京都大学水野清一作注，转载于日本《东洋史研究》卷3、4。

(5) 马衡：《考古与迷信》，引自中华书局编辑部撰《编辑后记》，《凡将斋金石丛稿》，第385页。

(6) 易培基由于不避嫌疑，主持出卖故宫博物院的一批杂物，以补经费的不足，使人生疑，又因得罪国民党元老张继之妻崔氏，被控盗宝。“崔氏向法院起诉状并未举出具体证据，但谓清宫古物中发现许多伪造之品，既有伪品，即反证系易盗窃。其实清宫中物伪造品本来甚多，即如乾隆本人，即不能辨别古董真伪，大员进呈之品有真有伪，一经盖用御印，即伪亦真，同样保存，如此而已。”（江庸：《故宫盗宝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印《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0年版）该案国民党当局因张继的关系，交检察院立案，并派张的亲信郑烈为检察长，于1933年12月30日通令严缉易培基。易变姓改名避匿隐居，1937年9月病死上海。轰动一时的盗宝案随之不了了之。

(7) 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1963年8月25日），《凡将斋金石丛稿》。

(8) 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1963年8月25日），《凡将斋金石丛稿》。

马鸿宾

马启成

马鸿宾，字子寅，回族，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其父马福禄，系清末武进士，1900年率部入卫京师，与八国联军作战阵亡，被清廷追封为“振威将军”。

马鸿宾从十一岁起，即随侍叔父马福祥，得马福祥的不断提携而步步高升。1904年，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时，他在镇台衙内当“戈什哈”（满语，即侍从武弁）。1908年升任西宁矿务马队队官，并“兼理蒙番事宜”。时藏族的一支刚察部聚众抗官，马鸿宾“出而为之解和”。1910年以炮兵营长随马福祥的“昭武军”由西宁移驻兰州。辛亥革命时马福祥通电拥护共和，1912年底调任宁夏镇总兵，马鸿宾任管带，率部驻银川。

马氏叔侄初入宁夏时，北有后套卢占魁的“独立队”，南有陇东张九才起义民军，东有退居陕北的原宁夏民军高士秀部，各股势力互争雄长。马福祥以马鸿宾为后套统领，令他率部前往围剿。1915年，马鸿宾率部在绥西科布尔地方消灭了哥老会头目弓占元、包永祥。在绥西东大沟、白家地击败后套“独立队”卢占魁、同心县金占魁和白彦公等股民军。在宁夏灵武南部崇兴寨伏击金占魁部时，杀俘戮尸，极为野蛮。时袁世凯政府批准马福祥的扩军报告，允许添募新兵七个营，号“甘肃新军”，以马鸿宾为司令兼炮兵营长。他再次击败卢占魁。后又于1917年率新军在宁夏和绥西磴口一带追剿高士秀及冒充清裔称帝的达尔六吉，在贺兰山俘虏了达尔六吉部下二百多人。后北京政府称马鸿宾“勇略无前，忠谋自备”，授予他陆军少将、勋五位。1921年初，马福祥离宁夏赴绥远任都统，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职兼新军司令。这时他已羽翼丰满，所部步、骑十二个营，使署卫兵马队一个

营，后又新扩编步兵七个营。

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不久，在开放烟禁问题上与甘督陆洪涛发生矛盾。民国初年，甘肃全境已禁绝鸦片种植。1921年，陆洪涛督甘后，陇东、陇南开禁，遍种鸦片，波及宁夏。马鸿宾以开禁种烟影响军队粮饷，攻击陆洪涛。后经马福祥从中调解，马鸿宾便与陆洪涛同流合污，开放烟禁。为了欺骗舆论，掩人耳目，马鸿宾成立了所谓“宁夏道属禁烟罚办处”，专办“烟亩罚款事宜”，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实则乘机搜刮民财。1923年夏，马鸿宾以“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向宁夏所属八县提出借款八万元的要求，以低价折收鸦片烟，运往京、津地区高价出售，获得暴利三十余万元。宁夏回、汉人民在开放烟禁之下，备受剥削与毒害。

1925年春，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李鸣钟接替马福祥任绥远都统，要马福祥之子马鸿逵部从绥远退往甘、宁交界驻扎。但马鸿宾以宁夏为自己的地盘为由，拒马鸿逵入境，一时大有兵戎相见之势。后经马福祥向冯玉祥多次斡旋，冯准马鸿逵部扩编为第七师移驻宁夏金积、灵武，马鸿宾答应每月给两万元协饷，才暂时平息。

1926年9月，分据陇南、陇东的孔繁锦和张兆钾，不甘心于国民军取得甘肃地盘，在吴佩孚的策动下，挑起了对国民军驻甘军副总司令刘郁芬的战争。马鸿宾为平息战火，在甘肃各界的支持下，发出召开平番会议的倡议，要求各方派出代表前来平番（甘肃永登县）谈判协商。后马鸿宾认为张兆钾对刘郁芬的条件苛刻，难以调解成功，平番会议一直没有开成。马从此投靠冯玉祥。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后，于1927年4月宣布取消“宁夏镇守使”建制，改马鸿宾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委马为师长；又委马为甘肃剿匪司令，调马部至甘肃宁县、正宁地区追剿张兆钾残部。起初马鸿宾不愿离开宁夏，因出动迟缓，曾受到冯的记过处分。后马率部配合陕西宋哲元部攻克泾阳，击溃张兆钾残部。9

月，冯玉祥将马鸿宾部和郑大章的骑兵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由马任军长。但郑大章师远在河南，实际马鸿宾只有他的第二十二师，经过整顿和补充以后，分驻陕西西安、渭南、朝邑、大荔、韩城、郃阳等地。此时，陕西的原国民二军李云新部与河南的樊钟秀部联合倒冯，于1928年春夏之际，包围渭北各县。马鸿宾奉命进剿李云新部，采取以兵力迫之、围而不撤、分化瓦解的办法，杀戮甚少而成功，为人所称道。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为稳定后方，派马鸿宾任宁夏省主席。马抵银川后，先后收编了韩进禄、单有才、杨老二、马存良、杨子福等杂牌部队；遣散了不愿改编的马谦部一部分兵力；在中宁迫走了苏玉生的部队，控制了宁夏局势。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后，马鸿宾便投靠了蒋介石。由于其叔马福祥多次斡旋，蒋介石也需要笼络西北回族军阀，马鸿宾被委为暂编第七师师长、甘凉肃边防司令、甘肃省代理主席，不久又正式任主席。这期间，土著军阀各霸一方，横征暴敛。甘肃全省又连年大旱，民不聊生。马鸿宾由于裁减军饷，与驻兰州第八师师长雷中田的矛盾日趋尖锐。驻兰州国民党特派员马文车从中挑拨，雷中田于1931年8月25日发动政变，将马鸿宾软禁了三个月。后经调解，恢复自由，马即率部赴银川，企图主政宁夏，但国民党政府未予任命。1932年冬，马鸿宾为取得正式任命，致电蒋介石试探，佯称要当时在河南的马鸿逵前来宁夏任主席，自己愿率部去南京“拱卫中央”。不料弄巧成拙，蒋介石立即发表马鸿逵为宁夏主席，要马鸿宾把部队仍留宁夏，与马鸿逵留在河南的第三十五师互换番号，前往河南任师长。马鸿宾大失所望，又企图阻止马鸿逵前来。1933年春，马鸿逵率部到宁夏任省主席，马鸿宾部移往金积、灵武一带驻扎。同年冬，蒋介石命令驻绥远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道经宁夏赴青海任边区屯垦督办，同时又暗命马鸿逵、马鸿宾堵击孙殿英。1934年春，“二马”联合青海的马步芳，与孙部大战于银川以北地区，马鸿逵初战失利，后赖蒋介石派兵协助，才将孙部驱出宁夏。

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徐海东部北上抗日，经过甘肃陇东地区。马鸿宾奉蒋介石命率第三十五师主力进行堵击，在固原的三关口、平凉马莲铺和泾川的王田宫等战斗中，遭到红二十五军沉重打击。1936年春，马部在甘肃西峰镇、曲子、环县、庆阳等地再次遭到红军西征部队的歼击，所属第一〇五旅被歼，旅长冶成章等人被俘。是年冬，红四方面军的前锋组成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连续苦战后遭到失败，“二马”派出许多支骑兵分队，从酒泉到武威，沿整个河西走廊，到处搜捕红军，残忍杀害不少红军战士。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西北划为第八战区，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以马鸿逵为集团军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1938年5月，马鸿宾又兼任绥西防守司令，进驻今内蒙临河一带。1939年冬，日军进犯绥西，马率部在狼山、乌拉山一带与日军激战。1940年冬，马部移驻内蒙伊克昭盟一带，其先头部队在包头附近曾多次与日军激战。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马鸿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原第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惇靖接任。马部奉命多次向陕、甘解放区进犯，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在蒋介石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之时，1949年春夏，马部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靖为司令，希图配合马步芳、马鸿逵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同年9月，在解放军强大攻势和起义政策的感召下，第八十一军在中卫宣告起义，马鸿宾审时度势，也参加起义。

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鸿宾任宁夏军管会副主任、宁夏省副主席。1950年以后，历任甘肃省省长、省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1960年10月20日，因患胃癌在兰州病故，终年七十六岁。

主要参考资料

马鸿逵：《马氏宗谱》，原件存宁夏公安局。

陈泌淮：《朔方道志》卷28，天津泰华书局1927年版。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31—35，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版。

张维等撰：《甘肃人物志》卷13，陇右乐善书局1926年版。

《中央周报》（总第171期）1931年9月14日、10月4日。

《甘肃民国日报》1930年8月号。

卞得云口述，王五典整理：《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堵击红军惨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文史资料》第12辑，1984年版。

马鸿逵

王劲

马鸿逵，字少云，回族，甘肃临夏人，1892年3月9日（清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生。其祖父马千龄以农商起家渐为地主。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马千龄虽与以河州（即临夏）为据点的马占鳌为姻亲关系，但不愿公开反清，并说动马占鳌降清。事后，左宗棠称其为“良回”。光绪初年，马千龄次子马福禄中武举人，继中武进士，马家从此显赫乡里。1895年，河湟地区[(1)]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清起义时，马千龄率其子组织民团，对抗起义军，后被清军收编为步骑两营，由次子马福禄和四子马福祥带领。马福祥即马鸿逵之父，为西北回族军阀前期人物中表现最活跃、地位最显赫者。他不仅恃武力，且长于交际，善于游说，政治手腕灵活，这为马鸿逵出入军界政坛打开了广泛的门径。

马鸿逵十二岁时，马福祥即以纹银一千两为他买得“蓝翎知县”虚缺。1909年，马鸿逵结束家塾，考入兰州陆军小学堂。学习期间，他对于“军训体操及军事学科，均感兴趣”，“惟不喜英文、日文”，“考试前辄往教官处索题”[(2)]。1912年，马鸿逵在其父部下任职营长，继升宁夏新军统领。1914年至1917年，马鸿逵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袁世凯搞洪宪帝制，马福祥上京劝进，被封为男爵，事后懊悔不及。张勋复辟时，马鸿逵注意将北京情势及时电告其父，马福祥因此通电拒绝了复辟“朝廷”给他的“甘肃提督”的任命。其时，马鸿逵还悄悄离开北京，到天津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当了“讨逆军”的中将参谋。及张勋事败，段祺瑞重新上台，欲收马鸿逵为羽翼，拨给日式轻重武器及经费六万元，令其扩编宁夏新军，授其为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在嗣后直系与皖系的斗争中，马鸿逵与其父恐有所失，一直不作表态，直皖战争直系获胜后仍能取得曹锟、吴佩孚的信任。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双方都拉拢马氏父子。马氏父子则左右应付，借口“地方不靖”、“匪患未清”，婉拒任何一方促其派兵支援的要求，蹲踞绥远驻地不动。当奉系败北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通电讨伐张作霖，呼张为“胡匪”[3]。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曹锟、吴佩孚先发制人，于部署时即派马鸿逵为骑兵总指挥，令他率部开往热河前线。马氏父子故伎难施，只得成行。战争进行中，冯玉祥回师倒戈，与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政变进行中，马鸿逵闻风转向，尾随冯玉祥撤退到北京。政变后，奉系头子张作霖来到北京，马鸿逵急忙前往拜谒，乞求谅解。张作霖于见面时一开口就说：“前次我与曹、吴之战，曾请你父亲派兵支援，你父亲未答应，实在对不起我。”[4] 马鸿逵甚为尴尬。

北京临时政府组成，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其后奉系与国民军矛盾加剧。冯玉祥向西北发展，于1925年3月任西北边防督办，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迫于冯军势力，马鸿逵与其父以退求存，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职位交给冯之亲信将领李鸣钟，担任了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其部队则交马鸿逵带领，编为冯的西北陆军第七师。不久，北京政府又发表马福祥为航空督办，遂居住京津，从此活动转向中央政界，遥作马鸿逵和侄子马鸿宾的奥援。

同年10月，冯玉祥部刘郁芬进入甘肃。时马鸿逵驻宁夏的金积、灵武。他特地赶往兰州，引介甘肃回军其他人物马麒、马廷勷等人与刘见面。这样，既借冯的势力抬高了自己在地方军阀面前的身份，又借回军力量，向冯显示自己的重要。

1926年1月，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渐次放弃河南和京津地区，全部退往西北。河南军阀刘镇华依吴佩孚、张作霖之意，率“镇嵩军”进军陕西，把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围困在西安。9月，冯玉祥自苏联返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北

伐。在冯要求下，共产党人到其部领导政治工作。时马鸿逵部已扩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刘志丹被派到该部任政治处处长。马部参加了进军甘、陕以解西安之围的战斗。

1927年初，冯玉祥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马鸿逵任冯部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5月，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马鸿逵部队主力配属孙良诚指挥，进军到开封以东。冯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声明反共，“礼送”第二集团军的共产党人离去。马鸿逵也逼刘志丹离开开封。此后，马受冯、蒋指挥往山东一线作战。

1927年，蒋、冯、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进攻直系残余和奉系军阀。马福祥初在津门坐观成败，及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节节败退，张作霖已难固守北方时，马鸿逵密催其父赶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言“统一西北”大计，从此为蒋所信任和驱使。

在蒋介石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当蒋介石与冯玉祥的争斗初露端倪时，马鸿逵颇为如何自处而苦恼，他怕开罪于冯，不敢贸然接近蒋介石。蒋在南京接见冯军将领，两次向马鸿逵表示关怀，马佯装听不懂奉化方言，敷衍而过。他还辞谢了蒋通过其父转达的单独召见的邀请。但北上山东驻地后，他却写长信密送蒋介石，报告冯玉祥不满蒋的言行，并“对在京若干失礼之处，深致歉意”[(5)]。

1929年5月，冯玉祥决定反蒋，命所部由山东、河南向郑州、洛阳集中。马鸿逵到开封时，与从潼关赶来的韩复榘密议反冯投蒋事。然后韩返洛阳预做准备，及马部开到洛阳，即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署名者尚有石友三、庞炳勋。这一行动，打乱了冯的作战计划，推迟了蒋、冯大规模战争的时间，使蒋得以稳住阵脚，从容布置。

公开附蒋后，马鸿逵为了摆脱冯玉祥军事围困，率兵东入郑州。冯玉祥为扭转局面，屡电马鸿逵温语慰劝，望其归返。蒋介石闻讯，

即派钱大钧、贺耀祖、邵力子前往宣慰，带去百万元巨款。接着，召马到南京。款待马的宴会上，宋美龄及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出席作陪，又拨款几十万元补充马部军需。马部后来辗转调驻徐州。

是年12月，唐生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酝酿反蒋。韩密商与马鸿逵。马阳为应诺，阴向蒋介石报告，并条陈对策。蒋于是先设法稳住韩，同时急调大军进攻唐生智。韩以局势不利，未敢助唐，唐军因此全军覆没于河南许昌、漯河一带。

中原大战前，马鸿逵严密控制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为蒋运输军火、军需创造条件。同时自己乘机贩运倒卖海盐，牟利以百万计。蒋介石为分化马与韩复榘、石友三的关系，故意不追不究。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调嫡系顾祝同之第二军进驻徐州，马部则被调到兖州、泰安一带，以隔开韩复榘与冯军的接触，避免其阵前倒戈。接着，蒋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使其脱离战场。马鸿逵部调驻鲁西及山东陇海线右翼。这时，石友三复叛蒋投冯，进攻曹州（山东菏泽）甚急，马奉蒋令驰援，石部退向东明，马部亦调往战事吃紧的陇海线作战。这时马鸿逵的部队已正式扩编为蒋的讨逆军第十五路军。

战争初期，蒋军失利。马鸿逵部撤至山东邹县、滕县布防。这时，韩复榘在青岛摇摆不定，大有被冯、阎拉去的可能。韩一旦有变，则马鸿逵很有随韩转向之虞。蒋介石因此频频电马，极力笼络，以“岁寒知松柏，板荡识忠臣”[(6)] 相勉。7月底，蒋军重新集结后大举反攻，马鸿逵复占泰安。蒋介石论功行赏，马部增加了两旅编制。9月，一直被对峙双方拉拢的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冯、阎大败，联袂下野。11月，战争结束。

1930年底至1931年，蒋介石三次“围剿”红军失败，第四次“围剿”红军时，调马鸿逵部到河南许昌、漯河一带。马设总部于信阳，指挥所部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但马鸿逵鉴于黄杰、曾万钟、岳维峻等的前车之覆，一度装病迟迟不行，招致蒋的不满，因此

曾发生刘峙部包围马部的事件。

1931年8月，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同时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但马当时觊觎河南省主席一职，滞留豫南，宁夏省政由他人代理。后蒋看到马畏于和红军作战，改变委其主豫主意，并让刘峙部压迫马鸿逵。1932年夏马福祥死，马鸿逵处境更加窘迫。恰甘、宁政局紊乱，蒋介石要他回宁夏就职。马鸿逵匆忙赶回西北，以摆脱困境。离豫时，按蒋命令，马鸿逵部队基本不动，由马鸿宾前来接统。马鸿宾在宁夏部队则交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马鸿逵为保存实力，借蒋允其可带直属部队返宁夏一事，连夜选拔精壮官兵，密藏优良武器，于隆冬寒天，迅速把部队运往包头，再星夜兼程步行进驻宁夏。留在河南的部队，只是一些老弱病残之流。后马鸿宾托词亦留宁夏。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他摆出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手订公务人员“行为准则”的八项要求。然而马鸿逵真正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7)]。他的一切活动无不以“抓兵”、“抓权”、“刮钱”为目的而展开。

马鸿逵不断地补充军队，由1933年仅有一万二千兵员扩大到40年代末的十万人，占宁夏省当时人口的七分之一。富户雇人当兵，后因可雇壮丁越来越少，“兵价”也不断上涨，达到每丁三四百元。贫户为避当兵，或自残身体，或举家逃亡，凄惨之相，比比皆是。为了控制士兵逃跑，马鸿逵规定了兵逃罚主户（出兵的人家）及严惩逃兵的许多办法，常常成批枪毙追捕回来的逃兵。

为了独自控制地方政权，马鸿逵处处安插亲信。宁夏地处边远，交通落后，蒋介石无法控制太严，无法决定省府委员、各厅、处长，除教育厅长外，其他均由马自行提名保荐。尽管如此，马仍然一连赶走了五个国民党政府派来宁夏的教育厅长，最后由他自己保荐亲信杨

作荣上任。马鸿逵以军管政，以政管党，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及各县党部都在他的操纵之下。

马鸿逵嗜财如命。他敛财的办法有：清丈土地，增加征粮、征款；垄断宁夏贸易和金融，缉拿他人走私，自己则走私烟土；开办工厂，搞官僚资本企业敛财；借整顿税收之名，行增加税款之实，局卡林立，百物皆税；克扣军队及公务员薪饷，士兵津贴极低，还强行“储蓄”，扣而不发；收取地租房租，房产延至平、津、西安、包头等地，其中有的作商号、金店，获利甚巨。

1934年初，孙殿英在蒋介石诱使下移兵西就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马鸿逵联合马步芳，说动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请求蒋介石收回成命，同时调集大军严阵以待。当孙军兵临宁夏（今银川）城时，马鸿逵与马鸿宾全力阻击，同时向蒋介石、朱绍良告急。朱绍良迅速调兵增援。马步芳先已派兵来宁夏，此时也亲来督师。战争愈益升级。由于马鸿逵用重金收买了几个孙军将领，孙殿英全线动摇，大败而去。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马鸿逵深恐从此失去蒋介石这样一个靠山，又虑若张学良、杨虎城得势，也不敢公开拥蒋。及各方态度明朗，蒋有释放可能时，他乃以倒填日期的办法发出通电，主张讨伐张、杨。

1935年前后，日谍多次潜入宁夏活动，马鸿逵对此一度知而不问。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即以防备和阻遏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为己任。时蒋介石曾亲飞宁夏布置防务，蒋走后，马立即划分全省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边区。1936年10月，更向蒋进呈“剿共”意见书。同年马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但很快被红军逐出。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从未进入对日作战的战场。他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从事的活动，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

1945年冬，蒋介石违背“双十协定”，调遣傅作义沿平绥线推进。包头以西空虚，马鸿逵奉命进驻河套地区，次年渐次全部撤回宁夏。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命令马鸿逵攻打三边，因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遂占三边。是年冬，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围攻陕北榆林国民党军，蒋电令马援榆。马怕损兵折将，指示所派部队在途中拖延，蒋介石空投手谕，严责统军的马鸿逵次子马敦静：“如果榆林有失，惟你父子是问。”[(8)] 马部方速行，于11月13日到距榆林一百二十里的袁大滩一带，先与解放军三五九旅一个团发生激烈战斗。接着，马部绕道向榆林城转进，人民解放军乘机猛攻，马部两千人被俘，马敦静败逃榆林。后解放军主动撤围，马部方得喘息，不久借口粮秣困难及解放军可能反攻三边，返回宁夏。

1949年春，国民党军主力丧失殆尽。蒋介石企图经营西北、西南，以为反攻基地。张治中参加和谈后所遗西北军政长官一职（由郭寄峤代理）遂成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论资历马鸿逵自胜一筹，军阶上将，马步芳长期偏处一隅，军阶只达中将。考虑作战实力，蒋倾向于马步芳。马步芳又不惜巨资，大肆活动。马鸿逵暂作退让，主动提出由他保荐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交换条件是马步芳保荐他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

同年5月，两马部队进攻关中的解放军。马鸿逵部被解放军打击后节节撤退，马步芳对此十分不满。8月，兰州战役前夕，马步芳要宁夏方面出兵援助。马鸿逵时在广州，因对马步芳一度食言自肥，不保荐自己就甘肃省主席，反而暗中为其子马继援活动，使自己该月上旬才得到这项任命一事无比忌恨，所以意存观望，指示部队缓慢开往甘肃。8月26日兰州解放，宁夏马鸿逵军才开到甘、宁交界的县份。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打算让部队在宁夏顽抗，打光为止；而他早做逃跑准备，外运黄金，亲到台湾布置房产。8月底又去重庆，后再未返回宁夏。9月，其子马敦厚、马敦静也乘机离宁夏。然而，马鸿逵部队却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于是月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

解决宁夏问题的办法，宁夏获得解放。

马鸿逵到台湾后，被以“擅自撤兵”、“驰援不力”的罪名，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他处境艰难，心灰意冷，请准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病故于该地。

---

(1) 河湟地区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及青海省东部的黄河、湟水流域各县。

(2)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4年版，第52页。

(3) 民革甘肃省委员会：《马鸿逵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马鸿逵史料专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4)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第101页。

(5)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第128页。

(6) 民革甘肃省委员会：《马鸿逵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马鸿逵史料专辑），第25页。

(7) 陈少校：《西北军阀记》，香港致诚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8) 民革甘肃省委员会：《马鸿逵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马鸿逵史料专辑），第143页。

马济

李微

马济，字慎堂，回族，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生于广西百色。祖籍陕西扶风，清嘉庆年间落籍百色。其父马殿勋，曾任百色厅城守兼带绿营左三队、龙州提标中营守备等职，与陆荣廷是结拜兄弟。马济只读过三年私塾，1909年到龙州，拜陆荣廷为义父。这时陆任广西左江镇总兵，马济随往听差。马济身材魁梧，擅武术，气力过人，性机灵，善伺人意，深获陆的喜爱，同年即被保送广西讲武堂学习。半年后，又被陆召回任随从副官，并与闻机密。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陆荣廷以广西副都督被地方实力派推为都督，马济仍为随从副官。1915年，马调升为广西游击营营长。护国战争在云南发动，陆荣廷秘密做出反袁的决定，马济是参与密谋的心腹之一。1916年2月，袁世凯派龙觐光率粤军经广西进攻云南，马济受陆荣廷之命率游击营尾随，在田阳、百色间截袭粤军，尽夺其饷械并生俘龙觐光、龙体乾父子。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后，马济又奉命将缴获的枪械运到广东肇庆，成立武卫军，并任总司令。5月，陆荣廷率桂军入湖南，马济部武卫军随陆入湘，为桂军前锋。马率尖兵一营先入长沙，时值桂军大队尚未到达，他虚张声势，令尖兵从南门进北门出，再从东门进西门出，以示抵城桂军为数甚众。不久，袁世凯死去，广东都督龙济光与段祺瑞勾结，通电取消独立，遂与入粤的滇军发生战斗，陆荣廷命令莫荣新率桂军马济等部入粤。龙济光失败逃往海南岛，陆荣廷经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督军。马济所部改编为广东陆军第一军，仍由马济任司令并兼任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

1917年护法军兴。10月，陆荣廷任命谭浩明为粤桂联军总司令率部援湘，马济自告奋勇随谭入湘作战。湘粤桂联军在湖南击败北洋

军，马济所部进驻湘鄂边境的通城。1918年3月，北洋军大举反攻，直系将领吴佩孚率领第三师连陷岳阳、长沙，4月占领衡阳，马济部随各路南军一直撤退到郴州栖凤渡。北洋内部由于直皖矛盾，吴佩孚没有得到湖南督军的职位，又经吴的幕僚张其锽撮合，南北双方便在衡阳按兵不动。在郴州的马济与北军明为对垒，暗则通好，信使往返不绝。1920年5月，直皖矛盾激化，吴佩孚决定撤防北归，但须由南方接济军费六十万元，经张其锽与马济洽商后，得陆荣廷认可，并约定吴军后撤一步，南军跟进。吴军北撤，皖系湖南督军张敬尧无力单独对付湘军，在湖南人民驱张运动高涨中，也于6月11日从长沙仓皇逃走。

1920年粤桂战争时，马济奉陆荣廷命到广东增援，旋桂军败退广西。1921年6月，孙中山令粤军入桂，讨伐陆荣廷，桂军土崩瓦解。陆荣廷逃往上海前，马济为之去沪与各方面联络，并预做安排。1922年，粤军从广西撤退，陆荣廷乘机重返广西，就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军务督办职，马济则留居上海负责与直系的联络，为争取直系军阀对陆荣廷的支持，他曾去洛阳会见吴佩孚。

1923年，湖南发生谭（延闿）赵（恒惕）之战，吴佩孚应赵之请，派北军进驻岳州，建立两湖警备总司令部。吴佩孚电邀马济到岳州“决川”舰上晤面，旋聘马为两湖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马济就任后，得吴佩孚及湖南省长赵恒惕之助，重建武卫军。武卫军第一团以广西人陈良佐为团长，第二团以陈雷为团长。这两团的枪支弹药均系吴佩孚从汉阳兵工厂拨给的，而饷款则由赵恒惕先后以湖南铜元局及城陵矶米捐局的收入资助。

1924年春，陆荣廷从南宁到桂林出巡，被驻防桂林的沈鸿英部包围。马济急派陈良佐率武卫军第一团前往接应，到广西咸水，被沈军击败。后经吴佩孚、赵恒惕调停，沈鸿英撤围放走陆荣廷。陆将自己的警卫旅梁山甫营拨给陈良佐，编入武卫军第一团，其余各营交马济编成武卫军第三团，任马济之弟马逵为团长。不久，陆荣廷通电下

野。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马济的武卫军已从湖南移驻湖北咸宁、武穴一带。北伐军挺进湖北，马济率武卫军第二、三团向武汉撤退。陈良佐因与李济深有旧，率第一团投靠北伐军，编入李宗仁的第七军。北伐军进攻武汉时，马济率武卫军第二、三两团再退到黄冈。不久，陈雷也率第二团向九江方面移动，投靠北伐军。马济见武卫军已无法维持，遂改任周定儒为第三团团长，向安徽西部撤退，本人则和其弟马逵去上海居住。

马济抵沪后，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所闻，旋被罗致，马感其知遇，允就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春，北伐军第七军向安徽进军，与马济指挥的原武卫军第三团在皖西相遇，第七军以“广西人不打广西人”为口号瓦解对方，马部不战而溃。马济率少数卫队逃到安徽定远县大青山，4月17日被当地红枪会所杀。

主要参考资料

陆君田、苏书选：《陆荣廷传》，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黄绍竑：《五十回忆》，杭州云风出版社1945年版。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

马驹誉、陈良佐、林虎等人生前口述材料。

马君武

曾诚

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到日本留学时改名和，字君武，后以字行。1881年7月17日（清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1)]。祖籍湖北蒲圻，后定居桂林。其父马衡臣曾在广西恭城、平南、马平（今柳江）等县衙任文牍。

马君武九岁丧父，家庭贫困。他母亲从裁缝店领来衣服缝花边，向爆竹店领来爆竹插引线，以维持一家生计。马君武幼读私塾，在严母的督促下，知发愤读书，行路不释卷。他临帖写字，无钱买纸，就用芭蕉叶当纸。后来在亲戚陈允庵家附读，陈家藏书甚丰，他得以博览群书，因而旧学很有根底。

甲午战争以后，国难日急，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各省废科举，兴学堂。1897年，康有为到桂林讲学，设立“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宣传变法维新主张。马君武深受影响，曾以“马恫”笔名投稿《广仁报》。他认为非精研西学，不足以致中国于富强，乃于1899年考入广西体用学堂。他在学校里发奋学习数学、英语，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主讲经史的唐景崧联系当时的政治情况，指出清廷的昏庸腐败以及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马君武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产生了外出求学，进一步探索救国途径的想法。1900年，马君武到广州入法国教会主办的丕崇书院学法文。同年7月，去新加坡，谒见康有为，请教救国大计。这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康有为正以衣带诏号召天下勤王，便派马君武返桂活动，策应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自立军在武汉起义失败后，他去上海，入震旦学院继续学习法文，并翻译《法兰西革命史》一书。1901年冬，马去日本，在横滨与梁启超、汤睿及日本宫崎民藏、寅藏兄弟相识，曾为

《新民丛报》撰稿。次年，马君武在横滨由日人宫崎民藏介绍，往谒孙中山，聆听革命言论，甚为钦佩。他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人物也。"[(2)] 此后，马君武和冯自由、刘成禺等人经常走访孙中山，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在孙寓畅谈革命。从此，他追随孙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4月，他和章太炎、冯自由等十人发起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明朝崇祯皇帝殉难日"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以动员反清革命。1903年农历正月初一，东京中国留学生千余人在骏河台留日学生会馆举行团拜，"时有马君武、湖北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并中国的历史，主张非排满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国，慷慨激昂，满座掌声"[(3)]。

同年秋，马君武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工艺化学。他在暑假期间，对一些留学生传授炸药术，准备作为狙击清廷权贵之用。

1905年7月，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共同对敌，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决定共同组成中国同盟会。由马君武、黄兴、陈天华等人草拟章程。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马君武曾被指定为执行部书记，因那时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未能就职，改由田桐接替[(4)]。他曾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先后发表《甘必大传》和《帝民说》等文，鼓吹革命，宣扬民主政治。

由于反清运动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蓬勃发展，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要求，为禁止在日学生进行反清活动，颁布了《取缔清韩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发动罢课斗争，以示抗议，一大批留学生因此愤而归国。1906年初，归国留学生在沪自办了一所中国公学，同年夏，马君武毕业归国，担任该校总教习（教务长）兼理化教授。由于中国公学的学生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马君武被两江总督端方指名缉捕，他不得不于1907年到德国入柏林工艺大学，学冶金，毕业时获工学士学位。

1911年11月上旬，马君武由德归国抵沪。当时辛亥革命已爆发，他在为《民立报》撰文宣传建设共和的同时，积极参加组织临时政府的筹备事宜，被推举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起草，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成立后，马君武以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并参与起草《临时约法》。

当时，袁世凯为了掌控国家政权，从各方面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同盟会内部也有人主张妥协，建议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马君武却指出袁为人诡诈，心怀叵测，坚决反对孙中山让位。后来，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亲自主持中国铁路总公司，马君武亦辞去实业部次长职务，任铁路公司秘书长。1913年国会成立，任参议院议员。

“二次革命”失败，马君武被迫离开北京，再次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并兼德国波鸿化学工场工程师。在院四年，提出蚕丝七种原素之分析研究论文，获工学博士学位，于1916年归国。袁世凯败亡后，国会恢复，马仍任参议院议员。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号召“护法”，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最初任大元帅府秘书，旋代理护法军政府交通总长，并兼任广州石井兵工厂无烟火药厂总工程师。1918年5月，孙中山被桂系军阀排挤，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马君武也跟着到了上海，与广西同乡王乃昌、梁烈亚等人组织“改造广西同志会”，在广西旅沪人士中进行反对陆荣廷的宣传和活动。1920年，孙中山命陈炯明从福建回师，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11月重组军政府，马君武任秘书厅长。次年4月，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6月，孙中山进兵广西，7月，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马君武雄心勃勃，励精图治，提出禁烟禁赌，整顿金融，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建筑公路，成立新军等计划。但陆荣廷

旧部分布于广西各地，割地自雄，附粤的桂军刘震寰又不听指挥，以致政令不出省会南宁，马君武一筹莫展。1922年5月，粤军撤出广西，自治军蜂起，陆荣廷旧部伺机进逼南宁。5月22日，马君武致电广州政府，辞去省长职，旋去上海，一度在上海杨行镇经营果园。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马君武由于远离政治舞台，不了解情况，并受居正、冯自由等人的影响，在章太炎领衔发表的《护党救国公函》上签名，这个“公函”实质是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三大政策的。11月，马君武受聘为上海大夏大学校长。1925年4月，并出任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同年12月底，段祺瑞执政府任命马君武为司法部总长。当时段祺瑞执政府正向各国交涉取消领事裁判权，需要有名望的人主持其事，马君武由于对北洋军阀的本质认识不清，加上好友章士钊的援引促驾，便以“事关国权，勉从其请”，于1926年1月7日就职。是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君武违纪参加段祺瑞之善后会议为由，予以除名处分。两个月后，段祺瑞改任马君武为教育部总长，工大学生群起反对，马未就职，同时辞去工业大学校长职务。3月底离京回沪，再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从此息影政坛。

1927年初，马君武应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之邀回桂，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1929年，粤桂军阀混战，学校经费无着，校务停顿，马君武乃离桂赴沪，再回上海大夏大学任教。1930年1月，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辞职。5月，马君武被该校校董会推举任校长，并主讲文化发展史。马君武出任校长，向上海聚兴诚银行贷款六万元建校，学生增至一千多人，是中国公学的全盛时期。马君武重视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而对国民党党义及纪念周等课题，不予重视，因此颇受学生欢迎。但国民党当局对此却深为不满，挑起学潮对他排挤打击。马君武于1931年初愤而回桂，5月复任广西大学校长。1932年，又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广西修志局总纂。

马君武在任广西大学校长期间，聘请国内一些名教授来校教课，添置图书仪器，充实教学设备，开办化学、机械等教学工场和农场，使学生获得实践知识。并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贫苦学生基金会，还由学校出资选送有培养前途的助教出国留学深造。他经常在晚上自修时间，提着马灯到学生宿舍巡视，亲自指导学生学习。1936年，因马君武不积极推行军训，反对广西的“三自三寓”政策，白崇禧借故将广西大学改组，免去马君武的校长职，只给他一个顾问空衔。马君武便离开广西去上海，与人合办农场。

马君武一向坚决主张抗击日本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仓皇迁都洛阳，马君武去电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5)]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国难日急，马君武大声疾呼：现在已是千钧一发的时候，“要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以民众的力量去收复东北失地”[(6)]。1937年抗战开始，马君武被任命为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1938年，马君武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在桂林开办科学实验馆，马为常务委员。马还和戏剧家欧阳予倩成立“广西戏剧改进会”，从事桂剧改革工作。同年，马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1939年，国民政府改广西大学为国立，任命马君武为校长。1940年，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马君武写了《三州纪事》诗，斥汪“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7)]，卖国求荣，卑鄙无耻。同年秋，马君武胃病复发，于8月1日在桂林病逝。

马君武青年时代，在贫困中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学者。他懂得英、法、德、日四国文字，精通数学、物理、化学、冶金、生物、农业等自然科学，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有研究。1902年，先后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介绍卢梭、圣西门、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学说，后来在《民报》上发表了他

1901年翻译的《法兰西革命史》。1918年翻译出版卢梭的《民约论》，至1930年，发行了六版。1919年，他第一个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此书一出，风行全国，到1936年，发行了十二版。此后，他还翻译出版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并写了《达尔文》一书，系统地介绍达尔文的学说。马君武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也不遗余力。他在1901年翻译出版《代数学》一书，两次留学德国期间又翻译和编写了《平面几何学》、《微分方程式》、《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德华字典》等，其中有的被用作大中学校教科书。他在广州任无烟火药厂总工程师期间，还翻译了维也纳教授菲里波维所著《国计民生政策》全书。他自己写了一本《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对王安石变法作了肯定。马君武工诗能文，学贯中西。他不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也是一个爱国诗人。1909年，他和同盟会会员柳亚子、陈去病、高吹万等人组织南社，以诗会友。他的诗多“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8)]，有的诗脍炙人口，传诵一时，深为读者所喜爱。在20世纪初，他与诗人柳亚子、苏曼殊齐名。这些诗多收入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诗集》中。

马君武去世后，周恩来送来祭幛，挽词是“一代宗师”，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教泽在人”，对马君武的一生作了评价。

---

(1) 马君武的出生年月，各书所说不一，今依马君武在《一个苦学生的自述》（《马君武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72页）一文中的记载。

(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56页。

(3) 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编纂委员会编：《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第37页。

(4) 田桐：《同盟会成立记》，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3页。

(5) 《广西大学周刊》第2卷第1期，第56页。

(6) 《广西大学周刊》第4卷第3期，第5页。

(7) 《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第26页。

(8) 胡朴安编辑：《南社丛选》第4卷，上海国学社1924年版，第24页。

马麒

魏明章

马麒，字阁臣。回族。甘肃临夏西乡乩藏沟人。1869年9月23日（清同治八年八月十八日）生。其祖父马兴隆，来往兰州、临夏间以驮脚为生。父亲马海宴[(1)]，喜武术，善骑射，广交游，曾任马占鳌部旗官，生三子，长子马麒，次子马麟，三子马凤。马麒系清末武科生员，1894年，甲午中日战起，与父马海宴随董福祥、马安良（马占鳌之子）入卫京师，驻扎京畿一带。1895年，马麒任哨官。由于“平回”有功，得六品军功牌，受命驻扎摆羊戎厅（今化隆回族自治县）。1900年庚子之役，马麒及其父又随董福祥部甘军入京，在马安良属下供职。曾与八国联军血战于河北廊坊、卢沟桥等处，并攻打了外国使节驻地东交民巷。北京陷落之前，慈禧、光绪西奔，董福祥率甘军随同护驾。路过河北宣化府时，马海宴病殁（年七十四岁）。董福祥即转奏两宫，追赐记名总兵衔，马麒即任教官之职。慈禧等至晋南风陵渡过黄河时，马安良、马麒等组织水手，并亲自掌舵，护驾渡河，博得了慈禧的赏识和信任。马麒回甘后，仍驻摆羊戎厅。不久，调升花翎副将衔循化营参将。

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攻占西安，宣布独立。在甘肃的清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等拼凑了“东征军”，从甘肃分三路进攻陕西革命军。马安良任“精锐西军”总统，马麒任帮统。部属除其原有的部队外，还有临夏、循化、巴燕戎格（今巴戎县）、碾伯（今乐都）等县征拨团丁，组成有步兵五千、骑兵一千的马步二十四营、旗。

当他们正向陕西进军时，适逢宁夏（今银川）刘华堂等响应革命，组成宁夏军政府。长庚命马安良派马麒率西军六个营直扑宁夏，

于10月中旬，攻陷宁夏城，镇压了宁夏起义。旋马安良即调马麒率部东开援陕。之后，马安良部在陕西乾县、邻县、永寿梁一带，与革命军多次血战，革命军伤亡较大，后清帝被迫宣布退位，陕甘战事亦宣告结束。

1912年4月，攻陕甘军次第调回，马安良、马麒部驻防兰州。马部在兰州，横征暴敛，甘肃省临时参议会表示反对。6月，马安良指示马麒，派人杀害甘肃省临时参议会会长李镜清于临洮家中。省内一直呼吁查办凶手，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予置理。参议员李步沄赴北京向袁世凯申诉，亦不得要领而返。同年8月，马麒经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宁镇总兵。旋又因外蒙西藏之乱，北洋政府以马麒熟悉蒙藏情况为由，任命为“青海蒙番宣慰使”，坐镇西宁。

1914年，川边第十一营营长李某率兵突占弥多之尕令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派员至昂欠（川名隆庆），胁令投诚。藏民诉于西宁，不愿归川。马麒认为玉树二十五族耕牧相杂，物产丰富，实为青海精华之所在。将玉树二十五族划归川边“势必长藏卫之渐”[(2)]，遂电甘肃都督转北洋政府派员勘界。结果，隆庆（即昂欠）、玉树仍归西宁管辖，川边兵退出境外。此次勘界玉树，使西南边防社会治安得到了安定，解决了川甘省界纠纷。随之，马麒着手筹设玉树、都兰两理事（相当于县一级政权机关），作为经营海南、海西的开始，并派马麟为玉树驻防司令，从西宁至结石（今玉树）一千六百二十里，沿途设驿站二十五处，置营堡戍守，为控制青海南北部奠定了基础。同年秋，甘督张广建呈报北洋政府，发来藏香，命令青海办事长官廉兴“祭海”，马麒“陪祭”。会后，马麒径电袁世凯，“宣布中央德意，使与祭之王公咸晓然于民国共和之宗旨”，并表示“以率属而景从”[(3)]。

当时，青海办事长官廉兴设立青海皮毛公估局，借以控制青海羊毛，从而影响了马麒的利益。时逢廉兴招慕护卫军数十人，马麒遂密电北洋政府，“廉兴私招军马，勾结蒙藏，图谋不轨”。1915年北洋政府令马麒将廉兴解往兰州。10月，北洋政府裁撤青海办事长官及西宁

镇总兵缺，另设甘边宁海镇守使，任马麒为镇守使，“以青海属甘，以长官事属镇守使”[4]，统辖西宁所属驻军及管理蒙藏地区的军政事务。自1912年，马麒创建“宁海军”，到1915年，前后招募兵马共六十营旗。任用其弟马麟、儿子马步青、马步芳、侄马步元、族侄马仲英等掌握兵权，形成了以马氏家族为中心的军事统治。从这时起，对蒙藏人民“每年增收草头税白银三十万两”[5]，解交镇守使署，作为军费。又在农业区加税加粮，并经营皮毛、药材、挖金、盐、采矿等工商业，以充军费。

清末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甘肃统治当局为了增加税捐收入，默许民间种植大烟，甘肃地区遂大量种植烟苗。马麒为扩充实力，解决军粮和兵源问题，采纳幕宾黎丹根绝种植罂粟的建议，极力执行禁烟。至民国七、八年间（1918年—1919年），西宁附近的烟苗已基本绝迹，粮食产量增加，农村经济一时尚称小康，曾有“西方一片干净土”之称[6]。

1916年6月，宗社党人吕光号称“忠顺公”，来西宁道属地区活动。先在拉卜楞倡乱，后到保安一带大肆封官授爵，提出“助清灭民”的口号，散发颠覆“民国”传单。一时部分青海的蒙藏王公、千户、百户和大通、湟源、互助一带的群众多受骗参加。吕光从保安出发，攻占了贵德县城，声势浩大。9月，马麒派“宁海军”平定吕光之乱，安定了地方秩序。在文教方面，马麒创办了蒙番学校、回教促进会立学校、职业学校等。对地方人士的文集诗抄，也曾捐资刊印，广为流传，学者称便。马麒自诩“优礼贤士，爱才如渴”。在民族宗教方面，他主张“汉回蒙藏，各得安其业；儒释道耶，各得遂其信仰”[7]。马麒迎伊斯兰教伊赫瓦呢派的倡导者马万福（即马果园）父子来西宁，以为己用。马万福所倡导的伊斯兰教伊赫瓦呢派，自称为“艾海力逊乃提”（即凭经立教）。他主张遵经革俗，反对门宦制度，反对单一的经堂教育等，这个学派在我国一般称为新兴教。由于马万福博学多才，有较高的声望，又得到马麒的大力支持，在不长时间内，以西宁

为中心，传遍了甘、宁、青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教派。他还督促兵工，兴修公路桥梁，种植树木，开荒造田，兴修水利等事宜。

1921年，果洛藏族反对马麒征派乌拉（即差役），抢劫马部商队，杀害玛沁雪山采金员工，西宁至玉树的交通阻塞。马麒遂派“宁海军”前往镇压，迫使果洛女王路吉卓玛来西宁投诚，开创了马氏家族统治果洛的开端。事后，北洋政府以征服果洛“有功”，授予“锐威将军”、一等文虎章、陆军中将衔[(8)]。1923年，拉卜楞居民与“宁海军”发生冲突。拉卜楞久隶宁海，因内部纠纷，诉讼于西宁，马麒庇护一方。“宁海军”曾两次前往镇压，藏民死亡及财产损失巨大。嘉木样呼图克图等人向上控告，不愿隶宁海。1927年，设立拉卜楞设治局，派省兵驻防。次年成立夏河县。

1925年，刘郁芬代理冯玉祥任甘肃督办，马麒仍任甘边宁海镇守使。1927年初，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任命马麒为暂编第二十六师师长。1928年初，国民军高树勋部进入西宁后，马麒被迫交出军政大权。

1929年1月，青海省政府成立，孙连仲任主席，任马麒为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马以“腐朽无能”为词，终未就职。后厅长由马麟担任，他只保留委员名义。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军陆续东撤。孙连仲出任甘肃省主席，青海省主席一职由高树勋代理，9月2日高亦被调走，冯任命马麒暂代青海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马麒即举起“倒冯拥蒋”的旗帜，急电蒋介石表示忠诚，“麒倾心南向，惟冯部来甘，遂致倾心之诚，无由上达，冯且蓄意剪除异己，只得曲与周全而已”[(9)]，从此投靠了蒋介石

1930年1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马麒为代理青海省主席。1931年8月5日，马麒故于西宁。

(1) 《清史稿》作马海彦。

(2)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北洋政府公报》。

(4) 《北洋政府公报》。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6) 《西宁市志》编委会编：《西宁市志》，历史部分征求意见稿，第148页。

(7) 魏明章：《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两篇碑文述略》，青海《社会科学参考》1984年4月。

(8)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9)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马叙伦

宗志文

马叙伦，字夷初，号宦香，浙江杭州人，1884年4月27日（清光绪十年四月初三）生。他的父亲马琛书是一名秀才，多次乡试不中，很不得志。马叙伦幼年入塾读书，十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做女红和父亲的朋友资助继续上学。1899年进杭州养正书塾学习。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加设师范班。他入师范班，在这里一面继续学习，一面教刚入学的新生。课余则博览群书，阅读西方的《天演论》、《法意》、《民约论》和反清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明夷待访录》等，逐渐萌发了推翻清廷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立志毕业后到日本学习陆军，从事革命活动。不料1902年临毕业前两个月，因为学校无理开除同学的事，他打抱不平，帮同学说话，触怒了学校当局，被学校除名。

同年夏天，马叙伦到上海，先是帮助维新派蒋智由编辑《选报》，不久又参与编辑《新世界学报》，两者皆带有反清革命的倾向。他还常常参加蔡元培创设的“爱国学社”在张园举办的讲演会，听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演说。这些人大声疾呼推翻清廷统治的主张，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思想。1904年他回杭州结婚，在新房中挂了一副自撰的对联：“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大胆地表示了自己争取民主，反对封建的愿望。婚后，他在杭州、江山、诸暨等地教书。1906年到广州，先后在两广师范馆及两广方言学堂教书。1909年回到杭州，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杭州这时已有反清秘密组织，他的朋友有不少人参加。他时常参加他们的秘密会议，一起议论国事。同年底加入“南社”。这时，他读到一本孙中山的传记《孙逸仙》，革命情绪更加高昂。翌年春天与朋友游西湖，在游船里吟诗，他在一首诗里抒发自己对反清革命必胜的信心说：“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

看。”

1911年夏天，马叙伦随老同学汤尔和去日本游历。马的目的是“要找章太炎先生”，与章相见后“谈得火热”。不久，马经章介绍参加同盟会。9月，马回国，适逢江浙人民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马和几个同盟会员一起，乘机扩大事态。他们借得几个股权，参加铁路局召开的股东大会，控制会场，取得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的胜利。

武昌起义后，马叙伦和几个同盟会员在杭州筹办民团，准备响应起义。11月5日浙江光复，马被邀担任都督府秘书。他刻了一颗“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携带封条，将大清银行、布政司、盐运司等前清衙门次第查封了。次年他任都督府印铸局局长。不久，因与该局公报总纂杭辛斋等人意见不合而辞职，仍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他的辞职，也还有思想上的因素。他过去读《高士传》、《独行传》、《逸民传》，又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超然物外”的思想，“想做一个高人逸士”。辛亥革命后他认为：“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分让‘学有专长’的人们去做，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上工作吧。”(1)

1913年春，马叙伦到北京，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当国文教员，随后又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教课。“二次革命”失败后，8月，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马叙伦经常去探望他，两人“一谈就是一天”。特务监视的时候就谈孔孟，谈老庄，谈佛学，谈理学；特务一放松监视，他们就商量倒袁的事。章太炎有一次消极绝食，还是马叙伦劝过来的。1915年初，袁世凯图谋称帝的消息传出后，马曾动员从前在两广方言学堂的学生廖容回广东组织武装力量起兵讨袁。廖回广东后，马写了一篇讨袁檄文寄廖。云南起义后，这篇檄文曾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对起义起了声援作用。年底，马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到上海。

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马叙伦再回北大任教。他授课之余，潜心著述，写了《老子校诂》、《庄子义证》，还着手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五四运动爆发后，马积极支援学生运动。他走出书斋，参加社会活动，被推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联合会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两个组织的书记，不久被推为主席。马曾代表教职员会联合会看望被拘禁的学生，向他们发表演说，鼓励他们进行斗争，并代表教职员会联合会同政府当局进行谈判，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

1920年春，北京大中小学教师因北洋政府长期拖欠薪金，向政府发起索薪运动，组成“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马叙伦又被推为主席。在他主持下，索薪运动不断发展，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1921年6月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上万人前往总统府，要见总统徐世昌，要求政府发还积欠薪金。马叙伦走在队伍前列，在总统府门外遭到军警毒打，头部受重伤，被送进医院。徐世昌还扬言要向法院控告马叙伦毁坏他的名誉。大家设法将马迁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不久他出院，仍然主持北京教职员会联合会的工作。后因头部伤未痊愈，年底请假回杭州休息。

马叙伦回到杭州时，正值浙江第一师范闹学潮，无人愿任该校校长，浙江教育厅再三邀请马担任，他只得应命。马任一师校长后，推行北大“教授治校”的一套办法，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拥护，学潮遂平息。当时，浙江教育相当落后，马有意进行改革。1922年夏，经蔡元培等人推荐，马任浙江教育厅厅长。他认为办好一省的教育，首先要办好各县的教育，曾亲自到萧山、绍兴等县视察。9月，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汤尔和入阁任教育总长，马叙伦应汤尔和之邀任教育部次长。11月，王宠惠被迫下台，马叙伦亦随之辞职。这时，国民党在北京已开始公开活动，马叙伦被任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马因事未能参加，曾建议孙中山为国民党掌握政权早做准备，设立调查和研究机

关，免得将来措手不及。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黄郛任国务总理，易培基任教育总长，马叙伦第二次出任教育部次长。不久临时执政府成立，段祺瑞任执政，马叙伦任国务员，代理教育部部务。当时他不愿在军阀政府任职，有人劝他说：“教育部关系革命很大，不应放弃。”他才继续干下去。年底，教育部收到一份内政部要查办“共产党首领”李大钊的密件，他有意压下，使李大钊幸免被捕。

1925年3月，段祺瑞任命唐继尧为教育总长，唐派他的代表王九龄到京赴任，马叙伦辞去教育部职务，仍回北大任教。“五卅”惨案后，马联合各界人士组成北京“五卅”惨案后援会，积极响应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1月，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自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通过一系列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决议。北京的国民党分裂，马叙伦站到西山会议派一边。他说：“我虽然信仰社会主义，却不赞成暴动政策……我因此也参加了西山派。”(2) 1926年初，北洋政府的教育经费仍然常常无着。马叙伦提出教育经费独立的主张，和一些朋友拟定了一个教育特税提案，交到国务总理许世英那里，得到许的赞同，并经国务会议通过，还发表马任督办教育特税事宜。不久“三一八”惨案发生，马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被迫躲进东交民巷。随后化装离开北京回到杭州。此后，他脱离了“西山会议派”。

北伐战争开始后，马叙伦动员他的老朋友浙江省长夏超参加国民革命，并代夏到广州与国民政府接洽，国民政府委夏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事宜。夏超宣布独立，马叙伦出任浙江建设厅长。不久夏超兵败，马遭孙传芳通缉，逃到上海。

1927年2月，北伐军进入江浙一带，浙江省政府成立，马叙伦被任命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厅长。他有心改革浙江吏治，很重视县长和警察所长的挑选。为了防止这些人贪赃枉法，他主张增加他们的

薪俸，增加行政经费。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后来他认识到必须“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曾说：当局“无明察之才，公平之度，恳挚之情，严峻之刑，不掣之权，皆不足以矫枉而反正；且如堂高廉远，不与百姓相接触则亦不能济也”[3]。1928年底，马叙伦任教育部次长。因国民党当局不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再直接发命令到教育部，马叙伦不满，1929年冬辞职而去。事后赋诗一首：“袍笏登场又一回，未酬素志鬓丝衰。身无媚骨难谐俗，从此柴门不再开。”表示不愿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了。1930年暑假后，再回北大教书。

“九一八”事变后，马叙伦痛感河山破碎，极为悲愤，常常写诗抒怀，排遣内心郁闷。1933年“九一八”国耻纪念日时，他写了一首七绝：“可怜歌舞弃金城，边月仍圆岁月更。我自年年歌当哭，旁人错认绕梁声。”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华北，在北大教授举行的抗日问题讨论会上，马叙伦积极主张抗日，与胡适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2月，马约集当时北平高等学校一些主张抗日的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被推为主席。适逢“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他为了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活动，日夜忙碌，终于累病了。胡适等人乘机要他休假一年，实际上是要他离开北大。他愤而辞职，回到杭州。

“七七”事变后，马叙伦带着家眷避乱到上海，在之江大学（由杭州迁沪）教课。上海沦陷后，他改名邹华孙，隐居上海，从事著述。他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三十卷，约二百四十万字，就是在这个时期定稿的。1939年12月，汪精卫、陈公博等在上海筹划降日卖国。陈是马叙伦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他义不容辞地找陈谈了一次，劝他停止卖国活动。陈多方狡辩，还请马叙伦出来帮忙，他断然拒绝说：“我是决定不出来的。”后来他在上海贫病交加，陈多次派人送米送钱，他都拒绝接受。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叙伦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发动内战大失所望，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大声疾

呼："我们中华民国过了三十四年，仍然是独裁政体，我们老百姓享受的生活仍然是不民主的。"[4] 1945年，上海一部分进步的文教界人士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不久，以他领衔的上海文教界六十一位著名人士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要求美国人民推动美国政府协助中国建立包容全国各政治党派在内的政府。随后，他又和郑振铎一起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八点要求，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马叙伦的正义言行，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痛恨。1946年5月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时，民主促进会被排斥在会外。6月23日，以马叙伦为首的十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几百名暴徒蜂拥而至，殴打代表团成员，马叙伦受伤住院。

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马叙伦异常悲愤，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它好像春天的草，生生不绝。"[5] 还说："我的历史一部分正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还他一个原子炸弹。"[6] 他继续在大学里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有一次他说："我知道今天台下有许多带手枪的特务，我不怕，我还要讲话。"[7]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中国民主同盟，环境异常险恶，马叙伦随时有被暗杀的可能。他接受一些朋友的劝告，暂时转移到香港。他在香港同王绍鏊等筹划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1948年10月，马叙伦转入东北解放区，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1949年9月，马叙伦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长、高等教育部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外，他还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卧病十多年后，在北京逝世。

马叙伦的著作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石屋余沈》、《石屋续沈》、《我在六十岁以前》等。

---

(1)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44页。

(2)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94页。

(3) 马叙伦：《石屋续沈》，上海建文书店1949年版，第175页。

(4) 马叙伦：《马叙伦言论集》，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2页。

(5) 周建人等：《爱国革命不断奋斗的一生》，《民进通讯》1980年第5期，第5页。

(6) 马叙伦：《马叙伦言论集》，第51页。

(7) 周建人等：《爱国革命不断奋斗的一生》，《民进通讯》1980年第5期，第5页。

马师曾

张洁

马师曾，名伯鲁，字景参，艺名师曾，著名粤剧演员，又名关始昌，风华子，广东顺德龙潭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商人家庭。七岁时跟祖父及父母避债到武昌，投靠他的曾叔祖马贞榆。那时，马贞榆是两湖书院的经学馆馆长。马师曾到武昌后，就在两湖书院跟曾叔祖攻读“四书”、“五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师曾一家又辗转逃回广州。马先入小学读书，十五岁那年考入敬业中学。他是一个喜玩好动的学生，特别爱好音乐、戏剧。每逢校庆演戏，他都积极参加；假日或课后，经常瞒着父母去看粤剧，暗地里模仿一些演技。

1918年，马师曾中学毕业后，父母把他送到香港一家收购店里当学徒，从早到晚不得休息，工作稍出毛病还要挨骂受罚，日子很不好过。三四个月后，与店主闹翻，不辞而行。

马师曾回到广州后，不敢回家，偷偷进了一间教戏馆学戏。可是学戏要钱，他没有钱。一天，有个南洋客来戏馆招徒到新加坡做戏，马想到有个姓陶的同学在那里，极愿应招。教戏馆师傅觉得马无油水可捞，就代他订了卖身契，以三十元代价，将马转卖给南洋客。

马师曾到新加坡后，被交给“庆维新”粤剧团，仅学了几次台步，团主就要他登台扮演《六国封相》的一名马旦，马只好硬着头皮登场。后来，剧团的人知道他是读书人，很敬重他，并劝他不要做戏，还是转入学界好。有个演员，人们称为“小生全”的，对马的遭遇格外同情，劝他找那个姓陶的同学另谋出路。不久，马果然打听到陶在新加坡一间小学当校长，“小生全”出钱为他赎回了卖身契，他入小学当

了教员。但两个月后，小学因故停办，马又失业了。这时，山区小市镇文冬埠的“尧天采”剧团到新加坡招聘一名第三小生，“小生全”就将马介绍进去。马只演过两次马旦，台步、曲调均不熟悉，幸得“小生全”的指点，几天内学会了小生戏的基本唱调、台步和动作，同时又得“小生全”购赠了一些小生戏服，便改名为风华子，与“尧天采”剧团签了合同。

马到“尧天采”剧团不久，“庆维新”剧团的大旗手“盲公贤”到文冬埠招聘演员，看见马写的海报潇洒而苍劲，颇有好感，便邀马仍回“庆维新”剧团。马考虑“庆维新”多舞台老手，便于学戏，乃欣然接受，即随剧团往金宝埠演出。

一天晚上，该剧团上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开演前，正印小生和第二小生都病倒，班主临时指派马来顶替。当时，主角和有些演员多表示反对，马却满口答应了。上台后，马的唱词、对白、台步、动作都有条不紊，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马自恃聪明和有“盲公贤”的赏识，有些趾高气扬，从而招惹了其他同行的反感和妒忌。后来“盲公贤”因事返广州，马就被排挤出剧团而失业了。

马师曾离开金宝埠，到大辟历、吉隆坡、坝罗各地流浪，曾卖过膏药，挖过矿，拉过黄包车，还替殡仪馆看守死尸，用这种种办法来维持生活，仍不能得到温饱。在生活的压力下，愤而跳海自杀，幸被渔民救起，得以不死。

不久，“平天采”剧团来坝罗演出。马前往谋职，该团第三小生恰好离班，班主便让马顶替，讲明暂不订合同，不计待遇，有戏登台，无戏打杂。经过一段时间，戏班见马工作勤奋，演技超过原来的小生，便聘为正式演员。从此，马决心献身舞台，决不再改弦易辙。这是他一生戏剧生涯的正式开始。

马在“平天采”初露头角是扮演《痴嘲废戆》一剧的丑角“烂赌

二”。他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但又招惹了原有丑角的妒忌，要求停止马演出，幸得该团著名演员靓少风挺身而出，为马说话，始得平息。随后。靓少风与马组织新班到端洛上演《白蛇传》。马被提升为第二小生，兼丑生。五四运动之后，时装新剧流行，马师曾和靓少风一起演过一些新剧。

再稍后，粤剧著名小武靓元亨来南洋演出，马从小就崇拜他的技艺，即拜他为师。马从靓那里学到一套小武的硬功夫，进一步奠定了他的舞台艺术基础。靓元亨也很器重马的才艺，组“普长春”新班往新加坡演出，邀马参加，列马为台柱之一。当时南洋戏行有个规矩，每个台柱每周要轮流献演自己的第一出戏。马入行不久，没有第一出戏，便连夜赶工，编出自己的第一出戏——《洗冤录》。但这出戏表现不出主角的分量，演出时嘘声四起，草草收场。挫折激发了马勤学苦练的决心，他反复钻研了《江湖十八本》，对剧中每个情节、人物性格、历史背景、曲调乐谱、台词台步及各种传统演法，都细致领会琢磨，并经常到各大剧院向名伶偷学。于是他的技艺日进，既吸收了别人的长处，又有自己的创新。为了竞争，各剧团都须不断更换剧本，马编的剧本不但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雅俗共赏的特点，而且有的还带一些反封建的内容。由于马的演技常常别开生面，半年后他的戏居然比师傅靓元亨的戏还叫座，成了班中的红角。但是在旧社会“同行是冤家”，马的声誉遭到师傅和其他同行的妒忌，他们经常想方设法压制马。马感到长期在此终难出头，便偷偷离开新加坡回到广州，进了名班“人寿年”，这时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前夕。

马师曾初进“人寿年”，由于戏路不对，曾小受挫折，但不久即声誉鹊起。有一次，马扮演乞儿，他对如何创造乞儿的腔调，苦加思索。他想起夜阑人静时，经常听到卖柠檬的沿街叫卖声，音色沙哑，令人怜悯。从这种叫卖声中他受到启发，想到乞儿受尽饥寒，声调自不宜高亢洪亮，只有这种沙哑凄厉的声音，才能表达在饥寒线上挣扎的情景。于是他用这种声调作基础，开创了粤剧唱腔的新声“马腔”。

这种唱腔适宜于表现被侮辱被压迫的下层群众的疾苦，亦易于为人模仿习唱。后来人们称之为“乞儿喉”、“柠檬腔”或“豆沙喉”，曾饮誉粤剧艺坛达数十年，并一直流传至今。

马成名以后，自恃有了“资本”，由于人事纠葛与“人寿年”闹翻，另与人组成“大罗天”新班。可是“大罗天”开锣以后，并不叫座。马为与“人寿年”竞争起见，便努力赶编一些迎合观众庸俗趣味的新剧。多是花前月下、悲欢离合一类的东西，这时已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广州，国民党宪警特务与流氓恶霸朋比为奸，绑架凶杀，日有所闻。当时粤剧名伶都纷纷私雇保镖，向宪警交“保护费”。马师曾几次受到恐吓勒索，但他不买账，也不雇保镖。一次，演完戏卸装出来，突然被炸伤。不久全市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马携带全家避居香港，参加由“大罗天”更名的“国锋”剧团的演出。其后，马在港又一次遇刺，幸免于难。从此，马即闭门读书，钻研戏曲，暂时不再登台。

1929年末，马师曾应邀组班，先后到西贡与南洋各州府演出，1930年底回香港。1931年4月又应邀赴美国演出，并到美国各地旅行。1933年4月离美回港。回港后组成“太平”剧团，对粤剧的一些陈规俗套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吸取了某些南乐与北乐，采用了电影的灯光布景和导演排练的方法，废除了男扮花旦的成规，改用女性花旦。这些改革，对粤剧舞台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师曾以舞台进行抗日宣传，当时他编演的抗日新戏有：《爱国是侬夫》、《汉奸的结果》、《还我汉江山》等。为了上演这些爱国新剧，马被港英当局多次传讯警告，日本驻港领事也多次干涉，但他仍坚持演出，并不畏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马师曾和全家

逃到澳门。不久，到广州湾（今湛江市）就地组成抗战粤剧团，率领全团人员和家属百余人前往广西境内，数年之间，由郁林而容县，由容县而柳州、桂林，再到梧州。各地演出，多为抗战宣传或义演献金。但义演所得，又多为国民党军警宪特所瓜分，而全团人员反不得温饱。此后，又从梧州折回粤西德庆、都城、肇庆等地演出，易名为胜利粤剧团。1944年再应邀到桂林演出，但不久日军迫近桂林，马只得率领全团再行流亡他处。马在大后方几年的演戏生活中，备受国民党军政官吏的压榨、欺凌，当日从香港出走时的豪情壮志反被消磨，思想上陷入苦闷。

1945年8月，马师曾正在广东罗定演出时，听到日军投降消息，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带领剧团回到广州、香港，继续登台演出。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马立即由香港回到广州演出，并参加庆祝游行。抗美援朝开始时，马又到广州参加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并向人民政府捐款购买飞机大炮。但由于思想上的种种顾虑，到1955年10月，才下了到广州定居的决心。回到广州后，看到新中国各方面的进步与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激发了他为祖国献身的积极性。这时他虽已年老体弱，仍到各地为工农兵群众演出。1956年和1960年先后拍摄了粤剧《搜书院》和《关汉卿》两部舞台艺术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1959年和1961年先后两次出国访问演出，其中一次回国途经昆明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马自回国后，除参加演出外，还主持广东省粤剧院和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工作，对培养新一代演员，作过不少努力和贡献。

1962年马师曾患气管癌，经治疗后病情基本得到控制。1963年春节期间，在北京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文艺晚会。

1964年4月21日马师曾病逝于北京。

马师曾逝世后，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各界的隆重悼念。

主要参考资料

沈纪：《马师曾的戏剧生涯》，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红线女：《哀痛的回忆——悼念马师曾先生》，《南方日报》1960年4月27日。

范敏：《马师曾》（1—46），《广州日报》1981年8月21日—11月29日。

李门：《马师曾的粉墨春秋》，《戏剧艺术论丛》1980年第11期。

赖伯疆：《薛觉先马师曾对粤剧革新的贡献》，《人民戏剧》1980年第11期。

马相伯

娄献阁

马相伯，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原籍江苏丹阳，1840年4月7日（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六）生于丹徒（今镇江）。父名松岩，是位医生，并开过药铺和米布店。其父母和外公、外婆都是天主教徒，他出生后不久就受了洗礼，教名“若瑟”。

马相伯幼年入塾，先读教中经典，续读儒书。到十一岁时，他背着父母跑到上海，进了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学名“马斯臧”。第二年他弟弟马建忠也到这个学校来念书。马相伯在公学普通科学习期间，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数学和天文学也学得不错，深受意籍校长晁德莅（Angelo Zottoli）的赏识。

1862年，马相伯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神修”训练。1864年小修院学习期满后，在耶稣会研究中国文学和拉丁文学，后又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1870年得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

1871年，他奉耶稣会长命，先后到南京、徐州等地传教。从1872年起，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教学之余，仍研究哲学及数理科学，译书百余卷。他对学生除宣扬宗教外，还重视中国经史子集的讲习。教会怕他把学生变成“异教徒”，于1875年指定他专研究天文、数学。翌年，又调他到南京任编撰，翻译数理书籍，因与当地教会外国传教士有矛盾，不久便不辞而别，跑回上海。自此，他暂时脱离耶稣会，但并不脱离天主教。

马相伯的大哥马建勋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

动，后为淮军办理粮台。马相伯离开耶稣会后，经其大哥介绍，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掌理文案。1877年余兼署山东巡抚，委他接任潍县机械局的差事。次年又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

1881年，马相伯随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本任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曾与日本维新要人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往还酬酢。同年秋为兄病回国，过南京，适李鸿章轮泊南京，他往谒李，随李到天津办事。这时他弟弟马建忠已留法回国，也在李鸿章幕中。

不久朝鲜政府向李鸿章要求推荐办理新政人才，李即派马相伯前往协助。1882年上半年他到朝鲜，“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1)]。他还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其他一些改良主义的条陈，其中有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材、兴学校等项目。为时不到半年，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等带兵前去助朝鲜“平乱”。事后马相伯仍留朝鲜襄助办理“新政”。翌年，他回天津述职时，鉴于朝鲜“新政”难于进行，向李鸿章要求不再回去，并请李“即早决定对朝政策”[(2)]。

1884年，李鸿章委马建忠任招商局总办，同时派马相伯到全国有关各埠调查招商局财产、账目。他从天津动身，经烟台、上海、汉口、厦门而至广州。翌年，他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旋离广州北返，行至厦门时，得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曾劝刘借款开发台湾经济，未被采纳。1886年被李鸿章召回天津。当时李正奉命筹办海军，苦于经费短绌，马趁机劝李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开设银行。李听了他的话，便派他赴美接洽借款。其时美国资产阶级渴望输出资本，所以他在美备受政府、商人、银行家欢迎，各商团及银行家争相贷款。结果商定“以五千万（美金）为正式借款，以三万万（美金）为银行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视中国财政缓急、需要提用”[(3)]。但由于清政府中顽固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的矛盾，李鸿章遭到攻击，筹办银行事流产。马无奈，只好溜之大吉。他离美赴欧，在英、法等国游览，曾到罗马觐见教皇宗良十三世，1887年回国。

从1892年起，马相伯又一度任驻日本长崎领事、驻日使馆参赞，后归国。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请马主持筹设译学馆，他建议将该馆设于上海，事将告成，由于政变发生而成泡影。他对于康、梁的失败深感惋惜，但也颇怀畏惧。次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也离京回沪，重度书斋生活，与其弟合著《马氏文通》，后以其弟马建忠之名出版。

马相伯回沪后，转向文教界活动，1900年曾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翌年退居徐家汇，除主持徐家汇天文台事外，仍从事译著数学和宗教书籍。这时他因教授拉丁文结识了南洋公学教员蔡元培，后来蔡又从学校选派一批青年跟马学习，于是风声所播，各地来学的人日渐增多。马早有创办中国新式大学思想，这时便联合同道，得耶稣会之助，着手筹办震旦学院，企图实现其“教育富国”的理想。学院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为校舍，于1903年2月成立。他自任监院，监院下除设一总干事与会计外，其余各项行政由学生自己管理。学院标榜：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于右任、邵力子、马君武等都曾是该院的学生。1905年担任讲座的外籍教士趁马养病之际，改变办校方针，学生大哗，相率离校。他招集离校学生，并与熊师复、袁观澜等商议另创新校，得两江总督周馥赞助，拨地拨款。新校定名为“复旦”，以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于是年秋开学。马被推为校长，李登辉主教务，惨淡经营，逐步打下了复旦大学的基础。

1906年，马相伯应两江总督周馥之聘，曾至南京讲演君主立宪的主张。1907年12月，马又徇梁启超之请，参加立宪派组织政闻社，任总务员（相当于干事长），并为此专程赴日。赴日期间，复旦校长改由他人接任。到1909年马复任复旦校长，并于是年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

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被江苏都督府聘为外交司长。1913年他到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旋辞去，改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同年马与北京天主教上层分子英敛之联合上

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兴办大学。他居北京四年，历任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这期间，曾与章太炎、梁启超拟议创办“函夏考文苑”（类似研究院），用以“校勘古籍，编纂词典，奖励著述，表彰硕德”[(4)]，但没有办成。又与英敛之发起辅仁学社，社址在北京西山，招集生徒，讲授经史百家之学，此即辅仁大学之前身。

当袁世凯进行帝制活动，袁家党徒及孔教会分子准备在起草的宪法中规定尊孔教为国教时，马相伯以“信教自由”为理由加以反对。曾与雍剑秋发起“信教自由会”；同时马在所写的《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及为教会代拟的五篇请愿书中，驳斥了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主张。后来，他鉴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便出京蛰居上海。1918年发表《民国民照心镜》，批评袁世凯的君主专制和武人政治，阐述了立宪共和的思想。此后他虽然担任过江苏财产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中国科学社董事、上海天主教办的《天民报》总主笔等职务，但已年老、体弱，多是挂名虚衔。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后改名辅仁大学）国学部由英敛之出面设立，马十分关心此事，对办校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成立宣言等多所建议，翌年英不幸去世，有关方面请马北上主持校政，他亦以年老体弱谢绝。1926年整理出版了旧稿《致知浅说》一书，此外他还先后撰写了一些有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之后，国难深重，马相伯在这时痛感“国亡无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无以自救”[(5)]。当时他在上海积极参加救国工作，坚决主张对内团结，对外抗战，被尊为爱国老人。他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表了很多抗日言论，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说：“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6)] 马曾提出《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和《实施民治促进宪政以纾国难案》，并发起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和不忍人会，主张抵制日货，号召为抗日将

士劝募义勇捐。1933年，日军进一步侵占我山海关和承德，他与章太炎两次发表对外宣言，以历史事实证明东三省和热河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并通电全国请政府及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恢复失地，消灭伪国。同时马还要求“立即召集国民大会，政府与全民统筹国是”[7]。此外他对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宋庆龄出面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均积极予以支持。马更热心投入救国会的工作，被推举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全国救国会执行委员。国民党当局一面采取高压手段，在1936年11月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即七君子），另一方面借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请马前往襄助教务、修改《救世福音》一书之机，于1937年3月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以弱化其言行，分裂他与救国会的关系，但他始终心系抗日救亡运动而不动摇。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马相伯在广播演说中，强调“钢铁政策是富强的捷径”，“完全能够保证中国万岁”[8]。抗战期间，他的意志更加坚定，决心“甘抛弃一条老命，与广大爱国民众，携手前进，共同抗日救亡，直到胜利”[9]。同年10月上海沦陷，日军迫近南京，李宗仁等请马移居广西桂林风洞山；1938年11月，于右任又请马移居昆明，他在赴昆途中因病留居谅山。1939年4月，当马相伯一百岁（虚龄）之际，国民政府对他颁令“褒奖”，并在各大城市为他举行遥祝百龄大会。罗马教皇也派于斌向他颁送“圣像”。同年11月4日，马因病逝于谅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曾去电吊唁，新华社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和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予以赞扬。他的著作大部分收在《马相伯先生文集》里。

---

(1) 马相伯口述，王瑞林笔记：《一日一谈》，上海1936年版，第42页。

(2) 马相伯口述，王瑞林笔记：《一日一谈》，第56页。

(3) 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逸经》第33期，第46页。

(4) 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见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

(5)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27页。

(6) 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第35页。

(7) 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第68页。

(8) 《中央日报》1937年7月10日。

(9) 韩希愈：《反帝爱国百岁老人马相伯》，《人物》1983年第2期，第120页。

马星野

熊尚厚

马星野，名伟，笔名星野，1909年10月26日（清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生，浙江省平阳县人。其父马敏中秀才出身，以教书为业，曾任某书院院长，属书香门第。马星野青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平阳县立高等小学和温州浙江第十中学。自幼养成喜爱读书的习惯，对于诗词、小说颇为爱好，并广泛阅读哲学、历史、地理、政治及社会等各类书籍。在中学时曾受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教授语文课，并任学校壁报与校刊主编，开始对新闻事业萌生兴趣。

1926年夏，马星野考入厦门大学预科，后升入文学院，翌年夏天，学校发生风潮停课，暑假后因一时不能返回学校复课，遂于同年秋考入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受到教务处副主任罗家伦的器重，毕业后留校任教务处编辑部翻译。1928年，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编审、《党军日报》主编。翌年春，罗家伦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马随同前往，入清华大学半工半读，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不久转到教务处工作，同时在《清华校刊》编辑部任主编兼编译。同年4月，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中央政治学校，他被电召回校工作，在编译部任编译。

1931年8月，马星野获中央政治学校奖学金赴美留学，入密苏里安大学新闻学院三年级为插班生，1933年冬获新闻学士学位。翌年5月回国，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秋季开学后在外交系四年级讲授新闻学概论。

1935年秋，中央政治学校增设新闻系，教务主任程天放兼系主任，马星野任讲师，实际主持新闻系的工作。除负责行政工作外，还讲授新闻学、新闻史，并任《中外月刊》发行人兼总编辑。此外，还

以新闻系师生为基本会员，组织新闻学会。1936年1月，程天放出任德国大使后，马接任系主任，从此更以全力从事新闻系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政治学校先后迁江西牯岭、湖南芷江，新闻系在芷江接办《芷江民报》，新创《新闻学季刊》，均由马星野负责主持。1938年7月，中央政治学校经贵阳迁重庆南温泉，马星野除自己讲授新闻学概论及新闻史课外，还先后聘请吴国桢、董显光、萧同兹、成舍我等社会名流讲课；相继创办《新闻战线》、《南泉新闻》及南泉通讯社等，吸收学生参与各种工作。教学方面除讲授专业课外，还开设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课程。

1941年3月，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成立，马星野负责起草该会章程。同年他拟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十二条，作为新闻记者道德、修养和行为的准则。11月，他辞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职务，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但仍兼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教职。1943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与中央政治学校合办新闻学院，马兼学院教授，讲授新闻学课。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马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星野于9月接任中央日报社长，由王新命任总经理，陶希圣任总主笔。11月，他由重庆回到南京，大力革新《中央日报》版面，强调以新闻第一为主旨，同时极力要使报纸杂志化，加强对副刊的编辑工作，除办有科学、地图、食货等双周刊和青年、国际等周刊外，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新闻学的《报学》双周刊。他发起创立南京新闻记者公会，还兼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讲授新闻学；并任中国新闻学会和南京报业联合会的常务理事。

1947年5月，中央日报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陈立夫任董事长，马星野任常务董事兼社长。翌年初，马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3月出席日内瓦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会后在欧美考察新闻业及社会、

政治。回国后，他于11月应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的邀请前往参加博览会。此时正值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遭到惨败，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马星野眼见形势危急，乃决定于广州、台湾增设《中央日报》版，把南京的印刷机等撤至广州，派总经理黎世芬赴台筹办，并向美国购买最新的三色套版卷筒机，把自己的家眷也送往台湾。

马星野到台湾后，继续主持《中央日报》社务，仍然辟有《报学周刊》专栏，并先后成立编辑人协会、记者公会，由编辑人协会出版了《报学》半年刊。1950年兼中央通讯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国民党中央第四组主任，主管宣传业务。1957年任国民党第八届候补中央执委，1959年8月改任台湾驻巴拿马“大使”。1964年他返回台湾，12月接任中央通讯社社长。1980年3月当选为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理事长。1985年7月，马退休，之后连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至第十三届，并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

马星野编著有《新闻学概论》和《新闻事业史讲义》，以及论文《新闻自由论》、《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等。

1991年3月11日，马星野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主要参考资料

马星野：《我从事新闻教育经过》，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5期。

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

蔡绍元：《马星野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团结报》1986年2月1日第4版。

马星野：《我在南京办报的回忆》，台北《中华日报》1966年2月21日。

张力耕：《忆马星野先生主持中央日报经过》，台湾《中央日报》1957年3月12日第15版。

马寅初

汪仁泽

马寅初，初名元善，浙江嵊县人，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九）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马棣生，擅长酿酒，自设酒坊，营业颇盛，因被劣绅诈索巨款，店务遂衰落。马寅初自幼敏慧，初在家乡私塾就读，十三岁进绍兴县学堂求学。十七岁毕业后，不愿从父命守家业，随亲友进上海教会办的中西书院就读。

1904年，马寅初在中西书院毕业后，受“实业救国”的影响，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攻读冶矿专业。1907年，北洋大学总办丁惟鲁与教务提调美国人丁家立（Tenney，Charles Daniel）不和，相互攻讦，讼于北洋大臣兼北洋大学督办袁世凯。袁为两全计，调任丁家立为留学生监督，带领马寅初等尚未毕业的学生赴美留学。马因国内冶矿采用土法，既无机械设备，又无安全设施，进美国耶鲁大学后，改学经济学[(1)]。该校规定：体育课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时马的身体羸弱，遂在体育教师指导下，每天锻炼身体，冷水擦浴，竟转弱为强。1910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再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修部门经济学。此时国内公费中断，马课余从事码头、餐厅的繁杂劳动，半工半读，1914年底修完学业，获得经济学、哲学双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选作该校大学一年级教材。

1915年初，马寅初婉辞留校在美任教之聘，怀着振兴中华之志，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先在北京政府财政部当职员，深感“官场习俗，非我所愿”，宣称今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挂冠而去。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就任该校经济学教授。1917年兼任该校经济研究所主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传来，马寅初在他主编的

《北京大学校刊》1918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热情歌颂劳动大众。1918年10月，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倡议设立教授评议会，马寅初等被推为评议员，积极推行民主办校。次年初又以得票最多而当选第一任教务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并代表北大与警方交涉，开释被捕学生。在此期间，结识了李大钊等人。

马寅初为了研究国内社会经济，于1920年向北大请假一年，辞去教务长职，南下上海、杭州等地考察。在沪期间，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合作，创办东南大学商学院，后改名为上海商科大学（抗战胜利后又改称上海商学院）。他在上海被聘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并就工商、金融等问题发表演讲及论文数十篇。1921年回京后，他发起组织北大经济学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兼任北京中国银行总行总司券（纸币总发行人）。1923年发起组织“中国经济学社”，被推为社长，出版社刊《经济学专刊》。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马寅初多次撰文，强烈抗议租界当局的暴行，并赞成外资厂商职工的罢工斗争，但反对华资厂商职工的长期罢工、罢市，认为此举非但不能打击帝国主义，反而导致自己受损，且不能持久[(2)]。

1927年3月，奉系军阀盘踞北京，下令撤销北京大学，此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胜利抵达江浙一带。蔡元培离京到杭州，就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代主席，邀请马寅初、蒋梦麟等北大教授南下参加浙江省政府工作，从事地方建设，被称为“北大派”。马寅初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实行禁烟，筹设农民银行。1928年初，嵊县农民上告当地土豪勾结官吏增收田亩附加税四万元，马经查实后，怒斥土豪，追回款项，移作地方教育经费。不久蒋介石任用亲信张静江主浙，“北大派”受排挤，蔡元培等相继离职，马寅初亦重返教育岗位，执教杭州财务学校，并兼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稽核。他从回国至1928年先后发表的二百余篇论文和演讲中，选了一百七十四篇收入《马寅初演讲集》，作为中国经济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间他向国

内介绍了西方各种经济学说，发表了自己研究比较的结论；并对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从理论高度加以阐述和评论。此时他已成为名重中外的著名学者。

1928年10月，蒋介石为了使国民政府增添广揽学者名流的色彩，聘任马寅初为立法委员，次年又聘为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马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经济学教授，后又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和蒋介石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有着深刻的矛盾。在立法院中他始终保持个人的立场，刚直不阿，敢怒敢言，抨击时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马寅初为《交大抗日特刊》撰写序文，并发表《长期抗战之准备》一文，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立即抗战，与日绝交。1932年，蒋介石为了显示“礼贤下士”，奉马为师，请去当面求教有关经济问题，马当面指出蒋“攘外必先安内”向江西革命根据地进攻的不当。1934年冬，物价上涨，国民政府财政部反而大幅度调低外汇比价，陷物价于更大混乱。马寅初在立法院会议上当面严诘财长孔祥熙，舆论亦随之群起而攻之。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怒，责备马的言论“不符合党国利益”。马著文反驳：“鄙人每以党员之地位，对于危害党国，藉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3)] 1935年8月，马寅初在报上揭露外人所办“万国储金会”的骗人黑幕，劝告我国同胞勿再上当，并呼吁当局下令关闭，因而开罪与之有牵连的金融界人物，随后他愤然辞去浙江兴业银行的高薪兼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寅初在庐山座谈会上力主深入动员广大民众，采取有效措施，以期持久抗战。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他经汉口至重庆，途中目睹难民流离失所、颠沛于道的困苦之状，与重庆的达官显宦花天酒地形成鲜明对照，愤怒不已。此时马任中央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课余考察战时经济，发现官僚集团利用权势以抗战为名实行经济垄断，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他痛心

疾首，挺身而出，撰文、演说，口诛笔伐鞭挞豪门，并建议向发国难财者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4)]，直接触及官僚豪门的切身利益。

1939年初，马寅初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蒋介石以马在国内外声望卓著，熟悉美国财界人物，便于争取外援为词，拟派他常驻美国“考察”，欲将其排出国门。马寅初严正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继续到处演说，发表文章。10月在香港《工商日报》撰文指出：“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他建议实行征收半数的资本税，且“必须先自发国难财者之大官始”。12月又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力言：“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快人快语，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引起了社会共鸣，影响极大，陷国民党当局于惊慌之中。蒋介石先派人约马会见，后又许以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的高官厚禄作为利诱，但都为马所拒绝。此时他接到两封匿名信，其一内附派克金笔一支，附言“笔下留情”；另一附有子弹两颗，附言如再攻击“党国要人”，将以手枪对付。马慨然语人：“二万里江山已尽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此区区五尺之躯！”一笑置之，而口诛笔伐发国难财者如故。

在此前后，马寅初在重庆多次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交往，深受影响。1939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清算过去学术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学说不宜于中国”的思想认识，后来他自称这一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的一年[(5)]。

1940年起，在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干预下，重庆各报刊不再刊登马寅初的文章。但他义无反顾，仍凭一腔正义，到处演说，抨击当局，不遗余力。除继续提议开办临时财产税外，针对国民党当局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的状况，发表题为《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的演讲，直指蒋介石“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

家民族”，不是民族英雄，只能算“家族英雄”，指出若要成为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马自知随时都有遭特务毒手的可能，即在这次演讲结束前慷慨陈词：“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6)]

1940年12月6日，国民党当局派出宪兵悍然逮捕马寅初，并将他投入贵州息烽集中营，《中央日报》则发了《马寅初到战地考察经济》的假消息。但真相不久即被揭露，各界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并多方设法营救。重庆大学学生在1941年6月发起一个声援示威性的“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马虽远在息烽狱中，但他威武不屈的气节、大义凛然的正气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称颂，并得到中共的赞扬[(7)]。是年8月马被转押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在周恩来和民主人士的营救以及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马寅初，但旋即将马软禁在重庆歌乐山的住所，并规定马：不准任公职，包括在公立学校任教，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立信会计专校潘序伦以早已发出聘书为由，聘其任教，但不久亦被阻断。马撰文投稿都被退回，陷入“教书不成，投稿无路”的困境。周恩来获悉后，即指示《新华日报》刊用马的稿件，并破例整版一次发表；又经常邀其参加各种座谈会。一次马在会上发言：“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而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则表示：“我宁可头断，也不与他们合作。”“他们越压制我，怕我讲，我越要到处讲。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嘛！”[(8)] 在此期间，他写作了《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等著作出版发行。

1944年12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人身自由。四年的监禁，使他深感“欲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必先解决政治问题，但欲解决政治问题，非换汤不换药的局部改组所能奏效。彻底的改革，实有必要”[(9)]。凭着铮铮铁骨，冒着再度被捕的危险，他除在经济上继续抨击国民党当局搜刮

民财、“劫收”贪污，提出“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是年底，在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上，他直指国民党当局“其不肖者，当存亡危急之秋，大刮民财，大事囤积居奇，狼肺狗心，可恨亦可杀”[(10)]。

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马寅初是民主运动的勇士。从1946年1月起，他在重庆、杭州、上海等地多次上街与青年学生一起，参加风起云涌的反蒋示威游行，昂首挺胸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并表示“凡是学生们伸张正义的游行我都参加”。1946年2月，他离渝东归，在杭州的五个月中应青年学生之邀，作了十多次抨击政府当局的演讲。7月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之聘，到沪受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1947年南京发生血腥镇压学生的“五二〇”惨案后，5月23日他贴出布告，响应上海学联号召罢教一天。次日约定郭沫若、施复亮等人到南京探望受伤学生，并拟分头去各大学演讲。国民党当局闻讯如临大敌，派出特务，扬言马如去学校，要他“来得去不得”。面对威胁，马毫不动摇，预立遗嘱毅然去中央大学演讲，揭露中国豪门资本在美国存款达二十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属于四大家族，引起学生极大愤慨。讲毕在学生们护卫下，特务无从下手，安然而返。1948年初冬的深夜，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搜捕，被住校的马寅初严词斥走，此时他已被列入黑名单。是年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化装成厨师，避过特务监视，取道香港，安抵华北解放区。

1949年8月，马寅初出任浙江大学校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5月调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连续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并任政协第一至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他为解放后的制止通货膨胀、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等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1953年6月，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人口已由解放前的四亿七千万发展到六亿多，引起马寅初的重视。早在20年代，他曾撰文谈及我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弊病。1954年至1955年他三次赴浙江视察，深入农村，走访农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浙江小组代表会上，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的问题。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发表了计划生育的见解，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将控制人口的材料整理成文后，作为一项正式提案，提交大会；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系统论述了我国人口增长过速，将影响生产建设、资金积累、劳动就业、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必须加以控制，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他深谋远虑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被有些人曲解，甚至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报上发表了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继之有人竟拟划马为右派分子，周恩来闻讯坚决加以制止。1958年2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五次会上对《新人口论》作了补充。但5月陈伯达在北大六十周年校庆会上，突然点名要马寅初作“检讨”。7月，康生到北大作报告时，竟蔑视在旁的校长马寅初，向师生暗示：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在陈、康的直接插手下，九千多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北大校园和马在燕南园的住所，许多报刊也纷纷刊出难以计数的批判文章。马寅初坚持真理，在《新建设》等报刊上连续撰文说理反驳。次年压力更大，好心的友人关切地劝他做些检查，但是他明白表示：“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1960年初，马寅初上书坦率陈词：学习毛泽东著作要防止个人崇拜。是年他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展开争辩。由于该文在报上刊出时，被康生加上一篇编者按语，因而招来了更多的批判和攻击，北京大学连续召开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大会小会，剥夺了他申辩的权利。此时他已无法执行校

长职务，愤然辞职。

马寅初辞职回家后并不消沉，曾去家乡继续调查人口问题。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女儿说："我已是八十开外的人了……我叹息我的观点、我的主张明明是真理，却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那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的大事呀！个人受批判、罢官免职算得什么，要紧的是不能无视我国人口盲目地增长，否则那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一大难题了。"[(11)] 此后他着手编写《农书》，准备总结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的经验传之后世。1966年"文革"开始，马寅初撰写的《农书》数十万字手稿被作为"四旧"付之一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计划生育已经定为基本国策。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任命他为北大名誉校长。1980年他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1年2月，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他被推为名誉会长。6月，祝贺他百岁寿辰的庆贺会，在他曾任教的各地大学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出版了《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重庆大学修复了已经倒塌的"寅初亭"。10月，亚洲议员和人口发展会议在北京召开，他担任中国代表团名誉顾问。会议向他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表彰信，使他深感欣慰。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病逝。

马寅初的重要著作有：《纽约市的财政》（纽约1914年）、《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通货新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财政出版社1958年，1980年重版）；他的演讲和论文先后汇编有：《马寅初演讲集》第一、二集（商务印书馆1923、1925年）、第三集（京华印书局1926年）、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以及《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2年）、《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1945年）、《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财政出版社1981

年）、《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等。

---

(1) 马寅初1947年在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曾向同学（包括笔者）自述学历。并参阅邓加荣《马寅初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2) 1925年6月13日发表《上海不宜继续罢市》，《上海总商会月报》第5卷第6号时论栏；又7月发表《总罢市、总罢工之足以自杀》，《现代评论》第2卷第28期。

(3) 《武汉日报》1935年2月3日。

(4) 《论战时过分利得税》，重庆《经济动员》第8号（1938年11月）。

(5) 马寅初在1960年《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自述："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是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刊于《新建设》1960年第1期。

(6) 马寅初在重庆大学经济研究社的演讲词（1940年11月24日），《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1945年版。

(7) 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联名赠送的红绸寿联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华日报》送的贺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8) 朱正直等：《平生疾腐恶，人民同呼吸——马寅初的百年岁月》（二），《中国企业家》1986年第3期，第59页。

(9) 马寅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商务日报》1946年5月21日。

(10) 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1944年12月22日在重庆工商界星五聚餐会上演讲词），《民主与科学》1945年第1卷第1号。

(11) 邓加荣：《马寅初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马应彪

熊尚厚

马应彪，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其父马在明靠种田和捕鱼为生，家境贫困。马应彪少年时与弟马焕彪跟随乡亲远渡重洋，前往澳洲雪梨（今译悉尼）谋生。初时在果菜店当杂工，后来自己设摊，做水果蔬菜杂货买卖，数年间获利颇厚。

1891年，马应彪与人合股开设永生公司扩大营业，三年间在经营方面增长了许多知识。他见西欧来的侨商开设大型百货公司，职工数以千计，营业发达，遂决心回国如法炮制。1894年回到香港，开设永昌泰金山庄，经销进出口货物。那时，香港和内地的商店仅售两三种商品，沿袭旧习讨价还价，于买卖双方都十分不便。马乃倡议创办以“不二价”相号召之百货商店，经过多方联络，说服许多友人，卒得澳洲华侨蔡兴、马永烁、郭标、马祖容，美洲华侨林敏良、郑干生及香港的李月林、王庆昌、黄在朝等人赞助，筹集资本二万五千元组成股份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购置铺面。为使顾客确信其买卖“完全公平”、“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马提议取《中庸》的“君子诚之为贵”之意，定英文Sincere（诚笃）之中文译音“先施”为商店的名称。马应彪被推为正司理（即经理）、李月林任副司理。1900年1月8日，香港先施百货公司正式开业，有职工二十五人，是为我国华商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的先施公司，在我国和远东最先树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型商业的模式。他力图扫除我国商人历代相传买卖讨价还价的旧习，实行买卖不二价；首倡以妇女任营业员；又因马应彪为基督教徒，职工亦参加礼拜，故星期日停业休息。由于种种革新办法均属首创，开办伊始即毁誉参半。部分股东提出非议，谓星期日休业徒耗

时日，录用女营业员有伤风化。是年8月又遭台风，公司二、三楼被吹塌。多数股东主张歇业，马力主革新，坚持开办，说服众股东不要中途拆伙。翌年，先施公司榜标的“不二价”逐渐取得信誉，“明码实价”为广大顾客所欢迎，营业额日增，盈利渐丰，遂取得众股东的信赖，仍由马应彪主管营业。他重建铺面，扩大规模，于1904年再加改革，除营业员取消妇女全用男子外，还在公司内先后设立德育部、智育部、惠爱会等，培养和训练职工，提高其经营和服务水平，使营业更有起色。年终股东分得一笔股息，遂再无歇业之议。此后营业更加发达，年终除分股息外，至1907年尚有盈余九万元。嗣后，马应彪提议将先施公司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获众股东赞同，马被推举为公司正监督兼司理。

1909年2月，先施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资本额增至港币二十二万元。马应彪勇于开拓，又于香港德辅道与康乐道通联处之四层楼设置货场，规模宏大。初以其地处新区，商店寥寥无几，电车初设，行人稀疏。有人颇为担心，但马认为新区发展前途很大。不一年时间，附近大商店纷纷崛起，游人日夜熙攘，马遂将先施之门面重新装潢，货物陈列璀璨夺目，数年间获利倍增。

马应彪着手改组先施公司时，即计划筹办广州分行。1910年经董事会决议，集资港币四十万元在广州长堤大马路购地六亩建筑五层大楼。1912年大楼建成，6月正式营业，以马祖金为首任司理。除经营环球百货外，更在楼顶辟有先施游乐场，设茶室、酒菜部、照相部、理发室、电影院及剧场等，供顾客游乐。1914年再增设备华丽的东亚大酒店，附设酒吧、餐厅。此外，为了广辟货源和降低商品成本，又先后兴办了化妆品、汽水、皮革、制鞋、饼干等十个工厂，工人逾千；并于市区设立支店两所。广州分行资本扩大至一百二十万元，正式向香港当局注册，获利颇厚。

接着，马应彪等筹谋在全国最发达的大商埠上海，开办大型百货公司，乃于1914年集资港币六十万元，仍向香港当局注册，沿用先施

之名，在上海闹市区南京路择地十余亩，建造五层大楼（当时上海楼房最高仅三层）。次年，因建筑工程浩大，又增资至一百二十万元；及1917年10月公司开业时，更增资至二百万元。董事会举马应彪任董事长兼监督，由黄焕南任司理。上海先施公司继续坚持“不二价”，以“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为广告招徕顾客；并且仿效广州，除有规模宏大的百货商场外，也在楼顶辟“先施乐园”供人游乐；还附设东亚旅店、东亚酒楼。为了自制有特色的商品，赚取更多的利润，又设立工厂，所出产品不仅有中西家具、儿童玩具、保险柜等，且有车床、钻床，还承包修建工程，有职工三百余人。上海先施公司后来居上，营业状况优于港、粤，亦为当时上海和全国百货公司之冠。英商在上海开办的两家最大的百货商店惠罗公司、福利公司顿即被挫，降成第二流商店。其后虽有新新、大新、永安等公司异军突起，但先施一直跻身于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列。

马应彪在向广州、上海扩展业务时，对于港行的经营和扩充仍十分尽力。1913年港行资本增加到八十万元，于香港德辅道通连永和道、康乐道地区，又建筑六层大楼为新址。1916年再增资本至二百万元。1917年1月新厦落成，门面宏丽，货场宽敞，中西货品陈设缤纷，屋顶亦辟有天台乐园，设酒菜、茶点和演唱、杂耍供人游乐，顾客如云，为港岛游乐场地之一。

先施拥有港、穗、沪三大公司，规模之大为国内首屈一指。但三行仅为联号，其财权、人事均各自独立，殊感窒碍。1918年，马应彪倡议三行统一，得沪、穗两地董事同意，三方开股东大会决定共同成立先施总行。资本额为港币七百万元，以香港为总行，设董事会领导全公司业务，沪、穗两地为分行，各设参事会辅助经营业务。翌年1月16日，总行正式成立，马应彪任总监督，陈少霞为总司理。先施公司统一后，资本雄厚，事权统一，金融互通，人才调用，货物联合采办，商品合一营销，营业更臻发达。至1927年，即拥有职员二千，工人数千。

马应彪主持先施公司，在扩大经销中西百货的同时，还先后创办化妆品制造业、保险业及银行业，以扩展其经营范围。先是1915年5月，马提议港、穗、沪三公司各投资四十万元，筹办先施保险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专营水火保险、股份产业买卖及汇兑业务，举蔡兴为总司理。7月开业后，营业发达，遂相继在天津、上海、广州、石岐、江门、梧州、福州、汉口及新加坡、暹罗（泰国）、越南等地设分公司。1921年，马应彪与汤信、蔡兴等发起创立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资本额为港币二百万元，后增至五百万元，马任董事兼监督。1922年春，马应彪等以先施穗行化妆品厂为基础，于香港设立化妆品制造总厂，生产花露水、生发油、雪花膏及牙粉等产品。1926年该厂资本额增至一百三十万元，改组为独立公司，相继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昌、重庆、奉天、哈尔滨及新加坡、吉隆坡、柔佛、槟城等地设庄，有代理店数百家，于上海设制造分厂，成为我国民族资本化妆品制造业之巨擘。1922年11月，马应彪又与董事会商定，投资港币二百万元，创设先施人寿保险公司，以林瑞书为总司理。因系新兴事业，一时无人问津，马等以“储蓄保寿”为号召，营业渐有进展。三年间营业范围扩大，先后在上海、天津、广州、石岐设分局，于南京、南昌、九江、宁波、汕头、江门、澳门、福州、汉口、济南等地设代理处；并在海外华侨中广为宣传，使其有效保险额增至八百万元。

马应彪创办和经营先施成功，成为国内及海外华侨中的著名商业资本家。他热心教育事业，曾任岭南大学、世光女校等校董。他与社会名流时相过从，1921年参加竞选香山县长，结果难以与吴铁城匹敌而落选。

马应彪在先施公司有极高声誉，因其年近花甲，所任总监督一职于1921年交蔡兴接任，在1921年至1927年间任总公司名誉总监督。1928年，马为了重振因“沙基惨案”受英帝封锁而使港、穗两行营业萎缩之局面，再次出任总监督。他将公司历年积余，除照常派发股息及

红利外，另加派红股，每十股分派三股，再由股东加认新股九千股，翌年使总公司资本额增至港币一千万元。1930年再次扩建总行，次年于香港增设总务局，聘蔡兴、马永烁、郑千生、王国璇为顾问，推行其营业新计划。如开设“一元货商店”，将残次和积压商品廉价搭配成价值一元一包，任顾客选购；又如举办国货展览、时装表演、教育展览等，在香港别开生面。马还对先施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及人事大加改革；在营业方面则扩大招徕，因之业务蒸蒸日上，有效保险额超过二千万元。1932年又于澳门筹建先施分行及东亚酒店，兴建八层大楼，为濠江最大的百货店和餐馆，于1935年9月建成开幕。澳行除经营百货、餐馆外，还兼营银业、信托、保险、人寿联保等业，盛极一时。

正当马应彪重振先施卓有成效之际，香港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发生金融风潮，市面挤兑，银根吃紧，先施银业信托公司首先受到冲击。1935年9月，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一度停业；香港总行及澳门分行随遭袭击，营业萧条。此次风潮使先施公司营业损失甚巨，其后虽得英商汇丰银行借款暂渡难关，但马应彪重振营业的愿望则因之夭折。1936年，他再次辞去总监督职，仍任名誉总监督，退休养老。

1944年7月15日，马应彪病逝于香港。

主要参考资料

《商界名人传——马应彪先生》，上海《商业杂志》1927年第2卷5号。

《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5年版。

《一九七五年香港先施公司钻喜纪念册》，1975年版。

孙碧奇：《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沧桑》，台北《传记文学》第32

卷第6期。

马约翰

王维屏　黄延复

马约翰，1882年10月10日（清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与其兄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在亲友资助下，十三岁进私塾读书，十八岁到上海读中学，二十二岁考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于1911年毕业。

马约翰从小喜爱运动，进私塾读书以前，整天和同伴们爬山、游泳，身体很健壮。在大学读书期间，酷爱体育运动，成绩优异，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等各种代表队的主力队员。尤长于中、短距离赛跑，曾获全校冠军，并多次在校外比赛中取得优胜。1905年，他参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一英里竞赛。在落后于日本选手十码的情况下开始冲刺，最后以领先五十码的距离冲破终点线取得优胜。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约翰，中国”的欢呼声，赞扬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从此，他成为上海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

由于马约翰具有出色的运动才能，1914年被清华学校选聘为体育帮教。从这时起，到1966年逝世时止，他一直在清华工作了五十二年，由助教而教授而体育部主任，终生为体育教育事业服务。

他在清华致力于体育普及工作。除上体育课外，还说服学生参加学校规定的每天下午4时到5时的体育锻炼。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每天下午走上操场，到学生中去，以身作则和学生一起锻炼，并在锻炼方法上随时给予指导。他在清华坚持实行“体格检查”和“体能测验”等项措施和制度。严格的规章制度加上广泛深入的说服动员，使清华的体育运动得到比较广泛的开展。他还倡导正确的竞赛思想，提出“球可输，体育道德不能输”，“对外比赛不必先把输赢放在心上，只希望把

我们的技术全部施展出去”。1928年底，他率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冬季球类比赛。在争夺冠军的决赛中，清华主力中锋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昏，全场哗然。许多队员主张“罢踢”，马约翰力息风波，换人继续比赛，结果虽然输了这场球，却赢得全场观众的赞扬。

马约翰十分关心祖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师资的培养。1928年前后，他和郝更生、徐国祥等一起，利用清华较为完善的体育设备和器材，几次创办“暑期体育学校”，自任主任，聘请国内体育界名流张汇兰、董守义、高梓、许明辉等任教，为提高我国早期体育师资业务水平和祖国体育事业的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马约翰学习和总结了外国的经验，根据田径和球类等项运动的训练特点，创造出徒手操的编组方法和拉力器的训练方法。早期的清华学校先后成立了足球、篮球、网球、曲棍球、棒球、垒球、田径、滑冰等十多种代表队。在他担任教练或指导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校外的比赛中，也多次名列前茅。

1919至1920年，马约翰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到美国春田大学进修体育。结业时用英文写了《我对西方体育的十四年经验》一文，概述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发展情况。1925—1926年，他再次利用休假时间到春田大学进修。结业时用英文写了《体育的迁移价值》的硕士论文，论述体育对全面培养人的教育作用，是该校1926年度主要硕士论文之一。

马约翰经常参加全国和国际性体育竞赛的指导和组织工作。1919年第四次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他是奥林匹克代表队选拔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27年，第八次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他任田径委员会的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会的委员。1930年，他担任参加预定于193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九次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他担任中国田径代表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他在

欧洲一些国家进行考察，并做了考察记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他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犹积极设法开展体育活动。

马约翰虽怀有“谁能发展体育事业我就拥护谁”的“超政治”观点，但他不趋炎附势。1943年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聘请他担任政治色彩很浓厚的“江津体育专科学校”校长，他严词拒绝。

马约翰对体育理论研究也很重视。早在1926年，他就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中系统地探索了体育不但对于人的肌体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价值”，而且能“迁移”到人们的心理、道德、品格以及精神等方面去，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他于1950年发表了《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体育的科学基础，运动对生理的影响，技能的训练方法以及体育和生物学、心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

“运动是健康的泉源。”这是他早在20年代就提出来的论断。1954年，他发表了《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一文，用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再次强调了这一论断。

早在40年代初，马约翰就打破常规，主张用运动来治疗某些在当时被认为只能“卧床静养”的慢性病，是“体育疗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1952年，他主动和校医院大夫配合，对校内一大批患各种结核病的师生进行“体育疗法”，取得了成效。

马约翰身体力行，终生坚持锻炼，身体非常健康。酷暑，他在烈日下连续活动几个小时不头晕，不中暑；冬天，他从不穿棉衣。他六十岁时还和青年教师进行激烈的室内手球比赛，七十六岁时和一位中年教师合作争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是七十六岁老人达到一级运动

员标准的第一人。年逾八十时，鹤发童颜，仍然生气勃勃地照常工作，被誉为“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

马约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任、主任和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任。1957年，他以七十五岁高龄率代表团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体育运动会，任团长。第一、二届全国运动会都由他担任总裁判。1964年，清华师生曾聚会祝贺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五十周年。

1966年10月31日，马约翰因病在北京逝世。

马占山

陈宁生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1885年11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辽宁怀德（今属吉林）。父亲务农，家境贫寒。马占山稍长，即为地主放马。1903年，因放牧时丢失地主家的一匹马，被迫逃亡在外，沦为胡匪。他好骑射，枪法娴熟，后为官军收编。1905年由怀德县衙门游击委为哨官。

1911年，马占山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陞，充任四营中哨哨长。1913年，吴部改为中央骑兵第二旅，马充任三团二连连长。1918年，因剿匪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赴黑龙江省，升任骑兵团团长，驻防黑省东部。1925年，升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吴俊陞被日军炸毙。17日，张学良任命第八军军长，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不久，马被任命为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同年冬马占山改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10月，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日本侵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吉两省，进而侵入黑龙江。日军以大批军械武装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唆使他进攻齐齐哈尔。此时，担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万福麟正在北平，当地群龙无首，人心慌乱，形势危急。万福麟为了卸却责任，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10月10日任命正式发布，13日，张海鹏派其少将徐景隆率伪军三个团沿洮昂路（洮南至昂昂溪）向江桥（嫩江铁桥）进犯。16日拂晓，进抵江桥南端，当即遭到军署卫队团徐宝珍部的坚决阻击，

伪军被击溃，徐景隆被击毙。日军利用张海鹏部进窥黑龙江的企图受挫。

19日，马占山经由哈尔滨抵达齐齐哈尔，次日宣布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职。在爱国军民抗日热情的鼓舞下，马占山当众宣称："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1) 并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亲自视察防地，进行布防，准备抵御敌人的袭击。此时，以劣绅赵仲仁为代表的亲日派企图劝马向日军投降，迎张海鹏入省。马坚决拒绝，并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2)

27日，日本关东军以所谓洮昂路系用满铁借款修筑，日方负有护桥责任为借口，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并保证日方修桥人员的安全，当即遭到马占山的拒绝。

11月4日晨，在七架飞机掩护下，一千三百余名日军以保护修桥为名，直趋江桥我军驻地大兴站，驱赶我方修桥人员，迫令守军后撤，并强行抓去我方哨兵三名。是日午间，又悍然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抵抗，我方将士立即英勇战斗，迅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江桥抗战，也是中国军队不顾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奋起抗战的先声。

江桥首战告捷后，我军士气大振，马占山当即赶赴前线犒赏官兵，阵地上同仇敌忾，守土卫国的气氛十分热烈。

日军进攻受阻，乃于5日晨尽驱张海鹏部打头阵，日军殿后，复向我方阵地发起进攻。我方将士奋勇抵抗，激战竟日，坚守阵地。6日晨，日军自为前锋，向我军发动总攻。马占山亲赴前线督战，双方在江桥进行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敌飞机大炮向我阵地轮番轰击，阵地难以坚守，马遂下令退守大兴站以北的三间房阵地。

日军一面依仗军事优势步步进逼，一面又采取政治攻势，多次电

迫马占山辞职下野。对此，马向全国民众保证："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于异族。"[3] 同时明令本省大小文武官吏，不问客籍省籍，一律不得擅离职守。

12日，日军将朝鲜驻屯军的多门第二师团铃木旅团调至江桥，再次发动进攻。16日，更向我阵地全线猛攻。至18日，我部队伤亡很重，又无援军。马占山不得不下令全军退出齐齐哈尔，沿齐克路（齐齐哈尔至克山）撤退。日军遂于19日占领齐齐哈尔。

在国民党将领一片恐日声中，马占山敢于奋起抗战，深受全国人民的称赞。各地人士纷纷发来函电，赞扬他"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国民之表率"[4]。各地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支援黑龙江抗战。上海、哈尔滨等市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组织了"援马抗日团"，赶赴黑龙江。

21日，马占山在海伦县设立省政府，将队伍分驻于克山、拜泉等处，积极整顿军备，编练新军，军民爱国热情十分高涨。12月，马占山经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和政治中心后，纠合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亲日派，策划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他们认为马占山拥有实力，如能使之就范，较张海鹏、张景惠之流更为得力。于是，不断对马进行诱降活动。还在江桥抗战时，溥仪就以封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作诱饵，劝其归顺日本。及马占山退至海伦，汉奸、特务更是接踵而来，劝马停止抗日。之后，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的身份，亲自出面，向马占山提出，只要变更抗日举动，仍将黑省军权交授于马。本来，马占山的抗日，一方面是由于爱国军民的推动，另一方面是为报答上司的"知遇之恩"，思想并不十分坚定。此时，由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在一群汉奸、卖国贼的怂恿下，幻想以妥协投降求得苟安。1932年2日28日，马重返齐齐哈

尔，就任伪黑龙江省长。3月8日，赴长春迎接溥仪。9日，参加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典，并当了伪满的军政部长。

马占山的背叛行为激怒了全国民众，爱国群众团体纷纷向马索还捐款，上海烟商愤怒地停止出售“马占山牌”香烟；他的部属中坚决抗日的军官如苑崇谷、金奎璧、徐宝珍等均不辞而去；黑河驻军、马占山的卫队和学生军等甚至抄了他的家。其实，日本侵略者也只不过视马占山为傀儡，对其防范甚严，控制很紧。在马占山就任伪省长的次日，日方即发出公函，要求马对黑龙江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做主，凡是重要法令、规章制度、用人、预算等事项，必须取得日本顾问同意始能实行。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方进而要求各省设立之总务、警务两厅长必须由日本人充任。马对这些要求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迟迟不予照办。为此，日本顾问大为不满，迭次提出要挟。马占山甚感日本主子咄咄逼人，难以自存。同时，日方还要求编遣他的军队，又传闻日方将追查他在江桥抗战时所领军费和所得捐款的下落。马占山处此名誉、地位、权力、财产均将失去的境况下，疑惧交织、惶惑不安、遂起反正之心。适在此时，张学良派前黑龙江省税捐局长韩立如潜回齐齐哈尔，劝说马占山反正，并许仍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遂下决心挣脱日方羁绊，3月底，马占山抓住国联调查团到东北的时机，一面向调查团揭露伪满内幕，暴露日本侵略者的无耻嘴脸；一面秘密布置军事行动，准备再战。4月1日，他带领亲信随从二百余人离开齐齐哈尔。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再揭抗日旗帜。

马占山随即联合吉林的李杜、丁超，海拉尔的苏炳文，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设总司令部于哈尔滨，自称总司令；又传令各县组织义勇军，集中于黑龙江东部各县，配合作战。初期，抗日联合军转战于黑、吉北部铁路线上，与日伪军相周旋，虽间或取得小胜，但由于指挥不统一，力量分散，不能有效地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7月中旬被迫离开铁路沿线，退入山林作战。28日，马占山率部至庆城罗圈店南森林附近，遭日军伏击，伤亡惨重。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时

被日军射杀，血肉模糊，日军误认为马之尸体，立即拍照登报，大肆宣传。马于混战中率卫队四五十人向东奔入大山，辗转四十余日，至9月9日始出山至龙门。接着奔赴讷河，设立义勇军总指导部，筹组三路义勇军围攻省城。10月20日，马占山发出总攻命令，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各路义勇军终因势单力弱，于11月28日退至拜泉。12月1日撤离拜泉。4日，苏炳文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7日，马占山亦相继退入苏境。

马占山、苏炳文一行在游历了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后，于1933年6月6日，经香港回到上海。蒋介石对马明捧暗压，表面上责成国民党中常会于23日委任马占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对马占山统率东北义勇军继续抗日的要求，置之不理。马占山在南京、上海作短期逗留后，即北上寓居天津英租界。

马占山在天津闲居期间，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栗又文等交往甚密。在共产党员孙达生等人的影响下，曾承诺联络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马占山由沪去西安，赞助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上联署。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派兵进逼西安，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防。马占山表示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从中斡旋，不使双方发生冲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5)]，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8月，马在大同正式成立司令部。不久大同失守，司令部移至丰镇。9月，日军沿平绥线进犯。晋绥骑兵司令赵承绶和绥远国民兵司令袁庆曾守绥远，但两部在敌人尚未攻击归绥（今呼和浩特）东部要塞卓资山之前，即相偕离去。绥局顿时混乱，马占山等部苦战绥东，孤军无援。9月12日，敌进占兴和，袭击孤山车站，经马占山挺进军之冲杀，将敌人逐出绥境。随后，马率部布防于归绥城东大黑河一线。10月13日，马部被敌军三面包围，仍奋勇抵

抗。激战至下午5时，马占山险被敌擒，遂放弃绥垣，退至包头。16日，包头陷落。马部退守五原。

1938年初，敌伪拟在东胜成立自治政府，于3月初分三路包围挺进军。马占山亲率所部，以夜袭方式于16日进占河口镇，又于17日晚克复托克托县城，乘胜击退三路来犯之敌。4月1日，马部由高隆渡口渡河，进至绥北敌之后方。中旬，敌伪军将挺进军四面包围于大青山，鏖战七八昼夜。20日夜，马部突围至固阳黄油干子。22日与敌遭遇，骑六师师长刘桂五阵亡，马占山率余部转至安北。5月中旬，总部移至陕西府谷县哈拉寨镇。

马占山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委曾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东北大学学生参加挺进军。共产党员邹大鹏任挺进军司令部中校军械官，栗又文任上校秘书主任。他们帮助马占山抵制国民党特务刘广英制造的反共摩擦罪恶活动。

1940年5月3日，重庆国民政府命令改组辽、吉、黑、热四省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41年8月4日，黑龙江省政府在陕西榆林成立。此后，马以黑龙江省政主席的身份进行抗日复土活动。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马占山被任为委员。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两个骑兵旅在楚溪春统率下为蒋介石死守大同，并于9月21日突围至得胜堡与傅作义部会师，接着又进攻张家口。9月23日，马占山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公开表示将他的两个骑兵旅交由傅作义指挥。

国民党为了利用马占山收编胡匪、扰乱东北解放区，又任命马占山为松北挺进军司令，但马长期避居北平未去长春就职。军统特务机

关借用马的名义滥发委任状，收编胡匪，进行所谓策反活动。

1948年底，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形势下，马占山认识到和平解放北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愿意为此进行工作。北平中共地下党通过马占山，邀请邓宝珊来北平，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上旬，马、邓、傅三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号召，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11月29日，因患肺癌去世。

---

(1) 徐棻编：《马占山将军抗日战》，北平中北印刷厂1933年版，第10页。

(2) 《申报》1931年11月18日。

(3) 徐棻编：《马占山将军抗日战》，第10页。

(4) 徐棻编：《马占山将军抗日战》，第10页。

(5) 属第二战区，1944年后属第八战区。

马宗汉

史月廷

马宗汉，乳名纯昌，字子畦[1]，别号宗汉子，浙江余姚浒山马家路（现慈溪县）人，生于1884年3月30日（清光绪十年三月初四）。父马云骧，为附贡生，在当地开米店。马宗汉十五岁到余姚姚江达善学堂读书[2]。他喜爱诗词，闻诵岳飞《满江红》词后，曾自誓说："长大亦当如是。"其后阅读史传，尤多感慨。他在《己亥课程》中写的一首七言绝句道："世上英雄原不亏，雄才亦许常人为；如吾夙负平生志，当使声名千古垂。"[3]在达善学堂，马宗汉结识了几个具有民族思想的少年，纵谈国事，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己任。平时，他除学习国文课外，又学习英文，能阅览英文书报，从中了解国际大事。

马宗汉从达善学堂卒业后，于1902年进入浙江大学堂学习[4]，1904年勉从父亲意见，应科试入县学。举业非所素愿，不久就回到家乡，先后在润德学堂和三山学堂任教。执教期间，经常以"亡国之痛，异族之祸"相督教，学生们为之悲愤泣下。

1905年秋，马宗汉与陈伯平相识，旋即参加了光复会[5]。1906年1月，他随陈伯平去日本。在东渡船中，又结识了徐锡麟。到日本后，马宗汉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预备科，在此期间，他进一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毅然剪去辫子，暗中寻求革命志士。

在日本不到半年，马宗汉同徐锡麟、陈伯平等人一起回国。归国途中，三人对今后的革命工作做了初步的设想[6]。马宗汉回国后，在家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着力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7]。通过徐锡麟的介绍，马宗汉又认识了秋瑾。从此，他和秋瑾不时来往，

以磋商革命事宜[8]。

马宗汉在家乡时，光复会一同志曾写信劝他再去日本，他谢绝了这个邀请，认为革命的“实行必须（在）内地，他国究非用武之地，不过暂时寄迹、预备学问而已”。他在回信中还明确表示，对于革命，“我辈宗旨已定，自然坚持到底，死而后已，不以他人而怀贰也”[9]。

当时，清廷下诏实行预备立宪，企图用欺骗手段缓和革命风潮，马宗汉著文揭露了清政府的阴谋。

同年12月，徐锡麟以道员出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获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徐锡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与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遥相呼应，并相约皖、浙同时起事。陈伯平几次往来于皖、浙之间，为之联络。起义规划拟定以后，徐锡麟写信给马宗汉，促其去安庆；马因祖父去世未久和路费不及筹措，一时难以起程。

1907年春，徐锡麟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会办，后又任陆军小学监督。他再次要马宗汉去安庆。5月18日，马宗汉借赴上海参加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之机会，前往安庆。临行前，他给家乡诸挚友写了绝命书，并嘱妻子说：“吾此行无论事成与否，必难生还，然求仁得仁，固吾素志，无庸为我悲也。二子其善视之，异日成人，嘱其毋忘乃父之志。”[10] 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牺牲精神。他经上海，与陈伯平同行去安庆，住在徐锡麟寓所，紧张地投入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6月22日，马宗汉和陈伯平奉徐锡麟之命再去上海，购买手枪与印字机等物；同时约秋瑾在上海会晤，互通消息。

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等原定7月8日巡警学堂甲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请安徽巡抚以下大员莅校观礼，以便一网打尽，然后直下南京，大举起事。为此，他们通知外地会党前来支援。不料恩铭事前

已微有所闻，命将典礼提前两天举行，致使外地会党无法及时赶到。

7月5日，陈伯平和马宗汉从上海购运手枪等物回到安庆。徐锡麟立即同他们密商，决定提前至次日起事，先刺恩铭，派人守住校门，断绝政府官员退路，以尽诛诸大员；然后率领巡警学堂毕业生占领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及督练公所等，争取起义的成功。他们估计，军队中有不少忠诚之士，举事后会起来响应。

7月6日一早，陈伯平和马宗汉从徐寓径赴巡警学堂。八时许，恩铭及文武官员到达警校礼堂就座，随员排列两旁。徐锡麟率领教习等站立阶前，陈伯平和马宗汉立于堂侧。徐锡麟抢步上前行举手礼，随呈学生名册于案上，大声说："回大帅，今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正惊恐间，陈伯平上前向恩铭猛投一炸弹，未爆发。徐锡麟立即拔出两支手枪，连续向恩铭射击；陈伯平和马宗汉也拔枪射恩铭。恩铭身中七弹，由部下抢走后，当天毙命。先是，徐锡麟命巡警处收支委员顾松守住校门，但顾松拒不执行，致使文武官员得以逃脱。当顾松乘机逃跑时，被马宗汉抓住。徐锡麟怒斥奸细顾松，连劈数刀，不死，马宗汉随即举枪将其击毙。紧接着，徐锡麟号令警校学生取枪站队，自己领先，马宗汉居中，陈伯平在后，急奔军械所。占领军械所后，徐锡麟命陈伯平把守前门，马宗汉守卫后门。不久清兵蜂拥而至，团团包围了军械所。马宗汉眼看情况紧急，向徐锡麟提议："事已无成，不若焚此军械所，与清兵同尽。"徐锡麟制止说："徒死无益，亟去犹可为后图。"在搏战中，陈伯平英勇战死，徐锡麟不幸被俘，马宗汉爬墙逃出后，至半途亦为清兵所捕。

马宗汉被捕后假称黄福，企望获释后再起革命，后被清政府查出，投进安庆监狱。他被囚五十天，经受了严刑逼供，但清政府得不到一个人名[(11)]。8月24日，马宗汉在安庆监狱门前被害，年仅二十四岁。

辛亥革命后，人们将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三烈士的遗体合葬

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并树碑立传，供后人瞻仰。

---

(1) 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和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作“子贻”，误。

(2) 马纯昌：《己亥课程》（手迹），余姚梨洲文献馆藏。

(3) 马纯昌：《己亥课程》（手迹），余姚梨洲文献馆藏。

(4) 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5) 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页。

(6) 姜枝先：《马宗汉烈士传补遗》（手稿）。

(7) 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59页。

(8) 据马宗汉烈士家属说，秋瑾曾几次去浒山马家路，同马宗汉密谈。

(9) 《马宗汉遗札一》，《浙东三烈集》，绍兴鲁迅纪念馆藏，第40—41页。又见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10) 马燮钧：《马宗汉》（1943年7月7日），罗家伦主编《革命人物志》第4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版，第134页。

(11) 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181页。

毛健吾

王淮水

毛健吾，原名礼键，字剑夫、剑舞，江西吉安人，1905年6月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四）生。父亲毛叙轩是清末秀才，教私塾为生。毛健吾幼年务农，暇余随父就读，二十岁时考入江西省第七师范学校。

1926年秋，毛健吾转入江西省第五师范继续学习。适逢北伐高潮，他投笔从戎，于同年12月在南昌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二师第五团特务连任上士文书，并参加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发现毛的字写得不错，又是小同乡，调毛到师部工作。1927年12月，由刘峙出资并保送入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班，后改称为中央党务学校。该校公开宣称："本校为本党最高学府，受命作育政治干部人才"，蒋介石兼任校长，实权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毛与二陈从此有了师生关系。1928年6月，他以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离校，由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陈立夫先派到江西省党部工作，继调任江苏省嘉定县党部书记长；1933年3月他被派任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书记长，辞未到职；1934年，调到胶济铁路特别党部任委员兼书记长。1935年，刘峙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以同乡和旧部关系，将毛健吾调去任上校党务科长，兼任河南和平通讯社社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开始，刘峙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征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决定在华北前线出一张报纸，派毛健吾负责筹办。11月9日，《大刚报》在郑州创刊，毛任社长。"大刚"二字，源自《孟子》，取其至大至刚之意。他办报缺乏经验，事事从模仿《大公报》入手。《大公报》重视言论，他请侯桐、毛礼锐两位教授负责撰写社论；《大公报》的战地

通讯深受读者欢迎，他就聘请李蕤、田涛等青年作家担任战地记者。《大刚报》行销冀、鲁、豫诸省，及时传播抗战消息。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之下，华北和东南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8月，《大刚报》刚从郑州撤退到信阳，惊魂甫定，信阳又将弃守，刘峙表示不再过问报社的事。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周佛海来电："已无他迁之必要，着令停刊。"没有了后台老板，经费无着，报纸还办不办？毛健吾连夜召开会议，与职工商量，最后共同决定：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报社迁往湖南衡阳，愿者同去，不愿者各奔前程。他在满怀抗战激情的多数职工支持下，正式宣布：从现在起，《大刚报》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毫无怨悔。他向刘峙辞去上校科长的职务，全力办报，从此，人称"毛大刚"。

武汉陷落，长沙大火，广州不守，衡阳成为联结东南和西南的重镇。在衡阳复刊后的《大刚报》，行销湘、桂、粤、赣，成为大后方引人瞩目的一张报纸。毛健吾信心倍增，提出要赶超《大公报》。他认为，《大刚报》是民营报纸，如果也像国民党官办报纸一样，只是对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这样的报纸是没有人愿意看的，以报养报就不可能；而要"为民喉舌"，刚正不阿，对国民党应当有所批评、指责。他陆续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报社工作，放手使用，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又先后聘请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著名记者担任总编辑、总主笔，编辑部内进步力量逐步占据优势。报纸在宣传报道上坚持了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国际形势的宣传尤具有特色。《大刚报》举办"民意测验"，增出敌后航空版，由美军飞机在沦陷区空投，在国内均属首创。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毛健吾还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发起募捐"十万救急包"，支援前线；捐款购买滑翔机，推动航空事业；劝募寒衣，救济难民。他提出"文化与实业并进"的主张，以文化为目的，以实业为手段，用实业的收入，弥补文化事业的亏损，实行自给自足，以摆脱报纸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他先后开办了"大刚

印书馆”、“大刚造纸厂”、“大刚中学”等企事业，可惜1944年7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衡阳，均毁于战火。

由于预见到衡阳可能失守，毛健吾在留下少数职工坚持出版到最后的同时，及时带领大部分职工和家属转移，并抢运部分印刷设备到柳州。他与大家一起席地而睡，同甘共苦，使报纸继续出版。两个月后，桂林沦陷，柳州又将不守，乃转辗撤退到贵阳。《大刚报》在贵阳复刊，毛健吾悲愤难忍，亲自撰写社论《实在不能再退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批驳了国民党当局在文告中所说的就是再多失些地方，也不能使我们屈服的消极抗战论调，说：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不能用了，我们必须确保西南，要把握时间，争取空间。在日军逼近贵阳的情况下，他又赶往重庆，买房屋、购机器、求人才、为万一贵阳失守，仍能在战时陪都——重庆出版《大刚报》而奔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毛健吾十分兴奋，他以为，《大刚报》在八年抗战中，四次搬迁，三次被炸，渡过了重重难关，如今抗战胜利，苦尽甘来，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他雄心勃勃，要把《大刚报》办成报业托拉斯，计划在五年之内，在国内出十个版。经过紧张的筹备，汉口版于1945年11月9日出版。但他派人去南京、上海筹备出报纸，却遇到了困难。毛健吾只好求助于老师陈果夫、陈立夫。这时，国民党CC系也正拟在南京办报。他们认为，利用《大刚报》的民间面貌，充作CC系的喉舌，比自己出面新办一张报纸为好。于是，二陈慨然应允给毛以“帮助”。二陈商请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三行两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邮汇局）投资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原《大刚报》资产作价二千五百万元，共五千万元，另由蒋介石批给官价外汇十八万美元，成立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毛健吾任总经理。二陈派亲信祝麟任南京《大刚报》总编辑，并陆续调进一批亲信部属担任编辑、记者，逐步控制了言论权。原《大刚报》同人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反控制斗争，终因大权旁落，无可挽回。1947年3

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那一天，南京《大刚报》刊登了财政部一职员因生活无着全家自杀的新闻，蒋介石阅报，勃然大怒，手谕“勒令《大刚报》停刊”。二陈乘机进行人事大调整，撤销毛健吾的总经理职务，派他去美国“考察”新闻事业；原《大刚报》同人，纷纷被解除职务。经过斗争，南京大刚报归CC系所有；汉口《大刚报》则由原《大刚报》同人自主经营。由于汉口《大刚报》始终保持民间立场，成为中南地区深受读者欢迎的进步报纸。

毛健吾在南京办《大刚报》的一年多，逐渐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联系到个人的遭遇，更使他对国民党失望。他深知要从CC系手中夺回《大刚报》，犹如虎口取物，已不可能，因此筹谋另起炉灶。他在出国前，曾试图与龙云合作在香港办报，谈了几次，没有结果。他到了美国，与在香港的李济深联系，希望李能支持他办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毛健吾的政治态度日趋鲜明。他多次以亲身经历，在美国发表反蒋谈话。1948年，李济深函邀他去香港，并动员他参加了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毛取道欧洲，继续考察新闻事业，并以个人身份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香港后，他积极劝说一些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靠拢人民。1949年8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参加了黄绍竑、龙云、贺耀组、李默庵等共四十四人发表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起义声明，号召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员立刻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开除四十四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寓居香港的刘峙劝毛健吾再去美国，陈立夫托人带信胁迫他去台湾。香港大学拟聘请他担任新闻系主任，希望他留在香港。毛健吾热爱祖国，义无反顾，于1950年9月返回大陆。

毛健吾回到北京后，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他主动要求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革命理论，改造思想。学习结束后，他要求继续从事新闻工作，遂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任编

辑。嗣后在北京《大公报》工作，并担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和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1958年3月，毛健吾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11月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十八年。1968年3月28日病故。1978年以后，毛健吾的“右派”错案被改正。

主要参考资料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同学录、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任命令、毛健吾请辞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书记长给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的辞呈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欧阳柏：《大刚报史话》，《新闻研究资料》第24、25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黄绍竑等：《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版。

访问王浩山（与毛同时参加北伐军，后曾任《大刚报》经理）的谈话记录。

毛智汉（毛健吾的儿子）来信和毛智汉访问毛礼锐（毛健吾的哥哥）的谈话记录。

1979年8月22日财贸战线报社：《关于毛健吾右派问题复查结论意见》，1979年8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

毛人凤

马振犊

毛人凤，原名善馀，字齐五，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1911年，十三岁的毛人凤考入本地县立文溪高小求学。在这所学校里，他结识了比他高一年级的同学戴笠。是年，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戴笠在校内组织“青年会”，毛人凤亦为会员，他们进行反对女子缠足和吸食鸦片等陋习的活动。

1914年秋，毛人凤从浙南山区来到杭州，进入省立一中，再次与戴笠同学。虽然两人关系十分亲近，但性格却相差甚远。戴笠生性放荡，常在校内外惹事犯纪，数月后便被学校开除；而毛人凤则秉性拘谨，循规蹈矩，最后完成了学业，并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一时难以谋职，回到江山县，在新塘边嘉湖小学任教。

1925年春，国民革命的浪潮在各地兴起，毛人凤投笔从戎，报名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次年夏，毛人凤父亲病故，他回家乡奔丧，在江山县城巧遇浪荡江湖从上海归来的戴笠。毛人凤向他讲述了广东的情景，建议他去粤报考黄埔军校，戴笠随即整装南下。然而毛人凤在办完父丧之后，没有重返潮州军校，而是辗转去了湖北黄陂县政府，担任代理秘书科长。在以后数年中，他又先后在浙江温岭县土地局及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处做文秘工作，直至1934年夏。

在这段时间内，戴笠却在黄埔军校与右翼学生为伍，以后又以其在情报工作中的业绩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被赋予“密查组”及组建特工组织的专任。1932年3月，“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开始了他的特工头目的生涯。毛人凤以与戴笠“故友、同乡、同学”的关系，于1934年受招来到南京，加入复兴社，旋即被派

往培训特工人员的浙江警官学校，出任“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文书。毛人凤对戴笠十分谦卑与顺从，谨慎地奉承他的这位“半师半友”。他对待繁琐的文秘工作克尽厥职，勤勉有余，整天足不出户，恪守纪律，赢得了戴笠的信赖。

1935年3月，毛人凤被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第三科第一股股长，负责有关“剿共”军事情报的搜集与整理。年底，又被派往西安，出任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与特务处西北区长一起负责对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的谍报工作。他竭力挑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矛盾，以便从中控制。不久，毛人凤被戴笠调回特务处本部任机要室主任秘书，负责处理内务机要。1936年秋，毛人凤综合各方情报，预计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将有危险，报告戴笠劝蒋中止行程，但蒋介石执意要去西安，没有理会。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惊于毛人凤预料之准确，对之更加器重。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毛人凤随戴笠前往上海，策划战地情报工作，并与杜月笙等人筹组了“苏浙别动队”以协助守军作战。11月，上海守军全线撤退，毛随戴笠离沪，转赴南昌、杭州等地部署特工情报工作。

1938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正式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局务。为了加紧内部控制排斥异己，戴借口局本部主任秘书郑介民兼职于参谋本部，便特设代理主任秘书一职，由毛人凤出任，主掌局内一切日常事务。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本部迁往重庆。蒋介石在对日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实施“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加紧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力量的迫害，军统与中统两支特务组织都积极活动。毛人凤秉承戴笠旨意，加紧培训和网罗人员，组织规模迅速扩大，内外勤工作人员一时多达五万之众，所掌握的各类公开或秘密武装近二十万人。

毛人凤在主持军统局内勤的几年中，以其老成圆滑的手法，对上恭敬谦谨，尤其对郑介民、唐纵这些老资格特务表现得敬重悦服；对下则“关怀备至”，常为之排忧解难，以致上下左右都对他存有良好印象，蒋介石也认为他是一个“老成持重”、“办事有方”的人。毛仍然对戴笠奉命唯谨，百般逢迎，使戴笠诸事均能得心应手。

1943年4月，在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之际，毛人凤正式取代郑介民出任军统局本部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戴笠忙于奔波各地，军统局日常工作由毛人凤掌握。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坐机失事毙命于南京城郊江宁县岱山，毛人凤悲恸不已，除主持了从搜寻遗体到丧葬等善后事宜，尤忙于为争夺局长一职与郑介民、唐纵等人开展较量。毛人凤虽然资历难以与郑、唐匹敌，但他自恃为多年的军统直接掌权者，拥有雄厚的基础，因此四处活动。当他觉察到蒋介石有另选他人的意图时，便退一步认为不如让历来不太过问军统实际工作的郑介民出任为好，以利自己保住实权，乃于3月20日晚召集军统局主要干部会议，决定主动向蒋推举郑氏，博得了蒋介石的赞许。

是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以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升为副局长。毛表面上对郑介民恭敬从命，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郑的声望。他在郑介民五十岁生日之际，利用其妻贪财的秉性，怂恿部下为郑多送寿礼，并将寿堂上高堆成山之金银财宝摄成照片报送给蒋介石；同时又唆使一批军统遗属于寿宴之时前来大闹索要饭食，演成轰动一时的丑剧。其后，毛又不断向蒋呈送有关郑介民贪污的材料，最终使蒋介石认定郑介民无法在保密局再干下去，下令调职。

1947年2月，毛人凤终于如愿以偿继任保密局局长。他迅速采取措施，翦除异己，平息内部争斗，整顿机构，派出得力干员充实各地方组织；对外则采取和解方针，大力修好陈诚、何应钦等派系，并拉

拢蒋介石的左右人员，对蒋经国则更是极力奉迎。

毛人凤竭力为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效劳。1947年夏，他指挥破坏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和保定、重庆、西安、沈阳等地的部分地下组织，捕杀了数百名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他还得到了蒋介石特别批准的编制和预算，组建了一支两千余人的技术总队，专门在临近解放的大中城市进行爆炸等破坏活动；又组建了另一支同样规模的行动总队，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大量逮捕与屠杀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竭尽全力。无奈，蒋政权大势已去，毛人凤徒唤奈何。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毛人凤先奉蒋令秘密布置了刺杀李宗仁的计划，后因蒋改变主意，欲利用李吸引美援维持内战，这一计划便告中止。李宗仁上台后，对保密局采取遏制政策，毛人凤急往奉化向蒋介石请示。根据蒋的旨意，他指令副局长徐志道率部分人员迁往广州，同时派人纵火烧毁了南京局本部大楼，借口档案资料被焚，拒不承办李宗仁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他自己则率领主要人马前往上海，成立了新“本部”，继续听命于蒋介石，指挥全盘特务工作。

在国民党的统治全面崩溃之际，毛人凤奉令将保密局的工作集中在破坏与屠杀两个方面。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解放前夕，他指挥特务武装进行了大屠杀与大破坏。他协助汤恩伯将集中于上海的黄金、白银及各类物资运往台湾，并强迫资产者迁资台湾。5月间，他又在上海指挥军警宪特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无辜市民共三万余人，并下令将其中一万三千余人杀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重庆，毛人凤执行蒋介石命令，指挥特务进行了血腥大屠杀。9月6日，先在“中美合作所”内戴公祠屠杀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口人，其中包括两个儿童；10月，又把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杀害于同一地，其中有江竹筠（江姐）等著名人士；11月25日至

27日临撤逃前，又对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等集中营的六百余名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进行了大屠杀，并焚尸灭迹。毛人凤原拟将重庆市重要工厂、白市驿与九龙坡机场、成渝公路内江大桥等重要设施一一炸毁，由于当地人民应变护卫及解放军进兵神速，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毛人凤在指挥特务实施暴行的同时，还部署了潜伏特务的工作，计划在解放区暗藏一批人员，窃取各方面的情报和进行更大的破坏。他先在南京办了一所“全能训练班”，对一批隐蔽的特务进行无线电收发等专业技能训练，然后将其分别派往各大中城市，谋取正当职业以为掩护。这些特务按严格的组织联络，以美制特工机具及密码联系，尽可能混入人民政府机关工作，骗取信任，以获得情报。1949年3月，他在重庆主持会议，布置各地特务返回自己家乡潜伏的“还乡计划”，规定在必要时特务可向人民政府“假自首”。9月，他又亲自在重庆开办“全能训练班”，想再训练一批特务，但因解放军逼近山城，训练班迁往成都，不久编入交警第一旅，训练计划被迫中止。12月10日，毛人凤与蒋介石父子同机由成都飞往台北。

蒋介石在台湾成立了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后改组为“总统府”资料室，统辖所有的情报工作。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在蒋经国指挥下，专事对大陆的谍报及破坏工作，并兼及侦破在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1950年3月，毛人凤主持破获“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等人“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案”，捕杀了一批人；1952年又炸沉了前往大陆的英国货轮“泽生”号。但其后一系列在大陆的暗杀破坏活动，均告失败。

1955年4月11日，毛人凤主持策划了企图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而使毛的阴谋失败，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南海上空被炸，酿成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

在台湾，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与原“中统”改组成的“内政部调

查局”之间依然摩擦不断。1955年3月，蒋氏父子采纳毛的建议，将“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调查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前者专对大陆，后者专职岛内控制。至此，毛人凤将“中统”系统在大陆各地及港澳的组织全面吞并，满足了他多年来兼并“中统”的愿望。

1956年5月，毛人凤因患肝癌，赴美医治无效，10月14日在台湾死去。

主要参考资料

周养浩等：《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沈醉：《我的特务生涯》（正、续篇），香港金陵出版社1986年版。

茅盾

林印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桐乡。父亲沈永锡，晚清秀才。母亲陈爱珠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1905年茅盾在故乡乌镇入小学。1909年先考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后转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未入本科，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在英文部、后在国文部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同时开始了他早年的文学活动。

茅盾开始文学活动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前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很注意阅读、研究国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选译一些内容和风格都有特点的外国小说。1920年冬，茅盾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十二人发起成立我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商务印书馆原出版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主持的刊物，专门登载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决定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请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专门介绍外国文学。1920年11月，又决定请他主编《小说月报》。茅盾任主编后，《小说月报》面目一新，成为一个进步文艺刊物。这引起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怨恨和攻击，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守旧派也表示反对。在内外夹击之下，1922年10月，茅盾辞主编职，改由郑振铎接任。

1922年到1924年，茅盾和郑振铎等人一道，曾经和文艺界的三个方面展开论战：一是鸳鸯蝴蝶派，二是创造社，三是南京的学衡

派。其中，除与创造社的论战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外，对其他两派是对旧文学营垒的冲击与批判。

从1920年开始，茅盾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1年，他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各省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茅盾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为中央传送信件，联络来往人员。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茅盾被选为执行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茅盾根据大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运动。1925年12月，恽代英和茅盾组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为宣传部长。1926年1月，茅盾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工作，编辑《政治周报》。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回上海，负责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主持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的各种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并派观察员去各省考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同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翌年4月初，他主编汉口《民国日报》。这个报社的社长是董必武，这份报纸实际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在《民国日报》上，他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不久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反共面目，武汉的政局十分动荡。6月底，茅盾为应付突然事变，把快要生产的妻子孔德沚先送回上海。7月8日，他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辞掉《民国日报》的工作，转入地下。他在武汉法租界一家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7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去九江，在九江见到董

必武和谭平山，被告知即去南昌。这时他在牯岭得了一场急病，失去了去南昌的机会，遂于8月中旬绕道回上海。

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南京国民政府正在抓人，茅盾亦名列其中。大革命的失败使他痛心，也使他悲观。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为了暂避蒋介石的迫害，他隐居了十个月，除了和同住在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鲁迅等人有来往，几乎不和外界接触。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有一段自叙："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9月到1928年6月的十个月中，茅盾用"追忆"的手法写了三个连续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他的意图是写大革命时代青年所经过的三个时期：革命前夕的高昂兴奋和革命遇到挫折后的幻灭；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这三篇小说于1928年用笔名"茅盾"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由于它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一举成名。同时它也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引起某些非议，有人认为不应该去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人指出小说反映作者悲观失望情绪太浓厚。1929年这三个中篇被合印成一卷，小说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

1928年7月初，茅盾离开上海去日本。16日，他在日本东京写了散文《从牯岭到东京》借以回答当时上海文艺界某些朋友对他的批评。他表明《幻灭》等三篇只是忠实的时代描写，算不得是革命小说。同时他对有些人把文艺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也是不赞成的。在这之后，他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

茅盾在东京住了五个月，写有短篇小说《创造》、《自杀》、《一个女性》。12月，他移住日本京都，又写了一些短篇和散文。

1929年写了长篇小说《虹》。除此之外，他在日本期间还写有《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同年底，他写了《关于高尔基》，说真正的普罗文学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写有血有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

1930年4月，茅盾结束亡命日本的生活回到上海。他回国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头半年，他取材于历史传说写成《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三个短篇小说。1930年9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判后，左联工作有了新的气象。1931年4月，茅盾开始和鲁迅、冯雪峰合编左联的秘密刊物《前哨》。5月，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和鲁迅、瞿秋白结成革命的战友，向国民党御用文人展开了英勇斗争。当时，他曾经通过瞿秋白向中共中央要求恢复他的共产党党籍，但是没有得到党中央的回答。这年10月，茅盾为要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子夜》，辞掉了左联领导职务，但仍坚持左翼文艺的旗帜。1932年到1936年他和鲁迅合作创办了《文学》和《译文》杂志。1934年2月，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全国性的复古逆流，茅盾和鲁迅都积极写文章反击。1935年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茅盾和鲁迅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祝贺胜利。

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写成于1932年底，但酝酿与构思则早在1930年冬。1930年夏秋之交，他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并发，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他每天访亲问友搜集素材。他在上海的朋友有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人，有自由职业者，也有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他又不止一次地到交易所、丝厂、火柴厂去，这很有助于他对社会的观察。

《子夜》中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以一个非常精明能干、抱有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雄心的民族资本家丝厂老板吴荪甫为主角，刻画了复杂的斗争场面。吴荪甫为了自保，一方面加紧对工人的剥削，一方面不得不向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最后走上了绝路，从而揭示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子夜》形象地驳斥了当时托派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也打破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希望振兴中国民族工业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子夜》是我国“五四”以来在艺术上最成功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社会的文学巨著。《子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也很快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英、美、苏等国家出版，为世界文坛所重视。

茅盾在创作《子夜》的同时，还写有《林家铺子》。它的主题反映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小市镇的小商人不论如何会做生意，终归只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同期和稍后他又写成《春蚕》、《秋收》和《残冬》三个短篇，刻画了30年代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掠夺的江浙蚕农的贫困，和农民开始觉醒、反抗的斗争场面。从1933年到1936年，茅盾还写有许多杂文、散文和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先到汉口，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阵地》。并与郭沫若、老舍等人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不久去上海。11月他偕同妻子离开上海经过香港到长沙，然后到九龙。他在九龙住了九个月，为广州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并为香港《立报》主编副刊《言林》。1938年底，他应杜重远的邀约，带领全家去新疆学院教书，于1939年春天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除教书外，并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不久，由于新疆督办兼省长盛世才日趋反动，使他无法工作，他一家只得于1940年4月底离开新疆，回到西安。5月，他随朱德的车队去延安访问，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同年初冬，他把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留在延安学习，自己和夫人离开延安到重庆。他写了《风景谈》、《白杨礼赞》等出色的散文，歌颂延安的革命精神。

1941年皖南事变后，茅盾离重庆经桂林去香港，创办《笔谈》。又参加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任编委，在《大众生活》上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他在这部小说里通过女特务赵惠明被腐蚀和

逐步堕落的经过，揭露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特务的血腥罪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茅盾和叶以群、廖沫沙等人一起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十分动荡不安的惊险生活。后来，由于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他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达桂林，找到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小屋栖身。他在那里写了描述香港生活片段的《劫后拾遗》和描写民国初年城市士绅生活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从1943年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茅盾定居重庆近郊。他追忆东江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抢救流亡香港的一千多文化人的经过，写成《归途杂拾》、《过封锁线》等文章。1945年，写成了以揭露黄金舞弊案为主题的剧本《清明前后》，曾在重庆公演。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茅盾离重庆回上海。是年底，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杂谈苏联》与《苏联见闻录》。1947年底，他再次去香港，任《小说月刊》编委。这个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锻炼》，在《文汇报》上发表。

1948年底，茅盾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由香港乘轮船赴大连，旋至沈阳。北平和平解放后，茅盾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部长直到1964年夏。他曾任全国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茅盾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根据他逝世前的请求，于3月31日做出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主要参考资料

《茅盾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茅盾散文速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茅盾评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茅盾：《自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茅盾论创作》，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茅以升

刘秋阳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江苏镇江人。祖父茅谦是举人，精通文字，对自然科学，尤其数学、水利学颇有研究；父亲茅乃登是报社记者。

茅以升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生活就很艰辛。五岁启蒙，六岁上私塾，七岁进入南京思益学堂念书，1906年进入江南中等商业学堂读书。翌年，同盟会员徐锡麟、秋瑾因起义失败被捕牺牲，茅以升闻悉后，慷慨激昂地说："二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豪杰，他们蓄志革命十几年，目的在于推翻清王朝，建立自由平等的中国。"(1) 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按规定校内举行"国哀"，茅以升愤而剪掉辫子，校内轰动，被校方记大过一次。

1911年7月，十五岁的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读土木工程科。10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茅以升意欲到南京投效革命，被母阻止。他发愤用功读书，五年中每次大考都获全班第一名。1913年孙中山至唐山路矿学堂视察、演讲，还与学生一起照相留念。茅对孙中山提出用十年时间，在全国建十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设想备受鼓舞，增强了学习桥梁专业的信心。

1916年夏，清华学堂向全国各大学招收十名留美官费研究生，茅以升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他于9月到美国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桥梁专业学习，深受美国工程界著名专家、系主任贾克贝（Jacoby，Henry Sylvester）的器重，一年后获硕士学位。之后，经贾克贝介绍，到匹兹堡一家桥梁公司实习。在实习期间，他晚上到加利基理工学院桥梁系进修，攻读工学博士学位，以具有创见的论文

《框架结构的次应力》通过答辩，于1919年底获博士学位，是该校第一名工学博士。康奈尔大学当时还把专门奖给那些学术研究上卓有成效的、每年只颁发一枚的“菲梯士”金质奖章奖给了他。在匹兹堡期间，茅以升积极参加留学生的活动，任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副会长。

茅以升毕业后立即回国，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授，开始了为期三十年的教育生涯。1923年执教于东南大学，任工科主任；继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教授、校长；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原北洋大学）院长；1933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教授、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

茅以升在执教期间，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结构力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和土力学等。他讲课条理清楚，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中常常采用“学生考老师”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让学生在对课程认真深入地思考之后，提出疑难问题，请老师回答；老师根据学生提问难易程度来打分，如果提出的问题使老师答不出的则给满分。教育家陶行知亲自听课后，称赞“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我们推广”[(2)]。

1933年8月，茅以升担任浙江省建设厅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负责主持钱塘江桥的建桥工作。钱塘江桥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分正桥、引桥两部分，全桥结构采用双层式，上承公路下载铁道，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的第一座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大桥，是我国建桥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茅以升创用“气压沉箱法”克服潮水和流沙的障碍，以“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施工方法，使工期大大缩短，于1937年9月建成通车。可惜通车后三个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南京国民政府为迟滞日寇的进攻，下令炸毁大桥，茅以升担负炸桥任务。他赋诗抒发自己的心情：“三年之功废一旦，破坏容易建设难。国破愈觉山河美，毁桥为的保江山。”[(3)]

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授予名誉奖章，奖励他对建桥的贡献。其后，茅以升历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茅以升于1946年9月，奉命负责主持重新修复钱塘江桥的工作。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撤离杭州时又炸毁桥面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以升再次主持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使钱塘江桥得以为国家建设继续发挥巨大作用。他是我国近代铁道桥梁事业的奠基人。

1946年，茅以升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后为院士。1949年3月，茅以升作为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五位代表之一，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请愿呼吁和平，并参与请愿书的草拟工作，要求不以工矿区为作战据点，不破坏工矿、交通、公用事业，不准士兵侵入工厂、矿场，不损坏或迁走工厂设备。

5月2日，上海新任市长陈良为维持混乱局面，请茅以升任市政府秘书长。茅以升先是予以拒绝，后应中共地下党要求才到任。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茅以升利用与陈良之妻是留美同学的特殊关系，要求陈良不破坏工厂，并保证关押在龙华监狱三百名学生的安全，茅欣然答应并顺利完成。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约请茅以升等座谈，称赞茅以升："上海解放，你是有功的。"(4)

1949年9月，茅以升以自然科学家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秋，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讨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应邀参加。周恩来对他说："你建设过钱塘江大桥，对建桥富有经验，希望你对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多出力。"(5)

1952年，茅以升任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大桥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茅以升提出的"大型管柱钻孔法"，克服了技术困难。1956年6月，他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桥梁会议，作了题为《关于武汉长江大桥新的施工

方法》的报告，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关注。

1953年，茅以升被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时又被选任副主席。同年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开始兴建人民大会堂，茅以升担任结构审查组组长，被周恩来指定负责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人民大会堂”的定名亦是由他提出来的。

1979年，茅以升主持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1982年2月，他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这也是中国第一人入选。1984年，又被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同年还被推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茅以升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认为：“科研需科普补充，科普中有科研问题。”两者可以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早在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时，他就被选为副主席，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如《中国的石拱桥》、《桥话》等，大多收集在《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里，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科普作家。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

茅以升是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六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7年任中央名誉主席，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于北京。其论著编有《茅以升文集》、《茅以升选集》、《茅以升科普文集》出版。

---

(1) 齐敏、孙士庆：《茅以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2) 公盾：《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第40页。

(3) 公盾：《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第19页。

(4) 公盾：《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第85页。

(5) 公盾：《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第87页。

梅兰芳

林印

梅兰芳，字畹华，我国卓越的京剧艺术家，被人誉为“四大名旦”之首。他原籍江苏泰州，1894年10月22日（清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他的祖父梅巧玲（1842—1881年）是19世纪著名的京剧演员，又是当时北京四大徽班之一“四喜班”的老板；父亲梅竹芬（1874—1896年）也是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伯父梅雨田是著名的琴师。梅兰芳十五岁丧母，幼年家境困苦，依靠伯父梅雨田拉胡琴收入来维持生活。

梅兰芳八岁开始学艺，教师吴菱仙是时小福的弟子。吴与梅巧玲生前友好，追念故人，对梅兰芳另眼看待，教戏时特别认真。

梅兰芳初次登台是1904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初七），这年他才十一岁。那天，斌庆班在北京广和楼贴演《天河配》，他在戏里串演昆曲《长生殿·鹊桥密誓》里的织女。过了三年，他正式搭班“喜连成”（后改名“富连成”，是叶春善手创的科班）。梅一边学习一边登台演出，演技进步相当快。这时他除向吴菱仙学青衣戏之外，还向姑丈秦稚芬和伯母的弟弟胡二庚学唱花旦戏。梅早期的武功是得之于替他操琴的茹莱卿的传授。后来梅演的《木兰从军》、《霸王别姬》都是茹莱卿帮助排练的。

梅兰芳请教过的老前辈很多，著名京剧教育家王瑶卿、演员路三宝、专教昆曲的乔惠兰、谢昆泉、精通武功的钱金福、著名青衣陈德霖、架子花脸李寿山等人对梅都有过较大影响。他肯于勤学苦练，因而在唱、做、念、打等方面，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成名之后，练功也从未间断。

梅兰芳在艺术上的进步与深入，除了名师指点与自己实践外，也很得力于看戏。他搭班“喜连成”的时候，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到剧场，一直看到散戏才走，由此吸收了许多前辈艺术家宝贵的经验。

梅兰芳平时在演戏练功以外，业余爱好养鸽、养花和绘画。他幼年时眼睛微有近视，有时迎风流泪，眼珠转动不够灵活。从十七岁起，他开始养鸽，因为经常要观察鸽子在天空翱翔的姿态，有时要从鸽群中辨别属于自己的鸽子，由于天天这样做，不知不觉使眼睛变得灵活起来。这和他后来表演中的眉目传神有一定的关系。

梅兰芳向许多名师学画，并有自己的画室。他特别爱画仕女和佛像，他认为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京剧艺术。

梅兰芳二十岁时，已经是一位驰名京沪的京剧演员了。在当时军阀统治时代，戏剧演员的社会地位低下，经常遭到屈辱和打击，不少有才能的演员在艺术上也往往无法进行新的探索。然而梅兰芳却能突破各种困难，不断勇敢地攀登艺术高峰。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和著名京剧演员王凤卿一同去上海演出，演的是《彩楼配》、《玉堂春》、《武家坡》，曾轰动了上海。以后，他的剧目中开始出现了《穆柯寨》、《虹霓关》等不属于青衣的戏，打破了过去传统的青衣、花旦等角色分行的限制。

梅兰芳回到北京后，开始创作《孽海波澜》、《宦海潮》、《一缕麻》、《邓霞姑》等反对封建婚姻、揭露官场黑暗的时装新戏。他大胆的尝试，对京剧艺术的革新起了不小的作用。不久，又排演了一些古装新戏，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剧目，刻画了那些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青年妇女的形象。这些是舞台上从未出现的古装新戏，取材于神话故事或文学名著，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后来，他又向前辈学习昆曲，演出昆曲剧目《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断桥》等。从1915年4月到1916年9月这十八个月当中，梅兰芳以他旺盛的精力，创演了十一出新戏。

随后，梅兰芳在继续创作新戏的同时，还整理和上演了许多著名的传统戏，如《宇宙锋》、《花木兰》、《思凡》、《拷红》等等。1921年，他编演了《霸王别姬》，他演虞姬，细腻深刻。这出戏后来成为梅派保留剧目中比较优秀的一个。

1922年梅兰芳应邀赴香港演出。他的琴师茹莱卿因病不能同行，改由他的姨父徐兰沅接替操琴，王少卿任二胡伴奏。具有特色的梅派唱腔，就是梅兰芳和徐兰沅、王少卿共同研究创造的。京剧配乐中增加二胡，使演出伴奏的音色丰富起来，便是从这时期开始的。

“九一八”后，梅兰芳迁居上海。他创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用来表达他对敌人的恨和对祖国的爱。这时期他和现代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时相往来，受到他们的戏剧理论上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身在沦陷区，拒绝为敌伪演出，蓄须明志停演八年。他曾经因为停演而影响生计，卖掉了北平的住宅。抗日战争胜利后，梅兰芳再度出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梅兰芳应邀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1年3月，梅兰芳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他组织了“梅剧团”到祖国各地为工农兵巡回演出。从1951年到1955年，共演出五百多场，观众超过一百万人。1953年，梅兰芳亲自率领“梅剧团”到朝鲜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后，又到广州去为人民解放军作慰问演出。1958年到福建前线为战士们演出。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梅兰芳以六十五岁的高龄排演了《穆桂英挂帅》。他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创造出一个爱国女英雄穆桂英的形象。

梅兰芳经过不断的斗争实践和学习，政治觉悟日益提高，195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梅兰芳在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涯中，上演的传统剧目数以百计，创演的新戏共有三十余出。他继承了我国京剧悠久的优良传统，又进行了自己独立的艺术创造。在过去许多名旦角表演艺术的基础上，他不断加工，使他的唱、做、念、打结合成一体，表演技术达到了十分优美、动人的境界。他还带头取消了演员在台上饮茶等陋习；把原来出现在舞台上的乐队移到纱幕后面。从这些细节的改革中，也可看出他对待艺术的认真态度。

从1919年到1950年，梅兰芳曾率领剧团先后多次出国演出，把京剧艺术介绍给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观众，赢得各国戏剧家的好评。他在1929年冬到1930年春访问美国演出时，荣获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美国著名艺术家卓别林、范朋克、罗伯逊等都曾和梅兰芳结识，交流艺术心得，因而他也从外国艺术家那里吸取到某些营养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梅兰芳著，中国戏剧协会编：《梅兰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

中国戏剧家协会编：《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梅兰芳著：《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欧阳予倩：《一得余抄：1951—1959年艺术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梅思平

朱佩禧

梅思平，名祖芬，字思平，以字行。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生，浙江永嘉人。父梅佐羹，清末秀才，是温州有名的讼师。1915年梅思平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1919年入北大法科政治系，1923年夏毕业，获得文学学士。毕业后，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之聘，在该馆任编辑，直至1926年北伐时期。

1927年，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成立，梅思平应陈果夫之聘担任教职。1928年《新生命》杂志创刊，梅思平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文。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即三民主义的基础是民生史观，而民生史观立于“生的世界观”，这是后来陈立夫“唯生论”的蓝本。而其提出的，自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的社会，乃完全是一个商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 (1) 。

1933年2月，梅思平任江宁实验县县长，此举是国民党CC系将其势力打进基层的一个重要步骤。梅思平认为，实验县所负的使命有两个部分：一是制度上的实验，研究县有制度如何最适宜；二是政策上的实验，研究县政的推行，其先后缓急的程序如何最合理。其到任后，在制度上将原来的局裁撤或合并，成立民政、建设、教育等六个科合署办公，另设一个秘书处，主持人事工作等。科长由县长选材录用，而不是由省厅委派，而实际上当时各科科长及业务骨干几乎清一色地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在政策上，大力发展教育、卫生与生产，都颇有成绩 (2) 。

1932年4月，梅思平到洛阳出席国难会议。夏，与中央大学教授萨孟武（本炎）、张其昀（晓峰）、何浩若（孟武）等创办《时代公论》周刊，“对内鼓吹国家统一，对外号召全民抗战”。梅思平在杂志上为国民党的党治进行鼓吹，认为“现在喊结束党治的，算是书生之见”，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使国民党或非国民党的能够与资产阶级相团结，以制裁武力的问题”，“创立一个资产阶级和智识阶级联合的代议机关”，“来监督财政，继而制裁武力”，因此，“就实际环境而言，现在中国只有渐由党治推进至民治一条路”[(3)]。

1936年，梅思平任江苏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7年5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专员、大本营第二部秘书。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梅思平出席蒋介石等召开的第一次庐山谈话会，对会上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后，梅思平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和平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认为从国际形势观察，以中国军备和经济都无法与日本开战，必须得到英、美的援助才有获胜的可能，但英、美其时更关切的是日本；就国内来说，中共会借助抗战发展实力。因此，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但蒋介石等不为所动，坚持长期抗战。

1938年3月，梅思平受周佛海指派赴香港，开设蔚蓝书店，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开展对日情报工作。其时，林柏生主持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丛书》，朱朴主编《国际通讯》，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他们是对汪精卫“和平运动”进行舆论鼓吹的“四大金刚”。在香港期间，梅思平介入了中日间的秘密谈判，成为“和平运动”的“牵线者”。从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高宗武、梅思平和日方的西义显、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会谈了五次，其主题为撤兵与承认伪满洲国两个问题。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回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在港与日人谈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的

意向，以及今后联络的方法。26日起，汪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等问题。30日，梅思平飞回香港，会同高宗武去上海进一步谈判，即重光堂会谈。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11月12、13日抵达上海。14日起，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即所谓“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及其助理伊藤芳男就梅思平带来的中方最后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这个草案与八九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讨论的内容差不多，双方就细节进行反复研讨、辩论。15日，今井带协议草案回东京汇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以这个协议作为推进日中“和平运动”的基础，并指派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分别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代表，负责完成谈判。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同行。20日起继续谈判，下午7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则暂未签字，但为保证实行的事项，这三份文件后来得到御前会议的通过，是决定日本扶持汪精卫，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后日本军方与汪组织谈判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基础。他们四人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约定，于11月27日密带协议文件返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随即召开会议详细研究协议内容，及讨论今后的行动步骤。

12月1日，梅思平带了汪精卫的答复回到香港。12月19日，汪精卫和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梅思平五人一起叛逃，从重庆飞抵越南河内。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以梅思平等所商得的条件发表声明。汪精卫于29日草就艳电，交由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带至香港，由林柏生、梅思平共同署名负责，于30日夜送往报馆发表。

1939年4月，汪精卫指定周佛海和梅思平去上海进行“和平运

动”的舆论宣传和联络党羽工作。周佛海与梅思平恢复出版《中华日报》，并轮流主持社论，对重庆方面展开宣传战。5月31日，梅思平随同汪精卫等人秘密赴日，与日本外务省与军部人员进行接触，商谈建立统一的伪政权事宜。1939年7月，梅思平发表《和平运动之如是我闻》，宣传“和平建国”理论。8月28日起，汪伪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组织上打击了国民党抗战力量。会后，梅思平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

1939年11月3日，梅思平与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作为中方代表与影佐祯昭等在上海谈判所谓中日和平方案，30日双方代表在《调整中日关系之协议文件》上签字。这是继重光堂会谈后签署的一个更为具体的卖国密约，也是准备成立汪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1940年1月，高宗武与陶希圣逃往香港，并在《大公报》上公布这一秘密协定，揭露了汪精卫一伙所谓“和平运动”实为卖国行为的面目。

其时，梅思平和汪精卫等一起由上海搭乘日轮“奉天丸”去青岛，参加与“临时”和“维新”两伪政权举行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机构”的建立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的拟定等重要事务。3月，汪伪南京政府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梅思平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工商部部长。1940年秋，梅兼粮食委员会委员长。为了获得日本对伪政权的正式承认，1940年7至8月间，汪精卫、褚民谊、梅思平、周佛海等人与日本特使阿部信行等讨论中日调整国家关系条约草案，共开会十六七次，梅思平参加了全部会谈。11月30日，汪伪政权同日本政府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基本关系条约》及一系列附件，将以前日汪之间密约规定的诸如日本在中国一些地方驻兵及驻扎海军舰队、开发利用中国资源等基本内容，正式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这一卖国条约签订后，梅思平在12月的广播讲话中替它美化，说什么“这次条约关于经济部分

的根本精神，是在建设东亚共同经济圈”，“中日经济提携”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并不是那一国侵略那一国，那一国把那一国作殖民地看”，“说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占”，是重庆方面的反宣传[(4)]。

1942年12月，梅思平作为汪精卫出访日本的重要随员之一，参加了东京会谈。会谈进行了一周，主要涉及物资统制权移交汪伪政府，汪伪政府收回被日军强占的工厂；驻华日军将物资统治权移交汪政府，由汪伪政府制订法令设立专门机关实行物资统制。由商人团体负责采购，兼顾军需与民生，中日商人共同参加专门物资的统制[(5)]。1943年1月20日，身为实业部长的梅思平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汪伪政府恢复正常后，虽不直接参战，但除供给日本物资外，将向德国、意大利等欧洲轴心国供给物资。同时，强调对米、谷等战略物资的控制[(6)]。

2月4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召开第四次会议决议各省设立经济局，并委周佛海、陈群、李圣五、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陈春圃和罗君强等人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3月11日，梅思平以实业部长名义召集唐寿民、周作民、林康侯、江上达、许冠群、闻兰亭、袁履登、吴震修、叶扶霄等在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开会报告，决定在上海设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指定以上各人为发起人，以各地同业公会、各业同业联合会为其下属机构，其性质为商业自治集团，政府居于监督地位[(7)]。实业部的政策变动直接导致大批沦陷区商人“投敌”成为汉奸。3月15日，商统会成立，由唐寿民担任该会理事长。商统会成立后，协助政府执行物价管理，稳定物价，增加生产，推动统制工作[(8)]。后来，梅思平的实业部不断干预商统会事务，与唐寿民矛盾激化，因此5月20日举行的第十五次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将商统会改隶行政院，而各业别的联合会为商统会的下层机构，实业部撤回派往指导各业别联合会的所有监理官。为了控制物资统治权，6月，梅思平还担任物资统制会议委员会委员。物资统制办法的实施，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9月，江苏省省长李士群被日方毒死后，内政部长陈群调任江苏省省长，而梅思平由实业部部长改任内政部部长。梅思平接任后，认为中国内政无法进步的最大原因是地方长官权力太少，地位太低，经费太少。他提出提高地方官地位，增加县级财政；地方县政的主要工作是保甲和警察两个组织，着手这两方面，将顺利推进县政[(9)]。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梅思平被军统局逮捕。1946年4月27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对其提起公诉。这是正式对汉奸进行审判的第一个案件。5月3日，在首都朝天宫高等法院进行公审，包括梅思平家属在内的各界旁听者达数千人。审判过程被拍摄成电影送各地公映。梅思平被控通谋敌国、图谋反抗，为此梅思平写了自辩书，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进行辩护。9日，首都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处其死刑，听到这个消息，梅思平“脸呈赤色，颇显紧张，未发一言，鞠躬画押”[(10)]。同年9月14日上午10时，梅思平在南京珠江路老虎桥监狱被枪决。1948年1月14日，他在苏州中正路八二九号房屋一所被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所清理，其财产也全部被没收[(11)]。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金雄白：《汪精卫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出版社1965年版。

---

(1) 梅思平：《民生史观概论》、《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新生

命》第1卷第5期、第11期（1928年）。

(2) 梅思平：《两年来之江宁实验县——梅思平在苏省党政联合纪念周报报告》，《江苏月刊》第3卷第3期（1935年）。

(3) 梅思平：《党治问题平议》、《再论党治问题》，分别见《时代公论》创刊号、第2期（1932年）。

(4) 梅思平：《中日条约与经济建设——十二月四日晚广播》，《中央导报》第1卷第19号（1940年）。

(5) 《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1943年1月20日，引自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册），第1210—1223页。

(6) 《梅思平谈物资动员，并不动员人力》、《梅部长阐释物资搬运问题》，《申报》1943年1月20日、3月20日。

(7) 《唐寿民自白书——经办商业统制备忘录》，上海档案馆藏，Q459—1—329。

(8) 《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昨举行成立大会》，《申报》1943年3月16日。

(9) 《梅部长对记者谈推进政令问题》，《申报》1943年10月26日。

(10) 《梅逆思平被处死刑》，《申报》1946年5月10日。

(11) 《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公告》，《申报》1948年1月14日。

梅贻琦

黄延复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八）生于直隶天津。父梅臣，字伯忱，曾任盐务事。梅贻琦幼时家道已中落；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全家赴保定避难，乱后返津，家当已被洗劫一空。

1904年，严范孙、张伯苓在“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创办天津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的前身），梅贻琦入该校第一班学习，1908年毕业，名列第一。毕业后，按校章被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学习。翌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美生，10月赴美，1910年春入麻省伍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专业。学习成绩一贯优异，曾被选入“Sigma Xi”荣誉学会（美国奖励优秀大学生的一种制度）。1914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在美期间，他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

1915年春，梅贻琦回国，初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书记，9月至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先教数学、英文，后教物理，至1926年由教员而讲师而教授而教务长。他学识面广，曾被称为“科学各教授之首领”，除教上述诸课外，还主讲过测量、工程事业（土木、机械、开矿、电机）、运输等课；作过“洋灰造制法”、“矿地设备”、“电子原理”、“X光射线”等专题报告。此期间，梅贻琦表现出对教育事业广泛的志趣和热情，先后担任唯真学会[(1)]顾问，清华童子军团长、军长、总司令以及全国童子军理事长，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校科学社顾问及名誉社长，大一（学校当时最高年级）课程工业部主席，华员大会书记及交际组主任，新校委会议教员代表等。在校外，他曾与陶行知、曹云祥（时任清华校长）等一起组织“中国科学教员促进研究

会”，任管理部书记。1921至1922年，他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再次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并曾一度任纽约大学讲师。1922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1926年起，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指派，而由教授会公举，梅贻琦被举为改制后首任教务长。在两年任内，显露出其治校才能。这时的清华，设有游美预备部、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三种学制，作为教务长，梅贻琦统管各部的教务。他首先把新建大学部的学程、师资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的雏形。他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赠别大一诸君》等文章，阐述他在办大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观点和方略。对于中国学生到外国去留学所应持的基本态度，他说：“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坏的”，“不能不将他们看清楚了”，“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掉自己”，“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2)]。8月，因校长在学生出国问题上有独行专断行为，梅贻琦率先请求辞职以表抗议。被挽留后，他为了克服以往校领导关门办学的作风，于10月赴江、浙、鲁、奉四省调查教育一月余。

1928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势力入控北京，清华学校被接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受命暂代校长职务。8月，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11月，因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处财务上发生混乱，梅贻琦被派赴美接替“监督”一职。嗣后清华校内发生校长风潮包括罗在内连续三个校长被驱，校长一职未有适当人选，校内曾出现连续十一个月无校长的局面。经过反复物色、选择，梅贻琦于1931年10月10日被任命为校长，12月3日到校就职。梅贻琦自此连续任清华大学校长达十七年之久，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他以清华校长身份兼任“联大”常委会主席。梅到校就职当天，即召开全校大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一）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二）要“在学术上向高深方面去作”；（三）要培养和爱护人才，严格避免人才的浪费；（四）要尽全力充实师资队伍，广泛延聘第一流学者来校执

教。他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 他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一直被清华大学作为优良传统对待。

1931年—1937年的清华大学，在梅贻琦的主持下，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师资队伍的进一步充实。他反复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4] "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极也。"[5] 其次，他实行"教授治校"，对校事采取"吾从众"的方针，调动教授们治学和治校的积极性。当时学校采取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和校长"四权分制"的治校方法，评议会是核心，但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校长是前三会的主席，但一切重要校政必须经过评议会讨论后才能决定。朱自清曾撰文称颂梅的民主作风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的。"[6] 第三，创办了清华大学工学院。清华在工程专业方面，原只有一个属于理学院的市政工程系（即土木工程系），梅出任校长后两月，即1932年2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发展"的计划。6月，成立了包括机械、电机、土木三系的工学院，自任院长。嗣后，设立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还陆续建成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实验馆、水利实验馆、发电厂等教学设施，添置了当时先进的设备，聘请了一批国内外工程学名流来校充作工学院教师的骨干。第四，与国外学术界联系与交流。1933年，清华首先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法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并先后请来国外名流学者来校讲学。清华教授出国者，亦多担任讲学任务。第五，大力发展研究事业。到1935年清华已拥有较为健全的三个研究所共十个研究部，占全国同类学校共三十七个研究部的百分之三十七。1934年10月起，梅贻琦又"鉴于国内需要，拟即举办特种研究及理工特别设备"，陆续兴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抗战期间，又在昆明兴办了金属、国情普查两个研究所。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日亟的形势下，梅贻琦勉励同学谨记国家危亡的情势，时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1932年9月18日，他在学校“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公开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7)]。这期间，他常常告诫学生“不忘国难”；但不赞成青年学生脱离学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说：“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8)] 还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9)] 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出于爱护学生的目的，曾几次出面保释被捕的进步学生，但也曾以“维护校规”为出发点，签署过开除进步学生的布告。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南迁，初于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半年后又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一起组成联大常委会，梅任主席（常委会主席一职原本是由三校长轮流担任，但因蒋、张在重庆任职，故该职一直由梅担任），始终坚守在校主持校务。他表示：“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10)] 在“联大”八年期间，梅贻琦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办学才干和责任心，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学风的三校师生，同舟共济，使联大师生能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弦歌不辍”，为国家和民族保存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才。

1940年9月，梅贻琦在清华服务满二十五周年，在昆明的清华大学师生，为他举行了一次公祝会，他在美留学的母校伍斯特工学院授予他名誉工程博士的称号。梅贻琦在公祝会上面对众多的称功颂德之词致答辞，把自己比做戏台上的“王帽”，说：“其实会看戏的人，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

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也觉着‘与有荣焉’而已。”[11]

1941年4月，梅贻琦借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系统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他主张“通才教育”，但又不是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的翻版，而是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综合中外现代大学教育思想和体制而成。他认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应该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12]，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们以“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非如此，便不能完成大学教育中“新民”（化民成俗，改造社会）的任务。他主张大学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通才”，不可能也不应该担负直接为社会各部门培养“专才”的任务，这个任务应由其他教育机构如研究院、各种专门学校，特别是各该社会事业本身来完成。大学教育应成为学生们通向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知识，成为具有更广博学者专家的桥梁。他认为“通才教育”的灵魂是自由思考和讨论。他引宋代学者胡瑗的话说：“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13] 他特别赞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和作风，“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14]。

抗战初期，梅贻琦在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下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他在政治上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一步步接近，常常作为知名的大学校长和“党内同志”，被邀为蒋介石的座上客，有时还特意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这使他逐渐产生了一种“知遇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梅贻琦以十分欣悦的心情，组织清华师生北上复员。11月，梅贻琦首先抵北平视察清华园。12月初，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他即回昆明，在昆明招待记者会上斥责了便衣暴徒行凶杀人的暴行。翌年7月，闻一多遇刺牺牲，梅贻琦亲自主持组织治丧委员会及家属的抚恤问题。10月，在清华园主持复员后第

一个开学典礼。他曾拟定一个《本校复员后院系充实计划草案》，积极修复校舍，延聘师资，准备把清华大学切实地再向前发展一步，但由于局势动荡，他的“充实计划”未能实现。这期间清华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梅贻琦仍本其既不得罪国民党当局、亦力求不使师生受到无辜残害的态度，曾先后掩护过一些进步和革命师生免遭反动派的毒手。1948年8月，他得知反动派黑名单上有吴晗的名字，就连夜找到吴晗对他说：“你要当心，千万别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就没有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15)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已在旦夕，吴晗等清华校友曾从解放区拍电报给他祝寿，挽留他不要离校；但梅贻琦似乎事前即做好出走的安排；他在城里设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学校一些重要账目及贵重物资转移到城里以“应变”。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前几小时他离开学校，在城里逗留了一星期，终于21日由国民党当局派来的专机接往南京。同日孙科内阁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但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他由上海抵广州，6月飞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9月参加“联教”组织大会，任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12月飞纽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商清华基金保管及运用事宜，后即常驻纽约。1950年起，他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常务董事。1951年，他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

1955年，梅贻琦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即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觅定新竹所址。1956年2月，他赴东京及纽约参加原子能展览及讨论会，11月赴美洽办定制原子反应堆事宜。1958年7月，他出任台湾政府“教育部长”（1961年因病辞去），仍兼任新竹清华研究所所长。1959年起，兼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因患癌症，于1962年5月19日去

世。

---

(1) 唯真学会是当时清华校内之学生团体，施滉、冀朝鼎等均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

(2) 《清华周刊星期增刊》1927年5月28日。

(3)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7年12月4日。

(4) 《清华校友通讯》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

(5) 《清华校友通讯》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

(6) 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9期（1940年9月）。

(7)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年9月23日。

(8)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7年12月4日。

(9)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7年12月4日。

(10) 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9期（1940年9月）。

(11) 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9期（1940年9月）。

(12)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941年第1期。

(13)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941年第1期。

(14)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5年11月5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 吴晗：《清华杂忆》，《光明日报》1961年4月23日。

孟恩远

张学继

孟恩远，字曙村，天津人。1859年（清咸丰八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童年时代以卖鱼虾为生。成年后投入淮军当兵。1894年11月，鉴于陆海军在中日战争中惨败，清廷命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主持编练新军，首练十营，号“定武军”，孟恩远从淮军转入定武军。

1895年，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到天津小站主持编练新军，规模有所扩大，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孟恩远在袁世凯手下历任新建陆军右翼骑兵营队官，北洋常备军第二镇骑兵第二标标统、第四镇骑兵第四标标统，直隶巡防营统领，河南南阳镇总兵。1907年，孟恩远随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前往东北任职，初任吉林省巡防营翼长，升记名提督，并任吉林督办剿防事宜。1911年，升任陆军第二十三镇统制，下辖第四十五协（协统高凤城）、第四十六协（协统初为张春廷，后易裴其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孟恩远改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当时，东北境内宗社党活动猖獗。11月20日，吉林巡防营统领郑宝斋在伊通州被宗社党人刺杀身亡。事发后，孟恩远一面派人捉拿凶犯，一面派重兵在省城吉林日夜巡逻，严防宗社党扩大事端[(1)]。11月22日，孟恩远升任吉林护军使，仍兼第二十三师师长。1914年6月，吉林护军使一缺裁撤，孟恩远改任镇安右将军督理吉林军务。1915年袁世凯称帝，孟恩远表示赞成，被袁世凯授予“一等伯”。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孟恩远投靠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7月，改任吉林督军。为时不久，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因争权

夺利酿成“府院之争”，作为皖系督军，孟恩远参与了“督军团”的活动，成为“督军团”的重要一员。当“府院之争”达到高潮时，段祺瑞决心解散支持总统黎元洪的国会。1917年5月21日，“督军团”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京的各省督军及督军代表由年长的孟恩远与王占元两人领衔，呈文总统黎元洪，借口宪法会议通过的宪法条文，将导致所谓的议会专制，陷内阁于“颠危之地”，要求“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2)]。21日，黎元洪召见孟恩远与王占元，训诫他们切勿超越宪法行事，对宪法草案有意见可商诸国会。黎元洪还表示：时局的症结在内阁，国务总理段祺瑞“理宜引退”[(3)]。孟、王退出后将总统的态度转达在京各督军及其代表，孟恩远随即离京前往天津，在此观望事态的发展。

由于双方不妥协，黎元洪于5月23日颁布总统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职务。段随即出走天津策动“督军团”出来驱逐总统，由此激成张勋复辟。张勋复辟后，孟恩远被授予“吉林巡抚”。对此，孟恩远一面上折谢恩，一面派亲信于当天返回吉林，催促省长郭宗熙迅速办理交卸离开吉林，随即发出告示，宣布吉林各机关一律改用宣统年号，并悬挂清龙旗。张勋宣布复辟后，各省并未响应，而且段祺瑞又在天津组织“讨逆军”，孟恩远见势不妙，急电吉林解释误会，请郭省长照旧供职。孟恩远首鼠两端，遭到吉林省议会的弹劾。上海《时报》载文讽刺说：“复辟后旬日内之吉林，态度凡四变，东泊西飘，朝秦暮楚，官场直作戏场看。……读神怪小说《西游记》，恒叹孙悟空之善变，不期千百年后，具七十二变玄妙功夫，竟有驾齐天大圣而上之孟恩远在。”[(4)] 复辟取消后，孟恩远立即去拜谒“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本想有所解释，未料到段对他非常不谅解，闭门不见，孟恩远吃了闭门羹后怏怏不快，返回吉林。

奉天督军张作霖在统一奉天军政、坐稳“奉天王”宝座后，即着手兼并吉林、黑龙江两省，以实现其“东北王”的梦想。张作霖利用黑龙江省内部的矛盾斗争，派孙烈臣率兵进驻黑龙江，并保荐他的同乡和

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黑龙江的实力派许兰洲部被强行调到奉天，成为张作霖控制的一部分，而不服的英顺、巴英额则被撤职，黑龙江完全纳入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张作霖在夺取黑龙江之后，又把手伸向了吉林。张作霖抓住孟恩远参与复辟的把柄，策动吉林籍国会议员向北京政府控告，要求罢免孟恩远。段祺瑞立即响应，于1917年10月18日下令免去孟恩远的吉林督军职务，调为北京将军府惠威将军，令其进京供职。与此同时，将察哈尔都统田中玉调任吉林督军。田中玉是段祺瑞的亲信、皖系干将，过去在长春驻扎过，与日本人关系“极为良好”。调令发布后，孟恩远立即宣布拒绝服从。张作霖对此也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想驱孟，取得吉林地盘；另一方面，张作霖更怕亲日的皖系干将田中玉来吉林，迎来一个更强的对手。在张作霖看来，与其让田中玉来吉林，不如让孟恩远再干一段为好。这样，张作霖便暂时放弃驱孟的念头，转而在北京政府与孟恩远之间进行斡旋，北京政府不得不允许孟恩远“督任延期”。

为了捍卫自己的督军宝座，孟恩远决定迅速扩充军队，增强抵抗实力，并派军队至哈尔滨，震慑俄国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人，希望以此来博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北京政府的好感。但他在吉林无节制地扩军极大地加重了吉林人民的负担，这时，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乘机“唆使吉林公民何守仁等，分别向国务院及东三省巡阅使署控孟恩远纵兵殃民八大款”[(5)]。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免去孟恩远的吉林督军，改调将军府惠威将军。

孟恩远依然拒不服从调令，并唆使其部下及外甥、吉林第二混成旅旅长高士傧等反对易督，举兵反抗。张作霖勾结日本吉林驻军，制造宽城子（长春）事件，并派吴俊陞和孙烈臣率大军南北夹击吉林，迫使就范。这时，北京政府又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二人免职。命令称：“孟恩远应问不能严守军规之罪，其所有督军事务，可移交鲍贵卿，径来北京。”[(6)] 至此，孟恩远四面受敌，不得不遵令离开统治多年的吉林，回天津当寓公。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在大战爆发以前，为了捣毁张作霖的老巢，吴佩孚通过孟恩远居间联系，任命原吉林暂编第一师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卢永贵为副总司令。卢永贵原为高士傧的部下，高士傧下台后，卢永贵被张作霖收编为中东路山林剿匪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高士傧由哈尔滨潜入卢永贵的司令部，由中东路的终点五站起兵反张。但很快被张宗昌打败，高士傧及其弟高秀峰、卢永贵兵败后，落荒而逃。6月3日，逃至中俄边境的珲春，投奔高的旧部营长邬某。但邬出卖了他们，将他们捉住献张。6月5日，张宗昌请准张作霖将高等三人就地枪决。从此，孟恩远不再过问政治。

孟恩远利用多年来搜括的钱财在天津附近购买了大量土地，并在天津投资经营面粉厂、棉纱厂等工商企业，是当时天津有名的官僚资本家。

1933年，孟恩远在天津病故。

---

(1) 《吉林通信》，《民立报》1912年12月30日。

(2)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22日。

(3)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24日。

(4) 《吉林之反正谈》，上海《时报》1917年7月16日。

(5) [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1页。

(6)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371页。

孟目的

寿祝衡

孟目的，名广义，字目的，北京人，1897年10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其父孟继增，为公理会牧师。

孟目的少年时代在通县端蒙小学就读，以后入潞河中学、萃文中学，1918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大学（北通州）（燕京大学前身），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的留美学习班。毕业后，院方公布取消药科学生留美计划，经该院英国教授资助，他去英国勤工俭学。1919年到伦敦后，他先在爱兰伯利药厂实习，1921年考入伦敦皇家大学药学系，毕业后，取得英国皇家药学会会员资格，为该会第一名中国会员。

1925年，孟目的学成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药房副主任。鉴于我国药学工作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当时药房的调剂人员少，知识水平低，孟乃联合同事冯志东、何鉴清等，于1927年创办了北京药学讲习所，以提高初、中级药剂人员的业务水平。二十多年中，这个讲习所培训了两千多名中级调剂、制剂人才。

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邀孟目的去南京，参加编纂《中华药典》，并任命孟为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系主任、军医学校药科主任。其时，各国药品竞相倾销，伪劣药品充斥市场。国民政府决定编纂一部药典，孟认识到药典是国家对药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的技术规定，是药品生产、使用、供应、检验、管理等共同遵循的法定依据，编订药典是一项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必须认真做好。他首先创议并厘定“药典”这个名称，明确这是药品的法典，是国家对药品的立法，具有法律上的约束

力。其次，初步统一了许多药品的名称。当时，药品多数是进口的，商品名、译音都很乱，孟等潜心考察了我国一些词汇，结合制剂的特点和拉丁名的音节，拟定了简明的剂名，如用酒精提取或制备的制剂，拉丁名称Tinctura的定名为“酊剂”，拉丁名称Spiritus的定名为“醑剂”；其他如Tabellae称“片剂”，Suppositoria称“栓剂”等，比较简短、明确，沿用至今。

1935年，中国药学会举行第七届年会，孟目的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学会理事。年会对于加强药学教育问题展开了讨论。当时国内仅有少数医学院校设有药科，校方又都重医轻药，药学教育得不到发展。孟目的和一些年会参加者强调应当创设独立的药学院，学制应改三年为四年。会后，孟等人四处奔波，据理力争，于1936年在南京设立了药学专科学校，孟任校长，并兼药剂学、调剂学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孟目的率领药学专科学校迁往武汉，1938年又迁到重庆。孟悉心教学，培育青年，赞助爱国抗日的学生去延安，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于1939年被免去校长职务。次年，孟去香港创办协和制药公司，一面筹设药厂，一面为抗日军民选购药品器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香港，孟辗转回到重庆，创办协和制药厂，自任厂长，生产磺胺、葡萄糖等原料及制剂。孟并兼任药学专科学校教授，每星期去讲课两天。他十分关心培养造就药学专业人才，于1943年冲破重重阻力，敦请中英友好协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交涉，选派六名药科毕业生赴英深造。

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目的至上海主持接收七个日伪药厂。他不辞辛劳，将接收的药厂加以调整，成立了第一制药厂。他还准备调整组建其他药厂，发展我国的制药工业，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挤，未能如愿。1946年春，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筹建制药厂，当时孟恰回北平奔父丧，解放区派专人迎孟前去进行技术指导，孟欣然前往，受到解放区领导人聂荣臻等人热烈欢迎。孟建议根据解放区的具体条件，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当地出产的麻黄提取麻黄素，利用柴

胡制造柴胡注射液等中药制剂。孟对生产操作要求严格，经常亲自动手洗安瓿、灌药液、焙封、检漏等，对别人操作的还要检查。孟还给技术人员讲授制药基础理论，给青年工人讲授制药操作知识，有时学生因事缺课，他还给补讲。药厂经过孟半年的指导，扩大了生产规模，改进了产品质量，职工提高了技术水平。

孟目的从解放区回到上海后，被聘任药品制剂厂厂长。他为生产防治疾病的药品，发展我国制药工业不遗余力。该厂解放后称上海制药一厂，生产磺胺噻唑、葡萄糖酸锑钠等原料药。葡萄糖酸锑钠习称五价锑，是治疗黑热病的有效药物，对消灭华东几省流行的黑热病起了很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孟目的继续为发展我国药学事业努力不懈。1950年，他由华东人民制药公司调往中央药品检验所（1962年改称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并任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总干事、药理小组组长，1952年起任副主任委员。他对药典编纂工作非常认真细致，还亲自编写部分条目，逐字推敲修改文稿，并对规定的质量指标和检验方法进行复核试验，逐一修改订正，于1953年定稿出版。此后，孟仍不断修订充实药典，1957年主持编订了第一增补本；1963年版收载各类药品一千三百一十种，在结合我国医药生产实际，反映医药科学研究的成就，整理祖国医药使之逐步标准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以后，孟继续被聘为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耄耋之年，仍为编纂新版药典贡献力量。

孟目的对中国药学会的工作十分热心，藉以推动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自1935年第七届药学会年会上当选为药学会理事后，历任第八、九、十、十一届理事，第十二届理事长。药学会总会由南京迁到北京，在195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58年起并兼北京分会理事长。孟经常到药学会主持会务，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为《药学学报》、《药学通报》、《中药通报》撰写和审改文章。

孟目的先后被推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常委。

1983年5月21日，孟目的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袁士诚、谢海洲：《热心药学事业的孟目的教授》，《药学通报》1981年第16卷第3期。

卫生部药典委员会提供的资料。

孟目的家属提供的资料。

苗杏村

王家鼎

苗杏村，原名世远，字杏村，山东桓台人，1875年3月15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初八）生。父苗仲九务农。苗杏村早年因家贫未能上学，目不识丁。十五六岁时充当“赶脚”，于家乡桓台索镇和小清河下游羊角沟之间，驱赶小驴代客驮运，故当其发家致富后，辄以“两条腿的本钱”自诩[(1)]。

清末，胶济铁路尚未兴修以前，索镇得濒临乌河水旱码头之利，手工作坊、商业和过载栈（运输行）比较繁盛。1894年前后，苗杏村的长兄苗世忠以经营煤炭所得，与本街荣种森合伙，在索镇开办恒聚油坊。不久，苗世忠病死，由苗杏村次兄苗世厚继任油坊副理。苗家经过数年经营，兼放高利贷牟利，颇有积蓄，遂逐步向外地拓展，于1906年与人合伙，在济南泺口创设了恭聚和粮栈。苗杏村即随兄前往泺口，辅助经营。旋又由恒聚油坊出资，在泺口开办恒聚和粮栈，苗杏村出任经理。因泺口粮业有利可图[(2)]，1910年苗家复独资在泺口创设公聚和粮栈，苗杏村任经理。翌年苗世厚病死，苗杏村继其产业苦心经营。其时，索镇荣家惧于形势动荡而提出分伙要求。双方协议：苗杏村在索镇恒聚油坊的股权归荣家，荣家在泺口恒聚和粮栈的股份则归苗家。

1911年，苗杏村眼看津浦铁路修筑工程行将竣工，济南商埠必将取代泺口为贸易中心，乃收束公聚和、恒聚和二家粮栈，集中经营公聚和粮栈和设于济南的恒聚成炭栈。1912年，为扩大粮栈业务，苗家在济南经一路纬四路修建三十余间门面的楼房建筑，并改恒聚成炭栈为粮栈。是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南北客商云集济南。苗杏村多方结交应酬，广为招徕，致使恒聚成驻客经常有二百余家。他又派人南

下徐州、蚌埠等粮食集散地，兜揽客商，生意日隆。至1913年底，已获纯利四万余元，为恒聚成原始资本的五十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我国面粉业乘时发展，粮食市场随之活跃。苗杏村为扩大经营，将粮店职工由二十三人增至四十六人，在津浦、胶济沿线设坐庄三十余处，代客买卖并自运自销。

1915年10月，广州部分出口客商和丹麦宝隆洋行买办罗叔素等人，来济南大宗采购生米、生油，运销南洋、欧洲。苗杏村不惜重金殷勤款待，并以“回扣”相笼络，同时又严密封锁消息，使同业无可乘之隙。与此同时，他采取坚守信用、质量第一的方针，以取得广东客商的信赖。他垄断了“广帮”生意，每年获纯利四万元上下，直至“七七”事变后海运中断，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其间，恒聚成不仅垄断济南的生米市场，而且博山、泰安、滕县、徐州一带的生米行市，亦唯其马首是瞻。

同年，无锡茂新面粉厂资东荣宗敬派人到济南采购原料，苗杏村办得既快且好，引起荣宗敬的重视。荣宗敬到济南调查小麦产销情况，苗全力与之结交，后又赴沪访荣，过从甚密。嗣后，荣宗敬在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苗倾力协助选址、购地、建房、装机，使该厂得以于1920年3月顺利开办。荣力邀苗出任经理，以示酬谢，苗不愿为他人做嫁衣，婉辞不就。但恒聚成、公聚和却从此取得为茂新四厂代购小麦的专权，每年获佣金二万元，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茂新厂停机。

苗杏村在经营粮栈的同时，还从事工业和金融投资。1918年他向其儿女亲家穆伯仁创办的惠丰面粉厂投资一万五千元，任该厂董事。1919年又投资穆伯仁所办的晋丰面粉厂、通惠银行和晋泰公司。后来，苗、穆之间因惠丰厂协理职位问题发生争执，苗一怒之下，撤出在穆所有企业中的全部投资，以股权和房产一举偿清通惠银行的巨额

贷款。

1921年10月，苗杏村联络同乡苗星垣、王冠东等人，集资发起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星垣为董事兼经理，王冠东为监察人。因资金不敷，苗杏村赴上海转托荣宗敬，向国外赊购了一批机器。该厂1922年8月投产，日产面粉五千二百包。1924年再度增资，6月在北京政府农商部核准注册。同时新设永丰祥麻袋庄，并建筑恒聚成粮栈仓库，一面办理银行外仓抵押，一面代客货办理押款，收取栈租。同年，京、津面粉市场为进口外粉所夺，成丰厂产品滞销，资金周转陷入困境，后得董事车百闻邀得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投资和贷款支持，始渡过难关。1929年再次扩大生产规模，自设铁工部，制造部分磨粉机器。成丰1930年投产，日产面粉八千余包，成为当时济南面粉业中首屈一指的厂家。此时，成丰厂的人事和经营权，为苗星垣等所左右，苗杏村任董事长徒具虚名，遂决意另起炉灶。

苗杏村为了开拓其经营门径，不断结交北洋军阀和政府当局，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民国初年，他首倡成立济南商埠粮业同业公会，任会长。1916年7月，任商埠商会会董，旋任常务董事，垂二十年。1924年任山东省督办公署咨议。1925年以重金与张宗昌部第九军军长兼运输司令朱子芹相结纳，常假“军运”之名运送粮货，俾能吞吐及时，在同业竞争中独占鳌头，大获盈利。1930年韩复榘主鲁后，他与其实业厅长王芳亭时相过从，并得韩复榘赏识。后经韩提名为国民会议代表，出席1931年5月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1934年7月，任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济南分会会长。1935年任山东省政府参议[(3)]。因此，他的实业活动，曾长期得到统治当局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

1929年，济南民安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宣布倒闭清理[(4)]。苗杏村乘机租用其全套设备，组织成记面粉厂。双方议定机器修理费由租金中抵拨，民安厂在一年半内无法得到租金。这时，民安厂因无力偿

还债权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六万元欠款本息，经法院判决，拍卖其抵押的部分固定资产。苗杏村以八万元购得其仓库和地皮后，转而以部分产权变更为由，要求重议租价。逼得原资东张怀芝等人走投无路，将一百余万元全部股权折价三十七万元让渡给成记[(5)]，苗杏村终于蚕食了民安厂的全部财产。1934年组成成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其侄苗兰亭（苗世厚之子）任常务董事兼经理。为控制企业，厂内各要职，均由恒聚成旧人充任。此时市场粮价因受国民政府“麦棉借款”影响暴跌，成记厂原粮耗尽，资金枯竭，无法开机。苗杏村奔走求援，得到山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兼民生银行董事长王向荣支持，取得该行八十万元信用贷款及抵押透支，低价购进大批小麦备用。次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制，刺激了物价回升，当年成记获纯利三十五万元。苗于1936年开设恒聚成北记面袋厂，以适应成记需要。

苗杏村鉴于济南已成为当时国内主要棉花市场之一，发展纺纱业有利可图，遂于1932年6月与苗星垣等人再度合作，发起组织成通纺纱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苗杏村广为募股，凑集七十五万元，并亲赴上海托荣宗敬担保，向英商怡和洋行赊购一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一千五百千瓦的发电机一部，连同成丰厂铁工部的自制机器，于1933年5月开机投产。到1937年时，该厂扩充到一万九千六百枚纱锭，年产量达到一万四千余件。但苗星垣等从建厂伊始就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控制了企业，与苗杏村间的矛盾随之加深。

1935年底，济南规模最大的鲁丰纱厂，因经营不善，无力抵制日本纺织品的竞争而停业倒闭[(6)]。1936年2月，韩复榘迫于该厂失业工人请愿的压力，授意苗杏村接办整理并派军队“保护”[(7)]。苗遂代表成通纱厂，以月租三千元与民生银行签订承租合同，改名成通纱厂分厂。1936年9月因经营失利，亏赔九万余元而再度停业。此时苗星垣等人坚主退租，但苗杏村却仰恃韩复榘的支持，为摆脱苗星垣等人

的羁绊，决计倾力以赴，独自承租，遂签订租赁合同，改名为成大纱厂。苗集资三十万元，又取得民生银行信贷透支八十万元，于1936年11月7日开机投产。他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设施等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由鲁丰时期日产十六支纱六十件提高到七十三件，所出凤山牌、工农牌棉纱畅销各地。

1937年7月，民生银行以原鲁丰纱厂积欠旧款无力偿还提出起诉，经法院判决，拍卖鲁丰全部固定资产。苗杏村遂认价承领，以八十五万元的代价，取得了鲁丰价值二百余万元的全部产权。

“七七”事变后，苗杏村一度拟迁成大、成通二厂于内地，但又认为“日本人也得做买卖”，迁厂遂告中止。12月济南沦陷后，日军军管成大，随后半年内，成通、成丰、成记也相继被军管。此时苗杏村尚保有恒聚成粮栈、恒聚成北记面袋厂，其业务已捉襟见肘。1938年初，马良等人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暂代伪政府职权，苗杏村被推为评议员。3月筹建商会，初拟推苗为商会会长，因其抱病体衰，会长职遂由其侄苗兰亭出任。1939年，苗力促苗兰亭出资创立鲁兴银行，推行伪钞，进一步走上附逆道路。

苗杏村热心参与慈善活动，先后担任华洋义赈会董事、山东省赈务会委员、惠鲁工商中学董事等职。1937年秋，任历城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曾设立收容所四处，捐资设立小学三所[(8)]。

1940年12月14日，苗杏村在济南病故。

---

(1) 市工商联文史组：《五十年来的桓台苗家资本集团》，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资料》第2辑，1981年版。

(2) 据1914年4月15日《山东公报》载：泺口在1912年（民国元年）初津浦铁路未通车前，尚有粮栈三十余家，足见当地粮业之兴盛。

(3) 至晚在1936年底以前，苗杏村已取得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档案。

(4) 民安面粉厂系北洋军阀靳云鹏、张怀芝、王占元等在1920年创办，其管理人员多是校尉军官出身，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5) 此数字依据山东省档案馆藏《苗杏村致民生银行函》1935年7月12日。

(6) 鲁丰纱厂成立于1915年，由北洋军阀潘复等人创办，历任董事长有王占元、庄乐峰、田中玉、潘复等。

(7) 1936年3月28日，山东省政府第四七五次政务会议决有鲁丰纱厂“先由通成纱厂承租，其法律问题由省府解决”等语。见《山东省政府公报》第378期。

(8) 《苗杏村先生讣告》、《哀启》，山东省图书馆藏。

缪培南

边篆

缪培南，字经成，号有群，广东五华县人，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贫寒农家。父缪献琴终年劳作不息，全家仍食不果腹。缪培南幼时曾随祖母外出乞讨度日。他意志刚毅，勤奋好学，1905年得入塾求读，两年后入本县长蒲初小，继入五华模范高等小学。1912年他考入广东陆军中学，两年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冬毕业。翌年初，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六期步科生，与薛岳、余汉谋等同学。多年的军校学习生涯，进一步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更掌握了比较系统的军事科学知识。

1919年春，缪培南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发到段祺瑞所属的边防军任见习排长。翌年直皖战争中段祺瑞告败，参战的边防军宣告解散，缪回到广东，得族兄缪培堃之举荐，加入邓铿粤军第一师，任上尉教官、机枪营第一连连长。1921年5月调至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任薛岳第一营第二连连长，11月护卫孙中山至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1922年6月，陈炯明统率的粤军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缪培南在薛岳率领下与叶挺第二营固守总统府，保护宋庆龄突围脱险。8月，又参加了东江方面的河源、博罗战役。1925年，又次第参加了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以及南征讨伐邓本殷之役，因战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副官长；1926年5月任第三十五团团长，驻海口。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缪培南所在的第四军第十二师奉命北上进军湖南，先在湘江东岸参加攻占醴陵、平江战役；8月26日参加汀泗桥之战，缪与叶挺独立团夹攻铁桥，全歼守敌；29日又与叶团担任中路攻击贺胜桥之主力，奋勇冲杀，击败了敌军侧翼之反击，胜利夺取贺胜桥，为北伐大军攻占武汉打开了通道，亦为第四军

赢得“铁军”美誉做出贡献。

北伐军突破吴佩孚的所布层层防线后，直逼武昌城下，缪培南第三十五团被部署在宾阳门至忠孝门之阵地，两次攻城受挫后死死围困不懈，直至10月10日守城部队出降。10月20日，缪团被调赴江西战场，参加马回岭之战。缪指挥所部与敌激战直至肉搏，与友部合力遏止了敌之反击，夺取了马回岭。继于11月2日参加了德安之战。江西光复后，缪因战功于1927年1月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

1927年4月，北伐军进军河南，讨伐奉军。缪培南指挥所部5月14日在上蔡战役中击败奉军第六军于东西洪桥后进驻宋庄。奉系援军第十军来攻宋庄，缪待敌进至近时指挥所部发起猛冲，迅即击退来敌；继之率部攻击临颍，在十里头正面主攻守敌，激战不已，终因双方力量悬殊，缪部只能转攻为守，后得援军之助一举克敌，进据临颍城。6月，北伐军回到武汉，7月15日缪升任第十二师师长。

大革命洪流在“四一二”“七一五”两次政变后急转直下，8月1日叶挺、贺龙等部在南昌起义，正驻九江的缪培南师奉命南下讨伐。其时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归附李济深回粤，缪乃率十二师驻扎广州市区整训。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听命汪精卫在广州发动政变，缪不赞拥张、黄之举，称病离开部队，师长一职被张另命吴奇伟代之。12月政变失败后，张、黄被迫离职，第四军五个师交由缪培南指挥。12月18日，缪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为副军长。缪深恐第四军如今已难以在广东立足，乃集中惠阳北去入赣。途中遭到桂军、粤军之不断追击，缪指挥所部左冲右突，损兵折将，减员甚众，直到翌年1月，经贝岭退入江西安远、会昌一带归附蒋介石。

1928年4月，蒋介石指挥四个集团军北伐奉系张作霖，缪培南率第四军编入第一集团军北上。在攻克枣庄、滕县、界首、泰安等战役中，第四军均以急攻猛冲的战术取捷，后进至济南近郊，占领机场。“五三”惨案发生后，第四军退至界首，经东平、东阿渡黄河北

上，攻略德州进至沧州。在奉军撤往关外后，缪培南率领第四军驻防德州。继后蒋介石编遣军队，第四军调泰安整编，缩编为陆军第四师，原有五个师的兵力被缩编成三个旅七个团，兵员减少三分之一，军费开支更被严格控制。缪大失所望，愤以称病赴沪，1929年3月去香港闲居。

1930年春，缪培南应陈济棠之邀，至梧州任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翌年1月升参谋长。缪派员向张发奎、白崇禧游说，化解了他们与陈济棠之间的芥蒂，进而实现了两广合作。1931年5月，反蒋各派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陈济棠出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缪培常为集团军参谋长，并兼第一教导师师长，嗣后教导师改为第五军，缪为军长。缪竭力召集原第四军之将领来粤共事。“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在“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在上海举行“和平统一会议”达成妥协。缪培南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后来在国民党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5月，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谋议以出师抗日之名反蒋。缪培南认为两广之军力难以与蒋抗衡，极力劝阻，但难以说服陈、李。“六一”事变发生后，陈济棠部许多将领纷纷投蒋，陈无力挽回颓局，在缪劝说下下野去港。蒋介石于7月13日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余与缪培南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同学，毕业后在边防军、粤军、第四军前后共事八年，关系密切，乃邀缪出任第四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后又任第五军军长兼广州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缪培南任广东第三军区司令官。缪嫌余汉谋对自己信任不够，先称病回家，1938年5月弃职闲居。1939年4月，缪应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之邀，至韶关出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12月，日军沿粤汉路向粤北进犯，缪指挥第六十五军和六十二军集结于翁源、青塘，在横石、佛岗攻击日军，切断了日

军后方联络线，迫使敌军撤退，为第一次粤北大捷做出贡献。后因胃病复发，于1940年3月改任粤赣向边区总司令，指挥潮汕地方团队抵抗日军。1945年1月调任支江行署副主任、代主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缪培南在惠州受降，侵至东江的日军第一〇四师俯首缴械。1946年春，张发奎出任广州行营主任，缪为联勤总司令部第三补给区司令，负责两广地区部队的后勤补给。1947年5月起，缪升任广州行辕副主任，翌年8月改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广州一时成了“首都”，缪见势不可挽，乃辞职，于9月离粤去港寓居。

缪培南在香港专注于医药研究，1952年冬著成《医学简要》十卷二十五万字，1953年著成《药性新编》五卷十二万余字。

1970年5月9日，缪培南在香港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邹瑛编选：《缪培南先生年谱》，（香港）穆园书舍1971年版。

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戴仰明：《缪培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人物传记》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缪云台

熊尚厚

缪云台，名嘉铭，号云台，1894年3月23日（清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七日）生于云南昆明。祖父和父亲都经营酱园，家境小康。缪云台七岁入塾读书，清廷废科举兴办学堂后，1905年改入公立小学学习，三年后考入昆明方言学堂英语班（后改名云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云南高等学堂解散，1912年他入留学预备班。翌年6月获官费前往美国留学，先入康萨克斯州的西南大学，一年后转入伊利诺大学，嗣又转入明尼苏达大学，均学矿冶。1916年春，他曾回国参加护法，同年秋返美继续学习。缪云台1918年毕业，供职纽约王肯钢铁公司年余。

1919年10月，缪云台回国，次年春返回昆明。他立志兴办实业，走西方富国之路，乃向当时云南省都督唐继尧提出整理锡矿意见书，11月被派为个旧锡务公司总理。时个旧锡矿财务亏损，债台高筑，他大刀阔斧进行整顿。首先清理债务，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和富滇银行借款，然后厉行节流，裁汰冗员，进而改革技术，采用西方新法开采，以重金聘请英国专家，重用技术人员和经过短期培训的技工，改造熔炼设备和技术，短短年余时间，公司面貌大为改观。1922年春，唐继尧打败顾品珍复任云南省省长，免去缪的锡务公司总理，改任云南省政府高等顾问，因无事可做而滞留上海。

次年11月，他应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李根源之邀去北京，曾任农商部佥事、商标登录处处长等职。1924年初，缪云台将亡母灵柩由沪运回昆明安葬毕，唐继尧派他任富滇银行会办，负责视察海防、香港、上海分行业务。1928年1月，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后，曾派任富滇银行总办，他未应允而留在香港。翌年5月回到昆明，出任新设的云

南农矿厅厅长，11月改任省政府委员。1930年秋，云南省整顿金融委员会成立，他任常务委员，负责主持实际工作，12月复兼农矿厅厅长。任内他提出成立进口特捐局，不顾外商的反对，对进口商品征收特捐，使云南的财政和经济得到好处，龙云十分高兴。次年夏兼任新设的云南劝业银行总经理。

缪云台一面主持劝业银行业务，一面负责农矿厅工作，开始大显其经济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才能。他认为要发展云南的经济，必须着重出口贸易，而出口贸易的发展首要发展锡矿，在其建议下于1932年冬成立云南炼锡公司，担任总经理。由于农矿厅和劝业银行并归建设厅，所以他专任炼锡公司之职，聘请英国专家亚迟迪克主持炼锡。经过改良提高了产品质量。翌年初，炼锡公司投产，年产达两千吨，后增至一万零五百吨，锡条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达到国际市场的标准。接着解决直接外销问题，使云南和国际市场间的电讯及滇币与外币问题得到解决，产品直销伦敦市场。炼锡公司业务成绩显著，缪云台被称为云南“锡大王”。

1934年春，缪云台任富滇新银行行长，仍兼炼锡公司总经理，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银行业务。接任后首先采取两项措施：（一）清除特货（鸦片）寄存、抵押等业务。（二）除上海、香港、海防等三个分行外，省内外办事处一律撤销；接着清查账目。为在短期内能够支付汇兑而实施外汇管理，又采取：（一）全部购进炼锡公司的外汇，使其汇兑业务正常化。（二）推行跟单押汇和省政府机关汇兑全由该行包办，不代理省金库、不为省府举债，使该行具有独立性。（三）发行新滇币贬低币值，挤走法国的越币。从此银行业务走上轨道，奠定了云南的金融基础。

缪云台以富滇新银行为依托，建议省政府成立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以提倡基本建设事业，发展云南经济，使政企分开，成为一专门管理企业的企业机构。1934年12月，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成立，他任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云南的经济政策，对省内的经济复苏起

了极大作用。在人事及事业管理上采用分权制，实行间接管理，纵的方面用单位责任制，横的方面用分层负责制，注重延揽管理和技术人才，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地方实业。除经营锡务公司外，在战前先后创办了云南纺织厂、云南五金厂、昆明电力厂、云南金属工具公司，以及开蒙垦殖局、明家地马料河水利工程处等，拥有三十八个企业，还鼓励农民种植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

抗日战争时期是云南工业的大发展时期，缪云台抓住有利时机，与中国银行、资源委员会及其他民营企业合资，又先后投资合办了裕滇纺织厂、昆明水泥厂、云南锡业公司、云南百特矿务公司、云南化工厂、裕云机器厂、中国电力制钢厂、云丰造纸厂、华新水泥公司、昆明水利工程处、云南缫丝厂、蚕业新村有限公司等等。在战时大后方工商界中，缪云台有较高地位和声誉，曾任工业协会理事长、经济建设研究会理事长等职。在抗战初期，他被云南省政府派为修筑滇缅公路的中方代表，前往仰光与缅方商定协议，并亲自勘探地形催促动工，于1939年初通车。之后又与法国商定输入军火和大米。翌年夏，任中国访缅代表团副团长，就滇缅公路恢复交通事宜进行协商。

1943年春，缪云台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助理居里之邀，与之讨论国际问题，他认为战后维护和平应着重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须立即策划，受到美方重视。7月，他应美国总领事馆和居里的邀请访美，讨论战后善后问题。同时还应英国昆明领事的邀请访英。在英、美两国进行了一年的考察，1944年9月始回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龙云被迫辞去云南省主席，由卢汉继任，以李宗黄代理民政厅长（后任省主席）。缪云台辞去云南省政府委员等职务，暂居重庆。1946年1月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态度公正。会后他回到昆明，眼见蒋介石下令冻结云南经济委员会及云南省企业局的资产，封闭了富滇新银行的库存，重组民生企业公司，使云南地方经济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抵制国民党官僚资本及地方政权的侵吞，缪云台积极筹组云南人

民企业公司，企图运用宪法约束当局，以保护云南地方企业，并实现“民有”、“民营”、“民享”的理想。次年5月，云南人民企业公司正式成立，卢汉任董事长，他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对所属三十八个企业进行整顿，努力在困难中求发展。始初将公司决策程序和管理原则制度化，使公司获得盈利，恢复和稳定了云南地方经济；在政治上支持卢汉的统治。在此期间，他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大”代表，1948年5月任立法委员。

1949年7月，缪云台辞去人民企业公司总经理，前往广州出席立法委员会议。不久，卢汉在昆明起义，他遂移居香港，次年7月去美国，长期侨居于纽约。在美期间，他在一家美国矿业咨询公司和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任顾问，并做点股票生意维持生计。因其拒绝去台湾出任经济部长，1952年被台湾驻纽约领事馆吊销了护照。1955年经美国国会专案通过，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缪云台应国务院的邀请，于1973年和1976年两次回国观光。他为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取得伟大成就深受鼓舞，毅然决心放弃美国国籍回国定居。1979年6月，缪云台及夫人赵佩玲回到北京定居，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对外贸易经济部特约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等职。

1988年9月3日，缪云台病逝于北京，著有《缪云台回忆录》。

主要参考资料

缪云台：《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李希泌：《爱国老人缪云台先生》，《人物》1984年第1期。

郭垣：《云南省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0年版。

张魁堂、陈理：《出国归来的缪云台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风雨同舟专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莫荣新

李伟中

莫荣新，字日初，化名高崇民，汉族，1853年11月20日生于广西桂平县宣一里盘石村，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之孙莫平米后裔[(1)]。莫荣新出身贫寒，祖上均以务农为业。童年时仅读了一年半蒙馆，因家贫辍学，在家务农兼做短工。十五岁到姑丈张仕达的万泰号食杂店帮工，一年后离开，以贩卖食盐和苎麻为生，往来于桂平县山区。1871年，莫荣新投靠时任百色协镇的族兄莫昆甫（字火生），开始了行伍生涯[(2)]。

莫荣新的族兄莫昆甫行伍出身，以镇压太平军余部和会党有功，累迁为百色协镇。莫荣新先在莫昆甫部下充当伙夫，不到半年就被补充为哨兵。1872年，莫荣新随莫昆甫开赴贵州镇压苗族起义军；1884年，又在中越边境参加了中法战争。第二年，因作战勇敢，积有战功，升充毅新营右哨副哨。战争结束后，广西边防督办苏元春调莫荣新为督办署亲兵右哨哨官，长达十余年之久。

19世纪末年，会党和游勇活动遍布整个广西，社会动荡不安。1900年，莫荣新奉命率队进攻百色一带的游勇和会党，积功升充镇南营帮带。1901年，莫荣新又带队进攻归顺州一带的游勇、会党，事后升充管带。同年，莫荣新被派驻防龙州布局，兼任布局对讯官，兼理外事。1903年，苏元春被革职，丁槐接充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后，调莫荣新为贵字右营管带，令其率队进攻十万大山的会党、游勇。自1905年至1910年的五六年间，莫荣新先后在玉林、陆川、桂平、昭平、平乐、东兰等地进剿会党、游勇，1907年积功升为两营督带，旋又升游击衔，赏戴花翎。1909年，晋升为广西巡防队帮统，驻兵梧州。1910年，参与镇压了岑溪县崇正团大城圩民众抗议地方官吏加征

契税的斗争。1911年6月，莫荣新奉新任广西提督陆荣廷之命，率部驻守庆远。

辛亥武昌起义后，梧州、平南、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先后响应独立。莫荣新在柳州同盟会党人王冠三等人的劝说下，于1911年11月中旬在庆远宣布独立。其后，广西军政府委莫为庆远府长。11月下旬，陆荣廷继任广西都督以后，为消除广东惠军统领王和顺（原南宁会党首领）对自己广西都督职位的威胁，派龙觐光率军进驻梧州，并于1912年5月19日委派莫荣新任梧州府长[(3)]，以隔断王和顺同梧州、藤县民军的联系。

莫荣新在梧州忠实执行陆荣廷的意旨，大肆捕杀民军和会党成员，深得陆荣廷的赏识。时居梧州的前清翰林梁廷栋记其事说："四月初三，新任府长莫荣新到任。莫本以军士起家，于政治未深讲究。……专整顿地方，大加搜缉，清除匪类，无日不有枪毙，甚至日杀四五十人者，行之月余，匪类已去十之七八，将及半载，则四境安靖，经月不闻一案矣。"[(4)] 不到半年，莫荣新兼任了梧州关监督的肥缺；不一年，又擢升广西中区第一正司令，后授陆军中将。1914年，又升任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兼苍梧道道尹；1915年9月，任桂平镇守使，掌管桂平、梧州等十余县军政大权，陆荣廷"倚之如左右手"（《莫荣新墓碑文》）[(5)]。

1916年初春，陆荣廷密谋响应讨袁护国，莫荣新与督军署参谋长李静诚、第一师师长兼桂林镇守使陈炳焜、第二师师长兼龙州镇守使谭浩明等参与密议。3月15日，陆荣廷、梁启超、莫荣新等人通电宣布广西独立，参加讨袁护国运动，莫荣新率部进驻广东肇庆，会同在广东响应的肇罗阳镇守使李耀汉及护国军各部对付亲袁的广东督军龙济光。5月1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举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

1916年5月8日，作为南方统一政府的军务院在肇庆宣告建立，

以唐继尧为抚军长，由副抚军长岑春煊代行。军务院的建立，是西南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开始，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等人在组织军务院及其活动中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膨胀了自己的野心，从而加速了以他们为代表的西南军阀集团的形成。尤其是桂系集团，势力扩张极为迅速。陆荣廷任副抚军长，其手下谭浩明、莫荣新所率领的桂军第四、第五军均为军务院护国军的骨干。其中莫荣新任护国军第三师师长兼肇庆卫戍司令，该师下辖两旅四团，以邓文辉、申葆藩为旅长，稳玉廷、莫正聪（莫荣新长子）、江永隆、刘志陆（莫荣新义子）为团长，其余多是莫的老部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继掌国务院。府院之争一现端倪，桂系为了自身的利益，倾向于支持黎元洪，与投靠段祺瑞的龙济光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6月9日，龙济光宣布撤销广东独立，并密电段祺瑞政府请求派兵援粤。6月18日，龙济光密令韶州镇守使朱福全炮击驻扎韶关城外的护国军李烈钧部，挑起与滇军的冲突，并让北京政府任命他暂署广东巡按使。陆荣廷为夺取广东，命莫荣新趁驻粤滇军与龙济光开战之机向广州进军，配合滇军夹攻龙军。7月6日，北京政府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驻海南；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锟为广西督军。然而，龙济光并不想退出广东，同一天，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又被任命暂署广东督军。桂系为了巩固在广东的地位，令莫荣新加紧向龙济光进攻。7月18日，莫荣新军等各路护国军在狮子头等地与龙军激战，先占领三水，与龙军战于广州外围，屡败龙军。10月，龙济光败退琼崖，陆荣廷接任广东督军，由谭浩明代任，陈炳锟任广西督军，莫荣新兼广惠镇守使。谭浩明无法应付广东复杂的政治局面，即与陈炳焜对调。12月，莫荣新又兼任广东第二混成旅旅长。从此，莫荣新与谭浩明、陈炳锟成了陆荣廷统治两广的三根台柱，开始了桂系据粤的时代。

1917年4月10日，陆荣廷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升任两广巡阅使，以陈炳锟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

州。9月1日，孙中山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诞生。陈炳锟以桂人治粤，既要“自主”于北京政府之外，又要和护法军政府对抗，还遭到在粤各方反桂势力的强烈反对，无法处理好广东事务。同时，段祺瑞在驱逐张勋以后重掌北洋政府大权，并于11月8日委任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李耀汉为广东督军，唆使龙、李率部进攻广州。形势危急，陆荣廷只得将陈调回广西，11月21日擢升莫荣新为广东督军。

莫荣新就任广东督军以后，面对复杂的政局，为了不重蹈谭、陈覆辙，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为了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莫荣新首先坚持以郭椿森为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武宣人，清拔贡，留学日本，善言词，好交际，是陆荣廷的亲信。郭椿森还是同盟会会员、国会议员，又是政学系分子，莫荣新可以通过他的活动联络在广东的晚清遗老、同盟会员、国会议员以及滇军实力派中的政学系分子（如李根源等）。其次，莫荣新祖上是广东人，落籍广西不久，便以原籍广东相标榜，利用乡土观念与广东地方实力派周旋。莫荣新生活俭朴，经常身穿陈旧布衣，手执旱烟袋，与本地人称兄道弟。第三，莫荣新极力扩大桂系在粤的军事势力。他请求陆荣廷任命马济、林虎、沈鸿英为广东第一、二、三军总司令，还成立了第四军，以义子刘志陆为总司令，又以心腹申葆藩、邓文辉为游击司令。为了使部属为自己效力，莫荣新通过各种方式收买人心。在督军署设立“军警同袍社”，少校以上军官和巡官以上警官均可参加。每逢周末，莫荣新与他们在社内尽情宴乐或赌博，有时也替他们解决一点实际困难。第四，注意处理好与粤籍军人的关系。他先后推荐了粤籍军人、地方实力派李耀汉、翟汪、张锦芳、杨永泰任广东省长，魏邦平为第五军总司令兼广东警务处长及广州警察局长，李福林为广惠镇守使。正是由于莫荣新处事圆滑，惯于手段，才能督粤长达四年之久。

对于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莫荣新遵照陆荣廷的意旨，采取了比陈炳锟更为严厉的限制方针。孙中山南下护法三阅月，外而西南群帅

意见不一，内而以莫荣新为首的广东当局不听号令，事事听命于武鸣，视军政府为无物，对军事及财务更是多方掣肘。大元帅府成立以后，莫荣新密令所属军政机关阻挠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在广东招兵买马，并大肆捕杀孙中山派往各地的招兵人员，仅增城一县被捕杀者就达六十九人。孙中山曾痛心地说："当陈炳锟督粤时，曾致电唐继尧，谓听军政府自生自灭。果其听之，犹可言也。今则愈逼愈紧，只许自灭，不许自生。如欲行其职志，而事事掣肘。"[6] 决意对莫荣新进行惩戒。1917年11月中旬，孙中山密令所属海军驻省河舰只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并令听命帅府各陆上部队等海军发炮后即起而响应。命朱执信直接指挥驻河南之李福林部，罗翼群分别秘密联络驻在河北的黄明堂、魏邦平等部及林虎部的梁鸿楷营，约期出动进攻莫荣新之督署。晚上，孙中山临时改为亲自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台兵发炮，奈因炮弹为三十年前彭玉麟抗法遗留之存货，因药包潮湿而轰不着火，第一次炮轰莫荣新流产[7]。

1917年底，为了对抗龙济光与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四面围堵，莫荣新等在林虎的劝说下拨二十营省长亲军给陈炯明，成立了援闽粤军，开拔福建进攻李厚基。准备期间，军政府派大元帅卫队连、排长往石龙招兵数十人，被莫荣新以"剿匪"为名逮捕，孙中山专函保释，莫荣新收信后，为报复朱执信民军之前在顺德、香山对其子莫正聪部的打击，将这些人就地枪决。孙中山赫然震怒说："如果做过土匪的，便要枪毙，那就怎样去处理现在的广东督军和省长（莫荣新和李耀汉）？"[8] 便命朱执信指挥陆上军队，许崇智、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决意进行第二次惩戒。1918年1月3日晚，孙中山命令军舰开炮轰击莫荣新的观音山督军署。然而，此次行动遭到了海军总长程璧光的坚决反对，陈炯明等也因对此次行动持有不同意见而并未响应，当晚仅有李安邦小舰响应向桂军机关扫射。莫荣新事前已从李福林及翟汪处得知了这个消息，商之与参谋长郭椿霖，郭谓："还击则彼众我寡，决无胜算，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莫采纳了郭的建议，下令熄灯灭火，不许所部还击。第二天，

莫荣新主动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安问好。事后，陆荣廷在南宁对盘珠祁说：“孙文呀，满清推倒，就应出洋去，不应东捣乱，西捣乱，他竟敢炮击督军署，日初（莫荣新字）忍得下，如果是我，我一定要还枪，一定要结果他。”在处理与大元帅府的关系上，莫荣新表现出了圆滑的一面。但孙中山炮击督军府也促使桂系走向驱孙、粤桂彻底反目的极端。

1917年12月10日，龙济光通电就任两广巡阅使，率部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在粤桂系：李嘉品为第一路，段云源为第二路，马存发为第三路，分别从阳江登陆准备攻取广州，从雷州半岛登陆准备攻取南宁。潮梅镇守使莫擎宇也同段祺瑞勾结，进兵东江。另外，粤军实力派李耀汉也受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鼓动，蠢蠢欲动。为了稳固自己在广东的统治，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部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在恩平方向迎敌。同时，派刘志陆的第四军开赴潮梅防堵莫擎宇，陈炯明率领二十营粤籍的省长亲军“援闽”。对粤军李耀汉则采取拉拢和分化并用的手法，一方面多方设法邀李耀汉从肇庆来广州会晤，一方面分化李部，争取李的部下翟汪等拥护桂系。李耀汉被莫所迫，不敢轻举妄动。1918年3月7日，莫荣新又任命军政府总参谋长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部反攻。3月16日，攻克恩平；3月25日，又攻占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逼龙济光主力退缩到高州、化州、石城一带。讨龙军分水、陆两路进击龙军，4月25日收复化州，4月27日攻克石城，4月28日拿下遂溪。龙济光进退失据，被迫弃军逃走，讨龙战争成功。

广州护法军政府除了在南面受到龙济光的进攻之外，北面也受到北洋军的进攻。1918年4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的指令，攻占南雄。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云南巧家人），急调驻韶关等地兵力，增援南雄。由于援兵立足未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急调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率所部

滇军从讨龙战场疾速北进。5月初，李烈钧也奉命率讨龙部队北上增援，会同李根源整顿部队，分三路于6月3日发动全面进攻，激战四昼夜，逼使赣军向江西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是役史称为南雄之战。

为了与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相对抗，由岑春煊倡议西南各省自主军阀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1918年1月15日，“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州成立，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日，莫荣新等联衔通电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明确规定对外对内执行政务，职权有：办理共同外交，订立契约；监督共同财政，办理内外公债之募集；统筹军备，计划作战，议决停战议和事件；议决与各省之争议事件等，还规定联合会议置军事、财政、议和各参赞若干员，由各总代表分别聘任之。联合会议条例从内容上看“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因此遭到了非常国会和孙中山的坚决反对，加之西南军阀之间内部矛盾重重，实际上未能发挥作用。

为了解决莫荣新和孙中山的矛盾，1918年2月，广东实力派魏邦平、李福林、翟汪等曾电请陆荣廷调莫为讨龙军总司令，推荐海军总长粤籍程壁光为广东督军，广东省议会也通电附和。这一倡议遭到陆荣廷的坚决反对。2月2日，在伍廷芳的邀请下，莫荣新又和孙中山集议改组军政府事。4月10日，莫荣新命郭椿森等积极拉拢国会议员中的政学系分子和益友社分子如汤漪等人，以改组军政府为名，向非常国会提出“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案，非常国会通过将改组军政府案交付审查的动议。5月4日，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孙中山愤然辞职，并发表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9)] 5月18日，非常国会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将大元帅制改为合议总裁制。2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为总裁，岑为主席总裁。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经汕头与陈炯明会晤后转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亦告结束。

由于军政府陆军总长滇军将领张开儒拥护孙中山，莫荣新大力支持滇军将领李根源夺取滇军军权。1918年5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后，莫荣新突然发布命令，解散陆军部警卫队，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的招兵机关，并以侵吞军饷的罪名在韶关将支持孙中山的张开儒逮捕，囚禁于督军署。接着，又枪毙了代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以“示威”。同年8月，岑春煊充任军政府主席总裁，以莫荣新兼任军政府陆军部长。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迅速席卷全国。5月11日，广州各界在东堤东园广场举行十万人的国民大会，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坚持废除中日密约，收回青岛。29日，广州各界约三万人再次游行示威，烧毁先施、真光、大新三大公司的日货。莫荣新指示警察厅长魏邦平派出军警，逮捕一批学生。各界人士大愤，酝酿罢课、罢工、罢市，魏邦平被迫释放被捕学生。7月10日，广东各界又举行国民大会，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桂系在广东的反动统治。运动的深入引起了桂系的恐慌，莫荣新令军、警镇压群众，拘捕多人。7月中旬，孙中山从上海致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代表。广州的《国民报》等报刊，刊登军警殴捕工人和学生的消息报道，魏邦平竟拘捕报社人员二十余人。

桂系清除了支持孙中山的在粤滇军势力之后，在广东更加有恃无恐。将骄兵乱，包烟包赌，贪污勒索，走私牟利，无所不为。莫荣新的儿女姻亲沈鸿英，贪污搜括之多，骇人听闻。为了解决桂军的军饷问题，莫荣新还派曾彦、杨永泰等多次向日、英、美等国银行乞求借款，以广东的税收或矿产作抵押，从而激起广东人民的极大愤怒。加之联省自治的风潮日益强盛，莫荣新感到自己难以支撑广东局势，便于1920年初以年老力衰（莫比陆荣廷长六岁）为由，屡请陆荣廷准其辞职，并推荐其儿女姻亲沈鸿英继任广东督军。陆荣廷的义子马济与沈鸿英不和，屡向陆密报沈部军纪废弛及贪污搜刮。因此，陆对沈鸿

英的印象不佳，不同意莫荣新的推荐，拟以马济继任督军。但马年轻任性，不负众望，陆于是一再慰留莫荣新。个中消息为沈鸿英所知，与马济及陆荣廷之间的矛盾急剧增长。

同时，由于莫荣新支持李根源夺取滇军的控制权，桂军与在粤滇军的矛盾也急剧激化。1920年2月10日，云南督军唐继尧下令免除李根源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职，令驻粤滇军由其直辖，广州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就近统率。岑春煊、陆荣廷则仍令李根源统率滇军，广东督军桂系莫荣新令滇军各师旅团长，拥李根源为统帅，并派兵助李根源，导致滇桂双方武装冲突。2月15日，莫荣新委任李根源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兼南韶镇守使，节制驻粤滇军，以对抗李烈钧。李烈钧取得驻粤滇军统率权后，受桂系军阀的排挤攻击，在广州难以立足，于2月24日李托言巡视江北防务离开广州率部北上。莫荣新即派沈鸿英、邓文辉等五十余营，水陆并进，进行截击，多次发生战斗。3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以李烈钧部在粤滇军遭受桂军沈鸿英、粤军魏邦平等部攻击，任命唐继虞为援粤总司令，率兵东进。陆荣廷则自广西出师阻遏，并驻兵龙州，声援莫荣新，共击滇军。16日，李烈钧率驻粤滇军突围，进入始兴，25日进占南雄。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到韶关调解。4月1日，李烈钧又由韶关返回广州。4月13日，李根源部将赵德裕借口追查逃兵，在莫荣新的支持下包围参谋部，入内搜查；同时，警备队长进入赣军司令部搜查，两处都是李烈钧常住之处。李逃往海珠岛海军部躲避，27日秘密离开广州。

1920年春天，孙中山积极筹划讨伐桂系，指示驻闽南的粤军陈炯明部准备返回广东，驱逐桂系。7月15日，李绮庵策动驻粤海军“江大”、“江固”、“江巩”、“准捷”、“安北”、“新安”、“雷震”等十六艘军舰起义，反抗桂系军阀，事被澳门葡萄牙驻军得知，以至舰艇被桂系军队和葡军围攻。起义被莫荣新镇压，十三人死难，二十三人被俘。7月21日在孙中山积极策划下，徐绍桢等率数千人在江门起义，号称“救粤军”，分五路进攻广州。同时，李耀汉策动肇庆、钦廉一带旧

部起而响应，意图与陈炯明的粤军里应外合，驱逐在粤桂军，从而掀开了讨桂序幕。

莫荣新得知消息，转达于陆荣廷。8月11日，陆在龙州召集会议，委任沈鸿英为总司令、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分路向漳州粤军阵地进攻，并派林葆怿率海军开往诏安配合作战，莫荣新以广东督军兼军政府陆军部长的身份指挥桂军作战。战争开始，粤军发布宣言，痛斥桂系“残害吾民，无所不至”，并提出“粤人治粤”，“广东人不打广东人”的口号，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桂军中路司令刘志陆是广东人，部下官兵亦多粤籍，他们受粤军政治攻势的影响，军心不稳，不肯为桂系卖力。8月中旬，刘部桂籍统领张驻云向莫荣新密报其粤籍副统领兼营长车渭英动摇通敌，莫电复立即就地枪毙。于是，刘部的粤籍官兵人人自危，纷纷倒戈相向。沈鸿英则因得不到广东督军位置，对陆荣廷不满，也不肯卖力作战。如是，刘、沈两军先后被粤军击败。莫荣新急调林虎、马济及李根源海疆军增援。由于马济以督军名义发布军令，引起久已觊觎督军之位的沈鸿英的强烈不满，将前线部队违令撤退，让开大路。粤军长驱直进，桂军节节溃败。

9月26日，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广州河南宣告独立，响应粤军讨伐桂军，所有内河兵舰及广三铁路，均为其收复。魏邦平、李福林致函莫荣新，促其解除兵权，“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10)] 10月，莫见败局已定，扬言撤兵，向广东各界索取开拔费二百万元。10月下旬，开拔费尚未交出，粤军已逼近广州。26日，莫荣新急电徐世昌、靳云鹏，宣布取消自主，并声称：“为保全粤民、减免战祸起见，于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所有维持地方治安事宜，应由粤民选举的新督军负此责任。”次日，粤军攻占增城，莫荣新炸毁广州兵工厂，将督军印信交海军总长汤廷光。29日，粤军陈炯明、许崇智和李绮庵部合攻广州，莫荣新、马济等在勒索广州商民付给的若干开拔费

后，率残部向北江方向退却。11月21日，粤军继续西进，桂军大败。陆荣廷被迫于是日通电：“所有驻粤各军，现在已经一律调出粤境，以后粤省地方治安，即由粤人负责。”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宣告结束。

莫荣新兵败后到达清远县境与沈鸿英会晤，担心回到广西会受陆荣廷责备，便由沈鸿英派人护送，取道江西，到上海居住，化名高崇民。1922年2月25日，北洋政府授莫荣新“腾威将军”职，中将军衔，莫荣新去函致谢。1928年秋，莫荣新离开上海回到广西桂平，1930年3月30日在桂平病故。

---

(1) 王纪成：《中华百家姓谱》，112，http：//read.cuiweiju.com/files/article/html/68/68792/ .

(2) 李静生、刘震霖整理：《关于莫荣新的回忆》，此系莫荣新侍妾罗氏1963年口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桂系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803页。

(3) 《广西公报》1912年5月12日。

(4) 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5) 《广东督军莫荣新》，广西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民国广西人物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孙中山：《在广州各界茶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1页。

(7) 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与讨伐老桂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8) 陆丹林：《莫荣新破坏军政府募兵》，《老桂系纪实》，第366-369

页。

(9)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10)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1，“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莫觞清　蔡声白

张守愚

莫觞清，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人，1877年12月21日（清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一个开土丝行的小商人家庭，幼年曾入私塾。入学堂后，为寻找日后出路，曾努力学习英语。

1900年，莫觞清经人介绍至苏州延昌永丝厂工作，因办事能干，并能说一口洋泾浜英语，深得经理杨信之的赏识，派他在丝间工作兼翻译，两年后莫到上海勤昌丝厂任总管车。1903年，莫觞清伙同王笙甫、杨孚生等人开设久成丝厂，拥有丝车二百四十部，所产生丝商标为“玫瑰”和“金刚钻”。同年，上海宝康丝厂刘桂增聘莫兼该厂经理，从此奠定了莫在上海发展缫丝业的基础。

1910年，莫觞清又在卢家湾自建厂房，置丝车五百一十二部，是为久成二厂。同年并在唐家弄租厂，有丝车一百三十六部，厂名又成。旋在日晖港建久成三厂，置丝车六百二十四部；又在恒丰路租设恒丰丝厂。综计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莫投资开设的丝厂和担任经理的丝厂有：久成一厂、二厂、三厂、德成丝厂、又成丝厂、余成丝厂、云成丝厂、云成二厂、元利丝厂、元元丝厂、大有利丝厂等十余家，共有缫丝车二千五百八十八部，执上海缫丝工业的牛耳，煊赫一时。莫设总管理处于江西路，其邻即为美商兰乐璧洋行，那时他已担任兰乐璧洋行的买办。

莫觞清兼做洋行买办之后，深知缫丝厂制丝外销的命脉完全操纵在洋商手里，厂丝国际市场投机性强，价格波动大，外汇汇率变动也大，盈亏毫无把握，朝夕之间就可倾家荡产。莫乃于1917年与汪辅卿及美国人兰乐璧（Robert　Lang）合资开设美亚织绸厂，以增加自产

的生丝在市场上的回旋余地。美亚织绸厂置有兰乐璧洋行经销的美制织绸机五十台和捻丝车，技术由兰乐璧主持。但机器装好之后，技术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开不出工达两年之久。直到1919年，在杭州工业学校毕业生蔡品珊、童莘伯、刘祖农等协助下，才制出绸匹。但这一年国际生丝市场价格涨跌互起，汇率波动亦很大，而莫所经营的各丝厂的原料与成品大量抵押在银行、钱庄里，仅生丝一项即有二千四百担之多，还有干茧两千多担，价值二百三十万银元。由于丝价跌落，亏折不赀，到年终无法弥补，乃不得不将美亚织绸厂厂房售与日商康泰绒布厂，机械设备分别售与锦云绸厂及杭州天章绸厂，以抵偿债务。第一个亚美织绸厂，竟如昙花一现。莫虽受此挫折，然对于开办织绸厂的意愿并未动摇，于1920年春与天生锦绸庄合作，再度开设美亚织绸厂于马浪路（现马当路），置有织机十二台。当时蔡声白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到美亚任职。莫看到蔡精明干练，善于经营管理，于1921年春聘蔡为美亚织绸厂经理，自己退居幕后，其后又将长女怀珠嫁与蔡。不数年，莫又辞去兰乐璧洋行买办职务，让他的亲戚张惠生继任，自己过寓公生活。1938年莫觞清病逝于上海，终年六十一岁。

蔡声白，原名雄，字声白，以字行，与莫觞清是同乡，1894年1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七日）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00年，蔡七岁时进他父亲蔡旬宣（举人）担任校长的双林学堂读书。1905年入杭州府中学堂，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915年被保送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攻习地质，1919年获工学士学位归国，旋入美亚织绸厂任职。

蔡声白在美国学习期间，很注意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方式，以及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和增加剩余价值积累资金的手腕。1921年春，蔡任美亚织绸厂经理后，“即着手添置机械，罗致人才，革新管理，扩大营业”[(1)]，锐意经营。

蔡声白初进美亚时，只有织绸机十二台，规模甚小。由于蔡经营

得法，1924年他就在闸北交通路开设美亚第二厂，1925年并进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天纶美记分厂，1926年并进斜土路东庙桥路（现东安路）天纶美记总厂，1930年又并进久纶绸厂及南新绸厂，到1933年2月1日，改组为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时，已拥有织绸机共一千二百台。隶属美亚公司的有：美亚织绸总厂、美亚第二厂、天纶美记总分厂、美孚织绸厂、美成织绸厂公司、美生织绸厂、美利织绸厂、南新织物公司、久纶织物公司、美经经纬公司、美艺染炼整理工厂股份公司、美章纹制合作社和美兴、美隆两绸庄，美纶绸缎布匹局等。1933年美亚公司资本达法币二百八十万元，拥有职工三千多人。30年代，美亚织绸厂的规模不但在江南地区织绸业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亦是独一无二。

蔡声白为了笼络高级职员为他的企业尽力，让一些厂长、技师、会计等投资经营美成织绸厂。他还曾想以“美工”为厂名来诱引工人投资，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止。蔡为了掩饰劳资雇佣关系，以出租的名义将工厂租给厂长，而自己却在幕后操纵。如美亚苏州分厂租与厂长宋保林，而实际厂内员工工资都由上海美亚总管理处会计科支付。蔡不允许他控制的公司所属各厂高级职员在外面另开设织绸厂，一旦有人这样干，他就借故把这个人辞退。可是美亚的许多高级职员，看到办厂的利润比工资高得多，便不顾当“股东”的诱惑，而纷纷离厂自己去开设绸厂。

蔡声白对产品的推销也有一套办法，上海各丝织厂的绸缎产品外销，一般都是售与绸庄，再由绸庄贩卖给洋行辗转出口，而美亚厂则直接与国外联系销售。蔡曾亲赴新加坡、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视察那里的人民喜爱穿着哪些绸衣。他除了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委他的妻弟莫如德为经理外，并与巴达维亚富商订立销售合同。他看到南洋一带对输入用英国制人造丝原料织造的绸缎所纳关税特别低，便把美亚香港分厂所用原料人造丝全部改用英国货，产品的售价随着关税的降低而低廉，输往南洋各地颇受欢迎。这样，蔡把过去被日本绸

缎排挤出南洋的中国丝织品市场，重又夺了回来。

当时上海海关对人造丝进口税率系从量征收，估本达百分之二百以上，因此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阻碍了人造丝织品的外销。蔡声白通过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的关系，经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批准，把上海美亚十厂改为“关栈厂”[(2)]，进口原料人造丝和产品出口均无须缴税。这样，他就利用了国内廉价劳动力的有利条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打开了销路。这是其他丝织同业无法与之抗争的。

1932年及1936年，蔡声白两次派美亚厂副总经理兼营业主任高事恒率领南洋考察团，携带了美亚厂出品的绸缎及时装表演影片，分赴南洋群岛以及国内宁波、杭州、福州、广州、厦门、青岛等地，举办产品展览会，放映电影，广泛宣传。蔡在广告宣传方面不惜工本。

蔡声白对经济活动与金融调度，主要是靠与国民党政府官僚拉关系。他以美亚织绸厂全部机械设备、原料和成品，向中国银行抵押，由中国银行派两个管理员驻在美亚厂总管理处，算是监督。这样美亚织绸厂就可以长期向中国银行透支一百万元。

蔡声白善于利用各种关系随风应变。在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美亚厂房上高悬意大利国旗，算是意商。而到1941年12月9日军队占领租界后，美亚厂随即“聘请”日本律师冈本为法律顾问，并将“法律顾问证书”悬挂在出入要道。

1944年，蔡声白招股组织的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为伪储备券五千万元。他企图仿照美国“托拉斯”，准备日后与美亚绸厂合并，成为从缫丝、织绸到印染出厂的全能企业，达到垄断丝织业的宿愿。

缫丝厂原料是蚕茧，一年的原料要在鲜茧上市时一次收足，这需要很多资金。蔡声白于1944年邀请江浙同业来沪开会商议办法，当即

组成丝绸业联合会，他被举为理事长。蔡以丝绸业联合会的名义，通过当时中国银行经理潘久芬、李祖莱的关系，向汪伪储备银行联系贷款，结果由中国、交通、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新华、垦业等银行组织银团，以承兑汇票方式，贷给“丝茧贷款”伪储备券五亿元，而蔡声白的中国丝业公司在这笔贷款中得到了一半。在日伪时期，物价飞涨，伪储备券不断贬值。因此这笔“丝茧贷款”到期之时，只要若干担厂丝就可清偿，中国丝业公司就此成了抗战期间的暴发户。至抗战胜利前夕，仅厂丝已拥有五千担之多。

蔡声白曾先后担任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丝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总经理、利亚实业公司总经理、美恒纺织公司经理、铸亚铁工厂经理、美兴地产公司董事、劝工银行董事，以及上海市电机丝织厂业同业公会主席、丝绸业联合会理事长、商业统制联合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上海丝织工业界的领袖人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声白曾赴美国考察，对美国丝织厂的自动化设备深有感慨。他感到“中国丝织业很难与之抗衡”，因此去香港后，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做地产买卖上。

1951年蔡声白曾与吴蕴初一同回上海，并去东北参观。当年又去香港，后侨居澳大利亚。1977年4月14日，蔡偕次婿香港巨商杨元龙从澳大利亚旅游返港，当晚蔡还谈笑自若，精神饱满，讵料翌晨10时尚未起床，家人进房探视，蔡已经故去。

---

(1) 引自蔡声白1929年为“西湖博览会”丝绸馆特刊所撰之专文。

(2) “关栈厂”就是美亚十厂织制出口丝织品所需原料人造丝，进口后堆存海关仓库，无需缴纳进口税。惟海关派驻监督的关员工薪由厂方支付，类似现时所称“加工区”的工厂。

穆藕初

陈正书

穆藕初，名湘玥，上海浦东人，1876年6月18日（清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1)]。世代以植棉为业。其父穆琢庵在上海十六铺开设“穆公正花号”，家境尚好。藕初幼年体弱多病，六岁入塾，读诗书八年。十三岁时父亲破产，家道中落，十四岁入棉花行学徒。艰辛的生活磨炼了他的体魄和意志，丰富了他的知识。

甲午战败，马关签约消息传来，他与同时代青年一样，“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形容者”，从此，他决心求西学以便将来报效祖国。他白天劳动，晚上又以充当工役代替学费，在夜校学习英语，三年后以优秀成绩考入海关。他工作之余仍如饥似渴地在海关图书馆遍览群书，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同时，他还追随马相伯、黄炎培等人投身社会改良活动，参与发起沪学会。1905年，他以海关华职员俱乐部名义召集海关、邮电华职工集会，抗议美国虐待华工暴行，遭到美籍副税务司忌恨，他愤怒弃职而去。他的爱国行动深受张謇等知名人士赏识，先后受聘于龙门师范和江苏铁路公司。在任苏路警察长之际，目睹农村破败、交通梗阻、工商凋敝，他更坚定了求实学、兴实业、救中国的决心，于是开始积极筹划出洋留学。

1909年夏，在朱志尧等人资助之下，他告别了妻子，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和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攻读声、光、化、电各科，专修纺织、制皂两门专业。在寒暑假期去工厂、农场劳动，不光为赚几个钱，而是对机器设备的性能、特征、操作要领等进行细心考察；对管理体系，人际关系以至民俗、风情，处处注意调查。他访问过的人中，上至经理、工程师以至著名学者泰罗，下至工农。1914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

穆藕初归国途中便着手翻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并结合在美考察访问所得，做了大量笔记，与国内状况作了比较研究。归国以后，立刻筹划办厂。1914—1920年，七年之中昼夜奔忙，一举而创办了三家各具特色的纱厂。

德大纱厂的特色是以小克大，以质取胜。该厂于1915年开工，资本仅二十万两，纱锭只有一万余枚，与当时上海英商、日商规模相比仅及八分之一左右，与华盛纺织总局相比，也只及六分之一左右。德大厂广觅各厂产品，做细致的实验分研，集各家之长创出宝塔牌棉纱，质量远胜中外各厂产品，在1916年北京产品质量比赛会上一举夺魁，名震中外。

厚生纱厂的特色是厚集资本，流程规范化，管理系统化，成为华商办厂者参观、派员实习之基地。该厂于1918年开工，有三万纱锭。穆藕初据各国流程设计之短长，设计了规范化工艺流程，亲自把关安装；设计了国内前所未有的厂内各部门统计报表和成本核算体制，创技工夜校，亲自授课，开了华商纱厂生产高支纱之先河，且质量上乘。一时之间参观者、派员实习者络绎不绝。

郑州豫丰纱厂的特色是规模大，设施完善。受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启发，穆藕初在厚生厂正常投产后即奔赴河南考察，确认郑州办纱厂有三利：原料集中价廉；交通依陇海、京浦两路便捷；劳动力充沛而价廉，于是拟定规划回上海集资。上海多数投资人视为畏途，应者寥寥，后获贝润生等支持，集资二百万元，经过两年辛劳，一座拥有三万纱锭，自备水厂、电厂，设轻便铁路与陇海线接轨的宏伟纱厂于1920年开工投产了。

穆藕初在这一时期还为发展高支纱生产，长年主持植棉改良工作；为抵制日商控制市场，参与发起创办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并且连续七届被举为理事长。为华商工业资金融通，参与发起创办中华劝工银行；为团结华商与外商竞争，参与发起组织华商纱厂联合会。他在

实业救国中获得的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美国著名学者艾萨克·马可逊评价说：当时“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要能超过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的”[(2)]。

穆藕初在实业上的成功虽然使他“由无产而跻身有产”，但他始终不忘救国初衷，生活俭约，把大量金钱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他不仅出任校董，向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捐赠巨资，以后还常年给予资助，有“校董中最热心之一人”的美称[(3)]。1920年夏，他捐赠白银五万两，在蔡元培等著名学者主持下，遴选了罗家伦、段锡朋等五人出洋留学；以后，又先后捐款资助了张纯明、韩朝宗、方显廷、万云骏等二十余人出国深造。1937年，罗家伦等十位曾获得穆藕初资助的著名归国学者发扬穆先生的精神，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在1940年首次获得该奖学金的学者之中就有后来成为华人第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杨振宁博士。最能反映穆藕初远见卓识的还在于捐资创办位育小学和位育中学，因为他在资助著名教育家李楚材先生时就提出：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高级人才，也必须具备良好的中等人才和初级人才，而高级人才也必须具备良好的初、中等教育基础。尽管1931年、1937年两次捐款时他的处境已很困难，但他还是以个人名义向新华银行借了巨款给以资助。

穆藕初以巨资挽救当时已濒于危亡的昆曲艺术是有口皆碑的。他在1921年捐款创办了苏州昆剧传习所，招收培养七十余名小学员。他们就是当今著名的传字辈老艺术家。同一年，他还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请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为已故俞振飞先生的父亲、著名的清曲传人俞粟庐先生灌制了录有十三个剧目的八张唱片。已故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说：昆曲艺术能“获苟延一脉”，“得存于后世，则（穆）先生之功，固已不朽”。

穆藕初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环境发生根本逆转。不平等税制、中外经济实力对比悬殊、军阀混战，给他（以及整个民族工业）以沉重打

击，虽然，穆藕初、聂云台等多次代表上海企业界进京，要求禁止原棉出口，要求改革不平等税制、要求举办棉业借款和发行纱业公债，但是，北洋政府始终置之不理。外部的巨大压力造成企业内部分裂，一部分股东拒绝追加资本，一些在穆藕初管理改革中失势的工头起而造谣攻讦。1923年4月，他愤而辞去厚生纱厂总经理之职；同时，他被迫变卖了所有财产去维持豫丰纱厂。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24年豫丰被迫由美商慎昌洋行接办。1925年，他又被迫辞去德大纱厂总经理之职。穆藕初于这一年重病一场，在病中抚躬反思，作《藕初五十自述》，追忆了实业救国的成败得失。

穆藕初坚强地挺了过来，以其正直的人品、杰出的才能、爱国主义精神在上海工商界保持着很高的威望。他在1925年以后，继续出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同时，逐步地由实业界转向政界主持商政。1928年11月，他应孔样熙聘请，出任工商部常务次长，希望为民族工业开拓市场，实现税制改革，然而，客观上却总是事与愿违。因此，当1929年冬工商部、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再次聘请他出任次长时，他拒绝了。不久，他被改聘为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任职期间开始了农业改良工作，邀集了一批农业专家，开展发展农业机械、改良农作物品种等工作。但是，当他提出在中国“复兴农业计划”以后，如同石沉大海，这就使他陷入了更深的沉思。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他立刻亲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 (4) 。1933年他又致书农业复兴委员会，揭露农村封建势力的黑暗，提出民主改良建议，再次遭到了冷遇。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穆藕初立刻出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奔走操劳，积劳成疾，不久辗转内迁重庆。1938年5月，他出任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主持后方农业、手工业技术推广事业。鉴于抗日战争中民族棉纺织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穆藕初上任以后便组织专家亲自参与设计，创造了七七手工棉纺织机，在后方农村广为推广，对于推进后方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他被任命为农本局

总经理，负责调整后方花纱布的购销供应。1942年冬被解除农本局总经理职。1943年3月，肠癌发作，经多方治疗无效，于1943年9月19日病逝。在他不幸病逝以后，中共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穆藕初先生》，指出："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穆先生的逝世"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一个损失"。号召"我们国内的民族工业家应当继承他的遗志"，"替我们国家建下一个工业国家的基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出席了追悼会，董老在挽联中称："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5)

---

(1) 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卷首简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朱信泉：《穆藕初》，《民国人物传》第1卷，中华书局1978年版。

(2) 《藕初五十自述》，第10页；及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55—456页。

(3) 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第52页。

(4) 毕云程：《穆藕初先生传略》，《农业推广通讯》第5、11期。

(5) 《悼穆藕初先生》，《新华日报》1943年9月2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五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五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 华 书 局

目录

N

内山完造　汪仁泽

倪嗣冲　萧栋梁

倪映典　王学庄

聂耳　查建瑜

聂云台　江绍贞

钮永键　杨克义

O

区寿年　边篆

欧阳予倩　张小曼　杨光莹

P

潘昌猷　肖宇柱

潘复　马陵合

潘公展　李戈

潘光旦　全慰天

潘天寿　刘江

庞炳勋　汪仁泽

庞元济　王铁生

彭家珍　吕乃澄

彭寿松　许在全　陈孝华

彭禹廷　冯文纲

彭泽民　周天度

平刚　王川

溥仪　余觉金　寿祝衡

蒲殿俊　综文

蒲辅周　陈志新

Q

齐白石　奚纯

钱大钧　张昊

钱穆　熊尚厚

钱能训　张树勇

钱新之　江绍贞

钱玄同　娄献阁

钱锺书　李红岩

秦德纯　沈庆生

秦润卿　陆书臣　吾新民　程庸畴

覃振　万江红

丘逢甲　陈民

仇亮　朱信泉

秋瑾　闻少华

邱清泉　颜平

邱菽园　陈民

R

任白涛　任嘉尧

任鸿隽　赵慧芝　王震

任可澄　李双璧

任援道　朱佩禧

任卓宣　马宣伟

容闳　李希泌

荣宗敬　荣德生　江绍贞

柔石　邱德新

阮玲玉　查建瑜

阮忠枢　张学继

S

萨本栋　孔立

萨镇冰　陈贞寿

沙千里　傅能华
沙逊　陆志濂
沙彦楷　汪仁泽　陈光贻
商震　张小曼
上官云相　王家鼎
尚小云　李仲明
邵力子　袁钟秀
邵飘萍　耿云志
邵元冲　黄德昭
沈从文　娄献阁
沈鸿烈　马庚存
沈鸿英　黄秀颖
沈钧儒　周天度
沈克非　商一仁
沈联芳　汤肯堂
沈缦云　汪仁泽
沈知方　熊尚厚
盛丕华　汪仁泽
盛世才　陈宁生
盛宣怀　朱宗震
施从云　吕乃澄
师复　杨天石
施复亮　寿祝衡
施今墨　寿祝衡
施愚　张学继
施肇基　罗幼娟
石筱山　商一仁
石友三　沈庆生
史迪威　严如平
史良　周天度

史量才　耿云志
舒新城　谈宗英
斯诺　任嘉尧
斯特朗　任嘉尧
司徒雷登　阎铁
司徒美堂　陈民
司徒乔　任嘉尧
宋棐卿　熊尚厚
宋汉章　汪仁泽
宋教仁　周天度
宋美龄　严如平
宋庆龄　宗志文　李静之
宋炜臣　徐凯希
宋希濂　颜平
宋则久　熊尚厚
宋哲元　陈民
宋子文　朱信泉
苏炳文　程舒伟　刘信军
苏曼殊　熊尚厚
苏汰余　徐凯希
孙宝琦　孙青
孙本文　马先阵
孙传芳　张振鹤
孙道仁　黄国盛
孙殿英　熊尚厚　邢汉三
孙渡　杨光斗
孙多森　孙多钰　熊尚厚
孙衡甫　冯伯准　宋紫云
孙洪伊　潘荣
孙科　严如平

孙立人　颜平

孙连仲　严如平

孙良诚　汪仁泽

孙烈臣　汪恩郡　王凤琴

孙蔚如　靳英辉

孙武　萧栋梁

孙秀三　马国晏　刘辔

孙岳　陈民

孙震　马宣伟

孙中山　尚明轩

返回总目录

内山完造

汪仁泽

内山完造，日本冈山人。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11日生。其父贤太郎，曾任村会议员、村长等职。内山五岁入学，十二岁去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十六岁在京都赤野商店供职，其后曾自行经商，1911年至京都报社当送报员，此时他从信仰佛教改信基督教。

1912年，内山得牧师介绍，任大阪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推销员，被派至中国，在上海、武汉、沙市、常德等地推销眼药。1916年与井上美喜结婚，常居上海。

1917年，内山完造以妻子的名义在上海四川路住所楼下开设内山书店。他确定的经营方针是开架售书，听任顾客自由翻阅选购，对中国顾客不论购书多少都可赊售，有人说他这样做书会被偷，赊账会收不回来，书店就将亏本关门。但结果却相反，由于内山良好的服务态度，反使顾客日益增多，获利颇丰。开始时该店只经销基督教书籍，后来从日本购进大批医学书和日本进步文学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书籍销售。尤其后者在当时军阀统治下别处难以买到，因此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都是书店的顾客”[(1)]。进入20年代，内山扩大书店，迁入新址，店面扩大，内间设有桌椅，冬天生了火炉，顾客可围着火炉品茗座谈，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漫谈场所。内山名之为“漫谈会”，当时中方经常参加的有田汉、欧阳予倩、谢六逸、郁达夫、郭沫若等人。1926年内山书店销售《马恩全集》、《新经济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大众文学全集》等各书数百上千套。据统计，当时我国出版现代日本文学的中译本约八百三十种[(2)]，内山回忆说：“这些书（所据以翻译的日本原著）大部分都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特别是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三十三

种书，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原著）就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看一下这些译本与我的关系，我自豪地认为，日本文化通过我的书店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3] 这些书的主要译者有鲁迅、郭沫若、田汉、夏丏尊、欧阳予倩、陈望道、丰子恺等，大多是内山书店的常客。1930年内山与参天堂断绝了关系，专心致志经营书店，并积极参加沟通中日民间交往的社会活动，如资助举办星期演讲会等。在此期间他还研究中国的上海，先后撰著了《活生生的中国》、《关于中国的民俗》、《上海漫话》、《上海夜语》、《上海霖话》、《上海汗话》等书，陆续在日本出版。

内山“以书会友”，先后结交了我国很多的著名文人。郭沫若192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与内山结识。次年他任大夏大学讲师期间，为了备课，每天在内山书店立读或借阅有关参考书。1927年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仓促之间跑到内山书店暂避，后由李一氓接他去见周恩来。次年郭沫若被通缉，举家亡命日本前夕，由内山安排住宿，次日护送上船东渡。此后郭沫若在日本侨居十年间，内山为之介绍出版商，帮助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顺利出版。1927年鲁迅辞去广州中山大学教职，来到上海后，常去内山书店购书，与内山相识，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常促膝谈心，内容涉及幽默的人间世态和严肃的中日两国国民性话题。内山陆续向鲁迅介绍了从日本来华的著名人士小路实笃、增田涉、鹿地亘、岩波茂雄、山本实彦等五十多人。他支持鲁迅提倡和推广现代版画艺术，于1930年至1933年在沪协同举办了三期木刻展览。他还经销已被反动当局查禁的鲁迅著作《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书。鲁迅也为内山的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作了序文[4]。1930年至1934年间，内山曾四次帮助鲁迅避过反动当局的迫害[5]。当时有人恶毒攻击鲁迅与内山的友谊，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予以严厉反击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捡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

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1936年10月18日鲁迅病危，内山请来了医生，并在他身旁照料，直至翌晨鲁迅逝世。当天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内山是九位成员之一[(6)]。1953年，内山作为民间人士战后首次访华，在与许广平、郭沫若畅谈后曾激动地记下当时的心情：“我心想，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由于我和鲁迅的关系，今天我无论走到中国的什么地方，都有知己。他们把我称作中国的朋友或中国人的老朋友。活着的知己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感到能作一个死去的鲁迅和健在的郭沫若的朋友是幸福的。”[(7)]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内山曾给去租界避难的中国邻居写了多张保证字样的名片，以防在通过日本军警戒线时发生麻烦。他还勇敢营救因“便衣队嫌疑”被日本自卫团拘禁的中国无辜者。他在路上遇到被带往日本陆战队的周建人一家，即出面保证，终于使周全家获释[(8)]。内山的这种立场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怀疑，被迫暂时回到日本避祸，直到5月间方始回上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内山夫妇和撤离上海的日侨一起回国。翌年5月返沪准备结束在华店务，后为友人劝阻，遂将书店改为合资公司继续经营[(9)]。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英、美宣战后接管上海租界。15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部拘留，内山尽力营救，直至次年2月始获释。此时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和章锡琛亦被捕，也经内山设法营救，半月后被保释。不久日本军方指定内山书店接管中美图书公司。1945年初，内山妻在沪病故，葬于沪地公墓。是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内山还去股东的股本后，将店内资产除留一百五十令白纸赠予鲁迅夫人外，其余全部分给店员，不久书店由国民党当局接管。此时上海日侨成立了自治会，内山当选为代表，协助办理日侨的遣返工作。1946年6月，内山申请永久在华居留。1947年2月，他从日本归侨中收购大量旧书，开设了“一间书屋”旧书铺。11月中旬郭沫若夫妇来告别，未遇。12月5日，接到郭从香港来电，告已平安到

达。翌晨内山所住吴淞路义丰里一带即被国民党保安队包围，以组织颠覆国民政府“阴谋团”的嫌疑，强将内山等三十三名日侨押解上船遣返回国。

内山完造为了向日本人广泛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从1948年1月起一年半中，足迹遍及日本各地，作“中国漫谈全国巡回演讲”达八百多次，10月间出版了所著《同一条血流中的朋友啊》。1949年6月，日中贸易促进会成立，内山当选为常任理事，是月出版了所著《中国四十年》，9月又出版《上海话》。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山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创立准备工作。翌年10月协会成立，内山当选为理事长。1953年1月，作为民间人士访华。在此前后，他曾多次在日本热情地接待我国的访日代表团体。1956年内山应邀再度来华，在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是年12月18日，他又一次从日本来华，飞抵上海时深情地说：“我禁不住热泪纵横，这是因为鲁迅和我的亡妻的墓都在上海的缘故。而且，这里是我活动了半辈子的地方，它与其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倒不如说是我前半生的故乡。”[(10)] 次日他参拜了移葬于虹口公园的鲁迅墓以及他前妻的墓。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组阁后，执行露骨的反华政策，次年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了以内山为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召开国民大会，开展了要求岸内阁总辞职的全国运动。为此内山不顾自己年高多病，再次作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题为“日中友好运动是直接拯救祖国的运动”。自1958年5月起至1959年4月，由于长途跋涉疲劳过度，突然高烧不退，被迫返回东京卧床休息，这时他被误诊为肺结核病。9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内山来华疗养，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此时他的自传体《花甲录》以及《两边倒》、《平均有钱》、《新中国读本》等著作，已先后在日本出版。9月19日，内山应邀到达北京，在当天的欢迎会上突因脑溢血昏倒，经抢救无效即于20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所遗骨灰根据他生前遗愿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前妻的墓旁。

(1) 吉少甫：《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第51页。

(2) 根据近藤春雄所著《现代中国的作家与作品》（新泉书房1949年版）所载目录统计。

(3) 内山完造：《花甲录》1933年条，岩波书店1960年版。

(4) 原书名《生ける支那の姿》，1935年11月在东京学堂书院首版发行，其后再版达46次。1936年开明书店以《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为名出版尤炳圻的中译本。

(5) 内山完造曾四次帮助鲁迅逃避国民党的迫害：一、1930年3月，国民党政府通缉鲁迅，内山让他暂住内山书店假三楼上约一个月左右。二、1931年1月，左联青年作家柔石等被捕后，内山帮助鲁迅全家避居日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约四十天。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鲁迅全家至内山书店避难，数天后由内山派日籍店员护送迁至四川北路支店二楼，住至3月中旬。四、1934年2月，内山书店两华籍店员因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被捕后，鲁迅全家连夜搬至内山家中避居一个多月。

(6) 鲁迅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宋庆龄、蔡元培、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九人组成。其中毛泽东的文章除上海《日日新闻》（日文）刊载外，其他各报都未敢刊出。

(7) 吉少甫：《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第53页。

(8) ［日］山下恒夫编，赵知燕译：《内山完造年谱》1932年条，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9），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 此时内山书店在上海设有施高塔路8号本店，及北四川路1017号及吴淞路432号两支店，资本金十二万元，股东分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两种，此外在日本设有东京神田及长崎八坂町两店。参阅《中华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上海之部）》（日文版）1940年上海兴信所藏版，第381页。

(10) 吉少甫：《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第53页。

倪嗣冲

萧栋梁

倪嗣冲，字丹忱，原名毓桂，安徽阜阳倪寨人。生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其父倪淑，曾任四川开县知县。倪嗣冲少年时随父在四川读书，中秀才后回到家乡，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县。早年入淮军幕，历任淮军记室、佐杂、历保至监司。旋投靠袁世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任倪为幕僚，后充北洋营务处总办，后捐纳知府。

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倪以道员擢升奉天提法使、黑龙江民政使兼巡防军翼长，复司垦政。1909年锡良代徐为东三省总督，以倪贪劣，劾去其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继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于10月荐任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统领豫军出镇皖豫边区，旋又命为安徽布政使。12月，倪与段祺瑞、张勋等四十多名清军将领，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同月，倪率军五千从河南周口出发，攻占安徽太和，并猛攻颍上，打死淮上军官兵一千余人，攻占阜阳后又屠杀无辜百姓五千余人。民国成立后，倪拥护并支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倪嗣冲又积极配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7月22日，被袁任为皖北镇守使，27日改任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由此攫得安徽省统治大权。8月，他集中十门大炮和数百敢死队强渡淮河，攻占正阳关后，又以肉搏战等方式攻占寿州，于8月28日进驻安庆。10月通电请驱逐身居要津之国民党人，并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反袁人士。1914年3

月，下令解散安徽省议会和各县议会，实行军阀统治；6月袁世凯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立将军府，设将军府诸名号，分驻各省督理军务，以倪为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所部改为安武军，倪任总统领官。倪在帝制复辟急先锋段芝贵倡导下，联合十四省将军劝进袁世凯速定大位；又在梁士诒等谋划下，伪造民意，参与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共和制为帝制。1915年12月袁宣布称帝，册封倪为一等公爵。倪在安徽大肆恢复清朝旧秩序，使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须呈手本、履历等，甚至在1916年春，袁世凯召开公府紧急会议宣布取消帝制时，倪仍极言反对，并向袁表忠心：“臣愿统领大军平定南方，为圣主效命疆场！”1916年4月，袁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兼署安徽督军，任倪为长江巡阅副使，驻蚌埠，旋兼署安徽省长。5月倪去南京，力主维持袁之总统地位；同月又与张勋通电拥袁，对反对者不惜以兵戎相见；6月2日至汉口，准备攻湘，6日袁死，7月才率军离开岳州返回安徽。

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皖系首领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倪嗣冲又投靠段祺瑞。7月6日，黎改各省将军为督军，民政长为省长，任倪为安徽省长。倪即指使儿子倪道杰、倪道煌、侄子倪道烺等十余名倪家子侄包办操纵全省的选举、军事、人事等方面事务，安插亲信党羽，包揽全省要职。当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后，9月，倪与张勋联名召集山东、奉天、吉林、江苏、直隶等十三省区代表在徐州开会，组织“十三省联合会”，史称“督军团”，攻击国民党议员、阁员干涉国会、宪法、内阁，图谋复辟清室。1917年2月，又与张勋召开第三次徐州会议，并约江苏督军冯国璋至徐州与张勋会谈。4月，段祺瑞为推行其对德宣战政策，召集安徽、福建、江西等十省督军在北京开会，指使他们对总统黎元洪施加压力，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倪充督军团骨干，与张怀芝、李厚基等晋见黎元洪，请求对德宣战；5月，倪又出席第四次徐州会议，继续坚持复辟清室活动，呈请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宣称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为非法，实行与中央脱离关系；6月又反对由李经羲组阁，主张由段复职。7月1日张勋

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溥仪任倪为安徽巡抚。倪得此消息即指示政务厅长张贴黄榜，宣布“圣谕”，表示要亲自“接旨谢恩”，在全省遍挂象征清朝的龙旗，掀起复辟狂潮。但张勋复辟遭到举国反对，孙中山号召讨张，段祺瑞亦认为倒黎目的已达到，3日在马厂通电讨逆。次日，段祺瑞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誓师马厂。5日倪通电表白复辟之举“事前既毫未商明，事后岂甘心承认”，今后一切当随冯国璋、段祺瑞一致进行。7日冯国璋与段祺瑞联名任命倪为讨逆军南路总司令。次日又令倪兼署安徽督军。倪遂由复辟的急先锋变为“反复辟”的司令。

1917年9月，倪嗣冲被冯国璋任命为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准免倪安徽省长本职。9月，孙中山高举维护“临时约法”大旗，下令讨伐段祺瑞、倪嗣冲等，而北京政府却给倪授勋，将其所部安武军扩编为四个混成旅的新安武军，除拨给倪三百八十万元军费外，还任由倪在安徽横征暴敛，扩军肥私。12月，倪与曹锟、张怀芝、阎锡山、张作霖等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西南护法军政府，并与曹锟、张作霖等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

1918年，倪嗣冲积极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他与张敬尧等于2月电请以武力解决湘事，又与曹锟、张作霖等坚主对南方下讨伐令；4月进京劝段祺瑞、徐世昌继续用兵，并与曹锟、张怀芝等电请代总统冯国璋迅速召集新国会。7月出席天津会议，决定推徐世昌为总统。8月再次通电力主对南方用兵。11月出席北京会议，讨论停战撤兵等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倪下令解散安徽罢课的学校；11月与曹锟、张作霖等十六名督军、省长电请裁军二成。

1920年1月，以参战出力，获北京政府奖叙，授陆军上将。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段祺瑞被免去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宜等职。9月16日，北京政府免除倪嗣冲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职。1924年7月12日，倪于天津英租界寓所病卒，年五十七岁。

主要参考资料

翁飞等：《安徽近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王传厚整理：《倪嗣冲在安徽的罪恶统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3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倪映典

王学庄

倪映典，字炳章，安徽合肥人，1885年9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倪玉泉，是个乡村医生，倪映典自幼随父亲学医。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和约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年青的倪映典，他不愿再伏处乡里，想出外寻找报国的机会。

1904年，倪映典考入安庆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在学兵营里，他爱读欧美革命史和宣传革命的书籍，与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学柏文蔚、孙启等接近，加入了革命团体岳王会。1906年，他以术科优异成绩毕业，入军见习，因遭排挤，弃差至江宁，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将校科，结业后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倪在江宁与赵声、吴春阳、柏文蔚、冷遹、龚镇鹏等相往还，经常在鸡鸣寺聚议革命进行的方法。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第九镇被派往萍乡镇压，倪随队出发。他与赵声等密谋寻机响应起义，不果。次年返宁后，应同学邀，往安庆任新军炮队教练。两江总督端方、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以其私自离职，追回禁闭一月，事后又改授马队队官，加以怀柔。同年，经皖抚冯煦请调，倪映典始得回皖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他与该营队官熊成基、步队管带冷遹、薛哲等联络，共谋于次年春间发动起义。1908年2月11日，倪等正在薛哲营中议事，冷遹匆忙来告事泄，当局下令捕人，倪只得将后事托付给熊成基等，秘密逃往芜湖、合肥。由于端方严令通缉，他又偕方楚乔去沪，然后同舟赴粤，投奔赵声。

此时，赵声正在广州任广东陆军小学堂监督。倪映典向赵声报告了安徽起义筹备情况，表示愿得到广东方面的响应。赵声介绍倪与当

地革命党人朱执信、胡毅生等相识，并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云南河口起义开始，缺乏军事人才，倪应召前往，但正待离开香港时，起义已告失败，只好折回广州。于是，他改名倪端，由赵声介绍入新军任炮队见习排长。同盟会在广州军队中的活动，这时已逐渐展开，倪也对部属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宣传种族革命思想。因言语不通，他冒险在黑板上大书“汉亡二百六十余年”八字，士兵大半表示领会。倪喜出望外，继续口讲笔授，介绍岳飞抗金、清兵入关、扬州十日等事迹，启发士兵的反清觉悟。同年冬，安庆来信告知将乘太湖秋操起义，约广州响应，倪认为粤军起义条件尚不具备，密电劝暂缓发动，但很快就传来了熊成基起义失败的消息。

1909年春，广东新军步、炮、工、辎各营次第建立，成为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人决计以运动军队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同年夏，他们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举行会议，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工。倪是干事员之一，他发给每人二百张同盟会盟票，在军队中扩张组织。当时，他任炮一营右队二排长，旋调任左队二排长。该营管带齐汝汉是安徽人，知道倪一点底细，见倪行动可疑，便借故将他斥革，倪只得在军外继续活动。赵声也因受当局怀疑被解除督练公所提调职务，不久去槟榔屿。运动新军的责任便由倪映典独力担承。倪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他破除省府县籍贯不同的乡里界限，通过下级官佐、士兵罗激扬、巴泽宪、赵珊林、谭瀛、黄洪昆、王占魁等人与士兵广泛接触。他们利用野操和假日，不断将各营士兵带到白云山，由倪演说革命道理，“言至忿际，拍桌几烂，各人则鼓掌赞和”。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军中同盟会员增加到三千余人。

同年10月，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等人报告运动军队情况。南方支部决定次年发动起义，将决定电告孙中山，并电请黄兴、赵声、谭人凤等人来港主持。南方支部还发布了倪手订的《运动军事章程十条》，指导活动。在南方支部主持下，起义准备

做了明确的分工，倪映典负责新军，张醁村、姚雨平运动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会党，陈炯明、邹鲁、林云陔、莫纪彭、郑赞丞、方楚乔等人都参加了活动，筹款、筹械、调查、通信、宣传、联络，均有专人负责。不久，赵声回到广州，住华宁里遇兴隆客栈，主持全部军事。为使赵声无后顾之忧，倪映典与胡汉民相商，将赵声家属从镇江接到香港。

起义正在积极准备中，12月28日发生了突然变故。一标长官发现了同盟会盟票，为此，排长巴泽宪逃亡。这件事虽没酿成大案，却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于是倪映典赶赴香港，将起义时间定为庚戌年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元宵节。为避免遭受敌人破坏，起义机关又增加了雅荷塘、清水濠等九处，贮藏枪支、弹药、旗帜、文件。有的机关由妇女驻守，以掩人耳目。

1910年2月7日（己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借迎接赵声父亲抵港的机会，赵声、倪映典等领导者均赴香港商议起义军事。行后，广州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2月9日（己酉除夕）傍晚，新军二标士兵因细故与店家争执，警察上前干涉，相互交哄，新军包围警局。消息传至香港，倪映典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紧急磋商，认为新军可能因此被遣散，那样就将失去基本队伍，不如孤注一掷。于是，决定正月初六日（2月15日）起义。倪迅即于2月11日（正月初二日）晚赶回到广州。

这时，广州形势更加紧张。庚戌元旦（2月10日），二标士兵结队入城，捣毁警局多处。粤督一面布置镇压，一面派人安抚、压制。新军协统张哲培到二标训话，并将枪机、弹药运进城，宣布全协初二日不放假，初三阅操。初二日，驻北教场的二、三标已被防营监视，驻燕塘的一标因不放假大哗，又因传有兵来攻，纷纷夺械出防。谭瀛、黄洪昆等乘机鼓动士兵到各处夺取枪械子弹，协统、标统均逃避。当晚，奉命安抚士兵的军官黄士龙回城时又被旗兵打伤，新军群情更加激愤，跃跃欲试。

该晚，倪映典了解到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次日起义。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上午，倪映典来到燕塘炮一营，这时，齐汝汉正集合士兵训话，倪用枪将齐击倒，号召士兵们起义，炮、工、辎四营响应，推倪为总司令。倪率队到一标，击毙队官胡思深，士兵响应。倪分兵攻城，自率千余人经沙河进攻东门。清军早有防备，水师提督李准坐镇东门，派统领吴宗禹率二千余人分路进攻。下午，两军相遇，吴部在牛王庙一带布防。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新军进入阵地。清军管带童常标（倪旧部、同乡）、李景濂（同盟会员）心怀不良，施毒计谋害倪映典。他们伪装调停，诱使倪上前会面，倪未加怀疑，当面晓以大义，以争取防营一同行动。童等佯装赞同，推此事须请示统领，驰回阵地即下令开枪。倪还在巡视战场，受伤坠马，被清兵抢去，砍头而死。

倪映典牺牲后，起义军奋起猛攻，激战一小时有余，终因伤亡惨重、弹药不继而退却。延至次晚，起义军的反抗全为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倪映典领导的这次武装起义，过去习惯称之为“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主要参考资料

陈春生：《倪烈士映典传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页。

邹鲁：《倪映典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

《实录馆剪报今人谱——倪秉章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奔粤英勇起义的倪映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

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纪念辛亥革命专辑），1982年版。

聂耳

查建瑜

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紫艺，笔名黑天使、红孩儿、浣玉、噪森、王达平，云南玉溪县人，1912年2月15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昆明。父亲聂鸿仪，原在玉溪县行中医，后至昆明市行医兼营成春益药铺。聂耳四岁时，父亲弃世。他和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全靠母亲彭寂宽袭夫业，供他们上学。聂耳1918年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1922年转入求实小学，1925年春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1927年夏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考入当时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云南省立第一师范高中部外语组，攻读英语。

聂耳幼年受家乡民间音乐、滇戏、花灯等的熏陶，爱上了音乐。十岁时跟一个木匠学吹笛子、拉二胡，又学会弹三弦和月琴，是小学生音乐团的骨干。入中学后他学小提琴和钢琴，经常到风景如画的西山美人峰、翠湖练提琴，萌发了想当一名音乐家的愿望。他积极参加读书会、戏剧研究会及游艺晚会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吹奏乐器，还饰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后，他为自己确立了“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1)] 的奋斗目标，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济难会”，经常探望、接济被反动当局囚禁的革命志士。

1928年秋，聂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冬，滇军第十六军到昆明招兵，他们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欺骗中学生“参加学生军是进军官学校，将来为民众谋利益”。聂耳与一些同学报名参军，离昆明经海防、香港、广州，及至被编入湖南郴州新兵队当兵后，才知上当受骗。他化装逃离新兵队，被一个当营长的同乡收留在营部当文书。次年3月被送到军官团受训。不久，该团奉命调赴广州

与燕塘军校合并，他被遣散，流落广州。

聂耳在军营数月，对当时一些军阀政客高唱的“国民革命”大失所望。1929年5月，他回到昆明，继续在第一师范高中部读书。这年他写成《薄暮》、《碎礼》两部小说和一篇《在轮船上》的散文。

聂耳在昆明一师求学时，发起成立“七一一青年救济团”[(2)]，受到反动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1930年7月，他在一师毕业后，离开云南，到上海谋生。他先在一个同乡开办的云丰申庄帮工，还秘密参加了上海虹口区反帝大同盟。次年春，云丰申庄倒闭，他考入联华音乐歌舞学校为练习生。联华是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社”扩大改组而成的，对外演出仍以明月的名义。在首席提琴手王人艺的帮助下，聂耳刻苦学艺，每天苦练小提琴。不久他又跟随意大利籍小提琴教师帕杜施卡（Podashka）学习。他为歌舞伴奏，也兼舞蹈演员，从此改原名聂守信为聂耳。他勤奋学艺，一年后即由练习生升为正式琴师。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人民抗日爱国的斗争如火如荼，聂耳经常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1932年春，他认识了共产党人田汉，受革命思想熏陶，树立了“为大众呐喊”的志向，决心以音乐谱写人民的心声。

当时的音乐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提倡西洋音乐的所谓“学院派”，宣扬艺术至上，埋头于正统的古典音乐，严重脱离时代和社会实际；另一种是以“明月歌舞社”一些人为代表的“毛毛雨派”，演些“妹妹我爱你”、“桃花江是美人窝”等低级庸俗的歌舞，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犯中国领土、民族危急的形势极不相称。聂耳几次向“明月歌舞社”领导提出严厉批评，并以“黑天使”、“浣玉”等笔名发表《批评杂谈》、《中国歌舞短论》、《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等文章，要求“明月”领导摒弃毒害青少年的音乐歌舞节目[(3)]。他还竭力主张“明月”到苏联演出，吸收新的艺术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他提出的意

见未被采纳，便愤然脱离“明月”，8月底离开上海前往北平。他参加左翼剧联领导的新剧活动，在抗日独幕剧《血液》中任主角，并在北平各界群众举行纪念“九一八”周年的隆重集会上，用小提琴演奏被禁演的《国际歌》。同年11月，聂耳回到上海，进入联华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

1933年2月，聂耳与夏衍、田汉、洪深等三十一人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他和任光、安娥、吕骥等人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经常在任光、安娥家里聚会，交流创作思想，研究音乐艺术。他提出“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应该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解决的课题[(4)]，他创作了《开矿歌》（田汉词，电影《母性之光》插曲）、《小工人》（安娥词）、《饥寒交迫之歌》（董每戡词，独幕剧《饥饿线》插曲）、《静夜曲》等作品。同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被百代影片公司请去组织国乐团，并协助任光搞录音工作，为电影《渔光曲》配音。6月14日，《渔光曲》在“金城”公演，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赞许。11月，他又被“联华”请回主持音乐工作，并兼顾艺华影片公司和新开办的电通影片公司的音乐工作。是年，他共创作歌曲二十二首。他与田汉合编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他负责配音并谱曲《码头工人歌》、《苦力歌》等四首歌曲，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能准确而又深刻塑造工人阶级形象的作曲家。苏联《国际艺术》杂志也刊登了聂耳的照片。他的《毕业歌》（田汉词，电影《桃李劫》插曲）充分表达了中国青年慷慨激昂的反帝爱国精神。他的《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大路歌》（孙瑜词）也因节奏深沉、刚毅，将劳动阶层的痛苦、怨恨以及反抗精神展示无遗，获得强烈的社会效果。嗣后，他为艺华公司的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村》和《牧羊女》两首抒情插曲（孙师毅词），以及为话剧《回春之路》创作的《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田汉词）等插曲，成为鼓舞各阶层人民奋起抗战的精神武器。

他还根据民间乐曲整理改写了《金蛇狂舞》、《山国情侣》、《翠湖春晓》等四首民族器乐曲，旋律优美动人，感情色彩浓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他还创作了《前夜》、《时代青年》两个剧本，撰写了《看俄国歌剧杂谈》、《一年来之中国音乐》等十二篇论文，以及短篇小说、散文、通讯等。

1935年，聂耳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主题歌《新女性》（孙师毅词），为电影《逃亡》创作了《塞外村女》、《自卫歌》两首插曲。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田汉词）在国内引起轰动。

短短两年，聂耳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传遍中华大地，他的作品灌制成唱片，被抢购一空。人们赞誉他为乐坛巨星，冼星海评价他为“划时代的作曲家”，“民族呼声的代表者”[(5)]。

1935年4月初，聂耳得到上海反动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经过党组织同意，决定赴苏联学习音乐。4月15日，乘长崎丸离开上海，准备先到日本学习一年。4月17日抵神户，次日上午到达东京，第二天便开始了紧张的学习。6月2日，他出席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界聚餐会，发表《关于中国新兴音乐》演说，在听众热烈掌声中演唱了《码头工人歌》和《大路歌》。6月16日，他出席留日中国学生诗歌座谈会，并提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作为下次座谈会的研究题目。

不久，聂耳认识了一位在日本新协剧团从事灯光工作的朝鲜籍人李相南，两人很快成为朋友。新协剧团这时正准备赴外地演出，李邀聂耳帮忙。聂耳想到既可以观摩演出，又达到旅游目的，便欣然同意。他与李先行出发旅游，7月8日上午到达神奈川县藤泽町，借住在李的朋友滨田实弘的姐姐家。当时正值盛夏，聂耳和房东滨田一家每天赴鹄沼海滨浴场洗海水浴。7月17日午后，他们前往鹄沼海滨，聂耳独自一人在水深至胸部的海水里做跳浪活动。一小时后，李相南和

滨田的姐姐携孩子先后上岸，遍寻聂耳不见。第二天早晨聂耳的遗体从海底打捞上来，嘴里流着血，头部也有血迹，据当地医生检验，聂耳系窒息死亡，年仅二十三岁。

聂耳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到祖国，人们惊疑、叹息不止。8月，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田汉、郭沫若致悼词。日本东京、千叶县等地也先后举行了追悼聂耳的大会，出版了《聂耳纪念集》。藤泽市民在聂耳去世的鹄沼海滨建了一座聂耳纪念碑。

1954年2月，中国政府在云南昆明市西山、园通山分别修建了聂耳纪念碑和纪念亭。郭沫若撰写的碑文有“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不能明焉”之句，表达了人们对聂耳惨遭不幸的疑惑与惋惜之情。

---

(1) 汪毓和著：《聂耳详传》，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2) 汪毓和著：《聂耳详传》，第8页。

(3) 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4) 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第198页。

(5) 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第88页。

聂云台

江绍贞

聂云台，名其杰，原籍湖南衡山，1880年10月8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五）出生在长沙。他父亲聂缉槼是曾国藩的女婿，当过上海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等官职。聂缉槼在1890—1893年上海道台任内，其账房徐子静侵蚀的赃款中，有华新纺织新局股票四百五十股，计银五万四千两。徐被迫交出后，聂将其据为己有，因而占有这个企业股权的十分之一[(1)]。1904年聂缉槼任浙江巡抚时，凭借权势，又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在湖南沅江、南县一带洞庭湖滨取得淤田四万余亩，后来建成了“种福垸”大地主庄园。

聂云台是聂缉槼的第三子，1883年即随父住在上海。少年时延师就读，于1893年回原籍参加童试，考取秀才。此后，他跟随外国人学英语及电气、化学工程等，虽未入过正式学校，但于各学科皆有所通晓，操英语尤熟练。

华新纺织新局是洋务派所主持的官商合办企业，原为前任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人在李鸿章支持下于1888年筹办，1891年开工，聂缉槼任上海道后，曾参与筹办。开工头几年，营业情况较好，但甲午战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连年亏损，许多股东失去经营信心。1904年，聂缉槼任浙江巡抚时，不便出面经商，便指使其旧日亲信汤癸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新，由汤任复泰总理，聂云台被派任复泰的经理。当时日俄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复泰租办华新第一年就获利九万两。次年，汤癸生病死后，复泰进行了改组，聂云台取得他父亲的同意，将复泰改组为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由他自己担任复泰公司总理，其弟聂管臣任协理。改组后的复泰，仍继续租办华新。这时聂家除已据有的股权外，经汤癸生生前又代聂家陆续收

买了一部分华新股票，同时汤家一部分华新股票也被收买过来，遂一家占有了华新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股权上占了绝对优势。

1908年底，复泰对华新的租期届满。当时纱业有利可图，华新其他老股东要求收回自办，而聂家则想独占经营，争夺激烈。聂云台便凭借聂家在股权上的绝对优势，召集华新的董事会议，迫使董事会同意全部厂产拍卖。开标结果，聂云台以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两银得标。但划除聂家应得之拍卖份额外，只需再拿出十万两左右，就全部占有了这个企业。

华新为聂家收买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由聂云台担任总理，聂管臣任协理。初期，因沿用华新旧有机器设备，产量和质量都不高。为此，聂云台曾进行过一些技术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1909年，由聂云台亲自主持开办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废除了包工头制。特别是1912年率先将蒸汽引擎改为电动机，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恒丰也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到1918年底以前，聂云台没有及早地更新和扩充恒丰的生产设备，而是将利润所得投资在封建土地的经营上。恒丰的设备更新，是1919年以后的事。

“种福垸”大庄园是聂家经营的另一产业，它与恒丰的关系，像一对孪生兄弟，互为支援和调剂。在“种福垸”建立之初，因为筑堤排涝，继续收买邻近土地，需款甚巨，截止1915年，从恒丰汇往“种福垸”的资金不下六十万元。到“种福垸”工程完成有了收益之后，又反转来，以收益支持恒丰。“种福垸”东西长十六里，南北宽十里，分东、南、西、北四区，三百七十四牌，可耕地达四万五千到四万八千亩，招租佃户三千余家。从1916年起，聂家开始从土地上得到大量的收入，每年从农民身上获得“正租”稻谷五六万石，棉花一万五千斤左右，其他杂课尚多，超过正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920年后，正式建立起一套管理机构，设有总理、协理、堤务局主任等职，并有由县府名义派往、而实际由聂家豢养的保警队，可以任意对佃农进行逮捕和

审判。

1915年，聂云台作为中国实业团副团长赴美访问。1917年，他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聂担任临时干事。1918年冬，由于家族内部的矛盾，聂氏兄弟实行析产，将恒丰分作九股，成为其母（曾纪芬）与各房兄弟的合伙公司，推聂云台为总理，协理一职改由其另一兄弟聂潞生担任。“种福垸”无法分割，仍为聂家各房共有，由聂其贤等在当地经营，但大权仍由聂云台掌握。

欧战结束后，我国棉纺业仍有几年的继续繁荣。由于恒丰历年有了积累，加之又有大量的地租收入，聂云台开始对恒丰进行扩充，除增添纱锭和布机外，并着手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1919年6月，由聂云台发起招股，在吴淞蕴藻浜筹建大中华纱厂。大中华原定资本银九十万两，聂家投资二十三万两。由于投资踊跃，到1922年全部建成投产时，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资本达二百万两，为当时华商第一流纱厂，聂云台担任该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此同时，他还与姚锡舟等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正廷、吴善卿等在上海建华丰纺织公司，与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等在吴淞办中国铁工厂，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办中美贸易公司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聂云台分别担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等职。他还参与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筹建，并自设恒大纱号，作为交易所经纪搞投机买卖。1921年，聂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为湖南最大粮栈之一。聂家企业的发展，使聂云台在工商界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1920年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迄1921年止，恒丰的纺锭增加到四万一千余枚，布机六百台，有职工三千余人。但由于他们家、厂不分，封建的人事关系与企业的管理体制纠缠不清，使其发展速度落后于同期全国棉纺业的发展水平。

1923年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卷土重来，华商棉纺业陷于慢性危机，聂云台所经营的各项企业都遭受巨大的损失。恒丰纱厂于1923—

1924年间一度停工，为了维持周转，1924年曾向恒隆钱庄借款六十万两，此后长期借债度日[2]。特别是大中华纱厂，开工不到三年，因受外资竞争的打击，承担不起债务的负担，于1924年8月仅以一百五十九万两忍痛出售，聂家损失银三十余万两。其他企业，如中美贸易公司向美商订购颜料，因价格跌落损失三四十万两。华丰纺织厂因亏损于1927年被日商吞并。中国铁工厂因经营失利，一度被债权人拍卖未成，1932年“一二八”之役毁于炮火。

聂云台在经营上的失败，使他在工商界以及在家庭中的信誉大为降低。1924年后，他虽仍旧总理之名，实则处于退休地位，企业由聂潞生出面维持。此后，聂潞生逐渐成为恒丰厂和聂家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

恒丰的工人工资水平在同业中属于最低的，又有各种克扣课罚制度。1923年恒丰工人自发地发动了第一次罢工，以后接连不断。1925年五卅运动中，恒丰工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聂云台、聂潞生等非常恐惧，他们买通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捉拿罢工工人，拘留、开除工运领导干部。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高涨，聂云台多次著文，把群众称作是“随声附和的群氓”，极力宣传印度的甘地主义和提倡生产救国[3]。

1926年，聂云台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和顾问，这年他生病几死。此后疾病缠身，意念消沉，在长斋念佛中生活，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1943年，又因骨痨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而恒丰则在聂潞生主持下，聂云台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二百四十万两偿还旧债，并以余款建造三厂。1935年秋，恒丰各厂（包括纱号）因亏损停业。1936年由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征得聂家同意，将恒丰出租给宋系资本开办的中国棉业公司，改名为恒丰中记纺织新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棉公司商请浙江兴业银行同意，停止租赁关系。“浙兴”为保全债权利益，与聂家一起将恒丰伪装成英商产业，借以逃避日军管理，但没有成功。1938年5月，恒丰被日本军管。1942

年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所谓“恒丰纺绩株式会社”，向日本领事馆注册，资本中日各半，聂家从日方找补的现款中偿还了“浙兴”的债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潞生因曾担任过汪伪政权“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理事及其他伪职，不便公开活动。聂云台虽已体肢残疾，不得不再次走到前台。当时，恒丰已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聂云台为收回产权，写信向宋子文求助，又指使他儿子聂含章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聂含章的表兄）活动，由俞向宋子文说情。聂家与“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主任徐寄廎、“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等人也都早有交情，经他们疏通，终于在1946年3月将产权收回。为此，聂家赠送俞大维和俞母大量恒丰股票，并让俞大维充当恒丰董事。这样，出任过伪职的聂潞生也就未受到任何追究。

聂云台虽将恒丰收回，但经过抗战以来的变化，聂家已无力经营，遂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由聂云台出任董事长，聂含章任总经理，吴柏年为经理。恒丰由聂、吴两家合办后，利用吴家提供的流动资金，趁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和通货膨胀之机，大搞投机活动，猎取暴利。但是，他们并不将盈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而随时分掉，同时将纱布出口所得的外汇存放在国外。解放初期，恒丰设备陈旧，资金缺乏，财务亏损，种种困难，几至无法支持。经过人民政府对该厂多方面的扶助与整顿，工人们努力增产，主动减薪，并对资方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斗争，促使他们将逃资调回，生产才逐步好转。

1953年12月12日，聂云台因病在上海去世。

---

(1) 据曾纪芬记述：“初，中丞公在沪道任内亏空八十万，皆系因账房徐

某吞蚀所致，爰由内账房汤癸生君经手陆续追出各种股票，其中以汇丰银行及开平煤矿为大宗。此外则轮船一只名飞鲸及码头，亟以变卖，抵偿公款。有纺织新局者，因已数年不分股息，其股票五万四千两（即四百五十股）竟一钱不值。”见《崇德老人自述年谱》，京城印书局1933年版。

(2) 恒丰1924年向恒隆钱庄借款六十万两，次年到期，无力偿还，改向恒丰昌等四家钱庄借款一百万两，1926年又无力偿还。使用机器、厂房做抵押，向沙逊洋行借款一百五十万两。此款转期三次，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二百四十万两后才归还。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第一家棉织厂》，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 聂其杰：《廉俭救国说》，国光印书局1934年版。

钮永键

杨克义

钮永键，字惕生，江苏上海（今属上海市）人，生于1870年4月8日（清同治九年三月初八）。父钮世章，同治三年中乡举，曾创办吴会书院，著有《琴韵楼诗文集》。

钮永键五岁起入塾，因聪颖过人，于1889年二十岁时考取秀才，居榜首，由提学使特调到著称于江南的江阴南菁书院就读。其时，恰与吴稚晖同学，俩人间的毕生友谊亦从此开始。1892年，书院学生与江阴知县发生纠纷，他与吴稚晖因不满书院山长的所为，愤而退学。返上海后，入正经书院攻读。在此期间，他接受了维新思想，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尤为倾心。1894年，他应江南恩科乡试中举。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钮痛恨清廷腐败，乃弃文习武，于1895年考取湖北武备学堂，接受德国式军事教育四年。毕业后返回上海，先在经莲珊办的两等学堂任教，后又帮助经莲珊创办高昌庙女学，并任教务长。

1899年，张之洞选送日本留学生，钮永键赴武昌应试获第一名，被录取。因抵东京时间迟误，他未能进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即在东京补习日文，同时为组织留学生事奔走。次年3月，吴稚晖到东京与他同住神田区朋凌馆。5月，他受程家柽、吴禄贞之邀，去横滨山下町拜访孙中山，一起畅谈了革命思想和形势。从此，他与孙中山有了较多交往，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投身民主革命的志向亦愈益坚定。他串连川、粤籍留日学生，筹办地方性的学生会，为成立留学生总会“中国协会”而奔走。当时国内为培植青年，抵御外侮，各省多筹办武备学堂。12月，他受两广总督陶模的邀请，回国在黄埔筹办广东武备学堂。半年后，武备学堂招生就绪，他又返回东京。在东京，他与史久光等编印《江苏》杂志，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1903年，俄军在日俄战争中占领我国东北，留日学生群情激愤。钮永键与黄兴、蓝天蔚、秦毓鎏、叶润等发起组织留日学生抗俄集会，会上议决成立拒俄义勇队，推蓝天蔚为队长，并选举钮永键与汤尔和为特派员，回天津说服袁世凯对俄主战。由于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阻挠，义勇队被迫解散，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为东京发动国内革命的一个团体。5月，钮与汤尔和回到天津，几次请见袁世凯均被拒绝，只得重返东京。在留日学生革命热情的影响下，不久他又返回上海活动，在家乡创办紫岗学舍，招收青年训练新式兵操，灌输革命思想。第二年，他应广西太平思顺兵备道兼边防督办庄蕴宽的邀请，去龙州边防大营任总文案，兼边防教导团总理。1905年，黄兴从日本回国，为谋桂林起义，曾去龙州联络钮永键、秦毓鎏等。嗣后庄蕴宽调任桂林兵备道总办，钮亦调任为帮办，同时受命筹办广西讲武堂及陆军小学，兼任总监。他经黄兴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在广西任职四年多的时间里，他的革命思想对学生影响很大，许多青年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09年冬，钮的革命活动被清廷发觉后，受到两广总督的缉捕。他逃往香港后，于次年赴柏林，考察德国军事。1911年春，他在德国获悉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决定立即回国投身革命。

10月中旬钮永键抵达上海后，武昌起义已爆发，他看到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各处多在酝酿革命起义，上海方面也已由陈其美、李燮和等策划布置，便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他在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之间做了一些协调工作，推动上海反清势力的三股力量汇聚在一起。11月3日，陈其美率先攻江南制造局被拘。第二天钮永键协助上海商团组织援军，由李燮和率敢死队攻陷制造局，解救了陈其美等人。上海光复后，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钮永键任军务部长。钮又立即转赴松江，说服他的许多学生——松江驻军举行起义。11月6日松江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分府，钮被推举为军政部长。他组建松军干部学校和弁目营、学生军，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其时，与革命军相持的清军将领张勋自南京秘密逃往徐州，南京城内空虚。

钮即与革命党人顾忠琛连夜走访上海巨商虞洽卿，筹借巨款，交给因起义不成、在上海待机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徐得款后赶赴镇江，集合旧部，会同浙江、江苏义军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取得胜利。12月初，江苏都督府由苏州移驻南京，钮永键被任命为参谋次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成立参谋本部，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钮永键为参谋副长。从此，黄、钮二人的交往和友谊更趋密切。2月13日，在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参议院应孙中山咨请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电请袁来南京就职。袁不肯南下，孙中山就派蔡元培为欢迎特使，宋教仁、钮永键等八人为欢迎员，北上迎袁。袁借口曹锟部兵变，不肯南下。钮洞察袁之用心，曾向孙中山提出兴兵讨袁建议，因认识不一而未成。3月，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则于4月1日行解职礼，钮也随同解职。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北上，钮永键作为参谋随同前往。在北京时，适逢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钮被举为名誉参议。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刺，袁世凯反对革命的阴谋败露。孙中山发起讨袁，开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7月间，上海继江苏宣布独立，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钮永键为总参谋长。同时松江也宣布独立，钮被推为司令。7月23日，上海讨袁军攻江南制造局不克，钮25日率松江学生军及敢死队猛攻，仍未能下。8月，沪、宁等地讨袁军事先后失败，钮率领余部退至江苏嘉定一带。但大势已去，众寡悬殊，最后被迫在太仓解散部队，自己赴日本避难。其时，孙中山在日本积极酝酿筹建中华革命党，钮亦参与其事，并与戴季陶、陈其美等二十三人在东京先期入党。

1914年春，为组建中华革命党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发生歧见，以致形成了两派。钮永键虽有先期入党之举，但此时又与黄兴等人的主张相接近，因而感到左右为难，不好自处。他采取回避矛盾的方

法，在3月间离开日本，经美转英，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事。其间，与当时在英国的吴稚晖有较多的联系交往。一年后，他于5月动身经美国返回日本。这时由于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状况亦渐趋稳定。是年秋，袁世凯帝制阴谋公开暴露，全国反对帝制的浪潮风起云涌。10月，钮永键返回上海，参加国内反袁斗争。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钮与林隐青冒险去南宁，策动陆荣廷倒戈未果。当他乘船到达香港时，知道各路讨袁护国军已纷纷出兵，乃于1916年3月赶回上海，进行苏浙方面的讨袁策应工作。5月，陈其美在上海被袁党暗杀，钮永键受命和王宠惠筹办其丧事。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他也参与办理治丧事宜。当时，吴稚晖从英国返沪后，担任《中华新报》主笔，钮曾在报社任职。

1917年9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年底，钮永键应孙中山电召到广州，接受冷遹所部的十五个营，出任师长。1918年初，孙中山任命钮永键为军政府参谋次长兼石井兵工厂总办。12月，钮在广州遭枪击受伤，乃离职养伤，愈后即辞职返沪疗养。他一时情绪消沉，为回避时局的纷扰，在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中西女塾执教，又与徐谦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办“查经班”。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表钮永键为江苏省长。因此时江苏尚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钮无法就职，只做一些筹备工作，各方联络苏沪的革命党人，开展活动。1923年，孙中山为打破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方局面，派员北上联络同志和策动各方军政人员，钮永键和徐谦受命赴北京，在冯玉祥身边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后钮被冯委为国民军总参议。1924年冬，孙中山受邀北上商讨国是，钮永键得知孙中山途中病发，特赶至天津迎候，陪同进京。孙中山于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钮被推举为抬棺移灵的国民党二十四位要人之一。此后钮仍留在国民军中工作，直至国民军撤离北京，钮才返回南方。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钮永键奉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部总参议，负责上海的敌后活动。其间，他曾策动孙传芳部的海军起义，但他不肯支持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活动，而热衷于用官禄来收买和策动敌军。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夕，他辞去任职，声称要“闭门谢客”，回避革命风暴，也未参与后来的“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不久又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厅长。11月，省政府改为主席制，他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当时，刚摆脱军阀统治的江苏，政治、经济上的稳定和发展任务很重，加之江苏又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畿辅拱卫”之地，故而钮永键是身负重任。在主政江苏的三年时间里，他秉承蒋介石建立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方略，以“清、慎、勤”作为格言，做了不少工作。为充分发挥省政府的作用，避免省政府与中央机关、南京特别市机关同处南京而受到的干扰，他主持将省会迁往镇江。他自兼水陆公安管理处长，建立陆上保安团和水上公安处，强化治安工作，清剿溃兵游勇、盗贼土匪，较快地取得了社会安定。与此同时，他也积极执行“清党”反共的方针，对转入地下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进行搜捕镇压。他下力整理财政，清整全省的田政、地籍，并督促清查赋税。他对文化教育工作比较重视，省政府专门成立教育经费管理处并自兼处长，对各县教育经费实行单独管理，不准其他方面侵占或挪用。1928年至1930年，江苏省大、中、小学的学生数及经费数字，均居全国各省之首。钮还重视发展社会教育，在无锡设立省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人才，设立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识字教育，在各县普遍设立民众教育馆，以致当时的江苏成为全国推行民众社会教育最发达的省份。

1930年3月，钮永键辞去江苏省政府主席职务，旋即被任命为行政院内政部代理部长。年底，又调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考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半年。考试院的工作本是有职无权，但钮在工作中仍很认真，在人员的任用、考绩、奖励以及考试院的组织等多方面，参与或主持制定了若干规范和条例，并参加了一

些考试实施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钮永键又奉命兼铨叙部部长。1941年国民政府成立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他被聘为专任委员。12月，钮永键辞去考试院副院长之职，转任国民政府委员兼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简任官以上政务官员的惩戒事宜。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举行，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抗战胜利后，钮永键和叶楚伧奉派为京、沪、苏、浙、皖五省市宣慰使，往来于苏、浙、皖之间。其间因叶楚伧病逝，宣慰一事多为钮永键负责。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迁返南京，他仍任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职。1947年，国民政府组织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选举，他受派督导江苏省选举。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钮永键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49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考试院副院长，并随考试院迁往台湾。

钮永键在台湾先被蒋介石聘为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1950年9月举行高等及普通学校考试，他担任典试委员长。1952年钮永键八十三岁时，以年老体弱辞去各项职务。1953年夏赴美就医。1957年曾返台出席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1965年12月23日，钮永键在纽约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杨恺龄：《钮惕生先生的生平》，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8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

杨恺龄编：《钮惕生先生遗札选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杨恺龄编：《钮惕生先生年谱》，《东方杂志》复刊第10卷第2—3期。

区寿年

边篆

区寿年，字介眉，广东罗定人，1902年10月5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生。祖父区龙光是个武进士，其后人多崇尚武艺。区寿年幼时入本村塾，后在多镜圩小学求读，高小毕业后居家务农。

1921年冬，经叔父介绍，区寿年至舅父蔡廷锴所在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第十一连连部任文书。嗣后至粤军阳江军事教练所学习，结业后回十一连任司务长，后升排长。1922年5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粤军第一师进军北上占领赣州，区寿年也参加了攻克赣州之战。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粤军回师平叛，但第四团在团长带领下附陈，至增防梧州时又投拥戴孙中山的滇桂联军。区随部辗转，先后参加了收复省城、进攻肇庆、争夺英德等战斗。1924年秋，蔡廷锴在粤军第一师第二团任第一营营长，任区为第三连连长。区在家乡招募一批青年，在封川一带训练。

1925年8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区寿年连编属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一营。不久，参加南征讨伐邓本殷之役。翌年7月，第十师出征北伐，区连在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带领下担任前卫，参加了攻克平江、激战贺胜桥、进占武昌城等战役，英勇作战，是“铁军”中的一支优秀队伍。嗣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区寿年升为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参加了对奉军作战的临颍、开封等役，获得嘉奖。

蒋介石于1927年4月“清党”反共后，7月汪精卫又在武汉“分共”，第十师在师长蔡廷锴率领下跟随叶挺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在随后南下向广东进军途中，第十师脱离了起义队伍，开到赣东北之铅山。

第十师又恢复了编属第十一军的建制，为第二十四师，区寿年被任命为第七十团团长。部队编配后由赣入闽，1928年初奉李济深之命至广东东江，截击张发奎军奏捷，驻防琼崖，区团在高州、徐闻整训。

1929年秋，区寿年升任蔡廷锴第六十师第一二〇旅旅长。在年末的粤桂战争中，区旅在花县击溃桂军后跟踪进击梧州、火山奏捷，打开了广西的门户。1930年2月粤桂战火再燃，区随蔡廷锴作战，在进占北流一带后驰往民乐援香翰屏第六十二师，歼桂军数百。5月，第六十师与蒋光鼐第六十一师联袂参加中原大战，先击败桂张（发奎）联军于衡阳，旋即快速北上，在鲁境津浦线上与阎锡山军激战。在攻克泰安之战中，区旅攻占右翼集镇后又驱逐泰安守敌。继后在攻占济南之战中，区旅与敌激战于长城岭和党家庆附近之高地，抢占火车站。敌全线溃退，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合力攻打济南城，于8月15日进占。蒋介石为奖赏两师，遂编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接着第十九路军西驰河南，投入陇海线战事。战后，区因战功获四等宝鼎勋章。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队前往江西，第十九路军开至兴国，参加第二次对红军的“围剿”。1931年5月，第十九路军在江西吉安扩编，新建第七十八师，区寿年升任该师师长。在接着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战中，区师留守吉安。“九一八”事变后，第十九路军将士义愤填膺，在赣州集会强烈要求武装抗日，停止内战。嗣后第十九路军调赴宁沪沿线，总部和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区寿年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

1932年1月中下旬，日本侵略军在上海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无理要求中国驻军撤退三十公里。1月2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至上海，要蔡廷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蔡拒，区闻悉愤慨不已，表示若要撤退就退伍回家做农民，免受侮辱。随后区偕第七十八师旅长以上将领随蔡至苏州，出席第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紧急会议，表明抗日决心。日方加紧挑衅，还于27日提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撤退闸北的

中国驻军。何应钦与参谋总长朱培德27日三次急电命令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并令第七十八师防地交给宪兵团接防。28日下午4时还来电限于当日下午6时交防完毕，不得贻误戎机。但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在上海市区的四川北路、老靶子路等地频繁调动。区寿年接报后，要求推迟到29日交防，以免自乱阵脚。区还接到蒋光鼐、蔡廷锴的密令：如若日军来犯，即行抵抗。结果28日深夜11时30分，两股日军分向驻守在闸北虬江路等路口的第七十八师翁绍垣第一五六旅第六团第一营、二营防地突击。第六团官兵奋起还击，打响了淞沪抗战。区寿年果断指挥所部坚决抗御六千多海军陆战队的进攻，还利用闸北街道楼群堡垒进行反击。嗣后，战线由闸北延伸到江湾、庙行、吴淞、宝山等地，第十九路军三个师三万余兵力一齐上阵，更得到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及教导总队、宋子文领导的税警总团等部的增援，还得到上海和全国民众的鼓舞和支援，将士们抗日御敌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在闸北巷战、吴淞要塞战、八字桥战斗、蕴藻浜战斗、江湾庙行战斗、浏河战斗等前后三十三天的血战中，杀伤日本侵略军万余人，迫使敌军三度增兵、四次更换指挥官。由于日军增援部队又于3月1日在太仓、浏河登陆，而蒋介石未再增派援军，第十九路军在苦战月余、伤亡逾万、弹药不济的困难情况下，不得不撤离上海，退驻嘉定等地。中日双方3月3日宣布停战，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区寿年坚决抗敌，勇敢善战，受到各界和舆论的赞扬，国民政府亦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为全国军民赞颂的第十九路军随即被蒋介石调赴福建“剿共”，在闽西北几次与红军遭遇。区寿年率第七十八师驻守连城，但在朋口一战中被红军击败，损失甚大，只得弃连城撤往永安。

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与陈铭枢、李济深等爱国反蒋人士发动“福建事变”，自建“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革命军”，区寿年被任命为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军长。但蒋介石抽调十

五个师进攻福建，同时利诱收买一些军官。“闽变”于1934年1月失败，第十九路军解体，所部接受改编，区寿年离开部队潜赴香港。后赴德国研学军事，还赴英、法、意等国参观考察，获取新知。

1936年7月，区寿年随同蔡廷锴由香港至南宁，经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商妥，在广西恢复第十九路军，8月发表宣言后即赴前线抗日。第十九路军恢复三个师的建制，区寿年仍任第七十八师师长。不久，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妥协，蔡廷锴出走香港，广西部队缩编，第十九路军被缩编为第二十六师，区寿年任师长。翌年初第二十六师改为陆军第一七六师，区仍为师长，隶属李宗仁第五路军。

卢沟桥事变后，区寿年所部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徐州会战和保卫武汉的黄梅、广济战役。1938年9月，区寿年升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兼第一七六师师长。武汉保卫战结束后，区率部随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先曾兼任第四十八军军长）入皖，在大别山地区建立豫鄂皖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东区南分区指挥官，在安徽太湖、潜山、桐山和湖北应山、罗田等十一县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区建立了一个政治总队，在根据地宣传抗日救亡，建立群众自卫组织，恢复地方秩序，清查汉奸敌探，还组织战地服务队协助作战。1939年11月，区升任第四十八军军长。翌年7月，他到重庆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两年。1943年2月，区被任命为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驻湖北恩施。但他手头无一兵一卒，常与其时软禁在恩施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打牌消遣。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整治军队准备内战，改集团军为绥靖区，区寿年于1946年2月改任第六绥靖区副主任，协同周岩率部驻防豫南商丘。1948年6月，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已陷入“分区防御”的困境，区寿年被任命为第七兵团司令，指挥余锦源整编七十二师、沈澄年整编七十五师共五个旅的兵力，配合邱清泉第二兵团进攻开封。区兵团奉命由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于6月27日被解放军主力分割包围。区率整七十五师在龙王店投入很大兵力修筑外壕、鹿砦、土

围墙、火力点和防御工事，打算坚守待援。7月1日，解放军向龙王店发起总攻，突破土围子向守敌阵地猛烈进攻，区部难以抗御，坚固的土围子反而成了困缚区部的陷阱，左冲右突也出不了土围子。战至2日凌晨，第七兵团司令部、七十五师师部及第十六旅一个个全被歼灭，区寿年及师长沈澄年等人被俘。

区寿年经过两年学习改造，获得宽大处理。1951年回到广州，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选为宣传委员会委员。1954年被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翌年又任市政协常委。1957年1月15日，区寿年因长期胃溃疡医治无效而逝。

主要参考资料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史略稿》，中华书局1987年—1992年版。

陈燕茂、黄和寿：《十九路军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林一元：《区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欧阳予倩

张小曼　杨光莹

欧阳予倩，湖南浏阳人。1889年5月1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二）生。他的祖父欧阳中鹄是清末有名的学者，官至广西巡抚。唐才常、谭嗣同都是他的学生。

欧阳予倩从六岁到十二岁在家塾读书，唐才常是他的蒙师。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被杀，欧阳颇受刺激。1901年随祖父到北京读书。次年入湖南长沙经正中学堂。经正的教员中有几个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劝欧阳到日本去。1903年欧阳到日本东京进成城中学。1906年奉母命回乡结婚。1907年再次赴日入明治大学商科。同年他在东京参加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了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黑奴吁天录》，目的是为了惊醒国人，奋发图强。此后，又演出了法国浪漫派作家萨都的《热血》。这是一出歌颂革命党人、鼓舞革命斗志的戏剧。看了“春柳社”的演出之后，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参加了同盟会。这使欧阳意识到戏剧艺术的教育作用，决心一生从事戏剧事业。1908年改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

辛亥革命后欧阳予倩从日本回国。1913年他在湖南长沙组织“文社”剧团。演《运动力》一剧时，因剧中结尾是农民焚烧地主的楼房，触动了统治阶级，“文社”为湖南都督汤芗铭逼迫解散。1914年春节后，欧阳从长沙回到上海，和陆镜若等组织“新剧同志会”，用“春柳社”名义演出《猛回头》、《社会钟》等话剧，宣传民主革命，揭露当时的黑暗统治。

欧阳予倩在从事话剧的同时，刻苦地向陈祥云、江梦花等学习京剧，向薛瑶卿学习昆曲。1916年终于正式成为职业京剧演员。此后十

五年中，欧阳对京剧加以革新和创造，编演了二十多个新的京剧剧目，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妇女形象，自成一派，获得“南欧北梅”的赞誉。

为了发展话剧运动，1918年欧阳予倩再次去日本调查戏剧情况。同年回国后，得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支持，到南通办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想借此培养一批有知识的演员，以便组织剧团，改革戏剧。但欧阳在南通三年，收获不大，于1921年离开南通回到上海。同年12月，与汪优游、谷剑尘、应云卫等人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体——上海戏剧协社，并结识了田汉。1922年洪深回国后，经欧阳介绍也加入了戏剧协社。由洪深导演，协社连续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汪优游的《好儿子》和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娜拉》等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1926年，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兴起，欧阳予倩参加了民新影业公司。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玉洁冰清》，后来又拍了《三年以后》、《天涯歌女》。

1927年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田汉参加了政治部的工作。欧阳予倩接受田汉的邀约，到南京担任政治部艺术指导员，因此认识了陈铭枢。不久龙潭战役发生，南京一片混乱，欧阳便与田汉、唐槐秋一起回到上海。

1928年1月，欧阳予倩参加了田汉所组织的南国社，并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冬，陈铭枢邀欧阳到广东去搞戏剧运动，他便随陈到了广州。1929年2月在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附设有戏剧学校、音乐学校、管弦乐队，并办了一个《戏剧》杂志。当时广东政变频繁，内战不断，戏剧研究所也时办时停，三年中就停办了三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欧阳在广东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广东分盟。10月，离开广州经香港转往上海。

同年11月，欧阳予倩在上海组织“现代剧团”，参加的有应云卫、唐槐秋等。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现代剧团”解散。欧阳写了《不要忘了》和《同住的三家人》两个剧本。《不要忘了》以活报剧的形式，反映了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后，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的无理态度，以及工人阶级对此事的示威抗议。独幕剧《同住的三家人》真实地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巧立名目掠夺老百姓的黑暗统治。

1932年秋，欧阳予倩与陈铭枢同赴欧洲考察戏剧。欧阳在法国住了半年，曾和冼星海一起多次参加留法华工组织的晚会活动。1933年夏，欧阳到苏联参加第一届戏剧节。10月回到福州，参加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并拟定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国旗”、“国歌”。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欧阳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4年冬通缉令取消后，回到上海，为新华影业公司编导了电影《新桃花扇》。1935年欧阳参加明星影片公司，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等片。1936年冬他加入联华影片公司，编导了《如此繁华》，没有拍完，“八一三”战事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欧阳负责组织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来，他加入戏剧界和京剧界救亡协会，并被选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积极组织救亡演剧队，往各地演出。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欧阳予倩在上海租界内组织了一个中华京剧团。上演的第一个戏是欧阳自编的《梁红玉》，接着又演出了《渔夫恨》和《桃花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汉奸特务逼他和日本侵略者见面，他设法秘密离开上海到了香港。随即应马君武电邀到桂林帮忙改进桂剧，于1938年5月到了桂林。

由于马君武不赞成欧阳予倩的剧本，欧阳予倩在桂林勉强排完了一出《梁红玉》，就和徐悲鸿一同到了香港。这时，正值唐槐秋带了中国旅行团在港演出，欧阳为他们排了《流寇队长》、《日出》、《钦差大臣》等戏。欧阳还为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写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后来这部影片打破了当时国产片的卖座纪录。1939年，欧阳应何香凝邀请，曾在香港为《救亡日报》募捐，并与廖承志、夏衍取

得联系。从那以后，欧阳与中共经常保持联系。

1939年8月，欧阳予倩又接到马君武和原北大教授白经天的信，劝他仍回桂林，于是他再次回到桂林。马君武便将桂剧团全部交欧阳经管。1940年，广西省政府又把徐悲鸿走后留下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移交给欧阳，由他担任艺术馆馆长兼桂剧团团长。从此，直到1944年桂林沦陷，欧阳一直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和桂系的矛盾，运用戏剧艺术武器，大力进行团结抗日宣传活动。这期间由欧阳导演的多幕剧有老舍的《国家至上》、夏衍的《愁城记》、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和他自己的《忠王李秀成》等戏。

与此同时，欧阳予倩还编导了不少桂剧，培养了一批桂剧演员。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欧阳和田汉在桂林组织了有八个省包括几十个剧团参加演出的“西南戏剧展览会”，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戏剧力量的大会师和大检阅。

1944年7月，桂林因受日军进逼紧急疏散，欧阳予倩和广西艺术馆的一部分人退到桂东昭平县。这时欧阳和陈劭先、陈此生、千家驹、张锡昌等经常接触。以陈劭先为主，在昭平办了《广西日报》昭平版。昭平吃紧后，他们疏散到深山中的黄姚村继续办报，后来该报改为欧阳负责。由于这个报纸经常转载《新华日报》的消息，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桂东十几县的人都看这份报纸。1945年夏，欧阳正式加入民盟。日本投降后，欧阳从昭平回到桂林。

1946年纪念“五四”时，欧阳予倩在讲话中批评美国前总统胡佛利用粮食为诱饵，破坏东欧国家的团结，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愤然辞去艺术馆馆长职，于同年秋离开桂林回到上海。当时，他生活相当困难，一度在上海市立剧专讲课。冬天，新中国剧社因在上海找不到演戏的地盘，约欧阳领队去台湾演出。1947年1月欧阳和他们到台湾后，为他们导演了《郑成功》、《桃花扇》、《日出》等戏，深受欢

迎。

1947年冬，欧阳予倩接受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聘约到了香港。不久，与顾而已、舒绣文等另组大光明影业公司，拍了《野火春风》等两部影片后，于1949年3月来到北平。

7月，欧阳予倩参加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53年10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4月9日，欧阳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

欧阳予倩在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和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期间，辛勤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戏剧艺术人才，同时从事戏剧艺术理论和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整理出版了《自我演戏以来》、《一得余抄》、《话剧、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欧阳予倩选集》、《电影半路出家记》、《唐代舞蹈》等著作，并主编了《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欧阳予倩：《欧阳予倩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欧阳予倩：《电影半路出家记》，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

欧阳予倩：《一得余抄》，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潘昌猷

肖宇柱

潘昌猷，名文义，四川仁寿县人，1901年1月1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父潘在田，去世较早。潘昌猷童年时家境清寒，曾随其母到地主向兰亭家干活。其兄潘文华先在成都一家商店当学徒，后考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数年后，潘文华擢升营长，汇款回家，潘母在本乡购置田地，家境渐趋好转，潘昌猷在乡就读私塾。

1924年，潘昌猷到成都去见杨森求职。杨森与潘文华是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时任四川省督理，委派潘昌猷任成都东外统捐分局局长。不久杨森垮台，潘昌猷被免职，回到仁寿老家。

1925年，潘文华已升任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驻节重庆。潘昌猷到重庆，在师部当军需，继升军需处长。1928年，潘文华任重庆市长，委派潘昌猷为市金库主任兼市奖券所所长。奖券所发行“市政公益奖券”，他从中挪用资金，与人合伙开设中孚钱庄，开始进入金融界。1931年，潘文华下令开设重庆市民银行，官商合办。潘昌猷被推为总经理，代表官股，由市商会会长温少鹤任董事会主席，代表商股。潘昌猷延揽人才分别担任襄理、会计主任、营业主任等职；又开办商业补习学校，培训班底，亲自到校听课，学习银行业务知识，还向行家请教经营管理经验。经过一番努力，市民银行业务逐渐开展，连年获利，在重庆金融界渐露头角。特别是市民银行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更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潘昌猷声望大增，1934年当选为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接着被选为市商会主席，还兼任重庆市立中学校长。

潘昌猷以其兄潘文华系驻军师长兼市长，以后一旦调防，市长易人，地位不保，亟谋将市民银行转化为己有。他采用向市民银行透支款项，扩大自己股权的办法，在股份总额中占到八成，并得潘文华的支持改组市民银行，又收买了官股，于1934年8月29日将“重庆市民银行”改为“重庆商业银行”。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行“统一公债”，按票面额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交易，行情时高时低，潘昌猷以为有机可乘，大量贪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统一公债”价格惨跌，重庆商业银行亏累甚巨，陷入严重危机，向四川省银行申请贷款解困。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的刘航琛，素对潘不满，不给贷款，并向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财政部特派员关吉玉提出关闭重庆商业银行，以平息金融风潮。潘昌猷前往见顾、关，声称购买公债是拥护国家的金融政策，重庆商业银行只是一时周转不灵，并非资不抵债。顾祝同考虑到其兄潘文华在四川军界的声望，彼此交情还好，允由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刘航琛只同意抵押三天。后潘得到聚兴城银行杨粲三相助，给予三个月的一百万元贷款，才渡过难关。

潘昌猷遭此失败，心情沉重，下了一道“罪己诏”，自免总经理之职，宣布“本人不善经营，降为三等行员”，以常务董事名义处理行务。

1938年1月，川省主席刘湘去世，以潘文华（时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继任的呼声最高，但他不愿放弃军权，转而支持王缵绪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为酬谢潘文华，于是年6月委派潘昌猷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于是潘昌猷利用省行低利贷款，把重庆商业银行的业务搞活起来。王缵绪颇为眼红，也想动用省银行资金，壮大他投资经营的建设银行，同年11月派他的军需处长郭松年为省行董事长，改行董事长责任制，潘昌猷成了一个徒具空名的总经理。

次年6月，成都发生以潘文华部彭焕章为首的七师长，在成都发

动“倒王（缵绪）事件”，潘昌猷响应配合，联络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的驻渝代表，以及有关人士冷杰生、何北衡、吴晋航等二十多人，在其住宅集会，一致同意支持“倒王行动”。“倒王”快邮代电传遍成、渝两地，迫使王缵绪于1939年下台。蒋介石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授意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拉拢四川军界的核心人物。孔与潘文华换帖订为兰交，潘昌猷因此得到孔的垂青和提携。1940年6月，财政部投资二百万元，改组四川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任董事长，再度掌握省行的实权。潘昌猷控制四川省银行后，套用资金更甚于前，转入重庆商业银行及其所属企业运用，同时得孔祥熙的关照，获得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和邮政储金局的低息贷款。在币制日趋贬值的情况下，他调运大量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的投机活动，财富剧增，重庆商业银行从而跻身于重庆著名银行之列。

潘昌猷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企业有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植华纱厂、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四川兴业银公司等，投资的企业有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等数十家。

抗战胜利后，潘昌猷积极向省外发展，图谋重庆商业银行发展成全国性的大银行之一。他以上海为据点，设立重庆商业银行临时管理处，增设汉口、广州、南京、天津、香港等分行，于连云港、长沙等地设立分支机构。重庆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的业务重心也转移到上海，初期经营尚称得手。当内战爆发后，时局动荡，形势急转直下，他的扩张抱负终成泡影。

在此期间，潘昌猷在重庆的事业接连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扰乱。1949年初，重庆特刑庭指控重庆商业银行买卖金钞触犯禁令，行员李某被捕并被提起公诉，潘昌猷从上海赶回重庆营救，被勒索黄金六百两；6月，西南长官公署以“签发空头支票，扰乱金融”的罪名，勒令重庆商业银行停止营业。潘函托黄应乾（潘文华的高级幕僚）向有关各方疏通，遭到国民党重庆负责人曾扩情等的强硬抵制。时潘文华的防地在重庆，乃与在渝的财政部长徐堪洽谈，由财政部发代电“准予

先行恢复营业”，始得缓解。潘昌猷不堪其扰，调拨港币四十万元将重庆商业银行欠款还清，于1949年11月底结束。

此时国民党统治已现崩溃之势，潘昌猷预谋退路，陆续将资金（包括黄金七千五百两、美钞和美金公债一百七十万元，以及港币一百多万元）向香港转移，于1949年秋携眷去港。

潘昌猷以其在工商、金融界的地位，先后任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重庆市商会主席、重庆市参议院议员、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在抗战中期，潘昌猷与张澜、李济深、郭沫若等时有往还接触。他为郭无偿提供住宅，在经济上也有所支持。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9月17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实业界人士，潘亦应邀参加。1948年他曾以巨资支持程潜竞选副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昌猷于1950年1月回到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和张澜的欢迎，并出席张澜的宴请。嗣后，潘在京购买住宅一幢，又从香港调汇数十万元，准备恢复重庆、成都、上海、天津、汉口等重点分行业务，后感觉社会制度根本变革难以适应，心存疑虑。同年冬，他托辞清理外汇赴港。1953年由香港远去南美，在巴西定居。晚年，他曾想回国一行，因疾病缠身，思归未成。

1981年1月2日，潘昌猷在巴西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石体元、刘选深、赵世厚：《重庆商业银行的兴起与衰落》，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等编《重庆五家著名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7辑），西南师范大学1989年版，第157—175页。

刘仁耀、赵世厚：《我们所知道的潘昌猷》，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编《重庆工商人物志》，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

208页。

潘复

马陵合

潘复，字馨航，山东济宁人，生于1883年11月22日。其父潘守廉，字洁泉，光绪十五年进士，素笃信佛教，号对凫老人。曾任河南省邓州知州，历职二十余载，辛亥革命后引退在家赋闲。潘复自幼在家延师攻读，他天资聪颖，文思敏捷，举笔成章，书法造诣颇高。

1908年，原津镇铁路的终点从镇江西移至浦口，改称津浦线。原线路经由潘复家乡济宁，由于线路变化，不再过济宁。济宁各界民众哗然，因济宁为鲁西南重镇，工商业繁盛，交通运输至关重要，于是公众推举潘复、吕庆圻、袁景熙、李其庄等赴京请愿，据理力争，后经议决既定路线不再改动，另修兖济支线（兖州至济宁），潘复力主其事，奔走上下，从此名声大振。时潘曾撰有《争路小记》，详述争路理由和历程："济宁一线，地坦途平，施工甚易……铁路之性质，实为发达商务为唯一之目的。轨道所经，必由民物繁盛之区，四方荟萃之地，方能多所运输，同臻发达。……济宁商埠为南北枢纽，数十百年商务著名繁盛之区，较之曲兖，岂止十倍，设轨线一旦交通，南北商货多一伟大销场，于实业前途，关系匪尠……"当时，除济宁代表向各方呼吁外，与之配合有的山东旅京同乡官员杨毓泗编修等上津浦督帮办大臣公呈，全济绅商学界上旅京同乡诸公及四省总协理书。尽管最后争得修支线的结果，但是，潘复仍不满意，他认为"代表此行，谓之毕功可也，谓之失败可也"[(1)]。

清季，潘复纳赀捐官挂知府衔，分发到江苏候补，巧遇其父科场同年陆钟琦任江苏布政使，潘复遂得以入其幕中，并颇得陆钟琦之赏识。1911年陆钟琦擢升为山西巡抚，潘亦随之赴晋。同年10月，山西新军标统阎锡山举兵响应武昌起义，光复太原，陆钟琦全家遇难。

潘复经此变故，遄回济宁老家。1912年，潘复与同乡靳云鹏在济宁合资创办济丰面粉公司。但经商非其所志，对仕途兴趣甚浓，故于同年赴宁，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谋得一司员职位。然嫌官卑职小，又投身进步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亦无成就。又转到关外，供职张作霖幕府中，得与奉系发生渊源关系。

同年4月，江苏都督庄蕴宽辞职，袁世凯遂命程德全继之，潘复为其秘书。1913年1月，经程德全推荐，潘复赴山东投靠山东都督周自齐。周自齐对其颇为器重，先委任为劝业道道尹，后又被委任为山东实业司司长。在此任内，潘复曾举办过一次博览会。同时，在治理鲁西南湖河水灾方面，潘复也有所作为。清末，因铁路兴起，鲁西南一带运河湖泊失于治理，河道淤塞，吐纳宣泄不灵，汶河泗水泛滥其间，东平、济宁、鱼台等县七千万亩土地连年水灾，百姓饱受其苦。潘复据实向政府当局陈述灾情，于1914年成立了南运河疏浚事宜兼山东水利局，亲自兼任总办，机构设在济宁城里塘于街，培训科技人员，派员实地勘察，拟订疏浚工程计划。曾拟订《勘察江北运河水利统筹分疏泗沂沐淮草案计划》、《勘议筹治南运河水利草案》等勘测与治理方案。后因筹借款项，遭到日、美等国财团的反对，只好中途停办。后升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继续拟订相关计划，如有《奉令履勘江苏运河水道利病情形统筹施工计划概要文（全国水利局副总裁潘复呈大总统）》、《郡国利病：勘察江运河水利统筹分疏泗沂沐淮草案计划书》等，为治理南运河提供了一定的前期准备。

期间，为涉足政界，潘复加入了统一党，为该党山东支部副部长。1914年6月，靳云鹏以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因军人初管政治，需要助手，便首先选中了潘复，两人结为金兰之好，潘复为报效靳云鹏，利用自己任职实业司长之便，为靳云鹏筹办鲁丰纱厂，王占元、田中玉等人均有投资，全省一百零七个县招股四十万元。1919年春开业，纱锭一万六千枚。该企业经营效益良好，靳云鹏与潘复大发其财。

1915年，周自齐在财政部任内，以潘复为参事，这是其在财政部升迁发轫。1919年11月，靳云鹏受总统徐世昌之命组阁，推举潘复做财政次长，自此潘复便正式步入了北京政坛。

1920年5月，靳云鹏受安福系排挤，呈请辞职，由海军总长萨镇冰兼代国务总理。7月，直皖交战，徐树铮的边防军受挫于吴佩孚部，皖系败北，因此安福系的财政总长李思浩遂被免职，由潘复署理部务并兼任盐务署督办。同年8月9日，在张作霖的推荐下，靳云鹏再度受命组阁，周自齐为财政总长，以潘复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潘复在此任内，不仅利用权位大敛钱财，而且不断与权贵结交。他在赌场中故意认输而献媚于张作霖。10月，潘复晋授勋五位，1921年1月，又晋授三等大授宝光嘉禾章。潘复此时位尊多金，生活奢侈，晚上常在其红罗厂、毛家湾两私宅中欢宴豪饮，选色征歌，继以豪赌，每至子夜仍未休。

1921年5月14日，靳云鹏以内阁总理辞职的方式重新组阁，潘复仍任财政次长。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921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John Jay Abbot）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一千一百万美元及其利息六十六万美元，并须扣除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一百三十万美元及其利息一百零八万美元，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但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为了控制烟酒借款竟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如果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一百多万美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

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这样，潘复的盐务署就可以得到佣金的一半八十万美元。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起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Stevens，Frederic W．）继续商谈，后也不了了之。潘复却因此事受到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佩孚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账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要求追究责任。

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世昌，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云鹏却要潘复继任，徐世昌坚决不同意，并声称："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双方经过折中协调，决定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随后，北京政府正式批准李士伟辞去财政总长职，由直系高凌霨继任之。潘复直到徐世昌卸任大总统，也没有当上财政总长。潘复曾一度认为任盐务署长可得实利，加上当时财政困难，各方索饷之声，纷至沓来，对于财政总长一职也未过于强求。但是，因潘复聚敛自肥，不为徐世昌所喜，财政总长没有希望之后，连盐务署署长也被他人取代。

潘复在公府方面的信用已扫地，不得不筹其退路，欲谋得山东省省长一席，但到12月靳云鹏内阁倒台，潘复图谋掌鲁的一线希望也变成了泡影，未几潘复便退居津门[(2)]。

潘复这一时期利用财政次长之职，大发其财。其生财之道无孔不入，既弄权卖官，又操纵公债市场。有一个叫英翰的满洲人，在清政府执政时曾任巡抚职，后家道衰败，便让其儿子通过关系找潘复谋事，事成后，英翰送给潘复几箱古字画作为酬谢，字画价值连城，潘复视若珍宝。每当发行公债时，潘复在北京联系银行，又在南方派员

推销公债券，从中牟利。1920年，他联合虞洽卿组织劝业银行，推靳云鹏为董事长，虞洽卿为常务董事兼上海行经理。在发行公债之前，潘复先同海关税务司联系，得到内部消息后再通知虞洽卿等向各银行商洽推销或押款，套购牟利，大肆肥私。当时，军警饷源应由财政部筹拨，这本是财政部的一笔特别开支，但潘复却常用公债或国库券向各银行抵押借款，以此推销公债和国库券。潘复于1919年11月在山东组织过丰大商业储蓄银行，美其名曰办理储蓄事业，而实际是他们的私人账房，所以收储蓄存款任意提用[(3)]。寓津期间，潘复帮助褚玉璞发行直隶省公债，操纵市面金融；与人合资创办了边业银行；接办了德兴盐务公司，把持长芦盐的销路。种种手段使潘复累资巨万，富豪一时。

潘复退居到天津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张弧、吴光新、吴毓麟等人常到潘宅聚会，潘复的私宅变成了朝野官僚的俱乐部。其中与直系人物来往特别密切，对吴毓麟、张廷锷、曹锟的秘书王兰亭等，潘复每每贿以千金，以谋重登政坛。同时，潘复的二姨太和曹锟的三姨太刘凤坤感情相投，来往密切，曹锟曾一度有起用潘复之意。但是，王克敏久思攘夺财政而阴谋破坏，并说“潘太会搞钱，手段太辣”。他暗中唆使孙宝琦向曹锟建议另换别人，曹锟乃授意王承斌在天津劝张弧进京，就任财政总长一职。这样，潘复即将到手的财长一职，又再次沦入他人之手。事后，吴毓麟再为潘复说项，乃为其谋得全国水利督办一职，但有名无实[(4)]。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结果直系战败，奉系张作霖入关，控制了北京政府。奉系李景林督直隶，潘复经齐协民介绍，得与李景林接近，因此和张学良也拉上了关系。次年，张宗昌成为山东军务督办，潘复对张宗昌竭尽贿赂，被张委任为山东督署总参议。上任后，潘复尽其所能，迎合张宗昌，投其所好。他曾送张一件镏金镶翠、珍珠玛瑙装潢的金葫芦，价值巨万。张宗昌在南口与冯玉祥作战时，潘复竟

送妓女到南口进行慰劳。张宗昌认其为知己，以至后来潘复东山再起，重登政坛，张宗昌在暗中多方出力。与此同时，潘复也千方百计与直系拉关系。

此时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经常发表文章抨击军阀当权，潘复、张宗昌都在挨骂之列。1923年以前，潘复曾经做过财政次长。林白水曾在1923年1月25日的《社会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的时评，说的就是潘复贪污的事情。他说："他（潘复）总共做了一年零几个月的财政次长兼盐署署长，在北京就买了两所大房子，连装饰一切，大约花去十万块钱。又在天津英界盖一座大洋房，光是地皮，就有十亩之大，一切工程地价，统共花去十五万块。"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中发表题为《官僚之运气》的文章，文中有一句："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并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潘复哭诉于张宗昌之前，一定要置林于死地，因此张宗昌命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即逮捕林，并于8月6日晨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林杀害，潘复借刀杀人，泄了私愤。

1926年秋，直系孙传芳在江西被国民革命军打得大败，微服逃至天津，因与潘复有乡谊关系，到津之后，先找潘复，在潘复家同张宗昌见面，然后孙传芳由张宗昌陪同去见张作霖。孙传芳在张作霖面前赔罪认错，并表示今后一切都听张作霖的，张作霖对孙传芳表示不咎既往。此间，潘复与孙传芳、张学良、张宗昌、褚玉璞、杨宇霆等人"义结金兰"，成为结拜兄弟。潘复过去拉拢张学良、李景林想当财政总长而未成，此次总算和奉系攀上了关系，并且孙传芳对其心存感谢，这为他后来当国务总理奠定了基础。

1926年潘复任黄河工程督办。是年，吴佩孚被北伐国民革命军打败，张作霖入京主政。1926年4月，颜惠庆摄阁，在张宗昌和褚玉璞推荐下，潘复重掌财政。6月23日，颜惠庆辞职，由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总理。到10月1日又由外长顾维钧兼代。1927年1月23日，顾维

钧重新组阁，以外长兼署总理，阁员变动颇大，惟潘复财政一席，在三次摄政过程中，始终连任。

当时正值九六公债贬值，投机者损失不赀，潘复初受命尚未就职，投机者们便寄很大希望于潘复，潘复亦极力想以提高九六公债价格为自己树立威信。所谓九六公债是指1922年北洋政府为对盐余抵押借款的一次全面整理而发行的公债，其名称为“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由于发行定额为九千六百万元，故而称之为“九六公债”。由于债多券少，因此北洋政府在发行九六公债时规定先补偿原债券额面的百分之六十三，再按发行条例中规定的八四折之，事实上债权者所得九六债券百元，只实得折合债券五十三元。如此低廉的折扣，一旦有升值的迹象，必然会成为投机者的首选。果然，在本息无着的情况下，九六债券成为市面上的买卖投机砝码。1926年底，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南方国民革命军已经北伐至长江流域，军事节节胜利，势不可当，于是债权人害怕政策发生变化，不断抛出手中的九六公债。更为要紧的是，年关将至，银根吃紧，严重影响到公债的交易。同时，却有付息的消息四处传播。于是，在“京沪电汇规元飞涨至七钱五分二厘，京津电汇洋元每万元加至百二十元，为十数年来未有之现象”的大背景下，九六公债的价格在市场上再次暴涨暴跌。九六公债在发行之初，信用已经非常薄弱，市价仅仅在三十八元左右。但在1926年8月初，价格攀升到惊人的七十多元。九六公债的价格在1926年11月、12月间又暴涨暴跌。以北京为例，九六公债在市场上1926年11月8日最低收盘价格五十七点八元，11月20日回涨，11月21日暴跌十余元，11月23日，最低到四十四点四元，与最高时七十多元相去甚远。当时造成行情下跌的原因是安格联（Sir Francis Arthur Aglen）不肯担保九六公债中用于偿还国内公债的五千多万元的本息。潘复就任财政部后，凭借与安格联有过交往，说服安格联同意整理九六公债，想借此抬高市价，发笔横财。他通过庄云九的恒源银号大量收购，使久已价值不到一扣的九六公债行情大涨，遽升到六扣以上。但是，此时发生了奉军郭松龄倒戈事件，北京政权不保。九六公

债的行情一落再落，潘复闹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北洋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挽救其即将垮台的命运，于是同年6月中旬，张作霖、张宗昌等奉系高级将领在北京开会，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任大元帅后，潘复到处活动，要想和张作霖见面，屡次被拒绝。最后，通过夏仁虎和曾毓隽介绍，得以与张作霖面谈。同时，当时属于实力派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宗昌联合孙传芳、褚玉璞等支持潘复，潘复遂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5)]。当时潘复内阁的阁员多为奉系人物，王荫泰任外交总长，何丰林任军事部总长（陆军、海军两部合并为军事部），沈瑞麟任内务总长，阎泽溥掌财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商总长，后在杨宇霆的推荐下，常荫槐接任潘复兼任的交通总长一职。张作霖虽同意潘复组阁，但实际上对其仍存有戒心。

潘复内阁的统治区小得可怜，不但山东、河南两省岌岌可危，就是北京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之张作霖穷兵黩武，内战频繁，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北京政府财政拮据，所以财政部特设关盐两税抵借外债委员会，严令各地方速收关税款解京以备偿还外债后，再充军费支出。面对财政困难的局面，潘复理财也乏术，只好大举裁员简政，中央财政经费每月只剩八十万元，财政部裁员后仅剩下二十个公务员，但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是挽救不了罗掘已穷的财政困难，庞大的军费开支是有增无减，天怒人怨。潘复本人多次收到被辞人员请他吃手枪、炸弹的匿名信，吓得潘复每天到院上下班先由宪兵净街，然后由警察迎送，一时传为笑谈。

1928年2月3日晚，潘复在私宅邀集外交、财政两界要人商量关税事务，以原定关税自主期迫近，在关税自主期前之过渡税率亟应图早日实施。此前，北京曾令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Arthur Francis Henry Edwards）南下商量办法。此次会议决定再由税务处去电上海，训令易纨士在上海接洽实施过渡办法，同时在北京成立关税自主

委员会。2月6日，关税自主委员会成立，潘复以国务总理身份兼任该会主席，委员中有顾维钧、梁士诒、罗文幹、沈锡麟、王克敏、曹汝霖等人。3月1日，易纨士回北京汇报在上海交涉情形。鉴于财政困难，潘复通知易纨士拟于4月实行过渡关税，不管南方是否同意，北方先办，至于是否实行七级税级制，待疏通外交使团后再定。因北京政府迅速垮台，过渡关税并未实行。同时，潘复为筹措军费，向中国、交通、边业三银行借款二百万元，以崇文门关税为抵押、预扣除利息外，净交一百六十七万元。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9日，张作霖在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潘复、张学良、杨宇霆等军政要员到会。会上，张作霖接纳各将领之劝告，决定以大元帅身份下总退却令，京汉线奉军全部先行退至琉河、长辛店一线，主力部队撤离京津，向滦河一线总退却。1928年6月1日，张作霖下令将安国军大元帅印旗、国务院印信及外交部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奉天。2日，张作霖通电宣告退出北京。同日，潘复表示退让贤能，院中事务交许宝蘅暂时负责，阁员大多数亦与之同退。

4日，张作霖的专车在皇姑屯被日军预埋之炸弹炸死。潘复因转赴天津，逃过了这一劫难。此后，潘复回到天津英租界小营门寓所，过起寓公生活。

潘复下台后，一度被张学良聘请为高级顾问。后来又结识了宋哲元，当时宋常驻天津，两人交往甚密。1935年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撤回在华北的党政军人员，华北局势危急，这时潘复怂恿宋哲元出来维持局面，并对宋说：“国民党丢下华北不要了，你为拯救华北几千万民众，必须当仁不让，出来维持，我看此事非君莫属。”宋哲元不久便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同时潘也在该会挂了个顾问的虚职。但是，此时他已大病在身，不能任事。

1935年冬，潘复患感冒，久不愈。1936年6月赴北平就医，9月12日在北平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军阀逐鹿：济宁籍军阀人物专辑》，1993年版。

马叙伦：《石屋续渖》，上海建文书店1949年版。

潘复：《山东南运河水利报告录要》，南运河水利筹办处1916年版。

---

(1) 孙瞿门：《潘复其人其事》，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军阀逐鹿：济宁籍北洋军阀专辑》（《济宁文史资料丛书》第11辑），1993年版，第156页。

(2) 朱缙卿、余生：《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潘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9卷（军政人物编），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6页。

(3) 陈志新、何丽敏：《北洋政府的末任总理——潘复》，《军阀逐鹿：济宁籍北洋军阀专辑》，第119页。

(4) 程海鸥：《潘复的政坛浪迹》，《军阀逐鹿：济宁籍北洋军阀专辑》。

(5) 曾毓隽：《忆语随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

潘公展

李戈

潘公展，原名有猷，号淦清、幹卿。浙江吴兴县人，1895年10月23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六）生。其父潘理斋（名士达）经营丝业，曾设大集成丝行。

潘公展少年时，入湖州城内私塾改办的两等小学堂读书，因受当时反清思潮的影响，曾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并和同学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富强报》，鼓吹反清。1912年经当地美国传教士介绍，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学习。

潘公展聪慧好学，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常在英语讲演比赛中获优胜，还经常为校刊《约翰声》投稿，并先后兼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人。他经国文老师介绍参加了“南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学生闻讯积极响应，于5月7日正式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潘公展被举为评议部秘书、财政委员会委员。学生会创办会刊（日刊），潘公展又被选为主编。

1919年夏，潘公展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在上海私立市北中学执教，兼教务主任。翌年协助汤节之筹办《商报》。1921年《商报》正式出版，潘任《商报》电讯主编，并撰写每日时评和每周大事述评，文名渐著。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南昌后，蒋介石筹组中枢机关，物色秘书人才。经陈果夫推荐，潘公展于1927年1月与《商报》编辑主任陈布雷应召同往南昌。蒋介石和潘、陈二人长谈了两次，并

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经蒋介石、陈果夫介绍，潘与陈布雷即于2月加入了国民党。当陈布雷留在蒋的身边任秘书时，潘得蒋允暂回上海，被史量才延揽任《申报》编辑，主编要闻。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在上海设立政治分会，张静江任主席，潘公展任分会委员。此后，潘由一个报人变为国民党要员。6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任市长，潘任农工商局长。不久农工商局改社会局，潘仍为局长并兼任市政府秘书长。

1929年，陈果夫、陈立夫把“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成“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简称CC。“中央俱乐部”以二陈为中心，以张强、潘公展、程天放等人为主要骨干，自此潘成为CC系要员。

1932年8月，潘公展改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四年后又兼任社会局长。

潘公展在国民党内，因为得到蒋介石和陈果夫的重用，一直处于显要地位。1927年5月，上海特别市党部开始“清党”，潘被任为整理委员，后又当选为常务委员。此后，潘一再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并出席了国民党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1935年11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潘公展在抗战前一直活动在上海文化宣传和教育界，为国民党统治效力。为配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他在上海指使和支持一批文人进行文化“围剿”，制造白色恐怖。“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潘公展在上海力图控制局势，规定了一套新闻、书刊送审制度，就连小人书画稿也要经过审核，力图以此“杜绝赤化宣传”，“达安内攘外之成功”[(1)]。

潘公展还于1932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晨报》，自任社长。

他宣传“本位救国论”，即所谓：“人人均宜为本业致其最善之努力，谋如殊途同归之救国。”他说：“吾人若不唤起国人本位救国之意义，则国人或将中风发狂。”[2] 以后，潘又办起《晨报晚刊》（后改名《新夜报》）和《儿童晨报》、《儿童画报》。

1934年3月，国民党声言“依据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文化”，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陈立夫为理事长，潘公展为常务理事兼书记长。潘随即在上海组设分会，说要“把以往此种凌乱的无条理的各自为政的文化工作，改变为有计划的协作，将上海的文化界谋通盘规划的办法”，以改变“以往的所有个人或团体作文化工作没有中心”[3] 的状态。潘还鼓吹要彻底“剿匪”，就要“肃清有阶级色彩及共产主义的出版物”[4]，随即下令销毁大批进步书籍和杂志，包括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和《蒋光慈遗集》等。

潘公展接任上海教育局长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师生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潘竭力维护学校秩序，同时唆使一批人另行成立“中学联”、“大教联”、“中教联”及文艺团体等，对爱国师生进行分化和控制。1934年5月，他下令各中学校长和训导主任严密控制学生的课外活动和课外作业。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波及上海时，爱国学生又一次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潘下令各学校阻止学生游行示威。当五千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时，潘下令“所有全市公私中学校于即日起提前放假”。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进入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主张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潘公展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有糖衣的毒药”，于1937年2月18日至24日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统一与和平》的长文，为蒋介石制造内战进行辩解，说“必须内部统一，才能抵抗外敌……统一就是安内，抗敌就是攘外”，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外有识之士的驳斥。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潘公展离沪经港到达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汉口开办“独立出版社”，叶楚伧任董事长，潘任经理。10月潘撤退至长沙，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秘书长。1939年初又撤至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嗣后并兼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主任，1942年12月改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重庆创办了一家胜利出版总社，在福建等省设有分社，除出版一些鼓励抗日、揭露日军残暴侵略的书籍外，还出版了一些反马列主义的书。

潘公展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跻身于掌握国民党宣传大权之要位。他指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工具，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建设三民主义”为宗旨，为维护国民党统治制造种种舆论。他于1938年写了一本题为《领袖、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家”及“一党专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潘公展一面不准《新华日报》报道事件真相，一面指挥国民党报刊反诬新四军“违反军纪”、“破坏统一”。潘还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军纪根源论》，说“新四军之违反军纪，其根源乃由于三民主义信仰不诚、信仰不坚所致”，为杀害抗日革命军队将士开脱罪责。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于1945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公展被提名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5月12日作了一个“关于中共问题的总报告”，诬蔑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还说：“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他提出：“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潘公展报告，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对外发表的，说对中共要“采取政治解决之方针”，“尽力于团结御侮”；另一

个是对内的，说“根据中共问题之总报告，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决议要国民党员对共产党“提高警觉，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5)]。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有些代表不满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控制，在选票上画乌龟或骂“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等。潘公展提议要把投票人的号数记下，阴谋加害，遭到一些代表的责骂和反对，并有二三十人喊打，拉起椅子奔向潘公展。但潘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潘公展于1945年12月回到上海，参加上海接收工作，先接办了《申报》任社长，后任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并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后来蒋介石标榜“实施宪政”，在各地相继建立参议会。上海参议会于1946年3月建立，潘任议长，以“民意领袖”身份四处活动。1946年11月，上海三千摊贩为抗议当局的无理取缔，结队游行请愿。潘公展以议长身份出面讲话，要求“当局施政必须慎重，亦望市民共同维持秩序”，貌似公正。当上海当局无理拘捕七百余人，并拘捕送饭家属一百六十余人时，潘公展则并未出面说话。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连连败北，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用召开“行宪国大”和选举总统的手法，力图稳定时局。潘公展在上海积极响应，四处发表“竞选演说”，鼓吹“行宪要义”、“民主政治真谛”等等。1948年3月，潘到南京出席“行宪国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48年8月，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限价政策”，发行金圆券，强行收兑金银外币等。潘公展特地召开宣传大会说：“吾人如能信任金圆券一若物资然，则藏币胜于藏物。”但是没过三个月，蒋介石就被迫宣布“取消限价”，金圆券剧烈贬值，人民损失惨重，经济极度混乱。潘此时又号召参议员们：“在此时局危艰，社

会动荡之今日，应该协助政府安定人心为第一要务。”[6]

同蒋介石共命运的潘公展，把朝不保夕的国民党统治寄希望于美国政府。1948年11月，他与上海各界头面人物联电美国政府：“当此决定生死存亡之际，我们人民不得不向阁下及贵国人民呼吁，假如欲及时避免此人类历史上之大惨剧，数万万爱好和平之士被迫而受共产党之迪克维多统治，则贵国必须加以援助，刻不容缓。”[7] 潘又于12月发起成立“上海自救救国联合会”，号召“拥护元首，协助政府”，“坚定人心，自救救国”[8]。他在市参议会还声称要“全力救上海”。

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一个求和的声明，潘公展起而呼应，以上海参议会的名义，于3日“呼吁停战，商谈和平”；并于9日“建议”各省市参议长、各团体理事长或代表，于2月10日来沪开会，“共商促进和平”问题。当中共中央于14日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后，潘即于15日说“此时亟应暂时不提出任何条件”，而应“先立刻同时命令停战”[9]。此外，他还在上海张罗“全国和平促进会”，说“人民代表应参加和平谈判”，想要挤进和谈会议。4月15日，国共双方和谈代表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案”，潘公展于当晚立即召开上海市参议员座谈会“征询”意见。他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并主张发表一份反对和平协定的意见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潘公展潜往香港，开办了一个“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文摘”。年底转赴加拿大。次年5月又至美国，初在《纽约新报》撰稿，1951年5月与陈立夫等人创办了《华美日报》。他虽庇身美国，却经常写文章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献计献策，历时二十余年，被夸赞“是近数十年来最难得的一位文化斗士”[10]。

1975年6月23日，潘公展病死于美国纽约。

潘公展著有《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史》、《罗素的哲学问题》、《陈英士先生传》、《战时政治制度》、《以不变应万变的抗战原

理》、《统一与抗战》、《领袖、政府、主义》。他后期写的文章，编有《潘公展先生言论选集》；晚年诗词编为《潘公展先生诗词选集》。他还主编过《五十年的世界大势》、《五十年来的中国》两书，并译有《儿童爱》、《遗产的废除》等。

---

(1) 潘公展在文化新闻界商讨会上的致词，《晨报》1934年1月20日。

(2) 《本位救国之余义》，《晨报》1935年4月7日。

(3) 潘公展“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分会上的致词，《晨报》1934年4月1日。

(4) 《沪市庆祝“剿匪”胜利，潘公展假中西电台播音》，《晨报》1935年1月4日。

(5) 《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1945年5月17日通过），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1页。

(6) 潘公展：《痛斥失败主义，请同仁协助安定人心》，《申报》1948年11月23日。

(7) 《市参议会会长潘公展及各界联电美政府》，《申报》1948年11月27日。

(8) 《潘公展在上海自救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申报》1948年12月13日。

(9) 《潘公展谈和平》，重庆《中央日报》1949年1月16日。

(10) 陈立夫：《悼念潘公展》，台北《中央日报》1975年7月12日。

潘光旦

全慰天

潘光旦，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899年8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八）生。父名潘鸿鼎，曾任清翰林院编修。

潘光旦1905年入私塾读书。1913年至1922年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经常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和年报、学报、周刊等编写工作。1915年右腿因参加体育运动受伤致残，依靠双拐走路，但仍然爱好活动，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罢课游行。1921年曾携带同学捐款到河北唐县赈济旱灾。

1922年，潘光旦去美国留学。开始在达茂大学学生物学，1924年毕业，得学士学位及成绩优异金牌。1925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1926年毕业，得硕士学位。同时期还先后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其他研究机构参加有关优生学、人类学、内分泌学、单细胞生物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成绩优秀。1925年在纽约与清华校友闻一多、罗隆基等发起组织大江学会，并发行《大江季刊》，兼任学会理事，为季刊写稿。潘还曾兼任纽约中国留美学生季刊（中文）总编辑、月报（英文）编辑。这几个刊物主要宣传科学、民主等救国主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潘参加中国学生在纽约召开等追悼会，并将《总理遗嘱》译成英文，又与人合作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译为英文。

潘光旦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地区的大学工作，先后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预科主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等课程。他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书报春

秋》、《优生月刊》、《华年周刊》，1928年至1934年兼任《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编辑。这些刊物宣传科学、民主等救国主张，更多地讨论人口、劳工、家庭、妇女、优生等社会问题。当时，潘光旦还参加平社、中国社会学会、太平洋国际学会等学术团体。平社的社员多是留美学生，经常聚餐，宣读和讨论文稿，然后送《新月》月刊等处发表。

1934年，潘光旦到清华大学工作，任社会系教授，除主讲优生学、家庭问题外，还先后开设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中国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1935年至1937年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长沙，合办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西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在这烽火连天的八年间，潘光旦一直随同清华辗转南方各地，坚持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部主任、社会系主任等。他一直在社会系讲课，一度在云南大学社会系、昆明译员训练班、云南留美学生预备班兼课。

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复校，潘光旦随同回到北平，继续任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长，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西洋社会思想等课程。

潘光旦先后完成的著作有：《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读书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抗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等。译著有：霭理士著《性的教育》、《性的道德》、《性心理学》，赫胥黎著《自由教育论》等。

潘光旦在优生学方面的中心思想是：不但要求个人进步、社会进

步，而且要求种族进步。他认为，种族进步更为根本，离开它，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是不可能长久的。在潘光旦看来，只有种族进步，在先天遗传方面比较优秀的人才能辈出，社会、经济、文化等才会不断繁荣昌盛，源远流长。种族的演变，首先是通过生物现象中的繁殖、变异、遗传、竞争、选择、淘汰、死亡等因素进行的。如果优良人种在质量上得到提高、在数量上得到增加，便是种族进步，否则便是退步。其次，人种的这种演变，还同时受到社会现象中婚姻、家庭、战争、宗教、政治、法律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很大的，必定造成人口中不同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从而引起种族的进步或退步。潘光旦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审判下被杀害的多是优秀人才，这不能不影响种族进步。他认为，欧洲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很快衰落了，而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这不是没有种族方面的原因的。

潘光旦在社会学方面的中心思想是：力求建立一种健全的社会。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包括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两方面，这两方面并不是势不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就个人方面说，又总有通性、个性、性别三方面。通性是人人相同之处，个性是因人而异之性，性别是男女之分。就社会方面说，即就人群方面说，又总有社会秩序、文化进步、民族绵延三个方面。社会秩序与通性一致，文化进步与个性一致，民族绵延与性别一致。只有使这两大方面、六小方面都得到照顾，才是比较健全的社会。潘光旦说："在温暖的情绪与清明的理智之下，试问哪一壁的哪一方面我们愿意捐弃的呢？我们谁不知道，缺一壁或缺一壁的任何一方面，多少总是不健全的表示呢？"(1)　他认为几十年间先后传入中国的，最先是英美式的个人自由主义，接着是苏联式的阶级集体主义，最后是德意式的种族集体主义，各有偏蔽，都不可生搬硬套。他又认为：个人生活的健全发展，通性、个性、性别不偏废，主要依靠自由教育；社会生活的健全发展，秩序、进步、绵延不偏废，主要依靠民主政治。健全社会必须以自由教育为体，以民主政治为用。

1926年至1927年间，潘光旦在上海与张君劢等人经常往来，商谈时局，1936年加入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1947年至1948年，还一度参加在北平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任理事及该会所办《新路》周刊编委，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他在国共两大党的政治斗争中，日益明显地反对国民党的许多政策和措施，而同意共产党的若干经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日趋反动腐化，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潘光旦的政治态度日益发生变化。他经常发表文章，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抨击。1939年他反对大学设训导长，认为把训育从教育里划分出来，在理论上很有问题，并且没有人当得起这训导长。1940年，他发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由于昆明《中央日报》一篇社论的反对，他又发表了《再论宣传不是教育》，在文中写道："我说宣传不是教育，多少还说了一些为什么不是。那篇社论说宣传就是教育，却没有说为什么是。"[(2)] 同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在重庆《中央日报》与昆明《每周专论》上撰文，指责大学教师的思想不纯正，潘光旦便发表《异哉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说："作者厕身大学环境且二十年，所见和公展先生的很有不同，又忝为教师的一人，责任有归，未敢缄默。"[(3)] 1943年，潘光旦指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真自由和假自由刚好弄颠倒了，希望再版时更正，并说："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的更分明。"[(4)] 1944年，他公开主张学人论政，并要求国民政府真的广开言路，说："试想大家，特别是一般学人、艺人和有专门技术的人，对于国家大事，既连口都不能开，还敢希望有更进一步的贡献么？"[(5)] 1942年至1945年，他和闻一多、吴晗等西南联大教授一起，创办《自由论坛》月刊和周刊，大力呼吁自由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他在解放前的论文集，有一本就叫做《政学罪言》。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潘光旦参加。他自1941年起一直担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曾兼任民盟昆明支部委员、主任委员，负责创办和编辑民盟在昆明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他在昆明经常和闻一多、吴晗、费孝通、曾昭抡等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华岗、尚钺、楚图南等人在唐家花园秘密召开的小型座谈会，讨论政治形势。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涨过程中，尤其在1945年底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后，西南联大不少民主教授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迫害。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潘光旦和其他民主人士一度往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嗣后回到北平，他继续兼任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光旦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总部宣传委员和文教委员、民盟北京市支部委员和文教委员、民盟清华大学区分部主任委员。

1949年至1952年间，潘光旦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担任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长，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他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家庭进化史、马列名著选读等课程，译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1年春，潘前往上海、苏州、吴江、无锡、常熟等地视察土改运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谁说江南无封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收编为《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出版。1952年，潘光旦到中央民族学院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他调查研究湘西土家族，写出了调查报告和有关文章。他还研究景颇族史、畲族史，并整理中印边界有关资料。

1957年反右斗争中，潘光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十年，他通读二十五史，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史料约达一百六十万字，同时翻译了达尔文巨著《人类的由来》。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逝，遗书万册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潘光旦的遗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以及《人类的由来》均已出版。2000年12月，《潘光旦文集》出版，共十四卷，约六百四十万字。

---

(1) 潘光旦：《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76页。

(2) 潘光旦：《自由之路》，第229页。

(3) 潘光旦：《自由之路》，第101页。

(4) 潘光旦：《自由之路》，第14页。

(5) 潘光旦：《自由之路》，第359页。

潘天寿

刘江

潘天寿，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在有的作品上或自署“阿寿”。1897年3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县北乡冠庄村。父潘秉璋是个秀才。他童年随父启蒙识字，七岁入塾。课外喜画画、写字，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绣像插图；村里祠庙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鸟兽等，也是他模仿的“范本”。假日或课余常帮助家中放牛、砍柴、车水、耘田。冠庄村西有群山，最高者为雷婆头峰，是他常去樵牧的地方，故晚年画上署别号“雷婆头峰寿者”。

潘天寿十四岁时去宁海县城小学读书。课外临习各家碑帖。后从市贾处购得《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有空就按图临绘，习作常为同学及亲友所喜爱。

1915年秋，潘天寿高小毕业，步行到达杭州，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接触到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教育家经亨颐、文学家夏丏尊和李叔同等人，对于他们的才学和品德，极为敬佩。“五四”时，一师师生举行罢课、游行，潘也曾参加活动。后来官方镇压爱国运动，校长经亨颐被免职。潘天寿目睹现状，思想彷徨，觉得青年人应当力挽狂澜，但自己“无干事之才，只有画画还能胜任”，因此决心以国画为振兴民族精神的工具。在校几年，他向长于西画的李叔同学习素描，向经亨颐请教书法篆刻，使自己在诗、书、画、印诸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积极参加学校里研究书法篆刻的“乐石社”和“寄社”，空暇时常去裱画店观赏古今名家字画作品，假日常为同学书写楹联、绘画中堂等。因此在一师五年，他对书画的笔墨技法、气韵品格诸项，都有了相当的体会和理解。

1920年潘天寿于一师毕业后，先后在宁海、孝丰等地农村小学教书。他在乡村大自然环境中，留心观察各种强劲有力的动植物，以及富有野趣的画材，耳濡目染，铭记于心，晚间则尽兴挥毫，以雄阔气魄试画松、鹫、竹、梅，常至深夜。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已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气势与审美情趣。

1923年，潘天寿经师友介绍，来到上海，任教于民国女子工校。他一面执教，一面更加广收博采，对青藤、白阳、石涛、八大山人、石谿诸家悉心研究，朝夕临摹，艺事日益精进。他在创作中，受当时名家吴昌硕、黄宾虹等人的影响。当时吴昌硕已年近八十，有一次看了他带去的几件作品，对他的才气十分重视，殷切勉励，曾写了一副篆联送他："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吴又作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幛子》相赠，称他："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1)] 以后潘天寿与吴昌硕过从甚密，请益甚多，并常观摩吴作画，深得其气势与神韵。

同年秋，潘天寿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之聘，为国画系讲授中国画与中国绘画史等课程，著有《中国绘画史》，1926年出版。1928年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成立，院长林风眠聘潘为国画主任教授，潘遂定居杭州；同时仍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等校兼课，每周来往于沪、杭之间。1929年赴日本考察艺术教育。1932年他与诸闻韵、张振铎、吴茀之、张书旗等在上海组织了"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画派石涛等人的革新精神发展民族绘画，举办展览，并出版《白社画集》。"九一八"后，外敌入侵，国内新军阀又混战不休，潘天寿原先设想的以美育来振兴民族精神，收效极微，思想甚为苦闷，一度曾寄托于道佛禅理以求解脱，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他这时期的作品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潘天寿随杭州艺专西迁，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诸省，其间曾短期在东南联大、英士大学艺术系任教。在湖南沅陵时，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

并改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教授等职。

1944年秋，潘天寿在重庆被任命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立即着手复校杭州的准备工作，于次年夏迁回杭州。这时期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通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爱国学生多次游行示威。身为艺专校长的潘天寿，对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深为不满，但又无力满足学生的正义要求，加以某些人争权夺利，终于在1947年秋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国画系主任。

潘天寿在国画艺术和教育上，一贯主张可用国画“振兴民族精神”。他认为国画教学不仅是为了传授技巧知识，“民族绘画的发展，对培养民族独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观念，是有着重要意义的”[(2)]。因此他启导学生要有忧国忧民的思想，要求画家注意人品的修养，常说“品格不高，落墨无法”[(3)]。他主张在学习时间的分配上，“可三分读书，一分写字，五分画画，一分其他（包括社会活动、体育锻炼、文化生活等）”[(4)]。在专业教学实施上，他认为应分科教学，因为“人物、山水、花鸟等科各有其特点与要求”，“写生要活写，不要死写”。他还主张既要继承一切优秀传统，又要推陈出新。他说：“凡事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5)]，“体现民族风格不等于同古人一样，有继承还要有发展”[(6)]，画家“要有时代性”，“要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点”[(7)]。

潘天寿的作品，确实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他取材平凡，立意深邃，章法奇特，结构严谨，表现出一种坚韧、憨厚、挺拔、浑朴的风格。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潘天寿感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振兴民族精神的愿望得以实现，无限欣喜。他多次下乡下厂并参加土改，画了《踊缴爱国粮》、《文艺工作者下乡》、《和平鸽图》等作品。1957年他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1958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被聘

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等。1963年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

“文革”中，潘天寿受到冲击，1971年9月5日在杭州去世。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中共浙江省委为潘天寿平反昭雪。1979年在杭州建立了“画家潘天寿纪念馆”。

潘天寿除著有《中国绘画史》外，还撰写有《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国书法史》、《治印丛谈》、《顾恺之》等著作，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成《潘天寿美术文集》出版。

---

(1) 吴东迈：《吴昌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2) 潘天寿：《谈谈祖国目前的国画情况》（1959年），《潘天寿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3) 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4) 潘天寿：《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学工作会上的讲话》，《潘天寿美术文集》；潘天寿：《在泰安讲学记录》，记录稿。

(5) 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第8页。

(6) 潘天寿：《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潘天寿美术文集》。

(7) 潘天寿：《对浙江美院附中讲话》，记录稿。

庞炳勋

汪仁泽

庞炳勋，字更陈，直隶（今河北）新河人，1879年12月16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四）生。父亲为晚清秀才，全家靠其教书维持生计。庞炳勋童年时拜举人宋洛雨为师，稍长进南宫县油坊街学堂上学。毕业后因父亲去世，家境困难，乃从事小本生意。

1899年，二十岁的庞炳勋弃商从军，在北洋新军第三镇当炮兵，因术科成绩优等被选入学兵队，与教官孙岳结成深厚的师生情谊。其后曾进东北测绘学堂学习，毕业后回第三镇担任初级军官，经孙岳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孙岳密谋策应“滦州起义”，被察觉后革职，庞亦随之离军返乡，重操商贩旧业，曾到蒙古贩马，练就相马技术。1918年，庞在高邑县贩运粮食时，偶遇正拟赴保定就任直系军官教育团团长的孙岳，遂随同往保定，任该团副官。

1920年，庞炳勋任孙岳的义勇军队长参加直皖战争，战后历任孙岳第十五混成旅少校营附、副官长等职。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庞在长辛店作战时，腿被炮弹炸伤而致微残，故有“庞瘸子”之称。因作战勇敢，战后升任中校骑兵营营长、上校旅参谋长。6月，第十五混成旅移驻邯郸、大名一带。当地匪患严重，庞被孙岳任命为威平八县联防总指挥，负责剿匪，不到一年八县土匪被肃清，所部纪律严明，被誉为“剿匪劲旅”。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庞炳勋随同孙岳参加驱逐曹锟的“北京政变”，在保定击败北洋军阀曹世杰部，升任国民军第三军补充团团长，不久升任第二混成旅旅长。其后又随第三军转战洛阳，攻克西安，继而北上，在天津以南地区将奉鲁联军驱至德州。1925年

秋，庞被任命为天津镇守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翌年初，庞率部在津南与直鲁军作战，夺回沧州、杜林等地。3月，日舰炮击大沽口进行挑衅，事后庞奉命率所部前往塘沽，沿海布设水雷，修筑工事，以防日军再次挑衅。

1926年4月，国民军在奉系和直系的联合进攻下失利，弃守京津。庞炳勋认为国民军大势已去，未随孙岳撤退，而将所部带至武清投向吴佩孚，被改编为直系第十二混成旅，但遭到部下反对，部分官兵奔赴南口归国民军。庞部改编时，所辖炮兵营被直系将领田维勤以武力截去，使庞怀恨在心。8月上旬，庞奉吴佩孚之命南下信阳，此时已在信阳的田维勤和庞同时被吴任命为正副城防司令。庞与附近的豫军樊钟秀暗中约定共同突袭田部，但突击之时樊失约未到，庞部反被田维勤逐出信阳，事后吴命庞率部到明港整顿。是年冬，吴佩孚的直系势力被北伐军逐出湘鄂一带，濒于绝境，庞部亦粮饷无着，处境窘困，后被靳云鹗改编为保卫军第十一师，庞任师长，驻防洋河镇。1927年3月，庞部再改编为河南保卫军第三军，奉靳命北上漯河。此前庞已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策反，途经驻马店时公开打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的番号，被编入唐生智部。5月中旬，庞率部进攻遂平直系张万信师，围攻一月始获胜，庞部进驻遂平整训。此后庞部按北伐军编制，设各级政治干部，庞并学习孙文学说。

先是，冯玉祥国民军已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5月入潼关参加北伐，在豫西北攻打奉军告捷。庞炳勋往见冯玉祥表示愿接受冯的领导，乃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司令鹿钟麟）第二十军军长，下辖第五十八、五十九两师和骑兵团、炮兵队各一。10月，冯部与直鲁军在豫东大战，庞率第二十军进至宁陵时，冯部姜明玉倒戈，庞部腹背受敌，退至皖北。月末，庞部在睢县长岗集与直鲁军血战数日，攻克睢县和归德。此时韩复榘部亦进入归德，将庞部缴获的军械全部扣留，庞不服，经鹿钟麟调停，另拨庞枪二千支、马二百匹，并赏洋五万银元。11月庞部随冯军西撤，直鲁军分三路反攻，

庞奉命迎战，再克归德，并进占夏邑。12月庞部随同冯军攻取徐州。庞屡建战功，年终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委员（省主席由冯玉祥兼任）。

1928年1月，庞炳勋率部北进滑县围剿红枪会后，进驻汤阴整训。庞部本系旧军阀部队，军内多有吸食鸦片恶习，且连年征战，军纪松弛，庞仿冯玉祥治军之法，实行“烟酒必戒、嫖赌必禁”，自己以身作则，半月内戒绝烟毒，并提倡部下学习冯玉祥所编“精神书”，定期考查学习成绩。又设立军法处、稽查队，上街巡逻，遇有违纪者即行处置，并通报全军。整训一个月，全军面貌一新。3月奉命赴林县镇压农民武装天门会；4月驰往彰德击溃奉军，进至保定、容城，激战中庞头部受伤。

北伐战争结束后，庞炳勋第二十军被改编为暂编第十四师，庞任师长，下辖两个旅、一个补充团。1929年初，冯玉祥对蒋介石的“编遣”不满，率所部西撤，庞师改为冯玉祥护党救国军独立第一军，后又改称国民军联军第六军。4月，在冯玉祥发动的反蒋战争中，庞阻截反戈投蒋的韩复榘，缴获其大量辎重。不久庞率部开往渭南华州（今华县），任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10月初，庞部又参加西北军的反蒋战争，在黑石关与唐生智部对峙，后撤至陕州。

1930年初，冯玉祥与阎锡山谋划联合讨伐蒋介石，庞炳勋被冯派为代表与阎会商讨蒋事宜，达成了协定。3月庞任冯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作为预备队集结郑州待命。战启，冯军刘恩茂部倒戈，庞奉命率部征讨，激战十余日获胜。推进至杞县、太康一线后，会同孙良诚、吉鸿昌部对蒋军实行分割包围，使蒋军伤亡惨重。8月庞协助孙、吉进攻宁陵，因值雨季作战困难，未克而归。9月18日，张学良拥蒋入关，冯军全线崩溃。庞部随西北军撤过黄河，驻山西沁州（今沁县）一带。入冬军无棉衣，粮饷也靠晋军接济，庞心灰意懒，勉支残局。1931年庞部被张学良改编为步兵第一师，旋扩编为陆军第四十军，庞任军长兼第三十九师师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全国军民悲愤万分，庞炳勋请缨抗日，蒋介石令其待命。1933年初，庞率第三十九师参加长城抗战，担任构筑工事和援军任务。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久蒋介石调集大军对之围攻，并派国民党中央执委张厉生对庞进行收买拉拢，许庞如将冯赶走即委以察省主席。庞不顾部下反对，出任察省“剿匪”总司令，竟然率部攻打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亲笔致庞函，要其顾念袍泽之情、不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但庞反劝冯自动下台。冯见其不听劝告，即策动第四十军内部反庞。7月中旬庞部进至沙城时，所部成排成连投向抗日同盟军。8月，冯玉祥在蒋军和日军的夹击下被迫下野，提出宋哲元主持察省省政，得蒋同意。庞所望落空，后经张厉生周旋，将改编后同盟军中的刘振东、唐聚五两部归属庞部，又补充其部分重武器，并兼任察省委员作为补偿。

1934年，第四十军移驻河南，庞炳勋在军内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等组织。是年夏，庞参加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时受蒋介石接见并获五万银元。其后庞率部在南阳收编地方武装别廷芳部，在卫辉剿匪禁烟。翌年4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7年初，庞任第四预备军总司令，所部调驻山西运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庞炳勋部奉命开赴津浦前线。9月间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姚官屯庞部发起猛攻，庞亲临前线激励部下奋勇杀敌，指挥所部以步枪、手榴弹拼死抗敌，击退日军的多次冲锋，激战四昼夜，守住了阵地。后因伤亡过重，奉命转移至安徽砀山，归第五战区指挥。不久庞兼任徐海警备司令，所部移驻海州休整补充，担负海防。1938年初，庞任第三军团军团长，2月奉命率部防守临沂。此时日军侵占南京后，调集了十三个师团约二十万兵力，南北合击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决策“阻南打北，各个击破”。南线抗日军队经过激战，阻北上之敌于淮河一带；北线日军准备从滕县、临沂东西两路夹击徐州门户台儿庄。2月下旬，日军板垣师团五千多人大

举进犯临沂。庞深知临沂得失关系全局，率部奋力坚守，在当地民众大力支援和鼓舞下，面对强敌主动出击。3月11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攻临沂外围相公庄、诸葛城，庞亲临前线指挥，血战一昼夜，击退了来犯之敌。正在徐州的外国使团和记者得知日本精锐师团竟然被阻在中国“杂牌军”面前，大感惊奇。此时庞的军团部离前线只三华里，有人建议后移十公里，庞答称：我如临危后退，影响士气，临沂必失。15日敌增兵两千再次强攻，庞部伤亡惨重，急电请援。次日下午张自忠赶到临沂，所部第五十九军强渡沂河袭敌后右侧，敌大乱。庞指挥所部发起反攻，日军败退莒县。庞、张两部乘胜追击至汤头，毙伤敌二千余人，日旅团长长野、第三大队长牟田皆被击毙，并缴获敌大量军用品。临沂之战告捷轰动全国，《大公报》等发号外、社论，给予赞扬和高度评价。3月下旬，日军再次增兵进犯。在敌优势兵力猛攻下，庞部边战边退，撤至临沂城郊，又获第五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王肇治旅的增援，三部协力作战，将日军截成两段驱逐至汤头一带，再获大捷。4月初，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向临沂发起第三次猛攻。此时第五战区在台儿庄对滕县南下的矶谷师团已形成包围，庞奉命坚守临沂拖住板垣师团。19日，板垣师团炸毁临沂西门城墙蜂拥而入，庞和张自忠指挥抗日将士与敌逐街逐巷展开肉搏战，双方伤亡惨重，直到我军台儿庄战役全胜后始奉命撤出临沂，向郯城转移。庞部爱国将士在临沂之战中浴血奋战两个月，阻滞了板垣师团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大战。

1939年初，庞炳勋部奉命在黄泛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不久又奉蒋介石之命调至太行山地区，一面在敌后牵制日军，一面阻止八路军在太行山扩大根据地。10月，庞炳勋并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军军长，下辖第五十军和孙殿英新五军、范汉杰第二十七军。他曾按照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向八路军进攻，占领高平、陵川等地。1940年初，庞接替鹿钟麟任河北省主席、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冀察战区司令等职。2月，庞部向冀南八路军进犯，受到反击后不再敢妄动。此时庞部驻林县、陵川一带，同八路军以及日伪军防地犬牙交

错，情况十分复杂。庞所辖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是惯匪出身，不听指挥，第二十七军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指挥不动，庞感到难以有所作为，只是偶尔向日伪阵地小规模出击而已。1942年夏，曾与对太行山实行“大扫荡”的日伪军在林县合涧镇作战，歼敌七百余人。

1943年4月，日军调集五个师团突然围攻第二十四集团军驻地，庞炳勋指挥所部仓促应战，各军阵地仅一天即被敌全部突破。第二十七军退往黄河以南，孙殿英率新五军于24日在鹿岭投敌。庞率第三十九师突围时，队伍被击溃，庞藏身山洞，被孙殿英搜山部队发现送往新乡。此前庞曾通过敌后军统电台向蒋介石请示“如何自处”，蒋复电要其“委曲求全”。此时庞遂向日军投降，日伪即在沦陷区大肆宣传，将庞原任各职全部加上伪号予以保留。6月，庞受汪伪政府任命为伪开封绥靖上将主任，率伪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移驻开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庞炳勋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戴罪候处。蒋复电慰藉，并派飞机准备接他去重庆，庞疑虑重重借故不愿去渝。不久庞的伪军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一路军，庞任总司令，率部阻挠八路军进开封城受降，并通电向蒋表示所部愿做“剿共”前驱。1946年春，已经六十七岁的庞因年迈体衰自愿放弃军职，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咨议。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庞炳勋携眷迁居台湾。曾同昔日西北军朋旧孙连仲在台北合开餐馆。

1963年1月12日，庞炳勋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新河县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庞炳勋史料》，1990年版。

李捷三：《我所知道的庞炳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天津人

民出版社1988年版。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北平版。

周康燮：《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

庞元济

王铁生

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生于1864年7月27日（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四日）[1]。南浔地处杭嘉湖三角洲，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庞父以经营典当起家，后独资开设庞怡太纸行，为南浔镇上四大巨富之一[2]。

庞元济在青年时期喜好字画碑帖，常常购置乾隆、嘉庆年间的名人字画，精心临摹[3]。后发现字画买卖可获大利，于是从事此项交易。他雇了熟练的裱褙工匠和临摹工匠，从书肆中发现真迹，加以裱褙整修，然后高价出售，有时也以赝品冒充真迹。

1895年，庞元济与杭州富商丁丙等人在杭州武林门外拱宸桥开设世经缫丝厂，资金三十万两，采用进口的新式机器，日可制茧丝一担。庞、丁等人后又在浙江德清县唐栖（今余杭塘栖）开设缫丝厂[4]。这些都是浙江最早的缫丝厂。但因经营不善，无利可图，加以庞元济后来信奉佛教，认为煮死蚕蛹有悖佛旨，不久即将两厂先后盘出[5]。次年，庞元济又与丁丙、王震元等人集资四十万两，由英国进口机器，在杭州筹设通益公纱厂。1897年建厂竣工，初期购置英国纱锭一万五千零四十枚，雇男女工人共约一千二百人，1898年产纱二百万磅，1899年达三百万磅。但因管理不善，资金不足，债台高筑，又因北方义和团事件影响棉纱销路，不得已于1902年停产，次年将该厂转让给李鸿章之子李经方[6]。

1904年秋，庞元济在上海与人合资开办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严于均为协理，陈润夫、韩山羲、祝兰舫、苏宝森、顾牧斋等十余人为董事。原定官股银六万两，商股银三十万两，但在建

厂过程中，几度发生资金短缺的困难，经庞元济力为挪借，终于在1907年夏建成，开工造纸[7]。建厂初期由于经营不善，加以纸价行情看跌，发生亏损。1909年召开董事会，决定向清政府商部借银十五万两，另招新股十万两[8]。庞元济请他堂弟庞赞臣来龙章纸厂主持厂务。庞赞臣毕业于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后改为交通大学），精通技术。来龙章厂后，立即将蒸汽动力改为电力动力，使生产效率大增，营业蒸蒸日上[9]。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资无暇东顾，给龙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极盛时有工人两千名[10]。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庞元济因自己年迈力衰，遂将盈利颇丰的龙章纸厂卖给其外甥、国民党要人张静江，后张将龙章纸厂拆迁重庆[11]。

除了兴办工业以外，庞元济还在南浔、绍兴、苏州、杭州等地开设米行、酱园、酒坊、药店、当铺、钱庄等大小企业，在绍兴县置田四千亩，在苏州、上海、南浔等地置有大量房地产[12]。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庞元济去世这段期间，庞因年事已高，不再从事实业活动，在上海当寓公。

庞元济属于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成员，故政治思想保守。戊戌变法时，反对维新派。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后来溥仪已是伪满洲国的傀儡，庞元济仍对溥仪念念不忘[13]。

清末，庞元济曾出资捐上海道台不成，后放上海商务督办[14]。1919年前后，曾赴日本游览，历时半年。庞元济虽曾出资捐官，但系从生意着眼，出于商业需要，对政治不感兴趣。以后在国民政府时期及日伪时期，与统治阶层人物也有周旋，但未出任职务[15]。

庞元济信奉佛教，每日清晨盘膝打坐，念《金刚经》，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发财之后，经常为乡里举办一些赈粥、施药之类的慈善活动，并曾出资兴修荻塘，用石块整修湖州至平望间长约三十里

的一段运河堤岸[16]。

1949年3月8日，庞元济于上海病故[17]。

---

(1) 据樊伯炎口述。樊于1934年入庞家为门客，很受庞的赞赏和信任，一直到1949年庞元济去世后才离去。

(2) 据南浔藏书楼管理员汤福根据地方志整理的资料。庞父以经营典当起家，是樊伯炎口述。

(3)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序言："余自幼嗜画，未及冠，即喜购置乾嘉时人手迹，刻意临摹，颇得形似，先君子顾而乐之曰：此子不愁无饭噉矣。"《虚斋名画录》，现藏樊伯炎处。

(4)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95页。

(5) 孙世源口述，孙曾在庞元济之弟庞元澄家任账房多年。

(6) 许超：《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七十年来的变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64年版，第1—2页。

(7)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3页。

(8)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1页。

(9) 据樊伯炎口述。

(10) 据张福祥口述。张曾为庞元济家中多年的老佣人。

(11) 据樊伯炎口述。

(12) 据南浔镇工会文化工作组蔡启桢根据地方志整理的资料。

(13) 据樊伯炎口述。

(14) 据南浔镇工会文化工作组蔡启桢根据地方志整理的资料。

(15) 据樊伯炎口述。

(16) 据樊伯炎口述。

(17) 据张福祥口述。

彭家珍

吕乃澄

彭家珍，字席儒，1888年4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四川金堂县[1]。其父彭士勋任清朝主事，曾一度到日本考察，颇有志革新，在四川首倡新学，常念中国积弱，非武力不足以救亡。彭家珍一岁多时，其母因病不能抚育，由其父兼任鞠养。五岁时，父亲教他学习文天祥的《正气歌》，背诵如流。稍长，又教他读黄宗羲等人的书。因此，他自幼就对清廷高压汉人的政策不满。

彭家珍于1903年2月从父命考入四川成都陆军武备学堂炮科，1905年冬毕业。因考试成绩优等，为四川总督锡良所赏识，派他赴日本考察军事，并委他从日本购买一批军火。这时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派很多，他常与进步同学交游，从此遂抱保种救亡的决心。回国后，彭家珍充任四川新军第六十六标第一营左队排长，后又升任该营左队队官。1906年夏，革命党人谢奉琦等人在四川叙州府一带起义，未成。清吏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彭家珍表面上戒备森严，暗中通知革命党人逃避，因而党人被捕的很少。这事后来被协统朱庆澜发现，彭被迫于1909年5月离开四川入云南，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练官。同年9月，又升任本堂提调。1910年4月，彭家珍随锡良入东三省，充任奉天讲武堂学兵营队官兼教习。新军第二十镇内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大都是他的学生。这时清廷政治更加腐败，全国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他秘密联络奉天军界同志准备武装起义，未遂。1911年9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委彭家珍为天津兵站司令部的副官。他负责从奉天解送军米、手枪、马匹到天津，有机会与京津的革命党人经常接触，便由赵铁桥、黄以镛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经常到国光新闻社参加革命活动，他还把陆军部发给天津兵站司令部的军用免票、半价票、输送军用物品票等私赠党人使用。这样，不仅革命同志

往来自如，而且各种物资得以源源接济。

1911年10月上旬，第二十镇从新民府调往滦州参加永平秋操。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秋操停止。清廷随即令调第二十镇南下攻打武汉革命军。该镇统制张绍曾据守滦州，按兵不动，并联合蓝天蔚等人签名，盖用了第二十镇统制的关防，于10月29日向清廷提出“政纲十二条”，请求速开国会，制订宪法，组织责任内阁，释放国事犯等要求。同一天，山西宣布独立，准备组织民军进攻北京。恰在这时，清廷由欧洲购买的一批军火（枪五千支，弹五百万发）[(2)]，从俄国运入关内。东督赵尔巽特派彭家珍、刘其达、张允仁三人负责押运。彭家珍利用机会先和他的学生商震、程起陆等人商定扣留方法，接着乃密电张绍曾，请他派兵截留。电云：“自鄂变以来，我军驰赴前方应敌，近日战事最为激烈。我军以军火缺乏，难挫顽凶，兹特购买大批军火，由西伯利亚铁道运经滦州，直赴前线援救。闻公等奏请立宪，原系崇尚和平，此旨正大，薄海钦迟。惟朝廷无立宪之意，不惜购买军火自相残杀。珍等恭逢运输之役，苦无挽救之方，军火到滦，望公等妥为保护是荷。”[(3)] 张绍曾得电，将军火扣留，并电迫清廷停战。同时，又电告鄂军政府，告以扣留军火的真情，示意及时进攻。清廷得电后，迫于形势，不得不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并特赦革命党人，图以此缓和革命。同时，又阴下毒手，由良弼与袁世凯派人合谋暗杀吴禄贞于石家庄，又撤掉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削去他的兵权。因此，吴禄贞、张绍曾相约进攻北京的计划失败了。但是彭家珍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仍然极力策动第二十镇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秘密组织武装起义。

1911年11月6日，清廷释放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黄复生、罗伟章等人。他们出狱以后，乃赴天津组织秘密机关。12月1日，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于天津义租界寓所成立。汪精卫任正会长，李石曾任副会长，分军事、文书、财政、司法、外交、交通等部，彭家珍在军事部任事[(4)]。会后他和黄复生、赵铁桥、罗世勋四人被派往上海

联络南方革命党人，请求接济北方革命运动。彭家珍、黄复生因此留沪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接着，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彭为北方招讨使，革命党人复推他为北方暗杀部部长。当自制炸弹试验成功后，他运炸弹由上海到天津。这时军事部经济困难，彭暗中把天津兵站司令部的军饷二百金献给同盟会，以作购买炸药之用。后来这事被赵尔巽发现，以盗饷罪由陆军部出令通缉。他被迫改名朋嘉桢，号锡三，仍然经常往来于京津之间，专门从事暗杀工作。当时被袁世凯暗中收买而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以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的身份，阻挠和破坏北方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1911年12月27日，汪精卫暗中接受袁世凯的任务，以议和代表参赞的名义，自北京南下到上海，劝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置给袁世凯，为袁效劳。

自汪离京后，北方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2日在滦州举行武装起义。袁世凯派王怀庆带兵镇压，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京津党人义愤填膺，秘密决议：清臣如袁世凯、良弼、荫昌、载泽、载洵、载涛等皆可杀，而袁世凯宜先诛之。彭家珍与陈宪民昼夜赶装炸弹，不到十天，便装成了一百多枚。待侦察清楚了袁世凯的行动路线以后，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人投弹袭击袁世凯于东华门，未中。三人被捕殉难。事后，清吏大肆搜索党人，彭家珍居住的四川营董宅被军警搜查，仆人张顺被捕去。他又迁寓中西旅馆四十三号，经常打听良弼、铁良、那桐、载洵、载涛等诸亲贵的活动情况，准备一网打尽。1月19日，清资政院开会，王公大臣都到，彭探悉赶来，而院会已散，未能下手。同年1月中旬，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以后，亲贵良弼、铁良、毓朗等人极力反对。他们组织三十余人于1月18日齐赴庆王府，包围主张清帝退位的奕劻，次日便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成立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破坏共和。当时担任军谘使的良弼，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彭家珍奋然曰：“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5)] 他便挺身而出，以暗杀良弼为己任。可是他并不认识良弼。他从四川同乡徐某的家中，找到

良弼的照片，仔细观察，识别良弼的容貌。他了解到四川同乡张敬三、罗春田与良弼友好，便冒张的名义诱良弼来而杀之，未果。他想直接刺杀良弼，然而良弼出入陈兵自卫，无法接近。他又想起了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良弼至亲密，他在讲武堂工作时曾经保存了崇恭的名片。于是派他的学生熊斌和刘升之赴奉天，用崇恭的名义发了一个假电报给良弼，假称东督赵尔巽愤宗社将亡，举崇恭来北京，共图挽救。至1912年1月24日（阴历辛亥年十二月初六日），彭家珍探知清室内廷将于腊月初八日，假腊八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他决定在腊八宴上行刺。初七日辰刻，他在中西旅馆写了绝命书，书中有云："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6) 他写完了绝命书以后，便叫他的仆人伍焕章，交给他银票百元，并对伍说："我有事他往，能否回京，尚不能定，明晨早车将余衣服用器运往天津交民意报馆，你也暂住在报馆。如果陈宪民诸先生来，请他不要住宿在我房里。"(7) 腊八傍晚（即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穿着标统制服，身佩军刀，乘马车到金台旅馆，说他是从奉天来的，因军事来京，从怀中取出崇恭名片，因得开十三号房居住。休息一会儿，他说有紧要公事入城，命馆人快替他备马车。他上车入前门，先到军谘府，没有碰见良弼。再往红罗厂入良弼私宅，门房告诉他良弼到摄政王府未归，引彭入坐客房，久候弼未至。他复出门，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良弼。刚上车行至大街，恰好碰见良弼驱车归家。彭复引车回，下车立于门的左侧。良弼下车进门，门丁持崇恭名片给他。良弼说："夤夜至此，胡匆迫乃尔！"(8) 彭家珍乘其不备，掷一炸弹，轰然一声，阶石炸裂。良弼被炸断左股，晕绝卧地，奄奄一息，过几天便死了。弹片触石反射，伤彭家珍头部，立刻牺牲。同时殒命者有良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良弼死后，清廷王公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出北京，赴天津、大连、青岛等地逃命。

这时，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特追赠彭家珍为大将军衔，谥义烈公。北京西郊万牲园烈士墓道建成时，他的遗体已由其家

属运回四川省金堂县安葬，所以西郊烈士墓仅是他的衣冠冢。

---

(1) 《彭大将军家珍墓志铭》，王暨英修，曾茂英纂：《金堂县续志》卷10，1921年版，第37页。

(2) 《京津同盟会纪事》，台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各省光复”，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2年10月版，第179—183页。

(3)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0页。

(4) 邹鲁、胡鄂公、眭云章等人的著作中都说彭家珍任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长。但“中国同盟会京津分部章程”中说蓝天蔚任军事部长（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2册，第333页），彭家珍为部员。因此，本文未写肯定的职务。

(5) 《烈士彭家珍绝命书》，《金堂县续志》卷10，第24页。

(6) 《烈士彭家珍绝命书》，《金堂县续志》卷10，第24页。

(7) 眭云章：《彭家珍刺杀清臣良弼案》，眭云章著《中华民国开国记》，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年7月版，第510页。

(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5页。

彭寿松

许在全　陈孝华

彭寿松，字岳峰，湖南长沙人，生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其父彭定太是清湘军将领，曾率兵驻扎固原、肃州近十年。彭寿松自幼随父，久居边塞。

1884年，法国侵略军进犯福建，清政府派左宗棠带领湘军入闽，彭定太亦随左至闽。中法战争结束后，湘军仍留闽，彭在闽安家。嗣后彭寿松在闽捐资为候补县佐，于1903年出任福建保甲局总办，以其强悍、大胆的作风，在福州地方初露头角。但不久因“忤上官意”[(1)]被参劾革职。

彭寿松闲置在家，教子济溶、侄荫祥读书识字。这时清朝政府日益腐败，外来侵略不断加剧，民族压迫严重，开明人士、血气青年竞起议论国事，图谋革命。彭寿松受其影响，“愤国事日非，国土日蹙”[(2)]，参加秘密会党哥老会。

1907年6月，留日学生闽人陈不浮在归国的轮船上蹈海而死。福建革命党人认为这是痛愤清廷腐败而做出的举动，在福州下渡十锦祠隆重举行追悼会，借以鼓吹革命。彭寿松莅会，发表慷慨演说，当场剪去发辫，以示推翻清政府的决心。同盟会会员刘通等人见彭反清革命意志坚决，开始与之联络。此后他们往来更加密切，共同从事反清斗争。1908年11月，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福州设立灵堂于明伦堂，全城文武官员每天前往哭灵。彭寿松力主乘机举事，以炸弹聚歼之，但其他革命党人认为来不及部署，而未实行。

1911年4月，彭寿松由刘通主盟加入同盟会。时适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及闽籍革命志士多人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彭愈加痛恨清王

朝，且认为“实力在于军队，非联络反正必不成功”[3]。为便于联络军警界，经彭寿松提议，在福州设立军警特别同盟会，由彭担任会长。时驻闽清军为陆军第十镇，基本成分系原湘军改编而成。中法战争中蒙受的耻辱记忆犹新，部分官兵痛感清廷窳败，倾向革命。彭寿松既是湘人，又是湘军将领之后代，与军界有较深渊源关系。经过彭的努力活动，驻福州的第十镇十九、二十两协新军，以及巡警道所属的警察，很快都加入军警特别同盟会，从而使后来福建辛亥光复有了武装力量的基础。与此同时，彭还联络哥老会各山堂，促使他们联合起来。

彭寿松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福建布政司尚其亨先是用笼络手段，请彭入署赞襄，还把他推荐给闽督松寿，委以警察提调，但皆为彭所谢绝。尚其亨遂施调虎离山计，把彭推荐给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彭与党人商议，均主张应行，可以借此机会联络湘鄂一带革命党人。为此，彭寿松召回时任广西柳州水师管带的儿子济溶，让其与胞侄彭荫祥负责主持军警特别同盟会的事务，自己则赴汉口任职。

彭寿松在汉口期间，除与湖北革命党人有过联系外，还曾到宜昌进行活动。10月6日，他在“宜昌适报丁忧”[4]，乃请假返闽。9日，彭乘轮船抵达汉口时，由于革命党人起义的秘密暴露，武汉三镇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亦险遭逮捕。当10日夜彭寿松登江轮离开汉口的时候，革命军经过一夜激战，已克复了武昌。彭先到上海，在这里与革命党人共商响应武昌首义之举措；同时协助在沪的福建革命党人将一批军火运回福建，以准备福州起义之用。

10月15日，彭寿松回到福州。这时福州革命党人正加紧筹备起义。为了争取新军将领，继第十镇协统许崇智加入同盟会之后，彭寿松于11月5日介绍该镇统制孙道仁加入同盟会。至此，在福州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日，彭和同盟会革命党人郑祖荫、刘通等人在城外白泉庵举行秘密会议。会后他们代表同盟会与新军将领孙道仁、

许崇智在闽江夹板船上会晤，商议起义日期、作战部署等重要问题。决定拥戴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以于山为总进攻阵地。由于起义军队子弹缺乏，还决定由彭寿松负责运动屏山弹药库守兵凿垣偷运子弹。

11月8日晚，彭寿松率领由各学堂学生组成的炸弹队（亦称敢死队），以及由各山堂哥老会会员、闲散官兵组成的先锋队与差遣队，上于山进入总攻阵地，彭在于山观音阁设立了军警特别同盟会办事处作为临时指挥机关。9日拂晓，福州起义正式发动，革命军在于山向清将军署发起进攻。彭亲自率领炸弹队与清旗兵作战，击毙清将军朴寿。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福州宣告光复。

11月11日，彭寿松与郑祖荫等人率新军、学生军和同盟会员列队前往旧督署，开会议定组织军政府，推举孙道仁为都督，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等十人为参事员，并组成由彭担任会长的参事会，协同都督掌握政权。13日，在都督署大堂举行都督就职典礼，彭寿松代表同盟会将闽都督府钤印授予孙道仁。15日，在南较场开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彭在会上大声疾呼“犁庭扫穴是吾辈后死者之责，新亭对泣尚非其时”。21日，军警特别同盟会与同盟会福建分会合并，彭寿松继郑祖荫出任分会会长。都督府成立一个月后，又决定撤销参事会，改设政务院。12月12日政务院正式成立，任命彭寿松为总长。翌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南返广州，彭曾亲往上海迎孙中山至福州，并于孙中山到达的20日晚主持了欢迎会。

彭寿松担任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和都督府政务院总长后，独揽大权，日渐一意孤行。他只依靠原军警特别同盟会的一帮人，尤其是对旧官僚马绛生言听计从。彭自视甚高，欲居闽省首席，不久即与孙道仁、许崇智时生龃龉。许崇智掌握军队，彭无法制许，便组织防卫军，由其子彭厚庵统率。孙道仁拥有都督名义，彭则轻视之，让其侄彭荫祥任延建邵道尹，下属三府均由亲信担任。与此同时，彭与同盟会元老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人也渐渐疏远，乃致使自己陷于孤

立。1912年春，福建省临时议会选举议员，外省旅闽人士要求特定议员专额，彭利用在政务院的职权，使政务会议通过这一规定。本省人士群起反对之，同盟会会员蒋筠反对尤力，多次召开群众大会，登台演说，措词激烈。彭寿松十分愤怒，竟遣人于4月29日将蒋刺杀。案发后，主办《民心报》的黄家宸撰写文章谴责彭罪行，彭恼羞成怒，又命人于5月22日将黄杀死。时称“蒋黄惨案”。

“蒋黄惨案”引起轩然大波，旅沪福州同乡会大为激愤，要逐彭寿松出闽，守旧分子则在背后推波助澜。众怒难犯，彭于5月间发表告退通告，宣称“近病益甚，更难再勉”，“唯有远避”[(5)]。时值都督府根据北京政府电令进行第二次改组，彭被挽留。7月1日，政务院撤销，在都督府内设参议厅，彭寿松任总参议兼全省警察总监，统辖防卫军，督办全省禁烟事务。8月1日，彭寿松以“扰乱治安”罪名查封福州《群报》，主笔苏鉴亭被捕，并笞数十板。此事引起京沪新闻界的不平，北京政府亦来电诘问。京沪闽籍同乡更是愤慨，大有非去彭不可之势。袁世凯乘机派岑春煊以镇抚使名义来闽，迫逐彭寿松。

岑春煊于8月下旬率部乘舰到闽，驻扎马江，遣人谕彭离闽。彭寿松曾欲抵抗，但此时能为其效力者无几。同盟会党人陈子范顾虑彭一去，福建革命势力将受重大影响，特由沪赶回劝彭抵抗，但看到彭已是外失人心，内亦解体，乃太息而去。福州各界人士唯恐双方引起冲突，糜烂地方，而在京乡人又纷纷来电，促家属迁徙，致使人心动摇，钱庄倒闭，社会秩序纷乱。9月24日，与彭寿松素有交谊的郑祖荫、刘通等人，劝彭暂行息肩，且为彭预拟好退职电文。彭见势不可为，于是日发出辞职电。不几日，北京政府来电召彭晋京，并准予出洋考察。但彭认为舆论都称岑系专为查办自己而来，“故暂缓行期以俟之，庶得攸分黑白，稍明心迹”[(6)]。地方人士则顾及彭钱款不充裕，难以成行，由商会筹十万元赠之。10月9日，彭寿松从福州马尾搭轮离闽。从此，福建政权完全落入官僚军阀之手。

彭寿松离闽后，避居汉口租界，“建屋数幢，取名寿松里，一面

收租，一面与马绛生合资经商”[7]。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彭冀图在武汉起义炸毙鄂督，但未成功。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是年彭返回长沙，被孙中山任命为湘鄂民军联络部部长，从事运动湘鄂交界的羊楼司一带几千会党，并统辖民军千余人。1918年3月，北军吴佩孚部攻占岳阳，彭受命率部援助南军湘、粤、桂三省联帅谭浩明，但谭见前方部队败退，即不战而退出长沙。于是彭将所部遣布于湘、贵流域，自己则潜回长沙购运军火，以图再举。这时北京段祺瑞政府已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彭在长沙被张的密探诱捕，虽经其妻花费重金营救，仍被判处十七年徒刑，关押在狱。6月间，发生张部行营起火以及马夫枪刺张敬尧之弟未遂案，彭寿松被指控为此案的指使者，于6月14日被处死。

---

(1) 《彭寿松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

(2) 佚名《彭荫祥历史》，《武昌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43页。

(3) 佚名《彭荫祥历史》，《武昌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43页。

(4) 《彭寿松事略》，《武昌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37页。

(5) 《彭寿松事略》，《武昌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39页。

(6) 《彭寿松事略》，《武昌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40页。

(7) 沈来秋：《辛亥前后的彭寿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文史资料选辑》（辛亥革命专辑）第1辑，1981年版，第42—43页。

彭禹廷

冯文纲

彭禹廷，原名延忠，后改名锡田，取字禹廷，以字行。1893年3月3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五日）生，河南镇平县七里庄人。其父彭如璧，早年设帐教书，后改营中药铺，同时兼耕七亩半田。彭禹廷七岁起随族兄读书，十二岁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906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07年转县立师范传习所，1908年考入开封知新中学堂。作文试题为《子胥复楚论》，彭在文中“痛诋楚君不能用人致以资敌”，语义中肯，切中要害，校长郑黻门“大为击赏”[(1)]，1909年保送彭入河南优级师范。这时，民主革命思潮已经在开封传播，彭禹廷学业精进，思想蓬勃而不可遏，遂参加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11月，张钟端等河南革命党人在省城开封以优级师范为据点谋取响应，彭禹廷参与其事。12月22日夜，举义事泄失败，张钟端等十一人被捕，彭禹廷越墙隐匿，后随革命军刘凤梧部即河南奋勇军进入南阳。不久，河南光复，彭禹廷复入优级师范，继续学业。因其在校为人憨直，触忌校方，1913年遂被除名。同年，彭禹廷转入北京汇文大学，甫经二载，又因他不信宗教，常在礼拜时读书，引起牧师不满，要把他赶出教堂。彭禹廷不堪忍受，遂于1915年愤然离校回籍。

1918年，彭禹廷应聘南阳第五中学任英语教员，教课认真，深受师生欢迎。1920年春，经校长阎敬轩推荐任河南印刷局副局长，第二年改任南阳丝厘局局长。后因厘税事务与己志不合，坚辞图他就。1921年10月，阎敬轩随冯玉祥部赴陕，任陕西路政局长，彭禹廷应邀到西安，奉命视察潼关一带路政。11月，阎敬轩突然病故，彭禹廷为其料理善后，适逢西北军旅长张之江来吊，张感其义气，荐彭于陕

督冯玉祥，彭被冯委为卫队团过之纲部书记官。此后六七年间，彭禹廷均随冯部，自陕而汴，而北京，而塞外，历任旅部书记官兼军法官、军法课长兼察哈尔禁烟督办。

彭禹廷为人做事坦直热诚，刚毅果断。1924年他自题《自求自》词说："吾跪吾前，自求自焉：岁月易迁，速醒莫长眠，立志要坚，读书要专，言多易招愆，应留半句在口边；今日应为之事切勿待明天。彭锡田求彭锡田。"1925年夏，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委彭禹廷为都统署秘书长。1926年3月，张改任西北边防督办，彭禹廷随张任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同年8月，直奉联军攻占南口，冯部撤退，彭禹廷随军西入绥远。这时，军阀混战，国事日非，对中国旧军队中的许多黑幕他深为厌恶。次年1月，他返回北京，借寓学友梁仲华家，与梁结为莫逆之交，开始共同探索新的道路。

1927年6月，张之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执法处处长，邀彭禹廷为高等执法官，移驻郑州陇海花园。这时，蒋介石已经公开背叛革命，彭禹廷目睹时事，以及父老昆仲度日的艰难，断然抛弃旧念"即谬于'欲为民族寻出路，非建设乡村不可，欲谋乡村之建设，非由民团入手不可'的偏见"，决然离军回乡，倡办地方事业，立志有益社会。

是年8月，彭禹廷返家奔母丧，途中为土匪所阻，滞留襄（城）叶（县）。10月初到家时，镇平南区（侯集区）正是土匪蜂起，一夕数掠，土匪还探听彭的所在，企图绑票取赎。彭禹廷愤不可遏，遂应地方绅董之请，出任镇平南区区长，组训民团，肃清匪患。他将全区壮丁编组成第一队和第二队，与土匪交锋，先后击毙匪首张孝先等三人，使土匪相继远遁。1928年3月，境内又先后成立民团第三队、第四队，每战皆捷，各杆土匪纷纷逃至他县，镇平全境获安。8月，陆军二十四师师长石友三驻防南阳，任彭禹廷为镇平民团旅长。11月，民团改组，全县设一大队，彭禹廷改任民团大队长。是时，张之江由南京连电"促其入都，共襄国事"，彭禹廷则以"国家之基础在乡村，乡

村不治，国基即难奠定，誓以救地方者救国家”为由，复电恳辞。1929年1月，韩复榘主豫，省府当局委彭禹廷为河南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统辖南阳、南召、方城、唐河、邓县、内乡、淅川、新野、镇平九县民团，并与匪首王光斗、王老十等激战于南（阳）、南（召）、唐（河）、邓（县）等县。5月，石友三部移防，宛属（南阳地区）空虚，杆匪乘机窜南召，破鲁山，陷赊店，围方城，留宛部队亦有议变消息。彭禹廷闻警，挺身独往，说服留宛部队听从他的指挥，驰援方城等地，使新街、贾庄、黑龙集一带免遭劫掠。

1929年夏初，镇平匪势敛迹，彭禹廷暂住菩提寺休息。他发现匪患虽暂告解除，农民的困苦依然如故，农业的改良，工业的提倡，社会问题的解决，均迫在眉睫。彭多次与梁仲华函商，研讨办法。这时，韩复榘又委他为豫南民团总指挥。彭亲赴开封，屡以“现在民众痛苦，非剿匪一时所能解决，必有治本办法，健全人才，方能奏效”面陈，坚辞不就民团职务。7月，经韩同意，在辉县百泉创办河南村治学院，以彭为院长，梁仲华为副院长，王柄程为总务长，郭海封为教务长，并聘梁漱溟为主任教授，以期寻找农村问题的根本改革之法，培养造就实施自治的人才。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并由梁漱溟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广为号召，一时直、鲁、豫、晋各省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该院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村长训练部、农村警察训练部、农业实习部，尤其注意乡村自卫，以及农业改良和农业教育的试验与推广。全国村治派的名流风从云集。是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筹划反蒋，专到百泉，表示战后亦“要从村治上着手，为人民谋切身利益”，“为中华民族找一条出路”。中原大战后，学院竟为辉县县长李晋三纵匪抢掠，同时镇平亦遭“八二六”土匪屠城浩劫，全县民团险被瓦解。彭禹廷一气之下，便把院务委诸梁仲华等人维持，摒弃“走曲线的软办法”，于1930年9月17日“只身返里，走入硬干的途径”，专门从事以镇平为中心的宛西自治。

彭禹廷回县伊始，应邀给民团讲话。他见匪势日张，动辄千人，实非一县民团所能抵御，首倡宛西联防。1930年9月27日，宛西民团首脑内乡别廷芳、邓县宁洗古、淅川陈重华齐集内乡召开联防会议。会议议决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公推别廷芳为司令，彭禹廷自任第四（镇平）支队长。10月10日，豫南民团司令李正韬任彭禹廷为豫南民团宛属游击总指挥。彭禹廷发表《告宛属十三县同胞书》，详述此次回县意愿“是要救农民的贫穷，为农村增加生产”，把在村治学院研究的“救穷”、“兴利”办法贡献出来，“以偿平生之愿”。在他向民团发表讲话后的第二天，镇平县长阚葆贞亦召集民团训话，说彭禹廷回县之后只“不过是一个平民”，“不配给民团讲话”。同时施以重金送他出门，逼他离开镇平。一些土豪劣绅亦说彭禹廷此次回县旨在“捣乱”，意在“造反”。彭禹廷不为所动，阚葆贞见彭态度强硬，于10月29日将宁洗古暗杀在泌阳城东。彭禹廷失去左右手，便设计在镇平侯集将阚扣捕，公布罪状，就地枪决。1930年10月，镇平十区自治办公处和镇平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发表宣言，颁布章程，规定自治委员会为立法机关，十区自治办公处是由人民自治替代官治之过渡机关，并号召全县人民依靠自身的努力奋斗来解除地方上的痛苦，以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全县范围内的“及早实现”。此后，举凡壮丁的训练，息讼会的建立，清丈土地的实施，田赋累进法的推行，查户口，兴实业，便交通，立学校，设医院，建工厂，积义仓，改良风俗，讲究卫生，调剂金融，整理财政，以及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丝绸，推广家畜农作物优良品种等“自治”、“自卫”、“自富”的措施，均在彭禹廷的倡导下开展起来。

1931年1月，他又邀集全县“乡运先进”组成自治研究会，借以阐发自治建设原理，同时针对当时社会的“自私自利”、“依赖性”、“匪”、“穷”四大病症，提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的十六字自治目标。5月至7月，他又将自己的自治主张命名为“地方主义”、“自救主义”和“地方革命”。他解释说，“地方革命”即是缩小的“国民革命”；“自卫主义”即是缩小的“民族主义”；“自

治主义”即是缩小的“民权主义”；“自富主义”即是缩小的“民生主义”。“自卫”、“自治”、“自富”，即是“镇平的三民主义”。他还把国民党“匪式军队”、“贪官污吏”和“万恶土匪”作为“地方革命”的直接打击对象，主张地方自治既“不靠县官”，也不靠国民党“军队”，虽迹近反抗政府，但借以达到“直接救地方”和“间接救国家”的目的。

彭禹廷认为20世纪是个“革命的时代”，外国侵略者于此必将“日即于崩溃”。“九一八”事变后，他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他认为我国农村“尚未露出大不均的现象”，只有“大穷小穷”、“大家小家”的区别，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用不着共产”。他说共产党亦是“民团的敌人”。他又认为“欧美式的代议制度，我国试验失败，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没有一点成绩”。据此，他主张“地方革命”甚至整个国民革命，只能走以“知识为要件”，以“不合作为对待匪式军队、贪官污吏之唯一武器”，“用不着流血”的道路。1932年3月，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刘镇华来宛，任彭禹廷为南阳、南召、新野、镇平四县绥靖联防区主任。同年4月，南阳、汝南两地保卫团干部训练所聘彭禹廷为村治部主任，并邀他亲到南召、新野指导“自治自卫”办法。1933年3月1日，筹办两年的宛西乡村师范正式开学，彭禹廷被推为校长。3月22日，彭禹廷手创《自治歌》，歌词为：“地方自治，关系匪轻，以伸民权，以裕民生。自治不成，革命无功，有志之士，努力笃行。任劳任怨，不伐不矜，群策群力，贯彻始终。”他对地方自治事业仍然寄予满腔热望。

彭禹廷的镇平自治及其自治主张，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施行的是一种“国民党改组派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但诸如“建立农村自治、农民银行，按照托拉斯的形式集中绸缎丝行的生产与出卖，提倡经营地方水利，发展交通（如修汽车路）与对旧的地主豪绅加以不断的严重打击，反对封建思想，废除高利贷，免去一切杂税，尤其是目前在改造（选）自治村村长的过程中，更将大部分的地主豪绅赶出自治村机关门外，而代之以大批富农，即是将乡政权从地主豪绅手里夺

来交给富农管理，使在政治方面更帮助了农村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式发展”[2]的结果，以及“佃户（或不足五亩地者）不纳粮”和“田赋累进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确实部分减轻了农民的沉重经济负担，使镇平或宛西一隅免遭国民党“匪式军队”以及各杆土匪的肆意蹂躏，保护或部分发展了镇平乃至宛西各县的社会生产，安定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因此，时人常把镇平称为“世外桃源”。但镇平自治为当地劣绅所仇视。1933年3月25日，被劣绅毕浴佛、杨瑞峰贿买彭的随从杨天顺等人将彭禹廷谋害致死。彭著有《讲演集》[3]一书传于世。

---

(1) 镇平县地方建设促进委员会：《镇平自治概况二集》，文华美术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97页。

(2) 《鄂豫边特委给镇平特区信》（1931年10月27日），转引自《中共镇平简史》（附件九，未刊稿），第56页。

(3) 以上未注出处引文均引自《彭禹廷讲演集》（王扶山、王彬质笔记，镇平县教育局1932年版）、《镇平自治概况》（镇平县十区自治办公处，京城印书局1932年版）和《彭禹廷与镇平自治》（李腾仙著，镇平县地方建设促进会1936年版）等书。

彭泽民

周天度

彭泽民，字锦泉，号镛希，1877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年十月初三）生于广东四会。父亲彭明翰，在佛山靠糊纸盒为生，家庭十分贫苦。彭泽民幼年入塾受教，断续七年，并曾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后因父亲病故，生活无着，1902年被迫离乡前往南洋马来亚谋生。起初在吉隆坡郊区当塾师，后在一个锡矿场任文书。

彭泽民到吉隆坡后，常去兴中会在吉隆坡创设的“中和讲堂”听讲，受到革命思想启蒙，倾向革命。1906年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立，有会员十余人，彭泽民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书记。因英国殖民当局监视甚严，不能公开活动，同盟会托名“中国青年益赛会”，利用基督教宣道堂内座为机关。青年益赛会不久即成为马来亚雪兰莪邦的革命中心，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策划广州起义，彭泽民积极动员华侨捐款，鼓励华侨回国参加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李晚和罗成，就是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吉隆坡当局认定青年益赛会为暗杀机关，下令停止活动。辛亥革命后，吉隆坡同盟会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青年益赛会得以恢复，会员增至数千人，彭泽民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四年。1915年9月，彭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雪兰莪副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在华侨中为中华革命党筹集讨袁军饷，并组织华侨讨逆军，入广东东江参加讨伐龙济光的战斗。

彭泽民初到南洋时，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急需橡胶，殖民当局招垦橡胶园，彭领到橡胶园一处，并得到锡矿场工人的帮助，建木屋数间，全家悉力以赴经营橡胶

园，生活有所改善。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彭泽民参与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工作，发起创办吉隆坡《益群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益群日报》受到侨胞欢迎，畅销南洋各地。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国共合作，彭泽民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因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以及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广州。随后，他被芙蓉总支部推选为代表，参加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起来反对。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彭曾到孙中山遗像前痛哭[(1)]。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议，1927年1月彭泽民由广州到达武汉。这时，蒋介石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彭在武汉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发动的旨在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反蒋运动。他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在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抵抗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在这次会议上，他继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彭泽民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的讨蒋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总理的政策，我们非打倒蒋介石不可。”[(2)]

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汪精卫集团又公开背叛革命。彭泽民与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竭力反对。事先，他曾向汪精卫指陈利害，

规劝汪坚守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反革命立场，汪精卫不听，反而指责他“叛党亲共”。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会散后深夜12时，彭泽民赶至林伯渠家中，将会议情况告诉了林伯渠和吴玉章，使他们能及时脱险。接着，彭泽民随第四集团军的第二方面军离开汉口。

7月底，彭泽民到达南昌。8月1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被推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屠杀人民的罪行，并号召革命同志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3)]。8月5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彭随部队南下。当时气候酷热，加上敌人的不断袭击，行军十分艰苦。他与共产党人一道，不畏艰难险阻，在行军途中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为战士看病，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毅力。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汕头后，他在彭湃的帮助下，取道陆丰的汕头，乘渔船到达香港，从此开始了他在香港二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由于彭泽民坚持反帝反封建和反蒋的爱国革命立场，1928年国民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及屠杀工农的罪行，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写信给彭泽民，邀他共同发起。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路过香港时，与彭一起商讨反蒋问题。随后，邓演达在上海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脱党分子组成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彭泽民列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彭在香港组织了南方干事会，负责会务工作。但不久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失败。1933年冬，彭泽民到福州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彭认为不可能成功，不久，即离闽回港。

彭泽民流亡香港期间，受到国民党特务和英国殖民政府的监视，

生活异常艰苦，但他操守不移。为了维持生活，他经友人介绍向香港名医陈伯坛学习中医六年，随后在香港挂牌行医。他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同情，经常赠医赠药，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

1935年，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1月1日，彭泽民和章伯钧等人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对日抗战，反对蒋介石的官僚独裁统治。《纲领》还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4)]，要求恢复大革命时期联俄、联共政策。彭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前夕，彭泽民发表《告全国各界领袖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顺从民意，迅速实行民主政治，各党派平等合作，共赴国难[(5)]。“七七”事变后，他和章伯钧于7月10日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民主政治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他还主张予华侨以参加祖国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6)]。他在香港创办了《抗战华侨》杂志，积极向海外侨胞进行团结抗日的爱国宣传。

皖南事变后，彭泽民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于1941年1月20日联名发表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7)]。是年3月，各抗日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彭泽民因此也参加了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彭泽民在香港两次被日本侵略者拘捕入狱，备尝艰辛，但他凛然不屈。抗战胜利后，他呼吁和平团结，反对内

战，是南方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9月，他写了《孙夫人〈对时局主张〉代表了全中国人》一文，表示完全赞同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的《对时局主张》所阐明的立场，要求国民党立即接受她的主张，与共产党实行停战，恢复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成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并认定这是实现“人民权利的起点”[(8)]。

1947年1月3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鉴于抗日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实现人民民主，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4月，国民党为了和缓人民对其一党专政的强烈不满，宣布“改组政府”。彭和农工民主党留港中委郭冠杰、李伯球等人发表《对改组政府的意见》，指出，“国民党临到政治完全破产，人心尽去的今日，竟来一套‘改组政府’，以图挽救危机”，完全“违反人民的要求，徒增人民的痛苦”[(9)]。这时，彭泽民被推为设在香港的民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他连续发表文章和宣言，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摧残民主运动的行径。

1948年5月，彭泽民代表农工民主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这时，他已是香港的名医，生活优裕，但他不顾一切，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离港，于12月26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途中曾赋七绝一首：“廿年空有还乡梦，此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表现了无比兴奋的心情。

1949年2月，彭泽民到达北平，9月，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务。他继续用自己的精湛医术替人民看病，为社会主义服务。1951年他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6年10月18日，他在北京逝世，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深切哀悼。

---

(1) 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香港朝阳出版社1973年版，第21页。

(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3)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4)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5)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6) 彭泽民：《怎样动员华侨》，《抗战行动》第1期。

(7) 《新中华报》1941年2月9日。

(8) 《中华论坛》第2卷第2期。

(9) 香港《华商报》1947年4月24日。

平刚

王川

平刚，字少璜，贵州贵阳府贵筑县青岩人，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祖籍安徽。清朝末年随其父母迁居贵阳，以经营小帽铺为业。父平敬斋，系一虔诚的天主教徒，平刚不信教，父子二人的见解颇为分歧。其母先后生十三胎，仅存平刚及姊妹三人。

平刚自幼性格坚强，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读小学时，常为贫穷无势而被欺辱的同学鸣不平，惩治那些仗势欺人的小恶霸。关心民间疾苦，扶助弱者。平刚勤奋好学，八岁入私塾读书，二十岁考取秀才。他胸怀天下，为民担忧，富有叛逆精神，敢于反抗朝廷。1904年（光绪三十年），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全国奉命庆祝，贵阳也沿大街搭成几座“万寿台”，大肆筹备庆祝。平刚剪发以示抗议，成为贵州剪辫第一人。之后，又撰写一副对联贴于寿台旁边：“东望日本西望意，卅年来人皆进化；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意在讽刺慈禧在穷途末路之时，对国内外环境视若无睹，竟作如此厚颜无耻的“庆寿”之举[(1)]。此联一出，大快人心，但却激怒了地方当局。贵阳知府下令提讯平刚，将治以重罪。后经友人解救，在杖打手心四十之后，由其父领回家中严加管教。平刚在家中受其父狠斥，加以不能向官府申辩，立志出游日本，以摆脱当时的恶劣处境。1905年5月，平刚离开贵阳东渡日本。

尚未东赴日本之前，平刚即认为应致力于文化教育方能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1904年，他与张忞等人创办寻常小学于贵阳。后由日返筑后，平刚担任光懿学校董事长，特别把精力倾注于创办乐群学校（后增设中学），常年不断地为之筹措经费，排除官吏和军队的多种干扰。

1905年，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在日本东京成立，平刚抵达日本后即加入同盟会，担任干事，并结识贵阳人于德坤。二人虽性格不同，而友谊颇深。二人都善于写作，曾为同盟会刊物《民报》分担编写任务。平刚一度有被提为总干事的拟议，后由宋教仁担任此职。

1907年，贵州始由张百麟组织发起自治学社，黄茀青、陈兰生等人从旁协助其运作。平刚虽在日本，但与张百麟、周培艺、乐嘉藻等人秘密书信，论述世界大势及中国革命的方针。1908年，张百麟写信给平刚，表示愿意将自治学社加入东京同盟会作为贵州分会；但为避免清廷注意，仍保留自治学社之名，以便活动。后来经孙中山认可，平刚被任命为贵州同盟分会主持人[(2)]。当时，不论是在国内外互通情况、联络关系方面，还是在介绍贵州留学生及旅日人士参加革命方面，尤其是在促请同盟会接纳自治学社，承认其为贵州分会组织方面，平刚皆为活动最力的关键人物，他以通信方式，向自治学社传达革命思想。

1910年，在贵州的革命酝酿成熟即将爆发之时，平刚由日本回到贵阳，参加创办乐群小学，目的在于以办学为名，秘与张百麟、周培艺保持频繁接触。

1911年11月4日，贵州革命部队入城，革命各方当日下午在谘议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枢密院全权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平刚成为枢密院七要员之一。6日，军政府移于前巡抚署（旧贵州省政府）办公。平刚被公推为军政府起草条文，定名为《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咨请贵州立法院同意并公布，平刚协同周培艺（行政总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及函电来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平刚当选为众议院秘书长，并偕同国民党议员去京，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袁世凯对国民

党人的迫害和威胁无处不在，国民党在京议员常不能自安，平刚的革命抱负未能实现。在这一时期，革命好友宋教仁遇刺，平刚随即产生消极意念。此后平刚盘桓上海，蓄意读书，受知于革命同志陈子渔。后与陈子渔之女陈凤飞结为夫妻，平刚从此在闺房课读，少与国民党议员往来。

1915年，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起义，出兵讨袁，平刚跟随其师章太炎入滇，支持护国运动。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大元帅。章太炎到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平刚也随至广州，任府中秘书。平刚以幕僚身份曾向孙中山建议自行设立军官讲练所训练一般军事骨干，以解决国内各方的武装纠纷。党内有不以平刚之言为然者，斥之为军阀思想，故平刚的建议未被采纳。一直到1923年，平刚都在孙中山身边效力。

1923年，因父母衰老，其妻陈凤飞身体孱弱难于支持家事，生活日见窘迫，平刚不得不离开广州革命政府，回家探视。归黔后，其职务仅限于省内。首先担任镇宁县长。1923年，滇军径直闯入镇宁县署，勒索人夫和现款，并以刀枪相遇。平刚挺身而前，与滇军阐述国民革命的道理。滇军不听，遂将平刚逐出县署。失去县长职位的平刚即由镇宁返回贵阳。

1926年，平刚被控制贵州的兴义系军阀袁祖铭的部将周西成延揽，并被委任为古蔺县长，后调任为赤水县长。尔后周西成从袁祖铭另一部将彭汉章手中夺得政权，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平刚也回到贵阳，被周西成任命为政治顾问。

从周西成掌权开始，历经毛光翔、王家烈，直到1936年，平刚等人一直在筹设国民党贵州党务指导委员会任职，平刚任指导兼训练部长。平刚虽以老革命的声望办党，但在军阀系统的控制下，其工作没能取得较大进展。

1937年冬，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到任后，立即筹备成立贵州省临时参议会，从全省推举参议员和正副议长。第一届共为三十人，平刚被公推为议长，第二届仍蝉联为议长。平刚率领的临时参议会曾对省政府提出若干质询和建议，但都未被采纳，使他心灰意冷，便以“看经念佛”自娱[(3)]。他曾任贵州省佛教会会长，只要方丈和尚所反映的庙里问题和困难，他都尽力解决。

平刚虽有多年的革命资望，但对国民党中央身居高位的老友，他不想向上攀附，少有信件、应酬的往来；也鄙视与军阀、官僚为伍。而对牺牲、病故的同志，尤其是其中的贵州人，时常思念不已。对于张忞、黄泽霖、于德坤等同志的遗孀或子侄，他都代为出面请求抚恤费，或介绍工作。为纪念这些同志，平刚撰写了《贵州革命先烈事略》，并予以刊行，传播广远，还为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张百麟撰写纪念碑文，立于河滨公园。

平刚一生为民，曾两次使贵阳免遭大火之灾。1944年日寇从广西侵入贵州独山，省城一片混乱，奉蒋介石命令率军守卫贵阳的汤恩伯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坚壁清野，火烧贵阳的恶毒计划。参加会议的省参议长平刚听后拍案大怒：“谁要烧贵阳城，我就不讲客气，先把他坠南明河，我也做个落水鬼，和他同归于尽。”并告诉汤恩伯：“你敢烧，我就敢这样做。”并且宣布放弃准备疏散去毕节的决定，要与贵阳城共存亡。为避免这场灾难，平刚在家中堂屋内横放一口棺材。汤恩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敢得罪这位民国元老，撤销了对贵阳城的火焚计划，使得贵阳城幸免于难[(4)]。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师长刘伯龙从外地来到贵阳，据说准备夺得贵州省大印后烧掉贵阳，然后逃之夭夭。谁知被当时的省长谷正伦捷足先登，带着大印逃跑了。于是刘找平刚谈话，意为宁肯烧掉贵阳城，也不能将贵阳留给共产党，遭到平刚的坚决反对。刘无奈，不敢立即行动，后终于未能烧城。贵阳城也因此得以保住。

平刚治学十分严谨，早年曾师从章太炎先生，为其所器重，师生

间有诗唱和，还曾为太炎先生代笔写过一些文章，如《赠陆军中将黄君墓志铭》、《故陆军上校李君墓志铭》等。平刚对章太炎先生也极为崇敬。平刚嗜好读书，读过的书大多有眉批，逝世后全部捐赠给贵州省图书馆。他一生著述较多，计有日记一百一十四册，约百余万字，记述了从1914年至1951年的政治生涯和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此外，还有文集《嘘云集》、《感遇集》、《贵州革命先烈事略》等，许多文章都是正楷抄写[5]。

解放后，平刚自愿接受党的领导，政府安排他为省政府委员。其时他年事已高，老弱多病，于1951年底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主要参考资料

严平、张宗屏整理：《平刚日记选辑》，《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至1985年第4期。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杜元载著：《革命文献》第65、6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4年版。

---

(1) 陈恒安：《平刚先生生平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花溪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8年版，第85页。

(2) 平刚讲、白杨记：《贵州光复史实——在贵州光复纪念大会上讲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3) 《民国元老平刚》，《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6期，第21页。

(4) 平明宁：《我的叔祖父——平刚》，《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78—79页。

(5) 平明亮：《忆祖父平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79年版，第140—141页。

溥仪

余觉金　寿祝衡

溥仪，姓爱新觉罗，字浩然，于1906年2月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出生于北京醇王府。祖父奕䜣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咸丰皇帝的七弟。咸丰登基时，封奕䜣为醇郡王。咸丰十年，十九岁的奕䜣奉旨和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的妹妹成婚，于是咸丰和奕䜣既是兄弟，又是连襟。溥仪的父亲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乃荣禄之女。1908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懿旨授载沣为摄政王，其长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日由乳母王焦氏抱送入宫。次日，光绪帝暴卒，无子，懿旨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光绪）之祧。乃尊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隆裕为皇太后。

慈禧以嗣皇帝溥仪尚在冲龄，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嗣后所有军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15日慈禧病死。溥仪于是年12月2日即位，是清朝第十代皇帝，时年三岁，以明年为宣统元年。授载沣为监国摄政王。12月18日上皇太后徽号为隆裕皇太后。1909年1月2日以足病为由，罢斥袁世凯，令开缺回籍养疴。

辛亥革命成功，宣告民国时代的诞生，维持近三年的宣统王朝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逊位诏书而结束，溥仪成为清朝的末代皇帝。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摧毁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按照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得以暂居宫禁，尊号仍存不废，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帝王生活。依附退位小皇帝的那些宗室王公大臣和遗老遗少们，自然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溥仪六岁开始延师授读。以陈宝琛为代表的师傅们在向冲龄的溥仪授业时，总是宣扬“康乾盛世，同光中兴”的业绩。溥仪从小就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1]为己任。复辟的逆流始终在紫禁城里泛滥。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溥仪实现复辟的梦想不是寄托于宗室觉罗、王公大臣以及大大小小的遗老遗少们，而是寄托于投共和之机当上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其他北洋军阀之流的实力人物。

袁世凯生前，乃至后继者如黎元洪、段祺瑞之流，各人出自不同的目的，对清室履行优待条件，巨细无遗。每逢阴历元旦，溥仪生日，或隆裕寿辰、忌辰，彼等都不忘派员参加庆吊活动。他们对小朝廷恩惠有加，连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也居然得到民国总统颁发的“嘉禾章”。于是小朝廷俨然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赐谥号，赏朝马，封官许愿，以示皇恩浩荡。上上下下，认为复辟在望。

1917年7月1日，废帝溥仪在紫禁城养心殿召见了拥有六十营兵力，以“辫帅”著称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接受了张勋的要求，在京复辟，下诏“亲临朝政，收回大权”，恢复“大清帝国”，第二次当上大清皇帝。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通电讨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张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避难，这场闹剧仅上演了十二天便告结束，溥仪第二次宣布退位。在段祺瑞等人庇护下，溥仪未受到惩罚，优待条件继续有效。

在紫禁城里，对溥仪影响最深的人，除了汉文教师陈宝琛外，就是苏格兰籍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于1919年3月由小朝廷延揽。他对溥仪宣扬英国绅士风度和大英帝国的风土文物。就溥仪而言，庄士敦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年轻的溥仪开始醉心于欧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对大清传统威仪产生厌倦，甚至不顾小朝廷上上下下的非议，首先自动剪掉辫子，以取悦庄士敦。

1922年12月1日，溥仪十八岁时，册立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同时又纳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之女文绣为淑妃，这

是溥仪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已成年的他不再凡事都听任那些王爷和王公大臣们的摆布，他要冲出紫禁城的樊篱。这时他把“光复故物”、“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幻想又寄托在列强的声援上，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愿望。

溥仪的出洋留学问题一经提出，紫禁城上上下下闹得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王公大臣们认为，溥仪一旦离开紫禁城，民国政府就会取消对清室的优待。他们一致反对溥仪出洋。溥仪的唯一支持者是弟弟溥杰。考虑到公开出走会遇到许多阻力，两人就改变策略，准备潜逃。首先着手筹集资金，方法是把紫禁城里最值钱的字画以及古籍珍本，以溥仪赏赐溥杰为名，每天让溥杰运走一定数量。盗走了的宝物就存放在溥仪的七叔载涛事前在天津英租界准备好的房子里，以便待价而沽。

出洋资金解决了，接着就准备行动。庄士敦建议溥仪先向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系，欧登科作出承诺：只要溥仪逃出紫禁城，以后一切就包在他身上。1923年2月25日，由于临行动前走漏风声，紫禁城实行全城戒严，溥仪出走受挫。事后，又经庄士敦建议，先从整顿紫禁城内部着手，以待时机。7月，溥仪先遣散大部分太监，继而整顿内务府。内务府是为服侍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溥仪把整顿的重任交给郑孝胥，委以“内务府大臣”的首席。但郑一筹莫展，加以当时流言四起，盛传民国将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和接管紫禁城，郑只好知难而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原属直系的冯玉祥部在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支持黄郛组阁，冯部改称国民军。11月5日，黄郛以代行国务总理名义颁发优待清室的修正条件五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同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等将领率领军警执行该项决议，溥仪被迫携眷出宫，移住北京什刹海的醇王府。

溥仪从到醇王府之日起，就确定要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寻找藏身之所。几经周折，先得庄士敦的协助，潜入德国医院，但又顾虑医院不安全，乃通过郑孝胥的活动，征得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于11月29日潜往东交民巷，住进日本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护和影响下，溥仪开始向往去日本留学。对此，日本使馆示意溥仪应先行迁居天津，然后着手筹备出国事宜为妥。溥仪的股肱之臣朱汝珍也积极配合行动，在天津日租界物色到一座占地二十亩的叫“张园”的楼房。1925年2月23日傍晚，溥仪由日本便衣警宪护送到天津，从此当上日租界的寓公。

留在溥仪身边的股肱之臣罗振玉主张溥仪留学日本，争取外援。郑孝胥则先是主张“用客卿”、“开放门户”，最后则坚决主张只投靠日本一家。但溥仪此时并未采纳罗振玉的主张，也不全按郑孝胥的主意行事。他住进“张园”，乃至其后迁居“静园”，长达七年的日租界寓公生活，主要是多方结纳各方武人，以此作为他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依仗。这一时期溥仪不仅与张作霖秘密会晤，还公开与其他奉系军人酬酢，相互馈赠，杯酒言欢。张宗昌固然是座上客，盘踞中蒙边境的白俄头目谢米诺夫也是入幕之宾。溥仪原把复辟的愿望寄托在这些武人身上，结果事与愿违，人财两空。1928年还发生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刨挖溥仪家的祖坟，孙的工兵营只用三夜工夫便把乾隆和慈禧全部殉葬宝物掠夺一空。1929年3月，溥仪把溥杰送去日本，以代替他自己出洋留学。他把复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猝起，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坐使日寇不旋踵而强占东北三省。当日的“静园”远非安静，近臣遗老之间的争论越演越烈。罗振玉以及日本军方人物力主溥仪速去东北复位。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政界人物，当时则主张慎重行事。但郑孝胥一向是主张投靠日本人的，故日后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国务总理大臣。溥仪原本倾向于离开天津，后因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话建议东北局势未稳，东北之行以缓为宜，溥仪便改变主意，在“静

园”听令。

同年11月2日晚，溥仪接见了本庄繁的参谋土肥原，此人在关东军内部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代表关东军希望溥仪早日前往东北。这次会晤，是溥仪更进一步投靠日本的标志。事后溥仪的近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议，但由于溥仪会见土肥原的消息已经走漏见报，在社会上已引起轩然大波，恰值天津又发生骚乱事件，急于复辟的遗老们，唯恐夜长梦多，坐失时机，最后也统一了看法，决定依土肥原的计划行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溥仪接见了蒋介石的使者高友唐，高代蒋传话：国府答应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只要溥仪不去东北和日本，居留上海或出洋考察都可照办。但溥仪始终不忘蒋曾是“东陵事件”主谋孙殿英的庇护者，因此一口拒绝了蒋开出的条件。溥仪于11月10日傍晚离开“静园”，经过日方事前周密的安排，先乘汽船偷渡白河，到达大沽口后，又改乘日商船“淡路丸”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从而结束了历时七年的天津日租界寓公的生活。

1932年2月，盛传日方要以溥仪为傀儡，在满洲成立一个共和国。热衷于称帝的溥仪，于19日写下必须“正统系”十二条，要郑孝胥、罗振玉两人立即前往沈阳向板垣力争，维持大清的皇统，并扬言若遭拒绝，他就返回天津。但郑、罗在和板垣会谈时，并未提出“正统系”十二条，溥仪也没有回天津去。2月23日下午，在旅顺举行了溥仪、板垣会谈。尽管溥仪当场把板垣提出要他当“满洲国”执政的方案顶回去，会谈没有结果，但次日板垣让郑、罗等人传话：如果溥仪仍固执己见，就看作与日本为敌了。溥仪经不起板垣的恫吓，态度软化，只得准备粉墨登场。

全部演出提上日程，担当导演的关东军已事先安排妥善：2月末由所谓“全满洲会议”在沈阳作出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推选溥仪为新“国家”元首——执政。3月1日和5日由所谓会议代表分两批到达旅顺搞两场类似“劝进”的活动。溥仪于3月8日离开旅顺，前往长春。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当此时尽管在场的遗老廷臣中还有人为溥仪

降贵纡尊屈就执政而黯然神伤，然而溥仪本人却一反常态，踌躇满志，认为身居执政，就有了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早晚总要重登大宝。当日下午，溥仪按日本主子指定的人选，任命了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省长、院长等官员。

曾几何时，溥仪就认识到他只是个名义上的执政，真正的执政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溥仪还发现他这个名义上的执政，比名义上的总理郑孝胥还不如。郑可以背着他径自和本庄繁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十二条。但溥仪自认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除他溥仪而外，日本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利用的皇帝。

1933年10月，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上名义上的皇帝，就在这一天，他连登基时该穿什么衣服也得由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决定。这年7月间，溥仪的父亲来长春，溥仪曾派一队护军去车站迎接。次日关东军司令部以大使馆的名义，提出口头抗议，斥溥仪派护军迎载沣时进入了“满铁附属地”，违反协议。然而日方没有把事情闹大，总算给溥仪留了一点颜面。

1935年4月，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对日本作了一次“国事访问”，受到从日本天皇裕仁以次各方面头面人物的热烈接待。溥仪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回到长春，立即向新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通报东京之行的经过，随后又向简任以上的伪满官员作报告。尽管溥仪对日方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但日本主子决不会在权力上给他多加一个额外的砝码。不久，南次郎曾以郑孝胥需要退休的消息通知溥仪，溥仪不假思索地建议让臧式毅补缺，可是立刻遭到南次郎的拒绝，说“关东军已决定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了”。

溥仪始终认为只要他当上皇帝，日人总得对他另眼相看。直到1936年春天，南次郎的后任，兼第四任大使植田谦吉向他亲口证实：他的姻亲、伪兴安省省长凌升因“反满抗日”已被处决。以及后来又因

接见伪内蒙自治军政府首脑德王一事，事后一再受到日方盘诘。乃至溥杰的婚事，日方也越俎代庖，不容置喙。1937年4月，溥杰和嵯峨胜侯爵之女嵯峨浩在东京结婚，就是由关东军授意安排的。经过这一连串事实，溥仪总算略有醒悟地掂了掂自己的分量。

日方自然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听命的傀儡皇帝。“七七”事变前夕，日人曾以溥仪的名义颁布“满洲帝国刑法”，借法之名，行大肆镇压抗日民众之实。“七七”事变以后，溥仪为了保住皇帝的宝座，不顾东北人民死活，从人力、物力、财力，一直到军事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作出全力支持。

1940年，继植田谦吉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的梅津美治郎通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2)] 吉冈安直传话：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就是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应该趁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的机会，把“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奉祀。

同年6月间，溥仪二次访日，把所谓“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剑、铜镜和勾玉携回长春，供奉在“帝宫”旁新建的“建国神庙”，并设“祭祀府”。每月初一、十五按时由溥仪率领日、满文武百官上庙祭祀，并强令东北各地建庙，任何人走过神庙都得行礼如仪；但“天照大神”并没有给溥仪以特殊的照顾，1942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吉冈安直又提醒溥仪：“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所以日本就是‘满洲国’的父亲，以后‘满洲国’就称日本为‘亲邦’！”由此可见，不仅溥仪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的儿皇帝，“满洲国”也名副其实地是日本的儿子国了。

“天照大神”同样也没有保佑日本的国运，日本不可战胜的面纱终于被扯下来，1945年8月9日早晨，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伪宫同德殿气喘吁吁地向溥仪通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紧接着日军宣称退守“南满”，“满洲国国都”迁往通化。在吉冈安直的安排

下，溥仪开始逃往通化。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仍在日方的安排下当众宣读了“退位诏书”。至此，在伪满粉墨登场达十四年的这场丑剧终于结束了。

1945年8月16日，溥仪、溥杰等人在吉冈安直的陪同下，从通化乘日本小型飞机回到沈阳，准备换机逃往日本。飞机刚到沈阳机场着陆，正待换机起航，受降的苏军恰巧也乘机赶到，这样，溥仪一行便成为苏军的俘虏，次日被用飞机运往苏联。溥仪先后在苏联的赤塔和伯力收容所里度过整整五年的拘留生活。祖国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祖国人民的审判，他曾三次上书苏联当局要求政治避难——永远居留苏联。但苏联当局终于在1950年7月31日，把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伪满战犯都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溥仪回到祖国，是新生的起点。抚顺和哈尔滨战犯管理所不是监狱，而是一座世上少有的新型大学。溥仪经过管理所方面长达十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指出：溥仪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12月9日这一天，新生的溥仪作为一个公民回到北京。

溥仪从1960年起直到他去世之日止，人民政府先后妥善地给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辖下的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排了工作，溥仪一方面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活，另一方面从事研究文史资料的专员工作，并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一书。1960年，毛泽东主席还亲自接见了溥仪，陪他吃了一顿备有苦瓜的家常饭，从此以后他也喜欢吃起苦瓜来了。当天毛泽东和他照了相，还对与他相关的劳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情况关怀备至。事后毛泽东还在另一个场合对周恩来总理问起溥仪每月的工资定额，周总理回

答溥仪的月薪为一百元时，毛泽东当即指示每月工资应增加一百元。

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和1961年间更是先后多次接见溥仪、溥杰夫妇和溥杰的岳母家族等人。周总理不仅对溥仪的学习、工作、待遇等问题关怀备至，甚至对溥仪的婚姻大事，乃至后来溥仪身患肾癌住院治疗以及医治无效去世的善后问题，也一一过问。

1962年，溥仪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4月30日和李淑贤结婚。1964年，在政协的安排下，他参观访问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陕西、河南各地。同年3月，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患肾癌不治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孙喆甡：《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

---

(1) 本传引文均引自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一书。

(2) “满洲国帝室御用挂”，是日本的名称，据说类似“内廷行走”，又好像是“皇室秘书”，但实际是傀儡皇帝的操纵者。

蒲殿俊

综文

蒲殿俊，字伯英，亦字沚庵，笔名止水，四川广安县百仓沟人，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1)]。蒲家为县中巨富，拥有大量田产。祖父蒲端溪是位廪贡生，善书法。父亲蒲玉林是县学生员；母亲李氏，素读经史且能文。蒲殿俊幼时即聪颖过人，髫龄入塾，由母躬亲课读。稍长，以广安名儒周煦笙为师，其祖父端溪、姑丈胡骏（字葆森）亦为之解释经史义理，于是造诣日深。十八岁应童试中第一名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获丁酉科拔贡，次年赴北京参加朝考，落第而归。

蒲殿俊在京时，适值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等六君子被清廷杀害；而刘、杨为川人，极为蒲所敬仰。两年前康、梁在京创立保国会、强学会时，蒲与胡骏、罗纶等即受刘、杨之嘱，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办《蜀学报》，故对“六君子”被害极为愤慨，并决心做革新救国的努力。

1899年，蒲殿俊与顾鳌、聂开基等在广安创办紫金精舍，推胡骏为舍长，聘吕翼文、彭光弼、张澜等有革新思想人士为教员，广授经史词章，兼及时务、舆地、博物等知识，“力矫旧时书院群惰之风”。蒲等革新教育的尝试，遭到当地“甘堂”和“培文”两书院山长及守旧势力的反对，被称为“紫金派”并诬其为“康党”。

1902年，蒲殿俊受绥定知府之聘，任汉章书院山长，次年参加乡试，中解元。1904年到京会试，以进士授法部主事。旋以官费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梅谦政法大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与在日爱国青年聚谈，主张在不改变君主体制下，实行日本式的立宪政治。

1903年，川督锡良曾奏请清廷允许川人自办铁路，以杜列强觊觎之议。次年，蒲殿俊在日联合川籍学生三百余人集议，倡率认股，促进了川路征收租股的推行。由于官办集股弊端百出，舆论沸腾。1906年，蒲约集留日四川学生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蒲被推为会长。他与改进会主要成员提出《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建议书》，上书川督锡良，并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从而促成锡良于1907年2月上奏清廷，将川路公司改为商办。蒲首倡川路商办，反映了川省绅商的要求，因而成了“四川新派人物中的佼佼者”。

1908年秋，蒲殿俊由日本返国，任清政府法部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次年，清廷令各省成立谘议局，蒲殿俊被原籍广安选为议员，10月14日四川谘议局在成都举行第一次常会，他被举为议长。蒲主持此次常会，曾对省内一些不法官吏进行了纠举弹劾，对省财政预算进行审查和诘难。次年，蒲结合多数议员和省城绅、商、学、工各界人士集资创办《蜀报》，为谘议局的机关报，蒲任社长，邓孝可为主笔。该报以输入新知、提高民智、监督官吏、促进立宪为主旨，“谋政治之革新，以推动历史的前进”。此外，蒲还创办《白话报》、《西顾》、《启智画报》等刊物。这些刊物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的揭露，客观上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从而也使蒲殿俊在川省绅、商、学界声望日高。

蒲殿俊在任议长同时还参加了反对张之洞签订四国借款合同和请求清廷速开国会实行立宪的斗争。四国借款合同由于遭到鄂、湘、川、粤四省绅民的激烈反对，在张之洞死后清廷曾予以搁置；而要求速开国会活动，则一再遭到清廷的拒斥，对此蒲殿俊颇为失望。

1911年5月8日清皇族内阁成立，次日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又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湘、鄂、川、粤人民的反对。川人保路的初衷，不过是要求保住现有股款和归还已用之款。清廷对四川绅民及地方当局反对铁路国有和借款修路的奏请一再予以严厉拒斥，并下

令各地电报局不准收发有关“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这就更激起四川各界民众的反对，他们认为“收川路是剥夺川民股本，禁发路事电报，则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咸主强硬对付，要求办保路同志会以保路、保川、保国。

6月17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殿俊、罗纶分任正副会长，号召实行“破约保路”。几天之内省城参加民众达十万人以上，外州县也都迅速响应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同盟会革命党人、各地哥老会组织，不仅大量涌入该会，而且一开始就在筹建武装，做与清廷血战的准备。于是保路运动就成为各阶层各界人士联合的组织，力量空前扩大，斗争方式也就从原来少数上层人士的和平请愿、文字和口头哀求，发展到由广大民众用实际有力的行动与清廷对抗的阶段了。

8月8日，川汉铁路临时股东总会开会讨论铁路国有问题时，获悉邮传部竟勾结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不仅收路，更夺路款，引起与会股东大忿，当即通过由蒲殿俊拟就的“断难承认邮传部的咨案，请奏明撤销，并严治盛（宣怀）大臣以忤旨害民之罪”的呈文；莅会的川督赵尔丰为示好川人，也允为代奏。到8月下旬，清廷电谕到川，不但不准所请，并饬赵尔丰严行弹压争路权的川绅，当24日向大会公布电谕后，股东们愤怒已极，最后一致决议即日罢市、罢课，并派代表上督院请愿。

成都罢市后，各街居民用黄纸书写德宗景皇帝光绪的牌位供于门前，牌位两旁写上“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摘自上谕的话，作为战斗的口号。前一个是参政的要求，后一个是财产权的斗争，两个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一片。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下统一团结起来了。罢市三日，蒲殿俊等见无结果，便嘱股东总会提出将收路借债问题交资政院和谘议局议决的要求，借以为清廷和川人谋退路的办法，却又遭到清廷传旨申饬，严饬赵尔丰切实弹压争路川人，并派端方带兵入川查办。

9月7日，赵尔丰以请蒲殿俊、颜楷、张澜、罗纶以及股东、保路两会主要负责人邓孝可、江三嵊、叶茂林、王铭新、胡嵘等人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加以诱捕。当成都市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奔向督署请愿，赵尔丰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余人，伤者数百。成都血案激怒了川人，他们被迫拿起武器，起来自卫。

从9月16日起，成都附近各县起义的民军开始围攻成都，由于民军所持原始武器，与持有快枪、大炮的清军作战，多次失利，伤亡较大。民军遂改变作战方针，先攻取清军力量薄弱的州县，以蓄积兵力、筹取给养、扩大声势、孤立成都。不出旬月，全川一百三十余州县大半为保路同志会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率领的民军所攻占。赵尔丰只好收缩兵力，退保成都。

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次日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接着湖南、江西等省宣布独立。11月15日，赵尔丰将蒲殿俊、罗纶等一律释放，以谋妥协。蒲等获释即发表《哀求全川伯叔兄弟书》，吁请全川人民、各地民军停止战斗息事归农。但四川民众不为所动，清政府的倒台已不可免。于是赵尔丰在索得安全、地位等保证后，愿将四川政权交与蒲殿俊和朱庆澜等，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组成，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宣布四川独立。

蒲殿俊出任都督后，省城各方本无异词。但蒲初掌政权，缺乏经验，重要事项不能迅速作出决定，日惟忙于拟制法令、审阅公文，不懂得驾驭军队之术，从而为存心造乱者提供了机会。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在成都东校场检阅巡防营及部分新军之时，军队以索饷为名，放枪哗变，使成都民众蒙受空前灾难。而蒲、朱则在兵变时仓皇逃走。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在新军中川籍军官的支持和罗纶调来民军的配合下，平定了哗变，恢复成都秩序。在成都的四川士绅等公推尹昌衡、罗纶继任正副都督。蒲任职仅十二天。

民国初年，蒲殿俊一度热心政党政治，1912年8月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民主党；1913年5月29日，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蒲任该党九名理事之一兼四川支部常委。蒲想通过政党政治实现资产阶级宪政。同年蒲当选国会众议员。1915年筹安会出现，蒲迁居上海，“讽议共和不可复摇”，著文抨击复辟。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蒲在天津与梁启超、汤化龙等赞助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辫子军。后任段内阁内务部次长兼市政公署督办，不久辞职。其后致力于舆论指导和社会教育，1919年任北京《晨报》总编，改组晨报副刊，增设自由论坛和译丛，介绍新知识新思想，使《晨报》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一定影响。1921年蒲殿俊创办《戏剧》月刊，组织“民众戏剧社”，为戏剧革命和文化建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1922年恢复国会时，蒲再任众议员。

1927年，蒲殿俊奉母命回广安，“卖文鬻字”，不问世事。其后他为躲避四川军阀与蒋介石拉他出来做事，又举家迁往北平。他在自己五十岁生日时写道：“止酒从医谏，因逃恶税征；已无民畏死，安用壮犹人。饥饱凭毫翰，兴亡听鬼神；此生浮未了，差免附朱门。”充满对时事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1934年10月28日，蒲殿俊病逝于北平首善医院。

主要参考资料

米庆云执笔：《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1981年版。

肖湘：《广安蒲君伯英行状》，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邱远应：《蒲殿俊》，任一民主编《四川现代人物传》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隗瀛涛：《蒲殿俊》，戴逸、林椒言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1) 蒲殿俊的生卒年月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为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卒于1934年10月28日；另一种记载则为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卒于1935年。本文取前一种记载。本传根据下列主要参考资料综撰而成，故署名“综文”，特此说明。

蒲辅周

陈志新

蒲辅周，原名启宇，后改名辅周。1888年12月11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九）生于四川梓潼县西溪沟一个中医世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显聪，均为闻名乡里的中医。蒲辅周懂事起常见有病人登门求医问药，其病势危重之患者更是苦不堪言，而一经长辈们诊视，无不应手辄效，这在蒲辅周的幼小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其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刚满十五岁的蒲辅周决心从医，得到祖父和父亲的首肯。蒲国桢对蒲辅周说："医乃仁术，不下一番苦工夫，不足以为医。"蒲辅周自幼好学，初读通俗的如《医学三字经》、《医学五则》等，后循序精读《内经》、《难经》、《伤寒论》、《温病条辨》等重要医学典籍。一个偶然机会从朋友处借来一本日本人汤本求真编写的《皇汉医学》，其精华处令蒲辅周拍手叫绝，蒲将这部百万字的书手抄下来，以备日后参研。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医学尚能如此精通，而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通学中医学责无旁贷。在祖父、父亲两代人的精心调教下，蒲辅周朝夕侍诊，耳濡目染，尽得家传之秘。

1906年，十八岁的蒲辅周在其祖父开设的杏林药店举行出师仪式。传统的中医学家一向以忠信为本，故学医者必须信守戒律三条，即：一、不嫌贫爱富。有钱人的病要看，无钱人的病亦要看。二、不调戏妇女。为妇女诊病尤须郑重其事。三、不忘恩负义。走遍天涯海角也要牢记先师之教诲。蒲辅周出师时其父即语重心长对他讲：人生在世，全凭志气，学医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决不可半途而废。蒲辅周怀救世之心，体恤民间疾苦，乃改启宇为辅周，意在辅助贫弱、周济病人，在日后数十年行医中，始终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蒲辅周年二十余岁已名震川北，求医者络绎不绝。某日一伤寒病患者登门求治，蒲以《伤寒论》太阳篇中麻黄汤，施以大剂麻桂，患者服后大汗淋漓，顿感轻松，岂料翌日病情如初，头痛、全身酸软、无食欲。后经蒲细心调理，历时半月方痊愈。蒲再读《伤寒论》，知桂枝汤令履被取微似汗最佳，否则病必不除。他深感内疚，责自己学医不精，险些贻误患者。重温家教：医乃仁术，既可活人，亦可杀人，其业不精，必为庸医。遂决定停诊三年，闭门读书，潜心钻研医理。他广求方书，搜阅名家医书百余种。蒲把握整体，博采众长，同时遍访远近名医，广交同道。本地一老中医名张东友，乃将治关节炎痛的“痛风验方”口授与蒲；为学眼科名医龚老先生的经验，蒲无偿为其做几年丸药，龚在弥留之际，将治内眼病及白内障的“九子地黄丸”方传授给蒲。他还从另一位老中医处获得治疗跌打损伤的特效良方“百损丸”。蒲辅周闻成都有一名医，善用“五积散”医病，遂登门拜访，与其探讨精奥，运用于临床之中，使“五积散”治疗范围更为广泛。

蒲辅周把希望寄托在振兴中医学上。1934年3月，蒲辅周被地方各界推举出任一区区正，弋游宦海有悖其素志，他甘为布衣，于是远离故乡，到成都另辟蹊径。成都人才济济，名医荟萃，正可以医会友，切磋医理。是年冬，成都流行温病，蒲对治疗此症一向很有办法，但成都人对蒲不甚了解，加之对麻黄素有偏见，对蒲的处方不愿接受。蒲便将麻黄研成细末包成药引子，视病情轻重冲服，患者服后很快痊愈。一时间，蒲的药引子是家传秘方，灵验得很的消息不胫而走，患者接踵而至，局面很快打开。蒲辅周崇尚范仲淹，早年在梓潼创办同济施医药社和平民教养工厂。到成都后，仍在泰山堂药铺定点施药，解救贫困患者。1940年，梓潼流行霍乱，死人无数。蒲辅周闻讯立即汇款至家乡，委托当地药房按方配药分送病人。

1945年夏，成都麻疹流行，此症属内蕴热毒、外感天行的温热病。当地医家均以辛凉宣透之法对待，效果甚微。蒲辅周反复琢磨症

状深思：大凡春夏之交疫病流行，而当年成都雨水尤多，温暑温热之气交结互蒸，热毒内隔不能外出。此症虽宜重用寒凉之剂，然须防泄泻，否则气下陷，无力托毒外出，必须以通阳利湿之药施之，方能收效。蒲用此法屡试屡验，遂遍告同道，从而使麻疹得以遏制，百姓始释重负。

1949年四川解放，蒲辅周迎来了医学昌明的春天。1950年，他加入成都东城区联合诊所，并当选为区人民代表，不久又受聘于成都铁路分局医院应诊。1956年1月，蒲奉调入京，于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从事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他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并积极学习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中医当中去，直接指导临床实践，当时的流行性脑炎、腺病毒肺炎、冠心病等重点疾病医治和预防均取得长足进展。后蒲担任中央领导人及国际友人的保健方面的工作，乃以一平常心对待这些特殊患者。周恩来总理问过他：蒲老，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答道：别人把您当总理医，我把您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总理对蒲的高尚医德称赞不已。

1962年，蒲辅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出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他精通中医内科、妇科和儿科等症，尤其以治疗温热病见长，被誉为热病国手。蒲辅周在治疗热病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他把伤寒、温病两大学说熔为一炉，对其病因、脉症、治法均能予以评辨，即使病势重危，一经其诊视，也立能回春。蒲非常注重中医医学典籍的研究和理论探讨，称赞中国医药学有其独特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东方文化宝库之精粹。他既反对那些只认经验不要理论，不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又坚持不抱残守缺的进取精神。

蒲辅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虽优裕而简朴，晚年服用滋补药从不用公款。1975年4月29日，一代名医蒲辅周溘然长逝，终年八

十七岁。

蒲辅周由其学生帮助整理的有《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蒲辅周医语》等著作，为中医学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主要参考资料

高辉远：《蒲辅周》，卢嘉锡主编《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黄树则主编：《中国现代名医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

崔月犁、韦功浩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1卷，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

李兴培：《蒲辅周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高辉远等：《蒲辅周医案》，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年版。

蒲辅周：《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年版。

蒲志兰编：《蒲辅周》，中国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齐白石

奚纯

我国著名的艺术家——画家、诗人、篆刻家齐白石，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滨生，号白石。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在湖南湘潭县南星斗塘的一个贫穷农民家里。全家靠种田织布为生。齐白石六七岁时，他的祖父用柴灰教他认字。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将辛苦积蓄下来的一点零钱，买些纸笔，送他到外祖父周雨若处读书，但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未满一年就停学了。回家后帮助父亲放牛、砍柴、耕田，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

齐白石从幼年就非常喜爱写字画画，但因为家境贫寒，买不起纸，他拆下旧账本上的纸来画画写字。他也很爱读书，劳动之余，总是抓紧时间读书，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本《千字文》背得烂熟。这样的童年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

齐白石十三岁的时候，跟他一个叔祖父学木工，开始学的是粗木作。次年又跟村里的一个木匠学雕花木作。这种雕花木作，让从小就热爱画画的齐白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借鉴于我国古典小说和戏曲插图的艺术成就，使所雕的木器上的图案不论是人物还是花卉，都显得层次分明，形神兼备。他创作出很多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雕刻作品，为当地群众所喜爱。

自1877年至1888年，齐白石做了十一年的雕花木匠，同时也练了十一年的绘画，这为他后来走上绘画和篆刻的创作道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齐白石真正开始他的艺术生涯，走上专业绘画和篆刻创作的道路，是在1889年他二十五岁的那年。那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

会，他在农村为一家新娘子雕一张嫁床的时候，经主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位颇有才学的塾师胡沁园，通过胡沁园，又认识了另一个塾师陈少蕃。这两位热心的教育家，是齐白石走上艺术创作道路极其关键的人物。当他们发现了齐白石的才智后，就把培养齐白石作为一件十分慎重的大事来做，陈少蕃教他读书，胡沁园教他学画。他们还为齐白石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为齐白石介绍了很多学识广博的学友。在他们的指导和启发下，勤奋好学的齐白石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学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艺术能力。

从1890年到1901年，齐白石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创作了不少富有诗情画意的诗配画创作，如《琴书至乐图》、《浮想望岳图》等，都受到过师友们的夸赞。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和师友们组织了“龙山诗社”和“罗山诗社”，多次参加作诗、诵诗集会的活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创作生活，是齐白石由雕花木匠成为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的转折，是他的艺术生涯发生质的变化的开始。

齐白石最善于吸取前人和今人的长处。他不但努力向前辈名画家和民间画家的作品学习，还能虚心地向和他朝夕相处的师友们学习。当时，他向胡沁园学习画工致的花鸟草虫，向萧芗陔学习画人物肖像，向谭溥学习画山水。他不但注意临摹，而且十分注意对实际生活现象的细致观察，经常看鸟、兽、虫、鱼的特点，揣摩它们的精神，描绘它们的动态。这一切，为他后来在艺术上独创门户准备了成熟的条件。就这样，齐白石在劳动生活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自己艺术生活的道路。当时他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学习条件也十分清苦，在没有油灯的夜晚，就燃起松枝来读书，为了练习篆刻，买不起印章的他总是把一枚印章刻了又磨掉，磨掉了又刻。

齐白石在1902年到1909年的七八年间，曾“五出五归”，游历了南北各地，足迹遍及北京、西安、桂林、梧州、广州、钦州、香港、上海、苏州、南京等六七个省市的主要城市，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身行万里半天下”[(1)]，使他结识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朋友，鉴

赏了好多秘籍、名画、书法、碑拓，大大开阔了他的胸怀，扩大了他的眼界。

1909年暮秋，他暂时结束了游历生活，回到故乡，在风景明媚的茹家冲居住下来。这就是他的书画篆刻中每每提到的“寄萍堂”所在地。他在这里一住十年，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仅这一时期的速写或工笔画的毛边纸画稿，数以千计。每纸画稿都不出一张信纸那么大，有的画几只虫，有的画几只鸟，有的是打乱了的花瓣，有的是折下来的树叶，但都凝结着画家的心血。通过这十年的刻苦磨炼，基本形成了他那种明快而自然的独特画风。

1919年，齐白石五十五岁以后才在北京定居下来，以篆刻和作画为生。这时齐白石的艺术造诣已经成熟，很有名气了，但他并不自满，他不断地从当时名画家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等人的作品中吸取营养，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他总是长夜镌印，晨起临池，经过千锤百炼，使他不论在篆刻、诗词、书法、绘画上都达到更高的境界。到抗日战争前的十多年中，他创作出一万幅以上的画和三千方以上的篆刻印章。他的每件作品，都为艺术界人士所重视。

1927年，齐白石被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聘为教授。他在教学中，奖掖后进，培育新生，后来成名的画家于非闇、王雪涛、李苦禅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三千门客赵吴无”的一方篆刻[(2)]，正是表达了他当时对自己培养一代青年画家的高兴和自豪的心情。

抗战开始时，齐白石已七十多岁了。他身处沦陷后的北平城内，精神极其痛苦。他本来十分好客的，从此，他紧闭大门，减少交往，辞却了北平艺术学校教授的职务，公开告白不见客，不赴宴，不照相。为了不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有可乘之机，他贴出告白，声言“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3)]，这种具有反抗性的告白，充分表现了这位艺术老人的民族气节。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曾没收过

他的存款，搅扰他的画室，但他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势所压倒，他借画抒发与寄托他胸中的苦闷与义愤。1944年他在《群鼠图》上题句说："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灺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4)] 又在水墨螃蟹的画上题诗说："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5)] 抗战胜利后，齐白石于1946年恢复卖画刻印，赴南京参加中华全国美术会画展，旋赴沪展览。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的那一天，历尽旧社会无限沧桑的八十五岁高龄的齐白石跑到大街上，挤在欢呼的人群中，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一队队的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愉快地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又被延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并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画研究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1952年，他为祝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创作了大幅的百花与和平鸽的图画，赢得了国际和平战士的声誉。

1953年，齐白石九十岁（虚岁）生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为他隆重举行庆祝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的荣誉奖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状。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又宣布齐白石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

"一天不画画心慌，五天不刻印手痒。"解放后，齐白石的创作多得惊人，仅1953年一年的绘画作品，大小就有六百多幅。所作的《荔枝鸽子》、《和平鸽》、《牡丹》等作品，充满着老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幸福生活的歌颂。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在北京病逝，各界人士沉痛哀悼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整理了他的诗词、篆刻、书法和绘画，出版了《齐白石作品集》。

---

(1) 龙龚：《齐白石传略》，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8月版，第36页。

(2) 龙龚：《齐白石传略》，第56页。

(3) 龙龚：《齐白石传略》附图版手迹影印。

(4) 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00页。

(5) 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第100页。

钱大钧

张昊

钱大钧，字慕尹，1893年7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生于江苏昆山。其祖父钱伯熊，晚清贡士，父亲钱自美（自梅），母亲江氏。钱大钧四岁时随父迁居苏州，六岁入私塾，1902年，读完“四书”、“五经”后，入英华学校，不久转入新创立的初等小学读书，1903年考入苏州长洲高等小学堂。1906年父亲去世后，到上海习商，不久返回苏州。1909年，由长洲高等小学堂保送，入南京江苏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学习。

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苏陆军小学堂停办，钱大钧回到苏州，不久他听到上海独立的消息，去上海参加学生军。随后革命党人钮永键在松江军政分府创办松军干部学校，钱大钧赴松江投考，半年毕业后，被派任军政分府所属弁目队班长。南北议和后，军政分府撤销，弁目队移驻苏州。1913年，江苏陆军小学堂复校，钱大钧回校补训，年底毕业后，回松军任别动队排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钮永键组织学生军和敢死队攻克上海郊区龙华，进而攻打上海制造局，钱大钧积极参加战斗，失败后，部队退到吴淞、嘉定一带解散，钱大钧只身赴沪，后潜回昆山老家。

1914年初，钱大钧经钮永键介绍去日本东京，认识了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参加东京大森浩然学社听讲，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钱大钧率先宣誓加入。同年底回国，考入武汉南湖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袁世凯复辟帝制，钱大钧联络同志，积极开展倒袁活动，引起湖北都督王占元怀疑，遂秘密来到上海。因生活所迫，先在《时事新报》担任日文翻译。一个月后，钮永键在松江重建旧部，钱大钧赴松江帮助编练新军，来往于上海及平湖、金山

卫之间。袁世凯死后，钱大钧回湖北恢复学业，同年12月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入伍生炮兵队学习。1917年4月，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学习。

1919年6月，钱大钧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担任保定军校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保定军校停办。10月，钱大钧奉命参加复校工作，任第九期炮兵队队长。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当选为非常大总统。钱大钧闻讯后毅然辞去炮兵队队长职务，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被任命为粤军第一师学兵营营务官。不久调任师部少校参谋，在广东、江西等地多次参加战斗，1923年晋升中校参谋。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为培养革命军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钱大钧奉命到黄埔参加军校筹建工作。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钱大钧由于精通兵器学被任命为中校兵器教官，不久升为代理上校总教官。10月，任校本部参谋处少将处长。

1925年，黄埔军校师生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钱大钧任校本部少将参谋长，协助蒋介石、周恩来指挥部队。2月12日，东征军进攻淡水，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由于缺乏指挥能力，贻误战机被撤职，钱大钧代理该团团长，击败敌军。3月14日，棉湖战斗快结束时，第一教导团千余人在棉湖的西北山地遭到敌军林虎部主力围攻，伤亡惨重。钱大钧率领第二教导团增援，粉碎了敌人攻势，并乘胜翻越猴子岭，追击溃逃之敌，于19日和22日相继攻克林虎部的后勤基地五华及其司令部所在地兴宁 (1) 。4月底，他被调回黄埔军校训练新兵，组建第三教导团，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不久出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少将团长。6月，钱大钧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在10月举行的第二次东征中，钱大钧率第三团防守博罗，22日，他率部攻打海陆丰，配合主力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2月22日，钱大钧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

1926年1月，晋升为第一师中将师长，一个月后与王柏龄调换，任第二十师中将师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钱大钧兼任广州警备司令，防守后方。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15日，钱大钧同李济深等人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实行“清党”。钱大钧“任临时戒严司令，指挥一切陆海军”[(2)]，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八百余人[(3)]，广州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不久，钱大钧被蒋介石任命为北路总指挥，前往曲江、赣县遣散、改编部队。

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取道江西的临川、宜黄、广昌进军广东，钱大钧奉命堵截。8月25日，钱部在瑞金以北的壬田与起义军遭遇，两个团被击溃。8月30日，起义军攻克会昌，歼灭钱部四个团。随后又发生多次战斗。起义军由于伤亡过大被迫转移。9月中旬，钱大钧又把部队调往梅县，围攻朱德、陈毅等留守三河坝的部队，激战之后，起义军于10月初突围。9月下旬，何应钦第一军扩编为三个军，钱大钧部改编为第三十二军，他任军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钱参加平定张（发奎）黄（琪翔）“广州事变”。后率部经闽浙北上。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重掌大权，为加强其军事统治，调钱大钧部驻沪宁一线。4月，钱大钧就任淞沪警备司令，不久又任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6月，国民党中央整编军队，第三十二军与第二十一师合编为陆军第三师，钱大钧任师长兼江南“剿匪”司令，设司令部于苏州。7月他在上海创办了一个训练治安人员和秘密警察的学校。

1929年春，钱大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随蒋介石在长江中游地区参加新军阀混战。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把李宗仁创办的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钱大

钧出任教育长。1930年夏，中原大战爆发，张发奎、李宗仁等将领趁机反蒋，陈兵湘桂边境。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总指挥，在湖南羊楼司一带布防。张、李退回原防后，钱受命编练教导第三师（中原大战结束后改编为第十四师）。编练成军后，钱大钧派第一旅到津浦铁路前线对冯、阎作战，另派三个团兵力参加会攻鄂东根据地的战斗。1931年1月，陈诚接任第十四师师长，钱大钧改兼武汉要塞司令。由于作战有功，钱大钧在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31年2、3月间，由前线返回的一百多名伤兵闹饷，武昌第一纱厂和震寰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钱大钧按蒋介石“严惩首犯，格杀勿论”的指示，派兵逮捕了部分伤兵和工人，并枪毙了领头的十二名伤兵。同年秋天，武汉大水，他奉蒋介石“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得任意抽调兵力，参加防汛”的手谕，对洪水泛滥坐视不管，致使洪水进入汉口市区，造成汉口有史以来最大劫难，一百多万难民无家可归[(4)]。

1932年1月，武汉要塞司令部撤销，所属部队改编为第八十九师，钱大钧兼任师长。同年春，钱升任第十三军军长，指挥所属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三十三师参加“围剿”红军的战斗。3月，钱调任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帮助蒋介石筹划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初，钱大钧任委员长保定行营上将主任兼军政部保定编练处主任、北平军分会委员。他用金钱和礼物馈赠河北各将领以资笼络，所花钱财在“行营开支特别费”中支取，每次至少数万元。年底，蒋介石为集中力量打内战，撤销保定编练处，调钱大钧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代蒋处理三省军政大事。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后，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武昌行营，并于1935年2月任命钱大钧为行营参谋长，协助行营主任张学良处理军政事宜。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成立，下

设第一、二两处，钱大钧任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负责蒋介石的驻留和行动安全，其工作直接对蒋负责。6月，“两广事变”爆发，由于钱大钧与陈济棠部军长余汉谋是保定同学，又是粤军第一师同事，蒋介石派他密赴江西大庾与余接触，促使余通电反陈拥蒋，使“两广事变”顺利解决。钱大钧作为功臣在11月补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12月初，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钱大钧随蒋住临潼华清池。12月12日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钱大钧听到枪声后，匆忙奔赴现场命令警卫部队拼死抵抗，在华清池五间厅转角处被流弹击中，子弹由前胸部穿出，伤及右肺尖，由于流血过多跌坐墙边，被东北军急送医院抢救，幸免一死[(5)]。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钱大钧等人获释。钱大钧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于1937年2月恢复健康后仍任侍从室主任和侍卫长，后改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钱大钧随蒋介石视察全国各地防务，并奉命两次赴前线劳军。11月，他“与后勤单位协调，于军运繁忙中勉为调集车辆十余部……亲自监督，于24小时内将库存国宝抢运下关装船西迁”[(6)]，保护了大批故宫文物。

1938年2月，航空委员会改组，钱大钧任主任，专门指挥空军对日作战。4月29日，他参与组织了武汉空中保卫战，击落敌机二十一架。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钱大钧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于5月20日上午在福冈、长崎等地上空投掷宣传弹并胜利返航，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和信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同年11月，钱大钧参与处理“长沙大火”案，奉命将酆悌等人就地正法。1939年初，钱大钧经宋美龄批准分配一笔特别费时，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官员，有人将此事密报蒋介石，致使钱大钧被撤职查办。

1941年7月，何应钦推荐钱大钧出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参谋

长，不久改任秘书长，统筹国内外物资运输管制以及检查事宜。1942年3月，钱大钧调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点验委员会主任，与常务次长张定璠一起处理军政部日常工作。钱大钧同时还担任军政部特别党部特派员。1944年11月底，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军政部人马大换班，钱大钧第二次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1945年5月，钱大钧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9日，他出任上海光复后第一任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任职期间，钱大钧向英国交涉，收回跑马厅（现上海人民公园），不许在此搞赛马、赌博等活动；责令工务局扩建南京中路，方便闹市区交通；修筑吴淞口海堤；同时利用“接收”之机，大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7)]。由于深知宦途艰险，1946年3月5日，钱大钧分别辞去淞沪警备总司令和上海市长职务，到苏州过起奢华生活。

1947年4月，钱大钧当选为吴县参议会议长，同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钱大钧作为上海代表，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1949年2月，钱大钧出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6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钱大钧从海南岛转赴台湾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60年2月任中国国民党纪律委员会委员。1963年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由于喜爱体育活动，钱大钧在台湾先后担任过台湾省足球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田径协会”理事长等职，率领足球队、篮球队和田径队参加亚运会、世运会[(8)]。

钱大钧擅长书法，1975年2月手书篆体《金刚经》全文赠送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

(1) 钱大钧：《八十自述》（上），台湾《中外杂志》第28卷第6期，第38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

(3) 魏汝霖：《记钱大钧上将》，《中外杂志》第32卷第4期，第14页。

(4) 文心珏：《我所知道的钱大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

(5)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页；钱大钧：《钱慕尹上将七十自传》，（台）淞沪警备司令部刊行1962年版，第21页。

(6) 钱大钧：《八十自述》（下），《中外杂志》第29卷第1期，第37页。

(7) 邢建榕等：《旧上海第十任市长》，《联合时报》1987年6月5日第4版。

(8) 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钱大钧》，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第139页。

钱穆

熊尚厚

钱穆，原名恩嵘，字宾四，笔名未学斋主，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其父钱永沛是秀才，以教书为业。

钱穆七岁进私塾，聪颖好学，一年后就能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九岁入果育小学读书。果育小学网罗了一批对旧学有深厚基础、对新学也能融会贯通的人任教。受老师的影响，钱穆既喜欢读古代欧阳修、韩愈和近代洪亮吉、汪容甫等人的作品，又爱看西洋小说《天方夜谭》之类的书，尤好史地，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读高小时，他的作文成绩冠全班，老师奖给他一本蒋百里译的《修学篇》。他深受书中欧美自学成才者的启发，决心走自学成才之路。

钱穆十二岁时父亲病故。次年冬他考入常州府立中学堂，颇为史地课老师吕思勉青睐。当时常州中学堂发生反对舍监的学潮，钱穆出任学生代表，并参加了罢考。其后，他转入南京钟英中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钟英中学停课，钱穆辍学回家，经人介绍到秦家水渠当小学教师，教国文、史地、英文等课，兼教体育和音乐，后相继转入鸿模学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他蛰居于农村，自知升学无望，“决意自学读书”[(1)]。闭门谢客，刻苦攻读《孟子》、《史记》等经史子书及唐宋诸家文辞，并开始撰述，数年间相继写成《说惠施历物》、《辨者二十一事》和《论语文辞》等著作。他看到北京大学的招生广告，考生必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即觅而读之，继又读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努力使自己具备大学的文史知识。1919年夏，钱穆回到鸿模学校教书，利用该校藏书楼的有利条

件，攻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文集。同年秋，他到后宅镇秦伯市一小任校长兼市立图书馆馆长，在教学中努力从事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不久因肺病休养，期间他仍研习许氏《说文》等书。在十年的教书生涯中，钱穆于“冥索”中自学苦读，勤于笔耕，开始踏上学术之路。

1922年秋，钱穆南下厦门，经史学家施之勉举荐任教于集美师范学校，课余在图书馆得《船山遗书》，仔细阅读，对古史地名变迁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半年后，他回到无锡任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在编写《论语要略》讲稿的同时，经常为报纸杂志撰稿。为了考证孟子的生平，他计划撰著《先秦诸子系年》，先编成《孟子要略》。其《墨辩探源》一文，1924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8号上，引起读者的瞩目。而《论语要略》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还校译了《公孙龙子》和《易经》三卷 (2) 。那时军阀战乱，学校停办，生活拮据，但他仍专心于学术的钻研。无锡第三师范复课后，他讲授国学概论，随讲随录，先集成七章。

1927年秋，钱穆进入苏州省立中学，担任全校国文课首席教席，续编《国学概论》。苏州中学是清末紫阳书院的旧址，藏书甚丰，城里还有很多旧书肆。此时，他全力以赴地撰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时蒙文通教授在南京看了钱的《系年》一书的手稿十分赞赏，将其中关于《墨子》的部分在南京一杂志上发表，并说钱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才，不宜长期留在中学教国文，建议他到大学去教历史。与此同时，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有《孔子略史及其学说的地位》、《易经研究》和《论十翼非孔子作》等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的《墨子》、《王守仁》等著述。

1930年秋，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被燕京大学聘为讲师。同年冬，《燕京学报》发表他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该文是解决晚清道咸以来经学今古文争议的专著，对1891年康有为著的《新学伪经考》提出批评，还针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学风也提出意见。钱穆以史治经，

破经学之壁垒，纠正一味疑古的风气，在学术上显示了他敢于突破前人论点的勇气，得到胡适等学者的推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书成了钱穆的成名之作。1931年夏，北京大学聘他为史学系副教授。

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期间，钱穆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秦汉史》和《中国政治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唤醒国魂，御侮救国，他会同傅斯年等学者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并任北大中国通史课的首席教授。同时继续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1933年春，他完成了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积以往数年对考证孟子生平的研究，以及对老子和《老子》书的考辨等成果，撰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该书内容从孔子到李斯前后二百年间诸子学人的生平出发，论及师友渊源及其学术流变，被当时的学者称为是对清代版本考据的一次总结。接着，他又针对梁启超等人对清代学术史的见解，以两宋学术概要为引言，乾嘉经学为中心，偏重从理学方面评述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章学诚、龚自珍等一大批学者的学术思想，撰成他的第二部学术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性喜山川，屡次出游访古，遍游中原各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完成上述著作的同时，他还先后撰写有《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黄帝故事地望考》及《楚辞地名考》等十余篇文章。在旅游途中，他见到农村贫困的情形，忧戚于心；面对日本侵华日亟，他主张积极抗日。“七七”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临时大学于长沙，钱穆在文学院任课。翌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设在昆明附近的蒙自，他遂辗转前往任教。不久，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至昆明，钱穆住于宜良的岩泉下寺，除讲授中国通史外，则闭门著述。他撰写的《国史大纲》于1939年6月完成，交商务印书馆于次年6月出版。该书在体例上首重政治制度，次为学术思想，再次为社会经济，并对其相互间的联系于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鉴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所用的历史方法，是“记补考证派的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

的”，又因以文化治史，故对以往历史多继承少批判，否认历史的种种变革，其观点有许多的“混乱与错误”[(3)]。

1939年，日机频繁地轰炸昆明，钱穆潜回苏州探亲，在家乡住了一年多。他一边闭门奉养母亲，一边自学英语，借助字典通读了英文《西洋通史》。1940年夏，他撰写了《史记地名考》八十万字。翌年，他返回大后方，在成都受聘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1941年6月，他与罗忠恕等学者发起成立东西文化学会。其后，钱穆于成都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并在齐鲁大学兼课。他曾去乐山的武汉大学和遵义的浙江大学讲学。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他在华西大学文学院任教。同年冬卧病于华西坝，在养病中他通读了《朱子语类》一百四十余卷和子目录整部，对朱学的研究深有体悟。在成都时期，钱穆有心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撰有《中国文化导论》等书。同时还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学术和时论文章数十篇。时论文章辑成《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两书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穆于1946年夏离蓉赴沪。时上海各校仍处于恢复状态，他暂时回到家乡，不久应云南大学之聘前往昆明执教，一年后仍回江苏。1948年春，他任无锡私立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至1948年间，钱穆先后发表《孔子的心学与史学》等论文三十余篇。到江南大学后，他计划仿郑樵的《通志》写一部《国史新编》，并续写宋明理学的宋学部分，由于时局巨变，《国史新编》只写出了庄子的部分，书名《庄子纂笺》。

1949年春，钱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同年秋，他携眷南走香港，10月在九龙开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次年秋更名新亚书院，任院长。他在新亚讲授中国文学史、庄老、楚辞和礼记四门功课。1951年到1953年，他撰有《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和《孔子与春秋》等著作。1954年，新亚书院与美国雅礼协会合办，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的资助。同年，蒋介石在台湾提倡王阳明之学，钱穆将旧作增写成《阳明学述要》出版。1955年秋，钱穆在新

亚书院内创设新亚研究所，香港大学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1月，他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前往讲授《论语新解》，耶鲁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翌年又应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之请，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63年，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他向新亚董事会提请辞去院长职未准，仍留新亚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1965年6月，钱穆获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后，前往吉隆坡，在马来亚大学任汉学教授，历时近二年。

1967年10月，钱穆定居于台北，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等课。同时整理旧讲义和散篇论文，撰著出版了《秦汉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孔子传》等书。1969年6月完成《朱子新学案》一书[(4)]。钱穆还发表有《墨子思想研究指导》、《陆象山思想研究指导》等论文，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

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钱穆患眼疾黄斑变性症，视力已经很弱，仍前往讲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专题讲座。后在讲座记录稿基础上加以扩充，出版了《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该书以他数十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持见解的精要，内容深入浅出，呼吁青年们要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并为弘扬光大这种文化作出贡献。1983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再次举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北京大学朱光潜教授应邀前往参加，钱穆闻讯专程前往香港与之会晤。翌年，他获得台湾颁发的文化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出版。

钱穆晚年双目失明之后，长日杜门，仍继续从事学术著作。在其夫人的帮助下，他于1987年8月出版了《晚学盲言》上下两卷巨著，讨论中西文化传统的异同。同时，他还在其寓所向他的学生口头讲授，并对学生说：“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5)]。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

钱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史学家，生平著述极为丰富。他一生维护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其学术观点为文化史观，虽有一些“混乱和错误”，但他很有民族精神。

---

(1) 钱穆：《师友杂忆之三——三兼小学》，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2) 为“原始、本事、传辨”三卷。

(3) 胡绳：《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评论文集》，三联书店1950年12月修订版，第63页。

(4) 该书计五十八章，一百余万字，1981年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

(5) 唐端正：《我所怀念的钱宾四先生》，《钱穆传记资料》（一）。

钱能训

张树勇

钱能训，字幹丞，亦作幹臣，浙江嘉善人[(1)]。生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2)]。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戊戌科二甲第十八名进士，翌年留馆，为翰林，散馆后授编修，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监察御史、广东和湖北乡试主考官、广西学政等职。1903年，因得到左都御史裕德的保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后升监察御丞。1904年，清政府设巡警部，因受知于徐世昌，在徐任巡警部及民政部尚书时，钱能训先后任巡警部左参议、左丞，民政部右丞等要职，并成为徐的心腹。1907年东三省改制，徐世昌首任东三省总督，旋即奏调周树模、钱能训为奉天左右参赞参与帷幕。时徐尊周而亲钱，不久，钱即升任顺天府尹。1910年（清宣统二年），徐世昌在军机大臣任上，又推荐钱出任陕西布政使，时巡抚杨文鼎一直未到任，钱又以布政使护理巡抚。从此，钱便跻身于督抚封疆大吏之列。

辛亥武昌起义后，陕西随之响应，在西安的同盟会与会党领导人相约在10月29日于省城举事，钱能训得知消息后，惊恐万状，除调巡防营进城防守外，又在省城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当民军光复西安后，又与西安将军文瑞派兵进行镇压，遭民军痛击失败后，文瑞投井而死，钱能训匿居民宅而被民军拿获。钱曾举枪自杀未遂，后逃出省城奔赴北京。

民国成立后，钱能训凭借与徐世昌等人的老关系，又屡次出任政府要职。1913年10月16日，钱出任北京政府熊希龄内阁之内务部次长。1914年3月，钱以蒙古、西藏、青海三省区的名额被选为约法会议议员。同年5月，袁世凯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以徐世昌为首任国务卿，时钱能训被任命为政事堂右丞兼任礼制

馆副总裁（总裁为徐世昌），与左丞杨士琦一起成为徐的得力助手，协助徐世昌处理日常政务。钱由于徐世昌的引荐，深受袁世凯的器重。1915年1月，钱被袁授为中卿，10月24日又署理平政院院长，同时兼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16年4月22日，又正式被任命为平政院院长。1917年8月，时任副总统的冯国璋继黎元洪之后代理北京政府大总统，同年11月段祺瑞因对南战争失败引咎辞去内阁总理一职，初由汪大燮代理，紧接着改由王士珍署理，12月1日钱能训出任王内阁的内务总长。1918年2月20日，王士珍在皖系的攻击下辞职。钱一度又暂时兼代国务总理，为时仅一个月零三天。3月23日，段祺瑞重组内阁，钱蝉联内务总长。是年9月4日，徐世昌继冯国璋之后被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并于10月10日正式宣誓就职，段随即请辞内阁总理职，专任参战督办，训练参战军、边防军，以践与冯国璋共同引退之诺言。于是，徐以内务总长钱能训暂时代理国务总理。在钱代阁期间，因徐世昌通电尊重和平以谋统一，所以在11月15日就和战问题召集督军会议，总统、全体阁员均出席，讨论问题共五项，其中第一项即停战撤兵。此时欧战告终，经外交团劝告，和平空气几乎弥漫全国，因此段祺瑞及各省督军不得不附从其议。16日，钱令前方各军队罢战退兵，至20日，广东护法军政府亦宣告停战。12月，徐世昌提请国会参众两院讨论通过对钱的任命，12日，钱能训正式组阁出任国务总理。23日，徐在总统府成立善后讨论会，由钱兼任会长。1919年1月11日，内阁进行改组，钱兼任内务总长。

钱能训正式组阁以及在国务总理任上实际只有半年的时间，即1918年12月12日至1919年6月13日。其间因南北分裂，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矛盾重重，政坛斗争此起彼伏的原因，使他作为阁揆而大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当时段祺瑞虽然已经离开内阁，但他一方面拥参战军实力，一方面挟安福系大多数议员，对其关于事涉政府重要问题，大半一意孤行，对于钱阁，根本就“不在其心目中”[(3)]。这些困境处处使钱能训穷于应付。而且，在组阁之初，陆军总长靳云鹏和财政总长龚心湛即因索款发军饷过年关的问题发生争

吵，闹得不可开交，使钱能训束手无策，后来经段祺瑞出面调解，方告平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使钱能训难办的是如何对付段的心腹号称“小徐”的徐树铮。时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这本是总统徐世昌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小徐企图保段卷土重来操纵北京政权，莫说钱能训对此大伤脑筋，就是号称“老狐狸”的大总统徐世昌亦无可奈何，于是把小徐调到远离京城的蒙疆去发展。当时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即今蒙古乌兰巴托）要求自治，北京政府对此一无办法，而徐树铮两赴库伦，竟然使外蒙古取消自治，为国家可谓建立殊勋，因此徐树铮更恃才傲物，愈加骄纵，更不把国务总理钱能训放在眼里。时欧战告终，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发起和平会议，于1919年1月1日由美、英、法、日等国家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会议。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和战胜国之一，亦被邀请出席。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日本归还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立即表示反对。随后，英、法、美三国代表为此举行会议，并提出一项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即把以前德国享有胶州湾权利让与日本，日本将山东主权交还中国，并许日本保留德国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且许以特殊铁道警官之聘用。对于此项解决办法，中国代表表示反对并提出抗议，三国亦无表示。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与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表示赞同我出席和会代表的意见，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可是，徐树铮唯恐天下不乱，与段祺瑞一起坚决主张签字，使徐世昌、钱能训左右为难。

在钱内阁当政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即南北议和。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后，标榜和平，而作为内阁总理的钱能训，便秉承徐的旨意致电西南军阀，提出“国人不堪再战，希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4)]。钱同南方军政要人如陆荣廷、岑春煊私交颇深，双方私下派人联络，电报往返，经多次磋商，终于于1919年2月20日使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旧德国商会地址举行。北方先后派朱启钤、王揖唐为总代表，南方先后派唐绍仪、温宗尧为总代表。开会不久，双方因陕西停战及取消参战军与停支参战借款问题相持不能解

决，南方代表通电停止和议，北方代表亦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后来虽又复会，但讨论数日，亦无结果。最后南方代表提出一揽子的八项条件，北方代表难以接受，和议遂告破裂。

钱能训虽身为北京政府内阁总理，然而上有大总统徐世昌的决策权力，间有段祺瑞颐指气使的屡屡干政，还要受到徐树铮的不断压迫，又适逢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严重危机，钱举步维艰。后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一传到国内，举国愤怒，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经此运动，钱内阁成员残缺不全，最后终告瓦解。6月13日，钱能训被明令免去国务总理职务，以财政总长龚心湛暂时兼代。同年11月13日，北京政府又任命钱能训为苏浙太湖水利工程督办，然钱不谙水利工程，且对此项任命兴趣索然，遂于第二年8月即自动辞职。不久，钱应聘为外交部顾问。1921年8月21日，钱能训与熊希龄、汪大燮、谷钟秀等人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在成立大会上，钱任主席，同时与汪大燮、孙宝琦等人一起被举为该会理事。随后，理事会发表声明：一、反对华盛顿会议协商议程；二、反对二三国的秘密协商，主张山东应无条件归还中国。1924年6月5日，钱能训因病在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7年版，1978年重印本。

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

《申报》、《国闻周报》等报刊。

(1) 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卷2，“钱能训”条目，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第168页。

(2) 一说生于186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774页。

(3)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4) 《钱内阁之主和通电》，《申报》1918年10月26日。

钱新之

江绍贞

钱新之，名永铭，字新之，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幼时入塾读“四书”“五经”，1897年进上海育才学堂（后改为南洋中学）。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1903年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续习财经及银行学。1909年回国，参加清政府考察留学生的考试后，因父丧南归。次年，钱任教于南京高等商业学校。

辛亥革命后，钱新之一度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被唐绍仪内阁任为工商总长，钱新之由陈派往北京接收旧农工商部，任会计课长。未及一年辞职回到上海，受中国实业银行筹备机构之聘，赴东北考察金融实业。同时又为工商总长张謇起草过一些金融商业方面的章则条文，得到张的赏识。1916年4月，袁世凯为筹军饷作最后挣扎，提出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现金或发行不兑换券之议，致使两行发生挤兑风潮。5月11日，国务院竟下令停止兑现。这道命令，首先遭到上海的中国、交通两行抵制，钱参加支持宋汉章、张嘉璈等人的抗拒停兑活动。

1917年，钱新之参与蔡元培、张元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恢复营业，钱经张謇的介绍任该行副经理。由于该行执行停兑令，已是元气大伤。钱新之采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经营方法，推动与扩大了银行业务。1919年升任该行经理。1920年又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交通银行开办于1907年，兼有代理国库以及发行钞票等特权，后一直被交通系梁士诒等人所把持。1921年，张作霖支持梁士诒组阁，

遭到吴佩孚和直系军阀的反对。1922年春爆发直奉战争，结果奉系失败，梁士诒罢交行总理职。这时，钱新之积极活动，抬出张謇任总理，钱则被张任为协理。张謇挂名而已，行务实由钱新之主持。钱新之在稳定钞票发行，改善放款制度，清理催讨政府机关欠款，以及整顿分支行处等方面实施改革，使交行扭亏为盈。1925年5月，梁士诒再得张作霖支持，复任交行总理，钱随张謇一道去职。次年，钱转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

1927年2月，钱新之受吴鼎昌之请，代表北方金融界至南昌见蒋介石。他和陈光甫联合借给蒋五十万元军饷，数额虽不算多，却帮助了蒋的年关急需。3月22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的组织，钱新之作为北方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并担任常务委员。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与虞洽卿等人策划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钱被蒋任为该会委员。这两个所谓一官一民的机构，从上海银钱两业中为蒋介石垫借了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钱又继续为蒋筹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为部长，钱被任为财政部次长。时古应芬长期在粤，钱实代理部务。

国民政府为筹措大量的内战经费，以发行债券为其财政根本方针，钱新之为此积极出谋划策。当时，国民政府曾想废除北洋政府所发行之旧公债，钱力持不可，指出新公债之购主即旧债之持有人，不可废旧债而自隳其债信。这一主张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不仅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使国民政府所发行之江海关二五库券及续发二五库券近一亿元的巨债，得以在资产阶级特别是银行业中顺利推销。1928年，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邀钱新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是年10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建立，钱被任为该行理事。11月，交通银行加入官股二百万元，改组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钱任常务董事。

钱新之虽然在国民政府里得到一定的职位，但他的主要愿望还是在金融实业方面求得发展，因而于1929年辞掉政界职务，当上了中兴

煤矿公司总经理。该矿当时因经过军阀混战，资金短缺，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工人生活极端困苦，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比较活跃。钱新之出任总经理后，立即请求陈立夫派遣吴绍澍（原名雨声，1927年叛变共产党，改名绍澍）前往山东枣庄，在该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工人运动。钱新之还凭借他与银行界的关系，取得贷款五百万元，添置设备，使生产得以恢复。该矿原有运煤轮船，经过钱的筹划，建立了中兴轮船公司，资本一百五十万元，拥有轮船吨位二万八千余吨，由钱任董事长。

当时帮会头子杜月笙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五大赌台，又大肆贩运毒品，得到巨额的赃款。钱新之为他筹划，于1929年创办了中汇银行。此后，杜在金融工商方面的活动，大多由钱谋划，钱也以杜为靠山。是年，钱当选中华职教社董事会主席，直到解放前止。但社务主要是由黄炎培等人主持。1930年，钱新之受国民政府委派为中法工商银行中方副董事长。当时曾有驻法国公使之任命，钱不愿脱离金融实业界而没有受任。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建立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钱新之与杜月笙等人充任理事。1934年，会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杜任会长，钱任副会长。1933年，钱新之与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一起，收购杭州电厂，建立杭州电力公司。又投资太平洋保险公司和泰山保险公司等企业。

1935年，出现全国性金融危机。国民党政府乘机以救济金融工商为名，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增加中国、交通两行官股，并改组人事，张嘉璈等人均遭排挤，钱仍被派任为这两行的常务董事。同年，他还参加赴日经济考察团，进行所谓“睦交”、“通商”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新之与杜月笙、潘公展、王晓籁等人遵国民政府之意，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沦陷后，他随同杜月笙、王晓籁等人于11月27日离上海到香港。在港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

办事处和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

1938年，钱新之受国民政府聘任为国民参政员。是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从香港乘飞机赴渝途中，遭日机袭击坠机身亡，钱遂接任交行董事长职。当时，钱新之打算以香港作为交行的中心，他将从上海撤出的资金和人员大半都集中到香港。不料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交行和钱个人在港的资财损失惨重。他只好审时度势，致力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添设分支行处，发展营业。

1942年3月，钱新之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他担任常务董事。该公司得到戴笠在交通、检查等方面提供的方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是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统一发行法，将钞票发行权统一集中于中央银行。这对当时握有发行权的交行是一大威胁。同时，钱得悉财政部长孔祥熙有打入交行兼任董事长之意。他为了对付孔的威胁，便企图依靠CC系的势力与孔抗衡，聘请了CC系的赵棣华任交行总经理。结果交行的发行权不仅没保住，反而从总行到分支行都侵入了CC系的势力。钱新之为对付CC系的威胁，一方面凭借他依靠政学系、宋系以及杜月笙的帮会势力的多角式的手段，一方面紧紧握住实权，因而他在交行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1943年，杜月笙在重庆筹设“通济公司”，钱新之代表交行投资，并担任常务董事。这个公司与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开设的“民华公司”对口，进行物资交换。抗战胜利前夕，他还用交行资金投资宋系官僚资本开设的孚中公司，担任董事长，但实权掌握在宋子良、宋子安兄弟手里。该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大量套购外汇，从美国输入汽车、无线电设备等禁运物资，牟取暴利。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钱新之奉蒋介石之命，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席。政协会后，他回到上海，一方面恢复沿江沿海及内陆各大都市的交行机构，同时在工商企业以及文化事业机构中大肆活动。钱新之先后担任了闸北水电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上

海《新闻报》等许多企业事业机构的董事长。10月，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遭到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钱新之不仅自己紧紧追随，当选为“国大”代表，而且多次诱劝黄炎培等人参加，遭到严拒。

由于蒋介石的大打内战，带来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危机。1947年4月建立起政学系的所谓两张财权（行政院长张群，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用发行公债等办法筹措反共内战经费。钱新之被任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始初，他想借江浙资产阶级的捧场，擅自代表金融界承销公债总数的四分之一，结果除部分较大的行庄购入少数外，中小行庄则强烈抵制。他的承诺不能实现，便采用种种强制手段，如强令四行二局的职员认购一个月薪金总额的债券，生产贷款搭配债券，甚至挨户摊派等等。但经过四个多月的卖力推销，也只售出总额的六分之一。

1948年，钱新之与杜月笙一起筹组了规模较大的复兴航业公司。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为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长江，调集了不少民航船只自沉于江西境内马当山下的长江中。抗战胜利后，钱、杜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交涉，得到几万吨船只的补偿。又经过他们向美国借贷美金三千万元，购买美国剩余船只五万吨，组成了这个公司，由钱新之任董事长。是年8月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联合商业储蓄银行，钱任董事长。

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时，杜月笙受美国的指使进行上海“国际化”的阴谋活动。为此，杜月笙曾组织“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拼凑了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妄图以此迎接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以实现其“国际化”的阴谋，钱新之参与了这一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钱新之于上海解放前夕，去了香港。

1950年3月，钱新之与杜月笙将复兴航业公司由香港迁往台湾，

改由官营。其后钱因病退休，迁到台湾定居，于1958年6月19日病故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姚松龄：《张公权与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结识与彼此合作经过》（台），《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李兆涛：《钱新之外圆内方》，《艺文志》1978年第149期。

戚再玉编：《钱永铭》，《上海时人志》，上海展望出版社1947年版，第217页。

［美］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钱永铭》，《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4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

钱玄同

娄献阁

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其父钱振常是位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任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

钱玄同六岁入塾，初读经、史、文学诸书。到1901年因得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钱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1904年又读了章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以及其他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政治思想上发生变化，渐有排满反清意识，并毅然剪掉发辫，表示“义不帝清”[(1)]。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

同年，钱玄同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壮（字献廷）造新字的学说，引起了兴趣，于是便矢志作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改号“掇献”，表示要“掇拾刘献廷之坠绪”[(2)]。

1906年其兄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去日本，旋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其时章太炎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曾往谒，并于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钱与鲁迅、龚宝铨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3)]，钱受章太炎在古文经学上的某些影响，此外还颇留意于“章草”的研究。

1910年，钱玄同回国，先后在浙江嘉兴、海宁、湖州等中学任国文教员。翌年曾谒崔适，认崔为师，读崔的《史记探源》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书，遂背章氏古文经学说而宗经今文学家言。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钱又打破“家法”对经今古文均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一度觉得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并参照《礼记》、《书仪》、《家礼》等古籍，写了《深衣冠服说》。时沈钧儒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聘钱为教育司科员、视学。1912年3月，他穿戴着深衣玄冠到司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1913年，钱恂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随兄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国文教员。1916年起改任高师和北大教授，与鲁迅、周作人等人常相往还。

1917年，陈独秀、胡适发起文学革新，钱玄同很快表示赞成，积极加入了这一革新的行列。同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应用文亟宜改良》的信，除阐明改革应用文的理由外，还提出了改革大纲十三事。在此前后，钱写了不少文章、随感录和通信鼓吹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建议采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改横排加西式标点符号等，并希望《新青年》及其撰稿人做除旧布新的示范，对“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4)]。

1918年，钱玄同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轮流编辑之一曾邀鲁迅投稿，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的推动之下写作发表的。此外，钱玄同还与刘半农合演双簧信，即先由他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反面说出守旧派的各种谬论，然后再由刘从正面逐条进行驳斥，特别点名批判了守旧的林纾。林大骂钱等人“伤天害理”，并在其毁谤性小说《荆生》中，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百般加以丑化；而鲁迅则热情称赞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5)]。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的言行是颇激进的，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事可以不改革。他多次批驳保存国粹和灵学等谬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他首先提出的，并称这两种文妖“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6)]。钱更反对孔教，拥护捣毁孔家店的主张。1919年2月，他在写给SF的信中说“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要人们“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刑政、历史、文学弃如土苴”[(7)]。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钱先是站在前面热烈欢迎；但运动过后，他便逐渐退回书斋专搞语音文字等学问了。

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成为国语运动初期的活动分子之一。1918年首次在北大讲授音韵学，编有音韵学讲义，后以《文字学音篇》印行。他教授此课达二十年，对语音声韵颇有研究，但专著不多。同年钱曾参与审定《国音字典》，又与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创编国语课本，字旁加注音符号，供北京孔德学校小学一年级用。当时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多是宣传国语的，尤重视注音符号问题，曾陆续写了《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等文章，对注音符号的改进与推广提供了不少意见。

1919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玄同任委员兼常驻干事。曾与刘半农等人提出“统一国语进行方法”案，主张改国文为国语和编纂辞典等，得该会第一次大会通过。1920年国语讲习所开课，他主讲国音沿革，并有《国音沿革六讲》一书排印。

钱玄同十分重视汉字改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提倡世界语，希望废汉字用世界语来替代，说这是灭孔学与道教妖言，使中华民族成为20世纪文明民族的根本解决之道。但很快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不易达到，逐渐转向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年，钱玄同经与黎锦熙等人商议，决定把他们准备推行的新文字叫做国语罗马字，并发刊“汉字改革号”[(8)]，以促进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为此，钱精心撰写了一篇题为《汉字革命！》的长文，系统论证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着重强调汉字革命必须“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不仅使用注音符号，而且应进一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9)]。他曾拟定两种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仍任教授，同时继续参加国语工作。这年召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他为该两会的成员之一。他又提出增修新式标点符号的意见书，建议增加隔号、音界号、略字号和连字号等符号。1925年，章士钊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后，又在小学恢复读经，并将《甲寅》杂志复刊，宣称不收白话文，复古逆流再次抬头。钱很有打“章老虎”的勇气，与黎锦熙一起在《京报》附设之《国语》周刊上对《甲寅》作战，反对古文，积极维护国语运动。

同年9月，刘半农由欧洲回国，发起语音学者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参加，经过一年时间，开会二十多次，合各家意见，排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草案，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名义于1926年11月公布。同时钱还努力从事增修国音字典工作，编成了十二大册稿本。

1928年秋，钱玄同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等课程。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授权他与黎锦熙筹备成立国语研究机构，他们拟订了一个计划书，将编纂国语大辞典、设立国语专修学校、广印国语罗马字和汉字注音符号读物等均列入计划。不久教育部聘钱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同时在北平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为纂著部第一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

1929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决定由钱玄同主持编纂《国音常用字汇》，到1932年编成出版，经教育部公布定为发音标准。该字汇共收一万二千余字，编选精当，卷首的长篇例言是钱精心

撰写的切实之作。1933年大辞典的纂著开始，钱与黎锦熙分任总编纂，黎主字义和词类，钱主字形和字音。同年，他还写成《说文部首今读表》、《说文音符今读表》各两卷。

1934年，著名的语音学家刘半农、白涤洲先后病故，钱玄同很悲痛，在纪念文章里写了“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10]的俚语来自勉。当时钱玄同的身体已很虚弱，仍担负师大及北大的授课任务，又撰《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还准备编写《简体字谱》一书。在他看来，简体字有益于国语前途者甚多，此虽是治标的办法，然而却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11]。同年他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经国语统一筹委会通过并把编制简体字表的任务委托给他。1935年钱因病休假，但仍抱病赶编。第一批编了两千三百余字，最后教育部长仅圈定三百二十四字公布，还遭到当政的某些要人反对，竟下令暂缓推行。

同年国语统一筹委会裁撤，另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钱玄同仍是委员兼常委，但已没有固定经费，很快因时局关系便偃旗息鼓了。

除语音学外，钱玄同还注意搜集古今有关辨伪的著作。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古籍都只是可供参考的史料，“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12]。不仅辨伪书，更要辨伪事。从1921年起他就与顾颉刚等人通信讨论书史之真伪，取号“疑古”，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不仅疑子集诸书，而且疑“群经”，1931年发表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是他在经学方面的得意之作，曾被译成日文。

随着学术成就和名位的提高，钱玄同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曾受到他的老朋友鲁迅的讽劝与批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时，他的爱国情绪又从书斋中萌动起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即断绝与日人往来。1933年日军进一步侵占榆关、承德，更使他感到痛

苦。1936年面对国难极端深重的局势，钱和北平各大学教授共同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何梅”等屈辱协定，并提出中日外交公开以及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及取消一切伪组织等项要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因病留平。他在病中完成了编校《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工作。钱是个知名人士，不能不为日寇所注意，有的朋友曾劝他及早离开北平，但终为病体所不许。钱曾多次表示决不任伪职，决不当汉奸。1938年，他复名钱夏，“夏”即非“夷”，意即不做日伪的顺民。他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至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去世。

---

(1)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8期。

(2) 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与黎锦熙罗常培书）》，《国语周刊》第77期。

(3) 钱玄同：《章草考序》，《师大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第71页。

(4)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4号。

(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l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6)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6号。

(7)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2号。

(8) 《汉字改革号》即《国语月刊》1922年第7期，实际印行于1923年1月。

(9)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第1卷第7期），第19页。

(10) 钱玄同：《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国语周刊》第160期。

(11) 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

号”第1卷第7期，第160页。

(12)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29页。

钱锺书

李红岩

钱锺书（1910.11.21—1998.12.19），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作家。

父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又字哑泉，号老泉。著名国学家。著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近百年湖南学风》等著作。

钱锺书早年在无锡、苏州读小学、中学。1929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3年6月毕业。就读期间，与新派学人罗家伦、叶公超、温源宁、张申府、吴宓以及陈衍等老派学人交往，在《清华周刊》、《新月》、《大公报》等报刊发表诗文，学术才华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

1933年9月至1935年6月，钱锺书在上海任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讲授诗学、英文学等课程。其间，曾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Weekly*）编辑，在英文《天下月刊》（*The Tien Hsia Monthly*）等刊物发表论文。1935年夏，与大学同学杨季康（绛）结婚。

同年秋，钱锺书考取英国庚子赔款资助公费留学，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留学，主修英国文学。其间曾担任《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丛书》特邀编辑。以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获牛津文学士（B．Litt）学位。1937年秋，钱锺书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夏，回国。

回国后，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7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

任教授，讲授“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大二英文等课程。1939年10月，自上海赴湖南安化县蓝田镇（涟源）任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至1941年7月而止。其后，回上海。抗战胜利前，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6月任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兼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主编。9月，任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主讲“欧美名著选读”、“文学批评”等课程。在上海期间，钱锺书与国内学术界、文艺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确立了坚实的学术地位。

1949年夏，钱锺书迁居北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成员。1953年，转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职。1956年，该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文革”中，钱锺书曾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开始撰写《管锥编》一书。1977年，学部独立并扩大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钱锺书任该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室研究员。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为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学术代表著作《管锥编》（英文名：*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随笔》），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8月第一版，全四册，一千零八十九千字，这是该书最初的版本。1982年9月，中华书局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一册，八万四千字。198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第二版，其中1994年12月推出的第四次印刷本，将《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管锥编增订之三》合为第五册。该五册本是《管锥编》的定本，共一千三百六十千字。

全书由笺注古籍的形式构成，由古籍中的某段话语发凡引绪，铺展开来，形成既相对独立成章又相互映照、长短不一的文字内容。起发凡引绪作用的古籍共十种，由之形成的文字内容共七百八十一则，计：《周易正义》二十七则，《毛诗正义》六十则，《左传正义》六

十七则，《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老子王弼注》十九则，《列子张湛注》九则，《焦氏易林》三十一则，《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太平广记》二百一十五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百七十七则。

该著作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价值的学术经典性著作，在国内外获得高度评价。全书用文言写成，运用了多种西方语言，引用中外典籍数千种，贯通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反映了作者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以及深邃的思辨力和超群的写作才华。

该书是一部以文学为核心的观念史著作。从“文学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是该书最重要的特点。这一立场，是对学术史中以史学为中心的立场的扬弃，也是对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学术立场的修正，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化、文学化乃至诗化的特性。

在文学观念统领下，该书在具体研究层面又采用了实证性的方法，表现出庞杂而综合的特点。全书所采取的笺注古籍的著述形式，吸取了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撰述义例。在材料选择上，遵循尽量完备的原则。但是，作者的目的并不在古籍之疏解，而在人性观念之抉发。书中的思想探讨过程，没有采取逻辑演绎、构造体系的形式，而是通过实证性的资料搜集和梳理，将古今中外、异时异地的具有统一性的心理观念资料排列比勘，相互映照，以求贯通，从而达到思想研究的目的。

钱锺书的历史观是一元史观。他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因而他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具体而微的阅读体验，繁复而庞杂的文献梳理，将人类的“基本根性”揭示出来。他站在一元的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将一元的统一性归结于人类的心灵，但又强调“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因而最终体现出唯物主义的立场。

由一元史观出发，《管锥编》表现出对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强烈关注。全书具有辩证的性质，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又时刻通过细节去映现世界的统一性。书中采用“理一分殊”的方法，通过大量事例，揭示了一般与差别、规律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不但不因“一元”的原则而削弱对特殊性、偶然性、具体性、多样性的重视，而是在文献的大量征引中予以强化。同时，书中对只看重“规律”、“模式”或“韵节”而忽略“个人”、“偶然性”及“差别”的思想进行了抨击。

全书鲜明地反映了辩证思维的特点。书中不仅娴熟运用辩证法，以辩证的眼光观察、论断研究对象，而且在辩证的思维中全面继承发展了我国学术以学术考辨方式进行思想论述的传统，具体而微地揭示出儒家“中庸”学说的辩证内涵，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亦儒家于辩证之发凡立则”。

全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打通”，即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关联。“打通”的基础在于不同文献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书中将这些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献进行现象学的处理，即在相互映现中表现共同性，使共同性显现出来，从而达到创造性阐释的效果。在中西文献的对比中，全书融通历史与现实，模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用现实的眼光作阐释性的对话，“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在叙述中，全书将现代阐释学的方法与文学创作的手法相互结合，体现出“于旧解别出新意”、“以解颐为解诂”的特点，提供了大量讽语、谐语和警句，充满诙谐和机趣。

《管锥编》内容非常丰富，带有人文百科全书的特征。但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是诗化观念，亦即用艺术化的眼光阐释各类文献，观察各类事物。作者认为，文士和诗人往往在见解上高于学者乃至哲人，并经常成为后者的先声。书中多次强调“哲人欲探析意蕴，而实未能远愈词人之舞文弄笔”，“诗人感觉虽及而学士知虑未至，故文词早道‘首’，而义理只言‘心’”，“文士慧悟愈于学士穷研”。全书以艺术化

的眼光考察中外史学，以条举例证的方式，细致入微地阐释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诗化的史学见解。

钱锺书认为，艺术作品具有观察人情与人心的史料功能，但受艺术属性限制，基本不具备考信具体历史事实的功能。所以，书中反对无原则地“以诗证史”。同时，又主张“史蕴诗心”，即认为历史著作常常采用艺术的手法，在局部上成为艺术作品。由此出发，书中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抨击，认为“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甚至艺术属性较淡的诸子书，其中所道，也常常“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故“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作者既反对用考据而非审美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也反对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著作。此类相关言论，在书中是大量的。

书中还考察了中西历史中哲学（含伦理道德和人生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科技、语言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中西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许多具有普遍性的议题进行了考察，涉及创作、文体、鉴赏、批评、修辞等方面，也包含许多考据性的内容。

《管锥编》是20世纪我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文经典之一。它是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全面汇通以来文化发展的产物，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体现了全球化的特点。该书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价值，正日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阐释、认可和应用。目前，国际上有诸多人文学者专门研读该书，并出版了一批专业性的书籍。

钱锺书的另一学术著作《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姊妹篇。该书最早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48年6月出版。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补订本，共四百三十千字。由于《管锥编》的标目截止于隋朝，而《谈艺录》的论述对象以唐至清朝为主，故该书客观上与《管锥编》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全书以诗话为主，内容虽不如《管锥编》丰富，但基本风格与基本理念相同，而文气较《管锥编》更为锐利。特别是

书中所贯穿的“文本自足”的文学本体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学术观，在《管锥编》中得到了更加切实的验证。

钱锺书在文学创作上的代表著作是长篇小说《围城》。该书最早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在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6月，收入赵家璧主编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晨光文学丛书》。这是《围城》最早的单行版本，至1948年再版，1949年3月发行三版。该书受到中外文学史家广泛好评。

另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收录《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部短篇；选本《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一版；文集《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第一版；诗集《槐聚诗存》，（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3月第一版；手稿缩印影本《钱锺书手稿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第一版。另有少量零散著作。

主要参考资料

李洪岩著：《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德］莫芝宜佳著，马树德译：《管锥编与杜甫新解》，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张文江著：《管锥编读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秦德纯

沈庆生

秦德纯，字绍文，山东沂水人，生于1893年12月11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四）。十三岁就读于沂水高等小学。1908年考入济南陆军小学第三期，1911年夏毕业。次年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毕业。后入保定军校第二期步科，1916年夏毕业，到驻在济南的陆军第五师见习，不久在该师补充二旅任上尉团附。1918年经人介绍到皖系参战军第一师任上尉参谋。1920年皖系垮台，秦由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派遣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六期学习。1922年冬毕业后，经人介绍到河南归德镇守使王为蔚处任上校参谋长，王属直系。1924年10月，直系首领吴佩孚于第二次直奉战中失败后，辗转退据河南，调王为蔚为二十四师师长，秦德纯任该师参谋长兼骑兵团团长。12月，国民军二军岳维峻部攻入河南，吴佩孚逃走，王部二十四师被岳收编，改为国民军二军第五师，王为蔚任师长，秦德纯任参谋长，仍驻防豫东一带。

1925年11月中旬，岳维峻派兵两路进攻山东奉系张宗昌，一路由其将领李纪才部由归德向鲁西进攻，一路由其收编的王为蔚、田维勤、陈文钊等旧直系部队由徐州进攻鲁南。秦德纯随王为蔚进军至泰安。

10月间，浙江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先是乘机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11月，当岳军进至泰安时，吴派其豫东讨贼军第一路司令靳云鹗到豫东，以协助岳维峻指挥直系旧部会攻山东为名；俟靳到徐州，经其联络，王为蔚、田维勤、陈文钊相率脱离国民军二军，仍回直系。王为蔚部又恢复了二十四师番号，秦任该师四十七旅旅长。时直奉联合对付国民军之势已成，靳反而与张宗昌联

合，率王、田、陈三部于1926年1月突然转攻李纪才部并回军河南，驱逐岳维峻。秦德纯随王为蔚等人于1926年3月进占郑州。4月，吴佩孚令二十四师北上，与奉军会攻南口国民军。秦旅驻防琉璃河。5月，吴至保定督师，升秦为二十四师师长。

10月，广东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吴令二十四师回防郑州。11月，秦调任二十七师师长。1927年1月，奉系头目张作霖趁吴佩孚新败之后，派张学良率大军南下，声称愿帮助吴收复武汉，要求进军河南。但秦认定奉军的要求是“假虞灭虢”，真正目的在一举而占有河南，吞并直军，所以他力劝靳云鹗坚决拒奉。靳转与吴佩孚商议，吴同意拒奉，并将直军全部交靳指挥。3月，靳在信阳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准备与奉军作战。靳将直军各部拼凑为十几个军，任秦德纯为第四军军长。这时，张学良派人秘密与秦联系，劝秦投奉，在几经磋商后，秦表示：一旦奉军渡河南下，愿率部撤离郑州，撤往京汉路以西，不与奉军作战，俟奉军全部占据河南后，再“有以报命”。张学良对秦的这一表示，认为“这人不简单”，意在“坐观成败，看风驶船”。3月底，奉军打败靳军，占领郑州后南下，时秦部在漯河，他果然对奉军只略事抵抗，即撤至遂平、西平一带。

同年6月，冯玉祥率领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打败奉军，占据河南，时秦部无所归属，乃托人与冯玉祥联系，由冯收编为二十三军，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不久，秦和冯治安对调，任十四军军长，旋调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1928年6月，冯系将领石敬亭、孙良诚先后掌握了山东省政府，秦任省政府委员。

1929年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到10月，宋哲元奉冯玉祥令率西北军出潼关反蒋，秦德纯任国民军副总参谋长，随宋哲元对蒋军作战，11月失败，退回陕西。次年4月，冯、阎联合反蒋，冯玉祥在潼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组织第二方面军，以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秦德纯任参谋长。10月，冯、阎失败，退入山

西的西北军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归张学良改编为二十九军。时孙良诚与宋哲元争着统带二十九军，后宋哲元依赖肖振瀛、秦德纯活动之力，遂让张学良同意委任宋为军长，同时秦被任命为二十九军总参议，肖任军法处长。从此秦、肖两人为宋出谋划策，成为宋的“智囊”。“九一八”事变后，当张学良处境困难时，秦示意宋向张学良表示拥戴到底，因此1932年秋，张以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年春长城之战，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于喜峰口，大捷，秦任第三军团副总指挥，因功获青天白日勋章。同年3月热河失守后，张学良终于被迫下野，蒋介石将北平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亲日派何应钦、黄郛主持，秦德纯兼任军分会委员。1935年6月初，发生所谓“张北事件”，日寇乘机要挟，国民政府指派秦德纯同日军代表土肥原谈判，于6月25日订立了屈辱投降的所谓“秦土协定”。“协定”订立后，秦恐受到舆论责骂，向外界透露说“这是何应钦同意的，应该叫‘何土协定’”。在这一事件发生期间，何应钦恐事态扩大，密报蒋介石，蒋将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务解除，而以秦德纯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准备将二十九军南调。宋被免职后，甚不满，秦遂未就察省主席职。

同年7月何应钦订立了“何梅协定”后，借口回南京“述职”，一去不返。政客肖振瀛利用平津空虚的形势，乘机活动，为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谋取冀察地盘。时日本土肥原等人正暗中策动“华北自治”，肖振瀛向日方说明，宋哲元愿率二十九军与日本“亲善合作”。他借日军驻华北势力要挟南京政府，公开提出“拥宋驱黄（郛）”，二十九军不能调走。秦对肖的这一活动，出谋划策，积极支持，肖在前台，秦居幕后，通力合作。南京政府为安抚宋哲元，先后任宋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公署主任。11月，土肥原及日本华北驻屯军谋促宋哲元进一步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图谋中国愈急。秦为宋策划，主张取得华北政权，须“名正言顺”，“避免戴上汉奸头衔”，最好办法是逼使何应钦荐宋以自代。因为当时北平军分会虽已形同虚设，但何尚担任委员长名义。秦以军分会委员名义电何应钦，故意促其“北来主持

大计”。蒋介石被迫派何应钦等人于月底北上处理华北问题。何在秦、肖鼓动及日军威胁下，报请蒋介石核准，于12月初宣布成立了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秦德纯为常务委员兼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常务委员兼天津市长。当时北平学生为反对冀察政权特殊化和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掀起了有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运动，秦德纯对示威群众采取了驱散、逮捕等镇压措施。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对日本勾搭事项上，多由肖振瀛出面；对与南京政府的联系上，多由秦德纯负责，秦与肖互为表里。西安事变后，1937年春，宋哲元派秦密赴南京，摸蒋介石今后对日政策的底。秦向蒋表示，愿照蒋的意旨，“应付华北危局”，蒋当面嘉奖了秦，并嘱秦与宋“忍辱负重”，秦因知蒋介石对日政策未变。因此秦于返平后，直到“七七”事变前，对日军的陆续向华北增兵，无所戒备，幻想冀察局面仍可苟安一时。等到卢沟桥炮声响起，秦看到全国人民和二十九军士兵的抗日情绪高涨，虽有主战表示，但实际仍摇摆不定。到7月26日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任秦为北平城防总指挥，秦才做防守部署。在平郊只抵抗了一天，到28日，宋哲元即委张自忠自代，偕秦德纯退往保定。宋哲元深怕蒋介石把放弃平津的罪责加在他一人身上，派秦德纯到南京见蒋，经秦活动，蒋介石不但未予“追究”，反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宋哲元为总司令，秦为总参议。

1938年3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蒋介石撤销，秦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不久，又改任军法执行总监部副总监。1944年，任兵役部政务次长。当时，国统区走私之风盛行，秦派他的兵役部上校部附张任之往来香港等地，秘密贩卖药品及日用百货，并与肖振瀛合伙大搞走私活动，牟取暴利。1945年秦调任军令部次长。1946年改任国防部次长。同年5月前往日本东京，作为中国方面的证人，参加对日本侵华战犯军事审判庭的审判。

解放战争开始后，全国青年学生不断掀起反蒋浪潮。1948年，北平爆发了反迫害、反饥饿的“七五”运动，蒋介石派秦德纯于8月上旬往北平以“调查”为名，策动对进步青年的镇压。从8月22日起，北平、天津两地军警逮捕了大批学生。

是年12月，济南已解放，蒋介石令秦德纯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1949年2月，秦先在上海圆明园路设立山东省政府临时办公处，3月中旬，到青岛就职。到任仅八天，南京解放，秦飞往广州，复任国防部次长。8月，前往台湾，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63年9月病死于台北。有《秦德纯回忆录》一册。

主要参考资料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10月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初稿。

《正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6年）。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宋哲元口述，兆庚记录：《西北军志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总第33号）。

秦寄云、赵钟璞：《秦德纯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

秦润卿

陆书臣　吾新民　程庸畴

秦润卿，名祖泽，字润卿，以字行，浙江慈溪人，1877年9月27日（清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生。父亲秦九龄在上海一家洋行当门房，收入菲薄。秦润卿少时入塾，十五岁时因家贫辍学，由表叔林韶斋带到上海，进协源钱庄当学徒。秦办事勤恳，颇得店东程觐岳的赏识。满师后，先任信房（文书），后为外场[1]。后来协源钱庄先后改名为协大、延源、豫源。秦在担任豫源外场时，放款很有魄力，同业中有人想聘请他到别的钱庄任职，程觐岳知道后就叮嘱经理罗樾卿说："润卿是个人才，一定要留住他。"秦遂于1909年被破格擢升为副理，1917年又被提升为经理。1919年5月豫源改名福源钱庄，秦仍任经理。

秦润卿常讲："乐群以敬业为先，博利以止贪为要。"[2] 业务经营必须采取稳健方针。当时各钱庄因资金不足，大多做"缺单"，而福源则坚持做"多单"[3]，历年存放同业的款项均超过同业存入款项，从不向洋商银行拆款。福源钱庄放款也逐步从以信用为主转为以抵押为主，据统计，自1925年至1935年抵押放款常占70％以上。它的投资以房地产与公债为主，不搞金钞、股票投机。此外，秦润卿还规定钱庄股东和负责人不得向本企业借款。由于经营稳健，福源钱庄业务日益发展。1933年福源在宁波路70号自建营业大楼[4]后，业务更加发达，年底存款从三百三十八万两骤增至五百三十四万两，跃为同业前列。

福源、福康、顺康钱庄的店东程觐岳于1923年去世前，召集程氏子弟及三庄负责人嘱咐，将店事家事全部托付与秦润卿，并叮嘱程氏子弟今后不得干预店务。从此，秦除继续担任福源经理外，并兼任福

康和顺康钱庄督理，三店大事均听命于秦。几年之间福源、福康、顺康三庄业务不断发展，资力日益雄厚，秦亦逐步成为上海钱庄业的头面人物。

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之时，秦润卿即被选举为副会长。1920年1月会长朱五楼去世，秦被公推为会长。此后历次连任，直到1935年11月，前后主持上海钱业公会近二十年，历经上海钱庄业盛极而衰的大部分过程。秦自担任钱业公会会长起，大力整顿会务，制定公会章程，修订钱业业规，热心指导同业经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上海钱庄获得发展，到1920年底从四十家增加到七十一家。战后，列强势力卷土重来，我国经济动荡不定。秦通过钱业公会，一再劝告同业稳健经营，审慎放款。1921年上海发生“信交风潮”[(5)]，由于钱业公会事先采取防杜措施，劝告会员钱庄不去交易所投机，并督促同业慎重签发银票，所以在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倒闭时，钱业没有受到重大损失。钱业公会初成立时会址十分狭小，秦设法筹款建造四层新屋一所，于1922年落成。1921年2月创办《钱业月报》，除报道钱业动态、金融商情外，改变过去钱庄股东资本向外保密的习惯，公布会员钱庄的股东、经理、副理姓名和资本金额，以昭信誉。此外，秦还创办修能学社、钱业中小学以培养钱业职工子弟[(6)]。秦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除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外，还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工部局华董、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以及华人纳税会、四明公所、华洋义赈会董事或理事等职。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蒋介石为了筹措军费，派财政委员陈其采来沪与上海金融业协商借款。经反复商谈，上海银钱业同意借款三百万元，其中银行业二百万元，钱庄业一百万元，上海银钱业还委派陈其采、虞洽卿等十五人组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持其事，秦润卿作为钱庄业代表亦列名其中。此项借款后由国民政府发行“二五库券”抵偿。此后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曾不断发行各种公债，1927年至1935年间，上海钱庄业先后承购各种债券或承借垫款

达二千九百余万元，秦作为钱庄业领袖，总是以各钱庄生存为立足点。每次金融风潮来临，他辛勤奔波，与政府当局折冲，来平息钱庄业的危机。此时，秦除继续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和总商会副会长外，还先后担任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市银行董事、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和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

中国币制原以银两为本位，后来外国银元输入，本国又先后铸造银元，形成银两和银元并用的局面。1932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废两改元”，钱业公会曾提出异议，发表《为废两改元问题告国人书》，秦润卿并发表谈话要求延期实行，均无效，终在1933年3月实施，钱庄业因取消洋拆，失去了银洋兑换的收入。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先后宣布废除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自此，钱庄对本国银行的优越地位完全丧失，在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钱庄本身业务经营和管理制度上的保守性更加不能适应形势。1935年金融风潮中，上海各钱庄资金周转普遍困难，全市六十五家钱庄中有十家歇业倒闭。钱业公会一再集议，公推秦润卿去见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政府救济。秦代表钱庄界向孔祥熙力争，经一再磋商，决定由财政部发行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由各大银行承垫，对钱庄发放抵押放款，才使钱业渡过这一难关。财政部为此指派徐堪、杜月笙、王晓籁、顾贻穀、秦润卿为委员，组成钱业监理委员会，负责办理此项贷款，并责令借款钱庄缴验押品证件，缴呈资产负债表，对钱庄业务进行监督。

秦润卿主持上海钱业公会期间，对于国内发生的群众爱国运动，是同情与支持的。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领导上海各钱庄，自6月4日起停市至11日。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各钱庄自6月3日起停市至26日，与各界人民共同表示对侵略者暴行的抗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秦领导上海各钱庄一致与日本厂商绝交，并摒除与经销日货商行的经济往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秦润卿不愿事敌，辞去各种社会职务，另觅秘密住处，深居简出，蓄须明

志，除担任福源、福康、顺康钱庄督理外，不再参与社会活动。但事实上他仍是上海钱庄业首领人物，同业间遇有大事必与他商量。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10月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秦仍被推选为理事长。

秦润卿虽然身为上海钱庄业领袖，但个人生活不尚奢华，平日在钱庄里和职工一起吃饭。他自己不做生意，在钱庄里不多宕账[(7)]。秦一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所得各项董监酬劳，颇多捐赠社会福利事业。除在上海创办钱业中小学等事业外，并在故乡慈溪创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如普迪小学[(8)]、慈溪中学、云华堂（养老院和育婴堂）和保黎医院等。此外，还在慈溪故居宅旁营建“抹云楼”，收集各种藏书四万册，解放后连同房屋、设备悉数捐献给国家，受到当地人民政府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秦润卿历任上海市各届政协委员。年事已高的秦润卿喜见国家欣欣向荣，对私营金融业联营联管积极支持。1952年私营金融业全行业改造，秦所领导的福源、福康、顺康三家钱庄，以及秦担任董事长的中国恳业银行和鸿祥钱庄，都顺利地参加公私合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秦被推选为副董事长，时虽已年逾七旬，仍每日坚持到银行办公。

1966年7月5日，秦润卿因病在沪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采泉：《金融巨子秦润卿的一生》，孙善根、邹晓昇编《秦润卿史料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马积祚：《领导上海钱庄业五十年之秦润卿》，《秦润卿史料集》。

秦祖泽：《抹云楼家言》，《秦润卿史料集》。

秦省如：《秦公润卿年表》，《秦润卿史料集》。

俞佐庭：《慈溪秦润卿先生七十祝辞》，《秦润卿史料集》。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1) 钱庄职员有内场、外场、信房、库房等职务。联络客户、经管放款的称外场，俗称跑街。

(2) 上海钱业公会“劝告同业稳健经营”函，载《银行周报》第9卷第25期，第37页。据原福源钱庄职员称，该函虽由公会出面，实出秦意，能代表秦的一贯经营思想。

(3) 钱庄依靠同业借入款经营投放的，称“缺单”；反之，经常有余款存放同业的钱庄称“多单”。

(4) 钱庄营业用房屋素不讲究，大多设在一般里弄中。福源钱庄自建沿街营业大楼，在上海钱庄中属于首举。

(5) 1920年，西方信托公司和交易所事业传入我国，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设立，各项投机活动盛行，后因投机失败，又纷纷倒闭，造成市场混乱，称为“信交风潮”。

(6) 修能学社开办时间较短，学生不多。钱业中小学开办时间较长，解放时学生达一千七百余人，1950年由上海市教育局接办，后改名为“新中中学”与“塘沽路第二小学”。

(7) 钱庄职工平时工资较低，有急需时可以宕账，不计利息，于年终分红时扣还。钱庄高级人员往往利用职权，大量宕账，投机囤积，图谋私利。

(8) 普迪小学有一小与二小两所，均吸收贫苦儿童入学，免收学费，还赠送书籍和笔墨纸张。

覃振

万江红

覃振，原名道让，字理鸣，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大田村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覃幼年就读于私塾，聪颖早慧，“十四五岁时已博览群书”[(1)]。1902年，他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并认识了同乡宋教仁。翌年进入常德府中学学习。此时，官府要人在朗江书院新设小学及图书馆的开幕典礼上讲了一番忠君爱国，覃振毅然走上讲台，驳斥了官绅的谬言，畅述要救国必须革命之理，在场官绅大惊失色。事后，武陵知县欲加逮捕，常德知府兼湘西学务总办朱其懿爱其才气，力主宽容，最后开除了他的学籍。除学后，覃振写《死里求生》一文，书写多份张贴，一时轰动全城。官府下令逮捕，他得朱其懿的帮助，改名郭谦之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当时，湖南的留日学生仇鳌、罗杰在东京发起成立新华会，覃振率先加入，并积极参加其中的军事训练。

1904年，覃振回国。此时，正值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积极筹谋起义，计划旧历十月初十在省垣举事，同时浏阳、常德、衡州、宝庆各地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地的起义工作，覃振也前往协助。他与蒋翊武、成邦杰、易本羲、文斐等人“愿负运动新军责任”[(2)]。由于风声外播，他几遭不测，幸得警界同志预为报信，乘机脱逸，避躲乡间。是年冬，与宋之昭结婚。由于清政府追查起义一事甚紧，覃再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秋，覃振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并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

1906年，覃振离日回国。6月，长沙、善化（今长沙县）等地学界要求公葬爱国志士陈天华、姚宏业，覃振与禹之谟、宁调元等倡议公葬岳麓山，与封建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葬最后得以举

行。然此事不为当局所容，于8日将禹之谟逮捕，不久杀害于靖州。覃振也在加害之列，幸得警界同志的密告，得以逃脱赴日。

1908年，覃振又从日本秘密回到上海，准备联合革命党人在长江中下游起义。惟他的行动早被清政府察觉，于午夜到达长沙时即在连升客栈被捕。在狱中，他遭到多次提审和逼供，然而始终未透露实情，清政府一无所获。由于学务处提调张鹤龄的斡旋，幸免一死，被判终身监禁，囚于长沙监狱。覃振除了咏诗作文外，还向狱友宣讲革命道理。由于始终找不到证据，后被押往桃源县监狱。此时，刘复基、蒋翊武等革命者及常德学生常来探监，覃振继续和革命同志保持联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随即光复，覃振获得自由。此时，焦达峰、陈作新被变兵杀害，覃在新军中“痛苦陈词，大局始平”[(3)]。嗣后，覃振任湘桂联军督战官随军北上武汉，被黎元洪挽留担任秘书，并协助谭人凤、蒋翊武部署大江南岸防御事务[(4)]。不久，他又受湖北都督黎元洪和湖南都督谭延闿委派，以两湖代表身份赴南京参与商组政府事宜。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覃振当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次年春改任众议院议员。袁世凯在攫取总统的过程中，对内施用武力，对外进行大借款，覃对袁的倒行逆施多次进行抨击。袁屡屡想笼络他，都无济于事。

1913年3月，袁世凯派出歹徒刺杀宋教仁，覃振痛失良友，悲愤填膺，强烈要求政府当局“彻底追究主谋，明示天下，藉正人心”[(5)]。覃的呼号为袁氏所嫉恨，派警察悍然来到覃宅进行搜查。覃潜往天津，乘船秘密东渡日本。覃的家眷也从北京迁回湖南家乡。1914年，覃在东京加入了黄兴主持的“欧事研究会”。为促进革命党人内部的团结，后又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而主张解散欧事研究会。覃振被孙中山委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长。1915年，袁世凯加紧帝制活动，覃振在东京联络华侨及留日学生在神田青年会聚会，发表演讲声讨袁世凯。他的学生吴先梅将监视留日学生活动的密探蒋士立刺伤，

袁氏悬赏捉拿凶手，并以此为借口请日本警方出动拘捕中华革命党人达百名。覃亦被捕，在日警厅遭到严刑拷打，终因缺乏证据，两月后被释放。

袁世凯称帝后，覃振受孙中山的派遣，以特派总司令身份回湖南主持党务军事。当时在湖南主政的是汤芗铭，杀害众多革命党人。覃振在上海与龙璋、周震鳞商定，以驱赶汤芗铭为斗争目标。1916年2月，讨袁独立的省区日益增多，湖南十分孤立。汤芗铭请其兄汤化龙派人劝说覃振，勿操之过急，等有机会一定请湘人回来主政，但必须保证汤芗铭安全离开湖南，覃振严正拒绝。覃派遣的廖湘芸、杨王鹏等人，因秘密收藏炸药被敌发觉，乃提前进攻督军署，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同志殉难二十余人，杨王鹏被挖心剖腹而死。覃振闻讯，急忙从上海赶到汉口，准备亲往长沙指挥。汤芗铭见民愤极大，乃伪装宣布独立，以缓和局势。覃则坚决不允，加上此时程潜的护国军声势不断扩大，汤芗铭无奈，终于逃跑。

汤芗铭弃职逃跑后，在黄兴的举荐下，谭延闿主持湖南政务。中华革命党人在湖南长沙及各县分布很多，覃振也逐渐公开活动。经孙中山允准，他在长沙创立了正谊社，并在各重要的县市设立了分支部，推举龙璋为社长，覃为副。他们通过正谊社，在湖南广泛团结各界人士推进党务。

1917年7月，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派傅良佐任湖南都督，遭到湖南人民反对。覃振乃与赵恒惕等人密商，派廖湘芸去湘西策动独立。此时，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覃前往协助。不久覃奉孙中山之命回湖南任检阅使，部署湘西的军事活动，与已在零陵宣布独立的林修梅互为犄角。同时又与入湘的黔军建立联系，两路配合，最后击败了北洋军，傅良佐被迫退出湖南。

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职去上海，覃振随同前往。1920年11月，孙中山去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覃前往参加。

1921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覃为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是年冬，孙中山到桂林督师北伐，覃受委托负责党务工作，并派多人回湖南进行北伐宣传。1922年10月，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覃振被指定参加起草党章。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覃振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第二、第三、第四届连任，第五、第六届为中央监察委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覃振为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常务委员，负责办理湘鄂陕等省党务，在湖南以学界、工商界为对象发展党务。他与林祖涵、包惠僧、彭素民商量，派工商联合会主席刘少奇为国民党湖南工商分部筹备主任，夏曦为国民党湘界分部主任。但覃内心对孙中山的联共并不赞成。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覃振北上参加奠祭。当时汇聚北京的国民党右派人物组织起了同志俱乐部，覃成为其成员之一。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他参与其中，还与林森、邹鲁等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次非法的会议炮制了一系列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文件，还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覃也到达上海。鉴于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覃振等十二人受到书面警告处分，限期改正。但覃振等人坚持固有立场，继续分裂活动，于3月29日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覃振与林森、邹鲁、张继、谢持等二十五人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4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后，与西山会议派妥协，于6月7日作出决定，恢复覃振、林森、居正等人的党籍。9月16日，国民党宁、沪、汉三方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召开成立会，覃振代表上海方面参加特别委员会，并与戴季陶、顾孟馀、胡汉民等八人被选为特委会宣传部委员（各部实行委员制，不设部长）。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第一次预备会，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南京“一一二二”惨案，覃振与邹鲁、谢持、居正等十人被指控而即行停职监视。覃避居上海，后于1928年6月举家迁往北京。

1930年，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各派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南京蒋介石相对抗，覃振亦参与反蒋活动。起初，反蒋各派在党统问题上纷争不休。覃因主张反蒋，又是国民党元老，被请了出来进行调解。覃振经过奔走各派，提出了兼顾各派意见的方案。5月上旬，以他的提议为基础的党务讨论会在天津召开。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预备会在北平召开，覃振出席会议，会后被派往前方劳军。8月7日，“扩大会议”在北平召开，覃振被推任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并为秘书主任。为争取张学良反蒋，8月20日覃振以扩大会议代表身份到北戴河访张，但未获结果。后因阎、冯军事失利，“扩大会议”迁往太原，他也随之前往。阎、冯战败下野，覃也不得不避居他乡。

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张继为立法院院长、覃振为副院长，张继未到任前，由覃代理。不久，改孙科为院长，未到职前仍由覃代理。1932年5月，覃振改任司法院副院长，并兼任司法院下属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原官吏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综理会务，监督所属职员，并查询惩戒案件进行程序。1934年夏，覃振赴英、法、德、意、美等国考察，半年后回国。为推动法制，他专门组织了中华民国法学会。

抗日战争期间，覃振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仍任职于司法院。1943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因患哮喘症久治不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治疗。

1947年4月18日，覃振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遁园：《怀理鸣先生》，《畅流》1951年第3卷第4期。

覃環：《忆先君覃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吴相湘：《西山会议健将覃振》，《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胡耐安：《欢乐岁月覃理鸣》，台北《传记文学》第14卷第4期。

---

(1) 吴相湘：《覃振》，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75、276页。

(2)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页。

(3) 吴相湘：《覃振》，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75、276页。

(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83页。

(5) 《参议员之质问书》，《长沙日报》1913年4月5日。

丘逢甲

陈民

丘逢甲，字仙根、仲阔、蛰仙，号仓海，诗文中常自署“南武山人”、“东海遗民”、“台海遗民”，1864年12月26日（清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台湾府淡水厅铜锣湾（今属苗栗县），祖籍广东镇平（今蕉岭）。父亲丘龙章曾中秀才，又获选为贡生，先后设馆授徒于屏东、铜锣、丰原。丘逢甲四岁随父亲读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十四岁应童子试，主考福建巡抚丁日昌阅其卷，大为赞赏，特赠“东宁才子”[(1)] 印一方。发榜时他名列榜首。

1887年，丘逢甲以诗文受知于兵备道唐景崧，应召入其幕府，并拜唐为师。丘一方面在海东书院读书，一方面为唐辅佐文书事宜。唐藏书颇丰，喜结纳贤士，奖掖风雅，公余常办诗酒之会，为当时台湾颇有名气的诗人。丘逢甲有机会结识学子，博览群书，见识日益增广。然而为时未久，即因才高年轻遭人嫉妒，乃以告假省亲为由返回家乡，专攻举业的书籍。1888年赴福州应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工部候补主事。但他眼见日本不断侵略台湾，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开发建设受阻，遂无意于仕途，不久即告归台湾，走上开启民智、培育英才的讲学道路。先后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台南罗山书院主讲和嘉义崇文书院主讲。他在讲学时鼓吹新思想，遭到一些冬烘学究的忌妒。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戒严。台湾巡抚自刘铭传去职、邵友濂继任以来，军备不修，防务弛废。丘逢甲以局势严重自请于当局，表示愿率士民共同守御，获准督办团练后，与其兄丘先甲及好友谢道隆分赴各地，招募乡民训练，以备战守。唐景崧临危受命，出任台湾巡抚。台湾军民正多方备战，但不久马关议和，且有割让台湾的

传闻。唐景崧迭电总署，极力反对割台，丘逢甲也向唐建议拒命抗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是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丘逢甲也领衔全台绅民，电奏清廷，表示抗日保台的决心："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2)] 至5月25日，台湾绅民得知和议已定，割让无可挽回，乃自立抗日政权，名称"台湾民主国"，设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置军务、内务、外务三大臣，另设上下议院，议员均由民间推选出任。以蓝地黄虎为国旗，年号"永清"，表示"永戴圣清"之意。丘逢甲与陈季同、林朝栋等绅商同赴抚署共进贺表，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总统"，领导抗日保台。唐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任军务大臣，以丘逢甲为义勇统领。由于全台各级官员纷纷内渡，被推举的议员也多不就任，虽电请各省援助，由于清廷制止，收效甚微，武器弹药尤为缺乏，形势极为严峻。

1895年5月29日，日军从鼎底澳登陆，守军未战而溃。不久，基隆沦陷，狮球岭失守，台北告急。6月4日，溃兵入城索饷，乘机抢掠，纵火焚烧抚署，火药库也发生爆炸。唐景崧眼看大势已去，自知无能为力，遂微装奔避沪尾，随即内渡厦门。6月7日，日军进占台北，丘逢甲驰援不及，遂回大埔厝柏庄，设置义军总部，筹划抗日事宜。日军攻占台北后继续南侵，义军虽节节抵抗，但由于装备简陋，枪械弹药不足，伤亡惨重，终告不支。尤其是谣传唐景崧内渡前曾发库银十万元送至台中，为丘逢甲及其部属私吞，致使军心涣散，号令不行。丘逢甲陷于困境，自知无可挽回，遂布告各义军，自由抗战，不限部勒。然后偕同长兄丘先甲奉父母内渡。在其悲愤而沉痛的离台诗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3)] 的词句。丘逢甲一行经厦门抵泉州，然后举家回广东镇平（今蕉岭）祖籍。然而台湾情结使他魂牵梦萦，东望故园，不禁吟咏出"古戍斜阳断角哀，望乡何处筑高台"以及"客愁竟义怜江月，乡梦千重隔岭云"[(4)] 的诗句，无限惆怅和深深的失落感溢于言表。

抗日保台的失败，使丘逢甲更加忧虑国事和向往日本的明治维新，对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变法维新，深表赞同。1897年，应潮州太守李士彬之聘，出长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实学课士，讲授时务策论，废弃八股试帖，开岭东新学之先河。次年，转赴潮阳东山书院讲学，仍鼓吹新思想，倡言维新变法。8月，戊戌政变推翻新政，丘逢甲感到十分失望。

丘逢甲于1899年与好友梁居实、杨守愚及三弟丘树甲，筹划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拟聘日本学者熊泽纯之助为教授，讲授日文，使学生学习日本维新富强之道。这时粤东当局命丘赴南洋考察侨务，丘乃乘便向华侨筹募创办同文学堂的经费。途经香港时，曾会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与唐才常议论时局。他对康、梁保皇之举颇不以为然，转而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对利用会党及防营的举措，却以为不足恃。这是得之于保台失败的惨痛教训：当年在台湾留用的湘勇、淮勇不下四五万人，但骄兵悍将，上阵对敌一触即溃。

由于得到南洋华侨的捐助，岭东同文学堂于1900年秋正式创立于汕头，丘逢甲任监督，温仲和为总教习，何寿朋、温廷敬分管教务。学堂聘请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讲授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英文、日文以及兵式体操，在新学上独树一帜，为尔后的国民革命队伍输送不少人才。

丘逢甲于1904年辞离汕头回镇平，在县城创办“镇平初级师范传习班”，后改为县立中学堂；又两年，利用“族田”收入，设立员山、城东两间家族学堂。1906年冬，丘应粤督岑春煊之聘，赴广州出任广东学务公所参议，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两年后，学务公所改为提学司，丘逢甲转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1908年，丘被举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仍兼中学监督。

1909年广东谘议局成立，丘逢甲被选为议员，继而任副议长，并受聘为两广总督公署议绅。丘在谘议局中常抨击地方积弊，语惊四

座；又荐举革命党人古应芬为谘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以利开展革命活动。并以其社会地位及政治影响，掩护革命党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汉口、汉阳光复，各省纷纷响应。丘逢甲因支持革命党人，被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密奏为广东革命大绅之首，准备就职后加以逮捕，幸亏凤山走马上任一到广州就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清吏因而胆怯，未敢采取行动。11月8日，革命党人动员谘议局与各界领袖召开大会，决议独立，以迫两广总督张鸣岐，丘逢甲极力赞同此议。次日，广州宣布共和独立。10日，胡汉民自香港抵达广州，成立广东军政府。丘逢甲登报启事，以革命告成，避讳为封建遗物为由，从此恢复邱姓本字为丘，又弃用“逢甲”二字，改以别号“仓海”为名，从此以后即称“丘仓海”。其次子丘琮则以“念台”为号，以示念念不忘光复台湾之志。丘逢甲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又被推举为广东省代表，北上参加筹组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丘逢甲任参议院议员。

丘逢甲至南京任职不久，即因劳累过度而肺病复发，乃告假南归故里，于2月25日在镇平老宅逝世。临终遗言葬须南向，以示不忘台湾。著作有《柏庄诗集》和《岭云海日楼诗钞》等。

---

(1) 东宁为台湾别称。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称台湾为东宁。

(2) 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3) 《岭云海日楼诗钞》，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730—740页。

(4) 《岭云海日楼诗钞》，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5辑，第135、131页。

仇亮

朱信泉

仇亮，原名式匡，字蕴存，号冥鸿，湖南湘阴人，1879年7月5日（清光绪五年五月十六日）出生。父亲仇道南，清附生。仇亮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十三岁便能文，应童子试、县府考，常列前茅。十六岁补博士弟子员，及冠，食廪饩。后肄业求实书院，尽心探究船山、黎洲、亭林之遗书，民族思想遂油然而生。又见清政府政治日非，列强交侵，赔款割地，国势阽危，以为欲救中国非先推翻专制腐朽的清政府，使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可。于是愤然弃科举制艺，1903年春经选拔出洋，留学日本。初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与杨毓麟、陈天华等组织《游学译编》以鼓吹革命。同时更为努力研寻治术，博览群书，因而悟到革命非武力不为功，于是改入振武学校习军事，刻苦自励，成绩优异。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在东京组织“同盟会”，仇亮当即参加并担任该会湖南支部长。《民报》创刊，仇任编辑。其时，正值中国留日学生革命情绪趋向高潮，他与同乡程潜、程子楷、陈强，江西李烈钧，云南罗佩金、唐继尧、李根源、叶荃，湖北李书城、孔庚、耿觐文，河南曾昭文、韩凤楼，陕西张凤翙，河北姜登选，山西阎锡山等反清人士深相结交，潜心研讨民族革命方略，莫不意气轩昂，情绪奋发。仇亮“以生性笃实长厚，尤为众所赞美，有仇长厚之称”。不少同学均由仇亮联络加入同盟会。当时国内各革命战役之始计定谋，皆决策于东京同盟会本部，如萍乡、钦廉、镇南关诸役，仇亮皆参与擘划。

仇亮于振武学校毕业后，继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卒业归国时黄兴赠以联云：“天生此材必有用，我与子别当谁从？”仇亮也以诗相

答，中云“誓把雄心挥一剑，积尸不羡故人多”之句，表明黄对彼“相知深、相期切”，而仇亮亦自负綦重也。仇亮归国后，初在清廷军谘府任职，次年赴太原任山西督练公所督练官，秘密进行同盟会反清活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9日，太原新军起义，攻占抚署太原光复，成立山西军政分府。仇亮因纠合山西同志举义响应，事成众议推为都督，他力辞转推阎锡山，自己则为之运筹决策、部勒军队，数日事定。仇亮乃前往石家庄，佐时任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图谋幽燕。

其时，清廷急令第六镇第十二协开赴石家庄，进攻山西。吴禄贞则令第十二协停战，并亲赴娘子关与山西新军密商晋燕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但已为清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探得此中情实，袁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马步周，于11月17日晨将吴禄贞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仇亮以情势危急，曾谋深夜移吴禄贞军中枪械弹药入娘子关为守衔用。清廷旋令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第三镇曹锟进犯山西，12月12日清军攻占娘子关。仇亮欲只身赴东南乞援，行前草家书，略云：“晋事急，不冒死乞援，无以对禄贞及山西国民。倘竟为国死，吾父母勿悲痛。”

仇亮间行至南京，会各省代表云集，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主陆军部，仇亮任军衡司司长。南北议和成，孙中山以总统让袁世凯，仇亮力言不可，谓“袁枭獍，熏陶帝制最深，终必危害民国”。及临时政府北迁，仇亮遂辞去军衡司长职，创《民主报》于北京，阐扬齐民为治之理，力斥君主立宪之非。

其时政党林立，争为雄长，同盟会为扩大计，宋教仁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及国民公党等组成国民党，仇亮任国民党本部会计部长。同时还与黄兴创办垦殖协会，黄兴任会长，仇亮为副，设本部于北京，山东、上海、湖南、湖北、河南及东北三省均

次第成立支部，以垦殖为务，并在苏州开办垦殖学校以培育人才；在北京、上海筹办殖银行以集经费；在贵州、陕西设置汞砂及银矿公司，以事开采。仇亮以为“革命当裕民生，以培国本，深谋远虑，有如是者”。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更为暴露，举国震愤。仇亮前往上海访孙中山、黄兴，共谋“二次革命”。仇亮由沪返天津寓所，适值夫人许氏产后病殁，因而滞留天津料理丧事。先是，《民主报》以宋案抨击袁世凯，因而受到军警当局的迫扰；及湖口战败，袁世凯大肆索捕，侦骑四出。仇亮乃诡踪迹、扶妻柩、携子女，间道返湖南湘阴原籍为妻营葬而获免。已而复密谋革命，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复返北京。抵京数日，即被逮下狱。1915年7月18日，仇亮就义于北京，卒年三十七岁。

主要参考资料

《仇亮烈士生平简介》，《文史通讯》1981年第4期。

程潜：《仇亮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胡达：《仇亮事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仇亮》（附录：仇冥鸿入狱始末记），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年版，第221—225页。

郑逸梅：《南社社友事略：仇冥鸿》，《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秋瑾

闻少华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对酒》

秋瑾，激进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近代著名的女诗人。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山阴县（今绍兴），1875年11月8日（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 生于福建厦门。秋瑾的祖父秋嘉禾做过厦门知府。父亲秋寿南是个举人，当过湖南常德县厘金局总办。

少年时代的秋瑾已经读了不少经史书，能诗词，又学会骑马击剑。

1893年，秋瑾的父亲到湖南做官，她随父入湘。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王是个纨袴子弟（王父与曾国藩是表兄弟），和秋的性情不合，家庭生活甚不融洽。1903年王花钱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随他去北京。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秋瑾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曾作《宝刀歌》以述怀："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还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她在京期间，结识好友吴芝瑛，两人意气相投，共同搜求新书报，讨论"新学"，对民主革命问题有了一些理解。后来，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表明她在当时已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

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辛丑条约》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秋瑾想探求更多的新知识。1904年夏，她冲破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只身到日本留学，“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是她当时出国心情的写照。到东京后，秋瑾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是年秋，秋瑾参加了冯自由等人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受封为“白扇”（军师），该会以“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为宗旨。9月，秋瑾创刊之《白话报》问世，该报鼓吹民主革命，重视妇女解放。11月，她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重组“共爱会”，以反抗清政府为主旨。12月，秋瑾结识了赴日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同年与在日本学习的鲁迅等人相识。

翌年春，秋瑾回国省亲及筹措学费，因陶之介绍，在上海爱国女学校认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由上海返绍兴，在热诚小学校又见到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1905年夏，秋瑾复去日本，当轮船过黄海时，她感时忧国，思绪万千，“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她挽救祖国的心声。她到东京后，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7月在该会成立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省主盟人。同年冬，清政府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由驻日清公使串通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异常愤慨，纷纷集会，讨论对策。当时留日学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求学，一部分则主张罢课回国，以示抗议。秋瑾是极力主张回国革命的。在浙江同乡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她为了表示回国干革命的决心，同时也针对有些人对她（他）们回国动机的怀疑，从靴筒里抽出她自买的一把倭刀，猛然往讲台上一插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是一个很有声誉的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她结纳革命志士，交游甚广。

1906年初，秋瑾回国，回国前她留信给在日友人说：“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回国后，与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教书，与徐自华、徐蕴华姊妹建立起不同寻常的友谊。初夏辞职离校，转赴上海，与陈伯平等人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祥熊等人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张恭等人运动浙江会党，做起义准备。同年9月，秋瑾与陈伯平等人在虹口祥庆里寓所试制炸药，不慎爆炸，炸伤手臂。

同年冬，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她在该报发刊辞中大声疾呼：“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伴随着她的革命实践，她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也更加明确，更加炽烈，“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

在创办《中国女报》的同时，秋瑾把她的目光投向军事方面。1906年12月，革命党人刘道一等人联合会党，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光复会会员集议于上海，计划起兵响应，由秋瑾负责联络浙江会党。不久她回到绍兴，进入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校。当时的大通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学校，事实上是革命的联络机关。秋瑾以大通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各地会党首领。不料尚未联络成熟，而萍、浏、醴起义已失败。秋瑾听说后非常痛惜，但她仍决定依靠会党的力量，准备在浙江举事。

1907年春，秋瑾被举为大通学校的督办。她以大通学校为中心，

往返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浙江军队官佐和军校（如武备、弁目学堂）师生参加光复会。同时又两次到金华、处州所属各县，把所属会党成员按军队编制起来，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顺序，编为八军，称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居协领。王金发、竺绍康等人为分统。光复军编制既定，积极准备起义。这年五六月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的起义，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在这种形势下，秋瑾认为时机成熟，她与徐锡麟约定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与浙江会党吕祥熊、王金发、竺绍康等人计议，预定浙江方面先由金华会党起义，处州响应，诱使清军调离杭州，出击金、处等地，然后以绍兴义军渡江直攻省城杭州，军学界为内应。如攻不下杭州，则把部队带回绍兴，从金华、处州进入江西，直趋安庆，和徐锡麟相呼应。她与会党首领决定的起义日期是7月19日，但不久，金华、武义等地会党起义相继失败，绍兴会党也过早地暴露了目标，清政府大肆搜捕党人。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事，失败遇害。7月7日，绍兴知府贵福得到劣绅胡道南的告密，星夜赴杭州报告浙江巡抚张曾敭，清当局即做好了镇压准备。秋瑾于7月10日得知徐锡麟失败遇害的消息，悲痛异常。7月12日，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学生侦知杭州派出清兵的消息，遣人密告秋瑾，她做了些疏散的布置。7月13日上午，会党首领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认为事态已急，劝告秋瑾暂避。秋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吩咐王金发快走，自己则留下。王走后的当天下午，知府贵福和山阴、会稽两县知县跟在张曾敭派遣的一队清兵之后，进入绍兴。这时，学生们又劝秋瑾走避，她没有理会，只叫学生们离开。清兵很快包围大通学校，荷枪实弹，入内捕人，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多人死伤，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

秋瑾被捕后，7月14日贵福派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审，秋瑾只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坚不供实”。贵福又改派人严讯，秋瑾仅说：“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手折亦是我物，革命党的事就不必多问。”不为严刑所屈。贵福等人怕久押生变，请准浙江巡抚张曾敭，

决将秋瑾就地杀害。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下。烈士遗骸经其友人收殓，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

主要参考资料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集》，1962年版。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史迹》，1958年版。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郭延礼著：《秋瑾年谱》，齐鲁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

---

(1) 秋瑾生年为1875年（光绪元年）。浙江绍兴偏门外峡山村歪台秋宅的客堂内有秋氏忌日牌，其记载："秋寿南女，秋闺瑾（即秋瑾），字璿卿，乙亥年十月十一日生辰（即1875年11月8日），丁未年六月初六讳忌，生肖属亥。"而且秋氏祖龛和杭州秋社供奉的秋瑾牌位上所记生卒年月，都与秋氏家谱和忌日牌记载相同。有关原件现存绍兴文管会。

邱清泉

颜平

邱清泉，原名青钱，字雨庵，1902年3月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永嘉县。其父邱箴衡，曾业裁缝，兼营负贩，后开恒泰鱼行。邱清泉八岁入塾，十岁入基圣小学堂，十四岁入永嘉县立高等小学，1917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五四运动波及浙江，邱曾与同学下乡宣传抵制日货。他读书兴趣亦由古籍转向西方学说，如达尔文“物竞天择”说、尼采的“超人哲学”等。1921年在第十中学毕业后，回乡执教一年，即赴上海求学，入上海大学社会系。

1924年夏，邱清泉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和击溃刘（震寰）杨（希闵）叛军的实地作战，获得筑桥、攻城和安置炸药等工兵方面的实际知识和经验。1925年9月自军校毕业后，即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少尉排长。第二次东征惠州之役后，升任中尉排长兼连党代表。1926年5月，调任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工兵营第三连连长。北伐军兴，工兵营随军入湘，配属第四军，曾参加武昌攻城战和南昌之役。1927年初，邱清泉等人率学生至武昌返回军校继续完成学业，时任工兵大队第一队队长。

是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宁汉分裂。邱清泉在武昌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一道反对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师生，曾被拘囚半月。邱逃逸至南京投奔蒋介石，入总司令部训练处为科员，后调任侍从室副官。1928年1月，任第九军第三师补充团第三营营长，次年又转第二师任营长，在开封、郑州一带参加蒋、冯之战。1931年升任第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

蒋介石对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于1932年5月组设“豫

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邱清泉入该司令部为政训处科长，追随原“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的政训处长贺衷寒之后，并常为《扫荡月刊》（后改为《扫荡报》）撰写文章。1933年邱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处长。

1934年7月，邱清泉被派赴德国留学，先入工兵专科学校，翌年10月入柏林陆军大学。他主要研习战术战略，除学巴尔克、斯蒂芬、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著作外，还学鲁登道夫的法西斯“总体战”理论，颇受普鲁士精神的影响。1937年5月毕业回国，在南京任教导总队参谋长。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邱清泉所在的教导总队调赴上海参战。淞沪会战经过三个月的鏖战，在日本侵略军登陆金山卫、占领松江后，邱随教导总队西撤，移驻南京，守卫紫金山、孝卫陵一线。12月13日南京沦陷，邱撤退不及，乔装匿居乡间两旬，后经句容至江阴渡江，由徐州到武汉。1938年3月，邱清泉被任命为由装甲兵团扩编成的第二〇〇师副师长。嗣后，邱兼突击第一纵队司令，率战车营、工兵营、战车防御炮营、装甲汽车队、高射炮队、摩托搜索队及步兵一营，由湘潭北上至兰封，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参加了兰封战役。6月，邱部奉派驻守郑州。9月信阳之役，邱曾率装甲兵深入敌后，日军畏慑。10月，第二〇〇师扩编为第五军，邱任该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率部至湖南东安进行训练。

1939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宁东北五十公里之昆仑关，第五军奉派增援桂南，归北路军徐庭瑶指挥。邱清泉率二十二师仿效宋将狄青征侬智高“微服过关”，由思陇翻山越岭，迂回至五塘、六塘断敌后路，与第二〇〇师、荣誉第一师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自20日晨起不断发起攻击，次第占领三角山等阵地，击毙日军少将、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等官兵多人。28日，第五军协同第六十六军、九十九军等部及空军发起全面反攻，邱清泉部参加正面作战。经过四天激战，于31日夺回昆仑关。邱清泉因战功获四等宝鼎勋章，并于次年5月升任第

五军副军长。

1940年9月，邱清泉调至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议。半年后又调任军训部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兼重庆第三警备区司令。他训练新兵，除督促传授战斗技能外，还以连为单位组织新兵利用驻区空地种菜、喂猪、养羊。胡宗南对邱之才干颇为赏识，邀邱去西安任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副主任。第七分校学员人数超过总校，所辖八个总队分设于西安四郊，邱在校本部设军官教育队训练教官，然后让他们分赴各总队施教。

1943年1月，第五军扩编为第五集团军，军长杜聿明升任集团军总司令，邱清泉任第五军军长，辖三个师、六个特种兵团共约四万五千人，是一支兵员充足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邱清泉上任后，注重给养和整训，以加强战斗力。1944年5月，邱清泉奉命率第二〇〇师由昆明前往滇西参加远征军作战，编入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于9月迂回攻击日军龙陵、芒市间之联络线，至11月3日会同第七十一军等部克复龙陵，12月次第克复畹町北之象鼻山、腰子山、冷山等。远征军和驻印军经过艰苦战斗，于1945年1月27日在芒友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为抗战末期国际援助作战物资的运输打开了孔道。此役邱清泉获得三级宝鼎勋章和美方赠给的铜质自由奖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密电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解除龙云所部武装，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谓“西南大局之成败在此一举”，并亲自坐镇西昌指挥。驻在昆明北郊及罗次、呈贡的第五军，在邱清泉的指挥下，于10月3日凌晨包围了昆明全城和云南省政府。龙云被蒋强行解除云南省主席等本兼各职，调离昆明。邱清泉在此事件中为蒋效忠出力，获“二等云麾勋章”和“忠勤勋章”。12月，邱的第五军又参与镇压昆明“一二一”运动，迫害爱国学生。此后，邱率第五军调赴江苏，驻南京北岸之浦口，拱卫首都。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部署下，邱清泉率第五军屡屡出

击，不遗余力。1946年8月，在进犯鲁西南解放区的“钳形攻势”中，隶属“徐州绥靖区”的第五军，协同整编第十一师等部，自砀山、虞城之线长驱北进，但被人民解放军冀鲁豫军区独立旅阻于城武地区。直至整编第三师等四个旅一万七千余人被歼灭，解放军主力已转移，邱部才于9月12日侵占定陶，20日占菏泽。11月，邱部奉命绕道东明渡过黄河北犯，12月先后侵占濮阳、清丰、观城，翌年1月2日又占范县。但在解放军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之际，邱部撤出范县退缩观城。嗣后，邱清泉的第五军改称整编第五师，继续在豫皖一带作战。1947年1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砀山、黄口，向徐州外围进迫。邱部与整编第三师等部奉调自商丘、宿县驰援。12月又南趋太和、界首企图追击。但解放军转而北上，会合鲁西地区解放军向开封、郑州方面进击，邱部又尾随于后赶去解救。1948年春，邱清泉部在河南杞县黄泛区被人民解放军刘伯承、杨勇部围击，顽抗三个月。继后由整编第五师扩编为整编第五军的邱部，在解放军的围击下，几乎全军覆没，更无力东援被围之第七十五师沈澄年部。蒋介石以邱不援友军之罪，予以申诫处分。邱垂头丧气，于8月告假回乡。

1948年9月，整编第五军扩编为第二兵团，邱清泉为副司令官，一月后升为司令官。邱上任后立即率部自虞城、砀山北进，欲去救援济南被围之王耀武部，但遭到人民解放军之阻击，刚进抵曹县，济南已告解放，只得返回商丘。嗣后，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菏泽、郑州、开封、商丘等城于10月下旬至11月初次第解放，邱清泉兵团只得往东撤退。淮海战役起，邱清泉兵团辖第五、十二、七十、七十四等军，于11月初集结于徐州以西黄口、砀山一带。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之碾庄地区围歼黄百韬第七兵团，蒋介石指令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去救援。邱率七个师东援，被“围点打援”的解放军强大兵力阻击，十一天只走出三十里，至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之时，邱还在碾庄以外四十余里。此时，碾庄以东陇海路两侧和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先后解放，宿县也已于16日升起红旗，徐州、蚌埠已成孤点，刚被蒋介石调来增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又被围于双堆集。蒋介石固守徐州

之计划已成泡影，急急下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南撤。邱率第二兵团撤至永城东北陈官庄，在人民解放军堵击下，被分割包围在纵横不到二十里的狭窄地区。邱指挥所部构筑工事固守阵地，以待蒋介石空投粮弹，伺机突围南逃。时已进入寒冬，连日雨雪交加，所部身无棉衣，赖挖地洞避寒。粮草亦渐尽绝，官兵纷纷宰杀马匹充饥，继食树皮草根，以至抢吃人肉。士兵纷纷投奔解放军，但邱清泉残暴枪杀意欲投降的士兵，负隅顽抗。12月17日，中原人民解放军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广播了敦促杜聿明、邱清泉等人投降书，但邱扬言“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顽抗到底。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向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发起总攻，邱清泉兵团随同杜聿明集团被全部歼灭。邱清泉在1月10日凌晨逃往张庙堂的途中被击毙。

主要参考资料

周振强：《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53页。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2页。

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8—92页。

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577页。

邱维达：《邱清泉第二兵团被歼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8—182页。

邱菽园

陈民

邱菽园，原名德馨，自号“星洲寓公”，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父亲邱正忠于1840年到新加坡当劳工，后经商致富，成为新加坡著名米商。邱菽园六岁出国至新加坡，由父亲聘家庭教师讲授中文典籍，后回国继续深造。二十岁参加乡试，中举。1895年赴京会试，不第。时值甲午战败，我国割让台湾，他参加上书反对割台，不获报。失望之余，绝意仕途，返回新加坡。这时他的父亲已故，他与弟邱德祥继承遗产，各得七十多万元，成为巨富。

邱菽园工诗词，为人豪放，倜傥不羁，日以诗酒与南来名士交游，对公益事业莫不慷慨解囊，有“小孟尝君”之称。林文庆等人倡办中华女校时，他捐三千元作建校基金，表示对女子教育的支持。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与林文庆同为当时南洋著名的维新派领袖。他们合作组织了“好学会”等社团，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陈楚楠、张永福等人就是受了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898年，邱菽园独资创办《天南新报》，自兼主编，亲撰社论，鼓吹维新救国。该主张得到林文庆的支持，林出任该报英文编辑。

1900年2月，邱菽园邀约康有为到新加坡，随后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会分会会长。同年7月，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会，图谋东南大举，邱菽园捐饷二十五万元。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康有为扣压华侨捐款，起义数次改期而失败。事后，秦力山、朱菱溪等人陆续来到南洋，向康有为清算。邱菽园才知道康有为骗款卖友的实情，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发表《论康有为》，揭露康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募捐，从中作弊。邱在文中质问：捐了许多款，究竟做出什么事来？有一笔明白的账开给大家看吗？此外，仅就康有为保

皇党的立场来说，他说有光绪皇帝的御书和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嘘，却从来没有给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假如是真的话，为什么同党极亲密的人都不能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再骗人了[(1)]！邱并声明从此与康断绝一切关系。邱菽园这一揭露，影响很大，许多投身保皇党或受过康、梁蒙骗的人，如马来亚的郑螺生、李源水等人也都先后与保皇党断绝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成为同盟会南洋分会的早期会员。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之役，使清政府开始注意到邱菽园、林文庆等南洋华侨富商的活动，遂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对邱、林等人支持“叛乱”的行为加以警告，还逮捕了邱菽园在国内的亲戚。邱菽园被迫花一千两银子向清廷捐了个“道台”，以示对清政府“效忠”。此后。他再也不涉足政治，但爱国之心未泯，思想也较开明，与许多革命派人士私交甚笃，曾出面为黄乃裳开垦诗巫做保证人。

1905年，邱菽园由于投资土地买卖而亏蚀一空，他的弟弟邱德祥也经营失败，兄弟两人不得不宣告破产，向法院报穷。不少人为之惋惜，但邱菽园却不以为意，身居陋巷而孜孜不倦于新小说之阅读与欣赏，并仿效钟嵘（《诗品》）体例，作《新小说百品》，后又著《客云庐小说话》[(2)]，完全以卖文为生，曾一度担任中华总商会的秘书。

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战祸连绵，邱菽园愤懑不已，曾在自己承办的《振南日报》上著文抨击。1929年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聘请邱菽园任该报副刊主任，但他上任一年，便以老病辞职。从此谢绝应酬，以诗酒自娱。晚年笃信佛教，为居士，终日蛰居于“觉觉经舍”。

1941年11月30日，邱菽园病故于新加坡。

邱菽园的主要诗作有《啸虹生诗钞》，康有为曾为其作序，认为

其诗“滂博天葩，雄奇俊迈”，“或与黄公度京卿骖靳联镳焉”[3]。此外，还著有《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等诗文集。

---

(1) 胡汉民述，张振之记：《南洋与中国革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478页。

(2) 邱菽园上述二文，于1907年先后发表于香港《新小说丛》第1期及第2、3期，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7—426页。

(3) 康有为：《邱菽园诗集叙》，《啸虹生诗钞》，1922年铅印本，第1—2页。

任白涛

任嘉尧

任白涛，笔名冷公、一碧。1890年1月24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生于河南南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生仅六月，父亲病故，依伯父为生。青年时好读书，邻居张衡蒲为同盟会员，所藏革命书刊甚多，因得接触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前后，任上海《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驻汴特约通讯员。曾参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1916年，任白涛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同时补习日文。因酷爱新闻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为首届会员，研究新闻学，并积累资料，进行写作。1917年，周恩来亦在东京求学，当时一些进步的留日学生，有着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共同愿望，常在周末至王扶璧寓处相聚，畅谈形势，议论国家大事与祖国前途，任白涛与周恩来由于志趣爱好相近，友谊甚笃。在日本留学时，任白涛已将《应用新闻学》一书初稿写就。当时我国尚无中文的新闻学专著问世，《应用新闻学》可称为我国新闻学专著的嚆矢。

1921年任白涛从日本回国，曾将《应用新闻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未被接受，乃筹款自费印刷二百本。不久任白涛离沪去杭州，寓寺庙中，创设中国新闻学社，积累新闻资料，与各地有志从事新闻学的研究者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潜心钻研新闻学。并以卖文为生，常为《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撰稿，译述外论，介绍国外情况，发表本人对教育、妇女、社会问题的主张。当时稿酬菲薄，任白涛生活清寒。名记者戈公振在撰著《中国报学史》时，鉴于手头积累资料不够，曾于1923年到灵隐寺访问任白涛，向其请益，任乃将历年珍藏的报刊资料慨然借予戈公振选用。

1923年，李一氓在《中国评论》杂志撰文，揭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伍超所撰的《新闻学大纲》一书，与任白涛著《应用新闻学》有雷同之嫌，任白涛核对之下，发现伍超一书有百分之七十系直接抄袭《应用新闻学》，当即致函商务印书馆交涉，但商务未予理会。

1925年，任白涛寄寓杭州大佛寺从事著述时，碰巧胡适亦来杭游览，晤谈之下，了解任白涛耗多年心血写成的《应用新闻学》，先交商务，商务不愿出版，却出版了伍超抄袭的《新闻学大纲》，颇为愤慨。胡适与商务总编辑王云五有师友之谊[(1)]，函王，始得王云五回信。商务方面决将伍超之书毁版，而同意将任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编集成《改造中的欧美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书，以版税作为赔偿。

以后，胡适又介绍任白涛与亚东图书馆主持人相识，任的《应用新闻学》、《给志在文艺者》、《恋爱心理研究》、《恋爱名论》等书，相继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927年，任白涛由杭州迁居上海，仍悉心撰述。次年，与南华通讯社女记者邓涧云（广东鹤山人）缔交。两人志同道合，于1929年秋在上海结婚。任婚后仍以写作维持生活。

1935年，任白涛将历年所积累的新闻学资料，加以整理分类，动手执笔写《综合新闻学》一书。原定计划写三十万至五十万字，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始全部杀青，计一百三十万字。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香港，任白涛将书稿寄往香港。为避免邮政检查一关，托友人汪馥泉把《综合新闻学》稿件寄出。行前写了《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一书，交北新书店出版。1938年春节，任白涛夫妇离沪到广州，正碰上日军飞机“大轰炸”，局势动乱，但任白涛仍不忘著述，写成《国际通讯机构及其它》一书，交广州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日军南侵，战局急转直下，广州处境险恶，任白涛通过《新华日报》驻广州经理张尔华的关系，把原稿、资料、信件、日记等材料装成一大木箱，由帆船运往梧州。自己则于10月21日广州沦陷那天上午，匆忙沿广三铁路步行离穗，几经颠沛流离，始抵梧州。在广西滞留期间，又为商务印书馆写成《日本对华的新闻宣传政策》一书。

1939年春，任白涛到了重庆，随即前往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找周恩来。适值周去第三战区视察，只见到邓颖超，留下通讯处（白象街商务印书馆转）辞别而去。当周恩来返渝时，重庆已遭到5月3日、4日的敌机大轰炸，商务原址化为废墟，周无法找到任白涛的下落。曾登《新蜀报》寻人，原文是："任白涛兄：弟已回渝，仍寓曾家岩渔村。兄现寓何处？请告。翔宇启。"[(2)] 任一见署名为"翔宇"的广告知道周回到了重庆。"翔宇"是周恩来在留日时用的别名，只有少数知友知道。便于次日赶赴曾家岩晤面。久别重逢，分外欢欣。任白涛向周恩来叙述了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并表示毕生以研究新闻学为夙愿，打算为抗战期间国际新闻宣传略效绵薄。

不久，周恩来介绍任白涛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设计委员，从事对敌宣传事宜。那时，重庆一再遭到敌机轰炸。任征得周的同意，将文稿资料等物装在竹箱内，存放在曾家岩。每逢空袭警报发出，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便协同将上述物件搬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又重新取出（放在防空洞内易受潮发霉）。正因为这些文稿资料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周恩来才这样关怀，这样爱护备至[(3)]。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白涛被裁员。此时湖北省政府已迁到恩施，拟邀任出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任当时想去延安，向周请教，经告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志和朋友在新闻界工作。你还是先到恩施去好。"[(4)] 任白涛在恩施，名义上虽是《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但薪金菲薄，生活清苦，住所楼下养猪，楼上住人，晚上要提着灯笼，走过田埂去上班，下雨天还要穿着钉鞋走路。可是他仍然认真

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想到的是一切为了抗战。工作了九个月，因与工人打成一片，受到社长谢然之[5]的疑忌和排挤，任被迫离开该报，再度失业。其后，任白涛曾任第六战区中校参谋、湖北省政府参议等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任白涛回到了重庆。一度借住在神仙洞《新华日报》职工宿舍，不久迁至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这儿每逢星期六改善生活，打一次“牙祭”，还举行联欢会。在沸腾的革命洪流里，任白涛感到极为兴奋，他说：“这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日子。”[6]

1946年7月，任白涛夫妇离开重庆，来到南京，曾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得悉寄存曾家岩的文稿资料等早由中共代表团专机运到，存放在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即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不久任到了上海，乃赴商务印书馆，晤编译所负责人谢仁冰，得悉《综合新闻学》原拟分四册出版，第一、第二册已于抗战时在香港发行，第三、第四册排稿后打好纸型，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尚未印刷。任将第一、第二册取回阅读，因未经作者本人亲自校对，谬误百出，非订正不可。加以付排后垂十年，形势发展变化颇大，第三、第四册亦须修改后方能出版。遂向谢交涉，一定要修改后始能出版。谢同意，但商定不能多更动版式。

花了九个月时间，任白涛将全书修改竣事，又往晤谢仁冰。谢却反悔说，这部书有些章节写得过于尖锐，目前不可能出版，并表示歉意，只是将该书全部清样、纸型、铜版、锌版等物交回任白涛，不了了之。

《综合新闻学》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新闻学著作中内容丰富、篇幅最长的一部，是任白涛花毕生精力撰写的。它就新闻学概论、原始的公告形态和方法、现代的采访技术和通讯方法、编辑和技术、经营管理以及杂志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保存了不少中外古今新闻事业

史的珍贵资料，可惜由于客观原因未能问世。

1948年，任白涛为三联书店翻译了《〈资本论〉图解》第一册，作为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辅导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任白涛曾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又孜孜不倦地继续修订《综合新闻学》，并为北新书局编写一些文学、医学书籍。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任白涛生活清苦及工作情况，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慰问，并电邀任赴京工作。7月中旬，任白涛准备就绪，即将成行，不幸突患中风，虽经医务人员悉心医疗，仍于1952年8月31日病逝上海。

任白涛遗稿、往来信件、日记、资料以及《综合新闻学》等遗物，亦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和任白涛生前愿望，全部交给国家有关单位保存。

---

(1) 胡适曾在中国公学读书，王云五时任英文教员。后胡介绍王到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工作。故有师友之谊。

(2) 广告剪报原件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任白涛文物中。

(3) 据任白涛爱人邓涧云回忆笔录。

(4) 据任白涛爱人邓涧云回忆笔录。

(5) 谢然之，一度在瑞金任《红色中华》主编，被俘后投靠国民党，解放前去了台湾。

(6) 据任白涛爱人邓涧云回忆笔录。

任鸿隽

赵慧芝　王震

任鸿隽，字叔永。1886年12月20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四川垫江县一个小官吏家庭，祖籍浙江归安县（今吴兴县），1863年（清同治二年）太平军占湖州，祖父任轶才率全家入川，依叔祖父任秋苹[(1)]，居成都。父任章甫，习刑名，初做幕僚，后纳资为佐贰，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选授垫江县典史，1902年殁于任上。

任鸿隽兄弟姐妹七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六岁延师在家就读，十二岁已熟读“四书”、“五经”，并同季弟任鸿年同时考入垫江书院[(2)]。他聪明勤奋，在书院历次月试中均名列第一。1904年他冒籍巴县参加院试，考取第三名秀才。同年，任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这是废科举后四川创办的第一所中学。他在此学得新知识，并在政治上受到老师杨沧白等人的影响，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底毕业后，在重庆开智小学和私立重庆中学堂执教一年。1907年初，以教学所得积蓄偕学友周秉鲁、罗锦章赴上海求学，入中国公学高等预科甲班。中国公学是当时革命党人的活动场所，秋瑾等人的革命活动对任鸿隽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课余任常与同学张奚若、杨杏佛、朱芾煌、胡洪骅（胡适）等人谈论时事，向往革命，怀有推翻清政府的情绪[(3)]。

1908年初，任鸿隽在学友邓子浮的帮助下，得到留日同乡李竹君、李雨田经济上的资助，随同佘耀彤东渡日本留学。初入同文中学，翌年夏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为官费留学生，学习应用化学。与此同时，他还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对形声、训诂及诸子源流之学得益颇多，并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是年，经同学朱芾煌、但懋辛介绍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书记、会长等职。他学习应用化学，目的在于继承喻培伦、黄复生之事业，为革命制造炸弹[4]。在此期间，他还常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接触，为支持国内革命购买军火[5]。1911年3月，为了配合黄花岗之役，牵制长江方面的清军援兵，和喻培棣一日内即拟就布告，油印数百份，并连夜刻制“中华民国军政府印”，盖在布告上[6]，带回国内在长江一带散发。武昌起义前后，为配合四川铁路风潮，发表了《川人告哀文》、《为铁路国有告国人书》等文章。

1911年11月，任鸿隽由东京返回上海。此时上海已经光复，四川方面战事正紧。聚集在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发起组织蜀军，推熊克武为首领，欲去四川支援，并推任鸿隽和另一党人去武昌与黎元洪的军政府交涉，借道返川[7]。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宣告成立临时政府。任鸿隽与吴玉章等人任总统府秘书[8]，他曾为孙中山草拟《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陵文》等文稿。南北和议告成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任鸿隽对此极为不满，便立意弃官请求出国学习。因对革命有功，经稽勋局派赴美国留学。在去美之前，他应邀北上，到唐绍仪内阁任秘书。6月，唐内阁倒台，任赴天津任《民意报》总编辑，他除为该报撰写社论、时评等文章外，还根据朱芾煌的日记撰写长文《共和建设别记》在该报连载，揭露袁世凯在南北和议中运用手腕谋取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内幕。文章刊出方半，袁世凯已怒不可遏，通过法租界当局迫令《民意报》停刊。11月底任鸿隽赴美留学，与杨杏佛等人同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实际上所学专业则偏于化学、物理两科。

1914年6月，任鸿隽在与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谈论当时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9]。为实现科学救国，他们商议创办《科学》月刊，以向国内介绍并传播科学，于是便着手草拟“缘起”，制订办法，募集资金。为要发行科学杂志，他们又发起组织科学社。数月之内，入社者达七十余

人，股金筹集到五百余元。1915年1月，《科学》月刊正式出版。4月，任鸿隽、胡明复和邹秉文草拟了社章，10月25日经全体社员通过，中国科学社遂正式成立。社章规定科学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10]。任鸿隽与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五人被选为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鸿隽被推举为董事会会长兼中国科学社社长。

在康奈尔大学期间，任鸿隽还曾主编过《留美学生季报》，与胡适等人过从甚密。1916年曾因为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问题与胡适发生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与梅迪生、杨杏佛一起反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尤其反对白话诗。此乃中国文学史上白话与文言论战之发端。

1916年6月，任鸿隽于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毕业，获化学学士。一度想去哈佛大学攻读文学硕士，但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化学，1918年获得化学硕士学位。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任与一批留美学生于10月搭轮经日本回国。中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由美国迁回国内，先后在上海和南京设办事处。该社为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扩大科学活动，曾发起“五万元基金”募集运动。任鸿隽为此奔走各方，历访各界名人，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大声疾呼。“可是在反动而又愚昧的政府统治下，对于人民的利益照例是漠不关心的，对于学术思想这种看来是不关重要的事情，尤其难望得到重视。”[11] 因此有时不免遭到冷遇，但他毫不灰心，以沿门托钵的精神，不辞辛劳，前往广州、北京、成都、南通、杭州等许多地方募集基金，获得社会各界开明人士的支持。任鸿隽在上海曾多次拜访孙中山，时孙正在著述《孙文学说》，以有关科学部分嘱任鸿隽校读，并鼓励留学生应自有组织，以对国家有所贡献，对中国科学社组织颇为赞赏，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1919年春，任鸿隽回到四川，在各学校、商会演说，鼓吹科学[12]。当时四川督军熊克武正拟筹办炼钢厂，他向熊建议应同时建立钢、铁两厂，“相辅而行，为四川立钢铁工业之基础”[13]。熊亟是其

言，遂委任鸿隽草拟创设钢铁厂的计划，并将筹办铁厂之事委托给傅友周和姜荣光。是年冬，任偕周子竞复去美国采购机器设备并调查炼钢方法。1920年夏，任鸿隽回国，适值四川一、二军之战，熊克武已去职，而继任者未遑远略，于是建厂计划中辍。十余年后四川设立钢铁厂所用机器设备，即系当年任鸿隽等人所引进。

任鸿隽在川筹建钢铁厂事中辍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兼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但任鸿隽一向主张专事一职，反对兼任，不久乃辞去北大教职。但未及一年，范源濂因教育界经费风潮去职，任遂辞去教育部职。

1920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任鸿隽与陈衡哲结婚[(14)]。陈长于西洋史，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也是颇有个性和见地的女学者，对任鸿隽的事业帮助颇多。

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江苏南通举行第七次年会，修订社章，增设理事会以负责经常工作，原董事会则主持科研方针和募集资金。年会选举张謇、蔡元培、梁启超、马良、汪兆铭、熊希龄、严修、范源濂、胡敦复九人为第一任董事，选举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十一人为第一届理事，任鸿隽为理事长。同年冬，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3年任去南京，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1925年春因不满学校两派斗争而辞职，专心著述《科学概论》一书。8月到北京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此后继而任秘书长、副干事长、干事长直至1935年。1927年蔡元培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大学院院长，并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15)]，任鸿隽积极参与筹建工作，并担任大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16)]。1929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至1931年去职。

1935年9月，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12月全家迁居成都，陈

衡哲亦在川大任西洋史教授。陈一贯同情被压迫的妇女，而目睹大学女生中不少人系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便在成都《新新新闻》著文抨击，认为这是对妇女的侮辱，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四川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并在《独立评论》上连续撰文，对当地政治和社会情况进行激烈的批评。陈因此受到攻击，被迫离开川大返回北平[(17)]。1937年6月，任鸿隽也辞去川大校长职务，回北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编译委员会委员长。7月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次年7月，任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年底，应蔡元培之邀，到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化学研究所所长和评议员等职。1941年冬，中央研究院迁至重庆，翌年任鸿隽辞去中央研究院的职务，再次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干事长。这时中基会、中国科学社组织机构和《科学》杂志均迁至四川重庆的北碚。1944年1月，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改为监委会，任鸿隽继任社长、监委会书记，以及理事会会长、临时编委会委员和特约撰稿通讯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同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返回上海。1946年任鸿隽再度赴美考察，次年春回国后定居上海，致力于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联合发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先组织筹备委员会，任鸿隽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这个会议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任鸿隽被选为全国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委员。任鸿隽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次会议，他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于科学事业是很重视的，认为“此后的科学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18)]。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配合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他召集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经讨论决定将当时该社主办的几项事业先后移交给人民政府或国家的其他科学组织。1951年将《科学》月刊与《自然科学》合并，由全国科联主办刊行；1953

年将《科学画报》交上海科学普及协会继续刊行；1954年将生物研究所移交给中国科学院；1956年将明复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组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1956年到1957年间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所属印刷厂合并给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给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合并给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最后，在1959年秋，由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提议，并得到全体社员同意，将科学社拥有的房屋、财产、书籍、设备等，全部捐献给国家。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社宣告结束，完成了历史使命。

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科学》杂志也是我国创刊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期刊，它对传播现代科技知识、推动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训练造就科学人才和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科学社四十五年的历史中，任鸿隽不仅是发起人之一，并且是始终致力于中国科学社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建国后，任鸿隽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1958年该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他继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技协会副主席等职。1961年11月9日，任鸿隽在上海病逝，终年七十五岁。

任鸿隽的著作和译著颇多，粗略统计，文章有二百多篇，主要发表于《科学》、《东方杂志》、《新教育》、《教育杂志》、《建设》、《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青年》、《留美学生季报》、《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英文版）等刊物。内容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科学发展史、科学家传记等。他很重视科学对于国家发展的巨大作用，写了很多宣传科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的文章。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学概论》，译作有《教育论》、《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大宇宙与小宇宙》、《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还有与李珩、吴学周合译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与胡明复等人合译的《汉译科学大纲》等。任鸿隽也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他的文章，特别是古体诗很见功夫，除散见于报纸杂志之外，还选有《古青纪游

诗》等。

---

(1) 任秋苹曾入四川总督吴棠戎幕，任四川盐运使。

(2) 任鸿年（1888—1913），字季彭，别字百一，同盟会会员，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宋教仁案件后，对资产阶级革命失去信心，投井自杀。遗绝命书七百余言。

(3) 杨小佛：《杨杏佛事略》，《人物》1982年第1期。

(4) 喻培伦（1886—1911），字云纪，四川内江人。日本千叶医学校留学生。1908年经吴玉章介绍参加同盟会。曾专力制造炸弹。1911年广州起义中，奋勇当先，弹尽被俘，英勇就义。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吴玉章：《辛亥革命》；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

(5) 任鸿隽：《五十自述》（手抄本，藏于其女任以都处）；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6) 任鸿隽：《前尘琐记》，《传记文学》第26卷第2期。

(7) 任鸿隽：《记为蜀军返川向湖北军政府借道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8) 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9)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1)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 任鸿隽：《五十自述》（手抄本，藏于其女任以都处）；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14) 陈衡哲1919年毕业于美国瓦塞学院，因成绩优秀，获得瓦塞奖学金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1920年获硕士学位。1916年夏，陈在纽约伊萨卡度假时与任鸿隽相识。

(15)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

(16)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版。

(17) ［美］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1卷“陈衡哲”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任可澄

李双璧

任可澄，原名文嵘，字志清，号匏叟。贵州安顺人。1879年1月14日（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一个有五百年谱牒可稽的官宦家庭里。

任可澄幼时受传统教育，“未冠入泮，蜚声庠序”[(1)]。1902年中举。次年，考取内阁中书，在北京做了一年多的闲官，后以升迁无望，报丁忧回籍。

时值清廷倡言改革，任可澄约同贵阳巨绅唐尔镛、徐天叙兴办了“贵州官立师范传习所”，为贵州的新式教育培养了第一批小学师资。1905年以后，他又与唐尔镛、华之鸿等人创办了“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和“宪群法政学堂”等新式学校。在“通省公立中学堂”里，任可澄担任堂长并主讲国文、史地、读经等课程。任可澄热心教育事业，为他在社会上赢得了较高声誉。1907年他当上了旨在发展贵州教育的“贵州黔学总会”会长。

在政治立场上，任可澄坚定地站在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一边。他通过在日本留学的陈国祥、蹇念益等贵州同乡，和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建立了联系，并联络了一批与他们有共同政治主张的士绅，于1909年10月成立了“贵州宪政预备会”，任可澄是这个组织的会长。他们先后发行了《黔报》、《贵州公报》，主张变革，鼓吹立宪。

任可澄和他所领导的“宪政预备会”在省谘议局选举以及教育总会会长的任命等问题上与另一主张立宪的激进组织“自治学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自治学社”日趋倾向革命。任可澄为了

阻挠革命的发动，曾使用攻讦、告密的手段诬陷自治学社，并向清政府秘递该组织负责人名单，以便官府按名捕拿，只是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才使这一图谋未能得逞。

云南“重九”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任可澄见贵州革命派也在积极准备发动革命，遂惊呼：“小人得志，我辈无噍类矣！”[(2)] 他向巡抚沈瑜庆献计，电召兴义土豪即西路巡防营管带刘显世“募土著五百人，星夜来省，以资捍卫”[(3)]，沈采纳了他的计划。自治学社为了实现“不流血的革命”，主动向“宪政预备会”提出“携手合作”的建议。两派领导人遂于1911年11月2日集议，敦劝巡抚沈瑜庆反正。可是，任可澄却向沈瑜庆另提出“既不保清，亦不革命，集中力量，以图自保”[(4)] 的主张，要求沈瑜庆效法江苏程德全，做“半独立”的表示，任的这一活动，遭到革命党人坚决反对。

农历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晚，自治学社联合陆小学生和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革命党人推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新军排长赵德全为副都督，“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为枢密院长，任可澄也被邀担任枢密院副院长，“宪政派”的重要成员也大都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然而，两派合作的历史甚为短暂，不久，任可澄即举荐刘显世参加新政府，担任军事股长一职。任可澄和刘显世还假借枢密院的名义，致电云南都督蔡锷，请蔡指派在滇的贵州立宪党人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另外，在政府各部门，任亦处处安插党徒，以致实权尽入其手。不仅如此，任可澄还扶持退职官僚和守旧乡绅郭重光等人组织了“耆老会”，从事破坏新政权的活动。任可澄、郭重光等人密议，由宪政派重要成员何麟书出面组织“尚武社”等所谓“五大社团”，倡开公口（即会党），扰乱秩序。他们反过来又将“公口林立”、“全黔糜烂无完土”的罪名加在革命派的头上，以此作为请滇军入黔平乱的借口。对任可澄在光复后的种种行为，革命派中一部分人曾向枢密院长张百麟提出“不去可澄必有后患”的警告[(5)]，但张百麟等人未采取防范措施。

在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立宪党人的请求下，云南派兵“援黔”。1912年3月1日，唐继尧率滇军到达贵阳，3日，贵州军政府即被颠覆。在唐继尧为都督的“军政府”里，任可澄担任了参赞兼秘书长的要职，“同时，任可澄对自治派大肆报复，不特贵阳，就是各县曾与自治派有关的人士，宪政派的分子也假任可澄的势力要求地方官搜捕，而地方官不敢不办”[(6)]。任可澄的所为，获得袁世凯的好感。1913年任被任命为黔东观察使，次年春被举为袁记约法会议的议员，6月任镇远道尹，8月升任云南巡按使。

1915年8月，“筹安会”策动拥袁复辟帝制。12月，袁政府的法制局要求各地明确表态，时任云南巡按使的任可澄当即召集省中绅商著名人物开会，谋划拥戴事宜。因赴会者寥寥，使任大为气沮，只好草草收场。事后，任可澄又亲拟奏稿，准备会同唐继尧等人奏报劝进情形，但滇中反对帝制的声浪已经很高，任可澄不得已乃以其个人名义电呈袁世凯，用涕泣而谏的语气请袁不必称帝。蔡锷返滇后，云南正式宣布讨袁，迫于形势，任可澄只好加入了护国讨袁的行列[(7)]。在1915年12月25日的“独立”通电中，任忝列其名，但由于任可澄在云南起义前有劝进的举动，护国军中有些将领对他是不信任的。尽管如此，任可澄在护国战争中“躬治军书，所为文檄，遐迩传诵”[(8)]，为护国运动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护国运动结束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于1916年7月任命任可澄为云南省长。任可澄发出通告准备就职，不料云南将领联名指斥他在帝制初期有劝进行为，不能服众，他只好以脑病复发为由，离开云南，回到贵州主持贵州通志局，编修《贵州通志》。

作为一个有声望的退职官僚，任可澄受到了贵州各派政治势力的重视。贵州兴义系军阀“新派”首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和乃兄、时任国会议员的王伯群，于1919年初创议成立了贵州政治会议，以商讨贵州政治改革问题为名义，从事夺取刘显世等“旧派”的统治权的准备活动。他们推举任可澄担任这个组织的会长。由于刘显世表示宁死也不

肯交出军政两权，政治会议很快就流产了。当时，兴义系内部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呈白热化状态，任可澄为避祸，迁居于安顺老家。1920年11月初，“新派”重要骨干何应钦、谷正伦等人发动了“民九事变”，刘显世被逼下台。时任督军署参谋长兼警察厅长的何应钦派人到安顺找来了任可澄，并策动省议会推举任为临时省长。任深知兴义系两派斗争的内情，不愿再卷入政潮中去，遂于事变数日后潜离贵阳，回到安顺。1922年夏，兴义系“旧派”军事头目袁祖铭在武汉组织“定黔军”，迅速平定了“民九事变”后出现的何、谷“五旅之乱”，分化了谷部团长彭汉章、王天培，驱走了何应钦、谷正伦，恢复了兴义系“旧派”的军阀统治。袁祖铭为借重任可澄的声望，致函任可澄，请他出任省长一职，期许他“综理自治事宜，部署全局，改进一切”[(9)]，任亦婉辞未就。

其后，任可澄一直致力于《贵州通志》的撰修，而在政治上，则更趋于保守。1925年2月，他以云南代表的身份列席了段祺瑞执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当北伐军兴以及袁祖铭已就职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之际，他还在袁面前“力陈拥吴（吴佩孚）之利”，他“强聒不舍，凡革命军之优点，概从掩蔽，且诬为赤化，盛张吴佩孚之形势”[(10)]。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任仍没有从北洋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1926年6月，他还在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杜锡珪内阁里当了半年教育总长。

此后，任可澄僦居北京，“日惟摩挲故纸自娱，仅赖及门生资济，常时不给”[(11)]。在他的后半生中，曾于1935年8月担任过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于1937年担任过云贵监察使等闲职，其余大部分时间均用于《贵州通志》的主编和其他著述。

1946年11月，任可澄因脑溢血逝于昆明[(12)]。他除了主持编修《贵州通志》，并撰写其中的《前事志》外，还有《牂牁江考正》、《读史脞录》、《且同亭笔记》、《续夏曾佑〈中国历史〉宋元明清编》、《黔语》、《藏山堂诗文词稿》等著作。

(1) 白之瀚：《代任泰撰任公志清事略》，《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1949年），第113页。

(2)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3) 白之瀚：《代任泰撰任公志清事略》，《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1949年），第113页。

(4)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5页。

(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9页。

(6)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72、75页。

(7) 李子辉：《任可澄为袁世凯所作的帝制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79年版，第60页。《贵州政报》民国十一年（1922年）七月下旬，第6号。

(8) 白之瀚：《代任泰撰任公志清事略》，《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1949年），第113页。

(9)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9页。

(10)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9页。

(11) 白之瀚：《代任泰撰任公志清事略》，《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1949年），第113页。

(12) 白之瀚：《代任泰撰任公志清事略》，《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1949年），第113页。

任援道

朱佩禧

任援道，字良材，又名亮才，号豁庵。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城西大街永宁巷进士第任家[1]。任家是宜兴望族，先祖在清代累有功名，北洋时期还有不少政界要员。

任援道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2]。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先后担任汉口学生军总指挥、汉阳军队后勤服务主任、第二混成旅指挥官。1913年，他担任上海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后投靠叔父任凤苞，担任天津造币厂总务科长。后在江西督军蔡成勋那里当江西银号督办，任湖南军阀唐生智的天津交际处处长。其后任山东兵工厂厂长、津浦路北段交通司令和京汉路警备司令。1929年6月25日，蒋介石过天津，当面嘱咐唐生智的交际处长任援道，电邀唐生智到北平与蒋会谈。26日，唐生智果真从河南北上，到北平与蒋介石会面[3]。

1935年12月，任援道任冀察政务外交委员会外交委员（宋哲元为委员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援道投敌当了汉奸。1938年3月，出任梁鸿志组织的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即伪保安部长[4]。1939年4月和5月，任分别担任绥靖军官学校和绥靖军水巡学校的校长，两校学生成为“绥靖军”的基础。6月，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政府。8月，日本关东军土肥原在天津、北平与任道援会晤[5]。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二百四十多人参加，任道援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0年，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王克敏青岛会谈，会谈结束后即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并出任委员、“警卫组长”职务。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援道担任汪

伪“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下辖七个师和一个独立团。无论在维新政府还是汪伪政权，任援道都是实力派人物。

1940年4月4日，任援道在南京设立总司令部，设立南京、湖州、杭州、庐州、蚌埠、苏州、芜湖七个绥靖区，并在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原址成立“绥靖军官学校”，培养绥靖军中、下级军官，任援道兼任校长[(6)]。4月27日，任援道在南京召开绥靖区司令会议，以上七个绥靖区司令徐朴诚、程万军等出席，28日会议结束。

任援道在汪伪政权先后任伪职有十三项之多，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主席），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确立了他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其中，任伪海军部长一职，反映出汪伪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本质。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其行政院下设海军部，体制和编制基本仿照原国民政府海军部，但是多设了一个顾问室，由日本海军少将级军官充任顾问，几名军官任助理，一切部务须经顾问室同意后才能实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野村中将通过中国留日海军军官李慧济，征求伪海军联谊社成员郑世璋、黄勋、何传滋、曾伟等人对部长人选的意见[(7)]。他们以为以前海军部军械司少将司长林献炘为适宜人选[(8)]。但林献炘称病婉辞，于是李慧济等人又推荐前海政司少将司长许继祥[(9)]。但日伪都不满意，这主要是伪政权内部陈璧君的公馆派与周佛海之间争权夺利所致。公馆派坚持海军部长一职由陈璧君的妹夫褚民谊担任。褚是留法医学专业，与海军素无关系，周佛海坚决反对。公馆派也反对改派其他人。双方互不退让。

1940年3月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海军部长人选仍没有选出，只得决定由汪精卫兼任部长，凌霄任政务次长，许继祥任常务次长。伪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得知海军部长一职尚

缺，即积极活动，得到日本海军顾问寺冈谨平、冲野中佐的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任援道又派徐沛（烟台海军学校第九届航海生）向李慧济、郑世璋等联谊社成员疏通，允诺到职后在部中给予他们职位。5月30日，伪政府特派任援道兼海军部长。6月5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任命姜西园为海军政务次长兼中央海军学校校长[(10)]。

1942年8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调整军事委员会机构案》，将军政部（改陆军部）、海军部改隶属军委会。当时担任军事参议院代理院长任援道继续担任海军部长，辞去军事参议院院长这一兼职[(11)]。他改组军事机关，设参谋总长（刘郁芬），辖管陆军、海军的两名参谋次长（许建廷为海军部次长），同时还任命萨福畴为海军部次长。1944年11月，汪伪政府调整军事机构，任援道改任伪江苏省省长，由凌霄代理海军部（1945年1月15日任部长）。1945年3月8日，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941年5月，汪伪政权开始“清乡”，任援道作为汪伪“清乡委员会”的委员，推荐儿子任祖萱为清乡委员会中的“招抚整编委员会”委员。任祖萱在江苏为非作歹，在许多交通要冲设卡收税，临时征收捐税。1942年6月1日，任援道陪同褚民谊，代表伪中华民国政府访问日本，觐见日本天皇裕仁，并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11月24日，任援道担任海军检阅使，定期向各检阅委员下令，同赴广州实施检阅海军部所属各机关舰艇部队的军风军纪[(12)]。12月15日，任完成对长江下游一带的海军检阅，即赴广州检阅要港部队所辖各舰艇及各基地部队[(13)]。

1943年，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任援道与就近的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建立了联系。2月23日，海军第二届高级干部讲习班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有二十多人，由各地调集。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派任援道致训词，他提出三点勖勉：一、各爱其国；二、互爱其邻；三、共爱东亚。要求海军高级干部忠实恪遵，在受训完成

后尤其须在实际工作积极表现[14]。2月23日下午，任援道携海军部次长招桂章、中央海军学校校长姜西园、威海卫司令鲍一民驱车至虹口方面与吉田将军会谈[15]。4月29日，任援道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前往皖中、合肥等地驻军检阅第四师防务暨训练装备事宜，经过芜湖，返回南京[16]。5月21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被美军炸死在太平洋，任援道发表了悼念谈话，认为山本元帅的战死是壮烈的牺牲等[17]。5月27日，日本第三十八个海军节，在南京举行演讲会上，任援道、寺冈顾问发表演说，任援道希望日本海军在中国海军新兴途中给予指导与协助，并共同担任保卫东亚太平洋的任务。演说会还放映了电影《夏威夷影片》、《马来战记》、《中国海军建设》等[18]。8月5日，在新国民运动公务人员和青少年学员两集训营上，任援道应邀作了特别演讲，题为《中国新海军之建设》，阐述了中国海军的历史、军校学生之生活及海军对国家之重要性等内容[19]。10月27日，任援道到无锡视察炮艇队[20]。12月2日，任援道对太平洋战役中日本的海空军表现发表谈话称“赫赫战果”[21]。12月6日，任在国立中央大学受邀发表演讲，题为《战时大学生》，对于战时大学生应负之使命及应有之抱负进行了阐释[22]。

1944年11月10日，任援道接任江苏省省长兼驻苏绥靖主任。1945年3月15日，任抵达上海，上海市商会、市政咨询委员会、市民福利协会、中国新闻协会上海区分会等六个团体举行欢迎茶话会。任援道在会上发表谈话，具体介绍在江苏省四个多月来的施政概况[23]。其中，治安和生产方面，江苏省现辖二十三个县，去年产出稻米约两千多万担，麦五百万担，其他杂粮大豆均有大量收成，可谓是江南鱼米之乡，米粮提供给米统会采购；财政与税赋，田赋征收实物，省库盈收；教育与建设也在不断改进管理等[24]。1945年5月27日，任援道为答谢上海市市政当局及工商界、金融界举办江苏农贷，宴请各界领袖，包括周作民、唐寿民、吴震修和上海市市政当局秘书长及各局处长。任援道致辞感谢，此次农贷十分成功，实际上对于帮助江苏省农民，而粮食丰收间接也帮助了上海自身，粮价稳定，市面安定

[2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南京政府作鸟兽散。由于任援道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苏、浙、皖三省总指挥陶广的建议，率军归顺重庆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南京和苏州一带治安，所有伪司令官原统辖之军警、保安团队统归其指挥[26]。后来，担心自己失去使用价值后，会遭到惩罚，于是，以二百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前往香港，在九龙弥敦道中段热闹市口开了一家酒楼。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又觉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举家远飞加拿大定居，不问世事。1980年病逝加拿大。

主要参考资料

汤虎君：《汪伪巨奸任援道》，《钟山风雨》2002年第3期。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汪伪政府海军部长任援道的简历》，敌伪政治档案案卷，1940年6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U38—2—80。

《金城银行关于伪军认借款、应酬、请托、宗教、请求资助介绍职业等事项吴蕴斋与日部长本芳太郎及汉奸梅思平、孙良诚等有关方面来往文书》，1945年，上海市档案馆，Q264—1—1292。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国海军的兴衰》（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调查部第六课编：《新国民政府名人鉴》（昭和十五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REEL No．調—0024—0107。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1) 一说1891年出生，清光绪十七年。

(2) 尤文远、马志祥编：《保定军校千名将领录》，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54页。

(3) 《蒋暂不招待使团，唐方任将赴平晤蒋》，《申报》1929年6月27日。

(4) 《申报》1938年3月29日。

(5) 《土肥原在津会晤任逆》，《申报》1938年8月12日。

(6) U38—2—80，上海市档案馆敌伪政治档案案卷，法帝警关于任援道和姜西园的简历。

(7) 李慧济，烟台海军学校第十八届航海生。伪海军联谊社系由留沪海军军官组成。郑世璋、黄勋、何传滋、曾伟为烟台海军学校第六届航海生。

(8) 林献炘，留德学生，黄埔海军学校第八届航海生。

(9) 许继祥，船政学堂第十二届航海生。

(10) 姜西园，烟台海军学校第十五届航海生。

(11) 《任援道改组军事机关》，《申报》1942年8月21日、9月25日。

(12) 《任援道为海军校阅使》，《申报》1942年11月25日。

(13) 《任援道赴粤检阅海军》，《申报》1942年12月16日。

(14) 《海军二届海军高级干部讲习班举行开学典礼》，《申报》1943年2月23日。

(15) 《海长任援道等访问日航司令》，《申报》1943年2月24日。

(16) 《任援道前往巡视皖中、合肥等地》，《申报》1943年4月30日。

(17) 《任海长悼山本大将》，《申报》1943年5月22日。

(18) 《纪念日本海军节，京市昨举行演讲会》，《申报》1943年5月30日。

(19) 《任海长昨莅临暑训练营》，《申报》1943年8月6日。

(20) 《任海长莅锡视察炮艇队》，《申报》1943年10月27日。

(21) 《对太平洋战役任海长发表谈话，盛赞盟邦海空军赫赫战果》，

《申报》1943年12月2日。

(22) 《任海长在中大演讲》，《申报》1943年12月7日。

(23) 《任省长莅沪谈江苏省政设施概况》，《申报》1945年3月15日。

(24) 《任省长莅沪谈江苏省政设施概况》，《申报》1945年3月15日。

(25) 《任省长莅沪宴请各界领袖》，《申报》1945年5月27日。

(26) 《申报》1945年8月18日。

任卓宣

马宣伟

任卓宣，又名任后彰，笔名叶青。四川南充县三会乡人，生于1896年4月1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六）。父亲务农，家境贫寒。读完私塾，入七宝寺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考入南充中学，得族人资助，始能完成四年学业。中学毕业后，到七宝寺高等小学教书半年。1919年进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读书。次年经张澜推荐公费赴法勤工俭学。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发生经济危机，民生凋敝随处可见，工人生活尤其困难。任卓宣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深有感受，有所感触，便创办《赤光》杂志，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并把《赤光》杂志寄回家乡，传播革命思想。这时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留法学生激于义愤，6月21日约集华侨学生百余名，到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抗议，任卓宣为总代表。24日，任卓宣被法国警察总厅逮捕，拘禁四个月始获释放，后被驱逐出境。他转经德国、波兰到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任卓宣从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两广区委宣传部长。1927年冬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时，在长沙被捕叛变，还和敌特一起在长沙市逮捕了贺龙的姐姐。1928年3月潜回成都，匿居成都大学，投靠校长张澜。任卓宣曾向中共川西特委写了长信，讲述他的出身、学习和工作情况，更多地为他第二次被捕叛变辩解，还要求与特委主要负责人谈话，要求与党建立联系。特委书记刘披云从中共中央通报上得知任卓宣已经叛变，未加理睬。不久，成都大学校长张澜请任卓宣主编《科学思想》旬刊，以介绍科学方法以及启发青年思想为办刊宗旨。

1930年，任卓宣由成都赴上海，参与川军第二十八军旅长陈离出资创办的辛垦书店，主编《二十世纪》月刊与《研究与批判》等刊物。他出版的著作有《胡适批判》和《张东荪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论纲研究》等书。另外还编辑出版《哲学论战》、《黑格尔》、《新哲学论战集》等。辛垦书店停办后，任卓宣投靠了陈立夫、陈果夫。

1935年7月，任卓宣与尉素秋结婚。随后与郑学稼等人创办真理出版社，继续搞反共反苏宣传。任卓宣出版了《伦理学问题》、《救国哲学》、《为发展新哲学而战》等书。

1938年1月，任卓宣应留苏同学、四川同乡、复兴社头目康泽的邀请，到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和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担任高级教官，主讲《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他公开提出中国革命之理论：既非斯大林之阶段论，亦非托洛斯基之不断革命论，实乃孙中山之一次革命论，即“举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这期间，他除出版《抗战底根本问题》一书外，还创办了《抗战响导》。1939年4月在重庆创刊《时代思潮》等刊物。任卓宣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和各种政策，他把刊物办成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喉舌。并与陈独秀、郑学稼联合一致，发表反对中共的文章。

1940年4月，任卓宣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邀请，到江西中正大学任教，并任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常委兼第一专门委员会主任。他出版了《中国不可征服》、《中国民族之伟大》、《统一与民主》、《从民主到宪政》、《三民主义底哲学基础》、《毛泽东批判》等反共著作。

1942年日军占领江西，任卓宣转赴重庆，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及朝阳学院

教授。他还主编《组织旬刊》、《政治响导》等刊物，尽力吹捧蒋介石，为国民党效力。1945年5月出席国民党“六大”，当选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任卓宣随张继代表国民政府宣慰华北五省。他到北平后，在各大专院校对青年发表攻击中共及苏联政府的演讲。1946年11月，作为代表出席“制宪国民大会”。1949年春，蒋介石在奉化召见任卓宣时问及对中共作战失败的原因，任卓宣答：“未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尤以耕者有其田政策之落空，致使广大农民终为共产党之驱策。”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同年5月，任卓宣奉命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他奔波于台北、广州、重庆、海南之间，竭力拉拢反共势力，以图挽救蒋家王朝。

任卓宣于1949年底随蒋介石集团撤退台湾。1951年，他接受蒋经国的邀请，任政工干部学校教授，主讲《三民主义研究》、《共党理论批判》、《三民主义与其它主义比较》等课。1968年，国民党在台北设立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任卓宣任所长。1974年，任卓宣届龄退休，获台湾政府所颁云麾勋章。他除在研究所继续任教授外，还在台大、政大、师大、文大及司法官训练所和军法学校等校授课。任卓宣到台湾后除致力于三民主义与孔孟学说的研究外，还创建和协办了“中国文艺协会”、“国父遗教研究会”、“五权宪法学会”、“中国经济建设研究会”、“中国土地改革协会”等团体。还发行《革命思想》、《政治评论》、《中国经济评话》、《土地改革》和《战斗周刊》等杂志。他自叛变投入蒋介石集团后，以宣传“三民主义”和反共思想为职志，发表了两千五百多篇文章，出书一百多部，总字数达两千余万字。

1990年1月28日，任卓宣在台北中和寓所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刘披云同志回忆在四川地下党工作情况谈话纪要》、《任伯戈

同志论大革命时代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分别载《四川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1981年第1期。

台湾高雄四川同乡会年刊资料室提供资料。

林铭章稿：《任卓宣》，《传记文学》第56卷第5期，第132—134页。

《任卓宣评传》，（台北）帕米尔书店1965年版。

《任卓宣评传续集》，（台北）帕米尔书店1975年版。

容闳

李希泌

容闳，字纯甫，1828年（清道光八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境距澳门四五里的彼多罗岛上南屏村（今属珠海市）。其父和岛上居民均靠种地捕鱼为生。容闳兄弟姐妹四人，全家六口，生活十分困难。

1835年容闳七岁时，被父亲送到澳门一所德国女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夫人办的小学，学习英文。不久，学校停办，容闳失学回家。1839年，美国传教士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门正式建立玛礼逊学校，1841年勃朗把容闳找回去继续学习。次年，容闳随学校一起迁到被英国割占的香港。

1847年，勃朗辞职回国，他挑选了容闳和另外两名中国学生王宽和黄胜去美国学习，准备培养他们成为传教士。1849年，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毕业。他在中学学习期间，阅读了英国著名文学家莎士比亚等人的文集和政治家卓伯斯特的演说辞，他的英文具有较好的基础。接着，他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妇女协会的资助下，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于该校。同期毕业生有九十八人，他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学生。这时，容在美国已居住了八年，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染，并已取得了美国的国籍，后来还娶了美国妻子。但当他看到外国殖民者加紧侵略中国，清朝政府贪污腐败，中国人民过着啼饥号寒的贫困生活时，他内心无法平静。容闳慨然发誓："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1)

容闳本想在美国继续深造，学习工程专科，可是资助他求学的教会急于希望他早日回中国传教。容遂于1854年11月启程回国，先在

美国代理公使派克（Peter Parker）[2] 处担任书记。三个月后，他辞职前去香港充当高等审判厅译员，同时学习法律，准备当律师，可是受到英国律师的排挤，使他在香港不能立足。他于1856年秋到了上海，在江海关翻译处担任通事。容闳发现海关其他通事和船商相互勾结，贪污走私，海关的华员没有升到总税务司职位的希望，遂辞职而去，从事翻译业务。由于他的译文准确流畅，使他在买办与洋人中间声誉噪起。

1859年3月，容闳受洋商宝顺公司的委托，到产茶区调查装茶情形。他从上海乘船，顺运河转入长江，历苏、浙、赣、湘、鄂五省，一直到了汉口，调查和了解茶叶的制造及装运出口的方法。1860年，容闳应曾兰生和两个美国传教士邀约，访问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他想乘此机会了解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同年11月18日到达天京，干王洪仁玕两次接见他们。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容闳在香港时已和洪相识，容向洪仁玕提出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七项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当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正忙于作战，没有时间研究容闳的建议，但很器重容闳，想把他留下，曾封他第四等义字的爵号。容闳和他的同伴对太平天国能否成功都没有信心，他亲自去向洪仁玕告别并辞谢给他的封爵，只要了一张在太平军占领区自由通行的护照后返回上海。

1861年，容闳利用洪仁玕给他的护照，受一家洋行的委托，带了几万两银子从芜湖乘船深入到安徽太平县的山区收购茶叶，历时半年，共收购茶叶六万五千箱，运往上海。因茶叶生意有利可图，他在九江设立事务所，专做茶叶经理人。不久发觉以经商所得来振兴国家的想法难以实现，遂罢。

1863年，容闳通过曾国藩的幕僚李善兰等人的介绍，在安庆见到了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首领曾国藩。他向曾国藩建议开办机器厂，制造各种机器，然后再用这些机器装备制造枪炮、造船等厂。他的建议，与曾国藩开设工厂自造坚船利炮的办洋务打算不谋而合。

曾委派他出洋购办机器，并赏给他五品军功的头衔。容闳领了六万八千两银子，到美国向朴德南公司订购了机器。1865年春，机器装运回国，在上海高昌庙创建江南制造总局，专门制造枪炮、弹药、火轮等。这是清朝洋务派最早兴办的军事工业。容闳因建厂有功，清朝政府赏给他五品候补同知的衔头，并任他为江南布政使署的译员。在此期间，容闳曾翻译哥尔顿所著《地文学》和派森所著《契约论》。

1868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先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陪曾参观了从美国进口各种机器的开动情况和产品制作程序，曾颇为赞赏。容闳乘机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曾予以批准。容闳认为兵工学校的成立是他的“教育计划”小试其锋，鼓舞了他把“教育计划”付诸实施的勇气。他的“教育计划”由他“交颇投契”的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容闳在“教育计划”中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3)]。其时，文祥居丧，不能参与政事，他的留学计划搁浅。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去天津办理此案。丁日昌电邀容闳赴津担任译员。容闳待办案完毕，乘机请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他的教育计划，并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赞许与支持。曾、李联衔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4)] 同年冬，清政府批准了曾、李派遣幼童留学的奏折。曾当即约容闳到南京共商派送出洋学生的名额、学习年限、留学经费以及设立预备学校等事项。次年7月，他们制定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上奏清政府，章程中规定：留学生名额为一百二十名，分为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国；学生年龄十二岁至十五岁；挑选学生的条件，不分满人或汉人，必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师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进学校学过英文的，加试英文；考试合格后，必须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一年中西文，然后派送出国；在学生未出洋以前，学生的父兄必须在“出洋志愿书”上签字，写明他的子

弟在出国留学期间，如有疾病或者意外事件，清朝政府概不负责；学生留学费用及出国的服装等，全部由清政府供给。章程中还规定了学生学习汉文的书目，宣讲礼教的次数以及遥向清朝皇帝叩头的日期等等。

清政府决定成立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与容闳为正副监督；又成立预备学校于上海，由曾国藩的幕僚刘开成任校长。该校先在上海招生，因所招学生不满第一批定额，容闳亲赴香港招生。詹天佑就是在香港报考而被录取的幼童[(5)]。第一批录取的学生于1872年3月到沪进预备学校补习中英文，同年7月由陈兰彬率领启程赴美，时容闳已先去美国安置学生们的入学、住宿等事项。容闳先在美国的斯布林菲尔设立留学生事务所，并于1874年在哈特福德的克林街建筑一幢坚固壮丽的楼房，准备做留学生事务所的永久所址。

1873年春，容闳为引进美国的新式军械格林特炮，而返国一行。当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时，适秘鲁派专使来招募华工。李派容闳与秘鲁专使进行谈判。他向李报告秘鲁与古巴等国奴隶般地虐待华工的情况，李派他去秘鲁，派陈兰彬去古巴调查华工情况。他和陈兰彬均有调查报告书寄给李鸿章。容闳的报告书中附有华工背部受笞被烙的伤痕斑斑的相片二十四张。秘鲁专使初对虐待华工矢口否认，后来看到这些相片，噤不能声，垂头丧气而去。清政府遂将华工出洋定为禁令。

1875年秋，留美幼童最后一批三十人送到美国。不久，清政府发表派陈兰彬与容闳为驻美正副公使。容闳为了专心进行他的“教育计划”，请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免去其副公使职，仍专任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但未得准许。次年，陈兰彬以全权公使的身份来美国，吴子登继任监督。吴认为中国派送留学生是背经叛道的举动，和陈兰彬勾结起来破坏留学生计划。吴还暗中打报告给清政府，说留学生仿效美国人参加或组织各种秘密结社，甚至信仰了“番教”。吴建议清政府必须从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时逢美国盛行反对华工以

及宣传种族歧视的舆论，背信弃义地破坏了1868年和中国签订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中美《勃林加姆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命令留美学生返国，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1881年，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生全部回国，其中仅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在美国获得了学位，其他都是半途而废，容闳的“教育计划”从此夭折。

1881年，容闳驻美副公使任期届满，回北京销差。他曾条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禁止输入和种植鸦片，未被采纳。不久闻其妻患病，遂于1883年再去美国。1886年其妻病故。此时容闳对清政府和洋务运动颇为失望。

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据说“合众”二字是容闳向孙中山建议的。他对孙中山说：“做皇帝不成功，洪王其前车也。莫如用合众二字号召。孙先生从之。”(6)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自美国接连写了两封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建议向英国借款一千五百万英镑，购买铁甲舰三四艘，雇用洋兵五千名，由太平洋抄袭日本的后路，使日本腹背受敌。张之洞看到容闳给蔡的信后，立即电令容闳去英国接洽借款。容闳即赴伦敦接洽借款，但由于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正向日本乞和，同时容主张以关税作为借款抵押，李鸿章与总税务司赫德均不同意，借款交涉终于流产。容应张之洞的邀约，再度回国。时张调署两江总督，他向张提出实行新政的建议，张未予采纳，给了他一个江南交涉使的挂名差使，他到任三个月便辞去了。

1896年，容闳打算创立中国国家银行，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的支持，并邀请他到北京草拟章程。章程中规定由清政府预筹开办费一千万两，供银行开办后第一年之用。户部尚书翁同龢看到章程后，与张荫桓的意见一致，并奏请光绪帝批准。他们积极进行集

资与购地建筑银行行址等筹备工作，并委托容闳去美国考察银行业务。这时，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盛宣怀闻知此事，立即带了三十万两银子到北京，贿赂有关人员，阻止国家银行的成立。后来连预筹的开办费一千万两也被盛挪去开办中国银行。容闳愤慨地指出中国上自慈禧，下至官吏，无一不以贿赂办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目的”[(7)]。

1898年，容闳打算组织铁路公司，修建天津到镇江共长五百英里的津镇铁路，取得清政府批准给他的筑路权。此时德国声称在山东有筑路特权，不许津镇铁路通过山东。容闳修铁路的计划又以德国的阻挠和破坏而失败。容闳救国有心，但他提出的主张到处碰壁，他感慨地说：“余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8)]

容闳在北京筹办银行与铁路时，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容闳认为：“维新是中国政治存亡危急之机，澎湃而来的潮流，全世界人见此莫不惊奇，以为从未曾有。”同时他也认清慈禧无时不思窃取政权。他决定留在北京，以观究竟。维新党的领袖们经常在他的寓所讨论变法问题。1898年，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了戊戌政变。容闳被慈禧视为奸细，容闳逃到上海租界居住。他仍和维新党人有联系。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康、梁等人指使在上海的唐才常邀集当地社会名流约百余人，开“张园国会”，主张起兵“勤王”，清除后党，拥戴光绪帝执政。容闳在会上被选举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会上还通过了由容闳以英文起草、严复译为中文的对外宣言。会后，唐才常赶赴汉口，指挥自立军于8月24日起义，但唐在起义前一天被张之洞捕杀。清政府通电缉拿容闳就地正法。容被迫亡命香港。

1901年，容闳曾到台湾游历，见到日本驻台湾总督倪玉。倪玉邀

他去日本游历。他婉辞，仍回香港，随后即返美。

容闳回美国后，用英文写成自传体的《西学东渐记》一书，记载了他大半生的事迹，也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亲见亲闻。后由徐凤石与恽铁樵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于1991年经王蓁重译更名为《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由中华书局出版。

1912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曾写信给容闳，希望他回国参加工作。此时他已八十多岁，不堪长途跋涉的辛劳了。同年4月21日，他在美去世，临终前还谆谆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回国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服务，以替他尽报效祖国之心。

---

(1) 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2) 旧译伯驾。

(3) 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86—87页。

(4) 李鸿章：《论幼童出洋肄业函》，吴汝伦编录《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1，合肥李氏1921年版。

(5) 徐启恒、李希泌合著：《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6) 李根源：《雪生年录》，曲石精庐1934年排印。

(7) 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120页。

(8) 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121页。

荣宗敬　荣德生

江绍贞

荣宗敬（名宗锦）、荣德生（名宗铨）兄弟，江苏无锡人。宗敬生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德生生于1875年8月4日（清光绪元年七月初四）。其父荣熙泰，原在浙江乌镇一家铁冶坊当管账，1883年去广东，次年随候补知府朱仲甫在广东三水县等地厘金局和肇庆府衙门任总账。

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宗敬于十四岁时去上海，先后在南市铁锚厂及钱庄当学徒，期满后任职森泰蓉汇划字号，负责无锡、江阴、宜兴三地的汇兑收解。1894年因所在钱庄倒闭而归家。德生亦在十五岁时往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期满后于1893年随父去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

1895年，荣熙泰携德生回无锡。1896年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资本三千元，荣家出一半，派荣宗敬任经理，德生管正账。不久又设无锡分庄，德生任分庄经理。1898年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并兼营茧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混乱，粮食减产。荣氏兄弟见面粉北运免税，能获厚利，便与离职回乡的朱仲甫共同发起，在无锡开办保兴面粉厂。共集股三万九千元，荣氏兄弟从广生盈利中提取六千元入股，依靠朱仲甫在官场的活动，得到专利十年。保兴于1902年建成投产，初时仅有法国石磨四部，日出粉三百包，并无大利。次年朱仲甫退出，荣氏兄弟增资至二万四千元，再吸收买办张石君、祝兰舫等人的入股，共五万元，将保兴改组为茂新，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兼任批发经理。

1905年，荣氏兄弟又与买办荣瑞馨等人合股集资二十七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7年建成。起初振新实权在荣瑞馨手中，后董事会推德生任经理。荣宗敬还向买办张麟魁、荣瑞馨等人合办的裕大祥号投资。1908年该号投机亏损倒闭，宗敬动用广生钱庄资金赔补，致使广生停业。1909年，茂新因受外国面粉竞销的影响，亏损很大，各股东失去信心，纷纷将股出售，荣宗敬以低价买下十四股，增加设备，决心继续经营。

辛亥革命后，荣德生于1912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提出扩充纺织业等提案，想依靠北洋政府发展实业。同年，面粉营业好转，荣氏兄弟各出资一万元，与王禹卿等人集股四万元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其后两年，以福新盈利开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忙于战争，急需粮食，不但外粉在国内市场绝迹，而且国产面粉一度远销欧洲、南洋，荣氏粉厂获得厚利。于是荣氏用企业的盈利和日本银行所借的款项，进一步扩充营业。通过收买兼并，荣氏在无锡建立了茂新二厂，在上海建福新四、六两厂，并在汉口新建福新五厂。振新方面，由于股东间存在矛盾，荣氏遂于1915年退出。次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纱厂，荣宗敬自任总经理。1917年又收买恒昌源纱厂为申新二厂。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趁此时机做继续扩展企业的准备，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在无锡建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经过几年筹划，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茂新三厂、四厂。荣氏企业经过不断扩充，截至1922年止，面粉厂达到十二个，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的三分之一左右，被称为“面粉大王”。纱厂四个，拥有纱锭十三万余枚。自有资本一千万余元，二十年中增了二百余倍（但借入资本对自有资本的比例以1923年申新和福新为例，均在百分之一百七八十以上）。荣家企业体系大致形成。1921年成立茂新、福

新、申新总公司于上海，荣宗敬自任总经理，并在苏、浙、皖等省设棉麦采购和纱粉销售机构达十九处。荣氏凭借雄厚实力，操纵纱布、粉麦市场。

与此同时，荣宗敬当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荣德生也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于1918年和1921年先后当选江苏省议员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

1922年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荣家企业出现亏损。他们兴建大型面粉厂的计划被迫放弃。1922年初，荣宗敬即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以常年一分一厘五的高息，以及用申新一、二两厂全部财产作抵押的苛刻条件，借了三百五十万日金，以应付资金周转困难的状况。为加强竞争，荣德生于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代替工头管理生产，以及定出一整套现代科学管理的厂规和罚则，提高了生产效能。

在五卅运动和大规模的抵制外货高潮中，荣家企业扭转了亏损，转为盈利。荣宗敬还在外汇套购中获利，趁机兼并，增设了申新五、六两厂。在抵制外货运动中，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并在工人、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了罢市。但当上海租界当局对上海华商各厂以停电相威胁时，他代表纱厂联合会要求北洋政府设法使电气工人复工，并随虞洽卿等人接受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条件，迫使电气工人复工以换取工部局电气处供给电力。

北伐期间，荣宗敬、荣德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非常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1)]；荣德生则阻挠申新三厂工人迎接北伐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荣宗敬因不愿认购国民政府摊派的库券，被蒋介石下令通缉，并查封其财产。荣宗敬被迫屈服，以后逐渐向国民党政府靠拢。他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工商部参议、中央银

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与官僚资本加强联系，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取得政府的一些帮助。又得到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支持，以做押款的办法，先后收买东方、三新等纱厂，建立了申新七、八、九厂。1931年，申新发展到九个厂，拥有纱锭四十六万枚。

此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和国民政府的苛税，加上在投机事业上的亏蚀，总公司负债已达四千余万元，其中向中国、上海两行的借款，占借款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荣家企业面临危机。荣宗敬依靠美麦加工虽然获得一些利益，但远不能抵补亏损。他求助于英、美等国，建议向英国赊购纱锭，还想借用美麦美棉以及分沾国民政府的棉麦大借款，结果一一落空。1932年起，荣德生在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以提高劳动效率，也未能使经营得到好转。

到1934年6月，申新资产总值六千八百万元，而负债已逾六千三百万元，以致荣家各厂大部分被抵押。在银行停止放款，债主宣告收取旧欠的危机下，申新搁浅。荣德生去南京向行政院长汪精卫请求发行公司债，得不到切实回答。荣宗敬又向实业部请求救济，实业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用三百万元将申新攫为国民政府的“国营”企业。荣宗敬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指责实业部的整理方案“实有企图宰割之嫌”[(2)]，荣德生在无锡联合申新三厂股东和同业，通电反对“整理”申新。这些活动得到吴稚晖出面支持，最后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才使申新幸免被吞掉。

1935年，申新七厂借英商汇丰银行的押款到期，无力偿付本息，荣宗敬再向国民政府呼吁援助，仍无效。向汇丰请求转期，汇丰不但不予考虑，竟不顾中国法律，悍然将价值五百万元以上之申新七厂财产，以二百二十五万之低价拍卖给日商。消息传出，上海各界愤英商违法，对申新强烈声援，申新七厂职工更群起护厂，坚决反对。汇丰慑于各方压力，才签了押款转期合同，使申新七厂得以保存。

1936年上半年，宋子文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长，企图利用债权将申新吞为己有。但迫于社会舆论，加之申新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宋的目的未能达到。经过几次波折，荣家企业虽然保存下来，但在资金上不得不依靠中国、上海等银行垫款营运，许多厂的经营管理权亦为中国、上海等银行组成的银团所掌握。在抗战爆发前，荣家各厂奄奄一息，仅勉强维持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荣宗敬留驻上海，荣德生则去汉口。荣宗敬为摆脱敌寇的利诱拉拢，避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病逝。

荣德生于荣宗敬去世后返回上海，他的子侄们要推他做申新总经理。他为避开日本人的胁迫未出任，企业分别由子侄们管理。福新系统则被王禹卿控制。这时荣家许多厂虽遭受日寇破坏，但位处租界的各厂仍继续生产，并趁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机会，获得暴利，一二年内即将债务偿清。太平洋战事爆发前，日军曾想与荣德生“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荣德生没有同意。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锐意进取，着手重建茂新一厂，扩建申新三厂，并创建规模庞大的天元实业公司，然至1947年11月仅建成天元麻、毛、棉纺织等厂。是年，荣德生由他儿子荣毅仁出面，与上海几个大粉厂合组小麦联购处，得到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得以垄断了安徽、江苏部分的麦源。又低价买进了敌伪遗留下来的原麦物资。这样就使茂新等厂顺利修复开工，并将王禹卿控制的福新系统重归荣家掌握，扩建后的申新三厂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棉纺织厂。

1948年，荣德生曾将他儿子们所控制的企业组成总管理处，由荣德生担任总经理。由于他的儿子们各自闹独立，未能真正统一。荣德生曾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企业，这些幻想后来都破灭了。1946年，荣德生遭匪徒绑架，1948年他的侄子荣鸿元又被蒋经国逮捕，两次敲诈勒索达美金百万元以上。这些事实，使荣德生对国民政

府感到绝望。在解放前夕，当得知他的女婿唐熊源等人要拆迁申新三厂机器去台湾时，他赶到厂里和工人一起制止了这一行动。

解放后，荣德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在无锡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1929年。

黄逸峰：《旧中国荣家资本的发展》，《学术月刊》1964年第2期。

---

(1) 《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4页。

(2) 《荣宗敬致财政部长孔祥熙函》，《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28页。

柔石

邱德新

柔石，本姓赵，名平复。笔名除柔石外，还用过赵少雄、赵璜、金桥、刘志清等。浙江宁海县市门头（今并入象山县）人，1902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柔石的家庭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父亲时，家境衰落，后开一小店，由于苛捐杂税，家境仍很困难，柔石十岁才上小学。

1917年夏天，柔石毕业于宁海县正学小学。同年秋天，到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上学，因对学校教学不满意，中途退学。1918年暑期，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俄和社会主义的书刊。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1) "五四"运动爆发时，柔石积极响应，在学校和一些青年组织文学小团体"晨光社"，出版刊物，宣传新文学。

1923年夏，柔石在第一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继续升学。1924年春至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这时，柔石利用教书之余，开始文艺写作。1925年1月，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人》。作品反映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思想，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多数带着伤感和虚幻的情绪，缺少积极上进的精神。作者自己后来也说当《疯人》"装订完毕后，自己就很愿意它立即灭亡，因为发现内容之幼稚和丑陋。那本书，以后我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用了"(2)。1925年春天，柔石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常去听鲁迅的课。当时他的生活颇为艰苦，有时

吃不上饭，但仍然很乐观，曾写信给家里说：“虽然没有早餐的钱，也不过一二天，我正可以从这种时候多读几句书”，“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炼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3]。

由于经济窘困，无力继续在北京学习，柔石应友人的聘请，于1926年3月回到浙江，在镇海中学教书，不久任教务主任。他一边教课，一边从事文艺创作。1929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就是这一时期写作的。这本书初稿完成于1926年上半年，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夜，打倒军阀、打倒侵略者的革命烈火渐成燎原之势。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指出：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大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内心的一腔愤懑，真恨得无处可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这部小说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号召人们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努力战斗。这是作者进步思想的一个表现。然而，黑暗社会怎样才能死去，未来的新社会应当是怎样一个社会？对于这些，作者还是朦胧不清的。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当时，柔石不顾军阀对学界的镇压，和镇海中学进步师生一起，到群众中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号召群众响应北伐。那年秋天，柔石患病咯血，但他还是坚持斗争。后来病势严重，不得不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帮助宁海县的青年筹办宁海中学。1927年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全部光复，柔石到宁海中学任教。他和学校几个朋友一起组织“消夏社”，办义务补习班，帮助贫苦青少年学习；又组织“教育储金会”，资助贫寒子弟升学。不久，他担任了宁海县教育局长。当时，教育界的保守势力还是很大的。柔石不顾新旧官僚的威胁和阻挠，致力于全县的教育改革，清除教育界里的保守势力，把全县小学校长和教员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928年5月，宁海县农民在本县旁亭（今属三门县）举行起义，反对当局统治，宁海中学二三十名师生参

加了这次起义。由于当局的镇压，起义不幸失败，宁海中学被解散，一些师生惨遭杀害，柔石也被迫出走上海。

在上海，柔石着手修改他的小说《旧时代之死》。不久，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鲁迅[(4)]。从此直至柔石逝世，他始终和鲁迅在一起，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作，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柔石是鲁迅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5)]。1929年初，经鲁迅的推荐，柔石担任过半年之久的《语丝》的编辑。

1928年秋天，柔石在鲁迅的帮助下，和殷夫、胡也频等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朝花社”。他们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当时东欧和北欧的文艺作品。“朝花社”出版了《朝花周刊》（后改为《朝花旬刊》），附出《艺苑朝华》（画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如：《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北欧文艺丛书》、《朝花小集》。在“朝花社”里，柔石是骨干，除写稿译书外，“大部分的稿子杂务都归他做”[(6)]。

“朝花社”开始成立时，经费不足，虽有鲁迅的支持，由于刊物销路不大，经费一直困难。后来“朝花社”无法支持下去，不得不于1930年1月宣布结束。柔石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译作有《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即《颓唐》）。

《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变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彷徨之中。《二月》通过对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寻找生活道路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彷徨状态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个方向：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个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批评，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

《希望》收集短篇小说二十八篇，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直接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反映了他们在苦难中的呻吟，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的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30年1月，柔石创作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发表在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上。这是柔石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作品直接触及到了封建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当局大肆迫害进步作家，查封进步刊物，实行文化“围剿”。为击破文化“围剿”，中共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柔石积极参加了中共所领导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品质。1930年2月15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柔石是发起人之一。大会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和思想政策的宣言。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柔石是筹建者之一，被推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后来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担任“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7)]。同年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8)]。不久以“左联”代表资格，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并向大会宣读了鲁迅等人署名的《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祝词》。6月，写《一个伟大的印象》一文，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生动情景。

1931年1月17日晚，柔石参加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同与会者三十余人一起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由租界当局将他们“引渡”给国民政府当局。在狱中，柔石仍然坚持学习德文。2月7日，柔石和其他二十余人在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柔石逝世后，鲁迅因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和自己失掉了很好的

朋友[9]，悲愤地写了《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来纪念他。

---

(1) 赵蒂江：《我的爸爸柔石》，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第186页。

(2) 柔石：《自序》，《希望》，商务印书馆1930年7月版。

(3) 赵蒂江：《我的爸爸柔石》，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第186页。

(4) 鲁迅与柔石第一次见面的确切日期，目前没有弄清。据王士菁的《鲁迅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记载，鲁迅在1928年9月9日从景云里二十三号搬到十八号，把原来的房子让给柔石住。《鲁迅日记》中最早记载与柔石的来往则是在9月27日。由此看来，柔石找到鲁迅的时间，可能在8月下旬至9月初之间。

(5)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482、486页。

(6)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481、482、486页。

(7) 《萌芽》月刊，原为鲁迅编，1930年1月创刊。自第三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

(8) 关于柔石入党的时间，阳翰笙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人民日报》1980年3月5日）一文中说，柔石在1929年9月就已经是“党内的负责人”之一。但在这以前的其他资料均说他是1930年5月入党。目前尚无材料证明哪一种说法准确。

(9)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481、482、486页。

阮玲玉

查建瑜

我国30年代著名的电影女演员阮玲玉，原名凤根，学名玉英，艺名玲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10年4月26日（清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浦东亚细亚煤油公司机器部的工人，在玲玉五岁时，因贫病交迫死去。母亲在电影公司老板家做佣人，玲玉随母充当小婢女。

阮玲玉从小天资灵敏，富于表情，爱看戏，喜欢模仿剧中人的动作。稍长，要求读书，她母亲多方设法，1917年把她送入一家私塾，1918年转入崇德学校。1925年曾在崇德登台演剧，初次显示了她的表演才能。就在这时，她的母亲因病被解雇，她被迫辍学。

1926年，阮玲玉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第一次参加拍摄的影片是《挂名的夫妻》，她扮演一个没有过门就守活寡的少女，很成功。接着在《北京杨贵妃》、《血泪碑》中充任要角。1928年转入大中华影片公司，主演《劫后孤鸿》等六部影片。她塑造的人物都很逼真，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从此在影坛崭露头角。1929年冬她转入联华影片公司，1930年主演《故都春梦》。后来相继主演《野草闲花》（1930年）、《恋爱与义务》（1931年）、《三个摩登女性》（1932年）、《城市之夜》（1932年）、《新女性》（1935年）等片。在《野草闲花》中，阮玲玉饰演一个倔犟的卖花女，把一个贫穷的卖花姑娘表现得很有性格，获得观众的一致称誉，成为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三个摩登女性》和《新女性》是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中出现的比较进步的影片，有反侵略反专制的倾向，社会影响比较广泛。影片中的反侵略场面和罢工场面曾被电影检查机构强令剪去。《新女性》一片中，揭露了一些黄色报刊助纣为虐的卑鄙行径，曾引

起当时“上海记者公会”的“抗议”。他们向联华影片公司施加压力，提出剪去影片中的某些片断以及登报向全国新闻界公开道歉等无理要求。阮玲玉在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刻苦努力，对《新女性》中受迫害人物的性格和发展过程，塑造得很深刻，她的艺术才华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时的电影是无声片，创作方法也很简单。一部影片开拍前，导演只交代剧情梗概，全靠演员的表情和动作表达人物的性格和语言。阮玲玉一经导演说明，便能准确地掌握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自然流露，而且不论反派正派，少女或老妇，只需服装一换，她便表情毕肖，往往超出导演的预期效果[(1)]。从1926年到1935年，阮玲玉共拍摄二十九部影片。她以认真的态度，丰富的感情，加上她的表演艺术，塑造出许多不同类型和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被誉为最有希望的天才艺人。

1925年阮玲玉还在上学时，被她母亲所服役那家主人的弟弟张达民引诱，1926年与他同居。张不务正业，挥霍好赌。阮玲玉进入影坛后，张把她当做摇钱树，索取无厌。阮玲玉在影坛出名后，交际渐广，张对她十分嫉妒。彼此意见日多，经常发生口角，阮忍无可忍，曾与张分居三次，并曾服毒自杀，幸抢救及时未死。后经亲友调解，两人仍住在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他们同赴香港。4月，阮返沪拍《续故都春梦》，张留香港。这时，茶界富商唐季珊经常找阮玲玉，乘机大献殷勤，骗取了阮的爱情，与他同居。1933年4月张达民返沪，阮玲玉委律师和张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订立离异契约，阮每月给张一百元，两年为期。两人正式脱离了同居关系。

1935年2月，两年快到期时，张达民见无利可再图，就借口以阮玲玉背夫和唐季珊私姘，合谋侵占他的财产为由，投诉于上海地方法院。经人出面调停，张索款万元，阮同意六千，张坚持不减，调停中断。

讼案在上海传开后，新闻界有些人因阮玲玉主演《新女性》怀恨在心，他们抓住阮的讼案，乘机在报纸上大加张扬，着力渲染，对阮进行人身攻讦。阮精神深受刺激，十分悲愤，曾对她母亲说：……一个孱弱女人始终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工作，不是受夫的束缚，就是受社会上的诽谤攻击。而眼前讼案又导致我誉丧名裂。人言可畏！人言可畏！她还说，她有时想起《新女性》影片中的那个韦明受迫害而服毒自杀的情景，不寒而栗！她这些话曾引起她母亲的警惕，也曾注意防范，但终于没有防范得住。3月7日夜里，阮玲玉服了过量的安眠药，经抢救无效，于第二日下午六时三十八分逝世，年仅二十五岁。

阮玲玉自杀前写了两封遗书：一给报社，一给唐季珊。她给报社的遗书中说："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2)

阮玲玉的遗体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去吊唁的人络绎不绝。3月14日下午出殡时，灵车所经之处，伫立路旁为她默哀的人达十万之多，不少人为她的冤死流泪，灵柩落葬于上海广肇山庄。阮玲玉的死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艺术界为她的卓绝才华惋惜，舆论愤愤不平，大多数人认为新闻界无休止的张扬和攻讦是迫使阮玲玉自杀的主要原因。新闻界也有人出面抵赖。也有人认为是有缺陷的法律制度迫害阮玲玉致死。不少报刊发表了悼念文章。5月5日，鲁迅发表了一篇《论人言可畏》的文章，斥责了当时新闻界欺凌弱者的可恶嘴脸。文章中说："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她被额外地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3]

附记：写作中曾参考陈协星《阮玲玉》一文。

---

(1) 蔡楚生：《追忆阮玲玉》，《中国电影》1957年第2期。

(2) 《良友画刊》1935年3月号。

(3) 上海《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署名赵令仪，现辑入《鲁迅全集》第6册，第261页。

阮忠枢

张学继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举人出身。早年入李鸿章幕府，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北洋军械总文案。在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失势之后，阮忠枢又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致其兄袁世敦函中说："正在侘傺无聊之时，忽遇契友阮斗瞻（忠枢）愿作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莲英）门下，得其承介晋谒荣中堂。"[1] 从函中可知，阮忠枢与袁世凯相识很早，在袁世凯未发迹前两人即已成为"契友"，而且袁世凯之投靠太监总管李莲英和军机大臣荣禄，都是由阮忠枢介绍的。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宠臣，他为人识见不高，好恭维，爱金钱。袁世凯抓住荣禄的这个弱点大下工夫，终于赢得荣禄的信任。由于荣禄的极力推荐，袁世凯得以于1895年赴天津小站主持编练新军，这是袁发迹的起点。

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起，阮忠枢就一直是袁的机要文案幕僚。袁的机要文案幕僚甚多，前后不下数十人，但以阮忠枢"笔利而快"[2]，拟稿"最当袁意"[3]。袁世凯上朝廷的奏折，大都出自阮忠枢的手笔，甚至朝廷的不少谕旨，也由阮忠枢起草，可见其文笔之出色。阮忠枢是跟随袁世凯时间最长、资格最老的机要文案幕僚。有人描述阮氏与袁世凯的关系说："阮内史长与袁氏为老友，而能承顺袁之意旨，而谨慎缜密，有口不言温室树之概。每有事，辄先延内史长入，密语良久，然后更及十三太保。虽以梁财神之倚重，杨杏城之尊信，不及内史长之昵如家人也。"[4]

作为文案幕僚，阮忠枢"有芙蓉癖，喜作麻雀牌，日以继夜，皆于牌桌及烟榻上饮食，倦则自以腰带捆于椅背上。项城有要公，需彼属稿，时时不见，命材官四寻，则已入勾栏中矣"[5]。张伯驹为此赋

诗云："倚马才华目一空，蒲卢掷罢卧芙蓉。材官四访无寻处，却在花街柳巷中。"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后来物色没有不良嗜好的张一麐取代阮忠枢，成为主要文案。袁世凯保荐阮忠枢做过顺天府丞、邮传部侍郎、副大臣等职务。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阮忠枢奉命两次到河南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清廷于1911年10月14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颁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驻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统率的陆军、海军亦得会同调遣。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以为袁世凯对此条件一定会满意，叫阮忠枢赶快赴彰德去劝驾。阮忠枢到彰德后与袁世凯是如何谈的，已不得而知。但当时已在彰德的杨度和王锡彤均劝袁世凯不要立即应命出山。杨度认为清王朝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即使平定了革命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而王锡彤则顾虑袁世凯出山后会有性命之忧。袁克定也赞同他们的意见，力主暂时不要出山。阮忠枢不敌众人之言，结果空跑一趟。于是，袁世凯给清廷上了一个"辞谢"的奏折："奉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等因。钦此。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实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是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间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是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6] 袁世凯的这个奏折很可能是阮忠枢的手笔。

袁世凯借机要挟清廷赋予他更大的权力。清廷被迫一一满足袁的条件，阮忠枢又带着隆裕皇太后的懿旨第二次来彰德劝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才于10月31日离开彰德南下，指挥清军镇压革命军。

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窃夺，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后，阮忠枢的本事却用不上了，他成为过时的人物。唐在礼说："袁世凯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所有奏折和重要公事几乎完全出于阮的手笔。阮在当时是个比较老实稳妥的人，他有意退位，避免自己揽权作威。他这样做，赢得了左右上下的人缘，再加上所有要政他全参与，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因之在僚属中威望很高。到民国成立以后，公文程式为之一变，新辞、时议皆非阮之所长，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地坐冷板凳，几乎什么事袁都不请他参加。"(7)

阮忠枢虽然不再司机要文案，但袁世凯又派给他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派他去徐州联络张勋。辫子军统帅张勋思想顽固，反对共和、反对民国，他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辛亥革命后他驻兵徐州、泰安一线，对袁世凯并不忠心耿耿，袁世凯对他放心不下。阮忠枢与张勋是拜把的兄弟，袁世凯即利用此层关系，屡遣阮忠枢等与张勋有关系的人前往泰安联络感情，并"观少轩对彼之项背"(8)。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一书说："（张）勋，赣人，迷信神怪，岁延天师往泰安，建醮施法。阮斗瞻诸人往说勋者，皆尊为唐淮南节使高骈以誉之。高骈好道，勋实替人，从好之方，无微不至。斗瞻与勋最相得，项城令阮月必一至泰安，三年不改。于晦若与袁书，所谓'可怜跑死阮忠枢'是也。勋纵情声色，大有淮上旧帅刘泽清诸人之风。斗瞻征逐其间，欲移其向。一日广宴张乐，淮海名娼，环列如肉屏风。张、阮抡猜狂叫，为长夜达旦之饮。阮葆头濯酒，据地作狮子舞。群妓□握短发，飞蓬刺天。张顾而乐之曰：'斗瞻头毛，真可谓狮子盘绣球矣，仆病未能也。'斗瞻乘机持利刀一柄曰：'大师亦欲为此乎？'佯执其辫。少轩震怒，剪未下而批其两颊，斗瞻弃剪，滚地大吐。左右曰：'阮内史监大醉矣。'扶入长卧。翌日谒少轩谢罪，实则斗瞻欲藉此一醉，观少轩复辟之志坚定与否，为他日游说也。"(9)

1913年7月，张勋攻下南京后，袁世凯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但江苏为东南重地，袁对之很不放心，不久即以日本反对为借口将其调开，另调嫡系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军阀最讲利害，在张勋看来，袁世凯将其调离江苏，无疑是不信任他，是他的奇耻大辱。袁世凯为了让张勋顺利交接，想了不少办法，除了亲自写信解释外，又派阮忠枢前往南京见张勋，当面解释并劝说。阮忠枢回到北京后，于1913年12月1日致函张勋，解释袁世凯迫于日本外交压力不得不调动张勋的苦衷，信中说："无如外部日前复呈阅日使所受该政府之训令，日使昨复向我政府催诘，极峰复召弟面对，深膑太息，欷歔不胜，明知日人之刁难，系由于我乱党之怂恿，其宗旨仍不外乎'离间'二字，而当此有强权无公理时代，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既虑以此来外人之责言，又虑因此损我公之感情，大有双方作难，无可如何之情状，而微窥其意，颇似怪弟不能将此等困难之情形代白诸左右者，爰亲致公长函一通，亦可谓详哉！言之披肝鬲而见情愫矣。今弟请为公一言决之曰：公之去留，亦视极峰之疑信如何耳！如果功高见嫉，极峰有疑忌之意，则我公自宜明哲保身，翩然远引，所谓君子见几，不俟终日者也。今极峰尚无疑忌之意，而且有信任眷恋固结不舍之情，则公又何妨曲谅其为难，而姑为之抑志以迁就哉！天下事有情所万不能堪，而势出必不得已者，此类是也。然似此之委曲迁就，亦非为一身计也，仍所以为极峰，为中国而已。不识我公以为何如？尚其深思而察纳之！幸甚！盼甚！"(10)

阮忠枢回到北京与袁世凯商量后，又决定派张小松持袁世凯、阮忠枢的亲笔函前往南京面见张勋，传达袁、阮的意见，并敦劝张勋接受新的任命。不久，张勋复函阮忠枢，声称："兄受大总统知遇，虽糜顶捐踵，无所足惜。然既见逼于外人，而无转圜之余地，兄又岂能贪恋高位而贻君父以无穷之忧也。已矣！兄已检点一切，一俟奉命，即行解甲归田，望以此情陈之于总统之前，并陈明俟兄卸任后，再当趋侍左右，以觐颜色而遂瞻依。"(11) 张勋对袁世凯调动江苏都督职务极端不满，始终以"解甲归田"相要挟。袁世凯也不得不耐住性子，

动员徐世昌、阮忠枢等与张勋函电往返，磋商调职条件。在袁世凯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后，张勋才遵令移交江苏都督于冯国璋。

阮忠枢时常奔走于北京与张勋军营之间，不计辛劳，人称阮忠枢为袁世凯的“神行太保”。文人包天笑还在上海《时报》上发表过《阮忠枢之脚》的文章[(12)]。刘成禺赋诗云：“将军跋扈慕高骈，金帛游谈佐绮筵。忙煞当年阮司马，移书淮上走年年。”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立政事堂，政事堂首领称国务卿。原国务院秘书厅改称内史监，阮忠枢任内史监内史长。这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第一步。内史监除内史长阮忠枢，还有内史二十二人：沈祖宪（吕生）、闵尔昌（葆之）、吴闿生（辟疆）、王式通（书衡）、夏寿田（午诒）、郑沅（叔进）、陈燕昌（友白）、董士佐（冰鹊）、张星炳（叙墀）、沈兆祉（小沂）、王寿彭（次箋）、刘春霖（润琴）、杨度（皙子）、刘燕翼（襄孙）、张国淦（乾若）、谢煊（仲琴）、吴膠（康伯）、王振尧（古愚）、高景祺（养祉）、马吉樟（积生）、杨景震（介卿）、孟以铭（鼎臣）。

据说，在准备称帝时，袁世凯担心章太炎以文字搅乱了他的帝王美梦，阴谋杀害章太炎。阮忠枢极力谏阻，他对袁世凯说：“武则天读骆宾王之檄文，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的口诛，尚欲其不死；太炎的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加戮，公的智谋，岂不逊于武则天、燕王吗？”[(13)] 听了阮忠枢的一番话，袁氏为之动容，才放弃了杀害章太炎的恶念。

洪宪帝制开始后，阮忠枢的主要任务除了继续联络张勋，又多了一个联络拉拢冯国璋的任务，显得比以前更加忙碌。因为袁要称帝，最不放心的就是张勋和冯国璋这两个资格老而且握有重兵的大将，需要阮忠枢时时宣达袁的意旨，沟通他们与袁世凯之间的感情。但张勋、冯国璋态度暧昧，袁世凯派阮忠枢反复陈说，最后，阮忠枢对

张、冯二人表示："不必明白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14]

在洪宪帝制中，江苏将军冯国璋的态度最为微妙，阮忠枢曾经两次前往南京面见冯国璋。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前后，冯国璋与梁启超及中华革命党的领导人暗通款曲，这种情形让袁世凯担忧。为了疏通冯国璋，袁世凯决定再次派阮忠枢前去。阮忠枢最后一次替袁世凯下江南，仍然住在冯国璋将军公署的西花园，冯国璋常常陪着阮忠枢一榻横陈，一灯相对，抽鸦片打发时光。阮忠枢在南京住了几天，回到北京时，冯国璋依然坚持要袁世凯"敝屣尊荣"，也就是要袁世凯不要恋栈，快快下台。

不久，阮忠枢又给冯国璋打来电报，大意说假如袁下野以后，西南方面还有进一步的要求，那该怎样应付，希望冯在这一点上预为筹划。阮电报中所说的西南方面"进一步的要求"，便是当时甚嚣尘上的一种呼声，也是袁世凯最害怕的，那就是把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交付国民裁判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对于阮忠枢的这个电报，冯国璋复电倒也干脆，他表示袁如果肯下野，就决不容许任何人再对袁追究责任。假使有人要这么做，他就一定要"唯力是视，与之周旋"，并且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袁的生命财产的安全[15]。在这个问题上，冯国璋总算给了袁世凯一个很大的面子。

但袁世凯口是心非，只是说下野，实际上赖着不动，还想挣扎观望。于是，冯国璋于1916年5月上旬发起召开南京会议。袁世凯很清楚："此次南京会议，明为北方势力，实不啻由予手中攘夺大柄。"袁一面指派蒋雁行就近监视南京会议，一面派阮忠枢前往徐州，策动张勋出来破坏南京会议。阮忠枢写信给张勋传授机宜："（一）拟请尊处商同丹帅（指倪嗣冲——笔者注）迅约各省同志代表汇集徐州，结成团体，预备各种抵制宁垣之法。（二）各省长官与尊处暨丹帅向表同情者，而其所派代表巧弄唇舌，当场捣乱。拟请尊处与丹帅迅电该省长官，诘其是否与之同意；如非同意，即电请其撤回原代表，另派新代表。（三）尊处与丹帅可以长江巡阅使、副使名义，另行召集沿

江各省军官代表成一团体，发表宗旨。（四）无论用何方法，凡由尊处与丹帅召集各省代表结成团体后，即可联盟签约，推其中一两人为盟长、副盟长，专以挽留元首勿遽退位为唯一之根本主旨。（五）联盟签约后，即可正式报明中央政府，并通电宣告各省，谓联盟者已主张一致，不得再有磋商之余地。有异议者，当公同以强硬之手段对待（如梁启超在广东开会，经龙子澄部下胡令宣一骂而逃，彼辈固非不惧强硬者也。）。（六）元首即允退位，联盟各省当正式发表意见，以大义相责。苟继任未得适当之人，与善后种种办法未经确定以前，不敢遽听轻言高蹈[16]。

在阮忠枢的挑动下，张勋与倪嗣冲发起徐州会议以抵制冯国璋主持的南京会议，阮忠枢并为徐州会议拟定了办法，他要求张勋："如各代表一致赞同，即请嘱各该代表将节略中大要各端及讨论赞同情形分电各长官，俟得复认可后，即拟请尊处会商丹帅，挈同认可之各省文武长官，联衔电致院部及在京政军警各机关，与夫业经号称之独立各省（即以此节略改为通电底稿）。盖专持不退位之说，固属根本上之唯一宗旨，然所以不能退位之理由，与退位后之危险，以及将来自由退位之办法，必须逐层声明，得大多数之同意，方足以昭示天下，而期可折服彼方面之口，且以见此次在徐会议解决之价值（所以通电已独立各省者，并非定要其赞同，但以表示此方面之结合团体系一致如此解决而已）……南京会议既拟设法打消，所有公举东海一层，虽已得各省赞同，请暂缓宣布，且南方各省如何复冯及梁任公是否足以代表彼方面，并允否赴宁？尚不可知，须看下回分解耳。"[17]

阮忠枢为保其主子袁世凯用尽了心机和心血。然而，袁世凯于6月6日一命呜呼，阮忠枢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但阮忠枢并没有从洪宪帝制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一年后他又参加了张勋复辟活动，并被任命为"邮传部左侍郎"。同年12月，阮忠枢病逝于上海。

(1) 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2)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3) 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4) 许指严：《新华秘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9页。

(5)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294页。

(6) 陈国权译述：《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重版本，第307页。

(7) 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148页。

(8)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9)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第278页。

(10)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433页。

(11)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二），第435页。

(1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页。

(13) 郑逸梅：《我所知道的章太炎先生》，载《杭州文史丛编·文化艺术卷》，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4)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第279页。

(15) 恽宝惠：《我所知道的冯国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77—878页。

(16) 史华：《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页。

(17) 史华：《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4—5页。

萨本栋

孔立

萨本栋，字亚栋，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7月生于福建闽侯县。萨氏祖先为西域回族，元代称色目人，从山西雁门迁居福建，父名幼实。萨本栋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1921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随即派送美国留学，先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机械，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转入麻省伍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1925年获得电机工程师学位。接着又攻读物理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应聘为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Co．）工程师。他在留学时代已蜚声学界。

1928年，萨本栋自美回国，2月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达八年之久。在这期间，先后出版了《普通物理学》和《普通物理实验》二书。原来清华大学普通物理课程采用的是美国教材，萨本栋的著作出版后取代了原有的教材，后来这本书成为“部定”的“大学用书”，被国内各大学广泛选用。萨本栋还参加指导理科研究所物理部研究生，并和他的助手合作，从事电路与无线电方面的科学研究，完成了有关用双矢量方法解决电路问题以及各种真空管的性质和效能研究的论文十多篇。他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得到物理学界前辈的推崇。后来他被清华大学教授会选为评议员。

1936年，萨本栋再度前往美国，作为俄亥俄大学聘请的客座教授，讲学一年。在这次讲学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并矢电路分析》（*Dyadie Circuit Analysis*）一书，于1939年在美国出版。

1937年萨本栋回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天，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这时他才三十五岁。7月底萨本栋到校就职。其时，日本

已经开始从厦门撤退侨民。9月初，日本军舰炮击厦门，所以萨本栋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迁校工作，先迁鼓浪屿，后考虑到东南各省学生升学的需要，他决定把学校迁往福建西部的长汀县。在校舍、设备、经费、师资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下，萨本栋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从12月下旬开始，未及一个月的时间，顺利地完成了迁校工作，图书、仪器等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接着，他又领导安排师生生活、建设校舍、添置设备、聘请教授等工作。他说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大至办学方向、教学质量、聘请教师、发现人才，小至学生伙食、照明用电等等，他都认真地对待和处理。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十分需要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工程等方面的人才，而当时厦大却没有这些系科，也缺乏必要的设备和师资力量。萨本栋强调培养人才应当“造福于国家和人群”，千方百计地为创办工科各系而奔走，先后办起了土木、机电二系，改理学院为理工学院。1944年筹办航空系，于当年秋季招生。厦门大学工科学生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

萨本栋主张学生在校应当努力学习，出了校门才能“本其所学，贡献社会”。所以他十分强调学生的质量，他说：“本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之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对于质的改良，比起量的增加，尤为重视。”他要求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的教学，著名学者如担任过教务长的傅鹰、谢玉铭教授和一些系主任都亲自担任普通化学、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的教学，萨本栋本人也亲自教过微积分、普通物理等课程。他规定理工科学生微积分不及格，就要转到其他学院学习。全校一年级学生都要修国文、英文，不及格的要重修，重修不及格则予以退学。1939年至1941年还实行毕业前的“语文特殊试验”，要通过国文、英文的特殊考试，才能取得毕业证书。他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十分重视，努力创造条件，让理工科学生参加各种实验和实习。此外，他还提倡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曾

经亲自参加数理系学生的专题报告会，并向报告人提问、培养学生对学术的兴趣，提高研究能力。

萨本栋除了校务工作以外，还担任了大量的教学工作。他为机电系开设过电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等课程，有时每周上课的时数达到甚至超过一个专职教授的要求。他的讲课富有条理性，能把枯燥的原理讲“活”了。他布置作业或考试，既注意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又有难度较大的问题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可是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经常带病上课。病倒在床上时，还让学生到他的床前听讲。在萨本栋献身精神的鼓舞下，厦大学生勤奋好学，蔚然成风，在全国大学学业竞赛中名列前茅。厦门大学办得日益出色，被誉为当时“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成为“东南最高学府”。

在厦门大学的七年中，萨本栋承担了过于繁重的任务，这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1944年，他还不到四十三岁，便已经腰弯背驼，显得异常衰老了。但是他为了谋求厦门大学的发展，还接受美国的邀请前去讲学，并准备考察美国的航空工程，为开办厦大航空系提供借鉴。

1944年5月，萨本栋前往美国，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当时中国抗战正处在艰难阶段，国际舆论轻视中国，萨本栋感到“精神的不愉快，远超过身体不好所造成的痛苦”，因而发奋著述。他把在厦大写的教材重新整理，用英文写成《交流电机原理》（*Fundamentals of Alternating Current Machines*）一书，在美国出版，受到各国学者的好评，被加州大学等许多学校选为教材。1945年在归国途中，他应邀到英国讲学，8月间回到重庆。这时他已经辞去厦门大学校长的职务，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来又兼任物理研究所所长。

萨本栋主持了中研院由重庆迁回南京的工作，接着又计划在南京、上海一带建立一个科学中心。1948年他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院

士。萨本栋和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私交甚笃，在南京时他就住在吴家，并且应邀在中大开设无线电工程课。可惜不久胃癌发作，1948年年底萨本栋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就医。在病情恶化时，他还向医生讲述他对物理学的一些新见解，希望把知识留给后人。他还要求把自己的尸体加以解剖，供医学研究之用。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逝世。遵照他的遗嘱，将骨灰安葬在厦门大学校园内。

主要参考资料

夏启瑞等：《萨本栋与厦门大学》、张存浩：《回忆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萨本栋》、萨师暄：《关于萨本栋二三事》、林泽芬执笔：《魂系中华，骨归故里——忆我们的萨校长》，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抗日战争时期的《厦大通讯》和档案。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唯力十日刊》（1938年、1939年）。

萨镇冰

陈贞寿

萨镇冰，字鼎铭，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59年3月30日（清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他的父亲萨怡臣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萨幼承家学，七岁即读经子诸书。十一岁考进马尾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三年毕业后派在“扬武”等舰见习，曾游历新加坡、小吕宋等地。

1877年3月，萨镇冰被派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三年后回国，任“澄庆”兵船大副。1882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黎元洪是他的学生。1886年擢升“威远”兵船管带，翌年改任“康济”号练习舰管带，1888年晋升为参将，1894年授副将衔，并补北洋海军精练左营游击。

甲午战争爆发时，萨镇冰奉命守卫日岛。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把守速射炮[(1)]，直到炮台被毁，他才按照提督丁汝昌的指示，撤退到刘公岛。威海卫之役，丁汝昌因弹尽援绝，服毒自杀。萨镇冰亦曾企图自杀“殉国”未果，战后受革职处分，回乡执教。

1896年，萨镇冰出任吴淞总炮台官，后任自强军帮统。时清政府为重整海军，先后向德、英等国购买若干艘新舰，萨镇冰出任“通济”舰管带。1899年，升任北洋水师帮统，兼任“海圻”舰管带。“海圻”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舰。

1903年，清政府任萨镇冰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不久升萨为北洋水师统领。1905年擢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1908年萨奏准清政府每年派舰访问南洋，抚慰侨胞，此举为我国政府宣抚华侨之始，而他的声望也由此著于海外。

1909年7月，清政府派郡王贝勒载洵和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萨把南北洋海军统一编制，将大小舰艇四十余只分为“巡洋”、“长江”两个舰队。10月，萨同载洵赴英、法、意、奥、德、俄等国考察海军事务，次年8月，又往日本、美国考察。后清政府设立海军部，在“巡洋”、“长江”两舰队之上，设统制部，任萨为海军统制。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急电萨镇冰星夜率舰赴鄂。萨乘“楚有”舰率舰队溯江兼程前进，助清军于10月29日攻陷汉口。由于海军官兵同情革命，部分已暗中联络酝酿起义，大势所趋，萨不得不自行引退。他搭乘一英轮下驶，至九江英领署住宿一宿，翌日乔装商人往上海[(2)]。时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命萨为海军大臣，他对形势踌躇观望，未就任。

1912年，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此时，萨镇冰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12月，授海军上将衔。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8月袁世凯起用萨镇冰，委其督办淞沪水陆警察事宜，维持上海治安。翌年，袁世凯命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任命萨镇冰为办事员。同年5月，袁世凯设立了他的御用机关参政院，任命萨镇冰为参政员。8月又任萨镇冰兼上海兵工厂总办。

1915年夏，袁世凯图谋帝制日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反袁活动此伏彼起。革命党人于11月10日刺杀了袁之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并谋先在上海发难。袁大为恐慌，派萨镇冰等人加强戒备。萨自德州、汉口视察兵工厂后于此月3日抵沪。5日，革命党人联络“肇和”舰上的海军练习生陈可钧等人趁机发动起义，占领了“肇和”舰，并迫使“应瑞”、“通济”两舰发信号表示赞同革命。萨镇冰与松沪扩军使杨善德、杨晟等人商议，决定用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两舰官兵。6日黎明，“应瑞”、“通济”两舰突向“肇和”舰开炮，击中锅炉，“肇和”舰遂复入袁军之手，沪上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遭受巨大挫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时由于龙济光的振武军炮轰驻韶关的李烈钧滇军，激起了战争，北京政府海军部特派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率海军前往查办。8月25日萨到广州，率舰驻泊沙面震慑，并调解龙、李矛盾，使粤事得以了结。

1917年5月，“府院之争”中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后，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萨镇冰任海军总长。7月初，张勋复辟，曾授萨为海军部尚书，未就任，张勋便垮台了。段复任总理，任萨为海疆巡阅使。时程璧光、林葆怿率第一舰队南下参加护法，刘冠雄以萨与程、林有袍泽之谊，命萨牵制羁留程、林，但此谋未逞。12月萨辞海疆巡阅使职。1918年9月，北京政府因李厚基在闽粤战争中败北，遂派萨镇冰为福建清乡督办，企图调动海军协助闽浙军抵抗粤军。吴佩孚在前线发表“罢战主和”通电后，10月闽粤议和，萨从中调解，使李厚基与陈炯明达成停战协议。1919年11月，北京政府内阁改组，靳云鹏任总理，萨镇冰被任为海军总长。次年5月靳云鹏辞职，萨镇冰暂代国务总理。7月14日爆发直皖战争，皖系失败，8月靳云鹏内阁再度成立，萨仍任海军总长，直至1921年5月内阁改组时去职。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靠近吴佩孚，主张参战助直，第一舰队司令林建章接近皖系，主张暂守中立。杜派员到沪游说林的部属助吴参战遭拒绝，即怂恿萨镇冰出台。萨以海军前辈的身份，登上“海筹”舰，亲率第二舰队“海容”等舰，北上秦皇岛，炮轰山海关，截断奉军归路。战胜奉军后，5月25日，萨被北京政府授为肃威将军。后萨又追随吴佩乎，通电拥戴黎元洪复位。当时驻沪海军发生“倒杜（锡珪）拥林（建章）”的运动，林建章在沪宣布驻沪舰队独立，这实际是脱离直系的“独立”。因此孙中山对林的举动表示欢迎，萨镇冰则站在直系一边表示反对。10月，闽北镇守使王永泉受徐树铮策动，与粤军许崇智等部联合向福州进攻，李厚基连电北京告急。时萨镇冰适在安徽、福建查勘烟禁，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遂电催萨前往应付，许其调遣海军。萨抵福州后，被黎元洪特

派为会办福建军务和福建省长。此时孙中山已委林森为福建省长。11月，北京政府命令孙传芳、周荫人为福建援军正副司令，屯兵于福建边境。时广东方面受陈炯明威胁，军情吃紧，许崇智部离闽回粤讨伐陈炯明，王永泉感到孤立，遂与萨镇冰合作，由林寿昌等人以学生会名义召开各界会议，推举萨镇冰为自治省长，林森被迫辞职。萨与王永泉、刘冠雄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拥护之忱。1923年3月，孙传芳、周荫人两部自杉关长驱直下福州，于次年5月驱走王永泉。孙向浙江进兵，周荫人继孙传芳为福建军务督办，萨仍为省长。福建至此完全成为直系地盘。萨虽为省长，但无实权。

1926年12月2日，北伐军东路军击溃周荫人主力后，迫近福州，省城各界推举萨镇冰为福建保安总司令。3日，林寿昌在福州组织“暴动”，响应北伐军，翌日，萨弃职而去。时周荫人军张毅部在被困瓜山地区时，大肆烧杀抢夺，南港瓜山一带九十三乡人民家破人亡，哀鸿遍野。萨以下台省长的身份，出面募捐，办理赈灾工作，颇著成效。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萨镇冰被聘为海军部高等顾问，但他这时已年近古稀，并未过问政治上的事，而是留居福州，从事社会救济工作，在社会上赢得较好的声誉。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萨镇冰应邀出席了在福州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和22日举行的“人民革命政府”就职典礼。他发表演说，支持闽变当局提出的反蒋抗日原则 (3) 。当时，福建分划为四省，萨镇冰被聘为“人民革命政府”的高等顾问和延建省的省长。他拒绝南京政府要他赴沪的劝诱。在萨的影响下，马尾海军各机关由十九路军顺利接收。但不久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扼杀，十九路军撤退时，萨镇冰亲自到马尾进行疏通，防止海军对十九路军的攻击 (4) ，待十九路军全部渡过乌龙江撤离福州后，他回福州临时维持地方秩序。

此后，萨镇冰蛰居福州，同族弟萨嘉曦续修《雁门萨氏家谱》，与故旧知交赋诗饮酒。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萨前往南洋，宣传抗日。次年2月取道越南回国，历游蜀、黔、湘、滇、桂、陕、甘各省。抗战胜利后，萨重回福州定居，刊行诗集《客中吟草》。

福建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曾有人看望萨镇冰，转达蒋介石之意，劝萨前往台湾，萨以病辞。后来，蒋又电朱绍良送萨赴台，萨称病住院。

福州临解放前，萨镇冰做了一些有益于福州解放的事情，与刘通、丁超五、何公敢、陈培锟等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出文告表示拥护共产党。

1949年9月，萨镇冰被特邀为全国政协代表，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他为新中国写了许多歌颂的诗章。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山。

主要参考资料

萨镇冰、萨嘉曦修：《雁门萨氏家谱》，1935年版。

萨伯森编：《萨镇冰（鼎铭）先生年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5辑，1986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

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美］奚尔恩：《狂风暴发》，《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年第2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编：《中国近代海军史参考资料》，1960年版。

陈国缪：《对萨镇冰先生言行的回忆》。

陈文会：《萨镇冰海军上将的简历》。

---

(1) 李鼎芳译：《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 陈国权译述：《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之第47号附件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8页。

(3) 均见闽变时出版的《人民日报》1933年1月下旬。

(4)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沙千里

傅能华

沙千里，曾用名仲渊、重远。祖籍江苏苏州，1901年6月12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祖辈曾是商业资本家，但他出生时家境已经破落，1908年丧父。因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被送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1)]。由于他学习刻苦，办事认真，深得老板器重，过了两年多就升任职员，再过两年多又代理账房，升任清账房[(2)]。他勤奋好学，空闲时间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青年会办的夜校补习英文，过着攻读生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深受新思想的影响，被上海复旦大学师生创办的《平民》周刊所介绍的合作主义思想吸引，认为“合作”一股一权，公平合理，是改造现有经济制度的好办法。在《平民》周刊的影响下，他撰写和翻译了不少宣传合作主义的文章。据《沙千里自传》中说，上海《时事新报》的《合作》副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在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进步，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虽然当时上海的军阀李宝章疯狂镇压国民革命，残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毫无畏惧，积极从事国民党的秘密工作，成为一名国民党的党员。当时他十分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赞赏其中的民生主义学说。他曾引孙中山民生主义关于分配社会化一节来论证社会分配“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或者是由政府来分配货物”[(3)]，以说明他的合作主义和民生主义学说的一致性。

大约1925年秋天，沙千里以同等学力考进了上海法政大学，次年秋转学到上海法科大学。1929年秋毕业于法科大学法律系本科[(4)]，1931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5)]。在法科大学读书时，正值革命低潮时

期，他在英文补习班教员许德良（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与几位同学集资创办刊物《青年之友》。该刊物的宗旨是“指示青年修养，努力改造社会”，要求青年对社会负起责任来，不要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更不要自暴自弃，意志消沉，丧失斗志。1928年春节过后，沙千里参加青年之友社成立会，被推举为该社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又担任《青年之友》的主编。《青年之友》周刊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切中时弊，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逐渐增多，最多时曾达五千多份，在上海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分销处，外地也有发行，远至南洋各地也有其读者。由于《青年之友》的读者越来越多，在青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0年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特务的破坏下，被迫宣布停刊。

《青年之友》停刊后，青年之友社并未解散，其骨干核心分子仍定期活动，他们改变斗争方式，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努力争取广大青年，团结斗争。1930年12月，在青年之友社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蚂蚁社”（简称“蚁社”）。他们以蚂蚁自诩，蚂蚁虽小，但能团结，能为共同的利益战斗，一只蚂蚁力量小，但一群蚂蚁力量就大了。他们要向蚂蚁学习，以蚂蚁精神互相鼓励。蚁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实际上其骨干分子中有共产党员在起作用，并有较明确的政治目的。“九一八”事变后，蚁社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大家向蚂蚁学习，为祖国独立与民族解放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蚁社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个著名的群众团体。沙千里在蚁社中有较高的威信，被历届蚁社社友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和社友部部长。在此期间，沙千里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他除了参加社团政治活动外，其本职工作仍是律师，并且是上海律师公会的成员。他在受理案件时，认真负责，特别是对贫苦老百姓尽力给予帮助，因此在社会上和同业中有很好的声誉。

“九一八”事变后，沙千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

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沙千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10月，他在蚁社中“苏联之友”小组的支持下，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以不露痕迹的方式，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成为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一个宣传阵地。12月9日，北平爆发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上海和其他省市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最先是上海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沙千里参与组织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分工负责总务部工作[(6)]。随后又作为职业界救国会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沙千里作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参加大会，并被选举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大会决定创办《救亡情报》为“救国会”机关报，沙千里担任编委。7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二中全会，“救国会”派沙千里和沈钧儒等五人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立即实行各党派合作，对日宣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抗日运动，保证救国自由。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救国会”在上海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把纪念大会变成为一次宣传抗日救国的大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全国各界、各党派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救国会”努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得到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却成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障碍。于是，“救国会”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1936年11月，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先后被捕，并解往苏州关押审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位救国会领袖在法庭和监狱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坚贞不屈的英勇斗争。沙千里在

狱中进行斗争的同时，还依旧勤奋读书写作，锻炼身体，每天记日记不间断。后来出版的《七人之狱》一书就是“七君子”在狱中进行斗争的纪实。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不得不对“七君子”“停止羁押，具保释放”。7月31日，在雄壮的军乐声、欢呼声、爆竹声、口号声和救亡歌曲声中，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光荣出狱。他们的爱国和斗争精神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敬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上海各界救国会改名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沙千里回到上海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担任“职协”的常务理事兼秘书长[7]。“职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从事战地服务，救护伤员，慰问伤员，救济难民，筹募慰劳物品与慰劳金，编印宣传刊物，培训救亡干部等等活动。他还担任《救亡周刊》主编和《国民》周刊编委。

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救亡协会的干部也先后到达武汉。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上海蚁社的一部分领导力量联络当地爱国青年，成立了以沈钧儒和沙千里为首的武汉蚁社。在武汉，蚁社得到迅速的发展，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蚁社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成为武汉地区较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之一。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沙千里带领爱国青年积极支援前线抗战，参加文化界慰劳前线战士的活动，以及积极开展文化活动。1938年，他在武汉经杨修范、袁清伟的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沙千里与救国会的部分领导人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在重庆，他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担任协会的推进组组长及主持《工业合作》月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和斯诺（Edgar Snow）创办，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支持。它主张用生产合作的方式组织三

万个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中国工业，建立起经济的国防线，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该会开设了西北、东南、西南和川康四区的办事处。到1940年10月，“工合”已建立起两千三百多个小工厂，遍布十六个省，从内地到敌后，到处都有“工合”的小工厂[8]。“工合”发展迅速，成绩巨大，国民党想把功劳归于自己，便派人打入“工合”总部，分化和打击“工合”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甚至诬陷沙千里等人领导暴动，以此打击和迫害国际友人艾黎，清洗进步的爱国青年，从而达到由国民党CC系分子来控制“工合”的目的。沙千里在“工合”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便不得不退出“工合”。

在重庆期间，沙千里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关系密切，经常往来，他经常替沈老代劳为国民参政会及各界爱国组织的事务而四处奔走[9]。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紧迫害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在重庆的一些抗日党派负责人，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和时局好转，1942年沙千里与沈钧儒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进一步推进民主宪政运动，扩大社会基础，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大量吸收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参加。10月，民盟发表了《抗日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一文，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这期间，沙千里汇编出版了国民政府公布的战时重要法律，以便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依据。此外，沙千里等人发起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团结工商界的进步人士共同坚持抗战，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邀请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谈判前中共领导人曾与沈钧儒、沙千里等人晤面，征求对谈判的意见，听到许多积极的建议。1946年7月，国民党一面扩大内战，一面加紧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和镇压。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沙千里与沈钧

儒、王造时、沈志远、徐伯昕、胡子婴等救国会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致电向云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以谢国人。同时在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众运动的罪行。同年11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后，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民盟立刻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沙千里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民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也是非法的。解放战争时期，沙千里参与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动民主运动，并以律师身份为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辩护。

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濒临灭亡，因此国民党当局加紧对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镇压和摧残。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沙千里陪同沈钧儒等人于11月下旬秘密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9日，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民盟恢复活动，确定反蒋、反美和反专制的政治纲领，彻底抛弃中间路线，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沙千里作为沈钧儒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9月，沙千里陪同沈钧儒离开香港，北上到东北解放区，以民盟和人民救国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后，沙千里于1949年2月25日同沈钧儒等人一起进入北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上海市的工作，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兼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组长。9月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高度赞扬新政协的召开，是“中国人民自己当家做国家主人的一个人民新世纪的开端”[(10)]。在会上沙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千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为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

难，稳定金融物价，合理调整工商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充分调动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沙千里从1951年底开始筹备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53年11月，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他被选为秘书长。后来担任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四届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的成立，对于推动私营工商业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沙千里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沙千里还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五届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等职务。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

(1) 邹韬奋：《韬奋文集》第3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5页。

(2) 邹韬奋：《韬奋文集》第3集，第125页。

(3) 沙千里：《合作运动概观》，上海特别市合作运动宣传周委员会1929年印。

(4) 据上海法科大学校史记载。

(5) 沙千里哪一年开始从事律师业务，说法不一，《沙千里自传》（未发表）说，“1933年开始做律师”，但登记表上登记“1935—1948”在上海、重庆做律师。而沙千里生前秘书殷宏志来信说沙千里“1931至1948年先后在上海、重庆执行律师职务”。笔者认为1931年的可能性大，理由是：1．沙千里1929年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毕业，1931年做律师有条件。2．1933年沙千里

应友人黄启堉和华东广播无线电台主持人的约请，在电台讲法律《婚姻、子女、继承》。这应该是沙千里当律师以后，甚至有一点名气以后的事。3．曾经帮助沙千里写《漫话救国会》一书的许九星在《沙千里与救国会》（《运城师专学报》1984年4月）一文中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沙千里正执行律师职务，主持一个律师事务所。"

(6)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54页。

(7) 关于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李文杰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主要发起人有沙千里、袁清伟（庶华）、王文清（纪华）、杨经才、石志昂、李文杰，还有许德良、黄逸峰……"职协"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下的"职救"的后继组织。1937年9月12日在新寰中学礼堂成立，大会推举沙千里为主席。见李文杰《职业界救亡运动的片断回忆》，《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8) 田森：《艾黎的春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9) 徐盈：《"家长"风范》，《沈钧儒纪念集》，第282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沙逊

陆志濂

爱里斯·维克多·沙逊（Ellice Victor Sassoon），生于1881年，英籍犹太人，英国海外财阀沙逊家族的后裔，世袭准男爵士。是个跛子，绰号“跷脚沙逊”。维克多的祖父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为老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Co．Ltd）的创办人。维克多的父亲爱里斯·大卫·沙逊（Ellice David Sassoon），简称E．D．沙逊，是老沙逊的第二个儿子。E．D．沙逊后来脱离了老沙逊的商号，在印度孟买另外创设了新沙逊洋行总行（E．D．Sassoon，Sons Co．Ltd．），并且以后陆续在香港、上海等地开设分行，新沙逊洋行总行和分行是E．D．沙逊和长子爱德华、次子维克多父子三人开设的商号，经营的业务和老沙逊洋行一样，以印度鸦片和印度棉纱为主。

1918年维克多在印度孟买接管新沙逊洋行。1921年新沙逊洋行在印度孟买的商号进行改组扩大为沙逊有限公司，成为E．D．沙逊财阀的中心。

沙逊家族从维克多的祖父和父亲起，就从印度将大量的鸦片装载上英国轮船一直开进黄浦江，时间持续远在鸦片战争以前，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经营鸦片的品种、数量和价值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沙逊家族就是以贩卖鸦片而发家致富的大鸦片商。

1923年，爱里斯·维克多·沙逊第一次来到上海，他看到这块冒险家的乐园——具有大量掠夺财富的有利条件，于是决定以新沙逊洋行上海分行为立足点，亲自指挥人马在上海大干一场。同年，上海安利洋行（Arnhold Brothers' Co．）的股东英籍德国犹太人阿诺特（Hary Arnhold）无意中在轮船甲板上和维克多相遇。阿诺特经营的

安利洋行在1920年2月至12月间上海发生的所谓“九先令风潮”中，因外汇汇率剧烈波动受到很大损失，它的大部分资金几乎都丧失殆尽，安利洋行濒于破产。阿诺特迫切需要资助以摆脱困境。对维克多来说，阿诺特虽处困境，但他是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总董，而且安利洋行内有着很多著名的买办经营着许多企业，这对维克多在拓展事业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人交谈之下，一拍而合。阿诺特以安利洋行在上海、香港、汉口和天津的庄口房地产作为担保。1923年3月27日，安利洋行接受新沙逊洋行资金的援助而改组，维克多担任安利洋行的董事，一切经济由他做后盾。此后数年间，新沙逊洋行对安利洋行的贷款多达一千多万两，至1935年5月，安利洋行正式让渡新沙逊公司作为总管理处，至此，维克多就掌握了安利洋行的实权。安利洋行原来经营的子公司有：英商中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资本一百万两；英商祥泰木行有限公司，资本五十万两；镕瑞机器造船公司，资本五百万两；英商耶松有限公司老船坞，资本二百七十八万两；扬子银公司，资本二千万两；中国钢车制造有限公司，资本一百万两；上海啤酒公司，资本二百万两。以上各子公司资本共约三千三百万两，换算“法币”约为四千六百万元。当阿诺特兄弟在和维克多最后分手时，仅从维克多那里获得一百多万元的补偿。维克多投资经营的企业，计有造船、锅炉制造、船坞、铁道和桥梁建设、金融、公用事业、酿造、地产、水陆运输、保险、饮料制造等，在华占有重要地位。在各个子公司中，维克多都安排得力心腹人员掌握着实权，而维克多本人则是新沙逊财阀的总头目。

维克多曾于1930年创立沙逊银行，总资产约为五百万英镑，到1935年乃增至七百八十万英镑，行址设在沙逊大厦内，自任总裁。该行是沙逊财阀从新沙逊洋行到所属于公司金融和财务的内部总账房和往来开户银行。沙逊银行在上海外汇市场上具有重要的支配力，成为当时金融界人士瞩目的中心。该行还利用当时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定和美国提高白银价格等情况进行金融投机，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935年底有人推算，新沙逊财阀全部资金“约达三十一至五十亿元左

右”。自从维克多掌权以后，他在中国所获得的财富与怡和、太古不相上下，甚至于超过了他们。

维克多在上海的主要财产，是购置大量的土地和房产。据估计当时旧上海二十八幢十层以上的大楼中，他一人就曾占有六幢，并拥有大小房屋一千九百多幢，占地六百多亩。如1928年建成的位于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维克多于同年6月依照香港政府的公司法，将大厦的一部分开设华懋饭店，资本五百万两，饭店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房间备有各国式样摆设，招徕一批洋行的大班买办和达官豪绅的捧场。而维克多自己则占用华懋饭店最高层金字塔尖顶下的一整套大房间。1930年，维克多又先后将上海苏州河畔的宝康里翻建为河滨大楼，福州路的福华里翻建为都城饭店，在都城饭店对面又盖起了汉弥登大厦。在上海主要几条热闹的马路，到处都有他的产业，如十三层楼（今锦江饭店）、十八层楼（今茂名公寓）等都是他的产业。

维克多在经营房地产方面有着多种办法，如接受客户的房地产抵押，采用高利息和累进利率，当客户到期无力归还押款，地产即归沙逊所有。再如出租土地给人家造屋，不但索取高额地租，且规定造屋式样，当使用期满，土地房屋悉数无偿归维克多所有。又如对一些旧式里弄房屋，维克多投保巨额火险，一旦房屋发生火灾，他可从保险公司获得巨额赔款。

维克多还通过当时任英租界工部局总董阿诺特的关系，预先知道当时租界的城市建设规划，就用低价大量购置将来要开辟为主要马路的周围土地，等马路铺成，商店次第建立，地价就会直线上涨。他还和国民党官僚合办大中实业公司，就在1934年一年里，他就通过这家公司从徐家汇、青浦等地用低价买进了大量地产。

维克多经营的房地产业务，是经过他设立的专门管理机构去完成的。1925年，他成立了远东营业公司，资本一千万两，经营地产交易

和金融投资事业；1926年12月更设立华懋地产公司，资本五百万两，经营地产交易和金融事业。1930年7月又创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向香港政府注册，作为买卖地产和从事金融投资的公司。此外，还设立了上海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新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地产公司等，这些专业的子公司为他在上海房地产的投机和操纵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维克多利用这些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十八层楼大厦就是由华懋地产公司发行的债券来建造的。同时，维克多又利用这些名义上各自独立的子公司，操纵地产市场。在各个子公司之间，卖出买进，哄抬房地产市价。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恰当美国提高银价，上海发生信用恐慌，地产业处于萎缩不振的时候，维克多竟然提议发行一亿元地产证券用以兼并，这一个举动，不仅轰动了上海，也轰动了伦敦地产界。

爱里斯·维克多·沙逊不仅和上海租界当局关系密切，而且和国民党官僚中的上层人物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如1934年，他花了七千多两银子购买了一辆新型的小轿车，他一面在租界上申请了一张“1111”号码的车照，一面向上海市“公用局”申请一张在中国地界行驶的“2222”车照，但是这张号码的车照早为中国某富商捐用，维克多派人和对方谈判，愿出高价从他手中挖过来而未得逞。维克多亲自写信给上海市长吴铁城指定要这张车照，吴铁城接信后唯恐“公用局”办事不力，竟亲自下令吊销这张号码的车照，把它转给维克多使用。在中国各派军阀混战期间，维克多曾将欧洲战场上剩余的军用物资，以高价贩卖给中国军阀，让他们用以争夺地盘，荼毒人民，而他却从中获取暴利。今四川中路延安东路口20号这幢大厦，过去就陈列过安利洋行的飞机样品，当时奉天、四川等地的军阀都曾到这里来购买军火。以后国民党政府购买飞机零件和军火，很多笔交易也在这里谈判成交的。1934年，宋子文还亲自到安利洋行去为“上海海关缉私营”购买步枪等军火，他和宋子文关系密切，经常通过当时的“上海海关监督”唐海安和宋联络。1934年，中国银行准备在上海外滩一侧建造一座远东最高的三十四层的银行大厦，但是维克多·沙逊强横地要求中国银行让

步，不能建造超过隔邻沙逊大厦的高度，结果中行当局竟然屈从这一无理要求，只造了十六层，高度比沙逊大厦的金字塔尖顶低三十多厘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维克多在上海的有关各项企业由于当时上海租界畸形发展而获得了相当的厚利，但他也察觉到这种繁荣后面的危机。此后，维克多为了保持E．D．沙逊财阀在中国的财产寻找安全出路。1939年7月，他第一次去美国，劝说美国为了对付日本，有确立英美对日共同作战的必要。1940年12月，维克多再次去美国发表谈话，阐明日本国内经济的危殆状况，强调美国对日本抑制力的影响，并且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出军队。以后维克多又三度赴美，一方面是活动借款及促使英美对国民党的援助积极化，同时为了保持沙逊家族的财产安全，着手把一部分财产转移到美国。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局面已由美国替代了战前的英国势力，其后他看到国民党统治集团在解放战争中节节失利，便把房地产的投机转移到外汇投机上去，加紧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相勾结，幕后操纵外汇买卖，抽逃在华资金，套购外汇，抛售在上海的房地产并在国外收款成交，将新沙逊洋行总行迁至巴哈马群岛的首府拿骚（Nassau）。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除了未及卖掉的土地和房屋外，大部分可以转移的资金都已被他提前转移。

爱里斯·维克多·沙逊1961年卒于巴哈马群岛的拿骚。

主要参考资料

张白衣：《远东英国金融巨子沙逊论》，《财政评论》第5卷第4、5期。

谢夫：《跷脚沙逊》，《上海经济史话》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中美图书公司1940年版。

上海华商国际贸易业蔡永泉访问录，编号3252。

上海华商国际贸易业李开第访问录，编号3326。

上海华商国际贸易业高事恒访问录，编号3303。

［英］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4年译印。

沙彦楷

汪仁泽　陈光贻

沙彦楷，字武曾，一字伯躬，晚年更名脊，回族，1875年7月1日（清光绪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祖籍原在西北，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镇压西北陕甘回民军时，沙的祖父沙燮和携家迁居内地，定居宜兴行医为业，曾因参加科举考试寄姓吴氏。沙彦楷自幼就读私塾，勤学好问。父亲沙安节，教子严，常亲自课读至深夜。1900年沙彦楷考取秀才，翌年又参加清政府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中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

1907年9月，沙彦楷考取京师法律学堂，三年毕业后，捐得候补浙江盐使职衔。民国成立后，在司法界任职。1913年2月任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分厅推事兼民事庭庭长，1914年2月调任北京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1916年4月兼署民事庭庭长，1918年2月调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1920年1月升任厅长。1922年发生“金佛郎案”，法国政府要我国以金佛郎的价值偿付“庚子赔款”余额，以其中部分抵付“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的欠款。当时投机政客乘隙活动，企图从中挹注取利，大理院院长董康等人亦参与其事，沙彦楷站在爱国立场上坚决反对，并向国会提议，得以立案。后愤于司法界之腐败，沙彦楷于是年7月辞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职务。8月，被递补为国会议员。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沙毅然放弃议员职务，挂冠离京赴沪。

1924年，沙彦楷在宜兴筹款创办宜兴中学，担任校董，经常往来沪、宜间，处理办学事宜，直至1931年该校改为省立农业学校。

1925年2月起，沙彦楷与知友沈钧儒在沪合设律师事务所，执行开业律师事务，积极保障人权。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的沈钧儒一度被捕，沙到处奔波营救，沈不久获释，继续共同执行律师业务。此后沙与沈多次参与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1936年，蒋介石对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迫害，发生“七君子事件”。沙坚决声援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反对蒋介石的卑劣行为。他亲往监狱探望被捕的救国会领袖，积极参加营救活动。

1937年抗战军兴，不久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沙彦楷不愿事敌，结束律师业务，回宜兴故乡，闭门读书，从事著作，他甘处清贫的隐居生活。1940年3月，汪伪政权建立，沙著文痛斥汉奸卖国罪行。1944年，沙彦楷更名脊，作七十自述诗，有“岁寒共抱冬心在，何恨何求更愠穷”句。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沪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沪谈判期间，曾多次与他会晤。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逐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曾加入民社党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为反对该党主席张君劢投靠国民党的行径而斗争。不久沙等人另组民社党革新委员会，先后被推为副主席、主席，坚持爱国民主立场，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并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各爱国民主党派发表共同声明，声讨蒋介石。1949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彦楷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等职。他在团结伊斯兰教界爱国人士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8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亲赴太湖，考察南江入湖故道。晚年专心研究水利，著有《三江五考》、《南江入太湖故道考》等专论。

沙彦楷擅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曾被推为武进县志总纂。另著有

《陶渊明集注补证》、《洪亮吉传》、《杂忆曹锟贿选》等书。沙还精于书法，作品曾选送日本展览，著有《迟翁论书》十篇、《霜鸣室金石考跋》等。

1970年1月27日沙彦楷在上海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沙彦楷：《自书履历表》。

张维骧编纂：《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10，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版。

陈会亮：《金佛郎案痛史》，1925年版。

商震

张小曼

商震，别号启予、起予，1888年9月21日（清光绪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生于河北保定，祖籍浙江绍兴。商震五岁丧父，家境贫寒，姐弟三人中他为长子，全靠勤劳的母亲给别人做活维持生计。

商震幼年曾就读于浙江同乡办的私塾，1905年入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洋文班学习。当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国内革命气氛日浓，商震愤恨异族专横，国事日危，遂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9年3月，商震在新军二十镇七十八标三营一哨任哨长，10月升为掌旗官，次年3月任二十镇参谋。在此期间，他与在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任三营管带的冯玉祥结为盟兄弟。

1910年1月，商震与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政府海军大臣贝勒载洵。事泄未果，熊成基被捕就义，商震逃往日本，入日本陆军专门学校。他与孙中山结识，遂加入同盟会。不久，商震仍回东北奉天，积极联络地方进步分子，倡导起义。1911年8月，商震任关外民军总司令。同年11月25日，商震与同盟会党人徐镜心等人在辽阳率众举事反清，次日为清军所败，退往庄河、烟台等地，继而进抵潍县，联合地方武装反对清军。黄兴当时曾致函孙中山，推荐“陕西之于右任、烟台之商起予”为应联络的海内豪杰。

辛亥革命后，1912年10月，商震就任山东第二混成旅旅长。1913年5月，商震被调充北洋政府陆军部顾问，甚不得志。后因袁世凯怀疑商震参与南方革命党“二次革命”活动而被京畿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拘押，后经冯玉祥向陆建章疏通幸免，商遂投陆。

1914年2月，商震被陆建章委任为河南省仓库总办。同年袁世凯

命赵倜及陆建章率部入陕镇压白朗军起义，陆建章委任商震为陕北卫戍司令部参谋长。1915年3月又被任为陕西省第一旅旅长兼陕北卫戍司令。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后陕西讨袁军陈树藩起兵驱逐陆建章，商震在陕西不能立足，率残部过黄河投奔阎锡山，该部被编为一个团，商震被任命为团长。1917年7月商震奉命率部参加平定张勋复辟后，晋军扩为四个混成旅，商被任命为第四混成旅旅长。此时阎锡山接受段祺瑞的要求派商震率所部援湘，结果全旅溃败。商震回晋后，奉命主管兵工生产，对山西近代工业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1918年，陕西郭坚部进入山西，阎锡山先令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总指挥率部迎击，又派商震为副总指挥增援，在吉县以西马斗关黄河滩上歼灭郭部数百人。同年7月，冯国璋任命商震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924年1月，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暂编第一师师长。同年冬，河南樊钟秀军突攻山西，破晋东南峻极关，围攻辽城，太原震动。商震奉阎锡山之命率部迎击，将樊军击退。经此一战，商震在山西军队中声名鹊起。1925年10月16日，直系浙督孙传芳通电反对奉系向东南各省扩张，吴佩孚19日通电响应。年底国民军冯玉祥部向山西进攻，晋北十三县除大同、天镇外皆失守。阎锡山命商震指挥晋军防守雁门关山岳地带。不久，吴佩孚转与奉张联合，共同反对国民军。1926年8月国民军从南口败退后，商率部挺进绥远，被阎锡山委为绥远特区都统兼北方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收编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师。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重振旗鼓，在商震的默许下，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师重返西北军。

1927年，山西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阎锡山的部队改为第三集团军，全面进攻奉军，曾由商震代第三集团军总司令。7月9日，商震任第一军团军团长，9月兼任第三集团军左路军总指挥。1928年1月，在偏关附近击溃奉军郑泽生部。1928年4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奉军，商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

率晋军向黑石关出击，先后占领保定和北京、天津，并另派一部由晋北进占察哈尔。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8月28日阎锡山委商震兼任河北省剿匪司令。10月19日商震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商震因北伐有功，兼任平津警备副司令，因当时阎锡山驻在太原，商震住在北平，因此商震兼代阎锡山的平津警备司令，并握有指挥平津警备部队的全权。

1929年3月，商震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0月，阎锡山趁国内新军阀间矛盾加剧之际，把有自主倾向的商震调回太原，改任有职无权的山西省政府主席。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商震不以为然，态度消极，未被起用，因而阎、冯失败下野后，商震没有受到南京方面的任何议处。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山西省政府，以商震任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2月13日，晋军缩编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四个军及孙楚的护路军。4月张学良在北平组织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改编山西军队，任命商震兼任第四军军长。6月商震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同年7月，石友三举兵进攻东北军，张学良向南京告急。蒋介石一面派刘峙、顾祝同沿京汉线北上援张，一面电示商震出兵石家庄，截击石友三后方。商震秘集所部黄光华、高鸿文两旅，星夜出娘子关截击，石友三叛乱敉平后，商震接管了冀南、豫北一带防地，所部三十二军扩充为三个师，即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师。以后又将驻邯郸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及驻大名的骑兵第四师郭希鹏部拨归三十二军建制。

商震以晋省情形复杂、派系各异为由，遂向张学良电辞晋省主席职，并保荐徐永昌继任山西省主席。8月6日，国民政府准免商震山西省主席兼职。9月12日，国民政府给予商震一等宝鼎勋章以示嘉勉。商震从此脱离了晋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于敌手。1932年8月，蒋介石委张学良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商震为北平军分会委员。同年10月，商震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2月热河失守，长城各口告急，商震被张学良任为华北第二军团司令，指挥五十七军何柱国部、六十七军杨正治部和三十二军等，防守长城冷口至秦皇岛一带，率所部与日军激战，多次争夺各防守口。3月22日，日军第六师团第三十三旅团进攻冷口，遭三十二军商震部黄光华师的奋勇抗击。4月9日，日军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共三万人的兵力猛攻冷口，三十二军虽奋力抵抗，因伤亡甚众，冷口于4月11日失守。不久，山海关以西各口相继被日军控制。5月31日，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商震率部退驻北平南苑。

1933年4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但在南京政府蒋介石的压迫下于同年8月被迫收束军事，方振武、吉鸿昌等少数部队向冀东一带挺进，意欲在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但在国民党军及日军的围击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方、吉被迫到顺义第三十二军商震部洽商解决办法，结果商定该部由商震收编。商密令部下在押解方、吉赴天津途中使方振武、吉鸿昌逃脱，并使抗日同盟军余部千余人在商部暂时栖身避难。

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授予商震为二级上将。6月，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根据日本人的要求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25日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河北省政府亦被迫由天津迁至保定。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6月18日又任命商震代天津市长。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刚挂出，就遭到日本人的抗议，6月22日遂改为津沽保安司令部才算了事。8月19日商震被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11月当选为第五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时，日本军人曾几次拉商震合作，一些大汉奸也向商游说，均被拒绝。12月8日，商震分电行政院、军委会请辞三十二军军长、冀省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及冀全省保安司令本兼各职。12日国民政府发表宋哲元任河北省主

席，商震为河南省府委员兼主席。1936年1月商震兼任河南省保安司令，所部三十二军仍驻冀南豫北一带。

2月17日，长征到陕西的二万红军东征抗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借口与阎锡山不能合作婉拒。蒋介石乃改派陈诚为总指挥，并调三十二军两个师（一四一、一四二）入晋归陈诚指挥“剿共”，商震难以拒绝。在两师出发前，商震在石家庄召集团以上军官讲话，要大家保存实力。故入晋后，并未与红军有大接触，虽避免作战，竟有二三百人携械投入红军。红军西撤后，商震的部队又回到冀南、豫北一带。1937年6月整编东北军时，商震任豫、皖、苏三省军事整编委员会委员。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商震被免去河南省主席，于10月2日就任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三十二军军长，接替刘峙担负平汉线北段抵抗日军的战斗。商部曾参加正定保卫战，因力不能支，节节败退，撤退到黄河南岸沿河布防。1938年，第二十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下辖第三十二、十八、二十九和七十四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同年底，商震奉命率三十二军调长沙，不久又调南昌担任南浔线防务。1939年3月1日，商震被蒋介石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辅佐薛岳，仍兼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四、五十三、三十七军和第二军，曾参加第一、二次长沙会战。

1939年10月，商震被调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2月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衡阳，商震仍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三军和第八十七军，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沿洞庭湖一线的防务。此后商震被调往重庆，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41年1月，中英军事同盟成立，中国组织缅、印、马军事代表团，以商震为团长，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印度进行军事考察。10月，商震又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1943年商震以高级随员资格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3月17日，蒋介石派商

震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5月31日，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介绍中国军事形势，曾参加敦巴顿橡树林会议。1945年9月初，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7日即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46年1月，商震兼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46年10月，商回国任蒋介石的副官长。1947年5月，商震改任盟国共同管理日本委员会中国方面代表及大使级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并于10日抵达东京。

1949年5月，商震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看到蒋介石政府大势已去，遂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退休，留居日本。蒋介石曾多次拉他去台湾，他都拒绝了。特别是70年代以来，商震更加向往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盼望祖国统一。

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一些留日中国人纷纷加入日本国籍，但商震表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人”，决不改变国籍。1974年和1975年，商震先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多次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亲切接见和宴请，这使商震深受感动。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祖国，心向北京，希望病好以后再次回国。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日本东京病逝。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及亲属将他的骨灰送回国内，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实现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主要参考资料

王兴纲：《商震略传》（未刊稿）。

唐永良：《商震历史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安田作子：《商震年谱》（未刊稿）。

周玳：《商震入湘覆没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

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王兴纲：《商震收编抗日同盟军余部及释放方振武、吉鸿昌经过》（未刊稿）。

杨玉文：《中国陆军的四十个集团军》，《纵横》杂志1996年10月。

上官云相

王家鼎

上官云相，字纪青，一作霁青，山东商河人。1895年2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生。祖辈世代务农，其父上官维兼营泥瓦匠，间或从事古瓷买卖。上官云相幼时从邻村塾师受业，于1910年7月至济南考入山东陆军小学。1914年6月升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1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生队，半年后转入第六期步兵科。

1919年3月，上官云相在保定军校毕业后，以见习生派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孙传芳部）任卫队排长、连副。1923年，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长孙传芳率部入闽，任福建军务督理，上官随任督理公署少校参谋。1925年，孙改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时，上官任督理公署中校宪兵营长。同年，升任暂编陆军第七混成旅（杨震东部）第一团团长，驻杭州笕桥。

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动浙奉战争，上官云相团属联军第二路军谢鸿勋部，沿沪宁线北进。11月3日，上官团在固镇以南与奉系张宗昌部激战，俘其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卓有战功。翌年初，孙传芳将赣军第三师（冯绍闵部）编为陆军第七师，升上官云相为该师第十三旅旅长，驻苏北宿迁运河一线。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入赣，孙传芳派主力抵抗，上官云相旅于10月上旬开抵九江，与第二师卢香亭部驻守南浔线涂家埠、乐化地区，曾一度挫败蒋介石嫡系王柏龄师，解南昌之围。11月，孙传芳兵败退出江西，上官旅撤往吴江、苏州。1927年5月，复退往江北，上官调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8月，升任第四师师长。此时，孙

利用蒋介石下野、宁汉矛盾之机，集六师三旅兵力大举渡江，在龙潭大战，威胁南京。上官师为孙军劲旅，随东路军渡江。兵败后，上官率第四师残部撤往德州后方补充整训。12月27日，因与奉军安锡珪部发生冲突，上官被逐，遂去职。

1928年夏，孙传芳余部在张家口被蒋介石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七师，以孙旧部王金钰为副师长，上官云相受王邀任该师第一四一旅旅长。

1929年，第四十七师先后移防徐州、漯河。10月，奉蒋命讨伐冯玉祥，11月，第一四一旅参与攻偃师、占洛阳，迫西北军退守陕州，上官受蒋介石传令嘉奖。1930年3月，上官升任四十七师师长。5月，中原大战爆发，上官师属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先在平汉线作战，继又东移陇海线作战。7月12日，上官云相升任第九军军长，辖第四十七、五十四两师。时冯军孙殿英部占据亳州，威胁蒋军后方，上官指挥五十四师攻克亳州，移防柘城。8月6日，冯集全力发动总攻，上官率部在宁陵、柘城地区与冯军主力作战，冒暴雨胶着坚持，使陷于空虚的蒋军阵地重归稳定。21日，上官率部重返平汉线作战。冯、阎由于矛盾，坐失战机，战局急转直下。9月初，平汉线蒋军分兵五路反攻，上官云相为第三纵队指挥官，率部沿平汉路西侧北上，切断郑（州）、洛（阳）交通，于10月6日首入郑州。上官在中原大战中积极为蒋效力，更加得到蒋介石信任。11月，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旋改任国民政府参军。1931年1月，接任第二师师长。

1931年5月，第九军军长王金钰因参加对江西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遭到溃败而“引咎辞职”。上官云相闻讯赶到南昌，获准回任第九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旋奉命兼代第五路总指挥。7月下旬，参加第三次“围剿”，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率五十四、四十七两师从永丰向南村急进，8月4日进占良村、莲塘。此时，在兴国以北的红军主力第一、三军团，断然摆脱西路蒋军主力陈诚、罗卓英部，又甩掉东路毛炳文、赵观涛、蒋鼎文等师，中间突

破，全力攻击处于薄弱环节上的上官部。6日，红军包围四十七师一个旅于莲塘附近山谷，7日全歼该旅，击毙其旅长。同日，红军又包围良村，歼其两个团。上官全军溃散，重武器丧失殆尽。他慌忙收容徒手官兵，重编第四十七师，开赴蚌埠整训。

1932年3月，当十九路军发动的淞沪抗战临近尾声之时，上官云相奉命率四十七师开抵常熟，拨归第五军张治中指挥，负责警戒二线沿江据点，但未经对日作战，淞沪抗战即告结束。6月9日，第四十七师奉命由镇江乘轮开汉口，旋移防武穴，投入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上官任鄂豫皖三省“围剿”军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9月初移驻蕲水，侵占英山后推进霍山，参与会攻根据地首府金家寨。1933年夏，上官云相率部继续在鄂东罗田一带，进出松子关，追击红军游击队。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上官被急调追击红军，任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总司令徐源泉）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由豫鄂入川，开赴绥阳、綦江、松坎防堵中央红军，并驰援桐梓王家烈部。5月，蒋介石令上官率四十七、五十四师修筑黔北公路扎佐至松坎段，沿途修筑碉堡，借以封锁、阻截红军。8月，上官任驻黔第一绥靖区指挥官。

1936年1月，上官云相因贪污军工筑路款项败露而去职，遂赴欧洲游历并考察军事，于1937年1月返国。同年5月15日就任豫鄂陕边区主任，驻湖北襄阳。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9月，上官云相调任第十一军团军团长，隶属淞沪战场左翼军（总指挥陈诚）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序列，驻苏州。11月10日，左翼军自淞沪退守吴（县）福（山）线，薛岳升任左翼军总司令，上官代理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撤退至皖南泾县三溪。1938年3月，上官改任第三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顾祝同）总参议，7月调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翌年4月，上官奉命率六个师自广德开往江西临川，担任鄱阳湖东、南两岸和赣江东岸对日防御守备，曾一度进击南昌，攻占机场，损兵折将，无功而

退。

1940年10月，蒋介石、顾祝同为袭击坚持在皖南敌后抗日的新四军[(1)]，置赣东对日作战于不顾，将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迁至皖南宁国，与原在皖南的第二十三集团军连接。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迫令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变更作战地区，限于一月内撤往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以“佳电”，表示愿顾全大局，将皖南新四军撤往长江以北。正当新四军积极准备渡江北撤时，顾与上官等奉蒋之命加紧秘密策划，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于皖南。12月中旬，上官从宁国总部匆忙赶到上饶，顾破例留他夜宿私寓，面授机宜。接着顾召开徽州秘密军事会议，指定上官为作战指挥官，确定动用七个师又一个旅兵力的作战编组[(2)]。会后，上官交代幕僚“要绝对保守机密”，要继续为新四军“催请经费粮秣”，但“弹药器材决不代他请领”，“万勿暴露企图，以免给予新四军口实”[(3)]。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军部暨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到达泾县西南茂林地区。当晚，上官云相召开军事会议，诬称新四军“南窜”黄山、天目山发展根据地，立即下令参与包围的蒋军各部推进、堵击，对新四军予以歼灭。他宣称：“我们和共产党誓不两立。”[(4)] 6日拂晓，上官总部直辖的第四十师在三溪镇东北山口隘路投入堵击战斗，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由此发生。

事变开始后，上官云相负责整个战役的全权指挥，随时通过战区一名联络参谋向顾祝同报告战况。新四军英勇抵抗，7日至10日战况激烈。上官在宁国万福村集团军总部，夜以继日地躺在鸦片灯旁精心指挥这场血腥屠杀。上官7日得报新四军已全部渡过舒溪，乃下令所属各师集中主力搜索、包围，形成互相衔接的封锁圈，又特令直辖四十师迅速夺占榔桥河山口隘路，迫使新四军无法展开、通过。新四军被围在山谷，寒冬阴雨，道路泥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地作战。当晚，上官严令各师长：“如果新四军从哪个师的阵地上突

围逃跑了，就唯那个师长是问。”[5] 上官还特别命令所有前线部队：在攻击位置变动后，原封锁线不得撤除，以防止新四军小股或零星潜出。他自诩这是他“多年剿共作战的经验”，“书本上找不到的”[6]。9日，上官得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人带领少量部队从茂林西北突围而出时，大为震怒，立刻撤换、扣押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以第七十九师师长段茂霖兼任该师师长。当天，上官督饬所属各师发动全线进攻，包围圈日益缩小，新四军军部被迫退守东流山、石井坑一带。11日拂晓，上官指挥所部强攻东流山等地，新四军顽强抵抗，激战至12日晚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分散突围[7]。上官指挥所部继续追击，叶挺亲自率领手枪队与之拚杀。叶挺致书上官，斥责其背信弃义，指出应以抗战为重，不要再自相残杀，表示愿与上官面谈。13日叶至上官总部，即被扣押。

皖南事变震惊中外。22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要求严惩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但上官云相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仅没有受到惩办，还得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特别嘉奖，国民党政府特发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奖金五万元。上官在欢宴“胜利”时炫耀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8] 1942年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有人建议将皖南事变战例列入报告。上官供认“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9]，阻止上报。由于上官云相反共有功，1943年1月被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5年春，抗日战争行将进入反攻阶段，继赫尔利发表援蒋声明后，国民党军队在苏南、浙西地区大举发动反共军事行动。5月，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所辖第五十二、第七十九等师以及部分美国训练的特务部队共十个师，分三路向新四军苏浙军区猛烈进攻。6月上旬，新四军主动退出新登、临安和天目山地区。上官率部跟踪紧逼，

侵入浙西解放区达百里[10]。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官云相调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接收平、津地区。终因非蒋介石嫡系将领，实则有职无权。1946年，他不甘寂寞，自请设唐山指挥所，自兼主任。旋移驻天津张园，奉命指挥冀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内战。1947年2月27日，他出席平、津、冀、热“绥靖会议”后，兼任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主任，致力监督天津外围防御工事构筑和款项支付事宜。上官为谋取军事实权，曾托人请求蒋介石准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11]，蒋未应允。

1947年7月，第十一战区撤销，改设保定绥靖公署，上官云相任副主任。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上官对华北战局感到消极悲观。1948年1月，他在改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后，曾指使亲信赴解放区走私贩运棉花，藉此牟利。同年秋，平津战役前夕，他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声威，以养疴为由，去职赴沪寓居。1949年4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旋飞香港，转往台湾。

上官云相赴台后，于1950年4月去职，即去高雄市隐居，晚年益加消沉悲观。1968年萌生出世之念，自印名片称“古穆和尚”[12]。1969年8月8日，因病在台北死去。

---

(1) 即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当时隶属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战斗序列。

(2) 皖南事变中参加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有：第二游击区第四十师，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的第二旅，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二师，近五万人。

(3) 武之棻：《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

(4) 武之棻：《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5) 陈士章：《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6) 武之棻：《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7) 这次突围的新四军仅新三团、老三团部分取得成功，在繁昌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县。

(8) 武之棻：《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9) 武之棻：《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10)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7月25日。

(11) 杜建时致笔者的信。

(12) 《山东文献》第1卷第3期。

尚小云

李仲明

尚小云，原名德泉，又名绮霞，1900年1月7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出生于北京安定门内法通寺草厂大院，祖籍河北南宫县。

尚德泉五岁读私塾，后因父亲病故，家境困难，乃于七岁时入“三乐社”京剧科班，学武生，艺名“三锡”，曾演《郊州庙》黄天霸一角，因身体软弱，改学旦角，执教老师见尚脸型颇似京剧名旦孙怡云，遂改艺名为“小云”。尚小云先后师从唐竹亭、孙怡云、张芷荃、戴韵芳等名角。学习青衣、刀马旦，又得到著名青衣演员陈德霖、路三宝、王瑶卿的指教，表演技艺进步很快。

1912年春，尚小云在北京主演《别宫祭江》等戏，声誉鹊起；翌年，他与赵桐珊（艺名芙蓉草）、荀慧生（艺名白牡丹）被称为“正乐三杰”；1914年8月，在北京《国华日报》为京剧界举办的童伶竞选活动中，尚小云被选为“童伶大王”。尚小云于十六岁出科前后与孙菊仙合演《战蒲关》、《三娘教子》、《审头刺汤》；1916年10月与龚云甫合演《母女会》；1917年冬与杨小楼合演《长坂坡》、《湘江会》；1919年春与王瑶卿等人合演《乾坤福寿镜》，均获好评。1918年北京《顺天时报》评选京剧新秀，尚小云再次当选“童伶大王”。他先后加入“同馨社”、“福庆社”、“玉华社”、“双庆社”等京剧社，先后与王又宸、杨小楼、高庆奎、朱素云、王瑶卿、梅兰芳、筱翠花等名角合作演出。

在演唱风格上，尚小云在学习陈德霖古朴刚劲的青衣唱法的基础上，得孙怡云、王瑶卿的指点，结合自身的性格和戏路，逐步形成行

腔高亢、吐字清晰、立音充沛、刚柔相济的特点，念白亦学习王瑶卿爽朗明快的风格。王瑶卿见尚小云武功底子扎实，又为尚整理排演了《昭君出塞》一剧。尚小云谦虚好学、博采众长，他的代表剧目《失子惊疯》、《昭君出塞》、《玉堂春》、《十三妹》、《梁红玉》、《秦良玉》、《武家坡》等，深受观众喜爱。民初的京剧评论家方宾在《十日戏剧杂志》发表《阁炉话小云》一文，评价尚小云的表演技艺：嗓音“刚而圆，炼而亮，似钢之音而浑厚，似石之音而高亢，盖庄重贞烈静雅大方之音也”；唱功“不取巧，无花腔”；念白“字斟句酌，吐字似有千钧之重，而不失自然之韵”；身段动作“虽嫌稍快，但因其神意浑厚而不觉其轻巧伶俐之病”；台风庄重，精神奕奕，是“青衣正宗，音乐戏剧之能潜移默化人之性灵也”[(1)]。

1923年9月，尚小云与余叔岩为各国驻华外交使团演出《御碑亭》，两人精湛的表演深深吸引了外宾，日本使节久保得二作诗称赞：“更有青衣迥不群，宛转歌喉高下分。正乐虽废传头在，婉娈第一尚小云。”[(2)] 几年后，尚小云创办“协庆社”（后改“重庆社”）挑班演出，至1949年他先后排演了新编、改编的历史剧目几十出，其中如《林四娘》、《婕妤当熊》、《玉虎坠》、《珍珠扇》、《峨眉剑》、《相思寨》、《前度刘郎》、《绿衣女侠》、《龙女牧羊》、《詹淑娟》、《混元盒》、《虎乳飞仙传》、《刘金定》、《北国佳人》、《兰陵女儿》等戏和外国戏《摩登伽女》较为有名。20年代中后期，尚小云不仅以其婀娜刚健的表演风格，以《红绡》、《峨眉剑》、《珍珠扇》（“反串”戏）的精彩表演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并列为“四大名旦”，而且以其在《昭君出塞》中边歌边舞的“马蹚子”，《林四娘》中的“剑舞”，《婕妤当熊》中的“扇舞”，《摩登伽女》中的苏格兰舞等创新表演，奠定了尚派艺术的坚实基础。他亦悟出：“任何艺术，要发展，就得创新；要竞争，就得独具一格，有自己的‘绝活儿’，没有创新，没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艺术，很难存在和发展。”[(3)] 在京剧舞台上，尚小云塑造了许多文武兼备、侠肝义胆的艺术形象，如云弹娘、冯婕妤、谢小娥、聂碧云、李梦兰、吕灵姑等，

发挥了自己能唱能武的艺术特长。特别是《相思寨》的排演，以少数民族妇女的正面形象呈现于京剧舞台，弥足珍贵，戏编得好，尚小云的表演亦鲜明生动。1934年出版的《尚小云专集》中收有曾啸宇的诗《观尚艺员小云演云斓娘歌》，诗曰："尚郎明慧夸才妙，描摹仪态神弥肖。倏尔长裙拖地重，袅娜西子浣溪湄。忽焉羽冠辘轳剑，桅婳将军来酣战。"(4)

30年代，尚小云排演了许多新戏，他在表演风格上坚持创新，博采众长，但在多数剧的表演路数上却按照传统演法，不将青衣、花旦融合一体，剧目多不超越青衣范围。徐汉生在《尚小云专集·序》中评论："青衫一行，在今日石头（指陈德霖）已故瑶卿老，继其后执牛耳者，当推绮霞（即尚小云）无疑。迩来观众心理，喜新厌故，竟尚杂糅花衫、青衫于一炉，号为改良新剧，久矣别成一派。而绮霞兴趣坚决，不为潮流屈服，向亦排演新剧，要皆不越青衫范围。"(5)

1935年春，富连成科班主要演员李盛藻等人组班赴上海演出，在京演员虽有叶盛章、骆连翔、袁世海等名角支撑，但营业渐衰，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豪爽侠义的尚小云见此情况，毅然到富连成找叶龙章，慷慨提出协助富社排戏，主动为李世芳、毛世来、袁世海、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等人排演了《天河配》、《昆仑剑侠传》、《娟娟》、《金瓶女》、《秦良玉》、《酒丐》等戏，这几出戏的上演，轰动一时，不仅止住了颓势，而且盛况空前。《酒丐》一剧，连演数十场，上座不衰。尚小云还多次把场，并为李世芳、袁世海主演的《霸王别姬》中虞姬的舞剑配奏"夜深沉"曲牌中的"南堂鼓"，技惊四座，满堂喝彩。

表演之余，尚小云在家里阅览群书，编写剧本；练习打鼓，弹琵琶；学习书法、绘画。他在《战金山》中的击鼓和《汉明妃》中的弹琵琶，以极高的艺术造诣，结合剧情，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梁红玉的巾帼英雄气概和王昭君凄婉哀怨的愁肠。博学多艺、勤编剧本丰富了尚小云的编剧经验，他曾对友人说："我每编一剧，只要深入了解素

材，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小舞台……从想到人名开始，接着出现这个人物形象，以及穿戴打扮。开笔写戏，就会自然考虑到这些人物在舞台上的位置与唱、念、做、打以及随之而来的锣鼓节奏。”[6]

1936年3月，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科班成立，对比自己当年入京剧科班的痛苦经历，尚小云特向入科学生作了三点保证：（一）入科学生均有人身自由，不立卖身契约；（二）入科学生从学习文化入手，革除目不识丁、学艺口传心授之弊端；（三）保证学生温暖，做到学有所获，出科职业有保证[7]。尚小云除聘请名师传艺，还亲自执教，荣春社以“春、荣、长、喜”排名，历时十二载，至1948年因经济窘困被迫解散时，共培养学生二百多人，其中较知名者，有尚长春、李甫春、徐荣奎、杨荣环、景荣庆、马长礼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尚小云经常率剧团赴各地演出，受到各界民众的欢迎。1959年为支援大西北文化建设，尚小云率家人和剧团赴陕西西安，对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各地方剧种的青年演员广为传艺。196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尚小云的《昭君出塞》、《失子惊疯》戏曲影片和《尚小云舞台艺术》纪录片。尚小云曾任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常委，尚剧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戏曲学校艺术总指导，陕西省剧协常务理事，陕西省京剧院院长等职。尚小云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至1976年初病情加重，4月19日逝世，弥留之际长叹：“惜天不假年，遗恨多多。”[8] 1980年9月，国家文化部将尚小云的骨灰迁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0月30日，举行了追悼会。尚小云弟子有黄泳霓（雪艳琴）、赵啸澜、黄玉华、梁秀娟、杨荣环、谢锐清、鲍启瑜、李翔、孙明珠等；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等及各地方戏演员胡小凤、马蓝鱼、王秀兰等也都受过教益。

---

(1) 陕西省政协、河北省南宫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2) 陕西省政协、河北省南宫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第243页。

(3) 陕西省政协、河北省南宫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第29页。

(4) 陈义敏：《尚小云》，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中国京剧史》中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645、643页。

(5) 陈义敏：《尚小云》，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中国京剧史》中卷，第645、643页。

(6) 陕西省政协、河北省南宫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第27页。

(7) 陕西省政协、河北省南宫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第246页。

(8) 陕西省政协、河北省南宫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第254页。

邵力子

袁钟秀

邵力子，初名景奎，又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生于1882年12月7日（清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父亲邵霜，曾任江苏吴县县丞。邵力子少时在家塾读书，1902年9月乡试中举人，江苏县令朱智邀任文案，辞未就，径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学习。1905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因法国神父干涉学院的行政和教学计划，同学罢课，监院马相伯忿而离职，邵力子等二十八名学生随之集体离校。马相伯带领学生又创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邵力子入该校学习并工作[(1)]。

1907年春，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邵力子参加筹办工作。邵随于右任赴日本募款，在东京会见了孙中山，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08年，邵力子与于右任在东京同时加入同盟会[(2)]，稍后回国。不久，《神州日报》因遭火灾停刊。1910年于右任又创办《民立报》，邵任编辑。1913年《民立报》因“二次革命”遭禁停刊，邵回到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员。1914年邵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该党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于1916年初创办上海《民国日报》，邵力子为经理兼编辑，并兼任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又兼大夏大学新闻系教授。《民国日报》因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受到当局的压迫，经济上十分困难，邵力子等人艰难支撑，有时不得不自己掏钱买纸张，以保持《民国日报》正常出版。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邵力子以极大的热情在复旦大学等处发表演说，鼓动广大青年积极投入学生运动，推动了上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邵力子还在《民国日报》新开办的副刊《觉悟》任主编，热情宣传新思想，并提倡工人组织起来，号召青年到劳动群众中去，

主张妇女解放，关心青年的学习和生活，很受进步读者的欢迎。邵力子亲自接待来访，答复来信，解决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撰写了近千篇短小精悍、寓意深切的短评、随感录和通信。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以前，邵力子就开始阅读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刊。1920年上半年，邵力子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稍后，该会转变为早期共产党组织，邵力子即为早期共产党成员。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因此《觉悟》经常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批判各种错误思潮。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上海东南高等师专学生酝酿学校改组，邵力子给予坚定支持。1922年10月，该校改名为上海大学，邵力子为副校长、代理校长，邓中夏任总务长，聘请瞿秋白、蔡和森、陈望道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各系主任和教员。从此上海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培养了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和共产党的干部。

邵力子于1919年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改组后，邵力子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委员和农工部秘书。

1925年春，上海工人掀起罢工高潮，邵力子把报道罢工的稿件送《民国日报》上发表。这引起欧美各国和国民党右派的忌恨和排挤，不久邵便离开了《民国日报》社。6月4日上海大学被封闭，邵力子被法租界当局驱逐出租界。他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困难，乃应蒋介石之邀，于6月中旬南下广州。

邵力子到广州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1925年10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邵力子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8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

次扩大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让他“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邵力子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3]。出国前，蒋介石嘱邵力子向斯大林提出，要求第三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力子向斯大林转达蒋介石的要求时，只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斯大林未做肯定答复[4]。第三国际会议结束以后，邵力子暂留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旁听。

1927年5月初，邵力子从苏联回国，始知蒋介石已发动了清党反共政变。他向蒋介石表示，“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说“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5]。

1928年初，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邵力子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后，邵力子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6]。1931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由于当时甘肃政界极为混乱，他直到1932年4月始赴任。

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注意发展农林事业，着手兴修水利，提倡开荒造林，成立陕西省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自任主任，同时发展交通文化事业。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同蒋介石在西安的军政要员同时被捕。12月13日，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向蒋介石表明，事变前他一点也不知道，并趁机劝蒋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7]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邵力子同张学良一起住在奉化溪口，名义上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是对西安事变补过。1937年1月5日，蒋介石正式免去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邵力子为大会审查委员、政治组负责人和大会宣言起草人之一，会上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卢沟桥事变后，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的会谈，协商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不久，军事委员会战区政务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周恩来等十三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邵力子被选为理事会主席。中国分会在进行反侵略宣传、揭露日寇暴行、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同年底，邵力子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他主张和苏联结成联盟，反对德意日的反苏反共轴心。

1940年4月，蒋介石为取得苏联的援助，派主张同苏联友好的邵力子为驻苏大使。邵感到任务艰巨，抱着搞好中苏邦交和促进国共合作的目的，于6月7日到达莫斯科。经过努力，苏联援助的军械物资在当年冬季通过新疆运进国内。

1942年10月，邵力子回国述职，他在重庆对新闻记者发表讲话表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8)]。其后，他接连在中苏文化协会、中央银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作报告并撰写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和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起了积极作用。邵力子的活动，遭到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驻华大使。1943年初，蒋介石免去邵力子驻苏大使的职务，命他为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应邀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为谈判代表。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双方在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双方又签订停战协定。在同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报告国共会谈的经过，表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9)]。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反对。邵力子认为在国家没有真正统一，上下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10]。因此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和参加“国大”的选举。1947年4月，他任国民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政府顾问委员职务。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21日宣布“引退”。代总统李宗仁在22日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代表，与中共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在正式谈判之前，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身份前往，同时与中共交换关于和平的意见。在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明确表示“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11]。2月22日，邵力子同代表团成员乘专机到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并同周恩来进行了两次商谈。

3月24日，张治中、邵力子一行北上。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在和谈中，国民党代表大多数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一条，只有邵力子是个例外[12]。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但由于蒋介石阻挠，国民党方面终于没有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当晚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商讨回南京还是留北平的问题，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不回南京。全体代表一致决定不返回南京。4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宣布撤销和平代表团。邵力子和章士钊于5月18日给李宗仁写了一封长信，托刘斐带到香港转广州交李宗仁，劝其勿“甘犯穷兵黩武之罪名”。5月20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五人又给李宗仁、何应钦一封电报，分析形势，剖陈利害，劝他们“悬崖勒马”，“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交替政权”[13]。5月27日上海解放，邵力子和黄启汉等人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

五十余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邵力子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等职。

1954年，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计划生育，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1955年，邵力子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6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邵以其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经常通过广播、通讯、发表讲话等方式对台湾军政人员进行争取工作，为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逝世。

---

(1) 刘麦生：《我所知道的上海震旦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92页。

(2) 傅学文：《邵力子生平简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

(3)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4页。

(4)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5页。

(5)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5页。

(6)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秘书处1928年印行。

(7)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8) 邵力子：《苏联工业化》，《苏联归来》，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印，第61页。

(9)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1946年版，第35页。

(10) 《和平巨人邵力子》，《联合画报》第226期。

(11) 傅学文：《邵力子生平简史》，第114页。

(12) 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6页。

(13) 傅学文：《邵力子生平简史》，第121页。

邵飘萍

耿云志

邵飘萍，名振青，浙江金华人。生于1884年11月1日（清光绪十年九月十四日）。他的父亲邵桂村是个教员。他弟兄共五人，其他四人都在家乡务农。邵飘萍幼年就特别喜欢读书，十四岁中了秀才。后来因受戊戌变法的影响，他丢弃了“子曰诗云”的一套，改而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1902年，他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在杭州，他开始读到多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那时，梁启超在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邵飘萍对梁的新文体及其“笔端常带情感”的议论颇为倾倒，用心加以模仿，不时为《申报》写些通讯文章，反映杭州及金华地方情况。不久，他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1905年，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回到金华，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继续为《申报》写通讯，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他看到报纸颇能影响人心，便认定报纸是救国的有力工具，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可以成为救国的一种途径。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一样，邵飘萍则可以说是一个“新闻救国论”者。

1911年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约法》里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于各地。这时，幻想“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心情非常激动，于1912年离开金华到杭州，与一个叫杭辛斋的报人合作[(1)]，办起《汉民日报》。邵在《汉民日报》上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有讥讽。所以，他办报还不足三年，竟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2)]。到这时，邵飘萍以其亲身经历，锐敏地觉察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汉民日报》于1914年被封禁以后，邵飘萍逃往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策划侵略中国。他感到无比愤慨，于是联络三个中国同学，“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3]，极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和野心。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纸上透露出来。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的愤怒声讨。他在通讯里，还经常反映留日中国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国内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1916年春，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的邀请回国。抵沪后，同时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以“阿平”的笔名经常发表反袁的政论，很快引起舆论界注意。6月，袁世凯倒台身死，军阀政客们又群集在北洋军阀的新首领段祺瑞周围，北京政局仍是群魔乱舞。邵于此时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

邵飘萍到北京后，奋力改变新闻界只靠摘引官方文件发消息的陋习，千方百计，必欲得事实的真相而后发出第一手新闻消息。在邵的要求下，《申报》大大扩充了北京电讯的篇幅。于是，《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以其内容丰富、真实、生动，受到重视，引起各家报纸效法。邵飘萍通过《北京特别通讯》，及时较详细确实地揭露了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种种丑行，因而遭到反动派的忌恨。

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4]，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5]，这有利于打破外国通讯社和报纸对我国舆论的操纵。是年10月，邵又在北京创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中写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6] 在他的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颇以舆论界“中流砥柱”自命。然而，这毕竟带着很大的幻想成分，恣睢暴戾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听命于多少反映一些民意的舆论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揭露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因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段政府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馆，要逮捕邵飘萍。邵仓促化装，逃出北京到上海。不久，他接受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前往日本，担任该报的特约记者。

邵飘萍到日本后，一面当记者，一面注意研究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在1920年内，他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前者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后者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邵根据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严正地指出，各国反动派所散布的对新俄国的种种诬蔑，皆属荒谬无稽；确认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7)]。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重新办起《京报》。根据对日本新闻事业的观察研究，他看到国内的新闻事业亟待改进，且必须发展新闻学教育。早在1918年，邵飘萍曾被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聘为导师，讲授新闻采访技术。由于邵氏思想进步，又有丰富经验，讲课很受会员欢迎。1923年，邵又在汪大燮办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并在这年写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出版。1924年，邵又受聘于北京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技术以及报纸经营方法，并于是年写成《新闻学总论》一书出版。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锐意革新。1925年初，《京报》陆续增出各种周刊，其中《莽原》周刊，是鲁迅先生主编的。其他有《妇女》、《儿童》、《电影》、《戏剧》、《民众文艺》等共十二种周刊，此外还刊行三种社会科学半月刊，这些定期专刊深受读者欢迎。这期间，邵飘萍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倾向更趋明显，《京报》成为最活泼而有生气的北方报纸。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它是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飘萍在《京报》上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广东革命政府。邵飘萍对南方出现这一新局面，自始就持欢迎态度。是年11月，趋向进步的北方军人冯玉祥率部入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的总统曹锟，并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宣布废除帝号。邵对这一进步行动非常赞扬。

1925年初，孙中山为谋求政治统一而北上。《京报》上几乎每天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并以“全国景仰”为题，刊出孙中山照片，表示了对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高度敬仰，热烈地希望他北上成功。而对于段祺瑞搞的善后会议，则一直持批评态度，曾指出：“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8)] 邵的这种政治态度，再度激起段祺瑞政府的忌恨。当时邵飘萍曾写信给胡适，向他指出，进步青年对他参加善后会议十分不满，同时在讲到自己的态度时说：“微闻当局对弟极为不满，此固意中，亦无所惧。”

接着，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邵飘萍在《京报》上连篇著文，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9)]；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指出英、日等国政府应负杀人罪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的口号[(10)]。他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

五卅反帝运动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日益奋起，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在“讨赤”的黑旗下，联合起来向革命人民疯狂进攻。这时，邵飘萍又在《京报》上发表《中国今后之趋势》一文，相当深刻地分析了所

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然后指出，被帝国主义、军阀、政客指为“赤化”的“祸源”的广东革命政府，其“治绩为全国第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11) 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段祺瑞下令卫队向举行反帝游行的学生群众开枪，造成又一起大惨案，全国为之震动。邵飘萍怀着极大愤慨，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严厉声讨段政府的罪行；揭露其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对爱国人民穷凶极恶的反动嘴脸；指出段祺瑞是惨案的祸首元凶，应当逮捕法办。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对邵飘萍恨之入骨，遂把他秘密列入通缉名单，企图进行迫害。

“三一八”惨案过后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4月15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奉军入京后，疯狂肆虐，不但封闭报馆，钳制舆论，而且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邵飘萍同情国民军，反对“讨赤”，还曾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多次指名谴责奉张亲日卖国，张作霖对他早已怀恨在心。邵为免遭迫害，当奉军入京时，便避入六国饭店。4月24日，奉军设计将邵诱捕，当即封闭《京报》馆。然后，不经审讯，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于4月26日将邵飘萍杀害。

---

(1) 杭辛斋（1869—1923），浙江海宁人。清末曾从事革命活动，在北京办过《中华报》。据《警钟日报》说，该报“内容丰富，以恢复国权、启导民智为主”。

(2)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油印稿）。

(3) 邵飘萍：《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

邵飘萍》。

(4) 据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及曾虚白《中国新闻史》所记，新闻编译社创立于1918年7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记为1916年7月，误。

(5)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上册，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289页。

(6) 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

(7) 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1920年版，第2页。

(8) 《京报》1925年2月7日。

(9) 《京报》1925年6月2日。

(10) 《京报》1925年6月6日。

(11) 《京报》1926年2月18日。

邵元冲

黄德昭

邵元冲，字翼如，浙江绍兴人，1890年6月1日（清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四日）生于一个商人家庭[(1)]。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加入同盟会，十七岁进浙江高等学堂。1909年举拔贡，次年考得法官，任江苏省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不久即辞去。

1911年，邵元冲东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主笔。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该党驻上海办事处编辑主任。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嫌犯应桂馨匿居租界，邵据法理与租界当局力争，使应桂馨得以引渡[(2)]。在孙中山反袁的号召下，邵于7月赴江西湖口参加讨袁之役，任长江各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邵加入中华革命党，担任《民国》杂志编辑，后任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奉命回国同夏尔玙图浙江，以事泄走上海。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参与讨袁的“肇和”兵舰起义；1916年又在山东潍县参与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举义，均遭失败。

1917年9月，广州成立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大元帅，邵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事。1919年冬赴美留学，先后肄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奉孙中山命，视察海外党务，周游美、英、法等国。1923年11月，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俄考察，后由苏联去德国游学。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邵元冲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年夏，由欧洲返国抵上海，9月与张默君结婚。后入粤，被国民党推为代理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同年冬，随孙中山北上，任行营机要主任秘书。在北京创办《民国日报》，任社长。孙中山逝世，他是遗嘱证明人之一。

1925年，邵元冲南下返粤，任潮梅海陆丰行政长。是年11月至北京，参加谢持、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后主持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创设“中山学院”，因此受到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书面警告[(3)]。但“西山会议”派我行我素，于1926年3月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邵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5月，邵元冲经蒋介石拉拢入粤，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次年，随北伐军赴浙江，任省政治分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因将杭州市工务局公款十余万元汇存沪行，为杭人责难，仅三个月即辞市长职[(4)]。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邵元冲大力从事宣传工作。1928年初，先任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同年4月，到上海创办《建国》周刊，使成为国民党喉舌之一。他提出要在“军事进展中为政治之建设”，“先建设自己理论”，“严密组织、统一意志、团结感情、集中力量为党之建设”一类的主张[(5)]。次年，《建国》周刊由上海迁南京，改名《建国月刊》，邵任社长。他以阐发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号召，主张强化国民党“党治”，大力宣扬封建专制思想。

1929年3月，邵元冲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兼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次年12月，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次年发表孙科为院长，邵提出十人要孙同意提为立法委员，孙因此拒绝就职，邵仍代理院长。是年冬邵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会议委员、宣传委员

会主任委员等职。1933年解除代理立法院长，仍任副院长及所兼各职。至1935年春，因对日外交问题与汪精卫有矛盾，辞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后赴陕祭黄帝陵，周游陕、甘、青、宁、绥、晋各省。是年冬再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工作。

1936年10月，邵元冲赴桂考察，12月应蒋介石电召入陕，适逢西安事变，被围困于西京招待所，12日晨因跳窗逃走，被士兵开枪击伤，两日后在医院去世。

---

(1) 据邵传志《哀翼叔之死国》云："元冲父大昌曾开设邵开成银楼于山阴县下方桥。"（见《建国月刊》第16卷第2期）

(2) 据邵元冲《治学自叙》自称："癸丑宋渔父被戕案作，租界当局认应桂馨寄居租界，不允引渡，予乃援据法理，以犯事地在沪宁站属中国，应犯为中国人，杀人为刑事犯，故应交中国法院讯理，乃卒得将应犯引渡。"

(3) 据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见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4)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5) 《建国月刊》本社同人：《敬悼邵翼如先生》；参见1928年4月其亲撰《建国》周刊发刊词。

沈从文

娄献阁

沈从文，乳名茂林，原名岳焕，字崇文，后改从文，笔名有焕呼、休芸芸、琬若等数十个。1902年12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湖南凤凰厅（又称镇箪城）一个军人世家。其父沈宗嗣自幼过继给箪军（湘军一支）将领，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提督的伯父，曾做过清军军官，1900年在大沽炮台抵抗八国联军失败后回到家乡，辛亥革命中暗通起义军。1912年去北京，后因参与谋刺袁世凯事泄，逃至热河，此后在内蒙、西藏军队中任事。母亲黄英为土家族，有文化懂医学，对沈从文影响较大。

沈从文天资聪敏，六岁正式入塾读书，但顽劣不用心，对外面世界那本“大书”的方方面面则感到新奇与亲切，加上受了一些同伴的不良影响，染上了逃学、说谎、掷骰子赌钱和说下流话等恶习，多次遭到家里和塾师的惩罚。1915年，沈从文先进了城内第二初级小学，后转入城外文昌阁第一初级小学，受教师南社诗人田名瑜的影响，能安心听讲，尤喜诗文，但“仍放不下那本大书”，“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上多十倍”。

1916年，沈从文得母允准参加了预备兵技术班，他训练认真、坚强、勇猛，获得好评，曾产生上陆军学校当将军想法，但不久技术班便解散了。1917年秋，沈从文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但因家境越发困难，母亲无奈只好让他去当兵。沈从文先投入张学济领导的湘西靖国第二军第一支队，随军驻扎于辰州、芷江、怀化镇一带。沈从文在军中只是按常规打发日子，有时也练习书法或临摹一些壁画，同时受一位闻姓秘书影响，开始接触新知识，与同事合伙订了一份《申报》，并阅读《西游记》、《秋水轩尺牍》等。1919年底，湘西靖国二军开

往川东，后退至湖北受到王占元部阻击，在1920年中秋节前在鄂西来凤遭所谓“神兵”和民兵偷袭，几乎全军覆灭，沈从文因留守沅陵，幸免于难，稍后被遣散回原籍。

1921年2月，沈从文再次去芷江，投靠任当地警察所长的五舅黄巨川，在警察所做办事员，后又兼任屠宰税收税员。在芷江，沈从文因七姨夫熊捷三的关系，得以常出入熊府，得阅熊府及熊希龄昔年创办的实务学堂的藏书，如《史记》、《汉书》、《大陆月报》等，尤对林纾所译小说感兴趣。后因与一马姓女子恋爱，而被骗去母亲交沈从文保管的卖房款一千块银元，感到无脸见人，便于1921年夏悄悄地离芷江，路过常德时，被表兄黄玉书留了下来。10月，经人介绍，沈从文去桃源贺龙部谋事，后又赴保靖谋事。1922年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湘西王陈渠珍部参谋处的司书。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负责抄写军部文电，担任会议记录，并经管陈渠珍收藏的书籍、碑帖、绘画及古物。因需经常替陈翻检古籍，从而增长了不少知识，这里成了沈从文“学习历史的地方”。

1923年，在陈渠珍的资助下，沈从文带着对新思想的推崇来到北京，先住在不用租金的酉西会馆，想读点书。但到京后，沈从文发现上大学要经过考试，他只有小学水平，难以应付，只好先进行自学。沈从文每天去京师图书馆看书，又常去住所附近的琉璃厂看古董、明清服饰、器物，打下了后来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1924年春，在北京农大学习的表弟黄村生帮助下，沈从文在离北京大学很近的银闸胡同找了一个“窄而霉”的小公寓。在这个“窄而霉小斋”，沈从文一边断断续续去北大旁听，一边学习写作并向报刊投稿。其时，由于陈渠珍的接济中断，生活陷入困境，靠赊欠与一些相熟的学生接济。沈从文想半工半读，到各工场去联系均失望。他大胆给一些知名文人写信以求帮助，只有郁达夫对他报以同情，特意来沈从文住处看望并请沈吃饭，把结账找回零钱也给了他，使沈从文深受感动。郁达夫鼓励沈从文好好写下去，并在《晨报》副刊发表《给一

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为沈鸣不平。

12月，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1925年春，结识了《京报》副刊《大众文艺周刊》的编辑胡也频，后又因胡邂逅丁玲。此时，沈的文章《遥夜》受到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赞扬，称“全文俱佳，实在感动人”。林约沈从文相见，并对他劝勉有加，这让沈从文终生感念。8月，经林和梁启超介绍，沈进了由熊希龄主办的香山慈幼园任图书馆编辑。后因发表两篇有关慈幼园的文章而发生芥蒂，为保持自己尊严和人格独立，沈从文离开香山。随后一度在《现代评论》任发行员，又去东北谋事，还在冯玉祥秘书处应过差。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沈从文随他的大学生朋友参加过几次反帝、反北洋军阀的游行和散发传单活动。随着南方北伐战争的进行，早先在燕京大学认识的许多朋友先后到达武汉，并来信邀沈从文南下，但沈从文醉心于“文学革命”，终也未成行。

从1926年起，沈从文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百七十余篇作品。9月，在北京与蹇先艾、张采真、天庚虞等筹备创立文学社团“无须社”，并在《世界日报》上创办副刊。11月，沈从文的第一部作品集《鸭子》作为“无须社丛书”的一种由北新书局印行。1927年9月，小说集《蜜柑》也由新月书店出版。由于和武汉革命党人通信而受到北京警察局的传讯与搜查，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也为寻求自身的更好发展，1928年1月沈从文迁居上海。为生活他拼命写作，先后完成、出版《山鬼》、《长夏》、《神巫之爱》等十多部作品集。为了免除书商的盘剥，1929年初他与胡也频、丁玲共同创办《红黑》和《人间》两个月刊，从写稿、编辑、出版、发行等各种杂事几乎全部由三人包干，开头效益不错，终以经济问题，《人间》只出了四期，《红黑》出了八期，便不得不停业。

8月，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开设“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并在暨南大学兼课。在此

认识学生张兆和。稍后，胡也频和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被选为该联盟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胡曾劝沈加入该联盟，沈思想有些疑惧，他们仍保持友谊，但因沈不愿同胡走同一道路，无形中产生了隔膜，在丁玲看来，沈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1930年秋，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1月放假回上海，逢胡也频被捕入狱，沈从文多方奔走营救未果。胡也频牺牲后，沈又帮助丁玲料理后事，耽误回武大授课，只好留上海继续写作。在胡牺牲半年后，为了纪念朋友，并为丁玲母子筹款，沈从文写了记述三人友谊的《记胡也频》。

1931年秋，又由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赴由杨振声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11月，徐志摩在济南因飞机失事遇难，沈连夜前往送别。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沈接连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揭露国民党秘密逮捕丁玲的行为，又列名于上海文化界营救丁玲的活动，7月发表了《论丁玲女士》（后集结为《记丁玲》）。1936年，沈从文曾去南京看望被囚禁的丁玲，但彼此心存芥蒂，关系已大不如前。

1933年7月，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来北平参加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一起工作的有朱自清、吴晗等。9月，沈从文同张兆和结婚。同时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进行小说等创作，数年间出版了十多个集子，成为30年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和巴金、朱光潜等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对青年作者萧乾、卞之琳、王西彦等给予大力帮助与鼓励。1934年1月，沈从文因母病危回家探望，深感十年间湘西在退化，后写《湘西散记》，表达感叹。同年，沈从文写成以湘西茶峒为背景的小说《边城》。这是沈从文计划以沅水流域为背景的“十城”之一部，也是沈从文的代表作，通过对沅水流域20世纪初凡夫俗子的记述，“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在文坛地位的提高，沈从文卷入了一系列的争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导，在北平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构”的作家提出了批评，引发了一场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1934年沈从文发表《禁书问题》一文，控诉国民党当局对作家的迫害及对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引发国民党方面对沈“站在反革命立场”的指控，左翼方面则认为沈是“忠而获咎”，是不懂统治者心理的“隔膜”；1936年，沈从文又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一文，指出当时许多作品存在着内容“差不多”的现象，并对这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提出批评，号召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遵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矛头所指的是文学的政治性。沈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作家的同情，而茅盾则以新文学的历史给予反驳，认为沈从文“抹杀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要不得”。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8月沈从文接教育部的秘密通知离开北平去武汉，不久杨振声、萧乾到武汉，继续《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年底，沈又离武汉去昆明，途经家乡沅陵。沈从文在此短暂停留，并通过办事热心的大哥沈云麓协助接待、安置经沅陵向后方转移的文教单位和人士。同时和陈渠珍、龙云飞等地方官员谈时局，做团结工作。为了介绍湘西的情况，沈从文着手创作小说《长河》。全书计划写四卷，一直写到国民党当局将数万湘西武装健儿送上抗日前线，而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开进湘西成征服者。结果只写出第一卷，主要写保安队长和橘园主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冲突。

1938年4月，沈从文抵达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授，主讲现代文学习作课。教学之外，他继续写作，先后出版有《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作品，并重新开始国文教科书的编辑

工作。为躲日机轰炸，他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龙街乡下，离滇池只有五里远近。在抗战时期生活窘迫，但精神却愉快。他关心爱好文学的青年，他的学生汪曾祺、林蒲等后来取得了出色的成绩。1939年和1942年沈相继发表《一般或特殊》、《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主张作家在创作中沉默努力，片面反对满足于一般宣传，猎取官职，引起了极大的文学争论，受到左翼文人的批评。1942年初，沈从文参与筹备、创办和编辑《战国策》半月刊，并负责“处理文艺部门稿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从文于1946年夏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并担任《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大报的文学副刊编辑。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沈反对内战，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然而1947年1月沈从文在《益世报》上发表《一种新希望》，认为中国国内政局出现了“三种新发展”，即“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学术独立的重呼”、“文化思想运动的更新”，欢呼“第三方面有能重造，将来自然有其光辉前途”，期盼“来重造这个国家”的“第四组织的孕育”。沈从文还指责投身学生运动的年轻人是误入歧途。沈从文的论调遭到左翼文化阵营的批评，认为沈从文的“中间路线”、“新第三方面运动”，实质是“配合四大家族和平阴谋的一部分”，“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郭沫若撰文更直指沈从文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的“桃红色”作家，“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但沈从文在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和进步学生的劝说下，拒绝国民党青年部次长陈雪屏之邀南下，而决定与朱光潜、杨振声等北大、清华的朋友一道留下来迎接解放。1949年1月，北大一些学生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3月，沈从文认为自己的作品会在重新估价中完全被否定，精神受到致命打击，遂自杀。后被家人发现，脱险后，在精神病院疗养。

8月，沈从文的病情好转，由郑振铎介绍去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并在辅仁大学兼课。1950年，沈从文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经十个月革大学习，沈从文在思想上有所提高，1951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我的学习》一文，总结了学习收获。随后，沈从文去四川宜宾参加一段土改工作，回北京后又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考虑到自己在题材、审美、处理材料的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均已过时，不如避贤让路，根据自己的爱好决定留在历史博物馆。这时，沈受到同乡陈赓的接见，陈对沈表示了关怀和鼓励。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沈从文以美术组成员与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鼓励沈从文继续从事写作。同年，沈参加政协工作，此后十年他就文物研究问题提出二十多次建议。

沈从文一直眷恋文学写作，1957年《沈从文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度激起他的创作热情，但因“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而熄灭。1958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曾提议要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由于他不同意而作罢。1961年，经王震安排，沈从文等九人去井冈山参观，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时过境迁，他创作小说的素材已难找到，只好打消，而重新回到自己所热爱的文物研究工作上来。

从此，沈从文一头扎进丝绸、陶瓷、漆、金、玉等工艺美术的瓦砾堆，刻苦钻研物质文化史。他边写、边观察、边思考，对其花纹设色、笔调风格、风俗习尚等无不注意。沈在馆内随时当讲解员，或为各方面打杂。沈从文同时开展几十个专题研究，经数年努力，成了享誉中外的文物专家，先后出版了《明织金锦问题》、《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绸案》等论文和著作，并参与《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

196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沈从文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一书的写作，1964年完成初稿，印出样书送有关部门专家征求意见，又增补定稿，但因极“左”思潮泛滥致使这本书未能及时出版。“文革”中沈受到冲击，下放农村仍不忘服饰研究。1971年冬因病获准回京。1978年，沈从文调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由王序、王

亚蓉协助，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进行最后的校正增补工作。1981年，此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隆重出版。此书正如胡乔木在给沈从文的贺信中所说："以一人之呼，历时十余年，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大贡献。"

同时在西方出现了沈从文热。1980年，沈从文应美国文学和学术界的邀请赴美访问，在美国会见了有关学者并进行讲学，取得了完满的结果。1982年起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陆续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1985年12月，《光明日报》记者为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周年做了专访，肯定了他的成就。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病去世。2002年，沈从文的全部文字辑成《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

凌宇：《沈从文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沈鸿烈

马庚存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生于1882年12月7日（清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其父沈际昌是塾师，沈鸿烈自幼受严格的传统教育，十八岁中秀才，后补廪生，二十岁参加安乐府府考，旋执教于府学。

20世纪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新军，1904年沈鸿烈弃文从武，前往武昌，入新军第三十标当兵，后擢任炮标司书，继调任初级军官补习班教习。

1906年春，沈鸿烈东渡日本，入海军学校第二期，经数年系统学习，熟谙近代海军业务。他思想尚新，参加留日学生爱国活动并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夏，沈鸿烈毕业回国，任海军教练官及参谋等职。武昌起义爆发，沈鸿烈积极响应，被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任为海军宣慰使，曾参与策动长江上下游清海军反正，率炮舰配合江浙联军攻打南京。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沈鸿烈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军机处参谋，次年调北京参谋本部任上校课长，主持海军作战及海防事宜，曾考察沿海各口岸及要塞情况。1916年3月，沈作为赴欧观战团海军观察武官，历时两年半，其间他有机会观察对德作战并访问了美国。1918年10月，沈回国仍就职参谋本部，旋任陆军大学第五、六期海军教官。

1920年春，沈鸿烈作为中国方面副代表，参加中日“庙街事件”（日方称“尼港事件”）的交涉，他据理驳斥日方对我国驻庙街舰队

毫无根据的指责，维护了中国海军的声誉，受到政界的好评。此事也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所注意，从而成为沈鸿烈厕身东北军政事务的开端。是年冬，吉（林）黑（龙江）江防司令公署成立，沈初始任江防司令公署参谋，后升任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后，沈奉命前往北京，利用他与黎元洪的老关系以缓和直奉间的矛盾，因此获得张作霖的赏识。沈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系留日同学，所以颇获杨的关照。1922年8月，张作霖在公署内添设航警处，命沈兼任处长，主管东北江海防及航政、渔业等事宜。1923年7月，张作霖接受沈鸿烈“要扩充东北的势力，必须建立东北海军”的建议[(1)]，正式组建了东北海防舰队，并将吉黑江防舰队并入，委沈鸿烈兼任海军中将司令，成为东北海军最早的领导人物。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之战直系败北，驻青岛的渤海舰队改隶于依附奉系的山东督军张宗昌。1927年7月，沈鸿烈利用渤海舰队内部矛盾冲突，趁机将该舰队并入东北海防舰队，并成立联合指挥机构——海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以沈鸿烈为上将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负责北自黑龙江、南至长江口的辽阔水域的防务。

1928年底，张学良统率东北地区改旗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沈鸿烈力表支持。奉系海军改名为东北海军，沈协助张学良仍统辖东北海军。1929年1月，沈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鸿烈将东北舰队司令部由东北移往第一舰队驻地青岛，全力统率舰队及陆战队。11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沈兼任青岛市长；12月，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沈鸿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次年6月被特派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塘沽协定”签订后，沈鸿烈卸去东北舰队司令职务，专任青岛市长直至1937年底。

沈鸿烈在青岛市长任内，按照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

策办事，以妥协退让来谋取对日本的“敦睦邦交”；对内则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压制和破坏抗日救亡活动。沈破坏了中共青岛四届市委领导机关，迫害进步势力，一批共产党人如市委书记李春亭等遭到杀害。

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期间，曾主持进行了一些旨在整顿市容、促进游览事业发展的市政建设，博得建设青岛有功的名声。沈鸿烈还在青岛设立了“乡区建设办事处”和“市区联合办事处”，以“提倡自治”；还兴建一些学校、平民住所、“感化院”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鸿烈兼任青岛陆海军总指挥部指挥。驻青岛日本军民数万人及军舰、飞机于同年9月撤回本国，沈鸿烈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决定“保护日人全部留青财产”，幻想战事能和平解决。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山东，进逼济南和胶济铁路。18日晚沈鸿烈才下令将青岛的日商九大纱厂及其他市政、工厂设施炸毁。27日，沈将海军陆战队、警备团等由青岛撤往鲁南。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对日作战不力率部南逃，被蒋介石绳之以法。1938年1月，沈鸿烈升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2月兼省保安司令及国民党部主任委员。同年鲁苏战区在山东成立，沈任战区副司令。

沈鸿烈主持山东军政后，以支援抗战为名过度征粮征工，借机搜刮民财民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加紧了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反动势力则加紧反共反人民，由“政治限共”发展为“军事限共”。沈鸿烈颁布《山东地方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这一时期，沈鸿烈所部“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2)]。1939年初，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中，流传着“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还叫嚣对待八路军和抗日人民，要“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4月间，沈指使他所委派的专员秦启荣率部队袭击

博山、太和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指战员四百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博山惨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反共第一”的方针，沈也进一步掀起反共高潮，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岁月。

1941年冬，沈鸿烈调往战时陪都重庆，任农林部长。1942年12月，沈兼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为支援粮饷工作，沈创设农业推广委员会，曾赴东南、西北各省推行管制物价及金融的工作。1944年8月，沈鸿烈改任国民党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1月，沈鸿烈被派赴华北、东北各地视察，为国民党抢占抗战成果而四处奔波。

1946年3月，沈鸿烈奉派担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到任后十分尽力清除战争遗害和建立国民党统治秩序。为笼络民众，曾采取降低田赋等措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各地解放区，沈鸿烈则指使绍兴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专区保安司令郑小隐等筹设四明山绥靖指挥部，破坏浙东革命根据地，指挥环山各县组织“自卫”武装，分兵十八路“围剿”四明山区，妄图一举歼灭该地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沈鸿烈在“围剿”失败后，曾恣意拘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且滥加株连，如中共四明工委负责人朱之光之父朱祥甫遭杀害，爱国人士郜之炳被拘留。

1947年初，沈鸿烈以省府决议在省内设立四明山、会稽山、文成县三个地方绥靖指挥部，组织各县全面清乡反共，历时两月[(3)]。

1948年7月，沈鸿烈改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1946年至1948年，他还担任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引退”，沈鸿烈亦随之辞职。全国解放前夕，沈随蒋介石去台湾。在台湾，沈鸿烈曾任“国策顾问”，后离职居家，撰稿。

十多年间撰有：《政海微澜集》、《东北边防与航权》、《青岛市政》、《抗战时期之山东党政军》、《抗战时期之农林建设》、《抗战时期之国家总动员》和《浙政两年》，其中《东北边防与航权》已于1953年在台北出版。

1969年3月12日，沈鸿烈在台中市病逝。

---

(1) 张衍学、袁方乔：《沈鸿烈是怎样起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2)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53页。

(3) 林泽：《沈鸿烈破坏浙东革命根据地罪恶措施大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

沈鸿英

黄秀颖

沈鸿英，又名沈亚英，字冠南，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原籍广东恩平，前代家业破落，迁居广西雒容。沈幼年家贫，读私塾二年，父母早亡，跟随哥哥沈鸿辉以肩挑贩卖为生。长大曾当店员，替地主当帮工，后沦为盗匪，宣统年间，常出没于柳城、雒容、象县、罗城、修仁、荔浦、富川、贺县等地。沈身强体壮，性狡黠，行动剽悍，被推为匪帮头目。

1911年武昌起义后，11月柳州独立。沈鸿英带领匪伙百余人接受柳州革命党人的招抚，被任为管带，隶属刘震寰统辖。1912年，沈因捕杀密谋叛变的民军队长冯五，被提升为督带。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沈鸿英帮助广西都督陆荣廷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出卖了革命党人刘古香，帮统刘震寰被逐，沈由此得到陆荣廷赏识，被提升为帮统。不久，被派到富川、贺县一带平息了“匪乱”，更得陆荣廷信任，升为统领，成为旧桂系军阀的重要人物。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发动。1916年3月，陆荣廷为形势所促，宣布广西独立，参加讨袁。同年6月，袁世凯死，广东督军龙济光与段祺瑞勾结，广东取消独立并阻滇军假道北伐，被在粤护国军击败，率部退往海南岛。“讨龙”战争时，陆荣廷命沈部开进广东，参加作战。沈在战争中攻城略地，尚肯卖力，被陆任为钦廉镇守使。1917年12月，龙济光渡海进攻高雷，陆荣廷组织讨龙军一、二、三、四军，沈鸿英任第三军总司令。

在讨龙作战中，沈鸿烈奉命率部渡海攻击，龙济光抵抗不住，被

迫率残部乘轮北投段祺瑞。其后，沈部改为广东护国军第三军，沈任总司令并调任琼崖镇守使。沈因缴了龙部的大量枪支弹药，实力益增，成了旧桂系军阀的显赫人物。1919年冬，沈部调驻北江，任南韶连镇守使兼粤赣湘边防督办。沈在韶关曾开办讲武堂，培训中下级军官，厚植势力。

1920年秋，孙中山命陈炯明率领驻福建的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势力。沈鸿英军败退广西，陆荣廷把沈部改编为广西边防军第三路军，沈任总司令，下辖三个旅，驻防贺县、平乐一带。

桂系军队自被逐回广西后，陆荣廷企图东山再起，重占广东地盘。陆曾获得北洋政府的支持，被委为广西边防督办，陈炳焜被委为广西护军使。陆、陈在梧州集结兵力，准备反攻广东，命沈鸿英由贺县进攻连山、连县、阳山。1921年6月下旬，孙中山派粤、黔、滇军平定广西。陈炯明率粤军第一军溯江西上，初时遭到陈炳焜部的顽抗，后陈部将刘震寰率数百人倒戈，袭击梧州侧背，使桂军防线崩溃，梧州遂为粤军占领。北江方面，许崇智部向富、贺挺进，沈鸿英见势不妙，在贺县发出通电，逼陆荣廷下野，宣布自治，自称为救桂军总司令。粤军怀疑其为诈降，继续进攻沈部，沈乃率部逃到湖南，依附赵恒惕。其后，沈通过岑春煊等人的疏通，获得直系吴佩孚的支持。吴于1922年6月将沈部列为北洋陆军第十七师，委沈为师长。

1922年春，广西境内的粤军回粤。7月沈鸿烈奉吴佩孚之命率部从江西西部向广东进军，屯兵大庾。因图粤不成，11月回到桂北，占据桂林、柳州、梧州一带。他怀着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收编各处自治军，成为桂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队伍。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退居上海，策动滇桂军各部发动对陈炯明的进攻。当时在广西境内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和沈鸿英部，孙中山都派了代表分别联系，委杨希闽为讨贼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西路总司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12月，沈

鸿英派代表黄应山参加了刘震寰、杨希闵、范石生等在藤县大浬江白马庙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商驱陈的战略行动计划。会后，以刘震寰和范石生部从西江右岸东下，向都城、广州之陈军进攻；以沈鸿英一部由怀集向清远、花县方面攻击陈军侧背，沈部主力和滇军沿西江左岸东下向肇庆、三水、广州之陈军进攻。1923年1月，讨贼军把陈炯明部逐出广州。

这时，沈鸿英部已扩充到约一万人，分布在广州、肇庆及北江一带。沈鸿英对孙中山并没有拥护的诚意，联合倒陈是为了在广东发展自己的势力，占地为王，因此他把听命于孙中山的粤军视为眼中钉。滇桂讨贼军进驻广州时，孙中山任命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后魏又受粤军推举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1月26日，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邀请广州各军将领在江防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分配防务问题，沈在幕后策动，用武力将魏邦平扣留，并将粤军第三师缴械。

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24日，任命沈为桂军总司令，并命沈部桂军撤离广州，移防北江一带。沈鸿英阳奉阴违，一面表示愿意遵照孙中山的命令移防，在新街设立桂军总部行营，另一方面又暗中与吴佩孚勾结。吴佩孚想利用沈来拆孙中山的台，3月20日由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沈鸿英于4月5日宣布接受北庭任命，次日拂晓兴兵进攻广州。孙中山对沈再次叛变极为痛恨，亲自到农林试验场与杨希闵共同督战，并调回刘震寰部救援广州。经过激烈战斗，终将沈部击败。沈退至银盏坳以北地区。后来，吴佩孚命方本仁、邓如琢率北军和樊钟秀部豫军援助沈鸿英，经过多次拉锯作战，沈军屡吃败仗，经源潭、韶关，狼狈逃窜到赣南的龙南、定南两县，最后窜回广西。西江讨贼军与新桂系黄绍竑部于7月夹击梧州，沈军败退桂林。

在沈鸿英窜回广西之前，陆荣廷已于1922年返回广西，1923年受北京政府委派，就任广西边防督办，沈回广西后遂与陆荣廷发生利

害冲突。1924年春，沈鸿英以陆荣廷出巡桂林盘踞不去，派兵包围桂林达三月之久，桂林居民粮食断绝，每天只吃两碗稀粥度日。后来吴佩孚、赵恒惕进行武装调停，沈才解围，让陆荣廷撤至全州。这时，新桂系已袭取了陆的老巢南宁。陆荣廷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23日通电下野。

陆荣廷下野后，沈鸿英独占了桂林、柳州、平乐一带，与占据玉林、梧州、桂平等处的新桂系的矛盾日益激化，沈鸿英在桂林向广西各地发了一个通电，宣称他为“广西建国军总司令”，准备进攻新桂系。1925年1月，沈部分三路向新桂系进攻。贺县一路，出信都攻击梧州，由其子沈荣光指挥；柳州一路，出武宣攻击浔州（今桂平），由邓瑞征指挥；蒙山一路，出蒙江截击平南至藤县水道，由陆云高指挥。新桂系亦分兵左、中、右三路迎战：右路军向贺县迎击，左路向武宣、柳州迎击，中路向蒙山迎击。双方同时在三条战线接仗。贺县一路的沈军，因沈荣光指挥无能，一触即溃，退回桂林。柳州方面，双方主力在武宣新墟一带激战，沈军主将邓右文阵亡，邓瑞征率残部弃柳州，分向桂林及长安（今融安）方面溃退。新桂系白崇禧率部向桂林进击，在桂林附近击败沈军，4月占领桂林。沈鸿英率残部窜往长安，后又窜回姑婆山。至此，沈在广西的军事势力完全崩溃。

其后，沈鸿英化装成商人潜赴梧州，再乘轮船下香港。沈搜括的民脂民膏早已在香港、九龙等处置有巨宅和地产，到港后过着骄奢的寓公生活。1938年在香港病死。

主要参考资料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1960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资料》，1962年版。

龙伟生、陈常九：《反复无常的沈鸿英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1964年版。

李家诜：《孙中山北伐取道桂林经过》、李家钊：《孙中山北伐在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2年重印本。

韦瑞霖辑：《沈鸿英事略》，《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3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黄绍竑：《五十回忆》，杭州云风出版社1945年版。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沈钧儒

周天度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七岁从师读书，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阅读了一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刊，开始留心时务，并接受了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00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03年应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了进士。

20世纪初，清廷办“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被派往日本留学。1905年9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留日期间，他的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1907年，沈钧儒学成回国，从事立宪运动，任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监督时，曾延聘鲁迅等进步人士为教员。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开始转向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他任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

民国初年，沈钧儒起初在浙江任教育司长，又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后递补为参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表示反对。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沈钧儒的挚友张耀曾出任段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他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政学系的活动。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

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系的《中华新报》主笔。次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吴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他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会议，推动自治运动。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儒拥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支持北伐战争，反对盘踞东南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1)]。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沈钧儒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3年，沈钧儒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沦亡。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平学生开展了“一二九”运动。沈钧儒目睹敌寇深入，国土沦丧，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内心悲痛。他为忧时而写的一些诗篇，充满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2)] 在一篇四首五言体诗中，由于爱国情深，他打

破格律，一连用了五个“我是中国人”[3]。“九一八”以后的严酷现实，使他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无济于事，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4]。1936年1月28日，他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职业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31日，沈钧儒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地方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5]。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进一步向党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沈钧儒在救亡运动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进行了巨大而细致的组织工作，勇敢地承担起困难任务。他虽已年过六十，仍像年青人一样热血沸腾。救国会成立后上海市几次大规模群众抗日示威游行，他都是走在队伍最前面，同游行群众一道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在国民党军警马队的阻挠威吓面前，他

毫不退缩。由于沈钧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加上他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的长处，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公认的救国会领袖。

沈钧儒对鲁迅十分钦佩。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和宋庆龄等参加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举行葬礼，他在素轴上亲笔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并在鲁迅墓前发表了演说。

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进行反日斗争，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予以支持。

救国会的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12月4日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成为当时有名的“七君子”之狱。

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同志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6)]，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七人提起公诉。沈钧儒等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7)] 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5月，国民党由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等向他们进行劝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入反省院，然后保释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在戒备森严中，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假使共产

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8] 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邹韬奋等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审判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沈钧儒等人的入狱受审，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即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9]，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制订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并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10]。由于沈钧儒等七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同时“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南京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沈钧儒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1937年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他任主席。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提出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作为它的基本任务。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全民抗战》从形式和内容都作了较大的改进，销数很快达到三十万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这时救国会已

被公认为一个政派，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0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从抗战开始，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多接触，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有人攻击他和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对此，沈钧儒坚定地表示，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正确，做这样的“尾巴”，也是光荣的[(11)]。在抗战期间，他介绍和资助了不少青年前往解放区。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并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点权利，均被取消。沈钧儒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并曾往桂林推动宪政运动。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下旬，他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2)]。他认定抗日、民主、团结三者不可分，“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13)]。以后，他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威胁和恫吓，但都毫不畏惧，仍然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各地生活书店被封闭，邹韬奋被迫出亡香港，沈钧儒则仍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中旬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怕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和救国会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亦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和救国会的加

入，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进步，起了推动作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被推为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暴徒屠杀昆明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教师和学生，制造了“一二一”流血惨案，他写了一首诗：“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14)] 愤怒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随后，他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该刊发刊词指出：“抗战胜利了，但人民没有得到胜利果实”，现实“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表示要站在人民方面，“用笔和舌来号召团结，争取民主”。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沈钧儒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同年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他和民盟其他负责人发表声明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随后，沈钧儒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职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他谴责美蒋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并反对民盟内部的妥协倾向。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

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随着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分歧也加大，妥协性增长。同年10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政治压力下，民盟少数领导人动摇屈服，接受国民党的命令，同意自行宣布民盟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反对向国民党妥协投降[15]，表示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随后，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以便恢复民盟总部的活动，并筹备召开三中全会。

沈钧儒到香港后，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汇集在香港及从内地来港的民盟中委，在他主持下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发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发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16]。三中全会严肃批判了盟内右翼分子政治上的投降行为，检讨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经过沈钧儒等左派的激烈斗争，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一、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要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必须“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一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二、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只有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才有保障”。三、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指出为了彻底推翻南京反动集团及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就必须“彻底铲除这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四、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作的努力，表示赞佩，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17]。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中常委负责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

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走向一边倒。民盟这一历史性转变，受到人民的欢迎。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提出的筹开新的人民政协的号召。6月中旬，民盟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并为此发表声明，指出：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与全民为敌的南京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去代替它[(18)]。9月，沈钧儒与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沈钧儒到解放区后，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坚定地跟共产党走。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提出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主张。1月22日，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号召，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大会，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民主人士，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19)]。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初，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和民盟其他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十四年来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做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发表宣言，宣告结束。12月20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与时俱进，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4年和1958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沈钧儒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十分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经常勉励自己和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1963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中说：“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20] 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

(1) 沈钧儒：《联省自治谈》，《浙江月报》第1卷第2期。

(2) 沈钧儒：《寥寥集》，艺术书店1946年版，第25—26页。

(3) 沈钧儒：《寥寥集》，第29页。

(4) 《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

(5) 《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

(6) 《“七君子”事件》，时代文艺社1937年8月出版，第15页。

(7) 《“七君子”事件》，第27页。

(8) 《“七君子”事件》，第65、66页。

(9) 《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10) 时代文献社编：《救国无罪》，1937年版，第127—148页。

(11) 范长江：《忆衡老二三事》，《光明日报》1963年6月15日。

(12) 《黄炎培日记》，1939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3) 《新华日报》1940年1月11日。

(14) 沈钧儒：《寥寥集》，第114页。

(15) 《黄炎培日记》，1947年11月。

(16)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印：《民盟文献》第3辑，1949年印，第1页。

(17) 以上引文均见《民盟文献》第3辑，第3—27页。

(18)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印：《民盟文献》第3辑，第51—55页。

(19) 《人民日报》1949年2月2日。

(20) 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405页。

沈克非

商一仁

沈克非，1898年3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生于浙江嵊县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他幼时家境清寒，三岁丧母，依靠父亲任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抚育成人。他的祖父是个基督教牧师。1914年沈毕业于上海华童公学，旋入杭州之江大学中学部。1916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庚子赔款预备生。1919年远涉重洋，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文市的西余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192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任该校教学医院为外科助理住院医师两年，同时担任美国中部学生分会会长、美国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1926年，他返回祖国，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及住院总医师。1929年任芜湖医院外科主任。1930年担任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后升任副院长、院长。

沈克非在青年时代目睹动荡、贫弱、分裂的旧中国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很早就潜心于“科学救国”，立志要摘掉中国人民头上那顶屈辱的“东亚病夫”的帽子。他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先进的医学科学。20年代的旧中国，西医还处于萌芽阶段，各地的医务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掌握在教会手里，如北京的协和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湖南的湘雅医院、上海各教会大学的附属医院等。沈克非渴望改变这种局面，而他所在的中央医院则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所大型医院。沈出掌该院后，苦心经营，锐意图新，从医院的行政管理、医疗质量、医师修养及作风等各方面下工夫，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制度。为了提高医师队伍的质量，他每年暑假往返宁沪道上，亲自到上海选拔医学院毕业生，充实中央医院的医务力量。在沈的精心擘划下，该院逐渐成为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医院，外国人垄断我国西医事业的局面有所突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医院始迁长沙，再迁贵阳，后建院于当时的陪都重庆。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沈克非不惮辛劳，往返奔波于祖国大西南。1941年国民政府委任他为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印度，在军队中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沈克非辞去卫生署副署长职务，受聘为上海医学院教授兼该院附属医院——中山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沈克非曾多次参加国际性医学会议。1944年，他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中东医学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英、美、苏四国倡议成立联合国，沈克非作为中国医务卫生界的首席代表，曾赴美国纽约参加创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沈去南美秘鲁，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外科学会，继又赴美国考察。在外科学会上，沈提出的论文对于麻醉术、胸腔手术作了精辟的阐述，引起与会者重视。沈克非在沟通我国与西方医务界方面起了桥梁作用，增进了学术交流，建立起友谊。他曾获得好些国家医务界知名团体和个人赠送的锦旗、杂志、书籍及纪念品，他的名字（Dr．Shen James Kofei）在西方医务界为许多人所熟知。他还是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的负责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

新中国成立后，沈克非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沈组织志愿医疗队到鸭绿江畔，担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后又在沈阳筹建中心血库，抢救志愿军伤员。1952年到1958年，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科研工作。后又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副院长、外科系主任，中山医院院长等职务，直至去世。他的夫人陈翠贞，是儿科专家，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兼该院儿科医院院长。

沈克非以高超的外科医术享誉海内，曾首创脾脏切除大网膜后固定术，以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疗效显著。他重视新兴学科，注意吸取世界先进医学科学成果。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脑外科就是在他推动下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并且他是第一个为脑瘤病人施行手术的医师。1950年春天，中山医院接受了一个确诊为脑瘤的病人，送进医院时已神志不清，经过沈克非长达九小时的手术，终于使病人起死回生。当时上海的《新闻日报》曾以“医疗手术上的辉煌成就，沈克非割治脑瘤成功”为题，高度评价这一外科史上的胜利。

沈克非不仅是出色的外科医师，也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先驱，很久以来他一直是医学院的一位受人欢迎的教授。他非常重视临床教学，强调外科原则，总是尽最大努力使病人不受或少受痛苦。他认为医师治病救人，应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特别是人道主义精神，否则就是亵渎这一神圣职业。对待工作，他讲究实效，勇于负责，要求严格，人们都对他很钦佩。在医务界，他“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人早已成为我国医务界的骨干，并在医学领域中作出贡献。

医学科学在解放后获得迅速发展，在临床部门中，外科学尤为显著。为赶上世界医学科学先进水平，1956年我国医学界自己编著的第一部高质量的《外科学》问世，沈克非任主编，故又称“沈氏外科学”。这部大型的专业著作，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学派及其理论，在书内均有所反映。如关于休克发病机制的两个主要基本观点——神经论和体液论，同时获得叙述和阐明。此书对外科理论、临床技术等方面都有系统的阐述，为临床医师及医学院学生所必读。出版后在数年内就再版六次。《外科学》出版后，沈曾因过于劳累致心脏病发作。稍愈，又倾全力编写《外科学》的姐妹篇：《外科手术学》，此书分胸腔、腹腔、神经、泌尿、心血管等几个分册，可惜只出了二册，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辍。

沈克非为人正直，一生廉洁奉公。他拥护公医制度，本人坚持不挂牌、不私人开业，一向反对以医学技术作为敛财的手段。他的这种

医德，受到许多人称赞。

在“文革”中，沈克非受到冲击。1972年10月9日，沈因患癌症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沈克非教授得到昭雪，1978年3月，他的骨灰被安放进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主要参考资料

本文的写作除参看有关文字外，还得到上海医务界知名人士石美鑫、史玉泉、冯幼贤、王鹏万诸先生的帮助。承蒙他们提供资料，特此一并致谢。

沈联芳

汤肯堂

沈联芳，名镛，以字行，浙江吴兴人，生于1870年12月2日（清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十）。沈幼年就读于私塾，十六岁时在湖州城内恒有典当为学徒。

1893年，吴少卿、李松筠在上海创办瑞纶缫丝厂，沈联芳由其舅父荐至该厂任职员，因工作勤奋，能力又强，逐渐升为高级职员。他看到当时缫丝国外需求甚殷，瑞纶丝厂很能赚钱，自己几年来渐有积蓄，就联合了一些朋友，于1900年集资四十余万两在上海河北南路鸿安里创办振纶洽记缫丝厂，系有限公司性质，沈自任经理。该厂有缫丝车二百四十部，工人多时至千名，少时亦有六七百名，在当时是一家颇具规模的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此时缫丝业正在发展，丝茧买卖非常旺盛，利润可观，因此他又开设恒丰丝号于集益里，经营丝茧买卖，获利颇丰。

1908年，沈联芳在闸北建造恒丰缫丝厂，设置缫丝车三百二十部，独资经营，自任经理，聘意大利技师特乃掰利来厂为监工。恒丰丝厂所生产的“飞虎”和“玫瑰”两个商标的厂丝输往欧美各国，颇获好评。当时生丝出口贸易完全被外商洋行所操纵，丝价起伏不定，风险颇大。他为求稳妥计，改变了对丝厂的经营方式，将丝厂出租，以收取租金代替了自行经营。他的恒丰缫丝厂，和与他有关系的振纶洽记丝厂、宝康丝厂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均出租给人经营，坐收租利。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缫丝业一度困难重重，他却安渡难关，无甚影响。

沈联芳以办丝厂起家，以后致力房地产投资，成为上海的房地产

资本家。他在闸北恒丰路、恒通路等地段建造不少里弄市房出租，计有恒丰里、恒通里、恒祥里、恒康里、恒乐里、恒丰大楼等。他与地产商卢少棠合伙购买南京东路集益里房产，当时以三十万元购进，后以九十六万元的价格售出，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与傅筱庵争买乍浦路联安里地产等。他的恒丰丝号后来改名为恒丰号，经营房地产业务。

沈联芳除置办房产外，还投资于工商企业和兴办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声名渐著，1902年被选为总商会书记议董。1910年闸北商团成立，他被举为会长。1912年被举为闸北市政厅厅长，又任闸北慈善团总董、湖州同乡会会董，并筹设一、二、三队救火会，被举为救火联合会会长。1915年初，被推为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总理，连任十余年，成为当时丝茧业的领袖人物。嗣后又任江阴利用纺织公司、上海丰业保险公司、中国丝业银行、苏州太和面粉厂董事长，闸北水电公司、中法求新厂、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董事，吴兴电器公司常务董事，中国红十字会监事等职。在他担任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总理时期，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初期外销一度停滞，差不多陷于停顿，丝厂业岌岌可危，沈联芳出面向北洋政府交涉请求救济，于1915年由财政部拨款六十万两，用作丝业维持金，使上海各丝厂得以渡过难关。

沈联芳担任闸北市政厅厅长期间，帝国主义者往往借口开辟马路兴建桥梁，以越界筑路手段扩充租界范围，侵占我国土地。沈联芳遂发起在闸北筑路造桥，阻止了帝国主义者向苏州河以北扩展的阴谋。从此，闸北市容逐渐兴盛，南北交通也日趋便利。恒丰路和恒丰路桥的名称，就是当时袭用了沈联芳的厂名“恒丰”两字，以此纪念他的功绩。1915年11月，沈联芳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正会长朱葆三平时不大过问会务，一切由沈联芳主持。1919年，当北京段祺瑞政府镇压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学生首先起来斗争，并要求上海商界罢市响应，但上海总商会不仅不发响应函电，反而发出“佳电”，此皆因上海日本商会会长授意日商三井洋行买办朱子奎（朱葆三之子）

诱迫之故，因此舆论大哗，朱葆三、沈联芳不得不于1920年6月联名辞职。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战事发生，闸北战火纷飞，沈联芳在闸北所有的房产、丝厂、企业，以及他主持的各种慈善团体的设施几被日机轰炸殆尽，使他大部分产业毁于一旦。他心灰意懒，乃将各项业务收束，全靠未遭战火所毁的房地产收入维持晚年生活。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因沈联芳过去在上海很有名望和地位，曾要他出任上海“副市长”伪职。沈不愿事敌，几次避居亲戚家中，后来又避居英侨哈同花园内，始得脱身。

沈联芳于1947年11月5日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商会史料》卷137，第79页；卷143。

《上海指南》，1909年版。

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工会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有关档案。

中国征信所编：《上海工商人名录》，中国征信所1936年版。

戚再玉主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版。

《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1号。

访问王汉祥记录。

沈缦云

汪仁泽

沈缦云，名懋昭，以字行。1869年2月7日（清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苏吴县，祖籍江苏无锡。他原姓张名祥飞，父亲张桐龄是举人，母亲郭氏也知书善画，在家乡设塾授课。太平天国进军江南，全家避居上海。父在某绅商家任家庭教师，母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清心女书院当教师。祥飞十二岁时，随母信仰基督教。他先在家自学，旋蒙培雅书院（约翰书院的前身）校长颜永京的允许，进该校为插班生，学习勤奋，品学兼优，深得师长赞许。此时，无锡富商沈金士因子早亡，遗独生孙女，拟招赘孙婿，承继家业。经校长颜永京介绍，张入赘沈家，遂改姓名为沈缦云。其后沈家专聘家庭教师教他读“四书”“五经”，旋应科举考试，二十岁时中举人。后来他顺从沈金士的原意，自己也有志于振兴实业，遂放弃仕途，在自办的铁工厂里学习技术，助理家业。

20世纪初，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面临遭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沈缦云受实业救国论的影响，深感振兴实业，首重金融。此时外国银行在中国纷纷开设，沈遂于1906年与无锡实业家周舜卿等人合资，在上海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集股五十万元，实收半数，推周舜卿、王一亭、顾馨一、林虎侯、徐子云等为董事，周舜卿任总经理，沈缦云任协理，主持日常行务。沈缦云办事精干谨慎，经营得法，该行业务得以迅速发展，次年又获得钞票发行权，并代理清政府上海道署的库银，信用益著。此后陆续在南京、天津、无锡、北京等地开设分行，营业蒸蒸日上，存款高达七百余万元，钞票发行额亦达一百一十万元。

沈缦云在从商之余关心时局，阅读中外书报杂志，并热心教育慈

善事业。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谋组自立军，沈助饷一万五千元，是为沈以雄厚资力参与政治活动之始。1906年，沈与人合办上海竞化女子师范学堂，由其妻沈钦苓任校长。同年沈受马相伯之聘，任复旦公学校董，又与高翰卿、王一亭、李平书等创办上海孤儿院于南市雨化堂，后又在龙华觅地二十余亩，建屋四十余间，收容孤儿三百余人。

1906年，沈缦云组织上海南市商业体操自治会，自任会长，号召青年锻炼体魄，从事军事操练。次年该会与商学补习会等团体合并成立上海商团公会，参加操练的会员数百人，沈亦带头出操。该会后来成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基本队伍，是光复上海时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自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后，国内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于右任等人1909年在上海先后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鼓吹革命，所刊文章慷慨激昂，沈缦云心向往之，亲往报社访于右任，倾谈之下结为莫逆，并慨助经费万余元。1910年，沈被上海商务总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但遭拒绝。他感叹：“釜水将沸，游鱼未知，天意难回，人事宜尽，请自此辞。”[(1)] 他认定中国前途“舍革命无他法”[(2)]。在高涨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他决心投身革命，经于右任、叶兆崧介绍，是年初冬参加同盟会，是为沪地上层资产阶级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下，王一亭、叶惠钧等人也在同年底、次年初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10月，于右任等人又办《民立报》，沈缦云资助经费五万元。此时报馆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总站，迎送来往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费开支浩繁，皆由沈缦云主持的信成银行负担；盟友经济困难商借旅费等，沈也有求必应[(3)]。此时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沈缦云受命筹款四万五千两，委托其兄——德商瑞记洋行军装部买办张祥和向德国购得步枪三千支、子弹五十万发，惟从欧洲运经香港时，被香港当局查获，全部没收。

1911年初，英、俄加紧对我边境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甚，同盟会决定指派沈缦云、叶惠钧等人组织反清武装力量。3月11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保界会”成立大会上，沈即席演说，号召“准备实力”。然后沈又与宋教仁等发起组织全国义勇队，由宋编订章程，但未成立前即被清政府侦知，勒令解散。接着“乃舍义勇队之名，行义勇队之实，与沪上有识志士创办‘全国商团联合会’”[(4)]，推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于4月8日成立，会员千余人参加军事操练，为上海的武装起义做准备。此后，同盟会于6月联合沪上各团体组成“以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的反清联合军事团体——中国国民总会[(5)]，由沈缦云任会长，其中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与江浙地区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较多的联系。

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上海同盟会党人多次集会，商议响应武昌起义的部署，初议上海视南京而定举动。10月24日陈其美、宋教仁、于右任、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在同盟会紧急会议上决定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争取商团重要人物李平书等人加入起义，并指派沈缦云担任此一任务。沈与李原系知友，经试探，李表示愿意站到革命方面来，于是约定李与陈其美会见。李认为“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6)]，并说动沈信卿、吴怀疚、莫子经等人于24日与陈相见，共同约定以保民为宗旨参加起义。从此每晚集会商讨，后又有钮永键等人参加，队伍不断扩大。11月1日因南京方面倾向革命的第九镇被调离，一时难以发动，而武汉方面清军反扑，形势危急，陈其美等人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解救武汉之危”，并立即进行布置。

11月3日下午，上海发动起义，闸北一路进展顺利迅即光复；而进攻江南制造局一路遇到顽抗，陈其美企图劝说敌军放下武器，结果被敌拘禁。此时清方声言：将从宁、松两路反扑，届时“无论革党、商团，擒获者一律正法”[(7)]，形势紧迫，沈缦云与王一亭、李平书、

叶惠钧等立即商议于商团公会会所，决定以商团为主力再攻制造局。商团集合千余人，临行前沈即席痛哭陈词，闻者动容，士气高涨，连夜围攻制造局，次日黎明胜利攻克，全市光复。是年年底孙中山回国抵沪时，曾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一方赠予沈缦云[(8)]，以彰其功。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任财政总长。由于事起仓促，军无宿储，而清政府所设各税捐局所，已于起事时明令裁撤，原主事者挟款逃遁，以致饷糈无出。与此同时，各地军队集沪者达数万人之众，军政各费皆需财部筹措，每晨鹄候环索者数以百计。沈缦云首当其冲，从黎明直至深夜奔走筹款，任劳任怨，而流言蜚语层出不穷，恫吓信函日必数件。信成银行前后垫款达三十余万两，犹不足应付[(9)]。原存信成的前清上海道公款二十六万余两，则被各国驻沪领事团强行提取充作赔款，不及扣留，致使都督府面临财政危机。沪军都督府委派沈缦云另组中华银行，于11月21日在沪成立，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以应急需。12月3日沈辞去财长一职，改选朱葆三继任。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委沈缦云为驻沪理财特派员，后复委为劝业特派员。同盟会特派沈为本部理财部干事兼南洋群岛交际员。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研究实业建国计划，以开办金融机构为实施计划的基础，发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自任名誉总董，指派沈缦云为筹备主任，由沈往南洋一带向华侨募集股款。次年事成回国，该行于5月15日在上海正式开业，沈任总理。不久，孙中山发起组织中日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在沪召开筹备会，孙自任筹备员长，沈缦云、张静江、王一亭、宋嘉树、朱葆三等任筹备员。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并向英、法等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筹措武力统一中国的军费，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在江西、江苏、安徽、广东以及上海等地举

兵反袁，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陈其美、李平书等流亡日本，沈缦云全家亡命大连。

沈缦云在大连继续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经常与当地工商、教育、新闻、宗教界人士接触。1915年，陈其美、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到大连，要沈联络关外党人，筹组革命机构，开办报馆，加强反袁宣传。袁世凯侦知沈的行踪，如芒刺背，非去之不可。此时有一自称在奉天（今沈阳）办报的同盟会盟友张复生者，常来访沈晤谈，执礼甚恭，并称奉天有一报馆拟出盘，沈遂被邀往奉天一行，观看该报馆馆址。沈离奉天上火车前，张殷勤设宴饯别，沈数小时后回到大连寓所，顿觉头晕欲吐，四肢麻木，全身颤抖，急延日本医生诊治，谓系烈性食物中毒，已难挽救。沈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你这盟友已变成叛徒”，“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你能害我的肉体，不能损我的灵魂、灭我的志愿”[10]。延至7月23日晨，抱恨逝世。孙中山获悉噩耗，潸然泪下，亲题“如见故人”挽词，以志哀思。

---

(1) 天津《大公报》1910年6月12日。

(2) 王蕴登：《无锡沈缦云先生之墓志铭》。

(3) 戴季陶1947年4月17日致陈果夫、陈立夫函称：“戊申（1908年）、己酉（1909年）以后，革命同志在上海之活动，无论其事业为教育为宣传，乃至四方途经上海者，或多或少无不受缦云先生物质上、精神上之鼓励。”（原函抄本存沈氏家属处）。

(4) 《时报》1911年4月9日。

(5) 《中国国民总会材料》，《时报》1911年5月8日、6月12日。

(6) 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卷3，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287页。

(7) 伍特公：《上海商团克复上海纪略》（1947年回忆），抄本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8) 沈子高：《沈缦云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9) 沈云荪：《上海信成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总第55号，第112—119页。信成银行于沈缦云亡命大连后因无人经营，1913年9月临时股东大会公推查察员进行清查账目，至1914年秋将存款全部发还，发行之钞票亦如数收回。各地分行相继停业，总行亦宣告清理。

(10) 沈子高：《沈缦云的一生》，第143页。并参见戴季陶1947年4月17日致陈果夫、陈立夫函："思昔年英士先生光复上海之时，商界中之努力相助者以缦云先生为多。即癸丑（1913年）之役，缦云先生亦为最出力之重要人。是以被忌于袁，终至客死大连。"

沈知方

熊尚厚

沈知方，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世界书局创办人。十四岁入绍兴奎照楼书坊做学徒，两年后转入余姚某书坊，其后为上海会文堂书局职员。1900年被夏瑞芳招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次年转乐群书局，未几因教科书出版问题诉讼失败，1902年再进商务印书馆营业所，不久升所长。辛亥革命前夕，他主张改编教科书，与商务张元济意见相左，遂和陆费逵、戴克敦、陈恭协等人暗中编辑教科书，筹集资金计划另创书局。

1913年2月，沈知方进中华书局任副局长，不久任董事，同时兼文明书局协理。沈推销中华书局教科书，以旧书商为发行网，销路不胫而走。中华书局声望一时鹊起，沈的地位亦随之提高。在负责销售和购货中，沈托美商茂生洋行订购纸张，因大战后纸价大跌，洋商索款甚急，沈被迫去外地躲账。1917年1月，他抽回中华书局投资离去。

沈在商务、中华任职期间，还同王均卿合办国学扶轮社；与陈立炎合办古书流通处；与沈骏声合办进步书局；与屠思聪合办舆地学社；曾任《小说大观》发行人。此外，还同黄楚九合办中华制药厂。

1917年，沈知方回到上海重操旧业，与旧在奎照楼书坊的同事合办广文书局。同时，为了投时所好，他去苏州约人编辑黄色书籍及通俗小说，以世界书局、国民第一书局等名义出版，委托大东书局代理发行。在经营中，他用摸彩赠送和七折八扣等手段招揽顾客，因而大获厚利，营业额不断扩大。

1921年7月，沈知方得钱庄经理陈芝生、书业商魏炳荣等入股，

创立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二万五千银元，总局设于上海，另于北京、汉口、奉天、广州等地设立分局，沈任总经理。世界书局开办后，他以买空卖空手法，连续向几家银行做抵押贷款，相继设第一、第二两印刷所。1923年接盘广智书局、俄商西比利亚印书馆，1924年又盘入东亚书局，资本逐步扩大并添置机器，于提篮桥购地建造总厂，集中总务处、印刷所及堆栈于一处。在闸北虬江路设编辑所，聘范云六任所长，下设国文部（秦同培）、英文部（严独鹤）、小说部（赵苕狂）、国画部（金少梅）和信托部，由范制订编辑出版计划。世界书局除出版发行中小学教科书外，还大量印行旧小说和通俗小说，推销黄色小说及医卜星相等书籍。一般说来，出版的书籍，品类较杂，质量较低，年出版书约二百五十种，营业收入数十万元。

1925年，沈知方吸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法官孙羹梅、大丝业资本家沈联芳等入股，资本额扩大为五十万元，并盘入古书流通处和进步书局。由于当时出版教科书获利较大，沈设法从商务、中华两书局中挖出几个有经验的编辑，专门编印出版教科书。1926年开始出版旧小说连环画。是年冬，广州分局发行《三民主义读本》、《不平等条约问答》等政治宣传读物。沈知方的锐意经营，使世界书局营业盛极一时，出版物达九百八十余种，资本额近六十五万元，世界书局也进入正规出版企业的行列。

世界书局营业的发展，受到商务、中华两书局的嫉视。为了一致对付世界书局，商务、中华曾提出以十万银元为代价，要沈停止教科书的出版，此项要求为沈拒绝。之后，商务、中华两家又联合出资另设国民书店，以削价竞销手段企图挤垮世界书局。沈亦采取各种办法相对抗，以厚利吸引经理人，于全国各地遍布营业网点；对各地教育部门、学校，使用各种手段收买；并暗中收买商务、中华的人员，实行反间计等等。结果，双方均亏耗大量资本，国民书店终因竞争不过而停业。从此，世界书局的地位愈加巩固，成为当时全国民营三大书局之一。

1927年后，沈知方每月送洋三百元贿赂政府有关部门，以支持世界书局新教科书的出版。同时，沈又聘徐蔚南为秘书长，兼编《ABC丛书》和《生活丛书》、《儿童少年文库》；聘陶行知主编《工人课本》和《农民课本》；出版初、高中教科书，新课程教科书；出版名人杨贤江、沈雁冰等人的译著。此外，承印各种印刷品，还在局内设立读书储蓄部，用职工存款扩充资金。1930年，沈聘请林汉达编的《标准英语读本》出版，立即被林语堂起诉，谓其抄袭《开明英语读本》，结果只好另编《进步英语读本》。次年又因历史课本、法学丛书事，分别与中华书局、会文堂书局在报上打笔墨官司。1931年，为了取得社会势力和金融界的支持，世界书局先后吸收了王一亭、顾馨一、钱新之、吴蕴斋等为董事，将资本额扩充为一百万元（实收七十五万元），并进一步增置机器、购买地皮、扩建厂房和发行所，在大连路增设油墨制造部，自任经理。当时，世界书局拥有各种机器达五十余台，年出版书籍增至二百三十余种，年营业额达二百余万元。沈还与刘亚夫在1930年1月以资本二十万元，创设了世界商业储蓄银行，自任董事兼行长，将存款贷给书局以充实其资本。1935年7月，该行因沈的地产被冻结，发生挤兑而停业。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到1933年世界书局的营业大受影响，销路日窄，存货积压，财务极度困难。此时，上海房地产价格大跌，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为了从世界书局收回金城银行的房产押款，通过张公权将李石曾引入了世界书局。1934年7月，世界书局改组，以李石曾为董事长，陆高谊为经理。沈仅任董事兼监理，留出版部工作，仍对出版负指导责任。世界书局遂为李石曾所夺。

上海沦陷后，沈知方认定中国决不会亡于日本，战事结束后文化事业定会大有发展。他约蔡丐因等大量搜集旧书进行整理校订，对每种书写出内容提要，并附以作者年谱，以备战后陆续出版，重整世界书局。

1939年9月，沈知方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朱保联：《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63年版。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

杨哲明编：《世界杂志增刊》（十年），世界书局1931年版。

盛丕华

汪仁泽

盛丕华，原名沛华，1882年3月29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一日）生于浙江镇海骆驼桥，父亲在宁波敦大北号当店员。七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依靠长兄盛丕荣继任父职的低微薪给度日。少年时在家乡私塾就读，后至亲戚费家，做表兄弟伴读。

盛丕华十四岁时弃学来沪，进老宝成银楼当学徒，后升为助理司账。在此期间，自修古汉语，泛阅古小说、史书等。戊戌变法时，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于是崇拜梁启超，多方谋阅梁之文章，迷信立宪即强国，国家观念油然而生”[(1)]，从此关心国家大事。不久进恒兴钱庄当跑街，后又经人介绍，进庆大洋布号为司账。1908年，英帝国主义欲攫取沪杭甬铁路路权，江浙旅沪同乡奋起力争，盛亦参加这次江浙争路运动。不久浙江旅沪学会成立，盛入会为会员。1910年上海发生外国投机商的诈骗案“橡皮风潮”，致使正元、谦馀、兆康三家钱庄亦遭倒闭，结欠外商庄票银百余万两。清政府上海道蔡某因与此事有牵连，欲以国库款偿付，盛丕华撰文反对，指出商人投机失败欠洋商之款岂能以国库抵付，此例一开后果严重，加以抨击。当天携文往见《时报》馆陈冷血，陈深以为然，次日在该报以社论地位发表。后虽仍由国库抵付，但盛文引起了当时舆论的广泛共鸣。与此同时，盛还在浙江旅沪学会出版的杂志上，发表改革钱庄的论文，得到宁波等地报刊的响应。此时，盛丕华鉴于上海商会为少数绅商所控制，乃联合方椒伯、洪苓西等人另组商业研究会与之对抗。1910年，庆大洋布号改组，盛转至大丰布号任司账。该号布匹外销朝鲜等地，获利甚丰，年达银二三十万两。旋因日本加强对朝鲜的经济控制，销路受阻，营业日衰。盛曾建议设厂自织棉布，但未被店主采纳。

1911年辛亥革命军兴，在战事影响下，上海叶澄衷与许春荣合伙之余大、阳大、承大、志大四家钱庄倒闭，许氏存款甚多，而叶氏只欠无存，因此许委派盛丕华为清理员。盛在查账中发现叶澄衷之子叶勉卿积欠该四庄债款达数十万两，叶勉卿恃其已入葡萄牙国籍，受外国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延不清偿。盛延请律师，首诉于葡驻沪领事败诉，再诉于印度加尔各答葡使馆，最后上诉至葡京里斯本，卒得胜诉，裁决叶勉卿应付清全部债务并加利息。此举影响甚大，是对当时某些借入外籍避债或行不法者的当头棒喝。

1914年，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虞洽卿以六万五千两白银承购该公司“甬兴轮”后，即以每年三十万银元的高额租费租给外商公司，坐获厚利。股东闻讯大哗，召开股东大会，盛丕华当时为该公司监察人之一，挺身而出。他一面向法院对虞提出诉讼，“并申请对该轮执行假扣押”；一面致函港务局，制止该轮的过户手续。这时虞虽在沪势力很盛，但对此事却理屈词穷，无力对抗，终于屈服。“甬兴轮”仍由宁绍公司收回。

1920年初，虞洽卿与盛丕华、张澹如等发起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选为常务理事，并主管该所会计。在此期间，盛接触了很多商界上层人物，尤其取得了张澹如（张静江之弟）的信任和重用，而张家是浙江南浔四大富商之一。此后经常由张出资、盛出面经营商业活动，从此进入了资本家的行列，闻名于商界。1927年，盛在交易所经营失利，赴汉口任中国银行分行行长洪苓西的秘书，后又在洪开设的开明公司任委员，经营麻、布、纱、丝等业务。在此期间，并与人合伙，由张澹如出资大半，在武昌开设五埠公司，经营房地产业。

1930年，盛丕华从汉口返沪，仍回证券物品交易所筹设证券部，由东南信托公司经管，盛任常务董事。与此同时，并兼任中一银行董事。上海总商会改选，盛当选为会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蒋介石不抵抗政

策下，大片国土沦丧，盛丕华深感在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下找不到出路。在此后数年内，盛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谋求救国之途，常常阅读进步书籍，观看进步电影和戏剧等。

1934年，盛丕华为挽救民族危机，在上海静安别墅组织爱国团体“中社”，出版《新社会》半月刊。后该刊由其长子盛康年主持，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加强了政治色彩，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出了数期即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此时盛与人合伙组织“上元企业公司”，自任经理，经营范围甚广。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不久上海沦陷，日商势力侵入，一些华商企业被迫与之合伙贸易。盛丕华鉴于此，遂将上元改称为地产公司。因日商对经营地产不感兴趣，以此避开日人纠缠，坚持其爱国立场。此时并与谢绳祖等合资开设美科药厂，他任董事长。原设在虹口的新亚饭店被日寇霸占，职工失业，纷纷要求店主张澹如在租界内另设一店。张商于盛丕华，乃筹设红棉酒家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闹市中心，盛任董事长。由宁商总会虞洽卿等人发起，以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为核心的星期聚餐会，也就在此时开始。起初主要是交谈生意经，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些人逐渐退出；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胡厥文、黄炎培、胡子婴、陈已生、盛康年等陆续参加。这样，聚餐会上谈话的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议论时局的集会，使盛的思想更趋向进步。在抗战后期，盛和爱国人士曾资助爱国青年、学生分赴内地和苏北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盛丕华参加“民主建国会”，并将红棉酒家三楼改为“红楼”，专供民主人士开会活动之用，常请有影响的人士如宦乡、孙晓村、马叙伦等人前来演讲，并曾招待从狱中获释的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受蒋介石排挤出国考察。出发当天，民主人士在红棉酒家开欢送会，由郭沫若主持，参加者二十余人，会上郭、冯作诗唱和。郭在会上说：“我到这里才真正嗅到民主的空气。”[(2)] 此时红棉酒家已成为中共团结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的重要阵

地，盛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更趋明朗，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常要盛康年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当时美国电影充斥沪上，盛丕华设法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在他合伙组织的五德公司管理下的大上海电影院，放映《青春的旋律》等三部苏联影片，轰动一时，反应甚为热烈。在该院还放映了袁雪芬等进步人士演出的《祥林嫂》等电影。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万余人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并由五十三个人民团体委托推举代表十人，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作和平请愿，盛丕华为代表之一。当推举代表时，盛感到工商界阵容不够坚强，认为蒉延芳对各方面都较熟悉，当代表较为合适，即亲自去劝驾，蒉允参加为请愿代表。当代表团到达南京后，即被冲散分为两处，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等被包围在候车室，盛和吴耀宗、胡子婴等人被拥至西餐室。特务与胡实声（随团同行的盛的秘书）交涉，要代表团当夜乘11时半的火车回沪，代表团不允。待这班火车开走后，特务就动手殴打候车室里的代表，使多人受伤，这就是国民党政府镇压和平民主运动的“下关事件”。直到半夜2时许特务散去后，大批宪兵才开到，把代表团用卡车先送警备司令部，要未受伤的代表下车，遭拒绝后，方送往中央医院。不久中共方面周恩来、邓颖超、滕代远等带了食品来慰问。次晨未住院的代表在兴华旅馆讨论对策，有人提出用法律起诉，盛认为“这样会被动，将来被告不审审原告，弄得经年累月，没完没了。代表们来京是为了和平请愿，不计较被打的事”[(3)]。代表们都表示同意，次日到国民参政会去请愿要求和平。

“下关事件”发生次日，上海各报刊出消息，盛丕华的家属金曰英、盛康年赶赴南京，在医院里遇到前来慰问的邓颖超。邓对盛的家属赞许说：“盛先生是商界有地位的人，他是为穷苦人民出来请愿的，是不容易的。”[(4)] 在代表团回沪前夕，周恩来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团成员。饭后周详细分析了当时形势，阐明中共的政策，

揭示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指明民主人士前进的方向，给予代表团以很大鼓舞。通过“下关事件”，盛看清了谁要和平，谁要战争；也更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因此他的爱国民主立场更加坚定，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逗留期间，1946年6月25日盛曾会见冯玉祥，冯赠以“重科学思想，求民主精神”的亲笔对联一副，相互勖勉[(5)]。盛回沪后，团结工商界人士积极支持和参加日益高涨的反蒋民主运动。

1948年10月，盛丕华和盛康年赴台湾，打算转道香港去解放区。11月盛康年先去香港，转来中共意见：等到时机适当去解放后的天津，盛遂从台回沪。1949年初，平津先后解放，1月23日盛离沪去香港。3月23日，盛与黄炎培、俞寰澄及盛康年等由港同船到达天津，受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热情欢迎。25日乘专车到北平，当天下午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晚上参加了中共中央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宴会后，毛泽东又设专席宴请盛丕华等人，并由周恩来报告了国共和谈经过[(6)]。4月15日晚，毛泽东又约盛等工商界人士谈话，盛陈述了关于经济方面的意见，毛甚以为然[(7)]。在京期间，盛除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外，又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筹划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全国组织的建立和整顿工作，并对解放军南下的准备工作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和采纳。6月19日，中共中央设宴欢送七十余位民主人士南下。盛到达上海后，向上海工商界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解除了他们的各种顾虑，并筹建上海市的工商业联合会。9月，盛丕华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是这次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10月1日参加了开国盛典。

新中国成立后，盛丕华在上海积极联系和组织工商界人士，开展劳军和认购爱国公债等工作。以后他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

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在各项工作中不辞辛劳，贡献了自己的才能。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中，他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递送了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1961年2月8日，盛丕华因患胃癌不治去世。

---

(1) 盛丕华：《过去五十九年之回忆》。

(2) 据邹兆铭、邢芹生、盛厚甫、刘百年、郑安甫、冯伯准等同志回忆记录。

(3) 《关于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座谈会盛丕华发言记录》，并经本人审阅后修改。上海市工商联史料档案编号31—130。

(4) 金曰英：《难忘的日日夜夜》，《新民晚报》1984年5月24日第5版。

(5) 这副对联现存金曰英同志处。

(6) 《盛丕华日记》1949年3月23—25日。

(7) 《盛丕华日记》1949年4月15日。

盛世才

陈宁生

盛世才，字晋庸；原名振甲，字德三。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辽宁开原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属汉军旗人。早年在西丰县小学、沈阳农林中学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得到亲友资助，留学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盛世才受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推举，返沪参加爱国活动。同年考入韶关讲武堂，盛在讲武堂期间，与该校教官郭松龄过从甚密，毕业后随郭返奉，在郭任旅长的奉军第八旅担任排长、中尉连副等职。后升为东三省镇威上将军府警卫团上尉连长、中校参谋。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官出国深造。1924年，盛世才由郭松龄推荐，保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邀盛参与其事，盛乃归国，在其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即仓皇返日，后被张作霖取消官费留学资格。

1927年盛世才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1929年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盛不甘任此闲职，多方谋求升迁。恰逢新疆督办公署秘书长鲁效祖在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设法与之结识，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之聘入新。经过辽宁时，对其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疆另创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1)

盛世才初到新疆时，由于金树仁素对南京参谋本部的军官怀有戒心，只委盛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初

来新疆，人地生疏，唯金之命是从，博得了金树仁的好感。不久，被委兼任军校战术总教官。盛以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教育学生，颇受学生欢迎。他即以军校为基础，培植个人势力。

1931年2月，新疆发生哈密事件。同年5月，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部入新，直趋哈密，威逼迪化（今乌鲁木齐）。金树仁派鲁效祖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开赴哈密，迎击马仲英，结果大败。金树仁又改派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前敌剿匪总司令，仍委盛世才为参谋长，驰援哈密。9月，马仲英部失败，退回甘肃。

马仲英部退回甘肃后，得陕西省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扶持，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任师长。他派遣部将马世明、马占仓再次进入南疆，以图再战。同年7月，金树仁提升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统率“归化军”，往剿马部。

1933年1月，马世明等攻陷迪化之咽喉要地达坂城，于旧历除夕，围攻省城。盛世才又挥师北上，在六道湾与马军遭遇，马军败走，遂解迪化之围。在连续两年战乱中，盛世才在军事方面崭露头角。

1933年春，战事虽暂趋缓和，但是，迪化城内粮煤恐慌，居民啼饥号寒，加上金树仁兄弟趁战乱囤积居奇，高抬物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更使民怨沸腾，金树仁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33年4月12日，迪化县县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长陈中等人密谋倒金，策动驻迪化南关的白俄归化军攻占了督办公署，金树仁逃走。晚间举事诸人在归化军指挥部邀集省府官员和当地士绅开会，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原教育厅长刘文龙为临时省政府主席，因在东北抗日退入苏联、归国后滞留迪化的原黑龙江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为“第一次新变”。

政变发生之时，盛世才部正驻防乌拉拜（迪化西三十里）。金树仁命令他火速回城平乱，而同时，陈中也星夜赶至盛驻地，请他支持政变。这时，盛世才举足轻重，他决定倒戈反金，以便伺机取金树仁之地位而代之。13日晨，正当金树仁调集军队进行反攻，归化军眼看招架不住之际，盛世才率部赶到，与郑润成部联合，在“一炮成功”（地名）击溃金军，金树仁仓皇西逃昌吉。14日，盛世才率队凯旋入城，随即参加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他命令所部包围会场，在高处架起机枪，以武力胁迫联席会议推举他为新疆省临时边防督办。随后他发表就职通电，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藉以安定人心[(2)]。迪化各阶层人民对盛世才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在4月22日，破天荒地举行了一次游行集会，表示对盛世才新政府的拥护。

这时，马仲英部又重整旗鼓，挥兵西进，6月14日，盛、马两军激战于阜康、孚远间的紫泥泉。结果，马军大败，向天山南路逃窜。

南京国民政府久欲直接控制新疆，但鞭长莫及，乃趁新疆内乱未息，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以图伺机取而代之。黄在督办公署院内，设立宣慰使署，同迪化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提出废除督办制，改设军事委员会新疆分会，欲邀郑润成等东北军将领参与军政工作。“第一次新变”的发动者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各怀己志，亦力主废除督办制。盛世才见黄等的活动威胁他的既得权位，便舍弃马仲英不予追歼，于6月25日匆匆回师。6月26日，盛世才在督办公署东花园设宴庆祝胜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将陈中等三人枪杀。接着，又故作姿态，表示不恋居高位，欲率部开赴塔城。临时省主席刘文龙深感自危，亦表示恳辞。与会者在震慑之余，对盛、刘表示慰留。是时黄慕松已陷软禁处境，只得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请维持督办制。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致电盛世才、刘文龙，表彰他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平定叛乱之劳绩”，劝慰他们“万不可自生携贰，

致隳前功”；要求他们“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3]。至是，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便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黄慕松也得以解脱“人质”地位，于7月9日离开了新疆，是为“第二次新变”。

1933年8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外交兼司法部长罗文幹入新视察，欲造成盛世才、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和南疆马仲英的鼎足之势，使三方互相牵制，以利南京控制全疆。盛世才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于10月10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控马仲英“煽惑省军哗变”，声称要“率师出发，以张讨伐”[4]。10月14日，盛军进攻达坂城，盛、马之战再起。马军势孤力单，由吐鲁番退守哈密。

11月，盛世才又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将郑润成和东北义勇军将领二十余人逮捕（后均被秘密处死），将省长刘文龙软禁，捧出已是高龄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这样，新疆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操于他一人之手。

12月，张培元与马仲英相策应，两面夹击，兵临迪化近郊。盛世才得到苏联的援助。次年1月26日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逃往喀什，后来偕其幕僚亡命苏联。全疆基本统一。

1933年，中国共产党从北平、天津开始派遣党员到新疆开展工作。此时，盛世才刚拿到新疆政权，统治还不巩固，特别是经过三年战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他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采取对外联苏、对内联共的政策。从1934年9月开始，盛世才即派财政厅长胡寿康和苏联国外贸易公司理事长商洽向苏联借款。1935年5月，以新疆土产公司名义同苏联驻新贸易公司签订了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5]，后来又向苏联续借了二百万金卢布。1936年和苏联签订了“聘请苏联专家待遇合同”，于是大批苏联顾问、专家来到新疆。与此同时，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换取各族人民的支持，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标榜“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依据的”，是“发展新经济、创造新政治、发展新

文化的正确方针”[6]。并悬挂自制的六星旗。盛世才执政初期，推行“六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疆的战略地位愈益重要。盛世才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8年，中共中央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办事处，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疆。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新疆成为重要的抗日后方基地。盛世才凭借新疆的特殊战略地位，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1939年以后，盛世才随着权力欲不断增长，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了他的独裁统治。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使社会主义苏联遭受严重困难，同时，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以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靠不住了，企图另找靠山，逐渐走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41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诬陷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是“汉奸”、“托派”，将他逮捕入狱，严刑逼供。被牵连入狱者达一千二百余人，著名文化人如张仲实、沈雁冰、赵丹等均遭到迫害。

蒋介石对盛世才的百般笼络，加快了盛公开反共的步骤。从1941年冬到1942年，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曾五次到迪化。1942年春，蒋发表盛世才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秋，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新，对盛表示抚慰。1943年7月，国民党任命盛为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督办公署特别党部特派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九分校主任，以及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席。盛踌躇满志，随即取消六大政策，并把六星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公开宣布反苏、反共。

1942年，盛世才制造了一起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案”作为投靠蒋

介石的觐见礼。他制造其四弟盛世骐被暗杀事件，无中生有地称之为“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的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并以此为由，在同年9月5日，通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命其撤走全部专家、顾问和驻星星峡的苏军。9月17日，盛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驻新重要领导人，又陆续将在外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押回迪化，拘留在八户梁招待所。1943年2月7日，他把在新全体中共党员投入监狱。9月27日，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秘密处死。还把杜重远案改为“共产党阴谋暴动案”，煞有介事也呈请国民党中央派员来新复审，并最后将杜重远毒死在监狱里。

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节节胜利，德、意、日法西斯灭亡在即，国民党加紧对新疆渗透与控制，同盛世才的矛盾日趋激化。盛世才遂故伎重演，制造了一起所谓“阴谋暴动案”，于8月11日深夜，把国民党要员黄如今、林继庸连同下属一千余人逮捕下狱，妄图再投靠苏联。对此，蒋介石立即派“中央军”入新，盛束手无策，只得听从国民党摆布。同年8月29日，国民党把盛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满载在新疆搜刮的金银财物，在朱绍良、徐恩曾的护送下前往重庆。当时有一首童谣：“盛贼世才讲清廉，八十汽车没拉完，三架飞机还不算，二千骆驼在后边。”9月18日，盛世才就任农林部长时，蒋介石曾亲临授印。但是，深受其害的新疆民众掀起讨盛浪潮，发布“新疆省全体民众讨盛檄文”，编写《盛世才祸新纪略》，迭向国民政府控告盛的罪行。1945年，国民政府撤去盛世才的农林部长职务，责成法院查办。但盛以重金行贿，此案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任胡宗南武汉行辕高参，1949年去台湾，曾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在台时，盛一度经商，并撰有《牧边琐忆》以及《新疆十年回忆录》等。

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死于台北。

(1) 周东郊编：《盛世才祸新记》之二，油印本。

(2) 吴蔼辰：《新疆纪游》，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6页。

(3) 《申报》1933年8月2日。

(4)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

(5) 孙福坤：《苏联掠夺新疆纪实》下册，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版，第50页；包尔汉：《盛世才在新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6) 盛世才：《六大政策教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1942年版。

盛宣怀

朱宗震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生于1844年11月4日（清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盛家世代官僚。1860年，清将和春的江南大营为太平军击溃，盛宣怀随祖父母从武进避至其父盛康湖北粮道任所。1866年，盛宣怀回籍应童试，补县学生，以后屡试不第。1870年春，李鸿章奉命督师入陕，进攻回民起义军。盛宣怀经杨宗濂推荐，投李鸿章幕，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的父亲和李的关系深厚，盛宣怀迅速获得李的信任。同年秋，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自此以后，盛宣怀不断受到李鸿章提拔：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补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

盛宣怀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早在1872年，他就向李鸿章建议“由官设局”、“试办招商”[(1)]，成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他参与了最初的筹划。翌年，李委他任招商局会办，直接经手具体业务，打破了官不经商的成例。1876年冬，盛宣怀为招商局活动到一笔官费，出高价盘进了濒于破产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并从中贪污了一笔手续费，而招商局营业却更加困难，摇摇欲坠。盛宣怀因此遭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奏参，被迫在1881年离开了招商局。1883年，李鸿章重新派盛宣怀入局。1885年盛升任该局督办，全面控制了招商局，并成为招商局最大的股东。当时，盛宣怀以局产作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款三十万英镑来维持营业。以后又多次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来避免在竞争中倒闭。

盛宣怀又于1880年向李鸿章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方法筹办电

报局，次年被派为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在主管电报局期间，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允许他们在中国沿海敷设电线，并在上海等海口登陆，控制中国沿海的电信。

1893年10月，李鸿章筹办十年而开张才两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焚毁，急派盛宣怀赴沪处理善后。盛重新招股，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担任该厂督办。当时，李鸿章经办的经济企业，多数归盛宣怀掌握。其中，华盛则被偷梁换柱，逐步变成了盛家的私产。

1895年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因兵败被撤销直督职务，失去了北洋地盘。盛宣怀的地位也跟着发生了动摇，不得不请假离开天津前往上海，打算另谋出路。他曾企图弃官从商，大干一番。恰好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汉阳铁厂亏空太大，束手无策，商请盛来接办。盛向张提出，如接办铁厂，须同时组织经办芦汉铁路的公司，以保证汉阳铁厂所产铁轨的销路。张之洞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1896年5月，盛宣怀首先接办了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1897年起又兼营萍乡煤矿），改为官督商办。同年8月，张之洞与直督王文韶会奏保荐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10月，盛宣怀又亲自进京活动，结果清廷委他经办的不只是芦汉铁路，而是包括东南诸路的“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时，他还获准主持开设中国通商银行。然后，他才轻松地卸掉了津海关道的职务。

1897年1月，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不久通商银行也在上海开办，从此盛宣怀的活动中心便从天津移到了上海。此后，他以铁路总公司为枢纽，遥控汉、冶、萍、铁煤厂矿，近制轮电、纺织及银行业务，声势十分显赫。张之洞、王文韶在保举盛的奏折中，曾称赞他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一身而兼“三长”[(2)]。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盛宣怀是一个新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铁路总公司成立后，盛宣怀一面开工建造芦汉铁路芦保段和淞沪铁路，一面立即筹借外债。他的方针是“造成一段”，就“抵借一款”[(3)]

。同年7月，盛与比利时正式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1898年，比在俄、法支持下，寻找借口违反合同，进一步向中国勒索利权。盛不得不与比改订了合同，使其获得贷款的高额利率，并攫得芦汉铁路的建筑权和行车权。同年，盛宣怀又与英国签订了沪宁、苏杭甬、浦信铁路的借款合同草约（浦信路约后来实际作罢），与美国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后于1900年签订正式续约），其条件较比利时的更为苛刻。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盛宣怀多次密奏清廷，主张对义和团实行镇压。八国联军入侵后，他运动“东南互保”，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保护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事后，西太后十分赞赏盛宣怀在东南互保中所起的作用，夸奖他是“不可缺少之人”[(4)]。1901年1月，盛升任会办商务大臣，驻沪办事。同年10月，又任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奉命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进行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的谈判，希望以出让内河航行权、增辟商埠、裁撤厘金为条件，换取列强增加关税。经过几年谈判，终因与列强的利益相违背，遭到反对，无果而终。

1902年起，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依仗权力，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电报、轮船两局。虽经盛宣怀的极力抵拒，在轮船招商局保存了很大的势力，但在电报局的势力却完全丧失了。从此，盛、袁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1903年7月，盛宣怀与英国把前签订的沪宁铁路借款草约改为正式合同。其后不久，湘粤士绅要求废除前与美国订立的粤汉铁路合同，收回自办。1905年，张之洞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废除美约，而盛则反对废约。因此，盛宣怀与张之洞之间发生争吵，盛由此失去了张的支持。继而，江浙两省士绅也要求废除与英订立的沪宁铁路合同及苏杭甬铁路草约，并发展为声势颇大的收回利权运动。至此，盛宣怀不得不口头上赞成废约，而实际上却勾结列强，破坏废约运动。盛的手段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是年11月17日，经商部奏请，清廷派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接管沪宁铁路。不久，铁路总

公司也被裁撤，盛宣怀黯然下台。

到1907年底，由于浙江地区人民要求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的运动仍在扩大，西太后乃召盛宣怀进京，研究对策。盛在西太后面前攻击袁世凯属下主持的铁路政策，朝令夕改，失信中外。

1908年3月，盛宣怀被任为邮传部右侍郎，但未到任即被袁排挤出都。他在京时，曾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正式合并，改为商办，于3月26日在农工商部正式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由他担任总理。

先是盛宣怀于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时，仅凑得股份二百万两，根本不足以扩大生产，只有依靠借债经营。为了使铁厂获得廉价的焦煤，他曾于1899年向德国贷款四十万马克购买采煤机器，扩大萍煤生产。1904年11月，他又以大冶得道湾矿山作抵押，以廉价供应日本优质矿石为条件，向日本预支矿石价款三百万日元，用以改造和扩大汉阳铁厂。他把这笔贷款看成是“无中生有，一线之生机”[(5)]，而实际上，却是把日本财阀的势力引了进来。到1907年底，汉冶萍公司成立前夕，厂矿设备确已初具规模，但在盛的一手包办下，经营腐败，债务累累。公司成立时，盛声称“加集巨股，大举合办”以扭转亏空局面[(6)]，但实际集股仍然十分有限。由于营业上继续出现巨额亏空，公司濒于无法支持。1908年9月，盛宣怀去日本治病兼行考察，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联系日本财阀。到11月间，由于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盛匆促回国。

1910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进京，回邮传部右侍郎原任，并要他“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实际上，清政府要他出面向列强借钱，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盛立即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先后谈判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1911年1月，他补授邮传部尚书。不久，就和度支部尚书载泽一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同年5月，随着清政府宣布全国商办铁路干

线“收归国有”的命令，盛又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把原先已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奉送给帝国主义。

所谓“铁路国有”，是由盛宣怀策划奏请，由清政府批准实行的。清政府通过铁路国有政策，以筑路权换取列强的贷款。但是，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民营铁路投资者的利益，立即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盛宣怀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保路运动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0月26日将盛宣怀革职。盛的反对者们乘机要清廷将他“明正典刑”，惊惶失措的盛宣怀赶紧向外国使节求救。革职后的第二天深夜，他在英、美、法、德、日五国驻京使节分别派兵护送下，经天津乘德国轮船逃往青岛。12月下旬，盛在日本人的接引下，移居大连。

盛宣怀在逃亡青岛、大连期间，密切注视着时局的演变。他消除了与袁世凯的宿怨，通过亲家孙宝琦的关系，一再为袁镇压革命、篡夺政权出谋划策，为袁的一举一动拍手叫好。

当时，盛宣怀在江苏等地的钱庄、房地产被革命当局查封。为此，他曾恳求外国驻华使节出面保护他的财产。但是，外国使节并不为他的那些与外国资本无关的财产“启封”而出力。汉冶萍公司则因有日本的大量投资，革命当局受到日本驻华使节的阻挠而不能予以接管，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继续维持经营。因此，盛宣怀认为“商产恐非洋债，终难保全”[(7)]。他打算重新组织汉冶萍公司，增强日本资本，来保护他的这一份财产。为此目的，他于1912年1月3日，前往日本神户。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孙中山派人向盛宣怀接洽借款，盛和日本方面于是提出了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1912年1月29日，盛宣怀指派其代表，在神户和日本签订了中日合办汉冶萍的合同。但消息一经传出，一些党派和社会舆论即表示坚决反对，孙中

山不得不宣布取消前议。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股东会于3月开会时，一致反对中日合办，撤销了盛宣怀的公司总理职务。

其后，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大权在握。盛宣怀以赈灾为名，独捐银元一百万元，向袁表示效忠。1912年10月中旬，他从日本悄然回到上海。回国后，立即要求发还财产。他在为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呈文中，公然气势汹汹地诋毁革命，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是年12月10日，在所谓“保护人权”的幌子下，以报销水利经费二十万元为条件，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的全部财产。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又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攻击这次革命是“革命流毒忽又剧作”[(8)]，一再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宣怀还乘机向袁表示忠心，吹捧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9)]。但是，盛宣怀这番献媚，并没有获得袁的青睐，袁不愿和这个已经无用的宿敌和解。盛在袁政府内部寻找靠山的目的既无法达到，他经营汉冶萍公司在政治上就缺乏依靠，因而不再享有从前的种种特权；而且，经济上还遭到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盘剥，使营业更为困难。于是，他一方面表面上提出“国有”或“官商合办”的主张；另一方面，决心更进一步接近日本，以便依靠日本的力量，来迫使袁世凯政府给予更多的特权，迫使袁政府不敢实行国有或官商合办。1913年12月，盛宣怀与日本财团签订了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贷款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大借款合同，规定长期供应日本廉价的生铁和铁砂，并由日本派遣顾问来监督企业。自此，中国这一煤铁联合企业，便与日本势力联系愈加紧密。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又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归中日合办。当时，日本方面曾派人和盛宣怀密商中日合办问题。但因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盛不敢贸然同意。随后他又和日本策

划搞一个中日合办的钢铁公司，但未及实现，就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故。

---

(1) 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附录·行述》，思补楼藏版。

(2) 张之洞：《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4，北平文华斋1928年版，第24页。

(3) 盛宣怀：《寄张香帅》，《愚斋存稿初刊》卷25第29页。

(4) 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附录·行述》，思补楼藏版。

(5) 盛宣怀：《寄京外务部张宫保、鄂端午帅》，《愚斋存稿初刊》卷62，第7页。

(6) 盛宣怀：《汉冶萍煤铁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折》，《愚斋存稿初刊》卷14，第15页。

(7) 《盛宣怀致王子展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

(8) 《盛宣怀致孙宝琦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页。

(9) 《盛宣怀致孙宝琦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91页。

施从云

吕乃澄

施从云，字燮卿，1880年4月25日（清光绪六年三月十七日）生于安徽桐城县。父亲施志宽，以农为业，兼做豆腐买卖，有七个子女，家境贫寒。施从云少时入村塾读书，稍长助父业农，仍勤勉好学，喜读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反帝反清的书籍。他性格豪爽，好见义勇为。

1900年，施从云不堪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背井离乡弃农从戎，经同乡介绍，入天津镇台吴化纯部。1904年入保定将弁学堂，次年毕业后，在北洋第五镇中任排长，继升队官，再升任督队官，驻奉天新民府。1909年春，他回家安葬母亲，誓言："从此双亲归净土，头颅便可造山河！"[(1)] 决心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王朝的斗争。由于他从军后多与思想进步的官兵交游，逐渐成为第五镇中的活跃人物。他与王金铭、冯玉祥等结交，联合六名下级军官，于1910年春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以读书研究军事为名，秘密鼓吹革命，互相传阅《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施经常向官兵讲述满清王朝屠杀汉人的残酷情景，激发大家的革命情绪。经过施从云等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武学研究会发展很快，许多士兵纷纷加入。

同年9月，施从云被编入新成立的第二十镇，由队官提升为第七十九标第一营管带。他与营副王金铭等继续在士兵中发展武学研究会组织，广泛开展活动，二十镇的同盟会员也参加该会活动。不久一部分下级军官也陆续入会，王化东所训练的学兵一千五百余人则几乎全部加入。武学研究会的声势日益扩大，受到二十镇的反动将领潘榘楹等人的疑忌和监视。正在这时，同盟会员在东北秘密组织"山东同乡会"以联络同志，于是山东籍的王金铭、孙谏声等发起在二十镇组织

山东同乡会，聘潘榘楹为会长以遮人耳目，王金铭为副会长实际负责。施从云虽非鲁籍，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被吸收为“名誉会员”，担任会外干事，实际成为该会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成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秋，第二十镇奉命入关参加永平（今河北卢龙）秋操，10月10日行军到昌黎，武昌起义爆发，清廷电令秋操停止，二十镇暂驻滦州待命，继而下令该镇赴武汉前线攻打民军。29日，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要求清廷立宪。施从云、王金铭、冯玉祥等人力劝张绍曾率部起义，进攻北京，推翻满清王朝。张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又不愿到武汉攻打民军，决定在滦州按兵不动。11月6日清廷下令张绍曾的第二十镇统制职务由潘榘楹接任，另给张一宣抚大臣并赏加侍郎衔空名，削去了他的兵权。清廷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第二十镇革命官兵的愤怒，施从云与王金铭等在滦州文庙召开七十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挽留张绍曾。施等力劝张绍曾说：“君主立宪并非我们最后的目的，为解救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革命一条道路。武昌首义后，全国革命胜利，指日可期，不必再有所顾虑。”[(2)] 张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已经遇害，自己的力量单薄，遂借口养病，避居天津。

潘榘楹接任第二十镇统制以后，奉袁世凯之命，把全镇部队拆散分驻于葫芦岛、海阳镇、锦州、临榆等地，并严密监视，滦州只留驻第七十九标。为了冲破敌人设置的障碍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爱国士兵共同推举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出来主持革命工作。他们三人毅然任之，召集革命同志开会，施说：“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不留将国事进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事业，须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我亦云然。同志相处，匪依朝夕，愿共以铁肩担当革命，竟厥全功。”[(3)] 他们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施、王随即与到滦州来运动新军起义的天津

革命组织“共和会”取得了联系，与共和会会长白毓昆及凌钺、王葆真等人密切合作，共策进行。12月下旬，他们研究决定由王金铭潜赴海阳镇，与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冯玉祥等秘密商议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

当王金铭从海阳镇返回滦州时，白毓昆已携带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之印”，率领二十多名敢死队员从天津来到滦州，积极发动武装起义。12月30日，施从云和王金铭等在北关师范学堂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并拟推举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为北军大都督，以造声势。散会以后，施与王去见岳兆麟，告以推举他为大都督之事，岳借口兵力单薄推辞。施、王为了争取岳，进一步把去海阳镇与冯玉祥密商起义的计划也告诉了他。当天晚上，他们即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的名义，由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署名，发出主张共和的通电。但岳兆麟是一个反动军官，他于第二天早晨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告密。王奉袁世凯之命，于第三天（1912年1月1日）赶到滦州，想用恐吓的手段“顺机消弭”起义，被起义军监视了起来。当晚，凌钺、张振甲率领官兵逼王怀庆起义担任北军大都督。王假装接受，暗中却与第七十九标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勾结，于1月2日早晨入滦州城的途中逃走。

王金铭、施从云等闻悉王怀庆逃走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推举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当天宣誓就职。在滦州城里张贴独立布告，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阐明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当时天津八国领事团推代表到滦州来与军政府谈判，承认滦州起义军为交战团体，允许起义军通过天津。

王怀庆到了开平，伪造了一份从秦皇岛登陆的民军的电报发给王金铭、施从云，要他们按兵待援；同时，他又急电袁世凯从石家庄调第三镇第十二标，于1月4日下午5时开到雷庄附近布防，并拆掉一段铁轨。这时，其他各地配合起义的部队，被袁世凯的爪牙监视，不能

自由行动，冯玉祥也被拘禁在海阳镇。王金铭、施从云原计划起义军于1月3日直取天津，因误信伪电而等待秦皇岛登陆的民军，迟未出发，直到4日才明白是中了敌人缓兵之计，乃于当天誓师出发。下午5时施等准备登车之际，忽然捕获了张建功派向王怀庆密报军情的奸细。张建功图穷匕见，率领第三营官兵踞城顽抗，与第一、二营展开激战，相持两小时不下。王金铭欲下令猛攻张部，施从云说："建功无能为也，若必攻之，旷日持久。海阳军及关外民军方盛，业已约定以劲旅直趋天津，会攻北京，大事可立就也。"(4) 遂决定放弃滦州，率第一、二营官兵约七百余人登车出发。晚十二时许，火车开到雷庄附近脱轨，并遭到炮火袭击，王、施指挥官兵下车奋勇杀敌。敌方炮火猛烈，且众寡悬殊，势难支撑。司书瞿胜耻和马弁龚某劝施从云换掉衣服往东后撤，施说："见危授命，古训昭然。予自从军之日，即思以死报国。死得其所，幸也！已矣，毋复言！"(5) 依然奋勇督战，与敌军血战数小时。此时清军鸣号停战，诈称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议和。王、施应允，众官兵谓王怀庆诡计多端，恐遭毒手。王、施认为："如果和议能成，双方免受无谓的牺牲，一直可攻京津。如出意外，以身殉志，求仁得仁，有何憾焉。"(6) 遂率领一百多官兵前往，到了雷庄，即全部被伏兵包围。次日施从云惨遭杀害，临刑时庄严挺立，大义凛然。时为1912年1月5日，年方三十一岁。

---

(1) 潘祭野：《施公燮卿烈士传》，稿存安徽省桐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2) 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9页。

(3)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3页。

(4) 罗正纬：《施从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66页。

(5) 罗正纬：《施从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66页。

(6) 刘骥：《滦州起义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59页。

师复

杨天石

师复，原名刘思复，民国初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84年6月27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五）生。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但不久即对科举失去兴趣，专心研究诸子学、文字学及中国古算术，颇有心得。1901年在香山创立演说社。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8月加入同盟会，旋至横滨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弹。1906年初归国，在香山创办隽德女学，提倡女子教育。不久，应谢英伯邀，至香港编辑《东方报》。

1907年春，为配合许雪湫、邓子瑜在潮州、惠州两地发动的起义，同盟会计议暗杀粤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李准，刘思复慷慨自请任实行委员，因试验水银炸药击伤脸部，未能成行。同年6月初，李准镇压潮惠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刘思复即准备乘其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11日晨，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1)]，面部及左手受伤，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巡警道龚心湛命将刘思复先抬入医院治疗，待伤愈后再行审讯。治疗中，刘思复左手下部被医生截去。出院后，清吏多次审讯，刘思复均自称为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吏虽怀疑其为革命党，也查出了他的真名实姓，但因得不到他的确实证据，于同年9月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

1908年9月，革命党人郑彼岸创办《香山旬报》，刘思复在狱中起草了发刊词，宣称“欲令邦人士女，拂拭真智，咸革旧染，兴化砺俗，作我民气，因以恢复自由”[(2)]。他在报上先后以净慧居士、寥士等笔名发表《净慧室随笔》、《寒柏斋剩言》、《绅庵谰语》、《粤语解》等著作多种，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涉及历史学、方言学等方面。他还曾起草《改良监狱议》，受到香山县令的激赏。1909年10

月，经陈景华、郑彼岸等营救出狱，赴香港，受到同盟会南方支部的热烈欢迎。

两年多的牢狱生活给了刘思复不少刺激。在香港，他专心研究《新世纪》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自己已属于“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3)]。1910年春，与谢英伯、高剑父、朱述堂等组织支那暗杀团，幻想以个人行动警醒社会，推动革命。据有关人士回忆，该团初次宣誓时，厅房四周围以黑布，中间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放一骷髅头，屋边燃着一支白蜡烛，宣誓者须在烛影摇红中独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4)]。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刘思复曾帮助林冠慈谋刺李准，后又曾准备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思复在东江一带领导民军起义，号称香军。同年冬，和未婚妻丁湘田、同志郑彼岸一起北上，准备暗杀袁世凯。途经上海时，适值南北和议告成，于是往游杭州西湖，隐居于白云庵。

1912年5月，为了散布所谓“社会革命”的种子，刘思复回广州组织晦鸣学舍，印行《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丛刻》等小册子，免费赠送。7月，废姓，易名师复。同月，因仰慕托尔斯泰及其道德自我完成说，与郑彼岸、莫纪彭组织心社，宣称“破除现代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5)]。该社无章程，无规则，取绝对自由主义，仅公布《信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6)]。师复自誓永远遵守。心社的成立及其活动引起广州社会的瞩目，称许者誉为圣人，反对者目为禽兽。师复曾于广州《平民日报》辟《心社析疑录》一栏，刊载讨论《信约》的有关文字。在论证其所谓“废婚姻主义”的时候，师复引用《史记》材料，说明孔子也是其父与人野合而生的“野子”，引起尊孔派大哗。同年秋，师复认为世界大

同当以语言统一为先导，发起研究世界语，任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

师复厌恶资本主义的都市生活，曾拟邀约几个同志建立无政府主义新村，已经选定了零丁洋畔一块地方，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命名为红荔山庄。因国民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计划中辍。

对“二次革命”，师复态度消极，认为两方面的是非胜败，均无“评论之价值”。1913年8月20日，他在广州发刊《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其中除中文外，特设世界语部，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世界语刊物。该刊宣称：“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7)]。《晦鸣录》仅出两期，9月8日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下令“永远停版”，晦鸣学舍亦同时被封，心社被“立饬解散”[(8)]。12月20日，《晦鸣录》转澳门出版，更名《民声》。出版两期后，龙济光又奉袁世凯命，串通葡萄牙驻澳门领事予以封禁。1914年4月，师复又转上海继续秘密出版《民声》。

7月，师复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对外名称用A·K·G，译名“区克谨”。该社宣言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9)] 其后，南京、常熟、广州先后有人成立类似的组织，表示响应，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等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也纷纷来信表示支持；日本人山鹿泰治并到沪担任《民声》世界语部分的编辑工作。8月，师复致书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提议组织万国机关、注意东亚的传播、与工团联络、万国总罢工、采用世界语等五事。11月，上海漆业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师复曾撰文鼓吹工团主义，要工人“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10)]。

1915年1月，师复肺病加重。医生建议多食牛肉汁、牛奶、鸡蛋等营养物，但他不愿违背心社《信约》，拒绝不吃；有人为筹集其医疗费，提议出卖印刷《民声》的机器，他表示此为“吾党主义、东方命脉”，不能“断之以活一人”[11]。当时，住院费极为昂贵，《民声》也因捐助经费者日少，陷于困难境地，他感慨地在致郑彼岸书中说：“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12] 同年3月27日师复病逝。著有《师复文存》。

在师复传播无政府主义期间，江亢虎正组织中国社会党，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传播社会改良主义。二人间曾展开辩论。师复批评江亢虎“违背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颠倒瞀乱”，“饰说欺人”[13]，并将有关文字编为《伏虎集》；其实，师复自己由反对剥削、压迫进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政府和权威，也是错误的。五四运动至1927年前后，师复的信徒们曾将他的思想吹捧为“师复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

(1) 刘思复：《驳江亢虎》，《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225页。

(2) 《香山旬报》第1号（1908年9月7日）。

(3) 刘思复：《驳江亢虎》，《师复文存》，1928年版，第226页。

(4) 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1962年版。

(5) 刘思复：《答凡夫书》，《师复文存》，第144页。

(6) 《心社意趣书》，《民声》1914年第14期。

(7) 《编辑绪言》，《晦鸣录》1913年第1期。

(8) 《粤督解散心社》，《民立报》1912年12月16日。

(9) 《师复文存》，第53页。

(10) 《师复文存》，第84页。

(11) 《师复文存》，第31、224页。

(12) 文定：《师复先生传》，《师复文存》，第8页。

(13) 文定：《师复先生传》，《师复文存》，第8页。

施复亮

寿祝衡

施复亮，原名存统，曾化名方国昌，笔名光亮、文亮、伏量等。1899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县叶村的农民家庭。家境较富裕，其父以耕为业，母亲能看书识字。施复亮幼从母读，六七岁时就帮助父亲下地劳动，做些杂活。九岁时才进村塾，勤奋刻苦，熟读“四书”。

辛亥革命后，施复亮受进步思想影响，率先剪掉发辫。不久他进了城里的长山高等小学堂学习，在课余，广泛涉猎《三国演义》、《西游记》、《古文观止》和《纲鉴易知录》等书，尤崇拜孙中山，阅读了不少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施有意从军报国，无奈不识门径。高小毕业时，他希望进一步求学深造，但父亲希望他回家务农，经母亲说情，才被允许继续升学。1917年夏，施复亮考上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著名的新派人物，教师有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和李次九等。施立志刻苦学习，以便将来做出一番大事业。在五四运动激励下，他开始接触《新青年》等刊物，看到陈独秀写的《复辟与孔子》一文，思想顿时开朗，遂和沈端先（夏衍）、阮毅成等创办《浙江新潮》，他们亲自撰稿，轮流编辑。施写的一篇激昂慷慨的文章《非孝》，发表在该刊第二期上，犹如惊蛰的春雷，立刻引起轰动，由此他名闻遐迩，但当局下令将他开除。

施复亮在杭州不能立足，便于12月与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一起到了北京，一度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工读互助团”，但该团旋即解散，1920年春又同俞秀松到了上海，并结识了陈独秀，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和其他有关问题。当时陈望道也在上海，与陈独秀密切来往，共同活动。这些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给施的思想较大影响。同年5月，施同陈独秀、陈望

道等借上海澄衷中学的风雨操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青年》、《星期评论》且出版特刊。会后他们经过多次商谈酝酿，决定着手建立共产党。施加入了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陈公培（吴明）、俞秀松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共产主义小组，同陈独秀等开始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但因7月去日本而中断。

在日本，施复亮首先拜访戴季陶介绍的宫琦龙介，又与李达的朋友周佛海取得了联系。施努力学习日文，很快就能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著作。不久接到陈独秀的信，陈通知施担任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该小组起初只有他和周佛海两人，后很快发展了杨嗣霞、林孔昭等十余人。施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曾发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等多篇文章。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他得到通知，要求东京小组推派一名代表参加，周佛海作为东京小组代表参加了一大。同年12月，施复亮在日本警察搜捕日共党员时被逮捕，并于1922年1月被驱逐回到上海。他立即向党组织报到，党组织派他负责青年团的工作。同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刘少奇、邓中夏、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会上选出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中央委员，施复亮不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且担任中央书记，负责主持团的日常工作。他多次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1923年1月，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前三期是刘仁静、邓中夏编辑的，第四期以后多由施复亮主编。他曾两次被捕，其中一次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后由李大钊保释出狱。同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施仍为中央委员，但因病力辞团中央书记工作，获得批准；团中央派他到上海就医，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

施复亮于1924年初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讲《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思想史》和《社会问题》三门课程，分别写有讲义，后收入《社会科学讲义》第二集中。同年瞿秋白被捕，社会学系

主任由施继任。作为革命摇篮的上海大学，无论在理论宣传和革命实践中都走在前列，施复亮不仅努力做好教学工作，更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在《五卅特刊》上发表了不少支持工人、鼓舞斗志的文章，在反对戴季陶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1926年下半年，施复亮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同时在黄埔军官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1927年2月，施复亮又到武汉，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施对此认识不清。5月，夏斗寅叛变，率部逼近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领、恽代英为党代表，施复亮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军开往前线。在行军途中，他多次登上较高的田坎，向部队演讲，激励士气。但因片面地听信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认为农民运动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又受陈独秀思想影响，感到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对共产党领导革命产生怀疑。在独立师凯旋武汉的路上，他听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二次改组国民党，解散共产党的主张，产生了共鸣，觉得为避免误会，“共产党这块招牌不是不可以牺牲的”[(1)]，终于写了《悲痛中的自白》一文，刊登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而不退出国民党。后来他对此不断自我批评，悔恨莫及。

1928年初，施复亮邀集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商量今后中国革命的出路，秘密成立一个定名为“本社”的组织，表示不忘马克思主义之“本”，反蒋而不反共。他们分别参加了认为可以争取的各派系团体，如“第三党”等，李达办《现代中国》，邓初民办《双会》，施和许德珩参加了号称国民党“左派”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社，出版《革命评论》。不久《革命评论》等刊物被查禁。

施复亮自1927年起，从事翻译工作，先后独译或与人合译《资本论大纲》、《现代唯物论》等二十余种进步著作，1932年出版了《中

国现代经济史》一书。这时他除译著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民国大学任教。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施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受到国民党市党部的监视，成为国民党市党部密令逮捕的五位教授之一，由于事先得到学生报信，才幸免于难。

1933年初，施复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冯玉祥，得冯资助暂去日本，同年回国，在老家叶村读书写稿。1935年春，应冯玉祥邀，施曾往泰山讲学，得酬劳两千元，偕妻子再去日本。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日本创办了《文物》综合杂志，任白戈、艾思奇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至1936年春，回上海投入救亡运动。施在《救亡日报》、《文化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驳斥“亡国论”、“速胜论”，指出全面抗战必须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思想等一切方面动员起来，要求取消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民主抗战论》一书出版。抗战开始后，施复亮征得叶澄波同意，把进化书局和一个印刷厂一同迁往昆明，改名为民主印刷厂，1940年复迁往重庆，改名为南方印书馆，施任总编辑和代总经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施失去工作，生活艰难，有人劝他当参政员，他拒绝说：“即使饿死，也不做蒋介石政府的官。”[(2)] 不久，由胡子昂介绍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工作，编辑《四川经济季刊》，并出版了《经济漫谈》、《四川征购粮食办法》等著作。

抗战后期，施复亮曾参加“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星五聚餐会”的活动，同企业家有所联系。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劝民族资产阶级成立自己的组织，表达自己的主张。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会见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施复亮对毛泽东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毛泽东对施热情慰勉，称赞他为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抗日救亡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希望他坚持统一战线，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继续努力。施复亮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先于9月间同许德珩等创立九三学社（民主科学社）。不久脱离“九三学社”，又于12月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在重庆成立民主

建国会。施为常务理事，他同黄炎培、章乃器等其他几位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一致，但都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具有进步意义。他们在党派关系方面标榜“不右倾，不左袒”[3]，自处于中间地位，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施复亮曾在民建机关刊物《平民》周刊上发表《怎样促进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文章，对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1月，国民党被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代表，共三十人。施对此寄予很大的期望，以为通过这次会议，可以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一人独裁的局面，实现政治、经济民主化，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为了促进会议成功，民主建国会同其他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一起，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多次假迁川工厂联合会合作会堂和沧白纪念堂等处，举行报告会以动员群众。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章乃器代表民主建国会参加大会主席团，国民党特务派遣一些流氓打手，冒充群众，大打出手。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数十人被暴徒打伤，施复亮伤势最重。较场口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貌似民主的假面具。施复亮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口述，由妻子记录，题为《愤怒的抗议》一文，在《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及各界各地代表到医院或致电向施慰问。出院后，周恩来劝施早日离开重庆，不久他随着新华社同志一起搭飞机离渝赴沪，稍后民主建国会总会也迁往上海。

施复亮想在上海找一个适合他的文教工作来维持生活，但国民党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得聘用施。在沪他拿不出租房押金，找不到住处，却受到一位叫周庚的人欢迎，让施住到半淞园路家中，而且不收房租，施非常感激，后来知道周是地下党员，是党组织让他帮助施复亮克服困难的。解放战争时期，施复亮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仍然坚持向反动派进行斗争。1947年，国民党实行大逮捕，发

生“六二”事件，施并没有被吓倒，他做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为了揭露反动派捕人的阴谋，他邀集民主党派在上海的十位领导人一起去见国民党上海市长，严正地说：“听说你们要逮捕，我们自己来报到坐牢。”[(4)] 弄得市长狼狈不堪。同年10月20日，国民党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建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施复亮对此非常兴奋。在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议上，施等经过争论，一致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蒋介石独裁政府决裂，为创建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同年冬，民主建国会领导人由沪到香港，施和章乃器、孙起孟被民建会推为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翌年1月，施复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到东北参观，在老解放区看到一派欣欣向荣和人民热爱共产党的情景，深受教育。回到北平后，他于4月间加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请民建会一些负责人共进晚餐，勉励大家为解放大上海作贡献，施立即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随陈毅大军进入上海。不久施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为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尽了自己的力量。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施复亮被推举为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后，施被任命为劳动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因病辞职。此后历任全国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同时继续担当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工作认真负责，在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运动中表现积极。他坚决拥护《共同纲领》，把民主建国会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政治团体，他通过开会作报告和到武汉、重庆、上海视

察，同工商界代表座谈，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施患有半身瘫痪，病中仍关心国家大事，“文革”时受到冲击，病情加重，于1971年11月29日去世。

施复亮一生为革命尽心竭力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5]。

主要参考资料

冯和德：《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施复亮同志》，《新华文摘》1982年第8期。

史群：《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小传（施复亮）》，《人物》1982年第2期。

戴逸、李文海：《翔实、公允、清新——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3期。

---

(1) 冯明：《施复亮同志传略》（未刊稿，存民主建国会），第25页。

(2) 冯明：《施复亮同志传略》，第42页。

(3)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孙晓村、冯和法、张帆《中国民主建国会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版，第84页。

(4) 冯明：《施复亮同志传略》，第49页。

(5) 《新华月报》1982年第8期，第189页。

施今墨

寿祝衡

施今墨，浙江萧山县人，生于1881年3月28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原名施毓黔，行医后，改名施今墨。表示他要向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学习：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同时，在医术上要勇于革新，使自己成为当代的医学绳墨。

施今墨幼年时期，其母多病，遂立志学医，曾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学中医。1902年，因其父在山西为官，进入山西大学堂就读。由于他参与反对该校西斋创办人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而被学校开除，于1903年转入山西法政学堂。1906年转入北京京师法政学堂学习。他在校虽然攻读法律，但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医。

施今墨于1911年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后不久，便追随黄兴奔走革命。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施今墨以山西代表的资格参与活动，为陆军编纂了三种法令：《陆军刑法》、《陆军审判章程》、《陆军惩罚令》。1913年，他返回山西。一方面行医，一方面从事社会活动，与范源濂、汤化龙等在北京和山西创办尚志学会和尚志学院。1917年，他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不到一年即辞职引退，弃政从医，并决心以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21年他协助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负责该院孤幼儿的卫生保健工作。

1929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废弃中医。施今墨到处奔走，组成“华北中医请愿团”，南下联合各省医家，多次请愿，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

南京中央国医馆成立后，焦易堂任馆长，施今墨任副馆长。为了发展中医事业，施今墨一方面行医，一方面从事中医教育改革。1932年，他在北平以自己行医的收入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任院长。学院除开设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外，还设有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细菌学、内科、外科及日、德文等课程。这在当时的医学界，还是一个创举。该学院一、二年级为中西医基础课，三、四年级为临床课，学生毕业时还须进行临床实习。施今墨亲自授课，并指导学生实习。该院在成立后十年期间，共培养出学员六七百人。

施今墨于1941年担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并在北平、上海、山西、察哈尔等地协助创办中医院校、讲习所及研究班。数十年以来，他除办学外，还收有门生数百人，培养训练了很多中医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施今墨曾“代表”华北医药界出任“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任职期间，多次提出发展和改革中医的建议及方案，均未被采纳。事实教育了他，北平解放前夕，他坚决抵制了国民党诱使他赴台湾或国外的阴谋，并于1949年9月和其他一些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人民日报》上联名发表《虔诚接受中共领导》的声明。解放后，他加入农工民主党，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及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他还在平安医院、协和医院、儿童医院、铁路医院等北京各大医院中医门诊部工作，并担任北京医院中医顾问及北京医学院顾问等职。

施今墨擅长医治胃肠病及妇科病，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也有独到之处。晚年对于冠心病和防老法也颇有研究。

他在医学上勇于革新，五十年前即提倡中西医结合。他常说：“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他主张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总结疾病规

律，取得古人理论的精华。他的医案常附中西医两论，中西并举，融会贯通。

施今墨不仅在疾病的诊断上勇于革新，对于中药的剂型和配制，也力图改进。曾创办“中药制药厂”，以实现自己的革新愿望。他处方配制的丸药，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高血压速降丸等，也是在打破常规和旧传统的基础上制成的。

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因病逝世。他预立遗嘱将自己的遗体解剖贡献给医学事业。他是中国历史上中医界第一位将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的名医，反映出他追求真理，献身科学，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始终不渝的决心。

施愚

张学继

施愚，字鹤雏，号小山，四川涪陵人，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赴日本留学，后又赴德国继续深造。回国后，历任户部江西司主事、考察宪政大臣顾问、山东巡抚顾问、宪政编查馆科员、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总办、弼德院参议、法制院副使等职务。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经孙宝琦推荐，施愚担任总统府秘书。1912年7月30日至1914年5月26日，施愚先后担任国务院、政事堂法制局局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施愚主持制订了北洋政府的官制官规及一系列法律文件。在袁世凯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过程中，施愚等法律派起了重要作用。

1913年6月底，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按照《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各自选出三十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起草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不久，袁世凯即将法制局拟定的一个宪法草案大纲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这个大纲共二十四条，除在形式上采用内阁制外，其主旨在扩大总统权力。大纲要求赋予总统下列权力：大总统对于两院之议决有复议权及拒绝权；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有发布紧急命令权；大总统有议会停会权；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行政最高权委任之于大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辅助等。袁世凯企图强迫宪法起草委员会按照他的意志制订宪法。

对于袁世凯的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未予理睬。1913年10月16日，宪法草案脱稿，并在报上公布以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袁世凯

见宪法起草委员会没有完全采纳其要求，便决心破坏国会的制宪工作。

首先，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由法制局提出所谓《增修约法案》，要求将《临时约法》中限制大总统权力的种种规定予以修正，但遭到国会的拒绝。接着，袁氏又于10月18日咨文国会，与宪法会议争夺宪法公布权，指责宪法会议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侵犯了大总统的法律公布权。袁不待国会的答复，即于10月23日派遣施愚、顾鳌、黎渊、方枢、饶孟任、程树德、孔昭焱、余肇昌八人强行要求出席宪法会议，他们声称“奉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并宣布袁氏咨文，要求此后开会都要事先通知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但宪法起草委员会严词拒绝施愚等八人出席宪法会议，并严正指出按照会议章程，“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即旁听亦不可”。国会的不妥协态度，促使袁世凯狗急跳墙，悍然决定以暴力手段解散国会。

袁世凯在非法解散国会并撕毁《临时约法》后，成立御用的“约法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共五十七人，实际上都是由袁世凯及其爪牙指定的角色，人们称“约法会议是法制局的放大”。袁世凯指定卖身投靠的原安徽都督孙毓筠为约法会议议长，法制局局长施愚被指定为副议长，王式通、顾鳌先后任秘书长。

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在北京象坊桥前参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国务院代总理孙宝琦代表袁世凯出席会议并宣读大总统“约法会议”成立“颂词”。“颂词”继续攻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称：“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盖两载于兹矣。……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之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

之进行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1]

袁世凯嘴里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内心里却一直做着皇帝梦。继孙宝琦、孙毓筠先后致词后，施愚也以副议长身份发表就职演说：“今日约法会议开会选举正副议长之结果，以鄙人承乏副议长一席，以在会诸君之年龄、学识、社会之声誉、政治之经历比较言之，先进甚多，而选及鄙人无任惭愧。鄙人近年来于立法事业以职务关系稍有经验，即此次增修约法，鄙人素日亦颇有所主张，当为诸君所共闻，以今日互选，卜之主旨当能一致，甚愿以经验所得供诸君之参考。鄙人尝考各国法律，凡经一次修改，必以施行之当时能否适合为标准，无论异国之法律不能强行于本国，即本国之法律因时间先后之不同亦有不能施行尽利者，约法之良否已有公论。今观已过之历史，政府与国民既皆因是障碍而受痛苦，则其对于约法观感相同，将来讨论结果，其增修条件虽尚待研究，然必能互相印证，一致主张，此则鄙人所可预料者也。约法既删去临时二字，将来究能为正式宪法之蓝本与否，现在尚不敢断定。惟既应当时之所必需而从事增修，则其增修之结果必能适合于施行之当时，此亦鄙人所可预料者也。果能适合于施行之当时，则此施行期间必能得一良好之结果，而我国将来之进行，即凭此数年间之建设以为基础。此数年间因根本法之良善，使国家基础得以坚固，则将来之进行亦易收效力。故现在增修约法完备一分，即将来正式宪法亦多得一分之良善结果。观于德意志联邦宪法几全用北德意志宪法之原文，盖已经实行而又适合，后此即难大变亦不宜屡更，我国将来正式宪法是否即用此次增修之约法，现在虽不可知，然宪法之良否，即视此次增修约法如何而以为根据可断言也。深愿诸君对于约法之增修当视同将来之宪法一体郑重注意，以备为将来正式宪法之蓝本则幸甚矣。”[2]

约法会议在孙毓筠、施愚主持下，用了一年的时间，先后炮制出了《中华民国约法》、《参政院组织法》、《审议院编制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大总统选举法》、《国民

会议组织法》等法律文件。在完成这一切形式上的手续后，于1915年3月18日举行闭会式。

其实，“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按照袁世凯一人的意图进行的。《中华民国约法》赋予了袁世凯以绝对的专制独裁权力，这些权力与封建帝王毫无二致。故人们称这部约法为“袁记约法”。

施愚在为袁世凯完成这一切独裁专制的法律文件后，却因为不赞成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5月辞去法制局局长职务，改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9月，任洪宪大典筹备处委员。施愚的思路是拥护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但不赞成袁世凯称帝。故在洪宪帝制过程中，施愚并没有积极参与请愿与劝进活动，目前所查到的史料中，施愚的名字仅在“四川省公民”张炳华等二百一十五人的劝进书上作为五名介绍人之一出现过一次。尽管如此，1916年7月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中华民国军务院还是将施愚列为洪宪帝制的首犯之一，并且下令通缉。但无论是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发表的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诛除祸首的通电上，还是黎元洪总统发表的惩办洪宪帝制祸首名单上，均没有列施愚的名字，可见，施愚在洪宪帝制关系不大[(3)]。

1919年2月，施愚作为北京政府代表团十名代表之一（代表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到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1925年8月，应聘担任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1927年1月，由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聘为政治讨论委员会委员。北洋军阀覆灭后，施愚在北平、上海等地做寓公。

1930年病故，时年五十五岁。

---

(1) 顾鳌编：《约法会议记录》（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338—339页。

(2) 顾鳌编：《约法会议记录》（2），第342—343页。

(3) 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称："1916年7月，（施愚）被护法军政府列为帝制首犯之一，被下令通缉。"此说显然是错误的。

施肇基

罗幼娟

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1877年4月10日（清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江苏震泽。其父施则敬举人出身，后从商，经营蚕丝出口业务，家道殷实。施肇基五岁时即习读中国典籍，1886年至南京入江宁府同文馆学习英文，一年后考入由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学习三年，主编过学生刊物《圣约翰之声》。1890年转入国文学院，专修中文。

1893年8月，施肇基随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赴美，任中国驻华盛顿使团翻译生。1897年夏，施辞去使团职，进入康奈尔大学深造。1899年，杨儒出使俄国，施肇基被调为驻俄使馆随员。其间曾随杨儒赴海牙，“出席弭兵会议，任中国代表团参赞官”[(1)]。嗣后返美，继续康奈尔大学学业，先获文学学士学位，两年后又获文学硕士学位。

1902年夏，施肇基学成回国，经其兄施省之推荐，入湖广总督衙门，任洋务文案，兼鄂省留美学生监督，曾两次率鄂省公费生赴美。施肇基工作勤勉，处理免付厘金的进口商品事务成绩卓著，迭获升迁，官至币制局督办。

1905年12月，清政府派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施肇基被奏请随同前往，任一等参赞官。施随同五大臣在欧美考察半年余，所得宪政专著四百余种。翌年7月回国后，即在北京法华寺参与编辑《列国政要》一百三十三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卷，呈请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施于9月参加清政府对留学士子举办的会考，获法政科最优等，“赐进士出身”。

施肇基的才华早已受到唐绍仪的青睐。在随同五大臣出国考察

前，同唐绍仪之侄女唐玉华在上海结婚。回国后适值唐绍仪调任邮传部右侍郎，施被任命署理邮传部右参事，兼京汉铁路局总办。由于他拒绝给浏河矿业公司优先权，一度被人讥讽是靠裙带关系当上官的。但他不为所动，并力革积弊。他为取消铁路免票制度，有官吏来索免票者，施或婉拒，或于个人薪俸中购票赠之，“因之索者逐渐减少，增加路上收入甚多”[(2)]。1907年，施肇基调任京奉铁路局会办。翌年出任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吉林林业局监督。1909年2月，他“对俄人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非法收税行为，向中东铁路公司提出抗议”[(3)]；3月参加与俄使廓索维慈、中东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等就中东铁路界内公议会问题谈判[(4)]。不久，施肇基升任吉林交涉使，办理对外事务。10月26日，前日本驻朝鲜统监、日本枢密院议长伊滕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施肇基妥善处理了这一涉外事件。

1910年，施肇基奉调回京，晋升为外务部右丞。翌年8月改任外务部左丞。10月简放为出使美、墨、秘、古大臣，因武昌首义爆发，乃中止出使。

1912年3月，袁世凯接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令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并组阁，4月施肇基出任内阁交通总长。唐绍仪不堪忍受袁世凯虐法越权之行为，于6月16日辞职，施肇基也托病递上辞呈。袁提名施为驻美公使，但未获国会批准。11月，施任总统府大礼官。1914年6月，被派驻英国公使，12月赴伦敦任，开始了历时七年的使英生涯。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七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率施肇基等人出席。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但是巴黎和会为列强操纵，中国难以在会上有所作为。在4月29日至30日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时，和会完全拒绝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归还被日本夺取的山东

权益的合理要求。消息传到国内，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在巴黎的华侨和留学生也强烈要求代表团拒绝签字。在中国人民共同声援下，施肇基赞成顾维钧等人的主张，不顾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21年2月，施肇基与顾维钧互换任所，转任驻美全权公使。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总统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发起召开华盛顿九国会议，以缓和列强之间的矛盾，继续讨论巴黎和会没有完全解决的分赃问题。施肇基和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是中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施、顾被特加大使和特任官衔，以表重视。由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华盛顿与会国某些代表对中国的态度极为傲慢。法国代表外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曾冷言冷语地询问施肇基：“贵国代表团能否代表全国？”施严正回答说：“能够代表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5)]

11月16日大会开幕，施肇基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国问题十项原则。要求各国须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与行政独立，给予中国充分的机会发展并巩固统一政权。尽管有“赞成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表示，仍不能满足列强的贪婪要求。后来美国代表罗脱（Elihu Root）将十项原则归纳为四原则，侧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于11月22日通过。对于施肇基在会议上的发言，当时国内报纸予以严厉批评[(6)]。此后，施肇基和顾维钧先后向大会提出关税自主、解决山东问题、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治外法权、退还租借地、取消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撤销客邮、撤销外国在华电台、确守战时中立等十二个提案，其中尤以山东问题为关键。经英美居间斡旋，中日双方进行会外谈判，英、美两国各派代表二人与议。经过中日代表在会外三十六次会谈，几经周折，终于在美英代表的压力下，于1922年1月27日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折中方案——《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三十四条，规定日本将山东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及胶济铁路有关设施以及青岛海关归还中国，撤走以上各地的

驻军；中国付给日本五千三百四十万金马克作为“补偿”，同时将收回之租借地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在请示北京政府同意后，施肇基代表中国于2月4日在条约上签字。

经过帝国主义国家的明争暗斗，华盛顿会议于2月6日结束，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和《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确认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否认了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与垄断地位，为美国加紧对华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至于中国所要求的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队等问题，华盛顿会议均未予解决。

施肇基在华盛顿会议上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出了一些努力，又听命于北京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因而获得北京政府的好评。1923年1月4日，张绍曾奉命组织内阁，施肇基被延揽为外交总长。施过于自信，未等国会通过表决就搬进外交总长的官邸。但众、参议院分别于1月19日、24日投票，由于“施肇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被否决”[(7)]。施十分尴尬，复感时疫，遂于2月11日提出辞呈，移津养疴。3月底，施肇基返美复任驻美公使。他与美国谈判，商定以庚子赔款作为派遣留美学生之用。为处理这笔基金，施担任了中国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的理事。1924年，奉命任中国全权代表出席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第一、二次会议。1926年5月，施被颜惠庆内阁任命为外交总长，但他看到颜阁之艰危，未即返国赴任，不久颜阁即被奉系势力摧垮。

北伐战争期间，施肇基已与国民党有了联系，在北京政府行将瓦解之时，施在美国表示：外国政府对中国应采取“不介入”政策。1928年7月，国民政府确认施肇基为驻美公使，11月调任驻英全权公使。

1930年，施肇基担任出席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兼国联理事会中国全权代表。他在1931年9月11日国联第十二届年会上发表演说，提请大会注意“‘如甲国谋以武力侵略乙国，国联应如何设法制止’之问

题”[8]。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翌日，施肇基即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真相，“要求国联主持公道”[9]。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联主持“公理”、制裁日本侵略行径，于9月22日在南京表示：“余敢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字国，对于日本破坏公约之所为，必有适当之制裁。”[10] 施肇基根据蒋介石的谈话，于9月25日在国联声称：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11]。但是日本侵略者对国联采取的是断然排除第三者干涉的强硬态度。虽然国联不分侵略和被侵略，先后于9月22日、9月30日、10月24日作出停止冲突、双方撤兵的决议，然而日本不但没有撤兵，反而扩大军事行动，进一步侵占吉林、敦化、洮南一线，并进攻黑龙江省。11月25日，施肇基奉南京政府训令，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但此举遭到全国舆论的强烈抨击。12月4日，施又接到南京政府外交部的紧急训令，立即在国联大会上表明：“‘锦州中立案’不能接受，如日军进攻锦州，我国将不能不采取自卫办法。”[12] 施肇基在国联处境艰难，并受到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指责，乃于12月5日向南京政府电辞国联代表之职，但未即获准。此后施惟南京政府之训令行事，仍然寄望国联能阻止日本进占锦州。翌年1月，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颜惠庆接替施肇基任国联理事会理事。

1932年4月，施肇基以身体不好为由辞去驻英公使职。旋即奉派去华盛顿，代理驻美公使职，1933年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公使。1935年6月，中美双方将驻外使节升格，施肇基遂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1936年8月，五十九岁的施肇基以年迈力衰为由辞驻美大使职返国，定居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打响，施激于民族大义，担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负责向外国宣传中国的抗日立场，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援助。他还兼上海市防痨协会董事长，并

在上海设附属医院。1938年7月，施肇基被国民参政会聘为参政员，他因住在上海，未去武汉、重庆出席会议。

1941年夏，施肇基去美国，被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为五名委员组成的美国南非联邦国际和平委员会的“非本国籍委员”。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施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驻华盛顿，为中国争取战时物资。1945年6月，施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的高等顾问。1948年施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兼顾问。

1958年1月3日，施肇基病逝于华盛顿。遗著有由施肇基口述，傅安明笔录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

---

(1) 施肇基口述，傅安明笔录：《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2) 陈之迈：《〈施肇基早年回忆录〉跋》，《传记文学》第9卷第6期，第11页。

(3) 李鸿林、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上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4) 李鸿林、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上卷，第375页。

(5)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01页。

(6) 《晨报》1922年2月7日第7版。

(7)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213页。

(8) 张本政等编写：《东北大事记，1898—1931》，《吉林文史资料》第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版，第298页。

(9) 李鸿林、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上卷，第727页。

(10) 张德良等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11)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51页。

(12) 李鸿林、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上卷，第738、739页。

石筱山

商一仁

石筱山，江苏无锡人，1903年10月21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二）生于上海。曾于上海神州中医专门学校肄业，该校停办后，回家随父学医，二十二岁开始悬壶，以善治骨折伤痛闻名江、浙一带。

石氏伤科，以独特的正骨复位手法和独创的伤科内治经验方，成为我国南方伤科的一大流派。它创始于清末，数代相传，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石筱山的祖父石蓝田，年轻时因习武而留心于跌打损伤的治疗术，后发展为理伤正骨，曾在无锡农村为农民驱痛治伤。石筱山的父亲石晓山也从小熟习拳棒，对接骨入骱，技法圆熟。石筱山继承先辈治伤经验，加上自己努力钻研，技术益加精进，渐至炉火纯青。他又从偏治外伤进而善治内伤，兼理针外科，是以声名大噪。

1929年，国民党政府卫生署曾明令取缔中医中药，粗暴地干涉有数千年历史的祖国医学，石氏伤科也横遭摧残，被污蔑为“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伤科技术被当做“邪术”。但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广大病家的信任，使他们得免厄运。

石筱山的私人诊所，初设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外复兴东路附近的新新街。抗战之前，这一带属于华界，周围住户多为码头、搬运、建筑和人力车工人。他们终年胼手胝足，筋骨损伤的事故特别多。石筱山的治疗，使他们解除痛苦，重获健康。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石筱山的名气不胫而走，成了城乡老少皆知的伤科名医。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后，石的诊所迁至当时的法租界吕宋路（今连云路）一条弄堂里面，病人仍然很多，其中还有来自四乡的农民。当时诊所内医生和职工有十余人，多系石氏族人。门诊无固定时间，往往从太阳出来看到

万家灯火。诊所除看病外，也配制、出售部分成药及外用药，予病人以方便。

在几代人努力的基础上，石筱山对家传的“三色敷药”、“消散膏”又进行了提炼，并发展了一系列临床有效的内服经验方。这些药膏、药方对骨折、脱臼、脑震荡、胸肋内伤等伤病都有很高的疗效。

石筱山对正骨复位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诸凡摸、接、端、提、按、摩、推、拿八法，无不精通，做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他纯熟的技巧，能使损伤的骨节、肌肉或筋络，离者合，斜者正，陷者起，突者平，筋急者松弛，疼痛者减轻，肿硬麻木者逐渐宣通而柔和[(1)]。

“内外兼治，动静结合，全体与局部相关联而又重在内治固本”为石筱山伤科的医疗特色。其基本原则是根据祖国医学中的辨证施治，做到气血并重。如有的病人头部内伤，来就诊时已神志不清，伤势十分严重，经石诊治后得以起死回生。又如对老年人常见的“髋部骨折”，石既重视手法运用，又强调牵引和夹板固定，再加上外敷内服，效果也很好。还有不少疑难病例，在石筱山手中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方针，十分重视祖国医学遗产的整理，并予以大力扶持。石筱山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及华东医院顾问。

1952年，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各科专家组成“中医公费医疗门诊所”，石筱山欣然跨出他的私人诊所参加公费门诊。从这时起他不但扩大了带徒弟的范围，第一次接受国家分配给他的学员，而且公开了石氏秘方。在1958年的中医献方热潮中，他把石氏经验方，包括百年来祖传老本子全部公诸于世，为不少医院包括解放军医院所采用。

石筱山治愈的各类伤科病人，多不胜数。他晚年体弱多疾，仍念

念不忘把自己一生从事伤科的经验留传给后世。根据石筱山口述，由其子石仰山协助整理的长达二十万字的《石筱山医案》原稿，是石筱山毕生心血的结晶和伤科技术的精华[(2)]。

1964年7月，石筱山因患癌症去世。

---

(1) 《医宗金鉴》，卷87“正骨心法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第276页。

(2) 本文资料主要根据石筱山之弟石南山（已故）及子石仰山提供。

石友三

沈庆生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白城县人，生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家贫，其父石玉琨在北小龙湾开荒落户。石友三有兄弟九人，他行三。年少时，经人介绍到长春一家粮店当徒弟，后进当地小学读书。成年后与刘氏结婚，后因逃赌债经刘氏亲戚介绍于1908年投到驻在长春的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当兵[(1)]。1912年春，在北京改投左路备补军冯玉祥营当马夫。1914年，冯玉祥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率军入陕，见石机灵敏快，颇为赏识，提为贴身护兵。此后石升迁很快，1919年升任模范连连长，不久升营长，与韩复榘同为下级军官中“十三太保”之一。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石由团长升任国民军一军第八混成旅旅长。1925年春，又升任第六师师长。1926年5月，当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大战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石友三、韩复榘等奉令率部往晋北，石在雁门、左云一带同晋军作战，很卖力气。8月，国民军在南口失败，向绥远等地撤退，时雁北国民军受前后夹击，军心离散，石、韩等乃与晋军将领商震联系，接受晋军收编。

同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到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召石归来，石深怀疑虑，经冯派人解释，石才率部回到冯处，被冯任命为援陕第五路军总指挥。1927年5月，冯玉祥由潼关出师攻豫援鄂，任石为北路援军副总指挥。6月，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石任第一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进占郑州。1928年4月，蒋、桂、冯、阎四派联合“北伐”，石率部在山东鱼台大败北洋军孙传芳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石密派其秘书长刘郁周到徐州谒蒋，蒋赠以巨款。1928年“北伐”结束后，经过“编遣会议”，石部缩编为第二十四师，石任师长，驻防河南

南阳地区。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时，冯玉祥令石友三部进驻襄樊，暂持观望态度。4月，桂系失败，冯电促石友三率部急向武汉挺进。蒋介石立即电石停止进兵，并派人携款赴襄樊，借劳军之名，再次对石进行收买。蒋邀石到武汉见面，石怕冯见疑，不敢亲往，派其亲信副官李志明密赴汉口见蒋。

1929年5月，冯玉祥策划反蒋。5月22日，韩复榘在洛阳发出“养”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把石友三的名也列在通电上。石与韩的叛冯投蒋，是早有默契的，因为他们对冯都怀疑惧，又都受蒋收买。蒋介石见韩、石通电喜出望外，立委石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即率部到郑州与韩会合，共同投蒋。7月，蒋介石委石友三为河南省政府委员。10月，安徽主席出缺，蒋改委石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0月下旬，石率部进入安徽境内，尚未就职，蒋介石又以广东地盘相许，命石南下，去和广州方面的李宗仁、陈济棠作战。这时，驻河南的唐生智和广州方面先后派人向石游说反蒋。他们都向石说，蒋可能趁他南下途中，把他的部队分割消灭。石很相信这个分析。1929年12月初，他率部到浦口后，突然与蒋决裂，以大炮轰击南京。蒋事先毫无准备，于是南京城内，乱成一团。石于炮轰南京后，自知终无法敌蒋，赶紧率部从浦口北撤，退入河南商丘，时韩复榘驻兵河南，得韩帮助，暂驻豫北新乡一带。

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反蒋逐渐成熟。冯事先派人与石疏通前嫌，阎又许以山东省地盘，要石采取一致行动。石既已得罪了蒋，乃又与冯、阎携手；并与韩密约，暂时各投一方，以便于胜负决定之后，互相提携。4月2日，石在新乡就任阎、冯加委的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接着宣布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职，派秦建斌暂时代理。5月至8月，石随冯、阎在中原地区与蒋方大战。8月中旬，晋军溃退，济南失守。石探知张学良即将派兵入关拥蒋，时局将急转直下，即放弃阵地，从前线撤兵，并电张学良：“服从东北，愿效前驱。”9月18

日，张学良“拥蒋”通电发出后，石立即通电响应。当石擅自撤兵时，陇海线上，蒋、冯双方尚处于胶着状态，石的行动，给冯军以重大打击。10月，大战结束，石退据河北与河南之间，收集了一部分溃散的晋军和大批物资，实力反而加大。经张学良、韩复榘从中斡旋，蒋介石复任石友三为十三路总指挥，受张学良节制，驻顺德（今邢台）。

1931年5月，汪精卫、李宗仁等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集中广州，促成粤、桂合作，在广州另组成“国民政府”，再与蒋介石集团相对抗。粤桂方面派李汉魂到顺德与石友三联络，许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联合反蒋。此前，石曾到沈阳谒张学良，张以优礼相待，但石好猜疑，反疑张将不利于己。他还认为东北军将骄兵惰，不值一击。待返回顺德，得到广州方面许给的条件后，他经过一番布置，于7月18日在顺德就任广州政府所委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决定先行北指，把东北军逐回关外，然后挥兵南下。但东北军在于学忠指挥下，诱敌深入，把石部诱至保定附近，然后反击；同时南京方面也派刘峙率军北来。在东北军和蒋军南北夹攻下，不到半月，石部六万余人全军覆没。8月初，石逃往德州，后寄居济南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内。

1932年秋，石友三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潜往天津，与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并勾结土匪、汉奸，组织伪军，在冀东一带活动。1933年8月，被国民党华北当局改编为河北战区保安队，驻扎冀东玉田一带。1936年1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委石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哲元将石友三部扩编为一八一师，石任师长，隶属宋之第一集团军，随宋军逐步南撤，辗转于冀、鲁边境。他收集了些散兵和各地自发的游击队，于1938年2月扩编为六十九军，得任军长。5月，徐州撤守后，石部进入沂蒙山区，又扩编为第十军团，石任军团长。

石友三生平反复无常，又嗜杀人，动辄把人活埋，因得“倒戈将军”绰号，又称“石阎王”。抗战初期，为了发展势力，他还一度表示进步，并得到进步力量的帮助。但到1938年武汉失守后，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活动，他于12月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遂专门进攻八路军。1939年初，石率部由山东入河北，驻枣强、南宫、宁津、盐山一带。不久石部扩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石任总司令。此后，石友三伙同张荫梧、朱怀冰等不断向八路军冀南部队寻衅，逮捕、活埋八路军政治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偷袭八路军部队。石又经常密派其弟石友信等前往北平、天津、开封等地与日寇勾结。为了制止石友三的投降活动并打击其反共气焰，1940年2月，八路军冀南部队在山东临清下堡寺一带将石部包围，予以沉重打击[(2)]。石率残部逃至濮阳。3月下旬，又移驻山东曹县。6月初，石派石友信和参议黄广源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了所谓“防共协定”。7月初，石部遵照日军命令，回驻濮县、濮阳一带，与日军实行“联防”，专门对付八路军。不久，石又派代表向济南日军接洽投降条件。日军准备给石以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名义，要石公开投降，宣布与华北伪政权合流。石的投降活动，为所部多数将领所不满。蒋、石矛盾本已很深，蒋介石早有除石之心；石部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石也有矛盾，同时，石的总参议毕广垣又为蒋介石所收买，石已处于众叛亲离之境。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毕广垣与蒋介石派来的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共同商定，乘石前来濮县柳下屯高军军部时，将其扣押，当夜活埋，第二天又将石友信杀死。

主要参考资料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初稿。

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45年版。

邵鸿基：《冀鲁豫边区挺进军抗战史》，1945年版。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

高树勋：《石友三酝酿投敌和被捕杀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

(1) 石友三的籍贯及当兵经过，现根据白城师范学院徐盛金先生于1980年11月6日来信所提供的调查资料补正。

(2) 围歼石部的地点，已据申以绥先生所提供的史料加以订正。

史迪威

严如平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年3月19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市，父亲经商。史迪威少年聪敏，语言天赋甚高，中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西点军校。1904年结业后入伍，以少尉军衔在美国驻菲律宾第十二步兵团任职。1906年回国，在西点军校任现代语教官，讲授英、法、西班牙语。五年后回菲律宾步兵团，升中尉。曾至日本、中国旅行，在广州、梧州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时。1913年又返西点军校执教；1916年至纽约州普拉茨堡训练营任上尉教官。1917年至德国，在美国远征军第四军团任情报官，大战结束后返美。

1919年8月，史迪威被任命为驻华陆军首任语言教官，先至加州伯克莱大学学习中文，翌年9月以少校军衔来华，入北京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他被国际赈济委员会聘为公路建筑工程师，参加修筑山西汾阳至黄河军渡的公路；后又被冯玉祥聘为修建陕西公路的总工程师。1923年7月，他奉调回国，在佐治亚州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班进修步兵课程，1925年又至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入指挥参谋学校进一步深造。

1926年，史迪威来华任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少校营长。该步兵团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驻华保护京津地区的侨民以及保证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畅通以备撤侨。1928年他升任中校、代参谋长。他对中国风俗民情以至政治派别都很熟悉，能用流利的北京话与天津街头小贩随意交谈，被认为是个“中国通”，每月向驻军作一次关于中国时局形势的报告。1929年，他奉调回国，在本宁堡步兵学校任战术科主任，与副校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交谊深厚。1932年

他被派往圣地亚哥训练后备军。

1935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晋升上校军衔。他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结识各界人士，广泛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对具有军事意义的各种因素和事态发展进行分析后向陆军部报告。1936年他至各地旅行考察，对中国抵抗日本的能力作出消极判断。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爆发后，他派人到卢沟桥实地调查，向中外记者提供了日军发动侵略的较为详细、确切的情形。他目睹日军的侵略罪行，对美国政府的绥靖政策甚为不满，对中国政府的消极防御战略和国民党军队将领的无能颇多恼恨。12月，他随外交使团撤至武汉，先后到开封、徐州、台儿庄、德安等地观察；在武汉会见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访问了八路军办事处。他向美国政府建议拨款援华，促成进出口银行于1938年末安排二千五百万美元援华贷款。1939年5月，史迪威奉调回国，任步兵第二师第三旅准将旅长，驻得克萨斯州。1940年被任命为第七师师长，晋升为少将；1941年任第三军军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同盟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史迪威被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美国总统驻华军事代表、美国租借法案监督。他按照美国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的布置，以打通滇缅公路，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帮助改进中国军队的战斗效能为使命，于1942年3月来华抵重庆。他被蒋介石派为援缅远征军总司令，率领中国第五、第六军赴缅作战。但是他指挥不动两军，因为远征军直接听命于蒋介石。4月日军攻占腊戍，中、英军队向印度退却，他拒绝搭乘前来援救他的飞机，与一百一十四名中、美、英、缅随行人员一道跋山涉水，穿越丛林，经过半个月的徒步行军，终于安全逃至印度边境英帕尔。他的体重减轻了八九公斤，并染上了黄疸病。

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力图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他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弊端，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备忘录，建议对军队重新加以整训、装备，整肃掉无能的高级军官，改善士兵的给养。蒋介石不理睬史迪威的改革方案，只同意史迪威在印度训练十万军队的计划。8月，史迪威在印度建立蓝姆伽训练中心，由美国军人担任教官和联络官，分批训练国民党军队，至1943年10月共训练十六个师。1943年春，史迪威又在云南昆明设立训练中心；同年冬，再在广西桂林设训练基地。他的目标是使中国拥有六十个装备优良、训练良好的战斗师，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

这期间，史迪威一再向蒋介石建议裁汰昏庸无能的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主张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共同出击日军，要求撤除胡宗南部队对延安的封锁。他牢牢控制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向共产党军队也提供了一部分；在缅甸失陷后，他同意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削减运往中国物资的方案；他也不肯支持蒋介石向美国政府索要五百架飞机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使蒋介石难以容忍，几次表示希望美国撤换史迪威。

1943年10月，盟军成立东南亚司令部，英国将军蒙巴顿（L．Louis Mountbatten）为最高司令官，史迪威为副司令官。11月，他参加开罗会议，代表中国战区提出了缅甸作战的方案。1944年1月，他赴缅指挥经过训练的中国陆军第二十二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美国远程突击队作战，进军胡康河谷，于6月攻占加迈，8月攻克密支那。这年7月，他晋升为四星上将。

已是强弩之末的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孤立于南洋的日军，建立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交通线，于1944年4月发动了号称“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4月22日郑州失陷，5月25日洛阳失守，6月18日又弃长沙。日军继攻衡阳，战局危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罗斯福提出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国的所有武装部队，以扭转危局。7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指挥中国所有武装部队的全权授予史迪威。蒋十分尴尬，但他不肯交出中

国军队的指挥大权。几经转圜，蒋于9月12日应允史迪威为中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同意，指挥全部陆军和空军。但是罗斯福9月18日的备忘录坚持要求蒋介石立即授予史迪威“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蒋介石不能容忍，一再交涉，最后终于迫使罗斯福为维护美国在远东的长远利益，于10月18日下令召回史迪威，改派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史迪威于10月20日愤然回国。

史迪威回到美国后不久，即被任命为第十军军长，驻冲绳，准备进攻日本本土。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史迪威回国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指挥官、装备部部长等职。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因胃癌不治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瞿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华盛顿版。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1944—1949时期》（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81版。

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t．of the Army，1956．

史良

周天度

史良，字存初，1900年3月27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江苏常州。父亲史刚，读得不少经书，但对封建纲常名教具有一种叛逆性格，生平不慕功名利禄，澹泊以明志，颇有名士气度。为了维持家计，他把教私塾和为一些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作为唯一职业。后来受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倾向反清革命，并参加了同盟会。母亲刘璇，对旧学也略有功底，还会绘画、刺绣、弹琴，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子。

史良有姊妹及一个弟弟共八人，由于家贫无钱上学，她幼年时在家从父读书，十四岁时才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入学后，一直很用功，成绩名列前茅。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女师和常州学界的爱国运动，是常州学界联合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女师学生的进步活动，遭到常州地方上一些封建势力的嫉恨，他们和县署当局相勾结，提出要求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女师校长刘古愚，停办女师。史良带领同学们和女师教员一道，为维护学校，反对旧势力，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斗争。最后江苏省政府下达了不同意停办女师的命令，护校斗争取得胜利。

1922年，史良从女师毕业后，到上海女子法政学校学习，后升入上海法政大学，不久又转入法科大学。毕业后到镇江，在江苏省妇女协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务主任，从事妇女运动工作。1931年到上海任律师，加入上海律师公会，不久被选为执行委员。她担任律师后，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营救了被捕的邓中夏、艾芜、任白戈、熊瑾玎及贺龙家属等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

“九一八”事变后，史良积极参加了反日爱国运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年12月，史良和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等发起救国运动。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率先成立，史良是主要领导人。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会后率领全体与会者举行了游行。妇女界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提出“打倒妇女只会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要同爱国的男子来共负救国的重任”[(1)]。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民众在市商会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史良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是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她被推为常委。5月11日至6月1日，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史良作为上海妇女界的代表与会，并被选为常务委员，成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人物之一。9月18日，“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救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会，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史良亦被殴伤。她在医院疗伤时写《九月的鞭笞》一文，控诉军警的暴行，称这“是一个伤痛的纪念日”，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苏醒的群众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要凝结成一条铁链。”[(2)]

11月23日凌晨二时许，国民党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通过法租界巡捕房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辣斐坊1号史良的寓所逮捕了她。与史良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12月4日，沈钧儒等六人被送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史良先得友人帮助得以脱身，30日仍前往苏州投案，被押于吴县横街女看守所。史称“七君子”事件。

1937年4月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3)]，罗织“十大罪状”向沈钧儒、史良等七人提起公诉。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幕后进行劝降

活动，要他们承认有罪，送入反省院，写具悔过书，然后予以释放。史良等人坚持救国无罪的正义立场，断然予以拒绝。6月7日，他们和辩护律师发表了长篇《答辩状》，逐一驳斥了《起诉书》提出的罪名，并有力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要求国民党司法当局"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4)]。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他们进行审讯，并内定以"危害民国"罪名判处徒刑。史良和沈钧儒等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依据事实，据理回答了法官提出的各种讯问。史良等七人在狱中坚强抗争，加上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很大压力；不久全面抗战开始，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江苏高等法院于7月30日裁决将沈钧儒、史良等七人交保释放。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良作为妇女救国运动的领袖人物，十分注重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在她看来，抗日战争没有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两亿多妇女参加，是根本不能取胜的。1938年，她在武汉写的《妇女动员中的一点意见》、《今年"三八"纪念中的特殊任务》两文，主张跳出知识分子的圈子，目光向下，强调发动广大下层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参加抗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求各级政治机构向妇女开放，吸收妇女参加；并指出，忽视妇女参加，不动员她们贡献力量，无异甘愿毁弃一半抗战实力。如果妇女不解放，整个民族就谈不上解放；也只有民族解放的成功，才足以保证妇女解放的实现。是年春夏间，在宋美龄领导下，武汉成立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和作为全国妇女总动员机构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史良是重要领导成员之一。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她被聘为参政员。

10月下旬，史良和一部分参政员由武汉抵达重庆，继续在妇女指导委员会从事妇运工作。为了支援抗战，在她参与领导下，开展了妇女献金竞赛运动和为前方将士征募寒衣运动，获得各方人士的好评。

救国会在重庆成立了“十七人座谈会”，定期开会研究时局，讨论工作，史良是成员之一。

1939年9月，重庆各抗日党派发起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立即实行民主宪政，并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由二十五名参政员组成，史良是其中之一。她是重庆妇女宪政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她主持下，重庆妇女宪政座谈会先后开会七八次，气氛十分热烈，统一了思想认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实施宪政即实现三民主义，如要巩固团结和加强抗战力量，非实施宪政不可。妇女参政运动必须随着宪政运动实施，才能得到成功。”[(5)] 在讨论如何修改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时，史良提出在有的条文中须加上“不分男女”四字，以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在宪草“国民大会”一章，妇女代表名额应有明确的规定，至少应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由于史良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宪政期成会通过了她的提议。但因国民党坚持一党专制，不愿意实行民主宪政，宪政运动被压制下去。接着国民党于1941年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妇女运动也受到遏制，史良退出了妇女指导委员会。1942年，沈钧儒参加各抗日民主党派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救国会同时成为盟内党派成员之一，史良因之也成为盟员。

1944年，国民党统治区再次出现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史良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她针对现实，就民主宪政、民主的涵义和妇女与民主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她认为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官吏只不过是由主人请来代为管理事物的公仆，如果仆人有了错误，主人是有权来更换的；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澄清吏治，铲除贪官污吏，挽救政治腐败；人各有自身的人格和价值，大家都是平等的，应当互相尊重，民主不分你我，只有正义公理；空谈民主不够，人民应当自己起来学会使用和实行民主等等。由于史良对深受压迫的广大中国妇女寄予深切同情，她始终把争取妇女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平等当做自己

的首要任务。她说，民主是“我是人，大家是人”，“我们妇女说，我们女人也是人”，“妇女要民主可说是对不民主的反抗”，“我们妇女要踏上世界人的立场，中国社会人的立场，要真正争取到每人天赋的自由，人的应有的权利”[(6)]。

1945年9月，民盟重庆支部改选，史良当选为委员。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良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救国会召开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救国会），史良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仍然是救国会的领袖之一。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陶行知因患脑溢血逝世，史良深为悲恸，积极参加悼念活动。是年秋，史良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同时参与了民盟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求实现人民民主。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史良是主席团成员之一。3月，她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撰文号召妇女起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与反民主的行动。国民党政府在扩大内战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10月下旬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解散。民盟被迫停止活动，其领导人沈钧儒和章伯钧等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那里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民盟三中全会。此时，史良担任上海支部主委，她对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纲领、路线表示完全赞同。

1948年，在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扶日的新高潮，在史良的参与领导下，上海民盟组织参加了斗争。6月28日，她在上海几千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要充当学生的义务辩护律师。

国民党当局对史良的进步活动十分痛恨，特务一直在监视她。1949年四五月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曾发出密令，要不择手段逮捕史良。史良四处躲藏，她的家被军警特务洗劫一空，亲戚多人株连被捕，秘书遭到毒打。5月25日上海解放，史良才从虎

口脱险，死里逃生。不久她到北平，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历时十年。她勤奋工作，推动各级政府建立和健全司法机构的工作，在全国各地筹建了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史良十分重视律师工作，认为新社会的律师是“法庭的桥梁”，至1957年初，全国已建立法律顾问处七百多个，律师两千多人。此外，她还创议建立了公证制度。史良反对歧视妇女、男女不平等、包办婚姻以及重婚、纳妾、寡妇不能再嫁等封建陋习，参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不遗余力地督促贯彻执行。

史良历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常委，第二、三、四届副主席，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主席等职。她还历任第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5年9月6日，史良在北京因病逝世。

---

(1) 《大美晚报》1936年1月9日。

(2) 《妇女生活》第3卷第6期，1936年10月1日。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4) 《救国会》，第249、270页。

(5) 《新华日报》1940年4月7日。

(6) 史良：《妇女与民主》，《现代妇女》第5卷第4号，1945年4月。

史量才

耿云志

史量才，名家修，1880年1月2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上海青浦县泗泾镇。其父史春帆是个商人。1899年，史量才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但以后他放弃了科举道路，开始研究日文及理化等近代科学。1901年秋，他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上海教育界，先后在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即苏州女子蚕桑学校前身）。1907年，他积极参与江、浙两省绅商的拒款保路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史量才在上海与陈其美、章梓等人结识，乘机多方联络，因而于民国初年被委任主办沪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

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以特殊机缘盘进《申报》，以后遂将一生主要精力经营报馆。《申报》是在中国出版最早的报纸之一，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原为英人美查（E．Major）所办，后美查返国，由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接办，即逐步变成华商企业，但仍用外人名义发行。到史量才接办后，《申报》才真正成为中国报纸。史接办后，初任席子佩为经理，继又将席挤走，改任张竹平为经理，自任总经理，悉心经营，销路日增，1912年销七千份，1917年销两万份，其后仍逐年上升，其间还先后增出多种专栏、专刊，成为国内著名的大报。

1929年，史量才从美商福开森（John．C．Ferguson）手里购进《新闻报》的大部股权，从而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申报》在史量才的经营下，规模不断扩大，1932年4月，《申

报》销数已达十五万份。同年7月，创办了《申报月刊》，1933年开始编印《申报年鉴》。同时期，还陆续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及申报流通图书馆。1934年，出版了翁文灏等绘制的中国新地图。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史量才凭借他在新闻界的地位，扩展其社会活动。1921年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发起民生纱厂，又曾帮助项松茂扩大五洲药房，协助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特别是中南银行的成立，使史成为金融界有力分子，而《申报》也有了经济后台。

《申报》从史量才接办以来，其政治立场基本是保守的。但从销路着眼，又以“民众喉舌”自诩，对时政亦偶有批评。袁世凯搞帝制活动时，《申报》等上海报纸持批判态度；北洋军阀混战时，《申报》政评甚少；蒋介石统治初期，《申报》采取了拥蒋的立场。

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及其《申报》的政治态度逐步地有了变化。当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时，他曾捐巨款支援抗战，因而被推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同时，《申报》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有所批评。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史量才及其《申报》，曾给史各种荣誉职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及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但这并未改变史量才及《申报》对国民党政策的批评倾向。相反，随着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日益丧失人心，《申报》对它的批评也愈趋激烈。《申报》从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1932年12月，宋庆龄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史量才积极支持该同盟的活动。他代觅通讯社发表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并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尖锐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登载有关民权保障同盟的代电和报道。这时期，史量才还聘请了一些爱国和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工作，如用李公朴主持业余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以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同时

还经常刊登陶行知、胡愈之、茅盾等人的文章和作品。从1933年1月至1934年5月，鲁迅用各种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

1932年，《申报》曾连续发表短评，抨击国民党的军事“剿共”政策，要求结束国民党专制统治，引起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严重不安和仇视。与此同时，《申报》报道关于“中大学潮”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蒋介石遂下令对《申报》禁止邮递。后来，蒋介石得到其特务机关关于史量才的种种“告发”材料，终于下令要戴笠亲自部署暗杀史量才。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携眷去杭州休养，11月13日下午乘汽车由杭州返上海，途经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近，为蒋介石特务狙击遇害。

主要参考资料

《申报月刊》1934年第12期。

舒新城

谈宗英

舒新城，又名维周、心怡、遁庵，湖南溆浦县人，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生于1893年7月5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世为小农，家境贫寒。五岁入私塾读书，1907年进鄜梁书院，次年转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1911年因闹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后，曾在常德第二师范附设单级教员养成所、长沙游学预备科和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暑假英文补习科等处求学，1913年8月借用同族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1917年毕业。

此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及长老会所办福湘女学执教。在福湘女学曾任教务主任，但未及一年，因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发表《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一文而去职。在此期间，他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曾据美国人贺恩（H．H．Horne）的《教育上的心理原理》等书，编著《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离开福湘女学之后，又与宋焕达、杨国础、方扩军等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以“研究我国教育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评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目的，出至第五期即在军阀张敬尧的胁迫下停刊。此后，他在省立第一师范教授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与此同时，他还为《体育周报》写《儿童学》，为北京《新中国》杂志写《美学》，为《北洋时报》写《心理学》等。

1921年7月，舒新城应张东荪邀请，至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后改名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主持校务。他不满当时的教育制度，一意实行改革，如推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和选科制以及男女同校等。时适美国人柏克赫司特（Helen Huss Parkhurst）创始的道尔顿

制传来中国，舒对此作了研究，认为道尔顿制的自由合作原则，即不用旧日的班级制及钟点制，而使学生按照自己的能力与同学共同研究、自由学习的教学制度，可以解决年级制及学科制的许多问题，其理论与办法都比国内现行制度好。于是力排众议，从1922年10月起，与常乃德、沈仲九、孙俍工等在吴淞中学进行试验，主要措施有三：（一）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用书和实验仪器，使其兼备旧日教室、自修室、图书馆、实验室的作用，每室由教师一人或数人为指导员，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入室研究问题。（二）废除课堂讲授，由教师将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分周的作业大纲，并规定需要完成的各项作业，由学生自行学习。（三）制定学习进度表，由学生将各科学习进程及所费时间记录在表上，以检查自己的成绩，再由教师加以考核，决定其是否达到某种程度。舒新城在试行道尔顿制的同时，还为《教育杂志》的《道尔顿制专号》撰文，广为宣传，以期引起教育界的注意。

1923年2月，舒新城因吴淞中学内部对推行道尔顿制有分歧，愤而辞职，举家迁居南京。不久应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主任廖世承的聘请，在该校任研究股主任，继续实验道尔顿制，同时还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兼课。此时，道尔顿制已逐渐为教育界所重视。他因最早试行道尔顿制，故各地通函及面询者很多。于是在这年夏天，他专为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授道尔顿制，旋又应上海、上虞、武进、宜兴、武昌、长沙等地邀请，到各地作有关道尔顿制的讲演，介绍研究所得，供有志改革者参考。

同年11月，舒新城经恽代英、李儒勉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曾与会员杨效春、曹刍起草少年中国学会的办学计划，规定学校的目的为实现本会之宗旨——创造中国的教育，但因时局纷扰，未能实现。

1924年4月，舒新城为了研究实际教育问题，又先后至芜湖、安庆、宁波、上虞、绍兴、杭州、嘉兴、上海、徐州等地，深入调查中

等教育。在此期间，他连续发表了《心理学初步》、《人生哲学》以及介绍道尔顿制的四部译著：《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和《道尔顿制浅说》。此外，他还翻译了桑戴克（Edward Lee Thorndike）的《个性论》、莫尔（J．S．Moore）的《现代心理学之趋势》等。

11月，舒新城由南京溯江而上入四川，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任教育学教授，旋因学校发生风潮，在川不足八个月即于1925年6月返南京。从此专门从事著述，翻译了美国人林勤（A．J．Lynch）所著《个别作业与道尔顿制》，又与余家菊等合编《中国教育辞典》，编著《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新教育概况》、《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指南》，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史的论文。由于他对清末以来的留学教育方针不满，著有《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建议以后的留学政策当以研究学术改进本国文化为唯一目的，并提出改进办法：国家应调查国内学术界之需要，通盘筹算，预定每年应派出国研究某种学术的名额，公开向全国召集此项专门人才；留学生研究期满回国后，应严格考察以验其所学，及格者予以适当的事业使之办理，俾能展其所长，以免空耗国家经济、个人精力等，见解十分精辟。他从1924年至1928年秋，前后五年多，共编著了各类教育书籍十七种二十册，共四百余万字，堪称一位多产的教育理论家。

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共二百余万字的《中华百科辞典》，从拟订体例至校阅全稿，用力极勤。全书收集通行名词万余条，一以中等学校之各种科目为标准，一以一般社会所需要之基本知识为根据，尤注意于教科书或专业训练中所不易见的常识事项，故此书实为兼备常识教科书作用的百科辞典。

1928年，舒新城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约，继徐元诰主编《辞海》。任事之后，立即组织力量从事编纂；同时又为全书厘定编辑计划，规定内容体例及排列方法。他以原稿中已死的旧辞太多，流

行的新词太少，乃变更方针，删旧增新，并改加新式标点。1930年，舒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曾创刊《新中华》等期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与刘济群合编《淞沪御日战史》。1936年，收词十万条以上，兼有字典和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辞海》正式出版，受到读者的好评，对当时的文化教育界颇有影响。次年陆费逵去香港，舒为中华书局代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他因久病仍留居上海。1944年长沙沦陷，日本侵略军曾企图强迫他返湘出任伪职，他以病重为托辞，坚决拒绝。抗战胜利后，继续主持编辑所工作，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各种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对于所主持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一贯重视，尤其注意收集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史料，进行研究。1957年秋，他提议重新修订《辞海》，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后即着手筹备。次年春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他对再次主持《辞海》工作极为重视，曾对制定修订方针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并力予贯彻。在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级领导的研究后，确定了《辞海》的修订方针，强调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三者紧密结合，以提高《辞海》的质量。他积极筹划，全力以赴，即在病中亦经常关心。1960年11月28日，因癌症在上海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舒新城日记》，现存上海辞书出版社。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

舒新城：《我和教育》，中华书局1945年版。

舒新城：《道尔顿制概观》，中华书局1923年版。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中华书局1947年版。

“魏文伯在舒新城公祭仪式上的悼词”，《解放日报》1960年12月1日第3版。

斯诺

任嘉尧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J．Edgar Snow），母亲安娜·埃德曼·斯诺（Anna Edelmann Snow）。年轻时，他半工半读，当过农场收割工人、铁路工人、印刷学徒。1923年，斯诺进入堪萨斯城初级学院，后在密苏里大学及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

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堪萨斯市的《明星报》及纽约的《太阳报》担任记者。不久，他当了远洋货轮的海员，又开始了旅行记者的生涯，先到中美洲，取道巴拿马运河，动身到南太平洋去，在夏威夷和日本逗留了三个月，终于在1928年到达了上海。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通过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的介绍，斯诺见到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作为一个具有新见解的人，斯诺被任为《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他阅读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刊，写了一系列《新中国》特刊的文章。

在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孙科帮助下，斯诺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平跨长城而东北，作了四个月的旅行，逐渐熟悉各地风土人情，认识了中国社会众生相。他看到了太湖地区的丝绸、西湖的山水、“东方威尼斯”苏州的园林、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泰山附近的孔庙、北平的故宫，以及拥挤着白俄的哈尔滨，还亲眼目睹了西北和内蒙古令人毛骨悚然的饥荒、黄河流域悲惨的水灾。《密勒氏评论报》刊载了他的旅行通讯。

1930年，当鲍威尔前往东北和苏联采访时，斯诺被委任为《密勒氏评论报》代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在《密勒氏评论报》和《中国新闻》创办人、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亚洲首席记者托姆·密勒的推荐下，斯诺接受了统一新闻协会的旅行记者的任命，为《今日世界》专栏写稿。统一新闻协会当时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外新闻机构，要为《纽约太阳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十二家报纸提供消息。而旅行记者可以在亚洲各地游历，这对斯诺的旅行癖是理想的职业。鲍威尔返沪后，斯诺便履行他新的工作了。他到了被日本侵占了三十五年的台湾，去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一带，访问了西南重镇云南，报道了越南三十年来的农民起义运动，目击了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再到缅甸等地游历，然后回到中国。

当时，斯诺又应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之邀，担任了特派记者，去上海访问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从而懂得孙先生和宋庆龄所信赖的中国，正是劳苦民众的中国，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自己的国家，并能迅速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斯诺在“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冒着枪林弹雨，深入上海和东北中日交战的前方采访。通讯报道集中记述了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也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上海时，斯诺开始同姚克（莘农）合作，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曾同鲁迅多次见面，提出要把一些中国现代白话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结集出版。鲁迅对这打算予以热忱赞助。后来，斯诺在北平又得到杨刚、萧乾的帮助，还有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又名佩格，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的参与，终于编译成《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一书，把中国新文艺概况及代表作品介绍给世界广大读者。

统一新闻协会倒闭后，斯诺又和《星期六晚邮报》取得了联系，作为经常撰稿人。不久，斯诺迁往北平，担任《纽约日报》驻华记者，并兼任燕京大学教师，讲述新闻撰述和旅行通讯。他一面学中文，一面写书，并为《亚细亚》、《现代历史》、《幸福》、《展

望》等刊物撰写文章。那时，他跟海伦·福斯特结婚，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相识，还和一些爱国青年、中共地下党员黄敬、龚澎、黄华、龚普生、陈翰伯等经常接触。人们称斯诺的家为“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还替自己起了个“施乐”的中文名字。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斯诺热情参与示威游行并及时报道了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斯诺还向在场镇压学生运动的士兵质问：学生为了不当亡国奴而上街示威，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他们？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带有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问题，着手访问红色中国。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带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斯诺于6月初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困难，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延安。他是第一个向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他首先在安塞同周恩来会晤，随后到达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晤谈，记下了毛泽东的生平和战斗历程，了解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明了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搜集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斯诺发现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于他深深懂得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这些要求是推动革命前进复兴中国的动力。斯诺当时就预言毛泽东将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宁夏南部预旺县，同彭德怀将军作了交谈。不久，离开这和国民党中央军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冒着炮火，重新折回保安。再经过西安，顺利返回北平。

四个月的红色区域旅行，扩大了斯诺的眼界。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领导人，革命战士，农民，牧民，工人，知识分子，妇女，老人，儿童的亲切恳谈，他思想感情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精心编写、琢磨、修改他这次采访的实录。一系列文

章首先刊载在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接着美国《生活》杂志和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先后刊登了那组文章及照片。《每日先驱报》并提升斯诺为该报驻远东的首席记者。

这些震撼人心的报道，1937年—1938年在英国和美国以《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为名被结集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在被日军包围的“孤岛”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经问世，向英、美和全世界人民公开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迄今为止有关远东的最畅销书之一。《西行漫记》的出版，更轰动了中国人民、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在香港等地出版了众多的重印本和翻印本。在中国内地，当时这本书被秘密地广泛地流传着，人们藉此认识中国共产党，懂得革命道理，看清中国前途。

1937年初，斯诺在北京和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合办了英文刊物《民主》，出版了几期，“七七”卢沟桥炮声响了，刊物便夭折了。这期间，海伦·福斯特去延安采访，后来写成了《红色中国内情》，亦称《续西行漫记》。

抗日战争期间，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他采访了上海之战，取道汉口、重庆、西安，1939年在延安重访毛泽东，这些对话后来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

与此同时，斯诺还同路易·艾黎（Rewi Alley）、海伦·福斯特共同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计划（简称“工合”），企图运用“生产救济”方式恢复被日军侵略所破坏的工业生产，发展经济，提高士气，为持久抗战打下基础。这个计划得到宋庆龄和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等热心人士的赞助，斯诺他们并在海外募集了好几百万美元的捐款。到1940年10月，“工合”在十六个省建立了二千三百个小工厂，职工达二十五万人，还有四万人在家劳动制造军

毯。当时在游击区和敌后这是一支可观的生产大军。蓬勃发展的“工合”终被国民党当局通过冻结信贷和经营资金以及政治干涉等方式扼杀了。

1941年，斯诺对于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护照被吊销，于2月被迫离开中国。这一年，他的《为亚洲而战》出版。其后，他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首席世界记者，在香港、泰国、缅甸、印度以及中东、苏联、欧洲等地采访，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和新闻评述，出版了《人民在我们一边》、《苏维埃力量的格局》、《斯大林需要和平》三本书。1942年—1943年，他又一次来到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是越来越困难了。

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把斯诺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他的文章。1951年，由于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被利用来支持他所不赞成的方针，斯诺不得不辞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的职务。1957年，他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这是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重要补充。次年出版自传《复始之旅》。

1959年斯诺被迫迁居瑞士，那时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Lois Wheeler Snow）及子女们偕行。斯诺的护照被禁止去中国旅行，但他认为中国的事业也就是自己的事业。直到1960年6月，斯诺得到中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交谈。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新中国的报道，出版了《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一书。1964年到1965年初，他再度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又接见了他。根据此行所搜集的资料，他拍成一部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1970年8月，斯诺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访问。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理陪同斯诺夫妇和毛泽东主席会面，作了亲切交谈。12月18日，斯诺又一次和毛泽东主席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晤谈。从

中美两国关系来说，斯诺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关于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记录在197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1972年2月，斯诺刚回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接着，尼克松总统访华之际，斯诺原拟以记者身份再次访问中国，可是病魔缠身，不克如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获悉，急派以马海德（George Harem）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前往协助医疗护理；当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驻瑞士大使陈志方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前往慰问探望。1972年2月15日上午2时20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

在弥留之际，他用毕生感情喊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都致电斯诺夫人，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问。遵照斯诺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校园里），汉白玉石墓碑上镌着叶剑英题写的"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1905—1972"。1973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主要参考资料

斯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三联书店1979年版。

《海伦·福斯特的来信》，《新闻战线》1980年第1期。

胡愈之：《〈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三联书店1979年版。

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原名《尊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三联书店1979年版。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选

编》，1965年版。

梁士纯：《回忆斯诺》，《编译参考》1979年第3期。

裘克安：《斯诺怎样采访和写作》，《新闻战线》1979年第2期。

张文定：《斯诺在燕园》，《新时期》1980年第3期。

张文定：《斯诺先生与北京大学》，《文化与生活》1980年第3期。

斯特朗

任嘉尧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女，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一个牧师家庭。她在芝加哥郊区一所中学毕业后，曾在德国住了一年、瑞士待了半年，学习语言。1903年上大学，从欧伯林学院毕业后，在芝加哥《前进》周刊担任了几个月的副主编。190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是《祈祷者的心理》，成为当时该校最年轻的博士。

1909年—1910年，她和父亲悉尼在西雅图一起组织“熟悉你们的城市”讲习会，在西部沿海城市巡回演讲。1914年—1916年，为美国儿童局担任展览会工作专家。1916年起，她在西雅图市教育委员会工作了两年。随后，西雅图工人主办的《联合纪事报》创刊，她任特写编辑。1921年，报社由于经济不景气倒闭，她被美国教友会派往海外，作为服务队成员，去波兰、苏联调查饥荒状况，并把救济物资运往伏尔加河灾区。旋受聘为赫斯特报系国际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于1922年又到了苏联。她在农庄孤儿学校担任“大姐姐保护人”，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革命的儿童》一书（1925年出版）。

斯特朗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25年初，那还是军阀割据时期，南方则呈现变革迹象，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州创建了一个国共合作的新政府。正当省港大罢工之际，斯特朗访问了朝气勃勃的广州，后来又访问一些将军和北洋军阀头目。两年以后，斯特朗又前来中国旅行，她从上海经武汉，取道西北，经蒙古再到苏联，她亲眼看到中国工农中兴起的强大的新生力量。1928年出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就是这两次访问的实录。随后，她又把在苏联中亚细亚历次旅行的见闻，写成《撒尔马罕的红星》（1929年）及《通往古老的帕米尔高原

的道路》（1931年）。1929年，她访问苏联，了解农业集体化计划推行的情况，在《苏联人征服小麦》（1931年）中作了戏剧性手法的描述。

1930年，斯特朗在苏联政府主办的英文报《莫斯科新闻》工作，曾与斯大林及有关人士商谈，将两份英文小型报纸并成一份日报，她先后担任该报主编及特写撰稿人，广泛介绍苏联革命的成就。1932年，她与苏联农学家舒宾（Joel Shubin）结婚。这期间，斯特朗撰写了《中国大众：1927年——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1935年）、《我改换世界：一个美国人的改造》（1935年）、《苏联社会真相》（1936年）和《苏联宪法》（1937年）等书。

1936年，斯特朗辞去《莫斯科新闻》职务，回到美国西海岸安家。她数次访问西班牙，写成《武装的西班牙》（1937年）一书，就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作了忠实的记叙。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期间斯特朗两次来华，访问了武汉八路军总部以及抗日各战场，看到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生动景象。在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对中国革命的不同阶级进行了细致的描述。1941年1月，她将抵达旧金山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斯特朗在纽约的报纸上揭露了蒋介石不再统治着一个统一的中国，也不再指挥着一个统一的军队的事实[(1)]。1940年出版的《我的祖国》，是斯特朗描述她本人对美国的观感，是一本出色的报告文学。1941年出版的《苏联人的预见》，分析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中所采取的各项政策。1943年出版的《荒野的河流》，是一本以作者在苏联战时生活为素材的小说。1944年—1945年，又出版了《苏联各族人民》和《我看到了新生的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特朗于1946年6月再度来华。这是她第五次访问中国，在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在延安多次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度过1946年的寒冬，经历过中国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

刘少奇用一整天时间和她谈马列主义如何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她在革命根据地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情景，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力量源泉。访问时她写了一系列文章，由路透社向四十一个国家发稿[(2)]。其中最著名的是1946年8月去延安，毛泽东主席同她作了一次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谈话，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3)]。斯特朗把这些文章编成《中国现出黎明》和《中国人征服了中国》（1949年），前者凭着作者敏锐洞察力，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后者叙述了在中国解放区的见闻。

1948年秋冬，斯特朗从美国来到欧洲，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然后打算取道苏联来中国，以美国新创办的《国民前卫》周报记者的身份，报道中国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实况。当时美苏走向冷战，1949年2月斯特朗在莫斯科竟以“间谍罪名”被捕，苏联当局指控她是“一个有名的间谍分子”，她在监狱里关了一些日子后被驱逐出境。蒙受不白之冤的斯特朗拖着虚弱的身躯回到美国时发表声明说：“目前全世界都弥漫着对间谍的恐惧心理，只要一个政府希望的话，任何记者的任何活动都能被称为是间谍活动。”[(4)]她不愿人们利用她来“加剧国际摩擦”，她说：“如今的新闻犹如原子弹，它能爆炸并能摧毁一切。”并指出：“官方的愚蠢行为并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品。”[(5)]

尽管蒙受如此冤屈，斯特朗对苏联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情并未因此而改变[(6)]。六年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愿意同斯特朗谈话，但她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得到澄清。即使被不少老朋友疏远，斯特朗仍丝毫不动摇自己的政治信念，仍然用自己的力量去教育人民。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国民前卫》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向世界各地寄发她编印的时事通讯《今日》，并在美国许多城市作旅行演讲，继续进行战斗。直到1955年苏联终于发表声明，承认对斯特朗的指控没有根据。清白无辜的不屈战士斯特朗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在

全世界人民面前恢复了名誉。

1956年，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作者成功地描写了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首创精神，以及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重建的生动场景。

斯特朗渴望在中国度过晚年，可是美国国务院拒发护照。经过三年交涉，她赢得了胜利。1958年8月，七十二岁的斯特朗到达北京，这是她第六次访问中国。斯特朗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我希望学习和写作。"[(7)] 在这最后的十二年，斯特朗以她的名义发行《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出版，每期印四五万份，先后发行了七十期，字字句句浸透着她的汗水和心血，浸透着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她还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寻找报道素材。有一段时间，她每天经常工作十五六小时[(8)]。她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及其对全世界人民的意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中国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1965年11月，斯特朗在上海度过她的八十岁生日。那一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她并共进午餐。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为斯特朗举行盛大宴会，祝贺她的八十高寿[(9)]。

1970年3月29日，辛勤劳动、紧张战斗、永不知疲倦的斯特朗在北京逝世，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斯特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促进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她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0)]。

---

(1) 斯特朗：《我在中国的经历》，《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

(2) 陆璀：《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人民日报》1980年3月28日。

(3)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

(4)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1979年版。

(5) 詹姆斯·阿伦森：《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新闻采访和写作》新华通讯社1980年版。

(6) 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中译本《出版说明》，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7) 斯特朗：《我在中国的经历》，《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

(8) 路易·艾黎：《回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人民日报》1980年3月29日。

(9) 王楚良：《为中国的明天讴歌终生——纪念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十周年》，《光明日报》1980年3月27日。

(10) 新华社北京1980年3月27日电：对外友协举行大会，纪念美国朋友斯特朗逝世十周年。

司徒雷登

阎铁

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其父斯图尔特·约翰·林顿（John Linton Stuart）是美国南长老宗的牧师，1868年来中国传教，在杭州四十六年，1913年病故。母亲霍顿·玛丽（Mary Louisa Horton），亦为传教士，早年来中国，1925年病逝。司徒雷登夫人名艾琳（路爱玲，Aline Rodd），也是传教士，1904年11月与司徒雷登在美国结婚后，同来杭州传教，1926年病逝于北京。

司徒雷登儿时，父母为他选择奶娘、女仆和中国小同伴，教他学杭州方言。同时母亲授英语课和“主日学”教育。1887年，司徒雷登十一岁时回美国读书，1888年入亚拉巴马州莫尔比城小学校。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毕业，获学士和文学士学位。1897年到潘尼普斯附中任拉丁文和希腊语教师三年。1899年秋进入里士满城协和神学院，1901年加入学生义勇海外布道团。1902年被授为长老宗牧师。同年6月神学院毕业，得神学士学位。1904年11月，受南长老宗差会派遣回中国杭州传教。

司徒雷登从1904年至1908年一直在杭州北部乡村传教。他十一岁前已有杭州方言基础，这时又特聘高敬甫教授汉语。平时也尽量找教友攀谈，上台布道讲汉语。如是者三年，他对浙沪一带吴语系的几种方言，都能流利地会话。后来他到南京，又延师学习南京方言，到北京又学习普通话。他的中文水平相当高，被目为中国通。

1908年，司徒雷登调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主持《新约圣经》注释系并担任拉丁文、希腊文教授。在金陵神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十

一年。著有《环球布道小史》、《希腊文初阶》、《希英汉词典》、《启示录新注释》和《第四福音注释》等。

司徒雷登欣赏“基督教青年会不受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因而经常参加青年会举办的一些夏令营讨论会，彼此“公开讨论如何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问题上”[(1)]。这种思想与他后来创办燕京大学和参加政治活动，是息息相关的。

1918年秋，司徒雷登奉华中布道团之命，到北京筹建一所教会大学[(2)]。原北京汇文大学（属圣道宗北派美以美会）、原通州的协和大学（属公理会和长老会合办）、原北京协和大学与协和神学院（几个公会合办），遵照差会的意见合并为一个大学。为并校组成联合委员会，聘请司徒雷登为新校的校长。司徒雷登了解到合并中的矛盾很多，主要争论是通县协和大学与北京的汇文大学（他们自己英文名字称北京大学）都坚持新校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彼此争论不休；而新校的经费来源，却无人关心。司徒雷登首先要求委员们停止争论，他对委员们说：“诸公爱护旧校，理所当然，然基督教运动前途，实赖教育，幸勿以小害大。”[(3)]对新校校名，采纳了诚静怡博士建议，不用“汇文”，也不用“协和”，而用北京的古称“燕京”这一词汇。一经提出，委员会便一致通过。

接着，司徒雷登大力解决经费来源和物色新校址。他推荐齐鲁大学副校长哈利·卢斯（Henry Winters Luce）为燕大副校长和纽约燕大托事部的副主席，专门负责筹款事宜。卢斯立即启程赴美。1922年，司徒雷登又亲自赴美。他曾往返中美间十次，发动过三次大规模募捐活动，截至1936年，总计共募捐二百五十万美元[(4)]。创办燕京大学的关键经费问题得到解决。

1912年，燕大在北京西郊以六万银元买妥前陕西督军陈树藩的一所旧园，地处海淀北面两公里，面积达三百八十亩。接着在附近买了一些废园、荒地，总面积达到一千余亩。1921年起兴建，到1925年

基本竣工，将旧校迁入，1929年举行落成典礼。校园建筑，利用原有的山水风景精心设计，采中国宫殿式外观，内部钢筋水泥，西式水暖和照明。园内湖光山色，碧树繁花，配以小桥流水，宝塔古钟。这座独树一帜的校园，为燕大和司徒雷登本人赢得了好声誉。

司徒雷登受命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他认为办“正规大学”“应该与宣扬宗教互为助长，相得益彰”[(5)]。从1919年至1929年，他用了十年工夫使燕大基本上具备了普通大学规模，设立了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后改称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后改称法学院）三个院和一个国学研究所，院下共分十八个系（后来增至二十多个系），教职员（不含工人）共三百四十五人。此外，他把宗教学院和哈佛燕京学社单独经济核算，名义上与燕大分开。燕大学生经常保持八百人左右，日本占领时期到过一千二百人。从1919年至1949年“一共有六七千学生”[(6)]。燕大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聘请师资，以1930年为例，拥有教授、讲师、助教一百七十人，内正副教授占六十人；同时还聘请客座教授授课。燕京大学被列为当时全国著名大学之一。

司徒雷登认为：“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一个组成部分”，燕大应“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7)]。他提倡“思想自由化”，要“传教士完全可以壮着胆子去宣传基督教生活方式”。他还认为：“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8)] 1922年，他废除了宗教必修科目和礼拜仪式的规定，他认为：“必修与强迫，劳而无功。”[(9)] 他仿照青年会在燕大独创了一个“基督教团契”（Fellowship，即同志会），规定任何教职员工，任何教派的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参加，契友都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团契不属于任何教派，由选出的执行委员会领导，有自己的牧师，能施洗礼、收教徒等等。他认为这样可以把宗教活动与学校行政分开，避免教派间矛盾[(10)]。

燕京大学后期虽有中国人担任校长，但实权依然掌握在司徒雷登手中。

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颇受美国政府、美国基督教会和美国上层社会的重视。1930年6月17日，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司徒雷登一向重视广泛结交上层社会人士，参与他们某些政治活动。在民国成立之初，司徒雷登就以兼任美联社特约记者身份，经常找机会会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列席会议，开始接触一批名人，如王正廷、蔡元培、王宠惠、袁宝林（袁世凯的侄女）等。到北京后，司徒雷登联络的权贵有阎锡山、孙传芳、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张学良、冯玉祥、汪精卫、张宗昌等。他熟悉每个人的政治动向和要求，为这些人出主意拉关系。1936年“两广事变”中，司徒雷登两次造访李宗仁，为蒋介石说项。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占平津，司徒雷登坚决执行美国的“严守中立”政策。珍珠港事件前，他曾受华北日军最高当局之托，为日、蒋之间牵线搭桥。他借参加中华教育基金会之机，每年春偕秘书傅泾波经香港飞重庆会晤蒋介石。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军逮捕。日本宪兵没有送他去潍县集中营，而把他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胡恒德，Henry Spence Houghton）、总务主任特利弗·鲍恩（Trevor Bowen）、荷兰籍大夫斯纳珀博士（Dr．Isidore Snapper）一同幽禁于霍顿的住宅，厨师、仆人依旧，读书看报照常。如此幽禁生活，过了三年零八个月。

1945年5月，希特勒彻底垮台，日本为挽救覆灭命运，曾试图通过苏联或蒋介石做中间人，同美国媾和。苏联回绝后，日本内阁打算起用司徒雷登，让他去重庆说服蒋介石充当媾和的中间人，乃匆忙派出两名外交官到北平办理。正当此期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责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已无和谈条件，司徒雷登亦未能成行。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广泛活动，颇受美国政府重视，不时接受政策咨询，并搜集战略情报。1933年5月3日，他受罗斯福召见，“垂问中国时局……颇蒙嘉纳”[11]。此后，美国政府为制定对华政策，多次向他咨询。他在燕大时，每年至少要有一次亲自起草向纽约托事部作的“秘密报告”。珍珠港事件前，“他先后就日本人威胁以及美国应趁早采取行动，以防患于未然的建议”，曾几次送过“绝密报告”[12]。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7日司徒雷登获释。他于9月飞赴重庆会晤蒋介石并看望燕京流亡在渝的师生。10月，他回北平参加复校后第一次开学典礼。1946年4月，司徒雷登又到南京拜会蒋介石。蒋氏夫妇建议他去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马歇尔对他通晓中国情况、结交广泛、长期为美国政府做政策咨询等非常欣赏，当即向国务院推荐他为驻中国大使。此项任命于1946年7月发布。

司徒雷登任大使时，正值美国采取援蒋反共政策。他随同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偏袒国民党，还支持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企图为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合法”的面纱。

蒋介石为获得更多美援，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先后同美国签订公开或秘密的条约一项、协定十六项，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有十四项。其中由他代表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名为“友好通商”，实则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许多特权。订约消息一公布，全国舆论哗然，称之为“新二十一条”。

司徒雷登还要在华基督教各差会派代表去南京，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1947年秋，司徒雷登多次向蒋进言改革，无奈此时国民党政权已腐烂至极，无计可施。后来，司徒雷登寄希望于李宗仁挽回败局，亦无补于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1949年2月，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他建议美国政府试行与中共接触，谋求建立新的关系。他通过南京军管

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和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传递建立新关系和他本人可否去北平的信息。中共方面答复：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欢迎他以“中共老朋友”的身份前往北平。司徒雷登把上述两项请示美国国务院，均被否定。于是，他于8月2日乘一架小型飞机离开了生活长达五十年的中国，随行的有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

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从此他过着拮据的隐居生活，未再参加政坛。他写下约十万言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内容主要来自他的日记。据说：“司徒雷登在生命最后的十三年中，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13)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中心医院逝世。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14)。时隔四十六年之后，这一愿望终得实现，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15)

---

(1)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38页。

(2) 司徒雷登属于华中布道团。

(3) 刘廷芳、谢景升编：《司徒雷登博士年谱》，燕京大学1946年版，第25页。

(4) [美] 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61页。

(5) [美] 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44、61页。

(6) 陆志韦：《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7) 陆志韦：《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

(8) [美] 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61页。

(9) 刘廷芳、谢景升编：《司徒雷登博士年谱》，第19页。

(10) [美] 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61页。

(11) 刘廷芳、谢景升编：《司徒雷登博士年谱》，燕京大学1946年版，第41页。

(12) [美] 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31页。

(13) 《司徒雷登·晚景凄凉魂归中国》，《老年文摘》2008年11月27日第4版。

(14) 《司徒雷登·晚景凄凉魂归中国》，《老年文摘》2008年11月27日第4版。

(15) 《司徒雷登·晚景凄凉魂归中国》，《老年文摘》2008年11月27日第4版。

司徒美堂

陈民

司徒美堂是美洲爱国华侨领袖。他从1880年出国到1949年归国，在美国生活了近七十年，“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1)]。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清同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开平县滘堤洲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他四岁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童年时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后到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

1880年，十二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希望，随同乡亲经香港乘轮船去美国。船票龙洋五十二元，是他母亲东凑西借得来的。他刚踏上旧金山码头，就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2)]。此后，他在旧金山两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帮厨，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月工资仅得十二美元。

1883年，司徒美堂先后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他激于义愤，加入洪门致公堂[(3)]，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即吃饭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居异国，无可奈何。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加上从小又学得格斗武术，所以遇上这类流氓，他就挺身而出，把对手打翻在地，抛到街上。有一次，因把一美国流氓打伤致死，被捕坐牢，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捐营救，囚禁了十个月才获释出狱。从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华侨中传开了。

1894年春，司徒美堂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工，随军舰到过南北美及欧洲各地，此行使他大开眼界，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各阶层人物。1898年春，因“美西战争”爆发，司徒辞职不干，回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等，走街串巷。

早在1894年冬，司徒美堂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涣散，作用不大，经同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商议后，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总堂系统之内）。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司徒被拥为“大佬”（即洪门大哥）。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四十四年之久，一直到1938年他七十岁时才退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努力活动，“安良大厦”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两万人之多。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曾经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到北美大陆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美堂发动该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司徒家住过一段时间。这期间，司徒聆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孙中山对司徒的组织能力也颇为赞许，并曾给予指导。

1905年，司徒美堂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继续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工作，并从人力、财力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十五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经司徒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了出去，才筹足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由司徒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

司徒美堂“为人慷慨豪爽，热心公益事业”[(4)]。他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记得清清楚楚。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司徒除

担任安良堂总理外，还几度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在美国华侨社会，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他都过问，深为广大侨胞所拥戴。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需遵守的规约。致公堂和安良堂一贯同清朝驻外官员、保皇党相对立；其后则同国民党反动派相对立，用司徒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5)]。如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到美国进行欺骗华侨的宣传活动，华侨在一次宴会上，就对他镇压广州公社、屠杀华侨子弟的罪行，严加责问，搞得他狼狈不堪，中途逃席。再如1943年，国民党CC分子肖吉珊赴美“募捐”骗钱，当他出席“七七”纪念大会时，就遭到致公堂的反对，开始是嘘声，继而是喊打，国民党外交官也无可奈何。而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陶行知等人赴美宣传抗日，由于得到司徒美堂的关照和保护，使国民党特务无法捣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6)]。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回国。途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司徒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司徒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他因跛足而手执木杖，步行二百多里进入我东江游击区，然后经曲江、桂林到达重庆。蒋介石对司徒颇为重视，到访必迎，出则搀扶，还叫吴铁城拉司徒参加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作诱饵。司徒断然拒绝，并于次年经印度飞返美国。1945年初，司徒及致公堂其他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织“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大家认为另起炉灶建党，不如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更有群众基础。同年3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决定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这一美洲的致公党同后来在国内成立的致公党是两个不

同组织），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致公党还只是一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于1946年4月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钱、出力，这次海外归来，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们回国前夕，曾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家族也正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司徒在记者招待会上沉痛地说：“数月居沪，曾亲睹国内实际情形，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均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7)]

10月23日，司徒美堂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事后，周恩来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这几次会晤，对司徒教育很大。

1946年11月，国民党“国大”开场前夕，由于国民党军队已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更加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放在眼里，只给五洲洪门“国大”代表一席和特别费美金三千元。司徒表示不接受。蒋介石、陈立夫又指使江征卿、杜月笙等进行“劝驾”。他们向司徒恐吓说：“蒋为人翻面无情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会吃亏。”司徒勃然大怒，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8)]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出面“调解”，并邀请司徒到南京美国大使馆吃饭，声称是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这位“半个美国人”的老华侨。宴会上，当司徒雷登吹嘘所谓美国对华援助时，司徒美堂当场严正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掀起中国内战，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不是什么“援助”[(9)]。结果不欢而散。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后，洪门代表全部离沪返

美，他自己也于1947年7月乘船去香港。

这时，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灭。他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因此留港期间，闭门谢客。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通电拥护。这个号召对司徒美堂也是个很大的鼓舞。他于8月12日在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临别赠言”，指出回国后的耳闻目见，使自己实在不能缄默无言，过去华侨出钱、出血、出头颅，完全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昌盛；今后“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10]。这是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当时香港各报都作为要闻刊出。

司徒美堂返美前夕，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接连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经过深入交谈，司徒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即席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说：“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1] 随后，又起草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并郑重地签名盖章，嘱留港秘书俟他到达美国之日，即在报上发表。10月30日司徒抵达纽约，这篇声明也就于同日在香港各主要报纸上登载出来。《声明》中说：“美堂于1946年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热诚表示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12]

司徒美堂返回美国之后，在进步华侨人士的支持下，到美国西部

各城市唐人街去访问演讲，报道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对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思想，打击蒋介石集团在洪门中的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回国之时，逃到美国的孔祥熙邀请他吃饭，假惺惺地“劝告”说：“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13] 司徒断然拒绝这种“劝告”，严正指出自己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归国，完全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

1949年8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毅然离开居住了将近七十年的美国，于9月4日到达北平。9月21日，他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14]。

此后，司徒美堂一直住在北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经常向国外华侨发表讲话，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宣传党的政策，介绍侨乡的土地改革，增进华侨的爱国大团结。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遗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

(1) 廖承志：《首都各界人民公祭司徒美堂先生悼词》，《人民日报》1955年5月11日第1版。

(2) 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祖国与华侨》，香港《文汇报》，1956年版，第45、94页。

(3) “洪门”是明末抗清人民群众的秘密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

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国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习称为“洪门致公堂”。

(4) 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1946年1月版，第16页。

(5) 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第6章附注，《光明日报》1950年12月5日第3版。

(6) 廖承志：《首都各界人民公祭司徒美堂先生悼词》，《人民日报》1955年5月11日第1版。

(7) 上海《文汇报》1946年11月15日第3版。

(8)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中华书书局1963年版，第248页。

(9) 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祖国与华侨》，香港《文汇报》，1956年版，第45、94页。

(10) 香港《大公报》1948年8月13日。

(11)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252页。

(12) 司徒美堂：《祖国与华侨》，第1页。（“八十有二”是本人习惯按虚岁说的）

(13)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255页。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1949年版，第218页。

司徒乔

任嘉尧

司徒乔，小名乔兴，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广东开平县赤坎塘边村。父亲司徒郁曾在本县小揽地方开过小米店，由于英、法商人在广东倾销洋米以及本人不善经营，不几年工夫便倒歇。司徒郁回乡下无所事事，于是弄起画笔，学着给人画真容，画关羽、岳飞，因无法解决一家生计，后经堂兄介绍到广州美国教会办的岭南大学附小管杂务、办伙食。当时每个校工可享有一个孩子免费入学的优待，于是便把司徒乔从乡间鸣鹤小学转到岭南附小。在各门功课中，司徒乔最喜欢图画课。学校每年的图画奖，都是司徒乔领走的。

司徒乔在岭南附中读书时，同洗衣妇冼大娘的儿子冼星海最要好。他们虽然不同班级，但都爱好艺术：一个绘画，一个拉小提琴、唱歌，两人十分契合。在一位油画老师和广州赤社美展、全省美展的启发下，司徒乔一边揣摩，一边练习，经过两三年实践，终于画出了《搁浅》和《海》两幅早期的油画。后者曾在国内多次展出，还参加了1929年的巴黎沙龙画展。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对当时的青年影响巨大。岭南许多学生纷纷北上转学，冼星海转到上海音乐学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司徒乔也于1924年到北京入燕京大学神学院，靠免费继续上学。他赞同蔡元培“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不愿听《圣经》上那套说教。他热爱绘画，课余时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等等，试图画出人民的辛酸疾苦和街头的悲剧。他还给未名社和《莽原》半月刊画封面、插图。1926年6月，司徒乔把七十多幅习作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画展。鲁迅曾选购了《五个警察和一个0》、《馒头店门前》两幅画，对初出茅庐的司徒乔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司徒乔大学毕业了。他决心不当牧师，而要用画笔来参加变革人民生活、挽救祖国命运的斗争。他毅然拿起画笔，背着简陋的行李，搬进北京西城的贫民窟，去与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接触，走上了荆棘丛生的创作道路。

1926年12月初，他用十天时间画成了十幅画，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万国美术展览会的展出。俄国女画家罗尔斯卡娅认为“司徒乔年轻，很有希望”，并指出作家画家必须到工厂去、到贫民窟去、到人力车夫家去，在那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作品”。司徒乔的《被压迫者》在英文《晨报》星期画报上被称誉为“全场五幅最好的人像之一”[(1)]。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7年2月司徒乔来到扬子江畔的武汉，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办公室工作，用画笔进行政治宣传，鼓动人们战斗。4月蒋介石清党反共，不久武汉白色恐怖也开始了，司徒乔化装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好不容易在虹口租到一座三角形小屋，取名为“乔小画室”，又开始了创作生涯。1928年春天，挑出了七十多幅作品举行了“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鲁迅特地为他的展览会目录写了序言[(2)]；徐悲鸿撰文赞扬说：“司徒先生对色调之感觉，为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3)]随后，万国美术会在上海给他开了个展览会，会上出售展品获得了几百元收入，使司徒乔筹得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川资。行前，还在上海、香港举行了画展。

1928年底，司徒乔怀着兴奋的心情到达巴黎，向写实派大师比鲁求教，在名师指点下严格锻炼。但好景不长，仅仅半年时间，他无法偿付高昂的学费，被迫辍学了。即使靠画稿所得的一些稿酬，也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学。巴黎的艺术宝库鲁佛尔宫藏有欧洲各国的名画佳作，司徒乔常带着几块黑面包，整天在绘画大师的作品前流连，用达·

芬奇、伦勃朗、米勒、杜米埃、莫奈们的心血来灌注自己的艺术生命。有时，还通过朋友的介绍，探访有成就的画家、雕塑家、收藏家，来丰富艺术修养，增长社会知识。

也就在这个时期，司徒乔遇上了爱好文学的冯伊湄。冯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正在法国留学。由于艺术创作上有着共同的语言，两人友情弥笃。1930年初，冯的父亲经营的赣省矿业被军阀方本仁掠夺而破产，不久身故。冯接济断绝，不得不辍学东返；而司徒乔靠朋友的帮助，要到美国去观摩学习。两人只得暂时别离。

司徒乔到纽约后，靠着替饭馆装饰壁画的菲薄收入维持生计。他把五十七号街画廊当做课堂，把书店里的名画复制品和画家传记视为老师。1930年，戏剧家梅兰芳访问纽约，梅卓越的京剧艺术风靡了美国。罗马尼亚著名肖像画家斯托恩内斯库渴望为梅画一幅戏装画像。司徒乔促成了这事，从而第一次亲眼目睹一幅杰出的油画是怎样绘成的。正好印度诗人泰戈尔来美讲学，司徒乔用最新的心得，以大刀阔斧的笔触画出了这位诗哲风采粲然、神思清澈的半身像。

正在他半工半读学习和创作逐渐登堂入室的时候，警察以留学生画画赚钱、触犯移民法的罪名予以拘禁，他在监禁中终于病倒。监禁期满又花了一笔罚款才被释放，但限令在两星期内离境。

1931年5月，他横渡太平洋，回到广州。这时，岭南大学开了美术课，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奇峰教国画，司徒乔教西洋画。冯伊湄在中山大学教书。司徒乔和冯在8月间结婚。冯业余爱好国画；司徒边练习油画，也边学国画和书法，试图画出中国气派的油画，把中国画简练有力的线条化入素描和速写中去。埋头苦练一年后，他在青年会开了个画展，其中富有“东方精神”的油画《夜未央》（画的是在茫茫黑夜里，珠江上一个老船夫划着小艇送客过江的情景），更博得舆论的好评。

不久，岭南大学美术课停开，司徒乔又染上肺结核病。1932年，邹鲁当中山大学校长，一下撤换二百多人，冯伊湄亦在被撤之列，司徒乔的父亲又失了业。这时司徒乔的长女刚出世，六个弟妹都在念书，生活十分窘困。

1933年，日军强占热河，进犯察哈尔。广东人民组织了粤东各界慰劳团北上慰问抗日同盟军，司徒乔不顾疾病，随团到了张家口，为冯玉祥将军画速写油画像，表达了支持打日本的心意。为了描绘抗日战士的不朽业绩，他四处奔走搜集题材，后来病倒在一家小客店里，被送到北平治疗。

1934年春，冯伊湄在西山疗养院找到了司徒乔。冯这时在民国大学教古典文学，光靠薪金是不够维持生活的，家里断炊是常事。恰好《大公报》要办《艺术》周刊，司徒乔把这工作接下来，每月有编辑费六十元。北海、什刹海、天桥，到处有入画的题材，可是限于经济，他那时画的都是竹笔速写和素描。

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司徒乔一家于1935年12月初移居上海。《大公报》接着出上海版，但《艺术》周刊只继续办了几个月便夭折了，他再度失业。这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了。他急忙赶到万国殡仪馆，含泪画下了鲁迅的遗容，一共画了三张，最后一张背面写上："鲁迅先生盖棺前五分钟司徒乔作。"不久，"七君子"下狱[(4)]，司徒乔痛心人民没有爱国的自由。

正当就业无着的时候，司徒乔被介绍到南京中山陵园去画孙中山像。为了把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体现到画面上，他八易其稿，呕心沥血半年多，终于完成。这幅画曾被誉为"惊人的肖像画"[(5)]，陵园管理处只送润笔费二百元，他对此并不介意。由于积劳过度，他重又病倒。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15日，日机突袭南京。司徒

乔十二年的创作，连同书籍、日记、文稿都化为灰烬。他一家乘轮船到了武汉，又遇见冼星海。不久，冼星海去延安，司徒乔因病打算返乡疗养。到了广州，冯接到仰光福建华侨女子师范学校的聘书，便举家于1938年1月到达缅甸。司徒乔的病体有了转机，三个月后，他便画出《泼水节》、《缅甸古琴图》、《街头夜宵》、《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等作品。后来因为司徒乔夫妇给陕北公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募捐，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岭南大学时的同学）把钱款转去延安，触怒了当地的国民党分子，被扣上一顶红帽子，使他俩不能在仰光立足，于1939年4月流离到槟榔屿，同年末到达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乔一家历尽艰难，于1942年2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他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生活也无着落，在贫困和疾苦折磨下，他花了十个月工夫画成了高达一丈七尺的大壁画《尚未瞑目》，后改名为《国殇图》[(6)]。过了一年，他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西北视察组前往新疆，画了二百八十多幅作品，其中有《生命的奔腾》、《珠勒多斯草原》、《新疆集体舞》等，于1945年9月举行画展，轰动了山城。

抗战胜利后，司徒乔谢绝了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作画的邀约，却应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聘，到遭受天灾、战祸严重的粤、桂、湘、鄂、豫五省旅行创作。他倾注了真挚的感情，用有力的彩笔，写了地狱的一角，写了黄河的水，写了无名英雄，写了忠骨和义民，写了人间的互爱，写了神州的剩水残山，把劳动人民苦难遭遇在画上再现。1946年6月、7月，灾情画展先后在南京、上海展出。《义民图》的长卷最吸引观众，人们不忍离开这些血泪交织的作品。郭沫若对司徒乔只以三个月的努力画出这许多画面，深深“佩服了他的献身精神”[(7)]。司徒乔如此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可是肺病加剧了，不得不于这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治病。在洛杉矶遇见医生贺达（去灾区作画途中的旅伴），承他热忱款待和细心料理，病情有些起色。然后，去纽约一所肺病疗养院诊治，那时链霉素刚问世，医药费昂贵，幸有美国

友好人士马莉·壁珈和她的弟弟以及侨胞们的支援，加以冯伊湄的辛勤照料，经过五个月的治疗，他肺上百孔千疮的病灶大都结了疤。其后，又相继在两所免费医院疗养。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1950年8月28日，他一家从三藩市起程返国，同行的还有物理学家钱学森、赵忠尧等。10月底到达北京，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

这是司徒乔第三次来到北京城。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又立即描绘《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新作了。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七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他打算采用中国画法以简练明快的线条来纪录时代的脉搏，画一幅有一百二十五位代表形象的巨幅史画（可惜这幅史画到他生命最后一息只完成了初稿）。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为农民诗人王老九、《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等人画像，还创作了《鲁迅与闰土》等插图。1956年10月，他去上海庆祝国庆，用画笔记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图景。1957年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他画了《秋园红柿图》，这是他最后一幅创作。

1958年2月16日，司徒乔病逝于北京。正如他的老友廖承志所说："司徒乔把整个生涯贡献给了祖国的劳动人民，司徒乔的一生是为苦难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民族敌人的刻骨的仇恨，他的节操，他的淡泊，他的无欲，都可为我们的师鉴。"(8)

---

(1) 冯伊湄：《未完成的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2) 鲁迅：《看司徒乔君的画》，《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良友画报》第26期。

(4)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蒋介石政府坚持内战政策，于11月悍然逮捕了上述七位爱国人士，时称“七君子事件”。

(5) 引自一位德国人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中的话。

(6) 这幅画的构思是：在巍峨的山头上，就山形凿成一个抗日阵亡将士横卧的石刻。他脚边有长明的火焰，他身后出现抗日阵亡将士们的英灵，他们都睁着眼睛好像在问：我们舍命保卫祖国，你们为祖国干了些什么？在重庆展出时，国民党的军委政治部却不许用《尚未瞑目》作画题，司徒乔只好改题为《国殇图》。

(7) 郭沫若：《从灾难中象巨人一样崛起》，《清明》杂志第4号。

(8) 廖承志：《〈未完成的画〉序》，《未完成的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宋棐卿

熊尚厚

宋棐卿，名显忱，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生，山东益都人。父亲宋传典是基督教徒，为济南德商德昌花边行买办，早年在外籍牧师的资助下制作花边、发网，兼营地毯、土产出口，获利甚大。其后在济南开设德昌洋行，相继于青岛设分行，烟台、上海设分庄，又在天津开设德昌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遂成了巨富。1922年，宋传典不惜花费大洋十八万元，当上了山东省议会议长。1925年又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政院参政。

宋棐卿十二岁时在益都上教会中学，十八岁时考入山东齐鲁大学读书，不久转入北京燕京大学。1918年他去美国留学，入西北大学习商。在美“求学时，则感到毛织事业在中国地位之重要及生活上之需要，遂决意于回国后创办毛织工厂”[(1)]。

1925年宋棐卿回国，在济南德昌洋行内开设毛纺部，聘一名德国人为技师，因缺乏办厂经验，误购粗纺机而失败。次年，他再次前往欧洲考察各国毛纺织厂，进一步学习毛纺织的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办法。1927年宋回国，筹划重营毛纺织业，派其弟宋宇涵去英国留学，专学毛纺技术。同时帮助其父扩展德昌的营业，在济南、青岛、烟台、天津等地经营出口地毯、发网、帽辫等土产，及进口汽车、呢绒等业务，兼办毛纺业，一时均甚发达。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济南，他认为山东易受威胁，遂分别收缩在山东地区的营业，前往天津专办德昌贸易公司，自任经理，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并经理飞得禄牌汽车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高涨，各地抵制日货斗

争蓬勃开展，国货畅销，此时宋宇涵亦自英回国。宋氏兄弟遂会同德昌贸易公司副经理赵子贞，于1932年春组成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厂集资二十三万元，并得到山东军阀韩复榘投资，有工人一百七十余人，宋棐卿任董事长兼经理，赵子贞任副经理，宋宇涵任副经理兼厂长及总工程师。他们眼见我国毛纺织品市场长期为外商控制，年年进口大量呢绒、毛毯，资金外流，“素抱创办毛织工厂以杜塞斯项漏卮之大志”[(2)]，受爱国热忱的驱使，取“抵羊牌”作为东亚厂产品的商标，以寓抵制洋货之意。1932年4月毛纺厂投产，于上海开设分庄。始初仅开毛纺，专纺单、双、四、六各股毛线，高举“提倡国货”、“实业救国”的旗帜广为推销。由于产品经过良好的梳毛加工，光泽弹力较之舶来品均无逊色。除英国的蜜蜂牌外，“抵羊牌”毛线在国内市场上数得上是最好的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1933年11月，上海经营进口毛线生意的洋商，以捏造“抵羊牌”毛线系日货冒充相中伤。在中华工商总联会及上海国货维持会等团体的支持下，宋棐卿聘上海著名律师江庸代表出面，悬赏万元征求反证，结果获胜。是年，东亚公司资本额扩大至五十万元。年产四、六股毛线七十五万磅，为1932年产量的五倍，年营业额一百五十万元。宋在东亚公司特设编织科，专门传授手工编织毛衣的技术，以利产品之推销，营业更是骎骎日上。同时，又得南京国民政府获得相当的优惠待遇，实业、交通、铁道等部准予免征各种捐税二年，核准官营轮船、火车运费二年内各减五成，财政部亦批准只纳出口税及二五附税。宋氏兄弟取得各方支持，信心倍增。

为了进一步办好东亚公司，宋棐卿锐意改进经营管理，努力提高产品质量。1934年春，他聘请山东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任东亚公司化学部主任兼技师，加强对毛质的化验和染色的分析工作，大力革新技术，改良产品。同年6月，宋创办《方舟月刊》，“以增进家庭幸福，研究家庭实施，提倡家庭手工业为宗旨”[(3)]，发行近万份。该刊系一家庭杂志，除研讨各种家庭问题外，还经常大量介绍手工编织

毛线衣的技术和各式图案，以利东亚毛线广拓市场。11月，他再派宋宇涵出国，考察英、法、意、美、日等国毛纺织的新技术和新机器，了解国际行情。在推销方面，他扩大营业部和经销商店，设置督销主任、督销员，分赴各地广泛建立代销处达六百余家，并分别聘请一些大商号为地区的总经理。在华北地区以天津国货售品所为总经理，以天津会利合作社为华北“专牌经理家”；华中地区以长沙湘记经理处、汉口集义生号、南昌德大永等为总经理；西南地区以重庆宝元通为总经理，华南地区以汕头震东公司及集会昌号为总经理；华东地区以上海义裕兴为总经理。是年，东亚公司资本额增至八十万元，拥有各种机器数十种，蒸汽罐两台，男女工人增达四百六十余名；同时添设毛织部和针织部，生产驼绒、绒头绳及各种毛纺织品，年产四、六股毛线一百三十余万磅，单股呢绒纱四十万磅，年营业额二百余万元。在产品推销上，与天津祥和毛织厂展开了激烈竞争。

东亚与祥和经过一年的鏖战，祥和终于不支，遂请人出面调解。祥和大部分资产并入东亚，厂主袁子卿等任股东。宋棐卿接收祥和后，改组为东亚第一分厂。东亚扩张后，使用低锤精纺机生产粗毛线，采取薄利多销办法；同时以部分进口半成品毛条生产三百号细线，用德国染料生产高级呢绒。此时，东亚产品除“抵羊牌”外，还出有“孔雀牌”、“五羊牌”、“骑羊牌”等，自称“唯一国产”、“完全国货”产品，畅销全国，名噪一时。1936年7月，宋又在天津旧英租界建成一座新厂，陆续添购前纺、后纺、洗染三大工段的机器设备，使之成套，并出产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针织品，产量不断增大。数年之间，宋棐卿成了华北著名的毛纺织工业资本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东亚厂地处租界得以苟安。1939年欧洲大战激烈进行，东亚进口原料减少，生产顿即不振。此后，宋棐卿将东亚公司的经营重点先后转为麻纺和西药业。同时以业务活动为名前往上海，在租界暗中会见国民党人，通过上海租界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给津地一些抗日人员家属

以帮助。1940年，他创设东亚麻袋厂，以印度麻和国产青麻制袋，年产约计二百余万条，销路甚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英法租界，将东亚厂房当做“敌产”加以接管，还强迫东亚麻袋厂替其生产军需品。宋对日军采取一些应付手段，一面利用日人翻译虚与委蛇，一面以重金拉拢日本三井、三菱洋行和华北日军军需司令前川少将等以求庇护。

1944年9月，宋棐卿采用募集医药股的办法，向医生、护士和药店主广招股份，筹集资本创设了东亚化学厂，聘请北平协和医院的几位医学博士，生产西药及化学品，又利用“股东”（医生、护士、药店主）广为推销，他还开设了福隆、新中两商行经销其产品。1945年春，宋棐卿从事股票买卖，又开办广信行经营东亚股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扩展企业，宋棐卿请天津商会会长兼河北七省银行总经理姬奠川任东亚公司董事长。通过姬的关系得与国民党华北军政首要李宗仁、孙连仲、张廷谔等结交，以张其声势。但事与愿违，1946年民族工业面临美货泛滥和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及恶性通货膨胀的摧残，东亚化学厂于是年被迫停办。次年春，宋棐卿利用东亚公司十五周年纪念之机，将公司再次改组，更名东亚企业公司，广泛招股，资本增至法币三亿元。同年9月，又加入CC系控制的天津恒大企业公司为董事，与官僚资本拉上关系。1948年南京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陷入全面崩溃，东亚公司遭到军警当局的接连强征和敲诈勒索，宋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在此期间，他任天津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天津经济调查研究所评议员。

天津解放后，宋棐卿表现积极，人民政府对他十分信赖，曾邀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0年，宋棐卿赴香港增购机器，准备扩大天津东亚公司生产。后从香港去了阿根廷，1956年病故[(4)]。

(1) 《一九三四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年刊》“问答”栏，天津华中印刷局1935年版。

(2) 《一九三四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年刊》“本公司沿革”栏。

(3) 《方舟月刊》1934年第1期。

(4) 杨天受、李静山：《宋棐卿与东亚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宋汉章

汪仁泽

宋汉章，原名鲁，原籍浙江余姚。1872年4月6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福建建宁[(1)]。父亲宋世槐曾在闽办盐务，兼营木业，后协助经莲珊创建上海电报局。宋有兄弟四人，排行第二。早年在本地私塾就读，后随父到上海，进中西书院，1889年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当会计，业余在夜校补习英文，1895年考取上海海关任关员。

1898年，经莲珊赞助康梁变法，通电拥护，宋汉章亦列名其间；戊戌政变后受清政府追缉，随经出亡。不久，经以宋尚年青，亡命非久远之计，且非要员，不为追索者所瞩目，乃更其名为汉章，资助返沪，进中国通商银行当跑楼[(2)]。该行系盛宣怀1897年在沪创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聘有西人大班和华人买办两名经理，跑楼专任沟通华洋经理之间的业务联系。宋在该行十年间，学到了中西金融工作的实务经验。

1908年，清政府的户部银行决定在北京增设储蓄部，宋汉章经人介绍主持该部业务，成绩斐然。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后，宋被调至上海分行进行整顿，不久任沪行经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任上海分行协理，1913年升任经理，张嘉璈任协理。陈其美任上海都督后，曾责令宋汉章筹饷，宋以中国银行系官商合办为由，婉言坚拒。陈乃设计将宋扣捕，但宋仍不屈，后经伍廷芳等营救，始获释。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至翌年4月，滇、桂、粤各省相继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但仍试图以武力镇压各地反袁势力，为急筹军

饷，密谋攫取中国、交通两银行在各地的存银。消息外泄，京、津两地中、交两行出现兑换券挤兑风潮。5月11日，北京政府悍然下令各地停兑，并封存现银。电讯传来，中国银行沪行宋汉章、张嘉璈紧急磋商，认为如执行停兑则非但持券人将蒙受严重损失，银行也信誉扫地，且将牵累全市市面；照兑则必将触怒当局而受查究，但两人认为个人得失事小，“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事大”[(3)]，决定抗命照常收兑票面上印有“上海”字样的沪行兑换券，并由商股股东组成的股东联合会作出照兑决议，并登报声明沪行事务悉归该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已移交律师代表股东进行管理。宋汉章取得外商银行支持，订立透支契约备用。收兑之初一度曾发生挤兑，后增加委托同业代兑，不及一周，人心即趋安定。不久袁世凯殒命。经此风波，沪行兑换券反信用大增，发行量遍及江、浙、皖各地穷乡僻壤，外商银行在沪发行的纸币，无形中也受到了排挤，宋汉章在沪的声誉随之大为提高。1916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宋当选为会长，辞未就。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宋汉章、陈光甫当选为首届正副会长。此时上海的外汇市场，仍为外商银行所操纵，每年损失巨额外汇。为挽回利权，宋汉章亲自研习有关书籍，并聘请熟悉业务的外汇人才。1919年沪行开始经营外汇业务，并与欧、美、日本各国银行签订代理合同，在纽约、大阪等地成立机构，宋亲自拟稿签发重要涉外电讯信函。此后外汇业务日趋发展，足以与外商银行抗衡。

上海开埠后，租界上华人处于无权状态。20世纪起，华人发起参政运动，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口号。经过长期酝酿和斗争，至1921年争取到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内设置华人顾问五人委员会[(4)]。是年11月，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选出宋汉章、陈光甫、余日章等五人为首届华人顾问，此后宋连选连任。其间曾参与两次抗拒工部局加捐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后，宋汉章等五人愤而集体辞职。

1922年，上海总商会再次改选，宋汉章、方椒伯当选就任正副理事长。该会在宋、方主持下，是年8月通电全国商会主张“裁减厘金，

增加关税”，后又提出《裁厘办法及理由》，谓此举乃“解百业之倒悬，慰兆民之渴望”。12月15日发起组织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宋任会长。分电各省商会及众、参两院，主张裁减现有军队，整理财政，迅速制订适合国情之宪法[(5)]。1923年2月英驻华大使、1924年5月美驻华公使先后来沪，宋汉章在总商会欢迎宴会上，强烈要求无条件收回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并于事后派代表赴北京会见外交、司法部长，要求与英、美各国严正交涉。同年6月召开上海总商会临时会员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政府中断，国会违法，早失人民信仰，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今日正人民行使其主人之职权”；主张组织“民治委员会”解决国是，受到舆论赞许[(6)]。1924年虞洽卿继宋汉章任会长，民治运动渐趋低潮。

1927年3月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多次责令各业垫款筹饷。5月2日银钱业再次讨论筹款时，中国银行等表示困难。次日蒋介石直接电宋汉章：“军需孔亟，请竭力设法预购二五库券一千万元，限本月5日前解交”，“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宋13日复蒋函：“汉章为创办中国银行之一分子，初即忝长沪行”，“对于北方政府方面暨省库事务向非汉章所顾问”，继述自北伐军出发以来粤、闽、浙、汉、宁、沪各行已先后垫借六百六十余万元，最近5月7日沪行又勉垫二百万元，合计已达八百六十余万元，但未提续垫事。20日蒋再电宋，严责“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以一千八百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此次沪上借款以有确实二五税作抵、信用卓著，而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务请于23日前补足一千万元”。次日宋即复其电，说明“汉行非属沪行管辖”。同时致函陈光甫等陈述实情，“宁、浙两行再垫二百万已超出千万之数，在政府虽属杯水车薪，在银行已属精疲力竭，至沪行发行数目，外间不察以为漫无限制”，实际因“准备金共同管理，不容丝毫假借”，“发行之数不足三千万元，即需相当现金以应兑现，又须稍留余力以平市面。其间可以活动之数固已有限，而垫款之巨又如上述，在银行责任实属

万分冒险。当总司令不予见谅，必令增垫，设谣言一播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反响及于财政，此汉章期期以为不可者。至此次商垫转辗迁延，实因各行接洽起见，并非汉章不具诚意”，请其向蒋缓颊。蒋介石一面派钱永铭、翁文灏赴中国银行商洽；一面指示俞飞鹏，谓宋“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25日蒋又电陈光甫等，指责宋所筹之款延宕无期，“请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显示蒋已欲对中国银行与宋汉章作断然处置。为此陈光甫急于6月初以长函劝蒋慎重处置，并指出逼中行从准备金提垫将会产生严重的金融后果[(7)]。此后，陆续发行二五库券七千万元，由沪上各业、商联会、两淮盐商等分摊认购，解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之围。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外汇银行，官股五百万元、商股二千万元，并将总管理处由北京移沪，以张嘉璈为总经理，宋汉章升任沪区行总经理、常务董事。此后该行积极开展外汇业务，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六十三处、特约代理九十六家。

1930年，张嘉璈从国外考察回国，对保险业务与金融的重要关系感受至深，向董事会提议投资设立中国保险公司，并推定由宋汉章兼任中保董事长，全权筹办。时宋已近花甲之年，受命后刻苦钻研保险业务，精心筹划，使中保于1931年11月在沪开业。中保以中行信用为后盾，各地中行机构为中保设经理处、分行经理则出面任中保代理人，业务发展顺利。1933年3月承保的汉口申新四厂突遭大火，损失达二百余万元。中保和太平保险公司为首的各分保公司迅速、及时地全额赔付申新四厂[(8)]。为此，申新四厂在沪各大报刊登整版鸣谢启事，使中保声誉鹊起，业务更加发展，当年还能盈余。此时宋联络同业发起组织学术研究机构“保险学会”，被推为会长。

1935年，国民政府加强金融垄断，发行金融公债一亿元，其中一千五百万元公债预约券拨充中国银行官股股款，随即成立改组后的中国银行董事会，推选宋子文为董事长，实行董事长负责制。原总经理

张嘉璈被迫辞职后调离中行，宋汉章保留常务董事职，并受董事长聘为总经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宋汉章随中国银行总部迁往香港，后赴重庆。抗战胜利后，宋汉章回到上海，仍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47年6月宋为造福桑梓，筹款数十万元创建余姚阳明医院[(9)]。1948年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宋汉章被胁持去香港，但他坚决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仍被缺席推选为新生的中国银行董事。1950年宋汉章去美国，翌年到巴西依其子宋美扬，但仍受国民党“联络员”暗中监视。1960年设计离开巴西，回到香港。

宋汉章自四十岁起即患重听症，晚年几至失聪。他一生生活简朴，以薪金度日，不谋私利。当选总商会、银行公会、华洋义赈会等会长之职，全尽义务，所得车马、酬谢等费一概谢绝不受。即使在中保董事长任内二十年，也从未领取分文报酬，甚至代表公司对外应酬交际各费，也往往自己承担。垂暮之年，宋时时思念故乡，并以毕生事业的中国银行为念，曾对人表示只要该行得以保存下来，后继有人，自己死也瞑目了。

1968年12月宋汉章因病在香港去世。

---

(1) 余姚县政协文史组：《宋汉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2) 陈安性：《宋汉章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旧上海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3) 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4) 卢汉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述论》，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第2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5) 《上海总商会1922年12月15日快邮代电》，苏州商会档案乙类，卷号695。又参阅《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1、2号。

(6) 《民国日报》1923年6月23日发表专评，内称："总商会会员大会是不轻易开的……以难得的大会应付非常的时局，于此可以显出上海商人对政治的真实态度"，"今天的大会……是对军阀官僚宣战，是做民治运动前驱，是抱牺牲主义的，是抱革命精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年）中说，"这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甚至当时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主张中也提及此事，并给予赞许。

(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99页、第105—110页。

(8) 保险公司为了分担风险，将部分承保额转分给其他保险公司承担。

(9) 余姚县政协文史组：《宋汉章》，第71页。

宋教仁

周天度

宋教仁，字遯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1882年4月5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生。父亲宋起龙，占有土地百余亩。宋教仁童年入私塾。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喜爱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1903年春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校常与同学田桐等议论时政，关心国事，渐萌革命思想。是年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组织拒俄义勇队，派黄兴、陈天华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与宋教仁取得联系。1904年春，宋教仁和黄兴、陈天华、刘揆一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同年夏，他又参加了在武昌成立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任文书。

华兴会成立后，决定于当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这次起义未经发动即因消息走漏而失败，宋教仁被迫潜离长沙。11月10日，船过湖北螺山，他感慨革命事败，口占长歌一首："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1)

12月13日，宋教仁从上海到达日本东京，起初上东京法政大学，后入早稻田大学。他到日本后不久，即和田桐等于1905年6月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他在第一期上提出用黄帝纪元代替帝王纪元，以示与清廷决裂。第二期因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出版后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罪名予以干涉，全部被没收。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

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当同盟会成立时，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为《民报》，宋教仁担任《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07年春夏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离日本去河内组织领导机关，准备在中国南部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宋教仁受同盟会委派，和白逾桓、日人末永节到东北安东联络“马贼”，谋占奉天，以与南方起义相呼应。是年4月1日，宋教仁等到达安东，致书“马贼”头目李逢春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2)] 李表示赞同，愿一致行动。宋教仁于是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策划进行。后因招兵失败，白逾桓被捕，宋教仁复返日本。

宋教仁回日本后，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并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在日期间，曾著《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证据，证明延吉为我国领土，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阴谋，作了有力的揭露。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和谭人凤、赵声等主张将注意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在中部地区发动革命。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革命三策：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然运动不易；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边地起义为下策。随后，由谭人凤出面，在东京召集十一省区同盟分会会长会议，宋教仁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3)]。这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在于右任所创办的《民立报》任主编。他在《民立报》上写过不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抨击清朝反动统治的政论文章。

1911年广州起义的再次失败，使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意念愈加坚定。宋教仁与谭人凤等按照前在东京拟订的计划，积极活动，于该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读了

谭人凤与宋教仁草拟的宣言和章程，预定宣统五年（1913）在长江各省举行大起义，注意点尤在武汉。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分别担任。之后，谭、宋二人秘密往来于沪汉间，联络党人，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并与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取得联系，得到黄兴的赞同和支持。

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猝然爆发，10月下旬，宋教仁与黄兴由上海到达武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并与居正拟定了《鄂州临时约法》。随后，他到了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在当时南北议和中，他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同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命唐绍仪组阁，宋教仁在内阁中任农林总长。后唐绍仪辞职，他一同退出了内阁。

宋教仁也认同大总统非袁莫属，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他热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是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宣传者。他以为只要有了一个健全的内阁，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为了在国会中争取选票，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他不顾一些党人的反对，在“朝野合作”、“新旧合作”的口号下，于1912年8月下旬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抹掉，并吸收了许多封建官僚和投机政客入党。至此，同盟会原有革命精神全失，而所谓国民党，其纲领之含混与分子之复杂，同当时其他政党几无多大差异，连他的好友谭人凤也把它看成是狐群狗党，拒绝参加[(4)]。国民党虽然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实际主持人则是宋教仁。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于是，宋教仁便以政党内阁组织者自居。他没料到由他一手造成的国民党的声势，却深为袁世凯所忌恨，袁已蓄意要除掉他，而他却沉浸在“胜利”的幻想中。这时，他从家乡省亲后，经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达上海，沿途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一心企望实现自己的抱负。1913年3

月20日22时，宋教仁从上海搭车北上，在车站突遭凶手狙击，22日逝世。事后判明，杀宋教仁的主使者，正是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但宋临死前在遗嘱中还期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5]。

---

(1) 《宋渔父日记》1904年11月1日，《建国月刊》第9卷第4期。

(2) 《宋渔父日记》1907年4月9日，《建国月刊》第11卷第4期。

(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09页。

(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5) 《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

宋美龄

严如平

宋美龄，广东海南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人，1899年3月2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生于上海。父亲宋耀如，字嘉树，本姓韩，1875年随同舅父去美国波士顿谋生，在舅父店中学徒，被收为嗣子，改姓宋。后入基督教，离店去当水兵，得热心人士资助入万特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被派回上海传教，次年与倪桂珍结婚。后来辞去神职，开设印刷厂，又创办基督教青年会。他结交志士，资助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结为好友，曾任同盟会司库。他有三子三女，宋子文、宋霭龄、宋庆龄是宋美龄的哥哥和姐姐。

宋美龄幼年在母亲的抚育下健康成长，五岁入幼稚园，又得家庭教师直接授教英文和中国古文。1907年，八岁的她随同二姐宋庆龄远渡重洋到美国，先入新泽西州萨密特城的波特温学校，翌年去佐治亚州梅肯，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作为旁听生开始学习。期间曾在皮德蒙特学校学习九个月。五年后，宋庆龄毕业回国，宋美龄乃转往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学习，受到在哈佛大学攻读的宋子文的照顾。她主修英国文学，研读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甚力；同时选修哲学、天文、历史、植物等课程，还学法语、讲演、音乐，以及小提琴、钢琴等。以后又至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四年级时获大学“桂兰学者”的荣誉。她在学校甚为活跃，喜好交友，还参加网球、游泳等体育活动。将近十年的旅美留学生涯，使她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她自己也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1917年，宋美龄学成毕业，偕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宋子文离美归国。她到上海后，首先补习汉语和古文，熟悉祖国的文化、习俗；同时参加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活动。不久，

她担任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工部局委任的童工委员会委员。童工劳动重、工资低、营养差的状况，使她深为震惊，她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同情和关怀。1919年宋耀如病故，宋美龄孝敬其母甚笃。

宋美龄风姿绰约，才貌出众，在上海社交界曾引得许多人的仰慕和追求。她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民心涣散，地方割据各行其是，须有铁腕人物实行强权政治，要有拿破仑、俾斯麦一样的领袖人物来统治中国。她对终身伴侣的理想人选，就是才堪统驭中国政局的英雄人物。1922年冬，她在宋庆龄家遇见向孙中山请示工作的蒋介石，看到蒋风流倜傥，英姿焕发；但她从姐姐那里得知蒋已有一妻二妾，故未放在心上。但是蒋介石却一见倾心，寻找机会与她接触，显露自己，还常常写信以赢得好感。后来宋的大姐霭龄又竭力撮合，因为在宋霭龄看来，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政治前途的人物，如能联姻成亲，对于宋氏家族必然大有裨益，乃一再劝说宋母和诸弟妹。当1926年蒋介石在南方崛起，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声名日隆之时，一直未曾觅到意中英雄人物的宋美龄，听取大姐的意见考虑蒋的求婚。1927年5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镇江焦山同游十日，倾心交谈，感情倍增，进而商谈了婚事。这时，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宋子文也表示同意。宋家只有宋庆龄因为蒋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坚决反对这桩婚事。10月，蒋介石到日本拜见正在神户有马温泉疗养的宋母，表示已与妻妾离异，并允认真研究基督教义。宋母考虑到宋美龄已年近三十，加之霭龄、子文一再劝说，遂乃应允。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先在宋家举行宗教仪式，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随后在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新式典礼。婚礼结束后，即动身去浙江莫干山度蜜月。只是蜜月刚一天，蒋介石即于3日匆匆下山回到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一月后由沪至宁，执掌党政军大权。中外舆论和朝野各界广泛认为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是蒋介石把自己与

宋氏家族以及孙中山联结成一体，并且得到江浙财阀及亲英美势力支持，使自己在争夺权势斗争中增添实力的重要举措。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没有眷恋上海的现代化豪华生活，随同蒋介石去南京定居，尽管当时南京残破陈旧，黄沙蔽日。她全神贯注地帮助蒋介石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搏击，凭借自己的才华纵横捭阖，效力甚多。她有留学美国多年的知识底蕴和流畅的英语，是蒋介石进行外事活动，尤其是与英、美等国打交道的重要助手。她经常出席蒋介石举行的各种会议和宴请，周旋于中外政要之间，常为蒋转寰说项，化解纠葛和矛盾；尤其在蒋脾气暴躁、缺乏理智之时，更是表现出她独特的作用。因此即使蒋介石出征去前线，宋亦随同东奔西走，形影不离。

宋美龄对于在战争中殒命的国民党军队的遗孤表示了同情和爱怜，认为这些孩子“大都缺乏教养，亟应设立学校，造就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1)]，乃于1928年10月在南京筹设“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以后又加设女校，从选择校址、募集经费、延聘教员、确定教学方针直至学校行政管理，她都具体指导进行，倾注大量精力，只要身在南京，每周都要去学校一两次，“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2)]。宋美龄还将蒋介石于1929年创立的“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掌管起来，派曾经留学美国的黄仁霖主管，成为一个军官俱乐部，仿照美国军队的基督教青年会行事，以密切联系黄埔系的军界要员，使他们效忠蒋介石。

宋美龄多方面以西方文化影响蒋介石。她向蒋介石朝夕灌输基督教义，督促他诵习圣经《旧约》，终于使蒋于1930年10月23日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一名信徒；她还向蒋讲解西方文化、礼仪和生活习俗，并且每天午休前后为蒋播放欧美古典音乐唱片。她对于蒋介石于1934年初在江西“剿共”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中发动的“新生活运动”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亲自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在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合乎“礼义廉耻”、要从改造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

实行起点之余，还特别号召妇女要根除缠足、吸鸦片烟、不讲卫生等陋习[3]。只因这个“新生活运动”原本是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心理建设”、“社会建设”的一种手段，根本不能解除人民和妇女的贫穷落后，虽然声势不小，而实效甚微。

1935年1月，蒋介石为建设一支空军，成立航空建设委员会，自兼委员长。宋美龄自告奋勇任该会秘书长，实际领导空军的筹建工作。她阅读有关书籍资料，研习航空理论和飞机的知识，参与购置飞机、培训人才、修建基地等重大事宜的筹划。在她的组织和推动下，空军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已有各型飞机三百零五架，组成十个空军作战大队，航校训练出了三批毕业生，在南昌还建造起一座飞机制造厂。

宋美龄凭借自己对蒋介石的影响力，使蒋介石偏袒她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不仅使他们在国民政府中获得高位要职，还能凭借职权营私舞弊而逍遥法外。她对孔祥熙的几个子女视同己出，溺爱有加。

1936年10月，蒋介石去洛阳、西安督饬东北军、西北军“进剿”长征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宋美龄因病在上海休养未曾随行。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无效，遂于12月12日断然扣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美龄闻讯后当夜赶回南京，同有关人士商议解救办法。她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武力讨伐、轰炸西安的主张，同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力主用政治谈判的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4]。她到中央军校发表演说，要求军校学员“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还指出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5]。14日，她派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飞往西安了解实情，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南京情况，并带去一封亲笔信，说“戏中有戏”，暗示南京有人借机别有图谋。鉴于何应钦16日出任“讨逆总司令”，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督率三军指日北上”，欲调十多个师进攻西安，宋美龄愤然直接找何责问，坚持要何

停止出兵；同时急电端纳，要蒋介石下停战手令。她为促成西安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于22日在宋子文陪同下飞往西安，向蒋介石介绍并分析了近日的国内外形势和南京动向，力言应与张、杨和中共和平谈判，以挽救大局。在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张、杨和周恩来进行谈判后，她和周恩来长谈了两个小时，获悉中共并没有参与兵谏，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也甚积极公允；还了解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表示钦佩。24日，宋美龄亦参加谈判，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对谈判中的多项条款，也代表蒋介石作了承诺。当晚，她和宋子文陪同周恩来见了蒋介石，蒋向周保证说："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6)] 在她和张学良的斡旋下，蒋介石得于25日飞离西安至洛阳，26日回到南京。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表现出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投身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淞沪抗战开始后，她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次遇敌机扫射发生车祸，不幸摔断了几根肋骨。她在抗战一周年的武汉献金运动中，捐献出了巨款和金银首饰。她主持抗战妇女运动，担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会长，组织开办战时妇女训练班，亲自讲课，训练年轻妇女从事战地救护等工作。她热心推动"工合"运动，组织生产自救工厂，安置难民妇女。她还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开展救助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难童的工作，开办保育院收容教养。她带头捐款，并和蒋介石认养一批难童，负担一批难童的生活费用，带动了各界人士掀起捐献和认养的热潮。她在赴香港治病期间，与宋庆龄重叙手足之情，共同投身抗日救亡事业；1940年4月一同返回重庆后，视察医院，慰问伤病将士，组织义卖义演，募集抗战基金等，表达了坚决抗战到底的意志。

宋美龄在整个抗战期间，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宣传活动。卢沟桥事变后，她于9月12日发表了《告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充满激情地用英语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此后她经常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费城记事

报》等美国报刊上发表《中国通讯》、《战争与和平通讯》，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介绍中国军民的艰难处境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主持正义、给予同情和援助。1940年，她撰写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中国》和《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两书在美国刊行；翌年，又刊行《中国即将复兴》一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宋美龄以巨大的热情协助蒋介石建立中国和美、英等国的反日军事同盟，争取美、英的援助。她为协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化解两人的龃龉，充分施展了她的才华和魅力。1942年3月，她陪同蒋介石一行访问了印度。同年11月，她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赴美国访问，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我国抗战更多的支持和同情。她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夫妇的客人，在白宫住了十一天；1943年2月18日在罗斯福夫人陪同下，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强调亚洲战场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性，指出美、英应当改变偏重欧洲战场的观念，要求美国更多地给予金钱、物资和人力援助。此后，她又去美国许多地方并至加拿大，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1943年11月，她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直接参与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三国首脑会谈，为争取中国的权益和国际上的应有地位竭力周旋。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宋美龄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中。她为发展国民政府与美、英等国的关系，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以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是她没有想到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虽然得到美国大量援助，却没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陷于内外交困之中。宋美龄眼看局势急剧恶化，把挽救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危局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上，于1948年11月代表蒋介石飞赴美国求援。但是她受到了与六年前迥然不同的冷遇，等了一个多星期才得以与美国总统杜鲁门

（Harry S．Truman）会谈了半个小时；与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也只在医院病房里见了两次，蒋介石所期盼的增加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发表支持声明等要求均一一落空。她大失所望，原准备立即回国，可是传来的消息是国内局势遽变，她不愿回到已在做撤逃准备的南京，乃暂时留居于美国纽约孔祥熙的宅邸，与大姐宋霭龄做伴。她对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这本白皮书大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全怪美国援助太少。

宋美龄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的失败，最终撤逃至台湾孤岛，沮丧至极。1950年1月13日，她黯然神伤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她鼓励蒋介石东山再起“反共复国”；自己也于4月组织起“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并出任主任委员，为蒋介石“反共复国”助威。她赞同蒋介石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的立场，坚持一个中国。她虽然在外交场合仍有活动，但已无昔日风采。她不时去美国，为争取反华势力对台湾蒋介石的支持而四处游说，但终究不能阻挡世界进步潮流和美国朝野各界正视现实。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台湾代表被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之后，她颇为气恼，说联合国“应该称之为不合国”[(7)]，责怪美国当政者对中共一再“屈服”[(8)]。她因胆结石和乳腺癌于1966年和1970年去美国手术治疗。在台湾则渐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学习中国画自娱。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宋美龄不胜悲痛。尽管她对台湾政局还有一定影响，但她看到主政的蒋经国自有一套，便在料理完丧事后去了美国，住进纽约长岛孔祥熙别墅，与孔令侃、孔令伟生活在一起。1976年10月，她在纽约公开发表《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录》，追述她1926年冬在武汉与国民党高等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几次谈话，说鲍罗廷讲的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是“漠视人类生活”、“赤化世界的狂热”[(9)]。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之时，她不肯接受邀请前往北京探望；1982年8月和1984年2月，她又先后公开致函廖承志、邓颖超，说三民主

义才能建设中国。

在1986年10月台湾纪念蒋介石百岁诞辰的前夕，宋美龄在孔令伟陪同下回到台湾，发表了一篇纪念文，说要“突破困难终期”，扬言“我将再起”[10]。但是星移物换，不久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又不顾她的阻挠继位上台。1991年9月，年逾九旬的宋美龄还是选择在美国纽约长岛定居，离开了台北。在孔令侃、孔令伟的陪伴下，她日常诵读《圣经》，阅览报刊，莳花，散步，也接待故旧来访，但对台湾的政情只止于关心。定居在加拿大的孙子蒋孝勇，有时偕同妻子、儿女飞来探访，算是对她最大的慰藉。在她百岁寿辰之时，亲友纷纷祝贺，但台湾当局并无重大表示。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病逝于美国纽约。

---

(1) 宋美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经过》（1935年），《蒋夫人言论集》，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409页。

(2) 宋美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经过》（1935年），《蒋夫人言论集》，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419页。

(3) 《新生活须知》（1934年），中央宣传部编《新生活运动言论集》，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142—143页；宋美龄：《中国的新生活》（1935年），《美国论坛杂志》1935年6月号，《蒋夫人言论集》，第390—392页。

(4)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正中书局1937年版。

(5)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

(6)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7) 宋美龄：《真伪之辨》（1974年10月），《我将再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50页。

(8) 宋美龄：《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1975年3月5日），《我将再起》，第64页。

(9) 宋美龄：《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录》（1976年10月），（台北）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6年版，第103页。

(10) 宋美龄：《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文》（1986年10月31日），《我将再起》第10页。

宋庆龄

宗志文　李静之

宋庆龄，广东海南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宋嘉树，十三岁时随舅父到美国，在丝茶行当学徒，后入基督教，经人资助入大学研习神学。1886年回国，在上海一所教会中学任教，兼做地区传教士。1892年他辞去教会职务，经营印刷业，逐渐发展成富有的资本家。他跟孙中山是朋友，同情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曾帮助孙中山印刷革命宣传品，并一度追随孙中山一起工作。

宋庆龄七岁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那时，孙中山常常到她家跟她父亲议论国家大事，讨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问题。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意志，曾给予少女时代的宋庆龄以深刻影响。

1908年，宋庆龄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Wesleyan College）学习。她好学深思，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她关心祖国的命运，经常翻阅报纸，从中了解国内的情况。她还大胆地在校刊上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主张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府。辛亥革命胜利后，她把宿舍里悬挂的清朝龙旗取下扔在地上，换上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不久她在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盛赞辛亥革命的胜利，并说："革命已经使得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但是，还要争取博爱"[(1)]。这时，她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理安大学毕业后回国，途经日本，到那里看望双亲。她的父母是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

中山一起流亡日本的，父亲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满怀革命理想的宋庆龄到日本后，也决定献身于中国革命运动。不久，她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帮助他处理机密信件和起草文件。经过孙的帮助，她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1914年，孙中山聚集革命力量，组成中华革命党，准备再举革命，宋庆龄是其中成员之一。

宋庆龄在日本随孙中山工作了将近一年后，向她的父母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被拒绝。为了不与家庭决裂，她等了差不多一年。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护国战争爆发后，1916年5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回到上海。6月袁世凯死去，掌权的北洋军阀继续破坏《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宋庆龄随往。1918年8月，孙被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排挤，辞去军政府元帅职。宋随同他回到上海。孙在上海从事革命理论的创作，继续撰写《建国方略》，创办《建设杂志》，以启发民众，“唤醒社会”。宋除照料孙的生活外，并和他一起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帮助查阅资料，誊写文稿。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宋庆龄和孙中山一样非常兴奋，十分向往，希望从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此后，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孙致列宁的函电，有些是宋起草的。五四运动时，许多爱国学生被反动政府逮捕。孙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发出的“爱国无罪”的电报，也是宋起草的。

1920年8月桂系势力被逐出广东。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重返广州。次年6月，孙决定进军广西。宋庆龄同何香凝一起，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到前线慰问。不久广西平定，孙中山赴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宋随同前往，常常陪同孙视察军务。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反对北伐，于1922年6月16

日在广州发动兵变，指挥叛军包围并炮轰总统府，形势十分危急。孙中山催促宋庆龄一起撤离，宋担心自己同行会影响孙的脱险，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2)] 她坚持让孙首先撤离了险境，然后才在卫士掩护下，历尽艰险，突破火线，辗转到达永丰舰，与孙相见。她因这次历险，健康受到摧残，遂先行离粤到沪。

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两次护法失败，使他认识到革命不能依靠军阀，必须另找新的力量。宋庆龄完全同意孙的看法。早在1921年底，孙中山就和张太雷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G．Maring）密谈过多次。这次到上海后，他又几次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进行这些活动时，宋都在场，从而她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不久，列宁派出的代表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在李大钊陪同下，与孙中山就当时远东局势和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商讨。宋一直在座，这为她以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接着，孙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宋亦参与其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是积极支持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的统治垮台。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商讨国是，宋庆龄偕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宋庆龄极为哀痛。但是她没有消沉，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投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之中。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解释他的新三民主义。4月，她从北京回到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宋向记者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赞誉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1月，宋庆龄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举为主席团七成员之一。她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紧密合作，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集团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次会上，她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她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

工作。同年7月，北伐军在广州誓师，10月攻克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于11月到达。12月13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宋庆龄每天都到联席会议办公室去办公，还时常参加民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2月，她在汉口办了一所妇女政治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动员她们参加国民革命。她在开学典礼上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3)

正当大革命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篡夺领导权，坚持要迁都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致反对，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决议坚持了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并改选了党政军领导机关，抑制了蒋介石的独裁。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7月14日，隐藏在武汉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提出要同共产党决裂。宋没有参加会议，请陈友仁代表她发言，坚决反对“分共”，说“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4)。同日，她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决裂。《声明》明确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5)。宋庆龄表示绝不同流合污，决定“暂时引退”，和蒋、汪之流控制

的国民党断绝关系。她表示“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6)]。8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的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发表宣言，严正地揭露和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同日爆发南昌起义，宋当时虽然不在南昌，仍被推选为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七位主席团成员。她随后高度评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革命暴动，说：“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7)]。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8月下旬，她赴莫斯科。行前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8)]。

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论文。同年11月1日，她和邓演达、陈友仁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表示要与新旧军阀作坚决的斗争，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2月18日，她通电斥责蒋介石与苏联绝交的“自杀行为”。不久，她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以后，她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声明说：“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9)] 她拒绝了戴季陶请她住到南京去的游说，坚持住在上海。1930年又动身去欧洲。

1931年6月宋庆龄回国。她拒绝了国民党集团给她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中的要职，指出：“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并表示“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

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10]。“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同时她又指责国民党内当时正在争吵的宁粤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11]。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她热烈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与何香凝等设立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受伤的士兵，并予以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这年12月，她联合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自担任同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盟”以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为主要任务，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进行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933年3月下旬，上海公安局勾结租界巡捕房逮捕了罗登贤、陈赓、廖承志等五人。宋庆龄积极组织营救，并于4月1日发表《告中国人民》一文，反对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迫害反帝抗日战士，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她与杨杏佛、沈钧儒等人亲赴南京，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良狱中待遇。她并亲自往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罗登贤等人，给他们以极大鼓舞。她还以国际主义精神，亲自出面援救被国民党政府扣押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帮助照顾他们的孩子。宋庆龄的这些活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恼火。特务们一直严密监视她的行动，多次向她投寄恫吓信。6月18日又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妄图以此来吓倒她。但她却发表声明说：“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即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定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12]

同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民族革命战争。她谴责国民党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赞扬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她带头签名于中国共产党1934年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1935

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多年，她不但有许多共产党朋友，并与中共中央有直接联系。“一二九”前后，她曾帮助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同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3]。1936年1月，她应中共中央的要求，设法安排护送美籍记者斯诺（Edgar Snow）和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到陕北[14]。

“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潮流在全国高涨。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宋庆龄当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国民党当局威胁要解散救国联合会，11月22日又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位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立即抗议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15] 第二年6月，她与何香凝等为了营救沈钧儒等七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7月法院审讯“七君子”时，宋亲自带人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西安事变时，宋庆龄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出发，主张释放蒋介石。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为了团结抗日，出席了这次会议。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改变其错误的政策。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面对亡国论者散布的“中国必败”的悲观论调，宋庆龄于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她分析了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它“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16]。11月，她又发表《国共合作

的声明》，赞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团结御敌。

同年底，宋庆龄去香港。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和医药供应等工作。同盟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保卫中国同盟》双周刊，向全世界宣传抗日，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援。同盟为抗日前线募集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宋庆龄以她崇高的声望和杰出的才智，几次在香港发起大规模的募集基金运动，争取到很多同情者。她冲破国民党集团的封锁和阻挠，通过各种渠道把物资输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前线去，还组织和安排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救护工作。在她的不断援助下，马海德、白求恩（Norman Bethune）、柯棣华（Dwarkanath Kotnis）等许多外国医生，先后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四十二个前方流动医疗队、八所医科学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香港。宋庆龄转移到重庆，在那里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举行大规模募捐活动。她在重庆仍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她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照样公开活动。她联络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诺、艾黎（Rewi Alley）等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肩战斗。她争取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将军的支持和帮助，由他派美国军用飞机运送急救物资到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从美军军用仓库里拨送医药用品给八路军、新四军，并派去美国军医。在她的影响下，美国援华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外国友好团体，也都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给抗日根据地一些援助。

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庆龄回到上海。1946年7月23日，她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阻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她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即保卫中国同盟，1950年8月改名中国福利会），开展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重点是儿童福利工作。她亲

手创办儿童福利站，给穷苦孩子治病、发放衣物和食品，并创办儿童剧团，给孩子们以精神食粮，使他们看到未来。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设立了一个中国儿童义养会，专门为解放区的儿童筹募物资。

在解放战争期间，宋庆龄“千方百计地力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活动资金，支援民主运动，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募集药品和物资，支援解放战争”[17]。她亲自出面，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在运输条件十分困难，国民党特务肆意捣乱的情况下，她想尽一切办法，把救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48年1月，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为首，在香港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5月，宋庆龄十分兴奋地迎接了上海的解放。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她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欢呼“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18]。9月，她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19]。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且担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福利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会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作为国

家的重要领导人，她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活动。1950年宋庆龄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把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作为发展我国儿童和妇女福利事业之用。中国福利会1952年1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向世界介绍今日中国情况。她定期把《中国建设》寄给海外的朋友，三十年来，她为这个杂志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六篇是介绍新中国的全面成就。

1953年，她的论文、演讲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1957年11月，她随毛泽东等一道去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参与党代表会议，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

---

(1) 路易·艾黎：《回忆宋庆龄》，《中国建设》纪念宋庆龄特刊（1981年8月）。

(2) 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3) 宋庆龄：《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页。

(4)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5)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11—21页。

(6) 《宋庆龄选集》，第22页。

(7) 宋庆龄：《中国目前的形势》，《宋庆龄选集》，第36—37页。

(8) 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7页。

(9) 宋庆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42页。

(10) 宋庆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宋庆龄选集》，第51—53页。

(11) 《宋庆龄选集》，第52页。

(12) 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79页。

(13) 曹靖华：《点滴忆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14) 石肖岩：《一份宝贵的资料》，《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4日。

(15) 宋庆龄：《为沈钧儒等人被捕而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98页。

(16) 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宋庆龄选集》，第120页。

(17) 张执一：《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18) 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宋庆龄选集》，第185页。

(19)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190—192页。

宋炜臣

徐凯希

宋炜臣，字渭润，1866年（清同治六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自幼入乡塾，稍长入南货店做店员，性情沉稳，处事机敏，为乡里父老所器重。1889年，宋被同乡叶澄衷所赏识，带至上海协助叶创办燮昌火柴厂于虹口。宋初任管事，叶的族叔叶安新为经理。宋管理厂务有方，很快升任副经理。嗣后叶安新去世，宋继任经理，总揽全权，锐意扩充，任职六年，获利一百万两。

1896年，叶澄衷、宋炜臣为拓展业务，开辟内地市场，经实地考察，确认汉口居九省通衢，交通便利，火柴市场销售极佳，由宋携银二十五万两，持叶介绍函，来汉求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在汉埠立足，宋首先开设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借以联络湖北文武官员。他不惜巨金，于华胜号二楼辟设书房、吸烟室、卧室、客厅等华丽房间，专作招待官员之用。张之洞有事过江到汉口，即以华胜号为休息、进膳之处。对于新军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等其他文武高官，宋也百般结纳，投其所好，以此打通官府门路。

1897年，宋炜臣招股创办武汉地区第一家民族资本工厂燮昌火柴厂，股金总额二十万两，叶澄衷、宋炜臣各占三分之一，余为散股，宋自任经理。创办初期，除有排梗机三十八部外，其余工序依靠人工完成。梗片等项购自上海，轴木、硫黄、纸板则为日产 (1) 。开办当年盈利十八万两，嗣后陆续添置机器设备，生产“双狮”牌硫化磷火柴和安全火柴。日夜两班，用工一千二百名。经宋呈请督署批准专利十年，产品完厘采用专章办理，“由厘局发与统捐票，每箱收钱四百文，通行全省，不用重征” (2) 。因无有力对手竞争，产品遍销湖北各县，行销河南、陕西、甘肃各省，连年盈利，盛极一时 (3) 。

宋炜臣多财善贾，燮昌火柴厂开办不久，他以重金捐得候补道衔，嗣又获二品顶戴[4]，亦商亦官，蜚声汉皋。张之洞称道他是“有为之士”[5]，常勉其好自为之。1898年，张之洞设立汉口商务局，办理汉口全镇华洋商务，宋以同知衔列第一届商务局总董。

19世纪末，汉口全镇除租界自设电厂，广大市区尚无自来水和电灯。曾有绅商多次要求承办，因查出附有洋股，未获张之洞批准。宋炜臣窥知其意，1906年6月邀集浙江、湖北、江西各帮十余名巨商，联名呈请筹办汉口水电公司，设筹备处于华盛号。7月，得到张之洞批准，给予专利，允附官股三十万元，以资提倡[6]。为扩大征股，宋又罗致徐之棨、周鲁、张庚飏等七人共同发起，取“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张之洞亲为书写“既济”二字，宋炜臣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总经理，收足股本三百万元。

同年8月，水、电两厂同时动工。1908年，电厂竣工送电，计有五百千瓦直流发电机三部，半年中报装电灯二万盏。1909年7月水厂落成，每昼夜送水五百万加仑，并在后城马路修建水塔一座，兼作消防报警之用。为消除市民对“洋机器水”的疑虑，宋曾至汉正街闹市，当众饮用自来水，市民疑虑顿除[7]。因水、电两厂工程浩大，全部工程费用超过预算一百万元，股东大会议决增资二百万元，以资弥补。适因市面金融枯竭，仅募得四十万元。乃由宋炜臣向日商东方兴业公司联系借款一百五十万元，借期三年，附加条件为：水电二厂所需燃煤、机器及各零部件，均须向日方购买；工程技术部门须聘请日籍工程师担任，财会部门须聘请日籍会计人员，另设日文账目一套，以便日方稽核。日方同时要求，由公司付款敷设通往日租界输水管道，向汉口各租界供水[8]。公司经营业务，无形中受到日商的干预和牵制。

20世纪初，国内兴建铁路之风方兴未艾。1907年8月，宋炜臣与顾润章、王光等集股四十九万元，创办扬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于汉

口，准备利用汉阳铁厂产品，制造铁路所需桥梁、车辆及叉轨部件。宋申请援照汉阳铁厂成例，对建厂机器和一切进口物资暂免税厘五年。农工商部仅奏准该公司制造车辆、铁桥等铁路材料，暂准一体免税。对建厂购机及其他进口物件，仍令遵章完税，以示限制。张之洞则以汉阳铁厂旧机器和现银五万两作为投资股份，指名由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插手承办。同年末动工兴建厂房，陆续安装机器设备，生产规模逐步扩大，除生产铁路车辆、叉轨部件外，发展到制造锅炉、水闸、煤气发动机和大小驳轮，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机器厂家之一。

1910年，宋炜臣又招股组织矿务公司，勘购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富池口铜煤矿；修建铁路专线，载运矿砂直抵江边。他还先后集股二百五十万两，创办厦门信用银行；集股五百五十九万元，创办湖南常德德义房地产合资公司等。宋历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一至六届议董。

宋炜臣与汤化龙、杨度等立宪派人士关系密切。1910年，杨度由湘入京，途经汉口，寄寓既济水电公司。杨力主路权收归国有，故劝阻湖南谘议局晋京请愿代表回省。湖北文学社成员闻讯集会湖南会馆，约杨辩论，杨未敢前往。刘复基、李六如二人遂寻至既济水电公司，宋密报英国领事馆，致使刘、李被巡警暂时扣押。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广总督瑞澂逃往楚豫兵舰，幕僚星散，粮源断绝。瑞澂托宋炜臣代为寻觅食物，宋曾以粮米接济之。湖北军政府成立，宋转向支持革命，与韦紫封、刘子敬等三十二名工商界名流，共同发起国民捐，募得款项十一万余元。但当清军迫近汉口时，宋内心十分不安，唯恐遭到报复。

同年10月末，冯国璋为报复汉口商民对革命军的支持，下令纵火焚烧市区，大火三昼夜不熄，商业各帮损失惨重。宋炜臣为保全水电设施，冒着炮火，求得南北双方同意，将汉口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以外，但电杆、电线仍有九成被炸毁破坏，各种水电输送设备损失合

计六十八万余元，连同汉口市区房屋大量被焚毁，水电营业收入锐减，总计损失设备和资财一百五十万元。南北停战议和，宋炜臣与蔡辅卿、刘歆生等渡江面谒黎元洪，要求军政府筹划经费，重建市区。他多次呈文黎元洪及袁世凯，提出建筑汉口新市场办法六条，代表旅鄂浙商请求迁都武昌。

1912年1月，汉口商务总会会董聚会，筹议重建汉口市面办法，宋炜臣提出重建汉口财政困难，建议黎元洪转告袁世凯“与清政府开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9)]。4月，汉口商务总会、各团体联合会、商界维持会共同统计，汉埠因战争损失计五千七百万元，一致推举宋炜臣、万伪伯等赴京，要求袁世凯赔偿汉埠兵祸损失。经宋、万等代表一再追询，北京国务院允谘内务部调查确数核办。后几经争取，议定偿恤汉口商民损失五条。1913年2月，经宋炜臣等一再呈请，北京政府责成内务部筹划光复汉口市场，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

民国初立，时局甫定，宋炜臣为恢复既济公司水电设施四处奔走，多方告贷。他先后两次以价值五十万元的私人财产向日本正金银行抵借短期资金，逐步修复供水供电设备，始保持公司得以继续营业。1913年7月，日债到期，无力偿还，日方债权人凭约催索甚急。宋炜臣为避免公司由此落入日商之手，多次进京，谒见军政大员，最后由财政部担保，日商始允延期偿付。

同年秋，宋炜臣在湖北竹山招股创办五丰铜矿。1914年合资创办金矿和硝碱工厂各一座。宋个人创办和投资的企业已有十家，被称为“汉口的中国头号商人”[(10)]。同年，宋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曾为袁称帝向各方疏通说项，耗资颇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国内市场活跃，既济水电公司各项营业也逐渐恢复，用户大量增加。为了扩充设备，改发交流电，1916年宋炜臣向日本东方兴业公司续借资金一百万元，连同

前债共为二百五十万元，订期十年，相继添置五百千瓦交流发电机一部，斯特林水管锅炉两座，作为远距离供电之用。1917年，购置备有两部一百一十五马力浑水泵驳船，解决了压气起水机容量过小的问题。1919年，为将直流全部改发交流，陆续安装一千五百千瓦奇异型交流发电机两部、大型拔柏葛锅炉两座、五百千瓦变压器三台，配电方式则改为单相三线式，使耗煤量大为降低。其后几年，既济电厂又相继安装交流发电机、水管锅炉和单相升高变压器多部，敷设六千六百伏输电线，装机容量达到一万零五百千瓦，基本满足汉口全市用电。

作为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办人，宋炜臣自公司开办，连续担任总经理一职十五年。其个人股份一度占公司总股份的近八成。1920年，宋炜臣利用战后日币汇价低落，“筹借华银，购买日币”[(11)]，提前偿还了外债。此时，既济电厂设备不断更新，公司营业蒸蒸日上，但公司内部浙江、湖北、江西三帮势力，为争夺经营管理大权引起纷争。一些股东对宋炜臣长期占据总经理职位，管事擅专，不开股东会，不发股息及账目混乱极为不满，掀起“索息保本查账清弊”风潮。1921年4月，经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干预，既济水电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进行改选，宋炜臣被迫辞去总经理职务。

1927年，宋炜臣创办的竹山五丰铜矿资本蚀空，宣告倒闭。因开采铜矿资本主要依靠燮昌火柴厂垫补，各方债主前来索债，燮昌火柴厂无法维持，宋不得不将该厂作价三十万元，转卖给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更名为炎昌火柴厂。

1927年9月，宋炜臣因病在汉口去世。

---

(1) 《武汉自办工业之状况》，《中华实业界》第10期（1914年10

月）。

(2) 《中外日报》1900年4月7日。

(3) 《华制存考》宣统元年正月刊，第12页。

(4) 梁绍栋：《汉口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和演变概况》（未刊稿）。

(5) ［清］张之洞著：《张文襄公全集》第118卷，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36页。

(6) 湖北省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2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58页。

(7) 湖北省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2卷，第758页。

(8)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3页。

(9)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12页。

(10) 《商埠志》，第708页，转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957页。

(11) 湖北省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2卷，第758页。

宋希濂

颜平

宋希濂，又名荫国，湖南湘乡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生于一个耕读世家。其父宋宪文，务农，崇尚诗文。宋希濂幼年由父、叔教读古文诗词，八岁入塾，后又入小学求读五年。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爱好文学，与同学曾三创办墙报《雷声》，文多爱国激情。

1923年冬，宋希濂经进步教师熊亨翰介绍，考入程潜在广州开办的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春黄埔军校创办，宋转入黄埔军校，编在学生总队第一队第三区队。当时他年仅十七岁，为全校六百三十五名学生中最年轻者。年底毕业后，分派在军校教导二团第四连任副排长，半月后升任第一排排长。

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与许崇智粤军为右路。宋希濂参加了攻克淡水和棉湖之役，表现英勇，战后升任第四连副连长，5月下旬接任连长。随即回师参加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率四连战士攻克了滇桂军设在广州市郊的瘦狗岭阵地。宋希濂战斗热情高昂，思想追求进步，经陈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广州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的党军第一旅（即原两个教导团）编为第一军第一师，宋为第二团第四连连长。9月下旬，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第一军是主力。宋希濂参加了惠州、潮州、汕头、海丰、河婆、阿田、横冈诸战斗，战后升任副营长，随部驻防潮州。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扣押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还下令第一军中不能有跨党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还不到一年的十九岁的宋希濂，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便不再“跨党”，而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宋希濂所部编属总司令部预备军，宋任预备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副营长，加紧训练队伍，待命出战。11月，北伐军底定湘、鄂、赣、闽诸省后，预一师编为第二十一师出征，宋任第六十三团第一营长，在师长严重、团长陈诚直接指挥下作战。1927年1月，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发生遭遇战，2月又在桐庐浪石埠与孟昭月部苦战，宋负重伤。2月15日，宋营随二十一师六十三团进占新登，18日攻克杭州，宋入杭州医院治疗；后二十一师北进至苏州，宋转至苏州一教会医院养伤。10月伤愈后，至南京在军事委员会军政厅任职。

1927年末，宋希濂被送往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深造。翌年5月，日本侵略军阻挠北伐军北上进击奉系张作霖，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残暴杀戮我国外交人员和无辜军民。宋闻讯后悲愤填膺，立即与在步校学习的黄埔同学一道，发动在东京的千余名中国留学生，在中华青年会馆举行抗议日军侵略暴行的大会，宋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发表演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会后准备游行，即遭日方警察拘捕，被关押半月之久，经驻日总领事馆交涉始获释。他曾与一些留学生写信给蒋介石，要求罢学归国，未能获准。

宋希濂在日本步兵学校和参谋学院学习两年后，于1930年5月回国，被分派在国民政府警卫军教导一师任中校参谋，嗣后调任营长、副团长。中原大战爆发后，教导师出战，宋因战功升任第二团团长。是年底，又升任警卫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1931年，警卫一师改番号为第八十七师，宋任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率部驻南京近郊小营、马标一带。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宋希濂激愤不已，于1月31日下午晋见军政部长何应钦，请缨开赴淞沪前线抗御日军，言词激烈，但被何拒绝。当晚十一时，他又鼓动全旅营长以上三十多人乘车闯至何宅请战，与何激烈争执至凌晨一时许。2月14日，宋率全旅在第五军军长兼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指挥下开赴上海抗日前线，协同第十九路军抗

击日本侵略军，先后在蕴藻浜一带几次与敌展开激战，击退敌军的进犯，坚守阵地。战后，第二六一旅调至南京整训，宋希濂升任第八十七师副师长。

蒋介石在先后四次“围剿”工农红军失败后，为加强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8月将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的四个补充团编为第三十六师，任宋希濂为师长，并令宋兼抚州警备司令。12月，宋希濂奉蒋之命率师南下，参加镇压“闽变”，攻打延平夺取九峰山奏捷，获蒋嘉奖；继后又向古田推进，直至惠安。1934年9月，宋率师在福建新泉附近参加“围剿”红军，在进攻温坊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离队到后方休养，伤愈后率部驻福建长汀。他对1932年2月被省保安团逮捕的共产党人瞿秋白进行审讯，于6月18日按照蒋介石“着将瞿秋白就地枪决具报”的命令在长汀公园杀害了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原奉命准备讨伐张、杨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从潼关进驻西安，宋兼任西安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希濂于1937年8月率师南下参加淞沪抗战。宋率部曾攻入汇山码头，后在江湾天宝路及大场一线抗击日本侵略军达两个多月，不畏牺牲顽强作战，官兵伤亡达一万二千人。10月下旬，宋升任第七十八军军长，仍兼第三十六师师长。日军于11月5日在金山湾登陆后战局危殆，宋率部据守的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敌突破，乃于9日晚向昆山方向撤退，17日开往南京。此后参加南京保卫战，在红山、幕阜山、下关、挹江门一线防御日本侵略军。12月13日南京失陷，各部撤退，宋希濂指挥三十六师掩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西撤。

1938年5月，宋希濂任第七十一军军长，率部在河南参加对敌土肥原十四师团的抗御，在夺回兰封之战中与敌激战两昼夜告捷。继后在武汉会战中，在武汉东北的史河地区阻击日军第十二师团、十六师团各一部的西进攻势；在富金山要地坚守阵地，与敌苦战十日，使日

军十二师团荻州立兵部伤亡过半；接着又在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守月余，阻击了敌军的多次进犯。10月中旬，日军绕道从潢川、罗山夺取信阳，另一部又越过桐柏山占应山，包围我抗日部队。宋希濂奉命率部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为避免落入敌军布设的“口袋”，将部队分散隐蔽在三里城、宣化店、七里砰一带；经过一段观察后，于一个夜晚指挥全军二万余官兵安全越出包围圈，渡过淮河迅速南下，转至南阳地区。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宋希濂于1939年冬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年9月曾兼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1941年11月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联合抗御日本对东南亚的进攻，宋希濂部张轸第六十六军被编为远征军入缅参加作战。由于英国军队败退，我远征军亦遭日军袭击，一部退往印度，第六十六军残部退至云南。宋希濂将残部编组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归入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由集团军总司令部指挥。1942年5月初，宋指挥所部阻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东进，歼灭渡过怒江的敌军四百余人，与敌在怒江两岸对峙。1943年中国重组远征军，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以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集团军，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集团军。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发动强大攻势，担负防守怒江南岸的宋希濂部，亦以四个加强团分别由惠人桥、双虹桥等地渡过怒江进击前进。接着宋希濂按卫立煌之部署，指挥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之王凌云第二军、黄杰第六军、钟彬第七十一军以及直属之三十六师、二〇〇师全部渡过怒江参加攻击。宋率部分两路前进，6月10日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攻入龙陵，但敌增援反扑，宋指挥所部退据龙陵东北郊区，与敌对峙。宋指挥北路主力切断龙（陵）芒（市）公路和腾（冲）龙（陵）公路，占领龙陵外围据点后与敌之援军反复争夺，相持多日。与此同时，配属第十一集团军归宋希濂指挥的何绍周第八军，在滇西人民支援下，向松山之敌连续发

动九次攻击，历时三月馀，终于在9月8日全歼敌第五十六师团之第一二三联队，克复了松山。

正在远征军乘胜大举前进之时，宋希濂接到军事委员会命令，回重庆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结业后被派往新疆，先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1946年3月，蒋介石组建西北行辕，任宋为行辕参谋长；10月，又任宋为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倚重他控制西北边疆要地。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有生力量大量被歼，战局每况愈下。1948年7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宋希濂奉命与会。会上蒋介石决定收缩战线，实行重点防御，编组机动兵团和后备兵团以应付全局，蒋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同时派宋希濂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驻守鄂西北，要宋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进入湘西。宋于9月初在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部署所属各军及湖南保安第一旅在鄂西、湘西严密防守各自阵地，首先在各自地域“肃清”共军力量。11月，淮海战役起，蒋介石急调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并命宋率第十四兵团东下驰援徐州，但白崇禧力阻宋率部东调。蒋无奈，只得令宋回沙市好生经营。

蒋介石内外交困，难以为继，不得不于1949年1月20日宣告下野，但他对宋希濂有所叮嘱。宋先任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后又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以刘平第十五军、龚传文第七十九军、方暾第一一八军编为第十四兵团，推钟彬继任司令官；另以陈克非第二军、顾葆裕第一二四军组成第二十兵团，陈克非兼司令官，驻扎川鄂边境，扼守川东门户。

国共和谈破裂后，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突破天险渡江奏捷，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军队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防线势如危卵。宋希濂受命统一指挥湖南岳阳城陵矶至湖北宜昌南津关一线的江防部队。但人民解放军5月突破宜沙防线胜利渡江。7月，渡江南下的人民解放

军发起宜沙战役，宋部无力招架，退出宜昌向巴东、野三关及秭归等地撤退。8月，他和胡宗南谋议“退守滇缅边境”，以保存力量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但为蒋介石所不准。宋审时度势，准备在川鄂黔边区打游击，乃部署各军分占防地。10月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15日进军大庸，继又攻取秀山，锐不可当。宋指挥所部退集都山、江口、彭水以西地区，但龚传文第七十九军和顾葆裕第一二四军在撤退途中被歼于宣恩、咸丰地区，方暾第一一八军一部被歼在黔江东。宋的兵力锐减，对于防守川东战线亦已失去信心。在解放军分几路渡过乌江后，他害怕被围歼，指挥所部沿乌江向武隆、涪陵方向撤逃，但一部在白涛镇被歼，一部在白马山地区被截后从小道逃窜，仅剩勤杂部队万余人。宋乃指挥余部分三路向滇缅边境逃窜，企图找个落脚地等待时机。宋打算奔綦江入宜宾再西行，不料驻扎宜宾的郭汝瑰部宣布起义，只得率部沿岷江向西北方向溃逃。12月19日渡过大渡河时，队伍被解放军包围，宋见已无逃路欲自杀，未遂，被俘。

经过近十年的关押改造，宋希濂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第一批特赦。1961年2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撰写了一批回忆亲身经历的战事资料。1965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1988年，被选为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热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80年他赴美探亲后，旅居美国。是年7月他写信给台湾袍泽，建议两岸通邮，以释亲人思念之苦。1982年参加旅美华人发起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任首席顾问。1984年2月与蔡文治、李默庵、侯镜如发起成立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发表宣言说：“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1984年6月，他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被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他将自己以往写的回忆资料整理成书，定名《鹰犬将军 [(1)] ——宋希濂的自述》出版。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病逝于美国纽约。他的骨灰于当年4月

11日葬于湖南长沙“唐人永久墓地”。

主要参考资料

陈训正编著：《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1929年南京刊印。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1962年版。

张其昀著：《抗日战史》，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版。

《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的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1986年—1996年版。

---

(1) “鹰犬将军”之说，初见于台湾国民党的报章，责骂“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不久，台湾持不同政见者李敖撰文说，他查遍国民党档案中有关宋希濂的记载，“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的鹰犬”的记录。李的这篇介绍宋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经历的文章，题目就取为《鹰犬将军》。《北美日报》在发表李文时加按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宋深有感慨地说，这几句话是对我八十年的总结。因此宋在出版《自述》时即将书名定为《鹰犬将军》。

宋则久

熊尚厚

宋则久，字寿恒，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河北直隶（今天津）人，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十五岁进入天津德泰绸布庄学徒，出师后在庆祥、聚隆、德生锦等布店做店员多年，1899年任敦庆隆绸布庄经理。1903年到1912年间，他先后与人创设天津制胰公司（宋任董事兼协理）、天津北洋保险公司和天津报国公司（制造牙粉）等企业。此外，宋则久还兼任上海华通保险公司董事，以及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等职。

1912年6月，宋则久创设直隶国货维持会，以顾琅为会长，自任副会长。他为该会起草章程，聘用宣传员和调查员，编辑出版《白话报》，宣传国货的销售和改良，并计划设立国货介绍所。嗣后，宋担任直隶国货维持会会长，因其长于演说，所以他的提倡国货讲演很受听众欢迎，会员发展到三千人。

1913年5月，宋则久辞去了敦庆隆绸布庄经理的职务，以资本二万银元，收买原直隶省工艺总局的实习工厂和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创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所，自任经理。他规定所内店员和学徒均须加入国货维持会，并遵章使用国货。1915年2月，宋则久又创刊了《售品所半月报》，进行实业救国的宣传。同年，宋仍以救国相号召，创办“救国储金会”吸收资金，以扩大其经营。通过这些活动，他在贩卖“爱国布”中发了财。

1916年，宋则久加入基督教，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积极传播宗教思想。他规定售品所职工必须加入基督教，使他的职工都成为基督教徒。1917年，宋任中国基督教自立会执事，次年任天津基督教

联合会干事。其后，他将爱国与宗教结合，创立了基督教救国会，并著有《民德与宗教》、《宗教白话谈》等，进行宣传。

1915年至1918年间，宋则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宣传国货，推销售品所商品。曾多次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及广告游行等活动以宣传国货，使售品所的营业得到很大发展。为了增辟货源，他与人合办毛巾、牙刷、肥皂等小型工场。此外，宋则久还举办一些社会事业：如创办小学和教养院，以博取社会的同情，从而推动国货运动的开展。1918年售品所的货品增至两千余种，职工六十余人，年营业额和盈利额大为增加。同年，他被聘为直隶省实业厅谘议，成了当时天津提倡国货运动的著名商业资本家。

五四运动期间，宋则久更加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担任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干事与天津国民大会委员会委员。在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他改天津工业售品所为天津国货售品所。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运动，取缔抵制日货斗争，并宣布救国十人团和国民大会等爱国团体为非法组织。1920年1月，宋则久将救国十人团等组织迁入租界，继续坚持开展爱国运动。次年，他任天津各团体代表会干事，并加入了天津救国联合会。1924年，宋则久任天津总商会董事，次年任天津国民大会促成会主席。当冯玉祥到天津时，他与冯相结识，帮助冯部国民军解决部分物资。在这期间（自“五四”后），宋则久的社会声望日高，天津国货售品所的营业更加发达，货品增达八千余种，职工增到一百余人。到1926年春，奉系军阀李景林进入天津，3月以“赤化”罪名封闭售品所，并逮捕职员，他遭到勒索而负债，乃被迫辞去总经理职务。售品所被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宋任名誉顾问。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宋则久加入了国民党。次年，他去河南见到冯玉祥，由冯出资十万元设立开封国货商店，宋任总经理。1929年3月，宋则久由商而官，当上了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厅长、河南省赈务委员会顾问，并任河南省政府“特派清理共产军事

犯负责委员”。

1931年，宋则久回到天津，任售品所监察人，次年任董事兼董事长。“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华北形势危急，全国抗日爱国运动更加高涨，宋则久复以极大的热情来开展他的国货运动。1935年到1937年，他在北平、济南、青岛、上海、郑州、太原、西安等地先后设立售品所分所或分庄，大力扩展售品所的营业。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天津，国货售品所营业萎缩。在日寇压迫下，宋则久被迫放弃推销国货而改营中外百货，1939年将天津工业售品所改名天津百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不久，他离开天津避居北京香山。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则久的工业售品所再以“专售国货”相号召，1947年在美货大量涌入下，又一次被迫放弃“专销国货”，添设国外贸易部，经营进出口业务，并改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这时他已年满八十高龄，退居北平香山养老。

1956年1月，宋则久病逝于北京香山。

主要参考资料

宋则久：《宋则久论著》，天津国货售品所1933年版。

纪华：《国货售品所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杨家骆：《宋则久》，《民国名人图鉴》（草创本）第10卷，辞典馆1937年版，第31—32页。

宋哲元

陈民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县赵洪都村人，生于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父亲宋湘尺是清末廪生出身，在村中教私塾为业，由于子女较多（共养育三子二女），生活长期陷于贫困。宋哲元从七岁开始，先后随从父亲及舅父沈兰棻苦读十来年，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1906年他投考北洋陆建章为总办的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分至第六镇见习。1911年调至左路备补军任第一营哨长，后转入冯玉祥京卫军第二团任前哨哨官。从此，他追随冯玉祥十余年，转战南北，其治军思想和练兵方法，深受冯的影响。

1917年冯玉祥部改编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宋任该旅第二团第一营营长。是年6月，张勋拥清逊帝复辟，北京政府段祺瑞在马厂誓师，令冯旅率部讨逆。宋哲元的第一营奉命进攻万庄、丰台，率先攻入北京天坛。此次讨伐迅速取得胜利，宋哲元获得冯玉祥的赏识。

1918年6月，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宋哲元任第二团第二营营长，担任常德城防，他对当地日本侨民的不法行为与停泊沅江的日舰水兵进入城门，均严予执法盘诘，不予通融，甚得冯玉祥的赞赏，称他“忠实勤勉，遇事不苟”[(1)]。

1922年10月，北京政府任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所部驻防北京南苑。这时冯部扩充为第十一师与三个混成旅，即张之江的第七混成旅，李鸣钟的第八混成旅和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混成旅。从此，宋哲元跻身为冯玉祥的高级将领，因骁勇善战，被时人称为冯部的“五虎上将”之一[(2)]。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亦称“北京政变”），驱逐宣统出故宫，取消其帝号，并宣告脱离直系军阀系统，将所部队编为国民军，任命宋哲元为第十一师师长。

1925年初，冯玉祥至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从此，冯部统称西北军，宋哲元以第十一师师长兼教导团团长，为西北军培训干部，驻热河，任热河都统。是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了“讨赤联军”，企图消灭南方的国民政府和北方的西北军。冯部在北京及河北、河南两省的地盘处于直系与奉系的大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急。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以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自己赴苏联访问，企图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但反动军阀并不因冯的下野而善罢甘休，而是兵分五路对北京地区的西北军施行大规模围攻，迫使西北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是年8月，西北军南口溃败，宋哲元率残部撤至绥远。

冯玉祥在苏联得知南口兵败的消息后，即动身回国，宋哲元协助冯玉祥聚集残部，并参加著名的“五原誓师”。冯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该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1927年12月，第二集团军与南方的革命军会师郑州，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重新划定新战区，冯部各路军均改编为军，军以上为方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后又兼任陕西省主席。

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是年5月初，第二集团军将领二十八人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拥冯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敦促冯发兵。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翌年，冯又联络了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由阎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为副司令，宋哲元任第四路军总指挥，施行倒蒋，是役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战况空前激烈。在大战过程中，由于蒋介石收买了西北军的一些将领，加上张学良通电拥蒋，奉军入关，中原大战遂以西北军的失败而告终。宋哲元率残部渡黄河入山西，通电听候中央处置。初，被改编为东北陆军第三军，后

改称为南京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宋被任命为该军军长，副军长为佟麟阁，参谋长为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包括四个师，各师师长分别为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1932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随之进驻察哈尔。是年“九一八”事变，宋哲元率部下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有“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壮语。

1933年2月底，日军攻占热河承德后，继续向长城各口进逼，第二十九军奉命调往长城各口抗击日军，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第二十九军采取近战、夜战等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取得长城抗战的胜利，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更是扬名全国，为此，国民政府颁奖宋哲元及所部高级将领以青天白日勋章。是年四月间，日军采取迂回战术，突破商震第三十二军防线。第二十九军处于腹背受敌境地，遂奉命向河北通州以东撤退。日军得以突破长城各口，直逼北平城下。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成为冀察平津的主要负责人。同年12月，宋被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35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侵华日军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华北五省自治，使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由于当时中国的民心和第二十九军官兵仇视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心，日军眼见煽动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一时难以实现，便退而求其次地炮制出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宋哲元处境微妙，他忍辱负重，努力维持局面，争取时间，使国民政府做好抗战准备。

193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十九军首当其冲，当时宋哲元本人不在平津，因日军催逼履行“经济提携”条款，无法应付，而避往老泉山东乐陵“扫墓度假”。在日军的进

攻面前，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相继壮烈殉国。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虽愤慨，但对日军的“和平谈判”仍抱幻想，一度态度犹豫，及至部属伤亡惨重，日军进占廊坊，威胁北平，并对他下最后通牒时，才下令第二十九军全力抵抗，但为时已晚，在日军陆空优势兵力进攻下，节节败退。

1938年4月，宋哲元渡黄河到郑州，以病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接受其辞职，宋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染肝病，遂离职上衡山疗养。后又患脑血栓，转至四川灌县疗养。1940年初再移至绵阳。是年4月5日，因中风逝世。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抗日战局，曾留下“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的遗言[(3)]。国民政府颁令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主要参考资料

孙湘德、宋景宪编：《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王戍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

---

(1)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2)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70页。

(3) 孙湘德、宋景宪编：《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3页。

宋子文

朱信泉

宋子文，广东海南文昌县人，1894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基督教徒家庭，父母给他取英文名字“Paulos”（保罗）和中文名“子文”，意思是希望此儿将来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弘扬基督教的福音，像革命家孙文（中山）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洋富强之学。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字嘉树，原本姓韩，1875年随舅父前往美国波士顿丝茶店学生意，后被舅父收为嗣子，从此改姓宋。1885年他毕业于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回国后在上海任基督教牧师，后经营工商业。他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忠实支持者，曾任同盟会的总司库。他和倪桂珍婚后生有六个子女，他们是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和子安。宋子文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接受西方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富有开创和进取精神的家庭。为了培养子文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宋耀如不惜遭到基督教教友的非议和反对，把子文送到天主教会办的圣芳济学堂读书，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2年宋子文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191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纽约，进入国际银行任办事员，负责办理向中国汇款业务，同时他还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宋子文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离美回国。曾在国际银行的实践，使宋子文熟悉对华金融往来和侨汇等业务，并结识了一些美国金融方面的人员。这些经历为他回国后从事金融工作投身财政界提供了初步经验。

宋子文回到上海后，不久就被盛泽丞所罗致，请他担任汉冶萍公司上海总办事处的英文书记，负责汉冶萍公司的业务经营擘划。宋的才识颇获盛府上下的器重，后因向盛家提亲一事被拒而辞职。曾先后

经商、炒股和在银行任职。总之，这一阶段宋小试所学，均未能有所展布，从而悟出如果自己没有资本，纵有天大的学问也未必能有所作为，除非打出一个天下来由升官而发财。

1923年春，滇桂军把陈炯明部叛军逐出广州，孙中山于2月下旬由上海到达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孙中山不再用“护法”的旗帜，把所能控制的军队改称讨贼军，并宣布此后转入讨贼时期。3月1日广州大本营组成，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税收多被当地驻军截留，增税又受到商人们的反抗，截用关余则遭到公使团的武力威胁，因此广州政府在财政上一直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此时宋子文从上海来到广州，正是广州政府急需人才之际，4月22日就被孙中山派为中央银行筹备员，负责筹备工作。5月9日宋子文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副行长。由于筹集资本不易，筹备工作进展迟缓。7月中旬宋曾奉命北上，与孔祥熙同晤冯玉祥于北京，做联络工作。10月27日宋又被任命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改进盐税的征收。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由于国共合作和获得苏联的援助，广州的政治形势有所好转。3月5日孙中山严令统一广东财政，其后由于获得苏联的贷款，中央银行的开办资金才有了着落，筹备工作得以加快进行。6月广州政府令广东造币厂大量铸造银元，并通令自8月1日起所有田赋、厘捐、租税均以新造银元缴纳。8月2日孙中山遂下令设立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行长，黄隆生、林丽生为副行长，资本一千万元。在15日的开幕会上，宋子文在开幕宣言中称：“本行系国家银行，其资本由政府借款拨充，并奉政府颁布条例，俾资遵守”，“际此开幕之日，所足以为诸公告者有三：第一，自来官办银行每因借垫政费过多，遂致周转不灵。本行自当恪守条例之限制，绝不敢稍有瞻徇。第二，省银行滥发纸币，前车可鉴。本行现既发行纸币惟有十足准备，绝不敢超出定额。第三，为银行所最忌者，厥为投机营业，本为条例所不许。本行应与同人共勉，绝不敢偶涉冒险”[(1)]。孙中山亦亲临开幕式致训词，阐明“银行最高之信用是兑现”，并要求军政各界把中行这个资本视为谷种和母鸡，用它播种下蛋，发展经济和生产；开展汇兑免受外

国人高汇兑水之苦。中行纸币要十足兑现，一定没有广东省立银行纸币的毛病。

中央银行开业后，由于能确实遵守上述主旨，各项业务都能正常进行，所发行的纸币甚至在不受广州政府控制的地方也能行使。该行信誉日增，宋子文在广州也因此崭露头角。此外对广州财政的开源节流方面，宋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积劳成疾，抵京后竟一病不起。1925年2月上旬，宋被电邀至北京参加照料病人和办理身后各事，并是《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8月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并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和省商务厅长的兼职。宋继廖仲恺之后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的主要负责人。二次东征胜利后，省政府将广东九十四县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宋被任命为广州各属行政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除通过政治、党务、军事等决议案外，还通过了《关于财政决议案》，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期内迅速统一财政。随后宋签发广东省财政厅的通电，要求各军政单位核实经费，确定预算案；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和金库独立[(2)]。3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在此期间整理财政的具体措施有：清理田赋和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募集国内公债与金库券等。由于广东军事政治渐趋统一，为财政的统一和整理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25年广东的财政收入为二千五百一十八万二千元[(3)]，而1925年10月至翌年9月底，即宋任财长的第一年，财政收入猛增至八千零二十万余元[(4)]。宋子文在

广州理财获得了初步的成效。

随着两广的统一，国民党于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经过一系列战斗，到9月上旬攻克汉口，10月10日光复武昌。由于革命重心已移至长江流域，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随后宋子文被派往武汉做迁都调查和布置。12月中旬，已到达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职权。当时宋子文一身膺任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要职。1927年2月1日湖北省政府成立，宋子文又兼省府委员和财政厅长。

为解决军需和政费，武汉政府和宋子文曾采取一些措施，如发行公债、征收附税、设立银行和统一财政等。由于连年战乱，当时工商衰落，财力已竭，加之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敌对势力对武汉地区的封锁破坏，以及武汉当局所采取的措施也有失当之处，入不敷出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江苏、浙江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上海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金融枢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为了统一财政、增加税收，曾决定以宋子文财长兼江浙财政处长，前往整顿统筹。当3月28日宋奉派抵达上海时，蒋介石已于两天前抢先委派了江浙地区的财政负责人，上海经济界因而不与宋氏接洽。好不容易宋向上海各银行、钱庄借到三百万元，却被蒋介石截去，“仅由苏俄之远东银行借得五十万元接济汉口”[(5)]。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宋子文的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也于17日被蒋查封，宋本人则滞留上海。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形成宁汉对立的两个政权。

对宋子文，蒋介石采用又拉又压的手腕。由于宋霭龄、孔祥熙的一再劝说，以及蒋介石等人的威胁和利诱，宋子文处于犹豫动摇和恐惧不安之中。6月，美国记者希安来沪，说服宋子文去武汉，宋已口

头同意，随后他在征求家人意见时遭到反对而作罢。宋对希安说，“我去武汉毫无意义”，“你知道，我其实不是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6]。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以及家族成员的影响，宋子文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开始倒向蒋介石一边；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经谭延闿劝导后，也由反对转变为赞同。

7月12日，宋自上海抵武汉，为蒋向汪精卫等游说宁汉合流。当晚他往见二姐宋庆龄，以家人骨肉手足之情来劝诱，又以外界形势险恶来威吓，企图使宋庆龄放弃革命立场或至少保持沉默。坚持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宋庆龄自然不为所动。14日，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与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蒋、汪一伙决裂。

武汉汪精卫一伙开始“分共”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除为蒋介石集团联络英美争取支持外，则为宋美龄的婚事而奔忙。为此宋子文先期到达日本，向母亲为蒋疏通一切。10月3日蒋介石拜见宋母，婚事终于获得宋母同意。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参加这次显赫婚礼的不仅有朝野诸要人、沪上的名流大亨，还有美、法、日等国的领事以及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Mark L. Bristol）。当时有人说它是“中（正）美（龄）联姻”。《上海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在一起。”蒋通过与宋美龄联姻，可以取得宋氏家族对他在争夺政权和维护统治的支持；对联系江浙财阀，筹款理财和争取美、英等列强的支持，都有巨大的作用。宋子文及其家族则可以利用蒋氏这位“宁波拿破仑”的权力杠杆，步上升官致富的终极捷径。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沪返宁，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重掌军事大权。7日宋子文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3月27日孔祥熙被选为国府委员并特派为工商部长。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一门当部长。“四大家族”的统治由此开端。

由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浩繁，宋子文出任财长时，南京的财政收入每月仅有二三百万元，支出则需一千余万元，收支相去甚远。随着二次北伐开始，军费日增，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每五日筹集一百六十万元以供军需。为此，宋除规定苏、浙、皖三省财政机关按时向南京筹解的款项外，同时采取高压手段向上海资本家筹集款项，这种做法与北洋军阀强行摊派并无区别，引起了社会不安和反对。

宋子文为获得江浙资本家的合作和控制预算，使财政工作渐上轨道，于1928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在上海和南京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由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财政专家与会；财政会议的出席者，则为负有执行财政计划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会议的结果，为南京政府岁入、岁出、债务、银行与币制、划分中央和各省财政收入等方面，获得广泛的咨询和建议。宋子文与财政专家、企业家、各级官员集思广益，沟通了朝野关系。

二次北伐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因权力、地盘的争夺连年混战，南京政府的军政费用更是猛增不已。宋子文作为蒋介石政府的“钱袋”，所采取的措施有：争取关税自主，改革国内税收，发行公债，建立国家预算，成立中央银行，改革币制废两改元等。

争取关税自主，即废除当时仍受列强控制的协定关税（值百抽五的固定税率），与各国另订新约，增加关税收入，它从1928年岁入一亿三千四百万元，上升到1931年三亿八千八百万元。由于国际上银价跌落，1930年1月1日起改用海关金单位计征，以消除银价跌落带来的损失。当时南京政府除偿还到期外债，每年可从关税中获得一亿元以上的纯收入。

宋子文大力改革国内税制，首先对积弊丛生的盐税进行改革。废除包商引岸旧制，改为就场征税和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运销、加强稽核和缉私等措施。盐税收入从1928年岁入三千四百万元，到1933年增至一亿五千九百万元，使“财政部竟能宣布不但能

逐年摊还盐债，并有余力可以清偿旧欠矣”[8]。税收明显增加了，但民众负担依然沉重。

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办理统税。所谓统税，即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另征捐税。从1928年1月颁行“烟草统税条例”开始，其后棉纱、火柴、水泥、麦粉等产品也先后实行。它对增加中央税收，促进商品流通，裁撤厘捐减少税负，客观上有着较明显的效用。1931年全国统税收入，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

为了开通借债的渠道，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承担北洋政府原有内外债务，并筹划清偿拖欠的旧债。至于举借新债，则以海关的二点五附加税的收入和对卷烟、石油征收的新税移充新债的担保，并用很大的折扣向银行取得现金。这种做法使江浙金融资本家获得高额债息，从而使他们与南京政权利害相共而拴在一起。到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时，共发行内债十一亿三千二百万元，这些资金原本可以推动私人资本投向生产发展事业的，却被蒋介石用来实现独裁统治所引起的无休止的战火所吞噬。

由于宋子文采用上述多种措施，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支出增加更快，尤其是军费开支竟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因此每年都有巨额的赤字。宋子文曾多次呼吁，需要“用一个预算代替现在这种缺乏计划的现挣现吃，而且挥霍靡费的办法”[9]。这一主张曾得到出席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人士的支持，认为控制岁出、严格预算最为重要，力促设立一个强有力的预算委员会实行财政上的控制，并要求全国裁兵，把每年军费开支压缩到一亿九千万元。上海商界人物虞洽卿为此还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南京当局要求裁兵和限制军费。蒋介石初不同意，后发现它符合自己“削藩”的意图，在全国裁兵编遣会议上用它作为向异己派系军事领袖们施加压力的舆论武器。预算制度一直是纸面上的东西，蒋向财政部索取军费从不顾及财政和预算，也是蒋、宋之间多次发生冲突的一个重

要原因。

在改革税制的同时，中央银行则于1928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子文自任总裁兼理事会主席，以留美同学陈行为副总裁。该行主要职责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财务代理人，主要业务则为国库存款、发行公债、发行兑换券、铸造和流通货币、经理外汇等。宋力图以中央银行为枢纽，加强对全国金融业的控制。随着南京政权的控制力向各省市伸延，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也迅速在各地成立，它从经济上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地方当局的控制力量。

宋子文任财长时，国内市面上流通的主要通货是银两和银元，而钞票则是随时可以向银行兑换银元的兑换券。而银两和银元间的比价常变动不定，对商品流通和债务关系造成许多不便。192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都主张废除银两，专用银元作为货币单位，以为日后采用金本位制做好准备。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先从上海实施，以规定银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实行，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改标银元单位。废两改元，一举成功。它对简化纷杂的货币、促进商品流通、发展经济、便利人民生活都产生较好的作用，并推动了中央银行的业务扩展和中行纸币在国内流通的范围，从而为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奠定基础。

在南京政府中，宋子文除主管财政金融外，还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时，为了和蒋同进退并给粤方制造财政困难，宋也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次年1月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分主军政，宋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汪精卫出国养病期间，宋曾代理行政院长。

在南京政府的外交事务中，宋子文以亲美英而著称。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时，宋支持蒋介石依靠国联调停的主

张；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宋表现出一定程度抗日积极性。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宋命令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改名为第八十七师独立旅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同年12月间，宋曾联络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把军队集中于热、察、冀地区，以抵抗日本侵略军；还号召全国一致抵制日货。但此提案被会议所否决。1933年初，日军由山海关向关内侵犯，宋曾率军政、外交、内政等部的部长北上会同张学良到热河视察，表示中央决不放弃东北，决不放弃热河；随后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初步计划。

热河抗战失败后，宋子文于是年5月出访欧美，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此行为争取欧美诸国对中国发展经济和结束对日本关税特惠待遇的理解和支持。宋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进了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并取得美国给予五千万美元以购买棉花与小麦、面粉的借款；以及争取国联的技术合作等。此行有利南京政府获得欧美经济上的支援和削弱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方面的影响，这就引来日本当局的攻击和国内亲日派的不满。加之对此项棉麦借款在用途上的分歧，以及当时“剿共”军费不断增加，每月赤字逾一千万元，筹款极感困难，遂使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矛盾加剧。

宋子文反对更多的借款，他认为“这个方针存在着毁灭、政治不稳及最后的灾难。赤字和短期借款的恶性循环，此中痛苦我久经饱尝”[(10)]。宋的态度与蒋、汪所坚持的对内镇压、对日妥协的方针相抵触。宋于10月上旬提出辞职。10月14日行政院长汪精卫携行政院秘书长曾仲鸣、外交次长唐有壬赴庐山，与蒋介石商量宋子文辞职及“剿共”经费和福建政局等问题。28日蒋介石由南昌飞回南京，为宋辞职一事经与汪精卫、孔祥熙晤商后，次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同日国民党中常委决议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职，选孔祥熙继任，并选宋为国府委员；对宋辞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则予以慰留。对于宋子文辞职原因，当时传说纷纭，比

较可信的说法是蒋、宋在政策上分歧造成的。此时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进一步向日本寻求妥协，对内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采取更大规模镇压措施；而宋则主张坚决抵抗日本，对福建事变反对武力解决，同时主张用经济和政治的办法扑灭共产党。但宋本人拒绝公开说明辞职原因。据胡汉民私下说，宋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11)

宋子文辞职后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仍保留着国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等职位。宋在官场失意，决心另辟致富蹊径。全国经济委员会当时实际由宋主持，美国棉麦借款的巨额资金则归该会分配运用。宋在为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运动”效力的同时，以近水楼台之便，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中国棉业公司”，为家族和个人牟利。1934年5月31日，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定为一千万元，共分一百万股。认股者多为一些大银行家和金融界知名人物，宋子文、子良兄弟认购六万股，孔祥熙认购二万股。在股东会上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宋子文为执行董事，执掌公司全权，宋子良被任命为总经理。他们利用与当局的特殊关系，使公司得以迅速发展，资产由1934年末的一千二百六十万元，到1936年6月扩展到一亿一千五百万元；又筹集中外资本修筑成渝、杭甬、广梅等铁路，组建扬子电气公司，接管淮南路矿公司，控制上海证券交易所等，仅1936年一年，该公司即获利一千九百一十四万元。

宋子文还伙同蒋、孔攫夺中国银行。在当时国内金融界，中国银行是首屈一指的大银行。1934年该行的业务情况，比中央银行的现金多百分之五十，存款多一倍许，有价证券多一百五十倍，资产多近三倍。这些情况早已引起孔、宋的觊觎之心。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对南京财政当局派销公债、勒借垫款，又常悭吝不给，甚至趁机抛售公债，使南京政府十分难堪。孔祥熙经与宋子文密商并请示蒋介石认可后，就对中国银行下手了。办法是增资改组，1935年3月19日以财

政部发出一张二千万元的公债预约券，送交中国银行作为增资的股本，随后对该行进行人事改组。中国银行新董事会以宋子文为董事长，张嘉璈调离改任中央银行副总裁，所遗总经理一职由张的老对手宋汉章继任。同时增资改组的还有交通银行。孔、宋攫夺中、交两行，实为南京政权控制全国金融业的开端，也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发轫。而宋子文成为豪门巨富，正是在掌握了中国银行之后，运用金融实力巧取豪夺而得以迅速膨胀起来的。一年后，宋以国家银行的资金，投资于广东银行并将该行改组，宋自任董事长，后由其弟宋子安代理，成了宋家的私人银行，从此公私交替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又如以中国银行控制新华储蓄银行，再运用该行将自己势力扩展到众多民营企业之中。宋由金融而实业，在聚敛财富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宋的政敌曾讽刺他说："宋从政之前，不过一穷措大耳。"[(12)] 而今虽暂时丢了官，却大发其财。

在华北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年底，宋子文和宋庆龄商议请董健吾持密函去延安接洽联合抗日的问题。董健吾顺利完成任务，并携回中共中央关于联合抗日的具体建议，向宋子文、宋庆龄复命。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希望他为促成联合战线"竿头更进，起为首倡"[(13)]。

由于蒋介石仍然不愿放弃"消灭红军"的反动政策，使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迟迟不能实现，终于导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宋子文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支持下，抵制南京内部"讨伐派"的压力，以私人身份于12月20日冒险飞抵西安调停，经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后，获知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目睹蒋介石十分安全，便于次日飞返南京后向宋美龄、孔祥熙汇报。22日，宋子文陪同宋美龄再次飞西安，并经蒋介石同意由宋氏兄妹为代表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终于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26日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成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

重大转折点，宋子文是有功绩的。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却食言自肥，有些承诺未曾兑现，反把张学良长期软禁起来。宋子文为释放张学良多次向蒋劝谏，也无效果。

“七七”抗战爆发，正值孔祥熙出使英国，国内财政金融的若干重要措施，宋子文曾参与主持，如限制提存、集中外汇加强控制，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协助政府应付危局。这些措施，对当时稳定金融并转入战时轨道是必要的。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争取国际援助以利持久抗战就变得日益重要。1940年6月，蒋介石以宋子文为特使赴美，与罗斯福总统就时局交换意见并争取美援。蒋授予宋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之全权。经宋积极向美国各方面进行接洽，同年10月达成二千五百万美元钨砂借款，12月上旬又获得一亿美元借款，其中五千万美元用以支付中国从美国进口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等；另五千万美元作为外汇平准基金，用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随后宋在纽约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了环球贸易公司和中国防务补给公司，负责向美国采购军用物资。1941年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由美方收购中国锡等军用原料六千万元；美方则由进出口银行贷款五千万美元，由中方支用。同年4月1日，宋与美、英分别签订“平准基金协定”，由美国贷予五千万美元，英国贷予五百万英镑以支持法币稳定汇价。5月6日，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美拨给中国总值为二千六百万美元的物资。此外，还有如接洽购买作战飞机、招募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加强中国空军，参与攻缅计划的制订等。为争取美国援助以利抗战，宋子文是出了力的。

宋忆文在美国办事常常越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因而胡、宋常生摩擦互不相能。胡更不齿宋借公营私的行径。1941年12月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胡适在工作上就更难开展，1942年9月胡适辞职获准，由魏道明继任驻美大使。从此宋可以无所顾忌地去为所欲为，大

搞公私兼顾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加快了联合对日作战的协商。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宋子文代表中国在有二十六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它标志着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汇合，结束了长期孤立抗战的局面。随后，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被推举担任最高统帅，以美国将领史迪威任参谋长。美国援华作战物资和借款也获得明显的增加。

为了联合对日作战的需要，美、英两国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随后宋子文以外长身份主持了与美、英关于废除旧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由于英国不肯放弃在1898年强行租借为期九十九年的九龙租借地，因而使谈判拖延，至1943年1月11日才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至此得以基本上废除，全国人民都为此欢呼庆祝。宋子文则以“如愿以偿”感到“无上欣幸”[(14)]。

在中美共同对日作战中，双方也并非融洽无间的。由于缅甸作战失利和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使用的决定权，使蒋介石对史迪威产生不满。而史迪威则对中国政府、军队中的“腐败失职、混乱”提出批评。为了挽救“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赋予史迪威指挥中美一切军队作战的全权，以阻遏敌军深入，而蒋不允。这样终于导致蒋介石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宋作为外长积极支持蒋介石，并于1944年9月9日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其后美国特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也向罗斯福建议调回史迪威，以免与蒋介石破裂。10月19日，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以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极大地暴露了重庆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它受到参政会的质问并要求严惩失职官员；当时美国舆论对华亦抨击甚力。为了平息国内外的不

满，蒋介石不得不于11月20日调整中央政府人事：以陈诚代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以俞鸿钧代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以朱家骅代陈立夫为教育部长。12月4日又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诚然，孔、宋交替用，肥水不流外人田。

豫湘桂大溃败，国内外舆论哗然，却给宋子文带来取代孔祥熙的机遇。1945年5月3日，经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通过，宋由代理而被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外交部长，7月25日又被任命为“四联总处”副主席。宋子文再次掌握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外交、金融大权。

1945年4月，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会议，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宋子文与英、美、苏外长同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轮流主持大会，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以宋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联合国的产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日本投降前夕，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于8月14日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大连的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此次中苏会谈与有关协定的签订，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美国力图在远东与苏联达成妥协的产物。宋子文虑及签订这些协定日后的政治责任，乃于7月30日辞去外交部长兼职，由王世杰继任，由王代表中国政府于8月14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上签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中国行政首脑的宋子文，对战后的国计民生全无通盘筹划，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上，趁机膨胀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10月，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成立，由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命令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将接收封存的

物资交由该委员会接管。在此之前，各色接收大员涌入收复区，以接收日伪财产为名，大肆劫掠应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他们像饿狼一样，每到一地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钞票），大发劫收财。当时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宋子文亲自前往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召集各地方军政官员，会商和布置接收处理事宜。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受敌伪物资值六千二百亿元之巨[15]。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正是在接收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所聚敛的巨额财富而集大成的。国民党财政当局还用不等值的办法收兑伪钞，使收复区民众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民众愤恨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这一带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16] 连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也对行政院的工作给予严厉指责，“尤以财政经济多所贻误，均无可讳言”。

随后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全面内战，不久社会政治、经济全面恶化。宋子文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17] 坚持反动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妄想在三个月至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而宋子文则把解决财政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开放外汇市场以争取美援和抛售黄金外汇来回笼法币，弥补巨额赤字上。然而这种买办商人的手法，仅仅有利于国民党特权阶层化公为私和美国商品似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民族工业和农业进一步遭到摧残，南京政府掌握的为数有限的硬通货，则迅速濒于枯竭。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国库尚存有六百万两黄金和九亿美元外汇，及至1947年2月爆发争购黄金潮而无法收拾时，已抛出黄金三百五十一万两，占存金的百分之六十，而九亿美元外汇亦所剩无几。由于停售黄金和禁止外币买卖，则牵动物价狂涨不已，法币呈加速恶性通货膨胀。当时南京、上海的一些报刊公开抨击宋子文，要求将宋等有关人员撤职查办。国民党内政学、CC等派系则趁机攻讦。为了推

卸责任，蒋介石大骂宋子文是“败家子”。傅斯年则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署名文章，实际成了倒宋的“檄文”。随之而来的是监察院的彻查，立法院、参政会的质询。宋子文陷于“四面楚歌”之中。3月1日宋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随后又被免去行政院绥靖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务。

宋子文的去职，除责有攸归，也有代蒋受过的一面，因此得到蒋介石的极力庇护，不久监察院的弹劾案也就石沉大海了。4月1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宋子文为国府委员。9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宋又当选中执会常委。9月13日宋子文发起募集国民党基金，捐献他持有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隔了一周行政院竟决议以宋子文代罗卓英为广东省主席。

1947年9月30日，宋子文走马到广州就任广东省主席一职，11月15日兼广州行辕主任，集广东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梦想把广东建成抵御中共的“堡垒”，大力整顿和扩充了省政府所辖的武装。在经济上他想利用美国资金、器材和技术人员，在广东建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广东、华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宋统治广东一年多时间，除修筑了黄埔港、黄埔公路及粤汉路通黄埔的支线外，其他所成不多。但宋利用所掌握的省府权力成立的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燃煤供销委员会和物资调节委员会，则加紧对重要物资控制和垄断，从中牟取暴利。此外大炒金钞，套购港汇，操纵广州金融市场，并趁机把从政以来所掠夺的巨额财富及早转移至香港和海外。

在中国大地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迅速胜利，标志着蒋介石统治集团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的军事力量已基本被摧毁。蒋介石所面临的是：战场上已无可战之军；币制改革的骗局破产已使民心丧尽；宋美龄赴美乞援受到冷遇；加之各界反对继续内战呼吁和平声浪日高，桂系趁机逼宫。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同日宋

子文也辞掉了广东省主席之职，于24日携妻张乐怡前往香港暂住。此时宋对南京的“和平”攻势和“长江天堑”尚存有幻想。3月下旬宋曾一度由港回到广州，与孙科及在穗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晤谈，随后去溪口见蒋介石。宋自称此行是为处理与家族有关的私人事务。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4月21日晨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被中国共产党列为主要战犯之一的宋子文在香港再也待不下去了，5月16日携妻赴巴黎，6月9日由巴黎飞抵纽约。

宋子文到美国之后，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向美国乞求军事和经济援助，8月与宋美龄商量后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但国内形势发展更快，解放军已向华南发展，8月5日解放长沙，10月15日解放广州，12月26日解放成都。中国人民革命迅速胜利，粉碎了宋子文一伙期望依靠美国援助使国民党政府苟活下去的美梦。

宋子文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8月5日美国公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指责蒋介石“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18)]。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宋家的动产大都存在旧金山宋家开办的广东银行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曾对作家默尔·米勒（Merle Miller）说过这样的话：“他们都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三十八亿美元中偷去七点五亿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去圣保罗搞房地产，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19)] 宋子文拥有财产实数，迄今所说不一。宋美龄在美的乞援活动，也受到美方的冷落，于1950年1月13日黯然回到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出，再任“总统”。为了吸取失败的教训，他着手“改造”国民党并加紧对去台军队的整顿和控制。蒋曾要求宋子文回台任职，而宋对台湾的前景已丧失信心，同时更怕蒋挖他的宦囊，因此拒绝回台。在美国，宋子文把精力用于经营他的金融事业，大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同时在金钱上支持“院外援华集团”，而自己直接出面的政治活动不多。

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在台北的别墅中住了几天。据说蒋请宋子文帮助分析美国当局对蒋“光复大陆”的态度有无变化。1969年3月，宋子文曾去香港出席幼弟宋子安的葬礼。

1971年4月，宋子文偕妻张乐怡去旧金山会友，24日晚他的老朋友设宴款待他们，宋在进餐时因一小块食物卡在气管里而引起心脏病发作，猝然故去。

---

(1) 《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23、24号。

(2) 《国民政府公报》1926年第51号。

(3) 《宋子文答记者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4日。

(4) 《宋子文财政部长呈报一年间库款收入及整理财政经过情形》，《国民政府公报》1926年第51号附录。

(5)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评述》，《国闻周报》第4卷第15期。

(6)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42—343、626页。

(7) 尚明轩等编：《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8) 《国民政府十九年财政报告书·盐务》，《中央周报》第93期。

(9) [美] 阿瑟·恩·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10) 《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6月18日。

(11) 艾萌：《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香港环球内幕秘闻社，第18页；中外出版社编：《中国豪门》，中外出版社1949年版，第4页。

(12) 《中国豪门》，中外出版社1949年3月初版，第4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4) 《解放日报》1943年1月13日。

(15)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况报告表附件（二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 《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

(17) 《新华日报》1946年6月21日。

(18) “艾奇逊为公布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1949年7月31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19)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342—343、626页。

苏炳文

程舒伟　刘信军

苏炳文，字翰章，别号铁盒，辽宁新民县人。1892年10月2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二）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苏京洵为晚清秀才，为人开明正直。

1899年初，苏炳文入私塾就学。十三岁时，他鉴于国家衰弱，屡遭侵略，以“非武力不能图存，慨然抱投笔从戎之思想”[(1)]，离家出走，徒步到奉天城（今沈阳），考入陆军小学堂。1910年毕业后，由小学堂送到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中学，系统学习军事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从奉天到北京，顿使苏炳文视野开阔。他耳闻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更为“痛心疾首”[(2)]。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甚为兴奋”[(3)]。

1912年9月，保定军官学校成立，苏炳文考入该校，为第一期步兵科。在校期间，他学习努力，训练刻苦，渐露头角。力图加强统治地位的袁世凯为扩充实力，于1914年在北京成立模范团，军校毕业生三百余人参加训练，苏炳文也被选中，并任班长。模范团以忠事元首、不入党会为宗旨，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1916年苏升任排长，次年又升为连长。苏所在部队自袁世凯死后隶属皖系，张勋复辟时，该部队在讨伐张勋中立有战功，苏因功被升任第五混成旅一团二营副营长，不久又调任北京陆军第九师三十三团二营营长。

1917年8月，北京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方面共同出兵远东。1918年苏炳文被派遣任驻海参崴支队营长，担任绥芬河以东至海参崴的护路任务，不久升任团长。1920年7月，直系联合奉系对皖系作战，苏团奉命参与战事，混战于河北涿县、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结果皖系失败，苏团被直系收编，苏炳文被任命为北京卫戍总司

令部卫队团一营营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失败。苏因籍属东北，受到排挤，愤然辞职，南游长江，旋入福建。1923年9月在福州应旧友刘春台之邀，任福建陆军第三旅参谋长，后调任第一团团长。翌年春，江浙战争爆发，苏炳文不愿卷入军阀混战，辞职回到北京，隐居不仕。

1925年11月，苏炳文应奉系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之请，任东北镇威军第十二旅参谋长。11月24日，郭松龄发动兵变，出关攻奉，改所属部队为东北国民军，苏任第一军少将参谋长。12月，郭兵败被杀，其部被张学良改编，张对参加兵变者既往不咎，苏炳文被任第六旅上校参谋长。

1926年春，苏炳文率部与冯玉祥国民军大战于河北。翌年，又渡黄河，抵上蔡，与北伐军张发奎等部激战于河南。因作战甚力，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和赏识，于1927年春升任第六旅少将旅长，1928年1月改任东北军第十七师师长，成为东北军的一员重要将领。未几，随万福麟在涿州（今涿县）参与对傅作义部的围城战。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万福麟晋升黑龙江省军务督办，苏炳文被委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国防筹备处处长及省政府委员，驻防齐齐哈尔。同年12月底东北易帜，苏于1929年1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和省政府委员。在中东路事件中，他曾多次奔走沈阳，面谒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停战，达成和平协定。1930年3月，苏调任东北军步兵第十五旅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市警备司令及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司令。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辽、吉两省，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黑龙江省。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苏炳文奋笔写下了“正气有歌文宋瑞，鞠躬报国武乡侯”的诗句[(4)]，并将全家南迁北平，以全力筹划抗战。10月，国民政府任命黑

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黑省军政界有人担心苏炳文会不服这一决定而影响抗战，但苏以民族利益为重，诚恳表示："个人的利害久已置之度外，我们军人保国御侮责无旁贷，敌如来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于倭寇绝对抵抗到底。"[5] 支持马占山领导全省军民共同抗日。11月4日，日军向嫩江桥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苏炳文派所部两个步兵团参加战斗。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1932年2月，在日伪重兵压境、威逼利诱下，马占山一度与日方妥协，后复反正。3月，伪满洲国成立，黑龙江省也挂上了伪满旗，只剩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一块净土"未被敌人占领。对驻守在这里的苏炳文何去何从，社会上议论纷纷。日伪以高官厚禄来收买他，他托词谢绝，表面上与日方相周旋，暗中则积极进行抗日准备，将从敌占区逃来的爱国学生组成学生连，以此为骨干建立步兵第九团；又在博克图军营中秘密创办了兵工厂，大量制造地雷和手榴弹。同年10月1日，苏炳文高举抗战义旗，在海拉尔召开"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和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就任该军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希望"敌忾同仇，共纾国难"，"复我国土，还我河山"[6]。会后，他率部在嫩江西岸与日伪军展开激战，亲临前线鼓舞士气，给敌人以重创。不久敌我双方又在富拉尔基进行血战，民众救国军几进几出该城，曾推进到齐齐哈尔附近郊区。日伪对苏一面用兵，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亲自电劝苏炳文投降归顺，许以高官。苏坚决拒绝。11月中旬嫩江封冻，对救国军不利，日伪军乘机出动步、骑、炮兵三万余人，配合装甲车、坦克、飞机进攻救国军。救国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损失甚重。为保存实力，苏于12月4日率军民四千人撤退到苏联境内，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1933年2月，暂寓苏联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二十余名将领，绕道欧洲归国。时张学良正在国外考察，马、苏、李应邀于5月8日抵罗马和张会晤。国破家亡，相遇异国，四人感慨而泣。他们计议

重整旗鼓，收复东北失地。苏等归国途中，备受各地爱国华侨欢迎。6月5日船抵上海，次日到达南京，旋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委员。苏炳文渴望重赴北国疆场，收复失地，但无一兵一卒，壮志难酬，深为遗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苏炳文激情满怀，屡次请缨杀敌，均未如愿。1938年5月，苏继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8月转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第三团主任委员，巡视鄂、赣、湘、桂等省。但时仅一年，他又闲居重庆，直至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炳文不满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政策，在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多次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表达心迹，并有所默契。苏炳文的所作所为，被蒋介石认为是“思想异动”，令其退休，回北平家居。1947年秋，苏炳文回到阔别多年的新民故里。次年，卫立煌主持东北军政，任苏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参议。在辽沈战役中，苏为使沈阳守敌放下武器，曾四处奔走，不遗余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炳文移居北京。1953年，周恩来亲临苏家探望，使他深受感动。此后，苏历任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和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民革副主席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5年5月22日因病逝世于哈尔滨。

---

(1) 苏炳文：《自传》（1950年）。

(2) 苏炳文：《自传》（1950年）。

(3) 苏炳文：《自传》（1950年）。

(4) 苏炳文秘书郭竹书的回忆（未刊稿），中共辽宁省委地方党史编委会存。

(5) 贾文琦：《马占山抗日的见闻》（未刊稿）。

(6) 印维廉、管举先编：《东北血痕》第3章，中国复兴学社1933年版，第52页。

苏曼殊

熊尚厚

苏曼殊，原名戩，字子谷，后改名元瑛、玄瑛，出家后法号曼殊，曾用过的名号有四十多个。苏家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其父苏杰生，名胜，字仁章，在日本横滨充英商万隆茶行买办，娶有一妻三妾，长妾河合仙是日本人。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十）生于日本横滨，其生母是日本一位叫若子的下女，他出生后未满三个月，生母就与苏杰生脱离关系，独自返回自己的家乡，曼殊幼时由河合仙抚养，以后他只知河合仙是自己的生母。

苏曼殊六岁时，随嫡母黄氏回到广东香山老家，翌年随乡儒苏若泉读书，课余喜欢绘画。他在家不被嫡母黄氏爱护，在校又受到同学的歧视，被人视为“异类”，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封建家庭及社会的反感，曾想去庙里当和尚。九岁那年，他父亲经商失败，从此家道中落，每况愈下。十三岁时，他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学英文。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初寄食于上海姑母家，后受表兄林紫垣的资助读书。

1898年春，苏曼殊东渡日本求学，入横滨大同学校学习，与冯自由、郑贯一诸人同学。1902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学习期间参与兴中会的活动，与廖仲恺、朱执信等结识。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年后，他转入成城学校学军事，又结识刘季平、黄兴、陈天华、蓝天蔚等人。基于爱国热忱，他先后加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以及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成为留日学生革命运动中积极的一员。

1903年9月，由于表兄林紫垣反对从事革命活动而断绝接济，苏曼殊被迫回到国内，先后在苏州、长沙、芜湖、南京、安庆等地教书；也曾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任翻译、编辑；还为了与养母河合仙团聚，曾多次前往日本。在此期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时，他满怀爱国热忱，与秦毓鎏等参加过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义准备活动，并是光复会活动的中坚分子，与革命志士陶成章、刘少白、章士钊、杨笃生、张继、章太炎、陈独秀、柏文蔚、赵声等相往还。苏曼殊一面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词客飘蓬”的文学生涯。

苏曼殊是一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杂文及诗，并作绘画，寓其反清、反帝革命激情于作品中。重要著作有《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本事诗十首》、《岭海幽光录》、《清秋弦目图》等；编译有《悲惨世界》、《娑罗海滨循迹记》、《文学因缘》、《拜伦诗选》、《燕子笺》等；绘画有《儿童扑满图》、《猎胡图》等。他用批判的武器对封建社会进行反抗，突出反清、反帝、反封建思想。其中特别强调“排满”，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传统的统治思想，对孔子持否定态度，也谴责帝国主义的奴才。他鼓吹起义、暗杀，对无政府主义颇为欣赏。他同情穷人，憎恨富人，对未来新世界主张“公正”、“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

由于对身世有“难言之恫”，加之苏曼殊生活漂泊，造成经济拮据，而思想伤感，时常有悲观厌世和颓废倾向。当上海《民国日日报》在1903年12月停刊后，他经冯自由的介绍，去香港见《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希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受到冷遇。在救国无门、生计断绝之际，他一气之下跑到广东惠州一座破庙削发为僧。苏曼殊跟着老和尚靠化缘糊口，结果受不了饥饿和僧侣的戒律，只好拿了已故师兄法号曼殊的度牒回到香港，从此即以曼殊之名行世。

其后，苏曼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文学创作，一度只身前往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地游历，热衷于佛教。时常学

佛典、学梵文、译梵文典，撰《梵书摩多体文》，钻研律宗，以苦为极，致力于佛经的研究。他主张改革佛教，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和发挥其教化作用，阐扬“唯识论”和“禅宗”的境界。同时反对崇拜偶像，针对佛教、寺庙、教徒生活，与章太炎合撰《敬告十方佛教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等文。其间，他曾应聘于曼谷青年会、锡兰菩提寺；回到国内后，曾与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帝为主旨。

辛亥革命起义前的一年左右，苏曼殊再次游历新加坡、爪哇等地，一度在爪哇惹班的中华学校教英文，当他获悉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地于1912年春回到上海，在《太平洋报》主笔政，不久加入南社。袁世凯篡权后，他一面满怀忧国忧民之情，发表《讨袁宣言》慷慨声讨；一面以“批判的武器”通过文字形式进行斗争。在《太平洋报》、《民国》、《甲寅》、《小说大观》、《青年杂志》及《南社丛刊》等刊物，先后发表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小说；杂文《南洋话》；与人合编《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等工具书；续成《燕子龛随笔》；还选编中英诗合集的《英汉三味集》，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此外，尚有《东居杂诗十九首》等诗歌问世。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统治下，“莽操尸位”，一切成空，国家和社会依旧黑暗腐败。苏曼殊深感幻灭和失望，厌恶某些原革命党人“乘时得位”，鄙视争权做官，自己宁愿卖文自给，或向朋友乞贷，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也不肯随波逐流。他对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十分悲观，厌世和颓废思想更加严重；加之长期养成狂吸雪茄，滥饮冷水，喜食摩登糖及其他甜食，且饮食无节，致使肠胃病日益严重，身体极度虚弱；由于思想厌世，看破红尘，早想结束生命，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顾。1917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后肠胃病大发，之后又患肺炎，多种疾病缠身，长期住在医院治疗。翌年2

月，他的病情恶化，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革命者，其短暂一生的主要成就是文学著作。他的诗歌、小说及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有较深的影响。其遗著主要载于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及施蛰存辑的《燕子龛诗》等书。

主要参考资料

《苏曼殊全集》，上海中央书局1948年版。

裴效维校点：《苏曼殊小说诗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朱传誉主编：《苏曼殊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柳无忌：《苏曼殊传》，三联书店1962年版。

刘心皇：《苏曼殊大师新传》，台北东大出版公司1984年版。

苏汰余

徐凯希

苏汰余，原名必润，四川巴县人。1886年6月16日（清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生。其父苏蓬仙以教书为业，家道清贫。苏汰余在兄妹九人中居长，自幼在父亲所办私塾中读书。1900年，其父前往成都西川书院任教，他同往附读三年。1903年回到重庆，继入存仁书院学习。喜爱阅读严复的译著，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曾改名苏适、苏存[(1)]。

1907年，苏汰余供职于重庆广益报社。因撰文讥讽清廷腐败无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罪恶行径，触怒当局而遭缉捕[(2)]。他以其父曾在刘象羲家任教关系，逃往汉口，在川帮德厚荣号做文书。因忠于职守，学习勤奋而受到器重。与徐荣廷共事数载，意气相投。不久，被滇帮票号天顺祥广州庄管事黄辅卿所看中，与其独生女黄冰梅结为伉俪。

辛亥革命后，德厚荣号因徐荣廷与鄂督黎元洪私交甚厚，得以承租湖北布纱丝麻四局，集股八十八万两，组成楚兴公司。徐荣廷任总经理，代表德厚荣号全权主持公司业务，苏汰余被引进公司，做徐的助手，负责文牍和财务。楚兴公司在徐荣廷主持下，经营管理很快大有起色。适逢欧战爆发，花贱纱贵，购销畅旺，连年获得厚利，引起各方垂涎。为确保承租权，苏汰余在内出谋献策，对外沟通渠道，颇为得力。

为了筹备自办纱厂，苏汰余帮助徐大量收购应昌公司韦氏父子所持楚兴股票，又从楚兴公司历年积累中调出资金，先期购买地皮，平整土地，兴建厂房。待四局被迫移交楚兴公司接办时，徐、苏等即以

历年积累白银二百一十万两，筹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兴建大兴纱厂于石家庄。又以各人历年分红，合资组成裕华纺织股份公司，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由于事先准备充分，两厂于1922年都相继投入生产。

1923年，苏汰余为大兴纱厂产量偏低事，以大兴公司董事身份，受命前往石家庄考察。经同去的公司技师石凤翔调查，认为主要是车速问题，提出应加大皮带轮直径，通过提高车速来增加产量。大兴经理张英甫则以车速为纺机设计所规定，如增加车速，电机不能负荷为由，表示反对，并提出如加快车速，不愿承担后果，两人相持不下。苏汰余经反复研究，毅然决定更换全部皮带轮，以提高车速，产量大增，很快达到裕华纱厂水平。

1927年春，徐荣廷及裕华经理张松樵看到劳资纠纷日见增多，生产每况愈下，心怀惶恐而联袂赴沪，厂务交由苏汰余负责。苏以湖北纱厂联合会主席身份，被选为全省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竭力调解有关纠纷，但对涉及裕华纱厂案件的处理，惴惴不安。适其父因脑溢血在重庆去世，他便离汉赴渝，厂务交黄师让暂为代理。同年冬，年已七旬的徐荣廷辞去裕华公司总经理，改行董事长负责制，公推苏汰余继任董事长。

苏汰余接任董事长后，独当一面，以经营稳健著称。为提高生产效率，使纱厂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十分重视和培养专业人才。裕华公司每年都向南通纺织学院招聘毕业生，将他们安置在适当岗位上，积累经验后委以重任。公司内部则办有纺织、成本会计、工业管理培训班，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员。1928年，苏汰余选派汪文竹、许伯馨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工业学校师生名义，分两批前往日本仙台丰旭纺织厂“实习”[(3)]。并以“实习”所获，对本厂生产进行改革。

在经营管理方面，苏汰余重视实地调查，经常赴各公司、厂矿考

察，直接了解经营情况。他主张集中使用资金，实行按期提取历年公积金，多赚多提，将应分年摊提的项目，一次在盈利中刷账。这样，凭借雄厚财力，平时就可以适时购入大量原棉和机物料，避免官僚资本借口贷款而进行兼并，新建企业时则可一次拨足资金。

1929年，湖北建设厅厅长石蘅青为解决鄂棉质硬短粗、品种严重退化问题，建议由湖北纱厂联合会、武汉大学、省进出口棉业公会和省建设厅共同组成湖北棉业改进委员会，以民办为主、官方协助为原则。苏汰余对此热情赞助，以省商会主席和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身份，出任主任委员。他主持扩建武昌徐家棚棉种试验场，派遣该场总技师出国深造，并聘请江、浙、沪有关专家来汉实地指导，培育出亩产籽棉二百斤，提前十五天成熟的优良品种[(4)]。后又逐渐推广到汉水流域和湖南、四川、陕西等省。

30年代初，国内华商纱厂受日纱倾销、政局不稳和税捐繁重影响，十分不景气，花贵纱贱，资金短绌，武汉民生、震寰等纱厂被迫停工或改组[(5)]。1933年，裕华纱厂首次出现棉纱全年积压，多时达一千多件。大兴纱厂则因日纱放价倾销，东北市场尽失，积压纱布达九千余件，每月亏损十余万元。为此苏汰余多次与中国银行宋汉章接洽，谋求卖厂未成。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苏派汪文竹等前往平汉路沿线，调查纱号及用户意见。同时亲往大兴纱厂，了解经营情况，发现除日纱竞销原因外，大兴内部管理混乱。厂长石凤翔忙于应酬交际，一些职员追求奢华生活，玩忽职守，以至购回原棉、机物料从不验收。许多用户因大兴棉纱条杆不匀、棉布破眼过多而改用日货。苏汰余回汉即召开董事会，亲自接任大兴总经理职务，并确定由汪文竹接任大兴厂长，以石凤翔负责筹建大兴二厂，对不合格管理人员予以撤换。

与此同时，苏汰余一反货滞减产的习惯做法，采纳徐治平减产不如增产的意见，采取避实就虚，深购远销方法，与日纱展开竞争，突破日商对市场的垄断，通过薄利多销来渡过难关。他一面与川、鄂、

湘三省绅商各界积极联系，吁请打破销区限制，加大回佣，多方疏销[6]；一面调集大兴部分人员设备，添置新式自动织机，创办西安大兴二厂，利用当地棉煤来源充足、独家经营等有利条件，占领新的销售市场。为扩大裕华、大兴两厂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苏汰余调集资金、人力，扩充生产设备，引进高压电机、改换立达式大牵伸，采用纱布加重放长，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增设小型印染厂和棉毯厂，通过向国民党军队兜售棉毯，以减少产品的积压。1933年底，大兴纱厂所有积压棉纱、布匹全部销出。1935年开始转亏为盈，1936年获利四十七万元。

1934年10月，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及天津、汉口、无锡等地分会，选派代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请愿。苏汰余作为武汉各纱厂代表前往南京，经石瑛引荐，请愿代表得以列席国民党中常会，正式提出：增加进口关税，限制外纱倾销，维护本国厂商利益；发放贷款，帮助厂商渡过难关。财政部长孔祥熙不但不予支持，反责怪厂商只会赌交易所，不思改进生产。苏汰余当场质问：请问部长，谁在赌交易所？博得一片掌声。孔哑口无言，会议无结果而散。

1936年9月，裕华、大兴两公司股东，以西安大兴二厂为基础，合股创办大华公司。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正式成立，设公司于汉口，苏汰余任董事长总理全盘。时值华商各纱厂受到外货倾销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兼并，处于困境。裕大华集团所属各企业在苏汰余主持下，因在陕西设有裕兴联合采办处收购原棉，棉花存底雄厚，得以自保和稳步发展。1937年，裕大华所属各纱厂纱锭和布机，较1923年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和百分之四十七；棉纱、棉布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六十一和百分之四百一十六，利润总额达到二千零三十一万元，相当于原始股本额的二十四倍。

1937年春四川大旱，苏汰余与徐荣廷、张松樵发起组织救灾委员会，邀请卢作孚到汉报告灾情，倡导募捐救灾。苏带头认捐，计募集十余万元救济灾民。同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苏带头出面募捐，为

前方将士募集寒衣和药品，同时出任汉口孤儿院副院长，赠款一万元，专事收容战争孤儿。不久，平津流亡学生途经武汉，他又主动赠款，以济急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上海、青岛等地纱厂停工，内地棉纱、棉布日见缺俏。除大兴纱厂地处战区，准备搬迁外，裕华、大华两厂均利用市场有利条件，更新、添置设备，极力扩大生产。武汉撤退前夕，部分年老董事以四川不产原棉，亦难运进为由，主张不迁。后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通知，决定裕华迁往重庆生产，利华煤矿一并撤迁。苏汰余即偕张松樵飞赴四川选择厂址。1938年10月，裕华、利华两厂设备近万吨运抵宜昌，货积如山，待运无期。11月，遭日机数次轰炸，棉花、布机损失严重，形势日见危急。苏多次请求聚福公司协运未成，改与民生公司接洽。双方商定采取相互投资办法，才得以用专轮将全部物资辗转运至重庆。

1939年6月，裕华渝厂落成开工，7月产纱上市，计陆续安装纱锭三万六千枚、布机二百五十余台，成为战时西南最大的民族资本纱厂。同年10月，西安大华厂迭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苏汰余暂不准备修复，拟迁往内地。因军队被服急需，军需署责令立即修复机器，开工生产，允诺在原棉、物料及运输方面尽量予以方便。苏即协调物资和人力，加紧修复厂房，先迁出纱锭二万五千枚，翌年于四川广元设立大华分厂及大兴煤矿。不久，又租进震寰纱厂内迁纱机一万六千锭，补充西安大华厂，迅速投入生产。同年，苏在巴县冰水场开办学校，帮助湖北籍流亡教师解决就业问题，免费招收附近贫苦子弟入学。

1941年7月，福生庄被撤销，经济部农本局执行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统制政策，限制棉价并直接掌握棉花采购储运业务，首先在陕西施行。因损害棉农利益，加之田赋征实政策的施行，棉农改种粮食，致使1942年陕棉播种面积锐减，大后方棉花来源更为吃紧。6月，苏汰余、潘仰山等代表裕华、豫丰、申新、沙市四厂，具名在重庆《大公

报》发表《对穆藕初先生“棉纱评议”之评议》一文[7]，引起各界关注。各纱厂提出“棉贱伤农”，“纱贱无以奖励生产”两口号广为呼吁。9月，为增加产量，调整纱价，裕华、豫丰、申新、沙市四厂于重庆冠生园招待新闻界，苏汰余等详述各厂生产情形，以及棉花物料采购运输种种困难，提出对核价管制及税捐意见，要求管制纱价必须同时管制其他物料，实行“全面管制”。不久，裕华公司董事黄师让、营业部主任何文翰、遭重庆警察局督察长东方白敲诈，被侦缉队以“抬高纱价，扰乱市场”为由捕去，几经疏通未成。苏汰余求助原农本局总经理何廉，通过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用蒋介石名义下一“无罪开释”的手令，此事方得解决。

1942年12月，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全体会员聚餐会，邵力子讲演苏联战时工业概况，苏汰余等签名发起工业界志愿节约按月献金运动推进会。1943年1月，为调剂各厂生产资金，苏汰余在重庆主持创办永利银行，股本额一千万元，裕华、大华两公司占六成，苏任董事长。设立分支行于成都、西安、兰州、广元、宝鸡、达县、平凉等地[8]。3月，苏汰余、胡西园等代表迁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商会，进谒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等。孔等避而不见，推由主管下属接见。苏汰余等对新税法提出尖锐批评，希望予以调整，当局允为从长考虑。6月，苏汰余为解决大华、广元分厂原料来源，资助陕西农业改进所推广美棉，扩大陕南植棉区计划[9]，义务代为运输、散发美棉种。同年7月，裕华渝厂被国民政府财政部管制。为逃避管制，苏汰余、黄师让利用成都纱布市场尚未管制，在四川地方势力庇护下，投资法币一亿元，设立裕华纺织公司蓉厂，1944年6月投产[10]。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苏汰余回到武汉，主持裕华等纱厂复员工作。调配充实各厂负责人员，加强生产管理，把握时机，迅速恢复生产。为缓解原棉紧缺矛盾，他恢复联合采办处，调动一切财力设法购棉。1946年，苏汰余等集股十亿法币，创办华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桐油、猪鬃出口业务。设总公司于重庆，设分公司于汉口、万县、上海、天津等地，苏任董事长，先后购买汉口美商其乐油栈，设置储油趸船于万县。

1947年，国统区通货恶性膨胀，裕大华集团所属各企业经营相继陷入困境，利华煤矿负债累累；华年进出口公司被迫转向内贸；永利银行汉口分行因做暗账被控，资金损失殆尽而被迫停业。各纱厂虽努力增开设备，生产仍未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此时，湖北参议会议长何成濬乘机谋夺裕大华董事长职。苏汰余避居庐山，以为抵制。

苏汰余担任裕大华集团董事长二十余年，历经艰难困顿，治厂有方。他平素待人诚恳、宽厚，善于听取意见、协调大股东关系，博得信任。40年代末，裕大华各厂已有纱锭十万六千万余枚，布机一千三百余台，年产棉纱五万四千余件，棉布四十八万七千余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纺织资本集团。他还私人投资于枣庄中兴煤矿、民生轮船公司、聚兴诚银行、川康毛纺织厂、大秦毛纺织厂、庆华颜料化学公司、秦丰烟草公司等。历任湖北商会联合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汉口市商会常务委员，以及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华全国工业协会、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理事、监事等职。

1948年春，苏汰余眼见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对其滥发通货、横征暴敛做法十分不满。为拒纳“戡乱救国捐”，他避走上海。同年9月10日苏汰余病逝于庐山。

---

(1) 苏光勤、苏先劬：《缅怀先父苏汰余》，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第47页。

(2) 苏光勤、苏先劬：《缅怀先父苏汰余》，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3辑，第47页。

(3) 《大兴津庄函稿》，《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写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4)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汉人物选录》，1988年版，第320页。

(5) 《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6月），第70页。

(6) 《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2月），第92页。

(7) 厉无咎：《抗日时期国民党管制后方花纱布的经过》（未刊稿）。

(8) 《新世界》月刊1944年6月号，第15页。

(9) 《永利银行档案》，《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415页。

(10) 黄师让：《裕大华企业四十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孙宝琦

孙青

孙宝琦，字慕韩，晚署孟晋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世居湖墅。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三月，曾祖讳嘉谨，妣闻氏；祖讳人凤，妣邵氏；父讳诒经，子子绶，谥号文靖，妣朱氏。孙诒经是清咸丰十年（1860）进士，于同治三年（1864）入值南书房，十年（1871）迁侍讲，光绪四年（1878）升内阁学士，曾授皇帝读，兼礼部侍郎衔，后迁工部、刑部左侍郎，调户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

孙宝琦早年“好经世之学”，“性不喜帖括，故两应科试即弃去”。光绪元年（1874）逢恩诏，孙承父荫得到从四品荫生的身份，未经考试，又于光绪十五年（1889）遵例改承正二品荫生。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即以二品荫生资格经钦派大臣在上谕馆考试取列一等，由吏部带领引见，分在刑部贵州司学习行走。光绪二十年（1895）十二月遵例报捐候选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经升任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奉调发往北洋差遣委用。九月委办淮军行营银钱所，二十二年（1896）正月派稽查津榆铁路，十月销差，二十三年（1897）九月委兼办育才馆及开平武毅军武备学堂，二十四年（1898）五月赴京陛见后，仍回天津办理洋务局；十月经大学士李鸿章奏调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二十五年（1899）三月经李奏保二品顶戴，六月办理海河工程；七月经前直隶总督裕禄奏保，留于直隶补用，领咨赴部。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经宗人府府丞盛宣怀委办西安电报局，九月驰抵西安，于西安行在办理军机处官电，二十七年（1901）三月经政务处大臣札派检校折件，任政务处提调，办理新政。

孙宝琦日后发迹的起点，即始于庚子事变随扈西安。他因通晓

英、法文，又谙熟电码，被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事务。当时，李鸿章回京与联军首领瓦德西谈判，两地通电频密，孙宝琦日译数千言，不假手电码簿而能准确无误，赢得了慈禧和庆亲王奕劻的垂青。于是等到和谈完毕，局势暂定后，孙宝琦便以候补五品京堂擢授三品卿衔，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奉命出使法国，年底抵任。他的换帖兄弟袁世凯在保荐折中，盛赞他是奋发有为、办事精当、熟悉洋务的“济世之才”，“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向在北洋供差，历办银钱所、育才馆、武备学堂等事，皆区处精当，条理井然，而于各国政治条约均能悉心讲求”。1902年12月17日至1905年11月12日，孙任驻法大臣。翌年11月，因驻美大臣兼辖的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使事移交驻法大臣兼摄，他又兼任驻西大臣，实际事务由法馆二等参赞吴宗濂主持。

在驻法、西任内，孙宝琦考察欧洲政情，参观兵工厂及各种机器厂，深明变法之必行，外交之迫切，专才之紧要。清朝官费留学生向由在地使臣督导、稽考，孙宝琦特别强调政法、外交、经济等的专科培养，为国家储备使才。孙保荐了使才如李经方，陆徵祥、刘式训等。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如顾维钧、唐在复、陈箓、王继曾等非其僚属即其门下。孙在公使任上，屡上封奏，请朝廷定宪法、行新政，并指出，清廷在中外交涉中只抄录汉文约本，遇到交涉事件，援约论辩必因转译的语义损失而贻彼口实，因此建议清廷汇印各国通商条约、往来国书的汉洋文本，咨送各使臣及督抚，令译员日常研习，以随机应变。

辛丑之后，清廷再度上谕变法，并设立督办政务处。但往往是上有诏令而下无施行，舆论以为言路壅塞，变法徒有其表。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战，孙宝琦深知此战关系中国存亡，遂会同俄、英、比使臣胡惟德、张德彝、杨兆鋆电请清廷一面恪守中立，一面痛自更新。他稍候又上专折于政务处，倡议仿照英、德、日之制，确立宪政国体。先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议员由

军机、钦差大臣从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中选拔。此折虽未被采纳，但孙以清季大臣中首个明言立宪者而声誉鹊起，不仅原折全文见诸报端，更被舆论誉为中国“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不仅使孙宝琦暴得大名，也使“伦敦蒙难”后的孙中山找到了“联法革命”的新契机。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活动期间就曾与法人联络，计划在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以两广、闽贵为中心的独立民主政府，这正与法国扩张主义者欲巩固和拓展在印度支那既得利益相符。但由于法国对华政策以稳健的“保全论”为主导，故未答应其请求。日俄战争使西方列强对日有所忌惮，故孙中山于1905年1月抵达巴黎，一面在留欧学生中招募兴中会会员，一面与法国政经界人士接触。他提出，以法代日作为革命的后盾，要求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并允许革命党人在安南活动；而作为交换，将发动相熟的秘密会社领袖助法深入中国西南地区。双方相谈甚欢，法殖民部长莱芒泰尔（Etienne Clémentel）并交付授意安南总督襄助广西起义的密函一封。不料这封信被四个入兴中会后反悔的留学生窃取，向孙宝琦告发。孙宝琦深谋远虑，一面斥令告密者归还文件，遣人劝孙速逃；一面又将密函内容电告清廷外务部，外务部即饬令广西巡抚林绍年严加防范，并向法驻华公使提出抗议。

1905年底，孙宝琦卸任归国，次年署顺天府尹。1907年4月，因原驻德大臣荫昌丁忧回国，孙又奉使德国。当时德国正欲与中、美结成三国同盟以对抗英、日，孙宝琦奏请收回青岛主权，为廷议所格，于1908年9月卸任。归国后，因亲家奕劻奏以山东为对德外交要冲，孙曾使德，便于应付，乃于1909年10月任山东巡抚。1911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11月13日，孙氏“顺应潮流”，宣告山东独立，旋又向朝廷解释自己是“奏请独立”，以绥靖地方、伺机恢复，并劝谏清廷“速定共和政体”、“承认各省都督”、“公举全国总统”。袁世凯急派亲信前往控制山东实权，又以财政支援为交换条件，使孙在11日内又取消独立。不足一月，孙即以病免职。经此一大变故而须发皆白。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孙宝琦受聘为外交部顾问。1913年7月，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复派遣其与李盛铎以考察日本经济专使名义赴日，实际是袁政府希望获得日本的正式承认，并取缔在日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日本趁机要求满蒙五路借款优先权。10月5日，中日互换照会，同意《铁路借款修筑预约大纲》。次日，北京政府终获得日本政府正式承认。

另一方面，俄人亦伺中国内乱，于1912年11月签订《俄蒙协约》及其他囊括在蒙权利的专约，罔顾中国主权，视外蒙为己之禁脔。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俄使，严正拒绝承认该约。但俄国借口催讨庚子赔款，更仗着与英、日分别所订密约，陷中国于外交孤立，欲迫使中国承认该约。陆徵祥时任外长，历半年之谈判，始于次年5月与俄方议定六款条文，稍为维持晚清旧制。但在“二次革命”爆发前一日，该协定在国民党占多数的参议院遭到否决，陆亦称病辞职。俄人推翻前议，另行提出承认外蒙自治、认中国为其上国、中俄依《俄蒙协约》及本条款共计中蒙关系和中俄在蒙利益等四款，实质上仍欲使外蒙独立。袁镇压“二次革命”后，孙宝琦于9月接任外长，始与俄使重开谈判，要求仍依前议六款协商，但俄人不允。孙与其前后磋商十次，最终于1913年11月5日，在俄人新四款框架内，议定主件五款、附件四款。该议以声明形式发表，故无须国会批准，翌日便予以通过，11月5日双方正式签署《中俄声明文件》。前陆议各款只涉及基本立场，虽已开启祸端，但将来交涉尚有回旋余地；而孙声明虽将“外蒙为中国领土”列为附件第一条，但内容更加细化，中国既不得干涉蒙古内政与工商业，又无外交上监督的专权，而承认俄人在外蒙一切特权，实际争回的不过一个空洞的宗主权。

1914年2月，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孙宝琦又以外长而兼代理总理。5月，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孙仍出任政事堂外交总长。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胶州湾租借地全境陷落。日人伺机欲使中国沦为其保护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

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二十一条”。19日，又将另一文本递交北京政府外交部，作为正式交涉的依据。当晚，孙宝琦等人被召集讨论，之后又连续两日紧急会商应对方案。讨论结果，袁令孙称病辞职，由陆徵祥接任，遂得以新外长须对案件加以研究为借口拖延时间，一面多方打探日本真实意图，一面向报界透露日方要求，鼓动舆论，争取国内外支持。

2月2日起，中日双方代表开始密谈。而孙宝琦并未赋闲，亦开始为汉冶萍公司的事情积极奔走联络。

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湖北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为清季民初中国最大的钢铁厂，1906年后盛宣怀承办，形成官督商办的格局。辛亥革命起，与袁世凯不和的盛宣怀因提议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而引发革命风潮，被清廷问罪革职，家产籍没。日人伺机邀其东渡，后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支绌，商议中日合办，不料遭到全国舆论反对，遂罢。袁就任大总统后，兼为袁、盛两家姻亲的孙宝琦在两人间斡旋，助盛讨回家产，而盛亦借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民国成立之初，盛曾致书鼓励孙从政，并谓财政与外交互为表里，而与实业相始终，当务之急是借外力修内政。这番话也成为孙宝琦在民国活动的最好注脚。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钢铁需求量激增，本对汉冶萍是个极好消息，但当时日资介入已深，而内外交困的中国政府无力收之国有，故日人于“二十一条”第三号中再次提出合办要求，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此时若孙宝琦继续以外长身份出面交涉“二十一条”恐受掣肘，而幕后专为汉冶萍事项活动则为不二人选。

密谈之初，中方即深悉若准许日人插手汉冶萍，则中国不仅是以南中国数省矿山拱手相让，更将使一独立主权国之政府受制于一公司，故提出汉冶萍为商人企业，不在国际商议范围。后被迫在《第一次修正案》中让步，请将第三号改成换文，允许汉冶萍合法自愿与日

人合作。但日方坚持不允，且以债务催迫。情势告急，盛宣怀只得通过交通部长杨士琦向袁建言，拟将公司移交孙宝琦负责。袁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4月下旬，孙借回乡扫墓为名，赴沪与盛晤谈，后又亲到大冶、汉口考察。但日方5月7日便下了最后通牒，在没有欧美外交援助的情况下，9日，袁世凯政府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附十一“关于汉冶萍事项之换文”中明确允准中日合办，中方不得擅自将其收归国有，不得向日本以外国家借资。5月底，孙宝琦入股汉冶萍，仍与盛宣怀竭力谋求最大限度地保全国利。孙一面向财政、农商两部上呈勘探报告，力争不可合办，积极联络政府补助；一面欲勘定萍乡官私矿界，并力阻日人攫取福建安溪矿山，争取将其由汉冶萍公司合办，先发制人。曾商谈向英资通惠公司借款、中交两行筹款，因国库支绌及日人阻挠，未果。1916年6月，孙被推举为领袖董事（总理），又计划筹集内债以偿日债，但遭日方阻止。

1916年4月，段祺瑞内阁成立，孙宝琦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后任税务总署督办。1920年，又转任经济调查局总裁。1922年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孙宝琦任副会长。其间，他曾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反太平洋侵地；又敦促南北合作，安内对外，但未被当局采纳。

1924年8月，孙宝琦被任命为中苏建交后第一任驻苏大使，但孙始终未赴任，使馆馆务由代办郑延禧主持。后又明令其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孙欲借之复起，但因人密告之，政府建设之名为虚，公卖鸦片为实，遂慨然辞去。由于家累太重，又仅赖汉冶萍公司车马费养活，再加上晚年误信女婿盛承泽，举债二十万元买入其名下汉冶萍公司股份而大伤血本，因此生活过得颇为拮据，不得不靠戚友周济。但孙素负政界名流的声望，沪港等地不少赈济事业都推他领衔，倒也博得清廉好施的清名。孙晚年尚存复起之志，但遇事不能果断，竟托信卜算者言，终无所作为。北伐之后，移居上海。1931年2月3日，因胃疾

发作，逝于沪上。死后葬于杭州杨家牌楼。著有《抚东奏稿》、《出使英法德三国随记》。

主要参考资料

杨恺龄辑：《孙慕韩（宝琦）先生碑铭手札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海上名人传编辑部编：《海上名人传》，文明书局1930年版。

［美］柏脱（T．B．Burt）等编，［美］勃德（A．R．Burt）译：《中华今代名人传》，上海传记出版公司。

《传记文学》，第12卷，第4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孙本文

马先阵

孙本文，原名彬甫，别名时哲，江苏吴江县人，1892年1月23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祖父是个秀才，做过乡村塾师。父亲是个贡生，任本乡小学校长，兼事蚕桑。孙本文四岁入家塾，凡十年；1905年始受学校教育，先在吴江县明体学堂就读，继转江震小学堂学习。1909年，孙考入江苏两江师范学堂初级师范科，1915年春毕业，因家庭经济困窘，即去吴江县立小学任教。同年8月，孙考取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勤奋，成绩优秀，毕业后，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任国文和哲学教员。

1920年秋，孙本文考取江苏留美公费生，次年4月赴美。先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社会学一年；1925年在纽约大学研究院得彭德尔（Binder）教授指导，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进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又专门进修社会学理论，1926年回国。孙在美国学习达五年之久，美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他尔后三十多年的政治、学术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

1926年2月，孙本文到上海，先在大夏大学任教，不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孙视此为北伐的成功，幻想通过支持国民政府的一切措施，以谋中国社会之进步。他努力介绍欧美社会学，同时搜集我国社会之材料，致力于社会学的教授与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于1927年出版。次年，又出版《社会问题》、《社会学ABC》和《人口论ABC》三书[(1)]。1929年，他到南京任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所著《社会学的领域》、《社会学的文化基础》、《文化与社

会》、《社会变迁》四书也于这年出版。

孙本文在教学之余，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社会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他与游嘉德、吴景超、潘光旦、吴泽霖等于1928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会”，作为沪宁各大学教授共同研究社会学的学术团体。1931年在北方各大学教授陈达、陶孟和、许仕廉等建议下，“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作为全国社会学者的团体，孙当选为理事，后被推为理事长。学社的宗旨是研究社会学学理、社会问题及社会行政，主要活动是开年会和办期刊：每两年一次年会，宣读论文，交流心得经验，到1948年共开了九次；期刊名《社会学刊》，孙任主编，经费与印刷均由世界书局承担，自1929年创刊至1936年共出了十五期。1943年，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年会在重庆举行，社员们为恢复《社会学刊》，派代表与国民政府社会部接洽，决定社会学社与社会部合作，于1944年创刊《社会建设》月刊，登载社会学、社会行政、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等类的论文，孙仍任总编辑。此外，他于1933年为《时事月报》社会栏编写有关人口、劳工和灾情救济等类社会资料；于1936年至1937年代编《中央日报》副刊“社会调查与研究”栏，发表农村调查等方面的材料。

1930年5月，孙本文经北大同学冯友兰和杨振声介绍，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部长是他在北大的老师蒋梦麟。不久，蒋梦麟辞职，蒋介石自兼部长，实权掌握在常务次长陈布雷手中。1931年6月孙经陈布雷、陈立夫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时孙仍兼中央大学教职，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课。他主编的《社会学大纲》上下两册于1931年出版。

1932年初，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孙本文随即辞去司长职，回中央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8月，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两年后他又教授社会学并主持系务。1941年，顾孟馀任中大校长，孙任中大师范学院院长，兼理附中校务。1944年，蒋介石自兼中大校长，孙辞师范学院院长职，复任社会学系主任。从1935年到1945年间，他相继撰写出

版了专著多种，有《社会学原理》（上下册）、《中国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四册）、《社会思想》，其中《社会学原理》被当时各大学采用作课本。

抗战胜利后，孙本文在中央大学执教的同时，继续进行社会学的著述和社会调查工作。出版的主要著述有《社会心理学》（上下册）、《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当代中国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科学趋势》。他还与人合作，根据社会调查资料写成小册子数种，如与陈依兴合著《湖南长沙崇礼堡农村调查》，与赵二喜合著《南京的工厂劳工》，与凌楚璇合著《南京市五十二教员家庭生活费用的分析》以及《南京市人口的分析》等。

孙本文在我国近代社会学界一直居于首位。他的学术思想属于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文化分析，并以此代替阶级分析，以改良代替革命。他在《社会学原理》中说："人类满足需要，解除侵迫，以调适环境而求生存者，其枢纽惟在文化。是故欲求人生之充实，与社会之进行者，惟在发展文化。要而言之，人类共同生活之中心问题，为生存之调适，而共同生活之中心要素，为文化社会学。"他所讲的社会改进，一是要保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另是要吸收欧美优良文化。所以他主张革新社会机构，调整环境状况，提高文化水平。他虽钦佩马克思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但说马克思只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并认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更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2)]；中国只有像蒋介石那样具有"伟人特质"的人作为"最高领袖"，在他的政府统制之下，方能获得进步。因此孙在论著中，拥护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法令，提倡劳资协作，主张劳工运动应由政府集中指导，推崇保甲制度是农村自治自卫最发达可靠的基本组织，宣扬"新生活运动"是现时调整我国新道德标准的基本社会运动，社会教育应经常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放弃个人党派私见，等等。这些言论，都适应了国民党统治的需要。

孙本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标榜以中间路线自居，力求超脱政治，专心学术工作，但他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是直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为维护国民党统治，他更是态度鲜明。如蒋介石发动军事“围剿”苏区时，他为《时事月报》编写《一月来之匪患与灾情》中，赞扬蒋介石的“包围封锁，步步推进”的反革命策略，说对苏区红军“若能严加封锁，使其给养断绝，则可不剿自毙”[(3)]。因此，国民党政府一直很重视他。从1941年起，他一直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泰斗”、“文坛的权威”，多次作为名流被请到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属军政人员训练班作讲演。他在教学生活以外，常常被邀兼任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工作，曾任国立编译馆社会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社会部社会行政计划委员、考试院典试委员等。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使孙本文逐步醒悟到自己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后期，他竭力推辞政治活动，倾力于社会学的教学和著述。1949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逃往上海，学校陷于无政府状态，孙本文被选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三名常务委员之一，维持校务。4月南京解放，8月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孙代表维持委员会办理校务移交，事毕，被聘为专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的社会学系撤销，孙调地理系任统计学教授，开讲“统计学与统计图表”和“国民经济计划”课。1957年，北方一些学者提出恢复社会学的主张，他表示反对，并作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专题发言。1962年孙调政治系（后改哲学系）任教，着重进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介绍与批判，并进行国民经济计划与统计学的研究。自1952年起，孙历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海学刊》编委，并被推选为江苏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委员。

1979年2月19日，孙本文病逝于南京。

(1) 这是世界书局在1928年编印的“ABC丛书”的一种。这部丛书共有七十种。

(2) 孙本文：《社会思想》，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70—176、202页。

(3) 孙本文：《五省严密封锁匪区》，《时事月报》1933年9月号第103页。

孙传芳

张振鹤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1904年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由练兵处以直隶官费生送往日本留学。1908年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孙留日期间曾混迹同盟会。1909年初由日回国，经陆军部考试，名列上等。11月13日陆军部奉清廷上谕赏给孙传芳“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1)]。发往北洋陆军近畿第二镇，任步队第五标教官。民国以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驻防湖北，他又历充该师辎重第二营营长、步兵第六团团长、步兵第三旅旅长等职[(2)]，深为湖北督军王占元所赏识。1917年升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起，王占元拘留皖系的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8月，以孙传芳代替吴职。1921年8月，“湘鄂战争”中，王占元兵败逃离湖北，28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继王兼第二师师长[(3)]。时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孙遂转依吴佩孚。

1922年5月，以英、日帝国主义对华争夺为背景的直奉战争发生，直系迅即取得胜利。奉系失败后，退守山海关外。直系曹锟、吴佩孚为了赶走安福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垄断北京政权，并对抗南方护法政府，阴谋策划抬出黎元洪充当傀儡总统，并准备恢复“民六”旧国会，演了一出所谓“法统重光”的丑剧。孙传芳在这幕丑剧中充当中了曹、吴的急先锋。5月15日，他领先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电文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4)] 28日，再次发出劝告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应同时下野的通电。6月2日，徐世昌被迫卸任，11日黎元洪被捧了出来。这是孙传芳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从此他逐步成为

曹、吴集团中的一员要将。为了夺取福建地盘，孙奉命于1923年1月率部从湖北经江西入闽，3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为福建军务督理。

孙任军务督理之前，福建政局与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与奉、皖两系的结合）的形势密切联系着。在1922年5月以后到1923年3月以前，福建境内成为皖系军人、孙中山的北伐军与直系策动的陈炯明部队错综复杂的斗争场所。孙传芳率部入闽后，经营一年，到1924年春，才把接近皖系的王永泉与臧致平部赶走。王、臧旧部退入浙江境内，接受皖系卢永祥的委任。浙卢收编王、臧旧部，成为直系齐燮元进攻浙江的借口。同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又打起来。孙传芳奉曹锟的命令，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当苏、浙两军在黄渡前线对峙时，孙传芳军突然越仙霞岭，占领衢州，使卢永祥迅速失败。曹锟政府于9月20日任命孙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孙由于收编了卢部五个师，实力大为加强[(5)]。

奉张为了援助浙卢，出兵讨直，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底，由于直系冯玉祥部和奉张秘密停战议和发动北京政变，致曹、吴兵溃失势。从此，北京政府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曹、吴虽倒，但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齐、孙、萧等仍在。他们通电表示拥段，段也愿挟他们以自重。但奉张怂恿浙江督军卢永祥向齐燮元夺回江苏地盘，于是段于12月11日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办职，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派奉军张宗昌部随卢沿津浦铁路南下。孙传芳在浙江感受威胁。1925年1月11日，他伙同齐燮元，组成“江浙联军”，以阻挡奉军前进。段为分化孙、齐联合，于1月16日任卢兼江苏督办，孙为浙江督办，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孙觉得自己有了保障，即不再参与齐、卢之争。齐受孤立，被迫宣布下野。2月初，孙、卢签订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的妥协。

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都惊恐不安。在此之前，奉军并未履行“江浙和平公约”完全从上海撤兵，至是，奉军在帝国主义的纵容下，又大批地进驻上海。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杨于9月分别到皖、苏就职。奉系势力向东南的伸张，终于又使孙传芳和奉系军阀的矛盾再次激化。孙为了自保，一面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反奉，一面拉拢江苏张謇、张一麐等地方代表人物，制造反奉的舆论[(6)]。10月中，孙出敌不意，突然向奉军发动猛攻。杨宇霆猝不及防，又恐战线过长，急令奉军撤退，于是孙军一举夺得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10月17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发布命令让孙传芳立即撤回原防[(7)]。时鄂、皖、赣三省直系军人及旧苏军师旅长多人纷纷通电响应讨奉，并电请吴佩孚与孙传芳共同主持讨奉“大计”。奉军见势不敌，即放弃苏、皖两省，将军队全部集中徐州，与张宗昌部汇合，准备反攻。11月初，孙又到蚌埠督师，与张宗昌的反攻部队交锋，在安徽固镇以南战役中，重创张部的白俄雇佣军，俘获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山东帮办军务、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并把施处决。11月8日，孙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同月底，他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任章太炎为顾问，蒋方震（百里）及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成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五省的实际统治者，也成了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8月初，北伐军进抵湖南岳州。当时主要打击的对象是盘踞两湖与河南的吴佩孚。这时孙传芳虽然在南京有些惊慌，但他还希冀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让他坐收渔利。因此，他暂时伪装中立，声称“保境安民”[(8)]。为了对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所谓“三爱主义”，来蛊惑群众。等吴佩孚在两湖挫败，北伐军于9月初进入江西时，他才慌忙地派兵迎战，并通电叫骂北伐军“共产共妻”[(9)]。9月21日，他亲赴九江督战，妄想挽回败局；但革命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孙传芳在江西战场上进行了一个半月的顽抗，仍然被打得一

败涂地。11月初，他狼狈逃回南京，陷于日暮途穷的境地。19日，他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化装潜赴天津，去会见了张作霖。在此之前，靳云鹏、王占元来往天津、南京间，虽然已为双方撮合[(10)]，但尚未合拍。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蔡园召开奉系将领会议，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使奉系将领深感惊讶和“钦佩”。孙向张作霖求救。于是，他们在反对革命军的共同基础上，化仇为友。张作霖答应派张宗昌带一部分“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孙也表示对张的衷心拥戴。11月30日，孙传芳和张宗昌等领衔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张分任安国军副司令，孙仍兼五省联军司令。会谈结束，张宗昌把直鲁联军开到浦口，孙回到南京，指挥他的部队摧垮了当时蔡元培等搞的“浙江自治”，重新夺取了浙江地盘。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了杭州，战线渐次逼近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军，组织武装起义，遭到了孙传芳的血腥镇压。先是上年10月，当孙在江西指挥作战时，已指使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镇压了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至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时，孙传芳又一次命令李宝章和各帝国主义的陆战队配合，对工人、学生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孙虽然镇压了上海工人的两次起义，但他的前方作战部队已经涣散无力，24日后，他不得不把浙江防线和宁沪移交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张宗昌代替了孙传芳，但并不能扭转他们的败局。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取得了胜利。24日，北伐军又收复了南京。孙传芳退处扬州，收集残兵败将，设司令部于蚌埠。4月12日，由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北伐停顿，才使孙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6月，张作霖企图联蒋反共，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会议，主动劝张晋升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承认取消五省联军番号，改任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军团长。早在5月底，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军已会师郑州；南京蒋介石的军队也占领了徐州。7月，安国军趁宁汉分裂，发动反攻。

孙传芳奉张作霖之命反攻徐州。由于蒋介石的背叛革命而造成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蒋军望风而溃，使孙军一战而夺回徐州，并把蒋军赶回浦口。8月底，孙传芳又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蒋、桂分裂的混乱局面，决定孤注一掷，分兵三路渡江，与蒋、桂军在京沪铁路沿线栖霞、龙潭一带激战五天，结果遭到失败，损失了数万人。从此，他再没有多少实力，只有仰承张作霖的鼻息了。1928年春，他奉张作霖的命令，任鲁西前线总指挥，和蒋军激战于金乡、鱼台、丰县；和冯玉祥部激战于曹州附近。当沿津浦铁路的张宗昌所部溃退北逃后，孙部阵脚立即混乱，他本人也逃回济南。

1928年4月10日，以蒋介石为首，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的国民党军向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发动总攻击。张宗昌在鲁南的防线未战先溃，孙传芳军在鲁西南的后路，被冯玉祥军截断而全线溃退。孙、张两人于30日离济南渡河北逃。6月初，张作霖逃离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的残部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由阎锡山派人收编。随后孙传芳即逃往沈阳，寄食于张学良门下。1929年1月10日，在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的次晨，孙害怕祸及自身，仓皇避往大连 (11)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举家迁回天津英租界。经皖系政客靳云鹏介绍，孙传芳皈依佛教，过起“念佛韬晦”的生涯。1935年11月13日下午，当他正在天津居士林清修禅院跪诵经文时，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背后用手枪刺杀 (12) 。

---

(1) 《正宗爱国报》1909年11月4日、5日、24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十月十二日）。

(2) 《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头班步兵科》，第8页。

(3) 《时报》1921年8月28日大总统令。

(4)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1946年版，第228页；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再版，第500页。

(5) 马葆珩：《齐卢之战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6)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7) 《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0日。

(8) 《孙传芳复总商会电》，《申报》1926年8月18日。

(9) 《孙传芳第二次通电》（阳），《申报》1926年9月9日。

(10) 《申报》1926年9月16日、17日。

(11) 任作楫：《孙传芳在东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深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2) 《大公报》1935年11月14日。

孙道仁

黄国盛

孙道仁，字退庵，号静山，湖南慈利人，1867年2月1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其父孙开华，系入闽湘军将领。孙道仁幼年随父在闽，好驰马试剑。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开华以署福建陆路提督职，由泉州渡台办理台北海防，镇守沪尾。法军封锁台湾的时候，孙道仁密雇帆船，把弹药藏在舱底，渡海接济驻台守军，因而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委任前敌营务处，后保加四品衔。这是孙道仁从军之始。

中法战争结束，孙道仁赴北京以荫生参加考试，任京府通判，分发顺天补官。孙道仁赴京时，携有巨金和其父孙开华在战争时抢来之古玩珍宝以通关节，孙开华又巴结攀附庆亲王奕劻，因此他得以于1890年被安置在颐和园海军水操内学堂任办事官。这一差使向来多由满洲贵族担任。

1891年，热河发生金丹道农民起义，清政府调集直、热、奉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孙道仁奉命担任后路运饷事务，往返于朝阳、赤峰、热河等处。后得赏三品衔以知府分发福建补用，不久又升为道员仍留福建补官。1893年其父孙开华死，他回籍守制。

甲午中日战争时，孙道仁被湖南提督娄云庆调用，总管庆字全军营务处兼统庆新五营，驻岳州听候调遣，议和后解职。1895年，孙道仁受闽浙总督边宝泉委任，会同督办善后局。1897年在闽统带福胜中前两营。次年受闽浙总督许应骙委任，总办全闽营务处仍统领福胜步炮等营，驻扎省城；旋又兼统福强水陆全军。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闽省官僚和洋人惊惶不安，各

国驻闽领事指名要孙道仁“出任保护之责”，孙贸然应许。孙并劝请闽督加入“东南互保”，“与各国订约保其商民教士”[(1)]。为了防范福建人民起来斗争，孙道仁照会各领事，请闽省各国商人及传教士移居省城，由他派得力军队两营严加防卫。孙道仁还密布侦探，亲自带兵严密梭巡，竭力压制民众的反抗，被时人讥为媚外。同年浦城县刘加福聚众数千人，起来反抗当地官吏的苛暴统治，孙道仁得到情报后立即传令部下，授以机宜，“擒刘加福于江山界”[(2)]。孙道仁深得清廷赏识，获二品顶戴。

《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以倡办“新政”为名设练兵处，编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并下令各省编制地方新军，借以维护垂危统治。1901年秋，闽浙总督许应骙奏派孙道仁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兼考察陆军教育。孙道仁回国后，即开办福建武备学堂，任武备学堂总办，聘日本士官和教习，教学管理等均仿日本士官学校办理。学堂毕业生赴北京考试多名列前茅，各省争相延揽，充任统带、管带者不乏其人。闽军不少军官都曾受训毕业于该学堂。孙道仁同时着手建造陆军营房、购买新式枪炮，为建立闽省新军筹谋甚力。

1902年，闽省暂编常备军左右两镇，以孙道仁本部及福强军步队数营编为常备军左镇。1903年闽浙总督许应骙被清廷免职，孙道仁也为藩司所中伤，解去左镇职，降补通判，但仍充任武备学堂总办兼充督练营务处。不久官复原职。湘人李兴锐1904年督闽，孙道仁被委任为常备军右镇兼统长门炮台。不久李离闽，将军崇善兼署闽浙总督，孙道仁被解去右镇及长门炮台统领职，改任职军政局，仍总办武备学堂。

1905年初，孙道仁代理福宁镇总兵。他奉命筹办改编常备军事宜，为使闽省武力练成一镇，变卖其父遗产不少。是年河间府秋操，孙道仁前往参观，并去上海、湖北参观兵工厂。11月，清廷正式提升孙道仁为福宁镇总兵。孙到京谢恩，朝廷赏其福字，并询问湖北张之洞枪炮厂和袁世凯秋操情形，孙受宠若惊，竭力表示效忠清廷。不久

孙道仁又世袭骑都尉之衔。1906年升任暂编陆军第十镇统制，成为闽军头面人物。1909年解去练兵处及武备学堂总办职务，因办学堂有功，清廷赏加提督衔。翌年奉命率兵前往厦门“照料保护”美国来华“游历”舰队人员。事后又往安徽参观第八、九镇会操。入京复被召见，得赏陆军副都统衔。1911年，清廷正式任命孙为福建提督。

武昌首义告捷，各省革命迅速开展。福建革命党人积极运动新军。曾任福建佐杂官职的彭寿松，设立“军警同盟会”，在第十镇发展革命力量甚众。第二十协协统许崇智是同盟会骨干会员，第三十八标标统杜持和革命党人赵声曾有联系，此时皆跃跃欲试[(3)]。孙道仁本来与革命无缘，面对是顺从还是抵制的抉择，初甚犹豫。这时福州将军朴寿制造恐怖，于福州各城门遍埋炸药，还企图把闽省新军将领诱入署中聚而坑之。孙道仁闻悉后颇为震惊，以大势所趋，遂于11月5日在马江一船中，由彭寿松做介绍人，加入了同盟会，立誓并摁手印。孙道仁与革命党人林斯琛等会商部署起义日期和计划后，于8日发出部署密令：许崇智担任前敌总指挥；与“旗界”交接各街道地带，分布进攻和堵截部队，以于山为总攻阵地，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于山观音阁；各革命与进步社团组织于当晚配合军队，紧密巡防，等等[(4)]。9日拂晓，福建新军在省城正式宣告起义，孙道仁至于山督战。经过激烈战斗，杀死了朴寿，旗兵投降；但孙道仁对闽浙总督松寿在城内吞金自杀，颇为伤感，为松寿开会追悼，“以尽寅谊”。后来他回顾辛亥经历时仍感慨地说：“余虽赞助汉族之光复，且回念先壮武公（即孙开华）谆谆训诫之辞，尤究不能免清史之讥，殊自惭也。”[(5)]

11月11日，福建成立临时政府。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郑祖荫等执旗捧印往都督府，推举孙道仁为军政府闽省都督。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后，孙道仁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福建都督。

光复后的福建情况和全国相似，革命党人涣散自满，新政权内部各派力量争权夺利，局势混乱。任参事会会长的彭寿松居功自傲，认为福建光复系他一手造成，不把都督和其他人放在眼里。第十镇官兵

虽然参加了彭组织的军警同盟会，然皆系孙道仁部属。彭寿松无法制孙，乃自设亲兵两营，由哥老会重要分子张煊、刘辅廷分任管带，使其子彭厚庵统之。彭与孙表面上虽然没有公开冲突，但内心仇结愈深。1912年初商讨正式建立“福建临时议会”时，以彭寿松为首的湘籍“旅闽人”，力主议会需特别规定“旅闽人议员专额”。同盟会会员、都督府民政科科长蒋子尊和福州《民心报》经理黄家成，因坚决反对议员专额，先后惨遭彭寿松手下帮凶的暗杀，引起舆论公愤。孙道仁无能为力，通电袁世凯、黎元洪等，要求派员来闽调解，自己愿意立刻解职，“以谢两面，而息争竞”[(6)]。不久岑春煊受袁世凯指派，乘舰船带军进入马江。这时革命党人刘伯仁、黄光弼、郑兰荪等人对彭进行了诚恳的劝说，彭寿松不得不退职，孙道仁得以暂安。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李烈钧湖口通电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这时福建省内各方群情愤激，福州警界派代表向都督府请愿，要求宣布独立。孙道仁看到袁世凯握有绝对优势之兵力，甚为胆怯；但又看到李烈钧、黄兴决心讨袁，群情难违，感到左右为难，便拖延观望，等待时机。时任民国陆军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约同刘通、黄光弼等人去见孙道仁，要孙作出“最后决定”。孙不得已，于7月19日和许崇智联名通电各省，宣布福建独立；但电文中只说：“袁氏派兵迫赣，赣省既已率先，吾闽岂容后义，特合各界会议，即日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不敢明确谴责袁世凯，也不说及出兵北伐。当时人们就看出，这是孙道仁害怕得罪袁世凯，替自己留有“余地”的表现[(7)]。孙道仁对许崇智要求出兵北伐之事只在口头上敷衍，不予行动上的支持，因此名义上虽宣布独立，但实际上并没有行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道仁于8月9日宣布取消独立，电袁世凯请罪，并把责任推诿于许崇智。袁世凯一面复电予以安慰，一面裁编闽军，调刘冠雄率李厚基的北洋军第十七旅入闽，并将闽省湘籍军队尽数遣散；随后又下令裁撤福建都督，并以李厚基为福建护军使。闽军

遣散后，孙道仁失去活动地盘，事实上等于退出了军界。孙被迫辞去都督职之后，入京受袁世凯审查。期间，孙得知原福建盐场知事饶汉祥担任参政院参政，遂托饶在袁面前为自己“辩白”。袁世凯从饶口中闻知“孙本不学无术，不过是纨袴子弟而已”[8]；又经陆军部查证，说孙道仁宣布讨袁“有不得已之苦衷”，于是袁发布策令，对孙“特予免议，以示宽大”[9]。不久孙道仁获准回籍。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道仁于翌年被聘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但不久黎元洪下台，孙也去职。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特任孙道仁为永威将军。孙奉命前往甘肃、新疆两省查勘烟禁，乘机捞了一笔贿赂之财。1923年事毕销差回京，遇上黎元洪再次被迫退位，孙失去黎氏依靠，告老回籍，购置田产。晚年应女儿女婿所请，居住厦门养老，于1932年8月去世，葬于长沙[10]。

---

(1) 孙道仁：《退庵纪事》，见孙道红撰《闽省革命战史》，抄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 孙道仁：《退庵纪事》，见孙道红撰《闽省革命战史》，抄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3) 杜伟：《闽军北伐支援胶东光复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

(4) 刘通：《辛亥福建光复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5) 孙道仁：《退庵纪事》，见孙道红撰《闽省革命战史》，抄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6) 福建私立光复中学编：《福建辛亥光复史料》，（连城）建国出版社1940年版，第226页。

(7) 郑坦：《许崇智响应“二次革命”点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

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8) 闵子南：《我对孙道仁片断之所知》，政协泉州市委员会秘书处藏稿。

(9) 见《奋兴报》1914年10月16日。

(10) 湖南慈利县党校罗祥祯调查。

孙殿英

熊尚厚　邢汉三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其父孙玉林，不务正业，后因口角而杀人，被囚死狱中。孙殿英七岁入塾，后因与同学斗殴受到老师责罚，竟放火烧了塾馆，被开除出塾，随母亲在乡里乞讨度日。

孙殿英自幼游手好闲，顽劣成性，成年后和地痞流氓厮混，出入赌窟，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赌棍。他精习赌博的骗人伎俩，诡计多端，逢赌多赢。其后他以赌博所得，从事鸦片贩卖，北去商丘，南走亳县，远至洛阳、西安，大发横财；同时浪荡江湖，广结军警胥吏。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孙在豫西投土匪队伍张治公部下，又在洛阳加入了“庙会道”，不久成了庙会道的头目 (1) 。他领着会道门分子，勾结土匪，过着打家劫舍的盗匪生涯，同时继续在洛阳一带大肆贩毒。1922年，直系首领吴佩孚在洛阳缉拿毒犯，孙无法立足，乃逃往陕县，投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下任副官。他继续贩卖海洛因、红丸于晋南、豫西一带，还买了几十支枪，拉起一支队伍，被丁香玲委为机枪连连长，次年升为补充营营长。

1924年秋，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退，孙殿英率部在陕县哗变，重操抢劫旧业，并收编散兵游勇和零星杆匪，扩充至三四千人。他借口筹集军饷，攻城掠寨，抢劫商民，数月之中，临汝、鲁山、郏县、宝丰诸县皆被掳掠。不久，孙受镇嵩军憨玉琨招抚，初任代理团长，不久即升为第五混成旅旅长，驻防密县。

1925年3月，憨玉琨部在豫西被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击败，孙殿英改投国民三军叶荃部，任旅长；不久升任第二师师长。同年秋，国民

三军西调入陕，孙即脱离国民军，率部在伏牛山一带流窜，并收编朱锡川等土匪队伍，壮大声势。这时，孙谋投吴佩孚被拒，乃率部越过京汉路东窜，在亳县大肆抢掠后，投奔直鲁联军张宗昌，在褚玉璞部任第五师师长。是年底，孙师在津浦线桑园一带袭击国民三军徐永昌部，翌年夏又参加南口战役，攻打国民军。孙上阵督战，敢冒危险，受到张宗昌、褚玉璞的嘉奖，成为直鲁联军中的一名悍将。孙部编为直鲁联军第二十五师。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湘、鄂、赣、闽次第光复，继向豫、皖、浙、苏推进。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孙殿英部被调至安徽阜阳、太和地区。翌年春，孙被任命为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驻防大名，阻抗国民革命军北上。5月，奉调南下曹县扼守。7月，孙传芳、张宗昌利用宁汉对峙之机反攻徐州，调孙殿英部去豫北。孙率部于10月中旬攻占汤阴、临淳，11月又占卫辉、彰德、淇县。1928年初被冯玉祥部第三路军孙连仲击败，退往河北。5月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力图死守津浦线，调孙殿英部到交河至河间一带。但奉军和直鲁联军阻挡不住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军的北进，全线败退。孙殿英率部先退至天津南仓，继退至蓟县、遵化马兰峪一带。6月奉军撤回关外后，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先后逃离天津。孙殿英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仍任军长。

孙殿英率部驻马兰峪一带，临近清东陵。7月上旬，他以“军事演习”作掩护，自带少数亲信，悍然炸开慈禧太后和乾隆帝的陵墓，盗走大量珍宝文物。孙盗墓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各地报刊纷纷揭载，要求惩办[(2)]。但孙拿出一部分珍宝贿送权要，得到了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等人的庇护，国民党最高当局亦不予深究，最后仅以“警戒失职”之名，调动防地移往延庆了事。

同年11月，第六军团缩编为师，第十二军编为步兵独立第二旅，孙殿英任旅长。旋奉调南下，行至山东齐河时，孙宣称“自行其是”。

1929年初他在章丘收编土匪张明九部，掳掠大批财物。其时，张宗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东山再起，纠合鲁军余孽在烟台登陆。3月孙殿英率部至黄县、蓬莱，自封为鲁东民军总司令，加入了张宗昌部，参与胶东混战。不久张宗昌败逃去日本，孙于是年冬又向蒋介石输诚，被改编为新编第十八师，移驻河南商丘[3]。

孙殿英率部到河南不久，又接受阎锡山允为军长的笼络。1930年春，他赶去太原面谢阎锡山，并与阎部各军长结为盟兄弟。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孙被阎委任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孙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他自率一部进驻亳县。蒋部王均、叶开鑫等围攻亳县不克，曾派人以二十万元收买孙；孙收了一笔巨款，但未允降蒋。7月，中原战局逆转，孙部在孙连仲部救援下突围，经杞县、朱仙镇退据山西晋城。他在晋城设修械局制造武器，设制造局制造和贩卖海洛因等毒品，设印刷局伪造钞票，竭力扩充实力。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败北下野。孙殿英立即改换门庭投张。经多次要求，孙部被张学良收编为暂编陆军第二师；1931年7月又改称第四十师，在平汉线与反蒋之石友三军交战。11月，孙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

此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孙殿英表示要抗日，于11月22日通电要求“团结御侮”，“速定出师计划”，“恢复山河”；说“公理公法均不足恃，势非诉诸武力，断难雪此奇耻”，“静待明令宣战，当执戈前驱”[4]。由于他的这一表现，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军事力量，派出韩麟符、宣侠父等人前往该军工作，广泛进行抗日爱国宣传，使该军官兵的民族觉悟有了提高。

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热河告急，平津震动。2月下旬孙殿英奉调率部驰援热河，在赤峰以北地区布防，与万福麟、汤玉麟等部共同御敌。孙部由山西晋城北上，经河北转入热西围场、隆化时，万福麟部在朝阳、陵南被击溃，日军直逼赤峰。孙部急行军赶至赤峰，部署未定，即遭日军、伪满蒙军猛烈攻击。在爱国官

兵的支持下，孙率部阻击，士兵浴血奋战，与敌相持七昼夜，歼敌四五百人；但因敌众我寡，乃从赤峰转移到猴头沟门新阵地，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后奉命撤退，绕道北山、大庙返回围场，又转至沽源，退驻察东赤城独石口。孙沿途收编了不少东北军，弥补了他在热河抗战中损失的实力。他的赤峰一战，获得了全国舆论的好评[(5)]。

是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旗帜。蒋介石担心孙殿英加入同盟军，乃委孙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职，诱其移军西开。孙踌躇满志，派人去天津大批购买军火，在冀、察、热等地广招兵马，所部拥有骑兵三师二旅、步兵三师，号称五万之众。7月中旬，孙率部抵包头后，向晋绥各地征收粮秣；并将驻晋城之余部悉数调出与大队汇集。9月，孙率部开发。

孙殿英率部西进，震惊了甘、青、宁诸省的统治者。西北地区久属马家天下，马麟主青海，马鸿逵主宁夏。而蒋介石诱孙西进，本意是借马之刀杀孙，先已密令马鸿逵中途截击孙部；更派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兼靖绥主任，节制三省军务。此时，马鸿逵、马麟、朱绍良先后通电反对孙军西来，并调兵三旅布防磴口，严阵以待。孙率部至五原、临河、陕坝（今杭锦后旗），暂停前进，一面休整、练兵，补充给养，并收编绥西骑匪杨猴小部；一面四出求援，派人分头同汪精卫改组派、陈济棠广东派、福建人民政府、陕西杨虎城以至伪满拉关系。阎锡山担心孙军滞留绥西，危及晋境，许以军械、粮饷，促其早日西去赴任。

1934年1月初，孙殿英率部进入宁夏，与马鸿逵部接火交战。初战甚为得手，一星期内接连攻占石嘴子、五响堡和馒头桥，包围平罗，兵临宁夏县（今银川市）城下；接着又占领了宁夏城外的两道堤岸。马鸿逵向南京蒋介石、北平何应钦及甘肃朱绍良告急，朱迅即调兵增援马军，何、蒋先后下令双方停战，孙不肯甘休。此时，孙军好几个将领被马鸿逵收买，1月下旬两次攻城均未能奏效。孙仍将大部

兵力集结宁夏城垣附近，但先后四次攻城均不能下，师劳兵惫，军心涣散。3月中旬，阎锡山突然出兵晋绥，截击孙的后路；何应钦更是指挥五省兵力进剿。孙殿英败退绥西，饷糈不继，内外交困，一筹莫展，于3月23日通电离军，被迫交出所部三万余人由胡宗南、阎锡山等“整编”，自己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晋祠。5月，何应钦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等顾问的虚衔。两年后，孙到平、津向各方活动，后经宋哲元提携，于1936年6月被委为察北保安司令。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在北平设立抗日民军总司令部，任孙殿英为冀北民军司令。7月28日宋哲元撤往保定，北平失陷，孙殿英在房山收容散兵及平津流亡学生，迅即集合人枪三千余，加以编练。他赶去南京见蒋介石，被委为冀察游击司令。嗣后日本侵略军沿平汉线南下，孙率队南撤，继续收编散兵游勇，发展实力。他利用地形伏击尾追之日军，将所获之战利品及生俘之五名日军解送给蒋介石邀功领赏。1938年孙部退驻河南林县一带活动，继与日本侵略军有数次作战。孙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隶属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此后三四年间，他纵横捭阖，竭力保存实力，表面上仍为抗日部队，甚至派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暗地里却与日伪势力进行勾结。

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对太行山区发动“大扫荡”，进犯林县、陵川，孙殿英部在林县被围。孙被俘，投降了日军，并派人带领日军至莲花山洞引庞炳勋降日。孙降日后，被日伪编为伪新五军，任军长；后又被扩编为第四方面军，所部各师均扩编成军。孙并兼伪豫北保安司令。他利用职权，重操贩卖毒品勾当，并倒卖金银，武装走私，获取暴利。抗战胜利前夕，孙又与蒋介石派出的熊斌等人挂上了钩，奉命进行所谓“曲线救国”活动[(6)]。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于11日广播任命十名汉奸分任各路军总指挥，孙殿英列名为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孙立即派人买通一记者编发新闻，佯称其将星夜北上维持平津治安；随即去电并派人联络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兼伪

联合银行总裁汪时璟。汪答应提供饷给，先后交出伪联币一亿元。孙派人拿了这笔钱在北平抢购黄金珠宝，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并以此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

蒋介石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内战后，孙殿英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官，隶属胡宗南部，屡向解放区进犯，兵员被歼甚多。1947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攻汤阴，孙率部顽固踞守。解放军炮火轰开县城东北，孙在缺口处仍负隅顽抗，以猛烈炮火反扑。后夺路逃出，在石庄被围，5月2日被俘。同年冬，孙在狱中病死。

---

(1) 张和宣、苏勋丞口述，张知人整理：《我所知道的孙殿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盗陵案内幕复杂》，《国闻周报》第5卷32期。

(3) 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9页。

(4) 陈觉编：《国难痛史》第3卷第4节，《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上海书店1996年版。

(5) 温仲良辑：《东北战区视察记汇编》，第51—61页。

(6) 王健民：《熊斌宣抚华北概略》，台北《传记文学》第13卷第3期。

孙渡

杨光斗

孙渡，字志舟。1898年5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出生在云南省陆良县。父亲孙绍，是陆良县有名的大绅士。孙渡少时在家乡读小学，1915年入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1917年毕业后，到滇军警卫二团任排长。几年间，追随唐继尧出兵川、黔，历任连长、营长。1922年3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孙渡升为滇军直属独立团团长。

1923年，孙渡奉调随滇中镇守使胡若愚出征四川，联合川军熊克武、石青阳等攻打川黔军刘湘、杨森、袁祖铭部，10月占领重庆。12月，重庆复为川黔军所占，胡军败退贵州，驻防遵义、毕节。

孙渡旋升任滇军张汝骥部旅长兼贵州省警务处长、云南省政府委员。1924年下半年回滇，调任云南烟酒公卖总局局长。不久又任云南省宪兵司令官。1927年2月，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联合倒唐，孙渡潜逃滇西，投奔唐继尧残部。6月，爆发了胡、张与龙云争夺云南政权的战争。7月，孙渡见唐军大势已去，又投奔龙部卢汉，随卢汉反攻昆明获得胜利，又诱迫胡、张等释放了龙云，从而成了龙的左右手。在之后两年的军阀混战中，孙帮助龙云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部及其他反对势力，统一了云南。1929年到1930年间任云南省团务总局会办。

1930年5月，蒋、桂、冯、阎大混战时，蒋介石派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令其出兵广西，抄袭桂军李宗仁后路。龙云派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统帅三个步兵师二万余人，进兵广西。孙渡为九十八师第三旅旅长。部队从昆明出发，沿途不断抓兵派款，抽收烟税，军

纪败坏，被老百姓称为“三杆枪”军队（即携有步枪、大烟枪、水烟枪）。7月，进迫南宁，围城三月余，未能攻占。10月，张发奎部和桂军在白崇禧指挥下，从柳州出发，解南宁围，并与南宁守军内外夹攻，大败滇军。龙云、卢汉率部经田州（今属田阳县）、百色，撤至乐里（今属田林县）集中，并乘机将部队整编，裁并庞杂腐败的滇军，1931年2月开拔回云南。

3月，孙渡升任龙云的参谋长，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师长请求龙云安置编余官兵，并发给饷糈。龙云既吝不给钱，又不给官，激起编余官兵的不满。各师长认为是孙渡等人在龙云左右梗阻。孙又建议龙云废除师旅建制，以团为单位，划全省为若干绥靖区，以各师长为绥靖区主任。各师长恐失去兵权，乘龙云召集他们到昆明开会之际，联合向龙云进行兵谏，并将孙渡放逐到上海。后因内部发生分裂，他们反而被龙云扣押。不久，孙渡返回昆明，仍任参谋长。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时，蒋介石令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命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到川、黔、滇边界防堵红军。孙渡认为蒋介石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红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如果红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至，云南政局便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他建议，在红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若红军进入云南，则追而不堵，将红军尽快赶出境外。孙渡的意见得到了龙云的赞赏，又命孙渡兼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指挥全责。

1935年2月，红军由云南镇雄回师东进，云南部队也随之进入贵州毕节、大方、黔西一带布防。3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贵阳，通令各军由他直接指挥，并调来大批中央军和飞机。红军佯攻贵阳时，蒋调孙渡前往保驾。孙渡率部昼夜兼程，提前赶到，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得奖金三万。由于红军行动神速，灵活多变，孙渡纵队调动十分频繁，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在安顺、贵阳、龙里、毕节、黔西、打鼓新场及川黔边境、赤水河畔、黔西南等地往返奔

命，防堵不成，反遭红军袭击。

4月下旬，红军从黔西南经兴义进入云南，孙渡军一直尾追不舍，5月中旬，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才停止追击。

1936年3月，蒋介石委任龙云为黔滇绥靖公署主任，龙仍派孙渡率第三纵队开到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一带尾追长征的红军二、六军团。

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挺进滇东北，插入宣威县境，孙渡纵队尾追红军到宣威。红六军团萧克曾写信给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但孙渡置之不理，继续尾追，在宣威来宾铺一带发起猛攻，红军伤亡数百名。随后经过两天激战，红军毙俘滇军近千人，从此孙渡不敢单独再与红军正面交锋。

4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滇军防线向西挺进，直指普渡河。孙渡纵队尾追不舍，被红二、六军团打得七零八落。红军渡过金沙江，孙渡纵队才停止尾追。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7月，龙云在云南新编五十八军，任命孙渡为军长，开赴湖北。11月，该部与云南部队第六十军、新编第三军合编，成立第三十军团，在第一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下，参加武汉会战与崇阳战役，部队伤亡惨重。12月，第三十军团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划归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1939年2月，日军侵入江西，进攻南昌。第一集团军开赴江西奉新、靖安、安义，和友军配合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弃守南昌。接着，日军向奉新、高安西南进犯，与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作战。第一集团军奉命驰援，在潦河南岸，大禾岭、白塔路、上龙岗、新形山一带与日军激战五昼夜。4月，赣北战局转稳，蒋介石严令罗卓英全力反攻南昌。第一集团军奉令在靖安、安义、奉新一线与日军作战，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由于敌我装备悬殊及指挥不

力，反攻未能奏效。7月，薛岳下令发动赣北秋季攻势，孙渡所部奉命进攻雷王殿，未克。9、10月间，华中日军向第九战区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为确保战区第一线侧背安全，命第一集团军立令孙渡率五十八军到江西宜丰、高安间之杨公圩、村前街一带与日军作战。此役重创日军，长沙会战告捷。在此期间，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高荫槐请假回滇，由孙渡代职。11月，第一集团军调往奉新、高安等地与日军作战二十余日。

1940年上半年，孙渡率第一集团军在江西潦河南北两岸袭击日军，破坏敌军交通联络，收复奉新等地。5月底，日军被逼撤退。6月，第一集团军调离江西。9月，六十军调回云南，五十八军和新三军移驻湖北通城一带整补。1941年5月，又回防江西上高等地。同年8月下旬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和12月中下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孙部五十八军都参加了作战。

1942年，日军纠集五个师团的兵力与赣中之敌合力出击，企图打通浙赣线。孙渡奉命率部参加赣东会战，与日军转战于临川、崇仁、丰城之间。9月，调驻分宜、宜春整训。1944年5月，孙部五十八军参加了湖南长衡会战。12月，奉命赴江西宁冈、遂川、新城一带堵截敌军。战后，就地休整，不久调驻安福、永新。

1945年初，孙渡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调驻安庆。从此，受蒋介石的拉拢与分化，逐步脱离了龙云、卢汉的控制。

抗战胜利后，孙渡第一集团军总部由安庆移往东北锦州，参加反共内战，孙渡任第六兵团司令兼东北“剿总”副司令，辖六十军、九十三军。

在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下，云南军队人心惶惶、士气低沉，一些高级军官纷纷逃回云南，军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孙渡无力控制，加上第六兵团部武装包庇走私，蒋介石便以影响军誉为由，于

1948年2月将孙渡调任热河省主席，以卢浚泉为第六兵团司令。

1949年12月初，蒋介石妄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令孙渡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他回云南活动。

孙渡回到云南，眼看全国即将解放，思想处于矛盾惶惑之中。他曾经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也读过一些进步书刊，但又不愿投向人民。云南和平解放后，他到昆明郊区潜藏了两年。1952年，“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捕。

1959年孙渡经人民政府大赦释放，其后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和第三届委员。1967年4月在昆明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一至三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孙渡：《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

王天锡：《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

郑洞国：《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龙国钧：《长春解放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孙多森　孙多钰

熊尚厚

孙多森，字荫庭，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生，安徽寿州（今寿县）人。他的父亲孙传樾，曾在李鸿章幕下参加镇压太平军，之后转任江苏记名道，在南京任洋务局总办。孙家在长江一带经营盐务，家资巨万，富甲一方。1885年孙多森中秀才，继为贡生，捐得候补同知官衔。1893年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孙氏兄弟在其叔父孙传鼎的支持下，决定开办实业。

初始，鉴于面粉业有利可图，且制造较易，孙多森派人去上海筹办面粉厂。经过两年的准备，1898年2月与其兄孙多鑫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是为国内华商第一家机制面粉厂。阜丰资本规银三十万两，获清政府准免税款，向美国购买机器，总公司设上海。1900年建成投产，日产面粉二千五百包（五百桶），孙多森任总经理，孙多鑫任协理。阜丰开办后营业颇有起色，1904年扩建厂房，增置机器。次年，国内发生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同时因日俄战后东北三省面粉销路很好，阜丰日产增至七千余包，获利甚大。是年，孙多鑫投直隶总督袁世凯幕下，阜丰由孙多森独自经管。

孙氏兄弟与周学熙是安徽同乡，并是亲戚，他们在天津都先后成了袁世凯的僚属，因而关系日益密切。先是孙多鑫在直隶同周学熙一起替袁经办启新洋灰公司、直隶滦州矿务局和天津造币厂等企业，并投资这些企业。1907年春，孙多鑫病故，袁世凯召孙多森去天津接替孙多鑫的职务。他抵津后，与周学熙共同经营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担任两公司协理。次年，周学熙在北京创办自来水公司，孙多森任该公司协理。1909年，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成立他任总办，并兼南洋劝业协赞会会董。其后直隶总督杨士骧指派孙多森会同周学熙组织

直隶出品协会，孙任协理，在天津劝工陈列所举办劝业会。1910年4月，孙任直隶劝业道，不久被人指为“庸人”，遭到直隶省谘议局的弹劾，遂辞劝业道职，仍任启新洋灰公司和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协理。他在劝业道任内，编有《直隶实业汇编》一书。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12月孙多森被袁世凯举荐，任清廷内阁和议代表，随总代表唐绍仪去上海议和。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议陷于停顿，孙回到天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他被派往安徽任实业司司长，未及一月被免职。9月，周学熙于北洋政府财政部内筹设“国家银行事务所”，10月派金邦平为总办，孙任会办。12月，周又邀孙管理中国银行，继吴鼎昌任监督。孙多森鉴于中国银行袭用大清银行的旧式管理甚为陈旧，即提出改革意见：增设分行十九处，以在政界有声望的官吏任分行负责人，而以熟悉银行业务的留学生任副职；派人前往日本考察银行业务；派员在各省调查商情；设置金库及高等银行学堂等[(1)]，很想办好中国银行。1913年4月，孙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他修订《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得到参议院的通过，由财政部公布施行。其要点是：（一）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二）资本总额六千万元，由政府先认垫一半，缴所认股份的三分之一开业，同时召募商股；（三）经理国库及公债，代政府发行货币；（四）经营买卖金银及各国货币[(2)]。5月，财政总长周学熙下台，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署财政次长代理部务，随即下手攫取中国银行。

1913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革除革命党人柏文蔚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以“皖人治皖”名义，派孙多森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7月4日，孙由南京乘“建成”号军舰前往安庆接任，遭到安徽省议会议员的反对。不久，国民党人李烈钧、黄兴、陈其美等分别在江西、南京、上海发动反袁斗争，安徽驻军胡万泰（旅长）于15日在安庆响应，发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要求孙多森辞都督职（仍任民政长），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孙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拔营前来

援救，并电请倪嗣冲出任皖北司令。17日，安徽宣告独立，孙被胡万泰软禁于都督府。后经柏文蔚函胡万泰从中说项，谓“孙多森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如果释之，还将取信于天下”[(3)]。胡遂将孙释放，专轮送往南京，27日袁世凯下令免孙本兼各职。次日，孙在上海发电声明，谓：自“九江兵变，南京响应，安庆陷入危地”，为了“权宜暂维秩序，环迫宣布独立”，“自十六日起凡有安徽民政长印信及孙多森私印各项文件，均非出自多森，多森不负责任”[(4)]。其后，孙经海路至北京，向袁解释安庆事变，取得袁的谅解。

8月3日，袁世凯宣布孙多森并未参加“叛事”，随即派他为赴日实业调查专使，前往日本考察。1914年5月，顺应日本的投资要求，孙多森、王克敏、陆宗舆、曹汝霖、杨士琦、李士伟与日人中岛久万吉、仓知铁吉、尾畸敬义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一投资公司）。6月，经农商部批准开业，资本五百万日元，中日各半，于东京设本店，北京设总营业所，上海设分所，孙任总裁。

袁世凯为了筹备帝制，于1914年5月设立参政院，指定周学熙、孙多森等人为参政。10月，袁拨官款六十万元在北京开办“通惠实业特种公司”以辟财源，孙多森和周学熙任筹办人，列名发起者还有袁克文、张镇芳、李士伟、梁士诒等三十人，资本定额五百万元，招商股九十万元，实收一百五十万元，由孙任议长（一说任临时总裁）。通惠实业公司经办银行、仓库、保险及其它农工实业，在北京设总公司，上海、汉口设分公司[(5)]。继后，该公司以资本六万元并招商股十四万元，在烟台创办通益精盐公司；集股三十万元于河南新乡开办通丰面粉厂；并创办天津通孚堆栈及上海沪丰堆栈、协孚地产公司等企业。

1916年4月，孙多森筹办中孚银行，作为其企业的金融机关，资本定额二百万元，由通惠实业公司投资六十万元，招商股四十二万元，实收一百零二万元，于11月开业。中孚银行设总行于天津，经营

信托、储蓄、汇兑、押汇、贴现及金银买卖等业务，孙自任总经理，聂其炜任协理。次年3月，该行在北京（初设分号）、汉口（初设通汇处）、上海设分行；继后又与广东银行、中国银行定约，于镇江、扬州、徐州、南京、无锡、苏州、广州、香港、绍兴、宁波、杭州等地设立特约通汇处。1918年中孚银行开办国外汇兑，通过美国花旗银行和运通银行、日本第百银行代办国外汇兑[(6)]，为我国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一个发展的好机会，上海阜丰面粉厂的营业进一步发展，获利更巨。1919年孚丰增资至七十万银两，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五四运动抵制外货的影响下又得到了发展。同年7月6日孙多森患糖尿病于天津病故。

孙多钰字章甫，安徽寿州（今寿县）人，生于1882年2月26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九），为孙多森的幼弟。孙多钰六岁入家塾，十二岁在家塾兼学英语。1899年随其胞兄孙多堃（字厚甫）赴美留学，1905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09年毕业。

孙多钰毕业后回国，经清政府考试，得工科进士。次年，经他舅父邮传部右侍郎李经楚举荐，任吉长铁路工程局工程师。1911年春，清政府授他为翰林院检讨，吉长铁路工程局升他为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1913年，袁世凯撤掉了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沪宁、沪杭甬两铁路管理局总办钟文耀之职，调孙至上海接任。1915年，他被调任湘宁铁路工程局总办。1918年，美国停止湘宁铁路借款，该路工程计划被取消，他改任珠钦、湘鄂两铁路总办。

1919年夏，孙多森病逝，孙多钰即辞去铁路总办职，接任北京通惠实业公司总裁和中孚银行总经理。1920年10月，孙多钰任督办浦口商埠管理局局长。1923年1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推荐他任交通部次长，他将通惠实业公司总裁一职让给孙多森之长子孙震方，但仍兼中孚银行总经理。1924年11月，辞去交通部次长，专任中孚

银行总经理。1929年，他接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1937年起任开滦矿务局天津局华经理（买办）。他是国内民族工业资本集团中“通孚丰财团”（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和阜丰面粉公司）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声名颇著的大实业家。194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以《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训令中孚银行停业清理，将中孚银行夺为官僚资本所控制，其后他仅挂名为中孚银行副董事长。

1951年4月26日，孙多钰病逝于天津。

---

(1) 聂其炜：《我和一九一三年的中国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2) 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及附录二《中国银行则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3) 孙锡三：《孙多森传》（未刊稿）。

(4) 上海《时报》1913年7月28日第3版。

(5) 上海《时报》1915年10月22日第3版。

(6) 《汉口银行》第1卷1号，第39页。

孙衡甫

冯伯准　宋紫云

孙衡甫，又名遵法，1875年3月28日（清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幼年入塾读书，时读时辍。1906年在宁波一家鸦片烟行学徒满师后，进上海[illegible]余钱庄做账房，1909年转入升大钱庄当信房[(1)]，1910年又转入浙江银行上海分行任营业主任[(2)]，工作勤奋，后提升经理。1911年4月，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改组，孙衡甫应邀任总经理。

四明银行自1908年创办以来，因不善经营，历年亏损，股息无着，濒临破产。孙衡甫接任总经理后，先从整顿内部入手，健全组织；继而开展存放业务，经常亲自外出招揽，辛勤经营，元气渐苏，历年稍有盈余，陆续抵偿积亏。1917年四明开始发给股息三厘，以后逐年皆有增加，1922年至1927年每年发给股息一分；1927年春又从积存的余利项下，拨出规银七十五万两，分发给各股东。四明银行经过孙的悉心经营，稳步发展，面貌一新，1931年5月董事会改选，一致推选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年，四明银行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实业部分别注册领照，进一步刷新行务。

早在北京政府时期，四明银行已取得钞票发行权，为开展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孙衡甫声言“银行决不能因一时需要而增加钞票发行”；又说“争取存款，不在存款利率高低，而在银行信用厚薄”，力求该行经营作风稳健。当时，在上海经商的宁绍帮、广东帮及印度商人纷纷把款存进四明银行，四明银行1930年拥有的存款总额由1926年的二千余万元增加到四千余万元。由于存款总额迅猛上升，四明银行信誉越发提高，以致该行开出的本票，可得到洋商仓库同意提货。孙衡甫把四明银行从濒临破产的困境中挽救出来，获得蓬勃发展，他自

己也一跃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

孙衡甫对于四明银行资金的运用，侧重购买公债票和购置房地产。四明银行在上海除拥有四明别墅（在今愚园路）、四明村（在今延安路）、四明里（在今淮海路）、长兴里（在今天目路）、元吉里（在今唐山路）外，林森路（今淮海路）支行、民国路（今人民路）南市支行、南京路西区支行以及北京路总行的行屋，均属自产。房地产是四明银行的主要资产，据该行1931年的营业报告称，房地产和营业用房地共值二百七十余万元。四明银行还投资四明保险公司，占该公司股款总额百分之二十，孙衡甫兼任该公司董事长。

孙衡甫与上海许多钱庄关系密切。1931年四明银行对钱庄存放款总额达三百余万元。为了防止钞票挤兑风潮的袭击，孙预先与通商银行及一部分钱庄约定，在头寸调拨方面，遇到紧迫之时相互支持。1935年上海工商业因营业凋敝，无力归还银行借款，谣言纷起，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柜面挤兑现象。通商银行立即出面支持，大庭广众之下把银元木箱源源抬进四明银行，敞开兑现，壮大声势；同时又有一些钱庄贴出通告，代理四明银行兑现业务。四明银行本身，则星期日照常营业，便利客户前来兑现。客户认为四明银行资金实力雄厚，挤兑现象很快消除。

孙衡甫主持四明银行，独揽大权，总分行人事安排，多重用亲信，他儿子孙祥簋是宁波分行经理。四明银行设有宁波、汉口、南京三个分行，他放手让分行发展业务，指示分行经理“开支大些好”，认为业务发展，开支必大。他还对分行经理说“放款快些好”，认为只要确实掌握情况，危险不大，可以先放后报，必要的大宗放款，可用长途电话与总行联系，以简化放款手续，争取较多的放款利息。

由于孙衡甫急功近利，放款过多而不慎，以致四明银行后来吃了不少倒账，对三北轮船公司放款一百多万元就未能收回，对不少钱庄同业存放款也收不回来。又因孙衡甫在“九六公债”上投机取巧[(3)]，

使四明银行受到亏损。在上海经济不景气时，公债票和房地产一时都不能兑现，遂使四明银行形成外强中干的局面。孙为了对外缓和空气，于1935年5月托病辞职，挽出曾任工部局华董的叶琢堂代理该行总经理，自己仍任董事长。叶辛劳逾年，无法挽回困局，旋接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职务，四明总经理一职仍交还孙衡甫。孙衡甫一筹莫展，四明银行从此每况愈下。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孙衡甫曾让蛰居上海的蒋介石住在极司斐路（今万航渡路）自己寓所三个月，两人无话不谈，结为至交。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军次南昌，曾拟任命孙衡甫为北伐军经理部长，但孙婉谢，说自己只会做生意，不会做官。孙从事金融业，始终不愿卷入政治旋涡。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曾邀请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酝酿中央银行理事会名单，孙借故不到，招致宋子文的不满。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由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发行，原已发行钞票之各银行限期收回本行钞票。财政部通知四明银行须根据发行钞票总额，提出十足准备，其中现金百分之六十，房地产债券等百分之四十，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孙衡甫力不从心，不得已亲往南京见蒋介石，以期获得转圜余地；但财长孔祥熙不肯收回成命，并采用巧取豪夺的手法，不断吸进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继而放出空气，造成四明银行柜面发生挤兑现象，形势严重。孙无力招架，官僚资本乘虚而入，四明银行股东会无奈，于1936年冬决定增资减值 (4) ，将旧股按一五折减值，计折合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元，合共四百万元。四明银行自此成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由财政部派吴启鼎为董事长，李嘉隆为总经理。孙衡甫从此退出四明银行，成为一个失意寓公。

孙衡甫对地方公益事业颇为热心，曾在家乡独资兴建半浦小学的校舍，独资修筑半浦乡七华里长的石板路及其沿线的桥梁，并为重建宁波市的老江桥捐款五万元。

孙衡甫除四明银行外，先后投资的企业计有成丰钱庄、益昌钱庄、恒隆钱庄、恒赉钱庄、信裕钱庄、童涵春国药号、穿山轮船公司、长卷煤矿、苏州电灯厂、宁波永耀电灯厂、泰州泰来面粉厂及汉口元泰五金号等十余家。

1944年1月24日，孙衡甫在上海病逝。

---

(1) 信房：钱庄职工的一种职称，专司各种文书信件往来，及接洽客路的收解。

(2) 浙江银行创办于1909年，官商合办，总行设于杭州，分行设于上海，经理库款，发行纸币，实具浙江省立银行性质。辛亥革命后改行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经理国省库款，1914年金库移交中国银行，1915年7月改名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年3月官股与商股分家，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在杭州；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总管理处设上海。

(3) 九六公债：北京政府1922年7月发行，因发行总额为九千六百万元，故称。发行后，基金虚悬，利息欠发，票面价格逐步下跌。1924年，孙衡甫得知“九六公债”有付息消息，四明银行乘机大量吃进，接着票面价格趋涨。但不久苏浙发生战争，财长李思浩下台，“九六公债”没有付息，公债价格猛跌，投机者遭到失败。见上海《银行周报》第592号。

(4)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

孙洪伊

潘荣

孙洪伊，初用名洪仪（1909年宣统继位，为避讳改仪字为伊），字伯兰，天津人，1872年11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出生于天津北郊北仓村。孙的祖父与父亲均因经营长芦盐而富甲一方。祖父孙景前死后诰授中议大夫，其父孙孝曾为附贡生。1881年孙洪伊入乡塾从同邑孝廉刘士瀛读书，“资禀颇钝”，“读书不易上口”，但是其毅力非凡，“手不释卷”、“久之豁然开朗”，十几岁时所作文章已是“气象弘强沉毅，见者咸以大器目之”[(1)]。1893年考取秀才。

孙洪伊尚在科举道路上纡行时，家乡遭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清军一部据北仓孙宅抵抗，北仓失陷后，侵略军纵火焚毁孙宅并殴打其弟孙仲华，使孙家产业“十去七八”。庚子事变后不久，其弟即因伤势沉重身亡。家乡的惨祸，使早就留心“经世有用之学”的孙洪伊更深切感到清廷腐败，非革旧布新不足以匡世，迅速走向改良主义道路。

庚子事变后，孙洪伊即移居天津城里，并广泛结交有志于改革的社会名流，在严范孙等影响下，他很快成为天津地方绅士中兴办新式教育和实业的代表人物。1902年，率先在北仓废弃古庙，出资兴办北仓村蒙养小学堂。同年，捐资建立北仓集市，推进城乡自由贸易。次年孙先在北仓创天津民立第十小学堂，继而又联合妹夫罗云章，各出资一万五千元在城内户部街关帝庙创建天津电报学堂。1906年，孙洪伊卖掉祖遗田产得款四万二千元，全数用来创办一所新式中学。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同时立宪运动也日益高涨。1906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自

治局，孙洪伊乘机联合谷钟秀、温士霖等组建天津自治研究会，积极宣传提倡宪政和地方自治。次年8月，天津县士绅集会，成立天津县议事会，孙被推选为议事会议员。1908年7月，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清廷被迫谕准公布《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次年3月，孙洪伊以办学卓然，被推选为直隶谘议局议员。10月，谘议局开幕。11月，孙应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邀请，赴沪出席各省谘议局代表会议。12月，16省谘议局代表群集沪上，经过多次会议，组成了请愿代表团。孙洪伊被公推为领衔代表。在孙的组织下，请愿代表团于次年1月到京，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此后，孙还遍访王公大臣，呈交请愿书副本，吁请他们支持。但月杪清廷却发布上谕，以“反致纷扰不安”为由，拒绝速开国会。第一次请愿失败后，孙毫不气馁，依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支持创办《国民公报》，为速开国会大造舆论。第二次请愿遭清政府更严厉的拒绝，但清廷的上谕并未吓倒孙洪伊。在上谕发表第二天，孙即复电各省谘议局：“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2)] 在孙洪伊等发动下，第三次请愿的声势远远超过前两次，驻京请愿团吸收了各省各团体的代表加入，各地还组织了群众性的请愿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请愿运动压力下，清廷为缓和形势，被迫宣布，“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与此同时，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着手对请愿运动进行分化和镇压。由于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上层的妥协，请愿运动最终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而以孙洪伊为代表的立宪党人激进派在请愿运动中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同年与雷奋、徐佛苏等组“政闻社”，继续推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请愿运动结束后，立宪派头面人物均把注意力转向组织政党，孙洪伊也不例外。1911年3月，他以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邀请各省谘议局进京会议。公开说这次会议是筹商国是，实际以组织政党为主要目的。各省谘议局的议长或副议长大都应邀到京。谘议局联合会议结束后便研究组党问题。经过充分的研究和协商，确定党名为宪友会，于6月4日宣告在北京成立，孙洪伊被推举为常务干事。10月10日，武

昌起义爆发。月末，张绍曾等发动“滦州兵谏”，孙洪伊曾邀集天津士绅开会商讨，以图有所响应，但不久即因暗中支持张绍曾的吴禄贞被袁世凯谋杀，张本人亦被去职而作罢。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不久，孙洪伊赴沪与汤化龙、林长民等共同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研讨民国建立后的制度建设等问题，并为组织全国性政党做准备。10日，他出面介绍梁启超入会，并于当日向尚在日本的梁发出“入会证”。3月，孙返北京，与谢远涵等组织共和统一党，被选为理事长。与此同时，他为谋求原立宪党人协调一致，组建大党，竭力联络各方，曾多次与梁启超的同道麦孟华、汤觉顿、黄可权等商讨迎梁回国及梁归来后地位问题。8月27日，汤化龙与孙洪伊等多日谋划的第三大党——民主党宣告成立。该党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又联合了国民协会几个小团体，而精神领袖实为梁启超。10月8日，梁由日本回国，先至天津。孙率在津民主党人对梁表示热烈欢迎并主持接待工作。这一时期，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的联系，也多由孙洪伊等居间转达。孙积极筹建民主党的主要目的，本在以政党和国会限制政府独裁，而袁的倒行逆施很快就使他失望了。1913年初，他虽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为国会“韬园派”的首领，却与梁、汤等人日益疏远。5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孙颇不以为然，“自是不问事”。1913年到1914年，在梁、汤等争相向袁政府献策，并在国会中与国民党人吵骂不已时，其“蜷居陋巷，不与世通，世咸几忘其人”[(3)]。

自“二次革命”发生后，孙洪伊在政治上明显地倾向国民党一方，令袁世凯十分恼火。为躲避袁政府的迫害，1913年10月，孙在亲友帮助下，逃离北京，并辗转移居上海。1915年，袁氏称帝意图暴露，他立即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写信痛斥袁“妄行”。当时报纸盛誉其为“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4)]。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掌握北京政府实权。30日，经黎提议，段副署，任

命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孙尚在犹豫是否履任之际，又于7月13日改任内务总长。在孙中山与黄兴等敦促下，孙于27日抵北京就职。

孙洪伊到任后不久，即与段祺瑞及其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发生冲突。首先从孙的政治倾向看，他与段、徐发生的冲突实不可避免。8月，国会复会后，从原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以孙为首的“韬园系”便与由原中华革命党人组成的议员团体“丙辰俱乐部”建立了同盟关系。此同盟在国会中反对段内阁内外政策的态度最为激烈。其次，黎元洪继任后，不甘心仅给段祺瑞做盖印的工具，使府、院双方经常在权限等问题上发生争执，给孙洪伊在内阁中寻机反段反皖提供了便利条件。8月下旬，议员郭人漳等对投靠皖系的政客胡瑞霖（时任福建省省长）在湖南财政厅长任内的劣迹提出查办提案。但该提案转到国务院后，徐树铮不经国务会议，甚至不与主管的孙洪伊打个招呼，就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咨复众议院，极力为胡辩护并将此案驳回。孙闻讯后，立即质问段、徐，并诉诸舆论，搞得段与徐非常狼狈，此后段便寻机去孙。9月初，孙为整顿内务部，裁减若干冗员。被裁汰者即在段、徐煽动下向平政院控告孙违法。孙早就提出平政院为袁世凯私造的机构，当然不肯接受其“所谓”裁决，而且在此事上孙争取到黎元洪的支持。段不能容忍黎、孙联手，便于10月19日呈请黎元洪罢免孙，遭黎拒绝。在国会中，“韬园系”和“丙辰俱乐部”都坚决支持孙与段斗争，六十多名议员联合提出查办徐树铮，而“研究系”则坚决支持段，汤化龙亲自到总统府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在段、汤威胁下，黎动摇，劝孙“自请辞职”，“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或“转任其他特任官”；但孙表示，宁受免官处分，决不自请辞职[(5)]。段无奈，只好提出“自辞”，转而威胁黎。黎无法收拾，只好请北洋团体的元老徐世昌出面调停，结果，孙洪伊和徐树铮二人同时被免职。孙被免国务员后，便以议员身份返国会活动。段提出的任命任可澄、张国淦接任内务总长的提案，接连被国会否决。12月2日，“韬园系”大将温世霖在众院直接提出弹劾段祺瑞的提案。段遂决心诉诸武力解决。次年1月13日，步兵统领江朝宗派人包围孙宅，企图罗致罪名，致孙于死地。事先得

人通报，孙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国璋。孙洪伊在南京与冯国璋会谈后，仍赴沪定居。2月中旬，他发表《致各政团书》，表示不赞成对德绝交。在外交问题上采取与孙中山等一致的立场。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在孙洪伊等支持下乘军舰由上海赴广东，揭橥护法旗帜。在孙中山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9月1日，南方的国会非常会议授权孙中山组织护法军政府。10日，非常国会选举各部总长，孙洪伊当选内务总长。这一时期，孙常驻上海，为南方阵营主持宣传和联络工作。1918年到1920年，《民国日报》的重要社论大都由孙署名发表，瓦解北洋军阀政府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孙洪伊利用各种关系，做江苏督军李纯和直隶督军曹锟等人的工作，对促成直皖反目起了一定作用。孙洪伊坚决和孙中山合作，深遭政敌忌恨，1918年10月20日，其上海住所遭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因守门仆人得力，方得免遇难。

1920年底，陈炯明率粤军击败陆荣廷驻粤桂军，为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开府扫清道路。次年初，孙洪伊受孙中山之邀，赴广州。在穗期间，他与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多有接触。此后一段时间，他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孙中山在实行国共合作时，对中共领导人物李大钊格外友好并屡委重任不是偶然的，孙洪伊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孙与李关系很深，早在清末天津学界参与国会请愿运动时，尚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的李大钊与孙结交。李从法政学校毕业后，孙帮助李找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孙和汤化龙又共同资助李赴日留学。李回国后，与孙来往更加频繁。1916年下半年，孙任内务总长期间，曾聘请李代拟《地方自治法规》[(6)]。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李数次赴沪开会，都落脚于孙宅。1922年8月底，李通过孙洪伊，得以面晤孙中山，并由孙中山本人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年10月19日，孙中山急电上海国民党党部，宣布已委派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转请孙洪伊立即通知李到上海“会商”[(7)]。下旬，李由京至沪，经孙洪伊介绍，与廖仲恺会谈多次，并参加廖主持的国民党改组会议。两个月后，中国国民党“一

大”召开，李大钊代表中共出席，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建立。

1924年春，孙洪伊受孙中山委托赴南京、安庆、九江等地了解各地军阀及各界人士动向，5月26日返归天津。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政权垮台。11月，孙中山北上，12月4日抵津。孙洪伊曾前往看望。次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他十分悲痛，赴京吊唁。

孙中山逝世后，孙洪伊与广东革命政府的联系减少。北伐战争期间，他的住所曾被当时占据天津城的直鲁联军褚玉璞部查抄。1928年6月，奉军和直鲁联军从北京撤走以后，阎锡山的军队控制了天津。1930年6月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恐孙为南京方面所用，指使天津市当局软禁孙达半年之久。解禁后，孙转赴上海定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孙致书蒋介石，反对依赖国联，主张直接交涉。次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孙即发表《忠告日本全国国民书》，痛斥日本当局穷兵黩武，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侵略中国。嗣后，国民政府发表孙为国难会议成员。

晚年孙洪伊笃信佛教。1936年3月26日，在上海病故，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的小山坡上，与秋瑾墓遥遥相望。

---

(1) 陆乃翔撰：《孙公洪伊行状》，《河北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

(2) 《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3) 大林山人：《孙洪伊别传》，北京《实报》（半月刊）第19期。

(4) 《觉报》1915年12月11日。

(5) 《晨钟报》1916年10月24日。

(6) 《李大钊年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集》第3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孙玉枢：《孙洪伊生平事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3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据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件。

孙科

严如平

孙科，字哲生，1891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为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孙科生后次年，因孙中山在澳门镜湖医院就职，即随母去澳门居住；不久改在香港定居。1895年冬，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为安全计将孙科母子等送往檀香山，请哥哥孙眉照顾。孙科童年先随母习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七岁从塾师读“四书”、“五经”，十二岁入当地天主教会办的圣安东学堂就读。他聪敏好学，成绩优异，八年课程四年就学完毕业，十六岁考入圣路易士学院。

1910年3月，孙中山到檀香山开展革命活动，在大学求读的孙科决心投身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翌年从圣路易士学院毕业后，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他参加当地华侨创办的《少年中国晨报》编辑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四处演讲宣传革命，学业暂辍。1912年2月曾回国，7月再去美求学，文理两科兼学，并阅读大量名著。1916年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修政治、经济，选修新闻，翌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17年8月，孙科学成归国，正值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乃任大元帅府秘书兼外交部秘书。翌年孙中山离粤赴沪，孙科与友人创办英文《广州时报》，任副主编。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后，孙科任广州市政厅长兼治河督办。不久广州改制为市，他任首届市长，精心制订《广州市组织条例》五十七条，规定市政府设公安、工务、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确职责。他于1922年8月任“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改组国

民党的准备工作和拟订新的党纲、总章；1923年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筹措经费，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1924年秋，孙科奉孙中山之命去沈阳联络奉系张作霖，以图南北合作共讨直系。11月孙中山北上，12月4日抵津，孙科从沈阳至天津迎接，以后随同赴京。孙中山患肝癌不治去世，孙科一直随侍在侧。1925年7月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孙科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5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暨建设厅长，并重主穗政。他科学规划广州城市建设，大力整顿市容，修筑道路，其中改造西关“盖渠筑路”工程费力甚大，收效显著。他还整理税收，规定公安、工务、公用、财政各局的税收项目，去除繁多的税捐，教育、卫生经费则由政府统筹解决。

随着北伐战争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于12月迁往武汉，孙科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在二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兼青年部长等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汪精卫继而“分共”，西山会议派又先在上海另立中央，孙科深为国民党的分裂局面不安，乃积极奔走于九江、南京、上海，游说各方，并倡议成立中央党部特别委员会以求党的统一。该建议终于获得三方赞成，孙为1927年9月15日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9月20日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1月改任建设部长。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依然激烈，孙科于1928年1月与胡汉民等出国赴欧洲和中、近东考察各国政治经济状况，以求建国之鉴。6月，他们在巴黎商议未来政府应按孙中山之构想试行“五权之治”，孙科执笔起草《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办法》草案。9月回国后，他参加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0月，国民政府改组，孙科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行政院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他主掌铁道部，前期着力于整理和养护全国线路，恢复战后铁路通车，并收回日军占领的胶济路，以及将粤汉路收

归国有；同时他积极筹划修建新路，主张利用庚子赔款重点建设陇海铁路、组织勘探、设计等工作。他还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航公司，任董事长。

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后，与国民党内外许多派系矛盾激化，内战频仍，政坛风云迭起。孙科虽然不满蒋之专权独裁，但竭力避开冲突，维持合作局面。1931年2月28日，蒋悍然囚禁胡汉民。孙科素与胡交谊深厚，闻讯后愤然而起；原来拥戴胡汉民、鼓吹“再造”国民党的“再造派”成员，这时也以孙为领袖。孙离开南京去广州，以两广为基础，联络各派反蒋势力，于5月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任两组织的常务委员。两广正谋起兵北上讨蒋，“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上下强烈呼吁息争御外，宁粤双方应谈判解决“党争”。孙科出席“和平统一会议”，会后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并出任行政院长，于1932年元旦就职；但他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无力处置财政危机和外交困境，于1月25日即辞职，拱手将行政院长一职让给汪精卫。

1933年1月，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投入很大精力主持宪法起草工作，集中专家四十余人于2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张、吴分别组织起草了两部宪法草案初稿，以个人名义自行发表，听取各界反映。孙决定以吴稿为本参照张稿加以修订，提出实行内阁制，行政院负实际责任，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不负实际责任，等等。蒋介石等人大为不满，遂一再修改，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总统负实际责任，行政会议由总统任主席，行政院长对总统负责；还将总统选举改为由国民大会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并删去“军人非解职不得任总统、副总统及省长”等条文。宪法草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于1934年10月立法院会上三读通过，之后又送国民党中央审查，又经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五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反反复复修改，把十二章一百七十八条改成八章一百四十八条，再于1936年5月1日回到立法院作形式上的通过，于5月5日

公布。此后抗战爆发，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辞，将实施“宪政”束之高阁。1944年1月，张澜在成都发起民主宪政促进会，讨论“五五宪草”，要求施行民主，促进宪政。孙科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权，主张实施宪政；但蒋说条件还不成熟，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在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对“五五宪草”进行了讨论，中共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提出了许多修正意见。会议通过《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决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制定宪草修正案；但蒋介石置政协决议于不顾，在发动全面内战后于1946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自行通过了修改为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条的宪法。孙科主持起草十余年的宪法就此了结。

孙科在主持立法院期间，还在制订民法、刑法、商法及行政、司法、军事、税务等各项法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司法裁判的各种程序和手段方面，能适合于领事裁判权取消以后违法的外国人受我国法律制裁的需要。

孙科为改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不遗余力。1935年孙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改善两国关系。抗战爆发后，孙科三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很快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为争取苏联的军械援助和贷款，孙科1938年1月、3月和1939年4月三次出访苏联，取得成功。他竭力推动蒋介石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使抗战前期两国政府关系比较融洽友好；但他后来终究无力阻挡和扭转蒋介石推行反苏亲美的外交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科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0月“制宪国大”任主席团成员。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主席，孙任副主席兼立法院长。1948年3月“行宪国大”，蒋介石当上了总统，孙科被蒋提名参加竞选副总统。孙原本嫌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差使，还不如当立法院长实在，后经蒋说服，并许诺当选副总统后仍可兼立法院长，乃参加竞选。经过三次选举，虽有蒋介石及其部属的支持，孙科终究抵敌不过李宗仁而落选，仍任立法院长。1948年11月，孙科

被蒋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下野后，他于1949年2月5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对代总统李宗仁持不合作态度。后经李劝说返回南京办公，但在部分立、监委员攻击下，于3月8日辞职下野。

孙科离职后，去香港休养。1951年秋赴法就医疗养，1952年移居美国。1965年到台湾参加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后，被蒋介石留下聘为“总统府”资政，次年又被聘为“考试院”院长，1967年8月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委员长。

1973年9月13日，孙科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孙科：《八十述略》，台北《传记文学》第23卷第4—6期。

孙科：《广州市政忆述》，台湾《广东文献季刊》第1卷第3期，1971年版。

《孙科传记资料》（一）、（二），台湾天一图书公司1979、1981年版。

孙立人

颜平

孙立人，字抚民，号仲能，安徽舒城人，1899年11月1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生于庐江。其父孙熙泽，晚清举人，在山东登州府任职，民国时期曾任安徽省督察署署长、五省烟酒专卖局局长。孙立人幼年在庐江金牛山入塾，后随父至山东，在济南上小学。辛亥革命时至烟台、青岛，入高等小学。1914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土木工程系学习。他爱好体育活动，为学校篮球队长；1921年6月，还作为中国篮球队队员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结果中国队获得了冠军。

孙立人在清华学校学习九年，1923年毕业，以官费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理学学士。1925年，被北京政府保送进入美国弗吉尼亚西点军校深造，与美国著名将领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等均为校友。两年后毕业，去英、德、法、日等国参观考察，丰富了军事知识和对各国的了解。

1928年回国，先被分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不久调入中央党务学校（后改称中央政治学校）任军事训练队队长。1931年，经宋子文介绍，调至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不久又回到中央政治学校任训练班主任。1932年，宋子文在财政部设税务警察总团，以黄杰为总团长，调孙立人任第四团（特种兵团）团长。孙招收官兵严格挑选，考试拔优，中上层军官多系欧美留学生。他自编自订一套训练制度和方法，严格训练所部，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

抗日战争于1937年全面爆发后，税警总团以第八军番号开赴淞沪战场，孙立人任支队司令，率部驻于苏州河畔。10月8日，孙部接受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指挥，在大场、蕴藻浜一带抗击日军。孙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勇猛冲杀，给日军以重创。孙立人在战斗中负伤达十三处之多，经紧急处置后被送往香港治疗。翌年7月，孙又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两次立下战功。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财政部组建盐务总局缉私总队，以孙立人为总队长。孙先在湖南扩充所部，组建五个团和三个直属营，兵力达两个师。不久，缉私总队迁至贵州都匀；孙又兼贵州第三绥靖区司令。孙在总队部设八个处，三个直属营扩为团，并建教导总队。他督饬所部严格训练，还注重开展田径、体操、游泳、球类等体育活动，经常举行体育比赛和运动大会。经过一年多的训练，缉私总队成为一支精锐部队，为军统头子戴笠所垂涎。1940年，财政部盐务总局成立缉私署，戴笠施展伎俩获命为缉私署署长，而以孙立人为副署长。戴要孙交出缉私总队（又恢复旧称为税警总团），孙不允，几经周折，终究抵不过戴的权势，只留下了三个团，还受军统特务的监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国民政府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协同英军抗击日军。此时，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隶属于张轸第六十六军，孙立人任师长，集中黔南地区整训。孙请缨赴缅获得批准，并至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新三十八师的训练和素质获得军事委员会点校小组的好评，由丙种师擢升为加强师。1942年4月初，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随同所属的六十六军、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相继入缅。孙部由安兴出发，4月14日至腊戍，继抵曼德勒，策应英军和我第五军等兄弟部队抗击日本第十八师团和三十三师团东西两路的进攻。为救援被围困在仁安羌北面一带的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兵第七旅，孙调派第一一三装甲兵团星夜穿过克钦邦赶赴前线，自己也亲临现场指

挥作战。所部将士训练有素，面对侵略军斗志高昂，英勇奋战。经过两个昼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克复仁安羌，歼灭日军主力一千二百多人，解救出被围困的七千多名英军，其中还有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上将；同时还解救出被俘的英军官兵、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共五百多人。对于被日军夺去的百余辆辎重汽车及千余匹战马等，孙也如数交还英军。孙立人指挥一个不足千人的装甲兵团，击败数倍于己的日军，解救出十倍于己的友军，取得仁安羌大捷，一时轰动中外，舆论赞扬不已，英国王室并颁给勋章，美国政府也授予丰功勋章。

由于侵缅日军疯狂东进，先后侵占八莫和密支那，西路英军连连败退，东路和中路的我远征军又来不及集结，以致战局危急。5月，我远征军各部次第由孟拱以西、以北退入云南。孙立人指挥所部掩护英军退却，由孟拱以西经过英普哈尔退入印度境内。8月，孙率部进驻印度比哈尔邦兰姆珈。10月，新三十八师与第五军新二十二师等驻印部队合编为新一军，郑洞国为军长，孙立人仍为新三十八师师长。他率所部在异国仍加紧整训不懈。

1943年10月，驻印的新一军向缅北大举反攻，孙立人指挥所部翻越印缅山区，投入胡康河谷战斗。孙调派第一一二团掩护筑路部队一边筑路一边前进，被日军围困于邦加达一个多月；孙派第一一四团增援，苦战七个昼夜，终于歼敌获胜。翌年1月，孙率全师在新三十师主力协同作战下，肃清大龙河以西之敌，迅即攻克太白卡、甘卡等地；继又次第攻占拉征卡、拉安加、马高、拉树卡、礼卡道等地，3月5日攻克孟关，15日攻克丁高沙坎，从而使驻印军完全占领了胡康河谷地区。接着孙立人又指挥所部发起对坚布山的进攻，第一一三团在攻抵拉班后，与新二十二师南北夹击日军，29日攻占沙土渣，进入孟拱河谷。至4月底，孙指挥新三十八师先后攻占高利、瓦兰、马兰、曼平；嗣后继续前进，于6月16日与新二十二师在加迈会合，迫使日军残部向南撤逃。孙还派第一一四团迂回南下救援英军，抵孟拱

东北攻击日军侧背，随即切断孟拱四周之交通线，进入孟拱城垣，与敌巷战两昼夜，于6月25日完全占领孟拱。孙指挥所部继续前进，7月11日与夺取密支那的新三十师会合，打通了卡盟、孟拱、密支那之间的交通线。

我驻印军取得反攻缅北第一期战斗的胜利后，经过整训扩编，由新一军扩大为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以战功升任新一军军长，指挥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和新六军的第五十师，在10月开始的第二期战斗中，为东路军。孙指挥所部从密支那向南前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孙乃以陆空协同、步炮协同、战车掩护、逐点歼敌的战术，指挥新三十八师苦战月余，毙敌官兵二千四百余，终于在12月15日进占八莫城，敌守城司令原好三大佐被击毙。与此同时，孙指挥新三十师沿八莫公路向南坎发动强大攻势，第五十师攻打瑞丽江岸之敌。经过新三十师与新三十八师的合力奋战，迂回奇袭，终于在翌年1月15日袭占南坎。接着孙又指挥所部与卫立煌指挥的远征军东西夹击，会攻芒友。孙以新三十八师主力沿芒友公路进击，新三十师进攻老龙山地区之敌，在攻占开阳、曼伟因、苗西等据点后，与远征军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联合发动进攻，于1月27日攻占芒友，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新一军在孙立人的指挥下又继续攻击前进，2月8日进占南帕卡，继后又攻占朋朗、满塔、腊戍、贵街、新维、拉西、芒卡等地，3月8日第五十师占南图，24日新三十八师占细包，27日新三十师占孟岩，取得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的完全胜利。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一军凯旋，返抵广西南宁。未及部署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反攻，孙立人即奉命参加军事考察团赴欧洲，考察盟军的欧洲战场，历时三周，行程五万英里。从欧洲归来，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孙率新一军到广州，接受日本第二十一军投降。新一军不仅缴获了日军的大量军械，还装备了美国新式武器，又扩充了兵员。孙立人仍严格整训部队，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

1946年3月，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率新一军搭乘美国运输舰从广州北上，在秦皇岛登陆后转乘火车到达锦州，分布在沈阳外围，配合第五十二军和新六军与东北民主联军作战。4月，所部五个师分两路沿沈长线向四平平行推进，遇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有力阻击。在新六军等部增援下，凭借优势兵力，于5月19日进占四平，22日占领长春。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长春警备司令，率第一军扼守长春及永吉以北松花江以南各重要据点，遏制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南渡松花江。在随后的作战中，孙部作战不利。1947年4月，孙立人被调至沈阳，改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8月，又调离东北，改任代理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但孙立人并不称心如意，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新一军被蒋介石收回，交给了黄埔系的潘裕昆。孙几经努力，只从新三十八师和军部选走了原是税警总团及印度、缅甸时期共事的几百名亲信，渡海到台湾去训练新兵。1949年9月，孙立人被任命为台湾防卫司令，协同陈诚营造退守台湾这个最后据点。

蒋介石复任“总统”，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孙立人对蒋介石多年的独裁专制统治素有不满，到台湾后对蒋经国在军队中推行的一套“政治工作”又多加抵制，龃龉日深。其时美国派至台湾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主张废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同时对早年留学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孙立人又多加赞许。蒋氏父子对孙立人疑虑丛生，于1954年6月下令免去孙之“陆军总司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翌年6月，又以孙之部属郭廷亮涉嫌发动“兵谏”之阴谋活动为名，将孙“看管侦讯”。8月，蒋介石下令陈诚等九人组成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孙立人案；10月21日，公布调查报告，并决定免去孙的参军长职务，“准予自新”，送往台中软禁。直到三十二年后的1988年3月22日，孙立人始获行动和言论自由，时已年近九旬。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病逝于台湾。

主要参考资料

风云丛书编辑小组编：《孙立人自述生平》，台南风云丛书海外出版社1989年版。

许逖：《百战军魂：孙立人将军》（上、下），台湾懋联文化基金1989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远征印缅抗战》编审组编《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1987年—1995年版。

龙中天：《孙立人事件的始末、内幕与疑情》，艾思明编著《名将孙立人》，台北群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页。

孙连仲

严如平

孙连仲，字仿鲁，直隶雄县人，1894年2月3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廿八日）生。父亲孙保安出身农家，在当地开面店，后在雄县南关开办钱粮行，获利甚丰，购置田产四百余亩。孙连仲四岁丧父，由母亲和哥哥孙连喜（席珍）抚育成人。他七岁入塾，后入保定旧制学堂，勤奋学习，尊敬师长。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爱好武术，仰慕战国齐人鲁仲连义不帝秦，乃以仿鲁为字。

1912年2月，孙连仲应募北洋军，对母亲和兄长的劝阻答曰："男儿应立志报效国家，岂能终在田园与草木同腐！"入伍后编入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为学兵。民国成立后，北洋军改镇为师，孙属王占元第二师。不久，孙由学兵升为正兵，调入炮兵营。1914年春改归陆建章军左翼第一旅（后改为冯玉祥第十四旅、第十六混成旅）炮兵营任班长，前往陕西追剿白朗，开始成为冯部一员。1915年末蔡锷在云南率领护国军讨袁，在川的冯旅奉命征伐，孙在龙头山战役中一人扛起二百多斤的山炮，带领士兵抄击护国军后路，一炮击中对方阵地。战后，孙升任炮兵营第一连连长。

张勋复辟事件发生时，第十六混成旅上下义愤填膺，但冯玉祥等将领均不在旅，孙连仲乃配合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佟麟阁等其十二名连长率领全旅士兵，在万庄一带阻截张勋"辫子军"，追击至安定门，俘敌五千余。嗣后孙升任炮兵第一营营长。

1922年直奉战争后，冯玉祥部扩充为第十一师和三个混成旅，孙连仲于5月因战功升任炮兵团团长；1924年又被冯玉祥升为卫队旅旅长；辖有冯治安手枪团、张自忠学兵团和自兼之炮兵营。在冯玉祥发

动“北京政变”时，孙指挥手枪团包围了总统府，收缴了警岗枪支，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曹锟卫队团。政变后冯玉祥与孙岳、胡景翼所辖各部共编为国民军，孙连仲调任国民一军炮兵旅旅长，驻平地泉；不久又升任骑兵第二师师长。他严格训练队伍，与士兵一起操练，同甘共苦，并要求官员恪守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宗旨。

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于1926年遭到直奉两系联手进攻，时驻山海关的孙连仲师难以抗御奉军入关，奉命调赴绥远进攻山西。但因南口大战后国民军全线退却，孙连仲亦率师经包头、五原退到宁夏，所部仅剩千余人。孙下力整训队伍，力期恢复元气。9月，冯玉祥率国民军“五原誓师”后，孙任第十二师师长，并被委为“全军总执法”。10月，孙率全师由宁夏入甘肃，收编孔繁锦部，继入汉中发展。后接冯玉祥电令，即火速起赴西安，参加11月解围西安的战事。

1927年5月，冯玉祥国民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事。孙连仲率师在豫西南一带作战，进占唐河、确山后控制了该地区的平汉线。9月宁汉合流后，孙先任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进驻新乡；稍后与鹿钟麟对调，改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梁寿恺第一军、孙连仲第十四军、秦德纯第二十三军，孙并任北伐军京汉前线总司令，在漳河沿岸与奉军杨宇霆第四方面军团激战二十六天，歼敌甚众，对稳定京汉、陇海两线战局起了很好作用。

北伐战争于1928年6月胜利结束后，孙连仲率部赴陕，7月入甘，9月击溃河州事变的马廷勷部，进占古浪、武威。孙在甘肃将连年作战减员甚多的部队加以补充整训，恢复实力。

国民政府于1928年9月19日任命孙连仲为青海省政府主席。这是冯玉祥为巩固实力而争取到的重要一着棋。孙到西宁后，以所部第三十一师（原第十四军编遣后之番号）之第九十一旅驻乐部，第九十二、九十三旅及直属部队驻西宁附近，以控制局势；同时得到冯玉祥支持，将盘踞青海之马家军一一调离：马步青旅去潼关，马子乾旅去

湟源，马步芳旅去循化、巴戎。面对贫穷落后的青海，孙连仲着手修筑公路，修渠引灌，植树造林，并修建清真寺，成立回教促进会，开办阿訇训练班，力求改善民族关系。但被派赴湟源的马子乾不久即率部进攻西宁，孙指挥两个旅进剿，马子乾被击毙。孙亲至西宁城外迎马之棺柩，并主持了追悼会，赢得了回族军民的好感。

1929年8月，孙连仲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他秉承冯玉祥之意，厉兵秣马，扩充实力，为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积极准备。这年10月，宋哲元领衔揭橥反蒋，孙连仲任第八路军总指挥，率部出紫荆关直扑南阳。但阎锡山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孙良诚第二路军又有投蒋之意，冯军难以为继，乃向潼关退却。翌年4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手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冯下令把所属全部军队调往前线。孙连仲主张留一部分队伍控制甘、青，为冯所不允。孙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乃率第八军三个师全力投入战斗。6月入豫，在漯河、太康、归德（今商丘）和安徽亳州等地，先后与蒋军何成濬、朱绍良部激战奏捷。7月战局开始逆转，阎锡山军次第撤出主要战场，冯玉祥军各部军心动摇，庞炳勋等部“自由行动”，石友三则通电拥戴张学良，蒋介石则多方利诱，冯军分崩离析，余部被迫退往豫北。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后，冯玉祥、阎锡山先后下野，冯军部分将领拥鹿钟麟为总司令，孙连仲为副总司令，重振旧部。此时，冯指示鹿、孙“西望长安”，带部队西撤；但众将领认为陕、甘、青、宁过于贫瘠，难有出路。鹿于此时亦离开了部队。而开入晋境的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部，被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驻在新乡的孙连仲一筹莫展，与部属几经商议，瞻前顾后，经韩复榘说明，向蒋介石表示愿服从中央，接受改编。10月18日，孙在新乡发出通电，随即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二军军长，下辖自兼之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关树人骑兵师。

孙连仲归附蒋介石后，不久即被派往江西，连续参加第二至第五次“围剿”工农红军的战事。他对蒋介石的命令和部署绝对服从，率领

所部猛打猛冲，以博取蒋的信任。孙部多是西北籍官员，不习惯南方水土，患疫病者甚众。1931年12月，代孙指挥作战的参谋长赵博生和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率一万七千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归附红军；1932年春红军围攻宜黄的战役中，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弃城而走，被撤职。孙连仲向蒋自谴以求宽恕，蒋鉴于在前四次“围剿”之中，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孙部的这些败绩也不算罕见，因而未多加责备。1933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为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训练军官时，除自兼团长外，特委孙连仲为副团长，而以陈诚为教育长。孙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对蒋更加心悦诚服。接着在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中，孙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率领冯安邦第二十七师、李松昆第三十师、李敬明第三十一师、张华堂独立四十四旅和李汉章第七十四师到江西作战。翌年初，蒋介石还把彭振山第二十七军、张印湘第四十二军分孙连仲指挥。1934年4月，蒋介石指挥陈诚所部发起广昌战役，孙连仲指挥所部负责守备永丰、藤田以东及南丰、广昌以西为中间地区，修筑公路和碉堡。红军西撤长征后，孙部于1935年调往湖北“围剿”和追击湘鄂川黔边区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

1935年10月，孙连仲奉命率部开赴苏北，各师分驻宿迁、涟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等地，总部驻淮阴，从事国防工事和导淮工程的建设。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7月9日，驻在信阳、确山一带的孙连仲接蒋介石电“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乃于7月12日率部北上，途中接宋哲元电，要孙部暂缓前进“以免刺激日军”，乃停于彰德（安阳）。孙电蒋介石请准继续北上到保定。7月底，平津次第失陷，华北形势严峻。孙连仲被任命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司令，率部于8月10日进至良乡西南窦店，与日军河边旅团对峙。15日起战事日趋激烈，孙部奋勇作战，予敌重创。日军以猛烈炮火摧毁我阵地，孙部乃于8月下旬南撤至琉璃河一线。9月15日，日军侵占固安后继续

南犯，孙部在涿县御敌，遭日军迂回包抄。保定战役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仓皇逃跑，蒋介石怒撤刘职，命孙代之。孙指挥所部转入石家庄地区，10月参加忻口会战之娘子关战役，担负总预备队任务。娘子关右侧的旧关位置险要，敌我反复争夺，孙率第二十七师赴援，沉着应战，激战两周。敌以猛烈炮火轰击，我阵地工事被毁；其他各部伤亡亦甚大，乃转移撤至阳泉。不久忻口会战结束，太原、阳泉失守。孙率部经晋南撤至豫境，招募新兵，并在许昌设立干部训练所，对流亡来豫的青年学生加以培训，大力整补队伍。随后在潢川、武胜关一带构筑国防工事。

1938年3月，孙连仲率第二集团军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第三十师、池峰城第三十一师东进，参加台儿庄战役。3月19日，孙指挥三十一师主力防守台儿庄城寨，其他部队分别防守台儿庄之西的范口村和之东的官庄以及贾汪东北和台儿庄以南地区。24日，日军濑后启第三十三旅团福荼直平第六十三联队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猛烈进攻台儿庄，孙连仲亲赴前线指挥第三十一师坚决反击，师长池峰城率领敢死队与敌拼杀，歼击从突破口冲入的二百敌军。27日，福荼直平指挥其攻坚部队进攻台儿庄以北之防线，第三十一师各团和炮兵顽强抗击，与敌进行巷战、混战，浴血搏杀，虽死伤十之七八仍拼死坚守。29日夜，第三十一师选敢死队员三百，各持大刀一把、手榴弹五枚乘黑夜杀入敌阵。其时各增援部队陆续赶来，协同包围进犯台儿庄之敌，形成对敌军内外攻击之势。4月6日，内外各军全线出击，在台儿庄北三角地带围歼敌军两万余，残敌万余人向北溃退，孙连仲指挥所部追击前进。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后，孙率部至豫南信阳、许昌一带休整补充。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集高级将领会议，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战况，确定战略相持阶段的作战方针，会后并调整全军指挥抗战。1939年1月，宣布孙连仲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同卫立煌统率在河南的抗日部队。孙率第二集团军池峰城第三十军和刘汝明第

六十八军进驻唐河、桐柏等县，嗣后向敌占之信阳展开全面进攻，激战四日取得胜利。同年11月孙又调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1940年4月，孙指挥第二集团军所部配合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在鄂北随县、枣阳地区迎战日军。1943年2月，孙又调任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至恩施代理陈诚指挥所部。是年5月日军向鄂西进犯，孙指挥所部在沙市以南组织抗御失利后，全力在长江入川要塞石牌进行阻击，奏捷后即沿长江组织进攻，恢复了宜昌至宜都间的江防，稳住了重庆的西大门。战后，孙被正式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1月初，孙组织指挥常德会战，以诱敌深入之战术，将日军主力吸引于澧水及沅江两岸地区加以聚歼。11月22日，日军增援部队分五路攻击常德外围各据点，于24日对常德发动全线进攻。据守常德的部队顽强抗御，拼死击退日军的冲锋，从城区战转为巷战、屋战，抗日官兵人自为战，短兵相接。12月3日，常德被日军侵陷，孙即指挥一个兵团的兵力增援，与常德退出的余部会合强力反攻，日军仓皇突围北逃，失陷六日的常德得以光复。孙指挥所部将士继续攻击敌军，至年末在会战中失陷的城池全部收复；但孙部在英勇作战中损失亦大，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等师长及大量团营连排长均于前线牺牲。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新建第十一战区，组织抗日军队北进击敌。蒋介石特任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孙连仲率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编第八军和第三十二军集结于豫北新乡、安阳地区。8月，日本投降，孙受命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接受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济南、青岛、德州地区的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10月10日，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接受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根本博等俯首呈递的降书和武士道军刀，二十多万民众在太和殿前和天安门广场扬眉吐气地观看了这一受降典礼。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加紧策划发动内战。10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奉命率领所部四万五千余兵力进攻晋冀

鲁豫解放区的磁县、邯郸地区。10月30日，不愿打内战的高树勋及新八军万余人阵前起义，通电主张和平；31日，马法五在漳河以北大败，马及第四十军二万三千多人被俘，鲁崇义第三十军亦被歼众多。孙连仲的主力部队损兵折将，实力大减；以至对于调拨第十一战区指挥的第九十三军、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均难以驾驭。1947年3月，第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为主任。孙感到华北军事责任重大，自己难以担负，向蒋介石请辞。1947年12月，孙被调往南京，任首都卫戍司令。翌年5月，蒋介石当总统后不久，孙改任总统府参军长。

1949年1月，蒋介石在风雨飘摇声中下野，孙连仲亦辞职离京，3月去台湾。蒋介石于1950年在台湾“复职”后，孙先后被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还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晚年他倡导网球、高尔夫球甚力。

1990年8月4日，孙连仲因肝癌在台北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孙仿鲁先生述集》（口述录音记录整理），（台北）孙仿鲁先生九秩华诞筹备委员会，1981年印行。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北平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81）。

刘琦等编：《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姜克夫著：《民国军队略稿》，中华书局1987年-1995年版。

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

孙良诚

汪仁泽

孙良诚，原名良臣，字少云，1893年6月22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九）生于直隶静海县（今属天津市），父亲孙云亭在天津清军中当一名哨兵。孙良诚少年时务农，1912年弃农投军，入冯玉祥部左路备补营当兵，驻扎北京。曾随冯赴河南围攻“白朗”军，因作战勇敢、机警灵敏，受到冯玉祥的器重，为其改名为良诚，1916年升为连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驻京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受排挤离部队去天津，众举孙良诚、刘汝明为代表，赴津请冯回京，不久复辟被平定。1920年孙随第十六旅赴陕西驱逐陈树藩。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孙已升任团长，随旅长李鸣钟率部由陕西急趋良乡，抄袭奉军侧翼获胜。战后冯玉祥任河南督办，孙奉命在豫东剿匪安民，于1924年9月升任旅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孙部奉冯玉祥之命留驻北京参与北京政变，配合鹿钟麟部行动。1926年春，孙再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驻兰州。此时陇南及陇东镇守使孔繁锦、张兆钾分据天水、平凉，受吴佩孚指使，组成甘肃联军围攻兰州，经激战被孙部击败，孙乘胜追击，获全胜。8月，国民军在南口失利、西安被围，处境危殆，甘肃遂成为国民军大后方。10月，孙良诚任援陕军总指挥，统率前方各军入陕，一举攻克咸阳，随即与围困西安的刘镇华镇嵩军发生激战，孙以疲惫之师苦战一月毫无进展，又逢大雨给养不济，军中苏联顾问建议退守咸阳待援。孙则认为撤守无异自杀，下令决一死战。孙乃以少数兵力佯攻，吸引敌军主力，而调集精兵出敌不意猛袭敌大本营侧背，又因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将镇嵩军击溃，使被围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得以解围。战后孙被擢升为国民军第四军军长。

1927年4月，冯玉祥率部在潼关誓师北伐，任命孙良诚为第三路军司令，率领方振武、石友三、马鸿逵部从潼关进入河南，连克灵宝、峡县、渑池，于5月下旬攻占洛阳直抵郑州，6月1日攻克开封。同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7月上旬孙率部渡过黄河，连克新乡、彰德（今安阳），肃清豫北奉军。8月直鲁奉军大举反扑，第二集团军五路迎战，孙良城部在郑州为各路策应。

1928年4月，蒋介石会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军北伐奉张，孙良诚部奉命肃清山东一带直鲁联军残部。是月中旬，孙部连克郓城、兖州、济宁，5月1日进入济南。“五三惨案”后孙于21日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9月赴南京商讨山东军政外交事宜，受到蒋介石宴请。10月，孙宣布治鲁方针，包括肃清土匪、铲除贪官污吏、整顿教育等六条。此时济南仍为日军盘踞，孙的省府设在泰安，省内政治气氛活跃，由反日会查禁日货，妇女会宣传妇女解放，省府录用女职员，开风气之先。

1929年4月初，孙良诚派代表与日方议定接收胶济事宜，并通电全国。但此时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激化，蒋阻止孙部进入济南，而另派自己的部队入鲁。孙大为不满，通电提出辞呈，于26日离泰安赴开封。5月中旬，孙被冯任命为开封及兰封警备司令。蒋介石对冯军向豫西集结之异动密切注视，命唐生智部逼近河南。15日，孙通电责蒋派“大军压境”，次日与宋哲元等通电促蒋下野，拥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孙部当日撤离商丘，炸毁桥梁二十八座，拆毁铁路、扣留运兵西行的列车；但冯的反蒋战争因所部韩复榘、石友三反戈投蒋而告失败，冯于5月底宣布下野。孙良诚一度在洛阳与韩部激战，6月率部退入潼关。此时冯赴山西被阎锡山软禁，9月，孙到晋与冯密商反蒋事宜，阎表示愿与西北军共同反蒋。10月10日，孙与宋哲元等二十七名将领联名发表反蒋通电，列举蒋六大罪状，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12日，西北军由宋哲元任代总司令、孙良诚任副总

司令兼前敌总指挥，以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采取攻势。孙率主力沿陇海路东进，午刻已抵洛阳，逼使唐生智部从洛阳退守孝义。嗣后孙部进至新郑、密县一带围攻郑州，唐部以强大兵力反击，双方胶着对峙；但因晋军未如约响应，致使孙部孤军深入危境。孙欲保存实力待援，与唐在前线互通款曲，表示愿反戈归附蒋介石。在洛阳的宋哲元风闻消息，恐遭不测，急令西北军西撤，唐生智部乘机反攻；孙面对强敌孤立无援，仓促后撤，混乱中一败涂地，军需物资悉数丢失，反蒋战事全盘失败。战后宋、孙相互指责，矛盾加深。

1930年2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3月中旬，孙良诚与西北军共五十七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拥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冯调集各路大军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孙良诚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从陇海路出击，次第攻克洛阳、郑州，后又至杞县，击败陈诚部队。6月下旬，冯玉祥部署诱敌深入的“口袋战役”，孙部奉命让出杞县，蒋军中计进入后，被孙及吉鸿昌等部截成数段，双方激战，伤亡惨重。随后在冯部发动“八月攻势”中，孙良诚任左翼，向宁陵以北的顾祝同部进攻，因连日大雨，河水泛滥，攻势受阻；此时，津浦线方面的晋军战败撤出战斗，蒋军乃集中兵力全面反攻。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拥蒋，阎、冯军陷于腹背受敌之势，战局剧变。蒋介石并收买分化西北军将领，孙部悍将梁冠英、张印湘等相继降蒋，孙良诚只得率余部辗转撤至山西。反蒋兵败后，冯玉祥原意让孙收拾西北军残局，但遭诸将领反对而未果。张学良在改编西北军时，以宋哲元为改编后的西北军军长，孙未得军职，遂下野寓居天津。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招集旧部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孙良诚应召任骑兵挺进军军长，变卖部分财产以充军费。6月，抗日同盟军成立军事委员会，孙任常务委员。同盟军先后收复康保、沽源、多伦等地，全国振奋；但为蒋介石所不容，调集大军围攻。在蒋军先头部队离孙部仅数里之际，孙忽称病回张家口，冯玉祥殊为不

满，从此对孙十分冷淡。8月15日，冯玉祥通电下野，抗日同盟军各部由宋哲元收编，孙被解除兵权后重返天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但孙良诚未被起用。天津沦陷前，孙携家眷迁至汉口。1939年，冀察战区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委孙良诚为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但能受孙指挥的仅旧部赵云祥的游击纵队。1940年春，孙被委为鲁西行署主任，其后石友三旧部王清瀚率两团人员来投，使孙的实力有所扩充。1942年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对孙良诚部既不核定经费又不补给武器装备，使孙日处愁城；5月又被免去行署主任职。孙在赵云祥、王清瀚的怂恿下偕赵、王同去南京投附汪伪。参谋长傅二虞抗阻不成，带走于飞所率的游击队坚持抗日，团长段海洲、孙兴斋也率部投奔卫立煌。6月，孙就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职，所部三万余人随之成为伪军。8月，孙继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职。他为自己留后路，曾接纳国民党方面人员，并开放河口与内地进行物资交流。11月，孙改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率部驻扎泰州、盐城一带，多次与新四军发生冲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孙良诚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路军，孙任总指挥，受命原地驻防。其后赵云祥第四军被新四军包围后宣布起义，王清瀚第五军的王和民师在宝应被歼，孙部只剩下第五军残部和孙玉田的第三十七师等总共不及五千人。其时汤恩伯又欲夺其兵权，孙投靠桂系李品仙，得第五纵队番号，开往滁州，苟延残喘。1947年，孙部奉调寿州，缩编为第一保安纵队。1948年，移驻宿迁、睢宁，改为暂编第二十五师。淮海战役前扩编为第一〇七军，归徐州“剿总”节制。11月，淮海战役开始，孙部奉命向徐州集结，行经阜宁西二十里处被解放军包围，孙被迫下令所部放下武器，受到解放军的优待。此时刘汝明兵团在淮河一带布防，孙良诚、王清瀚表示愿前往劝降，到达蚌埠后，刘汝明责孙投共，孙推诿于王清瀚，刘即将王解送南京杀害。孙良诚不久到了南京，后移居上海。

上海解放后，孙良诚被捕，1951年5月10日病死狱中。

主要参考资料

傅二虞：《孙良诚从军始末及投敌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黄广源：《孙良诚投敌及其下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

邓俊升：《孙良诚其人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总第8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朱忠民：《汤恩伯与伪军孙良诚的勾结》，《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

孙烈臣

汪恩郡　王凤琴

孙烈臣，原名九功，字占鳌，后改赞尧，祖籍直隶（今河北省）乐亭县孙家庄，1872年6月23日（清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生于辽宁黑山县老河身屯。父孙魁，以染业为生。

孙烈臣五岁丧父，姐弟三人依靠寡母裴氏替别人做针线活糊口，家贫如洗，度日艰难。因家境贫困，无力常年就学，只乘冬闲进私塾就读。他十五岁起佃田耕种或为人打短工，家境稍微好转。孙虽出身染业世家，但“唯好驰马试枪”[(1)]。1890年起常偕马贩子去古北口，因善辨马之优劣，所获多名马，时人皆以“孙马贩子”相称。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富商巨贾争雇炮手以自保。孙烈臣曾受雇于黑山县北新立屯镇立德堂王家，持械护院，后因与主人龃龉而离开。1897年，他到县北砬子山贾府充当炮手。1900年，遵母命投效清朝盛京将军部下。1902年，在田庄台招募马步军旅数百人，隶属中路巡防统领朱庆澜，为绥靖营哨官。孙能身先士卒，练兵有法，用兵有方，深得朱的器重。1906年，张作霖任奉天（今辽宁）前（左）路巡防统领时，将绥靖营编入所部，任孙烈臣为巡防马队二营管带。1907年5月，清廷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为行省，设东三省总督取代盛京将军，徐世昌充其首任。1908年，张作霖奉徐世昌之命率奉天前路巡防队移驻洮南。时顽匪白音大赉、陶什陶胡窜扰洮南、双辽（郑家屯）一带，孙率马队三百余人随张作霖追剿，连战皆捷，自11月出师渡洮，驰骋八百里，直抵呼伦贝尔河畔，才胜利回师。战后“叙功保守备加都司衔”[(2)]。从此，孙扬名于洮辽及蒙古等地。

1910年，奉天成立讲武堂，孙烈臣入该堂骑兵科学习，次年毕

业。因成绩最优，被张作霖擢升为奉天前路巡防队帮统。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与张景惠等人成为张作霖在奉天的耳目。1912年9月，奉天中、前路巡防队合编为陆军二十七师，张作霖任师长，孙烈臣任该师五十四旅旅长。12月，北京政府晋升孙为陆军少将，1915年8月，加衔陆军中将。

1916年4月，张作霖同陆军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密谋驱赶督理东三省军务段芝贵，孙烈臣建议以人民团体名义方为正大光明。张极表赞同，便假借二十八师官兵要求惩办帝制祸首来威吓段芝贵。段闻讯即电请北京政府赴津养病，以张作霖代理军务，冯德麟为军务帮办。段备专车一列，带走库存官款二百万元及大宗军火。张作霖佯做不知，并派孙烈臣率兵一营护送。车行至沟帮子，冯德麟早已在此伺候，上车检查，声称欢送段将军，被段的部下挡驾拒绝。随后，孙等拿出以奉天各团体、省议会以及二十八师官兵名义发来的电报，要求扣段惩处。段慌忙将官款、军火留下，才得以脱身。10月，孙获四等宝光嘉禾章。

段芝贵离开东北，张作霖被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冯德麟自恃是绿林前辈，不甘屈居于张之下，二人发生矛盾。张宠信王永江，以其为奉天警察厅长，又引起汤玉麟的不满，孙烈臣等二十七师高级将领也都忌恨王永江。但当汤玉麟企图依靠冯德麟与张对抗时，一度附和汤的孙烈臣等又都站到张作霖一边，反使汤孤立无援。张便于1917年3月19日发布撤销汤玉麟旅长职务的命令，派孙率所部三千二百余人包围汤部驻地新民，监视汤的交卸，由张景惠继汤任五十三旅旅长。7月，冯德麟参与张勋复辟失败，被夺去军权。孙烈臣升任二十七师师长，张自兼二十八师师长。

1918年，重掌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约法，力主“武力统一”，与南方开战。张作霖按北京政府的军事计划，派奉军两个混成旅进关援湘，组成湘东支队，以孙烈臣为支队司令。另在天津设立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5月，徐擅自以副

司令的名义，召孙烈臣等赴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引起张作霖的极大反感。张出兵关内名为“拥段”，实为扩张势力，不能允许徐公然调动军队，将关内奉军全部摆在湖南战场。9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势力及于吉林、黑龙江。同月，张撤了徐的奉军副司令职，以孙烈臣充任关内奉军副司令。由于段祺瑞“武力统一”失败，孙率奉军湘东支队从湖南撤回北京，改编为奉军第一师。

1919年7月，经张作霖保荐，由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任命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8月兼黑龙江省长。黑龙江省毗邻苏俄边境，当时苏俄国内红军与白俄军相持于满洲里外，红白两军更迭进退，边境事务非常棘手。孙抵任后，首先屯重兵于满洲里边境，同时召聚蒙旗各部，恢复呼伦贝尔故地，以固边防。沙俄驻海拉尔领事曾煽惑呼伦贝尔宣布“独立”，后经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陆徵祥与俄国驻华公使签订《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虽规定呼伦贝尔盟为特别区，受中国政府管辖，但名存实亡，呼盟之吉拉林金厂、察罕敖拉煤矿和呼伦湖渔业均为沙俄侵占。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归中国军队守护，孙烈臣审时度势，于1920年1月毅然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收归黑龙江省治理，在其地先后设置了胪滨、呼伦、室韦、奇乾四县。是年10月，白俄军首领谢米诺夫被苏俄红军打败，退至阿巴赅，企图进入中国境内，在兴安岭设立司令部，遭到孙的拒绝，并将越界进入中国境内的白俄军数千人解除武装后遣送海参崴。同时，孙也拒绝了苏俄红军关于引渡谢米诺夫和在中国满洲里设联络机关等项要求。

孙烈臣督黑期间，注重整顿金融和垦殖荒地。他鉴于黑龙江省钱法极为混乱，由该省钱法维持委员会议决四项解决办法；他还指定由实业厅长、垦务厅长及垦务员会同拟定垦务办法十余项，对省内外领垦者加以保护。孙执法较严，杜绝说情。黑龙江山林警察队长兼山林局副局长李紫英，纵人种植鸦片，克扣警饷，鱼肉乡里，被收押法办。李之胞兄李荫棠系北京政府参议员，黑省议会议长高玉堂系李之同乡，二人为李说情，孙均拒而不见。

1921年3月，孙烈臣调任吉林督军兼省长，旋又兼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王树翰随孙同往吉林，任省财政厅长。12月，孙烈臣为阻止日本在哈尔滨的交易所扰乱金融，下令逮捕该交易所中方股东十一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无理提出“抗议”，遭到孙的严词拒绝。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烈臣任奉军副司令，留守沈阳替张作霖坐镇。这次军阀混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战前准备，只打了六天，结果奉军溃败。5月，张作霖、孙烈臣、吴俊陞联名通电，宣布东三省自治。6月，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陞为副司令，正式宣告“联省自治”。同月，直奉两军停战议和，奉军以孙烈臣、张学良为代表，直军以王承斌、杨春芳为代表，在秦皇岛签订停战协定。直军从秦皇岛向后移动，奉军亦大部撤到山海关以外。

张作霖从直奉战争的失败看到奉军的素质太差，于是积极整军经武，扩充实力，以图再起。同年7月，将原东三省巡阅使署与奉天督军署合并，改组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并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后改称训练处），由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统监，张学良为参谋长，郭松龄为副参谋长。孙等协助张作霖将东三省全部军队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使用统一番号。每个师、旅分期分批地到指定地点集中校阅，进行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各级军官的选拔标准和各级军官的任用权限均有规定，校阅完毕时，都按规定有所升降，使东北军迅速改变了面貌，素质有很大提高。

同期，孙烈臣仍主持吉林的军政，但大部时间在沈阳，对省事除重要及关系三省者外，多假手僚属，自己很少过问。孙还将督军署移驻长春，省公署设在吉林，以魁升任省长，王树翰任督军署秘书长，又请划中东路界线为特别区，以朱庆澜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并兼特别区行政长官。不久魁升去职，由王树翰代理吉林省长。王事事不敢擅专，凡遇用人、行政之事，均由孙首肯。

孙烈臣治理吉林无什么政绩。吉林匪患猖獗，积重难返，在蛟河至吉林一带，有大小股匪二千余人，往返骚扰。1922年除夕，竟乘省城居民燃放鞭炮之际，入城抢劫绑票。吉林官兵也四处勒索财物，人民苦不堪言。鉴于吉林军政衰微，张作霖令孙回省解决，孙于1923年11月回到长春，连日召集军政当局开会，议定整饬军务、肃清土匪、厉行禁烟、整顿税源等四项计划，但实效不大。同年，孙烈臣因宿疾未愈，精神不佳，向张作霖提出辞呈，保荐张作相任吉林督军、王树翰任吉林省长，张未准所请，但允归故里静养。此后，孙迭次请辞不许。逢新宅落成，他携夫人往视，见雕梁画栋，极为美观，赞美之余，二人竟抱头痛哭，叹曰："此等住宅吾二老去世，遗留于谁也？"[3] 孙烈臣病情日益加重，1924年4月25日死于沈阳。

---

(1) 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卷49，职官传38，北平1933年版。

(2) 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卷49，职官传38，北平1933年版。

(3) 陈志新：《孙烈臣》，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21辑，1992年版，第317页。

孙蔚如

靳英辉

孙蔚如，1896年1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陕西省长安县人。出生于耕读传家的诗书门第。祖父、父亲务农，伯父、叔父均有功名，居乡课读，兼务农事。孙蔚如自幼随父辈读书，1910年入咸长初等实业学校，后入长安高等小学校。1913年入西北大学预科（旋改为省立第三中学）。是年冬，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5年夏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班员。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他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志反对北洋军阀。在讨袁战争时，经友人李桂棠、杨景震介绍，于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底，在陕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号召，组成陕西靖国军，反对段祺瑞政府及陕督陈树藩。孙蔚如入靖国军第三路第二支队第一营任连长，在反对北洋军围攻陕西靖国军的战斗中，初立战功。以后，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分化瓦解下，纷纷接受直系改编。孙蔚如于1922年初转入继续坚持靖国军旗帜的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城部，任第五营营副，旋任营长。这是孙蔚如和杨虎城长期共事的开始。4月，靖国军在武功、马嵬坡附近与北洋军激战半月余，孙蔚如两臂负伤，部队也因众寡悬殊，形势不利。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和杨虎城商定："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1)] 部队遂转移陕北，依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此时井尚未投靠北洋军阀），保存实力，徐图未来。

1923年初，孙蔚如伤愈后，返回陕北，这时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孙任中校团附。他负责招考进步青年学生，成立安边军事教导队，兼任队长，为部队训练忠于三民主义的军事干部。吴

岱峰、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都是这时的学员，以后成了杨虎城部队的基干力量；不少人在抗战前后反蒋起义，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军事干部。

1924年冬，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推翻了曹锟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建立起国民军。杨虎城的部队即出山响应，回师关中，对北洋军阀部队作战。孙蔚如任陕北国民军第二支队参谋长兼教导营营长、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在陕西省汧阳（今千阳）、陇县地区击败甘军孔繁锦部，并参加追击北洋系陕西督军吴新田，重创吴军，使关中西部的北洋军阀无力东犯。1926年初，吴佩孚指使军阀刘镇华等拼凑十万之众，在陕西土匪武装的内应下，侵入潼关，围攻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孙蔚如率部参加了坚守西安的保卫战。这一场战斗，拖住了北洋军阀的十万部队，从侧面上威胁了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军队，遥相援应了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1926年冬，冯玉祥率国民联军解西安之围后，翌年春率军东出潼关。杨虎城就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孙蔚如任第十军参谋长、第二师副师长、代理师长等职。10月，率部出关参加北伐战争，协同友军在豫东与北洋军阀张宗昌部队会战，年底攻克徐州。战后移防皖北、豫东一带训练。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孙蔚如执行杨虎城“不危害革命，掩护共产党人”的主张[(2)]，力求保持中间立场。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孙就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有密切接触，并涉猎共产主义书籍；但他不信仰共产主义，只信仰三民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分子，共产党活动很困难，很多共产党人到孙蔚如部队中工作。孙蔚如师部的政治处长曹力如就是共产党员。孙蔚如在一次纪念周大会上讲话时，对于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严加指斥，认为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3)]。1928年春，杨虎城赴日本，由孙蔚如代行军务。这时，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皖北暴动，有人叛变告密交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孙蔚如给共产党人发路费送出部

队，没有一个受伤。1929年，孙部在南阳驻防时，部队内的共产党组织曾有兵暴计划，事情败露后，孙蔚如即将这些暴露的共产党员送出部队[(4)]。对“时而容纳共产党人，时而送走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他自己说：“我既反对右倾的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的暴动政策。”[(5)] 他也很注意军民关系的处理，1929年驻防山东时，部队在蒋、冯的斗争夹缝中争取生存，粮饷困难，常以杂粮果腹，“而军纪整饬，为时所称”[(6)]。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而对内则加强反共独裁。11月，被打倒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辗转到达兰州，由甘肃、四川、青海、宁夏等地方军阀拥戴为中国国防军总司令。自称甘肃省保安司令的雷中田，也在甘肃打出独立旗号。孙蔚如当即奉杨虎城之命，带领所部两个旅入甘，在静宁、会宁、定西等地击败雷中田部，驱逐了吴佩孚，慑服了西北地区很多地方军阀，稳定了西北局势。12月，孙进入兰州，主持甘肃省政，起用进步民主人士杜斌丞等，安抚流民，整顿经济。杨虎城曾数电蒋介石，要求以孙蔚如为甘肃省主席，均遭拒绝，仅委以甘肃宣慰使。孙蔚如曾建议杨虎城弃陕西，经营甘、宁、青、新四省，与苏联取得联系，形成一个进退有据的基地，以在未来时局中应付蒋介石的压力和外患日深的局面，时人称为“大西北主义”[(7)]。以后，由于蒋介石的排挤打击，孙部被迫撤出甘肃，移防陕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和对内排斥异己的行为，加深了孙蔚如的反蒋抗日情绪。在1933年至1935年驻防陕南期间，孙采取了与革命力量联络、反蒋抗日的立场。他在路过张良庙时，曾刻石“借君之椎，以椎暴日”八字，借申其志。从1933年开始，他奉杨虎城的指示，派参谋武志平（地下党员）赴川陕苏区与川北红四方面军秘密联系十数次。红四方面军也派徐以新两次到汉中，与孙蔚如商谈互不侵犯及共同反蒋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形成停战合作的局面。孙蔚如曾送给红四方面军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陕南各县、甘南各县）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讯器材、医药器械等物[(8)]。这种合作局面一直持续到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为

止。

1935年秋后，孙蔚如部先后驻防关中、陕北。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杨虎城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孙蔚如执行了与红军停战合作的方针，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掩护红军人员和物资过境。在被蒋介石逼迫无法时，即遵照杨虎城的指示，用打假仗的办法迷惑蒋介石。1936年西安事变时，孙蔚如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军团长。他赞同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结束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其部队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第十七路军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孙蔚如历任第三十八军军长、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战区受降长官等职。他对日作战积极，曾派出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以重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军的军事进展。日军逼近黄河时，盛传将有西进陕甘的行动，飞机也频频侦察、轰炸关中和西安地区。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放弃关中，并已遣送其眷属及高级人员分乘飞机、火车逃亡成都、宝鸡等地。人心惶惑，不可终日。孙蔚如在西安各界的一次集会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讲话，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坚决表示绝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发出“守土抗战”的通令。“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9)] 使主张撤退逃走的人惭沮缄默，人心也安定下来。

1938年7月以后，孙蔚如长期在华北地区率部抗击日军。直至1940年奉命守备晋南中条山地区，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保住了原有阵地。日军由于被大量杀伤，曾先后补充新兵十九次，称中条山是他们军事侵华的盲肠炎[(10)]。以后孙蔚如部移防河南，曾于

1941年从日军手中收复郑州。

孙蔚如的司令部和属下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的部队一度曾归朱德和彭德怀指挥[11]。他曾邀请中共和八路军派人代为训练干部，在茅津渡办了训练班。在孙部特别是第三十八军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军长赵寿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部队政治工作按着人民军队的办法开展起来，提出了“不嫖、不赌、不吸烟（鸦片烟）”的三大纪律和“自觉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12]，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演出革命戏剧，当时国民党中流传着“这支部队赤化了”的说法。蒋介石极为恼怒，派遣特务进行监视、分化、挑拨等活动，企图削弱、拆散这支革命力量，并曾数电孙蔚如，勒令交出第四集团军中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但都为孙搪塞过去，没有交出一人。1944年，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将孙部主力三十八军的军长赵寿山调任第三集团军司令，而将其嫡系张耀明调任三十八军军长，赶走三十八军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军官，并借口战局紧张，将孙部三十八军拨归其嫡系刘戡指挥，九十六军拨归川军李家钰指挥，调孙蔚如到重庆将官班受训。1945年6月，又以提升、架空的伎俩调孙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至此，孙的实权被蒋介石剥夺净尽。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蔚如兼任武汉战区受降长官，曾连电辞职，未获准。1946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旋改行辕，孙蔚如为副主任，是蒋军系统中完全没有权力的一名备员。1948年秋，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加紧逃台的准备工作，并威逼孙蔚如逃往台湾。孙蔚如乃于7月携家避居杭州，并将原带之警卫团扩编为旅，后改为二三二师，随程潜驻长沙。在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孙派秘书王子义前往长沙，授意该师相机起义。后程潜起义，就是以该师为警备进行的。1949年春，解放军向上海挺进，孙蔚如以经沪赴台为名，至沪潜居，与共产党联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迎接了全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孙蔚如于1950年8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第一、四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副省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因病逝世。

---

(1) 孙蔚如：《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靖国军旗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九十周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8页；孙蔚如：《自传》未刊稿。

(3) 孙蔚如：《自传》。

(4) 杨虎城的许多老部下都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两件事。实际上，孙蔚如这种立场为十七路军所共知，直到解放后，还为人们所称道。

(5) 孙蔚如：《自传》。

(6) 中共汉中地委党史调查室访问徐向前、傅钟的记录。另据武志平的回忆。

(7) 孙蔚如：《自传》。

(8) 《中国名将录》，第45页。

(9) 《西北文化报》1938年3月8日。

(10) 《中国名将录》，第46页。

(11) 《孙蔚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陕西日报》1979年8月2日。

(12) 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另据蒙定军：《回忆我党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工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蒙当时为三十八军中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

孙武

萧栋梁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卿、摇清，号梦飞，湖北夏口柏泉乡人。1879年11月8日（清光绪五年九月廿五日）生。祖父孙永忠系太平天国天将、处州王。孙武幼好武术，喜弓马击技，读书但观大略。1894年父亲病故后，迁居武汉。1897年张之洞在武昌黄土坡创设武备学堂，招生一百二十名，聘德国军官当教习，孙武考入该校，与吴禄贞、傅慈祥最为友善，常与议论时政，忧时忧国。1898年吴禄贞赴日本入士官学校中国学生第一期，孙武因母泣留未能赴日。

孙武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武威营哨长、湖南岳州新军教练官、武威营管带。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吴禄贞等回国，与唐才常在汉口筹组自立军，孙武被推为自立军岳州司令。8月9日至21日，自立军在安徽大通与湖北汉口起事先后失败，孙武改姓金，逃亡广州。1903年因母丧，潜回故里年余。1904年7月，吕大森、曹亚伯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孙武参加该所，负责运动军队、会党。9月20日，科学补习所因长沙事泄被军警搜查，孙武逃亡日本，进入成城军事学校学习海军。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引起留学生公愤，开会抵制，推胡瑛为会长，宋教仁为外交长，孙武为纠察长，因反对无效果，即决定回国办学。孙武回到湖北，在武昌加入刘静庵组织的日知会，并协助刘办理江汉公学和党务。1906年12月，因浏阳事败影响，日知会被封，刘等被捕，孙武逃亡辽阳，依东三省督署军事参议吴禄贞，相与联络关外马侠。1907年，奉延吉边务督办吴禄贞之命，赴延吉查勘边务，孙武乘间游间岛、晖春、海参崴等地，考察北满形势。同年秋，孙武再去日本东京。1908年春，闻黄兴起兵云南河口，孙即前往相助，但行抵香港时，起事已失败。孙武再返日本，与焦达峰等入大森军事讲习会，研

究野外战术和新式炸弹。焦达峰、张伯祥等曾于1907年在东京组织“共进会”，孙武由东北抵日后曾加入该会并被推为军务部长，负责编军制、定旗式、内定各省都督，与同盟会军事滴血会互通声气。9月，被推为湖北主盟人，回湖北策划革命。12月与焦达峰等共商两湖革命。

1909年3月，在武汉设机关，联络武昌黄申芗等组织的群治学社。同年秋被当局侦破，孙武逃往广州，协助共进会推举的广东都督起事，也因失机谋败。孙武退居香港，由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

1911年春，谭人凤到湖北，约两湖响应广州大举，孙武积极准备，配合广州暴动，至3月广州暴动失败，孙武又与居正、杨时杰等决定在武汉举义，以武汉有兵工企业，武器弹药充足；铁路国有引起全国同愤，乘时起义可得人心；军队会党均已运动成熟，起义条件具备。故决定于10月举事。9月24日，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等14个革命团体代表六十余人在胭脂巷共进会机关开会，推孙武为主席，报告各单位合作举义的经过与必要，旋由孙武提义，请蒋翊武任起义临时总指挥，自任参谋长，以示合作诚意，并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为起义日期（后因故改为10月9日）。10月9日上午，孙武在俄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孙武姐夫刘燮卿之弟在旁吸烟，引起爆炸，致孙武头部及两手受伤。由李次生用九角旗两面包扎伤处，背负出后门，乘车至日租界鸿顺里日本同仁医院，请日人院长河野医治，后转德租界共和里11号李春萱处暂避。俄国巡捕则将发生爆炸的宝善里机关内的革命党人名册、文告、照会等搜去，并捕去有关的人员三十二人，致使当晚未能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武因伤未愈，未能参加战斗，但口授起义命令：一、夜间城内外举火为号。二、工程营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三、混成协工辎各营，自通湘门入，集合楚望台会攻总督署。四、炮队自中和门入，架炮蛇山轰击总督署及其他要地。当晚，按孙武命令起义，瑞激、张彪逃走，武昌光复。10月15日，推黎元洪为都督，孙武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下设七科，掌

管将校任免升迁等二十四项职权；10月26日，孙扶伤至武昌高等法院军务部办公，视事约四月余。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在宁湖北代表推孙武出任参谋长或陆军次长，未获同意。3月1日，因湖北内部派系斗争，孙武不愿同室操戈，自行引退。至4月9日，孙武接待来武汉慰勉辛亥武昌首义革命党人的孙中山。1913年4月24日，黎元洪任进步党理事长，孙武等九人任理事。1914年11月12日，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反袁声浪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孙武任将军府义威将军，晋授勋一位。此后，孙武不与闻政事，徜徉于京、津、沪、汉之间，或开办实业，或诵经礼佛。1939年11月10日，孙武在北平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邹鲁：《邹鲁全集》第七卷，台北三民主义书局1976年版。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石芳勤：《孙武——武昌首义的领导人之一》，李新、任一民等编《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3月版。

孙秀三

马国晏　刘辔

孙秀三，名大有，字秀三，以字行，直隶乐亭县人（今属河北省），1882年12月29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生。孙秀三幼年家境贫寒，读书很少，十三岁便远离故土前往东北，到长春“益发合”大车店“住地方”[(1)]。

长春“益发合”是乐亭县汀流河刘石格庄大财主刘梦道以四万八千吊资本于1892年投资开设的，最初仅是一个大车店。“益发合”大车店通过招待过往货车，服务食宿吸引客商，或代客购销，从买卖成交中提取佣金。每到秋后，也囤积粮豆，从倒把中获得厚利。还附设了油坊、碾磨坊、粉坊和豆腐坊等手工作坊，开设了粮米铺，零售油酒米面和杂货。孙秀三入“益发合”时，该号正不断发展，蒸蒸日上。

孙秀三刚到“益发合”时虽然年轻，但聪颖勤奋、任劳任怨，故深得掌柜们的重视，数年便升为“小掌柜”，成了“益发合”车店里出类拔萃的年青买卖人。

清末东北金融混乱，币制复杂，多种银、钱、钞票同时流通。为适应商品流通，便于兑换货币，钱庄业在长春迅速发展，大商号多自办钱庄。1904年，“益发合”大车店在本城西三道街开设了“益发钱庄”。翌年，二十三岁的孙秀三被提升为钱庄经理。

孙秀三经营“益发钱庄”后，深知钱庄要发展，关键是筹措充裕的流动资金，增强购买和储存各种钱钞的能力。1907年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有密切关系的长春“同和盛”银号倒闭，他迅即聘用该银号精通业务的佟锡侯等三人，通过他们与正金银行搭上关系，取得贷款。同时，孙积极改进内部业务，增设新的营业项目，扩大业务活动范围：

第一，向交通银行学习办理汇兑业务，使“益发钱庄”不仅获得了较多的汇水（汇款手续费），而且提高了存款额，扩充了流动资金。例如，1914年仅乐亭一地待取的汇款，有时就达一百多万元。第二，增加买卖和兑换金票、钞票、卢布和大小洋的业务，从中获利。第三，于1929年自设银炉，铸造“吉林大翅”[(2)]，并自出一至五吊的凭帖。第四，1913年以十万元（小洋）为资本，禀请“在黑河开设金炉，收买沙金，铸造‘宝条’”[(3)]，运赴上海出售。由于色纯量足，信誉甚佳。在机构设置上，于上海、乐亭、天津、营口、哈尔滨等地增设了分支机构，办理汇兑业务。这样，“益发钱庄”由以兑换为主，逐步转为以汇兑和买卖钱钞为主，并在“益发合”内进行单独核算，独立经营。

由于孙秀三经营有方，“益发钱庄”成为“益发合”各柜中最主要的获利单位。1912年至1917年，“益发合”共盈利二百零二万元，其中绝大部分为钱庄盈利，大车店的生意，则因中东铁路通车后货运量锐减而常常亏损。1916年秋，“益发合”的总经理韩杏林拟从钱庄提取一笔巨款，作为车店买卖粮食的流通资金，孙及钱庄众掌柜对此举颇不以为然。次年元宵节，他与钱庄掌柜们提出总辞职，韩见形势不妙，便自请退约。此时财东刘家亦已看出，韩杏林和一帮老掌柜们不谙商情变化，无所作为，而孙秀三和一伙后起的掌柜们年富力强、有识有为，于是同意韩杏林退约，从而迫使身股高、年岁大的三十余名老掌柜纷纷辞职。店东将孙秀三等人的身股增加一倍，委任孙为“益发合”总经理。此事在当时长春商界影响很大，人们称之为“孙秀三闹革命”。

孙秀三就任“益发合”总经理后，他以钱庄为“益发合”的总柜，在原有分柜、分庄的基础上，积极改革内部业务，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创办了榨油、制粉等工厂。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强社会联系，使“益发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孙秀三主持下，“益发合”的金融业务扩展较快，经营方法更加

灵活。他大力经营金银和各种钱钞，随时用电话掌握各地兑换比价，在此地低价购入，在彼地高价抛售。1919年，为日商三井、三菱洋行代收金票，即获利数十万元。“益发钱庄”除自身发展外，又于同年和交通银行合作，各出资十万银元，在长春开设“益通商业银行”。同时，“益发合”还大量经销粮豆，赚取厚利。由于经营金钞和粮豆等倒把买卖，企业经常冒着很大的风险，孙切身感到办企业“虚的不行，要办实的”。鉴于长春一带盛产粮豆，生产豆油、豆饼和面粉，不仅加工简便，而且销路畅旺，于是积极筹建榨油厂、面粉厂等近代工业，这是“益发合”前进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1921年，油厂建成投产，安装有四十台水压式压榨机，日产豆油二万斤，豆饼三千六百块，每日需用大豆二十万斤，是当时长春设备最先进的机械动力榨油厂。1924年，以四十余万元买下日商“中华面粉公司”的制粉厂，日产面粉四千袋，每日需用小麦一百二十吨，是当时长春设备最先进、产量最大的面粉厂。为了加强面粉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益发合”不惜高薪聘请外籍技师指导生产，在选购原料、精心加工、严格检查产品质量上下工夫；同时还开设了织布厂，自制面袋，为生产面粉服务配套。经过一番努力，“益发合”生产的“龙马牌”面粉在大连博览会上被评为一等品。1928年又租用哈尔滨“永盛公司”火磨（机器面粉厂），是为“益发合”的面粉二厂。次年与长春“裕昌源”合买“裕滨”火磨，建面粉三厂。这样，“益发合”面粉的年产量遽增至五百四十万袋，在当地位居第一，产品畅销于南满、吉长铁路沿线各地。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榨下，为使“益发合”能够生存发展，孙秀三注意联络结交地方官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的吉长道尹蔡运升、曾任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的袁金铠、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等人，或为“益发合”的座上客，或与孙时有来往。他看到负责经销吉黑两省食盐的吉黑榷运局，进出款项数额颇大，便与局长董某拉关系，为该局代收盐款，从而得到近百万元的存款充作流动资金。同时，由于他在长春商界积极活动，1917年被选充长春商会常务董事，1922年又当上了长春总商会的副会长。1924年—1931年“九一

八”事变前，一直担任长春总商会会长。

1925年前后，由于军阀混战，滥发纸币，致使奉票币值不稳。当时，不少钱庄大量倒卖奉票牟利，“益发钱庄”内部也有人主张多做奉票买卖，孙秀三虑及这样做可能给“益发合”招致祸患，便坚决禁止买卖奉票，并布置向沈阳、大连等地大量销售“龙马”面粉，使“益发合”的商誉为世人皆知。其后，奉票贬值，市场动荡，民怨大起。为了转嫁责任，奉系首领张作霖竟将倒卖奉票的钱号“天合盛”沈、长、哈等三柜的执事人逮捕，并于1926年8月19日将冯浚川等五人枪毙。据说，“益发合”也曾被列入查办的名单之中，幸有与他早有结交的奉系要员臧式毅出面力保，声称“益发合”素营实业，并不倒把，遂得使该号化险为夷。对此，“益发合”内外无不赞佩孙秀三掌柜有先见之明。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益发合”已经是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的集合体，各业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1920年至1931年，盈利约计八百万元。除长春总号（包括油厂、面粉厂及其附设的织布厂）外，在关内外二十四个地方设分支机构二十七处，全部从业人员达二千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孙秀三避居大连，在大连设立“总管理处”，仍负“益发合”经营管理的全责。为了扩大粮豆外销，1932年在大连“益发合粮栈”设出口部，直接向欧洲、南洋各地出口大豆、豆油、豆饼等。后因无力与洋商竞争，加上日伪进一步控制，被迫于1939年歇业。1932年，“益发合”还在长春西四马路口开设“泰发合”百货商场，这是当时中国人在长春开办的营业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百货商场。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1936年他提出改进组织领导形式，成立股份公司。是年7月，在大连召开筹备会，决定成立“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于长春，孙任代表董事，领导董事会。公司成立后，“益发合”由原财东刘家独资变成合资；由一人执掌全局，改为代表董事依董事会决议行事；将三年结账一次改为一年

一结算，采用簿记帐，每年提出《业务报告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经济掠夺，施行全面经济统制，“益发合”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一样，原材料和商品几乎断绝了来源，生产和销售受到严格限制，因而日渐衰败下去。处此逆境，孙秀三仍然尽心竭力进行经营，终使这一民族工商企业得以保存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孙秀三抑郁愤懑，不久即辞去连任七年的长春商会会长职务，派“益发合”一名副经理出任副会长以事应付。翌年，他干脆以养病为名从长春出走，摆脱伪满“首都”——“新京特别市”的社会活动。日伪当局曾加给他“新京特别市自治委员会委员”、“满洲制粉组合理事”、“新京地区直辖油房组合副组合长”等伪头衔，但孙从未参与其事。在日伪残酷统治下，他对日伪不予合作态度只能是有限的；但作为一个商人，孙秀三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是可贵的。

“益发合”是个拥有数千职工的大企业，孙秀三担任这样一个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用人、操守等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益发合”的一些业务骨干大都是他亲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老成持重恪守职责，或精明干练勇于创业，对一个私营企业来说，也可谓人才济济。孙执掌柜务，号令统一，不别亲疏。他的女婿高某在“益发合”任事，派驻海龙，1929年春节前夕，因业务需要，总柜通令各地驻在人员不得回长春度岁，而高某竟擅返沈阳家中过年，当时虽经东家为高求情，但仍执意责令其“出号”[(4)]。孙体恤下情，善于笼络人心。一次，经理室内存有蜜橘，一小伙计趁室内无人，登高取食，恰逢孙入内，小伙计惊惧失措，他却毫不介意和悦地说：“取下来，我要吃。”小伙计转恐为安，感激不尽。在企业内他虽权重位高，但廉洁公正，为同人所悦服。他精于计算，一般加减乘除均用心算，很少借助算盘等工具，俗称擅长“袖里吞金”。

孙秀三长期担任“益发合”总经理，资深功高，个人身股也较高。后来将身股折算成钱股，遂成为除刘家一门八支外的较大股东。

1945年2月2日，孙秀三病逝于大连。

附记：在撰写过程中，吉林省工商联副主委万玉英（原“益发合”财东刘次玄的夫人），原财东刘益旺、文书经办人王赫然等曾积极提供资料。稿成后，又经孙秀三的后人孙广礼先生订正，在此一并致谢。

主要参考资料

长春市民建、工商联编：《长春“益发合”史料初稿》。

---

(1) 当时到私营店就业，俗称“住地方”。

(2) 吉林地方铸造和流通的宝银，每锭重为53.5两，因形似元宝，两边有翅而得名。

(3) 《关于“益发合”请于黑河地方开设金炉禀帖》，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4) 从旧企业中退职、被开除，俗称“出号”。

孙岳

陈民

孙岳，字禹行，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于直隶高阳县西庄村（今属河北省），为明末兵部尚书孙承宗之后。他童年被送到外祖父家受启蒙教育，早年曾中秀才。但因祖上被清军所杀，怀深仇大恨，遂无心于科举仕途，常往来于高阳、保定之间，结交朋友，饮酒作乐。其父孙迈唐一生勤俭治家，对孙岳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视他为不成器的败家子。当时，孙岳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曾杀死蠡县一地痞，逃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1904年，孙岳投考保定武备学堂，被录取入炮兵科。在校期间，结识了革命志士吴樾、刘廷森等人。1906年，又进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后改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后改称陆军大学）第二期速成科进修。这时，北方同盟会创始人陈幼云受孙中山委托，从日本东京回到保定。陈着意在军官学堂进步师生中工作，以聘请体育教员为名义，请孙岳等到育德中学，进行革命联系。后来由陈幼云主盟，张继、王法勤介绍，孙岳加入了同盟会。

孙岳于1909年毕业，先后担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统领曹锟）九标三营管带（营长）、中校参谋等职。他在军中联络下层军官，积极从事反清活动，与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秘密组织的反清团体“武学研究会”暗通消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为策应南方革命，孙岳参与王金铭、施从云等策划滦州起义。由于有人告密，在滦州起义前夕，孙岳便被革职。不久他潜回保定，随即南下投奔革命党，至南京时江北独立，被陆军部委任为苏、松、宁、扬、镇五路军总司令，驻扎长江以北，与清军作战。后来军队改编，孙岳被任命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民国成立后，孙岳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聘，参赞军务并督办庐山牧场。1913年“二次革命”时，任讨袁一路军总司令。反袁斗争失败后，同李烈钧逃亡日本。不久密潜回国，隐居于陕西华山脚下。

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奉、皖三大派系，各自扩张势力，争夺地盘。1917年，孙岳凭借与曹锟的旧关系，任直系曹部军官教导团团长，先后参加了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被任命为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移驻直隶大名。

曹锟、吴佩孚把持北洋政府后，穷兵黩武，吴佩孚企图武力统一全国，残酷镇压工农运动。1923年10月8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锟令，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又派李石曾等秘密联络北方将领。孙岳与冯玉祥在滦州起义之前就相交甚厚，两人在政治上都有进步倾向，在直系中又都受到吴佩孚的排挤，因此都有倒直的意愿。1924年9月10日，孙岳应冯玉祥之约，以祭奠殉难官兵之名，在北京南苑昭忠祠，就推翻曹、吴之事进行秘密商议，即史书上所称的“草亭会议”[(1)]。会后，孙岳即联络胡景翼。胡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部在陕西耀州起义，后迫于形势，接受直系改编。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驻扎于彰德、顺德一带，正好与孙岳的部队相比邻。经孙岳联络，欣然同意，并派部下岳维峻去见冯玉祥，表示绝对服从指挥。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第三路军司令，率部进军赤峰，置于奉军重兵之下，并派胡景翼等监视冯部，如有异动，就地解决。这更迫使冯最后下决心推翻曹、吴。在直军动员会之后，冯向曹锟建议，调孙岳部来拱卫首都。曹不知有计，即令孙岳率部进京，委任为京畿警备副司令（总司令赵玉珂）兼北京戒严司令，负责京城治安。孙岳为了掌握举事主动权，安排得力副官门炳岳当陆防处处长，派出马、步兵在各主要街道来往巡查。10月12日，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18日，又将驻长辛店、丰台的嫡系部队全部调往前方。冯玉祥得到消息后，遂于

10月19日通知孙岳监视总统府卫队和吴佩孚的留守部队，做好举事准备；通知胡景翼扼守通州，防止吴佩孚反扑，命令所部李鸣钟急趋长辛店，切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急令已到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部停止前进，限期回师；急令鹿钟麟率部日夜兼程，迅速返京。10月22日夜12时，鹿部前锋到京，孙岳令士兵开城门迎接，布置所有官兵佩戴事先备好印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的臂章，占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控制了北京与外部的联系，并派人去中南海通知曹锟。曹梦中惊醒，觉得大势已去，只好下令卫兵向孙岳缴械。这样，不费一枪一弹，一夜之间，完成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使直系失去了根基，前线直军溃不成军，吴佩孚只得收拾残兵败将，从海路仓皇南逃。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孙岳力主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同时，极力推荐与孙中山有密切联系的国民党人李书城、李烈钧、李石曾等出任过渡政府的重要职位，并坚持自己及其部下均不参加内阁，以示举事为国，不图私利。会议决定将参加北京政变的各部队统一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会后，冯、胡、孙三人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并派代表持冯玉祥的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2)]。11月1日，孙中山向冯、胡、孙等发表了感谢电，表示“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3)]。但是冯、胡、孙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的政治主张却遭到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反对。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未及开展工作，便因病逝世，使冯、胡、孙等人期盼与孙中山共商大计，开创政治新局面的主张未能实现。

国民军成立后，孙岳即率国民军第三军进取保定，肃清曹、吴残余势力，释放关押在保定监狱的“二七”大罢工的工运干部，使京、津、保等地的工会得以恢复。同时还同意共产党在保定建立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孙岳带兵，军纪严明，深得军心、民心。进驻保定后，兵力得到扩充，由一个混成旅发展为

两个师，后又扩编为四个师三个混成旅。孙岳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其余三个师的师长分别为叶荃、杨虎城、何遂。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分别为徐永昌、庞炳勋、刘廷森。

1925年1月，孙岳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8月，任陕西省督办。11月，国民军反奉之战爆发，直隶李景林部败逃山东，孙岳调任直隶督办兼省长，进驻天津。1926年初，冯玉祥因和苏联接近激起北方军阀的攻击，以冯“赤化”甚于洪水猛兽。冯迫于处境日益险恶，提出息争呼吁，通电下野。孙岳接任对奉作战前敌总指挥。3月，奉军及直鲁联军反攻，天津失守，国民军撤回北京。孙岳心情郁闷，染病住进医院。4月中旬，随国民军退至包头，留五原养病。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重整国民军，孙岳抱病参加“五原誓师”，本想参加北伐，但因病加重，不得不赴上海就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一职由徐永昌代理。1927年6月，孙任河南省政府委员，8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

1928年5月27日，孙岳病故于上海。12月25日，安葬于北京西郊温泉山下，张继为之撰墓志铭[(4)]。

---

(1) 冯玉祥：《我的生活》（合订本），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489—491页。

(2)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北平版，第128页。

(3) （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三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978页。

(4) 牛国华：《孙岳将军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孙震

马宣伟

孙震，名定懋，字德操，四川成都人，1892年2月5日（清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七）生。孙家三世业儒，父亲孙祖翼兼习韩老刑名律学，因家贫，携妻申氏糊口四方。孙震四岁在绵阳发蒙，五岁后随父辗转崇庆、嘉定、叙府各地，八岁时返回成都老家，经亲友介绍到吴运明家附馆读书，喜读历史。1903年父亲病逝，家境更加艰难。次年，孙震考入成都学堂甲班。他埋头苦读，自修补课，于1906年7月考取四川陆军小学第二期，同学有黄隐、刁文俊等。三年后毕业，由成都至西安入陆军中学。在学习期间，孙震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参加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与牛范九、黄隐、夏首勋等人参加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孙震在西安与党人组成了有二百人枪的“四川革命军”，拥戴在西安的四川藩台王人文为大统领，回川发动革命。这支队伍先攻下广元，继而又分道向成都进发。孙震在途中获悉成都独立而武汉仍在恶战，乃和夏首勋等经重庆到武汉参战；但等他们赶到武汉后，局势已定。孙震遂于1912年8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3年春，夺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又派人杀害了宋教仁，还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孙震毅然抛弃学业，由保定南下至上海参加讨袁。不久讨袁失败，遂去汉口。8月，孙得悉熊克武、杨庶堪在重庆举兵讨袁，他和三十名川籍同学返川参加。孙震等抵达重庆时，熊、杨讨袁军亦已失败，重庆治安由前江西都督府参谋长陈泽沛为临时总司令在维持，孙震等人乃在陈泽沛麾下工作。不久黔军将领黄毓成率黔军入川，骗取了陈泽沛的信任，将大部队带入重庆，即按袁世凯的旨意到处搜查、捉拿革命党人。孙震潜离重庆，返成都隐居。

1914年，孙震入刘存厚的川军第二师任排长，翌年12月升任连长，随后在叙永参加护国军讨袁，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十分勇敢。1917年初，升任刘存厚部骑兵旅上校参谋，又调任独立第二支队长。他率队先后参加与滇军罗佩金、黔军戴戡部之战，以功升任田颂尧第三混成旅第一团团长。从此，孙震率领的团成为田旅的主力部队。1917年12月，重庆镇守使熊克武通电拥护孙中山护法，联合滇、黔军组成靖国联军，起兵讨伐依附北京政府的四川督军刘存厚。1918年2月，刘存厚退出成都，孙震率全团随刘存厚、田颂尧经绵阳败退陕南。

1920年7月，熊克武在吕超等部组成的滇黔联军攻击下不支，败退至保宁、盐亭、苍溪一带，电请刘存厚回川主持讨伐滇黔军之战。刘存厚当即下令所部组成“靖川军”，任命孙震为靖川军第一路司令，率部于8月10日出兵返川。孙震部先攻占泸州，后合攻成都。由于熊克武、刘存厚、刘成勋联合，终将滇黔联军驱逐出川。刘存厚进驻成都后，升孙震为陆军第二十一师第四十一旅旅长。此后在一、二军之战，熊克武、刘成勋与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之战，熊克武与杨森之战等战乱中，孙震都是田颂尧的得力战将。1924年3月，孙震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将军府将军，4月4日，又被任命为第二十七混成旅旅长。1925年7月，杨森发动统一四川之战失败后，四川大小军阀瓜分杨森的军队和防地，田颂尧、孙震占据川西北大片防区，田颂尧为川西北屯殖总司令驻三台，孙震为副司令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率部驻防绵阳地区。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10月即底定湘鄂，川军纷纷易帜，12月，田颂尧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孙震任副军长兼第一路司令。孙震在军中以勇敢善战著称，又精于出谋划策，注意对部队的训练和建设，在官兵中具有威望，已实际掌握该军的大权。

孙震热心家乡教育事业，1929年，在成都捐款创办了树德义务小学第一、二、三、四校；1932年，又开办树德初级中学，分男女生部，招贫寒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和食费，期末还把伙食结余发给学

生。后来办起男女高中部，才开始征收学费和住校伙食费。孙震为使办学事业正常进行，设立“私立树德中学董事会”，出任董事长兼校长。他捐出银币四十万和乐山嘉乐纸厂股本十万，以及他在成都市的十几处公馆、百余间铺店，以利息和房租收入作为学校常用经费。孙震还划出郫县的四百亩良田作为学田，由学校收租补充经费。由于他重视教育事业，还在驻防地区奖助开展文教工作，在绵竹、剑阁等县捐资修纂县志等。

1932年初，孙震与田颂尧争权的矛盾表面化，他负气以养病为名前去上海，经侄儿孙元良牵线，投靠了蒋介石。田颂尧为统率全川军队，又将孙震请回四川。同年，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与田颂尧交恶，爆发了成都巷战。孙震指挥所部在成都皇城煤山与刘军展开争夺战，双方激战六昼夜，冲杀不下百次，煤山终于被刘军占领，孙震将守煤山的团长枪毙以泄愤。

此时，红军第四方面军趁四川军阀混战之际进入四川，占领了第二十九军的防地通江、南江、巴中等地，使蒋介石、田颂尧、孙震等惊惶不已。蒋介石令第二十九军向红军进攻，委田颂尧为“剿匪”督办，孙震为前敌总指挥，结果遭到惨败。蒋介石又委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率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一军及邓锡侯、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部，分六路围攻红军。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阆中、南部一带西渡嘉陵江，突破第二十九军防线。蒋介石大为震惊，当即手令田颂尧撤职查办、孙震“戴罪图功”，实际上这是让投向他的孙震掌握第二十九军及其防地，4月19日，即正式任命孙震为第二十九军军长。5月15日，国民政府派孙震为第四十一军军长，取消第二十九军的番号，彻底更换了田颂尧的班底。

孙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兼第二路总指挥后，指挥所部在雅安金鸡关等各要点围堵西进的红军。西安事变发生后，孙震部编为讨逆军第五预备军，奉命进入陕西南郑、凤县。1937年7月初，蒋介石派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企图大量削减川军。会议进行之

际，“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孙震当即在会上请缨出川杀敌。8月初，孙震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四十一军军长，率三个师六个旅出川。孙部官兵都是单衣薄裳，赤脚草鞋，身背土造步枪，每人配子弹三五十发、手榴弹两枚，徒步翻越秦岭到西安。他们原盼望得到蒋介石许诺补充的枪械装备，结果蒋介石限令川军原车东开，迅速渡河，补充装备的事只字不提，孙震只好带部队进入山西。

是年9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山西。孙震第四十一军隶属第二战区。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分兵沿正太线西进，由测鱼口窜入晋境，绕道攻击娘子关守军的侧后。孙震奉命率部赶赴娘子关西南的东回村、柏井驿、石所、平定等地，截阻西进的矾谷师团，掩护娘子关友军转移。接着，孙部又奉令驰援太原。当孙部日夜兼程赶到太原，阎锡山主力已撤走，孙震乃率部扼守洪洞、沁源一线。第四十一军入山西作战四十余天，伤亡过半，全军无一个完整的团，但阎锡山反骂川军是支烂队伍。

是年12月，孙震所部奉令调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防守鲁南。1938年1月，孙部与南下徐州的日军在邹县、滕县间遭遇。2月，孙震升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一军仍守山东滕县、邹县一带，同日军作拉锯战达两月余。川军军纪较韩复榘部队好，又远道来山东抗战，受到群众的爱护和支援，蒋介石也电令嘉奖孙部。3月初，占领济南的日军十二军团西尾寿造部队南下。孙震于3月10日到滕县及其以北的界河前线视察，与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等人一同制定了作战方案，并对固守滕县作了具体部署。3月中旬，日军迫近滕县，蒋介石、李宗仁命令孙震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务必死守滕县三日。孙震派王铭章为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四十一、四十五两军对日军作战。3月14日拂晓，日军步骑兵万余人，配备二十余门大炮、二十余辆坦克并飞机三十架，向两下店、界河一线进攻。镇守滕县的王铭章部奋勇作战，伤亡严重，孙震命令守卫总部的特务营营长刘止戈率三个步兵连援救滕县，仅留一个

手枪连守卫总司令部。16日上午，汤恩伯集团军来到孙震总部住地临城，孙震面请汤恩伯出兵增援滕县，汤以所部经临城向日军左侧背进行攻击为由，拒绝援助。王铭章率孤军坚守滕县浴血苦战三昼夜，在巷战中壮烈牺牲。孙部官兵阵亡三千余人，负伤者四千余人。正如李宗仁所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孙震率部在鄂北地区正面战场继续抗御日军。1939年5月，孙震部参加鄂北会战，8月，击退窜扰高城、唐县镇的日军第三师团一部。12月，孙部向日军发动冬季攻势，攻克随县城外擂鼓墩、独崇山各重要据点，及淅河、马坪间各交通要点。1941年5月，孙震率部参加随枣会战。1942年，孙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二集团总司令。同年11月，他指挥部队击退由京钟路窜入张家集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1943年5月至8月，他两次率部参加鄂西会战。1944年2月，日军第三十八等五个师团及骑兵四旅团约十余万人进犯鄂北老河口、襄樊和豫西的南阳、西峡口，孙震指挥抗日部队固守老河口，痛击进犯的日军，并反攻河城口李官桥及襄樊附近的日军阵地。孙部在这一战役中伤亡官兵达七千余人。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孙震于1945年9月20日以第九战区受降副主官身份，在漯河举行受降礼，第二十二集团军解除日军驻郾城、漯河的第一一五团及第十三警备旅的武装。1946年5月，孙震调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孙震奉命率部进犯鄂豫陕解放区，与李先念部作战；又回师在开封、兰封一带与刘邓大军对抗，均遭惨败。1947年初，孙震率部守汲县，与刘邓大军再次作战。后来孙部进入豫北、冀南、鲁西地区，驻防考城、车明、滑县、浚县、濮阳、濮县各地。6月，孙震调任国防部郑州指挥所总指挥，负责守卫黄河南北两岸。1948年8月，蒋介石组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孙震任副总司令兼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移驻宜昌。他的基本部队交侄

儿孙元良组建成第十六兵团，自己只带少数杂牌部队。1949年2月，孙震改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川东绥靖司令，准备阻挡人民解放军入川。10月，人民解放军由陕、鄂、湘、黔攻入四川，蒋介石政权已届总崩溃，孙震率残部退往南充转绵阳，设立川鄂边区绥靖公署指挥所。12月13日晨，刘文辉、邓锡侯通电起义后，派专人到广汉送信，约孙震、杨森一同起义，使四川免遭战祸，但他和杨森表示不能前往与刘、邓见面。12月18日，孙震和杨森从成都飞往海口转台湾。

孙震到台湾的当天下午，便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被委为“战略顾问”，后又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大代表”等职。他晚年在台湾入不敷出，生活困窘。写有《十年磨剑》、《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等书。

1985年9月9日，孙震在台北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四川文献》。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马宣伟、温贤美编著：《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孙中山

尚明轩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逸仙，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在广东香山县永宁乡大宇都（今中山市翠亨镇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归家务农。哥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做雇工，后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六岁参加农业劳动，十岁进塾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非常向往。1878年，他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家里，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初受西方思想影响。1883年返回家乡，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常加批评。因毁村庙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往香港。1884年到1885年间，先入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读书。

1885年，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屈服而告终。孙中山鉴于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从事改造国家的念头。他打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便于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中的会党人物郑士良，以后在革命过程中运动会党起事，得郑助力甚多。第二年秋，他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到1892年毕业。在校五年，他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先后结识的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人，志趣相同，经常聚谈，倡言革命。其中和陈、杨、尤三人同住香港，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结束学生生活后，从1892年起，先后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正在国内盛行，孙中山及其同志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存有若干幻想。早在1889年，他就曾致书已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过效法西方国家以进行改良的具体意见，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各地。1894年6月，他又约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的主张，遭拒绝。

通过事实的教育，孙中山觉悟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抛却对统治阶级的幻想踏上了革命之路。他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辅仁文社，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积极准备在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举行起义。不料在起义前两日，正当运械赴广州时，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遇害，孙中山逃往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11月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辫，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再往檀岛。时当新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在1896年6月又赴美国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往英国。10月1日，他到达伦敦，首先访问了他学医时的老师英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并在康寓附近住下来。10月11日，

孙中山在外出途中被清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羁囚在使馆里。幸得康德黎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才于十二天后脱险。此后一年，他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悉心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其间曾访问过第二国际。他接触到风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并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遂于1897年秋重到日本，并结识了日本朝野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10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日本。由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劝说孙中山等和他们谈判合作。于是，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要他们“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谈判不得结果。1899年夏秋间，孙中山又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因康有为强烈反对，梁启超口是心非，联合的计划终未实现。此后，孙中山逐渐识破了康有为保皇派的反动面目，并认为他是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1)]。

孙中山在日本于准备再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对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早在1898年和菲律宾人民起义军派到日本的代表彭西（Maroano Ponce）有过接触，并应其所请，积极帮助。1899年，孙中山为他们购买和运送了一批军械，并准备亲率杨衢云等赴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1900年1月，他再次设法为他们购置了一批枪械。这种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人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10月8日，孙中山组织了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是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进行的。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多人，血战逾半月，但由于革命党人未能在人民自发斗争浪潮汹涌高涨时刻发动群众，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粮械失继，弹尽援

绝，最后终于失败。

1901年至1904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1902年冬到越南，1903年秋又从日本往檀香山，1904年春再去美洲，至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欧洲。这次所到之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华侨与留学生中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地多起来了。因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迅速增长。同时，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增强。不少地方蓬勃地开展抵制美货及收回铁路矿权的运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日益倾向革命。国内外各地继兴中会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些诸如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与此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各种报刊书籍也纷纷出现，促进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

但是，从1898年秋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又于1899年7月以后，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保皇会，反对和破坏革命。同年12月，梁启超忽然伪装愿与孙中山合作，骗取了孙中山给孙眉等兴中会员的介绍信，持赴檀岛，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混淆视听，诱骗华侨加入保皇会。兴中会发源地的檀岛，会员被夺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兴中会员也受他们的迷惑，不少人入保皇会，为康、梁所利用。1902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他惯于在字里行间玩弄些“革命”的词藻，用来蛊惑群众。这一套骗人伎俩，逐渐地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所识破。早在1900年，孙中山对梁启超上年在檀岛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已给以严厉的谴责；随后，在孙中山指导下，横滨的革命派半月刊《开智录》、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对保皇派一些报刊（如《清议报》、香港《商报》、广州《岭海报》以及后创的《新民丛报》等）上的反动谬论都进行批驳。两派之间初步

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

1903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看到檀岛各埠华侨误入保皇会的很多，自己亲手组织成立的兴中会，因梁启超等人的破坏而面目全非，不少老会员都变为保皇会的骨干，痛感保皇会的危害性。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2)]，决心与保皇派的主张“划清界限，不使混淆”。他一面在檀埠和希炉（Hilo）等地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演讲，驳斥保皇派的各种谬论，一面改组华侨程蔚南所办商业报纸《檀香新报》为革命喉舌，亲自撰文和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笔战。他针对保皇党徒对革命的攻击及《新中国报》主笔陈某发表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一文的谬论，于1903年底和1904年初，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会》及《驳保皇报》两文猛烈抨击保皇派的宣传，揭破他们所讲的“爱国”，是爱的虐民媚外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华国”，所讲的“革命”是假革命。他们所谓“借（保皇）名以行革命”，全是骗人的。此外，孙中山还驳斥了他们所谓革命可召瓜分说的可笑，指责他们先行“立宪君主”才能行“立宪民主”说法的荒谬，断言他们没有政治学常识和不懂逻辑，他们是“惑世诬民，遗害非浅”的。这些讲演与文章，有力地揭穿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保皇的区别，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人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在檀岛各埠发生很大的影响。

1904年夏，孙中山离开檀岛到了旧金山。那里是保皇派势力集中之地，华侨中的上层人物多受“保皇”宣传之骗。孙中山为了使宣传易于生效，先在小商人及工人中进行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力驳“保皇”谬说，博得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同情。同时，指派干部改组《大同日报》成为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重要喉舌，使该报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偕同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肃清保皇派的流毒。

孙中山与保皇派经过激烈的论战，初步打击了各地保皇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为同盟会的建立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

的准备。

1905年初，孙中山在比、德、法等国向中国留学生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7月，他由欧洲再到日本，在东京会晤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针对过去革命团体的分散状态，商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8月13日，他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了长篇讲演，再一次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和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并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智慧，认为只要敢于革命，就一定能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坚决主张从革命着手，在封建皇朝的废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接着，他和黄、宋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在《章程》中提出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翌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还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号召，对同盟会的四条政纲分别作了阐释。）11月26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里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并且设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这是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以来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它的提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派更加广泛地全面开展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暹逻、旧金山、加拿大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了论战。从1905年起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论战的内容，主要环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

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通过这场激烈的论战，暴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国内外广泛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更积极地筹划武装革命。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3月，他离日本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就近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5月有潮州、黄冈起义，6月有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据守炮台，与清军交战。此役失败后，他被迫离越南，行前又派黄兴、黄明堂分别入广西、云南，因而又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孙中山又派人策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虽仍归失败，但孙中山毫不气馁，随即召集党人会商于南洋庇能（即槟榔屿），决心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经过近半年的准备，遂有1911年4月27日（即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影响最大的黄花岗之役。这些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党人主要是在部分新军、会党或防营中进行工作，而没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因而均归失败；但是这些起义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在1907年到1911年的这一时期内，各地劳动群众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单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这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客观上相互配合，形成了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向火山口上。1911年5月以后，不断扩大的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风潮，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当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曾在清朝的新军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湖北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

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在声势浩大的群众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冲出营房，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城，两三天内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革命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接着，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立即在各省领导和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办理外交交涉，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因此，便由美赴英，再到法国奔走活动；于11月下旬才动身归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29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以这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随同清朝政府的垮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最后结束。孙中山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短命的丑剧。

但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结果就被内外反

动势力所包围，通过所谓“南北和议”，革命党人被迫向袁世凯妥协了。根据协议，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也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荐袁以自代，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所篡窃了。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总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份，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9月，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满怀着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回到上海。1913年2月，他去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积极进行借款活动。同年7月初，在上海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逐渐丧失了警惕。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桩震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醉心于责任内阁制，为争取国会中的优势，他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于1912年8月吸收其他小党派与同盟会合组为国民党。他想以内阁来削弱总统权力的主张和活动，以及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的事实，引起袁世凯的嫉恨，袁便指使凶徒把宋杀害。宋案发生后不久，4月，袁世凯又违法和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作为用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它使孙中山从“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幻想中警觉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断然主张立即兴师讨伐。7月中旬，他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因国民党涣散无力，难以发挥大的战斗作用，旋即失败。孙中山被迫再次逃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被推举为总理。他接受失败教训，希望严密组织纪律，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党员最多时只有五百来人。1914年至1916年，中华革命党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是

比较坚决的力量，也积极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斗争相继失败。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中华革命党也只充当了配角，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16年5月，在全国反袁护国胜利的形势下，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时袁世凯见势不妙，已“自动”撤销了帝制；孙中山当即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提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说明了他对国内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袁世凯在全国军民反对下倒台并于同年6月毙命之后，继起掌权的段祺瑞，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的全部反动政策，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仍是一个“谋危民国者”。孙中山对此坚决反对，主张打倒“伪共和”。1917年7月，他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去广州，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滇系军阀，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军阀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并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揭起“护法”的旗号，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

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象征。此后多年，卫护《临时约法》一直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旗帜。其实，《临时约法》在北洋军阀几年来的任意蹂躏下，已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国会”，已成为政客们卖身分赃的活动场所。因此，“护法”不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起不到动员革命人民的作用。当时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桂系首领陆荣廷与北方的直系军阀素有勾结，谋取私利。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孙中山局处于广州一隅，“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918年4月，桂系军阀决定改组军政府。废元帅一长制为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本身又无力反击，被迫于同年5月向国会非常会议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并从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3)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一筹莫展，他闭门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1918年，他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撰写《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1919年完成了全书。同时，他指派朱执信等创办《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鼓吹建设思潮，阐明建设原理，传播新的思潮，并亲自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

在此前后，孙中山将视线转向给他带来新的希望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真诚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是一种推动。他在同年10月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4) 不久，又说：“‘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5) 表明他对人民群众的威力有所感受，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当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这虽然谈不上彻底的改造，但孙中山是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

在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已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1920年8月，他命令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部（时驻闽南）回粤讨伐桂系，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同年11月，孙中山在粤省军民欢迎声中重返广州。1921年4月，国会开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一次揭起护法旗帜。同年7月，他派军队平定了广西，于是两广统一，便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这时北方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手里。孙中山积极筹划与准备讨伐直系，“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但

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受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的策动，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准备改道北伐。时北方直奉战起，孙中山照事先与奉系约定夹攻直系的计划，便于5月中旬派兵进入江西。不料6月间，当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时，陈炯明于16日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于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午夜避登到白鹅潭的楚豫舰上，翌日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率各舰反击叛军，相持五十余日，至8月9日，迫不得已始离开广州转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他心情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6)

两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很痛苦，甚至绝望，但也使他觉悟到依靠军阀打倒军阀的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必须走新的道路了。

如前所述，孙中山向往十月革命，希望学习俄国的经验。他曾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又拟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习。还在1921年8月间，他在答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信中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7) 同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约见了经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密谈了五天。共产国际代表向他陈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一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打电报给廖仲恺说，这次会见使他“心中非常高兴”。

1922年8月间，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适逢中国共产党发表了

《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这个文件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建议，对正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如李大钊就在这时由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8)]。《向导周报》也发表文章，对孙中山进行帮助。正在这时，苏俄政府派出的代表越飞到了上海，和孙中山会见并先后晤谈多次，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之后，为避开反动派注意，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去进行详细会谈。这一会谈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决心。

这时工农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孙中山从展现在面前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并从而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帮助，并肯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终于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他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开始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初步成立了改组工作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孙中山并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

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9)] 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正由于共产党人的影响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与廖仲恺会谈的苏联代表回到上海，孙中山再一次会见了他，双方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恰在这时，滇、桂军中接受孙中山

策动的各部向粤境发动了对叛军陈炯明的进攻，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又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在此期间，他除继续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外，又于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访苏联，并邀请了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的革命工作。孙中山这些勇敢的步伐，使他晚期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可喜的异彩。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特为发出了十三号通告，具体布置各地保证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10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等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对国民党员作了三次演说，表示他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联的决心。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0)] 年底，李大钊由北京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65人。在由各省推派及由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中，有些是共产党人。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几个审查委员会中，也都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工作。依靠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这次大会的成功。通过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辩论和斗争，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和各项具体办法，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部也大部分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的通过，

使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纲领，因为这里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与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了。在《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1]。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12]。这样，就使旧三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革命内容，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13] 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符，因此它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训练武装革命干部。6月，黄埔军校开学。长期曲折的革命实践过程，使得孙中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他不但认识到革命必须有武力，而且提出要“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14]。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右派分子心怀不满，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三大政策的推行。孙中山很生气，斥责他们说：你们“站在革命队伍的后面，革命的青年前面去了，你们还在说他们什么呢”[15]。他对右派分子多次进行批评，并发表《致全体党员书》，说明联俄、容共的必要性。在该书中指出散布谰言者，“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16]。为了排除右派顽固势力的干扰，孙中山在代表大会前，把阻挠改组、无理取闹的张继加以囚禁；代表大会

后又把破坏容共政策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开除出党。

国民党改组后不久，中国革命就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工农群众运动在各地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从一度处于低潮又开始高涨。过去遭破坏了的工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会也陆续成立。广州的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广州郊区农民组织了自卫军。孙中山这时坚定地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1924年“五一”劳动节，他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鼓励工人“作国民的先锋”。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开会，非常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8月，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时，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17)]。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帝国主义也就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早在1923年12月，当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美、英、法、日、意、葡等国为劫夺广东“关余”，截断革命政府的经济来源，就调集兵舰二十艘，集中黄埔，进行威胁。孙中山没有为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所吓倒，他指出截留“关余”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那时广州各界人民，以广东工会联合会为主导，也一再举行收回海关主权的示威运动，给他以有力的支持。最后，北京外交使团不得不作出将一部分“关余”拨交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关余事件”的胜利，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成果，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国民党改组之后，英国又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它一面积极援助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又利用广州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武装，从内部颠覆广东政府。1924年8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进行阴谋叛乱而秘密运入广州的一批军火。商团便借此出动一千多人包围孙中山的大本营，喊叫发还枪械。在陈廉伯等人煽惑下，广州商人掀起罢市风潮，陆续蔓延到全省一百多城镇。8月28日，英舰九艘集中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

国军舰，进行恫吓，同时英国总领事向孙中山提出最后通牒，宣称“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为此，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出：“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18] 同时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其时，孙中山一直想实现他拟定的北伐计划。还在1923年10月，北方直系军阀曹锟利用国会贿选为“总统”时，孙中山即曾通电全国声讨曹锟和通缉受贿议员，下令出师北伐，以谋国家统一。他的北伐计划由于内部牵掣等原因一再受阻，可是他毫不懈怠地部署军事，有时还亲临前线，鼓励士气。为了打击主要敌人，他曾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一致行动，进攻直系。国民党改组之后，1924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应乘这一时机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遂再次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军到韶关。他到韶关之日，也正是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加紧煽动叛乱之时，在陈廉伯煽动下，各地买办商人、豪绅地主趁孙中山离开了广州，纷纷集会，肆意攻击广东革命政府，并向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的通牒。10月10日，当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并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四处捕人，发动武装暴乱。在这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力劝孙中山当机立断，镇压叛乱。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都纷纷表示支持孙中山，愿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决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他立即成立镇压叛乱的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军，并命参加北伐的部队星夜由韶关回师广州戡乱，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就平定了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商团事件的解决，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心和力量，使广东革命政府得以巩固下来，也增长了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必胜

的信心。

商团叛乱平定后一周，正在鏖战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部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系迅速溃败而结束。之后，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而又相互猜忌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影响，电邀孙中山北来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也想“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以求实现和平统一，遂接受了邀请，于11月13日带病离粤北上。这时，孙中山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革命坚定性进一步加强。在当前局势问题上，他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主张，也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而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他在北上前，对《粤报》记者谈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为我国实现独立自主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反革命势力最大的因素。”离开广州前三日，又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他由上海取道日本到天津，沿途多次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谋求全国真正统一的重要言论，表现了坚强的原则性。他反复申述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19)]。

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发动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各地区、各阶层都建立了促成会组织，积极展开斗争，为孙中山北上作后盾。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冯玉祥一派渐被排斥，无能为力。旧的反动统治去了，新的反动统治又建立起来。因此当孙中山年底到达北京时，面临的对手仍旧是以前的那个“谋危民国者”段祺瑞了。段祺瑞政府于12月6日发表了要“外崇国信”的致使团书，表示要尊重不平等条约；24日，又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件，将要召集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这些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怒斥段祺瑞的谬误。随后，他由于忧劳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孙中山仍坚持斗争，拒绝

与段祺瑞妥协，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极力反对“善后会议”。他在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革命，留下“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并在《致苏联遗书》中，表明了他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决信念。著作结集出版的孙中山文集、选集或全集、丛书等，有八十多种不同的版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是较完整者。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家，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孙中山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也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宝贵遗产。

---

(1) 《犬养毅传》卷二，转引自Jansen Marius B，*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p8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726—727页，1954。

(2) 《致黄宗仰乌木山僧函》（1904年1月），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22页。

(3)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年5月4日），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4) 《孙中山先生在寰球学生会演说辞》，铅印原件；参见《救国之急务》，《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

(5) 《致海内外国民党同志函》（十），《总理全集》下册，“函札”，第160页。

(6) 《致国民党员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48页。

(7) 《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新华月报》第三卷，第四期（1951年2月）；又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6页。

(8) 《李大钊狱中自述》，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9)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10)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基础》，《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1924年版；参见《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1页。

(11)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铅印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6页。

(12)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7页。

(13)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6页。

(14)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1925年4月12日；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28页。

(15) 恽代英：《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1925年3月14日），《孙中山先生与中国》，民智印刷所1925年5月版，第27页。

(16) 孙中山：《致全体党员书》，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6日。

(17) 《向农民宣传应该为他们谋幸福》，《总理全集》中册，“演讲”（关于农工商各界及一切国民者），第43页。

(18) 《孙中山先生遗言》，上海书店1925年四版；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1页。

(19) 《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又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97页。

(20) 《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六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六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T

太虚　韩廷杰
谈荔孙　汪仁泽
谭浩明　刘立道
谭平山　刘秋阳　吴明光
谭人凤　周天度
谭曙卿　李锡贵
谭鑫培　白吉庵
谭延闿　李静之
汤恩伯　沈荆唐
汤尔和　娄献阁
汤化龙　曾业英
汤寿潜　郑云山
汤芗铭　经盛鸿　殷文
汤用彤　宗志文
汤玉麟　张学继
汤子敬　李本哲
唐继尧　谢本书　孙代兴
唐群英　罗绍志
唐绍仪　郑则民
唐生智　李静之
唐拾义　汪仁泽
唐文治　毕苑
陶成章　尚明轩
陶希圣　贺渊
陶行知　宗志文

陶孟和　涂上飙
滕虎忱　王家鼎
田耕莘　雷镇阊
田汉　陈小村
田颂尧　马宣伟
田桐　徐辉琪
田文烈　罗幼娟　邵桂花
田中玉　邵桂花
佟麟阁　范立君　于晶娜
土肥原贤二　汪仁泽

W

万福麟　丘琴　姜克夫
汪大燮　朱杰仁
汪逢春　寿祝衡
汪精卫　闻少华　丁贤俊
汪康年　汪仁泽
汪笑侬　汪仁泽
王伯群　熊宗仁
王伯元　董建侯　宋紫云
王承斌　邵桂花
王宠惠　郑则民
王光祈　李义彬
王国维　耿云志
王和顺　黄碧琴
王怀庆　张学继
王家烈　周春元　林国忠
王家襄　夏高阳
王金发　裘士雄　徐和雍
王金铭　梁旭毅
王荆山　马国晏　刘辔

王阊运　白吉庵
王克敏　王春南
王乐平　刘培卿　刘镇
王陵基　刘识非
王懋功　陈德军
王少堂　倪波　沈道初
王世杰　严如平
王士珍　公孙訇
王泰　庞守信
王天培　熊宗仁
王天纵　综文
王统照　鲁海
王文华　熊宗仁
王希天　任秀珍
王小航　娄献阁
王晓籁　汪仁泽
王性尧　罗九和
王亚南　林其泉
王亚樵　姚怀然
王尧臣　王禹卿　朱复康
王揖唐　萧栋梁
王一亭　汪仁泽
王以哲　张玉芬
王荫泰　朱佩禧
王永江　武育文
王用宾　萧栋梁
王芸生　熊尚厚
王云五　熊尚厚
王造时　江绍贞
王占元　张振鹤

王振　庞守信
王正廷　郑则民
王芝祥　王川
王志莘　吾新民
王郅隆　熊尚厚
王缵绪　马宣伟
卫立煌　严如平
魏如　李新辉
温生才　杨天石
温宗尧　邵桂花
闻兰亭　汪仁泽
闻一多　王子光
翁文灏　严如平
吴鼎昌　熊尚厚
吴光新　张学继
吴国桢　颜平
吴晋航　袁嘉新
吴经熊　李在全
吴景濂　张树勇　张黎辉
吴俊陞　孙德昌
吴克仁　姜克夫
吴禄贞　李宗一
吴懋鼎　熊尚厚
吴佩孚　李宗一
吴奇伟　戴仰明　林熙敦
吴清源　顾大勇
吴世荣　陈民
吴铁城　郑则民
吴旸谷　马陵合
吴耀宗　汪仁泽

吴贻芳　王娟

吴有训　李援朝　齐辉

吴虞　吴嘉陵

吴樾　尚明轩

吴蕴初　朱信泉

吴兆麟　闻少华

吴稚晖　严如平

吴忠信　沈荆唐

武百祥　辛培林

伍朝枢　郑则民

伍连德　陈民

伍廷芳　郑则民

返回总目录

太虚

韩廷杰

太虚和尚，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生于1890年1月8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五岁丧父，六岁丧母，幼时多病，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虔信佛教，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九岁随外祖母朝拜安徽九华山。十三岁又随外祖母朝拜浙江普陀山，从此萌发出世思想。十六岁在苏州平望小九华出家。当年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同受戒者数百人，太虚年龄最小，但答问戒律名列第一。

清朝末年，革命思潮日盛。与太虚同寺的华山法师教育他以革新之路求佛教的复兴，让他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谭嗣同的著作和严复的译作。太虚十分欣赏谭嗣同的“仁学”，用以自励；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

1909年冬，太虚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僧教育会，这是他从事佛教运动的开始。1911年，太虚赴广州宣扬佛法，被推为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他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因写诗吊唁黄花岗烈士而招忌，潜返上海。

为了加强各佛教寺院的联系，复兴并发展佛教势力，太虚于1912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当时寄禅和尚领导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协进会”即合并于“总会”，由寄禅任会长。不久，寄禅死于北京。上海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教理革命”，是反对探讨死后问题，主张用佛教解决现实问题；“教制革命”，是主张设“佛法僧园”，统管全国僧务；“教产革命”，是反对宗派继承教产、私有私占，主张寺院财产属全体僧众所

共有。

中华佛教总会1913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太虚任该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发表了《宇宙真理》、《致私篇》等论文。这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他的佛教观点基本上是承袭古人的，用“宗下”和“教下”说明佛法的全部内容。他所说的“宗下”，是指不用语言文字，只求自悟自证的禅宗；他所说的“教下”，是指由语言文字所建立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家，也可以包括律宗、净土宗和密宗。他的这种观点反映在上述几篇论文中，也反映在他撰写的《佛法与调整》这本小册子里。

1914年，太虚在普陀山锡林禅院闭关治学，钻研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等，旁及古今东西之学，著有《整理僧伽制度论》、《成大乘论》、《法界论》等。这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他的佛学观点基本形成。他认为：小乘可附属于大乘，即所谓“附小于大”，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至于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禅、律、净土、密这大乘八宗，它们的根本原理和追求的极果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八宗平等”。但实际上，他更倾向于禅宗。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大乘宗地图》中。

太虚于1917年春漫游台湾地区和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佛教。后他与蒋作宾、黄葆仓、陈元白、章炳麟、张謇、王一亭等居士在上海成立“觉社”，由他主编《觉社丛书》。1919年初，改名为《海潮音》月刊，移杭州净梵院，他继续担任主编。不久，太虚应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之请，到长沙讲学，并成立长沙佛教正信会。冬天回杭州，途中写成《新的唯识论》。他把“新的唯识论”看成是真唯识论的应化身，用新近的学术思想予以阐明，以适应现代思潮，结果遭到以圆瑛为首的一派佛教徒的反对。

1923年以后，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三时期。与前两期迥然不

同，“不为旧来宗派所拘束，而欲将释尊流传到现代的佛法，作圆满的判摄罢了。这期可分‘教’、‘理’、‘行’三者来讲……” [1] 他所说的“教”是对释迦牟尼等佛教导师遗教的研究；所谓“理”是对佛教理论的探求；所谓“行”是指佛教修炼，如持戒、坐禅、念咒、念佛等。

太虚为了复兴庐山大林寺的佛教，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曾先后邀李隐尘、张仲如、黄季刚、汤用彤等开暑假讲演，使沉寂数百年的庐山佛教复活。来听讲者多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外人士。太虚由此产生联合世界佛教徒、从事世界佛教运动的思想。他于1924年夏天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日本、德国、美国、芬兰等佛学家都赶来参加。太虚在讲话中，结合大乘佛教“利他”教义，阐明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主题。

为了改革佛教、培养骨干，太虚热心于筹办僧侣教育机关。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都是他一手筹办的。他还在上海创设佛化教育社，出《心灯》旬刊，进行佛教宣传。他在武昌佛学院讲《志行自述》，提出“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口号 [2] 。武昌佛学院采用日本佛教大学教材，管理制度参用丛林约规，早晚诵《弥勒上生经》。

1924年，太虚在《海潮音》第五卷第二期发表《新僧》一文，主张僧尼都应当受教育，接受新思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后来兴起的新佛教运动，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僧众把太虚拥戴为新佛教运动领袖。

1927年，太虚受转逢、常惺、会泉等之请，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秋天，应蒋介石之请，在溪口雪窦寺为蒋讲《心经》，从此深受蒋介石器重。这一年，他还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

太虚于1928年6月8日发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对

唯物辩证法极端仇视，把努力“俗化”犯“幼稚病”的僧人说成是“恰犹国民革命中杂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一般危险，此则非速加以清除不可”[3]。他在《训词》中仿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三佛主义”的口号：（一）佛僧主义。建立“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僧团”[4]，坚持寺产属僧众所共有，严守戒律，对违犯者要规劝，以至于勒令还俗。（二）佛化主义。大力发展佛教徒，只有僧侣组织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居士组织。（三）佛国主义。即用佛教影响国家，以至于全世界。他提倡由僧众信众联合组成“中国佛教信徒会”或“国际佛教信徒会”，以加强中国和世界佛教徒的联系，扩大佛教影响。春天，蒋介石过访杭州灵隐寺，邀请太虚进京讲《佛陀学纲》。为了健全佛教组织，推进佛教文化运动，太虚得蔡元培、戴季陶等赞助，以李子宽、黄忏华、谢铸陈为骨干，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同时发动筹组中国佛教会。

1926年，太虚遍访南洋群岛，并于1928年秋，去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他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回国后，写成《环游记》。太虚是中国僧侣去欧美传播佛教的第一人。他的传教活动受到各地反动头目的赞赏。希特勒在接见他时指出：“欧洲青年需要东方宗教了（专指佛教）。是的，东方宗教岂止东方而已。”[5] 蒋介石在致谭延闿的信中也吹捧说：“沙门太虚，著作等身，苦学潜修，垂三十年，此番赴欧美弘法，为国宣劳，玄奘以还，斯为第一。”[6]

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太虚任常务委员，1932年，应蒋介石之请，一度任雪窦寺住持。

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太虚多次电告日本佛教徒：本着佛陀“大悲兼利”的精神，佛教徒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抗议，促使它停止对中国的侵略。1938年，太虚历游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讲学，号召佛教徒参加抗战救国事业，指导筹组训练僧众救护队，分发各战区服务。1939年，太虚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

秋，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阐明中国抗日救国的政策，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太虚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密切。1946年元旦，国民党政府授以宗教领袖胜利勋章。在《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太虚发表《青年知识僧的出路》一文，认为“若要中国能够好起来，无论如何要由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联合教导资助着大多数贫苦劳动工农，共同警觉着土劣贪恶的毒害……然后当政的民权民生主义的政治才能实际施行，才能走上现代国家社会的大路”。太虚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蒋介石。他抄录旧作一首登载于《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云：“党国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岂贻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并在注释中称：“民十六年秋，蒋主席倦勤，邀余雪窦晤谈，曾赠此诗。日本海豨今已缚，喜而书之。”年底，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社会部在重庆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太虚被推为主任委员。

1947年5月7日，太虚患脑溢血症死于上海玉佛寺，遗著有《太虚大师全书》等。

---

(1) 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海潮音》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2) 海潮音社：《太虚大师行略》，汉藏教理院同学会等编《太虚大师纪念集》，1947年版，第8页。

(3) 太虚：《人生佛教》，海潮音社1945年版，第2页。

(4) 太虚：《人生佛教》，第4页。

(5) 成德：《太虚大师的思想体系》，《太虚大师纪念集》，第65页。

(6) 续清：《太虚大师救国救教救世之真精神》，《太虚大师纪念集》，第11页。

谈荔孙

汪仁泽

谈荔孙，字丹崖。祖籍江苏无锡，寄籍江苏山阳（今淮安）。1880年12月13日（清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祖父谈静山曾在山阳县作幕友，后入蜀任夔州知府，归里后在山阳定居，对官场灰心失望，嘱子孙不入仕途。1891年捐资创办谈氏东文学堂，延聘日籍教员授课。父亲谈亚蘧曾捐得山东候补知府虚衔。谈荔孙少时就读私塾，1892年入东文学堂学习文理科和日文，1896年初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

1900年谈荔孙在江南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守“不入仕途”的祖训，自选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经济专科。由于谈曾在东文学堂学过日文，加以学习勤奋，因此学业优异，毕业后在日本银行界实习。谈的同学除吴鼎昌、钱永铭、王冶昌等外，尚有日本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七郎。大仓财阀当时在日本创办化工、制麻、制革、酿酒等公司企业，设有注重实务的大仓商业学校，并侵入我国东北，经营煤铁矿等多种实业。大仓的经营思想，给年轻的谈荔孙留下深刻印象。

1906年谈荔孙应张謇之聘，回国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他在教学中，采用大仓商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开办银行实践室，培养了一批我国早期的银行、会计人才。

1908年8月，谈荔孙参加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考试，以成绩优等，得授商科举人，派任度支部主事，但谈仍“不入仕途”，坚请调离。适值清政府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遂调谈任大清银行稽核。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谈荔孙应聘赴南京财政部任职，管理军用钞票的发行和流通事宜。1912年2月，大清银行清理结束，另组中国银行，谈奉派赴北京接任中国银行总行计算局局长，主持建立全行的新式会计制度；后又转任国库局长，负责拟订国库管理制度等。

中国银行为了扩展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业务，掌握该地区的财政权，选派谈荔孙赴南京筹建分行。1914年，南京分行成立，谈任行长，并次第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镇江、徐州、苏州、常熟、杭州、淮阴等地设立分支行。除经营工商业信贷、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主要是代理国库，并发行印有省区名称字样、限在各该省内使用的中国银行纸币。

1916年3月，袁世凯废除洪宪帝制后，为筹措军饷，依靠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以致京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5月，北京政府明令停兑，致使风潮扩大，造成市面混乱，不久波及南方。为了维持银行信誉，谈荔孙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拒不执行总行的“停兑”命令；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北京政府长江巡阅使、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以省库为担保，无限制收兑当地印有省名的中、交两行纸币，不久挤兑风潮在南方即告平息。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代理总统职位，于次年调谈荔孙为北京中国银行行长。此时冯国璋意欲另组金融机构，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谈亦感到任职国家银行难以施展其利用金融资本从事实业的抱负，渴望创办商业银行又缺乏资金，双方的意愿为江苏省会警务厅长王桂林所悉。王是冯的亲信，亦是谈的挚友，经王穿针引线，由冯国璋投资二十万元（冯的副官长张调宸代表出面），李纯、齐燮元等人认股十万元，扬州盐商贾颂平认股五万元等，凑得股金三十八万元，由谈负责筹建商业银行，定名为“大陆”，股本额一百万元，实收五十万元，向北京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由于冯国璋的关系，验资等手续十分顺利，不久颁发执照。1919年3月，大陆银行正

式成立，设总行于天津、分行于北京，谈荔孙被推选为董事长，张调宸、王桂林等为董监事。1920年4月，安福国会开会时，有人指摘谈荔孙身为中国银行行长，又兼任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与法制不合，有公私不分之嫌。谈闻讯后，决然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国银行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职。

谈荔孙久欲仿效大仓经营思想以施展才能，任职中国银行时，因与政局浮沉息息相关而难展所长，如今专心经营大陆银行，得以实现其抱负。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视储蓄业务，吸收社会游资，通过调剂金融，输送给工商企业，逐步使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做一个大仓式的实业家。在谈的筹划下，大陆银行于1920年3月在上海设立分行，翌年春，天津总行迁入新厦。大陆银行除了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国内外汇兑业务外，由于与黎元洪等人的关系，故能吸收军阀和官僚的大量存款。又大力开展银行的信托、储蓄业务，在京、津、沪三行分别设立保管、信托两部，建有水泥保管库，首创出租保险箱、接受露封保管和信托业务（代管点明数额的有价证券、股票、契约等，并代办取息、转期、投资经营等）。1922年夏，专设会计独立的储蓄部，设计多种名目的储蓄，其中如“特种定期存款”，一次存入一百七十元五角一分，十五年到期后可得本息一千元。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颇能吸引一些储户，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储户即达一千一百余户，1932年增至六千三百多户。在此期间，大陆银行的各种存款总额常在二千万元以上。

谈荔孙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便利客户，1922年指示天津总行在劝业场、梨栈、小白楼等处分设支行六处，开同业的先例。此后北京、上海以及陆续设立的汉口、南京等分行也纷起仿效，在市内以及济南、青岛、滕县、苏州、杭州等多处设立支行。

在谈荔孙的主持下，大陆银行参加了和盐业、金城、中南共同组成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准备库”，联合担保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并合办“四行储蓄会”，建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上海国际

饭店。

谈荔孙办事严谨，对于大陆银行的放款业务，时以稳健告诫所属。鉴于银行放款多需以实物做抵押、以存仓的商品栈单为凭证，因此谈荔孙以经营仓库业务作为开展大陆银行投放的重要环节。1925年，大陆为与在天津设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除在万国桥堍自建仓库外，另又租得两处，规定客户以该行仓库所出栈单做抵押时，贷款利息可受优待，押款金额也可放宽至货价的八折，因此深受欢迎，业务逐渐发展，每年押款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将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经营。大陆沪行亦在谈荔孙的倡议下，自建仓库于北苏州路，1928年押款数达八百七十余万元，仅次于津行。与仓库业务有密切联系的是保险业务，1931年，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四银行，合营太平保险公司，谈任该公司董事。此外，从大陆银行拨出部分资金，在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与外商进出口行相竞争。

1931年春，谈荔孙患高血压病日趋严重，但为贯彻其化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以利国利民的初衷，未听众人的劝告作长期休养和治疗，而仍抱病去黑龙江调查大豆的产销情况，并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日产一千五百担的全套榨油设备，积极在该地筹建大型榨油厂。后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略战争，被迫中止筹备事宜，赔偿西门子洋行损失一万五千美元。他痛感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下，要实现其抱负极为困难。

1932年春，谈荔孙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以财力支持傅在绥筹建毛纺织厂。该厂建成后，利用当地羊毛织出毛毯、呢绒，行销华北、西北各地，为当地毛纺工业奠定了基础。

谈荔孙曾于1929年春在大陆银行董事会上提议：调整人事，聘用具有金融和工商业管理方面丰富经验和学识的人才，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多数董事系旧军阀、官僚，鼠目寸光，惟求眼前利益，认

为选用新人进行改革，势必增加开支；且人事一经变动，原有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入行的人员有被淘汰之虞。因此会上虽表示原则同意，但力言以缓行为宜，使谈的打算受到阻遏。谈并不气馁，其后又制订了具体计划，在总经理处增设顾问室，拟延请学者、名流和富有经验的人士，指导全行工作，进行内部整顿。但谈荔孙初愿未遂，突因脑溢血症于1933年2月25日在北平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的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锡金谈丹崖先生年谱》，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校学生辑《谈丹崖先生纪念册》，1934年版。

谈沅：《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淮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安文史资料》第7辑，1989年版。

［美］柏脱等编，勃德译：《中华今代名人传》，上海传记出版社公司1925年版。

《大仓喜八郎》，日本《大人名事典》卷1，东京平凡社1962年版，第466页。

谭浩明

刘立道

谭浩明，字月波。广西龙州县水口村人。壮族。1871年7月3日（清同治十年五月十六日）生。他的父亲谭泰源，业农兼撑水口渡船。谭幼年失学，识字不多，从小就帮父亲耕种、撑船。1878年，陆荣廷流浪到水口，得谭泰源之助，帮谭家撑渡船，娶谭浩明的大姊为妻，谭与陆遂为郎舅亲。1886年中法战争后，陆荣廷聚集三点会众，结成小股武装，活动于中越边境一带，谭浩明也入了伙。至1893年，这支百余人的绿林武装，接受了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陆被委为管带，谭浩明则为哨长。不久，开赴金龙、化岗、靖西、西林等地，招抚当地其他游勇、会党和绿林武装，队伍逐渐扩大。1896年，陆升任督带，谭升哨官。到1911年6月，陆升任广西提督，谭亦随之升为广西巡防营统领，驻在南宁。

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上旬广西独立，陆荣廷被推为副都督，旋任都督兼民政长，他将全省军队改编为两个陆军师，谭浩明为第二师师长。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先后举义。陆荣廷支持袁世凯，谭曾奉陆令杀害了革命党人甘尚贤。1914年7月，谭以师长兼任龙州镇守使及广西边防对讯督办，驻龙州。

1915年冬，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陆、谭曾联名上劝进表，袁封陆为一等侯，封谭为二等男。1916年元旦，袁世凯改元“洪宪”。陆因不得袁信任，并见帝制丑剧遭到国人的激烈反对，加上岑春煊、梁启超等人的规劝，乃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讨袁，进兵湖南和广东。4月6日，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也宣布独立。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谭浩明为护国军第五军军

长。

6月6日，袁世凯死，大权落入国务总理段祺瑞之手。6月9日，广东龙济光取消独立，阻挠滇军李烈钧取道广东北伐。陆荣廷遂令谭浩明移师广东，协同在粤各军驱逐龙济光。驱龙后，陆于7月6日就任广东督军。次年4月，升任两广巡阅使，他以原广西督军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调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在陆荣廷授意下，6月20日，谭浩明和陈炳焜宣布两广自主。段祺瑞肆意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北洋军入湘，准备进攻两广。谭浩明受陆荣廷派遣，就任“粤桂联军总司令”，于10月初统率桂军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的第一、二、三军和粤军马济的第一军，林虎第二军的第三团，以及马晓军的模范营（后改称总部卫队第一营）“援湘”。这时湖南护法军将领程潜、刘建藩、林修梅等已在衡阳设立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谭率部进入湖南，改称湘粤桂联军总司令；10月12日，联军与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等部在衡山萱州一带开战，激战十二天，占领衡山县城。11月12日占领双峰。17日、18日又占领湘潭、醴陵，前锋进占长沙，王汝贤、范国璋不战而退。24日，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在长沙就湖南省长职，谭浩明抵长沙后颇为不满，通电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逼得程潜只好辞去湖南省长职。

1918年1月27日，湘粤桂联军占领岳阳，次日占领羊楼司，前哨到达湘鄂两省交界线上。但湖北是直系地盘，陆荣廷企图“联直倒皖”，指示联军不得进入湖北境界，谭浩明遂按兵不动。这时，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在南北和战问题上分歧很大。直系主和，皖系主战。由于皖系得到奉系支持，直系只好迁就，派曹锟、张怀芝分任第一、第二路军总司令，分途进兵湖南。

1918年2月6日，曹锟到汉口成立第一路总部，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于3月6日也到达南昌，前线战云密布，谭浩明仍然未做任何应战

准备。3月初，直系吴佩孚军绕过羊楼司直取云溪，湘军首先被击溃，桂军第三军冯浦澄团也被击败。联军不战而放弃岳阳，向长沙溃退。18日，吴佩孚部占领岳阳，张敬尧部占领平江。岳阳失守时，谭浩明加紧在长沙搜刮钱财，并且张贴四言布告："岳阳小挫，兵家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谕尔人民，毋得惊慌，造谣惑众，明正典章。"[(1)] 24日，谭还身着戎装，骑上高头大马巡视长沙大街，以示镇定。可是当天午夜，他却乘小火轮经湘潭向南逃走了。25日，联军撤离长沙，桂军向湘桂边境退却，湘粤军退守耒阳、郴州一带。联军溃退时，既无行军序列，更没有退却的作战部署，沿途强抢粮食，掠夺财物，湖南人民惨遭浩劫。吴佩孚于4月24日占领衡阳后，即不再前进，湖南战场暂时沉寂下来。6月，联军总司令部迁回南宁，此后就无形取消了。谭浩明仍做他的广西督军。

谭鉴于援湘溃败的教训，决心实行军事改革。他成立广西陆军混成旅，以李祥禄为旅长，尽量任用陆军学校学生为各级军官。又将卫队第一营加以补充，仍以马晓军为营长，黄旭初为营附，白崇禧任第一连连长，黄绍竑、张守义（张淦）、廖光为第二、三、四连连长。1919年元月，又开办广西陆军讲武堂，以金永炎为堂长。各军科长、队长、教官都聘用日本士官生和保定军校学生。每期学员一千四百余人，步、骑、炮、工、辎各科俱全，中下级军官和军官子弟均能入学。如陆荣廷之子陆裕藩、谭浩明的兄弟谭浩澄、谭浩清和儿子谭文茂等都来此受训。

在广西建设方面，谭浩明提倡植棉（广西缺少棉花，每年因此耗资甚大），是年在南宁成立"广西棉业促进会"，自兼会长，出版"广西棉业促进会刊"。除开辟示范棉场外，还在南宁郊外设立棉业讲习所，每县选送一人来所学习，毕业后，回县指导农民种植美棉。但他推广植棉的活动，由于具体机构工作不力和选种等方面没有因地制宜而失败了。

1920年8月，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

阀。是年冬，所有在粤的桂军都被逐回广西。1921年元月，陆荣廷进行反扑，计划分兵三路攻粤，以陈炳焜指挥韦荣昌部从梧州取肇庆，以林虎部（林辞职去沪，由黄业兴代）取广东南路高州等地，以沈鸿英部取广东四会等地，其余部队由谭浩明指挥。6月，孙中山令陈炯明、许崇智等率领粤军入桂，讨伐陆荣廷。桂军刘震寰部在梧州前线倒戈，梧州不守，陈炳焜、韦荣昌、黄业兴等相继溃败，沈鸿英见势不妙，退回贺县，通电宣布“自治”，迫陆下野。各路粤军乘胜前进。谭浩明在玉林督战，部众不多，士气低落，茂林桥一战，全线溃败。他逃回南宁，粤军又从大河和宾阳分路向南宁进攻。陆、谭率领残部万人匆匆向左江撤退，打算在崇善、龙州间作背城一战。但因大势已去，军心涣散，终于无法挽回败局，7月16日，陆荣廷、谭浩明宣布下野，从龙州入越南逃往上海。

陆、谭出亡后，仍与北洋政府相勾结，企图东山再起。1922年6月，粤军全部退出广西。北洋政府任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谭浩明也随陆回到龙州。1924年初，陆出巡被沈鸿英围困于桂林，谭浩明率领谭浩澄、邓大模、马逵等部前往解围，中途被沈军击溃。陆荣廷得吴佩孚、赵恒惕武装调停，从桂林脱身，宣布下野。谭将所部交谭浩澄率领返靖西一带活动，自带随从数人随陆入湖南，后又随陆去上海作寓公。

谭浩明文化不高，对读书人和所属军官较为重视。他为人圆滑，很少与同僚争执，故手下的文武官员愿为他效劳。他胆小心细，遇事向陆荣廷请示，按照陆的意旨办理，因此能统治广西多年。

1925年4月17日，谭在上海私宅因蹂躏其随从副官黄永福的未婚妻，被黄暗杀。

主要参考资料

广西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1960

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1964年版。

林虎：《往事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2年重印本。

刘立道：《谭浩明事略》，《广西文史资料》第16辑，1983年版。

《辛亥革命在广西》。

黄绍竑：《五十回忆》。

《李宗仁回忆录》。

---

(1) 据当时随军将士冯璜等的回忆。

谭平山

刘秋阳　吴明光

谭平山，名鸣谦。广东高明县人。1886年9月28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生。父亲谭超凡，以裁缝为业。谭平山早年丧父，家境清贫，少年入塾攻读，后在哥哥支持下完成学业。1898年入高明东洲书院学习，1904年秋考入肇庆肇罗中学，1908年升入广东两广优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谭平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不满清廷腐败统治，于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0年，谭平山从两广优级师范毕业，到雷州半岛任雷州中学数学教员，后任校长，同时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1912年初，被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代议士（议员）。1916年到阳江中学任教。

1917年夏，谭平山与同乡谭植棠及陈公博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在文科哲学门学习。1918年11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谭为《新潮》创刊号撰写《哲学对于宗教之关系》，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蔡元培阅后十分赞赏，特在文后加上评语："此论甚有见地。"[(1)] 1919年春，谭又撰《"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同时介绍《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详细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5月，他投身五四运动，参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曾被北京政府逮捕关押。在北大期间，谭平山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7月，谭平山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授。他在广州积极宣传新思潮，8月发起组织广州社会

主义青年团。10月，与陈公博、谭植棠等创办《广东群报》，负责新闻编辑，继续致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介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情况，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12月，陈独秀应广东政府之邀到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多次提出："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征求他们参加这个组织的意见，谭等表示赞同。1921年2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谭平山与沈玄庐主编《劳动与妇女》周刊，撰著文章，宣传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

3月，谭平山与陈独秀、陈公博、谭植棠等"开始组织真正的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谭任书记。嗣后，创办宣传员养成所，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阵地。与此同时，他深入工人中去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自任夜校董事会董事长，并建立广州土木建筑、茶居等行业工会。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因协助陈独秀筹集广东大学经费没有出席，派陈公博参加大会。会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谭被选任南方分部主任。8月，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谭平山担任书记。是年冬，他组织三百多工人支援广州车衣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进行大罢工，谭平山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发表《敬告罢工海员》的声明传单，支持海员工人罢工斗争。与此同时，谭还加强对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3月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5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组织这次大会。

1922年7月，谭平山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4月，谭与陈独秀一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6月，中共在广州举行"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谭平山参加了这次大

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后任中央驻粤委员，具体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10月初，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谭向他介绍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同月下旬，谭平山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廖仲恺等九人一起负责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他还兼任书记、组织员，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1月，谭平山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兼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他安排许多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的各级领导职务，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右派的不满，说“组织部是党中央最重要的机关，由共党谭某主持，本党的一切章程由他拟订，各地组织方面的人员由他委派，弄得本党的忠实党员都不愿登记”。5月，谭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9月，任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10月，任“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动员和组织军队和工农武装平定商团叛乱。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谭平山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驻粤委员；稍后被任命为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1926年1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大”，向大会作《党务总报告》，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还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工作。5月，蒋介石等人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获得通过后，谭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中共中央派为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代表。

1926年11月，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向大会递交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他在代表中国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作报告时强调，“目前的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领导权应属于无产阶级”[(2)]。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期间，还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授予“荣誉学生”的称号。

1927年2月，谭平山返回国内。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人民

周刊》上撰文，称“中国革命胜利可以推动世界革命”。他未出席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长。4月4日，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上，他指出：“中国革命就是为解决农民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使农民自己掌握政权”[(3)]。月底，在武汉参加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5月，又被选为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负责发展农民运动。其时，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称其“过火”，谭平山在农政部长就职典礼上为此进行辩白：“现在农民运动发展之时，难免发生种种复杂问题，但不要奇怪，在革命的观点看，这种现象并不是不好的现象。”但是共产国际批评谭平山不提没收土地，而国民党右派更是多加责难。6月底，谭平山称病离开国民政府。7月13日，即汪精卫“分共”前两日，谭平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苏兆征联名发表公开辞职书，退出武汉国民政府。

谭平山与李立三等7月19日从武汉抵达江西九江，商定在南昌发动暴动，以反对国民党“清党”、“分共”。27日，他与李立三等抵南昌，加紧筹划起义事项，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阻止按期起义，谭平山坚决反对。南昌起义成功后，谭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主席。8月3日，他随起义部队南下，辗转赣南、闽西等地。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他经海丰到香港，后转赴澳门。11月，在“左”倾惩办主义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原因是他说过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张杀掉的话。两个月后谭平山从澳门回到上海，始知自己已被开除党籍；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谭曾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政策和行动是“超时代”的，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当做反面教材公开批判。

1928年2月，谭平山在上海与一部分脱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系，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准备成立新党。稍后，中华革

命党在上海成立，谭平山实际负总责，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提出“科学的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他还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后，谭平山与邓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活动，任临时中央执委。翌年，因和邓对党的纲领、指导思想等存在分歧，谭即去香港活动。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反蒋，谭平山积极支持，一面设法与中共联系，一面组织第三党干部赴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谭平山从香港经广州赴武汉，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3月，他参加起草《抗战建国大纲》。嗣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并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谭平山看到蒋介石故态复萌，此后不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会议。与此同时，谭平山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的关心。他曾要求恢复共产党党籍，到解放区去，被周、董劝留在国统区，做团结抗日民主力量的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谭平山支持中共代表的抗议活动，拒不参加二届参政会，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在成都和重庆积极参加争取民主、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抗日爱国活动。1943年初，谭与陈铭枢、杨杰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国内外时事为主要形式，宣传抗日，团结各种民主力量。8月，筹议成立国民党内民主派的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设立十人筹备小组，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翌年开始吸收会员，并酝酿制定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举行，谭平山被选为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实际主持“民联”的工作。

此后，谭平山积极领导“民联”参加民主进步运动和反内战斗争。

1946年1月，谭平山参观《新华日报》举办的延安生活艺术展览会，题诗一首曰："开荒坚抗战，辛苦卫疆封。耕作丰衣食，弦歌歇佃佣。打开民主路，敲响自由钟。旋转乾坤运，时贤正折冲。"被认为"年龄虽老，而思想却永远年青"[4]。5月，与冯玉祥、李济深等乘船离开重庆赴上海。在船上创办《民联日报》，冯玉祥任社长，谭任总编辑。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对民主进步人士的迫害，谭平山再度流亡香港，继续领导"民联"成员进行革命活动。其后，谭与国民党诸民主人士共商联合大计，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48年1月，"民革"正式成立，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5月，谭平山代表"民联"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中共提出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9月，与沈钧儒、郭沫若等乘船离开香港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翌年2月到达北平，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负责主持起草政协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平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

---

(1) 《新潮》第1卷第1号（1918年12月）。

(2)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谭平山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4页。

(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4)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31日。

谭人凤

周天度

谭人凤，号石屏。湖南新化县人。生于1860年9月20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六）。十三岁中秀才，爱读《船山遗书》。十六岁参加洪门组织。甲午中日战争后，接触新学，思想眼界渐开，对时局日益表示关心。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涨，谭人凤决心从事反清革命。1903年至1904年间，曾在新化县城创办革命机关福田小学，自任校长，召集江湖党友，活动于湘西一带，待机起事，由于走漏了风声，被当地官府追捕，于1906年冬逃往日本。

谭人凤到日本后，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他受同盟会委派，和宁调元、胡瑛等回国策应。到湖南后，起义已失败，他只得重返日本。1907年初到东京后，入法政学校学习。

1907年春夏间，孙中山和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河内，在南方策动起义，谭人凤曾于1908年1月由日本到安南协助进行。同盟会在粤、桂、滇边境的几次起义相继失败，他于同年8月返回东京。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与宋教仁等人鉴于同盟会在南方的武装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在中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同年夏间，由谭出面在东京召集十一省区同盟分会长会议，宋教仁提出“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谭极表赞同。11月，孙中山和黄兴、赵声等在南洋槟榔屿集会，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11年1月，黄兴和赵声到香港设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积极准备广州起义，招谭人凤前往参加。谭于2月初由日本到香港，询悉起义计划后，向黄、赵建议在长江各省筹

设机关，联络军人起事，与广州相呼应。他说："南京之事，向谋之矣！若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1] 黄兴、赵声问他的办法，谭答称两湖同志很多，且积极，因经费缺乏，难于进行，如能给予援助，"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计日而定也"[2]。黄、赵表示同意，交谭两千元，派他前往联络策应。他随即离香港到上海和宋教仁取得联系，然后到武汉和长沙，将携款分予居正、孙武和湖南同志。在与两湖和上海等地区党人共同商议部署后，返回香港。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谭虽年过半百，体弱多病，仍要求参加敢死队，于起义队伍出发前，整装待命，为黄兴所劝阻。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于这年6月从香港到武汉，恰遇湖南党人焦达峰、杨任等因广州起义失败，到汉口来与孙武、居正等商讨以后进行办法。谭人凤与两湖同志开会商议，并在焦达峰、孙武等的推动下，决定在长江流域继续策动武装起义。为此，他促进了当时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和统一，接着往长江下游进行联络。谭到上海后，7月31日（阴历闰六月初六）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湖州公学召开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会。会议宣读了由谭、宋分别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议决于宣统五年（1913年）在长江各省举行大起义。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分别担任。8月2日，谭被推为总务会议议长。总会成立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设立分机关，并以两湖为活动中心。谭、宋秘密往来于沪汉间，策动起义，并与当时在香港的黄兴取得联系，得到黄兴的赞同和支持。

武昌起义爆发后，谭人凤即于1月13日由上海赶到汉口，在湖北军政府协助工作。10月22日湖南起义胜利，焦达峰被推为都督，但实权很快被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夺去。26日，谭人凤回到长沙，看到都督大权旁落，焦达峰成了立宪派的"笼中之鸟"，主张取消立宪派所把持的参议院和民政、军政两部，由都督掌握一切。革命派和立宪派

的斗争尖锐化起来，立宪派随即策动了谋杀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的流血政变，谭延闿被拥戴当上了都督。不久，谭人凤离长沙回武昌。11月下旬，武汉战事失利，汉阳失守，总司令黄兴离武昌去上海；谭人凤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同年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在汉口开第一次会议，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并被推为议长。12月3日，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谭认为当时南京集中了民军十万，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正打算继续出兵，总的形势对南方有利，因此，表示反对当时举行的南北和议，主张继续举兵北伐，曾组织北伐机关于上海。南北和议成，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为了推行他的政党政治，于8月间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抛弃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吸收大批官僚、政客入党。谭对宋教仁此举持怀疑态度，因此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3)]。但他也认为辛亥武装起义成功，民国成立、反满种族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秘密会党已失去存在的必要。因此，他提出的改进社团书中，企图把会党变成一种改良主义团体。在此期间，他曾先后任川粤汉铁路督办和长江巡阅使等职。

1913年3月，宋教仁为袁世凯指派的奸徒所杀害。接着袁又违法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举办了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对南方国民党的战争。6月，谭人凤受黄兴之命，到湖南策动反袁独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派汤芗铭督湘，大肆迫害革命党人，谭逃往日本。

他到日本后，住在福冈县，改名林泉逸。1914年，孙中山和黄兴流亡东京期间，由于在革命和组党问题上意见分歧，曾一度不和，各行其是。孙中山筹建了中华革命党，黄兴拒绝参加，离日本去美国。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同情和支持黄兴的人，在东京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党人之间出现了不团结现象。谭人凤双方均未参加，和周震

鳞等奔走于两方之间，竭力促进民党的团结，为孙中山所称许。黄兴到美国后不久，也写信给谭人凤等说："以维持固有的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4)

1916年春，谭人凤回到上海，参与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曾到汉口和山东等地进行活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他曾往来于闽粤间，联络党人，后寓居上海养病。1920年4月24日，病逝于上海。

---

(1)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1页。

(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册，第811页。

(3)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4)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谭曙卿

李锡贵

谭曙卿，字镇湘。湖南湘潭县人。1884年4月22日（清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七日）生。父亲谭舜生早故，家境贫寒，在家随兄长务农，嗣后到福建古田县衙当亲勇。

辛亥革命后，谭曙卿转入福建新军，在陆军第十四师警卫第十七营当排长，1912年3月加入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李厚基带兵入闽，解散了第十四师。谭携带武器赴粤，投入驻在南雄、韶关一带的滇军。当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改隶粤军。是年底，孙中山组织援闽粤军，他在许崇智部任连长。

1921年6月，许崇智部奉命“援桂”，向广西贺县进发，先头部队遭到阳朔方面桂军陆荣廷部威胁。谭曙卿所在的团疾速驰援，里外夹攻，击溃驻阳朔敌军，扫除了前进的障碍，大军终于挥戈直下，夺取桂林。谭作战有功，升为第八旅第八团第一营营长。

1922年5月，孙中山到韶关督师北伐，谭曙卿部编属右翼先锋，在许崇智指挥下从翁源攻江西之虔南（今全南县）、龙南、定南，于6月13日与友军会师，直捣赣州。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击总统府，谭所在的北伐军奉令回师讨逆。7月，北伐军在韶关、翁源一带与叛军激战，因援军不济而失利，转趋闽省。10月，许崇智率领北伐军与皖系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合谋进攻福州，驱逐弃皖投直的闽督李厚基。10月6日，在进攻古田的战斗中，谭曙卿受伤，弹洞胸背，仍裹伤力战，骁勇当先，一鼓作气攻克险要的水口，北伐军乘胜攻下福州。10月19日，孙中山电令入闽的北伐军改为东路讨贼军，谭晋升为第八旅第十五团团长。

1923年春，谭曙卿随东路讨贼军回粤讨伐陈炯明，取泉州，过漳州。讨贼军抵达潮、汕以后，陈炯明属下的洪兆麟、林虎等佯为归附，不久在揭阳、兴宁、老隆、河源间发动突然袭击，讨贼军二万余众剩下不足万人，损失惨重；谭所在的张民达旅有所戒备，损失较轻。当时，谭曙卿团担任殿后任务，屡战皆捷，并从敌人手里夺回揭阳入丰顺的要地言岭关。7月，谭曙卿代理第八旅旅长。

是年8月，陈炯明为解惠州之围，兵分三路进犯，增城、博罗同时告急。谭曙卿率部迎击来犯之敌，大获全胜，并占领淡水；嗣后协同友军克平山，夺派尾，击退来犯之叛军。1924年春，孙中山将粤军各部统一整编为建国粤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谭曙卿改任第七旅第十三团团长。许崇智因嗜酒色、吸大烟，回师又受挫，曾一度受到孙中山的责备而去沪。蒋介石在粤军改制和许崇智离穗期间，逐步掌握粤军军权，谭曙卿夤缘攀附蒋介石甚力。

1925年初，第一次东征战启，谭曙卿部序列前锋、下石龙、略淡水，夺取海陆丰，并在鲤湖、棉湖、河婆等处经历大小数十战，次第平定潮、汕。谭曙卿因战功晋升为建国粤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8月，军队统一编组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于9月逼走许崇智改编粤军时，得到谭曙卿内应，将谭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任命谭为师长，兼第七团团长，归蒋介石直接指挥。

是年10月，蒋介石率师进行第二次东征，直指惠州城，与叛军杨坤如、莫雄等部血战不下。惠州三面环水，依山为堞，号为天险。蒋介石指挥炮轰惠州城，谭曙卿率部炮轰城西南角奏捷，在硝烟弥漫中振臂疾呼踏坎登城，获摧坚之功。旋在华阳附近之塘湖与叛军主力林虎部遭遇，苦战受挫，退守羊湖角；后在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师和李济深指挥的第十一师援助下协同作战，脱离困境，在塘湖歼敌约五千。嗣后奉命率部追击窜入闽境的叛军残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湘鄂。10月初，第一军由军长何应钦指挥，东进福建。谭曙卿奉命部署第九团在松口右岸布防，率余部随何应钦在大埔集结。闽军李凤翔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在防地起义，谭率部进攻永定城。因有冯轶裴的第十四师进攻芦下坝、断峰市回援之敌，谭部次日进占永定城，当即回师松口，击破闽军。闽军兵败如山倒，民军纷起响应北伐军。何应钦率谭曙卿等部长驱直入，12月上旬进占福州。

北伐军占领福州后，何应钦改编福建民军和部分闽军，组成新编第一军，任命谭曙卿为军长，留在福建专事点编、训练新编部队。新编第一军编有：第一师吴威部，第二师郭凤鸣部，独立一旅高义部，独立一团叶定国部，独立二团陈国辉部，独立三团杨汉烈部，共计十八个团；此外，收编为独立第一师的卢兴邦部也归谭曙卿指挥。原定整训两个月后即出发北伐，但这些民军头领原来多是占山为王或划地为界的军阀、土匪，他们不愿离开老巢出战。谭得到蒋介石的允准，也就在福州驻扎了下来。

1927年3月，谭曙卿因母病故，拟告假回原籍湘潭治丧，蒋介石和何应钦电示："现在闽省军事善后亟待进行，全赖荩筹硕划，移孝作忠即在闽持服，毋庸请假离职。"谭得到蒋、何的信赖，竭力扩大自己的权势。他组织"新编军同志联欢社"，党同伐异，先是压服驻在城台一带的独立第四师师长兼卫戍司令张贞部，后来又与海军陆战队和省防军教导团相抗衡。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谭曙卿次日即在福州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谭立即通电"拥蒋护党"。他在福州组织"处理共产分子委员会"，先后捕杀中共福州特委负责人徐琛、余招贞夫妇，宣传部长方尔灏，福州学生会联合会理事长翁良毓，以及其他共产党人林梧凤、郑尚衡、朱明庄等。

是年7月，蒋介石把福建政权交给海军部长杨树庄，正式成立福建省政府和国民党党部，谭曙卿欲主闽政的野心未能如愿。但他不甘

罢休，除在军事上依靠参谋长赵启录外，千方百计在省城军政、党务、报馆、民众团体安插私党，形成了以张志韩、胡遁、胡启儒、李大超、程玄斟、蓝瑛、谢瘦秋、罗谷荪、尤永增、吴求哲等十人为核心的谭系帮派。而在闽南、闽北则被收编的郭凤鸣、卢兴邦等横行无忌，称王称霸，致使省政府的政令几乎出不了省城之外，杨树庄愤而离闽赴沪。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省府委员兼军事厅长方声涛代理省主席。谭仍未得逞，更加肆意刁难，从而和杨、方等闽系海军派以及与黄展云、林寿昌等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

“八一”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朱德率领叶挺、贺龙两部南下，何应钦及南京军事委员会迭电命令谭曙卿率新编军前往闽粤边境堵截。方声涛等人为要乘机驱谭出闽并削弱新编军，也催促他早日拔队出动。谭当即派员到省财政厅坐索大笔开拔费和给养物资，但只派驻在福州的第二独立团陈国辉部和第一独立旅陈国华部开往龙岩。

9月，蒋光鼐、蔡廷锴在赣东铅山重建第十一军，奉命拔队东进。谭曙卿闻讯后，企图阻止第十一军过福州未成。10月10日，第十一军开抵洪山桥一带，福州各界人士前往迎迓，高呼打倒谭曙卿的口号，并派出代表向蒋光鼐等请愿，诉说谭祸闽的罪行，要求第十一军将谭驱逐出闽。谭的亲信谢瘦秋开枪捣乱欢迎第十一军的会场，当场被缚送公安局关押。谭闻讯自知处境岌岌可危，一方面做转移驻地的打算，饬令闽侯县调集挑夫一千二百名供其急用；另一方面派出代表于10月12日去第十一军慰劳。蒋光鼐、蔡廷锴极力稳住谭曙卿，将部队驻扎在城外，蔡还特地单骑入城，向谭道谢，再三表明第十一军只是过境并非久驻，打消谭的疑虑。当天晚上，谭曙卿宴请第十一军领导人，蒋、蔡等只带了两营卫队进城，徒手赴宴。次日，蒋、蔡设午宴回请谭曙卿等人，暗中命令第十一军以出操、野营为名，分头向新编军各部驻地接近。到了12时午炮一响，全市特别戒严，第十一军分割包围了新编军军部及驻大王府、东湖、南门、旧米仓各部，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就把新编军全部缴械，而谭本人则在宴会上被拘捕。

事后，谭离闽去日本，往见正在日本访问的蒋介石，然后到上海，向何应钦报告这次事变的经过。

1928年1月，蒋介石回到南京复职后，谭曙卿继续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胶东军点验中将主任。不久，胶东军兵乱萌发，谭前往处置，将胶东军改编为独立第四旅，自任中将旅长，并兼陇海铁路警备司令。9月，改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1932年11月，到汉口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参议。

1933年11月闽变事起，谭曙卿奉命以军事特派员名义随卫立煌部“参赞军幕”。谭曙卿企图东山再起，把古田的陈鸣九，闽清的黄炳武、黄懿兰，永泰的林成珊、吴大昂、张致华，闽南的陈国辉等部再次予以改编。但时过境迁，能听他调遣的不过千把人。1935年3月至次年2月，谭曾任蒋介石南昌和汉口行营中将参议。后即隐居田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国。在全民抗战的激励下，谭曙卿于1938年春赴武汉，奉令襄理西北军务。4月15日，谭由西安驱车赴甘肃，途中突患肺炎，21日逝于甘肃平凉。

主要参考资料

《福建三十年来省政暨民军嬗变纪略》，1942年铅印本。

王敬：《谭曙卿》及附录，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

杨兆英：《蒋介石随粤军入闽及篡夺军权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晨报》1927年10月14日、27日。

陈齐煊：《十一军驱逐谭曙卿侧记》（1980年5月18日笔者访谈

录）。

钱履周：《记谭曙卿》（1980年3月18日笔者访谈录）。

谭鑫培

白吉庵

谭鑫培，原名金福，字鑫培，以字行。湖北江夏县（今武昌）人。生于1847年4月23日（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其父谭志道，演唱汉剧老旦兼老生，因嗓音尖，类似北方“叫天鸟”之音，故得“叫天”之艺名。谭鑫培从小跟父学艺，人称“小叫天”，十一岁进金奎科班学昆乱老生。七年满科后，在京一时不易搭班，遂走天津。在津也不如意，大约二十岁时，又返回北京，入永胜奎班当配角。后来因“倒仓”（即声带发生生理变化，嗓音变哑），便由老生改演武生兼武丑。

谭鑫培自“倒仓”后，收入逐渐减少，处境日见艰难，产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这时恰巧有外地科班来京延聘教师，谭氏父子便应聘到京东三河县一个科班去教戏，“大叫天”教老旦及老生；“小叫天”教武生及武老生。后来，谭父因年迈辞去教职返回北京。谭鑫培只身在三河县一边教戏，一边在农村巡回演出一年多，直至戏班散伙。之后他又被介绍到丰润县一姓史的财主家，为财主看家护院，在此结交了一些会武术的人。他每天早起练功，并向他们学习拳棒，得益不少。后来他演唱《卖马》中秦琼所耍的双锏，之所以那样精到绝伦，就是那时学到的功夫。在丰润史家住了将近两年，嗓音有所恢复，他考虑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遂离开史家，南下上海，重返舞台生涯。

谭鑫培在上海依然碌碌无奇，不久又回到北京。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加入“三庆班”，拜程长庚为师，继续深造老生，获得长足的进步。1872年二十五岁时，他在“三庆班”名列生行第三，但因有程长庚、杨月楼在，他仍以演武生为常。后来程认为他嘴大，扮武小生不好看，不如演武老生，可以用髯口把嘴盖住，谭便改演长靠戏，如《定军

山》里的黄忠等。

谭在外数年，颠沛流离，甘苦备尝，入“三庆班”后，学艺更加勤奋。当时，他除向程长庚学习外，又拜余三胜为师，学《卖马》、《桑园寄子》和《捉放曹》等戏。余也是湖北人，因有乡谊之情，戏路也较接近，故谭得到一些真传，后来《卖马》便成为他的看家戏了。谭除向老一辈虚心求教外，又博采众芳，酌取昆曲、汉剧、京韵大鼓，乃至青衣、花脸、老旦的精华，结合本身条件，创造出一种平稳、自然、婉转、细腻的新颖唱腔，对各种人物感情，都能很好地给以表现。这种谭腔，初期在观众里并不怎么受欢迎，有的甚至反对，说他唱的纤巧，没出息。后来人们听多了，又觉得韵味隽永，非寻常可比。同行也热衷学习他的唱腔，于是有所谓“无腔不学谭”之誉。其后以学谭派起家的有王又宸、余叔岩、言菊朋、马连良、周信芳等人，惟其孙谭富英乃正宗的谭派。

谭鑫培不仅唱得好，做工也是独树一帜。他的特点是不墨守一招一式的陈规旧套，能够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去塑造艺术形象，因此他的演技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有一次，程长庚看过他的演出后，高兴地对他说：唱的有味，做的边式，继续用功吧，今后老生一席，非你莫属了。谭惊喜地问道：有师兄孙菊仙在，弟子何敢？程道：不然。菊仙之声，虽然宏壮，但其味苦，难适众人之口。你的嗓音润，声甘而且柔，使人听了如饮醇酒，子其勉之[(1)]。自此以后，谭锐意求进，数年之后，舞台声誉渐隆。

1880年，程长庚去世，杨月楼继程主持“三庆班”，谭鑫培名列第二。然而，这时正值慈安太后（咸丰帝妻）“国服”之期，“三庆班”没有演出。1882年开戏禁后，谭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三庆班”，改搭“四喜班”，与孙菊仙轮流演唱大轴。他俩都是程门弟子，又是盟兄弟，所以表面上还过得去，但暗地里互不相让。他们一打对台，观众便得大饱眼福，看一些好戏。他们二人技艺的长短，正如程长庚在世时所评价的那样，孙菊仙每每赛不过谭鑫培。再说，孙是票友下海，能文

不能武，而唱腔又多尊古调，不能随着京剧的发展而前进，在客观上就棋输一着。这点谭心里有数，所以他不在“三庆班”内与杨争一日之短长，却愿意到“四喜班”来与孙打对台，这就是他悄悄离开“三庆班”的奥秘。

谭鑫培为求得事业上的发展，又离开了“四喜班”。从1887年起，自己挑梁组班，另辟蹊径。先后曾与余紫云、张胜奎同组“胜春班”，与迟韵卿组“同春班”。这是他与孙菊仙、汪桂芬争霸梨园的时期，人称他们为“后三鼎甲”[(2)]。

1890年，谭鑫培首次奉诏入清宫演出，之后差不多每年都要到宫里演出几次。慈禧太后对他的技艺十分欣赏，曾赏赐四品服。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梨园众芳逐渐星散，孙菊仙南下上海，汪桂芬“皈依佛门”，京城里老生一席，乃由谭鑫培一人独占鳌头。这期间他组“同庆班”，与王瑶卿合作，琴师是梅雨田。他们的演出十分精彩，时人称为“梨园三绝”。这是他最后一次组班，时达六七年之久。由于谭鑫培对自己要求严格，刻苦钻研，因此他在京剧表演艺术方面获得了更高的造诣。由他开创的谭派戏，雅俗共赏，风靡一时，被人们誉之为“神品”。他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精湛的表演技巧，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活跃在京剧舞台上：如《卖马》里的秦琼，《定军山》里的黄忠，《空城计》里的诸葛亮，等等。这些戏脍炙人口，成为谭派的传统节目，至今仍为京剧观众所喜爱。

谭鑫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创造了一个流派，更为重要的是，他继程长庚等人之学，促使徽剧与汉剧结合；又与王瑶卿等人一起通力合作，发展了京剧艺术。他改革过的戏是很多的，《失空斩》、《珠帘寨》、《打渔杀家》等戏，可作为他的代表作。其中如《空城计》城楼上的“慢三眼”、“二六”两段唱腔，经他改革后，一波三折，十分动听，这些唱腔至今仍为京剧观众所欢迎。据当时的戏剧

音乐家陈彦衡说："谭的唱腔，只有《南阳关》里在城楼上一大段西皮'叹双亲不由人珠泪双抛'的'抛'字的行腔是程长庚的，其余的差不多都是他自己发明的。"[3] 由此可见，他的革新精神和艺术才能非比寻常，因此有"伶界大王"的美名。

1905年秋，谭鑫培受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之聘，拍摄《定军山》的戏曲片段。这是京剧艺术搬上银幕的最初尝试。

1912年民国建立后，北京戏剧界的组织"精忠庙"改为"正乐育化会"，谭鑫培担任该会首任会长。这期间，他因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不再自己组班，只是在外临时搭班散唱而已。他人虽老了，但演唱艺术仍有很大的魅力。据他晚年的琴师徐兰沅说：老谭的嗓子，到晚年调门反而增高了，唱得十分动听，做派已入化境，演谁像谁。这时，谭的艺术造诣已臻炉火纯青之境。

谭鑫培艺高如此，对京剧的创新卓有贡献，但他晚年的处境却坎坷不幸。1912年秋，他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受上海新新舞台之聘，偕同金秀山、孙怡云、文亮臣、德珺如等赴沪演出。这是他第五次受聘到上海[4]，当时海报上热烈宣传。后来年终演封箱戏时，他反串《盗魂铃》里的猪八戒，那晚他爬上三张高的桌子，拿了个"顶"，做了几个虚拟动作，好像要从上面翻下来似的。接着是向台下摇摇手，表示不行，于是便轻轻地爬了下来。这是以演丑行的身段来演猪八戒，按理是可以的，但台下有位名叫李午初的观众不谅情，以为他不从上面翻下来是偷懒，不卖力，于是喝"倒彩"，全场为之哗然。前台"老板"黄楚九也蛮不讲理，依仗人多势众，把这位观众狠揍了一通，为此引起诉讼。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涉，由黄楚九与谭鑫培出面，请客赔礼道歉，并答应以后取消"伶界大王"的称号，才算完事。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谭非常痛心，春节过后不久就返回北京了。

到京后，谭鑫培也没有碰到好的际遇。1914年，袁世凯总统府举行堂会戏，传谭鑫培去演出。后来因为赏钱给得少，谭的二儿子

说："总统府怎么和皇宫一样，也要传差？可是钱又给得那么少……"[5] 这话传到袁府总管王文卿那里，王就唆使警方不准谭鑫培登台演出。后来，谭四处求人说情。经过一番周折，才找到了曾拜王文卿为"义父"的余叔岩，答应去讲这个人情，余的条件只是要拜谭为师。不久禁令取消。谭对军阀的霸道颇为愤慨，但却意外地收了一个徒弟。

1917年春，桂系军阀陆荣廷到北京，黎元洪为了进行笼络，特举办堂会，请谭去唱戏。时谭正有病，不能赴约。黎府三番两次派人来催逼，并威胁说："要是不去唱这个堂会，明儿就把你抓去关起来。"谭无可奈何地随他们去了。那晚唱的是《洪羊洞》，他以气愤难抑的心情来演这出悲剧，唱到曲中伤心处，凄凉婉转，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时人称之为绝唱。可怜这位老病不堪的艺术大师，在唱过《洪羊洞》后回到家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就于5月10日怀着悲愤的心绪与世长辞了。

---

(1) 刘过鹤：《谭鑫培专记》，《剧学月刊》第1卷第12期（1932年）。

(2) 后三鼎甲，即后三杰之意。前三鼎甲为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

(3) 张缪子：《京剧发展略史》，上海大公报1951年版，第24页。

(4) 谭曾先后六次到上海演出：1879年为第一次，偕孙彩珠等同行；1884年为第二次，与大奎友等前往；1901年是第三次；1910年是第四次；1912年是第五次；1915年第六次到上海，只演了十天即返。

(5) 梅兰芳：《我和余叔岩合作》，《戏剧论丛》1981年第1期。

谭延闿

李静之

谭延闿，字组庵、祖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生于1880年1月25日（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其父谭钟麟曾任陕西巡抚，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等职。谭延闿1892年入府学，1897年为优贡，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回到湖南。当时，清政府正举办“新政”，一些较开明的湖南官绅纷纷倡议兴办学堂，谭也积极投入这些活动，广泛地交结了湖南上层官绅和商界人物，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

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并从1907年起，在京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省会筹设谘议局，作为立宪的“准备”。这时谭延闿和一些立宪派成员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进行立宪活动。1908年12月，湖南巡抚岑春蓂委他为筹办省谘议局的会办之一。次年10月，省谘议局正式成立，谭任议长，成了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

湖南谘议局成立不久，便屡与督抚发生龃龉。1910年4月，谭延闿不满湖广总督瑞澂对长沙抢米案的处理，以谘议局议长名义，请旨复查，受到清廷严厉申斥。加上谘议局屡受督抚轻侮，他逐渐对清廷产生不满情绪。

1910年冬天，谭到北京参加全国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未果，遂与川、鄂等省代表谋划组织第四次请愿。不料清廷竟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其他人见势不妙，纷纷离京，谭也回到湖南。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大为失望。恰在这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

议，谭延闿入京参加，并任会议主席。会议决定成立“宪友会”，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促成责任内阁为政纲，谭延闿被推定为湖南支部的发起人。他们以谘议局联合会名义先后两次上书清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例，要求重新组织责任内阁，结果受到清廷严词申斥。谘议局联合会关于借债、禁烟等问题所上各书，也都未获结果。这时湖南、四川为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而兴起的群众护路运动已渐开展，全国临近革命高潮。谭延闿等预感时局将有急剧变化，遂纷纷离开北京，各回本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也顺风转舵附和革命，但却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所谓“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1)]。与此同时，立宪派开始策划抢夺政权的活动，预定“举事后大会于谘议局，推谭延闿为都督”[(2)]。当新军发动起义，攻进长沙城时，立宪派就曾擅用“都督谭”名义发布告示。10月22日，长沙起义胜利，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立宪派夺取政权的目的未遂，于是便一面造作谣言，对焦达峰、陈作新等进行中伤，挑拨绅商、新军与都督府的关系；一面借口“提倡民治”，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一个“湖南参议院”，推举谭延闿为院长，议员几乎全部都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成了凌驾都督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接着，他们又借口“军民分治”，设立军政、民政两部，由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总揽一切民政事务。民政部下设六司，其负责人也都由立宪派担任。这样，正、副都督便被架空，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控制了湖南政权。

10月26日，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来到湖南，他鉴于都督大权旁落，主张取消由立宪派把持的参议院和军政部，集权力于都督府。立宪派得知这个消息，深夜秘密开会，制定了由新军第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杀害焦、陈的阴谋计划。30日，焦达峰召集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通过了谭人凤等的建议，谭延闿被迫表示辞去参议院院长等

职。第二天立宪派便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二都督。焦、陈牺牲后，谘议局推举谭延闿继任都督。紧接着，立宪派又夺取了湖南各级政权，镇压了各地人民起义。这样，谭延闿等立宪派向清廷跪求多年而不可得的政治权力，现在用阴谋和暴力手段从革命者那里夺到自己手中。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谭首先通电表示拥护。7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批新旧官僚政客。湖南支部在9月改组成立时，也把谭延闿拉了进来，并且推他当支部长。这时，谭对革命党人施展了一套逢迎笼络的惯用手腕。黄兴于这一年10月回到长沙，谭组织盛大欢迎，称颂黄为“开国元勋”，还把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但是，他与立宪派仍保持密切关系，在他控制的权力机构中仍然以原来的立宪派为骨干，同时又拉进许多官僚、政客、在野军官以为己用。他既注意联络国民党，也同袁世凯拉关系，对湖北的黎元洪、广西的陆荣廷以及其他方面，都极尽拉拢之能事，有“八面玲珑”之称。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纷纷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湖南的下层国民党势力较强，成立了反袁的“湖南公民联合会”，要求湖南当局脱离袁世凯宣布独立，并声称，如果谭延闿敢于违背众意，将给予“相当之对待”。谭延闿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即派人秘密到武昌对黎元洪表示：“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劝以“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3)]。谭按照黎元洪所授机宜，便在7月25日宣布“独立”。宣布“独立”前，他故意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烧了军装局所存的军械子弹，以使革命党人在独立后赤手空拳，无所作为；宣布“独立”后，谭却按兵不动，不去援助讨袁军。不久，江西、南京方面讨袁军先后失败，谭延闿便在8月13日通电取消“独立”，并且杀害了坚决反对取消独立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他曾通电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

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4]

湖南取消“独立”不久，黎元洪即致电袁世凯为谭延闿开脱说：“湘省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督暗地维持，始终一致。”[5] 袁世凯虽表面声称“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6]，但终视谭为异己。为了平定西南敌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他必欲将湖南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便在10月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把谭赶下了台。此后谭先后寓居青岛、上海。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从云南揭幕后，湖南人民掀起了激烈的反袁驱汤斗争。1916年5月29日，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声明和袁政府脱离关系。但是由于他罪恶昭著，湖南人民仍坚持驱汤。汤通过其兄汤化龙，请在上海客居的谭延闿出面调停。谭用“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湘军旧部国民党军人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四人回到长沙，为汤“赞襄大计”。在此之前，程潜奉孙中山命已由日本东京回到湖南，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参加讨袁驱汤。7月，程潜率军大败汤部于道林，进迫长沙。汤芗铭仓皇逃走。赵恒惕、陈复初等乘机拥谭延闿回湘。当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由于湖南军民及西南军阀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湖南，北京政府不得不在8月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程潜愤而离长沙往上海。

谭延闿二次督湘，并不符合段祺瑞政府要由北洋军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的意图。谭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利用黎、段矛盾，另方面又与广西军阀陆荣廷订立湘桂攻守同盟，使段不敢轻易下手。谭更利用湖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心理，提倡“湘人治湘”，反对北军侵入。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直系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以国务总理总揽大权。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援助，肆意推行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统一政策，又一次废弃了《临时约法》。8月6日，下令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湖南人）为湖南督军，北军再次入湘。谭延闿鉴于形势不利，不愿做空头省长，遂于9月初辞去省

长职务，离湘赴沪。行前，他任命一向反对北洋军阀、同他关系密切的刘建藩署理零陵镇守使，又调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防衡山，有计划地在湖南地区安置自己的力量，以做异日回湘的准备。

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9月18日，刘建藩、林修梅分别在零陵、衡州宣布湖南独立，打响了武力反段的第一炮。程潜也回到湖南，被推举为湘军总司令，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任前敌总指挥。傅良佐派兵讨伐，湘南战争发生。10月初，陆荣廷出兵援湘，组织湘桂联军北伐，傅良佐兵败，弃职逃回北京。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兼理湖南军民两政。1918年3月，北军大举反攻。8月27日，段祺瑞政府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北军犯湘主力、第三师师长、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衡阳后，因为没有得到督军职务而不愿再战，按兵不动，湘军得以退守零陵、郴州。6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谭延闿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由上海到零陵重任湖南督军。他利用直皖矛盾，与桂系军阀一起商定联直倒段、联吴驱张的策略。但是这时，程潜还驻在郴州，不承认谭是督军。谭又利用桂系军阀和国民党的矛盾，伙同吴佩孚、陆荣廷制造了一个诬程潜通敌的事件，逼程离开了湘南。7月，谭由零陵移驻郴州，集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等职务于一身。赵恒惕任湘军总指挥。

1919年冬，湖南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驱张运动。1920年5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酝酿战争，吴佩孚从衡阳撤防北归。按照事先的协议，吴军一面撤防，湘军便一面接防。张敬尧于6月11日仓皇逃走，谭延闿随即顺利进入长沙。从此，湖南境内北洋各系军阀均被赶走，湖南完全落入本省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的统治之下。

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军阀官僚政客，还利用湖南人民深受南北军阀混战之害而激起的强烈自治要求，打着“湘事湘人自决”、“还政于民”的幌子，在1920年7月22日向全国发出“养电”，宣布“湖南自治”，主张各省制定省宪，民选省长，采取联邦制统一全国。接着便开始了官办的“自治”和“制宪”活动，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地方军阀的割据。

驱张以后，湖南军事实力操纵在湘军总指挥赵恒惕手里，但程潜在湖南仍拥有相当势力。1920年11月，由于权力分配的矛盾，发生了平江兵变，这次兵变成为倒谭运动的序幕。谭为谋求与各派妥协，声言废除督军，民选省长，请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赵想利用反谭势力逼谭下台，坚不就职。11月22日，程派军官李仲麟等又通电逼谭去职，赵恒惕也不表示挽留，谭延闿只好辞职，于11月27日第三次离湘赴沪。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不久又任临时省长。

谭延闿在上海走投无路，通过湘籍国民党国会议员周震鳞的介绍，于1922年投奔孙中山，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谭延闿跟随前往，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和建设部长，逐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这时，他仍不忘伺机夺回湖南地盘。6月，湘西镇守使蔡巨猷起来反赵恒惕，指责赵“甘心附北，背叛西南”。7月，谭延闿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北伐讨贼湘军”，入湘讨赵，赵亦组织“护宪军”迎战。谭赵战争爆发。赵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击败谭军。恰在这时，陈炯明反攻广州，孙中山急电谭回师救粤，谭便率领所部湘军共五个军于11月底由湖南入粤，谭赵之战因以结束。

陈炯明部反攻失败、广州解围后，孙中山任谭为湘军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湘军遂驻广东为客军。谭有了这支一万多人的队伍作为资本，更能见重于孙中山。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乘江浙战争之机派兵入赣北伐。10月，任命谭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11月，孙中山北上，又令谭全权办理所有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谭率部进入江西，被方本仁军战败，退驻北江。1925年5、6月间，谭曾参加讨伐驻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谭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谭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谭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他兼任军长。1926年3月，汪精卫

出国，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政治会议主席。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召集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谭当选为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委。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谭延闿这时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甚至改号为“左庵”，一面偷偷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使宁汉双方对他竞相拉拢。当时，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的地主豪绅在农运高潮中受到清算斗争，许多人跑到武汉谭延闿那里造谣诽谤，攻击农民运动过火，谭的住家成了地主豪绅谋划反攻倒算的大本营。谭延闿代表官僚地主豪绅阶级，也大肆指责农民运动。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宁汉开始合流。8月，蒋介石被桂系军阀排挤，暂时下野。9月，谭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之一，往南京与李宗仁等协商宁汉合作问题。9月15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合作后过渡性的党的最高执行机关，谭被推为成立大会主席，并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常委。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一度任“国民政府”主席，甘做蒋的傀儡。同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全国，10月，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五院，蒋自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谭便退居行政院长。在1929年至1930年历次新军阀混战中，蒋率师督战时，由于谭恭顺听话，便让他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一生以圆滑著称，晚期主持政务，继续施展八面玲珑的手腕，周旋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胡汉民比之为“药中甘草”。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脑溢血症病故于南京。

---

(1)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北京正蒙印书局1914年版，第7页。

(2)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第9页。

(3) 易国幹等辑：《黎大总统政书》卷二十六，上海晋益书局1916年版，第3页。

(4)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页。

(5) 易国幹等辑：《黎大总统政书》卷二十六，第3页。

(6) 子虚子：《湘事记》政党篇，第22页。

汤恩伯

沈荆唐

汤恩伯，原名克勤。浙江武义县人。1900年9月2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生。家庭世代务农，父亲汤德彩盼子成材，悉心培育其上学。汤恩伯在武义读完小学后，于1916年至金华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后又转学到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投入吕公望举办的援闽浙军讲武堂，后任班长、少尉排长。1921年，伴随同乡富商童维梓东渡日本留学，先习日语。1922年3月入明治大学法科。他得童资助，在东京本乡区追分町开了一家“追分楼饮食店”，以维持学费与生计。但经营不善，入不敷出，于1924年夏歇业返回上海。经同学徐逸樵之助，得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慨允每月资助五十元，再去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科。他感恩陈仪之厚爱，跪拜称陈为“恩师”、“义父”，并改名为“恩伯”。他在日本与陈仪的义女日本蚕桑学校学生王竞白相交，感情日增。

1926年夏，汤恩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妻马阿谦离婚，改与王竞白结婚。经陈仪举荐，汤在陆军第一师任学兵连连长，继任少校参谋。1928年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军事教官、第六期上校大队长，后升任总队教育处少将副处长，曾编写步兵连队操典教材，受教育长张治中赞赏。1930年，军校编组教导师参加中原大战，汤任第一旅旅长。战后升任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八旅旅长，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清剿”长达一年，杀害大量苏区干部和民众。汤以“剿匪有功”升任第二师师长。在1932年春第三次“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汤部在大别山遭红军歼灭性打击，受撤职处分。未几，又被蒋介石任为第八十九师师长，“清剿”黄陂一带。他凶残杀害苏区民众，曾一次枪杀两千多人。在第五次“围剿”中，汤任第十纵队指挥官，率第八十九师和第四、十、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在广昌以南的驿前、白水和

石城的洛寨山地，进行了九次激烈的阵地战。红军主力出发长征，汤领兵抢占瑞金，并对红军围追堵截。1935年，汤升任第十三军军长，率部北上追击红军；继任陕西“剿匪”善后办事处主任，进攻陕北地区的工农红军。1936年11月，傅作义第五十九军在绥远抗御日本侵略军，汤恩伯奉命协同作战，参与收复百灵庙之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恩伯第十三军编入傅作义第七集团军，任前敌总指挥，在南口的东西大岭一带布防，依托山地凭险扼守，与日军搏杀半个月。9月，调至皖北亳县集结，所部扩编为第二十军团，任军团长，辖第十三军、关麟徵第五十二军、王仲麟第八十五军。1938年编入第五战区序列，汤将所部分布在邳县、郯城和兰陵镇一带，与孙连仲第一军团、庞炳勋第三军团、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等合力在徐州外围阻抗日军。在李宗仁督促下，汤指挥主力向南转进，在敌侧背发起攻击，与敌激战三天多，伤亡甚重。3月31日，关麟徵部向峄县前进，王仲麟部推向枣庄、峄县。4月2日，李宗仁下令向台儿庄之敌发起总攻，汤恩伯指挥所部在郯城以西的坍王山、禹王山一带与日军互相延翼包围，配合孙连仲部击溃台儿庄之敌，歼灭日军万余人。4月7日，敌向峄县撤退，汤部追击，取“精兵夜袭”战术攻占九山，歼击敌军。

台儿庄大捷后，汤恩伯部至归德地区驻扎。6月，汤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布防郑州以南铁路沿线地区。武汉会战中，汤率部在大别山组织防御，阻挡敌军南下。战后，汤部进入河南，设总部于叶县，1941年兼任鲁苏皖豫四省边区委员会主任。他曾与李品仙等部进攻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制造国共摩擦。1942年1月14日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司令，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在四省边区扩充实力，拥兵自重，除正规军外还收编游杂部队，总计达四十万人。汤及其所部在所在地区横行霸道，苛征暴敛，肆意杀人，祸害至深，民众苦不堪言，比之与蝗虫一样，当地有“水旱蝗汤”之说，连其好友戴笠都深感不安。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以十二万兵力发动豫湘桂大战。汤恩伯虽拥有四十万兵力，但他部署不当，指挥失误，所部闻风丧胆，一触即溃，只五天即弃守郑州，接着许昌、洛阳、叶县、临汝亦相继失守，前后仅三十八天河南全省便沦入敌手。汤之主力部队在撤逃中还被地方武装包围缴械，汤本人化装成伙夫才得逃脱。汤之昏庸误国引起朝野极大愤怒，豫籍参政员纷纷弹劾，要求军法审判；河南党政代表团写请愿控诉书，历数汤之十大罪状；新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严厉责备汤之失败是因为“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后得蒋介石庇护，汤于8月被撤职了事。半年后，汤即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下辖十四个美械师，在黔南、湘西抗击日军。1945年5月进入广西，与张发奎合力收复桂林。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被蒋介石派到上海受降，解除沪宁地区日军武装；嗣后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兼第一绥靖区司令。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汤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卫戍司令官。他率五个整编师及十五个旅约十二万兵力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1947年3月任第一兵团司令官，指挥八个整编师向鲁中山区实行重点进攻。结果所部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万二千余人在孟良崮被歼，他又受到撤职处分。1948年7月，他被任命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编组第二线部队。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前，派汤恩伯专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嘱其凭借长江天堑，确保中枢要地之安全。这时，主政浙江的陈仪，看清了时局大势和人心向背，为免富庶的江南毁于战火，策动早年受恩于己的汤恩伯起义立功。他于1月28日派外甥丁名楠携亲笔信去上海面见汤恩伯，向汤提出：（一）释放政治犯，（二）停止修筑工事，（三）保护一切属公财物，（四）改编所属部队，（五）开放长江渡口；并谓如能履行上述五项，即可取消战犯名义，获得相当职位。汤假意向丁表示不日赴杭与陈面商，却派人携原信赴奉化向蒋介石告密。陈仪随即于2月17日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23日在上海寓所被捕。汤此举更赢得蒋之信赖，但是他不能挽救国民党统治彻底失败

的命运。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汤恩伯苦心经营的防御线，强渡长江成功，第三天即解放南京。汤指挥沿江所部撤向上海、杭州，构筑坚固工事，陆海空联合行动，加固防御。结果人民解放军先于5月4日解放杭州，接着于5月12日向上海郊区发动强大攻势。汤恩伯无力抗御，于5月24日率五万残兵从吴淞登舰逃向福建，8月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接着又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厦门绥靖总司令。9月底，厦门战役开始，汤恩伯部在解放军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残部撤往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10月24日，解放军某部三个团在金门西北角古宁头一带强行登陆，汤部仓皇应战，同时电请蒋介石准其撤离金门。蒋不准，并严令汤督兵死战。在空军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加以解放军后续梯队不济，汤得以守住阵地。后来汤到台湾后，蒋不满其主退之事，只给以“战略顾问”虚衔。

1954年5月，汤恩伯因病去日本东京治疗，6月29日不治身死。

主要参考资料

汤恩伯上将逝世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1964年台湾版。

政协浙江省武义县委员会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武义文史资料》第6辑《汤恩伯史料专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徐时人：《关于汤恩伯在日本留学的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文强：《“中原王”汤恩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编辑组：《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

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汤尔和

娄献阁

汤尔和，原名鼐，字调鼎，又字尔和，晚年自号六松老人，称其住所为六松堂。浙江杭州人。1878年6月30日（清光绪四年六月初一）生。其父本姓沙，名成亮，因过继给姑父为嗣，改姓汤。

汤尔和幼年父母双亡，靠祖母抚养长大。祖母有文化，从小教他读书识字。汤六岁那年，由于生活困难，随祖母到江苏淮安，寄居于姑父魏平甫家。1888年，祖母病故，汤继续留在魏家学古文，又自读了些医书。

1896年，汤尔和往清江浦（今淮阴）武劼斋家任塾师。教学之余常练拳棒，并与隐士杨玉农、皇甫硕等往来，结为文字之交。

1900年，汤尔和回到杭州，就读于养正书院。他学习努力，又得名师陈介石的指点，进步很快。1902年，受留学热潮的影响，筹得旅费去日本，考入东京成城学校，与钱稻孙等同学。他除学日语、普通科学常识及受军事训练外，尤关心时事政治。

1903年，中俄关于归还东北问题交涉决裂的消息传到日本，汤尔和十分愤慨，他与钱稻孙等连夜赶印宣言，并邀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开会。会上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来他与钮永键被选派回国请愿，在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凯递交了请愿书，结果清政府不但不接受，反而要逮捕他们，他们只好逃回日本。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汤尔和离日回国，在杭州任浙江高等学堂音乐教员。1907年，他再留学日本，入金泽医科专门学校学习。这时他已不再关心政治，全力钻研医学，以求得一技之长。他的生活

很艰苦，但不愿意请官费，常以翻译小说和给报纸投稿等补贴食宿，有时还要借债。1910年6月，汤毕业回国。

汤回到杭州，受到浙江巡抚增韫的器重，不久即任“谘议局谘议”[1]。他颇为尽职，在会上总是侃侃而谈。时值浙人反对将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他与马叙伦等积极支持路局股东保护路权。当局又让汤擘划浙江病院，他以韩士颂为院长，自任副院长兼内科医师，仅用四个月时间就将医院筹备就绪，于翌年春开诊。此外，他还兼任浙江高等学堂校医，工作十分繁忙。

1911年武昌起义后，汤尔和与浙江部分立宪派人士欲将浙江政权拿到手中，以“加强防卫”的名义，发起组织省城民团，汤主持起草民团总局开办大纲十数条，结果未成。革命党人于11月5日起义成功，杭州光复，很快成立军政府。此时，汤一方面拥护革命，另一方面又很同情已被推翻的浙抚增韫，暗中接济衣物，以报答“知遇之恩”。

同年12月，汤尔和作为浙江军政府的代表到武汉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旋该会议移南京，他被推选为临时议长。12月29日，与会之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汤受会议派遣，同王宠惠等至沪恭迎孙中山一行。

1912年初，汤尔和重回浙江病院工作，被浙江都督蒋尊簋聘为民政司佥事。不久，被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为中央教育会议员，8月，赴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他对专门学校暂行计划案把法政学校列为“最急”开办提出异议，反对滥倡法校，主张多办医校。会后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在北京办一所模范医学校，他欣然同意。10月，汤着手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他主张“要办就得专门西医，不可中西合璧”[2]，以原北京医学馆为校址，汤任校长，本科四年，不设预科。从聘请教员到招收学生，他都亲自动手，很快于翌年1月开学。开学典礼上他致词说：“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

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藉医学为前驱。……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3] 当时教职员仅有九人，他兼教授组织学。他的讲义，年年换材料，还亲自用水彩画成组织示教图约三四百张。该校曾聘日人石川喜直、中野铸太郎等来校任教。

汤尔和十分重视解剖学，多次呈请施行，说“医学基础以人体解剖为不二之根据”[4]，但受到一般人的反对；经过反复交涉与论辩，终于得内务部同意，于1913年和1914年先后公布了解剖条例和解剖细则，是为中国医校有解剖学之开端。

1915年2月，汤尔和主持医校附设的诊疗所（即后来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诊。4月，他被聘为协和医校干事会学术部主任。9月，为促进医学研究，他又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此后每年开会一次，并出版会报，发表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汤还代表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医学名词审查会，集合国内专家共同解决医学名词的科学性和统一问题，他负责草拟解剖、组织、胎生部分的名词。

同年12月，鉴于袁世凯称帝在即，汤不愿意在皇帝辇毂之下当医专校长，赶在袁登极之前辞职南行，居上海替商务印书馆译书。1916年夏，袁世凯死后，汤回北京重掌医校。1917年张勋复辟时，汤再次南下，后仍回医校任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为反对北洋政府无理逮捕学生，北京各大专校长均辞职，汤尔和亦辞职；但他并不赞成学生游行罢课等举动，认为这些学生有的带着政治色彩，有的贪玩，白白耽误功课，非常可惜。他写了《现行学制根本改革的意见》二文，提出学校应当让人们自由听讲，不考试，也不发文凭，不负责安置就业。

1920年冬，北洋政府教育部派汤尔和赴欧考察。汤正想摆脱教育界的是非，便欣然出国。他先后参观了英、法、荷、比诸国医学研究

机关，然后待在德国柏林大学，跟生物学和解剖学教授克鲁采从事研究工作。出国前汤就写有《蝎之毒腺》、《猪十二指肠之黄色细胞》等论文，颇有价值。这时他更利用显微镜认真观察实验，发现猪、羊、鸽、鸦心脏普顷氏（Pur-kinje）纤维之线粒体及猪、羊等动物的内网器，取得了成果。

1922年初，汤尔和回到北京，仍任医校校长。旋辞校长职，从事译著。5月，胡适联合蔡元培、王宠惠等十余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鼓吹改革政治，建立“好政府”，汤亦列名其中。7月，经人推荐，汤出任教育部次长。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下王宠惠组阁，汤当上了教育总长。两个月后内阁改组，他亦离职，复去医校教书。

1924年，汤尔和应吴佩孚之邀至洛阳晤谈，受到吴的赏识。汤也很佩服吴，但不愿入其幕，因为他标榜自己是无党派，力图同各方面保持等距离的关系。1926年10月，汤尔和出任顾维钧内阁的内务总长，1927年初改任财政总长，曾以实施二五附税等在财政上替张作霖效劳，6月，即随顾维钧内阁的垮台而辞职。

此后，汤尔和仍继续译书，除译日人著的医药书外，还有满铁特务机关编的有关我国东北地理、物产、人事方面的资料，数年内出版了《组织学》、《生物学精义》、《精神病学》、《寄生虫病学》以及《东省刮目论》、《满铁外交论》等多种。这期间他多次到沈阳，成了奉系的座上客。

汤尔和常去日本活动。1929年3月，他第七次至日游历，稍后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汤有心缓和日本当局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曾代表张向日方朝野疏通，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绝不肯放弃侵略，汤虽竭力游说，也无法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同年11月，他任“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委员，又被张学良聘为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议。

1933年，日本侵略军大肆侵略热河，进而侵入华北，汤尔和看不到正义与群众的力量，充满恐惧和亡国的思想，当时他写了三首诗给朋友，其中之一说："国到将亡百事哀，惯从沙上筑楼台。谁令朽木支危屋，早识庸医种祸胎。只恐人心今已去，料应天意久难回。老瞒命断黥彭醢，降格犹无乱世才。"[(5)] 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进行妥协谈判，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汤尔和等一些亲日派人物为委员，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蒋介石进一步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完全承认了华北的"特殊"地位，派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汤是得到日方认可的委员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后赶回北平。不久平津沦陷，汤甘为傀儡，替日本侵略军奔走效劳，"维持秩序"。日本帝国主义于同年12月在北平扶植成立了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与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同为该伪政府的三巨头。伪临时政府初开张，汤尔和即以对外代表的身份发表宣言，接见新闻记者谈施政问题。以后他主要负责奴化教育，处处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1938年春，他曾召集中小学教师训话，大讲"中日亲善"；又特设编审会，严格检查中小学课本，生怕有所谓排外思想编入教材。同时他也很注意"整顿"大专院校，先后派汉奸鲍鉴清、周作人等分掌各学院，1939年更亲自兼任北大总监督。此外他还是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曾率会员去日本东京开会，深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此时他已患肺癌，署务由别人代理。同年11月8日，汤尔和在北平亡故。

(1) 幼松：《汤尔和先生》，金华印书局1942年10月版，第32页。

(2) 幼松：《汤尔和先生》，第51页。

(3) 幼松：《汤尔和先生》，金华印书局1942年10月版，第53页。

(4) 汤尔和：《呈请提出法案准于解剖》，幼松《汤尔和先生》，第61页。

(5) 汤尔和：《哀热河寄黄任之上海》，汤尔和译《哀哉热河》，1933年版，第4页。

汤化龙

曾业英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1874年11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生。祖上数代经商，家境富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才由于战乱的影响而衰落下来。其父本为诸生，为了恢复祖业，弃儒经商，常年奔走于长江沿岸的九江、安庆等地。汤化龙出生之年，正是家境恢复小康之时。

汤与其父不同，走的是科举做官的道路。他幼年从族父习章句，十三岁时入塾苦攻八股文，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1892年，以县试第一，补县学附生。1897年，补廪膳生，并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黄州经古书院。1902年秋，考中举人。逾二年，参加清朝最后一次会试，得中进士，授法部主事。之后，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

辛亥革命前夜，为寻求“新知”，汤化龙自请资送日本留学。1906年，赴日入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留日期间，他联合孟森、孟昭常等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并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

1908年秋，汤毕业回国，由鄂督陈夔龙奏调还鄂筹备地方自治，任谘议局筹办处参事[(1)]。次年，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在第一届谘议局常会后，又被举为议长。他目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坚信“速开国会为救时要略”[(2)]。1910年8月，汤去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会议主席。会后，他参与各界代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第三次请愿。11月4日，清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同意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令各省请愿代表

即行回籍。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立宪派对此结果表示满意，相继出京，但汤化龙不以为然。他联合谭延闿、蒲殿俊等人仍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原议，继续留在北京，谋第四次请愿。直到清政府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才失望而去。

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6月，汤化龙再次赶往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之非。与此同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决议成立“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汤出任湖北支部发起人，开始成为立宪派中全国有数的头面人物。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夜，汤化龙“潜匿私室”。次日晨，经起义士兵数次强迫，始出而任事。他初任都督府秘书，负责民政，但却“垂头丧气，毫不事事”[(3)]，偶有所表示，就是让革命党人“严守秩序”[(4)]。无奈之下，蔡济民、牟鸿勋、梅宝玑等革命党人只好借用他的名义，通电各省谘议局，促其速起响应革命，脱离清政府。

至12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汤意识到革命已有成功可能，于是立即转而附和革命。他一面主动告诉革命党人，清朝官员柯逢时家中藏有密码本，可作各省通讯联络之用，以争取革命党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施展种种手段，“图揽政权”[(5)]。他先和胡瑞霖等私下拟好一个都督府组织条例，于17日通过都督府正式公布实行，集军政、民政大权和战时总司令于黎元洪一身，使蔡济民等革命党人失去了参谋部的控制权。接着，又“串通宵小，由运动而得政事部长”[(6)]，并“集旧日朋好”[(7)]，将政事部之下内务、外交等七个局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

汤化龙如此明目张胆的争权夺势，引起革命党人强烈不满。25日，都督府再次召开会议，宣布废除原先通过的都督府组织条例，重新调整人事安排，只给汤一个编制部长的闲差。此后，他便极力讨好当时正在武昌的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汉阳失陷后，随黄兴

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汤化龙为法制局副局长。他辞而不就，与林长民、张嘉森、刘崇佑、孙洪伊等立宪派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13日正式成立），拥尚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为领袖，并积极运动袁世凯、黎元洪、蔡锷等“有力者”促梁回国从政。4月，他由上海入京，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同年5月，汤加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共和党，被选为干事。曾一度主张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后因不见信于共和党的民社派，于这年10月27日将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等六政团合并，另组民主党。汤被举为该党干事长。他在成立会上说：民主党“不争政权，而注意于普及政治教育”[(8)]。但该党另一重要成员刘崇佑的私下密语，却坦承：“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9)] 原来，民主党并非“不争政权”，只是尚须等待时机而已。

1913年1月，汤化龙在国会选举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在民主、共和、统一三党议员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院议长。4月5日，为抵制国民党试图利用制宪机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力，他要求民主党议员严格遵守以下三条原则：一、对制定宪法与选举大总统孰先孰后的问题，应主张先定宪法中“大总统”一章，然后选举大总统；二、关于大总统有无解散议院权力的问题，应主张有解散权；三、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需要国会同意的问题，应持否定态度。汤化龙的提议，获得袁世凯舆论机关的高度赞扬，其御用报纸《大自由报》评论说：“卓哉！汤氏之见识。”[(10)]

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后，遭到全国民众的愤怒谴责。为解袁世凯的信用危机，汤化龙联合原临时参议院议员四十八人，通电说明“善后借款”并不“违法”。5月，为对抗国会多数党国民

党，又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与梁启超等人将民主党与共和、统一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并出任理事。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宣布武力讨袁。汤认为“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11]。他一面联络孟森等进步党议员发表所谓“护国讨乱”通电，一面致电黄兴，要他“及早觉悟，敛兵效顺”[12]。1914年5月，袁世凯于相继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之后，任命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

1915年8月，袁世凯暗中推出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反对。汤化龙随即称病告假，滞留天津。10月，宣布辞职。12月，密行赴沪，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其间，他曾与旧立宪派要人蒲殿俊、谭延闿以及唐绍仪等致力于策动江苏督军冯国璋宣布“独立”，但始终没有结果。1916年3月19日，他电劝袁世凯“急为退位之图”。随后，又发表答帝制派王印川书，表示袁不退位，则不罢兵。为逼袁退位，他还答应其弟湖南将军汤芗铭的请求，代为疏通革命党人的关系，在覃振等革命党人允诺其弟宣布“独立”后继续为湖南都督的条件下，促成汤芗铭于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

袁世凯死后，汤化龙认为收拾时局非段祺瑞莫属，再次与北洋军阀同趋一途。8月，国会重开，汤复任众议院议长。9月，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组织的“宪法商榷会”（通称“商榷系”），他在梁启超支持下组织“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这时，为制宪问题，国会内外发生省制订入与否的激烈争论，汤及其“宪法研究会”为满足段祺瑞个人集权的需要，坚决反对省制订入宪法。10月20日，众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讨论省制问题，他攻击“宪法商榷会”要求将省制订入宪法，就是“不忠于民国”[13]。

1917年春，段祺瑞在日本的策动下，积极主张对德绝交、宣战。汤化龙认为这是“正当办法”，呼吁国会停止一切政争，“予政府以后援”[14]。当段与黎元洪为此争执不下，段内阁陷入被黎改组的困境时，他不改初衷，继续在国会支持段内阁，并为段祺瑞支持下的“督军团”破坏国会，出谋划策。汤希望在新的国会选举中，依靠段的支

持，赢得国会的多数席位。5月23日，段被黎元洪免职，汤随即具呈辞职，以示与段共进退。

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登极”。汤化龙一面通电各省，宣布与张勋誓不两立，一面随段祺瑞赴天津马厂誓师，并出任讨逆军总部参赞。12日，张勋复辟失败，由段祺瑞续组新内阁。汤因拥段有功，被任命为内务总长。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他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尽速召集临时参议院，以实现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宿愿。汤的所作所为，招来国民党议员的不满。10月，遭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明令通缉。11月，再次随段而辞职。

段内阁后虽又复活，但因段所依为股肱的安福系政客集团已经崛起，汤不再受到重视。1918年3月24日，他与林长民、蓝公武等怀着失意政客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游历。6月，远渡重洋，前往美国考察。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籍华侨理发师王昌枪击而死。

---

(1) 有几种材料说汤于1909年回国，均属不确。兹据《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汤被聘担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可断定他于是年秋即已回国。

(2) 汤用彬：《新谈往》，国维报馆1912年版，第72页。

(3) 《湖北革命实录馆咨湖北稽勋调查会请转呈中央稽勋局指拨汤化龙得二等嘉禾章考语》（1913年1月10日），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4) 剑农编：《武汉革命始末记》，《民国报》第1号。

(5) 《湖北革命实录馆咨湖北稽勋调查会请转呈中央稽勋局指拨汤化龙得二等嘉禾章考语》（1913年1月10日）。

(6) 《湖北革命实录馆咨湖北稽勋调查会请转呈中央稽勋局指拨汤化龙得二等嘉禾章考语》（1913年1月10日）。

(7) 《黎副总统历史》，《宪法新闻》第9期。

(8) 《时报》1912年10月31日。

(9)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台北世界书局1959年版，第404页。

(10) 《大自由报》1913年4月5日。

(11) 《时报》1913年7月24日。

(12) 《新纪元报》1913年7月26日。

(13) 《时报》1916年10月21日。

(14) 《新闻报》1917年2月16日。

汤寿潜

郑云山

汤寿潜，原名震，字蛰先，一作蛰仙。浙江山阴县天乐乡大汤坞人。1856年7月3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二）生。其父汤沛恩以塾师为业，同治年间曾在陕西武功盩厔（今周至）等地充任幕僚。

汤寿潜少年时在家乡读书，“早岁颖异，以文学见称”[(1)]。二十岁起离家到杭州、上海等地，一面继续阅读各类典籍，一面留心经世致用之学。1886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参与治水等活动。1890年，他有感于国势江河日下，内外危机日深，将平日所思所录汇作《危言》一书，计四卷共四十篇（1892年经修订后改为五十篇，仍分四卷）。他在书中揭露了捐纳、厘金等制度及官场种种弊端，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深感不安，主张迁都长安，并望全国上下借此更新振作；严惩贪官污吏，以使政治廉洁；提倡俭朴，痛斥一些人“不师夷人之长技，而徒濡染其穷奢极巧之风”；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员；推广学校和西学，培养真才实学的人才；坚决废除捐官制度，认为“贫于财之非贫，而贫于才之谓贫”；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此外，《危言》还提出了设立议院，逐步裁撤驻防八旗，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加强海军，设立武备院，以及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等广泛的改革主张。《危言》发表后引起社会的重视，“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有疏通知远之用”[(2)]，从而使汤寿潜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

1892年，汤寿潜得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以知县归部铨选，于1895年3月被外放赴安徽为青阳县知县。赴任离京前，汤受到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召见。翁前此对《危言》一书颇有好评，认为其“于时事极有识”。这次召见后，翁又认为汤“必为好官”[(3)]

；但汤到任仅三月，即“以亲老不乐就养”而辞官回籍[4]。

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等人发动维新运动。其时汤寿潜担任浙江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在师生中提倡讲求实用之学。“百日维新”开始后，因翁同龢、孙家鼐先后向光绪帝推荐过《危言》，光绪帝两次传令浙江巡抚廖寿丰，要汤寿潜入京，“由部带领引见”[5]。汤适逢母病，请求缓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汤北京之行因而中止。

1903年，汤寿潜被擢为两淮盐运使。盐是旧时国家的专卖品，盐运使为许多人觊觎之肥缺。但汤利禄之心淡泊，故仍以母病不能远出为由而辞去此项肥缺。翌年，他应聘就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将该书院改名龙门师范学堂，此即后来上海中学之前身。

从1905年起，汤寿潜参加了苏浙两省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的斗争。先是1898年11月，英国“银公司”与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四款，攫取了该路的修筑权。但该草约规定需“俟会商抚部院，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仍俟订正约后，会同入奏”获准，方能生效；且规定“银公司”应从速派工程师测勘。而结果《草约》签订后一直未订《正约》，“银公司”也从未派工程师来测勘，故该《草约》实已等于作废。20世纪初叶各地兴起收回路矿权运动，江浙人民要求正式收回苏杭甬路权。1905年3、4月间，美商培兹到沪活动，又企图攫取浙赣铁路修筑权。汤寿潜闻讯与张元济、夏曾佑等浙籍旅沪士绅，立即发动旅沪同乡起来抵制。同年7月，他们在沪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议决集资自办全省铁路，并要求清政府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收回路权。汤寿潜被举为铁路公司总理。清政府批准由商民集资自建铁路的要求，并授予汤寿潜以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翌年，又批准江苏省绅商自办铁路。1906年，江浙二省绅商，通过自集资金，开始分头动工建路。汤寿潜在主持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兴建浙江境内铁路期间，“刻苦经营，不辞劳苦，不支薪水”，博得普遍好评[6]。

但是，英国“银公司”拒不同意废除草约，反而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清政府与它订立苏杭甬铁路正式合同。清政府既慑于舆情，又不敢得罪英方，乃玩弄花招，宣称把借款、建路“分为两事”，即由它向英方借款，再转借给江浙二省铁路公司，表面上铁路仍由二省自建，实际上路权将控制于英方之手。消息传出，两省绅商强烈反对。10月，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表示：“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7] 并成立“浙江国民拒款会”，公举汤寿潜等人赴京，向清廷力争拒借英款，仍由商民自建。但清廷坚持卖路政策，1908年3月与“银公司”订立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旋又相继任命经办卖路的盛宣怀和汪大燮为邮传部侍郎。汤寿潜即以全省铁路公司名义，致电军机处，弹劾盛、汪，表示要以辞职抗议盛、汪的任命，但不为清廷所采纳。这时沪杭间铁路正加紧施工，1909年8月全段竣工通车，经邮传部考核，其质量为全国商办铁路之冠。同月，清廷为破坏浙江保路斗争，授予汤寿潜云南按察使之职，以便将汤调离浙江。随即邮传部令浙江铁路公司改选总理。该公司股东大会致电清政府反对调离汤，汤本人亦向摄政王载沣面陈不赴云南之愿。同年冬，清廷改授汤寿潜为江西提学使。汤再次辞不赴任，坚持留浙继续主持杭甬段铁路的施工。1910年8月，汤再次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任邮传部侍郎。清廷终于恼羞成怒，以其电文“措词诸多荒谬，狂悖已极”为由，下令将他“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清廷此举，引起舆论强烈不满。

汤寿潜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物。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汤曾对清廷这一“预备立宪”举措抱很大期望，即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苏、浙、闽绅商二百多人，于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称“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8]，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张謇、汤寿潜被举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地其他立宪团体，积极敦促清廷早日实行立宪。1908年7月，他们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要求清政府“决开国会，以两年为限”。但清政府不顾立宪派的请求，一再玩弄花招，拖延实行之期。1911年5月，清

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彻底暴露其对立宪之缺乏诚意。汤寿潜与张謇、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电载沣，请求改组这个皇族内阁，而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入阁[(9)]，清廷置之不理。至此，汤寿潜对清政府完全失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1月5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起义，一举取得成功，全省其他各地亦在紧接着的几天之内相继起义成功或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鉴于当时在浙江革命党人中缺少一位足资号令全局的人物，因而尽管汤寿潜并非革命党人，但因他早年写过《危言》，颇著声名，尤其后来在主持修建沪杭铁路和保卫浙江路权斗争中功绩突出，受浙江绅商拥戴；杭州驻防八旗兵中的实权人物贵林也在参加保卫浙江路权斗争时与汤结交，对汤很信赖，故早在杭州起义之前，在杭浙江革命党人商议未来浙江革命政府首脑——浙江军政府都督时，已决定届时请汤寿潜出任此职。11月5日，杭州起义发动后，浙江革命党人派代表赴沪，邀当时息影沪上的汤寿潜来杭，以尽早稳定浙江局势。汤初不愿回杭任浙江军政府都督，经代表们力劝，乃于7日回到杭州，正式就任都督。汤就任后，即确认以周承荧为浙江水陆军总司令，朱瑞为协领兼陆军小学堂监督；并发布命令，免征全省钱粮、厘金一年；派员慰问在杭州外国人；等等。旋即又批准朱瑞等人率领浙军，开赴江苏参加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之役。

随着武昌起义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迫切需要成立中央革命政权。11月11日，汤寿潜与江苏都督程德全、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通电起义各省，倡议在沪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讨论成立中央政府事。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汤寿潜即赴上海，与到沪各省代表共商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和选举大元帅事宜。当时孙中山尚在国外，各省代表对于黄兴、黎元洪二人中由谁出任大元帅一职争持不下，汤便“通情代表，终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1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

总统。元月3日，孙中山公布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15日，汤交卸浙江军政府都督之职。但他离杭以后，即逗留上海，不去南京就职，并在上海参加了由章炳麟、张謇组织的“统一党”，任该党参事。2月9日，汤寿潜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即离沪出国。出国期间，袁世凯于3月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汤寿潜被排除在内阁之外。5月，汤自南洋归国。此后，他“唯以优游晦迹，不欲复闻世事”[(11)]。6月9日，浙江铁路公司开股东年会，坚请汤寿潜复任总理，他辞不获允，乃于8月1日复职，改称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不久，浙江铁路改归国有，北京政府论汤以往劳绩，特赠予他二十万银元。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在乡病逝。临终遗嘱以二十万银元全部捐办浙江文化教育事业。

遗著除《危言》、《三通考辑要》外，尚有《理财百策》、《尔雅小辨》、《说文贯》等。

---

(1) 张謇：《汤君蛰先先生家传》，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张謇：《汤君蛰先先生家传》，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4) 张謇：《汤君蛰先先生家传》，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5)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0。

(6) 《浙路总理汤寿潜革职后余闻》，《东方杂志》第7卷第9号。

(7) 《汇报》1907年10月26日。

(8) 《预备立宪公会章程题名表》，《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6页。

(10)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1) 张謇：《汤君蛰先先生家传》，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汤芗铭

经盛鸿　殷文

汤芗铭，字住心、铸新，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其父本为诸生，为恢复祖上商业，弃儒营商，常年在长江沿岸九江、安庆等地奔走，后为北洋军阀段系要员。汤化龙是汤芗铭的兄长。汤芗铭少时入塾攻读，1903年中癸卯科举人。后肄业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04年2月，被署湖广总督端方选派前往法国留学。

1905年，孙中山由英抵法，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一次演讲后，孙中山以听者均无异议，发给每人一张白纸，让他们写上“某某当天盟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誓，人天共殛”。当时汤芗铭、向国华等十余人立誓加盟。事后，汤害怕清政府追究，对自己前途不利，就与向及在柏林加盟的王发科、王相楚一起去孙中山下榻的旅馆谒孙。乘孙不备，王发科、王相楚潜入孙的卧室，割破皮包，取出德、法两国留学生的誓词及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介绍函等物品，跑到清驻法使馆向公使孙宝琦举报，以求将功赎罪；但孙宝琦并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只将名册掷于壁炉中焚毁，而把法文书函抄录一份，原件遣人送还孙中山。留学生闻悉，皆不齿汤等所为，汤无地自容，遂离法转往英国学习海军。

1909年，汤芗铭学成归国，先后任“镜清舰”机关长、“南琛舰”副舰长。1911年初，再调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在萨身边办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北京海军部急令萨镇冰率军舰前往武汉，水陆夹攻起义军。当时停泊在上海黄浦江的军舰不多，有一些正在船坞修理，只有“楚有舰”能够立即出发。萨镇冰命汤芗铭一面拟电命令

在胶东海面作夏季演习的“海容”、“海琛”两舰火速开赴武汉；一面通知“楚有舰”准备开船。10月12日，汤芗铭随同萨镇冰登“楚有舰”自上海出发，溯江西上，所有参谋、副官、秘书的事务皆由汤一人担任[(1)]。10月17日，到达汉口刘家庙江面，先期抵汉的长江舰队统制沈寿堃向萨镇冰报告了军官郑礼庆、朱孝先投向革命的情况。几天后，黎元洪派朱孝先假扮洋人送信给萨，请萨共举义旗，萨默然不语。又逾数日，黎托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瑞典人轲斯送信，重申前请，萨还是没有表示。见萨举棋不定，汤芗铭乃派员入武昌城给其胞兄汤化龙送信，时任武昌军政府政事部长的汤化龙回信叫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勋”[(2)]。汤遂与“江贞舰”舰长杜锡珪分途活动，并劝萨率海军起义。大势所趋，但萨镇冰推辞自己年纪已大，愿自行引退，乃乔装商人，乘太古轮船公司客轮返回上海。汤芗铭即召开会议决定起义，被众人推为临时海军司令。汤即派人向九江军政府取得联系。黎元洪派李作栋持致汤化龙亲笔函和慰劳金驰赴九江慰问；并任汤芗铭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请其即日开到武汉江面助战[(3)]。汤率领的海军舰只在刘家庙至汉阳的江面游弋，与清军作战。后因“海容舰”船头中弹数十处，其余各舰亦有损伤，乃率舰返回上海修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钟瑛任海军总长，汤芗铭任次长兼北伐海军总司令。当时有许多留欧的革命党人因汤芗铭曾参与盗取誓约，提出异议。孙中山认为，汤率海军起义，对革命有功，吾党可以不念旧恶，反对者始息议。汤率领“海容”、“海琛”等舰至烟台，帮助革命军收复登州及沿海各地。后他又应关东都督蓝天蔚之请，派“海容”等舰到秦皇岛、营口等地示威，以壮声势。

随着南北议和的成功，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汤芗铭从烟台入京觐见，袁对他礼遇有加，倍加拉拢，汤感激不已。4月6日，汤芗铭被袁任命为唐绍仪内阁海军次长，继后又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的海军次长。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汤芗铭加入，但在9月1日即宣布退出。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汤芗铭奉袁世凯命

率“飞鹰舰”赴九江镇压，与江西招抚使段芝贵、师长李纯等协同攻占湖口；又率第二舰队转战赣、皖，攻击长江下游讨袁军，后回驻岳州。袁世凯以汤镇压讨袁军有功，授以勋二位、上将衔海军中将。同年10月又任为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并暂兼理民政长。二十九岁的汤芗铭志得意满，效忠袁氏不贰。1914年6月，汤芗铭被任命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兼巡按使。

汤芗铭深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之仇恨，又得其兄汤化龙之特别嘱咐，在湖南的几年里，实行残暴统治，对革命党人肆意杀戮；湘民不断发动反袁反汤斗争，汤更是血腥镇压，被湘人称为“汤屠户”[(4)]。

1915年，袁世凯加紧筹谋帝制，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积极鼓吹，汤芗铭亦在湖南设立专门办事机构，捏造民意，以堂皇之表册，典雅之辞藻，把袁世凯说成天愿人归的圣明天子，敦请“早正大位，以慰民望”。汤还在湖南演出一场“民选”的丑剧，让选民按指定的席位入座，采用记名投票法，在印着“兹推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选票上填写“赞成”和自己的姓名。汤芗铭在湖南如此卖力地制造舆论，深得袁的欢心，于1915年12月21日袁称帝前夕，被特封为“一等侯”[(5)]。

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但全国反袁斗争继续高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直到5月28日，汤芗铭亦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并称与袁世凯脱离关系。6月3日，汤芗铭又致电袁世凯，不承认其为总统。袁世凯于6月6日病亡后，好事者挽以一联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以两服中药名，喻指筹安会“六君子”和最后通电反袁的四川将军陈宦、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都督汤芗铭。7月，汤芗铭被逐出湖南。

其后，汤芗铭寄寓北京，以研究佛经自遣。他声言不问政事，其实只是一种韬晦之计。1917年1月，黎元洪任其为信威将军；8月，汤为国务院“战时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1923年初，汤经过一番活

动，被任命为湖北省长。他带着秘书从北京出发，先到保定谒见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又至洛阳拜见吴佩孚。吴以鄂人反汤为辞，劝汤“好自为之”。汤无奈，默然回到北京。经过一番疏解，汤再次南下前往武汉。汤虽然先布置了“迎汤团”到汉口车站迎接，但因不敌以湖北督军萧耀南为背景的“拒汤团”，汤被迫改乘军舰抵达武昌。汤芗铭原是想以“鄂人治鄂”为名出任湖北省长，但终究拗不过直系军阀的势力。萧耀南发布公告说：“省长一职经士民环请，辞不获准，勉兼省篆。”曹锟贿选总统上台后，正式发布命令：“特任萧耀南暂行兼署湖北省长”，“湖北省长汤芗铭呈请辞职，汤芗铭准免本职。”[(6)] 汤芗铭难以立足，不得不黯然离开湖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汤芗铭被直系任为会办军事执法司。直系失败后，汤芗铭没有活动余地，只好蛰居上海研究佛教。1928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劣迹昭著之王揖唐、吴光新、汤芗铭等人，汤隐匿不出。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等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反蒋，任汤为湖北安抚使，但不久阎、冯兵败下野，汤之任职乃成一画饼。1933年4月，张君劢等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汤因与张有旧谊而出任该党常务理事兼组织部长，嗣后主持北平党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7月底北平沦于敌手，汤芗铭一度充当敌伪的维持会长，后赴重庆。

抗战胜利后，“国社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于1946年合并改组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汤芗铭任中央组织委员，积极从事民社党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芗铭在北京两次被捕又获释，后一次给予免予起诉的处分。汤懂得多种文字，于1958年拟了一个“汉、藏、梵、英、法佛教名词辞典编译计划”，首述理由，次为收集佛教术语注意之点、体例以及工作人数、时间等，未能付之实行。1975年初，汤芗铭于北京病死。

(1) 汤芗铭：《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2) 汤芗铭：《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89页。

(3)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208页。

(4) 贺觉非：《汤芗铭》，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36—639页。

(5) 贺觉非：《汤芗铭》，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第636—639页。

(6) 贺觉非：《汤芗铭》，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第636—639页。

汤用彤

宗志文

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生于1893年6月21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八）。他的父亲汤霖是光绪十九年进士，当过甘肃渭源知县，后在兰州和北京教馆。汤用彤出生于渭源。少年时代在父亲的塾馆中读书，勤奋刻苦。他说自己“幼承庭训，早览乙部”[(1)]，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2年他入北京顺天学校，1914年入清华学堂。1916年在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公费留美，因治疗沙眼未成行，遂在清华学堂教国文，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8年到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两年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哲学，并习梵文、巴利文。

汤用彤1922年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暑假回国后，在南京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后又在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0年起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没有离开过北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他随之同往。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除任教外，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

青年时代的汤用彤一心钻研哲学，对国家大事以至新文化运动都不大关心。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正在美国。当时有一部分留美学生联名撰文支持五四爱国运动，他曾在上面签名，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并不怎么了解。1922年回国后，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指摘新文化运动，说：“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聚议纷纷，莫衷一是。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2)]

汤用彤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研究中国佛教史，同时研究印度哲学史和梵文，以加深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在大学里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英国经验主义（洛克、巴克莱、休谟）。他研究历史很注意掌握充分而可靠的材料，长于考证。“由于他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有较深的理解，他就有条件利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比起那些只用封建的含混不清的叙述、用佛经解佛经的中世纪办法提高了一个阶段。”(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汤用彤思想上有所震动。这时，虽然他还是埋头治学，不问政治，但思想上也有矛盾。暑假南下至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左近写《大林书评》，序言中带着自责的口气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大林书评》共六篇，其中五篇是批评日本人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谬误，他自称是借此抒发抗日救国的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加剧，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很激烈。当时昆明的学生运动日趋高涨，许多教授也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汤用彤的心情是沉闷的：既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又不愿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所走的还是那条为学术而学术，在学术中寻求安身立命的道路。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时，他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曾经参加悼念牺牲烈士的追悼会。当时梁漱溟到昆明做调处工作，对民主运动和反革命镇压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汤用彤与梁漱溟虽是多年的朋友，但他公开反对梁的这种态度。

1946年，汤用彤回到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建校工作。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常常不在学校，有些工作就落在担任文学院长的汤用彤身上。他感到难以应付，十分苦恼。1947年暑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就乘机到美国去了。一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请他讲学，他没有同意，1948年9月回到北平。不久平津战役打响。胡适动

员他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飞机票，被他拒绝。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任副校长。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56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54年冬，汤用彤患脑溢血症，经过多方治疗，才逐渐痊愈。他经常对人说："若不是解放了，若不是党和人民的关怀，我这个病是不可能治好的。"[4] 汤用彤病愈后的十年中，身体一直不好，但仍然指导青年教师，带研究生，从事佛教史研究，孜孜不倦。这时期，他积累了十几本读书札记，其中有关于佛教史的，有关于印度哲学史的，还有一部分是翻阅《道藏》的摘录。他写成九篇论文，概名之曰《康复札记》。他校点了梁代慧皎的《高僧传》，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曾改杜甫诗两句"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用以表达自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因心脏病逝世。

汤用彤的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讲义》、《往日杂谈》、《汤用彤全集》。

---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 《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

(3) 任继愈：《悼念汤用彤先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4) 任继愈：《悼念汤用彤先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汤玉麟

张学继

汤玉麟，字阁臣。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于奉天阜新县马吉沟村。后迁奉天黑山县汤家窝堡。汤玉麟的外祖母是蒙古族人，因此他有蒙古族血统。汤生性鲁莽，以好打群架著称，因其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故人送绰号“汤二虎”。

因家庭生计困难，汤玉麟早年给地主王文虎家放过牛羊，后又当车把式，经年赶车拉脚往返于阜新、朝阳之间。有一次，在赶车路上，遇上一股土匪，不仅将汤玉麟押运的货物抢劫一空，而且将汤本人狠狠揍了一顿。汤玉麟遇此劫难，愤愤不平，一怒之下，铤而走险，投奔大凌河两岸苑四、苑五兄弟为首的土匪队伍，落草为寇。因善于骑马，精于枪法，勇猛凶悍且不怕死，敢于和围剿的官兵对抗，屡突重围，化险为夷，众匪徒佩服不已，便公推汤为“二当家的”，与苑氏兄弟平起平坐。后来，汤玉麟以苑氏兄弟行为不轨，不讲绿林义气，与之发生冲突。汤玉麟愤而与苑氏兄弟决裂，率部分匪徒出走，占据镇安县的虹螺岘自立山头。

不久，盘踞广宁一带的巨匪金寿山对盘踞中安堡的张作霖保险队发动突袭。张作霖因势单力孤，立即派人向汤玉麟求救。汤的绺子人数虽然不多，但武器精良，个个凶猛好斗，有较强的战斗力。汤率兄弟星夜赶来中安堡，里外夹攻，把金寿山绺子打退了。中安堡解围之后，张作霖对汤玉麟非常感激，认为汤玉麟能征善战，有意和汤合在一起。汤对张作霖的印象也很好，虽然年轻，但是性情豪爽，胸有大志。张提出两股绺子合在一起，汤欣然同意，拥护张作霖坐第一把交椅。从此，张作霖保险队逐步扩大。

1900年的除夕，张作霖率领众兄弟喝酒吃肉，个个酩酊大醉。金寿山率哥萨克骑兵一中队再次奔袭中安堡，将张作霖保险队大院团团包围，坐探乘机接应，顿时枪声大作。张作霖指挥众兄弟仓促应战，因众寡悬殊，张作霖不得不指挥众兄弟突围，由孙德山背着已经怀孕四个月的张作霖的赵氏夫人，汤玉麟背着张作霖的长女张首芳，边打边退，张作霖手持双枪断后，当逃至雷家屯时，张作霖的队伍已散，只剩下八人。张作霖将家眷送往张家窝棚赵氏的堂侄家中暂住，便与汤玉麟等几个人沿辽河两岸活动，一边收留被打散的残部，一边招收新人，重新组织队伍。不久，张作霖经与汤玉麟合计后，决定投奔八角台团练长张景惠，张景惠不仅接纳了张作霖，而且推张作霖坐第一把交椅，任八角台自卫团的团练长，张景惠退为副团练长。张作霖与张景惠两股合流后，拥有弟兄七十余人。汤玉麟协助二张训练团丁。不久，又有张作相带领二三十号人马投奔张作霖、张景惠，力量更为增强。1902年，张作霖在消灭拥有二百多名匪众的台安县巨匪项昭子之后，又吞并了周围小村的保险队，队伍逐渐发展到四百多人，成为辽西一股很大的力量。

张作霖不仅机灵过人，而且实有政治野心，热衷于升官发财。有一次，张作霖和汤玉麟摆酒论英雄。张作霖酒后吐真言："当今之世，满洲无主，我等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汤玉麟听了，也说："我也有这种想法。"

1902年10月，当地乡绅张子云等串联十八屯绅商及各界代表作保，由新民府知府增韫手下红人赵经丞牵线，张作霖率汤玉麟等共三百多人接受收编，增韫将张作霖的人马编为新民府地方巡警前营马队，张作霖任马队管带（相当于营长），下辖中、前、左、右、后五哨，汤玉麟与张景惠、张作相、王利有、孙福山分任哨官。从此，汤玉麟等人摇身一变成了清廷的军官。

1907年，张作霖升任奉天巡防五营统带官（相当于团长）兼中营营长，汤玉麟与张景惠、张作相、邹芬分任营长。

1907年5月，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鉴于东北“胡匪”遍地，“马贼”猖獗，徐世昌上任伊始，首先抓剿匪。徐世昌命张作霖消灭辽西巨匪杜立三。1907年7月6日，当杜立三率亲随十多名到新民府来见张作霖时，张作霖早已设下埋伏。伏在门外的汤玉麟从杜立三背后将杜抱住，随后又过来几个人将杜立三按倒在地，摘下手枪，捆绑了起来。当晚即将杜立三枪杀。汤玉麟与张作霖合谋除掉杜立三，立了大功，徐世昌立即上奏朝廷为汤、张请奖，朝廷立即赏银两千两，并升张作霖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汤升为二营帮带。

不久，徐世昌调张作霖部到辽源（郑家屯）、洮南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军。这时张作霖的队伍由五营扩编为七营，除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邹芬等营以外，又把驻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为张的部下，张的队伍增加到三千五百多人。张作霖受命后，率领所部在漠北的荒原上，和蒙匪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等股匪进行了殊死搏斗。1908年6月，张作霖指挥所部奇袭内蒙的龙王庙（蒙匪的一个根据地），将白音大赉手下的干将巴塔尔斩首。当陶克陶胡袭击长春一带，白音大赉乘此在洮南反击时，张作霖联合黑龙江官军进行夹击，迫使蒙匪西窜。张作霖带领所部穷追陶克陶胡，一直追至大兴安岭的索伦山。在冰雪覆盖的索伦山区，张作霖身先士卒，与蒙匪短兵相接，张作霖两次被困，均被汤玉麟率敢死队拼死救了出来。汤玉麟虽立有战功，却因部队损失严重，被清廷免去第二营管带职务，令其戴罪立功。1909年春，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什被生擒。1910年4月，陶克陶胡被击败，率残匪四十五人越境逃往俄国。8月，沙俄派人用船将陶克陶胡等人的家眷从郭尔罗斯接到哈尔滨，然后送往俄国。从此，蒙匪陶克陶胡叛乱宣告失败，汤玉麟亦得以官复原职。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汤玉麟奉张作霖之命，首先率马队一千五百人进驻奉天省城，设司令部于小南门万福客栈，汤玉麟追随张作霖参与镇压革命的活动，先后捕杀革命党人张榕、田亚斌、宝昆，并抄了他们的家，将贵重金银财宝据为己有。

中华民国成立后，赵尔巽由清王朝的东三省总督摇身一变成了奉天都督，张作霖当上了第二十七师师长，汤玉麟任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1913年2月28日，汤玉麟升任第五十三旅旅长。1916年4月，张作霖与冯德麟合谋赶走奉天将军兼巡按使段芝贵，袁世凯被迫任命张作霖署理奉天将军兼巡按使（同年7月改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在登上“奉天王”的宝座后，认识到再依靠几个绿林兄弟逞蛮勇已远远不够了，于是重用袁金凯、王永江、王树翰、孙百斛等一批文人治理奉天。

汤玉麟身为五十三旅旅长兼省城密探队司令，依然不改绿林土匪习气，他带头在公馆开设赌局，从中抽头。他的部下也都目无军纪，横行街市，开设赌局，作奸犯科，欺压群众，敲诈勒索，土匪习气十分严重。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警务处处长，大刀阔斧地整肃军风军纪，依法缉拿违法乱纪官兵，并严令封闭赌局，矛头直指汤玉麟部。汤玉麟对王永江极为反感。他认为天下是我们用枪杆子打来的，王永江凭什么管军人？当王永江下令逮捕汤部不法者宗某时，汤玉麟怒不可遏，立即枪杀两名执法法警，造成军警冲突案，以此向张作霖施加压力，要求撤换王永江，遭到断然拒绝。张作霖并教训汤说：“枪杆子能打天下，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却不能治理天下，治理天下要靠人才，你们懂得什么！”

汤玉麟受到训斥后，很不服气。1917年春节，按照惯例，二十七师、二十八师要分别请省城文武高级官员吃年茶以联络感情。初五这天，二十八师请客没有请王永江。初六这天，二十七师请客又没有王永江。张作霖在二十八师吃年茶时，没有见到王永江，觉得有些不对劲，二十七师吃年茶又没有见到王永江，不免有些恼火，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不请王处长？”谁也没有吭声，张作霖接着又说：“二十八师不请王处长，我不好说什么，你们怎么也不请王处长呢？”孙烈臣连忙打圆场说：“我们忘请了，改日再专请他吧！您别生气。”张作霖厉声说：“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我用定了这个姓王的啦，谁反

对谁辞职！”

汤玉麟本来对警察到其公馆抓赌已窝了一肚气没法出，听张作霖这么一说，火气顿时上升，连忙站起来回敬道：“你不用骂街，辞职算不了什么。”联欢茶会不欢而散。

汤玉麟与张作霖闹翻后，对张作霖不服的冯德麟立即派人给汤玉麟打气说：“一切有冯帮办给你做主，将来奉天的天下说不定是谁的呢！”

有了冯德麟的支持，汤玉麟底气更足了，他串联二十七师其他将领，拟定一张呈文，共同求见张作霖，要求撤王永江的职。张作霖当场将呈文撕得粉碎，指着汤玉麟的脸大骂，连祖宗三代都掘出来了，痛斥“汤二虎”混蛋，“没你这个鸡子也能做槽子糕（即蛋糕）”。汤玉麟挨骂后，恼羞成怒，准备调兵对张作霖实行兵谏，并派人去抓王永江。王永江闻风而走，跑到汤岗子温泉。

这时，冯德麟乘机与汤玉麟配合，共同对抗张作霖，要求张作霖将奉天省长一职让给他，并任命汤玉麟为二十七师师长，否则自由行动。在紧急情况下，张作霖派兵包围了汤玉麟的旅部，汤也构筑防御工事，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地方团体呼吁不要在省城打仗，张作霖同意让汤玉麟率第五十三旅旅部移驻新民。

汤玉麟到新民后，张作霖给汤玉麟写了一封很带感情的信，劝汤玉麟回心转意[(1)]。但汤玉麟没有接受张作霖的劝告。汤的外甥刘景双，在汤部当营长，火气比汤还大，对汤说：“舅舅！我帮你干，万不得已咱们再进山。”

不久，冯德麟获悉日本和段祺瑞政府支持张作霖后，态度首先软了下来，当汤玉麟到北镇想和他联合时，冯拒而不见。这时张作霖又通过阚朝玺等策反汤手下的军官，汤更加孤立，只好逃往医巫闾山寨重新做起了山大王，纠集千余人进行活动。1917年5月4日，张作霖

下令免去汤的旅长职务，次日，任命张景惠接任第五十三旅旅长。张作霖并命第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和骑兵团长张作相率部讨伐汤玉麟。汤走投无路，逃往徐州投奔张勋。汤玉麟反张遭到彻底失败。

汤玉麟投奔张勋后，担任定武军统领官，成为“辫子军”统帅张勋的部下，张勋知汤玉麟有一股蛮勇之气，对他十分重视。1917年，张勋利用“府院之争”的机会图谋复辟，张勋与汤玉麟带领辫子军五千人首先进入北京，将逊帝溥仪拉出来宣布清朝复辟，张勋自封为议政王，封汤玉麟为侯爵。汤玉麟率领辫子军一部与讨逆军李长泰第一师在北京展开激战，汤玉麟亲冒弹雨，袒身露膀，展开搏斗。终以寡不敌众，辫子军迅速遭到失败。张勋逃往荷兰使馆，汤玉麟则在混乱中逃出北京，逃到日本人占领下的大连躲避起来。

1919年1月，经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等人说情和汤玉麟母亲桑氏的请求，张作霖不再追究其造反之罪，并允许汤回省城。汤玉麟见到张作霖，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张作霖原谅了汤玉麟，两人言归于好，张任命汤为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

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汤玉麟任奉军侦探队长，潜入北京活动。1921年5月，汤玉麟出任东北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率部驻凤城，兼任东边镇守使。1922年2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汤玉麟率一个团的兵力入关，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负责保卫奉军总司令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汤玉麟任第五军副司令（司令吴俊陞），汤率所部作为总预备队，驻扎绥中待命。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汤玉麟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驻防朝阳、北粟一带。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汤玉麟率部从义县出击至大凌河西岸，截击郭松龄军。郭松龄反张失败后，张作霖认为汤玉麟作战英勇，立有功劳，论功行赏，于1926年4月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特别区都统，为张作霖把守西北门户。1928年12月31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汤玉麟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热河省

政府主席。

汤玉麟在热河任都统、省主席前后共八年之久。汤玉麟把热河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举凡重要职位，非亲莫属，汤玉麟的五弟汤玉书任骑兵第一旅旅长，四弟汤玉铭任混成旅旅长，长子汤佐荣任热河兴业银行总办兼禁烟局总办，次子汤佐辅任财政厅长，长女婿周钟中当阜新县知事，次女婿苟荫南任阜新县税捐局长等，所有的肥缺都由汤的亲戚独占，外人休想染指。

汤玉麟深知有兵就有权，因此拼命扩充军队。热河本是贫瘠之区，汤为筹军饷，任命其长子汤佐荣为热河禁烟善后管理局总办，名为禁烟，实际上是强迫热河人民普遍种植鸦片，将热河变成一个烟毒的世界。汤氏父子从这种罪恶的鸦片生意中横征暴敛，搜括了大量财富。汤玉麟治下的热河，官匪不分，兵匪同流，鱼肉百姓，成为人间地狱。

1933年2月，日寇在侵占东三省后，又进犯热河，汤玉麟无心抗战，敌人未至，汤即将八年来在热河搜括来的赃物（包括鸦片），征用供前线运输的载重汽车二百四十辆运至天津租界保存，汤玉麟本人闻风而逃，一枪未放就丢失了热河省城承德。举国舆论抨击汤玉麟不战而逃的罪行。热河失陷后，南京国民政府迫于舆论，于3月8日下令通缉汤玉麟。

汤玉麟率部撤入察哈尔省后，于1933年5月间参加冯玉祥等人组成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任命汤为察东司令。7月，汤派参谋长赴承德与日寇秘密进行勾结，因部下坚决反对，汤玉麟投日未成。不久，汤玉麟所部为察哈尔省主席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收编，宋委汤为第二十九军总参议，解除了他的兵权。

1934年1月9日，南京政府撤销对汤的通缉令。5月2日，北平军分会任命汤玉麟为高级顾问。半年后，汤辞职，回天津闲居，1937年

5月病死天津。

---

(1) 刘禹：《北洋军阀末代元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汤子敬

李本哲

汤子敬，字培，号厚珍。1860年9月19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五）生。江西临川县人。其父汤汉高，务农为生，家境贫寒。汤子敬十四岁时，随叔父汤韵高赴云南谋生，离家时仅带了一把雨伞、一双钉鞋和一吊六百钱的旅费。路过重庆时，同乡谢亿堂（谢亿泰布店老板）见汤子敬勤快伶俐，便留他在布店当学徒。谢亿泰本是一家小店，后来由于英、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益深入内地，谢亿泰便由经营土纱、土布逐渐转向经营洋货，业务日趋兴旺。

汤子敬三年学徒期满，谢亿堂借口他身材矮小，不能满师，要他再做了一年。以后，汤留在布店，从帮账到管账、办内事、跑街，步步上升。谢亿堂很赏识他的经营才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

1898年，余栋臣起义威震川东，一般商人都惊慌失措，唯恐战火蔓延而遭受损失，不敢把货物运到重庆，有的甚至把在重庆的存货倒运沙市、宜昌一带寄存。汤子敬认为“要得富，险中做”，将谢亿泰在上海所进的货全部运来重庆。这时市场布匹奇缺，又正值清政府急需赶制大批军衣，一时之间布匹供不应求，价格暴涨，谢亿泰奇货可居，获利颇厚，汤也因此在同业中被誉为“胆大有识”。

汤子敬在谢亿泰布店二十余年，朝夕奔走市廛中，耳濡目染，创业兴家的思想与日俱增，加上他袖笼里的私生意和东家的业务逐渐发生利害冲突，势难在店里长处下去，到1899年便离开了谢亿泰，分得银子八万两。

汤子敬在离开谢亿泰之前，已私下开办了两个企业。一个是聚福厚商号，创立于1894年，主要是做鸦片买卖。他利用江西“土客”来川

收买鸦片的机会，在资金周转上支援他们，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每次都搭上一二挑烟土，请“土客”代购代销，从中赚取厚利。另一个是1896年开设的同生福钱庄，最初只是为了适应当时市场上银锭和铜钱并行的商业需要，做制钱买卖生意，后来发展为代办收交和经营存放汇兑。汤子敬离开谢亿泰后，不数年间又先后开设了源远长、正大昌、德大永、正大永等钱庄，聚福厚、德大昌、德大合、裕生厚、大昌祥等匹头、棉纱字号，以及聚福长山货号、协太厚银朱丹粉作坊等十多个企业。到1909年，所谓“汤十号”在重庆名噪一时。

这时，汤子敬坐镇同生福钱庄，全面指挥和策划十多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他曾利用当时日货大量倾销、价格较低的机会，暗中把日货商标换成国货或英货商标出售，获利极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羊牛皮滞销，产区价格陡跌。他通过由聚福长山货号改组成的聚福洋行，大量收购囤积，大战结束时，一次盈利即达银四十余万两。于是，“汤百万”的称号名满全城。这段期间，同业中有要仰仗他这块招牌的，只消他允诺一声，无须拿出分文，便成了某企业的股东，年终照例分红。有的企业一时发生信用危机，只要能请他光临店堂稍坐片刻，或者求他送一条幅挂在墙上，便可转危为安，渡过困难。因此，后来人们就直呼他为“汤财神”。

在尔后的十来年中，汤子敬经营的商号虽然有起有落，但总的说来业务日益兴旺，经营范围更加扩大。当时，他的经济实力约占重庆资金流转总额的三分之一，匹头棉纱业务在市场上首屈一指。特别是裕生厚，成了各联号的轴心，甚至经营银钱业的人也以此为第二市场。他的房产遍布重庆全市，有些通连成片，由是又有“汤半城”之名。他所经营的大昌祥盐号，以及乘人之危兼并来的同亿义盐号，都曾盛极一时，居于重庆四大盐号之列。

汤子敬在经营上的节节得手和业务上的日益扩充，使他愈来愈感到应接不暇，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于是永美厚银号即应运而生。嗣后汤又在沙市、汉口、上海等地设立分号，对渝申线上各埠

汤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起着监督作用。

1925年，汤子敬考虑到在武汉经商的利润较重庆要高，加之家庭纠纷时起，于是决定转移资金，在汉口另辟市场，他便带现银一百多万两去汉口。汤仍然采用在重庆的办法，将永美厚银号扩充为六七家，并在进出口业建立据点，还企图进一步染指工业。可是这次故伎不灵，一百万两巨款放出去便陷于呆滞，无法活动。1927年又被国民政府在武汉封锁现金，发行的“国库券”一日数市，不断贬值，兑换现银一千两要补水二三百两，最后竟跌到对折以下，形势十分严重。其时一般商人深怕亏累过甚，都设法抢先汇出一部分现款，唯独汤子敬仍然株守过去搞投机的经验，一文也不汇出，手握巨额“国库券”，静待市面恢复正常而“出奇制胜”，结果一百八十余万两现银全部化为乌有。

汤子敬在汉口的彻底失败，使他元气大伤，汉口、沙市一带沿途各庄先后缩小经营或停业。重庆的同生福钱庄也连带损失三四十万两银子。号称重庆第二市场的裕生厚商号，1932年因受德丰、丰泰两家联号所经营的烟土在汉口遭到火灾的影响，损失达二十多万元，被迫停业。汤经过这一连串打击，情绪悲观，勇气锐减，回到重庆。初时他颇有自责之意，表示要“闭门不再闻问”，然其内心还是念念不忘重振家业。过去的失败教训使他认识到，光有钱而无势是站不住脚的。于是通过其子汤志修、汤壶峤和四川军阀官僚刘湘、王陵基、刘航琛、范绍增等结识，冀图借助地方势力东山再起。

1933年，汤子敬伙同范绍增开设四川商业银行，范出资四十万元。汤以“财神”之尊任总经理，汤壶峤一度任经理，其他重要职务亦多由汤家联号中人担任，经营尚称顺利。1934年，汤又和刘航琛的川康殖业银行结合，并把商业银行并入川康殖业银行。这时汤氏父子沾沾自喜，满以为往日之鼎盛可以再现。殊不知地方军阀官僚假惺惺地与他携手合作，只是为了利用他在商场中起联系作用，不久就把他排挤了出去。

汤子敬遭排挤后，不得不仍寄希望于自己发家的老路，并且迷信他的“财神”招牌还可挽狂澜于既倒。由于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汤到处招干股，做空头，从而信誉大降，连他的“班底”都渐次对他怀有戒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内中有的见势不妙，干脆撤伙另起炉灶，分道扬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汤子敬经营连连失利，加以做申汇投机失败和受金融风潮的冲击，遂成强弩之末，一蹶不振。就是曾为他奠基立业、特别受他珍视的同生福钱庄，到1939年也仅有资金一万二千元。虽经改组增资，也不过徒事挣扎，最后终于将牌号卖与别人经营。其余企业或先后歇业，或招牌换记，至1942年时，所余商号不过两三户而已。

1943年9月24日，汤子敬在重庆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蔡鹤年、陈诗可、蓝襄臣、刘闻非、彭肇维：《重庆巨商汤子敬的发家史》，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1辑，1962年。

唐继尧

谢本书　孙代兴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县人。1883年8月14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出生。他家“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他六岁入私塾，十五岁中秀才[(1)]。1904年考取官费留日学军事，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唐继尧不久即加入。同时，唐与少数人另组“陆军团”和“武学社”[(2)]。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活动，引起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起程回国。唐继尧不同意罢课，甚至号召留日学生安心学习，1906年，唐继尧在振武学校毕业，入金泽第九师团炮兵联队见习，见习期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

1908年4月，革命党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消息传至东京，留日云南人士开会庆祝，而唐继尧却持消极态度。事后一些积极支持起义的学生被革除官费，有人怀疑为唐继尧“禀揭”[(3)]。同年唐继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

1909年，唐继尧回国，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提调，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官，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等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云南同盟会员闻讯密议于李鸿祥、唐继尧宅，准备响应。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夜，在蔡锷、李根源等领导下，云南起义爆发，唐继尧协同进攻督署。翌日昆明起义成功，全省迅速光复。起义官兵组织了“大汉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军都督，唐继尧被任命为军政、参谋两部次长。

1912年1月，蔡锷派韩国饶、李鸿祥等率部“援川”。继又派唐继尧以“北伐军”司令名义率师与援川滇军会合，出师武汉。师未出，唐

继尧又奉蔡锷之命，假道贵州，代平“黔乱”。时贵州已于1911年11月初光复，由同盟会支持的“自治学社”革命党人掌权，组成了贵州军政府。贵州立宪派为了夺取政权，由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周沆等人请求蔡锷命北伐滇军取道贵州，戡平“公口”（哥老会）之“乱”。唐率师行至平彝（今富源），蔡锷又急电唐终止入黔，援川“北伐”。但唐不受命，继续东进。蔡无可奈何，只好以“先其所急”，听之任之[(4)]。唐军于1912年3月初袭占贵阳，对战败的黔军“无论官长士兵，恐其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之东郊，悉数坑杀”[(5)]。大屠杀后，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唐继尧为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政府正式委任唐继尧为贵州都督。立宪党人戴戡、任可澄做了都督府的左、右参赞，刘显世出任军务部长。

1913年，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7月，赣督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响应。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命他出兵攻打熊克武[(6)]。唐派贵州第三师师长叶荃及混成旅旅长黄毓成等率部入川进攻重庆，声称要“奋其武力，剪此奸凶”[(7)]。叶荃等率部入川，打败了熊克武，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8)]。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云南都督蔡入京，另有任用。蔡乃电请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很快批准。唐继尧回滇不久，便发生了杨春魁攻占大理的事件。唐派兵镇压，“未逾月而乱平”[(9)]，逼死了杨春魁，还趁机杀害了著名革命党人、辛亥起义时的滇西都督张文光。

1914年，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开武将军”兼云南巡按使，不久复以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令唐专任督理军务。1915年10月，唐继尧又以开武将军受爵一等开武侯，并接受袁世凯每月津贴三万元[(10)]。

袁世凯帝制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中下级军官先后召开三次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反对袁氏帝制。唐继尧却认为，滇逼强

邻，“黔则汤芗铭扼驻于湘”，川则“陈宦逼己”，因而“迟疑久不决”[11]。但是，滇军对袁氏“愤慨异常”[12]，唐继尧深感军心不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又闻蔡锷即将来滇，冯国璋也表示“滇发难，当继踵而起”[13]，乃被迫同意参加反袁，并迎接蔡锷和李烈钧、熊克武、程潜、方声涛等人来昆明，共同策划。

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到昆明。21、22日，滇军将领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举行了两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制）。23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14]。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同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蜀，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入桂，唐继尧以都督名义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反袁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运动发展迅速，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把住大总统位置不放，护国军要求袁世凯下台。同时，起义的滇、黔、粤、桂、浙五省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处理“军国重事”，唐继尧遥领军务院抚军长职，岑春煊以抚军副长代行职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护国战争不了了之。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等人以黎元洪继任总统和恢复国会为条件，于7月14日宣布撤销军务院。

在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之时，唐继尧却将原护国军三个军扩大为八个军，继续派往四川。这件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在给唐继尧的电报中说：“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15]

1917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破坏《临时约法》，掀起了“护法运动”。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也宣布响应“护法”。8月2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但是，唐、陆都

拒不就职。唐继尧在一个密电上写道“中山举动，本嫌唐突”，但“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16]。而且，唐继尧支持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分化瓦解支持孙中山护法的驻粤滇军，囚禁了驻粤滇军将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

1918年5月18日，广州非常国会在唐继尧、陆荣廷的支持和政学系政客的把持下，议决改组军政府，废除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举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后又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而实权却掌握在西南军阀手中。孙中山很失望，还在军政府改组前夕，他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大元帅的咨文，并通电斥责滇、桂军阀，“态度暧昧，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明白地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唐继尧在孙中山的电文上批“无耻已极”、“一片胡说”[17]。而唐继尧在收到改组后的广州军政府的电报后，立即宣布就总裁职，并表示“军府改组，同深庆慰”[18]。

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出师击败四川军阀刘存厚，赶走段祺瑞派到重庆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1918年5月，亲赴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号称“联帅”）。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国军相号召，唐继尧俨然又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19]。

同年下半年开始，唐继尧利用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议，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秘密勾结。1919年11月23日，他们的代表会于衡阳，在吴佩孚提出的军事密约《救国同盟》修改稿上正式签字。在密约上先后签字的还有粤、湘、桂、川系军阀的代表。密约的附件规定“同盟军遇有危迫时，近者以实力援助，远者以函电响应，或转托他军协助”，而且条约“永久发生效力”[20]。

1920年6月1日，唐继尧在“废督裁兵”声中，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声言要“闭关自治”[21]。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连年出兵川、黔，激起人民的不满。他自己也承认“滇省连年兴师，民生凋敝”[22]。而滇军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23]，使滇军处境十分不利。1920年爆发的川滇战争，滇军先胜后败。在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死，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乃以“士兵厌战”为由，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大军压境，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乘滇越路车出亡香港。顾品珍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

1922年春，唐继尧以重金收买正在孙中山组织和指挥下准备北伐的驻桂滇军，折回云南，同时收买了滇南大土匪吴学显，从内部配合，向顾品珍发动突然袭击。顾品珍在路南天生关指挥部中弹身死。3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再次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

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以后，参与“联省自治”的合唱，于同年8月1日改组省政府，实行“民治”，颁布《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并被推举为云南省长。同时，扩编所部滇军五个军为“建国军”，自号川、滇、黔、鄂、赣、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北伐。9月，孙中山为促唐继尧参加北伐，在广州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提议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但是唐继尧又拒不接受。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粤军陈炯明于1925年1月分三路进攻广州。唐继尧也在一二月间，派胡若愚、龙云率军三万余人进攻广西，占领南宁；又派唐继禹、张汝骥、吴学显率兵四万，进逼柳州。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唐继尧即通电说已于3月18日在滇就副元帅职[24]。广州革命政府谴责唐继尧的行

径，并于3月19日通电讨伐唐继尧。5月，唐继尧派代表与杨希闵、刘震寰等人以及英帝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政府。6月，广州政府先发制人，击溃在粤的滇、桂军数万人。8月，在南宁、柳州的滇军亦先后败退回云南。

唐继尧为了连年进行战争，不断扩充军队，纵容匪患，并用增加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强售公债、统运大烟等手段，加紧搜括民财，过着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而滇军从广西败归后，唐继尧集团内部矛盾又尖锐化起来。1926年8月，维西镇守使罗树昌起兵永北，进攻大理；杨振寰、徐进占据保山；刘正伦亦响应于腾冲，联合声讨唐继尧[25]。

1926年下半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唐继尧深感恐惧，加紧了与吴佩孚、孙传芳的勾结，并以“反共”、“讨赤”相号召，组织所谓“民治党”。1927年初，北伐军席卷了半个中国，眼看着滇系军阀唐继尧的统治行将崩溃时，唐继尧的老部下，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突于2月6日举行“兵谏”，联合发出通电，指责唐继尧“全面独裁，势同专制”。四镇守使联合举兵，进逼昆明。唐继尧见大势已去，被迫允诺交出政权，解散民治党。这就是昆明“二六”政变。四镇守使推胡若愚为重新组织的省务委员会的主席，“拥戴”唐继尧为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26]。

“二六”政变后，唐继尧“愤懑吐血，偃卧月余”，于1927年5月23日在昆明不治身死。

---

(1) 据唐继尧的亲属说，唐继尧中秀才时十八岁，但有关唐继尧的各种传记均记为十五岁。

(2)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民国十四年一月版，第1—2页。

(3) 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民国六年二月版，第11页。

(4) 郭燮熙编纂，蔡锷订正：《援黔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章），载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613页。

(5)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169页。

(6) 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民国六年云南图书馆发行，第8页。

(7) 唐继绕派兵入川的《誓师词》，见《会泽督黔文牍》杂文第28页，云南督军署秘书厅1920年版。

(8) 马伯周：《叶荃生平述闻》，云南大学历史系油印稿。据叶荃的儿子叶苍绿说，“二次革命”结束以后，叶荃以攻熊之役虽系奉唐继尧之命令，但终以违反“二次革命”的宗旨，耿耿于怀。

(9) 《唐继尧》，第20页。

(10) 吴乾就：《从政治立场评价唐继尧》，《学术研究》1961年第5期，第14页。

(11) 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民国三十五年版，第30页。

(12)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松坡学会1926年版。

(13) 邓之诚：《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民国二十四年）。

(14) 原电稿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卷宗号四三九（2）560。原件底稿批注：“此电已于23日午后十一时拍去。”后来报刊记载，说是限二十四时答复，实应是限25日上午十时答复。又《会泽首义文牍》（民国六年六月版）所收的这个电报，也是说限25日上午十时答复。

(15) 蔡锷：《致唐继尧等皓戌电》（1916年7月19日），《松坡军中遗墨》。

(16) 唐继尧在徐之琛密电（1917年9月12日）上的批语，见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3—764，第70—75页。

(17) 唐继尧、周钟岳在孙中山电文上的批语，见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3—1311，第250—261页。

(18) 《承领军府总裁电》，《会泽靖国文牍》，卷五，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厅编，民国十二年昆明版，第9页。

(19) 唐继尧以七省、八省或十省联军总司令自命，说法不一。这里根据《唐继尧》一书第二十二章记载归纳。

(20) 谢本书：《“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谈新发现的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军事密约》，《光明日报》1964年3月12日。

(21) 魏家猷：《唐会泽言行录》，云南官印局印，民国十二年五月版，第14—15页。

(22) 唐继尧在向文甲函（1917年12月19日）上的批语，见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3—762，第135页。

(23) 唐继尧在李烈钧电报（1917年12月6日）上的批语，见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3—762，第124—125页。

(24) 《唐继尧就副元帅之皓电》（1925年3月19日），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下册，上海文明书局1929年版。

(25) 吴乾就：《再论唐继尧的政治立场》，《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第37页。

(26)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龚自知：《龙云夺取云南政权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3年版。

唐群英

罗绍志

唐群英，字希陶，册名恭懿。1871年12月8日（清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南衡山。其父唐星照，清末提督。他共有二子四女，唐群英系第三女。

唐群英自幼聪慧好学，稍长能诗善文。十五岁时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等佳句，被塾师批谓“女文而有男性”[(1)]。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病逝。次年，她从母命嫁到毗邻的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与曾国藩的堂弟曾国纲结婚。1897年，她丈夫去世，独生女也夭折。在曾家的日子里，唐群英结识了秋瑾及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

1904年春，唐群英赴日本学习，寻求救国之道。在日本，她先入青山实践女校，与秋瑾同学，两年后，考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湖南当局嘉其成绩，把她改为官费生。她因才华出众，深得校长山根正次及老师水谷直孝、宫田修等器重。

在东京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等湘籍志士。1905年春，她胞弟唐乾一也抵日。5月，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姊弟俩同入华兴会。7月，黄兴介绍她会见了孙中山。8月20日，华兴会、兴中会等革命团体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起初，华兴会会员在讨论是否加入同盟会时，有些人不赞成，她的弟弟唐乾一便是其中之一[(2)]，唐群英坚决赞同加入，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她年岁较大，是当时同盟会里有名的“唐大姐”。

唐群英加入同盟会后，积极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与秋瑾等在横滨学习制造炸弹，带头参加抗议日本当局“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罢课斗争。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当时经费困难，她与

秋瑾节衣缩食，各捐银二百元。1906年10月，湖南留学生筹办的《洞庭波》在日创刊，她利用课余时间为该刊撰稿、组稿。“霾云瘴雾苦经年，侠气豪情鼓大千。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就是她发表在创刊号的八首绝句之一。

1907年底，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是年7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在与唐群英话别时，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3)] 1908年春，唐群英返湘后，即按照中山先生的部署，与陈荆（即陈癫）、张汉英等在湘、赣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10年春，她再次赴日，入音乐专科，开展学生运动，组织留日女学生会，初任书记，后改任会长。次年4月，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亲任主编，动员女界投身革命斗争。8月，经傅屯艮等介绍加入南社。9月上旬，奉命回国，在上海与张昭汉等发起成立上海女界协赞会。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同月下旬在上海与张汉英组织女子后援会任会长，一面派人到各省为民军筹款，一面组织北伐军救护队，“随赴战地，医救受伤兵士”[(4)]。随后，又在湖北组建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率队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是当时有名的“双枪女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她与张昭汉、程颖、陈鸿璧四人，作为女界协赞会代表，受到孙中山接见，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章[(5)]。

民国建立后，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各地妇女纷纷组团设会。当时，除唐群英、张汉英发起的女子后援会外，还有林宗素、沈佩贞、吴木兰等在上海发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以及王昌国在湖南长沙发起的女国民会等，致力于女子参政活动。1912年2月20日，唐群英联络五个女子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组织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6)]。

此后，围绕女子参政问题，唐群英等同参议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唐群英认为“女子参政为民国所必需”，“须从根本上要求解决”[(7)]，上书

参议院，提出“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8]。参议院19日开会讨论时，竟以“事件重大，应候国会成立，再行解决”[9]为辞，予以推诿。妇女界群情忿激，孙中山闻讯，深感不安，20日，晤见唐群英，嘱坚持忍耐，不可采用暴烈行动，唐群英即与蔡蕙等分头疏导。21日，议院开会，唐群英率女界代表二十余人到会旁听，被门卫阻拦，她们推开门卫拥入，唐群英发言后因事离场。有议员发言有辱女性，沈佩贞等提出质问，发展成部分议员与女代表之争执，被哄传为“大闹参议院事件”。

3月22日，唐群英与蔡蕙晋谒孙中山，面陈事件真相，并再次提出女子参政的要求，请其敦促参议院修正《临时约法草案》。孙中山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并热情给予鼓励，说只要坚持不懈，据理力争，将来定能达到目的。在孙中山的认同和支持下，女子参政同盟会于4月8日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选为会长，会上通过了由她主持起草的十一条政纲，并选举张汉英、林复、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徐素贞、蔡蕙、李芝等八人分管总务、交际、政事、实业、教育、财政、审查、文事八部事务。会后向全国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会致各省都督等电》，声明对南京参议院所颁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10]。

临时政府北迁后，唐群英不顾袁世凯的阻挠，于5月与王昌国等“联袂北上”，联络北方女界，继续力争女子参政权利。是年7月，她获悉参议院拟定国会选举法中，没有规定女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认为“此乃切肤之利害”，必“出死力以争之”，便与北京女子参政团“筹商对付办法”[11]。8月10日，以女子联合会名义，再次上书参议院，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并颁布实行。然《女子选举法》未经讨论便被参议院否决。12月9日，唐声色俱厉地与议长吴景濂辩论，声言如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

同时，唐群英还领导女子参政同盟会开展反对同盟会抛弃“男女平权”的斗争。在8月14日同盟会本部召开改组为国民党的酝酿会上，她质问主持人宋教仁：“此次同盟会合并，何以不知会女会员，擅由一般男会员作主？且合并之后，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她声明“此等合并，吾辈女会员绝不承认”[(12)]。当天晚上，她召集同盟会女会员紧急会议，决定致电同盟会各省支部女会员，“迅筹对待办法”。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新的党章仍无“男女平权”条文，到会女同盟会员一致抗议，群情激愤，唐群英在盛怒之下，打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记耳光。会后，她又为女子参政同盟会起草“驳诘同盟会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于9月1日召开女界联合会，号召女界“切勿动摇”，要继续努力“必达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13)]。

对于唐群英倡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孙中山虽极力支持，但由于社会上和党内重重压力，亦爱莫能助。他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结束时解释说：“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时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日。……但现在国势危急，当先设法巩固政府。盖有国家，不患无平权之一日。”[(14)] 9月2日，孙中山又致函唐群英等，指出“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孙中山认为“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他向唐群英等建言“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15)]。

孙中山的劝告，对唐群英的启示很大。她深深感到：女子参政在“理想上有莫大之希望，事实上未免有暂时之让步”[(16)]。为了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唐群英决定暂时放弃党内的女权之争，共同对付袁世凯。于是在北京创办“中央女学校”和“女子工艺厂”，筹办“南洋女子法

政大学”，发表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得到宋教仁、唐绍仪等的大力支持。为了“扩张势力”，还于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其他各地分设支部。由唐群英任总理，继识一、王昌国任协理。紧接着，在北京创刊《女子白话报》和《亚东丛报》，主持复刊《神州女报》，一方面揭露袁世凯的复辟阴谋，一方面继续宣扬女权。

为了加强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地方的发展，唐群英于1912年12月中旬回到长沙。在她的推动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会员达八百人，唐群英兼任支部长。湖南支部一建立，唐就与张汉英等多方奔走，建立“秋瑾烈士祠”，领导了反对《长沙日报》攻击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斗争。创办了《女权日报》，宣传男女平权和女子参政，相继创办“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和筹办“女子法政大学”以提高女界的学识和实业能力。随后，唐群英还为政府推荐一批女学生赴日留学，并领导了反对女国民会强占秋瑾烈士祠的斗争，在湖南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后，于11月13日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等，禁止《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银洋一万元通缉唐群英。自此，全国性的女子参政活动被迫停止。

1916年2月，唐群英在长沙发动女界开展讨袁运动，在一次声讨会上，险遭袁世凯的爪牙围捕。此后，唐群英一直从事女子教育，先后在衡山、长沙等地创办白果红茶亭女校、衡山女校、长沙复陶女子中学、岳北女子实业学校和一所云在庐课堂。

1924年6月9日，湖南女界联合会在复陶女校举行恢复成立大会，公推唐群英为会议主席。代表们纷纷演说：“以后如有再轻视女子，蹂躏女权者，当效唐群英先生打宋教仁的法子来打一打，看他们怕不怕。”[(17)] 会上，唐群英当选副主任。

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长沙时，唐群英组织复陶女校师生、长沙市妇女数千人夹道欢迎。

唐群英为女子教育事业奔波，以至家业耗尽，负债累累。1935年5月，老同盟会员张继、覃振、仇鳌等电邀她去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次年因病回故里，1937年6月3日病逝。

---

(1) 唐乾一：《又征文事略》，未刊稿，存唐群英抚子唐遂九手。

(2) 子虚子（唐乾一）：《湘事记》1914年6月10日，北京正蒙印书局1914年版。

(3) 曾昭桓：《辛亥革命女战士唐群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癫，即陈树人，湘籍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好友。

(4) 《女子后援会简章》，《时报》1911年12月7日。

(5) 《衡山治平晋昌唐氏七修族谱》。

(6) 《民声日报》1912年4月12日。

(7) 徐辉琪：《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8) 《时报》1912年2月20日。

(9) 《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第4页。

(10) 《民声日报》1912年4月12日。

(11) 《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稿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5页。

(12) 上海《大公报》第3604期。

(13) 《平民日报》1912年9月7日。

(14) 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1912年8月25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9—410页。

(15) 孙文：《复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8页。

(16) 《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民国新闻》1912年9月4—13日。

(17) 《女界联合会恢复矣》，《大公报》（湖南）1924年6月10日。

唐绍仪

郑则民

唐绍仪，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市）人。生于1862年1月2日（清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1)]。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矿务局总办。

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经清政府选派，由容闳带领到美国留学，经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共留美七年。1881年被召回国，改派至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当时袁世凯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对唐十分赏识，调唐任西文翻译，接着兼任办理龙山商务委员。1894年7月，袁请内调，委唐代理其驻朝鲜的职务。

1895年，唐随袁世凯至小站练兵，和徐世昌一起经管学务处。其后，袁任山东巡抚，唐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和商务。1901年冬，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特荐唐绍仪为津海关道。

1904年，英国加紧侵略中国西藏地方，引起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年9月，清政府派唐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同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条约。他力图改变英国与西藏地方当局擅自签订的、非法的《拉萨条约》。经过两年的交涉，与英国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虽允许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有关商埠的权利，但使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2)]。随后，他被授为外务部右侍郎，参加中日、中俄关于我国东北问题的交涉。

1906年，唐绍仪出任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1907年，清政府改革东三省官制，设总督、巡抚。唐出任奉天巡抚，仍致力于东三省的对外交涉。他曾大胆设想，依赖美国等修建东北“新（民）法（库）铁路”和设立“东三省银行”来与日本扩张势力相抗衡，但在日本干预下设想落空。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清政府。唐绍仪被派为“致谢”专使，赴美活动。回国后于1910年一度任邮传部尚书。

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唐绍仪充当袁内阁的全权代表，于1911年12月18日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议和。首先达成了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的停战协定。

唐绍仪认为他的主要使命在于运用妥协手段，使南方确认袁世凯的地位。在谈判中，面对南方代表坚持必须承认共和的主张，他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的折中方案[(3)]，中经英国公使等穿针引线，又经过双方多次密谈，初步达成协议。正在这时，孙中山自美归国，南方十七省代表迅速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闻讯，非常忌恨，策动唐绍仪于1月2日辞去全权代表职务，由袁亲自出面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立即对南方革命党人施加政治、军事的压力。但同时，袁又授意唐绍仪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孙中山的辞职和以袁继任的各项问题。最后由于南方一再让步而达成协议。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提名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唐为了取得支持，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实行政党内阁的心理，表示愿意加入同盟会。

1912年3月25日，唐绍仪到南京组织新内阁，30日，经蔡元培、黄兴介绍，由孙中山主盟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唐加入同盟会后，思想感情有显著变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倾向南方，多次致电与袁磋商。经过几番周折之后，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

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不久由施肇基担任）。这个内阁当时曾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从数量上说内阁的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而军、政、财实权则由北洋派掌握。在内阁之上设总统府握有实权，但北迁后的参议院里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内阁，处于不稳定状态。

唐绍仪力图推行他的“责任内阁制”，而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则要求大权独揽。从内阁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4月20日，唐绍仪与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次日在总统府由唐主持内阁第一次会议，宣告内阁成立。在内阁成立之初，唐绍仪仍希望振作精神，在任内做一番事业。但当袁世凯看到唐绍仪对他不甘驯服的时候，便联合当时拥袁的共和党人，向他刁难和胁迫。终于以王芝祥的改委事件为导火线，造成内阁更迭。6月15日，袁公然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擅自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慰使，冯国璋为直隶总督。唐因此感到难堪，便于当天提出辞呈，愤而赴津，27日获准辞国务总理职。

唐绍仪离京后，在天津稍事逗留，便南下上海。过了一段时间寓公生活。1914年，他出面邀请一批绅商朋僚，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集资额达一百万元。其中设有董事会、经理部、总务部、出纳部、交际部等，唐被推为董事长，同乡富商兼政客卢信任总经理。列名为该公司股东的包括当时副总统黎元洪、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等。“洪宪”帝制发生时，唐绍仪约集在上海的蔡元培、汪精卫联名“率先向世凯严厉警告，使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电文抬头称袁世凯为“慰廷先生”，公开在国内各报上登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4)]。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一度声称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曾任命唐绍仪为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唐拟北上就职，行至天津，获悉张勋等军阀联名通电反

对，于是便毅然南返。

1917年春夏间，北京政府内部发生了以美、日两国势力为背景的“府院之争”，引出了解散国会、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到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也南下参加，于9月11日被孙中山任命为财政总长。次年5月，军政府中的桂系军阀排斥孙中山，取消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唐任总裁之一兼财政部长。由于桂系军阀推行“以粤养桂”的政策，大肆掠夺广东人民及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倒行逆施，促使唐绍仪逐渐同桂系分离，在政治上同孙中山趋向一致。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和平热潮，南、北政府酝酿举行和谈。护法国会参、众议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等发电推荐唐绍仪为南方出席和议的总代表。唐绍仪依赖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支持为南方代表借筹了一笔经费，促使和议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举行。唐绍仪充当南方军政府总代表，北京政府总代表为朱启钤。双方表面上就恢复国会等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为划分地盘、争夺权力而争吵不休，到五四运动发生后，以毫无结果而中断。

1920年6月，孙中山、伍廷芳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唐绍仪在上海也参加。接着粤军把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他随孙中山等回广州恢复军政府。这时唐认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难于实现，不愿支持，没有继续任职。此后，退居家乡。1922年夏，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复任总统，8月5日，发表唐绍仪组阁的任命，因有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的阻挠，唐“不愿出山”。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唐采取沉默态度，闭门不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聘唐为高级顾问，他也没有前往就职。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唐绍仪应邀参加，担任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当年冬，唐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

员。1932年1月，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唐任常务委员。3月，唐兼任中山县县长。后因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争夺政治权力和该县的收益，陈济棠策动了中山县的“倒唐”事件。1934年10月，县兵“哗变”，以索饷为名包围唐的寓所，迫使他离开中山县，重返上海。1936年，唐绍仪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两机关，帮了蒋介石的忙，后因蒋没有给以相应的报答，对蒋不满。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南京后，企图拼凑一个统率南北的伪政权，把南方的唐绍仪、北方的吴佩孚作为重要争取对象，有所谓“南唐北吴”之称。日本方面曾多次派人与唐绍仪接触，企图说动唐绍仪出山充当傀儡，但唐并未答应日方要他出任伪职的要求。

在日本拉拢唐充当傀儡的同时，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也不断对唐笼络，不仅防止他为敌所用，还曾指令他利用与日方接触的机会，探听同日本议和的条件。1938年4月，唐绍仪的旧友罗家衡受吴铁城等人之托由广东到上海，劝说唐保全晚节，为国民党效力。罗在上海活动后到武汉，受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赞赏。随后罗发密函告唐说：“中央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5)] 又有材料说：5月初，章士钊“在汉受中央之嘱，专事来沪探讨唐少川意旨，并影响唐在中央领导下一致对日。故章到沪后，仅与唐晤面两度即返港也”[(6)]。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1938年7月5日给唐绍仪的复信，其中表示对唐“个人关于展开达成体面和平的谈判的建议表示欣赏”。孔还明确表达如下意向：“在我看来，两种方式可以尝试一下，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通过你的斡旋，你是否可非正式地把日方关于实现体面和平的看法和条件通知我们，显然我们必须先知道日方是否有消除敌对状态的愿望；同时，消除敌对状态必须以高层领导人，最好是文官出面。同时，起来催促各自政府进行和平谈判。”[(7)]

就在上述信件发出两个月后，唐绍仪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进行接触，社会上有所传言并产生了重重的疑云。1938年9月30日，潜伏

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奉命”策划刺唐行动，由谢志磐等三人假装送古董为名，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毙于其家中，并声称为“锄奸”行动。事件发生后，重庆国民政府并没有掌握唐绍仪投敌的真凭实据，为了掩人耳目，当局正式颁发《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认为唐“近年养病沪滨，于国事多所献赞”。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8]。蒋介石、孔祥熙等也发电表示“极惋悼”之意。

---

(1) 唐绍仪的出生时间，有关传记、辞条通称1860年，现经查证，应为1862年1月2日（清同治辛酉年十二月初三）。见《上海时报》1938年10月1日，又见张晓辉：《唐绍仪出生年月考》，《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315页。

(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45—348页。

(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4) 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2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02—303页。

(5)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5月20日），见郑会欣：《唐绍仪被日蒋争夺及被刺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74页。

(6)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5月20日），见郑会欣：《唐绍仪被日蒋争夺及被刺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74页。

(7) 《孔祥熙给唐绍仪的复信》（1938年7月5日），唐绍仪亲属保存的信件。

(8) 《大美日报》1938年10月3日。

唐生智

李静之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1889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生。祖父唐本有曾任广西提督。父亲唐承绪，在东安办过天锡矿冶公司，在湘西管过盐卡。唐生智1907年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继入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和保定入伍生队学习。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任见习军官、代理排长、代理连长，参加过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7月在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任营长。经过湘南独立战争和援鄂之役，次第升为第三团团长、第二旅旅长。当时，湖南内部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明争暗斗，1923年8月发生谭赵战争，唐参加赵的“护宪军”，击败了谭派蔡巨猷部。11月底，谭延闿率领一部分队伍退往广东。赵把留在湖南的湘军整编成四个师，唐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移驻衡阳。

唐生智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未及三年，将队伍扩充到号称五万人枪，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此时，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向他学佛。唐即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令官兵一律摩顶受戒为佛教徒，佩带“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的革命浪潮迅速波及湖南。唐生智去洛阳会见吴佩孚，了解吴对湖南的意图。同时，又派人前往广西和广东，窥测南方形势。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赵运动，唐生智加入了驱赵行列，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一面派代表见吴佩孚，请吴谅解他去赵的“苦衷”。赵恒惕于3月12日通电辞职，委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代理省长。唐于25日在长沙就代省长职，并派兵占领了岳州。广州国民政府即派

陈铭枢、白崇禧同他联系，共产党湖南省委也对他做争取工作。他表示拥护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

4月，吴佩孚以援赵为名，驱军南下，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向唐军反击。唐军在湘北失利，5月1日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吴佩孚又派兵助叶，遣兵力占领湘潭、宁乡、醴陵等地，衡阳处在包围之中。唐急电请广西派兵入湘。李宗仁令钟祖培旅兼程于5月初赶到衡阳，与唐部合力反攻。广州国民政府亦决定提前北伐，5月下旬，派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李宗仁部进入湘南增援，唐部转取攻势，成为北伐战争的序幕。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职务。7月初，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以第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迅速占领了长沙。唐到长沙后，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成立省政府，率全军宣誓加入国民党。鉴于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对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持，他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容许开展工农运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8月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唐被选为执行委员。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先攻取武汉，然后向长江下游发展。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统率第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8月底，先后突破汀泗桥、贺胜桥，9月上旬攻占汉口、汉阳，10月10日攻克武昌。第四、第七两军随即转入江西战场，第八军则留驻两湖整训。1927年初，唐生智担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负责巩固武汉，俟机进攻河南。他辖有由第四军扩编的第十一军、第四军及由第八军扩编的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等军，实际上控制了武汉的军事大权。在政治态度上，他对共产党表示友善，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

其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至武汉，但是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他把总司令部迁至南昌。12月13日，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开展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唐生智站在武汉反蒋阵线一边，以军事实力支持武汉革命政权，被推为“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1927年2月，被增选为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唐生智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所辖之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清党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局面。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下令通缉，唐生智极力主张东征讨蒋。时因奉系进兵河南，武汉政府决定先进行北伐。唐生智率领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六军及贺龙独立第十五师等部约六万人北上，于5月底将奉军逐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

正当武汉政府挥师北伐的时候，驻湖北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于5月17日叛变，企图袭取武汉。接着驻长沙的何键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进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部、省党校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时两湖地区的反动气焰极其嚣张。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左派面具，发布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这时，唐生智怕激起两湖人民暴动，无法控制局面，于24日从河南前线电代理湖南省主席张翼鹏，指示驻湖南各军不许再有任何行动，要他们发还收缴工农武装的枪支。他还公开演说，表示拥共反蒋，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对“马日事变”“派员查明处理”[(1)]，并因许克祥是他的部下而自请处分。但是，25日，他又电令湖南省党部、省政府，严惩“侵扰”军人家属财产的“暴徒”，派副军长叶琪、周斓回湘“镇慑”[(2)]。26日，唐生智回湘。他一面继续表示遵守三大政策，解散了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救党委员会”；一面又指

责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应即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以“激于义愤”，从轻处理[3]。不久，唐返回武汉，仍遥领湘政，以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代行省主席职权。

同月，唐生智所部从郑州回师武汉后，武汉政府将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任命唐为总司令兼该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军；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及暂编第二十军，东征讨蒋，进攻南京。蒋介石立即将鲁南前方的第七军调到安庆、芜湖间迎堵，宁汉交兵迫在眉睫。就在这时，卫戍武汉的李品仙第八军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何键第三十五军占领了总工会和重要行业工会的房屋，气势汹汹。6月29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4]，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为共产党东征。”[5]唐则表示“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但又说“无奈这些赳赳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最好还是CP顾全大局，自动地解决这个难题”[6]。他又公开提出，愿送在武汉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出洋考察”。由于汪精卫等在武汉加紧准备“分共”，东征被搁置起来。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唐生智也背弃“拥护三大政策”的诺言，并于7月29日出席庐山“分共”会议。8月13日，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东征讨蒋失去借口，宁汉对立局面表面有所缓和；但是，唐生智坐拥重兵，以两湖为根据地，仍全力向长江下游发展。8月中旬，特派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进窥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等联名电请武汉方面中止东下之师，迎汪精卫、谭延闿等到南京，协商宁汉“统一”。8月下旬，汪等到南京。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取得暂时妥协，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唐生智被推为特委会委员；但是，汪精卫、唐生智等未能取得党政实权，于是唐借口特

别委员会为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于9月21日返回武汉，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对峙。10月初，南京方面再派代表与汪精卫磋商合作，但宁方所提条件为唐生智所拒。南京政府于20日以“通敌叛党”罪名免唐生智本兼各职。24日，特委会又决议永远开除唐的党籍，解除其党内一切职务。11月初，南京政府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三、四、五路总指挥，率领西征军进行讨伐。同时，冯玉祥部樊钟秀、方振武等由鄂北挺进，鲁涤平由宜昌顺流东下，李福林、方鼎英、范石生等从广东进兵湖南。唐生智四面受敌，不得不在11月12日通电下野，当晚离开武汉前往日本。唐军大部被编归桂系统辖，在继续北伐奉军时由白崇禧率领进驻唐山、开平一带。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派人到白崇禧军中收买李品仙等人倒戈；一面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要他接掌旧部。唐生智立即启程赴开平回到他的部队，4月5日，在北平通电就任蒋所委的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职，为蒋击败桂系立了功。

5月，冯玉祥亲赴山西拉阎锡山反蒋介石，李宗仁也在广西打出“护党救国军”旗号，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反蒋。蒋介石对唐生智很不放心，遂于6月1日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兼编遣会议编组部主任，要他到南京任职。唐见形势不利，随即通电讨冯。10月，蒋冯战争正式爆发。蒋介石派唐赴河南前线指挥。唐非常卖力，替蒋扭转了战局，受到蒋的传令嘉奖。11月，冯军败退，蒋亲到郑州车站慰问唐生智，礼遇极隆，并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归他指挥。

尽管如此，唐生智仍在暗中与各方进行反蒋洽谈。12月3日，与冯军达成一致倒蒋的谅解，同日，安徽省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在浦口异动，以图进攻南京。唐随即在郑州通电反蒋，沿平汉路南下，将主力集结在驻马店一带。12月20日，唐电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索让武汉。蒋介石下令褫唐本兼各职，通缉法办，调刘峙北上讨唐。27日，唐对蒋军发起总攻，被阻于遂平、确山间。蒋部新编第十

四师师长杨虎城又袭击和占领了驻马店，使唐受到致命的打击。与唐同时酝酿反蒋的阎锡山，这时为蒋收买，赴郑州以陆海空军副司令指挥讨唐军事，南下夹击唐军。唐的反蒋战争不到一月便遭惨败，他只好在1930年1月9日通电下野，化装逃到天津，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

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粤方四监委借口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发表通电公开弹劾蒋介石，唐生智通电响应。5月27日，各派反蒋力量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建了反蒋的国民党政府。唐被推为广州国民党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协议统一，于1932年元旦组建了“统一合作”政府，唐生智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但已没有兵权。1934年12月，唐被调任训练总监部总监，留居南京。1935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陆军上将。以后，他又担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第一厅主任，仍兼训练总监部总监。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时，他以执行部主任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等事宜。

11月，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危急。蒋介石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7)]。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他奉蒋介石的命令仓皇撤退，军民损失惨重。南京撤退后，唐生智避居湖南，在家乡东安创办耀祥书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耀祥中学），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等。1939年，蒋介石派他做军事委员会运输总监，不久，他辞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唐挂着军事委员会委员头衔，闲居于重庆、东安两地。由于他两次反蒋，蒋对他颇有戒心，在东安和重庆都派有宪兵“保护”。他对蒋也小心戒备，怕遭暗算。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思想彷徨，带领全家仍回东安办学。这时，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乡居期间，对人民的疾苦有所感受，促使他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

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唐生智看到内战没有出路，曾于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停战言和，予民休息。他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在野各党派人士和学者名流中，做了一些谋求和平的工作，并和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人员有过接触。

1949年4月，湖南省主席程潜迎唐生智到长沙共商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大计。唐于月末到达后，发出湖南人民应该团结自救的呼吁，并担任湖南各界人士组织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唐为团结湖南地方势力，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5月，白崇禧从武汉败退窜湘，疯狂镇压湖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运动。唐生智于5月24日返回东安原籍。这时，共产党湖南地下组织也派人到东安，继续对唐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唐联络道县、零陵等地的地方部队，袭扰湘桂路，阻拦白崇禧部队退守广西，并对桂系部队进行策反。白崇禧派李品仙对他进行威胁利诱，他不为所动。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高级将领三十八人的起义通电。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的响应通电，并吁请西南、西北迅速采取一致行动。5日，长沙和平解放，唐生智担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

全国解放后，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二、三届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肠癌在长沙逝世。

---

(1) 《湖南军农工冲突事件》，《国闻周报》第4卷第23期。

(2) 《湖南军农工冲突事件》，《国闻周报》第4卷第23期；《申报》1927年6月4日。

(3) 1927年6月26日唐生智致武汉中央“宥电”，见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第351页。

(4) 《武汉反共之重要文件》，《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

(5)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著，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88页。

(6)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著，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7—88页。

(7)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唐拾义

汪仁泽

唐拾义，名振之，字拾义，以字行。1874年7月26日（清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出生于广东三水白泥布。父亲在家乡卢包镇经营商业。

唐拾义青年时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1912年起在广州华林街开设医馆。当时西医、西药刚在我国兴起，他挂牌专治喘咳症，医名日渐传扬。医务之余，兼制久咳丸、哮喘丸发售。该两种药丸，服用方便，易藏易带，对咳喘有一定缓解作用，销路渐广。唐善于宣传，常在报端刊登大幅广告；又善于猎名，药名前皆冠以“唐拾义”三个字，出诊时乘坐的肩舆也饰有“唐拾义大医师”标志，以收广告之效。初期他上午在家中前屋设医馆诊病，下午或出诊，或在后屋监制药丸。他不雇用职工，由家庭成员利用简单的工具手工操作，揉搓制成丸药销售。不久销量渐增，原址不敷应用，遂迁至下九路扩展诊所及制药工场，添雇亲友及临时工、童工，自任药厂经理，由其长子即开业医师唐太平为副经理，称“唐拾义父子制药厂”。

1919年，唐拾义赴沪设立诊所。初时人地生疏，为扬名起见，在报端刊一广告，诡称来沪途中走失爱犬一头，悬重赏一百元寻找，藉此自抬身价。1924年起，唐拾义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开设沪厂。初时规模不大，产量有限，后因沪地交通便利，商贾四集，销路逐渐打开，营业额超过了粤厂。此后，唐又陆续在天津、香港、汉口等地设立分厂，在上海成立了总管理机构，并在广州增设旁支机构“增寿堂”药房，经销产品。

唐拾义经营制药业日益发展，乃逐步革新生产设备，沪、粤两厂

从1931年起使用新式制药丸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产量随之激增。是年粤厂另迁新址，翻造新式楼房，雇用职工增至一二百人。由于久咳丸和哮喘丸的销路在秋冬为旺季，春夏为淡季，为求药厂生产均衡和扩大营业范围，唐先后又研制新药疟疾丸、疳积散，也都冠以“唐拾义”为记，以老药带销新药，销路也逐步打开。疟疾丸因采取薄利多销的方针，远销西北、西南、东北各地，销售额不断上升，沪厂仅该药一种，旺销时一年约可获利二十万元。唐拾义为保持其高额利润，对制剂配方严格保密，非亲信人员不得过问。

唐拾义药厂的产品主要销往农村。他以“名医处方监制”、“货真价实”、“疗效显著”相招徕，根据各地邮局所征集到的药店、药房、代销店的街道门牌和字号名称，寄发各种宣传品，然后通过邮寄，委托代售。唐厂联系的字号，遍及穷乡僻壤，数以万计。他还在车站、码头竖立广告牌，在各大城镇粉刷墙头广告。又随时令季节赠送扇子、日历、年画。在久咳丸、哮喘丸的药盒内附有“验真券”，集满若干张，可向代售店换取赠品等等。当时国内同类成药竞争者甚多，但唐厂产品由于药效较好，宣传得法，因此始终保持畅销地位，销路远及东南亚一带。唐厂的药丸还同同类的进口西药竞销，起了一定的抵制外货作用。止咳药如日货重松药房的止咳药水、欧美的科发白松糖浆、屈臣氏咳嗽药水等，但都是药水，西药味重，携带不便，仅治一般伤风咳嗽。疟疾丸同类进口药品有疟涤平、百乐君、扑疟母星等，但价格较高，且无中文说明，不易为农村所接受，仅供西医处方使用。爪哇的糖衣奎宁丸和唐家疟疾丸，同样是奎宁制剂，前者价格较疟疾丸便宜，销路也已打开，但后来有大量赝品在市场上混售，真假难分，以致影响该药信誉，反有利于唐拾义疟疾丸的竞销。

唐拾义鉴于药丸的某些主药加的盐酸麻黄素、山道年等，需仰赖国外进口，曾设厂沪西，试行提炼麻黄素及驱虫中药使君子的有效成分，以替代进口原料，后因战争影响而中断。

唐拾义素以“良药济世、半慈善性质”为标榜，实则所售药品本轻

利重，获利甚巨。即以疟疾丸而言，毛利率达60%以上，而久咳丸及哮喘丸则高达80%。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唐拾义已积资成为百万巨富，购进沪地北海路吴宫饭店，以及爱多亚路、虞洽卿路（今西藏路）西北角一带、广西路、牛庄路沿街门面等房地产多处。他还投资大三元粤菜馆，为大股东，并任董事。

唐厂职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以上，星期日和节假日亦不放假，而于每年年终一次补发星期和节假期间的工资，全年全勤职工另加发十天工资。为使职工能长期在唐厂安心工作，唐拾义规定职工工作每满十年，加发工资一年，以资鼓励。每逢年关，唐对得力职工另以私人名义发给金额不等的红包年奖。

1939年9月20日，唐拾义因脑溢血在沪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郑世农：《关于唐拾义药厂的几点回忆》。

黄中业：《唐拾义药厂简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1965年版。

访问唐志寿先生记录稿。

唐文治

毕苑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1865年12月3日（清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苏太仓州镇洋县后岳王市。唐文治自幼家教严谨，六岁启蒙，逐年读《孟子》、《诗经》等经典，因恒月读书致目力受损。后受业于王祖畬门下，初识理学门径，1882年中试举人。1884年黄体芳设南菁书院于江阴，提倡朴学，次年唐应试获取超等，受业于院长、经学大师黄以周门下。此后数年间治《易》，编《茹经堂文集》，并协助接任院长的王先谦校勘《续皇清经解》。

1892年春中进士，房师沈曾桐，座师翁同龢。殿试朝考毕，签分户部江西司，并为翁延至其宅教授子弟。1894年翁同龢掌军机，甲午战争爆发，唐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的“万言疏稿”，深得翁同龢、沈曾植赞叹，在京中传诵一时。1895年中、日议和，日本强割台湾并索要巨额赔款，唐文治与同乡举人汪仲虎谋议上书，并代拟《上察院呈》，力主拒签辱国条约。马关议和成，日本侵占台湾，唐文治“痛心曷极”。是年调任户部云南司帮主稿，得以熟悉滇省财政，兼漕务、仓务诸事。1896年阅各国条约事务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及曾纪泽、黎庶昌等人文集，于经世之学粗得门径。1897年奉派为户部则例馆纂修官，辑成《漕运门》八卷。1898年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深得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的器重。1899年日、俄、意等分别索要福建鼓浪屿、山东庙岛群岛、浙江三门湾，唐文治随总理衙门大臣徐昶、许景澄参与谈判，负责记录问答诸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议和全权大臣，与英、法等国议和，唐文治随同办理条约文件。1901年随同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是年冬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唐文治补外务部榷算司主事。1902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改约，葡萄牙大使欲将大孤、小孤诸岛划入澳门

版图而归葡国管辖，外务部颇感棘手，唐文治闻讯后告知外务部官员援引公法据理力争，遂使葡门阴谋落空。是年3月，随同载振赴英参加英国新君加冕庆典，并随访欧、美诸国及日本。在日本，唐文治与时在日考察学务的吴汝纶不期而遇，多次畅谈古文源流及曾国藩行谊宗旨。

1903年商部成立，载振为尚书，徐世昌与唐文治分任左、右丞，参与制定商政宗旨，拟定《商部章程折》和《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年底升任商部左丞。唐文治在商部为筹划振兴商务、发展经济之策出力甚多。1904年，唐文治拟定《订立商勋折》和《请拟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并在北京西城设立高等商业学堂；创议在北京、上海两处设立总商会，并草拟《请设立商会折》。1905年，支持地方商人办理葡萄酒公司、潮汕铁路和福州银行等事务；批准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仪器馆立案；奏请在正阳门外设立劝工场、将西直门外三贝子废园改为农事试验场；与严修联手援助濒于危境的湖南明德学堂，以商部名义为该校拨款拨地。同年，唐文治上《请设立勘矿总公司以保主权折》、《请筹拨勘矿总公司官股片》、《请改定官制折》等，建议改革官制，以革事权不一之弊；拟奏《请立宪折》，呈请立宪；草拟《兴办东三省要政奏稿》，以免东三省沦为“朝鲜、埃及之续”。1906年，唐文治在北京西城设立绣工科，聘苏州著名刺绣家主持办学，兴办女工；拟奏《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请调用人员设立贮才馆折》、《请派遣学生出洋片》、《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等折，然受多方牵制，事多未成。是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奉旨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年底母逝，借丁忧离开政坛。

1907年8月，唐文治应邮传部尚书陈玉仓之请，就任上海实业学堂监督。1908年将铁道工程班扩充成铁路专科，学制三年，是为我国第一个学校工程专科；重新厘定《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制定《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留学章程》。1909年增设机电专科，是为我国高等学校最早设立的机电专科。1910年在实业学堂设西文

科，在课外为学生开设英、德、法文及拉丁文补习，成立英文会，制定《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英文会章》，要求全校学生一律为会员。唐文治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组织演讲和辩论会，要求学生重视体育课程，并选派学生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体育大会等。1909年，唐文治当选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发起全国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并致函邮传部转咨学部，指出立国之要在教育，主张学堂废弃科举名目奖励，专重科学。1911年受邮传部电派，在吴淞建立商船学校。是年派铁路专科五名学生赴英留学。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伍廷芳等拟请求宣统皇帝逊位电稿，唐文治列名其中。11月江苏独立后，将“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名为“中国南洋大学堂”，改监督为校长；召开全校剪发大会，率领师生剪去发辫。年底，举行大会欢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莅临演说，孙中山于演说中强调中国建筑铁路的重要性，阐述其建筑铁路的构想。1912年辞江苏教育总会会长职，改校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3年重订学校章程，强调以“注重道德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1914年，规定学校附中除国文外，采用西洋原版教科书，课堂讲授亦用英语。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组成六校体育联合会，举办运动会。1915年实行强迫运动，聘请美国体育专家对学生进行专门训练，要求学生必须报名网球、拳术、田径等活动。此外，唐文治还邀请黄炎培、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来校演讲，黄炎培介绍美国旧金山城市之勃兴及美国汽车工业之宏大，吴稚晖论述工业救国的道理。1919年5月，唐文治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当局体谅学生的爱国热忱，并与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等三十余人讨论后，致电北京政府和南京省府，恳请当政者“俯允京校学生之请求”，否则上海各校校长“全体引咎辞职”。1920年，唐文治五十六岁时双目全盲，坚辞南洋校长之职。是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邮电学校等合并为“交通大学”。

1921年，唐文治任交通大学董事，筹设之无锡国学专修馆开馆。次年刊印“十三经”完成，并先后编成《性理学大义》、《政治学大义》。1927年北伐军入苏，国学专修馆被迫解散，改校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唐文治复校长职，聘钱基博为教授。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代表前来学校考察，对学校表示赞佩。1933年前往苏州国学会讲演《论语》、《孟子》及《性理学大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唐文治率领师生雇民船西迁，辗转汉口、长沙、湘乡至桂林，次年6月回返上海。1941年上海交通大学为保护学校不被日伪接管，改名“私立南洋大学”，被聘为董事之一，并对学生表示坚决不与日军妥协。1942年汪伪“教育部”强行接管“私立南洋大学”，派人劝驾就任伪交通大学董事长，并要挟签字，唐文治从容答曰：“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1947年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十老”联名致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对政府调集警力殴打“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深表愤慨，呼吁释放被捕学生，采纳学生诉求。1949年10月，无锡国专改为“中国文学院”，分文学、史地、哲学三个系，唐文治任院长，王璩常为副院长。

1954年5月4日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唐文治：《茹经堂奏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

载振、唐文治：《英轺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74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王桐荪等：《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陶成章

尚明轩

陶成章，字焕卿，笔名汉思、巽言，别号匋耳山人，自称会稽先生。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曾化名起东、志革、何志善等。浙江会稽县（今绍兴）陶堰乡人，生于1878年1月2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父陶正（字品三），因家境衰微，做漆匠为生。

陶成章六岁进陶堰乡义学读书。十五岁时已通读了“四书”、“五经”，并读了一些史地书籍。1893年起，陶成章在家乡设馆任塾师，曾挺身痛击村中欺压农民的土豪某，为乡里群众所赞颂。任塾师期间，逐渐接触到一些新学书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益关心。由于对清政府统治下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不满，陶开始萌发了进行种族革命以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陶曾打算趁混乱时机，刺杀西太后。他先后两次到北京进行活动，未得到下手机会。同年，赴奉天（今辽宁）和内蒙古东、西盟等地，察看形势，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做准备。

1902年春，陶在北京寻找门路谋入陆军学堂，未成功。同年夏，离开北京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清华学校读书，在这期间他与龚宝铨（字味荪）同处一室，两人纵谈时事甚为契合，结为好友。由于陶成章在留学生中倡言革命，为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所察觉，汪诱以爵禄，骗其归国。陶考虑可以趁机掌握权力，便利进行革命，乃允诺回国。及抵北京，汪食前言，并捏造罪名开除其学籍，陶甚为愤怒，立即重返东京。从此，革命的志向益坚，更加积极地在留学生及华侨中进行反清宣传。

1904年初，陶成章自日本归国，抵上海后，参加了中国教育会的活动。他的主要工作是积极地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曾徒步三次潜入金、衢、严、处等府所属之地，组织起义，但均被清政府所侦破而失败。但他愈失败愈振奋，在联络工作中，日行八九十里，经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以致废寝忘食。他曾四过杭州，与会稽只隔一江，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度岁，他答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又说："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1)] 是年8月，联络各地会党的工作略有头绪，他回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等计划于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在湘、鄂、闽、浙等省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他在拟定《新中国军政府檄文》中通俗地解释"怎样叫做革命"，他说："革命就是造反。……《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不过他设想革命成功后的情况是"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从这段话中，流露出的是小生产者主观幻想的平均主义的世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不甚理解。后来由于条件不具备，他所策划的起义未能实现。

同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2)] 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担当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会党工作的责任，他深入各地，打进基层，收效显著，从而使他在会党中享有较大的名望和影响。

1905年9月，陶成章和徐锡麟等为发展革命力量，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陶召集金、处、绍三府所属各县会党首领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并规定，凡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毕业后也仍受学校领导人统辖和节制。大通师范学堂事实上是革命的联络机关。

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同时，陶成章提议革命党人捐官去日本学习

陆军，学成后打进清政府军事系统，掌握军政，以谋“中央革命”。这一倡议得到徐锡麟等的积极赞同。陶捐的是知府，填的是步兵科。徐锡麟、龚宝铨等各捐不同的官职，分填各科。他们办妥捐官和留学手续后，于同年冬季先后去了日本。后来，因清驻日本公使的刁难，不准他们学习陆军学科，计划未能实现。

1906年，陶成章再次从日本回国，积极团结福建、安徽各地的革命志士，进行准备武装革命的活动。不久，秋瑾成立光复军，陶被推举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旋以谋事不密，为清政府侦知，机关被破坏，陶又东渡日本。

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稍后担任留日会员中浙江省分会长，主管浙江留学生入会主盟工作。同年夏，他因徐锡麟在安徽活动卓有成效，便回国到芜湖中学堂任教师，以便就近联系，共同推进革命工作。7月，徐在安庆击杀清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战败被捕，惨遭杀害。不久，秋瑾响应起义，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被捕，也壮烈牺牲。之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他被迫出国，潜赴南洋。再后，他曾参与新加坡《中兴日报》及仰光《光华日报》的笔政，同时在爪哇创办书报社，努力进行革命宣传及联络工作。

陶成章在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兼事撰述工作，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鼓吹种族革命，1904年在日本东京印行，1907年易名《中国民族史》，又在东京出第二版。1909年冬，编《浙案纪略》一书，凡三卷，记载徐、秋二烈士事迹，用来向人们宣传革命。

1908年3月，陶成章在东京接替张继主编《民报》，该刊第20、21、22期是由他负责编出的。曼华（即汤增璧）在《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一文中曾说：“《民报》之所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为事者，盖自陶氏编辑时始。”[(3)]

同年秋，陶成章赴南洋，拟向华侨筹款五万元，在江、浙二省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4)] 相告，没有给予热情的支持。他认为孙中山措置失当，由此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与意见。1909年初，他在爪哇创办光复分会，负气不再用同盟会，改用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他印发捐票，单独向华侨筹款。这种狭隘的情绪继续发展下去，到9月，他与李燮和等人发布了一份攻击孙中山的所谓《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行》），诬指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藉革命肥家，并亲自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恰好，这时章炳麟也对孙中山有了意见，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从而掀起了第二次罢孙风潮。陶、章互相呼应，发表文章，散发印刷品，在南洋和日本等地对孙中山大肆诋毁。陶的错误行为遭到黄兴等大多数同盟会员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在黄兴等人帮助下，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挫败了这一攻讦。不久，陶在南洋英、荷所属各埠均以光复会名义，别树一帜，与同盟会互争雄长。

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炳麟又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陶分任正副会长，在南洋大力扩展会务，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5)]，并“骎骎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6)]。陶成章这时期的表现，是把会党中的宗派情绪带进了革命队伍。这种狭隘的门户之争，是小生产者的思想反映。他的这种分裂活动，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是很不利的。

1911年3月，陶成章从爪哇回国，准备再次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因为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形势不利而中止。6月，陶再赴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支援国内革命。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立即归国，在江苏、浙江各地号召旧部起义，响应武昌革命。不久，上海、杭州、松江等地陆续被革命军攻克，这中间乃有陶成章多年努力的成果。浙江军政府成立时，浙江都督一席为立宪党人汤寿潜所得，陶成章被举为没有实权的参议会参议员，因而“郁郁不得志”。

1912年1月，陶成章因病住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治疗。当时，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总长，众议拥陶继任浙督，而沪军都督陈其美把陶视为威胁同盟会和自己潜在的政敌，倍加忌恨，就派遣他的部属蒋志清（即蒋介石）设计杀陶。14日凌晨2时许，陶成章被蒋介石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在医院里，年仅三十四岁，著作编为《陶成章集》。

---

(1) 樊光：《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未刊稿），其中陶成章传部分由汤志钧辑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9—447页。

(2)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页。

(3) 《建国月刊》第7卷第2期。

(4) 孙中山：《致王子匡函》（原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广东省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8页。

(5) 冯自由：《光复会》，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8页。

(6) 新加坡《星洲晨报》1910年4月19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5页。

陶希圣

贺渊

陶希圣，原名汇曾，字希圣。1899年10月3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北黄冈一读书入仕家庭。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丁酉拔贡，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清末历任河南夏邑、新野、安阳、叶县、洛阳诸县知事，民国初年任湖北黄陂县长、河南汝阳道道尹等职。陶希圣少时随父居住河南。

陶希圣接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儒学，九岁入旅汴中学，学校的课程除国学外，还有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致，以及博物和体操等新课程，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的元素被引入课堂。辛亥革命后，陶希圣回湖北，考入英文馆继续中学学习。1915年，陶希圣就读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门，专攻日、俄法学，兼学欧美法学，涉猎法理学、法哲学。学生时代的陶希圣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陶醉其间，热心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并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2年，陶希圣受聘前往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亲属法，留下一部亲属法讲义，1923年底辞职。1924年7月，陶希圣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其间，他结识了不少“博学多才之士”，如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沈雁冰等，也与倾向国家主义的曾琦、李璜、陈启天、何公敢等人交往，成为国家主义刊物《醒狮》、《独立青年》的热心读者，并应何公敢之邀，担任《独立评论》主编。1925年，他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任讲师，主讲“法学通论”。

“五卅”惨案，激发了陶希圣的民族意识。案发后，陶希圣等上海学术界十学者联名提出抗议。陶希圣撰写《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一长文，分析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责任，刊登在《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上。巡捕房一纸诉状，反而将《东方杂志》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告上会审公堂。在应诉过程中，陶希圣负责为辩诉状提供资料。陶希圣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先后被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商务印书馆罢工委员会聘请为法律顾问。上海环龙路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写信给陶希圣劝其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的“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与三民主义具有一致性。这是陶希圣与国民党的首次接触。

1926年初，陶希圣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聘书，聘其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欣然前往。在武汉的一年里，他兼武汉大学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来往密切。虽然，陶希圣自称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但其思想倾向无疑属于国民党左派。

1926年5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为“中央独立师”，陶希圣一度被任命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随军西进，至咸宁时又任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在咸宁任上时，咸宁农民大会准备枪毙五个农会叛徒（据陶说这五人想退出农会），陶闻讯后命令农会会长不准这么做，威胁说如果一旦这五人被枪毙，他就枪毙农会会长本人。该农会会长不敢直接冲撞，跑到武汉告状，不几天陶被武汉国民政府派人替换。陶希圣反对武汉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认为当时没收土地的结果，造成城市商业的萧条和农村经济的衰落，并攻击农民协会除了残害地方而无他。因此，他反对中共提出的“打倒封建制度”口号，认为这时中国农村制度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最多只有残余的封建势力存在。随后，他

一度十分消沉。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分共”，陶希圣再次活跃，出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其间，他与汪精卫相识。10月，宁、汉分裂后，陶希圣从武汉转道南昌回到南京。1928年2月，陶希圣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政治总教官，担任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指导科长。

1928年，陶希圣加入陈公博、顾孟馀等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的身份使他于同年12月辞去一切公职，不得不离开南京回到上海。陶希圣从政的第一阶段结束。

1928年12月至1937年7月，陶希圣回到书斋，办刊物、写文章和当教授为生活内容。《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是这一阶段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两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还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作品面世。1928年底，陶希圣到上海时，周佛海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创办《新生命》月刊，并设新生命书局，以宣传三民主义为主，在全国颇有影响。陶希圣立即加盟并很快成为主笔，取代了政务繁忙的周佛海，逐渐成了刊物和书局的核心人物。此前，1928年10月，陶希圣已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一文，指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1)] 该文提出的问题关乎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持久而广泛的论战。陶希圣唯恐争论不激烈，甚至不惜用不同的笔名，提出不同的观点，自己和自己展开论战。他将自己在192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汇集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把1930年的论文收入《中国社会拾零》之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面世后十分畅销。在传统的经世思想熏陶下，陶希圣虽然远离官场，然而现实政治却没有离开他的脑海。他的学术研究由

法学扩大到社会学和历史学，触摸到了最新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陶希圣回忆说："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本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2)] 虽然，他的自我评价让人费解，但他确实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1930年底，《新生命》月刊无疾而终，自动宣布停刊。正在此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1931年1月离开上海到南京。

1931年8月，陶希圣应母校北京大学的聘请前往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当时的北京，学术气氛浓厚，陶希圣在授课的同时，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册。陶希圣还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并把自己关于时事的见解发表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了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杂志——《食货》半月刊，强调社会发展有其历史法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更不是史料的堆砌；同时，他以为找寻规则要从史料入手，反对公式主义，反对先搭框架后找史料填充的做法。陶希圣以杂志为平台，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吸收学生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及沈巨尘诸人，从唐代经济史料的收集做起。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他们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八大册，并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遗憾的是"七七"事变后佚失了。陶希圣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步入了学术的鼎盛时期。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独立"，平津危急，"一二九"运动爆发，陶希圣再度进入政治的旋涡。当他得知有学生与教授被抓后，主动去见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当局停止搜查学校、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在学生与教员之中，他一再宣传二十九军有抗日之心，充当宋哲元的二

十九军与学生之间的调人。作为一名国民党员，此时的陶希圣显现出极强的党性，表现在他鲜明的反共立场之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力持蒋介石的安危关系国家存亡，并认为这次事件不是苏联搞的，而是“粉红色的东西做出来的”，将矛头对准中共。1937年纪念五四运动时，陶希圣发表演说，随后在《大公报》上发表《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一文，激烈反对中共提出的“人民阵线”的口号，指责这是一个“分裂运动”。学联向地方法院以“教唆伤害罪”对陶希圣提出起诉。陶希圣接到法院传票后，没敢到庭。但是，他在《华北日报》、《小实报》之上，前后发表了四十篇文章，重申自己的观点。他在回忆录中称之为“一场苦斗”。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赞许。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7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邀请北方知识界名人上庐山牯岭开茶话会，讨论与抗日相关的问题，陶希圣也在被邀之列。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讲话，表明了抗日的严正立场。牯岭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8月，陶希圣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的成员之一，9月被聘为国民参议员。

然而，1937年至1939年底，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使其政治生涯留下了污点。陶希圣自1927年在武汉认识汪精卫后，他与汪精卫及汪派人士比如陈公博十分接近，并加入改组派。从庐山下山后，陶希圣前往南京，寄住在周佛海公馆。当时，周佛海的公馆成为讨论时局的“俱乐部”，大部分成员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国力太弱，硬碰硬地打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主张不放弃通过外交等途径寻求和平，他们将坚持全面抗战、提倡焦土抗战的主张视为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以唱低调自诩，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陶希圣也属其中一员。1937年至1938年，陶希圣与汪精卫来往十分密切，陶希圣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到了武汉，经常与汪精卫晤谈，有时每天见面。1938年1月，陶希圣和周佛海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该研究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对外不公开，以收集各国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为任务，并在汉口、长沙、成都、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社。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研究会有事，陶希圣都会向汪精卫请示，而汪对于该会的工作十分热心地加以指导。陶希圣除了担心敌强我弱难有胜算外，反共防共之心甚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顺应民意联共抗日，令陶希圣十分失望。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从昆明逃往越南河内，陶希圣同机前往。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日华调整关系发表第三次声明，声称要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原则，要求“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中国政府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次日，汪精卫便起草了响应近卫的声明，陶希圣和梅思平、陈公博三人带着声明前往香港，于31日在各报发表了汪精卫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即所谓“艳电”。电文将近卫声明作为和平结束战争的契机，要求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8月下旬，陶希圣在汪精卫、陈璧君的催促下由香港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指定陶希圣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39年11月1日开始，代表日本政府的“影佐机关”和汪组织进行正式谈判，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参加，在谈判过程中，陶希圣彻底明了了日方的侵略野心，并据实向陈璧君作了透彻的说明，由陈转达给汪精卫，他表示赞成汪精卫中止谈判出国隐居。但汪精卫仍不悔改，终致不可逆转，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形成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八份文件。1939年12月30日，日汪双方签字之时，陶希圣称病没有前往。1940年1月2日，他和高宗武达成离开上海的默契，次日乘船出逃，5日安全到达香港。1月22日，《大公报》头版以《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为题，披露了高、陶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日汪谈判的真相。“高

陶事件”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的野心以及汉奸的嘴脸，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自此，陶希圣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高陶事件”后，陶希圣一心一意追随蒋介石直到去世。1941年，陶希圣奉重庆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出版《国际通讯》周刊，为国内了解国际局势和国际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陶希圣混入难民之中逃出香港。1942年2月25日到达重庆，在陈布雷的公馆安身，被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撤销，陶希圣以少将组长的资格转职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四十三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四十一位。1949年，陶希圣到台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连任九届），“立法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副主任，《中央日报》董事长。

陶希圣虽曾犯有严重错误，但蒋介石对他始终网开一面，仍然加以重用。其中，不能否认蒋介石欣赏陶的学问与为人，并在思想上存有共鸣。因此，陶希圣是陈布雷之后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幕僚，他先后帮助蒋介石完成两部最重要的论著：《中国之命运》和《苏俄在中国》。《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抗战出现转机之时，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作。1942年10月10日，英、美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随后，蒋介石开始着手写《中国之命运》的政论文章。题目来自于孙中山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即“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觉”。文稿在黄山官邸花四十多天完成，经过反复修改，再将书稿印成样本二百本，分交给国民党党政领导及负责人研讨，收到反馈回来的意见二百余条，再逐条加以斟酌，对全稿进行修订，1943年3月正式由正中书局印刷发行。全书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订、排版校对的工作，则由陶希圣总其成。据陶希圣回忆，该书出版三个月，已

行销一百三十万册以上，影响空前。《苏俄在中国》酝酿于1955年冬，出版于1956年12月。陶希圣是最初执笔人，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们和蒋经国均参与其间，补充完成。该文是蒋介石在失败后对于世人的一个交代，中心说明由于苏俄共产主义的渗入，最终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陆。强调了“反共”的必要性，同时也检讨了国民党失败的教训。全书近二十万字。

在担任幕僚的同时，陶希圣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掌握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1943年起，陶希圣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写了大量的社论，仅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两年中，陶希圣发表的社论就有三百三十余篇，相当于每两天一篇。抗战胜利后，陶希圣仍为《中央日报》总主笔，他站在幕后，将国民党在政治协商、“国大”、和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态度揭示出来，兢兢业业地为国民党为蒋介石掌握舆论。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

晚年，陶希圣重温旧时研究之梦，1970年他在台湾创办食货出版社，复刊《食货》半月刊，笔耕不辍。1979年，八十高龄的陶希圣出任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

---

(1) 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新生命》第1卷第10期。

(2) 陶希圣：《大风暴之后的三年》，《传记文学》第1卷第4期。

陶行知

宗志文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他原名文濬，早年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行知。父亲靠教书谋生，家境清寒。1906年，陶行知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学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因此，留学期间。除了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外，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

1917年，陶行知由美返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后来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又任教育系主任。1921年，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到北京与一些留美回国的人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鼓吹教育改造运动，呼吁开展平民教育。不久，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平民千字课》，设平民读书处，推行平民教育，幻想“教育救国”。他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的“希望”，“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说“要把平民教育输入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里、济良所里”[(1)]。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传统教育，提出自己改革教育的主张。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推行几年之后，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到处碰了壁”，如他自己所说，“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2)]了。当时，他把中国“穷和弱”的原因归根于“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3)]。因此，他的出路就是办乡村教育。1926年，他为中华教

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4)]。1927年3月，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合力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简称晓庄师范，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在办晓庄师范的时候，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还提出“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一系列新颖动人的口号，构成了他的所谓“生活教育”论的主要内容。这套“理论”在晓庄师范的实际运用，如他所说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5)]他引导师生整天忙于烧饭、种田、做工、演戏、说书、开茶馆、当会计、办民校、会朋友、放哨守夜等等，以这类活动作为其教学的全部内容，学生很少认真读书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晓庄师范的招生广告上写着：“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这些做法，从反对关门读书的传统的旧教育而言，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翻版。

陶行知对晓庄师范师生的政治信仰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学校里有国民党，有国家主义派，也有共产党员。那里的进步势力比较强，学校中的骨干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1930年5月，晓庄学校师生在共产党员的鼓动和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日本把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国民党当局借口学校里有共产党活动，派兵包围并封闭了学校，捕杀师生十余名。陶行知也受到通缉，逃往日本。到1931年春天，才由日本回到上海。经过这次打击，他心情沉痛苦闷，但仍然盼望着晓庄启封，继续他的事业。开始他隐蔽在商务印书馆借译书谋生，后来他的活动又逐渐展开，着手普及科学教育。他提出“科学下嫁运动”的口号，幻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让下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现代科学的成果。他创办了自然科学

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还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创办一种业余学校——山海工学团。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他们接受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生育等六项训练。他曾主观设想把“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6)]。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界掀起了大规模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得到共产党友人的帮助，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先后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从这时起，他开始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7)]他的政治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

1936年7月，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国民党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他在国外访问了欧美二十八个国家，所到之处，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动员华侨捐款救国。

1938年夏天，陶行知回国。经过香港时，他说愿意在抗战中从事三件工作：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这时，国民政府宣布他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8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冬季，他

到重庆。1939年2月，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提出抗战教育方案，主动动员全国的物资、人力与日寇总决斗，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他的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交到国民政府手里，却如石沉大海。

陶行知从国外回来后，蒋介石曾拉他加入国民党，想叫他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高级职位，陶断然拒绝了，以后，就常常受到监视。他想办晓庄大学，国民政府不批准。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北碚附近的合川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靠自筹经费办起了育才学校。育才的办学方针仍以他那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这时他在政治上已更加倾向进步，学校里容纳不少共产党人，因此国民党总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它。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异常困难，有时衣食都难以为继。国民政府对这所学校不但一钱不给，而且还对它进行刁难。陶行知为了筹款，到处奔波，经常碰壁。

抗日战争后期，陶行知对蒋介石的专政越来越不满，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自觉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1945年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除继续坚持办育才学校外，又和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学校课程。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重庆许多人民团体在较场口开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被毒打。当时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在场，他目睹特务的暴行，非常气愤，回校后对大家说："沉着，要知道民主需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才会到来的。"[(8)]

1946年4月，陶行知由重庆回到上海，一方面筹划育才迁校，一方面忙于民盟的工作。他到处讲演，为反独裁、争民主而大声疾呼。

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的群众大会上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9] 7月11日、15日，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同时，社会上传闻陶行知已名列"黑榜"，国民党特务准备暗杀他。他冷静沉着，不怕牺牲。7月17日，他给重庆育才师生写信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的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10]

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严重威胁下，陶行知日夜忙着整理自己的诗稿。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送了挽词。

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诗歌集》等。

---

(1) 陶行知：《作十万新民寿六旬王母》，《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27页。

(2) 白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23页。

(3)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31页。

(4)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教育改造》，第129页。

(5)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教育改造》，第139页。

(6) 陶行知：《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陶行知教育论文

选集》，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98页。陶行知最初对工学团的解释是：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团体。

(7) 生活教育社编：《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99页。

(8)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年版，第470页。

(9)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陶行知先生纪念集》，第470页，照片注文。

(10)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陶行知先生纪念集》，第470页。

陶孟和

涂上飙

陶孟和，原名履恭。天津人。生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祖籍浙江绍兴。父亲陶仲明是位饱学之士，1892年应晚清翰林严修邀请来为家庭教师，教授严氏子侄，陶孟和也在其父亲门下课读。1901年，陶仲明因患肺病去世，严修改定先人所设的义塾课程，并借陶仲明的家设学，招收十一人，陶孟和仍在其中就读，得到严修的关照。1904年，严修将家塾英文馆改为敬业中学堂，陶孟和为敬业中学堂师范班学生。1906年，敬业中学堂建新校于南开，改称南开学校，陶孟和为南开学校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

南开师范毕业后，陶孟和得以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留学归国后，191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被聘为教授，并一度任教务长。他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学戏曲等。1915年11月，北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开始设立评议会，为“商决校政最高机关”，由每科选出评议员二人组成，陶孟和与张耀曾作为法科的代表入选。

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北大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开展，陶孟和积极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北京大学于28日起连续三天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陶孟和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参加了演讲活动。1919年1月25日，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陶孟和与杨昌济、马叙伦等为发起人，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为宗旨。1922年，陶孟和被聘为社会科学组编辑员，主持编辑北大社会科学季刊。

1926年，陶孟和受处置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聘，任秘书，创立社会调查部，开展中国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1929年，社会调查部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陶孟和任所长。社会调查所的经费仍来源于基金会，但组织上完全独立自主，各项研究工作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陶孟和任所长。1935年冬，陶孟和偕全所成员搬迁南京。1937年抗战开始后，社科所先从南京转移到长沙，12月又迁往桂林，次年初至阳朔，1938年底迁往昆明的黑龙潭，1941年又迁往四川宜宾县境的李庄，陶孟和始终领导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转辗各地，艰辛备至。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南京，直到全国解放。

陶孟和在社科所任职二十余载，领导全所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1926年—1929年间，他主持对我国城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他采用家庭每日记账法，首次于1926年—1927年间的半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等四十八个家庭做了记账调查，最后由他写成《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接着又与上海调查物价局合作，于1927年—1928年对上海二百三十户纱厂工人做了一年的记账调查，由杨西孟写成《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一书，陶孟和高度评价此书并作了序。陶孟和还同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合作，在1929年对一百九十九个天津缝纫编织工家庭做了全年的记账调查，最后由南开方面写成书面报告。此外，陶孟和还将工人运动、劳资争议、工资问题等也列为研究重点。

1929年以后，社会调查所随着人员的增加，项目也不断增多。陶孟和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国民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涉及农业、工业、金融、财政、对外贸易等等。他安排韩德章、吴半农、吴承禧、千家驹、郑友揆等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来关于上述问题的专题报告《铁煤及石油》、《交通工业》、《中国的银行》、《中国的内债》、《我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等，于1927年—

1931年分别出版问世。

陶孟和在领导同事们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了一批后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卓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在选拔、培养、任用年轻人才时，陶孟和不存门户之见，不论来自清华、北大、燕京、南开、武汉、中大或其他大学，均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同时，所有工作人员一旦确定主攻目标之后，即放手让他们去做，很少加以干涉，也不中途打乱。

在社科所二十几年，陶孟和除了负责全面工作之外，还抽出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他曾是社科所两种期刊《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主编。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过不少论著，如1930年写有《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1931年写有《中国的生活与劳动》、《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研究》、《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劳工的生活程度》、《在中国的工业和劳动》等等。

陶孟和一贯强调对中国社会进行身临其境的调查的重要性，以便从调查的实际资料中找出切中时弊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他坚持这一点，逐渐成为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风。由于重视实际调查，他所出版的著作及主编的《社会科学》杂志，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有较为充实的现实资料。不仅在国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所发表的不少经济论文，在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辑成册，以供科研和教学的参考。

陶孟和在主持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期，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利害，不止一次延聘革命党人及进步人士来所工作。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之际，蒋介石密令中研院各所搬迁台湾，并要当时任院长的朱家骅具体执行，陶孟和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时，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正在上海治疗，为组织全所员工起来斗争，扶病到南京，召集全所人员开会，用投票签名的办法，请大家表

示态度，结果多数不愿离开。后来朱家骅用停发工资的手段来胁迫，陶孟和领导全所人员坚决不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孟和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些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

陶孟和晚年将他珍藏的数百册书籍，包括明刊珍本，全部赠给他曾经工作过多年的北京大学。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于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吴铎：《春风化雨十一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杨西孟：《追求真理，不断前进》，《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

严仁赓：《回忆陶孟和先生》，《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

沈性元：《敦厚、正直、勤奋——我所知道的陶孟和先生》，《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

滕虎忱

王家鼎

滕虎忱，原名景云，字虎忱，一作虎臣，以字行。山东潍县滕家庄（今属安丘县）人。1883年8月7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初五）生。其父滕福建，耕种土地六七亩，兼营打铁和补锅修旧。滕虎忱七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三年后因家境困窘而辍学。稍长，跟随父亲务农学艺，常至潍县城东李家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的“乐道院”，为教会及其附设医院、学校做零杂活计，父子遂相继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翌年9月破土兴建胶济铁路。滕虎忱跟随父亲前往青岛修铁路，靠打制铺路石子为生。1902年，考入青岛德国水师工务局船坞工艺厂，在该厂机械科热炉部当学徒。他在四年学徒期间，白天做工，晚间随班上课学习机械知识，逐渐对机器制造产生浓厚兴趣。满师后按厂规留厂做无偿“效力”两年，后以精通锻工手艺，被提升为带班工头兼作车间统计，在该厂前后达十三年。他在工休日常与一二同事共同切磋琢磨技艺，因而技艺精进，能够全面掌握镟工和钳工手艺。1912年8月，孙中山任全国铁路督办后，视察华北、华中铁路时，于9月28日到达青岛作两天逗留。滕虎忱参加了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在三江会馆和德华大学两次聆听孙中山演说，深为其发展实业与振兴中国的思想所感动，萌生了要创办机器厂、制造国产机器、以代替“舶来品”的愿望。1914年11月，日本借口参加协约国攻占胶州湾，接收了原德属各工厂，滕虎忱仍留原厂，转而被日本厂主雇佣。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滕虎忱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觉得国家将亡于日本，若再继续为日本做工，“在良心上受不住”。宁可回原籍务农，也不愿屈辱地为日本制造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的军备武器，遂坚决要求辞职。日本厂主因他是这个厂年资最长及技术最为熟练的工人之

一，提出种种优厚的条件加以挽留，均为他所拒绝。滕回到潍县故里后，恰遇严重虫灾，秋粮失收。为生计所迫，于同年冬天出走济南谋生，又经友人介绍赴北京做工，一年后重返故里。

1917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潍县“乐道院”办的文华中学，成立了一个小型庶务修理工厂“理化制造所”。滕虎忱因其父早年与“乐道院”美国传教士狄乐波（M．Robert Mateer）相识，遂得以进入该所任主任，负责管理和维修“乐道院”里设置的发电机、内燃机、锅炉以及水塔等机械设备。因此机缘，滕结识了许多基督教友，并以其刻苦耐劳和娴熟技艺而得到他们的好感和信任。此时，滕薪水较少，不敷养家糊口。为谋求生活出路和实现振兴实业的夙愿，他勃发了创办机器厂的愿望，并得到文华中学教员尹焕斋的支持和鼓励。1920年1月，滕虎忱邀约当年在青岛学徒时的同事丁执庸，正式发起成立“潍县华丰机器厂”，滕为经理，丁为副理，继聘张仲元总管账房。

华丰厂初创，滕虎忱在潍县东关大街租赁了数间破旧民房，内仅有一部红炉、两部小镟床以及手摇钻等简单工具。他招收徒工二三人，亲手教他们打铁锻造，自任掌钳，其妻帮助拉风箱。因股金短少，设备简陋，仅能为烟潍公路打制桥梁道钉，或为济南电灯公司加工螺丝等，入不敷出。这时，潍县东乡农户自天津购买织布机从事的织布业迅速发展，滕虎忱眼看当地对织布机的需求将与日俱增，乃于同年10月在尹焕斋等人资助下，扩大增资至一万元，从上海购进机器设备，增收徒工十余人，开始仿照日本“石丸式”织布机，制成铁轮木架结构的脚踏织布机。又鉴于北方气候常常干旱，农村需用灌溉设备，遂将农村通常使用的固定式木斗水车研究改进为转动式铁斗水车，制成畜力灌田机。滕每天提前到厂，指导徒工们精心研究制造工艺。由于他锐意经营，讲究产品质量，注重向农民宣传，并做示范操作表演，还采用订购、赊销的办法，很快为织布机、灌田机打开了销路，获利甚厚。

1921年秋，滕虎忱在潍县东关购置三亩多地皮兴建厂房，招收徒

工进厂学艺。以后逐年招收徒工培训，渐次形成该厂的技术骨干。1923年，随着潍县民间织布业逐渐由东乡向四乡扩展，华丰厂生产的织布机供不应求，又陆续制造出弹花机、榨油机、轧花机等品种。1928年，复扩大厂房面积达四十亩，增添机器设备，扩建木工、铸工、锻工、金工、白铁、装配等车间，职工增至一百五十余人，产品亦逐渐销往昌邑、掖县、益都、寿光、安丘等地。1929年设立黄县营业部。华丰厂的发展和成就，使滕虎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随之提高，被当地教会推选为长老，参与管理教会事务。1930年，滕发起创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出资赎回潍县城内和南关两处教堂，脱离美国长老会，由中国人自办[(1)]。1931年3月，潍县文华中学、文美女中和培基小学三所教会学校合并成立广文中学，滕应聘为该校校董。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滕虎忱仍抱定“实业救国”的信念，将企业发展的重点转向生产动力机械方面。为试制柴油机，他于同年冬增资至五万元，从上海购进英国制车床、气锤、大摇臂钻、龙门刨等大型设备。专程赴青岛延聘青年技工王宏茂来厂，以厂内原有的一部英国制十五马力“狄塞尔”卧式低速柴油机作样品，多方鼓励王研究仿制。经反复拆装试验，王绘出了图纸，又用手工操作制出推、研、磨、刨、铣等专用工具，并于1932年秋先后试制成十五马力、八马力、二十马力和四十马力四种类型的柴油机，并批量投产，华丰厂从此一跃而成为能够独立生产柴油机的主要厂家。这一年，滕虎忱主持该厂再次增资至十二万元，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推选尹焕斋为董事长。1932—1935年间，先后在徐州、济南、郑州、青岛等地设立营业部，派遣专人主持各地推销业务。

1934年5月，冯玉祥从泰安出发游历胶东地区[(2)]，沿途发表讲演、谈话，宣传抗日主张。16日抵潍县，滕虎忱陪同他冒雨参观华丰机器厂。冯看到该厂产品制作精细，在了解工厂创建历史后很受感动，热情称誉滕说：“全国如有二百人能像您这样有血性、能奋斗，国家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3)] 华丰机器厂于是年再度招股增资，股

东扩大到潍县绅商各界近三百户，资本总额达四十万元。1935年，滕虎忱在潍县南关筹建第二厂，于翌年建成投产后，原第一厂则专业生产柴油机。1937年初，在第二厂内增设电气车间和铆工车间，从事电动机和锅炉生产。至此，两厂总资产为一百五十万元，职工总数达六百余人。当时潍县地区民间拥有近十万部织布机，由华丰厂生产的约占十分之七。该厂各类机器产品运销华北、东北、西北和云贵等十八个省区，经营盛极一时。滕虎忱还计划发展黄河、小清河水运交通事业，准备制造用以装备轮船的立式柴油机和挖泥船等，所需机器图纸和部分机器零部件均已备齐，终因“七七”事变爆发，计划未能实现。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占平、津。滕虎忱预感潍县沦陷势将难免，表示决不与日本“合作”，决心将该厂内迁汉口。他向山东省政府三次呈文，请求调拨车皮协助运输机器设备，但韩复榘政府一再敷衍拖延。滕虎忱等候到12月，当胶济铁路濒于中断时，见内迁无望，乃被迫向董事会辞职，只身搭乘货车赶到济南，携眷撤往西安。

1938年夏，滕虎忱由西安移居汉中，半年后举家迁往成都。1939年冬赴重庆，任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总会顾问等职，曾参与财政部烟叶复烤厂筹建工作。他提出建厂设计图纸后，由于货币贬值，财政部拒绝支付追加投资，该厂筹建流产。1940年，滕奉命转赴昆明任烟叶复烤厂副厂长。1942年辞职回成都，与同乡集资购置电磨一台，开办小型“利丰磨坊”，借以维持生活。同年，冯玉祥在重庆发起“中国基督教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滕热诚捐款。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滕虎忱满怀兴奋，匆匆收束“利丰磨坊”业务，急欲返回潍县重整华丰厂旧业，于1946年2月回到济南。华丰厂于潍县沦陷后被查封，全部设备被日军拆迁至济南，改建为“历山铁工厂”，专为日伪修造军械武器。抗战胜利后，该厂被国民政府接收，改名为“国防部兵工署第四十四兵工厂”。滕虎忱回到济南后，幻想政府当局能够发还该厂产业，立即呈文省政府申请发还，接着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财产处理局不断交涉。1947年1月，

政府当局被迫承认“应发还民营”，但又要求适应其反共内战需要，按“借用”或“租用”办法处理。2月，第四十四兵工厂负责人借口无国防部命令，拒绝会商，滕虎忱在失望中继续交涉。8月，他赴南京辗转托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国防部兵工署、敌伪财产处理局、中央信托局、联勤总部等军政部门申述发还理由。经交涉月余，最后仅得到“照前批发还”一纸空文。10月，滕回济南再与第四十四兵工厂交涉，该厂竟以“总动员期间”为理由，拒不发还。滕虎忱前后奔波两年多而毫无结果，曾愤然说道：“我到崂山当和尚去。”[(4)] 反映他在幻想破灭后的绝望和苦闷。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潍县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扶持下，华丰机器厂利用原东关营业部残存设备，恢复生产和营业。9月，滕虎忱应邀回潍县担任该厂经理。1952年5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命滕为潍坊市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滕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3月被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华丰厂公私合营，滕继续任经理。

1958年12月28日，滕虎忱病逝于潍坊市。

主要参考资料

刘冰：《记华丰机器厂创办发展过程及创始人》，《新潍坊报》1948年6月10日。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4年12月初版。

访问滕怀礼、张蓝田、王宏茂、王宏遇记录。

(1) 王振纶整理：《基督教在潍坊的传入与传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 - 163页。

(2) 张功常述：《冯玉祥胶东游记》，上海军学社1934年印行，第9页。

(3) 《山东青岛区处理敌产审议会济南分会第44次会议记录》，济南市档案局存。

(4) 《新潍坊报》1948年6月11日。

田耕莘

雷镇阊

田耕莘，字聘三，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人。生于1890年12月5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父开良，以教书为业，曾应聘为本县坡里庄天主教小修道院国文教员，并受洗入天主教。

田耕莘十岁时，父亲病故，得到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支持，就学于教会主办的坡里庄小学。1901年十一岁时受洗入天主教。1904年入兖州小修道院就读，1910年毕业，后即转入本区大修道院攻读神哲学。1918年6月任神甫，传教于山东单县、曹州、范县、鱼台县等地。他募捐办小学和短期训练班，用“免膳宿”的恩惠，笼络青少年入教。

1929年3月，田耕莘加入属德国势力的天主教圣言会，并到山东济宁戴家庄圣言会初学院受训两年，后到嘉祥、郓城等地传教。1932年7月，罗马教廷传信部把山东阳谷、寿张、观城、朝城及范、濮等六县划为“独立教区”，田耕莘任该区代理主教。1933年12月，该独立教区改为“阳谷监牧区”，次年2月，罗马教廷任命田耕莘为该区首任宗座监牧，坐镇坡里庄。1939年7月，罗马教廷又把阳谷教区升格为“宗座代牧区”，委田耕莘为宗座代牧，领主教衔，并召田耕莘去梵蒂冈。是年10月底，田耕莘前往罗马，接受“祝圣”。罗马教皇嘉奖他的阳谷区“教务发展奇速，常列于全国最前若干名之内”[(1)]，并赠金十字一枚。当时参加“祝圣”的共十二人，独有田耕莘被罗马教皇看成是“若望宗徒”（即罗马教皇最器重的一人）[(2)]。

1941年10月，青岛教区宗座代牧出缺。1942年11月，罗马教皇调任田耕莘为青岛主教，领导德籍教士管辖的青岛教区，因而“惊动

了当时的中外人士”[3]。田耕莘到任后，除大力传教外，并抢购大量德国颜料进行囤积，不久物价大涨“获利甚多”[4]，使青岛教区从负债累累一变而为有基金“若干万”美金，田耕莘因而获得善于理财之名[5]。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海军侵占青岛，帮助蒋介石输送军队和物资，准备发动内战。田耕莘急忙投向美国，对美军关怀备至。美国海军中一个天主教信徒写了一本田耕莘“小史”，为他树碑立传，夸奖他说：“美国海军驻扎青岛，多蒙田公殷情款待，慈父之怀，令人难忘。”[6] 1945年12月，罗马教廷任命田耕莘为中国第一个枢机主教。1946年1月，田耕莘由美国枢机主教斯培尔曼陪同，乘坐美军飞机赴罗马举行就职“祝圣礼”，行前，曾受蒋介石接见。4月，罗马教廷宣布中国“成立正式教统，划全国为十二教省”[7]。5月，任命田耕莘为北平总主教，主持全国教务。6月初，田耕莘返国，立即跑到南京去“晋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他“优礼有加”[8]。田耕莘就任北平总主教后，即派青年神甫入大学深造，把本教区的小修院改为耕莘中学；在北平成立上智编译馆和圣多玛哲学院；组织天主教广播协会等。同时指示凡修会能维持一堂区者，即划分堂区，千方百计扩大教会的势力和影响。

1948年6月北平解放前夕，田耕莘跑到上海。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又跑到香港，随后避往美国。1957年9月，他曾一度前往台湾活动。1958年8月，他在德国因车祸受伤，10月去美国施行移骨手术，接着又带伤赴罗马参加新教皇的选举投票。1959年6月再去美国，同年12月4日，罗马教皇若望廿三世任命田耕莘为台北总主教，次年3月到台湾任职。他抵任后，即成立若瑟修院、托玛斯神哲学院、耕莘文教院及耕莘医院等，并任辅仁大学董事长。1962年他到罗马参加天主教大公会议，1963年他参加新教皇保罗六世的选举，1964年他又前往美国为台湾教会“募捐”。1965年3月，田获罗马教廷批准辞职，退居台湾嘉义圣言会。1967年7月24日病故。

(1) 方豪：《田耕莘》，《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3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1页。

(2) 《田枢机主教传略》，见天津《益世报》1946年6月30日。

(3) 《田枢机主教传略》，见天津《益世报》1946年6月30日。

(4) 方豪：《田耕莘》，《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3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1页。

(5) 方豪：《田耕莘》，《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3册，第341页。

(6) 《田枢机主教传略》，见天津《益世报》1946年6月30日。

(7) 方豪：《田耕莘》，《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3册，第341页。

(8) 于斌等著，吴智德编辑：《公教信友手册》，公教真理学会（香港），1948年，第33页。

田汉

陈小村

田汉，原名寿昌，笔名陈瑜。1898年3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先祖世代务农，由河南迁居入湘。父亲田禹卿，在湖南岳阳、邵阳等地做厨师。田汉九岁丧父，靠母亲易克勤纺纱织布为生。

田汉六岁入塾启蒙。十岁时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及至新学堂开办，他靠舅父接济才得以继续入学。1909年，他入长沙选升高等小学，1911年升入长沙修业中学预科。时值辛亥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报名参加了湖南革命党人组织的学生军。焦达峰等革命党人遭到杀害后，学生军被解散。1912年，田汉得到舅父易梅臣的帮助，考取由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的公费生。他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异，读书期间得到徐特立的亲切关怀和资助。徐特立注重启发学生们了解社会，关心国家大事，锻炼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写诗作文的才能，对田汉的一生有很大影响。

田汉自幼酷爱戏剧，童年时在长沙农村就喜爱看皮影戏、木偶戏、湘戏以及农民自己演唱的花鼓戏。以后在长沙看到文明戏（话剧），更萌发了对戏剧艺术的倾慕与追求。在求学时期他就开始练习作剧，写有《新教子》、《新桃花扇》。

田汉在长沙师范勤奋学习的同时，广泛阅读了革命刊物，如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国风报》和《民报》、《上海时报》等等，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6年秋，田汉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时值舅父易梅臣被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田汉随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他先与舅父同住

东京小石川茗谷町湖南经理处当抄写员，同时在舅父的指导下自学。舅父易梅臣是南社诗人，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悉心教诲田汉向上之道，指导他怎样读书做人。

经过勤奋自学，田汉考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值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田汉在易梅臣的关怀指导下，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并搜集报刊上的经济材料，撰写了一篇《俄国革命的经济原因》，对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作了扼要分析。文章引起易梅臣的好友李大钊的注意，并从北京写信来加以鼓励。后来田汉回忆说："倘使当时按照大钊同志的方向继续前进，我早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幸大钊同志在北京牺牲了，梅臣先生也死在军阀赵恒惕之手，失掉了指导我的人，同时我的兴趣被吸引到文学戏剧方面去了。"(1)

在日本，田汉接触了大量西欧现代戏剧和日本的新剧，并受到各种文艺思潮流派的影响，良莠不辨，兼收并蓄。他"一面热衷过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启蒙思想，一面却又迷恋过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2)。在"艺术救国"思想指导下，他凭着青年的热情和正义而写作，企望当个剧作家，以"中国未来的易卜生"自许。1919年，田汉在东京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国内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文章，追求进步。暑假，田汉从东京回国省亲，与表妹易漱瑜结婚，10月同往日本攻读。1920年，田汉在东京发表剧本《咖啡店之一夜》、《梵峨嶙与蔷薇》，开始走上了戏剧文学之路。

1920年初，田汉经宗白华介绍与郭沫若建立通信联系，相互倾慕。同年3月，田汉由东京到福冈访晤了郭沫若，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交谊。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之间的书信，当时编为《三叶集》出版。1921年7月，他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经过长期酝酿正式成立了创造社，鼓吹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注意自我表现，积极冲破"文以载道"的旧传统。

1922年9月，田汉携妻归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随后又任

教于大夏大学和上海大学。这期间，田汉致力于戏剧运动，从事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与在戏剧界初露头角的欧阳予倩、洪深等结为好友，在艰难困苦中共同创办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电影剧社等，合作主编《南国周刊》、《南国月刊》等杂志。田汉等人所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团结了一些知名的艺术家和一批进步青年，在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给当时的文坛很大的推动，开创了话剧运动的新局面。他所主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了编剧、导演、表演、音乐、美术诸方面的众多人才。这个时期他创作的剧作有《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江村小景》、《苏州夜话》、《古潭的声音》等。这些剧作表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艺术上熔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炉，反映了田汉对黑暗现实的鞭笞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获虎之夜》被誉为中国早期话剧的代表作品。《名优之死》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也有些剧作品，如《湖上的悲剧》和《南归》，流露出一些感伤情调，存留着作者早期的“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感伤”[(3)]。田汉这些剧作的相继出版和南国戏剧运动的蓬勃开展，使我国当时因追求商业化而趋于没落的话剧得以中兴，并为我国话剧的健康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田汉重视培养文艺人才，并善于发现人才，如戏剧界的郑君里等，美术界的吴作人等，音乐界的冼星海、聂耳等，贡献甚巨。

田汉在思想上的突进是1930年。1927年南国社改组之前，田汉以自己为中心从事艺术活动；南国社改组后，采用委员制，依靠多数人的力量共同推进革命戏剧运动。从1927年下半年起，他就一步一步地转向了革命。1929年，他在南京公演《孙中山之死》被当局禁演，使他对国民党当局有了深刻的认识。1930年初，他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又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被选为执行委员。他在《南国月刊》上发表了十余万言的《我们自己的批判》，对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和批判，并严格剖析自己，批判南国戏剧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方

向和艺术方向，这标志其思想和创作上的成熟，是其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其后，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成批的文学和戏剧方面的优秀分子投到左翼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田汉利用企业界的力量，组织了艺华公司，联系各方人士，掌握了“明星”、“联华”和“艺华”三家影片公司。同时，田汉所领导的南国剧社的转变，也带动了戏剧协社和辛酉、大夏、摩登、复旦等许多戏剧团体，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戏剧工作的强大的统一战线。

1932年4月，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田汉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文艺思想的发展，“对人民疾苦和民族命运不断的关心”，“使一个带着若干小资产阶级感伤情绪的剧作家终于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4)]。此后田汉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了新的高度，创作热情十分旺盛，创作活动扩大到了话剧、电影、戏曲、诗歌等许多方面。他写了近三十个剧本，题材大多是反映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如他创作的话剧《梅雨》、《乱钟》、《1932年月光曲》、《回春之曲》、《阿比西尼亚的母亲》，电影《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等，洋溢着磅礴的战斗激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完全摆脱了过去的感伤、消沉情调，对当时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田汉写的《顾正红之死》，以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为背景，热情地讴歌了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在戏剧发展史上第一次塑造了我国工人领袖的英雄形象。1934年，田汉创作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由聂耳作曲并主演，在上海演出闭幕时，观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久久不离开剧场。这一剧作为革命歌剧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田汉还积极推动革命音乐活动，同著名的音乐家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合作，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田

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文委成员同时被捕。3月，田汉被解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不久在狱中患了背疮需手术治疗，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人保释出狱就医。田汉病愈后，仍被软禁于南京。南京政府当局允许他在南京从事戏剧活动，他随即组织“中国舞台协会”，约集上海戏剧界的洪深、舒绣文等在南京演出《械斗之歌》、《洪水》等剧，反映战区人民的痛苦，反对内战，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在高涨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中，田汉结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写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的剧本，《乱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回春之曲》歌颂爱国华侨青年回奔祖国，勇敢参加抗日斗争的故事。田汉还写了《扫射》、《战友》、《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鼓舞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抗战爆发，实现了国共合作，田汉获释，并经中共代表团审查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在全国人民抗日洪流激励下，田汉迅速写出了宣传抗日的多幕剧《卢沟桥》，热情歌颂爱国军民英勇保卫卢沟桥的抗日激情与斗志，揭露国民党上层将领的妥协行径，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是年8月，田汉到上海，组织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1月由上海回到湖南长沙，与廖沫沙等人筹办《抗战日报》。1938年，田汉到武汉，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处长，主持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抗日宣传，广泛团结文艺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组成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戏曲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和后方演出。他还负责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抗战戏剧的组织领导工作。其后在长沙、桂林进行戏剧活动，带领抗日救亡演剧队、平剧宣传队、文艺歌剧队等，多次赴前线慰问，奔波于炮火硝烟之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这个时期他以饱满的热情不断创作，主要作品有《秋声赋》、《再会吧，香港！》（与洪深、夏衍合作）、《武松》、《琵琶行》、《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黄金时代》、《哀江南》等话剧、戏曲和电影剧本。

抗战结束后，田汉重返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46年，创作了著名话剧《丽人行》，对日伪统治的暴行进行血泪的控诉，实是影射国民党统治的倒行逆施。《丽人行》不仅具有感人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1947年3月14日，上海文艺界举行“庆祝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对他勤勤恳恳地“永远为人民服务”，“通过其艺术改造中国”，为戏剧创作和人民的戏剧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1948年，田汉转入解放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先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第一、二、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倡导戏曲改革，并先后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和京剧《白蛇传》、《谢瑶环》等优秀作品，成为他一生戏剧创作的最高峰。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田汉即被诬为“叛徒”而入狱，1968年12月10日冤死于狱中。1979年4月25日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给田汉恢复名誉，予以平反昭雪。

田汉一生创作和改编、翻译的各类戏剧作品达一百二十余部，编有《田汉戏曲选》（上下册）、《田汉剧作选》及《田汉文集》十六卷等。

主要参考资料

田汉著：《田汉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田汉著，尹琪编：《田汉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何寅泰、李达三著：《田汉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版。

廖沫沙：《回忆田汉师》，《人民戏剧》1979年第5期。

---

(1) 田汉：《我认识的十月革命》，载《戏剧报》1959年第22期。田汉舅父易梅臣，字梅园，后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

(2) 洪灵菲：《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载冯乃超主编《文艺讲座》第1册，神州国光社，1930年。

(3) 田汉：《自序》，《田汉戏曲集》第4集，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2版。

(4) 田汉：《后记》，《田汉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田颂尧

马宣伟

田颂尧，本名见龙，又名光祥。1888年6月19日（清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十）出生于四川简阳县一个商人家庭。父田元章，开设德全堂中药铺。田颂尧自幼读私塾，后进新学堂。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一期[(1)]，次年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2)]。田在这里结识一批革命志士，受革命思想影响，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以后，他离校在南京、上海一带参加革命活动。辛亥武昌首义后，陆军第四中学的学生们受到鼓舞，成立学生军支援武汉[(3)]，田颂尧任学生军教育长。不久返回四川，任四川陆军第四镇参谋。1912年4月镇改为师，田在第四师任营长。1916年4月，陈宦入川任会办督理四川军务，以大清乡为名捕杀革命党人，田颂尧被派任清乡独立支队长，驻在下川南。

田颂尧深感川军受入川北洋军的歧视和排挤，1916年1月随刘存厚在纳溪起义，参加反袁护国，被委为第二路三支队长[(4)]。刘军集中于纳溪，决定先攻江安、南溪两县，再进取泸州城。田颂尧支队受命攻打江安、南溪两城。正当此时，田部前卫连队截获向泸州城递送文书的北军传达兵，得悉北军即将退出泸州，田遂将队伍分布于江安下游沿江一带，派重兵把守距江安城三十里的马腿津，还配备大炮两门。待北军兵船顺流而下，到达有效射程时，田部枪炮齐发，北军多数船只中弹沉没，落水者全被掳获，只有部分官兵弃舟登岸向富顺县方向逃走。田部据守马腿津，连续截击三日，先后俘获军官二十余名，士兵二百六十余人。田颂尧随即派谢松营先抵南溪城下，奋勇环攻，2月2日攻克，获枪炮、子弹和粮食甚多[(5)]。田以这一战役为荣耀，升任师长后，定此为“二二护国纪念日”，每年举行庆祝大会，以资宣扬。

同年2月10日，田颂尧率部配合入川护国第一军在月亮湾作战，后与舒荣衢、邓锡侯两支队在棉花坡、马鞍山、头背梁一线与北军激战。马鞍山、头背梁是泸州、纳溪之要冲，北军白天黑夜不停地进攻，均被邓、田支队击退。后两支队又在纳溪与北军奋战月余，直到陈宦宣布独立，袁世凯败亡，战事始告结束。6月，蔡锷任四川督军，升田颂尧为第二师骑兵团团长。1917年7月，因争夺四川政权，先后发生川军第一军军长刘存厚与督军罗佩金、省长戴戡之间的战争。田颂尧在两次巷战中为刘存厚立下战功，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北京政府授刘存厚崇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授田颂尧为炮兵中校，加陆军炮兵上校衔。

1918年1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出兵讨伐投靠北洋政府的刘存厚，熊部攻下成都，田颂尧随刘存厚败退陕南。同年7月，刘存厚入汉中设四川督军行署，田颂尧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师步兵第四十一旅旅长，8月，被授陆军少将军衔，11月获授三等嘉禾章。

1920年4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等人在唐继尧策动下，发动倒熊之战，7月10日熊败退出成都。8月，熊联合刘湘拉拢刘存厚返回四川，共同驱逐滇黔军和以吕超为首的倒熊军。刘存厚率田颂尧等部由汉中返回四川，田率部攻占绵阳，距成都仅二百余里，一时川中大震[(6)]。倒熊军败退出四川后，11月田颂尧任中央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所部驻防阆中。1923年2月，继一、二军之战后，熊克武、刘成勋与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之间又展开一场争夺权力的战争。3月，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全力进逼重庆。田颂尧乘机反攻，占德阳、广汉，与邓锡侯、陈国栋驻新都部队联成一片。

此时，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竭力笼络一些川军将领，以反对得到广州军政府支持的熊克武。9月5日，田颂尧被北京政府授为陆军中将。但在与熊克武军作战中，附北川军节节败退，10月丢失重庆。北京政府为鼓励他们继续顽抗，12月10日又授予田颂尧为章威将军、邓

锡侯为骠威将军。1924年2月熊部转胜为败，退入遵义。5月21日，经吴佩孚保荐，田颂尧被北京政府授陆军上将衔，27日又被任命为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

田颂尧虽然与杨森等人合力打败了熊克武，但四川内部仍然是群雄割据，各自称霸。已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杨森于1925年初发动了一场“统一四川”之战。田颂尧与云集川东的川军各师组成反杨联军，指挥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师侧击杨森驻遂宁部，取得胜利。田颂尧乘势占据以三台为中心的大片防地，收编了第十二师段荣琮等部。他于1926年5月26日受吴佩孚委任四川军务帮办兼川西北屯垦使后，还打出刘存厚任川督时委他的川西北屯殖总司令的旗号，加紧扩充实力，扩大防地，所辖部队有：中央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孙震），中央陆军第二十二师（自兼），川军第五师、第八师、第十一师和独立师及混成旅、独立旅等，防地达二十余县。

1926年夏秋，北伐军在湘、鄂、赣、闽节节胜利，田颂尧派代表联络易帜。12月12日，蒋介石委田颂尧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就军长职后，军部设三台，成都设行营，总兵力达六万人。

同四川其他军阀一样，田颂尧也在自己的防区内形成省中之国，自行委派官吏，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征收田赋等各种税收。初期，田军每年对防区百姓征一次田赋税，即可维持。后来为了扩军，参加混战争夺防地，竟每年向百姓征五六次田赋税。当地流传两句民谣：“为了他‘田家’，害了我田家（指农民）。”田颂尧借建设为名，提取各县的官、公、庙、会产业一百多万银币，但仅以二三十万元修建绵阳城内的公园和潼（川）、绵（阳）及潼、阆（中）的公路。田在川西北银行发行纸币越来越多，又不能兑现，到1933年变成废纸。田颂尧统治川西北十余年，搜刮了大量钱财，购置良田数千亩，街房、公馆二百余座，银行、字号林立，国外还有产业，其财产总额在四川军阀中名列前茅。

1932年11月，田颂尧为了争夺防区，与刘文辉爆发了成都巷战，使成都人民饱受苦难。正当这时，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突进川北佛子关。田颂尧得报，立即命令万迭青旅赶到瓦石铺抵御。万旅抵挡不住，田急调大部队增援，又遭失败。红军于12月25日占通江后，又于次年1月23日解放南江和巴中。通、南、巴三县是川北富庶地区，交通险阻，易守难攻。蒋介石得报后，立即委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迅速结束与刘文辉的决战，于1月28日就任新职，赶到阆中设督办署，以孙震为总指挥，曾宪栋为右纵队司令，指挥第一、二师和第二路；罗乃琼为中央纵队司令，指挥第三师和第一路；王铭章为左纵队司令，指挥第四、五师和第三路。2月18日，田颂尧指挥全线向红军进攻。经过激烈的争夺战，通、南、巴几次易手。田部于6月初战败，退守广元、旺苍、阆中、南部一带，田之督办署移南部县城，并向全川各军请求增派援兵“协剿”红军。

1934年7月，以刘湘为首，六路川军围攻红军，田颂尧部编为第二路。但在红军反击下，田率部再退，将督办署设在盐亭，企图凭嘉陵江天险防御红军，但仍屡被红军击溃。9月中旬，工农红军收复仪陇、阆中，田军被歼二千余人，残部溃散。22日，红军又占领苍溪以南的木门等地，田颂尧的二十九军被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怒将田颂尧撤职查办，并将二十九军改为第四十一军，以孙震为军长。田颂尧经营几十年的军阀队伍就此瓦解。

田颂尧解除军职后，寓居成都。抗战时期，蒋介石给田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闲职。田不甘寂寞，于1945年在刘存厚、邓锡侯支持下，田以其旧部为基础，成立“二二护国同志会”，邀请四川军政界及地方士绅七百余人参加，自任理事长，邓锡侯、刘存厚为名誉理事长。1946年3月，田颂尧在简阳县选区竞选立法委员，但四川省主席张群来电称：立法委员未经国民党党部提名者无效。田愤懑不已，从此心灰意冷，“二二护国同志会”也就此瓦解。田对办学较热心，先后担任成都树德中学、荫堂中学、龙泉驿中学的董事长。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田颂尧随刘文辉、邓锡侯起义。解放后，田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后为四川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10月15日在成都病逝。

---

(1)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2) 《军机处录副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3) 沈铸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赴武汉参加革命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页。

(4) 邓锡侯、田颂尧：《四川护国战役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79年印本，第36页。

(5) 邓锡侯、田颂尧：《四川护国战役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79年印本，第38页。

(6)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254页。

田桐

徐辉琪

田桐，字梓琴，笔名恨海，号玄玄居士，晚年署江介散人。湖北蕲春县人。1879年12月25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田士莲是个穷秀才，在本地设塾教书。田九岁从父入塾，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但不喜八股文章。二十二岁补县学生。是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同学。田目睹外国侵略和清王朝丧权辱国，开始“肆谈革命”。1903年冬，他在考卷上“鼓吹革命”，被教员告密，巡抚端方认为“大逆不道”，责令“从严惩办”，被学校开除。随后，他离国赴日求学。

在日本，田桐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人。在留日学界高昂的革命情绪鼓舞下，更加自觉地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1904年夏秋之交，他邀约白逾桓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该杂志后在宋教仁等人参与下，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于促进各革命团体的联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到日本，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田桐热烈拥护，并积极动员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成员百余人加入，成为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他被举为评议部议员。不久黄兴荐其任书记部书记，负责会内机要。

同盟会成立后，田桐抱着“不灭清胡死不休”的决心，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他为激发人们的“覆清之心”，搜集明末遗老有关抗清记述，编辑出版了《亡国惨记》。是书“字字悲哀，字字泪血”，不及一年，售逾三万册。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徇清政府之请，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他愤激异常，四处联络，以谋抵制，并在弘文

学院组织罢课斗争。1906年5月，又与柳亚子等创办《复报》，与《民报》相呼应。由于田桐在革命活动中特别活跃，是年被清政府下令缉捕。直到1909年，宣统即位颁布赦免“上谕”，他还被宣布为不能“开复”。

但在此期间，田桐对思想战线上反对立宪派的斗争缺乏应有认识。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后，他认为同梁启超的争论是“无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党人的“价值”，是“耻辱”。提出应以暴力手段对付之，“力不足以诛梁启超者，任之可耳”[(1)]。

1907年5月，孙中山在香港密谋发动潮州、黄冈起义，令东京同志赴港相助，田桐欣然而往，于7月抵达香港。但这时黄冈之役已经失败。11月，他与何克夫等携革命军债券前往参加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行至海防，不幸为法吏拘捕。年底田被迫令出境，孙中山派他去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他与当地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文战经年”，使《中兴日报》成为南洋革命党人反对改良派和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次年，应荷属侨商邀请，到泗水创办《泗滨日报》。其间，田曾一度参与陶成章等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后因披露荷兰殖民者虐待华侨的罪状，被强令离境。田桐鉴于南部边省举义连遭失败，决意实行“中央革命”，遂于1909年下半年隐姓埋名潜入北京。到京后，他一面创办《国光新闻》报，“倡导民权立宪”，一面密与景定成、井勿幕等联络北方革命志士，伺机起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田桐经上海随黄兴到武昌，任参战员。在保卫汉阳的战斗中，他临危不惧，受到黄兴“智计亦大过人”的赞誉[(2)]。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黄兴派他与时功玖代表武昌一地的同盟会员前往上海“接待”。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田被任为内务部参事。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又被推举为参议员。

田桐对袁世凯的窃权极为愤懑。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到北京

继续办《国光新闻》，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进行猛烈抨击。袁曾派田的旧友农林部次长张昉持重金收买田，他断然拒绝，以致险遭暗害。6月，共和党机关报《国民公报》诬称南京政府为“假政府”，他愤然不平，与白逾桓、仇亮等将该报馆砸毁，曾轰动一时。此时，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提议取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组为国民党。田桐时任同盟会总务部干事，力加反对。在7月14日讨论改组会上，他“拍案痛骂”，声言“以性命拥护同盟会三字，与民国同休”，致使会议无法继续进行。后见孙、黄亦表示同意，才不再坚持。此后，田桐变成了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勇士”。在国会里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议员，发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称为“田三句”[(3)]。在竞选活动中，他为拉选票到处奔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手枪相威逼。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党徒暗杀宋教仁。田桐由湖北赶到上海，坚请孙中山兴师讨袁，斥责法律解决“不足有为”。孙中山大为赞赏，令他随张汇滔去安徽举兵讨袁。田偕张到安徽寿州后，与张旧部加紧联络，秘密策划。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张军历战月余，因孤立无援而失败。田桐再度亡命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鉴于国民党涣散无力，坚决主张另组中华革命党。田桐积极响应，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针对某些国民党要员的变节和动摇，在《民国》杂志上撰文强调“名誉”、“人格”的重要。他还远涉日本各地，说服动员党人拥护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田参加本部领导工作。10月7日又被委为湖北支部长。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加紧进行卖国称帝活动。10月，田桐与居正等以国会议员名义发表通电，表示“誓与共和同休戚”的决心[(4)]，并多次参加留日各界反对帝制大会，发表演说，对袁世凯大加抨击。年底，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离日归国。田到汉口后，依照孙中山“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的指示，联合当地各

派反袁力量，积极发动武装讨袁。

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8月，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会重新召开。田桐作为众议员到北京与会，声称“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5)]。在国会中张继等原国民党议员组织“宪政商榷会”，与原进步党议员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对立。商榷会主张地方分权，省长民选。研究会则主张集权中央，拥护段内阁。田桐与马君武等以中华革命党议员为中心，组织“丙辰俱乐部”，隶属商榷会，反对段内阁最力。当时段祺瑞企图以参战名义取得日本借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田桐“持绝对反对态度”，在众议院提出“质问”[(6)]，并为“外交商榷会”起草宣言，对此大加指责。

1917年6月12日，张勋胁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图谋复辟。田桐当晚离京赴沪，发表演说，称“即令稍有破坏”，也要“除此奸贼”[(7)]。

张勋复辟失败后，7月5日，段祺瑞复称总理。田桐与孙洪伊等致电西南各省，痛斥段为“非法伪造之总理”，请“即日出师，檄布叛徒隐蒂”[(8)]。

是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田桐于月底赶到广州，9月19日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议。在非常国会内，田维护孙中山，主张出师北伐，同西南军阀及政学系排斥孙中山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田桐对爱国学生的罢课斗争持反对态度，发表《告罢课学生》一文，说“罢课抗师之举动，按之生理上哲学上，非未冠者之所为”[(9)]。

1920年11月，孙中山再返广州护法。田桐先后担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党务科主任、韶关大本营宣传处长，直接协助孙中山

从事党务和宣传活动。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田在韶关大本营任内，被指名索捕。就捕时，毫无惧色，厉声应道："老子即是田桐！"[10]

不久，田桐被陈炯明释放回到上海，适逢孙中山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9月6日指定他为修改党章起草委员。而这时，旧国会已经复会，正围绕制宪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田桐对国会依然抱有幻想，随即到了北京。1923年6月，曹锟开始以重金贿选总统，田拒绝贿赂，愤然离京。回到上海后，他打算组织赴沪议员自行集会，以为对抗，后因经费无着而作罢。

同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容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面对国民党的这一重大转变，积极追随孙中山多年的田桐，却认为"此事不可行"，起而反对。他专程跑到广州，向孙中山接连"抗争三次"，后见孙中山"改组之意终不可回"，乃将所有各职通通辞去。回到上海后，他与章太炎、居正等联名发表所谓"护党救国公函"，与孙中山公开对抗[11]。同时，他还发表了《社会主义华北论》一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田桐致电冯等，称这次事变为"我辈谋之内阁、谋之国会十年不足者，竟以一日之工行而有余"，并提出应"专心于过渡内阁及总统、宪法问题"，以建"千载之大业"[12]。随后他到了北京。不久，胡景翼南下就任督办河南军务，他又到了开封。

田桐在京期间，继续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元旦，他串联冯自由、刘揆一等乘孙中山卧病之际，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发起"民前同盟旧友新年恳亲会"，对孙中山发泄不满。

田桐到开封原想通过胡景翼在政治上有所施展，但胡不久病亡，

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之后，他曾去陕、晋等地“漫游”，去张家口为冯玉祥讲学。1926年3月，吴佩孚率旧部向河南进攻，田桐随岳维峻部北退，为晋军俘虏，获释后到了天津。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联名谭延闿、张静江函召田桐南下，旋任为江汉宣抚使兼湖北省政府委员，对田加意笼络。田桐接受委任，于汉口就职后，为配合北伐军事行动，募人将孙传芳运载枪械弹药的江永轮船炸毁。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田桐看到蒋肆意排除异己、加紧军事独裁，开始对蒋产生不满。是年六七月间，他便以劝说阎锡山与蒋合作为名，走避于山西五台山。一年后回到上海，主办《太平杂志》和从事著述。

田桐晚年在政治活动中，对蒋介石党同伐异的横暴行为日益不满。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委员、中央党史史料编纂，他一概拒之不受，并于1929年春参加了居正、许崇智等人组织的反蒋同盟。但同时，他又仇视中国共产党，拥护蒋介石“清党”，认为共产党实行“扰民主义”、“事必致败”[13]。

1930年7月2日，田桐病逝于上海。

田桐一生著述甚多，死后有《玄玄遗著》刊行。

---

(1) 《民报》第5号。

(2) 田桓：《先兄梓琴先生行状》，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31页。

(3) 贾逸君编著：《中华民国名人传》卷2，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版，第29页。

(4) 《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6日。

(5) 《中华新报》1916年7月29日。

(6) 《民国日报》1917年2月11日

(7) 《民国日报》1917年6月26日。

(8) 《民国日报》1917年7月18日。

(9) 田桐：《玄玄遗著》，1937年版，第115页。

(10) 田桓：《先兄梓琴先生行状》，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32页。

(11) 《逸经》第11期。

(12) 田桐：《玄玄遗著》，1937年版，第123—124页。

(13) 田桐：《书清党实录后》、《共产党成败论》，《太平杂志》第1卷第l号、第3号。

田文烈

罗幼娟　邵桂花

田文烈，字焕亭或焕庭，又字姚堂，晚号拙安老人。1858年（清咸丰八年）生于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城区一小吏之家。其父田维翰，游幕于湖北，治鹾政。

田文烈幼濡庭训，且聪颖好学，摛翰振藻，捷若宿成。年弱冠补博士弟子员，食廪饩。复肄业江汉、经心两书院。屡乡试不第，乃以廪贡弃文从戎。1885年北上，以第一名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归籍。1889年，选授广济县训导，后以母忧去官。时袁世凯留任朝鲜，田随之入朝。曾任驻仁川理事府文案。袁喜其文武兼备，相交甚深，遂纳为心腹。

甲午中日战前，袁世凯向清廷上“团结朝鲜，抗御日本”的条陈，再次受到李鸿章的重视，为袁日后腾达之发端。此条陈出自田的策划，且还是田的手笔。甲午之战爆发前，袁畏战托病，请调回国，田随其归，被聘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

1895年12月，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于小站，田职司督练处总文牍，运筹关策，田之力居多。由此与新建陆军主要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以僚长身份建立了深厚关系。

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袁奉命率武卫右军开赴山东进行镇压，田任武卫右军文案，时该军统制姜桂题闻田善治军，延综营务，一应章划，皆倚田主办。

1904年，田文烈总理北洋常备军左翼营务。翌年，调充北洋督练公所正参议，兼兵备处总办。积劳累荐至道员，继实授通永镇总兵。

田治军有方，器成卒选，以备非常。此前，防营截旷，官者多饱私囊。田不隐不欺，一一归公。田尤勤于捕盗，使民安居。旋署天津巡警道，时逢地方病疫大作，田施药防治，民不为灾。1909年初，清廷勒令袁世凯回彰德“养病”，田则为袁联络北洋暗通消息。

1911年，陆军大臣荫昌向摄政王载沣保举田文烈出任陆军部副大臣。10月10日，武昌首义告捷，清廷急派荫昌督师南下镇压。田推荐其同乡——陆军部司长易迺谦为参谋长，并面授机宜，嘱其相机应付。同时，在袁世凯授意下，田以陆军部代理大臣身份与冯国璋、段祺瑞等紧密配合，迫使清廷起用袁为内阁总理大臣。接着，田参与袁策划挟制清廷退位和南北议和的活动。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田文烈任北京总统府军事顾问。1913年8月，袁以田文烈任山东民政长兼会办山东军务。田到任后从整饬吏治入手，同时清理财政，兴办实业，改良教育和肃清匪患等。任内，田并将劝业道息借商民款百余万两饬令偿还，并请部借外债时，改名省欠为部欠，以苏民困。12月24日，田奉令实任民政长，并获二等文虎章。

1914年2月11日，田文烈出任河南民政长。其时正值白朗军讨袁势盛之时，田秉承袁氏旨意，严酷镇压豫境白朗军，获授将军衔。4月3日，段祺瑞回京供职，田兼护河南都督。4月30日，袁世凯任命田文烈兼署河南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

袁世凯为谋复辟帝制，于5月23日对地方官制大加变动，改民政长为巡按使，田文烈改任河南巡按使。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田文烈着加将军衔，督理河南军务。9月20日，袁任命赵倜督理河南军务，田改任会办河南军务。

河南境内贾鲁河横决二十余载，泛滥成灾。田文烈到任后，成立省水利委员会，急图疏治。自1915年始至1916年8月，将河道修复如

初，商舶往来，田亩丰茂，嗣是豫省诸河开新复旧者，五十余县。田尤重视实业，乃出私资辅助各县工厂发达；设森林局，购田百余亩植树造林；教民植桑养蚕，如此三年，树茂民裕。田文烈于荥阳、滑县、安阳、遂平、临章、武安、巩汲诸县，设高初等小学校及女校、农校百数十处，对已设者，再各增设十余校，使河南文风大盛。

1915年1月2日，袁世凯授田为中卿，为加快称帝步伐，指使心腹爪牙制造民意改变国体。9月5日，田文烈与豫省督军赵倜致电袁世凯，表示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田还在9月21日各省巡按使及京兆尹的联名致袁电文中署名，以表竭诚拥护之意。袁称帝后，田被封为一等伯。同年12月25日，蔡锷等首先在云南举起讨袁护国大旗，各省纷起响应。其后，冯国璋、段祺瑞等亦敦请袁世凯取消帝制。袁慑于国人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当终身总统。4月17日，田在冯国璋领衔的电报中，委婉劝袁表明态度，是进是退不能含糊其辞。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田文烈与黎有乡谊，中间又有时任黎的秘书侍从的汉阳同乡殷学璜从中活动关节，田仍留任河南，并受到黎的重用。

同年7月6日，黎元洪申令，改巡按使为省长，田文烈任河南省长。10月4日，田与十三省督军、省长致电黎元洪，请提议于国会，照旧定孔教为国教，保存郡县学官及学田、祭田，设奉祭生，行跪拜礼，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

12月2日，黎元洪就河南省官员有渎职殃民案下惩办令。众议院咨请查办河南省长田文烈等，国务院当即派员前往豫省确查；但经逐项确查，认为虽用人间有不当，但田本人并无溺职殃民情事，着即免予置议。

1917年5月23日，府院矛盾加剧，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

理职。29日，田文烈与赵倜宣布河南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以此支持段祺瑞。7月1日，张勋复辟，田虽未与闻此事，但仍被加封为陆军部左侍郎。

同年11月26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传见田文烈，磋商改组内阁事宜，田力推王士珍堪膺国务总理，以期南北战事早日息止，冯对田的主张极为赞许，更请田氏出任财政，俾维时艰，然而田不敢承应并辞河南省长职。1917年11月30日，王士珍以参谋总长兼署国务总理。12月1日，田文烈出任农商总长。1918年2月20日，王士珍辞去国务总理，钱能训兼代，田仍任农商总长。3月23日，王士珍内阁倒台，冯国璋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3月29日，田出任段内阁农商总长。4月2日，田氏以农商总长名义密咨外交部，请予于唐努乌梁海设官，以坚蒙人之内向，而杜邻邦之觊觎。

同年8月2日，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田文烈、财政总长曹汝霖、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与日人专理事务常次郎在北京签订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三千万日元合同。22日，北京政府农商、财政两部呈请设立中华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为发行金券机关。

1918年10月，总统冯国璋任满下台，徐世昌出任总统。10月10日，徐世昌令准开去国务总理段祺瑞职缺，着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12月20日，徐世昌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转年1月10日，特任田文烈为农商总长。田文烈复任不久，农商部即出面与日本安川制铁公司代表实相寺真彦交涉三百万日元借款事宜。据传是以山西省某煤矿和铁矿的开采权为担保。田主持农商部期间，正值欧战告终，各国皆全力于经济上的竞争。为此，田于部内设经济调查会，下发部令，由部咨送各省长转各实业厅长，说明中国在此潮流冲击之下，更当急起直追，对国内经济状况必须做切实全面调查，而各省实业厅责无旁贷，务将调查结果详编造册，迅速报部以凭核办。第一次欧战给中国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经济损失严重。田主持部务会同参事、会计、工商司长筹编制欧战损失表，中立、绝交、宣战三个时期损失确切数额为二

千三百七十余万元。田文烈在任内，组织矿法研究会，集中外矿学专家修订矿业条例，并于1919年2月22日正式公布。田氏还规定了华商注册公司审批办法，对凡与国有实业相抵触或涉嫌外商资本者，一律不准注册。

自龚心湛入主财政以来，捉襟见肘事时有发生。1919年3月份，军政各费已是不名一钱，3月29日，龚于国务会议上与陆军总长靳云鹏大起冲突，几至挥拳动武大打出手。会未散，龚即匆匆回部提出辞职，并搭晚车赴津，政府派田文烈往津挽留。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发生，钱能训内阁垮台，6月13日，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阁揆，藉以维持政务现状。半月已过，总理人选尚未确定。田文烈是徐世昌提出三人选之一。徐世昌曾提出田出任阁揆，田因不愿受制于安福派，故坚拒避谢。

9月24日，靳云鹏兼代阁揆，田文烈农商总长职务未变。11月5日，靳云鹏组阁。12月3日，田文烈改任内务总长，仍兼署农商总长。1920年3月1日，北京新国会第三期常务会开会，田文烈代表国务总理靳云鹏出席会议，并代表总理致颂词。

直皖战争前夕，靳云鹏内阁出现危机，府方拟以周树模继靳云鹏之后组阁，得段祺瑞首肯。周树模意在组阁人选中罗致名流，因此对安福系入阁颇为踌躇，这势必触怒了皖系。同年3月3日，安福系成员积极倒阁，阁员相约不出席国务会议。次日，阁员提出辞呈，以此拆靳内阁的台。3月4日晚，安福系开会，以周树模、田文烈二人假投票，结果田文烈得票为多，安福系头目即征求田的意见，田以为此是有意玩弄，气愤不允。7月24日，北京政府改组，特任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8月9日，大总统徐世昌特任靳云鹏署理国务总理。8月11日，田文烈力辞本兼两职，得总统徐世昌令准。当局拟以经济调查局总裁畀诸田氏，并聘为公府高等政治顾问。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在曹锟为首的直系导演下，复任总统

职，特任颜惠庆署国务总理。8月5日，内务总长孙丹林免职，特任田文烈兼署，田辞未就。8月6日，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复举田文烈为内务总长，田仍辞不就，并于8月6、7两日，先后称病请辞内务总长职，总统黎元洪将辞退呈文退回，予以挽留。当日田第三次上辞呈，黎元洪无奈，准其辞职。

田文烈脱离政坛后，目击时局，痛心疾首，莫可如何。惟日以祈死为志。卸职之后，杜门扫迹，时与二三遗老饮酒赋诗，达官要人造其门者，皆谢绝不见。田尝言：处今之世，行古之道，不循俗，不变节，守分安命，以终天年，如斯而已。

田文烈于1924年12月11日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上册），文化学社1930年版。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六），武汉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85页。

田中玉

邵桂花

田中玉，字蕴山。1869年10月（清同治八年九月）生于直隶临榆（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小高连庄。其父田润，长年在外经商。田中玉七岁入本庄私塾，1878年，因父病故辍学。稍长，与人合伙在山海关南海开小饭铺。1884年，清淮军将领叶志超统率正定练军驻防山海关南海，成立随营武备学堂，招考新生。田应试被录取，弃商从戎，与北洋系重要将领王用宾、卢永祥、鲍贵卿等结识。翌年，转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炮科学习，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受到法籍教官萨尔的青睐，他于每日功课之外，常对田中玉“焚灯授受”，并称田“是个可造就之才，将来就是一个中国长城”[(1)]。

1887年，田中玉于武备学堂毕业后，仍到提督叶志超部下任职。1894年，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聂士成和叶志超率军进驻朝鲜牙山地区镇压东学党起义。田中玉、鲍贵卿等随叶赴朝。同年7月下旬，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田随叶志超在牙山对日作战，叶畏敌临阵脱逃，绕道至平壤。9月日军进犯平壤，叶又尽弃粮械军资溃逃过鸭绿江。事发，叶被革职下狱，田等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

1895年12月，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田中玉复被起用，委为新建陆军右翼快炮队营帮带，不久升任新建陆军右翼炮队营官。1899年初，荣禄编组拱卫京师的武卫左、右、前、后、中五军，田充任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炮队统领。1902年初，袁以小站旧部为骨干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田为北洋常备军第一镇炮队第一标统带，补用参将。

1904年，岑春煊编练新军于广东，特调田中玉为协统。1907

年，田随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出关，任督署练兵处督练公所总参议，兼任刚成立的东三省讲武堂首任监督。1910年，程德全任江苏巡抚，调田中玉为江苏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统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告捷，全国各省纷纷独立。田仇视革命，反对独立，效命清廷，但又力不从心，遂于是年冬弃职北上，旋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兖州镇守使。

民国元年，田中玉一度代理山东民政长。其间，奉命去日本购买新式火炮。回国后，所购火炮无人会用，田便亲自试炮，个个成功，从此名声大震，被誉为“北洋炮圣”[(2)]。1913年7月，田中玉兼任曹州镇总兵，未逾一月，继施从滨任兖州镇守使。1915年4月，田到北京，接任陆军部次长。时值袁世凯图谋称帝，他积极支持，被袁封为一等男爵。1916年6月，袁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制斗争中死去，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个派系，田接替张怀芝任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隶属皖系。

1917年4月，田中玉参加段祺瑞召集组成的督军团。7月，张勋复辟失败，吉督孟恩远涉嫌复辟，被北京政府免职，拟派田继任；但张作霖不允许他人染指吉林，视田中玉为称霸东三省的障碍。吉林也不断发生挽留孟恩远并阻止田赴任就职的示威事件。在这种情况下，10月10日，田从张家口至北京面见段祺瑞，表明不愿卷入吉林混乱漩涡，得准复回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人贪婪，对下属要求颇苛刻。田在都统任上，连都统署食用的面粉都要亲自过秤，当时无电灯，特定标准照数发放灯油。

1919年11月，得到直奉两派支持，靳云鹏正式组阁，并兼陆军总长，推荐田中玉接任山东督军。1920年元旦，田被北京政府授勋四位。田在山东势力单薄，省长屈映光系“安福系”健将，素以阴谋家著称，与四十七旅旅长马良勾结在一起，军政齐抓，实力大大超过田中玉。田来鲁之初受到压制，不免栗栗自危。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田中玉表面上虚张声势，调动军队，对皖系表示全力支持，实首

鼠两端，坐视皖系失败。战后，田派胡聘三和郑士琦在禹城堵截马良，不许回济南。尔后北京政府将马良撤职，军队被遣散，省长屈映光也被省议会弹劾去职，从此解除了“安福系”对田的威胁。

直系控制北京政权以后，吴佩孚也想取得山东，已拟定督军与省长的人选，后因发生变故，不得不留任田中玉，田即倒向直系。1920年8月，靳云鹏再度组阁，对田中玉进行多方庇护，致使田能赶走省长齐耀珊，独揽山东军政大权。他亲自掌管督署收支，兼代省长后，没几天就捞到七千块大洋。直皖战后，第三师改编用款二十余万，而报销竟达六十余万，遣散四十七旅用款十三万余元，而报销三十万有余。军装费列入预算五十六万，实支出三十万元左右，兵工厂原定预算十二万，后竟增至二十五万，所有这些余款均流入田的小金库。

田中玉兼山东省长不久，即演出加赋一年裁军一半的把戏。有人劝他“山东在清末以来就没有加过田赋，怕加出问题来”[(3)]。田利令智昏，不听劝告，结果提案被省议会否决。在山东人民反对声浪中，田被迫于1921年1月30日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后因响应卢永祥电请裁兵，裁减了军费虚数，又核减了公署用款，受到中央褒奖，打消辞意。但此举并未缓和省民反对情绪。是年夏，扣留财政厅借边业银行之贷款三十万元作预支军装费，造成黄河宫家坝溃决之虞，财政厅长愤然辞职，由此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议员纷纷提出质问，田一面挽留财政厅长，一面宴请议员，笼络人心。

同年9月，在山东省选举第三届省议会时，田中玉操纵议会选举并分化议员，甚至出动军警包围议会，绑架议员，拘捕选民，指定选举人员名单，引发了青、兖等地选民罢选的风波。田又严密封锁消息，查封报馆。田中玉的倒行逆施，激起山东各界的公愤。旅京鲁人也集会宣布田之罪状，推代表谒见总统，要求速免田职务。而田毫无改悔之意，声言“山东反对我，我是不怕的。既是山东人与我不留脸，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叫他倒看看我姓田的本领就是了”[(4)]。果然田于11月携巨款进京，首先拜会鲁人同乡会被拒，又到西车站食堂设

宴，联络旅京鲁人，亦不能得逞。国务总理靳云鹏对田中玉也有所不满。田又赴保定加紧活动，屡谒曹锟陈述在鲁情形，苦言督鲁之难。曹叱之曰："如此无能，何以为人，鲁省人民如有任意捣乱者，可以军法从严惩办几个，若有反响，或他种变动，余（曹自称）当为汝后盾。至翼青（靳云鹏的字）处，吾即电彼，为汝维持。"(5) 曹锟密电靳，称无论如何，此次总得保全蕴山的面子，故田在山东众人倒之而不倒。

由于曹锟等人支持，田中玉耀武扬威返回山东，张灯结彩，大开筵宴。文自各厅长、道尹以上，武自师长以上，出席庆贺。此后田的倒行逆施有增无减，不仅在各地安插亲信，更公开卖官鬻爵。对田的劣迹，当时京沪各报馆曾连篇披露。田为掩人耳目，令警察厅具函各报声明更正。济南《大民主报》对田颇有讥讽，他虽大怒，欲用镇压手段，但因该报为教会人士所办，已在美领事馆注册，而不敢孟浪从事。

1922年1月，田中玉借口修堤（黄河）堵口，赈济灾民，提出向洋商借款，遭到省议会的反对，他便暗中怂恿部分不明真相的人上街游行请愿，转移矛盾，来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旅京山东人士集会，历数田任用私人、蹂躏议会、漠视河工、违法加税、纵匪殃民、借款营私等多条罪状。他以退为进，再次提出辞呈，得北京政府慰留；但传出韩国钧长鲁的消息，田急忙进京活动，并得到北京政府允诺加征丁漕税后返回山东。4月6日，他在济南召开各界人士大会，声言预征丁漕，在所必行，田某说的出，办的到，有反对者，我必铲除之。山东人能将我赶掉，我即走开不办，否则我在任一天，我要干一天。又威胁说今日报界亦在座，谁要泄漏我今日之秘密者，我即封闭之。与会者面面相觑。

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而告终。曹锟、吴佩孚进一步把总统徐世昌赶下台，让解职已经六年的黎元洪复任总统，黎元洪则打出"废督裁军"招牌来沽名钓誉。遭到鲁人反对的田中玉通电表示：

废督裁军，请自中玉始。这不仅是配合曹、吴敷衍黎元洪，更主要的是在缓和山东民众的不满。

在田中玉统治下的山东当局，对盗匪横行听任不管，将已得预算的游击费扣留不发，因此各军旅都不出力剿匪。山东民众苦于匪患，不得已团结自保，田又乘机把军队缴回的旧枪高价售给乡民，得款数十万元，尽数肥己。

1923年5月6日，在苏、鲁交界处临城（今薛城）、沙沟两站间发生匪首孙美瑶劫持几百名中外乘客要挟政府招安封赏的大案。由于旅客中有外国人，北京政府下令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陆军、内政两部议处，同时，又将应付事件的全责委之于田，田亲往枣庄与匪首谈判，首先达成被劫者与家属通讯联络的协议，后又达成放人协议。当中外旅客全部放回后，外国驻华外交使团两次通牒中国，要挟北京政府，其中有惩戒田中玉的条款。1923年10月5日，外交使团再次要挟北京政府惩戒田，曹锟被迫于10月15日罢免田中玉督军职，仅授益威将军虚衔，田遂隐居大连。

田中玉自蛰居大连，很少抛头露面，来往天津大连之间也是潜踪而行。他早在从政之初就出资兴办实业，以后又与北洋系其他要人合资开办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离开政治舞台后，田更亲自过问所办实业。他还在山海关购置大量房产，曾为其孀居的祖母与母亲建“姑妇节孝祠”，并遵祖母、母亲之训，在山海关等处捐设河北省田氏私立中学及田氏私立中学初中女子部、田氏预备学校、私立田氏初级小学等八校。1935年11月，田中玉在大连病亡。

---

(1) 秦皇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海揽胜》第1集“山海关”，1986年版，第84页。

(2) 秦皇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海揽胜》第1集“山海关”，1986年版，第84页。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2页。

(4) 《晨报》1921年10月29日第6版。

(5) 《晨报》1921年11月28日第2版。

佟麟阁

范立君　于晶娜

佟麟阁，本名凌阁，字捷三。直隶（今河北）高阳县边家坞村人。1892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生于农民家庭。其父佟焕文，母亲胡氏。兄弟二人，他居长，幼时就学于舅父胡老先生门下，读经史。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高阳县在庚子之变后，惨遭八国联军中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当地民众流离失所，困苦不堪。佟麟阁受父母和胡老先生嘱咐要勤奋读书，长大报国雪耻，所以他从小就有救民报国之志。

1907年由父母做主，佟与彭静智结婚。次年经人介绍到高阳县衙署充当缮写。公余浏览县志，增长知识，佟对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深为敬仰，遂有从军报国之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冯玉祥在滦州参加起义失败，次年冯经陆建章引荐，任北洋备补军左路第二营营长，后奉命到河北景县招募新兵。佟慕冯玉祥爱国之名遂投笔从军，开始了军人生涯。

佟麟阁入伍初为哨兵，驻守北京南苑。他训练刻苦，又有一定文化，不久升任该哨第一棚什长（班长）。在冯玉祥影响下，佟于1913年加入基督教，决心以耶稣精神牺牲自己，尽军人卫国保民的职责。同年被任命为排长。1915年升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二连连长。

1915年底，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兴起，冯部奉命入川“讨伐”护国军，而冯不赞成袁帝制自为，促成四川独立，沉重打击了袁的复辟活动。佟麟阁拥护冯的主张，参加了这一反袁行动。1917年，他又随冯在廊坊参加反对张勋复辟的战斗，升任副营长。1920年，佟

任第四团营长，驻防湖北。

1921年，冯部入陕，打败陕督陈树藩后，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1922年初，佟麟阁任该师第二十二旅第四十四团第二营营长。同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他作为冯部先锋出兵潼关，进攻倾向奉系的河南督军赵倜，大获全胜，为冯定河南做出了贡献。1923年，冯玉祥为培训高级军官，在北京南苑开办了“陆军检阅使高级教导团”，佟麟阁带职入团受训一年。他学习勤奋，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同年8月，被任为陆军步兵少校，并加中校衔。1924年2月升任团长，3月被授陆军步兵中校加上校衔。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于10月22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脱离直系，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改所部为国民军。佟部在回师北京后接着又奉命率一个加强营在徐水以南挫败直军曹世杰旅一部，协助友军合围保定。旋部队扩编，他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十一师步兵第二十一旅旅长。

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改所部称西北军。同年7月，佟麟阁被授陆军步兵上校加少将衔，后又升任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11月下旬，郭松龄起兵反奉，密约冯玉祥联合行动，佟奉命进攻热河策应郭军。他即率部占领滦河，出任滦河防守副司令。不久一度脱离张作霖的直督李景林改变态度，与张宗昌取得联系，组成直鲁联军，对抗冯军。佟又奉命参加进攻天津战斗，李景林败走山东；但因直系吴佩孚复起，与奉张取得“谅解”。在奉直及直鲁联军的联合攻势下，1926年4月中旬，西北军退出津、京，撤往察哈尔、绥远等地。佟部第十一师奉命断后，进驻得胜口一带，协助第十师刘汝明等部扼守京北的南口。南口是西北军顺利退往西北的要冲，佟麟阁利用南口的山势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奉军猛扑南口正面受挫后，改攻侧翼佟部阵地。佟指挥部队顽强反击，大量杀伤敌军，坚守南口四个月。后因多伦不守，奉军进至张家口，威胁到南口后路，佟部才于8月13日悄然撤出阵地前往绥远。南口战役显示了佟麟阁的军事才能，成为

西北军历史上的著名战役。

当时正在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得知南口失利的消息，立即回国，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重新整训部队，并与国民政府接洽。按照国民军当时部署，佟率部进入甘肃，在进军陕西解除西安之围后，移军天水。1927年被任命为甘肃陇南镇守使，代理甘肃督办。同年4月，冯玉祥接受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佟麟阁任第十一军军长。1928年1月，佟麟阁部在河州（今临夏）被回军马仲英部围困，损失很大，冯玉祥令吉鸿昌接管该部，佟赴兰州休息。

同年10月，冯玉祥为应付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举措，着手削弱包括第二集团军在内的其他派系实力，将所部缩编为十二个师（新制）。佟麟阁任暂编第十一师师长，继后改任第三十师、第二十师师长。不久调南京任国民政府参事，1929年，国民政府编遣会议后，任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委员。1930年春，冯、阎（锡山）联合起兵中原，对蒋介石作战，佟麟阁重返军队，担任第二十七师师长，驻守西安。由于张学良率军入关，冯的高级将领梁冠英、吉鸿昌、孙连仲投蒋，致使反蒋失败。冯玉祥率军西撤，被杨虎城阻于潼关。西北军余部被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佟麟阁任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而佟看到西北军大势已去，不得不交出兵权离陕而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华北成为抗日前线，二十九军接任察哈尔省防务，佟麟阁于1932年8月被任命为察哈尔警备副司令。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3日承德失守，二十九军被急调到长城一带迎敌。3月9日，长城要塞喜峰口失守。宋、佟调三十七师兼程前来，乘夜收复了喜峰口两侧制高点，压住了日军，次日又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宋、佟及三十七师旅长赵登禹总结经验，决定采用夜战。入夜，由赵登禹率兵迂回到敌后，接近日军特种兵营地，举大刀冲入敌营，击毙日军无数，炮兵大佐被击毙在睡梦中，出奇制胜，夺回了喜峰口。

面对日军侵略的严重形势，冯玉祥坚决主张团结抗日。此前，冯来到张家口与佟麟阁共商大计，得到佟的支持，于同年5月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佟任第一军军长，兼代察哈尔省主席，并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他与吉鸿昌第二军、方振武第三军紧密配合，向张家口北部的日伪军展开强大攻势，将其赶出康保、宝昌、沽源，收复多伦，屡战屡胜，军威大振。但蒋介石诬冯玉祥“滥收散兵土匪”，“妨害统一政令”等，派兵加以围攻。在日、蒋的夹击下，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8月，冯不得不抱恨离开张家口，退居泰山，由宋哲元再任察省主席，佟改任察哈尔警务处处长兼省会公安局局长。不久佟也离开张家口，退居北平香山，以研究圣经教义、练字、摄影消愁度日。

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中央军退出华北，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百事缠身，急需一位文武兼备的干才协助。在宋及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的邀请下，佟麟阁于1936年夏复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驻守南苑。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提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使佟麟阁受到鼓舞，看到了希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是日午夜，日军向宛平城开炮，中国守军奋起反击，抗日战争开始。当时宋哲元尚在山东，由佟麟阁主持军部，他抗日意坚，力主战议，在南苑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慷慨陈词：“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同月13日，二十九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表示：“保卫国土，义不容辞，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冯治安、赵登禹将军纷纷请战，全军将士群情激愤。18日，日军再次炮轰宛平城。此后，北平城外战争打打停停，日军佯示和议，拖延时间，以便增兵。而宋哲元迷惑于日军“和谈”假象，南京政府也没有抗战决心，未能及时集结军队，佟麟阁只好坐守南苑。

日军在华北地区已有十万兵力，并在继续增加和集结。从7月20日午夜开始，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很快攻占廊坊、丰台，南苑战斗频繁。27日，日军调动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机械化旅团、飞机三十多架，猛攻南苑、北苑、黄寺、沙河、团河等地，南苑至北平间的公路也被敌人切断。佟麟阁等人说服了宋哲元，紧急调赵登禹部来北平增援。28日拂晓，日军由南、东、北、西四个方向向北平附近阵地发起总攻。南苑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守军仅有二十九军卫队旅、军官教导团等部约二千人，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面对强敌，佟与赵誓死坚守，英勇抗击，由晨至午，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下午，佟麟阁等奉命率部向大红门转移，中途被日军包围，尤奋力与敌苦战。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阵突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顿时鲜血染红了裤腿和鞋袜。部下劝他退后急治，他不允依然带领士兵拼杀。这时又遭敌机狂轰滥炸，佟麟阁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英勇殉国，终年四十五岁。中国红十字会将其遗体从永定门运回北平城，安置在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内。同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平市政府和各界人士把佟的灵柩移葬到北平西郊拦箭沟半山腰处，并将北平西城区的一条街和通县的一条路定名为“佟麟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发出通知，定佟麟阁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并为佟将军修墓立碑。

主要参考资料

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2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党德信、杨玉文主编：《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武月星等编著：《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中华民国史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郭雄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马洪武编写：《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土肥原贤二

汪仁泽

土肥原贤二，日本冈山人。1883年（日本明治十六年）8月8日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土肥原良永系陆军少佐，兄土肥原鉴曾任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自幼受到家庭中武士道精神的熏陶。

土肥原贤二十四岁时入日本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以成绩优异转至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十六期生。1904年秋毕业，任步兵少尉，供职于高崎步兵第十五联队。期间曾一度被派至中国张家口一带从事谍报活动，工作出色，1907年升为中尉。次年被选送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夏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军部参谋本部。11月奉派至中国，任驻华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1)]的辅佐官，开始间谍生涯。他经常随坂西与我国北京政府军政要人交往，曾受张作霖聘任为齐齐哈尔驻军的军事指导官两年。此后一度回国任冈山步兵第五十四联队队附，后又被参谋本部任为少佐部附，派至欧洲短期工作。1920年，奉派至黑龙江尼港地区调查该地日本领事馆受不明国籍舰艇炮击事件。起初漫无线索，后来他从中国一炮舰的用煤记录中发现事发当天的耗煤量激增，据此迫使中国方面道歉，索赔巨款，他也因此受到参谋本部的嘉奖和重视，不久晋升为中佐。1928年初，土肥原受聘为张作霖的私人军事顾问。5月张在与北伐军作战中失败，指挥奉军退回东北。此时张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不愿再对日本俯首听命，拒绝中日合修吉会铁路，因此与日方矛盾激化。在土肥原等人的合谋策划下，6月3日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炸毙[(2)]。不久土肥原升为大佐，并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精通汉语，谙熟我国习俗，交游广阔，平时寓所宾客满

座，皆系军阀显宦等辈，他从宾客高谈阔论中刺探我国机密情报，成为日本军部有名的“中国通”。他待人接物貌似温厚，实则城府深沉，惯施阴谋诡计，用心险恶，手段毒辣。1931年初，日本加紧谋划侵占我国东北，土肥原先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8月改调奉天特务机关长。在到任视事前，为制造“九一八”事变，土肥原特赴上海、汉口、北平、天津等地，搜集我国军政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以作最后的估量[(3)]。在事变前数天亲去日本东京，向当局汇报，成为事变的主要组织和策动者之一。事变发生的当天，他绕道朝鲜重返沈阳。事变得逞后，他出任奉天（即沈阳）市长，兼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发言人与占领区“自治指导部”的负责人。他在沈阳及占领区内组织成立日伪地方机构，并实行鸦片专卖，公开发售毒品[(4)]，广设妓院、烟馆，毒害我国人民。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军部召集土肥原、坂垣、石原等人商议事变后的对华政策，土肥原建议制造一个“以宣统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作为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第一步。他的建议经军部批准，并指定由他负责执行。11月8日，土肥原在天津策动武装暴乱，当晚乘混乱之际，将溥仪用汽车接至塘沽港，搭轮劫持至东北。1932年3月，溥仪的傀儡政权正式在长春（伪称新京）登台。翌年2月，在土肥原秘密策划下，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地附逆，日军顺利占领了热河全境。4月土肥原因功晋升少将，旋被任命为广岛第九旅团长。一年半后来华，复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于6月初以关东军代表和华北日本驻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借口日本特务人员大月等四人在河北张北受阻的所谓“张北事件”，要挟中国政府当局指派察哈尔代省长秦德纯与之谈判，签订了城下之盟《秦土协定》，从而使日方控制了冀、察两省。此时土肥原又频繁往来于张家口和承德之间，与内蒙德王多次会晤，筹划炮制伪内蒙古自治政府。11月，土肥原又唆使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国民党通州专员殷汝耕打出反蒋亲日的旗号，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土肥原进一步迫使宋哲元成立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

会”，后又当上该会的最高顾问进行“指导”，使华北政局“特殊化”。此后天津一带汉奸、特务公然横行，嚣张一时，抗日力量受到严重遏制。

1936年初，日本军部图谋扩大侵略鲸吞我国，着手扩编和充实侵华军事力量。3月将土肥原调回日本东京，任留守第一师团长。翌年3月，又以“钦命”调任宇都宫第十四师团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土肥原率领该师团，更新装备，从大阪出发，于8月20日在我国塘沽登陆后，立即投入华北侵略战场，气焰十分嚣张。他纵容侵略军沿路烧杀，疯狂残害无辜，惨绝人寰，直抵黄河渡口。1938年5月，土肥原师团为配合进攻武汉，准备向郑州发动攻势。6月11日，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岸，水淹数十县，使土肥原所率侵略军在一片汪洋中陷入绝境，被困经月；但18日土肥原本人忽奉调回国，任日本参谋本部部附，此时他的军阶已升至中将。

是年7月8日，日本五大臣会议决定策划在我国的日军占领区内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伪政权，为此特设由土肥原、津田、坂西等人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指定土肥原为主要负责人。土肥原立即在上海虹口设立“土肥原机关”。为了物色傀儡工具，9月土肥原在上海与唐绍仪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但不久唐被暗杀而无果。接着他又以吴佩孚为对象，经过多次接触，吴未能答应日方要求，拒绝日本拉其下水，还要日军撤出中国，结果以1939年底吴的突然死去而告失败[(5)]。此时土肥原转而参加原已在进行中的对汪精卫一伙汉奸的招降工作，经过日方以土肥原、影佐祯昭等为代表与汪伪陈群等为代表的多次谈判，后来汪精卫直接参加，双方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6)]。土肥原因功于4月被授予二等金鸢勋章。

1941年4月，土肥原擢升陆军大将，并被召回日本，先后任航空总监、最高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等职。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土肥原调至中国东北任日军第五军司令官，于中苏边境制造事端，指挥所部在诺门坎地区对苏作战，破坏苏日中立条约，牵

制苏联兵力。希特勒1942年11月特颁给土肥原鹰徽卐字勋章，并赞扬他“在联合作战方面颇多贡献”。1943年5月，土肥原调任日本东部军司令官。

1944年初，由于英美盟军的反攻，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处境日趋险恶。是年3月，土肥原奉调赴新加坡就任第七方面军总司令[(7)]，防守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区。任职期间纵容侵略军在辖区内肆意拷打、屠杀、虐待集中营的平民和战俘，种种暴行令人发指。10月，日本海军在菲律宾莱特海面与美决战中大败，丧失制海权，新加坡已成为盟军进击的目标，土肥原向日本大本营表示决与阵地共存亡，同时加紧野蛮统治。1945年4月，土肥原被召回本国，任军事训练总监，为军方最高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训练总监）之一。

1945年8月，日本被迫宣布投降，铃木内阁总辞职，土肥原曾被提名为新内阁陆军大臣人选，后未果。8月24日，日本东部司令官田中静一自杀，土肥原降格接任遗缺，以稳定局面。9月12日，拱卫东京的第一军总司令杉山元帅又自杀身亡，土肥原再被派去递补。但未及上任，次日即作为甲级战犯被盟军逮捕。在审讯中他态度顽劣，始终未发一语，拒不认罪[(8)]。1948年11月12日，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鸭巢监狱被处决。

---

(1) 坂西利八郎（1870年—1950年），清末民初的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同时受聘为清政府兵部顾问，后又任冯国璋总统府的顾问，冯下台后转而支持段祺瑞，成为日本政府与北京政府间的重要人物。见杜春和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2) 张作霖被炸时，另一日本顾问仪我诚也在车上陪同，竟得免一死，爬下车后即去责问土肥原，为何事前不告知他，险些“我也给干了”。见杜春和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第230页。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2190号B。

(4) 日本为了筹措侵略军费，早在1929年起即在台湾、朝鲜储存及设厂制造鸦片毒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377号）。法庭审讯土肥原时。田中隆吉作证称："满洲每年税收仅鸦片一项就达二千万日元。""所有东北的鸦片和毒品买卖都是由沈阳特务机关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3470号）

(5) 吴佩孚当时在北平，对吴的计划在土肥原机关内部称为"吴工作"，所需经费在中国日占区的海关关余项下支付，动用时日人姓名是保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3608号A、3743、3744、2190号A）。

(6) 据影佐桢昭等人在法庭上陈述：汪精卫逃出重庆经河内于1939年5月到达上海，6月初即与土肥原等人直接谈判，直到汪伪政权的建立，土肥原一直是直接"指导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证据第3302号，法庭记录第30115页、30441页）。

(7) 土肥原在上任时曾对下属训话，自称"我以'主一无适'作为精神信条"。"主一无适"一语出自我国宋儒程朱学说，意谓至诚则专一而不移，"心中无欲，天理自纯"。这既说明他标榜以"至诚"来笼络部下，又可见他对我国儒家学说颇为熟悉。

(8) 土肥原在法庭上对其宣读起诉书后，他竟声明不认罪。在受审时他自知铁证如山，罪责难逃，始终未发一言。中国政府国防部次长秦德纯1946年5月在法庭上作证时称日本侵略我国，"土肥原是执行侵略政策最重要的主持人"。法庭根据大量证据，并在审讯同犯坂垣等人时，其罪行又得到相互印证，最终他同坂垣等同被判处极刑。

万福麟

丘琴　姜克夫

万福麟，字寿山。1880年12月21日（清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生。吉林省农安县人。万福麟八九岁时受雇于王老魁地主家，白天放猪，晚间在伙房烧火及刷洗炊具等，主人怜其贫困，年终分给半个长工的劳金，直到他任黑龙江督办，时人仍戏称之为“万半拉子”。

1894年中日战争后，东三省成为俄、日帝国主义觊觎之地，不断收买民族分裂主义者和胡匪作乱。清政府敕令奉天将军增祺扩充军力。这时，万福麟正当壮年，遂弃农应募入伍，被编入吴俊陞的奉天后路巡防营。万在讨伐陶克陶胡、巴布札布等顽匪战斗中屡立战功，由士兵提拔为哨官，清末升任管带。民国成立后，吴俊陞部改为奉天骑兵第二旅。1916年袁世凯称帝，扩编吴俊陞部为中央陆军第二十九师，万升任第一一四团团长。1920年升任第五十七旅旅长，长期驻防黑龙江并曾兼任中东路哈满段护路军司令。

1924年，张作霖扩军，吴俊陞任镇威军第五军军长，万福麟升任第十七师师长，辖马占山、张殿九两个骑兵旅。1925年10月，张作霖为与冯玉祥争夺华北地盘，命令吴俊陞率万福麟骑兵师并指挥奉军穆春和吉军张九卿两个骑兵师及黑龙江省的梁忠甲步兵旅，横越蒙古草原向多伦进军，抄袭张家口冯玉祥西北军后路。此时郭松龄倒戈反奉之战突然爆发，11月下旬，吴俊陞接张作霖告急电，命令进入热河的部队迅速班师赴援。等到吴部骑兵调回到出击地点时，吴即于12月21日到达辽中前方指挥作战。22日拂晓，以万福麟骑兵师为突袭部队，穆春骑兵师随万师挺进，张九卿骑兵师在大民屯左翼警戒。23日拂晓，归马占山指挥的焦景彬骑兵十七团首先攻入郭松龄的指挥部，后穆师王永清骑二旅终于将郭俘获。战后，万福麟升任第八军军长，

马占山继万任第十七师师长。

这时吴佩孚被直系将领拥戴再起于武汉，由助孙传芳反奉转为联合张作霖、阎锡山发动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1926年6月，从两广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很快打败吴佩孚、孙传芳，抵达长江流域。冯玉祥国民联军转进陕、甘，准备东出潼关，逐鹿中原。1927年2月，张作霖借口援吴，派张学良、韩麟春率三、四方面军团进入河南，万福麟部入列张、韩麾下陈兵豫西，堵塞冯玉祥军进入中原。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9月，阎锡山突然背盟，出兵娘子关，企图截断奉军归路，很快被奉军击败，缩回山西老巢。晋军傅作义第四师抢占涿州后被奉军截住，未能撤回山西。张学良为拔除锲入奉军后方的钉子，指挥部队连续发动三次攻击，亦未攻下。张作霖复派万福麟为攻城指挥官。万指挥柏桂林部工兵挖掘坑道，轰击城垣，又令邹作华指挥百门大炮向城内狂轰，并调来六辆坦克突击城门，均未得手。万久攻涿州不下，备受张作霖申斥。万福麟提议以毒瓦斯弹攻城，被张采纳，但这些炮弹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物资，早已失效。后经三、四方面军团参谋长鲍文樾建议，采取围城战术，奉军围困两个多月，天气逐渐变冷，百姓饿毙者数以千计，守城晋军亦饥饿难忍。鲍文樾与傅系保定军校同窗好友，在鲍劝说下傅遂于1928年1月6日开城接受改编。从此，傅作义、万福麟以涿州围城之战知名于世。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和吴俊陞被日军炸死，东三省参议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接任后，任命万福麟继吴俊陞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常荫槐为黑龙江省长。奉军退回关外后，张学良为减轻人民负担，大力裁编军队。常野心勃勃，利用省款组建数团山林警备队，以扩张势力，且轻浮狂躁，咄咄逼人，不断流露出万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应将司令部移至海拉尔。万忍无可忍，乃向张学良及其夫人于凤至哭诉。凡此种种，均为张在处决杨宇霆时将常剪除的重要原因。

同年12月31日，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任命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

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翌年7月，张保举万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从此，万集黑省军政大权于一身。万福麟统治黑龙江三年，是张学良大力从事东北建设的时期。万在黑省积极剿灭胡匪，社会安定；禁种鸦片，招收冀、鲁灾民开垦，农业得到很大发展；修筑齐克（齐齐哈尔——克山）铁路等。但用人唯亲，所有重要官职均委之自己亲属。东北陆军第二十九旅，委其内兄王永盛为旅长；东北陆军第三十旅，委其义子于兆麟为旅长；黑省仅有的洮昂（洮——昂昂溪）、齐克两条铁路，竟委其长子万国宾为局长。

万福麟与张作相、吴俊陞、张景惠、汤玉麟这些同张作霖打天下的人相比属于晚辈，是被张学良提拔到封疆大吏位置的，故对张奉命惟谨。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均派代表至沈劝张学良参加己方，张偏重助蒋，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则主张坐山观虎斗，万与于学忠、王树常等则唯张学良的命令是从。是年9月，张决定拥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1月，设副司令行营于北平（今北京），节制北方八省军队。5月，张患伤寒病，住协和医院，万来北平探视。张患病不能理事，万即以北平军分会常委身份会同军分会参谋长戢翼翘、于学忠（第一军军长）、王树常（第二军军长）、鲍文樾（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代张处理军务。是时，被张收编的冯玉祥旧部石友三，闻张学良患重病，突于邢台叛变，万福麟即飞调黑龙江的王永盛、于兆麟两国防旅入关，协助于学忠、王树常两个军平息了叛乱。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乘东北军大部调进关内，突然进攻沈阳北大营，随后即占领辽宁、吉林各重要城市。张学良大病初愈，尚不能完全理事。闻变后，各将领惶惶然不知所措。张于9月23日派万福麟和鲍文樾飞南京见蒋分石请示方略。蒋面告万、鲍二人：“你们回去告诉汉卿，他现在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万等返回，转达蒋意，促使张学良对日军进攻持暂不抵抗的做法。

同年10月，日军开始向黑龙江进攻，张学良电委省防军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任讨逆军总指挥，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为副指挥。马、谢二人率领黑省三万驻军对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作战。万国宾代行其父职务，大权在握，对马、谢多方掣肘。此外，万还派人与投敌的蒙边督办张海鹏谈判，幻想保住万家父子的江山。11月中旬，日本关东军进攻嫩江桥，省垣岌岌可危，万国宾竟席卷黑龙江省库公款潜逃，据上海《申报》揭露数字达一千一百万元。对万国宾侵吞巨量公款事，国内外报刊纷纷抨击，万福麟声名狼藉。嫩江桥一战马占山名声大噪后，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马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并于1932年1月17日，免去万福麟的主席及边防军副司令职。后由张学良于1月21日任命万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总参议，倚为左右手，参与重大军政事务的决策。1933年春，日军开始向热河进攻。张为抵抗日军侵略，自兼华北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于学忠、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军团。任命张作相为华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汤玉麟、孙殿英两军团及退入热境的东北义勇军防守承德、赤峰及朝阳、开鲁等城。时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辖奉军主力五个师，布防于凌源、叶柏寿（今建平）、平泉等地，阻击日军沿锦（州）承（德）大道西进。日军进袭时，防守热东前线的汤玉麟第四军团不战溃逃，防守叶柏寿、凌源两要道的王永盛、于兆麟两师亦溃败。日军发动进攻未及旬日热河即丧失，全国舆论大哗，要求惩办汤玉麟、万福麟。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张仅通缉汤玉麟，撤销王永盛、于兆麟师长职务，对万未予任何处分。

同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在离平前将东北军整编为四个军，万福麟任五十三军军长，辖缪澄流、周福成等五个步兵师，黄显声、郭希鹏两个骑兵师和乔方炮兵旅，为当时东北军中最大的一个军。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后，万和于学忠两个军仍在华北。

自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后，万即极力与何靠近。当时蒋介石为控制军队，在各军设立政训处，派往东北军的政训

处均遭主官拒绝，而万独接受。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对万和东北军进行所谓谋略工作（抗战期间日军大本营给的代号谓“狗工作”），万始终未为所动，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

1936年初，张学良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纳中共党人，改造东北军。万认为张此举尽听信青年人，早晚要吃亏的。张为逐步撤下不跟他走的高级将领，1936年秋，将黄显声由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教务长提升为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万极反感，从此和张产生矛盾。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令万率军抢占郑州，切断陇海铁路。黄显声和进步军官主张执行命令，万却表示这么大的事汉卿也不和我商量就干，简直是胡闹。由于万按兵不动，使何应钦顺利地输送十余万中央军进驻潼关。翌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立即解除黄显声一一九师师长兼职，并拟将中共掌握的一一六师吕正操六九一团缴械，由于吕事先采取措施，万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万即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整编方案，将五十三军缩编为一一六、一三〇两个乙种师，并借机派其亲信充任师、旅长，将五十三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全面对日抗战开始。是时，万福麟任第二十六军团长，指挥本军和冯占海独立第九十一师，布防于固安、永清永定河南岸。9月19日，日军进攻万福麟军团防守的永定河防线，首先击溃防守固安的冯占海师，以后连连得手，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退，万部也随之南撤。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程潜拟调万部坚守石家庄，万为保存实力既不架设电线与行营联系，还派其军部参议李树滋去子牙河前线联络吴克仁，谓平汉线中央军已溃，应离开交通要道与他靠拢，退入太行山，企图将吴的部队抓到手。对于津浦、平汉前线军人拥兵避战的罪行，抗战将领纷起抨击。后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仅将韩复榘和檀自新枪毙了事，万因何应钦庇护未被追究。同年10月，万福麟军撤退到辉县整顿。翌年1月，土肥原师团渡过漳河。奉战区严命万率部迎击，但屡战屡败，退入太行山区，在八路军

掩护下休整。1938年5月，万福麟部渡黄河，徐州会战时固守郑州、汜水河防。7月，武汉会战开始，蒋介石将万部调往长江南，隶陈诚第九战区张发奎第二兵团，部署在阳新一带掩护武汉卫戍部队右侧翼。10月初旬，日军攻下长江沿岸要塞后，又于14日攻陷阳新，万率部于三溪、金牛镇等地节节抵抗，最后以残余部队坚守贺胜桥掩护武汉守军撤退。25日武汉失守，万始率残部退往湘西。

同年冬，蒋介石改委万福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周福成升任军长。万到重庆后经常与东北老官僚刘哲等作竹雀之戏。1940年5月，万奉命任辽宁省政府主席。抗战后期与萧振瀛联合开办大同银行。1945年5月，万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聘他为顾问，不久即离沈阳。1949年，万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在台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1年7月15日，因脑溢血在台中寓所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美］鲍华德主编、沈自敏译：《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

岳超：《奉晋两军涿州之战》，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1901—1936》，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夏商周：《抗日战争时期的五十三军》，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史资料》（内部资料）1982年号。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天津政协编译室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大事记》1932、1933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万福麟》，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万福麟》，秦孝仪主编《革命人物志》第22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330页。

汪大燮

朱杰仁

汪大燮，原名尧俞，字伯唐，一作伯棠，浙江钱塘人。1859年12月20日（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生。先世由安徽黟县弘村迁居钱塘。父汪清冕，字子周，广东候补盐经历。汪大燮从小过继给汪清澜为嗣子。1878年应童子试为秀才，1889年中浙江恩科乡试举人。后因累次会试不中，遂捐赀为内阁中书，又由会典馆保升侍读及户部郎中。不久，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任驻俄使馆参赞，然未成行。1895年参与发起北京强学会，任强学书局总办事人，又充《中外纪闻》主笔。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汪奔赴慈禧与光绪所在的陕西，当时总理衙门在陕西者只有一二人，汪大燮得以参与中外交涉事宜。《辛丑条约》谈判时，俄国趁机占领东三省，提出特别利权，迫清政府签订专约。议和大臣李鸿章急电西安请旨，清政府方面已准备妥协，而汪大燮代新任驻俄使馆大臣桂春上说帖，痛陈各国均势利害，谓万不能于和约之外，别订专约，致使各国仿效。后清政府从其议，拒与俄国签订关于东三省的特别条约。自此后，当局以汪大燮知外国情势甚详，经常咨询。

190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汪大燮任和会司员外郎。1902年任赴英贺国王加冕专使载振的参赞。同年，发生中国留日学生的成城入学事件，为此清政府派遣汪大燮为首任留日学生总监督。1903年在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中，汪大燮一面劝导学生，一面向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方面密告留日学生的动向。同年补外务部左参议。1905年转右丞，充出使英国大臣。

汪大燮在驻英任内，以张国体保国权为帜志，同时意识到“今日政治之乱，非立宪何能挽回”。11月，汪大燮与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拟

定奏稿，并联合前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等八人入奏，请求清政府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指出“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者”，而“保邦致治，非此莫由”。为此清政府应急需实行三事：一宣示立宪宗旨，二布地方自治之制，三定集会言论出版律，此三者为“宪政之津髓，而富强之纲领”。1906年3月，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三大臣考察英国政治，汪大燮为之安排行程、联络，聘请英国学者按日给三大臣及其随员讲述英国宪法纲要、内阁各部的设置及地方自治制度，并“尽昼夜之力”向载泽等痛陈改行立宪。

汪大燮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其时甚为流行的“黄祸论”，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当时欧美强国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借口，尤其是德国在东亚的争夺利权，其结果是英、德相争。就中国而言，“倘英、德弃旧嫌而结新好，必将以我为礼物，此则无可挽回矣”。同时，汪大燮对禁绝鸦片、币制改革、海军与财政上了一系列的奏折，对晚清的改革有较为系统的认识。1906年5月，英国下议院对鸦片贸易政策进行辩论，要求英国政府停止鸦片贸易，汪大燮获悉后，于7月初上折请求清政府禁绝鸦片。汪认为“若设我果有禁意，英必投袂而起以表同情，可以断言矣”，指出如果只是“以征为禁”，虽利于税收，而英国“反恐有要求也”，并提出包括稽查、限种、戒瘾和专卖的一整套办法。汪的上奏终使清政府于9月发布禁烟上谕。1907年1月，汪大燮条陈“行用金币”，主张实行金本位制，以解清政府国库之支绌。汪大燮认为按照日本的办法，金银币的比价定为一比二十八，银币高于银块市价十分之二，则中国赔还洋款、赎回铁路及购买武器等费都可节省二成，一年就可省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这样就可以救政府财政之急。这一奏折也引起清政策决策层的重视，交度支部条议。1907年4月，度支部尚书溥珽以汪大燮折中所说“何言之太易，于国际通商、货币原理均未加体验”议复。当然，汪大燮也深知“用金银一节，非真正财政家不易断”，但在其看来中国只有解决了财政与海军问题，“乃能立于不亡之地”，因此又“具海军计划于政府”，主张利

用英国的帮助重建中国海军，而海军所需有经费则从鸦片专卖中筹得。

1906年，汪大燮补外务部右侍郎。1907年6月由英国回北京就任，即卷入了江浙铁路风潮事件。先是，1898年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签订苏杭甬铁路借款草约，1903年5月盛以英商办路逾期多年为由提出废约，1905年江浙绅商分别组成铁路公司集款筑路，而英国银公司此时突然催定正约，并由英国公使朱尔典（J．N．Jordan）出面向清政府施压。汪大燮奉命与英国公使磋商两全之策。汪大燮认为“用外财办国内事，各国皆有之，但患事权同去耳”，故提出“部借部还”和借款、造路分为两事办理的方案，即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不用路权作抵押，而用其他国家收入项抵押；出售铁路债票，由中国自行购回；修筑铁路材料由中国自行采办，英国方面不得干预；聘英国工程师一人，受中国总办节制。浙江方面群情大哗，谓汪“以浙人卖路媚外”，为“浙路罪魁”，宣言削除汪等人浙籍，并恐吓掘汪家祖墓。对此黄远生在民国初年有过中肯的评论：“汪氏之爱国热诚及缜密勤慎，以吾所见，前清大官中，吾未之见。苏杭甬一案，知其内容者，皆知与汪氏丝毫无关而横被唾骂，几于葬送此人一生，此真平情论事者所引为痛心者也。”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汪科举时的座师、军机大臣瞿鸿禨因袁世凯等的攻讦于7月被开缺回原籍，8月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汪遂不安于位，9月转任出使英国考察宪政大臣，并于11月出京，江浙铁路交涉事宜转由袁系的梁士诒负责。

1908年，汪大燮赴英就职，其间又补仓场侍郎，复转邮传部左侍郎。1909年考察事务结束，成书《英国宪政丛书》上奏。1910年出任驻日公使，1912年由驻日公使改任中华民国临时外交代表，传递有关清帝逊位及改共和政体事项。5月，共和党成立，汪以驻日公使的身份，为该党留日支部长，后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汪当选为名誉理事。1913年任中华民国外交代表。同年，任满回国。8月，熊希龄正式受命组阁。9月，熊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

经验的内阁”，实际只有教育、司法、农商几个位置由熊来配置，因袁世凯早就选定了内务、外交、交通等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汪在教育总长短短的任上，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设法维持各中小学、师范学校，同时制定专门及大学各项学制，制定学制系统，组织社会教育事项。但其在任上也发表废除中医的言论，谓“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废止中医”，遭到京师医学会的反对；又以费用过多，风气不正，学生程度尚低及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立一个大学为由，拟将北大停办，合并于天津北洋大学，遭到反对后，又谋将北洋大学移至北京，也遭北洋师生的反对。

1914年2月，汪大燮辞去教育总长。3月，任平政院院长。平政院直隶于大总统，专司行政裁判，负责“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行为”，汪大燮根据东西方各国的规章制度，为草创平政院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但实际上，平政院长是闲曹，所谓“察理”俱托空言。正如当时有人指出：“民国有势力无法，少有凭藉者断非平政院所能制裁，其无势力者先自默尔，与人无竞，更不劳裁判。”1914年5月，新约法公布。这个约法规定设立“参政院”作为总统的咨询机关，并在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代行立法院的职权，还拥有宪法起草权。而参政院的参政由总统委任。这样袁世凯通过参政院掌握了制宪权。5月，袁世凯任命黎元洪兼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秘书长林长民。8月18日，参政院迎合袁之意，建议修改1913年10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后通过修正案，改总统任期为无限期，可由现任总统推荐下任总统人选。1915年9月，参政院议决请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12月，由汪大燮提议，参政院议决由参政院以国民大会总代表名义向袁世凯上“改用君主立宪”的推戴书。1916年6月，袁世凯复辟帝制闹剧收场，29日，参政院被裁撤。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阁。段祺瑞提出由汪大燮任交通总长。但汪为舆论所不容，7月12日汪大燮提出辞职。10月，段祺瑞提议由汪大燮任外交总长，又为众议院所否

认。段祺瑞执政后，即发生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之争，进而由于对德参战问题而进一步激化。1917年5月，黎元洪邀请张勋入京调停。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帝制。5日，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汪大燮负责与各国公使团的外交问题交涉。1917年7月，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的姿态再次组阁，汪大燮任外交总长。11月下旬，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失败，提出辞呈，以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屡次催促中国参与对德战事，汪大燮力主参战，认为参战能使中国国际地位得以提升，缓期庚子赔款，从而使财政困难得以缓解。先是2月间，汪在北京参与和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商议参战条件；3月，汪以日本赠勋大使身份，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寺内正毅和外相本野一郎就对德参战问题交换意见；4月，段祺瑞组织国际政务评议会，这一机构专门研究有关参战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内阁决策提供依据，由段任会长，汪任评议员。正是在汪大燮任外交总长期间，中国正式对德奥宣战。这一决定，最终使中国得以在“一战”结束后，能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巴黎和会。

1918年12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立外交委员会，为总统和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咨询及建议，“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并“承大总统之命调查审议外交事件”，由汪大燮任委员长。汪大燮向徐世昌密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形势，认为中国以收回胶济铁路利权和青岛主权为主要目标。1919年1月6日，外交委员会将所拟政府对巴黎和会的提案草案呈北京政府，包括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和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1月8日，国务院将其发给中国代表团，成为中国政府的正式提案。由此外交委员会和北京政府在讨论和拟定方案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方案没有涉及山东问题。但统一铁路案触动了日本在山东的利益，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遭到新旧交通系的曹汝霖、陆宗舆、梁士诒的反对。1919年2月18日，钱能训在中南海召开特别会议，汪大燮、林长民坚持此案。汪在给徐世昌的条陈中

说："改变政治性质之路为商业性质之路，改变一国单独垄断之政策为本国完全之基础"，并强调"能改则存，不改则亡"。此案终以研究系的妥协告终，国务院电令中国代表团在提案中删除这一条。汪大燮为此提出辞职，使外交委员会处于停顿状态。后经林长民恳请汪回会视事，外交委员会才重新开始工作。

与此同时，汪大燮等还从事国民外交活动。1919年2月12日，蔡元培、汪大燮、林长民、熊希龄等在北大召开"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强调国际联盟应保证各国政治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汪任代理理事长。后又联合国际联盟协会、国际研究社国际联盟同志会合组中国促进国际联合总会。2月16日，蔡元培又与汪、林、熊等一道组织成立"国民外交协会"，从事国民外交活动。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一面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签订的密约和合同，收回德国在我国山东的一切权利，同时在国内多次举行演讲，呼吁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权利而斗争，实行国民外交，摈除秘密外交。

4月30日，巴黎和会决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5月1日，陆徵祥电北京政府，请示是否签字。外交委员会获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致电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并由汪大燮、林长民二人将致专使的拒签电文亲呈徐世昌。但国务总理钱能训于3日又另电专使签约，为林所知。汪大燮见事已至此，辞去职务，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事务。当晚，汪大燮将此消息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持坚决反日立场的北大学生许德珩及《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把拒签和约的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五四运动由此而引发。五四运动发生后，汪大燮联合王宠惠、林长民，联名具呈警察总长吴炳湘保释被捕学生。而皖系认为五四运动是研究系煽动起来的，谓"学生受政客林长民、汪大燮之运动"。故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对研究系提出一系列的弹劾案，攻击"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

力范围之名，不惜将全国铁路置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铁路为国家之命脉，汪大燮等宁不知之”？

1919年12月，徐世昌特邀段祺瑞、汪大燮等入府咨询，决定组成由国务总理靳云鹏为会长，汪大燮、林长民等为委员的鲁案委员会对此进行研究讨论，决定中国方面不单独与日本交涉的宗旨。1921年8月，美国政府邀请英、法、日、中等九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以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不声援中国代表。同年8月，梁士诒、汪大燮等组织太平洋研究会，希望能够联合南方一致讨论，并为此致电询孙文、陈炯明、黎黄陂等。9月，汪大燮、孙宝琦在北京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再次希望“无党派畛域之分，惟冀抒发国内贤达之所见，共同主张”。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为研究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各项条款如何施行问题，1922年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特任汪大燮、孙宝琦为正、副会长。

1922年，汪大燮任平政院院长。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汪大燮与蔡元培、梁启超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通电，寄希望于直系的吴佩孚，称其“伟略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提出解决时局当先谋国家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但宪法未成以前，所有统一善后各问题，应由南北各省选派代表于适中之地组织会议，协谋解决”。这呼应了吴佩孚所提“恢复法统”与开国民大会的主张。

1922年9月，王宠惠组成“好人内阁”，受到直系吴佩孚方的支持。11月，众议院长吴景濂等借口财长罗文幹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迫总统黎元洪将罗逮捕入狱，内阁遂总辞。汪大燮受黎元洪之托具状将罗文幹保释。29日，黎元洪任命汪大燮组阁。汪于30日上午就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但声明代理期不超过十天。但即使如此，汪就任的当日，议会方面张伯烈即以汪“事前迎接罗犯出狱，事后补具保结”通电反对汪任国务总理，随即议会方面的吴景濂、直

系津保派江西督军蔡成勋、直隶督军王承斌等人也通电反对。12月1日和5日，汪大燮副署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中国接收青岛和赎回胶济铁路，基本上解决了山东问题。12月10日，汪大燮通电代阁期满离职。仍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会长，先后达五年之久。

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建立，汪大燮兼外交委员会会长。汪大燮于会中设立条约编纂处，将国际不平等各约详加论列，编成《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一书，一直为外交官员作为交涉参考的依据。

汪大燮晚年致力于善举，1920年10月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同年北方五省旱灾，汪大燮与熊希龄、梁士诒等组织华北救灾总会，并邀请旅京外人各救灾团体联合组织国际统一救灾总会；1922年4月，汪大燮联合在北京的公共团体及各公民，组织注重京师治安、维持市民粮食及保护妇孺、救济失业为宗旨的京师公益联合会，任会长，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等任副会长。1926年至1928年间，北京周边久成战场。汪大燮与王士珍、熊希龄等设立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救济难民。此外，汪大燮还于1921年创设平民大学。

1928年12月17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汪大燮书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出使英国大臣外务部右丞汪大燮奏为罂粟流毒日深请设法铲除事、呈条拟禁止罂粟办法清单；奏为库储支绌行用金币有无利弊折，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汪逢春

寿祝衡

汪逢春，名朝甲，字凤椿，逢春是他行医用的名字。1884年5月29日（清光绪十年五月初五）生于江苏吴县。父亲是从事丝绸业的小商。汪逢春十余岁时，在吴中名医艾步蟾的门下学医，勤奋刻苦，博览群籍，虚怀深求，因而医学基础相当扎实。

1908年，汪逢春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为求进一步精进医术，他一面担任“法医”，一面求教于名医力轩举。公余常为患者诊治，疗效显著，就诊者日众。1913年辞去法医职务，正式悬壶行医。由于治愈不少疑难大症，名声日起，与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并称为北京四大名医。

汪逢春讲究辩证施治，主张“尊古师古而不泥古”，也不存门户之见。他诊疾疗病，一面循规前贤，一面对气候、方土以及病人的体质认真参酌。在诊治一些重症时，往往在医方中写明“备候高明政定”，非常尊重同行，决不固执己见。在诊治内伤症方面，他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主张着重护理脾胃，力求早日自行吞纳，依靠自身之支持，俾能早日复原。他常说：“药以治病，不能持以补虚，病后体虚可以药补，如体质素弱，徒以药补不如食补。”在治疗外感方面，则认为“肺主皮毛，风寒首先犯肺”，着力于“由皮毛宜达，使外邪早出，免内传为患”。

汪逢春以擅长治湿温病著称。湿温病一般多见于夏秋之交，由于暑热与湿气侵入人体，破坏了人体内的正常生理机能，引起了病理变化。这种病理变化，特别表现为既有热象，又有胃肠机能障碍。汪逢春在治疗时，首先认定此症由于“气郁不得宣畅，以致肠胃秘结不

通”，分清主次矛盾，然后根据轻重缓急分三个步骤进行治疗：“第一步先投以辛香宣化为主、通腑为佐的药剂；俟头痛止而仍昏晕，形寒解而身热未净之际，再采取第二步，投以清湿解热、兼通肠胃的药剂；乃至身热已退，舌苔渐化，胸闷已舒，小溲渐淡，其湿温化而未净之际，再采取第三步，投以泄化余热兼治肠胃之剂。”如此，则湿温得化，余邪得解，肠胃得通，湿温病自然痊愈。

在用药方面，汪逢春还常常采用将药末装入胶囊中，随药汁吞送的“少而精”的办法。这种办法，既能节约药物，又能达到收效“大而快”的目的。诸如治疗温病，初起时“以紫雪丹七分，犀角粉一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此外，还常用“沉香末一分，洋芦荟末二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分两次以药汁送下”的办法以达到和络通导的作用。

汪逢春对待患者认真负责，满腔热忱，在处方上往往记入护理注意事项，诸如“病虽小效尚在紧要之际宜乎避风慎口”，“千万少劳不可动气至嘱千万”，“深虑由泄转痢幸勿轻视”等等。他对求治患者中无力购药者，往往签名盖章于处方处，嘱患者持赴指定药店免费取药若干剂，其药款则由他本人于月底统结付款。汪逢春救世治人的医风，一时多为传诵。

汪逢春虽业中医，但对西医学说及诊断方法也认真参酌。在诊治重大疑难病症时，往往主动建议延聘西医到患者家会诊，共作治疗方案，以期收综合治疗之效。

汪逢春重视培养医药业传人。他收录门人很是严格，需要详知底细并具有相当的文学、书法等基础，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认真的考察，方肯收纳。门人的学习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半日侍诊，半日在家学习指定书籍。然后开始抄录方底，熟习老师的处方，包括诊断、药味、书写方式等等。再则根据学习程度提出问题，请教老师，达到明确的理解。为使高年级的门人得到实习的机会，他在医室中另

设施诊部，由门人先拟定诊断处方底稿，经他本人检阅修订后再正式处方。1936年冬，他还组织门人成立了“同砚小集”，以期相互钻研共同提高。在门诊休息之日，他与门人聚集在公园，就平日门诊中疑难病例，循经典或先贤之遗著作深入的探讨。他在京前后共收入室弟子二十余人，造就了一批中医。他的弟子辑录了一批他的门诊医案，于1941年编集《泊庐医案》出版。

汪逢春主张业药者也应知医，1942年，在天安门西侧廊为国药业公会主办了中药讲习班，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前辈瞿文楼、杨叔澄等为主讲教师。

汪逢春于1949年8月2日在北平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汪逢春撰，吴子祯等辑：《泊庐医案》，1941年印本。文内所引资料，均出于此。

冯仰曾：《介绍汪逢春医案数例》，《中医杂志》1958年第8号，第549页。

谢海洲：《北京四大名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汪精卫

闻少华　丁贤俊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父汪瑊，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做过多年幕僚，其后即寄籍于番禺。

汪五岁进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游的诗词。其母亦督促他刻苦攻读。因此汪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1)] 他十五岁前双亲相继病故，随长兄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1902年应番禺县试，获第三名，接着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旋应广东水师提督李準之聘，任家庭教师。这时，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深重，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与古应芬、朱执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

1904年，汪精卫考取留日法政学校速成科官费生，由于"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2)]。一年半后，汪在速成科毕业，留在法政学校专科继续自费学习。

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同盟会，汪精卫加盟并参加起草会章。8月20日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汪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在《民报》上用"精卫"的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

系列文章，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指出："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3] 这些文章笔锋犀利，爱憎分明，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

1906年，汪精卫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次年春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庇能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8月，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汪是该报的主笔之一。汪精卫有很好的口才，常在南洋召开讲演会，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演说"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4]，深受当地华侨欢迎。他先后参与筹设河内、仰光同盟会分会和在新加坡设置同盟会南洋支部等活动，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工作卓著成效。

1907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同盟会内部又发生分裂，反清革命转入低潮，革命党内一些人中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汪精卫认为，此时只有"直接激烈之行为"，才有可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5]。于是，他在1909年约集同志数人潜入北京，与虏酋拼命。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曾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与黄树中（即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

清政府为了粉饰立宪骗局，收买人心，仅将汪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捕之初，曾写过悲壮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6] 肃亲王善耆对汪大施软化手腕，还多次赴监狱探视，对汪表示倾慕。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响应。清廷一面起用袁世凯，用武力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形势，收买人心。11月6日，汪精卫被释出狱。当时，袁世凯正想拉拢一些革命党人为自己所用，他看上了汪精卫并让其子袁克定与汪结为异姓兄弟，汪和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也把推翻清王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汪在袁的示意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便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1月15日联合发

起“国事共济会”，标榜调和南北，共济国事。11月下旬，清军攻下汉口，进攻汉阳。袁世凯一面再次对湖北军政府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向汪表示愿配合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一次起义，对清室进行军事恫吓。但革命党人起事后，袁却按兵不动，致使党人遭到无谓牺牲。因此，有些革命党人义愤填膺地说：“世凯、兆铭果相继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7] 12月初，汪在天津组织同盟会京津保分会，有些革命团体因此不愿加入，另外成立革命同志协会。

12月27日，汪到达上海，被任命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参与议和，但他暗地里则和北方代表唐绍仪过从甚密。他赞同总统一席“非袁莫属”的主张，吹捧：“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8] 年底，孙中山归国，旋即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对和议，汪就对孙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9]

袁世凯掌控政权后，汪精卫自命清高，1912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到法国留学去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6月初，汪从法国匆忙赶回上海，同拥袁的张謇、赵凤昌等密商调停条件：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都督在袁任临时总统期间暂不撤换；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10]。袁却不采纳汪的调停条件，悍然下令撤销国民党系南方三督，挥兵南下。7月中旬，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反袁，汪以懊丧的心情向张謇诉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而不可收。”[11]

讨袁失败后，汪精卫又以超然于政坛之外的姿态，跑到法国去进行“考察”。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讨袁，汪曾一度返国。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纷乱，汪又跑到法国去“经营其‘小休’的生活”[12]。

1917年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汪精卫在此之前也自法返

国，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1919年，他参加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的工作。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汪任广东教育会会长。

1923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对此，汪精卫大致是赞成的，但对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表示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13] 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他转而拥护三大政策，他承认："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14] 他受孙中山指派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宣传部长。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汪是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中央核心领导。

同年11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被在京国民党人士推举草拟遗嘱，经孙中山同意并签字认可，这件事更增加了汪的政治资本。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12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对待这些事件，汪都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予以处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以反共、反汪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此大为不满，于是愤而辞职，出走法国。

汪精卫出走后不久，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在那里设立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为了抑制蒋介石的独裁，成立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发表宣言，"迎汪复职"；此时蒋介石等也觉得有利用汪的必要，迭电促驾。这就大大提高了汪的身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蒋介石正在上海密谋发动政变，随即拉汪合伙反共。但蒋主张立

即分共，汪则希望暂能维持合作，主张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分共问题。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声明》，否认蒋介石在策划反革命阴谋，要求国共两党“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亲密”[15]。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左派身份发表激昂的演说，表现出进步姿态。就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他在一段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16] “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政府，汪斥责蒋破坏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他表示：“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17]

但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工商业主闭厂怠工，流亡分子的造谣煽惑，国民党将领相继发动叛乱。汪精卫感到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很难攫取政治权力了，于是撸下左派桂冠，决心反共。以汪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强迫总工会制裁工人，下令解散农民协会，收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6月1日，汪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他透露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为借口，说共产党要颠覆国民党，作为公开反共的“理由”。7月15日，汪精卫亲自主持清党分共会议，正式宣布跟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

“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宁、汉在反共的基础上合流了，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能消除，加上国民党内还有西山会议派、桂系、粤系等派别，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激烈的角逐中，蒋介石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南京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主张迎汪赴宁主持政局。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达成妥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党政机构，推汪为特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由于特委会被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控制，汪精卫

十分不满，重返武汉另组政治分会，宁、汉再度分裂。随后汪又南下广东，在粤系张发奎、黄琪翔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统问题。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趁粤桂战争之机，发动广州起义。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此对汪精卫进行猛烈攻击，汪不得不于12月再度出走法国。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利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排挤了汪精卫集团。汪系重要成员陈公博、顾孟馀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不甘失败，聚集上海进行反蒋活动。同年冬，他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打着恢复民国十三年（1924）国民党改组精神的旗号，遥戴汪精卫为领袖。1929年3月，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和永远开除陈公博等人党籍的决议。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异己政策，也引起各地方军阀的不满。1929年，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蒋唐、蒋张桂等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指使陈公博等在反蒋军阀中推波助澜，一方面从国外返抵香港，准备亲自出马。但上述反蒋战争相继失败，汪只能驻港待变。

1930年春，改组派又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对蒋的不满，策动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反蒋战争。阎、冯、李鉴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于是决定联汪反蒋。他们议定：汪主持党务、阎主持政务、冯主持军务。为了反蒋，汪精卫不惜跟过去被他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人联合，酝酿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反蒋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5月，蒋、阎、冯、桂军阀大混战揭幕。8月，汪抵北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被推举为七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这时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对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9月，张学良决定派兵入关助蒋，阎、冯联军迅速溃败，汪精卫由北平逃往太原，随后潜赴香港。11月，在蒋派控制下，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决定

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次年1月，汪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约法问题爆发了蒋介石与胡汉民两派的激烈斗争。2月，胡被软禁。胡派的重要成员古应芬等人联合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反蒋。汪精卫于5月下旬由港返穗，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汪与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等当选为常委。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谴责军阀混战，要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在蒋介石再次下野并释放胡汉民的条件下，宁粤对抗转化为权力分配的谈判。10月，粤方汪精卫、孙科等赴上海参加“和平统一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同时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再合起来开一中全会，产生政府。这时粤方又分裂为广州、上海两派。汪精卫一派在上海单独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央委员。12月，宁、沪、穗三方面的中央委员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辞职离京赴奉化；胡汉民滞留香港，拒绝进京；汪精卫则突然称病住院，等待与蒋联合上台时机的来临。1932年1月，蒋、汪经过谈判，组成了汪、蒋合作的政府，汪出任行政院长。不久，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

是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汪精卫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进逼下，一再屈辱求和。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举行，汪虽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行政院长职务则由蒋介石所取代。次年2月，汪去德国就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兼程返国，但当他于1937年1月抵沪时，蒋已被释放回南京。汪想取代蒋的打算落空。

汪精卫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内和平新形势阴存反感，继续坚持

其媚日、反共立场。同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继续叫嚷："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18]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汪精卫不得不装出支持抗战的姿态，但又散布失败主义，说什么"一个弱国对于一个强国，不得已而战，极度的牺牲是万万不能免的"[19]。后来他自己承认："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20] 所谓"转圜"，即是求和的同义语。

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国防最高会议，推汪为副主席。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汪任副总裁，汪对屈居蒋下，深感压抑。

抗战开始不久，汪精卫周围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中心，在南京组成"低调俱乐部"。后来又网罗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无知青年，在汉口成立了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的公开团体——"艺文研究会"，宣扬战必败和投降卖国主张。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汪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据汪自称："我对于觅得和平（即降日）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21]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继1937年对国民政府诱降活动失败之后，1938年1月16日由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扬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讨论和平，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施展分化的策略，促使汪精卫一伙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企图付诸行动。

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

序的口号，声称国民政府……更换其人事之构成而举更生之实，来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则并不加以拒绝。汪立即通过周佛海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于该月中旬与日本侵略分子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议。20日，双方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明确规定日本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其中重要条款还有：缔结防共协定，日军驻扎内蒙地区，承认伪满洲国等。他们并商定了汪精卫等降日的“行动计划”。

12月18日，汪率领其党羽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等从重庆飞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按预定步骤，日本近卫内阁于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汪公开招降。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并说：“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22)]

汪公开叛国后，全国群情激愤，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2月中旬，蒋介石派谷正鼎赴河内，劝汪去欧洲游历，汪不理会。蒋转而采取硬的一手，派特务赴河内刺汪，误中曾仲鸣。4月25日，汪精卫等在日本特务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28日再换乘日轮北光丸号，于5月上旬秘密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住进江湾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公馆。

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影佐祯昭等陪同下，乘日本军用飞机抵东京，和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汪乞求以“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23)]。汪还和日本陆军、海军、财政、外务大臣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进行会谈，要求这些侵略头目支持他建立伪中央政权。6月18日汪精卫回国。7月，他在上海、南京与早已投敌并建立地区性伪政权的其他汉奸头目梁鸿志、陈群等会谈，筹组伪中央政府。同月9日，汪还在上海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声称：他一贯的观念是对于日本冤仇宜

解不宜结，并将本此观念，对于日本努力于转敌为友。同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干部会议，组成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叶蓬、李士群、丁默邨等近二十人的汪伪政权的基本班底。

1939年8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纠集投敌的国民党员秘密召开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授权他组织伪中央政权。在这次群魔乱舞的会上，汪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黑旗。9月，汪赴南京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汉奸头目王克敏、梁鸿志等磋商，商议成立伪中央政府及伪中央政治会议事务。

这时，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梅机关”[24]继续与汪精卫等人磋商成立伪中央政权的细则；另一方面用“桐工作”为代号派人与重庆政府代表谈判。12月，汪与“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承认“满洲国”；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作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府成立后日本设顾问监督；伪军警由日军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经济大权由日本掌握；资源任日本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1940年1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第二次会谈。汪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部分内容作了说明。会谈正式决定组建伪中央政府。

由于对重庆诱降的“桐工作”受阻，日本只得加速建立汪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登场，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同年11月29日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同时解散。在日寇刺刀保护下的汪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其实际辖区仍只有苏、浙、皖的一部分，宁、沪两市，以及鄂、赣、湘等省的少数地区。

从7月5日至8月底，汪、日进行“调整国交”的谈判。11月30日签

订了《中日国交调整条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这项条约包括《日本国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关于附属议定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等，进一步确定了汪伪政权的附庸地位。接着，汪又在《中日满共同宣言》上签字，承认伪满洲国。

1941年6月，汪精卫率领党羽再次访日，向近卫乞求援助，获得贷款三亿日元。汪在日本陆相东条的招待会上表示，“不管国际情势如何变化”，他都要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基本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之精神，与日本一道，“从速建设新秩序，以图共存共荣”[25]。7月，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府承认汪伪政权。11月25日，德、意、日、西班牙等国签订延长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并邀汪伪参加此项协定。次日汪发表谈话说，他愿意和德、日、意等国一起，“坚守东亚轴心”和“世界反共轴心”[26]。

同年12月8日，日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汪发表声明，决心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难局”[27]，表示参战的希望。但是日本侵略者反应冷淡，“中国（指汪伪）参战是否必要？是否得策？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及如何与帝国（日本）战争配合”[28]，拒绝了汪的要求。直到1942年2月，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日本认为有强化汪伪国民政府的必要，于是将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行政权移交汪伪国民政府管理。汪精卫“深表感谢之忱”，并说：“今后与日本益当密切提携，以期实现东亚永久之和平，并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设。”[29] 5月，汪精卫偕林柏生、褚民谊等访问“伪满”，声称他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同年12月20日，汪精卫应召第三次赴日，他向日本侵略者保证，“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30]。

1943年1月7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决定让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9日，汪伪政府声称：“当悉全力与

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31] 同日，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强调：“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移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协力。”[32] 9月20日，汪精卫、陈公博第四次秘密去日本，双方讨论改订日汪同盟条约问题。

同年10月30日，汪伪与日寇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以取代《关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和有关附约。条约标榜“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33]。11月，日本首相东条纠集汪伪、“伪满”、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傀儡，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叫嚣：“大东亚会议得到泰、缅、菲三国参加及印度临时主席列席，共荣圈的范围更加扩大了。”[34]

汪精卫一贯以反共自诩，投降日寇后更以反共邀宠于主子。1941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兼该会委员长，5月开始“反共清乡”。汪叫嚣，清乡地区是“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1943年汪又强调，“清乡就是建国，就是参加大东亚战争”[35]。第一年以苏州为中心，划江苏省内十个县为实验区，集结伪军一万五千人，配合日寇，挨村挨户搜索盘查，编定保甲，联保连坐。设置封锁圈，限制人员与物资的流通。强调“保障治安”，扬言要“在和平区域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阵线”[36]，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清乡范围逐渐扩大到太湖东南以及浙、赣、粤等省。敌伪铁蹄所至，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抓丁抢粮、抢劫财物，对沦陷区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为了配合日寇侵略战争的需要，汪伪政权在经济上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1941年，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日寇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流通。不仅滥发纸币，而且为日本强征物资。连日本战犯重光葵也不得不承认，

日本对中国“完全是单方面的榨取。日本榨取的大多是军用物资，只供消耗，并没有再生产可能。战区愈广，需要这一类的物资更多，除了用占领区的军票支付，更无其他经济手段。因此通货膨胀，民怨沸腾”[37]。

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以苏北地区为例，除了六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特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汪精卫卖国集团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强调所谓发扬固有道德，开展“新国民运动”，灌输反共思想，宣扬“中日亲善”、“和平反共建国”、“完成大东亚圣战”、“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等等。汪伪还利用暑假举办学生训练班，提出“打倒共产主义”。汪精卫特别指出，上海是“二十余年来共产思想之策源地”、“须从思想清乡着手”、“不仅剿已有之匪，尤在防未然之匪”[38]。

1943年8月，汪精卫因当年被刺未取出的子弹引起疼痛，同年12月经手术后，又患感冒并发脊髓炎症。1944年3月3日，偕陈璧君、周隆庠及其子女赴日治病，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

主要参考资料

《汪精卫集》（1—4册），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

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南京1943年版。

《汪精卫先生集》（双照楼诗词稿），1945年初版。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4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1960、1961、1964年版。

《汪精卫文存》（初集），广州民智书局1927年版。

《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年版。

---

(1) 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年谱》，第1页。

(2) 《汪精卫自述》，《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第2页。

(3) 汪精卫：《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说》，《汪精卫文存》初集，第94页。

(4)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9页。

(5) 汪精卫：《致孙中山先生书》（1909年12月），载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第2页。

(6)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1页。

(7)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9页。

(8) 甘簃：《辛亥革命和议之秘史》，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17—118页。

(9)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8页。

(10) 《张謇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第43页。

(11) 《张謇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第49页。

(12)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112页。

(13) 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之一幕》，《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册，上海民智书局版，第87—88页。

(14) 汪精卫：《怀廖仲恺同志》，《汪精卫集》卷4，第172页。

(1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4月5日。

(16) 汪精卫：《给〈中央副刊〉的题词》1927年4月11日。

(17) 汪精卫：《到汉演说概要》1927年4月。

(18)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页。

(19) 汪精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1937年8月3日），转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79页。

(20)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5页。

(21) 汪精卫：《复华侨某君书》，《汪精卫先生关于和平之重要言论》，第24页。

(22) 《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第1页。

(23) 《汪精卫与平沼会谈内容》，《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S487号》。

(24) “梅机关”是1939年5月日本军部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由影佐祯昭负责，其中心任务为扶植汪精卫建立伪政权。

(25) 上海《中华日报》1941年6月21日。

(26) 上海《中华日报》1941年11月27日。

(27) 上海《中华日报》1941年12月9日。

(28)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46页。

(29) 上海《中华日报》1942年2月19日。

(30) 上海《中华日报》1942年12月26日。

(31) 上海《中华日报》1943年1月10日。

(32) 上海《中华日报》1943年1月10日。

(33) 复旦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

(34) 汪精卫：《同心协力共存共荣》，《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辑》，第427页。

(35)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22页。

(36) 汪精卫：《今年新国民运动之要点》，上海《中华日报》1943年1月1日。

(37) ［日］重光葵：《昭和之动乱》，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45页。

(38) 上海《中华日报》1942年9月15日。

汪康年

汪仁泽

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1860年1月25日（清咸丰十年正月初三）。其父汪养云，清咸丰举人，初授教谕，后纳资为广东候补知县。汪康年年幼时随父在粤就读私塾，1882年丧父，回乡里谋得书局校对工作，不久往汉口开馆授课。

1889年，汪康年入京应优贡考试，入选。初选主考为瞿鸿禨，遂结师生之谊。旋复考取八旗官学教习。是年秋返浙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受两湖总督张之洞聘请，赴武昌教读张的孙辈，成为张的幕宾。不久又兼任汉口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1892年汪入京应会试，中试，但因足疾骤发，不及应殿试，遽返湖北。1894年入京补应殿试，并谒见主试官翁同龢，执师生礼。

甲午中日战起，汪康年关心战局，遍阅京沪各地报刊，见内容殊多失实，乃萌自办报刊之念。甲午战败，割台赔款，全国震动，汪深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亦认为“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且“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1)]。遂创议组织“中国公会”，往来于沪汉间，“讲求中国之所以贫弱，西国之所以富强”[(2)]。但中国公会一时难以成立，因有先办报馆“而寓学会于其中”之议[(3)]。

1895年夏，康有为等人在京沪先后成立“强学会”，汪康年应康之请至沪主事，并携家迁居上海。不久北京强学会受劾被封，上海强学会也随即解散。汪康年、黄遵宪等人谋再振之，商议以报馆为倡始。次年春，汪康年与梁启超共同商讨创办《时务报》的宗旨及章程，以

上海强学会结余款项移作办报经费，不足之数再向外募捐。1896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石印旬刊，月出三册。梁为主笔，汪任经理，掌财政、人事，间亦执笔论著。先后延请麦孟华、徐勤、章炳麟等人为撰述；张坤德、郭家骥及日人吉城贞吉分任英、法、日文翻译。报设论著、上谕、奏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该报传播维新救亡思想，成为宣传变法图强的主要刊物。初期梁启超等人议论新颖，文字通俗，以犀利的笔锋“去塞求通”，深受时人欢迎，阅之“心气勃豁，顿为之喜”，“论不变法之害，沉着痛切，言言扼要”[(4)]。因此不数月风靡海内，印数达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5)]。在推动变法制造舆论方面，作用显著。张之洞乘机邀誉，札饬以公费购发全省官员及书院诸生阅看。

汪康年先师事翁同龢，复与梁启超同事，与谭嗣同亦时有书信往返，在师友的影响下，“以为民气之郁久矣！宜重民权、瀹民智，用以明目而达聪”[(6)]。故于《时务报》第四册上发表《中国自强策》，提出“复民权”的主张；继在第九册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称，“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然者”，“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7)]。虽然他的民权论仍不脱“君民共治”的范围，但发表后立遭顽固势力的指责非难。张之洞授意僚属，以民权文字触犯纲常伦理为辞，嘱其“以后文字真要小心”，“实做经理二字，千万不可动笔”[(8)]。汪原是张的旧属，《时务报》又受张的资助，此后遂不敢再侈言民权。但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仍不断侵及洋务派的利益，为张之洞等所不容，曾以停发该报相胁迫，并一再通过僚属促汪转而干涉笔政。适值梁启超离沪去湘，汪兼代笔政，乃擅改梁自湘发来论著，引起梁的不满。此时维新派拟推龙泽厚进报馆，以“稍分汪氏之权”，但汪视《时务报》似“一人一家所开的生意”而拒之[(9)]。嗣后梁启超辞去《时务报》笔政，汪遂总揽一切。从此《时务报》转而成为洋务派张之洞集团的喉舌。

是年11月，汪康年与曾敬贻等在沪创设“蒙学会”并发刊《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开通锢蔽”为宗旨。12月汪偕曾敬贻东渡日本，遍游东京、横滨、大阪等地，采访政治风俗，联络朝野名流，匝月而返。1898年1月，汪康年等在沪设立“东文学社”，招生开课，授以日文，议拟于毕业后送日留学。

《时务报》虽已风行全国，但旬日一册，对于时事评论往往不能及时，汪康年遂与人另行集资，在沪创办《时务日报》，日出一期，锐意经营，改革版面，仿照西文报刊，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分版面为四版两栏，与当时沪地《申报》等尚用有光纸一面印刷、书册式不分格栏之面貌迥然不同。1898年5月11日创刊，与《时务报》同时发行，记载中外要闻，评议时政得失，并重在摘译西报、沟通商情。汪欲“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转圜时务，广牖见闻”，使“壅蔽顽固之俗一变而洞澈，而愤励”[(10)]。该报采访、论述皆由汪一人担任。7月，上海发生旅沪甬人抗议法租界当局持强欲毁四明公所义冢事件，该报全力声援，获得好评，销路渐广。

是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7月经言官奏请改《时务报》为官办，派康有为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旧商办”为由，将《时务报》“暂行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筹办，本报特改名《昌言报》，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11)]。此时汪与梁启超的矛盾已公开化，梁诋汪私据《时务报》，但汪得张之洞的庇袒，仍占用《时务报》馆址，自办“商报”——《昌言报》。汪自任总理，聘梁鼎芬为总董。同时汪将《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发行。《昌言报》在戊戌政变后的总董改为日人安藤虎雄，11月19日出至第十册后停刊。

1900年，义和团运动事起，《中外日报》诬之为“邪民拳乱”，并提出“乱民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的主张。7月东南各省督抚勾结各国订立“东南互保”，汪为之奔走联络与制造舆论。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不撤，并胁迫清廷

签约。汪康年闻讯激于义愤，与蒋智由等召集会议，力陈其害，演词慷慨激昂，闻者动容，并摘登报端，沪地西报亦竞相转载。汪又腾电中外，并上书张之洞等督抚，请为力争，引起当局瞩目。由于朝野舆论一致抗议及全国民众掀起拒俄运动，卒使俄军分批撤出东北。

1904年春，汪康年暂委他人代理《中外日报》，入京补应朝考，授职内阁中书[(12)]，此后经常往来于京沪间。次年，在京浙人筹建浙省铁路，公推汪康年等为代表，由汪持公函到沪邀集同乡，组成商办浙江铁路公司。此时清廷以科举既废、教育趋向犹待商议，于1906年特设学部谘议官，汪康年与名流陈宝琛、张謇、严复、汤寿潜等二十三人入选。

汪康年于1907年在京筹设《京报》，以为“报馆与政府距离既近，见闻自较确实，不致有捕风捉影之弊……较之设在外省，虽言之力竭声嘶，而政府仍不闻不见者，其效力实有大小之殊”[(13)]。《京报》于5月10日（三月二十八日）发刊。其时军机处内首席大臣奕劻与大学士瞿鸿禨对抗，相持不下。汪康年既是瞿的门生，又有姻亲关系，《京报》遂成为瞿的政治斗争工具，多次揭载奕劻父子卖官纳贿的贪污秽行，奕劻、袁世凯一伙对汪恨之入骨。西太后对奕劻的作为亦有所闻，一日单独召见瞿鸿禨时，微露罢奕劻之意。瞿喜甚，退而告汪康年，汪即转告在京友人、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高某，不料高某遽发电伦敦，在该报上刊出消息，外国公使纷至宫廷询问。西太后既怒瞿的泄密，奕劻、袁世凯复落井下石，乘机策划言官罗列“交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名劾瞿，瞿遂被免职，着即开缺回籍。《京报》亦于7月17日接巡警总厅一纸公文被勒令停闭。汪康年颓然返沪，继续主持《中外日报》，仍持君主立宪派立场，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

1908年6月，《中外日报》刊载来稿《金陵十日记》，极言南京军警政绩之腐败，致获咎地方当局。两江总督端方电苏松太道蔡乃煌，盛气诘责。蔡与汪康年本系旧交，并曾资助该报，是该报股东，

蔡乃以地方长官及股东身份代拟认错书稿一纸，交人转饬汪康年照抄。汪答以此腕可断，此稿不可照缮。后在蔡的压力下，汪被迫将《中外日报》售予蔡乃煌。次年，汪康年与清廷驻比利时使署职员王慕陶创办“海外通讯社”，并参加中国新闻常会。

1910年11月，汪康年复办《刍言报》于北京，五日一期，月出六册。在创刊例言中称“本报义取询于刍荛之意……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间及摘登要闻，补充漏刊消息[14]。此时清廷已病入膏肓，而《刍言报》仍持保皇立场。

1911年8月，各地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汪康年惊呼：“聚集无数人妨害官吏之行动，阻社会之生活，即大乱之道也。”不久武昌起义，震撼北京，汪康年避居天津。11月3日晚得在京友人来书密告：清廷将起用袁世凯。汪阅毕叹息不已，称：“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遽起就寝，夜半忽发呻吟声，家人往视已昏迷不醒，延至次晨去世。

---

(1)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1938年版。

(2)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1938年版。

(3) 此时友人邹沅帆来书劝告：“若能先译西报，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汪康年深以为然。

(4)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立三《致汪康年书》及同年八月十六日纪钜维《致汪康年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知新报》第66册。

(6) 唐文治：《同年汪穰卿先生传》，《茹经堂文集》第2编第6卷，太仓唐氏1927年版。

(7) 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9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8) 梁鼎芬：《致汪康年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

(9) 梁启超：《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

(10) 汪康年：《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时务日报》第1号。

(11) 汪康年：《昌言报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昌言报》第1册。

(12) 清代沿明制，在内阁设中书若干人，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诸事，官阶为从七品。

(13) 汪康年：《京报发刊词》，刊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创刊号。

(14) 汪康年：《刍言报第一期小引》，清宣统二年十月，《刍言报》第1期。

汪笑侬

汪仁泽

汪笑侬，原名德克金，字俊青，满族旗人，1858年5月15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初三）出生在北京一官宦家庭。自幼颖慧，就读私塾。少年时喜阅诗词，观赏戏曲。十七岁考取秀才，进入八旗官学。二十二岁应乡试，中举人。此后他无意仕途，转而涉猎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博闻强识。其时西学东渐，他广览西方心理学、法学以及商业史、西洋史，甚至催眠魔术等书籍亦无不涉猎，与友朋讲研佛法和金石等学，更醉心于京剧戏曲，潜心听书顾曲。他曾进北京翠凤庵票房，向名伶金秀山学戏，往往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一度作为票友登台客串，竟蜚声京都。亲友劝其进取功名，他答道："我不愿作书卷中的蠹鱼。"(1)

1879年冬，汪笑侬的父亲盼他光耀门庭，为他出资捐得知县官职，分发河南太康任县令。他到任后在案牍之余，聘一梨园子弟为幕友，朝夕高歌唱和，不习于宦海浮沉。时有当地乡民受豪绅鱼肉，他秉公仗义，为民伸曲；豪绅受惩怀恨，贿赂河南巡抚，挟私参劾，汪笑侬竟因此受革职处分。亲友为之惋惜，他说："我如何而来，如何而去，今日幸摆脱桎梏，逍遥自在了。"(2)

汪笑侬回到北京后，决心下海从伶，专事梨园生涯。往访心仪已久的名伶汪桂芬，自陈志趣，欲投门下。汪桂芬见其既非科班出身、又中过举、当过县令，而伶工须自幼练功，怕他吃不起苦，成不了名，故以"谈何容易"而拒之。汪笑侬闻言并不灰心，日夜苦练，终于粉墨登场，复邀汪桂芬往观，托人探听对其评价。汪桂芬嫌他嗓音带嘶，扮相不佳，笑而不语。他得悉后愤然改姓名为汪笑侬，意谓"汪桂芬非笑于我"，以此激励自己。他艺术上求进心更切，凌晨即起吊

嗓，兼练武功，博采程长庚、汪桂芳、孙菊仙、谭培森各派之长，复融粤调、徽调、汉调诸唱腔精华，结合自己嗓音的特点，创成新腔。他吐字有力，深沉苍劲，抑扬顿挫，铿锵慷慨，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善于随剧情的发展变化而加以运用，世称“汪派”。

当时演员地位低下，“倡优隶卒”被视为社会末流。汪笑侬因此而被削去满籍，遂出京门。族人纷加指摘，他却莞尔一笑说：“我作官不过七品知县，如今王侯将相随我为之，这是何等赏心乐事！”从此遨游南北，开始他四十年的舞台生活。他以天地为逆旅，世界作戏台，更名僛，加号仰天，自称“天地寄庐客”。他面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将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之情，通过戏曲，力尽唤起民众、高台教化之责，“隐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因此被称为“隐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临刑长吟“我自横刀向天笑”，汪笑侬痛呼：“他自仰天而笑，我却长歌当哭”，并以北宋故事编演《党人碑》以悼之。他借剧中人痛斥权臣把持朝政诛杀贤良，矛头直指戊戌政变中的顽固派。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大举侵略，汪笑侬痛斥清执政者“只知衣锦食肥，大好神州将无噍类”。他在《大陆》、《民报》、《浙江潮》等革命报刊上发表诗文，抨击时政，抒发爱国思想。

汪笑侬在上海从事演出的同时，还凭着他深厚的文学修养，渊博的历史知识，切合时弊，创作了十多出借古讽今的新剧《受禅台》、《哭祖庙》、《长乐老》、《纪母骂殿》和时装戏《镂金箱》、《博览会》、《立宪镜》等。在创作中，他不拘泥于形式，富有创新精神，常打破京剧十言、七言的常规，在句中加词、加字，最长达数十字，使唱白更趋生动活泼。他还打破了京剧只演中国故事的束缚，曾用外国历史故事，创作《瓜种兰田》、《苦旅行》等剧，开风气之先。他从昆曲、传奇及其他地方戏剧中移植改编为京剧的有《党人碑》、《马前泼水》、《马嵬驿》（又名《六军怨》，后又补充发展为全本《风流王子》）、《博浪锥》、《易水寒》等十多出；并整理京剧老戏《张松献地图》、《骂阎罗》、《完璧归赵》、《空城计》

等，经过他的润色、增删、丰富、提高，使剧本既求情节合理，又重吻合史实，文采斐然、上口流畅，较旧本有很大的提高。由于他能编能演，又集各派之大成，艺术趋于炉火纯青，因此被誉为戏剧界的一代“伶圣”。

汪笑侬的爱国思想和艺术上的造诣，甚为社会所重视。1904年，革命党人柳亚子（亚庐）和陈佩忍（去病）等人与他合作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撰稿者大多是革命人士。该刊在《发刊词》中公开主张改革戏剧，宣传民族革命。汪笑侬的《长乐老》等爱国主义作品和《安乐窝》等反清剧本，刊载于该刊，为各界瞩目。因此仅出两期，即遭清政府查禁，但影响甚广。是年，汪笑侬根据波兰与土耳其交战兵败乞和的史实，编演新戏《瓜种兰田》，痛诉亡国痛苦。剧本先载于革命刊物《警钟日报》上，后又重印单行本问世。陈独秀曾作评介：“暗切中国时事，做得非常悲壮淋漓，看这戏的人无不感动！”(3)

1905年4月，美国订立排华法案，苛待在美华侨。上海等地掀起反美运动，汪笑侬备受鼓舞，欣然赋诗：“一声怒吼睡狮醒，三载惊闻大鸟鸣。”并在上海春仙花园再次取材波兰亡国痛史，编演《苦旅行》，“表明不爱国的恶果，无主权国民之苦况”，激发群众的反美爱国热情，后来遭到租界当局的干涉，不久即被禁演。

1909年，汪笑侬应邀赴济南演出，并就任山东省戏剧改良所所长。辛亥革命前夕，他编演著名的“三骂”：《骂阎罗》、《骂王朗》、《骂安禄山》，借剧中人强烈抨击黑暗的专制统治。他在编演《张汉祥刺马》一剧中，歌颂革命党人暗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一事，宣扬革命思想，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许，被称为“戏班第一革命巨子”。

辛亥革命后，汪笑侬在天津演出，并任正乐育化会（伶界联合会）的副会长。又主持戏剧改良社，任社长，从学者百余人。他还撰写《戏剧教科书》，连载于天津《教育报》上。1914年，他随前辈孙

菊仙到京演出，忽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他以诗讽袁：“利用共和窃专制，奸雄依样画葫芦。”(4)

随即愤而南下，在上海登台演出《博浪锥》，借剧中人张良之口，声言要“把专制君万剐千刀”，痛挞袁氏。1916年6月袁死后，他重返北京，编演孔尚任同名戏曲《桃花扇》，情文并茂，博得时人激赏。其后甘冒险阻，前往当时尚未收回的大连演出《哭祖庙》，借三国蜀亡故事，用大段反二黄淋漓尽致地抒发忧国伤时的感情。当他唱到“国亡家破，死了干净”时，情深意切，悲凉万分，听者动容，台上台下一片哭泣之声，一时在大连市民中广为传诵。此剧后在上海演出时，竟遭歹徒投掷烟幕弹进行破坏，可见该剧在社会上影响之大，以及敌人对它的恐惧。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也写过少量消极的剧本，如在《煤山恨》中不满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

汪笑侬饱学多才，胸怀理想，但茫然不知出路何在，一生颠沛困苦，郁郁不得志，晚年乃借烟酒浇愁。1918年春，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时，突然嗓音失调，哑不成声，从此时演时辍，生活更为困顿。是年7月，应浙督杨树棠之召，赴杭州祝寿献艺，竟遭警厅挟嫌拘捕，虽不久释出，但因此愤郁成疾，10月27日在沪病逝。

汪笑侬艺术上的成就，受到戏剧界人士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57年在他诞辰一百周年时，中国戏剧家协会重修他的墓地，剧协主席田汉题碑“爱国艺人汪笑侬之墓”。出版的《汪笑侬戏曲集》，收集了《哭祖庙》、《党人碑》、《长乐老》等创作和改编的剧本十八种，周信芳撰《敬爱的汪笑侬先生》一文为序，书后并附有钱杏邨（阿英）所辑《竹天农人（笑侬）诗辑》，收有他的诗词近百首。

---

(1) 周信芳：《敬爱的汪笑侬先生》，载中国戏剧出版编辑部编《汪笑

侬戏曲集》，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版。

(2) 周信芳：《敬爱的汪笑侬先生》，载中国戏剧出版编辑部编《汪笑侬戏曲集》。

(3) 汪笑侬自编外国故事新剧《瓜种兰田》，先刊于《警钟日报》，旋又在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第11至13期上连载，陈并撰文评介。

(4) 罗义俊：《剧班第一革命巨子——爱国艺人汪笑侬》，《中国近代爱国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423页。

王伯群

熊宗仁

王伯群，名文选，以字行，贵州省兴义县景家屯人。1885年9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生。其父王起元，通文墨，以办理团练而著名乡里，1903年病故。王伯群少时在当时任兴义团练头目的外祖父刘官礼处，从姚华、徐叔彝等人就读。1905年得其当时任兴义县劝学所总董的舅父刘显世资助，东渡日本。先入大塚弘文学校，后考入中央大学，专习政治经济，1910年毕业，再入研究院深造。留日期间曾加入同盟会，但思想却深受梁启超政闻社的影响。

辛亥武昌首义，全国响应，留日学生纷纷返国参加革命，王伯群亦随之回到北京。1912年1月，他在京参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对抗同盟会的新政团——中华民国联合会，并积极筹组黔省支部。未就绪，适上述诸人在上海发起统一党，王遂赴沪参与其事，得推为本部干事，后受统一党委托，联络已返贵州的留日学生张协陆和符经甫，以原贵州的立宪派人士为骨干，成立统一党黔省支部，并谋在各府、州、县筹设分部。2月，唐继尧率滇军入黔。3月3日，在第四标标统刘显世和旧巡防营的配合下，颠覆了贵州军政府。以自治学社为主体的革命派纷纷逃离贵州，在北京等地成立“冤愤团”，向全国控诉贵州反动派和唐继尧的暴行，外界舆论群起谴责唐、刘。王伯群在沪，为唐继尧、刘显世辩护，他“以为非借言论机关，不能将吾黔是非邪正表白于天下。适统一党亦有大共和报之设，遂经理其事”[(1)]。在任《大共和日报》经理期间，兼理刘显世驻沪代表事务。从1912年至1913年5月，在“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的演变过程中，王伯群均出任干事。他把孙中山、黄兴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主张视为“荒谬计划”加以反对，积极支持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的活动[(2)]。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次年3月解散参、众两院后在京召开约法会议，制订了袁记“新约法”。这期间，袁氏复辟帝制的用心日益显露，国内外革命党人反帝制舆论日益强烈，王伯群与胞弟、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王文华及贵州巡按使戴戡相谋，谓“国难且作，辄为备”[3]。“筹安会”出现后，进步党在全国各阶层反袁声浪的推动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由拥袁规劝袁，走向公开反袁。梁启超、蔡锷在京津秘密策划以滇黔为立足点，准备发动武装反袁，电召戴戡、王伯群到天津相商。天津会议决定蔡锷到云南发动武装起义，梁启超到南京、广西游说冯国璋、陆荣廷作响应，戴戡、王伯群负责策动贵州独立。王伯群以“当局（刘显世）意向，文华能左右之。所部虽成军日浅，气锐，可一战也”[4]为词，自请负责策动王文华迫刘显世反袁。12月14日，他先蔡锷假道香港、越南，到达昆明。稍后，蔡锷也辗转到滇。王伯群参加了由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的决定云南起义具有重大作用的第四、第五两次军事会议[5]。云南起义爆发后，王伯群由滇经兴义到贵阳，与王文华一道策动贵州独立。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护国战争中，王伯群是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和右翼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的主要谋士。护国战争结束后，王伯群因曾参与密谋滇黔首义的天津会议，与梁启超、蔡锷、戴戡、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一道，被誉为“天津会议七君子”[6]。8月，北京政府任命王伯群为黔中道尹。

护法运动期间，王伯群开始参与贵州的经济事务。先任专司开采铜仁等处矿产的裕黔公司董事，不久当上主办全省矿务的群益社的理事长，成了省中瞩目的实业活动家。

1918年11月，王伯群以贵州省长公署代表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1月，受委为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并得督军兼省长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

五四运动爆发，王伯群也察觉到时代潮流的变化，认为“现在科

学时代，无科学不足以立国，无新学识不足以成才……谋国之本，树人为先”[7]。当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时，贵州留日归国学生二十余人，在黄齐生倡导下，组织贵州教育参观团，王伯群曾予以支持，并请刘显世拨济经费二千元[8]，王本人也资助经费一千元。

1919年3月30日，王伯群以贵州全权代表身份，同美国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士觐在上海签订了借款修筑渝柳铁路（由四川重庆经贵阳至广西柳州）草约，该草约中有将铁路沿线三十公里区域内的矿产、森林归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和采伐的条款，规定贵州省长公署以每百元实收九十六元、年息六厘向该公司借款美金五百万元，并允许该公司有在贵州投资、兴办实业的优先权。草约内容透露后，刘显世所倚重的一伙人纷纷反对。财政厅长张协陆、政务厅长陈廷策、督署秘书长熊范舆和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等人，以草约条件苛刻、借款偿还方式于贵州不利，并以王文华有言将从借款中提取一百五十万元偿付黔军欠饷为由，攻击王伯群兄弟“卖省”营私。这就是贵州“渝柳铁路借款案”。刘显世对王伯群签订草约同意于先，见张协陆等人反对激烈，又犹豫于后。他担心王氏兄弟权力膨胀，转而支持反对王氏兄弟的行动。因此，草约未得批准，从而加剧了护国运动前后逐渐形成的王文华集团（握有军权的“新派”）与刘显世集团（握有行政、经济大权的“旧派”）之间的矛盾。王文华发起了一系列行动，揭露张协陆等人贪污腐败，攻击刘显世集团。到年底，政争更加激烈。陈廷策遭人暗杀受伤，张协陆被迫服毒自杀，张彭年辞职避祸。这就是贵州所谓的“民八事变”。与此同时，王伯群与王文华借口军民分治，在贵州策划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会议，“想要刘（显世）让出督军或省长一席”[9]。王伯群利用南北和议代表身份在上海、广州极力活动，迫使刘显世作出让步，“允南北统一后让伯群长黔”。[10]

1920年冬，王伯群随孙中山由沪返粤。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后，当时交通部长唐继尧未到任，由王署理。是年11月，贵州发生了“民九

事变”，王文华集团杀死刘显世的亲信熊范舆和郭重光，迫使刘显世宣布辞去贵州督军和省长职务。事变发生前，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而赴上海。次年3月16日，王文华被黔军司令部总参议袁祖铭收买刺客刺杀身死。王伯群曾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策划行刺袁祖铭复仇未遂。是时，贵州政局大乱，黔军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五个旅长相互火并。1921年4月，北洋军阀以饷械支持袁祖铭在武汉成立定黔军总指挥部，准备回黔定乱。王伯群希望取得黔军总司令卢焘、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第四旅旅长张春圃及其妹夫第五旅旅长何应钦等的支持，重振黔局，反对袁祖铭回黔。1922年3月，广东军政府委任王伯群为贵州省长。王伯群由上海启程，经湘西入黔，准备开府铜仁，但被袁祖铭所阻，未能就任。8月，北洋政府委任袁祖铭为贵州省长，王伯群无力与袁抗争，返上海作寓公。同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1924年6月，厦门大学发生学潮，二百多名学生失学。部分教授为学生鸣不平辞职到上海。王伯群与这些教授共同筹商，决定为失学的厦大学生创办一所新学校，并由他捐款二千元作基金。经多方筹措，新创办的大夏大学于同年夏成立，马君武任校长，王伯群被推为该校董事会主席董事。他主张大夏大学“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11)]；以“三苦主义”（即职员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师生合作”和“自强不息”作为校训[(12)]。1925年，王伯群出席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并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26年冬，大夏校长马君武回桂主持广西大学，王伯群经大夏校董会推为校长。同年底，王伯群与同乡窦简之见北伐军节节胜利，相约前往投奔。二人设法贿买孙传芳部下，得以安全出境，潜赴何应钦之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何以王系文人，不宜任军职，畀予“总参议”一席。北伐军到达上海后，王兼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四一二”政变后，王伯群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9月，宁、汉、沪三派组成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王伯群为

委员。1928年，王伯群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监督。在交通部长任上，他免去法国人铁士兰（Henri Picard Destelan）担任的邮政总办，接收英国在烟台和威海卫的水线收发处，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讯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真茹国际大电台及开办宁、沪、汉、青岛的自动电话，由部统管全国无线电台，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创设航政局，并先后公布了航空条例、电信条例、邮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使交通部所司渐上轨道。他还主张兴建粤汉、湘桂、黔桂诸铁路，因资金和技术不足而未能实施。1929年3月，王伯群以贵州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三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次年递补为执行委员。第四、五两届连任执委。1931年10月至1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宁、粤“上海和平会议”后，王辞去交通部长职，改由陈铭枢兼任。时值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交恶，川局纷扰，王伯群被派为特使入川协调川局。由汉口赴重庆时，川军刘文辉部以重金贿赂船主和王的随员，将步枪六千支和子弹数百万发藏于特使“专轮”底舱。事为刘湘特工侦知。“专轮”甫抵渝，枪弹皆为刘湘截获。刘湘遂借故不与王谋面，致使协调川局之行一无成效。由渝返汉时，王的随员双清、刘协恒等又私运毒品，以图牟利。不意又为刘湘获悉，预报武汉行营。“专轮”到汉，又被扣留，毒品被没收。一时各报竞相刊载，舆论哗然，双清、刘协恒二人因此入狱，王伯群则以“不知情”而免议处。1932年，王伯群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受命为川滇黔视察专员，次年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决定内迁。王伯群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设大夏、复旦两校第一联合大学于江西庐山（后迁重庆），设第二联合大学于贵阳。1937年12月27日，第二联合大学在贵阳正式开课，王伯群任校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事竣，令大夏、复旦两校分立，以重庆第一联合大学为复旦大学，贵阳第二联合大学为大夏大学，任命王伯群续任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为副校长。王为大夏在贵州确定的宗旨是：“抗战教育之推行”、“协

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13]。在内迁贵州的各大、中学校中，图书设备较完备者首推大夏。大夏迁黔期间，王伯群继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8年3月，王伯群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筹划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大学和贵阳县政府经理其事，旨在使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建国”[14]。1939年，王伯群受任为国史馆筹备委员。1940年，副校长欧元怀出掌贵州省教育厅，大夏大学校务全由王伯群承担，并先后在贵阳、柳州创设大夏中学。王伯群曾以“学不倦，教不厌，行不惑”三语自勉，并与大夏师生相期[15]。贵州食盐素仰川省，抗日战争时期，盐运受阻，贵州食盐昂贵。王伯群主张开发黔盐，积极与刘熙乙等人筹办裕民盐井公司，并出面聘人来黔勘测盐区。为培养盐务人才，王伯群在大夏大学附设盐务专修班，首开大学培养盐务人才的先例。该专修班共培养学生四五百人，分布国内各盐务机关任职[16]。大夏大学自创办到1944年，先后毕业学生达数千人，成为颇有影响的私立大学之一。

1944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贵州独山、荔波等县，声言将袭取贵阳、遵义，直捣陪都重庆，西南一片惊慌失措。王伯群急赴重庆商议保卫贵州及大夏大学去留问题。因胃溃疡复发，12月20日病逝于重庆江北陆军医院。

---

(1) 《王伯群君在进步党黔支部演说词》，《贵州公报》1915年2月3日。

(2) 《王伯群君在进步党黔支部演说词》，《贵州公报》1915年2月2日。

(3) 汪兆铭：《勋三位陆军中将王君文华神道碑》，《兴义县志稿·人物志》。

(4)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3年版，第18页。

(5) 参见《中央党务公报》第7卷第1期，第12页。

(6) 天声：《中兴民国内幕之人杰》，《贵州公报》1916年7月15日。

(7) 《赴沪代表王伯群呈据上海留学生倪松寿请助留美各情》，贵州省档案馆藏件，全宗2，案卷148。

(8) 《王伯群致刘显世电》，贵州省档案馆藏件，全宗2，案卷177。

(9) 桂百铸：《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6页。

(10) 1919年12月4日《刘亚休致熊克武密电》，原件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11) 《大夏周报》第24卷第14期。

(12) 参见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十四日出版的两期《大夏周报》。

(13) 王伯群：《弁言》，《大夏周报》第14卷第7期。

(14) 参见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出版的《大夏周报》。

(15) 何辑五：《悼伯群先生》，《中央日报》1945年1月25日。

(16) 刘熙乙：《悼伯群校长》，《中央日报》1945年1月25日。

王伯元

董建侯　宋紫云

王伯元，字怀忠。1893年6月4日（清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出生在江苏吴县（今苏州），祖籍浙江慈溪。父亲王清芬曾在江苏海门、苏州一带经商，后任苏州恒孚银楼经理，定居苏州。王六岁延师课读，十七岁到上海震丰永金号当学徒，三年后被留用跑外勤。在学徒期间，王已加入上海金业公会，开始参加社会活动。1916年，应涵恒金号资方徐伯熊邀请，任该号经理[(1)]，1918年改任天昌祥金号经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市面金价时涨时落，王观察行情变化，常能不失时机地为天昌祥金号买卖标金，从中牟得暴利，受到资方赏识。

1921年，王伯元辞去天昌祥职务，自筹资金开设裕发永金号任经理，同时做金业交易所的经纪人，在金业界渐露头角，不久被推选为上海金业交易所理事。他在金业交易所任事，掌握标金行情。遇到赤金行情[(2)]比外汇汇票行情低时，他就卖出汇票买进赤金，从中套利，逐渐积有巨资。1923年，王又独资开设元发证券号，买卖各项有价证券，从中谋利。不过数年，王便从一个普通商人一跃而为百万富翁，在慈溪长石桥广置田产，兴建住宅。

王伯元深知从事黄金投机买卖风险极大，遂转而投资金融事业。1929年，他联合上海金融界领袖秦润卿、徐寄廎、李铭等人，通过交通银行总行副理梁晨岚的联系，接办中国垦业银行，进行投资改组，资本总额一次收足二百五十万元，王伯元独自投资一百四十万元，占百分之五十八。该行原创于1926年，经改组后总行由天津迁到上海（天津设分行），成立董事会，推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伯元为常务董事兼总行经理，掌握实际权力。秦润卿作

风正派，办事稳健，素为上海金融界所敬重，在答应出任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时，有言在先：一是垦业银行不做买卖外汇业务，二是垦业银行的股东和负责人不准向本行借款宕账。王完全赞同。

王伯元主持垦业银行总行，积极推进业务。他首先向董事会建议，拨出基金十万元成立储蓄处，开展储蓄业务。吸收的储蓄存款，第一年为六十余万元，第二年达七百余万元。1933年，储蓄处在南市文庙公园设立一个储蓄所，吸收的储蓄存款以零星细数居多，为广大市民所欢迎。

王伯元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地产委员会委员，熟悉地产业务情况。他于1931年在垦业银行总行添设地产部，办理房地产押款业务，代收房租，但不直接经营地产买卖。他私人拥有四处房地产，面积五十余亩，每月可收房租九千元，为了使房租能及时入账，也交由地产部经收。同年，垦业银行上海总行新建八层钢骨水泥大楼，内设保管库及银库，于1933年10月初落成，其二楼以上房屋全部出租，每年收入租金三四万元。

当时，上海浦东一带的农民，多以植棉为业，新棉上市时花价往往被商人压低，棉农多愿以棉花向私营仓库作质，待价而沽。王伯元针对这一情况，于1934年由垦业银行与浦东恒大新记纱厂、恒源兴记轧花厂合作，设仓库十一座，对棉农办理棉花抵押放款。棉农以籽花或花衣作质，垦业银行凭仓单放款，每年投放贷款五十余万元，为银行资金谋得出路。

王伯元对民族工业抵押放款，肯于放手。亚浦耳电器厂的产品与舶来品竞争，垦业银行不断贷款给予支持。1935年，市面萧条，银根吃紧，民族工业岌岌可危，垦业银行仍继续投放资金，对振华纱厂、经纬纱厂、章华毛纺厂、亚浦耳电器厂等均先后承做数额较大的抵押放款。

王伯元对于代客买卖有价证券，富有经验。1940年，他建议董事会拨出资金五十万元设立信托部，办理信托业务，兼收各种定期活期信托款项。对外商发行的股票，如橡树种植股票及其他实业股票均有投资，但坚持不做买卖外汇业务。

王伯元能与秦润卿和衷共济，一贯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以抵押放款为主，坚持做“多单”不做“缺单”[(3)]。储蓄业务发达，则运用储蓄存款资金购置房地产，收租作息，保证资金运用稳妥。1943年底，秦润卿因年事已高，辞去垦业银行总经理兼职，仍任董事长。1944年初，王伯元接任总经理。

垦业银行原以放款于垦牧农林等事业、辅助实业发达为宗旨，而实际上经营业务与一般商业银行相类似。1948年，国民政府颁行银行法，规定“银行之种类应在其名称中表示之”。秦润卿、王伯元等人反复商讨，为求与银行法不相违谬，决定取勤恳乃业之意，改“垦业”为“恳业”，名“中国恳业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中国恳业银行”。

王伯元除主持经营恳业银行外，私人投资的企业尚有同庆钱庄、同润钱庄、元大钱庄、绸业银行、国泰银行、贻成面粉厂、天一保险公司等多家。

王伯元成为巨富后，曾为疏浚慈溪长石桥至樟桥大河、重建宁波市的老江桥、兴办长石桥植本小学捐资，并在长石桥附近买下荒丘为义冢。王还在南洋中学和复旦大学设置奖学金，先后资助几十名家境贫寒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期间，王伯元先后出任伪上海市保甲委员会副联保长、伪上海市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他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慑于清议，避地离沪，1948年底赴美国侨居。

1977年9月28日，王伯元在美病故。

(1) 当时资本家开设金号，根据金业公会会章规定，必须聘请金业公会会员担任经理，即资本代理人。

(2) 上海黄金市场的价格，是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决定的，当时每天看汇丰银行外汇行情为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按英镑计算，欧战后按日元计算。

(3) 银行经常有余款存放同业者称“多单”；反之经常依靠同业借入款经营投放者称“缺单”。

王承斌

邵桂花

王承斌，字孝伯，满族。1874年8月21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初十）生于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市）。王幼入私塾启蒙，1898年受业于表兄吴景濂，学习经史纲鉴。1902年，吴景濂入京师大学堂就读，在其影响下，王于翌年考取京师优等师范学堂。时国人有识者倡导御侮自强与尚武精神，有志青年竞相向往之。1905年，王承斌弃文习武，投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1907年毕业。同年秋，升入保定军官学堂，1909年毕业，补授禁卫军排长，旋即被派往东北，担任曹锟为统制官的第三镇三等参谋官，驻防长春，后升至管带。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急调第三镇入关，旋即开赴山西镇压革命。12月12日，攻陷娘子关，进逼太原。1912年1月，第三镇驻防南苑拱卫京师，时王参加反对共和、维护清廷的复辟团体“宗社党”。为此，吴佩孚曾多次劝曹锟开除王的军籍，曹不以为然，但王与吴的芥蒂由此而生。

同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为第二任临时总统。2月29日晚8时，第三镇部分官兵于京城哗变，大肆抢劫，为袁拒绝南下就职制造了口实。8月19日，陆军改制，王任第三师第六旅第十一团团长，授陆军上校，未几加陆军少将衔，后补授陆军少将。1913年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王承斌随第三镇入湘，驻守岳州。1915年冬，护国战争兴起，王随第三镇入川西征。1916年1月，王承斌升任第三师补充旅旅长，并于川境招募成军。2月6日，王部先抵泸州，初显身手。10日，王与吴佩孚部进攻中兴场，护国军以少胜多，顶住北洋军压力，与其相持于川南。

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总统。月底，第三师奉命出川驻防保定。转年5月24日，黎元洪任命王承斌为直隶第一混成旅旅长。嗣后，王补授陆军中将衔。王承斌在曹锟手下任职多年，随其南征北战，被曹收为心腹。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王承斌部为西路讨逆军，在吴佩孚指挥下攻打辫子军。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北京中枢，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9月1日，孙中山于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立局面形成。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积极对南方用兵，以曹锟为攻湘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两湖宣抚使。1918年2月7日，曹锟督师南征，调王承斌等三个旅赴前线，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吴指挥第三师占领衡阳后不再前进。6月16日，吴在前线通电罢战主和，并自行决定停战。参战官兵不服水土又有厌战情绪，因病减员甚多。时王承斌在湘南因病一再请假，故前线军事行动已陷停滞。6月27日，北京政府授王承斌为陆军中将。

1920年5月22日，吴佩孚指挥第三师从湘南且战且退，27日王承斌等部过长沙，湘督张敬尧陈兵以待。6月9日，该师返抵直豫之交驻扎。15日吴佩孚至保定与曹锟商讨对付皖系办法。6月23日，张作霖以调人身份向段祺瑞陈述曹、吴的五项要求，为段所拒绝。张以调停失败，宣布“中立”，随后派出奉军两个旅入关助直讨段。7月9日，直系于天津举行讨皖誓师大会，吴佩孚任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指挥，曹瑛任东路指挥，王承斌任后路总指挥。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16日，吴率王承斌等部包抄袭击皖系两个师，切断其归路。吴、王在直皖之战中身先士卒，使直军将士奋勇前驱，经过五昼夜激战，以皖系失败告终。同年10月17日，王承斌升任第二十三师师长。曹锟久居保定，以王帮办直隶军务。王在曹嫡系中之地位仅次于吴佩孚。吴深恐被王取代，竟不断施计离间曹、王。同时，吴克扣王部军饷，致使王部因索饷未果而发生哗变，王为此受到曹的申斥。

直奉以暂时的联合战胜皖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然直奉间的矛盾又在酝酿新的战争。1922年2月3日，直系召开保定会议，王承斌力主对奉让步，这符合曹氏兄弟心意。2月11日，张作霖于奉天召开军事会议，王奉命于同日抵奉，旨在调和奉张与吴佩孚的冲突，避免战争。此后，王又两次衔命出关进行调停，均无功而返。不料王竭力弥合张、吴裂痕，竟成为吴攻击王有“通奉嫌疑”的佐证，致使王在临战前被拒保定高级军事会议大门之外。

1922年4月19日，直系在京畿琉璃河一带聚集十余万军队，以王承斌为西路司令，布防京保一线，后王又改任中路司令。26日，王在任丘、河间首先同奉军接战。29日，第一次直奉之战爆发，两军分别在三个战场上厮杀。随着战局的变化，王兼领中西两路指挥，在王指挥下，直军大败奉军，西路奉军十六师投诚，牵动全线瓦解，张作霖被迫下令总退却。奉军败绩，王自告奋勇追至滦县停进，代奉求和，恳请吴佩孚以张、曹姻亲为重，前时意见不合非为世仇，得吴首肯，允王全权处理对奉问题。在英国人调停下，6月17日，王承斌、杨清臣等直方代表与奉方代表孙烈臣、张学良签订和约八条与附约两款，战事始告平息。

战争中，王奋力督战与奉军厮杀，大败奉军，战功显著，但竟受吴佩孚派人暗中监视，王对吴恨之入骨。战后王大发牢骚说，老马为主人效驰驱有年，现已不被信任，应当知难而退了。又说，我是奉天人，就疑心我通奉，然则曹仲帅和张雨帅为儿女亲家，岂不也是通奉！

直曹打败奉张，进入鼎盛时期。曹锟得意忘形，迫不及待要赶走徐世昌，实现总统梦。直系实际领袖吴佩孚却大谈“法统重光”的好处，使黎元洪复任总统，既便于赶走徐世昌，又能使南方军政府无法可护，不打自倒。6月4日，王承斌继曹、吴之后领衔发拥护电。迎黎复职时，王充任代表赴津促驾。

黎元洪复总统职后，于6月24日特任王承斌为直隶省长。8月6日，曹锐正式“因病”辞去直隶省长职，王才正式接省长任。

1923年2月22日，王等军政要员齐集保定，共商倒阁之事。其目的在于去黎，为曹当总统铺平道路。然直系内部在总统产生、联皖抑联奉乃至内阁问题上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形成津、保、洛三派。津、保派曾在王的策动下，联合起来对抗洛吴。

曹锟为尽早登上总统宝座，积极进行倒黎活动。6月13日，黎元洪因不堪北京军警当局的多方压迫而避往天津，黎的专车在天津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并发通电谓：黎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解职，印信亦未交出，不知是何用意。为其劫车索印寻找借口。王还逼黎在代拟的三份文件上签字：向国会辞职文；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文；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当黎被迫签字并电京交出总统印信后，方才放行。但黎一回到津门本宅即发电声明，前所发三份电报系由王承斌胁迫而成，非出己意，应属无效。

直系在索饷、逼宫、劫车、索印丑剧中扮演主角的正是一年前请黎元洪复职时声泪俱下的王承斌，社会舆论对王多有非难和谴责。王辩解说，军警包围专车是相当仪仗兵和军乐队，固属迎接元首之惯例，为己开脱罪责。其后，王又设法阻止滞留天津的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以便让高凌霨一伙放手搞贿选。6月21日，王承斌致（个）电与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把吴佩孚给曹锟的（号）电照转，还在电文结尾加：宪法不许成立，大选早日观成。这个电报被人探听出来公诸报端，引起各方强烈的反感。吴矢口否认发过此电，王则声明此电为奸人伪造，正在密查中，实际上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这和王同日给上述三人的另一电报中，要求做好三件事：军警严密监视议员，不得令议员出京；妥速进行大选，以法定正统名义号召中外；不许制宪的内容完全一致。

此时，曹锟也急不可耐，用重金四十万元收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

包办大选。曹还调来山东省长熊炳琦坐镇北京，具体协调大选。王承斌则往来于京、津、保之间指挥大选，同时肩负筹集贿选经费重任。

为疏通议员，王承斌7月13日进京会见吴景濂。其办法有三：担保制宪会议不致临时改为大选会议；担保大选票费完全兑现；众议院议员瞬息届满，如有人愿入政界，当援助使其得所。附带条件：各政团对上述条件不满意者，当明白表示，不能临选反悔贻误大局；不得故意缺席。王出京前，向熊炳琦面授机宜：许诺出席制宪会议议员，足法定人数三次以上时，于此三次中分期发还去年至今之欠费；坚持先宪后选，避去票价之名目，给予一次酬勋若干等。

9月12日，贿选大会流产。以包办大选自诩的吴景濂不得不邀请王承斌到京主持一切。14日，王承斌到京。王表示这次来京，定使选举大功告成，否则决不返津。为此王使出全身解数，不惜血本贿赂各大报馆，京中除两家公正报纸外，无不接受王的津贴，故所发消息无一真实。为打击上海反对派，王托江苏督军齐燮元以五十万元收买上海各报馆，以造成不赞成黎元洪在沪组织政府的舆论，也不容黎在沪久住。王同时派人到沪进行反黎和反孙中山的活动。为拉拢齐燮元，王电齐称：如需巨款，请即电知，决不延误用途。王向议员则提出了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决定在选举前发给每票五千元的支票，选后三日即可兑现，以坚议员之心。10月1日，于贿选办公处——甘石桥俱乐部向“猪仔议员”共发支票五百七十三张。

10月5日上午，国会开会选举总统。场内军警、侦缉队、保安队密布，如临大敌。为凑足法定人数，选会三次延长时间，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五百九十三人，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总统。6日，王承斌如释重负回津。曹锟贿选总统耗资甚巨，据当时天津《大公报》揭露：贿选经费经王承斌、吴景濂、高凌霨等结账总共用去一千三百五十六万七千余元。这笔巨额贿选费中，有王承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以“借军饷”为名，饬令直隶各县征收一万至八万元，共勒索约四百万元；他还饬令直隶地方官厅逮捕贩卖鸦片的坐商、行商几百

人，除少数处决家产充公外，绝大多数烟贩由家属缴纳巨金赎人。

曹锟就任贿选总统后，王承斌马上发贺电到京，恭颂圣明。王在贿选总统过程中作用特殊，论功行赏，曹锟任命王为直隶军务善后督理。但王承斌意犹未足，看上直鲁豫巡阅使一职，直截了当向曹要官。为满足王的要求，曹决定免去吴佩孚直鲁豫巡阅副使职，改任两湖巡阅使。此举为吴所不容，吴派其参谋长面见曹锟陈述利害，谓是谁给你曹家打下的天下，离开吴子玉，你这总统稳不稳？曹锟恍然大悟，11月11日，特任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以王承斌副之，并授王为将军府匡武将军，陆军上将。这样一来，王不但要听命于曹，还要受制于吴。12月28日，吴电令王承斌，今后无论何项团体，若有集会索薪或罢工情事，须严加取缔惩办，先给王一个下马威。

由于王接近吴景濂及常与奉系往还，为曹氏左右所不喜，致使直鲁豫巡阅副使职权形同虚设。虽为直隶省长，然实权仍操纵在前省长曹锐及津派手中，王除每月从井陉煤矿捞取十万元补贴外，别无他利，有实权的只有一个二十三师师长兼职。然而好景不长，在吴佩孚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下，以省长不便带兵为由，于1924年2月28日被免去第二十三师师长兼职。王承斌军权旁落，对吴更加切齿。从此，王广泛联络津、保派策划联冯倒吴。王曾企图拥戴齐燮元为副总统，以遏制吴，未果。不久，王与冯玉祥、齐燮元秘密结成反吴联盟，后王又加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反吴同盟。

王承斌失去军权后态度更为消极，曾几次致电曹锟请辞，外界舆论认为此系王不满曹采纳吴的“军民分治”主张之故，实为直系内讧加剧之显露。经过曹几次殷殷慰留，王始打消辞意。1924年8月17日，曹锟派陆军总长陆锦赴津，与王承斌商洽防奉南下援浙事。8月23日，曹锟召开紧急会议，筹防东北。是日，王承斌到京谒曹，陈述此次主战非宜，未被采纳。曹嘱王速筹军饷百万元。9月1日，吴佩孚在洛阳集议御奉援苏，王亦派代表参加。10日，曹锟召见冯玉祥，请其负责山海关军事，冯表示不能胜任，并谓，去年不应解除王承斌等兵

权。11日，曹与冯、王商议出兵开鲁。14日，王应允出任讨逆军副总司令。

是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趁机派兵入关。17日，吴佩孚在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在四照堂召开军事联席会议，部署对奉作战，前线分三路，后援为十路，兵力约二十万。以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以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等。当王向吴佩孚领取开拨费时竟遭吴无故训斥，王、吴嫌隙已成鸿沟，无法弥合，行动上王处处消极抵制。

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冯玉祥部奉命出兵古北口，直趋赤峰，但冯寻找借口迟迟不进，暗作倒戈部署。吴佩孚对冯始终存有戒心，10月3日，派王承斌到承德前线，以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指挥冯玉祥、王怀庆的二、三两军，以此对冯进行监视。吴又派车庆云、陈德修等为前线执法官赴热河督师，殊不知王承斌与冯玉祥已另有所图。4日，冯玉祥与王承斌在古北口密议时局，冯深知王对吴之怨恨，为争取王的合作，将其倒戈计划全盘托出，王对冯表示同情，从而结成同气。王在古北口停留两日即转入承德。21、22两日冯将两旅军队悄悄开入北京，23日晨1时，冯在北苑召集会议，胡景翼、王承斌等出席，一致主张和平停战，并议及维持现政府或另筹过渡办法以及宪法与国会有否修正改组之必要等。与此同时，冯军将京内车站、电报、交通通讯机构占领，并派兵包围总统府，将卫队缴械，曹锟被囚禁。第二次奉直战争从9月15日到11月3日，一共打了五十多天，以直军主力全部覆灭和吴佩孚狼狈遁逃为其结局。

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面对逼他下台的人，正是一年前筹集贿选巨款并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那个健将，不由得百感交集。

由于王承斌是参与北京政变主要人物之一，11月3日冯玉祥在京召集军政要人会议，决定恢复王承斌二十三师师长职，派往天津收束

军队，办理善后。由于张作霖背约，奉军入关。11月11日晚，奉军李景林部将王承斌新编二十三师缴械，王仓皇避入英租界，不敢出面。12日，直隶省议会及各法团在李景林授意下，以直人治直为标榜，推李景林为直隶保安司令，并继王承斌为省长。12月12日，京师地方检察厅托天津地方检察厅票传避居天津租界之曹锟贿选涉嫌行贿人王承斌、吴景濂等，并搜查吴的住宅。此后王寓居天津。

1936年，王承斌病逝于天津寓所。

主要参考资料

《盛京时报》1905—1935年。

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1—5辑，四川出版社1985年版。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1—6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6月版。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页。

［美］柏脱等编：《中华今代名人传》，上海时代传记公司1925年版，第148页。

王宠惠

郑则民

王宠惠，字亮畴，原籍广东东莞。自其祖父起，迁入香港。父亲王煜初是香港基督教堂牧师。王宠惠1881年12月1日（清光绪七年十月初十）在香港出生，家住香港荷理活道75号，与孙中山早年学医之西医书院为近邻。孙与王煜初常有交往，王宠惠从小便认识孙中山，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1)]。

王宠惠幼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继入皇仁书院。1895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学习法律。1900年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任教。1901年赴日本留学，致力于政法问题的研究，并曾参与秦力山、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任英文记者。1904年赴美留学，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接着前往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又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的会员。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翻译为英文，由英国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问世后，立即博得称誉，风行一时，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所指定的必读课本。这便奠定了王氏在国际上的法学声誉的坚实基础[(2)]。

王宠惠在欧美求学期间，同孙中山过从甚密，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深。当1904年孙中山到达美国纽约时，王听孙谈论有关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计划。同年8月，王协助孙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指出中国问题是整个远东问题中“不能不特别注意”的。该文还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劝说西方各国放弃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以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3)]。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王宠惠加盟并

参与筹措经费、发展会员的工作。

1911年9月，王宠惠由欧洲回国，抵天津时，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上海光复，王抵上海后，受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为顾问。12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谈判，王受任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12月25日，孙中山自美洲归国，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王宠惠以广东代表身份出席，被推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副议长。这次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王宠惠经孙中山提名，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王宠惠就职后，协助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争取各国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阻止各国对清廷的继续支持。他们在《对外宣言书》中表示："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以前，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4)]。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任唐绍仪为第一届内阁的司法总长。6月，唐绍仪忿于袁世凯的独裁，辞职出走，王也继唐绍仪之后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改当外交部顾问。不久又往上海，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兼在孙中山所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13年受聘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法学研究，当年著有《宪法平议》，随后又著《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书。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他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5)]

1916年护国运动发展，5月西南方面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命王宠惠为外交副使，他在上海曾有所活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总统。1917年王宠惠赴北京任法律编纂会会长，1920年改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1921年10月，与施肇基、顾维钧同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

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回国后，于12月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

直系军阀在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控制了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同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从广东回到上海。吴佩孚企图利用孙的政治威望，同他协调关系，标榜统一，以谋求向外国借款。孙中山为了集中全力推翻陈炯明，对北方采取了缓和态度。他授意在北方任职的王宠惠同吴佩孚密谈，借以削弱直系军阀对陈炯明的援助。王回忆说："民国十一年，总理见厄于陈逆炯明，于是慨然哀民生之多艰，思得较有实力，而又可与共事者谋统一之局。时北方大势在汴、洛间，宠惠始则经南北同志之怂恿，继得总理之同意，遂与汴、洛为秘密之谋，兼借此而阻北方援陈之举也。"(6)

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为了控制中国，加紧侵华活动，增加对华投资，注意支持和培养亲美的政治势力。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1922年5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要求"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7)。他们草拟了"政治计划"，争取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支持。6月，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入京取代徐世昌，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王宠惠任司法总长。8月初，国会开会后，黎正式提出由唐绍仪出来组阁，名单中王改任教育总长。吴佩孚等强烈反对唐绍仪出山，主张由王宠惠组阁，以便争取与孙中山的合作和美国的支持。8月15日，吴电请王宠惠出面组织"超然内阁"，表示愿意全力撑腰。王宠惠先以教育总长兼代总理。

1922年9月19日，王宠惠在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字的罗文幹和汤尔和也入阁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因此，这届内阁被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操控在直系军阀手里。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势力乞讨借款，为军阀筹措内战经费，引起人民的不满。当时直系内部分为以曹锟、曹锐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王宠惠

倾向洛派，对其提供较多的军费。保派对王宠惠内阁十分不满，企图通过推倒内阁，进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夺取大总统的“宝座”。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幹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对罗加以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事件发生后，先是在吴佩孚干预下将罗释放，接着曹锟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主张惩办罗文幹和王宠惠等人。吴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只得屈从于曹，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的支持，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由汪大燮署理内阁。

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是有名望的学者，1921年6月曾代表北京政府出席国际联盟会议，被选为国际仲裁法院裁判员。1923年，国际联盟又选他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王辞内阁总理后，遂前往荷兰就任。1924年1月又回国就任孙宝琦内阁的司法总长。孙提出“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主张，遭到财政总长王克敏的抵制，拒绝提供经费，王宠惠感到难以有所作为，于7月辞职，1925年再次出任修订法律馆总裁。

1926年1月，王宠惠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这时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准备进行北伐，北洋军阀的统治日渐面临困境。同年5月，北京政府颜惠庆内阁重新复活，任命王为教育总长，但他没有就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6月24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王宠惠为司法部长。同年9月中旬，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合并，仍任王为司法部长。

1928年6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告“统一告成”后，发表对外宣言，提出关于“改订新约”问题，即国民政府就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两个问题向各列强进行一次软弱的外交活动。王宠惠作为司法部长，为上述交涉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关税自主权问题获得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承认，取得一些成效。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进展甚微，至“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就搁置起来。1928年8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二届五次全会，讨论通过在训政时期实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度，王宠惠同胡汉民、戴季陶三人，被推为拟定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审查委员。10月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任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实行五院制，任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

1931年初，蒋介石在接连打败了同他对立的地方实力派后，即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便利用民意机关和法律形式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独裁统治；但他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2月28日，蒋把胡汉民囚禁起来后，召开一系列会议确定起草约法，推举王宠惠、邵力子、邵元冲三人起草初稿，王宠惠为主稿，王写出初稿后，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审议补充后，于5月8日由国民会议通过。这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计八章八十九条。这是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它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合法化。

当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触发了两广的反蒋行动，王宠惠的态度倾向于两广方面。4月他和孙科一起离职，从南京赴上海。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要求蒋下台。王宠惠不愿深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起程赴荷兰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职务。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曾选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他未返国就职。1935年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王宠惠在海牙国际法庭任正法官约五年，这一职务需要法学精深、资深并经验丰富者方能胜任。王在参与多起重要判案中，常阐发法学见解，贡献自己的智慧，深得同任法官的尊重[(8)]。

1936年，王宠惠辞去国际法官之职。这时正当全国抗日运动高潮，他是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重要人物，对日本的不断扩大侵略深感不安。西安事变后，他从英美派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

重开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联合抗日之后，于1937年3月起用王宠惠继张群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久又兼代行政院的院务。这时，日本新任外相佐藤标榜“对华亲善外交”，发表演说表示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王宠惠也向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表示：“热望调整中日国交，对佐藤外相演说至甚钦佩，愿在事实上努力促其具体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最初企图把这一冲突作为地方性局部事件加以解决。7月12日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要“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但由于日本政府继续进逼，8月13日又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所属各部“毅然进入全面抗战”。8月14日，王宠惠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自卫而抗战，声明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以应之。”(9) 这表明国民政府顺应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决定自卫抗战。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寻求国际上的援助，苏联表示积极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派孙科和王宠惠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晤，由王宠惠和鲍大使在南京谈判，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年11月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后，外交部又秉承蒋的旨意，指示出席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说：“我国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10)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王宠惠在外交上予以配合。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歪曲事实，为国民党开脱罪责，并通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吹嘘国民党反共军事部署周密，“即令共军续有异动，必可立予制止”(11)。

1941年4月，王宠惠调离外交部，不久改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

会秘书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当上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了劝说印度停止反英，共同抗日，并谋成立中印联盟，乃于1942年2月4日出访印度，王宠惠和宋美龄等十余人陪同前往。1943年11月，王又陪同蒋介石前往埃及出席开罗会议。经过美国罗斯福、英国邱吉尔同蒋介石的会谈，以及三国高级随行人员四天的商讨，于11月26日一致通过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当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王宠惠受委托将其译为英文。1945年4月，中国派出有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王宠惠是当时国民党派出的代表之一。该会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及集体安全和平之基本原则。

1946年11月，蒋介石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王宠惠参加了大会并参与制宪工作。国大通过了一个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把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合法”化。宪法规定大权集中于总统一身，它可以不受刑事诉究，任期六年连选连任。与此相反，人民、地方和议会处于无权的地位。王宠惠还赶忙写了《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一文，吹嘘这个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12)]，接着，王宠惠再次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宠惠以养病为名赴香港。1950年转往台湾，积极支持台湾当局沿用“中华民国”称号，恢复五院制政府，由蒋介石“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王宠惠在古稀之年仍继续担任“司法院院长”，实际上他年事已高，不常亲理“院务”。1958年3月15日王宠惠因心脏病于台北逝世。

---

(1) 王宠惠：《追怀总理述略》，载尚明轩、王学庄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页。

(2) 浦薛凤：《忆王宠惠博士及其英译〈德国民法〉》，台北《传记文

学》第38卷第3期，第91-94页。

(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3-255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页。

(5) 谢瀛洲：《王宠惠先生传略》，载王宠惠著《困学斋文存》，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年版。

(6) 王宠惠：《追怀总理述略》，载尚明轩、王学庄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3页。

(7) 《努力周报》第2期。

(8) 浦薛凤：《忆王宠惠博士及其英译〈德国民法〉》，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第91-94页。

(9)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4页。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1) 《王宠惠、王世杰致胡适电》1941年2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中华民国史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3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4页。

(12) 王宠惠：《困学斋文存》，第139页。

王光祈

李义彬

“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创始人王光祈，字润琯，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祖父王泽山是清季四川著名诗人，有诗集刊行于世；父亲早卒。王光祈出生时，他家在温江城外开设一个锅厂。后来家境衰落，生计日艰。

王光祈童年依靠寡母劳动生活。九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后由于得到四川总督赵尔巽（赵曾是王泽山的受业弟子）的资助，十三岁时入成都第一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与李劼人、周太玄、曾琦等同学。他在这里学习了五年，1912年毕业。1913年，他离别家乡，先到泸州，1914年由泸州出川到达北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对“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尤感兴趣。课余时间在清史馆任书记工作，以此所得作为学费和生活费。1918年6月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

“五四”前后，王光祈生活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又从事新闻工作，因此广泛接触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并受到较深的影响。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十分庞杂，既有传统思想的影响，又接受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1918年6月30日，他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在北京发起筹备“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学会的宗旨，经他提议，开始定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正式成立时，宗旨又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1)]。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时，他被选举执行部主任，一直到1920年3月他赴欧留学，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主要由他主

持。他仿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经验，在学会里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个方针，是因为“战后世界潮流的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2)]。因之，学会会员的成分复杂，信仰不一致。

“五四”前，王光祈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积极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欢迎俄国的十月革命，1918年12月22日在《每周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国际社会之改造》中说“俄德革命，社会党的骤然兴起”，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差强人意的事情”。他在这篇文章中还主张用“打破国界人种”的办法，“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建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理想社会”。1919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认为新生的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关于经济组织有所改造，比较的差强人意”，但其“国家权力甚大”，“拿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3)]。王光祈在“五四”时期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报刊，进行了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宣传。作为《川报》驻京记者，他在这家报纸上及时报道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和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四川“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1919年初，王光祈曾说：他“因留意世界大势，不知不觉的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4)]。但是，他接受的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克鲁泡特金提倡的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他在《每周评论》第十八号上写道：“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攻击国家社会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道：有了国家，便有了强权。又采行集产制度，便免不

了交易。有了交易，就免不了嫉妒竞争的心。有了嫉妒竞争的心，那社会上又要闹得不安宁了。并且人的能力，虽然是有差等，但是所需要的，同是一样。今若以所得报酬，以工作的多寡为比例，是强者智者所得常常有余，弱者愚者所得常常不足，与今日的地狱社会，有何区别？故不如各取所需的方法完善了。”[5] 实际上这也是王光祈当时的思想和主张。

王光祈不只是鼓吹无政府主义，而且积极地去实践。开始，他曾设想在农村建立一个“新生活的组织”，并异想天开地描绘了一幅蓝图：在城市近郊，建立一个菜园。这个菜园不大不小，适宜十来人种植便可。菜园中间建筑十来间房子，楼上作为书房、阅报室、藏书室等，楼下则作为卧室和饭厅。会员每日在这里种菜两小时，读书三小时，翻译书籍三小时，其余时间可游戏、阅报。会员的生活除靠种菜收入外，还靠译书的稿酬。稿酬的一半作为译者的津贴，另一半则作为共同生活的费用。王光祈十分向往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他说“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是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6]。可惜，这个“自由世界”只是座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根本不能实现。它反映了当时的读书人急欲摆脱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压迫，追求自由和平等新生活的强烈愿望。王光祈设想的这个“新村”虽未实现，1919年末，他却在城市里搞起“新生活”实验来了。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下，他参与发起并直接组织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这个工读互助团分为三组：第一组十三人，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第二组十一人，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附近；第三组十余人（全是妇女），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几十名青年为了改造社会，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集体生活，一面从事炊事、洗衣、印刷、装订等项体力劳动，一面在北京大学等校旁听。他们劳动所得归公共所有，“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幻想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以这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来“创造新社会”[7]。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企图实行共产主义的

分配原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也如此。北京工读互助团虽名噪一时、影响颇广，但其生命极其短暂，只存在了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反封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了分化。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会员；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成了信仰国家主义的右翼分子；王光祈等一大批人是学会中的中间派会员。“五四”后，他逐渐摒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走上了教育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左翼会员极力要改变学会那种宗旨笼统和组织涣散的状况，想使它成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革命团体。王光祈不赞成这种主张，认为改造社会可以不触动现行的社会制度，从“教育实业下手”即可。他解释说：“教育可以革新我们的思想，灌输各种知识；实业可以增益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生计上的痛苦。”还说，从事教育和实业，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活动的方向”[(8)]。他反对李大钊等关于学会要确定主义信仰的主张。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人根本没有信仰和实施主义的能力，充其量只能做些确定主义的“预备工夫”。再则，他反对“抄袭”现成的主义，主张重新“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主义”[(9)]。

1920年上半年，王光祈到德国留学，先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同时兼任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的驻德记者，以稿费维持生活。起初他不懂德文，由魏时珍阅德报口译，他笔记整理成文。两年后，他迁居柏林，改习音乐，走上了“音乐救国”道路。此时的王光祈远离了国内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踏上了复古的道路。他把“少年中国运动”倒退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他认为中国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他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复兴民族之路，是从事“自反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的根本途径，就是利用西洋的

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礼乐，“用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10]。他在1924年写的一首诗反映了他当时的这种思想，“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立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11]。

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潮。这时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更为深刻和激烈，左右两派势同水火，互不相容，学会分裂已成定局。长期远离祖国的王光祈无视这一客观现实，仍想维持这个名存实亡的学会。同年10月15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调查表中表示，“倘会中国家与共产两派不能合作，则主张将学会分为：（甲）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派；（乙）少年中国学会共产主义派；（丙）少年中国学会民族主义派”[12]。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从1925年下半年起，这个学会就停止了活动，无形中宣告解散了。

1926年，王光祈从柏林大学转到波恩大学继续研习音乐，先后出版了《西洋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和《东西乐制之研究》等著作。从1932年11月1日起，他开始在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讲师，讲授中国文艺。1934年，以“中国古代歌剧研究”论文，获得音乐博士学位。其后，经左舜生推荐，蒋介石曾通过驻德使馆参赞谭伯羽劝其归国，未果。

“九一八”事变后，王光祈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虽在国外也积极投身于爱国活动。“他做了不少攻击日本替中国辩护的文章，发布于柏林及法兰克福各大报。”[13] 1934年2月19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记述了他在波恩与留学生们一道抵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御用文人讲演的爱国行动。他写道：“本月15日，有一日本教授在此讲《满洲国与日本》，并附以有声电影。此间同学，交涉阻止无效，乃与东方语言学院院长接洽，于讲演之前，由该院院长说明吾辈反对经过之情形，并朗诵吾辈拟就之抗议书一遍，读毕，吾辈全体同学退席，以表示抗拒之意。”[14]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病死于德国波恩。其骨灰由友人运回国内，安葬于成都东门之牛市口。

---

(1) 《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印。

(2) 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总会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中华书局1919年3月印。

(3) 《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中华书局1919年6月印。

(4) 《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中华书局1919年6月印。

(5) 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6) 若愚：《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7) 王光祈：《北京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8) 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9) 《会员通讯：王光祈致恽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15日）。

(10)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1页。

(11) 《醒狮》周报第4号（1924年11月1日）。

(12) 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15页。

(13) 陈剑修：《与王若愚先生同舟赴欧的追忆》，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年版。

(14) 魏嗣銮：《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王国维

耿云志

王国维，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他的父亲王乃誉，本为儒生，太平天国时期弃儒经商，又曾一度在江苏溧阳县做小官。他的家庭是“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1)]，是个有读书传统的中等收入家庭。

王国维三岁丧母，六岁入塾读书，十五岁进州学。他于1893年、1897年两次赴杭州应乡试，都没有考中。当时西学渐盛行，他便放弃举业，于1898年到上海，在汪康年等办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当书记校对。是年6月，开始以业余时间去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跟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外文及理化等科学。学社只有六个学生，王在文史方面的才识很受罗振玉赏识，王事罗以师礼，并终生依庇于他。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报》停办，罗振玉把王国维留在东文学社治庶务，资助他继续学习，1900年秋，东文学社解散。次年春，王应罗振玉之招，赴武昌，在罗主持的农务学堂任译授。秋天，罗资助他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1902年夏，因病回国。

1903年，王国维受聘于南通师范学堂，任心理、论理学教员。次年，因罗振玉就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王国维随去，在该校任心理、论理及社会学诸科教员。1906年，罗振玉被调入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又跟随入京。次年，由罗振玉举荐，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以后又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

王国维治学开始，对西方哲学发生兴趣，倾心研读尼采、康德的著作，对叔本华的书尤为爱好。190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住在罗振

玉家中为罗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直到1907年。他在《教育世界》上发表过大批哲学论文。到北京以后，他的治学兴趣集中于文学方面，特别潜心于词曲。先后有《人间词甲稿》、《乙稿》和《人间词话》问世；并写成《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等数种整理与研究古代戏曲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于1912年流亡日本时撰成《宋元戏曲史》（最初发表时，书名为《宋元戏曲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开始过亡命遗臣的生活。到日本后，罗振玉对王国维说："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末由也。"[(2)] 从此，王国维"尽弃前学，专治经史"[(3)]。

王国维居日本四年多，以研究整理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为事，并常与日本学者相交流。其间，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先后写成《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以及其他考古学论文多篇。

1916年春，王国维应犹太富商哈同（S．A．Hardoon）的聘请，回国到上海，为哈同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1918年，王国维兼任哈同办的所谓"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9年，应藏书家蒋孟苹之请，为他编写《密韵楼书目》（1923年初完成）。同年，参加纂修《浙江通志》，担任总纂的是与王国维关系非常密切的清室遗老沈曾植。

王国维在上海一直住到1923年春。这是他学术活动最盛的时期，著述极多，主要为甲骨文及古史考证。较重要的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来在清华研究院将其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及《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等。1921年，王国维将辛亥以来的主要著述辑为《观堂集林》二十卷，于1922年刻印完成。

1923年4月，以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又被清末陕甘总督、宗社党主要成员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召为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先生。他5月入京就职，得到“五品”官禄。从此，作为已经退位但还不甘心灭亡的清室的臣仆，拖着长辫随侍废帝左右。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避居日本使馆，王国维“侍行未敢稍离左右，其后又时往日使馆觐见”[4]。而且为了表示效忠清王朝，还几次要投“御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

当时，清华学校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请王国维当院长。他以“时变方亟，婉辞谢之”[5]。1925年初，溥仪亲自劝他去就任，他才接受聘请，允任教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两年多，除教授经史小学等科外，还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曾刊行《蒙古史料四种校注》。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到1927年4、5月间，北伐军进抵河南，冯玉祥部亦由陕西东进。当时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对革命十分恐惧，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6月2日，他写就遗书，其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便到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6]。

---

(1) 王国维：《自序》，《静安文集续编》，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2)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1927年刊行。

(3) 罗振玉：《观堂集林序》，《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

(4)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第126页。

(5)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第126页。

(6) 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21页。

王和顺

黄碧琴

王和顺，字德馨[(1)]，号寿山。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于广西邕宁县一个壮族的贫苦农民家庭。王和顺青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参加过抗法战争，担任过哨官。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大批遣散抗法战士，王和顺回到家乡并参加了三合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广西天灾频仍，瘟疫流行。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西各族人民，在会党的组织和领导下，酝酿大规模的反清斗争。王和顺这时正在宣化县（现在邕宁县及南宁市的一部分）署当衙役。他有五个兄弟当时因抗租税而被官府杀害，目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他心中燃烧起了反抗的怒火。县署衙役当时肩负有所谓“捕盗”的任务。王和顺利用职务的方便，暗中串联了许多穷苦失业的壮汉族兄弟和散兵游勇，设台拜会，组织抗清队伍。1898年，他被清政府逮捕入狱。次年8月，从狱中逃出，召集会员，“聚众拜台”，公开举起了反清革命斗争义旗。在王和顺的影响和推动下，当时南宁府属的邕宁、横县、隆安以及思恩府属的武鸣等地，先后发生多次会党武装反清斗争。

1902年，清政府特命广西提督苏元春兼任广西边防督办。这年6月，苏元春饬令总兵马盛治率领大军镇压人民起义。王和顺率领会党武装，将马盛治的队伍围困在隆安县马鞍山峡。马盛治率部突围，被王和顺开枪击毙，其部几乎全军覆没[(2)]。

1903年，广西人民起义出现了新的高潮。清政府以苏元春“疏防失职”革去其职，充军新疆。另派岑春煊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岑春煊调集了湖南、广东、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大军共十多万

人，妄图一举扑灭广西的人民起义。广东调来的军队称“安勇”，由陆爵率领，兵多粮足、装备精良，王和顺在南宁石埠布阵诱敌，而将大队人马埋伏在隆安县境的梅龟山。陆爵驱兵急进，在梅龟山遭到伏击，伤亡过半。这支有“天上雷公，地上安勇”[3]之称的清军，被王和顺一仗就打垮了。

经过马鞍山峡和梅龟山两战役的胜利，王和顺声威大振，许多分散的会党武装，纷纷投奔王和顺部下。都安的韦五嫂（会党领袖韦五之妻）、南宁的关运培等抗清义军与王和顺领导的会党武装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南宁为中心，势力扩展到马山、都安、武鸣、隆安、扶绥、上思等地区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王和顺成为这一带地区会党的著名领袖。

1904年3月12日至4月21日，王和顺联合南宁地区的黄五肥、滕正宜，钦州的黄三等，集中了三千多名会党武装，在武鸣赖屯、花园村，及隆安的局理、都吉等地，与广西提督兼代理边防督办丁槐亲自督率的十多个营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随后，王和顺又率领义军转战到了扶绥、上思一带，依靠当地壮、汉人民的支持，凭借十万大山天险，与清军周旋。同年5月，柳州爆发了会党领袖陆亚发领导的起义，桂、柳、庆三府一带（即今桂林、柳州和河池三地区），人民纷纷起来响应。王和顺挥师北上马山、都安县境，与柳州地区会党起义军相呼应。随后又由上林县率队南下，占领了上林县和宾阳县交界的一带地区。接着转战邕宁、武鸣一带，专门打击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

1905年前后，广西会党起义暂趋低潮，王和顺不屈不挠，一直坚持反清斗争，他对清政府的招抚诱降视之“如粪土”，“宁备历艰险，未尝稍贬节操”[4]。清政府对他恨之入骨，悬赏万金购其头颅。由于寡不敌众，王和顺避往安南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

1907年3月，孙中山从日本到达安南西贡策划武装起义，王和顺

前往谒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旋随孙中山由西贡经海防到达河内，受命负责钦州、南宁一带的起义活动。同年4月，钦州、廉州“三那”（即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爆发了刘思裕领导的大规模的抗捐运动。清政府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和新军标统赵声（同盟会员）前往镇压。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发动起义的好机会，派人去郭、赵军中活动，并委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5)]，深入“三那”地区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王得知驻扎防城的清军连长刘辉廷、李辉堂有反清之意，决定在防城发动起义。这个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同年9月1日，王和顺率领“三那”的群众武装二百多人，从王光山出发，袭取防城。3日，王和顺以南军都督名义，发表了《告粤省同胞文》、《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文告，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反动，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得到清军连长刘辉廷、团长唐浦珠以及驻防城江对岸的守军连长李辉堂的内应，王和顺率领革命军于5日攻入防城，部队发展至五百多人。接着王和顺又率队向钦州进发，但因驻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不肯依约内应而没有攻克，起义军又转攻灵山，与清军激战三天，终因弹药缺乏，被迫撤回“三那”。由于一时无力进取，王和顺下令解散队伍，自己则退到河内，向孙中山报告钦廉防城起义经过。孙中山勉励王和顺继续战斗，命他负责组织桂边的镇南关（今友谊关）、水口关、平宜关（今平而关）一带的活动，着手准备镇南关起义。11月，王和顺赴那模村与凭祥土司李佑卿商议夺取镇南关炮台的问题，但因李佑卿的部下拒绝合作，孙中山改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派王和顺募集同志，夺取龙州水口关作为声援。

1908年4月，孙中山命令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三人筹划云南河口起义。4月29日，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领一百多人在河口起义，与清军血战一昼夜，占领了炮台，击毙清防务处督办官王玉藩，缴获枪支一千多支，子弹二十万发。驻河口清军六个营全数投降。5月4日，王和顺率领队伍沿滇越铁路线向北推进，两营清军相约来降，王部顺利占领了南溪。5月下旬，清政府调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清军数万人向河口大包围，王和顺率队迎战，相持了二十

多天。起义军弹绝粮尽，不得已撤出河口。王和顺和黄明堂率部六百多人退入越南，后被法国殖民政府扣留，驱逐出境并派轮船押送新加坡。

王和顺在新加坡居住三年，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到达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王和顺回到广东，他没有来得及征得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同意，便自告奋勇募集粮饷，于11月初（农历九月十一日）发动了惠州起义，组织的惠军与清军在飞鹅岭血战七昼夜，光复惠州。11月9日，广东光复。各地民军纷纷开进广州城，王和顺也率领惠军不下一万人的十七个营的队伍，进驻广州长堤一带。此外，还有黄明堂的顺军、陈炯明的循军等也相继进驻广州。不久，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独揽广东军政大权，他扩充自己的实力，排斥异己，实行消灭民军的政策。当时各路民军中“以王和顺惠军势力最为雄厚，又颇有纪律”[(6)]，是民军中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因此，被陈炯明视为眼中钉。陈炯明召开所谓裁军会议，遭到民军领袖王和顺和黄明堂的反对。当时，王、黄已意料到冲突不可避免，就将队伍退驻于东堤一带。1912年春，陈炯明出动军队包围惠军驻地，遭到惠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了几天，惠军终因枪弹接济不上而失败，王和顺出走香港。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中华革命军及护国军讨袁，王和顺亦组织义军，参加讨袁运动。

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王和顺回到梧州，与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兴师讨逆，1923年初随滇桂军进入广东。以后，王和顺离开军队，隐居广州多年。因积劳成疾，久患足疾，医治无效，于1934年在广州逝世。

---

(1)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册，第757页，关于云南河口起义的叙述中，称王和顺为“张德卿”；冯自由：《革命逸

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关于钦廉起义的叙述中，说王和顺“改名张德兴”；《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2版，第1编第13册，第155页，记述，“王和顺，字德馨”，可见，“卿”、“兴”、“馨”几字之差，皆为谐音之故。

(2) 关于马盛治之死，史志有不同的记载，本文采用余一清：《南宁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版）之说，第230页。

(3) 余一清：《南宁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30页。

(4)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145页。

(5)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156页。

(6) 李蘅皋：《王和顺惠军与陈炯明循军冲突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2页。

王怀庆

张学继

王怀庆，字懋萱。1876年（光绪二年）生于直隶宁晋县。因家庭贫困，自幼年起即在家从事放牛、牧羊、种地等农活，十二岁母亲去世，十五岁那年因不堪忍受继母的虐待离家出走，流落到直隶芦台时正赶上淮军将领聂士成部在此招兵，遂入伍当兵。王怀庆不仅勤快而且胆大，受到上司赏识，不久被保送到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二期学习。毕业后回到部队，提拔为哨官。1893年升千总。1894年随聂士成开往东北参加甲午战争。1900年，王怀庆升任直隶提督聂士成帐下的中军兼马步卫队管带。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后，聂士成奉命率部守卫天津。7月9日，聂士成所部在天津城南八里台战役中，与八国联军展开浴血奋战，在前线督战的聂士成中炮阵亡。王怀庆不顾生死，将长官的遗体从战场上背回，随后又亲自护送聂士成的灵柩回安徽合肥原籍埋葬。王怀庆忠于长官的举动得到朝野一致赞扬，聂家更是感激万分。

1903年，聂士成的母亲专函介绍王怀庆前往投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对王怀庆效忠主将的行为早有耳闻，次年即破格提拔王怀庆为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马一标标统，1905年春改调第二镇马二标标统。同年夏，王怀庆因镇压直隶沧州、献县、河间等地的农民起义“有功”，晋升为北洋常备军骑兵第二协协统。

1907年4月，王怀庆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前往东北，任东三省总督署军务处会办兼奉天中路巡防营统领，是徐世昌在东北倚重的军事助手之一。

1909年2月，改任淮军五路统领，同年升任直隶通永镇总兵，驻

防开平镇。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联合在北方发动“滦州兵谏”。吴禄贞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刺杀身亡。兵谏失败后，清廷下令第六镇、第二十镇分散各地，以防异动。其中驻防滦州的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是北方新军中革命力量最强的一支部队。该标第一营管带施从云、第二营管带王金铭等都是激进的革命党人。这两营官兵“自排长以至士兵，十九倾向革命”。在北方革命党人白毓昆、孙谏声、凌钺等人的策动下，七十九标官兵于1910年12月31日宣布起义，通电“主张共和”，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军政府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朱佑保为民政部长，凌钺为外交兼司法部长，陈沣为前敌总指挥，张良坤为秘书长。1912年1月4日晚，起义部队按计划向天津进军。不料，部队准备开拔时，张建功突然叛变，率所部第三营进攻军政府。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起义军为争取时间进攻津、京，遂放弃同张建功作战，登车西进。

清廷电令通永镇总兵王怀庆部与第三镇统制曹锟派部队阻击起义部队。起义部队乘坐的火车行至雷庄，遭到王怀庆部与第三镇优势兵力的阻击。起义军奋战一天，终以敌我悬殊，弹尽援绝，死伤惨重。这时，王怀庆派人到起义军中，假意请王金铭去雷庄车站议和。王、施遂带少数官兵前往会谈，途中为王怀庆伏兵扣留，并予以枪杀。王怀庆杀害王、施后，与曹锟的部队一起对起义军发起最后进攻，将起义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1912年3月，王怀庆任天津镇总兵。6月2日，任蓟榆镇守使；6月28日改调多伦镇守使，因镇压蒙古叛军有功，先后获得二等文虎章、勋五位的奖赏。1914年9月，调任冀南镇守使。袁世凯在宣布接受帝制后，大封功臣，于1915年12月23日册封王怀庆为“二等男爵”。1916年6月，王怀庆调任大名镇守使。

袁世凯死后，王怀庆依违于直、皖两派军阀之间。1918年2月，王怀庆升任直隶军务帮办，9月授将军府庆威将军。10月10日，徐世昌宣誓就任大总统，委王怀庆为总统府高等顾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京师步军统领李长泰因处置失宜，被迫于5月21日去职，徐世昌任命王怀庆署理京师步军统领兼第十三师师长（同年7月31日改为实任）。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徐世昌命王怀庆任京师步军统领兼署京畿卫戍司令，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王怀庆根据曹锟的旨意，将京畿的皖系溃兵先聚集起来，然后一律缴械，遣送回原籍。甚至连北京政府陆军部和段祺瑞公馆卫队共三千余人也全部缴枪遣送回籍。前后有四五万人的皖系军队被王怀庆解除武装遣回原籍，此举得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的赞赏。

1922年1月，毅军统帅姜桂题病故，北京政府命王怀庆会办毅军事宜。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3日，张景惠指挥的西路奉军被击败，此路奉军于次日败退至北京附近时，王怀庆指挥他的军队在南苑，对正在败退的奉军发动攻击，一举俘虏奉军三万余众。

奉系战败退回山海关外，北京政局由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把持，5月28日，王怀庆实任京畿卫戍总司令，29日又兼任热（河）察（哈尔）绥（远）巡阅使兼热河都统兼第十三师师长，多种职务集于一身，成为第一次直奉大战的赢家。

直系接连取得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曹锟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吴佩孚为此策划将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迎前大总统黎元洪复位，召集旧国会，再利用旧国会选举曹锟为大总统。为此，吴佩孚首先指使直系议员发表宣言，斥徐世昌的大总统非法无效，后又指使直系将领通电逼迫徐世昌立即辞职。徐世昌不甘心失去大总统宝座，更不愿被北洋后生辈逼迫下野，于是找来王怀庆问计。徐世昌问

王怀庆："你是我的体己人。你说，事到如今，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法子可想？"此前，王怀庆已得到曹锟的密令，叫他派兵押解徐世昌出京。王怀庆听完徐世昌的问话，直截了当地回答："只怕没法子可想了。我看您老还是让步，免得节外生枝。"6月2日下午，徐世昌发表辞职通电，随即由王怀庆亲自护送乘火车出京前往天津寓所。

6月11日，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捧上台。直系的意图是让黎元洪复位补足任期。可黎元洪一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就舍不得下台，想方设法延长总统任期。黎元洪恋栈，使得迫不及待要上台的曹锟忍不住了，决定以武力驱黎下台。于是，身为京畿卫戍总司令的王怀庆又担当起驱黎元洪下台的急先锋。

6月7日，王怀庆奉曹锟旨意，率领军警五百余人，腰佩军刀闯入新华门，围住黎元洪办公的居仁堂，索要军饷。面对王怀庆率领的气势汹汹的军警，黎元洪答应端午节（6月28日）前拨军饷四百万元。王怀庆才带领军警退出大总统府。

其实索要军饷只不过是名目，真正目的还是逼黎元洪辞职。6月9日，北京城的警察全体罢岗，守卫大总统和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的卫戍部队也撤走了。6月10日，又有三百多名军官到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住宅闹事，住宅内电话被军警监视，自来水龙头也被堵塞。天安门前还有大批的所谓公民团集会，高喊"总统下台"的口号。6月11日，又有千余名军警闯进黎元洪的住宅。黎元洪住宅内的水电全被切断，电话不通，一片混乱。身为京畿卫戍总司令的王怀庆竟向黎元洪提出辞职，表示不再负责维持治安。王怀庆还指使第十三师中下级军官集体辞职。至此，黎元洪感到大势已去，于13日下午匆匆乘专车离开北京。

将黎元洪驱赶下台后，王怀庆又将他搜刮来的几千两烟土（鸦片）献给曹锟，用作贿选费用。在正式选举那天，王怀庆率大批军警到象坊桥众议院以刺刀监督议员选举，众议院里里外外布满军警，在

众议院对面的墙上还架设起了机关枪。议员们投曹锟一张选票，可得五千银元的支票（重要议员还有高达一万甚至几万的特殊票价）。曹锟以贿选的形式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

曹锟上台后，要王怀庆尽早去承德组建巡阅使公署。王怀庆因为迷信，迟迟不肯出京。曹锟念他保自己当选大总统有功，让他在北京成立热察绥巡阅使署军务处。热河都统的职事则由热河军务帮办米振标代行。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任命吴佩孚为直军总司令。9月17日晚上，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军事会议，派兵点将。王怀庆自告奋勇担任直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指挥第十三师及驻热河的米振标部毅军，总兵力大约有两万三千余人，此路的作战任务是出喜峰口，趋平地泉至朝阳攻击奉军。王怀庆的对手是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此路奉军大约三万人，其作战路线是由北镇出朝阳，经凌源，直奔喜峰口。

王怀庆受命后却按兵不动。原来，王怀庆每次出征都择黄道吉日。王怀庆迟迟不到前线，热河前线只有第二路副司令米振标指挥的毅军。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练兵一向注重“急行军”，他以快速行军进攻朝阳，迅速打败了战斗力弱的毅军，占领了朝阳。王怀庆到前线后，见奉军攻势猛烈，为了保存实力，不敢与奉军交锋，节节败退。随后，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与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率军倒戈，回师北京与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将大总统曹锟囚禁，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大败告终。直系失败后，王怀庆被北京政府免去热察绥巡阅使、陆军第十三师师长等本兼各职，第十三师的番号也被取消。王怀庆被免职后，寓居天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很快沦陷。王怀庆离开天津回原籍宁晋县居住。日本侵略军继而占领涿州、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为了进一步掠夺华北的资源，日军制定《华北各铁路运营纲

要》，拟委任王怀庆担任平汉铁路治安军总司令。王怀庆闻讯，借故推辞，重返天津。

王怀庆在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和热察绥巡阅使时，从北京故宫、颐和园及承德避暑山庄盗出大批古玩、玉器和名贵字画等文物。1937年他从天津回原籍居住时，将这些珍宝带回藏于家中。为时不久，藏在老家的珍宝被日军洗劫一空。王怀庆受此打击，从此精神失常，多年卧床不起。

1953年，王怀庆病死于天津。

王家烈

周春元　林国忠

王家烈，字绍武，贵州桐梓县人。1893年7月10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生。其父王大章，在乡村教私塾十多年，后任保正，常以调解为名向乡民勒索“规矩费”（即讼费）。王家烈七岁读书，1909年考入桐梓县高等小学堂，1911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翌年去遵义，以教私塾为生。

1914年，王家烈投笔从戎，入贵州陆军步兵六团，先后为列兵、下士、副班长。次年8月，进黔军贵阳模范营学习。1916年回原部参加护国战争，编入陆军第一混成旅步兵二团二营五连，为少尉排长。年底随护国军右翼总司令戴戡进驻成都。次年春返贵州，入贵阳讲武学校，肄业。1918年4月，回部队任中尉排长，驻营铜仁。6月入湘，参加护法战争。1920年4月回黔。这时，第一混成旅十团二营营长周西成为培植个人势力，大力提拔桐梓同乡，王被提升该营连长，驻防黎平、永从。翌年春，孙中山命黔军援桂，王随周部入驻广西柳州，不久，又离桂返黔，驻铜仁。

1922年春，袁祖铭取得贵州统治权，时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周西成不愿附袁，率部入川投靠川军石青阳部。王家烈随往，在石部任营长。6月，王经石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王家烈协助周西成在涪陵收编从重庆东下鄂西的杨森军千余人，被提升为团长。1923年初，进兵遵义，又协助周收编了两个团，再次为周扩充了实力。周擢升师长后，王被提为旅长。同年4月，王在江津将北洋军、川军两营多兵力缴械，第三次为周扩充了实力。嗣后，周令其移驻叙永，养精蓄锐，历时两年。

1926年1月，周西成担任贵州省长，王家烈随之返黔，继续为周效力。因职位在周的妹夫、师长毛光翔之下，王不服，要求周合理调整职务，结果被周撤职。1927年春，王被重新录用为团长，驻铜仁。不久，被提为师长。9月湖南爆发秋收起义，蒋介石急电贵州出兵。王受周西成命，率师抵湖南沅陵，但因与湘系熊震、陈汉章等争夺地盘，一再失利，而且孤军深入、难以持久，旋奉令回黔，仍驻铜仁。1928年春，王被周委为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驻四川綦江、东溪，帮助川黔边防军赖心辉、郭汝栋部，防备川军刘湘移黔。这时，驻鄂西的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得到南京的支持率部返黔。11月，周西成、李燊之战爆发。王被周委为酉阳、秀山前敌总指挥，与李军战于龙潭、秀山、铜仁、松桃等地。混战持续到年底，王家烈屡战不利并在作战中受伤。1929年春，龙云滇军两个师与李燊部合力攻入黔境。5月，周西成死，6月，王家烈进据贵阳。

这时，毛光翔任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常在人前贬低王家烈，又不公开发表王的军职。王心怀不满，渐与毛分裂，投靠了蒋介石。是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王受蒋介石委派，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占据黔东南一带。1930年4月，毛光翔欲夺王兵权，诡称滇军袭黔，急电王“轻骑来省，指挥作战”[(1)]。王不从，且攻占铜仁、松桃以及黔东北一带，扩大自己的地盘。7月，蒋介石令王家烈出兵湘西，攻打工农红军，王被任命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驻洪江。1931年7月，王又出湘西南的靖州、绥宁，与湘军章亮基等联合，“清剿”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红七军李明瑞、张云逸部，蒋介石拨给枪一千支、子弹二十万发。11月，王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当面夸奖他“剿匪很有成绩”[(2)]，拨给迫击炮十六门、子弹二十万发。

1932年1月，王家烈以毛光翔要其回省参加“整编会议”为名，率主力退黔。由于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支持，他被任命为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自知实力不足，被迫表示“欢迎”，“推荐”王当贵州省主

席。不久，王又兼任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掌握了全省党政军大权。

是年冬，被赶下台的毛光翔联络王家烈部属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密谋反王，坐镇贵阳的王率部与战，指挥不当失利被迫退出贵阳至榕江。1933年1月，王再率部与战才夺回贵阳，恢复统治。这场军阀混战一直延至1934年春。王家烈统治贵州后，贪恋酒色，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妻子万淑芬干预军政，握兵八团，乘飞机纵横捭阖于南京与两广之间，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铜仁同乡，形成铜仁派。铜仁派与铜梓派争权夺利，人民怨声载道，有人曾作对联称："王纲堕地，万恶滔天。"(3)

从1934年下半年起，王家烈接受蒋介石命令，多次参与阻击长征过黔的工农红军。他先派旅长李成章率兵三团，在思南一带追击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9月，在黄平一带，亲自指挥所部追击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王又亲自率部进行防堵，并设军部行营于遵义、镇远，动用兵力二十一个团。次年初，蒋介石委王为"剿匪"第二路第四纵队指挥。他以侯之担师六个团固守遵义，以柏辉章师开赴遵义、刀靶水之间，据守乌江渡。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8、9两日连占娄山关、桐梓。王被迫退回贵阳，继续指挥黔军尾追红军。同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入贵州，王部又尾追红军至遵义北郊董公祠、飞来石等地。红军将其击败，再克遵义城，王狼狈逃至金沙、黔西。由于接连丧城失地，受到蒋介石的电报训斥。

蒋介石早认为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极不利于全国统一施政，在红军进入黔边时，他即决心"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4)。王家烈部在西南军阀中力量较弱，蒋乃乘其新败，派薛岳于3月30日用武力控制贵阳，吞并了王部侯之担师。4月，红军主力入滇，黔境战事已近尾声，蒋又逼王于军政二职中辞去一职。王无可奈何，辞去省主席职。接着，蒋又派人煽动王的部属闹饷，同时密以巨

款收买师长何知重、柏辉章，逼王下野。王无奈，只好辞去军长职务，后被委以“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闲职，于5月3日离黔去武汉。

同年11月，蒋介石让王家烈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1938年8月，日军进攻广州、武汉，蒋介石派王至鄂南，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军团长是汤恩伯）。不久，又调他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闲职。1942年，改为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王被迫退役，回遵义闲居。因王有社会声望，1947年被桐梓县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7月，王去贵阳治病，被当时省主席谷正伦委以绥靖公署副主任职。王未到任，贵阳即告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贵州省人民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11日病逝于贵阳。

---

(1)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8、33页。

(2)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8、33页。

(3) 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4)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王家襄

夏高阳

王家襄，字幼山，浙江会稽（今绍兴）人。1872年10月27日（清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其父王官亮，举人出身，曾署河南怀庆知府。王家襄幼失怙恃，由伯叔抚养成人。少时有志于学，用功甚勤，但屡试均未考中，以后改读法律。

1904年，王家襄以县丞分江苏，随即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学警政，毕业于东京警视厅特设警察专科。1906年回国，任浙江全省巡警参议，旋调任绍兴府巡警总理，后转任浙江高等巡警学堂提调，兼法制教习。1909年9月浙江谘议局成立，王家襄当选为议员，多有建白。在第一次常年会议上，王家襄被选为谘议局常驻议员和资政院议员，参与君主立宪活动甚力。

1911年，王家襄应友人之招，赴吉林任巡警道。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吉林巡警多为满、蒙人，对革命扞格不入，王联络官吏，“阳示镇定，阴调护之”[(1)]。不久，民国成立，南北统一，吉林未经动乱，王家襄颇获赞誉。旋南归，任浙江杭县知事。1912年4月，他被浙江省议会推选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赴京就职。

民国初年，政团纷起，分合迭变。王家襄先为民国公会会员，继为共和党员。后来共和党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王又为进步党党务部长。

1913年初，袁世凯下令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王家襄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起，张继辞参议院议长职，王当选为参议院议长，并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及理事，参与起草宪法。王自居于国民党与北洋派以外，以“独立自主”的中间派人士面目出现，其实进步

党为袁世凯所用，已成为在国会中打击和对抗国民党的御用工具。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势颓力衰，袁世凯为所欲为，不等宪法的制定，急于当正式总统，王家襄在国会为之奔走。是年9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案。10月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了匆匆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6日，国会在袁世凯党徒唆使的“公民团”包围下，演了一场逼选总统的闹剧。10日，袁在清宫太和殿就大总统职，王家襄以选举会主席身份向袁授大总统证书，并去武昌向黎元洪授副总统证书。

不久，袁世凯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欲变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当时王家襄及其他进步党议员，正在草订一部既可以维持国会的表面尊严和议员的个人地位并同时也可供袁利用的宪法，已进入到三读会。不料袁竟派出八名代表强行“列席”宪法会议，直接干涉制宪。在国会最后一点面子亦难以维系的情况下，议员们拒不接待八代表，使袁大为恼怒。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指责宪法起草委员会为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宪法草案侵犯政府特权，取消行政独立，形成国会专制，“势必亡国灭种不止”，号召各省“共抒谠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2)]。于是，各省都督、民政长等群起应和，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撤销宪法草案、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声喧嚣一时。曾为袁效命的王家襄等进步党议员，到这时也不得不为维护所谓国会尊严，宣称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

11月4日，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派出大批军警彻夜追缴国民党议员之证书、徽章，连跨党者、脱党者亦被追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一手扼杀了国会的活动。王家襄等进步党议员震惊之余，以参、众两院名义分别向政府提出质问书，限期答复，袁党置若罔闻。拖延了很多日子，内阁总理熊希龄才函复两院议长王家襄、汤化龙略称：“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3)] 接着，袁指派专人召集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权。一

个半月后，1914年1月10日，袁竟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正式宣告解散国会，王家襄等进步党人也被撇在了一旁。

袁世凯在实现了总统独裁制后，于5月设立参政院，自行指定当朝显宦、前清官僚、进步党名流等七十人为参政，王家襄亦列名于中。参政院名曰“以备大总统之谘询，审议重要政务”[(4)]，实为筹备帝制之专设机关。接着，袁又下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以便明目张胆地变更国体。在筹安会鼓吹帝制的喧嚣声中，参政院于9月1日开会，要求变更国体、实行君宪的“请愿书”犹如雪片飞来，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接踵而至。在讨论请愿事件的参政院会议上，王家襄发言表示反对，谓：“今日之事，除将一切请愿书却下外，无他办法。”[(5)] 次日，王知如此表态必为袁党所不容，在友人促使下托故离京，未再参与其后参政院上书拥戴袁世凯称帝的丑事。

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下令裁撤参政院，恢复约法和国会。8月1日，国会重开，不久宪法起草会议亦续开，王家襄回到北京，仍任参议院议长。

1917年2月间，由于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政策封锁海上，段祺瑞政府抗议无效，提出对德绝交问题。王家襄支持段祺瑞对德绝交的主张甚力，在参、众两院议员中为段游说，遂获得国会通过；但在进一步对德宣战问题上，各派意见分歧甚剧，议员中袒护黎元洪者颇不乏人。5月10日，段之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同时唆使几个所谓“请愿团”二千余人包围国会，殴辱议员，企图胁迫国会通过。议员愤懑不已，停止会议，不予讨论，遂使段之国务院与国会间冲突激化，王家襄虽欲竭力斡旋，亦难挽回。时段指使“督军团”出面干预，联名呈请黎元洪改正宪法草案，解散国会；而国会则断然主张内阁改组，迫段去职。23日，黎下令免段职，督军团遂宣告反叛，张勋以调停为名要黎限期解散国会，接着张勋更演出复辟丑剧。王家襄得到黎被迫下解散国会令的消息，便携带参议院印信微服出京，在天津以参议院名义通电声讨。

段祺瑞讨伐张勋竟功后，重掌北京政府大权，有意任王家襄为总长或省长，王未受，而力主恢复国会。段不愿尊重约法、恢复国会，下令另组参议院，于1918年8月另立第二届国会，世称“安福国会”，王家襄拒绝与他们往来。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败北，安福国会于8月解散后，王家襄与吴景濂等人积极筹划恢复旧国会，向直系首领曹锟等人游说恢复国会之诸多好处，建议恢复法统。1922年5月，王等在天津成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6月1日，召集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继续行使职权，同时宣布徐世昌是非法总统。王家襄与吴景濂、熊炳琦等人秉承吴佩孚之意，环请黎元洪复大总统职。6月11日，黎复出，随即下令恢复旧国会。8月1日起，国会开第二次常会，王家襄仍为参议院议长。王联络同志，主张此次国会应专事制宪，暂时停止行使其他一切职权。他们力陈民国成立已十一年，仍无宪法，前此责任或可诿为外力干涉，“此次开会，若不专力制宪，或因政争阻碍制宪通行，则国会咎无旁贷”[(6)]。但另有一批议员在曹锟唆使下，提议讨论黎元洪复职是否合法，谋作政治买卖另举曹锟为总统。10月，国会开第三次常会，参议员第一班任满，王家襄依法退议长职，仍当选为参议员。王热心于制宪，想继任议长，但是杨永泰的呼声也很高，重选议长之举竞争激烈。由于双方各有研究系和政学系为后台，势均力敌，各不相下。“初则彼此以不出席相抵制，继则以武力相对待。展开选会，屡次斗哄，均无结果而散。遂有行政委员会之组织代理执行会务。”[(7)]

曹锟急于登上总统宝座，策动内阁辞职和军警索饷，黎元洪被迫于1923年6月离职去津，行前将总统印章交王家襄，王不受。国会议员被直系操纵、受贿者越来越多，王乃托故出京，不再视事。旋曹锟命杨永泰以五十万元巨赂要王家襄赞助贿选，王拒不受。

此后，王家襄不问政事，专任中英合办的福中矿务公司督办，寓居北京，不与在位者相通，仅时与一二知己文酒聚会。1928年6月16日病逝。

(1) 张寿镛：《王幼山先生传》，《风云》第1期，上海风云出版社1943年9月刊印。

(2)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第150—152页。

(3)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3页。

(4) 顾敦鍒：《中国议会史》，苏州心正堂1931年版，第211页。

(5) 张寿镛：《王幼山先生传》，《风云》第1期，上海风云出版社1943年9月刊印。

(6)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1页。

(7) 顾敦鍒：《中国议会史》，第357页。

王金发

裘士雄　徐和雍

王金发，名逸，谱名敬贤，字季高，号孑黎，金发（亦称“金法”）是他的乳名。浙江嵊县董龙岗人。1883年4月3日（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王金发出生于小康人家，祖遗水田三四十亩（一说一百多亩）。他的祖先“因恶清避居董龙岗”，祖父王修宫不满清朝腐败统治，1861年“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为偏裨，率队驻宁波，已而太平军败，知事不济，乃散归，恣饮以终其身”[(1)]。父亲王启孝亦耻仕清，在籍从事耕读。王金发从小就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民族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感染。

王金发少时聪颖过人，生性强悍，好习武弄枪棒，尤喜射击。其母徐珍梅督教甚严。王二十一岁考中秀才，同时也练就了一手射击绝技。“时值欧风东渐，梁启超、康有为等刊行《新民》、《时务》等报大声呼号，又有孙文、黄兴辈潜结志士，为积极地进行，于是，‘革命’、‘排满’、‘民权’、‘天职’、‘自由’、‘流血’种种新词几乎遍及国中，尽人乐道。”“而金发亦于此时在乡联合胡士俊、胡春霖、周志由、张陔南等创立大同社，名为办学，实则植党结群，以待时机之至。”[(2)]他参加反清的会党组织——乌带党，继而归附平洋党，并很快取得绿林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戴，被推举为“龙头”（首领）。王金发“凡所举动，均以身为党徒先，故党徒咸乐就之”[(3)]。他们抗捐拒税，劫狱反官，从事反清斗争，清政府甚为震惊和不安，故“官府捕之，急如星火”[(4)]。1905年春，光复会领袖徐锡麟到嵊县寻访王金发等，密谈竟夕，相见恨晚。是年8月，王金发应邀入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创办的大通学堂，并参加了光复会。同年冬，他与徐锡麟、王振汉、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东渡日本，“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及至试验，成绩竟以第一人高标毕业”[(5)]。

翌年夏，王金发回国后任大通学堂体操教员，协助秋瑾培训骨干，准备武装起义。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事失败被杀，继而秋瑾以大通学堂为据点的光复军起义，也在发动之前便遭清政府的血腥镇压。7月13日清军来时，“金发适在校，欲谋抵敌，秋瑾以己系女人毫无证据，即被捕亦无妨，而催金发速行，与竺（绍康）等为后图。金发不从，促之再四，声色俱厉，金发不得已逾墙远遁”[(6)]。结果，秋瑾当天被捕，7月15日凌晨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王金发虽系清政府悬赏千金通缉的“要犯”，处境甚为艰险，但他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他更名孑黎，坚持反清斗争。王金发常向为富不仁之户摊款索粮，“以四分之一散贫民，以二分接济党人机关，以一分自充旅费”[(7)]。1907年冬，他策动裘文高率台州数百义勇，伺机抗击清军的剿捕，嵊县白竹之战，杀死清军管带刘庆林、哨官杨华泰等。1908年夏，王金发变卖家产和向亲友筹借数千元，与陈其美、竺绍康在上海开设天保客栈，作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机关。他是以暗杀为手段惩治内奸、叛徒的能手，曾在绍兴干净利落地击毙出卖秋瑾的胡道南，替秋瑾烈士报仇；曾在十里洋场上海惩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责令刘确保已被捕入狱的张恭人身安全；还指派堂兄王敬良在上海四马路处决叛徒汪公权。当时此类暗杀事件，多系王金发所为或参与指挥，因此，王金发名声大振，敌人则闻风丧胆。王金发或向华侨筹款，或购置枪支弹药、或联络会党，其足迹遍布日本、南洋、港澳、上海和浙江等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王金发积极参与光复上海的斗争后，即与张伯岐、蒋介石、王文庆等率领敢死队于11月2日赶赴杭州，4日晚，与驻杭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等部攻克军械局、抚署，活捉浙抚增韫。5日杭州光复后，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都督。次日，起义军领导人会议，王金发提出汤寿潜曾参与杀害秋瑾，要求改选，否则就用炸弹对付，被褚辅成竭力劝止，王乃愤而率部离杭。其时，绍兴的“几个旧乡绅”也拼凑了所谓“绍兴军政分府”，民政长则是原知府程赞清，治安科长则是“以刑幕致富”、杀害

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绍兴“光复”后的第二天，鲁迅和挚友范爱农到街上去走了一通，只见“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8]。因此，他们派代表赴省城请求派驻革命军。这样，王金发于11月10日率领革命军乘船到绍兴主政，鲁迅曾组织绍兴府中学堂师生和绍兴各界人士到五云门外欢迎。

王金发在绍兴主政期间，为开创新的政治局面做了一番努力。进城后，他重组绍兴军政分府，本人就任都督。王金发得悉程赞清的罪恶历史，曾欲捕杀，但为陈燮枢等人所劝阻，王金发受理群众的控告，将“矢忠清廷”的章介眉逮捕归案，并镇压了几十个民愤极大的恶霸，没收了景五四等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王金发接受北伐军副总司令（黄兴任总司令）的委任令，练兵筹饷，待命北伐。王金发饬令免一年钱粮，平米价、禁鸦片、奖励兴学、劝导实业、赦免“罪犯”，隆重公祭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并优厚抚恤其遗属，还任用了一批新人，其中鲁迅被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因此，光复初期，绍兴在各方面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可是，好景不长，自1912年袁世凯窃据政权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绍兴的复辟势力随之掀起一股“拥袁（世凯）、反孙（中山）、倒王（金发）”的恶浪，革命队伍内部也产生分裂，有的人倒向复辟势力一方。而王金发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他的某些失误和缺点也为政敌提供了口实，如在军政分府里任用了一批无能的亲朋故旧，助长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歪风；扩军后，新兵素质差，滋事生非，违纪扰民的事件屡有发生；王本人经不起权力的腐蚀，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诸如此类，不仅使王金发的新政方案计划得不到进一步实施，而且舆论日非，招致“祸绍”的罪名。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已和王金发熟识，他看到绍兴政局的逆转和王金发的转变，感到痛心和不满，曾创办《越锋日报》撰文予以监督、规劝和批评。王金发公开声称：“一声光复，满幕都翻。凡我同盟，

宜如何开诚布公，咸与维新，冀大造国利民福。”[9] “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本都督推诚相见，无诈无虞，愿我同胞，共喻斯义。”[10] 其时，一方面有黄兴、陈其美等上司派员或来函来电替章介眉讨保说情；另一方面王金发惑于章的韬晦之计，竟予以平白开释。鲁迅他们对王金发的这些错误言行，是竭力反对的。王金发虽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要派人去暗杀他的老朋友鲁迅，但他却是非不分地停发了学务经费，使鲁迅在此后不久便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别故乡。王金发在绍兴成了士绅们的“众矢之的”，最后也抵制不住袁世凯撤销军政分府和遣散部队的通令，被迫卸职，于8月1日挈眷赴沪“闲居”。在沪他出资筹办“竞雄女校”，又在南京路福建路口开设“天然旅馆”，秘密联络旧部。他的“寓公生活”无非是一种掩护而已。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王金发经多方侦察，“查悉确系应桂馨间接指使，武士英为凶手。季高遂率从者带巡捕与陆惠生乘汽车跟踪至妓院获之，并查获武士英，研讯口供，再检查其家中函电，牵连要人不一，其首逆则袁氏”[11]。于是，报界竞相披露，全国民心共愤，导致“二次革命”爆发。王金发在上海招集旧部奋起响应，出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命谢飞麟起草讨袁檄文，亲赴宁波策动驻军，以图响应，终因浙江都督朱瑞的阻挠反对而连遭挫折。“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国事犯”悬赏通缉王金发。王金发蛰居上海，陷于困境。其母在别人的怂恿下，背着王金发，托人写信至陆军部呈请赦免。王金发在亲友的催迫下，曾赴京争取“受得实职，以冀实行其革命之本旨”[12]，而陆军部却提出要他拿获革命党人自赎。王金发不屑卖友求荣，愤然离京返沪。他表面上仍逍遥自娱，暗地加紧活动，图谋重新举事。1915年5月，王金发以赴杭筹建新寓为名，打算招集旧部，以图东山再起，不幸为督理浙江军务的兴武将军朱瑞所捕。章介眉辈闻讯欣喜若狂，急电政府：“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恳即明断，以张法纪[13]。”6月2日，朱瑞既无罪状宣布，诿为“未奉特赦明文，遵通缉令”[14]，将王金发枪决于杭州，时年仅三十三岁。他“临刑时神色如故，无恐惧态，但求速死”[15]。广

大革命党人和人民闻讯既悲愤又痛惜，孙中山誉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不禁感叹说：“天地不仁，歼我良士。”[16]

主要参考资料

浙江嵊县董龙岗《王氏宗谱》（1—8卷）。

裘孟涵述、汪振国记：《王金发其人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去病：《王逸·附姚勇忱》，《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13期。

---

(1) 楼翼谷：《景风翁家传》，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2) 谢震：《王季君行述》，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3) 岑梦楼：《王金发》，上海华洋书局1915年仲秋初版。

(4) 岑梦楼：《王金发》。

(5) 谢震：《王季君行述》，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6) 谢震：《王季君行述》，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7) 谢震：《王季君行述》，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8)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3页。

(9) 王金发致孙中山电文，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

(10) 朱忞等编著：《鲁迅在绍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11) 谢震：《王季君行述》，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12) 谢震：《王季君行述》，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13) 岑梦楼：《王金发》，上海华洋书局1915年仲秋初版。

(14) 岑梦楼：《王金发》。

(15) 绍兴《越铎日报》1915年7月5日。

(16) 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王金铭

梁旭毅

王金铭，字子箴。1880年6月23日（清光绪六年五月十六日）生于山东武城县。他父亲王成耕种祖遗的七亩半地，不足赡养全家十一口的生活，以高利借来一点资本，做买卖土布的小本生意。王金铭八岁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喜爱阅读《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培植了他的民族意识。十七岁时进本地洪瑞钱庄当学徒，备受东家的苛待。

1898年，王金铭离开家乡，到天津小站投奔在新军中的大哥王金镜，旋应募加入北洋常备军左镇第三协第七标前营。王为人正直，不染恶习，不久即被提升为棚的副目。1900年随新军调往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后，被提升为左哨哨长。1905年，调任北洋第五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驻扎在济南千佛山下。1907年，升为第一混成协第七十九标第一营营副，队伍开到奉天，驻扎于新民府。

王金铭在军中常以岳飞的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下治矣”作为座右铭。这时候，同盟会员孙谏声、戴锡九等已先后打入北洋新军任下级军官，在官兵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策动起义。由于王金铭品行端正，足智多谋[(1)]，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他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刊，又结识了施从云、冯玉祥等倾向革命的下级军官。他们于1910年春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以读书研究军事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同年9月，王金铭所在的第一混成协与奉天巡防中路独立第一、二标合编为第二十镇，不久王升任管带。由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对革命持同情和赞助态度，参谋长刘一清是同盟会员，因而为武学研究

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参加武学研究会的官兵愈来愈多，风声过大，受到该镇反动军官的疑忌。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王金铭、孙谏声等山东籍的官兵又发起组织“山东同乡会”，举第四十协统领潘榘楹任会长，以遮人耳目，王金铭为副会长，负实际责任。他们利用这种合法的组织形式，广泛开展革命活动，把外省籍的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吸收为名誉会员，并把武学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全网罗到“山东同乡会”内。他们分赴奉天、北京、天津、唐山等地联络革命同志，在唐山设立“山东同乡会”暗作机关。

1911年9月，第二十镇的一个混成协奉命参加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队伍行抵昌黎县崔庄时，武昌革命爆发，清廷电令停止秋操，队伍暂驻滦州，旋又下令该镇赴武汉攻打民军。王金铭、冯玉祥、施从云及广大士兵获悉这一消息后，要求统制张绍曾率部起义，进攻北京，推翻清政府。张绍曾不敢接纳他们的要求，但也不愿去武汉攻打民军，决定拒绝受命，在滦州按兵不动，并联合蓝天蔚等人，向清廷提出十二条立宪政纲。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他们的立宪要求，于11月3日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接着于11月6日下令解除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削去他的兵权。王金铭、施从云等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在文庙召开七十多人的会议，挽留张绍曾，力请张率部起义。这时张看到与他联合起义的吴禄贞已被刺身亡，自己势孤力弱，乃借口养病，避往天津租界。

张绍曾去职以后，接任第二十镇统制的潘榘楹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将领。他为了拆散革命力量，把全镇部队分散驻于葫芦岛、海阳镇、锦州、临榆等地，滦州只留驻第七十九标，而标统岳兆麟也是个反对革命的军官。他们密布侦探，监视革命官兵，禁止自由往来；但王金铭和施从云、冯玉祥等继续领导革命官兵坚持斗争。王金铭密派郭凤山赴天津，与革命党人王葆真、孙谏声、董锡纯等酝酿滦州起义计划。其时，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校一批师生已组成革命团体“共和会”，派凌钺、张良昆、于树德等人到滦州来运动新军。王金铭、施

从云等乃与共和会会长白毓昆及凌钺、孙谏声等人秘密会见，商定了滦州起义计划。

12月下旬（农历十一月初），王金铭潜赴海阳镇，把滦州和南方联络的情况以及白毓昆和王葆真的意见，告诉冯玉祥。他们认为京奉线一带革命实力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陆，支援海阳镇和滦州的起义，又商议了配合民军登陆的起义计划，分头布置，只待民军登陆即行发动。

王金铭从海阳镇返回滦州时，白毓昆已先带着“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之印”的印信，率领二十多名敢死队员来到滦州，公开宣传起义，全城家喻户晓。王金铭一见大惊，因为烟台民军未到，还没有与各方联络妥善，起义日期也没有约好。可是起义已经公开宣布，无法挽回，他们便于12月30日在北关师范学堂营部召开会议，决定起义部署，并推举标统岳兆麟为北军大都督。他们明知岳“反对革命甚力，借此饵而诱之也”[(2)]，会后并把起义的全盘计划告诉了他。当天晚上，他们又以第四十协官长目兵署名，发出主张共和的通电。

可是，岳兆麟并没有被王金铭、施从云说服，他于第二天早晨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告发，把起义的计划全部泄露。王怀庆立即电请直隶总督陈夔龙转报袁世凯。袁采纳陈夔龙的献策：一面派王怀庆赴滦州“劝解抚慰”、“察其真相”，同时“收束兵队”、“密筹抵御”[(3)]。1912年1月1日，王怀庆来到滦州，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以求达到“顺机消弭”的企图。王金铭义正词严地驳斥王怀庆说：“清廷误国殃民，罪已昭著，海内志士，同举义旗；凡有血气，皆当振臂兴起，光我民族……我辈宣言独立，词义正大，心之所至，万死不辞。”[(4)] 同时立刻派人把王怀庆监视起来，并以大都督之职饵诱王怀庆参加起义。王假装接受，暗中却与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勾结，1月2日早晨，佯称入城就职，途中在张建功掩护下逃跑。

王怀庆逃走以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成立

军政府，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北军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部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凌钺为外交部长兼敢死队长[5]。当天王金铭宣誓就职，正式宣布“直省独立于滦州”[6]。滦州全城张贴独立布告及“王大都督布告赏罚十六事”，以安民心，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军政府原定独立的第二天即1月3日直取天津，由于接到王怀庆伪造的南军从秦皇岛发给王金铭的电报，决定暂缓出兵，等待来援。等到1月4日还未见南军开来，才明白是中了敌人的诡计，乃于当日誓师，发出檄文。下午五时许，起义军正准备登车出发，张建功图穷匕首见，踞城叛变，射击第一、二营官兵，王金铭下令还击，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王金铭等决定放弃滦州城，直取天津，乃率领第一、二营官兵及敢死队员共七百余人登车前进。当晚十二时许，火车行驶到雷庄附近，突然脱轨。原来，王怀庆已电请袁世凯调了第三镇第十二标增援，在雷庄设防，拆去一段铁轨，并布置炮队一营，截击起义军。王金铭指挥全军下车，与敌军激战约两小时。敌军鸣号停战，派人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议和。他俩当即答应愿往，众官兵阻止，认为王怀庆诡计多端，恐遭毒手。王、施认为：“如果和议能成，双方免受无谓的牺牲，一直可攻京津；如出意外，以身殉志，求仁得仁，有何憾焉。”[7] 官兵纷纷报名同去，王、施率领一百多官兵到达雷庄，敌人伏兵四起，把他们包围逮捕。王怀庆致电袁世凯邀功，袁电令首先杀王金铭。王金铭临刑时挺身叉手，大义凛然。清军统带汪学谦责备他说：“清朝待恩厚汝，何故反耶？”王金铭怒斥说：“汝非黄帝之苗裔耶？胡为出此言也！满人以异族入主华夏垂三百年，宰割我土地，鱼肉我人民，凡有血性人人欲得而诛之，何反之有！”[8] 这时王金铭看见他的马弁刘荣在旁边，便对协统陈文运说：“若无罪，可纵之去。”刘荣说：“予随大都督上阵杀贼，今不幸被困，生死同也，都督死，吾何生为！”[9] 遂同时遇害。

王金铭死后，灵柩存于雷庄，一个月后，他的好友连之铎将其移

到天津，后来他的胞弟王金钰又把灵柩移到山东，安葬于武城县。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于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为王金铭、施从云铸立了铜像，像的基石上刻有滦州起义始末及烈士殉难的经过。以后冯又在泰山为王、施建祠立碑。

附记：本文曾参考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有关资料。

---

(1) 冯玉祥：《我的生话》第一本，天津民国日报社1946年5月版，第94页。

(2)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46页。

(3) 《直隶起义清方档案》。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77页。

(4)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48页。

(5)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72页。另见凌钺：《关于滦州起义史实之辩正代电》，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269页。

(6)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8月版，第152页。

(7) 刘骥：《滦州起义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59页。

(8) 罗正纬编：《滦州革命先烈事略》，《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65页。

(9)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65—366页。

王荆山

马国晏　刘辔

王荆山，又名王琳，吉林长春县人。1876年1月11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其父王永祯，从原籍山东逃荒至东北，佃租田地耕种，勉强度日。王荆山幼年家境贫寒，十三岁入私塾读书两年，十五岁偕弟王奂清，随同叔父去黑龙江瑷珲（今爱辉），在“和顺成”银匠铺学手艺五年。由于银匠业日趋衰落，生计艰窘，王荆山二十一岁北渡黑龙江赴俄境，拟以挖金为业。因体力不强，又无同伙，便改做小商贩，靠肩挑背扛贩卖花生、榛子等食品为生。翌年6月，乘船行千余里，至当时中国人俗称“黄河口”地方，继续做小商贩，略有盈余。迨至1900年沙俄强行驱逐黑龙江以北中国居民，王荆山被迫渡江南返，是年底回到长春。

这时，长春已遭俄军侵占。王荆山利用粗通俄语之便，出入于俄军兵营，为俄军采办粮秣赚取佣金。1902年秋，他结识铁路工程师塞尔维亚人苏伯金。其时苏伯金在长春修建火磨，王荆山受雇“跑外”，为该火磨采办建筑材料和生产原料。两年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交战，俄军节节败退，苏伯金惧怕日军进占长春，便将火磨委托给王荆山经管，只身往哈尔滨暂避。次年苏伯金返长，见火磨完好无损，于是对王荆山颇为信赖，并将所产面粉全部交王包销，作为酬答。此时王荆山已稍有积蓄，便约同刘向阳、刘麟阁，集“羌帖”[(1)]九千，王自出三千，开设“裕昌源”粮米铺，主要经销苏伯金火磨所产面粉，兼加工高粱米、榨制豆油等[(2)]。王荆山为洋商当掮客，又自开商铺，从此发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首先在塞尔维亚点燃，苏伯金仓促返国，将火磨以四万九千卢布的低价出兑给王荆山。王获此意外之

财，如虎添翼，遂于该年9月12日开办“裕昌源”火磨。此时欧战正酣，国际市场上面粉及其他粮食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裕昌源”赢利甚厚。

为取得进一步发展，1915年春，由英商伊达洋行经手，王荆山以四千五百余卢布，在长春头道沟“铁路附属地”内购地七千坪[(3)]作为新厂址。王用三年多时间，修建厂房、平整道路、添置机器，至1917年冬，“裕昌源”火磨在新址建成投产。该厂雇佣工人六十名，日产面粉一千五百包，一昼夜可加工小麦近四十五吨[(4)]。该厂设备比较先进，场地宽敞，并建有联结铁路的专用线，这些对“裕昌源”的日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事过三十余年，讲述到“裕昌源”这一变化时，王荆山仍掩饰不住当时踌躇满志的心情，说：“裕昌源之事业为之划一新纪元。”[(5)]

“裕昌源”迁入新址后，除加工面粉，每年还收购数百以至上千（火）车皮的大豆和其他粮食，或囤积起来待价而沽，或径直发往大连外销出口，其中仅运往日本的大豆每年就近万吨。为了运销粮食大豆，王荆山在大连开设了“裕昌源”分号。1919年，王在吉林市以十九万元收买“恒茂”火磨，改称“裕昌源吉林火磨”，一昼夜加工小麦二十一吨[(6)]。1926年又在哈尔滨收购了一处正在修建中的火磨，一年半后竣工投产，是为“裕昌源”的哈尔滨分号。此外，“裕昌源”在长春还增设碾米厂和烧锅，并经营房产，在黑龙江安达县开设“裕达”火磨。

随着资本积累的迅速增长，王荆山不再满足单独经营粮食加工企业，开始向金融和其他产业投资。1921年，趁长春“益通商业银行”发生亏损之际，“裕昌源”加入三分之一股本（该行额定资本一百万元，实收二十五万元），王从而取得了董事长的职位。1941年，王荆山又让其子出面，投资开办“大明陶瓷厂”。

多年的苦心经营让王荆山积累了不少财富，并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得以跻身上层，成了当地的头面人物。1922年，长春地方当局为了城

市建设和整顿市容，成立市政筹备会，王荆山被聘为筹备委员。其后，王担任长春头道沟商务会会长。王还通过举办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创办私立自强学校、修建校舍和学校经费均由他负担，又创办“荆山幼稚园”等。

为了取得铁路运输和资金融通的方便，王荆山积极与长春的日本经济界拉关系。早在1912年王就因在当地商界比较活跃，被长春满铁事务所看中，物色成为商业参观团成员，赴日本参观访问。1921年至1931年，王兼任“长春信托会社”社长。该社直属于日本关东厅，每年从东北收购大量大豆出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后，在长春实业界中，王荆山被物色成为接受其侵略政策的应声虫。在残酷的殖民统治和严密的经济控制之下，王荆山企图通过投靠日本侵略者来保全和发展自己。1941年，在伪满经济部授意之下，王荆山将日本“锺渊纺织公司”所属“义大”火磨合并于“裕昌源”，并聘请日本人为常务理事；同时，王向日本“泰东烟草”、“军援产业”、“满铁”等企业投资。王荆山还积极靠拢日伪，与汉奸臧式毅、阮振铎、丁鉴修等人交往甚密，“裕昌源”中并有这伙人的股份。王荆山曾以“民众代表”的身份，参与了对伪满傀儡溥仪来长春的“迎銮”丑剧。国联李顿调查团到东北，王在日寇指使下，参加了“请愿团”。该团假借民众的名义，颂扬日寇的侵略暴行是“拯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王荆山被选任“新京头道沟商工会会长”。1937年该会与市内商工会合并，成立“新京特别市商工公会”，王又充任副会长。当南美萨尔瓦多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后，曾委托日伪为其选派驻伪满的“名誉领事”。王荆山遂于1940年担任了虚有其名的“萨尔瓦多驻满洲国名誉领事”。日寇为了利用王荆山为其侵略活动服务，给王多种头衔，诸如新京特别市咨议、日满实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央禁烟促进会委员、满洲军援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银行协会会长、新京防范协会会长等十几个伪职衔。1942年，在伪满洲国“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实施一周

年之际，王荆山在报刊上发表讲话，拥护“七二五”停止令的无限期延长，重弹“日满一体，共同防共”的反动滥调。1943年，在伪新京市公署的策动下，王荆山带头发起“五大城市捐纳飞机”的活动，为日寇的侵略战争效劳。

“八一五”光复后，王荆山曾被苏联红军拘留，获释后避居哈尔滨，后闲住长春。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王荆山于4月26日被逮捕，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死刑，次年3月19日在长春伏法。

---

(1)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部分地区流通的俄币，俗称“羌洋”、“羌帖”。此时多指银卢布，一卢布含银九钱，其市价高于银洋，而银洋一元仅含银约七钱二分。

(2) “王荆山档案卷”，长春市公安局藏。

(3) 坪，日本计算地积的单位，约合三点三平方米。

(4)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16页；又日本工业化学会满洲支部编：《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沈学源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03页。

(5) “王荆山档案卷”，长春市公安局藏。

(6) 《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第203页。

王闿运

白吉庵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璿，业商。王闿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闿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1)]，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

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2)] 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喧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3)]。在教学方

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穀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4)]。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5)]。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怕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6)] 于是，王闿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闿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湘军将领的情况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

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闿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王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王闿运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

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7]。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8]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

---

(1)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第1卷，1923年湘绮楼藏版，第13页。

(2) 王闿运：《湘绮楼诗集》第6卷，1907年刊本，第20页。

(3)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第2卷，第27页。

(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49页。

(5)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重印，第1页。

(6)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884页。

(7)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第6卷，第13页。

(8)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第6卷，第17页。

王克敏

王春南

王克敏，字叔鲁，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浙江余杭县人。1901年乡试中举，旋由清廷派赴日本，先后任浙江留日官费生经理员、留日浙江学生监督、驻日公使馆参赞。1906年，清廷派出使大臣杨枢为留日学生总监督，王克敏任副监督。次年冬王返国，供职于度支部，不久转入外务部。1908年，入直隶总督杨士襄幕，襄赞外交事务。1910年任直隶总督陈夔元属下的直隶交涉使。

1913年，王克敏赴法国游历。返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1917年7月，继李思浩任中国银行总裁。是年11月，王士珍临时组阁，王克敏入阁任财政总长，仍兼中国银行总裁及盐务署督办。1918年3月，王因内阁改组辞职。12月，作为北京政府十名代表之一，参加南北政府的和平善后会议。1920年起，历任中法实业银行总裁、天津保商银行总理、中国银行总裁、教育减债基金委员会委员等职。其间，北京政府曾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省长，因该省民众团体坚拒而作罢。

1923年6月，总统黎元洪去位，内务总长高凌霨摄政兼代内阁总理，王克敏于7月16日出任财政总长，刚刚一周即因张作霖要挟和天津直系势力反对而辞职。10月6日，王又辞去中国银行总裁职务，同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贿选总统。王克敏与曹锟渊源很深，在保定时就与曹时相过从，深相结纳，因而得于11月12日出任财长。在中国与法国就“金佛郎案”进行交涉时，王克敏充当法国内应，出卖国权。不久，孙宝琦奉命组阁，王克敏仍任财长。王与孙不相容，曹锟袒护王，孙不得已于1924年7月2日提出辞呈。接着顾维钧、颜惠庆相继组阁，王克敏蝉联财长。王克敏积极为北京政府聚敛钱财，时人蔑称

他为北京政府的“钱鬼子”。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拘禁贿选总统曹锟。王克敏逃匿至使馆区，不久潜至天津，任保商银行总理，后又任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委员、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等职。1927年1月，任张作霖安国军总司令部财政讨论会委员。

1928年6月，北伐军战胜奉系张作霖后，王克敏被通缉，乃避居大连。不久，仍依附奉系，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兼财政处处长。后经张学良疏通，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11月取消对王的通缉。1932年，王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同年1月，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王克敏为该委员会属下财政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实掌全权。1933年5月被派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财务处主任，7月任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常委。1935年6月4日至25日，任天津市市长。6月18日至8月29日，代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12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成立。7月13日，王克敏接替萧振瀛为主席。9月12日，王克敏以不得日方谅解为由，提出辞呈。卢沟桥事变前夕，王克敏前往上海蛰居。

1937年7月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立即积极筹划组设傀儡政权为其统治工具。10月，日本政府派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负责物色汉奸人选筹组华北伪政府。喜多亲往上海，迎王克敏至北平。王受宠若惊，甘为汉奸。抵平后，即受命与董康、汤尔和、朱深、齐燮元、王揖唐等，在北京饭店成立“政府筹备处”，开始了伪政府的筹建工作。日方以王克敏人望未孚，不拟把他作为伪政权的元首，而王权衡利害，也愿意替伪政权找一个挂名元首，自己操持实权。他极力拉拢曹汝霖，曹只愿以在野之身给予赞助。王克敏便转而拉靳云鹏，曾与王揖唐、齐燮元、高凌霨两次去天津拉靳下水，亦遭拒绝。王乃赤膊上阵，粉墨登场。

王克敏等人原拟于1938年元旦成立伪政府，后据日本旨意，提前于南京陷落的次日，即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怀仁堂成立，以此表示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临时政府”下设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并任议政委员会常委和行政部总长。该伪政权施政方针为：绝对排斥容共政策，与防共各国协力，“确保东亚和平”；与日本实现“真正的亲善提携”；等等。1938年4月，日本派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顾问三名及辅佐官十五人驻“临时政府”。该伪政权遂为日人所直接控制。

王克敏成为汉奸政权的首领后，大量掠夺华北物资资助日本侵略军。他与华北日军当局的平生钒　三郎商定，在华北设置“日华经济协会”，下设华北开发公司，每年向日本输出大量粮食等物资，并向日提供大量中国劳工。

王克敏又自任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该组织主张建立日本、中国、伪满洲国的联盟，“共存共荣”，“由日华满之联盟，更进而为大亚细亚之联盟”。他宣扬奴化苟安思想，为日本侵略和汉奸卖国张目。

王克敏有心将华北的“临时政府”与梁鸿志在南京成立的“维新政府”合流，组成统一的伪中央政权，1938年4月下旬特地去东京，谋取日本政府允准。5月3日会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无果而还。王约梁鸿志在大连会谈，梁只同意采取分治合作办法。9月22日，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由“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两方各派委员三人组成，王任主任委员。南北两伪府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实则各行其是。

汪精卫1938年12月叛变投敌后，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为建立伪中央政权，于1939年6月27日与王克敏在北平举行会谈。同年9月中旬及次年1月下旬，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先后在南京、青岛举行会谈。在青岛会议上讨论了“中央政府树立大纲”、“华北政务委员

会组织条例”等，并就“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与汪伪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及“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1940年3月，王克敏到南京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一天的3月29日，伪临时政府撤销。汪伪国民政府建立的同时，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任委员长，兼任内政总署督办。不久，王克敏的后台喜多奉调返国，与王有嫌隙的森冈升任华北联络部部长。在森冈与汪精卫的压力下，王克敏被迫提出辞呈，于6月7日辞去本兼各职。

1943年7月2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病亡，由汪时璟暂代。在日方支持下，王克敏于11月10日复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又于1944年4月任“华北税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剿共委员会”委员长，7月任“华北政务委会教育总署”督办。

王克敏为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当然委员，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延聘委员，又任1943年1月成立的“最高国防会议”委员。次年5月，任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物资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因长期生活骄奢淫逸，身体羸弱不堪，不得不于1945年2月8日去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11月30日发布命令，通缉陈公博等七十七名汉奸，王克敏列名其中。12月6日，王克敏在北平被逮捕，拘于北城炮局胡同陆军监狱。12月25日，王克敏病死狱中。

主要参考资料

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六），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

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中华

书局1963年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王乐平

刘培卿　刘镇

王乐平，名者塾，1884年12月8日（清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王家楼子（今属五莲县）。其父王季龙是举人，教书为业。王乐平自幼随父上学，十八岁中秀才。尔后在家务农。

1906年夏，王乐平到济南考入山东高等学堂，翌年加入同盟会，开始了革命活动。他和山东优等师范学堂于洪起、陈幹等同盟会员组织“保矿会”，反对清政府以山东矿产为抵押向德国借款，被学校当局以“革命嫌疑”为由开除学籍。1908年底，王回诸城，在相州中学任教数月。1909年夏返济，考入山东法政专门学堂，继续学习并开展革命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王乐平和丁惟汾等人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成立了山东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王被推举为议员，倡办学生军保卫新政权。11月24日，袁世凯胁迫孙宝琦取消独立，以其亲信张广建署藩司，吴炳湘署巡警道，在济南捕杀革命党人。王乐平弃学避居青岛。1912年1月，他受山东革命党人委托，去南京谒见孙中山，受孙派遣，赴烟台参加以胡瑛为都督的山东军政府工作。当时山东革命党人正在登州、黄县、青州、诸城等地组织起义，王被委任为革命军司令，曾指挥胶东之役，与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夺。不久南北议和，2月，王乐平作为山东军政府的代表之一，与张广建的代表举行谈判。4月，山东军政府从烟台迁济南，重选议会。山东独立时创刊，旋被张广建取缔的革命党人机关报《齐鲁公报》恢复，改名《齐鲁日报》，王乐平担任该报主编。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齐鲁日报》被迫停办，王在山东高等学堂执教。翌年春，孙中山从东京派人携密书赴山东联络革命党

人武装倒袁，使者途中被捕，联络名单被搜出，山东都督靳云鹏按名单捕人。王乐平遭通缉，避难甘肃，先担任甘肃教育厅课长，后到陕西略阳县任厘金局长。

1916年初，王乐平返回山东，往来于中华革命东北军驻潍县居正部及驻周村吴大洲部之间，策划讨袁。6月袁世凯死后，王被推举为参议员，到北京就职。1917年7月，张勋复辟，国会被解散，王回山东。他利用在甘肃、陕西所得之款，在博山殷家沟兴办了一处年产二万吨的煤矿。不久，因受日本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排挤，难以维持，乃重返政界。1918年8月，王当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并任省议会秘书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乐平代表山东省议会去上海，发动山东旅沪人士参加运动。6月18日，他率领山东各界八十六人组成的请愿团晋京请愿，在怀仁堂向总统徐世昌面陈山东人民的爱国要求，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同年夏，他在济南创办了“齐鲁通讯社”（不久改为“齐鲁书社”），推销进步书刊，联络革命同志。12月，在省议会讨论财政预算的会议上，他根据调查所得的确凿资料，提案弹劾山东督军张树元侵吞军费，获得与会者的拥护。1920年冬，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但王乐平没有行动。1921年底，他应陈独秀的邀请，在王荩美动员下，拒绝了北京政府安排他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的派遣，而作为山东革命团体的代表，和王荩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一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实地考察了苏联的社会制度。1922年5月回国后，他向孙中山汇报时，建议采用“俄国之组织方法”，孙深以为然，遂派他回山东主持国民党党务，注意同共产党合作。

王乐平同共产党山东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建立了“平民学会”，创办了《十日》杂志。王乐平利用这个半公开的学术团体，作为复兴国民党山东党务的机关，王荩美则利用它宣传马克思

主义。同年6月，国会恢复，王乐平重新出任参议院议员。他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青岛等地，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活动，和丁惟汾等人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北方分部，着手党务改组。1923年7月，因反对曹锟贿选，王离京赴沪，与丁惟汾合办《北方周刊》，鼓吹反对军阀的北方革命。年底又与丁去青岛创办胶澳中学，作为国民党在青岛的立足点。

1924年1月，王乐平作为孙中山指派的山东代表，和王荩美、丁惟汾等人一起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王被派回山东，负责建立有王荩美等参加的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并派人到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惠民等地建立了临时党部。同年8月，他与共产党人一起，召集山东三十一个团体开会，成立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开展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内容的反帝运动。12月，他和王荩美、王哲、阎容德在天津受到孙中山接见，被委为国民会议宣传特派员，回省开展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1月7日，他主持成立了济南国民会议促成会，随后又成立了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2月初至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出席3月1日至4月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逝世，王乐平担任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委员、招待股第五组组长。会后，他回山东。于4月27日至29日在济南公园主持召开了山东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发起组织了“孙文主义研究会”。7月11日至13日，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王乐平当选为主任委员。同年冬，军阀张宗昌通缉王乐平并派人包围他的住宅，他逃往北京。1926年1月，王乐平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回北京，和李大钊等一起，领导了反帝爱国斗争。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时，他是主席团成员之一。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时，他举旗走在队前，并被群众公推为五位代表之一，进府同段祺瑞交涉。当地军警镇压时，王被棍棒打伤。

北伐战争开始后，王乐平赴广州，随军北上。9月，他潜入武昌，对吴佩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策动吴的暂编第三师团长贺对庭（山东临沂人）部反正，以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不久，王又赴九江、南昌等地主持对北洋军队的收编工作。邓演达在武汉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王应邀到武汉，担任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武汉电信局局长，旋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王乐平自认为是国民党的元老，一向看不起蒋介石，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1927年3月，出席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赞同全会关于维护国民党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并撤销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的决议。“四一二”政变后，丁惟汾劝说王乐平去南京拥蒋，王拒绝。但王在武汉遭到山东左派青年的反对，难以为继。7月，经顾孟馀介绍去开封，在冯玉祥举办的党政训练班担任主任，培训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

王乐平对国民党分崩离析和政客角逐的局面十分不满，产生了改组国民党的想法。他撰写《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训练》一书，提出“恢复十三年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该书于1928年初出版，成为改组派的基本纲领之一。

1927年9月，王乐平追随汪精卫先后去上海、广州。11月1日，王参加汪精卫在广州召集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赞同在广东另立国民党中央，以与南京政府相对抗。1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事变后，王乐平积极支持广东省代理主席陈公博。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拉拢王乐平，为王所拒。嗣后，王在上海竖起改组国民党的旗子。6月，王乐平与顾孟馀合办《前进》杂志，抨击蒋介石，支持陈公博的改组国民党主张，还创办了大陆大学，培养国民党改组派的人才。同年冬，王乐平和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在上海开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下设宣传、组织、总务三部，陈公博总负责，王乐平和朱霁青分管组织工作，兼管军事。王派人到各地

联系，成立了改组派的各省市党部和海外分部。1929年1月，改组派在上海召开中央及地方组织负责人会议，亦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陈公博出国，王乐平实际上成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兼大陆大学代理校长。总部的一切组织、宣传、军事联络等筹措工作，都由他最后决断。他主持总部工作，指挥各地改组派的活动。其时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颇多反蒋情绪，王借“济南惨案”和选举国民党“三大”代表等机会，在政治上广造倒蒋舆论。他还利用一些军事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的情绪，组织“护党救国军”，策动李宗仁、张发奎、石友三等部军事倒蒋。

改组派的活动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蒋介石对王乐平恨之入骨，密谋铲除。1928年秋，王乐平护送其父灵柩从上海回诸城安葬时，蒋介石一面假意送花圈，一面密令山东当局逮捕王乐平。王乐平闻讯乘帆船逃回上海。1929年11月19日，蒋密令国民党军政机关查禁改组派总部。接着，派陈希曾到上海，嘱令特务头子杨虎于1930年2月18日将王乐平刺杀。

主要参考资料

《王乐平先生墓碑》碑文。

九皋：《访辛亥革命老人郭叔蕃》，《团结报》1981年11月7日。

丁惟汾主编，于恩波等编纂：《山东革命党史稿后编》卷1第2章，台北山东革命党史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

山东省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向汉文：《改组派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

版。

王陵基

刘识非

王陵基，号方舟，四川乐山县人。生于1883年9月10日（清光绪九年八月初十）。其父继承祖业，在乐山、成都经营绸缎庄。王陵基少时在家馆中就读，1903年7月考入四川武备学堂速成班学习一年。时值四川增设新军，缺乏初级干部，王陵基被派往各县招募弁目学生。学生招回后，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徐孝刚任管带，王陵基任队官，从事弁目生的训练。不久，王随徐孝刚到日本购运武器，自请留在日本学习，乃入东斌学校一年，又在成城学校学了几个月的日文。1906年回国后，在川军协统钟颖部任参谋。不久，钟颖部调驻拉萨，王随往。

1908年秋，四川开办陆军军官速成学校，原弁目队学生刘湘、杨森、王缵绪、潘文华等多数考入军官学校。该校步、骑、炮、工、辎各科长，最初都由日本军官充任，由于缺乏翻译，当局把王陵基由拉萨调回成都，担任该校翻译。辛亥革命前，不少军官速成学校学生和弁目生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革命活动。王陵基则拒不参加同盟会，还说军人是保卫国家的，军队只能受国家的指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用不着参加什么党。

辛亥革命后，四川增编新军三个镇（师），王陵基在四川副都督胡景伊的保荐下，任第二镇的标统（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起，在上海的川籍同盟会员熊克武组织了两千多人回川，受孙中山委任为蜀军总司令。熊率部到达重庆后，兼重庆镇守使，通电讨袁。袁世凯即令川督胡景伊与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出兵围攻熊克武。王陵基向胡景伊请缨率部讨熊，被胡擢任川军第二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率部由南充向重庆进攻。王部到达重庆附近时，滇黔联军黄毓成

部已逼近重庆，熊部因各方围攻众寡悬殊，弃渝出走。黄部先入重庆，王陵基将其部队主力驻在江北，自率有力部队进入山城，与黄火拼争夺重庆。在巷战中，民房被毁甚多，居民伤亡多人，重庆士商呼吁停战，王、黄各执一词互相攻讦不止。北洋政府遂将黄、王二人“解职查办”，黄毓成率部回黔，王陵基调任督署参议。不久，北京政府又恢复王陵基少将军衔并发还勋章奖章。

1915年2月，袁世凯派其亲信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掌管四川军政大权。王陵基经胡景伊引见受到陈宦赏识，常被询问川事。不久袁世凯恢复帝制，王陵基说袁是改朝换代的英雄，愿作“从龙之士”。12月护国战争爆发后，陈宦派王陵基任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不久王陵基又升为第三师第五旅旅长。1916年5月，陈宦见反袁声势日盛，被迫通电反袁，宣布独立。第一师师长周骏则对袁表示忠诚，通电讨陈。袁世凯将陈宦撤职，任周骏督理四川军务，赐周以存武将军勋位。周骏电荐王陵基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并在电中陈述王的忠袁言行。王赢得袁之欢心，被授为尚威将军。王陵基旋奉周骏命令，率部向成都进攻，申讨陈宦。6月，袁世凯病逝，周骏、王陵基声名狼藉，被迫从成都撤向南充，不久赴北京。经多方疏通，王谋得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职。1918年初，王又到北京另谋出路未成，悻悻回川。

1921年2月，王陵基投奔驻重庆的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任该军参谋长，不久被派到第六混成旅帮助整理部队，旋任该旅旅长。1922年初，川军各派互争地盘，爆发内战，但懋辛第一军与刘成勋第三军等组成“省联军”，与杨森第二军对抗。杨森惨败，得王陵基旅掩护，率残部逃往宜昌，王陵基自请留在四川。1923年7月，刘湘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王投刘麾下。1924年初，受任陆军第二十八混成旅旅长，次年升任川军第三师师长兼江（北）巴（县）卫戍司令。

1926年，北伐军节节推进，刘湘于12月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王陵基任该军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这时，

重庆组成以杨闇公为首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王陵基认为侵犯了他的权限，对省党部的活动大为不满。1927年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制造“南京事件”，打死打伤我军民两千余人，四川人民极为愤慨，省党部组织群众于4月3日在重庆举行示威大会。王陵基事先未能禁止，遂指使军警向群众开枪镇压，打死四百余人，打伤一千余人；他还指使暴徒捣毁了省党部、四川日报社及中山、中法等学校，杀害了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漆树芬及冉钧、杨闇公等。惨案发生后，受到各方舆论严厉谴责，刘湘默不吭声，王陵基则反诬共产党破坏重庆治安，并派特务四处捉拿共产党人。

王陵基为了发展他的势力，取得刘湘支持，在卫戍区保安团开办一个团务学校，学生由各县选送，毕业后派回各县为保安团骨干，校长请刘湘兼，王自任副校长负实际责任。不久。王又开办重庆军官学校，招考中学毕业生训练一二年，培养一批有文化的军官作为自己的亲信，校长仍由刘湘兼，王自任副校长。两校开办后，王经常到校讲课。毕业学生后来大多是王部的高、中级干部，分配在地方任保安团干部的亦多倾向于王。

1931年，红二方面军贺龙所部在鄂中洪湖地区发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委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不愿离开四川，即委王陵基为代总指挥，率六个旅、两个加强团及特种部队“围剿”洪湖地区红军。王陵基欣然承诺，对其亲信夸耀说：“剿匪”既可发挥自己的才能，又可增长声望，还可借机谒见蒋介石，增加将来发展机会。王亲率主力前往沙市，除以有力部队固守沙市外围据点外，派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和前敌指挥官郭勋祺分左右两路向洪湖革命根据地进攻。嗣后并请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派出三四个师在潜江、沙洋及襄阳以南地区阻截红军。王陵基亲到前线督战，得悉红军主力向荆门方面移动后，认为红军将包围其左翼，亦以主力向左移动，要在荆门地区同红军决战，妄图在荆门、郢城地区消灭红军。红军打了几个歼灭战后，向老河口方面作战略转移。王陵基所部伤亡甚大，不敢深入洪湖地区，退

而固守当阳、曾家集一线。

此时，王陵基得悉河南有三股土匪，各有人枪一两千，当即派人前往联络，招抚为第三师第一、二、三路警卫部队，名义上为增大“剿匪”力量，实际扩充了他个人的武装。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陕边区，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蒋介石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率四川各路军队围攻红军。刘委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俊分任六路总指挥，向红军进攻。王陵基为第五路，指挥八个旅共二十四个团和特种部队，并代刘邦俊指挥第六路的四个旅，于12月中旬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为集中力量，主动放弃达县、宣汉，王陵基立即向上表功，并企图借机吞并第六路的队伍，因而惹起各路“剿匪”军不满，刘湘遂将其撤职。王被撤职后，百无聊赖，跑到上海当了两年寓公，花天酒地。1936年春，刘湘又邀其返川，任省保安司令部保警处长并代行保安司令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初，王陵基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于夏初出川抗战。8月参加南浔战役，防守瑞昌武宁一线。嗣后，王部新十三师在万家岭一役奏捷获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王部陆续参加了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等。1939年6月，王升任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率七十二军驻修水。此后王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常向其部属讲：打日本人没有什么，将来打共产党才要真正流血。我把我的意见多次向委座（蒋介石）提出，委座也赞赏我的见解。他多次建议在湘鄂赣边区组织“剿共”部队等，深得蒋介石信任。他指令参谋长宋相成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妨碍”、“破坏”抗战材料报到重庆去。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指令第一线部队及时消灭新四军和共产党组织。王还责令所属把消灭共产党及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视为最重要任务，规定各级主管长官要层层具结，并推行连坐法，三人连环保。他在总部成立肃奸委员会，自兼主任；各军、师成立肃奸

小组，军、师长任组长。他对共产党员或有嫌疑的人，都凶残地加以杀害，被逮捕的新四军和共产党员押到总部，极少有生还的。他说，委座曾指示过，对共产党宁可误杀三千，不可走漏一人，这句话很有道理。

1941年冬，日军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由于王陵基平时散布消极抗日保存实力言论，其部属对日军也就不积极作战。会战开始，王率主力赴平江、长江地区参战，令七十二军三十四师陈良基部担任武宁、修水方面守备。三十四师抵抗不力，节节败退，使少数敌、伪部队窜到修水地境，总部仓库几遭失陷，王陵基不得不在前方抽调两个团星夜兼程回援。会战结束后，王陵基回到修水，将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撤职，三十四师师长陈良基撤职查办，还枪毙一个团长泄愤。

王陵基一向把“剿共”看得比抗日重要。1945年春初，第三十四师参加湘粤赣边区会战，收复了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太和，继续追击南窜之敌。王陵基却下令三十四师立即改变追击日军之部署，回援湘鄂赣边区去进攻渡江南下之八路军王震部。他还设宴招待团以上军官，告诫他们拼命“剿共”，不要怕伤亡，将来一定优先弥补。

王陵基忠实执行反共政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嘉许，1943年春晋级陆军上将，1945年春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又擢升为第七绥靖区司令官，辖两个集团军。王陵基深恐反共落于人后，自请将七十二军派到长江北岸去承担“剿共”任务，得到蒋介石赞许。

不久，王陵基调任江西省主席，他要七十二军调到江西担负“绥靖”任务，与武汉行营发生了矛盾。后来蒋介石电令将七十二军仍留鄂东北“剿共”，将驻江西的青年军两个师拨王指挥。王在江西大量征粮征兵，以补充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需要。

1948年春，王陵基调回四川任省主席。他对蒋介石的任命心领神

会，表示要做好“反共后方基地”的建设。他一到四川，就大刀阔斧地更换专员、县长，委派原刘湘部特别是第三十集团军军官充任各级文武官员。他下令各地彻底肃清中共地下组织，对反对他的民间机构、人民团体等，则进行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他极力扩大反共地方武装，同时联系胡宗南、宋希濂、孙震、杨森等，想利用他们的力量阻止解放军入川。

1949年夏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西南后，蒋介石委任王陵基为四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王立即委任各区专员为该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又令各总指挥委县长为师长，大力发展反共武装。12月，四川大部地区陆续解放，王陵基还想要退守雅安，但人民解放军已撒下天罗地网，其所属之十个保安团亦先后起义，王走投无路，于12月下旬只身化装逃跑，在途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获得特赦出狱。他晚年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获赦后曾入医院治疗。1967年3月17日病故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辑：《四川军阀史料》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988年版。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王懋功

陈德军

王懋功，原名国华，字东成、东臣。江苏睢宁县双沟镇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六岁从父亲读书。十四岁应童子试中秀才，旋入徐州中学。后弃文习武，相继在南京陆军小学、陆军第四中学、保定军事学校学习。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江苏任陆军第一师连长、营长。1913年南京兴师讨袁，王懋功率部响应，先任江苏陆军第一师司令部一等参谋、代理参谋长，继任安徽讨袁军第一师参谋长，积极进行反袁斗争。

讨袁失败后，被通缉，乃易名懋功，赴广东，1917年至李烈钧部任营长。1920年8月转任广东省政府警卫军营长暨统领。警卫军改制为粤军后，任粤军第一路军统领（团长）。随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自福建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莫荣新、陆荣廷后，任粤军第一军第一独立旅旅长。

1922年5月随粤军第一军军长许崇智率部北伐，进入江西。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王懋功率部随粤军回师讨伐陈炯明。讨陈受挫后，率部入闽驱逐北洋军阀李厚基。经过激烈战斗，李厚基溃败逃走，王懋功部进占福州。10月，入闽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1923年孙中山命东路讨贼军由福州回广东讨伐陈炯明，王懋功改任东路讨贼军第一独立旅旅长兼第三旅旅长，后又任东路讨贼军中央军命令传达所所长。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6月，王懋功任孙中山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参军。1925年初，先后任黄埔军校检阅委员会委

员，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随右路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1925年3月东征军抵达潮汕后，为给随同出发的黄埔第二期学员补课，成立潮汕分校。其时，蒋介石与许崇智相互斗法，王懋功原本是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改投到蒋介石的门下之后受到重用。4月，王懋功任潮汕分校本部行营主任。8月，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蒋介石率第一军主力参加第二次东征后，王懋功奉命留守后方，兼代国民政府广州卫戍总司令。但是，王懋功投靠蒋介石后，和蒋的一些嫡系亲信王柏龄、贺衷寒等关系紧张，陷入到激烈的党派纷争之中。为了走私问题，王懋功和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发生冲突；又因包赌、包烟、包娼的问题，与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结仇。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案发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1926年1月14日，经汪精卫推荐，王懋功担任廖案审判委员会委员。自此，王懋功和汪精卫日益接近，并受到汪精卫的拉拢。1926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三十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十二万元，结果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二十七万元，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十五万元。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而按照次序，广西军队应该编为第七、第八军，第七军的序列即预留给王懋功的第二师。这些行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押王懋功，免去其第二师师长职务，并押送赴沪。

王懋功被免职后，1926年秋天奉令与贺衷寒、杜从戎、陆瑞荣四人到苏联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随又到德国、法国考察研习政治、经济和军事，并与汪精卫书函往来，讨论国内局势前途。1929年冬回国，任十一军军长，该军改编为骑兵第八师后任师长。这时王懋功追随汪精卫，奔走于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之间，为汪精卫联络军事力量反蒋。1930年王懋功以汪精卫侍从武官及军事

顾问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及中原大战等一系列反蒋活动。

倒蒋失败后，王懋功隐居天津日租界。1931年12月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1932年1月，王出任任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从法国人手中收回正太路。1933年6月，王兼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在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任内，王懋功委派中共党员，恢复和建立了正太铁路工会，做过一些有益于工人福利的事情。

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留俄学生在学成归国之后，成为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1933年下半年，留俄学生以苏俄评论社社员为基础，由南京和各地的留俄学生二百多人发起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在留俄同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名誉会长，王懋功选为理事。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王懋功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6年，调平绥铁路局局长；11月，获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王懋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中将副监。1941年2月，任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同年去职后，又被调为江苏省主席，未到任。1943年7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评议员。1945年1月，由国民政府委任为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主席。2月15日，接印主政。旋即兼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江苏省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以及第十战区中将司令长官、苏北挺进军总指挥等重要职务，全面掌握了江苏省党政军的大权。

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共产党领导下，华中敌后战场开始对日伪军局部反攻。1945年3月，王懋功在皖北阜阳召集江苏省各区县专员、县长、县党部书记及各挺进部队司令举行紧急会议，指示党政军各部与共产党抢夺江苏地盘。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王懋功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10日，王懋功从广播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当即带领江苏省政府、省党部由皖回苏准备接收。9月，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电令王懋功主持接收江苏省境内的一切行政与地方性事业机构。王懋功随即主持成立了江苏省党政接收委员会，拟定组织和办事规程，决议各项接受程序，处理接受事宜。当时江苏省所接收敌伪的资产在苏、浙、皖接收区遥遥领先，据统计，至1946年底，安徽省处理敌伪产业收入总额为一亿三千三百亿元，浙江为两亿八千八百亿元，而江苏省达到了一百二十三亿多元。

1945年10月，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到镇江。12月，王懋功继续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主席。1946年1月，兼江苏省保安司令，获忠勤勋章。3月，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江苏省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王懋功积极贯彻国民政府“行政配合军事”的方针，提出江苏“以整个省政设施与剿匪军事相配合”，要求各县市长于军事收复行动开动之始，即率领县府人员及县保安队，“与剿匪国军齐头并进”，每收复一地，则恢复该地的基层组织，编制保甲，清查户口，“扫除残匪”，组织民众自卫队。在苏南各县，王懋功对共产党力量实行武装“清剿”；在苏北，则进行扫荡。至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几乎控制了江苏省全部的县城。

1946年夏秋之间，苏北徐海地区遭受特大水灾。王懋功遍巡各地视察灾情，在上海及江苏等处募捐，在灾区设站赈济，向国民政府请求拨款。灾后，又举行以工代赈，恢复水利，并借救灾之机侵占苏北新四军所接收的一些地区。由于大量游资涌入米市，江苏出现全省米荒。王懋功检举囤积投机分子，采取各种措施维持米价的稳定。

1947年5月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后，王懋功提出《群策群力共谋安定建议》，制定了江苏省政府的两

阶段施政方针：第一阶段配合军事行动，恢复全部省境，以武力掌握江苏；第二阶段，逐渐恢复秩序，强化治安，派捐派税，供应军需，以军事巩固江苏。1948年7月，王懋功又主持制定了《江苏省戡乱时期施政纲领》，强调江苏戡乱工作之重心在加强地方武装，组训民众，“配合国军肃清匪患”。“纲领”要求苏北应在绥靖区司令部指挥下，从速整编保安团队，增强战斗力；要求苏南从速建立督察队及相关机构，维持治安秩序。在江苏省主席任上，王懋功为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自己讲道：“在余任内，每年增兵配额，无不先期完成，且额外征募三万人以上；军粮供应，所有征实征借征购之粮食，应缴中央部分，大部未到期已由中央提取净尽。”

王懋功在省主席任内一直默认以“反蒋拥共”为宗旨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在江苏的组织活动。1948年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正式通过其政治纲领。9月，王懋功被免去本兼各职。11月，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未几去台湾。1950年5月去职。1952年10月退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61年12月27日，王懋功在台北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汪精卫致王懋功密函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吴晓晴等主编：《江苏文史资料》第49辑，1993年版。

睢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睢宁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申报》1947年5月11日、13日、24日。

王少堂

倪波　沈道初

王少堂，原名德庄，又名熙和。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六月）生于江苏扬州。王家数代说书，名字均带一“堂”字，扬州人称之为“堂门”。他的父亲王玉堂系著名的评话艺人。

童年时代的王少堂，得到王玉堂的直接传授和督促，学练评话技艺。七岁时他开始模仿父亲演说《水浒》。为了记住评话内容，他天天观摩父亲说书，反复背诵，久而久之，便把数十万字的《水浒》刻印在脑海之中，为后来说讲《水浒》打下了基础。他十二岁开始登台表演，演说《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四部。十六岁时已经获得一定的艺术成就，尤以说《武松》最为成功，在扬州、兴化、镇江一带颇有影响。1908年，二十一岁的王少堂开始离开父亲独自说书。

王少堂在继承其父说书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吸取了专说《三国》的康国华和善于表演的刘春山的精华，使表演与说书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把《水浒》的说书时间从他父亲延续的四个月延续至八个月，仅《武松》一部的说词就长达八十余万字，大大扩展了施耐庵的《水浒传》有关部分。

王少堂说书有三样道具：扇子、手帕、醒木（惊堂木），有时还有一把小茶壶。他说书不离桌，边说边演，但基本是靠说来吸引听众。他说得意境清新、奇巧豪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还穿插了很多“噱头”，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由于王少堂的技艺高明，并常去扬州附近各地演出，这使历史悠久的扬州评话一时在苏北、南京及安徽

芜湖、合肥一带广为流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年轻的王少堂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说书中揭露专制社会的丑恶形态，赞扬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强占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孤军抗战，得到全国声援。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王少堂义愤填膺，在扬州、盐城等地说书时，常到军队中作劳军表演，并把说书收入的一部分捐献给扬州“救国储金会”、镇江“书社联合会”，用以表达抗日救国的心意。

王少堂的爱国行动受到扬州宜陵镇保守官吏的忌恨，他们有意陷害，于1932年4月，把王抓去坐牢。王身受八个月囹圄之苦，了解到监狱的黑暗情况。此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说书中借古讽今，抨击国民党统治下警察局、监狱的黑暗。

扬州解放后，王少堂的说书艺术得到新的发展。1949年，他参加扬州艺人讲习班，认真修改评话《水浒》，删除了许多思想糟粕，提高了思想性。1958年，王少堂参加江苏省曲艺会演，获得了荣誉奖。同年，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任扬州曲艺协会主任、江苏省文艺协会执委、省曲艺研究会会长、省曲协主席和中国曲艺协会副主席。同年7月1日，王少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整理了几百万字的《水浒》评话稿，出版了评话《武松》一书，还积极为曲艺团学员讲课，精心培养新人。

1968年1月6日，王少堂逝世。

王世杰

严如平

王世杰，初名燮廷，字雪艇，湖北崇阳县人。1891年3月10日（清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一）生。父亲王为翰，字步瀛，事农商，有子八女二，王世杰在兄弟中行五。王世杰幼时入塾，勤奋好学，业绩优异，九岁识时务文字，被塾师视为奇才。1903年赴武昌应童子试，未及试毕即向往鄂督张之洞兴办之新学，考入南路高等小学，分在理化选科西堂，除学数理化等外，亦学中国文学、教育、地理等。1910年王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

辛亥武昌首义后，王兴杰辍学南归，任职于鄂省都督府秘书，曾参与守城战事。旋奉派赴湘请援成功，与赵恒惕率领之旅乘轮返鄂，驰援武昌解围。嗣后王与石瑛受命组设国民党湖北支部。继在武昌创办经济杂志，倡言共和，反对专制。1913年反袁之“二次革命”失败后，王赴英国留学，考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7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后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研究公法，1920年春获法学博士学位。巴黎和会时，王被旅欧同学会推为代表，往见中国政府代表，陈述不可签约之主张。后又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

1920年冬，王世杰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归国，应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行政法、比较宪法等。王撰之《比较宪法讲义》，经商务印书馆编印列为《大学丛书》。不久兼法律系主任，佐蔡举新校政，主张教授不要因政府财政困难欠薪而兼课兼职、而请假旷课，应当以教学为重，不请假、不兼课、不索薪，虽被人认为“伪君子”，但不为所动。1921年8月，王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发起“国立八校太平洋会议研究会”，以研究美国邀中、日、英、法、意五国出席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讨论缩减军备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主旨。1924年12月，王与

陈源、周鉴等在北京创立《现代评论》周刊，传播学术，鼓吹民主与科学，抨击时政。

其时，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的国民革命在广东等地兴起。1924年2月，广东大学筹备成立，王世杰欣然应邀任筹备委员，并兼法律委员会委员，为筹议各科组织、课程厘定、设备计划、图书扩充、经费筹集、规章制定等建言甚多。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中央法制委员会，王世杰列名为委员。6月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王邀集专家草拟各种公私法规，积极推进法制建设。翌年10月，王被国民政府提名为海牙国际公断院公断员。

王世杰对发展教育事业十分关注。他商请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将武昌大学扩大为国立武汉大学。1928年3月，王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王履任后，以原校址狭隘、陈旧，乃在武昌郊外珞珈山开辟新地。他多方筹措经费，购地迁地，备历艰辛，费时三年，初步建成。他还聘海内外各科教授来校执教，并扩大招生，使学校日益发展。1932年3月，王兼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1933年4月，王世杰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长。其时抗日救亡运动勃兴，各校学潮风涌，王世杰力加遏止，以求恢复教学秩序。他在教育部长职位上历四年八月之久，主要业绩有：谋求中央和地方教育经费之独立，确定国立各校经费额度、使各校不再欠薪，安定教职员生活；严格学校考核标准、不避权贵，停办水准过低的十余所学校；提倡设科学、医药、艺术、体育等专门教育校系，以期各方面平衡发展；扶助、促进职业教育之发展，推行国语注音符号、促进国语统一运动等。其间有些人假学校以培植个人政治势力，有些人则提倡复古而攻击现代教育，王周旋于中，甚为费力。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我国之态渐露，王世杰审时度势，先于

1936年密令一些著名大学预做迁校准备，并督导故宫博物院将珍贵文物先由北平迁至南京，再由南京迁往内地。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世杰不再任职教育部，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经常约请政治、经济、外交各界名流学者共同研讨时政，每周应蒋介石之约餐叙一次，接受蒋之政策咨询。他研究中外关系甚力，密切关注国际时局之变化，惟始终主张联络英美，对日抗战到底，不为任何私情所动。对联苏或联德之议，则予以否决。曾多次主持签署外交意见促蒋抉择，颇受蒋之重视。

王世杰从1938年2月起正式列名为国防最高会议委员，置身于中枢最高决策机构。王还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1938年3月至1940年9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1938年4月至1946年5月），三青团中央干事（1938年7月起），三青团中央监察会监察、常务监察、书记长（1938年9月至1947年9月），中央党政训练班总教官（1939年4月至1944年5月）、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4月至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9年12月至1942年12月、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1年1月至1943年8月），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38年6月至1943年10月），主席团成员（1943年10月至1948年3月）等。虽然兼职众多、政务繁忙，但他辛勤不懈，且学识渊博、执简驭繁，举措得当，所以多获赞誉，亦颇得蒋介石等当权人士之信任和好感。

王世杰秉承蒋介石旨意，为协调党派关系，促进朝野合作，达成举国一致对日作战，做了许多工作。他曾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商谈，力主以协商方式解决分歧。随着蒋介石推行限共政策，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紧张，王曾与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代表赴西安，与中共代表林伯渠举行会议，磋商解决僵局方案。后又移至重庆继续商谈，历时4月。1944年9月，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来华，表示愿意参加国共之间的斡旋，王参与商拟《协议之基本条

件》五条。赫尔利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后，王又参与讨论修改，另提修正案。1945年1月至3月，王参与和中共代表的多次商谈，对中共提出公开“各党派会议”之方案，王主张改为“政治咨询会议”。嗣后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王为国民党方面八代表之一，并是政府组织召集人。

王世杰于抗战期间对外关系方面所显露的学识与才能，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好评。1943年11月开罗会议结束后，王世杰被任命为中国政府访英团团长，为推进中英合作和中、英、美、苏四国的战后合作与英方作了具体磋商，并落实了英国政府给予的五千万英镑贷款。1945年7月30日，王世杰被正式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这是一项“临危受命”的决议。此前，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于6月率领有蒋经国等人参加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6月30日至7月12日间举行了五轮谈判。宋子文秉承蒋介石旨意，为取得苏联和美国对我国抗战的最后援助和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支持，屈服于苏联和美国的强大压力，在五轮谈判中虽然据理力争，还是基本上接受了是年2月间美英苏之间首脑秘密签订的涉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包括维持外蒙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恢复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但是宋子文虑及签订这些协定的政治责任，于7月30日辞去外交部长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的首项使命，就是签订这些协定。8月5日，他赴莫斯科，与苏联方面继续进行后期谈判。四轮的艰苦谈判，王折冲樽俎、费尽脑筋，只在细节上得到一些修改，大局已难以挽回，报经重庆批准后，最后于8月14日以中国政府主席全权代表身份，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属协定上签字。好在蒋介石向王说了：“你就是代表中国政府去签字，这个责任也不是你一个人负得了的。”

此后，王世杰于1945年9月赴伦敦出席中、英、美、苏、法五国

外长会议，商讨对意、罗、匈、芬五国之和约。1946年7月，率团赴法国出席二十一国代表参加的巴黎和会，讨论欧洲各国之领土争议等问题，其后也参加了其他一些国际会议。

王世杰在其任内的主要外交事务，是处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加紧谋划取得美国支援发动内战。王世杰秉承蒋介石旨意，对美国政府曲意迎求，先后签订了一系列有损我国权益的条约和协定，其中以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最。这个条约并不只是通商航海协定，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规定了两国领土、市场、河流港口、文化教育均全部对对方开放，享有最惠国待遇。从条文上说来是采取“平等互惠”的原则，规定了双方对等的互惠，实际上却是使美国不仅保留并扩大了已经被废止不平等条约中关于门户开放的规定，恢复了美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还新增加了军舰行驶的特权，破坏了中国领土自主权。至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又怎样把自己的军舰和商船开到美国的“一切口岸、地方及领土内”去自由航行呢？“平等互惠”实为不平等的美方独惠。在此前后，中美之间签订的其他诸多条约、协定和撰文，也无不是在“平等互惠”的名义下，对美国的侵略敞开了大门，使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王世杰的这种屈辱外交，受到有识之士和国内外舆论的抨击。

尽管美国给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很大援助，王世杰也为之效力甚勤，但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还是节节败退，江河日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1948年12月，王世杰在蒋介石下野前夕，辞去了外交部长一职，但他力劝蒋不要言退，说不能一日无君。1949年末，蒋介石撤去台湾，王世杰亦随之去台，任总裁办公室顾问、设计委员。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复任“总统”，王为“总统府”秘书长。1962年兼任“行政院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4月，王世杰在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王早在1935年6月中研院初建时即为社会科学方面之评议员，此后历任十届。1948年3

月，王为中研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1962年2月，担任中研院长的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猝发心脏病不治而逝，王乃于4月继任此职，历时八年。

王世杰晚年对我国历代书画兴致颇浓，尤其对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之书画，做了很多研究，主编出版了《故宫书画录》（与罗家伦合编）、《故宫名画三百种》、《故宫法书》以及《艺苑遗珍》、《艺珍堂书画》等，颇受书画艺术界的重视。

王世杰一生在法学和外交方面的著述甚多，主要有：《联邦宪法权限之分配》（1920年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论文）、《女子参政权之研究》（1921年北京新智识书社出版）、《比较宪法》（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与钱端升合著增订版）、《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与胡庆育合编，1967年台湾出版）；其他还有：《宪法原理》、《移民问题》（与张梁任合著）、《代议政治》（与昔尘合著）、《中国奴婢制度》等。1980年，台湾出版了《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1990年影印出版了《王世杰日记》（1933年5月至1979年9月，共十册）。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王世杰先生行述》，1981年台北版，治丧委员会印行。

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台北裕台公司1980年版。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

蒋经国：《关于1945年与斯大林谈判的回忆》（1956年），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王士珍

公孙訇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乔，别号冠儒。直隶（今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生于1861年7月14日（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七）。曾祖父王朝凤，精通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擅长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父亲如柏和伯父如松都早逝，王士珍兼祧两房，由伯母刘氏和生母丁氏抚养成人。王九岁入塾读书，十六岁习弓马。这时家道已经中落，王于1878年考入正定镇标学兵队，不久开赴山海关驻防。

1885年，李鸿章为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奏准在天津创立北洋武备学堂，通饬淮军各部选送学员，王士珍遂被聂士成保荐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王肄业三年，“操行学绩俱优”[(1)]。期满，仍回山海关，督办随营炮队学堂。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王奉命率由学员组成的炮队，随直隶提督叶志超于6月开赴朝鲜牙山。7月29日，日军进犯牙山时，王士珍曾多次请战增援，皆被叶志超所拒绝。成欢驿失陷，王士珍所率炮队随直隶提督叶志超抵达平壤，与入朝清军奉天练军统领左宝贵等部会合。9月12日，日军兵临城下，王士珍所部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王士珍观察阵地地形后，积极建议，认为应于城外山上设兵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叶志超以为王士珍年轻多奇，不予采纳。14日，日军攻城时，王士珍誓言为国效力，率炮队与进犯的日军顽强鏖战，杀伤敌军无数。当王士珍闻知左宝贵壮烈牺牲的消息时，他亲手操炮，轰击日军。作战中他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也被弹片击伤，后在炮队官兵护卫下突围。

回国后，王改统榆防炮队，仍驻防山海关。和议签订后，王随新任直隶提督聂士成移驻芦台。

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暴露出湘、淮军的腐败，清政府逐渐认识到编练新式军队的重要性，1895年12月，任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新军。王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旋即转任工程营管带，兼工兵德文学堂监督。王在小站辅佐袁世凯练兵，以悉心筹划、办事认真，博得了袁世凯的重用，凡有关训练军队的上奏或下发的文牍，袁世凯都命王士珍参赞擘划。凡全军成绩考核和升降黜陟，也不无与之磋商。

1898年，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时，王士珍指挥工程营搭帆布桥迎接，荣禄一行人马“行过如履坦途”，深为“惊异”[(2)]。待荣禄检阅完毕回津时，王再次架成此桥，荣禄认为时已二月，河水将要解冻，恐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勿虑，三日后冻方解。”果然三日后解冻，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赅”。荣禄曾致函袁世凯称王士珍“负治国大才，不第长于兵事也”[(3)]。1899年9月，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领衔主持编成《新建陆军兵略汇存》与《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十二册，“成为袁军教学的标准课本，也是晚清编练新军主要的教育典范”[(4)]。该年冬，袁世凯获悉清廷将任命他署理山东巡抚的消息后，立即派王士珍率少数亲信赴山东视察一切，以便做好所部新建陆军移防山东的准备。王士珍连日奔波山东各地，仅一月余，就将省内，尤其是屯兵处和沿海要塞形势一一了解，随即向袁世凯复命，袁“惊喜过望”，遂令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坐镇小站，指挥各营依次开拔。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以王士珍参谋全省军务。此时山东义和团反帝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王士珍权衡利弊后，建议：先行劝解，继威以兵，如仍不从，再捕诛首犯，解散胁从。此议为袁世凯采纳。

袁世凯为了取媚德国侵略者，任命王士珍为全省操防营务处督办，饬令冯国璋、段祺瑞协助，抓紧军事训练。未几，袁世凯特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总督看到袁世凯的新军确比清朝旧军操练精娴，又知道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都是受过德国军事教育的，故当面称赞王、段、冯为“北洋新军三杰”。

1901年11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保定设立北洋军政司，王士珍被任命为总参议，总管全军操防营务。不久为左翼翼长。在此期间，王士珍为袁世凯推行常备军制，编写了常备、续备、后备各军章制，为北洋陆军六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大臣，操实权。袁荐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旋调任军政司正使，并先后兼任北洋军第二、六镇统制官，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故新军编定营制，厘订饷章及军屯要扼，多由王士珍主持制定。

1906年10月，清政府抽调二万北洋军在彰德举行秋操，王士珍以军令司正使充总参议，整个秋操几乎全是在王的指挥下进行的，从始至终井井有条，获得各方称赞，中外被邀参观者，赞誉王“调度擘划，为不可多得，所以特别对王垂青，其誉望也骎骎乎驾于冯、段二人之上”[(5)]。

是年冬，兵部和练兵处合并为陆军部，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部右侍郎。

1907年，王士珍以侍郎衔外放为江北提督，节制文武，兼理盐漕事务。1908年秋，王率江北新军参加太湖秋操，秋操尚未结束，革命党人熊成基率新军在安庆举行起义。两江总督端方飞电请王士珍派兵往剿，在王部追击下，起义遂告失败。

王士珍自从外放江北提督后，乘机敛聚，宦囊渐丰。先后在北京西单、前门和天津等处购置房产，并在故乡正定县广置产业。他首先

委其叔父王如云在牛家庄盖起家宅一处、家庙一处、小学堂一座。不久，又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购宅基地二十余亩，大兴土木，建造王氏宗祠和公馆四百余间。同时期在本县和邻县藁城购地十五顷。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驾崩，袁世凯失宠。王士珍称病请开缺。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袁世凯在“非袁不能收拾局面”[(6)]声中，东山再起，他首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任王为襄办湖北军务。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后，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王士珍心有清室，念念不忘其恩泽，当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时，王深为不满。溥仪退位既成事实，王士珍又竭力为其退位力争优厚条件。溥仪退位，王士珍决计辞职，他表示“身任陆军大臣，决不愿署名于皇帝退位诏后”，遂即“退居乡里不问政事”[(7)]。

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鉴于王士珍“不攘权夺利，不植党营私”[(8)]，故几次派人去正定请王士珍回京担任要职，皆被王婉言谢绝。不久，王士珍被段祺瑞请到北京，遂就任模范团筹备员，被授为陆军上将。5月9日，袁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任王为六大办事员之一，但“实权最大”[(9)]。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袁以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8月，段辞职，由王继任陆军总长。

王士珍为人精明圆滑，时称“好好先生”。正当帝制密锣紧鼓之时，上书劝进者比肩继踵，唯独王士珍“迄不签署”[(10)]。有人向他试探，他淡淡地说：“自己人嘛！何必来这一套。”[(11)] 1916年4月23日，王调任参谋部总长。此时袁世凯极想利用王士珍团结北洋僚属维持局面，故二人密谈“退位之法”[(12)]。6月6日，袁世凯终因帝制失败羞愤成病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王士珍仍任参谋部总长。不久，因“参战”问题引起府（总统府）

院（国务院）之争，段祺瑞极力主张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宣战，黎元洪则受英美影响不主张对德宣战，王士珍提出“德国不可轻侮”[13]的劝告。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王士珍被任命为京畿警备总司令，李经羲任总理后，又任命王为陆军总长兼参谋部总长。

段祺瑞被免职后，离京赴津，积极联络各省督军，一面谋以武力倒黎，一面又暗中支持张勋策划丁巳复辟。6月14日张勋率辫军进京，6月30日夜，王士珍为张勋所胁，跟随张勋、康有为等进宫奏请复辟，随后又同梁鼎芬、李庆璋一行人去总统府，逼迫黎元洪“奉还大政”。因此，复辟王朝授王士珍为“内阁议政大臣”和“参谋部大臣”等职，并赏穿军衣。特别是当冯玉祥等人率军攻入北京，张勋作最后挣扎之时，王士珍和陈宝琛还为张勋出谋划策，“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14]。

丁巳复辟平息以后，王士珍深感无脸见人，准备再回故里隐居。然而，段祺瑞不但不追查其罪责，反对其竭力抚慰，还说王士珍对维持北京秩序有功，继续留任参谋部总长职务至是年底。

段祺瑞重掌北洋政权后，与总统冯国璋在对付南方护法军政府的策略上，发生分歧。不得不于11月15日辞去本兼各职，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总长，30日，冯国璋又任命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在王士珍任总理期间，不断受到段派机关报的恶意攻击，经不起风波的王士珍，终于1918年2月20日借病请辞。

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保荐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王辞以老病。第二年特任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未几，王士珍辞去军界职务，以“野鹤闲云”自处。不久，宣布担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

1926年5月，吴佩孚联络张作霖、阎锡山“讨伐”国民军。国民军

退出北京，王士珍被北京社会团体及知名人士推为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和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以维持北京秩序。

1928年5月，蒋、冯、阎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等人在北京发起和平运动。张作霖退出北京，王士珍再次出任治安维持会会长，电请南京政府迅速和平接收京津地区。

王士珍两次组织治安维持会，尽心竭力维持社会秩序，使北京免遭战争灾难，为京师民众所钦重。此后，王士珍还曾几度主持北京的慈善事业。

1930年7月1日，王士珍患肠癌在北平去世。

---

(1)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6集，台湾新生报社1981年版，第151页。

(2) 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北平文楷斋承刻印，第3页。

(3) 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北平文楷斋承刻印，第4页。

(4) 刘凤翰：《武卫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193、492页。

(5)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6集，台湾新生报社1981年版，第163页。

(6)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3页。

(7) 见《正定县情》（未刊）。

(8)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6集，第164页。

(9) 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年版，第94页。

(10) 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第9页。

(11)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6集，第166页。

(12) 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1页。

(13) 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205页。

(14)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王泰

庞守信

王泰，又名学聚，字会文。河南省临汝县人。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生。家贫，只有五亩薄地，父亲出外谋生时，客死外乡，母亲领着他兄妹二人经常以乞讨为生。十六岁时，王泰离家出走，跟着“杆首”、“膛将”打家劫舍，到处流窜，曾多次负伤，但未丧命，故人称“橡皮人”。

20年代的中州大地，战争连绵，兵匪横行，灾害频仍，民不聊生。王泰落草为寇，由匪卒、“小杆”、“大杆”，逐渐成为名震一时的“膛将”。他和临汝、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地的著匪崔二旦、孙世贵、李老末、李长有、戴正、魏国柱、牛绳武等人时合时分，聚众数千乃至数万，活动于豫西、豫东、豫南和豫皖、豫鄂边等广大地区。

1926年10月，王泰与牛绳武等联合行动，攻陷周口镇，踞商水县之邓城，连破西华县之逍遥集、河状村、南流渡口、南沱村等地，占据该县西南的半壁达半年之久，次年4月归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靳云鹗。王泰被招抚后，移防京汉路西，临行时在南流渡口杀人票数百，并将附近六七十里村舍、树木烧伐殆尽。

1927年9月，靳云鹗部被冯玉祥军击败而溃散，王泰率部投靠当时分驻于宛属各县和汝、鲁、宝、郏、伊一带的建国豫军樊钟秀部，被编为樊部李万林军第一混成旅，王为旅长，下辖三个团，活动于汝南、方城、叶县、上蔡和桐柏县之平氏镇等地。

1928年6月，王泰脱离樊钟秀部，由襄县开至许昌，投靠魏益三军，旋即乘火车北上，驻于北京南苑。但王泰旅未编番号，也没有任

何名义。7月，蒋介石下令编遣军队，王泰所部在南苑被缴械。

没有了部队的王泰，不甘心就此被招抚。他只身潜返河南宝丰大营，伙同孙世贵等招外队[(1)]，聚散匪、重新组合拉杆，窜扰于豫南、豫皖边界。8月，王泰率部攻破正阳县城，掳县知事，烧杀甚惨。秋冬，王泰与李老末股联合活动，东窜安徽省临泉县，以新村集为据点，四处骚扰，攻陷许多村镇。新村集南的李老炳寨是个大寨，住有许多富裕士绅，王、李集中全力轮番猛攻破寨，击毙守卫团丁四五千人，逃跑者十不二三。一时尸骨横陈原野，恶犬相率啃食，路断人稀，商人往阜阳购货均需结队持棒而过。此后，王泰又率部回归樊钟秀部李万林军[(2)]。

1928年12月，樊钟秀部由赵天清、李万林带领，向冯玉祥军缴械。王泰、孙世贵等没有从命，又离开樊部“自由行动”，将队伍由豫东鹿邑、柘城一带拉到南阳等地，重操匪业。1929年至次年春，王泰先后活动于正阳、罗山、方城、南阳、赊旗、应山等豫南、鄂豫边广大地区[(3)]。

1930年3月，蒋介石派樊钟秀由上海返回河南招收旧部，以备与阎、冯交战。樊以王泰、孙世贵两大杆匪众为基础，编为一个军，孙世贵为军长，王泰为师长，计二万余人；但樊违逆蒋意，宣布拥阎、冯反蒋。这时，任应岐率部由蚌埠到许昌投樊，也编为一个军。至此，樊军达四万余众，被阎、冯编为反蒋联军第八方面军[(4)]，樊为总司令，任应岐为前敌总指挥，王泰兼任许昌警备司令。4月上旬，中原大战开始，樊军踞京汉铁路重镇许昌，与蒋军激战。6月4日，蒋军飞机轰炸许昌城，樊钟秀重伤致死，邓宝珊接任总司令。王泰继续指挥所部抗击蒋军。7月，孙世贵、王泰部万余人奉命转战于新蔡、项城、商水、太康等地，于8月上旬进驻太康县城。不意蒋军骤至，包围攻城十余日，且有飞机投弹狂炸。旋由郜子举、梅达夫进城，收编王泰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十七师，王为师长[(5)]。中原大战结束后整编军队，王泰部被编为旅，王为旅长，12月调驻西华县城[(6)]

。

王泰爱枪如命，视枪为最大“家产”。家里要钱置买田地，他总是拒绝，并说：“我有钱了买枪也不置家业，有了枪杆子啥都有了，枪就是我最大的家产。”因此，十年来他家里的房屋仍旧露着天[(7)]。

十年来的兵匪生涯，养成了王泰的流寇习性，他虽多次归顺或被收抚为官军，但仍不习惯正规军纪律的约束。1932年1月，王泰奉令调往安徽省涡阳、蒙城驻防，他拒不受命，经西平、遂平、宝丰、郏县等地，将部队拉到豫西南一带。他与崔二旦、李长有、焦文典、魏国柱、洪泰昌等股匪纠合一起，约计二万余人，窜扰于南阳、南召、镇平、邓县、内乡、淅川等地，攻城略地，破寨陷镇，与各地民团交战，战线绵延至数百里，奸掳烧杀，惨不忍睹。王泰部在镇平县境焚毁民房四万七千余间，伤亡男女一千四百余人，掳去人票四千余，受灾人口达十一万余。2月16日，国民党军刘镇华部由方城等地赶到，与宛西各县民团联合进击，股匪溃散。是月下旬，王泰率部逃入湖北省光化、襄樊等地活动。4月，王率部经房县、竹溪、竹山转至四川万县地区，为川军刘湘部第三师师长王陵基收抚，编为一旅，王为旅长，计四千余人。

次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川军田颂尧、刘湘等部不断向红军根据地发动进攻，王泰所部亦被调往川东梁山等地，与工农红军作战，破坏根据地。当时，红军曾在前线多次散发传单，号召王泰部官兵弃暗投明，参加红军，但王泰继续进攻红军不止。

1935年夏，王泰所部被王陵基并入川军，王被授予旅长空衔。王泰有职无兵，百无聊赖，乃于1936年独自离开川军，由重庆经汉口转赴北平，拟在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处谋一差事未成。次年移住天津法租界，但常到北平孙殿英处活动。“七七”事变后，王泰在北平与孙殿英谋划，认为形势对己有利，准备返回河南组织武装，东山再起。此

时，宋哲元召集在北平闲住的各方将领，成立抗日民军总司令部，委孙殿英为北城区司令，王泰在孙处觅得了游击队长的职位，准备配合宋哲元的正规部队作战。但是，日军攻势凶猛，宋哲元于7月28日夜率部退出北平，孙殿英只好带着王泰等二百余人，出西直门经门头沟往房山一带逃去。王泰在途经卢沟桥附近时不幸被日军捕去，于7月29日遭杀害，时年三十三岁[8]。

---

(1) “外队”系被收抚后又被暗放的土匪。官军让其继续拉杆为匪，二者互相利用；外队给抚军暗送金钱，抚军给外队暗送枪弹；抚军不能自安时则有所归，外队不能自安时则有所靠。

(2) 范龙章：《回忆解放前豫西土匪的活动情况》（未刊稿）。

(3) 根据正阳、方城等县县志资料。

(4) 王留现等：《樊钟秀和建国豫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年版，第71—72页。

(5) 杜鸿宾等修，刘盼遂纂：《太康县志》卷1，1933年版，河南赈务会编《豫灾纪实》，1930年版，第41—42页。

(6) 《西华县志》卷1。

(7) 王泰妻刘自贞的回忆。

(8) 根据范龙章等人的回忆资料。

王天培

熊宗仁

王天培，字植之，号东侠，侗族。贵州天柱县人。1889年1月5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四）出生于一个兼营商业的地主家庭。其父王伯登，曾任清军绿营都司，得清政府授予振威将军封号。

王天培幼时在本地北乡学堂就读。1906年转入县城高等小学堂。次年毕业，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1909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辛亥革命爆发时，王天培与同学一起参加了武昌起义。1912年，王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次年初，因母逝世，告假回乡奔丧。曾纠合乡绅谭毓坤、李世荣等组织乡兵，查禁会党。

1914年，王天培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经陆军部委派回贵州，在王文华黔军第一团任见习排长，奉命“视察南防，协助清乡”(1)。不久，王升任连长，并在王文华创设的集训黔军的模范营任教官。

护国战争时期，王天培随同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王文华出湘西。在与北洋军马继增部争夺晃州、芷江之间的杀牛坪战斗中，王天培率领的连队英勇顽强，立下了功劳。护国战争结束后，王天培晋升为营长。

1917年8月，王天培随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入川作战，驻军綦江。12月，王天培第二营与北京政府委派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的军队激战于巴县土桥、三百梯，为黔军顺利攻克重庆开辟了道路，得到王文华和纵队长袁祖铭的赏识，不久升任黔军第二团团长。

1918年3、4月间，王文华与袁祖铭争夺黔军领导权的斗争公开化，王天培因与袁为贵州陆军小学同学，又是换谱兄弟，站在袁祖铭

一方，成为拥袁派的得力人物之一。在黔军军官中逐渐形成的“士官系”和“保定系”[2] 两大派系斗争中，王天培是“保定系”中有影响的实力人物。1920年10月，袁祖铭被王文华解除兵权，准备赴上海之前，曾与王天培密谈数次。袁走后，王天培与袁时常有函电往来，因而成了以后袁祖铭“定黔”时拥袁派的首领。

1920年11月10日，贵州发生“民九事变”，贵州军阀中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推翻了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统治，军政大权落入窦居仁、谷正伦、胡瑛、张春浦和何应钦五个旅长手中，黔军代总司令卢焘和代省长任可澄都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接着出现“五旅争权”的局面，各旅长竞相争夺对团的控制权。王天培的第二团隶属于谷正伦的第二旅，但王一向对谷怀有二心。而第五旅旅长何应钦为了压倒谷正伦，极力拉拢王天培。王两面讨好，坐收渔利。黔军总司令部为了调和五旅之间的矛盾，将全省划分为五大防区，分别由五旅所属的十个团割据，王天培第二团驻锦屏一带。本来第二团只有两个营，在由贵阳赴锦屏途经镇远时，他收编了刘显潜等人的游击军四百余人，编为第三营。

1921年夏，孙中山号召西南各省出兵援桂，谷正伦乘机将王天培团带到广西。王天培到柳州后，又收编了张廷光等人的游击军武装二千余人，实力已经超过一旅。黔军在广西并没有参加什么战斗，因为陆荣廷等已经退出了广西，战事告一段落。但谷正伦、王天培等部以此标榜自己支持孙中山，援桂有功。1922年1月19日，孙中山调黔军到桂林、柳州，改编为中央直辖黔军，以谷正伦为总司令，王天培为第二混成旅旅长。王并于此时加入了国民党。

这时，贵州政局混乱，袁祖铭想乘机夺取贵州军政大权，率部回黔。王天培先派其弟王天锡率第二营到湘西去迎袁，随后自己率部由榕江、独山到达贵阳，扶持袁祖铭上台。袁先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8月接受北京政府任命为贵州省长。王天培在“定黔”中立下了首功，被袁祖铭委为定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省公署军务处长。王此时

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定黔军的半数。

同年12月，滇军胡国璘旅假道贵州自桂返滇时，王天培与袁祖铭合谋，在剑河县的瑶光河口将其所部一千六百多支步枪、四挺机关枪全部缴械，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唐继尧甚为愤恨，于1923年2月派其弟唐继虞率滇军万余人，以护送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回黔主政为名（袁发动“定黔”时，曾允拥刘回黔，成功后背约拒刘），大举侵黔。袁祖铭兵力不足，一触即溃。王天培随袁祖铭退到川东，进驻重庆，加入了四川军阀的混战。

袁祖铭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扩充了实力，1924年底重新组编黔军，把王天培部编为第九师，下辖王天锡第十七旅、牟银洲第十八旅和牟守光独立旅。1925年2月，袁祖铭请北洋政府任命王天培为贵州军务督办，目的在于削弱王天培对在川黔军的控制权。王天培识破了袁祖铭的计谋，不回黔就职，仍然驻在重庆。

1926年夏，四川军阀刘湘、杨森联合驱逐黔军，王天培的第十八旅大部投降川军。王在四川站不住脚，要回贵州也有困难，时值北伐战争起，便转而依附于国民革命军。7月中旬，王在綦江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职，这支军阀队伍摇身一变就成了北伐军。当时，袁祖铭也投入北伐军，受委为左翼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彭汉章两部由袁祖铭节制率领进抵湘西。由于他们行动迟滞，一度引起蒋介石的怀疑。8月6日，蒋介石“电催王天培、彭汉章迅速集中津澧，与正面齐头并进，以便会攻武汉”[(3)]，王天培第十军担任洞庭湖以西的助攻任务，配合其他部队，击溃了吴佩孚军卢金山部，解除了长江上游的军阀势力对武汉的威胁，立了战功。同时他收编了卢金山的残余队伍，使第十军扩大为六个师和四个直属团，官兵达九万余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出兵东下讨蒋，派吴玉章等人到宜昌慰劳第十军将士，劝说王天培支持革命的武汉政权，但王天培执意投靠蒋介石、阻止武汉北伐军讨蒋。蒋介

石的南京政府成立时，王天培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1日，蒋介石委王天培任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指挥第十军的“枵腹”士兵，与奉鲁白俄军的铁甲肉搏[4]，先后攻下安庆、徐州，占领鲁南。7月，津浦线上战事逆转，孙传芳、张宗昌的联军反攻，李宗仁、白崇禧等部全面溃退，第十军孤军突出，寡不敌众，致使临城、徐州相继失陷。为了重新控制战略要地徐州，蒋介石自兼总指挥督师反攻，7月26日电令王天培为他火中取栗。王天培在“兵疲弹竭，伤亡众多……兵心涣散，士气颓丧异常”的情况下，驱赶着在徐州陷落时就“伤亡逾三分之一”的第十军投入战斗，节节溃败，直到淮河边上[5]。蒋介石在遭到失败后，以退为进，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并将王天培当做替罪羊，以擅自撤退、克扣军饷等罪名将其逮捕下狱，于9月2日在杭州被秘密处死。

---

(1) 《王永泓、王永明哀启》，贵州省档案馆藏件。

(2) “士官系”是黔军军官中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何应钦等为首的一派，基本立场是站在王文华一边；“保定系”是以袁祖铭、王天培等为首的贵州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基本立场倾向袁祖铭。

(3)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2卷，《近代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版，第65页。

(4) 王天培在被蒋介石枪毙以前所作的《宁归歌》中有“哀我将士，万里从征，枵腹从公兮，惨惨无人知……白俄铁甲兮，搏以肉体”之词。

(5)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22页、第140—141页、第108页。

王天纵

综文

王天纵，幼名天同，原名天从，字旭九。河南嵩县鸣皋镇臧凹村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耕种七八亩山坡地，虽终年辛劳，仍难温饱。其后他的父亲将土地卖掉，移住鸣皋镇做小生意。王天纵及其弟王天佑，均因家贫读不起书。兄弟二人在帮助父亲劳作之余，常喜参加附近练武场子，学习练拳使棒、舞刀弄枪，从此思想上就崇尚游侠作风。到十八岁补上本镇陆合总局的团勇，他利用团里的快枪精心练习射击。

其时，镇上有孟继珍（外号孟老七）其人，是位官宦子弟，为人讲义气、爱交游、疏财济困、好打不平，故附近数县各阶层皆有交结；短处是不爱读书，使气任性。听说王天纵精于射击，遂延之于家，以友待之。孟家枪弹俱全，王天纵获更多练习射击机会，技术更加精进，几乎击无虚发，人呼之“神炮”。孟因故与鸣皋镇上的一位老进士郭铭鼎家结仇，后郭的众多学生诉之官府，河南知府文悌奉省令查办此案，派巡防营官兵拘孟。王为感激孟对他多年知遇，保护孟家眷属免遭拘捕，率孟宅家丁持枪抵抗，突围赴南山，从此王天纵和追随者过起绿林生涯。

王天纵一伙初无定址，游窜于伏牛山区伊洛流域，官府虽屡派队搜剿，但因王飘忽无定，也打不着他。经过两年多的流窜、联络，团伙已发展到二三百人枪，于是选择杨山修寨扎营，占山为王。他对山寨的防御、远近的侦察和情报联络、山寨的供应征集，以及对属下应遵守的禁令等，都规定得有章有法。由于王天纵的“盗亦有道”和驭下有方，杨山寨迅速发展到千余人，王天纵成了伏牛山中的绿林领袖，东西数百里内的绿林刀客，莫不听其指挥。他曾在杨山召开过伏牛山

各地绿林头目会议，以后还结拜兄弟十四人，如张屏、张治公、柴云升、憨玉昆、陶福荣、关老九等。王以绿林中的侠义相标榜，故当时人以“中州大侠”称之。而杨山附近各县一般穷百姓亦公认王天纵为公道大王，甚至豫西一些文人亦慕王之作风与他交往；洛阳的外国传教士和跑津、沪、汉的大商人，也与王有交往，王在津、沪购买械弹物品，皆经他们之手。王天纵唯一不妥协的，只有清政府官吏和清军。

自王天纵占杨山扎寨后，清政府即指派河南巡防营管带谢宝胜率兵进剿。十余年中谢率部搜山攻山不下百十次，王天纵凭借地利人和、情报及时，采用远程奇袭、截击、迎击或吸引敌人向远离山寨的地方兜圈子等战法，与清军周旋于伏牛山中。但每次战斗大都是绿林跑了，官兵就算胜了，并以此上报得胜邀功请赏，十几年间谢宝胜就由一个管带屡获擢升，到官居南阳镇台。

王天纵虽身居山寨，却很注意外边形势，订阅上海《申报》以了解时事。为了到外埠开阔视野，经过精心准备，王装扮成一名候补道，携带熟悉官场交际者为随从，于1909年经汉口前往上海游历。在沪两月余，除游览、参观外，广为交游，结识不少朋友。还托人购办了一批德制“自来得”手枪，在汉口交货。在沪期间还获得一位同住一家旅馆的张姓候补道的青睐，张将其女许王为妻。王游沪满载归来，既慕西洋的物质文明，又恨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租界的横行霸道，遂萌发了民族革命思想，从此就与同盟会的河南籍革命人士有了联系。

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首先响应，革命军光复西安后出兵潼关；河南同盟会党人会集洛阳图谋起事，派吴沧洲、刘纯仁上杨山联络王天纵及伏牛山各路绿林武力，推王天纵为丁部大将军，约王攻占洛阳迎接陕西的东征军。嗣以攻洛失败，王天纵等率部八千余人前往潼关与陕西民军会合，经秦陇复汉军东征大都督张钫委任，王天纵任东征军先锋官兼第一标统，张治公、柴云升、憨玉昆、丁同声、赵忠、王修己等为标统。另聘刘纯仁为总参议，杨勉斋为秘书长，刘镇华、蒋我山、贾巨卿、石又謇、刘玉山等为参议，在东征戎幕中参赞军机。

因之军威复震。

随后，东征军出潼关攻击清军，在战斗中王天纵亲自率部攻克函谷关天险，会同柴、憨、赵等部夺取灵宝城，并追敌至渑池，嗣以清军增援，王等不善于正面阻击作战，败退潼关。

鉴于当时形势，王天纵建议由他率部先占南阳，再发动伏牛山中武力，从南进击洛阳，与东征军收夹击之效，较易成功。此议为张钫所采纳。随后王率数百人枪经龙驹寨、荆紫关，在伏牛山中发动绿林武装，进出邓州，与鄂北革命军季雨霖联系会攻南阳。南阳既下，会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各省停战，王应邀赴京，从此离开了带领十余年的绿林部队，为袁所羁縻。

王天纵奉召进京，仅带卫队一连，所部交其参谋长马文德带领。袁任命王天纵为陆军部中将顾问兼京师军警督察处副处长，所带卫队编入督察处的稽查队供其指挥，负维持街道秩序稽查奸宄之责。王不惯官场生活，颇感无聊，1914年至1915年间袁世凯大捕革命党人，他更感味道不对，就不大到督察处办事。当白朗纵横豫陕时，他想趁机离京，向袁请缨说：白朗部下有他的旧部，愿出京招抚白朗，但为袁所婉拒。及袁帝制失败而死，黎元洪接任总统，对王颇为垂青，王仍留京供职。其后张勋复辟帝制，在反帝制诸军攻击张勋辫子军时，王曾率领其原来的卫队扒开南河沿以北围墙，猛攻张勋的公馆，迫使张勋避入荷兰使馆。

孙中山南下护法后，曾派于右任抵京访问张钫，传达请即赴陕领导靖国军在西北发展的指示。张钫离京前曾往晤王，密告赴陕的任务，并劝王仍应本辛亥革命精神，服从孙中山先生的领导，继续革命。其后，王通过田范九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又派陶福荣、李魁元等赴豫西和南阳一带召集旧部。1918年1月4日，王天纵在河南宣布自主，自称河南靖国军司令。由于鄂、豫两省为北军所控制，发展不易。其时四川已为熊克武部靖国军所控制，王于是前往四川夔府组织

靖国豫军。5月2日孙中山任命王天纵为靖国豫军总司令。到1919年夏靖国豫军已编成两个师，由李魁元、陶福荣分任师长，但部队的给养颇为困难，在川又属客军，王不愿就地征发，因而出发颇感周折。王积劳成疾，于1920年春逝世。

当张钫在陕得知王天纵去世的消息后，极感悲痛，撰《中州大侠王天纵》一文对王多有赞语："天纵于清朝末年竟敢独树叛逆之帜与清兵对抗，辛亥年能参加反清革命，最后复能厌弃军阀统治，走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下思有所作为，总算是一个能进步的人物，比之同时之豫西其他许多闯荡起家者高出多多矣。故我对辛亥前后豫西地方之闯将，独取王天纵、樊钟秀二人焉。"(1)

主要参考资料

张钫：《中州大侠王天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5辑，1985年版。

李铭西：《东征先锋官王天纵》，《河南文史资料》第7辑，1989年第2版。

雷蕴吾：《王天纵攻打清兵守备衙门》，《河南文史资料》第7辑。

贺觉非：《王天纵在鄂西》，《河南文史资料》第8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1) 王传，系根据文后所列"主要参考资料"编撰而成，故署名"综文"。

王统照

鲁海

王统照，字剑三，山东诸城人。1897年2月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八）生。父亲是当地的地主。他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为他延师课读。1907年，王考入县城高小。这时候他爱读《封神演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小说。高小毕业后，1913年考入济南育英中学。

同年夏天，王统照用章回体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剑花痕》，描写辛亥革命时期男女青年志士的革命活动。他认为这部小说很不成熟，没有送去发表，但从此引发了创作的欲望。1916年，他的短篇小说《遗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

1918年夏天，王统照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英文系，开始读到《新青年》等刊物，结识了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五四运动时，王曾参加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爱国行动。由于他酷爱文艺，积极投入了新文化运动，热情地写新诗和白话体小说。他最早的白话小说是写一个青年因自由恋爱不遂而牺牲的悲惨故事，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编辑的《曙光》杂志上。

1920年冬，王统照与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共十二人，组织了文学研究会。该会的宣言说："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

固。”[1]

王统照自始至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他把自己的政治热情倾泻在作品中。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他发表过《遗音》等短篇小说和《生命的火燃了》、《少年的梦》等新诗。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2]。1922年，王在文学研究会创办的《诗》月刊上，又发表了《未来的阴影》、《烦激的心河》等诗歌。这年他在中国大学毕业，到平民大学任教。

1923年，王统照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叶》，翌年又将前几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汇集命名《春雨之夜》出版。这些小说多是以青年男女的苦闷、追求人生的意义为题材。他的小说文笔细腻，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内容上虽没有为读者指出一条出路，但却强烈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有一定影响。

1925年，王统照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童心》，收有1918年到1924年间写的诗歌九十首。他初期的诗，从形式上看，受旧诗的影响较大；从内容上看，有些是讴歌田园的，但更多的是探索人生。他因为找不到答案，对人生感到“玄秘”和“悲哀”，同时也相信人生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前路定有明光，阴影终将退去。”[3]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而又怀有希望的情绪。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革命党人和群众。严酷的现实使王统照痛苦不安。这年夏天，他从北京回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教课，以后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兼课。“有时一股强烈的悲感冲上心头，无可排遣，又读不到什么书，便写下十篇左右的短篇，类如《搅天风雪梦牢骚》……。”[4]

1930年，王统照去东北旅行。这时东北尚处于“九一八”事变前

夕，但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迹象已昭然若揭，他目睹这一切，忧心忡忡，写了报告文学集《北国之春》，描述了东北人民的痛苦生活。

1933年，王统照出版了诗集《这时代》，收入他1925年到1932年写的诗。序言中说，在这火与血的时代里，他逐渐摆脱了怀疑与伤感，变得坚强起来了。长篇小说《山雨》也是这个时期写成的，他在跋中说："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及农民的自觉。"这是王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小说之一。接着，他又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春花》，以五四运动后的济南为背景，写一群中学生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走向不同的道路，于1936年出版。

这时，王统照已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青年慕名请教的很多。他对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竭力培养，当时在青岛的臧克家、王亚平、吴伯箫，在外地的王西彦等，都受过他的教益。他曾与闻一多（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一起，资助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

《山雨》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但也触犯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其"内容颇含阶级斗争意识……予以警告，勒令禁止发行"[(5)]。1934年王统照出国去欧洲。他先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抄录资料，又去剑桥大学研究文学；以后，从欧洲去非洲，游历了埃及，再回到意大利，凭吊了著名诗人雪莱的墓地，写了《在雪莱墓旁》等诗。后来，他的游记汇编为《欧游散记》，于1937年出版。

王统照1935年春游欧回国，住青岛观海山旧居。这年夏天，老舍、洪深、赵少侯、王亚平、吴伯箫、孟超、臧克家等一批作家聚集于青岛，创办了《避暑录话》文艺周刊。所谓"避暑"，既是避炎热，也是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炎威"，王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歌。

1936年秋天，王统照到上海，接任大型文学刊物《文学》主编。

这是3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发表了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发表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同年10月，华北危急，王统照与巴金、茅盾、郭沫若、鲁迅等联合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吁请“全国的学者、新闻记者、作者与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以收全国上下一致救国的效果”[(6)]。12月，王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7年6月，王统照自己编辑了《王统照短篇小说集》，收进1915年到1932年这十七年间的主要作品，认为“殊觉自惭！不但观察、思想觉得浮薄，文字也无甚气力”[(7)]。他以1932年为限，是因为自1933年发表《山雨》以后，他的思想境界前进了一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租界成了“孤岛”，王统照与许广平、郑振铎、唐弢等人继续从事文学活动。1938年起，王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兼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还为《大英夜报》编副刊《七月》，为《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写稿。由于当时环境恶劣，他除与郑振铎、耿济之、柯灵、唐弢等交往外，很少外出，写作也多用笔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上午，日本军队冲进上海租界，王统照为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要求学生“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8)]。从此他化名王恂若，在沪蛰居。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统照应邀在中文系担任教授，同时还为《民言报》主编《艺文》副刊。这时，青岛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山大的校舍被占为军营；国民党“劫收”的情景，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的消息，使王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1947年山东大学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王挺身而出，在学生大会上演讲说：“同学们，我支持你们！”王统照的行动影响了一些老教师，也鼓舞了青年学生们的斗志。1948年10月，他在诗中写道：“北国鼓声萦梦寐，平生意想剩华巅。”[(9)]表现了对反动派的战斗精神。

1949年7月，王统照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9月，他出席青岛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常委。1950年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被选为省文联主席，1952年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他还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病逝于济南。

1949年后，王统照的诗集《鹊华小集》、文学评论集《炉边文谈》，以及《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诗选》先后出版，并重印了长篇小说《山雨》，编印了七卷本的《王统照文集》。

主要参考资料

王统照：《这时代·序》，载《这时代》，1934年版。

王统照：《江南曲·序》，载《江南曲》，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

田仲济：《序言》，载《王统照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王统照墓志铭。

臧克家：《情感的彩绳》，《前哨》1978年第2期。

王亚平：《忆诗人王统照》，《前哨》1978年第2期。

臧克家：《剑三今何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

(1) 《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

(2) 郑振铎：《〈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8页。

(3) 王统照：《夜行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

(4) 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1937年版。

(5)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知》第397号，见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1933年版，末页。

(6)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185页。

(7) 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

(8) 徐开垒：《我的“最后一课”老师》，《人物》1981年第3期。

(9) 晦庵：《童心》，《书话》，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18页。

王文华

熊宗仁

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生。祖、父辈均为地主，清朝咸、同年间曾参与组织团练，镇压黔西南回民起义，在当地颇有影响。外祖父刘官礼系兴义知府，与其子刘显世等办团练起家，称霸兴义一方。王文华幼年丧父，与兄王伯群多得舅父刘显世资助。

1895年王文华入塾就读。稍长，值刘官礼聘贵阳名士姚华等人到兴义执教，王与刘氏宗族子弟皆从姚受业。1906年王文华毕业于兴义笔山书院，次年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未卒业即转入优级选科师范文科。在校期间，与爱国团体贵阳科学会负责人张忞结为忘年交，深受其爱国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濡染。当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已传播贵州，以张百麟、钟昌祚为首的贵州自治学社与东京同盟会发生联系，宣传反清爱国思想。王文华通过张忞与自治学社成员有较多的接触。他剪去发辫，阅读《民报》等革命书刊，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席正铭、阎崇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活动。

1910年，王文华辍学，受聘为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学监，兼历史、地理和体操教员。后经人辗转介绍，注籍于美国三藩市同盟会支部。次年王任高等小学堂堂长，与窦居仁、何辑五创办体育学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贵州革命派在贵阳策划武装起义。王文华在兴义以体育学会名义向团防局借枪，想有所行动，因官方警觉，计划受阻。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止贵阳发生武装起义，电召巡防营管带刘显世速率部来省护卫。当时王文华在刘部当前队队官。军次安顺，11月4日以杨荩诚为都督的贵州军政府已宣告成立。刘显世派王文华到贵

阳与革命派联络。由于革命派失去警惕，宪政派又极力怂恿，枢密院长张百麟等迎刘显世到省，授予枢密院军政股股长兼第四标标统职，王文华在该标当了管带。

贵州辛亥革命应时而起，兵不血刃取得成功。为了夺取政权，代表官僚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政派、耆老会和地方团练势力公开合流，引滇军唐继尧部入黔。1912年3月3日凌晨，王文华奉唐继尧之命，率领部分滇、黔军，援城先登，直扑都督府，逼走代都督赵德全[(1)]。旋唐继尧任贵州都督，于1913年任王文华为省城警察厅厅长。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晋京，唐继尧回滇继任滇督，刘显世就任贵州护军使。王文华建议改旧巡防营为陆军，共编练六个团，以德、日军事教程进行训练。王文华自任黔军精锐第一团团长，以卢焘、胡瑛、李雁宾等为辅佐，确立了自己在黔军中的领导地位。

1914年3月，王文华辞去省城警察厅厅长职务，倾力于军队。6月，王文华任护军使署副官长。是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已现端倪。王伯群在京、津参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反袁密谋，函告其弟王文华秣马厉兵，应时起事。次年4月，王文华在贵阳设立模范营，抽调各团下级官佐轮流来省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并劝说刘显世参加武装反袁。12月21日，北京政府突然任命王文华为陆军步兵上校，以示笼络，王未为所动。25日，云南起义爆发，在蔡锷、唐继尧等发表的讨袁通电中，刘显世亦列名其中。贵州耆老会主张降袁，刘显世因黔军已表示讨袁，依违两可，犹豫不决。王文华向刘显世陈词："吾志与民国同命，舅氏不谓然，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京。吾自驰助蔡君，灭家亡身吾独任之，事成则归舅氏。"[(2)]并将黔军两个团集中镇远、铜仁，准备作战。

1916年1月中旬，护国第一军先遣支队进抵贵州，24日支队司令戴戡抵贵阳，贵州人民和黔军将士热烈响应护国讨袁。此时，北洋军马继增的近畿第六师和卢金山的第十八混成旅约三万余人进逼源陵。刘显世在内促外迫之下，于27日宣布贵州独立，任王文华为护国第一

军右翼东路司令，率领黔军三个团入湘迎击北洋军。时黔军以数千之兵抗敌数万，兵员伤亡甚大，加之刘显世、熊范舆等扣饷扣械，王文华曾迭电辞职，以示抗议。由于湘西人民大力支持，黔军士兵英勇奋战，王文华亲临前敌指挥，战局得以稳定。激战至5月中旬，卢金山全旅被歼，马继增兵败自戕，北洋军退出湘境，湘西、湘南均为护国黔军控制。王文华被贵州报纸誉为“黔中第一伟人”。

护国之役胜利后，贵州组建陆军第一师，王文华任师长。他罗致了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浦、王纯祖、李毓华等留日士官生，形成了握有军权的少壮派集团。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被称为“新派”。刘显世因列名参与护国运动，当上贵州督军兼省长。他以省长公署秘书长熊范舆、顾问郭重光、政务厅长何麟书和财政厅长张协陆四人为台柱，掌握全省政治、经济大权。因这帮人具有浓厚的封建保守性，被称为“旧派”。从此便开始了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同刘显世为首的旧派之间的内部斗争。

1917年4月，王文华以贵州军事代表身份到北京参加为对德宣战问题而举行的督军团会议。在段祺瑞操纵下，5月19日督军团要求改正宪法草案和解散国会，王文华不赞成干涉制宪和胁迫国会，拒绝签字，愤而赴沪，拜谒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王文华兼程返黔，表示愿“竭尽全力，扩张军备，以作孙先生后盾”[(3)]。

是年8月，王文华响应孙中山组织三省联军入川的号召，率黔军两个团出川东。11月，同北洋政府新任四川查办使吴光新部激战二十余日，于12月4日攻克重庆，正式组成三省靖国联军，推唐继尧为总司令，王自任靖国黔军总司令。1918年1月，王文华又任命袁祖铭为纵队长，率部参加联军对依附北京政府的川军刘存厚部作战。联军1月20日攻下成都，黔军立了首功。袁祖铭自恃战功显赫，乃活动所部团、营长联电刘显世，请委为黔军第二师师长。这正投合了旧派以袁制王的心意，刘显世立表赞同。王文华认为袁要求任第二师师长，是

同他争权，便以归还建制为辞[4]，调袁为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剥夺其兵权。

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后，主张地方自治、联省自治。孙中山对熊很不满意，一度把解决川事的希望寄托于王文华身上。3月25日，孙中山致电王文华："欲达护法救国之初心，唯有根本解决一途耳。"[5]希望他率领联军北伐。27日王文华与黄复生、叶荃等誓师东出援鄂，以图会师武汉、北定中原，但因陷入四川混乱局面，不能自拔。5月，王文华就任重庆镇守使职，旋因熊克武等人反对而辞职。

1919年五六月间，贵州发生"柳渝铁路借款案"[6]，旧派借机攻击王文华、王伯群弟兄不顾贵州财政困难，妄借外债，新派与旧派之间斗争激烈。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贵阳的学生运动也发展起来，王文华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亲往讲武学校演说，又支持其妹夫、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创办"少年贵州会"，发行《少年贵州报》，演出话剧，办补习学校，抵制日货[7]。讲武学校学生成了贵阳学生运动的主力。新派利用学生运动向旧派猛攻，政局大乱。政务厅长陈廷策被刺受伤，财政厅长张协陆服毒自杀，省议会推王伯群掌黔，刘显世被迫应允"统一后正式与伯群长黔"[8]。

1920年初，熊克武以"川人治川"为号召，排斥滇、黔军。王文华再度由贵阳赴重庆，指挥黔军加入川战，并开始在军中策划取代刘显世的活动。唐继尧以王文华倒刘，有碍其对贵州的控制，与刘显世谋划以韩建铎取代王为黔军总司令。刘为此部署其堂兄贵州游击军总司令刘显潜和驻湖南洪江的黔军清乡司令王华裔密谋倒王，并由其胞弟刘显治草拟了讨王通电。驻川黔军中也出现了以薛尚铭为司令的"靖难军"，拥刘反王。这些动向，加速了新派向旧派夺权的步伐。

同年，8月，川、滇、黔拟设联军司令部于重庆，王文华被推为筹备员，实际负责重庆一带防务。10月，熊克武联合各路川军大败滇、黔军，王文华部被迫撤离重庆。此时刘显世准备倒王，王为先发

制人，在离渝前，以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部署黔军以“清君侧”为名，回黔向旧派夺权；自己则为甥舅关系，避免舆论谴责，先于10月15日赴沪就医。11月11日夜，以旅长谷正伦、何应钦和警卫营长孙剑峰为指挥，在贵阳发动“民九”事变，杀死了耆老会头目郭重光、省署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何麟书逃跑，其子侄三人被杀。刘显世被迫于13日通电解除贵州军、民两政职务，避难云南。

“民九”事变后，贵州各界电请在上海的王文华兼贵州省长。王为避“以甥逐舅”之嫌，借病辞谢。12月，王文华赴广州谒孙中山，被委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一度奉命往浙江劝说卢永祥参加讨伐徐世昌、段祺瑞。王文华在上海还联络辛亥革命后流亡沪上的周素园等贵州革命派人士，与他们弃嫌修好，动员他们一同回黔执政。王的行动，遭到北洋军阀和贵州旧派的仇恨。他们利用王文华与袁祖铭的矛盾，唆使袁收买刺客，于1921年3月16日下午五时，在上海一品香旅馆门前将王文华刺杀身死，时年三十三岁。193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王文华为陆军上将。

---

(1) 都督杨荩诚率军北伐援鄂，副都督赵德全代之。

(2) 汪兆铭：《勋三位陆军中将王君文华神道碑》，贵州省档案馆藏件。

(3) 王健安：《王电轮先生教学时期的革命思想和他的几点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义县文史资料编写组编《兴义文史资料》第1辑，1960年版。

(4) 当时黔军的编制是以团为单位，共十个团，直属总司令王文华调遣。

(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5页。

(6) 王伯群以贵州全权代表资格同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士觐在上海签订

了借款修筑由柳州经贵阳至重庆的铁路合同草约，其中牵涉以贵州路、矿作抵押和利息偿付等问题，王文华亦想从借款中支取军费，引起元老派对少壮派的猛烈攻击，时人称为“柳渝铁路借款案”。

(7) 徐廷栋：《贵州五四运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 1919年12月4日和9日刘亚休致熊克武密电，四川文史研究馆藏。

王希天

任秀珍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吉林长春人。1896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出生于长春金钱堡一个民族工业者家庭。王希天的祖籍为山东登州蓬莱县，清康熙年间，其祖辈迁居辽宁金州，以农耕为业。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其祖父王文保移居吉林长春，始学皮革手艺，后在长春三道街开设“皮铺”，经营日渐发达，家境殷实。王希天的父亲王相为王家的次男，以苦读求科举仕途。王希天七岁随父读书习字，九岁入塾，十二岁入长春龙王庙小学，因成绩优秀，未及一年便升入长春第一高小，十五岁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翌年，与张万英结婚。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时在“一中”读书的王希天欣然带头剪掉自己的发辫并劝母亲为妹妹放足，劝言乡亲邻居戒毒，鼓励妇女学文化。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北洋军阀攫取了政权，帝国主义侵略依然如故，军阀苛政暴敛，民不聊生，“民国”徒具虚名。为了探求救国拯民的道路，王希天决心去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求取真实之学问，归以报效祖国。1914年11月，王希天东渡日本留学。

王希天到东京后，刻苦学习新知识，在欲求实业救国道路的探索中，曾产生净化自我、不为私利诱惑的圣洁感情。1916年春，他在东京美以美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决心以济世救人的博爱精神去挽救世人的苦难。

在日本经过预科学习，1917年7月王希天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并获得官费。时值欧战后期，物价飞涨，留学生纷纷要求增加官费。

王希天则以国家利益为重，规劝同学亦应撙节自持，养成俭朴之风。此论颇为多数学生所赞同。当年日本高等学校的食宿条件均甚简陋，多数学生对此难以适应，故寄宿生寥寥无几。王希天虽出身富裕家庭，却不畏清苦发奋读书，坚持在校食宿，并借此机会考察校内生活。他为人和蔼，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常将所得官费节省下来接济贫困同学。中国留学生王朴山和预备留学的周恩来等都颇钦佩王希天的品格，他们志同道合，结下深厚的友谊。1918年王希天被推举为中华留日美以美会执事，后当选为执事部长。

王希天在日学习期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加速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之时。日本以对德国作战为名，于1914年11月夺取德国占领的我国胶州湾和在山东的各项权益。1915年日本政府又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1917年日本与北洋政府签订以攫取在华特权和培植皖系军阀为目的“西原大借款”。1918年5月更与北洋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妄图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时刻，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王希天和留日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抗争。在东京“一高”化学讲堂的一次集会上，王希天手持报纸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不见报纸所载‘中日军事密约’乎？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1)] 王的讲演获得与会同学热烈响应。留日中国学生奋起共谋拒约的爱国行动，遭到日本当局弹压。他们不畏强暴，各校代表于5月5日在东京中华大商俱乐部集会，决议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留日学生决定罢学归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拒约运动。会议还决定回国后，分上海和北京两路活动，在上海设救国团总部，北京设支部。

5月12日，王希天作为先发队代表与阮湘、李达等先期归国。14日他们在天津与《益世报》及各校联络宣传拒约，受到欢迎[(2)]。次日，王希天等到达北京，在湖南会馆与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许德珩会晤，共同筹划京、津、沪的拒约运动，要求废除“中日密约”。王希

天等走访北京《中华新报》、《晨钟报》、《北京日报》、《群强报》等报馆，揭露中日密约真相，争取舆论界的支持。又两度往见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面陈拒约要求。与此同时并发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宣言》，呼吁“一致对外”、“惩日人之妄，大华夏之威”。5月21日，留日学生救国团与北大等校学生两千多人集会于新华门前，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密约，使拒约运动进入高潮。

王希天作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北京支部负责人之一，来往于京、津之间宣传拒约运动。为抵制日货，他亲售国货，并成立了“国货贩卖部”。同年8月，在拒约运动遭到北洋政府阻止后，他亲赴哈尔滨的东华中学讲演，介绍拒约运动盛况，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是年10月，国民杂志社在北京成立，王希天等留日学生亦加入为社员。震动中外的拒约运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却为一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播下火种，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王希天成长为很有影响力的留日学生领袖之一。

拒约运动过后，多数归国学生不愿再回日本，但由于国内无相当学校可入，转学他国又不可能，王希天只好和一些人再次去日本。翌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希天等人在日本又积极组织声援活动。由此他被日本警方视为“煽动”留学生的“排日领导者”，并予以严密监视。

王希天归国期间，目睹了北洋政府的腐败，深感内政不修，“外交万无胜利之望”，心情十分沉重。为唤起民众的觉醒，他决心弃工习文。1919年，他于日本东京“一高”毕业后，即转入名古屋“八高”政法科学习。在“八高”，王希天除完成学业外，经常接触日本新思想学者，与地方平民友好往来，为此被日本当局视为“排日分子”，遭到莫须有的刁难和迫害，后因此患病，于1920年春被学校除名，赴长冈养病。在养病期间，他并未因病魔缠身停止自己的追求，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了解社会，接触旅日华工，潜心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21年秋，王希天病愈返回东京，被推为中华留日美以美会宗教

干事。同年10月，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德育部干事。

旅居日本的华工，多数是欧战后相继从中国浙江温州、处州和山东等地到日本行商谋生者，人数多达六七千人。仅来自浙江温州一带者就有三千五百多人。他们从国内带来雨伞、锯、六神丸、山东绣花边等小商品，到日本的长崎、门司、神户、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贩卖。当货源不充或本小利微难以维持生计时，他们便流落东京等地工厂做苦工，从事挑煤挖土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收入菲薄，常遭资本家和工头的刁难、殴打和克扣工资。他们多数居住在贫民窟，更有甚者只好栖身于桥洞、下水管道或露宿街头巷尾[(3)]。由于饥寒、疾病侵袭，横死街头者也屡见不鲜。特别是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参加拒约运动后，日本当局对旅日华工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非但不准他们做工，还要将他们驱赶出境，生存毫无保障。对于旅日华工的艰难处境，王希天与好友王兆澄等深为同情，他们决心为维护华工的利益有所作为。这一行动，曾受到远在欧洲的好友周恩来的赞许[(4)]。

1922年夏，王希天在留日青年会召集的留学生负责人箱根会议及在大原海岸举行的夏令会上，先后讨论了有关华工事宜，建议“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谋其福利”。更于8月下旬，联合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等团体，共同向日本当局交涉，拒绝其“驱逐华工回国”的荒谬命令；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华工聚居地之一的大岛町进行视察，目睹华工的悲惨生活，决计为华工设立事务所、组织华工团体。经过多方努力，又争取到日本友人的帮助，王希天以个人名义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立案，于9月21日在东京大岛町建立了“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王希天被选为会长。为了更好地为华工服务，他辞去了留日青年会德育部干事职务。

为促进共济会事业的发展，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王希天将自己的薪金由一百元降到三十元，生活颇为简朴。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神户、横滨、大阪等地募捐，未及一年就募集大洋一千九百

六十五元。王希天在共济会中设立了检病所、治疗部、教育部、慰问部和华工补习学校等机构。他的挚友孙绍唐为华工诊病，王朴山为华工讲授文化课，王希天则亲自到华工劳动场所视察，帮助华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保护华工的利益，除了进行合法斗争，与争取日本友人的帮助与支持外，有时遇到华工与日本厂主、工头发生争执时，他便挺身而出据理以争。有一次共济会会计杨庭杰向日本工头索讨积欠的工资，工头立川却粗暴地将杨的门牙打落，王希天获悉后无比愤怒，立即出面与彼论理，蛮横的工头竟用短刀相威胁，他不畏强暴，捍卫华工的尊严，最后逼使对方不再敢逞凶，厂主也不敢再无理克扣工资或进行其他损害华工利益的活动，华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一定的保护。王希天以自己的言行，实践其爱国拯民的理想，成为深受旅日同胞拥戴的华工领袖。

王希天主持共济会，为华工服务，行动正义，却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钉”，被视为“排日巨魁”。1923年9月1日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继之大火，城市化为焦土，巨大的自然灾害，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政府为此召开特别国会，讨论恤邻赈灾；中国各界民众也以极大的热忱关怀东邻蒙受的灾难，在物质上给予慷慨的援助。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幌子，趁机进行大搜捕、大迫害，天灾后又加人祸，东京地区的华工陷于一片阴森恐怖之中。

关东大地震发生前一天，王希天因行将赴美国学习，已辞去侨日共济会长职务，当震灾发生后，新会长王兆澄为救护侨日同胞竟被日本歹徒打伤，无法履行会长职责。面对此种危局，王希天毅然担当起共济会长的责任，约同好友王朴山、孙绍唐等联络中国驻日使馆、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对日震灾救济会”，奋力援助和解救遇难华工。9月3日午后三时，日本暴徒三百余人拥至东京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一百七十四名浙江温、处旅日华侨赶至客栈外的空地上，诳称：“即将地震，须卧地上。”当惊恐无

助的华工被诱迫卧地时，暴徒们即上前狂砍乱杀，当场打死一百七十三人，仅一名叫黄子莲的重伤昏厥，倒在同伴尸体下方得幸存，恢复知觉后从尸堆中爬出前往共济会向王希天哭诉同胞被屠杀的悲惨情景。王闻讯心急如焚，他不顾震后秩序混乱、交通阻断等险境，不听友人极力劝阻，于9月9日晨八时只身骑脚踏车前往大岛町查访，欲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虐杀华工的暴行。不料日本宪兵趁机将王希天拘留并押往宪兵司令部，后解至神户警署。他虽身陷囹圄，仍一心惦念如何去援救众多华工，置自身安危于度外。至12日凌晨三时，王希天被两名持枪日本宪兵捆绑押出警署，当行至东京关东区大岛町八丁目逆井桥时，隐藏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连队中尉垣内八洲夫，突然窜出抽刀将王希天砍毙，随后将尸体砍碎抛入竖川河中灭迹，以图掩盖罪行。王希天就这样惨死在野蛮卑劣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屠刀下，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王希天和众多旅日华工遇害的消息，在国内外激起强烈的反响，我各界人士纷起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侨胞的罪行。日本名古屋共济会支部、日本救世军总部、中华留日学生会等社会团体也先后举行王希天追悼会。中国政府外交部派人赴日调查王希天被害情况。1923年11月4日，王希天的家乡吉林人民在丹桂茶园为王希天及遇难华工举行示威性追悼会[(5)]。1924年3月2日，北京举行三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6)]。同年吉林创建“希天医院”，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谢介眉编著的《王希天小史》，1926年温州工学界同仁集资建造“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以资景仰。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曾委托马骏烈士之子马德钟多次寻找王希天遗属的下落。1962年6月16日，周恩来到吉林视察工作时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圻。1973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室根据王希天的生平事迹，下达了“关于王希天家属应按烈士待遇”的批示。1974年1月15日，吉林省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198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王希天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1993年，通过中日两国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日本关东大地震时虐杀王希天及旅日华工案，在尘封了七十年后方始真相大白，东瀛沉冤终获昭雪。王希天烈士的遗骨运抵故乡长春[7]。同年9月3日，在温州市华盖山上举行被侵华日军破坏的王希天烈士纪念碑的重竖仪式。同年，日本王希天悼念会今井清一、石井良一、田原洋、仁木富美子等知名学者，组织各界人士于日本东京山手教会堂，召开关东大地震七十周年纪念会暨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术研讨会。1994年9月4日，吉林省史学界同仁为进一步研究王希天生平事迹，弘扬王希天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发起成立长春王希天研究会。1995年6月30日，王希天烈士陵墓在长春烈士陵园兴建，并于翌年烈士百年诞辰纪念日对外开放。

---

(1) 谢介眉：《王希天小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页。

(2) 《在京留学生日记》，《民国日报》1918年5月23日。

(3) 孙宗尧（孙绍唐）：《王希天烈士牺牲前后回忆》（未刊）。

(4) 思宇：《〈切磋集〉题记——怀念周恩来伯伯》，《吉林日报》1980年1月8日第4版。

(5) 下田荣吉著、白金山译：《吉林学生运动今昔》（1911—1930）。

(6) 《京报》1924年3月3日。

(7) 《长春日报》1993年9月25日第1版。

王小航

娄献阁

王小航，原名照，字藜青，号小航，又号水东。河北宁河人。1859年6月8日（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八）生。曾祖王锡朋做过安徽寿春镇总兵，1841年于定海对英作战时阵亡，谥刚节，赠提督衔。父王楫为太学生，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王小航幼年丧父，由叔父抚养，从小喜欢观察星象，爱读天文、地理、兵法之类的书。十岁以后从塾师学诗文，1877年入书院。

当时北京同文馆招生，王小航欲报考，家中长辈以其曾祖被“鬼子”害死，后人不该学“鬼子”，拒允。但他仍广求时务诸书，凡同文馆、上海制造局和教会译印的新书均尽量搜集研读，亲族乡人把他看作中了魔气 (1) 。

1891年王小航中举人，1894年取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适逢中日甲午战争，为维护地方秩序并准备御敌，他在家乡芦台办起了乡团，曾受到直督王文韶的称赞，说王小航“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2) 。

1895年，王小航赴北京应散馆试，改任礼部主事，于是将乡团收束，至京供职。中日战争失败后，朝野要求变革之风日炽，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897年回芦台创办了一所小学堂。是年冬，王仍回京供职。翌年3月，王又与同省京官徐世昌、李石曾等在北京设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 (3) 。

1898年戊戌变法时，王小航参与维新活动，多次上书言事。在“请布纶言以祛众惑，广慈训以定众志，设教部以释众疑”一折里，批驳守旧顽固派的言行，说明变法图存的必要性，提议设立“教部”。

他在奏议中请求："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以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从而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温和。他劝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以孝治镇服天下"[(4)]，想让慈禧到海外去开开眼界。该折递到礼部，礼部汉尚书许应睽不允代奏，并劾王小航包藏祸心，而光绪则赞扬王"勇猛可嘉"，超擢四品京堂候补，并赏三品顶戴；同时怒斥许，将礼部堂官六人革职[(5)]。

在变法中，王小航与康有为等经常往来，但意见不完全相同，面对新旧势力和两宫间的激烈斗争，康主张扶帝抑后，削弱旧党的权势，王则想调和两派的矛盾，平定宫闱的变乱；康主激进，王主渐进；康较注意军政，王却看重教育。王小航曾对康有为讲："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反驳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6)]在康等私下策动袁世凯进行兵谏之前，谭嗣同等两次要王去劝说聂士成保护光绪帝，并许聂以督直相酬。王认为那是使光绪去冒险，坚决加以拒绝。此外，当时光绪的亲信张荫桓力助康有为变法，王以张奸贪，不顾康的劝阻严劾张。正因这样，"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7)]。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王小航与康有为等均逃亡日本，此后王即退出政治舞台；与康的关系渐疏远。王流亡日本一年多时间，先后游历了东京、高知等地，作诗二百多首，大半是抒发胸中悲愤之情，后自选一部分编成《雪泥一印草》。王颇注意研究日本的假名文字，为以后创造"拼音新字"奠定了基础。

1900年春，王小航潜行归国，不敢公开露面。他身穿僧装，诡称"台湾和尚"。他从烟台上岸后，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以化缘为生，备尝艰苦，有自撰《行脚山东记》，记其事甚详。

同年秋，王小航回天津隐居。不忍空耗岁月，着手仿日本片假名

创编官话和声字母，初刻本翌年印于日本江户，署名“芦中穷士”。该字母共有声母五十（初为四十九），他叫“音母”，韵母十二（初为十五，后省去衣、乌、迂三字），他叫“喉音”，总计六十二个音符，均取汉字的某一部分构成。王制此字母主要着眼于普及教育，“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8]，在拼法上，概用两拼，反对三拼。言文一致，只拼北京白话。拼音字母可用来注音，也可代替汉字。有人称它为“简字”，实际是中国文字由衍型过渡到衍音、实行拼音化的初步尝试，比以往的切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文字改革运动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推行新字，1901年王小航冒险到北京求见李鸿章。李托病不出，由于式枚代见。在谈话中王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说“中国政府非注重在下层的小学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又“非制出一种沟通文语的文字，使文字语言合而为一不可”[9]。于式枚很不喜欢他的这套说教，王扫兴而归。

1903年，王小航在北京裱褙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不便与多人见面，用门人王璞为教员，自己隔屏听之。同时化名赵世铭往来京、津、保定间，暗中进行传播，取得不少人的同情。先是王璞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这套简字是使人人能看书看报的便捷之法。张等迫于下面的呼声，不得不在同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10]其后直督袁世凯也曾依从保定大学堂学生何风华的请求，饬督署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翌年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更在天津办起了简字学堂。此外，名儒严修、吴汝纶等皆热心提倡，于是官话字母不胫而走，习者越来越多。

随着官话字母的流行，王小航正在为推行官话字母而尽力时，他的处境却日趋危险。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开始他尚不以为意，后他的朋友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被捕，忽以戊戌余党杖毙狱中，王才感到大难临头。但别无良策，他只好于1904年春向提督衙门投案自首，

幸而得到那桐和庆亲王奕劻的帮助，免于一死，但仍定为永久监禁。不久，奕劻为缓和舆论，建议慈禧太后宽赦党人，清廷特诏除孙文和康、梁外，皆赦。王获赦出狱，并得开复原衔，但他不愿做官，继续搞他的拼音字母。

1905年，王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该社所刊行的拼音官话报销路很广，又印有伦理、史地和自然科学等拼音官话书，发行多达六万部以上。一时间官话字母颇为风行，除河北外，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均令在省城设立简字学堂；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亦都有人学习和推广，迅速流传至十三省区，识者不下数万人。1907年劳乃宣在王氏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而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也可以通行了。但是当时学部诸要人多反对以北京音为官话，在在掣肘。1910年摄政王载沣竟借口恐汉文废绝，严禁官话字母传习，并将官话书报社封闭，王也被迫避往江苏。

辛亥革命后，王小航寓南京水明楼，曾撰《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一文，继续致力白话教育之推广和普及。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小航被选为副会长。会上，王与正会长吴稚晖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两派。吴强调汉字音读，王重视造新字；吴主张将十三浊音加入字母，王则极力反对，双方争辩相持不下。王联合北方及川、滇、闽、粤代表提出每省一个表决权案，使他的主张得到大会通过。会议还议决了一套“注音字母”（后称注音符号），又审定了六千余字的读音。王小航对这一结果不完全满意。不久吴、王相继辞职，由王璞代理会务。

读音会期间，袁世凯曾有意晤见王小航，王因袁曾出卖光绪破坏变法而不愿为伍，以“闲人不便搅忙人”婉辞。此后数年，王闲住北京德胜门附近水东草堂。段祺瑞当政时，王一度入幕，但很快离去。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至草堂邀王做国语统一会领袖，王以年老力衰未允。

1922年直奉战争之前，王小航曾写信给徐世昌反对财、内两部征收房捐，并批评了徐世昌纵弟贪赃的行为。又致书劝王士珍不要组阁，谓“不能以恢复国会、容纳南方护法之意，不必登台，不能废止妖异之督军团制，不必登台”[11]。不久，直奉之战结束，黎元洪复任总统。当时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王小航对黎抱有好感，也跟着凑热闹，作《屯田议》一文，主张“寓兵于农”，上书于黎[12]，还提出了十项具体办法，然而根本不可能实施。

1923年以后王小航从事著述，主要有《三体石经时代辨误》、《表章先正正论》和《读左随笔》、《读易随笔》等，均持古文经学家的立场。1925年曾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说纲》一文，主张维持儒家的“三纲”，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1927年又撰《方家园杂咏记事》，揭露了一些清廷内幕，较有价值。

王小航晚年仍持“教育救国”的主张，说“我国非教育内阁不能挽救”，又说他“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13]。但晚年思想更趋保守，1928年和1930年他先后写了致李石曾、阎锡山、梁漱溟书多篇，反对三民主义，并公开抨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王小航于1933年6月1日病故。其著作大部分收在《水东集》中。

---

(1) 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2) 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3) 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4) 王小航：《戊戌六月礼部代递奏稿》，《小航文存》甲，第1—6页。

(5) 黎锦熙：《王照传》，《国语周刊》第129期。

(6) 王小航：《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小航文存》丁，第72页。

(7) 黎锦熙：《王照传》，《国语周刊》第129期。

(8) 王小航：《摘录官话字母癸卯再版凡例十一条》，《小航文存》甲，第37页。

(9) 王小航：《大谬》，《小航文存》丙，第42页。

(10) 黎锦熙：《光宣语运史略》，《国语周刊》第130期。

(11) 王小航：《劝聘老勿上台书》，《小航文存》乙，第25页。

(12) 王小航：《屯田议》，《小航文存》乙，第7页。

(13) 王小航：《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小航文存》丁，第70、71页。

王晓籁

汪仁泽

王晓籁，名孝赉，别号得天，后改号晓来。1886年1月28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浙江嵊县。父亲王芷湘为县里首富。王少年时就读私塾，平时爱习武艺。1905年初次来沪，就读名师裴庆邦处，不久回嵊。

1907年，王晓籁在家乡参加反清组织光复会。时秋瑾谋组光复军，派周亚卫来嵊募集人员，王及青年数十人应征赴绍兴，中途闻秋瑾事败被捕，旋即折返。因惧案发受缉拿，遂携眷避沪从商[(1)]。初任岳父楼映斋所设浙江萧山通惠公、合义和两丝厂驻沪账房经理。1910年在沪与友人创办闸北商团，并开办闸北商场和闸北工程局。后又独资或合伙开设大来、天来、泰来、春来等缫丝厂数家。

1911年武昌起义，上海响应，王晓籁组织闸北商团参加攻占北火车站之役[(2)]，上海光复后受到都督府的嘉奖。其时王与陈其美、沈缦云、王一亭等人过往甚密。1913年“二次革命”时，上海组织讨袁军，王曾助饷支援。此后他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多方结交，事业得以迅速扩展，先后任上海商业银行、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和闸北商会会长（皆连选连任）等职。1925年并代表上海商界列席关税会议。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选派代表赴粤参观新政，沪总商会公推王晓籁等为代表。7月抵粤，与当时军政要人蒋介石、张群等人会晤，并参加了北伐军誓师大会。回沪后向总商会等团体作传达，盛赞广东革命政府廉洁奉公，北伐军纪律严明。此时上海为军阀孙传芳所控制，闻报指王为“宣传赤化”，悬重

赏通缉，王避居租界友人处。不久孙传芳军队节节败退，通缉令亦无形中取消[3]，而王的声誉却随之提高。此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依附孙传芳，王晓籁与虞洽卿等人另组上海商业联合会与之对抗。王任该会总务长，暗中曾筹济北伐军军饷。1927年春，北伐军攻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主力，商界亦组商人别动队配合。他曾策动闸北保卫团响应，参与解除在沪奉系军阀毕庶澄部的武装[4]。起义胜利后，上海筹组临时市政府，成立委员会，他被推为商界代表，任主席委员。3月29日，召开市民代表大会，举行委员就职典礼，在进行中突接蒋介石来函，命令临时政府“暂缓办公”，但在到会代表一致要求下即时成立临时政府，各委员仍宣誓就职。但随后各委员相继请求辞职，王晓籁也随之辞职[5]。4月初，沪上谣传工人将举行暴动，上海商界联合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人主张诉之蒋介石或白崇禧，以武力对付工人。王晓籁当即发言：“现在民气之盛，远非昔日，恐压力愈重，反抗力愈大，此事只能与工会磋商。”众皆赞同[6]。次日汪寿华应王之邀，代表总工会到商联会就劳资、工潮及外交等问题发表谈话，众表满意。王即席要求各业自行调剂劳资纠纷[7]。直至4月10日，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王在上海建设讨论会上，仍高声呼吁“农工商学军警政各界，无分轩轾一致联合”，反对武力镇压工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晓籁被指定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与虞洽卿等人摊派筹募“二五附税库券”。同时还兼任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全国卷烟税局局长等职。1929年5月，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成立，虞洽卿、王晓籁、秦润卿等七人为常务委员。翌年7月上海市商会改组成立，王任理事长，不久又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此后曾赴全国各地“考察商务”。

王晓籁平时乐于助人，广为人排难解纷。因此，沪上某些市民为求庇护，自称门生归依王的门下；越剧艺人多嵊县同乡，有人为避恶势力的胁迫，自愿认王为义父，王来者不拒，因此投拜者众多形成一

股势力，遂被称为“沪上闻人”[8]。他又在家乡嵊县斥资十五万元创办芷湘医院，回报桑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逆来顺受”的不抵抗政策。9月22日，上海各界八百余团体代表五千多人集会，议决电请国民政府下总动员令，驱逐日军，扩大反日会、组织义勇军，并通过成立上海抗日救国会。王晓籁不顾当局取缔“越轨行动”的威胁，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救国会委员[9]。会后又与集会群众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接着王又无视不准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的禁令，与友人共同发起组织抗日义勇军，并于11月1日在公共体育场参加全市抗日义勇军三千多人的大检阅和宣誓典礼[10]。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抗敌。日军的疯狂侵略，更激发了王晓籁的爱国抗敌热情，他积极支援抗日将士。1月29日，他以市商会主席的身份，以个人担保付款调集十辆大卡车，采购大量食品，连日派人代表上海商民送至前线慰劳浴血抗日战士。31日，他被上海地方维持会（即上海地方协会前身）推举为副会长，并兼任粮食委员会主席。2月5日，他亲自带领二百多名童子军（志愿抗日青年）到真如，将他们交给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参加对日作战[11]。20日，市商会又组织童子军团，成立担架队赴前线救护伤兵。沪战开始后，因国民政府未公开支援十九路军一兵一弹，3月3日市商会电责政府是“张强敌之焰，摧义士之气”[12]。在此前后的数月时间里，王晓籁奔波于宝山、真如、吴淞等地慰劳前线将士。在有损我国主权的《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市商会等团体集会表示反对，并进而成立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在这段时间里，王晓籁自称“只知有国而已，生死置之度外”，不久便“落得顶秃、鬓斑、眼花、身病，却尚能志坚胆雄，心直气壮”[13]。

王晓籁反对当时各军事实力派的混战，1932年5月，在地方维持会召开的一次反内战集会上，他当即声明：市商会可做废止内战发起者[14]，其后沪上知名人士通电各地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6月，市商会召开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提倡国货、反对设立上海自由市、反对鸦片公卖。此后王晓籁即致力于提倡国货运

动，认为“国货是国家之生命线，亦即我人自己的生命线”[15]。1933年3月，王晓籁等组织国货制品协会，任理事，并选送国货产品赴美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1934年11月，他发起创办的中华国货产销联合会开幕，三十家国货工厂联合临时商场也开始营业。1935年9月，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成立，王任执委，并发表通电和告市民书，使爱用国货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此时王晓籁任理事长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数年来共募得航空救国捐三千余万元[16]，支援了我国航空事业。1936年11月，王以上海东北难民救济协会主席的身份，携带大量慰问品，率领慰问团赴绥远慰问抗日将士。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22日上海成立全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推定王晓籁为执行委员，发表宣言号召市民以“自爱爱国、自救救国”的精神做永久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拉开序幕后，当晚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呼吁市民全力保卫上海[17]。此后他通过市商会组织安置难民、慰劳抗战将士、救护伤兵等工作。并经各团体讨论决定：连日汇集的慰劳品一律分批送至市商会，由该会逐日运至前线转交抗敌将士。10月，成立上海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推选王等为执委，通电全国组织相应执行机关。1938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伪势力猖獗，他自称在“明枪暗杀”中“险难言状”[18]。27日，化名黎柳堂离沪去香港，转赴汉口，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管红十字会救护队，往来于港、黔、渝、昆、蓉等地。1940年，任第二届国民参政员，兼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政治部主任。翌年，与虞洽卿在渝合组三民贸易公司，任经理；由虞斥资并亲自购买大批卡车往来滇缅公路上抢运物资。1943年，王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常委兼滇黔区副主任，驻滇黔一年半。次年，国民党筹组青年军，王晓籁在此前后命其及龄在学子辈十人入伍。

1945年，王晓籁在渝筹组开来兴业公司及中国人事保险公司，自任总经理。又连任第三、四届参政员，以及由南洋华侨集资的中南贸易协会理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飞抵上海，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先

后任中一信托公司、通易信托公司、江海银行、东南汽车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公司理事，上海市商会监事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等职。1946年曾去台湾考察，后又以商会代表名义，去美国考察两个月后回国。此时蒋介石发动内战，滥发纸币，导致通货恶性膨胀，民不聊生。“天虽亮而云雾未开”[19]，他对国民党政府已感到绝望，与民主进步人士的交往日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所认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王晓籁与刘鸿生父子同机抵粤。是年冬广州解放后，他搭沪粤线火车回到上海[20]。1950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欲自陈经历，周说：“当时你的行为我很了解，可不必再说，要紧的是谈谈今后。”[21] 此后他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表，列席各部召开的有关会议，对于交通运输、经营丝茶及对外贸易等方面提供咨询。9月中旬回沪后，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8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革”期间，王晓籁受到冲击，于1967年6月15日去世。1978年他的历史错案得到了平反。

---

(1) 《王晓籁回忆录》，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31—520号。

(2) 当时清政府上海道刘襄孙曾电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电文中有“闸北商团首先变”等语。

(3) 《王晓籁赴粤参加北伐誓师》，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27—45号。

(4) 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5)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6) 上海市档案馆编：《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224、226页。

(7) 上海市档案馆编：《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221、224、226页。

(8) 据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称："洪门在组方面只有横的关系，没有纵的系统，因为如此，所以比较涣散，在上海没有起什么作用。杨虎、王晓籁等五闻人也不过五个山头，但他们都是外行，根本不是洪门中人，不过借此名义结合而已。"

(9)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0)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1) 蒋光鼐、蔡廷锴、戴戡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一文中说："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如指挥部，随来二百多名童子军交十九路军指挥。他们在我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我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11页。

(12)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3) 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14)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5) 《王晓籁》，商报社编《现代实业家》，1935年版。

(16) 《王晓籁回忆片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31—615号。

(17)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8) 《王晓籁回忆录》，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31—520号。

(19) 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20) 《王晓籁回忆录》，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31—520号。

(21) 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王性尧

罗九和

王性尧，原名师伦，1905年1月5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浙江镇海。其祖辈为嵊泗列岛的渔民，后移居镇海。其父王栋臣是镇海恒丰山货行的“阿大先生”（即资方代理人）。

王性尧自幼聪慧好学，入塾开蒙，兼习珠算。九岁入本地时中小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去汉口亲戚家塾馆附读。他学习刻苦，两年后便达到了相当于高中的文化程度。

1921年，王性尧由亲戚介绍，到北京泉通银行当练习生，并进修英语。1924年到上海荧昌火柴公司当文书，他留心火柴生产，不久就熟悉火柴行情，人称“火柴状元”。不数年，他略有积蓄，由公司经理朱子谦介绍，投资于大华仪表厂，后被选为该厂董事。1930年，火柴生产过剩，外货又大量倾销，为应付这种状况，荧昌公司与鸿生、中华火柴厂三家于7月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王性尧升任公司总务科副主任。他为人信实可靠，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经常代表公司外出联系生产业务，在公司内外俱获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日货充斥我国市场，民族工业受到很大打击。为了打开国货销路，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邀集生产国货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方液仙、美亚织绸厂蔡声白等人定期举行“星五聚餐会”，研讨如何提倡和推销国货。王性尧作为大中华的代表，于1932年3月参加了聚餐会。同年8月，“星五聚餐会”商定成立正式团体“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张嘉璈任理事长，王被推选为理事之一。“产销协会”在上海开设国货介绍所，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开设了分所；次年2月，又在上海开办了中国国货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大国

货推销业务，“产销协会”于1934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国货公司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张嘉璈认为需要有一个得力的人员主持业务，遂向新式管理卓著成效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物色联办处主任。经与大中华经理刘鸿生协商，重金礼聘王性尧任国货联办处主任。

王性尧主持国货联办处后，首先制订了一份筹设各地国货公司的计划，将筹设计划编印成册分发各工厂，向社会做广泛宣传。他联络各国货工厂，接洽银行贷款，筹划在全国各地开设国货公司。国货联办处初创时，在经济、人事、业务上都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在王的擘划指导下，业务发展颇快，到1935年已有郑州、长沙、镇江、温州、济南、徐州、福州、重庆、广州、西安、昆明等国货公司十一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1935年3月，张嘉璈被排挤出中国银行，国货联办处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王性尧只得紧缩业务，等待时机。不久，吴鼎昌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在上海几个国货团体欢迎吴的一次宴会上，王性尧向吴陈述国货联办处在打开国货销路方面所起的作用和目前面临的困难，请求给予帮助，并面交了他草拟的发展国货公司的意见书。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正在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业部决定成立一个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简称联营公司），吴鼎昌于1936年10月通知王性尧参加共同筹办。王被聘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和联营公司筹备委员。联营公司筹备委员会在上海的办事处设于国货联办处。王性尧看到自己提出的意见书大部分被采纳，国货联办处又活跃了起来，一时兴高采烈，四处奔走。1937年4月，联营公司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声白为总经理，王性尧任副经理，国货联办处遂告结束。联营公司的总公司仍设在上海，于5月开幕，由王性尧主持业务。嗣后又在南京、武汉筹办国货公司，并计划对先前国货联办处所设的十一处国货公司投资改组，还打算组织“国货银团”。

几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大片国土先后沦丧，联营公司的发展计划受挫。王性尧于1937年11月离开上海去汉口，在武汉主持国货公司开幕后，即往重庆改组重庆国货公司，并与四川宝元通合作成立了成都中国国货公司，旋又往贵阳筹设国货公司。1938年9月，香港中国国货公司成立，同年桂林、广州、新加坡三处中国国货公司成立。联营总公司于1939年1月迁至重庆。王性尧往返于渝、沪之间，维持公司业务。

1940年底，由于国民党政府内的派系之争，王性尧和经济部（即原实业部）所属几个机构的负责人在重庆被拘禁了两天。释放后，王性尧便决心改组联营公司，脱离官府。经过王的努力，次年5月联营公司的官股全部退出，中国、交通、新华三家银行承接了这些股份，联营公司改为私商经营。8月，王因病到上海休养。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亦为日军所侵占，联营公司在沪办事机构受到威胁，王收起招牌，改用其他商号名称搞秘密运输，向内地输送布匹、日用百货等紧缺物资。日本侵略者想利用他的声望，几次派人拉他下水，他都设法拒绝。从此杜门谢客，在家写字、画画、学唱昆曲，并劝告朋友同事不要为日本人效力，保持了一个爱国工商业者应有的民族气节。不久，联营公司的活动为日方发觉，王的寓所被搜查，大弟被逮捕，他自己住进疗养院躲避。

抗战胜利后，联营总公司自重庆迁回上海，王性尧仍任公司协理。在美货泛滥于市场的情况下，国货生产和销售都受到冲击；加以通货恶性膨胀，市场行情不稳定，营业十分艰难。王性尧为了保住联营公司，从推进各地国货销售业务，转而从事运销业务，在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各地成立办事处，运销机制品及土产；同时又代理中国纺建公司，将棉纱、棉布运销香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联营公司获得了新的发展，王性尧任副经理，1951年任总经理。以后王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致力于上海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王并任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

会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常务委员等，被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1968年6月17日，王性尧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王性尧：《参加“提倡国货”工作二十二年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联营公司简史》（原联办处副主任陆乾惕口述），上海工商联档案室存。

王性尧“文革”期间所写“交待材料”三份。

访问原大中华火柴公司襄理戚福铭、原联办处职员施新元、原联营公司职员刘励杰及王性尧之女王逸秀等人的记录。

王亚南

林其泉

王亚南，原名际主，号渔村，笔名王真、碧辉。湖北黄冈人。生于1901年10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三）。父亲王凤庭是当地的破落地主，母亲早故。王亚南童年在乡里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在哥哥支持下到县城学堂读书，1916年毕业后到武昌读中学，1922年考进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王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秀；课余还到校外兼课任教，以贴补生活费用。

1927年初，王亚南大学毕业后，曾到武昌私立成城中学教了几个月的书，后由其同乡王仲友介绍，转到长沙，入北伐学生军教导团执教。是年国内政治形势剧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分共”，许多革命者被杀害，大革命失败了。这个现实给王亚南以很大的教育。他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问题。1928年初，王离开长沙回到武昌，谋职未果，遇到留法回国的夏康农，同赴上海找工作，也无结果。不久，王从上海转到杭州，借住在古庙大佛寺中，想写小说谋生。适遇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也在那里，正从事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两人一见如故，朝夕倾谈，商量合作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翻译，先着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于是两人同去上海，与神州国光社等出版单位订了译书契约。这是王亚南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开始。

1928年秋，王亚南东渡日本，得到在日本工业大学学习的同乡方达功的帮助，住在东京郊外一个僻静的小旅馆里。他一边学习日文和德文，一边同留在上海的郭大力合作翻译经济学著作。他们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书。他自己还单独翻译了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

史》以及《人类婚姻史》等。此外，他也写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南离开日本回到上海，以示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抗议。他在上海除了继续翻译和校订有关译著之外，开始从事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作并出版了《经济学史》（上册）。1933年，王在上海暨南大学执教。

这前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妥协退让，造成我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王亚南对国民党政权有了进一步认识。1933年11月，李济深和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王得知消息后，兴奋异常，放下写作，从上海赶到福州，担任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文化委员兼《人民日报》社长。王利用《人民日报》这个阵地，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并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不久，“闽变”失败，王被通缉。1934年初王逃亡香港，香港当局令他限期出境。

1934年夏，王亚南去德国。他在柏林学习德语，注意搜集西方经济学资料。其间他应上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之约，翻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如奈特的《欧洲经济史》等。因为当时希特勒执政，德国政治空气恶劣，生活费用昂贵，王住不下去，1935年秋离开德国经伦敦去日本，与在明治大学学习的李文泉结为夫妇。年底，同李文泉一起回国。在上海，王先后出版了《德国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等书。不久，他和郭大力应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之约，以1936年和1937年两年时间从事翻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工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卷出版于1867年至1894年，五四运动后不久已被部分介绍到中国，但十几年中只翻译了第一卷。王亚南同郭大力一起决心进行《资本论》三大卷全书的翻译工作。这期间，王除于1937年担任“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执行委员，参加一些抗日宣传

工作外，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翻译《资本论》工作方面。由于《资本论》中的一些名词概念在中文字典中查找不到，为要忠于原文又要让中国读者看懂，王亚南和郭大力根据德文原本，参考日文译本，也参考当时国内已翻译出版的第一卷部分，尽可能地加以通俗化，以方便中国读者阅读和研究。那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前后，生活条件很差，王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胃溃疡病，但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工作。郭大力则在翻译工作中承担了更多的章节。后来王常谦虚地说，在《资本论》翻译工作方面，他是郭的助手。

《资本论》中译本三大卷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引起各方面的瞩目。这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王亚南于1938年初带病经香港到武汉，参加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同各党派代表和民主爱国人士一道，参加抗日战争的民众发动工作。10月武汉沦陷，王从湖南经广西、贵州转到重庆，住在重庆乡下。那里生活艰苦，连报纸也看不到，王又患严重的胃病，以致无法工作。

由于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推行反共政策，许多抗日团体和进步书报被摧残和破坏，王亚南在上海出版的《战时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被查禁，他同郭大力合译出版的《资本论》从上海运到重庆时亦被扣留了几千部，连他的住处也受到搜查。王亚南十分愤怒，不愿再在重庆住下去。1940年9月，他应中山大学之聘，到粤北砰石镇，任经济学系主任，先后开设高等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还撰著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国经济原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总结以往这方面研究，开始形成了他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944年日本侵略军袭击粤北，中山大学西迁。王亚南未跟学校撤退，到赣南南康县郭大力的家乡，与郭同住一村。旋因日本侵略者侵袭赣州，王从江西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担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永安，他除出版《中国经济论丛》等书外，还撰写了一

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1946年集为《社会科学新论》出版）。其间，他于1945年春到迁设在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学系讲授经济学说史。

抗战胜利后，王亚南被聘为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从此，他专心在厦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撰写了一些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官僚的论著，如《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修订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他还曾应邀到台湾大学讲学一个月。在厦大，王亚南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进步力量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但同情和支持师生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而且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忌恨。王经常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有的信里还装了子弹，但是他泰然处之，并不惧怕和动摇。

在国民党政权总崩溃前夕，王亚南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劝说，于1949年1月乘飞机到香港，在中共地下组织所创办的达德学院教经济学，并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撰写社论。不久，达德学院被香港英国当局封闭，王亚南与郭大力一道，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到达北平，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到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1950年秋，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1957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春，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并于这年下半年至翌年初，以教育专家身份到缅甸协助缅甸教育改革委员会工作。1955年到1965年，王先后修订出版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以及《资本论研究》等论著，并组织领导《中国经济问题》、《学术论坛》等学术刊物，组织编写《〈资本论〉通俗讲座》等。1961年，王亚南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会议，承担了编写经济学史方面教材的任务，会后同上

海几位经济学教授编选出版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他还协同郭大力修订了《资本论》的中译本，并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说史》。从1954年起，王亚南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福建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

王亚南于1969年11月13日因癌症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王亚南：《我的出身、简历及社会关系》（手稿）。

王亚南：《论文、著作登记表》（手稿）。

厦门大学图书馆：《王亚南校长译著系年目录》。

王亚南部分著作、文章及学术报告记录。

《王亚南言行录》。

王亚樵

姚怀然

王亚樵，原名鼎，字擎宇，别字九光。安徽合肥人。1889年2月14日（清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出生于农民家庭。其父王荫堂，号厚斋，略通诗文，粗知脉理，在乡以种田为业，兼以行医。

王亚樵七岁入邻村私塾读书，十三岁攻经史，习书法，喜读武侠小说，并学练武功。1906年晚清末科考试，他去庐州书院参加府试未中，于是回到家乡设馆授业，一年后到附近众兴集的团防局当了司书。他与合肥青年学生许习庸、王庆廷、葛杰成、张梦九等人组织“正气学社”，因此结识了吴旸谷、柏烈武（文蔚）、常恒芳等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同盟会员孙万乘在合肥组织军政分府，因军费缺乏，准备没收李鸿章的义和、恒升典当及同泰钱庄等财产。其时，王亚樵以时局混乱，有机可乘，与李鸿章的侄孙李十一等人组织地方武装，胁迫李鸿章家的管事交出上述财产。管事报告军政分府，孙万乘即以反革命罪将李十一等人逮捕枪毙。王亚樵因去乡下办事，得以幸免。但军政分府追拿甚紧，王与好友邓子云逃往南京。

王亚樵到南京后不久，加入了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随后回到合肥四处宣传，发展党员。他得安徽都督柏文蔚之助，加之他自己的组织才能，不到一年竟发展党员七八万之众。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倪嗣冲督皖，宣布社会党为乱党，下令解散。王亚樵受到通缉，逃往上海。在沪他由柏文蔚的介绍结识李少川、关芸农等人，并经景梅九介绍而加入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

1919年，王光辉、谌小岑在上海组织湖南旅沪劳工总会，王亚樵

受到启发，也在上海组织安徽旅沪劳工总会。安徽历来旱涝灾害严重，特别是淮泛区的灾民流落到上海当工人者不下几万人。他们在异乡谋生，备受资本家及地痞流氓的欺压。王亚樵组织安徽劳工会，以维护在沪皖籍工人权益为号召，所以加入该会者多达万人。王以其过人的组织才能，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成为他立足上海的基础。由于他敢作敢为，且讲江湖义气，好打抱不平，颇具“受人之托，不惜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慨然拔刀相助”的豪侠性格。久之，在旅沪皖人中颇受尊重，凡有皖人为难之事，他都乐于帮助。他有什么事情，皖人也都愿为其效力。

当时上海滩递门生帖的风气甚盛，许多人为混口饭吃，便拜在王亚樵的名下为学生，王不分良莠一概收下，除供给食宿外，偶尔还给点零花钱，所以，投其门下的有数千人之众，王被人称为上海滩上的“小孟尝”。

王亚樵自己没有资产，为要养活这么多人，他常向大户“借”钱。如遇不肯“借”者，王就会给他制造许多麻烦。上海富翁不少，这些人为求安宁，不得不拿钱买安宁。而王与其他地痞流氓不同，有感恩图报思想，收了人家的钱，总要设法报答。渐渐地，那些大户皆愿解囊相助，王也因此有了名气。

1921年夏初，王亚樵率同乡席文翰、王竹如等人强行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同年底，又派王铁明、邓洪铭、郭恒昌、黄道隆等人组织“小斧头队”，遇有纠纷，便召集这些人持斧而来，或砍或杀，凶猛异常，被人视为亡命之徒，多趋避之，甚至连杜月笙亦吩咐部下要让他三分。王亚樵的“斧头党”遂名扬沪上。其后，“湖南劳工会”的谌小岑等人前往广州另谋政治出路，把工会转交给王亚樵，他一跃成为“上海劳工总会”的总头目。

1922年，王亚樵在皖人李少川家认识了来到上海的粤军第一师第

四团团长陈铭枢，很快结成莫逆之交。

其时，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同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激烈争斗。卢为除去直系的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樑，托王亚樵杀徐，许以重金酬谢。

王亚樵侦悉徐国樑于1923年11月10日下午在大世界游乐园对面的温泉浴室洗澡，即与同党郑益庵等怀枪伺候，待徐浴罢出来正要登车，王、郑出枪射击，弹中要害，徐于13日死亡。卢为酬王，除酬以重金外，并委王为浙江别动队司令。

1924年9月江浙齐、卢战争爆发后，王亚樵亦率部参加战斗。结果卢永祥战败，王的浙江别动队也作鸟兽散。他带领部分人员携带枪支弹药返回上海，准备重操旧业。后又随柏文蔚去河南投靠国民二军胡景翼，被胡委为河南混成旅旅长。不久，胡暴病身亡，王难以容身，又随柏文蔚南下广东，认识了蒋介石、胡汉民、居正等人。

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王亚樵也跟着蒋介石跑到了南京。因王有较大的社会势力，蒋也有借重之意。不料王受一些在野人士的策动，竟公开宣扬“民权高于党权”，反对独裁专制，被蒋视为“左倾”而弃之不用。王大失所望，乃转而利用“安徽旅京同乡会”，以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时陈调元再次主皖，强征烟苗捐，盘剥老百姓，任用私人，激起安徽人民的公愤。王和同乡会负责人打着“皖人治皖”的旗号，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撤换陈调元；并将助陈祸皖的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刺杀在南京寓所。

1929年，国民政府接收上海轮船招商局，以赵铁桥为招商局督办。原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十分不满，乃请王亚樵杀赵，答应事成之后将江安轮的用人权及营业收入归王所有。此时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赵铁桥用招商局的船替蒋介石运送兵员及给养。王恨赵助蒋为虐，乃允李之请，派党徒于1930年7月24日在招商局的大门口将赵击

毙。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蒋介石囚于汤山后，西南发起反蒋运动，王亚樵受策动，也参与其事，力图刺杀蒋党要人以挫其势。1931年7月23日，王侦知宋子文将乘夜车自南京来沪，即派刘刚、李凯、谢文达、孙凤鸣等人到上海北站守候，于23日晨八时许在宋所乘专车到站时进行狙击，宋侥幸免死，其秘书唐腴胪中弹殒命。宋案发生后，当局侦知为王所为，乃通令悬赏缉捕。上海警宪当局曾几次追踪王亚樵，终因王机警过人、行踪诡秘而脱险。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王亚樵基于民族义愤，积极投身抗战。他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有相当的号召力，在“一二八”事变当晚，即组成一支近万人的义勇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在幕后主持。王还组织数支敢死队，专门锄杀日军和汉奸。3月1日，王派敢死队员将炸弹从水下送到停泊在浦东的日驱逐舰和停泊在浦西黄浦滩一带的“出云”旗舰下。惜因弹药位置放得不对，两舰未被炸沉，但也受震不小，慌得日军连忙把舰艇驶离江岸，并在四周布下电网。4月29日，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天皇诞辰）庆祝大会，王亚樵策动流亡上海的韩国独立党人安昌浩、安昌杰、金天山、尹奉吉等人，将定时炸弹带进庆祝会场。结果，侵沪日军指挥官白川义则大将、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长川端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师团长植田、舰队司令野村、总领事村井、书记长友野等十一人被炸伤。

《淞沪停战协定》于5月签订后，王亚樵曾策动上海律师团责问交涉员郭泰祺，并召集部众锄杀日本侵略军士兵。9月，国联调查团来沪住华懋饭店，对外发表之谈话颇有偏袒日本之意。王乃派人去华懋饭店租下房间，准备伺机刺杀调查团团长李顿。事为王之老友李少川知悉，怕引起国际争端而对中国更加不利，力劝王不要莽撞行事，王方才罢手。但事为蒋介石所知晓，大为恼火，立饬军警特务限期捉拿，一时侦骑四出，到处追捕。王见难以安身，即化装离沪，避居香港。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王曾

由港赴闽，以安徽人民代表资格参加该政府。“闽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回到香港。王亚樵到香港后，参加了李济深、陈铭枢联合章伯钧、黄琪翔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以“抗日、反蒋、拥共”为宗旨。王亚樵分工负责策划刺杀蒋介石等人，乃召集部属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贺坡光等人计议，决定在南京组织通讯社作掩护，伺机行动。“晨光通讯社”成立，由华克之（化名胡云卿）任社长，张玉华、孙凤鸣、贺坡光等为记者。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怀枪进入中央党部礼堂。上午九时大会开幕式后，与会者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蒋介石见会场秩序不好，便到秘书长办公室找叶楚伧查问，没去参加合影。在记者群中的孙凤鸣见蒋不在，即将枪口转向第二目标汪精卫，于摄影完毕众人返身上楼进入会场之时，孙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连击三枪，弹弹命中。在场的张继将孙拦腰抱住，张学良上前将孙踢倒，汪的卫士又向孙连击两枪，孙当场负伤被擒，延至次日，不治身亡。

刺汪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悬赏重金通缉王亚樵，并要求港英当局协助逮王归案。王在香港无法存身，遂在李济深的协助下避往广西梧州。王的处境困难，经济拮据，全靠友人每月给点生活费，对其部属已不能再有接济。时王之旧友余立奎因刺汪案被捕，余有一妾住在香港，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诱骗收买后，带领特务至梧州寻找王亚樵。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被军统特务刺杀于梧州。

主要参考资料

宣济民：《我所知道的王亚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

余立奎：《王亚樵帮会暗杀集团的内幕》，《安徽文史资料选

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

郑青士：《回忆王亚樵》，《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

沈美娟：《“暗杀大王”王亚樵》，台北《传记文学》第332—335期。

关德辛：《杂忆王亚樵》，台北《传记文学》第330期。

王尧臣　王禹卿

朱复康

王尧臣（名尔忠）、王禹卿（名尔正）兄弟，江苏无锡人。王尧臣于1876年10月7日（清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王禹卿于1879年9月27日（清光绪五年八月十二日）生于无锡扬名乡的青祁村。其祖父王云亭，在苏州设肆经营南北货，后在吴县公署协助征收漕粮。父王梅森，在乡里设馆教授生徒。

王尧臣少时在其父所设村塾读过几年书，十六岁时先在无锡染房当学徒，1899年到上海在瑞丰衣庄当伙友，后升会计。1904年由友人介绍入顺全隆洋行，司账务。1907年在同乡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所设的华兴面粉厂任会计，曾先后调至华兴所设天津、营口、安东、大连、烟台、青岛等地分庄，主持面粉销售业务达七年之久。

王禹卿只读了五年书。于十四岁时搭信船到上海，在亲戚所设的胡亦来煤铁油麻店当学徒，十八岁升兼外账。1902年经人介绍入沈元来油麻店，店主令其招揽崇、沙各帮客商交易[(1)]。数月之后，王禹卿悉为罗致，店主既嘉其功，而又阴嫉其能，不久即借词辞退。王禹卿遂入恒来油麻店，被派赴烟台、天津、营口、乐亭等处进行兜销，其营业额辄胜于前任者数倍。

是年冬，王禹卿偶在烟台帮客商处，遇到同乡周某兜售无锡保兴面粉厂的“飞虎牌”面粉。他熟悉北地各帮交易情况，并知面粉为北方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销路定可打开，即去访见保兴驻沪经理荣宗敬，获得推销该厂各牌面粉的合同，不数月便销售数万包，荣氏于是知其干练。翌年，保兴改组为茂新，添置法国钢磨，并设苏北姜堰、黄桥、泰州等处办麦机构，遂挽王入茂新工作。荣宗敬先派王禹卿到

黄桥麦庄任会计兼司函牍，不久改派他推销积粉，未满一月存粉销售一空。10月，又派他赴烟台销粉，仅一月工夫存粉三万余包售尽。1904年2月王赴烟台，6月转营口与各帮驻营口客商联系，除推销茂新所产面粉外，兼销进口美粉，并营汇兑。时逢日俄战争爆发，粉销大畅，驻营口三个月，销粉二十余万包。荣氏兄弟[(2)]知其有经营才能，正式聘为茂新公司销粉主任。

1906年，王禹卿任茂新驻津分销处主任，兼裕大祥号天津分号经理。裕大祥是上海买办资本家张麟魁、荣瑞馨和茂新的荣宗敬等所设的字号，经营北方花、纱、布、粉、麸、杂粮等贸易，以及从事股票投机。1908年因张麟魁投机失败财务大受影响，裕大祥倒闭。茂新亦受连累，经王禹卿向欠款各庄联系，立据负责归还，方得勉强渡过难关。

王禹卿任推销面粉的几年中，深知面粉工厂前途大有可为，遂与浦文渭、浦文汀兄弟合议集股。因资金不足，又与荣氏兄弟合作，共集资本四万元（其中荣氏兄弟二万元，浦氏兄弟一万二千元，王禹卿八千元），订购美国粉机二百筒，日产一千二百包。1913年开工，定名为福新机器面粉厂，并挽其兄王尧臣为经理，这是王氏兄弟经营福新的开始。由于福新与茂新都是荣宗敬所主持，所以福新一开始就以“绿兵船牌”为商标。兵船粉早已畅销国内，因而福新货未出厂，已为客帮订购一空，尤其这时的麦价对粉厂极为有利，福新第一年盈利就达三万二千元，盈利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王禹卿看到福新已经得手，便与荣氏兄弟商议扩大经营，第二年即租办中兴面粉厂，并购地另建新厂。又恰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的面粉不但无力输出，而且要向国外采购。同时，处在战线以外的广大国际市场，由于参战各国暂时退出市场，货源短缺，我国面粉价格低廉，产量较多，自然成为各国的主要采购对象。此时，日商三井、三菱、英商祥茂等洋行纷纷向我国各面粉厂采购，运销欧洲，一时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上海面粉工业蓬勃发展，形成了

所谓黄金时代。从1913年至1920年5月前后，不过七年光景，福新系统从一个厂扩展到八个，分布在沪、汉两地。在全国各产麦区设置的麦庄和面粉销售批发处约二三十处。据1928年统计，福新八个厂拥有粉磨机二百八十台，资金六百一十万元，共有职工一千五百余人。平均每日用麦三万五千二百担，成粉七万零五百包，比初创时的产量增加约近六十倍，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总能力的四分之一强。至1937年中日战争前，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第一、三、七厂经理，王禹卿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兼福新七厂副经理。由于王氏兄弟与荣氏兄弟一起办厂，所以荣家所办的企业如申新纱厂等，王氏兄弟也大多参加了股份。

1919年欧美各国经营交易所之风甚炽，日商在上海也设有“取引所”[(3)]，经营粉麸期货买卖。王禹卿看到这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物交易所，对于厂商控制原料与产品价格都具有一定作用，于是怂恿荣宗敬联合同业，发起组织“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来更名为“上海面粉交易所”，并议定以福新系统的兵船粉为标准粉。这样，福新便能对国内的麦市和粉价基本上有所控制。继面粉交易所成立之后，1920年王禹卿即与荣宗敬等又创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经手买卖纱布、证券等业务。

王禹卿经营企业善于窥测市场动态，对掮客、跑街不惜多方笼络，所以市场消息比较灵通，在市场竞争上能取得优势。他深知经营面粉厂的关键首在麦源，每当新麦登场季节，便向金融界四处联系调集资金，抢先购买大量原麦储存，到入冬以后青黄不接时，他厂已经停工，而福新系统各厂仍能继续生产。至于销粉方面，他不惜用高佣金招揽掮客或跑街等中间商。当时同业常例每千包付给佣金二元九角二分，他为了吸引各帮客商，把佣金提高到每千包八元一角九分。但他见销路已经打开后，又把佣金率逐步降低。

为了使福新获得更多的利润，王禹卿又联合同业，协议改革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一些办法，如粉厂的副产品麸皮最初不过供饲养家畜之

用，都由居间人加佣转售，后来化学工业、食品工业逐渐发达，国外需要量日增，他就把居间商“加佣转售”这项权利由厂方收回。又如我国机制面粉向例每袋净重五十磅，而进口洋粉则每袋四十九磅，相沿由来已久。为了与洋粉竞争，在他的提议下取得同业同意，自1924年5月起，国产粉也一律改为每袋重四十九磅。

30年代初，王禹卿看到荣氏兄弟先后在无锡修建了梅园、小箕山等处园林风景，即效法荣氏所为，也在家乡建筑了一座“蠡园”。蠡园面临五里湖，点缀亭榭，风景优美，虽是私人园林，亦供公众游览。

1932年后，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加上东北沦陷、市场缩减，日粉倾销、国产面粉销路滞呆，福新营业大为衰退。后因国民政府借款购买大量美麦，福新系统取得巨额美麦加工代磨，连同茂新代磨，占进口美麦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于是转亏为盈。此时荣宗敬经营的申新系统各纱厂，则濒于岌岌可危之境。荣氏准备采取“以粉济纱”的办法来加以挽救，王禹卿坚决不允，且要荣宗敬允许福新系统另立总公司，以其本人任总经理，荣只好同意。申新在债权团的加紧逼迫下，荣宗敬不得已于1934年夏提出退职，由王禹卿出任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由于申新亏累太重，债务纷集，王禹卿也无法应付，不久也只得辞职。后由荣德生向申新提供全部有价证券，给予全力援助。经债权人同意，仍由荣宗敬复总经理职，但福新系统在上海各厂仍为王禹卿全权控制。

1932年，王尧臣在无锡设立赓裕布厂，最初资本十万元。抗战前共有布机三百三十五台，以后续有增添。1938年，王氏兄弟又集资在上海创办寅丰毛纺织染厂，颇具规模，由王尧臣的次子王云程主其事。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福新系统的第一、三、六诸厂皆在沦陷区，二、四、七、八厂处于“租界”内，“孤岛繁荣”期间颇有盈利。抗战胜利后，上海属四区面粉公会，由杜月笙主其事，王禹卿以粉业

巨子的地位，在公会中与吴礼门、杨管北号称“粉厂三巨头”。这时，福新联合茂新和国民政府粮食部，组织小麦联购处，垄断了苏、皖两地的部分麦源，又廉价购进日伪遗留下来的原麦物资，获得不少盈利。在这些联系工作中，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的活动发挥了作用，于是荣毅仁又担任了福新副总经理之职。原由王禹卿独权控制的福新系统，又逐渐重归荣家掌握之中。

解放前夕，王禹卿避往香港，1965年5月患心脏病卒于香港。王尧臣于1965年4月在上海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王氏三沙统谱》谱首，1936年王尔忠、王尔正续修稿本。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周年纪念册》，1929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上海市油粮公司档案资料。

王禹卿之媳张宜可访问谈话。

王尧臣之婿、前福新面粉公司经理曹启东访问谈话。

前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银账房荣得其访问谈话。

---

(1) 油麻店专营桐油、苎麻丝、船钉等造船和修理材料。崇、沙各帮客商，指崇明、常阴沙一带造船商人。

(2) 指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3) 日语“取引所”，即交易所。

王揖唐

萧栋梁

王揖唐，原名志洋，字慎吾，又字什公，后改名赓，字一堂，号揖唐，笔名逸塘，晚号今传是楼主人。安徽合肥人。1877年10月17日（清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生。1904年中甲辰科进士，嗣上书清廷请求选派出国学习军事，经北洋督练公所批准，于9月保送日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习军事，毕业后分配到金泽炮兵第九联队实习。后以不适应军旅生活，改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参加杨度等在东京组织的留日学生总会，并任皖省分会职员长。

1907年，王揖唐回国后，在清政府供职，历任兵部主事、东三省总督署军事参议、吉林陆军第一协统领、吉林督练处参议。

1909年，王揖唐随戴鸿慈赴俄国，任“赴俄答谢专使头等参赞”，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由俄授予宝星勋章。王在回国前，以两年时间，顺道访问欧美各国，考察军政、铁路、交通、运输事宜，回国后任吉林兵备处总办。

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徐世昌推介，王揖唐历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等职。其时，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民主共和思想广泛传播，人们思想言论顿获自由，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2年春，王先后加入“民社”、“共和促进会”、“统一党”三个政党；5月9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共和党”成立，王任干事；1913年4月，王揖唐由西藏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5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由黎元洪任理事长，王揖唐为理事，兼国会中进步党“宪法起草委员”，政治上依附袁世凯。1914年初，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废除民元制定之《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随即召开约法会议，王由安徽选出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参与袁记《中华民国约法》的制定，为袁世凯独裁专制铺平道路。约法会议解散后，王又于5月担任依新约法产生的参政院参政，竭力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曾在北京举办《国华报》，作为鼓吹策划帝制的喉舌。1915年8月免参政院参政职，改任吉林巡按使。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王于1916年4月23日继朱启钤任内务总长，至6月30日辞职，从此加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嗣后出国游历欧洲，在德、法等国考察陆军组织。

1917年春，王揖唐归国后再次投入皖系。11月，段祺瑞为反对孙中山而违法组织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王揖唐任议长，负责修改1912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为过渡到正式国会做准备。1918年2月，临时参议会公布《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员、众议员。同年3月8日，王受段祺瑞指使与徐树铮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史称“安福系”。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主任王揖唐，又设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相当各部总次长。凡有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议决之后，凡安福系议员必须在国会参、众两院一致主张。安福俱乐部外靠日本，内凭皖系，盗卖国权，大借外债，操纵国会，阻挠和议，祸国殃民。8月2日北京临时参议会闭会，新国会开幕，由安福系包办，选举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李盛铎为参议院议长。由于议员绝大多数为安福系成员，故称“安福国会”。9月，在安福系操纵下新国会选举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1919年8月议决宪法草案一百零一条。1919年王曾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参与南北议和谈判。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总统徐世昌于8月3日下午解散皖系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旋即明令通缉王揖唐，王被迫亡命日本，从事著述工作。

1924年春，王揖唐从日本秘密回国，抵达天津，即与段系联系，参与段系复起活动。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

发动北京政变，由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11月28日，段任命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执掌安徽军政大权。1925年2月，王列名“善后会议”议员，参加段祺瑞为对抗孙中山国民会议而召开的善后会议，与议长赵尔巽及各省军阀代表和政客一起，通过了《国民会议代表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等。1926年王纠集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对抗北伐。1928年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以王揖唐“劣迹昭著”，下令通缉。王即匿居天津日本租界从事佛教研究。在此前后，王以“逸塘”作笔名，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今传是楼诗话》达数年之久，后由《大公报》出版单行本。1931年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国难会议会员、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1934年一度游日，回国后出版《东游纪略》一卷，由天津《大公报》印行。1935年12月，任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后任天津汇业银行总理。1936年5月，任伪蒙古军政府实业署署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沦陷，王揖唐叛国投敌。12月14日，与王克敏等在北平组织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任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赈济部总长、内政部总长等伪职。1938年4月，担任“华北临时政府”、“华东维新政府”在北平组织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委员。1939年9月，与王克敏等联名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1940年1月，随王克敏等赴青岛，参与和汪精卫、梁鸿志的谈判，为组建汪记“国民政府”效力。3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王担任第一任考试院院长、兼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由原“北平临时政府”改称）委员；6月，继王克敏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旋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伪内务总署督办。1941年3月，配合日本占领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华北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屠杀爱国志士，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掠夺华北资源，供给日本扩大侵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表示要“完成华北的决战体制”，使华北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后方

兵站基地。1943年1月，王任伪最高国防会议议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促进委员会”委员，后为常委。

抗战胜利后，王揖唐于1946年夏因汉奸罪在北平被逮捕，1948年9月10日被枪决，年七十一岁。留下的著作除前已述者外，尚有《近边建置概略》（民初版）、《上海租界问题》三卷（1924年）、《世界最新之宪法》、《逸塘诗存》等；译作有《德皇威廉第二自传》及《新俄罗斯》（日本川山俊彦著）等。

主要参考资料

李元晖：《今传是楼主人年谱》（王揖唐年谱），载王揖唐《逸塘诗存》，1941年《大公报》版。

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田子渝、刘德军主编：《中国近代军阀史词典》，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

《人物》1984年第3期，第107—108页。

王一亭

汪仁泽

王一亭，名震，号白龙山人。1867年12月4日（清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九）出生在上海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原籍浙江吴兴，世代务农，父王馥棠从事商业，因避战乱迁居江苏南汇周浦镇。王一亭早年丧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十三岁时进李云书所设的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晚上在广方言馆学外语[(1)]。二十岁时，进李所设的天余号做跑街，后升为该号经理。天余号拥有若干沙船，经营海运业务，走南北洋航线。

王一亭早在十岁时承外祖母教读《孝经》，内有插图多幅，引起了他的兴趣，故从小喜爱绘画[(2)]。少年时拜画家徐小仓为师，进钱庄后仍利用早晚时间学画。因他勤勉颖慧，逐渐入门，并为店中同人所知。某次，钱庄经理命他绘画一幅，交裱画店裱装时，适被画家任伯年见到，大为赏识。探悉是王一亭所作，亲往找王，收他为徒。从此他常往任家作画，画艺有了很大提高[(3)]。

1898年，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派出商船来华参加长江航运，1900年在沪设立分社，经李云书推荐并作保，谙日语的王一亭被聘为分社买办。1907年，该会社与其他三家在华的日本航运公司合并，成立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清公司），续聘王一亭为日清公司买办。由于该公司资力雄厚，又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营业迅速发展，王分得佣金甚多。后因日清航线专走内河，而三菱所属邮船公司专走外洋，王一亭又与日商三菱洋行买办李志芳约定合作，相互补益，双方言明：日清公司的佣金王得六成、李得四成，三菱洋行的佣金李得六成、王得四成，如此，即可多一层保险。当时日商规定买办佣金外洋线是货运收入的百分之三，内河线是货运收入的百分之

五。王一亭每年的佣金收入可达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以后，王又兼任专走天津、大连、基隆等线的日本大阪邮船株式会社的买办和三井洋行在沪所设之上海制造绢丝社社长（买办）等职，收入益丰。数年后，他积资购得南市梓园作为住宅，园内饲养白鹤等各种鸟类，供作绘画写生之用。

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宣称“预备立宪”后，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王一亭被推为董事之一。不久上海城自治公所成立，李平书任总董，王一亭等人任董事，并组织了商团地方武装。1910年清政府立宪骗局逐步败露，王一亭转向反清阵营。是年冬与沪地绅商沈缦云、叶惠钧等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王任同盟会上海分会机关部财务科长，经管分会款项。1911年武昌起义后，上海同盟会员筹划响应。10月27日，李平书经王一亭等人介绍，与同盟会沪地负责人陈其美会面后，参与运动上海军警工作[(4)]。11月3日，上海起义，迅即占领闸北和上海城区，但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犹负隅顽抗，革命军在陈其美率领下进攻受阻；陈只身入内劝降被拘禁。时闸北已光复，清军声言将从宁、松两路反扑，“无论革党、商团，擒获者一律正法”，而制造局一时难以攻下，形势危急。次日，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商议于商团公会会所，李等犹豫不决，王一亭慷慨陈词，称：“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5)] 遂决议再攻制造局，经过激战终于攻克，陈其美得救出险。不久上海光复，成立军政府，众拥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任王一亭为交通部长，后改任商务部长。此时王任董事长、沈缦云任经理的信成银行，几成为政府银行，都督府担保其钞票的流通。王常出面邀集沪地绅商筹措军费，并曾经手向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五万元。

在此前后，王一亭将历年买办积聚的资金，大量投资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6)]，成为买办兼民族资本家。1904年投资大达轮船公司，任董事暨经理；1906年与沈缦云等创办信成银行和业成公司，后

者经营地产业务，王任经理；1909年、1910年与顾馨一等先后创办立大、申大两家面粉厂，均任董事长；1913年与朱子奎等集资二十五万元，改官办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为商办，王任董事长。此外，还投资湖州电灯公司，任董事长；投资上海内地电灯公司、华通保险公司、华兴火险公司、正大商业储蓄银行、上海义清地产公司、开明房产公司、沈阳地产公司等企业，任董事。由于他在商界的地位和声誉日渐提高，先后被推选为沪南商务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自治公所议董、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等职。

1913年3月，宋教仁在沪被刺，袁世凯为宋的丧葬拨款，以掩饰其指使杀宋的罪行，王一亭被公推负责建造宋墓。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上海组成讨袁军，居正任吴淞炮台司令，扼守要塞，监视长江海军的活动，王不断给予接济。王自辛亥革命以来，曾为革命军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后都无法收回。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王一亭、沈缦云、李平书等人。此令虽被租界当月扣压，并未执行，但王因此在政治上转入消沉，向张静江表示：“我家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今后不能再参加革命了。”[(7)] 从此他脱离了政治活动，并登报退出国民党，从南市避居英租界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深居简出，潜心绘画。

王一亭的居处离名画家吴昌硕家甚近，经常走访，切磋画艺，有时请吴为其画作诗题款，结为知友。王受吴的影响，画风也为之一变，由工笔细绘趋向阔笔写意，但仍保持写实的特色。他用笔酣畅雄健，气势磅礴，设色鲜艳。吴昌硕称他：“书法醇穆雄，酷类平原；画则山水花木，郁有奇气。”[(8)] 他还善于为人写照，聊聊数笔，神形兼备。旅游青岛，所作《海滨浴场图》、《印光和尚对众说法图》等，均系写实作品，别饶情趣。他还常与书画家浦作英、胡公寿、释虚谷、李梅盦等人交往，议论书画。日本对中国国画向颇崇尚，王一亭的作品也被日本画界认为具有“浑厚”的气势，受到广泛的欢迎，每

年选送精品去日本，并多次被邀东渡，举办画展。曾受日本天皇接见，声誉日增，作品也愈传愈广。抗日战争前每年销日作品约数万元，所得大都用于国内慈善事业。1923年日本大地震，他曾代表上海绅商租招商局轮船一艘，捐募满船救济物资，赠与日本灾民。此时他将日清公司的买办事务交其子代理，自己整天作画。当时向他学画的生徒有陆伯龙、邓怀基、许醉侯及其幼子王季眉等数十人。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日清公司首先受到影响，营业一落千丈。王一亭每天收到很多责难以至警告的信件，谴责他“为虎作伥”。对此他内心极为紧张，但又不愿放弃优厚的买办收入。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成立上海市临时政府，原拟任命王一亭为财政厅长，后因他的买办身份为人所反对而作罢[(9)]。不久蒋介石到沪，曾专程访王；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特邀他赴宁，授以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用以酬谢他对蒋在陈其美手下任职时的接济和“二次革命”期间蒋寓居梓园时所给予的款待。

王一亭因受其母亲的影响，信奉佛教。晚年由于其次子投机失败时受牵连，所任面粉交易所理事长一职被杜月笙所取代，住宅抵押后尚不足清偿债务，刺激甚大，精神空虚，信佛益笃，在家设佛阁，每日焚香礼拜，茹素持斋，十分虔诚。在此前后，他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与人共同举办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曾为华洋义赈会作流民图多幅，印发各地劝募赈款。在绘画方面，常作佛像和佛家经典故事。在佛教团体中，王先后担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佛学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等职[(10)]。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入淞沪。由于他的地位易被日方利用，蒋介石电召其离沪去香港。到港后本拟即赴内地，后因病滞留近一年。其间惊闻上海、苏南、浙北等地相继沦陷，他客居异地，遥

望故乡遍地烽火，竟失声大哭。其后病情日见沉重，1938年11月上旬从港搭船返沪，13日病故于上海梓园住所。

王一亭的遗作传世甚多，已刊印出版的有《白龙山人画集》一至四册、《廿四孝画册》、《王一亭选集》、《孔子哲学》及《王一亭题画诗选集》等多种。

---

(1) 《王季眉谈他父亲王一亭先生事略》，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127。

(2) 王贤：《吴兴王一亭先生行状》中引王一亭自述。

(3) 《王季眉谈他父亲王一亭先生事略》，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127。

(4) 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姚文枏：《李通敏先生行状》，1929年铅印本。

(5) 伍特公：《上海商团克复上海纪略》（1947年回忆，抄本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开沅：《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6)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统计，1895年—1913年王一亭投资于民族工业及航运业（不包括金融业）约九十三万元。

(7) 郑熊丞：《王一亭与同盟会、国民党的关系》，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155。

(8) 吴昌硕：《白龙山人小传》，1925年印本。

(9) 王晓籁：《关于王一亭点滴情况》，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96。

(10) ［日］桥川时雄编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版。

王以哲

张玉芬

王以哲，原名海山，字鼎芳。1896年1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

王以哲就读县立小学、中学后，1915年考入陆军预备学校，1917年进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学习，1920年秋毕业。后投东北军，为军士教导队排长，1923年12月升任连长，1925年初又升任第三步兵营营长。他在教导队期间，教授《简易测绘》，讲课通俗易懂，自做模型，著有《步兵操典详解》，为大家所喜读。

同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以教导队第四期的干部和学兵为基础，编成第二十七补充旅，王以哲任该旅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隶张学良部。1926年夏，张学良、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战于南口。吴俊陞、汤玉麟部配合张、韩由背后进攻冯军，先后占领多伦、沽源，直入张家口冯军大本营。但吴部王永清骑兵旅纪律不好，竟抢劫多伦喇嘛庙金佛等器具。为平息群众义愤，张学良、韩麟春率卫队前往张家口缴王旅的械，联合军团司令部上校卫队长姜化南被叛军打死。张学良决定由王以哲接替姜任卫队队长，将王引为心腹。

同年冬，张学良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在北京旃坛寺内成立讲武堂，招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入伍，责成王以哲负责招考和训练。1927年春，张学良将司令部卫队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晋升少将旅长。不久，山西的阎锡山改悬国民党旗，并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自9月起，晋、奉两军发生冲突。10月，奉军集中三万之众，围攻坚守涿州的晋军傅作义部。王以哲的卫队旅也调来参战。涿州仍

久攻不下，最后只好和平解决。翌年5月，张学良将卫队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王晋升为中将师长。这时，张学良将第十九师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自任监督，命王兼教育长，招考满十五岁的高小毕业生入队学习，然后输送到高等军事学校或出国深造，后来不少人成了有名的军官。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炸毙。7月，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秋，奉军陆续撤回东北，王以哲的第十九师由河北省开回沈阳，驻沈阳北郊北大营。经整编第十九师改为步兵第一旅，仍以王为中将旅长。年底东北易帜后，王以哲部第一旅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王以哲十分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军事指挥能力，在旅里成立了步兵研究班，对各团上尉以下的军官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轮流训练，又于各连抽调士兵成立军事队，隶属于步兵研究班指挥。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参谋处为各级军官制订了学习计划，学习情况列入年终考核项目。王尤其重视对官兵进行爱国教育，他亲自编定充满爱国激情的《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书写好装入镜框高悬于每座兵舍、讲堂、办公室。每当“总理纪念周”，他总要请一些社会名流学者来部队讲述国内外形势，以及俄、日对中国的侵略史等。王还在军队中实行军工制，1930年，全旅以营为单位，分别建立了一种工厂，营房外的空地被充分利用来种蔬菜，“移兵于工”、“移兵于农”。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东北军大部入关，助蒋介石打内战。张学良亦移驻北平，王以哲及其所部仍留驻北大营。日本趁东北后方空虚，不断制造事端，伺机侵略。王以哲预感到战争的严重危险，积极谋划对策，于1931年8月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会议，大家认为日本的军事进攻已若箭在弦，势难避免。会后，他携带有关材料赴北平面见张学良汇报，并请张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加强东北防卫力量，而张交给王的却是蒋介石“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1] 的一纸电令。

王以哲回沈后，为应付突然事变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性措施。他本着衅不自我开，做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决定一旦第七旅受到敌人的进攻就开炮迎击，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全军撤退。他又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要各连严加管束士兵不得随便外出，并组织全旅在9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夜，由北大营向东大营做转移演习。

1931年9月18日晚十时许，日本关东军悍然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事变发生时，王以哲正在三经路家中，当他接到旅参谋长赵镇藩的电话，得知日军已向我北大营进攻后，立即赶往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公署，要求反击，未被允许。第七旅的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实行自卫，并于19日凌晨三点多钟边打边退，突出日军重围，撤往东大营。王以哲回军途中受阻，直到这天下午才抵达旅部。他含愤整顿部队，布置撤退。日军派出大队骑兵、步兵跟踪追击，且配合有飞机侦察轰炸，意欲全歼这支有生力量。王部昼伏夜行，隐蔽前进，终于10月上旬安全绕过南满铁路，由新立屯乘火车到达锦州。旋又奉命开进关内，驻防于北平附近的南口、昌平一带。日人办的《满州日报》也不得不承认："王以哲旅的全体士兵，个个都怀着强烈的反日情绪，今已安然退至山海关矣，这是满洲治安的隐忧。"[2]

1932年8月，张学良就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王以哲被调任北平军分会军衡处中将处长兼一〇七师师长。在此前后，为了加强对战士、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王在所部办了《东望》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并常在该刊上题词或撰文，曾写道："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3] 表达了抗日救国、复土雪耻的坚强决心。此外，他还积极支持由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复东会的工作，使该会成了联系东北军和东北人的纽带。

1933年初，日军袭击山海关，不久又向热河进攻。王以哲奉命率

军出古北口，在滦东地区与日军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同年三四月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行前将东北军整编为四个军，以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蒋介石乘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大肆拉拢、分化，曾召王以哲赴庐山面见，要王听其调遣，参加“剿共”。而王以哲忠于张学良，不被收买，让蒋直接和张商量。蒋加倍赠送王程仪五万元，王用此款为全体官兵购置了学习用品、军衣和补助困难军属，自己则分文不留。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2月被任命为豫鄂皖“剿总”副司令，东北军陆续南下。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由河北调往大别山地区，参加“剿共”内战。在六十七军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给王以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剿共”持消极态度。1935年夏，蒋介石又驱使东北军开赴西北，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攻，王部奉命进驻洛川、富县、延安等地。王以哲等不但不能打回老家去，反而离故土越来越远，他想起东北军的处境，内心十分苦闷，常常唏嘘叹息不已。

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东北军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有近三个师的兵力被歼灭，两名师长、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员不予补充，反而乘机取消有关师的番号，减发军饷，对死者不加抚恤。张学良经过深刻反省，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迫切地希望和红军联合抗日。在杜重远、高崇民等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的影响下，王以哲坚决拥护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并受张嘱托积极寻找机会打通与红军联系的渠道。

1936年1月初，已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变立场的原王以哲部团长高福源带着重要使命回到东北军驻地。高在洛川先后见到了王以哲和张学良，进行密谈，加速了东北军与红军秘密而频繁的交往。同年2月下旬，应张学良之邀，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等为正式代表到洛川，先与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以及恢复交通和通商等项口头协议。后又于3月4日会晤张学良，进一步确认了局部停战协定。按照事前的约定，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作为全权代

表和张学良再次会谈于延安，从晚八时至次日晨四时，双方在诚恳的竟夜长谈中，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相互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一系列协定。王以哲参加了各次谈判的全过程，对会谈的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的密切配合，红军与东北军双方电台建立了直接通讯，他对谈判的细节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对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代表尽了招待和保护之责。王还两次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物资，并收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及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送给红军。王以哲根据协议，将二千五百支七九步枪、六万粒子弹运交红军；派人护送钱之光赴西安采购石印机、无线电器材和烈性炸药等；指定专人负责为红军输送物资，红军的车辆可挂王以哲军用车的牌子往返于西安、延安之间，以通向苏区。他又在西安设两个秘密联络点，为叶剑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提供方便条件。还护送过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等。

同年6月，为培养骨干做好抗日的准备，东北军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并联合西北军，在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王以哲任该团教育长。在开学典礼上，王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励学生团结御侮，奋起救国。该训练团对普及联共抗日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中也有王的一份功劳。“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王又著文慨叹：“我们何时能重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于水火之中？”表示：“唯有我们锋利的铁才可致敌人的死命！”“唯有我们热烈的血才可将我们的耻辱洗清！”[(4)] 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

蒋介石不顾日本侵略扩大、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继续反共内战，于同年10月调胡宗南部十余万人至陕甘边界，“围剿”红二、四方面军，同时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到西线配合胡宗南的行动，以阻挠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王按照联共抗日的既定方针，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经常“函电交驰”，“将自己所部及胡宗

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通报彭，并按彭要求想尽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5]，使红军赢得了有利的时机，为红军击溃胡宗南军队作出了贡献。

王以哲完全拥护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的西安事变，当日在八项救国主张通电上签名。14日，又出任张、杨组织的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对日作战。

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促成下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然而蒋却背信弃义，不仅扣留了张学良，还调兵遣将组织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包括王以哲在内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八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南京发出了措词强硬的通电。为了遏止蒋的军事压迫，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周恩来副主席与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共商，组成三方面联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布防西线，担负钳制、监视胡宗南、关麟徵等数路蒋军的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当时事态，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东北军中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力主与南京政府决一死战，救回张学良；而以王以哲为代表的大多数老一代高级将领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对逼蒋抗日、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因而事变发生后的一系列问题也应力争和平解决。为了确定“和”与“战”问题，根据王以哲的提议，1937年1月30日晚，在他家中召开了有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周恩来副主席、东北军的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位军长、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参加的“三位一体”的最高会议。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也派代表旁听会议。会上王以哲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王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三方面意见取得一致。三方最高会议的决定没有被少壮派军官接受。他们不听从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多次劝说，于2月1日晚秘密举行会议，拟定了枪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2月2日晨，少壮派军官派遣武装卫士闯进王以哲住宅，将王枪杀在病床上。

王以哲作为“东北军与我党接触最早的高级将领”[6]，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1936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王以哲，称赞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抗日救亡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肯定他们“首先提倡与实行”[7]联共抗日政策的贡献。王被害后，周恩来副主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穿过重重岗哨，第一个来到王以哲家中吊唁。2月4日，中共中央向王以哲家属致唁电说：“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8]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王以哲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所起的特殊重要的作用。

---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58页。

(2) 程敏、顾龙生：《王以哲将军》，《人物》1980年第4期，第159—160页。

(3) 程敏、顾龙生：《王以哲将军》，《人物》1980年第4期，第159—160页。

(4) 程敏、顾龙生：《王以哲将军》，《人物》1980年第4期，第159—160页。

(5) 王秦：《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人民日报》1986年4月27日。

(6) 罗瑞卿等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1页。

(7) 王秦：《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人民日报》1986年4月27日。

(8) 王秦：《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人民日报》1986年4月27日。

王荫泰

朱佩禧

王荫泰，字孟群。祖籍浙江绍兴。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于山西临汾。父亲王式通（字书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京师大学堂提调兼办学务处，以文辞名当世。民国初年，王式通担任司法部次长，因总长王宠惠未就职，代理部务，兼任约法会议秘书长、政治会议秘书长、总统府法制秘书、内史，起草《约法》，成为民国初年的法学名家。王荫泰十五岁时赴日留学，就读第一高等学校。1906年毕业，赴德国留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习法律。在留德期间，曾替其父王式通就法律问题向柏林大学的教授请教，并助其父制定清末和民初的一些法律条文。1912年，王荫泰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学科毕业。

1913年，王荫泰回国后，在北京政府中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研究法制和外蒙问题。后到奉系杨宇霆部任职。1917年，以特派使节身份赴日本，1919年—1920年兼库伦宣抚总务处处长。1921年起任张作霖顾问，在外交事务方面得到了重用。1926年6月22日，颜惠庆辞总理兼外长职，内阁会议通过以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及兼外长，田应璜为内务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王荫泰为外交部次长等[(1)]。直到1926年7月，王荫泰才从天津赴北京就任，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外交部次长。因其时北洋政府与苏俄关系改善，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派加拉罕为驻华大使，这是外国向中国派驻的第一位大使。而按当时各国驻京公使团的惯例，公使团的首领应由驻华大使担任。这引起仇视苏俄革命的西方国家的不满。王荫泰上任不久，就中俄关系对英国记者系统地发表看法。他一面认为中俄关系应该保持和睦，但也指责“至中国一般人之心理，因中俄条约曾经规定，两国间均不得有侵犯干涉之行为，俄国对于此条，似未能积极履行，颇引为

憾事。故现在所当努力者，即如何可以免除使中国人民有此印象”。第二，他认为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在清华学校演讲涉及帝国主义侵略一事，“应研究不干涉原则之意义。……中俄两国现均在改造之时期，必须各谋适合于国情者为准绳，设对方参加意见启干涉之机，则必致引起种种误会也”。第三，对《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苏俄对中国之宣传和影响程度，王荫泰认为：“俄国革命时，中国改造已毕，故政治家及人民对于俄国改革情形均极为注意，即全世界之目光亦莫不注视于实行社会主义之苏俄。……于外国学说输入俄国之源流，亦颇为注意，此不独余个人为然，国内人士之注意于此者，正复不少，但研究学说纯是另一件事。若竟指此为苏俄主义已在中国得到若何势力，则不免误会。”[(2)] 10月1日，王荫泰担任条约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

10月2日，法国公使就中国政府事前未通知法国而公布道胜银行清理办法，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法国公使认为，该银行是法国政府所发起，是纯粹的法国银行。而中国政府认为根据道胜银行与1920年交通部之协定，该行是俄国银行，因为俄国革命后，道胜银行收归国有，开始整理银行的债权债务，并将存于该行的关余和盐余移交政府指定的银行。针对法国的抗议，王荫泰作出回应，道胜银行是中俄合股公司，法国不能过问[(3)]。

从1926年开始，中国和法国、日本、比利时等西方列强的条约依次到期，需要修约，并因为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协议，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1925年10月，关税会议开幕，委员有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蔡廷幹、潘复、王荫泰、夏仁虎七人，到1926年12月，历时一年有余，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所拨耗费会议经费一百三十万元至11月已经用完，至此关税会议停顿。1926年夏，蔡廷幹邀请西方各国代表非正式会谈一次，但各国意见冷淡，终究没有结果[(4)]。1927年，王荫泰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担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兼全权代表期间，希望重新与西方列强订立税率、整理国债。可

是，当时张作霖的北京政府面临蒋介石的北伐运动，“皆以军务方殷，尚未暇及时筹备”，列强也无意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路途仍不平坦。

1928年2月，王荫泰调任司法总长。但其时北伐军进展顺利，奉系安国军政府行将崩溃，王荫泰遂辞去职务[(5)]。1929年南下上海，开业当律师，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律师之一。当时王荫泰的事务所在江西路金城银行内，律师业务繁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失陷，王克敏等受日本人指使组织伪临时政府，王荫泰闻讯北上。1937年12月14日，伪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荫泰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成为汉奸，是当时临时政府的实权人物之一。有人用状元、榜眼、探花来比拟“华北”的汉奸三大王，状元王克敏，榜眼王揖唐，探花王荫泰。1938年4月，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1939年兼任伪华北合作事业总社理事长。1940年3月，汪精卫等组织伪国民政府，华北伪临时政府改成华北政务委员会，实际上仍是独立的政府机构。王荫泰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担任伪实业总署督办后，曾设立劳工局，督促伪劳工协会，强征华工，供敌用作运输军用物品或其他役夫。

1943年3月20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京外交大楼举行华北各省、市长会议，王荫泰以实业总署督办与会，并报告经济政策。他提出华北粮食对策，说明输入物资、安定物价、圆滑配给等的办法；要求日本应交还专管租界及撤销之外法权；并就消灭“共匪”、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甄用人才及强化地方自卫等重要问题提出意见[(6)]。

4月10日，王荫泰参加伪南京政府的“国府还都三周年纪念庆典”，他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参加国府还都三周年纪念后之感想》[(7)]。15日，与华中方面代表周佛海等就调整华北经济、华中粮食输往华北以及华北煤炭输往华中等物资交流进行了协商[(8)]。王荫泰向

记者招待团说明三个问题：第一，针对华北灾荒，力谋从满洲、蒙疆方面输入粮食，从华中方面输入面粉，如果各方能运入大批粮食到华北，华北供应将圆滑，价格也将安定；第二，战时状态下，必须实行统制，今后需要民众多加协助，强化和扩充统制工作；第三，国府近已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华北应设立统制交易之分机关。王荫泰命令成立商统会分机关，委托商人收买，最后交给粮食管理局方面实行配给[9]。

6月13日，王荫泰代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前往伪满洲国视察经济政策实况，受到了伪满洲国外交大臣李绍庚、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等的欢迎。15日上午王荫泰进宫谒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退出宫后，访问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张景惠，双方进行了恳谈。正午到关东军司令部，访问梅津美治郎[10]。

6月28日，王荫泰出席在南京举行的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对记者发表感想[11]。后去上海，与全国商统会洽商南北物资交流问题。另外，华北灾情严重，为了消解粮食恐慌，王荫泰提出，分治标和治本两办法进行，治本是增产，本季麦作收成预料较去年要丰产；治标是对粮食等物资进行统制，生产配给[12]。

1943年11月，伪实业总署奉令改为伪农务总署，王荫泰兼任该总署督办暨伪华北政委会总务厅长官、伪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常委。1944年5月，兼任华北食粮公社理事长。在华北合办之华北食粮公社，借词配给都市民食，命令各省、市、道、县搜括农村米、面、杂粮，而以大量食粮供给日军。他设立伪财务委员会，征收战时利得税，增发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供日军金钱，扰乱金融。他派程希贤任伪华北禁烟总局局长，供卖鸦片，毒害民族。同时推荐亲信曾彝进在日本开发公司下的伪华北石炭贩卖公司任董事长，统制民众用煤，节余大量煤炭，每年用船运往日本，约四百余万吨[13]。在日人举行的献铜运动中，他将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里的铜器献给日本[14]。1945年2月，王荫泰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新民会会

长。1945年3月8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五次会议通过王荫泰担任该“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抗战期间，王荫泰曾索回了日本黄金五吨、拒绝故宫收藏军火，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维持地方治安以协助接收人员。他在日本投降后，曾赶印一册《王孟群先生言论集》，罗列一切可资附会的言论，以逃避战后的惩罚。1945年12月7日，王荫泰因汉奸罪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后和北平其他汉奸一起关押在汪时璟的别墅[15]。1945年12月10日，他在《自白书》中写道：“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怨天，不忧人，自负其责可耳。”因为他在伪政府任职的七年时间内，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公署督办、中日实业公司总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华北巨奸”之一[16]。1946年5月28日，王荫泰等十四人从北平押运南京，其间有记者问他感想时，他答道：“没有话讲，我的一切，华北人民都会知道的，相信政府的裁决也会公平的。”[17] 1947年，王荫泰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1962年12月15日病亡于上海市监狱。

主要参考资料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调查部第六课编：《新国民政府名人鉴》，昭和十五年六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REEL No．調—0024-110。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 《（北京）颜阁改组发表》，《申报》1926年6月23日。

(2) 《王荫泰谈中俄外交关系》，《申报》1926年9月11日。

(3) 《法国公使访外交次长王荫泰》，《申报》1926年10月2日。

(4) 《关税会议自行结束》，《申报》1926年12月16日。

(5) 《北方外交困难之一斑：王荫泰向张作霖辞职》，《申报》1928年3月6日。

(6) 《华北政委会召开省市长官会议》，《申报》1943年3月21日。

(7) 《王荫泰在京广播》，《申报》1943年4月11日。

(8) 《王荫泰谈华北食粮问题》，《申报》1943年4月16日。

(9) 《王荫泰谈华北食粮问题》，《申报》1943年4月16日。

(10) 《王荫泰昨赴满》，《申报》1943年6月14、15、16日。

(11) 《出席全经会议华北代表王荫泰等发表感想》，《申报》1943年6月28日。

(12) 《华北缜密计划开发重要资源——王荫泰氏答记者问》，《申报》1943年11月21日。

(13)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0页。

(14)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第970页。

(15) 《平津省首次搜捕汉奸，王荫泰等240名入网》，《申报》1945年12月7日。

(16) 《北平巨奸空运解抵京，王、江两逆在机场对谈》谓："历任伪组织机关首长，搜刮民食，发行伪币，包庇赌场，资敌军械和原料，罪大恶极，列为北平字汉奸第一号。"见《申报》1946年5月29日。

(17)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今晨解京审理》，《申报》1946年5月27日；《北平巨奸空运解抵京，王、江两逆在机场对谈》，《申报》1946年5月29日。

王永江

武育文

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生于1872年2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九）[1]，奉天金州（今辽宁金县）人，祖籍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他的祖父王作霖逃荒过海，定居金州，以农为业；父王克谦，少时曾在金州双兴货栈当学徒，后升任账房。

王永江童年拜宿儒李某为师。清末政治腐败，李怀才不遇，“愤中国国势陵夷不振，外交着着失败也。每读剑南集中从军感事诸作，常慷慨悲歌，倾酒狂醉”[2]。王永江受其师影响，也“钦慕放翁之为人，而酷喜其诗集”[3]。

王永江二十一岁时为廪生[4]。其时，为了谋生，他在旅顺口开设“采真堂”中药店。1904年日俄开衅，俄国战败，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旅大地区，日本商人竞相到旅大地区投资经商。王永江的中药店受到日商西药店排挤，营业萧条，不久倒闭，他回到金州。时逢日本人创办“南金书院”，延请他为汉文教员。任教期间，他洞悉日本人在华实行奴化教育的卑劣用心，不满而辞职。此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租界地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颇为留意考察，尤其注意村屯制度和警察制度的实施情形。

1907年，辽阳地方团总袁金铠写信叫王永江调查日本租界地实行警察行政的情况，王将调查所得复信详述，袁深为满意，便邀他去辽阳办警务学堂，这是王永江踏上仕途之始。他参照日本警察制度，结合当地社会情况，编写教材、章程等若干种，培训了一批警察人员。由于他办警务成效显著，受到东三省总督的奖叙，被誉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

1910年，王永江任辽阳警务所长。这时东三省鼠疫蔓延，王因明了医学，防疫有功，经辽阳知州史纪常保荐为候补知县，1911年改任南路巡防营管带。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他进省，入督府民政司民政科，参与镇压铁岭县革命党人起义[(5)]。

1912年，他署理东边兴凤道尹，“甫三月，即挂冠归里”[(6)]，经袁金铠相劝，才又出任辽阳、康平、牛庄、海城以及省城等地税捐局长等职。1915年，他任奉天省税务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及屯垦局长，以“干练”而知名。

1916年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之后，深知欲成霸业、必须“延揽人才”，王永江经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袁金铠的推荐，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高等顾问。同年11月被任命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又任奉天财政厅长、代理奉天省长等显职，成为张作霖手下“文治派”的首领。王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在奉省实行了若干措施，如整顿全省警政、招民垦荒、发展实业、整理税收等，为奉张的“霸业”竭尽心力。那时，张作霖感到原来绿林出身的军人难于约束，是统一奉天军政的障碍，决心整顿军纪。王永江任警务处长之后，立即改革警政，仿效日本警察制度，重新厘定警务规章，在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他严督部下按章办事，凡军民人等，如有违犯警章者，概依法惩处。其时，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部下纪律最坏，在省城胡作非为，常用军权侵害警权，不时发生军警摩擦。有一次汤的部下在省城西关平康里妓院闹事，不服从警察干涉，并殴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将闹事人员拘押起来。汤玉麟闻讯大怒，径向警务处要人，扬言要率兵包围警务处。王永江也不示弱，在警务处院内，架起一门小炮借以防卫。汤玉麟无奈，怒气冲冲地去找张作霖告状，要求撤销王永江警务处长职务。王永江也自动提出辞呈，等待张作霖裁决。张作霖为了长治久安而支持王永江惩处闹事官兵，并对汤玉麟等人严加申斥。汤玉麟颇觉难堪，后竟与张作霖闹翻，于1917年3月被免去旅长职务。

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初，金融紊乱，财政入不敷出，年亏空二三百

万元，并负外债一千余万元，极为窘困。张作霖为了巩固统治，扭转财政困难局面，1917年任命王永江为奉天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就任后，对奉天省财政紊乱状况做了调查，研究积弊的缘由，力图刷新。

王永江有多年当税捐局长的经验，深谙聚敛之道，他首先整顿官营企事业。按照兴利除弊的原则，对官营企事业或予维持，或停办，或改由民营以进行整顿。对省内的荒地实行开放，奖励开垦殖民。对省内各矿山的采掘，则实行官营。

其次是整顿税收，制定田赋征收成绩考查条例。按税捐局所征税区的耕地面积、商户多少和农工产品生产情况，定出切实应征税额，超过定额增收的税款，对有关人员除记功外并留出提成部分作为奖金；对达不到征收定额者，查明原因，确实由于自然灾害等情况，准予酌情减免，如属贪污中饱或不尽职责者，则按章惩罚[(7)]。他还于1918年提请省议会通过，发行省公债五百万元，年息六厘，从奉天省税捐收入溢出项下，每年拨出一百万元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此项公债实际发行额为三百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七元，并于1920年10月将本息全部偿还[(8)]。

经过一番整顿，到1920年3月，奉天省的财政状况已经好转，不仅偿还一千余万元地方外债和弥补了每年二三百万元的财政亏空，还有一千余万元的结余。对此，张作霖大喜过望，说："这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9)]

张作霖看到王永江理财有方，决定将奉天省长职务交给王担任。王永江执意不肯，经张作霖再三促请，才应允任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省长仍由张作霖兼任）。

王永江代省长后，首先是整顿吏治，对官吏实行甄别考核制度。贪赃枉法的，轻者撤职，重者依法惩处；奉公守法著有政绩的，予以

奖励、提拔重用。他还注意培训县知事，开办讲座，亲自讲授“县知事学”，内容有：保护商业，奖励工艺的发明创造，振兴实业，宣传教化，沟渠整理，严禁苛敛诛求，边境开垦与殖民，褒扬荣典，保存古迹和提倡优良的风俗道德，兴办义仓、学塾，清查盗源，禁止吸毒，讲求卫生，提倡特产等等[(10)]。

王永江很注重文化教育事业，认为“教育为人才之本”[(11)]，大力普及小学，发展中学，并创办东北大学，造就专门人才。他还创办实业、发展交通。如建立奉天纺纱厂，开采铁矿、煤矿，修筑奉海铁路等[(12)]。此外，他倡导讲究卫生，把讲卫生作为地方官保护公众福利的一项职责[(13)]。

在王永江代省长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所谓“仓廪足，治安宁”的景象。这时张作霖看到东三省的实权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奉省财富厚集，政治野心益炽。为了向关内伸张势力，不惜把人民的血汗用于扩军备战。1920年7月，张作霖趁直皖战争之机，率军入关，助直倒皖，把势力伸展到察哈尔与热河，并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权。王永江曾向张力谏说：“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我们修明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就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14)] 然而，张作霖热衷于问鼎中原，迷信强权政治，对诤言无动于衷。从此，王永江与张作霖开始发生政见分歧。

1921年底，奉系支持梁士诒组阁，直系军阀反对，直奉矛盾激化。1922年4月9日起奉军入关，4月28日直奉战争正式爆发，但不到一周，奉军战线便迅速瓦解。奉军战败后，缩回东北，张作霖在王永江等人的策划下，由东三省议会宣布东三省“自治”，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张作霖觉得没听王永江的话吃了亏，他安抚王永江说，这回你当省长，放手干。同年6月，王永江被任命为奉天省长。

张作霖经此次失败，以所谓“存励精图治之心，蓄卧薪尝胆之

志”，整军经武，准备对直再战。王永江任奉天省长期间，企图趁势进行某些改革。他认为欲使东北富强，必须注重文化建设，不参加内战。曾写信给杨宇霆说：“现在潮流所趋，日重文化，此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反足以遗害于国家而已。弟本明达，又系武官，当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他日使奉省为庄严灿烂之奉省，不当使奉省为焦头烂额之奉省，即大有造福于桑梓也。”[15] 王永江建议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经张作霖同意，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王永江兼任校长。

王永江主张东三省闭关自守，增强实力、充实财富、储备人才、改革军备，说这是不战而胜的万全之策。这时，张作霖则全力整顿奉军，设立陆军整理处，改革军事教育机构，重用军校出身的军事人才，扩充兵工厂，建立海军和空军，兴建葫芦岛军港和东塔飞机场等，为此每年耗费二三千万元。王永江认为，军事之繁费有增无已，将来后患无穷，劝张作霖“幡然改计，以兵足自卫为度，而将兵工厂缩小一半作生产事业，汰粮秣处之冗费，去骈枝之机关，裁冗滥之闲员，省财力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政”[16]。但张作霖不愿听这些意见，总想进兵关内，打败直系以雪战败之耻。

1924年10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时，王永江还是力劝张作霖武力不可恃，战事结束后速回东北，他说：“战事结束后，我们什么也不要，因为北京如同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东北地大物博，有发展前途。我们有这样的好基础，决不应放置不顾，而去夺那无肉可食的骨头。”[17]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张作霖背弃原先与冯玉祥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诺言，于1925年初挥师入关，迅速占据了直、鲁、苏、皖等省，到6月将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上海。张作霖的穷兵黩武行径，使关内人民深受涂炭，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使东北民不聊生。奉军各将领则争相扩编军队、抢夺地盘。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的穷兵黩武，于1925年11月22日在滦州起兵反奉。张作霖为挽救自己的统治，不惜勾结日本

出兵，才把反奉郭军击败。此时，奉天的危局虽然暂时渡过，但王永江所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却有增无已：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履行援奉反郭所许条件；而内部则是民生凋敝、财政困难和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王永江为此急得“左目失明，心脏漏血”[18]，“征敛能手”也束手无策。1926年2月19日，王永江请假回金州故里省亲，到家后以才弱事纷，留职无益，给张作霖写了辞呈，请开去本兼各职。他在辞呈中写道：“窃永江从将军治奉，将十年于兹矣。初意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端，逐渐发展，兼经营东蒙，以为利用厚生根本之图。……自民国六年，畀永江以财政重任，勉竭愚忱，不避劳怨，得以财政日裕，内外债渐次偿清，度支由是以不乏……乃又值时局不靖，战端屡开，知进而不知退，而卒因军事之牵动，致金融紊乱，且犹复牵动不已，则一切期望，将难达到，民生日蹙，复何以固根本而图发荣……夫时局如此，简练军实，自属必要，然备兵自卫，与逞兵争雄，则利害相反。……况中原兵交方始，民生凋敝之秋，独东北一隅，最得地利，本足以自强，无待外求，而不速图之。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将自投入荆棘之中，而纳人民于水火之内也。”[19] 王永江的信也表明张作霖穷兵黩武政策的破产。从此王永江退出政界，张作霖虽多次挽劝，王始终未归。晚年王从事著述，其诗作有《铁龛诗草》二集。王永江对《易经》、《管子》亦有研究，著有《读易偶得》、《易原窥余》、《阴符经注》等。王在医学方面也有所造诣，著有《医学辑要》、《痼疾蒙谈》等书。

王永江于1927年11月1日病逝于金州[20]。

---

(1) 《王公墓志铭》，［日］田岛富穗著《王永江》附录，满洲公论社1944年版，第231页。

(2) 《非好爵所能縻之王岷源近况》，《满洲报》1926年7月14日。

(3) 《非好爵所能縻之王岷源近况》，《满洲报》1926年7月14日。

(4) 王永江本人曾在《辛亥元旦吟》有中："昔年十五二十时，学书学剑未见奇。世上功名不解取，文场驰逐等游嬉。苟幸食饩二十一，公车三上翅三垂。归来无复寻章句，不慕良相慕良医。"又王永江的儿子王贤沣 在《王永江的一生概略》（载政协大连市金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王永江纪念文集》，大连出版社1993年版）一文中，有其父王永江"考取乙酉科优贡"之说，按乙酉科应为1885年，其时王永江仅虚岁十四岁，恐有误。今从王永江在诗中所说，二十一岁食饩为廪生。

(5) 王永江：《铁龛诗草》二集，1919年版，第12页。

(6) 王永江：《铁龛诗草》二集，1919年版，第11页。

(7) 王贤沣：《王永江的一生概略》。

(8)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34—35页。

(9)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34—35页。

(10)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95—105页。

(11)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234页。

(12)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234页。

(13)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95—105页。

(14) 王贤沣：《王永江的一生概略》。

(15) 王永江致杨宇霆的信（辽宁省档案馆藏），《王永江纪念文集》，第158—159页。

(16) 王贤沣：《王永江的一生概略》。

(17) 王贤沣：《王永江的一生概略》。

(18)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53—54页。

(19) 王永江致张作霖辞职书，［日］田岛富穗著：《王永江》，第53—54页。

(20) 《王公墓志铭》，［日］田岛富穗著：《王永江》附录，满洲公论社1944年版，第231页。

王用宾

萧栋梁

王用宾，字太蕤，山西猗氏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王三岁丧母，备历艰苦，十岁开始读书，记忆力强。其父王盈伯因家贫，弃儒经商，供儿学费。王用宾目睹甲午战争惨败，丧权辱国，痛感非推翻清廷无以图存。1900年庚子变后，更加致力于经世之学。1904年，山西考选留日学生，王入选东渡，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王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并介绍山西留日学生一百余人入盟。历任东京同盟会山西支部长和太原同盟会山西支部长，并与同志景梅九、刘翼若、景太昭等在东京创办《晋话报》，倡言反清，因言论激烈，被山西当局查禁。旋即回国，在太原创办《晋阳公报》，任总编辑，1907年11月创刊，作为宣传革命、联络同志的总机关，不久再赴日本。

1909年，日本向清政府要挟安奉铁道筑路权，留日学生为此开会，倡议抵制日货，推王用宾负总责。王的寓所因此遭日警搜查，行动受到监视，愤而返回国内，在天津起草《为安奉铁道告国人书》，呼吁抵制日货。在津、京各报未及登完，因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当局遂罚五报停刊，王被驱逐出京，回太原仍任太原《晋阳公报》总编辑。

1910年春，山西交、文两县因清军铲除鸦片枪杀民众百余人，王用宾撰文抨击山西巡抚与谘议局，并决定召开大会声讨，被巡抚丁宝铨下令禁止，并封闭报馆，逮捕记者。王再次避往日本，家产被官府查封，其父被捕入狱，至丁宝铨被劾离晋，方才获释。

辛亥夏，王用宾奉命自东京潜至北京，窥视国内虚实。武昌起义爆发，王自京潜赴石家庄，与同志温寿泉、常子发等密商在太原响

应。拟请陕西先动，引诱山西清军守河，再在太原发动。王按计划先入北京策动，温、常等入太原。10月22日西安宣布独立，晋抚派新军守河，新军获得弹药，即于10月29日起义，太原光复，举阎锡山为都督。阎遣人邀王返晋。因清军集中井陉，阻止山西新军前进，王即绕道河南返回河东，被推为河东兵马节度使，联络西安军队，光复河东，迫使兵备道余鎏投诚反正。王即与余商定官商合作，维持治安，组织河东绅商议事公所，招练蒲、解两地民团三千余人，并密结会党及管世英所统盐捕营，合组革命军。后因清军反扑，娘子关、太原相继失守，河东亦陷敌手。王遂日夜兼程至河津，收集晋军，联合秦军，再次光复河东，重组河东军政府于运城，王任兵马节度使兼民政长，并率数千革命军独力与数万清军苦战数月，终使袁世凯不敢全力对付南方。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用宾解除军民两职，前往太原被选为山西临时省议会议长。晋省议会乃分电各地，力促阎锡山回省复都督职。同年，同盟会山西支部改为国民党山西支部，阎任支部长，王任副支部长。1913年，王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提出的大借款案，声讨袁世凯帝制阴谋。后又南下参加护法运动，并随孙中山由广东赴上海。1920年粤军反攻胜利，孙中山回广东重组大元帅府，王先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总统府、大本营及国民党本部参议。后奉派为北方特派员，两次自粤北上，联络段祺瑞、张作霖同盟反直。1922年王任中国国民党山西支部筹备处长，曾以自己在天津的寓所作联络机关，联络国民党议员到上海集会，参与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活动。

1924年1月6日，王用宾被指派为国民党“一大”山西代表，出席1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改组国民党的“一大”会议。同年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王用宾为（北方）军事委员兼胡景翼部慰问使。北京政变后，王随胡景翼部国民二军到河南，任省长公署秘书长，代行省长职务。曾受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之托，先后招考北方各省学生一千四百余

人，送黄埔军校肄业。1925年孙中山、胡景翼相继逝世，国民军处境困难，至1926年春，国民二军从河南撤退，王用宾一度陷于开封，脱险后到杭州养病，目睹北伐军正向湖南、江西进军，直趋武汉，即策动夏超易帜，夏超败，王微服乘内河小轮赴上海。1928年夏，王任国民革命军南路军总参议。10月，任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旋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1930年第二届连任，兼任该院法制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王兼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次年，特任为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并担任第二届高等考试、第一、二两届司法官再试，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司法人员考试典试委员长、中央党务工作人员从政考试典试委员兼秘书长。

1934年王用宾调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致力于司法的党化，调训法官，清理积案，整顿司法收入，施行三级三审制。新设高等法院分院五十二所，增设各省地方法院二百所，县司法处九百余处，以加强南京政府的统治。1935年，王用宾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9月，调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41年冬，被推为前线将士慰劳团第一团团长，赴陕西、河南、湖北各省慰劳抗日将士，甚为劳累。1943年夏一度脑溢血，1944年2月心脏病加剧，于4月7日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王用宾于文字学造诣甚深，喜吟咏，有《半隐园诗草》四辑行世。

主要参考资料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载《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

王秀清总编：《运城地区古今名人传》，山西运城地区地方志办公室1985年，第223页。

《近代中国》1981年第25期。

王芸生

熊尚厚

王芸生，名德鹏，字芸生。1901年9月2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生，直隶（今河北）静海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亲在天津做炊事员。童年入蒙学馆读旧学，十三岁时因无钱继续学习，乃到天津一家木行当学徒。在学徒期间，他聪敏好学，除读些杂书外，还经常看报纸杂志，遂给报纸投稿。曾在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过短文，萌生了将来做报人的想法。此后他借钱去读商务印书馆办的英文函授学校，又报名参加木行的英文打字班。经过刻苦自学，他对文、史、哲、经均有一定知识，又能独立处理英文文牍事务。他还崇拜王船山之学，对颜（习斋）、李（恕谷）四行之学也颇喜欢，后来十分崇尚力行哲学。

王芸生青年时代富有爱国热忱，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接触了新文化，受到的影响使他“终生不可磨灭”。1925年五卅运动时，天津洋务华员工会成立，他担任宣传部长，主编工会刊物，鼓吹反帝反军阀，宣传爱国主义。不久，直隶军阀褚玉璞镇压爱国运动，他受到通缉和追捕，遂南下上海，与秦邦宪（博古）等办《亦是周刊》和《和平日报》。同年12月，原为李秋生办的《救国日报》复刊，他回到天津入该报任主编，不久脱离《救国日报》另起炉灶，将其在木行的积蓄做部分资本，另约友人入股，用原《新民意报》的设备与社址，创办了天津《民力报》。他在言论上仍站在反帝反军阀立场，同情南方革命政府。1926年3月，《救国日报》营业不佳，并入《民力报》共同经营。时直鲁联军在天津战胜了国民军，他怕受到直鲁联军的迫害再次逃到上海，经人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其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上海市党部遂陷于分裂状态，他站在左派一边，旋任国

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上海特别市党部内共产党员甚多，他受他们的影响，由秦邦宪（博古）、彭述之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的春节，王芸生回到天津，在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工作，并参加共青团的工作，同时每天替天津《华北新闻》写社论，继续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同年“四一二”政变后，他退出了共产党。

此后，王芸生决心“摒绝一切政治的镠　镐　”，重返新闻界，于1928年5月加入天津法商永兴洋行买办叶庸方主办的《商报》，先后任记者、总编辑。他每天写一篇社论，引人注目，充分显示出他的才华。因为多次评说《大公报》的社评论点，其锋利的文笔受到张季鸾的赏识，被《大公报》暗邀前去工作。不久，王与《商报》总经理王缕冰意见不合，遂登报声明辞职，1929年秋正式转入《大公报》工作。

王芸生初入《大公报》时，主编地方版，编辑要闻版，并研究田赋问题。由于他的思想敏锐，文字简洁明快，有时在张季鸾、胡政之口授下执笔成文，能将其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很快受张季鸾的器重。“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提议在报上辟专栏刊登日本侵华史料，以便唤醒国人救国，他被授命编纂《中日关系史资料》。为了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张季鸾改派他负责编《国闻周报》。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常去北平图书馆和北大、清华、燕京各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不足时还专程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查阅档案，并寻访曾与日本办过交涉的外交人士、名流，以及对日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为了查阅日文资料，他从师学习日文，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经过他的潜心研究，短短两年半，他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分辑册，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中日关系史的权威著作。从1932年1月起，每日在《大公报》发表一则中日关系史事，继由《国闻周报》连载。他因此而一举成名，被国民政府外交部聘为条约委员。

1935年《大公报》在上海增设分馆，9月王芸生被派到上海负责

社评写作。他撰述的社评热情洋溢，很有气魄，更加受到张季鸾的器重，继许伯萱担任编辑主任。王的言论受张季鸾的思想观点影响较大，除坚持《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外，和张季鸾的“深怀文章报国之志”一样，王芸生热忱希望国家站起来，挺身前进，不要继续睡在地上，任列强的欺凌。他深感“九一八”事变后失土受辱，整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为国家的前途着急，曾围绕中日关系、国民党的外交、日本与苏联、日本与美国等问题写过不少短评，宣传“从容赴死主义”，以图挽救国家的危亡。蒋介石曾邀他去讲学并面谈，使他一时对蒋寄予希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设立新闻检查所钳制抗日言论，王芸生不屈于日本的淫威，拒绝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11月14日，他在上海《大公报》撰写《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两篇社评后，《大公报》上海版即停刊。他在社论中写道：“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1938年初，他至武汉参加《大公报》武汉版（原天津《大公报》迁汉）的编辑工作。到了重庆后，张季鸾患肺病日重，又长期住在南岸，很少亲自撰写文章，重要社评多由王执笔、文笔犀利。1939年5月，日机轰炸重庆，市区十家大报馆被炸，暂时改出联合版，王任十报编辑部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后，王接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委员会主任委员，独掌《大公报》言论，其声誉更隆。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王芸生都十分尊重蒋介石。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敢于说自己的话而不盲从。1941年12月22日，他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强烈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修明政治，因此逐渐为蒋介石所不满。次年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邀他去美国，蒋听信其属下所云“王芸生不可靠”而不准，王得知后心里很不痛

快。1943年2月2日，王在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中，揭露河南的严重灾情，抨击重庆当局的腐化，蒋对此十分震怒。3月，王发起“爱恨悔运动”，宣传“爱恨悔”，被国民党指为替共产党做宣传，通知其不要再发表“爱恨悔”的文章。继后在翌年的夏季，王向蒋进言，希望把全力放在击败日本上，不要把力量用于消灭共产党，蒋又十分反感。抗战胜利时，他又向蒋进言，希望派员与苏联改善关系。《大公报》与国民党之间关系淡化，王芸生与蒋介石的关系若即若离。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沪馆成为总馆，王芸生于1946年4月到上海主持社评委员会工作。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情况下，他怀着民族主义思想，站在中间立场，既批评国民党，也批评共产党。1945年9月国共重庆谈判时，他向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当苏联从东北运走大批机器时，他执言表示反对，并对中苏共同使用旅大持异议。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四处抢掠、大发横财，他写社评批评，规劝国民党政府；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来华，他写社评主张由美、苏共同出面调解国共之争，如此等等。王的这些言论，既为共产党方面和民主进步人士所不满，更招来蒋介石的恼怒。

1947年春，王芸生参加赴日考察团回国后，撰文反对美国扶持日本，还表示支持各地反美扶日的学生运动，并对美国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在华以钦差大臣自居表示反感。在全国人民反内战的热潮中，他同情民主爱国人士和学生的民主运动，也同情被国民党军警拘捕的新闻记者，并进行营救，不附和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政策”。

王芸生虽是站在中间立场，但由于他的许多社评及表态触到国民党的痛处，蒋介石等人即对之大加攻击。1947年2月，因他发表社评反问“何必防闲学生运动”，蒋的幕僚长陈布雷就公开声言要与王在精神上绝交；《中央日报》更指名攻击他，指责《大公报》煽动学潮，

1948年7月，《中央日报》发表社评《王芸生之第三查》，公开扬言要发动“三查运动”检讨他；南京《救国日报》更骂王“为匪张目”，站在共产党一边。王芸生难以忍受，内心愤慨万分，对此不断进行反驳。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的宴会上他疾言厉色反唇相讥，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日趋恶化，使其由中间立场逐渐向人民方面接近。1948年冬，王芸生感到处境十分困难，又认为共产党不会容他，思想苦闷彷徨，遂去香港。1948年，他发表社评《和平无望》公开表示转变立场，向人民靠拢。翌年初，中共中央派李纯青邀请王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才感到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随即秘密经海路于3月18日至北平。

1949年5月，王芸生随解放军南下回到上海。6月17日，他主持《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后担任社长主持《大公报》。1953年1月《大公报》迁天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作为全国财经方面的报纸，他到天津工作。1956年10月《大公报》迁北京。1957年后，他不再过问报社事务，赋闲在家写些回忆《大公报》的文章。1963年，他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进行修订，并续写第八卷。时间从1920年至1931年，用大事记的体例完成。在1976年病重时还加紧工作，终于修订完毕。

王芸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当选为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至五届常委。他曾两次访问日本，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其著作除《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外，还有《芸生文存》、《日本半月》、《由统一到抗战》、《劫后的上海》、《台湾问题》和《台湾史话》等。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王芸生：《王芸生文存》第1集，天津大公报馆1935年版。

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61年版。

《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侧面观》，1947年《人物》杂志第2期，第31页。

王鹏：《王芸生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4页。

李秋生：《我所知道的王芸生》，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2期。

王云五

熊尚厚

王云五，原名之瑞，小名日祥，族派名鸿祯，后改字云五，号岫庐，笔名出岫、龙倦飞，晚年自署岫庐老人。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生于上海。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小店。王云五八岁时在家由长兄王日华（秀才）课读，两年后长兄病故，乃改入私塾就读。

王云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因其长兄早逝，父亲不愿他再走科举的道路，十四岁受父命去一家五金店当了学徒。王云五上进心强，不甘于就此辍学，白天在店里学生意，晚上进夜校学英语，同时还阅读一些自己喜爱的书。当他读了科学发明家《富兰克林传》一书后，更增添了自己苦读成才的信心，半年后即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十六岁那年，父亲又命他在一家洋行仓库当助理，再次被迫辍学。但他仍不甘心，半年后又入同文馆学习英语，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有图书馆，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亚丹、斯宾塞及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十八岁即开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学社社长，10月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骅）、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他继续任教历时四年。他曾一度想出国留学深造，就读于美国所办“万国函授学校”土木工程专科，又由于二哥的病逝而放弃。1909年，江宁提学使李瑞清开办留美预备学堂，他又兼任该校教务长。

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宸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受到孙中山的青睐。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大总统府秘书。此时他就改革教育问题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因而得以在教育部兼职。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不久被荐为佥事，随即又兼北京国民党人所办《民主报》主编、国民大学法科英文教授。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1913年3月，教育总长由农林总长陈振先兼任，王云五任主任秘书兼专门教育司司长。5月辞去教育部任职，8月任中国公学大学部专任教授，讲授英文修辞学、英国文学史及英法通论等课程，历时三年。其间一度兼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1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此后他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1920年为上海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开始步入编译出版行列。

1921年9月，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上海商务印书馆为国内最大的近代化出版企业，“五四”以后力求出版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籍以适应时代潮流。王云五接任后，以“教育普及”和“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改组机构，延聘朱经农、杨杏佛、周鲠生、竺可桢、陶孟和、何炳松等专家学者，分别主持各部工作；创编各科小丛书，为日后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扩充原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改名函授学社；加强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联系，增出大学教科书。从1922年到1929年，王主持编译所的八年间，先后编译出版有《教育大词典》、《动物学大词典》、《英文大词典》、《英文习语大全》，影印《四库全书》，出版《说文解字诂林》、《四部丛刊》、《百科全书》、《万有文库》第一集，以及《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等。

王云五在主持编译所期间还从事辞书检索的研究。他在高梦旦探索多年的号码检字法的基础上，参考陈文的号码检字方案，着手四角

号码检字法的研究，于1928年10月完成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同时，为促进商务涵芬楼藏书的公开阅读，他又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于1927年4月写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王云五在商务的这些成就，使他在出版界开始显露头角，除兼任商务东方图书馆馆长外，还先后任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主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中国公学校董等职。但因商务连年发生劳资纠纷，王云五为商务工会和职工所不满，1929年10月辞去编译所长职离开商务。经杨杏佛向蔡元培举荐，转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法制组主任兼研究员。

1930年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经夏小芳、张菊生、高梦旦等商议，再聘王云五回商务担任总经理。王云五到职后先往日、美、英、法、德、意等九国考察企业管理，9月回国后向董事会提出实施科学管理的计划，推行科学管理以整顿商务。他针对商务各科问题与积弊，先后公布改组编译所和总务处的方案，组设编译评议会，推行总经理负责制，施行《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等。这些“科学管理法”，尤其是编译工作按时计算、按字数付酬的办法，使职工工作量陡然较前增加二三倍，也不合脑力劳动的特点，因而遭到商务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四个工会的强烈反对，提出十九条要求迫其答复。嗣后经上海社会局出面调解，王云五口头上表示撤回改革方案，而实际上于无声无息中坚持改革整顿，避开编译计酬及人事改革的阻力，先对成本核算和计划财务管理方面分项分步推行。

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商务总馆、总厂在战火中被毁，损失奇重。王云五宣布总馆、总厂停业，职工一律解雇，组设特别委员会和善后办事处处理善后。在经营管理上分别加强北平、香港分馆、分厂的经营。同年8月宣布总馆、总厂复业，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

编译、出版、印刷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还创立“星期标准书”向读者推荐新书。从1934年到1936年的三年间，商务每年出版新书一百八十种以上。其中包括《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第二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部丛刊续编》、《幼童文库》、《丛书集成》、《四部丛刊三编》、《中山大辞典》、《国学基本丛书》及《中山文化史丛书》等。许多书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国近代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贡献颇大。王云五在出版界、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声誉隆起，执全国出版界牛耳，成了国内最著名的出版企业家。他除任上海市图书馆协会主席、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长、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及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外，还任国民政府行政效率委员会委员、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员会委员、国难会议议员。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坚持仍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他曾计划在长沙增设分厂，将主持人分配于上海、长沙、香港三地，分头开展商务的经营。嗣因长沙遭日机轰炸和沪地职工不愿去长沙而未实现，乃改变计划，于昆明、重庆、桂林、西安及江西赣州筹设分厂，在香港设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于重庆设编审处和印刷厂，仍以香港为出版重心，分区印刷供应教科书和参考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转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继续编印《大学丛书》及其他专门著作，并新印和重印许多有价值的一般图书。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除主持商务业务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1942年10月起任驻会委员，1943年1月兼参政会经济策进会滇黔办事处主任，还任参政会第四届第一、二次大会主

席团成员。此外，他还兼三青团设计委员会委员、中训团党政班讲师、中国访英团团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等职。

王云五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一直自称为“二无党党员”[(1)]，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举为开了“恶例”，事后自称这是“从侧面协助政府以打击中共，较诸简单责备中共者手段实更厉害”[(2)]。在他担任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时，对有利于蒋介石的议案，都竭力予以通过。1946年1月重庆政协会议召开时，他又为会议代表。在讨论“国大代表”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他替国民党说话，谓战前由国民党定下的九百名代表“是依法选出的”，应该有效[(3)]。

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四处活动，所言所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1946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政府大员。王云五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分，喜形于色地宣称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同时又“了解政府的困难”[(4)]。他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表示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5)]。他标榜经济部的施政方针，是要将全国经济由官营为重心向民族工商业转变，统筹辅导“国营事业”的改良；并于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分设工商督导处，负责民营工商业的调查、调整、辅导及扶助，对有竞争性的舶来品采取限制办法。他还打算设立计划委员会为其咨询机构，企图帮助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笼络和欺骗。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王云五任国大

代表及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中，他与莫德惠等具名提出反共的“关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积极活动于大会内外，被国民党报刊捧为“国大之宝”、“主席团发言人”、“说明专家”等等。为此，蒋介石对之“信任有加”[(6)]。当王云五辞去经济部长后，1947年4月又升为行政院副院长；后又兼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预算委员会和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7月，他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务会议，极力支持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戡乱方案”进行内战。1948年4月，任“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

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王云五于8月初提出“统一财政经济决策机构”和“行政业务计划方案”，随又草拟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王自鸣得意，“长饮龙门”[(7)]。9月，他前往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大吹其币制改革，以图讨好美国而获取贷款。可是，发行金圆券不过三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于11月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广州。其后，仅任行政院顾问。

1949年2月，王云五前往香港，创办了国华两合公司出版社，又回到了出版界。翌年冬发行《自由人》三日刊，并增编出版《王云五综合词典》。1951年1月，他在台湾设国华出版社分社，定居于台北。

王云五到了台湾后，重新活跃于政坛上，先后任“行政院”设计委员兼改制组召集人、“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公务员高

等考试典试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国大”一届三次会议主席团主席等职，1963年7月一度代理“行政院”院务，仍为台湾政界大员。他还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西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台湾商务印书馆业务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1963年12月，王云五在台湾退出政坛，仅任“总统府”资政，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大力整顿改革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出版，头两年续出旧书，随后大量印行新著及译本，先后出版《万有文库基要》、《四库丛刊初编》缩本、《丛书集成》简本、《各科研究小丛书》、《人人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古籍今注今译》和《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等书，平均日出新书约五种[(8)]。

王云五在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之余，还整理旧稿，从事新著，先后出版《谈往事》、《纪旧游》、《王云五新辞典》、《十年苦斗记》、《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二千五百余年来中国治学方法的综合研究》、《岫庐最后十年自述》等；并有译著《企业组织与财政》、《苏联工农业管理》、《美国全史》等；还编有《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新辞典》、《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篇》、《中国史地词典》等。

1979年8月14，王云五病逝于台北。

---

(1) 张道藩：《读〈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有感》，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1期，第19页。

(2) 王云五：《谈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68页。

(3) 《划时代的会议——政协会议》，新时代印刷出版社1946年版，第49、56、60页。

(4) 上海《新闻报》1946年5月16日。

(5) 上海《新闻报》1946年6月9日。

(6) 王寿南主编：《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7) 当时上海《申报》载文讽刺他常穿着长袍，前往龙门饭店得意地独酌。

(8) 徐有守：《王云五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台北）《东方杂志》复刊第7卷第1期。

王造时 (1)

江绍贞

王造时，原名雄生。江西安福人。1902年8月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王八岁入塾，1913年入安福县高等小学。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的反日风潮发生，使他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1916年入南昌省立一中，翌年暑期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学生演说、编写传单等工作。6月3日，他率领同学在东安市场演讲，遭军警逮捕，后获释。8月，为支援天津、济南学生抗议山东军阀马良枪杀爱国回民事件，曾往总统府请愿，被军警驱至天安门内禁闭，后逃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积极发表反封建主义的文章，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曾连续担任清华学生评议会主席及干事会主席。

1923年10月10日，清华举行国庆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梁启超登台演讲，说中华民国之所以弄得乱七八糟，国民党要负重大责任。王造时即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驳梁的文章，指出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乱七八糟，梁和他领导的研究系要负重大责任。此文由北京《时言报》作了转载。梁启超得知后十分气恼，向清华要求辞去教职。校长曹云祥找王谈话，要他写悔过书并向梁道歉，否则以侮辱师长论，将其开除。王据理反驳，表示无过可悔，如被开除，则诉之法院并向社会公开，曹只得不了了之。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王造时代表清华参加北京学生组织的沪案后援会，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随后被沪案后援会派往武汉，调查武汉发生的惨案。

1925年8月，王造时赴美，入威斯康星大学学政治学。他感到“五四”以来参加政治活动太多，在留学期间应埋头读几年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对国事前途感到渺茫，愈加发愤读书。1929年6月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随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研究国际政治。拉斯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王受其影响，认为中国工人人数少，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1930年秋天，王造时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后又任文法学院院长），同时在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兼课。他在学生中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他要求民主法制、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1931年8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意在影射蒋介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对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的活动，认为是“流寇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出于爱国热忱，立即撰写了《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新月书店1931年10月出版），主张对内取消一党专政，对外与日寇拼命到底。同时参加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并代表该会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1932年1月，国民政府聘任他为国难会议会员。淞沪抗战发生后，他受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的推派，往北平要求张学良出兵东北，以解上海之围，但后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与日本妥协，国难会议也被当局用种种方法改变了原来“共赴国难”的宗旨。因此王造时和一些国难会议会员拒绝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而与黄炎培在沪发起组织民宪协进会。5月，他在上海各大报上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驳汪精卫等人不同意结束训政的言论。他指出：“像国民党近几年来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始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2)] 11月，他与彭文

应、潘大逵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自任主编。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该刊仅出三期，即遭国民党当局禁止而停刊。1933年1月他将刊名改为《自由言论》半月刊出版，在创刊号上，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发表《安内必先攘外》一文，痛论非对外抗战，不足以安内，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亡。他逐渐改变了往昔对共产党的看法，说共产党“乃是有组织、有主张的政党”[(3)]，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同时，王造时参加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被选为宣传委员；3月又被选为执行委员。4月，同盟全国临时执委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他为委员之一，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一起，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人士做了不懈的努力。他提出民权保障运动“须有广大的民众做基础，分子应该加多，组织应该推广，不应该限于党派的关系，更不应该限于名流的集团”[(4)]。他的意见切中同盟的主要弱点，受到重视。

由于王造时不断批评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始则想用高官厚禄为饵，诱其到南京做官，王不为所动；接着国民党特务组织寄匿名信，附寄子弹相威吓。上海教育当局下令光华大学撤掉他的职务，并密令各大学不得聘他任教。他不得已，只好挂牌当律师。11月福建事变发生，他应陈铭枢邀约前往福州，准备参与其事。不久因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回到上海，在《自由言论》上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一文，要求国民党当局“乘机痛悔，与民更始”[(5)]。12月，国民党当局以“言论荒谬”的罪名将《自由言论》查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他采取了缄默的态度。1935年4月，他将自“九一八”起至1933年底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题名《荒谬集》，作为对国民党当局的回击。

正当王造时处于苦闷之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一二九”运动爆发。这使王造时受到极大鼓舞，从此不再缄默，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

器、李公朴、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要求收复失地、保护群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接着上海文化界成立救国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理事。1936年初他参加发起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王造时出席并当选为常务委员。

国民党当局极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们勾通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将包括王造时在内的七位救国会领袖非法逮捕，不久解往苏州，拘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是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王造时被捕后，陈立夫指使王的老师、河北监察使周利生向他提出，如放弃救国会活动，可先释放。王断然拒绝，坚定地和其他几位难友采取一致主张和行动。

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人提起公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开庭审讯。王造时等七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驳斥对自己的强加之罪。国民党法官虽然窘态毕露，但仍然不予无罪释放，并声言要判刑。直到“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七人才于7月31日获释。

8月13日，王造时回到上海，适逢淞沪抗战爆发，他立即投入抗敌后援活动。上海沦陷后，他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延聘，到南昌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1938年7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春，王造时到吉安，汇集一部分文化人士及流亡学生组织前方文化社，创办生活书店，发行进步书刊。1939年5月，他把吉安《日新日报》改名为《前方日报》，自任社长。他亲自写过不少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汪精卫投敌后，他接连写文章揭露和谴责汪伪集团的罪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撰文反复阐明坚持持久战、中国必然会胜利的道理，并强调结成世界各国反侵略阵线的重要性。他的文章切中时弊，常被各报转载。

1942年国民参政会改组，王造时与救国会的几个参政员被排斥；但在1943年底，国民党当局迫于要求实行宪政的舆论，设立了一个宪政实施协进会，又聘王造时为会员。

抗战胜利后，王造时回到上海，为《前方日报》迁沪做筹备，由于该报迁沪许可证迟迟未能领到，便与生活书店合股开办自由出版社，自任社长。

1947年1月，国民党当局为分化拉拢民主党派人士，再次发表王造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近一年，其他救国会参政员已退出的情况下，他出席了5月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但他仍然想尽最大努力，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曾奔走于张群、陈诚、陈立夫等人之间呼吁和平。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代总统李宗仁派人动员他为和平运动奔走，这时王造时的回答是："现在不是和平问题，而是革命问题；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投降问题。"(6) 予以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造时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及上海法学会理事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1年8月5日去世。1980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为他补行追悼会，宣布政治上予以平反，并赞扬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作的贡献。

---

(1) 王造时：《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新月》第3卷第11期（1931年8月）。

(2) 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版，第38页。

(3) 王造时：《五月十五日的主张》，《荒谬集》，第185页。

(4) 王造时：《自由之战争》，《荒谬集》，第133页。

(5) 王造时：《为闽变忠告当局》，《自由言论》第1卷第21期（1933年12月1日）。

(6) 《王造时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占元

张振鹤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生于1861年2月20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青年时代投淮军刘铭传部当兵。1886年被保送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1890年毕业，投入宋庆的毅军，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往天津小站投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被委为工程营队官。1902年，袁世凯着手扩充军队，以小站旧部为骨干，于保定编练成北洋常备军，王占元任步队第七营管带。第二年晋升为步队第一标统带。1904年，袁世凯、铁良奉命开始编练北洋陆军六个镇，王占元被提升为第二镇步队第三协统领。1906年王占元由副将衔补用游击，准以“参将留直补用”。1910年升为记名总兵。1911年4月，授陆军协都统衔。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的第三协奉命编入第一军，南下镇压革命。10月27日，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王部伙同他部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纵兵烧杀抢掠，极为残忍。11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军队攻陷汉阳，使革命军孤守武昌，陷于严重困难。王占元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晋级为第二镇统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长，驻保定。1913年春夏间移驻信阳，参与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3月，兼“豫南剿匪总司令”，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以白朗为首的反袁武装[(1)]。4月，任湖北军务帮办。

1915年，袁世凯策划称帝，王占元积极拥护，曾列名段芝贵等人的劝进电。10月，袁世凯授以壮威将军。12月底，云南护国军起义反

袁，王向袁表示忠诚不贰，袁又授他以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1月，正当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不满和反对而精神沮丧时，王占元还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的神话，向袁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2)]。这种为袁世凯称帝捧场的丑行，成为当时人们谈话的笑料。2月18日，王占元又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的反袁士兵[(3)]。

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授王占元以湖北督军兼民政长。王表面对黎恭顺，暗中附和实力派。不久，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5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在段的唆使下，串通各省督军，领衔要求解散国会，向黎施加压力。王占元曾与孟恩远一道列名通电。之后，黎特意召见王、孟二人，恳求他们向各省军阀进行疏通。5月下旬，段祺瑞被免职，九省督军宣布独立，王占元表面未曾列名，实际上仍然与各省军阀沆瀣一气。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日益明显地分化为直、皖两系，王占元站在直系一边。9月，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实力派，建立"护法"军政府，反对窃据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这时，直、皖两系由于利益不一致，在对护法各省的和战问题上发生分歧。冯国璋依靠王占元等长江直系三督军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政策，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11月14日，北洋政府驻防湖南前线的两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的授意下，首先通电撤兵，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接着，18日，王占元又同李纯、陈光远、曹锟联衔发出相同的通电。在直系的和平攻势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挫，军事行动随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赶出长沙，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取得暂时优势，但由于皖系的牵制，对和战犹豫不决。

王占元为保持他在湖北的统治，对和战采取观望态度，企图左右逢源。1918年1月27日，打着"护法"旗号的湘桂联军攻占岳州，2月11日，冯国璋免去被联军击败的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的职务，由王

占元兼代[4]。王占元和江苏督军李纯以南北议和调解人的身份展开活动，示意联军勿再进逼。湘桂联军并无真正实力，总司令谭浩明为了争取湖北中立，向王做出“不入鄂境”[5]的保证。南北对峙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首领。王占元附和曹锟、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1920年4月，他出席了曹锟为部署反皖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盟会议。5月，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前线撤兵北上，路经湖北时，王占元慷慨资助饷械。6月13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曹锟的示意下，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7月，王又乘直皖战争之机，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从而扩大了他在湖北的军事实力。

直皖战后，奉系张作霖把触角伸向长江中游，想方设法拉拢王占元。北京政府也想依靠他调解直、奉两系间的矛盾。1921年4月，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曹锟、张作霖分别代表直、奉两系外，还邀请了王占元，一时称为“四巨头会议”。王占元在会上大肆吹嘘，捏称“湘川黔滇不日北附”[6]，想以此向北京讨取更大的好处。当时，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立政府，王占元尾随曹、张等北方军阀一起通电反对。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烧杀抢掠，人民遭受惨重损失。因此，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诚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第一、第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8月7日，王占元被迫辞职，携带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

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他经常往来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的活动才稍加收敛。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的训练总监[7]，与孙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做垂死挣扎，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8]。但历史作了无情的回答：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国租界的保护。

王占元曾经用搜括来的钱，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9]；在山东投资于纱厂[10]、煤矿[11]；在直隶投资于面粉厂[12]、电力股份公司[13]；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元；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乘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14]；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在北洋军阀中，王占元算得上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

1934年9月14日，王占元病死于天津寓所。

---

(1) 《时报》1914年3月1日、3日、13日、23日。

(2) 《时报》1916年1月17日。

(3) 《民国日报》1916年2月25日、26日。

(4) 《大总统冯国璋命令》，《时报》1918年2月14日。

(5) 《李纯主张停战议和电》，《时报》1918年2月5日。

(6) 《章太炎致赵恒惕电》，《民国日报》1921年5月10日。

(7) 《申报》1926年9月9日。

(8) 《申报》1926年9月14日、15日、16日、17日、26日。

(9) 郑延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4页。

(11) 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山东矿业报告》，北洋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164页。

(12) 河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第130页。

(13) 《保定工商业状况》，《工商月刊》1935年第7卷第4号，第65页。

(14) 郑延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61—265页。

王振

庞守信

王振，原名耀堂，字荣轩，因在兄弟五人中行五，人称王老五。河南宝丰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做过长工。王振没上过学，年轻时以务农为主，兼开小煤窑。清末豫西一带灾荒频仍，兵匪横行，民不聊生，王振铤而走险，投身绿林。

辛亥武昌首义后，河南革命党人组织民间武力会攻洛阳失败，一部分溃散的学生队路过宝丰西乡，王振等乘机围缴了他们的枪弹，自此聚众数百人，活动于宝丰、鲁山、郏县等地。1913年，白朗军起事，王振投白朗军。次年白朗军失败，王振重新为匪。1920年王振率匪众三百余人与杆匪刘占标等会合。因王善于谋略，被推为头目，遂有众二千余人，活动于临汝、登封、宝丰、鲁山、郏县、禹县一带，绑票、截款、烧杀掳掠，人民惨遭蹂躏。河南督军赵倜屡派官军追剿，均告失败。

1921年，王振潜至开封，向官府疏通，请求招抚。时值赵倜扩充宏威军之际，同意收抚，委王振为巡缉营营长，所部五百人，驻防于宝丰、鲁山、郏县一带。王振摇身一变而为营长，骄横异常，勒派敲诈，鱼肉乡里，当地居民一提起王老五，无不切齿痛恨。王振为了准备高升的资本，不断放出“外队”[(1)]，扩大势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赵倜败北，宏威军瓦解，王振失去了靠山，重新落草。同年秋，王振与悍匪张庆（老洋人）等合伙，形成数万之众，西窜陕县、洛阳等地，声势浩大。吴佩孚急调刘镇华之镇嵩军往剿，将其击溃。王振所部匪众千余人流窜陕西商洛地区，

又被镇嵩军第三路统领憨玉琨收抚，编为补充团，王振为团长，仍驻防商洛地区。

王振在驻地烧杀绑架，无所不为，乡民苦不得已，纷纷组设民团自卫，抗拒王部劫掠。但刘镇华竟然指商洛民团为反叛，添派郭金榜等协同王振“围剿”。王、郭“奉令洗杀，男女老幼不留，放火烧杀七十余村，祸延六百余里”。[(2)]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败归洛阳，镇嵩军叛吴拥段（祺瑞）。刘镇华命憨玉琨师出潼关，抢占河南地盘。1924年12月初，憨命其参谋长吴沧洲率王振等部进兵洛阳，赶跑了吴佩孚；接着进兵郑、汴。王振为憨玉琨争夺河南立了首功，被升为第一混成旅旅长，驻军登封一带。

1925年初，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所部国民二军进入河南，憨师被迫撤至豫西，自此，胡、憨两军时有冲突。1月23日凌晨，王振在憨玉琨的授意下，派部勾结禹县民团，偷袭驻禹县之国民二军曹世英旅，殃及无辜，人民被杀者两三千人，造成重大惨案。二三月间，爆发了胡憨战争，憨玉琨失败而自杀身亡，王振等率残部西窜，盘踞豫、陕边界熊耳山、伏牛山一带，收集余部，重组力量。后转入陕南武关、安康一带，依附驻陕南之皖系军阀吴新田，伺机待动。

1926年春，吴佩孚派军攻入河南，击败国民二军。此时，王振率部八团，约万余人，由灵宝出山，抢占了函谷关一带险要阵地，凭险阻击，切断了国民二军入陕的通道。刘镇华率后续部队赶到，击败国民二军，在陕县、灵宝整编部队。王振又立战功，实力猛增，被刘镇华委为镇嵩军第四师师长，辖四个旅和三个直属营，所部三万余人，成为镇嵩军的王牌部队。

刘镇华为了夺回陕西的统治权，于4月初率镇嵩军围攻西安，与杨虎城、李云龙所率国民军作战。王振野心勃勃，梦想再立首功，以

取得陕西省长高位。他亲临阵前督师，组织敢死队反复冲杀，致使死亡枕藉，惨不忍睹。王振久攻西安城不下，便把怨恨倾泻到支持国民军的民众身上，放火烧毁了城郊十万亩即将成熟的麦田。11月，冯玉祥为解西安之围下令国民军入陕，与镇嵩军激战，杨虎城、李云龙部亦猛烈反攻，镇嵩军大败东逃，退至豫西。刘镇华将残部整编为两个军，任王振为第二军军长。

王振及其亲信骨干张得胜、姜明玉等，大都是豫西府十处、州五处[(3)]的山大王。他们败归河南后，在豫西各县及南阳一带任意搜刮，烧杀抢掠，闹得农民耕种失时，无法生活。1927年3月底至4月上旬，新安县红枪会进行武装反抗，遭到王振部的血腥镇压，新安铁门、辛庄一带，十七个村庄被焚烧一空，附近村庄人民纷纷逃避。

1927年5月，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入河南，6月初占领郑州、开封等地，与武汉北伐军会师。盘踞豫西的刘镇华见奉军大势已去，转而投向冯玉祥，被编为第八方面军。王振坚不投冯，只身投奉。他到太原经阎锡山疏通，在北京与张作霖见面，后被派往济南与张宗昌配合，专做分化镇嵩军的工作。10月，直鲁联军与冯玉祥部在豫东大战，由于王振暗中策动，刘镇华部军长姜明玉叛冯投奉，致使冯军遭受重创。1928年6月，冯玉祥、阎锡山等部占领平、津，奉军败退东北。王振随同逃往关外，先居大连，后又移居天津等地。

1929年夏，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利用土匪势力，扩充军队，特召王振回汴，委以豫西警卫团总指挥名义，到豫西招抚土匪。王振先后在洛阳、临汝、郏县、宝丰、禹县等地广招杆匪，滥委师旅，号称九师，约三万余众。先驻郏县，后移禹县，1930年4月全部开入鄢陵县，分驻城乡。这支名为官军实为土匪的部队，到处占民房、抓壮丁、勒索巨款，强缴民团枪械，致使鄢陵民众纷纷外逃。

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王振所部隶属阎、冯一方，被

编在第八方面军中，同蒋军作战。9月中旬，蒋军肖之楚第四十四师攻占鄢陵县城，王振退守城西冈底、张寨等地，遣人乞和，希图保住官位。肖与王虽有旧交，但深恨王曾缴过其部下枪支，乃将王诱入城内扣押，将所部包围缴械。10月13日肖之楚以绅民控告王振祸豫之名，杀王振于鄢陵县城。

主要参考资料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本。

靳容镜修，王介等纂：《鄢陵县志》卷1，1936年版，第112—113页。

尹文堂：《镇嵩军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王凌云：《豫西旧社会军匪横行的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长沙《大公报》1925年2月、1926年5月。

《时报》1921年8月12日。

---

(1) 外队，系被收抚后又被暗放的土匪。官军让其继续拉杆为匪，二者互相为用。外队给抚军暗送金钱，抚军给外队暗送枪弹；抚军不能自安时则有所归，外队不能自安时则有所靠。此为招抚土匪以来暗行之惯例。

(2) 陕西《新秦日报》1925年3月24日。

(3) 府十处：即河南府所辖的洛阳、偃师、巩县、孟县、登封、新安、渑池、宜阳、永宁（洛宁）、嵩县；州五处：即临汝州所辖的临汝、鲁山、宝丰、郏县、伊阳。

王正廷

郑则民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生于1882年7月25日（清光绪八年六月十一日）。父王际唐是基督教圣公会牧师，曾在上海郊区传教。

王正廷六岁时在宁波进小学堂，十岁往上海入英国传教士所办的中英学校习英文。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二等（预科），后升入头等（本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陷天津、北京，北洋西学堂被德国侵略军占据，学堂停办，王正廷辍学返回上海。1901年曾一度进海关任职，不久再去天津随原在北洋西学堂任教之坎特（Percy H．Kent）研习法律。其后到中美书院任英文科主任。1904年去湖南长沙中学堂担任英文科主任。

1905年，王正廷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白乐门（Fletcher S．Brockman）邀请前往日本，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同年王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入密执安大学，次年转入耶鲁大学文科研究院。

1911年夏，王正廷因父丧回到上海。10月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王正廷前往湖北，在黎部下参与起草都督府组织条例，被任为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办理外交事务。12月中旬，袁世凯派代表唐绍仪同民军方面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谈判，王正廷任民军方面和谈代表兼伍廷芳的参赞。12月下旬，他以浙江省代表的资格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织新内

阁，王正廷被任命为工商部次长。因总长陈其美没有就职，由王代理总长职务。7月，内阁总辞职，王正廷回上海，继白乐门之后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同时，他还与张伯苓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筹备第二年在北京举行民国时期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此后，他长期兼任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多次领队参加亚洲运动会和世界运动会。他和孔祥熙均为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终身委员。

1913年春，北京政府产生了正式国会，国民党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有三百九十二人，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副议长。时宋教仁力图实行政党内阁，为袁世凯所忌恨。3月，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王正廷等对袁世凯的违法活动及擅自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7月参议院议长张继离开北京，王正廷代理议长职务。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国民党并下令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王正廷遂离京去沪。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王正廷回京继续担任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6月，张勋率兵入京“调停”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所谓“府院之争”，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拥清室复辟。7月，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复辟帝制，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并从上海率“应瑞”、“海琛”两舰南下广东，建立护法根据地。王正廷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7月底电复广东省议会，同意前往广州开会。他与吴景濂电请美、英、法、俄等国赞助中国国会。8月初到达广州，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共同商议组织政府等事宜。8月25日，王正廷和其他南下的国会议员一起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11日王正廷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并暂行兼署外交总长。1918年护法军政府派王正廷赴美国，接洽美承认军政府事。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英、法、德、意、日等

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和会，为表示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外的“一致”，广东护法军政府派王正廷为中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之一，他与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一起，曾向和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希望列强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山东的一切权利等。但是，中国的正当要求不仅遭到与会列强的拒绝，并且和会还将日本夺得的山东权益明文载入对德和约。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我国人民的一致反对，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国外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斗争。在当时形势和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王正廷于5月中旬明确表示，如果签订和约不准中国保留意见，则无论如何“决不签字”[(2)]。这一主张符合当时我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多方面来电的支持，也得到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等的支持。这种态度对当时我国争取独立主权的外交斗争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最终在全国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共同斗争的压力下，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3)]。王正廷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获得当时国内舆论的好评。

广东军政府于1918年5月通过改组排挤了孙中山之后，实已成为桂系一手把持的傀儡机构。1920年初，滇、桂两系军阀因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关系破裂，国民党系的国会议员与军政府间的矛盾亦加剧。4月21日，林森、王正廷、吴景濂、褚辅成通电宣布：自3月29日起，广东军政府会议已不足法定人数，一切决议概属违法。王正廷及不少议员离粤去沪。

1921年，王正廷到北京就任中国大学校长。这所大学原是民国元年由孙中山授命创立，黄兴、宋教仁先后负责经办。其后袁世凯复辟帝制，该校受到肆意摧残，在艰难中维持近十年。这时由王宠惠任董事长，王正廷任校长，经过筹款扩建，规模日渐完善，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后来该校得到中国国民党的资助，长期存在下来，甚至在抗战爆发后，也以私立大学的名义继续留在北平，校长一直由王正

廷挂名，直至北平和平解放为止。1921年5月，王正廷还被选为海牙国际常设公断法院公断员。1922年初，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促使中、日两国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达成“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让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胶州原德国租界地，改向各国开放”；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4)]。3月，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为“鲁案”督办，与日本办理交涉，至12月签订了“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5)]。接着王正廷担任青岛商埠督办兼胶济铁路理事长。当时北洋政府曾把这件事吹嘘为“外交胜利”，王正廷也从中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加强了他在北洋政界中的地位。1922年11月29日，王宠惠内阁因遭到曹锟的反对而辞职，黎元洪先命汪大燮署理国务总理，王正廷署外交总长。这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排斥现任内阁，逼迫黎元洪重组对他有利的新内阁，并企图赶走现任总统，为自己登台扫清道路，汪内阁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12月6日，黎元洪不得不提出由张绍曾出来组织新内阁，因张与曹锟、吴佩孚的关系都很密切。在新内阁没有通过以前，汪内阁代理时间已到，黎元洪便于12月11日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王正廷于14日通电就职。内阁成员除王正廷兼任外交总长、凌文渊代理财政总长外，其他成员均是留任，即由高凌霨、张绍曾、李鼎新、许世英、彭允彝、李根源、高恩洪分别任内务、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总长。12月31日，王代理内阁，打破自己不任免重要人员的诺言，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王正廷临时内阁是个过渡性的政府，时间较短，不为曹锟等的重视，只不过为张绍曾内阁起催生的作用。1923年1月4日，张绍曾内阁组成，任王正廷为司法总长，但他未就职。3月他出任中俄交涉督办，与苏俄代表谈判恢复邦交问题。1924年3月，双方会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案》[(6)]第一阶段结束。其后由外长顾维钧亲自主持谈判，至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协定》正式签字，中俄外交关系恢复。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下台。31日，黄郛任代理国务总理，王正廷任外长兼财政总长。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上台，当上了北京政府“临时执政”。黄郛

下台，王也去职。1925年3月，王再任中俄会议督办。12月段祺瑞改组内阁，王任外交总长。1926年3月，辞职赴上海，不久，任全国道路协会会长。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加入国民党，并与南方国民革命军相配合，出潼关参加北伐。王正廷应邀参与冯玉祥的军事谋划。1927年夏，当冯军占领河南以后，鉴于陇海铁路有涉外事务，冯荐王正廷任陇海铁路督办。

1928年，王正廷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5月，日本军队为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竟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因执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引咎辞职。6月，王正廷继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其后他还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1928年10月，王正廷与日本代表谈判解决“济案”问题，日本方面仍然蛮横无理，拒不撤兵。王正廷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一再妥协迁就[(7)]，引起了南京市民的愤懑，于12月13日举行示威，并捣毁了王正廷的住宅。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达成所谓“济南协议”，除规定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所谓双方的损失外，还要中国政府负责保护在中国的“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个“协议”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中国军民数千人等罪责一笔勾销，还声明：“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8)]

王正廷任外长期间，为了应付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独立自主的要求，也曾采取过一些新的外交手法。1928年7月间，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即国民政府在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要求就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有关条文进行若干修改。虽然在几年内先后与美、英、法、德等国家就“新关税条约”达成某些协议，在形式上争取到他们的某些让步，但中国受制于人的半殖民地局面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至于连

年宣称的“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又匆忙通令暂缓执行。尽管如此，王正廷任外交部长期间，办理了一些条约和协定，其中有的西方国家也作了某些让步，还同希腊、波兰、捷克等国订立了商务协定，进行了商品交流，当时外交工作还是有所进展。王本人不是亲日派，但由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仍然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政策，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不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冲开警卫的阻拦，用墨水瓶掷伤王正廷的头部。王于纷乱中从窗口跳出，始得逃脱。事件发生后，他被迫辞职。1932年1月，改任外交委员会委员。

1936年8月，王正廷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美国国务卿安排下与日本驻美公使会面，但毫无结果。以后，他也没有能够从美国方面得到新的“援助”。1938年9月，国民政府将王正廷调回，改派胡适接替驻美大使职务。王正廷经香港转赴重庆，此后不再担任政界要职，只挂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曾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菲律宾交通银行董事长、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1961年5月21日在香港病逝。

---

(1) 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4页。

(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0—351页。

(3) 关于1919年拒签“巴黎和约”的情况，王正廷在1927年7月为《国闻

周报》作《近二十五年中国之外交》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叙述。又见吴天放编《王正廷近言录》，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127—155页。

(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集》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2页。

(5)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48、453页。

(6)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19—125页。

(7) 洪钧培编：《国民政府外交史》，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185—194页。

(8) 《芳泽谦吉与王正廷互换照会》（1929年3月28日），《东方杂志》第26卷第9号。

王芝祥

王川

王芝祥，号铁珊。1858年（清咸丰八年）出生于直隶通县。王芝祥从小饱读诗书，关心国内外政事，颇有康济时艰之志，周围聚集了大批志同道合之士。1885年考中举人，被清廷派至河南各地担任知县，成绩卓著，进而清廷颁发特旨升调其为广西知府。当时广西盗匪猖獗，时时滋扰百姓，王芝祥到任后采取果断措施剿匪，取得成效，深得清廷赏识，迅速被提升为盐司。1907年6月，清政府令王芝祥担任广西按察使，1911年7月担任布政使。

清季朝政不纲，社会秩序混乱，不少同盟会成员潜入内地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出没于两广者尤多。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有着悠久历史。广西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地，人民的民族革命意识极为浓厚，所以革命党人注重广西一地有其特殊背景。在张鸣岐任广西巡抚（1906年至1910年）期间，革命势力更是有所发展[(1)]。受环境影响，加之本身具有革命倾向，王芝祥任职期间没有对革命志士进行围剿，而是以其爱才之心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时如黄兴、柏烈武、吕公望、赵恒惕、钮永键等革命党人或受其资助出国求学，或是暗中受其保护得以保全性命，因之王芝祥与同盟会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推翻清王朝的新军起义，旋即各省革命党人纷纷策动本省响应。广西巡抚沈秉堃被迫接受革命党人的要求，于11月7日宣布广西独立。省谘议局推举沈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11月8日，广西最高军事长官陆荣廷与同盟会代表谈判，表明赞成独立意愿，“附和共和”。清廷崩溃后，新的民主共和权力中心未能及时确立，各独立省纷纷树起“省人治省”旗帜，广西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也呼吁“桂人治桂”。作为外省人的沈秉堃

（湖南籍）、王芝祥，感到势单力薄难以立足[3]。此时武昌革命军和清军正相持不下，需要各地革命军增援。其时广西新军和旧军也时生摩擦，所以沈秉堃、王芝祥力主调新军北伐，既可协调新旧两军的冲突，亦欲乘机离桂自保。沈秉堃自愿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亲自统率北上。王芝祥待陆荣廷将到桂林时，则以广西北伐军总司令名义率广西旧军六大队假道湖南开往武汉支援革命军。沈、王离开之后，11月23日，广西议院推举陆荣廷为都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中华民国诞生。南北和谈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6日，王芝祥担任第三军军长兼陆军部高等顾问官[4]。3月29日，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4月1日政府迁往北京。唐绍仪出任总理前为得到同盟会的支持，与同盟会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即推举与同盟会素有交谊的直隶人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直隶士绅也有意选举王担任，并且也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与同盟会关系良好。因此，当5月下旬王芝祥从南京赶到北京、直隶省议会选举其为都督并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做直隶都督。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5]。唐绍仪以政府不能失信于直隶绅民，拒绝副署，但袁世凯置之不理，在6月15日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芝祥，派其赶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事务，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唐绍仪也因此事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1912年9月19日，北洋政府授予王芝祥、徐宝山等四人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6]。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随着新的政治格局逐渐建立，各种名义的政党纷纷成立。1912年4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张凤翔、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等为总务干事。

1912年8月，宋教仁在南京将同盟会进行改组，与统一共和党等五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芝祥等九人担任理事。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实行政党政治的基本条件，因而各政党之间难免互相排挤，不但破坏了民族团结，也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是非公理和竞争秩序，严重阻碍着国家政务的解决。

为纠正“甲党之所是，乙党必以为非；乙党之所非，甲党必以为是”的政党混乱局面，王芝祥、孙毓筠、于右任、章士钊等国民党人，于1913年2月16日在北京成立“国事维持会”，其宗旨在于疏通、调和“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冲突，以“维持大局，俾国家得抵于和平统一”[(7)]。嗣后国内政局迭变，战争连年不断，王芝祥本着“国事维持会”成立时确立的宗旨，凭借自己的声望或是为时局奔走呼号，或是以和平息争为职志，为各方所推重。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军政大权落到了各省都督手中，为独揽大权，袁世凯提出军民分治。此措施付诸实施时遭到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反对，袁世凯对此非常忌恨。1912年12月，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江西发生兵变。李烈钧为减少北京的压力，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与自己有师生情谊的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李原以为汪处世温和，可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世凯的矛盾，却不料汪瑞闿已经投靠袁世凯。李烈钧只好另想对策，迫使汪很快离开江西回到北京。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一批枪械及子弹被袁世凯收买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扣留，李烈钧坚决要求予以归还。眼看江西风潮愈演愈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各路人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损伤国家元气，向袁世凯表示愿去江西调停。1913年2月16日，王芝祥离京南下，3月1日到达南昌进行调解[(8)]，请求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长，袁世凯同意，民政长事件和平解决。3月15日，李烈钧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剥夺了戈克安九江镇守使的职权。戈克安连续向北京告急，王芝祥闻讯后又立即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在王芝祥的调解和李烈钧的坚决抵制下，袁世凯不得不让戈克安离职赴京，

3月26日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事务，以节制李烈钧[9]。江西局势也暂时恢复平静。

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新任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贵州人戴戡为川东巡阅使。蔡锷到成都后不久即因病辞职。9月13日北京政府特任云南人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当时罗佩金驻守成都，在滇军军阀唐继尧的支持下不愿让戴戡到成都接任省长，11月又命令督署、省署官员改着便服参加公民大会反对戴戡，迫使戴戡迟迟不敢来成都，只得于1917年1月2日在重庆就职。北京政府以四川参加护国战争有功，特派王芝祥为四川检察使前往成都为有功人员晋级授勋，以示羁縻[10]。王芝祥于1917年1月7日抵达成都，正逢罗、戴二人相持不下之时。在王芝祥的斡旋下，1月14日戴戡自重庆到达成都视事[11]，罗佩金也不得不交出政权，实行军民分治。

自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经费的积欠越发严重，教育人士为维持生存纷纷起而采取行动。1921年为北京教师大规模索薪的第一年，6月3日当北京国立八高校教职员和学生一起赴总统府请愿时，在新华门与卫兵发生冲突遭卫兵殴打，数十人受伤。北洋政府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力主缓和，派遣王芝祥慰问国立八校校长及教职员学生代表[12]。经过反复磋商，政府和八校教职员达成协议，事态才有所缓和。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不满吴佩孚排挤自己，于10月24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直系失败。当时依附于曹锟的京兆尹刘梦庚被迫去职，北京各界官绅民众共推王芝祥继任。11月5日段祺瑞政府任命王芝祥接任。12月31日，王芝祥又被调任侨务局总裁，1925年7月23日王辞去总裁职务[13]。此后王芝祥远离政界，专门致力于社会活动与慈善事业。

1913年，在湖南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刘人熙筹办船山学社的过

程中，王芝祥、张謇、夏寿康、庄蕴宽等社会名流，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愿望联名恳请总统袁世凯同意设立船山学社，最后得到批准[14]。船山学社成立后，刘人熙负责搜集和刊刻船山著作，出版《船山学报》，定期向各界人士讲述船山的学说，扩大了船山的影响，使得船山学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

1921年3月18日，山东济南成立了一个跨国性的民间宗教慈善组织——济南道院，由同善会头目杜秉寅出任总负责人，钱能训、王芝祥、何澍等人为名誉负责人。济南道院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向外发展组织，在1921年到1923年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已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绥化、保定、武昌、南昌、福州、重庆等地成立一百多处道院，遍及长江以北及关外各省市，声势颇为浩大，影响也很广泛。王芝祥统掌上海、杭州、南京道院的事务。1924年日本大地震，济南道院趁机设立“神户道院”，是为向国外发展之始，后渐向南洋发展[15]。1922年10月28日，在王芝祥、杜秉寅、徐世光等九人的推动下，北京政府内务部正式批准成立世界红卍字会[16]，作为济南道院的下属组织，总揽道院所有的慈善事业。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址设在北京，王芝祥担任中华总会会长[17]。每逢水灾、旱灾及战争爆发时，凡是有关赈务及救济之事，王芝祥无不极力提倡劝募赈灾，所以当时一般“贫苦无助之老弱妇孺莫不知有大善士王铁老”[18]。总会创办了分会数十处。

1923年1月，王芝祥协同邓孝然、汪大燮、王人文、刘莹泽向北洋政府内务部、教育部、京师警察厅送达组织世界宗教大同会立案书，声称设立世界宗教大同会是以“发扬基督、犹太、儒、释、老、回六大教真理以期宗教大同为宗旨”，目的是“为挽救人心计，和平世界计……专提倡宗教，讲求实证实用之道德，俾合人心日趋大同，以谋世界和平幸福”。1923年3月2日教育总长彭允彝准予立案，23日内务总长高凌霨也准予立案[19]。

20世纪20年代王芝祥退出政坛后，除参加社会慈善活动外，赋闲

家中教养晚辈。1930年7月21日，王芝祥病逝于通县家中。

主要参考资料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发行。

《王芝祥（1858—1930）》，贾逸君编《中华民国百人传》，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92—93页。

---

(1)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

(2) 《王芝祥（1858—1930）》，贾逸君编《中华民国百人传》，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92页。

(3) 蒙力力整理：《陆荣廷主政广西要略》，黄德俊主编《桂西文史录》第2辑（1911—1937），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 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7页。

(5)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4—135页。

(6)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发行，第65页。

(7) 《国事维持会简章与第一次宣言书》，《申报》1913年2月25日第8版。

(8)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84、85、87页。

(9)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1卷（1912—1916），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1—139页。

(10) 王连芳、赵振銮、赵泽光：《回族名将、爱国老人赵钟奇生平》，

《中国穆斯林》1993年第2期，第38页。

(11)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79页。

(12)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582页。

(13) 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2页。

(14) 船山学社：《改组湖南船山学社筹备会缘起》，《船山学刊》1932年第1期，第25页。

(15) 朱式伦：《世界红卍字会在济南的兴衰》，山东省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4年版，第151—153页。

(16) 此非世界红十字会。据当时人分析，创办者的意图是要和世界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并驾齐驱，希望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组织。参见严薇青著《济南掌故》，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1页。

(17) 《王芝祥（1858—1930）》，贾逸君编《中华民国百人传》，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92页。

(18) 《王芝祥（1858—1930）》，贾逸君编《中华民国百人传》，第93页。

(19) 《王芝祥等组织世界宗教大同会致内务部立案呈》（1923年1月—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9—724页。

王志莘

吾新民

王志莘，原名允令。1896年4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九）生。上海人。五岁时，父亲王南山去世，靠母亲刺绣收入维持生活。1910年因贫辍学，由叔父介绍进钱庄当学徒。但他坚决要求读书，母亲省吃俭用，支持他到南洋公学求学。1915年毕业，先后在定海县立小学、上海留云小学教书，并到新加坡做过教员、报馆编辑，经管过橡胶种植园。1921年王志莘回国，考进上海商科大学（东南大学与暨南大学合办）读书，并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受到黄炎培的赏识。1923年经黄炎培介绍，得到菲律宾华侨李昭北资助，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银行系，先后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

1925年，王志莘毕业离美，绕道欧洲考察各国银行业务，回国后在上海商科大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他担任第一任主编，不久由邹韬奋接办。1926年，王志莘进薛仙舟主持的工商银行，任储蓄部主任，提倡用合作贷款调剂工商资金，被称为平民银行。他又和薛仙舟、吴觉农等人设立“中国合作学社”，担任该社常务理事和“合作函授研究班”主任。1928年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赵棣华筹办江苏省农民银行，聘请过探先为总经理，王为副经理。不久过探先去世，他接任总经理，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江苏省农村合作社数目之多居全国第一。几年之间，王志莘在银行界逐渐崭露头角。

1930年，王志莘出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以下简称新华银行）总经理，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新华银行成立于1914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储蓄银行之一。由于经营不善，1930年时负债累累，无法维持，乃由中国、交通两行增资改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推荐王志

莘主持整顿新华银行，王又引荐孙瑞璜为副经理。王志莘主持新华银行后，发表《改组宣言》，提出银行的使命，“在以社会为对象，从事于其经济力与信仰心二者之集中，进而运用之于社会，为社会福”。实际上就是采用欧美资本主义银行的做法，运用银行的资本和信用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用于投资和放款。新华银行改组后大力举办生活储金（即活期储蓄，按十天最低余额计息）、存取两便储金、礼券储金（可转存各种储蓄，从填发日起息，也可向国货公司购货）、零存整取储金、俭约储金（亦属零存整取，但每月存储数不限）、子女教育储金、整存整取储金、整存零取储金、存本付息储金和人寿储金（办法同人寿保险）等各种储蓄存款；开办代客户经理房地产、代管理证券投资等各项信托业务；以及通过代收学费、水电费、牛奶费等各种服务方式，集聚社会零星资金。并先后设立十个市区办事处和吴淞、闵行、洛社等乡村办事处，机构之多在上海银行业中数第一。同时努力革新人事，吸收大中学校毕业生，注意选拔人才，优秀的还资助出国留学或考察。在职工福利方面，举办福利资金、子女教育补助金、业余进修补助金、医务室免费门诊、人寿储金等，对工作满二十年的老职工还赠送“欧米茄”金表，强调“新华精神”，喻银行为“大家庭”等，培养工作人员为银行终身服务的思想。几年之内，银行业务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上海银钱业中比较有朝气的一家新型银行。

王志莘过去在职教社工作时，就提倡“振兴实业，职业救国”，主持新华银行后，通过银行投资和放款，支持国货产销事业，因此先后担任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棉麻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资金运用则取稳健方针，如该行1932年底各项投资和放款中，有价证券（主要是公债）投资占百分之五十六以上，多余寸头大半转存中、交两行。他除主持新华银行外，曾长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负责为该社筹措经费。1936年还应邀兼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常务理事及协理。1937年担任赴泰国使节团团员，出国考察。1939年又应钱新之邀请，兼任交通银行设计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志莘经香港辗转到达重庆，于重庆设立新华银行总管理处，管理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分行业务。同时保留总行于上海，由副总经理孙瑞璜主持，管理沦陷区的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广州、厦门等地分行业务。王志莘在重庆时，除主持新华银行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联合票据承兑所和联合征信所的主任委员和总经理等职务。他从抗战后方与各方人士接触和现实情况的教训中，思想上逐渐追求进步，主持进步事业。他曾对当时资金困难的生活书店一次给予贷款十万元。国民党特务造谣说生活书店接受共产党津贴，对它搜查迫害，后来又予以查封，王亦因此受到特务注意。1943年王去昆明时，在重庆机场被阻回，不许他离开重庆。1944年国际商业会议开会，王被选任中国代表团顾问，赴美出席会议。会后访问欧美一些国家作业务考察，至1946年初才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重庆新华银行总管理处撤销，仍由上海总行领导各地分行业务，并增设香港、长沙、苏州、无锡等分行，广州、汉口两分行也先后复业。此外，并与世界各大城市通汇，业务进一步发展。194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筹组，王志莘被推为常务理事兼总经理。当时他想把它改造成为新的投资市场，结果事与愿违，乃主动脱离。1947年当选为“国大代表”。

王志莘对金融理论素有研究，著有《中国之储蓄银行史》和未出版的《合作金融》等书稿。他长期担任银行学会理事长，对银钱业从业人员的学习热心支持。1946年，他担任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会主席和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董事长。这两个组织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但他并不知道。

解放前夕，国民党胁迫各界知名人士去台湾，王志莘不为所动，坚守岗位，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和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新华银行是首批公私合营的银行之

一，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和支持下，业务迅速发展，还增设了青岛和南通分行，存款总额占全市合营、私营银行之首。1950年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肯定了新华等合营银行在改造企业和开展业务方面的成绩，提出了集中经营是私营金融业的新方向。会后，王志莘就和其他四家合营银行负责人磋商，于1951年成立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半年后又扩大为有十一家大型银行参加的联合总管理处，他担任联合董事会常务董事和总管理处第一副主任；1952年金融业全行业合营，他担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和总管理处第一副主任（后改称副总经理）。在金融业改造中，他协商各方，沟通公私关系，协助筹建机构和安排人事，发挥了带头和桥梁作用。

在努力推动金融业改造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财经出版社副社长等职。他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事业十分关心，多次向台湾亲友广播，希望促成祖国统一。1955年他患胃癌，但仍非常达观，表示“愿以有生之日，尽可能为国家效力”，抱病参加各种会议和人大代表团视察活动。

1957年2月2日，王志莘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王志莘编：《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34年版。

朱锡祚：《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黄炎培：《王母朱太夫人传》。

王郅隆

熊尚厚

王郅隆，字祝三。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于天津。父亲是粮商兼管运粮船的船帮把头。王少时入天津一家粮店当学徒，因舞弊被掌柜辞退。嗣后转做粮食和木厂掮客，兼营元庆木号。他善于投机，在一次买空卖空中发了横财。之后，他凭借钱财进行政治钻营，纳捐得清廷候补道衔，历任黑龙江、湖北、安徽等省盐务采运局总办，成为天津著名大盐商。1902年英敛之创办天津《大公报》，王为大股东。1910年张新吾等创办天津华昌火柴公司，他入股任董事，1918年华昌与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合组丹华火柴公司时，仍任董事。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勒令返回河南老家“养病”，安武军的倪嗣冲也回到天津，王郅隆利用各种机会同倪嗣冲拉上关系，结为密友。1913年7月，倪嗣冲任安徽都督后，王任倪嗣冲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常驻京、津，为其采办军需供应。同时，由倪嗣冲、段芝贵等出资，在安徽、河南等地贩运食盐，成为倪嗣冲的财政掌管人。他通过倪嗣冲的关系与段祺瑞手下干将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等结党营私；与段芝贵等侵占了长芦盐商何炳宗等的资产后，组设天津长顺盐业公司攫取巨利；还和段祺勋、靳云鹏、许世英等合办河北井陉正丰煤矿公司。1914年周学熙任财政总长，以“支大收小”为由[(1)]，取缔了长顺盐业公司，改由芦纲公所承办，王曾多次试图恢复未成。

1916年春，天津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换，他在天津开办了保市银行。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在政治上更加得势。他通过段、徐等人，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等拉上关系，并参加了日本僧人吉井芳纯在日租界金刚寺设立的中日密教会（会长段祺

瑞，副会长王揖唐、高凌霨），与王揖唐、倪嗣冲、张弧等，号称“八大金刚”。同年9月，王郅隆接办英敛之的天津《大公报》，聘胡政之任经理兼编辑，自任总董。

1917年5月，周作民、吴鼎昌等创办天津金城银行，王为该行发起人之一，投资十万元，曾任该行第一、二届董事兼总董。同年8月，王和日商大仓洋行、日本棉花会社合办天津裕元纱厂（1918年后，日资先后退出，改由大仓洋行给予贷款），资本二百万元，主要投资人还有王克敏、陆宗舆、倪道杰等。次年4月投产，后资本额增至五百余万元，五年之内获纯利六百余万元。1923年后，由于欧美列强势力的卷土重来，以及官僚办厂承担利息过高，裕元负债额达二百九十万日元，遂为日商所吞并。

段祺瑞因对德国宣战问题，于1917年5月被总统黎元洪解除总理职务后，一面策动张勋反黎，一面派徐树铮去奉天联络张作霖，同时还派王郅隆去拉拢倪嗣冲。结果段祺瑞借张勋复辟之手赶跑了黎元洪，接着又用“讨逆军”名义讨平了张勋，重新上台。同年11月，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组成安福俱乐部作为政治工具，王郅隆担任了安福俱乐部常任干事兼会计课主任，成为安福系的干将、财经掌管人。1918年2月，当冯玉祥部在武穴发出寒电反对南北战争，直系将领陆建章以安徽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在鄂皖边境给主战的倪嗣冲以极大威胁时，他和徐树铮密商，引奉军入关助战，以解倪的受迫处境。8月，安福国会组成，王任参议院议员。1918年到1919年间，王为段祺瑞、张作霖、倪嗣冲之间的勾结，常奔走于奉、皖之间，随同安福系的得势而大显身手。倪嗣冲曾向段祺瑞推荐王任财政总长，又亲自活动安徽省长及南北和议北方代表，均未得手。此外，他还帮助皖系军阀秘密向日本购买军火。1919年王假段祺瑞政府参战处名义，开办荣庆米行，每月购江浙大米二三十万石北运天津，出口日本获取厚利。1920年春，他利用严重旱灾，大肆囤积、高价出售大米，又大发横财。同年4月，徐树铮在天津创设边业银行，他为该行发起

人之一，任董事。王郅隆十余年来依靠安福系势力聚敛致富，到1920年前后拥有资产约计四百五十万银元[2]，被视为“安福财阀”。

1920年7月，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王郅隆被列为第一批祸首，遭直系的通缉。他得日本大仓洋行经理的庇护，后离京避居天津日租界。皖系军阀为东山再起，1923年王郅隆随徐树铮辗转到达日本，与日本军界、财界洽商，筹借军费；同时为扩建裕元纱厂向日本大仓洋行商谈借款。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王郅隆在地震中被难，死于横滨。

主要参考资料

濑江浊物编辑：《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总第27期，1962年。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刘冰天：《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日］外务省情报部编：《王郅隆》，《改订现代支那人名鉴》，东亚同文馆1933年版。

---

(1) 鸿隐生：《安福秘史》，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年版，第9页。

(2) 四川《民视日报》五周年纪念刊，1926年10月10日。

王缵绪

马宣伟

王缵绪，字紫泥，号治易。1886年10月23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西充，家资殷富。王缵绪幼年勤奋好学，受业于举人，善书法，工律绝，好收藏书籍。1903年他考取秀才，1907年考入四川军事讲习所学习。1908年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成都开办，他转入该校深造，与刘湘、杨森、唐式遵、潘文华、鲜英等同学，为后来在川军中形成之“速成系”之一员。王缵绪毕业后被分发到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见习；1910年任陆军第十七镇炮兵排长，与队官（连长）杨森关系亲密。

辛亥革命后，川军编为五个师，王缵绪在第一师任连长。1913年他随团长刘湘进攻熊克武、杨庶堪率领的讨袁军，升任营长。1916年初，王缵绪又随刘湘进攻护国军，受到袁世凯的嘉许，被授予五等嘉禾章。1918年1月，他被授陆军炮兵上校衔，同年4月升任第二师第八团团长。1920年3月，刘湘策动在滇军任独立团长的杨森率部回川，委以第九混成旅旅长，并将王缵绪的第八团拨归杨森节制，王又与杨森共事。5月，王缵绪升任旅长。

1922年6月，杨森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率部与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开战，王缵绪随杨出战。杨军号称十一个旅，于7月8日乘轮东下，分道袭击一军喻培棣、余际唐等主力。第一军以退为攻，主动撤出梁山（今梁平县），放弃绥定、渠县等地。杨部穷追不舍，遭到第一军全线反击。王缵绪旅遭到猛烈反击后退时，又遭刘伯承部袭击。王随杨森冒雨觅得木船逃往南岸，再乘船逃往武汉投吴佩孚。杨森、王缵绪为了重新组建队伍，在吴佩孚的授意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的支持下，由王出面，以绑票方式胁迫原川汉铁路负责人将储存在汉口银行

的铁路股款提取出一百万元，作为军饷和购买枪械的费用。王缵绪从中先提十万元，购得步枪二千四百支、轻重机枪六十挺和一批子弹。他将枪弹运到夔府，再派人回乡招兵，在川鄂交界地区招募农民三千余人，成立了两个团和一个营的部队。这便是王缵绪一生引为自豪的“夔府成军”。

吴佩孚为图谋四川，委杨森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王缵绪为第三十二旅旅长。1923年，王与杨森在吴佩孚的援助下，打回四川。杨、王出兵先占万县，然后联合川军邓锡侯、陈国栋等部与熊克武等部交战。1924年2月，王缵绪随杨森攻占成都。北京政府3月20日授王陆军少将军衔，6月3日再授陆军中将军衔。杨森出任四川督理，总揽全川大权。王缵绪深恐杨森对自己用而又疑，便在自己左臂上用针刺一“森”字，再用蓝靛染上，令其部队官兵仿此刺字，以表忠心；杨森十分欢喜，委王兼任成都市市政督办。王缵绪上任后按照杨森旨意，在成都兴修马路，又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开辟公共体育场，成立通俗教育馆。

1925年1月，杨森发动统一四川之战，王缵绪被委为川军第一师师长兼北路总指挥。他率部由金堂、中江出发，占领乐至后向遂宁推进。王缵绪原对杨森任四川省督理仍兼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心有不满，对杨森重用子侄也极端反感。刘湘侦知王、杨矛盾后，便派第十师师长鲜英以同乡、同学的身份拉王倒戈重回刘湘部，许诺任他为第十六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于是，王在进攻中按兵不动，7月31日在遂宁发出“息兵弥战”通电，使杨森部全线崩溃。战后，王如愿获得第十六师师长职，从此成为刘湘的部将。他率部到资中、内江、荣昌、隆昌等地驻防，组织“怜民社”，自任社长，要求全师军官一律参加。1926年11月，川军先后易帜，刘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王缵绪任该军第四师师长。

1930年5月，王缵绪兼四川盐运使。他恢复了已废止的专商运盐制，名为招商承包，实为多数政客、军人及其家属化名垄断运、销，

操纵盐价，牟取暴利。此时，他利用盐商出钱，在重庆创办《巴蜀报》，以黄绶任社长兼总编辑；又于1932年在重庆张家花园创建巴蜀小学，以后发展到初中。学校以“公正诚朴”为校训，请国文教员叶圣陶创作了校歌歌词。

在刘湘与刘文辉展开争夺四川霸权的两年交战中，王缵绪率师一直攻占乐山一线，助刘湘在四川夺得霸主地位。1935年1月，王缵绪升任第四十四军军长，辖三个师九个旅。这时，蒋介石派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做分化川军的工作。王见风使舵，开始投靠蒋介石。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四川，王缵绪率十五个团在绵阳、江油、邛崃和大邑等地围追堵击，以示对蒋之忠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湘率大军出川抗战，王缵绪所部四个师留守四川。1938年3月，蒋介石任命王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辖廖震第四十四军、许绍宗第六十七军。4月，由副总司令许绍宗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蒋介石为安抚川康地方实力派，收回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的成命，以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王欣喜之余感到自己名分不正，急于想去掉“代理”两字。于是经四川复兴社负责人介绍，在6月办了加入复兴社手续，取得蒋介石的信任。8月1日王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主席。王就职后，对刘湘的班底大加裁撤，尽量安插蒋介石的亲信，引起川军各派将领的不满。王又向蒋介石密报了云南省主席龙云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签订的滇、川、康三省联防密约。刘文辉等感到王缵绪出卖川康利益，授意彭焕章、刘元塘、刘树成、谢德勘等七个师长，于1939年8月5日通电反对王缵绪，各地进入战备状态。王用“请缨出川”摆脱困境，于9月率领新编的四旅人马出征，参加“宜沙会战”。战后王率部坚守大洪山一年零三个月，于1942年3月调河南新乡整训，后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他指挥“滨湖战役”；同年11月又率部参加“常桃会战”，战后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月，王缵绪任重庆卫戍总司令，5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于1946年6月28日改组，王缵绪调任武汉行辕副主任，后又改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王历居副职，多是空有其位，闲居成都，常与文人鉴赏金石书画、吟诗作赋以消遣。1949年12月初，王被委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劝请准备起义的刘文辉、邓锡侯返回成都。刘、邓等于12月9日在彭县发出起义通电，王徒唤奈何。蒋介石随即撤离成都飞往台湾，王缵绪见大势已去，立即取消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职，成立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搜集残兵败将，维持成都地区的治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王缵绪于12月13日发出起义通电，25日在成都召开各人民团体会议，宣布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王缵绪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成都市人民代表等职。他对这些职务认为太低，于1956年借治牙为名，化装潜往深圳，准备由罗湖桥偷越出境，中途被边防军俘获，押至成都收审。

1960年王缵绪病死在狱中。

主要参考资料

《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同官录》，四川省档案馆藏。

《弁目速成两校同学录》，四川省档案馆藏。

马宣伟等著：《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川康督办公署档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马宣伟等著：《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卫立煌

严如平

卫立煌，字俊如。安徽合肥人。1897年2月16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生。父卫正球，为本县石塘桥乡册书，登记管理当地田赋，1905年殁于瘟疫。此后全家赖其大哥卫立炯在县任职维持生计。卫立煌少时入邻村私塾就读。辛亥革命后，卫立炯任和县军事训练班主任，卫立煌亦前往和县，受到大哥及其友人革命思想的熏陶。“二次革命”起，和县宣布独立，袁世凯派倪嗣冲出兵镇压，卫立煌随大哥加入群众武装队伍抵抗，失败后潜回家乡。

1914年初，卫立煌去汉口报考学兵营被录取。结业后，卫不愿去北京入北洋军，到上海寻找革命党人。后南去广州，入朱庆澜的省军，旋任班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卫立煌被选派参加孙中山之卫队，不久升任警卫团排长。1918年5月，孙中山命陈炯明、许崇智率“援闽粤军”入闽讨伐李厚基，卫立煌奉派编入粤军第二支队。在一次夜战中，队伍被冲散，卫挺身而出，集合百余人袭击敌军指挥部反败为胜，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战功升任营长。此后，卫立煌在粤军许崇智部转战广西、江西、福建，并参加镇压商团叛乱和东征平定陈炯明叛军，战斗中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先升任团长，后又任补充旅旅长。1925年9月，粤军首领许崇智离开广州，所部粤军被改编，卫立煌旅被缩编为第九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卫改任团长。

1926年7月北伐军兴，卫立煌第九团先编入总预备队留粤，10月在何应钦指挥下入闽作战。在永定、松口两战中，卫立煌英勇沉毅，兼富谋略，立下战功，先升任第十四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不久又任师长。平定福建后，卫部北上入浙，与孙传芳军作战。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第十四师驻南京，后移镇江。8月下旬在龙潭战役中，卫率第十四师自镇江进占龙潭车站北侧之高地，日夜鏖战，全力拼杀六昼夜。击溃孙传芳军后，第十四师等部乘胜渡江追击，直至蚌埠。10月，第一军扩为第一、第九两军，卫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旋北上入陆军大学将官特别班第一期进修。

1930年初，卫立煌奉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任师长。在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第四十五师奉命保持津浦线南段的畅通。中原大战取胜后，蒋介石接连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2年5月他调集二十五个师又七个旅，分兵三路进犯鄂豫皖苏区，卫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率李默庵第十师和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于6月先在平汉线南段花园车站附近活动，8月占河口后向黄安（今红安）前进，与红四军、红九军等红军主力遭遇，第十师在冯寿二地区受到伏击，消耗兵力甚多。第二纵队等部在黄安、新集、七里坪等地与红军激战受重创后，均停滞不前。蒋介石下令各纵队向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进击，重申将来设县时以先占者名字命名。9月，卫率第六纵队自新集北进策应第二纵队，于18日走山间小路袭占银山畈，越过大别山北部之蒙家山，与红军交战后进抵汤家汇。红军为保存力量转移东去，卫部第十师主力遂于20日乘虚进占金家寨。事后，蒋介石划霍山、商城、六安等县的边境地区设县，命名为立煌县（今金寨县），并任卫为“豫鄂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在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卫又被任命为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

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调兵镇压，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卫率主力沿闽江疾趋仙游和惠安东北之涂岭设伏，袭击十九路军南撤队伍；1934年2月，改编在泉州的十九路军余部。蒋对卫听从调遣、虽非亲信嫡系而肯效力作战，深为满意。以后，卫先后被任命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兼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豫鄂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

兼三省边区督办、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6月，他兼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犯平、津。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请缨北上，第十四军三个师迅速北调。部队开到保定，北平已失陷，乃绕满城至易县，进入太行山脉东侧；旋北进至北平西郊门头沟附近之千军台，与日军接战。1937年10月初，卫率部自石家庄入晋，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在忻口一线集结重兵，除李默庵第十四军、郝梦龄第九军外，还有刘茂恩第十五军、陈长捷第六十一军等，共约十万人，正面防御自晋北南犯之日本板垣第五师团等部共五万余人。卫指挥各军奋勇作战，在忻口地区展开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防御战。广大士兵满怀民族义愤同仇敌忾，坚守阵地，大量杀伤日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等在战斗中阵亡。忻口战役在卫立煌指挥下支持了将近一个月，寸土不让，歼灭日军二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锐势，鼓舞和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直至日军占石家庄后沿正太线突破娘子关直奔太原，忻口阵地侧背均受到威胁，卫才指挥守军撤至太原城北。11月8日，太原陷落，卫指挥各军撤向汾河以西、太原以南地区，集结在汾阳、平遥一线，继续抗御日军南下。卫作风谦和，对杂牌军不存门户之见，能够一视同仁，因此各军多能协同对敌。1938年1月，卫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1939年1月，卫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9月兼任河南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翌年又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卫周密布防，在中条山背水为阵，保卫黄河，与日军对峙四年不懈。

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统率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袭击日本侵略军。卫立煌钦佩八路军英勇抗日，在作战部署及战术配合等方面相互密切合作。1938年春节，卫亲去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贺年，并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建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开展抗

日宣传活动。3月，卫率一部东去中条山，在大宁遭日军袭击，朱德接卫电后即派八路军驰援；此时驻石楼的日军又扑来，八路军一部赶至白儿岭奋勇阻击，掩护卫等脱险，卫深为感动。4月，卫偕参谋长郭寄峤等人自永和渡黄河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待和宴请，毛泽东称赞卫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使卫更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念。他督促所属按时向八路军供给足够的饷械，遏制所部与八路军闹摩擦。对于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游击战，卫都表示支持。他说，二战区的军队，凡是打日本的，都应当一视同仁，曾一次拨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给八路军。以后在第一战区，他与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亦有较好的合作关系。他还请朱德向所部官佐演讲世界形势、抗战前途和游击战术。

自1938年冬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提出许多“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唆使部属制造反共摩擦。卫立煌认为这不符合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方针，予以敷衍和抵制。1939年10月，国民党特务伙同当地反动势力，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伤残病员和家属二百多人。卫震怒之余，将南阳专员朱玖莹撤职，并惩处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别廷芳等有关人员。1940年二三月间，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向太行区八路军驻地进犯，遭到八路军自卫还击。朱怀冰急电向卫求援，卫拒下驰援令，结果朱部主力及反共游杂武装共万余人被歼。卫还不顾蒋介石、何应钦之电令，照常给八路军发放饷械。1940年秋，蒋命卫北上太行山，遏制八路军向南发展。卫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摩擦。蒋介石指责他偏袒八路军，于1942年1月将他调离第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改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剥夺了他的军权，并派人暗中监视。

1942年3月，我国组建中国远征军，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以确保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畅通。卫立煌被任命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

官，但还未到任，被指为偏袒八路军有据，蒋介石即于4月改派罗卓英任之。远征军援缅作战失利，大部退回云南。1943年蒋介石重组远征军，10月命卫立煌接替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卫到任后，在保山县马王屯建立前进指挥部亲自坐镇。他除了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保证远征军有足够的粮秣外，还与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建立友好联系。美方建立一支代号为“Y部队”的联络部队，负责向远征军供应弹药和武器装备，以及组织空军配合作战。卫部署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担负攻击集团军任务，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集团军，另以何绍周第八军及第五军高吉人第二〇〇师为直属预备军在昆明待命。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指挥远征军发起攻势。第二十集团军先后由栗柴坝、攀枝花渡过怒江发动攻击，第十一集团军的四个加强团亦分别由惠通桥、蚌董渡等地渡过怒江。第五十三、五十四军经过激战收复唐习山、大塘子，向腾冲攻击前进。第五十三军由高黎贡山东坡强攻，在罕无人迹的悬崖峡谷攀行三昼夜，到达山顶后乘势猛攻，日军惊惶失措，放弃阵地，退入据点固守。第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奏效后，卫立煌改变部署，指挥第十一集团军也全部渡江，参加攻击。8月，卫指挥所部围攻松山，猛击腾冲。日军凭借坚固工事拼死顽抗，但我抗日将士在滇西人民的支援下英勇战斗，终于在9月7日攻克松山，14日收复腾冲，击溃日守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及滇西日军指挥部；11月3日光复龙陵，20日进占芒市。卫指挥远征军乘胜追歼日军，12月1日克复遮放，1945年1月20日攻克畹町和猛卯，继续追击至南坎以西。经过远征军九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盘踞在滇西和中缅边境两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共被歼灭一万七千余名。在远征军节节推进的同时，郑洞国、孙立人率驻印军在缅北艰苦作战，次第攻占了加迈、密支那、八莫、南坎等重要据点。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遂即通车，被封闭近三年的对外交通运输线得到恢复，国际援助的抗战物资源源输入。卫立煌指挥远征军抗战奏捷，声震中外，3月被任命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但卫与

总司令何应钦的思想作风不合，难以合作共事，故不常到部问事。

卫立煌自1939年10月妻子朱韵珩病故后，独身生活数年。有人曾为孔祥熙之长女孔令仪说媒，为卫拒绝。1945年初，卫与旅美执教的韩权华在昆明结婚。韩是一个爱国心很强、音乐造诣和文化素养甚高的女子，她倾慕卫坚决抗日、具有民主思想而对卫感情真挚，婚后卫的心情颇为欢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亟谋发动内战，蒋介石以及陈诚等人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卫立煌主张国共之间的争执及八路军改编都应以政治谈判来解决，与内战叫嚣格格不入。1946年春，卫由重庆回南京。不久，内战烽火四起，卫态度消极，深居简出。11月，卫偕韩权华启程赴美，考察军事，历时半年；继又旅欧，在英、法、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参观考察。他深为国内战事日剧而焦虑，在欧洲曾让亲友通过法国共产党人与延安联系，表示愿为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进行合作。回国途中，他还参观中东各国，直至1947年秋返抵上海。

此时，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败北，尤其是东北战场，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被迫退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1948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猛烈的冬季攻势，蒋介石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并解脱其亲信陈诚的困境，下令卫立煌继陈诚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剿匪”总司令。卫推辞未成，北上就职。他力谋掌握一些实力，并部署各军屯守沈阳、长春和锦州，只是整训部队，修筑工事，竭力避免出兵与解放军交战，争取东北战局能够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要东北军队出击，打通北宁路（今京沈线）沈锦段，将主力撤到锦州，以备转入关内。卫以兵力不足、地势不利等理由加以拒绝，相反要求蒋从关内增援三个军的兵力登陆葫芦岛来打通沈锦段，与蒋争执迭起。嗣后，蒋径自向范汉杰、杜聿明、廖耀湘等人发出指令，自行其是。卫坚持按兵不动，只想多掌握一些部队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以待时局的变化。

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蒋介石不顾卫立煌的反对，以廖耀湘第九兵团等共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新民出彰武和新立屯；又以锦西、葫芦岛的守军及从华北海运来的援兵共九个师组成“东进兵团”，沿铁路线北上增援锦州。蒋责备卫不肯出兵辽西是不想打仗，一再到沈阳及葫芦岛、锦西直接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主力攻打锦州，将“西进兵团”阻击于新立屯以北地区，并将“东进兵团”挡在塔山阵地以南，于10月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激战三十一个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解放锦州。18日，蒋介石又抵沈阳，以卫立煌指挥不力，命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开赴黑山、大虎山，企图夺回锦州。卫立煌要廖退守沈阳的主张，被蒋严词拒绝。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经两日一夜激战，至28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万余人在辽河以西、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全部被歼，廖耀湘亦被俘。长春已先于19日解放，沈阳此时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下，一片混乱。蒋为推卸责任，此时又命令卫为东北“最高指挥官”，叫卫在葫芦岛继续指挥。11月2日沈阳守军被歼，东北全境解放。卫退抵北平。

东北战局是蒋介石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的，但他11月30日以“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的罪名下令将卫立煌撤职。卫携眷属离北平经上海至广州，但被拦阻而返回南京受软禁。卫在苦闷之中醒悟自己误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决心与其断绝关系。1949年1月蒋下野，卫于春节潜离南京，到香港寓居，闭门阅读各种书刊。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来游说卫去台湾，卫均峻拒。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热烈祝贺。1955年3月，卫立煌为祖国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成就所鼓舞，决然离港返回北京，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受到祖国和人民的欢迎。卫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1960年1月

17日卫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卫道然：《卫立煌将军传略》（手稿本）。

温广汉对卫立煌的回忆（手稿，1979年—1981年）。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7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983年版。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韩权华对笔者的两次谈话（记录稿）。

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1947年5月20日—1947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502页。

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月报》1955年第4号。

魏如

李新辉

魏如，原名汇茹，字子拔。浙江诸暨人。生于1897年4月3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二）。他的祖父魏彭年、父亲魏奕圭均系秀才，以教书为生。1910年魏如考入浙江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为该校监学。辛亥革命前夕，该校革命气氛浓厚，魏如参加秘密组织“革命社”。1913年校方无端迫害四名毕业班学生，魏作为三年级级长，领导全校学生罢课，以示抗议。罢课失败，他被开除学籍，并通报全省。1914年，魏如改名大刚，进入美国基督教教会在杭州主办的之江大学。半年后，因对基督教持异议而退学，在乡村小学教书谋生。1915年入浙江第三中学读书，1916年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魏如在校担任学生评议会书记，并兼任宣传队长，曾多次上街向市民宣传。

1920年魏如毕业后，先后入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华商华昌贸易公司、英商久胜洋行担任练习工程师、工程师。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外商洋行的中国雇员全体罢工，魏出于爱国热忱，与同学支秉渊、吕谟承、朱福驷等每人出资二百五十元开设新中工程公司，寓意“新中国”。魏如等人白天仍在洋行谋生，利用业余时间，代客设计洋行不愿承接的特殊电气和机械装置。半年后，新中公司约请原在慎昌洋行的工人吴梅生加入，开设工厂，用人力车床等简陋机械，制作抽水机和柴油机。1926年先后仿制五马力和八马力柴油机成功。

1927年，魏如工作的久胜洋行并入英商怡和机器有限公司，他入该公司动力部门为工程师。虽然报酬优厚，但魏总觉为外人服务于心不甘。1929年魏的同学王崇植被任命为青岛市工务局长，魏遂辞去怡和公司职务，应王之邀赴鲁，任青岛市政府技正兼自来水厂总工程

师，先后为青岛市设计和改装全市路灯以利照明，为自来水厂改装设备使夏季供水无缺。不久王离任，魏见官场腐败，辞职回上海，专任新中厂工程师。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地处闸北的新中厂全部毁于炮火。原任厂长吕谟承转任南通大生纱厂工程师，魏如接任新中厂厂长。在几年中，新中厂逐步恢复了机械制造部门，先后研制、生产三十六、五十四、六十七、九十马力新式柴油机，并兼营各种修理装置业务，承包建筑铁路、公路桥梁。在1934年和1935年先后承包了粤汉、浙赣、苏嘉等铁路桥梁数十座，获利甚丰，工厂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1936年试制成功四十五马力汽车用高速柴油机，效果良好。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魏如和支秉渊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帮助下，将新中厂迁至武昌购地造厂，准备长期制造汽车发动机。但未及半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魏在危急中一面安排工厂撤退，一面组织人员协助汉阳兵工厂拆迁。

魏如等将新中厂迁至长沙，喘息未定，又逢长沙大火，仓促间再移祁阳，制造专供汽车使用的煤气机，并装配汽车。抗战时期石油匮乏，这种煤气机汽车在内地发挥了作用。从1938年到1944年的几年中，新中厂在祁阳逐步发展，先后开设了锻铁、铸铁、炼钢、轧钢、金工、发电等十一个工场，生产各种煤气机、蒸汽机、切削机床、抽水机、鼓风机等。为了保证机器制造的原料需要，魏如又与银行家吕越祥等合办了民生炼铁厂，并招股开设了七里桥煤矿公司，开采烟煤以供发电之用。这时，新中厂就职工人数、业务及生产品种来说，都算是内地私营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家。

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攻湘桂路，逼近祁阳，新中厂又一次受到严重威胁。魏如除给不愿撤退的工人发给少数费用遣散外，将一千多吨机器设备迁往四川，先由湘桂路运往柳州，再经黔桂路辗转运往重庆。由于黔桂路秩序混乱，新中厂的器材几乎散失殆尽。撤退员工与

家属沿途忍饥挨饿失散不少，又遇瘟疫，有的死于途中。退到重庆时，工人只剩一百余名，图纸和器材不满一车。新中厂一面由支秉渊带了一笔定金到美国去买旧机器；一面由魏如接受资源委员会的任务，在重庆开设分厂，生产四十五至二百四十马力煤气机，并制造迫击炮弹的引信，工厂逐渐重新发展起来。不久，新中厂与内迁各厂在重庆举办产品展览会，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莅临参观，大为赞扬，并题词："供应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的第一要义。"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魏如由胡厥文介绍入会。这时，国民党政府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内迁工厂无事可为，发不出工资，普遍解雇工人，停工停产，引起工人罢工。魏如与马雄冠等人邀集在重庆办厂的一百多位厂主，组成请愿队，先后向国民政府翁文灏、宋子文等人请愿，要求建造成渝铁路，以维持内迁工厂的生产。宋子文一心要进口外国设备，坚决不允在建造成渝铁路时使用国货。从这些现实教训中，魏如对国民党政府的媚外行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资源委员会乘内迁工厂处于困难之机，出面收买各厂机器设备，实际上是要并吞内迁工厂，扼杀民族工业的生机。对此，魏如坚决拒绝。他在1946年春回到上海，购得厂房，买了一部分日本赔偿的机器，加上由支秉渊从美国买回的机器，恢复了上海新中厂。

由于国民党政府大量倾销美国剩余物资，民族工业生产不断缩小，新中厂在极端困难中挣扎。这时，魏如经常参加民主建国会的秘密会议，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秘密材料，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军工生产订货。新中厂紧缩开支，四处筹资金，找货源，勉强维持生存。在发不出工资时，魏宁愿抵押材料、机器去借款，也不为国民党政府生产内战所需的军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魏如积极恢复和发展新中厂生产，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评为“完全守法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带头将新中厂公私合营。1953年，魏如担任公私合营新中动力机器厂厂长，1956年后任上海农业机械公司（后改为汽车拖拉机工业公司）经理。

魏如从1953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民建副主委、代理主委等职。

1966年10月18日，魏如在上海病逝。按他生前嘱咐，遗体捐赠医院解剖。

主要参考资料

《魏如自传》（未刊稿）。

上海市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

周维本、金文秋等人的回忆。

温生才

杨天石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家里很贫穷，又无依靠，幼年时就被人诱到南洋荷属殖民地去做童工[(1)]，后归国给人家做仆役，又曾投身行伍当兵。1903年左右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做工。多年的苦难生活熬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某次，受当地技师无理鞭打，温生才瞪目怒斥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2)]。1907年冬，同盟会在该地设立阅书报社，温生才读了《扬州十日记》一书，反清思想因之勃发。其后，又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说，非常信服，便托人介绍见面。他向孙中山表示，情愿为"排满"牺牲性命。不久，加入同盟会[(3)]。1909年秋，与人在矿场开办广益学堂，白天汗流浃背地劳动，晚上聚会在学堂里讨论国事。由于觉得革命一时难以成功，温生才与华侨李佐汉等组织暗杀团，决心从暗杀着手，"誓除民贼"[(4)]。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拟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而作罢。1911年3月底，他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5)]，在给南洋怡保同盟会李孝章、李源水、郑螺生等人的信中，他说："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锡麟）、汪（精卫）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6)] 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机，孚琦等以下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暗藏五响手枪一支，在东门外一茶馆伺候到傍晚，见有卫队前呼后拥、喝道而来者，便从茶馆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开枪，连发四弹。卫队、轿夫见状，惊逃四散。孚琦毙命后，他向东校

场缓步走去。途中，被巡警等所捕。

审讯中，温生才气宇轩昂，谈笑自若。清吏要他招供，温说："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温随吃随谈，声言："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伸气。"又讲："以我一人，手枪一支，便吓杀数十旗兵，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官兵无用，将来对待外人，必不可靠！"(7) 清吏讯以同党，答称："十八省皆有，以广东为最多。"讯以何人主使，答称："出于自己。"讯以同党所在，答称："遍地皆是，惟伊额头无字，故不能识。"吓以刑法厉害，答称："何不取来试试呀？"(8) 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再讯同党及主谋姓名，即闭目不言，施以严刑，不言如故。4月15日，番禺县令再讯，温生才除痛斥官场腐败外，没有其他的话。县令喝令捆绑，温生才伸直两手，刽子手居然无法使之弯曲。赴刑场途中，温生才神色自然，绝无怯容，行至惠爱街闹市时，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既而又说："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9)

温生才牺牲后，南洋华侨曾编演《温生才新剧》以志悼念(10)。

---

(1) 《温生才传》，杨佣子（徽五）：《榕园琐录》卷6，梅县东山中学1944年印。

(2) 辟尘：《烈士温生才事略》，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4月18日；古宜：《书温生才轶事》，《南社》第23集，未刊稿，国家图书馆藏。

(3) 冯自由：《温生才事略》，《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李佐汉传》，秦孝仪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

(5) 一说为谋刺清军水师提督李准，但证以下文“看满贱种太无人道”，“先杀满官”等语，谋刺对象应为孚琦。

(6) 邹鲁：《温生才传》，革命纪念会编《红花冈四烈士传》，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版。

(7) 《神州日报》1911年4月16日。

(8) 《神州日报》1911年4月18日。

(9) 《神州日报》1911年4月22日。

(10) 《光华日报》1911年9月22日。

温宗尧

邵桂花

温宗尧，字钦甫。1867年5月21日（清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生于广东新宁（今台山县）[(1)]。幼年入香港官办中央书院（1891年改名皇仁书院）读书，与孙中山为先后期校友。1892年3月13日，温宗尧与杨衢云、谢缵泰等十六人于皇仁书院教员陆敬科寓所成立以开通民智、提倡新学为宗旨的“辅仁文社”，群推杨衢云为社长。不久尤列经罗文玉介绍成为社员，旋经尤列介绍杨衢云与孙中山晤面，中山以革命说之。温宗尧于皇仁书院毕业后，负笈赴美留学。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设兴中会总机关乾亨行于香港，“辅仁文社”并入该会，温遂成为兴中会会员。1897年，温宗尧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教习，之后，返港任皇仁书院英文教员。时编有《英文文法易解》两册（商务印书馆版）。温以精通中、英文兼充改定英国通商条约委员冯克伊之书记。

1900年7月，温宗尧经门生黎科之介绍，任唐才常之“自立军”驻沪外交代表。8月9日，“自立军”于安庆举事失败，负责人秦力山流亡上海，温宗尧闻讯，嘱王宠惠匿秦于南洋公学。21日，唐才常被捕后遇害。温宗尧南下，出任两广洋务局局长、广东电话局总办、广东将弁学堂总办、江苏候补道等。

1904年，温宗尧受廷命，随唐绍仪赴印度，处理有关西藏交涉事宜。1905年8月，温由印度返国。后入两广总督岑春煊幕，负责对外交涉事宜。

1908年，温宗尧奉廷命出任清政府驻藏参赞大臣。翌年6月27日，温宗尧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会奏筹办西藏事宜，列举开商埠、练

新兵、兴学堂、垦荒地、开矿山五端，并请添设参赞一员驻后藏。1910年2月，温宗尧奉命赴川。不久，温宗尧入两江总督署，任洋务顾问，后入京任外务部参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兴，各省纷起响应。11月2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24日，温宗尧与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托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Calhoun，William James）转电清廷监国摄政王载沣，请共赞共和政体。12月6日，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以醇亲王退归藩邸。18日，民国代表伍廷芳与袁内阁全权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召开南北议和首次会议。温宗尧等人为议和参赞。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温宗尧兼任议和参赞，10日，任温宗尧为上海通商交涉使。1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成立，温宗尧与伍廷芳交卸湖北军政府外交代表职务。2月3日，温宗尧与唐绍仪、章太炎、程德全、熊希龄等组织统一党，任参事。继之，温宗尧又与岑春煊在上海另组国民公党，温任副会长。

2月15日，全国各地举行中华民国统一大典。16日，国民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参赞温宗尧、汪精卫，以议和告竣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请辞议和代表职。17日，孙中山复电同意。4月16日，温宗尧辞去驻沪通商交涉使职，由陈贻范继任。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于北京召开成立国民党大会，选举孙中山等七人为理事，温宗尧等三十人为参议。9月20日，蒙藏交通公司于北京成立，举伍廷芳为总理，温宗尧、王人文为协理。12月3日，该公司以库伦事日急，呈请政府修筑张（家口）库（伦）轻便铁路。

1913年1月30日，温宗尧、伍廷芳、陈锦涛、王宠惠、王正廷等代表天津北洋大学全体师生，联名呈请教育部，取消北洋大学合并于

京师大学之议案。

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讨袁护国军兴。翌年4月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等由上海绕道香港，转抵广东肇庆。5月1日，护国军为谋统一指挥，于广东肇庆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温宗尧任都司令部外交局长，一致声讨袁世凯。2日，唐绍仪、温宗尧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以二十二省旅沪公民名义发表宣言，反对冯国璋东电，对其所提各款逐条批驳。

8日，滇、黔、桂、粤四省于肇庆成立护国军政府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并摄行抚军长职，唐绍仪为外交专使，王宠惠、温宗尧为副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25日，温宗尧与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电请黎元洪罢斥广东将军兼署广东巡按使龙济光职。7月14日，岑春煊以内部分裂日甚，宣布撤销护国军军务院，其抚军长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10月3日，黎元洪特任江苏督军冯国璋兼督办浦口商埠事宜，以温宗尧为会办。1917年3月，温宗尧与唐绍仪、章太炎等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5月11日，温宗尧与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等联电黎元洪，请严惩滋扰众议院之伪公民团。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次年5月，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在政学系和桂系军阀操纵下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改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制为总裁制，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1920年4月8日，广州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召开政务会议，议决免除伍廷芳的外交、财政部长兼职，保留总裁本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5月4日，政学系召集留粤议员开会，改组军政府，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代替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并重定各部部长，温宗尧得兼外交部长。5月15日，离

粤旧国会议员在沪开谈话会，宣言并声明，所有广州政学系议员私选总裁及政务会议任免职官及其他一切决议，概属违法，当然不生效力。

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及旧国会，决定移设军政府，谓：自今以后，西南护法各省区、各军，仍属军政府之共同组织。其广州现在假托名义之机关，已自外于军政府，其一切命令行动及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交本军政府。

针对孙中山等四总裁联合宣言，6月6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并通告北京政府：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代表业经取消。声明孙、唐、伍等宣言及一切行动无效。由于南方内部纷争，南北和谈也难进行。6月22日，温宗尧被北洋政府免去浦口商埠会办职务。其后，粤、桂派系矛盾发生，9月，温宗尧与陈锦涛访美、英、法三国驻广州领事，请其调停莫荣新与李福林、魏邦平之争。当驻闽粤军返粤讨伐桂系后，10月23日粤军攻占博罗，进逼广州。岑春煊以广州陷入重围，自知无法挽回颓势，是日通电全国，宣布引退。次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急电徐世昌、靳云鹏，声明即日辞去总裁、取消军政府。同日，岑春煊、温宗尧、李根源在广州英领事派兵保护下，乘“新疆号”离穗赴港。11月2日，温宗尧等抵沪，寓居上海不问政事。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等乘专车抵粤。次日，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1921年2月10日，广州军政府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李根源、温宗尧、杨永泰等人。

1932年1月23日至28日，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敦聘国难会议会员二百四十五人，温宗尧是受聘会员之一。4月8日，温宗尧曾到洛阳出席国难会议第一次大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7月末，平、津相继沦陷，日寇在平、津两地分别组织“地方维持会”。12月，南京陷于敌手。日寇又策划平、津两地维持会与1935年12月建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并于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接着日寇和汉奸又谋划于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拟拉唐绍仪任傀儡政府的首脑。日本特务机关指使温宗尧做唐绍仪的工作。1938年2月21日，温宗尧、陈锦涛、陈群、梁鸿志等一伙汉奸会商于上海汇中旅馆。随后由温宗尧往说唐绍仪，温面告唐开会情形，并请唐出山组织伪政府事。唐予以拒绝说，“如此我是不干的，而且我劝你也不必干”。22日，温宗尧偕陈锦涛复与唐绍仪晤谈，唐劝温、陈二人说，“我辈出处，应极端慎重，当此空前巨变之际，若稍有苟且，则一经投足，即无术自拔”。因此，温宗尧、陈锦涛亦曾抱消极之念。

然而说与做是两回事，温宗尧并未与唐绍仪同进退。1938年3月30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于南京，温宗尧出任伪立法院院长，投敌附逆，堕为汉奸，曾参与梁鸿志与日本华中驻屯军所签订的若干条约，承认日本所要求的鸦片专卖权及管理伪维新政府所属区域内自来水、电气、航行等项之特权。9月22日，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温宗尧是委员之一。12月，温宗尧与梁鸿志、陈箓等飞赴北平，参加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1939年6月29日，温宗尧在上海与汪精卫进行单独会谈，并积极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力主建立强有力的伪中央政府，温还建议与日、德、意共同缔结牢固的防共同盟。

1939年9月23日，温宗尧与梁鸿志、陈群等联合发表声明，公开表示支持由汪精卫建立的“中央政府”。同年，温宗尧任隶属于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民会”（兴亚会）副总裁。日人松室孝良操纵该会大权，致力宣传亲日思想。

1940年1月22日，在日本顾问原田熊吉的陪同下，温宗尧与梁鸿志、陈群等赴“青岛会议”。24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方举行第一次会谈，温宗尧为梁鸿志方面参加会谈成员之一。会议通过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政纲、政府名称、首都、国旗和成立日期等案。26日，会谈结束。3月19日，汪精卫公布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及出席“中央政治会议”三十人名单，温宗尧是伪维新政府方面政治会议三十名委员之一。22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议决通过伪国民政府人员名单。温宗尧出任伪司法院院长。24日，汪精卫公布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名单：主席汪精卫、温宗尧是当然的五委员之一。30日，重庆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严缉温宗尧等七十七名汉奸。同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于南京。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人员温宗尧等宣誓就职。温宗尧等袍笏登场为傀儡。诸逆合影留念，温与陈公博坐在汪精卫之左右。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并训令中国驻外使节照会各驻在国政府，郑重声明：南京汪伪政府或中国他处存在之其他伪组织，其任何行为当然完全无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深信世界自尊之国家对中国境内之日本傀儡组织决不予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承认。是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发表宣言，宣布自即日起解散。

3月，温宗尧等著《时论集锦》（兴亚社版），因属敌伪宣传品被查禁。5月，温宗尧新著《中日事变各要点评论》，因属汉奸宣传品，也为国民政府查禁。6月，温宗尧出任汪伪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1年2月1日，汪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于南京，汪精卫任会长，温宗尧为常务理事之一。4月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温宗尧连任第二届当然委员。1942年1月，温宗尧任汪精卫伪时局策进委员会副委员长（汪精卫为委员长）。3月，温宗尧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届当然委员。1943年4月1日，汪伪政治委员会通过该会第四届委员名单，温宗尧连任当然委员。

1944年11月10日，大汉奸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医

院。11月12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推陈公博为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新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8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特任梁鸿志继温宗尧之后为伪司法院院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9月28日，温宗尧被逮捕，先囚禁于上海军统看守所“楚园”，后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翌年11月30日瘐毙于狱中。

主要参考资料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1—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盛京时报》1905年—1937年版。

---

(1)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闻兰亭

汪仁泽

闻兰亭，字汉章，号庸庵。原籍江苏武进。1870年2月14日（清同治九年正月十五日）出生在江苏靖江季家市，其父为小商人。闻兰亭少年时在家乡私塾就读，十一岁丧父，十五岁经族人介绍进靖江一杂货棉布店当学徒。三年满师后，由友人推荐至武进俞大祥棉布号当职员，工作勤奋，应对敏捷，学到了从事棉纱布业买卖的本领。

闻兰亭二十一岁时，由店主派至上海该店联号的一家绸布庄当经理，与沪上花纱棉布业中领袖人物荣宗敬昆仲、穆藕初、刘国钧等广为结交。数年后，闻兰亭在上海自设纱布号，其后在沪郊各县及苏南一带设立分号，专为沪上各纱厂收购棉花、经销纱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闻兰亭利用民族纺织业空前发展的机会，扩大经营范围，在长江流域中下游一带城镇陆续设立分号、联号达五十多家，营业额在同业中跃居首位，成为纱业巨子，当选纱业公所董事。1938年创办上海纱业银行，自任董事长。

1920年，闻兰亭和虞洽卿等人共同在沪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虞洽卿任理事长，闻任常务理事，主持日常业务。闻为交易所制订各项规章制度，规定交易发生时，买卖双方必须交纳保证金。张静江等人常将不能兑现的支票强行抵充，以致造成巨额欠款，后由虞、闻等设法归还。孙中山在黄埔创办军校期间，虞、闻亦曾拨巨款接济。此后闻兰亭被推为全国交易所联合会会长、上海市总商会会董等职。1923年5月，津浦铁路一列北上火车，在山东临城遭匪首孙美瑶率众拦劫，车内中外旅客三百多人，悉数被掳为肉票，其中颇多上海工商界人士，家属纷纷要求上海总商会设法营救。闻兰亭被推为总商会代表，赶赴出事地点，日夜会同地方当局与匪首谈判，从中斡旋，

卒使中外旅客全部安然返回。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闻兰亭任上海特别市商整会执行委员、江苏省商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改任会长）。此时闻在上海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人排难解纷，开始广收愿受庇护的义子、义女三四百人，门生千余人。其中既有医生、画家、律师、教师，也有工商、党政各界人员。他并接受数十家工商企业馈赠干股，挂名董事长、董监、理事等职，成为海上闻人。1931年，长江水灾殃及十多省，灾民数千万，闻兰亭出任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济赈会干事长，带头向工商各界劝募巨款及大量救灾药品、物资，送往灾区分发。次年“一二八”淞沪战起，闻以红十字会会长身份积极动员各界捐献钱物，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设立伤兵医院，并组织医疗队、运输队，救护伤兵、运送物资，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1935年春，闻兰亭等人出面组织佛教界“和平护国法会”，掩护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是年秋，闻兰亭受任全国赈灾委员会常务委员，赶赴江西等地办理赈济水灾灾民工作。12月，又组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简称慈联会）救灾会，参加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军民奋起抗战。闻兰亭主持的红十字会设立伤兵医院，并组织战地服务队，成立红十字会救护队、医疗队、运输队，奔赴前线及各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开展战地救护、慰劳等活动。此时沪郊各县难民大量涌入租界，人数达七十多万。慈联会组成“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屈映光、闻兰亭、黄涵之分任正、副主任（屈于1938年初即离沪），闻几乎每天到会办公。该会动员停业的游乐场、剧院、学校等处收容难民，设立难民收容所五十多处，并发动各界筹募经费，供给难民衣食住宿。三年中收容、救济难民达五十多万人次。该会任用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赵朴初、朱启銮、杨昌镛、梅达君等任职；李一氓、曹荻秋、刘述周等也都先后参加收容工作。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难民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

救亡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先后组织三千多名进步青年，奔赴新四军等抗日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国民党和日伪方面，曾指名要求租界当局捕人，因有闻兰亭、黄涵之等人的保护而未得逞。

闻兰亭爱好京剧、书画、花鸟等。中年笃信佛教，家设佛坛，法号白莲居士，常游历各地名刹，捐款修缮寺院塔庙，并任中国佛学会副会长等职。此时他家中常有食客，日四五十人，其中既有中共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国民党方面在其家中设置秘密电台，与重庆方面联络。闻又应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职业界抗日救亡团体益友社等组织的要求，出任名誉理事，进行掩护。

1941年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多次威逼利诱闻兰亭出任伪职，为闻所拒绝。迨至1943年，日方筹设“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强迫闻出任负责人，闻以年高体衰为由拒之。不久，日本宪兵队突然侵入其住所，将闻绑架而去。三日后由工商界林康侯、袁履登等人将其保释。此时日本欲拆毁华商纱厂百分之三十三的纱锭，作为废铁“敲锭献铁”，纺织界人士焦急万分，一再就商于闻兰亭。有人以佛教名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相赠，要闻出面庇护。闻乃于1943年3月出任伪商统会监事长（1944年7月改任该会理事长，兼任伪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上海市民众福利协会理事长）等职进行斡旋，“敲锭献铁”一事被掩饰过去，使各纱厂免遭重大损失。此后“商统会”下设三十多个经济机构，中共党员渗入工作。闻兰亭在中共政策感召下，提供了这些机构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使中共方面比较详细及时地了解到敌伪经济活动。日方密令收购四十万件纱布等消息，都首先在延安电台揭发播出。后来，有些中共党员被捕，闻出面加以保释。抗战即将最后胜利之际，新四军一度准备进入上海，闻将“商统会”的重要档案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支持新四军接收上海，因此遭到国民党方面的仇视。

1945年9月，闻兰亭以汉奸嫌疑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6月提起公诉。在审讯过程中，国民党中统局出具公函证明闻出任伪职事

前，曾经该局转报中央同意；军统局组长等人出证在闻家设置秘密电台，受闻掩护；该局地下工作人员戚再玉、吴是沂及国民党市党部张红薇、陆惠民等人出庭证明，曾在上海被捕后均经闻营救出狱。几十家纺织厂亦共同具状作证，大批原棉、纱布、机器，幸赖闻的保护而得以保全；敌征购棉花、纱布也经闻的交涉，并采用拖延、“化整为零”等手法减少了损失。颜惠庆、徐寄廎、王志莘等人还证明，闻曾在敌统治区掩护抗日工作，对敌伪采取消极态度，不合作；并参与策动任援道反正。

在审讯期间，闻兰亭曾四次拒绝出庭。1946年9月5日受审时声明三点：“（一）本人不承认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更不承认是汉奸。（二）本人所担任伪职事务，事先系奉国民党中央命令，事后亦随时秉承中央之意志办理。（三）本人在军统局之一切口供及自白书，系出于环境所逼迫故应作无效。”[(1)] 著名律师江庸、沙彦楷等为闻所作的辩护词中称：闻“数十年来襄助革命，服务社会，可说完全为公，不为自己”。“被告并无假借敌伪势力，作不利于本国之行为，而是假借敌伪势力，作有利于本国之行为，故不能称被告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而应称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且出庭作证者“皆系自动前来，并非出于被告之自称和要求”[(2)]。沙彦楷说：“被告热心社会，如此下场，而真正祸国殃民者反逍遥法外，令人痛心！”[(3)] 即使如此，闻仍被法院于1946年9月12日判处徒刑八年，理由是“出任伪职”，但又称“综其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行为，不一而足”[(4)]，自相矛盾。闻不服，上诉。1947年1月，因病经核准保外就医。同年5月9日，最高法院认为闻“出任伪职系奉密令”一事，原审未予详研，上诉“指摘原判不当为有理由”[(5)]，撤销原判，发回更审。在更审中国民党中央党部专员嵇希宗出庭证明，闻出任伪职均经核准有案，掩护地下工作，“并在闻家设秘密电台，与中央暗通消息”[(6)]。8月5日，法院承认闻在“充任伪职期间，尚无不利人民行为”[(7)]，但仍改判三年六个月徒刑。闻仍不服，再次上诉。其后闻的病情日趋恶化，于1948年7月5日在医院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恽逸群：《记闻兰亭》，《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断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赵朴初：《我记忆中的闻兰亭先生》（赵致闻蕴如的信），上海市文史馆编《上海文史》1991年第4期。

---

(1) 《申报》1946年9月6日。

(2) 《申报》1946年9月6日。

(3) 顾雪雍：《上海闻人闻兰亭》，《人物》第6期。

(4) 《申报》1946年9月13日。

(5) 《申报》1947年5月10日。

(6) 《申报》1947年7月16日。

(7) 《申报》1947年8月6日。

闻一多

王子光

闻一多，原名闻多，字友三，辈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后，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个“一”字，改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岭。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造诣，一度参加过维新变革活动。

闻一多六岁入家塾读书，除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在这所学校前后读了九年半。他精力旺盛，读书很多，兴趣极广，观察问题敏锐，被同学公认为“博学之士”。

闻一多入清华不久，就编演了表现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热烈赞颂。1915年，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后又担任总编辑和《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编辑。1916年冬，清华学生成立专司戏剧演出的游艺社，他任副社长。1918年底，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又任编演部负责人。他“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1)]，是校内出名的编导和演员。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在清华中等科时，所作水彩风景画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以“图画冠全级”而得奖，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博览会[(2)]。1919年9月，他与同学杨廷宝等发起美术社，“以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为宗旨，发表《征求艺术专门者的呼声》。1920年12月，与杨廷宝、浦薛凤、梁思成等成立组成研究具形美术的团体“美斯司”，希望用“生命底艺化”促进生命的“高深醇美”[(3)]。

年轻的闻一多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他爱读李

白、李义山、陆游等人的诗，在外国诗人中喜欢济慈、雪莱、拜伦，这些诗人的作品对他的诗作有明显的影响。1920年9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开始以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出现在中国的新诗坛上。1921年创作十四行诗，并将这种体裁称之“商籁体”，受到新诗界公认，沿用至今。20年代他发表的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钻研新诗理论探讨。1921年6月发表《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音节底研究》报告，1922年3月写定论文《律诗底研究》，接着又在《创造月刊》先后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提出新诗既要接受外来影响，也要具有本地彩色等颇有创见性的观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当天深夜在清华食堂贴出岳飞《满江红》词，用以激发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中，清华成立学生自治会性质的学生代表团，他担任文书，负责宣传工作。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会后召开学联常会，他与罗隆基等人作为清华代表出席，并担任学联日刊股编辑。

1921年6月，闻一多念完了高等科四年级，正在迎接毕业考试，准备出国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的国立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闻一多积极参加北京学联的罢课声援，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拒绝走入考场。最后被学校给予留级一年处分，推迟出国[(4)]。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西洋美术。次年暑假后，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5)]，推荐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评选极严的一年一度的画展。

闻一多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后，逐步由学画改攻文学。他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为酷

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1924年秋，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与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等人共同编写排演了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又名《此恨绵绵》或《长恨歌》），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美国舞台的演出。留学期间，他关心国内局势。1923年暑假，与清华同级同学吴泽霖、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人发起提倡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大江会”。1924年暑假，“大江会”正式成立，成员还有吴景超、潘光旦、王化成、沈宗濂、梁实秋、吴文藻、顾毓琇、蔡公椿等人。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积极提倡者，曾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6)]

1925年5月底，为了发动国剧运动，闻一多放弃还有至少两年的留学，提前回国。9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回国前，并兼任油画系主任。在北京艺专，与余上沅、赵太侔经过努力，创办了国立院校的第一个戏剧系。1926年4月，与朱湘、饶孟侃等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表示对“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崇敬。文中说“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7)]。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是闻一多把文艺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表述。

1927年春，闻一多应邓演达的邀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亲自绘制了反军阀大幅壁画，悬于武昌黄鹤楼前，唤起群众“打倒列强除军阀”。9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成立，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程。

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自此专攻

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本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外，还在外文系教英诗等课。这时他致力于唐诗的研究，写出《杜甫交游录》。1931年1月，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创刊，刊登闻一多的《奇迹》，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首新诗。

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离别十年的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以及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接着又先后讲授诗经、楚辞、唐诗和乐府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6年，他还讲授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带着家眷离开北平南下。11月1日，清华、北京、南开三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遂到长沙。1938年1月21日，临大再迁昆明，他放弃乘车，参加二百多学生和十数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三千五百里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中，和青年学生一道收集研究歌谣、民俗、神话以及苗区的服装、语言，并画了百余幅风景写生画。由于步行途中的匆忙和劳顿，他蓄起一把丰茂的胡须，誓言要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由于深入民间，他开始了解到人民的痛苦。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5月4日，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1940年暑假后至1946年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整理《易经》、《诗经》、《楚辞》等著作，并指导研究生。1942年3月，《楚辞校补》出版，次年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审，获社会科学类学术二等奖（一等奖汤用彤、陈寅恪等六人，二等奖朱光潜、刘节等十四人，三等奖洪深、郑天挺等三十二人）。新学年起，

他讲授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旋邀闻一多参加。他们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开始主要讨论学术，后来渐渐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8)]。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9)] 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担任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

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为了工作，闻一多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6月，蒋介石发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加剧白色恐怖，迫害爱国民主活动。在昆明的特务、暴徒对闻一多不断进行造谣、威胁、恐吓和监视，但他毫不畏惧。

为了争取民盟的活动公开，和当地各界联系开展工作，并粉碎反动派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造谣诬蔑，6月26日至29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在商务酒家举行招待会，说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事，反对暴力。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无比悲愤，赶到云大医院，抱住李公朴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坚定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他不顾疲劳和危险，仍然按计划做好善后工作。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虽经亲友多方劝阻，仍毅然出席大会，作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盟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

招待会。5时半左右，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在离宿舍大门才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被特务用乱枪打死，时年四十八岁。为了保护父亲，闻立鹤也身中数弹。

闻一多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外的强烈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电悼唁，并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罪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加拿大、美国的爱好和平人士，都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

闻一多的遗著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潘光旦、叶圣陶等负责编成《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为纪念闻一多八十诞辰，1980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闻一多还有大量遗稿未曾发表，为此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重新整理编辑了十二卷本的《闻一多全集》，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说明：本文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研究员仔细审阅校正，谨此致谢。

---

(1) 朱自清等编：《闻一多全集·年谱》，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34页。

(2) 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6页。

(3) 《美斯司宣言》，《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年4月28日，清华学校印行。

(4) 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02、455页。

(5) 朱自清等编：《闻一多全集·年谱》，第43页。

(6) 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第72页。

(7) 《闻一多全集》（3），第240页。

(8) 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第75页。

(9) 《闻一多全集》（3），第240页。

翁文灏

严如平

翁文灏，字咏霓、永年，号君达、悫士。浙江鄞县人。1889年7月26日（清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生于一个官宦绅商之家。祖父翁步云曾任清廷内阁中书；父亲翁勉甫好治新学，热心实业。翁文灏童年入塾勤读，十三岁考取秀才。1906年考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学院，学习法文和数学等新知识，课余喜读《清议报》、《新民丛报》及《天演论》等新书刊。1909年，他怀抱“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志愿考取公费赴欧留学，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岩石专业。1913年毕业，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第一名地质学博士。

翁文灏学成回国，正值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开办地质研究所（实即高等地质学校），翁被分派在该所任讲师，1914年任教授，担任矿物学、岩石学课程，为近代中国培育第一代地质科学人才。1915年春，翁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实科第一，被委任工商部荐任技正。1916年北京创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翁任矿产股长，主持测勘各种矿产资源。1919年丁文江赴欧洲考察，翁任代理所长；1921年丁辞所长职，翁正式继任。1924年，翁并兼北京大学、清华学校教授，后于1931年曾代主清华校务。

翁文灏主持地质调查所十余年，组织全所人员大量进行地质调查，积极开展地质、燃料、土壤新生代等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工作。1920年12月16日，甘肃海原发生八点五级特大地震，他不畏艰难困苦，赶赴现场，因旅途艰辛，饮食营养失宜，患维生素缺乏症以至不能举步，仍坚持不懈抱病进行实地调查。

翁文灏对于我国地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颇多建树。他先后撰著《中国东部地壳运动》、《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与岩浆活动》、《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等重要论文，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学说，阐明侏罗纪和白垩纪间亚洲东部的造山运动。他在《中国北部水平运动所成之构造》等文中，指出我国造山运动具有“推复体（nappe）构成”的特点，并论述了它的重要意义。这对我国后来探测石油资源，是一重要启示。翁撰著的《中国矿产志略》及其他论文，创建了我国矿产区域论。他应用地热分带，从理论上探讨我国南部的金属矿床分带，存在有锡钨钼带、铜铅锌带、锑带、汞带。他还将中生代花岗岩划分为与钢铁有关的偏中性花岗岩和与钨锡有关的偏酸性花岗岩两种。他论述成矿规律，首次提出了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

20年代初，一些外国人因为在陕北延长投资钻井探油失败，即对在中国找到丰富油矿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中国贫油”之说逐渐盛行。但翁文灏怀着在中国找到石油的希望，力排众议，组织力量进行勘探，先在陕北获得若干成果，继而又在甘肃玉门探得油田，奠定了我国西北石油开采的始基。1934年2月，翁获悉浙江长兴煤矿有油气苗现象，于春节初二赶去察看，不幸所乘汽车行至武康县的桥上发生车祸，他头部受重伤，不省人事逾两月，后经多方抢救、医治，才逐渐恢复记忆力，继而完全恢复了健康。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探测矿藏不懈地工作。

对于我国地震地质研究，翁文灏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对甘肃海原地震以及我国地震史料的一系列研究论文中，指出地震的起源是某些地质构造形成的。他提出了初步的地震区域轮廓，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首次绘制出《中国地震分布图》。他于1930年在北平郊区设立了我国第一个鹫峰地震研究室；同时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使我国地震学研究进入世界行列。他是近代研究中国地震地质科学的第一人。

翁文灏在地质地貌学方面取得许多成就，主要论著有《中国山脉

考》、《中国北方河流的沉积物及其地质意义》、《中国地势》（与曾世英合著）、《中国地理通论》等，为创立我国地理科学作出了贡献。1934年，他和丁文江、曾世英合作，编绘了我国第一部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彩色绘制的地形地图集《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欢迎。

为推动我国地质地理科学的发展，翁文灏做了许多组织领导工作。1922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任副会长，1924年起四任会长、理事长；1934年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翁文灏地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先后被聘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伦敦地质学会名誉会员、德国赫勒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并获得柏林工科大学、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等称号[(1)]。

“九一八”事变后，潜心地质地理科学研究的翁文灏，眼见国本垂危，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撰文，吁请当局保全国家领土和民族独立。1932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庐山邀见翁文灏，翁除向蒋讲述我国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外，并盼政府担负起保全国家领土疆域的责任。蒋表示要以巩固国防为己任，准备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人才筹划增强国家防御力量的各项工作，邀翁任该会秘书长。翁虽力辞任职，但认为蒋“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2)]，并有知遇之感。蒋曾拟任翁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翁仍坚辞不就。但蒋一再“礼贤下士”，垂听翁之政见，并深表赞赏。蒋在1935年12月出任行政院长时，宣布翁为行政院秘书长。翁在“共赴国难”的号召下自此加入国民党政权。他把地质调查所迁到南京，建立新址，扩大工作范围，自己仍住在所内，主持所的工作。

1937年4月，翁文灏受命访问英、德、苏等国当局，告以当前日本侵华之局势，“探询他们具体方针”[(3)]，并商谈军备易货及建设事

宜。他及时将各国态度密电报告蒋介石。他在巴黎参加了法国科学院会议和地质学会年会；在莫斯科出席了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当选为大会副主席、煤田地质组主席。

翁文灏由欧洲回国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他受任经济部部长，嗣后并兼资源委员会（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原行政院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处长，主管战时全国工矿企业生产。翁尽力组织沿海大中城市国营厂矿和民营工业将机器设备往内地拆迁，在西南和西北各地复工或建厂，并协助申请贷款、供应原料、调整产销，以至技术辅导。

翁文灏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生产，组织和委派专家学者去主持开发和组织生产，先后在江西、湖南开采钨矿、锑矿，在四川天府、南桐扩建煤矿，在甘肃玉门开发油矿，在叙府、遵义、北泉开办酒精厂等等。1943年，翁文灏任战时生产局局长，配合美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组织军、民厂矿合作生产焦炭、钢铁、机械、酒精等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资。

翁文灏于1938年加入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次大会后，国民政府改组，由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长，翁任副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翁连上辞职呈文五次，结果得以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职，但仍留行政院副院长名义。1947年4月行政院改组，翁卸去副院长职，又再主持资源委员会。翁任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专心从事全国石油开发和生产工作。

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了总统后，在各派系激烈争斗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提名翁文灏为“首届行宪内阁”的行政院长。翁虽居高位，却是有责无权，一切皆要听命于蒋介石。他上任后最大的难题是维持内战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摆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蒋介石于8月19日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

期收兑金银和外币，并强令限制物价。结果不到三个月就彻底破产，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狂涨，黑市猖獗，民怨沸腾，社会骚乱。翁文灏于11月26日引咎辞职，为蒋介石担当罪责。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潜居故里，翁文灏去浙江奉化往见，劝他完全放弃政务、真正退休；但见蒋正在召见部属布置一切，继续操纵国民党军政要事，破坏和谈，乃大失所望，当即告退，不甘与其继续为伍。其时，翁对于公开主和的代总统李宗仁抱着希望，于2月初应邀出任代总统府秘书长，表示“只要还能替国家做点事，我决不迟疑”[(4)]，期为和平谈判效力。直至4月20日李宗仁也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翁乃决心完全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

翁文灏在国民党政权任职前后历时十三年，洁身自好，清廉从政，一心想专做自己的工作，不管党派政治。当他醒悟到自己的一切不能自主，无法摆脱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操纵，甚至被冒名列于反共宣言而自己一无所知时，决心与国民党统治彻底决裂，拒绝去台湾任职。他担心得不到共产党方面的谅解，乃旅居香港，不久又潜去法国巴黎。当时美国驻法使馆向他发出了邀请，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函愿以优厚待遇聘他任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矿冶工程及机械工程学会也向他发出邀请信。翁文灏经过深思熟虑和对时局的观察，决意改变方向，回归祖国。1950年冬，毛泽东、周恩来邀其归国，他十分兴奋，立即启程，于1951年3月回到北京。他是第一个从海外回到祖国的国民党政府高级人士，毛泽东评誉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5)]。

翁文灏到北京后，先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并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常去各地参观、视察，并曾率领一批地质专家和科技人员去考察矿藏。他还从事翻译国外重要石油地质论著，并主持《法汉大辞典》编译工作。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病逝于北京。

---

(1) 本文记叙翁在地质地理科学方面之成就，多据翁文波《地质学家翁文灏》（《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4期，第24—29页），并参考黄汲清《翁文灏选集·序言》，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2) 翁文灏：《回顾往事》（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3) 翁文灏：《1937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页。

(4)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页。

(5)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9页。

吴鼎昌

熊尚厚

吴鼎昌，字达铨。1884年4月（清光绪十年三月）生于四川绥定（今达县）。吴家原籍浙江吴兴，世代做师爷。父亲吴赞廷在绥定府做幕十余年，退休后定居成都，置有田产。1896年吴鼎昌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后考中华阳县秀才。1903年5月，他获官费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普通科读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任本部评议员。1906年6月，吴鼎昌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与胡霖（政之）、张季鸾同学。1910年7月毕业回国，同年秋在北京应游学生毕业考试，得清政府学部授给商科进士，次年春又经廷试，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习。其后经其族伯山西藩台吴匡涛举荐给东三省总督铁良，先后任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顾问、中日合办本溪湖矿务局总办。1911年8月，经大清银行总监督叶景葵的介绍入大清银行总行充总务科长，不久转任大清银行江西分行监督。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鼎昌由江西到了上海，参与上海大清银行清理处事务。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应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商股股东的要求，派员改组成立中国银行，吴又参与中国银行的筹备事务。2月，他被派为中国银行正监督，拟定中国银行条例，推行改革计划，决定北京分行、天津分行开业。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银行总行迁往北京，其正监督职位未变。5月，黎元洪、熊希龄在北京成立共和党，吴鼎昌加入该党。11月，他任袁世凯政府工商部全国工商会议副议长兼工商部顾问。1913年5月，梁启超合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组成进步党，吴任进步党政务部财政科主任。在“二次革命”战争期间，他曾著有《赣宁战祸之原因》，分析导致战祸之症结，在于“勉强而成之局”[(1)]，对袁世凯的统治有所批评。是年因财政总长周学熙要另设筹备中国银行机构，新派人充当总办，仍让吴继续管理

几个分行。因有违其初衷，吴鼎昌辞职离开了中国银行。1914年，他改任造币厂监督，为划一币制作出贡献。是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吴引见袁世凯，袁以“才大难驭”[(2)]，未予重用。1915年2月，袁世凯授吴上大夫衔，12月任袁登基大典筹备处办事员，受到笼络。次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他被任命为农商部次长，未就，再任造币厂总裁。袁世凯死后，吴鼎昌利用与徐树铮的关系投段祺瑞，6月再任中国银行总裁，7月兼国务院参议，从此成为皖系的理财大员。

1917年5月，周作民与王郅隆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吴鼎昌为发起人之一，任董事。7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张镇芳拨银行资金二十五万元资助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张镇芳被捕，经王郅隆向段芝贵推荐，吴入盐业银行清理复辟用款，攫取了该行领导权。嗣经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梁启超正式任命，他担任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1918年3月，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组织安福俱乐部，吴任院外评议员。同月，经徐树铮推荐出任财政部次长，12月被派赴欧美考察财政。1919年2月，南北政府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吴鼎昌任北方代表。在和会期间他参与密议，往返奔波传递消息，是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的智囊人物。他和朱启钤主张另行选举国会，在和会破裂之前，奉段祺瑞的命令，在上海要求孙中山放弃恢复国会。

1920年7月，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吴鼎昌被直系列为祸首之一，被免去财政次长职务。吴退出了政坛，只剩下盐业银行总经理的职位，活跃于金融界。1922年初，中南银行为发行钞票充实准备，请周作民出面发起，联合金城、盐业、大陆三行联合组成四行联合准备库，发行钞票，吴鼎昌被推为主席；7月又组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他又兼任主任；1923年组成四行储蓄会，任主任。所谓“北四行”集团于此形成，以北方数省为营业重心，发行钞票，主要吸收军阀官僚的存款，投资于北洋政府的公债、库券，为北洋军阀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为自己攫取高额利润，营业畸形发展，一时居北方银行业

之首，吴鼎昌因而成了金融界首脑人物之一。

吴鼎昌虽活跃于金融界，但他对时政甚为关注，对昔日在政界的地位，仍颇留恋。1924年，胡政之在上海办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发生经济困难时，吴每月给予四百元资助，并以“前溪”的笔名，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一些经济论文，后著有《中国经济政策》一书。

1925年春，张季鸾赋闲在津，胡政之因办《国闻周报》亦常到天津，与吴鼎昌三人在津聚首议定筹款五万元，办一份独立自主的报纸。随即由胡政之出面，从王郅隆的后人手中盘购了天津《大公报》，组建《大公报》新记公司，以吴鼎昌任董事长兼社长，负财经责任，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为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商定述评。还规定社内人员一律不得担任社外职务，不拉政治关系，共同专心办报。1926年9月《大公报》续刊，《国闻周报》亦由上海迁天津发行，吴又兼《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社长。三社合一，通过掌握舆论工具扩展其影响，在政界崭露头角。

吴鼎昌投资《大公报》，与张季鸾、胡政之共同拟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言论方针。从1926年到1935年间吴常驻平、津，一面经管盐业银行等金融业，一面兼管《大公报》的出版，主管经营方针。他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报社参加商讨社务，研讨时事，选择社评题材，经常参与《大公报》的社评写作，财经方面的社评主要由他执笔。吴对世界贸易市场情况甚为熟悉，报馆购储外币和银行结账都由他决定，还善于选择商机，采买进口的白报纸，在行市有利时结汇，经营日隆。

《大公报》出版初期，正值北伐战争时期，吴鼎昌以“前溪”的笔名发表社评“战卜”，说“袒刘袒吕，左右皆非”[(3)]，竭力站在中间立场，不偏不倚，对政局采取观望态度。他主张和平解决南北战争，为《大公报》定下言论基调。眼见北伐战争进军胜利，而《大公报》仍

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他们发表数篇社评，虽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又有善意的劝告。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大公报》批评蒋介石大开杀戒，呼吁不要杀害青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当权，《大公报》抨击国民党官僚贪污腐化，置工农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

1928年夏，张季鸾与蒋介石会面后，吴鼎昌主持的《大公报》逐渐转变了态度，表示“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站在拥蒋立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通过于右任致电张季鸾，希望支持其“安内攘外”的政策，《大公报》遂在言论上公开唱“缓抗”。1932年5月，吴鼎昌在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声称“外侮纷来，源于内乱”，“苟内战不能废止，一切无从谈起”，博得了蒋介石的赞赏。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时，吴鼎昌名列委员。7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了他，多次与之密谈。11月，吴被任命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从此跨进了蒋介石政权的门槛。

1933年3月，吴鼎昌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如何救中国》一文，主张建立“好政府”，拥护“好领袖”[(4)]。次年，政学系首领张群、杨永泰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和秘书长，吴鼎昌与之交往密切，常常谈论中日问题。1935年，蒋介石开始调整对日政策，10月吴组织平、津、沪、汉等地工商金融界首脑人物，以“赴日经济考察团”名义前往日本，自任团长。在日期间，吴等同日本大财阀组成“中日贸易协会”，从事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活动。12月，蒋介石组成一个“名流内阁”，以吴鼎昌任实业部长。吴随即辞去了《大公报》社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事务（仍保留董事长一职），前往南京就任实业部长。他尽力替蒋介石拉拢四川的大小军阀，劝说段祺瑞脱离日本魔掌南下，将孔子的后裔孔德成接到南京，并提倡出口和合资办企业，帮助国家资本创设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等企业。吴鼎昌次第兼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

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委员会第一组委员、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以及中国国货联合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鼎昌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管民营工业，负责京、沪沿海地区工厂内迁事宜。11月，他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12月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及军区司令，并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他在贵州大力起用年轻官吏，推行新县制、保甲制和新生活运动，禁止种植鸦片。1939年，吴鼎昌吸收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资本，在贵州组成贵州企业公司和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以贵州银行为金融机关，建立起从工矿业、商业到农业的贵州地方资本企业。陆续开办化工、玻璃、火柴、烟草、面粉、丝织、电气、水利、水泥、农业机械、煤矿、木业、林牧及井盐、垦殖、商业等十六个公司，投资总额达二亿二千六百余万元。吴鼎昌将其主政贵州期间的心得与经验，撰著《花溪随笔》一书出版，别署“花溪老人”。1944年12月，贵州独山为日军所侵占，吴以守土失守自请降处，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

1945年1月，吴鼎昌调往重庆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幕僚。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吴鼎昌向蒋介石建言，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前往重庆举行国共谈判，14日由吴起草电文拍发延安。9月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该局总裁为蒋介石），成为蒋介石“宠信历久不衰”的策士。其时，蒋介石正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6月，上海十万群众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并欢送上海市人民请愿和平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请愿，23日晚发生下关惨案。次日请愿代表到蒋介石官邸，吴代蒋接见。代表问他：“为什么要打内战？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吴答：“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5)] 为

蒋介石辩解。他为蒋介石分化和拉拢第三方面的中间势力效力甚勤。

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为总统后，吴鼎昌改任总统府秘书长。11月熊式辉、张群等在上海筹备组织新政学系——“笃行社”，他前往参加，但筹备会开了三天，即草草收场散去。岁杪，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之时，吴辞去了总统府秘书长职，改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吴鼎昌黯然前往香港寓居。

1950年8月22日，吴鼎昌病故于香港。

---

(1) 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1914年版。

(2) 梅麟高：《吴达铨先生座谈会发言要点》，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101页。

(3) 《大公报》1926年9月2日。

(4) 《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1期。

(5) 阎宝航：《揭露敌人反革命两手》，《人民日报》1962年6月22日第4版。

吴光新

张学继

吴光新，字自堂，亦作植堂、志堂。安徽合肥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段祺瑞妻弟。早年入随营学堂学习，1903年6月赴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三期炮兵科，1904年11月毕业回国，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炮三标管带，奉天混成协标统。1908年，入陆军大学正规班第一期学习。1910年任第十三混成协炮标标统。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二军参议官，随北洋军第二军总统段祺瑞南下武汉，参与镇压辛亥革命。

1914年4月，吴光新任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同年8月因病辞职。1916年9月，北洋政府授予吴光新陆军上将军衔。1917年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的滇黔军与川军矛盾迅速激化，在成都及川南多次发生激战，把持北京中央政府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决定利用四川主客军矛盾激化的机会，将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于是他通过北京政府于7月24日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8月6日颁布“特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的总统令，令其率领北洋军李炳之、刘耀龙两个混成旅由湖南岳州入川查办。北京政府还明令北洋第二十师以及冯玉祥、张锡元两个混成旅均归吴光新调遣使用。吴光新奉命后，于10月率领两个旅进驻四川重庆，准备谋取四川督军职务。然而，皖系的武力扩张政策不仅在湖南遭到了惨败，在四川也毫无作为。四川幅员广阔，境内川军、滇军、黔军矛盾重重，吴光新要想凭借区区北洋两个混成旅制伏四川境内主客各军、登上川督宝座实非易事。11月间，吴光新部遭到黔军的突然袭击，部队遭受伤亡。吴光新深感川事不可为，遂于11月14日电请北京政府惩办黔军，并“罢免查办职，以谢国人”[(1)]。不久，北京政府同意吴光新辞去四川查办使，专任长江上游总司令，退出四川，司令部改驻湖北宜

昌。吴光新退到湖北后，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军饷、军械方面的接济，部队得以恢复。后又参加镇压荆沙民军起义，所部有一支人马从此在荆沙驻扎下来。

吴光新不满意有兵无地盘的状况，图川失败后，又盯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因为时任河南督军兼省长的赵倜是毅军将领出身，是北洋军的杂牌，在直皖矛盾中一直采取骑墙中立的态度，段祺瑞一直想将他赶下台，以皖系骨干取而代之。1920年2月，皖系集团经过研究后，决定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河南人、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长）为河南省长。在北京政府正式命令下达前，吴光新即以清剿河南境内土匪为名，率领所部由湖北宜昌进驻河南信阳，准备以武力驱逐赵倜。然而，皖系的图谋不仅遭到了赵倜的拼死抵抗，而且因为利害关系，直系各省督军及高级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以及南方护法军政府也纷纷发表通电表示反对更动河南督军，直系将领的态度尤其强烈，曹锟在致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电报中说："去赵用吴，北洋解体，万不可办。"[(2)] 皖系集团不顾各派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于1920年2月26日操纵国务院通过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决定，但徐世昌担心因此造成皖系与直系的决裂，只同意发表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任命，将吴光新任河南督军的任命扣押下来。皖系衡量利害后不得不让步，吴光新谋求地盘的企图遭受挫折。

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湖南人民反对皖系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如火如荼开展起来，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与此同时，因为直皖矛盾激化，驻扎湖南衡阳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奉曹锟之命，与西南军阀建立了反皖军事同盟，并准备将驻衡阳的一师三旅部队开回直隶，保卫直系老巢。段祺瑞获悉直系的意图后，密令张敬尧对撤防的吴佩孚给予迎头痛击，同时令吴光新将分驻宜昌、荆沙、岳州、信阳等地的部队全部集中到岳州，将吴佩孚部消灭于洞庭湖中。

1920年5月20日，吴佩孚在没有北京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率领所部自衡阳撤防北上，张皇失措的张敬尧一再打电报给段祺瑞及北京政

府，请求速调吴光新部增援长沙，然而，吴光新是个无勇无谋的人，他根本没有勇气到前线去面对强悍的直系师长吴佩孚。当吴佩孚率部北上后，南方护法军尾随而来，张敬尧在所部士气低落、援军观望的情况下，于6月12日仓皇放弃长沙，逃到岳州收容残兵败将。6月13日，北京政府以张敬尧擅自放弃省会，下令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同时任命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吴光新随即赶到岳州坐镇，但是面对声势浩大的南方护法军，吴光新还是没有面对的勇气，他在逗留数日后就置张敬尧于不顾离开岳州逃往武汉，其部队也相继撤退到湖北境内。张敬尧率残部在岳州抵抗一阵后也向湖北撤退。6月29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张敬尧撤职查办，任命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次日又任命吴新田为第七师师长负责收容张敬尧残部。吴光新认为，湖南局面复杂，自己无能为力，所以始终拒绝接受湖南督军兼省长的位置，他滞留武汉始终按兵不动，对于张敬尧的请求、企求甚至哀求，一概置之不理。

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7月16日，隶属直系的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响应曹锟、吴佩孚，设计将吴光新从汉口骗到武昌加以扣押，开始软禁于督军公署花园，后解军法处关押，吴光新所部六个旅全部被缴械解决。王占元解决吴光新后曾专程到保定向曹锟报告，曹主张将吴光新“暗地处死”，因王占元不同意而作罢。直皖战争结束，皖系彻底失败，皖系骨干相继受到追究。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吴光新的湖南督军及长江上游总司令等职，交王占元查办。8月30日，北京政府又根据王占元的呈复，宣布褫夺吴光新的官秩、勋位、勋章，在湖北组织军法会审。9月5日，王占元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吴光新十五年徒刑。12月，北京政府陆军部呈报总统徐世昌：“已革军官吴光新，通谋叛乱，擅调军队，依律判处无期徒刑。”但所谓的无期徒刑并没有得到执行，1921年吴光新被提前释放，到天津当寓公。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独霸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亦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对付直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皖

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与孙中山之间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段、张之间即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推翻曹、吴。”[3] 吴光新与曾毓隽等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和代理人经常奔走于京、津及沈阳之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吴光新还担任了奉军第六军的副军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因冯玉祥等倒戈而彻底失败。11月，张作霖与冯玉祥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吴光新跟随姐夫再次登上北洋军阀的政治舞台，担任陆军总长兼陆军训练总监。但此时北京政府实权掌握在张作霖与冯玉祥手中，作为陆军总长兼陆军训练总监的吴光新，除了奉办的公事外，没有什么作为。1925年3月24日，吴光新与陆军部次长贾德耀、张厚琬代表等随段祺瑞到中山灵柩前宣布祭文。1925年12月，吴光新被免去陆军总长，从此脱离政治，再度隐居天津。1933年，应南京政府的邀请，吴光新随段祺瑞南下，先至南京盘旋数天后，即前往上海定居。

1939年11月25日，吴光新病死于香港。12月，国民政府宣布追赠吴光新为陆军上将。

---

(1)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0页。

(2) 陈长河：《直皖战争期间的皖系骨干吴光新》，《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3)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页。

吴国桢

颜平

吴国桢，字峙之。湖北建始人。1903年10月21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二）生。吴家世代书香门第，父亲吴经明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教官、步兵副军校、清政府陆军部科长等职，曾密谋响应辛亥举义，后曾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等职。吴国桢三岁入塾，性聪慧，被族人誉为神童；五岁至北京入府学胡同小学和大兴两级小学，七岁能作文，八岁能赋诗。1914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用功读书，成绩优异，在校曾加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任童子部部长，曾与周结金兰之交。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四年后毕业，被保送至美国衣阿华州格林纳尔学院留学；获经济学学士后，又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以论文《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获哲学博士学位，年仅二十三岁。

1926年秋，吴国桢学成归国，先在上海政治学校执教；翌年被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延揽为秘书兼交际科长；1928年至南京，任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兼条约委员会委员。他至汉口探亲，有意在家乡施展才华，遂以万言书《整理财务税收方案》送呈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提出改革武汉和湖北全省税收的意见。李甚为赞赏，即设湖北烟酒税务局，任吴为局长。吴颁布烟酒纳税通告，加强对烟酒销售的管理、监督和检查，令行法随，成效卓著，九个月收入税金九十万元，较上年同期多达五倍。1929年6月起，吴历任汉口特别市政府参事、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31年5月升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1932年6月，蒋介石以“剿匪”总司令坐镇汉口，主持对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吴国桢被蒋介石揽为私人秘书。吴除陪蒋会见宾客

外，还要搜集和整理有关资料，为蒋决策作参考或依据；为蒋起草文电，整理讲话文稿；将英文报刊的要闻翻译给蒋听；出席各种会议充当蒋的耳目等等。吴的才华和敏快深受蒋之赞赏，但吴觉得在蒋身边工作过于拘谨、刻板。几个月后，吴被宋子文调去江西榷运局整理盐税，得以离开随侍“君主”之职。

1933年11月，三十岁的吴国桢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他着力市政建设，主持修筑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拓宽了十几条马路，扩建了中山公园。1935年夏，武汉地区遭洪水威胁，他率军民终日奋战于张公堤，十几天未曾回家。警备司令叶蓬下令将护堤官兵撤走，吴苦苦哀求、下跪磕头，仍未获理睬；吴转求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调兵支援抢险，避免了一场堤破城淹的劫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很快成为全国战时的政治军事中心，吴国桢以很大精力投入战时动员、后勤保障、组织疏散等工作。武汉会战打响后，他让眷属撤去昆明，自己独留汉口，组织支援前线和民众撤退工作，一直坚持到武汉失陷的前夕，始随军撤离。

吴国桢撤至重庆后，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处长，九个月后被任命为战时首都重庆市市长。他主张“以法治的精神推进民治的市政”，施政纲领是三个“并重”：疏建并重——把没有职业的公职人员和职工的家属疏散到乡村，以减轻城区的负荷，同时趁敌机轰炸造成的废墟拓展街道，鼓励在新街两旁建造楼房；城乡（郊）并重——在整顿、建设老市区的同时，在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歌乐山、九龙铺等地建起一批卫星城镇，尽量把工厂设在市郊；心物并重——注重市容、街道建设，同时倡导清廉、节俭新风尚，提倡集体结婚、慰问伤兵、义演义赛义卖等。由于日军飞机对重庆连续不断的轰炸，兼任防空副司令的吴国桢以很大精力管理民防，组织修建地下室、防空洞以减少损失。1941年6月5日发生较场口防空隧道窒息事件，吴国桢难辞其咎，受革职留任处分。

1942年12月，吴国桢调任外交部政务次长，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其时我国已与美、英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而宋子文又常在美国，吴国桢主政外交部，责任重大。他思维敏捷、办事果断、作风民主、精于管理、颇获上下好评。蒋介石在决策许多国际事务时，多倚吴为股肱，或通电话或召见面商，有时一日数次。

吴国桢于1945年8月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6年5月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其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军费支出庞大，财政赤字超过全年财政预算之数，常以滥发纸币充数。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为战争所累，金融混乱，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吴国桢如履薄冰，谨慎处置，竭力控制财政预算，组织宪警坚决取缔黑市和奸商，以期平定局面、苏解民困，但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于19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和外币，并实施限制物价的政策。吴认为用行政手段强制管理经济，难以解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反易生出变乱，曾三去南京向蒋进言；蒋独断专行，吴乃谓请中央派员至沪直接主事。蒋介石即派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导”，实施《紧急处分令》，而要求吴管好市政，尽量与蒋经国合作。结果未及三个月，蒋介石的“紧急处分”与蒋经国的“督导”完全失败，上海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吴国桢如坐针毡，疲于应付，频频请求辞卸，直到1949年5月初始获允准，乃携眷属离沪去台。

吴国桢到台湾后，先任“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先后陪同蒋介石出访菲律宾和韩国。1949年12月被蒋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他力图吸取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崩溃的教训，以“民主政治”刷新政务，稳定局势，大力整顿各项税收，严格收缴印花税、所得税、特种营业税、矿产税、货物税等，以填补巨额军政经费。他对蒋介石、蒋经国在台湾继续实行独裁专权和专制统治颇多扞格，几次阻挠蒋经国任意捕人杀人，还曾向蒋介石建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

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1] 劝蒋应让蒋经国做社会福利方面的事。他看到蒋氏父子仍然我行我素，而军政官员继续互相倾轧、争斗不休，还怀疑蒋介石企图制造车祸为害自己[2]，乃于1953年4月辞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职，偕妻赴美，定居于伊利诺伊州伊万斯顿城，任《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顾问，经常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对于台湾盛传他曾套取巨额外汇一事，他十分不满，于1954年1月写信要求彻底查明公布真相；半个月未见回音，即具一“辟谣启事”于报上刊出；同时在美国广播和电视中发表谈话辟谣，并说不愿回台湾是因为“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他还寄发了《上国民大会书》，并四次上书蒋介石，批评台湾当局“一党专政”、“特务横行”，说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等。“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出面对吴进行指控，在“立法院”提出十三项“质询”，并在“国民大会”通过对吴“严厉制裁”案；蒋介石也下“总统令”，要“依法彻查究办”“违法渎职情事”；国民党中常会则决议将吴“开除党籍”。

此后，吴国桢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并撰写史学论著《中国传统》和小说《永静巷》。他对于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尤其是70年代后期和进入80年代的变化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倍加赞赏。在1983年致南开同窗、旧天津市长杜建时的一封信中说，中国“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既周且彻，一代坚持，一代继行，不出两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二十一世纪中，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之一国”。他还接受邓颖超的邀请，准备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不料于1984年6月6日病逝于美国萨凡纳城寓中。

主要参考资料

江南：《吴国桢八十忆往》（1984年4月13日），《台湾与世界》第12期。

黄卓群：《吴国桢的履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鄂西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鄂西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版。

吴水平：《我所知道的吴国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鄂西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版。

许有成：《吴国桢生平漫记》，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总第40辑），1990年版。

韩道成：《吴国桢有关资料汇辑》，台北《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

---

(1) 吴国桢：《上总统书》（1952年6月），见江南《蒋经国传》，美国论坛报1984年版，第214页。

(2) 吴国桢1954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对李宗仁说：1953年（疑应为1952年10月底）蒋介石过生日，蒋夫妇到台北附近某山别墅避寿。那天特约吴国桢夫妇上山吃饭，并留吴在山上过夜，态度殷切。第二天吴国桢夫妇下山时，没有找到汽车司机，由蒋的官邸另派一名司机驾驶。中途因故停车时，司机发觉前面两个车轮和后面一个车轮外面的螺母都被取下了，若不是停车发现，到某个转弯处车轮飞脱车身，则吴氏夫妇和司机都会粉身碎骨。李宗仁从美国写信给在香港的程思远、陈孚木、周一志，详细介绍了吴国桢的上述谈话。周一志：《全国大陆解放后台湾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之一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吴晋航

袁嘉新

吴晋航，名国琛。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原籍浙江，祖父入川定居。父亲吴懋庚曾任梁山县沙河铺县丞，后改事警务。吴晋航以此渊源，于1909年考入四川警务学堂。

辛亥革命后，吴晋航在重庆警察局工作，由巡官、署员、科员而科长，1916年升任重庆警察厅厅长，次年卸职。其后，吴在大邑系军阀陈洪范、刘湘、刘文辉部任职，还任过丰都、梓潼、江安县县长。他在刘文辉部时间较长，与之关系甚深。北伐战争开始后，川军先后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刘文辉被任为第二十四军军长，吴晋航奉派与张笃伦一道，任第二十四军驻汉口代表。1929年间，吴同冷杰生一道任二十四军、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驻南京代表，与戴传贤、张群等交往，又挂上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头衔，为刘文辉联络各方。

1930年间，刘文辉与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各拥重兵十余万，为争霸全川，剑拔弩张。吴晋航及两军部分高级部属主张二刘合作，先安定川局，再于适当时机向云、贵、陕、甘、湘、鄂扩展，吴为二刘合作奔走联络。但二刘利害冲突不可调和，终于1932年秋兵戎相见。吴迭电刘文辉，劝其停战议和。刘文辉直到1933年秋败退万源，才由他大哥刘升廷出面，以亲族情谊请刘湘留点余地。吴晋航衔命去走刘湘的“神仙”军师刘从云的门路，刘湘方允刘文辉回驻雅安。

“二刘之战”后，吴晋航感到自己并无政治资本，决意弃政从商。经反复考虑，认为金融业发展的可能性较大。1934年初，他与掌握全川财权的第二十一军财务处长刘航琛相商，取得刘的支持，被邀先任川康银行总务主任，未及一年，即由主任而升襄理、经理。后因不满

刘航琛恣意提款，与刘失和，1936年吴晋航离开了川康银行。

吴晋航在川康银行工作时，与第二十四军原驻渝代表宁芷树共同发起，约集旧日袍泽，筹组和成钱庄。原拟集资十五万元，因入股亲友缺乏信心，不愿多认股额；吴晋航自己宦囊也不充裕，所认二万元股本，还是以他成都住宅向川康银行抵借而来，结果只筹集了十三万五千元。

和成钱庄于1934年5月开业，因股东多系军政人员，外界不免猜疑，初期业务清淡。吴晋航接近地方上层，消息灵通，不久即从吸收机关存款、做申汇、向地方银行领钞（当时地方银行准以四成公债六成现洋十足兑领地方钞，而在市面上公债只以二三折便可收进）等方面推进业务，获得厚利，头年结算盈余十多万元。1937年和成增加资本为六十万元，改组为银行，吴晋航任总经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成于西南各重镇遍设分支行处，以汇兑为重心，大力发展业务。又开办沦陷区汇款，便利后方人员寄钱沦陷区赡养家口。和成附设和益公司，从沦陷区购进纱布等物资运销西南，经营亦颇得手。不数年间，和成跻入川帮银行前列，被目为后起之秀。

吴晋航经营和成，一开始便注意物色人才。他认为有无一个主持业务的能手，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为此，他虚心求教于商界前辈，多方物色，郑重挑选，请来在重庆巨商汤子敬开设的正大永钱庄从事金融业有年的陈诗可。陈勤奋朴实，经营稳慎。陈主内，吴主外，配搭得当，当家得人。

吴晋航经营和成银行，以稳健著称。在经营中他注意市场动态，留心时局变化，力避大的风险；在通货贬值时，力求保本保值。同时，他通过投资结交四川畜产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等大型企业；还把积累的百万美金部分存储于上海商业银行，显示资力，增加资信，在

头寸周转上取得有力支持。

吴晋航比较开明，肯用青年。和成七百多名职工，大约有八成是招考来的青年，其中还有不少女青年，经过培训和业务实践，步步提升，分别担任总分支行处经理、副理、襄理、主任等职，人称和成为“青年银行”。吴晋航对青年职员不摆老板架子，多以老弟相称，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常个别交谈。凡写信给他的，必亲笔作答。青年职工结婚，他亲往道贺，不在一地的，总要照顾关系，调到一处工作。青年职工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遭遇危难的，他出于对青年的爱护，辄加营救和掩护。

吴晋航在金融业打开路子后，即向其他方面发展。早在1936年初，和成开业不久，卢作孚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筹组四川生丝公司，吴晋航被荐为总经理。何北衡担任董事长的华通公司（后易名华懋公司），亦邀吴任总经理。随着和成银行的发展，对外投资日增，吴还担任了四川畜产公司、民治毛纺织公司、四川桐油贸易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和《新民报》等企事业的董事长、董事等职。1943年，吴晋航被推为重庆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重庆银钱业放款委员会副主任，已是重庆金融界有影响的人士。

吴晋航雄心勃勃，一心要把和成由一个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办成全国性的，再进而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抗战胜利后，他将和成的经营重点移往上海，并在广州、南京、汉口、宜昌等地广设分行。1949年又在香港设立和成分行。数年间，分支行处几遍布南中国通商要地。

1948年，吴晋航同四川美丰银行经理康心如相偕赴美，考察银行业务。其时，和成公司已改组为和彝公司，并在香港、纽约等地设立机构，把业务拓展到海外。吴晋航到纽约，便以和彝名义，与美商英科公司签订代售契约，和彝长期存桐油三百吨于纽约作保证，英科提供一千吨油价的长期信用券，以便和彝陆续运油去美销售。

吴晋航弃政从商，但并未绝意于政治。抗战初起，他一度出任四川贸易局副局长。抗日战争中民主浪潮兴起，吴晋航受到进步影响，1942年周恩来初会刘文辉，即在吴晋航的住宅。抗战胜利后，民盟总部迁往上海，张澜由川去沪，吴均给予资助。他还接纳张澜在上海和成分行的小院居住。其后，张澜等民盟负责人到香港，他继续给予支持和帮助。1947年他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参加了国民大会。

1950年元旦，吴晋航从香港启程回北京，途经汉口，得到共产党员赵忍安帮助，进一步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其时，和成各地经理会议于汉口举行，遂决定将各行内外账目，悉向当地人民银行申报。5月，吴晋航向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陈述和成业务情况，表明愿为新中国服务的意向。8月，吴被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金融会议。会后，和成银行即申请公私合营，1951年9月参加联营联管，1952年进入金融业全行业合营。吴晋航任公私合营和成银行副董事长，同时还任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副董事长。

吴晋航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民主建国会第一、二届中央常委。晚年参加文史资料撰写工作甚勤。1965年6月15日吴晋航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吴晋航：《经营和成银行回顾》（未刊稿）。

吴经熊

李在全

吴经熊，字德生，英文名John C．H．Wu。浙江宁波鄞县人。1899年3月28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生。父吴葭苍，早年当过学徒、米商，后成为当地一家银行经理、当地商会的主席。

1905年，吴经熊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习读《二十四孝》等书籍。两年后，入陈氏翰香小学，除学习中国传统典籍外，还学习英语。1909年，吴父过世。次年，吴经熊进入初中学习，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知识。1914年，进入宁波效实中学读预科。1916年4月，十七岁的吴经熊与李友悌结婚。同年秋，进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后来因为在一次化学实验中受伤，遂应好友徐志摩的邀请，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法律。1917年秋，转学到上海，入读中国比较法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学院。在这里，吴经熊深受该校笃信基督教的教务长兰金（C．W．Rankin）的影响，对《圣经》产生兴趣，同年冬天，接受教会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1920年6月，吴经熊大学毕业，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8月，吴经熊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学习。次年3月，在《密歇根法律评论》上发表《中国古代法典与其他中国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料辑录》。4月，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Oliver W-Holmes）通信，交流学术心得，两人成为忘年交。在密歇根大学，吴经熊学习了政治理论、宪法、国际法、罗马法、法理学等课程，由于学习刻苦，最后以全优的成绩，在入学不及一年，即于1921年6月获得密歇根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同年秋季，由于学业优异，吴经熊获得国际和平卡勒基基金资助，到法国巴黎大学游学，研究法律哲学和国际公法，并结识惹尼（Francois Reny）等法学名家。1922年春，吴

经熊再次获得国际和平卡勒基基金资助，进入德国柏林大学访学，研究哲学和法理学，师从法学大家施塔姆勒（Rudolph Stammler）等人。1923年秋季，吴经熊以研究学者身份，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跟随法学泰斗庞德（Roscoe Pound）等人研究比较法律哲学。在以后的岁月中，吴经熊与这些世界级的法学家保持联系，探究学术与文化问题，鸿雁往返，传为佳话。

1924年夏，吴经熊归国，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法学、哲学、政治学等课程，开始在中国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崭露头角。1927年1月，出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推事（法官），从此开始进入司法界。3月，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编订法典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民法的起草工作，不久又担任司法部参事。1929年8月，吴经熊出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但未及三个月，于同年11月辞职赴美，担任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特约讲师。1930年春，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比较法讲座特约讲师，并研究司法思想。6月，返回中国。是年秋，在上海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接着，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会战打响，民族危机日甚。在此关头，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召开国难会议，吴经熊被聘为议员，参与国是。1933年，应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之邀，吴经熊担任立法委员，在孙科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吴经熊以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并以自己的名义公布了《吴氏宪草》，该宪草的部分思想被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所吸收。

1935年，与林语堂、温源宁等人在上海创办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吴经熊担任总编辑，这份刊物被人誉为“中国出版史上最具品位的杂志”。同年，吴经熊还与华懋生共同编辑出版了《法学文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7月中旬，吴经熊到江西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全国多党派及社会名流谈话会；12

月，受时局影响，同时也是自己多年思想变化的结果，吴经熊接受天主教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次年，为避战乱，举家移居香港，《天下月刊》在港继续出版发行，吴经熊担任主编。1939年，吴经熊当选美国学术院名誉院士，8月，完成《唐诗四季》，陆续刊登在《天下月刊》上。1942年9月，应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傅秉常的邀请，吴经熊来到重庆，出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与此同时，接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资助，开始用文言文精译《圣咏》、《新经全集》等。

1945年春，吴经熊担任中华民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担任联合国宪章中文本起草委员会主席。7月，他回到重庆，8月，向国民政府立法院报告《联合国宪章》，三读通过中译本。1946年初，吴经熊担任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委员、起草小组成员，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工作。9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罗马教廷公使，同年底，赴罗马就任。次年初，抵达罗马，开始其外交生涯。他在公务之外，经常向《圣经》研究的专家学者请教，不断修改自己的《新经》译稿。1948年，吴经熊代表中国赴日内瓦，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1949年2月，奉行政院院长孙科之命回国，拟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因时局不稳而未果。不久，辞去驻罗马教廷公使职务。

1949年7月，吴经熊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担任中国哲学与文学客座教授，11月，《新经全集》译本在香港出版。1951年4月，吴经熊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在美国出版。是年秋，他转任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天主教自然法哲学，1961年至1966年，又担任该校亚洲研究教授。1957年，应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邀请，出任国际仲裁法庭仲裁员。1961年8月，返台出席阳明山会议，在会上，他建议设立研究中国文化机构。1966年，吴经熊返回台湾定居，9月，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哲学教授。1968年，开始撰写《孙中山传》，次年当选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评议委员。1971年，被聘为

国民政府“总统府资政”，同年，出版《中国哲学的悦乐精神》、《国父的人格与学说》、《哲学与文化》等论著。1974年，吴经熊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1981年，当选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1985年，获得“行政院”文化奖。1986年2月6日，病逝于台北。

综观吴经熊的一生，除了在政界历任立法、司法、外交等部门要职外，在文化学术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同时还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沟通与相互理解。他平生著述宏富，内容广涉法学、哲学、宗教、文学等诸多领域，所获得名誉头衔也很多，如波士顿大学、波特兰大学、圣若望大学等校的法学博士，劳克赫斯大学、韩国岭南大学的文学博士，韩国圆光大学的哲学博士等。就吴经熊的学术成就来说，大体而言，前半生侧重于法学研究，后半生转到哲学、宗教、文化等领域。代表性的论著有：《法律的基本概念》（1922年）、《法律的三度论》（1927年）、《法学论丛》（1928年）、《法律哲学研究》（1933年）、《法理学汇编》（1935年）、《法律之艺术》（1936年）、《法学文选》（1936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释义》（1936年）、《中国制宪史》（1937年）、《唐诗四季》（1939年）、《圣咏译义》（初稿，1946年）、《新经全集》（中译本，1949年）、《超越东西方》（1951年）、《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1955年）、《孟子的人生观与自然法》（1957年）、《法理学判例与资料》（1958年）、《哲学与文化》（1971年）、《内心悦乐之源泉》（1981年）等。

主要参考资料

吴经熊著，周伟驰译：《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健：《超越东西方：法学家吴经熊》，《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

田默迪：《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吴经熊早期法律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曾建元：《超越东与西：吴经熊的人与法律思想素描》，《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孙伟：《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

吴景濂

张树勇　张黎辉

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别署晦庐，晚年又自称“抱冰老人”。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人。1873年3月18日（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生。父吴大祥，在乡经商。吴景濂于1882年入塾读书，1894年考取秀才，1898年参加乡试，中第六名副车。后在家设馆授徒。戊戌变法时，吴同情维新派主张。

1902年冬，吴景濂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四年后毕业，学部奏请给举人出身，并授给候补内阁中书，加五品衔。1907年春回籍，经奉天提学使张鹤龄聘为奉天师范学堂监督。不久，吴在奉天创办全省教育总会，被举为会长。1908年，他又在教育总会内设立宪政讲习所，鼓吹立宪，从而获得一些声望。是年夏，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资助下，吴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09年10月，奉天省谘议局成立，吴被选为谘议局议长。他极力主张编练全省预警（后改称“保安团”），兴建全省水陆交通网，并想通过向英、美借款，开发东北资源。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奉天的一些革命志士要求吴景濂宣布该省独立，但吴借口“事关重大”，予以拒绝。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吴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乃极力拉拢革命党人，谋议通过和平方式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宣布独立。赵尔巽闻讯，立即调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部进省震慑，使宣布独立的计划告吹。11月12日，赵尔巽操纵下的“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赵被推为会长，吴景濂任副会长。这时，吴看到巡防营张作霖军队调省益多，形势日恶，又接到驻奉天巡防营另一统领冯德麟关于“省城保安局面恐生变化”[(1)]的密告，预感到自己在奉天处境有危险。时苏、浙有召集

各省代表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之议，吴作为奉天谘议局选出的省代表，于11月24日潜出沈阳，南下赴沪，参加会议。12月29日，他在选举会上投了孙中山的票，并参加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工作。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吴景濂当选为参议员。这时政党林立，吴急谋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乃在南京参与筹组统一共和党的活动。4月11日该党开成立大会，吴被举为参议。统一共和党介于同盟会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之间，是当时重要的第三党，举足轻重。4月底，临时政府北迁，参议院重选议长、副议长。共和党为了削弱同盟会的势力，与统一共和党暗相提携，愿以正议长相许让。吴善于钻营，被统一共和党提为议长候选人。5月1日吴景濂被选为正议长。继而统一共和党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选举中夺取选票，决定与同盟会联合。8月25日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吴景濂被选为理事。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正式开会，采参、众两院制，吴景濂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并被国民党推举为众议院议长的候选人。但袁世凯不愿国民党人当众议院议长，授意选进步党人汤化龙为议长，吴遂落选。国民党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孙中山曾派人至京要吴景濂南下讨袁，吴竟然拒绝南下。7月31日，袁世凯悍然传讯在京的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员，令限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开除出党，并自行宣布“不与逆谋”。8月3日，吴景濂以国民党北京支部长的身份前往警备司令部，公然申明遵令将黄兴等五人开除出党。吴对袁这般恭顺，所以10月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后，吴被聘为总统府顾问。1915年8月间，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帝制活动大力鼓噪时，孙曾请吴景濂加入。吴善于观察形势，他对袁称帝之能否成功，心存怀疑，遂谢绝参加。1916年3月，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攻击下被迫取消帝制后，力图保住总统职位，吴景濂当时躲在天津，他看出袁之败局已定，乃发表《劝告袁前总统去国书》，反

对袁继续任总统，袁十分恼火，当即下令予以通缉。吴潜往大连，联合东北革命党人杨大实、顾人宜、赵忠鹄等发起“三省公民讨袁协会”，促袁世凯尽快下台。他的这一行动，又为自己赢得了政治资本。

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实权。8月1日国会复会，吴景濂回北京参加国会。复会后的国会中，国民党与进步党互相抗衡。吴景濂和张继、王正廷等挂出“宪政商榷会”的招牌，同进步党的宪法研究会进行斗争。不久商榷会又分裂为四派，吴景濂归入“益友社”一派。这些派系虽然各立门户，但无助于大局。因为这时的政局，既有南北的区界，又有直皖的分化，复有府院之争。国会中的党派，只不过在一系列政潮中推波助澜而已。1917年5月28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在“府院之争”中辞职，吴景濂继任议长。6月12日，黎元洪被迫非法解散国会，19日吴景濂赴天津。张勋复辟后，吴与在津的六十五名国会议员一起通电讨伐复辟。

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揭起护法旗帜，吴景濂赴粤参加护法运动。8月25日，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吴景濂仍被选为议长。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建立护法军政府，吴被聘为军政府高等顾问。不久，国会决定继续审议未完成的宪法草案。吴景濂派议员分赴京、津、沪等地，联络各省议员来广州开会，到1918年9月，以候补议员递补方法凑足法定人数，国会正式开会，吴再次被众议院举为议长，主持宪法会议。到1919年2月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议员星散，宪法会议遂告中断。吴景濂亦离广州前往上海。1921年5月孙中山第二次回广州，重组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吴正在上海办交易所。孙中山电吴“盼速偕留沪议员来粤开会”[(2)]。但此时已在直皖战后，吴景濂默察全国形势，不愿再回广州，旋即借口母丧回籍，闲居天津，等待时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吴景濂见时机已到，便设法接近直系。曹锟想当总统，吴景

濂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等向曹、吴献策，在驱逐徐世昌后，以“恢复法统”的办法（指民六国会）作为“过渡”，然后“名正言顺”地扶曹上台。曹、吴同意后，吴景濂从保定回到天津，积极进行倒徐世昌的活动。5月16日，吴与王家襄打出了“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的招牌，6月1日在津召集一些国会议员开会并发表宣言，宣称即日行使职权，同时宣布徐世昌为“非法总统”。曹、吴暗示各省直系军阀立即通电响应。吴佩孚并出面号召，为使“法统重光”应召集民国六年旧国会，并愿拥黎元洪复职。吴景濂与王家襄当即前往黎宅敦请黎元洪复出。11日，吴从天津亲送黎元洪赴京就职。次日，吴在京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到8月1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次正式宣布复会。黎元洪也深知自己地位的危险性，便竭力拉拢吴景濂。10月10日，授给吴景濂勋一位及一等文虎章。

曹锟把复会的旧国会看成自己手中的工具，为迅速完成“过渡”，必须利用国会把黎扶起后，再把他赶走。11月18日，在曹锟授意下，吴景濂等出面，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幹在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的金佛郎一案中有“受贿”情事，迫使黎下令逮捕罗入狱。此举目的在于推倒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的“好人内阁”，为曹锟篡夺总统职位扫清道路。与此同时，吴景濂等人与曹家兄弟在国会内外加紧活动，收买议员，做“驱黎拥曹”的准备。经过他们一番紧张活动，1923年6月，终于把黎元洪赶下了台。然后以五千元乃至万余元一张选票的高价，贿买大批议员，在这年的10月5日，把曹锟选为“大总统”。8日，吴景濂亲赴保定，向曹锟呈送总统当选证书。随后，吴等又匆匆地搞了一部“宪法”，以图掩盖他们的贿选丑行。

曹锟登上总统的宝座后，吴景濂满以为自己包办贿选有功，一定会被曹锟派作内阁总理。“讵知曹锟甫得当选，即背义食言”[(3)]，准备把内阁总理许给自己的亲信、当时暂代总理的高凌霨。吴深感自己受骗，痛恨曹锟，并与高凌霨成为水火。12月，众议院内有一派拥高的议员提出吴景濂任期届满，应改选议长。同时，吴又听到高凌霨有

不利于己的消息，便于同月21日携带众议院印信潜逃天津日租界匿居。北京地方检察厅以吴毁坏文书罪提起公诉。吴闻讯乃秘密东渡日本暂避。

吴景濂隔年后回国，闲居天津，虽企图东山再起，终无所获。随后便以皈依佛法为名，无所事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丧。翌年，“国联”李顿调查团经过天津时访问吴景濂，吴如实向李顿陈述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及东北民众的真实心愿。“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企图拉吴下水当汉奸，吴以老病托词拒绝。1944年1月24日，吴景濂在天津病故。

---

(1) 《吴景濂生前口述自传》（未刊稿）。

(2) 《吴景濂日记片断》（未刊稿）。

(3) 《吴公莲伯行述》（未刊稿）。

吴俊陞

孙德昌

吴俊陞，原名兆恩，字兴权。1863年10月11日（清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于奉天（今辽宁）昌图兴隆沟村。祖籍山东历城，出身农家，其父吴玉以贩马为业。

吴俊陞五岁随父落户于奉天省郑家屯（今属吉林省）。因生活贫穷，八岁就给双合大车店喂猪放牧牛马。1880年，吴俊陞十七岁时投奔设在康平大屯的清军捕盗营丁春华把总手下，充当伙夫。三年后，自备马匹和武器，当上了一名骑兵。吴酷爱军旅生活，处事圆滑，1887年由什长而哨长。因受当过马贩的父亲影响，以习马性、识马行、善相马闻名营内外。1897年升为哨官，成了丁春华的得力助手。

清朝末年，辽西人民困苦异常，土匪猖獗，拉杆子立山头，四处抢掠。吴俊陞在讨伐胡匪（马贼）、蒙匪战斗中，常为军中先锋，屡立奇功，于1906年升任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调驻郑家屯。1907年6月，张作霖移驻郑家屯，两人皆行伍出身，一见如故。

辛亥武昌首义后，吴俊陞奉总督赵尔巽之命，率部赴奉天（今沈阳）拱卫省垣，曾与张作霖联名致电袁世凯，请率兵勤王，镇压革命。1913年2月，吴被任命为奉天第二骑兵旅旅长，5月加陆军中将衔，11月到林西驻防。

1914年2月，吴俊陞晋升陆军中将，3月兼洮辽镇守使。1915年袁世凯大搞帝制自为，吴曾递请愿书劝进，12月被授二等男爵。1916年日军悍然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制造“郑家屯事件”，日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北京政府接受驻华日本公使的“警告”，吴俊陞被迫屈服承认，赔礼道歉。

1916年5月，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与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为争“奉天王”秣马厉兵，吴俊陞向张作霖表示：“若大帅想打（指打冯），俊陞带兵打前敌。”[1] 冯因附张勋复辟被解职，由张作霖兼任二十八师师长。1917年6月，张作霖将后路巡防营与骑兵第二旅合并，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师，任命吴俊陞为师长，以报答吴助臂之功。吴对张表示：“虽不能同生，但愿同死。”[2] 同年10月，吴俊陞受张作霖派遣进驻齐齐哈尔，解除黑龙江省驻军旅长巴英额、英顺的兵权。1919年7月，吉林督军孟恩远被解职，以鲍贵卿继任，孟不服，孟的外甥吉林师长高士傧请收回罢免孟的成命，并兴师讨伐张作霖。张任命孙烈臣为东三省南路总司令，吴俊陞为北路总司令，进行夹击，高士傧被撤职查办，孟只好交出吉林政权。1921年3月，孙烈臣调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由吴俊陞署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6月加陆军上将衔。从此，以江省为基地，发展地方势力，实行军阀统治。他统治黑龙江达七年之久，极力驾驭部下，培植爪牙，把江省变成吴家天下，百般弄权，简直就是当地的土皇帝。民间盛传“石家兄弟，刘家外甥，靖家有旅长、县长，董家有厅长、道尹”[3]。

1922年4月至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5月10日北京政府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任命吴俊陞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直系吴佩孚想以山东同乡同族关系拉拢吴俊陞，离间分化张作霖旧部，吴俊陞不为所动。张作霖于5月12日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奉军总司令；吴俊陞、冯德麟等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命令。6月8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陞为副司令（孙、吴仍任吉林、黑龙江督军），正式宣告联省自治。保安司令部于7月16日组成，下设七处。旋又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后改陆军训练处），实行整军经武，加强备战。同时奉系与孙中山及皖系取得联系，以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付直系，此即所谓的反直“三角同盟”。吴俊陞作为张作霖的伙伴，一切遵照张的旨意。8月，黑龙江亦成立军事训练处，由吴兼任督办。

由于曹锟贿选总统，吴佩孚坚持武力统一，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内部因内阁等问题也起分化，奉张乘机倒直已成不可免之事。1924年9月初，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福建的孙传芳，向皖系的浙江督办卢永祥发起进攻，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段祺瑞等通电支持卢永祥，张作霖借口援卢，迅速调集十七万人马，编成六个军，于9月15日向山海关、热河进发。直系以吴佩孚为总司令迎敌，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吴俊陞任奉系第五军军长，率二十九师及两个混成旅攻占开鲁，进逼赤峰待命，并将留守部队均配置江省各要冲，巩固后方。是役奉军占明显优势，而直军冯玉祥又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使吴佩孚腹背受敌，全军主力丧失殆尽，万不得已，于11月2日率残部二千余人乘舰南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张与冯玉祥的矛盾逐渐扩大，各方调和的结果是把段祺瑞重新推上政治舞台，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4年12月，令吴俊陞督办黑龙江省军务善后事宜。1925年元月，吴将省防军改为保卫团。2月，“善后会议”开幕，吴俊陞为善后会议会员之一。3月，东北军再次整编，吴兼任第十八师师长。

1925年10月，吴俊陞奉张作霖命令，指挥万福麟、穆春、张九卿等部骑兵，向多伦、张家口进军，袭击冯玉祥西北军后路。11月下旬，接到张作霖关于郭松龄在滦县倒戈反奉的告急电，吴俊陞立即从热河班师助张。张作霖派吴为“讨逆”军总司令兼左翼军司令。12月，吴亲至前线督阵，他所指挥部队除一部增援张作相的右翼外，其余均在左翼，形成夹击郭军态势。23日，巨流河决战，郭军受挫，由胜转败。24日，吴部骑兵更乘机袭击郭设在白旗堡的指挥部，郭松龄夫妇潜逃，被穆春骑兵师王永清团追上俘获，傍晚押在新民老达房（今老大房）一烧锅（酒厂）院内。25日，郭被害于老达房村外五里许辽河沿地。29日，张作霖在帅府召开讨郭善后会议，吴俊陞等一些老派人物认为附“逆”的这些东西都是“郭鬼子”（郭松龄外号）一手训练出来的，将来恐怕靠不住，不如将他们一网打尽，坚持主张“刑乱用重，

此辈叛徒，不（宜）轻恕”[4]。

1926年1月，奉张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再战，7月吴俊陞部先后占领榆树沟、沙门口和多伦。时北伐军已从广东出发，接连在两湖、赣闽战场取得胜利。为了挽救北洋军阀即将灭亡的命运，解决北方统一及对南用兵问题，张作霖屡次召开会议，吴俊陞、张作相等老将希望保境安民，而张宗昌及少壮军官则要求以援吴（佩孚）、援孙（传芳）、“讨赤”为名，夺取被援助者土地。后孙传芳因被北伐军战败投奉。1926年11月，在天津蔡园会议上吴俊陞与孙传芳、张宗昌等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于12月就职，随即出兵河南及苏、皖，吴俊陞、张作相负责巩固后方。

1927年6月，吴俊陞、孙传芳等再次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其军队统称安国军，吴俊陞任第七军团军团长。9月，齐齐哈尔人民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在临江设领事，吴派大批军警进行弹压。10月，吴被任命为东三省边防司令兼保安总司令。翌年1月，以通化为中心的东边道大刀会暴动，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吴亲自率部配合宪兵司令齐恩铭督“剿”，残酷屠杀大刀会员和无辜农民三千余人，烧毁民房数千间。

1928年4月，国民党继续北伐，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一、二、三、四集团军向张作霖的安国军进攻，安国军节节败退，吉、黑增援军已赶到关内，张作霖派吴俊陞率领至德州布防，旋决定放弃德州，命吴在榆关设后方总司令部，吴于5月上旬偕张作霖家属回奉。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决定退回关外。日本政府乘机要挟奉方解决“满蒙悬案”，未得满意回答，日本军方必欲除掉张作霖。张于6月3日夜乘专列返奉，吴俊陞得报即同莫德惠等前往山海关迎接，并同车北行。4日晨五时二十七分，列车行至皇姑屯三洞桥铁路交叉处，突然被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设伏炸毁。张作霖重伤送至大帅府，当日死去，吴俊陞头部被一硬铁扎入，脑浆外溢，当即身亡，终年六十五岁，正应了“但愿同死”一语。

吴俊陞四十岁以后开读《三字经》，曾自书“自古名将爱良马，从来美人属英雄”[5]，送日人早川正雄。吴作为军阀，集强悍、愚昧、荒唐、贪婪于一身。他依仗权势，搜刮民脂民膏，财产不计其数，在东北除张作霖之外，吴俊陞数第二号财主。吴占有土地之广，真乃洋洋大观，良田竟达二十七万垧之多。他大兴土木，建公馆多处，在奉天（沈阳）小河沿上坎山神庙地有之（今沈阳市大东区委），在郑家屯吴辕门处有之（今吉林省双辽县公安局），在北京北皇城根（地安门）有之，在大连黑石礁有之，而督军府在齐齐哈尔（今解放门北齐市建华区委）。吴还广办工商业，有绥滨火犁公司、齐齐哈尔广信公司（合办）、广信烧锅、油房杂货栈、钱庄银号及黑河金矿和典当多处。家养三千匹蒙古马，上百头双峰驼，放牧在齐齐哈尔、洮南等草甸子上。养猴子多达四十余只，每出巡得用两节车厢随车供其玩赏。

---

(1) 周大文：《张作霖统一东三省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人物资料专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2) 沈阳市参事室副主任姜明文口述。

(3) 赵长碧、王鸿宾：《吴俊陞与日本帝国主义》，《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第91页。

(4) 金毓黻：《郭松龄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74页。

(5) [日] 早川正雄：《吴俊陞的面影》，大阪屋号书店1930年印行。

吴克仁

姜克夫

吴克仁，字静山，满族。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出生于吉林宁安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入乡塾受启蒙教育，民国成立入县城高小和中学肄业。

宁安地处国防前线的牡丹江流域，曾备受日、俄侵略者蹂躏之苦，吴克仁目睹身受，壮怀激烈，遂立志弃文习武，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被分派到皖系边防军服役。直皖战后被张作霖收编，从此进入奉军。因吴学术优良，在第一、二次直奉战中屡立战功，先后由排长、连长升至营长。1925年被选派赴日本入炮兵学校深造，翌年学成回国，任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主任兼炮兵教导队上校队长。

1928年6月，北伐军进逼京、津，张作霖于返奉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炮兵教导队改为炮兵教导团，吴克仁任团长，后又改任东北炮兵第十八团团长。1930年，张学良为提高东北炮兵素质，派吴克仁赴法国考察炮兵，回国后升任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少将教育长。吴精心治学，将在国外学到的炮兵战术传授给学员，为国家培训了大批炮兵指挥人才。1933年春，日军侵略热河，吴克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七师副师长，编入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参加了长城抗战。

1934年春，张学良自欧回国，因在意大利期间受法西斯主义影响，高唱“拥护领袖”口号，接受蒋介石所委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职，调东北军南下“剿共”。吴克仁时任一一七师师长，率部自北平清河镇进驻河南光山，对红二十五军作战。9月，红二十五军自鄂豫皖

西撤进入陕南，张学良奉蒋介石令，派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开赴陕南追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改委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督率王以哲等部进攻陕北，在榆林桥、直罗镇两次战斗中被红军歼灭了近三师之众。张学良既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又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争取之下，认识逐步转变，终于在1936年4月在洛川与周恩来会谈，达成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协定。此时吴克仁已升任六十七军副军长，随王以哲进驻延安，与参谋长赵镇藩共同协助王以哲执行张学良与红军达成的协定，负责对陕北红军输送弹药物资，保护红军人员来往的安全。东北军虽然原是一支军阀部队，但通过和红军的频繁接触，思想很快发生变化，许多爱国军官和广大士兵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吴克仁痛感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为军人之耻，于1936年春即参加了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进步军官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王以哲留西安协助张学良处理军政大计，吴克仁则率六十七军移驻陇东平凉地区，监视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行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被蒋扣留，东北军内部因此发生混乱，王以哲竟被孙铭久等少壮派所杀。六十七军官兵闻耗，极为愤激，纷纷要求进兵西安为王以哲报仇。吴克仁与王以哲友谊素笃，虽亦极悲痛，但为顾全大局，力予劝阻，使东北军避免了一场更大的自相残杀的灾难。

王以哲遇害后，吴克仁经西安抗日联军总部委为第六十七军军长。1937年2月，东北军被迫调离陕、甘，东移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六十七军军部移驻界首，各部分驻阜阳、涡阳、沈丘等地。所辖五个师经过整编，合并为一〇七、一〇八两个乙种师。

六十七军整编甫毕，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吴克仁当即率全军将士通电请缨。7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动员令，东北军刘多荃、吴克仁两军皆在动员之列。吴克仁接到动员令后，即集结全军经商丘、徐州开赴沧州，接替自平、津南撤的二十九军正面阵地。8月

下旬，六十七军又奉命驰赴大城，接替二十九军王长海部，堵击由独流出动的日本侵略军。当时二十九军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六十七军开到大城后，即在左翼姚马渡扼守拒敌。

1937年夏季，我国北方大雨为灾，平地水深没膝，六十七军辗转跋涉，行军备极艰苦。但自“一二九”救亡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即派遣刘景希（谷牧）、杨西光等一批共产党员在该军开展工作，官兵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开到前方后，中共东北特委又派于毅夫等人以东北救亡总会名义前去慰问、鼓动，故全军上下斗志昂扬。

8月21日，日军向津浦线发动新的攻势，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对沿子牙河南下之日军中岛师团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因正面二十九军于9月11日向南撤退，六十七军亦不得不于16日放弃姚马渡，辗转经献县到达邯郸，拨归商震指挥，担任防守临洺关的任务。10月15日，日军土肥原师团猛攻临洺关，六十七军在敌军猛烈炮火攻击下，死伤惨重，渐不能支，又得不到商震的增援，16日，吴克仁被迫率军南撤，到达新乡休整。

吴克仁对河北前线各军将领保存实力、怠于作战，致被日军各个击破，非常痛心，前往南京向蒋介石陈述，要求调离北战场。这时上海战局吃紧，蒋正苦于无兵可调，遂将该军迅速运至安亭。

淞沪抗战自8月13日爆发后，南京统帅部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迫我作城下之盟的企图，提出了不惜任何牺牲守住大上海的口号，先后投入了八十五个师的兵力，在北起宝山，中经江湾、闸北，东迄浦东、川沙约一百公里的弧形阵地上，与日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搏斗。日军虽投入了二十余万人，挟其优势的火力，历时两个多月，攻势迄无进展。但至10月下旬，淞沪战场形势开始逆转。10月31日，日军突破我左翼方面军大场防线，威胁中央方面军侧背。适于此时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开到战场，经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拨归右翼方面军张

发奎指挥，作为右翼军的总预备队，驻军青浦。

11月5日，日军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三个师团及第五师团之国崎登旅团在金山卫登陆，获得滩头阵地后即直扑松江。张发奎当即命令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协同四十三军郭汝栋部及松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公玙死守松江三日，以掩护上海守军撤退。6日傍晚，吴克仁率六十七军赶到松江。当时郭汝栋所率四十三军仅存残部五六百人，武器又窳陋不堪，而六十七军则军容严整，装备齐全。吴克仁向王公玙了解敌情后，即命令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率部防堵城西之敌，一〇七师师长金奎璧出新东门迎击北犯之敌。金师出击后，与日军谷寿夫师团先头部队遭遇，杀伤敌人五六百人，敌被迫后撤。该师三一九旅旅长吴骞负重伤，三二一旅旅长朱之荣阵亡，团、营长亦伤亡多人。7日下午，敌谷寿夫师团大队开到，将金师击溃，直趋苏州河左岸。张文清率一〇八师开出城外，敌军国崎登旅团即已接近松江城垣，乃令三二二旅旅长刘启文率部占领松江城至石湖荡之线。7日中午，刘旅在三十号桥附近与敌遭遇，刘启文力战阵亡。敌军遂突进到松江城西关大桥附近，与夏树勋三二四旅展开激战。至8日下午，战况愈趋激烈，夏旅伤亡惨重。吴克仁以战况紧急，乃亲自出城督战。坚持到8日半夜，吴克仁以守城任务已经达成，遂与郭汝栋、王公玙商定突围，令六十七军向昆山撤退。9日黄昏，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四十四岁。

淞沪抗战中，吴克仁为了掩护上海守军撤退，率六十七军坚守松江三日，不仅全军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且本人以身殉职，其壮烈事迹理应受到褒扬。该军副军长贺奎于事后为吴克仁及各级战死官佐请恤时，国民政府军政部竟根据所谓战区情报，诬吴克仁为叛变投敌。第六十七军番号亦被撤销，缩编为一〇八师，拨归中央军王敬久部。吴克仁所受不白之冤，后经旅美报人田雨时于1981年撰文揭示，真相乃大白。为了褒奖吴克仁的英勇殉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7年2月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子女颁发了烈士证书。

主要参考资料

王公玙：《“八一三”之役吴克仁军长殉国纪实》，台北《中外杂志》第28卷第3期（1980年）。

田雨时：《忠烈泯没昭恤无闻的吴克仁将军》，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年）。

吴禄贞

李宗一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生于1880年3月6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其父吴利彬是秀才，在武昌教书，1898年病故。

1897年，吴禄贞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为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在校期间，与第二期学生清室贵族良弼交谊甚厚。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学生参加革命。吴禄贞虽然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不同意反满学说。同时，他和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也保持友好关系。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改良派认为推翻西太后使光绪当权的机会到来。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兵“勤王”，吴禄贞秘密回国参加。“自立军”以汉口为中心，分立五军，吴禄贞和秦力山等率领大通前军，于8月仓促起事，与清军巷战数日，因寡不敌众，终于失败。吴禄贞逃到上海，不久返回日本士官学校。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他更加倾向民主革命。

1902年4月，他毕业回国，在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担任教习，暗中向学生宣传革命主张，在他鼓励之下，后来参加革命团体的青年有刘静庵、胡瑛等三十多人。1903年冬，他应黄兴邀请，同李书城、耿觐光等赴长沙，筹划在湖南发难。这时，适逢清廷在北京创设练兵处，编练新军。经良弼推荐，练兵处调他入京。他“初不欲往，同志中谓君为当道注目，与其在外无所建树，不若投身中央，伺隙而动”[(1)]。吴禄贞接受了劝告，于1904年4月抵北京。

1904年5月，吴禄贞被派署理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即科长），次年8月实授。在京时，他仍与湖北革命志士暗中保持联

系。刘静庵被捕后，他通过良弼（军学司副使）和铁良（练兵处会办）向庆亲王奕劻说情，竭力挽救。1906年10月，他被派赴新疆伊犁考察新军。11月抵兰州，身穿便服谒见陕甘总督升允，“辞气之间未能谦和逊顺”，升允大怒，当即将他扣留，并诬奏他“冒充钦差”，沿途“需索供应”[(2)]。铁良奉旨查办，一面派员前往兰州调查，一面致电升允释放他。年底他回到北京。次年6月，铁良查办结案，复奏他“并未冒充钦差”，但“往谒督臣升允，便服请见，亦与体制未协，此实因该员游学外洋多年，于中国礼节律例均未深加考究所致，其轻率疏忽之处自应量予薄惩，俾资儆惕”[(3)]。为此，将其监督差使立即撤去。7月，他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充军事参议。

吉林省延吉厅与朝鲜接壤，以图们江为界。日本侵占朝鲜后，即觊觎延吉地方，并于1907年秋制造借口，派兵渡江，侵占延吉厅所属龙峪、光霁峪等地，强立“间岛”名目，妄图吞并。吴禄贞奉命“密往确查”[(4)]，于9月担任延吉边务帮办，常驻延吉，“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5)]。他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和文献记录，提出《延吉边务报告书》三册，证明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逐条驳斥了日本制造的“间岛”谬论。经他据理交涉，终于迫使日军退出侵占地方，因此得到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的赏识。1909年4月，他升任延吉边务督办，被授以陆军协都统，仍驻延吉。

1908年底，光绪帝、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和少壮亲贵铁良、良弼等人，企图重用留日陆军学生，以削弱袁世凯北洋派的军权。载沣罢免了袁世凯以后，于1910年初调吴禄贞回北京，授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派赴德、法两国阅操。吴禄贞回国后，向黄恺元（同盟会员）借了二万两银子，馈送庆亲王奕劻，谋出任一省巡抚。结果于12月23日被任命为陆军第六镇统制。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原由段祺瑞担任统制，协统李纯、周符麟及各标统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小站旧人。他们对非北洋派的吴禄贞自然心怀不满。吴禄贞又过于操切，一上任就试图通过人

事调换，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先任命同盟会会员、留日士官生张世膺为参谋官，又以“烟瘾甚重，行同盗贼”为理由，将周符麟撤职。因此，各级军官“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6)]。不久，他又呈请任命李书城为标统，但陆军大臣荫昌不予批准。为此他写信指责荫昌“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7)]，语气十分凌厉。荫昌怀恨在心，派陆军部检查官到第六镇秘密查访，罗织罪名，企图将他撤任。他“觉得第六镇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遂萌退志”[(8)]。从此常住北京，与蒋方震、李书城等饮酒赋诗，“借以消胸中的积闷”[(9)]。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北京，他一方面庆幸革命终于发生，另一方面又为未能控制第六镇而担忧。10月14日，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赴湖北，镇压革命。他曾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于是他便前往保定，掌握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倚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秘密会商，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与此同时，山西也爆发革命，清廷急令第六镇第十二协开赴石家庄，进攻山西。吴禄贞又由滦州赶赴石家庄，令第十二协停战，并亲自赴娘子关，一面与山西军密商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以山西军已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他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下令停战，北洋军退出汉口，严惩纵兵焚烧汉口的军官。清廷大惊，疑心他是革命党，但又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以假言假语嘉奖他，并于4日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已经出山，由彰德到达湖北孝感，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身份指挥北洋军对革命军作战。他侦悉吴禄贞的密谋后，立即派在湖北军中的周符麟携带巨款至石家庄，以两万元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字惠田）刺吴[(10)]。

吴禄贞平生志大气豪，错误地认为警备是怯懦的表现，得知周符麟至石家庄谋害他，仍不加戒备。11月16日深夜，他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至次日凌晨，马步周率领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11]。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下令对吴禄贞以大将军例赐恤。1913年11月7日，遗体安葬于石家庄。有《吴绶卿先生遗诗》二卷行世。

---

(1) 《吴君禄贞事略》，《时报》1912年3月8日。

(2) 《铁良奏请将吴禄贞冒充钦差详细电复由》，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故宫军务人事档。

(3) 《奕劻等奏查复吴禄贞冒充钦差由》，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故宫军务人事档。

(4)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1，1911年版，第9页。

(5)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1，第9页。

(6) 《陆军部检查官吴宗煌上陆军大臣荫昌密呈》，宣统三年二月。

(7)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0页。

(8)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50页。

(9)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50页。

(10) 关于刺杀吴禄贞的主谋人，另一说是良弼，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11) 张世膺，字善飞，江西人。周维桢，字干臣，湖北麻城人。两人都是留日士官生，同盟会会员。

吴懋鼎

熊尚厚

吴懋鼎，字调卿，又名荫柏。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生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他的父亲吴宗禄在苏州经商，1858年举家移居苏州。吴懋鼎读了几年私塾后，入苏州二妙堂笔庄当学徒。后来他父亲常往上海做生意，托人将他介绍去上海充外轮跑仓。吴懋鼎在任跑仓时，常同一些买办打交道，遂与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立功相识。1864年经席介绍，他进了英商汇丰银行，业余刻苦自学英语，企望将来当上买办。

吴懋鼎工作勤恳，头脑聪敏，颇受汇丰银行主持人的赏识，1871年任上海汇丰银行副买办。1880年，他被派往天津，与汇丰银行代理人博维斯（F．D．Bovis）共同筹设汇丰天津支行。次年天津汇丰银行开业，他任该行第一任买办。其后，又任英商仁记洋行买办。

吴懋鼎在天津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因清政府在财政窘迫下常向汇丰银行借款，遂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攀上同乡关系，往来频繁。李在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兴办铁路和通过英商谦顺洋行替淮军购买军火时，都以吴为中间人，故此吴深得李的赏识。在李的保荐下，他捐得直隶候补道官衔，并充淮军钱粮所总办。其后还经李的引荐，被召至北京觐见了慈禧太后。

1887年，李鸿章在天津、唐山间建造铁路，4月将开平铁路局改名中国铁路公司，以吴懋鼎出任总办，指定天津汇丰银行为收款银行。1894年，吴被清政府任命为关内外铁路总局总办，任职三年，被称“办事干练”。

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杨锐等维新派首要分子的推动下，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派人士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吴懋鼎在博维斯的支持下，也上书光绪帝，由李鸿章代奏条陈十项，建议在全国各大城市筹设商会。在变法期间，他被任命为京师农工商总局三督理之一，与端方、徐建寅平列。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废除新法，重新听政，谭嗣同等六人被逮捕处死，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吴懋鼎也遭到通缉拿办。由于得到英国公使馆的保护，他躲在北京汇丰银行里。事后经过李鸿章的力保，始免被缉拿，然而却丢了所任的官职，专任买办。他是天津外商银行买办的第一人，与天津怡和洋行买办梁炎青、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合称“天津四大买办”。此后，他继续与清室大吏密切往还，投拜军机大臣荣禄为门生，又与邮传部侍郎、路矿督办胡芸楣及北洋新军头子袁世凯等结识。在袁任直隶总督期间，吴曾任天津商务局总办。

吴懋鼎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兴办实业，是天津著名的买办资本家。1887年他伙同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杨宗廉、盛军统领周盛波，集资一万八千银两开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火柴业），获李鸿章批准，在直隶省境内专利十五年。该公司产品销售京、津地区，大获其利。1891年5月，制造厂发生火灾，被焚毁。同年8月，他利用被火焚毁的旧厂址，与司达赛（A．D．Starsatt）等四名英、俄商人创设华北贸易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资本银四万五千两，吴任总办，司达赛为稽查。

1888年，在天津的英、德、法及丹麦商人共同投资，推吴为发起人，出面开办天津气灯公司。该公司开办后至19世纪90年代末，吴一直任董事。

1897年，吴懋鼎经直隶总督王文韶批准，以资本银三十五万两筹办天津织呢厂。两年后投产，生产上等毛毯、呢绒及其他毛织品，供给天津外国驻军及贵族、官僚享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该厂厂房被毁。

1898年，吴懋鼎独资创设天津北洋织绒硝皮厂，资本额七十六万余两，获清政府批准专利十年，官督商办，包办清政府禁卫军及新军装备。未及十年，该厂因经营不善而无形停顿。

1899年，吴懋鼎与德商兴隆洋行合办天津打包公司，他占股二分之一。次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毁于炮火。由于吴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曾给英国领事馆通风报信，告知清军将炮击英国侨民所在地，为此他的织呢厂和打包厂均从《辛丑条约》赔款中取得赔偿，还被英皇授以维多利亚勋章及金壳表等奖品。

1905年，吴懋鼎独资创办天津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开办后营业发达，然不久被英租界工部局强制收买。1907年他又与英商合办宛平通兴煤矿公司，资本银一百万两，中英各半，他任董事长。其后该矿营业不佳，转让给英商麦边经营。

此外，吴懋鼎还投资新记地产公司和中国投资公司，并为上海、香港等地一些英商公司的股东。

吴懋鼎在1905年辞去了天津汇丰银行和仁记洋行买办职务，居于天津英租界（今和平区）寓所。同年12月，清政府赏给他二品顶戴，任商部三等顾问官。他在晚年虽然仍和清政府官僚及北洋军阀政客密切往来，但却不愿再出山做官。1909年和1913年，清廷和袁世凯曾拟派他任山西巡抚、财政总长，他均推辞未就。

1928年1月，吴懋鼎病逝于天津，遗有财产约四五百万银两。

主要参考资料

吴焕之：《关于我父亲吴调卿事迹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英］雷穆森著，许逸凡、赵地译：《天津》第20章《当代中国名流》，《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2期，第146—147页。

《吴懋鼎》，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70—971页。

团红石：《天津概述（1919年以前）》，《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3期。

吴佩孚

李宗一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著名的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生于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他的父亲在县城里开设杂货店，是个小商人。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学兵，兵事余暇仍继续读书。二十二岁时（1896年）考取秀才。次年因得罪了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秀才，并遭到通缉。他遂逃到北京，以摆卦摊算命谋生。

1898年，吴佩孚到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当兵，被派在一个姓沈的管带手下当戈什哈（即勤务兵），传送文书，为文案郭绪栋所器重，当年被选拔入开平武备学堂肄业。1899年聂军改称武卫前军。次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开平武备学堂停办，吴回武卫前军，担任后路炮队队官，驻防北塘。10月随军赴马兰峪驻扎。1901年2月，武卫前军中、后两路裁并减员，吴被裁减。次年9月改投直隶总督袁世凯，被批准入保定武师范学堂，后转入测绘学堂，1904年1月毕业[(1)]。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北洋督练公所与日本军队在烟台秘密合组侦探队，吴佩孚被选为队员。他和冈野增次郎（日本人）等扮成肩挑小贩，赴东北各地刺探俄军情报，因“功”以帮统记名。日俄战后，他奉调回保定，拨归北洋陆军第三镇差遣。1905年10月担任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次年升为第一营管带，1907年随第三镇至吉林长春驻防。当时，第三镇统制曹锟对吴很器重，1908年调吴担任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镇奉调入关。炮兵第三标在娘子关哗变，原任标统撤职，吴遂受曹锟提拔，继任第三标标统。

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镇改称师，标改称团。吴佩

孚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驻扎南苑。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于1914年4月以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吴佩孚改任师部副官长，随军南下，1915年晋升为第六旅旅长。随后，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运动兴起，第三师于1916年初奉命入四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吴率第六旅先至綦江，2月下旬与护国军战于纳溪，因攻占纳溪有“功”，袁世凯于3月7日申令授吴为陆军中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帝制，袁世凯的皇冠迅速落地，并于6月6日因忧愤成疾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第三师奉命撤回保定。1917年7月，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充当“讨逆军”西路先锋，由保定进攻北京，与张勋所部“辫子军”战于天坛。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下台，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首领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北洋政府大权。由于段拒绝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抗。段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佩孚随军驻汉口，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这时，冯国璋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主张与西南军阀议和，不肯公开下讨伐令。在直、皖两系的矛盾中，曹锟和吴佩孚都属于直系，附和冯国璋。

1918年春，护法湘军攻克岳阳。由于皖系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冯国璋不得不下令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指挥，反攻湖南。当时，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由鄂入湘，连陷岳阳、长沙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他满以为凭“战功”可以得到湖南督军的职位，没想到这个据有地盘的实职竟然落到皖系张敬尧手里；他只赢得“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空衔，因此十分气愤。这件事是他以后反段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他攻占衡阳后，即按兵不动，并于耒阳公平墟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所派代表商洽停战。段祺瑞屡次急电饬令进攻两广，他均置若罔闻，不予理睬。8月21日，更公开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对段的“武力统

一”政策，而主张南北议和[(2)]。为了哗众取宠，他还大唱“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地盘”的高调，并以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来标榜自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迸发出来，段祺瑞控制下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吴佩孚乘机接连发出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支持”学生运动，摆出一副“爱国军人”的姿态，颇博得一般舆论的好评[(3)]。11月，吴与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代表在衡阳秘密签订《救国同盟草约》，结成反段的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的首领地位。

1920年5月，吴佩孚得到西南军阀供给的军饷六十万元，自衡阳领兵北撤，抵汉口时，赋诗言志，斥皖系为“妖孽乱京畿”，自己是要“摧狂虏”，“扬国威”，并且是“不问个人瘦，为期天下肥”的大人物，还令军士沿途唱他自编的“满江红”军歌。随后，他把军队布置在京汉铁路保定至郑州一段沿线，即通电攻击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亲日卖国，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其首领徐树铮，对段进行直接挑战。由于皖系的卖国政策丧尽人心，人们对吴的反段寄予很大的期望，甚至把他视为“革命将军”。7月，段强迫总统徐世昌下令免曹、吴职。吴即挥兵逼近北京，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系军队于涿县和杨村一带，一举推翻了段祺瑞控制的亲日派政权。同日本敌对的英、美大喜过望，看中吴是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在报纸上对他大捧特捧，誉之为“强者”、“英雄”、“中国模范之统将”[(4)]。此后，北京政府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8月，吴通电发起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企图利用“国民大会”这种形式驱逐皖系扶植的总统徐世昌，另外组织一个合乎他胃口的政府。但他的计划遭到张作霖反对，未能实现。9月，曹锟升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为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练兵”。

1921年7月，吴佩孚以援助湖北督军王占元抵抗湘军为名，派萧

耀南进兵湖北，镇压了湖北自治军，并把湘军赶回湖南，夺得了王占元的地盘。8月，吴升任两湖巡阅使，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完全暴露了吴“不做督军”的伪善嘴脸[5]。

吴佩孚权势的增长，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这就激化了他和受日本扶持的张作霖之间的矛盾。1921年底，张作霖支持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企图压制直系势力。次年1月，吴率领直系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卖国媚外，向奉系回击。双方通电互相攻击达三月之久，至4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吴率领直军在马厂、固安和长辛店等地击败奉军，张作霖退到关外。

自战胜奉系以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政治野心大为膨胀。当时，一帮政客倡议“恢复法统”，即恢复民国初年的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吴鉴于“恢复法统”既可使南方护法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因为南方政府是借护法成立的），又可赶走徐世昌，因此立刻接受了这个主张。黎元洪于1922年6月复任总统。吴曾企图通过黎元洪和王宠惠内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计划，而曹锟则急于取代黎元洪当总统，从而直系内部发生了“保（定）”“洛（阳）”的分化，使吴利用黎元洪的计划落空。于是吴进一步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狂妄地表示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6]。他一心步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后尘，追求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吴升任直鲁豫巡阅使。曹、吴之间虽有权力之争，但始终没有决裂。当时，吴的巡阅使署所在地洛阳，实际上成为北方政治、军事的中心。巡阅使署机构庞大，除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八大处的办事人员外，谘议厅拥虚位而列名顾问、谘议、差遣者有千余名。政务处为公署的重心，吴的心腹白坚武担任处长。各省都有代表常驻洛阳。英、美帝国主义又对他大力扶植：美国运给军火价值三百多万元，英国给他贷款，英人莫立斯（H．E．Mooris）和格林（O．M．Green）做他的政治顾问。此外，还有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在此期间，北京政

府国务总理、总长、次长以及英、美、日本等国军政要人肩负着秘密的或公开的使命，络绎不绝地奔走于中州道上。1923年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显要人物至洛阳祝寿者达六七百人。当时康有为想拉拢他支持清室复辟，也献上手撰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7)

这时吴佩孚的直属部队有五师一混成旅，他自兼第三师师长驻洛阳，第八师王汝勤驻宜昌，第十四师靳云鄂驻郑州和信阳，第二十师阎治堂驻潼关，第二十四师杨清臣驻开封，第二十六混成旅田维勤在河南，另外还有若干独立团，总计兵力十余万人，控制着河南、湖北、直隶和陕西等省地盘。他一面积极准备对付要向他复仇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北伐政策，指挥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等地。

吴佩孚的军饷每月约八十万元，其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截留京汉铁路的收入，京汉铁路又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军事交通线。为了利用和欺骗工人，他曾发表过"保护劳工"的主张。但是，当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时，他指使军警进行破坏，下令不准开会。为反抗他的专横统治，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他就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然命令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杀死四十多人，造成著名的"二七"惨案。他对工人的野蛮屠杀、赤裸裸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及支持曹锟贿选总统，这一切使全国人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从此他迅速地走向失败。

1924年9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指挥奉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应曹锟的急电，由洛阳到达北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直系军队十余万，派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别担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三路迎击奉军。吴亲到山海关督战。正当两军激战时，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带兵由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成立"国民军"，反戈讨吴。吴前后受敌，

大败而逃。他由大沽口乘船南下，溯长江到达武汉，企图依靠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组织“护宪军政府”，但未能得逞，即回洛阳。不久，国民军胡景翼部攻入河南，镇嵩军憨玉琨部也由潼关东进。吴在洛阳不能立足，退往信阳，准备入鄂。这时鄂督萧耀南为形势所迫，对他婉言拒绝，并请他通电下野。吴被迫退入鄂、豫边界的鸡公山，其残部约四万人多被胡景翼缴械或收编。当胡景翼军逼近鸡公山时，吴只得表示愿意下野，并于1925年春经过武汉，乘“决川”号军舰逃到岳州，托庇于湖南军阀赵恒惕。这时，赵正高唱“联省自治”，通电保护吴，并赠给养。

吴佩孚在岳州暗中联络旧部，伺机再起。1925年10月，孙传芳在江苏发动反对奉系的战争，并通电拥吴出山。吴即乘机到武汉，通电自称受十四省区将领推举，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部于汉口东北之查家墩，任命张其锽为秘书长，蒋方震为总参谋长，派张联陞、寇英杰、陈嘉谟分任一、二、三路司令，攻入河南省。11月13日，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国民军和奉系军队分别沿京汉、津浦铁路南下。但不久奉系和国民军的矛盾尖锐化，张作霖派人联络吴以打击国民军。吴对国民军本来十分仇视，遂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而与奉军勾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3月，吴击败国民军岳维峻部，占领河南省。又沿京汉路北进，先后占领石家庄、保定。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联，将国民军交其部下张之江、鹿钟麟接管。张、鹿致电吴，请求停战议和。吴回电要张、鹿将部队交出。4月，直鲁联军及奉军围攻北京，鹿钟麟发现段祺瑞与奉军勾结，遂将段赶下台。段逃往天津。鹿释放曹锟，并再次致电吴，请入京磋商大计。吴坚持原来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的条件，张、鹿被迫率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吴支持王怀庆于5月8日入京，就任卫戍司令，颜惠庆组织内阁。5月27日，吴由汉口北上，30日抵石家庄，会晤山西军阀阎锡山。6月3日，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攻击国民军。稍后，又派张其镶、张志潭为代表与张作霖的代表郑谦在天津开预备会，双方议定“军事合作到底”。但奉方对颜惠

庆内阁有保留。6月28日，吴和张作霖在北京会谈，经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动，双方表面上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宣布“合作讨赤”，继续对国民军作战，而暗中却仍激烈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

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直军攻击南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开始，吴低估了北伐军的力量，仅派李济臣等督率杂牌军入湘，援助叶开鑫等。北伐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将敌军击溃，席卷湖南，直指武汉。这时，吴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才极为恐慌，一面严令李济臣等收集残兵两万多人坚守汀泗桥等要隘，一面让齐燮元代理总司令，留守长辛店。自己则率领刘玉春等主力军由京汉路仓皇南下增援，1926年8月27日到湖北咸宁，亲至汀泗桥督战，以“大刀队”分八路监视直军，据险顽抗，斩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九人，下令退却者杀无赦。他原想守住汀泗桥，等待孙传芳的援军，以便向北伐军反扑。但是，北伐军以勇猛的攻击迅速夺取了汀泗桥要隘。吴退贺胜桥，扼险以守，革命军又来猛攻。他亲临督战，手刃后退官兵多人，可是仍阻止不住士兵溃逃。9月1日，他自己也狼狈败退到汉口查家墩。但仍命令刘玉春等收拾败兵，坚守武汉，负隅顽抗。不久，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他经信阳败逃郑州，企图组织援军反攻，也未能得逞。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俘虏刘玉春等两万多人。至此，吴的主力被北伐军打垮。

1927年初，北伐军攻入河南，吴佩孚的残兵败将望风溃逃，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暗中向北伐军输诚，齐燮元以亲奉嫌疑离去。奉军以“援吴讨赤”为名，沿京汉路节节南下，妄图趁火打劫，夺取河南。吴众叛亲离，又处南北夹击之中，遂于5月13日偕其妻张佩兰等由巩县南逃。经南阳、兴山、巴东，抵达四川白帝城。先后托庇于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流寓于大竹、绥定等地。这时，他身边只有卫队千余人，仍然打着“孚威上将吴”的大旗，维持着“大帅行辕”的空架子，并不时与新旧军阀暗中勾结，伺机而动。但表面上他不得不通电全国，声明“入川游历，不问政治”。1930年，当新军阀蒋介石、冯玉

祥、阎锡山在中原激战之际，吴企图乘机出川，自绥定起程至麻柳场，拟赴万县东下，为万县驻军王陵基部所阻，遂折回宣汉。次年7月至成都，与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会晤。这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拟聘请吴为高等顾问，借以笼络北洋势力，并派军舰入川迎接。但吴对蒋介石存有戒心，不愿乘船东下，而以应蒋电召为名，率领卫队取道松潘北上，经过兰州、包头，于1932年1月底到达北平。

当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吴佩孚想趁全国动荡之际，借“抗日”旗号纠集北洋直系势力东山再起；但是，由于受到蒋介石的压力，未能得逞。当时，张学良正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月给他“补助费”数千元。国民党政府曾聘他为洛阳“国难会议”会员，他没有应召赴会，而一直住在北平什锦花园公馆里做自己的“大帅”。当伪满洲国出现时，他曾以个人名义通电声讨溥仪。

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并企图把吴佩孚抬出来做傀儡。吴怫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8)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长，他亦严词拒之。当年底，以王克敏为首的一群汉奸在北平组成伪华北临时政府，吴的旧部齐燮元担任伪京津卫戍司令。伪临时政府于1938年1月给吴“特高顾问”的空头衔，月送“车马费”数千元。6月，日本侵略者决定把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等极力拉吴下水，吴故意向他提出请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要求，他也就拒不接受土肥原的策动，表现了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

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馆(9)。

(1) 《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吴佩孚衔名年籍三代详细履历清册》（第三镇统制曹锟造），宣统三年四月。

(2) 《时报》1918年8月25日。

(3) 《民国日报》1919年6月4日、28日，7月8日、13日，1920年8月11日。

(4) 《西报揄扬吴佩孚》，《民国日报》1920年8月21日。

(5) 改造湖北同志会编：《民国十年之吴佩孚》，1921年版，第113页。

(6) 冈野增次郎：《吴佩孚》，日本山梨县万圣阁1939年版，第830页。

(7) 吴佩孚先生集编辑委员会编：《吴佩孚先生集》下编，台北1960年版，第315页。

(8) 章君穀：《吴佩孚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02页。

(9) 关于吴佩孚的死，有不同的记载：一说日本特务为了让他当傀儡，花了大笔钱，他不出山，日本特务无法向日本政府交代，只有将他害死；一说拔牙时感染败血症或毒入神经不治而死；一说被汉奸齐燮元毒死，等等。

吴奇伟

戴仰明　林熙敦

吴奇伟，字晴云，别号梧生，广东大埔人。1890年1月28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八）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岁时在龙川县城伯父开设的一间店铺里打杂，勤恳苦干，为伯父所喜爱，资助入学读书。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转入武昌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后，回到广东在陈炯明部见习，逐步提升为排长、连长和营副等职。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吴奇伟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属下的第三十六团任中校参谋长。汀泗桥之役，第四军叶挺的独立团和黄琪翔、吴奇伟指挥的第三十六团，攻破了吴佩孚坚守的据点，战功卓著，使北伐军得以乘胜进攻武昌。1927年春，吴奇伟以战功升任第三十四团团长。随即在河南上蔡，东、西洪桥对增援吴佩孚的奉军作战。北伐军进军河南奏捷，不久即与由陕西向东出兵的冯玉祥部配合，击败奉军，占领郑州、开封。吴在这次战役中作战勇猛，腿部受伤。

1927年8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后，吴奇伟团随张发奎部进驻南昌。9月，张发奎率部回粤，吴奇伟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三十四团团长。

张发奎部回到广州后，在汪精卫的策动下，11月联合黄琪翔以护党为名发动政变。李济深、黄绍竑被迫离开广州，桂系部队沿西江败退。吴奇伟奉命率部赴西江追击。12月中旬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张发奎急命吴奇伟率部集中惠州，防备驻在东江一带的李济深部队回师广州。广州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广州复为李济深所

得。张发奎、黄琪翔逃往香港。缪培南接替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任第十二师师长，驻兵惠州。1928年1月，第四军在五华县双头圩、岐岭一线，以两天时间迅速击溃了陈铭枢指挥的李济深东路军四个师。吴奇伟率其全师精锐向连平方向穷追，远离主力。缪培南指挥第四军其余四个师在潭下圩一带迎击李济深的西路军四个师，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惨重。吴奇伟率部赶回时，第四军已弹尽不支，遂被赶出广东，退到江西的安远、会昌地区集结，投靠了蒋介石。

5月，第四军奉蒋介石之命调到徐州集训，然后沿津浦路北上，进攻张宗昌的部队，攻取济南、德州，进驻沧州。编遣会议后，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原第十二师缩编为第十二旅，吴奇伟任旅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四师由山东调回江西九江，旋开赴湖北沙市、宜昌间，与驻在该地的桂系部队作战。4月桂系战败，第四师收编了桂军的一部分。不久，蒋介石命第四师乘船东下，阴谋在该师经过武汉时缴械。张发奎在香港获悉蒋的阴谋，秘密赶赴宜昌。9月通电反蒋，并将第四师的番号恢复为第四军，经湘西开往广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组织“张桂联军”，企图夺回广东地盘。1930年2月，第四军为陈济棠所败，绕道广东南路退却，损失很大，只得将三个师并为一个师，恢复第四师名称。张发奎为师长，吴奇伟任三十四团团长。

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联军”又乘机而起反蒋，进兵湖南。6月攻到长沙，赶走了何键。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兵入湘增援何键。第四师腹背受敌，又退回广西，何键得以重返长沙。这时第四师已不足两个团，白崇禧给它补充了一个团，凑成一个师。张发奎于年底离开第四师，由吴奇伟任师长，驻防柳州。

1932年春，吴奇伟奉命率部调离广西北上，抵达江西樟树镇后，在同乡罗卓英劝诱下归附蒋介石，获军费五万元。

吴奇伟投蒋后，第四师又改为第四军，吴任军长。蒋介石随即派

其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吴为保存实力，不肯卖力。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蒋命吴部归薛岳指挥，开往湖南衡阳、祁阳一带堵击红军。红军进入湘西南向贵州前进途中，吴部隔河并行，互不开枪。吴部经湘西芷江到达贵州镇远时，见红军已进入川、贵边境，遂回贵阳附近整训。红军三渡赤水，回师遵义，吴奉命驰援遵义。吴渡过乌江后，获知遵义已被围困。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已从遵义逃出，却要吴部火速前往。吴部进抵遵义以南四十余里的大托铺附近，停止不前。旋红军突然回击大托铺，吴军惨败，漏夜退回乌江南岸。蒋介石得知红军占领遵义后，立即赶到贵阳，召见薛岳和吴奇伟。吴自知尾随红军不打又不救遵义之急，必将受到蒋介石的谴责，立即向蒋“请罪”。此后吴部撤至贵阳附近整训。红军南渡乌江，远离贵阳西进后，吴部又尾随红军经安顺、盘县，一路“送行”到雅安。吴部在雅安整训后东调。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吴奇伟奉命率第四军到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作战数天，伤亡很大。上海沦陷后，由南京撤至芜湖、九江一带。1938年吴升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在南浔线上与日军作战。10月广州沦陷后，吴部调到广东兴宁、潮汕一带驻防。1940年春，吴率其一部防守广西柳州。不久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驻湖北三斗坪。同年6月，陈诚弃守宜昌后，吴指挥所属在湘北、鄂西的澧县、安乡一带作战，击退日军进攻。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吴奇伟任湖南省主席。这时他已成为“无兵司令”。一年后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为薛岳）。他们指挥所部进犯苏北、鲁南解放区，屡吃败仗。吴对抗战胜利之后再打内战，意态消沉，内心矛盾，1947年春托病住进南京汤山疗养院。

不久，吴奇伟又听从张发奎的安排，同张一起回广州，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吴感到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已为时不远。1948年8月，在中共地下党和旧部的帮助下，吴思想上有很大转变。1949年2月，秘密离开广州赴香港，通电起义。吴驻在

东江一带的旧部两个保安团和其他若干部队，也举行了“东江起义”，为加速广东全境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吴奇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3年7月10日，吴奇伟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何滨：《威震敌胆的吴奇伟将军》，《团结报》1985年8月3日。

姚仁隽、孙璞方：《解放战争时期起义的部分国民党将领简介——吴奇伟》，《人物》1985年第3期。

吴清源

顾大勇

吴清源，名泉，字清源，排行为第三子。父亲吴毅，母亲张舒文。1914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十九日）生于福建闽侯一盐商家庭，同年10月随家人迁居北平，在北平度过童年。

吴清源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七岁从留日的父亲那里学会了围棋，不但沉迷于国内高手的名局，而且在父亲的指导下研读了大量日本的棋书和棋谱。父亲的辞世使年仅十一岁的吴清源开始以棋艺养活家人。经顾水如引荐，当时已有“围棋天才少年”之称的吴清源成为北洋军阀段祺瑞门下的棋客。十三岁时，他已隐然有中国顶尖高手之势，并且在日本人的俱乐部战胜了日本棋客，得到山崎有民先生的赏识。与岩本熏六段、小杉丁四段、井上孝平五段等日本棋手对局后，受到日本棋院濑越宪作先生的赏识和邀请，遂于1928年10月在母亲和大哥的陪同下赴日学棋，当时的名人秀哉亲自率领众棋士到火车站迎接。

初到日本，吴清源在棋院“段位认定”对局中连胜筱原正美（先）、本因坊秀哉（二子）、村岛谊纪（先），被定为三段。因健康原因，1929年一年之内没有参加棋士的升段大赛，只参加了《棋道》杂志和《时事新报》主办的“新闻棋”的对局，十二胜七负二平。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擂台赛中，吴清源首次与“怪童”木谷实相遇，开创了“模仿棋”的先例，最终以三目之差落败。此后的四年间，木谷实一直是他最强劲的对手。1930年，吴清源参加了棋士升段大赛，在春季大赛中七胜一败，在秋季大赛中八战全胜，晋升为四段。1932年，在春季升段大赛中八战全胜；在秋季大赛中七胜一败，升为五段。在时事新报社主办的擂台式棋战中力胜十八人，当年取得了四十

四胜五败的最高胜率纪录。

1933年，十九岁的吴清源获得日本选手权战冠军，秋季开始与本因坊秀哉名人进行纪念性对局。吴清源执黑先行，第一子下在右上角“三三”的位置，这在秀哉的棋派中叫做“鬼门”，是禁忌的走法；第二步黑子下在左下角星位；第三步下在天元。起手使用“三三·星·天元”的布局让本因坊秀哉名人大吃一惊，也震惊了整个日本棋坛。随后，吴清源又占据了包含天元在内的四个星，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模样。这也是他研究的一个新布局。这样的布局和先前的常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隔壁观战的本因坊弟子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冲击。这完全和本因坊一门所教的布局背道而驰，这样的对局使得《读卖新闻》的销量直线上升。秀哉名人一遇到困难的局面，就开始说“头疼”等等，然后就宣布“打挂”，就是比赛暂停。有一次，吴清源下了一步预先想好的棋，结果名人长考了三个半小时后，最终还是没有下子就回家去了。这场“恶斗”事关本因坊乃至日本棋坛的名誉，在新旧门派之争外，又添上中日恩怨，更加备受关注。这局棋“打挂”了十三次，下了三个月，翌年1月29日，在第十四次重开比赛后，才终于结束了，秀哉执白二目胜。在这期间，吴清源同时要参加秋季比赛和新闻社主办的比赛等十一局棋。而秀哉名人有众多弟子共同商议，据说第一百六十手那一子就是他的弟子前田陈尔出的妙招。名人多次“打挂”的行为引起争议，从此以后，日本棋院规定每局比赛必须当天结束，不得拖延。赛后，民意调查显示，吴清源在日本的知名度仅次于天皇。这一年，吴清源与木谷实共同创造了重视速度与实利的新布局，并在秋季大手合（升段赛）中使用新布局，11月，吴清源与木谷实合著、安永一主笔的《新布局法》出版。

1934年，吴清源升为六段。1935年春季比赛取得全胜，未参加秋季赛。1936年春季比赛获第二名；接着参加了日本新闻社联盟发起的比赛，至第十四轮对局时，因健康原因由医生劝告退出比赛，当年秋季比赛又未能参加，开始疗养。1937年6月起，吴清源在富士见疗

养所住院，至1938年9月出院。住院期间，担当了本因坊秀哉名人对木谷实七段的“名人引退棋”的解说，写出病中感想《莫愁集》，1940年由天元社出版。

在“名人引退棋”中，木谷实战胜本因坊秀哉，按理，他应当是秀哉引退后的棋界第一人了，但是，人们认为还有吴清源在。1939年10月，读卖新闻社发起了吴清源与木谷实的“升降十番棋”决胜战，即“镰仓十番棋”。在十次对局过程中，几次有人向吴家投掷石子、写恐吓信，威胁说如果吴清源胜了木谷实，就要小心脑袋等等。到第六局时，吴清源以五胜一负把木谷实降为“先相先”手合。至1941年6月，最终以六胜四负战胜木谷实七段。此后的1939年至1956年间，连续十六年，吴清源凭个人之力大胜“十番棋”，创造了日本围棋界的“吴清源时代”。除与木谷的十番棋外，还有1941年对雁金准一，1946、1950年两次对桥本宇太郎，1943年、1951年、1952年三次对藤泽库之助，1953年对坂田荣男，1955年对高川格。除雁金准一在一胜四负的情况下顾及身份退出比赛以外，吴清源将日本所有一流棋士与之对局的交手棋份，不是降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为相差二段的“定先”。这十六年，是吴清源的全盛时代，他从此被誉为“昭和棋圣”。

在下“十番棋”的同时，1939年，25岁的吴清源晋升为七段棋手。1942年2月，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女生中原和子小姐结婚，婚后移居到和子家。3月，晋升为八段。1945年，在第三期本因坊战预选赛中与濑越宪作八段的对局成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最后的一局。1948年1月，与坂田荣男下三番棋，获三连胜。1950年，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以八胜一败一平告捷；2月，被日本棋院授予九段头衔；3月，以七、八段中的十三人作为对手的“对七、八段棋战”开始，十胜三败告捷。10月，移居箱根仙石原。1951年8月，吴清源应邀访台湾，被授予“大国手”称号，并与少年林海峰下了让六子的指导棋，胜一目。1953年5月，与已被自己降为“先相先”的坂田荣男下六

番棋，以一胜四败一平初尝受挫的滋味。1955年，从箱根仙石原移居小田原。1956年，长子信树诞生；同年，梅兰芳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访日，吴与之畅叙旧日友情。

1958年，长女佳澄诞生，同年获得第一期日本最强决定战（名人战前身，读卖新闻主办）冠军。1960年第二期获得第三名。1961年，再获第三期冠军。同年，次子昌树诞生。8月，吴清源在东京目白地区被摩托车撞伤后住院，棋力大受影响。从此，日本棋坛上的吴清源时代一去不返，继之而起的是林海峰、大竹英雄、石田芳夫和赵治勋等新一代棋手。这一年，吴清源与弟子林海峰一起应邀再次访台，并谒见了蒋介石。1984年，七十岁的吴清源正式宣告引退，从此辞别了现役棋士生涯，致力于“二十一世纪围棋”的研究。1985年，吴清源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国籍问题一直困扰着身不由己的吴清源先生，并使他遭受到种种非难。1936年，吴清源赴日八年后正式取得日本国籍；1946年战后混乱时期，在他人操纵下，吴清源一度和妻子一同失去日本籍，处于无国籍状态；1949年2月，他取得了“中华民国”的国籍，其妻则于1952年恢复日本籍。1979年后，遵从本人意愿，吴清源再次取得日本国籍。

吴清源生逢乱世，又介于中日两国之间，内心的苦楚不言而喻。吴在自传《天外有天》中说，围棋与信仰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早在1931年，经木谷实引见，少年吴清源就成为西园寺公毅的信徒。1935年10月，二十一岁的吴清源未参加秋季升段赛，回天津皈依红卍会，又经过两个月的修行成为道院红卍会的正式信徒。1945年5月，吴清源的住宅在东京大空袭中被焚。纹枰犹在，家国幻灭，吴先生一度舍弃围棋，加入红卍会中的“玺宇教”，与教主玺光尊一起辗转漂泊于各地，艰苦修行，宣传教义。直至1949年底，吴清源越来越不满于教主的压榨，才最终脱离“玺宇教”。围棋与信仰贯穿了吴清源一生的挣扎与徘徊，可以说，他热忱地走过一条宗教信仰的修行之路。

吴清源把“二十一世纪围棋”称作“六合之棋”。所谓“六合”，古汉语里是宇宙的意思，表示东西南北四方和上下天地。吴清源对21世纪围棋的构想十分崇尚调和、和谐。他认为围棋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生命哲学。对弈的最终目的，是从中领略圆满调和的“道”，追求棋艺和人生的共同完美。他认为，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要以和为贵。《易经》讲究阴阳调和，围棋也不能脱离这个道路。他说：“围棋的最终目标不是胜负，而是调和。”

吴清源主要著作有《新布局法》（与木谷实合作）、《吴清源全集》、《吴清源自选百局》、《名局细解》、《吴清源打棋全集》（4卷）、传记文学《天外有天》、《中的精神》等；门下九段弟子有林海峰、王立诚、芮乃伟。

悟透棋道，也可悟出人生之道。吴清源在布局、定式、序盘等方面见解甚多，被称为“近代布局的奠基人”。吴清源虽然远离赛场多年，但他的围棋思想和“求道”的围棋精神却长期指导着现代围棋，并将更深远地影响世界棋坛的未来。

主要参考资料

［日］吴清源著，［日］桐山桂一日文执笔，王亦清译：《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吴世荣

陈民

吴世荣，祖籍福建海澄。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吴有才在槟榔屿开设“瑞福”号，经营面粉、火柴及土特产，是当地著名殷商。吴世荣小时由父亲聘请家庭教师，传授中、英文。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读《史记·酷吏列传》至“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时，若有所悟地对家里人说：善于治国的固当如此，就是理家、修身也何尝不是这样。为国不俭，终难富强；为人不俭，必将破产。汉文帝还不忍费百金修建露台，何况我们老百姓，为了家业的兴旺，当以“觚圜雕朴”四字为座右铭。后来，他继承父业，身为富商，但平日生活衣着，仍自奉甚俭，经常穿耐用的黑布裤子；而对社会公益事业，则慷慨解囊，毫无吝色。故甚得亲友的赞许，在当地华侨社会也颇著声誉。

1906年，孙中山经吉隆坡友人介绍，第一次到槟榔屿，要拜访某富商，但其人避而不见，使孙中山处于尴尬境地。吴世荣与好友黄金庆得悉后，主动出面招待，并介绍当地一些爱国华侨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返回新加坡后，派陈楚楠、林义顺到槟榔屿筹建同盟会分会，吴世荣及黄金庆、陈新政、辜立亭等二十二人首先加盟，而后熊玉珊、徐宗汉（女）、陈璧君（女）等亦陆续参加。吴世荣被推举为同盟会槟榔屿分会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1)]。同时设立“槟城书报社”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槟榔屿同盟会分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感到有创办一家报纸的必要。黄金庆等原先办有《槟城日报》，但系商界中立性质，虽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却不便公开宣传革命，无法针对保皇派的谬论进行有力的辩驳。1910年春，缅甸仰光同盟会分会庄银安因办《光华报》屡遭

清领事迫害而至槟榔屿避居，庄与陈新政商议，拟将印刷《光华报》机件迁槟，添招股份，在槟榔屿出版《光华日报》。这一意见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并派胡汉民协助筹划创刊。4月，《光华日报》筹备会成立，吴世荣与黄金庆、陈新政、丘明昶等被推举为筹备委员，胡汉民撰写缘起及招股简章[(2)]，作为槟榔屿同盟会机关报的《光华日报》于12月20日正式创刊，先后聘雷昭性（字铁崖）、戴天仇、方次石为主笔，积极开展革命宣传，逐步取代日益陷于困境的新加坡《中兴日报》，成为南洋革命党人最主要的宣传机关。

1909年5月，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的建议，由新加坡迁至槟榔屿。从此，槟榔屿就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孙中山本人也于次年7月移居槟榔屿柑仔园。汪精卫、黄复生谋炸清摄政王载沣未成，被捕入狱，同盟会即在槟榔屿筹款营救。为了策动广州起义（即“三二九”黄花岗之役），1910年10月，孙中山约黄兴、赵声和孙眉等秘密商议，并命吴世荣召集南洋各埠同盟会代表前来参加秘密会议，这就是国民党史上著名的“庇能会议”。会后，吴世荣又召集槟榔屿的同盟会员，积极进行筹款，支援革命起义。当时国际市场锡价暴跌，华侨商人经济拮据，加上保皇党的破坏，筹款颇为困难。吴世荣率先变卖店产倾资助饷，表现出爱国华侨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而不惜毁家纾难的革命精神。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代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洋各埠同盟会公举吴世荣为总代表，归国参与组织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吴世荣以南洋华侨总代表身份，参加开国大典，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的隆重欢迎。

民国建立后，吴世荣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致力于发展祖国的实业，在上海设立“上海荣公司”，以“经理中华民国政府采办”为宗旨。他在致上海银行家沈缦云的信中说：“荣公司现在颇形发达，爪畦各埠来糖每月间到申数在七八万担，南洋侨商之见重者，可见一斑。”

[3] 为发展我国与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出力甚著。

吴世荣曾对人说：我国欲富强，不外“才”、“财”二字。“才”出于教育；“财”必商业、矿产。我国矿产甲环球，国民不能集股开采，弃利于地下，实在太可惜了。为了发动华侨回国投资，开发矿藏，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吴世荣于1912年2月在南京发起组织“华侨联合会”，这是海外华侨在国内建立的第一个群众性团体。联合会章程规定：本会宗旨“对于祖国，则代表华侨，协助实业、政治之进行；对于华侨，则联络各界，为谋保护发展之方法”[4]。首批会员有著名归国华侨陆秋杰、庄希泉等数十名，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也参加。为了推动南洋各埠成立“华侨公会”，作为华侨联合会的分会，以期联合会的宗旨得以“广范围而谋普及”，1912年4月，吴世荣与王少文联袂南渡，遍历美、荷各属，备受各埠华侨欢迎。不久，南洋各埠先后成立华侨公会二十多处；未成立公会的各埠和各地商会、书报社以及中华会馆等华侨社团，也表示赞成华侨联合会的宗旨，愿作其分会。一年之间，与华侨联合会接洽的华侨社团，不下二百多处，有力地促进了海外华侨的联系和团结。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专心从事实业，研究实业建国计划，并倡议在上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以振兴实业、并便利南洋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吴世荣积极响应，认股十万元。孙中山派沈缦云与爱国归侨庄希泉前往南洋各埠劝募中华实业银行股份，吴世荣备函介绍南洋各埠中华商会和华侨商界人士。由于华侨商人踊跃认股，招股任务圆满结束，共得华侨投资四百三十万元。1913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正式在上海开幕，孙中山任名誉总董，沈缦云任总经理，吴世荣任协理。这是国内民族资本与南洋华侨合资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后因政局剧变，中华实业银行被迫宣告解散。

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讨袁之役失败。吴世荣返回侨居地槟榔屿，继续经商，并致力于华侨社会的福利事业。几年之后，因商业经营失败，又因患病，双腿成残疾，一度贫病交加，陷于困

境。1918年初孙中山得悉后，深为同情，曾赠款五百元，托瓜拉比勒（Kuala Pilak）的邓泽如代交，以应急需[5]。后国民党南洋总支部函告中国政府，使吴世荣从1932年起每月获得生活津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津贴中断，吴世荣生活更为艰苦。

1945年7月21日，吴世荣在贫病交迫中去世，身后极其萧条。

---

(1)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7页。

(2) 钟城芳主编：《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1981年槟城出版，第116页。

(3) 原函存沈缦云之孙沈云荪处。

(4) 华侨联合会编：《华侨杂志》第1期，1913年11月出版。

(5) 孙中山：《致邓泽如函》（1918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7页。

吴铁城

郑则民

吴铁城，1888年3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江西九江。吴家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平湖乡。父吴玉田于光绪初年到九江任商店司账，后自营洋货店，曾任九江商会协理。

吴铁城幼年由其父延师教授经史、英文等课程，继入美以美会设立的九江同文书院读书。1909年同盟会会员林森从上海调往九江关任职，在交游中和吴铁城相识，逐渐成为好友。他们共同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宣传革命思想，吴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随后，吴铁城利用其父在商会中的关系，联络新军官兵和帮会力量，开展了一些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活动。吴曾回忆说：“广泛的周旋于一般商绅之间。就是军界方面的人，我也渗入去打交道。当时清军有一标人驻扎在九江（即五十三标），标统是安徽人马毓宝，我父亲和他认识，我也和他厚相交纳。”“九江当时还有许多帮会中人……我很喜欢他们的豪爽气概，各帮的头目，我也结识不少。”(1)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吴铁城负责同武汉方面的革命党人联络，担任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通讯员，彼此间常通信息。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吴参与策动九江新军标统马毓宝于10月23日宣布独立。九江军政府成立，由马毓宝任都督，蒋群任帮办军务兼参谋长，林森负责对外交涉，吴铁城任总参议，负责办理与军事有关的民事工作。清海军管带黄钟英率领海筹号等四艘军舰和几艘鱼雷艇，从武汉沿江东下，于11月13日驶抵九江。林森、吴铁城等代表九江军政府前往接洽，欢迎海军起义归附民军。九江独立和海军舰队起义增加了革命的声势，对沿江各省的起义有所推动。

11月中旬，吴铁城、林森等被选为江西代表，赴上海、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12月下旬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接见代表时，了解到吴是同乡的年青革命党人，决定将他留在身边工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8月北上会见袁世凯，吴也随侍在侧。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后，吴铁城经孙中山派赴江西催促李烈钧首先发难，起兵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他亡命日本，不久进明治大学，学习法律。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吴铁城首批加入。翌年，赴檀香山办理党务，任华侨《自由新报》主笔。曾以“吴丹”的笔名抨击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袁世凯政府通过外交机构，对吴进行起诉，由美国检查庭审理，经过一场辩论，宣告不予起诉。1916年春，吴返国，在香港、澳门等处进行反袁活动。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电召吴铁城回广州。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吴铁城任大元帅府参军。次年军政府改组，随孙中山回上海。

1920年，吴铁城和孙科等到香港办理粤军由福建回师广东的策应工作。9月，讨贼军总指挥朱执信在虎门联络讨桂军事时遇害，吴任代理讨贼军总指挥。这时，陈炯明、许崇智等率领粤军驱逐桂军出广州，吴带领部分队伍从石岐经宝安、东莞、广九路进入广州。11月孙中山回广东重组军政府，吴仍任参军职务。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吴改任总统府参军。11月孙中山赴广西准备出师北伐，吴留守广州，随后出任香山县“民选县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吴铁城在香山县组织地方团警抗击陈军。在抵抗陈军失败后，他经香港转赴上海。继又奉孙中山之命与古应芬、孙科赴港设机关，主持策反及接应讨陈的军事工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讨伐陈炯明，广西的桂、滇军奉命组成西路讨贼军，沿西江东下，连克肇庆、三水，直逼广州。粤军

许崇智等部在福建组成东路讨贼军，经汕头向广州方向进攻。吴铁城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带领沿海民军也向广州推进，配合西路讨贼军驱逐陈炯明军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经费奇缺，吴铁城曾为之筹集款项，以济急需[(2)]。不久吴铁城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兼省警务处长、工兵局筹备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改编为广东省警卫军时，吴兼任司令[(3)]。1923年10月25日，吴铁城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曾主持设立警卫军讲武堂，吸收部分青年学习军事，办了两期，至翌年5月并入黄埔军校。1924年9月，吴随孙中山北伐，任行营警戒兼代大本营参军长。10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吴奉命率警卫军参加平叛，再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还兼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及组织部长。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吴铁城和胡汉民、伍朝枢等“表面随和而实际抱阳奉阴违态度”，“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在暗中反对，消极怠工，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4)]。实际上，吴铁城等早就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作为反共活动的据点。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捍卫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于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到谋杀。当时吴铁城身任广州市公安局长，他不仅参与反对廖仲恺的活动，而且在知道有人要加害廖的情况下，竟然撤去中央党部大门的警卫。廖案发生后，又对被捕的凶手和嫌疑犯多方优待，引起了左派人士和工农群众的强烈不满。蒋介石为抑制粤系势力，乘机先撤去吴铁城广州市公安局长职，随后于1926年5月30日将吴扣押起来，囚禁于虎门横档炮台。直到同年10月，吴才获释前往上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吴铁城表示支持，并尽力催促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孙科等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流。1927年6

月，吴铁城重新被起用，先是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由于他擅长交际，与奉方人物有所交往，1928年秋，蒋介石派吴铁城等赴东北游说张学良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1929年，吴奉命往北平参加迁移孙中山的灵柩到南京安葬。同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蒋介石派吴铁城、张群再次去东北争取张学良反对冯、阎。终于促成张学良于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随即挥师入关，造成蒋军的胜利和冯、阎军队的瓦解。吴因此更加受到蒋的赏识和重用。

因约法之争，胡汉民被囚而形成宁粤对峙后，1931年10月吴铁城被加派为南京方面代表，与汪精卫、孙科为首的广州政府代表在上海举行“京粤代表会议”。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在中央政制、党务和外交等方面达成某些妥协，结束了宁粤分立的局面 (5) 。

1932年1月6日，吴铁城继张群之后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这时日本蓄意发动进攻上海的战争，先是在上海的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三友纺织厂，捣毁北四川路的中国商店。接着派遣大批日本军舰麇集于上海港，激起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2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等，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吴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在翌日晨下令封闭各界抗日救国会办事处，驱逐办事人员，还复牒给日本领事馆“深表歉意”。但日本帝国主义仍不满足，遂发动军事进攻，激起了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奋勇抵抗，曾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但国民党政府仍然执行对日妥协政策，于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此后，吴铁城继续担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他着手进行了一些市政建设，于1933年在江湾建成了市政大楼、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和医院等。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号令，严厉防范并禁止革命和

进步活动，取缔抗日救国运动，摧残进步文化事业。他组织一批人员在上海大量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及时向蒋介石、宋子文、汪精卫等报告。关于西南地区实力派反蒋活动的情况，是他注意的重点之一[(6)]。

1937年3月21日，吴铁城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这里原是陈济棠盘踞的地方，1936年7月陈反蒋失败，被迫下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广东省政府撤往粤北连县。吴在粤任职期间，曾以贩运、走私大发国难财。

1939年春，吴铁城前往重庆，改为主持港澳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兼管福建、广东的对外宣传。1940年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同年秋奉命赴南洋各地，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他经香港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历时五个月。1941年春回重庆，任“南洋华侨协会”、“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采用圆滑的手腕，排解国民党各派系、政客之间的明争暗斗，力图稳定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秩序。1944年10月，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动员知识青年从军，吴铁城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参与筹划，招募大批青年学生入伍，建立起“青年军”。这支队伍后来成为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工具。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和平，蒋介石同意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吴铁城是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在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问题上，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于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1948年吴铁城任立法委员，并一度酝酿竞选立法院院长一职。同年11月孙科组阁，吴铁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表

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吴铁城公开反对，与孙科联手把行政院撤到广州。不久他辞去了行政院的职务，以民间代表身份到东南亚等国访问。

1949年10月吴铁城赴香港，后转往台湾。在台湾，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年11月19日在台北去世[7]。

---

(1) 吴铁城：《江西辛亥革命前后》，丘权政、杜春和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2) 包惠僧：《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2），《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7期，第1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454、464页。

(4) 何香凝：《我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2页。

(5) 《1931年宁粤和平会议》，《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第70 - 76页。

(6) 《吴铁城关于西南军阀与蒋介石（1932 - 1934）斗争情况的密电》，《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1983年第3期。

(7) 据记载，1953年11月18日，吴铁城因王世杰被撤去“总统府”秘书长事，面见蒋介石为王说情，要求准王辞职，受蒋严厉斥责。吴不堪忍受，回家吃过量安眠药，以致于次日死去。参见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吴旸谷

马陵合

吴旸谷，字春阳。合肥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其父少庵，曾奉为孝廉，嫉恶清末官场腐败而不仕，以己学行督励诸子。吴旸谷幼承父教，读书不屑于科第功名，着眼于民族大义，治世经略，尤慨慕岳飞、文天祥之浩然正气。他从甲午战争、庚子赔款一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清廷不足恃，国人当丞起自救。"于1903年前后，约集同学乡邻在合肥成立了"自强会"，泛览古今及欧美哲理，研究伸张民志、复兴国家的有效方略。

1904年春至上海，与高荫藻等人创办了青年学社和《警钟日报》，聘请蔡元培、秦效鲁主持教务，以研究学术为掩护，联络青年志士。由此结识陶成章、黄兴、龚宝铨、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并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是年，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也来到上海。王之春，湖南衡阳人，曾担任安徽巡抚，任内将安徽多处矿山出卖给帝国主义，深为安徽人民所不齿。这次他潜居上海，又大肆鼓吹联俄，散布割让东三省给俄国的谬论，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万福华见王之春一而再地发出出卖中国主权言论，不禁义愤填膺，决心杀掉这个卖国贼，以儆效尤。决心既定，万福华便与当时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林白水、吴旸谷等人开始秘密策划，由陈自新、万福华一起执行刺杀任务。万福华等探知王之春与庐江吴葆初是酒肉朋友，便以吴葆初的名义，约请王之春于11月9日到英租界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二楼相会。届时，陈自新守候在二楼，只待王之春上楼，便开枪打死他，万福华则在楼梯下策应，以防万一。11月9日，王之春带着仆役乘马车准时来到金谷香西菜馆，登上了二楼，不料陈自新竟临时怯场，没有开枪。万福华在楼下没有听见动静，过了一会儿，又见王之春带着仆役匆匆从楼上走下，知情况不妙，不容细想，一个箭步奔上前去，迎面

截住王之春，一把抓住他的衣袖，大声呵斥道：“王之春卖国贼！”接着拔出手枪，对准王之春扣动扳机。没想到他临时慌张，忘记把枪上的保险拨开，子弹打不出去。王之春和仆役万分惊骇，呆立在那里，木然不知所措。正僵持间，租界巡警闻风赶到，将万福华逮捕。案发后，青年学社被解散，军国民教育会上海支部遭到破坏。吴旸谷也只得离开上海，回到合肥。

1905年，在合肥绅士蒯光典的资助下，吴旸谷等五人到日本留学。吴旸谷在东京结识宫崎寅藏。这年夏天，孙中山由美赴日，筹备扩大革命组织，加紧发展革命运动。吴经宫崎介绍得与中山先生相见，当面聆听孙中山有关革命与建设国家的纲领。第二天，又在程家柽寓所同孙中山会晤。当时，黄兴、廖仲恺、胡汉民、张继、陈天华等在座，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同盟会。吴旸谷为同盟会十六个发起人之一，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同盟会成立后，被推举为安徽省的主盟人。至此，吴旸谷的个人革命行动纳入了革命运动的主流之中。他从日本回到国后，先后在南京、合肥、芜湖、安庆等地发展了大批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积蓄了革命力量。

1906年春，吴旸谷到南京，联络在新军第九镇中的柏文蔚、倪映典，成立了同盟会南京支部。同年夏吴旸谷还介绍了岳王会全体成员加入同盟会。到合肥后，他建立了同盟会分会组织，取名江淮别部，又称武毅会，介绍了李诚安等人入会。在芜湖，他吸收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入会，其中有安徽公学青年师生张树侯、常恒芳等多人。

1906年冬，安徽成立新军混成协，其番号为三十一协，因马、步、工、辎各兵种均需要基层军官，因此设立弁目养成所，吴旸谷闻讯迅速返回安庆，策动同志，接受训练，以便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势力。由于吴旸谷的努力，新军各部队的下级军官多数由革命同志担任。“凡在新军中，稍有知识血性者，无不收入其间。”“每宣布满人之残暴祸国，无不愤激涕零，同呼效死。”经过努力，新军中加入同盟会的共达一百数十人之多。不久倪映典等先后回皖，熊成基也到皖投

军，新军中革命党人力量壮大。但是，他在新军宣传革命时，并没有将同盟会组织与岳王会合为一气，他只是与岳王会成员“潜通声气”，并没有让岳王会放弃独立性。在策划起义过程中，被安徽巡抚恩铭察觉，吴旸谷只得急返合肥，在安庆的同盟会组织受到极大影响。

吴旸谷到合肥后，出任城西学堂堂长。在城西学堂三年中，吴旸谷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不仅认真组织教学、管理行政，还亲自授课，教唱革命歌曲，对学生进行爱国爱乡的熏陶和教育，并且利用堂长这一公开职务做掩护，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将暗中发展的几位同盟会员延聘为教师，进行革命准备工作。吴旸谷在合肥期间还倡议组织了合肥学会，作为同盟会合肥分会的外围组织，积极联络同志，宣传革命。同盟会员通过合肥学会在教育界发展力量。当时，除吴旸谷任城西学堂堂长、劝学所所长外，殷义椎担任了模范小学堂堂长兼师范讲习所所长，胡渭清担任了文昌宫小学堂堂长，殷葆田则担任了教育会会长，王善达担任自治研究所坐办兼商会坐办 (1) 。此外，合肥学会还组织了“暑期学术研究所”，专门联络各地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向他们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引导他们走向革命。

吴旸谷在合肥期间还亲手编写革命理论的文章，油印成传单，题名为“天书”，使人携出城外，于通衢发散之。又宣传意大利复国之加富尔，并曰“中国亦有此人”。他得悉徐锡麟、秋瑾慷慨就义，悲愤交加。次年又得知熊成基起义失败的消息，他遥望安庆，吟诵出“浩荡长空一挥手，云翻雨复再来时”的警句，表示他推翻帝制百折不挠、再接再厉的决心。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起义失败后，其部下排长陈之轩率残兵四十余人退到合肥，合肥商会筹款数千元，由吴旸谷转给他们，并劝其分散隐蔽，保存实力。

吴旸谷在任堂长三年中，与地方相处甚洽，独与李鸿章之侄李斐军等斗争激烈。李在庐州知府和合肥知县处，屡言吴旸谷通谋革命党人，是危险人物，久在地方，必有大患。因此，吴旸谷不能安其位，他曾作诗曰：“三年辛苦凭谁诉，风雨无端忽找来。羞与群魔宣一

战，聊为多难惜真才。”又诗曰：“杜宇啼枝夜未央，声声恨断月横窗。三年枉费屠龙技，付与东流逝水长。”

1911年春，吴旸谷率城西学堂数十人潜往安庆。同年夏，又赴上海，与宋教仁、范光启、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为准备武装起义进行策划。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为响应武昌起义，吴旸谷到安庆密约王天培、胡维栋订下了安徽起义的行动计划，策动巡防营和巡抚衙门的卫队以配合新军的行动。为给安庆新军争取强有力的后援，吴旸谷带病去武汉联系，见到鄂军都督黎元洪，议定鄂皖联合响应的计划。黎元洪欲留其在武汉任职，但是他拒绝了，后被委任为鄂、皖两省的联络员。

10月28日，他回到安庆，安庆革命党人士气为之一振。当天，吴旸谷在安庆召集会议，推举某营教官胡万泰为城外军事总指挥，定于29日夜十时由六十二标步兵与六十一标及炮营合力攻城。此前，他联系的革命力量甚众，计有新军六十一标、六十二标、炮营、马营、工程队、辎重队、陆军小学、测绘学堂的革命力量，而且与安庆城内的巡防营以及朱家宝的卫队也有联系。他计划将起义军分为三大支，由胡万泰任总指挥、孙方瑜为副总指挥，自己留在城内组织策应。但是，胡万泰临阵怯懦，当夜逃跑，打乱了整个计划。而六十二标代表李乾玉在城里等候改变计划，返回太迟，被该标标统拘留。李乾玉所带计划未能传达，全标未动。30日黎明，清巡抚朱家宝率江防营出击，六十一标与炮营一哄而散。同日下午，六十二标革命党人击走标统，全标出发围攻安庆，至城下受到清军夹击。这时，王天培率学生军自北门登梯入城。因城内清军守备森严，双方相持不下。众人劝吴旸谷暂躲避一下，再图后举。这时，吴旸谷悲愤交加，呕血不止，誓以身殉职，不肯离去，决定一拼，称“军事无万全，况革命，难者我自当之”。此时，安庆城垣各要塞已满布清军江防各营。战斗至天明，起义军因攻安庆不下，最后各自散去，起义半途而废。31日，朱

家宝曾闭城搜捕革命党人。谘议局局长童挹芳为保护吴旸谷，对朱家宝说："闻革命党携炸弹数百，急则与城俱碎，不如暂开城，禁入不禁出，俾阴挟以去，免爆裂。"[(2)] 吴旸谷才得以离开安庆，再赴湖北求援。

吴旸谷发动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全省影响很大。吴旸谷到湖北后，发现湖北战事方殷，无力顾及安徽。他只得改道九江，与革命党人李烈钧等人同去说服九江镇军马毓宝起义。不几日，九江光复，吴旸谷即率学生军东下，并通知驻太湖桂丹墀军回援。不久，江苏和浙江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安徽谘议局议长窦以珏及童茂倩等人，见清廷大势已去，转而同情革命，开始与革命党人联合对安徽巡抚朱家宝施加压力，以维护地方秩序为由，要求朱家宝辞退江防营，招回新军。11月6日，安徽谘议局决定由地方自行宣告独立，改悬五色旗。同时议决：（1）召回新军；（2）调开江防营；（3）撤销督练公所；（4）警务、财政权移交谘议局接管；（5）朱家宝去留由其自决[(3)]。起初，朱家宝拒绝独立，并称："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诸君勿复多言。"其后袁世凯派人密电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此时，各路大军会攻安庆，忠于清廷的江防军土崩瓦解，巡抚朱家宝迫于形势，终于在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成立军政府。安庆光复之后，吴旸谷立即宣布免除当年各地方的一半租税，并派员调查安徽的财政情况。同时，召集各界领袖开会，推选安徽都督。会上，他登台发表演说，说革命是为了救国，是为了保民，"闻者莫不感动"。众人一致推举吴旸谷为都督。吴旸谷坚辞不受，并说："战事方殷，不能以一身羁留安庆。"推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众人对其一心革命而不贪图名利地位的高尚品质和光明磊落的胸怀深感钦佩。他功成不居官位，正体现了革命党人只知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革命精神。因对朱家宝并不信任，王天培意欲取代之。当天革命军又在高等审判厅宣布独立，公推王天培为临时都督，管鹏为军务部长，吴旸谷为全省经略。朱家宝只得同意将都督印让与王天培，同时又暗地里唆使他人将

王天培逐走。11月9日前后，一些反动军官煽动闹事，商人也宣布罢市，数百人冲击都督府。王天培无法控制局势，遂交出都督印平息众怒。吴旸谷为使王天培的人参加革命，亲自骑马到王天培住地平息事端，但被闹事者追逐，从马上跌下，头部负伤，昏迷不醒。

吴旸谷不做安徽都督，但对被推选为民军经略这个职务欣然接受。因为这正合乎他会攻南京的愿望。他强调，南京未攻下，长江中梗，影响革命发展，他决不能坐守安庆。他亲自检点部队，按名发饷。

安庆光复后，在芜湖的革命党人阚岚溪、吴振黄等人策动巡防营统领李宝林宣布独立。11月3日，县署差总赵三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与知县朱绣封秘密谈判，要求宣布独立，但朱绣封不允。革命党人意见也不一致，无法作出决断。吴振黄急电吴旸谷来芜主持。当吴旸谷听说芜湖方面的情况后，就带病前往芜湖军中，做善后处理。吴旸谷到芜湖后在大舞台召开商学警军各界大会。会上，吴旸谷提出芜湖急于顺应大势，宣布独立。在各方压力下，李保林同意率所部反正，于11月9日成立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为革命军司令，刘醒吾为参谋长，齐月溪为分府秘书长，下设军务部、财政部、民政部、警察厅等十一个部厅。不到一天，芜湖方面已化干戈为玉帛，免掉一场兵灾。

吴旸谷在芜湖传令各方部队进军金陵，而路过安庆的九江黄焕章部因索饷不遂，纵兵掠夺，安庆藩库、军械局、各大商号均被抢掠一空。吴旸谷闻知，急返安庆。吴旸谷回到安庆后，直抵黄焕章旅部，怒斥黄焕章，令速撤出。黄焕章诈称认罪，暗中与参谋长王则密谋久占安庆。为了安抚黄焕章，吴旸谷表示可以代黄焕章筹饷，并立即召开绅商会议，集款以使黄焕章部离开安庆。管鹏、孙传瑗等人劝吴旸谷不要再入黄焕章的军营，但为了平息兵变，他认为自己义不容辞，说："安徽素称多志之士，今事至此，难道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仗义说话么？"此时，有人煽动黄焕章说，吴旸谷回到安庆必定会讨伐乱皖者，说黄焕章"无望出安徽一步"，欲久据安庆，必要除掉吴旸谷。所

以，在吴旸谷第二次到黄部送粮饷时，黄焕章避而不见，让人引诱吴旸谷上楼，突派卫士袭击，打死警卫，将吴旸谷拘留并关押在藩署的楼上。消息传出，旅居安庆的欧美人士及领事出面作保，要求释放吴旸谷，黄焕章却避而不见。省城附近的部队自动向安庆集结，准备袭击赣军总部，进行营救。吴旸谷得知营救他的计划后并不赞成，告诫他们不要随便行动，千万不能因为自己而使地方老百姓受连累。11月18日夜，吴旸谷预知有变，立即写信给刘焕文，通知革命党人从速撤出城外。又写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拼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诗还未写完，黄则持枪登梯，向吴旸谷开了七枪。吴旸谷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吴旸谷后来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主要参考资料

李松林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王传厚：《以革命闯将闻名的吴旸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第5辑，1982年版。

"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1965年版。

---

(1) 龚啸云：《辛亥前后合肥的革命活动与军政公府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风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2) 《吴烈士旸谷革命事略》，安徽省图书馆藏本。

(3) 张湘炳、蒋元卿、张子仪编：《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16页。

吴耀宗

汪仁泽

吴耀宗，广东顺德人。生于1893年11月4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父亲吴博樵在广州开设木材铺。吴耀宗自幼聪颖好学，因家庭人口多，经济较拮据，他常用竹竿在家门后面小河滩旁划沙练字。少年时在广州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育才书舍，由于成绩优异，每年都获得奖学金。1909年，入北京税务学堂，1913年毕业，先后在广州、牛庄等地税关工作。1917年调至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工作之余，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1918年受美国来华传教的艾迪博士的影响，受洗入基督教。1920年，他因宗教信仰的关系，接受“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思想，辞去当时被称为“金饭碗”的海关职务，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先后担任学生部干事、主任。1921年与杨素兰医生结婚。1924年吴去美国协和神学院、德鲁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担任专做青年学生工作的校会组主任。1934年后改任该会出版组主任和青年协会书局的总编辑，直到解放。

青年时代的吴耀宗由于受到基督教义“爱人如己”和国际上唯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国内发起组织“唯爱社”，并担任该社主席，与唯爱主义的国际组织建有联系。参加唯爱社的多为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主张非暴力主义，认为只有用“爱心”才能感化人类、改造社会，使社会达到理想境界。此时，他还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曾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后来他又利用赴印参加国际基督教会议的机会访问甘地，赠给该书中译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

让，不到三个月，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吴耀宗激于民族义愤，痛感唯爱主义不能救中国，并在与抗日爱国进步人士的不断接触中，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毅然辞去唯爱社主席的职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并任该会理事，同时又先后参加了“东北社”、“国难教育社”等抗日救亡团体。他利用当时在青年会工作中与青年群众接触的机会，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吴耀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疗器械和药品[(1)]。他在沪组织“民社”，宣传抗日，提倡民主。是年冬发起“节约救难”运动，以劝募“寒衣”为掩护，为新四军募集军需物资[(2)]。1938年，周恩来以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的身份，驻节汉口，是年夏吴耀宗亦因公到武汉，他曾向有关同志表示，希望能会晤这位久已敬佩的中共领导人。5月20日，周恩来在吴玉章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吴的住处晤谈。据他后来的回忆：“是日，报载徐州已经失守。周恩来同志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还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他的谈话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对未来充满信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3)]

1941年，吴耀宗随青年协会书局内迁四川成都的华西坝，继续担任该书局总编辑，次年起，兼任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社长。任职期间，他编译出版了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丛书》数十种，如《社会主义新史》、《反利润制度》、《今日之苏联》、《苏俄的公民训练》，等等[(4)]。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独裁统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吴耀宗对此极为愤慨，多次写文章、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他还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和迫害，大力支

持成都青年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常昂首挺胸加入爱国学生反蒋示威游行的行列，并为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提供种种便利。他在成都华西坝等处曾多次给青年学生作国际形势的报告，由于材料丰富，逻辑性严密，分析精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当时感到抗战前途黯淡、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同学们顿觉心境开朗，视野开阔。当时他和文幼章、沈体兰被誉为三位民主教授。他的住所，常有不少进步青年趋访，亲如家人，因之被称为“民主之家”。

在四川期间，吴耀宗曾于1941年12月11日和1943年5月25日两次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走访周恩来。尤其是1943年的那一次，从上午谈到中午，周恩来留他用了午餐后，知道他身体欠佳，特为之在会客室搭铺午休后再继续畅谈到傍晚，那天董必武也在座，后来吴回忆说：“那次是周总理和我最长的一次谈话，继续了将近一整天。谈到党的宗教政策时，他重申：‘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从此我更相信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周恩来同志，对我国的前途也抱有更大的信心。临别之前，董必武同志还应我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我，一共五六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书单和这些革命书籍。”(5)

抗战胜利后，吴耀宗于1946年初回到上海。不久，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准备挑起全面内战。当时，制止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上海几十个人民团体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决定推举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946年6月23日到南京请愿，向国、共两党和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三方面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吴耀宗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严正表示中国人民坚

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在到南京后第三天，他亲自将《备忘录》交给马歇尔[6]。吴耀宗后来回忆说："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就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许多人被打伤，送到医院。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闻讯后，半夜赶来看望我们。邓颖超同志还送来了食物。第三天又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设宴招待我们。'下关事件'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是制造事端，欲置代表于死地而后快；一方面是热情支持，亲切接待。到底谁要和平，谁要内战，不是最鲜明的对比吗？回到上海以后，邓颖超同志在刘少文同志陪同下，代表周恩来同志到我家来表示慰问。他说：党很重视我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7] 在这以后，吴耀宗的爱国民主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继续支持和参加上海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民主运动，并曾帮助被迫害的青年学生摆脱特务的追捕。1948年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关系太密切，在面临历史大转变的时代，基督教必须实行改革，否则将被淘汰。为此竟遭到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对，被迫辞去《天风》社长的职务。由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他在沪处境日艰，1948年12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召开"亚洲基督教工作人员领袖会议"，吴被邀请作为讲员身份出席大会。会后，他借道香港，到达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他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增选为常委）。1949年10月1日，他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参加了开国盛典。

1950年5月，政协委员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和赵紫宸等基督教界知名人士到各地传达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精神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在中南海作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当他们反映了各地执行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后，周总理说："中国的基督教长期来曾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广大的人民不理解，有隔阂，这是很自然的。你们应当行动起来，让人民理解你们。既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能力

管理自己的国家，中国人难道办理不了中国人的宗教？”[8] 此后吴耀宗联合全国基督教会团体的有影响人士四十人，带头发起了一个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于1950年7月28日，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宣布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种种罪行。对此，周总理曾建议说：“这份宣言可以发表，让人签名嘛！”[9] 到8月底，仅一个月签名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二十七人。为此《人民日报》在9月23日刊载了新华社发布的关于三自革新宣言签名的消息，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指出“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并刊出宣言全文，还用三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签名者全部名单。接着其他各报也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支持。到1951年3月底，全国各地各民族中的基督教徒在宣言上签名的，达十八万多人[10]。在此基础上，1951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国基督教徒爱国运动的“中国基督教徒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继续当选为主席。他在发起和组织三自爱国运动中，团结广大基督教徒热爱新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反映基督教各界人士的正当要求和协助人民政府全面贯彻宗教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会得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割断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基督教会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吴被誉为中国基督教界的思想家[11]。

此外，他还积极参加了各种国际性活动。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多年，多次出席有关的国际会议，向世界各国友人介绍新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增进了互相了解和友谊，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吴耀宗曾当选为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委，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曾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等职务。

他在青年会工作期间，除了编辑、出版宗教方面的书籍外，还撰写和翻译了《黑暗与光明》、《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等著作。1979年9月17日，吴耀宗因病在上海逝世。

---

(1) 吴大琨：《我所知道的吴耀宗先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1982年版。

(2) 吴大琨：《我所知道的吴耀宗先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

(3) 吴耀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第3版。

(4) 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回忆吴耀宗先生》，第42页。

(5) 吴耀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第3版。

(6) 吴耀宗：《下关事件日记一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4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78页。

(7) 吴耀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第3版。

(8) 吴耀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第3版。

(9) 吴耀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第3版。

(10) 吴耀宗：《八个月来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天风周刊》第11卷第17—18期（1951年5月8日）。

(11) 邓裕志：《基督教界的杰出思想家吴耀宗先生》，《回忆吴耀宗先生》，第69页。

吴贻芳

王娟

吴贻芳，祖籍江苏泰兴。1893年1月26日生于湖北武昌，排行老三。父亲吴守训，秀才，数次考举人而不中，遂做私塾先生以维持生计。后走捐纳之路，得候补知县之衔，再经疏通，被委任为县牙厘局局长。母亲朱诗阁，大家闺秀。十六岁时，父亲吴守训因公案投江自尽。十九岁时，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吴贻榘跳黄浦江自杀。母亲朱诗阁在夫丧子亡的双重打击下撒手人寰。姐姐吴贻芬在为母亲守灵的夜晚也悬梁自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吴贻芳经历了哥哥、母亲、姐姐的骤然离世。然而，家中上有年迈祖母，下有年幼妹妹，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吴贻芳，在姨父陈叔通的开导和鼓励下，终于又鼓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不久，和祖母、妹妹迁姨父陈叔通家。

1913年2月，吴贻芳作为特别生插班到杭州弘道女子学堂四年级学习。1914年，随陈叔通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该校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1916年2月，又作为特别插班生开始了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习，并很快以全优成绩转为正式学生。在校期间，吴贻芳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非常刻苦，同时受洗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任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会长时，带领同学们声援五四运动，参加罢课，举行游行示威。1919年，吴贻芳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女子大学里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师和英语部主任。

1921年，吴贻芳赴美密执安大学攻读生物学专业。1924年，被推荐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1925年，被推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并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纷纷进行改组，由中国人接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Mrs-Lawrence Thurston）提出了辞职。在其良师益友的提议、推荐下，校董事会通过了请吴贻芳担任校长的建议。1928年春，进入写博士毕业论文阶段的吴贻芳收到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聘书，校方允其取得学位后再回母校任职。吴贻芳于当年10月获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1月3日，吴贻芳出席新校长就职典礼，发表就职演说，正式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履任校长之职后，吴贻芳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校向政府的注册。金女大创始人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为基督服务的妇女领袖，可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不得以宗教宣传作为目的”，规定“宗教课不能设为必修课”。吴贻芳充当教会和政府间的协调人，居中做双方的工作，终于在1930年12月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完成了注册。吴贻芳在协调与政府关系的同时，也主动争取政府支持，如邀请教育部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到校讲演；1934年6月，邀请蒋介石及宋美龄出席学生的毕业典礼等。

作为教会大学校长，吴贻芳注重协调与教会组织的关系。金女大虽然完成了向政府的注册，但其主要经费仍来自于国外教会组织，为了争取国外教会对金女大的支持，吴贻芳积极参加教会工作。在1935年至1947年间，她担任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多次出席国际间基督教协进组织会议，加强与教会组织和教会大学的交流。如1936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常务委员会议，会后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典礼。1938年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基督教协进会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日军开始轰炸南京后，金女大正常的教学就被迫中断，吴贻芳和校务委员会商量，决定建立上海、武昌、成都三个办学中心。随着战事的扩大，将武昌和上海办学中心迁往成都，1938年1月到达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大学教室上课，在动荡不安

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抗战胜利后，吴贻芳作出回迁南京的决定，1946年9月在原址复课。1951年，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上建立了南京师范学院。1985年5月11日，吴贻芳致函江苏省政府，建议在南京师范大学内，增设一所公办民助性质的金陵女子学院。1987年3月，金陵女子学院成立。

从1928年到1951年，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务二十三年，金女大誉满中外。吴贻芳调整了金女大的办学宗旨，淡化其宗教目的，强调其培养人格和造福社会的办学宗旨。她还结合学校实际，将基督精神渗入进人格，强调人格的爱国、奉献、牺牲品质，强调人格训练中的完整性，即德、智、体、群、灵五方面的充分发展等。吴贻芳重视系科建设，使金女大逐渐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特色系科，如音乐系、社会学系、家政系及体育系等，其中影响很大、成就突出的主要是社会学系和家政系。社会学系所授课程偏重于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及社会调查，较为实用。如西迁成都后，应战时之需，在四川仁寿县组建了一个乡村服务处，以社会学系学生为主体，分成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鸡种改良组等，利用假期开展各项专门的活动。吴贻芳注重学校的制度建设，制定了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学籍管理制度、考试评分制度，采用主辅修制度，实行积分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在办学上，吴贻芳主张文理兼通，重视基础知识，强调社会实践和实验环节，重视外语教学和体育教育。金女大先后向国内外输送了九百九十九名毕业生，活跃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被称誉为“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抗日战争期间，吴贻芳非常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1937年7月中旬，应蒋介石的邀请与一些著名教授和社会名流到庐山商谈国事。1938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主席团成员。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实行主席团制，吴贻芳与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

君劢被推选出来，组成第一任主席团。1942年7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吴贻芳再次担任参政员并当选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被选进国民大会主席团。“七七”事变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吴贻芳当选为执行委员。吴贻芳还参加了宋美龄在庐山举行的妇女领袖会议，讨论抗战时的妇女工作。1938年3月，由包括邓颖超、何香凝在内的各方面知名人士一百八十三人，发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负责抚养遭受战火灾难、流落街头的儿童，吴贻芳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做了大量工作。1943年3月，参加由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组成的“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又称“六人教授团”）前往美国，利用其影响力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1945年，吴贻芳作为教育家和无党派人士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是签字的第一位女代表。抗战胜利后，在政治影响日益突出时，吴贻芳选择了减少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如1947年辞掉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两次拒绝担任教育部长之职。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全面内战，制造了“下关惨案”、“李闻惨案”、“五二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也让吴贻芳非常震惊。吴贻芳曾当面责问蒋介石，并要求将南京市警察局长撤职；她探访教育局长，要求不准军警进入金女大抓人；她还宣布不参加国民大会主席团。1949年4月，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宋美龄派人送机票给吴贻芳，她选择了留下。在南京解放前夕，吴贻芳受邀担任南京各界治安维持委员会副主任，维持社会秩序。1949年9月，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新中国成立后，吴贻芳长期担任一系列行政职务。1951年1月6日，决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经费，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为公办。5月至10月，金女院与金陵大学合并，担任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第二副院长。1953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55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7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市主任委员，1962年1月任民进江苏省主任委员，连选连任，直至逝世。1956年8月24日，当选江苏省副省长。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妇联副主席，重新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兼任南京师范学院名誉院长。1979年2月，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校友会“和平与智慧女神”奖。

1985年11月10日，吴贻芳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程思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张竞：《吴贻芳》，《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朱学波著：《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第60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年版。

孙岳等编写：《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吴有训

李援朝　齐辉

吴有训，字正之。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897年4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西高安县黄沙岗石溪吴村。父亲吴起辅是一个私塾先生，后转行在汉口经商。吴有训天资聪颖，七岁时入堂叔吴起瑞的私塾读书，1912年入南昌心远中学。1916年升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科学习。在胡复刚教授的指导下，他对物理学尤其是X射线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20年吴在南京高师毕业，辗转任教于南昌二中和上海中国公学。1921年吴以优异成绩考取江西官费留美生，远赴美国深造。

1922年，吴有训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从事物理学研究，师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A．H．康普顿（A．H．Compton）教授，对X射线光谱问题做系统研究。此前，康普顿发现X射线在被某些轻元素散射后，射线的波长有异乎寻常的改变，提出了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这就是著名的康普顿效应。1923年，康普顿将研究成果发表后，因实验证据不足，没有得到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此时吴有训成为康普顿的学生和助手，吴有训以高超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工作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24年至1926年间，吴有训就康普顿效应共发表论文十篇。吴有训的这些论文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并进一步对该理论提出一系列新见解。这些成果使康普顿效应得到了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康氏也因此获得192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1925年，吴有训完成了《康普顿效应》的博士论文，旋即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助教。同年，吴有训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百三十五届年会，并在会上做首席发言。1926年，吴有训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

康普顿对吴有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康在1926年出版的《X射线的理论及实验》一书中共有十九处提到了吴有训的工作，并引用了多篇吴的论文，尤其是吴有训所做的一张十五种元素散射X射线的光谱图，被康普顿用来证明其理论的重要依据。由此康普顿效应也被人们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对康普顿效应的证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外科学家所钦佩，也奠定了他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

回国后，吴有训参与了江西大学的筹办工作。1927年夏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执教一年后吴又收到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邀请，到清华物理系执教。叶企孙尊重人才，当吴到职后，工资就定在叶氏之上，足见对吴的肯定与重视。

吴有训到清华后马上投入到科研与教学中，成为物理系教学的骨干。他教授的主要课程有：普通物理学、近代物理学、光学、中级光学、近代物理试验等课程。吴的授课以严谨认真的学风著称。他讲课风趣幽默，富有启发性，重视基本概念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他把当时一些很重要的物理实验引入到教学中，如密立根油滴实验、汤姆逊抛物线离子谱、汤生气体放电、卢瑟福X粒子等。这些实验侧重培养学生独立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深得学生的欢迎。在吴有训培养的学生中像钱伟长、钱三强等人，受其影响走进了近代物理科学的大门。

在清华教书育人的同时，吴有训积极倡导清华理学院开展近代物理学的研究。1929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在技术条件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这一时期吴有训的主要研究在X射线方面，特别是对散射和吸收的研究，有诸多成果问世。1930年，吴有训在英国Nature杂志上发表《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长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利用国内条件完成的科研成果；在《清华学报》上发表《Compton效应中变线强度与不变线强度之比率》。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吴有训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基础物理研

究，转而致力于应用物理学研究。1933年，吴有训赴美国参观访问。当时，抗战急需战时通讯用的真空管器材，他为学习真空管的制作工艺，以普通工人的身份深入工厂一干就是四个多月。在美期间他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采购了真空玻璃管的生产设备，希望回国后开展中国电子工业的科研计划，但因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和中国金融、实业界的重视和支持，无果而终。

1936年初，吴有训被推举为中国物理学会会长。同年4月，德国自然科学院又选举吴有训成为该院院士，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当时世界学术界中享有的最高荣誉。吴在国际上的声誉，与他重视中外学术交流不无关系。他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期间，曾邀请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狄拉克（P．A．Dirac）教授、丹麦物理学大师波尔（N．Bohr）来华作学术报告。这些学术讲座使中国接触到了世界物理学的前沿，开阔了视野。

1937年，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赴美考察，吴有训暂时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有训离开了刚刚分娩的妻子和女儿，随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吴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面临着三校合组的复杂情势，吴有训细心梳理人事关系，优化教学设备配置，克服战争带来的巨大困难，使西南联大的教学和科研得以继续。身为院长，吴有训不囿门户，选拔人才，其公正、严格的工作作风深得三校学子和同人的尊敬。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很差，物理系的仪器、设备少得可怜，吴有训带领员工秉持自力更生精神，没有电炉丝就用兵工厂的金属削片代替，缺化学原料苏木素就从当地一种木材中提取代用，没有显微镜载玻片就用日寇空袭震坏的玻璃代替，没有煤气就用蒸馏酒精代替。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吴有训等为国家培育了大批的物理学英才，黄昆、朱光亚、邓稼先、李政道和杨振宁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38年夏，国家抗战急需冶金工业，清华大学决定成立冶金研究所，筹备工作由吴有训负责，他带领同人仅用一年时间就使冶金所初具规模。该所在当时尚属首创，培养了一代冶金人才。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吴有训，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和交流，在抗战八年中，该学会召开了七次年会，会员逐年增加，工作始终不辍。

1940年，吴有训当选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1年中研院委托吴创办院刊《科学记录》（*Science Record*），并出任总编辑。这是一本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专门刊载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研究富有创见的论文，期刊用外文在国内外发行，是中国当时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唯一学术刊物。而这时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期，吴有训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科学记录》得以出版问世。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有训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在他的周密布置下，中央大学成功完成了复校任务。一万三千余名师生和两千多箱图书设备顺利从重庆搬回南京。在担任中大校长期间，他重视延揽人才，聘请赵忠尧、吴健雄、陈鹤琴、罗尔纲等到校任教。此外，还在中大新建原子核实验室，并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在九华山建立我国最早的原子能实验基地。尽管吴有训行政事务繁忙，但他仍然坚持教学科研工作，他每周要为理学院学生讲授四个小时的“普通物理课程”，并继续对康普顿效应展开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对伦琴射线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

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高校师生的思想控制，他对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了同情态度。1946年1月25日，吴亲自参加了反对内战的万人大游行，走在队伍的前列。在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中，中大师生被国民党特务打伤，他亲赴医院看望，并严词拒绝了逮捕进步师生的要求。正是在吴的支持和同情下，中央大学的民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被誉为“民主的堡垒”。

全面内战爆发后，吴有训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日益失望，先

后十四次要求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1947年10月，吴代表中国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在国外的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两篇研究人工放射性的论文。1948年秋，吴有训回国，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举家从南京迁往上海，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吴有训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吴有训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在他主持下，中科院自力更生研制了一系列高级精密科研仪器，并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统筹规划，充实提高科学院数、理、化、工程、仪器等研究领域的科研力量，为新中国科研的起步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他赴东北重工业基地进行调研和考察，建议科学院在东北设立分院。1957年吴有训主持了国家测绘局和上海天文馆联合会议，决定采用我国自己的授时信号，使我国的授时工作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1963年参与制定了科技发展十年规划（1963—1972）。1964年又在上海主持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鉴定工作，该项目是新中国取得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此外，还主编《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两刊登载了大量高质量的科技论文，为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文革”期间，由于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吴有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他对近代中国物理学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将他的论文编辑成《吴有训论文选集》于1997年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王大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吴有训》，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聂冷：《吴有训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林家治：《吴有训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郭奕玲等主编：《吴有训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吴虞

吴嘉陵

吴虞，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幼陵，号爱智，笔名吴吾等。四川新繁人。1872年12月19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地主家庭。父吴仕珍，副榜贡生，教书为业。吴虞少时虽家境清寒，但求学心切，博览强记，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十五六岁时工骈文及诗。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从经学家、诗人吴之英学习诗文。稍长从廖平游学，颇窥朴学门径。

19世纪末，吴虞受到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当时《蜀学报》鼓吹民权运动的影响，转向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被人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守旧派指责吴虞“澹于命世，不事科举”，不承认“西学”是“异端”[(1)]。1902年吴虞与王祚堂等人在成都创办“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传播新思想，后又与王祚堂、周克群等人议设“游学公社”，以便讲习日语做留学日本的准备。他还创议筹公费遣人留学，得到支持，四川遂派遣师范生三百余人东渡日本。1905年，他与伍伯谷等人倡设法学研究会于成都，以求普及法政知识，为地方自治及建立政党做预备。影响所及，以后四川各法学研究会接踵而起。

1905年秋，吴虞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四班。他钻研了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和刑法，熟读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的著作。他把西方近代政法学说同孔子的儒家学说作比较，发现中国儒学与西学的差距极大，从而产生了反孔“非儒”思想，认为中国要前进，必须反对儒学，学习西方，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系列旧观念。他主张推进宗教、家庭改革，但未赞同政治改革运动。他在日本积极参加四川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与邓镕等人共同研

究，反复商酌，于1906年提出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力主川汉铁路“商办”。

吴虞于1907年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回国，先后在成都县中学、嘉定府中学、通省法政学堂官班任教习，并一度任《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说，在报上发表反孔“非儒”的文章。在撰编《宋元学案粹语例言》中，他引用了被视为异端的明朝李贽的话，清政府学部令学政赵启霖查禁，并要开除吴虞的教职，后经人调解才免予开除。吴虞不断发表文章，发出要求言论思想自由的呼声。他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孔孟儒学，在四川参与支持立宪派活动，希望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他出资参加筹办立宪派的《蜀报》，并任该报的撰稿人。他还希望《蜀报》同德同力，扩其群策，览列强之诡画，弘爱国之大愿，上以慰先圣之玄灵，下以谋全蜀之幸福。

1910年，吴虞对其父纳妾李氏，不惜破产以供奢用，以致使其母忧郁而死的行为极为不满；母死后父迎李氏入家，命吴虞夫妇事以嫡母礼，吴虞更为不满，与父发生冲突，后来被他的父亲告到官府，一时轰动成都，被视为“家庭革命”。嗣经官方审断，他的父亲虽输了礼，但吴虞却遭到社会上欲以孔孟之道维持礼教的人们的责备，认为这是“非理非法”的“忤逆”行为。吴虞不畏舆论之攻诘，更积极地反对孔教和家族制度，批判封建礼教。

辛亥革命前夕，吴虞在《醒群报》撰文《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介绍李贽的思想，反对儒学，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竟然下令逮捕他。吴虞逃离成都，王人文又以“非圣无法，非孝无亲，淆乱国宪”罪“移文各省逮捕”。吴虞躲到乡下，住在舅父刘黎然家。刘是哥老会首领，在当地很有势力，使他得以免为官府的阶下囚。

正当吴虞被通缉、处境艰难之时，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吴虞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对罢市、罢课表示支持和同情。辛亥革命在四川获胜后，军政府成立，吴虞返回成都，先后担任《西

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川西道署顾问、代理内务科长、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职。与此同时，还参与筹建共和党成都支部的工作。

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攫取了统治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半途而废，又重新掀起尊孔崇孔的思潮。1914年7月，吴虞在成都《醒群报》上发表反孔文章，袁世凯即下令内务部查封《醒群报》。此后，成都各报都不敢刊登他的文章，他受到许多“名人雅士”的歧视。吴虞原本十分敬佩严复、章太炎、康有为等人，但在他们后来扯起尊孔旗帜时，吴虞即毫不留情地给予猛烈抨击。他认为，尊孔之人，其行为多不足道。他对连绵不断的四川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认为是法律遭到践踏，“人权”、“自由”得不到保障。在《书某氏社会恶劣状况论后》一文中指出：“社会状况之恶劣，岂偶然哉，岂偶然哉！”在《情势法》一文中指出，袁世凯复辟帝制，是法制不健全所造成的，提出要健全法制、“庶民贼独夫有所惩惧”[(2)]，以防止袁世凯称帝丑剧重演。

吴虞对尊孔复古思潮进行了勇敢的抨击。当时，成都的报刊都不敢刊登他的文章，他于1916年冬写信给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在陈的帮助下，他将《辛亥杂诗》九十六首交《甲寅》杂志发表。成都教育界的守旧派攻击他是“名教罪人”，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在《进步》杂志上刊载，热情地讴歌了这位明朝的“名教罪人”，与守旧派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感到找到了知音。此后即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等反孔文章。吴虞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对孔学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胡适称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3)]。

1917年，吴虞在四川法政学校担任法制史和国文教员。次年在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执教国文和文史。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吴虞又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组织创办的《星期日》杂志，同时他还支持学生创办的《威克烈周刊》，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守旧派对吴虞大肆攻击，企图将吴虞驱逐出教育界，但是吴虞得到广大青年的支持。

1921年夏，吴虞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离川北上，在北大讲“诸子文”及诗、文。初时听讲者慕名而来，十分踊跃，但因其新文学的基础欠深，讲课引申又多，到第二学期即受到学生的批评。与此同时，他还在北京高师、南方大学京校及中国大学、北京学院兼教。在京期间，他放荡不羁，经常前往妓院，并作一些恶俗不堪的艳诗。尊孔复古派遂以此为口实，对吴虞进行攻击嘲讽，使之声名狼藉。1924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认为吴虞不配称“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1925年8月，吴虞辞去北大等校教职返回成都，先后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他仍坚持反孔非儒的立场，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旧礼教和文化专制主义。后来，蒋介石提倡尊孔读经，成都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在《四川日报》辟专栏讨论尊孔读经、祀孔的“真理之所在”，又将“五四”时期已经批判过的孔子和儒家教条重新搬出来，吴虞十分反感。他在川大毕业典礼上，对学生发表题为《对祀孔问题的我见》的演讲，批判孔学和旧礼教、旧道德，提醒学生们不要受儒家学说的欺骗，而应追求国家富强之道。他在许多诗文中反对蒋介石提倡的复古教育。

吴虞在成都最后任教的几年中，仍遭到尊孔复古派的排斥和打击，到1933年终于被四川大学解职。从此便隐退在家，仍坚持反孔非儒之论，并勤于佛事，闲时每日写日记。抗战时期，华西大学曾拟聘为教授，他以年迈为由辞谢。

1949年4月27日，吴虞在成都自宅逝世。主要著作有《辛亥杂诗》、《饮水》、《明李卓吾别传》、《吴虞文录》、《吴虞文别录》、《吴虞文续录》等。

---

(1) 廖季平：《骈文读本序》，《蜀报》第一年第二期（1910年9月）。

(2) 《吴虞文续录》，成都美信印书局1933年版。

(3) 胡适：《吴虞文录序》，《胡适文存》卷4，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259页。

吴樾

尚明轩

吴樾，亦作吴越[(1)]，字梦霞，后改孟侠。安徽桐城县人。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父亲吴尔康，先官后商，经常离家在外。吴樾七岁丧母，靠二哥抚养。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十二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十九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2)]。从此，他放弃了由科举进身的道路。1900年到上海，本打算进“广方言馆”，因该馆过分偏重外语而放弃，于是离开上海北上，到了直隶（河北）保定。1902年，经乡前辈吴汝纶（时掌莲池书院）指点后，在清苑县报名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这时他所抱的志愿，还只是将来获得“出身”，当一名教习。入校后，交游渐广，眼界日开，在当时革命思潮影响下，他更加喜欢议论时政，思想上在起着变化。

1903年是吴樾政治认识上起伏激荡的一年。据他自己回忆说，这年他先从朋友那里得到《革命军》一书，反复阅读，受到启发，“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警传，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3)]。但是，他不久又受到《清议报》宣传的影响，反而一度推崇起改良主义者的康、梁来，曾说，若“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又过了不久，他接连阅读了《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及《中国白话报》等革命报刊，思想上又起了变化，“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4)]。是年暑假，吴樾与同学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相偕南旋省亲，道出沪上，探西牢访问章炳麟、邹容，会晤陈仲甫、张继，并购读上海所出版的《尪书》、《仁学》、《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进一步发

展，从此，毅然与改良派决裂，斥康、梁等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认定他们是些“欲遂一己之私心，甘作同胞之公敌”的人[5]。他反对康、梁的“立宪”主张，痛恨保皇党人，“念念欲杀尽此辈”[6]。

从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起到1905年离校前，这四年中吴樾还和当时一些爱国志士有直接交往或通信联系。他和在南方的陈天华、蔡元培曾通过消息，和杨守仁（字笃生）共同推进过军国民教育会的工作，吴负责该会保定支部；和赵声在保定相识，并结为好友，还到上海和秋瑾接洽过[7]。他怀着满腔的热忱，日益关怀国家民族的安危，每与友人“谈及国亡种削之势，辄饮泣不止”。为了宣传反清排满，他在保定创立过两江公学，自兼教师，并办过《直隶白话报》，自任主笔。

当时，一些犯急性病的革命者，在策动起义迭遭挫折之后，转而接受虚无党的思想，热衷于搞个人恐怖活动。他们幻想杀几个、几十个满族权贵，使反动统治者畏惧走避而取得反清的成功。有些革命派报刊也不断倡导冒险暗杀，宣扬暗杀活动的“神妙”作用。暗杀之风一时大盛。吴樾耳濡目染，也笃信此说，并成为这种冒险事业的一个积极鼓吹者与实践者。清户部侍郎铁良是个为人们所痛恨的满族亲贵，遂成为暗杀猎手们共同追踪的对象。1904年一年内，有在南京下关和河南顺德两起谋划狙击铁良的案件发生，但都没有成功。吴樾也把铁良作为自己暗杀的目标，他特为走访曾参与暗杀铁良的胡瑛，慨然以后继自任，倡言：不杀铁良，不足以言革命！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暗杀时代》，说明要杀铁良的意义与决心，以备自己牺牲后留传给后人。同年，吴樾与赵声在保定酒楼谈论反清革命行动时，还谈到军事行动与暗杀活动的难易问题，他对赵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8] 又说：“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者，必吾子也。”[9]

1905年，吴樾在保定师范学堂临近毕业时，未参加考试即离校去东三省，将欲有所作为。7月，他听说清政府将派载泽、绍英等五大

臣出国考察宪政。认为这是清政府欺骗人民的手段，如果得逞，会麻痹人民的反清情绪，延长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于是他决定把暗杀铁良改为暗杀载泽等人，借以揭露清政府的阴谋。为此，吴樾从东北潜入北京，寄居前门外桐城会馆，多方侦探五大臣的出国日期，并写好绝命书数封，待机行动。9月24日，考察宪政五大臣在前门车站登车，准备出发。吴樾怀揣炸弹 (10) 赶往车站，但站上戒备森严，不能靠近。他急忙买了一套无顶红缨官服穿在身上，乔装官方仆从，登上五大臣的专车，正准备投掷炸弹时，机车与列车接轴，车身突然震动，炸弹引发，五大臣仅绍英与载泽受轻伤，而他本人反不幸肢断腹裂，以身殉难。

吴樾牺牲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陈骨骸数日，也没有人认领。后侦缉员史某到桐城会馆，才查清这桩震动一时的刺杀案的发难者是吴樾。一年多后，1907年4月，《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在刊载吴樾的《暗杀时代》时，将他在死难前致章炳麟与致其未婚妻的信件同时收入。这几封信，明白地表露了吴樾自我牺牲、以身报国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国人寻获吴樾遗骨营葬于安庆平头山。其遗著辑为《吴樾遗书》。

---

(1) 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据潘赞化私拟之《吴樾别传》谓：“樾，潘传作越，谓名本越也，樾乃清吏惩罪人加偏旁如孙汶云。”另据姚憾《吴樾烈士略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编《革命先烈纪念专刊》，广州1933年版）谓：吴越是原名，“弃前名加木傍为樾，在烈士意思，无木傍之吴越为专制政府之小奴隶，有木傍之吴樾，为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

(2) 邹鲁：《吴樾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第1248页。

(3)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7年4月。

(4)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7年4月。

(5)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7年4月。

(6)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7年4月。

(7) 吴樾与蔡元培、杨守仁、赵声、秋瑾的交往关系，散见于一些回忆著述中，片言只语，缺乏具体材料。

(8) 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

(9)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

(10) 吴樾使用的炸弹，章士钊推断是由杨守仁供给的，时杨隐于北京译学馆。见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

吴蕴初

朱信泉

吴蕴初，名葆元，又名宝源，字蕴初，以字行。江苏嘉定人，著名爱国实业家。以创办上海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和天盛陶器厂等化工企业而知名，在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和当时在天津创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范旭东齐名，有“北范南吴”之称。

1891年9月29日（清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塾师家庭，十四岁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语，为了赚钱养家，辍学任小学教员半年，后入陆军部上海兵工专门学校学习化学，1911年毕业。在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回兵工学校任教。

1913年“二次革命”时，上海兵工学校停办，吴蕴初去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任化验师。一年后任该厂制砖厂厂长。1915年冬，应邀去天津筹办硝碱公司，未成，入天津造币厂任化验师。1916年复去汉口，先后任汉阳兵工厂理化课课长及制药课课长。

1921年，吴蕴初在汉口与开办燮昌火柴厂的资本家宋伟臣合伙开设炽昌硝碱公司。宋出资本，吴任技术指导，生产火柴原料。同年又去上海和施耕伊合办炽昌新制胶公司，生产制造火柴用的牛皮胶。当时日本调味粉“味之素”行销我国，获利颇巨，引起吴的注意。1922年，吴对“味之素”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研究并获得廉价成批生产的方法。1923年经上海酱园商张逸云投资五万元在上海唐家湾蓝维霭路（今肇周路）开办天厨味精厂，吴任经理，生产“佛手牌”味精。天厨味精行销后，与日货“味之素”竞争激烈。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影响下，天厨味精销路日广，不但畅销国内，且远销南

洋。在短短的几年中，由一爿厂发展为几爿厂，味精产量成倍上升，天厨厂年营业额不断增加，由数十万元增至一百数十万元。1932年产量最高达十五万九千公斤，年盈利达数十万元。

天厨味精厂的设立，给吴蕴初带来优厚的报酬。该厂创办时吴与资方议定，每生产味精一磅，付吴“技术酬劳”大洋一角。仅此一项，吴每月即可收入银元两千元。于是几年之间，便积累起现金数万元，用它向“天厨”入股，吴就成了股东兼经理。

吴蕴初对化工的科学研究颇为重视，1928年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自任董事长。该所从事化学实验，以应本厂和化学工业界的需要，经费由天厨厂负担。由于他对化工研究的提倡，后被推举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及上海化学原料公会理事等。

天厨厂在生产发展同时，逐步投资创建一系列化工原料企业。1929年，吴蕴初用天厨厂的盈利在上海开办天原电化厂，生产盐酸烧碱、漂白粉和其他氯化制品。在此以前，制造味精所用原料盐酸都是日货，吴设此厂是为了解决天厨味精所需原料，“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天原厂最初资本二十万元，后经多次增资，到抗战前夕已达一百零五万元，产量也大为提高，比初建时增加六倍多。它不但解决了天厨自身生存发展的原料，也为中国化工原料的生产开创了基础。

天厨厂在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中连年获得厚利，它对抗日捐献更是一马当先。“九一八”、“一二八”，天厨厂都捐款捐物。1933年，国民政府发起航空救国捐，吴蕴初与张逸云商量后决定用十二万元购买战斗机和教练机各一架，命名“天厨号”，捐给“中国航空协会”，对推动抗战热潮起了带头作用，同时也使天厨味精在国内外销路猛增，当年仅在南洋方面，即多赚利润三十多万元。

1935年，吴蕴初创办天盛陶器厂。以往酸碱容器依赖进口，该厂

成立后月产耐酸碱陶器二十至四十吨，完全可以自给了。同年，天厨主要投资人张逸云病逝，天厨厂总经理职务由其后人张祖安继任。张家因经营证券和房地产曾移用天厨巨额资金，从而引起天厨其他股东的忧虑与不满。8月，天厨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再次增资，张祖安改任董事长，吴蕴初任常董兼总经理并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改组后天厨营业更加发达。

1936年，利用天原厂的副产物——氢气制造氨，建成天利氮气厂。不久又增添设备，生产硝酸。

吴氏扩展企业的资金，除来源于新集股份和天厨的部分盈利外，还得到金城银行的大笔投资。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把上海天厨、天原两厂的重要机器设备迁往四川，留在上海的企业，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则挂上德国商人企业的旗号，以避免日本侵略军的侵占。

此外，设在香港对岸九龙的天厨味精分厂，则在吴夫人吴戴仪的主持下于1938年建成，产品销售南洋。1939年该厂添设酸碱部，谋求盐酸自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厂被日军占领，吴戴仪率领港厂员工不顾生命危险偷渡回国，并将一部分重要设备运往四川。

迁入四川的天厨、天原两厂，1940年在重庆先后复工，生产味精、盐酸、烧碱和漂白粉。由于资金短绌，官僚资本趁机进一步插手，到1942年金城银行已占有天原（渝）厂股本的百分之六十。1943年资源委员会也向该厂投资。其后中央、中农两行又贷出四千万元巨款建立天原宜宾分厂，从此天原厂遂为官僚资本所把持。

吴蕴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和“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等职务。在重庆的社会活动中，吴蕴初和中共党人、民主人士也交上朋

友。1944年10月和12月吴蕴初两次参加了由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特园召开的座谈会；在吴蕴初任董事长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中，民主人士章乃器任所长，胡厥文、吴羹梅任理事，该所和中共地下组织有密切联系，孙晓村、黄介然、张锡昌等都负责过该所工作。该所出版有关工商界的书刊并经常组织座谈会，反映战时工商界的要求，推动了内地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抗战胜利前夕，吴蕴初为实践他的“人生须以服务为目的，而服务贵求全民之福利”的理想，将吴氏夫妇所有天厨股份转到“蕴初资产管理委员会”，并决定以股息所得二分之一用以发展天厨生产，另二分之一用以资助教育和社会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蕴初把在上海的企业收回，经过修复于1947年相继开工。他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但实际面临的却是美货泛滥、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的摧残，企业处境更加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蕴初在党内外老朋友的关心下从海外归来，10月下旬，他从香港到达北京，受到政府的欢迎，周恩来亲自接见并希望他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多作贡献。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吴氏经营的企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吴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同时在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担任工作。

1953年10月15日，吴蕴初因病在沪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

落霞：《人物评述》，生活书店1937年版。

《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新世界月刊》1944年第8期。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华书局1948年版。

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一书之《十年来之化学工业》部分，中华书局1948年版。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中国国货工厂全貌》（初编），上海文明书店1947年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及天原化工厂卷》。

吴兆麟

闻少华

吴兆麟，字畏三，湖北鄂城人。1882年2月28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十一日）生。他的父亲是个菜农，为供给他上学，“耕耘纺织，勉备束脩”。1899年，吴兆麟考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随营学堂，在将校讲习所肄业。次年考入工程专门学校，1906年毕业，旋考入参谋学堂，以“名列前茅，提充领班”[(1)]。吴在提高军事技能的同时，又逐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1906年和1908年河南彰德、安徽太湖两次秋操后，吴编写彰德、太湖秋操纪事及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兵术等书[(2)]，曾被印发各军参阅。

1904年，吕大森、张难先、刘静庵等在武昌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他们确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3)]，乃分别投入工程营和马队，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春，刘静庵等又组织起革命团体“日知会”[(4)]，吴兆麟积极参与。他后来记叙日知会成立的经过说：“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秘运到鄂，梁启超之《饮冰室》及《新民丛报》，孙文、章太炎、汪精卫等之《民报》渐次输入国内，军学界同人阅之极为心服。民智大开，佥谓中国之所以不能图强，实由于满汉界限所致……于是军学界同人秘谋组合，利用武昌高家巷圣公会设立‘日知会’。”[(5)]

日知会一成立，吴兆麟即以工程营代表和日知会干事身份参加工作。他收会费、募捐款，印刷《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品，在各营目兵及青年学生中秘密散发。同盟会曾与日知会有所联系，并将革命战略问题寄交日知会讨论。在湖北军界同志讨论会上，吴兆麟说，汉阳有兵工厂，汉口是大商埠，武昌拥有大工厂，军队最要紧的弹药、粮秣、被服均不成问题；而且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因此“革命

战略要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至，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发展，以北京为作战目标”[(6)]。

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日知会组织因受牵连，也遭到严重破坏，刘静庵、殷子衡、张难先等人被捕入狱。湖广总督张之洞怕激起事变，不欲多事株连，因此军学界的同志得以潜伏下来。日知会被破坏后，吴兆麟一度表现消沉。

1911年9月，湖北革命党人准备发动起义。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制造炸弹，不慎失事，起义计划暴露，大批领导人被捕或避走。10日，总督瑞澂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党人，并欲按名册大肆搜捕革命者。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决心反抗。当晚七时左右，城外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起义，向城内进发。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了第一枪。“共进会”工程营代表熊炳坤很快聚集士兵扑向楚望台军械库，这时人数约四百人。吴兆麟时任工程营左队队官，当晚正好在楚望台值班。由于他在士兵中颇有威信，起义士兵遂公推他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分析当时的形势，做了进攻督署的部署，要求起义群众：“严守纪律，服从命令，违者必绳以军法。”[(7)]

当晚十一时左右，起义队伍已汇集三千多人，吴兆麟下令由邝杰、马荣、熊秉坤各率一队分三路进攻督署，惜未得手。十二时后发动第二次进攻。炮队在蛇山占领了阵地，但夜间目标不清。第三次进攻时，吴派人于督署后侧纵火，炮队遂集中火力轰击督署，总督瑞澂仓皇逃到楚豫兵舰躲藏，统制张彪亦逃至汉口刘家庙车站。“黎元洪等又皆已潜匿，而未响应之各营，又因电话不通，内外隔绝，均按兵不动。[(8)]”由于起义士兵的勇敢作战，加上吴兆麟指挥得当，到11日上午，武昌完全为起义军占领。

武昌首义成功后，因“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等均不在武昌，同盟会首脑人物又远在外地，一时陷于无人领导的局面。11日上午，革命党人聚集在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

机构。会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9]，结果就推出了黎元洪任都督。

当时军政府下设参谋、军务等部，吴兆麟任参谋部副部长，旋改任部长。军政府扩充军队，编步兵为八协，吴兆麟任第一协统领。军政府还将武汉划为四个防守区域，吴兆麟负责第一区，防守汉阳。不久革命军在汉口战役中失利，吴兆麟与蔡济民等曾先后渡江督战。

10月28日，黄兴偕宋教仁等来鄂，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及各省援军均归黄节制调遣。黄即偕吴兆麟、蔡济民等往汉口前线视察。11月1日汉口失守，吴兆麟及参谋部全体人员主张全力固守汉阳待援。在汉阳防御战中，参谋长李书城因不熟悉鄂军情况，又不明武汉地形，欲借用吴兆麟，几经磋商，都督府派吴率参谋数人到汉阳布置防务。吴“即派参谋姚金镛、宾士礼、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夏维善等，同往汉阳总司令部帮同办理军中一切事”[10]。27日汉阳失守，黄兴乘轮东下赴上海。经吴兆麟建议，黎元洪委蒋翊武为护理战时总司令。

12月17日，黎元洪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大元帅，扩编陆军为八师，吴兆麟兼第五师师长。12月南北议和期间，吴兆麟继黄兴、蒋翊武之后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官。他为坚守武昌作出了贡献。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为副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吴兆麟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黎元洪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将吴兆麟等首义军官调出湖北前往北京。吴兆麟被晋升为陆军上将，授勋二位，并先后获大绶嘉禾章、文虎章，列名将军府将军。此后，他由于对袁政府反感，对革命党人也丧失信心，转而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1922年秋，章太炎发起辛亥首义同志会，举吴兆麟为武昌首义理事会主席。吴倡议修武昌首义公园，为革命残废军人征集资金等。同年，吴兆麟任樊口堤工总理，他亲自督率工人筑坝、建闸、修港。1924年工

程全部完竣，鄂城樊口一带万顷良田在每年春夏之交不再有被江水灌入淹没之虞。

吴兆麟晚年“皈依佛法，茹素诵经，不轻出门”[11]，一直靠领退役金生活。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既得知吴兆麟仍在武汉，乃以伪湖北省政府首席参议及“和平救国军”总司令等头衔，诱其投敌。吴以生病为由住进医院，实为拒绝。他目睹沦陷区惨痛景象，精神苦闷，于1942年10月17日怀忧病逝。1943年7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抗战胜利后，1947年公葬于武昌卓刀泉。

---

(1) 《吴兆麟行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78页。

(2) 《吴兆麟行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78页。

(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5页。

(4) 梅川居士（居正）的《梅川日记》（重庆大东书局1945年版）作乙巳三月；又乙巳春夏之交有武昌“日知会”干部摄影留念（载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0年版），则该会成立不应早于1905年春。

(5) 吴兆麟：《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57页。

(6) 吴兆麟：《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59页。

(7)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9页。

(9)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6页。

(10)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30页。

(11) 《吴兆麟行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80页。

吴稚晖

严如平

吴稚晖，原名朓，后名敬恒，字稚晖，晚号朏盦。1865年3月25日（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江苏阳湖人。吴稚晖家境清贫，六岁丧母，在无锡外祖母家长大。他七岁入塾，天资聪颖，生性顽皮，在外祖母督责下苦读经史不辍。终因无力再缴束修，于十七岁辍学，设馆授徒。1887年，二十二岁的吴稚晖考取秀才，两年后考入江阴南菁书院。1891年赴江宁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落榜而归；1893年转入苏州紫阳书院攻读。

1894年，吴稚晖再次赴京会试落榜，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清廷割地赔款，使吴痛感国势危殆，拥护变法维新。1897年至天津任北洋大学堂汉文教习。1898年初，他在北京彰仪门大街拦住左都御史瞿鸿禨的官轿，递折要求光绪帝实行新政；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他亦签名于其上。戊戌维新之时，吴在无锡与友人创办小学堂，旋任上海南洋公学国文教习，1899年升任南洋公学学长，创办群智会，结识蔡元培并成为密友。

1901年春，吴稚晖自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高等师范学校。翌年夏，为促清驻日公使蔡钧担保九名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事，率二十名留学生到驻日使馆静坐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报警惩处，吴以“妨害治安”罪名被日警驱逐出境。吴悲愤不已，在押送途中投河自尽“以尸为谏”，被日警救起，后由蔡元培护送回国。

吴稚晖回到上海后，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爱国学社，任学监，为他们义务授课，并为《苏报》撰文以筹资办学，在爱国青年中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他们还发起张园演讲会，吴也登台抨击时政。

1903年6月《苏报》案发，吴遭通缉，乃逃离上海去香港。

吴稚晖至香港后，得友人帮助赴英国，在伦敦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涯，一面做排字工人，一面学习英语，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不止。他在伦敦结识了孙中山，赞叹孙品格“自然伟大”。1905年冬，吴加入同盟会，决心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翌年12月到巴黎，与张静江、李煜瀛等成立“世界社”，创办中华印字局；1907年6月又发刊《新世纪》周刊，鼓吹民主革命，介绍蒲鲁东、巴枯宁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吴与孙中山在海外往还频仍，对于当时章太炎、陶成章攻击孙中山敛财自肥之说，多次在《新世纪》撰文为孙辩白。1909年他将家人移往英国，自己在伦敦继续攻读英语，并研习写真铜版术等印刷术，博习化学、物理、天文、人种等，译《天演图解》、《荒古原人史》，著《上下古今谈》等科学知识读物。

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伦敦，吴稚晖兴奋不已。他应孙中山之邀，放下正在撰写的《六千年史谈》文稿，自英回国，于1911年12月28日抵达上海。1912年1月4日吴赴南京，应邀下榻总统府，与孙中山朝夕商谈国政。孙挽其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吴力辞不就，最后只允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表示要为中国文字不但“书同文”而且“语同音”而努力。他潜心创造注音字母，以求亿万文盲百姓能借助注音字母很快认识常用字。1917年，他把读音统一会审订的《国音汇编》，按《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重新整理编排，再增列六千多字，总计达一万三千七百字，定名为《国音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送请教育部公布发行。

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党人中迅即滋生一股腐败风气，丑态百出。吴稚晖与蔡元培、李煜瀛以及汪精卫等发起建立了一个叫“进德会”的组织，提倡“八不主义”：不嫖、不赌、不置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规定信奉前四条者为甲部会员，信奉前六条者为乙部会员，信奉八条者为丙部会员。吴是丙部会员，奉行甚笃。袁世凯在北京当上大总统后，以授勋之手段笼络老同盟会

员，吴稚晖致书袁氏：“我等在民国为百姓头衔，自诩极品，安肯受公等公仆之勋位者！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弄书生。”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公论报》鼓吹讨袁，撰文痛斥袁氏“动摇国本”。“二次革命”失败后，吴再次流亡伦敦，后至巴黎。

1915年夏，吴稚晖与李煜瀛、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在巴黎发起“留法俭学会”，后又组织“华法教育会”，1918年又在上海建立“留英俭学会”，倡导勤工俭学运动。一时渴求留学海外博求新知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陈毅、聂荣臻等爱国青年也络绎不绝地赴法，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吴稚晖在里昂筹办中法大学，于1921年建成，自任校长，在国内选了百余名青年，却拒绝在法之勤工俭学青年入学，遂引起风潮；后又因筹措经费无着，吴只得引咎辞职，前往伦敦。

吴稚晖1923年自英回国抵广州。此时孙中山正着手改组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吴稚晖颇不以为然，但因对孙甚为尊崇，未加干预。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以后他连任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吴稚晖随后亦至北京，被孙指定增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五委员之一。翌年3月孙中山病逝，吴随侍在侧，在孙遗嘱上签字，并参与治丧，扶柩移灵。嗣后他留在北京办海外补习学校，为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出国留学做预习，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子女汪文惺、文婴、女婿何文杰等都来入学。

这时，国民党内林森、邹鲁等人以“忠于三民主义”为旗号，在北京西山筹划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联俄联共，吴稚晖颇为赞同，乃参与其事，在第一次预备会议时被推为主席。但是他和戴季陶等人主张对汪精卫及跨党分子先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从容协商，遭到一些激进分子攻击，戴被殴打愤而南下，吴也从此不再与会。不

过他并未改变反共立场，离京到广州后，即与张静江等人一道，为蒋介石策划“整理党务”，建言甚多，被蒋介石尊为师长。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任总司令，吴代表国民党中央在誓师典礼上向蒋授旗并致词，俨然以国民党元老姿态出现。此后吴继续参与蒋介石反共清党的谋议，于1927年4月2日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紧急会议上提出了一份《请查办共产党文》，为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铺平道路。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吴稚晖极表赞赏，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后，蒋介石遇有内讧、争斗、训政、“剿共”中的难题，每每屈尊求教，吴亦甘为出谋划策，奔走说项，不遗余力，但他表示：“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拒任监察院长之职。

1930年初，冯玉祥、阎锡山联盟反蒋，中原大战蓄势待发，吴稚晖3月13日致电冯玉祥，责他“虚悬爱民之志，徒老垂白之头”，“甘心充当阎锡山之傀儡”，帮蒋介石制造声势。1931年5月，汪精卫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吴稚晖抨击他们是“垃圾堆里的人物，臭气冲天”。蒋介石曾打算聘他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闻讯后即在《中央日报》声明：“敬恒支离浪迹，方贻世笑，忽又以中央大学校长清衔与贱名连绵，如何滑稽！务求即日取消，虽一日变名，乃不敢当。良以事太离奇，故敬恒敢极端否认，免重罪戾也。”后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仍热心于语音统一和注音字母，于1930年将“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于1932年5月将《国音字典》改编为《国音常用字汇》公布发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接着又制造“一二八”事变。我十九路军奋起反抗，爱国军民同仇敌忾。吴稚晖于1932年3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亦提出《救国纲领意见》及《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但是汪精卫主持的这次会议，仍然是主张和谈的调子甚高，会后发的宣言称“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

统筹民族利害而决策，不以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吴的两个提案也就被束之高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稚晖出席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参与商讨抗日决策。战事日亟，他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离开南京时在寓所的墙壁上题诗：“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陈璧君等出逃叛国，经昆明去河内。吴稚晖与汪氏夫妇有数十年友谊，闻其出逃大为惊讶，写信给陈劝彼等切勿做出“将令全球腾笑、万世唾骂”的事情来，还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人皆信元老之颜面更华贵于少年之头也。”然而汪、陈一意孤行，公开发表“艳电”投敌，吴稚晖气愤至极，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上，怒斥汪之无耻行径，提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案》获得通过。此后他多次撰文斥责汪丧良无耻，卖国求荣。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身亡，蒋介石请吴稚晖继任主席职，吴自喻不过是“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婉言谢绝。后来蒋自任此职，他又被请了出来，代表国民党中央监誓并致祝词。抗日战争胜利后，年已八十的吴稚晖从重庆到上海，寄寓民居，粗衣粝食，洒脱人生。他仍常常被蒋介石拉去南京，曾端坐在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在蒋介石就职当总统的典礼上，他又出任“监誓”的角色，接着被聘为“资政”。

吴稚晖生平为人、处事、言谈、教学，多与常人不同，特立独行。他原本是一个苦读经书、做八股文的秀才、举人，但自留学日本、英国后眼界大开，提倡科学工艺以促社会进步，说“科学本身，原是永久有益人类的一种动力”，“世界的进步，只随品物而进步。科学便是各物最有力的方法”。他早年虽习得桐城派古文笔法，但三十岁以后崇尚语出天然，用文至情至性，不避粗俗俚语，绝不矫饰造作。王云五说他“简朴平凡中现出严谨，在淡泊宁静中热心教育，在幽默风趣中具有高雅”。他从不做寿，遇有人送礼，他一概以“放屁”二字拒之。六十岁时，同乡好友在上海为他大摆寿宴，贺礼满桌，他拒

不赴宴，独自去了杭州。七十岁时躲在黄山。八十岁时蒋介石赠以十两黄金，他送家乡办了所中学。他居常布衣简履，健步行走，六十五岁之后遍游名山大川，说是借以练练脚力。年届八十，仍步行出门开会，或健走十余里登门访友，不肯乘车。他追求生活的简朴与自然，厌恶繁文缛节，平时爱上小茶馆，爱吃小饭铺，往返南京、上海也不愿进头等车厢或包房，而喜在三等车里，“图个自由自在”。他崇尚“手脑并用”，说人人皆应学虞舜，不仅学才学，还应通农商，主张居室陈设应以斧凿锯刨代替钟鼎字画。他用积蓄在南京购置了一座“六亩园”，建屋供同乡子弟在南京求学、办事用。并留下遗嘱“把余下的钱送给亲戚”，又说自己“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49年2月24日，八十四岁的吴稚晖离开上海至台湾。他虽列名中研院院士、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意态消沉，深居简出。1952年因摄护腺肿大和尿毒症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1953年病情加剧，弥留之际蒋经国执弟子礼守护在其身旁。10月30日逝世。蒋介石题“痛失师表”匾额为挽，并亲临致祭。吴之遗体由蒋经国等送去火化，后在金门岛海葬。

吴稚晖一生著述甚多，1969年辑成《吴稚晖全集》十八册于台北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杨恺龄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罗家伦、黄全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史料编委会1969年版。

朱传誉主编：《吴稚晖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汤承业：《吴敬恒述传》，台北世界书局1987年版。

吴忠信

沈荆唐

吴忠信，字礼卿，又字守坚，号恕庵。安徽合肥县（今合肥市）人。1884年3月15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十八日）生。其父吴继隆，以耕读传家。吴忠信幼失怙恃，依赖兄长抚养成人。1900年就读于南京江南将弁学堂，1905年毕业后奉派赴镇江办理征兵事宜，旋入新军第九镇，任第三十五标第三营管带。

20世纪初叶，革命思潮在爱国青年中传播。吴忠信痛感清廷之腐败与国家之危亡，1906年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在新军第九镇官兵中积极宣传革命，事为两江总督端方侦悉，欲置诸法，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力保得免。嗣后改任第三十五标正执法官，1908年调任二等参谋官。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吴忠信加紧发动官兵响应革命。其时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也倾向革命，于11月8日在秣陵关誓师起义，吴忠信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徐绍桢率领各标、营人马分三路攻南京城，与清军张勋之江防军激战。旋苏、浙、沪各军组成江浙联军，徐为联军总司令，分兵四路协力进攻，南京于12月2日光复。1912年元旦，南京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徐任首都卫戍总督，吴任警察总监，协力维持首都秩序。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在北京组织政府后，吴忠信改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不久他到上海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经理兼代社长，协助于右任甚力。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吴忠信随同黄兴自上海去南京，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组织江苏讨袁军，吴忠信再任

南京警察总监。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吴忠信亦东渡躲避。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精神涣散、组织纪律松弛，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党。吴忠信拥护孙中山的决定，加入中华革命党，并进入革命党在东京开办的政法讲习所学习。1915年初，吴受孙中山指派回到上海，开展反袁军事斗争。后来陈其美到上海主持反袁斗争，吴参与策划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及策动肇和舰起义等行动，为筹措革命经费，协助陈其美四处奔走。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误中奸计遭袁世凯收买的凶手枪击，吴忠信夺门追寻凶手，不慎摔倒，磕掉了一颗门牙。

袁世凯毙命后，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军政府揭橥护法。吴忠信随后奉召去粤，被任命为粤军上校参谋，协助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指挥作战，在攻闽战役中，连续攻克武平、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上杭之役北军固守，吴冒险入城，费十小时的口舌，终于说服北军周永桂率部反正，建立奇功。嗣后吴升任粤军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于1918年12月率部攻占延平。1920年8月，粤军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担任第七独立旅旅长的吴忠信率部奋勇作战，连克梅县、兴宁、五华、回龙等地。1921年5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下令出兵广西。吴忠信被任命为攻击桂林的总指挥，率部迅速推进，先占桂林，又克龙州，迫使陆荣廷等人先后逃走。11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准备假道湖南出师北伐，吴忠信被任命为桂林卫戍司令，旋又兼任大本营宪兵司令。由于陈炯明的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决定改道江西北伐，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吴忠信建言孙中山先回广东稳定后方，再行北伐，孙不以为然。孙中山此时正谋联络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以组成“三角同盟”共同讨伐直系曹锟、吴佩孚，乃派吴忠信为全权军事代表，北上联络。吴忠信到达上海，因直奉战争结束，奉系退往关外，直系已完全控制北方局势，遂未再北去。此后因病回苏州蛰居三年多。

1926年夏，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11月，吴忠信应蒋介石之邀至南昌，任总司令部顾问，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幕僚。次年3月北伐军进占上海，吴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淞沪警察厅厅长。1928年6月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编遣”各地方实力派系的兵力，吴忠信被委派为河北编遣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激烈争吵中进行斡旋，但收效甚微。1929年2月，吴出国考察菲、新（加坡）、埃、法、德、意、挪、瑞士、美、日等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至年底才回到国内。

吴忠信于1932年3月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他推行首席县长制，实施保甲制，以加强地方统治。着手修建芜湖至南京的公路，以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全省财政年度预算从一千六百万元减为九百余万元，以节约政府开支。但他无力扭转各级官吏的徇私舞弊和挥霍浪费，更经不住大小官吏对他的诘难与攻击，不得不于1933年5月辞职。嗣后吴挂名南昌行营总参议，回到苏州家中赋闲一年多。1935年4月，又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吴整饬吏治，着力修筑川黔、湘黔、桂黔、滇黔等公路，设地区调查所及整理农事试验场，以改善地方经济。他专理政务，而请蒋介石派陈诚来黔“追剿”长征至黔的工农红军。吴颇注意同接壤的广西搞好关系，调和蒋桂之间的矛盾。

1936年8月，吴忠信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推行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

1940年初，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代表中央政府指示西藏各项方略，体现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治理。

1941年9月，吴忠信作为甘、宁、青区党政工作考察团团长，率团考察了三省的党政工作及经济、交通等。他在青海看到占据甘肃河西走廊的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之间不和，经过一番策动，使马步芳将河西走廊交由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驻扎，为蒋介石下一步进入新疆

打开了通道。1942年8月，吴忠信陪蒋介石及宋美龄赴西北各省巡视，至兰州、西宁、嘉峪关等地；并继续陪同宋美龄飞抵迪化笼络长期统治新疆的盛世才。

1944年9月，吴忠信接替盛世才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总司令。他提出天理、国法、人情并重的治理方针，采取了清理监狱、宣抚地方、敦睦邦交三项措施：释放了被盛世才无理关押的各民族代表人物包尔汉、马良骏等人，以及赵丹、王为一、徐韬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共二千余人；成立“宣抚委员会”，派员分赴伊犁、塔城、阿山等地，笼络各族政教界人士；改善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关系，派出专人进行“敦睦”事宜，不准报刊刊载反苏反共文字。为控制局势，他飞赴青海与马步芳商量，将骑五军调入新疆；并请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常驻新疆，代管保安司令部。由于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新疆局势严峻，吴忠信一筹莫展，急电重庆请求驰援。后经苏联驻华大使出面调停，张治中代表中央抵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达成和解协议。吴忠信随即辞去新疆省政府主席及保安总司令的职务，交由张治中接任。

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吴忠信列名为国民政府委员。翌年5月，蒋介石出任总统，聘吴为“总统府资政”。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略决战中溃败，实行币制改革、收兑金银外汇、限制物价的政策更使社会陷于混乱，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在被迫下野前，特地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吴不负蒋之重托，事事按照蒋的旨意行事，阻挠李宗仁行使总统职权。1949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组建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吴列名为委员。

吴忠信到台湾后，在蒋介石复职重任“总统”时，仍为“总统府资政”；此后又被选为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1953年7月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12月16日因病在台北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刁抱石编：《民国吴礼卿先生忠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金绍先：《忆述国民党元老吴忠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述：《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武百祥

辛培林

武百祥，又名作善。1879年2月4日（清光绪五年正月十四日）生于河北乐亭县何新庄。其父武士信，业农，自耕为生。武百祥九岁入本庄私塾读书。

1892年7月，武百祥随其舅父何善荣到长春，经推荐入万发号杂货铺学徒，次年改到万发德粮铺，三年后由学徒升管账。1900年，沙俄侵略军进犯我国东北，武百祥返回家乡避难，当了四个月“货郎”。次年，时局平定后，他又回到长春。1902年，他随人到哈尔滨寻友“开关”（即开赌场），但无结果。于是，又别谋生计。1903年，武百祥同友人合资小洋二千五百元，创办了“同记”杂货店。翌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与关内交通中断，关内货物不能运到东北，哈尔滨成了东北三省商业货源的主要商埠。这时，武百祥向外国钟表行招揽生意，从中获利。1906年，因内部不和散伙，“同记”闭歇。

1907年初，武百祥来往于哈尔滨、长春之间，用“羌帖”[(1)] 倒换现大洋，从中牟利。后因不慎，钱款全部被盗。他受此打击后，无意经商，沉溺于吃喝玩赌之中。几个月后，在亲友的规劝下，他又重新开业，商号仍用“同记”。当时，英式鼠绒皮帽在哈尔滨畅销，武百祥见有利可图，便买了一台手摇缝纫机，自己仿制了二百多顶出售，赚钱三百多元。1908年初，他同赵惮唐、王熙瑞合资四千元，共同经营“同记”。此后，武百祥工商兼营，使“同记”得到了迅速发展。他继续扩大英式皮帽生产，办起了“同记工厂”，“同记”的牌匾也添上了“帽店”字样。这样，哈尔滨英式皮帽的生产几乎为“同记”所独占，并遍销东北三省及海参崴等地。1914年，武百祥又在哈尔滨设立了服装工厂，在齐齐哈尔创办了“同记”分店。1917年，他在松花江北置地三百

多垧，办起了猪繁殖场。1920年，他乘“羌帖”停用，哈尔滨金融市场混乱之机，开设了“同记钱庄”。翌年10月，将道外头道街的小楼改建成四层大楼，雇用店员一百多名，开设了“大罗新百货店”。这一年，“同记”工商两方面共盈利现大洋三十余万元。

1922年，“同记”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工厂又不慎失火，楼房、机器、货场大部分烧毁。在外部索债、内部涣散的困境下，武百祥收缩营业范围，减少开支，渡过难关。此后，他大力经营，使其经商活动进入了“黄金时代”。1927年，他用八十九天时间建成了“同记商场”；盘进了“益丰源”百货店后，开设“大同”百货店。这样，在哈尔滨的商业中心地区，武百祥的“同记商场”、“大罗新”和“大同”百货店三足鼎立，经营商品达二十三类三千余种；当时仅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哈尔滨，到“同记商场”、“大罗新”和“大同”的顾客，年达六百万人次以上；这里也是外埠商人到哈尔滨采购货物的唯一去处。从而，武百祥垄断了哈尔滨的百货市场。在此期间，他雇用固定工人一千三百人、临时工三四百人、店员七八百人，年终获利达上海规银[(2)]二十三万六千五百两。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同记”因有七十余万元的“金票”[(3)]债务，又陷入了绝境。武百祥束手无策，拟将“同记”关闭。哈尔滨市政当局担心这将会给哈尔滨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便召开了“同记债权大会”，决定将其债务一律展期三年偿还，方使它勉强维持下来。

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陆续实行了棉花、皮毛、皮革、粮谷等物资的统制法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发行了名目繁多的公债，制定了“七二五停价令”等措施，残酷扼杀和疯狂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使“同记”每况愈下。1942年，同记工厂倒闭。1944年，同记商场歇业，大罗新百货店也处于销售残存商品的不死不活、奄奄一息的状态。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民族工商业得以复

苏。武百祥相继开办了制毛、皮革、制染、针织等工厂和“百善牧场”。“同记商场”死而复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年盈利近四十亿元[(4)]。1955年末，他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采取的赎买政策，积极申请公私合营，在哈尔滨工商界中起了带头作用。1955年12月2日，正式宣布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武百祥被安排为哈尔滨市百货公司经理。

武百祥由一名学徒成为拥资百万的资本家，“同记”由一个小杂货铺发展为雄踞东北的大工商企业，重要原因是他经商“与众不同”，能够坚持“仿洋”、“革新”，较早地实行一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和营业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能在中国商业场中首先革新，不畏人言，不怕失败，处处采取新法，以作商业界的先导”[(5)]。如1911年10月，他赴天津办货，亲自到外国租借地学习外商经营方式。1920年他又到天津、南京、上海和日本的大阪、横滨、东京、横须贺等地参观工商业发展情况。他还派员随莫德惠组织的欧洲参观团到苏联、波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士参观学习。同记商场、大罗新百货店不仅门面的修饰是“洋门脸”，而且内室的布置、商品的陈列和点缀，也都务求与外国洋行相仿。在哈尔滨的中国商界中，他首先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商店的明码标价、使用包装纸等售货方法。他还利用美国花旗、英国汇丰、日本正隆和苏联远东等银行的资金，扩大经营，为日商、俄商代理批发和零售，甚至在日本设立驻庄，采购货物，从日本和欧洲进货率曾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武百祥以“洋”取胜，招徕了大量中外顾客，生意兴隆，竞争者望尘莫及。

他制定了“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经营方针。他对进货价款的偿付，打破了旧商号通行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清账的常规，首创了随时支付的办法，这既“利公司”，又“利同业”，博得到了好评，赢得了信誉。1925年，他仿照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公司制办法，将旧的“份子制”改为“薪金分红制”，即盈余按“东六西四”的比例

进行分红。这个改革驱使职员、店员热心经营。后来，武百祥看到“各国劳资间的冲突日甚一日，欲想防止这种冲突，其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先使劳动与资本间的利益均等”[(6)]。于是，他将“同记”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把一百三十九名职员变为股东，使他们尽己所能，改变经营消沉的局面。

在管理上，武百祥以“良规善法”为准绳，多次修订铺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他对职员管理尤为严格，不仅使他们守规尽职，各司其事，还要求他们身为表率，弃绝嗜好，禁止吃喝嫖赌，倘有违犯，轻者记过，重者开除。他对店员的选择和训练，也与其他商号迥然不同，规定店员要有高小文化程度，录用时要经过训练和考试。为此，他曾在哈尔滨和河北省乐亭县设立培养新店员的学校，由他和“同记”的经理、各部主任亲自授课。他还给店员比较优厚的福利待遇，使工人和店员更加依附于“同记”。

武百祥的另一个重要的经营手段是在营业宣传上利用报纸、广播进行广告宣传，派人到各地张贴标语、图画，甚至雇用百余辆人力车，敲锣打鼓，贱卖商品，形式新颖，灵活多祥。他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和营业手段，为哈尔滨“多数商店效法步趋”，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武百祥信奉基督教。1914年2月，他在哈尔滨入丹麦牧师马继良办的基督教夜校学习英文、俄文和圣经。1915年10月4日正式领洗入教，并在“基督教信义会”中任司库执事。1924年，他成立了“教友生产合作社”，1927年，成立了“职工青年会”，下设多种传道机构，向工人、店员灌输“仁慈”、“博爱”思想，他主张不用外国牧师，退出了“基督教信义会”，成立了“自立、自养、自传”的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任执事长和牧师。“九一八”事变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满，终日在圣经院教授音乐和识字班。1936年，他入圣经院增设的神学院读书，1940年毕业后继续在圣经院任教。

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武百祥先后担任哈尔滨工商联合会副主任，社会事业协会理事长、政协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副主任、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委员及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等职。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1966年9月6日，武百祥去世。1979年被平反，恢复了名誉。

主要参考资料

中共哈尔滨市委统战部档案：《武百祥卷宗》。

哈尔滨市整理私人工商业历史资料委员会编：《同记商场五十年概况》。

---

(1) “羌帖”即清末民初东北各地对流通于中东铁路沿线的帝俄纸币的俗称。

(2) “上海规银”即规元，是1933年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帐货币，只作记帐用，并无实银。

(3) 1929年前，日本实行金本位，当时对日本在东北各地发行和流通的日本纸币统称为“金票”。

(4) 指当时的东北流通券。

(5) 武百祥：《大罗新商店政策》，哈尔滨市档案馆，第12页。

(6) 武百祥：《大罗新商店政策》，哈尔滨市档案馆，第16页。

伍朝枢

郑则民

伍朝枢，字梯云。广东新会人。1887年5月23日（清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一）出生于天津。父亲伍廷芳，清末曾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多年，1896年受清政府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即公使）；1911年武昌起义后，曾任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京政府代总理、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伍朝枢1897年随父前往美国，在华盛顿等地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05年回国，先后在广东劳工局和农工实业局任职。1908年得官费派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继进林肯法律研究院，取得了大律师的资格[(1)]。

伍朝枢1912年春学成归国，正当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得到全国统治权之时。5月伍被派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9月调入北京外交部办理条约事宜。次年列名为广东选出的首届国会议员，并为国民党籍的宪法起草员[(2)]。这时他援引国际公法撰写论文，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为争取各国承认中国政府制造舆论。1915年被任为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1916年1月袁世凯复辟帝制，任伍朝枢为“洪宪政府”参议。他提出辞职未获准，一度托词请假在家。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翌年黎、段即发生了以美、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伍朝枢和担任外交总长的伍廷芳先是站在黎元洪一边反对段祺瑞，稍后又反对黎元洪屈服于张勋下令解散国会的不法行为。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伍朝枢随伍廷芳南下参加护法运动。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军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1919年，护法军政府决

定派王正廷、伍朝枢等与北京政府代表组成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伍朝枢虽然没有全权代表的名义，但他在巴黎和王正廷一起，对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国内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的斗争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21年5月，孙中山再次到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

陈炯明1922年6月公开叛变孙中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率各舰反击叛军，伍廷芳和伍朝枢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他们接受孙中山的指示，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外国代表严守中立，勿助叛军。正在此时，伍廷芳突然病逝，伍朝枢为父办理丧事之后，转赴上海。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派伍朝枢为外交部长。伍协助孙中山起草对外宣言的英文原稿，6月29日以《大元帅对外宣言》发表。宣言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得到帝国主义列强“以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维持了黑暗腐败的统治，使“人民受害，水深火热，情况之惨，殆难言罄”，希望各国“不干（中国）内政，严守条约，同谋列强之利”[(3)]。此后，孙中山为收回关税主权，并解决军饷问题，坚决向美、英等国交涉，要求提取被无理剥夺的部分粤海关关税余款。对此，北京外交团致电广州政府，叫嚣要采取强硬手段；同时调集在黄埔的军舰，进行威胁。伍朝枢奉孙中山之命以外交部名义复照北京外交团，驳斥其谬论，指出：“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因此，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4)]。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

组了国民党。伍朝枢等一些人表面随和，而实际抱阳奉阴违态度。早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就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背着孙中山进行一些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并对工农运动的兴起表示畏惧。“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暗中反对，消极怠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5)] 2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任伍朝枢为商民部长。

初夏间，伍朝枢奉命赴天津、沈阳会见段祺瑞和张作霖，商讨有关联合反对直系统治的问题[(6)]。7月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任主席，伍为委员兼秘书长。8月下旬，以陈廉伯为首的商团策划运输大批枪械入口，阴谋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命令将枪械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伍朝枢主张商团事件“和平解决”，表现了迁就妥协的态度。

1925年6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示威群众的广州“沙基惨案”，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伍朝枢以大本营外交部长名义向北京公使团提出严重抗议。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伍朝枢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司法委员会主席兼广州市政厅委员长。这期间，伍朝枢同胡汉民、孙科、吴铁城等保持密切关系，参加他们的一些集会，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不满。11月伍被任命为司法调查委员会主席，着手调查广东的司法状况。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伍朝枢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担任司法行政委员会委员，一度代行主席。2月兼任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委员。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后，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中山舰事件处置办法，伍朝枢也出席了会议，不久还和蒋介石等人一起发表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于这时

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矛盾激化，伍朝枢和汪、胡原来关系密切，因此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冷淡。5月30日，蒋介石在广州逮捕新改编的第十七师师长吴铁城，伍朝枢和孙科等为吴向蒋缓颊无效，便告假离粤，经香港回上海寓居。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汪精卫相继“分共”清党，国民党内几派势力一度取得了妥协，9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伍朝枢被委为外交部长。伍先是发表外交声明，表示对帝国主义国家“不采暴动手段”，维护“友好关系”。此后采取了一些收回主权的外交举措，如宣布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发布进口关税暂行条例、出口税条例等。接着于11月23日发表了“对外请求废约宣言”，宣称：“凡从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无存在之理由。”[(7)] 还表示：“对于重要悬案，国民政府准备适当时期，以公平及互谅之精神，设法解决。”[(8)] 但列强置之不理。12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销承认”苏俄的领事，伍朝枢命令全国各省对苏俄商业机关、银行、商店、轮船公司勒令停业。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改组，黄郛继伍朝枢为外交部长。伍与胡汉民、孙科均下野，同往印度、埃及、土耳其及欧美游历。5月，北伐奉系途中，日本军队炮轰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伍朝枢赴美国，游说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支持和援助中国。7月伍任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与美国谈判修改条约的问题。1929年1月任驻美国公使，同美国方面多次谈判，为双方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之条约”奠定基础。在新的条约中，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继续保留着和他国“应无区别”的“最惠国待遇”。伍代表国民政府多次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均遭拒绝。9月，伍奉命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翌年在参加国联第十一届大会时，被选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理事。

1931年4月，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为导火线，国民党内汪精卫、孙科等反蒋势力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反对以蒋介

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分裂的局面。伍朝枢闻讯于6月15日离驻美公使职位，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琼崖特别区长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于10月底在上海举行会谈，伍朝枢被推为粤方代表之一。双方从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住宅举行了七次会议，在中央政制、党务、外交等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结束宁粤对立局面[9]。伍朝枢被任为司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但他想到自己并无实力基础，没有就职，连广东省政府主席也一并辞去。他曾打算就任西南政委会常委兼琼崖特别区长官，进行某些开发工作。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伍朝枢不得不亦辞职，移住香港，一度到北平、绥远等地旅行。

1934年1月3日伍朝枢在香港病逝。

---

(1) 陶履谦：《伍梯云先生行状》，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6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页。

(4) 《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5—27日。

(5) 何香凝：《我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

(6) 何国柱：《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杜春和、林斌生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112页。

(7) 洪钧培编：《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235页。

(8) 洪钧培编：《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第241—242页。

(9) 《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第70—76页。

伍连德

陈民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清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伍祺学是学徒出身的金店老板。伍连德七岁时在槟榔屿进英国人办的学校学习，1896年考取英女皇奖学金，进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医。他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曾多次获得奖金和奖章，还获得免费进伦敦圣玛丽医院（St．Mary's Hospital）实习三年的奖励，成为在该医院实习的第一个中国人。通过实习，他的医务技术大有提高，而且由于外出接生，接触到英国平民的生活现状，使他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1)]。

伍连德于1902年获得医学士学位，毕业后又得到母校资助，先后去德国哈勒卫生学院和法国巴士特研究所，研究细菌处理和破伤风病症。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细菌的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考试。随后回马来亚，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院研究热带疫病。

1904年底，伍连德完成热带疫病的研究工作，回槟榔屿挂牌行医。由于受著名华侨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的影响，医务之余，也注意为社会服务，致力于社会改革，如反对赌博和禁吸鸦片烟、主张男人剪掉辫子、提倡女子教育以及开展体育运动等。

1907年，伍连德接受清廷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回到国内。翌年9月到达北京后不久，正值光绪和慈禧相继身亡，袁世凯被黜回原籍。旋由丁士源（时任陆军部法官，与伍在英国认识）引见陆军部尚书铁良，被正式委任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因早年缺少学习

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懂中文之不便，到天津上任后，即聘请教师学习中文。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便能用普通话讲课。由于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交往，他对中国典籍也逐步入门，后来对历史文物颇有兴趣，曾搜集过不少古文物。

1910年底，哈尔滨发生严重瘟疫（俗称黑死病），疫症迅速蔓延，危及整个东北。当时东北群医束手无策[(2)]，人们想起中世纪欧洲数百万人丧生的黑死病，惊惶万状。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伍连德奉命前往。他运用多年研究病理学、细菌学的心得，积极探索病源，控制交通，隔离疫区和病人，火化传染病尸体。因东北严寒，泥土冻结，无法埋葬，致使死尸、棺木堆积街头。伍认为，如果老鼠咬食尸体，势必使疫病传染得更快，便与当地官吏商量，采取集体火化尸体办法，作为紧急措施，这在世界防疫史上是一创举，但违背中国土葬传统，于是由吉林巡抚与伍连德电奏朝廷，获得特准。由于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加之他执法认真，严格按科学精神办事，不到四个月的工夫，这场震惊中外的传染病被扑灭了。清政府特赏他为医科进士。一时被国内外称誉为“战胜瘟疫的有力斗士”，“防疫科学的权威”。

1911年4月，伍连德主持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防疫会议。这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科学会议，有十二个国家派遣著名专家出席。会议在伍连德主持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东北防治瘟疫的经验，交流各国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委任为外务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并着手在哈尔滨筹建“北满防疫事务所”及附属医院。同年8月，他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发表了科学论文《蒙古鼠（即土拨鼠）与瘟疫的关系之考察》。年底，出席海牙第二届麻醉药会议。

1914年5月，伍连德在上海与颜福庆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自任秘书，并负责编辑《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年，他被推选为该会会长，连任两期（1916年—1920年）。他为发展中国现代医学，做

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6年6月，黎元洪继袁世凯任总统，委任伍连德为总统特医，兼任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铁路的总医官。1930年7月，伍被任为全国检疫事务所监督。

伍连德因致力于医药行政和研究工作，先后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香港大学等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被选为中研院院士、苏联微生物学会外籍会员等。

伍连德先后主持兴办医院多所，有哈尔滨医院及其防疫医院、奉天东北陆军医院、齐齐哈尔人民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以及全国检疫事务所建立的各个医院。他曾在北京中央医院（今人民医院）工作了四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伍连德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开设私人诊所。当地的达官显贵多次劝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主动提出把他在北平的一幢楼房捐赠给中华医学会，表示他对祖国解放的拥护。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故于槟榔屿。

---

(1) 伍连德在自传中写到在圣玛丽医院实习期间外出接生的情形："自从进入几家产妇的房屋。我才认识到19世纪末英国平民的生活状况。房子狭小而肮脏，很少家具，连放医药用具的桌子也没有，热水也不够用，有几家甚至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铺些干草，产妇就躺在上面等待分娩。见到这样的穷苦的英国人，同在殖民地看到的那些养尊处优的英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见Wu Lien-te：*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189—190，Cambridge［Eng．］W-Heffer，1959．

(2)　当时在东北的法国医生摩赛尼（Dr．Mesny）在检查病人时也被传染上，医治无效而死亡。这件事引起很大的反响，造成极大的恐慌。1911年1月，仅哈尔滨傅家甸，每天因瘟疫死亡的人数总在40至60人之间，最多时达183人。有一天，伍连德到坟地视察，见到2000具棺材和冻僵的尸体（来不及掩埋的无主死尸），在雪地上排列着，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当时疫情的严重，可见一斑。见*Plague fighter*，pp20-21、pp26-29。

伍廷芳

郑则民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父伍荣彰在南洋经商。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新加坡[(1)]。三年后，随父回国，居广州芳村。幼年进私塾读书。有一次，他被土匪绑架到一座山中，土匪准备勒索其父母交赎金领回，他机智地同山中的一个被胁迫当厨夫的人暗约，乘贼首率队出去行劫时，用酒灌醉看守，经历了艰险的路途，安全地回到家中。这次经历，增强了少年伍廷芳的胆识[(2)]。伍廷芳十三岁到香港进圣保罗书院读书，1861年毕业，受聘任香港中、高等审判厅翻译。接着在香港与友人创办《中外新报》，经常翻译西文资料，供该报发表，延续了将近十年之久。1874年，他自筹经费赴英国伦敦留学，进林肯法律学院深造，三年期满，考取了大律师资格，不久，回香港任律师，后来被香港政府聘为法官兼立法局议员。当时香港殖民当局在立法和具体执行中，抬高英人地位，压制华人。有一次，一个英国人喝醉酒，在马路上和一华人口角，当场将华人踢死。事后，几个英人法官打算从轻了结此案。伍廷芳“挺身而起，根据法理。和这几个法官竭力争辩”，最后经“港督双方调解，才另判那英人监禁五年，还要赔偿巨资，恤死者的家里”[(3)]。根据香港政府的规定，华人病死，没有皇家医院的证明，都必须剖尸验明有无传染病。实际上这是有意刁难华人，向死者家属勒索金钱。伍廷芳对此愤恨不平，提出应该废除，还鼓励华人团体上书请愿，要求取消剖尸的无理规定。因此他与香港当局发生矛盾，终于辞职离港。

1882年，伍廷芳被直隶总督李鸿章招入幕府，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前后达十多年，多次参与外交谈判及缔约活动。1896年，清政府特命伍廷芳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即公使）[(4)]。1899

年，伍廷芳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5]，双方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互惠条件。这和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等西方国家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有所不同。这时，美国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对华外交上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独立”的幌子下，要求“机会均等”，享有其他列强在华的同等利益。伍廷芳认为这是中国避免被瓜分的好办法，大加鼓吹[6]。

1902年，伍廷芳应召回国，清政府授他以四品候补京堂衔。先任商约大臣，驻上海，同英、美、日等国进行订约谈判。继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交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曾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拟订了民刑律草案，报清政府颁布施行。伍廷芳通晓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目睹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灾难，清朝法律的封建落后性，曾试图有所改良。在所草拟的法律草稿中，删除了旧清律中关于“凌迟、连坐、刑讯”等条文。主张设立法律学堂，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培养司法人才。也写过一些奏折，陈明变法自强的必要。但清政府当权人物的顽固昏愦态度，使他感到失望。1907年再次任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他在美国设常驻使馆，与美国政界和社会名流交往较多，结识了一些朋友，1910年被清政府召回。归国后居上海，在原戈登路置有住宅，称为“观渡庐”，暂时未任公职，从事一些公益活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伍廷芳宣布赞成共和，先后致函清廷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劝告清帝退位。他在《忠告清监国赞成共和文》中指出：“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君主立宪政体，断难容于此后之中国”[7]。在《致清庆邸书》中又说：“武汉变乱，天下响应，旬月之间，大江南北相继独立，其志在乎扫除专制积弊，而建共和政体。”[8] 劝告清廷不要执迷不悟、与全国人民为敌。上海光复后，他和沪军都督陈其美、立宪派首领张謇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并与旧官僚程德全、立宪派重要

人物汤寿潜等相联结，准备在动荡的政局中有所主张和获取权力。11月中旬，南方光复各省，推定伍廷芳为临时外交代表，驻上海，负责革命方面的外交任务。接着，南方光复各省在北军压力下，接受了袁世凯通过英国等驻华使节提出的“调停”建议，派伍廷芳任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12月1日开始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举行所谓南北议和谈判。首先达成了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12月20日，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北京公使，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提出“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现争”[(9)]的“劝告”，向革命方面施加压力。伍廷芳和张謇等人乃于12月22日发表了“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认为如果革命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列强干涉的危险[(10)]，表现了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脆弱和畏惧心理。

在谈判中，伍廷芳代表民军坚持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又暗示对方，只要袁世凯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革命党人方面愿以大总统的职位作为报答。经过多次密谈，双方达成妥协，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由国民会议解决。

在谈判过程中，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伍廷芳任司法总长兼议和全权代表。临时政府在存在的三个月内，做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立法、司法工作，如颁布了《临时约法》，这是依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制定的，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利益和愿望，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又如连续发布了禁止刑讯、保障人权、禁止买卖人口等法令。这些立法工作和司法改革是在孙中山直接倡导和主持下进行的。虽然伍廷芳当时常驻上海办理议和谈判，对上述工作大多没有亲自参加，但他身为司法总长是赞成孙中山的主张的，而且他在上海还以司法总长身份，亲自过问当时一些审判工作，监督新政令的实施。不过在上海，他主要是与唐绍仪等人秘密议决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以及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等问题。当袁世凯以清廷内阁总理身份，在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

府之间为攫取权位玩弄阴谋诡计时，伍廷芳曾经予以揭露。但是袁世凯施展了一系列政治手腕，迫使孙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总统职。临时参议院于第二天决定将政府迁往北京。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政府的大权落入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

袁世凯当上总统后，伍廷芳退居上海，历时五年。在此期间，他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小党派推为首领，被“共和党”列为理事[(11)]，但实际上没有就职，而在家中研究灵学、养生学，攻读儒、佛、回诸书。同时，他还整理了法学方面的著作，1914年写成《宪法大旨》，1915年拟定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阐发了关于改革国家司法制度的思想。例如，在《宪法大旨》中，强调维护国民的人身、居住等权利和法律范围内的平等、自由，认为“国家法律，上下人须一律恪遵。位极长官，亦难枉法。犯法者无论上下，一同治罪。此之谓平等也”。反映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观，具有进步意义。他还指出自由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能在法律之外自由行事，认为“人能守法，斯能自由”。伍廷芳认为中国的司法必须改良，要收回治外法权，建立良好的治安和社会秩序，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关于司法改革，他认为必须坚持司法独立、文明审判的原则。指出专制时期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操于一身”，是不妥当的。凡“审判官所断之案件，行政官不能过问，如有冤抑，得上控于合格衙门”，这样才能限制行政官越权违章，使“上下守法，四民安谧”。他倡议的文明审判，主要是废除刑讯制度，根据证据和情理定案；建立陪审制度，由通达事理、公正、有名望的人任陪审官，准许律师辩护和旁听。他还建议增设法律学堂，任命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担任审判官。主张采用“罪止一身”的刑法原则，废止无罪株连。

当袁世凯演出帝制丑剧时，伍廷芳表示反对。1915年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的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他还给伍

廷芳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支持。伍认为古德诺“辜负了自由平等四个字”，对此表示不满。这时袁世凯还多次派人到上海请伍廷芳到北京，共谋帝制事宜，均遭拒绝，使来劝说的人“乘兴而来，败兴而返”[(12)]。伍廷芳同时写信训示在北京政府中任职的儿子伍朝枢，不得参与袁的帝制活动。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组阁任总理，先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唐未到任前由陈锦涛兼代。1916年11月，伍廷芳应邀北上，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1917年，在以美、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中，伍站在黎元洪一边，于5月23日任代总理，协助黎元洪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组成了伍廷芳临时内阁。内阁成员除由他兼外交总长外，另由范源濂、李经羲、张士钰、程璧光、张耀曾、谷钟秀、权量分别任教育（兼代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农商、交通等各部总长。其后，张勋带兵入京，以调停为名进行复辟活动，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黎元洪屈服于张勋的压力，但认为这道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方能“合法”生效，于6月11日请伍到总统府磋商，许诺以提拔他的儿子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作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交换条件。伍廷芳断然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黎元洪接着又派步军统领江朝宗，以人身安全等威胁伍就范。伍廷芳坚决地回答：“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又说：“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一死而已，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黎元洪不得不派江朝宗以代总理名义，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江的这一行动，受到人们唾弃。伍廷芳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为自己在政界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伍廷芳也南下参加，被任为外交总长。次年5月，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改设七总裁，孙中山辞职离广州赴上海，伍廷芳仍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长和财长。1919年春，南方政府派王正廷、伍朝枢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伍廷芳支持王正廷等以较鲜明的态度表示如果

列强不肯接受中国代表团的保留意见、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做法。当他看到桂系勾结北洋军阀独断横行时，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这期间，伍廷芳曾代表南方政府，出面与美、英等国交涉，使外国公使团不得不按比例拨出部分关税余款，交南方政府使用。伍以财政总长名义将款存入汇丰银行。随后商定作为办大学的基金。桂系军阀要求从中提出三十万元移作其他用途，被伍拒绝。随后，他们又借口要办银行需基金，军队要求发饷必须动用这笔存款，甚至声言，如果不答应要求，就将采取激烈手段对付他。伍廷芳被迫携印信和税款离广州去上海。在抵香港时他发通电声明："携款离粤，并没有他意，誓以忠诚，保存此款，将来还诸国民。"(13) 桂系军阀分别派人在香港和上海对他起诉，但是由于伍廷芳精通法律，桂系也无可奈何。在现实斗争中，他加深了对孙中山的认识，日渐采取与孙中山紧密合作的态度。他曾对人说："前次不奉孙公（中山）命令，以至岑云阶（春煊）、莫荣新等辈猖獗不堪，十分惭疚。今知孙公实一爱国男儿，我决意竭我能力和他合作。"(14)

1920年冬，伍廷芳随同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军政府。次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伍廷芳任外长兼财长。当孙中山往桂林指挥北伐时，伍代行总统职务。1922年4月，孙中山以陈炯明反对北伐而免去陈的职务，命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伍和廖仲恺一起，努力开辟财源，支援北伐军从粤北进军赣南，讨伐北洋军阀。当时广东工人运动有所发展，以他为首的广东省政府虽然废除了中国刑律中关于罢工治罪的条文，但依旧对工人严加限制，并在5月镇压了广州发生的盐业工人罢工。在外交上，伍廷芳倾向联络英美，不赞同联合苏俄。由于英、美等国对南方政府采取敌视态度，他在外交工作方面难以取得进展。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唆使部下炮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兵舰与叛军斗争。伍廷芳在遭受叛军围困的情况下，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拒绝陈炯明的威胁利诱。17日亲登永丰军舰与孙中山会晤，接受指示，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但英、美等国置之不理，仍助叛军夺取广州。伍廷芳愤而病发，于6月23日

在广州逝世。

---

(1) 孙中山：《伍廷芳墓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5页。

(2) 伍廷光编：《伍廷芳历史》，上海国民图书局1922年版，第13—15页。

(3) 伍廷光编：《伍廷芳历史》，上海国民图书局1922年版，第25—26页。

(4) 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23页。

(5) 王铁崖编：《中外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34—938页。

(6) 《伍秩庸博士哀思录》，第2页。

(7) 《伍先生（秩庸）公牍》，第11—12页。

(8) 《伍先生（秩庸）公牍》，第11—12页。

(9)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页。

(10)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卷上，1936年版，第49—51页。

(1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585—586页。

(12) 《伍廷芳历史》，上海国民图书局1922年版，第21—22页。

(13) 《伍廷芳历史》，上海国民图书局1922年版，第54—57页。

(14) 《伍廷芳历史》，上海国民图书局1922年版，第47—4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七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七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X

夏超　魏桥

夏斗寅　袁钟秀　胡淑敏

夏丐尊　万江红

夏瑞芳　熊尚厚

夏威　赵世怀

夏曾佑　袁英光

夏之时　周茂江

冼冠生　汪仁泽

冼星海　查建瑜

项松茂　孙德祥

萧佛成　陈民

萧龙友　寿祝衡

萧同兹　熊尚厚

萧耀南　朱丹

萧友梅　李俊

萧则可　江晏琦

萧长华　李仲明

谢持　罗敏

谢奉琦　周茂江

谢晋元　李飞

谢无量　杨伟立　马宣伟

邢士廉　张志强

熊成基　黄德昭

熊克武　马宣伟

熊庆来　夏光辅

熊式辉　严如平
熊希龄　熊尚厚
虚云　王学庄
徐悲鸿　李仲明
徐恩曾　刘敬坤
徐寄廎　朱镇华
徐镜心　卫香鹏
徐堪　马宣伟
徐谦　蔡静仪
徐荣廷　徐凯希
徐润　江绍贞
徐绍桢　徐亚玲
徐世昌　李宗一
徐树铮　李宗一
徐庭瑶　戚厚杰
徐锡麟　闻少华
徐新六　汪仁泽
徐永昌　汪仁泽
徐志摩　孙玉石
徐宗汉　郭烙
许崇智　严如平
许德珩　刘秋阳
许地山　徐斯年
许鼎霖　熊尚厚
许冠群　谈玉林
许广平　张小曼
许世英　郑则民
许雪湫　杨天石
许云樵　陈民
续范亭　田为本

宣铁吾　朱佩禧
薛笃弼　张天政　王韦娟
薛觉先　张洁
薛明剑　朱复康
薛岳　颜平
荀慧生　文曦

Y

严宝礼　徐铸成
严独鹤　陆诒
严复　罗耀九
严修　娄献阁
严裕棠　熊尚厚
严重　严如平
阎宝航　姜克夫　李侃
阎锡山　刘存善
颜福庆　谈松华
颜惠庆　娄献阁
晏阳初　吕乃澄
杨爱源　汪仁泽
杨粲三　熊尚厚
杨登鹏　吴忠才
杨笃生　杨天石
杨度　刘秋阳
杨虎城　黄德昭
杨杰　陈崧
杨荩诚　刘毅翔
杨衢云　袁鸿林
杨铨　陈崧
杨森　吴银铨　马宣伟
杨善德　张学继

杨士琦　张学继
杨寿栿　朱复康
杨树达　白吉庵
杨树庄　刘传标
杨庶堪　熊尚厚
杨廷宝　罗幼娟　陈志新
杨文恺　张学继
杨希闵　吴显明
杨永泰　萧栋梁
杨宇霆　周斌
杨增新　陈宁生
杨振鸿　高光汉
姚锡光　孙宏年
叶楚伧　郑春燕
叶恭绰　萧栋梁
叶鸿英　程庸畴　宋紫云
叶景葵　汪仁泽
叶企孙　阎铁
叶圣陶　马蹄疾
奕劻　汪仁泽
易培基　马复华
殷夫　丁景唐
殷汝耕　陈晓清
尹昌衡　陈祖武
尤列　李娜
于冲汉　张学继
于学忠　黄德昭　王秦
于右任　张应超
余汉谋　严如平
余日章　雷镇阊

余芝卿　汪仁泽
俞承修　姚祚鼎　汪仁泽
俞济时　严如平
俞庆棠　郭烙
俞颂华　俞湘文　葛思恩
俞佐庭　陈春雩　宋紫云
虞洽卿　汪仁泽
禹之谟　闻少华
郁达夫　马蹄疾
喻培伦　尚明轩
袁金铠　张学继
袁履登　汪仁泽
袁世凯　李宗一
袁守和　熊尚厚
袁祖铭　李德芳　刘毅翔

返回总目录

夏超

魏桥

夏超，字定侯，乳名守珍，浙江青田万阜新庄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父亲夏贡九是秀才，以教馆为业。夏超幼时随父在蒙馆读书。

1903年，夏超离开家乡到杭州，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在此期间，经秋瑾介绍，参加了光复会。1905年毕业后留武备学堂任学生队队长。1906年，蒋尊簋任广西督练公所总参议，从浙江挑选得力人员前往协助，夏超膺选而往，去广西督练公所任职。

辛亥武昌首义，浙江于11月5日宣告独立，夏超由广西回杭州，为都督汤寿潜的幕僚。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调任交通总长，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夏超任警察督练公所主办，1913年任省会警察厅长。

当时浙江的警政是个冷衙门，无权少势，又缺经费。夏超采取人弃我取的态度，经过几年努力，警察事务渐具规模。1916年12月起夏又任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这时各县都设立警察所，重要乡镇设立分所，人数逾万，而且一切人事任免、经费核发，均归省警务处管辖，夏权势日大。

袁世凯于1915年进行帝制活动时，浙江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上劝进表为之捧场，12月21日，袁特封朱瑞为侯爵，屈映光为伯爵。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后，各地响应。夏超和第四十九旅旅长周凤岐等人联络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等，密谋驱逐朱瑞。夏超设法取得第六师叶颂清部驻省垣营长陈肇英的支持，又贿通了将军署卫队长陈炳垣，于1916年4月11日黎明时开始行动，夏超率敢死队为先锋，陈

炳垣做内应，一举冲入将军署，朱瑞闻警逃逸，浙江遂宣布独立。

浙江独立后，吕公望就任督军兼省长。吕属“保定派”，夏超、周凤岐为“武备派”，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夏超与周凤岐企图把持浙江，密谋推翻吕公望，取而代之。吕公望有所察觉，决定先发制人，乃向北京政府密保其亲信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呈请总统黎元洪明令发表，以夺取夏超的实力。夏超闻讯，一面约傅其永于12月26日办理移交，一面加紧策划逐傅之阴谋。在办理交接设宴迎傅之时，夏唆使几名暴徒持枪闯入，把傅其永从席间拖出，当众予以殴辱。夏超又指使全城警察罢岗，声称反对傅就厅长职。傅被殴回寓后，夏派人送去五万元支票一张，迫傅离职回金华老家。同时，夏串通督署参谋长周凤岐、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宁波镇守使顾乃斌等，联名向吕公望提出辞职对吕施加压力。夏另外又炮制了一篇攻击吕公望的文稿，胁迫各报刊登。吕公望无可奈何，只得电请北京政府辞职。

1917年1月，北京段祺瑞政府批准吕公望辞职，派皖系的松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一任命，大出夏超意外，夏乃急忙召开会议，推汤寿潜等四十余人致电副总统冯国璋，表示“浙人治浙”，吁请北京收回成命；同时，又以浙江全体军官名义电京，挽留吕公望。但这一切均已无济于事，1月11日，杨善德带兵入浙，不久齐耀珊亦到省接事，控制了浙江政局。到此夏超只好改变态度，转而千方百计奉承他们，让妻子拜杨妻为干妈，命部属亲信笼络杨、齐的随从人员，从而保住了全省警务处处长之职。同时，夏还派人去北京恳求段祺瑞恢复他省会警察厅长的职位，也终于如愿以偿。

1924年9月，直皖两系爆发了齐（江苏督军齐燮元）卢（浙江都督卢永祥）之战，直系闽督孙传芳出兵援助齐燮元，自闽北袭击浙江衢州，卢永祥不敌，以“浙江还诸浙人”为辞，仓促退沪。浙江省长张载阳亦宣布卸职离杭赴沪，临行时将省长印信交夏超保管。夏超当夜召集会议，进行人事调动，宣布代行省长职务。

夏超代行省务，并非正式任命，于是他积极活动，以“卢去张随，省事无人负责”[1]等语电吴佩孚。9月22日，夏超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浙江省省长。不久任闽浙巡阅使兼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之职的孙传芳到达杭州，夏超百般奉迎，取得了孙传芳的欢心，稳住省长宝座。

此后，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坐镇南京，浙江总司令由第二师师长卢香亭升任，夏超与卢香亭面和心不和。夏超力图扩张警察总队，积蓄实力。他担任省长后，全省警务处处长之职已交由同乡叶焕华担任，但他仍直接控制警察力量，将全省保安警察扩编为三个总队，达八千人，派亲信吴殿扬、章燮、章培分任总队长，由自己总揽指挥大权。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少，但出身正式军校的骨干很少，缺乏军事参谋人才，平日又乏训练，枪支陈旧，加上三个总队之间互相猜忌，战斗力很差。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9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亲临九江督战，并调第二师卢香亭部和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援赣”。其时，广东国民政府派马叙伦、许宝驹到浙江与夏超联系，促其宣布独立。10月初，夏超派人备银三万元，赴九江犒赠孙传芳部，以取信于孙，孙以特制景德镇磁器回赠。10月15日，夏超在杭州召集部属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即日宣布浙江自立，翌日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省民政长职。同时，夏超将卢香亭留在杭垣的卫队宪兵三百余人缴械遣散。孙传芳在前方闻悉大为恼怒，于18日委第八师师长兼南京卫戍司令孟昭月主持浙事，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出兵浙江。夏超急命保安第二总队队长章燮率部开赴嘉兴前线布防，并拆毁沪杭线莘庄至新桥间的铁路，后又增派第三、第一总队迎敌，并亲临嘉兴督战。但是，所部兵无斗志，大炮失灵，只抵挡了两个半天，就被宋梅村部击溃。21日夏超在指挥战斗中咯血晕倒，经人抢救逃回杭州。

夏超逃回杭州后交出省长印信，请张载阳暂时维持地方秩序，自

己准备去富阳、桐庐一带搜集残部，以谋东山再起。这时宋梅村部已进入杭州，并出任浙江总司令之职，悬赏五万元缉拿夏超。22日清晨，夏超偕亲信数人，由杭州江干雇舟而上，午后天气转劣，大风骤至，船无法上行，被迫折回江干，被宋军逮捕。孙传芳电令宋梅村立即将夏超首级送九江，宋派人将四十四岁的夏超击毙，割下首级，专送九江，经孙传芳验明无误后，抛入江中[(2)]。

夏超死后第二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发褒恤令，依上将阵亡例抚恤。

主要参考资料

杜伟：《回忆夏超的独立》，《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许炳塑：《夏超死的经过》，未刊稿，藏浙江省政协。

黄元秀：《浙江夏军长殉职经过》，未刊稿，藏浙江省政协。

刘劲持：《回忆夏超》，未刊稿，藏浙江省政协。

---

(1) 李净通：《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时期的浙江政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版，第6页。

(2) 李净通：《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时期的浙江政局》，《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5页。夏超之死，一时传说纷纭。另一种比较多的说法是："二十三日，孙军进入杭州，并派兵追击夏超，在余杭公路上发现了便衣队数十人，双方开枪互击，夏超中弹毙命。"（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82年版，第1563页）

夏斗寅

袁钟秀　胡淑敏

夏斗寅，字灵炳。湖北麻城人。生于1885年12月15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其母早逝，赖祖父母抚育成人。他体格魁梧，臂力过人，喜交游，但不喜欢读书。其时，鄂督张之洞在武昌编练新军，夏决计从军，于1900年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毕业后到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标担任司书。在新军中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秘密加入共进社，后任新军三十二标队官。

1911年武昌首义，夏斗寅率队参加攻打总督衙门。武汉光复，夏斗寅任总稽查部稽查。1912年因部队裁编退役，他以退伍金在湖北黄冈团风镇开煤炭行，经营未久即倒闭。同年，去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后经同乡张森介绍去山西大同，时湖北人孔庚任大同镇守使兼师长，张笃伦任镇守使所属营长，张以同乡关系，安排夏斗寅为该营排长，很快提升为卫队营机关枪连连长。不久孔庚去任，夏斗寅随张笃伦回湖北。张笃伦在鄂军第一师任参谋长，夏斗寅当上了该师第一旅第二梯团掌旗官。

1917年12月1日，鄂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荆州（今江陵县）宣布独立，任湖北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夏斗寅被任命为新兵训练总监。1918年1月中旬，湖北督军王占元令吴光新军前往镇压，因众寡悬殊，石星川军溃败。22日吴部攻入荆州，在溃军逃散中，夏斗寅拾得一箱钞票，于是他树起团旗，召集散兵，有枪者发给五元，无枪者发给一元，溃兵争相报名，很快收集了两千余人，夏斗寅带兵退往津市。时任湘西防务督办兼援鄂军总司令的李书城正在招兵买马，遂将原鄂军第一师编为两个梯团，张笃伦任第一梯团长，夏斗寅任第二梯团长，李书城被推为鄂军总司令，率部

开往岳州[1]，后移驻永兴，又将所部编为鄂军团，驻湘鄂边界。

1920年，直皖两系矛盾加剧，5月下旬，吴佩孚率直军从衡阳北撤，湘军乘机驱逐北军张敬尧，夏斗寅率鄂军团进驻湖南省会长沙。由于李书城的推荐，夏斗寅担任长沙城防司令。北洋军阀王占元久踞湖北，民不聊生。1921年春湖北军事名流蒋作宾、孔庚等齐集长沙，请求湘军援鄂，恢复湖北自治，在长沙组织湖北省自治政府、自治军，发动驱逐鄂督王占元的战争，推赵恒惕兼任援鄂军总司令。赵将夏斗寅部鄂军团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混成旅，任夏为旅长兼任驱王军别动队指挥官。7月下旬，湖南援鄂军前敌总指挥宋鹤庚率湘军一、二师沿粤汉线北进，夏斗寅率别动队曾一度打到距武汉三十里的纸坊。8月上旬，湘、直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状态，到8月下旬，当新任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布置就绪后率北洋陆海军南下，占领岳阳，截击援鄂军后路，援鄂军败回湖南，夏斗寅部亦退驻长沙。这场战争虽然赶走了鄂督王占元，却由直系军阀占领湖北，吴佩孚以第二十五师师长湖北人萧耀南督鄂。赵恒惕向吴佩孚输诚言和。此后，夏斗寅在湖南的处境颇为困难。

1924年，赵恒惕划浏阳等三县为夏斗寅防区，夏部军饷有了来源之后，便购买军火武器，大力扩充实力，收编浏阳东乡土匪，补充兵员，同时尽量延聘保定军校出身的湖北同乡为鄂军骨干，创办鄂军军官研究所，培植干部，成立卫队营，夏部兵力从三个营扩大到三个团。湖北督军萧耀南允许夏斗寅部编为湖北第二混成旅，以不进驻鄂境为条件，每月助饷五万元。当时江西督军方本仁系湖北人，亦每月给夏部拨款五万元，连同赵恒惕每月给款二万元，夏部每月共有十二万元饷银，足可维系三团人马之需。

1926年夏，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收编夏斗寅部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委夏为师长，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战斗序列，受唐生智指挥。7、8月间，夏斗寅部参加攻打长沙、岳州、汀泗桥等战役，8月下旬，由武昌金口渡江袭击汉阳，9月上旬，从汉阳奔向孝感占领

花园车站，直插吴佩孚残部之背后，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12月，鄂军第一师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仍任师长[(2)]，万耀煌任副师长兼参谋长。为防止川军入鄂，夏部奉命驻宜昌、沙市。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并派秘使至宜昌，拉拢夏斗寅与四川军阀杨森，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经秘密商谈，夏斗寅决心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决定乘武汉空虚之际，分别由长江、汉水两路袭击武汉。4月底，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秘商清党反共计划，夏斗寅出席了会议，会上，他的反共态度最为激烈，坚决主张发动军事政变。会议决定首先在湖南发动军事政变，夏斗寅在鄂西响应。

5月5日，杨森扬言进攻宜昌，从万县举兵东下。夏斗寅召开军官会议，响应杨森，派船二十艘，协助杨森运输军队。6日，夏斗寅部撤离宜昌至沙市，并向武汉政府谎报军情，称已在荆沙地区战退了杨森，由于杨部有七个师的兵力，自己的兵力不足抵御，因而后撤。为掩饰其反革命活动，独立第十四师国民党特别党部在宜昌举行成立大会，工会、农会主席讲话之后，夏斗寅的代表张森也在会上讲了话，并高呼“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就在当天——5月13日，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电文称：“共产党徒乘机窃发，盘踞要津，藉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民政治扰乱我两湖。”“斗寅忍无可忍，只有率我将士，为民请命，班师东下，扑杀诸獠，去此害马，重建新政。”[(3)]

5月15日，夏斗寅部四个团占领嘉鱼、蒲圻，16日派张森部开往岳州，万耀煌带两个团进至咸宁、汀泗桥一带。这时湖北省党部派夏斗寅旧交任建若至嘉鱼，企图说服夏斗寅。夏斗寅为向蒋介石表示反革命的决心，当即杀掉任建若，并于所经各地，如沙市、嘉鱼、大冶、英山等县，捣毁党部及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为讨伐夏斗

寅前敌总指挥，叶挺率第七十二、七十五团及中央独立师第一团进剿夏部。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包惠僧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到蒲圻，以允许夏斗寅部扩充为一个军为条件，劝夏斗寅从反革命的路口上回转[(4)]。夏为作缓兵之计，声称只反对唐生智，不与叶挺部打仗。19日在纸坊土地堂一带，夏斗寅部遭到叶挺独立师的迎头痛击，仓皇南逃，经通山、崇阳，在湘鄂边境又为唐生智部所阻。夏部从大冶偷渡长江，6月下旬退至安徽宿松、太湖。夏斗寅向南京报告战况，蒋介石派人到前线抚慰，颁发任命夏斗寅为新编第十军军长的委任状[(5)]，万耀煌为第十军第一师师长，张森为第二师师长，以朱怀冰为军参谋长，指定安庆为第十军防地。

8月，孙传芳部反攻龙潭，夏斗寅部第十军奉命应援，行至太平、采石，龙潭之役告捷，夏斗寅部奉命渡江，9月6日，克和县、全椒、滁县，复加入北伐军序列，受何应钦指挥，会同第一、九、四十各军攻克蚌埠，随即沿京浦路北进，攻克徐州。何应钦以第十军作战有功，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夏斗寅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夏斗寅任第二十七军军长[(6)]。后兼任徐州戒严司令。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夏斗寅部编入第三纵队，于5月1日进占济南，两天后，发生“济南惨案”，夏部撤出济南，经德州、沧州到达天津小站。北伐战争结束后，夏斗寅部奉命驻兖州。同年10月夏部第二十七军被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三师，10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夏斗寅为师长，辖两旅四团[(7)]。随后调往皖北，驻正阳关，蒋介石曾亲临阅兵并讲话，认为“此次各种检校结果，以第一师及十三师成绩最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夏斗寅部奉命开赴鄂东黄陂，讨伐桂军，桂军李明瑞在前线倒戈，胡宗铎等部退至沙市、荆门，夏部追至荆门，胡宗铎通电下野，其部队一部分被改编，大部分被缴械资遣。5月4日，蒋介石任命何成濬为湖北省主席，以夏斗寅兼湖北省警备司令。

1929年12月初，驻守郑州的唐生智和安徽的石友三举兵反蒋。蒋介石下令讨唐，升任夏斗寅为第十三军军长[8]，指挥第六、九、十一、十三等师，在河南确山与唐生智部激战，1930年1月，夏斗寅部击败唐生智部，唐通电下野。蒋介石委任夏斗寅为武汉警备司令。夏任职期间，将湖北高等法院看守所、湖北第一模范监狱在押的数十名“政治犯”，以“图谋暴动”的罪名全部处死。据不完全统计，夏斗寅在武汉残杀革命志士达一千余人。

1930年春，蒋、冯、阎战争爆发，张发奎趁机联合桂系军阀进攻湖南，6月初，长沙被张、桂联军占领，夏斗寅奉命率领第十三师三个团支援何键，于6月中旬夺回长沙。此后，夏斗寅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中原大战，这时晋军傅作义部从济南南下，猛攻曲阜，夏斗寅于7月初赶到曲阜前线，在陈诚第十一师的协助下，曲阜解围。蒋介石任命夏斗寅为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夏率部沿津浦路继续北上，8月，越过泰安和胶济铁路，与晋军争夺济南。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冯玉祥、阎锡山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夏斗寅部被调回湖北，驻麻城一带。

中原大战期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迅速发展壮大。1931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鄂豫皖成立。1月下旬，驻麻城北部磨角楼的夏斗寅部被红四军包围，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磨角楼被攻破，夏部死伤五百多人[9]，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此后，夏部对红军采取守势。

1931年12月，夏斗寅当选为国民党四届中央委员。翌年3月，国民党政府委任夏斗寅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4月4日夏电军政部请辞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武汉警备司令等军职。4月11日夏就湖北省主席职[10]。

夏斗寅初任湖北省主席时，曾接受幕僚的建议，网罗社会贤达，辅佐治理省政，于是组织了“省政设计委员会”。事后蒋介石质问夏斗

寅是根据什么法令成立的，夏无言以对。1933年7月，夏斗寅提出辞去湖北省主席的职务，蒋介石很快即批准。为缓和矛盾，1935年蒋介石委任夏斗寅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总参议。同年11月，夏斗寅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1937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成立“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夏斗寅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夏斗寅在成都南郊隐居，后任国民政府新兵训练处第一处处长。抗战后期，挂名为成都行辕上将总参议。抗战胜利后，由川返鄂，一度经营东湖农场及煤矿。1948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5月武汉解放，7月夏斗寅出走香港，在六国饭店以星相为业，1951年在港病逝。

---

(1) 郑恒武：《夏斗寅的一生》，《纵横》1986年第4期。

(2) 郑恒武：《夏斗寅的一生》，《纵横》1986年第4期。

(3) 《夏斗寅》，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

(4) 包惠僧著：《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夏斗寅》，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

(6) 傅润华著：《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版。

(7) 《夏斗寅》，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

(8) 郑恒武：《夏斗寅的一生》，《纵横》1986年第4期。

(9)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编写：《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大事月表》，1959、1960年油印。

夏丏尊

万江红

夏丏尊，原名铸，字勉旃，号闷庵，别号丏尊。1886年6月15日（清光绪十二年五月十四日）生于浙江上虞。父亲是个秀才，也希望他走科举道路，故他自幼即入私塾读经书。1901年考中秀才，翌年去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书，因学费昂贵，一学期后辍学。回家后读《华英进阶》、《华英字典》（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代数备旨》等书自学。1903年入绍兴府学堂（浙江第五中学前身）读书。该学堂不收学费，成绩优良者还每月可得几毛至一块钱“膏火费”。夏因成绩优异，颇受老师们的青睐。

1904年，夏丏尊再次辍学回家，替父亲坐馆，一边教书，一边坚持自学。次年，他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中学课程，第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没有得到官费，经费拮据，不得不于1907年辍学回国。

1908年春，夏丏尊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沈钧儒的邀请，任该学堂通译助教，为教育学科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做翻译。翌年，鲁迅（周树人）留日归来，任两级师范生物学科日本教员本多原二郎的翻译和生理学教员，夏与鲁迅是同乡，又都留学日本，两人交往渐多。夏自称是受鲁迅“启蒙的一个人”。1909年冬，监督沈钧儒辞职，夏震武继任，因顽固不化，被称为“夏木瓜”。夏震武要求教员穿礼服到礼堂参见，又要求教务长许寿裳陪同谒圣（孔子）。夏丏尊与鲁迅、许寿裳等相约罢课，以示抗议，夏震武被迫辞职。这场“木瓜之役”以夏丏尊、鲁迅等人的胜利而告终。

在两级师范学堂，夏丏尊除做翻译外，1913年还兼任了舍监。在

任舍监的七八年里，学校秩序井然，学生讲礼貌，守纪律。人们把夏的管理比作“妈妈的教育”。1913年，两级师范学堂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夏丏尊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担任国文教员。他征求学生对国文课的意见，从语文教学和新文学的观点着眼，选择结构谨严或富有文学意境的文章做国文课教材，尤喜欢桐城派的古文。他教国文注重“朗读”和“干念”，考查学生成绩爱用听写的方法。在教学中，他注重“读”、“听”，也注重“写”。

夏丏尊在两级师范和浙江一师时，先后与鲁迅、李叔同、许寿裳、刘大白等同事，尤与李叔同交往甚密。两人共事七年，晨夕一堂，情逾手足。李叔同几次想离校另谋他职，都因夏丏尊再三恳留而作罢。“五四”时期，浙江一师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十分活跃，夏丏尊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都支持新文化运动。他们改革国文教育，主张文白并重，强调教材的思想性。他们的进步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并攻击陈、夏、刘、李为“四大金刚”。夏等和全校的进步师生团结一致，使这个省立中等学校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南北辉映，成为江南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基地。1920年春，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复亮）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浙江教育界和思想界的新旧两派，围绕此文展开激烈的斗争，顽固派乘机对校长经亨颐和“四大金刚”展开全面进攻，给夏丏尊等人扣上了“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等罪名，要求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经不从，他们竟下令撤换校长，遭到进步师生的坚决反对。顽固派恼羞成怒，唆使军阀派兵包围学校，制造流血事件，是为“浙江一师风潮”。

夏丏尊此时除在浙江一师任教外，还有一些社会兼职活动。1919年夏与沈仲九、经亨颐、刘大白等编辑浙江教育会刊物《教育潮》。

“浙江一师风潮”后，夏丏尊被迫离校，应湖南第一师范邀请去长沙执教，与周谷城等同事。夏丏尊继续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他教国文课提倡发挥学生自由思想，反对专替古人作注疏，并把后一种教学方

法讥为“留声机”。

1922年，上虞县的绅士陈春澜捐资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任校董兼校长，夏丏尊应邀返乡至春晖中学任教，和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一起，努力把春晖中学办成学生的乐园。1924年底，夏丏尊、朱光潜等主张男女合校，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乃集体辞职。1925年春，夏丏尊到上海与友人共办立达学园并任教。他教国文，兼授文艺思潮。不久，立达学会成立，夏兼编会刊《一般》。1927年夏应邀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加剧，夏丏尊掩护过不少革命青年。夏的学生叶天底是中共上虞县委书记，不幸被捕于杭州监狱。夏闻讯后想方设法营救，但终未成功。看到学生横遭虐杀，夏十分痛苦，写下了这样一副联语：“宁可早死，莫作先生！”他毅然离开了学校，和章锡琛在上海共创开明书店，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用他手中的笔，写、译、编、著，踏进了更大的课堂。为编辑出版有意义的书籍，他“把读者群规定为求知欲最旺的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翌年，夏翻译了意大利著名诗人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夏翻译这本书，是“希望国内整千万无福升学的少年们能从这书获得一种慰藉，发出一种勇敢的自信来”。《续爱的教育》出版后风行一时。

1930年1月，夏丏尊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创刊。为了把《中学生》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夏颇费心思，每期都是自己拟定题目，约人写文章。不到一年，杂志行销数就超过三万份。1931年3月，叶圣陶担任《中学生》杂志主编，夏任《中学生》杂志社社长，他们亲密合作，把《中学生》办得更好。

此时，各地有不少学生失学，夏丏尊和叶圣陶、章锡琛等人决定开办函授学校，帮助失学青年自学普通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些谋生必需的技能。1933年“上海市私立开明函授学校”正式开办，夏丏尊任校

长并兼国文课教师。函授学校每月出一册讲义，各学科教材混合在这册讲义中，寄交学员自学。计划共出十八册，每三册是一个学期的功课量，十八册讲完中学六年的课程。当时中学是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函授学校则用三年的时间来修习六年的课程。可惜两年后，因延聘工作人员支出过多，讲师批改作业负担过重而停办。

开明函授学校停办之后，夏丏尊集中精力编撰国文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早在浙江两级师范时夏就自选教材，在长沙一师和春晖中学时就编写讲义，至立达学园后其讲义经刘薰宇补充修改，于1925年以《文章作法》为名出版。1934年夏与叶圣陶合著的读写故事《文心》以及与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全三册）出版。次年，夏与叶圣陶合编的《初中国文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六册，每册十八课，因抗战爆发，后两册未能出版）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1937年6月，夏丏尊与叶圣陶合编的《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课本）》（六册）出版。1938年，夏丏尊与叶圣陶合著的《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出版。这些书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其中《国文百八课》被誉为30年代“颇具特色”的国文教科书。《文心》几乎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当时日本《新中国事典》称誉这本书是“在国语教育史上划了一个时代”。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聚集作家七八十人，夏丏尊年岁最大，被推为主席；他与茅盾等九人当选为理事。会议提出作家要形成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运动共同努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夏丏尊为编委之一。9月，开明书店内迁，夏因年迈多病，留守上海。1938年，夏丏尊编辑出版《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书。因开明书店经济周转困难，不能按月支薪，为生活所迫，夏在南屏女中兼任国文教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侵入上海租界。夏丏尊见环境日趋恶劣，辞去南屏女中教职，深居简出，闭户读书，并

皈依了佛教，成为终身居士。他应某大寺院的邀请，将《南传大藏经》中《本生经》从日文翻译成中文。这时夏丏尊对他的好友李叔同更加钦敬，认为李叔同献身侍佛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救世的大勇行为。然而信佛和闭门读书也不能躲过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纠缠，日方认为夏丏尊曾是留学东京的学生，要他出来为“东亚共荣”效力，夏丏尊坚决拒绝。为此，夏于1943年12月15日被日本宪兵关进监狱。审讯时，日军出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张抗日的宣言，据以问罪。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人的奔走营救，得以于25日获释。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夏丏尊与战前复旦大学同事傅东华和文教界志友筹组中国语文教育会，准备继续为文化运动努力。8月11日，他与李健吾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此后夏丏尊肺病加剧，但仍坚持工作，写《双声词语的构成方式》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四十一期后，即卧床不起。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和平日报》1946年6月5日。

贺玉波：《夏丏尊访问记》，《读书月刊》第2卷第3期，1931年。

郑振铎：《悼夏丏尊先生》，《郑振铎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平屋之辑：《夏丏尊文集》第1—3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984年版。

夏瑞芳

熊尚厚

夏瑞芳，字粹芳，商务印书馆创办人。江苏青浦县人。生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他父亲是上海董家渡的小摊贩，母亲在美籍牧师家做保姆。1882年夏随母到上海，入长老会清心堂南市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清心书院[(1)]。1889年去同仁医院当护士，一年后改入英商《文汇报》馆学排字，1894年转至英商《字林报》馆做排字工，其后，在英商《捷报》馆做工头。

1897年2月，夏瑞芳和排字工人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集资三千七百五十元，置印刷机数架，手摇四开机两部，圆盘脚踏机三部，在上海江西路创设一个小型印刷工厂，取名商务印书馆，由夏主持，鲍氏兄弟做帮手，初以承印外商商业文件为主，并替英美圣经会及广学会等印刷教会书籍。1898年6月，清廷下诏变法。夏鉴于学习外文风气日盛，乃增资一千元添购机器，租赁房屋，印行《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销路甚好。1900年商务接盘日商修文印刷局，次年，夏等吸收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上海闸北纱厂老板印有模等参与经营，创刊《外交报》杂志（为商务出版的第一种期刊），并将商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扩大资本至五万元，夏任总经理。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通令全国遍设学校。夏见兴办新学急需教科书，遂定商务中心业务为出版学校用书。次年更建立印刷所，添设编译所和发行所，并聘请主持爱国学社的蔡元培任编译所长。不数月，蔡因“苏报案”离职，又改聘张元济任编译所长，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发行。数月间风行全国，行销达十余万册。以后，又续出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及英语辅助读物等。由于教科书利润优厚，销数有增无减，商务营业骎骎日上。

1903年，日本商人金港堂计划在上海经营出版印刷业务，商务吸收日资，改组为中日合办，资本二十万元，中日各半。当时规定公司依中国法律注册，由中国人任董事和经理，日方仅任监察一人。次年向清政府商部注册，仍名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任总经理。同时，商务接盘北京直隶官书局，改名京华印书局。商务在闸北宝山路自建的印刷所和编译所新屋于1907年落成。规模更加扩大。其后，夏瑞芳一面聘请日人技师培训技工；一面派员去日本学习技术，并亲去日本进行考察。从1904年至1914年，除出版教科书和各种读物外，还先后创办发行《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法政杂志》及《少年杂志》等刊物。此时商务资本已陆续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七百五十人，全国各主要城市设分馆三十余处。此外，夏还附带兴办教育，先后创设了小学师范讲习所、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和养真幼稚园等。商务遂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近代化印刷出版企业，夏瑞芳成了著名的出版印刷业资本家。

正当商务营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上海大资本家席子佩和福州大商人曾少卿见印刷业有利可图，于1906年创设中国图书公司与商务竞争。夏瑞芳暗中收买中图股票折价抛售，使中国图书公司的股东不敢续交股本。后来该公司即被商务收买，改名中国和记图书公司。

1910年，上海发生外国流氓骗子制造的“橡皮股票风潮”[(2)]，夏瑞芳用商务的资金进行橡皮股票投机，结果失败，亏蚀很大。翌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各地分馆不能汇款接济，致使商务资金短绌，无法应付。夏一面解雇部分编辑人员和工人以转嫁损失；一面变卖宝兴里房产并向钱庄借垫以偿付欠款。馆内陆费逵等乘机暗中联络，于1912年1月退出商务，另创中华书局与商务竞争。陆费逵等还在报上揭发商务与日商合办的关系。夏为了对付中华的竞争，不得不向董事会提出退还日股，并亲去日本交涉。结果，给日方以优厚条件于1913年退还了日股，重向北洋政府工商部注册。

夏瑞芳除经营印刷出版业外，还曾投资制药业，1907年与中法大

药房经理黄楚九等共同投资一万元创办五洲大药房，任董事。翌年又与刘伯森等组织贸易集团，出资收买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股票，嗣因粤商刘问刍中途改变主意而未果。

1913年7月，国民党人陈其美在上海发动反袁，欲占闸北福州会馆作司令部。夏瑞芳与吴子敬等害怕在闸北发生战事，遂暗中勾通英美租界工部局，派兵驻扎闸北入口处阻止陈军，陈部被迫改驻吴淞。1914年1月10日，陈其美派人将夏瑞芳暗杀[(3)]。

主要参考资料

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附刊，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8页。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蒋维乔：《民元前后见闻录》，《人文》杂志复刊第1卷第1期第6、8页，1947年。

---

(1) 清心书院相当于中学。

(2) 1903年，英国流氓麦边在上海组织蓝格志拓殖公司，用招摇撞骗手法哄抬橡皮股票价格。随后，英国冒险家嘉道理、白克尔父子也分别创设橡树种植公司参与哄抬橡皮股票。1910年上海许多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群起争做橡皮股票投机生意。三四月间，当橡皮股票价格暴涨达于顶峰时，外国流氓分子们使用“金蝉脱壳计”大量抛出股票，套走了几千万两银子，制造了上海著名的“橡皮股票风潮”。

(3) 夏瑞芳之死，一说为日人所杀。

夏威

赵世怀

夏威，原名钧差，号煦苍。广西容县人。1893年3月2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出生。其父夏继虞是个地方绅士。夏威1910年春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与黄绍竑、白崇禧为同级同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桂林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先后到达武汉、南京。1912年春，转入南京入伍生队学习。是年秋，南京入伍生队奉命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校址移至武昌南湖，夏威在此学习两年，再经半年入伍期，于1915年6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年冬毕业后，分到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见习官。

1917年夏，陆荣廷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来的马晓军为营长，夏威与黄绍竑、白崇禧入该营任连附。是年秋，模范营随湘粤桂联军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改为联军总司令部卫队第一营。1918年4月北军入湘，联军退出长沙、衡阳，卫队第一营退到零陵东湘桥驻防训练，时夏威已升任该营机关枪队队长。

1921年6月，孙中山为消除北伐后患，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挥军入桂，讨伐陆荣廷和谭浩明。因第一营多是新军人物，陆、谭防其与粤军勾结，调其开往远离前线的百色。粤军攻占南宁后，陆、谭败走，孙中山委马君武为广西省长，第一营即拥护孙中山，脱离旧桂系。马君武任命原营长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所部扩编为三个营，黄绍竑、白崇禧分任第一、二营营长，夏威任第三营营长。

此后，夏威在黄绍竑麾下，先后任第一营营长（1922年春）、第三团团长（1923年6月）、第三纵队司令（1924年），参加讨伐旧桂系陆荣廷部与沈鸿英部诸役，为统一广西效力。1926年3月，广州国

民政府将广西督办公署的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下辖九个旅，夏威任第六旅旅长，后继白崇禧任第一旅旅长。

1926年初夏北伐战争开始，第七军抽四个旅约二万余人，由李宗仁率领入湘，分两路作战，夏威与胡宗铎分任第一和第二路指挥官。后第七军出征部队改编为三个师，夏威任第七军第一师师长。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夏威指挥第一路军强渡汨罗江，进占浯口，循岑川、长安桥，进至北港。然后又越崇阳、咸宁，直趋贺胜桥。8月30日，第七军及第四军与北军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刘玉春、陈嘉谟等师激战于贺胜桥一带，夏威部在余花坪击溃自金牛来敌，并尾追至鄂城，将敌宋大霈残部缴械，俘虏其参谋长聂洸，占领鄂城。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节节胜利时，蒋介石进攻南昌却受挫，9月10日蒋调第七军赴赣增援。在武宁县箬溪，夏威与胡宗铎部同孙传芳之精锐谢鸿勋师大战，将谢师包围歼灭。随后，夏威又率军向德安进军，与孙传芳部段承泽、陈光祖、李俊义等师三四万人激战，10月3日占领德安。此时，江北的陈调元、王普部又突然南渡，袭取箬溪附近的王家铺，威胁第七军之背。12日，夏威与胡宗铎部在李宗仁指挥下，快速前进，猛烈回击王家铺，次日，将敌三万人全部击溃，获得了三战三捷的战果。11月，北伐军占领了九江、南昌，第七军奉命陈师鄂东。

1927年2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挺进，夏威随第七军担任中路江左军，沿长江北岸进攻安徽，3月初进驻安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夏威所部又奉调进驻南京，负责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积极配合蒋介石“清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宁汉分裂。东线各军分三路继续北进，夏威任第三路第二纵队指挥官。5月13日，大破直鲁联军于柘皋，16日在合肥东北梁园又击溃马济的白俄骑兵千余人。6月2日攻下徐州，夏

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胡宗铎也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

这时，武汉方面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第七军奉命撤往芜湖以西布防。直鲁军乘机全力反扑，7月24日攻占徐州，8月中旬占领浦口，以重炮轰击南京狮子山炮台。19日，南京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三路大军南撤，防守长江，第七军负责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长江中段的防务。25日，孙传芳军偷渡长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和栖霞山阵地。夏威率领第七军向孙军逆袭，夺回所失炮台和阵地。

在栖霞山战斗激烈进行时，直鲁军又攻陷了沪宁路上的龙潭车站一带，孙传芳亲自坐镇督战，背水为阵，志在必胜。8月30日，夏威率领第七军与第十九军、第一军会攻龙潭，与敌恶战昼夜不停，孙军仅一部由柴洲等地渡江北窜，三万余官兵均被包围缴械，万余人则死亡及溺毙，孙传芳逃回江北。此役大捷，夏威升任第七军军长。10月，被任命为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南京政府与孙传芳部激烈交兵时，武汉方面唐生智指挥东征军分江左、江右两路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准备进攻南京。10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分兵三路讨唐，夏威第七军奉命担任第三路，沿长江北岸西进。10月25日克安庆，11月8日破蕲春，15日占领武汉。唐生智兵败下野，其残部退往湖南。1928年1月，夏威部在白崇禧指挥下，尾追入湘，27日攻克长沙。唐部接受改编，两湖遂为桂系所占有。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节武汉，夏威第七军、陶钧第十八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为其基干队伍。

1929年3月蒋桂战争时，蒋介石收买笼络夏威所部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第二师副师长杨腾辉。夏威沉湎于酒色，4月3日李、杨在前线倒戈，他和胡宗铎、陶钧惊慌失措，将部队撤往鄂西，使蒋介石“兵不血刃”而定武汉。7日，蒋介石以张发奎、朱绍良分任第一、第二追击司令，向荆沙追击。21日，夏、胡、陶联合通电下野，夏乘英轮潜往香港。鄂西桂军尽为张、朱二人缴械收编。

1931年，李宗仁、白崇禧重整桂局。夏威于次年从港归来，初任南宁军校校长，后任第十五军副军长（白崇禧兼军长），驻梧州。1933年，夏威升任第十五军军长。

1934年冬，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夏威率第十五军进行堵截，又率所部第四十三师尾追红军。1936年，第十五军奉命回驻梧州，后移驻南宁，担任南宁、梧州、百色、天保、龙州五区的防务。1936年广西部队再度改为南京政府的统一番号时，夏任陆军第四十八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率军北上抗日，夏威留守广西，并代理广西绥靖主任。1939年，第十六集团军成立，夏威任集团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贵县，以韦云淞第三十一军驻防玉林五属，以何宣第四十六军驻防北海至南宁一带，其中以黄固新十九师驻钦县防城，向钦州湾海面警戒，以保卫广西的南大门。11月15日，日军从龙门港登陆，连陷防城、钦县。新十九师被打得措手不及，向后溃退，其他各部也不战而退。11月23日，日军攻陷南宁，随后又占领了昆仑关和高峰坳。第十六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一军退至武鸣，第四十六军退至邕钦公路西侧。昆仑关会战时，白崇禧以桂林行营主任担任全局指挥，他调用非桂系部队作战，而第十六集团军只在武鸣和邕钦路西侧担任助攻任务。

1944年9月，日军沿湘桂路第二次进犯广西，蒋介石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确保桂柳，并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来广西指导会战，要求坚守桂林三个月。当时，张发奎决定以第十六集团军的两个军全力防守桂林。但夏威和白崇禧为保存桂系实力，将主力调到外围，避开敌锋，只留下两个师与敌人正面作战，牺牲惨重，11月10日桂林失陷。日军继续进攻柳州时，夏威不战而退，率部向黔桂铁路以西逃跑。1945年3月部队改编，第十六集团军及第三十一军被撤销，第四战区改为第二方面军，夏威调任第二方面军副司令。5月，夏威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蒋介石在全国设立绥靖区，调夏威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统率新桂系在安徽的部队，并有权指挥皖东、皖北和皖中各专员、县长。1948年8月，夏威继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他积极推行白崇禧的所谓党政军民一元化的“总体战”[(1)]。9月，夏威兼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皖北广大地区，并渡过淮河向长江北岸挺进。夏威将省府从合肥迁到安庆。他把两个保安旅合编为一个正规军即一二六军，以保安副司令张湘泽为军长，又将一二六军与原桂系的四十六军，合编为第十兵团，自兼兵团司令，与人民解放军相对抗。3月淮河两岸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逼安庆，夏威辞去安徽省主席职，到武汉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与白崇禧一道指挥桂系部队，在鄂、赣、湘、桂战场上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9月退至湖南的衡阳、宝庆一带。白崇禧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部分将领主张反攻长沙，夏威力主退回广西固守。此时，人民解放军向衡宝猛攻，歼灭桂系主力三万余人，桂系残部10月16日退回桂林。夏威不满地说：“如果当时按照我的计划，就不致有衡宝之战，也不致遭到巨大的损失。”[(2)] 11月20日，夏威与白崇禧逃往柳州，24日，又逃往南宁。12月2日下午，当人民解放军逼近南宁时，夏威与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在暮色苍茫中飞往海南岛。以后，夏威转往香港定居。

1975年1月3日，夏威在香港因车祸身亡。

---

(1) 韦晓萍：《夏煦苍与新安徽》，《广西日报》1948年12月1日。

(2) 张文鸿：《白崇禧败回广西后的慌乱情形和华中部队被歼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63年版。

夏曾佑

袁英光

夏曾佑，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生于1863年11月（清同治二年十月）[1]。父亲夏鸾翔（字紫笙），是晚清著名的算学家，曾任詹事府主簿等官职，著有《致曲图解》、《少广缒凿》等书。在夏曾佑出生后不久，病死于广东，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夏曾佑少年时生活不富裕，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习文化知识，十四岁进学，二十六岁考中举人。

夏曾佑二十八岁至北京考中进士，任清廷礼部主事，仍利用时间读书。他聪明兼勤奋，得以博览群书。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日烈，民族危机加深，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了改良主义思潮，作为理论依据的今文经学也日渐流行，夏曾佑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成为今文经学的信奉者。1892年左右，他在北京和维新运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相识，而且住所相邻近，他们之间乃时常讨论公羊学。由于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气味相投，交往十分密切，成为“讲学最契之友”[2]。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统治之所以腐败，政治思想方面应该归罪于荀况，因而在戊戌变法前夜曾企图发动“排荀”运动，并谓：“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3] 夏曾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冥冥兰陵门（指荀学），万鬼头如蚁；质多（即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4]

1895年，夏曾佑居住于上海，在梁启超、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中经常发表论文。次年他改官知县，在京候选未着，生活困窘。乃于是年年底赴天津，应同乡孙宝琦之聘任育才馆教师，历时三年。

此一时期，他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以宣传新学和鼓吹维新变法，和上海的《时务报》分执南北舆论的牛耳。由于办报关系，他与严复接触频繁。关于这时情况，他在给表兄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津之后，幸遇又陵（即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如遇。"[5] 通过严复的媒介，夏得以系统地了解天演论进化学说。于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使之由传统的今文经学历史变易思想发展为进化论的拥护者，并成为政治上的维新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夏曾佑虽然没有被株连，但《国闻报》被迫停办，育才馆也将他解聘。次年年底，他出任安徽祁门知县，目睹地方吏治之腐败、民气之闭塞，而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思想上日趋消极。根据他所信仰的"优胜劣败"的原则看来，中国民族"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而，他又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甘心于亡国灭种，因此又认为："物极必反，将有大变，若不变者，则地球将退化，岂仅黄种之忧哉！"[6]

1900年5月，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夏曾佑在祁门闻讯后，十分震惊，但是，他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上，而错误地寄托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认为英、美帝国主义者会帮助被幽禁的光绪帝亲政，再行新法。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走，并暗中与帝国主义谈判投降。夏曾佑这时鉴于自己幻想的再度落空，颇为悲观失望，慨叹："此次北方事起，全体震动。竟将全国中隐微深锢之情形和盘托出，仔细思之，必至无救。"[7] 他估计这次八国联军入侵的结果，"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矣"[8]。因而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几乎完全消失，说什么不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采取"二面绝不与闻为长策"，即"无论何事，必做二者之间，即可自存"[9]。

夏曾佑在祁门做了三年知县，据说是"政简刑清，祁民颂曰：'数

十年无此好官。’及行也，攀留者如潮涌”[10]。1902年4月，夏卸祁门任后，寓居上海。不久，以直隶州知州用，旋因母丧归。丁忧期间，居家无事，遂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这样做，主要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前途渺茫，力图从历史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这时已认识到历史与现状有密切关系，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为什么能推呢？因为“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11]不可。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迹象，只有从历史中才能找到它的根源。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指出：“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阒寂于己亥，重演于庚子。然皆变法而不见变法之效，非变法之无效也。”其原因是由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所以遭受了失败。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不然“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而政治的本身“亦无有不归澌灭”。“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他提出“致治之密合于历史”，其程序要做到“几如在躬之衣服，其长短必符其身；攻疾之药石，其寒热必视于病”[12]。

20世纪初，夏曾佑和康、梁一样，还幻想帝国主义国家会帮助中国自强，1904年他写了《论中日分合之关系》[13]一文，反对联俄，主张联日，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使中国强盛起来。对国内政治，他仍主张通过变法保存封建君主制，而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还不够开化，说：“无教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14]照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不但不应当向革命转化，连改良都应该推迟到将来去进行，其理由是中国“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15]。1905年8月，夏曾佑居丧期满，亟待复职，适值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夏曾佑经友人介绍，作为五大臣随员之一，赴日本考察，于1906年4月出国，历时两月回国。之后，又作为两江总督特派代表的随员，北上会议官制。当时《东方杂志》为立宪问题出了临时增

刊，他为该刊写了《刊印宪政初纲缘起》[16]，为清廷的假立宪制造舆论。1908年初署理安徽广德知州。但这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夏曾佑眼见立宪不成，前途渺茫，思想上越发消极颓废，遂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终日不倦。

值得重视的是夏曾佑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史学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供当时中学堂用的一本教材，原书分三册，1904年至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排印出版，以后又重印过几次。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加以句读，并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本书虽然只写到隋朝，只能算半部古代史，但它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编撰方法，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体裁之外，应用章节体编写历史，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可说是第一人；也是试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指导总结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夏曾佑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又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在上古时期内他分为两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之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形成，称之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他分为三个时期：一为由秦至三国，此时中国人才极盛，国势极强，称之为极盛期；二为由晋至隋，由于周边各族攻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而宗教（即文化——引者）亦大受外教之影响，称之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称之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期；二为清代二百六十年，为更化期。夏曾佑这样划分历史时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演变和因果关系而划分的，虽然还看不出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因果关系，但他打破了几千年封建史学不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旧传统，在史学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后，夏曾佑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自好友严复、沈曾植等相继逝世后，他落落寡欢，杜门谢客以诗酒自遣。1924年4月17日病逝于北京[17]。

---

(1) 关于夏曾佑的生卒年月，各书颇多歧误。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谓生于清咸丰，未注年月。夏元瑮《夏曾佑传略》谓生于咸丰癸亥十月，年六十二。按咸丰无癸亥，或为同治癸亥（1863年）之误。1863年至1924年适为六十二年。当以《传略》为是。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8—24页。

(4)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第18—24页。

(5) 《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下简称《手札》）夏曾佑部分第十三，原件藏上海图书馆，后收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 《手札》第四十七。

(7) 《手札》第六十。

(8) 《手札》第五十九。

(9) 《手札》第六十二。

(10) 夏元瑮：《夏曾佑传略》，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

(11) 夏曾佑：《叙》，《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页。

(12) 《东方杂志》第2卷第8号。

(13) 《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14) 《手札》第六十。

(15)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16) 夏元瑮：《夏曾佑传略》，第10—23页。

(17)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第18—24页。

夏之时

周茂江

夏之时，字亮工，本名有贵，入塾启蒙时改名为之时。四川合江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夏氏祖籍湖北麻城，清季始入川。其父夏德富是自耕农，生有四子，夏之时排行老二，自幼聪颖，且勤奋好学，颇得长辈厚爱。

1902年，在经商的长兄夏冕昭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夏之时离家到自贡树人中学读书。在具有民主思想的范达尊、范斗东、皮香泉等教师的培育下，其思想进步很快。后受邹容《革命军》之革命思想的影响而萌生“鼎革壮志”。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于1904年底东渡日本求学，入东斌学校步兵科学习军事。翌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夏之时经友人介绍，与熊克武等在日本入会，开始投身革命事业。

1908年初，夏之时奉孙中山之命还蜀，任务是“混进四川新军部队，联络革命同志，鼓动其他官兵，伺机起义”[(1)]。因在成都谒见四川总督赵尔丰时，夏之时言词过于激烈，惹赵尔丰不快，被令入川边及西藏等地从事军事勘查和测绘工作。后经多方努力，于1910年被委任为新军十七镇步兵排长，隶属卫戍司令部，驻成都。夏之时与党人陈宽创办《西顺报》，进行舆论宣传和鼓动。他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向思想进步人士解释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联络友人，秘密发展同盟会员，组织革命力量”[(2)]。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6月，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各行业、各街道、各学校和省内各州县厅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清政府闻讯后，以四川人民反对“铁道干线收归国有”，并罢课、罢市、停止纳税粮为由，于9月2日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十一标及三

十二标部分官兵两千人入川查办。同时命四川总督赵尔丰严厉镇压，解散保路同志会。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和川汉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等九人。消息传出后，成都上万余市民赴总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总督署营务处总办田征葵下令射击请愿民众，当场打死三十二人，受伤者甚众，制造了“成都血案”。各地闻讯后，纷纷揭竿而起，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

为镇压进攻成都的保路同志会，防止接受民主思想的新军哗变，四川当局调夏之时所在的卫戍部队进驻龙泉驿。夏之时认为起义时机渐趋成熟，因此，他一边积极宣传反清舆论，传播革命思想；一边筹划起义事宜。闻知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并成立了中华革命政府后，夏之时决意举事。11月5日夜，夏之时与贾雄、隋士杰等在龙泉驿土地庙前歃血为盟，誓师起义，策动了驻龙泉驿的新军步兵三排，工兵、骑兵、辎重兵各一排共二百三十余人举事，处决了清军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震惊全川。

龙泉驿起义的消息传到成都后，总督赵尔丰即令朱庆澜派管带龙光率大队官兵追击。为保留和壮大革命队伍，夏之时率部东下，一路上攻占了乐至、安岳、潼南等地，兵锋直指重庆。是时，重庆的革命党人杨沧白、张培爵正在筹划起义，但因武力不足而不敢贸然起事。夏军进逼重庆，重庆革命党人精神为之振奋，即派朱之洪与兵临城下的夏之时取得联系，约定里应外合攻占重庆事宜。11月22日，夏之时率军举着“中华民国”、“复汉灭满”、“保教安民”的旗帜从浮图关攻入重庆，重庆革命党人及绅商学各界人士数千夹道欢迎。在当日举行的朝天观盛大集会上，起义军通电全国，宣告重庆独立和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张培爵为都督，负责行政规划和政治管理；夏之时为副都督，负责军事指挥和整训部队。

蜀军政府的成立，将全川革命独立的浪潮推向了高峰，各州县纷纷起事，继而宣告独立，重庆宣告独立后的第三天，端方、端锦兄弟

二人被鄂军革命党人杀死于资州（今资阳）。赵尔丰面对重庆蜀军政府业已成立，川南、川北也争相独立的局面，以及清政府的特派大员端方在资州被杀的现实，意识到革命风暴已势不可当，自己已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遂将政权交给谘议局局长蒲殿俊与心腹朱庆澜，于11月27日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由于赵尔丰与蒲殿俊议定的独立条件利于清朝官吏，而不利于革命，川东南革命政府和人民群众要求重庆蜀军政府西征讨伐。蜀军政府认为赵尔丰仍居总督位，且手握重兵，一旦发生变乱，势必危及革命，遂议决推翻成都的立宪派政府，将四川政权统一在革命党人主持的重庆蜀军政府之下，令夏之时率师西上。夏之时受命后，于12月初率师出征，讨伐赵尔丰。此间，时任蜀军总司令的林绍泉因不满职位安排而阴谋叛变，夏之时协助吴玉章和张培爵粉碎了以林绍泉为首的内患，巩固了重庆蜀军政府。夏之时在随后进军成都的途中，“忽得成都尹昌衡来电，谓已推翻蒲、朱政权，戡平兵乱，经众公选了他和罗纶为正副都督，并已将赵尔丰明正典刑”[(3)]，遂停止西征，班师回渝。

不久，传闻清政府拟派重兵进攻潼关，滇、黔通电推举夏之时为北伐军总司令官，准备北伐。后因南京陆军部长黄兴电令西北统一，北伐遂被取消。

北伐搁浅后，由于有人倡议成、渝两军政府合并，重庆蜀军政府遂开会商讨。都督张培爵力主合并，称“四川军政，必须统一”[(4)]。在张培爵的坚决主张下，1912年3月11日（亦有4月27日之说），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杨沧白任民政长，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

但夏之时任职月余，即于5月7日发表辞职通告书，称“清政府已推翻，革命已大体完成，统一全国的南北合议，也已达成协议，大局已定，自己尚是青年（仅二十四岁），愿弃职留学深造”[(5)]。四川军政府再三挽留，但夏之时去意已决，最终准予辞职，并赠留学费银三

万元，以酬其革命功勋。

1912年夏，夏之时回到合江，旋即乘船东下。抵达上海后与同盟会人秘密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8月加入孙中山、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1913年2月7日，参与上海革命党人讨袁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在上海相识的董竹君结婚，不久逃亡日本。翌年，夏之时在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活动。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夏之时自日本返川。次年7月，护法战争爆发，夏之时积极加入护法战争行列，在合江建旗靖国，组织护法军[(6)]。12月，护法军元帅唐继尧委其为四川靖国招讨军司令兼川南宣抚使，驻防合江、璧山、永川等县。1919年，熊克武任四川总督，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改编，令夏之时率部至成都，交出军权后改任文职，被授为西昌道道尹。但夏之时“痛感时局动荡，名为护法，实为军阀相争，再也无心仕途，辞职不就”[(7)]。1920年，吕超任川军总司令，因仰慕夏之时，特邀之为护法军川西总司令，但夏亦不为所动，决然退出军界与政界，隐居于成都。

退出政坛后，夏之时着意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在余际唐、向传义等人的帮助下，在包家巷创办“锦江公学”（原址即现在的成都十四中学），并亲任董事长，一心培育青年，为国家储备人才。1928年因病赴沪就医，辞去校长职务，由向传义继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夏之时与朱之洪、向楚、唐宗尧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声援华北，抵御日寇，并请川军出师杀敌，表现出抗战救国的满腔热情。同年，夏之时与董竹君因情趣渐趋不合而离婚，不久与隆昌唐则吾女士结婚。后因敌机侵袭成都十余次，遂于1938年携家眷回故乡合江定居。

回合江定居后，夏之时修身俭行，不问政事，只领有合江县银行名誉董事长这一闲职，而以玩摩书画文物为乐，并潜心学佛，曾任合

江县佛教分会常务委员、法王寺佛学院院董。

1949年合江解放后，夏之时被委任为合江县招抚委员会委员。1950年，土匪暴乱，夏之时写信给匪首夏西夔（夏之时之弟），劝其反正，夏西夔见信后率部投诚。

由于解放初期地方新老两派的复杂关系，夏之时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1950年10月6日被误处极刑。这一历史错案于1987年11月得到纠正。

主要参考资料

周开庆撰：《夏之时传》，《四川文献》第160期，1976年9月。

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何一立：《夏之时》，四川省合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9年版。

---

(1) 杨诞孚：《记龙泉起义时的夏之时》，四川省内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91年版，第12页。

(2) 王斌：《夏之时》，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革命时期人物》，1986年版，第39—40页。

(3) 张映书：《龙泉举义的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四川风暴》，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6页。

(4) 张映书：《龙泉举义的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四川风暴》，第166页。

(5) 张映书：《龙泉举义的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四川风暴》，第166页。

(6)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辑：《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7) 何一立：《夏之时》，四川省合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9年版，第11页。

冼冠生

汪仁泽

冼冠生，名炳成，字冠生，以字行。1887年11月13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佛山一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冼济盛早亡，由母亲何氏抚养。因家贫，少年时只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即告辍学。十五岁时随乡亲舒竹生至上海，在其所设的竹生居当学徒。三年期满后，冼冠生在上海自设陶陶居广式小吃店，但因资金短绌，数度停歇。他曾筹措资金，改名冠香重行复业，但终因本金蚀光，借贷无门而无力继续。

冼冠生经营饮食店失败后，不得不改弦易辙。此时各游乐场门口，有设摊兜卖蜜饯干果的生意甚好。冼于1912年起，在他所住的亭子间内，自制广东风味的话梅、陈皮梅、牛肉干等，在上海南市新舞台戏院门前设摊并进场托盘销售。由于制作精美，风味特殊，颇受食客欢迎。这时香港有一家糖果店歇业，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即利用这家店的牌号商标印制包装纸。他的蜜饯食品，在摊贩中唯一有自己牌号，包装又美观卫生，形成特色，在附近地区小有名气，从而引起了新舞台检票员薛寿龄的注意。1918年薛商得冼的同意，筹集资金，薛和亲友五人各出资五百元，冼冠生以制作设备等作价五百元，共六股三千元，合伙在南市九亩地觅得店面，定名冠生园食品店，开始营业。而作坊设在小店的后间内，除冼的母亲、妻子帮工外，还添了几个职工。经过一段艰辛的创业阶段，营业颇为兴盛，附近小贩也常来批购，小作坊已有供不应求之势。

1923年，冼冠生和薛寿龄决定扩大经营冠生园，改合伙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至十五万元（原股升值为四万五千元，另招新股十万五千元），冼任总经理、薛任副总经理，在斜桥局门路设食品工场，结

束了小作坊的初创阶段。1928年又在南京路闹市租得八开间三层楼的店面房屋一幢，经冼冠生精心擘划，底层为门市部和饮冰室，除自销产品外，并代销泰丰、泰康两家食品厂的饼干、面包、罐头等；二楼为饮食部，供应各色粤菜、粤点，并附设冠真照相部；三楼特设餐厅雅座，布置幽雅富丽。此后冼冠生为自制饼干、罐头、糖果、面包，向德国泰来洋行等厂家订购制罐封罐机、制糖果饼干机等，在市郊漕河泾自建钢骨水泥四层厂房一座，糖果车间和饼干车间各占两层；另建平房四幢，专制面包、糕点，并附设仓库、办公室等用房。他经常接待各界人士参观各制品车间，试尝各种产品，作为广告宣传。

此时，冠生园已成为集工、商、饮食服务三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与著名的泰丰、泰康两食品厂并列而成鼎足之势，但年产值尚远不及两泰[(1)]。为此，冼冠生积极谋求产品质量的提高，加强广告宣传[(2)]，讲究产销实效。首先他讲究选料，凭其长期积累的经验，经过他的看、嗅、尝，即知来料的优劣。传统产品话梅、陈皮梅的原料，都是采自杭州超山等梅场的优质鲜梅精制而成。其次是配料和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手续，未经冼的同意不得擅自改动。再次是把好应市前的质量关，产品稍有差次，宁可返工或抛弃，决不上市以致影响信誉。此外，所产的多味果子露和果汁、橙汁、牛肉干更具有特色；同时又推出各色腊味、各种食品罐头和青梅瓶酒等新产品；并增加经营各种季节性食品——粽子、月饼、年糕、节日生日蛋糕等。

冼冠生为将产品销向全国，在主要商埠开设分、支店，1931年决定再增资三十万元。由于冠生园信誉卓著，一个月内招股即告满额。是年冼亲自偕同会做糕点的母亲及粤菜名厨数人，到汉口筹设分店。开张后营业兴隆，不久即在市内分设三处支店、一处工场、一处行所。其后又在武昌、南京、杭州等地设立了分、支店。不久，冠生园的代销店也已遍及其他各大城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抗日战士浴血奋战，急需大批食品，冠生园每日用卡车将面包、饼干、咸鱼等运到前线，冼冠生有时也随车前往慰问。翌年，冠生园又招新股

十万元，在漕河泾工厂附近辟地六十余亩，加建农场，对外开放，园内布置山石花木、小桥流水和错落有致的亭榭堂馆，环境幽美，另设茶室供应茗点，春秋佳日，游人如梭。是年冼冠生应日本森永糖果株式会社的友好邀请，率领职员、技术人员数人前往参观访问，并在临别时受该社馈赠各色糖果样品二十八箱。回国后，冼与技术人员对这些样品进行分析化验，研制成新产品“杏花软糖”和“鱼皮花生”，后又聘用外籍技师仿制“果酱夹心糖”，成为冠生园创优产品，畅销全国。

冠生园在上海的营业欣欣向荣，除南京路总店外，拥有漕河泾、局门路及九江路三个工厂、五个支店、一个农场和批发部、仓库、总管理处，1936年产值达九十二万元[(3)]，跃居全国同业之首；全公司职工人数已逾七百人。冼冠生除任冠生园董事兼总经理外，并任兴华制面公司、冠美印刷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康元五彩花铁印刷制罐厂、南京妙机百货公司董事等职[(4)]；后又担任上海市商会监事、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监事、上海市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成为同业领袖、沪上著名资本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冠生园沪地漕河泾厂因在战区内，被日军占作司令部，设备全遭毁坏；各地分、支店也因战争影响损失惨重。但冼冠生毫不气馁，响应迁厂内地的号召，重作部署。他先同军需署签订供应军用罐头的协议书，获得一笔预付款和迁厂补助费，将部分制罐设备迁至汉口。但未及投产，汉口吃紧，经军需署同意改迁湖南桃源，在该署协助下建厂投产，利用常德一带产牛区的资源，赶制大批牛肉罐头，供应军需。但不久因战火逼近，又经贵州迁至重庆。由于在国外订购的机器迟迟不到，直到1947年才算建成。正待开工生产，却由于美国剩余军用罐头的倾销而长期未能开工。在这同时，冼冠生在西南开设的分、支店却营业极盛。

早在战火逼近武汉时，冼冠生就从汉口调拨资金十二万元至渝，并调派得力人员带领部分职工赴渝，择定闹市都邮街（今解放碑）店址，开业顾客盈门；随后又在市区设支店四处、工场两处，职工达四

百余人。1939年冼又至昆明设分店，1941年在贵阳、庐州设分店，1943年设成都分店。这些分店以及后来又发展分设的许多支店，为冠生园积累了大量盈余。至抗战结束时资金已达法币一亿多元，以及美元外汇、黄金等，为战后恢复战区各店的业务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冼冠生重回上海，制订进一步恢复和扩展冠生园业务的计划，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将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拟在国外设厂并建立销售机构。但由于冠生园的股票大部分为纸业商人所购得，他们但求近利，从而操纵董事会，使冼多方面受到掣肘，不能独立运营。加以国内形势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交通阻隔，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冠生园的业务大受影响，冼的打算成为泡影。其后又经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和限价政策等变相掠夺，冠生园元气大伤，在风雨飘摇中勉力维持。此时有人劝他抽调资金到香港设厂，凭冠生园的声誉和他的经营手段必能获得厚利，但被他拒绝。他说："我的事业在国内，发迹在上海，抗战时内迁是为了抗日，现在是国内战争，将企业外迁，这是叛国行为，我决不这样做。"终于奋力支持到全国解放[(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中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的指引下，冠生园获得多方的扶持和照顾，企业有了转机，沪、渝等地业务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冼冠生继续在沪主持企业。

1952年4月21日，冼冠生自感心力交瘁，突萌厌世之念，在沪轻生身亡[(6)]。

---

(1) 据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07—109页载："当时泰丰食品厂工人一百六十三人，年产值七十六万元；泰康食品厂工人一百十二人，年产值四十万元；冠生园工人一百九十三人，年产

值仅二十余万元。”

(2) 冼冠生一贯重视广告的作用，早在学徒时期，就曾将报上各种广告剪贴成三大本随时翻阅。后来冠生园业务逐渐发展，他曾向人夸口说，他从这三大本中得益不少。参阅程道生、俞少庵：《冼冠生与冠生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24页。

(3)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812—831页载：“一九三六年冠生园沪厂工人三百零二人，年产值九十二万元；泰康食品厂工人一百七十一人，年产值四十四万元。”

(4) 《上海工商人名录》，中国征信所1936年5月编印，第68页；杨家骆编：《民国名人图鉴》第12卷，辞典馆1936年8月版，第1页。

(5) 戚再玉编：《上海时人志》，展望社1947年版，第84页。

(6) 顾义新：《冼冠生与冠生园》（未刊稿）。

冼星海

查建瑜

冼星海，广东番禺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生于澳门。父冼喜泰以捕鱼为生，在冼星海降生前半年即病逝，时仅三十五岁。母亲黄苏英以帮人浆洗衣裳为生，孤儿寡母依赖外祖父黄锦村做散工扶助而勉强度日。1912年，冼星海七岁时，外祖父病故，冼母披迫携冼星海赴新加坡谋生，在养正学校帮佣，供冼星海上学四年。1915年，冼星海入英语学校学习，次年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高小部，1920年毕业后入养正中学半工半读。1921年，广州岭南大学派人到新加坡募集经费并挑选优秀生回国深造，冼星海成绩优秀，首批被选中回国。不料岭大附中学费昂贵，冼星海虽有“成绩优秀”的转学证，也不能免交学费，被迫辍学。后经人介绍，入岭大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义校念书。义校免收学费，只晚上上课，冼白天则去岭大食堂打工。

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能吹奏多种乐器。他喜欢听妈妈唱的广东民歌，并且跟着学，后来对人称赞妈妈是他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他在岭大打工时，经常挤出休息时间，在校园僻静处，潜心吹奏黑管。秋去冬来，他坚持不懈，凝神专注学艺的神情，感动了每天路过他身旁的一位留德教授，表示愿意义务辅导他。从此，冼在这位教授指导下自学和声、对位、曲式、指挥等，音乐知识和技巧很快得到了提高。十七岁那年，他登台表演单簧管独奏，在广州音乐界崭露头角，获得“南国箫手”的美称，被岭大管弦乐队聘为队员兼指挥。同时他以做工的收入在岭大附中上学，于1923年毕业。他没有钱升入大学，便休学做工，并埋头自学，除主攻音乐外，对绘画、书法、诗词也广泛涉猎，这为他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冼星海入岭大预科学习。这时北京大学创办了音乐传习

所，他闻讯北上。1926年，冼在北京图书馆任助理员，同时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音乐理论和小提琴。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以“音乐有伤风化”为借口，勒令全国音乐院、所一律解散，冼星海被迫辍学返回广州。他应培正中学和岭大华侨附校之聘教音乐；还被聘请担任岭大军乐队队长、广州青年会事业部音乐主任。在此期间，经他主持举办的各种音乐会盛况空前，吸引了不少音乐爱好者。

1927年11月底，中国第一所正规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上海创办，院长是蔡元培，冼星海立即辞去在广州的职务，只身前往上海投考并被录取入学，学习提琴。他在院刊第三号上发表《普遍的音乐》一文，指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认为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冼结识了田汉等人，曾参加“南国社”的戏剧活动。

1929年夏，上海国立音乐院放暑假，有些学生因家境贫困没有路费回家，住在学校里，学校当局要他们补交住宿费、练琴费，甚至断电断水，封锁琴房，迫使这些学生成立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借住在“南国社”的冼星海闻讯后，激于义愤，参与组织请愿团的活动，事后被校方以“鼓动风潮”的罪名开除学籍。这时他认识了在法国学音乐的马思聪，在马的鼓励下，他决心去巴黎深造。

1929年秋，冼星海离上海前往法国。他没有旅资，在货船上日日夜夜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累得又黑又瘦，终于在1930年春到达巴黎。这时他身上仅有七个法郎，只得露宿在巴黎街头的屋檐下，达半个多月。有一次，他饿得昏了过去，被巴黎的警察误以为是尸体，装上汽车送往火葬场，幸亏途中经风一吹苏醒过来，才避免被活活烧死。后来得到一位东北籍华工的照顾，先在餐馆当跑堂，又在浴池替顾客修指甲，还看守公共电话、照顾孩子、打扫卫生等。在各种低贱的劳役之余，他仍挤出时间练小提琴。天长日久，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一次给客人送菜时，两眼发黑，栽倒在地上，气得老板娘大喊大叫，因而被逐出店门。

冼星海经常怀抱提琴到咖啡馆卖艺，忍受着仆役们的辱骂。后来终于找到了马思聪，在马的积极协助下，跟世界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ffer）学习提琴。奥别多菲尔听说冼星海千辛万苦来到巴黎学习音乐的经历后，破例不收学费，还经常送给他昂贵的音乐会入场券。冼在奥别多菲尔的辅导下，以自己亲身熬过那不眠的冬夜为素材，创作了以女高音独唱和单簧管与钢琴三重奏的《风》。这首曲调凄楚、旋律悲怆的乐曲，获得巴黎音乐界的好评，广播电台为他录音播放。嗣后，经奥别多菲尔推荐，冼星海跟法国作曲家、巴黎音乐学院教授诺埃尔·加隆（Noel Geallon）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跟巴黎音乐学院作曲教授保罗·杜卡（Paul Dukas）、巴黎圣咏学院作曲教授梵生·丹地（V．D'Indy）学作曲；跟巴黎圣咏学院院长拉贝（Labey）学指挥。两年后，冼星海以优异成绩考取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成为该班第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获得荣誉奖。

冼星海在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学习成绩突出，他创作了《d小调中提琴奏鸣曲》等作品。是杜卡教授最得意的学生。杜卡很同情冼星海的处境，给予多方关怀和照顾。

1935年春，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冼星海在法闻讯悲愤异常，思念祖国之心更切。是年秋，他经伦敦回到上海。上海各报纷纷报道这一消息，人们热烈欢迎他归来。但是，上海几个乐队的指挥职务都被外国人占据。冼星海几个月找不到工作，还要靠当佣人的老母亲养活他。他先是收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后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做配音工作。他这时创作的《运动会歌》（田汉词）、《我们要抵抗》（田汉词）、《战歌》（俯拾词）、《救国军进行曲》（田汉词）等八首作品，都充满振奋、战斗的激情，受到舆论的好评。

1936年，冼星海进入新华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为《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影片配曲，并任上述各片音

乐指导。同年，他创作了《热血》（田汉词）、《救国军歌》（塞克词）等十六首作品。他创作的《战歌》收入“百代”唱片集后，打破了“百代”唱片销售额纪录。他不接受重金聘请，拒绝创作靡靡之音的歌曲。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提出以高于影片公司四倍的月薪，请他担任音乐部主任，他亦未去，认为自己从事音乐事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金钱，艺术家有自己的人格。他为进步文艺团体演出《大雷雨》、《日出》谱写插曲和配乐，不要分文报酬。他很赞赏聂耳“为大众呐喊”的创作方向，经常到农村、工厂、学校了解农民、工人、学生的喜怒哀乐，也到舞厅倾听歌女唱歌，记下她们的曲调和情绪，以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更准确地谱写出被压迫者的呼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冼星海创作《保卫卢沟桥》（塞克词）、《女性的呐喊》（安娥词）、《抗战先锋歌》（塞克词）、《国防军歌》（俯拾词）、《我们不怕流血》（安娥词）等多首抗日救亡歌曲，动员和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冼星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参加“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洪深领导的演剧第二大队，到外地进行抗日宣传。经江苏、浙江、湖北数省到达武汉，沿途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热血》等活报剧，举行大小音乐会数十次，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宣传中，冼星海在各地组织起数十个救亡歌咏队，鼓舞无数爱国群众走上抗日战场。

1938年春，冼星海在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美术音乐科主任科员，与张曙共同负责领导全国的抗日音乐运动。在冼星海主持下，武汉地区先后成立救亡歌咏团体六十多个；先后举行救亡歌曲音乐会数十次，其中有十余万人参加的“火炬水上歌咏大游行”和名震全国的“歌咏大检阅”。冼星海在武汉创作了《保卫大武汉》（百鲁词）、《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词）、《游击军》（先珂词）、《华北农民歌》

（张永福词）、《我们的队伍往前走》（廉殷词）、《救亡对口唱》（艾芜词）、《反侵略进行曲》（侯甸词）、《长期抵抗》（季纯词）、《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江南三月》（施谊词）等三十四首作品。这些优秀作品对全国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前方战士的斗志，以及坚定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使冼星海的歌咏创作工作陷入困境，他与张曙建立起来的数十个歌咏团体也先后被合并、取消，“全国歌咏界协会”也夭折了。这时，他收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信，恳请他去鲁艺音乐系任教。与此同时，驻武汉国民党某军长也送来聘书，高薪请他担任军乐队总指挥，并授予上尉军衔。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他决心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

1938年10月1日，冼星海偕新婚妻子钱韵玲离开武汉，经西安，于4日到达延安。他全身心地投入了音乐教学、研究和创作，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和其他一些干部学校教音乐课，讲授作曲、歌剧、理论、指挥，亲手修改学生的作业，为培养和造就革命音乐人才作出了贡献。

冼星海很快习惯了延安的政治生活，比较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音乐上的许多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他非常主动地和工农群众相处、交谈，体察他们的情感。他认为：“他们命定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翁，把世界变成大同社会。这样他们的气魄是很大的，力量是深厚的。”因而“他们的声音感情是充溢着热爱和亲切、真诚和恳挚”。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在鲁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

冼星海对于鲁艺在音乐创作的大众化和民歌形式方面的成绩十分重视。延安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鲁艺的“民歌研究会”向他们收集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小调。冼星海把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小调以及大鼓、京调加以整理，精心改造和提炼，吸取其风格、特点，使自己的作品向着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大步前进。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冼星海创作出大量体裁多样、结构多变、乐思深远、取材广泛的优秀作品，其中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等六部大合唱，两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并继续谱写1935年开始动笔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场面雄伟，气势磅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顽强和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他的另一部大型作品《生产大合唱》在音乐创作的大众化与民族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1940年5月，冼星海经中共中央决定，承担抗战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作曲配音工作，并去苏联考察电影与音乐。在由延安出发前往苏联途经西安时，因时局的变化耽搁了几个月，于次年1月抵达莫斯科。他为影片的配乐工作进展顺利；同时他继续谱写《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并为《黄河大合唱》编写交响乐队伴奏谱，每天从晨至夜伏案不辍。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苏联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冼星海也被卷入残酷的战争生活。他决定用自己的音乐去谴责德国法西斯，着手创作《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莫斯科全城疏散，冼星海先至阿拉木图，后又转移至乌兰巴托。他曾试图从蒙古回国，因战时交通封锁未能如愿。在蒙期间，他化名孔宇，为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义务讲课，教授各种乐器，并组织音乐会，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他在蒙期间共创作六十多首作品，其中《乌兰巴托的早晨》（小提琴独奏曲）等作曲，富有蒙古人民的生活情趣，被当地群众尊称为“了不起的音乐家”，“我们最好、最值得敬爱的老师”。1942

年12月初，冼星海离开蒙古返回苏联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后又至库斯坦。这时，战争进入艰难岁月，冼星海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仍然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在防空洞里完成了《神圣之战》这部歌颂苏联红军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交响乐。他还创作了《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以及《中国狂想曲》等管弦乐作品，被苏联音乐界公认为天才音乐家，莫斯科计划举办冼星海管弦乐作品音乐会。

由于战争环境的折磨，冼星海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先后染上肺结核、心脏病、肝肿大、腹膜炎等多种疾病，而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直到1945年5月，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的病才被人们发现，转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但这时他已病势垂危，每天要抽出好几升腹水。在生命即将结束前二十多天，他还要苏联朋友给他送来谱纸，说要创作一部歌颂卫国战争胜利的大型作品《交响诗·胜利》。可惜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10月30日去世，年仅四十岁。

1983年1月，冼星海的骨灰从莫斯科顿斯柯依教堂移回祖国首都北京安葬。

主要参考资料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丛刊·冼星海专辑》（一）、（二）、（三）、（四），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广州音乐学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62—1983年版。

马可：《冼星海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项松茂

孙德祥

项松茂，名世澄，以字行，别号渭川。浙江鄞县人。1880年10月9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六）生。先世以耕读为业，至其父项锦三，始与其兄项仕元，在杭州合伙经营皮毛牛骨山货行。项松茂幼年随父读书，稍长进入私塾，十四岁到苏州陆姓皮毛牛骨行当学徒，工作繁重，生活艰苦，项勤工苦学，满师后为店东所倚重，委以账务。

1900年，项松茂经在上海中英药房任经理的舅父吴志成引荐，入中英药房任会计。项办事认真，“遇事富有责任心”[(1)]，而且“无不心细如发”[(2)]，初露了他的才能。1904年吴志成去世，陈镜如接任经理，委项赴汉口开设中英分店并任经理。项在汉口分店独当一面，积极规划经营，“业日以隆”[(3)]。1909年汉口组织商会，项被举为董事。1911年项受聘任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这是项赖以发展成为西药业巨子的基地。

五洲药房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杭州广济医院药剂师谢瑞卿、中法药房总经理黄楚九等合资创设，“资本不过万元”[(4)]，初由谢瑞卿任经理。五洲药房制销的药品中，有吗啡含量的“甘露戒烟丸”利润甚厚。当时谢瑞卿不专心经营，暗自制销“清心戒烟丸”另谋私利，经劝阻无效，夏、黄乃命谢退伙，联名电邀项来沪接任经理之职。项到任后，即以“勤俭”二字作为企业的方针，先将店中华丽陈设变卖，移充经营资金，增为规银一万五千两。项又拉拢钱庄跑街俞钜卿为副经理，取得资金上的支持。1912年将店址自福州路广西路口迁移至福州路河南路口。项工作勤奋，“每至夜半始寝”[(5)]。他加聘药剂人员，成立“合药间”，加强自制本牌成药，计有“人造自来血”（治疗贫血病）、“补天汁”（健胃补虚）、“海波药”（清血解

毒）、“月月红”（调经）、“助肺呼吸香胶”（化痰止咳）、“树皮丸”（健脑润肠）等药。

项松茂鉴于国内西药市场的日趋扩大，乃与夏瑞芳商定，将原为合伙组织的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正式宣告成立，以夏筱芳、黄楚九、项松茂、陈如翔、印锡章等为董事，张蟾芬为监察。次年黄楚九退出五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的西药和原料减少；五四运动又掀起了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从而为国产成药打开了销路。五洲的“人造自来血”，1920年年产量高达五万三千六百二十五升，比1913年猛升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点六。同时又增加了“代参膏”、“肥儿疳积糖”、“鱼肝油精丸”、“麦液止咳露”和“止咳杏仁露”等品种的生产，营业额和盈余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由1915年营业额三十一万元，盈余一万七千元，到1920年时营业额即上升为一百三十七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盈余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二元，各增加百分之三百四十三和百分之九十二。这些高额利润的获得，为五洲扩展事业提供了经济实力。

西药业原是以贩卖进口药品和制药原料为主要业务，但在项松茂主持下，开辟了代理欧、美厂商经营化学仪器、医药器械的进出口业务，获利甚厚。

项松茂鉴于“五四”后爱国运动的高涨和国外制药业的进步，遂有发展我国民族制药工业，以挽回利权扩大进益的愿望。1920年项出资十四万二千两，购进了闸北天通庵路地基，次年将五洲资本增为五十万两，扩建厂屋栈房。时有开设于徐家汇的固本肥皂厂欲作价出让，项与之交涉，结果以十二万五千两的低价盘进，并议定只付给现银二万五千两，另以四万两作为加入五洲股份，六万两作为存款，期限二年，利息八厘。如此安排，五洲实际上所费代价不多。成交以后，即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内设制皂与制药两部。1922年又经卢鸿沧

的介绍，以一万二千八百零六元的代价，收买了德商耐尔生氏所办的生产臭药水的亚林化学厂。两厂的收买，构成了五洲企业集团的柱石。1925年五洲又进一步收买了中华兴记香皂厂、南洋木塞厂，并附于皂药厂。

五洲皂药厂的生产设备，经过添置充实，日臻完善，皂、药生产也日新月异。药品生产方面，在原有老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品种。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特别是开始自制“牛痘疫苗”和“醚精”、“硫酸低铁”、“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跨出了西药业历来依赖外国原料加工的境域。

项松茂为了推销产品，广开门路，与上海各大医院和开业医师开展业务联系，甚至以资金和商品，帮助伯特利医院和福幼医院的建立。他积极参加国货展览，编印《卫生指南》扩大宣传。在本外埠广设支店，发展同其他店铺的领牌联号关系，放账赊销。这时“人造自来血”年产量继续增高，在遍销国内的同时，并委托香港瑞昌西药行、新加坡合丰商店、仰光兴华公司、越南吴昊药房等，在东南亚地区代销。肥皂生产方面，在继续制销家用洗衣的固本皂外，增加生产了“高花香皂”、“玫瑰香皂”、“檀香皂”、“透明药皂”、“硼酸浴皂”等多种。

“五洲固本皂”问世初期，就受到了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简称“中皂”）的“祥茂肥皂”的激烈竞争[(6)]。当时五洲的资力和规模，与“中皂”相比，强弱悬殊。项不畏对手强大，认真周旋，在质量、价格、市场三个主要方面和“中皂”开展了艰巨的竞争。在质量上，项先亲往中皂厂深入考察其内部实况，继派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乔装工人，深入中皂厂当临时工，历时九个月，尽得其技术上的奥秘及肥皂的成分和含量；回来反复对比试制，将固本皂的主要成分总脂肪酸含量提高为百分之五十五，水分减为百分之三十四，结果各项质量指标都超过了祥茂肥皂。在市场上“中皂”布成了推销网，划分上海、浙江、华南、华北、西北几个大区，派驻区长和营业员积极推销，月薪外再发

奖金，在上海还采取了寄售、放账、补价、赠送、发奖券等等办法争夺市场。五洲则针锋相对，在外埠由五洲药房支店、领牌店和代销店推销；在上海市区得到烟纸业大同行谦泰新老板沈德华的支持。沈联络大同行同业三十余家，组成专为推销固本皂的大成公司。五洲酬付大成公司以每箱肥皂佣金银二钱，交货后放账六十天，如肥皂跌价补给差价，年终结算再按推销箱数付给酬劳。因此大成及各零售店对推销固本皂都十分卖力。

1924年，五洲固本皂销售额虽达银三十八万二千两，但由于英商的竞争，年度结算时仍亏耗五千余两。项只得“以血养皂”，即以“人造自来血”等药品利润来弥补支持。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民众群起抵制英货和日货，遂使固本皂销路大增，供不应求，日产达五百余箱，该年营业额迅增至银五十九万六千两，比上年骤增二十一万四千两。在反帝风暴中，五洲固本皂终于战胜了祥茂肥皂[(7)]。

1929年，项松茂又盘进了宁波的公济药棉绷布厂，改为东吴药棉绷布厂，生产“脱脂药棉”和“脱脂纱布”。至此，五洲在本外埠先后增设的支店总计已有十七处，领牌联号共达五十五处。到1931年，“人造自来血”的年产量已递增到七万五千五百六十三升，固本皂的日产量已达二千余箱，年营业额已增达七百六十四万余元，盈余额多达二十三万余元。

五洲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扩大，日臻健全和严密。在董事会、经理之下，有店务、厂务、店厂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又按生产、营业、财务、管理四个系统设置科、股，分工职掌各项具体业务。1928年公司资本总额再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由最初的三十余人增加到四百余人。

随着五洲业务的发展，项松茂又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南洋烛皂厂、温州森林农林场和上海新亚药厂等十三个企业单位投资附股，兼任它们的董事，以取得国产原料如硫酸、松脂、除虫

菊等的低价供应。同时以自产的甘油、硝酸、盐酸等原料销给大丰等公司厂家使用，密切了交换协作关系。1931年，项与邬志豪共同发起筹组宁波实业银行，进一步与金融资本结合。项还与高恩洪联合组织沪闽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出任经理兼董事。五洲在地产方面的投资亦达五十五万余元。至此，项擘划经营的五洲药房，已基本成为具有现代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项松茂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历任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上海市商会议董、工商部国货展览会委员、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专门委员、华商皂业公会主席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委员等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他积极从事救灾恤贫慈善公益事业。

项松茂经营事业的成功，与他重视培养和使用人才有很大关系。1923年他聘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张辅忠为制药部主任。1927年张赴德国留学，1930年在柏林大学获得药剂化学博士后留德继续研究，项曾给予资助；他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店厂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同时直接招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以骨干使用。他还订购国外科技资料，供职工阅览参考。1928年后在厂内设立医务处，还在徐家汇斜徐路天钥桥东设立松茂小学，供职工子弟入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上海抗日会通过了组织抗日义勇军共赴国难决议，市商会召开会员大会，通令各业公会限期成立。项松茂积极响应，在厂内编组了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交通大学军事教官每日施以军事训练[(8)]。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项勉励驻厂同人照常生产，多制军用药品，以供军需。时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五洲第二支店邻接战区，住有店员蒋邦毓、虞耕丰、童永才、戚德江、徐和杰、丁兆年、陈汉坤、吴宸良、陶赋、李生才、周瑞龙等人留守。据传有日军伤兵车辆驶近店址，受到我爱国志士的射击。日军于1月29日突来店中搜查，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乃将蒋等全部劫去，捣毁店堂。项为了营救被难职工，冒险

亲往第二支店视察情况，遇相识的日本商团成员小山站岗，与小山约定次日相晤。1月30日下午，项偕朱灿如持盖有私章的名片再往，而小山不在；遇相识的芬兰木材商陪同进店，即为日本便衣所监视，芬兰商人和朱灿如离去，项即被日军缚送蓬莱路俱乐部，转解江湾敌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敌军头子恼怒其敢于抗日，项则抗争不屈。次晨，项与被捕店员同被杀害。后以尸骨无着，衣冠入殓。

---

(1) 《松茂小史》，《密勒氏评论报》。

(2) 刘镒襄：《纪念项松茂先生》，《五洲·项松茂先生纪念号》（1934年1月）。

(3) 黄炎培：《项松茂先生传》，《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

(4) 卢志学：《百年来的上海工商业》，《自修周刊》第50—51期（1939年2月28日、3月7日）。

(5) 高友唐：《项松茂先生行述》，《五洲·项松茂先生纪念号》（1934年1月）。

(6) 祥茂肥皂原是英国祥茂公司（William Gossage & Sons，Ltd）制造的一种洗衣皂，由上海英商祥茂洋行（Burkill & Sons）进口经销。后在上海英商白礼氏洋烛厂内附设制皂车间就地生产。英国肥皂托拉斯利华兄弟公司（Lever Brothers & Unilever）于1884年在伦敦设立。1925年时资本已达三亿美元，以制造“日光”（Sunlight）肥皂、“力士”（Lux）香皂等闻名于世，分支机构遍于四十多个国家，是世界肥皂工业的霸主。1923年在中国设立子公司即中国肥皂有限公司，资本为八百万元，在杨树浦购地建厂，拥有皂化锅二十只，成为远东最大的制皂厂，祥茂肥皂即改归其经营。

(7) 项泽辅：《五洲固本肥皂与祥茂肥皂的竞销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64年版。

(8) 《新闻报》1931年9月30日。

萧佛成

陈民

萧佛成，字铁桥。1862年（清同治元年）生于暹罗（今泰国）曼谷，祖籍闽南[(1)]。先世于明末抗清失败后逃居台湾，后南渡马来半岛的马六甲，19世纪初又移居暹罗，以经商为生。萧佛成童年在曼谷华侨设立的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业师高传百为参加太平天国反清斗争失败后南逃谋生的爱国者，萧佛成受其熏陶，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既长，获当地律师资格。1888年，萧佛成参加当地的反清复明组织“三合会”，由于人缘与学识，在当地华侨社会中颇有声望。

1900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主张。1905年，萧佛成与《中国日报》互通声气，与陈少白、冯自由多所联络。1907年，得到革命党人陈景华的协助，萧佛成在曼谷创办《华暹日报》，自任社长。该报分刊中文版与暹文版，中文版由萧佛成与陈景华任主笔；暹文版则由其女儿任主笔。《华暹日报》致力于改善暹罗华侨的境遇，受到侨胞的喜爱，直至1942年日军侵占暹罗时才被迫停刊。

1908年11月，孙中山偕同胡汉民等从新加坡到曼谷。当局禁止孙中山从事政治活动，但暹罗华侨志士及三合会人士，秘密集会欢迎孙中山。萧佛成积极参加活动，继而暹罗同盟会分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分会会长，陈景华任书记，会址设在《华暹日报》社的楼上。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党派，成立国民党。萧佛成任暹罗国民党总支部支部长。在民初的反袁斗争中，革命阵营内部一度发生意见分歧。萧佛成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讨袁革命运动，在讨

袁筹款中，暹罗华侨方面也是经费重要来源之一。

1924年1月，萧佛成当选为暹罗地区代表，回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再次回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他提议的极力保护华侨案，获得通过。同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等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这次全会通过了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萧佛成追随蒋介石等人，竭力贯彻此案，通告南洋各埠侨领彻底“铲除共产分子”。针对萧佛成反对国共合作的言论及其在暹罗的行为，1927年3月17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停止萧佛成中央执行委员职权，并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2)]。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不断制造反对国共合作的分裂活动。192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等人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弹劾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应行纠察”案，并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特别是对汉口三中全会决定准许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一事，表示“尤为痛愤”[(3)]，为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鸣锣开道。萧佛成亦同声呼应，于4月15日南京的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上，提出“清党”八项主张：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不合法”之汉口中央党部；三、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五、通缉“捣乱分子”；六、恢复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七、以武力征讨“奸党”；八、通电布告[(4)]。6月，南京国民党在蒋介石指挥下全面“清党”后，萧佛成与周启刚等五人组织“海外清党委员会”，办理海外各级党部“清党”事宜，甚为卖力。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宁汉渐趋合流。9月16日，南京方面、武汉方面以及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三方，在共同一致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中共的基础上，在南京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职权。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萧佛成出任国民党中央海外

部委员和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8年，萧佛成返回暹罗，参加了因济南“五三”惨案而发动的南洋华侨抵制日货运动。暹罗政府禁止华侨参与政治活动，对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加以取缔。萧佛成运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出面缓颊，曼谷华侨为“五三”惨案的受难者捐助了一笔巨款。

1929年3月，萧佛成回国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胡汉民派在广州召开的第四次、1935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萧皆连任。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擅权制订训政约法而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萧佛成与胡汉民历史关系较深，政见亦同，平素对胡十分敬重，对蒋介石此举极为不满。4月3日，他与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指责蒋“违法叛党，逆迹昭著”，“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5)]。当时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联络汪精卫、孙科等国民党内反蒋派系，乘机在广州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行成立“国民政府”。萧佛成也列名为“国民政府”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1931年底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改组，萧佛成被列名国民政府委员。广州的“国民政府”于1932年1月5日宣布撤销，另设国民党西南执行总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留在广州，担任西南执行总部海外党务主任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后，萧佛成成为在广州的国民党仅存元老，但他没有实权，终日以弈棋为消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萧佛成返回侨居地暹罗，以耆年侨领身份，支持当地华侨的抗日宣传和救济祖国难民的捐献活动。

1940年5月31日，萧佛成病故于曼谷。

(1) 因其先世早年移居海外，凡二百余年，年代久远，原籍具体县名已无案可查。

(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页。

(3) “中华民国”史事纪事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月至6月》（初稿），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631页。

(4) 中华民国史事纪事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月至6月》，第707页。1927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鉴于蒋介石个人擅权，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特重订《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萧之第六项主张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上述决议。

(5) 存萃学社编：《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上册，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289页。

萧龙友

寿祝衡

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号息园、息书、息翁，晚年又号不息翁。四川三台人。1870年2月13日（清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四川雅安。他的父亲萧端澍是清光绪戊子年（1888年）举人。萧龙友幼年受父教，用心攻读经史诸子及名家诗赋。少年时，因母多病，乃留心于医药，经常去族人所设药铺请教，逐渐能识药物、辨药味，识别药物真伪。学习之暇，曾阅读我国古代医学名著。

1890年，萧龙友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在校博览群籍，除深研经史词章以外，又涉猎许多医学古籍。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多人，街头一片凄凉。许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病人。萧龙友不顾危险，用中草药救治了不少病人。

萧龙友二十七岁中丁酉科拔贡，入京任八旗教习。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他离京去鲁，曾先后任淄川、枣阳知县。1901年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废科举，设学堂，山东省会设立高等学堂，萧龙友曾为该学堂制定章程，并充任教习。

辛亥革命后萧龙友移居济南。1914年奉调北京，先后任农商部秘书、财政部经济调查局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被内务部聘为中医顾问。这时萧龙友虽日理公务，但从未间断研习医学，常于公余之暇，以医道问世。

1928年，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署名“医隐”，号“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上，以述其志。

萧龙友自行医后，集中力量研究医学，不断总结临床经验。他不泥古非今，不仅攻读中医古书，并阅读当时新译的西医药书籍，随时参照研究。治病疗效甚高，治好很多疑难大症。当时北京有的西医院，因闻萧龙友的盛名，经常约请他会诊一些疑难重症。

萧龙友非常重视中医基础理论，对望、闻、问、切，常深究其辩证关系，主张四诊合参。他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它方法于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欺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1)] 对于四诊，他认为，临症时应结合病人的体格、性情、籍贯、职业、平素生活习惯等加以考虑。

萧龙友十分重视医德，曾作医范十条，主张稽古御今，心正意诚，有道有术，重视伦理[(2)]。萧龙友也很重视医史。他说："治医学史，必先将历代典章学术，搜讨无遗，然后可以言史，否则医自医、学自学、史自史耳，何益之有哉。"[(3)]

对药学的见解，他主张医与药不能分割。医者不但应识药，而且须能亲自采药，且能临症自为配合（炮炙、切制等工艺过程）。

在临床方面，他擅长治虚劳病。主张老少治法应有所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措施，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萧龙友十分关心祖国中医事业的发展。1934年与名中医孔伯华创办"北京国医学院"，以造就中医人才。萧龙友任院长，苦心经营十五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挽救和促进作用。解放前，历任北平市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和北平国医分馆董事等职。

全国解放时，萧龙友已八十高龄，仍继续从事医务工作。1949年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任北京市中医师考试委员会委员。同年1月，中央卫生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萧龙友被聘为华北区特约代表。1951年被政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1954年起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届代表，中医研究院顾

问、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人民医院中医顾问等职。

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的临症方案及遗稿很丰富。他珍藏的数千册医书，全部捐献给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

---

(1) 谢海洲：《北京四大名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2) 谢海洲：《北京四大名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3) 谢海洲：《北京四大名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萧同兹

熊尚厚

萧同兹，名异，号涵虚，以字行。1895年11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生，湖南常宁人。父萧越名，是个常年远走川、黔、粤、赣等省的行商。萧同兹七岁入本乡私塾，十三岁入衡阳联郡中学，1911年毕业。1913年入长沙中等工业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前身）预科，翌年秋升本科机械专业。在校时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其后又与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黄爱等人为友。

1917年，萧同兹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实习于长沙电灯公司。次年离湘北上，欲前往法国勤工俭学，遂在天津法国永和机械厂任绘图员。嗣因赴法勤工俭学未成回到湖南，1919年3月在长沙湖南兵工厂任考工员。1920年冬，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湖南劳工会，他参与做些宣传工作。为了与黄、庞二人共同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5月转入湖南第一纱厂任技士。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领导纱厂工人罢工，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萧为避祸逃至汉口，在《江声日报》披露黄、庞血案真相，控诉赵恒惕的罪行。同年秋返回长沙，任湖南乙种工业学校教师，不久转至湖南铜元局任事。1923年8月，谭延闿在衡阳组设讨贼军总司令部，萧任该司令部行政委员。是年冬，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率部去粤，萧又回到长沙任湖南铜元局总务课长。

萧同兹从事工人运动，是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准绳的，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1924年他去上海，与王光辉等一起，打着湖南劳工会的旗号，参与“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活动，专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办理了正式加入国民党的手续。翌年7月，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同志会任总干事。11月郑公玄等人与广州反共组织孙文

主义学会联系，将上海“国民委员会”改组成上海孙文主义学会，萧加入该组织，从此积极反共，破坏上海工人运动。1926年初，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设立中央党部，他任劳工部干事。因反共气味相投，他与吴铁城结识。

上海“四一二”清党反共后，萧同兹因长期在沪从事反共活动而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赏识，赴南京工作，6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劳工局处长。翌年他转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先任征集科长，主管联系新闻界事宜，受到宣传部秘书长叶楚伧（代理部务，翌年4月出任宣传部长）的器重，嗣任宣传部秘书。1929年冬，他被派往东北调查“中东路事件”，跟从吴铁城“慰劳”东北军，怂恿张学良反苏。翌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在东北的张学良有举足轻重之势，他又随张群、吴铁城再次前往东北“宣慰”，争取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

萧同兹在1932年春得叶楚伧的举荐，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中央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广州，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工作量甚小，影响不大。萧受命后雄心勃勃，力谋扩大中央通讯社业务，为国民党统治效力。4月，萧受到蒋介石特别召见。他向蒋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央社独立经营，成为社会文化机构，迁出中央党部；二、以新闻为本位，自设无线电新闻专业电台，发稿有自由裁决之权，不受干预；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之权，不受干预。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请求，萧遂于5月正式任中央社社长职。他将中央社加以改组，下设编辑、采访、电务、事务及秘书诸室，延揽人才，大力增添设备和建立国内外分支机构。他拟定了“十年扩展计划”和“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决定自备电台直接通报，十年内建成全国电讯网。在经费方面，得到蒋介石、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及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院的全力支持，以便使中央社能适应蒋介石正在进行的反共战争和强化其统治的需要。萧还获得蒋介石手谕，派中央社电务部主任高仲芹去德、意等国，购买无线电发报机和电讯器

材。中央社首在上海、汉口设立分社，翌年于北平、天津、西安、香港也增设了分社，于南京、上海新设电台。1934年与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签约，以交换稿件办法取得两社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的中文发稿权；同时聘请北平英文《时事日报》主笔任玲逊在天津创设英文部，开始供应英文新闻稿。随着蒋介石反共军事行动和对西南地区统治的进展，中央社在南昌、贵阳、重庆、成都等地又增设了分社。1936年，萧聘请原《北平晨报》总编辑陈博生任驻日本东京特派员，筹办东京分社，还派总社采访主任冯有真赴柏林采访奥林匹克运动会消息，逐渐地发展国际新闻业务。至1937年，中央社在国内已有分社十二个，通讯员办事处二十五个；国外设有日内瓦、新德里通讯员办事处和东京特派员办事处。中央社供应全国二百五十余家报社的新闻稿，形成对全国新闻通讯的垄断，迫使著名的民营通讯社天津国闻通讯社关门、上海申时电讯社停办。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同兹将中央社先于年底迁往汉口，继于1938年10月迁渝。萧任陈博生为总编辑，自己则专任社长职。在蒋介石和陈布雷的支持下，大力扩展中央社业务，进一步把中央社分支机构伸入西南、西北各地。除在长沙（后移沅陵）、洛阳、福州、连县（后移龙川）、屯溪、赣州（后移宁都）等地增设分社外，更于恩施、桂林、昆明、宁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新设分社；在国外则于新加坡、新德里、加尔各答、巴黎、华盛顿设立分社，于柏林、莫斯科等处派出特派员或特约通讯员；还在永安、沅陵、吉安、重庆、西昌、昆明、贵阳、南郑、兰州等地新设电台。虽然中央社在沦陷区的分支机构被迫撤去，但此时拥有国内外分支机构已增达四十处，职工一千二百余人。在国际电讯方面，除继续与路透社维持合约外，又与美国合众社订约，并先后接收法国哈瓦斯社和德国海通社在中国的电台，由中央社抄收柏林总社电讯经选择后编发。中央社还在成都设立了国际广播电台。

萧同兹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军事报道的需要，常常临时派出特别记

者或随军记者，设立随军组携带收发报机采访军事消息。1940年1月，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汉奸汪精卫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即日汪密约）潜入香港，萧闻讯即由渝赶至香港亲自参加采访。他与陶、高二人会晤后，即将“密约”交香港《大公报》发表，然后由中央社香港分社发往重庆，供全国各报披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社对全国新闻通讯的垄断又有进一步发展，它配合国民党的新闻专制政策扼杀新闻自由，又竭力为蒋介石的反共摩擦政策服务，制造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舆论。萧同兹在国民党内外的地位更加提高，1944年在重庆被举为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翌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同兹派员分赴台湾、杭州、太原、长春增设分社，前往香港、武汉、广州、洛阳、长沙、南昌等地恢复旧社；还派员抢往京、沪、平、津及东北，接收日本同盟社、伪中央电讯社、伪中华通讯社和伪满通讯社等敌伪通讯机构。中央社还在国外恢复和新设了东京、西贡、马尼拉、安哥拉、旧金山、巴黎等分社或特派员办事处，同时还恢复和新设了电台三十余处。在中央社总社于1946年3月迁返南京后，他为了加强采访、编辑、电务三部的联系，利用“美援”在美国订购了中型军用三百瓩发报机三十台、交流收报机七十余台、二点五瓩短波发报机十台，以及发报机设备等等，积极为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服务。1947年又在南京燕子矶附近建筑国际发报台，进一步发展国际通讯与广播。中央社作为全国新闻通讯的垄断机构更加庞大，至1948年国内分支机构达五十二处，国外二十五处，职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人，垄断全国五百六十余家报社的新闻稿，自称为“黄金时代”。萧同兹在国民党新闻通讯事业中声望达到顶点。他雄心勃勃地想要把中央社跻进世界大通讯社的行列。

战后的中央社在萧同兹主持下，虽然机构更加庞大，可它的方针是紧紧地为蒋介石反共内战服务，一切言论都是替国民党反动统治辩

护和粉饰，因而遭到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唾弃，其庞大也只是虚有其表。曾任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主任的唐际清事后回忆说：中央社“劝导民众保持镇静，虽然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发消息落人之后，往往为各地报界所诟病”，所发战讯“亦失去读者信心”，庞然大物的中央社“黯然无光”。萧同兹虽有一腔勃勃的野心想使中央社更加发展，可最后却被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所卷没，中央社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惨败而步步萎缩。1949年秋，他将中央社重要器材和资产撤往台湾，自己则于10月由广州至香港，1950年3月转至台湾。

萧同兹在台湾继续主持“中央社”工作，同年10月改组实行“企业化”，成立管理委员会，他辞去社长职，改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12月退休，但仍任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此外还兼台北市报业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和私立复兴戏剧学校董事长等职。

1973年11月11日，萧同兹病殁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75年版。

张佛千：《漫谈萧三爷》，台北《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

《萧同兹传》，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4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

《中央社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下辑，“中央社”1944年重庆版。

左东枢：《回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冷若水主编：《中央社六十年》，“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版。

萧耀南

朱丹

萧耀南，字珩珊。湖北黄冈县仓子埠（今武汉市新洲县孔埠区）人。1877年3月（清光绪三年二月）生。他出身寒微，家境清贫。祖父做过乡村塾师，父萧元亭曾以贩卖鳝鱼为生，后充货郎。萧耀南幼年曾就读于乡间启蒙馆，及长赴县考两次未中，但因“挂过水牌”，得以在乡间充启蒙馆塾师。任教期间，“每年所得束脩费仅二十余贯钱，不足以赡家”[(1)]。他二十岁上与当地女子苏氏成婚，婚后生活更加拮据。他慨叹：“曷如效彼班超，投毛锥而事戍伍，纵弗侯封万户，亦何致不能资生！”[(2)] 遂拿苏氏平日纺的十几两线卖钱做了盘缠，经自赴武昌第八镇工兵营当了一名士兵。

1900年，萧耀南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将弁学堂，在三年受学期间深得教官哈汉章的赏识。毕业后，萧入护军左旗充第二营哨官，翌年兼充帮办及护军左旗随营学堂教员。1906年5月，萧耀南得军谘副使哈汉章的引荐，入陆军练兵处任一等科员，翌年改任军谘处第一司一等科员；1907年7月，入陆军学堂第二班肄业，同班同学有伍文渊、阮肇昌、李景林等人。

1909年，萧耀南入军谘处总务厅，任一等科员，不久补升科长。同年冬，萧被派至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处任正参谋官。因他恭顺寡言，且有一定的办事能力，颇得曹锟信赖，1910年兼任第三镇第九标第三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曹锟所部移驻西娘子关镇压燕晋联军，萧被擢升为第十二标标统。1912年初，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袁世凯不愿南下；当南京迎袁专使到达北京时，曹锟在袁世凯的唆使下于2月29日在北京制造“兵变”，以乱兵纵火抢劫，通宵达旦，为袁拒绝南下制造借口。此次事变，萧耀南始终参与

其谋。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第三镇易名第三师，调赴北京保卫京畿，曹锟任师长，萧耀南任第三师参谋长。袁对北洋军中的南方人加以清除，萧原也在清除之列，后由于曹锟向袁力保而得于其位。1913年，萧调任第九团团长，因赴河南镇压白朗起义“有功”，授陆军少校衔。翌年，袁世凯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驻兵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力量，萧再为曹锟重用，升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15年末，袁世凯接到云南独立的警报后，命曹锟督师入川，帮助陈宦镇压护国军，萧随曹入川，与护国军交锋。袁命第三师扩军，曹锟成立五营卫队，萧耀南改任卫队统领。6月，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锟利用萧耀南与黎元洪同乡的关系，经萧耗费六十多万元向黎之左右游说，终于替曹谋得直隶督军的重要职位。随后，曹的第三师开赴直隶驻保定，并扩军成立三个混成旅，萧耀南任直隶第三混成旅旅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组阁。孙中山为维护革命成果，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南北双方再次形成对峙局面。段祺瑞派曹锟为南征总司令，以吴佩孚代理第三师师长。当时湖南督军谭延闿曾动员湘军第二师北伐，段祺瑞闻报，即电吴师开入长沙，阻止南军；萧的第三混成旅此时也为吴佩孚所辖，随驻衡阳、祁阳一带。曹锟企望在南北战争中争得副总统一职，因而积极内战，于次年将其部队全部拉出，移向鄂南，萧耀南的混成旅也在其中；曹同时任命吴佩孚为直军前敌总指挥。不久，北军又一次攻入湖南。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反对卖国的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1918年6月，萧耀南等五个旅长联名请假，湖南前线产生了主和派。吴佩孚拒不执行段祺瑞进攻两广的电令，公开反对“武力统一”政策，8月发表致代总统冯国璋的“马电”，请冯颁布停战令，俾南北军队一致对外，萧耀南是电报列名者之一。9月，萧耀南与湖南战线南、北军将领吴佩孚、谭延闿等二十余人联名发出“寝电”，请冯国璋颁布停战命令。这是自有南

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南北和议，萧耀南随吴佩孚驻军邢台、洛阳。

1920年，北洋军阀直、皖两系矛盾日益尖锐，直系首领曹锟亲自到天津行誓师礼，遣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7月，战争爆发，直军以逸待劳，连克皖军。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在吴佩孚的指挥下，向涿州进兵，以一旅之兵击败皖军一师以上的兵力，为捍卫保定大本营立下汗马功劳。直系获胜后，部队又复扩充。10月第三混成旅扩编为第二十五师，驻兵郑州，萧任师长并被授陆军中将衔。后来，第二十五师成为萧耀南统治湖北的基本力量。是年，萧耀南回家乡建造了萧家庄园。

其时鄂督王占元在湖北实行残酷统治，各界人民发起驱王运动，要求“鄂人治鄂”。其中一派人士暗与萧耀南联系，准备取而代之。曹锟、吴佩孚暗中拟定以萧耀南接替王占元为湖北督军，因为萧是湖北人，符合鄂人治鄂的要求，又能完全听命于己。这时，蒋作宾、孔庚、李书城等人则另辟途径，到湖南请兵，请求湘军“援鄂”驱王。1925年7月，湘军下总攻击令，王占元闻讯即电吴佩孚求援。在保定商讨出兵援鄂的会议上，萧主张利用这一机会把湖北拿到手，吴佩孚十分赞赏，立即委派萧为“援鄂”总司令，并密嘱萧“援鄂不援王”。萧率第二十五师7月31日到达汉口，派兵扼守重要据点，但不与王占元见面。此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占元不断催促萧军增援，萧却借口军队尚未集中，拒不发兵，同时拉拢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形成湖北内部的倒王势力。8月9日，王占元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后，被迫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同日，北京政府即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萧耀南上任后不久，吴佩孚来到汉口，连续任命其亲信担任鄂省的重要职务，将萧安排的人员全部改派，一时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萧耀南对吴佩孚不敢有一个不字，百依百顺，

完全听从吴的支使。在吴佩孚的授意下，萧向湘军提出停战建议，以期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8月下旬，直军在咸宁汀泗桥、官埠桥击败湘军，进占岳阳。此后，萧耀南秉承吴之旨意主持湖北防务。

曾经积极筹划洪宪帝制的亲日派官僚梁士诒，在张作霖支持下于是年12月出任国务总理，实行亲日政策，竭力压制直系势力。1922年1月5日，吴佩孚发出倒梁“歌电”，萧耀南追随吴攻梁，连发“青电”、“文电”、“铣电”，指责梁内阁勾结日本，并斥责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数落奉系祸国殃民十大罪状。4月，直奉战争爆发。萧耀南源源供给枪弹粮饷，使鄂省成为直方的主要军饷和军火基地。萧所辖军队虽未直接参战，但是他原地待命，既作为直系的机动部队，又可抵御支持张作霖的卢永祥部从东南方面的袭击，同时还摒除了孙（中山）段（祺瑞）奉（张作霖）三角同盟来自南面的威胁，解除了吴的后顾之忧，使吴得以全力对奉作战，击败奉军。直奉战争结束后，曹、吴为首的直系军阀主张迎黎（元洪）复位，借以驱逐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6月萧耀南通电附和。在直系的拥戴下，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不料，黎一上台，为限制各省督军的权力，以进一步达到废督裁兵的目的，分别任命了七名省长，其中汤芗铭为湖北省长。曹锟、吴佩孚本意是要将湖北完全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岂能容得异己插足，于是出面干涉，电黎元洪力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萧本人更欲总揽鄂省军政大权。在萧耀南的唆使下，湖北一些人组织了“拒汤团”，大造舆论反对汤芗铭到任。汤到汉当天，萧又发动不少人在沿江码头摇旗呐喊，拒其入境。汤见此情形，当即返回，终未到职。半月后。萧耀南宣布他是不得已循公民之请，权兼省篆。当时明白内情的人皆讥称其为“萧自兼省长”。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吴佩孚军队前往进行武装干涉，总工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吴佩孚电令各地军队开赴各车站，包围工会，破坏罢工斗争。萧耀南接到命令后，责成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镇压罢工工人，并密令

汉口警察厅、稽查处派出便衣特务，密切注意罢工动态。5日，萧派张厚生到江岸分工会，要挟交出京汉铁路总工会及江岸分工会负责人，遭到工会的严词拒绝。6日，在共产党人陈潭秋等的组织领导下，武汉十八个工团和学生联合会赴江岸举行万人慰问大会，会后万余工人游行示威，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走在队伍的前面。这次罢工与游行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恐慌，吴电示萧应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萧即任命张厚生为刘家庙铁路警路司令，部署武装弹压。7日下午，张率两营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分工会，开枪打死三十六人，打伤二百余人，捕杀了林祥谦、施洋，制造了“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萧耀南派兵封闭了湖北工团联合会、扬子江机器工会等十几个工会，毒打工人，拘捕代表，查封湖北工团联合会的机关刊物《真报》，并迫令武昌《大公报》停刊。萧并在汉宣布特别戒严，严禁人民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10月，直系头目曹锟在帝国主义及各省军阀的支持下，开始了贿选总统的活动。萧耀南对曹锟这次贿选，不遗余力，倾心相助。为配合曹锟的选举，他在鄂省召集军、政、绅、商各界联席会议，主张速选总统，为曹上台大造声势。曹锟、吴佩孚在贿选总统的时间问题上尚有分歧，萧耀南凭着与双方的特殊关系，居中斡旋，使吴转而附和曹锟，不再作梗。萧还联络直系嫡派以及与直系有关的督军、省长，共同拥戴曹锟。贿选经费由各省摊派，萧耀南不顾鄂省人民反对，承担六十万元。曹锟就任总统后，论功行赏，大封直系诸将，11月11日下令特任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受吴节制。14日，曹锟又封萧为上将军，勋一位。萧值此官运亨通之际，支持同宗族人续修萧氏宗谱，并亲自撰写了《续修宗谱叙》，谓“修明谱事”，是为“稍尽后人之义，借补往日之衍，载诵先芬，丕承前绪”[(3)]。他还请曹锟、吴佩孚分别为萧氏宗谱题写了《楚黄萧氏续修宗谱序》、《黄冈萧氏续修宗谱序》，以壮声势。

1924年2月，北京政府下令加派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第二十五

师师长职由陈嘉谟继任。这年正是萧耀南五十岁生日，他不顾人民疾苦，大举庆贺，还飞帖通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生日当天，前来祝寿的有北京政府大员，各省督军、省长或其代表，湖北各地区高级军、政长官等，贺客达五千人之多。曹锟、吴佩孚也撰联助兴。9月，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哨战的江浙战争爆发，直系从鄂、豫等省源源接济苏军。萧耀南除与冯玉祥等人联名通电讨伐浙督卢永祥外，还派王汝勤部东下援苏，将汉阳兵工厂枪弹尽数支援苏军。10月，浙军失败，鄂军张允明部首先开进上海。与此同时，第二次直奉大战也在北方进行。萧耀南援苏助吴双管齐下，忙于协筹款项，供给军需，共输送军饷二百万元，子弹五百万粒，铜元一百二十万串。10月22日，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使直军迅速崩溃。面对这瞬息万变的形势，萧耀南发出助吴讨冯通电，表示：“耀南誓随鞭镫，翦此顽凶。”并令陈嘉谟师、寇英杰旅准备沿京汉路北上援吴，后因山东、山西宣告中立，道路被阻而作罢。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全军覆没而告终，吴佩孚率残部南下，经天津至上海，萧派舰前往迎接，吴于11月17日到达汉口。

战后，国内各方势力消长：曹吴势已衰颓，段祺瑞重执政柄，冯（玉祥）张（作霖）明争暗斗，孙传芳在东南逐渐稳固。萧耀南为了达到自保的目的，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巧妙周旋，对吴佩孚、段祺瑞、孙传芳分别采取了疏远、软抗、联合的策略。11月17日，吴佩孚在武汉设立护宪军政府，萧耀南表示“保境息民”，随与孙传芳等联名通电拥段出山，否定吴佩孚的军政府，吴只得回河南另谋出路。12月初，吴佩孚在洛阳遭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崐驱逐，欲往武汉，萧耀南得悉后即电吴劝其下野，鄂省议会亦拒吴入境，吴只得在鸡公山停留下来。1925年1月，吴不待萧的同意，独自进入汉口。萧碍于老上司的情面不便以武力驱吴，但他受段祺瑞政府的任命为湖北军务督办兼省长，为避免引起段的不满，于元宵节后将吴佩孚送往黄冈，对外仍说是“拒吴保鄂”。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工人、学生于6月11日在大智门一带游行演讲，英国水兵用机关枪扫射游行群众，游行队伍沿英租界码头向北后撤，不料却被萧耀南派出前往弹压的军警挡住退路。群众被迫再次返回英租界时，各国“义勇队”和美国水兵突从北京街冲出，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打死八人，打伤十七人，数天后又有三名重伤者在医院死去。惨案发生后，萧竟向英帝国主义道歉，为他们惨杀中国民众开脱罪责；另一方面则逮捕进步人士，通缉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萧耀南在湖北遏制民众反帝怒潮、为虎作伥的行径，使湖北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

面对奉系势力逐步向长江流域扩展的严峻形势，萧耀南提出了所谓“拥段、尊吴、联冯”的主张，以对抗奉张。7月，萧与属于冯系的河南督军岳维峻在鸡公山秘密签订了鄂豫同盟条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奉系。此时，吴佩孚在岳阳同各省军阀频繁联系，图谋东山再起。吴的部下亦在汉口公然组织拥吴机关。萧耀南意识到吴再起之期不远，遂转而通电吴佩孚，敦请其出山。10月21日，吴佩孚由岳阳乘舰到达武昌，萧耀南亲率文武官员和军乐连前往码头恭迎。吴在汉口查家墩正式成立反奉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任命萧耀南为湖北讨贼联军总司令及后方筹备总司令。为满足吴佩孚的需求，萧耀南又一次在湖北调兵筹饷，扩充、改编了四个混成旅。

吴佩孚对于冯玉祥1924年11月的倒戈耿耿于怀，于1925年底与奉系捐弃旧恨，联合起来反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1926年1月，吴佩孚以鄂省为基地，分三路进攻河南，萧耀南坐镇湖北为吴之后援。

1926年2月14日，萧耀南因患肺病不治身死，时年四十九岁。

---

(1) 李懋东：《军阀萧耀南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

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总第12辑），1983年版。

(2) 刘熔百：《记萧耀南》，《实报》半月刊第24期（1936年10月1日）。

(3) 《楚黄萧氏宗谱》卷首一（上），《楚黄萧氏宗谱》今存二十余册，其中有两册是专记萧耀南生平的。

萧友梅

李俊

萧友梅，字雪明，号思鹤。原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1884年2月3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初七）生于澳门。童年随父亲寓居澳门，入私塾习旧学。因与一位葡籍牧师为邻，听其弹奏风琴，常为之神往，乃爱好音乐。

萧友梅十六岁入广州时敏学堂，习算学、格致等新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01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兼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声乐。190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同时继续选修音乐。这期间，他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积极开展了新的音乐活动和音乐教育活动，并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1906年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洪流。他常以自己的住所供孙中山同廖仲恺、胡汉民等集会，并掩护他们躲避日本宪警的追捕。1909年萧在东京帝大毕业后返国，在北京清政府学部任视学官。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萧友梅为总统府秘书。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萧友梅于5月任广东教育司科长。

萧友梅立志研习音乐，1912年11月由北京政府教育部资送留德。他先后入莱比锡大学和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专攻音乐理论及音乐教育学，并以《十七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的论著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萧友梅又转入柏林皇家大学，选修教育、伦理、音乐、美学、心理等学科，同时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作曲、指挥及配器等。他在德国直接受到著名音乐理论家李曼·谢林（Riemann Scheting）以及钢琴家泰许莫来（Teichmuler）的

传授，对近代西洋音乐有了相当的造诣。

1920年9月，萧友梅学成回国，应蔡元培的邀请，执教于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音乐发扬光大，使之无愧于文明古国的盛名，首先必须立足于音乐教育，建立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合格的音乐人才。他主张师范与专业人才并重，有了各方面的音乐人才，音乐这门艺术才能得以发展，才能对国民文化教育有助益。基于这一思想，他致力于开拓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他在北京大学与刘天华、杨仲子等一道，将音乐研究会这个娱乐性的社团改办成音乐传习所，任教务主任。同时，还主持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修科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并创办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管弦乐队——国立北大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小乐团。在这些音乐机构中，他既负责筹办行政事务，又亲临教学第一线，除讲课、辅导乐队排练、担任合唱指挥外，还编著教材，从事音乐创作。他编著了《普通乐学》、《和声学》、《曲体学》及钢琴、风琴、小提琴等教科书，创作了近百首乐曲。他的歌曲集《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是我国最早的两本作曲家个人的创作专集，其艺术歌曲《问》曾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此外，《南飞之雁语》、《女子体育》、《落叶》、《踏歌》等歌曲也都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他还撰写过数十篇论文发表于各种音乐杂志上。为了推进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他于1920年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了成立音乐学院的重要建议，但未能实现。

1927年，由奉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勒令北京的音乐教育机构一律停办，致使萧友梅惨淡经营起来的这些音乐教育之苗夭折。萧友梅十分气愤，乃南赴上海，在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下，经多方奔走呼吁，于同年11月在上海建立起我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授、教务主任。次年，蔡元培辞去院长职，由萧友梅代理院长。1929年9月。国民党政府把音乐学院降格为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

萧友梅在音乐教育中，主张教学课目、教学方法应当学习借鉴欧美成功的经验。他说："中国的音乐教育已停顿了一千多年，拿来同西方音乐比较，当然事事不如西方音乐的进化，所以西乐理论都应该学习介绍进来。"[1] 他将经费中的大部分用于聘请外籍教授，使规模不大的音专拥有许多高水平的外籍教授和欧洲一流水平的音乐家。为了造就出我们自己的专业音乐人才，他从学生入学考试、每次专业观摩以至期考、年考、毕业考等都亲自出席，严格掌握标准。他还放弃假期的休息，亲自办暑期补习班教课，以提高作曲专业学生的入学起点。音专规模虽然不大，但它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唯一的基地。萧友梅一方面招收各省学生来校学习，以便学生毕业回去在各地开展音乐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他广泛团结音乐界人士，在上海组织"乐艺社"，还出版《乐艺》、《音乐杂志》等刊物，传播音乐知识，宣传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萧友梅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制度，目的是要创造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在纪念国乐导师刘天华去世时，他呼吁："海内从事旧乐者，急宜奋起，破除成见……一面研习西乐理论，一面改良教授法与记谱法，使国乐终有发扬之一日。"[2] 他反对"全盘西化"，无论是音乐创作和器乐、声乐作品，都要"适合于中国人的耳朵"[3]，强调"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要用国语来唱本国的歌调，努力具有中国味儿的新歌曲"[4]，大力推荐、宣传并创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他与蔡元培、赵元任、刘半农等人组织了"国乐改进社"，还在音专开设民族器乐专业，规定作曲专业学生必修一件民族乐器，并且亲自讲授旧乐沿革的课程。为了创作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新音乐，萧友梅在《乐艺》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他译为五线谱的十余首昆曲。在他的遗稿中还有从《元人百种》中译为五线谱的带唱词及伴奏过门的戏曲百余首。此外，他还译谱京剧唱腔约百首。他不仅对昆曲曲调饶有兴趣，对元、清的戏曲音乐也有兴趣。他做这些准备工作，是想深入地从现在还盛行的戏曲音乐中，探索我国古代的音乐宝藏，使之能更好地发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新音乐。

萧友梅是一位具有爱国热情的音乐家，曾经在各个时期创作过一些广为流传的爱国歌曲，如1924年5月4日他发表一首《五四纪念爱国歌》，在当天国民音乐大会上演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他创作了《国耻》、《中华好》、《国民革命歌》三首，在群众中广为流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谱写了《从军歌》等抗日歌曲。“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与音专的同学组成“国立音专抗敌后援会”，组织演出队慰问抗战部队，并上街募捐支援抗日义勇军。1936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秀麿访问上海时参观音专，上台讲话时，萧友梅不许他讲日语，他只得讲德语；接着萧让学生代表发表了一篇谴责日本侵华的义正词严的讲话以示抗议。近卫秀麿要将一架钢琴赠送音专以示“中日亲善”，萧友梅严正拒绝。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友梅鼓励和支持音专部分师生到大后方去，自己忍受贫病留在上海继续办好音专。日伪威胁利诱，要他与日方合办音专，他始终不屈不移。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汉奸政权后，曾拉他去做官，他更是不予理睬，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萧友梅因多年积劳成疾，于1940年12月31日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陆仲任：《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编：《中国音乐家小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 萧淑娴：《萧友梅业绩之一二》，《音乐研究》1984年第2期。

(2) 萧友梅：《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乐研究班编《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1962年版，第54页。

(3) 贺绿汀：《纪念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先生（1884—1940）》，《上海歌声》1980年第6期。

(4) 贺绿汀：《纪念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先生（1884—1940）》，《上海歌声》1980年第6期。

萧则可

江晏琦

萧则可，字名诚。祖籍江西。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四川南溪，父亲萧运文从事药材生意。萧则可幼年就读于宜宾翠屏书院，后因无力继续支付学费而辍学。十四岁入宜宾万兴鸿锅厂当学徒，出师后从事跑街业务。

1920年9月，萧则可与族兄萧雨笙及表兄熊郁村、熊荫村等五人集资三百五十两银子，利用当时四川军阀各自为政、实行“防区制”、各地价格相差较大的特点，做“跑江边”生意。萧则可、萧雨笙、熊郁村等人携款在泸州、江安一带以较低价格购进土铁、洋钉、铁锅等，沿江而上贩往宜宾，沿途走村串乡销售。由于萧则可等人勤跑快销，勤俭节约，业务不断发展，到1923年，资金已积累到两千多银两。

20年代初期的四川，军阀混战频繁，川南宜宾作为军阀刘文辉的大本营，相对四川其他地区而言，较少受到战祸影响，商业也较为繁荣。萧则可等人为扩大经营范围，求得进一步发展，于1924年在宜宾下北街林家巷设立一个推销门市，以萧任经理。在修理门面平整地基时，挖得“宝元通宝”古币一枚，遂定店名“宝元通”，含“财源涌进，川流不息”之意。

萧则可最初经营宝元通阶段，一切因陋就简，仅收学徒一名。经营范围则从铁锅扩大到五金（元钉、铅丝、锯皮）、匹头以及煤油。萧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便利顾客为前提”招徕各界，接待顾客热情，说话和气，生意颇为兴旺。

1925年，萧则可去上海采办百货和进口物资，与上海批发商建立起稳定的邮购业务联系。1927年，萧则可又买下了宝元通对门的铺

面，开设“宝元通百货商店”，任总经理。由于宝元通是从摆摊设点起家，因而萧则可非常重视门市经营和商业信誉，严格规定售货员对顾客必须态度和气，百拿不厌，百问不烦；加之商店货物齐全，售出商品允许换、退，这样经过不长时间，宜宾百货几乎都被宝元通垄断，同业中歇业和改业的有三分之二以上。萧则可并且先后在南溪、江安、万县、嘉定（乐山）、成都、重庆等县市设立分支机构，由川南一隅逐步向全川发展。至1929年，已拥有资金三十万银两。

萧则可在经营宝元通的几年中，深感单纯经营商业难以巩固和发展其事业。因此，在宝元通取得成就的同时，他开始将目光转到工业生产，提出“以经营百货为过渡，以从事生产为目的”的口号。1930年，萧则可偕同熊荫村、黄凉尘等人专程赴成都参观工业，经实地考察后，认定“发展中国经济，应从事工业生产”。之后，萧在泸州开办联一铁厂，生产铁具、五金、机械等产品，任董事长。不久又陆续在成都开办袜厂、布厂，在云南开办茶厂。1935年，萧则可决定宝元通加入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并分别投资天津东亚毛纺厂、青岛冀鲁针厂、上海五和针织内衣厂、章华毛纺厂、鸿兴染织厂、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等。他与上述厂家建立产销联合的密切关系，得到在四川独家经营的权利，名牌产品一律印上“宝元通经销”字样，因而在四川商界的地位迅速提高。

1935年，刘湘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四川省主席，结束了四川军阀长达二十多年的混战历史。萧则可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决定将宝元通总管理处由宜宾迁往重庆，并在上海、昆明等地设立“宝元申”、“宝元昆”分支机构。鉴于宝元通货物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民生公司川江轮运，萧则可与熊郁村等人又发起组织“四川合众轮船公司”，以期自行运输。萧则可还与川东、川南一带锅商、铁矿等组成“联一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产运销结合”。至1937年底，宝元通已拥有资金一百二十万两银元，成为全国商界异军突起的从事生产事业与经营百货贸易相结合的大型企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工厂纷纷内迁，省外货源日趋减少。国民政府也内迁重庆，官僚资本大肆排挤、压抑民族工商业，宝元通面临严重威胁。萧则可不愿勾结官僚买办，制订了“独立经营”的方针，在宜宾开办宝星一厂，在重庆开办宝星二厂、三厂，在成都设宝星四厂，还相继开办了泸州皮鞋厂、宜宾食品作坊、昆明下关茶厂等，生产毛巾、皮鞋、糕点、沱茶、砖茶以及漂染棉布、印染丝绸等，以增加货源，供应后方市场需要。萧还投资合办了心生机制牙刷厂，又先后向中国毛纺厂、中国铅笔厂、义大玻璃厂、川康毛纺厂、美亚织绸厂等几十个厂家投资，建立起产销联合关系。由于抗战初期帝国主义在华外厂倾销商品的压力减弱，沿海民族工业产品入川销售几乎中断，沦陷区人口大量移入四川，为宝元通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至1943年4月，宝元通拥有资金近三百万银元，其中自办生产事业占百分之十三点四，对外投资占百分之九。商业贸易占百分之六十六，房地产占百分之十一点六。

1943年10月，萧则可在重庆主持召开宝元通总管理处主干会议，针对美军已在太平洋战争中全面反攻、日军节节败退的国际形势，决定紧缩国内门市业务，抽调资金法币七千万元，成立国外贸易机构，开拓缅甸、印度经营业务。12月，萧则可提出今后宝元通应由省际贸易扩展为国际贸易，达到国内外贸易结合。他择印度加尔各答为中心，于1944年9月设立宝元通加尔各答办事处，任命樊陶斋为经理。萧确定了“布在战时，用在战后”的国际贸易计划，就地雇用一部分华裔人员，以适应经营需要。1945年3月，萧则可将加尔各答办事处更名为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直属宝元通总管理处领导，有资金一百万卢比。萧则可规定印度公司的经营方针是：加强与英、美厂商联络，担任经销代理业务：组织生丝、麝香等出口，购买英印棉布等货进口；探询南洋商业状况，筹办仰光、新加坡办事处。其门市部进行批发销售业务，国内产品占百分之六十，英、美及其他外国产品占百分之四十。这一年，印度公司经营进出口额达四十万卢比，初步建立起了国外贸易基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国际贸易呈现出繁荣景象。萧则可抓住这一时机，于1946年6月在重庆北温泉召开扩大主干会议，将宝元通改组成立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向长江下游沿岸各大城市积极寻求发展，在国外以香港为中心，成立宝元通香港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改印度贸易公司为加尔各答分公司，资金全部转移香港，登记资金为港币一百万元。从1946年到1949年，宝元通国内贸易不仅恢复了战前在各地原有的机构，并将势力扩展到南京、广州等地；海外贸易机构从香港、加尔各答发展到卡拉奇、九龙、仰光、新加坡等地，资金由一百万港元扩大到五百零三万港元，在国外贸易上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

萧则可在经营宝元通的三十年中，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制度：一是“九等三十六级制”，将所有职工分为九等，每一等分为四级，凭业绩提升等级；其二是“三三二二”分配制，每年赚得红利，以三分给资方，三分给劳方，二分提作公益金，二分提作公积金。萧还鼓励职工入股，力图消弭劳资对立。萧经营宝元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信誉较高，还在于他有一套有效的经营管理之道：第一，职责分明，经营灵活，各分店经营管理自主；第二，注重研究顾客心理，讲究接待技术；第三，注重信息，掌握行情；第四，重视对职工的业务知识教育和爱店爱国教育，也比较关注职工的福利；第五，敢于大胆提拔、使用人才。

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加紧对人民的掠夺，造成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心惶惶，宝元通部分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宝元通经济实体受到动摇，萧则可原想在战后使宝元通获得大发展的愿望落空。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萧则可等在重庆永垭口召集公司主干会议，讨论“将来共产党胜利后我们的经营方向将如何转变”，一致认为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当上海解放之后，萧即派黄凉尘、樊陶斋赴北平，提出将宝元通日后转向国营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则可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重视，先后任川南商业厅厅长、四川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被选为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等职，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贡献。

1968年12月17日，萧则可病逝于成都。

主要参考资料

萧则可、黄凉尘：《企图走资本主义合作道路的宝元通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0年印本。

黄凉生、樊陶斋、李清法：《宝元通的组织管理及其转向国营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17辑，1983年版。

熊同元：《“宝元通”简史》，《重庆地方志通讯》1986年创刊号。

四川省商业厅：《宝元通公司贸易和生产事业的经营管理》，《四川商业志通讯》1986年第1期。

宜宾市民建、市工商联：《“宝元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宜宾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版。

宜宾市政协：《萧则可与宝元通》，藏宜宾市政协资料室。

萧长华

李仲明

萧长华，名宝铭，号和庄。原籍江西新建县。1878年12月1日（清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八）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伯父萧永寿是咸、同年间著名昆旦；父亲萧永康（艺名镇奎）是与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等名家同时期的著名丑行演员。

萧长华三岁丧母，八岁入私塾读书，十岁时与兄长荣投师景善堂徐文波门下，师从周长山、曹文奎、周长顺、裕云鹏等老师学京剧老生、老旦及文丑。十一岁首次演出，在《四进士》中饰保童。十二岁在四喜班演出《赶三关》、《回龙阁》、《芦花河》等戏。后专攻丑行，于十七岁时拜名丑宋万泰为师，打下扎实的表演艺术功底。

青年时代的萧长华曾搭小鸿奎班、天福班、同庆班、玉成班，与谭鑫培、黄润甫、王愣仙、刘鸿声、龚云甫、杨小楼等同台演出。1902年，萧与王愣仙合演《群英会》饰蒋干，把其酸而不俗、自作聪明而又尽做蠢事的书呆子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因而声誉鹊起。1905年，萧与谭鑫培合演《审头刺汤》饰汤勤，把一个狐假虎威、忘恩负义、虽貌似风雅而狡黠轻狂的势利小人的形象演得淋漓尽致，亦受到戏界和观众好评。

由于萧长华对演技精益求精，又善于虚心求教、观察生活、博采众长，所以他精心塑造了许多不同层次的舞台艺术形象，他在《乌龙院》、《法门寺》、《女起解》、《卖马》、《清风亭》、《骆马湖》、《盘关》、《李七长亭》、《选元戎》等戏中塑造的张文远、贾桂、崇公道、王老好、贺氏、前樵夫后酒保、皂隶、崔顺、程咬金；他演主角丑儿戏的《连升店》、《请医》、《荡湖船》、《荷珠

配》、《小上坟》等；唱工戏《十八扯》、《戏迷传》；婆子戏《普球山》、《探亲家》等，皆为观众所喜爱。其弟子评论："他一生所扮演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人物，虽千差万别，却各有寓意，褒贬有度，爱憎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1)

1922年至1937年，萧长华应梅兰芳邀请，与梅合作演出十五年，期间兼管富连成社的教学，还曾为徐碧云、陆素娟配演丑角。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萧长华再度与梅兰芳合作演出，直至1955年。梅兰芳主演的《西施》、《太真外传》、《贵妃醉酒》、《凤还巢》、《生死恨》、《廉锦枫》、《春秋配》、《虹霓关》、《穆天王》、《奇双会》、《牢狱鸳鸯》、《霸王别姬》等戏和徐碧云主演的《焚椒记》、《芙蓉屏》、《李香君》、《褒姒》、《绿珠》、《无愁天子》、《天香庆节》等戏中的主要丑角，都由萧长华扮演，他创造、首演的伯嚭、杨国忠、朱焕然、胡来、吴士公、柳敬亭、周幽王、孙秀等艺术形象，亦深受戏迷赞誉。梅兰芳十分敬佩萧长华的艺术和品德，认为："萧先生在台上演出的剧目，可以说凡是文戏里的丑角他无所不能，方巾丑和婆子戏，是他最拿手的……他非常关心戏曲界同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困难，他任劳任怨地办理很多与他个人利益无关的事，有时不但终日辛辛苦苦地奔走，还要自己拿出钱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2)

萧长华又是中国近现代戏曲史上杰出的戏曲教育家。1904年，由吉林商人牛子厚出资创办、叶春善主持的喜连成（后改名富连成社）科班在北京成立，叶聘萧长华为主要教师，教授生、旦、净、丑各行学生。年方二十六岁的萧长华毅然放弃了舞台生涯，把戏曲演员的最好年华和主要精力投入到当时梨园界一般人不屑一顾的戏曲教育工作中。1911年辛亥革命，科班一度营业不振，牛子厚不愿继续投资，萧长华不忍看着科班倒闭，那样不仅影响戏曲教育事业，而且不少穷苦的孩子将生活无着，他慨然拿出自己多年唱戏积蓄的四百两银子接济科班，渡过难关。唐伯弢于1932年著《富连成三十年史》说萧长

华："自任教以来，备极勤劳，无论生旦净末丑，文武各戏，无不遍为教授，迄今三十年之久，始终弗懈，该社大小五科之学生五百余人，经君为之开蒙指导者，竟十有六七焉……"直到1940年萧长华离开富社，他在喜（富）连成任教三十七年，培养出雷喜福、侯喜瑞、马连良、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李世芳、毛世来、袁世海等京剧表演艺术家。

在教学上，萧长华谆谆善诱，因材施教，摒弃旧科班打骂、惩罚学生的陋习，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教育学生"艺高不如德高"，告诫学生刻苦学艺、勿染恶习。他告诉学生们演戏要达到"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的境地。他常以著名花脸钱金福学艺的事迹鼓励学生："钱金福的拿手好戏《芦花荡》是跟一位唱武旦的老先生学的，这是谁能料得到的事？一个演员，你要是干等着老师把本事送上门来，而不懂得勤用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勤听、勤看，你就会'过宝山而空回'，你的'玩意儿'永不会进步！"[(3)] 他教育学生："舞台上演戏，不光是供人欣赏消遣，更应该教人向上，让人学好。"[(4)] 针对有的学生排演时忘了台词，即兴编词，萧长华鼓励说："不要怕难，要想办法对付，就是演砸了也无关，年轻人初上台，人们总会有个原谅的，一次砸，二次再来。"[(5)]

除了教学，萧长华还参加整理、编创和教授学生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和新戏，如《嘉兴府》、《梅玉配》、《赤壁鏖战》（八本）、《秦良玉》、《酒丐》、《胭脂判》、《得意缘》、《双合印》、《大名府》、《喜崇台》、《庐州城》等，约计四百余出。其中"三国戏"、"八大拿戏"及小丑、小生、小旦戏的整理、排演尤为出色，令观众耳目一新。萧长华晚年曾撰文《午夜挑灯修史剧》，回忆当年在科班教学之余，参照《三国演义》，整理《赤壁鏖战》剧本的艰辛。他白天教课，晚上便摆起炕桌，点上油灯，对照着小说和剧本，逐字逐句琢磨推敲，认为顺畅合适的地方就写在纸上，弄不通的地方记下来，次日求教他人，每晚看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有时通宵达

旦；有时困极了，坐在那里竟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发亮。数九寒冬，他仍在孤灯下苦读钻研，凝神剧本竟忘了寒冷，只是早上一照镜子，鼻孔被油烟熏得黑黑的。为了全力投入教学和整理、编排剧目，萧长华从1914年到1922年辞班辍演八年，舍弃了优厚的演出收入，保证了科班的教学质量。

1950年后，萧长华历任京剧实验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前身）名誉教授，中国戏曲学校副校长、校长，主持教学近十七年，培养出刘秀荣、袁国林、孙岳、朱秉谦、张春孝、张启洪、寇春华等优秀演员。他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奖状，1957年获文化部颁发的荣誉奖状。1955年、1958年参加《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和《群英会》、《借东风》戏曲影片的摄制。1967年4月26日去世。著述有《萧长华演出剧本选集》和《萧长华戏曲谈丛》。

---

(1) 钮骠：《京剧瑰宝长华老》，《老人天地》1984年第6期。

(2) 梅兰芳：《萧长华先生的艺术劳动和道德品质》，《戏剧报》1957年第24期。

(3) 贯大元：《萧长华先生八十寿辰》，《大公报》1957年12月。

(4) 刘元彤：《德厚流光——缅怀戏曲教育家萧长华先生》，钮骠编《萧长华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5) 徐兰沅：《洗脱尘畦，独标新趣》，钮骠编《萧长华艺术评论集》，第288页。

谢持

罗敏

谢持，字慧生。四川富顺人。生于1876年1月18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谢持自幼家境清贫，四岁入塾。据曹四勿所撰《谢持》传中记述："先生幼年除耕作外，同时在小烟店操学徒业。工作时，既在柜面搓纸捻（吸旱烟用）谋微利，又在膝盖上摊书阅读，求学极为艰苦。家中的活计，如打柴、挑水等，都躬自操作。日负柴数十斤，且奔走数十里，直到二十五岁为止。"[(1)]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惨遭杀害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为四川富顺人，谢持因此深感愤慨，萌生革命思想。1900年至1902年就读泸州川南经纬学堂期间，接受革命思想，结交了黄复生、黄方、吴玉章、方潮珍等一批有志青年，共同求索经邦济世之道。1907年2月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富顺县分部长，领导开展川南同盟会的各项活动。同年八月，谢持到成都后，开始主持四川同盟会机关事务。联络防营陆军，召集会党，积极筹划成都起义。同年11月，密谋已久的起义计划因事机泄漏，谢持被清政府通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四川革命党人继起，兵不血刃，光复重庆。重庆军政府成立后，谢持推却都督职务，任总务处长。

1913年3月，谢持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国民党人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谢持于是由沪挟炸药及黄兴交给的三千元经费前往北京，密谋运动倒袁。5月17日，谢持在北京被京畿陆军执法处逮捕。后因搜查无所获，参议院又提出质问，谢持暂获幸免。为了躲避北京政府的追捕，谢持曾两度流亡日本。1914年8月，正式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副部长。总务部为中华革命党之核心，谢持曾在《自述》中简要记述其经历称："总务部之责任本重，凡党人之入内而出外也，皆取决焉。……党人之客日本也不多给，而

党部按月饮之，由总务部核定，有弗之给或给而不足者则怨，至有以掌击余，于是知不顾公家之艰难，虽党人亦有如是之甚者。”[2]

1917年8月，谢持南下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曾先后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议、护法军政府代理秘书长。1919年1月26日，孙中山离粤赴沪后，由谢持代行总裁职权。主持粤局期间，谢持一方面以代总裁身份参加军政府政务会议的议事活动，一方面积极协助孙中山建立四川革命根据地。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军政府撤销。谢持被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兼理中国国民党党务。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谢持受命前往香港筹款。所筹款项对事变后之应急处置至关重要，据史料记载称：“大部分之款，均遣人送到座舰，其余则为议员被叛军迫离广州经港赴沪者川资之用。谢秘书长一面接洽各方，一面派遣同志，每日不分昼夜，附送报告和款项。”[3]

由于陈炯明之叛变，广州非常国会被迫解散。北洋政府趁机排斥护法议员，于8月1日召集旧国会议员在北京集会，宣布要承继民国六年二期常会。这样，不仅在广东的全部护法活动可能被视为非法，北洋政府还可能借此招牌在政治上合法化。九十月间，谢持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北京，领导护法议员在国会中的斗争。据邹鲁《回顾录》记称：“这次国会究竟应该继续民六或民八，成为一切先决问题，我和谢持先生力主继续民八；因此所有赞同继续民八的议员们的行动和言论，都由我们两人领导。”[4] 这一时期，谢持除在国会奋争外，还设法拓展国民党在北方的党务工作。

1923年3月26日，孙中山离沪前夕，委任谢持为全权代表，代为主持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本部工作。1924年1月16日，谢持离沪赴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之一，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谢持是率先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之一。1924年6月18日，他以监察委员身份，与邓泽如、张继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10月17日，谢持提请辞职。据《日记》记称：“提辞职书，辞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盖因病旷职，而又恶共产派之横恣也。”[5]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谢持因涉嫌受牵连，于9月初离粤赴沪。9月底，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筹组召开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正式会议于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史称“西山会议”。会议决议取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宣布永久开除谢持、邹鲁二人的党籍。“西山会议派”亦针锋相对，于4月1日在上海召开所谓“二大”，公开与广州抗争。直到4月10日闭幕的整个大会，除了5日由邹鲁主持之外，皆由谢持任大会主席。谢持当选为上海“二届中央”的常务委员，并实际主持上海环龙路党部的日常工作。

1927年3、4月间，蒋介石决心清党反共前夕，一面派吴稚晖等暗中与“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人疏通，一面仍继续主张“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四一二”政变期间，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面奉蒋之命，解除由共产党所组织的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查封设于环龙路四十四号的“西山会议派”所设的上海中央党部。谢持对蒋介石这种“挟智任术”的做法，内心深感忧虑，4月19日在日记中写道：“清党之气颇振，主军政者挟智任术，舍大路不由而以伪先天下。吾人守西山会议之正，初无所损益，然欲导天下于正，不几南辕北辙耶！故为国须识大体。”[6]

1927年9月15日，国民党宁、沪、汉三方中委分别在南京召集临时会议，决议正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统一党务，并于三个月内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谢持被推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三人常委之一，并任中央组织部长。特委会成立后，因汪精卫之公然反对、蒋介石之不合作，前途荆棘。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伐唐（生智）胜利之大会时，发生骚乱，致死伤多人，是为“一一二

二”惨案。事后，别有用心之一方将矛盾直指谢持与邹鲁等人为主使杀人者。谢持因受牵连，对纷乱的政争表示厌恶，于11月26日离开南京返沪，在日记中记称：“政争，乱之源也。吾不人竞，吾不能止乱，惟退而息耳。”[(7)]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谢持对此颇有微词，在日记中写道：“介石受国民政府之命复总司令职，殆不信不义之尤耶！是非不顾也，先后言论行动之矛盾不顾也，出尔反尔不顾也，惟权位是重。虽然，亦姑视介石今日以后之行为何如，吾不欲苛责。”[(8)] 寓居上海期间，谢持多次拒绝南京方面入京之邀请，积极谋划“西山会议派”之言论喉舌——《江南晚报》的扩张及《清党实录》的编印。

1929年9月中下旬，谢持北上天津、北平，参加北方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反蒋运动。12月12日，南京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开除汪精卫、谢持等人的党籍。谢持等人于次日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此后，谢持积极参与筹组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1930年8月7日，扩大会议于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并推定谢持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谢持还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

扩大会议失败后，谢持化名李佛生，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在天津建立反蒋联络站[(9)]。当时北方的众多反蒋的军人都秘密加入谢持所主持的反蒋联络站之中。1931年3月1日，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因约法之争遭蒋介石囚禁后，各方反蒋力量再次聚集，5月27日，汪精卫、邹鲁、孙科等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谢持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谢持返沪，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谢持先后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1931年年底，谢持身体急剧恶化，全身瘫痪，自此一病不起，很

少与闻政事。1939年4月16日，谢持在成都东郊厚生农场去世。

---

(1)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2)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第77页。

(3)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第166页。

(4)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01页。

(5)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第199页。

(6)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第289页。

(7)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第308页。

(8)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第319页。

(9) 谢幼田编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第362页。

谢奉琦

周茂江

谢奉琦，字能久，号玮颋。四川荣县贡井乡（今自贡市贡井区）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谢家祖籍湖北，先世于明代洪武年间迁往四川，定居在荣县贡井乡。父名坚，字固之，1887年授江苏铜山县利国分司巡检，即将赴任时突然病故。1897年丧母。谢奉琦幼年时就读于私塾，天资聪慧，刻苦自励，1902年入富顺县炳文书院学习，不久转学贡井乡旭川书院，成绩为同窗之冠。当时，谢奉琦的二叔在苏州任通判，多次书信令他前往，但他仍坚持在家乡书院学习。1903年谢奉琦应县试，旋即又赶赴嘉定（今乐山）应府试，均未中。经历两次失败，谢奉琦对科举制度更加憎恶，曾曰："天方丧乱，国事蜩螗，士者国家恃以为栋梁，而徒咿唔呫哔于章句间，以期揣合当世，国何贵乎有是？"(1)

1898年戊戌变法后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远走海外，而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却主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举国上下反清呼声日益激烈。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号召人们起来驱逐列强推翻清廷。受此影响，谢奉琦下定决心追求革命。

当时，贡井地处荣县、威远、富顺盐业的产销中心，乡绅巨贾均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谢奉琦对此十分痛心，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得知日本由弱变强之道后，毅然辞别亲友赶赴成都，进入东游预备学堂攻读日语，为赴日做准备。

日语基础打好后，1904年谢奉琦与黄治皋、黄选舟、傅缉生等人

自费从重庆乘船东下。到达江苏南京时谢奉琦绕道去苏州拜望二叔，向其禀告自己赴日留学的抱负，甚得二叔的赞扬。同年到达日本东京，谢奉琦住在久保田方处，不久考入成城学校，与荣县吴玉章等人同学。1905年上半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续订华工新约，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以上海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如火如荼，遍及全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响应。谢奉琦、吴秉钧等四川留学生在上野公园集会，商讨抵制美货的办法，决定与成渝等地取得联系，全面掀起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潮[(2)]。他们的举动推动了成渝等地抵制美货运动，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

后来因嫌成城学校组织不甚完备，谢奉琦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理化。在学习期间，他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探讨学问，并与学友詹肇甫、吴文伯等翻译编辑有关理化的教科书，准备介绍给国人。

1905年8月2日，谢奉琦由黄兴为主盟人，正式加入同盟会[(3)]。8月20日，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全国第一个统一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参与者多为留日学生和爱国志士。谢奉琦对革命充满激情，因而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委任他以调查评议要职，常与黄复生、熊克武商量革命事务。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清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非常活跃，便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11月，日本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规则一经颁布，立即遭到全体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很大一部分同盟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谢奉琦等人约集起来向清廷驻日公使提出交涉。在学生们的坚决斗争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答应中国留学生提出的条件，承认中国留学生的合法地位。反日斗争取得胜利后，谢奉琦返回早稻田大学继续学习。

经过这次斗争，谢奉琦看到情势危困之际想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其革命救国的信心益发坚定。为研制威力大而又便于携带的炸弹，谢奉琦常与川籍同盟会员熊克武、黄复生等一起秘密研制炸弹。正巧此时广东三合会首领梁慕光因惠州起义失败，亡命来日。经孙中山的介绍，谢奉琦、黄复生等人去横滨向梁学习制炸弹的方法[(4)]。1906年初，谢奉琦结识了日本革命志士宫崎寅藏，经其介绍进入日本小室氏私立兵工厂学习制造枪弹技术。

孙中山非常重视四川革命运动。1906年6月，孙中山委派黄复生、熊克武、谢奉琦为四川“主盟”（负责人）。7月底，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应在日同盟会员之邀前往日本东京，由黄复生等介绍面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是年冬，孙中山欲派佘英联络川、滇、黔三省会党和沟通长江青、红帮，扩展革命力量，但考虑到佘英为武人，于是又派谢奉琦、熊克武回川，共同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伺机组织起义[(5)]，说：“吾国革命用兵，当在扬子江之滨，四川乃其上游也，宜亟图之。”谢奉琦、黄复生、熊克武“可与佘英等共肩期任”[(6)]。不久，谢奉琦等人即购得大量弹药回国。

谢奉琦、熊克武、佘英等回川后，积极准备发动军事起义的工作。数月之内，谢奉琦十次往返于成、渝、泸、叙等地，设立革命机关，宣传革命大义，吸收党人，组织学生。

1907年4月，谢奉琦、黄复生、熊克武等于成都草堂寺多次召开军界、学界部分革命党人会议。此后，他们在学界、军界中发展同盟会员数百人。5月后，在川南、川东各地吸收了当地一些有声望的人士。5月底，谢奉琦等将同盟会机关设于泸州邓邦烈家。邓为世宦人家，住宅宽敞，便于掩护革命活动的开展。谢奉琦、熊克武等人以此为基础积极联络党人发展盟员。在他们的出色工作下，川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泸州也成了全川革命的重心。

1907年夏，谢奉琦、熊克武、黄复生等三十余人在成都草堂寺召

开秘密会议，决定遵照同盟会总部的批示，分叙府（今宜宾）、泸州、成都、江安四路发动军事起义。谢奉琦认为叙府地势险要，为川、滇、黔三省要害，又为川东南商业中心，如此地得手，上可进成都，下可临重庆，便主动承担组织叙府起义的重任。夏末，谢奉琦来到叙府。当地仅有罗仲渠、凌体萱、聂次苟、刘永年四位同志，革命力量薄弱。谢奉琦打算暗杀知府宋联奎，后因宋防范甚严而作罢。当时雷波彝民起兵反清，清政府调遣巡防军进行围剿，致使叙府兵力空虚。为了分化瓦解清军，谢、凌二人在巡防军中开展工作，动员叙府中堂勇管带刘绍峰、县幕詹树棠加入同盟会，并通过他们发动叙府宜宾县堂勇二百余人参加起义。谢奉琦又派人去屏山发展哨官李飞鹏、李忠臣入盟，从而控制了巡防军，还联络屏山党人杨功甫、聂芹轩等数十人配合行动。不久由熊克武、佘英等组织领导的泸州、江安、成都的起义先后因事泄而无法实施，革命党人于是逐渐聚集到叙府坚持战斗。1907年冬，谢奉琦、熊克武、佘英等商议在1908年1月14日发动叙府起义。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起义计划，熊克武、佘英前往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发动会党，熊克武率部住在金沙江对岸的冯家坝，谢奉琦领导府县团队官佐人员参加行动并负责屏山、百花场来援之事。一切安排就绪，只等起义那天的到来。

预定起义的这天傍晚，事先约集的数百人已经奉命集结城外，原定由城内刘绍峰、詹树棠首先起事，城外数百人便冲进城去，里应外合围歼清军占领县府。可是城外人等到晚上九十点钟仍无动静。原来是县办中央团队的雷东垣事前已将起义全盘计划泄露给知府宋联奎。宋联奎闻讯后立即逮捕了刘、詹二人，后将二人杀害。谢奉琦知晓此事后立即赶往城外与起义同志会合，并告知起义计划已泄露无法再继续斗争。当时多数同志认为情势紧迫，为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只好转移到其他地方，再行起事。不久，宋联奎大肆搜捕屠杀革命者，死难者多达二百多人。谢奉琦则回到家乡贡井。

宋联奎已经获悉谢奉琦为叙府起义领导人，乃悬重赏捉拿谢奉

琦。同盟会叛徒汪蔚然见利忘义将谢奉琦出卖。当宋派巡防军到贡井追捕谢奉琦时，有人劝他暂时避避风头或可保住性命。而谢奉琦坚定地说："吾首倡义于吾川，讵料中偾，己策不善，于人何尤，丈夫殆则死耳，去亦何为？且事败而图苟免，非勇也！吾方以节义声天下，振民儒，激来者，吾安之。且吾去，必多株连，吾孰若拼一命以予他人之死，彼不死者，得鉴我微诚，续踪而起，计万全企其成，则吾虽死而不死矣！复何惧乎！"[7] 1908年2月，汪蔚然带领清巡防军便衣来到贡井。汪蔚然先是只身找到谢家声称有要事与谢奉琦面谈。谢奉琦知道汪是同盟会员对他毫无戒备，与汪结伴来到茶馆。谢奉琦刚一落座，预先埋伏在茶馆里的便衣一拥而上，在他后背上横砍一刀，谢奉琦猝不及防不幸被捕。

谢奉琦被捕后经富顺、泸州押往叙府。捕役们认为他留学过东洋，有飞檐走壁之功，唯恐中途让他跑掉，竟然惨无人道地用铁链穿过谢奉琦的左锁骨，并挑断其脚筋。谢奉琦强忍剧痛，沿途向群众宣传排满大义，鼓吹革命。他的英雄气节使围观群众深受感动。

谢奉琦被押至叙府后即遭宋联奎的审讯，谢奉琦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毫不讳言。宋要谢奉琦交代同党，否则难免一死。谢奉琦不屑一顾地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吾死，归耳。且自我作之，自我任之，何必党？"[8] 宋联奎恼羞成怒，决定杀害谢奉琦。

谢奉琦宁死不屈的品格感动了四川臬台赵藩，遂设法营救。但宋联奎执意判处谢奉琦死刑。赵藩对此怒不可遏，一怒之下辞官返回故里。

1908年3月27日，谢奉琦神色泰然，从容走上刑场。临刑前仍然慷慨陈词，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朝，并索要纸墨赋绝命诗一首，然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四川光复后，泸州革命党人设法抓捕并处决了叛徒汪蔚然，以告慰谢奉琦英灵。

1912年3月12日，蜀军政府公布谢奉琦为四川死义烈士。同月，在南京的川籍党人黄复生、熊成章、吴玉章、任鸿隽等上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拟请“援吴禄贞烈士例，将邹容、谢奉琦、喻培伦、彭家珍四烈士，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并请崇祀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根据川人的呈请，孙中山以谢奉琦“在蜀运动起义”“功在民国不小”，着令陆军部对谢奉琦“改照陆军左将军阵亡例赐恤，仍准崇祀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9)]。

民国初年，叙府军民在谢奉琦就义处建“谢将军祠”以示纪念，并将叙府水洞口街改为“谢将军街”。谢奉琦家乡贡井街曾命名为“玮颋路”，并赠匾故居书：“左将军府。”

主要参考资料

何得方、李静轩：《谢奉琦烈士事略》，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发行，1961年版，第160—164页。

---

(1) 何得方、李静轩：《谢奉琦烈士事略》，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发行，1961年版，第164页。

(2) 谢淑明：《左将军谢奉琦》，四川省荣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91年版，第79 - 80页。

(3)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四川籍会员名册》，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4) 黄三德：《一生革命　两袖清风——记辛亥革命英雄黄复生》，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 - 67页。

(5) 陈必：《谢奉琦》，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人物编辑组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6) 萧仲仑遗稿：《叙泸永及成都之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第11辑，1964年版，第57页。

(7) 谢淑明：《左将军谢奉琦》，四川省荣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纪念辛亥革命暨荣县独立八十周年专辑），1991年版，第84页。

(8) 谢淑明：《左将军谢奉琦》，《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85页。

(9) 令示：《大总统令陆军部恤邹谢喻彭四烈士文》，《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1912年3月29日，第3 - 5页。

谢晋元

李飞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镇平（今蕉岭）人。生于1905年4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世居镇平同福乡尖坑村。父亲谢发香是个小贩，母亲李氏是渔民的女儿。谢晋元兄弟姐妹共十一人，一个哥哥，九个姐妹，谢晋元排行第五。由于家境贫困，姐妹大多从小送给别人，哥哥独自去南洋谋生，后来贫病早逝。谢晋元幼年在家乡育民学校和三圳公学读书，继入梅县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预科肄业。1925年12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肄业，次年10月毕业参加北伐，历任排、连、营长、参谋主任及团附等职。

1936年日本侵华形势日紧，谢晋元将眷属送回广东原籍。临别时对其妻凌维诚说："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遗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之素志也。"并说"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嘱咐其妻奉养双亲及儿女[(1)]。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时，谢晋元适任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二六二旅旅部参谋主任。是年8月11日该部奉调由无锡开赴上海增防。8月13日沪战爆发。谢晋元所在之旅参加上海闸北八字桥之役，与敌血战。9月间该旅第五二四团团附负重伤出缺，谢晋元遂补任该团团附，率部防守北火车站，坚守阵地达两月之久。

10月26日，大场失守，闸北、江湾守军奉令撤退，五二四团担任断后工作，掩护大军退却。谢晋元奉令率领第一营（营长杨瑞符）扼守要点。27日晨四时许，中国军队全部撤竣，谢晋元遂率所部将士据守西藏路新垃圾桥北堍四行仓库内，构筑防御工事，准备与日军血战到底。天明以后，日军大队开到，发动猛烈进攻。谢晋元率部雄踞仓

库大楼沉着应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敌伤亡惨重，不敢率尔轻进，只得改采包围形势，伺机进袭，均遭挫败。

租界上的英国驻军目睹谢晋元团孤军困守四行仓库，地处绝境，曾多次劝说孤军卸去武装，准予退入租界，愿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但谢晋元毅然谢绝，他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2)] 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谢团孤军死守四行仓库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传开后，上海市民莫不敬佩感泣，称他们为"八百壮士"（实际人数为四百余人）。连日来从早到晚有数万群众麇集苏州河南岸遥望，群情激昂振奋，对孤军赞叹不已，纷纷隔河挥帽致敬，连租界上的外籍人士也对孤军深表敬佩。中外人士携食物用品支援孤军者络绎不绝，但苦于交通阻绝，无法输入。10月28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子军杨惠敏潜往四行仓库，向孤军致敬，并献国旗。孤军将士即将国旗升上仓库大楼屋顶，周围观看的群众欢声雷动，外籍人士也深受感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关怀进一步鼓舞了孤军的抗敌斗志，他们精神抖擞，严阵以待。是日晨，谢晋元亲手击毙两名潜踵攀楼的日本兵，租界上环观之民众皆拍手欢呼。29日，某团体接到谢晋元从四行仓库写出的信函，信中表示"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3)]。激昂慷慨，令人起敬。四行孤军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国内外，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敬仰，而且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赞扬。但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害怕战争危及租界安全，乃电请国民政府下令孤军撤退。31日凌晨，孤军奉令撤离四行仓库，由新垃圾桥退入租界。谢团孤军坚守四行仓库计四昼夜，毙敌百余人，伤者无数，孤军仅牺牲十余人[(4)]。

谢晋元本打算撤退后通过租界向沪西方向归队，重新投入战斗。不料退入租界后枪械被租界当局收缴，人员也被羁留起来，"始知已陷入黑暗底深渊"[(5)]。全体孤军被羁禁在胶州路兵房，称"孤军营"，由租界万国商团派武装看守。在这艰苦的环境中，谢晋元身为孤军领

袖（后晋升为团长），督管孤军营的内务励精图治，制定了教育、体育、生产各项计划，勖勉部下“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6]。孤军自办伙食，学习技能，开办肥皂、线袜等生产工场，并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锻炼体格。为了不忘抗日爱国，谢晋元督率孤军坚持出操上课，并举行精神升旗典礼。除训练部属外，谢晋元勤学不辍，自修外文，并不时为文告激励“孤岛”同胞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曾勖勉部属说：“在上海租界上，我们的言行，必须使友邦从我们身上看出中国军人之气概，从此认识中国的真精神。”[7]上海人民对孤军十分敬仰和关心，许多群众团体向租界当局交涉，组织人员到孤军营参观访问，并捐款慰劳孤军。但孤军营的羁禁生活对谢晋元刺激很大，他内心十分苦闷，以致长期失眠。谢曾作诗述怀：“勇敢杀敌八百兵，千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8]

1938年8月，谢晋元为“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双重纪念周年，向租界工部局交涉要在营内挂国旗，工部局阻挠不允。8月11日晨，孤军在营内升起国旗，万国商团派白俄队冲入孤军营抢旗逞凶，手无寸铁的孤军为护旗与之肉搏战斗，有三位战士为保卫国旗而牺牲，负伤百余人，孤军当即绝食抗议。第二天，工部局又将谢晋元等官佐十余人移至外滩白俄队司令部幽禁，全体孤军继续坚持绝食斗争。孤军的斗争得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和声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撰文“向羁留在沪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致诚挚慰问之意”[9]。上海纳税华人会、市商会及各群众团体也纷纷向工部局抗议和交涉。租界当局被迫让步，郑重送还国旗，抚恤死难人员，谢晋元等人于10月7日回至孤军营，孤军终于获得斗争的胜利。租界当局的无理限制和虐待，使谢晋元非常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弱国国民处处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战，等待何时了？”[10]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处于积弱的地位，工业大部操于帝国主义者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11]，必须奋斗才能维护民族独立。

谢晋元身羁租界期间，日伪曾向他多方威胁利诱，均遭拒绝。1939年9月，谢晋元鉴于上海形势恶化，作书寄其父母，表示准备以身殉国，决不向敌人屈节投降。信中说："上海情势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此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12) 后汪伪上台，曾派人诱谢变节，也遭其严拒。汪伪诱降不成，遂策划阴谋，派人收买孤军营内部不肖士兵暗杀谢晋元(13)。

1941年4月24日晨，谢晋元督率全体孤军举行精神升旗礼后列队跑步，突有郝鼎诚等四名叛兵取出匕首向谢晋元猛刺，谢身负重伤殒命，死时年仅三十七岁。谢晋元死后，上海各界人民深为震撼，前往吊唁者达三十万人(14)。5月8日，重庆国民政府下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曾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15)，并优恤其遗属。

---

(1)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抗战英雄传记》，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29页。

(2)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抗战英雄传记》，第31页。

(3) 汉口《扫荡报》1937年10月30日。

(4) 汉口《扫荡报》1937年11月1日。

(5) 上海《新闻报》1938年8月1日。

(6) 重庆《时事新报》1941年5月8日。

(7)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抗战英雄传记》，第35页。

(8) 《陆军第七十一军“八一三”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公祭特刊》，1945年版。

(9) 《群众》周刊第2卷第8、9期合刊（1938年8月）。

(10) 朱雯编选：《谢晋元日记钞》，正言出版社1945年版，第66页。

(11) 朱雯编选：《谢晋元日记钞》，第99页。

(12) 据凌维诚所存家书影印件。

(13)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2，目录号508。

(14) 上海《中美日报》1941年5月12日。

(15) 据凌维诚所存“上海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处通知”第2347号（1949年10月27日）。

谢无量

杨伟立　马宣伟

谢无量，原名蒙，号希范，字无量。1884年6月28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六）出生于四川乐至县。他的父亲谢维喈系拔贡出身，先后在安徽当涂、桐城、芜湖等县任知县。谢无量四岁时随父母去安徽，由父亲教他读唐诗，日课五绝一首；也读经书，学作八股文。十二岁时，他已经阅读了许多中国古籍，特别爱好史书，喜论古今兴亡成败史事。1896年，具有维新思想的汤寿潜携马一浮到安徽，谢拜汤为师，与马结为朋友。汤熟习时务，研究经世之学，对谢启发甚多。

少年谢无量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读书之外，还想到外地游历，开阔眼界。1900年6月，他第一次出游，取道上海转北京。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谢目睹慈禧、光绪出奔时沿途骚扰情况，后来回忆说："此次以数月之时间，所历途程数千里，经过黄河、太行之险，游踪所至，饱看北方民生疾苦，及满清封建统治种种对我民族摧残之事实，第一次启发我革命意识，是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件大事。"(1)

1901年，谢无量绝意科举，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学习。课余，与马一浮等创翻译会社，编辑出版《翻译世界》杂志，内容多系世界名著，也有社会主义书籍，月出一册，共出了六册。这时期，他颇受新潮流影响，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诸人，为《苏报》撰稿，参加"爱国学社"举办的讲演会。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谢离开上海去日本学习。不久，马一浮从美国到日本，送谢《资本论》第一册，这是谢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端。1904年3月，谢从日本回国，欲觅山水秀丽之地读书，先后寓居镇江焦山、杭州西湖，也在当地学校任教。1906年7月，谢重游北京，担任《京

报》主笔，每天撰写社论一篇，评论时事。

1909年，谢无量被聘为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兼授词章一科，潜心研究文学。时年二十五岁，在教师中最为年轻，与尊经书院的年长者廖季平、吴伯朅等人结为忘年之交，深相契合，人称他为“小谢”。

1909年10月，四川成立谘议局，谢无量常和蒲殿俊、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他曾受托撰《国会请愿书》，指出：“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救危亡于万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2)]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主权，激起全国特别是湘、鄂、粤、川人民的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8月下旬，成都开始罢市、罢课、抗捐、抗粮。谢无量和蒲殿俊、杨沧白、张澜等人加强联系，参加保路运动。

1912年夏，谢无量离川赴上海，为中华书局编书，陆续出版《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1917年经杨庶堪、熊克武介绍，谢无量在上海谒见孙中山，谈论颇为融洽。五四运动爆发后，谢无量对新文化运动持支持态度，经常在《新青年》发表诗作，并开始用白话文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学小册子数种，其中《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收入《万有文库》时改名《马致远与罗贯中》）一书颇为鲁迅所称道；连同《楚词新论》、《古代政治思想》三种为孙中山所赞赏。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筹议北伐及改组国民党。谢无量适于此时游粤，先受聘在广东大学教书，不久受孙中山委

任为大本营参议。同年秋，谢奉孙中山派遣，与孙科、陈剑如到沈阳见张作霖，商量联合讨伐曹锟、吴佩孚问题，达成讨直协议。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5月谢任大元帅府特务秘书（即机要秘书）。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6年7月，谢无量转入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任教，兼历史系主任，讲授“历史研究法”，“以唯物史观为主，痛驳梁启超之历史研究法，是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第一讲座”[(3)]。1927年9月谢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谢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在上海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彻底抗日。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谢即把《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天著文痛诋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主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蒋、汪退让，民情益愤。在抗日救亡声中，谢无量写成建设四川的《意见书》。他认为中国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都集中在沿海一带，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在短期内即可从海空轰毁，置我于死地；（二）中国没有大陆上的交通干线，国际交通全靠上海、天津等几个重要商埠，对外作战期间，易为敌人封锁，使中国坐困以毙。他说，要排除这两个弱点，中国必须在内地建设工业基础，同时开辟贯通大陆的铁路干线；在此基础上，再以四川为中心建设西陲（包括川、滇、黔、康、藏、青、新七省）。西陲的建设，应从建设大规模的工农业着手，农业包括粮食及工业原料的生产，工业包括轻重工业、化学工业及军事工业等。如此，西陲进可以成为建设整个中国的基础，退可以作为复兴中国的根据地，这是一条民族生命线。《意见书》中还提到开辟新的大陆国际交通干线和新的经济中心——大成都市的建设问题，以及如何宣传教育、集中民间财力、设立银行网、推行信用制度、吸收康、藏、新、青的金货投入建设等问题。谢无量关于建立强大后方的见解是卓越的，但是当时四川的军阀正忙于内讧，没有采

纳这些意见。

1936年1月，沈钧儒等在上海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谢无量参加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谢去香港，原打算游历南洋，未能成行，在香港卖字为生。不久辗转取道广西，经衡阳回四川。1940年，谢无量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城内部中文系主任，仍以卖字补贴生活。常与在乐山办复性书院的马一浮以诗歌相唱和。

1947年，谢无量当选为国大代表，在南京开会后，住在上海以卖字维持生活。1949年2月回到重庆，应熊克武之邀担任中国公学文学院院长，暑假后回到成都，静候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无量先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3年12月10日，谢无量因病在北京逝世。

谢无量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佛学大纲》、《伦理学精义》、《老子哲学》、《诗学指南》、《诗经研究》、《楚词新论》等。

---

(1) 谢无量：《自传》（手稿本），陈雪湄藏。

(2) 陈雪湄提供之资料。

(3) 谢无量：《诰授中宪大夫谢公维喈行状》，唐受藩等修《乐山县志》，成都美利利印刷公司1934年版。

邢士廉

张志强

邢士廉，字隅三。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奉天府（今属沈阳市东陵区前进乡木匠屯村）人。邢家累世务农，较为殷实。至其父辈家道中落，除百余亩田产外，城里还有一个小作坊。邢士廉大排行老六，所以也有称他为邢子六的。他幼年启蒙于乡塾，及长想到城里去读中学，其父和管家的二哥却不支持，认为进城读书花费大，不如购买田产发家致富。后经亲朋说和才被允进城，考入省立第一初级中学，学业突出。

1908年，邢士廉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先在振武学校补习两年日语，再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骑兵科学习，与杨宇霆等同学。辛亥革命期间，不少留日学生中止学业回国参加革命，而邢以军人不干政为由，未曾卷入革命浪潮。但他对于校方规定有几门课不允许中国学生学习，以及日本军官士兵对中国留学生的轻蔑，则表示不满。

1913年，邢士廉毕业归国。当时东北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但在奉天掌权的依然是前朝旧臣张锡銮（时任奉天都督）和地方实力派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师长）。他们对曾鼓动过革命的新式军人，特别是留日学生是不欢迎的。蓝天蔚、张绍曾、张榕等革命领导人或被驱逐，或遭暗杀。邢不是革命分子，一时也未谋到什么差事，后经奉天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的推荐，他于1916年去齐齐哈尔充任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教练官。孙烈臣督黑，邢为督军署参谋。1920年3月，升为中校参谋科长，与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臧式毅同僚。不久，邢又转任军警处督察长、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谘议等。

1921年6月，邢士廉出任东北陆军第十九混成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旋又改任中东铁路护路军哈长司令部参谋长，长春、绥芬河铁路警备副司令等职。随着官职的升迁，他开始有机会接近奉系上层人物。

1922年5月，当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时，吴佩孚策动高士傧在绥芬河地区制造武装动乱，偷袭奉系后方。张作霖命令张宗昌、张学良率军前往弹压。在平定动乱中，邢士廉除以护路防区副司令的职责保障中东铁路运输之外；还派出部队配合作战，在生活上对张学良等多所照顾。动乱平定，邢被列为有功人员。其后，在中俄中东路事件中，邢按照奉张的意图接管了中东铁路部分警备事项，得到奉张青睐。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积极整军经武，准备一雪前仇。当时奉系内部有新派、老派之分。新派又分为士官系和陆大系。张作霖对士官系的核心人物杨宇霆十分器重，而邢士廉则是紧靠杨宇霆的，所以也成为新派的得势者之一。

当时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之间开始酝酿反直联盟（即所谓的三角联盟），孙中山意欲分化瓦解北方军阀以便各个击破，而张、段等也想借重孙的声望以扩大自己的影响。1923年，邢士廉、宁武、盛世才等奉张作霖派遣，秘密将一些枪械和现款送到广州，交给孙中山。邢之此行还负有实地考察广东政府实力的任务，返奉后他在报告中提出，奉、粤本不是一码事儿，奉系没有必要白送礼。

1924年，邢士廉被提升为上校，任东三省陆军第二十四旅旅长，驻防奉天省北镇。这是邢士廉第一次担任带兵主官。该旅隶属第一师师长李景林指挥，邢是李部“最优秀之武官”[(1)]，负责守卫奉军西部前沿。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该旅被编入第二军，仍受李景林指挥。邢部由北镇西进，为奉军打头阵，先后出义县，占朝阳，

攻凌源、建昌，趋长城，突入冷子口、九门口，进入关内。

邢士廉旅于1925年1月进占南京、苏州、太湖地区。后杨宇霆督苏，该旅归其节制，奉命进入上海。6月13日，邢士廉被任命为淞沪戒严司令。邢在受命当天即宣布淞沪戒严，次日又发出布告称："倘有散布流言，妄生是非，意存破坏大局者……从严惩办。"[(2)] 7月23日，邢屈从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令查封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和上海洋务工会三团体。9月18日，邢派出大批军队，解散上海总工会，封闭会所，拘捕工会干部，并以"宣传共产、鼓动风潮"为由通缉该会委员长李立三。邢士廉又被提升为少将军衔，任奉军第二十师师长。

奉军在上海的暴行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浙江督办孙传芳趁机组织"五省联军"，夺取丧失于奉军的地盘。10月8日，段祺瑞派员调停，毫无结果。10日，孙传芳以准备秋操为名，下令动员，准备进攻驻在苏皖的奉军。张作霖鉴于奉军南线过长，北方又受冯玉祥国民军的威胁，决定缩短战线。在南京的苏督杨宇霆也担心驻沪奉军被困，乃于14日电令邢部撤离上海。15日，孙传芳下达总攻令，16日"联军"占领上海。奉军宪兵一营未及撤退，被浙军缴械。邢于前一天已取消戒严司令名义，并率所部第二十师撤至苏州、常州等处。18日，"联军"占领镇江。19日，江苏陈调元军宣布反奉，杨宇霆等逃离南京。邢士廉率一旅又一团分乘三列火车从浦口北撤，在乌衣渡遭江苏军伏击，只有邢所乘列车脱险，驰抵蚌埠。23日，奉军集结徐州。25日，邢部由新安镇进攻海州，26日占领该地，稳住奉军阵脚。11月7日，张作霖下令奉军继续北撤，邢部亦由海州北退，返回沈阳。

事前，邢士廉派人在沈阳小北关购置房产作为公馆，其家庙也是三间青砖磨缝硬山起脊的北房。但因部队溃散，实力大减，入城时只好将两名警卫分立车门，伪装人多车多，虚张声势，以壮观瞻。

1926年1月，张作霖镇压了郭松龄反奉之后，又兴兵入关，意欲

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争夺京津。邢士廉仍被任命为第二十师师长，并兼镇威军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由于没有实力做后盾，逐渐丧失主兵官的地位。进占北京后，邢兼任军警督察长。此时他与一年前心境不尽相同，邢认为这次又两路出兵，四面受敌，而且吴佩孚、阎锡山对奉军均有戒心，所以主张应重新考虑军事计划，还搞了一些呼吁和平的行动，结果引起张作霖的不满，邢因此被撤掉了本兼各职。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在安国军序列中仍无邢士廉的职务。同年9月，奉军中将参议于珍到丰镇阅兵后返大同时，突然被晋军扣押，解往太原。奉晋之间局势骤变，晋军拆毁部分铁路，大同以西的奉军亦多被包围缴械。为了解决奉晋矛盾，邢被张作霖派赴太原，经与阎锡山谈判，于珍获释，奉晋关系恢复正常。由于此事办得周全，邢士廉又被张作霖任命为大帅府中将侍从武官。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专列返回东北时，在沈阳皇姑屯三洞桥被日本关东军设伏炸死，东北形势更趋动荡。张学良决心与国民党谋求妥协，遂派邢士廉等四人为代表，先后数次至北平和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邢等多次会见蒋介石，转交张学良的亲笔信，表示愿意实行易帜，但也提出：1．由东三省派遣青年一百人赴南京，学习国民党党务之后，开始办理东三省的党务工作；2．所有在东三省任职者的生命、财产均予保护等项条件。蒋允予接受，并希望东北各省市重要人选由张学良推荐，再经中央加委。邢士廉等还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分别交换了意见，阎等均表示容纳。但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粗暴干涉，张学良于7月26日电邢，令他代为向蒋介石致意："东三省一切不成问题也。"[(3)] 只是由于当时东北政局复杂，易帜不能马上进行，得到蒋的谅解。双方经过反复洽商，至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终于正式发出易帜通电。

易帜之后，邢士廉被任命为辽宁省政府委员、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顾问等职，却更远离带兵主官的位子。旋杨（宇霆）常（荫槐）事件发生，使邢受到很

大刺激。邢不满张学良处决杨、常，为士官系失去主将而寒心，更为自己的前景而忧虑。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又成为南北两军极力争取的力量。9月，大批东北军开入平津各地，邢士廉作为“闲职”人员留在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邢士廉是滞留在沈阳的九名辽宁省政府委员之一，他没有跟随省政府迁往锦州。邢士廉看到留日的一些日籍同学在侵华派遣军中担任高级职务，便产生了“攀龙附凤”的思想，在土肥原劝诱下，邢最终成为汉奸，出任了伪铁道委员会委员，吉长、吉敦铁路守备队司令官，少将军衔，为日军占领中东、洮昂、吉海、齐克、北宁、打通等线出谋划策。又因“讨伐”抗日义勇军有功，调任伪吉长地区警备司令官兼伪步兵第四旅旅长。1933年8月，在烟筒山与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吉兴联合召开军事会议，同时邢部伪军多次进犯双阳、伊通一带的抗日武装。后被调任伪新京（今长春）地区司令官兼第十混成旅旅长、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处长。

1937年6月，邢士廉晋升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设司令部于承德，负责承德、锦州等地区警备任务，担任对辽西地区抗日武装和冀东地区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他已被授以中将军衔，分别于1938年3月在热河省兴隆县药王庙、5月在兴隆北山、11月在半壁山等地与冀热边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交战，12月，参加伪治安部军事咨议院。翌年3月被授勋二位。

1939年5月，邢士廉改任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驻哈尔滨，负责哈、齐（齐齐哈尔）、绥（化）等地“治安”。1941年3月，邢又改任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负责伪满最为重要的奉天（沈阳）地区的“治安”。其间多次参与“围剿”抗日联军、封山并屯等罪恶活动。

1942年9月，邢士廉升为伪上将军衔，并被任命为伪治安部大臣，成为伪满政府内阁成员。他积极在冀东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配合日本侵略者，犯下了“梳篦清剿”、制造“无人区”等罪行。1943年4

月，伪治安部撤销，邢改任伪军事部大臣，继续指使伪满军队入关“扫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此前邢士廉作为伪满政府高级官员追随伪皇帝溥仪逃往通化。17日溥仪“退位”后随之返回长春，于18日与张景惠等成立“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25日邢被苏联红军逮捕，30日押往苏联。1950年7月31日，由我国政府引渡回国，收监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3月17日，邢士廉因病死于狱中。

---

(1) 东三省官绅录刊行局编：《东三省官绅录》，东三省官绅录刊行局1924年11月印行，第44页。

(2) 《申报》1925年6月24日第9版。

(3) 陈鉴波：《中华民国春秋》，台湾三民书店1981年印行，第536页。

熊成基

黄德昭

熊成基，一名承基，字味根。江苏江都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祖、父两代都做过清朝的小官吏[(1)]。熊幼年进塾读书，稍长，学过医。感于中国民族危机深重，使他仰慕岳飞、史可法等历史人物的业绩，决心改学军事。1904年夏，他到安庆，考进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这时，民主革命浪潮已波及到这所武备学堂。他读到暗中流传的《革命军》、《扬州十日记》等反清革命宣传品，“乃至流泪不止”[(2)]。他结识了同学中的柏文蔚、倪映典和在籍军人（陆军常备营排长）范传甲等革命党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清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3)]，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5年夏，练军训练期满，熊成基被派去南京入新军某营为副目。后经管带介绍考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学习。在校与同入炮校的倪映典等相约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熊从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充当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得到军中同志帮助，常向士兵秘密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听者多为感动。

1907年夏，安徽举行征兵。熊成基由南京应调回安庆，先后任马营、炮营队官。当时，新军中的下级官兵，在革命党人的运动和影响下，多已倾向革命。7月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熊成基与范传甲等计议，决心相机在安庆再次起义。是年冬，革命党人倪映典由南京回安庆，任马营管带，倪与熊策划于是年除夕起义。不料事机为清吏所觉察，倪被撤职，起义计划没有实现。倪去后，熊被推主持“岳王会”，继续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

1908年秋，清政府令江苏、湖北和安徽各镇新军于11月间在安

徽太湖举行会操，安徽革命党人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在太湖秋操时联合江苏革命党人发动太湖起义。但安徽巡抚朱家宝对本省派赴秋操的士兵官佐严加挑选，军中的革命党人多被怀疑而不能前去。眼看太湖起义的计划将无法实现，于是，熊成基与范传甲等又改变计划，决定于太湖秋操时，先在安庆发动起义，待得手后，开赴太湖策动参加会操的新军响应，转攻邻省，乘势扩大。恰好，光绪帝和西太后于11月14日、15日相继死去，熊等认为机不可失，遂于11月19日（旧历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召集党人举行会议，制订起义计划。会上决定以熊所掌握的炮营（驻城东门外）和马营（驻城西门外）为主力，先在城外起事；革命党人薛哲所部之步营（驻城内北城根）和范传甲的辎重队在城内接应。熊被推为起义军总司令。熊当即发布了作战密令十三条，决定是晚发动起义。

当晚九时，炮营和马营分别在城东、西举火为号，把拒绝投降的两个营管带一个打死一个打伤，迅速会师占领了子弹库，焚烧了城外测绘学堂和步兵营房，旋合马炮步营千余人直扑安庆城。不料皖抚朱家宝得到光绪帝和西太后死讯，已先于19日午间秘密回到安庆，督率协统余大鸿命城内各营紧闭各城门扼守。在城内的薛哲、范传甲等为清兵所制，未能按预定计划接应。熊率起义军，在城外迭次进攻，奋战一昼夜，未能破城。南门江面上的清军水师炮轰起义军阵地，起义军内外受敌，伤亡很重，难以支持。熊迫不得已，改变战略，于20日下午率众北向集贤关退却，欲取庐州为根据地，然后联络凤阳、颍州等地会党，进取中原。于是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时清提督姜桂题在河南闻讯，派兵来追。熊虽然打败了追兵，但到庐州时，所部仅剩士兵八九十人，而且在退却中，人心不固，时有叛逃出现。熊见如此，劝余众散去，自己则到一士兵家中暂避，安庆起义至此失败。

1909年初，熊成基从河南至山东烟台，经大连转赴日本，改姓名为龙潜，号望云。在东京，由革命党人肖翼鲲介绍加入同盟会；在勤学社结识了黄兴。黄和他谋划再举，适有党人获得日本之秘密图籍数

十种，拟向某国求售，以充革命经费。熊急于回国革命，即担负起售书筹款任务，于9月间化名张建勋到长春，寄住其友人之友臧克明父臧冠三家。后因在臧家居住不便，就到哈尔滨活动。1910年1月，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由俄回国，路过哈尔滨，传闻熊要谋刺载洵，清吏悬重赏搜查。臧冠三向吉抚陈昭常告密，以致熊于30日在哈遭捕。次日，解赴长春。清廷据陈昭常电奏于2月7日电令陈及皖抚朱家宝会勘，“就地正法”[(4)]。熊在狱中笔写供词数千言，直言革命宗旨是“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为主要，不尽是满汉种族之见”[(5)]，“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之耻辱”[(6)]。1910年2月2日，熊慷慨就义。

主要参考资料

陈春生：《戊申熊成基安庆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

陈春生：《熊成基谋杀载洵始末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

佚名：《熊案始末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

柏文蔚：《柏武烈五十年大事记》（1932年作），《纪念柏文蔚先生》。

顾忠琛：《熊成基戊申起义始末》，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12月11日。

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

(1) 熊祖父瑞生曾任安徽繁昌知县，父存仁系候补通判。见钱兆湘笺注《熊烈士供词》（宣统元年十二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0—243页。

(2) 柏文蔚：《柏武烈五十年大事记》有云，熊读《革命军》和《扬州十日记》时，“乃至流泪不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柏文蔚先生》，1986年版，第9页。

(3) “岳王会”是1904年由柏文蔚等发起组织的，意思是崇拜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总会设在芜湖，安庆为分部。（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

(4) 《安庆马炮营起义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255页。

(5) 《熊烈士供词》（宣统元年十二月）。

(6) 《熊烈士供词》（宣统二年正月）。

熊克武

马宣伟

熊克武，字锦帆。祖籍湖南麻阳。1885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四川井研。其父熊宝周，在井研以中医为业，并开一中药铺，有子女八人，家境不宽裕。熊克武四岁时，由父亲教读《千家诗》、唐诗和短篇古文，还被要求练字，八岁入熊氏祠堂私塾。十岁时转到十里外的石牛埂廖家祠堂读书，闲时帮助家里卖桑叶、收蚕茧和记账等。十三岁又转到荣县方家冲但氏家族设的私塾读书，与同学但懋辛结成终生好友。1903年，熊克武与但懋辛考入四川东文学堂，与戴季陶、刘光烈等同学。同年冬，在叔父熊治宜资助下，同但懋辛等赴日本留学。

熊克武到日本后，先考入东京大成中学补习日语，翌年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他在东京学习期间，结识众多爱国志士，也读到许多传播新思想的书报。1905年7月23日，熊克武在东京程家柽的家里见到孙中山。在孙的启发下，他懂得报国就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8月19日熊克武加入同盟会，在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评议会评议员，并受孙中山的委派去横滨跟梁慕光学习制造炸弹技术。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激起了广大中国留学生的愤怒，熊克武发动留学生参加抗议活动。12月，他和秋瑾、刘道一、黄树中、谢奉琦、但懋辛等留学生毅然回国。熊克武回上海后，即入中国公学学习，并为该校集资，使该校成为同盟会开展活动的联络站。

1906年冬，熊克武奉命返川开展武装斗争，先到重庆、泸州等地

联络朱之洪、谢奉琦、佘英等，然后返成都与黄树中在草堂寺召集党人开秘密会议，讨论开展武装斗争。会后，熊克武化名邱济川，赴重庆、泸州、宜宾、屏山、永川等地活动，日夜徒步奔走，被称为“铁脚板”。他在这些地区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等，为四川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1907年10月1日，他和佘英、谢奉琦等在江安、泸州组织武装起义，因事泄失败。继赴成都，与黄方、杨维、谢持等筹划在11月4日武装起义，临期因叛徒出卖而未成。

熊克武不屈不挠，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他于1908年春与佘英潜往日本东京购买枪弹。在吴玉章和宫崎寅藏的协助下，购得手枪三十余支，子弹二千余发，于冬天转运回四川。之后，他和佘英、曾省斋等人于1909年2月10日在广安发动起义。熊率队伍进攻州署时，署府大门紧闭，数攻未克，与清军保安营队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12月，他和佘英等又在嘉定发动起义，义军遭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牺牲达两百余人。1910年春，熊克武离川，经上海去香港。

熊克武在香港参加了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准备事项。起义发动在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时半，熊率领喻培伦、但懋辛等组成的小分队，炸开两广总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张鸣岐，此时张已闻讯避匿。小分队与清军水师在莲塘街北口展开激战，最后被敌人分割包围。在战斗中，熊克武与大家失去联系，后在当地群众和同盟会党人的掩护下，转移到香港与黄兴会合。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聚集在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公推熊克武组织蜀军参加北伐。1912年1月初经黄兴推荐，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熊为蜀军总司令。3月15日，熊克武奉孙中山之命，率三个营的兵力抵重庆，任重庆蜀军政府第一师师长。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4月合并，熊部改为四川陆军第五师，任师长，仍驻防重庆。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各地讨袁军纷纷成立，8月4日熊克武与重庆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成立讨袁军，被举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为四川民政厅长，发出讨袁檄文。熊、杨率部西上，讨伐川督胡景伊，迅速攻取了永川、荣昌、隆昌、内江等地，直逼泸州。胡景伊一面命川军四个师出兵抵抗，一面求袁世凯派兵增援。袁世凯当即电令滇、黔、陕、甘、鄂五省军队援川会剿，围攻重庆。9月13日，讨袁军失败，熊克武逃出重庆，队伍解散隐蔽。战事刚停，胡景伊布告全国缉拿熊克武、杨庶堪等一百零八人。熊克武乃化名陈颐年，逃往日本。但是，逃亡日本的四川同盟会党人，对他领导讨袁失败颇多责难。熊克武乃离开日本，去南洋追随黄兴继续反袁。1915年8月，熊克武回上海联络革命党人，后到香港与李根源等筹款十万元去昆明，参与蔡锷、唐继尧发动的讨袁护国运动。护国战争开始后，熊克武以“四川招讨使”名义，随护国军第一军入川作战。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蔡锷于8月委熊克武为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12月13日熊克武在重庆通电拥护。1918年1月，熊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与滇、黔军联合对抗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刘存厚。2月25日，熊率军攻克成都，即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兼摄四川军、民两政。他大力整顿川境的民政财政，指定粮税、肉税充实教育和实业经费，以兵工修马路，筹办钢铁厂。对于四川边防事项，因有藏兵侵及巴塘，特定烟、酒公卖税拨充边防军饷源，以坚防范。

熊克武自任四川督军后，亟谋扩充个人权势。他在整编川军中，对得到孙中山支持的石青阳、黄树中、颜德基、卢锡卿等民军加以限制和排斥，对孙中山派来的四川省长杨庶堪的职权也多加干涉。他逐渐倾向岑春煊的政学系，不与孙中山合作，致使四川国民党内的矛盾激化，这便给滇督唐继尧侵川造成可乘之机。1920年5月4日，唐继尧借孙中山之名，联合川军吕超及石、颜、卢、黄等发动“倒熊”战争。开战初期，熊部及刘湘等部败退阆中。9日，熊克武为联合川

军，委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并拉拢在陕南的刘存厚回川，共同攻打吕超等部和滇、黔军。9月，熊、刘等部攻占成都，10月又攻占重庆，滇、黔军及湘、鄂军撤出四川。

在熊克武的倡导下，川军将领于1920年12月联名宣布四川自治，既不服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也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但熊克武、刘湘、刘存厚、刘成勋四大势力在四川不能相容。熊克武先联合刘湘、刘成勋，以武力驱逐刘存厚再退陕南。1921年7月，刘湘就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后，刘湘、熊克武两军对峙日亟。8月，刘、熊两军出兵湖北，12月被吴佩孚击溃，刘成勋继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

此后，熊克武仍谋武力统一四川，于1923年3月联合刘成勋、赖心辉部，进攻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师。吴佩孚见四川内讧，急命北洋军援助刘湘残部杨森回川。结果，熊部被杨森、袁祖铭以及邓、陈、田等部击败。1924年4月熊克武率部出川，经贵州到达湖南常德。

熊克武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嗣后被任命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翌年1月，熊克武派但懋辛与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商定，会攻武汉。但不久胡景翼暴病身亡，进取武汉的计划落空。嗣后，熊克武率三万之众于8月到达广东连山一带，9月至广州。汪精卫、蒋介石于10月3日称熊勾结陈炯明图谋颠覆广东军政府，将熊囚禁于虎门炮台，所部则被收编、遣散。

1927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各方的舆论压力下，释放了熊克武。熊出狱后先去香港，后至上海寓居。抗战开始，熊克武任国民政府委员，奔走山西晤阎锡山等呼吁坚持抗战。1939年他回到成都，发现居宅有宪兵站岗。熊克武知道蒋介石对自己仍不放心，便与朱之洪等潜心编撰《四川国民党史》陆续发表。

抗战胜利后，熊克武与但懋辛在重庆创办中国公学，并联络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7月1日，熊克武与刘文辉等联络民主人士在成都组成“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克武任主任委员，12月与刘文辉等策动川西部队起义。25日，由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此后，熊克武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70年9月2日，熊克武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马宣伟等著：《熊克武传》，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刘光烈先生回忆。

熊克武回忆录手稿。

熊庆来

夏光辅

熊庆来，字迪之，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1893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生于云南弥勒县息宰村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熊国栋在清朝末年曾任云南省巧家县和赵州县“训导”（主管教育）。严格的家教和自身的勤奋，使他于少年时就学得丰富的文化知识。1906年，十三岁的熊庆来考入昆明的云南方言学堂（后改为云南高等学堂）法文班。他努力学习，成绩优良。1913年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赴法国巴黎矿业学校学习，想学成回国，开发矿藏，振兴祖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矿校关闭，他改入其他学校学理科。1914年至1920年的七年间，他先后在格勒诺布尔大学（Grenoble）、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Montpellier）、马赛大学等校读书，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初归国。

当时的中国，科学文化比西方国家落后很多，熊庆来立志献身科学教育事业。1921年春天，他在云南工业学校和路政学校任数理教员。这年秋天，他受聘到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创办算学系。1926年又受聘到北京清华大学创办算学系。中国数学在古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中国则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停滞不前。熊庆来立志改变中国的数学落后面貌，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引进西方现代数学体系，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实施，是创办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熊庆来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先后讲授球面三角、微积分、方程论、高等算学分析、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

微分方程论、偏微分方程论、变分法、力学等十余门课。他所讲课程，皆自编讲义，其中《高等算学分析》讲义被选入当时的大学丛书。他十分注意选拔和培养人才。在东南大学时，学生严济慈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但经济困难，熊庆来曾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在清华大学时，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看到华罗庚的论文，发现他很有数学才能，便破格把这个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青年店员聘请到清华大学算学系工作，使华罗庚获得深造的机会，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熊庆来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后来在云南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我国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是他早年的学生。他晚年曾回忆说："那时可注意的是，优秀同学不少，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1)

熊庆来在教学的同时，还致力于数学研究工作。1930年创办了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数学研究机构，由熊庆来、孙光远、杨武之三教授任指导，北京大学的江泽涵教授兼任指导，陈省身、吴大任、庄圻泰等是当时的研究生，华罗庚也参加了研究工作。熊庆来后来回忆说："虽然组织简单，研究空气则甚浓厚。"(2) 研究成果大多载于当时的清华大学理科报告。

1932年，世界数学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熊庆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他到法国巴黎，进庞加烈研究所研究函数论。经两年专心研究，写出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1933年论文通过，熊庆来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熊庆来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又称"熊氏定理"。

1934年，熊庆来回国，仍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任主任和教授。1936年，熊庆来参加创办中国第一份数学学报，并任编辑委员。

1937年8月，熊庆来受云南省政府的聘请，由北平回到故乡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夏天。在这十二年间，云南大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云南大学的前身是1922年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

1934年改为省立云南大学。熊庆来到任后，取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于1938年7月1日改为国立云南大学。熊校长办学的“基本方针在：（一）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二）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三）整饬校纪；（四）充实设备；（五）培养研究风气”[(3)]。熊庆来除要求教育部和省政府增拨经费外，还向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募捐，用以扩建校舍，增置教学设备，增购图书资料，建设了科学馆、铁道馆、航空馆、澄农馆、泽清堂、映秋院等。抗战期间，大批学者云集西南，熊庆来凭借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声望，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到云南大学任教。从1937年到1946年的十年间，教师由四十九人增为二百三十七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由三十八人增为一百二十六人。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都有专家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使云南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随着师资力量的增长，熊庆来逐步把云南大学的规模扩大，由原来的文法、理工两个学院，扩充为文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五个学院，下设十八个系。另有三个专修科和三个选修班，一个附属中学。还先后建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科学馆、水力试验室、冶金试验室、选矿试验室、植物温室、细菌学馆、附属医院、实习工厂和农场、果园等，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实验。云南大学成为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大学。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有这样规模的一所大学，加上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迁昆明合办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大改变了云南的文化落后面貌。

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十二年，正是他风华正茂的年龄。教学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实践了他教育家的一面，而作为数学家的光彩却没能充分显露，他“每盼有机会重理已经荒缀的旧业，从事研究工作”[(4)]。1949年夏天，他离开云南大学，赴法国巴黎参加国际教育会议。会后，他留居巴黎，想集中精力从事数学研究，以补十二年脱离学术研究之憾。第二年不幸患脑溢血病，致右半身瘫痪。他以病残的身体在巴黎过着清苦的生活。病势稍退，他就用左手重新学习写字，继续研究函数论。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深受法国数学家的敬佩。

1956年，他被法国数学界研究亚纯函数的一个学派推选，执笔撰写了《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作为法国数学丛书*Memorial des Science Mathematiques* 中的一本出版，为数学界所称道。

在此期间，熊庆来没有忘记尽力为祖国效劳。他出国前夕，云南大学曾筹集了一点外汇经费，委托他在国外购买科技图书。尽管他只身异国，病魔缠身，经济困难，生活清苦，但这笔钱分文没有动用，如数在巴黎购买了图书，邮寄回解放后的云南大学。

熊庆来第三次旅居法国不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1953年，周总理曾函邀熊庆来回国，他因病体未愈，行走困难，无法起程。在法国，熊庆来以病残之身，从事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他深感“工作只为个人生活，以留异国，殊觉无甚意义”[(5)]，希望返回祖国，发挥所长。在此期间，台湾当局以陈立夫等人出面写信邀他去台湾，熊庆来坚决拒绝。1956年，周总理再邀他回国，这时他正紧张地为法国数学丛书撰稿，决定稿成即启程回国，并通过多种途径表达了对祖国的思念和回国的决心。1957年6月，熊庆来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他满怀热情地表示：“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6)]

熊庆来回国后，按照他的志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从事函数论研究。他以“不知老之已至”的精神，与病魔搏斗，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论文。1957年至1965年的八年间，他发表科学论文二十余篇，占他一生所写论文的三分之一强。这些论文分别载于《科学记录》、《中国科学》、《数学学报》等杂志。他还应约为外国期刊撰写了三篇论文，一篇载于罗马尼亚《数学汇刊》，两篇刊于法国《数学学报》。其中一篇是法国维腊院士邀其为巴黎大学教授戛尼野院士的五十周年工作纪念所写的。这八年间，他还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完成研究论文二十多篇。

1963年是熊庆来的七十寿辰。北京大学数学系庄圻泰教授在《数学进展》杂志上发表题为《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祝贺文章，系统地总结介绍了熊庆来1963年以前所写五十余篇“有创造性的论文”的成就。文章写道：“在奈望利纳所建立的亚纯函数学理方面，米约和熊先生各获得一些关于函数结合其导数的不等式。而熊先生所得者，可用以解决米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此外，熊先生考虑函数结合其原函数（即积分）的问题，而获得若干基本不等式，并据以解决亏量唯一性等问题。熊先生所得某些不等式被认为是这方面最深入的结果。”“孟德耳（Montel）的正规族理论，在数学各方面起重要作用。熊先生得一新法，简化了米朗达（Miranda）定理，达到所期待的精密度。”“在正规族理论中，熊先生获得几个新的简单的正规性定则。”“关于代数体函数第二基本定理，伐理隆仅指示可以用一个恒等式得出，但未得出证明。熊先生补上了证明，并结合导数将其推广。此外，熊先生曾指出亚纯函数无穷级概念可推广于代数体函数。巴德纳斯所证明关于代数体函数之一个普遍定理，即利用熊先生所定义之无穷级所获得。”“熊先生对单位圆内全纯函数及亚纯函数亦有所贡献。”(7)

熊庆来还先后编写了十二部高等学校数学讲义和教科书，大多用于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些则出版发行。他还写了一些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性论文，刊登于报纸杂志。

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期间，熊庆来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发表卓有见解的学术讲演，提出研究方向，受到全国数学工作者尊敬。1961年全国数学会议后，熊庆来倡导组成北京地区的复变函数讨论会。这个科学集会每两周在熊的寓所举行一次，一直坚持到1964年，有力地推动了函数论研究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青年研究工作者。

熊庆来在年老病残的情况下，除自己努力进行研究工作外，还积极培养青年研究人员。数学界的后起之秀杨乐、张广厚等人，就是熊庆来6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

1959年，熊庆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4年又被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因病去世。

---

(1) 《熊庆来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欢迎会上的讲话》，《数学进展》1967年第3卷第4期。

(2) 《熊庆来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欢迎会上的讲话》，《数学进展》1967年第3卷第4期。

(3) 云南通志馆纂修：《续云南通志长编》卷49教育2，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版。

(4) 熊庆来：《回到祖国的七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3年版。

(5) 熊庆来：《回到祖国的七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6) 《熊庆来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欢迎会上的讲话》，《数学进展》1967年第3卷第4期。

(7) 《数学进展》1967年第6期。

熊式辉

严如平

熊式辉，字天翼，号西广，江西安义人。1893年5月19日（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四）生。父亲熊仰之，清末曾在地方团练任督教，后在江西巡抚衙门充当杂役，家境清寒。熊式辉在七个兄弟姐妹中居六，幼时敏而好学，七岁入本乡私塾，读“四书”、“五经”，苦练书法。

其时，维新思潮在青年中传播，熊式辉崇敬康、梁，认为国家孱弱，无以御敌，乃弃文从武，于1908年报考江西陆军小学，1911年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秘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即参加学生军奔赴汉口参战。12月回南昌，任江西都督府参谋。熊好学求进，1913年春北上，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与赖世璜等同学。

1916年初，熊式辉来到云南昆明。时袁世凯帝制自为，蔡锷、李烈钧等发动护国战争反袁，熊参加护国军李烈钧第二军，在方声涛第四师伍毓瑞第八旅任三十八团团附，南下广东。6月袁死后，护国二军改名滇军，拥戴孙中山护法。

1920年末，熊式辉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前往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与曹浩森、陈锐、杨杰同学，研读古今中外战史及战略战术方面的书籍，以及有关历史、地理书籍，学识俱增。1924年毕业归国，时值国内政局纷乱，初至河南督军府任少将高参，后应滇军军长朱培德之邀至广州，任滇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25年8月滇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校亦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熊仍为教育长。

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后，熊式辉奉北伐军总司令蒋

介石派遣，赴江西策动驻粤赣边境之孙传芳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反正。熊凭借同乡、同学、好友之情谊，晓以大义，力加劝说，获得成功。第四师迅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于8月中旬改称为第十四军，赖任军长，熊任党代表。当北伐军攻占长沙后，熊协同赖即率第十四军于9月3日从于都出发，次第攻占安远、信丰、梅关、大庾，进击赣州；继后又向抚州地区前进。熊率一部于9月17日北进，克吉水、古安，经宁都，向广昌、南丰、南城前进。在10月临川战斗中，第一师师长易简阵亡，熊自兼第一师师长。

江西底定后，赖世璜、熊式辉率领第十四军移师浙江，隶属东路军何应钦指挥，于1927年1月20日在丽水集结，2月初向金华、浦江前进，肃清浙东残敌。东路军克复杭州后，第十四军经宜兴、溧阳进往常州、丹阳，后奉命守备江阴。5月15日渡江北上，23日占靖江，26日克姜堰，再经如皋、海安北上，6月2日进抵阜宁，继续向鲁境攻击前进；7月18日协同友军进攻临沂城，亘三日未下。时值宁汉兵戎相见，敌军乘机反扑，徐州危急，北伐军纷纷南调，十四军于8月5日撤出鲁境，先退至扬州，继至无锡、江阴。龙潭战役后，十四军奉命于9月3日渡江向运河方向进攻，截断敌军归路。熊式辉力主迅速行动，但赖迟疑牵制，分歧显露，以致十四军迟至10月6日始行，16日到达淮安。是年冬，十四军缩编为独立第一师，熊式辉任师长；不久改编为白崇禧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熊仍为师长。1928年初，熊奉命率部进驻上海，代白崇禧所任之淞沪警备司令职。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编组为四个集团军，发动北伐奉张之战，第三十七师隶属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熊式辉将淞沪防务交钱大钧第三十二军接管后，即率师北上。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熊式辉于5月6日陪同蒋介石便装骑马出济南城绕道至党家庄；8日奉蒋介石之命以“军使”身份与罗家伦前往济南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傲慢蛮横，怒目恶声，竟拒不与谈。

北伐结束后，全国编遣军队，熊式辉奉调为第五师师长。1928年

9月2日任淞沪警备司令，旋又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

1930年12月，正在江西策划“围剿”工农红军的蒋介石，电召熊式辉即去江西。熊在上海所乘之飞机触及盐船桅杆失事，坠入黄浦江边之泥潭，熊一足受伤，自此跛足。他到了南昌后，被蒋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长，与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一道协助蒋介石谋划“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战略及其实施方案。

熊式辉的军事学识颇受蒋介石之赞赏，为人又颇持重，乃于1931年12月接替鲁涤平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后又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明白“今天的江西危机四伏”，说要学管子，不怕苦和死，决心“汗血拼”，变贫弱为富强；当然这一切“必定要匪患完全肃清后，政治上才有办法”[(1)]。他秉承蒋介石旨意，首先施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体系，集大权于一身。除了在省政府组建一个“府卫大队”，配备精良装备享受宪兵待遇外，熊将地方武装全部整顿改编成十五个保安团，以后又成立两个预备师，统归自己指挥。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他将全省八十三个县划为九个行政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派出亲信担任，加强全省的行政控制；同时设立县政人员训练班，培训出大批听命的县区级官吏。在民政管理方面，为了封锁苏维埃根据地，配合“围剿”战争的需要，颁发《整理保甲方案》，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严密管理每家每户，防止“通共”、“藏共”；各县还建立保卫团，把保甲武装起来，协助正规军对付工农红军。在邻近苏区的各县的交通路口和要隘边界，还遍设碉堡，严密封锁苏区。在地方财政方面，熊推行“一税制”，把以往的各种税收加成一个总数，称为“田赋税目”，由县政府统一征收。

为了迎合蒋介石来江西督战“围剿”，熊式辉很注意南昌的市政园林建设，把蒋介石的百花洲官邸周围的东湖、南湖、北湖重新疏浚，沿湖广种树草花木，还命名“中正桥”、“中正路”、“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等等，以赢得蒋的欢心。

熊式辉向蒋介石提出在民众中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主意，更是迎合了蒋介石要重整传统道德、改变社会风气来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需要。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纪念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要求在南昌和江西首先推行；并于7月1日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自任总会长、熊式辉与陈立夫等五人任总干事。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六篇长篇演讲，并主持制订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等[(2)]。熊在江西全省鼎力推行，在各县都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分会，从改变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但一切均以“礼义廉耻”为基准，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的复兴”。江西成了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创始、试验和推广的基地，熊式辉自然颇受蒋的赞赏。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熊被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于1937年7月全面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在赣粤边境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于8月20日将抗日宣言寄给熊式辉，熊即派人前往油山与陈毅谈判，接受陈的各项建议。9月24日，陈毅下山来到南昌，熊举行盛大的欢迎会。经过进一步谈判，熊在江西各行政区设置“招抚委员会”，将在各山区的中共游击部队编入抗日部队；并答应协助建立新编第四军。中共组织在南昌公开活动后，熊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曾山等不断会晤，表现出团结抗日的合作态度，并接受建议成立“江西青年服务团”，自任团长，吸引青年开展抗日服务活动。熊还建立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兼任院长，延请进步学者讲课。他还创办江西农村改进社，试行“政、社、教”三合一的体制和梁漱溟提倡的“乡村建设”，开办农村实用中学和仰公中学（纪念其父熊仰之）。

熊式辉对蒋介石之喜怒哀乐甚为关注，当他获悉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赴苏十二载终于于1937年4月归来，即专程去杭州道贺。蒋经国在家乡被训读“反省”半载，时值抗战爆发，上海、南京、杭州频遭敌

机轰炸，奉化也不安全，蒋介石让他携妻儿于10月内迁到南昌居住，熊当然热忱接待。熊思谋再三，想借“太子”以自重，乃向蒋介石表白“愿与经国世兄共事”，让他当省保安处处长。蒋介石答称：经国年轻，缺乏经验，不宜独当一面，可当副手，以资历练。但熊让蒋经国任省保安处副处长的同时，又请他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副团长；还聘他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军训总队长兼训育处副处长（处长为许德珩），对一千两百名参训人员进行军事操练。不久，又聘他为省新兵督练处处长，在临川温泉训练四个团七千新兵。蒋经国大展身手，备受尊重，心情愉悦，与熊相处甚洽。熊进一步又于1939年6月请蒋经国去赣州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委员兼保安司令，更得蒋介石之欢心。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限共防共政策后，熊式辉在江西竭力贯彻，除解散“青年服务团”，停办地方政治讲习院外，还成立了一个江西特种委员会，专事“防谍”“保密”等特务活动，破坏中共东南分局和江西省委机关；又在泰和设立“马家洲集中营”，关押迫害爱国志士和中共党员，廖承志被捕后即被关押在此。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熊式辉将省政府南迁至泰和，翌年10月还在泰和创设“中正大学”。

1942年2月，熊式辉奉调重庆。3月蒋介石派熊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驻美，与美、英等同盟国协调对日军事行动。但同盟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会议不能带翻译入场，熊不谙英语，越一年被调回另派商震接替。熊回国后不久任中央设计局代局长，推进中央与地方政府互相联系与配合之行政计划；并兼中央银行监事长。1944年，熊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收复东北研究委员会”，后改为“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拟订了一个国民党在战后控制东北的实施计划，包括将东北划为九省，实行三民主义施政方针，同苏联政府进行外交协商等等。

1945年6月27日，熊式辉被派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军事代表，与王世杰随同宋子文赴苏，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谈判苏联出

兵对日作战、支持国民党政府等重大事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属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14日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于8月30日将熊式辉等拟订的接收东北计划以“接收东北办法”为名公布；9月1日宣布特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并兼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10月12日，熊式辉与蒋经国飞往长春。但接收工作未能得到苏联军方的支持和配合；对四十万伪军又未妥加收编，相反，中共的大批干部加军队进入东北后，与当地的人民武装力量相结合，并对伪军加以改造，因而军力迅速发展壮大。熊的接收工作难以进行，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1月11日将东北行营撤往北平，意欲唤起美、英等国的关注而对苏联施加压力。经过蒋经国与苏联方面的交谈，熊式辉率东北行营的接收人员再去东北，先至锦州，后入沈阳，并将在华北收编的伪满军改称保安队运到长春。与此同时，杜聿明率领的国民党军队由美国军方派出飞机、军舰快速运往东北，实施“军事接收”。由于与中共方面的军事力量发生接触，内战的火焰在东北熊熊燃起。

熊式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依仗源源不断来到的国民党军队和美国的支援，在东北继续进军，于1946年初夺取辽西、热河一批城市，3月进占沈阳及外围城市，4月进长春，5月占四平，并部署向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占据区纵深进攻。1946年7月，各地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熊式辉仍为东北行辕主任。

为先南后北夺取全东北，熊式辉与杜聿明策划在冀热辽和南满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在占领安东、通化等地后，1946年12月起集结重兵，四次进攻临江通化地区，但是遇到民主联军的强力抗御。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有四万余人被歼，东北的战略态势因而改变。

东北战事如此进展使蒋介石大为不满，1947年8月15日任命参谋总长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被免职。熊回到南京，受到蒋介石

的训斥，后列名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赋闲。

1949年春，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熊式辉去香港蛰居，办了一个“海南钟声诗社”，与同好饮酒赋诗，聊以排遣。1952年赴泰国曼谷，经营一家纺织厂。1954年去台湾，定居台中。1974年1月21日病殁于台中。

主要参考资料

姚甘霖：《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南昌，1982年版。

王道平：《（蒋经国）出任专员前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赣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蒋经国在赣南），南昌，1989年版。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南京，1929年版。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2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

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陈沂主编：《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1) 熊式辉：《宣誓就职答辞》，赣政十年编辑委员会编《赣政十年：熊主席治赣十年纪念特刊》，江西省政府1941年刊印，第6页。

(2) 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6

页。

熊希龄

熊尚厚

熊希龄，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晚年署双清居士，学佛后号妙通。祖籍江西丰城。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于湖南凤凰直隶厅镇筸（今凤凰县沱江镇），故人称熊凤凰。其父熊兆祥，号云卿，嗜好诗文字画，承袭云骑尉世职，官至衡州澄湘水师营管带。熊希龄六岁在镇筸入塾启蒙，后因家迁芷江，入芷江县秀水书院学习，年十四岁考中秀才。1888年，他入沅州府沅水校经堂附读，课余常阅读新书新报，眼界为之大开，逐渐有了经国济世的抱负。由于在沅州府接连两次考试成绩优异，受到沅州太守朱其懿的重视，1891年3月被保送到长沙湘水校经堂攻读，同年秋应乡试中举人。翌年，他在黔江书院充教习，闲时练字以备日后参加殿试。1892年4月，他入京参加会试中贡士。之后曾上书湖南巡抚吴大澂倡言武备，提出关于整顿湖南武备八项建议。1894年5月，熊希龄补应殿试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词馆。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熊希龄的爱国热忱，曾上书反对与日议和，并主张“革新庶政”。嗣后，他走投笔从戎之路，被张之洞委充两湖营务处总办，著有《军制篇》，系统地提出改革军事制度的意见。时维新变法运动在北京、湖南等地率先展开，湖南新任巡抚陈宝箴实行新政，熊希龄遂回到湖南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首先筹办实业，向陈宝箴建议筹办枪厂、机器制造厂、两湖轮船公司，并兴路矿等业。因多种因素制约成效不大，遂转而致力于创办学堂、开报馆、组织社团等新政。

1897年10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熊希龄与岳麓书院山长蒋德

钧等创立湖南时务学堂，效法日本维新，研究西学，“探求攘夷之道”，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由熊任总理，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谭嗣同等先后任分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王史任分教习；许宝垣为数学教习，大力提倡新学新政。翌年2月，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由经学大师皮锡瑞主讲，以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宣传维新变法，于各地设立分会；3月又创办了湖南第一家近代报纸《湘报》，他任经理，唐才常任总撰述，谭嗣同、梁启超等任撰述，鼓吹“开民智”、“倡西学”，提倡新学、新政，实行变法维新。此外，还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社团，以及开办团练、整顿湖南通省书院等等。为此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维新运动，守旧派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群起反对，以时务学堂为目标，把攻击矛头指向熊希龄和陈宝箴。由于陈宝箴的妥协退让，湖南维新派阵营随之瓦解，梁启超等先后离去。熊见大势已去，遂回到其父任职的衡阳，想过一段平静的日子。8月，他应召入京陛见，因故未能如期至京。旋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亦被指为康、梁同党，受到革职处分，被迫隐身于衡阳、沅州。他悲观失望，闭门读书，历时近四年之久。

1902年5月，朱其懿任常德知府，创办西路师范讲习所，邀请熊希龄任讲习，后改为师范学堂，他任副办。与此同时还开办启智书局，又与人合办常德中学，复出于教育界。翌年秋，熊希龄受到湖南巡抚赵尔巽的赏识，被委为常德西路师范学堂监督，并参与赵尔巽诸种新政的议事，如废除书院制、开办各级学堂、派留日学生、创办省矿务总公司，以及裁撤绿营、编练新军等。为此又遭到湖南守旧派的攻讦，学务和新政又办不下去，于是乃转向办实业。

1904年秋，熊希龄前往日本考察工艺；回国后向新任湖南巡抚端方上呈振兴湖南实业计划和设想，以及兴办实业学堂，受到端方的赞许。为了兴办实业，首先在沅州开办了民立务实学堂，开设养蚕课，办有营造、养蚕、缫丝等工场，将学工结合，后改名务实蚕业学校。

与此同时，还创办了醴陵瓷业学堂，开办瓷业公司，用以改革和创新醴陵的瓷业，颇有成效；又与杨度等合办华昌炼矿公司；曾计划办硫磺公司未成。熊希龄是湖南近代创办实业先驱人物之一。

1905年5月，赵尔巽任盛京将军，奏请朝廷免去对熊希龄的“永不叙用”的处分照准。7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经端方举荐为奏调随员，任二等参赞官，熊希龄于是重新走上政坛。12月，他随钦差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出国，到了德国，于次年5月先行回国，以便完成一部宪政的书和撰写考察后的条陈与奏折。熊希龄一面组织人搜集外国宪政方面的资料编书，一面找了杨度和梁启超写奏议。待五大臣回国后，《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和立宪奏议两大任务早已完成，为此受到朝廷以道员衔分省补用、记名四川道的奖励。由此梁启超等立宪党人和清朝大臣们的关系也得以疏通。当梁启超等于1907年10月组建政闻社时，他化名文福兴与梁暗中书信往来，参与筹划和决策，并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大吏为立宪党捐款。在清政府筹备立宪活动中，熊关心宪法的编纂，对宪法大纲提出八项意见；同时还提出办理外交宜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和措施。

1906年9月，熊希龄被赵尔巽委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因办理新政有功又任农工商部商务议员。次年4月，他被派赴日本考察工商和教育。在赵尔巽离开奉天后，他改任江苏工商局总办兼苏属谘议局筹办处会办。此外还兼两江督署总文案兼宁属谘议局筹办处会办，以及南洋印刷官厂监督等职；又与人筹办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兼顾湖南醴陵瓷业。1909年7月，熊希龄被清政府赏给四品卿衔，派往奉天任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被推为本国农务联合会主席，之后又相继兼奉天盐运使、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奉天造币厂总办等，被称为理财能手。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后，熊希龄和张謇等立宪党人取一致态度，联名通电赞成共和。12月至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

人，表示维护共和大局，并组织湖南共和协会，任会长。翌年1月，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熊被选为参议员、理事。之后改组成统一党仍为理事，共和党组成时亦为理事。当唐绍仪内阁组建时，他被多次邀请出任财政总长未应，后无法推辞始于4月任财政总长。上任后，他计划节减军费，速立国家银行，预筹币制办法，改良税则，筹划盐烟专卖，划分税目，速定会计法规，整顿公债等，以整顿财政。但实际工作却是要他立即筹款，负责与六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5月议定了第一批借款，因借款书上有银行团派一人为核算员的“监督条件”，立即遭到各方指责，他曾一度提请辞职未准。之后又继续与银行团商议借款，以条件太苛而停议，仍遭各方反对，乃于7月辞职。袁世凯仍要他帮助解决财政问题，委他为财政委员会会长。1913年，熊希龄改任热河都统，负责筹建热河省，以及修筑铁路、整修避暑山庄等事宜。其间曾发生行宫盗宝案，他受到怀疑。7月，他以都统名义通电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获得在国会内有势力的进步党的支持，以便顺利攫取正式大总统职位，1913年7月选择了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于8月任职，国务院内阁名单到9月才经国会通过，由熊自兼财政总长，以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其余五个总长均系北洋派，成为北洋派与进步党的联合内阁。由于熊、梁、汪等是社会名流，张謇是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熊希龄任职后，表示要使“中华民国成为法制国”，实行内阁制。并发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表示要整顿“内政”、财政，改革弊政，实行司法独立，提倡教育，进行经济建设，“谋自立以渐进于富强”。从主观上讲，不失为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但和袁世凯的封建独裁专制却大相径庭，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1913年10月，袁世凯利用国会选举正式当上了大总统，便以“增修约法”为借口，相继解散了国会和国民党，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自行

解体，进而组织政治会议为御用工具，进步党亦被袁抛弃。在此环境之下，熊希龄不仅无法施行其政纲，反而只能听命于袁，恭顺地副署解散国会和国民党的命令。此后熊内阁便被袁视为障碍，袁还暗中策划各省都督攻击，利用热河行宫盗宝案涉嫌事，通过舆论制造非议，熊希龄陷于困境，十分悲观失望。1914年2月，梁启超、汪大燮联袂去职，他也只好先后辞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之职。

熊希龄辞职后被袁世凯委为全国煤油矿督办，他仍然热心地拟订勘查开采条例，聘请外国技师探测和开发，向袁上呈筹办煤油矿的办法和意见，还打算出国考察，想转而尽心于实业。但由于资金和人才的缺乏，办理经年毫无成效，其抱负照样落空。但他仍受袁世凯的笼络，任参政院参政。熊希龄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1915年3月请假回家。数月后回到北京，时值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他不愿被卷入复辟的旋涡，8月又请假回到湖南沅州。

熊希龄回到湖南，想为地方办点公益事业，撰写《疏浚洞庭湖刍议》，考虑如何根治洞庭湖的水患。11月袁世凯电促其回京，他复电续假一个月。12月，袁施展手段，推熊的夫人朱其慧为宫中女官长，迫他返回北京支持帝制。1916年1月，熊希龄被迫回到北京，袁世凯当上皇帝，授他为中卿加上卿衔。在无可奈何之下，熊只好暂与周旋。时蔡锷、梁启超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贵州护国军攻入湘西。熊希龄借老母在家乡遭到战火又向袁请假，袁世凯此时想借重他南下，企图通过他向蔡锷、梁启超疏通商讨调和之策，于是准其只身回乡。熊希龄回到常德，致函袁世凯说明疏通无望。3月，袁又任命他为湘西宣慰使，让其联络湘西地方当道对袁军放行。熊借宣慰之名策动乾州、凤凰等县独立，并约定交战双方商订停战和约，还办理各项救灾恤民事宜。4月，熊希龄电请南北双方订立停战条例，并再向袁呈请辞职，5月还劝袁“速定退位之计”。6月袁世凯气绝身亡，他才返回北京，请求恢复民元约法。翌年2月，熊先后任平政院院长、政务评议会评议员。之后，他萌生退意，“决志隐退”，住在天津英租界奉母颐

养。

决心退出政坛后的熊希龄，仍然忧心国事，眷念桑梓和民生，把他的后半生献给慈善教育事业。1917年秋他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尽力办理赈务和河工；在北京创设慈幼局二所，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幼。翌年10月在北京香山创办香山慈幼院，自任院长。与此同时，还创设湖南义赈会、临时妇孺救济会、婴儿教保院、北洋平民工读学校、长沙平民大学、兑泽学校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混战开始，他曾任平和期成会会长，调和南北相持的政局；与张謇等组织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废除临时裁判权；斡旋南北和议。

熊希龄在慈善教育事业方面的成绩卓越，社会地位显著，曾任北京老弱临时救济会名誉理事长、顺直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北五省协济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临时正主任、天津红十字会名誉会董、北平红十字会会长；又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中美协进社社长、协约国国民协会会长、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等近二十个职务。所办慈善教育事业最驰名的是北京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不单是个慈善机构，而且是个教育机构。熊希龄主张教育贫富均平，尤注重幼儿教育，把慈善事业和教育结合，使家庭、社会、学校结成一体，同时还将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结合起来。设有幼稚园、小学、男中学、女师范、中等职业班，以及图书馆、理化馆、美术馆，还有鞋厂、铜厂、石工厂、化工厂、印刷厂、商店、农业试验场等各种工场，实行学与工结合；在教育内容上，除知识教育外，还注重人格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有学生一千六百余人。熊希龄是民国著名的社会慈善事业教育家。

熊希龄一生爱国爱乡始终如一，在其晚年，爱国热忱更值得称道。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在北京发起组织“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

并参加集会游行追悼死难同胞。翌年12月与孙宝琦等联名通电，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共定国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香山慈幼院的学生组织义勇军抗日；同时与朱庆澜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上海湖南人国难救济会；并呼吁张学良、冯玉祥等将领坚持抗日，积极为抗日救亡而奔走，被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他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支持抗日；在上海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恤会”，进行善后事宜；在香山慈幼院进行抗日救亡总动员，组织抗日义勇队，并赴南京敦促国民党要人抗日；还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给社会慈善事业，次第在平、津、湘三地举办十二项慈善事业。热河长城抗战时，熊希龄亲临前线视察，组织救护队救死扶伤。

1937年2月，熊希龄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国分会会长身份前往爪哇出席国际禁贩妇孺会议，会后至青岛筹办婴儿园，并往来于京沪间着手推广其慈善事业计划。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主张长期抗战，在上海与红十字会共同设临时医院四处，难民收容所八所，还设街童教育社救济儿童，积极救死扶伤。上海沦陷后，他转至香港。

1937年12月25日，一生爱国利民的著名爱国慈善事业教育家熊希龄，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

主要参考资料

周秋光：《熊希龄集》上、中、下三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周秋光：《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杨大辛等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62页。

关瑞晋：《解放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166页。

虚云

王学庄

虚云是民国年间有名的大和尚，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重兴名刹著称。

虚云原籍湖南湘乡，1871年9月14日（清同治十年七月三十日）[1] 生于福建泉州。其父肖玉堂曾任泉州知府，卸任后流寓该地。虚云是个独生子，兼祧两房，备受溺爱，很早就娶了两个妻子。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2]，他突然离家，跑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次年，被其父侦知，勒令归家。过了一年，他又逃回寺中，从此脱离了家庭。他刚出家时，法名古产，字德清，后来才改叫虚云，别署幻游。

虚云在鼓山修头陀苦行，静坐念佛三年余，然后离寺云游。他先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的名山大寺参禅听经，在江宁会见过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1897年，他返居扬州高旻寺。1898年，到镇江焦山寺听经，随后往安徽铜官山结茅安居。不久，他启程北上参禅，计划经泰山赴五台，然后再折往终南山。1900年抵北京，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往五台通路被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虚云随清朝帝后的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不少王公大臣。抵西安后，他往终南山结茅，改名虚云。

1902年，虚云离终南山前往四川峨眉山，并去西藏。因见西藏教规不同，折至云南鸡足山。鸡足山历史上是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破烂子孙庙十余处。各庙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1903年，大理提督张松林邀请虚云往大理崇圣寺讲经。虚云不愿留居城内，张便教宾川知县在鸡足山钵盂峰找了一座破院供他安身。从此，虚云就

在各式各样的反动统治者直接庇护下进行宗教活动。他将这座破院改成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院，至次年春，来求戒者达七百人之多。1904年，虚云出国前往暹罗、南洋讲经募款，并往台湾、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时，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因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其设法挽救。虚云回到上海，便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1906年，他得当年结识的权贵们的支持，获得一通上谕，“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3)]。虚云还在京活动为云南寺院请龙藏（清朝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清廷于同年夏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虚云赐号“佛慈洪法大师”，颁赐龙藏及各种佛教用具。清廷的青睐，使虚云陡然身价百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贪酷的宾川知县张某被起义民众围攻，虚云玩弄阴谋，将张救出。次年，民国建立，清室退位，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预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道：“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驳，终于折服了李根源。同年，他赴沪与寄禅等协商，将寄禅等倡设的中国佛教会，重订章则，改为中国佛教总会。因政府的更迭，他在南京见过孙中山后，又赶赴北京去见袁世凯。回滇后，组织滇、黔两省佛教总会滇藏支部。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

1920年春，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邀请，往昆明主持水陆道场，唐全家皈依佛教。这种水陆道场，在八年间启建了九次。他还应唐邀请，重兴昆明西山云栖寺，大兴土木。虚云按照古碑记载的庙产数字，由唐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四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为此，他在财产到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政府闽籍官僚林森、杨树庄、方声涛等和福州涌泉寺僧众，邀请虚云赴闽任该寺住持。虚云崇奉唐代高僧怀海的《百丈清规》，在所住持的寺院内，均按此建立僧团制度。他到鼓山后，竭力革除旧有陋规，实行十方丛林制，这种做法虽遭受该寺上层僧众的抵抗，但吸引了四方大批僧众。1931年，在涌泉寺设立佛学院，以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训练年青的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省官僚便成了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大批宋明以来经版，虚云聘请观本和尚前往整理，编成《鼓山经藏目录记》。1933年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要求抗日。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时常到鼓山听禅或躲避空袭，虚云亦与李结为友好。

1934年夏，国民党广东西北区绥靖专员李汉魂派人邀请虚云去曲江住持南华寺。南华寺最初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成了一座破败不堪的子孙庙。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赀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等事，概由施主负责”[(4)]。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弘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权势、资财扩张佛教势力。李应允后，他立即扶病到粤北观察情况，当面向李索取“数十万金”。1935年秋，虚云正式由鼓山到南华寺主持重建。他用警察驱逐了住在庙内的贫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大小殿堂楼阁，在十余年内，共建成房屋三百余间，装塑佛像七百多尊，能容一二百僧众常住。由于工匠们辛勤劳作，精心制造，改建后的南华寺颇为壮观，重新成了广东首屈一指的佛教圣地。此外，虚云还按照旧日该寺以周围四天王岭为界的记载，请当局派人履勘划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赎赎。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农无家可归。其徒众荷枪向佃户收租，租谷由1935年的二十担激增至1939年的数百担。李汉魂也在寺边修建了洋房别墅。

南华寺自虚云来到后，达官贵人不绝于道。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及港澳的大批显要富豪前往观礼。此

后，每年举行一次，直至日本军队占领韶关，仍未停止。1942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派屈映光等赴粤迎接虚云前往主持。虚云乘车经湘、桂、黔抵渝，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赞美国民党反动统治，说什么“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5)]。虚云离渝前，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由林森等作陪。

1943年，虚云移居广东乳源云门寺，以本焕为南华寺住持，继续控制着该寺实权。本焕在山西五台山当和尚时，充当汉奸，遗有血债，住持该寺后，成为地方一霸。

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到广州举行超度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当时，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请求保释铁禅，并想乘机谋充该寺住持，但终因佛教内部的派系矛盾，受到当地部分僧众反对，未能成功。

1947年夏，宗教界一些人根据太虚（中华佛教会主持）生前的提议，在上海组成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虚云被推为该盟中央监察委员。同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振颓风”[(6)]，表彰虚云等用佛教麻醉人民的功绩。

1948年冬，虚云收美国女子詹宁士为归依徒，法名宽宏。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严遵中央制定的宗教政策，予虚云以礼待。

虚云对在云门、南华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1952年，南华寺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虚云曾为之叫屈。同年，虚云应邀离粤赴上海参加和平法会，他的爱国表现受到了欢迎。冬，应邀赴北京参加发起中国佛教会会议。1953年夏，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了中国佛教会成立会。虚云被推为名誉会长之一。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给了虚云摆脱同华南残余旧势力瓜葛、从事正常宗教活动

的便利条件。虚云旧友李济深劝他留在北方，但是他不愿意。同年，他应邀前往江西永修真如寺当住持，主持复兴古刹。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化不良症在真如寺去世。

---

(1) 虚云事，因其自己和僧俗徒众的吹嘘、编造，充满荒诞不经的神话，仅其生年，就有多种说法，虚云即曾自称生于1840、1846、1852年。较近情理的说法有两种。陈铭枢在1929年写的《云南西山靖国云栖禅寺募捐启》称虚云时年六十六，据此则应生于1864年；50年代，广东省韶关市有关部门在湘乡等地调查，虚云的舅父称虚云生于同治十年，即1871年。陈铭枢的《募捐启》是在晤见虚云时应其请而作的，其说法仍出自虚云本人。因为虚云屡易其说，无法信任，此传暂采后一说。

(2) 虚云出家，一般记载均作十八岁，但因其生年说法不同，无从确定年代，此据前述调查结果。

(3) 鼓山侍者：《虚云禅师事迹纲略》，理真居士编《虚云禅师事略》，大雄书局1942年初版，第1—29页。

(4) 虚云：《重兴曹溪六祖道场记》，《圆音月刊》第1期（1947年），第42—49页；亦见岑学吕编著：《虚云法师年谱》，题作《重兴曹溪南华寺记》，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94—104页。

(5) 虚云：《在重庆狮子山慈云寺上堂开示》，《虚云老和尚法汇》，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10页。

(6) 《勅建曹溪宝林山南华寺同戒录》（丁亥）。

徐悲鸿

李仲明

徐悲鸿是中国近代对中国画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大师。1895年7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一日）生于江苏宜兴县屺亭桥乡。其父徐达章（1869—1914）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贫苦画师，擅画人物、花卉，能诗，兼善榜书、篆刻。除授课外，还经营三亩瓜田，勉强维持一家生活。

徐悲鸿六岁时在父亲指导下开始读书，渐渐喜欢绘画；九岁时开始随父亲学画，每天临摹吴友如的石印人物画，并练习写生、着色；十三岁时随父亲辗转于邻近各县村庄卖字画以维持生计，这使他更多地了解民间的疾苦；十六岁那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了，建立了中华民国。十七岁的徐悲鸿于1912年（民国元年）到上海卖画，见到一些西方艺术大师绘画的复制品，耳目一新，产生了去欧洲学习西画的愿望。十九岁时父亲病故，徐悲鸿只得在和桥镇彭城中学、始齐女子学校和宜兴女子学校三校担任图画课教学，以维持全家生活。女校的国文教师张祖芬鼓励他："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认为他"盛年英锐，岂宜居此"[(1)]。

1915年，二十岁的徐悲鸿再赴上海，但求职艰难。他一面坚持作画学习，一面寻找机会工作，有时困难到一天只吃蒸饼一块，有时终日挨饿，仍坚持作画，曾投稿给岭南画派画家高奇峰，高十分赞赏，认为徐悲鸿画的马"虽古之韩幹，无以过也"，并出版了他的作品，使他解决了学习、生活的困难[(2)]。

1917年5月，在犹太富商哈同秘书姬觉弥资助下，徐悲鸿与蒋碧微一起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同年，两人结为夫妇。翌年，徐悲鸿

认识了蔡元培，蔡邀请其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3月，徐悲鸿赴欧洲留学，1920年春入法国巴黎美术学校学习；同年6月，他在蔡元培主编的《绘学杂志》上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文中指出由于“守旧”，使“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提倡写实，反对抄袭，并提出：“改之方法：学习、物质（绘画工具）、破除派别。”[3] 徐悲鸿留欧八载，遍历英、法、德、意、比利时、瑞士等国，创作出油画代表作品《老妇》、《持棍老人》、《抚猫》、《自画像》、《箫声》、《黄震之作》等，及《男人体》、《女人体》等习作。徐悲鸿既精通中国的传统绘画，又刻苦研究西方绘画技巧、规律，融会贯通中西艺术，成为会通中西、改革中国传统绘画的首创者。

1928年徐悲鸿回国，1930年完成油画《田横五百士》。这幅重要的油画巨作寓意深刻，意在借歌颂古人威武不屈的气节，激励国人不畏强暴势力，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1928年7月，徐悲鸿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邀请去福州过暑假，并请他画“五三”惨案中被日军杀害的蔡公时烈士油画像。徐悲鸿在讲学、访友之余，不顾炎热，精心作画，在约一点八乘以三点五米的草图上，“徐先生用巧妙的方法构图。我见他画的素描草图上面，蔡公时的背影面对两个日本宪兵，地上翻倒着一个箱，前景画一张长桌”[4]，塑造了蔡公时烈士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徐悲鸿创作了《九方皋》、《徯我后》等油画巨作，其中《九方皋》中的黑马，徐悲鸿为它画上了缰辔，这在他以前的创作中是很少见的，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处理？他说：“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5] 体现了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盼望政府重视人才，拯救祖国的赤诚之心。30年代初，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南国社”共事，田汉写剧本《械斗》，表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上演情况不

佳，观众较少。徐悲鸿见状，写文章给田汉打气，文称："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6)]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沪十九路军奋勇抗日，得到上海民众的支持，但因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徐悲鸿激于爱国热情，创作中国画《雄鸡》，并题："雄鸡一声天下白——十九路健儿奋杀敌，振垂毙之民族，图以美之。"同时期创作的中国画还有《独立》（马）、《沉吟》，反映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后者题诗："天地何时燬，苍然历古今，平生飞动意，对此一沉吟。壬申危亡之际。悲鸿。"[(7)] 1936年春，徐悲鸿愤于国民党的丧权辱国，拒绝为蒋介石画像，并在《新民晚报》发表评论蒋介石礼义廉耻诠注的文章，文曰："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无往，非礼也，日本既来中国，双手奉送东三省，此之谓礼也。义，不抗日，捐廉（上海方言钱与廉同音）买飞机，平西南。阿拉（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无耻。"1936年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徐悲鸿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畅谈广西之行的印象：广西省政府的墙壁上写的是"民耻教战"，而不是什么"不抵抗政策"[(8)]。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徐悲鸿从南京去桂林，后内迁重庆。入蜀途中，徐悲鸿眼见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创作《巴人汲水》、《贫妇》等，曾在《巴人汲水》上题："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廿六年冬，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所见。悲鸿。"[(9)]

1938年至1941年，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远去印度，在印度、新加坡等地，多次举办画展，并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祖国，支援抗战。他创作了《九歌》、《群马图》、《大士像》等名作。1940年，他在印度完成了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深刻表达祖国人民在民族危难中，坚持斗争，夺取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意志。徐悲鸿侨居印度时，为泰戈尔画像。在新加坡，徐悲鸿又与诗人

郁达夫交往频繁，郁达夫曾为徐悲鸿的画作题诗：“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一九四〇年作于新加坡，郁达夫《题悲鸿画梅》。”(10)

1942年，徐悲鸿回国，继续任教于中央大学，并在重庆磐溪筹备成立中国美术学院。在这段日子里，徐悲鸿过着艰苦的生活，房屋透风，点煤油灯，吃发了霉的“平价米”。1944年，他患了高血压和慢性肾炎。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掀起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徐悲鸿毅然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恐吓，他坚定地表示：“人在曹，心在汉，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11)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年，徐悲鸿离重庆北上，出任北平艺专校长，途经上海时，见到周恩来、郭沫若。周恩来鼓励徐悲鸿办好北平艺专，“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北平艺专复校后，徐悲鸿约请了一批进步的、有成就的教师任教，规定国画、油画、雕塑、图案、陶瓷各系都要学习两年素描，以掌握写生能力，教导学生：“画画要诚实，要脏，不要净；要方，不要圆；要笨，不要巧。”(12)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市美术协会”指责徐悲鸿“摧残国画”，艺专国画组三位教授也提出罢教。10月15日，徐悲鸿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书面谈话《新国画建立之步骤》，指出“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11月28日，他又发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提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虽不亡，而艺术必亡”。(13)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打电报，派了专机要接徐悲鸿去南京，徐不为所动，继续团结北平艺专师生员工，保护学校，拒绝南

迁。在傅作义召开的最后一次院校长会议上，当提出何去何从的问题时，会场沉寂无声，徐悲鸿第一个发言，率先声明不能走，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并请傅作义将军考虑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徐悲鸿兴奋地写诗赞颂："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同年4月，徐悲鸿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担任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创作了《慰劳》、《毛主席在人民中》（画稿，部分）、《奔马》等画作。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病逝世。1954年10月，徐悲鸿纪念馆建成。徐悲鸿的学生主要有吴作人、蒋兆和、李苦禅、韦江凡、傅抱石、吕斯百、王临乙、尹瘦石、冯法禩、艾中信、刘勃舒等。

---

(1)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2)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第15页。

(3)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第25页。

(4) 王临乙：《亲自经历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5) 郑一奇：《融会中西的杰出艺术家徐悲鸿》，宋嘉沛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6) 冯法禩：《一代巨匠　艺坛师表》，《徐悲鸿》，第38页。

(7)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第58页。

(8) 冯法禩：《一代巨匠　艺坛师表》，《徐悲鸿》，第38页。

(9)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第68页。

(10)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第79页。

(11)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第90页。

(12) 曾善庆：《终生难忘的情谊》，《徐悲鸿年谱》，第81页。

(13) 李松编著：《徐悲鸿年谱》，第100页。

徐恩曾

刘敬坤

徐恩曾，字可均。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双林镇。徐父经营商业并兼出租土地，早亡。徐与陈果夫、陈立夫为远房表兄弟。徐有兄弟三人和一个姐姐，由在北京任职的长兄徐恩源供给两个兄弟读书。徐恩曾幼读私塾，后入本镇小学，1913年高小毕业，至吴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徐记忆力强，读书用功，1917年夏，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由南洋公学改称）电机工程科。1922年夏，徐在上海交通大学（由上海工专改称）毕业，自费至美国入西屋工厂实习，后入卡奈奇工学院读工厂管理。1924年秋，徐与陈立夫在旧金山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同时加入国民党。1925年，徐获硕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市自来水厂任工程师。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徐恩曾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1929年2月，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筹建时，徐恩曾参加筹建工作，并建议在上海真如筹建国际广播电台，在上海举办无线电人员训练班，自荐为训练班负责人。同年夏，无线电训练班招收学员，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考入该班，以同乡关系为徐所赏识。

同年，徐恩曾经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援引，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任总务科长。徐在总务工作中建立严格有序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为中央党部安装电话总机，以方便对内外的联系；并编制一套难以破译的密电码，使保密功能大为增强。在此期间，徐了解到党务调查科职责重大，甚受领袖重视，乃积极谋求向该科问津。同年底，调查科主任叶秀峰因与陈立夫发生龃龉，陈遂以徐恩曾暂代。1930年春，叶秀峰调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徐恩曾遂于12月改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

党务调查科于1928年2月初成立时，只有工作人员十多人，科内设采访与整理两股；股设总干事一人，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徐恩曾接任后，任命有秘密工作经验并被誉为“俄国通”的张冲为采访股总干事。为了加强对中共的斗争，采访股下增设了一个特务组，负责对中共活动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与采取行动等。此外，张冲自编特工教材，开办特工训练班以培养骨干；并向一些中心城市派驻特派员，在省城及特别市、各铁路局设立特务室，以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破。

当特工机构基本上建立起来后，为便于开展工作，徐恩曾把调查科的活动从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移往中山东路紧邻中央饭店的一幢楼内，悬挂“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掩护；又把在中央党部总务科的得力助手钱壮飞调往该科担任秘书，代徐坐镇；调查科的函件及科内事务，悉委钱处理。钱壮飞由此为中共特科人员的渗入及获取情报提供了条件。

徐恩曾又增设秘密电台，积极扩大工作范围。在南京设总台，在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地设分台，随时取得联系。调查科还与首都警察厅合作，利用该厅督察处的名义，借检查户口为名，将认为有共产党员嫌疑或进步人士加以拘捕，解送宪兵司令部关押。党务调查科此时已形成以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遇有重大决策时，陈果夫也应邀参加。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保卫局长顾顺章被捕叛变，钱壮飞侦知此事后，及时机智地赶往上海经李克农转告周恩来，使中共中央机关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为了掩盖录用钱壮飞失察之责，徐恩曾串通陈立夫严密封锁此事，并紧紧控制叛徒顾顺章，使之在南京军人监狱中指认出恽代英。当蒋介石得知中共要员被捕的报告后，对调查科的工作更为重视，召见徐恩曾时给以鼓励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1)] 并批给十万元奖金。

1932年3月，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为了与该处展开竞争，经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商定，随即成立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由徐恩曾任特工总部主任，办公地址移设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特工总部成立后，经过多次调整，将原来仅具初级特务组织形式的党务调查科，发展成为现代规模的特工组织。特工总部的核心部门为书记室，下设组织、指导、审理、行动四组。凡总部所属各地的组织、人事及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侦查、破坏、逮捕、关押以至杀害，均由书记室研究决定，交具体部门去执行。除书记室之外，总部还设有训练、情报、总务三科，负责特工人员培训，指导下属各站、室对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此外，徐恩曾还在总部内设立了咨询性的设计委员会、督察室和通讯总台，把对建立特工总部起过重要作用的张冲调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知道徐的后台是陈家兄弟，自己难以与之争雄，此后逐渐脱离特工总部。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冲调任与中共谈判代表，他在谈判中对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有所了解，力主两党合作抗日。此后几年，张冲与周恩来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此时的特工总部，除边远的新疆和西藏以及为地方势力控制的广西、云南、山西外，在各省和各铁路管理局都建立了特务室，在南京、上海等直辖市则称之为区。区和室都是秘密机构，对外则以肃反专员或特派员的名义进行活动。各省特务室设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四科，较小省份的特务室不设行动科。特工总部在初成立时，本部仅有工作人员五十人左右，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增至三四百人之多。

特工总部成立后，忠实奉行国民党对共产党所采取的镇压政策，仅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由特工总部派人或经由首都卫戍司令部逮捕和杀害的共产党员即有近百人之多。中共中央自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后，特工总部对中共上海中央局进行过三次重大的破坏。徐恩曾宣

称："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已全部扑灭。"特工总部破坏共产党的另一重要手法，是插手各地高等法院管辖的反省院或感化院，由该部派员担任院长，以加强对被拘押人员的"感化自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撤裁各地的反省院。

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说，特工总部破坏了大量的中共地下组织，拘捕、杀害了大批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认为特工总部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斗争的主要力量。

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决定调整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党务调查处，不久调濮孟九任处长。这时，徐恩曾只任特工总部主任。特工总部为了夺取情报，与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之间在邮电检查领域里展开激烈的争夺，竟闹到双方动武的地步。1935年5月4日，蒋介石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派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即组织部长）陈立夫为兼任局长，派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为兼任副局长。局内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为党政处，即特工总部的全班人马与业务范围，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为军警处，即复兴社特务处的全班人马与业务范围，由戴笠任处长；新成立的第三处为邮检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由局本部秘书丁默邨兼任处长，后改由金斌担任。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恩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8月，军委会改组为大本营，下设七个部，陈立夫任第六部部长，主管党务、特工及民众动员组训事宜。徐恩曾任第六部第四组组长、中将军衔，戴笠任第六部第五组组长、少将军衔。1938年3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宣布，对特工体制进行重大的改组。原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升格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或军统；原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即党政处，归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或中统，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中统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相当

于部级单位。1938年8月，中统局在武汉成立，不久大队人马分三路撤往重庆。

抗战期间，中统局的主要活动是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是以日伪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展防（汉）奸防谍的活动；一条是以中共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展反共防共活动。但徐恩曾一再在局内强调："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抗日是我们临时的次要的任务；反共是我们长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务"[(2)]。实行两线斗争，但又侧重在反共防共方面。中统局初设三组、一处、一室的办公机构。此后，中统局又新设统计处、经济调查处与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资料室以及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改称侨务小组）、考绩委员会、党员调查网建立委员会。中统局还建立名为"生庐"的秘密机构，由徐恩曾与顾建中亲自掌握，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各省党部委员转来的高级特工人员，专门研究与策划对付共产党的活动。

中统局成立后，原来特工总部所属各省市的肃反专员与特务室即行撤销，成立以原特务室为基础的省调查统计室。省室在所属各县设调查组或派出调查员，在重要的县城设立县调查统计室，其负责人称调查专员。重庆因系抗战时的陪都，中统局特设重庆实验区，在兰州则建立了西北区。中统局派遣人员进入司法行政部法官训练所学习后，分派到各省法院任职。中统局曾与英国情报机关在抗战时实行合作，在缅甸、新加坡以及留在印度的华籍海员中建立三个工作队，但均未获得合作成果。

中统局的组织十分庞大，而着重在基层的扩展与渗透；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以及文化教育部门和民众团体，都属于中统局的活动范围，都有中统局发展的"蚯蚓"。抗战时期，中统局自各大学和国立中学的学生中吸收了不少新的成员。据1941年中统局人事科统计，在该局领取薪水的职业特工人员即达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而由该局掌握的五类人员，即调查工作人员、党员调查网成员、通讯员和外围分子

总数则有十万人之多。

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六年（指1926年、1927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国民党遂对中共采取"溶共、防共、限共"的基本方针。同年1月23日，国民党秘密设置防共委员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统局的工作中心遂即由原来的两线斗争全面转移到反共的方面。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和进行反共活动的纲领性文件。根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衍生出《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系列文件，主要由中统局起草定稿后，经蒋介石审定批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印发。徐恩曾强调称："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要求由"政府秘密策动"，"地方务求严密，中央可示宽大"。

1942年4月，吴铁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以加强交通部的特工活动为由，与陈果夫共同保荐徐恩曾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在徐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时，曾批准在重庆九龙坡为交通大学盖了一片砖木结构的校舍，使交通大学于1942年正式迁校重庆，并开始在渝招收首届新生。这一举措，可能是徐某一生中所行的唯一善政。

1944年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尾声，蒋介石要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人共同草拟战后复员计划，吴即要徐恩曾代为草拟。徐与中统局的张国栋等人商量后，认为战后的复员方案应强调和平统一建国，并且"只有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和平，才能建国"。因此，"首先是政令、军令的统一。要求共产党交出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军权和政权；其次为财政、税收的统一，废止边区银行和钞

票”等。徐恩曾提出的这个战后复员方案的统一前提，成为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所一贯坚持的方针。

徐自从当上交通部政务次长后，便积极谋求向从政的路上去发展，针对大后方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涨情况，遂与中统局的赵毓麟草成《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及《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主张改发行纸币为发行物价证券，国家改征税为征实；对公教人员及官兵一律改薪饷为折实的物价证券。徐恩曾把《措施》及《方案》呈送到蒋介石那里，蒋初看过方案之后，还当面夸赞徐的方案“不无见地”。等到蒋介石拿给吴鼎昌看后，吴当即指出，“大后方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是生产不继，求大于供，实物远远不能达到实际最低限度的需要”；并指出此案不可行，暗示徐恩曾的目的是在“猎官”。自此以后，蒋介石对徐恩曾开始怀有不信任感。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南会战时，蒋介石为了判断日军的战略动向，召集各特工机构负责人汇报，徐恩曾因忙于猎官，对此竟无材料，蒋介石当场对徐严词斥责，要徐集中精力，好好抓情报工作。1944年某日，重庆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贴出“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命徐恩曾查了许久也一无所获，斥责徐“有忝职守”。对于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能在重庆广泛发行的责任，蒋介石也算到徐恩曾头上，说徐“无能”。加之徐与军统局戴笠的矛盾日益加剧，连续查出中统局人员两次私运假钞案，复有徐的前妻王书青在成都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后方市场，1945年1月，俞飞鹏接替曾养甫任交通部长，沈怡继徐恩曾任政务次长。同年1月30日，蒋介石下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不许徐参与政治活动。自此，徐恩曾足不出户，在家闭门思过一月有余，对前来探视的老部下说，“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庆幸自己的脑袋尚在脖子上。

抗战胜利后，徐恩曾举家迁回上海，住霞飞路逸园新村七号，广泛展开社会活动，成为沪上的一个交际中心。徐在上海黄浦滩的麦加利银行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挂出中国农垦机械公司的招牌，向中国

农民银行取得大宗贷款，在投机生意中大发其财。徐又在上海组织中国打捞公司与台安轮船公司，并获得向浙赣铁路上海枕木公司供应枕木的业务，从中牟取厚利。在1946年至1949年间，徐在上海多方钻营，浸浸乎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1947年，徐恩曾由中国工程师学会分得的名额中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与“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春，徐与其妻费侠列名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委员。3月，迁至台湾，仍继续经商。

徐晚年得健忘症，遇到故旧老友均不认识。1985年，徐在台病逝。

---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 柴夫：《中统兴亡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徐寄廎

朱镇华

徐寄廎原姓陈，名冕，字寄廎，以字行。浙江永嘉人。1882年2月20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三）生。其父陈瀛士曾在县衙门任职，为人重情义，因执友徐某无子，应允以长子寄廎出嗣，改为徐姓。

徐寄廎幼年入塾启蒙，继而就读于浙江杭州高等师范学堂。1898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毕业后再入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深造，与李铭、陈朵如、钱新之等同学。

1905年秋，徐寄廎学成归国，即随同温州著名经学家孙诒让创设温州学务总处，孙任总理，徐任管理部副主任。1908年初，又协同孙筹建温州师范学堂，孙任校长，徐任监学，总理全校教务、任免教员及安排学科等。

徐寄廎在温州办学数年，深感所学非所用，不能为中国富强作出贡献，决心开拓新的事业。1911年他到上海，与留日同学黄溯初将《时事报》与《舆论日报》合并改组，创办《时事新报》。1914年，徐寄廎出任兰溪中国银行支行经理，翌年转任九江中国银行支行经理。1916年4月，被迫取消帝制的袁世凯为筹措军饷，有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现金或发行不兑换券之议，引发挤兑风潮。5月，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徐深知停兑之举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和金融稳定，乃仿上海中国银行抗命立场，设法维持兑换，稳定市面。不久，徐离开九江中国银行返回上海。

徐寄廎到上海后，与张嘉璈等人共同创办了后为银行公会机关报的《银行周报》。该报对全国金融业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发展起了较大促进作用。不久，社务主持人张嘉璈赴北京，就任中国银行副总裁，

徐寄廎接任社务主持人之职。随着中国银行业务实力的增强和《银行周报》社会声誉的提高，徐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

1917年初，徐寄廎由盛竹书延揽，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开始了在该行长达三十五年的服务，先任副经理职，不久升任协理、常务董事。他处事谨慎，对发展浙江兴业银行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如同工商业各界广泛发生联系，稳健地从事放款，在经济重镇增设分支行等。1922年，他主持总司库时，主张发行钞票准备金十足，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均以现金四成、证券六成做准备，而浙江兴业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金百分之一百为现金，社会信誉大增。

徐寄廎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十分努力。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副总裁陈行相继辞职，徐寄廎以“好好先生”的为人，于1932年1月6日被任为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兼代总裁。他就职后，虽致力于安定金融、维持债信，但终因孙科内阁财政困难，政治、军事又毫无办法，迅即垮台，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2月12日，宋子文重新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徐的副总裁兼代总裁职务被免去，只保留监事的虚衔。

其时，日军侵犯上海之“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英勇抗御。徐寄廎除参加地方维持会工作外，并任劝募救国基金委员会委员。1933年，他协同金融界同人办理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创立票据交换所，上海银行同业间票据的交换，从此不再需要互相派人递交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全面展开，徐寄廎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公共租界华人纳税委员会副主席、抗敌后援会委员、筹募救国公债委员会委员等职，主持上海市商会工作，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1939年，汪精卫叛国潜至上海，与日本秘密谈判签订卖国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受汪精卫指派，始终参与其事。徐寄廎以往与高宗武往返甚密，闻悉后晓

以民族大义，反复劝导高幡然反正。他还与在香港的杜月笙取得联系，电杜向蒋介石汇报。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高宗武于1940年1月3日脱离汪精卫集团，秘密离沪前往香港，于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精卫一伙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附件”，以及秘密谈判的经过。

1941年3月，徐寄廎秘密移居香港。香港沦陷，他匿名隐居。1942年春，徐因病秘密返沪。到上海后，日军胁迫他出山主持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工作。徐卧床称病不起，力拒伪职，对敌伪之威胁利诱始终不为所动；另一方面他秘密与重庆国民政府派驻在沪从事地下工作的蒋伯诚以及杜月笙、吴开先、王先青诸人取得联系。徐参与秘密研讨上海的工商业情况，以尽量争取少遭日伪的破坏。汪伪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开征营业所得税，他和项叔翔联络浙江实业银行等银行的负责人，与立信会计事务所李文杰共同筹商对策，确定在会计处理上隐匿所得的办法，抗征巨额所得税。1943年下半年，中共地下组织发起组设“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用以救济贫困职工和资助进步青年去苏北参加革命，徐积极参与，代表浙江兴业银行承担部分基金，对“贷金处”的活动热情支持。后来有人赞誉他为“金融界之莲花”，身陷敌境出污泥而不染。1944年底，他出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勉力经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徐寄廎以国民政府特派员身份，接收伪上海市商会及银行公会。1946年，被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长、上海银行公会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上海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他还兼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经济计划委员会、苏浙皖处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逆产处理委员会、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委员，和“民国三十六年美金公债、库券募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兼任中央银行监事，中国银行、上海市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董事，中国垦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上海商报出版社等常务董事，上海信托公司、泰山保险公司、温州商业银行、瓯海实业银行等董事长，全国

红十字会、上海地方协会和其他慈善救济等机构的理事，大夏大学、沪江大学等学校的校董。

1947年8月，徐寄廎对国民政府财政部禁止票据“当日抵现”的决定大胆陈述反对意见，指出在工商业资金普遍缺乏，市面利率高昂之今日，尤有票据当日抵现的需要，否则裨益绝鲜，为害滋多。他列举禁止“当日抵现”的七点弊端，指出不能为减少不稳健之信用扩张而因噎废食。他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后，积极会同总经理项叔翔采取办法，渡过了困难时期。徐寄廎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十分不满，常感叹说：“内战不能打，老百姓太苦啊！”(1)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徐指出：“从币制史角度讲，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具体的做法检查，是很背民心的。”(2)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约徐寄廎到吴淞口外复兴岛海军基地，鼓动他随同逃往台湾。徐以年近七十身体行动不便等为辞，加以拒绝。上海解放后，徐寄廎虽因患严重气喘和高血压病，行动很不方便，但仍勤于职事，为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生产贡献力量。他因病曾几次申请辞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之职，均被慰留，直至1952年底，全上海的私营金融业走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始摆脱浙江兴业银行职务。

徐寄廎好学不倦，勤于思考，平素余暇除读书之外，别无偏好。他经常告诫同行、朋友应多读有益的书报。从事银行工作，倘使不明世界经济形势，不懂得国内经济情况，对于自己的职责就很容易疏忽。徐著有《最近上海金融史》、《日中字典》和《近代泉币拓本》等书。《近代泉币拓本》当时只印二三十本，分赠国内各大图书馆及美、英、法、德、日图书馆，现在已成为稀有的版本。徐生活也一向简朴，不重视个人资产的积蓄，平日以“勤俭忠诚”四字律己。病危之际，还不忘叮嘱家属注意节俭。

1956年12月25日，徐寄廎在上海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科藏。

《银行周报》。

《徐天锡回忆资料》（未刊稿）。

---

(1) 方孟仁：《党在金融界活动的作用》，《旧上海金融业党史资料》，上海金融业党史办编（油印件）。

(2) 《浙江兴业银行档案·访问记录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科藏。

徐镜心

卫香鹏

徐镜心，原名文衡，字子鉴。1874年12月10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出生于山东黄县[(1)]。童年入私塾，聪明好学。他兴趣广泛，也爱音乐，十三岁时常于学习之余，到镇河寺跟僧人学吹笛和箫等。稍长，泛览兵法、宗教诸书，对陆王之学尤为嗜爱。二十岁为邑诸生。他目击甲午、庚子两役，“慨然于清政窳败，革命思想潜萌于中”[(2)]。1901年，徐肄业于烟台毓材学堂，次年转入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学习。

徐镜心在日本学习，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影响，逐渐产生反清革命思想。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他率先加入，并被举为山东分会首任会长。是年底，在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斗争中，一部分留学生愤然罢课归国，徐镜心偕谢鸿焘等回到山东烟台。他以倡导革命为己任，设立同盟会机关部，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筹措革命经费，他曾亲自向山东掖县留日同学邱丕振的父亲宣传“毁家纾难”的道理，说：“清室权贵，招权纳贿，国已不国，必致外人瓜分之祸。国若不存，家产何有？尊府拥有厚资，曷不毁家纾难，组织革命基础。”[(3)] 邱父受感动，即捐资两万元。为了唤醒民众，扩大影响，徐还劝说谢鸿焘出资在烟台西郊通绅冈创办东牟公学，聘同盟会员担任教员，借教育宣传革命。随后，又联络高密的刘冠三组织相州中学，与王学锦、徐文炳创设师范班于育英学堂。由于徐镜心等广事联络，同盟会在山东迅速发展。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徐镜心于1907年前往奉天，一度任《盛京时报》主笔。他又与张继等人结伴潜赴东北各地，宣传革命，结纳豪

杰，先后发展同盟会员三百余人。不久，事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闻，下令缉捕，于是潜往吉林，在省城高等小学任教员以为掩护。是年，宋教仁与白逾桓等到东北策动“马贼”举事，他与宋取得联系，在省城创办一木植公司，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后谋泄事发，同志数人被捕，徐镜心幸得走脱，往见当时担任延吉边务帮办的吴禄贞，在吴的掩护下，任督办处垦务委员。1910年秋，因母病回到家乡。

徐镜心返黄县后，初与本县邹斌元、王学锦、李梦庚等人组织县农会，担任会董。次年夏，在济南与刘冠三、王厚庵创立戏曲改良社以为掩护，从事革命宣传和联络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徐镜心得知消息后，便与丁惟汾、谢鸿焘等谋划响应。他们借游大明湖为名，在古历亭开秘密会，商议响应办法，决议召集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强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4)] 会后，事为地方士绅、立宪派所悉，他们认为徐镜心“峻急”，听说徐将担任各界联合会会长，竟群起反对。徐镜心闻此情况，不愿因一己之故而牵动大局，决定与党人杨岘庄南下，同沪军都督陈其美取得联系，相约南北互为策应。不久，徐镜心前往奉天，参与革命党人商震、程起陆等在辽阳发动的起义。

徐镜心南下后，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联络各界人士和清军第五镇中支持独立的官兵，于11月13日在济南召开各界联合大会，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这时袁世凯已到京组阁，立即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赴济南，策动取消山东独立，以稳定北方局势。第五镇的标统吴鼎元、张树元等人均是袁的旧部，这帮人经策动就立即转向反动，要求取消独立。11月24日，孙宝琦又宣布取消山东独立。于是，徐镜心决心以武力光复山东，他到烟台组织“共和急进会” [(5)] ，自任会长，宣布以“巩固山东革命之实力，与满洲同志相呼应，以为南方之声援”为目的 [(6)] 。并设立民政、军事、宣传、交通等部门，他兼任民政部长。随后，徐镜心派崔士杰、徐镜古去蓬莱、黄县筹款，本人则去大连组织民军。1912年1月15日，徐镜心率领由共和急进会

员和关东绿林军五百余人组成的民军袭占登州（今蓬莱），次日又攻克黄县，组成山东军政府，推连承基为鲁军司令，徐镜心任总务部长，军政府着手筹措款项，加紧战备，准备进军济南。

山东军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令青州总兵叶长胜率左路巡防营，向黄县民军发动进攻，连承基、徐镜心亲自指挥民军与之激战三昼夜，始将清军击退。随后得到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刘基炎部的支援，声势复振。对于清军对山东革命党人的镇压，徐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任胡瑛为鲁军都督，驻节烟台，因缺乏实力，清军复乘军政府内部改组之际再攻黄县。徐镜心不辞艰危，亲率士兵至前线侦探敌情并指挥迎敌，后终因民军势单力孤，黄县于2月14日失陷，徐镜心前往烟台。

南北议和告成后，山东战事不久也随之结束。徐镜心认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任务已经告成，目下应致力于民生主义，为实现“平均地权”移民关外垦殖，便发起成立“山东垦殖协会”；为谋渔航事业之发展，又创立“泺口河船协会”[(7)]。其间，山东都督周自齐曾以济南道一职相笼络，为徐所拒绝。徐镜心对议会政治抱有希望，积极参加政党活动。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任山东支部理事。同年冬，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13年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

随着袁世凯加强专制独裁，徐镜心对袁日益不满。他曾当面对袁说：“总统者，公仆也；国民者，共主也。仆无自己意志，以主人意志为意志，仆无自己行动，以主人行动为行动。总统能为此，则中国治，否则中国乱。治则全国之休，乱亦非总统之福也。”[(8)]袁世凯听后大为惊讶，说：“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9)]随后袁派心腹对徐进行笼络，表示拟任以甘肃都督，遭到拒绝。“宋案”发生后，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徐镜心即发表《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公开提出对袁世凯实行弹劾。他说：“袁氏借款不经国会议决，是为违背法律”，“不弹劾袁

氏，无以谢中华全国”[10]。此时，徐镜心还与南方的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三都督暗中联络，密谋讨袁[11]。

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后，为谋帝制自为，首先向《临时约法》开刀，提出增修《临时约法》。他授意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抛出《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对宪法起草委员会及《天坛宪法草案》大加攻击，为自己在宪法中争夺权限。徐镜心于是在《顺天时报》上发表《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文章说：“蔑视国会，即为蔑视国民。蔑视宪法起草委员会，即为蔑视国会。蔑视国民与国会，即为蔑视国家，即为共和之蟊贼，即为国民之罪人。”[12]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徐镜心等国民党籍议员被迫缴出议员证书。袁对徐早就怀恨在心，此时更派密探侦察其行动，后竟下令缉拿。1914年3月14日，徐镜心在《顺天时报》馆被捕。在狱中，袁世凯指使京畿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对他百般利诱，继以非刑拷打，但徐坚贞不屈。4月14日，徐镜心被袁政府杀害于北京[13]。

---

(1) 《徐氏家谱》第二卷（之二），第23页。

(2)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426—429页。

(3)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5页。

(4)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426—429页。

(5) “共和急进会”又名“北方革命急进会”，总部初设于烟台，后移往大连。

(6) 《时报》1912年1月3日。

(7)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5页。

(8)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426—429页。

(9)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集，第426—429页。

(10) 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43集，第343页。

(11)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5页。

(12)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9页。

(13)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425页。

徐堪

马宣伟

徐堪，原名代堪，字可亭。1888年1月1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生。四川三台人。父徐奋卿系秀才，在家乡教书为业。徐堪自幼随父读书。1904年应岁考，得中秀才。

1906年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招生，规定报考者应为举人、贡生、秀才、监生。徐堪应考，取第八名。入学后，常与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十分不满；同时经常阅读《新民丛报》、《民报》、《浙江潮》及《革命军》等书刊，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07年，黄复生、夏之时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川，在成都成立同盟会四川支部。徐堪经同学卢师谛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成都的同盟会支部拟在农历十月初十全城文武官员齐集万寿宫庆贺慈禧寿辰时，组织武装起义，占领省城。徐堪参与密谋，并领到手枪一支。不幸计划泄漏，清政府四门戒严捉拿革命党人。徐堪和三位同学步行逃往陕西，又辗转到武汉，入武昌工艺厂当学徒作掩护。1908年冬，徐堪接同盟会总部指示：以武汉起事尚待多时，着先各自散归。他长途跋涉返川，1910年初考入四川高等警官学堂。

1911年夏，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同盟会党人借保路推进革命活动。徐堪率警官学堂及陆军学校学生十余人，赴川北一带策动民军起义。途中得知蜀军政府已于11月22日在重庆成立，急忙率队赶到重庆，被委为蜀军第四标标统。1912年3月，调任夔州关监督。清代夔关监督由夔州知府兼任，每年交征解银十六万两，超额归监督私有；连同其他收入，每年所得不下十万两，是个肥缺。徐堪任监督后，大力整顿夔关制度，做到点滴归公，当年征解银达四十万两。

1913年8月5日，熊克武、杨庶堪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在重庆通电讨袁。讨袁失败后，四川督军胡景伊下令通缉革命党人，谓徐堪“并与逆党勾结最密，卷劫公款甚巨”[(1)]。徐逃亡上海，将原名徐代堪改为徐堪。

徐堪在上海继续积极参加护国战争及护法斗争，并常回川活动。1918年任川滇黔靖国军援鄂第一路总司令部军需处长兼江北县长。1919年被四川补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4月，他在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参与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国会在北京复会，徐堪来到北京，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勾结直系军阀，宣布补选议员不得出席，徐堪便跟随胡汉民、谢持、邹鲁留在北方组织国民党党部。1924年，北京政变后，他任北京政府农工部商品陈列所所长。1925年11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徐堪追随谢持、邹鲁等人，将商品陈列所作为西山会议成员的活动场所。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徐堪离北京南下，初任上海交易所监理官，后改任金融管理局副局长，负责管理上海金融。1928年，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改金融管理局为钱币司，徐堪初任副司长，12月任司长。他秉承宋子文的意旨办事，取得宋的信任。1933年，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徐堪又兼任公债司司长；1935年5月，升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兼钱币司长，1939年又兼任四联总处秘书长。徐堪在财政部十余年中，全力执行蒋介石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财政措施，一再出谋献策，事必躬亲力行，深得宋、孔信赖。

徐堪在财政部任职期间，为国民党政府做了四件事：一、确立中央银行的金融统治地位。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为国家之最高金融机关，负有协助政府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之重责”[(2)]，然而商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先是利用金融力量阻挠中央银行开业，“继则提出中央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全国不得超过四千万元；银行同业每日收到之中央银行兑换券须当日轧现；以及中央银行理监事名额与监事会主

席人名等种种限制与要求，非财政部完全应允与实行，中央银行不得开业”[3]。在中、交两行多方扼制下，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因无法解决庞大的财政赤字而被迫辞职。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后，徐堪献策对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增资：中央银行由二千万元增扩为一亿元，确立其金融统治地位；对中国、交通两行则增加官股，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二、变中国、交通两行商办为官办。徐堪提出的改组中国、交通两行的方案，使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三位一体，在同一战线上为国家奋斗”[4]。1935年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上述方案时，遭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徐堪多方搜集资料，写成会议辩论稿送交孔祥熙，再次开会时，由孔对汪等的反对意见逐一予以驳斥，又经蒋介石出面，改组金融案方得通过。从此，中国、交通两行改归“国营”，纳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系统。三、改革、统一币制。清末和民国以来币制混乱，除中央政府铸造银元外，各省也造了一部分成色不一的银元、铜元，并发行纸币。徐堪针对币制混乱情况，起草全国统一币制方案，于1935年11月4日由国民政府下令实行法币政策，为国民政府稳定和统一全国财政金融起了很大作用。四、改革公债的发行。1936年，国民政府采纳徐堪的建议，改革公债的发行，先后发行“统一公债”十四亿六千万元、“复兴公债”三亿四千万元，为国民政府减缓旧债的还本付息困难并筹集到大笔款项。

徐堪在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改革方面立了大功，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又兼任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5月，徐堪任行政院粮食部部长。他提出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从广大农民手中强行征取粮食。1946年11月，他调离粮食部，任国民政府主计长。他在南京搞了一个“四川建设协会”，企图在西南建立起经济势力。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金、银、外币。9月6日，徐堪奉派考察四川、云南、湖南、湖北等省“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执行情形”[5]。由于金圆券迅速

贬值形同废纸，他向蒋介石献策发行“银圆券”，以挽救金圆券全面崩溃的命运。11月，蒋介石任命徐堪接替王云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不久徐又兼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7月，他在广州主持发行银圆券，结果仍然是很快地变成废纸。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徐堪前往香港，不久去美国。由于他多年积聚的财产皆被子女瓜分，遂于1959年只身一人到台湾定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会常务委员。1969年7月29日，徐堪病逝台湾。

---

(1)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92页。

(2) 徐堪：《中交两行增资改组案经过》，周开庆编《徐可亭先生文存》，台北徐可亭先生文存编印委员会1970年版，第1—2页。

(3) 徐堪：《中交两行增资改组案经过》，周开庆编《徐可亭先生文存》，第1—2页。

(4) 徐堪：《财政上的四大建树》，周开庆编《徐可亭先生文存》，第4页。

(5)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395页。

徐谦

蔡静仪

徐谦，字季龙，教名乔治，晚年自署黄山樵客。安徽歙县人。1871年6月15日（清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生。他的家庭是当地的望族，所谓世代书香之家。他四岁丧父，在母亲抚育下成人，从小刻苦习读经史，兼涉西学。1902年乡试中举，1904年中进士，入译学馆攻读。1905年译学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他在仕学馆学法律、政治。1907年任翰林院编修，旋任法部参事，主持制定法律，曾拟订司法制度改革条例。1908年任京师审判厅长，一年中处理积案千余件，深得好评，升任京师高等检察长。1910年，他和奉天高等审判厅长许世英代表中国去华盛顿出席改良监狱的第八届国际会议，赴美途中曾到莫斯科、柏林、罗马、巴黎、伦敦考察各国司法制度。

1911年，徐谦回国时，武昌起义已爆发，他辞去京师高等检察长职。同年底他和许世英等发起组织国民共进会，以该会名义发表《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主张在中国成立“联邦共和国”，立法、司法集中于中央，行政分权于地方。1912年3月，徐谦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司法部次长。6月，由于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唐绍仪愤然去职，徐亦与其他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8月，国民共进会与同盟会及其他几个小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徐谦被举为党本部参议。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徐谦于4月27日在《民权报》上发表《布告国民》一文，号召武装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意态消沉，回上海当律师。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9月，徐谦到北京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次长，并于此时在基督教圣公会受洗入教。他说自己入教是为了救国，后来曾发起建立全国基督教救国会。

1917年7月，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南下广州，徐谦偕同前往，为大元帅府秘书长。1918年4月，孙中山为旧桂系军阀排挤，离粤赴沪，委派徐谦为代表，参加军政府政务会议，被桂系控制的军政府任命为司法部长。1919年1月，孙中山派徐谦和陈友仁以南方代表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他们反对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不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徐谦回国后，因对把持军政府的岑春煊不满而未回广州，去天津任天主教创办的《益世报》主编。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北洋政府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兼湘西镇守使冯玉祥率部队由湖南常德进驻汉口，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呼吁南北“早息内争”。孙中山命徐谦和钮永键去汉口和冯玉祥会晤，争取冯一致行动。据冯说，此次会见使他很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嗣后，徐谦成为孙、冯之间的联络人，常常往来于冯玉祥军中。

1921年4月，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徐谦任大理院院长。1922年8月，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广州赴上海，徐谦也随往。1923年2月，陈炯明兵败下台，孙中山再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大本营，命徐谦、胡汉民、汪精卫等为驻沪代表，参加南北和议。议和失败后，徐谦回广州，任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这一年，徐多次奉孙中山之命，与冯玉祥洽商联络反直。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徐谦表示积极赞成。同年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徐谦曾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赞扬冯“见义勇为”，主张解散非法国会，召集和平会议，从各省农工商学团体及全国孚众望而有功于民国的人士中遴选委员，并认为“前清废帝乃系民国乱犯，应治以国法”[(1)]。10月26日，冯玉祥邀请徐谦到北京，参加国事会议。旋被任为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2)]及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当时，李大钊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主持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徐谦在李大钊领导下，积极参加1925年的国民会议运动及“五卅”反帝运动。他还帮助冯玉祥在北京创办今是学校，收容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开除的大中学生，并从中选拔学生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去建立国民军政治部。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徐谦被选为政府委员，兼管司法行政。他去广州前，参加7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国民大会，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屠杀我国人民，被大会推举为执行主席之一。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徐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在京津一带的反日示威运动大会上，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援助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行为。同年3月18日，他主持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的国民大会，反对日舰进攻大沽口，驳斥八国最后通牒。段祺瑞下令镇压请愿群众，发生“三一八”流血惨案，并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等人，诬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3)]。这时，冯玉祥因遭奉直联合反对而下野，启程去苏联考察。徐谦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的建议，为了争取冯玉祥，与其同行，途中一再劝说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冯受徐谦及其他各方面影响，于4月底由徐介绍加入国民党。8月，徐回广州，当时北伐已开始，他正式担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职。10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国民政府政纲及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宜，徐谦为会议主席团五成员之一。

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鲍罗廷、徐谦及一部分国民政府委员先去武汉，筹备迁都事宜。然而，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安下北伐军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相对抗。蒋为了独揽党政军大权，执意迁都南昌，于是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12月13日，武汉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徐谦被推为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开展了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登陆，我国群众起而抗击，声势极大。徐谦前往发表演说，支持我国人民争取收回租界的正义要求。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次全体会议，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制止蒋介石独裁的决议，徐谦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委。4月2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清查共产党呈文》，徐谦被列入看管监视的名单之中。

4月19日，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6月1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郑州。6月10日至13日，徐谦和汪精卫、孙科、顾孟馀等武汉政府领导人到郑州和冯玉祥会谈，决定将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让作冯军防地，任冯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组织开封政治分会，由冯玉祥任主席，而徐谦为委员，负责党务。

徐谦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早在武汉政府初建时期就同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发生过分歧。他反对分配土地和惩治反革命，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开始对共产党和鲍罗廷产生不满。郑州会议期间，他又对冯玉祥指陈共产党“残暴”，鲍罗廷“专横”，武汉“秩序混乱”等等，建议冯出面要求驱逐鲍罗廷。这对冯起了一定的作用，使他终于通电武汉国民政府立促鲍罗廷回国。郑州会议后，徐谦以筹备开封政治分会及河南省立大学而不再回武汉了。7月初，武汉街头曾出现“徐谦右倾”等标语。7月以后，冯玉祥在其军中及他所控制的地区逐步进行“清党”，《清党章程》是由徐谦亲手制订的。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清党”反共，宁汉趋向合流。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召开的临时会议上，徐谦竟意外地被认为有“附共嫌疑”。一时报刊均对他进行指责和评论。他由河南鸡公山跑到上海，11月17日，公开声明退出政治活动。不久他迁往香港，定居九龙。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主张反蒋抗日，徐谦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筹备会议，并赴闽参加了在福州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当选为委员。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为最高法院院长。次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他又去香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徐谦从香港到南京，后到武汉、重庆，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但这是一个闲职。1939年10月，他去香港治病，于1940年9月26日在港病逝。

徐谦的著作有《民约总论》、《刑法丛编》、《劳资合一》、《诗词学》、《笔法荟谈》、《徐季龙先生遗诗》等。

主要参考资料

《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收入戴季陶《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1917年第3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徐季龙先生哀荣录》。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

---

(1) 《申报》1924年10月26日。

(2) 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25年3月7日改名为中俄大学，徐谦任校长。

(3) 《政府公报》第3570号。

徐荣廷

徐凯希

徐荣廷，原名笃论。1857年（清咸丰七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南乡一个渔民家庭。幼年家贫，无力延师，与其父打鱼为生。稍长，经同乡介绍，到汉口药材行作学徒，满师后留在店中，经常陪店主到外省采购药材，积累了一定经验，数年后自立门户，经营药材，兼作杂货生意。

1897年，徐荣廷到汉口川帮德厚荣号作跑街。该号经营长江沿线的百货、棉纱、桐油、药材生意，财力雄厚，在湖南长沙、常德等地设有分庄。徐因熟谙业务，不久被派往常德分庄任管事。以同乡关系与暂驻常德的黎元洪相识，结为金兰之交，曾代黎筹垫军饷。两年后，徐荣廷升任汉口总号副管事，回到汉口。

1909年，湖北人民掀起拒款保路运动，迫使清廷邮传部同意鄂省铁路自办。1910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在汉口正式成立，徐荣廷、夏寿康等被推选为查账人[(1)]，广泛动员商界认购股款，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汉口光复，徐荣廷率永济消防会成员张旗提灯整队欢迎革命军。应汉口商务总会要求，负责坐办干粮，供给军需。清军反攻汉口，会员星散，“惟徐荣廷等坚忍支持”[(2)]。会所及善堂因而被清军故意炸毁。

1912年，徐荣廷当选为武昌总商会会长，参加军政府理财部，募集军饷十万余两，深得黎元洪赞许。不久，被委任为湖北官钱局总办，聘为都督府谘议，有“政治商人”之称。同年，原承租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的应昌、大维两公司，均以租期未满，一再向军政府

要求继续租办，争执不已。黎元洪断然取消两公司的租约，令商界巨子集议于汉口商务总会，“公议招商承办”[3]，徐乃辞去官钱局总办职务，以德厚荣号为基础，要求承办四局，获黎批准。徐荣廷一面与应昌公司订约合作，折价收买其所存花纱机物料，一面邀请德厚荣号大股东刘象羲等，组成楚兴股份有限公司，由刘象羲、刘歆生、毛树棠、蒋沛霖、周星棠、徐荣廷等十三人组成董事会，公推刘象羲为总理，徐荣廷任总经理，总管厂务。徐提名苏汰余管理文犊、财务，张松樵管理纱局，是为裕大华纺织集团三巨头结合之始。

楚兴公司原计划招股一百三十万两，先收六成，实收七十八万两；加上应昌公司以存厂花纱及机物料作价所剩十万两加入股份，实际股金为八十八万两。1913年正式起租，每年租金十一万两，租期定为十年[4]。徐荣廷大力整顿内部管理机构，裁汰老弱，剔除冗员，加强对生产部门的管理，注意改进技术，培训人员，增设检验环节，使棉纱质量有明显提高，生产很快大有起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棉纱、棉布几乎绝迹，棉花出口急剧减少，国内市场出现花贱纱贵局面。徐荣廷全力组织生产，采取添招新工，增开夜班，实行职工分红，利用麻局织机改织纱布等措施，加快生产速度。建立楚新煤号，营运煤炭，以保证燃料供应。同时，他借楚兴公司独家经营，产品在省内销售概免税厘，行销省外，仅须在江汉关完纳正税的优越条件，积极开拓川、湘、陕、甘市场，扩大影响，棉纱供不应求，开办不到十年，楚兴公司获利一千一百余万两[5]。徐个人拥有资本已达二百余万两，成为武汉实业界巨子。

楚兴公司连年盈利，引起各方垂涎。十年之中，或要取消承租，或要增加租金，争夺承租权纠纷不断。大维公司总经理刘伯森，为此曾通过农商总长张謇，由总统府下令湖北省督，责令楚兴公司移交。徐荣廷依靠黎元洪支持，并借都督府咨议身份，与后任湖北督军段芝贵、王占元联为至好，始保承租权未动摇。直皖战争之后，湖北退伍

军官将军团势力日渐抬头，极力怂恿新任督军萧耀南，下令楚兴公司提前结束租期。萧为回报将军团助其上台所尽之力，发文勒令楚兴结束。徐荣廷在军阀的压力下，在1922年租约满期前三个月，将四局承租权交给将军团组成的楚安公司，价值二十余万元的机上棉纱和各种机物料，也被将军团一并夺去，拒不作价偿还[(6)]。

徐荣廷深感没有自己的独立企业，很难在实业界立足，从承租四局后期起，他就着手培养纺织人才，为自办纱厂做准备。1918年，徐荣廷创办楚兴纺织学校，聘请湖北实业厅技正、留日学生石凤翔为校长。1919年，徐荣廷与张松樵、苏汰余等抽出历年红利，邀约汉口棉纱行商孙志堂、许勉之等，集资一百五十六万两，创办“裕华纺织有限股份公司”。由徐经手代向湖北官钱局购得武昌上新河地基。因地势过低，填土四万八千立方，又从汉阳铁厂运来铁渣三万余立方填筑厂基，修补沿江驳岸。修建裕华铁桥一座，以利运输。由汉口汉盛协营造厂建造厂房、仓库及宿舍工程。1921年底全部完工，1922年3月，裕华纱厂正式开工，计有纱锭三万枚，布机四百台，以徐荣廷为董事长，张松樵任经理。徐荣廷在兴建裕华纱厂的同时，又从楚兴公司历年积累中抽出二百一十万两，准备在武昌创办大兴纱厂。1921年，徐聘请上海华丰纱厂经理张英甫前往主持。张赴华北等地考察后，认为石家庄地处河北产棉中心，附近手工纺织盛行，京汉、正太两铁路相交于此，交通便利，原煤价廉，提出以在石家庄设厂为宜。徐采纳张的建议，改建新厂于石家庄，定名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徐荣廷任总经理，张英甫为经理。1922年2月破土兴建，昼夜施工，当年10月落成，安装纱锭二万枚。

裕华、大兴两厂相继投产，正值欧战结束，日纱倾销中国，纱布销售形势日见严峻。徐荣廷分析市场形势，决定量力而行，稳步扩充生产规模，确定注重产品质量，面向初级市场方针。生产棉纱以十支和十六支纱为主，棉布则以十七磅“万年青”及“赛马”、“山鹿”牌居多。

徐荣廷在裕华、大兴两厂的投资居各股东之首，但在处理企业盈利时，坚持多积少分，以增加自有资本。他力主扩大资本来源，大量吸收内部存款，鼓励公司各级职员将余款存入公司账面。凭借雄厚财力，裕华、大兴两厂大量购储廉价原棉，以保证棉纱质量持续稳定，生产成本降低，使市场竞争能力显著提高。在外资压迫和军阀混战局面中，克服汇兑艰难、捐税繁重等困难，企业仍然有所发展。投产四年，裕华、大兴各盈利二百余万元，纱锭和布机分别增加了一万六千枚和四百九十六台。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徐荣廷看到劳资纠纷日益增多、裕华纱厂生产每况愈下，便与张松樵联袂赴沪，厂务交由苏汰余代理。1927年冬，徐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辞去裕华公司总经理，改行董事长负责制，由苏汰余继任。1928年，徐荣廷因患眼疾，双目几乎失明，不再过问具体业务，但有关裕华、大兴两厂经营大计等重要问题，仍秉承他的意见去处理。

1931年冬，为解决厂用燃料货次价高问题，徐荣廷在苏汰余、黄师让陪同下，前往大冶石灰窑利华煤矿勘察，洽谈投资扩建事宜，决定由裕华、大兴两公司主要股东投资一百二十万元，作为扩大生产和更新设备之用。仍沿用利华煤矿公司旧名，设董事会及总公司于汉口，以黄师让为总经理，设办事处于石灰窑。回汉后，徐即调派干员，监督扩建事宜。经改换动力设备，架设空中运输索道，利华公司原煤日产量自一百余吨，猛增至四百余吨。由于成本下降，公司扭亏为盈，先后收买兴华、德和、福东三矿，所出煤炭不仅行销武汉，同时下运九江、芜湖、南京、上海、福州、厦门等地。

1933年，徐荣廷辞去大兴公司总经理职务，公推苏汰余继任。1934年，由于日本棉纱在华北等地大量倾销，夺走市场，华商纱厂经营相继出现危机。大兴厂首当其冲，产品严重滞销，为谋出路，一度准备卖厂。一向销售良好的裕华纱厂，也开始出现滞销，积压棉纱多时达一千余件，资金周转日感困难。徐荣廷曾亲自致函张学良，请其

准饬军需部门，购买大兴纱厂所存棉毯[7]。

1936年7月，年近八旬的徐荣廷，邀请裕华、大兴两公司大股东，前来汉口集议，决定各投资一百二十五万元，组成大华纺织公司，在西安大兴二厂基础上，开办大华纱厂。由于独占西北销售市场，原棉价格低廉，取给方便，大华纱厂开工不及半年，已获利二十余万元[8]。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徐荣廷随裕大华公司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1947年，他筹资六十万元创办私立江汉纺织专科学校于武昌，专事培养纺织工业高级人才，他自任董事长，裕大华公司总经理石凤翔为校长。

作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创始人，徐荣廷还参与创办华年进出口公司和永利银行，投资于山东中兴煤矿、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上海庆华染料厂、民生公司等工矿运输企业。至1949年，裕大华纺织集团资本总额已达银币五千万元，成为国内著名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

徐荣廷一贯关心国事，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历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三、五届议董，汉口总商会第七、八、九届特别会董及湖北实业协会会长。当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徐荣廷发动武汉商界同仁一致反对。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他带头清仓烧毁日货，组织商界举行示威游行，年近六旬，鬓发斑白，仍持旗走在队伍最前面。五四运动爆发，徐荣廷发动武昌商界一致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武汉“六一一”惨案死难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922年，徐荣廷利用欧战后日元汇价低落的时机，筹措款项，为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还清了积欠日商债务，并始终反对日本吞并大冶象鼻山铁矿的阴谋。

1949年1月，徐荣廷因病在汉口去世。

(1) 《京津时报》庚戌（1910年）八月十九日。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编：《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3) 《湖北纱布丝麻四局之风潮详志》，《时报》1913年2月21日。

(4) 《湖北实业月刊》第1卷第7号（1924年5月）。

(5) 《黄师让回忆录》（未刊稿）1962年10月。

(6) 贺衡夫：《记湖北将军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15页。

(7) 《大兴纺织公司档案》，《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辑《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8) 《大华营业报告书》1936年。

徐润

江绍贞

徐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38年12月14日（清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其父徐宝亭，曾任清政府军官，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其伯、叔都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徐润七岁在家中延师就读，十四岁时由在英商颠地（Lancelot Dent）洋行当买办的叔父徐荣村把他带到上海转赴苏州读书。由于口音隔阂，不数月辍学折回上海，由伯父徐钰亭（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买办）介绍到宝顺洋行当学徒。入行后，拜买办曾寄圃为师，开初学习丝茶业务，后来由帮理账务升任主账。1859年，他与曾寄圃合开绍祥字号，为洋行兜揽丝、茶和棉花生意。次年在浙江温州自开润立生茶号，大获其利。以后又在江西上饶之河口、宁州（今修水）等地与人合开茶号。

1861年，曾寄圃病故，徐润继曾为宝顺洋行的副买办，同时在上海与人合开宝源、立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丝、茶、麻、烟叶以及鸦片。1864年投资钱庄、布庄。他在广泛投资商业的同时，还先后报捐了光禄寺署正、员外郎等官职。1866年李鸿章调淮军到浙江、福建镇压捻军时，徐润因帮助转运饷械，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经向清政府保奏加四品衔。

1868年，宝顺洋行股东拆股，徐润离开宝顺洋行，自开宝源祥茶栈。除其原在河口、宁州开设之茶号照旧经营外，又在江西漫江、湖北羊楼洞、崇阳、湖南湘潭等处增设茶号。他先后担任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洋药局和仁济医院等处的董事，并掌握了广东旅沪商

人组织的广肇公所财务权。

187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总局，次年，徐润与盛宣怀同被李鸿章委派为招商局会办。徐在招商局先后投资四十八万两，又为招商局招徕各亲友入股不下五六十万两[(1)]，被推为商董，成为招商局较有实权的人物。1876年，他与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集股创办仁和水险公司，后又开办济和水火险公司，共投资十五万银两，为我国自办保险事业之始，之后他们将这两公司转让给招商局经营。1877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急欲将一批旧轮船和在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栈房、码头拍卖，徐润代表招商局以二百二十万两收买下来。徐润自认为其值不止此数，占了便宜，但后来刘坤一参奏此事，说他等于以新制原价承受，吃了大亏，且当时旗昌公司即将倒歇，股票下跌甚剧，而招商局此举，反使其股票猛涨，让美商获得大利。不过，这件事却受到李鸿章的庇护，称之为“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2)]，并称徐润是“殷实明干”的人才。1878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以徐润办理漕粮海运出力为由，向清政府保奏加二品衔，两年后又经李鸿章保奏，以道员本班尽先补用。

1877年，徐润伙同唐廷枢用局款投资安徽池州煤矿，为股东之一。1881年，徐被委任兼办开平矿务局会办，次年徐润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在池州矿附近招股兴办贵池煤矿，想借此吞并池州矿。但贵池煤矿由于招股未足而停办，吞并池州矿之目的也未达到。

1882年，徐润与其从弟徐宏甫等集股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仿效英商所办点石斋石印图书，十余年印书多种，到1898年停办。

徐润在经办上述各业的同时，还大搞房地产经营。他在上海购地产三千余亩，建房数千间，用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年收房产租金可达十二万余两。1883年，中法战争影响上海，市场发生混乱，徐润所搞房地产投机失败，几乎破产。由于欠招商局款十六万二千余两，徐润被盛宣怀以“睃公营私，亏欠局款”，向李鸿章具禀，将其革职。

徐润自被参革离局后，一段时间内（约六七年）很失意，曾借资二十余万两经营茶叶。1888年，受台湾巡抚刘铭传邀赴台湾办基隆煤矿，因水土不服而折回。1890年，还清招商局欠款，经李鸿章奏请准予开复，由粤督李瀚章委他会办香山县天华银矿，亦因招股不足而停办。此后接连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王文韶委派办理开平局林西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永平等处金矿，还在天津、塘沽一带购地造房开办广益房产公司，在锦州大凌河与人合办天一垦务公司。1898年，徐被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撤去永平矿的职务。1902年，他在上海与人合资收买云章衫袜厂，改名为景纶衫袜厂，聘用在奥商洋行当买办的汪少云任经理。

1903年，徐润被北洋大臣袁世凯派回招商局重任会办，次年充上海商务总会协理。1906年12月，招商局总办杨士琦调京，袁世凯又委徐代理总办。这时招商局已为盛宣怀所把持，袁世凯想依靠徐润，从盛宣怀手里夺回招商局的控制权。徐润拉拢一些香港股东站在自己一边，很想替袁出力，但到职未久又被袁世凯怀疑，1907年5月，袁解除了徐润代理总办的职务。

徐润被解职后，1908年将景纶衫袜厂的外股收买，成为独资企业，自任经理，增添资本，扩充设备。1911年2月，徐润在上海病故。后景纶厂由其子孙经营，在民国时期一直开办，为上海几家较大的衫袜厂之一。

---

(1) 《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宣统二年），第83、86、87页。

(2) 《李鸿章致唐景星、徐雨之两观察手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0页。

徐绍桢

徐亚玲

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人。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生于1861年6月30日（清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其父徐灏，字子远，为广东名幕，曾历任广西庆远知府、道员，兼娴经术。徐绍桢幼承家学，刻苦自励，学汉宋儒学，后求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军事学，精研熟记各种战术、各国军事制度、军事历史与各种兵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希望以此报效国家，确立了“尧舜事功，孔孟学术”的远大抱负，常说：“大丈夫患不得志于时耳！”(1) 1880年，其父去世，家道中落。徐绍桢师从姐夫朱香溪学习刑名，并由朱香溪引荐到广西柳州府怀远县谋职，开始了早年的游幕生涯。后又先后在昭平、平南、苍梧、肇庆游幕。

1894年，徐绍桢参加广东乡试中举，此后广西梧州府、桂林藩府先后邀约入幕，助政颇有业绩。江西巡抚李兴锐赏识徐绍桢的才干，特邀他到江西辅政。1900年，徐绍桢到江西后，正值反洋教运动兴起，烧教堂、杀教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他奉命查办教案，深入各地进行调查，不到三个月，便将各案查清了结。他还应邀在课吏堂、讲武堂向各级官员、将校讲解文武之道，被李兴锐誉为难得的“儒将”(2)，得以升为江西道员，统领江西常备军，总领营务处。嗣后又随李兴锐先后任广东常备军统领、福建武备学堂总办、江苏候补道等职。

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推广常备兵制，令各省普练新军。1904年，徐绍桢奉两江总督李兴锐之命赴日本考察军事，年内回国，随即被李委任为两江兵备处总办，负责编练陆军新军第九镇。本着为国效命的夙愿，徐绍桢亲手编制新军章程、制度，又奏请裁汰绿营旧兵，实行征兵制度，招募有文化的朴实贫寒子弟入伍。一时豪杰之士

纷纷应征，徐在新军中容纳了不少贤能义士，革命党人赵声、柏文蔚、冷遹、倪映典、陶骏保、林之夏等均在其列。1905年，新军第九镇正式成立，徐绍桢被任命为统制，下辖新军第十七、十八两协，包括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标及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宪兵队三营，共约万人。第九镇司令部、第十七协、马队第九标、工程队第九营、辎重队第九营及军乐队等均驻南京城内，第十八协司令部及所辖第三十五标驻镇江，第三十六标驻江阴。徐绍桢在军中广泛宣扬儒家学说，颁发明儒吕坤《呻吟语》，各将校人手一册，务使确立为国效命的爱国思想。在他的严格训练下，第九镇威武雄壮，成为名闻遐迩的“南洋劲旅”。

1905年，各革命团体纷纷成立，革命形势高涨，清政府为缓和这种紧张局面，宣布“预备立宪”，可没有具体行动，这使徐绍桢十分失望，转而同情革命，“常痛国事积弱，根本解决非革命不可”[(3)]。当时，革命党人柏文蔚、赵声、冷遹、倪映典等在军中宣传反清思想，从事革命活动，徐绍桢虽时有所闻，然未加追究。当两江总督端方侦知赵声等人的异举，欲加迫害时，徐绍桢则尽力为之掩饰。由于徐绍桢的纵容和革命党人的组织宣传，新军第九镇兵士“皆知祖国之仇，恨异族窃据”[(4)]，反清革命思想与日俱增。

这时与新军第九镇同驻南京的，还有张勋统率的江防营七千人、督署卫队和旗营三千多人。新军装备精良，思想激进，旧军则以正统自居，思想保守。因此，新旧两军经常互相敌视，彼此隔阂，“如同冰炭”[(5)]。

1908年，徐绍桢被简授江南苏松镇总兵、护理江北提督，兼新军第九镇统制，1911年3月加授副都统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新军第九镇中的革命志士也跃跃欲试。这立即引起两江总督张人骏的疑忌，从10月16日起陆续将江防营由浦口调入南京城内，以防不测。面对这种形势，徐绍桢心情

沉重，为确保安全，从12月13日起，他先后到各标、营发表演说，讲解“忠君爱国”[(6)]，劝说部属一定要稳重，不可草率行事。10月23日，柏文蔚到军中策反起义，动员徐绍桢反正，徐从容陈词道：“光复大义，所以救民，非所以贼民，弹轰刃接，狭巷相搏，幸而胜，民室墟矣！不幸而败，何以为继？……与其轻率偾事，毋宁待机而动。”[(7)] 随后他一面暗中派人到湖北、上海打听消息，同时又与部属准备出师计划。对此，张人骏似有所觉，10月下旬下令南京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并秘密召见徐绍桢，宣布对新军第九镇进行搜捕。徐绍桢为掩护第九镇中的革命党人，不使张人骏逞凶，立即加以阻止，并指出如此必导致军心动摇，反而激起事变，使张人骏不敢轻举妄动。为了防止新军起义，张人骏又派布政使樊增祥在镇司令部宴请第九镇官兵以示“安抚”，并招募饥民二千五百人，编为十营，日夜巡逻，在狮子山、北极阁及署内架起大炮，对准第三十三标驻地，还在三叉河要道口架起大炮对准工、辎两营，防范森严，如临大敌。这时，新军人均只有五发子弹，徐绍桢要求张人骏发放弹药，张非但不发，反而从新军收回六门大炮和六门机关枪，而给江防营、督署卫队却人均补充五百发子弹。张人骏如此冥顽不化，新军将士愤慨异常。徐绍桢担心在城内与旧军如此对峙下去于新军不利，10月30日，以出秋操为名率新军移驻距城六十五里的秣陵镇。新军出城后，张人骏拒发弹饷，派遣密探严密监视，又指使江防营对新军日夜挑衅，甚至派人行刺徐绍桢。徐绍桢忍无可忍，决心起义，遂派柏文蔚到上海购运弹药。

这时，传来上海光复，苏州、浙江、镇江同时独立的消息，又得知张勋将分兵进攻镇江，黄兴督师失利，情况紧急，尽管上海的弹药尚未运到，徐绍桢仍决定于11月8日起义，进攻南京。11月8日黎明，新军兵分三路出击，以步兵第三十六标第三营、马队第九标第一营为右路纵队，由朱元岳指挥，经曹家桥进攻通济门；以步兵第三十三标第三营、马队第九标第三营为左路纵队，由傅鑫指挥，经铁心桥、安德门，进攻汉西门；余为中央纵队，由沈同午指挥，经姑娘

桥、花神庙进攻雨花台。新军英勇奋战，但遭到张勋江防营的猛烈抵抗，拼杀两昼夜，终因仓促行事，弹药告罄而败，于10日晨乘大雾撤往镇江。

新军退往镇江后编入镇军，归柏文蔚统率，徐绍桢则亲赴苏州、上海求援，谋求会攻南京。11日，上海、江苏、浙江各界商定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公推徐绍桢为总司令。徐绍桢慨然受命，13日在镇江金鸡岭洋务局设立联军司令部，以陶骏保为参谋长，史久光、于右任、范光启、伍崇仁等为顾问，孙毓筠为军事参议，在上海设立总兵站。随后镇军、浙军、苏军、淞军、沪军先锋队等参战各军陆续集中镇江，总兵力达两万人。11月21日，联军司令部拟定作战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攻取南京：中路浙军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南攻朝阳门，镇军由紫金山北攻天堡城、太平门；南路苏军攻雨花台、聚宝门；北路淞军攻乌龙山、幕府山；另派柏文蔚率领镇军二支队和扬军从江北攻浦口，迎击逃窜的清军。次日，各军开始分头出击。24日夜淞军巧取乌龙山，25日晨占领幕府山。各路联军士气倍增，越战越勇，激战五昼夜，攻占了城外各阵地。接着进攻紫金山制高点天堡城。徐绍桢亲临前线督战，将士们血战一昼夜，终于在12月1日黎明攻克。次日，联军乘胜占领南京。

南京光复后，徐绍桢立即致电各省军政府，表示攻取南京“皆群力所致，桢无丝毫之力，善后诸务极繁，务求诸公推举都督，以图长治久安”[(8)]。各界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移驻南京，又推举徐绍桢为北伐江浙联军总司令，挥师北伐（后因南北议和，北伐之议作罢）。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整饬战乱后的南京秩序，孙中山任命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徐绍桢受命后立即上任，颁行军律，对扰乱治安违反军律者严加惩处，从而使南京秩序井然。

1912年3月，南北谈判告成，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攫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袁曾先后委任徐绍桢为陆军参谋总长、仓场总督等职，然

徐绍桢不愿与袁为伍，均借口推辞，只担任一些顾问、参政之类的闲职以示应付。1915年6月，袁世凯为笼络外蒙古上层贵族，防止分裂，派徐绍桢、荣勋为册封专使，赴蒙古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对此保全祖国边疆之举，徐绍桢慨然受命，准备赴任。不料，袁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徐绍桢对袁破坏共和、复辟帝制深恶痛绝，乃毅然交还册印辞职，没有成行。袁因此对徐怀恨在心，以保卫为名在徐绍桢门前派了岗哨，监视他的行动。徐绍桢则闭门韬晦，每日以诗酒自娱。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徐绍桢在黎元洪政府中仍任顾问。1917年7月，张勋复辟，徐绍桢为躲避张勋迫害，逃亡日本神户隐居。

张勋复辟失败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徐绍桢“默观时局，心知其难”，仍抱定“在父母之邦，能尽一分之心亦不可自爱”[(9)]。1917年10月，应孙中山之邀，由日回粤，参加护法战争，举兵讨伐段祺瑞，1918年3月23日，孙中山任命徐为广州卫戍总司令，后兼陆军练兵处督办。5月，孙中山受西南军阀的排挤被迫辞职，徐绍桢亦辞职随孙中山赴沪。他多次致电南北政府和各省各方呼吁和平统一。

1920年6月17日，为讨伐把持军政府、破坏国会的桂系军阀，孙中山派徐绍桢为两广讨贼军总司令，率兵出击广州，揭开讨桂战争序幕。桂军被逐回广西后，孙中山回广州重组军政府，于1921年5月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任命徐绍桢为总统府参军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徐绍桢不遗余力，多方奔走，组织军力进行讨伐。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任命徐绍桢为广东省省长，5月，调任大本营内政部长。徐绍桢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卫生、出版、国籍等政策，使军政府内政走上正轨。1924年1月，徐因年老体弱而辞去内政部长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徐悲痛不已，立即赴京协助治丧，后回上海定居。

自孙中山逝世后，徐绍桢很少过问政事，潜心著述，著有《共和

述义》、《四书质疑》、《孝经质疑》、《三国志质疑》、《勾股通义》、《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日记》等，后家人将其所著编入《徐绍桢集》。

1932年1月，经孙科提名，徐绍桢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继而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6年9月13日，徐绍桢因病医治无效，逝于上海家中。次年，被南京国民政府公葬于当年光复南京时江浙联军司令部驻地麒麟门外小白龙山。

---

(1) 徐绍桢：《学寿堂文集》，见陈正卿、徐家阜编校《徐绍桢集》，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2) 徐承庶等：《徐绍桢行述》，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3) 茅乃登、茅乃封：《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5页。

(4) 《赵烈士事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89页。

(5) 徐鹏：《辛亥革命在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6) 《南京新军起义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7) 茅乃登、茅乃封：《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85页、388页。

(8) 《致各省军政府联军已攻占南京望推都督电》，《申报》1911年12月5日。

(9) 《学寿堂日记》，《徐绍桢集》，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徐世昌

李宗一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汲县。他的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父亲为候选县主簿。他两岁时随家迁到开封，六岁入私塾读书。次年丧父，家境败落。成年后，他历就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署文书或家馆教师[(1)]。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认识袁世凯，结为兄弟。他受袁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甲午科直省乡试磨勘官。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练“新建陆军”。1897年12月，经袁奏请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间，为袁的重要谋士；同时袁的爪牙如张勋之流，羡慕翰林之名，多投帖拜徐为师，因此徐和他们也结成深厚的关系。1900年8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随西太后逃到西安。次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保荐，徐被西太后召见，以编修升为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左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于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再次奏保，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仍任尚书。不久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2)]。

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世凯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

督抚之上。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名义下极力主张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势力[3]。同时他也为日、俄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攫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世昌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4]。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5]。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殆不可以言治”为由[6]，奏请把北洋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到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也受到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亲贵行贿，取得载沣信任。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大臣。次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清廷又授徐为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他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求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咨大臣，加太保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廷一边，实际上仍暗中参与袁的机密，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扮演内线角色。1912年3月，袁窃据民国总统后，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7]，避至青岛，以掩饰其观望政治形势的本意。

当袁世凯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并解散国会以后，徐接受袁的邀请，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充当帮凶，被人称为“相国”。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后，老奸巨猾的徐世昌窥测出袁氏称

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的危险，即于10月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8] 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下台前，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病危，托以家事。袁死后，徐世昌虽有觊觎总统地位、继承反动事业之野心，但实力不足，乃故意表示淡泊，又回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退耕老人"，等待时机。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应邀到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他看到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的反复，认为有机可乘，曾一度图谋通过拥宣统复辟，由自己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此，1917年1月，他派人赴日本，试探日本政府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又和复辟派张勋等人秘密串联。5月，黎、段之间的斗争因"参战"问题达到高潮，黎下令免段职后，拟以徐继任总理；段的党羽则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推举徐为大元帅；徐都没敢接受。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到天津，劝徐出山。当时，徐已得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段、并不赞成清室复辟的消息，乃幡然变计，力劝张勋暂时放弃复辟计划。7月1日，张勋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徐被任为弼德院院长，托故未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始入京，向各方面活动，为清室和张勋开脱罪责，竭力主张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7年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徐世昌又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指使其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易操纵。同时，为缓和直皖矛盾，段也辞去总理职务，而由幕后

操纵一切。徐出任“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等各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广东护法政府分别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极力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军阀分赃的“议和会议”[(9)]，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起初，徐认为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10)]，并下令逮捕游行示威学生，公开褒扬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体国公诚”[(11)]，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被迫免曹、章、陆职，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

这时，新文化运动高涨，尊孔复古分子极为惊慌。徐世昌适应保守派的需要，于1919年10月下令举行秋丁祭孔，又支持其亲信张凤台等人于1920年5月创办“四存学会”；次年4月发行《四存月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弢斋述学》等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妄想“转移风气”，阻挡革命潮流[(12)]。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徐世昌一直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则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当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他支持段的亲信靳云鹏当总理，反对段的另一个爪牙徐树铮；同时又勾结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企图打破皖系对政府的垄断。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直两系控制了北京，他又转而把自己的权位寄托在奉直两系的争斗上。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各系军阀的均势被打破，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囊中物，他就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

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黎元洪复任总统为名，逼徐世昌下台；1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秉承曹、吴意

旨，通电揭发了徐的“种种罪恶”，宣布他为“伪总统”[13]。这个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老官僚智拙计穷，于2日称“衰病”辞职，溜回天津英租界私宅。

徐世昌用做官搜括的金钱，在辉县、青岛、天津各地购置大片地产。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4]。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华北沦陷后日酋板垣、土肥原等曾拉徐下水充当汉奸，徐以年老多病拒绝，保持了晚节。1939年6月6日，徐病故于天津。

---

(1) 徐世昌：《续修天津徐氏家谱》下册，养喜堂1908年印本，第72页。

(2) 徐世昌：《退耕堂政书》第7卷，1914年版，第14页。

(3) 徐世昌：《退耕堂政书》第10卷，第14页；第33卷，第8页，1914年版。

(4) 《盛京时报》1908年9月24日、12月24日。

(5) 《辽宁义勇军檄文》，《民报》第20号（1908年）。

(6)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第4卷，1911年版，第1页。

(7) 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第23页。

(8) 徐一士：《谈徐世昌》，《越风》第4期（1936年1月）。

(9)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页。

(10)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1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267页。

(12) 《徐大总统四存学会第一年纪念会训词》，《四存月刊》第4期（1921年7月）。

(13) 《通告全国宣布徐氏罪状由国会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东电》，《民国日报》1922年6月3日。

(14) 如《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丛书》、《水竹村人诗集》等。此外，其奏议函牍多收入《东三省政略》、《退耕堂政书》。

徐树铮

李宗一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生于1880年11月11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初九）。他的父亲徐忠清是拔贡生，一生以教书为业[(1)]。

1892年，徐树铮十二岁时中了秀才，十七岁到南京考举人，没有考中。1901年冬，他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企图由此谋取出路，不成功，却无意中结识了段祺瑞，受其赏识，当了书记官，从此成为段的亲信人物。1905年，由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时，年方二十七岁，入段幕府，赞襄帷幄，少年“得志”，十分自豪。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2)]。

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3月，段祺瑞为陆军部总长，派徐树铮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9月调任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11月，创办《平报》，由臧荫松主编，吹捧段祺瑞，宣扬段的政治观点，被人称为“陆军部机关报”。1914年升为陆军部次长。同年在北京创办正志中学，自任校长，聘请林纾等人为教员，提倡古文。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他力劝段祺瑞抵制帝制。6月段以“病”辞职，徐也被免职。

1916年袁世凯败亡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依靠日本支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不久，黎元洪受美国策动，和段发生权力之争。段遂少入总统府，专由徐树铮持稿入府要求盖印；徐依仗段的奥援，意态倨傲，因政见不合，迭与黎争吵。加以徐在国务会议上恃势越权，多所主张，为内务总长孙洪伊所反对；于是黎、孙结合以抗段、徐，势如水火；后经徐世昌调解，11月20日徐树铮和孙洪伊同时被免职。

1917年春，黎、段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徐树铮代表段到徐州，

极力煽动张勋反黎。5月，黎下令免段职，徐即以同意清朝复辟为诱饵，策动张勋于7月1日把黎元洪赶下台。事后，他又以“讨逆军”总部参赞的名义，追随段讨平了张勋复辟。接着，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继任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仍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掌握北京政府。8月徐又被任为陆军部次长。当时，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徐极力推行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攻入湖南，妄图一举消灭护法运动。但是，冯国璋也以英、美帝国主义为背景，主张所谓“和平统一”，暗中指示前方的直系军队消极退守。段和徐不得不于11月辞职。

徐树铮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捭阖。他于1918年初到奉天勾结张作霖，自任奉军副司令，随奉军入关，压迫冯国璋同意对南方护法军作战[(3)]。3月，冯国璋被迫再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徐和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徐又谋杀了在直系中策划主和的陆建章，拉拢直系军阀曹锟，进攻南方。段祺瑞的重大措施，大半出于他的策划，因有“小扇子军师”之称。

1918年9月，因徐树铮挪用奉军军饷，张作霖解除了他的奉军副司令职务。段祺瑞随即任命他为参战处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他与日本代表斋藤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之详细协定》，又用“参战借款”两千万日元从日本购买武器，延聘教官，编练“参战军”，组成段祺瑞的嫡系部队。10月，冯国璋任期届满，徐世昌由皖系支持，出任总统。11月，徐树铮被授陆军上将衔，派赴日本观操。在东京，他与日本当局秘密谈判，图谋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换取日本对皖系更多的支持，没有得逞。12月16日回国。

1919年2月5日，他与日本陆军代表乙东彦在北京签订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极力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和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参战军”改称“边防军”，他被任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在外蒙古声明取消“自治”后，又兼任外蒙善后督

办，并以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名义，于1920年元旦在库伦主持册封活佛典礼。

徐树铮亲日卖国的行为不断激起全国人民反对。1920年夏，亲英、美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乘机通电攻击徐“祸国殃民”、“卖国媚外”，要求“免徐树铮各职”[(4)]，并率领军队逼近北京。6月，徐由库伦回到北京，极力主战。7月4日，徐世昌被直系逼迫，下令免去他西北筹边使等职务。段祺瑞立即组成“定国军”准备向直系迎战，派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徐指挥“边防军”第二旅沿京津铁路南下，与曹锟的部队战于杨村。17日，皖系军队一败涂地。段祺瑞通电辞职，徐树铮避匿日本使馆。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缉徐树铮等首要分子。11月，他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到上海公共租界。

1921年，徐树铮著《建国诠真》，宣扬他的政见。

次年1月，他代表段祺瑞赴广西见孙中山，又与张作霖联系，策划孙、张、段三方面的军事联盟，共同反对直系。10月，他潜赴福建延平，联络皖系余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按照《建国诠真》组成“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又联络许崇智的粤军，赶走倒向直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17日移住福州。不久，王永泉也倾向直系，借口“闽人自治”，强迫他于11月2日返回上海。1924年10月，趁江浙战争爆发的时机，他招集在浙、沪一带的皖系残余队伍，自称“浙沪联军总司令”，妄图东山再起。但是，由于英国人不允许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活动，被迫于11月出国“游历”。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被张作霖和冯玉祥推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1925年1月，派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当时，他正在巴黎，即组成考察团，先后到法、英、瑞士、意大利、德、苏联、波兰、捷克、比利时、荷兰、美、日本等国考察，12月11日回到上海。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冯玉祥也倾向革命，徐树铮遂鼓吹皖、直、奉三系军阀联合以对付广东革命政府。23日徐树铮

到北京见段祺瑞，29日离京赴上海。冯玉祥对徐树铮谋杀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内姑丈陆建章早已怀恨在心，加之当时政治冲突又趋尖锐，遂密令部下，于30日晨当徐乘火车到廊坊车站时，把他逮捕枪毙。

---

(1) 徐树铮：《先考妣事略》，《视昔轩遗稿》第2卷，北京文楷斋1931年版，第1页。

(2) 段祺瑞：《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徐君神道碑》，《视昔轩遗稿》，附录。

(3)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4) 张一麐：《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9—30页。

徐庭瑶

戚厚杰

徐庭瑶，字月祥，安徽无为人。生于1892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徐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十四岁入芜湖皖江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两年后毕业。1915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被编入步兵科第四连，与白崇禧、黄绍竑等同期同科。

徐庭瑶保定军校毕业之时，正值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乃回乡在励志小学任算术教员。徐感到在乡执教虽能维持生活，但难以发展，于是投倪嗣冲安武军，被分配在第三路第四营为见习官。1919年，徐所在部队由倪嗣冲之侄倪毓棻率领，随张敬尧、吴佩孚援湘，徐被提升为连长。徐看不惯倪部腐败和军纪松弛，经保定军校毕业同学介绍，只身前往广东，投入许崇智粤军，在第一旅任连长，1925年春，粤军与黄埔军校教导团进行东征，徐因功升任营长。同年9月蒋介石逼走许崇智，将许部编为第一军第三师，徐庭瑶任该师第八团团附，不久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攻克惠州战役中立功，后升任团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9月，第三师在何应钦率领下，编属东路军向福建方向进军。徐庭瑶团在进攻永定、松口等战役中英勇顽强。攻占福建后，张贞独立团扩编成独立第四师，徐庭瑶升任该师副师长。1927年初，东路军由闽入浙，徐调任第二师副师长，参加江、浙境内的北伐作战。8月，参加龙潭对孙传芳的作战。9月底，第二师师长刘峙升任军长，徐继刘任师长。

1928年春，徐庭瑶率部参加对奉系的北伐。攻占济南后发生了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五三”惨案，事后徐奉命率部戍守济南。7月，蒋介

石对所属部队实行编遣，第二师缩编为第一师第一旅，徐庭瑶改任旅长。

1929年春，以编遣会议为导火线，爆发了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徐庭瑶部在蒋介石指挥下力战各反蒋派系。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第一师师长刘峙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徐代理师长职，在陇海线上同冯玉祥部作战中负伤。同年底，徐调任第四师师长。第四师原为教导二师，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职员为基干编成，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高。时杜聿明在该师任团长，徐将杜倚为得力骨干，对杜倍加器重，为尔后两人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1931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工农红军的战争，将第四师调往湖北。徐庭瑶指挥该师第十二旅向湖北应城的红军根据地进攻，结果该旅被歼，旅长张联华被活捉，徐受到蒋介石的训斥。1932年夏，徐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军右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率部开往大别山地区，“围剿”鄂豫皖边区的红军，被红军击退。正当部队溃退之时，杜聿明率部赶到，在徐指挥下全力反攻，攻入霍邱。几年征讨，徐看到江北几省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于是写成《订定田赋减租与免除杂捐办法》，呈交南京国民政府，希望能公布实施。不久，蒋介石将徐部调到蚌埠，徐兼任蚌埠警备司令。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觊觎华北，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后继续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全国人民极为悲愤，当地守军奋起抗击。南京国民政府为应付民众的舆论，以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编成第十七军，任命徐庭瑶为军长，调到北京密云参加长城抗战。在战斗中，徐曾代理第八军团总指挥职。虽然抗日将士奋勇杀敌，重创侵略军，但得不到增援。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剿共”战场，长城一线的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加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术，继古北口失陷后，将军楼、八道楼子和南天门阵地接连丢失。5月，徐列名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参与何应钦、黄郛等人主持的

签署《塘沽协定》事。

徐庭瑶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于1934年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协助何应钦镇守北方。徐曾根据长城抗战中中日军队装备悬殊的情况，上书蒋介石建议组建机械化部队，建立专科军校培训人才，以提高军队装备水平和军事素质。5月，徐庭瑶与交通部次长俞飞鹏率领军事委员会和交通部联合组成的军事交通考察团，前往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考察军事交通情况，历时九个月，于1935年3月回国。他将考察观感及对军事装备、军事教育的建议撰写了数十万言，呈送蒋介石，又在中央军校等单位作考察报告，倡议吸收外国的经验，建立快速机动部队。5月，徐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兼通信兵监，同时兼任通信兵学校和交通兵学校的筹备处主任，筹备两军校成立事宜。

此后，徐庭瑶以主要精力投入于机械化部队的人才培训工作。10月，辎重兵学校和交通兵学校筹备处合并，成立交辎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庭瑶任教育长，实际负责该校的教育行政责任。他调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担任学员队队长，还从国外进口一批新式的汽车、装甲车和有关教育、训练器材，教育训练走上正轨。同时，徐又积极筹备通信兵学校，罗致技术人才，派人到国外购买通信器材。1936年8月，该校筹备就绪，于9月1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兼任教育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军事委员会，举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徐庭瑶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由于南京政府内意见不一，加上事变很快和平解决，何应钦的军事讨伐化成泡影，徐的总指挥职也很快结束。

1937年春，徐庭瑶奉蒋介石之命，以交辎学校战车营和交通兵二团的装甲汽车队等单位合并改编为陆军装甲兵团。在徐的推荐下，蒋介石委杜聿明为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交辎学校和通信兵学校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及装甲兵团一部由徐庭瑶率领向湖南转移。此时，交辎学校的交通、辎重两个兵科扩编成机械化兵学校和辎重兵学校，徐庭瑶兼任机械化兵学校教育长。

1938年11月，军事委员会将由装甲兵团改编而成的第二〇〇师为基干，扩编成立新编第十一军，委徐庭瑶为军长。该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当时唯一的机械化军队。1939年夏，日军侵占南宁，第五（新编第十一军改）、第九十九军奉命编成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为总司令，参加桂南会战。会战后徐仍回机械化兵学校。为免遭日军飞机轰炸，徐将机械化兵学校所属分散配置，战车机械工程研究班设在广西全县，战车工厂筹备处设于贵州威宁。1943年6月，为解决机械化部队技术问题，徐庭瑶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工程学院，甄选机械化兵学校毕业的优秀学员予以深造。此后，徐相继将校属试验队、驾驶兵教育团改为练习团和战车兵教育团，将毕业学员充实装甲兵部队。1944年2月，徐专任军训部机械兵监。1946年底徐任国防部所属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8年春，徐庭瑶被任命为装甲兵司令，所属装甲兵配属各“剿匪总司令部”，徐是有职无兵的司令。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溃败，蒋介石下令把装甲兵部队撤到金门、台湾，以备负隅顽抗。徐于1950年调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此时大陆已完全解放，该公署徒有虚名，与台湾军政机构重复，乃被撤销。徐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2年10月正式退役。

徐庭瑶爱好读书，戎马之余注重撰著，曾著有《干部必携》、《步兵操典草案之研究》。他对国画、篆刻、金石、考据等都有兴趣，收藏甚丰。1971年6月，他将所藏各种版本藏书数千卷赠送台北“故宫博物院”。

徐庭瑶于1974年12月16日病逝，葬于台北阳明山。

主要参考资料

黄杰编纂：《徐庭瑶将军纪念集》，（台北）徐庭瑶将军纪念集编纂委员会1975年版。

《徐代表庭瑶传略》，台湾版。

《装甲兵的编成和沿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交辎学校的开办和教育概况》。

《昆仑关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徐锡麟

闻少华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东浦村人。生于1873年12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徐家经营商业，富有资产[(1)]。父徐凤鸣字梅生，为人保守。徐锡麟幼年受父管束，常遭痛斥。十二岁时曾负气跑到钱塘当和尚，经家人找回，二十一岁为诸生。

1901年，徐锡麟被绍兴府学堂聘为教师，后提升为副监督。1903年，在其父的严命下应乡试，名列副榜。当时国内不少知识青年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多倾向革命，喜谈“新学”，卑视科举，徐也受到感染。就在这一年，他获得机会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到东京游览。适逢东京浙江学生正在开会讨论营救因宣传反满革命入狱的章炳麟，他积极参加，出钱相助，因而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人。那时留日学生界因帝俄侵占我东三省的问题，组织拒俄义勇队。徐受这一运动的影响，愤清廷无能，萌发了反清的革命思想。

回国后，他创建“热诚蒙学”于东浦，提倡军训；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他每听到有关沙俄在东北的暴行，即为之恸哭，常画沙俄侵略者的像为靶子，以短铳射击。他的行动吓坏了他那个保守的父亲，因此被赶出来，与父分居。

1904年，徐到上海爱国女校访蔡元培，这时陶成章也恰在上海，经陶介绍遂加入了光复会。他得知陶过去和浙江会党联络的情况，非常高兴。翌年2月，徐和他的几个学生游历了诸暨、嵊县、东阳和义乌等地，交结了些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回来后他对人讲：“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2)]

1905年，徐在绍兴创立体育会，招各校青年数百人，学习射击

术。有光复会会员自上海来，建议用“劫钱庄”的办法来筹措军费，徐得到富商许仲卿的帮助，筹款到上海购买后膛九响枪五十杆、子弹二万粒、声言是供体育会学生体操实习用，公开运到绍兴。然后与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商议，约集党中强有力者二十人到绍兴，准备执行上述筹集起义军费的计划。后因不易进行，乃与陶成章、龚宝铨密议，设立一所学校，以容纳招来的会党成员并贮藏购到的枪支、子弹；学校既立，定名为大通学校。徐又想借开学典礼之机，杀掉邀集来校参加典礼的大小清吏，即行起义。他要陶成章通知各府会党同时响应，陶认为时机不成熟，此议作罢。大通学校于1905年9月23日正式开学，改称大通师范学校，设体育专修科。陶成章、龚宝铨招金、处、绍三府所属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兵操训练。大通学校规定，凡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卒业后也仍受学校领导人统辖和节制。大通师范学校是一所准备革命的特殊学校，也是革命的联络机关。同年春，徐介绍秋瑾加入光复会。

与创立大通学校同时，陶成章提议党人捐官学习陆军，学成后打进清朝军事系统，掌握军权，以谋“中央革命”。徐极表赞成，经过他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荐，花银三千，被批准送日本学习陆军。这一年冬天，他偕妻子王振汉、友人陈伯平、马宗汉等去日本，先后欲进陆军联队、振武学校，均因眼患近视不合格被拒。又欲入陆军经理学校或警政学校，也未如愿。1906年春自日回国，北游京师及辽、吉，察看形势。当年冬，捐了一个道员，分发到安庆，经俞廉三推荐，加上他办事精明干练，得到安徽巡抚恩铭的重用，先任武备学校副总办，继任警察处会办。第二年又任巡警学堂堂长，接着又任陆军小学（原武备学堂改名）监督。徐利用其身份，广事交游，和兵备处提调胡维栋、马营排长常桓芳、督练公所学员龚振鹏等过从尤密，准备起义时引为奥援。他白天亲自督课，晚上和将士们饮宴，在学员中声望日高，与学员关系日益密切。

先是，徐赴安徽候补时，大通学校事交由秋瑾主持，并有浙、皖

同时起事之约。此后，党人陈伯平往来于安徽、浙江和江西之间，贯通声气，并运动会党。

在安庆起义前，上海侦探捕获党人叶仰高，押送南京。经两江总督端方酷刑严讯，叶仰高叛变，将所知同党供出，幸所供是党人别名或暗号。端方将名单电告恩铭，嘱其拿办。恩铭接电，召徐锡麟计议，不知名单中也包括徐锡麟。徐担心事已泄露，与陈伯平、马宗汉计议，决计速杀恩铭。徐原定7月8日乘巡警学堂毕业生举行典礼之机，将省府官员一网打尽，并已通知外地会党前来支援。但恩铭因这天有他事，命将典礼提前两天举行，因此外地会党未能赶来。

7月6日一早，徐锡麟同陈伯平、马宗汉到巡警学堂，召集学生演说，徐激励学生“不忘救国”[(3)]。语意虽甚激昂，可是学生们并不了解他的用意所在。上午八时，恩铭及文武官吏陆续到警校礼堂。徐抢上前向恩铭行举手礼，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方惊愕，陈伯平即上前向恩铭投一炸弹，未爆发。徐随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射向恩铭，因近视，恐不中，只得连续发射。恩铭身中七枪，由部下狼狈背走。一时文武官吏纷纷逃出。惟奸吏顾松被马宗汉捉住，徐立杀之廊下。徐回到礼堂，命令学生到军械所开库取枪支子弹，均不适用。从警校逃走之藩司冯煦、臬司毓朗等清廷官员立即组织清军进攻军械所，并悬赏缉拿徐锡麟等。经过近四小时的激烈战斗，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不幸被俘。

接着，冯煦、毓朗等组织审讯，要徐锡麟写口供，他挥笔直书说：“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还说：“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不可拖累无辜。”“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4)]

恩铭被刺后当天死去。端方致电冯煦立即处死徐锡麟，安庆司道等清吏并决定将徐斩首后剖腹剜心祭恩铭。徐锡麟于1907年7月6日

晚在安庆抚院门前慷慨就义。

---

(1) 徐父梅生在绍兴“开生绸庄、泰生油烛栈两铺……约计徐家产业：共值十五万元”。见毕志社编《中国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新小说社版，第90—91页。

(2) 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页。

(3)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4)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80—81页；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28—729页。

徐新六

汪仁泽

徐新六，字振飞。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祖籍浙江余杭。父亲徐珂，晚清举人，国学名儒，南社社员，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徐新六幼年时在私塾读书，后进杭州养正学堂求学，1902年入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1908年毕业后，考取浙江省公费留学生赴英，进伯明翰大学学习冶金专业四年，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又在英国维多利亚大学攻读经济学，次年获得商学士学位。再至法国，入巴黎国立政治学院，学习国家财政学一年。1914年回国，参加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分派在财政部任佥事，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徐新六幼年即闻康、梁之名，稍长与梁启超结识。1917年7月，段祺瑞组阁，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徐任财政部秘书，曾两次协助梁向日本商借贷款。11月，梁启超因在四川内战问题上与段祺瑞意见相左而辞职，徐也随之离开了财政部，进中国银行先任金库监事，后任北京分行协理。其间曾一度任汉治萍煤铁厂矿公司总会计。

1918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半官方身份赴欧洲考察，邀徐新六、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作为随员同行。1919年到达巴黎时，适值巴黎和会召开，徐被委为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的专门委员。

1920年3月，徐新六随同梁启超回国，在上海经营新通贸易公司。次年应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之聘，任该行董事会秘书。该行是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其时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放款及储蓄业务外，并发行银元券，办理外汇，经营仓库等业务。徐新六的才干深为

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揆初所赏识，1923年徐任该行副总经理，1925年起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徐新六主持浙江兴业银行后，积极以新的管理方法改进经营，推动和促进了该行业务的发展。对外通过代理汇兑、合放贷款、互相开户和清算票据等业务，使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后改称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旧中国南方的一个强有力的金融集团，被称为“南四行”。同时，对内部也进行整顿，延揽人才。他用人一秉公开，采取考试制度，选拔富有朝气、懂得新型管理的人员担任各分支行、部门的负责人。对原有在职人员给予业务技术训练的机会，提高工作效率，逐步淘汰老弱冗员，精简机构。浙江兴业银行由于叶揆初、徐新六的精心擘划，经营得法，信用昭著，1921年到1927年间的存款总额，在各商业银行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26年底的定、活期存款共达三千三百一十二万余元[(1)]。放款方面，他一改留学时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初衷，着眼于扶助我国民族工商业，1926年，该行对轻重工业的放款达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元，约是1919年六十七万元的五倍。尤其对因日、英纱厂竞争而陷于困境的纺织业，大量增加放款，1926年款额达二百七十二万元，是1919年二十四万元的十多倍。

1927年后，上海市面一度不景气，工商业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弱。浙江兴业银行在徐新六主持下，除了继续对民族工业，如刘鸿生所办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大量放款外，又另谋出路[(2)]。它增设“经营国外证券委员会”，调集资金，委托外商银行购入北洋政府期间在国外发行的以外币为单位、由关税和盐税作担保的“中法美金五厘公债”、“日金九六公债”券，以及外国企业的股票。到1930年，该行有价证券的投资额高达一千四百九十三万余元，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十四。此外又成立地产信托部，徐新六延聘蒉延芳任该部经理，经营第一年即盈余百余万元。以后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获利更厚，1931年年终存款总额在全国同业中居第四位。但是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沪地受到战争影响，市面萧条，地产市场一蹶不振，价格一落千丈。1934年初，浙江兴业银行账面上，尚有价值八百七十余万元的房地产乏人问津。徐新六通过董事会作出决议：“与其产业荒置坐耗利息，不若赶快施工建筑，收取相当之孳息为得计。”[3] 于是破土造屋，先后在施高脱路（今山阴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等建造了“兴业坊”、“兴业里”、“浙兴里”，以出租房屋收取房租，弥补投资收益。同时，在徐新六的筹划下，浙江兴业银行在江苏无锡、常熟、苏州、新浦，浙江湖州，河南陕县、信阳、驻马店，安徽蚌埠等地，增设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扩大了金融网和投放范围。1932年，徐新六又以浙江兴业银行名义，与美商斯达莱公司合组泰山保险公司，投资一百万元，徐兼任保险公司常务董事。

随着浙江兴业银行业务的发展，徐新六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1927年12月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执行委员，1929年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徐还任复旦大学校董（曾一度兼任校长），时事新报、大晚报馆、申报电讯社董事长，交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大陆报、上海毛绒纺织公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十余个单位的董事，以及上海市商会商务委员会委员、公断委员会委员及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副委员长、银行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36年，宋子文系官僚资本投资成立“中国棉业公司”，宋自任董事长，聘徐任常务董事。徐勤于治事，注重实干，作风平易近人，每日在银行午膳，与行员同桌同食，不求特殊[4]。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后，曾多次拟委徐新六以财政金融方面的官职，徐皆婉拒，但政府当局每遇有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时，常向徐咨询。1935年10月，国民政府组织金融、工商界头面人物赴日考察，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年11月，国民政府在实施“法币”改革这一重大决策前，曾征询徐的意见。徐草拟的币制改革方案，后来在实

行“改革”时被采纳甚多。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徐新六和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同时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指派，以民间金融界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1938年8月，国民政府组织代表团，赴美国商谈借款事宜，电邀在香港的徐新六参加。8月24日，徐新六与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相偕搭飞机从香港起飞，拟赴桂林再转重庆。日本军部获得情报，误以为是孙科座机，即派日本军用飞机截击。结果在广东上空被击落，机坠人亡，国民政府给予阵亡烈士称号。噩耗传来，上海各界团体和租界当局于28日下半旗志哀。徐遗有《币法考》等著作。

---

(1) 摘自浙江兴业银行1927年资产负债表。活期存款为1246.9万元，定期存款为2065.2万元。

(2) 1935年大中华火柴公司因上年起政府增加火柴统税，而日产火柴大量走私来华，造成成本激增，销路锐减，亏损达90多万元。刘鸿生向中国银行请求贷款遭拒，转向徐新六恳商后，得浙江兴业银行贷款，始渡过难关。

(3) 上海“公共租界”历年地价上升的统计：以1903年每亩平均价格指数为100，1924年为352，1927年为405，1930年高达584。

(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印：《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1978年12月油印本。

徐永昌

汪仁泽

徐永昌，字次辰。1887年12月15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一）生于山西崞县。其父徐庆，初务农，后至大同经商。徐永昌七岁起在私塾读书，十四岁时父母相继病故，生活无着，投役于一旅店。后被清军武卫左军某营书记官徐椿龄带入军营充当杂差，备尝艰辛。1906年，徐正式列名毅军军籍，生活始较安定，业余发愤自学文化。1908年，徐考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三年毕业，成绩优异，派任左军左路前营副哨长，驻北京琉璃河。

1911年武昌起义后，京师震动。左军左路前营奉命派赴大同镇压革命党人，徐永昌不愿回乡作战，留京改任毅军新兵营哨长，不久进入陆军部所设将校讲习所学习。1913年冬，学习期满，成绩出众。为求继续深造，先后辞去所派连长、团附等职，于次年考入陆军大学为第四期学员。1916年春，曾辍学赴沪转鲁，参加居正等人组织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6月，袁死后，重回陆大学习，是年冬以名列第一的成绩卒业。他与孙岳、续桐溪等人交谊甚厚，辞去外调的任命，留北京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

1917年冬，孙岳创办直隶军官教育团于廊坊（后迁保定），邀徐永昌任教官主持教学工作。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的骨干。1920年7月，孙岳组成直隶保卫团，徐任营长。不久孙任直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徐任参谋长。1922年直奉战起，孙岳任直军西路军司令，派徐督队作战。嗣后，徐调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1924年5月调任该旅第一团团长，驻河北定县。

1924年10月，冯玉祥与孙岳、胡景翼在北京发动政变，组成国

民军，孙岳就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徐永昌升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保定。1925年1月，孙岳被委为陕豫甘剿匪总司令，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率部从保定南下，经潼关，7月抵达渭南，遇新任陕西督军吴新田的北洋军第七师在临潼一带布防抗阻。徐以所部多为新兵，且后无退路，乃决死猛攻，速战而胜，进据西安。8月，孙岳兼任陕西督办，徐升任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11月，国民军暗中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倒奉，孙岳命徐永昌率部经郑州直入保定，猛扑任丘、大城，与张之江部会师天津。孙岳遂于12月任直隶督办兼省长，徐率部驻盐山、沧州。

1926年1月，李景林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反攻国民军。3月，各系军阀反对国民军的大联合形成，国民军四面受敌，于21日退出天津，退守北京附近。徐永昌率所部出居庸关，退集包头。时孙岳病，委徐代理第三军军长职，率部移驻五原。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五原誓师。徐反对冯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返归包头，旋赴山西访阎锡山，受到礼遇。11月，冯玉祥率部进陕，徐则率第三军从榆林间道入晋，被阎锡山以客军名义留驻汾阳、榆次一带。

1927年6月，阎锡山自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9月对奉系作战。徐永昌部被编为南路军，计划自井陉取石家庄再攻保定，但被奉系戢翼翘部夺取定县受阻，遂退集获鹿、平山，构筑工事，固守井陉山地。10月，徐部阻击奉军于井陉一带，使其无法南下。

1928年2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委徐永昌为第十二军司令、右路军总指挥。5月，徐率部与第四集团军南路军配合反攻奉军，出石家庄循京汉路北上，5月底攻克保定。此时孙岳病逝，徐辞去第三军代理军长之职，将该部移交阎锡山，正式归阎统率。6月，徐永昌受国民政府委派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协助该省主席商震处理省务。10月12日，绥远设省，徐出任省政府主席。1929年8月10日，徐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1930年4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矛盾激化，战事一触即发。徐永昌曾奔走各方劝说息争无效。5月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兼陇海路总指挥。鹿、徐率部东进，在考城、兰封一带与蒋军对峙。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战局急转直下。徐永昌与杨爱源率领阎部晋绥残军退入山西境内，被阎任命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司令。阎于下野前委托徐、杨共同主持晋绥军政。张学良主持办理晋绥善后事宜，将晋绥十四个军缩编为四个军。1931年1月，徐永昌任缩编后的第三十三军军长、山西省政府副主席。

“九一八”事变后，阎、蒋重新合流，在此契机下，1931年10月，徐永昌被南京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懂得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自己又非阎系，故任省主席后韬光养晦。每届省府例会，徐纵然出席，亦任凭阎派诸厅委自行其是，以避疑忌。即使如此，徐仍不能久假省主席名义，1933年因“肺疾操劳”被“照顾”而免去省主席职，由阎之亲信赵戴文继任。徐仅留下第三十三军军长空衔，从此也未到过司令部视事。

1934年7月，徐永昌受蒋介石电召，至江西反共前线视察。次年春，徐献策组织参谋团入陕指挥反共军事并监督省政，为蒋所采纳。此时日本侵华势力日渐南侵，华北局势严峻，徐劝说各派军政人士共同维持国民党政权，拥护蒋介石；同时拟就对日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意见向蒋进言，言词恳切，得到蒋的赏识，蒋在复电中有所谓“一鞭一条痕，针针见血”等语。

徐永昌与蒋介石的关系日趋密切，阎锡山对之颇具戒心。1936年5月，在阎的暗示下，徐被迫辞去第三十三军军长职务。6月，阎复畀徐以山西清乡督办的空衔，徐以病辞，随即以就医为名离晋去南京。阎一面假意挽留，一面电请蒋予以重任。1937年3月，蒋宣布由徐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职。

“七七”事变发生后，徐永昌被委为保定行营主任，协同指挥第一战区抗日军事。1938年1月，蒋介石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任徐为军令部部长，主管作战参谋、对敌情报及审定各战区作战大纲等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被任命为中国全权代表，参加盟国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受降仪式，代表中国政府与苏、美、英、荷等国代表共同签署了受降书。

1946年6月，徐永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12月22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院长，委徐为国防部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机日趋成熟。1月21日，徐永昌以蒋介石私人代表名义，携带蒋的亲笔长函，飞抵北平面见傅作义，要傅部分海陆两路南撤青岛，遭傅拒绝，徐倖倖而返。7月29日，国民党绥远驻军酝酿起义之际，徐永昌再度奉命与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飞往绥远临河陕坝镇游说，约见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等人，力图劝说董将主力西撤，联合马鸿逵、马步芳负隅顽抗，复遭董等拒绝。8月，傅作义为促成绥远和平起义，前往包头。9月15日，徐永昌第三次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三人的亲笔信前往包头游说，力图对起义作最后阻拦，并邀傅作义南下，又遭傅回绝。徐见无法回去复命，竟装病赖着不走。傅等识破诡计，晓以民族大义，要徐领衔一起参加起义。徐只得于9月19日绥远宣布起义的当天早晨失败而归。徐回广州后不久，即仓促率领陆军大学学员撤往台北。1951年陆军大学在台改制，徐交卸校长职务。

1952年，徐永昌在台湾被蒋介石任为“总统府资政”。1954年11月被委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7月12日病殁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徐永昌纪念集编辑小组辑：《徐永昌先生纪念集》，台北1962年版。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93—300页。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徐志摩

孙玉石

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初字槱森，小字又申。1897年1月15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浙江海宁。父徐申如，清候选中书科中书，与南通张謇友善，曾因兴办实业，蜚声浙江。

徐志摩四岁入家塾读书。1907年，十岁时进海宁县硖石镇开智学堂读小学，1909年冬毕业。第二年春，入杭州府中学堂求学，与郁达夫为同班学友。1913年，学校更名为杭州一中，徐志摩继续在该校就学，并在校刊《友声》上先后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用小说“改良社会”。

1915年夏，徐志摩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辍学，改入上海沪江大学，12月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16年秋天，重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1918年8月，赴美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此时始更名为徐志摩。出国时，他曾于太平洋舟中撰文，分致亲友，慷慨陈词，表示在此“内忧外患，志士贲兴”之时，要“益自奋勉”，以负起青年人“拨乱反正，雪耻振威”[(1)]的责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甚为关切，后来曾回忆说，当时得到消息后，“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已’过”，“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2)]。6月，他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获一等荣誉奖。9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政治，于第二年9月获硕士学位。此时，他热心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在二十四岁以前，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3)]。

1920年9月，徐志摩为从罗素就学，“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4)]，离美赴英，入伦敦剑桥大学为研究生，仍习政治学。剑

桥大学两年的英国教育和生活，留给他很深的影响。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5] 这时，他的“求学兴味益深”，“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6]。两年内他先后结识拜访了文学家威尔斯、狄更生、曼殊斐尔等人。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他西洋文学的熏陶下，他从1921年起开始了新诗创作。1922年10月，他离开英国回到上海。12月底，开始在胡适等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新诗。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对教育总长彭允彝“蹂躏人权、献媚军阀”不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并发表宣言，主张对北洋军阀政府取“不合作主义”，因而酿成学生要求驱逐彭总长的风潮。月底，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谴责“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对蔡元培“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态度表示赞赏，说谣传和政府“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7]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徐志摩与胡适、陈西滢、丁西林等人在北京组织了早期的新月社。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代表北方学界前往上海欢迎，然后陪同北上。泰戈尔来华前，徐志摩曾撰文说：“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是因为泰戈尔“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纠正现在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把人们引导入“完全的梦境”[8]，表现了徐志摩的世界观与泰戈尔哲学之间的默契和一致。6月，他随泰戈尔赴日本，暑期中返国。1924年夏，徐志摩被任为北京大学教授。12月，他与胡适、陈西滢、高一涵、王世杰、唐有壬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等爱国反帝斗争中，表现了与进步文化运动相对立的倾向，被称为“现代评论派”。1924年底，徐志摩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这时候的徐志摩，不满军阀混战以及民生

涂炭的黑暗现实，向往和追求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在散文诗《婴儿》中，他用“在生产床上受罪”的产妇象征苦难的中华民族，用“美丽的婴儿”象征他理想中的“新政治”。他后来解释说：“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婴儿出世！”[9] 诗集中有些作品流露出他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对城市下层人民生活境遇的同情，有些诗篇表现了他对“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10] 的黑暗现实的怨诉；更多的作品是在对自然与爱情的吟咏中袒露了他的诗人的情怀。

徐志摩的世界观驱使他向右滑动，但他的感情又常容易“无关闸的泛滥”，很不稳定，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沉。1924年10月，苏联大使馆举行升旗典礼，徐志摩参加后曾在一次演说中说，那旗帜的“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不仅表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11] 1925年3月，他经西伯利亚往欧洲，到德、意、法诸国漫游，7月返国。出国途经苏联时，听《伏尔加船夫曲》“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有感，作《庐山石工歌》。他看到苏联国内战后的困难状况，又产生了对苏联革命的误解和恐惧。

同年10月1日起，《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担任主编。这一年里，他写了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和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中的大部分作品。这一年是他创作收获最多的一年。

1926年1月，徐志摩看到陈毅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所作《纪念列宁》报告的油印稿之后，马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暴露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他说：“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认为“共产革命”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鼓动青年“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12] 。充分说明徐志摩向往的是“英美式的

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13]。

同年4月1日，徐志摩与闻一多、饶孟侃、朱湘、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等人创办《晨报副刊》的《诗镌》，由徐志摩主编。第一期为“三月十八血案专号”，载有闻一多的论文《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和徐志摩的诗《梅雪争春》。徐志摩在这首诗以及同时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文章中，反对军阀制造的“空前的血案”，断言只要实行他“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14]。《诗镌》对提倡格律诗起过积极影响，但有不少作品流于形式主义。6月10日出至第十一期停刊。

1927年春，徐志摩在沪与胡适、邵洵美等筹办新月书店。5月，散文集《自剖》由新月书店出版。6月，开始筹办《新月》月刊。秋天，徐志摩应聘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并兼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9月，新月书店印行了他的第二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他称这部诗集是自己“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15]。随着他思想上的趋向消极，他这部诗集除少数几篇以外，“几乎完全是颓唐失望的叹息”[16]。这些诗篇和他的散文一起，确实可以说是“中国布尔乔亚心境最忠实的反映”[17]。

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号出版。这时，围绕《新月》杂志，形成了一个代表右翼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社团——“新月派”。徐志摩在他执笔的代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了文艺的“荒歉”和“混乱”，提出了“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新月》月刊先后发表了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的《论中国的共产》等文章，表明新月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倾向，因而受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阵营的揭露和批判。

1929年，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英文系授课，并

兼任中华书局编辑。5月，小说集《轮盘》由中华书局出版。1930年，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秋天，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授课事。12月，辞光华大学教职，应胡适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

1931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出版。3月，参加创立笔会中国分会，并被推选为理事。8月，第三本诗集《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印行。其中收集了他1927年到1930年的作品。他这时已经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的诗人，不仅生活“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18]。其中有些诗表现了明显的颓废绝望情绪。如在《秋虫》里，他攻击包括革命理论在内的“主义”说“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在《西窗》里更加露骨地咒骂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是“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青年们“滚沸过的心血”；他反复低吟着“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这样绝望的调子。

1931年起，徐志摩的思想稍有转机。他看到了“劳苦社会的光与影”，“千百万人”在水灾和饥饿中“叫救命”[19]，曾表示要彻底改变生活。他翻译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国独幕剧《墨梭林尼的中饭》；发表了同情“左联”烈士的小说《珰女士》[20]，并在“左联”杂志《北斗》上发表诗作。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返回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徐志摩的著作还有：诗集《云游》，散文《秋》，剧本《卞昆冈》（与陆小曼合作），《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翻译《涡提孩》、《曼殊斐尔短篇小说集》、《赣第德》、《玛丽玛丽》（与沈性仁合译）等。

(1)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一节，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本，第11页。

(2) 1928年5月3日日记，《徐志摩年谱》，第73页。

(3) 《猛虎集》序文，新月书店1931年8月初版。

(4) 《我所知道的康桥》，《晨报副刊》1926年1月16日。

(5) 《吸烟与文化》，《晨报副刊》1926年1月14日。

(6) 《徐志摩家书》，《徐志摩年谱》，第19页。

(7) 《努力周报》第39期。

(8) 《泰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泰戈尔号》（上）。

(9) 《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6月版，第18、19页。

(10) 《毒药》，《志摩的诗》，新月书店1931年第4版。

(11) 《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6月版。

(12) 《晨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

(13) 茅盾：《徐志摩论》，《现代》第2卷第4期。

(14) 《自剖》，《晨报副刊》1926年4月3日。

(15) 《猛虎集》序文，新月书店1931年8月初版。

(16) 茅盾：《徐志摩论》，《现代》第2卷第4期。

(17) 茅盾：《徐志摩论》，《现代》第2卷第4期。

(18) 《猛虎集》序文，新月书店1931年8月初版。

(19) 《猛虎集》序文，新月书店1931年8月初版。

(20) 《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

徐宗汉

郭烙

徐宗汉，名佩萱。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76年（清光绪二年）出生于茶商家庭。少时随父在上海家塾读书，十八岁时，由父母做主，嫁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李庆春之次子李晋一为妻。李晋一曾跟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的一个同学学习英文，间接受陈影响，思想较进步。结婚数年后，李晋一病逝，遗有一子一女。

徐宗汉为人豪爽，与广州著名女医师张竹君交谊甚笃，经张介绍受洗礼入基督教。张在广州创办提福医院、南福医院及育贤女学校，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相助。

1907年，徐宗汉应执教于南洋槟榔屿的二姊徐佩瑶函邀，赴槟榔屿。这时槟榔屿刚成立同盟会分会，徐宗汉听到革命志士的宣传，热烈赞成，遂加入同盟会，此后即从事革命活动。她帮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在南洋发展党务。翌年秋，徐宗汉经香港同盟会分会派遣回粤，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在广州组织同盟会分机关，设守真阁裱画店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准备在广州举事，派徐宗汉等人去香港秘密运回炸药、子弹装在行李箱中，运到广州，别的人提心吊胆，坐卧不宁，而徐却态度安闲，怡然入睡。1910年2月，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倪映典准备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担任联络工作，设机关于广州高第街宜安里，准备当新军起义时，由她分头纵火，以扰乱清吏的耳目。由于清廷采取了预防措施，而起义士兵又仓促提前发动，使这次起义归于失败。徐宗汉在失败后逃亡香港。

半年之后，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多次集议，决定在广州再行举

义，为此，1911年1月，由黄兴、赵声等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徐宗汉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她在香港摆花街机关制造炸弹。临举事时又将机关迁至广州溪峡，她负责将枪械弹药从香港秘密运进广州的任务。她伪装成颜料行的主妇，把军火装在颜料罐中，并在储藏处的门口贴大红对联，装饰成屋内正在办喜事的样子以迷惑敌人，起义前夕，她将枪械弹药发给“选锋”（即敢死队）同志。4月27日起义（即通常所说黄花岗之役）发动，很快失败，总指挥黄兴负伤，于当天夜里脱险退至溪峡机关，徐宗汉为之裹伤，隐匿于机关。黄兴眼看起义失败，同志牺牲惨重，一时欲投河自尽，被徐宗汉劝阻。三天后，徐宗汉亲自护送黄兴乘轮船脱险至香港，住入雅丽医院动手术。照例动手术之前，必须有亲属签名负责，徐宗汉就冒充为黄兴的妻子签了名。在黄兴疗伤期间，徐宗汉对黄关怀备至，待黄兴伤愈出院后，他们便结成革命伴侣。黄花岗之役的失败，使黄兴痛不欲生，曾想亲自暗杀几员广州大吏，拼一死以谢死难烈士。孙中山等革命同志坚决劝阻，徐宗汉亦百般劝慰，使黄重振精神，筹划革命事业。

辛亥革命爆发后，黄兴自港经沪转鄂，主持革命事宜，徐宗汉随行。当他们自沪赴鄂时，长江沿岸各口清吏搜查极严，无法通过。徐宗汉求助于在沪开设医院的好友张竹君，张竹君发起组织由中外人士参加的红十字会救伤队，开赴武汉战地救护，黄兴与徐宗汉乔装成救护队成员，混迹其间，得以顺利到达武汉。黄兴担任战时民军总司令，指挥抗击清军。徐宗汉则投入救护伤兵的工作，日夜忙碌。当汉阳弃守时，清军封江，徐宗汉与张竹君则以红十字会的一只渡船，护送黄兴渡到武昌江岸脱险。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2月间南北议和告成，广东北伐军姚雨平部从徐州前线回南京时，带回战时难童二百多人，黄兴通知陆军部副官处觅民房收容，成立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教养院的工作。从此，徐宗汉把贫儿教养工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徐宗汉随黄兴

流亡日本、美国，从事反袁活动。

1916年6月，在全国讨袁护国高潮中，徐宗汉随黄兴自美经日抵沪，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徐宗汉悲痛之余，息影沪滨，抚育遗孤。

五四爱国运动中，徐宗汉激于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又振奋精神，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徐为该会负责人之一，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当刘清扬等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到上海呼吁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时，徐宗汉热烈赞助。她作为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之一，参加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工作，并任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她慷慨捐献经费给当时各爱国团体。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想赴法国勤工俭学，但缺乏路费，徐宗汉热情资助这些青年，使其成行。她既要支持爱国运动，又要资助青年求学，一年之间已囊中金尽，自己的生活反陷于窘困到不得不出卖住房的境地。

1921年，苏俄发生灾荒，上海成立俄灾赈济会，徐宗汉担任该会演讲部主任，到各地各团体去演讲，呼吁大家捐款，救济苏俄灾民。

1927年，北伐军到达南京后，徐宗汉回到她于1912年创办的南京贫儿教养院。她竭力整顿，使数百贫儿得到温饱，孩子们在此学习文化，兼学编织、园艺等知识。她还在安徽创办一所农场，作为贫儿劳动的场所。

1931年，徐宗汉为征集贫儿教养院经费，赴美国募捐。迨“九一八”事变爆发，她立刻改变为贫儿教养院募捐的初衷，转而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收复东北三省而奔走呼号。

抗日战争开始后，她带领一部分贫儿出国，流亡到暹逻，一方面为贫儿募捐，一方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呼吁侨胞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徐宗汉从泰国回国后，在云南大理鸡山创设贫儿院，但因经费

困难，不久就停办了。她把那些流亡的贫儿转送至安徽贫儿院农场，自己于1940年春到重庆。这时她年逾花甲，忧时愤世渐转为消极超世，静修打坐，苦度光阴。1944年3月8日，徐因肝病咳血病逝于重庆。

主要参考资料

［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记女斗士徐宗汉》，见许金城辑《民国野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

《黄兴在革命中恋爱》，见许金城辑《民国野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

冯自由：《徐宗汉女士事略》，《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记黄克强夫人》，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3月13日第3版。

冯自由：《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黄一欧：《辛亥革命杂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穆云：《敬悼徐宗汉先生》，《现代妇女》第3卷第4期（1944年4月）。

刘清扬：《纪念“五四”忆徐宗汉先生》，《现代妇女》第3卷第5期（1944年5月）。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

许崇智

严如平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禺人，1887年10月26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十）生。祖父许应鲲、父许炳衡均署朝议大夫，福建补用通判。许崇智三岁丧母，八岁丧父，靠叔伯婶母抚养成长。1899年，许崇智得到任闽浙总督的本族祖父许应骙的照拂，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就读。一年后，又在许应骙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先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1902年升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归国后，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不久升任福建讲武堂教习。许“于教授学术之余，灌输各学生以革命思想及理论”[(1)]。其后，许调任第十镇第四十标统带，继又擢升为该镇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少年得志，骄矜阔绰，时人称他为“贵公子”。

1911年，福建同盟会支部为发展革命力量，派彭寿松等人组织“军警特别同盟会”，广泛吸收新军第十镇官兵入会，许崇智也在这时加入[(2)]。10月，武昌起义声震全国，彭寿松等酝酿在福州起义，于11月8日集合新军宣布起义。许崇智于当日被推举为起义军前敌总指挥。9日拂晓，许指挥起义军对“旗界”发起攻击，炮兵轰击将军署及旗兵营，10日福州光复。许在此役中显露了军事指挥才能。

福建军政府于11月11日正式成立，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初被举为福建海陆军总司令，后为福建第一师师长。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福建第一师统一编为民国陆军第十四师，许仍任师长。接着，许以福建北伐军总司令名义率部北上，冒雨雪载道之苦，经上海至烟台；因南北和议告成，遂班师回闽。袁世凯继孙中山任大总统后岑春煊举兵入闽，同时电召许崇智入京，欲予收买。许崇智离京后，经日本到上海谒见孙中山，对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和善后大借款

等行径表示愤慨，得孙面授机宜，于1913年4月回到福州筹谋反袁。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于7月爆发，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派人到闽，拉许崇智举兵从福建进袭江西和南京。许拒之。他响应“二次革命”，和刘通等老同盟会员迫使孙道仁于7月19日通电宣布福建独立，自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但是孙道仁不肯得罪袁世凯，多方阻挠讨袁军出师援赣。许发讨袁通电，并吁请湖北黎元洪、浙江朱瑞、四川胡景伊共同反袁。7月下旬，江西李烈钧战败，其他几个省的讨袁战事也先后失利。许崇智迫于形势于8月8日出走上海，不久东渡日本。1914年7月，参加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被举为军务部长。翌年，奉孙中山之命两次去南洋各地开展党务活动，为反袁斗争筹集军费。12月回国，至山东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辅佐居正举兵讨袁，设总司令部于青岛。1916年2月，许指挥东北军所部沿胶济路西进，未及三月，光复县城十余座。5月，被举为东北军代总司令。6月，袁世凯暴卒，讨袁护国之战结束。许崇智返回上海，继续担任中华革命党总部军务部长职，与副部长邓铿等在军事上辅佐孙中山。其时许与蒋介石结交，曾先后联同张静江、吴忠信两次与蒋结拜为把兄弟。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东揭橥护法，许崇智追随赴粤。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孙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许任大元帅府参军长，不久又兼署陆军总长。12月，孙中山以省防军二十个营为基础成立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许崇智任第二支队司令。援闽粤军经过潮梅整训、扩充，于翌年5月在粤、闽边界分三路向北洋军阀控制的福建进军。许崇智率第二支队为左翼，向闽西南上杭、武平进发，复派一部驰援中路攻克永定，乘胜前进，地方军队和民军亦纷纷归附。援闽粤军在战斗中扩大至两万多人，改编为两个军，陈炯明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辖五个支队驻漳州；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辖四个支队驻汀州。

1920年8月，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许崇智

指挥所部先对驻闽南的浙军陈肇英师及福建地方军队张贞部加以扫荡，以解除回师广东时的后顾之忧。8月16日，粤军分三路回师，许崇智为右翼总指挥，率第二军沿上杭、永定之线前进，连克大埔、蕉岭、梅县、兴宁，直至河源。10月28日，粤军克复广州，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当选非常大总统后，决定出兵广西继续讨伐桂系军阀，许崇智奉命率第二军为右路，沿四会、广宁之线向贺县进发，直取桂林。孙中山于1922年4月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决定取道江西北伐。许崇智率部向江西进发，于6月13日攻克赣州，又进至吉安，直指南昌。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登永丰舰，许崇智遂率第二军及李福林、朱培德部回师，在韶关至翁源一带与叛军激战。由于梁鸿楷率第一师突然脱离北伐军退往东江河源，陈修爵、谢毅两团又倒戈加入叛军，许崇智及李福林部苦战多日，弹尽援绝，被迫后撤，退入赣南瑞金。9月初，许率领所部联合皖系驻闽之混成旅王永泉部，以突袭方式从建瓯和南平同向福州攻击前进，驱逐李厚基。10月13日，许崇智率部进入福州，占领福建，部队又扩充至两万多人。许被孙中山委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所部分编为三军十二个旅，以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自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惟许治军不严，对部属将领宽纵过度，自己又沉溺于酒色，嗜吸鸦片，故军纪日渐松弛。1923年春，许崇智奉孙中山命率东路讨贼军回师广东，5月，自潮梅向广州前进时，突遭陈炯明叛军洪兆麟、林虎两部拦腰截击，在揭阳、兴宁一带仓促应战，损失惨重。许崇智只身逃脱，于博罗收集残部，不足万人。8月，陈炯明部攻击博罗，许紧闭城门固守待援，被围十余日；后得李济深第一师相援，始推进至河源，但与陈炯明军相持不下。直至11月，经湘、豫军增援反攻，才把陈军击退，辗转到达广州。

1924年1月，许崇智出席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决议表示拥护，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在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长。大会后，孙中山着手整顿军队，把广东军队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辖四个军，许崇智被委为建国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

为了消灭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叛军，1925年1月，广州大本营决定东征讨伐，许崇智指挥粤军张民达第二师、许济第七独立旅和第十六独立团计七千五百人，以及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两教导团（约二千五百人）为右路，沿广九路出击，进占平湖、深圳，控制广九路全线。许率主力东进，躬冒矢石，将士奋勇作战，2月14日克淡水，21日占平山，接着攻克三多祝和海丰，在鲤鱼湖附近击溃洪兆麟部李云复师，入普宁城，进占揭阳，控制潮汕地区。3月，在棉湖、河婆与林虎部激战，进占五华后又在兴宁击溃了林虎部的最后抵抗，3月下旬占领梅县，底定粤东。6月初，桂军刘震寰、滇军杨希闵在广州叛变，许崇智率东征军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龙眼洞、石牌郊区作战，得工农民众协助，全歼滇、桂叛军，返回广州。

粤军底定粤东之时，许崇智驻汕头、嗜酒色宴乐，又体弱多病，军中诸事多委诸参谋长蒋介石办理。许崇智对蒋介石十分宠信，4月间曾对诸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许总司令就是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以后由许崇智名义签署的命令，下面盖的是许崇智的图章或是蒋介石的印章一样有效。”[(3)] 惟粤军许多将领对许如此宠蒋颇不以为然。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实行合议制的国民政府于7月1日在广州正式成立，许崇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声势显赫。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国民党中央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控制局势。9月5日又特授许崇智以监督

广东境内中央及地方财政全权。此时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在查处廖案中拘捕了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令梁士锋等八人，梁鸿楷、梁士锋等所属部队均被包围缴械。接着，蒋介石向许崇智提出：粤军很多将领牵涉廖案，粤军已不可靠，为安全计，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之警卫。9月中旬，许崇智发觉自己实际上已遭蒋介石软禁后，拟调许济、莫雄两支粤军精锐部队到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蒋介石于18日深夜派出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抢占要地，控制广州。19日，蒋在广州财政会议上又拘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并于当夜派黄埔学生军包围许的住处东山公馆。20日凌晨2时，蒋派人送亲笔函致许，历数许之过错后威逼他“毅然独断，保全名节”，“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4)]。许崇智异常惊讶，电话问汪精卫又得不到支持，于当日深夜11时，在陈铭枢带领的一支队伍“护送”下悄然离穗。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职由谭延闿署理，粤军总司令部则由蒋介石一手收束，所属部队均被改编，许济、莫雄等部则被包围缴械，许的军权完全落入蒋介石手中。

许崇智到上海后住于英租界，凭着蒋介石许诺他三个月后回粤的那封信，不断向蒋索取款项。他对邹鲁、张继、居正、谢持等人筹划召开西山会议表示支持，只因为一心等待届期回粤，没有公开露面活动。张继等西山会议派于1926年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许崇智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于南京另立国民政府，7月，汪精卫又在武汉反共，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形成鼎足之势。8月，许崇智派代表去武汉与汪商谈合作。9月初，许偕张继在上海与汪直接晤谈，提出合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于一体的主张。许出席9月11日至13日三方中委谈话会，会议决定共推三十二人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许崇智被上海方面举为委员，主持党务工作。但因蒋介石、汪精卫都没有获取到大权而竭力反对，这个特别委员会旋即夭折。许眼看重掌军政大权的幻想已成泡影，对蒋介石满腹怨恨，向人

表示要揭蒋介石在粤“逼宫”的阴谋。蒋介石担心许披露自己的亲笔信，几次派张静江来索要，许托言已遗失，实际上摄影复印多份，分地保管，以防不测。后经居正、戴季陶、吴稚晖等人周旋疏通，许崇智出洋“考察欧美日本党务”，蒋介石送给旅费三十万元。许偕邹鲁、程天固等出访，在檀香山、纽约、芝加哥、柏林、巴黎、伦敦等地，以国民党元老的姿态发表演说，多有非议蒋介石之词。从欧美回国后仍住上海，蒋介石给予国民政府委员和监察院副院长的虚职，许干领薪俸，未去南京就任。

在国民党各派力量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争斗中，许崇智常常是被策动、争取的重要对象。1929年冬，唐生智发动反蒋，许崇智于12月6日通电蒋介石，劝其“引咎自劾”，“洁身以安国”[(5)]。蒋介石十分恼怒，于20日以“阴谋反动，危害党国”的罪名对许加以通缉[(6)]。1930年7月，汪精卫联合反蒋各派在北平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许被列名为七名常务委员之一。1931年2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加胡罪以“勾结汝为，运动军队，包庇陈、温反对约法，破坏行政”[(7)]。反蒋派系及粤、桂军事首领集合广州，于5月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又组织“国民政府”，许崇智被迎去广州。他是“非常会议”当然委员，还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常委。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统一。许崇智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以后蒋介石召开的第五、第六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列名为中央监察委员。在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的1931年12月，许崇智又被列名为国民政府委员；1935年12月被重新任命为监察院副院长，但都是徒具虚名，没有实权。他仍然拿着蒋介石的接济，在上海常出入舞厅、妓院、跑狗场、回力球场；兼做投机买卖，出入交易所倒卖棉纱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崇智于1939年夏秋间离沪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攻陷，许崇智避居于一私人佛堂，乔装

成修行的和尚，后被附敌分子告密而遭日本宪兵拘捕，囚禁于香港大酒店。蒋介石闻讯后，即宣布许“辞免”国民政府委员及监察院副院长之职务。驻港日军少将酒井竭力笼络许崇智，三个月后释放了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与许崇智同学的矶谷廉介担任驻港总督后，一再施展诱降伎俩，帮助他开办宏丰公司赚钱，还想要他出任汪伪南京政府要职。但许坚持了民族爱国立场，加以拒绝。1944年，美国空军轰炸香港，矶谷离职，许崇智转移到澳门居住。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崇智于1945年底从澳门到广州，不久回到上海。1946年5月，他应邀到南京参加“还都大典”，蒋介石并未予以恢复监察院副院长职，更未委以重任，他大失所望，数天后返回上海。他与居正、吴铁城、戴季陶、吴稚晖等人开办成功贸易公司，设总公司于台北，专事台湾与大陆间的商业贸易。是年秋，许迁居香港。1947年4月蒋介石将许列名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5月又将许聘为总统府资政。这些虚衔，许皆未予置理。

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去台湾后，于1950年复“总统”职，聘许崇智为“总统府资政”，定期拨给许一笔款项。许崇智打算在香港成立一个“第三路线”的组织，曾草拟组织章程，四处活动，希望大家拥戴他做这个组织的首领，但得不到什么人的有力支持，后来也就无声无息了。

1965年1月25日，许崇智因冠心病在香港去世。

---

(1)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光复之役》，中华书局1960年版。

(2)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4页。有些撰述称许于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加入，但查阅《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即1905、1906年）之会

员名册》（《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8—77页）未见其名，亦未发现许在1911年前有从事同盟会活动之史料。

(3) 莫雄：《由同盟会到蒋政权四十年政治亲历散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

(4)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五篇，1936年版，第23—24页。

(5) 《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

(6) 《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

(7) 《国闻周报》第8卷第7期；蒋介石：《致胡汉民函》（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见《近代史资料》第52期（1983年第2期），第50页。“汝为”即许崇智，“陈、温”指陈群、温建刚。

许德珩

刘秋阳

许德珩，字楚生、楚僧，别名础。江西九江人。1890年10月1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初四）生。父亲许鸿胪曾参加府试，补为廪生；在九江同文书院任教时，方志敏是他的学生。

许德珩六岁在家馆读书，后入私塾。1908年考入九江中学堂就读，经老师杨秉笙、王恒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他投笔从戎，任九江都督府秘书处秘书。1913年春回九江中学堂继续读书。“二次革命”爆发后，许德珩再次投笔从戎，参加江西都督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讨袁之役。失败后，为躲避搜捕，只身到上海求学。1914年考入吴淞中国公学，因学费昂贵，一年半后辍学。

1915年秋，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先读英文，后转国文学门，曾师从陈独秀、李大钊，深受其影响。在校时，他结识了邓中夏等人。1918年5月，北京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驻兵东北，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引起北京各大学学生的反对，许德珩参加了请愿活动，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向总统徐世昌上交请愿书。6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还参与发起组织学生救国会。7月，受学生救国会委派南下联络，先后到达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等地，结识了张太雷、马千里、恽代英、林伯渠、邵力子、史量才等人。10月，参加爱国杂志《国民》的创办工作，任编辑委员会委员。

1919年初，许德珩与北大进步同学一起组织工人夜校，帮助学校工友读书识字，还与邓中夏一起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经常走上街头，深入海淀、卢沟桥、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宣讲革命道理。五四运动期间，他是运动的发起、组织、宣传者之一，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行动，后被捕入狱。6月16日，在上海参加了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任《全国学联日刊》总编辑。

许德珩于1919年秋从北京大学毕业，12月赴法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在法期间，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陈毅、徐特立等人，参加过旅法中国学生的爱国斗争。1927年初回国，任教于广东中山大学，讲授社会学、社会主义史。4月，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同时还在武汉第四中山大学讲授社会学。7月，汪精卫“分共”后，他掩护和资送不少共产党人离开武汉。12月，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还和邓初民、劳君展等组织“本社”，意为不忘本、恪守三大政策，谋求与共产党合作。1929年底，任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1930年初，翻译出版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这是该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31年7月，应聘北平师大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及主任，并兼北大法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后，许德珩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到东北大学等处演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痛斥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被国民党军队宪兵三团逮捕，后经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获释。出狱后，许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北平分会执行委员。

1935年秋，许德珩看到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兴奋异常，冒着被解聘和坐牢的风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他与杨秀峰、马叙伦等发起组织北平文化救国会，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同学生一起游行示威，并在清华大学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1936年夏，被北大解聘，旋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许德珩在北平大学任教期间，结识了中共北方局代表徐冰。1936

年冬，他从徐冰介绍中了解到延安缺乏日用品和粮食，和夫人劳君展表示要“买些日用品和食物给毛主席送去”[(1)]。随后，劳君展立即买了三十双布鞋、十二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转送给毛泽东。11月2日，毛写信致谢，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2)]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德珩离开北平，经武汉转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设计委员。南京沦陷后，又经武汉回江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7月，他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9月，任教于重庆璧山社会教育学院，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1941年初，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并任政团同盟联络部副部长。1944年底，许德珩与一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以聚餐形式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呼吁“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曾在红岩约请许德珩共餐。毛泽东对许等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十分赞赏，勉励他把座谈会发展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大会，决定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九三座谈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许德珩被推为理事，主持社务活动。

许德珩1946年从重庆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支持学生民主爱国运动。11月，国民党当局召开国民大会，许发表谈话指出：“此次国大断然召开，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个人责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协商一致，我个人不拟赴京。”[(3)] 1947年，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后，他就转入秘密斗争。

1949年1月，许德珩和北平其他文化界民主人士联名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谈主张。同时，与其他九三学社负责人一起在《新民报》上

发表宣言，拥护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倡议。3月25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到达北平后，次日邀请许等共餐。席间，周恩来对他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所做的事，我们都知道。"(4)

9月，许德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第四届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历任第一至第六届主席。1979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因病于北京逝世。

---

(1)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2)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第219页。

(3) 孙承佩：《百年风雨、伟大追求——缅怀许德珩同志》，《人民日报》1990年3月15日。

(4)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第291页。

许地山

徐斯年

许地山，名赞堃，号地山，笔名落华生。福建龙溪人[1]。1893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台湾省南府城一个爱国者的家庭。他的父亲许南英，号蕴白，进士出身，当时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许地山两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日军来犯，许南英随刘永福扼守台南，坚持民族大义，投入抗日斗争。失败后，抛弃全部财产，举家迁回大陆，在福建龙溪落户，过着清贫的生活。

许地山的父亲回大陆后，在广东做过几任知县。幼年的许地山从1897年至1910年，大部分时间随家住在广州。他四岁发蒙入私塾。十三岁入广东韶舞讲习所。十四岁改入随宦中学堂，1910年10月毕业。其父从亲身经历中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转而同情革命。大哥许赞书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些都对许地山的青少年时代有着积极的影响。加以往来华侨的熏染和革命党的宣传，早在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就剪了辫子。他父亲虽以为“文明不能专从外表上讲”，然而不久自己也学儿子的样，剪去了辫子，以至当他们搬到乡下居住时，都被当地人称为“剪辫仔”和“革命仔”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许地山，从小接触到较多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化。在学习方面，他除了正课之外，酷爱音乐，熟悉音律，善弹琵琶。广东的民间歌曲“粤讴”他不仅会唱，而且能编，这对于他后来的小说、诗歌创作都有影响。

1911年，由于父亲赋闲，家境更加贫困。十九岁的许地山开始自谋生活，任福建省立第二师范教员。1913年赴缅甸仰光，任华侨所办中华学校教员。1915年底归国，次年任教于福建漳州华英中学。

1917年又回福建二师任教，并兼附小主理。同年暑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在北京，他迎来了“五四”风暴，形成了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投身于反对封建礼教、争取民主自由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毕业，得文学士学位，转入燕大神学院研究宗教。同时，与好友瞿秋白、郑振铎等合力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又与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遵循该会“文艺为人生”的宗旨，开始创作一些短篇小说。1921年1月，许地山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发表处女作《命命鸟》。它的反封建的主题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当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同年，他还创作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和《黄昏后》。

1922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得神学士学位，留任该校助理并在平民大学兼课。同年出版散文集《空山灵雨》，共收散文四十四篇。次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1924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英国伦敦，入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在英国结识老舍，鼓励老舍写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并介绍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来二人成为挚友。1926年10月得牛津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途经印度，留在罗奈城印度大学研习梵文及佛学。1927年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助教。这几年间，他创作了《缀网劳蛛》、《海角底孤星》、《醍醐天女》、《枯杨生花》、《海世间》、《慕》等小说、散文。许地山的前期创作大都充满异域情调，富有浪漫色彩，但并不脱离现实。它们较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不满，顽强地探究人生的价值及其根本目的；但是，它们又笼罩着相当浓厚的宗教哲学气息，情调比较低回，反映出一种怀疑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思想。

《缀网劳蛛》是许地山的前期代表作。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不幸遭遇，却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然而她又对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幸与不幸，一概采取容忍的态度。她自比为蜘蛛，“把

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吐出生命之丝，不断补缀着残破的命运之网。这种人生观，对于当时青年中存在的悲观绝望、烦闷轻生的思想有着一定的针砭作用，然而又包含着宿命论的、“独善其身”思想的消极因素。茅盾曾经指出，《缀网劳蛛》“是‘五四’落潮期一班青年苦苦地寻求人生意义寻到疲倦了时，于是从易卜生主义的‘不全则宁无’回到折中主义的思想的反映”[(2)]。许地山的所有作品，都贯串着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但是他前期作品中的“人生理想”是朦胧的，矛盾的。这反映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愤激和苦闷。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把中国人民推进了血海。“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严肃的问题，更加尖锐地提到了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心民族命运的作家，许地山通过他后来的作品，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1928年，他被擢升为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副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兼授印度哲学和人类学。1930年，升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邀，前往讲学，特意与夫人周俟松绕道台湾，探望久别的故乡和亲友。台湾山水的明丽秀媚和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生活，都给许地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亲友介绍抗日形势，表达了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信念和期望。在中山大学讲学时，他极力反对某些人提倡“中学读经”的主张，坚持“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同年12月赴印度，在印度大学继续研究印度宗教及梵文。次年年底回到北京。这一时期，许地山除了潜心于宗教史、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云笈七籤校异》、《中国道教史》上卷等学术著作外，同时写作了《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女儿心》、《归途》、《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春桃》等短篇小说。与前期创作相比，这些作品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为鲜明的倾向性。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剖析取代了浪漫主义的构思和哲理问题的探索，语言更加通俗、冷峭。《在费总理底客厅里》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揭穿了国民党右派所标榜的“民生主义”的虚伪。《三博士》讽刺留学生中

的败类，暴露了教育界和官场的腐败。《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尖锐地触及时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的斗争和牺牲。

1935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许地山。他于是应香港大学聘，南下香港，就任该校中文学院主任教授。当时的香港大学，曾被鲁迅称为“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3)]，直到1934年，它的国文课还是只讲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桐城古文。许地山到任后，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立了文学、史学、哲学三系，革新了教学的内容。他还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担任过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字会理事及香港中小学教员暑期讨论班主任委员等职务。瞿秋白于1935年被捕时，他曾邀集友好，多方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投身于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他奔波于香港、九龙，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国庆日所立底愿望》、《七七感言》、《中国思想中对于战争底态度》等杂文，宣传抗战、民主，反对投降、独裁，还经常不辞辛劳地为救亡青年上补习课。

在文艺思想方面，这时的许地山明确地批判了以“我”为中心的“怡情文学”，提倡坚实的“群众文学”。他指出，处在“正义公理所维持的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险境地”的时势中，富翁贵人可以不要祖国，而人民群众则一旦亡国必成马牛。所以，大众需要的，不是那“行云流水，没弦琴，无孔笛”的文艺，而是那“对于人生间种种不平所发出底轰天雷”，即“带汗臭”、“带弹腥”的“群众文艺”。它的任务在于“切实地描写群众”，陶冶出我们民族“坚如金刚底民族性”[(4)]。

这一时期，他写有短篇小说《铁鱼底鳃》，书信体散文《无法投递之邮件》、《危巢坠简》，剧本《女国士》等。《铁鱼底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位胸怀救国大志的兵工专家，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献身无路，救国无门，终于在离乱中丢失了兵工新发明的资料

和成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地山通过主人公的口，喊出了人民要求坚持抗战的意志，表达了坚强的民族自信心："越逃，灾难越发随在后头；若回转去，站住了，什么都可以抵挡得住！"[5] 许地山认清了争民主和反侵略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坚信中华民族只有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只有在这个斗争的熔炉中才能锻炼出全新的民族性格。他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终于和革命斗争的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这标志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国民党反动势力曾想笼络许地山。抗战前期，他们的驻港官员请他赴会、撰文，均遭拒绝。反动派于是扬言要加害于他，许地山大义凛然地对家人说："我偏要活，活得还要更好些。"[6]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他当即与张一麐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抗战到底。然而他竟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祖国的新生。1941年8月4日，疾病夺去了许地山的生命，终年四十九岁。

许地山的作品，生前汇集出版的有小说散文集《缀网劳蛛》、《解放者》、《无法投递之邮件》，散文集《空山灵雨》。逝世后，他的夫人周俟松搜集遗作，编辑出版了《杂感集》和《危巢坠简》。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卷本《许地山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两卷本《许地山选集》。

---

(1) 许地山祖籍广东揭阳，明代即迁居台湾，至其父许南英已历九世。许南英回到大陆后，因清政府不准内渡官吏保留台湾籍贯，所以才落籍于福建龙溪。

(2) 茅盾：《落华生论》，《文学》月刊第3卷第4期（1934年10月）。

(3) 鲁迅：《集外集拾遗·两封通信（复魏猛克）》，《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9页。

(4) 许地山：《〈硬汉〉序》，《杂感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0、61页。

(5) 许地山：《铁鱼底鳃》，《许地山选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6) 周俟松：《许地山传略》，《许地山选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8页。

许鼎霖

熊尚厚

许鼎霖，字九香。祖籍江苏海州。1857年（清咸丰七年）出生于赣榆县。他的父亲许恩普为当地绅士。许鼎霖幼年入私塾读书，十四岁那年，父亲遭当地官吏诬陷下狱。1882年，他去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之后借助同期参加乡试友人的力量，替父申冤，使其父得释出狱。

1893年2月，许鼎霖随清政府驻美国兼秘鲁公使杨儒出国，任驻秘鲁领事。1897年回国，在安徽先后任庐州、凤阳等地知县。1899年冬，他在任大通货厘局兼保甲局委员时，侦得自立军党人秦力山等举义，立即分派局勇前往镇压，逮捕党人七名严刑审讯。次年底，聂缉槼任安徽巡抚，对许十分赏识，保荐他得安徽候补道衔，署理芜湖道篆，其后又任芜湖商务局总办。1902年5月，他会同芜湖巡警局增募警勇三百人，改设巡警总局。年底，又与道台吕韵生制定警察章程，试办巡警，并创设习艺所。1903年秋，浙江发生宁海教案，10月聂缉槼调任浙江巡抚，许鼎霖亦随任浙江洋务局总办。11月，他被派往办理宁海教案，与法国天主教主教赵保禄（Paul Marie Reynaud）磋商解决条件。次年7月，经清政府批准严惩反教首领，将宁海县令充军，并赔偿教堂银十五万两，给被杀教士立碑道歉结案。

许鼎霖在皖、浙两省做官期间，在聂缉槼庇护下积储钱财颇多。在当时新式企业利润的刺激，及“设厂自救”的社会舆论激励下，决定投资实业。1904年8月，在江苏徐州与张謇等开办耀徐玻璃公司，资本银八十万两，他任总理。次年10月，与英商福斯德订立合同，开始筹建厂房、购置机器，聘福斯德任工程师。1906年2月，该公司获清

政府商部批准专利十年，1908年5月正式生产出货。嗣因发生争执，福斯德突然撕毁合同，私自撤走机器，带走英国工匠，使生产停顿。后虽经英国领事从中调解，派回数人指导开工，终因质量低劣，无法正常生产，许鼎霖只好改聘澳洲人维斯罗为工程师，更换设备。1909年始大规模生产，日产玻璃七千块，品类五十余种，产品曾在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得奖。其后，因经营管理不善亏蚀，1911年秋破产歇业。

在开办耀徐玻璃公司的同时，许鼎霖与严信厚等在海州创办海丰面粉公司，官商合办，资本三十万银元，许任经理。1908年获利四万五千九百两（官利八厘除外），营业甚为发达。1910年4月，当地发生饥荒，该厂被饥民捣毁。

许鼎霖和严信厚等还于1905年6月集资四十二万元，在赣榆创办赣丰机器油饼厂（榨油），雇英人管理机器，获商部批准专利权五年，许任经理，开办后颇能获利。

此外，在1904年至1907年间，许鼎霖还与张謇、严信厚等合伙经营镇江开成铅笔罐厂、赣榆海赣垦牧公司、上海同利机器纺织洋线麻袋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并投资北京溥利呢革厂、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企业。

许鼎霖以封建官僚改营工业，受到清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数年间发起创办或投资如上的许多企业，成了清末著名大实业家。因此，清政府1908年1月赏给他正二品封典，以奖其创办实业之功。

1905年9月，许鼎霖与恽祖祁、王清穆等联合教育界人士，在上海发起组设江苏学会，他任会董兼经济部干事。次年江苏学会改组，更名江苏教育总会[(1)]，他又任干事员（1909年任副会长）。该组织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从事社会改良运动。

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各地立宪派纷纷发起组织立

宪团体。许鼎霖在创办工业活动中，与张謇关系密切，两人常在一起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是立宪派的重要活动分子。是年12月，许鼎霖同张謇等一起，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的立宪派，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许任本部事务所会董。1907年9月，清廷公布将设资政院，10月又通饬各省督抚筹设谘议局，各府县设议事会。许鼎霖和其他立宪派分子一样，对清政府愈加依赖。当时苏、浙群众反对清政府借外债筹筑沪杭甬铁路的斗争正在进行，许与王清穆等被指充代表去北京，但他们完全屈从于清政府的旨意，接受御史江春霖提出的部借部还方案（即由邮传部借，邮传部还），翌年春承认沪杭甬铁路借款条约，使苏、浙铁路拒款运动受挫。

1908年春，西太后害怕实行立宪，欲将预备立宪的上谕借故拖延。立宪党人纷纷发起请愿运动予以对抗，许鼎霖与张謇等即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致书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立宪派，相约各派代表集合北京，向都察院递交《呈请速开国会书》。同年8月和9月，清政府宣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公布《宪法大纲》二十三条。许对这次请愿感到安慰，认为总算取得一定成果。同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溥仪嗣位，以醇亲王载沣摄政。1909年3月6日，清政府颁布《重申实行预备立宪谕》，宣示“决心”立宪。同年秋，各省谘议局纷纷成立，许鼎霖与张謇于9月筹办江苏谘议局，许任总会办，10月又任学务特审员及审议会议长。各地立宪党人因得到法定集会机关，更加活跃起来。是年冬，张謇以江苏谘议局名义通电，请求清政府1911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并派人分赴各省游说，联络全国十六省谘议局，各派代表三人在上海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进行请愿运动。许鼎霖积极支持这一运动。

1910年9月，清廷成立资政院，许鼎霖被钦选为议员，任专任股第二股长兼审查各省谘议局关系事件特任股员。当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及各省商会、海外华侨等代表，正在北京举行第三次请愿，向资

政院上书提议速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许在资政院内极力支持。11月21日，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八号会议，立宪派为了缓和人民对清廷的不满，提出所谓“军机弹劾案”，要求组织内阁。部分议员表示如果不达目的，便决心解散资政院。许在会上表示异议说：“现在中国正在危险的时候，若我们对于弹劾军机大臣就存一个解散的决心，于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何以见之？现在一般人民有立宪国的意气，并无立宪国民的程度，一经解散人民的代表，即是弃绝人民，恐怕革命党、哥老会乘此机会煽惑民心，暴动起来就不得了。”[(2)] 同月29日，在宪政实进会开会时，他又表示“反对共和政体”、“反对不以兵力平内乱”[(3)]，充分暴露了他害怕革命、热心保皇的立场。

1911年初，许鼎霖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命为本溪湖煤铁公司督办，10月改任盐政监督。武昌首义后，沈阳学生联合各界，于11月2日组织奉天“国民保安会”，推赵尔巽为会长，许任奉天交涉使。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在赵尔巽把持下，暗中利用张作霖以武力镇压革命党。许顽固地站在赵尔巽等一边，表示与清王朝共生死，大谈“君主立宪是救世良方”，反对革命，谓“共和政体实毒害人心”[(4)]，反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12月17日，他经赵尔巽推荐，随唐绍仪代表清政府到上海议和。在开议中途返回北京向袁世凯报告，力言民军方面枪械不足，可用武力将革命镇压下去；并谓唐绍仪妥协，不足胜任总代表职[(5)]。在沈阳旅奉十三省联合会上，他说：“轻言共和”，“难免不遭内乱”，将会“亡国灭种”，“瓜分之祸必不能免”[(6)]。1912年1月，许鼎霖还担任了几天资政院总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2月12日，清帝被迫下诏退位，许只好另谋出路加入国民党。1913年2月，在国民党议员的支持下，他被举为江苏省议会议长。不久，袁世凯公开镇压革命党人，制造了著名的宋教仁被杀案，国民党人遭到打击时，许见势不妙，辞去了江苏省议会议长职。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篡改民元约法，设政治

会议为其御用工具。许鼎霖得张謇的举荐，被袁指定为江苏省特派议员。次年2月，袁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并打算成立所谓造法机关——约法会议，许被指定为政治会议审查员，参与拟具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3月，约法会议成立，他任该会议员。9月，任江北苇荡营督办，前往主持垦务。1915年改任江苏、安徽赈务督办。

1915年10月15日，许鼎霖病逝于上海。

---

(1) 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先由张謇、唐文治等担任，1912年后由黄炎培、沈恩孚等主持会务，1927年停办。

(2) 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二十八至二十九号），第11—12页。

(3) 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

(4) 上海《民立报》1912年1月17日。

(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6) 上海《民立报》1912年1月3日。

许冠群

谈玉林

许冠群，名超，以字行。1899年12月2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江苏武进县城内双桂坊。父许广澄，字孚康，常州汇丰钱庄经理。许冠群童年跟随谢伯远和曾熙读书。1918年去上海，在三新纱厂任会计员。晚上进外人开办的上海商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挂牌执行会计师业务。

五四运动爆发后，人民群众抵制日货情绪高涨，许冠群与陈蝶仙曾共商制造国货蚊香，以抵制日货“野猪牌”蚊香。后许与友人集资六百元，设“新农除虫菊公司”，雇工在常州试种蚊香原料除虫菊。1923年冬在沪试磨制除虫菊粉，由于获得率低，未能成功。翌年，许改做化妆品生意，试制“艳秋霜”雪花膏、花露水、生发油等，亦无发展。

当时日商三昌洋行跑街赵汝调，系日本千叶大学药科毕业，在戒烟运动影响下，赵向许提议以印度红土为主要原料做戒烟丸。1926年5月，由许冠群、赵汝调和赵的内弟屠焕生三人，合伙凑集银元一千元[(1)]，在上海成立“新亚化学制药公司”（简称新亚药厂），雇用一个职员和一两个工人，生产“戒烟丸”。不久，改生产“人寿水”（即星牌十滴水）。这是许冠群正式从事制药业的发端。

1927年，许冠群联络亲戚顾厚夫等向新亚药厂投资，股本增至一万元[(2)]，并把公司迁至白克路（现凤阳路）二十四号，职工增加到十五人。并将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推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的吴葆之为主席董事，许自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开始制造注射用水，第一只产品是“灭菌蒸馏水”，是为新亚药厂自制针剂之始。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新亚产品销路因而打开。此时，新亚兼出之“孔雀牌”化妆品，曾在小吕宋国货商品展览会上参加陈列，并开始进入南洋一带市场。

注射用水所用的“安瓿”，必须用硬质中性玻璃，当时从国外进口，破损甚大，成本加重。1930年6月，许冠群聘请日人田之助为顾问技师，试制中性硬质玻璃。9月，租赁麦根路（今淮安路）七百一十四号，设立较完整的制药厂，从事制造各种针剂和成药，复增设玻璃工厂，正式制造中性“安瓿”、注射针筒、玻璃仪器等；同时将白克路原址改为发行所，资本增至五万元[(3)]。1931年2月起，许冠群将化妆品业务收缩，专扩充药品业务及玻璃工厂，任赵汝调为制药厂厂长。8月起，其父许广澄担任了新亚药厂主席董事（后改称董事长）。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运动兴起，日本药品受到国人的坚决抵制。新亚药厂出品的针剂、片剂和针筒销路因而突飞猛进，1932年夏秋两季营业更趋旺盛[(4)]。许冠群于是在新亚原有基础上大加扩充，增设了药片、药丸制造部和软膏、浸膏等工厂。1933年4月，新亚药厂资本总额增加至二十五万元，职工人数增至一百多人[(5)]。

许冠群为解决新亚药厂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出路问题，竭力联络华美、五洲等几家大型药房作为依靠力量。华美药房在新亚初创时，就贷给流动资金四千元，后来转为投资；五洲药房除投资外，并供应新亚制药原料。华美、五洲从新亚药厂进货，在一般按定价六折的批发价之外，并有再打八折九扣的优惠，新亚仍有百分之一百三十的利润可得[(6)]。

为了给新亚做宣传，许冠群自1929年起，每年印发《星牌良药集》。1932年12月，以“新医药刊社”名义，出版《新医药杂志》，以沟通各地医药情报，因此很受外埠医师的欢迎，每期发行量两万册以上。1938年许聘请中医师丁福保为总编辑，出版《国药新声》。

1939年聘请潘仰尧等为编辑，出版发行《健康家庭月刊》。

1933年，许冠群召集新亚、信谊、五洲、中法、海普、余氏、民生七家同业，发起组织“上海市制药厂业同业公会”，许冠群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委员。在此前后，许还任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化妆品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和全国新药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以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等多项兼职。

1936年，新亚营业额已达一百万元以上，资本增加到五十万元，职工人数增至四百余人，成为上海的一家大型药厂[7]。除上海新闸路设总公司外，广州、北平两处设有分公司，国内一些大城市设有办事处十四处；另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马尼拉、怡保、马六甲、仰光、雅加达、爪哇、海防、西贡、曼谷等处设有发行所，派专人进行宣传和推销。

1936年，许冠群和赵汝调通过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的介绍，东渡日本参观了设备先进的“武田”、“盐野义”等制药厂。从日本归来后，许曾有在林肯路（今天山路）购地筹建新厂的计划。先是年初许已在沪设立“新亚化学药物研究所”，至此聘请了东京帝大药物学博士曾广方为所长，研究制造有机合成砒素剂“新消梅素”（即“606”）。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许在林肯路的建厂计划停顿。上海人口骤增到四百五十万人，军、民用药品需要量增加。许于是设立新亚卫生材料厂，聘请曹畤玉为厂长，专门制造橡皮膏、橡皮手套、血压计和药棉、纱布等产品。1938年4月1日，又设立新亚血清厂，聘请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专家程慕颐为厂长，研究制造血清、牛痘疫苗及其他生物学细菌制剂。新亚产品除供应本市外，并曾以红十字急救包十万只，运经香港转供内地。

1938年10月，为争取西南市场，成立了香港新亚药厂，资本为港币十万元，许自任董事长，以其弟许冠英为厂长。这时上海的资本

额从1936年的五十万元增加到1940年的三百万元。1940年3月，许冠群购进新闸路1044号辛家花园楼房十八幢，作为新亚总公司的新址。1941年，许又设生物研究所，聘请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博士、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部主任余贺为所长，研制防痨特效剂及新亚青霉素等产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进占租界，上海与外洋的交通完全断绝，欧美原料及药品不能输入，再加战时通货膨胀，币值渐趋低落，社会游资争谋出路，出现了各方大量囤积商品的投机之风。许冠群为了适应投机市场的需要，采取了不断增资的办法，从1941年至1943年连续增资三次，达到伪中储券一亿二千万元，为1940年的四十倍[(8)]。增资以后，他先创办了一个新亚建业公司，作为新亚企业集团投机的中心机构，将新亚药厂、新亚联合地产公司等企业置于它的管理之下；另外又与蔡声白等组织成立“中国股票公司”，从事股票投机买卖牟取暴利。

许冠群获利以后，即向业外发展，经其创办或投资合作的厂商，共达三十五家之多，成为一个范围庞大、机构复杂、托拉斯式的新亚企业集团。这个集团大体分为五大类型：金融投资、地产业十二家；化工制药、食品业九家；棉纺织、印染业七家；印刷、造纸业四家；金属制品、贩卖业三家。新亚建业公司是总枢纽，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中国工业银行等单位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达到了全盛时期，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成立“商业统制会”（简称“商统会”），控制和搜刮战略物资。在汉奸梅思平的撮合下，许冠群担任了“商统会”的理事[(9)]。新亚药厂替日本加工制造药品，新亚酵素厂生产的酒精，全部由日本人包去。1943年底，新亚建业公司和国华投资两家各出资一半，盘进三友实业社杭州染织厂，改名为杭州第一纱厂，许任该厂董事长，国华公司派张文魁担任该厂总经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冠群怕被检举为汉奸，于11月间抽走了一部分资金去香港。到港以后，与弟许冠英共同掌握香港新亚药厂，还另办了香港中国工业银行和香港新亚联合地产公司。但经营并无起色，在一次对韩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受到严重亏损，一蹶不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启发和在港亲友的劝助下，许冠群于1950年9月怀着对新中国半信半疑的心情，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新亚药厂董事长已是吴蕴初。吴把董事长一职让出仍由许冠群担任，同时让他担任杭州纱厂总经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许冠群当上了浙江省政协委员和杭州市人民代表。他在杭州还筹办了一家华侨饭店，动员侨胞在国内投资；并在沪、杭两地捐款办学，为培养人才作出过贡献。

1972年5月7日，许冠群患癌症在沪去世。

---

(1) 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的回顾》，1964年版。

(2) 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的回顾》，1964年版。

(3) 《工商史料》第二集，上海机联会1936年版。

(4) 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的回顾》，1964年版。

(5) 《新医药杂志》1932年12月创刊号。

(6) 根据原华美药房账载材料和合同依据及1936年《五洲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28页。

(7) 《制药业同业公会会员厂历史沿革》，上海市工商联1948年。

(8) 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的回顾》，1964年版。

(9) 《上海工商名录》，“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一览”，《申报》，1945年版。

许广平

张小曼

许广平，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她的父亲许炳瑶是庶出，在家庭中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母亲是一个澳门华侨的女儿。许广平生下刚三天，就被父亲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

许广平性格倔强，八岁那年，母亲要给她缠足，她大哭反抗，终于迫使母亲妥协。她上家塾时，父亲只让老师教她用土话读书，她的哥哥则可用官话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她进行了反抗，父亲只好应允她和哥哥一样用官话读书。她十二三岁时，就明确向家人表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1911年9月，许广平的母亲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的全家搬到澳门，许广平由大哥许崇禧照顾。许崇禧是留日学生，常向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大哥的影响下，许广平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东主办的《平民报》，产生了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愿望。她还购阅宣传妇女解放的周刊《妇女报》，深受其影响。许广平在《两地书》中曾追忆到："因为渴慕新书，往往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取，以不得为憾。"又好读"扶弱图强等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

1917年，许广平的父亲病故，她二哥从北京回广州奔丧，帮助她解除了包办婚约，她随即同二哥到北京。后又投奔在天津的姑母，考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天津，许广平立刻

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者之一，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0月10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遣保安总队的大批武装警察、马队，驱散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的一万名群众，许广平和女同学们用旗杆做武器，站在与军警搏斗的最前列，并勇敢地包围了警察厅，愤怒声讨杨以德的罪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

1920年5月7日，许广平又与同学们一起，不顾校方阻拦，冲出校门，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校方竟将她们全部开除。许广平和同学们团结一致，在家长和社会进步舆论支持下，坚持斗争一星期，终于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1922年，许广平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4年11月，为了反抗校长杨荫榆推行的奴化教育，北京女师大[(1)]学生爆发了驱杨运动。开始许广平因不明真相，唯恐被人利用，没有直接参与。次年3月11日，她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请求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2)]。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希望她用“壕堑战”的方式，跟旧社会进行战斗。从此，许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有时还登门谒见，向鲁迅求教。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当女师大学生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骨干，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这时，许广平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经常帮助鲁迅校对和抄写稿件，并积极为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撰稿。当北洋政府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残酷迫害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时，鲁迅挺身而出，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这一切，使得许广平和鲁迅之间的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产生了爱。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

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3]。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2月18、19两日，许广平曾随鲁迅到香港。鲁迅在港作《无声之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深刻地阐述了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广平为他把绍兴官话翻译成广东话，增强了这两次讲演的效果。4月15日，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政变的血迹未干，广州的反动派又进行了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10月3日，与许广平抵达上海。

鲁迅这时决定停止教学活动，专心从事创作。许广平也希望能独立地服务于社会。鲁迅很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4] 这话深深打动了许广平。她认识到，在残酷、艰苦的斗争中，鲁迅不能缺少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于是毅然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此后十年中，许广平追随着鲁迅在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中，过着半地下状态的生活。为了使鲁迅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她不但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要替鲁迅购买书籍，抄写稿件，查找有关资料，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也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由于得到许广平这样的支持，鲁迅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竟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5]。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鲁迅发表自己的译作时，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他还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6]

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燹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在一起，共同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1931

年，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反动当局屠杀后，鲁迅的处境也很危险。1932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鲁迅的寓所处于枪弹的威胁之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之后，又散布将暗杀鲁迅的风声。同年8月，作为鲁迅公开联络点的内山书店，有两名中国职员突然被警察局拘留，鲁迅的安全受到威胁。在这些危急的时刻，许广平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跟鲁迅步步相随。“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的这首诗，反映了他们之间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与世长辞。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1937年1月，她发出了《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呼吁收藏鲁迅书信的国内外人士捐赠或借录鲁迅的书信手稿，以便“整理成册，公布大众”。她又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十三篇编成《夜记》，于同年4月出版。6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7月，她编辑出版了《且介亭杂文末编》。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纷纷离沪。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留在上海未走，并投入了紧张的出版工作。1938年4月，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6月，她按《壁下译丛》体例，辑成《译丛补》。同年8月，由胡愈之发起，许广平、郑振铎等二十人组成的“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资助下，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二十卷本），其中收入了不少鲁迅的未刊稿和业已绝版的译著。全集编成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错字比当时出版的任何书籍都少，创造了当时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这套全集，为后来的鲁迅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还节衣缩食买了一百支手电筒，托人带给跟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此外，许广平还热情地为《上海妇

女》、《妇女界》、《上海周报》、《鲁迅风》、《中苏文化》、《文艺新潮》及《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等报纸杂志撰稿，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许广平借款刊印了《鲁迅三十年集》，内收鲁迅1906年至1936年的著作二十九种，计三十册，分三大函（不包括译作），售价比《鲁迅全集》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了上海的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妄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敌人对她采用了拷打、电刑等种种手段进行逼供。面对这些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广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保全了革命团体和无数的朋友。日军一无所获，1942年3月1日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郑振铎在《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一文中写道："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她是怎样的拼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伴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和女英雄。"(7)

1944年秋，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八百余封整理好后，分藏数处，194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并会见了中共驻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许广平请律师将鲁迅的书籍加封加锁，使之完整地保存到解放。

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道义上的声援，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她在《我的呼喊》一文中，愤然质问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许多军队，在对日寇的抗战中望风而逃的，这回反而

非常勇敢地在打自己的同胞了。难道养精蓄锐，为的是今天一役？国家亡在异族手里不要紧，让自己兄弟、亲戚、朋友来共管国事倒不愿意？”[8]

1948年10月，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经香港秘密转入解放区，受到李富春、蔡畅等人的盛情接待。

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许广平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她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她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

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9]。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宿愿。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病在北京逝世。

---

(1)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5月1日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2) 鲁迅、景宋著：《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1月北京重印第1版，第15页。

(3) 漱渝：《携手共艰危》，《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1、2期，转引自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4页。

(4) 许广平：《我又一次当学生》，《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80页。

(5) 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集〉引起的话旧》，《关于鲁迅的生

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6)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文艺阵地》第2卷第1期（1938年10月16日），转引自《许广平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54页。

(7) 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

(8) 许广平：《我的呼喊》，《民主》第6期（1945年11月17日）。

(9) 陈漱渝：《鲁迅的夫人和战友——纪念许广平同志》，《中国妇女》1980年第10期。

许世英

郑则民

许世英，字俊人、静仁。1873年9月10日（清同治十二年七月十九日）生于安徽秋浦（今东至县）中乡兆吉山许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耕读人家。父许玉堂受过旧式教育，注重伦理道德，结交乡绅名流。

许世英六岁入本村私塾，十一岁时往长江北岸望江县童问渠门下寄馆读书，打下了较好的旧学基础。1891年中秀才，其后曾两次参加乡试，均落第。1897年考取拔贡。同年进北京参加礼部选官考试，成绩列为第一等，次年任刑部广西司副主稿、主稿。后转任直隶司主稿。

1900年春，许世英得到同乡四川布政使周馥的邀请，告假离京赴川。当他于6月到达成都后，周馥却劝说他乘义和团发生后局势动荡朝廷用人之时，返回京城，争取个人升官的机会。许世英在归途中得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已出走。10月，许赶到西安，受命办理刑部直隶司和四川司的积案。1902年回京后升任刑部六品主事。

1905年10月，清政府新设巡警部门，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朱启钤推荐他任该厅行政处佥事。1906年年终考核时，列为京察一等，获得以四品任用的资格，受到慈禧、光绪的召见。

1907年4月，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特调许世英同往东北筹建司法机构，次年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在应酬交际中，结识了日本驻奉天领事广田弘毅和副领事有田八郎。

1910年春，许世英和徐谦等受清政府派遣往欧美考察司法和监狱，经过俄、德、法、意、比、荷、瑞、奥等九国，随后到美国参加

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1911年春回国。11月，正当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许奉调往山西任提法使。为配合袁世凯逼宫的需要，许世英和山西巡抚张锡銮联名呼吁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5月，许世英得张锡銮的推荐，被袁世凯任命为大理院院长，7月入陆徵祥内阁任司法总长，9月继任赵秉钧内阁司法总长。当民国初年出现政党林立局面时，许世英、徐谦、陈锦涛等发起组织国民共进会，成为该会的骨干人物。1912年8月，国民共进会等三个小政党和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1)]。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赵秉钧派人刺杀于上海，黄兴等人提出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许世英在袁世凯授意下，以司法总长身份，用“不合编制”为借口，加以阻挠。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在黄兴等强烈要求下，将有关宋案的证据公布，使袁、赵的杀人罪行难以掩盖。许世英再次出面通电“力争法权”，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的权利，受到革命派的抨击。他们认为许世英是赵秉钧内阁的成员，应当一起辞职，没有高谈法律的资格。黄兴在电文中指出：“惟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至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2)] 7月，赵秉钧辞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许仍留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派熊希龄组织新内阁，许世英辞去总长职，10月经张锡銮推荐任奉天民政长。这时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在他出关任职之前，特邀至天津段宅，结拜为“盟兄弟”。他们同为安徽人，这次拜盟，与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有相当的关系。

1914年春，袁世凯为了铺平复辟封建帝制的道路，策划增修《中华民国约法》，许被调入京充当约法审查员[(3)]。同年5月3日出任福建省民政长，不久改称巡按使。按照袁世凯的命令，许世英曾于1915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乘船巡视福建沿海之马尾、沙埕港、马祖、厦门和金门等处[(4)]。后因与扩军使李厚基不合，于次年4月辞职。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掌握军政实权。6月30日，许世英任内务总长，7月改任交通总长，从此他成为皖段的智囊人物。1917年，在府院之争中，许世英站在段祺瑞一边。5月3日，黎元洪责成查处津浦铁路租车、购车受贿案，翌日京师高等检察厅逮捕了许世英，旋以没有犯罪的证据，许被宣告无罪，随后许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1918年许世英任安福国会参议员及中意合办的华意银行总裁。

1921年9月，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次年11月受命署理汪大燮内阁司法总长，但尚未到任汪阁便已倒台，仍留省长原任。1923年初，许世英因坚持裁撤安武军，同安徽督理马联甲发生冲突，被迫卸去安徽省长职。2月，经黎元洪任命为航空署督办。11月曹锟贿选总统后，许被免职。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权后，同样极不得人心，皖系军阀企图乘机再起。1924年秋，段祺瑞派许世英南下广东，联络孙中山反对直系统治。10月初，孙中山在韶关接见了许世英，听取关于共讨曹、吴的意见。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权迅速崩溃。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商讨组织政府，段祺瑞和张作霖也虚伪地表示赞同；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已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段宣称“外崇国信”，表示尊重此前历届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到达天津后肝病发作，12月18日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等，怒斥段祺瑞政府的错误主张，质问他们：“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5)]

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随后任命许世英为筹委会秘书长，主持会议准备工作。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

开场，许世英担任秘书长。参加善后会议的有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各省、特别区的军政首领或其代表，西南各省军阀也派代表参加，此外聘请了一些政客、文人。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早就通电拒绝参加。善后会议至4月21日结束，花费了一百一十五万大洋[(6)]，但并未达到巩固段祺瑞统治的预期目的。5月1日，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条例》，3日，派许世英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五卅”惨案以后，全国反帝斗争高涨，唯军阀和帝国主义之命是从的临时执政府，更被民众厌恶。段祺瑞为了逃避集矢于一身的困境，于1925年11月下旬派黄郛、许世英去张家口与冯玉祥商讨改组临时执政府事宜。12月26日，公布修改临时执政府官制，添设国务总理，任命许世英为总理。许世英在组阁时，企图任用一些接近冯玉祥和国民党的人员，以稳住段祺瑞的统治，决定任命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但是国民党人于右任等因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拒绝就职，段派内部也有人对许世英表示不满，迫得他一度避居使馆区不愿就职。此时正逢年关，段政府财政吃紧，1926年1月18日段令许兼署财政总长，21日又令他兼署盐务署督办，设法筹款。许世英尽力搜罗款项，帮助段祺瑞渡过了年关。2月15日，许提出辞呈，段准其请假，由贾德耀代理内阁总理。5月13日，段祺瑞下台，许陪同段回天津，不久赴上海。

1926年秋，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吴佩孚主力被迅速击溃，孙传芳势力也遭到打击。这时许世英在上海参与组织反对孙传芳的苏浙皖联合会，历数孙传芳的罪状，主张地方自治。翌年初，许世英等人受到孙传芳的通缉，他避往香港，孙传芳失败后方才回沪。

许世英闲住上海时，曾参与救济灾民的工作。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许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社会救济事业长达八年之久。其间1929年河北、山东等省遭受大旱灾，1931年，长江、淮河发生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种灾害更是连续不

断，灾民无数。许世英曾亲往灾区进行赈济工作，他提出："救灾如救火，救人须救彻，查灾要查明，放赈要放洁。"[7] 并慨叹灾区之悲惨情况："床下鱼儿帐上蛙，阶前艇子室中车。更怜草舍沉沦尽，不见流亡不见家。"[8] 但由于国民政府只顾反共祸国，不管人民的死活，许世英主持的救灾工作只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敷，治本更无从谈起。

1936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二二六"事变，广田弘毅任首相兼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任日本驻华大使，他们都是许世英以往的老相识。蒋介石集团为了贯彻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反动方针，企图借助许的这种关系，与日本搞妥协，当年2月特命许世英为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到达日本后，与广田等会见，彼此除寒暄叙旧之外，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外交作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日本侵略者感到原定三个月结束全部对华军事的狂妄计划无法实现之后，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许世英受命在东京同德国人密谈。直到南京陷落，德国人宣告调停失败，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则等于断绝国交"[9]，在日本召回驻华大使后，许世英始获国民政府外交部准许，在1938年1月20日离开东京回国。

许世英经香港到达武汉，接着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再次主持全国赈灾委员会的工作。1938年12月，受派为中央救济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抗战胜利后，许回到南京。1947年4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至1948年卸职，不久赴香港。1950年夏到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1964年10月13日许世英在台北病故。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5—588页。

(2)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0页。

(3) 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119、138页。

(4) 许世英：《闽海巡记》，1915年第9版。

(5) 黄昌谷：《孙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详情》，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15页。

(6) 许世英：《善后会议经过情形略述》，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五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7) 许世英：《水灾咏事》1931年。

(8) 许世英：《咏事》1935年。

(9) 许世英：《雪楼记事》1938年1月。

许雪湫

杨天石

许雪湫（一作雪秋），原名有若。广东潮州海阳（今潮安县）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为新加坡华侨富商。雪湫年轻时，随父住在新加坡。其父死后，获得大量遗产，曾出钱向清政府捐过一个候补道的官衔。他懂武术，精技击，丈把高的墙可以一跃而上，又任侠好客，挥金如土，和江湖会党广有联系，因此被称为“小孟尝”。1902—1903年间，结识了到南洋鼓吹革命的福州人黄乃裳，非常倾慕，立志“逐满兴华”。1904年秋，邀黄乃裳、陈宏生等归国。10月27日，与黄、陈及吴金铭、李杏坡等在宏安乡故宅集会，立坛歃血，相约招集同志，筹饷举事。经过几个月的经营，结识潮州府属各县三合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波等数十人。1905年2月15日晚议定，以许雪湫为革命军司令，陈宏生为闽粤度支部长，吴金铭为参谋长，同时议定了联络学界、会党和各省同志的人选，并拟派陈宏生赴福州，联络黄乃裳，发动闽省响应。当时，潮汕铁路正在建筑中，许雪湫以承办铁路工程为名，派余丑、余通、陈涌波为工头，召集会党七百名为工人，又由吴金铭以绅士名义呈请清政府地方当局，在海阳上七都祠招募团练四百名，均以会党充任；约定4月19日同时举事。但因李杏坡用人不慎，走漏消息，李被捕牺牲。不久，又有人告发许雪湫为革命党首领，清吏派员密查。在这一危急情况下，许雪湫身怀手枪，单身到潮州衙门，侃侃自辩。清吏和许是旧识，又因他是地方大绅，没有深究。

初次举事失败后，许雪湫重赴南洋，准备筹款再举。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至新加坡，通过张永福介绍，许和孙中山相识，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不久，许即回到国内，散发以鹰球为图案的票布，招揽会党。同年冬，偕余丑、

余通、陈涌波等到香港，向冯自由表示，筹划已渐次成熟，要求致电东京，请孙中山派人回国相助。孙中山接电，派出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到港，就近协助。其后，许雪湫即在宏安乡自宅召集会议，定期1907年2月19日（正月初七）分头大举。一路由薛金福偕乔义生、李思唐等往饶平县浮山墟布置，进攻潮州；一路由方汉成、方次石等往黄冈发动，拟攻汕头，许雪湫则偕方瑞麟、谢良牧等三百人埋伏于潮州城边，另有六十人预伏城内，以为内应。届期，饶平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1)]；许在潮州东门外一直等到天亮，不见队伍开到，只得命令各部分散待命。数日后，薛金福等被捕杀。许雪湫即委托陈宏生处理善后，自己赶赴香港，向冯自由等报告起事中变情形。冯自由电告孙中山后，孙中山复电称：此后起义须与惠州及钦州、廉州义师同时并举，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许即留在香港等候消息。

5月初旬（农历三月下旬），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有会党二人为清吏捕去，当地同志极为愤激，要求立即举事营救。许雪湫跃跃欲动，冯自由、胡汉民均劝其静候孙中山命令，并命余、陈二人返黄冈制止。5月22日（四月十一日），余丑、陈涌波等在黄冈提前发动起义，占领全镇。24日，许在香港得到确讯，即于次日率同志十余人赶赴汕头，与乔义生、萱野长知等研究，计划发动丰顺、揭阳、惠阳等县会党响应。27日，黄冈起义军失败。许等极端懊丧之余，计议炸毁清水师提督李准的运兵轮船，因戒备严密，未能下手。返回香港后，许一面设立机关，召集同志，一面派人潜返内地，准备再次起义。

为了了解黄冈起义的有关情况，孙中山电召许雪湫到河内报告。在见到孙中山的时候，许表示，土炮不敌洋枪，因此失败。如能从外国购买新式军械，运至惠州汕尾洋面，他可以预雇大船数十艘在彼接应，随即可在海陆丰沿岸大举发难。孙中山赞同许雪湫的主张，即派

萱野长知回日本购械。10月8日，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得到萱野的电报：船械五日可到。许遂于9日赶赴汕尾，但在登轮时，发现有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的侦探在船，许登岸折回，因此，延误了一日。1月13日，萱野的运械船幸运丸号驶抵汕尾洋面，未见接应船只。等待多时，许才乘一小船前来探问。萱野责备许筹备不善，许答应数小时后大船必来，匆匆离去。由于准备起义，汕尾附近聚集了大量会党，早已风声四播，又由于日轮停泊时，沿岸观者无数，这样，就使得清兵加强了戒备。吴祥达派所属兵轮驶近日轮侦查。幸运丸号原是三井洋行包租的运煤船，船主遂不听萱野将船暂移别处的建议，径自将船开往香港。不久，粤督又照会香港政府，要求扣留该轮。日本领事得讯后，命该轮启碇返日。

此次事败，许雪湫受到各方责备。胡汉民曾将当时布置计划详情写了一份万余言的报告书，指责许“妄言无实，不负责任”[(2)]。从此，胡汉民对许的印象就一直很坏。雪湫初住香港，后来流亡南洋。因家产被清政府抄没，靠卖药为生。当时，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重点已转向广东西部的钦、廉地区和广西、云南等地，无力协助许雪湫再举。黄冈起义失败后，有二三百人随许逃亡，同盟会在安排这些人的生活出路上也发生困难。这一切，使得许逐渐对孙中山和同盟会产生失望情绪。1908年秋，陶成章到南洋，因在筹款中得不到孙中山的充分支持，加上前此已经存在的思想、策略等方面的分歧，便在南洋另立光复会，与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分庭抗礼。许同情陶成章，参加光复会，并带进了一批潮州、嘉应人，光复会的势力因之一振。

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雪湫偕陈宏生、陈涌波等回到潮州，招兵数百人，组织南路进行军，收复饶平、海阳、惠来诸县。当时，广东各地类似的民军很多，它们大都各树一帜，派捐派饷，不相统属。仅潮汕地区就有十三个司令，雪湫是其中之一。1912年初，驻守惠州的岭东镇守府司令林激真觊觎富饶的汕头地区，以“就饷”为名，企图率

兵入汕，受到汕头商会会长赖礼园等人的反对。3月，林军攻占汕头，纵兵抢掠。许雪湫支持林激真，曾带兵抄抢赖礼园家，勒索兵饷[(3)]。事后，赖向广东省方提出控告，同时，士绅巨贾等亦以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为名，向各方奔走呼吁。4月，广东都督陈炯明派清降将吴祥达率兵进驻汕头。5月初，新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下令遣散广东各地民军。同月，吴祥达于深夜包围许雪湫设在汕头道署的司令部，将许部缴械，并逮捕许雪湫。12日，奉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令，将许雪湫枪杀[(4)]。

主要参考资料

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湫》，《革命逸史》第2集。

伯璜：《司令许雪湫传》，原载汕头《大岭东日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抄件。

唯心：《许雪湫烈士事略》，原载汕头《大岭东日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抄件。

许无畏：《〈革命烈士许雪湫传记〉后序》，《革命烈士许雪湫传记》，1962年新加坡许氏自印本。

张馥村：《潮汕光复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1) 关于浮山一路未能集合的原因，说法不一。刘七辉等《潮州黄冈革命事实》认为是由于“丘松、薛金福等机谋不密”；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认为是由于“风雨大作，旋聚旋散”，“无法集合”。此据许

雪湫《致孙中山电》，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

(2) 《胡汉民自传》，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3) 《林激真乱潮实纪》，《神州日报》1912年4月3日。

(4) 《香港专电》，《神州日报》1912年5月14日。

许云樵

陈民

许云樵，本名钰，号梦飞，别号希夷室主。祖籍江苏无锡。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出生于苏州。父母早故，赖外祖母抚育成人。他得亲友资助，于20世纪20年代先后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和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因经济不继，中途辍学。他刻苦好学，对史地尤感兴趣，曾先后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有关暹罗的文章。

1931年，许云樵得到商务印书馆交际主任黄警顽的热心介绍，只身南渡新加坡；又经友人介绍，转往马来半岛柔佛州的新山宽柔学校担任教务主任。一年后，又返回新加坡，在静方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南渡时即矢志于南洋史地的研究。1932年5月，他在《星洲日报》副刊《南洋文化》发表了《大泥考》。

1933年冬，许云樵应友人吴学濂的邀约，往暹罗南部北大年的中华学校主持校务。三年后，因暹罗政府强迫华侨学校改授暹文，遂辞去中华学校职务，改往曼谷国立商科学院讲授英文。在暹罗期间，他于教学之余，潜心研究北大年历史，阅读了数百种中外图书，结合进行调查访问，考证有关史料，于1940年底撰成《北大年史》[(1)]一书，纠正中国古籍把北大年（古称“大泥”）与渤泥牵合之误。这是他研究南洋史的代表作。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顾其史料散在中外载籍数百种内，裒辑既需时日，考证尤费功夫，只字不解，则遍翻群书，一名有疑，竟商讨多日，事再倍而功不及半，稿数易而心犹未释。”[(2)]足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这期间，他还将暹罗郎苇吉怀根所著《世界史纲·暹罗史》中关于暹王郑信部分译成中文并加附注，以《暹罗王郑昭传》为书名问世[(3)]。

1938年，许云樵辞去曼谷教职，把长子留在暹罗岳母家，自己携眷回到新加坡，应聘于《星洲日报》社，与张礼千、姚楠合编《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刊《星洲十年》。1940年春，又联络《星洲日报》同事关楚璞、郁达夫（当时任该报副刊主编）、张礼千、姚楠，以及槟榔屿的刘士木、上海的李长傅等，共同发起创办“中国南洋学会”。这是我国学者在海外最早成立的研究东南亚的学术团体，许云樵为学会理事兼会刊《南洋学报》主编。他主编学报长达十八年，自己撰写的中英文论文有六十多篇。《南洋学报》从1941年创刊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不少中外著名学者为该刊撰文，这是许云樵对东南亚研究的一大贡献。

1941年初，许云樵辞离《星洲日报》社，转任中正中学高中部教师。1942年，日本侵占新加坡，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南洋学会的文件、学报及图书，密藏在住所天花板的暗格里。为了逃匿战祸于乱世，他改行与友人合营土产进出口生意。正如他在《学贾即事》一诗中所自述的：“浩劫余生僻地藏，烽火未熄少糇粮。笔耕贾祸非长策，货殖应堪隐伪装。”(4)

1945年9月，星马光复。许云樵即与友人合作创办“华侨出版社”，编辑出版《华侨生活》、《华侨经济》等周刊，以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等书籍。1946年，受聘于南洋书局，主编《南洋杂志》（月刊，后改为双月刊）和《马来亚少年》（半月刊）。

1949年，许云樵辞去南洋书局职务，与友人合资创办“新加坡印铁厂”。此为星马战后新兴工业之一，但由于人事关系，加以经营不善，结果亏损歇业，数年积蓄尽付东流。其时，他曾为《南洋年鉴》撰写《华侨篇》，约四十万字。

1957年，许云樵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之聘，任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六年后，任满离职，自办“东南亚研究所”，并出版所刊《东南亚研究》，积极培养新一代学者。在南洋大学执教期间，曾于

1959年率领该校史地系毕业生赴印度进行旅行考察，受到印度总统波罗刹博士和总理尼赫鲁的接见，回新加坡后著有《天竺散记》一书。

1964年，许云樵应聘任新加坡义安学院院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还负责编辑院刊。1968年因车祸，折股断腕，而义安学院又迁址改办为工艺学院，他遂宣告退休，时年六十三岁。1970年春伤愈，应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之约，汇辑《清实录》中有关南洋的史料，加以注释并编索引。由于日夜伏案，年迈力衰之躯不胜负担，以致左眼失明（经手术后略有好转），耳聋重听，终于不支而长卧病床。他平生酷爱图书，节衣缩食，购置中外图书三万多册，其中以东南亚文献为多。他曾选择其中有关南洋的书籍，写出书评，题为《南洋文献叙录长编》，为研究东南亚者提供方便。晚年贫病交迫，得不到应有的照顾，面对重利轻义的社会，只能自叹“读破十万卷，不及贩夫优”，[(5)] 终于忍痛出卖其全部藏书。

许云樵长期从事南洋史地研究，著作甚丰，蜚声国际。1940年后，曾被选为英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副会长，历数届；又连任中国学会副会长。世界上有关东南亚史地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多邀请他参加。

许云樵不仅为南洋问题研究专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中文根底深厚，擅诗文，有《希夷室诗文集》、《文心雕虫集》等行世。他精通英文，能用英文写作，也掌握泰文和马来文。他于中医药物方面也颇有研究，编有《传统中药展览目录》（中英文对照）、《马来验方新编》等，新加坡中医学术研究院聘他为终身名誉顾问。

许云樵的主要著作除《北大年史》外，还有《马来纪年》、《南洋史》（上册）、《马来亚史》（上下册）、《马来亚近代史》等。

1981年11月17日，许云樵在新加坡病故。

(1) 《北大年史》正式出版日期为1946年12月。许云樵在著者附言中声明："本书脱稿于1940年冬，后以风云日急，未能付梓。星洲陷落，余挟稿迁避者再……迨日寇屈伏，乃取出整理补充之。"

(2) 许云樵：《北大年史·自序》，［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6年12月版。

(3) 许云樵译注：《暹罗王郑昭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2月初版；1955年3月，中华书局用商务原版重印。

(4) 魏维贤主编：《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合刊，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年版，第5页。

(5) 许云樵：《庚戌左目眇就医有感》，转引自《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合刊，第9页。

续范亭

田为本

续范亭，名培模，字范亭，号恕人。1893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生。山西崞县西社村（今划归定襄县）人。父亲务农。续范亭高小毕业后，于1910年春入太原陆军小学，随即在族兄续西峰[(1)]的引导下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山西新军响应革命，组成军政府，陆军小学学生编为学生军；11月初，续范亭随续西峰回乡组织忻（州）代（州）宁（武）公团，训练人马，计划进攻大同。续范亭先任公团总部亲随副官，负责传布命令和联络事项；后任远征队队长。11月29日，他奉续西峰密令，率领一支仅由二十人组成的队伍，从繁峙间道奇袭大同，在城内同盟会会员策应配合下攻入城关，从而成为公团进占这座重镇的先锋。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任山西都督，于1912年将忻代宁公团强行解散，并对续范亭加以排斥，续遂赴直隶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继续学习军事。1914年，他因参加倒袁（世凯）反阎（锡山）活动，遭到通缉，乃离校去陕西华阴县，与陕西胡景翼、山西续西峰、河北孙岳、甘肃邓宝珊等聚会于华山下的杨家花园，共同策划讨袁，时人称为“华山聚义”[(2)]。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华山聚义”的成员组织了护国队伍，从陕西夜渡黄河攻袭山西，一度攻下荣河、猗氏、万泉等县；但进军到虞乡时遭到晋军的夜袭，队伍失散，续范亭被迫进入中条山中，历尽艰辛，后暗渡黄河，重返陕西。6月，袁世凯死后，续范亭随续西峰到北京活动，后进入直隶漕河军官教导团，一面攻读，一面任教。其间曾返乡探亲，因又遭到阎锡山通缉，再度奔赴陕西。1918年，陕西靖国军兴起，胡景翼在三原举义，续范亭参加靖国

军，随胡与北洋皖系党羽陈树藩、刘镇华部队作战，也曾在杨虎城所在部队襄赞军事，并为胡景翼和孙岳两部奔走于北京、保定、天津、洛阳之间，进行对外联络工作。

1920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对奉系作战，直系军阀力图分化与收编靖国军。靖国军也因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又受到入陕直军的威胁，各部均图自谋出路。1921年胡景翼部接受改编并进驻京汉线。此后，续范亭就到京、津及察、绥、冀、鲁各地，联络能够参与反北洋军阀的地方武装，准备待机再起。1922年他因四处奔波，积劳吐血，在北京养病年余。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各部组成国民联军，续范亭出任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次年任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1926年4月奉军入据北京后，续范亭率部退守南口。力主攻晋，自任前锋，一度攻克广灵、灵丘，后因敌众己寡，援军不至，遂率部撤至五原。9月，冯玉祥自苏联归来，在五原誓师。续率部与冯部会合援陕。其后因宿疾复发，在三原休养年余。1927年，续在西安受冯玉祥委托担任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次年回乡探亲，继则闲居北京几年。1932年，他应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之约，与邓宝珊共赴兰州。续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参谋长，后改任中将总参议。

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步步进逼，华北又面临沦亡的危机，时任第一军中将总参议的续范亭悲愤异常，起而奔走呼号。1935年11月初，他从兰州到西安找杨虎城面谈抗日救国问题，旋即经太原、北平赴南京。恰值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续范亭与原靖国军老友于右任共向国民党中央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但事与愿违，蒋介石拒不“纳谏”，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方针[(3)]。续范亭在极度苦闷中谒中山陵，并赋《哭陵》一诗，抒发自己的悲愤：“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4)] 他日夜忧国忧民，遂萌绝念，决以一死惊醒国人，竟于12月26日下午5时在中山陵祭堂前用短剑剖腹自杀，幸被汽车司机及时发现遇救。自

杀前他曾写下一份《告民众书》，有“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5]等语。他还留下了五首绝命诗，其一是：“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意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6]他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慌忙封锁消息，但消息毕竟还是传开了，许多友人和爱国人士纷纷来电来函慰问。在他住院期间，张学良亲至访晤，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等都派代表前来探望。旅日侨胞也写信给他，表示对他的钦敬。

续范亭自戕遇救，伤愈出院后，往苏州、杭州、无锡等地去疗养。在此期间，他已决心与国民党决裂，但今后方向是什么？他曾表示：“今后或出家为僧，或投奔共产党。”他曾拜访过苏州报国寺的印光大师，一度热心研究佛学，但结果是从中寻不到救国之途。他在杭州西湖疗养期间，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由此而接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对于如何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夙愿，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之后，绥东抗战的消息传来，他心情激动，赋诗以明志：“故人血战风沙里，愧踱苏堤第一桥。”他在健康情况逐渐好转后，得杨虎城之邀，于1936年11月经郑州、洛阳前往大西北。

12月初，续范亭来到西安，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争取冯玉祥旧属冯钦哉部和进行联络工作。这时他遇到老友南汉宸，通过南的介绍，拜访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过这些接触，他受到很大的启发，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有了深刻的领会。1937年初，他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回到阔别多年的山西，一到太原，就和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团结抗日工作。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他在山西威望很高，阎锡山任命他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谋，借以号召晋绥地区的上层人士。9月，续范亭亲往平型关前线视察，曾当着阎锡山的面指责其亲信郭宗汾避战观战，违反了与八路军分兵合击的作战计划。

续范亭从平型关回到太原前，山西各阶层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已经成立，公推他为主任委员。他尽管病体羸弱，仍以炽烈的热情与共产党合作，全力以赴地策划发展动委会组织，建立动委会直辖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动委会武装在敌后蓬勃发展，活跃于晋西北二十九个县，全在阎锡山意料之外。阎对此惊恐不安，下令动委会只准在岢岚、五寨、神池、河曲、保德五县活动，并不得发展抗日武装；已有的十个支队改编为三个支队，在岢岚成立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任命续范亭为保安司令。

1939年初，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召集秋林会议，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续范亭在会上朗读孙中山遗嘱，义正词严地批驳阎锡山及其同伙的荒谬论调。阎锡山曾对其核心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的骨干分子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秋林会议以后，续范亭绕道延安返回晋西北，专程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阎锡山的反共阴谋和晋西北抗战情况。此后，山西局势急遽逆转。3月，阎锡山悍然下令解散动委会，取消第二区保安司令部，原辖各支队改为陆军暂编第一师，续范亭改任师长，阎锡山还派自己的亲信担任参谋长，并取消了续部的供应基地。但续范亭坚毅地说：“只要我续范亭不死，我还是要抗战到底！”[(7)] 当年秋，阎锡山电令续范亭攻打日军占领的五寨县城。这时续范亭身边仅有一营兵力，而五寨县城内却盘踞着大批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但他在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民支持下以寡敌众，用两个连迅即歼灭了从五寨县城出动的日本侵略军。

当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十二月政变”。其部署是先令其旧军在晋西、晋东南攻打新军，与此同时，又在晋西北令其骑兵司令赵承绶召集各地旧军，举行临县军事会议策划反共。赵承绶是续范亭二十多年的老友，认为续这样的老国民党员不会得到共产党的真正信任，仍让续参加了这次十分机密的会议。会上赵承绶传达了阎锡山的命令：要在“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拖死八路军”的方针

下，进一步消灭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彭绍辉部，消灭地方抗日武装，控制晋西北，把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续范亭在会上不动声色，会中即借口外出，策马飞奔岚县向中共晋西北边区党委作了详尽报告。

彭绍辉三五八旅当时比较分散，不足以应付阎锡山的进攻。续范亭当即决定把自己的暂一师开上去阻击阎军，帮助三五八旅布置集结。暂一师、三五八旅和决死四纵队抢先占领临县、方山、岚县交界处的军事要地赤尖岭，并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了作战方案，成立了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临时总指挥。此后，原在晋西南的八路军陈（士榘）林（枫）支队和决死二纵队、政卫二〇九旅也都向赤尖岭靠拢。从1940年元旦开始，在续范亭与各方协同指挥下，新军英勇作战，终于在1月14日攻克赵承绶司令部所在地临县。这次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晋东南和中条山地区八路军各部的战斗，取得了粉碎阎锡山十二月政变、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大胜利。

临县战役胜利结束后，1月16日，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续范亭连任总指挥。不久，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部队自冀中返回，和新军胜利会师，巩固和发展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2月，晋西北边区行政公署在兴县成立，续范亭被推选为行署主任，并被延安总部任命为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山西新军也正式编入八路军的战斗行列。

1941年5月，续范亭因戎马辛劳，痼疾复发，病情严重，从晋西北转到延安治疗休养，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怀照顾。从此，续范亭长期生活在延安，经历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党的“七大”。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自己从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化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他经过几十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革命道路。他参加了延安的怀安诗社，经常与朱德、叶剑英及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互相唱和，写下了许多诗篇，后结集为《延水集》和《南泥杂咏》。

1942年和1945年，续范亭先后两次被晋绥边区参议会推选为行署主任，1945年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在这期间他因疾病缠身，已不能重返前线，实地担任日常领导工作。不过，他对晋绥边区的工作和人民生活仍时时关怀，每当形势变化的时刻，虽伏枕咯血，犹振笔疾书，发表了许多战斗檄文。1944年8月，他在病床上口述了著名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揭露阎锡山祸国殃民、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并晓以大义，劝其悬崖勒马。1946年11月，胡宗南将要进攻陕甘宁边区时，续范亭从延安转移到晋绥边区的临县。1947年1月，他的病势不断恶化，但看到阎锡山伙同胡宗南进犯解放区，仍愤然发表了《号召山西人民推翻万恶无耻军阀阎锡山》的战斗新篇章。他晚年的文章后结集为《诤声》[(8)]。

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临县逝世。病危之际，他致书中共中央，申请入党。13日，中共中央复电宣布：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续范亭的逝世，晋绥边区党政军民同声哀悼；毛泽东还亲书挽词，盛赞续范亭“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

---

(1) 续西峰，原名桐溪，是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写信申请加盟的早期会员之一。“华山聚义”之际，他系广东军政府任命的陕西省划界议和专使，并曾亲赴日本面见孙中山，商讨革命行动。

(2) 张淑琳：《续西峰先生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

(3) 黄既：《回忆续范亭同志》，《中国青年》1948年12月号。

(4) 南新宙：《续范亭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

(5) 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12月30日。

(6) 《东方杂志》第33卷第3号，1936年2月。

(7) 南新宙：《抗战初期的续范亭同志》，《红旗飘飘》第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8) 续范亭1921年至1936年的诗结集为《湖山集》，1941年至1947年的诗结集为《延水集》和《南泥杂咏》，1943年至1947年的文章结集为《诤声》，均辑入《续范亭诗文集》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宣铁吾

朱佩禧

宣铁吾，字惕我，又名蒋石如。1897年10月13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诸暨枫桥杜家坞村[(1)]。家境清寒，青少年时代就自谋出路，在杭州、绍兴做排字工人，期间曾任浙江省绍兴“国耻图雪会”干事、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执行委员长、杭州青年协作会委员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与陈兆龙、宣中华等共产党人过从甚密，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广州，入陆海军大元帅府卫士队任卫士。1924年1月由沈定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倪忧天（杭州文化印书局经理）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春由胡公冕、徐树桐保荐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4月，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三队，成为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毕业后，宣铁吾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中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东征和北伐。

1927年秋，蒋介石下野后，他也随之离开军职，在青岛市土地局担任第四科科长。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后，又从青岛回南京。1928年1月，蒋介石在杭州办军官训练班，收容黄埔军校第六、七期学生进行训练，宣铁吾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同年冬，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上校科长、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宣铁吾任八十八师参谋长，参加对日作战，并在战后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3月，宣铁吾与康泽、邓文仪等发起组织复兴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1934年，蒋介石提升其为侍从室参谋、少将侍卫长等职。1934年在浙闽边与红军作战，获国民政府颁给的一等三级国花奖章。同年，宣铁吾由侍由室调任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1935年，宣铁吾接俞济时任浙江保安处处长，并一直任职至1943年。这一期间，宣除本职外，还兼杭州戒严司令、浙江防守司

令、金（华）兰（溪）警备司令、浙江省保安司令、绍兴戒严司令、浙江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浙江省兵役司令、陆军第十预备师师长等职务[(2)]。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统治的手段也比较高明，设立了一整套组织体系。宣铁吾在浙江保安处长任上，对境内的中共武装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在政治方面，分批分期举办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以充实其所谓的“革命骨干力量”，如举办以加强“民众自卫”为中心的保甲人员训练班、保甲通讯训练班，并在各县成立训练所。宣铁吾提出“管教为手段，以自卫为中心，以养为目的”的基层政治训练纲领，并由此在地方党政行政机构中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情报网。三青团浙江支团成立后，为掌握知识分子和青年，宣铁吾又组织小学校长、图书馆长、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在军事方面，宣铁吾积极扩充编练地方团队，以加强其所谓的“清匪安民的地方实力”，在1935年编成十五个直属的保安大队。同时通过在职军官训练班、军训教官训练班、铁卫总队训练班等短期训练班，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宣铁吾成为当时浙江省内强有力的实权人物。1939年春，宣铁吾任第九十一军军长兼钱塘江南岸守备指挥官，担任钱塘江南岸、萧山、绍兴及富春江南岸一带的防御任务。

由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查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机要助理林世良的走私案，引起孔祥熙的不满。1943年7月，蒋介石调宣铁吾接替戴笠，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宣上任后，对缉私处进行精简，排斥军统人员，撤销戴笠所派的各省缉私处长。至1945年1月更提出裁撤缉私署，将其划归海关、税务、盐务等相关部门，获行政院的批准。宣铁吾奉调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受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任命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上海经历抗战的变乱，秩序破坏严重，物价高涨，失业者充斥社会，如何维持治安是宣铁吾上任后的一大难题。三个多月后，宣铁吾坦承“中国自从开始办理警察，一直到现在，可以说：

没有办好过”，其在上海“所应急切从事的工作”“以防范和逮捕盗匪为首要”[3]。到任后一个月盗劫案由一百四十余件降至八十余件，后反弹至百余件，说明上海形势的复杂以及宣铁吾的决心，而对著名资本家荣德生案的解决更显示了其能力和手腕[4]。此外，宣铁吾在上海“禁绝烟毒”，发布禁烟令，雷厉风行。

为防止不良分子危害社会，加强警员效率和保障治安，宣铁吾提出确保沪郊治安的七点办法[5]，招收优秀青年进警局以提高警察队伍素质，实施“警管区”制，并在《新闻报》、《申报》上发文进行宣传[6]。所谓的“警管区”实际上指的是每一个警察负责一定区域，该警察主要职责是经常前往所辖各户访问一切，包括调查户口、市民职业等，对受徒刑者之执行或宣告缓刑者、素行不正者、收入不敷者、来往顾客人等加以查察。但“警管区”制度引起了严景耀、萧思明、邱去耳和傅雷等民主人士在报纸上的言论抨击，认为这是妨碍人民居住自由与身体安全的权利。为了缓和舆论压力和收复民心，1946年6月，宣铁吾先宣布解除自敌伪时期每晚戒严的禁令，不久又宣布中止了“警管区”制。当时上海各报对这位警察局长毁誉不一[7]。可是，蒋介石对于宣铁吾十分放心，尽管宣铁吾多次提出辞职不干，蒋介石不仅电话安慰，而且在1946年5月令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以及中训团上海分团主任，宣成为炙手可热的实力派人物[8]。

宣铁吾在上海还进行肃清汉奸活动，比较著名的就是上海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泽汉奸案”。宣铁吾以上海新新公司职工检举总经理李泽为契机，借“伸张正义”之名将戴笠力图包庇的李泽逮捕。

由于物价飞涨，人民难以维持生计，上海学潮、工潮涌动，宣铁吾强行镇压，拘捕不少学生、工人，并遵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六条应对风潮，分别处置：关于学生方面，由教育局负责处理；工人方面，由社会局负责处理；治安机关则予助力，如有奸宄从中策动，决予逮捕法办[9]。1947年6月，宣铁吾专任淞沪警备部司令，俞叔平任上海警察局长。同月，上海五千名大中学生发动“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更是逮捕学生五十余名，引起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最终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不得不宣布释放学生。1948年1月，又镇压同济大学学生发起的争民主反迫害的“一二九”运动，拘捕学生一百多名，打伤学生六十多名。而对工潮的镇压终于在1948年2月引发生“申九惨案”，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出动一千多名军警，使用装甲车、催泪弹，冲入厂内，强迫工人离厂，打死工人三名，打伤百余人，逮捕二百多人。

针对上海物价飞涨、投机现象严重和囤积盛行的现状，宣铁吾向市长吴国桢提出应对措施，要求对粮食、纱布实行公营，避免中间商剥削，以杜绝垄断囤积，分区普遍检查囤积货物，发布经济戡乱办法等[10]。宣铁吾还设立监察团，自任团长。监察团的查账人员到一些银行、钱庄进行调查，要求他们交出账册，如拒绝交出账簿者，可予拘办[11]。宣铁吾提出“专打老虎，不拍苍蝇”，意思是对付那些非法的商人，不苛扰正当的商人。但是，宣铁吾以警告投机商人的方式，来设法抑平物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2]。

1948年，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上海市经济督导委员，希望在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限制住物价，从而促使全国各地物价趋于稳定。宣铁吾对蒋经国的工作积极配合，先后查办了一些重大案件，如以“非法囤积稻米”的罪名逮捕杜月笙的总管、上海豆米同业公会会长万墨林，以“以扰乱上海市场经济秩序罪”将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投入狱中[13]，将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家将”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实行逮捕，枪决敲诈勒索、恶名昭著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科长张亚民及第六稽查队长戚再玉，拘讯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但因宋美龄的干预，对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查封不了了之。最终导致蒋经国“打虎”行动草草结束，沦为“打虎不成，只打了几只苍蝇”的结局。万墨林交保就医，入狱的“杨家将”、杜维屏等最后都被保释出来，上海物价重新飞涨，限价政策失败，宣铁吾也因得罪了孔、

宋二家族地位不保，当时的报纸风传宣铁吾将离职的消息[14]。

1948年12月1日，宣铁吾离开淞沪警备司令（由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部下陈大庆接任，直至1949年5月22日上海解放），调防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宣未就职。1949年2月，宣铁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同年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陆军中将。

解放前夕，宣铁吾移居香港。1960年，他应蒋经国、陈诚之邀去台湾，任南山工商学校常务董事。1964年2月6日，病逝于台湾。台湾出版有《黄埔一期宣铁吾将军纪念集》等。

主要参考资料

徐范：《宣铁吾生平事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诸暨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诸暨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版。

金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金华》，《金华文史资料》第16辑，2005年版。

《淞沪警备司令部宣铁吾给行政院物资局证明书证明马保和等160是物资局职员，美国经会总署上海署长乔治·罗易（George St. Louis）给警备司令陈大庆关于戒严发新通行证等》（1947年11月—1949年5月），案卷号Q127—8—294，上海市档案馆藏。

王春英：《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

(1) 一说1896年生。

(2) 《陆军中将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氏履历》，《美》第11期，1948年

2月。

(3) 《申报元旦增刊》，《申报》1946年1月1日。

(4) 《警察局宣局长解释设置“警管区”制》，《申报》1946年5月12日。

(5) 《确保沪郊各县治安，举行十县警备会议》，《申报》1947年5月10日。

(6) 《论警管区与住居自由；反对访问争取民主》，D2—0—400—11，1946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7) 《宣铁吾收复民心》，《海燕》第15期，1946年6月。

(8) 《宣警局长辞职不准，将兼任警备司令》，《申报》1946年5月25日。

(9) 《奸宄策动阴谋　决予逮捕法办》，《申报》1947年5月10日。

(10) 《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全力侦查不法商人》、《宣司令向吴市长提意见书》，分别见《申报》1947年10月17日、10月15日。

(11) 《专打老虎，不拍苍蝇——监察团工作人员会议，宣团长指示两项原则》，《申报》1947年2月21日。

(12) 《宣司令昨发表谈话，警告沪投机商人，警政部经济检察人员已出动工作》，《申报》1947年4月6日。

(13) 郑重为著，沈立行整理：《宣铁吾同杜月笙上海斗法的内情点滴》，《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201页。

(14) 《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关于美国海军参赞斯莱登函为据悉宣铁吾另有新命敬布贺忱并对已往协助之处表示感谢案》（1948年9月20日），卷宗号Q127—8—79，上海市档案馆藏。

薛笃弼

张天政　王韦娟

薛笃弼，字子良，山西解县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其父薛士选为清代举人，薛笃弼自幼便深受其父的熏陶和影响。早年就读于太原的山西法政学校，并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后，响应号召与同在山西法政学校学习的同学傅作义在太原河东参加起义。不久薛笃弼被任命为山西河津县地方审判厅审判官，兼革命机关报《河东日报》社社长。《河东日报》以宣传革命、提倡民主为宗旨，反对官僚贪污腐化，反对不良的封建习俗和封建礼教，而且还揭露与批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的种种弊端。薛笃弼作为社长，不畏强权，公然对当时新官员中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揭露。他还公开批评河东民政长张士秀让女儿去学校时乘坐轿车并带卫士的腐化行为，揭露过张士秀的旧识芮城县知事郭朗清的贪污行为。1912年8月，法政学校复课，薛笃弼回到学校继续学习。适值校长张端创办《山西法政经济日报》，薛笃弼被任命为总编辑。他“白天上课，晚间到报社工作。日报公开披露了阎锡山自独霸山西军政大权后，与袁世凯同恶相济、危害共和的种种罪恶事实，在社会上反响很大”[(1)]。但发刊不久就遭到阎锡山的遏制，阎派人摧毁了报馆。

此后，薛笃弼前往日本留学两年，专攻法政。学成归来后追随冯玉祥，1914年出任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得冯的赏识，此后他便跟随冯玉祥，成为冯的高级幕僚和辅弼。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薛笃弼先任军警联合督察处长，“九月，获三等嘉禾章”；1919年7月，任常德县知事，“1920年7月，获二等嘉禾章”。1921年，冯玉祥调驻陕西，薛笃弼先后出任咸阳县长、长安县长。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下，军阀混战，强权横行，民不聊生。薛笃弼出任县长期间，明察秋毫，为民着想，深得百姓拥戴，

被誉为“薛青天”。冯玉祥督陕初期，陕西“财政既失统一，军费无法维持，及余就职，因荐薛笃弼为财政厅长，从事整顿”。首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当时陕西因滥发纸币，纸币价格贬值，每元仅值铜元二十枚。于是冯玉祥命薛笃弼一面准备现金，一面收买纸币，且令清理银行机构，纸币的价格逐渐增高，“不期月间，竟涨至六折以上”。

1923年1月，薛笃弼出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3月，任蒙疆善后委员会委员；5月，暂行兼代国务院秘书长；7月，兼代京师税务监督；11月，“查京师平市官钱局滥发铜元票案”，对犯案官员依法进行惩治[(2)]。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薛笃弼在北京政府任京兆尹，即北京地方行政长官。在任京兆尹期间，薛笃弼召集二十县县长在京兆公署举行“平民教育讲习会”；亲赴各地募资并带头捐款，指挥修复了北京钟鼓楼并将鼓楼改为“明耻楼”。还在楼上陈列列强压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件以及有关资料和照片，以激发广大国人的爱国情怀，深为各界人士所推崇。他还将安定门外的地坛开辟为“京兆公园”，建立“五族亭”象征五族共和，以激励各族人民加强团结，振兴中华。薛笃弼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注意发动群众，检举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以解民困。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每周一召集公务员，检查工作；而且编写“爱民歌”勉励大家爱国守法，戒烟戒赌，扭转社会风气[(3)]。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任薛笃弼为甘肃省省长[(4)]，辅佐刘郁芬（甘肃军务督办）治理甘肃，该时期他为国民军筹措军费等事出力不少。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誓师，将其军队改名国民联军参加北伐战争，薛笃弼被任命为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随冯玉祥军队入河南，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冯玉祥在督豫期间，知人善用，又“荐薛笃弼为财政厅长，令其着手整顿，力除积弊”[(5)]。当时的河南财政赤字严重，军费无着落，历年积亏严重。薛笃弼任职期间不但整顿金融，限制纸币的流通量，而且还创办财政养成所，训练财政专门人员。在任河南财政厅长期间，薛笃弼还兼任河南省政府委员以及国民党开封政治分会委员。

国民革命失败后，建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应蒋介石之请，冯玉祥向蒋推荐薛笃弼出任内政部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废除旧历运动，呼吁推行国历。5月7日，薛笃弼向国民政府提交《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认为中国要与世界接轨，必须改革旧有阴阳历。他强调："非废除旧历无以普用国历，而厉行国历，非详订办法，将各界关于利用阴历之习惯一律改正，并于预制历书之先，将办法提前公布，切实宣传，实不足收推行尽利之效。"[(6)] 不但如此，内政部还草拟了《普用国历办法八条》。从1928年底开始，国民政府按照以上原则和办法，开展了大规模的废除旧历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任内政部长期间，薛笃弼还严厉打击一切宗教迷信活动，查禁道院及悟善社等迷信机关。他在致国民政府秘书处的复函中说，道院、同善社、悟善社等机关"查事涉宣传迷信，壅蔽民智，阻碍进化，自应查禁，以遏乱源"[(7)]。他要求将查禁的迷信机关财产用于慈善公益事业。

另外，曾有传闻薛笃弼将有寺庙改办学校的提案，遭到了佛教会的抗议，薛笃弼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来电所称改僧寺为学校及薄于佛教云云，此等传闻殊属离奇。笃弼鉴于吾国国势之不振，以为信仰佛教故属国民自由，唯不应仅为僧侣博衣食之资，及为少数信徒精神所寄托，应将我佛博爱平等坚苦卓绝之精神发扬光大，使社会人类均得受其指导，蒙其利益，即具有感化人心，转移风气，改良社会，改造国家之效用，方不愧为真正佛教之信徒。"薛笃弼非常欣赏基督教舍身救世之精神，在所到之处或设学校，或设医院，扶助弱小民族，他认为佛教缺乏此种为民的救世精神。他对佛教者提出了两点希望：首先是整顿佛教，改良佛教之责任，"以拯救中国民族，挽回中国国权，免除远东战祸，促进世界和平为己任"[(8)]。其次希望佛教不应仅为消极之信仰，应努力做积极之工作，例如兴办各种学校、平民图书馆、平民医院、平民工场等，这样才能行我佛救济众生之旨，有益于国计民生。

1928年10月，薛笃弼出任卫生部长；1929年1月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29年，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案”引发了第二次中西医之争。2月，留日西医余云岫在中央卫生会议上提出《废除旧医以扫医学卫生障碍案》，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9)]。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医界和全国各界的强烈抗责，还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针对中西医之争，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一贯主张中西医并进，他明确表态：“我深信，对中医药之限制，并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本良心主张，对中医药这一宝贵国粹，断不能偏视。”[(10)] 他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最终国民政府决定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这次中西医之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在薛笃弼的调和下，算是得到了妥善解决，挽救了中医的命运。

薛笃弼在南京政府中任职，同时也是冯系人物。当时冯玉祥掌握着西北的军权，为了能够扩大局面，加强其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通过薛笃弼向南京政府提出甘肃省分治案，以宁、青距离甘肃省省城太远，交通不便，不易发展为由提出新设宁夏、青海两行省的提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1928年9月5日举行的第153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提案[(11)]。这个方案将甘肃省所管辖的宁夏和青海两道从该省划出，分别设立宁夏省和青海省。在任内政部长和卫生部长期间，薛笃弼被派赴陕西、甘肃视察灾情。1929年3月，薛笃弼到甘肃平凉视察灾情，他在致刘郁芬电中说：“平凉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挖掘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甘肃全省灾区殆遍，而兰山、渭川、西宁、宁夏各区，痛苦较平凉尤甚。”同年12月，薛笃弼又作为卫生部长来甘肃检查灾情，拨款举办“以工贷赈”[(12)]。

薛笃弼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工作认真，事必躬亲，这一时期南京政府的内政也起色不少。蒋介石曾亲自致电薛笃弼：“迩闻内政日有起色，不胜欣慰。”[(13)] 从1929年开始，薛笃弼当选为国民党第三、

四、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坚持清廉自守，其同学傅作义和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都曾高度评价他是一位奉公守法、两袖清风的好官。他常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14] 薛笃弼坚决反对其父曾因其无子而要求薛笃弼纳妾，虽然薛笃弼非常孝顺，但在此事上仍坚持原则，反对违背男女平等的婚姻，拒绝纳妾。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全国，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各派军阀在地盘分配、军队派遣等方面发生矛盾，于是冯、阎、桂联合起来同蒋介石进行争斗。在冯反蒋后，作为冯玉祥的幕僚和辅弼，薛笃弼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南京政府的通缉。于是他暂时逃亡日本，后来又秘密回到山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薛笃弼从山西回到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对于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下令采取不抵抗政策，薛笃弼十分愤慨，他坚决主张抵抗。1933年1月，薛笃弼辞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之职，在上海开设法律事务所，伸张正义，不畏权势，为无辜者和爱国青年保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及汪伪军大肆地拉拢甚至迫害政要人物。薛笃弼坚决不愿投敌卖国，他改名为"许义生"（取其音近薛先生），装扮成普通商人模样，乘船到达香港。后又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1941年7月出任行政院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抗战期间，薛笃弼提出水利建设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1944年1月获"二等景星勋章"[15]。1946年6月任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7年水利委员会改为水利部，隶属于行政院，仍由薛笃弼任部长。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水利设施、水利机构的建设，并且注重培养水利建设人才，多次组织召开中国水利学会。到1948年12月因行政院改组而辞职，继而被任命为南京政府国策顾问。

全国解放在即，国民政府官员纷纷撤离。薛笃弼辞去了职务，到上海当律师。1949年3月间，李宗仁曾专程到上海马斯南路（今上海思南路）薛家看望，拟邀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遭到薛笃弼之婉

辞。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又亲自来薛家邀请薛笃弼同往台湾，又遭薛笃弼的婉拒。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团结党内外一切爱国人士，薛笃弼作为一名原国民党政府资深的政界人士，在解放前夕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是爱国人士的典型代表。在1954年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外人士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了薛笃弼。1955年，薛笃弼参加了民革并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席，后又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56年1月，薛笃弼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1956年1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薛笃弼作为特邀委员参加。开幕式结束聚餐时，薛笃弼被安排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同席。言谈中，薛笃弼谈及他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不胜愧疚。毛泽东亲切地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廉官吏，你的为政、处世和做人，我都深知。现在真是野有遗贤，埋没人才啊！"[16] 薛笃弼深受感动，他感谢党和毛主席的知遇之恩，表示今后愿为中国的发展事业继续尽绵薄之力。此后薛笃弼先后任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学会"理事、"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等职。

薛笃弼晚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坦陈己见。另外薛笃弼还著文宣传爱国思想，介绍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他根据自己的平生经历写了许多回忆性文章，例如回忆辛亥革命的《太原起义和河东光复的片段回忆》，根据自己做冯玉祥幕僚的经历写了《冯玉祥生平》。薛笃弼还积极参加促进祖国统一的活动，希望中国日益繁荣富强。

1973年7月9日，薛笃弼因病在上海逝世。

---

(1) 张博文：《薛笃弼先生二三事》，《沧桑》1998年第1期。

(2)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2页。

(3) 周山仁：《民国廉吏薛笃弼》，《发展导报》2004年8月17日。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第1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5) 冯玉祥著：《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6) 《内政部致国民政府呈》（1928年5月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7) 《内政部关于查禁道院及悟善社等迷信机关致国民政府秘书处复函》（1928年10月9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491页。

(8) 《内政部长薛笃弼致佛教会复函稿》（1928年4月18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1071—1072页。

(9) 金宝善：《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10) 茂清：《1929：中医药界大请愿》，见《文史精华》1997年第3期。

(11)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20页。

(13) 《蒋总司令致薛笃弼部长指示北伐成功之内政要务电——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98页。

(14) 周山仁：《民国廉吏薛笃弼》，《发展导报》2004年8月17日。

(15)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三册），第353页。

(16) 殷之俊：《毛泽东与薛笃弼》，《团结报》2002年6月8日。

薛觉先

张洁

薛觉先，原名作梅，别号平海，后改为平恺。觉先是他投身舞台后的艺名。广东顺德龙江人。1903年4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出生于香港。父亲薛恩甫是个秀才，早年曾充幕僚，后退居香港设堂讲学。

薛觉先的母亲喜爱粤剧，他从小经常跟母亲看戏，看后就咿哑学唱。还常常偷偷出门，站在戏院门边或爬上戏院窗口看戏。戏院的人逐渐熟识了这个“小戏迷”，遂不收门票放他进去。他对粤剧的兴趣，也就与日俱增。他十岁左右的时候，香港青年会的“青年话剧团”吸收他参加话剧演出，担任主要童角，是他最初尝试舞台生活。

薛觉先自幼随父读书，很勤奋。稍长入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学习。不久，父亲去世，家计无着落，只得退学谋生。初随人沿街卖药，后又受雇于九龙英商经营的绍昌皮厂，寄人篱下，备受折磨。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薛觉先十六岁，受到爱国热潮的影响，用“佛岸少年”的笔名向香港报刊投稿，宣传反日救国。他参加了广州、香港的反帝爱国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讲演，遭到了香港英国当局拘捕，数日后获释。这时，他认识到爱国教育的重要，更感到失学的痛苦，就和几个青年朋友在香港开设了一所“平民进化学校”，以帮助失学青年，自任教师，讲授国语。

1921年，薛觉先十八岁的时候，通过姐夫新少华（粤剧演员）的关系，进入香港“环球乐”粤剧团学艺，很有收获。后跟随著名演员朱次伯上台跑龙套。当年，“环球乐”每次演出之前，照例必先演一出“文明新戏”。自此，演新戏的任务，多半落到薛的身上，而且多是由他

自编自演的。于是，薛觉先的名字很快为观众所熟悉了。后来，朱次伯在广州被刺身死，“环球乐”解体，薛被香港“人寿年”剧团聘为丑生，并被该团名演员千里驹收为徒弟。薛在唱腔、动作上模仿朱次伯，惟妙惟肖，使人看了不禁有朱次伯再生之感。不久，香港“梨园乐”剧团班主靓少华以重金聘他为正印丑生。他在该剧团日演丑生，夜演小生，大得观众好评。一时，誉满粤东和港澳。

那时，一个成名的艺人，往往受到黑社会分子的敲诈勒索，敲诈不遂，会遭到绑架、暗杀。朱次伯就是这样被暗害的。1925年，薛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为安全计，他避往上海，化名章非。不久，组织了一家“非非影片公司”，自任经理兼导演，与粤籍女演员唐雪卿合作，分任男女主角，拍成无声片《浪蝶》。薛在沪除从事银幕生活外，用很多时间观摩地方剧种，感到京剧的表演确乎精湛细腻，大有可学习的地方。他以票友的身份结识了许多京剧名艺人，吸收了不少京剧的表演艺术，对京剧的锣鼓、武工以及身段等，也有了深刻的领会，开始认识到粤剧有不少地方必须大加改革。曾说：“今日的戏剧艺术，应该跟着时代同行并进，那才不至落伍而至泯灭。”(1)

1927年，薛觉先回到广州、香港，重新登台。适值广州“大罗天”剧团改组，他被原班主敦请加入，将“大罗天”改名“觉先声”剧团，由他出任班主，从此，不再受雇于人了。这为他日后革新粤剧提供了方便。

薛主持“觉先声”剧团后，做大胆革新的尝试。首先破除了干扰演出的各种剧场恶习，如场内小贩叫卖，台上“饮场”、更换坐垫等。各种进出台上的闲杂人员，概予禁止。随后，在灯光布景、化装、服装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演唱方面，他试增加了些江浙剧的曲调，也吸取了一些京剧的唱腔，特别运用了京剧武场的技艺，开创了粤剧“北派”的场风。此外，在乐器上，他采用了小提琴和一些中低音乐器伴奏，吸收了京剧的锣鼓，使粤剧在音响方面起了显著的变化。

薛觉先的这些大胆改革和创新，使粤剧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面貌。于是粤剧界竞相仿效，一些年轻演员更是亦步亦趋，以学“薛派”、“薛腔”为荣。但这些改革也难免有些生搬硬套，损伤了粤剧优美传统的地方。后来薛觉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既融合了京剧的长处，又保持了粤剧的固有风格，从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薛觉先主持“觉先声”剧团时，是他的全盛时期，经常一身而扮各种角色，所谓声、色、艺皆有独到之处，因而被称为“粤剧伶王”，享有“万能”的声誉。当时英国伦敦“国际哲学科学艺术学会”曾聘他为会员。

薛觉先在带徒传艺上，善于启发、诱导，肯将自己的技艺和经验全部传授给徒弟，毫无保留，同时要求徒弟有所发展。由于他重视奖掖后进，经他手培养出不少的粤剧名演员，成为“薛腔”、“薛派”的发扬人和继承者。他还废除了旧剧界的所谓“师约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徒弟向师傅递交“卖身契”，终身受束缚和剥削。由于废除了这种制度，跟薛学艺的人，都心情舒畅，对他十分爱戴。

1934年，薛觉先带着全家迁居上海，重度银幕生活。他组织了一家“南方影片公司”，与“天一影片公司”合作，拍了一部粤语有声影片《白金龙》。这部影片是滑向庸俗和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作为一个旧中国的“伶人”，他还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戏剧商业化的局限。

薛觉先在上海时，各种筹款“义演”很多，他对各方要求从不推辞。有一次，有个租界捕房华籍侦探借辞强令他“义演”筹款，实为向他敲诈，他未及时承诺，竟被那些分子撒石灰伤了眼睛，就医八个多月，双目才逐渐复明。

1936年初，薛觉先离沪回港。当时，广州、香港、澳门一带的粤剧团已出现男女合班。薛也组成男女合班，重登舞台。不久，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邀他到新加坡演出，他组织了一个旅行剧团，于8月到

新加坡演出，随后在南洋一带巡回演出三个多月，场场满座，十分轰动。年底回港，除继续演出外，还与人合资经营“南粤影片公司”，自任经理兼编导。由于缺乏电影演员，他曾设立“演员训练所”，培养电影人才。影片公司筹备就绪后，拟将《西厢记》拍成电影，正从事配景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因而搁置下来。

抗战开始后，薛觉先在港选演爱国戏剧多种，宣传抗日。他在《咬碎寒关月》一剧中，自撰一首爱国歌，词曰：“歼彼凶仇，歼彼凶仇，纵苦辛与艰险，勿更忍受；要坚心来图强，共同努力来争斗；人人同心，快快救。国衰弱，本可羞，民赖国佑，国赖民厚，勿再束手，快来为国分忧，誓死奋斗，灭了日寇，快哉！我国锦绣河山，永保毓秀！”[(2)] 他还在港多次举行义演，将筹得之款汇回国内，支援抗日。

1941年冬，日军侵占香港，薛未及走避，1942年春节时，被威逼演出一个多月，而内心殊苦。5月初，薛佯称到澳门、广州湾（今湛江市）巡回演出，逃离香港。抵广州湾后，立即登报声明：因受日寇压迫，曾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回归祖国大陆。日本侵略军见报大怒，派便衣宪兵十余人潜入广州湾，将薛绑架，企图押解回港，幸赖有爱国船员帮助，化装成渔民转入内地。随即带领“觉先声”剧团赴广西玉林、梧州、贵县、桂林、柳州等地演出，所余除伙食开支外，全部捐献，支援抗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薛率“觉先声”剧团回到香港，由于操劳过度，健康大不如前，不得不处于半休息状态。

解放以后，1954年春，薛觉先由港回穗，离港时对友人说：“我要将三十多年所学的带回去，献给国家和人民。”[(3)]

薛回到广州后，深得政府和人民的信任，曾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

会副主席、广州粤剧工作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随着觉悟的提高，他对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有了新的认识。虽已年老体衰，仍深入农村，为工农兵群众演出，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1956年10月31日，薛觉先在广州一次演出中患脑溢血，不幸逝世。

---

(1) 觉先悼念集编撰委员会编：《觉先悼念集》，香港1957年版，第15页。

(2) 香港《公平报》1937年8月12日。

(3) 觉先悼念集编撰委员会编：《觉先悼念集》，香港1957年版，第70页，第15页。

薛明剑

朱复康

薛明剑，初名萼培，后改明剑，亦名民剑。江苏无锡人，1895年12月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生。其父薛华阁，民国初年曾充炮兵第二团军需长，属冷遹部。四弟薛萼果，后改名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

薛明剑六岁入塾读书，十三岁改入无锡东林学堂。1911年，报考上海复旦中学堂，因家乡水灾，无力负担学费辍学，乃在本乡德馨小学执教，旋升校长。10月，武昌起义，不久无锡光复。薛劝乡人破除迷信，倡导焚毁本乡寺庙偶像六处。后投入学生军，开赴镇江等地。

1912年，薛明剑入无锡县立单级师范传习所进修，毕业后改任寨门经正两等小学教员；旋任无锡县立第六高小教员、青城市立十一小学校长等职。1915年被选送去上海，入江苏省立体育传习所培训，翌年毕业后，任泰伯第一小学校长，并被推为县立教育研究会主任。他在这期间热心乡村教育，除担任学校教职外，常组织同事分赴各乡宣传普及教育，开展识字运动。他主张革新教育事业，学生在读书之外还应接受新事物，广泛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他经常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举行学生演讲会，率领学生参观展览会，组织学生春、秋季旅行，倡议组织童子军团，举办全县各校联合运动会、文艺观摩会等，颇为地方人士赞许。

1917年5月，黄炎培等人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薛明剑亦参与活动。他在江苏省教育会学习“职业教育”后，回无锡改就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教员，又被聘为育蚕试验所事务主任。翌年，薛主持筹建无锡县立公共体育场，10月建成，举办全县联合运动会，受到省教育

厅褒奖，并被委为体育场场长。体育场全年经费仅六百元，薛四处筹集，添办各种运动器材，并设宣讲、编辑、卫生、阅览四科，竭力提倡体育事业，唤起民众的重视。

1919年，薛明剑参加了无锡商会组织的实业研究会。他在一次会上独抒己见，谈了对振兴实业的看法，受到工业资本家荣德生的赏识。荣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欧美各国忙于战争，我国民族工业获得发展，其所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厂和申新纺织厂都大获其利，扩展生产；此时荣正在无锡筹建申新第三纺织厂，遂邀薛担任该厂总管。

申新三厂是抗战前荣氏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厂，拥有纱锭七万五千多枚，布机一千六百台，职工四千多人。虽然它的开办已在大战结束之后，遭到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市面上花贵纱贱，有些棉纺厂停工减产甚至倒闭，然而申新三厂生产业务仍然正常发展，年有盈余；在危机过去，市场好转的时候，则不断扩展，业务蒸蒸日上，在申新各厂中名列前茅。薛明剑在该厂任总管直至1937年，十八年间建树甚多。

早期我国纱厂的生产技术大都依赖外国工程师和工匠，申新三厂的发电机也是通过慎昌洋行向美国订购的，由美国工程师白朗和几个工匠到厂安装。这些人不但工资高，还要供给最优等的生活待遇，住特备的花园洋房，吃的面包要每天派专人从上海运到无锡，还备汽艇专供他们游览太湖之用。可是他们的技术并不高明，见到电机间房屋已建成，硬说不合规格，需要重建。与之辩论了几句，则蓄意刁难，提出种种条件。结果试车不灵，全厂势将延迟开工。薛明剑与荣德生商量，决定摆脱外国工匠，另请本国机匠，并访求精通电机的技术人员协助检修，找出毛病，得以顺利发电生产。从此，申新三厂生产技术完全由我国技术人员掌握。

申新三厂开工初期，沿袭旧式的工头制管理，全厂机工（技术工

人）及生产技术管理权，皆操在工头手中，检修保养不及时，工人操作困难，生产效率不高。薛明剑力主改革，取消工头制，录用工程师及新职员来掌握生产技术管理大权；并仿照外商纱厂办法，订立奖惩考核制度，实行科学管理。薛的这些改革，引起工头不满，他们煽动工人阻挠、对抗，酿成殴打、驱逐新职员的风潮。薛明剑不为所动，除严厉处置肇事工头外，对受蒙蔽工人则以谈判说服，风潮遂告平息。申新三厂率先取消工头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同业闻风响应。

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爆发江浙之战，奉军乘机南下，无锡地处沪宁铁路要冲，备受溃军劫掠，职工纷纷迁避四乡。薛明剑留厂与部分工人组织保卫团护厂，日夜轮值，以备不虞。时无锡城被围，电厂停顿，薛受地方公团委托，由申新三厂发电，藉以维护居户照明，有裨社会治安。

1926年，薛明剑东渡日本考察工厂经营管理，认为举办工人教育和生活福利事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很有好处，回厂后建议荣德生拨款筹办。申新三厂1930年成立“劳工自治区”，先办职工医院、消费合作社、女工养成所、职工子弟学校等做试验；以后逐步扩大，先后办单身女工宿舍、工人晨校和夜校、食堂、茶室、剧场、储蓄部、自治法庭以及“尊贤堂”、“功德祠”等等。薛明剑举办这些劳工教育和生活福利设施，其目的原为提高工人劳动生产效率，获取更大的利润；但在客观上则有利于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工人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些许改善，曾被报纸评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薛因办理“劳工自治区”颇著成效，被中华职业教育社委任为劳工服务部副部长。

薛明剑办事干练，甚为荣氏器重。1934年，上海申新纺织总公司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资金周转困难，几乎搁浅。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攫为“国有”。薛衔荣德生之命，利用同乡关系，要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反对，并联合各地同业及地方团体通电呼吁，申新幸免被吞并。次年，申新七厂因借汇丰银行押款到期，无力偿还，汇丰悍然将价值五百万元以上之全

部厂房机器，以二百二十五万元之低价拍卖给日商丰田纱厂，引起上海各界的震怒。在荣氏一筹莫展之下，薛明剑主张从激发群众爱国心理，来反对汇丰这一行径，遂动员组织申新数千职工集会游行，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号召工商界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并敦促国民政府予以制止。上海各界也给予声援，报纸连日揭载、谴责汇丰的非法行径。汇丰慑于中国民众力量之可畏，乃解除拍卖，签订押款转期合同，申新七厂赖以保全。

薛明剑在申新三厂任职的同时，以积蓄所得，陆续投资创办了一些化学工业、农业和家庭日用品工业的中小工厂。如大中国实业公司，制造药棉、纱布、羊毛织品和骆驼绒等；允利化学工业公司，生产石灰、砖瓦、纸麻筋等建筑材料，并制造碳酸钙、镁、电石、漂粉等；允华工业社种植除虫菊，制造灭蚊香。他还创立无锡蚕种制造场，自任场长。抗战前夕，又与陆费逵等合资组织上海保安实业公司，制造防毒面具及橡皮艇等备战用品。

1935年，薛明剑当选为江苏省国货工厂联合会理事长，曾赴青岛、济南、天津等地参观工厂，便道访冯玉祥于泰山，相互甚为敬慕。1937年7月抗战爆发，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设司令部于无锡，委薛任办事处处长。11月，冯调赴第六战区，又委薛为第六战区驻京沪线办事处处长，负责征集十万套军服及各项慰劳品运送前线。

无锡沦陷前夕，薛明剑携带亲属流亡至汉口，再溯江而至重庆。薛在渝筹设同心酿造厂制造酱油等，自任经理；又受荣氏委托，兼任由无锡迁川之公协、复兴两机器厂经理。该两厂共设分厂六处，代兵工厂制造地雷及迫击炮引信等军火，颇有成绩。薛还与无锡允利化学工业公司部分股东集资十万元，成立允利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陆续办起了机器、铁工、化工、面粉、碾米、纺纱、营造、锯木等二十个工厂。公司及诸厂采取合作经营方式，全体职员和大部分工人都有股份，盈利照分；各厂会计独立，盈亏自负。总公司投资于各厂，实

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企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产品展览会上，该公司生产的面粉和机械产品，共获得超等和特等奖状六张。当时重庆、桂林等地报刊曾介绍这种特殊经营方式。

薛明剑先于1936年当选为国民大会候补代表，1938年递补为正式代表，1941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大会上提出了请政府与人民彻底合作，加强团结，改进统制，安定物价等提案。1945年继续被选为第四届参政员。

抗战胜利后，薛明剑回到无锡，先后兴办允福面粉厂、允利米厂、允中冰厂、允丰堆栈、允新锯木厂、允固机器厂、允大化工厂、允友联橡胶厂、允慎粉厂等，职工总数约八百人。1946年10月，薛发起组织工业协会，被选为全国工业协会苏南分会第一任理事长。这期间，他又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立法委员。1948年被推为立法院粮政委员会召集人。

薛明剑对于家乡的改进和建设，颇为热心。1946年，以玉祁、礼社等二镇三乡为“自治实验乡”，从教育、实业、水利三方面着手，陆续建立了自治中学、钟瑞图书馆、文熹大礼堂、火力小电厂、芙蓉圩排水工程等，为当地乡民所称颂。

在从事工业和社会活动之外，薛明剑还经常利用空隙时间去学校教课，先后兼任无锡公益工商中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职。他曾主持出版过多种刊物：抗战前发刊《无锡杂志》，1935年参加出版《上海染纺织周刊》，1938年在重庆编印《江苏乡讯》，1941年担任民主建国会《国讯》发行人，1942年任《复苏月刊》发行人。抗战胜利后，又创“工业通讯社”于无锡。他还编印过有关家庭实用和农村副业的小丛书，如养鸡、养兔、养蛙、养鹌鹑、养鸽、种菰、种竹、种苧麻、种月季花等。

薛明剑除其四弟孙冶方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还有三个女儿参

加了新四军或地下党工作。他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颇多掩护，对被捕的革命者更多方营救；还曾购运纱布及医药用品送往解放区。1949年1月，无锡成立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薛被推为召集人之一，组织各厂护厂队伍，迎接解放。

1949年5月，无锡、上海次第解放，薛明剑应邀到上海，协助接收官僚资本工厂事宜。他在上海市工业协会上，提出了工商界对新形势应具的正确态度，并对如何解决原料、运输、工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6月，薛与在沪的前国民党“立法委员”萧觉天、葛敬恩等五十三人联名发表宣言，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诚心诚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通电系薛起草，发表于全国及海外报刊，影响较大。7月，薛以军属身份至北平、沈阳等地探亲，并晤见董必武等领导人。回无锡后被选为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薛移居上海，开设允一文具公司，并任衢州勤业蜡纸厂董事。1956年3月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编写和整理了《中国辞典目录提要》、《上海铁业史料》、《黎元洪年谱》等。

1980年4月12日，薛明剑在上海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薛明剑：《五五纪年》，1951年油印本；后刊于无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编《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6—8辑，1986年印行。

《无锡杂志》1946年复刊第1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薛禹言纂：《薛明剑先生事略》（复印本）。

薛岳

颜平

薛岳，又名仰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1896年12月17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其父在乡务农。薛岳幼年入塾就读，1907年春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同学有邓演达、叶挺等，三年后毕业。薛加入同盟会，随同朱执信等从事革命活动。1914年他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与邓铿等在广东进行反袁护国斗争。1915年春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1917年结业后又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与邓演达、张发奎等同学。

其时，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高举护法大旗，声讨北洋军阀。薛岳在保定军校学习一年，未等毕业，即回到广东参加粤军，任总司令部上尉参谋，随部前往福建漳州。1920年，邓铿奉孙中山之命创建粤军第一师，薛岳被邓铿遴选为机枪营营长。翌年5月，薛调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与叶挺、张发奎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陈炯明于6月16日凌晨发动叛乱，炮轰和围攻越秀楼总统府。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率部固守后门，一再击退叛军的进击。接着保卫宋庆龄突围，叶挺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机枪营殿后，护宋安全脱险。事后，薛率部分警卫战士到珠江永丰舰护卫孙中山。不久，薛奉孙中山之命，秘密前往广西梧州，请派兵驰援平叛。8月，薛被孙中山派往福州许崇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任中校参谋，旋任第八旅第十六团团长。1923年4月，东路讨贼军回师广东，薛岳率部在潮梅一带与敌作战；5月9日，在往揭阳途中遭敌军袭击，薛指挥全团参与攻夺言岭关战斗，勇猛顽强，回到广州后受到孙中山的接见与嘉奖。翌年，薛岳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旋任师参谋长。1925年9月，粤军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冯轶裴任师长，薛岳为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10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第二次东征。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薛岳调任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第一师先作为总预备队随总司令部北上，于9月上旬进抵江西战场，声援程潜第六军迎击孙传芳军主力卢香亭部。9月19日，第六军万余人得到南昌工人、学生起义的内应，攻入南昌城，但在孙军反扑下苦守三日而退出。次日第一师奉蒋介石之命协同第六军反攻再次入城，但孙传芳调集卢香亭、郑俊彦、邓如琢三部反扑。双方反复争夺，第六军与第一师合力苦战，反复冲锋七次不能击退敌军，伤亡过半，力竭而撤。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在战斗中畏敌后退而被撤职，薛岳英勇作战而任第一师代师长。10月，薛率第一师协同第六军攻占建昌、修水，继与由鄂入赣的李宗仁第七军取得联络，歼灭孙军陈调元部两个旅；11月初追击孙军过乐化，11月7日，南昌光复，江西底定，薛岳奉命率第一师入浙。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攻克杭州，薛岳率部首先入城。嗣后沿沪杭线挺进，经嘉兴到达上海市郊龙华。3月21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22日，薛岳应上海总工会代表的要求，不顾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反对与阻挠，率第一师昂然开入上海市区，做起义工人的后盾。

这时，蒋介石加紧反共“清党”步伐，3月末抵达上海后，对薛岳第一师支持上海工人的行动甚为不满，4月2日，勒令第一师解散政治部，并打算将第一师调离上海。薛岳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曾到中共中央机关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未予同意，而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4月5日，第一师被调离上海至苏州，薛岳被解职。

薛岳被蒋介石解职后，愤然南下广东，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关照，任广东新编第二师师长。9月，薛奉命率部前往揭阳、普宁地区，协同陈济棠、徐景唐部堵截南昌起义后南下的起义军，在汤坑激战后进占汕头。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夺取了李济深在广东的军政大权，薛岳归附张发奎，所部改编为第四军教导第一师。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发动广州起义，薛指挥所部参与

镇压。事后薛升任第四军副军长，与军长缪培南率部开往东江一带，不料被陈铭枢、黄绍竑两部东西夹击，损失近半。薛协同缪率余部两万人经江西北上，通电表示愿意继续参加北伐。1928年4月7日受蒋介石接见后，编入第一集团军序列。4月中旬，第四军攻击滕县，29日攻克界首后继续向济南挺进；“五三”惨案后折回界首，改道汶上、东平北渡黄河，于5月31日进驻德州。北伐奉张结束后，第四军编为第四师，蒋介石任命缪培南、朱晖日为正、副师长，对薛岳则不容。薛愤恨之余，到九龙闲居。不久，他参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反蒋活动，于1929年5月潜至广州，策动广西俞作柏反蒋。1930年2月，他回广东廉江，重归张发奎之第四军任职。但第四军6月在北流与蒋光鼐、蔡廷锴部交战中惨败，缩编为三个团，薛任第三十五团团长。接着在衡阳又遭蒋、蔡一部包围，苦战突围至广西桂林时，第四军仅剩五六百人。后得李宗仁桂军之补充，第四军才逐渐恢复建制，薛岳任第十师师长。10月在解围南宁之战中，薛负伤，战后改任柳州军校校长。1932年1月，他眼看国民党内部纷争不息，自己难以适应时局，便辞职去九龙再次赋闲。

正值壮年的战将薛岳，在蒋介石加紧招兵买马筹谋发动第五次“围剿”工农红军之时，被召至南京，任命为第五军军长。1933年10月，薛岳率部至南昌，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继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1934年1月又改任第六路军总指挥。他执行蒋的命令顽强作战，4月起在赣南展开攻势，利用工农红军受“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指导的失误，以优势兵力步步逼近，先后占领了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和左龙冈；10月又攻占石城，威胁瑞金。中央红军撤出瑞金开始长征，薛岳又指挥第六路军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薛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他指挥所部沿湘桂公路实施侧击，与红军激战七个昼夜。1935年1月，他指挥所部急速开进贵阳及其周围地区。不久即被任命为贵阳绥靖公署主任，并兼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黔军。他为阻击红军渡江北上入川，指挥所部尾追不舍。红军四次巧渡赤水河，黔军疲于奔命，一再损兵

折将，终究不能阻挡红军前进。当薛奉蒋介石之命正加紧调集二十余万兵力准备组织大渡河会战歼灭红军之时，红军主力已兵分两路，突破刘文辉部的防线，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但薛岳围追堵截红军不遗余力，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嘉奖，1937年被任命为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第三预备队副司令，成为蒋介石控制西南政局的一员亲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调集精锐兵力组织淞沪会战，任命薛岳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编入左翼军战斗序列。9月，薛指挥所部吴奇伟第四军、叶肇第六十六军、阮肇昌第六十九军、王东原第七十三军、万耀煌第二十五军、周嵒第七十五军、陶峙岳第七十六军及杨森第六军团在刘行、罗店抗御日军。他常至前沿阵地视察督战，镇定自若，不乱阵脚。10月8日，任左翼军中央作战区总指挥，组织所部在蕴藻浜一带坚守半月有余。10月28日，他指挥所部在竹园村与日军反复争夺，敌我双方均伤亡惨重。11月5日，日军增援部队在金山卫登陆，薛率第十九集团军被迫撤离，退保吴福线。

薛岳在淞沪战场的指挥，获得蒋介石的嘉许，11月13日被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统辖陈诚第十五、罗卓英第十九、刘湘第二十三、张治中第九集团军，负责守卫吴福线；但部署尚未定当，日本侵略军便从茆口、徐六泾口、浒浦口等处登陆，薛被迫指挥所部向锡澄线后撤，又受到日机轰炸，还遇连绵秋雨，道路泥泞，四个集团军几十万部队行动迟缓，拥挤不堪。退到锡澄线时，没有得到新建国防工事的钥匙，以致不能利用这些坚固工事防守阵地，无法在南京外围有效地狙击敌人。

南京失陷后，薛岳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整顿所属各部，分别派往杭嘉、宁芜一带深入敌后，切断水陆交通，阻滞敌军北上。薛实施“战略守势中取战术攻势”的方针，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击。他从第十九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将士组成游击队，任命孔荷宠为总指挥，以绕袭、埋伏、扰乱的战术打击敌人。

1938年5月，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从菏泽南下，连陷内黄、仪封等地，直指兰封。薛岳奉命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统辖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宋希濂第七十一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黄杰第八军，并指挥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和新编三十八师、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奋力抗御。5月30日又升任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的汤恩伯第十三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孙桐萱第十二军及李福霖部，进行兰封会战。薛岳指挥所部英勇作战，先后收复了内黄、野鸡冈等地，又将桂永清第二十七军弃守的兰封夺回，将敌第十四师团围困在三义砦、兴集、罗王砦。此时日军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从鲁西进占归德后赶来增援，使被歼在即的土肥原师团得以苟延残喘。

蒋介石为保卫战略中心要地武汉，特地组建武汉卫戍区，任命薛岳为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不久改序列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部署第二十五、七十、八、四、六十四、七十四、六十六各军在南浔线正面构成反八字形阵地，8月相继在金官桥、星子、黄老门、瑞昌一带阻击敌军的进犯，将松浦淳六郎第一〇六师团阻于马迥岭，在东西孤岭的战斗中将伊在政喜第一〇一师团大部歼灭；9月，在麒麟岭全歼铃木联队，在三角兴、金轮峰、南康兴亦歼敌七百余。10月初，薛岳调集优势兵力围歼万家岭之敌第一〇六师团和本间雅晴二十七师团，7日发起总攻，至10日全歼木岛一二三联队、池田一四五联队、津田一四九联队及配属部队等达万余人，并俘获三百余人。万家岭之捷被誉为“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

武汉会战结束后不久，薛岳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翌年2月并兼任湖南省主席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此时湖南已处于抗战之前线，薛岳以“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抒发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之气概，坚决抗御日军侵犯，捍卫祖国神圣领土。他先后指挥1939年9月、1941年9月、1941年12月三次长沙会战，调集优势兵力，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打退日军的疯狂

进犯，以反包围战术大量歼灭敌人。他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中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一再击退日军的进犯，并歼灭大量敌人，受到蒋介石的嘉奖、重用和爱国军民的赞誉。

薛岳取得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主政湖南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抗战的需要和湘民的愿望，提出“安、便、足”的三字施政方针，即尽力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一切要便民、便国、便战，做到民足食、国足兵、人足智。他并依此实施“生、养、教、卫、管、用”“六政”建设：“生民之政”是把提高国民身体健康作为第一要政；“养民之政”是发展农业、林业，鼓励开垦湖田，兴修农田水利，准许文职官员租田种地以改善生活；“教民之政”是发展中小学和中等师范、职业教育，以提高民智；“卫民之政”是强化警察组织，严惩汉奸、土匪；“管民之政”是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唤起民众力行抗战；“用民之政”是严格管理物价，防止奸商、官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1944年5月，日本侵略军二十余万人在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指挥下，分三路进犯长沙。薛岳指挥各部节节阻击，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但敌人终以强大的钳形攻势突破我军防线，于6月19日攻陷长沙，并立即分兵南下。薛岳调集兵力设防于渌水两岸，在衡阳外围迎敌。6月下旬两次击退敌军对衡阳的进攻；7月11日又击退敌军对衡阳的第二次进攻。7月30日敌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第三次围攻衡阳，除以重炮轰击外还出动空军狂轰滥炸。薛岳指挥各部实施反包围，并令守城部队“死守——求生——必胜”。驻守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和暂编第五十四师在守城一周中伤亡逾半，于8月8日开城降敌。薛岳指挥各部被迫撤至湘赣粤边区，阻止敌军实施打通粤汉路的计划。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令官，至南昌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此后在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中，薛岳于1946年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0月发动了进犯鲁南解放区的战役，指挥王长渝整编七十七师和马励武整编二十六师向峄县和

枣庄进攻，继后又向解放区“清剿”。翌年5月，薛岳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48年5月，蒋介石当总统后，薛任总统府参军长。此前，薛岳曾为孙科竞选副总统奔走，南京《救国日报》等揭露孙科拉选票及私生活欠检点事，薛岳等人感到难堪，遂率领百余人前往报社问罪，曾引起舆论界嘲讽。

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的1949年2月，薛岳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他以“广东人民大团结”为号召，大量安插粤籍亲信到省政府各部门及市县政府任职；同时扩充武装力量，编成五个师，装备重炮和战车，部署在广州附近和铁路沿线。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大举南下，广州虽然是国民党政府撤出南京后的“首都”，但也是风声鹤唳；吴奇伟率部于5月14日在粤东起义后，薛岳更是乱了阵脚。7月，蒋介石从台湾赶到广州，给薛岳打气壮胆，还号召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抵抗。然而大势已去，“保卫广东”已成空话，10月14日广州解放。薛岳于10月11日撤往海南岛，凭借琼州海峡部署十万残兵在岛上设立三道防线，自称“伯陵防线”，“可以固若金汤”。然而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4月16日一举渡过琼州海峡，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大举围歼国民党残军，“伯陵防线”不堪一击。5月1日，海南岛完全解放。

薛岳从海南岛撤到台湾后不久，被蒋介石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1958年8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6年5月任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98年5月3日，薛岳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1929年南京版。

薛岳编：《剿匪纪实》，《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四大会战》编审组编：《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易祖洛：《我所知道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1989年第4辑。

陈红辉：《薛岳轶事》，《乐昌文史资料》1987年第4辑。

文显瑞：《薛岳往事》，《乐昌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

荀慧生

文曦

荀慧生，本名秉超，又名词，别号留香。1900年1月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生。原籍河南洛阳，姓筍，其祖迁居直隶（今河北）东光县后，改姓荀。父亲荀风鸣务农，家境贫困，1906年带领全家到天津谋生，制作“线儿香”出售，但仍难维持生活，不得已将荀慧生及其兄慧荣以五十块银元卖给河北梆子班学戏。班主庞启发是著名的老十三旦侯俊山的嫡传弟子，他教徒严厉，生活上虐待徒众，绰号“庞剥皮”。荀慧生进梆子班不久，庞就要他练“蹯工”。“蹯工”是旦角必练的基本功之一，要将木制铜箍的硬蹯绑在两脚上，靠墙而立，以一支香燃尽为准。荀年幼体弱，站立不稳，疼痛得有时晕倒在地。他几次想逃，甚至想死，都被好心的人悄悄地劝阻了。庞强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索性要他成天踩着蹯走来走去。但经过这番苦练，他的“蹯工”打下了根基。

1908年冬天，不到九岁的荀慧生随着庞启发第一次在天津登台演出。庞给他取了个艺名叫“白牡丹”。此后，他们跑遍天津、保定一带的农村，搭野台或是赶庙会，随处演唱。1910年，他随庞到了北京，搭入鸿顺和科班。北京人才荟萃，他在这里向不少名家学戏，《辛安驿》、《花田错》、《小放牛》等戏，都受过老十三旦侯俊山亲自指点。他还与一些著名梆子演员同台演出，大大提高了技艺。这时，他喜爱上了京剧，常常背着庞启发暗自去看、去学。

1911年，荀慧生随庞启发加入北京三乐班（翌年改名正乐班），当时尚小云、赵桐珊（艺名芙蓉草）都在这个班，他们三人被誉为“正乐三艳”。这时荀慧生已开始学唱京剧的西皮、二黄，有时京、梆混演，俗称“两下锅”。荀慧生敏而好学，勤而好问。他成天埋头学

艺，反复琢磨，经过这一段苦练，技艺有更大长进。

两年后，荀慧生“倒仓”（即变声期，嗓音变哑），暂时停演养嗓。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名流，如画家胡佩衡、王雪涛、于非闇等人，关系颇好，交往甚密。这些名人纷纷出面跟他师父庞启发商量，建议让他正式改唱皮黄。庞无法逼迫“倒仓”的荀慧生登台，只好听从众议。于是荀得以聘请陈桐云为师，学唱昆曲和皮黄。不久，他的嗓音恢复得比以前更为清脆、响亮、柔和圆润，能演一些重头的青衣戏了。到1915年，荀慧生在庞启发这里应当满师出科，但因契约上没有注明起讫年月，庞启发不许他自立，仍只能继续为庞赚钱，直到1917年他才获得人身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从此，他专门演出京剧，经常同台演出的有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

1919年9月，上海天蟾舞台到北京聘请杨小楼组班“长胜社”赴沪演出。老生为谭小培，青衣为尚小云；刀马旦一角，杨指聘“白牡丹”荀慧生。荀功底深厚，扮演花旦、刀马旦都能把梆子和京剧旦角的表演融于一体，使上海京剧爱好者耳目一新。一时，“三小一白”誉满沪上。荀慧生演出之余投师访友，博采众芳，丰富了自己的上演剧目。三个月后合同期满，杨小楼等北返时，天蟾舞台坚决挽留荀慧生，每月包银高至五千元。荀在上海一演再演，数年不衰，直至1924年始北返。在沪期间，他和沈少安、谢香玉、李桂春、盖叫天等海上名角合演了许多老戏和新戏。他还结交了不少文化界名流，曾拜著名画家吴昌硕为师，习山水画。后来他演《丹青引》时，能在八句慢板唱腔的同时，几分钟挥就一张条幅，观众赞叹不绝。

荀慧生回到北京后，声誉翘起。他崇尚革新，无论唱腔和表演艺术，乃至化妆、舞台布景，都进行了改革。在唱腔上，他发展和丰富了旦角“南梆子”、“四平调”、“汉调”等声腔艺术，说白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在表演艺术上，他赞同王瑶卿熔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于一炉的主张。他还吸收了小生、武生的表演技巧，甚至外国舞蹈的步法，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妇女的艺术形象，从而逐步建立起荀派表

演艺术的独特风格。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梅兰芳《太真外传》、程砚秋《红拂传》、荀慧生《丹青引》、尚小云《摩登伽女》获选为前四名。从此，“四大名旦”之称蜚声中外。30年代初，荀派逐渐形成。

荀慧生在京剧上的建树卓著。首先，从20年代至40年代，他与剧作家陈墨香、舒舍予、陈水钟等合作，创作、改编、整理昆、梆、皮黄以至地方剧、时装戏等共二百多出，都是能发挥自己特长的。至今广为流传的有荀派六大喜剧、六大悲剧、六大武剧、六大传统剧、六大移植剧、六大跌扑剧。其中《红娘》、《钗头凤》、《红楼二尤》、《杜十娘》、《玉堂春》等，尤为他的拿手好戏。其次，他在化妆上创新，如改革旦角的发式化装、戏装等等。他创造了“坠马式偏凤髻”、“弯月蛾眉”，设计了绣花大坎肩、蝶形大云肩、二道裙、三道裙等，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妇女的艺术形象。荀以扮演天真、活泼、热情的少女见长。他扮演的红娘，脍炙人口，“红娘”几乎与他的名字分不开了。

“九一八”事变后，荀慧生激于民族义愤，多次到上海及其他地方义演，筹措经费，慰劳抗日义勇军。1934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时，敌伪派人到北平重金礼聘名伶去长春演出，荀慧生毅然拒绝，避往天津。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北平。当时，他为了身边一群人的生活，不得不继续演出，但受尽日伪汉奸的欺侮。他气愤之余，1942年竭尽所有开了一家留香饭店，想离开舞台，靠经商谋生，但他不善经营，不久即宣告歇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荀慧生多次带领剧团到全国各地为工农兵演出。他每到一地，注意观摩富有地方色彩的戏曲，吸取其精华。1950年，他对《红娘》一剧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琴心》一场，这是从汉剧及京韵大鼓中吸取的营养；创作了《听琴吟》，从而使主要

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1959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重新整理了《荀灌娘》一剧，表演上兼有花旦、刀马旦和小生的特点，刻画了一个少年有为、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

荀慧生一生收徒弟甚多。1957年以前举行过正式拜师仪式的弟子有三十六名，其中著名的有童芷苓、李玉茹、吴素秋、赵燕侠、毛世来等。这些人全是带艺投师，各有自己的师承和艺术成就，再经过荀慧生指点，因而兼有了荀派艺术的特色。1963年，荀慧生前往辽宁省教徒演戏，适逢周恩来到沈阳，看了他们两场演出，一场是以荀慧生为主演出的，另一场全是他的弟子演出。周看后对荀说："慧生同志，你要多培养一些学生，让荀派艺术发扬光大。青年们演的不错，可是与老将比起来，就差的远了，主要是基本功不过硬。"荀在周的勉励下，更加用力培养教授艺坛新人。他晚年对京剧现代戏曾给予支持与关注，对京剧《祥林嫂》、《白毛女》、《刘胡兰》提过不少改进意见。在他写的《艺事日记》里，留有这方面的感想记述。

荀慧生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又任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京剧二团艺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荀慧生京剧团团长等职。

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他的论著已出版的有：《荀慧生演剧散论》、《二红表演体系》、《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荀慧生唱腔选集》等。

主要参考资料

荀慧生：《荀慧生演剧散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荀慧生艺事日记》（未刊稿）。

严宝礼

徐铸成

严宝礼，1900年1月2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苏吴江。幼年随嗣父严公辅（字佐治，在江海关任文书）至上海就学。1916年秋，进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读书。1920年时，同乡任传榜任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局长，严经嗣姐严蔼徵介绍，辍学入路局，在总稽核室工作，经常被派往沿线各车站查对账目。他秉性颖悟，运算敏捷，经多年业务实践，益工于筹计。时路局设有“同仁会”，相当于职工俱乐部，办理储蓄及保险事务，他被推为负责人之一 (1) 。

30年代初，严宝礼业余创办“上海交通广告公司”，主要经营上海市内及铁路沿线路牌广告。广告设计新颖，深受工商界欢迎，业务日益发展。从此，他和各界人士特别是报纸的记者、编辑有所交往。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北站陷于火线，沪宁、沪杭甬两线铁路交通中断，路局将大部分职工就地遣散，严宝礼亦在被遣散之列。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上海租界当局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要求，规定中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刊登的新闻，事先须送日方检查。一时，《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立报》等纷纷宣布自动停刊，以示抵制；《新闻报》、《时报》等虽继续出版，或噤若寒蝉，或态度灰色，远不能满足租界三百万爱国居民的要求。严宝礼激于民族义愤，乃与路局同事余鸿翔、孙志衡等商议，与佛学书局经理沈彬翰、《社会日报》主持人胡雄飞、《新闻报》编辑徐耻痕等共同发起，筹集一万元，创刊一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为避免日方检查，决定用洋商名义。经方伯奋联系，征得原上海英文《文汇报》（Mercury）记者英国人克明（H．M．Cumine）同意，用《文汇

报》旧名，由克明以发行人兼总主笔名义，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2)]。

《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伊始，由于资金短绌，既无机器厂房，又缺排字工人，得原《大公报》（上海版）副经理李子宽的协助，由原《大公报》印刷厂代印，报馆亦设在《大公报》营业部旧址。股东二十余人，互推严宝礼、沈彬翰、胡雄飞、徐耻痕、方伯奋五人为华籍董事，克明、路易·乔治、萨埃门等五人为英籍董事。严兼任经理，实际执行社长职务。他殚精竭虑，全力经营。创刊之初，聘胡惠生为总编辑，柯灵主编副刊，邵伯南为记者，储玉坤主编国际新闻。因资金支绌，《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入股一万元，并介绍徐铸成任主笔，负责言论编辑工作。由于《文汇报》宣传爱国抗日，揭露敌伪罪行及投降派之阴谋，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加以编排新颖，文字生动，副刊《世纪风》等多刊载进步作家作品及反映边区、游击区情况的报道，使青年学生及各界市民耳目为之一新。《文汇报》发行日益扩大，半年间由一万二千份增至六万余份，为当时“孤岛”影响最大的报纸。嗣后，又发行晚刊及《文汇年刊》，风靡一时。

《文汇报》创刊后，敌伪视为眼中钉。2月10日，敌伪即向报馆抛掷炸弹，营业员陈桐轩被炸死，还有两人受伤。以后又发生送来死人手臂和毒汁水果以及炸毁机器房等事件。在此重重威胁下，严宝礼毫不畏惧，且与编辑部同事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经常留宿在编辑部附近。国民党方面也企图控制《文汇报》，中宣部及孔祥熙、宋子文等先后派其在沪代理人，以投资为名进行收买，严均予拒绝，以保持其民间报纸的本色。

当时，上海租界难民麇集，沦陷区不堪受奴化教育之青年学生亦多间道流亡上海。严宝礼在报上发起募捐寒衣代金，分发给难民；同时设置清寒学生奖，资助流亡青年入学，高初中生各五十名。

《文汇报》的抗日爱国宣传报道，振奋了上海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敌伪施展收买伎俩竭力加以破坏，英国人克明在敌伪利诱下，时时找严宝礼的碴，指摘他账目不清等等，并逼令严撤换负责编辑言论工作的徐铸成。克明还借口扩充《文汇报》，企图撤换一批人员，攫取编辑部大权，改变《文汇报》的抗日爱国立场。严宝礼与编辑部同仁站在一起，严加抵制，揭露克明的诡计，使敌伪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仍借故勒令《文汇报》自1939年5月19日起停刊两星期。由于《文汇报》内部对是否复刊意见不一，两星期后未能复刊。

《文汇报》停刊后，严宝礼以经商为掩护，经常往返于上海、屯溪间，名义上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南专员办事处办事员，实际为《文汇报》复刊做种种准备。1945年4月间，他与高季琳、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等突然被敌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后经营救出狱[(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严宝礼亟谋复刊《文汇报》，惟原来的馆址及器材已被国民党当局接收。严虽获得蒋介石颁发的“胜利勋章”，然而宣传抗日救国的《文汇报》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歧视，复刊要求被漠然视之。严乃劝说亲友任传榜、虞顺懋等投资，于1945年8月19日重新复刊。《文汇报》复刊之初，任储玉坤、朱云光为总编辑，因内容平平，未能打开局面。1946年1月，严矢志革新，还聘宦乡、陈虞孙任总主笔、副总主笔，马季良（唐纳）任总编辑，孟秋江任采访主任，高季琳（柯灵）主持副刊，使《文汇报》阵容一新。3月，徐铸成回到《文汇报》。编辑部人员大更动，徐任总主笔，与宦乡、马季良、陈虞孙、高季琳、张锡昌、孟秋江共同负责。3月29日起，《文汇报》改版革新，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并商请郭沫若、杜守素、侯外庐、李平心、吴晗、丁瓒、傅彬然等编辑各种周刊。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文汇报》内容丰富，旗帜鲜明，与国民党当局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广大读者的热

烈欢迎，一时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利用控制配发官价外汇作手段，对《文汇报》施加经济压力。严宝礼坚持抵制，宁以高价购得的黑市外汇购买白报纸，坚持出版。国民党有关方面在国共谈判破裂、公开发动内战和召开“国大”之际，曾三次企图以巨款收买《文汇报》，均被严宝礼与徐铸成等严词拒绝。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终于悍然下令将《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三报同时封闭，并非法逮捕三报记者多人[(4)]。

1948年春，严宝礼全力策应徐铸成去香港筹办《文汇报》，并劝说虞顺懋、任传榜等参与投资，又输送大批职工及印刷设备到香港，一度还去香港参加筹划。香港《文汇报》乃于是年9月9日创刊。其时，旅居香港的李济深、郭沫若、潘汉年、侯外庐、翦伯赞、柳亚子、茅盾、夏衍、马叙伦以及龙云、章乃器、王宽诚等人，均对《文汇报》予以精神或物质的赞助。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严宝礼率先复刊上海《文汇报》，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经理。此后《文汇报》在私营公助、公私合营以及转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历程中，严均以积极态度接受人民政府的安排。1956年《文汇报》一度停刊，大部职工赴北京参加创办《教师报》，严任管理部主任。同年10月，《文汇报》再度在上海复刊，严任副社长兼总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宝礼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及上海市委委员。

严宝礼1938年1月发起创办上海《文汇报》，1948年8月又创办香港《文汇报》，数十年来，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紧跟时代，追求进步，以祖国繁荣富强和新闻事业为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

1960年11月18日，严宝礼积劳成疾，患黄胆肝硬化不治，在上海病逝。

---

(1) 据严宝礼外甥任嘉尧所提供材料。

(2) 据严宝礼外甥任嘉尧所提供材料。

(3) 据当时同时被捕的柯灵、袁鸿庆等人口述及严宝礼生前自述。

(4) 当时三报停刊，“罪名”是“各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见上海《新闻报》1947年5月26日：《三报停刊原因，〈铁报〉所刊不确》。

严独鹤

陆诒

严独鹤，名桢，字子材。生于1889年10月3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初九）。浙江桐乡人。他幼年家境清贫，刻苦攻读。十五岁考取秀才，十六岁肄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习英文及数、理、化各学科。十九岁丧父，不得不谋职业赡养全家，初任上海南区小学教师，后赴江西上饶广培中学任英语教师。辛亥革命后回上海，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任文牍员。一年后到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辑，业余时间从事文艺写作。

1914年起，严独鹤参加上海《新闻报》工作，前后达三十多年，历任编辑、副刊主编、副总编辑。30年代的《新闻报》日销十五万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该报注重工商界和经济市场的消息，而严将副刊编得比较精彩也是吸引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严还二度兼任上海世界书局杂志部总编辑，主编《红》、《红玫瑰》等刊物[(1)]。

严独鹤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新园林》几十年，在工作实践中对文艺副刊进行各项改革，创造了自己的特色：（一）每天发表一篇“谈话”，与广大读者亲切交谈，谈情说理，寓思想教育于潜移默化之中。文字精炼，言之有物，长则六七百字，短则二三百字。“谈话”内容主要议论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诸如墨吏横行、贪污成风、毕业即失业等等，常在他笔下有所揭露和批判。也谈论国内外时事，尖锐泼辣，能切中时弊。例如1937年7月7日“谈话”，题为《十周欢祝》，是一篇庆祝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他一开头就说：“故意要在一片欢呼声里，来几句败兴的话”，接着就指出：“淞沪抗战时的炮声，固然已在香槟酬酢之下消失得不留遗影

了，可是断壁尚存，劫灰犹在，还令人能够追忆到当时铁鸟轰炸的惨况，希望大家欢欣鼓舞之余，对于当前的时势还要同时有所警惕！”[2]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卢沟桥响起日军的枪声。（二）重视副刊版面的图文并茂。他经常选刊时事漫画，约请著名漫画家马星驰、杨清罄和丁悚等供稿。他们刻画当年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丑态，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三）他还重视选刊连载小说，以争取长期读者。如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顾明道的《荒江女侠》，都是先在副刊上发表，再写成剧本，拍成电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抗战初期，严独鹤曾在报上辟出“抗日同志谈话会”和“救国之声”专栏，号召读者提出抗日救国的切实办法。他自己以笔杆为武器，撰写大量文章，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他在题为《以德报德》、《活人典当》、《大炮与纸团》等文章中，深刻揭露日本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新闻报》因在名义上改为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经营，又在租界的特殊环境下，报纸还能刊登一部分抗日的消息和言论。敌人曾多次对严独鹤进行诱说，因他不为所动，于是多次给他写恐吓信，甚至在信中装着子弹进行威胁，但他大义凛然，坚持抗日立场，决不屈服。与此同时，他还与《新闻报》同事严谔声等举办对贫寒子弟助学金，帮助一部分经济困难的青年上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闯进了租界，《新闻报》被敌伪接管，严独鹤毅然辞去报馆职务，创办大经中学，并担任校长。旋因不愿向敌伪登记注册，又愤而将学校停办，宁可赋闲家居，过贫困的生活，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严独鹤重新回到《新闻报》工作。他原希望政府在战后能体恤人民生活艰苦，恢复生产，努力建设，但国民党当局不久即悍然发动内战，导致生灵涂炭、民怨沸腾，使他大失所

望。他在《新园林》上继续发表杂文，批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象，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1948年末，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徐堪曾亲自登门拜访，要求他“笔下留情”，并许以子女可以享用“官费”到国外留学，严独鹤予以严正拒绝。

上海解放后，严独鹤调任新闻图书馆主任，积极参与上海新闻图书馆筹建工作。1956年6月，严担任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副馆长。1958年，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技图书馆合并到上海图书馆，他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并主持全国报刊索引编辑及剪报工作。他还热情参加对台广播工作，呼吁海峡两岸同胞早日促成统一大业。

严独鹤于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上海市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他曾任第一、二、三、四、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自1959年起历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1968年8月26日，严独鹤病逝于上海。

---

(1) 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8页。

(2) 上海《新闻报》1937年7月7日副刊《新园林》。

严复

罗耀九

严复，字几道，初名传初。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登仕籍后始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生于1854年1月8日（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祖父与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严复七岁进私塾，十一岁跟从本乡一位老教师黄宗彝读书，通读了“四书”、“五经”，并熟悉宋、明理学家的掌故典籍。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贫无力继续从师求学，入洋务派新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1871年毕业，被派在建威、扬武等兵船上实习了五年。曾先后去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许多地方，初步了解了那里的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1877年被派往英国抱穆士德大学院学习，不久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海军两年。两年之中除读书外，还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英国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他由一个受传统教育熏陶的青年，变为一个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留英期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西方的文明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对比，优劣之势如泾渭分明，使他不能不为之倾心。因而对海军的课程渐渐不感兴趣，将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富强的原因，摸索可使中国复兴、强盛的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了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接触和观察，为他后来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准备了条件。

1879年6月，严复毕业回国。这时，两江总督沈葆桢为了扩充南洋海军，极力收罗人才，把严复留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不久，沈葆祯病死。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总教习，以道员吴仲翔任总办。吴不懂业务，挂名而已，担负学堂的行政与教学实际责任的是严复。1889年，严复报捐了同知衔，经

过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派为学堂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总办。

严复入水师学堂之初，很想发挥他的才干，为救国图强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在洋务派官僚的把持下，“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1)]，难以按自己的理想办事。反之，留英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等人归国后都受重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日益富强，轻而易举地吞并了清朝的藩属琉球群岛。严复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大为忧虑，常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2)] 1884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3)]，从此一直不受重用。显然，严复的爱国热情与洋务派的妥协卖国路线格格不入。

严复怀才不遇，在李鸿章部下不能实现自己的宏远理想，便想另谋出路。他曾投资数千元与王绶云（慈劭）合股创办河南修武县的煤矿，以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他又慕湖广总督张之洞“好贤”之名，想投入张的幕中，“冀或乘时建树”[(4)]，大展宏图。他还去参加科举考试，想循正途博取官爵，挤入统治集团的行列。可是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发起变法维新运动。此时的严复，经济地位已经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上更是资产阶级的前导。他一方面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非常愤慨，另一方面却摆脱不了本国封建势力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这样，严复便走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1897年，他与夏曾佑、王修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成为维新派言论在北方的重要宣传阵地。戊戌政变前不久，他还写了上皇帝万言书，并且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由于他没有离开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岗位，他的活动范围也没有超出天津。虽然去过北京几次，但没有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实际政治活动。这个时期，他始终只限于在舆

论上与康、梁相呼应。严复除了水师学堂本职工作之外，还于1896年接受了创办俄文馆的任务，兼任总办，主持培育俄文翻译人才。同年他又支持维新派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培育西学人才。但这些社会活动还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主要是集中精力于介绍西学，即“致力于译述以警世”[5]。他的翻译工作十分严谨，要求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词能达意，还要文字优美。因此他的翻译工作是很艰辛的，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中文译词，往往十天半月不能决断，反复斟酌，屡易其稿。他的第一部译本是赫胥黎著的《天演论》，初版约在1895年问世。后来《天演论》的主要论点“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成为激励中国人自强保种的理论。严复在译文中常常加入自己的按语，联系中国的实际，大发议论。这本书受到普遍的重视，起了指导舆论的作用，影响颇为深远。

严复是个非常出色的维新派思想家，他在天津《直报》、《国闻报》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有几篇战斗性很强烈，充满了爱国激情。如《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猛烈抨击禁锢思想的儒家“旧学”，提倡新学，为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开展制造舆论。他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要求变革，批判“君权神授”思想，提出“尊民贬君”的观点，反对科举，提倡学堂。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入手[6]。他输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这些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严复虽然反对封建专制，但不愿提倡民主共和；他要求变革，但反对革命。戊戌政变发生后，严复参与创办的《国闻报》被封闭了，通艺学堂停办了。严复慑于西太后等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感到“一无可为”，于是“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7]。从1898年到1911年的十三年间，他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群己权界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介绍资产阶级古

典经济学理论、政治与法学理论以及社会学、逻辑学。严复希望通过输入西学以达到“疗贫起弱”[8]，挽救国家危亡的作用。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匆促离开天津，迁居上海，从此脱离水师学堂。初到上海时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任副会长，实际上是个名誉职务，并未参与唐才常的秘密活动。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以严复为译局总办。严复干了两年，即辞职回到上海。1905年，严复协助马相伯（马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担任了几个月校长便辞职了。1906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往安徽师范学堂任监督，也只有几个月时间，至1907年又离了职。1908年严复应学部之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清廷覆亡为止。1909年清政府为了笼络社会名人，曾赐给他文科进士出身。严复还兼了其他职务，如1910年海军部特授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这些虽然都是虚衔与闲官，然而可以看出严复在清末的政治地位已经显著提高。严复的大儿子严璩也由四品京堂、道员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严复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了。辛亥革命以后，他对于被推翻的清王朝时怀眷念之情，常常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9]。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聘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不及一年，辞去。1913年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曾著《民约平议》一文批评卢梭的《民约论》，表明他是民主制度的反对者。

袁世凯蓄谋称帝，1915年8月杨度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封建帝制造舆论，强邀严复列名为发起人。严复虽无活动，但不置可否，因此名声一落千丈。

后来，严复不但提倡读经，还否定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反对白话文运动，完全成了一个与历史潮流相悖逆的复古派。袁世凯死后，严复不再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职务。晚年常在病中度日，1921年10月

27日病卒于福州故里。

---

(1) 《与四弟观澜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1页。

(2)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页。

(3)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第9页。

(4) 《与四弟观澜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5)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第14页。

(6) 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

(7) 严复：《与张元济书》（1899年），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4—526页。

(8)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外交报》第9、10期（1902年），收入《严复集》第3册，第557—565页。

(9) 陈宝琛：《严君几道墓志铭》，见《严复集》第5册，第1541—1543页。

严修

娄献阁

严修，幼名玉珪，字范孙。1860年4月2日（清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生于顺天府三河（今属河北省）。祖籍浙江慈溪，先辈于顺治年间定居天津。严出生时，正值英法联军入侵，全家避难三河洵阳，1862年仍迁回天津。严家世代营商，祖上曾有数人得诰赠光禄大夫，其祖父以经营盐业致富，父严克宽（字仁波）曾任长芦总盐商多年。

严修自幼受到良好家教，五岁开始入塾，读《龙文鞭影》和“四书”、“五经”，并学作诗文。1873年，严十三岁时，经院试选入府学，除继续攻读儒家书籍外，还习数学等自然科学。翌年，岁试得一等第七。1877年夏，再应院试，补廪膳生。他长期跟名儒张文达学习，成为张的高足，同时又广交陈奉周、宋少南等名士，互相切磋，学问日增。

严修1879年起参加乡试，1882年中举。期间他谒见过军机大臣李鸿章与大学士徐桐。1883年会试后，严得授庶吉士，但仍回籍自修，进一步深造。1886年入京，任翰林院编修，不久补国史馆协修，1889年充会典馆详校官。他在京供职八年有余，多次从事试卷磨勘等项工作。

1894年严修参加大考，名列二等，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被实授贵州省学政。严于11月抵贵阳后，积极着手整理该省学务。他在黔任职三年余，努力进行学制改革。不仅常到各地考选人才，更将省城学古书院（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选四十名品学兼优者住校学习。除“购沪楚书籍运黔”[(1)] 外，还开办官书局，刊印各种新旧图书。他颇为崇敬张之洞，“刊印前贤所著《先正读书诀》、《辖　　轩语》、

《书目问答》分飨远近，使识门径”[2]。严对贵州士子多有嘉惠，任可澄、刘显世等均出其门下。

甲午战败之后，全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之声日亟，严修亦感到必须学习西方，注重时务。1897年9月，他毅然上书清廷，请仿照康、乾两朝召试博学鸿词例，开经济特科，“以广登进，而励人材”[3]，得到清廷允准。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此举庶有得人之望，梁启超甚至称它是新政最初之起点，却遭到大学士徐桐的反对。翌年春，严学政任满，返京复命，曾晤康有为、梁启超，又与袁世凯相识，后与袁成为莫逆之交。当时严修踌躇满志，很想在学制改革上一显身手，而徐桐竟拒绝见严，且解除了他翰林院的职务，只留编修一个空衔，严无奈只得告假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他和康、梁等新党没有更深的关系，故未受到牵连。

严修隐居在家，颇有怀才不遇之感。面对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形势，他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立志兴学，以图自强。1898年11月，他礼聘张伯苓在自己的寓所设馆，教其子侄与戚友子弟，最初只有学生五人，不久增加到十一人，通称“严馆”。该馆表面上同家塾无异，但教学内容已由明经帖括改为英文、算术和理化等科学知识，实乃新式教育的开始；成效甚佳，其中佼佼者如陶孟和等，日后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学者。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京、津，翌年强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处在被宰割的灾难之中。残酷的现实给严修以极大的刺激，进一步增强了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怀着“终年但忧国……想望太平时”[4]的心情，从挽救危亡必须加快人才培养、改良教育的认识出发，与好友林墨卿及张伯苓等商量有关办学事宜。1901年，严开设义塾，并亲自改订课程。1902年，得津绅王竹林、李子赫捐资，严在镫牌公所再设蒙养、学塾两斋，不久移至会文书院扩大成五斋，经改组定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开天津民办小学之先河。嗣后天津府尹凌福彭、天津知县唐则瑀等均请严出面办学，相继成立官办小学堂

多处。严还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拨地拨款的支持，得以从容发展教育，逐渐使天津学校为全省之模范。

1904年春，严修被袁世凯任为直隶学校司督办，赴保定视事。翌年，学校司改名学务处，移天津办公。袁治直之策，一练兵，二兴学，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修所为。严修主管直隶教育一年余，成绩显著，如在保定设初级师范学堂、改保定校士馆为普通科学馆，在天津改校士馆为师范学堂，改官立中学堂为天津府中学堂，收回法人所设之如意庵普通中学堂，以及筹建北洋师范学堂和高等法政学堂等，都是由他一手经办的。严更规划每府设中学堂与师范学堂各一所，注意奖励办学有成绩的州县官，在各县设劝学所以筹集经费，派卢靖率官绅出洋游历以振兴士气，并发行《学务报》，组织同人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刊印《国民必读》等著作，竭力推动全省教育。翌年，卢靖向袁世凯提出废止科举的建议，得到了严的大力支持，他认为此乃排除障碍、加速兴学根本之图，极力促成袁与张之洞联名上书清廷，终于废除了这一流传千年的旧制度。

严修在主持直隶学政期间，仍自办学校不辍。他曾率张伯苓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购得理化教具多种，并聘日人来华任教。回国后，严先将自办的“严馆”与津商王奎章办的“王馆”合并为私立中学堂，由张伯苓任监督。该校第一期招收学生七十三人，分成三班，并附设一师范班。旋改名敬业中学堂，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是为天津南开学校之前身。当时，严还在家设有女子小学堂、幼儿园及保姆科。他先后共创办私立学校五处、工厂二处，由于捐资助教有功，受到清廷五品卿衔的嘉奖。

1905年12月，清政府新设学部，由荣庆出任尚书，熙英为左侍郎，严修得袁世凯推荐，以三品京堂候补署右侍郎。不久熙英死去，严实授右侍郎，兼署左侍郎。因学部初创，而荣庆很少管事，政务主要靠严修擘划，所以十分忙碌。他既主张革新学制，又有保守的一面，工作中则力图沟通内外新旧，调融欧化与国粹。当时严修曾奏请

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为教育宗旨，就是新旧杂糅的典型，得到清廷认可，于1906年3月正式颁行。由于学制已为奏定章程所限，不能大有更张，他便从实施入手，在学部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规定提学使到任前先往外国考察三个月；派卢靖、沈曾植、刘廷琛等任直、皖、陕提学使，派张謇、王先谦等为苏、湘学务公所议长；确定女学教育章程；办理考试毕业归国留学生，授予进士头衔；咨各省举办法政及实业学堂等，均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同年，他还联合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等集资银二万六千两，用以兴建南开校舍，为该校的扩大提供了条件。

1907年9月，清廷令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管理学部事务。在张的支持下，严修的工作越发有起色，陆续成立京师督学局统一都中教育，组织专门班子编辑教科书及有关参考书，创建京师图书馆搜罗古籍，在京设女子师范学堂，积极筹办经学、法政、文学、格致、医、农、工、商等分科大学。他对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也十分注意，曾以学部名义咨各省：选派出洋学生须择有中国学问根底者；又派员调查留日学生状况，添设欧洲游学生监督，会同外务部组织游美学务处，主办学生赴美学习事宜。严还重视延揽人才，其时用人全归部荐，经他提拔的人有张元济、范源濂、罗振玉、戴展诚等，一时群英荟萃，为人瞩目；后来用人改为廷推，则生气渐失。

1908年，严修兼任考验询问各省保荐人才大臣，翌年又被派为宪政编查馆咨议官。不料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摄政王载沣等排斥，于1909年1月被黜回河南原籍，严颇为不平，大胆上书替袁辩护，且送行至卢沟桥。严修这番表现被视为袁党，并遭皇室要人刁难，后赖张之洞调护才勉强自安。同年10月，张之洞病故，严顿觉事不可为，托病请辞，于1910年4月获准开缺返回天津，决心从此不再做官。他当时心神郁闷，在其《五十述怀》诗中叹道：“大地江山几破碎，中兴将相偏凋零。河清人寿嗟何及，但祝神狮睡早醒。”又云：“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

前忏昨非。”[5]

严修不仅政治上不得志，经济上也很拮据。由于长芦盐运使借口偿还外债乱征苛税，使包括严家在内的盐商陷入绝境，加上他多年出资赞助教育，耗费甚巨，亏累很多。他无奈只得将引地租于郭家，而郭氏不久反悔，使严处境十分狼狈，后赖人奔走告贷才渡过难关，保全了家产。1911年，严修停止向南开中学堂捐款，经提学使改为公立，并把天津客籍学堂及长芦中学堂归入该校。严办的其他私立学校或停或并，只剩两处初等小学堂附蒙养园的经费继续由他承担。迨辛亥革命之后，南开应领公款无继，其所需少量维持费仍靠他暂时垫付。

1911年10月，武昌首举义旗，各省纷纷响应。天津绅商为维持社会治安，决定成立保卫局，推严修为首。有人拟拥严为都督，策动直隶独立，但严不愿置身革命，竟躲到北京。他虽对清室不抱希望，但认为中国也不能遽跻共和。他主张君主立宪，赞同张绍曾、蓝天蔚等提出的在本年行宪的十二条政纲，说这是清廷存亡之一大转机。面对行将覆灭的命运，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于同年11月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荐严任度支大臣，而严以“非所素习”为借口坚辞。袁与南方议和，委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严修、杨士琦为参赞，严再次谢绝。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参议院选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不愿离开北京，阴谋制造了京、津、保兵变，天津绅商组织治安会（后改称官民联合会），严修被举为会长。当时袁欲拉严出任直隶总督、国史馆总裁、教育总长等要职，他均未接受。

民国初年，严修的思想稍有变化，对共和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尤希望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梁启超携手，同策中国政治之进行，但见现实绝无可能，因此遇事便以韬晦的面貌出现。

严修与袁世凯的关系一直很好，辛亥革命前袁就把几个儿子送到天津托严帮助教育，严为袁氏诸生聘定了教师，并一再建议派遣出国

留学。1913年7月，严得袁世凯同意，亲率袁氏三子赴欧，漫游俄、比、德、法、荷、瑞士等国，最后将袁子安排在英国学习，自己于翌年夏返回天津。

旅欧期间，严修多次寄信友人谈论国事，谓："窃以为欧洲程度吾国数十年内恐无躐跻之望，而欲学欧美先学日本，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皆一定不易之序也。""市政良则社会良"，"欲社会之进步，非讲求市政不可。"又说："吾国今日财源枯竭，固无大举兴学之望，然于已设之学校加意整顿，正今日之急务。"[(6)] 他曾提出一个学界游历方案，还建议拟订小学教员应读书目和设俱乐部（附小博物馆及小图书馆）"为小学教员息游之所"，以陶冶性情，补充学识。

1914年2月，严修在英国得电传被授为教育总长，他立即电袁世凯推却，并请中国驻英公使代辞。严回国后，袁仍挽其出山，于同年6月和9月先后任严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参政院参政，他均未就职。不过严终于在冬季至北京，留居北海，替袁世凯照料儿子读书事宜。1915年4月，严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会后遵袁嘱托赴河南辉县察看建大学地址，并去上海观光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往杭州、南通参观各学校。

此时，袁世凯谋帝制日亟，筹安会的活动已公开化，严修为此于8月面见袁陈述利弊，郑重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帝制决难存在，"若行兹事，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各派人士恐相率解体矣"[(7)]。但袁一心要当皇帝，严谏诤无效，遂绝迹于北海。袁世凯称帝后，封严为中卿，他既不辞也未就。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号，严4月曾至北京晤袁。6月袁世凯死去，严进京吊唁，8月奔赴河南为袁送葬。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严修希望不另生枝节，但是由于国务总理段祺瑞和督军团再次毁弃约法，府院之争及北洋派内部矛盾加剧等，社会动荡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严越发不愿从事政治。1917

年6月，李经羲组阁，邀严修任教育总长，他毅然拒绝。不久，北京政府拟重新成立临时参议院来代替旧国会，有意请严为议长，他也没有应允。

严修仍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1917年8月，河北洪涝成灾，他曾去北京参加河工讨论会工作。前此，家中女学增开小学高等班，又在其对门设立贫民义塾。1918年4月，他偕范源濂、孙子文赴美国考察，与先期到美的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相会，共同研究了美国的教育和私立大学的组织问题。严等于12月一起归国，立即加紧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他与张伯苓前往山西、江苏进行募捐，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经过努力，校舍迅速建成，第一期招收学生近百人，分文、理、商三科，仅用半年多时间便正式开学。同年，家中女学中学班也告成立。

严修关怀青年学生的成长，对在南开中学学习的周恩来尤为器重，曾赞扬周有宰相之才。严多方支持张伯苓对周恩来的照顾，使周得到免交学杂费的优待，后又获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的特殊待遇。周恩来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的学生领袖，1920年1月因率领南开等校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但是严修和张伯苓仍未改变对周的看法。周于同年7月出狱，严、张等决定用“范孙奖学金”派周赴欧洲深造，使他得以在欧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尽管有人向严修进谗言，说周恩来已加入共产党，不要再帮助周了，严则以“人各有志”相答，丝毫没有动摇资助周的初衷。

自1920年起，严修不断受到病魔的缠绕。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肿瘤病，全身长了上百个瘤子，有的深入腹内，右偏痛苦不离身，左半时时患不仁，几次割治，反反复复，总不能去根。医生和亲友均劝他少看书、少会客、少说话，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体虚神衰，照旧手不释卷。严在病中更以极大兴趣浏览古籍，并引经据典，逐条注解张之洞的《广雅堂诗集》，列书满案，终日搜检，写成批语十万余言，其热忱与毅力非常人可比拟。

严修在病中还广邀华世奎、章钰、林兆翰、陈诵洛等好友，定期举行同人聚餐会，饮酒行令，吟诗唱和，借以自娱。聚餐会规模不断扩大，1922年改名为城南诗社，参加者多达数十人，良莠不齐，其中华、章都是遗老，也有复辟派和后来堕落成汉奸的。此时，严对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寿林墨青六十》的诗中表示：新学与旧学，文言或语体，“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诋”。文言乃“数十圣留贻，数千年积垒”，绝不能弃如敝屣，“语体为通俗，补助功亦伟”，同样不可缺少。严十分注重：“国要张四维，礼义与廉耻；人要守四勿，言动与听视；孔曾道忠恕，尧舜道孝弟；东西有圣人，此心同此理。”[(8)] 他当时虽然还抱有贯通旧新的想法，但更关心的则是如何维护传统的文化。

严修晚年爱国热情不减，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甚为忧虑，对北洋军阀统治与战乱表示不满。他在诗中写道：“与我相亲乃禹域”，“犹念神州怕陆沉”。“已信剖瓜谋渐协，犹闻煮豆急相煎。虎狼宁肯忘吞噬？鹬蚌焉能独幸全！”[(9)] 他深感“军阀时代，无理可讲，无事可作”[(10)]，常常发出“陆沉谁与挽神州”、“时危寸土暂相安”、“得为太平之世之幸民”一类感叹。他颇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等爱国文人，尽管年过花甲尚坚持参加教育改进社，积极支持林兆翰在天津办社会教育。严于1924年发起存社，1927年创立崇化学会，以斯文、名教、“崇乡党之化以励贤才”[(11)] 为宗旨。

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接管京津，10月下旬突然逮捕了长芦纲总李赞臣等五人，且电令南解。严家数代盐商，与此案不无关系，严修焦虑异常，病情加重，1929年3月15日病故于天津。生前曾预作自挽诗，并在避寿词中谓：“便活百岁，不作生日。”[(12)] 此外他还拟有家训及丧礼各八款，内容多循古制，主张勤俭，讲求实际，反对唪经、糊冥器、焚纸钱和大办丧事等旧习。

(1) 陈宝泉：《严先生事略》，见《严范孙先生手札》，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版。

(2) 高凌雯：《诰授光禄大夫学部左侍郎严公行状》，见严修编、商彤补编《严范孙先生自定年谱》附录，天津严氏1943年版。

(3) 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4) 陈诵洛编校：《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卷一，协成印刷局1933年印，第8—9页。

(5) 陈诵洛编校：《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卷一，协成印刷局1933年印，第8—9页。

(6) 严修致筱庄的信，见陈宝泉编：《严范孙先生手札》。

(7) 陈宝泉：《严先生事略》，见《严范孙先生手札》，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版。

(8) 陈诵洛编校：《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卷二，协成印刷局1933年印，第25、13、25页。

(9) 陈诵洛编校：《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卷二，第25、13、25页。

(10) 童家祥：《记严范孙（修）先生》，纪果庵等撰《晚清及民国人物琐谈》，台北学生书局1972年版，第222页。

(11) 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12) 伍稼青辑：《严修亲拟之家训及丧礼》，《民国名人轶事》，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09页。

严裕棠

熊尚厚

严裕棠，号光藻。1880年（清光绪六年）生于上海。父亲严介廷为英商自来水厂小买办，叔父严介坪是英商老公茂洋行买办。严幼时学过英语，青年时经叔父介绍入老公茂洋行，初拜严介坪为师，后任洋行主皮尔斯的私人佐理，其后他父亲让他转至公兴铁厂当跑街。在公兴铁厂，由于他对招揽外轮生意门路甚多，颇得老板徐福寿的欢心。后因人事问题打伤了老板的外甥，受人煽动离开了公兴铁厂。

1902年，皮尔斯替严裕棠筹办大隆铁厂，因严自己不懂技术乃与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合伙。初办时资本七千五百两银，雇有工人六七人，学徒四人，实际仅是一家小型作坊。严、褚双方议定，生产与财务由褚小毛负责，严管经营，为几家中外丝织厂和轧花厂做修理生意。次年添购机器，又为外轮修配机件，还兼做一般修理业务，营业十分得手。1907年，褚小毛认为厂中的会计与工人都在严裕棠掌握之中，乃向严提出收购股份，结果酿成一场官司。嗣经穆湘玥从中调解，将股本作价出让，褚嫌价太高而自愿退股，大隆即成了严裕棠独自开办的工厂。

严裕棠独资经营大隆铁厂后，经营业务逐渐扩大，先后聘请英籍工程师端纳·法兰克林为顾问，除主要修理纺织机及缫丝、轧花、碾米、磨粉等机器外，还承接洋行委托仿制各种机器配件及整台机器，而对修理外轮生意，则逐步减少直至停止，营业十分发达，1912年有往来固定客户四十余家（其中有几家英、日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纺织工业兴起，大隆除了原有的客户外，又多了一批华商纱厂客户。1916年，严裕棠命长子严庆祥停学到大隆实习，并仿效美国福特汽车制造厂，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统一，职责分明，生产一条龙，

建立生产记录卡及传票制度、惩罚制度，以进行改革。1918年，扩大生产规模，在大连湾路建造了新厂房。1920年，严裕棠派严庆祥任厂长，研制纺织机的全部传动装置，并试制各种小型机器，拥有大小车床一百部，工人和学徒三百余人。在大战期间，大隆获得了很大的利润，积累了大量资金和大批物资，还购买了一批房地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外国资本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大批破产倒闭，尚存者生产停滞。在此严峻形势之下，严裕棠也打算关闭大隆铁厂，由于工人的坚强团结，加速生产，并抢先抛售出部分物资维持资金运转，采取薄利多销、紧缩开支等措施，才逐渐闯过了难关。1922年，开始仿制棉纺织机，由一家铁工厂发展成了机器制造厂。从1920年至1924年，大隆购进汉运洋行机器，并自制了一批工作母机，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开辟了一条新的生产途径；致力于农业机械的制造，向广大农村寻求市场，生产柴油引擎、碾米机、磨粉机、戽水机、榨油机、轧花机等小型农业机械。为了推广其农机产品，附设了农具研习所，于嘉兴、无锡、周浦、高邮等地设立代理处，年销二三百台。

大隆生产的棉纺织机，因国内华商轻视国货，产品销路不畅。严裕棠为给大隆的生产寻找一条畅通的销路，于1925年以房地产抵押借银十万两做投资，伙同李仲斌以洽谈公司名义，租办了苏纶纱厂，把产品转给自己办的棉纱厂，走出一条棉铁联营之路。

1926年，严裕棠把大隆机械厂迁到光复西路新址，开始仿制英国道勃生式纺纱机和日本丰田式织布机，用以扩充苏纶纱厂的设备，随后聘请日本冶金专家冈岛为总工程师。次年他组设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严庆祥为副总经理。同年底因苏纶纱厂厂房破旧不能从事生产，为修理问题与业主涉讼。业主方面的多数股东主张将苏纶纱厂招标出卖，仍由严与李仲斌合伙的最高价投标购进苏纶纱厂，以严庆祥任经理兼厂长，不久改由其四子严庆祺任实习厂长、后任厂长，运用大隆的支持迅速扩建。严裕棠以苏纶纱厂两年的

赢余和向银行业借款，增加投资，由大隆制造两万枚纱锭的全套机器，于1930年增设纱厂一所。翌年又增造布厂一所，亦由大隆制造织布机器。初有布机三百台，一年半的时间内扩充布机到一千零四十台。1930年到1931年，产销纱三万余件，布约十一万匹。与此同时，年增利润达四十万两，以天宫牌为纱布交易所的期货筹码。严裕棠大力扩建大隆机器厂，分设车床工段、刨床工段、装机间和设计室，以适应装备与纱厂的需要，产品以纺纱机和织布机为最著。1929年，大隆在大连湾路分设了分厂和农具研习所，除为苏纶纱厂制造纺织机外，还制造了引擎和农具。两三年间，生产各种农业机器千余台，年销近三百台。1931年大隆年营业额达八十万两。

在当时民族机器工业和棉纺织业不甚景气的情况下，严裕棠的大隆机器厂和苏纶纱厂双双获利，营业十分发达，主要原因是他实行的棉铁联营获得巨大成功。同时也由于他重视经营管理和技术革新，使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聘请外国专家、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不断改革经营管理和技术，培养出大批技术工人等。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的成功，使他在全国工商界的声誉鹊起。

严裕棠在自己所创立的棉铁联营道路上继续前进。1932年1月，他让其从法国留学回国的第六子严庆龄担任大隆厂厂长，以其次子严庆瑞任经理，聘请法国工程师，对大隆进一步进行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加强对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改造，实行计件工资制等。时值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华商纱厂机件损毁甚大，给大隆产品的销路造成了有利条件，不久即能制造整套棉纺织机。到抗日战争之前，它能仿制日本、英国、瑞士等国的各式纺织机及各种机件，年生产成套纺机纱锭四万枚左右。因当时农业机械销路日蹙，大隆即以生产棉纺织机为主。与此同时，严裕棠利用“一二八”事变后，上海郊区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纱厂停工之际，命其长子严庆祥重新掌管苏纶纱厂，加紧进行生产，仅一个月的时间，苏纶赢利即超过原有资产。为了改善原有的动力，及时建造了一座发电所。冶金厂动力全部改用电

力，既保证了动力的供应，又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1933年，严家套购期货，赚了约一百万银两。从1930年到1936年，苏纶纱厂获得了独特的扩展。

1934年，严裕棠用苏纶纱厂的赢利，以光裕公司名义，向中国银行和劝业银行投标，收买了隆茂纱厂，调次子严庆瑞任厂长，改厂名为仁德纱厂。将原有的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余枚纱锭修配整理，并增加新的机器，扩充纱锭为一万七千余枚；又新建了布厂一所，有布机四百七十余台，资本额一百万元。由于该厂开办费小，管理费低，亦能获得利润。

光裕公司本意是用以总管大隆、苏纶、仁德三个企业，置于同一总写字间办公，但因严裕棠患心脏病后，各厂分别委任其子经营，光裕公司实际仅管房地产，由严亲自掌管，各企业与房地产之间，在管理和财务等方面截然分开。经营房地产，是严裕棠在经营大隆、苏纶时，历年从中提出部分赢余相继购置。严亲自主持经营大量房地产，所以又是一个房地产商。

严裕棠除主要经营企业外，还先后投资中国棉业公司、常州民丰纱厂、创业商业银行并任董事。他对社会公益事业也颇热心，曾在苏州的甘棠镇（后改名裕棠镇）设立医疗站、消防队，建造裕棠桥。还在上海创办有光裕第一、二、三共三所小学，捐资办慈善和教育达百万元。

1934年后，严裕棠因患心脏病，辞去了他所办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将其企业交给儿子们分别掌管，不再过问企业的具体事务，退休养息，大隆厂务全由严庆龄主持。抗日战争时期，严家企业留在上海，因此他仍旧待在上海。

严裕棠从1902年开办大隆，到抗战前的数十年间，由一个弄堂作坊发展成棉铁联营，拥有三个现代化的大厂，成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

的开拓者和巨擘，培养出一大批的技术工人，对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企业家之一。

1948年夏，严裕棠前往香港，其后由次子严庆瑞迎养，长期侨居于巴西。195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动员他回国。9月23日，他乘飞机途经台湾，被其在台湾开办裕隆机器制造厂的第六子严庆龄劝留，因生气而突发心脏病，10月18日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5—596页。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

1982年5月访严庆祥对严裕棠传记问题的谈话，及提供的有关传记资料。

《严裕棠先生行述》，《国史馆藏民国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第16辑，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573页。

严重

严如平

严重，又名立三，号劬园。湖北麻城人。1892年10月2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二）生。父亲严宜焕，曾在安徽颍州府任职，为官清廉，清介自持，处事公道，政声颇佳。

严重六岁启蒙，少时喜爱读书，广涉博览。时值晚清国贫积弱，他立志从戎救国，于1908年冬考进安徽陆军小学第四期，时年十六。辛亥革命爆发后，严重赴武昌投入起义军，年末入忠义军二营前队，任司书。南北议和后，他返回安徽复学，于1912年末毕业，列优等第一名。1914年3月他入安庆陆军预备学校补习所学习。半后年，转入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1916年9月毕业后升入保定军校，为第五期生，与邓演达、叶挺、李方等同学。严重研读军事理论著作十分专注、勤奋，获益颇多。

1918年9月，严重从保定军校毕业，不久被派赴参战军（边防军）军官教导团，一月后至参战军第二师工兵营任排长。他对北洋军队的封建习气难以忍受，愤而辞职。1919年6月，入交通教练所军官速成班学习，1920年4月又入陆军部无线电传习所就读。他与同学发起组织“道学会”，以发扬优秀学术文化传统、造福社会为宗旨。

1921年冬，严重离京回鄂，经邓演达介绍，他南下广东，到邓铿领导的粤军第一师任职。1923年2月，升任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团附，兼第二营营长。他在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中，率部英勇作战，次第升任团长及留守处主任。他与拥护孙中山的邓演达的友谊日深。

1924年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

合作，并在黄埔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担任筹备委员；军校成立后邓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严重应邓之邀亦调至军校，先任入学试验委员，6月任战术教官，8月兼代学生第一总队总队长，11月代训练部主任，翌年6月任学生总队长，1926年2月任训练部主任，5月任教授部主任。严重军事学识丰富，对教学工作要求严格。他要求学员熟读兵书，通晓各种战术，以备在战场上瞬息万变之时能够迅速作出决定。他讲课时重点突出，要点明确，并出题让学员作出答案。他重视操场和野外教练，让学员把课堂和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在实战演习中进一步学深学透。他在操场讲授步兵操典，还做示范动作带领大家操练，并要求各级带队长官做出表率。他对学员的纪律要求十分严格，见有军容不整、擅自外出或逾时未归者都要批评或罚禁闭，若在校外饮酒惹事、违犯校规更是严惩不贷。同时他对学员视同手足，夜间都要巡查为他们盖好被子，对病号则亲往探视，在医疗和饮食方面一一做出安排。他和学员一起就餐，还从花园洋楼的教官宿舍迁出，住进了校内一间工勤人员住宿的小屋，与学员朝夕共处。对于清寒子弟更是倍加关爱，凡家中有困难的还给予救济。因此广大学员十分敬重他，尊他为“黄埔良师”。

严重在黄埔军校期间，曾先后率领学员参加平定商团叛乱以及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阀的战斗，英勇作战，显示出了优异的指挥才能，更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当时在军校时时发生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的矛盾和冲突，严重不加偏袒，都让军校政治部解决。他敬重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政治教官萧楚女也很称道。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严重先任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8月兼任补充师师长，12月编列为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以黄埔第一至四期的学员为骨干，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倡导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的民主治军原则，全师上下团结一致，作战英勇。他率领所部由韶关经赣州至南昌。1927年1月，隶属东路军第三纵队的

二十一师奉命疾赴浙江衢州。严重要求各团兵贵神速，快速行动，因而全师当月即至龙游、兰溪一带，以出奇兵制胜之势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作战奏捷；继后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彪悍的孟昭月旅苦战数日，指挥所部以夜袭敌司令部而迫使孟旅后撤，歼敌万余。2月15日，严重率师克复新登，继入杭州。二十一师一时被舆论赞为以少胜多的模范师。严重扶掖新人，提六十三团团长陈诚为副师长。嗣后全师继续前进，攻占平望，迫近苏州，进抵松江。旋驻苏州整训。

此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国共合作局面面临严峻之势。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邓演达坚决反蒋，与友谊很深的严重之间书信往还频繁。蒋介石召严重至南京说：泽生（邓演达字）在武汉天天喊要打倒我蒋介石，你同他是莫逆之交，怎不去信劝阻他？严答：自己是革命军人，北伐是要打倒军阀，现在北伐尚未成功，还要继续努力。接着蒋问严身体怎样，副师长陈诚能力如何。严悟蒋之意，即云我的胃病甚重，请准我离职休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能力很强，可以接替我的职务。不久，何应钦至苏向二十一师官兵宣布严师长因病请假休养，陈诚代理师长职。全师上下哗然，何应钦不知所措。严重当即出面制止，并责成参谋长和军需处长交出关防和全部结余十万余银元。交接完毕即只身乘车去杭州，脱去军装换上僧衣住进天竺寺，谢绝一切访晤。

蒋介石在内外重重困境下于1927年8月被迫下野，9月宁汉合流，10月严重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陈诚副之。12月，蒋介石复出，严不愿在南京任事，以父亲去世应守制为辞，携眷返武昌。其时，居正等人提出“鄂人治鄂”，严重有心把家乡建成“三民主义的实验基地”，于1928年2月出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力图实行新政，建设“廉能政府”。他深知地方官吏鱼肉人民之积弊，公开招聘一批知识分子，开办“训政人员训练班”加以严格训练，然后分派到县区任职。严还提出推行地方自治方案、二五减租方案等，但当时桂系军事

实力派竭力控制湖北政局，严的很多新政难以实施；尤其是军方草菅人命，肆意杀害进步青年，更使严重失望至极。他深感自己势孤力薄，无法抗拒滚滚浊流，1928年11月呈请辞职。旋赴庐山，筑草庐“劬园”于太乙村，自号“太乙劬丁”。他洁身自好，谢绝一切友人之馈赠，自食其力，自己挑水砍柴，闭户静心读书，致力研读老庄。对于前来探访的陈诚等黄埔师生，则勉以清正廉洁，民主治军，并劝阻他们不要再来，以免有人疑忌。蒋介石曾两次去太乙村访严，他均避而不见。

严重的执友邓演达在国共分裂后坚持反蒋不懈，并策划军事政变，于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严获悉后深为焦虑，秘密下山去上海、杭州设法营救，曾要求陈诚向蒋介石说项。结果邓于11月23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严悲愤异常，废寝食数日以哀悼，并赴南京为邓料理后事。

享有盛名的严重长期隐居于庐山，为时人所关注。《大公报》有文称他为“当今之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蒋介石颇为不悦，欲将严逐下庐山。陈诚谓严在黄埔师生中声望很大，不如请他去南京任职为好。蒋遂派陈去请严出任军事训练总监或全国禁烟总监，严拒之。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犯我国、而蒋介石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极为忧虑，但报国无门，惆怅满怀。1936年春，他肩挑被褥徒步北上，去陕西谒黄帝陵，沿途考察川山地势，体察民间疾苦，历时三月有余。期间曾偕施方白潜往延安，与毛泽东等交谈对抗日战争之意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严重以“赴国难，求死所”之志，于10月应蒋介石之邀下山。他要求上前线杀敌报国，蒋介石请他去上海视察战局。惟此时淞沪战局已经恶化，严感到须另行从长计议。蒋同意严重提出的下一步以武汉为抗战之中心的建言，遂请严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严一再推让，仍任省民政厅长，旋兼省保安处长，与省建设厅长石瑛、省府委员张难先共同辅佐省主席何成濬，力图为家乡

民众办些好事。

1938年6月，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日大战迫在眉睫，湖北省政府改组，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省主席，严重仍任民政厅长。此前陈诚已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主要精力用于战事，乃请严重负责省政府工作。8月起，武汉时遭敌机轰炸，战局吃紧，省政府各厅局迁往宜昌，严仍坚持留在武昌，直至10月下旬武汉沦陷。11月，湖北省政府又从宜昌迁往恩施。陈诚对严颇尊重，但陈的部属擅自行事，不把严重等人放在眼里。石瑛、张难先等颇为不满，提出辞职；严重亦感到难以为继。但蒋介石、陈诚执意要严留任，并于1939年2月请他代理省主席职，惟财政厅长等人仍我行我素，严不愿与之计较。

严重主政鄂府后，尽力选拔能够守土抗战的将校担任专员、县长等职，鼓励地方官员把民众组织起来坚持抗战。但是他无力阻挡国民党内派系势力的你争我夺，尤其是CC系和军统插手政务，安插党羽，飞扬跋扈。只是他对任何贪赃枉法行为严惩不贷，任凭何人来说项亦不宽恕。他严禁鸦片，对吸食鸦片之公职人员处以死刑；进而以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之名义下令凡吸、售、种、运、藏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对这一全国独一无二的决定，行政院不予备案、司法院提出驳议、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不予批准，蒋介石也不表态，但严重坚持不让。

严重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他曾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现在大敌当前，国亡无日。只有和衷共济，才是唯一出路。汉阳、汉川、监利等地国共合作组织起了抗日武装，他均予以支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推行“限共防共反共”方针，提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重甚为不满，但对有“共党嫌疑”者只能暗中保护。

严重在湖北担任要职三年，清廉俭朴，布衣粗食，与百姓同甘共苦。他曾通令全省，宴会只能四菜一汤。自己去各县巡视时拒不参加

宴请。个别不得不参加的宴请，餐后也交费，并嘱下不为例。对自己的亲属，也是严格要求，不准占贪。

陈诚原对严重颇为尊重，但他忠实推行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方针，在1940年7月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恩施后，常常出席省政府会议干预政务，并提出“军事第一，六战区第一”的口号。严重甚为失望，于1940年8月辞去代省主席职。对于历年积存的“省主席特别经费”，他不拿一分一毫，全都用来救济难民。陈诚挽留严重仍任省政府委员，严坚持不任，拒不领薪。1941年，他离开恩施，到宣恩县办了一个“晒坪垦殖处”，亲自开荒种地；同时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课。垦荒、教学之余，他撰著《〈礼记·大学篇〉考释》，写成后没有交付出版，而是自费印了两百本分赠图书馆和友好。此后又著《大学释义》、《大学辨字》等。还著有《道学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

1944年4月30日，严重病逝于恩施。遗言“有罪”、“要火葬”。身后萧条，遗属全赖黄埔学员接济度日。

主要参考资料

贺存年：《严重传》，《会声月报》第3卷第9期（1944年10月18日，重庆）。

袁守谦：《吾师严立三先生传》，《传记文学》第37卷第6期。

严立三著，袁守谦编：《严立三先生遗稿汇编》，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

师籍：《记严重——立三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1年版。

阎宝航

姜克夫　李侃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生于奉天海城小高丽房村。少时由于家境贫寒，在村里为人放猪。阎天资聪慧，渴望读书，常利用空闲去塾馆窗外听课。塾师出来考问，常能对答如流。塾师怜其才，允免收束脩。阎在塾读完“四书”、“五经”后，又去大旺台读高小。

1913年，阎宝航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预科，1917年毕业。在校期间，阎受到西方文化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认为复兴中华必须从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入手，在师范毕业后，遂联络同学魏益新、张泊等于1918年4月在沈阳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该校不收学费，并免费供给学生书籍、纸笔等，经过几年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和声誉。由于各方面的支援，发展很快，不久在沈阳成立了总校和四所城关分校及实习工厂，招收贫民学生近千人。

阎宝航举办“贫校”获得成效后，渐渐引起上层社会的重视。先是阎在师范读书时曾入基督教，1920年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聘为干事。他利用这个岗位，组织社会问题研究会，举办时事讲演会，以及游艺、旅行、电影等活动，传播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阎还通过青年会的活动，广泛结交上层人物和外国人，特别是与张学良相结识，逐渐成为莫逆之交。

1923年春，奉天青年会干事郭刚自广州开会回沈，带回一批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阎宝航、苏子元、吴竹村等在一起学习这些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第二年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派韩乐然来沈阳开展工作，住在青年会。不久上海又寄来一批《向导》、

《新青年》等书刊。阎宝航通过学习和与韩的接触，逐渐从“教育救国”思想中解脱出来，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1925年春，中共北方区委派任国桢来奉天建党，从此，阎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6月10日，他以“奉天学生联合会”名义，在沈阳组织数万人的游行示威，东北民气为之一振。当年暑假阎宝航倡议办了一所暑期大学，自任校长，由任国桢、吴晓天等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同年底郭松龄反奉失败，阎因涉嫌助郭反奉，不得不隐匿起来。旋去英国游学，1927年秋事息后回国。同年冬，阎宝航曾通过苏子元向中共满洲省委吴立石申请入党，党组织派人找阎谈过话，后因吴、苏相继离奉而中断了联系。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城市掀起了群众性抵日货反日运动，号召以民众力量，督促南京国民政府实行革命外交。沈阳各社会团体的主要成员组成“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公推阎宝航为常委会主席。次年，辽宁各界爱国人士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者指使浪人在满铁附属地公开设立吗啡馆，大肆贩卖毒品，成立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阎宝航任总干事。他们组织学生协助警宪搜查毒品，一次即焚毁价值百万元的海洛因等毒品。此外，他还主持“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经常宣传反日。他利用暑假发动沈阳大中学校学生千余人到附近各县讲演，揭露日本侵华阴谋。阎的爱国反日活动，受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将领的赞赏，同时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仇视，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为此曾数次向东北当局提出“抗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阎宝航化装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阎任该会常委兼政治部长。1933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后，加紧镇压平、津的抗日救亡活动，8月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亦被取缔。阎宝航与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等暗中联合东北军的抗日将领，秘密成立了“复东会”，继续进行抗日复土活动，阎被举为理事长。“复东会”曾创办抗日干部训练班，请共产党

人讲授游击战术等课程，学员结业后派赴东北工作。

1934年，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民众思想上的控制，大搞“新生活运动”。蒋为了拉拢东北人士，指使宋美龄以基督教教友关系，商请阎宝航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阎经张学良劝说，于同年7月接受了书记职务（1937年改任总干事），同时还在国民党军委会挂了个少将参议头衔。从此，阎利用上述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除了完成张学良交给的任务外，并在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营救被捕人员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10月11日，阎和高崇民、卢广绩等去沪探望被关押的杜重远，联名给张学良上书，敦劝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保存实力，准备抗日。“一二九”救亡运动爆发后，流亡在北平、西安等地的东北爱国救亡团体纷纷出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为了营救张学良，阎奔走于宁、沪、奉之间，曾三次去溪口见蒋介石，但无结果。为了协调北方的东北各救亡团体的爱国活动，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阎宝航与高崇民、车向忱、陈先舟、杜重远、卢广绩等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同年，阎宝航再次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经中共东北特支向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报告后，于9月由博古和刘澜波介绍入党。

抗战期间，阎宝航在重庆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做掩护，积极从事上层统战和搜集情报、筹措经费等工作。当时在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人士，大都经济拮据，很多人来到重庆后都去上清寺阎家就食住宿。阎的住宅被同志们戏称为“阎家老店”。由于他的合法身份，他的家成了中共南方局对抗日团体布置工作的场所。阎宝航的活动，自然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曾受到特务头子康泽、戴笠的当面“警

告”，但由于他有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得免遭特务的毒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重庆各人民团体为促使会议成功，组织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每天在沧白堂集会讲演，揭露国民政府破坏政协会议的阴谋。阎宝航是集会的主持人之一。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举行大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却遭到以刘野樵为首的CC特务暴徒的围攻，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多人被殴伤。阎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将受伤者送入医院后，立即向中外记者报告事件真相，及时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面目。随后，阎又奉周恩来指示，联络东北在渝民主人士宁武、刘风竹、宁恩承、王卓然等，组织“东北政治协会”，呼吁建设民主新东北，反对国民党向东北大量增兵。

1946年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示威，并推派马叙伦、胡厥文、阎宝航等十人为代表去南京请愿。当天下午7点半，列车到达下关，代表们刚出检票口，即被特务雇用的暴徒推入候车室内，进行围攻。阎宝航挺身而出与他们辩论。暴徒们气急败坏，狂吼：“你是共产党，跪下！”阎紧握双拳对暴徒们说：“我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敢来？你们手中有枪，开枪好了，侮辱我是办不到的！”阎的凛然正气，使暴徒们相顾失色。请愿团与特务暴徒相持了三个多小时，至夜11时，暴徒趁四周群众逐渐散去，冲进候车室行凶，阎宝航、马叙伦、雷洁琼均被殴伤。请愿团的英勇斗争，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高度赞扬。

同年8月，东北各界人民代表在哈尔滨举行会议，选举阎宝航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阎遂返回离别十五年的家乡。不久，他被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为辽北省政府主席。在职期间，他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投入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发动农民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春，平津解放后，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筹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将阎宝航调来任筹备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条约委员会主任。1959年4月，周恩来在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号召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士写历史回忆。此时阎宝航已年过花甲，自觉难以胜任繁剧，乃辞去外交部职务，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参与文史资料工作。

1967年，阎宝航在“文革”中被诬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成员，于11月7日被捕狱。1968年5月22日阎宝航去世。1978年阎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他一生为革命所作的贡献，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赞扬。

主要参考资料

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复土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张韵冷：《社会教育家——阎宝航》。

苏子元：《怀念共产主义者阎宝航同志》。

黄胄：《回忆恩师韩乐然同志》。

周大文：《张学良将军学生时代的志趣》。

阎宝航：《七年来东北同胞的奋斗》，《反攻半月刊》第3卷第5期，1938年10月武汉版。

商闻实：《“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

辑》，1979年版。

阎宝航：《关于东北问题》，1947年版。

曹峥岩：《阎宝航同志生平纪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胡耀邦：《在阎宝航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

阎锡山

刘存善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阎九岁入私塾，十四岁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与金融交易。1900年经营失败，父子两人逃往太原躲债。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定了同盟会“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确定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1)]。

1909年，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列上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少尉）的军衔。不久，升任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

辛亥武昌起义后，阎锡山等同盟会员于10月28日决定发难。29日晨，新军八十五标内的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总司令，率部攻入城内，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清政府急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并任命其为山西巡抚。吴是个革命者，11月4日与阎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会

后，山西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不料袁收买吴的卫队长于7日晨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清政府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第三镇曹锟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2)]。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前者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进军，后者配合陕西民军攻克运城并围攻临汾。不久南北议和，阎率部南归，于1912年2月18日行至忻州时，被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命令停止前进，意在消灭之。阎锡山幼年熟读《中庸》，深谙“骑墙”之道，遂一面向孙中山求救，一面向袁世凯输诚。袁世凯在实行“军民分治”剥夺阎民政权力的条件下，于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于4月4日回到太原就职。

1912年9月，孙中山应邀到太原访问，特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3)] 从此，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的阎锡山自知反袁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保存实力，遂韬光养晦，对袁百依百顺；袁防阎造反，继续削弱阎的权力并派员监视其行动。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举为参议。袁世凯对国民党横加摧残，阎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11月又奉袁之命将山西各地的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袁世凯为了进一步削弱阎的势力，将归绥道改为绥远特别区，划出山西的行政区划之外；又派亲信金永出任山西民政长、巡按使，监视阎锡山并肆意迫害原同盟会员与反袁人士。袁又调阎晋京面审，阎佯装无能与恭顺，取得袁的初步信任。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两万元，接着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并恳请袁“以大有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

自胜，批复“颇有见地”，称帝后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又依附于段，得于1916年7月改任山西督军，继而于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他在府院之争中站在段祺瑞一边，又响应段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复辟；还派晋军第一旅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攻打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附段，遭到外界的责难，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4)]。后来他把这概括为“保境安民”，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尽力“不偏不倚”地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于1917年10月开始，在山西推行六政三事，即推行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种棉、造林、畜牧；推行发展民德、民智、民财的用民政治；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整理村政，订立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颂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者，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这使山西免受兵燹之害，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从而获得“模范省”的称号。

在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的混乱局面下，阎锡山认识到保住山西这块地盘，没有强大的实力是不行的。他把原来的修械所扩建为可以制造步枪、机枪和大炮及其弹药的太原兵工厂，又把军队由四个旅编为十七个师。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阎锡山应冯之请出兵石家庄，阻截吴佩孚由河南北上救曹。11月15日，段祺瑞在冯玉祥、张作霖等的拥戴下又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月17日，段取消各省督军，任阎为督办山西军务善后事宜，简称

督办。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攻占武汉后请阎响应。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也竭力拉阎入伙。阎认为“世上无论何事，均只有一个好处，此恰好处即是中”[(5)]，得中则成，失中则毁。他要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中”，这个“中”暂时就是与各方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如若现时响应北伐，在北方孤军作战，于晋不利。直至北伐战争次第推进到湘、鄂、闽、赣、皖、浙、苏诸省，吴佩孚与孙传芳部均被打垮，他才认为响应北伐的恰好时机已经到来，遂于1927年6月6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于5月25日任阎为国民政府委员，又于7月7日推阎为中政会委员。9月29日，阎锡山终于誓师讨奉，欲向北京进军。不料国民党内部纷争正酣，北伐军未能及时响应，山西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进入1928年，国民党决定北伐奉张，南京国民政府于2月28日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又任命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攻克保定，并向京津进军。6月4日，国民政府任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于8日率先进入北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的军政大权，成为雄踞华北的实力人物。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任阎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四、五届连任）。

北伐结束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总司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1929年初，蒋拟通过编遣会议，裁减军队以削弱异己，阎曾提出有利于蒋的裁军方案，会后各方消极对抗，李、冯先后兴兵讨蒋，阎则以与冯相偕出洋相挟。6月28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将冯软禁以自重。此后，蒋、阎双方钩心斗角，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拒绝就职，并于8月27

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职。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直到11月5日始行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蒋派监察院长、阎的高级幕僚与挚友赵戴文回晋劝阻，阎转而反唐，亲任总指挥赴郑州指挥作战。蒋密令何成濬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捕阎，阎得悉后迅速返回太原。

此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反蒋各派代表云集太原促阎举事。阎将晋军扩充为十个军、四个保安纵队、四个骑兵师和七个炮兵旅，共约二十余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由冯指挥所部共同反蒋。

经过宁、晋双方通电互相指责之后，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出兵讨蒋。4月1日，阎、冯、李分别在驻地宣布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斥责蒋“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今“应军民之请求”决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南京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双方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陈兵百万，中原大战全面展开。战争初期，晋绥军占领济南，蒋介石在陇海线上的柳河车站险些被虏。但反蒋各军貌合神离，有的观望不前，有的叛变投蒋，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朝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另组政府，推举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张学良虽被反蒋各派举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

并受到蒋方与反蒋方的竭力笼络，但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待到战局日趋明朗之时，即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挥师入关。面临夹击之势，反蒋战事全线崩溃。阎锡山不得不于11月4日通电下野，12月潜赴大连避难。

阎锡山在大连期间，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一面总结从政经验，研究当前政局。他提出“物劳主张”，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产多少物发多少），可以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他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创立了一种“中的哲学”，作为自己周旋于中国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三种力量之间的政治谋略。他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达到适中；人事以生存为最高真理。当阎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飞行员，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山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敌当前，蒋介石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2年2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在拥蒋的前提下，全力从事内部建设。在经济上，到抗日战争前夕，他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电力、化工、机械、兵器、造纸、卷烟、印刷、皮革、火柴、毛纺、印刷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以兵工修了八百六十公里的同蒲铁路，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成立了山西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总资本达到二亿银元[(6)]，奠定了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基础。在政治上，他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力图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抵抗异己的各种政治组织。

1935年，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炮制华北事变，接着唆使华北五省实行自治。阎锡山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以“防共保乡”为号召。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抗日，晋绥军欲加抵抗而

遭失败，蒋介石派五个师来援；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后，蒋又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

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寻求适于存在的“中”：蒋是国家元首必须拥护，但又害怕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必须抵抗；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还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最终形成了在拥蒋前提下的联共抗日的路线。1936年8月，日伪军入侵绥东，他提出“守土抗战”[(7)]的口号。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阎任会长。10月，阎邀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11月，晋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在绥东对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嗣后，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抗战的局面形成。阎还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又根据中共建议，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第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9月，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在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村指挥作战。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歼敌千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接着，我军又在忻口与敌血战二十三天，予敌重创。由于敌强我弱，太原于11月8日失守，阎锡山南撤临汾，整顿军政，新军发展为五十个团，约五万余人，百分之七十的专员、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阎还公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和民族革命同志会，阎任会长。

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临汾失守，山西大部城镇被敌占领。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反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

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建立了根据地。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日益强大，阎锡山感到对自己的存在构成威胁，遂于1939年3月在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但受到新军领导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发动旨在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但以失败告终。“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告终，从此他只能控制晋西南二十多个县。

在新的形势下，阎锡山研究他与三方的关系，寻求新的“中”。他认为共产党与八路军可能对他进行报复，是威胁他的主要敌人，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他不能三面树敌，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军这张牌以应付局面的念头，而这正与日军对阎诱降的策略不谋而合。1940年夏，双方代表开始接触，阎以“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为原则，1941年8月11日，在汾阳县城内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汾阳协定》），双方商定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8)]。阎的联日反共路线开始形成。

为使这一路线得以推行，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以树立绝对权威；对军政人员进行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9)]；还令其政卫组等保安机构，“肃清伪装分子，净白阵营”，作出与日伪合流的姿态。

为了把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八路军在山西与阎划定驻军界限，互不侵犯；蒋介石也增加了对阎的经济支援。阎锡山找到了在矛盾中适于生存的“中”，乃得安居于晋西南一隅之地，中辍了《汾阳协定》

的实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酋邀阎锡山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议（安平会议），逼阎履行原订条件。阎本其“中的哲学”，认为过犹不及，失中则毁，交往是中，脱离国民党则过，于是托辞拒绝，午休时逃会[10]。日军进行报复，双方关系一度紧张。之后，双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又行勾结，阎派其干部担任伪职，并发给伪县长以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阎在日军保护下，于30日回到太原。

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军向上党地区进军，在日军第十四独立旅团及伪军的配合下，进入长治及其周围数县。长期在此抗击日军的八路军，于9月10日奋起反击，国共两党的内战首先在山西打响。阎急调两万余人增援，不敌晋冀鲁豫部队的回击，先后损失达三万五千余人。从此，阎背离“中的哲学”，拒绝局部和平设想，一面应付军事调处，一面强调一切服从国民政府，积极备战。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名义积极响应，继续推行“兵农合一”政策，强化特务统治，开展“三自”专训（自清、自卫、自治），曾处死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与涉嫌人员；但其军队却不能阻止解放军的前进。1948年7月太原被围，阎乃将手中资产一一变卖，嗣后将库存金银运往上海。1949年3月29日，阎以应邀赴南京“商讨国是”为由，飞离太原。4月24日太原解放。

之后，阎锡山在广州居中调和蒋介石与李宗仁间的矛盾；6月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提出“扭转时局方案”和“全面作战计划”等，企图挽救国民党已经崩溃的残局，然而人民解放战争以席卷之势迅速推进，阎锡山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阎锡山及其政府机构于12月8日从成都撤往台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移居台北市金山之麓，从事著述《大同之路》等。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其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抗战复兴言论集》等。

---

(1) 孙中山：《在太原商学界宴会的演说》（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1页。

(2) 景梅九：《罪案》，京津印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北京版，第224、235页。

(3)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近代史资料》第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又见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4) 《重庆日报》1920年8月25日。

(5) 阎锡山：《中说》（1918年9月20日），《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2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1937年1月编印，第65页。

(6) 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山西《党史文汇》1992年第8期。

(7)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938页载："1936年8月12日，伪满军李守信准备大举侵犯绥东。（阎）急电傅（作义）主席加紧防御，并提出守土抗战号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8) 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曲宪南：《对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一文的订正》，见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5年）。

(9) 《阎锡山日记》（手写本），1941年7月21日、5月25日。

(10) 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曲宪南：《对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一文的订正》，见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

颜福庆

谈松华

颜福庆，字克卿，1882年7月18日（清光绪八年六月初四）出生于上海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父颜如松是牧师，在颜福庆八岁时去世。兄弟姐妹五人靠寡母任教堂女布道和江湾小学教员薪给抚养成人。颜福庆幼年寄居伯父颜永京家中，和堂兄弟同窗求学，受堂兄颜惠庆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尤深。颜永京曾任上海圣约翰学院校长，颜福庆于十二岁（1894年）时入圣约翰中学读书，1898年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学医，1903年毕业。

1904年，颜福庆报名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当华工医生，专为矿工治病，服务成绩卓著，1906年矿工集资授予金质奖章一枚。在南非的医疗实践中，他深感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之不足，遂以自己的积蓄和岳父曹吉福的资助，于190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进修，1909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随后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进修。

在耶鲁大学进修期间，颜福庆参加了“雅礼会”。这是一个以帮助中国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为宗旨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组织。当时参加该会的还有孔祥熙、马寅初等人。该会在长沙办有雅礼医院，因院务全由美方把持，不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急需中国医生参与其事。颜福庆于1910年回国，在雅礼医院任外科医生。经过他的一番努力，雅礼医院同当地士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地方的关系也因之有所改善。

1913年，湖南都督谭延闿批准在长沙创办医校。同年，湖南育群学会出面与雅礼会订约合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将雅礼医院和护士学校附属之。由育群学会和雅礼会各举董事十人监理一切，颜福庆被

举为首任校长。湘雅医校初设预科，1916年开办本科，1926年改名为湘雅医学院，颜仍任院长。

颜福庆目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多为教会医院外籍医生把持的现状，遂发起组织我国医务工作者自己的学会。1915年趁“中国博医会”（外籍医师所操纵的医学团体）在上海举行年会之际，颜福庆团结上海医务界的一些前辈，创立了“中华医学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该会办有《中华医学杂志》。

1926年底，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湖南，医院工人和护士罢工要求改良待遇；学生罢课要求辞退不合格的美籍教师，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要求均未得到圆满的答复，院中美方人员声言要关闭医院，拒绝接受中国病人，停发工人薪饷和津贴，并准备运走院中重要设备。医院工人坚持罢工两月余，学生亦坚持罢课。湘雅医学院遂告停办。

1927年，颜福庆受聘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协和系由美国人员把持，颜福庆决心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第四中山大学拟设八个学院，颜出任“中大”医学院院长，院址设于上海，由乐文照、高镜朗等人负责具体筹办事宜。1928年6月，颜福庆辞去协和医学院的职务，抵沪就职。不久，该院改名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由南京政府拨发经费。该院于1932年脱离中央大学而独立，称国立上海医学院。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吴淞为日军侵占，上海医学院迁至市区红十字医院附近。红十字医院条件陈陋，颜福庆经过五年的努力，获捐款一百万元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地产，在枫林桥购地建造附属中山医院和医学院校舍。之后，又接受犹太富商、官僚、士绅的捐助而增建第二实习医院、护校、药专和病房等设施。至此，上海医学院初具规模。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颜福庆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伤兵救护工作，组织救护队赴华北前线服务；组织上海医学院全体师生参加救护上海抗日伤员的工作。新落成的中山医院成为伤兵收容总站，从这里将伤兵分送市内三十余所伤兵医院。中山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在该院沦入敌手前半小时，把最后一批伤员三百余人转移到租界才离开，医院被日本侵略军占作陆军总医院。上海医学院再度迁至红十字医院，之后，部分人员迁往重庆办学。颜福庆亦随国民政府人员撤退到武汉。1938年2月，颜出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不久随署撤退到重庆。1940年，他因患胃溃疡辞职赴美治疗，同年病愈抵香港，1941年4月，由香港到达已成“孤岛”的上海，任上海医学院教授，从事公共卫生教学工作，直到上海光复。1946年他访问欧美诸国，看望和勉励上海医学院的出国进修人员。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医学院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颜福庆任该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1951年后一直担任上海医学院（后改名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1950年，颜福庆任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组织三批志愿医疗手术队和防疫检验队奔赴前线，从事医疗救护和反细菌战工作，并亲随代表团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伤病员。颜福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1957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三十周年校庆时，卫生部给予嘉奖。

颜福庆毕生从事医学教育，坚持严谨的学风，严格执行学生录取标准和考核制度，提倡“公医制”，要求医学院教师不兼私人开业，专心从事教学、科研；注重教师的培养和淘汰制，规定教师定期于国内外进修，提高师资水平。我国早期的医学专家，如张孝骞、汤飞凡、应元岳、高镜朗以及美籍病毒学家李振翩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35年后，他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中国医学院校和医院的经济财政管理》和《中国医学教育的现在和过去》等论文，对医学教育多所论述。

颜福庆长期热心于公共卫生事业。早年他曾赴拉丁美洲参加钩虫病防治。1911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颜在京汉铁路沿线开展防治工作。1914年，他赴美进修，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学位证书。1916年他到江西萍乡煤矿从事流行病学调查并参加防治工作，分别获得奖牌、奖状等嘉奖。1918年至1920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发表有关钩虫病流行及其防治工作的论文；1927年前后，又在《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上分别发表有关我国中央卫生机构的建设意见。在上海医学院建校之初，他倡导开设了公共卫生课程，创办了“吴淞卫生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打下乡村卫生工作的基础。抗战时期，他在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任内，在各地设立公路卫生站七十二处，以应战时大量军民转移之医药卫生需要，并设想战后将这些战时卫生站改为卫生院，以贯彻其加强公共卫生事业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颜福庆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参加九三学社，任该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并任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0年11月27日，颜福庆在上海因病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国高等学校简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朱裕庭、戎恭炎：《颜福庆和上海医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戴天右：《颜福庆》，黄家驷主编《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第1

卷，湖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有关文章。

颜惠庆

娄献阁

颜惠庆，字骏人，原籍福建厦门厅（今厦门市），1877年4月2日（清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生于上海。父亲颜永京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任翻译，后入基督教成为牧师，在上海、武汉传教多年，曾任圣约翰书院院长数载。母亲也受过新式学堂教育。

颜惠庆自幼获父、母启蒙，初识中、英文字。稍长入塾，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诸书，同时学习钢琴等乐器。1880年前后，颜家由虹口迁居圣约翰书院住宅区，使他有机会接触住区内的美国人，并同美国儿童一起合聘美籍妇女为家庭教师。此后数年，颜陆续就读于圣约翰书院、英华书塾和同文书院。由于他能刻苦努力，各门功课成绩均佳，总是名列前茅。

此后，颜惠庆在家自学一段时间，除由父亲帮他补习数学及拉丁文外，还请了一位理学士和一位老秀才进行辅导，为出国深造做准备。颜曾学作八股文与试帖诗，读过不少中国的古籍、古典小说和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人的外国文学名著。同时他也经常外出游览，并短期充任私立学校及私人的英文教员。

1895年10月，颜惠庆自上海赴美国留学，于翌年1月进亚历山大市郊的圣公会中学学习。他担任过班长与校刊编辑，并任黑津文学会书记一年。颜学业出众，毕业时获得了“英文作文和辩论的金质奖章，及全能超越的奖状”[(1)]。

1897年秋，颜惠庆升入弗吉尼亚大学，除按规定修毕德文、拉丁文、数学、经济学、通史、哲学、英国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外，还

加选了哲学史、国际法与宪法两门自己喜欢的科目。留美期间他到过纽约、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一些村镇游览、度假或从事社交活动；又加入共济会及基督教青年会；短期担任乡村主日学校教师；有时也替中国驻美公使馆帮忙做些事情。1900年6月，颜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8月返回上海。

颜惠庆归国不久，即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中学部英文、地理和大学部数学、英文修辞与作文。他在该校工作六年多，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学识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颜不仅积极参加校内各种活动，又发起组织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还业余阅读了《新政真诠》和《劝学篇》等新书，并结合教学译著了《翻译捷径》等书籍。

颜惠庆在1905年一度兼任上海《南方报》英文版编辑，开国内报纸编英文版之先河。同年，他着手主编《英华大辞典》，得同事协助，遍搜旧典，博考群言，费时两年，草成三千余页初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图画精详，移译审慎，“集华英诸合璧之大成”[(2)]，对沟通中西文化有一定助益。

1906年9月，清政府举行留学欧美毕业生考试，颜惠庆前往北京应试，成绩优异，名列一等第二，授译科进士，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被分发到学部任事。但颜仍回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被该校赠予文学博士学位。

1907年冬，颜惠庆作为中国驻美使馆二等参赞，随公使伍廷芳赴美。除负责起草使馆所有咨送美国政府之照会、备忘录的主稿和英文函札的答复，以及接见新闻记者外，还兼管留学生事务。曾赴哥伦比亚、哈佛、麻省理工、西点军校等学府视察，也常陪同伍廷芳去美国各地及墨西哥、古巴诸国处理有关公事。颜公余还刻苦自学国际法，并入华盛顿大学进修；又加入美国国际法学会，为终身会员；他在国际俱乐部的活动中结识了不少知名人物，外交才干日益提高。

1910年初，颜惠庆奉调回国，充外务部主事，分管新闻处工作，负责接见外籍驻北京记者，协助发刊英文《北京日报》。同时兼职于学部审定名词馆，协助严复从事审定工作。不久颜再应殿试，被授翰林院检讨，很快升任外务部参议（四品京堂）。1911年，他曾代表外务部与英方谈判印度输华鸦片案，几经商谈，最后签订了《禁烟条件》十款，规定印度逐年减运鸦片来华。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颜惠庆接任外务部参议，多次陪袁访问外国驻华公使，以谋取帝国主义的支持，遂得到袁的器重，被擢升为外务部左丞。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颜出任外交次长。袁世凯十分重视外交事务，常召颜惠庆至官邸询问有关问题。当时内阁不断变换，外交总长迭经更易，但他仍任次长如故。

1913年春，经陆徵祥推荐，颜惠庆出任中国驻德（意志）、瑞（典）、丹（麦）三国公使，长驻德国柏林。他忠于职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频繁与三国朝野要人及各国公使往来，多次到德国各地和瑞典、丹麦参观，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鉴于只通英语在外交方面不敷应用，颜努力补习德文与法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年7月和翌年6月，他曾两次出席在荷兰举行的国际禁烟会议，参加签订了有关条约，但因受到贩毒国的阻碍，未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使馆工作受到种种限制，颜惠庆仍能想方设法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战事进展情形，随时报告北京政府。8月，他奉命访德国外交部次长及海军部次长，希望德方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遭德国拒绝，结果该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很快被日军占领。1917年3月，中国宣布参战，加入协约国方面，中、德绝交，颜移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颜留此三年，同各方广泛联络，对了解战况、观察各国动向有不少收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协约国胜利结束，英、法诸国于1919年初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我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应邀出席，颜惠庆奉派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税自主、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等项合理要求，然而均未被大会接受，相反大会竟默许日本帝国主义对我领土之侵略；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义愤，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颜对巴黎和会颇感失望，不待会议结束即离开，提前返回哥本哈根任所，并于翌年夏归国述职。

1920年8月，颜惠庆奉总统徐世昌命入阁，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当时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与奉系时而联合时而冲突。内阁周旋于两大系之间，不断更迭，很难有所作为。颜属英美派，接近直系，在此后两年的历届政府中，他均长外交，并两次兼代阁揆，一时成了遐迩闻名的风云人物。在外交上颜惠庆基本奉行亲英美路线，但也注意同日本的关系，力图解决中日间的某些悬案，不仅办妥了两三件地方性的交涉，还废除了《中日军事协定》等密约。惟山东问题众目睽睽，日方多次要求直接谈判，他不敢轻易答应，只表示此案不能按照《凡尔赛条约》处理。这期间，鉴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一再声明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华特权，经颜提议，北京政府曾宣布停止帝俄外交人员待遇，分别接收帝俄在天津、汉口之租界及在哈尔滨之法院，停付其庚子赔款等。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反对，中国政府没有同苏俄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他还主持与德国缔结了复交条约。

同年11月，由美国发起的九国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开幕。颜惠庆对该会议十分重视，会前在外交部特设筹备处，自任处长。他为挑选与会人员和筹措经费多方磋商，很费周折，且通过内阁拟定了详细的指令及章则。他本打算亲自赴美参加会议，终因政务不能脱身而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等出席，自己则在国内密切注视

会议进展，以便对重要问题及时作出裁决。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等项要求，结果均未能得到圆满解决。关于山东问题，施等得颜同意，在英、美代表调停之下，与日方进行多次会外谈判，最后于1922年2月达成妥协方案：日本归还强占之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及其公产，中国十五年赎回胶济铁路，在赎回之前得用日本一人为车务长、一人为会计长。此外，颜还允准中国代表团在《九国公约》上签字，确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这对中国的权益不无损失。

1922年四五月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奉系战败退守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为了早日把曹锟捧上总统宝座，并拆南方政府的台，直系将领打起了“统一”的旗号，演出了“恢复法统”、重新召集第一届旧国会、驱徐（世昌）迎黎（元洪）等一幕幕闹剧。6月，黎元洪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仍兼外长，想借他拉拢列强承认其总统地位。但是内阁成员多为应付各方而七拼八凑，先天就不健全，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因亲信没能入阁扬言将不予批准；更由于“统一”、“废督裁兵”失败以及财政上的困难，黎、颜之间也常发生龃龉。颜惠庆坚决提出辞职，暂时退出中枢机关，仍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华洋义赈会主席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1923年10月，直系首领曹锟以贿选当上了总统，颁布了“曹记宪法”。翌年1月，颜惠庆再次入阁，任农商总长。1924年9月，内阁改组，颜复任总理，并兼内务总长。同时，他还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等不少兼职。然而曹锟的贿选丑行受到各方痛斥，全国反直浪潮汹涌，直系内部也起了分化，致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曹吴惨败。颜内阁本是在吴佩孚支持下成立的，实为吴手下办理外交和筹措军饷的一个机关，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曹、吴而倒台。同年11月段祺瑞登台执政后，先后命颜出任驻英公使和外交总长，他均未就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面对人民反帝运动高潮，颜惠庆也发表谈话，对上海工部局有所批评，但表现软弱。他提出将租界治安权暂

交中外秩序维持会，先使各业复工，停止罢工罢课罢市，然后再对抚恤、惩凶、撤警各条慎重计议的主张，没有引起反响。旋北京政府派颜为全权代表，参与“沪案”交涉。他不敢得罪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交涉中畏首畏尾，不愿多负责任。

同年10月，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颜惠庆为出席代表之一，负责主持第二委员会（即过渡办法委员会）甲种小组讨论会，协商整理内外债问题。他所提出的办法已有所妥协，无奈列强仍不肯接受，只好搁置缓议；会议断断续续，拖延许久，最后不了了之。

1926年初，张作霖、吴佩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重新联合，共同对付冯玉祥。4月，冯军撤离北京之前，将段祺瑞赶下台，北京政府一度陷于中断，由王士珍等组织临时治安维持会，颜惠庆亦曾参与其事。5月中旬，在吴佩孚敦促下颜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但是吴佩孚与张作霖在政治上颇多分歧，多数阁员感到前途暗淡，不肯到任就职，使颜惠庆成了孤家寡人，只能勉为事实上之维持，挨到6月下旬，终因遭到奉张的反对而通告下野。

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后，为了笼络和安抚各方名流，先后成立各种委员会协助内阁工作，颜惠庆被任命为外交委员会委员，但他态度消极，很快移住天津。颜在津的四年中，做过大陆银行董事长、南开学校董事会主席及其他几家公司的董事，从事金融企业和文教慈善事业活动。同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人亦蛰居天津，颜同这些旧交来往频繁，对国内外政局多所议论。1930年中原大战时，汪精卫、阎锡山等反蒋（介石）势力曾在北平另组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阎想拉颜惠庆充外交部长，颜不愿卷入政争，婉言拒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颜惠庆应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电邀至南京，并受聘为“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出席有关会议，研究对策，应付危机。他曾提出容许党外人士参加政府问题，

但未被采纳。旋奉派任中国驻美公使，于11月离国前往华盛顿赴任。

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和“调停”之上。1932年1月，颜惠庆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由美国赴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他多次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和特别大会上驳斥日本代表的谬论，用事实谴责日本的野蛮罪行，并在会下广泛展开外交活动，力图促使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得到不少国家的同情，但是操纵国联的某些大国态度冷淡。颜曾先后援引《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和第十、第十五条，冀望国联主持正义，而列强始终不愿采取有效行动。

同年12月，颜惠庆在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军缩会议时，在会外同苏联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达成了中苏复交的协议。1933年1月，颜被南京国民政府特派为驻苏大使，于3月初抵莫斯科莅任。颜使苏三年，为恢复和增进两国邦交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他曾起草有关中苏商务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两纸，结果未被南京方面采纳。颜认为苏联的建设成就和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条件的改善，其外交路线和国际政策事事翻新，是在进行空前的伟大试验，冀望发现人类幸福之路的一个国家。但他对苏联将中东铁路售给日本以及人民“生活单调”、“消息闭塞”等也有所批评。这一时期他还三次奉命去伦敦、日内瓦出席世界经济会议与国联会议，并多次游历欧洲各国。

1935年“何梅协定”出现后，颜惠庆曾提出抗议，至1936年初他已年届花甲，渐觉精力不济，决意退休归国。颜卸任之后，重返天津居住，被几家商业组织聘为董事，天津自来水公司且推选他为董事长。他还继续参加文教、慈善等公益活动，常到北平办事。主政平、津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多次向颜征询有关对外交涉方面的意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颜惠庆正在青岛避暑，因无法回天津而南下上海。旋淞沪之战发生，他积极投身抗日行列，被推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颜与委员会诸人努力争取国外对我国抗日的支持

和援助，成效显著，募款达美金三百五十万元，以救治抗战伤员和赈济难民。同时他还应邀参加国际关系学会。

1939年，太平洋研究会（通称太平洋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海滨举行年会，颜惠庆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参加。该研究会侧重探讨太平洋区域各民族的相互关系，颜在发言中据实陈述我国抗战的正义性和重大意义，受到与会各国的重视和支持。他在赴美途中曾在印度访问尼赫鲁，抵美国之后还会见罗斯福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政府要人，又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赢得了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

颜惠庆在美国弗吉尼亚开会时，忽接蒋介石自重庆打来电报，邀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颜颇感意外，以不明政府最近决策为由恳辞。自美返国后，暂留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被日本侵略者羁押。日军将领曾两次找颜谈话，问他个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他虚与委蛇，终不为敌人所利用。颜在香港期间写成英文自传一本，记其生平甚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被选为上海市参议员，并任联合国远东救济与复兴委员会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撕毁政协会议达成的协定，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到1949年初，蒋介石战败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想用“和谈”来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亲赴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3)]帮助搭桥，沟通国共谈判的道路。颜等乃于2月间率“上海人民代表团”北上接洽和谈，受到中共中央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容纳他们的意见，接受李宗仁的和平谈判要求。然而在其后国共谈判中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终被国民党方面拒绝。随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南京和江南广大地区。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一再胁迫颜惠庆同走，他则以“我生在上海，死也得在上海”[(4)]为辞毅然拒绝。

上海解放后，颜惠庆积极主持临时救济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的工作。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颜是特邀代表之一，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0年5月24日，因心脏病逝世于上海。

---

(1) 颜惠庆英文原著、姚崧龄译：《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2) 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例言》，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李宗仁回亿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933页。

(4) 赵朴初在上海各界群众追悼颜惠庆会上的讲话，《大公报》1950年5月24日第4版。

晏阳初

吕乃澄

晏阳初，字东昇，四川巴中人。1893年10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七日）生。父亲晏美堂，是当地著名中医。晏阳初五岁启蒙，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受孔孟思想影响较深。因科举废除而攻读西学，入教会办的华英学校。十一岁受洗礼入基督教。不久由华英学校保送到成都入华美学校。1913年毕业，旋即考入香港大学。

晏阳初于1916年赴美国留学，入耶鲁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受到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美国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1918年他在耶鲁大学毕业后，6月去法国替华工当翻译，一心想要“替华工争公平的待遇，替中国争口气”[(1)]。他分在一个有五千名华工的军营，发现华工思家心切、却有不能写寄和阅读家信的痛苦，便自选简易常用汉字千余个教给华工；不久又自编《华工周刊》传播新知，自己写稿，用钢板刻写，印发千份，立志为平民教育献身。在晏阳初看来，“愚”、“贫”、“弱”、“私”是中国人的四大病源，中国受列强欺侮的根源亦在于此，因此，欲救中国之危亡，惟在启发平民智慧，此即“造人”问题。他认为，中国之富强，不在于开煤矿铁矿，而须先开脑。他以“教人做整个的人”作为其平民教育的目的。他所谓“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要有公共心”[(2)]。他把中国人民没有文化和贫病交加的现象，作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而认识不到造成这些现象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制度桎梏社会生产力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晏阳初回到美国继续进修，192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历史硕士学位。1921年，他回国到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并在余日章主持的上海青年协会中任平民教育部主

任。他编写《民众千字课本》，于1922年3月在长沙开展识字运动，有一千三百人参加学习。他还培养了一批义务教师。长沙识字运动的成功，促使基督教青年会在其他城市推行。1923年，晏应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的妻子朱其慧的邀请到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自任干事长，推动和协助各地开办平民学校、工人夜校，推行《民众千字课本》。他还广泛收集民间故事、农业生产歌谣、农村卫生知识等，编写出版“民众丛书”，为新识字的人提供读物。在晏等人推动下，平民教育一时得到蓬勃发展，同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平民教育运动协会，他为执行秘书。1925年，晏利用出席第一次太平洋关系会议的机会，到檀香山大力宣传平民教育，赢得美国一部分人士的注意和华侨同胞的同情，得到爱国华侨慷慨捐助两万美元，作为开展平民教育的基金。

在政治风云激荡多变的20年代，晏阳初主张以超然的立场处之。他曾表示：“平教会应该是一个学术性质的社会团体，它是独立的、超然的。”[(3)] 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平民教育运动必须以农村为重点，以文字教育为基点，以农村建设为目标。1926年，他以河北定县作为乡村建设试验区，先从翟城村做起，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进而发展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工作纲领。所谓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疗“愚”，“生计教育”以疗“贫”，“卫生教育”以疗“弱”，“公民教育”以疗“私”；所谓“三大方式”，即是“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他推行的“四大教育”中，特别重视“生计教育”，主要是推广优良的猪种、鸡种、小麦种、棉花种，并开办合作社、合作金库等等。他说：“我们的生计教育，就是要打倒封建地主土豪的特权，以达粥饭大家吃的理想。”[(4)] 由于没有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他的理想难以实现。

令晏阳初困惑的是，平教会的工作受到当地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的抵制和破坏，这使他不得不放弃政治上的“超然”立场，提出“政教

合一”的主张，想利用行政权力来推行平教会运动。他乘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到定县视察之际，与甘商定把定县作为“政教合一”的实验县。

为筹集平教会基金，晏阳初于1928年再次赴美。他应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之邀到各地讲演，获得五十万美元。他在美国接受耶鲁大学荣誉硕士学位，回国后又获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九一八”事变后，晏阳初约集平教会百余人在北平西山卧佛寺开会，拟订了平民教育“六年计划”，提出要以救亡图存的精神办平民教育，并着手编写五百种平民教育读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翌年，他与梁漱溟等人发起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晏以“特聘专家”身份出席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参加讨论各省设置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办法。他的主张符合国民政府加强县乡政权统治的需要，在会上受到欢迎，有些省也开始设立实验县。晏的平教会在定县设立了“县政建设研究院”，县政府成为研究院的实验部，由平教会推荐县长。从此，平教会与国民政府县乡政权建设合一了。

1935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全国各省实行县政改革，设立实验县，于是湖南、贵州、四川等省都电请晏阳初去办实验县。晏即布置他的工作人员到这些省去工作，而以河北定县为样板。此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一百万美元组织“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的平教会和燕京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以及国民政府卫生署等均参加了这个组织。从此，美国开始介入中国的“农村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晏阳初率领平教会南撤。1938年初，在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支持下，晏开办县政研究班，推广定县的做法，实行新县制。其后晏到四川，任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持县政改革，以新都为实验县。由于该县县长陈开泗实行警官制度，压迫农民，引起“新都民变事件”[(5)]，使“县政改革”声誉扫地。晏并未气

馁，继续培养人才，于1940年在四川巴中县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学院”（简称育才院），自任院长，得到蒋介石和四川省主席张群的支持。该院于1945年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设有农田水利、乡村教育、社会学、农学四个系。

为了筹募平民教育会和“育才院”的经费，晏阳初1942年又去美国，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平教会“中美委员会”，委员有罗斯福夫人和赛珍珠（Pearl S．Buck）、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华莱士（Henry R．Wallace）、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霍勒等。他还到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地演讲，宣传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主张。1943年5月，他被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推荐为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之十大世界名人之一，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杜威（John Dewey）等九名美国科学家齐名，称颂他是“一种简易中文的发明者，开启了千百万文盲的智慧”，“他是本国人民的一个领袖，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增加了他们劳动的果实”[(6)]。他还获得锡拉丘兹（Syraquse）大学、缅因（Maine）大学、坦普尔（Temple）大学、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期间他曾到古巴去帮助开办“平民教育”，还几次到白宫去拜访杜鲁门，1945年被美国政府聘为“全国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6年初，晏阳初从美国回到四川，继续开展“乡村实验”，先在巴县与璧山县建立“巴璧实验区”，接着扩大为“华西实验区”。1947年5月，晏阳初又到美国，在纽约建立平教会“中美委员会”办事处，得到美国政府“援华联合会”的直接“援助”，所用经费由美国政府拨发，不再需要向民间募集。

鉴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节节溃败，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晏阳初于1948年初在美国向杜鲁门、马歇尔、司徒雷登、道格拉斯以及美国国会部分议员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说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失败，失去民心是因，军事失败是果，要争回已失的人心，才能制止共产主义，要形成“社会阵线”来辅助军事[(7)]。他提出要注重“社会建设”、“农村

建设”，“农村建设”的内容，即是平教会所从事的教育、生计、卫生、自治四个方面。他还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非政治的”“中美联合委员会”，经费则请求“美援”。这个所谓“晏阳初案”，很快在美国国会上获得通过，在1948年以后的“援华法案”中，单独拨出二千七百万美元作为“农村建设”的专款。美国政要看重晏阳初，希望他“替国民党政府稳定人心，尤其是稳住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心，来与中国共产党抗衡”[(8)]。

1948年9月底，晏阳初从美国回到上海，这时国民政府宣布“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委员，蒋梦麟、沈宗瀚、晏阳初三人为委员，与美国政府指派的穆懿尔（Raymond T．Moyer）、贝克（John Earl Barker）共同组成，晏为执行长，总会设在广州，接着在粤、湘、黔、赣等省设立办事处，开展工作。晏阳初说“要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另一方面却赞成在川东组织地主武装，用以对抗解放军。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南下，次第解放江南、华南，接着进军大西南。晏阳初的“农村建设”成了泡影。在重庆解放前夕，晏阳初由重庆去香港，接着又去了美国，在“中美平民教育促进会”落脚。

1951年，晏阳初担任在美国纽约建立的“平民教育运动国际委员会”主席。1952年，他到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活动，宣传他的“平民教育”主张；在菲律宾帮助搞农村教育运动。1960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马尼拉建立“国际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训练亚、非、中美洲各国乡村建设人才之中心，并向泰国、加纳、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推行。当时这些国家的农村正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美国支持晏阳初“乡村建设”的目的和效用是不言自明的。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在美国纽约去世。

---

(1) 李又宁：《访晏老》，香港《中报》1982年5月15日。

(2) 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教育杂志》第19卷第6号。

(3) 瞿菊农：《自我检讨中的平教会》，重庆《大公报》1941年7月30日。

(4) 晏升东、孙怒潮：《晏阳初与平民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5) 赵冕：《晏阳初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平教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6) 赵冕：《晏阳初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平教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7) 晏升东、孙怒潮：《晏阳初与平民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见《人民日报》1951年8月17日第3版。

(8) 美国《先驱论坛报》社论语，见《晏阳初与平民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杨爱源

汪仁泽

杨爱源，字星如，别号革非，山西五台人，1887年1月（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出生在一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家乡入塾，因聪明好学，经亲友资助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期学习。1911年考取保定军官学校，1914年冬在该校步兵科第一期毕业。先由陆军部分发至段祺瑞部见习，后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返回山西，在阎属下陆军第一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充当排、连长。杨处世谨慎，办事勤奋，略具韬略，善于随机应变，好临池、饮酒。1917年递升该团第三营营长。是年5月，陕西郭坚率部二千余人渡河进攻晋南，防守临晋的杨爱源营依城应战，奋力拼杀，多次击退郭部强攻，歼其主力五百余人。旅长商震为之请功，杨开始见重于阎锡山，8月升任该旅第一团团长。1924年，升任第六旅少将旅长，下辖第十一团（团长赵承绶）、第十二团（团长孙楚）。

1925年8月，樊钟秀率建国豫军以凌厉攻势从河南进入晋地，直趋辽县（今左权县），与商震部激战。杨爱源奉调增援，在八伏岭一带顽强堵截，击败豫军，再建战功。1926年春，阎锡山为扩展地盘，附奉、直讨伐冯玉祥国民军，派第一师师长商震率部进攻驻在直隶顺德的国民军第二军郑思成部，调杨爱源旅作为后续部队。是年夏，杨旅奉调参加担负正面防守大同的任务。此时国民军在奉、直、晋联合“讨赤”的攻击下，退至西北地区，阎锡山的地盘扩展到绥远一带，晋军改编为晋绥军，杨爱源升为第六师中将师长。是年冬，阎锡山整顿晋绥军，委杨兼任训练总监，负责管理军事训练。杨在训练中强调《孙子兵法》中的“节短势险”，要求距敌二百米外不放枪。由于训练严格，晋绥军在北伐战争中战斗力甚强。1927年春，阎锡山再次扩军，杨爱源就任第二军军长，与老上司第一军军长商震并列。但他在

阎、商面前，仍是恭谦备至。

1927年6月，阎锡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杨爱源为第二军军长。9月，阎锡山与奉系张作霖作战，徐永昌、杨爱源分任右路军总、副指挥，与商震指挥的左路军相配合夹击奉军。杨指挥所部出击新乐，后因左路军战败，受牵动而退回娘子关。奉军大举围攻，杨率部凭险坚守，使奉军失利退去，受到阎锡山的嘉奖。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动对张作霖奉军的北伐战争，杨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军团总指挥。杨率部进占石家庄，在定县击败奉军，5月沿京汉线北进，下旬攻克保定，6月8日进占北京，随后又占据天津，为北伐立下战功，受到褒奖。不久，察哈尔、绥远改为行省，11月，杨爱源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但省政实权统掌在阎锡山手中，凡事皆得听命于阎。

1930年5月，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发起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阎布重兵于陇海线上，任杨爱源为该线副指挥。杨率四个军的兵力，奋力督战，成为反蒋联军中的主力。但在张学良率兵入关拥蒋后战局急转直下，中原大战终以阎、冯全线溃败而告终。阎锡山将晋绥军政托付徐永昌、杨爱源后，潜往大连。晋绥残军由徐、杨率领退入山西境内。张学良主持办理晋绥善后事宜，将晋绥十四个军缩编为四个军，杨改任第三十四军军长，察省主席一职由东北军刘翼飞取代。杨在山西具有实力地位，蒋介石两次汇款九十万元拟于收买，但杨召集晋绥军各将领公议分配额，具条领取；然后杨将领据函蒋，并无一谢字，拒绝了蒋的笼络。

1931年8月，阎锡山回到大同，旋即转赴五台县，召见杨爱源、孙楚等人，商议成立“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杨、孙分任正副主任委员，组训考核部队。杨秉承阎的意旨，委派过去曾任军、师、旅长的二十余人为督练员，分赴各地募集部队，使该会成为阎锡山再度直接控制晋绥军的得力工具。9月初，张学良调遣直属部队准备分两路入晋，并电召杨赴平商议。杨到北平后住进德国医院治病。数日后，日

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忙于应变，取消入晋打算。杨返晋后即与徐永昌、傅作义等十五名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抗日。不久杨爱源出任山西清乡督办。11月，太原成立抗日义勇军训练所，杨兼主任，组织太原大中学生六百多人集训三个月，传授基本军事知识。12月18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枪杀要求抗日的太原请愿学生，制造流血惨案。杨爱源在阎锡山授意下，关闭省党部，扣押肇事的党部人员（后以“移地羁押”为名，予以开释），一石二鸟，既乘机铲除了国民党的反阎势力，又平息了民愤。1932年2月，蒋介石委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蒋、阎重新合流，阎与杨爱源、徐永昌等共同策划，将各地“客军”逐步调出晋绥省境。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阎锡山惧怕陕北苏区对晋的影响，召开“防共委员会议”，将全省划为十二个“防共保卫区”，分别成立“防共保卫团”，统归“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爱源负责指挥，并对全省公务人员及中学校师生实行军训。杨按阎的指示，在各县修建营房，抽派军官任教练，虽受到各校师生的反对，但坚持强制执行。

当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入晋时，阎锡山派杨爱源等率军沿河阻击未成，急电蒋介石求援，蒋调五个师入晋，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杨爱源任前敌总指挥。红军在攻克吉县、襄陵后，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于5月初回师陕北。

1937年抗战军兴，杨爱源任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防守晋北灵丘一带。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时，杨部作为友邻部队在附近与敌连续激战，起了协同作战的作用。10月，杨部参加由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指挥的忻口战役，战况激烈，血战二十三天，毙伤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二万余人，大挫敌锋。1938年初，盘踞华北的日军集结十万兵力，分三路进攻晋南，杨爱源指挥所部配合第十八集团军在隰县、永和、大宁一带，抗击日军六次进犯，巩固了晋

西根据地。

早在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阎锡山感到原有的统治组织已涣散无力，遂于1938年2月在襄陵另行组成“民族革命同志会”，作为其新的统治核心组织，由杨爱源等十三人组成高级干部委员会，阎为会长。此时晋省大半已被敌占，阎侷处晋西一角，杨爱源继续辅佐阎锡山，维持其统治。其间杨曾到延安访问中共毛泽东主席。回晋后对同僚谈及“延安的一些进步作法，我们是应该学习的”。

1939年，杨爱源升任第二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兼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是年秋，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的山西新军；同时在军队中建立“铁军”组织，委杨爱源为铁军的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的主任特委，担任传见、监誓和代阎行使各种手续等任务。1942年5月，日军进攻晋西，阎与杨爱源多次商议后，决以重兵对抗，使一贯轻视晋军的日军，猝不及防而受挫。1945年5月，杨爱源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阎锡山充当挑起内战的急先锋。1945年8月，阎召开军事会议策划进犯解放区上党，会上意见分歧，大多畏惧与八路军作战，杨爱源亦有此意，但未敢在会上表态。会后向阎陈述，未被接受。

1946年，杨爱源改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成为阎锡山统治山西的第二号人物，但阎唯我独尊，大权独揽，杨无调动一兵一卒之权[(1)]。杨长期跟随阎锡山，受阎的信用，除了同乡关系外，还因为他对阎一贯忠顺，善用韬晦之术。此时杨虽已身为副主任，但见阎时犹行九十度鞠躬礼，高呼司令长官[(2)]。为了迎合阎的“存在哲学”，曾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会长（指阎锡山）说啥，你就赞成啥，你才能存在住。”“要学会听会长的话。”“我是无我，我以会长的意志为意志，会长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会长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从来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3)] 以此表示对阎的绝对忠心，博得阎的信任。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阎锡山倾其全力向解放区进犯，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反击。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孝义，继续向介休推进，晋军溃退，阎亲至平遥指挥顽抗，太原军政大权暂交杨爱源代理。解放军乘虚猛攻太原，杨大为恐慌，急电请阎赶回太原主持全局。

至1948年底，阎锡山眼看大势已去，为了准备携带历年搜刮所得逃跑，一面责令省内外他所办的官僚资本企业一律结束，货物变卖，款交杨爱源经手汇集；一面命杨爱源以交涉给养为名，去南京并转赴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催收各地企业变卖后的价款，共计折合黄金约四万五千两，由杨代阎存储保管。翌年2月，阎锡山指使杨爱源赴南京向代总统李宗仁运动，谋划由阎接任行政院院长，以便逃离太原，而晋局则命杨以绥署副主任代理。杨未能说动，也没有应命回晋。3月，太原被围，阎已成为瓮中之鳖，杨爱源、徐永昌再次向李宗仁疏通，以邀阎赴南京商讨“国是”为名，派专机接阎逃出太原。4月21日，阎到上海，召集在沪的晋籍官僚政客“国大”代表及立法、监察委员等，交由杨爱源带领撤往台湾。

1950年4月，杨爱源被蒋介石任为“总统府”顾问委员会顾问。1952年10月退伍。1959年1月2日病殁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

《山西文史资料》有关各辑。

《国民政府公报》。

(1) 一次杨爱源将一青年军官调去当他的副官，阎锡山获悉后，立即命令调回，并对调动人事的人员说："我说过只有我能调动，谁也不能调动；你把他赶快给调回来，并告副长官（指杨）说，是我叫调回来的。"参阅《阎锡山是怎样统治山西的》（座谈纪要）中祝秉钧的发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2) 参阅《阎锡山是怎样统治山西的》（座谈纪要）中翟品三的发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3) 参阅《阎锡山是怎样统治山西的》（座谈纪要）中师孔彰的发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杨粲三

熊尚厚

杨粲三，名培英，字粲三，以字行。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四川重庆人。其父杨文光是重庆进出口商号聚兴仁的大老板。大哥杨培德与人合伙开设聚兴成商号。杨粲三读了几年私塾，就在聚兴成学生意，当助手，并被派往万县、汉口、上海等处坐庄，经营桐油、汇兑。1908年，聚兴成合伙人退股，由杨家独承经营，遂改名聚兴诚商号。两年后，杨培德病故，其父命杨粲三接办聚兴诚。杨家财富经过二十年的积累，拥有资产约为一百万两左右。

杨粲三的二哥杨培贤，先后在日本和美国留学，曾多次向家中写信介绍日本三井、三菱洋行的事业，主张走垄断资本三井、三菱的发展道路。1913年，杨培贤由美回国，力主将商号革新扩大，商号资本遂由二万银两增至十万银两，增设国外贸易部和航业部。随着规模的扩充，资金周转需求大增，杨氏兄弟决定筹创“聚兴诚银行”。银行为股份两合公司，资本定额一百万元，分有限无限各半，设“事务员会”（类似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杨培贤以事务员兼总经理，杨粲三以事务员兼协理，于1914年底呈北京政府财政、农商两部立案。次年3月，聚兴诚银行正式宣告开业。

聚行开办后，原商号改称“诚记”，由其七弟杨培善主持，杨培贤主持国外贸易部，杨粲三则为银行的实际负责人。随着银行的成立，原商号在成都、万县等地所设分号，均改作银行分支机构。开始银行经营虽以汇兑为重点，但与商号业务并未划清界限；既在宜昌、沙市为申、汉各纱厂办理押汇，又代四川铜元局在贵州采办铜铅，并为井盐商家采购机件和运销食盐；将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经营，而仍以商业经营为主。

聚行成立后八九年间，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先是哈尔滨分行因亏累而关闭，后北京分行又因用人不当而倒账。特别是，当时四川军阀连年派捐、借垫，层出不穷。聚行为了对付军阀的勒索，曾以高薪雇用外国人做代表出面应付，但终无成效。1923年冬，只得用躲避的办法，将聚行总管理处迁到汉口。与此同时，杨粲三与杨培贤之间因经营上意见相左，家族内部不和，也影响到业务的开展。1924年，杨培贤病故，杨粲三接任聚行总经理兼国外贸易部经理。从此，统一事权，进行整顿。但当时军阀混战如故，摊派勒索照旧，聚行的营业仍多风波。杨粲三为给聚行打开出路，乃创设储蓄部，注重吸收小手工业者的存款，和试办农贷、农仓，办理抵押放款。同时，除继续经营四川土产外，又收购各县沙金，炼成赤金到上海出售。另外还进行公债、纱布等投机活动，其间有盈有亏，而以1930年在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所作公债投机损失最大，亏折达一百余万元。

自上海投机失败，杨粲三深感难与江浙财阀势力竞争，便于1930年冬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准备向西南发展。回到重庆后，他一面调查云、贵经济状况，一面以重庆为中心，在川东、川南各县广设办事处，并新设长沙、常德两汇兑所，做伸入湘、桂及滇、黔的准备。同时，撤销了天津分行，裁并了国外贸易部，并自行设厂提炼桐油。1932年改贸易部为代办部，增设信托业务。经过数年的整顿，到1933年前后，业务大有起色。1934年，他偕亲友数人，和他的儿子去欧美考察，路经伦敦时，与英商“德善公司”经理商议，合组“联益金融有限公司”，投资四川工矿企业，以图扩张业务。事为中国留英学生所知，群起反对，所拟合同作废。同年聚行增设了地产部。1935年，他创设华兴保险公司，派其子杨锡远主持。

杨粲三为了拉拢四川地方官僚资本势力，扩大社会基础，早有将聚行改为有限公司之意。1937年3月，聚行召开十二届股东大会，决议将两合公司改组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订资本为二百万元，吸收刘航琛、何伯衡、董庆伯、杨晓波、龚农瞻等为董事，以董庆伯为总

经理，任望南为协理，自任董事长。这一改组，表面上好像聚行已非杨氏家族银行了，但杨家股票仍占多数，实权仍为杨氏掌握。抗战爆发后，人员、游资涌入四川。在物价上涨、商业利润骤增的刺激下，西南金融市场反形活跃。聚行以本地风光，并早着眼西南，遂乘机大事扩展业务。从1938年至1941年，聚行相继在昆明、贵阳设立分支行，在衡阳、柳州等地见缝插针设办事处，在四川境内增设自流井分行及新都、金堂、简阳、庐县、乐山、犍为、南充等办事处，大力扩充营业区域。此时，资本增至四百万元，到1943年又增资至一千万元。是年第二季度放款达七百七十余万元，投资工矿企业达五百余万元。1941年时盈利可观，职工要求分红，与杨粲三发生斗争，部分董事及其弟也和他发生纠纷，故于1942年，他以其侄杨晓波代董事长，自己退居幕后。1943年10月，聚行召开股东大会，杨粲三再次被推为董事长并兼总经理，权力更加集中。

在抗战期间，聚行对大后方各城市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由聚行干部和杨氏兄弟任董事和监察的企业，达数十家之多。仅杨粲三就先后担任川康毛织公司、四川丝业公司、重庆人造棉公司等企业的发起人、董事，四川兴业公司常务董事，重庆国货介绍所、四川合江煤矿、重庆自来水公司和铜梁造纸厂等董事，四川水力、四川电力、四川机械及华西兴业等公司监察人，并任四川省银行理事及重庆银钱业公会和银钱业公会联合公库常务委员。

杨粲三经营聚行，总是以“便利人群，服务社会”相标榜，但实际并不只靠正常的银行业务，也像国民党统治区其他企业一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他通过侄儿杨晓波与国民党官僚资本合作，用“永聚”名义暗中从事买卖黄金、美钞活动，还从国民党政府公债中大发其财。

抗战胜利后，杨粲三召开聚行“复员会议”，由于家族内部纠纷迭起，他不得不再一次以退为进，于1945年10月宣布“退休”，12月辞董事长及总经理职，由其九弟杨培荣出任董事长，李维城代理总经

理，他以元老资格任高等顾问。退居幕后的杨粲三，仍是聚行的重心所在。1946年1月，他提出“刷新行务”。3月，聚行被国民政府财政部指定为经营外汇银行之一，这在当时川帮银行中是唯一的一家。聚行地位为之提高，他也为此而沾沾自喜。于是他指示聚行增设了国外部，同时又再次于津、穗两地增设分行，并恢复南京、长沙两支行及宜昌、沙市、常德、香港等办事处。同年秋，在上海设办事处，计划将总管理处移至上海，力图将聚行发展成全国性银行。到1947年止，聚行发展到三十三个单位，职工一千三百余人。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反共内战，致使通货膨胀，工商倒闭，正常的银行业务极难经营。在一片混乱之中，杨粲三虽仍靠投机、做暗账等手段勉力挣扎，但对前途发展，却深感渺茫。

正当杨粲三走投无路的时候，1949年上海、重庆相继解放。是年冬，他从香港到北京，会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欲保持聚行的私人经营，不想加入公私合营，自然不得要领。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帮助下，聚行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杨粲三任重庆市联合银行副董事长。

1962年3月，杨粲三在重庆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本行艰难缔造的经过》，聚行月刊社《聚星月刊》，第1卷第1—6期，1947年版。

李维城、宫廷璋：《杨氏家族与聚兴诚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聚兴诚银行素描》，新世界月刊社《新世界月刊》1944年10月号，第15—19页。

杨登鹏

吴忠才

杨登鹏，广西西隆长发乡（今隆林各族自治县长发乡）人，苗族。1909年（清宣统元年）生。他的父亲杨文众出身于小康农家。

西隆县南部的克长、德峨一带是该县苗族主要聚居区。民国初年，这里开始种植罂粟（鸦片），所产烟土称“苗冲货”。征收“苗冲货”和过境的“云土”、“黔土”的税款，是桂系军阀的重要饷源。桂系任用苗族头领、杨登鹏的外祖父杨满统治这个地区。

杨登鹏少时读过三四年书，1923年跟大舅杨福应（自封为苗王）当随从。1926年升为队长，成为杨福应的得力助手。

1936年秋，杨福应因与共产党领导的滇黔桂地区游击队有联系被广西当局派兵“围剿”杀害。杨登鹏作为杨福应的亲信遭到追捕。这一年冬天，他带了少数人马去投靠西隆北部的匪霸陆尔福（壮族），结拜为兄弟，在黔、桂边界打家劫舍，抢烟贩，“拉生”（人质）。有一次，他领着几十人扮成客商到贵州安龙县城，半夜里从“货担”中抽出武器，洗劫了该城。他有时回到克长、德峨活动，袭击杨福应的那些对头冤家。广西省政府派兵围捕他，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死伤了一些人，丢了一些枪。

杨登鹏虽然与陆尔福结拜为兄弟，彼此间却是尔虞我诈，以至积怨日深。杨不满得来的财物受陆的勒索；陆也知杨难以制伏，于是密谋杀杨。杨登鹏探知陆的密谋后，于1937年2月初潜回长发乡，掩藏了枪支，带几个随从到云南广宁县躲避。

1931年至1937年间，德峨、克长地区多次爆发苗族群众反对广

西政府滥收苛捐杂税的斗争。为了加强统治，国民党省政府废除了当地的族长制，实行保甲制，物色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充当乡、村长。杨登鹏趁机于1937年底从广宁回家，出了千把块大洋向西隆县政府“自新”，在长发乡协助乡长做些事情。1938年冬，西隆县府送他到南宁进第八期民团干部学校受训四个月。结业后，杨登鹏被指派为长发乡民团大队长。1940年兼任副乡长，1942年9月升任乡长。这期间，他一方面悉心为国民党地方政府征集粮食、收缴烟税，以取悦上司；一方面培植自己的势力。

1944年末，日军入侵广西，广西省政府迁到百色。大小官员们在西隆、西林一带暗地里鼓动广种罂粟。这正合杨登鹏的心意，他公然强迫农民种鸦片。第二年夏初收获时，西隆一县种的万亩罂粟，产鸦片一百多万两，广西省政府烟税收入折黄金一千七百两。西隆县指派杨登鹏负责征收德峨、长发、克长、隆或等乡的烟税。罂粟刚开花，杨登鹏就派人到地头估产，收获时按估产的百分之五十交税。缴纳不起的，被说成是偷懒，要罚交“懒税”。上税时，杨登鹏拿出一把特制的“雷公秤”（秤砣下有一特制的小孔，可以放进铁珠），一百两大烟在这把秤上只有七十两左右。收上的大烟，他美其名曰加工，将黄豆粉掺入其中。他如此敲骨吸髓，巧取豪夺，捞到了二十万两鸦片烟。其中除将百分之四十左右上缴及馈送贪官外，他独占了约十二万两。这是他暴富的起点。

杨登鹏以这批烟土为资本，与百色、南宁等地的烟帮头子勾结，加入了以贩卖烟土为职业的洪帮组织。大烟从西隆运到百色，便获利数倍。从此，他在乡里大量购买田地，在外则勾结国民党军官、兵痞，贩卖枪支弹药。他自己添置了轻重机枪，以及新式步枪、手枪等。杨登鹏钱多枪多，赫然成了西隆的“南霸天”。对当地土豪和壮、彝等族的头目，他软硬兼施，或结拜“金兰”，或攀儿女亲家，或以武力威胁。对外地来的官、商、赌棍，他讲“义气”，或供食宿方便，或给一点做生意的本钱，使他们在必要时为他效劳。有些“风水先生”也

是他的座上客，常常散布说他家的坟山好，又得了杨福应家的什么法宝，理应由他来当苗王，以“保护地方”。他派出爪牙洗劫村庄、抢劫客商后，又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派人去“缉拿凶手”。

广西省政府为了笼络、利用杨登鹏这条“地头蛇”，1946年委派他担任西隆县民团总队副队长。这一年的五六月间，越南国民党头目阮海臣为了对抗胡志明的革命力量，来广西招兵买马。杨登鹏带了二十多人携枪到南宁，受阮口头任命为“越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准备扩充队伍。杨登鹏等人从南宁出发到谅山，薪饷没有着落，卖了几条枪以充伙食费。他觉得跟着阮海臣这个光杆司令没有什么出路，在谅山住了一晚便返回。7月回到西隆。这时，杨登鹏原任的职务已被解除，广西省政府考虑到他的势力和“黑货”生意，又给他以百色专署咨议的头衔。第二年升为参议。

1946年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1947年广西省政府为解决饷源，默许大种鸦片。杨登鹏利用征收烟税的机会，又一次大发其财。此后，杨的实力更为雄厚，掌握了五六百人的武装。西隆县南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常对手下的人说：如果你们不跟我，我的嘴巴一歪，就有人把你们干掉。他占有六百多亩田地，不少苗、壮族的农民成了他的“地客”（佃户）。这些“地客”受尽压迫剥削，每年除交付沉重的对半租以外，还要为杨家服劳役。

1948年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眼看杨登鹏在西隆县势力日增，想调虎离山，由田西县县长覃超以朋友名义邀杨到他那里当民团副司令。杨登鹏虚与委蛇，很少到职，仍在长发、克长经营他的“洋烟”。他还邀了兵痞出身的烟贩头子梁平，带了一些人和机器到长发制造假货币。因技术低劣，铸出的光洋和印制的纸币均不能使用。

1949年10月，国民党妄图以几万正规武装配合广西边远山区的地主、土匪势力，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他们在百色拼凑了新编十六军第四十八师，杨登鹏被委为副师长兼一四二团团长，有五六百人

枪。翌年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黔桂边绥靖区司令官张光玮在西隆县新州率部千余人起义，新四十八师师长萧若夫也随行。该绥靖区副司令官胡栋臣自任司令官，率残部进驻克长，委杨登鹏为新四十二师师长。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从滇南回广西，全歼了胡栋臣部，1950年3月1日解放了西隆县城。3月，杨登鹏被迫自首，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不久，杨伙同当地一些土匪恶霸和残余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暴乱，妄想重温“游击根据地”的旧梦。6月初，杨登鹏从南宁逃到百色附近，受国民党特务委为“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剿共军第七集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辖四个师，匪众二千余，枪千条。7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不久，杨登鹏在长发拼凑了伪军部，杀猪宰牛“庆祝”了三天，并改名杨万飞。8月，杨登鹏率匪部入西隆县城新州镇，大肆搜刮民财，残酷屠杀干部，有的村子全村被洗劫一空。

1951年4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剿桂西北土匪，杨登鹏带三十多人流窜于长发、克长一带。10月30日，解放军和民众百余人上山围剿残匪，杨登鹏被手榴弹炸死。

主要参考资料

《杨登鹏罪行材料》，《广西民族学院院刊》1975年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关于西隆苗族、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未刊稿）。

《隆林十年》，中共隆林县委办公室编《隆林自治县三十年概况》。

《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剿匪工作的伟大成就》，《广西日报》1951年8月1日。

陈良佐：《西隆、西林烟案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

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2年重印本。

岑建英：《广西百色的烟帮》，《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2年重印本。

杨笃生

杨天石

杨笃生，原名毓麟，号叔壬。湖南长沙人。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十五岁中秀才，后肄业长沙岳麓、城南等书院，泛览文学、历史等各类书籍，尤其留意于经世致用之学。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军失利，杨笃生感愤时事，作《江防海防策》，痛诋清朝政府中投降派的误国。1897年中举，第二年参加会试后，以知县分发广西，没有去上任，被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与梁启超等一起倡言变法。戊戌政变发生，清政府缉查改良派人士，杨笃生逃到乡下躲藏起来。

1900年之后，杨笃生在湘绅龙湛霖家教馆，常私购禁书，于深夜中偷读，思想境界随之大为开阔。他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具有“世界之知识”。1902年东渡日本，先入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这时，他交游渐广，思想逐渐转向革命，曾与黄兴等共同创办《游学译编》杂志，介绍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又曾写作并出版《新湖南》一书，批判康、梁等人的保皇言论。他呼吁湖南“中等社会”（指知识分子）奋起“排满”，热情地讴歌“破坏”，认为世界各国中“破坏”精神最强的要数俄国的“无政府党”[(1)]。1903年拒俄运动中，他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后又参加军国民教育会，被推为江南一带的“运动员”，负责筹备经费与联络同志。为模仿俄国“无政府党”从事暗杀的做法，他与苏鹏等在横滨秘密设立炸药制造所，学制炸药。一次，因失慎炸伤一目。1904年夏，他与苏鹏、张继等潜入北京，计划在颐和园至西直门的路上炸毙慈禧太后。一直窥伺了四五个月，终因无隙可乘，带着失望与愤懑的情绪离京赴沪。

杨笃生到沪后，和蔡元培、章士钊等设立秘密机关，继续研制炸药，同时联络各省留日同志，策应黄兴等在长沙发动的起义。10月，

长沙起义因事机泄漏失败，黄兴脱险来沪，在新闸路余庆里设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笃生被推为会长。次月，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余庆里机关被搜查，杨笃生被列入追捕名单，但幸得脱走，自此改名守仁。

在几经挫折后，杨笃生认为在边远地区发难不如在首都收效快。因此，他再次入京，以任译学馆教员为掩护，计划从事“中央革命”。不久，应赵声要求，到保定与吴樾等共同组织北方暗杀团（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当时，吴樾等只知道用手枪，杨笃生向他们提供自制的炸弹，并一起入山进行试验。1905年7月，清政府准备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一消息传出后，杨笃生与吴樾策划对他们施以暗杀。于是，先由杨笃生活动，谋得载泽随员职务，以为内应。9月24日，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谋炸五大臣未遂，壮烈牺牲。清政府大肆搜捕，但没有怀疑到杨笃生。12月，五大臣启程出洋，杨笃生随行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张继等见面商量，决定辞去随员职务。其后，杨笃生回到上海，设立江海交通机关。1906年6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4月，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当时有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2)]。同年5月，报社被邻近火灾殃及，仓促中杨笃生从楼上攀缘电杆而下，幸免于难，但机器、财物大部分损失。灾后，于右任离社，剩下杨笃生辛苦支撑局面。他有时就睡在铅字架旁。

1908年春，杨笃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书记，随行至欧洲。1909年冬，蒯回国，杨笃生改入苏格兰的爱伯汀大学学习，同时任《民立报》欧洲特约通讯员，为国内读者介绍西方工党、社会党、无政府党的活动情况。经过考察，杨笃生终于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排斥国家，排斥爱国论”，“足以涣散国人进取之心”[(3)]。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时杨笃生适患头部浮肿病。他听说黄兴战死，非

常悲伤。后来，得到确讯，知道黄兴无恙，才略感安慰。不久，又传闻列强有瓜分中国之说，他深受刺激，病势加重。正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同在爱伯汀留学的章士钊与保皇党人有来往，因而和章发生冲突，关系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到刺激[4]；同时，又因服用硫磷类药物过多，遍体炽热，痛苦难忍[5]。他便买票至利物浦，想觅一手枪，乘船归国，“寻一民贼死之”[6]。但又觉得海天万里，非旦夕可达，于是，就遗书给在伦敦的吴稚晖，告以“脑炎剧发，不可复耐，有生无乐，得死为佳”[7]，嘱他将自己所存英币百镑代为捐献，作为革命党人开办小型炸弹厂的基金，或寄给黄兴，解决他经济上的困难。

1911年8月6日，杨笃生在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

(1) 《新湖南》第5篇。

(2) 骚心（于右任）：《吊杨笃生文》，《民立报》1911年8月8日。

(3) 耐可（杨笃生）：《记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民立报》1911年6月14日—7月8日。

(4) 孤桐（章士钊）：《与杨怀中书》，《甲寅周刊》第1卷第33号。

(5)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甲寅杂志》第1第卷4号。

(6) 《杨君笃生绝命书》，《民立报》1911年9月8日。

(7) 《杨君笃生绝命书》，《民立报》1911年9月8日。

杨度

刘秋阳

杨度，原名承瓒，字晳子，后更名度，号虎禅师、释虎。生于1875年1月15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湖南湘潭人。父杨宋彝，以同知衔候补江苏知县。1884年父病逝，其伯父杨瑞生照料杨度一家人生活。杨瑞生以军功起家，官至朝阳镇总兵。

杨度六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十三岁从学国学大师王闿运。他聪明过人，勤奋刻苦，被王闿运视为自己衣钵传人。1891年，杨度兄妹三人到河南伯父家居住。1894年9月，参加顺天乡试中举。次年参加会试落第。时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联合湖南数十名举人上书，请拒绝与日本议和。秋末，他返回湘潭，继续师事王闿运，直到1902年。杨度深受王闿运的影响，自负甚高，年轻气盛，自称独得王的帝王之学。

1902年5月，杨度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教育，课余主编《游学译编》月刊，介绍西方政治学术。在所撰《游学译编叙》文中，力主中国“乘此迎新去旧之时而善用老大与幼稚，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11月返国。1903年3月以四川总督锡良荐在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第一等第二名。8月，杨度因被指为康梁余党，遭拿办，不得已再入日本弘文书院，学习法律和政治。同年10月，发表了广为流传的《湖南少年歌》，放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人尽死”。杨度的旧学和新知水平超群，为人热情活跃，交游广泛，其寓所有“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不久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1905年7月，孙中山曾与人访杨度，欲劝杨加入同盟会。杨表示：“革命破坏太大，立宪可事半功倍。”不愿加入同盟会，但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后来杨度亲自到

横滨拜会孙中山，两人“辩论终日”。结果杨度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1]

1905年，为缓和国内矛盾，清政府考虑实行“预备立宪”，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应随行参赞熊希龄之邀约，杨度于1906年夏为五大臣代撰《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五大臣据以修改，上报朝廷交差。1907年1月，杨度创办《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并连续发表约十四万字的《金铁主义》长文，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开国会以定国是，与保皇派所持君主立宪论异曲同工，因而受到革命派的猛烈抨击。与此同时，杨度积极从事组党之准备，2月组织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7月改名宪政讲习会，后又更名为宪政公会，杨为常务委员长。

1908年3月，杨度与人组设湖南华昌炼矿公司，任董事长。4月，军机大臣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得清政府任命为四品京堂及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对袁世凯知遇之恩感激不尽。同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驱赶回乡，杨度经常奔走于北京、彰德之间，传递消息，为袁世凯出谋划策。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先任袁为湖广总督，令其带北洋军队南下镇压起义，但杨度劝袁不要应命，袁世凯乃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后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1月，袁世凯任命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旋又让杨与汪精卫发起国事共济会，以“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民之意公决之”为宗旨。后又在袁世凯授意之下，杨度以国事共济会负责人名义上书资政院，建议南北两方停战，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由于该会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杨度只得在其成立二十天后又将其草草结束。随后，杨度参与南北议和。在杨度等人斡旋下，南方革命党人作出妥协，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1912年1月，袁世凯授予杨度二等嘉禾勋章。此后，杨度先后担任宪政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代馆长等职务。9月，黄兴曾极力邀杨度入国民党，但杨反对国民党所推行的政党政治，要求国民党“取消政党内阁之议”，拒绝了黄兴的邀请。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为复辟帝制做准备，并不惜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外交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1915年8月，袁首先授意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公开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鼓吹实行帝制。接着，袁世凯又通过内史监夏寿田转告杨度，让他公开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得悉袁的旨意后，即由夏寿田陪同前去觐见袁世凯，向袁表示：“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2)] 袁让他和孙毓筠等商量办理。杨度即和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串联，于是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杨任理事长。23日，杨度起草“筹安会”宣言，堂而皇之地称是为了“筹一国之治安”，并攻击共和制不适于中国[(3)]。接着，杨度又撰《君宪救国论》一文，鼓吹非君主不足以立宪，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实行君主制是国家富强之本，中国非实行帝制不可。袁世凯阅后赞赏不已，指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当即亲笔题书“旷代逸才”的横幅赏赐给他。杨的文章被印后广为散布，袁特嘱各省文武官员阅读。

杨度的文章和“筹安会”的活动，遭到全国反对帝制各界的抨击，并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谓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该纠弹。杨度害怕反对帝制者袭击其私宅和“筹安会”事务所，乃请京师警察厅特派军警进行保护。杨度等秉承袁旨，加紧进行复辟活动，以“筹安会”名义策动各地组织分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各地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组织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一鼓作气想让袁世凯早日当上皇帝。但袁鉴于当时还有一些封疆大吏没有表态，不敢贸然马上登基，于9月重新安排，以尊重“民意”为幌子，决定另造一“民

意”机关，放慢了帝制自为的步伐。此时，梁士诒以巨款收买各地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在杨度协同梁士诒等指挥下，“全国请愿联合会”三次向参政院呈递请愿书。10月，参政院决定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随后于12月进行所谓解决国体总投票，“一致”通过实行君主制度。杨度和孙毓筠当场提议，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拥护袁世凯登基当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令，杨度成为帝制“大典筹备处”的重要成员，里外奔走，于1916年1月1日拥袁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杨度没有想到，袁世凯复辟帝制会遭到全国人民极其强烈的反对。袁于内外交困之下，于3月下旬被迫取消帝制，在忧惧和恚恨之下于6月6日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于7月14日发布惩办帝制祸首命令，杨度等八人被列为祸首，“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4)]。杨度逃离北京，到天津躲避，住在租界做寓公。过了“缉拿”的风头之后，杨仍想继续他的“君宪救国”主张。翌年春张勋阴谋复辟之时，他曾应邀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只因张勋复辟清王朝与他的主张不同，杨才没有公开参加张勋的复辟活动，而杨于张勋正式宣布复辟后的第三天发出通电，谓张勋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并表示“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5)]。此后，杨度一面以文史为友，一面从事禅宗南宗的佛学研究，想从佛学中找到救国救亡的道理；进而认为社会之“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必须提倡“无我主义”。

杨度经过清末立宪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三次失败，接着又步入以“无我主义”救世的佛学境界，同时处于政治上受到冷遇、经济上没有来源、生活潦倒的环境下，促使他闭门思过，检讨自己的错误，彻底抛弃“君宪救国”论，寻找新的救国之道。1918年3月，北京政府发令赦免所有曾犯过复辟罪的人，杨度从此又逐渐投入政治活动。同年9月，他发表通电于上海，表示放弃君主立宪主张，提出解

决时局的主张。

五四运动前后，杨度在与李大钊、邵飘萍、胡鄂公以及北京大学等校进步师生接触中，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抚今思昔，他的思想发生了新变化，曾兴奋地说："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是废话，现在是改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6)] 1922年夏，受孙中山之托，他与刘成禺等商讨阻止吴佩孚率赣军援助陈炯明的计划，亲赴保定游说曹锟，完成了这项紧急任务。孙中山后来称赞："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7)] 1923年春，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党内干部，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后此事未果，杨度表示："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8)] 不久，杨度受孙中山委托北上进京，接洽和平统一事宜。1924年10月，杨在为同县沈润身《系统进化哲学》一书作序中，主张以革命手段，扫除"食不平等"、"贫富之不平等"、"贵贱之不平等"的社会制度。1925年8月，杨度应奉姜登选之邀到徐州，任姜幕参赞。他还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并参与该同盟举行的几次反帝示威活动。1926年，杨积极参与营救《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的活动。

1927年4月4日，杨度意外获知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将有搜捕苏联驻京兵营内共产党人之举动，立即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请转告李大钊等火速走避。但李大钊对此消息表示怀疑，以致延误了时机。李大钊被捕后，杨度立即与他人分途营救，并派儿子到狱中探视，秘传消息。其间，杨度将自己在京寓所作价变卖，将全部银钱充作营救之用；后为周济遇难者家属，又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1929年2月，杨度南下上海，寄居原北京政府众议院议员陆仲鹏家，以卖字画为生，后经陆介绍结识上海社会名流杜月笙。杨得陆、杜资助客住镇江，撰写《中国通史》，历时半年，嗣后返回上海。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直属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周

恩来批准，杨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由潘汉年、夏衍等与他单线联系。为掩护工作，经组织同意，杨度给杜月笙当名誉顾问。他乘机收集不少情报，“曾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交给夏衍[9]，甚至还劝杜月笙不要为国民党卖命。11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第二期出版，报头“红旗”二字，即为他题写。

1930年，杨度先后参加中国革命共济会、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翌年6月，杜月笙之宗祠落成，举行典礼，杨度为文书处主任。9月17日，杨度因长期腹泻不止逝世于上海。临终前数日，杨度曾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皆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

(1)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6、643页。

(2)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0页。

(3) 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版。

(4) 上海《申报》1916年9月16日。

(5)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6)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7)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643页。

(8)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9)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第88页。

杨虎城

黄德昭

杨虎城，原名虎　，号虎臣，陕西蒲城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里。幼年时，由于家庭贫困，他只念过两年村塾，便到一家小饭铺替人烧火。1908年，他的父亲遭仇家诬陷，被官府处死。这时，他才十五岁，得村民帮助勉强营葬了亡父。之后，他走投无路，和当地一帮少年成立了一个“中秋会”，以“打富济贫”相号召，后来发展到百余人，他是领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杨率领中秋会员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兵作战。1913年退伍回乡。他仍然以中秋会员为基本群众，参加当地农民的抗捐抗暴斗争。1914年，他纠合一批人打死了县东南乡一个向农民逼债的大恶霸李桢。此人包揽词讼，强占民女，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李桢被打死的事件，轰动了当地，县官派差役缉捕杨虎城等人，他们被迫流亡到同州（今大荔）、郃阳（今合阳）一带活动，杨成了当地“刀客”[(1)] 集团的首领。1915年冬，杨已有众数百人。袁世凯窃国称帝，民党井勿幕等发动反袁护国斗争，杨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转战于朝邑、华阴一带。1916年反袁军事结束，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2)]。

1917年底，中华革命党人在三原组成靖国军，参加“护法”，反对段祺瑞政府及陕督陈树藩。不久靖国军在三原、渭南宣布独立，杨虎城任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次年2月，杨率部参与临潼关山镇防卫战役，使陈树藩压境之敌不能前进一步。6月间，中华革命党人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入陕，为各军共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杨虎城任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19年1月，杨率部与陈树藩军及北洋政府八省援陕军相对抗。1920年杨攻占武功城，及于扶

风、麟游等县。不久，直系曹、吴取代了皖系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派阎相文督陕。直系对靖国军采取分化政策，胡景翼一师首先接受了直系收编。其后各路靖国军多被改编，独杨不为所动。1922年春，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到武功。于右任任杨为第三路司令。杨率军一旅迎击十倍之直军于大王店，奋战半月后，以孤军难持久，退往凤翔。在此决定：于右任南下向孙中山请示，部队由杨率领再转移到陕北。千里行军，冲破沿途堵截，最后到达延安，依托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井勿幕之兄）处。杨到陕北后，一面集训旧部，一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系。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通过杨的代表告诉他，批准他为国民党党员。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驱逐曹、吴的北京政变，与胡景翼、孙岳共组国民军，委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5年7月，杨率师自陕北南下，击败直系军阀吴新田，把他赶到秦岭以南，杨升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这时，杨虎城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由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学校政治部主任，请一些共产党员教授政治课，还吸收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在部队中任下级军官。这对杨及其部下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有不少影响。

1926年1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对国民军开战。4月，吴佩孚派刘镇华率镇嵩军七万人进攻陕西。镇嵩军是土匪集团，陕人过去深受其害。但当时陕西督办李云龙（属国民二军）新自豫西败回，潼关门户洞开，刘镇华得以长驱直入，兵临西安城下。陕西人民要求抗刘。这时杨虎城带领部队自三原迅速开入西安，与李云龙部共守省城。两部兵力不过万人，又当国民军各军新败；当时西安城内又有一批反动绅士、政客，见刘势大，与刘勾结，形势十分险恶。但西安城内，当时也有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学生、妇女等各种进步团体，这些团体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打倒军阀，帮助守军，给守城国民军以极大鼓舞和支持。杨在群众支持下，枪毙了“和平迎刘”的劣绅头目，镇压

了投降活动。守城战自4月中旬开始，至9月冯玉祥派国民一军援陕，到11月底西安解围，历时将近八个月。其间城内粮食吃光，代之以树皮、草根，可食之物皆掘殆尽。杨与李云龙部团结一致，坚守待援[(3)]，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这一战役有力地支援了当时已开始的北伐战争，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守城战例之一。

1927年初，冯玉祥入西安，6月杨虎城部归冯统率，任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旋改第十军），随后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同奉系直鲁联军在陇海线归德一带作战半年之久。后因失利而退入皖北太和休整。“四一二”蒋介石“清党”反共，冯玉祥接着与蒋合作反共，形势大变。当时在杨身边的中共干部劝杨起义，所部中也有反对起义者。杨处于左右为难的处境：由于杨申请加入中共的要求未获省委批准难以领导所部起义，但又不便留队妨碍中共皖北特委发动起义的决定[(4)]。1928年春，以魏野畴为首的中共皖北特委发动刘集暴动失败（魏牺牲），引起南京政府注意，杨从“朋友道义”的关系上，礼送其身边中共党员（有南汉宸等人）出境。蒋介石发动的二次“北伐”，他不愿参加；与冯的关系也渐疏远并有所不满。末后，他决定出国“休养”，于4月底到日本。同年冬，蒋、冯之间出现裂痕，双方都电促杨回国，他于11月回到国内。当时，他的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奉冯命开往鲁南。他到鲁南就任第二十一师师长新职，暂时仍隶冯部。1929年4月，蒋、冯矛盾濒于破裂，冯为备战，令其驻鲁部队西撤。杨权衡利害，不听冯命，继经蒋的拉拢，他率部投归了蒋介石，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9月奉蒋令调守河南南阳一带，阻击冯军。12月，助蒋击溃了反蒋的唐生智部。

从1930年4月起，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军在中原大战。杨虎城在蒋方何成濬指挥下对阎、冯作战。7月间蒋升任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率部自豫西转战入陕，11月占领西安。大战结束，蒋为收拾西北局面对杨极力拉拢利用，并临时授杨兼陕西省政府主

席。但从杨主陕之日起，蒋与杨的矛盾就开始了。杨一入陕，蒋立派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兵扼制陕东咽喉。其后，数年之间，蒋曾撤销了杨部所辖一个师的番号，策动该师长叛杨；又派马鸿逵率部回宁夏作主席，以控制杨向西北发展（1932年）；还派邵力子主甘肃，拉拢马家回军反杨；另外，还令胡宗南驻天水，以监视杨部。在杨虎城方面，则镇压了一批由蒋从中扶持反杨的地方武装，一度派其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驱逐吴佩孚的余孽及四川军而进入兰州（1931年）；并帮助回民马仲英部进兵新疆（1932年），准备从西北打通国际线。同时，杨与国内各方面反蒋势力，也有所联系。1933年5月，蒋介石突然免去了杨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保留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另委邵力子为陕省主席。1934年10月，蒋又调走了杨的一旅人，开往河南。这些都显示了蒋、杨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

杨在主陕期间，南汉宸又回到陕西，任杨的省府秘书长，援引了一些进步人士在杨处工作。杨的内部有进步、中间、反动三种力量，互相消长，左右着杨的政治倾向。“九一八”事变后，在应否抗日问题上，三种力量进行着斗争。1933年，当红军一部分到达川北、陕南时，进步力量推动杨与红军取得默契，迂回避战。但后来破裂，终于发生冲突。1935年，杨奉令阻击红军北上。当年1月，杨调其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进入陕南山区的红二十五军，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被歼灭六个营。2月，杨又将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红二十五军作战，并亲到蓝田指挥。3月，警二旅两个团在佛平、华阳地区被歼灭，旅长张鸿远负伤。4月，警三旅五个营在柞水九间房地区被歼。7月，警一旅在秦岭山区袁家沟口又被全歼，旅长唐嗣桐被俘。在军事上不断受到打击的情况下，经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全国人民抗日潮流的推动，他渐觉悟到此前之路不通。同时，1935年夏，张学良的东北军奉令入陕“剿共”，9月到11月东北军也连续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因而张学良发生了与杨同样的感想。当东北军入陕之初，蒋介石在张、杨两部之间施行挑拨，使其互相牵制而后加以操纵利用，因此，两部之间曾一度深有隔阂。后通过

中共地下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工作，双方沟通意见，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下，决定共同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到1936年春，他们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进而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当时蒋不但拒绝其建议，反调集大量嫡系部队入陕，准备对工农红军大举“围剿”。蒋于12月4日亲至西安向杨与张施加压力，说他们如不愿“剿共”，则将他们的军队调开，让出陕省，由中央军“进剿”。到此，张、杨与蒋的矛盾已无可调和，于是张、杨密商，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两部密切合作，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5)] 同时致电陕北，请中共和红军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16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士兵及西安群众，普遍要求公审蒋介石，把他明正典刑；汉奸、亲日派分子则企图利用群众情绪，杀死蒋介石，挑起内战；南京的“讨伐派”则力主用兵。末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以及南京主张和平解决人士的协力，终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由内战到抗战转变的关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竟背信弃义，于1937年4月迫杨辞职。6月，又迫杨“出洋考察”。6月29日，杨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赴欧美各国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在欧洲想返国参加抗战，曾两电蒋介石，均遭拒绝。后得宋子文授意他可“自动返国”的电报后，于10月29日由法国马赛乘船回国。11月26日到达香港，接蒋介石电要杨到南昌相见。12月2日，杨到南昌后即被戴笠囚禁。对此，杨虎城曾对其友好坦然表示：“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6)] 1938年1月中旬，他的夫人谢葆真带领二儿拯中及副

官张醒民到南昌看望，同被囚禁。5月被解往湖南长沙、益阳监禁。11月起又先后被囚于贵州息烽玄天洞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以及贵阳麒麟洞等处。其间，谢葆真于1946年2月1日（旧历除夕）在杨家山含愤去世。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在重庆指使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将杨等除掉。经毛人凤和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等谋划，将杨等从贵阳押解到重庆，9月6日晚抵达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时，杨虎城和他的二儿拯中、在玄天洞出生的幼女拯贵以及杨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儿子振中一起被凶手们用利刃杀害。其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于11月27日大屠杀中在松林坡被杀。12月16日，中共中央向杨的长子杨拯民发出唁电，指出杨虎城将军“有功于国家民族……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7]。重庆解放后，中共党政军人员找到了杨虎城及其家属、随员的遗骸，将他们的遗骸迎葬于西安韦曲少陵原，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

(1) “刀客”，陕西江湖人物的一种，崇尚侠义，劫富济贫。

(2)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192页。

(3) 黄成说：《西安围城记》，1927年作者自印本，第49页。

(4) 根据米暂沉先生于1979年4月21日给李新、桂五、克夫三同志来信中所提供的史料加以订正。原信存本书修订组。

(5)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6) 据王根僧关于杨虎城将军回国被捕经过的日记。

(7) 陕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调查组：《杨虎臣将军被囚十二年及遇难经过调查》，《陕西文史资料》第1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杨杰

陈崧

杨杰，字耿光。1889年1月25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云南大理。祖父是裁缝，父杨汉章以行医为生，母是白族，除操持家务外，经常替人缝补以贴家用。杨杰兄弟四人，居次。

杨杰童年在大理读私塾，后入中学，1905年毕业，随即赴昆明，考入云南武备学堂，爱好阅读改良派和孙中山革命派书刊，痛恨清王朝的腐败，向往先进的欧洲文明。他曾给同窗好友朱福昌写一对联："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由于学习优异，杨杰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学堂深造。1911年，又被云南巡抚选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习。

在日本期间，杨杰进一步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的影响，正式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杨杰与几位爱国同学一起返回国内，先至武昌任新军管带，后因队伍哗变而离职回云南。杨杰与唐继尧有乡里之谊，又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前后同学，遂加入唐继尧部，并随唐于1912年3月入驻贵州，先后任贵州武威军训练科科长、武威军总教官、武威军步兵第十团团长、贵州骑兵第一团团长等职。后又因战功升为第九旅旅长，并奉命率部赴四川，与援川滇军汇合。旋任重庆卫戍司令官，兼四川政务厅长、重庆警察厅长。1914年春，唐继尧由贵州回到云南，杨奉调回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并与同乡名士赵舒益之长女硕君成婚。不久，杨杰被任命为弥勒县县长。

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在蔡锷、唐继尧等主持下，组成护国军讨袁，杨杰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三军第三梯团第五支队

长。后第三梯团扩编为第四军，杨杰任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杨率部转战川东，屡立战功。讨袁结束后，升为陆军中将，获三等文虎章。

1916年6月，杨杰回云南任唐继尧的顾问，旋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授防空学。翌年1月，调北京任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1921年，杨杰再次赴日本担任云南留日士官学生监督。到达日本后，再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4年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先到沈阳张作霖处任上校参谋。不久，接受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孙岳邀请，出任该军参谋长。次年，随孙赴河南，9月转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

1926年5月，杨杰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六军总参议，协助程潜制定作战计划，并随军北伐。旋调任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不久又升任第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27年进至南京，4月蒋介石“清党”反共，程潜率一个精锐师返回武汉，留驻南京的余部被改编为“暂编第六军”，杨杰被任命为军长，负责指挥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三两师北上作战[(1)]。8月，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官。蒋介石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后，北伐军退守长江南岸，第六军番号改为第十八军，杨杰仍任军长。8月下旬，孙传芳率部反扑，直逼南京，何应钦指挥所部会同李宗仁部会攻龙潭告捷，孙传芳军溃退。杨杰受命为右翼追击指挥官，率第十八、十四和二十一军渡江追击孙传芳军[(2)]。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任命杨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4月7日又任命杨杰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北伐奉张。6月蒋介石占领北京，不久，杨杰被任命为北平宪兵学校校长。

1929年4月，杨杰被任命为陆海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12月，唐生智举兵反蒋，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洛阳行营主任兼第十军军长，指挥

豫西各军，攻唐侧面。1930年2月，蒋唐战争结束后，杨杰被任命为长江要塞总司令，负责指挥镇江、吴淞、江宁、江阴、镇海五区要塞的防务及新建工作。同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杨杰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统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野炮兵一团及教导第一师炮兵队，随同第二军团刘峙在陇海线作战。在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后，杨杰被提升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制定以陇海线为主战场的大兵团作战计划，并亲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17日攻克济南后，蒋军在平汉、陇海两面作战，杨杰指挥第二炮兵集团协助攻坚，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其后，蒋介石自兼陆大校长，杨改任教育长。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进犯长城各口，蒋介石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杨被任命为参谋长，兼任第八军团总指挥，负责对日作战。但是蒋介石实施妥协退让政策，批准签订《塘沽协定》，并于8月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9月，杨杰奉派出国考察欧洲军事。他先后到了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苏联、奥地利、捷克、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等国，作了历时一年的实地考察，并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提出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关于国防建设、培养兵工人才的建议，并拟定了《兵工业根本建设之计划》，呈送蒋介石。蒋以“一日万机，无暇细阅此繁冗长文”，批付存档。

1934年，陆军大学由北平迁至南京，蒋介石自任校长，杨杰任教育长。这期间，杨杰静心钻研并讲授军事理论，同时将讲稿整理撰写成《保留城垣意见书》、《战争抉要》、《总司令学》、《孙子浅释》等书，颇受一些军事将领敬重。1935年12月，杨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代理总长），兼任陆大教育长、防空委员会主任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派杨杰率领实业考察团赴苏联，负

责组织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物资运华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曾荣获斯大林颁发的勋章。1938年5月，杨杰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在苏联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和外交政策，政治见解开始有所变化。

1939年4月，邵力子接替杨杰出任驻苏大使，杨杰回到重庆，蒋介石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他在中央训练团担任《国防讲话》、《国家总动员》课程的教职，讲解国防军事，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遇有国内或国际间发生重大变故时，重庆各报的记者们常赶赴杨杰寓所向他请教，而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开怀畅论。这期间，他还系统地研究了军事国防问题，先后撰著出版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苏联的国防政策》、《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国民军事必读》等书。他的著述通俗易懂，爱国热情洋溢，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他认为："全体性国防和人民战争"已是"时代和历史演进的结果"；主张把国防问题的研究，从少数军事专家的专门学问，变为全国同胞的普通常识；还主张国防建设的基础，应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和工业电气化上。《国防新论》一书受到军界的欢迎，自1942年至1946年先后发行四版，高达数万册。

抗日战争后期，杨杰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方针深为不满，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爱国民主人士共同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推动国民党民主派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杨负责民联西南执行部的工作。他参与各种集会，经常在文章、讲演中分析国外政治形势。由于他在民主运动中旗帜鲜明，国民党特务分子图谋暗害于他。杨乃借口养病，由重庆赴昆明。此时昆明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开展，杨杰经常出席昆明的民主人士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和"丙戌聚餐会"，进行反对独裁统治的宣传活动。

1944年，国民政府组织国际考察团，杨杰奉派率领军事代表团，赴美、英等国考察，年底回国。1945年5月，杨杰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加紧策划发动内战，杨杰等深为不满和忧虑。1946年秋，杨杰派人到四川、贵州、西康等地联络爱国军事将领，策动他们举行武装起义。1947年底，他联络云南的第二十六军军长万保邦，并派人到香港同蔡廷锴联系，商讨在云南组织反蒋武装的问题。1948年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组织联合，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民革的工作。不久，民革中央派人同杨杰、万保邦联系，请杨指导筹组成立云南人民自卫军，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滇桂边纵队进行战斗。1949年初，人民自卫军发动了进攻蒙自的武装起义，后转入游击战。同年夏，这支起义武装编入人民解放军滇桂边区纵队。

杨杰还经常向当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宣传反蒋主张，常常被卢汉接到家里谈至深夜。杨杰进行的反蒋爱国活动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的特务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杨处境危险。中共于1949年6月秘密通知杨撤离昆明迁移香港，然后北上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杨认为云南民主爱国运动蓬勃发展，自己在云南的军事策反工作已有相当发展，一时不便撤离。8月1日，杨应昆明新闻界的邀请，作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演说，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其时，人民解放战争加速向西南推进，9月初，蒋介石下令云南进行“整肃”。9月9日，国民党特务、警宪在昆明大批出动，计划中第一个逮捕的就是杨杰。杨杰得到消息较早，于搜捕前夕秘密飞往香港，准备转赴北平。蒋介石指使其潜伏在港的特务，于9月19日将杨杰暗杀于香港寓所。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谴责了蒋介石杀害人民政协代表杨杰的罪行。1952年，杨杰的骨灰从香港运回云南，安葬于昆明西山墓地。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中华新报馆编辑：《护国军纪事》，1916年版。

杨春洲：《杨杰被害前的反蒋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3年版。

杨肇湘：《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上册，1980年版，第465页。

(2) 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846—856页。

杨荩诚

刘毅翔

杨荩诚，又名光准，字柏舟，土家族。1880年（清光绪六年四月）生于四川秀山，远祖为当地土司。他九岁丧父，家境贫寒，性格沉毅寡言。童年在家乡读私塾，喜爱经史，但并不热心封建的科举考试，认为举秀才是无意义的。1900年，杨荩诚在本乡蒙馆执教，后因处罚纨绔学生而被解职。1902年，他假称贵州松桃县籍投笔从戎，考入刚创办的贵州武备学堂，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受到日本总教习高山公通、宕源太三郎等人赞许。1905年，他以“最优等第一”[(1)] 成绩毕业，被选送日本官费留学，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五年余，成绩皆优。1910年归国，经部试授武举出身，任贵州新军第一标教练官（如副标统）。1911年春，又兼任贵州陆军小学总办。

杨荩诚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与留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尹昌衡、唐继尧、刘存厚、王绮昌、王思辅等人组织团体，与同学黄郛、胡瑛、宋邦翰、唐之道、陈复初、殷承瓛等人在东京西国桥经常聚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返回贵州后，他常利用自己在军界的较高位置，暗中对新军和陆小的革命活动进行鼓励和保护，因此得到学生和士兵们的爱戴。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革命风声日急，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范陆小学生，免去杨兼任的陆小总办职务，改派姜若望继任。为此，陆小学生自行延长暑假期一个月，以示抗议。

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新军相继响应，成立军政府。杨荩诚鼓动贵州陆小学生和新军士兵响应起义，原商定利用11月10日在野外演习的机会共同举事，由于机密泄露，陆小学生被迫于11月3日晚8时率先发难。11时，驻城外南厂军营的新军继起

应援。杨荩诚毅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原为同盟会员，于是便被起义新军拥为首领，当即誓师，并与陆小学生取得联系，决定待拂晓由他统一指挥入城。这时，驻在城内的抚署卫队和炮队亦闻风而起。沈瑜庆见大势已去，被迫书写承认贵州独立手令，附带巡抚关防，一并派人连夜送交省谘议局。第二天拂晓，杨荩诚率新军和陆小学生进城，只见街上已贴满贵州军政府宣布独立的告示。他便率部先向抚署绕走一周，将军械局占领，随后到谘议局与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团体领导人会晤，正式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贵州光复成功，建立军政府各级组织机构。由于他在起义的军人中职位最高，又深得新军士兵和陆小学生的拥戴，所以当天下午即被公推为都督，主管全省军事、政治。

11月下旬，因清军围攻武昌，汉阳危急，黎元洪迭电各省都督，恳请“迅速调拨老练之兵，携带枪弹并机关炮、新式快炮，星夜来鄂援助”[(2)]。湘督谭延闿亦来电，称湖南“西路辰、沅、永、靖一带抗不反正，湘军已悉师援鄂，无力兼顾，请黔出师代为平定”[(3)]。加上此时贵州东部松桃、安化（今德江县）等地，又“持湖南之西路、四川之秀山为奥援，负隅反抗”[(4)]，尚未光复。于是，杨荩诚决定率扩编后的新军两个标北伐援鄂。12月10日由贵阳出发，军政府饯行于城外。杨荩诚慨然举酒酹地说：“此行也，不歼国贼，誓不生还！”[(5)]他行抵铜仁，松桃、安化等地传檄而定；行至湘西，凤凰县南之镇筸，清吏亦闻风反正。1912年1月上旬，杨荩诚到达常德。这时，南北双方正停战和议，黎元洪致电杨荩诚：“请暂驻节常德，以待和议着落。倘和议不谐，自当飞电相请。”[(6)] 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北伐之举遂罢。杨荩诚委参谋田宗桢为司令暂行管理军队，只身经武汉赴南京谒见孙中山，报告贵州光复情况，并呈请解职归田。孙中山以黔多故，正式任命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并由黄兴拨饷银十五万元接济，令其急速率师回黔。

3月初，滇军北伐司令官唐继尧应贵州耆旧和宪政预备会之请，假道入黔，在贵阳镇压自治学社，接任了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闻

讯再次向孙中山辞职，仍未获允。杨荩诚又与旅宁黔人开会筹商，与会众人皆言为调和贵州省内党争和安置驻湘北伐黔军计，非杨亲自回黔不可。杨乃表示："俟诚回湘调查黔中情形，倘果如上述，自当斟酌维持。否则将驻常（德）军队及经手事件办理妥当，当即退休。"4月，杨荩诚由南京行抵长沙，却接到唐继尧控制的贵阳方面对他"肆口谩骂"、"指为争权"的来电。他屡加解释无效，只得暂驻常德而致电中央请示解决办法。此时，孙中山已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中央政权完全由袁世凯把持。25日，袁世凯下令：已改任唐继尧署理贵州都督；"杨荩诚于贵州光复有功，业令来京，另加委任；所部驻常德军队，另由谭都督（延闿）妥派干员，分别安插；其未布置以前，所有军队不准到黔"[7]。杨荩诚接电后，认为驻湘北伐黔军客秋反正，勋劳卓著，出师以来，险阻备尝，且贵州编练新军靡费何止巨万，除在贵阳被唐继尧杀戮驱逐者外，所余只此两标，绝不能再因他辞退而被无故解散。他迭电中央据理力争。驻湘北伐黔军亦致电谴责唐继尧率滇军入黔的各种暴行，表示"即日整队出发，誓以数千健儿颈血，饱餍饫滇军锋刃……昔日杨都督率我军以出，今日我军必奉杨都督以入"，"如唐继尧辈必剪除乃止"[8]。5月初，北伐黔军前卫尖队进至辰谿，而滇军赶至镇远，战争将在湘黔边境一触即发。黎元洪急电唐继尧和杨荩诚："望乞各驻现地，静待后命。"[9] 谭延闿和洪江西路防营统领兼安抚使陈斌生亦力持和平，出面调处。杨荩诚当即重申自己亟思引退，但求黔军安插得所，并无竞争权力之心。

6月14至16日，黎元洪代表赵均腾，谭延闿代表危道丰、陈书田，贵州省议会暨各界代表牟琳、胡为一、张绍銮、吴作棻、何煓和驻湘北伐黔军代表刘世杰、王净、肖键之等在洪江正式举行会议，达成滇军回滇、黔军由中央派宣慰使督率回黔等《洪江条约》八条。嗣后经黎元洪提议，袁世凯和国务院又屡次决定，委任赵均腾为宣慰使，接管驻湘北伐黔军，按照《洪江条约》规定督率回黔；"杨荩诚将军队交出后，即遵照前电来京听候任用"[10]。杨荩诚及驻湘北伐黔军对此竭诚拥护。尽管旷日持久，饷糈奇窘，黔军仍恪守军纪，以

待《洪江条约》实现。

然而，唐继尧和贵州耆旧、宪政预备会等却拒不承认《洪江条约》，坚持要将驻湘北伐黔军缴械遣散。赵均腾亦知难而退，以才力浅薄不克胜任为词，拒不就职入黔。8月，袁世凯暨国务院突然改变态度，强令杨荩诚将驻湘北伐黔军径交受贵州耆旧和宪政预备会支持的第四十二旅旅长周荣儒接管，由周回黔与唐继尧等人先商量办法，再行率队回黔。杨荩诚深为驻湘北伐黔军和贵州前景担忧，交接前后仍继续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等人，力争按《洪江条约》精神由宣慰使赵均腾节制督回，但却无济于事。是月底，杨含恨离开常德赴北京。

12月29日，杨荩诚被授为陆军少将并加陆军中将衔，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由于他厌恶当时出现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遂转而学佛尚空，在北京日事静坐，译有《日本参谋要务》二册，长时间不问政事。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杨荩诚于翌年5月由北京潜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和王芝祥，准备组织一支军队，直捣河南讨伐袁世凯。旋因袁世凯毙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寝其事。

1917年，杨荩诚奉北京政府之命赴四川接洽西南将士，至重庆闻张勋复辟之变，遂急走成都劝说刘存厚参加讨伐。不久，张勋被段祺瑞削平，杨荩诚被任为四川驻京代表重返北京。

此后，杨荩诚经常与旅京同乡筹措川局，日夕积劳，遂致成疾。1921年冬返回四川秀山家乡静养，1922年7月病逝。

---

(1) 《都督荩诚公传》，《杨氏族谱》，四川秀山濬秀书局1928年石印本。

(2) 《黎元洪致各省都督电》（辛亥年十月初八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3) 《湘督致杨荩诚电》，《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4) 《杨荩臣上大总统书》，《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5)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 《黎元洪复常德贵州杨都督》（1912年1月9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7) 《袁世凯委任唐继尧为贵州都督》（1912年4月25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06页。

(8) 《驻湘北伐黔军致各省电》（1912年5月9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

(9) 《黎元洪致唐继尧都督、杨荩诚都督电》（1912年5月11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10) 《国务院致鄂湘黔督电》（1912年7月3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杨衢云

袁鸿林

杨衢云，名飞鸿，字肇春，衢云为其号。福建海澄人。1861年12月19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于香港。祖父杨福康，清廪生，曾署理广东肇庆府新兴县知县，后弃官出国，居南洋槟榔屿。父杨清河，生于槟榔屿，十六岁时返回本籍，后定居香港，曾先后在福建、香港当过巡理厅辅政司通事（译员）和书院的教员。

杨衢云幼从父读，十四岁时入香港一家英国海军船厂学习机械，因不慎而断去右手中间三指。于是转而学习英文，考试常名列前茅。二十岁毕业后，任香港圣约瑟书院教员，后改就香港招商局船务书记长，1894年转任英商新沙洋行副经理。

杨衢云少时曾习拳术而精技击，并任侠好义，尤关心时事，富爱国思想。他为人仁厚和蔼，有长者风度，见同胞受外人欺凌，则怒起而抱不平，不惜攘臂为之力争。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结局，对他刺激颇深，其思想便由爱国发展到立志反清复汉，并曾去广东寻求同志，但当时风气未开，并无应者。

1887年，杨衢云结识了香港域多利书院（后改称皇仁书院）学生、具有反清意识的谢缵泰，并引为知己，结为拜盟兄弟。1890年，他与谢缵泰联络了在外人所办书院、洋行中求学、任职的爱国青年陈苏、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等人，开始在香港酝酿成立辅仁文社——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新型知识分子组成并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政治团体。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可谋划和组织一场中国大众的革新和驱逐……满族鞑虏的运动。”[(1)] 1892年2月13日，

辅仁文社正式设总部机关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社员共十七人，杨衢云被选为会长。辅仁文社的社纲有六条："（一）纯洁品性至最高程度；（二）禁染社会恶习；（三）为未来青年作表率；（四）经种种可能途径，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五）获得西方优秀科学文化；（六）学习如何做爱国者，如何从事爱国活动和如何消除祖国所蒙受的屈辱，尽心爱国。"[(2)] 提倡西学、开通民智和爱国维新是辅仁文社的公开活动，社中购置多种新书报，以供研读和传播。杨衢云和谢缵泰系社员中学习西学最优秀者。谢曾于1894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号飞艇的设计方案（方案发表后曾得到外国著名飞艇学家的高度赞赏）；杨则对西方政治理论研究较深，成为第一个主张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党人。而在暗中，以杨、谢为核心的部分社员时常密谋反清革命，还曾探访过广州清政府驻香港的特务机关，以侦察清方的虚实。辅仁文社的总部也曾受到香港英政府的怀疑，时有西人的警探出入其间。

1892年秋，杨衢云经尤列的介绍与孙中山相识。他们一见如故，常在一起抵掌畅谈救国大计，以至达旦不倦。杨首倡孙、杨两派合作，主张孙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与辅仁文社共策进行，孙表赞同。翌年冬，孙与尤列、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集会，孙根据杨的主张，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与会者均表赞同，但不及制定会名，亦未形成具体组织。杨由于居住香港，未能到会。次日，尤列去香港，向杨报告会议情况，杨大为称赞。其时，孙、杨之间已在反清革命的宗旨上取得一致，只是对于共和国制度，尚有出入：孙主张"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则非造成民国不可"[(3)]。尽管有此分歧，孙、杨之间的交往和有关合作的筹商，为后来孙、杨两派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杨衢云、孙中山等革命者，空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他们两派联合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的步

伐。恰值杨衢云和谢缵泰等人苦于找不到新的革命同志以发展辅仁文社之时，孙中山已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1月下旬抵达香港，杨衢云便与孙中山等人筹商两派联合，共组革命团体。2月，香港兴中会在孙、杨两派联合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杨衢云率谢缵泰、周超岳等部分辅仁文社成员加入，并取消了辅仁文社。

在孙、杨的共同领导下，香港兴中会成立伊始，即着手准备夺取广州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准备大致分两头进行，孙派在广州，杨派在香港。香港的准备工作在杨衢云的亲自主持下进展很顺利，筹措军饷、外交宣传、购运枪械以及邀集会党等诸方面的成绩均十分显著。在起义筹备基本就绪时，兴中会主要成员于1895年10月10日举行会议，选举兴中会会长兼起义后临时政府总统。会上，孙、杨两派争相拥戴自己的领导人出任，几乎导致两派分裂，后经孙中山退让，杨衢云遂被两派共同举为会长兼总统。起义原定于10月26日（重阳节）发难，不料起义前两日，因事泄而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由于杨衢云在这次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清政府广东地方当局把杨与孙并列为“匪首”，各出赏格“花红银一千元”，布告缉拿。[(4)] 孙、杨等人被迫外逃避难。11月13日，杨离港前往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并经过海峡殖民地[(5)]而去南非。孙早于10月30日偕陈少白、郑士良离港赴日。

杨衢云到南非后，便在当地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努力发展同志。1897年，他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彼得马里茨堡建立兴中会分会。1897年12月至1898年3月间，杨在返回香港的途中，又在海峡殖民地等处建立兴中会分会，并与当地的反清秘密团体建立了联系。期间，孙中山也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但是孙、杨两派由于起义前的争夺会长和起义失败后的互相埋怨，彼此互不联系长达两年之久，致使香港兴中会实际上陷于瓦解。1898年3月21日，杨衢云携家眷抵达日本横滨，以教授华侨子弟英语为生。不久，杨主动

找到孙中山，恳切要求两派抛弃嫌隙，重新共事，孙表示接受。两派从此恢复合作直到庚子惠州起义。杨始终维护两派合作，实是两派合作的纽带。

1899年4至6月间，杨衢云在谢缵泰的促使下，曾同康、梁一派有所接触，并与梁启超在横滨举行过会谈，筹商合作事宜。起初，杨与谢缵泰一样，认为康、梁一派也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其“和平革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们可能会乐意同革命派联合，共襄反清大业，因此对与康、梁一派的合作颇怀期望。但后来杨却发现：“康党甚傲慢……不愿同我们平等相处；总想要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全都服从他们。”(6) 因而与康、梁一派有关合作的商谈并无结果。以后，杨对康、梁保皇会明确表示谴责，断绝了同康、梁一派的联系。

1899年11月，孙中山指示陈少白、毕永年、宫崎寅藏等人邀哥老会、三合会首领集会于香港，成立兴汉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孙以不宜两会长并存为由，请杨辞去兴中会会长职。杨当即表示了赞助孙中山领导、维护两派合作的诚意，并说：“为了有利于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务了。”(7) 当时，杨闻孙正在筹划惠州起义，便自请回港筹备。1900年1月，杨从日本到达香港，经与谢缵泰商量，毅然提出辞职书，荐孙代兴中会会长，而从事革命运动则更加努力。他每日去兴中会在香港的机关《中国日报》社，凡筹备起义的事，无论大小，均奔走不倦。4月26日，杨离港去日本东京见孙中山，商量起义策略。6月17日，杨与孙同轮抵香港，经当日会议议决，杨与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在杨的积极影响下，已决意与孙中山分手的谢缵泰，也暂时中断了其独自谋划的另一次起义的准备，重与孙派共事。杨、谢两人还发展了李纪堂、史坚如为兴中会会员，李、史两人均在惠州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上旬，惠州起义在三洲田打响后，起义军屡胜清军。清廷南

海县知县裴景福惊恐万分，乃于中旬派植槐轩、陈廷威到香港见杨衢云，提出三条“议和”条件：一、招降党人各首领，以道府副将任用；二、准带军队五千人；三、给遣散费若干万。杨考虑到原定由香港和台湾给起义军输送枪械和干部人员的方案均已无法实现，起义军不久将接济断绝难以坚持，因此以为可利用这次“议和”，使起义军潜伏下来，以便“此后有所凭借，大可为李世民之续”[(8)]。杨将自己主张接受“议和”的意见电告孙中山请示可否，遭孙拒绝，“议和”遂止。

惠州起义由于接济断绝而失败，杨衢云被列为要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因此同志多劝杨出洋暂避。杨不忍虚糜革命经费，在香港设学校教授英文以自给，并慨然表示可为革命一死。1901年1月10日，杨正在授课，突然遭到清政府所派凶手枪击，次日不治身亡。杨衢云对于辅仁文社、香港兴中会的组成和发展，对于孙、杨两派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中的合作，都有卓越的贡献。孙中山在横滨得知杨衢云被杀的噩耗，异常哀痛，曾出名主丧，发讣告数百份于中外各地，又于1月26日召集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募集捐款一千二百余元抚恤其遗族。

---

(1) 谢缵泰：《中华革命秘史》（Tse Tsan Tai，*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Hong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中译本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337页。

(2) 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与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见薛君度编《中国近代革命领导人物》（*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22页。

(3)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南京版）。

(4) 文公直等著，大同学会编辑：《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第一卷，上

海新光书店1929年版。

(5) “海峡殖民地”为1826年英国合马来半岛南部之马六甲、新加坡、槟榔屿等处组织而成之殖民地之旧称。

(6) 《杨衢云致谢缵泰函》（1899年6月6日），见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7) 谢缵泰：《中华革命秘史》（Tse Tsan Tai，*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Hong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中译本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84—337页。

(8) 冯自由：《杨衢云事略》，见《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杨铨

陈崧

杨铨，谱名宏甫，字杏佛。1893年4月5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西玉山。祖籍清江县。幼时，由于家境贫困，随父移居扬州，后迁杭州。

杨铨六岁读私塾，稍长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在上海读书时，他结识了爱国青年张奚若、任鸿隽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深为不满，向往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1910年，杨铨参加了同盟会和“南社”，并写了一些充满救国豪情的诗词。他对革命起义的失败和烈士的英勇牺牲感到无比悲愤：“眼见英雄成白骨，好头颅未易苍生苦。心化血，血成雨！”[(1)] 他企盼着：“一朝狮梦醒，身与国魂还。”[(2)]

1911年8月，杨铨转学到河北唐山路矿学堂，编入预科第六班。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课，杨铨赴武昌参加革命。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杨铨遂至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912年11月，杨铨与任鸿隽等经稽勋局派往美国留学。到达美国后，先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留美期间，他和中国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任鸿隽等创办了《科学》杂志。该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杨铨任编辑部主任并经常撰稿。不久，他们又组成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科学社”。

1918年10月，杨铨由美归国。到达上海后，曾应中国环球学生会和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的邀请，先后发表题为《个人效率主义》、

《科学的工商管理法》的演说，积极宣传用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振兴民族实业。11月，赴汉阳任武汉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

1920年夏，杨铨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教授。不久，该校改为东南大学，他兼任工科主任。主要讲授工业管理课程。在此期间，他发表过许多有关社会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如：《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思想界与今日中国之祸乱》、《代议制与中国之乱源》、《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实业改造》、《教育革命与中国学术及政治前途》、《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等等。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例如，认为要使中国得救，必须做到政治上的改革同社会改革相结合，科学同革命相结合。他批判了当时对中国前途的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主张把中国交给“国际共管”；另一种是断言中国必能“同化西人，调和新旧”，以保持中国之独立。杨铨指出，前一种“悲观”论调，只能是“与虎谋皮”；后一种“乐观”论调，则是“画饼充饥”，所以“皆不可恃”[(3)]。

他在南京期间，同共产党员恽代英、侯绍裘、吴肃、宛希俨、黄觉新以及高尔松兄弟相交。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他站在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努力探索和阐述劳动问题的产生及其意义、劳动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指出不解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者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他的演说，充满革命激情，受到听众的欢迎。

由于杨铨坚持革新，坚持进步，遭到东南大学中当权的守旧者的忌恨。1924年10月，校方以杨铨宣传“社会改造思想”为由不发聘书，杨铨被迫离校赴广州。孙中山委托他参加筹备设立中央学术研究机关的计划工作。11月，他随同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杨铨被任命为“孙中山先生治丧筹备处”总干事。办完丧事后，杨铨全家从南京移居上海。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杨铨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6月10日，他联合爱国志士创办《民族日报》，并带病忘我工作。从撰写社论到编排校对，他都亲自动手。在短短半个月内，他撰写了二十余篇有战斗力的评论。他在该报发刊词中，号召人民组织起来，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在文章中，热情赞扬工人罢工、市民罢市，说这是表现出了“勇往直前的精神”，“大有气吞英日帝国主义的决心”[(4)]。《民族日报》的宣传，有力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媚外罪行。该刊出版仅半月，便被当局强令停刊。

同年9月，杨铨同恽代英、侯绍裘等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他在成立大会上做了演说，并被选为上海市总会的审查委员和募捐委员。

1926年7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秘密成立，杨铨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并在上海法租界设立秘密电台。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杨铨兼任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他参加了戴季陶所发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但是他不同意戴的“分共”主张，仍然坚持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例如，1926年11月12日，他为《中国晚报》纪念孙中山诞辰专刊所写的文章中便强调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是分散的，国民革命的成功，惟有全国民众参加方能实现”，并且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是以“联合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为起点，以消灭一切阶级制度实现大同世界为目的”[(5)]。

1927年1月，正当国民党右派积极进行“分共”、反苏活动时，杨铨挺身而出，借着庆祝元旦的机会，为《中南晚报》撰文，主张向苏俄学习革命经验。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杨铨当时作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参加了国共联席会议，并同共产党人汪寿华、周恩来等相配合，积极支持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出版于巴黎的《救国时报》曾赞扬他是“实为有功于上海起义的人物”[(6)]。起义胜利后，杨铨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蒋介石

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铨被撤销了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的职务，并一度被诬为共产党员而遭扣押[7]。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杨铨担任该院的教育行政处主任。11月，中研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杨铨被任命为秘书长。1928年4月，杨铨改任该院总干事，直至1933年6月。他在协助蔡元培主持院务的工作中，成绩优异，深受蔡元培赞赏[8]。

1930年，杨铨秘密参加了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与郑太朴、谢树英等一起积极进行反蒋的工作[9]。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枪杀于南京。杨铨闻讯后，立即报告宋庆龄，宋当即用英文写了一份谴责南京政府的宣言，由杨铨译成中文后，由陈翰笙和谢树英连夜送往《申报》，第二天就发表了出来[10]。通过这次事件，杨铨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政权反人民的本质，更以不知疲倦、不顾危险的战斗姿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斗争。

1932年夏秋间，面对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以及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志士的行为，杨铨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分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杨铨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同时担任由七人组成的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杨铨主持建立了上海和北平两地的“同盟”分会。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杨铨等八位筹备委员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禁的许德珩等师生。

1933年1月上旬，在北平狱中的共产党员刘尊棋，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名义，写了两封信给宋庆龄，揭露监狱对政治犯的迫害，要求释放，以便投身抗日斗争。于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派杨铨借成立北平分会之机，至北平考察监狱。杨铨到北平后，先后考察了北平军事分会所属的反省院、军事执法处看守所、陆军监狱，询

问“犯人”的待遇状况，听取了他们的控诉，并且表示了对他们的同情，他说：“我们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2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签发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的两封来信，在《大陆报》、《燕京报》以英文发表。2月6日，杨铨返回上海，向“同盟”总会报告了考察北平监狱的真实状况，为“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根据。2月11日，《中国论坛》（实际是“同盟”的机关报）用中文全文发表了北平政治犯的两封来信，同时还发表了“同盟”为此而写的《说明》，强烈呼吁“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这些材料的发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注意。杨铨对北平监狱的考察，也对在押的共产党人起了很好的鼓舞斗志的作用[(11)]。

事实表明，在实际斗争中，杨铨在对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立场愈来愈和共产党人接近。他在北平视察的时候，正值群众公祭李大钊。杨铨参加了公祭的游行队伍，并亲自撰写了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犹在，那用吾辈哭先生。”[(12)]

1933年3月，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推动下，上海三十多个群众团体组成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参加者有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各方面爱国人士。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号召团结抗日力量，“组织人民自卫团”，一致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向中华苏维埃区域的进攻。杨铨也在会上代表“同盟”发表演说，阐述反帝抗日与保障民权的不可分离[(13)]。

“同盟”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于3月间专门组成“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杨铨被选为委员。杨铨参加了宋庆龄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司法部长罗文幹，提出立即释放罗登贤、佘文化、陈赓、陈藻英等的要求。杨铨还随同宋庆龄，代表“同盟”中央，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探视了长期被关押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Hilaire Noulens）及其夫人。

1933年4月下旬，杨铨还为营救丁玲和潘梓年四处调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欺骗伎俩，并发动上海文艺界人士联名打电报向国民党政府抗议。

1933年5月13日，杨铨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一起，前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政权对德国人民的迫害。抗议书，既是对希特勒的声讨，也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抗议。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曾经大发雷霆。

杨铨参与的这些活动，是对于进步力量的有力支持，当然这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仇恨。为了破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党特务不断写信给宋庆龄、杨铨等进行威胁，甚至把子弹放在信封内恐吓杨铨。特务还曾印发三百张照片，悬赏以求暗杀杨铨。

1933年6月18日晨，杨铨携长子杨小佛由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研院乘车外出，车出大门，突遭潜伏路旁的特务枪击。杨铨伏在儿子身上，自己身中数弹，被送至医院，数分钟后，即因伤重逝世，年仅四十岁。他的著作有《杨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等。

---

(1) 柳亚子编：《南社诗集》第13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

(2) 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页。

(3) 杨铨：《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杨杏佛文存》，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3—4页。

(4) 杨铨：《对于上海市民大会的感想》，《杨杏佛文存》，第193页。

(5) 杨铨：《中山先生几个伟大的观念》，《杨杏佛文存》，第39页。

(6) 《救国时报》1937年3月21日。

(7) 《申报》1937年4月15日，杨铨所登启事。

(8)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5页。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史料选辑》第2辑，1982年版。

(10) 据陈翰笙、谢树英口述。参见《申报》1931年12月20日。

(11) 《纪念杨杏佛，学习杨杏佛》，《文汇报》1983年9月10日。

(12) 杨小佛：《杨杏佛事略》，《人物》1982年第1期。

(13)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

杨森

吴银铨　马宣伟

杨森，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祖籍湖南衡州府。1884年2月20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日）生，父亲杨廷安为邑武庠生，母吴氏[(1)]。

杨森幼年就读广安紫荇书院，后入顺庆府联合中学堂。1906年杨森联中毕业，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弁目队，1908年升入速成学堂受军官教育，由同学秦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速成学堂毕业，分发到驻成都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第六十五标任排长。1910年升任第十七镇六十五标一营右队官。

辛亥革命后，杨森在川军第一师任营长，时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杨森营为使署警卫。因受排挤，到成都川军第三师任军士队教育长。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响应反袁，宣布独立。杨森赴重庆投奔熊克武，任少校营长。袁世凯派贵州都督唐继尧为滇黔援川军总司令，出兵入川讨熊，唐派第一混成旅旅长黄毓成率滇黔军配合川军各师围攻重庆，击败熊克武部，杨森被俘。当黄毓成清点俘虏时，杨森自报系熊克武部少校营长。黄见杨森态度坦诚，乃留他在司令部任少校副官。

1913年9月18日，援川滇黔军与川军第一师模范团长王陵基部发生冲突。10月5日援川滇黔军奉命撤回云南。杨森到昆明后，被派到安宁温泉为黄毓成修建别墅当监工，同时伙同滇军军官贩运鸦片烟，遂染上了烟癖。

1915年1月，杨森任云南讲武堂队长。12月护国运动兴起，杨森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赵又新部少校参谋，入川作战。在川南安福

街、牛背石等地与北军作战中，杨森率部以寡胜众，得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的奖勉。1917年8月，杨森任驻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黄毓成任靖国军总司令入川，委杨森为叙府城防司令，引起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的不满。杨杰知杨森有烟癖，派队突然入杨森家搜查，拟当众加以羞辱[(2)]。黄毓成只好将杨森调回第二军任参谋长。杨森从此戒了烟。同年12月，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任命杨森兼第四混成团团长，参加争夺泸州之役，占领泸州。时川南匪风甚炽，杨森被任命为泸州清乡司令，他招抚了永宁土匪关子久、王凤岗两部，即成为他的基本力量。

1920年3月，川军与滇黔军开战，杨森脱离滇军，投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任第一混成旅旅长。8月，刘湘任第二军军长，杨森升第九师师长，并兼“靖川军”第二军前敌总指挥。杨森先率部攻占成都，又连续追击滇军至泸州，将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击毙，滇军败走。9月，杨森率部进驻泸州，兼永宁道尹。1921年7月，刘湘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因出兵援鄂失败，刘湘被迫通电辞职，由杨森代理第二军军长。1922年7月，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与刘成勋的第三军及赖心辉的四川边防军等组成“省联军”，向杨森的第二军开战。杨森军在下川东向第一军攻击，在渠县杜家岩一战中，遭一军伏击，杨军惨败。随即省联军兵分三路进攻重庆。8月20日，杨森率残部逃宜昌投靠吴佩孚，被委为中央陆军第十六师师长。

1923年2月，熊克武联合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及四川边防军赖心辉对川军第三师邓锡侯、第八师陈国栋等部开战。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援助杨森打回四川。3月杨森率部返回万县，4月6日乘虚攻入重庆，继续尾追熊部西进。熊克武、赖心辉集中兵力反攻，杨森大败，退至万县。杨森与刘湘、陈国栋、邓锡侯及黔军袁祖铭等合兵一处，在吴佩孚送来大批饷款、弹械的情况下，准备反攻。同年10月23日，北京政府授杨森为森威将军，他率部先反攻重庆。1924年1月2日，杨森率部直插潼川熊军总部，熊克武措手不及，缒城而逃，继而放弃成都退出四川，杨森进占成都。5月27日，北京政府委杨森为督理四

川军务事宜[3]。

杨森任督理后，独占成都兵工厂，将部队扩充到近十万人。1925年2月发动“统一之战”，力图以武力统一全川。他以第十师师长刘斌“称兵犯上”为词，下令向驻绵阳的刘斌部进攻，攻占绵阳等县；接着驱走驻简阳的田颂尧部及驻自流井的刘文辉；又将驻遂宁的陈国栋师和资中、内江的赖心辉部、驻新津的刘成勋部击败；再出兵将乐山的陈洪范师打败，迫陈通电下野。

杨森威势日增，咄咄逼人，刘湘联合邓锡侯、刘文辉及黔军袁祖铭等结成反杨同盟，组成川黔联军。7月，杨森与刘湘为首的川黔联军开战。杨森兵虽多但面很广，难以抵御对应之重点突破，先败于荣昌三溪镇，继而在战斗方酣之际，杨部主将王缵绪临阵倒戈投刘湘。川黔联军全线反攻，杨军大败，残部为刘湘等收编。10月，杨森由宜宾逃往汉口。当时正值吴佩孚在汉口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12月，杨森被委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

川黔联军逐走杨森后，由于分赃不均，致起内讧，袁祖铭率黔军独霸重庆。刘湘为反袁祖铭不得不与杨森言和，支持杨森招回在“统一之战”中失去的旧部。1926年5月，杨、刘通电讨伐袁祖铭，分路进击黔军，直至追出川境。自此，杨森部驻防以万县为中心的下川东一线。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万流”轮在云阳撞沉杨森部木船。9月5日，英舰又悍然炮击万县沿江两岸，致使民房、商店被焚四百余间，死亡六百〇四人，伤三百八十九人。在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下，杨森部曾开炮反击英军[4]。

这时，正值北伐军进军武汉，杨森观察形势，要求参加北伐，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见刘湘、刘文辉联成一气称霸四川，便与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等组成倒刘（湘）同盟军，合力进攻重庆。结果杨森败北，下川东防地丢尽，只得寄食于罗泽洲防地渠县内，后进据雅安。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杨森奉命在川北堵击，遭到失败。7月，杨森受任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围攻红军又遭失败。1935年春，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命杨森追击。杨森为保存实力，与红军远距离尾追，后奉命撤往洪雅整编。次年奉调至贵州“清乡”。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森率第二十军于9月开往淞沪前线。在收复陈家行的战斗中，所部英勇抗敌，伤亡惨重。后奉命撤往南京，杨森擢升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二十军军长。旋调安庆补充整训，后移驻湖南浏阳、醴陵一带。

1939年6月12日，杨森奉蒋介石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并逮捕杀害该处干部及家属十二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同年10月，日军进攻长沙，杨森率部在铁路、公路两侧山区，以夜袭、侧击，打退日军三次进攻。杨森被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了长沙三次会战。1944年8月，杨部在豫湘桂战役中从衡阳撤向广西柳州，后开赴黔东南榕江、黎平一带整训。

1945年1月16日，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主黔三载，从事兴修乡村公路、振兴农田水利等建设，并在贵阳市六元门修建体育场；但搜括甚亟，黔人大呼“亡黔”。1948年4月3日，杨森调任重庆市长[(5)]，仍控制第二十军。1949年4月，第二十军在芜湖、广德间被人民解放军全歼。是年8月，蒋介石撤至四川，以第二十军“反共有功”为词，命杨森在重庆纠集残部，重组部队；并提出“党政军一元化”，让杨森兼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11月，解放军入川，杨森又兼重庆卫戍总司令，护卫在重庆的蒋介石。11月29日，解放军进逼重庆南岸，杨森仓皇撤往成都；12月18日，飞离大陆去台湾。第二十军于12月26日在金堂起义。

杨森到台湾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又兼任台湾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及台湾省奥林匹克运动会理事长。

1977年5月15日，杨森病逝于台北市三军总医院。

---

(1) 杨森：《九十忆往》，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

(2) 马宣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3)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310页。

(4) 据《中华民国大事记》记载：1926年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轮在四川云阳江面违章疾驶，巨浪打沉杨森部木船三艘，溺死商民、船夫十余人及杨部解饷官兵五十八名，损失饷银八万五千元及步枪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当“万流”轮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上船调查，停泊于万县的英舰“柯克捷夫”号竟强行掩护“万流”轮驶离。杨森向驻渝英领事交涉未果，遂扣留停泊于万县的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艘商轮。9月5日英舰“嘉乐”、“柯克捷夫”、“威警”等三舰竟开炮轰击万县杨家灞、南津街及省长公署等地，引起火灾，焚毁民房、商店一千余家，死伤民众四千余，杨森部曾开炮还击。据驻京英使麻克类称死英海军军官三、兵士四；伤军官二、兵士十三。

(5)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03页。

杨善德

张学继

杨善德，字树堂，安徽怀宁人。1856年（清咸丰六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幼时以卖烧饼为生，稍长投毅军（淮军一支）当兵，后保送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1895年，投奔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任新建陆军右翼步兵第二营队官。1902年春，任北洋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营管带。1904年，任北洋陆军第二镇步队第五标统带。1906年，任北洋陆军第四镇第七协协统。1908年，奉调浙江编练新军，任浙江新军混成协协统。1910年，任浙江新建陆军第二十一镇第四十一协协统，该协驻扎在省会杭州城郊，近两千名官兵中有大批同盟会、光复会会员，是革命力量较强的一支新军武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杨善德调任第四镇统制，离开了杭州，也避免了新军起义后当俘虏的命运。

1912年，北洋第四镇改为陆军第四师，袁世凯任命杨善德为第四师师长。9月19日，升陆军中将。1913年2月，杨善德获得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嘉禾章。7月，“二次革命”爆发，杨善德率第四师一部随北洋第二军军长、江淮宣抚使冯国璋南下作战。8月16日，冯国璋发布总攻南京的作战命令，规定：“自老西江口至浦口一带之部队，均以杨（善德）师长为司令官，并监督三、五两师后路。”[(1)] 几乎就在杨善德指挥部队攻打南京的同时，所部第四师另一个旅也由海军舰艇运送到上海龙华，担任守卫龙华的任务。在江苏、上海的反袁军被镇压下去后，袁世凯于9月13日任命杨善德为江苏松江镇守使，并加陆军上将衔，授勋三位。1915年10月，授将军府克威将军。

1915年11月10日，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中华革命党东南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的革命志士刺杀身亡，袁世凯惊恐之余，

下令裁撤上海镇守使，松江镇守使也同时裁撤，另设淞沪护军使，任命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何丰林为上海防守司令，调兵遣将，加强镇压革命党人的力量，企图巩固上海这个工商业重镇。

孙中山针锋相对，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经过精心策划，于12月5日发动肇和舰起义，准备夺取上海制造局，打开反袁局面。起义发生后，根据袁世凯“将该舰击毁”的命令，杨善德立即会同在沪的海军司令李鼎新调遣军队镇压起义，他们一面组织陆军从岸上开炮轰击肇和舰，同时用重金收买靠近肇和舰的应瑞、通济两艘军舰同时向肇和舰开炮，致使肇和舰及舰上人员遭到严重伤亡，起义失败，参与起义的革命志士数十人惨遭杀害。杨善德镇压起义有功，故袁世凯在宣布接受帝制后破格赐封他为“一等伯爵”。云南护国战争打响后，针对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潜伏准备暴动的形势，杨善德下令在上海、吴淞、闸北、浦东实行特别戒严。

浙江自辛亥革命光复以后，实行“浙人治浙”，军政首长一直由本省籍人士担任。但因为浙军将领有武备派、士官派、保定派、陆师派的区别，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政局一直难以安定。1916年6月，保定派的吕公望出任督军后，各派为争夺省长一职发生严重内讧，致使吕公望不安于位，北京政府乘机于1917年1月1日任命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此一任命标志着辛亥以来“浙人治浙”局面的结束，激起浙江省内各派的反对，但北京政府拒绝收回成命。1917年1月12日，杨善德率第四师入浙接任浙江督军。

为了安抚浙江省内的军政实力派，杨善德就职后宣布“治省大计一以和平妥洽为主”[(2)]，对原有军政官员基本上不作更动，裁撤部分浙江军警，并将他们调出杭州，省城保卫由第四师卫兵团负责，同时训诫所部第四师官兵在浙江各地驻扎期间一定要遵守纪律，不得无故扰民。他“要求各官长约束兵目，随时告诫，处己以严肃为主，待人以谦和为主，先树起商民信仰之心，而顾本师十有余年之名誉”[(3)]。

上述措施，使浙江政局初步安定下来。

但是，浙江省内的政局刚刚得到安定，北京中央政府政局又起波澜。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因争权夺利酿成“府院之争”，段祺瑞鼓动北洋系各省督军组成所谓督军团向总统黎元洪施加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杨善德作为北洋皖系的骨干自然成了督军团的重要一员，亲自或者派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督军团会议，联名发表通电，向黎元洪总统施加种种压力，但黎元洪没有屈服于督军团的压力，并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结果引起段氏及亲段的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的强烈反弹。26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发表通电，称黎总统免段总理职务为非法行动，宣布安徽“独立”，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接着，陕西、河南、奉天等省的督军起来响应，5月30日，杨善德与省长齐耀珊也联名发表通电，宣布浙江“独立”。

“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复辟派头子张勋乘机浑水摸鱼，他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带辫子军入京，在迫使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后，又逼迫黎元洪“归还”大政于前清废帝溥仪，黎元洪在张勋的武力压迫下潜逃荷兰公使馆避难，同时电令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1917年7月1日，张勋进入紫禁城，宣布拥戴溥仪复辟，赐封中央与各省官职，杨善德被封为“浙江巡抚”。对于张勋复辟，杨善德宣布“万难承认”[(4)]，并与曹锟、冯玉祥等公推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同时响应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号召，苏、浙、赣、沪四方联合出兵直捣张勋的老巢，根据协议，杨善德派出了浙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潘国纲）、第二支队（支队长何丰林），归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节制指挥。

1917年7月13日，浙江督军公署参谋长赵禅在杭州奉直会馆门前遇刺身亡，杨善德对于自己的得力助手意外死亡感到十分震惊，以“匪徒潜伏，谋为不轨”为由，于7月17日起宣布浙江全省实行戒严，自任全省戒严总司令兼杭属警备地域戒严司令官，捉拿革命党人。

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形成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受孙中山广东护法的影响，浙江革命党人与浙江实力派首领蒋尊簋、周凤岐、顾乃斌、叶焕华等合作，于11月26日在宁波宣布独立自主，与浙江军政当局脱离关系。宁波独立军由蒋尊簋任总司令，随即出兵曹娥江，控制百官镇一带阵地。29日，杨善德派遣童保暄率领浙军第一师前往镇压。

童保暄与宁波独立军蒋尊簋等早有联系，原本计划在进军到曹娥江后反戈倒杨。对此，杨善德早有安排，他派第四师炮兵及机枪队随童保暄行动，使童无法与宁波独立军取得联络。两军在曹娥江隔江对峙，童部在晨雾弥漫中向对岸放了数炮，宁波独立军随即溃散。12月3日，宁波独立被迫取消。

1918年1月8日、13日，杨善德与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赵倜等十六省督军、都统两次联名打电报给主和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催促他下讨伐西南的总统令。冯国璋开始表示拒绝，但最终没有顶住主战派的压力，被迫于1月30日下令讨伐西南。讨伐令下达后，主战派核心人物徐树铮一再电请杨善德出兵援粤。4月，杨善德派童保暄率领浙军第一师前往福建，与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合组闽浙援粤联军，李厚基任联军总司令，童保暄任副司令。童保暄率领浙军第一师进驻闽南后，蒋尊簋、吕公望等奉孙中山令前来策反，遭到童保暄的拒绝，但所部团长陈肇英却在吕公望策动下率领该团五百余名官兵投奔广东护法军政府。护法军政府即以此为基础，组建护法浙军，以吕公望为总司令，陈肇英为护法浙军第一师师长。童保暄经此打击后，不得不退兵厦门休整，心中郁郁寡欢。1919年5月，童保暄在厦门病故，年三十三岁。杨善德呈请北京政府抚恤童保暄，并保举张载阳继任浙军第一师师长。

北京政府以杨善德出兵攻打护法军政府有功，先后授予他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勋二位。1919年8月13日，杨善德在杭州病逝，终年六十三岁。次日，北京政府颁布总统令追赠杨善德为陆军上将。

(1) 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8页。

(2) 天津《大公报》1917年1月16日，第1张，第3页。

(3) 天津《大公报》1917年1月13日，第1张，第3页。

(4)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7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923页。

杨士琦

张学继

杨士琦，字杏城，安徽泗州人。生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因在六兄弟中排第五，故人称杨五爷。十三岁时失去双亲，追随诸兄长读书，刻苦自励。十六岁为诸生，1882年中举人，后屡试不中，遂替人充当幕僚。后捐道员，1885年分发直隶试用。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兴起，杨士琦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请其痛剿义和团，引起袁世凯的注意。1901年，杨士琦与其兄杨士骧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充当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之间的联络人。因善于逢迎，得到李鸿章和奕劻的赏识。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后，杨士琦投靠袁世凯，任洋务总文案，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咨商”，成为袁的智囊。1903年4月间，首席军机大臣荣禄病入膏肓，继任者为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为寻求新靠山，必须结纳奕劻。为此，杨士琦向袁世凯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1)]的方策，并亲自出马为奕劻与袁世凯牵线搭桥。奕劻一向贪财重利，杨士琦替袁世凯将一张十万两银票送到奕劻手中。而袁世凯所得到的回报则是，庆王事无巨细，包括朝廷要员的任免，都必须“讨教”袁世凯。除奕劻外，袁世凯又广结王公大臣，如他先后与端方、周馥、张人骏、吴大澂、孙宝琦等一批督抚结为儿女亲家。甚至还厚着脸皮与慈禧的一个贴身小太监马宾廷结为把兄弟，利用他刺探情报，打通关节。通过“运动权贵”，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安插到朝廷和外省各个重要部门，掌握了清政府的实权。在这个过程中，杨士琦功不可没。

杨士琦日日奔走于清廷权贵之门，送钱送款，表面上极尽谄媚恭维之能事。但在背地里，杨士琦却对这些只知贪贿的权贵们十分轻

蔑，黄远生说：杨士琦“背后批评亲贵，则亦多语妙，谓满洲亲贵离不了一‘童’字，因私号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某某为童某，俪词造意，适如其人”[(2)]。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发展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正当袁世凯苦于经费不足而一筹莫展之时，杨士琦献策，建议将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所办的产业接收过来。袁世凯依计而行，解决了练兵和办实业的经费。

袁世凯保荐杨士琦以候补道，并以候补四品京堂用。1903年1月，杨士琦被派往上海任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办。11月，任商部右参议。1904年，任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名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监督。1906年改任商部左参议，后屡在商部（1906年9月改农工商部）任职。7月，任会办电政大臣。同月，官制编制馆成立，杨任提调。9月，受袁世凯指使，与孙宝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但遭到铁良等人的坚决反对。

1907年8月21日，清政府派杨士琦赴南洋各国考察商务，“抚慰”华侨，实则做欺骗宣传，妄图阻断华侨与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杨士琦到达马来亚的怡保时，当地保皇会召开大会欢迎。当杨士琦兴致勃勃地在台上演讲时，革命党人郑螺生等突然递上质问书，大意是：“我国自来多灾多难，我们侨胞在家乡无衣无食，不得已而远渡重洋。过去在国内还得不到政府的照顾，现在政府反而千里迢迢到南洋来抚慰我们，实在有点舍近就远，令人费解。”杨士琦一时无言以对，举座哗然。其秘书打圆场说：“诸位这般举动，岂不怕得罪杨大人？”听众不以为然，哄堂大笑。接着又有数人起立质问，杨士琦招架不住，匆匆结束“欢迎”大会，清廷愚弄华侨的企图没有得逞。

1907年，袁世凯、奕劻与军机大臣瞿鸿禨、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之间的政争引发了“丁未政潮”。由于杨翠喜案被揭发，袁世凯、奕劻一

方处于十分被动地位，不得不以退为进，载振主动请求辞职，其辞职书即为杨士琦捉刀而成。略云：“臣系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倏因时事艰难之会，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遂至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踞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一身后顾之忧；岂惟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3)]

正当袁世凯、奕劻一方节节败退之际，看似主动的瞿鸿禨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慈禧在单独召见瞿鸿禨时私下透露要罢黜奕劻之意思，这本是绝密消息，但瞿鸿禨竟将此事告其门生汪康年而泄露出去。杨士琦敏锐地抓住了瞿鸿禨的这一致命疏忽，向袁世凯献策。袁命他速写一纸弹章。杨士琦写成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奏章，内中罗列了瞿鸿禨交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各条罪状，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向瞿鸿禨提出弹劾。慈禧大怒，命孙家鼐调查，果然条条属实。瞿鸿禨当即被逐出军机，开缺回籍。在“丁未政争”中，杨士琦充分显示了聪明才干，更为奕劻、袁世凯所倚重，俨如左右手。瞿鸿禨罢职后，军机处缺得力主持人，奕劻保荐杨士琦。慈禧召见安徽籍的年迈大学士孙家鼐问：“杨士琦是安徽籍，你看此人如何？”孙家鼐对杨没有好感，便如实奏道：“此人乡评太坏，系一不讲品行的人，未便用在机枢之地。”[(4)] 孙家鼐的一席话将杨士琦的入阁梦粉碎了。

1909年1月2日，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将其罢官，命回籍养疴。袁世凯潜往天津，欲晤直隶总督杨士骧（杨士琦兄），杨怕殃及自身，拒绝会见袁世凯，并安排火车将袁送回北京。袁世凯对此痛恨不已，兼及杨士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

理大臣，11月26日内阁组成。组阁过程中，袁世凯并未看好杨士琦，后经徐世昌从中斡旋，杨士琦才得以入阁，任邮传部大臣。12月7日，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全权议和代表，与南方民军谈判。杨士琦作为议和参赞，随唐绍仪前往汉口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1月，杨士琦辞去邮传部大臣。

杨士琦不仅是袁世凯的谋士，而且是一个阴险毒辣的特务头目。刘成禺说：杨士琦“杀人用奇策。机密事，袁世凯与共之，号袁氏智囊。世人误称赵智庵秉钧为智囊，因赵字智庵，有智无囊，智而贮囊，则杨杏城耳”[5]。他配有一种毒性极大的毒药水，经常以此毒死政敌。直隶都督赵秉钧即是被杨士琦毒毙的。据赵秉钧的秘书长黄侃告诉刘成禺：“每晚必与智庵靠鸦片盘谈公事，谈倦，智庵饮人参水一杯方眠。一日喟然曰：项城帝制，是自杀也，我亦有杀身之祸。我愕然不知所云。过十余日，予与靠鸦片盘，倦归。不十分钟，急促予往，智庵已染急症，目瞪口闭，不能言语。问其家人，曰：饮人参水后，即发病，而打烟使僮，已不知去向。事后，始知以十万金贿烟童，滴毒药水于人参水中，即死。咸知杨杏城所为，无敢言者。”[6]杨士琦的伎俩在北洋派内部也引起极大的恐慌，他们害怕做赵秉钧第二。与杨士琦矛盾极深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曾说：“我梁某性命，不怕袁项城，倒怕杨杏城，惧其下毒药辣手也。”于是有人在梁士诒的官邸贴上门联：“红杏枝头春意闹，乌衣巷口夕阳斜。”[7]

1913年11月26日，袁记政治会议组成，杨士琦为委员。1914年1月23日，杨士琦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垮台。孙宝琦代理总理组阁，袁世凯欲发表杨士琦为交通部总长。但交通部历来是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的禁脔，而杨士琦是袁世凯幕府中的所谓皖系领袖，皖系与梁士诒为首的粤系历来面和心不和，现在杨士琦突然插足交通部，不能不引起梁士诒的强烈反应。梁士诒授意财政总长周自齐打电话给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转达梁士诒的话，说是总统让暂缓发表杨士琦的交通总长任命。由于梁士诒的坚

决反对，杨士琦终于没有做上交通部总长。记者形容杨士琦是纱帽飞到头上，忽又被大风吹去[8]。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不令撤销国务院，并在总统府内设立了政事堂，杨士琦为政事堂左丞。在确立总统制的过程中，袁世凯曾派杨士琦等拜访进步党人，说明尽管实行总统制，仍渴望与他们一起为国效力，并劝张謇留任农商总长。1915年5月8日，“二十一条”交涉时，杨士琦参加了袁世凯召开的紧急国务会议。

从1914年起，杨士琦作为帝制的鼓吹者，四处奔走。他曾游说于袁克定，力主实行帝制。而袁克定也以为其父如当上皇帝，自己日后可继父业，当二十年太平天子。因而对杨士琦言听计从，引为心腹，深相结纳。1915年1月1日，袁世凯授杨士琦为中卿。8月，杨士琦等政府要员上密呈给袁世凯，请实行君主制。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杨士琦虽然没有参加筹安会，但却是整个洪宪帝制运作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时人云：洪宪帝制之核心在于“二杨”：杨度浮夸，只是从事表面上的宣传；而运筹帷幄，发纵指示则全在杨士琦。又有“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宦”之说。

9月6日，袁世凯派杨士琦到参政院宣布对变更国体的意见，表示改变国体不能“急遽轻举”，且要看“国民之公意”。这份“意见书”表明袁世凯既要做皇帝而又“期待民意”的半推半就的微妙心态。12月11日，“民意”水落石出，国民代表全体公决结果不但以一千九百九十三票的全票赞成君主立宪，而且直推袁世凯为皇帝。1916年元旦，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杨士琦亦被免去政事堂左丞职务，任参政院参政。但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命令缉拿帝制祸首，杨士琦却未被列入，这大概与他平时不喜张扬，巧于掩饰，隐藏幕后有直接关系。

袁死后，杨士琦在上海租界亚雨培路、巨籁达路角购买了一套住宅，人称杨五爷公馆。杨士琦在这里纳小菠菜、小白菜为妾，过起隐

居生活。一日，杨士琦翻晒箱笼衣物古玩，毒药水瓶就放在箱内。杨士琦郑重嘱告家人："此种药水最毒，一点入口即死。"移放高柜上，令家人不得近，然后出外拜客。归家时推门而入，发现其子正与小菠菜、小白菜同榻。杨士琦见到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气极而晕，僵坐沙发上，口中扬言都要处死。小白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取来毒药水滴入茶中，令家人送杨士琦喝了，片刻即死去，时为1918年9月27日。这就是当年轰动上海滩的毒死杨氏家主大案。

---

(1) 远生：《杨士琦：电影中之交通总长》，《远生遗著》卷4，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版，第21页。

(2) 远生：《杨士琦：电影中之交通总长》，第21页。

(3) 沈宗畸：《东华琐录》，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8页。

(4) 沈宗畸：《东华琐录》，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第598页。

(5)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203页。

(6)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204—205页。

(7)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204页。

(8) 远生：《杨士琦：电影中之交通总长》，第18—21页。

杨寿枏

朱复康

杨寿枏，初名寿棫[1]，字味云，晚号苓泉居士。江苏无锡人。1868年10月6日（清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一个累代书香的家庭。祖父杨延俊是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山东肥城等县知县。父杨宗济系诸生，任溧阳县训导。伯父杨宗濂、杨以回、杨宗瀚，先后在李鸿章幕府，随军征伐太平军和捻军。杨宗濂历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杨宗瀚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总办等职。

杨寿枏六岁起读经书、《通鉴》，十二岁随父读于溧阳学署，十四岁学制义和试帖诗[2]，但他性好诗词古文。十七岁返里应试，以第一名入泮。1890年，被伯父杨宗濂召往直隶通州道署，受命教其子杨寿楣读书。1891年杨寿枏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三应会试未中试，遂绝意科举，专治史学，尤致力于财政一门，曾取“九通”内的钱币、赋税、盐法、漕运各门，提要钩玄，分类纂录，积成数巨册。

1897年，杨宗濂署山西臬台，不久擢任藩司，杨寿枏在其幕府任文案。当时山西巡抚胡蕲生颇注意新政，在省设武备学堂、商务局，办纺织厂等，皆与杨宗濂商定委办。杨寿枏主稿所有奏折、函牍，为胡蕲生激赏，遂延入抚署，主内文案。

1899年杨寿枏南归葬亲。他以资捐内阁中书职，因翌年义和团事件中止北上。其三伯父杨宗瀚在无锡筹办业勤纱厂，乃参与佐理厂务，遂得悉纺织厂经营管理的门径。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八国联军退出，杨寿枏入京就内阁中书职。次年为大学士孙家鼐邀入幕府主奏章。1903年清政府设商部，杨应商部考试被录取，分补保惠司主

事，1905年调补平均司。是年7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洋[(3)]，考察各国宪政，载泽派杨为二等参赞随行，于11月初出发，翌年6月返抵上海。7月回京复命，奉命督率译员在法华寺翻译有关东西洋各国政治制度的论著，杨任总纂，编纂专书共六十余种，咨送宪政编查馆，择其精要者分撰提要，进呈内廷。9月，清廷命载泽会同各部院尚书及南北洋大臣厘订立宪官制，由载泽主其事，杨协同编纂。

1907年，杨寿枏改补农工商部工务司主事，兼商律馆纂修。是年10月，随该部侍郎杨士琦赴南洋各地抚慰华侨，乘海圻、海容两舰历小吕宋、暹逻、爪哇、新加坡诸地，翌年春回京复命，上《考察南洋各岛华侨商务折》。旋补工务司员外郎兼公司注册局总办、商标局会办。这时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实行《奖励工艺》的措施，以图振兴全国工商业，颁订了《奖励公司章程》、《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这些章程、办法的草拟，大多出自杨寿枏之手。他在农工商部，深为本部堂官[(4)]所倚重。

1909年，清廷以载泽为度支部尚书，设财政清理处，杨寿枏为该部丞参兼财政清理处总办，专任清理财政。杨请派监理官分驻各省监督财政，并令各省造送财政报告，为编制全国岁入、岁出预决算之依据，并拟订六年内清理全国财政办法草案及分年办理程序。清政府财政收支向无预决算制度，杨采取欧美各国新法，参以中国旧章，创制全国收支预决算，其有关条例和程式皆亲手自订，颇费一番心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事权统一，控制全国财政，如网在纲。

1910年，杨寿枏被派充崇陵[(5)]监修官兼盐政院参事，旋补度支部左参议。他对部务颇有整饬风规、力除积弊之志，如过去户部书吏握权甚重，往往上下其手，中饱私肥。杨总办财政清理处时，即对核算、办稿诸事均调部员办理，雇用书吏仅事缮写。他严明考核，风气为之稍变。

清政府预备立宪，关于改革官制问题，杨寿枏主张仿效日本，设地方议事会，建立立法机构。他曾代度支部提出说帖，后来内阁会议制定官制，即以此为蓝本。杨对清政府采取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度极为热心，认为“历经欧美各国考察，封建专制已不能适合世界潮流，唯君主立宪犹可系维人心”[(6)]，所以奔走甚力，向各方鼓吹呼吁。他与劳乃宣、吴士鉴等数十人组织“宪政实进会”，推陈宝琛为会长，以期促进立宪早日实现。

宣统年间，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颟顸无能的亲贵各树党派，纷争甚烈。载泽历赴海外考察，于各国政体略有所知，深为“庆党”[(7)]所嫉。杨寿枏为载泽所识拔，故对“庆党”深感不满，常肆意抨击。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官吏纷纷请辞出京，而杨仍守本职，每日到部视事，至“逊位”诏下，始移居天津。

1912年7月，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以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杨寿枏由杨士琦荐举任盐政处总办。时张謇上盐务改革条陈，主张废除运商引票制度，撤销定岸引界，时舆论纷争激烈。袁世凯偏向保守，而对张的建议又觉难于驳斥，乃与杨寿枏商量。杨认为张文言之成理，未宜明予驳斥，不如由财部另拟一个盐务改革计划，以清除盐场积弊为主旨，降低盐价，减轻盐税，与张案一并提交参议院讨论。结果财部所拟计划被通过，张案乃取消。

9月，杨寿枏被任命为长芦盐运使，改革盐税征实银法为一条鞭法，改两为元，商民称便。他整理盐场产业，税率未加，而税收年增二百余万元。对财部某些不正当的提款，他敢于顶回去，为部主管所不喜。但因袁世凯认为他筹饷有功，调他为粤海关监督。不数月，又改派为总统府顾问兼财政委员，专任整理旧税事宜。1914年8月改任山东省财政厅长。该省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很尊重他，遇有财务问题，都和他商定而行。杨曾电财部请缓办杂税，谓“民间不苦税则之重，而苦税目之繁。请择税收丰富科目简单者踏实举办”[(8)]。于是在山东专办验契、田赋、公债三项，结果全省税收较前增加一千多

万元，居全国第一[9]。

1917年2月，段祺瑞组阁，任杨寿枏为财政部次长。时总长李经羲因病未到任，由杨代理部务。当时，许多省各自为政，税收往往不解国库。他力主量入为出，制订临时预算，提出开源节流之议，核定每月支出经费七百万元，以期收支适合。

7月1日，张勋复辟，任命杨寿枏为度支部左侍郎，旋命署理尚书。杨虽有“心怀旧君”之思，但因患病在家，未直接参与复辟丑剧。可是他在事后所写的笔记和杂文，仍认为“张勋此举磊磊落落，功虽未成，亦足为历史上有名人物”[10]，不难窥见他的心事。

1919年，杨寿枏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并推为财政理事，审核全国预算。又继周学熙之后任全国棉业督办，主持订购美棉种籽，分发各省种植，改良棉种；并举办棉业传习所培养纺织人才。1922年秋，江苏省辟无锡为商埠，杨寿枏奉派为无锡商埠局督办。是年冬，内阁改组，刘恩源任财政部总长，杨复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1923年4月，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上整理中国内债说帖，欲以“华府会议”议定的值百抽五所增新关税年约一千余万两，改充“金融”等六项公债基金。实则此项新关税已批准为“九六公债”基金，而安格联企图将新旧关余一手把持。杨坚执不可，与部员张竞仁著论力辟其谬。安格联联络各报指杨为破坏公债，而他始终不为所动，结果安格联之议遭到全体内阁会议的反对而未成[11]。

杨寿枏对北京政府常恃借债度日、积至后来几占全国岁入的十分之四，深为忧虑。尝谓外国发行公债以补助财政之不足，而中国发行公债则以国库岁收移充抵押，这不啻以财政交给银行，自失平衡调节之权。此时他看到军阀混战时起，对北京政权感到灰心。从1923年后，他结束了政治生涯，转向实业方面谋求发展。

早在1919年，杨寿枏已被公推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华新原是袁

世凯执政时，拟议在北方五省官商合办纱厂建立的唯一工厂，且因营运资金无着，久未开工。杨主持华新，着力解决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采用“包工制”的办法，以争取时间加速投产。“包工制”促使承包者挑选熟练工人，费用精打细算。华新从招工到开车，仅花了三个多月即顺利生产，二万五千锭纺机日夜运转，产品销畅，年终盈利一百五十余万元[(12)]。次年，一面派员学习，一面训练艺徒，抚循工匠，而将原有包工头渐次淘汰。第二，利用金融资本解决资金问题。华新初期，商股认缴仅五十万元，加上财部拨出八十万元，资金匮乏。杨筹设大同银号，吸取社会游资以作纱厂“活本”，利用金融资本，来为产业资本争取更大利润，对扩大生产起到了活跃作用，第一年纱厂和银号即获巨利，华新同时增招商股二百万元，扩大资本。第三，组织资本集团，发挥资本协作。华新获利丰厚后，相继建成青岛、唐山、卫辉三厂，虽资本各自独立，但连成一气，相互协作，又成立兴华集团，取得互相挹注之效。

1927年，华新改组，杨寿枏乃退居“专董”。他早岁即以诗文著称，尤擅骈体文，用典贴切，词藻工丽，颇为时人所推重。公余之暇，常和僚属以吟咏唱和为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作《秋草》诗四律以寄感，海内诗人争相传诵，和者百余家，辑成《秋草唱和集》。时人称他为“杨秋草”。

1935年后，杨寿枏寓居天津，息影林泉，常与故友结社唱酬，以诗文鸣当世。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洋旧官僚纷纷参加日伪组织，旧日同僚颇多挽他出山。他拒不接见，不问外事。晚年辑其自撰古文、诗词、笔记和书札，印行者有《云在山房类稿》、《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云荮漫录》、《云荮书札》等书。

1948年12月7日杨寿枏因肺炎病逝于天津。

---

(1) 杨寿枏初名杨寿棫，1894年始改名杨寿枏。见杨寿枏编：《苓泉居士自订年谱》，1943年铅印本。

(2) 制义，即八股文；试帖诗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诗。

(3) 五大臣出洋，原定在1905年8月19日，启程登车时，革命党人埋藏的炸弹爆炸，绍英受伤。徐世昌旋改任巡警部尚书，改期另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充任，其余三人照旧。

(4) 清制，部属称本部尚书、侍郎曰“堂官”。

(5) 崇陵，清光绪帝陵墓名。

(6) 杨寿枏编：《苓泉居士自订年谱》。

(7) 奕劻封庆亲王，故称其党羽曰“庆党”。

(8) 杨寿枏编：《苓泉居士自订年谱》，“乙卯、四十八岁”条，第20页。

(9) 杨景煃等辑《趋庭隅录》（1941年铅印本）记：“民国四年财政部呈明考核各省财政成绩，列山东财政第一。”

(10) 杨寿枏撰：《张少轩将军文》，载《云在山房类稿》；并见《苓泉居士自订年谱》。

(11) 杨寿枏编：《苓泉居士自订年谱》；又见杨寿枏：《云荭书札·复议员某君书》。

(12)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4页。

杨树达

白吉庵

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生于1885年6月1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其父杨孝秩为人好学，喜读史籍，于科举不甚在意，屡试不中，后为塾师。杨树达六岁从父学。稍长，其父授以《尔雅》、《资治通鉴》、《汉书》、《史通》等书。他尤好《汉书》，每读一篇，不忍释手。十三岁入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经今文学。次年春，因病辍学。十五岁遵父命从叶德辉受业。十六岁，转入求实书院，学经史、算学、英文等课。此后读书颇勤，开始治《易经》，拟仿阮元《诗书古训》体例，撰《周易古义》。二十岁，应院试，成绩优异，被选入经堂肄业。次年即1905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学日语。1908年入正则学校学英语。次年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清廷官费停止，杨树达辍学回国。时湖南成立军政府，求实同学陈润霖长教育司，被约往工作，旋任图书科科长。此外还在楚怡工业学校兼任英文教员。1913年，应聘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讲授国文法，开始研究语法，阅读《马氏文通》，发现书中有许多错误，有意弥补其不足。1916年转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在此任教四年，环境安定，有著述之志。1918年，辑《老子古义》，以五十日而成，继而治《盐铁论》，后因故中辍。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湖南。杨参加了教育界陈润霖、朱剑凡等人发起的“健学会”，响应北京大学教授提出的各项号召。当时湖南在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下，不但爱国运动受到禁止，教育事业也大受摧残。12月2日，长沙学界为了声援“闽案”，遭到张敬尧派兵镇压，激起公愤，爆发了“驱张运动”。12月8日，杨被推为教育界代表

之一，与毛泽东、罗教铎等进京请愿。次年6月，张敬尧被迫下台，他才离京返湘。

1920年，北洋军阀内部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失败，直系掌权，改组内阁，湖南范源濂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范与杨是时务学堂的同学。杨得此消息后，便北上谋事。通过熊崇熙、黎锦熙等人的介绍，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编纂字典。旋往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日语课。次年，由钱玄同介绍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国文法。当时所编的讲义，即为后来出版的《高等国文法》之底稿。1922年5月，他与吴承仕、程炎震、洪泽丞、邵瑞彩、孙人和等合组“思辨社”，每两周集会一次，研讨国学。后来入社的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等人。12月兼任教育部编审员，审查教科书。1923年7月，“高师”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濂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原国文系主任章嵌辞职，范请杨树达继任，而他以学力不胜而坚辞，改为代理主任。其时学校经费经常无着，范想整顿学校的愿望不能实现，愤军阀之混战，于1924年9月辞职离校。为此，杨与师大同人到国务院请愿，并赶到天津去挽留，后因范辞意坚决而作罢。次年《汉书补注补正》出版。是书纠正王先谦《汉书补注》六百余事，为杨代表作之一。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由于梁启超的推荐，杨于次年9月入该校国文系任教。1928年《老子古义》出版。后二年《周易古义》也相继问世。这两部书为杨早年之作，稿成至出版已快三十个年头了。

1929年，《词诠》出版。是书依《经传释词》体例编辑而成。他将以往各家之说，经过自己裁决举证而为一家之言，至今仍不失为学习古汉语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1930年，日本人用庚子赔款接待中国学者访日。6月杨与张贻惠、陈映璜、曾中鲁等人应邀赴日，先后到大阪、东京、京都等地参观了各大学及其图书馆，看到了许多中国珍贵文物和善本书籍，并会

晤了当地的学者。参观东京文理科大学时，该校诸桥教授对杨著《周易古义》与《老子古义》二书颇为赞扬，并称他讲授《老子》，即以此书为教材。杨于7月下旬返国。

同年杨著《高等国文法》出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很快以它为教本。书中举例丰富，不落空谈，为当时国文法中之杰出者，被选入大学丛书之列。次年，《马氏文通刊误》出版，此书是作者1919年前后所发表的许多评论文章，因《高等国文法》付印，限于教科书的体例，未尽其意，故重新整理而成。书中驳马氏之失，约举十端：即不明理论而强以外国文法律中文、误读古书，等等。持论有根有据，受到时人的好评。至此，杨氏文法之书——《高等国文法》、《词诠》、《马氏文通刊误》出齐，研究文法学他认为可告一段落，于是开始治文字之学。

杨在清华讲授《汉书》，经常考查汉制风俗，涉猎汉碑，久之对此学产生浓厚兴趣，且颇有心得。当时他编的《汉俗史讲义》及汉碑考证等，陈寅恪看后极加称许，故而约他到历史系兼课。从此他在清华便成为文史两系的教授。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局动乱。3月，章太炎及黄侃避难来京，经吴承仕介绍，杨往晤章、黄。黄称誉《词诠》不失为雅言之作。章谓湖南前辈于小学多粗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次年《中国修辞学》出版。此书为杨在清华教授之一科，积数年教学经验而成，特点是从中国古代语言实际出发，不以欧美体例为限，而有民族形式之美。1953年，徐特立与他见面时，称赞此书有辩证法之见解。

1934年8月，杨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读商承祚君殷契佚存》一文，其后，兼治金石甲骨，二十一年如一日，被誉为此学科中最为努力勤奋之一人。同年在清华讲授文字学，并出版了《古声韵讨论集》。

1936年5月，杨将近年来研究文字学的成果集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一书，付商务印书馆出版，竟遭拒绝。后经胡适说项，方允付梓。翌年2月，《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出版，书中对古代文字的解释，新意颇多，在学术界轰动一时。是年5月，其父病重，返乡省亲。不久全面抗日战争开始，8月，他应湖南大学之聘，从此全家定居湖南。次年，清华迁到云南，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曾函邀杨返校，他以家室拖累，路途遥远而辞。10月广州失守，武汉危急，他携眷随湖南大学迁往湘西。

1939年，撰《温故知新说》，略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妄。夫新与故为学问之两端，妄与庸为治学之两病。他认为治学当求其新，然要有其来源，切忌空谈。这反映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是极谨严的。

湖南大学自迁到辰溪后，敌机常来轰炸，师生们仍不得安宁。杨愤于国难，而开设“春秋大义”这门课，以此来鼓励青年学生，发扬民族传统，进行抗日斗争。他说：自恨不能执戈卫国，乃述圣文，诏示后进，恶倭寇明素志也。后来出版的《春秋大义述》，即此讲义之续成者。

1940年，在湖南大学的支持下，他与曾运乾、黄子通编印了《文哲丛刊》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读孙海波甲骨文编记》。此为他一度间断后再治甲骨文之始。1942年4月，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著作名单公布，《春秋大义述》获二等奖，得奖金五千元。继而他被选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他作寄怀一首谓：“平生百事不关情，身似蟫鱼老伴经。只有青山来好梦，可怜白发换浮名。惊心骨肉稀人在，放眼河山有泪倾。喜道孙通逃虎口，乱来玄鬓几星星？”诗中记述了当时的思想和生活概况，同时对畏友陈寅恪由香港脱险回到抗战后方表示喜悦之情。1944年《春秋大义述》由商务出版，他感到格外高兴，谓鼙鼓声中有著述问世，已是幸事，不能以平时论。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10月，他一家随校迁回长沙岳麓山本校，想集中精力多做一些学问。此后钻研金石甲骨，并写了《说文读若探源》一文，阐明许慎著书之由来。既而开始撰写《声训学》。他认为：柬声及简声之字，皆含有去恶存善之义，如瀚、涑、煉、鍊、练、漱、谏等字，如是理解，便可怡然理顺。他批评章太炎《文始》一书，不立柬为纲者，是有意避免义从声类之得也。他说学问之事，不可不正心诚意。

1947年8月，他得知沈兼士在北平逝世消息后，甚为悲痛。他说国人对于文字学，多逃难就易，治韵学，而兼士独治义诂。然而，治义诂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今彼死，余益孤特寡俦也。故挽之曰："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同年，他被评为中研院院士，获得教育部古文字研究的二等奖。

1948年9月，应中研院之请，他到南京出席院士会及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会后出席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茶话会，与所内同人夏鼐、丁声树等相见，并应傅斯年所长之请在会上演讲，题为《诗经》——"东方之日"与"天作"二篇。10月返湘，旋应中山大学之邀，到广州作短期讲学。在此他拜访了陈寅恪、商衍鎏、钱穆等学人，并互赠著述，讨论学术心得。游览了当地名胜古迹，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凭吊，抚今思昔，谓今国民党人秉政，权利唯恐或后，死者有知，能无痛哭。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广州一片混乱，学校已无法上课。5月他返回湖南。是时友人邹谦由台湾来函，邀他到台任教，杨未允。同年8月，他与伍薏农、潘硌基代表湖南大学教授会去见陈明仁，要求和平起义。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杨深受鼓舞，谓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余之幸也，遂应报社之约稿，撰《实事求是》一文纪念政协之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任

教，继续研究语言文字学。相继出版的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文史馆馆长。1956年2月14日逝世于长沙。

主要参考资料

《积微翁日记》（稿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积微翁回忆录》（稿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杨树庄

刘传标

杨树庄，字幼京，福建侯官人。生于1882年5月11日（清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父杨仁铿。叔父杨建洛（仲京）曾任北洋水师济远兵船二副，甲午中日战争中阵亡。杨建洛无后，以杨树庄为嗣。杨树庄为承其志，立别名“幼京”。因嗣父死，家道中落，他乃以父仇、国难为怀，于1898年以遗属身份获荫入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第八届驾驶班。他在校专心学习，曾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同学，得到师友的赞扬。1911年冬毕业后，奉派上海圻巡洋舰见习。1911年初任湖鹰号鱼雷艇管带。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震惊，急电海军统制萨镇冰率舰星夜赴援。10月17日，杨树庄接萨镇冰命令，驾湖鹰号星夜赶赴汉口刘家庙江面汇集，并奉命在江面游弋以切断水上交通。10月28日杨树庄督驾湖鹰协同海琛等六舰向青山南岸开炮轰击，11月1日配合清廷陆军夺取汉口。清军占领汉口后，第一军总统冯国璋下令纵火焚城，恣意残杀，市民死伤无数。杨树庄等目睹清军暴行肆虐，激于爱国爱民热忱，暗中心向革命，随后在奉命炮击武昌、汉阳时故意不瞄准目标。11月11日萨镇冰以“年老有病需到上海医治”为由离舰，海筹等三艘巡洋舰下驶九江易帜起义。杨树庄督驾湖鹰号也随之易帜响应，巡弋于江面，使清兵不得渡，为辛亥革命建立了功勋。

1912年4月，北京政府海军部成立，杨树庄入海军部供职，翌年1月补授海军中校衔。1914年5月晋升为海军上校，10月任永翔号舰长。1915年调任楚观号舰长，旋又改任飞鹰号舰长。1916年任肇和号舰长，负责督练海军实习生及海军练勇。1920年12月改任应瑞号舰长，1921年11月晋升为海军少将。由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积欠

海军粮饷严重，海军多向地方扩张。杨树庄于1922年8月率应瑞号在福建驱逐督军李厚基之役中，缴获大量枪炮等物资，为海军向福建地方扩张奠定了基础。1923年5月，杨树庄署海军练习舰队司令之职后，积极在闽扩张势力，先将长乐、连江、平潭等县列为海军“势力范围”，并在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授意下，于6月率应瑞、海容等舰及海军陆战队马坤贞团向闽南进逼，夺取金门等地。嗣后杨树庄发动厦门各界筹集巨款“恭送”李厚基之余部臧致平部离厦，于1924年4月进占厦门，建立以福州、厦门两要塞为中心，包括金门、东山、平潭、长乐、福清、福州、连江、霞浦、宁德、罗源等县市的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他被北京政府海军部委为兼摄闽厦警备司令。他在厦门增设海军要港司令部，在马尾设立“海军支应局”，在厦门、宁德三都两地设支应分局，并下设禁烟局、契税局、烟酒局、造币厂等征税筹饷。

此后，杨树庄在军阀派系纷争中依附于直系。在1924年9月直、皖军阀间爆发的江、浙“齐卢战争”中，他奉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之令，亲自督率驻闽厦海军北上，以应瑞号为旗舰，率海容、永健、楚同、江元、普安等舰及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入吴淞口。此时，依靠皖系扶植而另树一帜的林建章“上海海军领袖处”麾下的独立舰队（沪队）在炮台应援下列阵以待，杨树庄乃另辟航道直入吴淞口，参加直系齐燮元阵线吴淞浏河战斗，炮轰卢永祥部。经两个月混战，卢永祥部溃败已成定局，杨树庄乃对依附于皖系的林建章独立舰队进行策反，迫使独立舰队司令周兆瑞率舰归附，实现了闽系海军的统一。

在紧接着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杨树庄列名为“讨逆军海军副总司令”，但因闽厦舰队滞留长江而未参战。当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系惨败后，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组成北京政府，杨树庄升任海军总司令。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杨树庄纵观时局，感悟到军阀统治必倒无疑，今后海军唯有走孙中山革命之路，归附革命新政权，才有存在的可能。但他对北伐军尚存疑虑，

对北伐军派到上海来联络的林知渊说：海军人员既不是国民党，更不是共产党，但将来归附了国民革命军，就必须设置党代表，而选择海军人员来充当党代表，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一切传统、纪律、秩序，都将弄得凌乱不堪，难以维持。为此，他一方面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派人与北伐军联络、谈判。10月，北伐东路军何应钦部直指福建，时不我待，杨树庄与杜锡珪密商决定以“各舰队自行决断”的办法，指使驻闽厦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闽厦警备司令陈季良率先在闽发难，统领驻闽厦海军易帜拥护北伐。这时北伐军次第进占湘、鄂、赣，图攻皖、苏、浙。蒋介石为获取海军的支持与配合，先后派林知渊、宋渊源等人加紧对杨树庄的策反工作。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定易帜起义。他派李世甲督驾楚同舰向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汇报驻闽厦海军易帜经过及形势，并令陈绍宽密切注视北军。随后派其表弟海军上校陈可潜为海军全军代表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表示海军可以加入北伐军，但要求：一、确定海军全军各舰艇员兵以及陆战队、军械所、医院、学校等附属机关之饷额，每月应支五十万元，按月定期发给，不得缺少或积欠；二、闽人治闽；三、规定造舰建设费。这些要求获得蒋介石认可。此后，杨树庄将海军舰艇陆续调离要冲或限期入厂修整、补充给养，准备配合北伐军夹攻淞沪。次年2月，杨树庄令陈绍宽率第二舰队各舰驶入长江“扼要屯防”，并派舰艇护送由闽入浙江温州之北伐军。杨还亲自率领主力严阵以待，准备进击渡江南下之直鲁联军。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觉察杨有异动，为防杨统率海军倒戈，下令将闽系舰队归直鲁联军第五路指挥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指挥，如不服从则以武力接收，并派渤海舰队南下监视闽系海军。为此，杨树庄一面佯装答应将配合直鲁联军抗击北伐军，一面召集各舰长于海筹舰商定方略。3月11日，杨树庄派杨庆贞、萨夷、李世甲三位舰长督带楚谦、楚有、楚同三舰溯江而上，供蒋介石驱使；同时令陈绍宽率所部留吴淞襄助，并将高昌庙海军总司令公署内的重要文件档案及机关工作人员迁到吴淞口之海筹舰上。杨于12日下午1时发表《独立宣言》，宣布率海军第一、第二舰队及练习航队、海军机关独立，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同日在吴淞口建立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部，杨

任海军总司令。随后，杨率易帜海军投入北伐战争，为北伐军奠定东南效力。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树庄奉蒋之命，主持海军“清党”，下令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海军社”等进步青年组织，但他将查获的“新海军社”社员名单烧毁，保护了一批优秀青年军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杨树庄通电表示拥护，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由于杨树庄率闽系海军易帜，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乃派遣其嫡系海军——东北海防舰队南下，趁杨部戒备松懈之隙，突入吴淞口，袭击海筹等舰，并在杭州湾劫掠由马尾运物资北上的江利舰，骚扰闽系海军防守阵线。杨树庄调整各舰队防守阵线，令第二舰队楚有、永绩、永健等舰驻防于镇江到通州一带，第一舰队海容、应瑞等舰驻防于通州至吴淞口一带，切断北洋军水上交通线。同时，杨在南京设海军办事处，委派其表弟陈可潜为主任，负责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络及给养粮饷等事宜。

同年7月，杨树庄被委任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当时福建各派系力量明争暗斗，海军各山头也纷纷向福建地方插手，蒋介石又有顾忌，杨树庄主持的省政府实为形形色色的派系力量把持。为避免招惹各方疑忌，他一再表白：“海军不包办福建省政。”但他也不愿当“空头省主席”，主政期间积极扩充海军在闽实力，将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加一个步兵独立团扩编为两个混成旅，并另设四个补充团和两个独立团，控制了沿海县市，使海军陆战队在闽地之扩张进入鼎盛时期。

蒋介石于1928年2月30日宣布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杨树庄被列名为十二名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但在北伐军攻占北京，宣告统一完成后，即于12月宣布对陆海军实施“编遣”，下令裁撤海军总司令部。杨树庄认为蒋介石此举是要控制全国陆海军队，消除异己，对定于12月26日举行全国海遣会议“称病”不到。但翌年1月的全国编

遣会议，还是决定将全国海军编为四个舰队，直属军政部统辖，闽系海军仅留第一、第二舰队番号，东北海军编为第三舰队，广东舰队编为第四舰队。杨树庄对此举极为不满，竭力抵制，经与陈季良、陈绍宽等多次商讨后向蒋提出三点建议：全国海军统一；缓裁；人事统一。蒋介石疑忌闽系海军坐大，对杨等的建议置之不理，并以“张学良不愿交出海军”为借口，改取“分而治之”。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会上讨论成立海军部有关事宜时，蒋介石搪塞支吾，杨树庄、陈季良、陈绍宽等将领怫然退席以示抗议。蒋介石权衡利弊，为继续利用闽系海军为其独裁统治效命，乃在军政部设立“海军署”，以陈绍宽为署长，而以杨树庄专任福建省主席职。

由于蒋介石控制闽系海军之心昭然若揭，陈季良、杜锡珪等积极参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活动，杨树庄则坚持“海军不干政”，竭力制止海军的反蒋活动，将杜锡珪派赴日本、欧美考察海军及航空事业。杨的言行深得蒋介石赞许。在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中，海军供蒋介石驱使，巡航于鄂、湘、粤三省历时两个多月，为战胜反蒋力量立下汗马功劳。蒋介石于4月设立海军部，任杨树庄为部长，同时授予海军上将衔。5月，杨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由于杨忙于福建省政，海军部由政务次长陈绍宽主持。

热衷于福建省政的杨树庄，为控制闽省全局，积极培植嫡系势力，在福州建立教导团，因而引起各地方势力的怨恨。海军中也因他主张“海军不干政”对他不满，省防司令萨福畴及陆战队旅长林忠等认为杨重用小人，削弱海军在闽实力，是“亲者痛仇者快”，乃勾结第二师师长卢兴邦于1930年1月6日绑架省政府六名委员，图谋推翻杨树庄的省政府。杨树庄仓皇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寻求支持，然蒋介石此时忙于筹划对抗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无暇顾及，杨树庄无奈，避往浙江普陀山养病，福建省政府由方声涛主持，杨专任海军部长。1931年底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海军部长职由政务次长陈绍宽继任，杨树庄仅保留福建省政府主席与海军部高等顾问的虚衔。

1932年12月十九路军入闽，杨树庄福建省政府主席之职被免去。

1934年1月10日，杨树庄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杨之宏：《杨树庄哀启》，董执谊辑《近人荣哀文件汇订》第12本。

《海军大事记》，福建省政协未刊本。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1962年版。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8辑（海军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杨立：《福建军阀内讧与闽系海军派别的暗斗》，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2年版。

刘通：《参加杨树庄省政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杨庶堪

熊尚厚

杨庶堪，名先达，字品璋、沧白，晚年号邠斋，1881年12月9日（清光绪七年十月十八日）生于四川巴县。其父杨兆南从事商业。杨庶堪七岁入塾启蒙，幼年时即勤奋好学。年十六岁拜师于华阳吕翼文门下，肆力于经史词章，其父常托人买些国内外新书供他阅读，眼界大开，曾获老师吕翼文的赞赏。

1900年，杨庶堪赴重庆参加县试，获第一名秀才入县学。但他愤于清廷腐败，国家积弱不保安危，对科举仕途并不热心，而是急于吸取世界新知识。于是他留在重庆，进了译学会，向英人牧师巴克学英语，准备日后去欧美留学，充实自己的知识。翌年，他与同乡邹容结识，两人志趣相投，常谈论寻求救国强兵之道。时日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来渝游历，他和邹容又向日人学日语。1902年春，重庆府中学堂成立，他被聘为英语教员，因讲授得法颇获学生欢迎。时已赴日留学的邹容则常将东京留学生界的革命活动讯息函告，杨深受鼓舞。1903年，他常邀约同乡梅际郇、童宪章、朱之洪等在重庆五福宫桂香阁聚会，组织秘密团体公强会，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积极吸纳工商界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入会。同年4月，他和朱蕴章等创办了重庆《广益丛报》，抨击清政府，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稍后又与卞小吾等组织“游想会”，约集进步青年以郊游为名，谈论时政与革命。同年秋，杨庶堪应成都高等学堂中学部之聘，任英语教员。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同盟会员陈崇功、童宪章奉命回到四川发展会员，公强会推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等入盟，翌年初成立同盟会重庆支部，成为川东南各县的革命领导中心，他被指定为重庆分部负责人。为了主持重庆地区的会务，杨庶堪

回到重庆任正蒙、开智、重庆等校英语教员，设革命领导机关于重庆府中学堂内。他会同学监张培爵，以及巴县师范学校监督朱之洪、教习谢持等，以教书作掩护，在学校师生中发展会员，并常在《广益丛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展革命宣传。

1907年，杨庶堪被川南永宁厅（叙永）永宁中学堂聘为教员，后改任监督，朱之洪、向楚、熊克武等亦先后奔赴永宁。乃以永宁中学为据点开展革命宣传，向学生介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等书刊，吸收学生及校外革命青年入盟，如赵铁桥、杨莘野等诸人，并与黄复生等秘密策划武装起义。同年冬，他们利用学校的化学药品，在城外兴隆场制造炸药，共谋泸州起义。不慎发生爆炸惊动了官府，致使起义流产。为了避开地方官府的搜索，乃于次年春又回到成都高等学堂中学部任教。在蓉期间，他在《通俗报》、《成都日报》、《重庆日报》等报刊上鼓吹革命的同时，继续多方联络革命党人策划起义。1909年春天和冬天，曾参与佘英、熊克武等先后策划的广安、嘉定起义，均告失败。

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打开局面，杨庶堪回到重庆，与张培爵等聚集一起，通过各种关系联络当地工商界人士和袍哥中的知识分子发展会员和多方筹款，准备重庆起义以响应广州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杨庶堪决定利用风起云涌的四川保路风潮发动民众、组织民军、尽力将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起义斗争。

杨庶堪等以重庆府中学为革命据点，公开组织重庆保路同志会，在万寿宫、禹王庙等地举行大会，发动学生到处散发传单，进行革命宣传讲演，四川其他各地的保路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罢市、罢课遍及全川。护理督军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下令镇压，1911年9月制造了成都血案，诱捕全川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等。杨庶堪和张培爵等立即领导重庆同盟会支部，一面派代表至将军府请愿，并以重庆商会等团体代表身份，由朱之洪领衔上书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一面火速通知各地革命党人派员会集重庆，将保路运动发展

成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

10月武昌首义爆发后，杨庶堪等通过党人及会党打入防军、炮队营，举办团练，组织敢死队等，作为革命的基本武装。决定由长寿县首先宣布独立，继由涪陵、忠县、丰都、彭水、秀山、黔江、江津、南川、合川等地起义响应，用以分散和孤立重庆的清军。当长寿起义，涪陵独立，江津、合川起义，南川光复之后，他和张培爵等立即发动重庆起义。时任新军第十七镇排长的夏之时已誓师起义，率部直趋重庆，即派朱之洪与之联系，于11月22日举兵包围重庆府。在里应外合之下，活捉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县段崇嘉。在宣布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的大会上，杨庶堪举荐张培爵任都督，自己仅任顾问。1911年12月至1912年3月，他先后任四川军政府、四川都督府的外交部长。

1912年秋，杨庶堪当选为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翌年“二次革命”爆发后，8月，重庆成立讨袁军，熊克武任总司令，他任四川民政部长。袁世凯调集陕、鄂、滇、黔四省军队围攻，因敌我众寡，9月四川讨袁军失败，成、渝两地党人被杀数百人。杨庶堪被迫离川，经湘西、武汉、上海去日本，在东京加入了黄兴等组织的欧事研究会。1914年夏，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他和谢持被指定为四川主盟人，并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从此颇受到孙中山的倚重。

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发动各地讨袁，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杨庶堪前往相助。起义失败后，被孙中山派往南洋和胡汉民一起筹募军饷。翌年春，蔡锷组织护国军在云南发动武装讨袁，熊克武、吕超等随之入川。护国战争结束后，熊克武任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四川革命党势力随之大振。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恢复国会，他被补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旅居上海协助孙中山策动革命运动。1917年2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宣抚使，因故未能赴任。

1918年春，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吕超驻军成都，孙中山指示四川省长应由民选，望疏通省议会选举杨庶堪为四川省长，以谋全川的统一，希望四川能成为护国革命的根据地。3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根据四川省议会的推举，任命熊克武为督军，杨为省长。杨于10月回四川任省长，与熊克武分掌军政事宜。孙中山致函熊克武，勉其与杨通力合作，贯彻护法本旨。其后又多次指示搞好协作互助，共谋贯彻“建设真正之共和”主张。由于熊克武受政学系的利用，拒不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与杨发生隔阂，使他无法展开工作。1920年5月，他以调解川局无效一度通电辞职；之后又有熊克武联合旧川军反对吕超和滇军，因吕超战败，杨于10月再次通电辞职，愤而去沪，后至广州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

1921年6月，杨庶堪任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长。翌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他至上海发动舆论讨陈，并负责联络滇、桂军攻陈，还奉孙中山之命两次入浙，与浙督卢永祥接洽联合北伐事宜。1923年1月，滇桂讨贼军驱逐陈炯明出广州，2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杨任大元帅府秘书长。7月被孙中山特派为统一广东财政委员，从粮饷方面支持孙中山东征陈炯明部。同年冬，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他和廖仲恺等九人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庶堪被指定为四川省代表，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4年3月，任广东省省长，积极整理省政和教育，但遭到蒋介石和戴季陶的嫉视，乃于6月辞职去上海。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11月杨庶堪被邀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农商总长，未到任由次长刘治洲代理。次年8月改任司法总长，任职期间英、美等八国调查司法权代表来华，他提请拨发经费以备筹办，虽经阁议通过但事后分文未给，12月又愤而辞司法总长职，留居北京。1930年去南京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次年移居上海闭门读书。他对蒋介石采取不合作态度，不愿参与政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庶堪仍留居上海。1939年初，汪精卫投敌叛变，随后在南京组织伪政权，曾一再强邀杨担任伪职，遭到严词拒绝。杨庶堪在朋友的帮助下，于是年冬只身潜赴香港，然后辗转回到重庆。他在重庆寄居于友人家，以读书、写作、吟诗自娱，对重庆政府请其出任四川省主席、国史馆馆长等职，亦皆辞未就。

1942年8月6日，杨庶堪病逝于重庆。著有《沧白诗钞》、《杨庶堪诗文集》等。

主要参考资料

《杨庶堪》，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277—294页。

廖汀：《书生仗剑起西陲——杨庶堪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

周开庆：《民国四川史事》，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杨廷宝

罗幼娟　陈志新

杨廷宝，字仁辉，1901年10月2月（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生于河南南阳市赵营村。父亲杨鹤汀早先推崇康梁，创办南阳公学，后加入同盟会，两度被迫外逃。母米氏籍隶湖北襄阳，为宋朝大书法家米芾后裔，善水墨丹青。杨廷宝出生之日，母亲难产而死，由祖母抚养长大。祖母虑其短寿，依俗抱其入庙做“和尚”。

杨廷宝六岁入私塾启蒙，因其不善死记硬学，难以继续就学，后尝就读当地之小学，仍好嬉戏，课程多不及格。经父教诲，及观生母遗留画卷，颇受益并有所悟。九岁入新学堂，聪颖好学已显露，尤对绘画兴趣浓厚。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杨廷宝随父避难他乡，始惕于世变，恍然知向学。1912年秋，考取河南留美预备学校。1915年秋，以全省之冠的成绩咨送北京清华学校，插班三年级。在清华学校期间，曾任《清华年报》图画副编辑和孔教会图画书记。

1921年，杨廷宝在毕业前夕选择志愿时，受建筑师庄俊升的影响，选定了建筑学，使其对科学与艺术的两种兴趣结合起来。同年，杨廷宝赴美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主任美籍法国人克芮（P．Cret），是当时著名的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杨廷宝在此学习了西方古典建筑理论，接受了严格的古典建筑设计手法的训练和建筑技术知识的教育。与此同时，他的水彩画在名师道森（G．W．Dawson）的指导下，进步很快，水平远在当时一般建筑学生之上。

杨廷宝把整个身心倾在学习上，设计图作业总是提前完成，有时画几幅不同方案请老师讲评。他的学业进步快，到二年级时，竟然可

以帮助三四年级同学修改渲染图了。杨在全美建筑系大学生设计方案评奖活动中，连续获得奖牌和奖金，他的照片及其事迹，曾登载在费城等地的报纸上，尤其1924年获得艾默生奖（Emerson Prize Competition）和市政艺术协会奖（Municipal Art Society Prize Competition）两个一等奖，曾引起轰动。由于杨廷宝勤奋好学，才艺超群，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功课。1924年毕业时，杨获得学校授予的荣誉证书，校长莱尔德（Frank Llyod Wright）称赞他是该校数年内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1925年，杨廷宝进费城克芮建筑事务所工作。克芮重视实际，严谨细致和典雅稳健的设计风格，对杨后来的建筑生涯影响极大。1926年夏，杨廷宝赴欧洲旅行、游览、写生和考察古建筑，遍访英、法、德、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满载硕果于翌年春归国。

1927年，杨廷宝应邀加入天津基泰工程司担任主要设计师，后来成合伙人之一，并一直工作到1949年。他的处女作就是奉天火车站工程设计，这是当时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国内最大的火车站。杨的早期作品如东北大学校舍和天津中国银行货栈等，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显示出他高超的技艺和深厚的建筑素养。同年，杨廷宝与毕业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陈德青女士结婚。

1930年代后，杨廷宝结合当时复兴固有建筑艺术的要求，开始探索中国民族形式的学习与创新。1930年—1931年设计建成的北平交通银行，第一次把中国古典传统式样与当时的先进材料结合起来，这一成功案例，对当时国内建筑设计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另一成名之作是对清华图书馆扩建工程的设计。清华图书馆是清华大学四大建筑之一，设计均出美国人之手。1930年扩建时要求将新建部分作为主体，并要求新建阅览大厅南北向。杨巧妙利用地形，把正门放在东北角直上二层楼，使之壮观，而建筑细部及各种用料尽量同原有细部协调，以使全部建筑表现出一种完整、统一的章法。这一设计一直被行家叹为天衣无缝的杰作。

1932年初，在梁思成与刘敦桢的推荐下，杨廷宝受聘于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主持参加了天坛祈年殿、皇穹宇、圜丘坛、五塔寺、国子监、雍和宫、碧云寺、罗汉堂等九处古建筑修缮工程。他放下国内最大建筑事务所的主要设计师的架子，结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虚心向老工匠请教，终于掌握了修缮技术。通过这些修缮活动，他对中国民族建筑形式的研究和创新、中西古典建筑原理和技术达到很高造诣，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

1931年—1933年设计建成的南京中央医院，是杨廷宝又一杰作。设计上完全体现了中央医院作为一个大型现代化的医疗中心所需的复杂的实用功能。在外观上，杨饰以具有中国传统的花架、檐墙、滴水和门廊等细部，加之牌坊式的大门，配在主体建筑上，尺度适宜，简洁大方，和整个新建筑和谐统一，极具有艺术表现力。

杨廷宝在同一时期还设计了南京中山陵园露天音乐台。他在自然坡地上，运用具有传统特色的钢筋混凝土花架、回廊、花坛、坐凳，围成一个古朴的半圆形的剧场空间。重点艺术装饰的舞台照壁，底部是中国古建筑常用的须弥座，顶部云纹图案并饰有龙头、灯槽和可种垂挂植物的花槽。月牙形水池辟在舞台前，雨天能汇集全场之水。整个建筑在树丛环抱的衬托下，巧妙地将自然地形与建筑完美结合。时至今日，中外游人和行家仍赞叹不已，露天音乐台成为南京中山陵风景区重要景观和游息场所之一。而南京谭延闿墓的设计，采用中国古代园林的设计手法，依自然山水，着意自然情趣，传统陵墓建筑布局中的龙池、牌坊、碑石、祭堂墓圹等，均保持在因地制宜的自由构图中。绿树荫翳的墓园，迂曲的山径，潺潺的泉水声，就中点缀亭、台、小桥等，以秀丽幽静的景致与气势宏伟的中山陵遥相呼应，墓园中严格按照坐北朝南设置的祭堂，位在墓道之左，并仿清宫式建筑做法。墓圹位于墓园的最高处，保持了传统的严谨构图，宝顶背负钟山若屏，苍松古柏，壮丽肃穆。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杨廷宝先后设计建成的南京中

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他对“宫殿式”建筑的新探索，就功能和造型而论，均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杨廷宝随事务所迁到四川重庆。他在重庆一带设计建造的工程，多数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其求实精神同建筑创作相结合是简易竹笆抹灰建筑。这种古朴简陋的建筑材料，并没有使其在求得较高建筑效果上有任何减色。他设计的重庆青年会电影院和嘉陵新村国际联欢社，就是既经济、实用，又不乏艺术魅力的建筑。

1940年，应建筑专家刘敦植之邀，杨廷宝受聘兼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教育生涯。在抗战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其他学者共同努力，将巴黎艺术学院建筑教学体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老中大传统”，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教育早期蓝本，为开创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具有较深远影响。

抗战期间，基泰事务所业务萧条，他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遣，1943年—1945年赴美、英、加拿大考察建筑，接触到西方新技术、新潮流，拜访国际知名建筑大师，如莱特（Frank Llyod Wright）、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萨里宁（Eero Saarinen）等。抗战胜利后，事务所迁回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廷宝的政治热情和业务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受聘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规划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的设计。1950年短期受聘于当时北京兴业投资公司设计部，主持设计于1951—1952年建成的北京和平宾馆和王府井百货大楼。他在设计构思上顶住了当时片面强调复古形式的建筑思潮，将建筑环境、功能、施工和现代建筑空间艺术高度综合考虑。建筑完工后，在建筑界引起极大反响，被认为是建筑设计方面的权威之作。因

其经济、实用、合理，赢得周恩来总理的称赞。

杨廷宝从50年代始出任南京大学建筑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系主任、副院长和建筑研究所所长。杨廷宝主持指导和参与，设计建成的工程有：北京火车站、徐州淮海战役纪念碑和纪念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新机场、南京民航候机楼、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丁山宾馆等，并参与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北京图书馆等首都重要工程的设计、方案研究工作。

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他连任一至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和第五届理事长。1954—1982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1年杨廷宝被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授予荣誉会员。1957—1965年曾连任两届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

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去世。临终前他嘱托家人：死若有一块安身之地，就写上“南阳杨廷宝”。

主要参考资料

刘先觉编：《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刘怡、黎志涛合编：《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杨廷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人物志》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卢嘉锡主编：《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3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杨永生主编：《建筑文库·杨廷宝谈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年版。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杨廷宝建筑言论集》，学术书刊出版社1989年版。

杨文恺

张学继

杨文恺，字建章，直隶永清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出生。1902年入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后，前往日本留学，先入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步兵科。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到清朝禁卫军任一等参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以参谋的身份随第一军军统冯国璋前往汉阳同革命军作战。中华民国成立后，冯国璋任直隶都督，杨文恺任都督府军务科长。

1915年12月，王占元代理湖北将军（次年1月实任，7月改为湖北督军），杨文恺任将军（督军）公署军务课课长兼汉阳兵工厂总办。杨文恺经常代表王占元奔走于北京和长江各省之间进行联络，成为王占元的亲信幕僚。在袁世凯称帝时期，杨文恺奔走于王占元与冯国璋之间，探询冯国璋对于帝制问题的意见。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冯国璋于1916年5月20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协调北洋各军的矛盾，杨文恺代表王占元出席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他遵从冯国璋和王占元的意旨，主张和平。杨文恺慷慨陈词："湖北王督军派我来参加出席冯上将军所召开的会议，希望南北大局能以和平解决，我们湖北已经打了两三个月了，湖北和湖南都在最前线，日日夜夜在战斗中。如果继续打，那么，军费、弹药和兵源，都必须大大补充，空口说打打打，那是不行的。"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吴佩孚命令王占元把段祺瑞小舅子、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指挥的卢金山师、刘文明师缴械后遣散，并将吴光新扣押。王占元照办后，派杨文恺到保定见曹锟，报告编遣军队及扣压吴光新的情况。曹锟希望王占元暗中处死吴光新，但王占元与杨文恺都不同意这样做。王下令组织军法会审，判处

吴光新十五年有期徒刑，送往陆军监狱，生活上给予优待，实际上是保护起来。1921年8月，王占元在下台前几天，命令杨文恺把吴光新悄悄放了，由日本人护送回天津隐居。

1921年8月，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职务为曹锟、吴佩孚的嫡系亲信萧耀南取代，王带着六七年来在湖北搜括的数千万财富前往天津做寓公去了。作为王占元的亲信，杨文恺留了下来，继续担任汉阳兵工厂总办。汉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兵工厂之一，作为总办，收入十分丰厚。1925年1月，杨文恺交卸汉阳兵工厂总办，新任总办刘文明转达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的意旨，要杨文恺迅速赶往杭州，劝说孙传芳停止对浙江皖系将领陈乐山的进攻。杨文恺领命后迅速赶到杭州，但为时已晚，陈乐山已战败逃亡。孙传芳接收了陈乐山的第四师并委任谢鸣勋为第四师师长。原来卢永祥自兼师长的第十师，孙传芳已委任郑俊彦为师长，又将臧致平、杨化昭两部编为独立旅，委任杨赓和为旅长。这次齐卢之战，孙传芳由福建入浙江，占领了富庶的浙江省，并收编了四个能战之师和一个混成旅，这些就成为其后来五省联军的军队主力。

对于杨文恺的到来，孙传芳非常高兴。他们俩在保定和日本求学时都是同期同学，以后又同在王占元幕府任职多年，前后二十三年的同学、同僚关系。在孙传芳的挽留下，杨文恺欣然答应加入孙传芳戎幕，成为他的首席军师。1925年3月，杨文恺奉孙传芳之名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对广东保持警戒，同时筹措五十万至一百万元，作为浙军备战经费，周荫人应允照办。1925年4月，杨文恺又奉孙传芳之命去张家口会见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见面后，杨文恺首先陈述了孙传芳准备进攻江南奉军的决定，然后将孙传芳事先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的兰谱交给冯玉祥。冯玉祥表示愿与孙传芳结为金兰之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冯玉祥时年四十四岁，为兄；孙传芳时年四十一岁，为弟。杨文恺这次张家口之行顺利达成对付奉系的战略合作协议。在张家口公事完后，杨文恺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

芳非常满意。孙传芳取得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后，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迅速发动反奉战争。在一周之内，孙传芳的军队就占领了上海、宜兴、无锡、镇江和南京。奉军邢士廉师及刘翼飞旅几乎是一触即溃，只在丹阳做了一些零星抵抗。

1925年5月，杨文恺和段其澍一同前往开封，会见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双方共同商定：在孙传芳进攻奉军的同时，由国民二军出兵山东，攻打张宗昌，互相策应以收痛击之效。为了集中对付势力最强的奉系军阀，孙传芳决定敦请吴佩孚出山。有了冯玉祥、岳维峻国民军的支持，再把吴佩孚拉出来统率直系残余力量，这样孙传芳的反奉战争就有了可靠的支撑。1924年直奉战争失败后，吴佩孚初期驻鸡公山最困难的时候，杨文恺曾向他伸过援助之手，从汉阳兵工厂提出二十万元接济吴佩孚，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让吴佩孚非常感动。有了这层关系，这次孙传芳还是请杨文恺出面请吴佩孚出山。杨文恺同段其澍见过岳维峻之后又同赴武汉，段其澍留在汉口，杨文恺一个人前往岳州，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杨文恺在回杭州的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游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邓如琢同吴佩孚的关系很深，表示唯吴、孙之马首是瞻，义无反顾。方本仁的态度则很冷淡，所谈未得要领。事后杨文恺才知道这时的方本仁已经同广东国民政府取得联络，准备参加北伐了。

1925年8月，杨文恺又自告奋勇前往联络陈调元。陈调元同杨文恺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时就是同学，当然也是孙传芳的同学。见面后，杨文恺就历数奉张的野心以及对东南的威胁。陈调元也对杨宇霆的傲慢无礼十分愤恨，他们的谈话很投机，对于反奉举动一拍即合。陈调元爽快地答应反奉，杨文恺也爽快地答应在战争胜利之后必以优惠报酬相谢。在反奉战争取得胜利成立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时，孙传芳和杨文恺委任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

通过大量的结盟工作，杨文恺为孙传芳争取了冯玉祥、岳维峻的

国民军一军和二军；为孙传芳敦促吴佩孚接受出任十四省联军总司令，把旧直系部队都拉到反奉联盟一边，结成反奉统一阵线。1925年10月，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对奉军再次发起进攻，进展顺利。10月26日，奉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在安徽固镇以南被联军俘虏，随即被押送到孙传芳指挥部所在的安徽蚌埠。当时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者，围绕施从滨的处置问题，杨文恺与孙传芳发生了严重冲突。杨文恺劝孙传芳要冷静，对施从宽发落，但孙决意处死施。孙传芳在攻下徐州后回师南京，1925年10月25日，宣布建立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杨文恺任总参议，刘宗纪为总参谋长。

1926年3月4日，北京政府内阁改组，杨文恺被任命为农商总长。孙传芳不愿意给段祺瑞捧场，直到段祺瑞下台由隶属直系的颜惠庆组阁时，才让杨文恺到北京去上任。杨文恺到北京后，孙传芳凡事仍以电报书信同杨文恺谋划，重要事情还要杨文恺出面谈判。后来孙传芳同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濬、张群等以及同张宗昌、张作霖、张学良的谈判，都由杨文恺代表孙传芳出面进行的。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从两广出师北伐，为了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各集团，提出了“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政治策略口号。孙传芳的小算盘是希望吴佩孚和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两败俱伤，然后他再把北伐军从武汉、长沙赶走，这样他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不是帮忙者的身份占领两湖。因此，当吴佩孚派人或者函电要求孙传芳援助时，孙传芳不为所动。

北伐军取得汀泗桥、贺胜桥之战胜利后，孙传芳加紧了军事部署的步伐。1926年8月25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杨文恺、周凤岐、孟昭月、卢香亭等参加，会上决定增兵江西，分五路与国民革命军展开决战。与此同时，9月初蒋介石派张群为代表再次去南京同孙传芳谈判，力劝孙传芳参加北伐，并且可以给他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孙传芳抱着确保五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拒不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杨文恺提出孙传芳同蒋介石可以携手合作，但有

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现下广东部队不得侵犯五省辖境；第二，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双方共同商量收拾全局；第三，广东方面必须表明拒绝共产党政策。杨文恺的这个方案是一个缓兵之计，看起来好像是让了一步，同意双方合作，实际上是现在五省中立，将来五省自治，但蒋介石眼下却要放弃孙中山亲手定制的国共合作政策。自然，杨文恺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9月19日，杨文恺到济南，代表孙传芳同张宗昌正式谈判，最终孙传芳同张宗昌结成了联盟关系，这样暂时减轻了孙传芳发兵江西的后顾之忧。于是孙传芳大举发兵，把重点放在江西同北伐军的对抗上。由于陈调元投向北伐军，致使孙传芳在江西战场很快失败。

孙传芳回到南京同杨文恺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杨文恺认为要挽回败局，必须谋求北洋军阀各系的大联合。于是，孙传芳请段祺瑞、吴佩孚各派出代表来南京开会，研究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对付国民革命军。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祺瑞，熊炳琦代表吴佩孚参加会议。但北洋各派分歧颇大，未能达成联合的协议。孙传芳、杨文恺不得已争取联合奉系军阀对付北伐军。杨文恺代表孙传芳到济南去见张宗昌，表示“请效帅同心合力，加以援助”。到天津后，立即拜会张作霖，说明孙传芳实力尚存，“目下所需，首在饷械，不在兵力”；倘若反攻无效，再请予实力援助。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集张宗昌、褚玉璞等奉系将领，以及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和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商讨军事问题。这次会议正式确定奉军要同时援助吴佩孚和孙传芳，同时明确地进行了分工：张宗昌援助孙传芳、褚玉璞援助吴佩孚，奉军主力担任“后防及增援”。通过这次会议，杨文恺完成了孙传芳委托的联合张作霖、张宗昌的任务。1926年11月18日，孙传芳秘密乘火车由南京赶到天津，立即召杨文恺同赴蔡园与张作霖商谈合作。结果以反奉著称的孙传芳，甘心地投靠了张作霖。此后，孙传芳把上海和南京的防务交给了张宗昌和褚玉璞，他本人率部队在江北避战、观战。

达成孙传芳与张作霖、张宗昌联合作战的任务后，杨文恺于1927年1月宣布退隐，此后即在天津当起了寓公。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几次请杨文恺出山担任伪职，无论日军怎样威逼利诱，杨文恺均不为所动，保全了晚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文恺担任天津文史馆馆员，在他人的协助下，先后写成《孙传芳的一生》、《我所知道的陈调元》、《我在汉阳兵工厂与曹吴的关系》、《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段》等文章，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65年6月，杨文恺在天津病故。

杨希闵

吴显明

杨希闵，字绍基，云南宾川人。1886年10月（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入塾，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到云南第一梯团参加援川战役。1912年初入江西讲武堂学习，1913年分配在江西步兵第三旅任上尉参谋，参加“二次革命”湖口之役，事败后回滇任云南步兵一团连长。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杨随蔡锷第一军出兵四川，于一次战役中立有战功，升为营长。

1920年川滇战争爆发，滇军军长顾品珍率军回滇驱逐唐继尧，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杨希闵随顾返滇，升为第一梯团团长。1922年春，唐继尧向顾品珍发动突然袭击，顾兵败身死，残部由副总司令张开儒统率退往贵州境内。6月，张向孙中山发电表示“愿为北伐前驱”；同时重新整编军队，将全军编为五个旅，杨希闵任第三旅旅长。张率部经黔南趋桂林，谋与孙中山会合，适值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电滇军急赴广州讨陈。张开儒于是兵分两路：右翼军归杨希闵指挥，左翼军由第八旅旅长范石生指挥。滇军在广西经过多次战斗后，进至桂平。

这时，护国军黔军总司令、广西人卢焘请滇军协助收拾桂局。滇军中范石生、杨如轩等多数将领同意其请，但认为张开儒年纪大，不能率领全军，乃推卢为滇桂联军总司令。但滇军多数官兵不愿屯兵广西，仍然决定东下讨陈，推杨希闵为代理滇军总司令。

杨希闵就职后，一面与驻桂林的广西自治军首领林俊廷协商，请其通知各自治军将领，不要阻止滇军前进；一面派第一旅第一团团副

那博夫去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孙委杨希闵为西路讨逆军滇军总司令，并筹款十五万元供作军队开拔之用。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派廖湘芸、何民魂等到梧州，邀滇、桂、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以孙中山大元帅名义，委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函促杨希闵把握时机，迅速出兵讨伐陈炯明。12月上旬，杨希闵和桂军将领沈鸿英、刘震寰等，各派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即“白马会盟”），会商讨伐陈炯明的战略和合作条件。会议公举杨希闵为西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其部署是：以刘震寰和范石生部沿西江右岸东下，向都城、广州之敌进攻；以沈鸿英一部由怀集向清远、花县方面进攻敌之侧背，沈部主力和滇军主力沿西江左岸东下，向肇庆、三水、广州之敌进攻。

白马会盟后，杨希闵、沈鸿英、刘震寰各军同时开始行动。12月27日，驻梧州的陈炯明军指挥部及守军两团撤往肇庆。12月28日，陈部莫雄率粤军第四师第二团及杨胜广的补充团在梧州起义，滇桂军兵不血刃进入梧州。从此滇桂军士气大振，跟踪追到封川、德庆，歼敌陈修爵部一个团。陈部粤军第一师陈济棠团及师部工兵营长邓演达等与滇桂军早有联系，纷纷阵前起义。陈军林虎部被击溃，滇桂军乘胜进逼三水。陈军守将杨坤如等凭河死守。滇桂军在马房徒涉强渡，猛扑敌阵，陈军全线崩溃。1923年1月10日滇桂军克三水，直捣珠江南岸。粤军第三师亦从梧州河右岸向陈军攻击前进。陈军士无斗志，溃窜东江潮梅一带。滇桂军于1月16日进入广州。

讨伐陈炯明的各军到达广州后，杨希闵率滇军驻扎三水、佛山、广州市中心至西关一带，在富庶地区包烟（鸦片）包赌，对于陈炯明残部不再追歼。军官忙于敛财，士兵到处滋事，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杨复乘机扩充队伍，将滇军改编为三个军：第一军军长由杨自兼，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第三军军长蒋光亮。

这时广州既有滇军，又有桂军，各占一方，群龙无首，杨希闵遂

派人迎接孙中山回粤主持大计。孙中山于2月21日由香港抵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从23日起，连下六道嘉奖令，表彰滇、桂、粤军及海军讨陈功绩。

正当广州军民庆祝胜利的时候，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为广东督军。4月16日沈鸿英发动叛乱，所部由白云山进窥广州城。孙中山亲自督师，偕杨希闵率滇军进剿。滇军奋力激战，两日内即将沈军逐出广州，向北追至英德，复与吴佩孚由赣南调来援沈的方本仁第九师遭遇。滇军乘其立足未定，连夜出击。方、沈军溃败，退至韶关。滇军继续作战，迫使方、沈两部退入江西境内。杨希闵留第一师赵成梁部驻守韶关、南雄一带，防止敌军南下。

6月4日，沈鸿英在北洋军邓如琢第三师的配合下，分三路攻占韶关。沈军复沿铁路进攻，在火车头上架机关枪冲锋，滇军在军田车站及其附近阻击，伤亡较大，但终于打退了这次进攻。接着，沈鸿英再次勾结方本仁师第二次进犯广州，双方激战于英德。杨希闵亲到高塘指挥，孙中山亦亲临前线。滇军事先在英德破坏了铁路，把路基挖空，使沈军无法再使用火车头冲锋。杨以第一军挡正面，第二军打右翼，第三军胡思舜旅从左侧截断沈军后路。桂军刘玉山、粤军李福林部亦同时抄击。沈、方两部狼狈北逃，遁入赣境。

11月，陈炯明部又分四路猛攻省城。孙中山亲自指挥各军奋勇抵御，取得广州防卫战胜利。当时，云集广东的各省军队中，滇军是较有战斗力的，孙中山颇为倚重。但以杨希闵为首的军官，并不真正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而是想借孙中山的革命威望，争夺地盘和权位。他们视广东为征服地，骄横恣肆，漫无法纪。滇军总部设在广州长堤大庙内，院内插着一杆黄绸黑字大旗，旗上绣有一个很大的“杨”字，类似古时的军营。孙中山召见杨希闵，他不愿去。他对下不顾士兵生活，薪饷常不能按时发给。孙中山多次要滇军攻打东江，消灭陈炯明残部，可是他们不愿出力，久攻惠州而不下，养寇自重，战事一直没有进展。孙中山要统一广东财政，杨希闵等人更是阳奉阴

违。孙中山曾在大元帅府一次旅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各位纷纷联名电请我返粤主持国家大计，如今你们只知向我要钱要弹，却不愿东出消灭敌人。你们叫我孙某一个人怎么办呢？老实说，我回广东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跟我革命的话，随你们造反我也不怕的。"[(1)] 滇军将领充耳不闻，依然如故。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积极着手筹建黄埔军官学校。杨希闵、刘震寰认为这同他们的利益不相容，多方阻挠破坏。其后又看到苏援枪械只发给黄埔军校，不发给滇桂军，更为不满，处处与军政府为难，拒绝执行东征的命令。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唐继尧以副元帅名义，认可段祺瑞委任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兼省长。

5月3日，杨希闵一面与粤军将领联名通电驳斥唐继尧就副元帅职，一面却伙同刘震寰暗地策应唐继尧的入粤计划。5月中旬，杨希闵、刘震寰在香港召开会议，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邓本殷、陈廉伯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均派有代表参加。会议商定叛乱计划，企图推翻革命政府。会后，杨希闵加紧叛乱部署，把驻韶关的赵成梁师调广九铁路线布防，驻佛山的胡思清师调广州白云山一带驻防，驻广州市区的廖行超师扩展到郊区布防。

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阴谋很快暴露。6月3日，胡汉民代表大元帅府向他们提出：一、服从政府；二、所占防地一律交出，由政府指驻；三、交还所占财政各机关。当晚，滇桂军将领举行联席会议，对二、三两项拒绝接受。6月5日，胡汉民以代帅名义，下令免去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建国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职务，并任命朱培德为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刘遂公开叛乱。是日上午十一时，滇军占领省长公署及粤军总司令部，下午占领财政厅、公安局、电报局、车站等处。大本营调集了黄埔学生军、建国第一、二军及粤军陈济棠、徐汉臣等部平定叛乱。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工人实行罢工，拒绝为滇桂军队运兵运械，迟滞叛军的行动。省城东西北三江的交通完全断绝。6

月11日，革命军各部对杨、刘所部发起总攻。滇军全线溃败，退入市区。经过激烈巷战，溃败的士兵纷纷缴械投降。杨希闵和一些高级军官，早已逃往香港。12日下午，大本营各军收复广州市。所有被俘滇军官兵，除编了一个教导第四团外，其余数千人都编入了朱培德军。杨希闵从此结束了在广东的活动。

杨希闵在香港住了一个时期，就连同眷属迁居浙江绍兴。抗日战争爆发后，绍兴沦陷，杨迁居昆明。从1937年至1949年，他既未附日，也未附蒋，过着很少与外界接触的寓公生活。解放后，1955年召开云南省政协第一届会议时，杨被邀为省政协委员。1956年杨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17日杨希闵因病在昆明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莫雄：《“白马会盟”前后回忆》，《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1年版。

刘少伯：《滇军杨希闵部入粤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版。

---

(1) 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页。

杨永泰

萧栋梁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1880年（清光绪六年）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自幼接受严格的旧式教育，弱冠之年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广东高等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未几北上，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国立法政大学前身）就读，毕业后回广州任《广东报》主笔。1908年立宪风潮在全国兴起，任广东省谘议局议员。

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同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改组为国民党，杨隶国民党籍。1913年7月，任国会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0月与国民党员张耀曾、谷钟秀、汤漪、沈钧儒，进步党员丁世峄、刘崇佑、蓝公武等合组民宪党。1914年1月，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资格，杨与谷钟秀、丁世峄等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进行反袁宣传，鼓吹民主共和思想。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杨与黄兴、李烈钧、陈独秀、邹鲁等组织“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在反袁问题上基本一致，但持“缓进”策略。此会战后改名“政学会”，即后来演变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有重要势力的新政学系，杨与张群等是新政学系的首脑人物。1915年8月，袁世凯密谋推翻共和，恢复帝制，杨与谷钟秀、欧阳振声等组织“共和维持会”，发表宣言，痛斥袁“蹂躏国会，撤销自治”，擅改约法，抛弃共和。10月，又与谷钟秀、钮永键、张耀曾等创办《中华新报》，任总编辑，为推翻袁世凯做舆论宣传。1916年蔡锷、唐继尧发动讨袁护国战争，云、贵、川、粤、湘护国军兴。5月，杨与政学系李根源、章士钊，研究系梁启超等拥被称为“西南重镇恢复共和的首领”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兼副抚军长（抚军长唐继尧），设都司令部于肇庆，杨被任为财政厅长。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反袁声浪中暴死；8月重开国会，杨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兼院司法委员会委

员。杨在国会中，原属于和梁启超等“研究系”对立的“商榷系”，后因在选举中意见分歧，便与谷钟秀、张耀曾等从中分出，并于11月19日另立“政学会”，后来人们称之谓“旧政学系”。杨为十三名干事之一。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坚持拒绝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推行独裁统治，引起全国反对，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电请国会议员南下。杨永泰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但杨在观测风向，揣度孙中山没有军事实力，迟迟未在军政府中任职。随着政学系与桂系军阀的勾结，杨也由拥护孙中山建立军政府，转而支持改组军政府。1918年5月，国会非常会议改元帅制为七总裁制，推桂系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同月孙中山鉴于军政府牺牲国会，与北方谋和，排挤、架空自己，倒行逆施，声明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与军政府决裂。7月，杨永泰出任改组后的军政府财政厅长，8月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0月伙同督军莫荣新与英商订约，以借款港银十万元为条件，出卖陆丰、惠阳、海丰、香山矿产；控制广东银行，扰乱金融；对《民主报》等报刊进行摧残和压制。11月杨兼广州市政分所督办。1920年4月，杨升任广东省长。10月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岑春煊为首的军政府垮台，杨亦潜往上海。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南下国会议员支持下当选大总统，5月宣布取消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桂军即分三路攻粤，粤桂战争爆发。杨永泰见此形势变化，受岑春煊指使北上，向徐世昌条陈“谋粤计划”，被徐密委为广东安抚使，携巨款亲赴雷州，策划谋粤事宜，运动粤方叛军在后方捣乱，并以“归降者每人三十元”诱惑粤军投降桂军。7月，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并下令缉拿为桂系张目的杨永泰。1922年，旧国会在北京复会，杨重任北京国会参议院议员。期间，杨与宪法研究会之王家襄上演了一场争夺参议院议长的闹剧，致使国会第三期常会结束时，参议院始终未选出议长。1923年初，曹锟贿选丑闻发生后，旧国会解体，政学系随之偃旗息鼓，杨被迫蛰居上

海。1925年5月，任“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梁士诒）。1926年由段祺瑞任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1928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杨永泰通过张群结识了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黄向蒋介石推荐杨永泰，称：“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并促成蒋、杨晤谈，“极其欢洽”。此后杨历任交通部长王伯群的顾问、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从此逐步跻身为蒋介石亲信智囊。当时各地方实力派均拥兵自重，杨即援引历史上封建帝王削夺藩镇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经验，向蒋献“削藩策”：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手段对付奉张。蒋采纳杨的意见，召开削弱地方实力派巩固中央集权的编遣会议，直接导致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爆发，不仅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使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了对中国的入侵。1931年6月，杨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身份，随蒋介石到南昌，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但此次“围剿”仍以蒋介石的失败告终。杨目睹蒋连续三次“围剿”均遭失败，即乘机献万言书，详陈“围剿”须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政治剿共”的方案，并提出了在“剿共”中削弱异己的强干弱枝的“削藩谋略”，博得蒋的进一步赏识，被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并随蒋介石前行。1933年2月，蒋介石撤销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作为围剿红军的大本营，杨永泰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二厅厅长。因该厅负“政治剿共”之责，故杨被认为“七分厅长”。杨利用这一职务，大肆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害民政策，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推行保甲制度和“经济围剿”方针，以配合“军事剿共”。1934年2月，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在江西开始推行，杨为之起草《新生活运动纲要》，大肆鼓吹和推行，以强化对全国人民思想的统治。同年3月，又兼任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1934年，四川军阀“围剿”过境红军发生困难向蒋介石请求支援时，杨又乘机献策，提出用“政治渗入”的办法，加强对四川的统治。故1935年1月被任为新成立的军委会委员长四川行营秘书长，为蒋设计了设计削减川军力量、局部改组省政府、实施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等计谋，以巩固蒋介石对四川的统治。同时出席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

由于杨永泰等新政学系成员邀宠攫权，步步得逞，与国民党内的权要尤其是CC派的矛盾加剧。CC派在蒋面前攻击杨永泰，必欲去之而后快。蒋为平息内部矛盾，1935年2月改任杨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杨至鄂近一年，大力推行公务员军事化及省政府公役管理训练，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整顿武汉市政，整训全省保安团队，重订和推行保甲办法等方面颇著成效，从而加强了个人专断。1936年1月，杨永泰兼湖北省保安司令。这些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学系与CC派系的矛盾。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赴美驻汉口领事宴会返回时，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政敌所派杀手暗杀殒命。凶手姓施，被当场抓获。次年2月2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因杨永泰案被捕，6月5日被判处十年徒刑。

杨永泰留下的遗著有《外交政策》、《现代民主政治》等。

主要参考资料

孙彩霞：《新旧政学系》，《杨永泰与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聂桂庭：《杨永泰被刺之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1982年版，第89—94页。

《中外杂志》1969年第2卷第2期；1971年第9卷第3期；1972年

第12卷第4期、第6期。

杨宇霆

周斌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有自况之意。辽宁法库人，生于1885年8月29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其先祖世居河北滦州戴家岭。清同治年间，其祖父杨正荣携家逃荒，至奉天法库县蛇山沟村定居。杨正荣生有四子，次子曰永昌。永昌生四子，次子即杨宇霆。杨宇霆幼时聪颖好学，先后就读于本村毛麟兆私塾和铁岭县小江屯张秀才书馆。1904年，赴锦州考中清代末科秀才。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后，考入奉天省立中学堂读书。1906年，被清廷选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第七期学习。

1911年，杨宇霆回国，任长春陆军第三镇炮兵见习队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杨改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不久，又入奉天军械厂，历任科长、厂长。1916年4月，张作霖赶走段芝贵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延请各方面人士，调杨宇霆任督军公署参谋长。张作霖“初谋巩定奉局，继则笼吉、黑二省于掌握”，先后平息了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的叛乱，瓦解了奉天军务帮办冯德麟的势力，逼迫吉林督军孟恩远下台，驱逐黑龙江师长许兰洲等，攫取了东三省的霸权。这一切，都是“杨宇霆参预帷幄，而底于成功”的[(1)]。

杨宇霆在协助张作霖统一东北的同时，利用与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日本士官同学的关系，代表张作霖参加1917年4月和12月两次督军团会议，借支持“府院之争”段祺瑞一方，图谋向关内发展奉军势力。是年冬，段祺瑞以对西南主战政策失败而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其心腹徐树铮向杨宇霆提出，以陆军部在日本订购的军火作为交换条件，请奉军入关，逼迫代总统冯国璋下台，并恢复段的总理职务。在杨宇霆居间联系下，奉皖双方达成协议[(2)]。1918年2月，杨宇霆携

带徐树铮送给的空白领取军械证件，率奉军五十三旅张景惠部开到秦皇岛，劫走了冯国璋本打算用来武装直系的价值四千万元的军火，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秦皇岛劫械案”。张作霖利用这批军火武装了三个混成旅，迅速壮大了奉军。3月12日，张作霖组织援湘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进驻军粮城，直接威胁冯国璋。23日，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从此，杨宇霆之名“崛起于东北，而渐震乎中原”[(3)]。

1918年秋，徐树铮与杨宇霆合谋利用奉军之名，招募新兵四旅，在洛阳、信阳两地训练，发展自己的势力，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张作霖下令免去徐树铮、杨宇霆的职务，杨宇霆不敢回东北，遂依附徐树铮，历任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等闲职。三年后，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统辖奉、吉、黑三省及热、察、绥三特别区，思杨宇霆人才可用，重新启用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赞襄军务及对日交涉事宜。1922年4月，杨宇霆被张作霖任命为镇威军总参谋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后，在杨宇霆的建议下，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以备再战。杨宇霆将奉天军械厂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并自兼兵工厂督办，大力改善奉军的后勤供应。同时，成立“陆军整理处”，充实东三省讲武堂，培训中下级军官，编练新军。经过一年整训后，奉军共编成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约有三十五万余人，实力大有提高。期间，杨宇霆先后将留日军官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等人援引过来，逐渐形成日本士官派；而郭松龄凭借与张学良的关系，以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为主体，形成陆大派。由于杨宇霆“嫉视”郭松龄的崛起，支持郭的张学良也“事事受杨阻碍”[(4)]，两派的矛盾自此开始。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即以粤、浙、奉三角同盟为由，组织镇威军，以杨宇霆为总参谋长，率十七万大兵入关，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历时约有两月，奉张大获全胜，入关与冯玉祥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杨宇霆的声名也煊赫一时。1925年8月，段祺

瑞执政府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奉张势力达于苏、皖两省。杨宇霆到南京任职后，以胜利者自居，对直系将领、军务帮办陈调元多有歧视。陈遂与浙江督办孙传芳秘通款曲，共同反奉。10月初，孙传芳举兵进攻松江、上海，陈调元在南京策应，杨宇霆被迫离苏北上[(5)]。

本来，奉军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以郭松龄的战功最大，张作霖原打算派郭松龄督皖，但因杨宇霆的反对而改派姜登选，郭松龄对杨颇为不满。此次杨宇霆督苏不到两月，便丧师失地、铩羽而归，而张作霖仍任他为奉军总参议，更引起了郭松龄等一些奉军将领的愤懑。11月22日，郭松龄在直隶滦州倒戈反奉，要求张作霖即日下野，严惩杨宇霆。杨宇霆先避居大连，后又求助日本关东军禁止郭松龄军队“越过南满铁路线”，为张作霖争得了缓兵的机会。12月24日，郭松龄兵溃被俘，乃致书张学良，词颇哀恻，杨宇霆担心张学良对郭宽释，“纵虎贻患”，便将信焚烧，并急谏张作霖，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死[(6)]。可见，郭松龄之死，是与杨宇霆密切相关的。

同年12月，杨宇霆受张作霖之命，与吴佩孚的代表蒋方震在大连会晤，就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大体上达成了谅解”[(7)]。1926年1月，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并于4月进占北京。6月，经杨宇霆与吴的幕僚多次密商，张作霖与吴佩孚“聚首怀仁堂”，正式结成了“反赤”联盟。12月，为对抗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杨宇霆任安国军总参谋长，并制定了先利用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与北伐军火并，再消灭北伐军统一全国的计划。无奈这一计划在连战连捷、势不可挡的北伐军面前，只是个泡影而已。1927年6月，杨宇霆协助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并任元帅府总参议，以与北伐军作最后一搏。1928年1月，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以病痿不能治军，由杨宇霆接任，与张学良一起负责京汉线作战。5月30日，鉴于北伐军逼近京、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杨宇霆、张学良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即日下令总退却。6月4日晨，张作霖途经沈阳西北皇姑屯

车站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口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得知消息后，将全军委托杨宇霆指挥，自己化装成士兵秘密回到沈阳。7月4日，张学良经东三省议会推举，当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驻关内的奉军在杨宇霆指挥下也陆续撤回关外。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缩减军事开支，撤销了旅以上的军、师番号，以旅为军队最高单位。杨宇霆脱离军旅，以“兵工厂督办”的身份寓居沈阳，张学良仍不时就商政事。而杨宇霆却怏怏“非少主臣”，对张的诸多措施有异议，甚至肆意阻挠。他表面上称张学良为“少帅”或汉卿，背地里却不止一次地叫他“小六子”（张学良行六），对张学良极不礼貌。起初，张学良对杨的意见颇为尊重，“凡事得宇霆之关白，学良无不许可；凡人得宇霆之品题，学良无不擢用”。但“学良愈恭谨，而宇霆愈跋扈”，东北的一些官员们以为“宇霆之果能操纵学良也”，“故趋赴者愈多”，杨公馆辐辏如市[(8)]。张学良对杨“心渐厌之”，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是杨宇霆的心腹。他身兼省长、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等要职，是东北的实力派人物之一。常荫槐虽精明干练，但也与杨宇霆一样，根本未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甚至对张的命令拒不执行。常擅自在黑龙江省成立山林警备队，由杨宇霆从其兵工厂提供军械，“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9)]。这对急欲统一东北政令的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一大心患。

杨宇霆与张学良的政见分歧突出表现在“东北易帜”上。杨宇霆反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作，而主张联合西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抵抗蒋介石，保持东北“独立自主”的政治局面。1928年8月25日和10月7日，杨宇霆两次背着张学良与白崇禧会见。白崇禧劝杨宇霆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并愿意提供帮助。蒋介石获悉此事后，立即密告张学良，叫他“先下手为强”[(10)]。杨宇霆虽没有谋害张学良之心，但坚持反蒋不变。12月29日，东北正式“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杨宇霆为国民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

委员。张学良宣誓就职时，杨宇霆当场表示不接受其委任，乃拂袖而去[11]。与此同时，日本竭力挑拨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大川周明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史》，并用红笔将丰臣秀赖被权臣德川家康推翻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暗示杨即德川家康，张为丰臣秀赖。关东军还设法将一些杨宇霆与日本人密谋联系、要篡夺张氏政权的假情报传到张学良手中，希望张、杨互相争权、火并，日本好从中渔利。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为其父祝寿，杨公馆门前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亲往道贺，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席间，杨的一举一动俨然以东北领袖自居，而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也对杨恭维备至。张学良目睹这些情景，更感到杨宇霆是他施政的最大障碍，遂决心除掉杨宇霆。

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一起来见张学良，以管理中东铁路为名，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表示，目前东北刚刚安定，涉及外交的事情应慎重考虑，须从长计议。杨、常则要求立即决定，并拿出已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张学良认为杨、常欺人太甚，忍无可忍，便推托吃过晚饭后再说。当杨、常二人吃过晚餐来到帅府老虎厅坐下时，辽宁警务处长高纪毅等人奉张学良之命将杨、常处死。

---

(1) 金毓黻：《杨宇霆别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第17页。

(2) 叶惠芬：《秦皇岛劫械与奉军首度入关：〈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史料选录》，《国史馆馆刊》2005年第39期，第194页。

(3) 筱园：《记杨宇霆》（一），《国闻周报》第14卷第10期，第43页。

(4) 荆有岩：《杨宇霆轶事》，《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第40页。

(5) 杨蔚云：《杨宇霆督苏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 - 39页。

(6) 常城：《奉系军阀的“智囊”杨宇霆》，《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221页。

(7) ［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3页。

(8) 筱园：《记杨宇霆》（六），《国闻周报》第14卷第20期，第29页。

(9) 田庸：《常荫槐》，《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第23页。

(10) 陶菊隐：《张学良和杨宇霆的关系》，《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第58页。

(11) 潘喜廷：《杨宇霆》，《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第13 - 14页。

杨增新

陈宁生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莫别村人，生于1864年3月6日（清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1)]，出身于官僚家庭，少时家境已衰落。他聪慧好学，1888年考中举人，次年应会试，成为进士，9月以知县用签派往甘肃。1891年，因劝办顺直赈捐出力，获奖同知衔。1893年底，署甘肃省中卫县知县。中日甲午战争时，随宁夏将军钟泰练兵，管全军营务并兼管带。1896年4月，补渭源县知县。6月，因顺直赈捐出力案内保候补缺，得以直隶州知州升用，8月署河州（属甘肃兰州府）知州，创办河州书院，亲自执教。次年10月，充任直隶知州。1900年重返甘肃，升任甘肃提学使、甘肃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经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向新疆巡抚联魁推荐，以候补道员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兼督练公所参议官，后授任阿克苏兵备道。次年，联魁又以“茂才异等”保荐他入京，晋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1909年，重返新疆阿克苏本任。1911年调任阿克苏道尹。是年3月，新疆巡抚袁大化保举他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

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杨缵绪等响应辛亥革命，举行起义。次日，成立新伊大都督府，推已卸任的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后改为军务部总长）。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则按照清廷电令采取“剿抚兼施”[(2)]的策略对付起义者。此时杨增新向袁大化建议，募兵助战。袁大化遂命杨增新招募迪化（今乌鲁木齐）二十四个寺坊的青壮年，先后组成五营，由杨兼统领。战事激烈时，袁大化催促杨出兵，杨拥兵自重，托词逗留迪化不进。

3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电令新疆巡抚改为都督。27日，又电令速停战事。4月，新疆省政府同伊犁临时政府停战议和。革命形

势发展很快，袁大化自知无力控制新疆局势，自请去职，推荐喀什道台袁鸿祐继任都督。不料，袁鸿祐未及到任就被哥老会首领、时任总兵的查春华所杀。袁大化急于脱身，又保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1912年5月18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杨增新在督新之初，把镇压各地革命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他和伊犁临时政府的和平谈判，于7月8日达成和议：双方承认民主共和；公认杨增新为都督，主持新疆军政；取消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嗣后，杨增新电请袁世凯，对伊犁革命党领导人均委以重要官职，趁机将他们调出伊犁，以分散瓦解革命力量。不到两年，伊犁革命势力即被杨增新镇压下去。

对于哈密农民起义，杨增新采取“阳虽主战，而阴则主抚”的策略，他指令哈密知事白文超，“仍宜严为防备，善为笼络，毋使兵连祸结，以一隅而动全局”[(3)]。1913年3月，起义军等在杨增新的轮番诱劝下，接受了省方的“招降”条件。杨增新随后对起义军部众乘其在“遣散归农”的途中，进行伏击，消灭了起义军。

杨增新对哥老会亦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段，他认为哥老会“给新疆之威胁，什百倍于革命党人”[(4)]。初期主要采取分化手段，他将拥兵自重的哥老会将领查春华等免职，又将边永福、魏得喜部调赴科（布多）阿（尔泰）前线，遂使哥老会群龙无首，自行瓦解。1914年1月，趁北京政府通令各省严办会党，杨增新立即部署在全疆镇压哥老会，令参将童明才率马队兼程前往，“切实痛剿”。经过数年的“剿办”，已“设法将彼中渠魁，或以资遣，或以计去，或以法诛，一时风流云散，势力锐减”[(5)]。至1919年，哥老会的活动基本停止。

杨增新认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使全疆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民国成立后，改伊犁将军为镇边使，但仍不隶属于新疆都督管辖。1914年2月1日伊犁镇边使广福病故，2月4日杨即呈准中央，将镇边使撤销，改设镇守使，归新疆都督节制。1916年冬，又以“事权

不一”为由，呈准将塔城参赞改为道尹，军民两政均直接归新疆省长兼督军管辖。清末，阿尔泰设办事大臣，直隶于清廷，民初其隶属关系继续沿用。1918年3月7日，阿山发生兵变，杨借此呈请北京政府，将阿尔泰办事长官裁撤，改为阿山道尹，所辖区域亦归并新疆省。这样，原来在行政区划或某些管辖权限不属于新疆省当局的伊犁、塔城、阿尔泰都归并到新疆省，完成了新疆的统一。

杨增新曾是帝制复辟的拥护者。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杨增新立即通电拥护，并禁止在新疆有任何反袁的举动。1916年初，新疆督署副官长兼护卫军营长夏鼎和炮兵营长李寅等中下级军官，在云南人士马一的策动下，准备举行反袁起义。杨增新探悉后，于元宵节的前一天，在督署二堂举行宴会，当宾客酒兴方酣之际，他举杯离席，喝令刽子手当众将夏鼎、李寅砍杀。事后，杨又下令将参与夏、李起事的其他军政官吏逐个押解回原籍。又一日，昌吉县令匡时手持讨袁万言书，请见杨增新。杨对匡虚与委蛇，并约至西花园“补过斋”叙谈。两人并肩而行，至中途，杨突然借故停步，他的马弁随即在身后举枪将匡时击毙。事后，杨将万言书及处理匡时原委呈报袁世凯，受到袁的嘉奖。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杨增新鉴于关内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提出和推行了一套“闭关自守”、“保境安民”的政策，以维持其统治地位。他对北京中央政府抱定“认庙不认神”的宗旨，不管何人当权，他都拥护；不管头衔如何变更，都督也好，将军兼巡按使也好，还是督军兼省长，他都接受。对于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他采用“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态度，从不介入。他要“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使新疆成为与世隔绝的“桃园胜境”[(6)]。还特意在督署东花园西北角建筑了一座楼阁，题名为“镇边楼”，他说：“吾之建镇边楼者，实欲借斯楼以镇静镇定之力而常惕焉，意在鉴以往之危险，而思所以保长久治安也。”[(7)]

杨增新对民众采用愚民政策，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民智

过于开通，则机械变诈叛逆之事乃因之而起”[8]。他严禁新疆人民与内地人民思想文化的交流，实行严格的书报、通信检查制度，不准出版报纸，也不准阅读内地各省出版的报刊。他虽然承认新疆“全省的教育，尚不及内地一大县，一县教育尚不及内地一大村”[9]，但惧怕“发展缠民文化教育，启发其政治思想，势必肇乱于新疆”[10]，又极力阻挠兴办各类学校，并反对设立教育厅。在他治新期间筹办的学校寥寥可数，其中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要算新疆唯一的一所最高学府，还是因为他手下缺乏对俄外交人才而办起来的，且只有一届毕业生，人数不过四十余名。

杨增新崇尚老庄哲学，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法令严密则人相遁于法之外，甚或抗于法之中”，“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反对以法治国，提倡以礼治国。他说：“中国民俗浇漓，虽读孔孟之书，实未遵孔孟之道，若复弃孔教于不顾，将举国为无忌惮之小人，虽空言法治，何能挽陷溺之人心而归于正，欲天下不乱岂可得乎！”[11] 他也不注重整军经武，认为新疆的治安不是用兵所能维持的，单靠区区几旅军队，既抵抗不了外国的坚甲利兵，也戡定不了内部的民族叛乱；况且“国家耗财之事莫甚于养兵”，“竭穷民四十人之脂膏，始足充一兵之岁费”，“兵愈多而民愈穷”，“兵愈多而国愈乱”。他认为“前清以兵亡，民国以兵乱”[12]，应引以为戒，一再向北洋政府提出裁兵主张。对于他管辖下的军警，很少进行训练和整顿。各部队士兵从未足额，且多系临时招募，留去自便；而对各级军官，则听任其各行其是，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使不思聚众造反。他对新疆流民多、闲散官员多十分忧虑，认为这是致乱的祸根，“若不设法安置，听其流离失所，今日多一流民，即异日多一乱民”[13]。他呈请北京政府允许新疆的官吏和百姓均可领地开荒，并视此为一项德政。

杨增新还用宗教迷信束缚人民，下令各地方都要立上帝庙，遍设敬天尊孔会，各学堂设“昊天先帝先师孔子神位”，认为这样做可使“人人心中有一天，自能畏天，人人心中有一圣，自不侮圣；人心以此正

风俗，以此醇世道，以此转移浩劫”[14]，天下即可太平无事。

在外交方面，杨增新以“保境安民”为宗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被推翻的沙俄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干涉。北洋军阀政府亦于1918年8月出兵海参崴，参加对苏俄的干涉战争。与此同时，驻迪化、伊犁、塔城、承化、喀什的帝俄领事，不断地向新疆当局发出照会，怂恿新疆当局出兵中亚，支援帝俄军队。当时，喀什提督马福兴在英、俄领事的引诱下，在1919年初向杨增新请求派兵十五营入俄，协助帝俄“剿平乱党”。杨增新于3月18日指示马福兴：“查新疆对于俄乱向取不干涉主义”，“万不可误听人言，改变数年抱定之宗旨，以致吃亏”。杨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真新党，“盖真新党必占优胜，古今中外，各国皆然”。“俄旧党力难恢复，本督军已逆料于数年以前”，因此，他不去迎合北洋政府的行为，坚持“新疆独取不干涉主义”[15]。

1919年底，被苏俄红军击溃的白俄军曾窜入新疆境内的伊犁、塔城、喀什等地。杨增新一面饬令地方官员加强边卡防守力量；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坚持不许白俄军入境，如果白俄军不听阻止，应依照国际公法，解除其武装。1920年1月至5月，以白俄将军阿连阔夫为首领的白俄军连同随军“难民”约五千余人，窜入伊犁。杨增新电令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对白俄败兵“务须济以权宜，示以宽大，使其有赖我国之心，无仇视我国之意，终能解卸武装，俯就范围”[16]。并派员赶赴伊犁，向白俄溃军进行说服工作。结果，阿连阔夫交出了部分武器，伊犁当局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从而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同年6月，阿连阔夫向新省当局提出，允许他率部经迪化转喀什，前往印度。杨增新派员说服他们先至省城，然后移驻奇台。但阿连阔夫到达奇台后，同占据外蒙库伦的白俄军官谢米诺夫相勾结，企图先夺取北疆，然后反攻苏俄，遂于1921年1月6日袭击奇台。杨增新一面委任因公到奇台的军务厅长张鸣远为守城司令，嘱其紧闭城门，避免直接交锋；一面派旅长蒋松林指挥省军前往增援，并嘱其摆出“引而不

发”的态势，以迫使白俄军就范。阿连阔夫自知力量单薄，于2月下旬同意交出武器，其部众被押送到甘肃，散居各地，阿连阔夫本人则被解至迪化加以软禁。这支白俄军遂被瓦解。

1920年2月，白俄将军杜托夫的部众巴奇赤率领一万一千余人，马九千余匹，窜入塔城。杨增新指示塔城当局，尽可能动员他们缴械回国。实在不愿回国的，则安置在额敏县的游牧地区，加以监视和管理。1921年6月，巴奇赤袭击阿山，阿山道尹周务学仓促派边卡驻军前往堵截，周兵败自杀。巴奇赤得以进占承化和布尔津，进而与在外蒙的白俄谢米诺夫联络，企图久占阿山，进攻斋桑，形势异常危急。杨增新同苏维埃政府商定，双方配合，包剿白俄军。9月初，巴奇赤被苏联红军和新疆省军赶出了布尔津和承化，率残部逃往外蒙。至此，杨增新完全解决了窜入新疆的白俄军，使边境保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局面。

杨增新主张同苏维埃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恢复发展两国贸易关系。1920年，塔什干苏维埃政府派代表向新疆当局提出了正式恢复两国贸易等要求。杨增新考虑到当时苏俄政府还未经北京政府正式承认，只同意双方拟定临时性的局部通商条款。同年5月27日，双方签订《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随着贸易额的增长，一年后苏俄又派代表来新疆要求增修条款。1924年6月，双方达成互设领事协议：苏联得在迪化、伊宁、喀什、塔城、承化等处设置五领馆，总领事馆设于迪化；新疆得在斜米、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斋桑等处设置五领馆，总领事馆设于斜米，并明确规定：“双方互换之五领，在驻在国得依照国际惯例享受相当之待遇，以平等互惠为原则。”(17)

杨增新从“保境安民”这个总原则出发，重视苏联的存在，也承认十月革命给予世界的影响。当列宁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很感慨地说：“列宁可算是一个伟大人物啊！他手创的国家，改变了世界历史。”(18) 杨本人很注意研究了解苏俄，曾专门请苏俄总领事馆的翻译官给他翻译和讲解《资本论》。他尽力保持和苏俄正常的外交关

系，而不以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为转移。但是，他又十分担心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传入，因此，在各地安插密探，以掌握当地居民和苏联人民的往来情况，以及群众的思想动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运动在国内逐步兴起和发展，杨增新感到恐惧。1922年3月12日，他就呈请北京政府“查禁平民革命主义”，他以“共产党鼓吹平民革命，工界中赞成颇多”，如不警惕，“平民革命必将实行”，“中国亦将变为第二之俄罗斯”[19]。他提出了一套阻止革命的方法。在经济上，他认为由于工厂使用大机器，“工厂之利尽为大资本家所垄断，而贫富阶级遂相悬殊，此工人之所以罢工，劳动者之所以革命皆由于此”，因此提议：“今欲求补救之法，惟有少制多数人共用之大机器，而多制少数人独用的小机器。一人操一器便可养一身，一家操一器便可养一家，如此则贫富阶级可以渐渐化除，即社会主义之传播亦可预为之防而消患于未萌矣。”他把“共产”误解为“均产”，认为“如今均产之说势必夺富人之财以与贫民，贫者未见其富，而富者同归于贫，秩序必因之而大乱”[20]。为了防乱，他主张政治改良，而不必进行经济革命。在这一企图使社会倒退的思想支配下，新疆经济十分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化工业。虽然新疆的乌苏、绥来、沙湾、迪化、塔城等地均产石油，但“向以土法开采，既耗工时，又不谙提炼之法，货劣价昂，难期适用”[21]，就连中国传统的造纸工业也多拘泥于土法，制出的纸张只能作包装之用，而各机关用纸完全要从内地购进。

1927年，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北洋政府行将垮台时，杨增新已经意识到“全国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默察今日时局，窃恐武人专制久之必变为暴民专制”[22]。他既不想和吴佩孚、张作霖之辈同流合污，也不愿顺应历史潮流，仍抱定“纷争莫问中原事”的宗旨，严密封锁消息。1928年春，冯玉祥派两名代表到新疆进行联络，杨增新将他们秘密地软禁起来，并严禁走漏风声。尽管如此，国家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不可能不影响新疆，一个以交涉员兼军事厅长樊耀南为首的反

杨派别趁机组成，他们针对杨增新的各种弊政，提出了民族平等、整理财政、铲除贪污、发展教育、整顿军队的政治主张，还举行秘密集会，伺机推翻杨的统治。是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被炸身亡，杨增新看到北洋军阀统治已彻底垮台，立刻于7月1日通电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新疆易帜，同时改组新疆省政府委员会。樊耀南等认为“杨将军又耍骗人的手段了，想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混过去”[23]，一旦杨为南京政府承认，他们就无容身之地，于是密谋举行政变。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出席自己创办的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宴会，当场被樊耀南指派的刺客击毙。

---

(1) 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1930年铅印本），杨的出生年月有不同说法，今根据《行状》。

(2) 《新疆起义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2页。

(3)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4)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6) 根据吴霭宸《新疆纪游》（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记载，杨增新在他的督署大堂前，手书一副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第48页）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

(7) 王子钝：《杨增新轶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第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8)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1921年刻本。

(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10) 杨增新给袁世凯上的条陈。

(11)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

(12)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

(13)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14)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

(1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16)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17) 孙福坤：《苏联掠夺新疆纪实》，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版，第41页。

(18) 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121页。

(1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20)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

(21)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22)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

(23) 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71、121页。

杨振鸿

高光汉

杨振鸿，字秋帆，笔名志复、福升。1874年1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云南昆明东郊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在家参加生产劳动。他富于反抗精神，言词锋利，常常据理反抗地主和官吏的无端敲诈勒索，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也招致官府的迫害。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官府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监禁。在狱中，他坚强不屈，同时在难友的帮助下，以极大的毅力自学文化，知识大增。因为没有治罪的证据，官府不得不将他释放。杨振鸿出狱以后继续刻苦自学，不久就取得了县学生员的资格[(1)]。

年轻的杨振鸿目睹清政府的腐朽、卖国，以及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立志要为救国救民而献身，正如他这一时期写的一首《述怀》诗中所说："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颈血溅泥沙。头颅断送等闲事，一点泪痕一树花。"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云南也传出法国侵略者阴谋伏兵昆明一举夺取云南的消息。云南人民无比愤慨，昆明汇合了一千多人的群众队伍，捣毁了平政街等处的法国天主教堂。全省许多州县也纷纷捣毁教堂，驱逐教士。杨振鸿带领群众积极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后来他于1907年3月在《云南》杂志发表的《法国窥伺云南之渐》一文中，回述这次斗争"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关头"。对于腐败的清政府屈于法国压力，反以"赔偿教堂损失"十五万两来了结此案，他愤怒地斥责说："世界何有公理，黑铁赤血而已！"又说："凡我滇人，此后宜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及时谋防御之策，救卫之方。"否则，一千多万云南人民就将"狂呼哀号于法人之刀头马蹄，求生而不得"[(2)]。他还指出，国家之所以"被外人分攘割据者，

非外人能为之，乃官吏之卖我以为之也”。他认为，“欲御外寇，先杀内奸”[(3)]。

1903年，杨振鸿以首批云南官费留日学生资格，赴日本留学，先考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1905年毕业后又考入日本陆军测量部学校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一面学习军事科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盟会筹建期间，杨振鸿受孙中山接见，聆听了孙中山关于建立革命组织的计划。之后，他常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往，积极参与建立同盟会的工作。在杨振鸿及其他同志的带动下，在东京首批加入同盟会的云南籍会员就有五十多人，为辛亥云南起义初步奠定了干部基础。

1905年，杨振鸿在东京写了《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寄回云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们同心协力，奋起救国。他还不断寄回《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经过杨振鸿及其他同志的宣传鼓动，在昆明的一些爱国青年先后建立了“兴汉会”、“滇学会”、“誓死会”等组织，并分赴云南各地宣传革命。

1906年1月，孙中山和黄兴邀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赵伸和罗佩金五人商谈筹办《云南》杂志。经过大家努力，4月，《云南》杂志社正式成立。自1906年至1911年，《云南》杂志一共发行二十三期，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杨振鸿为《云南》杂志写了大量文章。云南曾有人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题名《暮鼓晨钟》翻印散发，广为宣传，部分文章内容还选载于《滇事危言》等书里，以期唤醒云南人民。

1906年3月，杨振鸿受同盟会派遣回国建立云南分会，任主盟人。他考察法国对云南的侵略情况，从河口到昆明，对滇越铁路沿线做了详细调查，写出《滇越边务及铁道之实况》的调查报告，深刻揭露法国的侵略罪行，号召云南人民奋起斗争，以避免当亡国奴的危险。

是年夏天，杨振鸿回到昆明，见到云贵总督丁振铎。他对丁讲述了英、法两国侵略云南的严重性，提出整顿军备、加强边防的建议，并要求分配他去军队工作。丁振铎未予置理。不久，他打算趁丁振铎参加云南清军阅操之机刺杀丁，举行起义。由于清军戒备森严，计划未能实行。6月，他在昆明创办体操学堂，从全省招收青年三百人入学，暗中培养革命骨干。他亲自讲课，对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每天清早还亲自带操，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青年学生的敬仰。

9月，杨振鸿在昆明创设“公学会”，又在云南一些州县设立分会，以“开拓社会文明”、“增进国民幸福”和“拯救本省危局”为宗旨，并要求清政府拒绝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无理要求[(4)]。为了启发群众觉悟，他亲自到昆明街头讲演，痛陈云南丧失路矿权益的情况，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感动。因此，他的名声更大，威信更高，同时也就更加引起清政府对他的注意，丁振铎派亲信对他进行监视盯梢。为了回击敌人，他策动留日学生和旅日同乡会揭发丁振铎在云南的罪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将丁调离云南。丁振铎为了遏阻革命和打击杨振鸿，赶在去职前把杨调出体操学堂，派往腾越厅（今腾冲县）任巡防营管带。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阴谋，劝杨不要去，可是他执意要去。他认为保卫边防是自己的职责，而且此去远离省城，少受牵制，正好发展革命的力量。他带着体操学堂学生董鸿勋等人，于是年冬赶往腾越厅上任。

杨振鸿到巡防营上任不久，就发展了张文光等一批青年加入同盟会，使革命势力扩展到滇缅边界一带和旅缅华侨中，同时抓紧整顿边防，严肃纪律，加强练兵，打击英国对我边疆地区的侵略破坏活动，保卫边境安宁。

其时，腾越厅属盏达（今盈江县莲山镇）土司刀思必治死亡不久，腾越镇总兵李宝书和迤西道台关以镛收受贿赂，武装支持不得人心的刀思鸿祺强行继位，遭人民反对。事件发生后，李、关命杨振鸿带兵镇压。杨竭力反对。他在取得腾越厅同知龙文的支持后，只身前

往盏达，首先宣布刀思鸿祺继承无效，然后与当地人士充分协商，切实尊重民意，让群众另行公举有威信的刀思必发继承土司职，圆满地解决了土司承袭问题，加强了民族团结和统一，稳定了边疆，使贪官污吏的屠杀计划和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未能得逞，也为日后在这一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5)]。

不久，杨振鸿拟定了一个起义计划，准备于1907年6月在腾越起义，得手后攻取永昌府城（今保山市），再进图大理与昆明。这时，反动官吏及土豪劣绅为土司承袭事件而迁怒于杨，一面散布匿名信件诬杨“将武装叛变”，一面又勾结英国领事电告督署，诬杨“破坏邦交”。督署接电，即刻撤掉杨振鸿的职务，表面上命他回昆明“候委”，暗地里却密令就地处决他。杨得到消息，取消原拟起义计划，一面致电督署批驳敌人的诬陷，并假报回省日期，一面立即取道缅甸，脱离险境。当局得知他已离腾赴缅，便急令通缉，派人四处堵截，并请英国领事致电英缅政府帮助缉捕。由于他勇敢机智，又得同志多方帮助，终于使敌人的捕杀计划完全破产[(6)]。他经由缅甸到达日本，参加同盟会云南分会的领导工作。

1908年4月，孙中山、黄兴发动云南河口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杨振鸿等急谋回滇参加战斗。接着又传来清政府向法国借兵镇压起义的消息。杨立即在东京主持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并发表激昂的演说，痛斥清政府的暴行，宣布他和云南全省人民同清王朝断绝关系，表示要同敌人奋战到底。会后，杨带领一批革命青年启程回国，准备投入河口起义军。不料，他们抵达香港时，闻悉河口起义已经失败。他们当即改变计划，一面派人返回日本，建议同盟会云南分会开办“速成军事讲习会”，培养军事干部，而杨振鸿等则转赴缅甸仰光，在旅缅侨胞中发展革命力量。

杨振鸿到达仰光后，除了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以壮大革命组织外，还同居正、吕志伊等人创办《光华日报》，大力开展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

是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杨振鸿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便立即回到云南干崖（今盈江县城），与黄毓英等革命者筹划起义。消息传到昆明，云贵总督锡良悬赏白银五万两捕拿杨振鸿。杨不顾个人安危，仍然日以继夜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他这时身患疟疾，但仍抱病跋涉于滇西峡谷和怒江两岸，联络民族上层，发动群众，组织起义。他们计划先以农民组成“敢死队”攻下永昌府，然后扩大为三军，一军回攻腾越，巩固后方基地，一军取大理攻打昆明，一军出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进军滇南；待全省光复后，再出师川、黔，进图中原。方针既定，他和何畏、黄毓英等各自分头准备。

12月31日，杨振鸿到达永昌府城外的马岭寨。入夜，起义战斗打响，杨亲自登城指挥。由于准备不足，匆忙起兵，起义军纯系农民临时组合，未加训练，人数又少，武器弹药缺乏，很快就失败了。杨振鸿等人退回马岭寨，以图再举。但喘息未定，敌军追到，形势十分危急。杨于忧急之下，病势加重，吐了很多鲜血，不得已连夜率同何畏、何兴、杨毓铣、彭莫等多人离开马岭寨。第二天到达何家寨，住何兴家调养医治。但终因操劳过度，缺医少药，于1909年1月2日去世。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追赠杨振鸿为“左将军”。杨是在云南宣传、组织、发动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为民主革命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第一人。

---

(1) 杨振鸿被捕和出狱，以及取得县学生员资格的确切时间，现有史料难以确定。根据李根源、吕志伊等的回忆文章，结合当时云南斗争形势，初步判断他被捕的时间大约在他二十岁左右，即甲午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之前这段时间。至于取得县学生员资格的时间，当在出狱一段时间后至1903年

考取官费留学生之前。

(2) 《法人窥伺云南之渐》，《云南》杂志第五号，1907年3月。

(3) 《滇官吏媚外之丑状》，《云南》杂志第九号，1907年9月。

(4) 《公学会之成立》，《云南》杂志第六号，1907年7月。

(5) 《办理盏达案件述略》，《云南》杂志第十一号，1907年12月。

(6) 《杨振鸿被诬始末记》，《云南》杂志第七号，1907年7月；《腾越之镇道因办理盏达土司承袭案诬陷杨振鸿》，《云南》杂志第十一号，1907年12月。

姚锡光

孙宏年

姚锡光，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57（咸丰七年）年生。1867年，姚锡光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光绪十一年（1885），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翌年应丙戌科朝考，考取二等，以教职用。十四年（1888），中试光绪戊子科举人，次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

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的十多年间，他逐步走向仕途，主要是在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手下任职，从事军事、教育等活动，并且不断在治军、教育、江防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光绪丙戌（1886）春夏间，他“以萃科入都，廷试报罢”，离开北京途经天津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开办北洋武备学堂，聘请他为教习。当时，该学堂依照西洋陆军学堂建立，聘用德国军官作教练；最初挑选各营中弁目前往学习，文员愿意学习武备的也一并录取，有学生一百人。学生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等基础学科，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和行军、布阵、攻守等军事方面的内容，兼习经史。开始时，学生仅学习一年，考试及格后就发回各营，以后逐渐延长了年限，选拔年轻的学生入学肄业。姚锡光在这里任职长达九年，先后教过四个班，学生三百多人，其中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何宗莲、张怀芝等人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中的重要将领，或者出任过地方大员。这期间李鸿章曾保请姚锡光为候补直隶州知府。

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期间，姚锡光多次上书李鸿章，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他向李鸿章呈递《请赴朝阳行营说帖》、《北洋军防

利器用法未竟说帖》等，一度要求到军营效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战争迫在眉睫，如何布防、迎敌等问题也提上日程。姚锡光又先后呈《请奖防军将弁说帖》、《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因为自己的建议未受到李鸿章重视，姚颇为不满，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奉讳旋里”，因“北洋将领数以兵事招”，经过秦王岛（今秦皇岛）、北戴河时，还代守卫这里的总兵贾制坛写了两份禀文，即《洋河口布置情形并请增营扼守禀》、《金山嘴设暗炮台禀》，呈递给李鸿章，并代写了《洋河口军防情形笺》呈给京师督办军务处，就秦王岛附近洋河口一带布防问题提出意见。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姚锡光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随军驻在莱州，任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他在李秉衡幕府任职前后五个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秉衡回驻济南，他也获准辞职返故里。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去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任幕府幕僚。这年秋冬间，他两次奉命与德国军事专家查看长江下游炮台防务，并向张之洞呈递禀折，报告视察情况，介绍长江要隘、各炮台的形势，就开办炮兵学堂培养人才等提出了意见。姚氏后来把这些禀折和总图一幅、分图四幅合并，并附录炮台、炮位编目，出版了《长江炮台刍议》一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到湖北，担任自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制。考察期间，他在东京两个月，了解了日本陆军省、文部省各学校的情况和“步、骑、炮、工、辎重队各操，旁及议院、银行、工厂并各公会”六十多处地方，与日本各界人士三百多人进行了交流。回国后，他呈递《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向张之洞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日本各类学校的情况。

在湖北任职期间，他根据在甲午战争期间搜集的资料，整理出版《东方兵事纪略》。此书原计划分六卷出版，因第十一部分的表、第

十二部分的图未在1898年本刊印，故“戊戌排印本”约十万字，只有五卷十篇，大致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日冲突的缘由、过程和重大的战役，并论述中日议和、中国人民保卫台湾反对割让斗争的情况，并强调此次战争中国失败的影响及原因，呼吁举国上下认真反思。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姚锡光被派往安徽，先后担任石埭、怀宁知县、和州直隶州知州等地方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安徽任职期间，姚锡光主要政绩是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文教事业，注重“时事”，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处理积案，解决民教冲突；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地方治理；应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其中，面对特大的洪水，他采取多种措施抗洪救灾，包括加固圩堤，保障安全；稳定社会秩序，设法筹集粮食，保障灾民的粮食供应；以工代赈，安置灾民，避免饥民外出逃荒；向国内外紧急求助，争取更多的资金开展救灾工作，尤其是发动上海士绅给予援助，表示“按月登报，以昭征信”，经过多方努力，救灾款的募集工作颇见成效。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姚锡光“请咨赴引”，此后直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他一直在北京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24日，经吏部引见，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光绪三十年春，请咨到省，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一度奉命拟定复兴海军的规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宣统元年（1909），

出任殖边学堂监督，2月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宣统三年（1911），他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闰六月二十日（8月14日）被任命为弼德院顾问大臣，九月，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袁世凯组织“完全内阁”，任命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重新任命顾问大臣九人，姚锡光等再未列入其中。

这期间，他关心教育、海军与海防、蒙古与西藏等各种事务，并光绪三十四年出版了《尘牍丛钞》、《筹海军刍议》、《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等著作，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对于西藏，姚锡光建议设立川滇边务大臣，笼络达赖，稳固西藏，保卫西南边疆；反思清代治藏的得失，强调要处理好稳定与开发、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姚锡光在清末对边疆民族事务颇有见解，又与袁世凯系统渊源很深，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姚锡光为会长，赵秉钧、志钧、熙凌阿、王宽、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五族国民合进会希望通过这一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促进“五族共和”的实现。

7月25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蒙藏事务局官制》，并自公布之日施行。7月29日，姚锡光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8月5日，姚锡光到局办公，内务部派员移交。由于总裁迟迟未见任命，姚氏一直以“兼署蒙藏事务局总裁”的名义主持工作，因此一些人在7、8月间呼吁民国政府任命他为总裁，如蒙藏交通公司等团体前后三次呈请中央直接任命姚为总裁。民国政府认为这是民间干预政府官员任免，对此颇为不满，但又因其一直标榜民主共和，宣称“人民意见本准陈达以备采察”，对前两次呈文未加指责。到8月中

旬，国务院对于第三次呈请则大为光火，指出“任命官吏为大总统职权，载在约法。各该团体不应任意干请”，并斥责各团体“原为增进智识共谋公益而设，倘辄干涉政治，殊属昧于大体”，还表示这样做“亦非所以爱姚君”。此事是因姚氏本有此意而暗示这些团体向民国政府呈文，还是这些团体自发而为，现在因资料缺乏尚不可知，但客观上却影响了姚氏在蒙藏事务局的任职。9月9日，贡桑诺尔布才被任命为总裁，16日，贡桑诺尔布到任视事，并呈报临时大总统。10月28日，民国政府任命荣勋署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姚锡光为口北宣抚使。11月11日，他启用“口北宣抚使关防”，为木质关防，中篆汉、蒙、唐古忒三种文字，正式就任口北宣抚使一职。1913年9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荣勋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免去姚锡光副总裁之职。事实上，这是以外出“宣抚”为由将姚氏调离该局。

姚锡光在蒙藏事务局任职期间，正处在该局初建之时，特别是八九月间担任副总裁兼署总裁，主持该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因此他不仅为蒙藏事务局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这一时期的蒙藏事务管理做出了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与内务部办理交接，启用印信办公。二、选派职员，充实机构。八九月间，该局陆续任命了主要部门的二十多名官吏，还聘请了熙凌阿、鄂多台、沈钧、陆兴祺等十九名顾问。三、主持蒙藏事务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沿习旧制并有所创新，主要在取消原来与皇权有关的满蒙联姻等事务的同时，根据“五族共和”的精神，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在喇嘛教管理和蒙古地区王公爵位的承袭、觐见和官员的任免，蒙藏院王公、喇嘛、活佛在年班、觐见时的礼仪及相关的“贡输、宴赉各名目”等蒙藏事务方面都力求稳定中有变革。四、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调查，先后派人前往内蒙、甘、新、青、滇、藏，既搜集情报、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又慰问边胞，稳定边陲。同时，一些关心、研究边事的民间团体和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能前往边陲进行调查，该局对他们也给予了支持。五、为及早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蒙藏事务局积极搜集相关情报，转报民间的有关建议，并建议中央政府恢复十三

世达赖名号，加封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恢复、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913年以后，伴随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各派军阀混战和民国政府不断更迭，北京民国政府治下的中国政局动荡，政潮迭起。在这种动荡的政局之下，姚氏的政治活动明显减少，但在政潮迭起的政局变动中又不时出现，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23年—1924年担任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和介入了曹锟贿选，后参与了1926年的“法统之争”。1923年1月31日，他被任命为锡威将军。4月30日，又被特派“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并于5月初就职。此时，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当选”总统，一方面加紧收买议员进行贿选活动，一方面在6月13日动用军警把大总统黎元洪从北京驱逐到天津，为曹锟“当选”扫除了障碍。但是黎元洪被驱逐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不仅国内反对直系军阀的各种力量对曹锟大选联合拆台，而且国会议员相继出走，国会陷于分裂。这对于曹锟利用国会达到“当选”目的极为不利，6月17日，姚锡光为此给曹锟写了密信，建议他在选举前“出动京中军警占领车站，无论如何不得令一员他行”，以保证国会选举时达到法定人数；在选举时“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作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的话“一则可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并限定一周内以所谓“合法”手续完成大选。曹锟认为这些建议“深识远虑”，让下属依计行事，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由于阴谋泄露，逼选计划失败，而后改为贿选，10月5日曹锟终于“当选”了总统。正是这一期间，9月20日北京民国政府一度下令裁撤“川边矿务督办”，同日被裁的机构还有“边藏劝业专员”和“青海劝业专员”。这一命令发生在曹锟“当选”总统之前半个月，10月5日以后似乎并未生效，故1924年姚锡光又以“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的身份，向北京民国政府保荐人才，经国务总理孙宝琦呈核，6月10日得到批复，对他“特保人才滕祖周等实职”一事，准滕祖周以简任职交院存记，吴昌曜以简任职升用。

到1926年5月，奉系张作霖击败冯玉祥之后，何人继承民国“法统”的问题颇受各方关注，据《申报》报道，5月6日，姚锡光致函吴佩孚，讨论护法的问题，指出：“君崇关岳，志在春秋，民国法统，在黎不在曹。史笔可畏，千秋昭鉴，帝蜀寇魏，可以存正统也。”当他主张以黎元洪承接“法统”之时，黎元洪却因为“复法声浪甚高，多有补足八十三日任期相请者”，他“不胜其扰”，拟妥下野通电，大意谓“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以后，冯玉祥逼宫，大法中斩。今幸大憝已除，法律可复，元洪忧患余生，未便重执政柄，请各方贤豪公开解决，重组中枢，国家幸甚”等语，表示“倘各方强迫复职，即拍发”。此后未见姚锡光政治活动的记载，卒年未详。

主要参考资料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昌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排印，第5册。

姚锡光：《长江炮台刍议》，光绪二十五年（1899）排印，第1册。

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第1册。

姚锡光：《吏皖存牍》，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第3册。

姚锡光：《尘牍丛钞》，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第2册。

姚锡光：《筹海军刍议》，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印于京师，第2册。

姚锡光：《筹蒙刍议》，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第2册。

姚锡光：《筹藏刍议》，宣统二年（1910）年刊，第1册。

《政府公报》，北京民国政府印铸局编，民国元年至十三年。

《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启》，《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1912年8月1日发行。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5月7日（四版）。

《姚锡光》，《丹徒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893—894页。

戴志恭：《姚锡光与镇江江防快炮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2期。

舒习龙：《姚锡光与〈东方兵事纪略〉》，《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

舒习龙：《姚锡光述论》，《史林》2006年第5期。

马骏杰：《姚锡光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军事思想及活动》，《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叶楚伧

郑春燕

叶楚伧，原名宗源，字卓书。1887年10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生[1]。江苏吴县人[2]。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叶凤巢是晚清秀才，因不事生产，家道中落。叶楚伧十一岁丧母，由姨母抚育长大。

叶楚伧自幼随父读书，童年先后寄读于吴江同里任氏、叶氏家塾，后归故里拜陶小沚为师。1902年参加县试和府试，均名列前茅，院试时落榜。翌年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叶楚伧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暑假后，转入浙西南浔镇庞青臣主办的浔溪公学，为高等科学生。入学未几月，发生学潮，浔溪公学解散。叶到桐乡县的濮院镇，召集原浔溪公学的八位同学，在一个名叫沈维伯的人家中“研讨学问”。这时正值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叶楚伧和他的同学秘密得到此书进行传阅。逢星期日，他们还在濮院镇公开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是叶楚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开始。1904年，叶考入苏州高等学堂，学满三年毕业时，因考卷舞弊案，叶等痛打学校监督，被苏抚端方饬吏捕拿。叶闻风离开学堂，避居友人柳亚子家中，幸免坐牢。这时，同盟会员、叶的表兄陈去病在广东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因病辞职，举叶楚伧以自代，叶遂由上海前往汕头。

1909年春，叶楚伧在汕头加入同盟会。他以《中华新报》为阵地积极进行反清活动，和汕头、潮州、梅县的民党交往甚密，并建立俱乐部，组织“诗钟社”，表面是诗词花酒之会，实是联络民党人士的组织。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和诗词，不少诗文中表达了他反清的雄心壮志。在《梦吴江行》中写道：“君王不向鼎湖去，马革何处非疆场。朝从太庙负矢出，暮挟胡俘北门入。”[3] 由于《中华新报》锋芒

直指清王朝，两广总督张鸣岐视之为眼中钉，1911年上半年下令封禁。同年秋，《中华新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复刊，对清政府抨击更加尖锐，销路很广，对社会影响颇大。这使潮汕的地方官吏感到恐惧，潮州知府曾派兵威胁叶楚伧和《新中华报》社的人员，但他们并没有屈服。

10月武昌首义后，广州、汕头、潮州相继光复。此时潮、汕一带各种武装纷起，秩序很乱，叶楚伧奔走潮、汕进行调解。不久，他离开《新中华报》社，加入以姚雨平为司令的粤军，任秘书，随军北伐。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叶随姚军进入南京拱卫。因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渡江还击，叶随军渡江，并兼任参谋，曾参加固镇、宿州两次战役。

2月，南北议和结束，东南军事粗定，叶弃武从文，和姚雨平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日报》，姚任社长，叶任总编辑。不久，他加入了柳亚子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南社的主要骨干。1913年，叶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叶主编《民立报》副刊，笔名“小凤”。在此期间，他痛击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和陷害民党人士伎俩，在《祭黄花岗诸烈士》一文中，痛骂袁是“狐鼠充位，当路杀人”，告诉国人“贤俊殂丧，国基摇落”。“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叶改任《生活日报》编辑，笔名“湘君”。后《生活日报》因欠款案被公共租界捕房封闭，叶又转任上海城东女学、竞雄女学和开明女学等校的国文教员，兼为民鸣新剧社编写剧本；在《礼拜六》等刊物上，还写了不少言情小说和诗歌。胡朴安在《楚伧文选》前言中说他“喜欢酒，为小说家，言一尊酒，一枝笔，终日不休。人谓楚伧之小说皆酒话，楚伧笑曰：‘酒话固绝妙小说也。’”(4)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陈其美集资于1916年1月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民党喉舌，从事反袁宣传，叶楚伧任《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为经理。袁世凯死后，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叶楚伧以努力办好《民国日报》来配合孙中山的

革命活动。他用犀利的文笔抒发正义，抨击暴政。当报社经费困难时，他四处借贷，以至典当妻子的首饰衣服。

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顺应新形势，柳亚子准备在1917年停止活动的旧南社基础上组织新南社。叶支持和促成改组南社的工作。1923年5月，新南社成立，叶为新南社起草了《发起宣言》，但在创办新南社的指导思想上，他和柳亚子存在分歧。叶在《发起宣言》中说："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蕲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的。"柳亚子在1923年10月起草的《成立宣言》则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此叶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柳的《成立宣言》个人色彩太浓，代表不了团体，力主《成立宣言》改名为《成立布告》，并再三叮嘱柳亚子：这份"布告"不要发表在国民党"一大"前。

此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国共合作，积极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叶楚伧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但是叶并没有积极贯彻"一大"宣言所确立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他在上海参与林森、邹鲁、谢持等人的一些反共活动。11月，他到北京参加在西山非法举行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与炮制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等八项决议案。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叶所控制的《民国日报》为阵地，大量刊登启事、声明、通电和反共文章。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声讨了"西山会议派"，给叶楚伧以警告处分，并停止他《民国日报》总编辑职务。不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破坏国共合作，后又利用《党务整理案》获取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叶楚伧看到蒋的变化，从上海去广州，一跃而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

长，成为蒋的亲信，与“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关系。

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1月攻占南昌。蒋介石欲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在南昌擅自召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会议，在叶楚伧帮助下作出了一个国民政府迁赣的决议。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叶楚伧不去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秘书长职，仍留在南昌蒋介石身边。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叶楚伧先到上海任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9月，参加了宁、汉、沪三方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为候补委员。1928年，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国民党中央领导大权，叶被任命为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9年后改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0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他先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的国民党元老身份在国民党内外颇受尊崇，兼任大小职务有二十多个。他对蒋介石的举措顺从有加，遇到派系争斗，多持中庸平和，被称为“好好先生”。

抗日战争期间，叶楚伧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总干事等职。1942年，他任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所担任的职务，并没有多大实权，在国民党统治中不占多么重要的地位。1945年叶继续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年12月任国民党中央特派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由重庆到了上海。

1946年2月15日，叶楚伧因病在上海去世。1947年葬于苏州灵岩山麓。

叶楚伧一生写了许多诗词、小说和文章，一部分诗词收入《世徽楼诗稿》，一部分文章收入《叶楚伧文存》。柳亚子主编的《南社诗

集》选录了叶诗一百余首；胡朴安编的《南社文选》选录了叶的《民国野史序》、《说诗》等七文。

---

(1) 叶之生年有两说：《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记为1887年10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叶元撰《叶楚伧简历》记为1886年8月14日（清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本文采前说。

(2) 叶原籍吴县周庄镇，辛亥前后周庄镇曾划归吴江县，所以也有称叶为吴江籍的。

(3) 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上海中学生书局1936年版，第630页。

(4) 胡朴安编辑：《南社文选》，上海国学社1936年版，第600页。

叶恭绰

萧栋梁

叶恭绰，字裕甫，又字誉虎，晚年自号遐庵。广东番禺人。1881年11月24日（清光绪七年十月初三）生于北京。叶家学渊源，年二十一岁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二十三岁任湖北农业学堂国文、史地教员。1905年任湖北方言学堂教员并兼上海《时报》湖北访员。1906年兼两湖师范学堂之普通中学教员。同年捐通判。是冬，邮传部成立，任职邮传部文案处，后任路政司科长、主事、郎中等职，曾致力于从比利时商人手中赎回京汉铁路路权。1909年升任邮传部承政厅副厅长、厅长。1910年升任铁路总局提调，7月派往欧洲游学兼任考查材料事务。1911年9月任铁路总局代局长。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5月任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同年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曾撰写《中国铁路之过去与未来》。1913年仍任交通部路政局长，7月兼代次长。1914年6月任交通部次长兼路政局长。1915年6月，因涉嫌与津浦铁路舞弊案有关，被停职候传四个月。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帝制，叶任大典筹备处会办。次年随袁世凯帝制失败而去职。1917年7月，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曾任叶恭绰为讨逆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负责筹集饷糈。复辟乱平，叶被任命为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1918年10月，以西原大借款不应牵涉交通事业，遂辞去交通次长职。是年冬赴欧美、日本考察，1919年冬回国。1920年初，任劝办实业专使，8月任靳云鹏内阁交通总长。

1921年3月，交通部将原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组建交通大学。叶恭绰以交通总长兼校长，5月辞校长兼职。同年12月，任梁士诒内阁交通总长。梁

内阁受奉系张作霖支持，因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极力抑制直系首领吴佩孚，并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把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遭到直系吴佩孚极力反对，引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叶恭绰于1922年4月去职，被迫流亡日本。叶为北洋政府时期深谙铁路交通事业的人才、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1923年5月，叶前往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同年7月，因建设部长林森未到任，由叶任建设部代部长。后任广东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1月，受孙中山委派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洽商讨伐直系事宜。1924年4月，兼广州政府盐务督办，9月辞职。

1924年10月，直系曹锟垮台后，11月叶任北京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交通总长。次年9月兼关税会议特别委员会委员，11月去职。1927年6月，张作霖为对抗北伐而组织的安国军政府成立，任叶为财政讨论会副会长，后任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评审员。1928年，安国军在与北伐军作战中连连失利，张作霖退往东北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毙后，安国军政府解体。次年叶恭绰与朱启钤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与朱祖谋、夏剑丞、冒广生成立“词社”，与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同年兼故宫博物院理事，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1931年12月，孙科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任叶为铁道部长，次年1月去职。1933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国学馆馆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0月，倡建上海市博物馆。1934年被聘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监事。1939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并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1940年发起编印《广东文献丛编》，次年辑刊《广东丛书》。1941年12月下旬香港沦陷后，叶滞居九龙，1942年10月在日方监视下迁居上海，以诗画自娱，闭门谢客，拒受伪职。1944年，编辑刊印梁鼎芬之《节庵遗诗续编》。抗战胜利后由上海到达广州，1948年移居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叶于1950年由香港经广州到达北京。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同年10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参与制定《常用字分类简化表》等；兼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中央普通话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叶恭绰于文化学术、考古、书画，无不精湛，搜集古代文物至为丰富。工画竹、石、松、兰，尤善画竹，秀劲隽拔，直写胸臆，画就辄题诗词。八十岁以后，将所藏珍贵书、画、典籍、文物，悉数捐赠于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市有关单位。主要著作有《遐庵词》、《遐庵汇稿》、《遐庵词赘稿》、《序跋一辑》、《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叶恭绰口述，俞诚之笔录）等。又辑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广箧中词》、《广东丛书》、《交通救国论》等。

1968年8月6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叶遐庵先生年谱》，1946年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出版。

沈柔坚主编，邵洛羊等撰：《中国美术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孙彩霞：《新旧交通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叶鸿英

程庸畴　宋紫云

叶鸿英，名逵，福建同安人。1860年5月6日（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生。其父叶丽水在沪经商。叶鸿英七岁时随父母迁居上海，就外傅读书。十四岁在其父自营的大昌杂货店学徒。满师后，随父执张尚德赴日本北海道经商，往来于北海道与长崎，采购海味杂货运往上海销售。叶学会了日语，熟悉了商情。

1877年，张尚德等集资在长崎开设丰记号，经营海味业，叶鸿英在丰记号任职员，经营有方，深为业主器重。越年，叶协助丰记号在朝鲜的釜山、仁川、元山各埠扩大贸易，进行顺利。

1881年，叶鸿英辞去丰记号职务，回上海开设源润昌行。生意有了进展之后，又往长崎、海参崴组织货源，扩充外贸业务。1889年，叶鸿英筹集巨资，开设源来号，经营进出口业务，直接从日本进口海参、鲍鱼、鱼翅、干贝、虾米、海带等商品批发给“行家”（小型批发商），并经营出口木材、棉花、海蜇、金针、木耳等商品。叶从日本大批进货时，由上海的日本银行开出信用证，对方凭信用证办理货物出口并结算货款，有时是对方开来押汇，货到付款。当时进口商品的利润可高达百分之一百，出口商品的利润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源来号生意越做越大，资财越积越多。1895年，叶鸿英周游日本四岛，考察市场情况，在长崎、神户、横滨三地设源来号联号，进一步开展业务。叶发现生粉在长崎销路不畅，但在上海是适销的热门货，就通过联号包销长崎一部分生粉。长崎、神户、横滨华侨甚多，华侨爱吃四川榨菜，叶即通过联号，打开了四川榨菜在日本的销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日元价格不断下跌，源来号从日本源源进货，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1923年，叶鸿英在大连开办升源机器油坊。由于就近采购东北大豆，又利用大连港海运销往国内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1924年叶被北京政府农商部聘为名誉顾问。

1931年，叶鸿英又在上海开设元兴行，并在香港开设分号，由其长孙叶元和任经理，向南洋群岛开展贸易。开始时专营进口南洋群岛海味，继又进口当地土特产如拷皮、石花菜、胡椒、生粉、大米、食糖、檀香木等，出口布匹、绢丝等，还兼营南洋华侨来货代销业务，得到了南洋华侨的信赖。

叶鸿英经商起家，拥有巨资，在上海先后投资了众多工商企业，有申大面粉厂、立大面粉厂、永豫纺织厂、荣大织布厂、永茂轧花厂、华商电气公司、华兴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源裕花行、源丰花行、源盛花行等；投资的金融事业有通和银行、正利银行、正大银行、正华银行、正义银行、国安信托公司、元大钱庄、福泰钱庄、信康钱庄、泰康钱庄、源安钱庄、明德钱庄、怡丰钱庄、晋德钱庄、瑞元钱庄等多家。

叶鸿英是个热心教育事业和地方公益的人。他曾于1906年捐助并筹募资金，在上海办起民立女子中学，妻苏本清曾在该校执教；1933年，他拨款五十万元（约合黄金一万两）成立鸿英教育基金会，以十万元专办乡村教育，以四十万元扩充人文图书馆，该图书馆遂改称鸿英图书馆。是年9月，鸿英教育基金会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代办鸿英师资训练所，于次年秋筹设沪郊乡村教育实验区，开办四所鸿英小学，兼办民众学校，便于学龄儿童及失学成年人都能受到教育。他对于水旱赈灾、地方公益等，或自捐资财，或劝募巨资，甚为热心。他先后被推举为旧上海城厢总工程局议董、上海县总商会会董、公断处评议、泉漳会馆董事、东洋杂货业董事，以及红十字会、济生会、仁济堂、贫儿院、残废院、公立医院、广益中医院、南洋慈善会等慈善团体的董事。

1937年2月17日叶鸿英病逝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闽南同安《叶氏支谱》。

《上海县志》。

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服务与学习》第27期，中国民主建国会1982年编印。

《人文月刊》第4卷第10期，人文图书馆1933年发行。

访问叶鸿英之长孙叶元和谈话记录。

叶景葵

汪仁泽

叶景葵，字揆初，别署存晦居士，号卷庵。浙江杭州人。1874年8月29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生。其父叶济，清末曾任直隶州知州，民国初改任郑州知事，后升开封道尹。母徐氏，育有三子一女，景葵居长。

叶景葵幼年时在外祖父家私塾就读。十六岁时举为秀才。二十岁娶朱氏为继室，次年参加乡试中举人。其文章受岳父之友赵尔巽的赏识，与之结为忘年交。1898年春，叶赴北京会试落第。时值维新运动期间，叶接受维新思想，入通艺学堂学习英文、算术，并用心研读《天演论》等汉译名著。戊戌政变后转而重视实业，抱有“实业救国”思想，研究各地物产，曾编撰《太康物产表》、《矿政纪要》等书。

1902年，叶景葵受山西巡抚赵尔巽之聘，入幕任内书记。次年赵改任湖南巡抚，叶随行，途经开封，参加会试中进士。仍赴湘任抚院文案，与同职的金还成为赵的两员得力助手，合称“金枝玉叶”。1905年赵改任盛京（今沈阳）将军，叶任文案总办。赵接受叶的建议，上奏获准改盛京为行省，叶任行省财政局会办。叶就任后，“剔除积弊，未及两年，所入骤增，逾千万”[(1)]。但也损及旧吏劣绅的利益，受到诬告。

1907年，清廷改授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到任后即弹劾财政局员工，叶被参革职，南下。次年受聘浙江兴业银行，为武汉分行总理。该行系浙籍人士为与英、美侵华势力争夺路权集资而于1907年在杭州成立，为中国最早商业银行之一，叶曾入股五千元，并受托在东北浙

人中集股。是年叶复受四川总督赵尔巽委派为四川转运局驻沪总办，乃移居上海，常往来沪、汉两地。1911年春叶受度支部派任天津造币厂监督。三个月后，叶忽奉旨进京，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大清银行监督，使叶倍感兴奋[(2)]，遂辞去浙兴武汉分行职赴任。此时大清银行由于贪污集团内外勾结，虽资本只一千万两，但放款六千四百四十五万余两，其中倒账达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余两，已濒临倒闭边缘。叶接任后对体制进行改革，取消总办事处，改设九个科，相互制约，加强监督领导，专以“维持币制，活动金融”为任务；改变任人唯亲、排斥贤能的现状，调配项兰生、吴鼎昌、宋汉章等得力人员任要职。正待一展抱负时，未及三个月突奉令去吉林查办官钱局火灾案，并考查东三省币制。10月武昌起义，待叶赶回北京时，大清银行早已宣布停兑，叶自责“维持无力，咎无可辞”，于11月5日辞职南下[(3)]。叶曾在该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旧员、守旧派的衔恨，乘机诬蔑中伤，一时谣言四起。叶于次年2月3日在《申报》上发表自白公开信，并揭露守旧派的无耻伎俩[(4)]。

此时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已告停业。1912年初，叶赴汉规划复业，押私产借款充作运营资金，复业后业务逐渐发展，叶被选为该行董事。此前叶曾投资汉冶萍公司，并曾为总办李一琴被诬事著文刊于《时事新报》辩白。1912年6月，该公司召开董事会，公推叶、李同为经理。奈公司因资金不足而停工，经叶赴京向政府请准借得八厘公债二百万元后复工。次年盛宣怀从日本回国，重掌公司经营权，叶、李同时辞职。

民国成立后，议将苏浙铁路收归国有，浙江代表要求政府归还股款，经协商签约由政府分三年（十二期）归还全部股款本息一千二百一十九万余元，并成立以叶为主任的浙路股款清算处。初尚能按期拨付，但自第五期起因政局动荡常延期，及至第十二期本息一百一十七万元则遥无归期，经叶再三催索，直至1936年7月始经新任铁道部长张嘉璈之手以折半八十万元了结，对此叶深以为憾[(5)]。至于股东中

未领款计一百四十万元，按规定逾期失效，但仍由叶以应得者名义移交浙省公益会。1934年，曾由浙江兴业银行承借其中一百万元投资兴建钱江大桥，占投资总额的半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暂时放松了对华控制与压迫，使我国的民族工商、金融企业获得发展的良机，浙江兴业银行此时业务也有进展，但杭州总行和沪、汉分行三处独立经营，各自为政，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亟待改组。1915年经董事会推举，叶景葵为董事长，掌握全行经营管理大权。叶就任后对全行进行重大改革。他改上海分行为总行，杭、汉为分行；修改全行章程，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董事会设在上海，下设总办事处管理总分行业务，使事权集中，改变三行分立的局面。为了增强银行实力，1917年收足资本金一百万元。初成立时仅收资金四分之一，1920年增资至二百五十万元。

叶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常说“树人百年，宁为早计”。留日学生徐寄廎初任副经理，不久升协理、常务董事，1945年初接替叶任董事长；留英、法学生徐新六初任董事会秘书，1925年起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在业务方面，叶景葵重视存放款经营，增设分支机构以吸收各地存款，至抗战前夕已达三十五处。1924年订立储蓄部章程，为确保存户利益，拨出专款作该部资金，会计独立，与总分行本身营业分开，并规定“本行全体董事及总经理对于储蓄存款均负无限责任”[(6)]。放款方面，他提出“将资金投资于工商业”的口号，并在各总分支行附设仓库，扩展抵押贷款业务。以上措施使存款额逐年上升，从1915年的四百三十八万余元上升至1924年的二千一百八十万余元、1926年的三千四百六十九万余元[(7)]。从1918年起至1927年多次居于全国商业银行的首位。放款额总行在1919年仅二百七十六万余元，至1926年达七百一十五万余元，其中半数以上投入工商企业[(8)]。企业家刘鸿生常称：“浙兴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1916年，北京政府下令停止兑现中国银行的兑换券，上海分行为

了维护持券人利益，稳定市面，在张嘉璈主持下反对停兑。对在沪发行印有上海字样的四百万元兑换券[9]全额照兑，受到各界支持。叶景葵以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身份出面组织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自任副会长（会长张謇），委托律师登报承担承兑责任；并以浙兴财产公债券四十万元借给中行，以备向外商银行借款时作抵押。反停兑事件使广大民众免受损失，中行沪行及浙兴信誉地位也随之提高。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抵沪，向各界摊派库券筹措军费，指定浙兴四十万元。叶景葵先认二十五万元，后加至三十万元，认为已尽己力；但蒋以该行是银行界有影响的大户，扬言“他不帮我，我叫他关门”。在同业劝说下，叶深感“孤军相抗，颇非所宜”，被迫认购四十万元。此时曾受浙兴贷款，并参与发行公司债的中兴煤矿，因拒交一百万元摊派款而遭蒋下令没收，后经叶景葵多方设法筹足交纳一百万元始获发还。1931年，叶相继当选该矿常务董事、董事长后，对该矿进行全面整顿，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添置运输设备，加以煤质优良，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936年产量达到一百七十三万吨，获利四百四十六万余元。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煤矿遭到日方掠夺性开采，破坏严重。日方曾多次派人找叶“合作”复工，但遭叶峻拒，始终未能正式复业[10]。

20年代末，上海经济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影响，工商企业对货币资金的需求相对减弱，叶景葵组织浙兴另辟蹊径，加大投资有价证券和房地产业的力度，建造大批“浙兴里”、“兴业里”、“兴业坊”等弄堂石库门房屋出租，弥补投资收益。在存款方面，总存额虽继续上升，1934年达七千七百四十七万余元，但这一期间同业竞争激烈，相形之下已落后于人。这一方面由于叶景葵一贯强调经营要“慎之又慎”，“不贪大利而冒进，务求小利而渐进”，稳妥有余，进取不足；另一方面仍坚持总办事处管理体制，事权过于集中，总分支行的经理们的创新精神和积极性都受到限制，对市场反应不能像其他总经理制银行那样灵敏和机动。如当时同业间争相以提高存款利息招揽存

户，而“浙兴”则反应迟钝，利率较一般同业为低，存款额不可能再居同业之首，1931年退至第四位，1936年更退至第六位。1935年更遭受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打击，被取消了银行兑换券（钞票）的发行权。浙兴上缴现金五百九十五万元，保证准备金三百五十万元，合计九百四十五万元，约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十，使浙兴的实力大为削弱，难再恢复昔日的盛况，叶亦萌“举贤自代”的思想[(11)]。但众董事一再选他，直至1945年他年逾七十才辞去董事长职，但仍任常务董事，且勤于视事。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叶景葵正在莫干山养病，乃转道汉口，同时处理战区各浙兴分支行的撤退和筹设内地的分支机构。次年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途见江、浙藏书纷纷流散，至感痛惜，遂邀同张元济、陈叔通、李拔可、陈陶遗于1939年共同创办合众图书馆，约请顾廷龙主其事，撒网罗佚，搜集古籍善本[(12)]。叶并率先捐赠全部藏书，并出资十五万元建造馆址。1941年新馆落成，叶另建一小屋于旁，自称别号“书寄生”[(13)]，日夜读书自娱，在“孤岛”险恶环境下，藉以洁身隐居。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叶景葵借诗讽之“蘧蒢在位非民望，葹菉盈朝是国仇”，将蒋氏比作残疾小丑，当政者都是无价值的野草。次年国民党军警特务镇压青年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叶闻后十分愤慨，与唐文治、张元济等十位有影响的古稀老人联名向市政当局吴国桢、宣铁吾发出抗议信，抨击黑暗统治，要求速行释放被捕学生；事后并集体拒绝吴、宣邀请的“茶会”。1948年冬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沪上应变之风日盛。友人询叶有何打算，叶笑答：“余避地有二，一为今日所坐之屋，一乃万国公墓。”1949年初陈叔通前往解放区，行前与叶景葵长谈，叶表示切盼上海早日解放，再聚首。1949年4月28日叶景葵因心脏病辞世。

叶景葵生前在整理古籍上卓有贡献，如曾购得已成碎片的《读史方舆纪要》，经亲手整比后，复招良工精修，得以完好如新，成为问

世孤本[14]。晚年致力于珍稀善本的搜集，对历代古籍不同版本亲加审定评述，多有独到之见；连同他的读书札记等，经后人整理以《叶景葵杂著》为题结集出版[15]。

---

(1) 顾廷龙：《叶公揆初行状》，《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2) 叶景葵在《我与浙江兴业银行关系之发生》中回忆说："我自38岁以前，所办各事，为时甚暂：至短者三月，至长者三年。以素无经验之人，办天外飞来之事，其始也兴高采烈，自命不凡；其终也意懒心灰，毫无结果。"

(3) 为了保全大清银行商股，1912年初，叶景葵与吴鼎昌、宋汉章等在沪发起筹组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呈请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将大清银行改设中国银行，获得批准。

(4) 公开信要求商股联合会将叶景葵任期内账册查核，如有弊混听候究办；又称"世风险诈，难保挟嫌造谣之人非即乘机舞弊之人……不可不虑"。

(5) 叶景葵：《浙路股款清算始末》。

(6) 《浙江兴业银行办理储蓄规程》，1924年6月议订，1929年8月奉部令核准。

(7) 《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上海金融研究所编印（1978年12月油印本）。

(8) 《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上海金融研究所编印（1978年12月油印本）。

(9) 上海中国银行钞票发行额约400万元，内250万元系该行直接发行，150万元系取得浙江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确实担保的领券发行，因此反停兑事件与浙兴关系至巨，受到叶景葵的全力支持。

(10) 《叶揆初（景葵）》，《中华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上海之部）（日文），1940年版，第423页。

(11) 叶景葵在《我与浙江兴业银行关系之发生》中承认："倘另举有学识有经验之人主持领导，其成绩决不止此……故时时刻刻思求贤以自辅，举

贤以自代。”

(12) 顾廷龙：《我与商务印书馆》，《解放日报》1987年3月12日。述及五人中除陈陶遗外都是商务董事，惟叶景葵任期较短。叶曾谈及：“我们五人学问未必皆深，也未必人人皆知图书馆之办法，但皆饱经忧患，有相当之修养，且皆无所为而为之。五人间有甚深之情感与互谅，故能知无不言，决无问题。”

(13) 叶景葵：《卷庵札记》。

(14) 徐森玉：《卷庵剩稿序一》。

(15) 《叶景葵杂著》内有《卷庵书跋》、《卷庵札记》、《卷庵文存》、《卷庵诗存》、《卷庵联存》五方面的内容，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叶企孙

阎铁

中国优秀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叶企孙（原名叶鸿眷）。1898年7月16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生于上海。父名叶景霆，清末举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曾赴日考察教育，担任过北京清华学校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江苏第三中学校长等职。

叶企孙幼时在上海读书，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8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研究物理，1922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获博士学位。以后又去德、法考察半年。1924年3月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任物理系教授，讲授力学、电子论、近代物理学等课程。

1925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叶企孙应聘到清华建立物理系。1926年开始，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1930年曾去德国休假一年，研究量子力学。在清华他曾讲授普通物理、力学、热力学、分子物理、光学等课程。

抗战爆发后，清华内迁。1938年11月至1941年8月，叶企孙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单独在昆明办有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和社会调查研究所，叶企孙为研究所委员会主席。

1941年9月，叶调任重庆中研院总干事，当时朱家骅代理院长，由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1943年叶当选为中研院的评议员。同年9月回西南联大任原职，1945年并兼理学院长。

1946年10月，清华复校迁回北平，叶仍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和理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平解放后，1949年5月叶企孙兼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2年高等院校改革，清华物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叶企孙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大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和物理学教授。1950年后，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应用物理所和近代物理所的学术委员、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研究员等职务。

1949年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委员。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为了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叶企孙早在1924年就参加中国科学社，担任理事和《科学杂志》编辑。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叶为发起人之一，他曾担任第一届常务理事、副会长，第二届会长。1946年又一次当选常务理事和理事长（会长改名理事长）。1950年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叶企孙对中国物理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青年时期留学美国时，对物理学研究就有了突出成就。他和杜安（W．Duane）及帕默尔（H．H．Palmer）合作的《普朗克常数h值的测定》一文，发表于1921年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普朗克（M．Planck）最早测定h值为6.548×10^{-27} 尔格秒。其后他人屡次有所修订，而叶等人的测定值是$(6.556\pm0.009)\times10^{-27}$ 尔格秒。这个测定值在其后十余年中曾为大家所采用。

他的第二个重要学术成就，是流体静压对铁、镍、钴的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工作是他在哈佛大学独立完成的，因此获得博士学位，论文载于1925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报。高压对铁、镍的磁化影响的研究，日本科学家在19世纪末便开始了，当时在实验室内只能

达到二百多个大气压，效应不显著。叶企孙一面改进测量方法，一面使用流体静压，使压力增高到一万二千个大气压。对此他作了理论分析，虽不能与实验数据定量符合，但得到了定性解释。他的这项研究，在布里奇曼（P．W．Bridgman）所著的《高压物理学》中，有较详的评述。

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界研究磁学的第一人。他留学回国后，引导施汝为研究这项工作，送施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磁学。至今我国磁学这一领域已经人才辈出，成果累累。

叶对自然科学史研究造诣也很深。他精通我国天文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等，对阿拉伯天文学史也有研究。

叶企孙最大的贡献是在物理学教学方面，他培养了多位年轻优秀的物理学人才。他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工作五十余年，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岗位，并始终坚持授课和指导研究生。他不仅讲授物理学方面许多课程，而且始终保持敏锐、活跃的学术思想。清华物理系初创时，他注意建立实验室，提倡理论与实验并重。教育与科研并重．他和郑衍芬合编的《初级物理实验》，成为当时大学普通物理实验教材。

他爱护青年，培养后进，对于那些踏实努力搞研究做学问的青年人，时常给予亲切的鼓励，而且大胆使用，不次擢拔。华罗庚由一个抄写员提拔为大学助教就是他的建议。1925年创建清华物理系时，他先后聘请了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物理学家，如萨本栋、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担任教授，使清华物理系在几年之中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他所领导的理学院其他各系的学术水平，也居于全国最先进的行列。

他因人施教，善于识别人才。赵忠尧、王淦昌原来都是学化学的，叶建议他们转学物理，后来都成了有名的物理学家。

清华物理系（1925—1937）在叶企孙和他的同事努力下，培养出很多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著名专家。如王淦昌、钱三强、施士源、周同庆、彭桓武、王竹溪、何泽慧、王大珩、龚祖同、赵九章、傅承义、钱伟长等。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培养的学生则有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陈篪等。

1925年，清华留美公费生改为面向全国招考，叶企孙主持这项工作。他从推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出发，设立留学生的名额不限于物理方面，其他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各学科都给予通盘考虑。他特别关注建设需要而国内基础又薄弱的学科（如地球物理、应用光学、弹道学、物理冶金学等），为之设立一定数量的名额。他办事公正，每次设立名额和主持招考，从不徇私。他不仅关心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等他执教的学生，也同样关心全国其他大学的青年，他曾鼓励大同大学毕业的钱临照投考公费留英。他对青年既关心备至，又严格要求。他招收研究生，总是严格按照考生成绩，从不徇情照顾。他治学严谨，为研究生改论文总是字斟句酌，数据都要重新算过。

叶企孙富于正义感，热爱祖国。年轻时他痛恨帝国主义的压迫，抱着科学救国思想出国学习科学技术。“七七”事变后，他因伤寒病在天津休息，曾积极支持清华学生援助八路军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一批理工科大学生秘密制造炸药，运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叶积极给予技术和经费资助，如为他们到香港活动经费[(1)]。1945年国民党当局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叶企孙义愤填膺，他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参加西南联大教授会议，声讨制造惨案的反动派。

叶一生未婚，无家庭负担，全部精力都用在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上。他个人生活简朴，却乐于助人，故除书籍外，别无积蓄。但在“文革”中，却横遭迫害，系狱数年，1973年7月13日因病逝世。“文革”结束后，方获彻底昭雪。北京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他一生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叶企孙档案（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钱临照：《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物理》1982年第8期。

王竹溪：《深切怀念叶企孙先生》，《物理》1982年第8期。

叶铭汉教授提供的有关材料。

---

(1) 蔡元培《杂记》手稿记载："叶企孙到香港，谈及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的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需别筹。拟往访宋庆龄先生，请作函介绍。当即写一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见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4页）（本文的撰写，承叶铭汉教授提供许多宝贵资料，钱昌照、傅承义两位教授也给予协助，特致感谢。）

叶圣陶

马蹄疾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号圣陶，笔名叶陶、王钧、郢生等，后以号行。江苏苏州人，1894年10月28日（清光绪二十年九月三十日）出生。父叶钟济，字仁伯，在苏州城内为一家地主做账房，以微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

叶钟济家教颇严，叶圣陶四五岁时，就开始识字描红，当他五岁进书塾时，识汉字三千左右，并已练就一手挺拔秀丽的好字。翌年转学到张承胪塾馆就读。同学中有顾颉刚、王伯祥、郭绍虞等。叶圣陶虽然对《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不感兴趣，对只背不讲的教学方法也颇不满，但为了应付严师的管教，还是认真背诵。课余，叶圣陶过得很愉快，在他七八岁时放学回家后，父亲常带他去听说书，大书如《水浒传》、《三国志》，小书如《珍珠塔》、《描金凤》。再大一些，他又跟父亲看昆曲。这些民间评书和戏曲，培养了叶圣陶对文艺的兴趣。

1906年，叶圣陶进刚创立的夏侯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除国文课外，开始学习历史、地理、博物、体育等课程。叶圣陶学业优异，三年制的小学他只读了一年便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即草桥中学）。这所中学在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方面都取法于日本模式，使叶圣陶在智育、体育的发展上都有很大的长进。著名南社诗人胡石予在此校任教，在学生中颇有声望；王伯祥、吴宾若、范烟桥、郑逸梅等和叶圣陶同窗共砚，争相传录诗稿，以圣陶所录诗稿最为工整。翌年，他和同学顾颉刚等组织诗社，起名“放社”，取放言高歌之意。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联诗，填词，唱和，抒发少年志向和抱负。这期间，叶圣陶对文学已有多方面的爱好，除做诗外，课余经常阅读《三

国演义》、《红楼梦》等明清白话长篇小说，又从英语课文中读到了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杂记》、爱迪逊的《文报捃华》和古德斯密的《威克斐牧师传》，那些富于情趣的描写，具有深刻寓意的叙述，清新明丽的风格，使叶圣陶爱不释手，赞赏不已。1909年，叶圣陶曾由学校推荐报考苏州存古学堂未果，遂与同学王伯祥、顾颉刚等组织国学研究会，创办油印刊物《学艺日刊》。至1911年，叶圣陶阅读和写作高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这时他最喜爱阅读的是于右任、宋教仁等主办的《民立报》上发表的胡寄尘和柳亚子主编的文艺副刊上的诗作，常和同学一起吟诵传抄南社诗人高天梅、王西绅及革命党人马君武的诗文，并开始向《民立报》投稿。同时，他和同学创办油印学刊《课余丽泽》，并开始在刊物上发表一些短评和诗文。

1911年冬，叶圣陶中学毕业，由于家境困难，无力支持他升学读书。翌年春，经袁希洛介绍，他到苏州干将坊的言子庙初等小学当教员，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五十多年的教育生涯。当时上海、苏州等地开始有社会党组织，叶圣陶与好友顾颉刚等同时加入中国社会党。不久社会党首领江亢虎被北京政府逮捕，翌年袁世凯通令查禁社会党，社会党很快解体。

1914年，叶圣陶的父亲失业，自己的小学教师的位置又被人挤掉，全家经济窘迫。叶圣陶开始写作文言小说，投寄上海《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海》等刊物。在半年中，所投的十多篇小说均被采用，这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开始。这些刊物强调趣味娱乐，迎合小市民口味。然而叶圣陶所发表的十多篇文言小说，却“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1)]，旨在写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的社会生活，其中《穷愁》、《贫女泪》等，告诉人们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

叶圣陶失业一年后，于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尚公小学任教。他一面教国文课，一面为商务编写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任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长吴宾若的邀请，叶圣陶与王伯祥

一起去该校任教。三人“情如手足，无分彼此”[(2)]，进行教育实验，在学校里创办农场、书店、商店，开设博览馆、音乐堂、篆刻室，建造戏台，组织编演话剧，进行文明宣传和爱国宣传。叶圣陶亲自指导学生编演、篆刻。1918年，新文化运动正在酝酿。叶圣陶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创作欲也开始冲动，渐渐把兴趣转移到白话小说的创作。他在1918年2月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青宴琐谭》，抨击了重男轻女的旧传统，提出了对妇女教育的重要性，肯定了妇女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表现了他进步的社会观和妇女观。1919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同年3月，叶圣陶经顾颉刚介绍，加入新潮社，并开始为《新潮》写小说和评论。为推动小学教学改革和社会改革，他在《新潮》上连续发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和《评妇女参政运动》等论文，被鲁迅称为是在新潮社中“有更远大的发展”[(3)]的作家。五四运动爆发后，叶圣陶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他在甪直创办了《直声》文艺周刊，宣传新思想。

1920年冬，叶圣陶和郑振铎、周作人、郭绍虞等十二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创作上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写实主义。从此以后，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成了叶圣陶的创作园地，他的创作一直遵奉着“为人生的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自1921年起，叶圣陶为求生计，四处奔波，工作多变。7月，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不久因学校当局不能实施教学改革方针，愤而辞职；11月，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与朱自清联床共灯。当时“一师”学生冯雪峰、柔石、魏金枝等成立“晨光文学社”，叶被该社请为顾问。1922年初，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往北大中文系讲授作文课，在北大任教仅一个多月，因妻子分娩南回。不久应复旦大学教授、神州女校教务长谢六逸之邀，往该两校讲授新文学和国文课。

1923年，叶圣陶重回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全家迁居上海。直至1930年的七年中，叶圣陶除编辑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文化

界、教育界的进步活动。1923年3月，他与郑振铎、王伯祥等十人在上海发起组织朴社，每人每月出资十元，集资出版著作。上海朴社解体后，又和顾颉刚、范文澜等筹建北京朴社，继续集资出书。是年冬，叶圣陶负责处理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在家门口挂“文学研究会”的牌子，主编《文学周报》。1925年春，叶圣陶热心支持匡互生、陶戴良等创办立达学园，并加入立达学会。五卅惨案发生后，叶圣陶不仅写文章声援反帝爱国斗争，而且参加了实际活动。6月1日，他与胡愈之、应修人等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同人集会，对上海报纸“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人类震动的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该说的话”[(4)]，表示愤慨，并决定创办《公理日报》，从社会舆论上支持五卅运动。叶圣陶参加了这份报纸的筹备和编辑工作。该报虽只出版发行二十二天（6月3日至6月24日），但在支持工人学生运动，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罪行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火雪明在《一年中的上海报潮》一文中所指出，“五卅”惨案后，“有许多爱国学者组织了几种报纸，其中要推《公理》的议论尤其中理而宏达”[(5)]。同月，叶圣陶又参加了由沈雁冰、杨贤江等发起的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进一步表明坚决和学生与各界共同反帝、合力救国的立场。同年12月，叶圣陶偕夫人到闸北青云路广场参加市民反帝大会，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济难会成立，其主要任务是营救革命者和救济被捕革命者的家属，叶圣陶受杨贤江委托，创办和主编济难会机关刊《光明》半月刊。在他主编《光明》期间，为营救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做出了很大的努力。8月6日，上海创造社被淞沪警察厅所封，并逮捕了柯仲平等四人，叶圣陶为此在《光明》上特辑了《涂炭日志》。1927年2月16日，叶圣陶和郑振铎、胡愈之等一起组织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并由叶圣陶起草《缘起》，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叶圣陶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并受临时革命政权委派，与王伯祥、计硕民往苏州接收学校。“四一二”政变后，叶圣陶由苏州返上海。5月，郑振铎赴欧游学，《小说月报》由叶圣陶代理主编。他在主编

《小说月报》期间，提倡作家“要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发表了不少反映大革命时代的作品。他自己率先写出了谴责“清党”大屠杀的短篇小说《夜》。在这期间，他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新进作家，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巴金、丁玲等，都受过叶圣陶的奖掖，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日记》，都是经叶圣陶之手得到发表的。

五四运动唤醒和觉悟了叶圣陶，使他坚定地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自“五四”之后的十年间，是叶圣陶创作史上的一个高潮，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童话、诗歌、剧本和评论，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大。先后出版了新诗集《雪朝》（八人合集，1922年），小说集《隔膜》（1922年）、《火灾》（1923年）、《线下》（1925年）、《城中》（1926年）、《未厌集》（1928年），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年），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集，1924年），童话集《稻草人》，剧本《恳亲会》（1925年）、《蜜蜂》（与何明斋合编，1926年）、《风浪》（与何明斋合编，1928年），评论集《作文论》（1924年）、《文章讲话》（与夏丏尊合著，1928年），此外还整理校点古籍和编写教科书多种。叶圣陶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五本短篇小说集，忠实地反映了我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和“四一二”政变这一风云变幻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展现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社会人物画卷。夏丏尊认为《倪焕之》的出版，“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以说是划一时代的东西”[(6)]。茅盾则称誉它是一部“扛鼎”之作[(7)]。因为它不只是“教育文艺”，而是写出了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内我国的社会现实，是对中国革命命运和他个人生活道路的一次成功的反思。他的童话《稻草人》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创作，鲁迅称之“是给中国的儿童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8)]。

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左联”领导人为了开展工作方便，请叶圣陶、陈望道等知名人士留在外面工作。叶圣陶没

有加入“左联”，但他和“左联”领导人鲁迅、冯雪峰、茅盾等保持密切的关系。同年夏，叶圣陶主编《妇女杂志》。年底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改任开明书店编辑。1931年1月，叶圣陶与鲁迅、杨杏佛等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2月起，主编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九一八”事变后，叶圣陶与夏丏尊、周建人等二十余人参加发起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并被推选筹备出版该盟机关刊《文化通讯》。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他和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列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揭露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2月，与鲁迅、茅盾等一百二十九名爱国人士列名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年底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复交，叶圣陶与鲁迅、柳亚子等五十五人列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1934年夏，上海文化界兴起一股“读经运动”和“复兴文言”的逆流，叶圣陶和陈望道、陈子展等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喱饭店集会，针对这股逆流，提出提倡大众语的口号，展开大众语的讨论。同时他和朱自清、巴金等列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提出推行简化汉字的主张。“左联”解散后，1936年叶圣陶参加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

自“左联”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的八年中，叶圣陶逐渐由文学创作转向写作指导。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明显减少，仅出版了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散文、小说集《脚步集》（1931年），散文集《未厌居习作》，小说童话集《四三集》（1936年）；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学生的写作指导方面的著作：他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1934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30年代起一直流传不衰，在国内外至少有三十种以上的翻印本；另外如《文章例话》（1937年），以及与人合编的《文章讲话》（1938年）、《阅读与写作》（1938年）、《开明文学辞典》（1932年）、《开明国语课本》（1934年）、《国文百八课》（1935年）、《初中国文教本》（1937年）等，在当时中学国文和写作教学中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8月16日，开明书店的编辑、印刷、出

版、发行部门，均毁于日寇炮火，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新少年》相继停刊。叶与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范洗人等到汉口准备筹建开明书店编辑部，后因由上海运往汉口的印刷机器和书籍纸张在镇江附近遭劫，又加之汉口形势吃紧，遂放弃在汉口筹建计划。1938年初，叶赴重庆，先后在重庆巴蜀学校、中央国立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抗战文艺》和《国讯》旬刊编委。同年11月，应邀到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全家迁居乐山。1939年5月，《中学生》杂志改名《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复刊，叶圣陶任社长兼主编。1940年6月，叶去成都任四川教育厅教学科学馆专门委员，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并担任《文史教学》、《国文杂志》和《笔阵》编委、主编等职务。1942年，开明书店在成都设立编译所办事处，叶辞去教学科学馆职务，回开明办事处主持工作。1943年，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以后一直主持《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后改名《中学生战时月刊》、《中学生》）的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叶返上海，任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部长，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叶圣陶应中共邀请，于1949年1月秘密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山东解放区，3月抵北平，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并参加筹备第一次文代会，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和作协委员。同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里，叶圣陶在完成繁忙的编辑、教学和社会工作外，仍不间断写作，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西川集》（1945年），并与人合写了《精读指导举隅》（1942年）、《略读指导举隅》（1943年）、《文艺写作经验谈》（1943年）等指导阅读和写作的著作，此外还编选了国文读本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圣陶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当选为第

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一至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等重要职务。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在北京病逝。

叶圣陶的著作建国后曾多次再版重印，主要有《叶圣陶选集》（1951年）、《叶圣陶短篇小说集》（1954年）、《叶圣陶童话选》（1956年）、《叶圣陶文集》（三卷本，1958年）、《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1980年）、《叶圣陶集》（多卷本，江苏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等。还出版有新作散文集《小说十篇》（1958年）和诗歌集《篋存集》（1960年）等。

主要参考资料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2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1994年版。

陈辽：《叶圣陶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叶至善编：《叶圣陶》，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至1982年第1期。

---

(1) 叶圣陶1914年11月13日致顾颉刚信。

(2) 叶圣陶：《心是分别不开的》，《未厌居习作》，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6版。

(3)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公理日报·停刊宣言》，《公理日报》1925年6月24日。

(5) 《时事新报》1925年10月10日。

(6) 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 茅盾：《读〈倪焕之〉》，《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8) 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全集》（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奕劻

汪仁泽

奕劻，姓爱新觉罗，满族。1836年7月（清道光十六年六月）出生于清皇族家庭。祖父永璘是乾隆帝的第十七子，封庆禧亲王。父亲绵性是永璘的第六子。永璘死后，郡王爵位传至长孙（绵志之子）奕䌷，因其在服丧期间纳妾获罪被革。绵性谋求袭爵，行贿钻营，案发被发往盛京（今沈阳）安置。奕劻因是绵性“罪宗”之子，袭爵无望，因此早年出继别房，后又转继绵志之后，奕䌷死后，始得承嗣，受袭辅国将军。1852年封贝子，1860年晋封贝勒[1]。

奕劻少年时工书翰、习绘画。未承袭前依靠微薄的宗人府津贴，生活贫困。奕劻家住北京方家园，毗邻西太后的母家，常为西太后之弟照祥代书家信，问候其姊起居，因此西太后渐知他颇通文墨。后来又与西太后的另一胞弟桂祥结识，并结为儿女亲家，成为他日后得到西太后“帘眷”的缘由。另方面，他还攀附恭亲王奕□，得到奕□的提携和援引，开始崭露头角，爵位和官职也逐渐显赫。1872年加封郡王衔，授御前大臣。1884年奕□罢官后，所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职，由奕劻接替，不久封为庆郡王。1894年晋封为亲王。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慈禧太后暗中饬人连日向各国公使馆送酒菜瓜果，又派奕劻亲往慰问。8月北京失陷，慈禧太后等逃往西安，命留京的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急于向帝国主义求和。1901年9月，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法、日、美等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回京之日，奕劻带领一班奴才，跪地叩头贺喜。慈禧太后进封他为庆亲王，并加世袭，其地位超过近支亲王之上。奕劻能循序直上，是和他既善于卖官鬻爵、行贪污之道，又精于以贪污所得结欢孝敬、求固宠分不

开的。有一次酒后，他对鹿传霖谈论陕西省各州、县牧令官缺的肥瘠，如数家珍，了若指掌。他有一本记载各地官缺优劣的簿册，遇有外官来京，总要详询核对。每次送客，常说："你暂且等待，可能会有美差肥缺。"这分明是索贿的隐语。他内室的案桌上常放满箱笼、封袋等物，里面尽是银票、金条之类，每隔十日结算一次，某人进贿多少，已放何缺，用砂笔登记入册，然后将金银赃物移入私库。奕劻迎合慈禧太后晚年好作方城戏，遣其女儿两人入宫侍候，每日必携银两数千，佯作输负，空手而归。对于内监宫婢也各有犒赏，仅此一项每月报效数万两尚不足。

1901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事，并兼管陆军部。1903年3月，奕劻晋升领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12月奉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授练兵处会办的袁世凯已先得消息，即派亲信杨士琦送去十万两银票一张。奕劻假意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答："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另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果然，此后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庆王府遇有喜庆婚丧诸事都有袁世凯预先布置，一手包办，不用奕劻操心。奕劻也从此为袁所收买，"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2)]，凡遇简放外省督、抚、藩、臬等官职，必先征袁意见，表面上请他提供咨议，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3)]。不久袁又与奕劻的儿子载振结为金兰之好。

1904年2月，御史蒋式瑆上疏弹劾奕劻贪污，谓其近日将六十万两白银赃款存入某外国银行。清廷派大臣往查，为外国银行所拒绝，以查无实据上报，蒋因此而落职。此事离奕劻领军机处仅十一个月，贪污不可能得如此巨款，显然其中大部分是出于袁所报效。袁接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遗下余款八百多万两，其后加上袁铁路收入利润和

奏准由各省合筹的练兵经费，总数达二三千万两。袁世凯将这笔财力，大半用在编练北洋新军，扩展势力；小部分用来报效如奕劻辈的权贵。自从奕劻主中枢后，由袁授意汲引，经奕劻荐举，而得到慈禧太后擢升的有：军机大臣徐世昌，丞参梁士诒、杨士琦、梁如浩，尚书梁敦彦，侍郎唐绍仪、严修、赵秉钧，巡抚杨士骧、朱家宝、冯如骥、吴重熹等人。还有已发为黑龙江巡抚，不久被参降调的段芝贵。

段芝贵的被参，涉及奕劻及其子载振。御史赵启霖在参疏中称："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4) 清廷派载沣、孙家鼐查办，奕劻早做准备，将杨翠喜退回天津，由盐商领去，串通供词，谎称案发前已作使女。载沣等也不敢深究，据之奏复，以为并无此事，反以"污蔑亲贵重臣名节"罪名，褫革赵的官职。但段的名声已坏，清廷不得不撤销任命，奕劻也深感不安，命载振自请开革各职获准 (5) 。此案将结，另一御史江春霖上疏列举载沣、孙家鼐奏复中的疑点，并称："买献歌妓之说起于天津报纸……报馆近在咫尺，历时既久，见闻必确，何至误登？"使案情破绽毕露。疏入，慈禧太后下旨复赵原职，奕劻事前未得预闻，深感惶恐，密商于袁世凯，认为追本穷源必须除去在西太后面前反对他们的军机大臣瞿鸿禨 (6) 。但瞿在慈禧太后面前颇受信重，一时难以摇撼，正感无计可施之际，发生了1907年的"丁未政潮"。由于奕劻利权独擅，贪污公行，政以贿成，官以贿进，致使朝贵嫉妒，路人侧目，舆论已至非罢其官不可的地步。一天，慈禧太后单独召见瞿鸿禨，对其透露欲罢奕劻之意。瞿辞出后告其门生、京报主编汪康年，汪又转告友人高某，高竟作为要闻急电其供职的伦敦泰晤士报馆。美国驻京公使得伦敦电讯，嘱其妻往见慈禧太后 (7) ，以探虚实。慈禧太后骤闻此事，即加否认，并追问消息来源。慈禧太后默念此事只对瞿一人讲过，必是瞿泄密无疑，十分恼火，自语："瞿鸿禨混账！"此时适值奕劻的女儿随侍在侧，闻言即向其父密告。奕

劻与袁世凯商议对策，认为机不可失，由杨士琦起草，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上疏纠劾，罗织瞿的罪名有“交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数条。疏入，慈禧太后着孙家鼐、铁良查复后降诏：“瞿鸿禨姑免深究，着即开缺回籍。”奕劻虽感快意，但仍惴惴不安，故意自请退出军机处，以作试探。慈禧太后因曾辟谣在前，不便即罢其官，降谕慰留，但另任载沣入军机处以分其权势[8]。

慈禧太后病亡，载沣以摄政王监国，奕劻反能以元老重臣的身份，在权贵们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中保持其原有地位。1911年4月，清政府撤销军机处，奕劻改任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后，他力主起用袁世凯。11月，袁世凯进京组成责任内阁，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奕劻改授弼德院总裁的空衔。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宣布溥仪退位，而奕劻则被皇族视为是出卖祖宗的罪人，无不戟指痛詈，奕劻带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携眷避居天津，1917年1月29日病死于天津。

---

(1)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第3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97页。

(2)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44页。

(3)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据崇文书局1918年版影印本。

(4)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5)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1997年影印本。

(6) 当时在职的军机大臣是奕劻、荣庆、铁良、徐世昌和鹿传霖、瞿鸿禨六人。其中前四人都属奕劻、袁世凯一党；鹿传霖年迈无能。唯有瞿鸿禨一介书生，平时常受奕劻等人排挤，而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深表厌恶不满，隐然成为朝中反对奕劻、袁世凯势力的领袖。且与御史赵启霖谊属同乡，劻、袁以为赵的参劾与瞿不无关系。

(7)　自从签订《辛丑条约》以后，西太后认为献媚各国公使的女眷，是媚外要诀之一，因此凡各国公使夫人请见，随时都能得到接见及殷勤款待。

(8)　徐一士：《一士类稿》，收入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易培基

马复华

易培基，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生于1880年2月28日（清光绪六年正月十九日）。其父为晚清武官，曾在湘西因事牵连入狱，年仅十六岁的易培基上书为父申冤，以文词婉曲感动办案上司，使其父得到赦免，易因此而享文名。

其时清廷窳败，丧权辱国，易培基愤于外侮日亟，欲从事外交报效国家，遂离家赴武昌，考入湖北方言学堂，与赵恒惕同学。毕业后，易培基又去日本进修，返国后回到长沙，于1913年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国文教员，讲授文字学等课程。他在文字学的研究上接近章太炎，在经学上则赞成康有为。一年后，改任长沙师范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他授课生动，喜标新立异，很能迎合青年学生的心理。当时毛泽东、田汉等人都在第一师范读书，曾受教于易。

1918年，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残酷镇压人民，摧残教育，易培基和一些教师参加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翌年，易被推为绅商界总代表，前往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处洽商事务，自此结识了谭延闿，并深得谭的赏识。1920年6月，“驱张”运动胜利后，为使被张敬尧摧残的各级学校迅速恢复，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接受教育界人士杨树达等人的建议，决定成立教育委员会，易培基被任命为委员兼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上任伊始，即将学校人员彻底改组，先后聘匡互生、周谷城、彭静宜等人担任教务主任，教员有杨怀中、徐特立、夏丏尊、刘大白等，师资阵容十分强大。毛泽东也曾于同年7月受聘在第一师范担任过一段国文教员。为使学生获取新知识，易还敦请中外名人如杜威、罗素、章太炎、蔡元培等到校做学术讲演。又首开女禁，丁玲（蒋冰之）等女生闻讯转学来到第一师范就读。学生组织

如“崇新学社”等也相继成立。当时，第一师范人才鼎盛，新潮澎湃，成为三湘新文化的先锋。

1921年，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奉孙中山命令组织北伐，讨伐赵恒惕部，任命易培基为总司令部秘书长，易遂离开第一师范。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谭延闿回师靖难，易培基随行至广州。是时他曾写下一首题为《赴粤途中》的言志诗：“万仞当关险，穷庐百雉城；秋风一何劲，瘦马欲纵横。”[(1)] 至广州后，孙中山任命易为大元帅府顾问，不久又派为驻浙江全权代表。易培基居杭州西湖俞（樾）楼，与胡汉民、汪精卫等经常往来，时有诗作唱和。易生平唯一著作《三国志补注》，也是在俞楼完成的。

1924年初，易培基奉孙中山命赴北京，作为全权代表与苏联代表加拉罕谈判庚子赔款问题，并暗中主持学生运动。在北京，易结识了国民党人李煜瀛（石曾），往来甚密，并与李结为儿女亲家。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废颜惠庆内阁，逐清废帝溥仪出故宫。11月7日，易培基在李煜瀛推荐下，署理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任委员长，易为委员。12月23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黄郛摄政内阁总辞职，任教育总长仅两周的易培基也跟着辞职。于是，他便专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从事接收故宫、查点文物的工作。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他被推为理事之一。

1925年3月，易培基与冯自由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活动。同年8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仰承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旨意，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了学生的反抗，章士钊竟下令解散女师大。易培基与李煜瀛等人对学生运动大力支持。迨至11月，章士钊等因时局关系向段祺瑞提出辞职，段于12月对政府进行改组，以易培基为教育总长。此前，段祺瑞决定继续开办女子师范大学，并任命易为校长。1926年1月，女师大举行大会欢迎易到校就职，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学生自治会致词欢迎。

1926年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关内，与冯玉祥国民军展开激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3月18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会后到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命令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死伤二百余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翌日，段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闯袭国务院”[(2)] 的罪名通缉易培基及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孟馀等人。易遂逃匿于东交民巷使馆区，不久返回湖南长沙。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易培基由长沙转往上海。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采纳张人杰、李煜瀛等人的建议，决定在上海创办劳动大学，任命易培基为校长。易曾邀鲁迅到该校讲演并授课，与鲁迅有不少接触和书信往来。嗣后，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易为大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

1928年1月，易培基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后又被加推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北伐军战胜奉系，占领北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北京为北平，同时通过北平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任命李煜瀛、易培基等二十七人为理事，并派易培基前往北平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卧病上海，不能前往，电告故宫博物院古物、图书两馆副馆长马衡（叔平）、沈兼士及秘书吴瀛（景洲）等代行接收，并接收清史馆和颐和园。不料，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易培基多方据理力争，故宫博物院得以保留。随即在南京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全体会议，推举李煜瀛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

同年10月，易培基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仍兼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及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易任农矿部长期间，除调整内部组织外，还制定了训政时期农矿部施政纲领。他计划整顿直辖各矿局公司，筹建国营矿业，筹办矿品展览会，召开全国矿业会议等，但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上述计划均未能实现。1930年11月，农矿、工商两部合并为实业部，由孔祥熙任部长，易培基的农矿部长

职务亦被相应免去，易遂北上专理故宫博物院事务。

易培基到北平后，决心以故宫博物院的管理为终身事业，自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由张继（溥泉）任文献馆馆长，江瀚（叔海）任图书馆馆长，以其女婿李宗侗（玄伯）为秘书长，使院务逐步走向正轨。他每天到院办公，对有关重要事项，都要亲自过问，全院工作渐臻改进，一度呈现蓬勃向上的气象。当时，故宫除按日分三路开放外，还增加陈列古代名画、玉器、钟表、仪仗等，以供游人购票参观。易又将太庙及景山辟作公园，供人游览。他还主持对故宫殿堂进行了必要的整修，着手古物的鉴别、审查、整理工作，领导编辑出版《故宫周刊》、《故宫书画集》、《文献丛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等刊物、书籍，以及各种拓片、印谱，使不少珍贵的史料、书画、文物得以流传于世。为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经理事会通过，并报行政院核准，1931年将故宫所藏金砂、银锭、绸缎、皮货、药材、茶叶等非文化用品公开降价销售，收入达七十余万元，对博物院的维持和发展不无补益。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仅侵占了我国东北大片土地，还觊觎华北地区，危及平津。面对险恶的形势，易培基于1932年春拟订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计划，经理事会通过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施行。他不顾某些人的反对，毅然于1933年2月6日将第一批文物启运南下，至5月15日止，全部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文物珍品分五批安全运往南京、上海。易为保存故宫文物尽心尽力，功不可没。

同年5月1日，正值最后一批文物准备装箱南运的时候，突有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到故宫调查处理物品问题，并于10月3日由最高法院检察署长郑烈向司法行政部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李宗侗凭借特殊权力有低价购买故宫皮货、绸缎的违法犯罪行为。据说这是由于当时任司法院副院长兼故宫文献馆馆长的张继没有当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怀疑是易培基从中作梗；加上张妻崔振华得悉故宫博物院将公开处理部分物品后，曾要求先行选购，被李宗侗阻止，因此崔串通

张继的门生郑烈，对易、李进行诬告。1933年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地曾刊出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提出五千余字的反诉呈文，要求行政院、司法部依法罢去郑烈的职务，但如石沉大海，而诬陷之词有增无减。他逐渐意识到此案含有浓厚的政治派系和个人恩怨色彩，不是单纯司法问题，所以不愿出庭自辩，且于同年10月15日提出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随即避匿天津日租界。旋因华北局势日紧，而潜往上海匿居，一些报刊则谓其已畏罪潜逃国外。

此后，郑烈多次派检察官到故宫和南迁古物存放地侦查，并通令缉拿易培基，还增加易在农矿部任内“吞没公款”部分，将该案由北平地检厅移归江宁地方法院办理。1934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更指称易培基、李宗侗在故宫博物院任内，盗取珍珠一千三百十九粒、宝石五百二十六颗，以假珠换真珠九千六百〇六粒，以假宝石换真宝石三千二百五十一颗。于是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盗宝案”震动全国。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外交部协助司法部严令逮捕易培基、李宗侗，南京和地方法院据此扩大了侦查范围。隔了两年多的1937年9月，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再次提起公诉，指称易培基、李宗侗及原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三人陆续侵占所保管之故宫文物，计有书画五百九十四号、古铜器二百十八号、铜佛一百零一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十二号、图章三号；珠宝除前案业已起诉者，尚有二号。并谓：“其侵占方法多以假易真，任意调换，间亦有将全号物品或其中一部分径行吞没，致无从查考者。对于书画，则掉换之外，尚有割裂、挖补、改裱重装等情事。”(3) 易的有些同事、朋友对这些指控愤愤不平，劝易再行反诉，易愤懑地对他们说：“我因不愿巴结权贵而被挤下政治舞台，张继却握有法曹权力与我为难。张、郑不倒，我的冤情无反诉胜利之可能。”(4)

易培基长期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故宫案嫌久久不能解脱，更使病情加重，因忧伤至甚，终于在1937年9月27日含恨死去 (5) 。死前

留有遗呈一柬，呈送国民政府，内称："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6]

易培基死后，一些友人曾为其申冤。蒋介石也说："易是读书人，亦是老同志，不至如此，应查明白。"[7]但长时间未予结案。直至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突然登载一则消息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8]这桩悬案遂告不了了之。但吴瀛（景洲）一直不服，于1983年写成《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叙述前后经过甚详。惟此案甚为复杂，当时未能查清结案，事后更是众说不一，直到解放以后，经过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的真相才终于大白。

---

(1) 傅清石：《易培基的生平及晚年遭遇》（上），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第69页。

(2) 《政府公报》第3570号，1926年3月20日。

(3)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1937年诉字第395号。

(4) 周益：《故宫盗宝冤案始末》，《文史通讯》1983年第2期，第33页。

(5) 《申报》1937年9月27日（四版）。

(6) 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218页。

(7) 傅清石：《易培基的生平及晚年遭遇》（上），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第69页。

(8) 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200、218页。

殷夫

丁景唐

殷夫，原名徐柏庭[1]，学名徐祖华[2]，别名徐白，笔名任夫、殷夫、殷孚、白莽、莎洛、莎菲、Ivan等。1910年6月11日（清宣统二年五月初五）[3]出生于浙江象山东乡大徐村[4]。父亲是个医生。殷夫幼年在乡间读私塾，1921年初进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书[5]。次年父亲病故，由慈母抚育。殷夫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

1924年初，殷夫从杭州赴外地求学[6]。1925年8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7]。他十四五岁时开始写诗，现在留存的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就是1924—1925年写的。这组小诗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

1926年7月，殷夫越级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这时开始同革命运动发生了关系[8]，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囚禁三月，几被枪决。后由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的大哥徐培根保释出狱。这次入狱对他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教育。他在狱中所作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9]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员的告密，敌人的搜查，押送去牢狱途中的经过，以及诗人的思潮起伏，表现出少年殷夫立场坚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高尚的品质。殷夫出狱后，徐培根把他软禁在身边。但殷夫仍坚持学习社会科学，阅读革命文艺书刊，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后殷夫回象山家乡。现有《人间》和《呵，我爱的》两首诗即作于此时。

1927年9月，殷夫想考大学，因曾被捕入狱，没有中学文凭，得女友盛淑真（后改名孰真）的帮助，通过她的同学向浙江上虞人徐文

雄借到一张中学文凭，殷夫就顶用了徐文雄的姓名，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10]。有一段时间，殷夫和革命组织失去了联系，尔后才重新接上关系，继续投入革命工作。殷夫在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读书时，刻苦学习，半年以后，即能从事德文翻译。1928年2月，殷夫用徐文雄署名写信给创造社的刊物《文化批判》，对该刊一月号上彭康《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的译文，提出商榷的意见[11]。

殷夫还经常留心阅读《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刊物。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后不几天，他就投寄一束诗稿给该刊编辑部。这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第四期上的长诗《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得到了著名左翼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蒋光慈和著名文艺评论家钱杏邨（阿英）的赏识。随即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

1928年秋季，殷夫再次被捕，不久，由他的大嫂托人保释出狱。殷夫出狱后回到象山县城家中。1929年初，殷夫潜离家乡，来到上海，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流浪生活，同党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从此离开了学校，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成为一个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写下《血字》组诗和《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一类被誉为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战歌。

1929年上半年，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投寄抒情诗篇，开始同鲁迅发生联系，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培养和帮助。从1929年6月到1931年1月，有关殷夫的记载见于鲁迅日记的，有十八次之多。1929年6月16日的《鲁迅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白莽的名字："下午复白莽信。"鲁迅这次复信是因为殷夫从德文译出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彼得斐（今译裴多菲）传》，投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鲁迅发信索取德文原文，以备核校，由于原文是载在《彼得斐诗集》里面的，因邮寄不便，殷夫就亲自送到鲁迅那里。这就是鲁迅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的第一次记殷夫来访的事。

鲁迅收到殷夫翻译的《彼得斐传》后，又写信建议他配合传记，再译十来篇彼得斐的诗，一同发表。他特地托柔石转给白莽一信并《彼得斐集》两本。不久，殷夫译了几首诗，亲自送交鲁迅；鲁迅为了校阅译文，将殷夫送来的那本德文《彼得斐诗集》留下，而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买来留在身边的两本德文版《彼得斐诗集》相赠，托柔石亲自送去。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抒情诗四首，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译文《彼得斐·山陀尔行状》一篇和彼得斐·山陀尔译诗九首。

同年7月间，殷夫在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12)]，遭到了毒打，在囚禁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和《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殷夫第三次被捕事，曾有记叙。殷夫当时因为衣物都被没收，没有长衫，而又要穿长衫，便从朋友那里借来棉袍，在大热天穿着它，汗流满面地去看访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并给以资助。

这次出狱后，殷夫很快恢复了工作，专门从事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同年冬，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从1929年末到1930年秋冬之间，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工作。直到1931年春他被捕牺牲前，他在党刊《红旗》、团刊《列宁青年》、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上写了不少政治论文，还自学俄文翻译政论文章。著译涉及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青年工人运动、少年先锋队工作、文化工作，以及党内的路线斗争等等方面[(13)]。这一时期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二十八篇作品，其中政治论文等二十一篇，文艺作品七篇。在《摩登青年》上发表政治论文两篇、诗两首。在党刊《红旗》上用徐白署名发表《拥护苏维埃运动中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和《扩大共产主义的儿童运动》两文。此外，在1930年10

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十八期上还写过《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的政治论文。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为“左联”的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和李一氓编的《巴尔底山》等写了不少红色鼓动诗和一些散文、随笔，成为“左联”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殷夫由于处在斗争第一线，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连。这一时期的诗，集中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中国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基地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党的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伟大气概。炽热的战斗情绪，高昂的旋律，构成了殷夫红色鼓动诗的特色。这些诗，正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评论的，它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还写过一些散文、速写、传记、剧本等。这些作品的成就不如他的红色鼓动诗篇，但也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变化。发表在1930年5月《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14)]，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向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哥哥，公开宣告决裂的宣言书，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1931年1月17—21日，林育南、李求实（即李伟森）、何孟雄等二十几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叛徒出卖，分别在东方旅社等处被捕，其中包括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四位“左联”青年作家在内。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2月7日深夜，殷夫同这些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

当局秘密杀害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年仅二十一岁。

二十几位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立即向全世界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界，用中、英、日等几种文字发布了对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书。“左联”专门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烈士和早一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宗晖烈士的肖像、传略和有关的作品等。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阿英写了《殷夫小传》。两年以后，鲁迅又为纪念殷夫、柔石等“左联”烈士的牺牲，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越三年，鲁迅又特为殷夫的诗集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和《续记》。

殷夫的政治论文和其他作品散见于《列宁青年》、《红旗》等秘密刊物和《太阳月刊》、《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和《摩登青年》等公开刊物，生前都未能结集出版。据阿英《殷夫小传》所列，殷夫著译计有：（一）《孩儿塔》（诗集），1930年初殷夫自编；（二）《伏尔加的黑浪》（诗集），1929年；（三）《一百零七个》（诗集），1930年；（四）《诗集》（包括译诗），1928—1930年；（五）《小母亲》（小说、随笔、戏曲集），1928—1930年；（六）《苏联的农民》（翻译），1928年；（七）《苏联的少年先锋队》（翻译），1930年；（八）《列宁论恋爱》（翻译），1930年。其中除《孩儿塔》原稿幸由鲁迅保存下来外，其他七种迄今未有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有《殷夫选集》（1951年7月，开明书店）、《殷夫诗文选集》（195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殷夫选集》（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孩儿塔》（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仅收原集六十五首诗中的二十七首）。

---

(1) 瞿光熙：《殷夫的出身和家庭》，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版，第252页。

(2) 《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同学录》（1921年3月），转引自丁景唐《〈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补正》，《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

(3) 殷夫生年，历来以阿英《殷夫小传》为依据，作1909年。但据殷夫的大姐徐祝三和挚友盛孰真证实：殷夫生肖属狗，生于庚戌年（清宣统二年）端午节，即1910年6月11日。

(4) 《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同学录》（1921年3月），转引自丁景唐《〈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补正》，《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

(5) 《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同学录》（1921年3月），转引自丁景唐《〈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补正》，《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

(6) 承殷夫亲友提供1924年初（甲子正月）徐培根在一张同殷夫于杭州合影照上题字“云妹惠存，时在甲子正月白弟将赴上海摄于杭州”，但未查到有关资料，或谓系赴宁波读书，今也未能确定。

(7) 据康锋查出：1925年8月28日上海《申报》、《新闻报》载：《上海民立中学校续取新生案》有殷夫借用徐培根的名字。1926年7月6日上海《申报》载《浦东中学第一次录取新生》高三级有徐白之名。1927年9月18日上海《申报》同济大学附设德文补习科有徐文雄之名。

(8) 阿英：《殷夫小传》（最初刊于1931年4月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收入《殷夫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及《殷夫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是有关殷夫生平的最早传略。由于当时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不能明说殷夫是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是CP（共产党），只是含蓄地用了“开始和革命运动发生了关系”的措词。至今尚未见到确凿资料以肯定殷夫当时是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

(9) 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发表于1928年《太阳月刊》4月号，为建国后出版的四种殷夫选集所未收。

(10) 《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28年9月）第296页上写着：“姓名徐文雄，号之白，年龄十九，籍贯浙江上虞，预科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

(11) 徐文雄：《被奥伏赫变的话》，《文化批判》1928年第3期。

(12) 丁景唐、陈长歌：《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5月第1期，第127页注⑥。

(13) 参见丁景唐、陈长歌：《殷夫烈士和〈列宁青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殷夫烈士和〈摩登青年〉》，《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

(14)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与组诗《血字》七首，同刊于1930年5月《拓荒者》第4、5期合刊（另名《海燕》），署名Ivan。后由阿英用张若英笔名，把它编入《现代文学读本》第一册，现代书局1930年出版，署名改为伊凡，文中“D大学”也被改为“大学”。建国后出版的四种殷夫选集，都未收入这篇重要作品。

殷汝耕

陈晓清

殷汝耕，号亦农，浙江平阳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殷家先世多显宦，为温州望族。殷汝耕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青少年时在家乡接受小学教育。1902年负笈东渡，入日本文学院学习日语，1905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考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工科。当时留日学生界愤于清廷专制，主张武装革命，殷也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其间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殷汝耕随黄兴回国，随同黄兴守汉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上海参与改组国民党事宜。不久赴北京为国民党办理对日外交。1913年宋教仁被刺，讨袁军兴，殷随居正、白逾桓等守卫吴淞炮台；又与柏文蔚、何海鸣等守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殷汝耕再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1916年回国。此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参众两院，殷得汤化龙之青睐任众议院秘书。1917年，他受中国银行委托，赴日调查金融，不久被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驻日委员。1919年，唐绍仪代表西南方面赴日接洽外交，殷为其随员，为唐出谋划策。1920年殷回国，一度脱离政治活动，从事实业，在江苏阜宁县创办新农垦殖公司，张謇为其擘划。1924年春，他复渡日考察，同年冬应唐继尧之聘，赴桂任财政顾问，嗣即因与唐继尧意见不合而离去。1925年10月，段祺瑞执政府召开关税会议，殷赴北京任会议顾问。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殷汝耕受日本人的指使，与林长民一起参加郭松龄倒张之役，任外交处长，为郭运筹帷幄。12月底，郭兵败被捕杀，殷汝耕亦被张作霖追捕，逃入新民屯日

本领事馆。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江西南昌，殷汝耕在日本方面秘密保护下潜抵上海，参与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活动。此时，蒋介石正物色对日外交人才，乃任命殷汝耕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通讯处处长，在九江、汉口、南昌、庐山一带活动；不久，殷汝耕又担任总司令部参议，凡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与交涉，都由殷担任翻译。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郛为上海市长，殷汝耕任秘书。不久，蒋介石下野，殷先东渡为蒋赴日疏通。蒋重新上台后，对殷颇为倚重。1928年黄郛任外交部长后，殷被派任驻日特派员。5月，“济南惨案”发生，中日外交一时陷入绝境，双方均希望打破僵局。对于该案，日本政界大多不赞成田中内阁之政策，在野各党拟乘此机会推翻田中内阁，变更对华政策。这年冬天，日本政党要人床次竹二郎来华游历，在南京遍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诸要人，以谋获得中国政府充分谅解，以便回国后夺取政权，与中国解决“济南惨案”。此事带有很大机密性，尤其对田中内阁更须保密。而床次在南京与蒋介石及诸要员的访谈均由殷汝耕担任翻译，殷竟于事后将床次与中国政界要人的谈话内容，全数密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致使床次永远失去了组阁的资格。后来床次托梅屋在吉转告马伯援，马又转告了中国政府，殷汝耕的间谍身份暴露，蒋介石立即取消了他的翻译资格。

不久，殷汝耕离开外交部，应王伯群之邀，出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1929年，参与修订中国航空公司契约条文。1931年9月因与王伯群意见相左而辞职，改任上海市政府参事。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殷汝耕得到吴铁城的赏识，以随员资格参与中日谈判及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并担任淞沪战区接管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与日军商洽淞沪战区接收事宜。

殷汝耕因娴熟日语，加之与黄郛是浙江同乡，因此，颇得黄的赏识。1933年5月，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黄郛出任委员长。黄从南京启程前，嘱咐殷汝耕早做北上的准备。他当时因事未及北上，至《塘沽协定》签订后才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工作。

1933年11月，经黄郛推荐，殷汝耕任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1935年8月改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此时，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以各种手段四处活动，威胁利诱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及殷汝耕等人，欲借“自治”为名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殷汝耕与土肥原频繁接触。11月4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土肥原于11月12日至北平阻止华北现银南运。日军嫌宋哲元迟迟不宣布“独立”，决定在停战区先制造自治政府，乃加紧策动殷汝耕叛反。

11月23日，殷汝耕率领冀东保安总队长张庆余等五人，谒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意欲胁迫宋哲元宣布冀东“自治”，宋拒绝接见。当夜在土肥原的操纵下，殷汝耕召集冀东各保安队长宣布“自治”，于25日合并蓟密、滦榆二区二十二个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称脱离中央。国民政府旋即对殷汝耕发出逮捕令。

12月，殷汝耕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实业五厅及秘书、外交、保安三处。殷下令改悬五色旗，取消各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停止总理纪念周；自行订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印花税条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印花税检查规则》；开办冀东银行，滥发五百多万伪钞以充经费，扰乱金融；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掠取民财；推行奴化教育，强令学校学生学习日文，灌输亲日思想；与日本人合办长城煤矿，协助日人收买柳江煤矿，出卖资源；改编原驻冀东保安队，成立五个总队，指令保安队与日军“合作”，由日军指挥其作战；建筑飞机场，供日军飞机起降，安置电话、电台，便利日本军事需要；纵容日本、朝鲜浪人走私，偷运白银；用威胁手段胁迫长芦盐务管理局每月津贴冀东伪政权二十多万元。冀东二十二个县，沿长城

与伪满洲国接壤千余里，且冀东为河北全省精华，又为平津肘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以冀东丰富物资拱手资敌，且为日军侵略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入关，通县日本驻军增至一个联队约两千人。7月26日，日军勒令驻通州城新南门外宝通寺的第二十九军阮玄武营官兵缴械，该营士兵趁日军前往收械时猛烈反击。天津日军派轰炸机助战，轰炸冀东保安队干部训练所。各保安队官兵不甘觍颜事敌，在保安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率领下群起与日军作战，进攻位于通县西的日军兵营，打死日军、日侨数百，并软禁殷汝耕，是为“通州事变”。7月30日晨，当张庆余率起义的保安队及押解殷汝耕的汽车开抵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遭遇日军拦阻。保安队士兵被冲散，殷汝耕趁乱逃脱，只身潜入北平城中。

殷汝耕逃到北平后，不久即被日军搜捕，拘禁于北平煤渣胡同宪兵队，并将其家属拘禁于天津宪兵队。日军误以殷为“通州事变”的主谋，拟将其枪毙。经其好友、日本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出面说项，得以保全性命。12月，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后，日军将殷释放，并让其承诺三项条件：（一）不许宣布“通州事变”真相；（二）不许作政治活动；（三）不许离开平、津。

殷汝耕被释放后，在北平蛰居五年之久。殷预见日军必将向华南推进，军需将增加，运输将更加困难，必然会利用贯通南北的运河来补充南北运输的不足。于是他浏览运河图籍，研究水利工程，指望以治理运河再受日人重用，渴望于南北两个伪组织之外独树一帜。

1942年2月，殷汝耕应王荫泰之约，经日本人出面斡旋担保，出任伪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原为保晋、寿阳等公司，日军占领山西后，将这几个公司合并，名为中日合办，实权则操于日本人手中，殷汝耕事事听命于日本人。

1943年2月，殷汝耕潜往南京，充任汪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于6月和12月两次参加伪经济委员会会议。会后，殷汝耕赴东京游说日本朝野恢复运河运输，获得赞同。1944年1月，汪伪政府发表殷为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殷费时三月，编就《治理运河刍议》及《治理运河计划纲要》，并绘图多幅，提出治理运河的具体方案。他原指望设立督办运河公署，因陈公博不同意，只设立了治理运河工程局。殷任局长，权限不大，因之不满，遂于6月6日提出辞职，回到北平。所任伪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及伪经济委员会委员等伪职，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12月5日，殷汝耕以汉奸罪被捕。1946年5月26日，与王荫泰等华北汉奸十三人由北平解往南京。殷在狱中写下《十年来日本侵华回顾录》，为自己的汉奸罪行进行辩护。

1946年10月，首都高等法院经过几次开庭公审后，判决殷汝耕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殷汝耕不服判决，一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于1947年11月8日核准首都高等法院判决。

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在首都监狱刑场被枪决。

主要参考资料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

张庆余：《冀东保安队通州反正始末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余真：《殷汝耕论》，《新知识》1937年第1卷第6期。

尹昌衡

陈祖武

尹昌衡，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人。生于1884年7月11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九日）。其父荩臣，是位塾师，家境贫寒。尹昌衡九岁时随双亲到成都，初由其父教读，后从一位陈姓先生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及名人著述。1903年，尹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1904年由四川当局保送日本留学，初进振武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在日本学习期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与同学刘存厚、杨荩城、唐继尧等组织“研学会”，以研究革命之方法 (1) 。1906年尹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次年参加“铁血丈夫团” (2) 。

1908年学成回国，到天津军队中实习，次年初到北京参加陆军部召集的留学生会试，奉上谕赏给步科举人出身并授“协军校”，分派广西候用。不久，任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干部学堂教练。尹与耿毅等在讲课中注意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并与覃鎏鑫、吕公望、赵正平等主办《指南月刊》，因言论激烈，刊出数期被迫停刊，改出《南风报》，仅出一期又被迫改名《南报》。尹为人放纵不羁，好饮酒赋诗谈革命，为广西巡抚张鸣岐所不容，于1910年辞职回四川，任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讲武堂教官。尹能为本省军人不被重用作不平之鸣，从而团结了一批倾向革命的川籍下级军官。1911年，尹被提升为新军教练处会办兼代陆军小学总办。

辛亥武昌起义后，四川重庆于11月22日宣告独立，张培爵、夏之时被举为蜀军政府正副都督，随后川南、川北、川东也相率起义。省会成都本是保路风潮中心，民军虽久攻未下，但此时更陷孤立，立宪派官绅与川督赵尔丰谈判妥协，实现成都和全川独立，11月27日，大

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尹昌衡被任命为都督府军政部长。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诸事未集，加之军政府许诺发放的三个月恩饷，又未能如数发给，在军队里引起很大的不满。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等在成都东校场阅兵，巡防军遂因索饷发生哗变，乱兵向检阅台开枪，蒲、朱逃匿。乱兵到处抢劫焚掠，全城极为混乱。其时，尹昌衡于乱中驰赴凤凰山军营，急召第六十五标标统周骏、管带宋学皋率新军入城剿捕乱兵。

乱平后，尹召集第十七镇的军官和士绅们开会，以蒲、朱既去，军政无人统摄，而尹昌衡戡乱有功，罗纶为同志会所属望，遂举为正副都督。次日，尹、罗就职并着手组织军政府，任命董修武为总政处总理，下设秘书、法制、铨叙、统计、印刷、庶务六处，分管各项行政；杨维为军事巡警总监，负责治安；周骏为军政部长。另设民政、财政、学务、司法、实业、交通、盐政、外交等部，由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分别担任。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十七镇为第一师，宋学皋任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二师，彭光烈任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三师，以孙兆鸾为师长。12月11日，尹、罗发表《告全蜀父老子弟文》，严禁造谣生事，破坏大局。

四川起义武装保路同志军的成员多为哥老会分子，尹、罗为笼络人心迎合会党，在军政府里公开设立“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罗均为公口的掌旗大爷。由于都督倡于上，下属风从附和，一时“公口”林立，成都成了袍哥世界[(3)]。

此时，原川督赵尔丰虽已交出军政权，但仍住在督院内，并拥巡防军三千人以为防卫。12月8日，兵变发生后，赵竟仍以总督部堂名义擅出安民告示，人们对此极为不满；而赵暗召边军入省妄图复辟的阴谋也为军政府侦悉。尹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心捕赵，以靖祸原。12月22日黎明，密派军队包围督院将赵尔丰抓获，是日中午尹在军政府

（旧皇城明远楼）门前开群众大会，当众历数赵的罪状而诛之，并传首全城。“赵屠户”的伏诛，大快人心，赵所暗召的边军也被革命军队击溃受编，川局渐趋稳定。

光复后的成都“公口”林立，袍哥的无视纪律，也给军政秩序带来麻烦。湘、滇、黔三省军政府曾联衔通电只承认重庆蜀军政府，将成都军政府斥为哥老会政府；滇军且以此备文咨请鄂军都督，主张派兵进窥成都。鉴于风声不佳，尹昌衡遂命巡警总监杨维取缔哥老会。

成、渝两军政府于1912年1月中旬派出代表开始会商合并问题，至2月上旬达成协议，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自愿任副职，3月12日，四川军政府成立，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罗纶改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尹统一全川军政后，以整军经武为己任。军队方面，除已发表三个师长外，又增委由滇返川的刘存厚为第四师师长，以蜀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为第五师师长，并特任其旧交胡景伊为全川军团长，节制各师。在重庆则设镇抚府，任命夏之时为镇抚府总长。不久，夏辞职出洋留学，尹昌衡遂委胡景伊兼任。

这时，驻西藏拉萨的川军，因藏兵寻衅发生冲突，川军败退，藏兵受英国人的唆使，乘势侵入四川边境。4月5日，尹曾电呈筹办藏务情形，请委钟颖为西藏行政使，筹办全藏事务。4月22日，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命速派兵赴藏增援。尹奉命后决定亲征，6月8日召开征藏军事会议，宣布由胡景伊回成都代理都督职务。7月10日，尹率西征军出发，12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尹为四川都督，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张培爵改任民政长。尹率部到达川边后，不数月，驱走藏兵，川边平定，9月25日袁世凯任命尹兼川边镇抚使，10月10日授予陆军中将并加陆军上将衔。

胡景伊于尹昌衡出征后，乃密派亲信赴京活动，通过陆军部次长陈宦的关系，得与袁世凯相勾通；在川省内部，胡景伊则大力安插亲信，遂引起尹的不满。胡、尹间暗斗甚烈。1913年3月，尹、胡曾分

别去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随后，经袁世凯、黎元洪先后复电慰留，但至6月13日袁政府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将尹昌衡调任川边经略使。尹得知后更为愤懑不平，于17日发出通电，以“食已尽矣，兵已穷矣，权已夺矣，迫已甚矣，惟有必败”声称解职[(4)]，并于7月3日赶回成都。尹曾多次设法与胡谋面，而胡则移驻城北昭觉寺，拥兵自雄置之不理。川省议会以胡私往他处，擅离职守，决议请尹仍回任都督，并通知胡交出印信；议长胡骏连电北京，挽留尹昌衡，均遭驳斥。尹愤极大骂胡景伊背信忘义，深悔自己所托非人。7月11日，袁世凯加委尹兼川边都督，佯为调和。“二次革命”发生后，8月四川讨袁军兴，尹部征藏军护卫团长张煦在打箭炉响应，宣布独立。尹感到变生肘腋，前后顿失凭依，乃仓皇赶回打箭炉，将张煦赶走。

尹到川边后不久，托病请假三月，于11月中旬赴京就医，期望能晋见袁世凯对边务有所陈说，但袁佯为倾听，实际不予理睬。1914年1月13日，袁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兼川边都督职缺，令尹留京另候任用。旋以赵尔巽控尹擅杀赵尔丰和胡景伊密控尹暗通国民党等情，竟于2月2日将尹昌衡拘捕入狱。3月24日袁世凯命令议恤前四川总督赵尔丰，8月16日下令褫夺尹昌衡的军职荣典。直至次年10月16日袁政府才正式宣布尹案“冒功通逆各款，均无其事”，惟“侵占公款，罪情昭著”，按律处以二等有期徒刑九年，褫夺公权全部，侵占之款，并着严行追缴[(5)]。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尹被特赦出狱。其后黎元洪又明令恢复尹昌衡的陆军中将及陆军上将衔，发还勋位勋章。尹恢复自由后仍留住北京。其时黎元洪与段祺瑞间的府院之争日益尖锐，尹与黎较为接近，为段所疑忌。1917年8月，冯国璋继黎元洪任总统，李纯继任江苏督军，尹被聘为顾问，不久去南京居住，1920年春去上海。

是时，孙中山正留居上海，尹遂往谒，表示愿在其领导下为革命奔走效劳。是年7月，非常国会议员在昆明开会，曾决议将国会及军

政府移设重庆。孙中山特派尹昌衡赴渝，协助李烈钧等筹备国会开会及军政府设置事宜。9月，川军总司令吕超及滇、黔军兵败，重庆已在熊克武、刘湘等部包围之中，国会议员离开重庆，李烈钧率所部退黔、湘边境，滇、黔军亦全部被驱逐出川。尹昌衡乃留住重庆，次年回成都。

尹回蓉后，意绪消沉，常以诗酒、参禅自遣。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时期，为了笼络川军将领，曾于1924年7月11日发表尹昌衡为盛威将军，但仅为空名衔而已。抗日战争期间，尹以社会贤达身份，发表演说，勉励青年抗日救国。尹晚年双目失明，更少问世事。1949年四川解放后，人民政府特予尹以生活照顾。1953年5月26日，尹在重庆病故。著有《止园丛书》、《西征记略》等。

---

(1)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谢本书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2)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3—184页。

(3) 李景骅提供（李曾任四川测量局长，和尹是拜把兄弟，对尹生平知之甚详）。

(4)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发行，第60—61页。

(5) 《政府公报》1915年10月17日第1236号。

尤列

李娜

尤列，字令季，幼名季博，学名其洞，原字惟孝，别字少纨、孝纨，号小园，居日本时自署西名曰Euclid，居南洋时号吴兴季子，晚号钵华道人。1865年2月22日（清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顺德北水乡新基坊的一个书香世家。十岁时受业于县中宿儒陆南朗（号蒲泉）。陆“文名籍甚，惟深于种族之辨”，“耻事虏廷”，不应科举。受陆蒲泉的思想影响，尤列很早就萌发了“反清”的意识，绝意科举仕进。

尤列十七岁时，开始涉足远游，当时华中（汉口、长沙、桂林）、华东（上海、南京）、华北、日本（长崎、神户、仁川）、朝鲜（高丽），都留有他的足迹，并在上海加入洪门会。1883年2月，尤列来到北京。1885年，考入广州算学馆，留馆读书三年。

1886年，尤列与族人尤裕堂到博济医院探访友人，结识正在此学医的孙中山、郑士良、邓景晖等。这是孙、尤二人订交之始。1888年冬，尤列算学馆肄业，充任广州沙田局文算总目。翌年，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旋即被委任为中法越南定界委员。因不满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遂决定不赴职。其时，尤列常往来粤港间。一天，尤列到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商店探访算学馆同学杨鹤龄，遇到时在雅丽氏医院学医的孙中山（因与杨鹤龄为同乡，孙中山亦经常到杨耀记与其叙谈）。孙中山正在意气激昂地与在座的友人高声谈论时事。尤列见此情景，便笑着对大家说：“诸君未见过洪秀全乎？”然后指着孙中山说，“此人头脑与洪秀全同样者也。洪秀全以种族革命为志向，你的头脑和他的一样，一定是要继续完成洪秀全未竟的事业！”孙中山亦指着尤列说：“你是游智开。”（尤游同音，当时游智开为广东巡抚）大家听了

都为之粲然。第二天，孙中山在路上遇到尤列，于是邀请他到威林顿街杏楼西菜馆小叙。孙中山对他说："你昨天所讲的，我很赞同。之前，我在美国檀香山曾经教人造反，因为那里的民智尚未开化，条件不成熟，所以无从下手，失败而回。今天有幸与你相遇，便是同志，彼此一起研究革命即是。"尤列听后说："既然如此，我只希望事情成功，最后的功劳归谁无需计较。"自后孙与尤友谊日深，孙中山还介绍陈少白与尤列等认识。自此，孙、尤、陈、杨四人常在香港中环歌赋街二十四号的杨鹤龄祖产商店杨耀记会面，并议论中国时政，大谈反清逐满，鼓吹共和。

1890年，孙中山提议立约盟誓，以此表明共同革命的坚定信念，得到其他三人的一致赞同。尤列自告奋勇，立即提笔起草，草成后由其他三人一一看过，大家都表示满意。于是再由陈少白用白纸誊正。誓词的原文如下：宣誓人×××等精诚宣誓，天地鉴容，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此誓——戊子年九月初五日。

尤列，广东省顺德县人，乙丑年正月廿七日出生，二十四岁。

孙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出生，二十三岁。

杨鹤龄，广东省香山县人，戊辰年六月初十日出生，二十一岁。

陈少白，广东省新会县人，庚午年七月十五日出生，十九岁。

宣誓书的签名，是按照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签过名后，四人整肃衣冠，点燃香烛，同时对天盟誓。仪式虽然十分简单，却严肃而隆重。宣誓完毕，四人回到西医书院拍照留念。从此，"四大寇"的称呼就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传扬开来（当时的人称造反作乱者曰寇）。

1892年，尤列赴香港，考取华民政务司署书记一职。同年，杨衢云、谢缵泰等设立辅仁文社。尤列由文社社员罗文玉之介结识杨衢

云，并介绍杨衢云与孙中山相识，此后杨、孙共谋革命之发展。为开展反清革命行动，孙中山和尤列频繁地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孙中山在广州冼基设立东西药房，接着又在澳门康公庙前设立中西药房。尤列则于1893年辞掉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一职，返回顺德，同陆皓东、周昭岳等一起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以经营优良蚕种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串联活动。孙中山曾多次在此议事，并为书门榜“兴利在我，利归于农”。作为公司股东的陆皓东，就在尤列的住所听涛阁绘制出了“青天白日旗”及五色旗的样稿。

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等在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以杨衢云为首任会长，并决定在广州起事。尤列回到广州并设立兴中会分机关，以“农学会”名作为掩护。原议定于重阳节发动的广州起义，由于消息泄露而遭到失败，陆皓东等人牺牲，孙中山偕同郑士良、陈少白逃亡日本；尤列则出走越南西贡避祸，辗转于香港、澳门、广西等地。

广州起义失败后，为维持力量，1897年，尤列潜回香港，组织以工商业者为主的“中和堂”（取“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之意）。4月16日，“中和堂”总部成立于香港九龙西贡，以“青天八针（八针乃崇尚八德之意）白日”为堂徽，并逐渐发展成为兴中会的外围组织。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后，横滨的华侨大多依附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保皇党，而兴中会的成员日少。为此，尤列于1899年设中和堂分部于横滨，堂中挂关羽神像，会员“以工界为本位”，以与保皇党抗衡。后来，尤列将中和堂推广到南洋一带，在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坝罗、芙蓉、庇能等地设立起中和堂分会，联络华侨中的工人与小商贩，与华侨中的保皇分子相抗衡。其时的中和堂在联络和团结广东革命群众、海外华侨工农，开展反清斗争、维护中华会馆公产、与旅日华侨中立宪派势力斗争等方面，颇有贡献。

1900年，孙中山委派郑士良筹划惠州军事行动，尤列则运动长江会党为之声援，来往于长江一带，虽有所行动，但一无所成。惠州起

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革命党的首要人物，尤列再次流亡日本。尤列到达横滨后，与孙中山同寓于横滨前田町一二一番馆，与留学生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程家柽等来往甚密，共同商议开展革命的行动计划，一是联络学界，一是开导华侨；还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并刻制了“中华民国万岁”的象牙国玺。1903年，尤列领导中和堂成员在南洋创办《图南日报》，翻印《革命军》，借此宣传鼓吹革命。1905年同盟会成立，尤列受孙中山的委托，将其领导的中和堂改组为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党员概皆加入同盟会”，并发动南洋各埠的中和堂成员，通电声援“苏报”案中的章太炎、邹容，并募集经费支援国内武装起义。1909年，钦廉、镇南关、河口起义相继失败，革命党人大都避居新加坡，因人庞品杂，聚众闹事行险杀人等事层出不穷，尤列被牵连入狱，后经孙中山出面营救才得以保释，被殖民地政府递解出境，遂移居泰国办《同侨报》以鼓吹革命。1910年，尤列返回新加坡继续主持同盟会的工作，并策动富于牺牲精神的会员，秘密归国，伺机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尤列只身一人前往东三省，意欲促使新军镇统吴禄贞反正，途中获知吴禄贞遇害的消息，遂秘密转往云南，襄助蔡锷举义。“云南反正，全国景从，南部军民，多数为先生指导之下者，惠协两军其最著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清朝势力如张勋等部，挥军南下，南京危急。尤列遂组织中和堂北伐军，并策动滇、黔等省兵力，共同保卫南京城。待到南北议和达成后，尤列率领中和堂人员南归就业，息影林下。

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到香港邀请尤列北上共商国是，实欲收买尤列来打击孙中山。尤列初以为袁世凯尚有为国诚意，遂与吕信之等人前往北京，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并欲授“三省筹边使”以笼络。后察觉袁世凯阴谋，即秘密离京赴津。1914年，尤列潜返汉口，组织中和堂救世军讨袁，事泄遭通缉，于是东渡日本避难。袁世凯死后，尤列见政权仍由北洋军阀把持，继续避居于日本神户，以教

馆著书为业，并在日本先后出版《四书章节便览》、《四书新案》等。1921年，尤列由日本返港，孙中山即派人相邀，受聘为总统府顾问。不久，孙中山督师北伐，计划将后方政务托付给尤列，因胡汉民力阻而未果。后来，尤列因与同是总统府顾问、早年“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政见不合，遂趁势隐退返港。

1922年，尤列与梁砚田等创办皇觉书院于香港旺角庄华道二号，任院长，倡言伦理救国，“孔教革命”。尤列不赞同孔教不适用于民国、废除孔教的主张。他认为孔教并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教育之教”。在尤列看来，“欲救今日秩序大乱之中国，舍伦理其没由，盖我国乃数千年涵育于伦理文化之中也”，“而伦理莫善于孔子。孔子者，本其伦理之要素，以施其民治之教育”。孔教之所以败坏，在于历代讲孔教的人中有些不道德者，因此“于历代诸儒，依附孔教，藉为求利之捷径者，举其中之谬论，廓而清之，其纯正者，依归存之，使孔子之都教蔽而复明，是以谓孔教革命”。尤列在中医学方面造诣很深，曾担任香港东华医院医师，认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后来，与香港中医黎琴石等人一起组建香港中华国医学会（即香港中医师公会的前身），并被推举为总干事。

民国成立后，尤列虽退出政局，但仍关心时局。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亟时，犹念念于尤列，欲以党国后事相嘱托。尤列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后，泫然流涕曰：“良友既没，知我者谁欤？”1927年5月，尤列发表《对时局宣言》，既赞同“清党”、“讨赤”，认为“肃清云者，肃清其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则可；若欲肃清其国民党外之共产党，虽百数十年，亦有所不可”，但亦指出“今各地数以枪毙共产党闻，列以为殊非善策”。1931年，粤、桂两省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尤列多次致电南京及粤、桂当局，呼吁统一抗日。1932年秋天，面对日本的步步入侵，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邀集海内外的隐退元老出席，尤列告病不赴，电陈御敌救国方略。1936年，尤列应国民政府之邀扶病前往南京。9月15日，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呼吁统

一抗日，“中华民国并不是很容易产生出来的，是赖许多先烈牺牲无数头颅，把他们的泪和血来染成的代价……若我们同胞意志仍不一致，行动不团结……是皆无法抑止外患的来临，终陷中华民族于不可救药也”。

9月26日，尤列自偕冯自由、叶夏声及前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等谒祭总理陵墓，追忆当年“革命倡言，晨夕快悦，意气相期，满腔血热”，嗟叹今日“抱玉悲号，知音弦绝”，行礼献花后，尤列亲捧祭文，读未及半声泪俱下，历一时始返旅邸。11月12日，即孙中山的诞辰之日，尤列与革命元老谈往事有所感，喘病发作，逝于南京。其遗嘱仍殷殷以国事为望：“……惟内忧稍舒，外患日迫，政府非中央集权，无以渡其危难，至实行宪政问题，须俟对日国交完满解决后方可。目下宜提倡孔道，以补法令之不逮。海外华侨过去协助革命有功之团体，甚望政府加以爱护维持。余一旦死后，丧葬从俭，不欲累及朋友之靡费。”尤列逝世后，由孙科主持葬礼，葬于南京麒麟门外小白龙山。

主要参考资料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尤嘉博编：《尤列集》，关雅印刷制本有限公司1987年版。

尤迪光、尤迪恒编：《四大寇——尤列：低调的不平凡》，基业印刷有限公司2007年版。

尤列：《孔教革命》，永康印务公所1929年版。

于冲汉

张学继

于冲汉，字云章，奉天辽阳人。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因其父于甫筠是清光绪年间直隶保定县的候补知县，于冲汉与其二弟早年均入保定莲池书院读书。在莲池书院，于冲汉与日本留学生宫岛勖斋成为要好的朋友。宫岛勖斋在学成归国之际曾对于冲汉说："中国虽是个大国，但一切腐朽落后，不足有为。你如果在国内不得意时，可到日本东京找我，我一定能帮你忙。"

其后，于冲汉的父亲升任直隶承德府大名城通判，在一次镇压凌源一带的农民起义时阵亡，于冲汉一家因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不得不返回辽阳原籍。于冲汉自幼游手好闲惯了，不习农活，又染上鸦片烟嗜好，一家人坐吃山空，不仅一家生计难以维持，而且因为在当地挑拨是非，为家乡人所不齿。为了找出路，于冲汉想起了宫岛勖斋当初的许诺，遂于1899年东渡日本找宫岛勖斋。于到东京后，人生地不熟，找了一个多月，也未找到宫岛，眼看盘缠已尽，走投无路的于冲汉在旅店上吊自杀，为女佣发现救下。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但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有几分尊敬，旅店老板告诉于冲汉：你不要寻死，没有钱也没有关系，你只管在这里住，我不要你的钱，慢慢找你的朋友，等你找到为止。此后不久，旅店来一个日本陆军大佐，看到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很好奇，旅馆老板把情况告诉了这位陆军大佐，真是巧合，这位陆军大佐正是宫岛勖斋的朋友，于冲汉因此找到了住在东京郊外的宫岛。宫岛见到找上门来的于冲汉，果然没有食言，对他的到来给予了热情接待。经宫岛安排，于冲汉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同时兼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汉语教官，以维持生活。

1903年，日本准备在中国东北对沙皇俄国开战，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招考一批随军翻译人员，于冲汉被录取，到陆军省受训一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于冲汉随日军回到东北，任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部附，为日军搜集俄军情报，并从事对外交涉方面的翻译和汉文文牍工作。1904年间，于冲汉在辽阳一带搜集情报时被沙俄军队逮捕，差一点送了命，后经人营救获释。日俄战争中，日本一举打败俄国，将沙俄势力驱逐出南满。1905年3月，日军占领奉天，设立“军政总署”，于冲汉转任“军政总署长”小川的翻译官。于冲汉为日军效劳有功，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二等瑞宝章的奖励。

1906年7月，日军撤销奉天“军政总署”，小川回国前，曾询问于冲汉的去向，于表示愿意留在东北工作，小川认为他留在东北与日本保持联系，对日本有利，于是将于冲汉介绍给清政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小川对赵尔巽说：“于冲汉这个人很好，日本话也好，为日本军做了不少的事。现在我要回国，请阁下多关照，给他安排好。”

鉴于于冲汉是辽阳人，赵尔巽就把他交给了辽阳团总袁金铠，袁金铠安排于冲汉为辽阳东路半拉山子警察区官。日俄战争后，南满地区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中日交涉成为东三省官员必须面对的课题。于冲汉因为日语谙熟，与日本人的广泛联系以及办事干练等特长受到东三省当局的赏识和倚重。从1906年至1911年，于冲汉先后任辽阳州交涉局局长、辽阳州候补知州、代理辽阳知州等。

1913年，于冲汉担任奉天交涉使，凡是中日双方的交涉事件，一经他的手，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于冲汉成了东北政界引人注目的政治明星。而他与日本的关系也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更加密切起来。

1916年春，张作霖与冯德麟等密谋驱逐奉天都督段芝贵时，于冲汉负责与日本方面联络，得到日本的赞同。赶走段芝贵后，张作霖于1916年4月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立即聘于冲汉为奉天省公署高等顾

问。“有外交事张作霖恒加顾问”，于冲汉成为张作霖事实上的“外交部长”。

1916年4月，日本乘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中国政局动荡之机，在我国东北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及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认为通过张作霖采取必要的步骤以实现“满蒙独立”，比利用“宗社党”对日本要有利得多。田中义一指示关东军参谋次长与张作霖的代表于冲汉开始秘密谈判，讨论建立一种脱离中国的政体问题。就在谈判过程中，支持“宗社党”的一派组成了以伊达顺之助、三村丰等为首的“满蒙决死团”，于5月27日进行了刺杀张作霖的行动。张作霖侥幸地逃脱了刺杀，他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这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命令于冲汉中止了与日本人的秘密谈判。

为了酬谢于冲汉，张作霖任命他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总办是个肥缺，管事不多，但每年可以分得十余万银元的花红。

于冲汉作为张作霖的外交顾问，由于摆脱了大量琐碎的日常事务，他的地位是超然的。1919年7月11日，于冲汉在写给杨宇霆的信中就说：“时事迁移，风云变幻，冷眼旁观，应接不暇。其热闹为何如也！弟闲散如常，贱躯粗壮，数年所未有之舒适，知注特闻。……弟近来颇有所悟，一切看开，非敢鸣高，实亦由于愚性如此也。”

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垮台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便取代段祺瑞成为日本的宠儿。为了与日本政府进一步勾结，张作霖便通过北京政府派遣于冲汉作为他的特使于1920年9月访日，拜会日本首相原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得到日本当局支持张作霖的承诺。于冲汉访日后，原敬首相在日记中写道：“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

为了确立日本对“满蒙”及张作霖的政策，原敬内阁于1921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东方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经营满蒙”，会议决定的方针是：日本应当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要利用张作霖充当日本在“满蒙”扩张的工具。为此，会议通过扶植和利用张作霖的方针，“一般说来，在整顿和发展东三省民政和战备的过程中，在确立张的稳固统治的过程中，（日本）帝国应当给予张作霖以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援助”。由于早在1919年日本与其他主要列强一起签订过一项协定，规定“禁止向中国售运武器”。因此，日本不宜直接向张作霖供应武器，会议决定援助张作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便张作霖能够自己生产武器。关于财政援助，决议第四款规定：“对于财政援助，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根据情况给予善意的考虑，要紧的是应以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应当采取在合办企业中投资的方式进行，以便避免列强的疑心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妒忌。如果张巡阅使也决心逐渐地努力增进实际的中日合作，例如，在关于租借土地、经营森林和矿产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方面，都能尽心尽力地合作；如果他决心做出每种努力去落实所谓共存共荣的原则，并搞出现在和今后联合管理的办法，以便建立起中日共同的贸易，那么，东三省的财政就能够自发地不显眼地繁荣起来。”第一次东方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成为规范日本与张作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执行到1927年第二次东方会议，日本通过新的方针为止。

1922年1月，张作霖派于冲汉先后访问关东军少将贵志和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除希望日本提供军火外，还试图让日本保证：万一发生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日本军队将会维护东北的安全。赤塚正助是张作霖的热心支持者，于冲汉向赤塚正助强调说：“吴佩孚是中国代表英美利益的急先锋，像威胁张作霖一样地威胁着日本。”于冲汉还向赤塚提出一张新的所需军备明细表和关于如何避开“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规定的有用建议。在所需军备明细表中，于冲汉要求日本援助一万支来复枪，一千万发子弹，十万发炮弹，二百挺机关枪（或者至少一百挺）与五百万发机关枪子弹。但日本政府考虑到华盛

顿会议正在进行，日本援助张作霖将导致日本同英美对峙，决定对张作霖的援助请求暂时保留态度。于冲汉未到达目的。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冲汉负责办理外交。5月5日，于冲汉写信给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就有关外交问题提出对策。1925年秋，张作霖以承认“二十一条”有关东北的条款为条件，向日本请求军火援助，以进攻国民军。这桩交易又是由于冲汉完成的。但随着杨宇霆的受宠和大量日本顾问的聘用，杨宇霆与日本顾问逐步分担了对日交涉工作，于冲汉对日外交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1923年间，于冲汉、李有兰代表张作霖与苏俄进行了有关中东路的谈判。1924年9月20日签订的《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即“奉俄协定”），代表奉方当局在协定上签字的是郑谦、吕荣寰和钟世铭，谈判是由郑谦等人完成的。1925年8月11日，吉林省长王树翰辞去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职，由张作霖批准，令于冲汉继任。1926年9月，于冲汉辞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专任东清铁路督办。

日本满铁地质调查所在奉天通过非法地质调查，探明奉天、辽阳、海城、鞍山一带有大量丰富的铁矿石，日本对此垂涎三尺。但是，按照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法令规定，外国人对中国矿山没有购买权。于是日本人通过于冲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15年，日本人聘用于冲汉为满铁奉天公所顾问，每月给他二百元津贴，由他出面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申请采矿权，以中日合办的形式攫取奉天采矿权。1916年3月，于冲汉与日本人镰田弥助签订合同，宣布出资合设公司，采掘辽阳海城县下鞍山站一带之铁石山、鞍山站之鞍山、鞍山站之对面山、小岭子、大孤山、关门山、樱桃园、王家堡子八处铁矿。经过于冲汉上下活动，通过贿赂北洋政府有关官员，日本终于在1917年2月23日拿到了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的采矿许可证，振兴公司据此设立采矿总局，下设矿工监视所，负责监督矿工进行矿石开采工作。名义上于冲汉是该公司总监，但在日本巨额金钱收买下，于冲汉给“满铁”出

具了不过问振兴公司的保证书，让日本人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实质上是听任“满铁”在东北大肆掠夺矿产资源。

于冲汉与其弟于凌汉、于文汉因盗卖中国矿产资源有功，均得到日本的重赏。日本人以支给薪金、补助金和股份红利的名义给于冲汉兄弟以巨额金钱好处。据统计，于冲汉每年从日本手中取得3.2万元的巨额收入，其中红利两万元，总经理年俸1.2万元。于文汉（字龙章）由“满铁”聘请为樱桃园监视所总监督，日本每年赏给这位总监督2.8万元。此后，于冲汉、于凌汉、于文汉三兄弟通过非法霸占民间土地等一系列手段，先后帮助日本侵略者扩大“满铁”采矿区，相继攫取火连寨、海城等地石灰石以及海城、盖平等地菱镁矿。日本得寸进尺，在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同时，积极筹建鞍山制铁所，将开采的矿石就地炼成钢铁运往日本。1919年4月29日，“满铁”鞍山制铁所一号高炉点火。为此，“满铁”特别赏给于冲汉一万元，并表彰他说：“振兴公司开办以来，因获得矿山采掘权和制铁所其他各项事业，于冲汉先生不断遭到中国一部分官民的疑惑，或称其为傀儡，或指骂其为卖国奴，而他却始终如一，排除万难，为会社的事业鞠躬尽瘁，实属功劳卓著。”

日本人经营的安奉铁路，原为窄轨，为了与其在朝鲜的宽轨铁路相连，需要改成宽轨。但是要改成宽轨，必须大量征用中国土地，日本人又通过于冲汉的活动取得了土地，使安奉铁路改成宽轨。日本为报答于冲汉，“满铁”无偿地向于冲汉提供树苗，让他在安奉铁路两侧栽植落叶松，成材后由日本人收购。通过盗卖国土资源，于冲汉家族成了暴发户。于冲汉本人在老家辽阳有土地六百多垧（一垧约相当于十五市亩）、园田四处，房屋百余间，并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及老家辽阳等地建有大量豪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浪人就住在于冲汉家策划事变。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劝袁金铠等成立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于冲汉分任这个“维持会”的正、副委员长。不久，于冲汉来到沈阳，

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陈述他的八条“政见”。于冲汉的这八条，迎合了日本建立傀儡政权的需要，受到日本的重视。于是，日本在建立正式的傀儡政权之前，于1931年11月10日成立了“自治教导部”，以于冲汉为部长，为建立傀儡政权作过渡。

当袁金铠对于将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改为伪奉天省公署迟疑不决时，于冲汉找到袁金铠之子袁庆清开导说：“你父亲太傻气了，这是什么时候，日本人是最厉害的，我们办事要知时务，为什么你父亲很卖力气，结果适得其反，闹得关东军很不乐意，这里是有说道的。我与你父亲是三十来年的老交情，换过谱，与你们袁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往了，不会不为你们着想，你要听我的话，给你父亲讲清利害，不要自己做的豆腐，将来叫人家吃啦！”为了鼓励人们做汉奸，于冲汉是这么兜售他的汉奸理论：“日军进到我们东北，表面看好像占了我们的领土，其实是因为军阀张学良他们做法太不像样子了。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为自己前途要好好考虑考虑，这可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1932年3月，伪满政权成立后，于冲汉出任伪监察院院长。10月，于冲汉病死大连，日伪当局除颁治丧费一万元进行“国葬”外，还赏给于家30万元“建国功劳金”，颁发一等旭日勋章。其子于静远，亦继承于冲汉的衣钵，甘当汉奸，为日本侵略者效力。

于学忠

黄德昭　王秦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蓬莱人，1890年11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生于旅顺[(1)]。其父于文孚曾任毅军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的部下。

于学忠幼年随父在军营中，1904年肄业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于学忠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被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提拔为镇守使公署中校副官长。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曾任职毅军，原隶于文孚部下，乃电召于学忠至襄阳，任为炮营营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于随赵旅参加对皖系吴光新作战，将吴部包围缴械。1921年秋，川、鄂战起，熊克武、刘湘进攻湖北。赵荣华旅防守宜昌，战事失利，准备放弃。适逢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至宜昌督战，于往见吴，面陈反攻计划，吴即采纳。后激战五昼夜，击退川军。于因此被吴佩孚赏识，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1922年7月，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的战争，年底吴佩孚派赵荣华、于学忠率部由湖北施南入川援助杨森、刘湘，攻击熊克武。不久，赵荣华因抗拒军令被撤职，吴佩孚任命于学忠为第十八混成旅旅长。

1925年10月，吴佩孚至武汉，经孙传芳、萧耀南等拥戴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整编直系各军，授于学忠为第二十六师师长，仍驻施南。1926年7月北伐战启，国民革命军席卷两湖，吴佩孚逃入河南。于学忠时任长江上游副司令，驻宜昌，不愿背吴，便率部

北撤。于撤至老河口时，接吴佩孚电令，任为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嗣再撤至河南邓县。1927年5月，吴佩孚逃到于学忠军中暂住，不久去四川暂依杨森、刘存厚。于学忠表示随吴佩孚同进退，遂于1927年6月下野，返回蓬莱故里。

于学忠下野后，所部归冯玉祥统辖。不久，于部师、旅长不满冯玉祥吞并异己，又将队伍拉至安徽蒙城，并派人找于想办法。事为张作霖父子所闻，即邀于到北京商谈。于学忠从此转入奉系，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仍统原部。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任于学忠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驻山海关。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三派结成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在中原混战。当时张学良拥兵关外，具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多次派代表拉拢东北军出兵进关，未有结果，便阴谋分化东北军，派人几次去信笼络于学忠，劝于举兵西向，愿以华北地位为交换。于表示唯张学良之命是从，未允。蒋又用重金收买于部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于采取措施制止了这一阴谋。至9月18日，张学良进兵关内，于学忠率第一军由沈阳出发，9月26日进驻北平。经张学良保荐，国民政府发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

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成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坐镇北平。7月，石友三反蒋。蒋命张把在关外看家的东北军大部调入关内讨石，并发表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平汉线作战之责。于率所部与王树常第二集团军及南路刘峙指挥的中央军，合力夹击石军奏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图谋控制华北，平、津时

局紧张。1932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将于学忠的平津卫戍司令与王树常的河北省主席对调，于赴天津就任河北省主席。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将东北军大部分交于学忠指挥。日本侵略者曾用种种手段对于学忠进行利诱和威胁，于皆不为所动。1935年6月，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屈服于日本军阀的要求，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方所提出的“觉书”第一条即为罢免于学忠，要求将于部五十一军撤出河北[(2)]。为了迁就日本侵略者，何应钦几次亲自打电话逼于辞职，均遭于拒绝。5月31日国民政府乃命于将河北省府由天津迁往保定；6月6日又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改任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令其率部开赴西安（后驻天水）。11月1日，于被任为甘肃省主席。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于学忠由兰州到西安，12月11日参加了张学良召集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于虽力主慎重，但同意张采取“兵谏”的决定，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12月12日，于学忠电报指示驻兰州的于部遵张学良命令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开会）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警察解除武装，并扣押了复兴社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的高级官员，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此后于学忠不断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边主持甘肃工作，一边参加西安各种会议。

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押。于学忠奉张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在此期间，于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做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在东北军内的进步力量[(3)]。蒋介石在无理判处张学良后，又派五个军进逼西安，并在1937年1月4日将杨虎诚、于学忠撤职留任。1月5日，于学忠同杨虎城通电质问国民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1

月中旬国民政府提出改编东北军、西北军的甲、乙两案[(4)]，为此于学忠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见蒋介石，并极力要求释放张学良。在蒋扣押张学良并对西安步步进逼的形势下，东北军内部发生“和”与“战”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1月30日晚，于学忠、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4日，于学忠与杨虎城及两军高级将领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2月8日，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西安，东北军接受乙案，准备东调。蒋介石、何应钦等便以处理善后为名，加紧分化、瓦解东北军的活动。1937年4月，蒋调于部五十一军往蚌埠、淮阴、宿县，发表于为江苏省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阴。

1937年7月抗战开始，蒋介石调五十一军到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中旬于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25日退出青岛。次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济南和山东大片土地。此时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山东军队统交于学忠指挥，任于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初，五十一军参加淮河战役，于学忠率领将士浴血奋战，毙伤日军九千余人，完成了稳定淮河防线的战役任务。此后，于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全军将士英勇杀敌，牺牲惨烈，在保卫祖国、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中作出了贡献。于军和其他东北军一样，由于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在战争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得不到补充，实力不断削弱。

1939年，于学忠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1941年底，于任山东省主席。1944年，卸去苏鲁战区总司令职，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学忠任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去台湾，于藏在四川乡间未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爱国民主人士，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

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

---

(1) 于学忠出生时间众说不一，本文根据黄曾元《毅军沿革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并经于学忠家属核实。

(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19—1020页。

(3)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事变发动后，抗日先锋队改用百十师番号（原百十师在劳山战役中被红军消灭）。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后，逼于学忠将其解散。经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于将此部编入五十一军，保存了下来。这批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4) 甲案规定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沿线，十七路军移驻泾河、渭河以北地区。乙案规定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

于右任

张应超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化名刘学裕、原春雨，笔名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晚年号髯翁、太平老人。1879年4月11日（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少年时代家境贫寒，父亲于宝文长期在四川江津、岳池等地当学徒，母亲赵氏是甘肃静宁逃荒到陕西的饥民。于右任两岁时，母亲病逝，遂由伯母房氏抚养。他七岁入私塾，十一岁时随名儒毛经畴（字班香）读经书、习诗文。

1895年，于右任以案首入三原县学，为秀才，随后在泾阳味经书院、三原宏道书院、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1898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并得到陕西提学使叶尔恺（字伯皋）的赏识，誉为“西北奇才”，并在传见时授以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勉励他关心国际形势。经叶尔恺识拔，于右任声誉渐起。其时于右任还受教于朱先照（字佛光）、刘光蕡（字古愚）等人。叶氏离职后，沈卫（字淇泉）继任，对于右任亦十分器重。时逢陕西大旱，饥民死亡甚多，沈卫在三原开设粥厂赈救，特调正在宏道书院读书的于右任为粥厂厂长，这是于右任步入社会之始。1900年春粥厂结束后，沈卫送于右任到西安陕西中学堂就读。1903年，于右任考中举人，嗣后应商州知州杨宜瀚之邀，赴商州任州立中学堂监督。

义和团运动前后，于右任写了大量抨击时政、忧国忧民的诗篇，1903年冬结集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在三原出版。诗中大声疾呼，“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借古讽今地写道，“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1)]，影射指斥慈禧。三原县令德锐看到诗集，立即上报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从前对于右任指斥时政的言论已

有所闻，又得德锐密报，遂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语上奏清廷[2]。1904年春，清廷密旨拿办，其时于右任在开封参加会试，接到家信，迅即逃往上海。途经南京时，感慨赋诗：“虎口余生不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3]抒发决心与清王朝坚决斗争的宏愿。

于右任到上海后，得震旦学院监院马相伯之助，入该学院读书，且免收其学膳费。他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干预校务，引发风潮。马相伯愤而辞职，进步学生亦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马相伯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筹办复旦公学，于1905年中秋节正式开学。同年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许多人忿然回国。于右任与王敬方等又发起筹办中国公学，使返国学生不致失学。他还任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员。

1906年4月，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业务，在东京由陕西留日学生康宝忠引荐结识孙中山，11月经胡汉民、康宝忠介绍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对于右任十分器重，委任他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1907年4月2日，于右任任社长的《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发行，销路甚畅。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又创刊《民呼日报》。《民呼日报》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陕西官员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陕甘官员以甘肃赈款事罗织罪名，租界当局于8月2日拘捕了于右任，后事实大白，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租界当局释放于右任，却明令将其驱逐出租界，并吊销《民呼日报》执照。但是于右任并未屈服，10月3日，他创办的《民吁日报》又在《民呼日报》原址发行，因不便公开出面，以范光启为社长。不久，租界当局又以该报发表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驻朝总督伊藤博文的消息为借口，查封了《民吁日报》。在沈缦云等大力资助下，于右任筹办的《民立报》于1910年10月11日问世。《民立报》资金雄厚，以于右任、宋教仁、张季鸾等为骨干，在宣传民主革

命思想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于右任以“骚心”、“骚”等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掩护宋教仁的革命活动，在宋离沪期间，他还以宋教仁的笔名“渔父”为名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于右任与陈其美等人组织武装力量，制定起义计划，为上海的光复起了重要作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因交通总长汤寿潜未到任，于实际主持部务。在任期间，创办沪宁铁路夜车，开创我国夜间通火车的先例。不久，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于右任回上海继续主持《民立报》。1913年“宋案”发生，“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迫停刊，于右任流亡日本。次年回国，奔波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曾以卖字维持生活。

1918年春，胡景翼等人起兵在三原组成陕西靖国军，反抗依附段祺瑞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为统一靖国军的行动，8月于右任由上海回陕西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领导缺饷少械的靖国军与五倍于己的敌军进行艰苦的斗争。他置生死于度外，在致上海友人的信中写道：“故人厚我，当捡我骸骨于战场灰烬中也。”[(4)]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尽力关怀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了解学校情况，组织三原县城各校轮流举办学术讲演会。他把自己有关新教育的设想及改造社会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孙在复信中赞扬说：“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5)] 陕西靖国军解体后，于右任于1922年8月13日到上海，翌日，孙中山亦到上海。他向孙中山汇报了陕西靖国军的成败始末，以未完成中山先生重托，有负厚望而引咎自责，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他进行了安慰。于右任根据自己和孙中山遭受挫折的深痛教训，很想投身教育界，培养一批有益于国家的人才。恰在这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驱逐不称职的原任校长，请于右任出任校长。于右任接受所请，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召开成立会，于右任到校就职。为办好上海大学，于

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人通力合作，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等人在该校任教，使上海大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内很有影响的大学。

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31日，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任命于右任为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长。于右任非常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进行革命的政治主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此革命期间""合则两益，离则两损。"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权，于右任参与密谋，并于11月应胡之邀请赴北京。12月，孙中山亦应冯、胡等人邀请到京，任命于右任、汪精卫等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政务。孙中山在京病重住院期间，于右任参加了《总理遗嘱》稿的讨论。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于右任题赠挽联："总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工，直是为生民立命，为一地立心，历程中揖让征诛，举同尘土；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因，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寰。"[(6)] 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一生的功绩。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于右任为委员之一。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任命于右任为内务总长，未就。

1926年四五月间，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请于右任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响应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解除河南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重兵围困。于欣然同意前往，7月抵达莫斯科。在苏期间，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在与冯玉祥商讨计划后，先期经蒙古回国。9月16日，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举行誓师大会，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同时迅速组成以冯玉祥为总司令、于右任为副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接着，于右任指挥大军经银川、平凉等地进入陕西。11月下旬，刘镇华部全线溃退，解了西安之围，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于右任主持陕西军政期间，西安一度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城市，有"南广州北西安"之誉。

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二次会议上，他连任中央执委会常委，还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任审计院长。从1931年春起，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直至逝世，长达三十余年。他任监察院院长之初，曾满怀信心地宣布：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他有害于人民，监察院都给他平等的待遇，并不打了小的，忘了大的。在多次碰壁之后，他感慨地说："打苍蝇也要受到限制，更谈不上打老虎了。"(7)

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爱国活动。他以监察院院长身份，组织战区巡察团、战区风纪巡查团、战区行政工作考察团，派赴各地视察伤兵、慰问民众，对战时医院的伤兵治疗、难民安置等工作进行检查。于右任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参加。他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颂扬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右任从女婿屈武口中得知事变真相，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合作的行动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8)　于右任是声誉很高的书法家，对抗日前线归来请他写字留念的将士，有求必应，且不让别人代笔。1943年河南省旱灾严重，于右任卖字捐款八十万元，比当时各界给河南捐款的总数还多四十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右任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国内问题。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曾设宴款待，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1949年2月，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等地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协商和谈事宜，代表团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赴机场迎接。4月，国共和谈正式在北平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嗣因情况变化，未成行。周恩来曾请屈武转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和平协定》，希望于留在南京，与张澜等人组织新政协。但在11月，于右任被胁迫去了台湾。

于右任晚年以多病之身，十分思念远在家乡的亲人。1962年1月24日，他以痛切的思乡之情写了一首催人泪下的诗歌："葬我于高山

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首诗写出了海峡两岸华夏子孙渴望早日团聚的共同心声，成为脍炙人口的诗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在台湾逝世。他的诗文、讲演稿、墨迹，由有关人士编为《于右任先生诗集》、《于右任诗歌萃编》、《于右任先生文集》、《于右任文选》、《于右任先生演讲集》、《于右任墨迹选》、《于右任草书集》等。

---

(1) 庞齐编：《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 于右任：《我的青年时期》，中共陕西省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3) 庞齐编：《于右任诗歌萃编》。

(4) 刘延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页。

(5) 孙中山：《复于右任函》（1919年9月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页

(6) 景常春编著：《近现代名人对联辑注》，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99页。

(7) 周伯敏：《我所知道的于右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8) 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的关怀和对我的教育》，《人物》1981年第4期。

余汉谋

严如平

余汉谋，字幄奇，广东高要人。1896年9月2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生。父亲余云樵，晚清曾任广东罗定县守备，后在东安（今云浮）盐埠任职，经营官办盐务。晚年穷困，生计艰难。余汉谋七岁入肇庆县城西图始小学求读，毕业后考入广东陆军小学第五期。继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又转入保定军校为第六期步科。多年的军校学习生活，使余获得比较系统的军事科学知识，亦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9年秋，余汉谋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先被派至北京政府边防军曲同丰第一师见习，三个月后在第三团第十一连任排长，驻北苑。1920年直皖战争后边防军解散，余回广东加入粤军第三师，先任魏邦平部连长，回师广州讨伐桂系莫荣新部。在1921年6月敉平陆荣廷之役中因战功升任第九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余营守封川江口，以防滇、桂军东下。是年末，余营追随张发奎、邓演达等独立。1923年初余转入广东宪兵司令部任副官长，6月转任粤军第一师陈济棠步兵二旅参谋主任，半年后任该旅邓演达第三团第一营营长，所辖四个连长是李洁之、陈审、唐拔、陈诚。在一些战役中，余作战勇敢，机警灵活，指挥有当，颇受上级好评。

1925年8月，驻粤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余汉谋升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和南征中，率团作战颇为英勇。广东统一后，余率全团驻防高雷地区，绥靖地方，后任高雷警备司令。他得到当地进步力量的支持和配合，大力清剿土匪恶霸，发展地方交通事业。

“四一二”政变后，广东当局亦电令余汉谋在高雷地区“清党”。余感到时局混沌，要搜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又都是协助绥靖地方的友人，遂派员先通知他们立即潜离，次日才去查封工会、农会。10月，已任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一团团长的余汉谋借口有病留在兴宁，未参与阻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战事。但第三十一团在丰顺县汤坑与起义部队短兵相接，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副团长阵亡。

1928年2月，李济深回到广东，对全省军政、民政、财政重加整理，把粤军编为三个军，余汉谋升任第四军第一师师长，所部调驻肇庆。余在家乡肇庆锐意编练部队，并大力清剿土匪，除暴安民。翌年3月，李济深遭蒋介石扣押于南京鼓楼，第四军军长陈济棠被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和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余汉谋等一些粤军将领力主武力营救李济深，但陈济棠不允。在蒋介石编遣全国军队之际，余汉谋之第一师被编为第一旅，任旅长。在1929年5月粤桂之战中，余汉谋被告有通敌之嫌而遭扣押，所部众将士甚为不满，军心涣散，战事失利。陈济棠顾忌兵变，乃释余以参谋长名义到前方指挥。余重新部署前线战事，分三路反击，连战皆捷。战后余任第五十九师师长。11月又任第二纵队司令，率三个师在花县击败了张发奎与桂军的进攻，长驱直入广西腹地，纵横桂东、桂南，余在粤军中的声威陡增。

1931年5月，孙科“再造派”等各派反蒋势力因不满胡汉民被扣而集于广州，得到陈济棠等人的支持。在反蒋各派策动下，5月26日余汉谋与两广将领二十余人联衔通电，限蒋介石四十八小时内下野。27日反蒋各派即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余汉谋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统辖三个师驻防粤北，准备北上讨蒋。嗣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军民强烈要求“内息争端，外抗强寇”。宁、粤双方经过谈判，达成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但广州仍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拥胡汉民为领袖，实际也是陈济棠、李宗仁分掌实权。余汉谋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西南执行部委员。

1932年春，余汉谋被任命为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率第一军进驻赣南，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战事。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大余、南康、信丰、安远等地修筑城防工事；继在各县兴建公路和碉堡，以固守为主，保存实力；并积极扩编部队，充实装备。其后虽与工农红军有几次接触，但均指挥所部固守为上，偶有激烈交战，亦以退守城垣而息兵；蒋介石调集大军围攻红军，余部奉命堵击，亦未发生大的战斗。1934年10月红军撤离江西根据地西进长征，蒋介石下令余率部堵截追击，但他怕损兵折将，指挥所部退守大余、南雄，结果反遭红军袭击，只能边打边撤；在安息又遭红军攻击，再向湘境转移。他顾虑蒋介石部队乘机进入广东，佯令一部进至蓝山追击红军，而主力在坪石休整，于11月下旬回到赣南。

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蒋介石示意两广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正在陈济棠顾虑丧失西南霸主地位之际，桂系来游说两广共同以抗日为名揭橥反蒋。16日陈济棠召集余汉谋等粤将领密商，众说不一。余劝谏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有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诸铁路线和海上实力，可迅速运兵南下，我们难有必胜把握。部分将领亦赞同余说。但陈济棠认为粤、桂两军拥有三十多万兵力，空军飞机两百多架，海军舰艇数十艘，在抗日名义下倒蒋，必可取得全国舆论的同情和反蒋各派的支持。乃以请缨抗日为名，联合桂系于6月初出兵，分向湘、赣边进发。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共同商决一切，同时向湘、赣两省增兵，于6月10日抢占衡阳，阻粤、桂军北上。当他闻悉粤军内部意见不一，乃请孙科等人拉拢余汉谋等将领，并以重金收买广东空军。粤军部分将领本有反对内战、欲对陈济棠实行兵谏之意，敦促余汉谋出来领导。但余怕以下犯上、不忠不义之罪名和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一再拒绝众请，直到7月4日深夜才在粤将跪请之下下定决心。7月8日余飞往南京，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向蒋介

石效忠。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并发给活动费两百万元，在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陪同下回粤收拾残局。12日余飞回大余，14日通电就职，并指挥所部挺进韶关，沿粤汉路南下。此时粤军不少将领纷纷公开表态拥蒋反陈，广东空军七十二架飞机18日集体飞往南昌。当日，陈济棠被迫离粤去港，亡命欧洲。余汉谋24日到达广州，接管广东军权。嗣后蒋介石派黄慕松至穗，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余汉谋的倒戈投蒋，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广东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为加强对多年处于独立状态的广东的控制，于1936年9月26日特地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以何应钦、陈诚为正副主任，直接行使对军政的监督与处理权。余汉谋原本与蒋没有什么渊源，在国民党内又无可作奥援之势，他极有自知之明，对蒋介石和广州行营尊重有加，还两次主动将粤军加以整编，将十五个师整编为十个师，辖四十个步兵团和一个教导旅；对于蒋介石嫡系部队入粤和将一部粤军调离出境，也表示了服从的姿态，获得蒋之容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福建划为第四战区，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将所部编成张达第六十二军、张瑞贵第六十三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李振球第六十五军、叶肇第六十六军，六十二军军长张达兼琼崖守备司令，其他四个军先后奔赴淞沪、南京、兰封、南浔沿线、蒲圻等地作战。将士们英勇抗日，不怕牺牲，表现出民族大无畏气概。余汉谋在广东开办民运、防空、救济等训练班，培训各方面人才；1938年还设立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请闲散的粤籍将领主事，统率在各地建立起来的民众抗日自卫团。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台湾集结部队向广东进犯，出乎余汉谋意料突于10月11日派出数十艘军舰云集大亚湾，次日晨久纳诚一第十八师团在海军、空军掩护下于澳头强行登陆，我守备部队遭猛烈轰炸和炮击，全部牺牲。敌三宅俊雄第一〇四师团即于同日上午在大

亚湾东岸玻璃厂登陆。余汉谋仓促部署，一时难以集结大量队伍抵御敌之凌厉攻势。12日夜十八师团攻陷淡水，随即进至惠州西南，一〇四师团则进至惠州东部之平潭。15日敌占惠州，19日又尾追至增城。守城部队寡不敌众，弃城而走。20日夜，余汉谋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面对敌即将进犯广州之态势，决定在广增公路两侧布防以狙击敌人。但蒋介石下令广州附近之队伍转移粤北，以阻击北犯之敌。余部乃奉命退至广州以北九十公里之靖远、横石、新丰一线，致使广州空无一兵。21日下午日军兵不血刃进占广州。接着日军追击余部，迅即侵占从化、佛山、虎门等地，完全控制了广州附近地区。

余汉谋撤至粤北，将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驻翁源三华，整编所属队伍，部署在源潭、良口、龙门一线，以抗御敌人来犯。他在翁源开办军官训练团，轮流调训所部的中下级军官；同时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招收从广州撤退来的爱国青年学生加以集训，分派到各部队做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士兵抗日斗志。为保存实力，余未对日军进行反攻；对于1939年5月日人和知鹰二的诱降活动则严峻拒绝。

1939年11月，日本侵略军对两广发动大规模进攻，海军舰队掩护七十余艘运兵船，运送今村均第五师团和盐田定七台湾混成旅团在钦州湾登陆，分三路向南宁进犯，11月17日占防城、钦县后迅即推进，22日晚第五师团第七、十一两个旅团进抵邕江南岸，即从南宁的东南和西南进攻，24日上午突入城内。我抗日军队扼守昆仑关要隘及武鸣、宾阳一线阵地阻敌北犯。余汉谋应命派出陈公使第六十四军和陈骥第六十六军开赴前线支援；同时指挥缪培南第六十五军、张瑞贵第六十三军、黄涛第六十二军攻击敌之增援部队，次第收复英德、连江口、花县、从化等地，取得第一次粤北大捷。

1940年4月，日军从广州发兵两万余北犯，余汉谋以黄涛第六十二军和张瑞贵第六十三军分别从从化、良口阻敌，与敌激战不已；敌改向西犯，余指挥黄涛率部迎击，并调兵增援，顽强抗御，并乘势反击，大量杀伤敌人，迫使敌军夺路南逃。是年8月，余升任第七战区

司令长官，设长官部于韶关，仍兼第十二集团军统辖广东全省军队。在日军于1944年底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余汉谋派黄涛率第六十二军赴湘驰援，阻击日军南下。但日军还是进犯粤北，余率部抵抗两昼夜后，从韶关撤向赣南、粤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实行全盘整编，于1946年春将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予撤销，所部各军亦均被整编、裁减，大量抗日将士被裁减复员回乡。余汉谋被调离一直驻扎数十年的广东，改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在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中负责浙赣路沿线地区。余难以抗争，只是将历年积存的部队部分公积金及可变卖之资财分发给被裁将士去自谋生计。

1948年5月，余汉谋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调至南京。但这是一个名声甚高、实无职权的虚衔，所有军队的调动和指挥全在蒋介石及其亲信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手中。其时，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皆是节节败北，尤其在是年秋冬次第展开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略决战，更使国民党军的野战主力部队被歼殆尽。蒋介石难以为继，于1949年1月21日被迫下野，下野前于1月18日宣布余汉谋继宋子文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蒋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国民党中政会24日决定迁政府至广州办公，随后中央党部亦迁广州，顿使广州成了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

余汉谋回到广州后，想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乃在广东加紧扩编军队补充兵员充实装备；兼将旧部部署在湛江、肇庆、海南等地。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摧枯拉朽锐不可当。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劝导余汉谋起义以保全广州和粤境免受战祸。余疑虑多端，不敢决断。7月蒋介石来到广州督阵，主持制订保卫广州军事计划，更使余不敢动弹。8月，蒋介石任命余为华南军政长官，将驻在广东的十一个军交由余统一指挥。10月2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二十二万人分三路进军广东，余知势不可挽，乃暗中布置所部苟安退却，不要抵抗丧命。他还把绥靖公署大部分职员分批遣散，让他们各自逃命。10

月13日，余率残部从虎门乘海轮经湛江撤往海口。10月14日广州解放。

余汉谋到海口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琼崖防御副总司令、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协同薛岳死守海南，将逃入海南岛的残部编为五个军另两个师，加上海军第三舰队和空军四个大队，严密防御。但终究难以抵挡一批又一批解放军登陆进击。蒋介石从台湾调派舰船到榆林、八所来接走败军，余汉谋与薛岳于1950年4月22日晚乘运输机撤往台湾。残部在解放军追击下，劫夺当地渔船下海逃跑，但仍有三万余人被歼于岛内。海南岛于5月1日完全解放。

余汉谋到台湾后，先后挂名“总统府”战略顾问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1981年12月因喉癌殁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陈训北，正编著：《国民革命军事史初稿》，1931年南京版。

台北“国防部史政局”著：《剿匪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粤桂黔滇抗战》编写组编：《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四卷本），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

李洁之等：《蒋介石分化余汉谋粤系部队史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6辑，

1962年。

高要县政协文史办：《余汉谋简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高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高要文史》第2辑，1986年。

余日章

雷镇阊

余日章，原籍湖北蒲圻。1882年11月25日（清光绪八年十月十五日）生于武昌。父余文卿，早年加入基督教，为中华圣公会牧师。

余日章从小入教，并在教堂附设小学读书。1895年入武昌文华书院。190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由于教会学校多年的熏陶，“这时他对于宗教运动已感有热烈的兴趣”[(1)]。

1905年春，余日章返武昌任文华书院附中教员。1908年秋，靠美国传教士帮助，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科，191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12月下旬返国。次年春，任武昌文华大学附中校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组织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并充黎元洪的幕僚。不久，在黎元洪任都督的军政府外交部任交涉局局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英文秘书。

1912年，余日章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次年任该协会演讲部主任干事，曾到江苏、广东、云南等地宣扬基督教义，高唱“教育为立国的基础”[(2)]。从此开始了他以基督教活动为主的生涯。

1916年，余日章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理总干事，1917年9月正式任总干事，以后连任达十七年之久，1923年到1928年还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成为中国基督教界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

余日章一生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极力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人格救国论”，反对社会革命，认为中国所以衰弱，是因为所谓道

德的“退化”，只有皈依基督，才能修养人格，富强国家。这种“人格救国论”，实际上是“基督救国论”。

余日章成为中国基督教界头面人物后，又以“民间”姿态频繁地参加政界活动。他曾多次为当时政府派出访美，1915年5月至9月，曾参加当时袁世凯政府农商部的“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任该团名誉书记。这次访美的目的是所谓“联络邦交，促进实业”[(3)]。余作为该团发言人，在遍访美国大部分重要城市时，作了九十次讲演。他很会迎合美国某些人士的心理，使他们感到“没有一个从外国来的人曾使我们这样兴奋过”[(4)]。1921年11月，他又以“国民代表”身份随北京政府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抵美后，他奔走于美朝野人士之间，到处介绍“中国实况”，并“征询”美方对会议的“意见”，幻想美国政府会“赞助中国”。结果，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烟幕下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合法”根据。1927年7月，余再率代表团赴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国民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他竟引中国古时有兄弟因闹分家打官司，经人劝导后复和好的故事，妄图去“劝导”侵略中国的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发“善心”，与中国讲和睦相处[(5)]。1932年8月，余日章去美国治病，曾面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希望美国对日侵华有所遏制[(6)]。

1934年，余日章病重，辞去青年会总干事一职而任名誉总干事。1936年11月22日病逝于上海。

---

(1) 袁访赉：《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版，第3—4页。

(2) 袁访赉：《余日章传》，第25页。

(3) 袁访赉：《余日章传》，第42页。

(4) 袁访赉：《余日章传》，第42—43页。

(5) 袁访赉：《余日章传》，第100页。

(6) 袁访赉：《余日章传》，第126页。

余芝卿

汪仁泽

余芝卿，号茂芳，浙江宁波人，生于1874年1月24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父母早亡，自幼靠姊抚养。十三岁时由姊夫朱昆山荐入上海德盛成东洋庄[(1)]当学徒。1890年满师后曾到镇江谋生，二十岁时又回沪进德盛成做掮客。不久转入泰生祥东洋庄当跑街，积了些资金后，自己开设永泰祥东洋庄。后经销火油失败，1904年避往日本。

1907年，余芝卿与人合伙，在沪开设和昌盛东洋庄，资金银五千两，分作十股，余仅占一股。此时余在日本另做棉纱投机买卖，又告失败。债主逼债，赖华侨及日本朋友帮助，出兴隆票[(2)]了结。余一时生活无着，乃以给和昌盛在日本办理进货业务，赚取回佣为生。为了保住这一业务，他暗中贴给和昌盛经理百分之一和有关人员百分之零点五的进货回佣。余用这种手法，还招来了沪地其他东洋庄和厂商的办货生意，进益日丰。不久不仅还清了兴隆票，还在日本大阪独资开设鸿茂祥进出口商行。初因经营不善，一度亏损，后雇用年轻伙友薛福基精心经营，一年内反亏为盈。余对薛十分赏识，提他为经理，倚为得力助手。由于他们经营得法，鸿茂祥信誉日佳，期票可在市面上贴现使用，余亦成为当地著名侨商。

此后，余芝卿谋求在国内投资工商业，1919年命鸿茂祥账席吴哲生在上海开设鸿裕编带厂，自产花边经销，是为国内首创。此时，余芝卿开设的鸿茂祥的一项大宗业务，是包销日本武川橡胶厂生产的“地铃牌”和A字橡胶厂生产的“铁锚牌”帆布跑鞋、橡胶套鞋。这时日货跑鞋在华略有销路，而橡胶套鞋则因无夹里布，不透气，易引起烂脚，乏人问津。后来余的亲戚洪念祖，在上海将美国制造的套鞋寄

给余芝卿。余委托日本武川橡胶厂仿制，加放夹里布防潮，运回国内试销。由于式样美观，轻便舒适，销路大畅，替代了当时内地笨重的钉鞋雨靴。余因此获得厚利，数年后回国居沪上。他举止阔绰，引起歹徒注意，1925年初遭绑架，出五万元现洋始赎回。不久余离国侨居日本。

五卅运动前后，群众爱国热情高涨，日货普遍受到抵制，东洋庄前途黯淡。薛福基鉴于套鞋在国内销路已经打开，销售网亦已形成，又与日本厂商有联系，可以设法引进技术，且橡胶原料价格因国际上用代用品而不断下降，胶鞋利润优厚，因此怂恿余芝卿在国内自办橡胶厂。余乃出资六万两，让薛福基回国与吴哲生共同筹备。经过薛、吴等人多方努力筹办，1928年10月底橡胶厂正式开工，雇用月薪工八十人、计件工五十人。初拟厂名“上海橡胶厂”，有人认为振兴实业，有利于国家，应有自豪感，遂用“大中华”为厂名。商标取名寓意“名利双全”的“双钱牌”。初期日产千余双，质量较差。后余以重金聘用日本武川厂技师加藤为技术顾问，质量逐步提高，尤以涂油技术见长，光泽良好，不粘不裂，销路逐步打开。此时余芝卿表面上已经退休，实际上对厂控制甚严。

大中华厂的胶鞋产量，1931年至1935年间，每年保持六百万双左右的水平，1936年达到八百七十四万双。利润率初期约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余芝卿以其历年的大量盈余，投入扩大再生产。大中华逐步以一个厂，发展到后来的九个厂（大中华第一、二、三、四、五厂，天津分厂，织布厂，第一、二原料厂——碳酸钙厂和锌氧粉厂）；先后在芜湖开设营业所，在南京、汉口、长沙、广州、温州、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设立发行所，并在沪特约一些批发商和百货店，委托代做广告，推销商品。

余芝卿在事业上富有进取精神。他看到大中华生产套鞋、跑鞋已站住脚，进而生产人力车胎、自行车胎。1932年又提出试制汽车轮胎，拨出专款二十万元，从日本高价购进机器，聘来熟练工人传授操

作技术，1935年试制成功正式投产。1936年产汽车轮胎二万六千余条，人力车胎三十四万余条。抗战前夕，余并接受国民党笕桥空军学校委托，试制飞机轮胎。但是国内汽车轮胎市场长期为洋商“邓禄普”、“固特异”等橡胶公司所霸占，他们力图继续霸占我国市场，先以压低售价的手段，企图压垮大中华厂，后又由邓禄普（John Dunlop）出面，借口大中华汽车轮胎与其厂轮胎花纹近似，于1936年提起诉讼，大中华轮胎生产一度被迫中止。

大中华厂的资金自开办后一再增资，1929年以红利升值，增资为二十万元。此时，余芝卿为鼓励薛、吴的积极性分赠红股，并变独资为合伙。1931年增资时吸收外股，经销客户为了争取经销权纷纷入股，乃增资至一百一十万元，并改为两合公司。到1934年增资时，余为了化解劳资矛盾，防止跳槽自行开厂，采用吸收职工入股办法，增资为二百万元，其中职工入股十一万七千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有的职工年底所得红利，已超过工资数。1936年再增资至三百万元。

1937年7月抗战军兴。8月14日沪战第二天，中国空军飞机的炸弹，误落大世界游艺场附近，造成死伤数百人的惨祸，薛福基亦罹难。余芝卿悲痛之余，请洪念祖、余本性继其任。余芝卿因自己曾长期侨居日本，恐被敌人利用，乃潜去香港暂避，并以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向香港当局登记注册，在港设总管理处，上海改称办事处，全部企业由余在港遥控。他将沪地部分工厂化整为零，分向德、美驻沪领事馆注册，悬挂外国国旗以求庇护。同年11月，他将制造汽车轮胎的重要机器、原料内迁，拟经越南运往昆明开设分厂。当运至越南后，日军很快侵入，将其全部没收[(3)]。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日商曾威胁利诱大中华厂与之合作，遭余芝卿拒绝。后来日本宪兵队借辞逮捕洪念祖，进行胁逼，诈取钱财。此后重庆方面打算在内地建立橡胶轮胎厂，派人潜至上海联系，征得余芝卿的同意后，吴哲生赴渝筹划在云南设厂，向英国进口机

器。后因滇缅公路封锁，机器无法运入而作罢。

余芝卿平时喜好研究《易经》，晚年笃信佛教。对慈善事业亦常捐输，1934年曾捐款二万元兴办德元小学。

1941年冬，余芝卿回沪，不久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大中华橡胶厂档案资料》，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66—3—1。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工作组等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

李宝森：《大中华橡胶厂厂史》（未刊稿）。

---

(1) “东洋庄”是清末民初专营进口日本商品经销业务的批发商。德盛成当时专营日货磁器、料器。

(2) 债务人欠债后无力偿还，向友人借款还债，出给借条，书明待日后兴隆时归还。

(3) 摘自上海市档案馆资料，档案编号66—1—157。

俞承修

姚祚鼎　汪仁泽

俞承修，字志靖，江苏常熟人。1894年5月3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生。其父俞钟銮，清光绪丁酉科举人，是翁同龢的外甥，爱好文学。后因翁支持戊戌变法被黜受到牵连，遂改业中医；并在本邑创办“儒英两等小学”，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主旨，自此不再在仕途中求进取。俞家子女众多，俞承修居幼，从小敏慧，深得父亲喜爱，对之精心教读，期望殷切。

俞承修自小受传统教育，1909年考进江阴南菁文科高等学堂。该校前身为南菁书院，校内学习旧学的气息很浓，可是他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以及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等书刊，从而扩展了眼界，思欲有以振兴中华，改变祖国贫困落后面貌，走富国自强的“革新”之路。同时他对“君主立宪”和“伦理纲常”等等在少年时代所受教育，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当他读到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群己权界论》等有关“三权分立”的学说后，进一步认识到“民主”与“法制”是救国图强的必由之路。这正如他自己在自传中所说：“看了这些书，使年轻的我大为兴奋，尤其是‘共和制度’，深入我心，认为中国大有可为”，“从而就决定了我毕业以后决心去投考政法学校”[(1)]。

1912年，俞考进了省立苏州法政专门学校。该校的教师，不是英美派，就是德日派，所讲授的大都是西方国家的法学理论，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观念[(2)]。俞在法专毕业后，于1916年经浙江省司法人员考试录取为专审员，先后被派往浙江嘉兴、山东济南等地担任承审员。1919年到北京参加高等司法官考试，录取

后被派往北京司法官讲习所学习。入学之初，正值“五四”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俞也走上街头参加了这一伟大爱国运动。北京司法官讲习所的教师，多为年长资深的司法官，也有日本的法学专家。这两年的学习，为他日后在法学上取得成就打下了一定基础。1922年讲习所毕业后，他被先后派到浙江永嘉、吴兴、杭县等处地方审判厅为候补推事及代理检察官。1924年调往浙江高等审判厅办事。

1926年，在北伐战争影响下，上海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1927年俞被调至该院的上诉审法院任候补推事。

俞为人方正，耿直不阿。从1916年走上司法工作岗位，到1931年离开“临时法院”，整整十六年始终未获递补正缺，当有人嘲笑他是个“老候补”时，他也处之泰然，不以为忤，但云只求问心无愧而已。在此一段时间，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公余之暇，搜集各国法律资料，钻研法学理论，每有发现或心得，即与俞钟骆、张志让等相互探讨，悉心研究，并视此为他生活中的最大乐趣。1927年，东吴大学校长吴经熊谂知他对法学钻研有素，并在刑法学方面有独到见解，就聘请他到东吴大学讲授刑法学。他在讲课中，每常用大理院的“判例”和“解释”，结合他自己在法院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来讲授课文，阐明法理，内容生动，易懂易记，深受学生欢迎并得到学校好评。自此遂蜚声讲坛，为高教界所知名，一些院校竞相争聘。从1930年起，他先后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以及震旦大学等院校兼课，讲授民、刑、亲属、继承等法，其中以讲刑法为主。当时在法学界中曾被誉为桃李满天下的刑法专家。

1931年，俞辞去了法院工作，加入上海律师公会，并在任课之余，开业从事律师事务。不久，又担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1930年至1935年，他主编《法令周刊》，除为读者解答法律问题外，还为该刊撰写专题和论文。1936年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了他所编《中华民国刑法总则释义》和《中华民国刑法分则释义》，次年又出版了他所

编的《中华民国新旧刑法比较》[3]。当时一些高等院校曾选用它作为教材或参考书。

1937年抗战开始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9年，上海特区法院被敌伪接管后，俞出于爱国主义思想，自行停止了律师业务，并坚决抵制敌伪对他的威胁和利诱，拒绝参加敌伪组织。这时他继续在持志等院校任教，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才重新复业，执行律师事务。1946年，俞曾应聘担任国民党苏、浙、皖区敌产管理局的法律顾问，同时还担任“中华法学会上海分会”的理事、“上海司法协会”的常务理事和“上海法学编译社”座谈会委员，从事研究法律等学术活动。

他在从事律师事务期间，除办理一般案件外，还能出于正义为受迫害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工人出庭作义务辩护。如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政府为了坚持“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镇压在全国兴起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时称“七君子”事件。当时俞承修等上海、苏州的二十一位律师，出于爱国激情和对反动当局的愤慨，主动担任代表律师，为此案出庭作义务辩护。又如1948年1月，上海展开了争民主、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瞿宇平等十一人被国民党逮捕。俞曾替瞿等出庭辩护，办理“同济学潮”案件，最后瞿等全部获释。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此向俞赠送题词为“保障人权、发扬民主”的红色锦旗一面，以资表彰。此外，他还直接或间接支持被国民党逮捕的爱国学生和青年工人，替他们代写诉状，同国民党展开合法斗争。他这样做，随时有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可是他从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这种见义勇为支持革命斗争的忘我精神，赢得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1949年上海解放后到1952年，俞仍继续在震旦大学执教，并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参加陪审工作。之后，他又担任了中华新法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委员会委员。这时，俞虽已年近六旬，但老骥伏枥，壮志未

已，常向人表示：要继续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政策和法令，并搜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资料，去从中探究社会主义的立法精神，以备我国立法部门起草民、刑、诉讼等法案，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提供材料[4]。不幸的是数十年来俞承修所搜集和积累起来的中外法学资料以及他历年来所写的专著和文稿，在196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被抄没一空，他本人在惊恐之余，1967年1月20日赍志饮恨而殁。

---

(1) 俞承修本人自传。

(2) 俞承修本人自传。

(3) 均由上海会文堂新纪书局印刷发行。

(4) 1952年9月俞本人所填《震旦大学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

俞济时

严如平

俞济时，字良桢，号邦樑。1904年6月14日（清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一）生。浙江奉化人。父亲俞阿城，清末小吏，在奉化县衙任税务、田赋员，生有十几个子女，贫困拮据，难以度日，有的孩子出生不久就给别人寄养。俞济时五岁发蒙，九岁入小学，继入中学，后辍学。1920年到县城永丰米店当学徒。旧式的店规，繁重的劳作，卑微的地位，稀少的薪给，使他心情郁闷，度日如年，以学些书画、珠算自解。一次担送饭菜时不慎摔跤，把饭菜全部倒翻，他怕被责打不敢回店，乃离家远走，1922年至福建浦城县政府任庶务职。1923年到了广州，投奔本族叔辈俞飞鹏。在粤军任审计处长的俞飞鹏，正应蒋介石之召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办工作，乃保荐俞济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二队。俞进入崭新天地，学习刻苦，操练认真，恪守纪律，学业优良。结业后俞济时被编在教导团，参加了两次东征，升为排长。经俞飞鹏之推荐，俞济时被素重乡情的蒋介石留在身边担任侍卫，吃苦耐劳、诚实忠顺的表现日渐获得蒋之好感。

1926年7月北伐战启，俞济时升任总司令部警卫团第二营营长，随同蒋介石北上湘、鄂，又至江西、上海，始终随侍在侧。他忠于职守，又深谙蒋介石之习惯和脾性，唯命是从，更得蒋之喜爱，遂升任警卫团团长。1928年北伐奉张结束后，全国编遣军队，诸多军缩编为师、师编为旅，唯独警卫团扩编为警卫第一旅，俞济时升为旅长，旋并兼代中央宪兵司令。俞虽升任要职，尚能谨守职责，受蒋介石进一步信任。1930年警卫第一旅又扩编为警卫司令部，俞任中将司令兼第一旅旅长。1931年警卫司令部与教导一师合编为警卫师，俞任副师长；不久，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顾祝同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俞为第二师师长。警卫军全以德国武器装备，按德国操典进行训练，军、

师、团三级均配有德国顾问，自知浅薄的俞对顾祝同及德国顾问均甚为尊重，并努力学习德国操典，所部成为一支精锐部队。嗣后，警二师改为陆军第八十八师，俞仍任师长。

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后，又于1932年1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御。日本侵略军不能得手，乃增兵扩大战事。驻扎在沪杭线的第八十八师将士义愤填膺，请缨杀敌。俞济时2月1日致电蒋介石云：“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惟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1)] 蒋介石回复令其听命何应钦调遣。与此同时，驻沪宁线的第八十七师宋希濂第二五九旅全体将士宣誓请缨；孙元良第二六一旅之团以下官佐一百八十余人具文请愿。2月6日，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2)]，并愿率部效命疆场。蒋介石盱衡战局，即以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并辖俞济时第八十八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俞师先于2月5日集结于苏州，归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指挥，7日进至南翔。11日，俞济时领衔与副师长李延年、第二六四旅旅长杨步飞、第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以及第二五九旅旅长宋希濂联名通电全国谓：“济时等忝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敌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并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光鼐），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3)]

俞济时率领第八十八师开赴江湾、庙行、大场一线，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坚守阵地。敌军在海军配合下疯狂进攻，炮火猛烈，我抗日将士死伤累累，但英勇不屈。2月20日起，日军重点进攻庙行一带，俞师在庙行南麦家宅阵地，与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激战不已，俞济时率师部从冯家宅赴前沿阵地督战。庙行之战异常激烈，我抗日将士同仇敌忾，不畏炮火，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第二六二旅旅长、副旅长均负重伤，全旅伤亡营长六、连排长近百、士兵逾千。俞济时亦腹部中弹致肠穿孔，不得不离队治疗，师长一职交孙元良接任。2月

29日第八十八师奉调至庙行南竹园墩防守；接着撤退至嘉定、常熟。

俞济时在淞沪抗战中负伤后，经上海的德国医院治疗得以痊愈。1933年，俞调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他衔蒋介石之命，把全省的保安团队及各县区的保安机构，改建成一支统一领导的地方绥靖力量。先以第八十八师旧部顶替原属浙军一、二师的营以上官佐；连排长则调至士官教育团训练三个月；招募之新兵需在新兵教育总队进行严格训练，以提高队伍素质。他竭力整编各县保安团，提出一个三年计划，其中规定县长兼团长，副团长由省保安处委派，实际上把县长控制在自己手中。计划上报后，省主席鲁涤平未予批准；俞越级上报给蒋介石，蒋即寄批“准予试办”。自此，俞在浙江飞扬跋扈，不把省主席或厅长们放在眼里。他对查获之吸毒、贩毒者均处以死刑，令人畏惧。他还在省保安处增设一个情报股，隶属南京军委会特务处，专事收集情报、逮捕爱国人士的特务活动。

1934年12月，俞济时被任命为赣浙皖“剿匪”指挥官，辖有伍诚仁第四十九师、王耀武预备旅和第七师第二十一旅，开赴安徽太平县一带，追剿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俞自率一个加强营，随王耀武旅行动。在谭家桥战斗中，俞对先遣队的突然进袭毫无准备，惊恐不已，手令王耀武坚决顶住；同时把加强营增援到正面作战。先遣队连续发起进攻，俞赶至前线督战，宣布退却者格杀勿论；并集中迫击炮、机枪火力向先遣队猛烈射击。先遣队伤亡甚众，副指挥兼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负重伤。接着俞又指挥王耀武旅在德兴搜索，俘获了先遣队政治委员方志敏等人。嗣后，俞济时被蒋介石调往宜昌，与被红军歼灭了主力的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合并，由俞兼任师长，就地编组何凌霄第一七二旅和吴济光第一七四旅。由于红军第二、六军团已向湖南方向发展，俞乃在宜昌整训部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俞济时被任命为第七十四军军长，除有自兼的第五十八师外，还有王耀武第五十一师。随即奉调从武汉经南京至上海，参加淞沪会战，编属薛岳左翼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布阵在吴淞

口至罗店、浏河一线。抗日将士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抗御侵略军的一次又一次进犯。第七十四军伤亡甚重，于9月30日退往蕴藻浜南第二线阵地，继续御敌。10月26日大场失陷后，俞率第七十四军退至南翔；11月8日日军在金山卫大举登陆后，俞部乃向青浦撤退。在青浦、苏州等地，俞部抗御追击之日军，牺牲众多。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第七十四军亦编入南京保卫战序列，但因缺员太多，已无甚作战能力。南京失陷后，俞率部到湖北沙市一带整训补充。不久奉命开赴江苏丰县，参加徐州会战。8月5日俞被任命为第三十六军团长，除自兼之第七十四军外，还辖陈安宝第二十九军。随即移师江西马迥岭防线，参加武汉保卫战。在万家岭一战中击溃日军一个旅，受到嘉奖。

武汉会战结束后，俞济时率第七十四军赴长沙、湘阴一带整训，兼长湘警备司令。11月13日长沙大火，震惊中外。俞奉蒋介石密电，负责处决直接责任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以平息民愤。俞同时还处决了执行枪决命令而私吞酆悌金表、金笔的卫士，以正军纪。1939年4月，日军板垣师团所部向高安进犯，驻在长沙以南的俞济时指挥第七十四军及刘多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师开赴高安。俞指挥各师反攻，经十个昼夜的苦战，夺回高安城，歼敌一个联队，又添声誉。

俞济时于1939年7月被任命为新五军军长。新五军是我国当时一支独一无二的机械化部队，俞准备带第五十八师赴任。但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机械化兵监徐庭瑶向蒋提出：俞非机械化人才，恐难胜任此职。蒋无奈，在白、徐的报告上批了“考虑”两字。俞难以如愿，病休了一些日子后，于10月调到浙江出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六军军长。他秉承蒋介石旨意，下力整编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自行建立的“国民抗敌自卫团”，将四个纵队缩为暂编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师，又将省保安纵队编为第三十五师，然后组成暂编第九军，由原第八十六军军长冯圣法任军长，分驻温州、台州、宁波等浙东各地。

俞济时自设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部于新昌，不把驻在金华岭下朱的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放在眼里，凡事直接向第三战区和重庆军委会请示汇报，与刘龃龉不断。

1941年5月，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发动浙东战役，俞济时所部莫与硕第八十六军等望敌而逃，日军兵不血刃轻取宁波、台州、温州等口岸，奉化溪口亦为敌所占。在浙江已有人怨的俞济时遭到各方抨击，不得不撤销副总司令部，于8月潜往重庆。

俞济时在浙江整编了黄绍竑的“国民抗敌自卫团”，是有大功于蒋介石的；虽然浙东战役之败难辞其咎，但仍得蒋之垂爱，于1942年11月被任命为蒋介石之侍卫长。侍卫长一职，原隶属于侍从室第一处，俞得到蒋之特准，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室，直接隶属于蒋介石，比侍从室第一处的地位还高。俞还把军委会警卫团扩充为警卫旅，除护卫蒋之官邸、别墅外，还担任军委会各部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会所在地的警卫。俞在侍卫长室下又先后设武官室、参事室，凡是要晋见蒋介石的军政要员以及外宾，均要先在武官室登记，经俞签署后再报蒋核准；参事室则是一个情报机构，三十多人以“视察”之职称分布各战区，收集军统、中统及中共的活动情报，由俞核转送蒋，真乃“特务之特务”。俞之所为，深得日理万机的蒋介石之欢心，俞之权势日增。1943年俞兼侍从室第一处副主任，12月又兼军委会铨叙厅副厅长；1945年3月被任命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后者乃军职之升任，但俞并未赴任，仍在重庆任侍卫长及侍从室第一处代主任之要职。

抗战胜利后不久，委员长侍从室改组，俞济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务局局长，掌理原侍从室第一处之要务。对于国民党军队主要将领之升迁调动，以及军法处置等，俞拥有向蒋参奏之职权。对于各路军队之作战态势，俞除设专人研究国防部报送的战报外，还设置一批战地视察官分处各地掌握实况，由作战研究室加以综合，每天绘出作战态势要图报送蒋介石，供蒋指挥作战以至作出重大决策之参考。

俞济时日益得宠于蒋介石。在1946年9月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俞列名为中央干事会干事；翌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党团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中央，俞列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总统后，俞出任总统府军务局局长。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溃败，不得不于1949年1月宣告辞去总统职，返回老家奉化溪口，但仍为国民党总裁，操纵一切。俞济时陪同蒋介石回浙，随侍警卫；8月被蒋任命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说起来职权更大，只不过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濒临崩溃，再大的职权也无处可使。此后俞随蒋介石辗转广州、重庆、成都，于12月护卫蒋介石撤往台湾。

俞济时到台湾后，于1950年3月起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战略顾问；1953年为“国策顾问”。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俞济时亦告老退休，仍挂有“总统府国策顾问”之衔领薪。1990年1月25日因急性胆囊炎不治而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台北史政编译局1983年版。

汪煜：《两任浙江保安处长的俞济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汪坚心：《我所知道的俞济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1987年—1992年版。

严如军、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

(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445页。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3)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俞庆棠

郭烙

俞庆棠，字凤岐，江苏太仓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上海。父亲俞棣云，系邮局职员。她三岁丧母，十岁丧父，由大哥俞风宾（上海名医）抚养成人。她的仲兄是名记者俞颂华。

俞庆棠1914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校，1916年入中西女塾，其后又入圣玛利亚女校学习。她自幼活泼、勇敢，娴于辞令，曾获上海学生演说竞赛第三名。五四运动时，她代表圣玛利亚女校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并代表上海学联出席过全国学联会议。通过参加五四运动，她认识到对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决心从民众教育入手，振兴中国。从此她始终不渝地献身于民众教育事业。

1919年秋，俞庆棠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台来佛亚（Deleware）女子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当选为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2年，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回国后，与唐庆诒（留美学生，在上海交通部南洋大学任教）结婚，历任无锡中学教师、大夏大学教授。1927年夏起，她担任江苏大学区（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江苏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等职，负责规划江苏省的社会教育事业。

俞庆棠在美国留学时，一度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她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环境，整个人生都可以受教育。她把这种教育思想和她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想结合起来，把民众教育当作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手段，提出一系列改进民众教育的理论和措施。她说：“中国民众教育的运动，是改进现行教育、完成教

育理论、经营合理的共同生活的一种教育运动；是根据中国实际社会需要，经过了屡次严重国难的刺激而激发的民族复兴运动。”[1] 她认为：“民众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全民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知能道德的前进和向上。”[2] 因此，“凡改变群众行为，授予知识技能理想而改进其个人团体生活的工作（如合作社、乡村改进会、保甲会议、农业推广等），都是它有效的方式”[3]。她还主张，教材与课程设置，应从民众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并注意培养民族意识。

俞庆棠为了实践她的教育思想，在江苏省创办和充实民众学校、民教馆、农教馆、图书馆等。1928年创办了以培养民众教育师资为目的的江苏大学民众教育学校（后改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自兼校长。不久，她辞去校长职务，担任该院教授及研究实验部主任。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她在该院专心致志地培养民众教育的师资，进行民众教育的实验和推广工作。民众教育首先在江苏全省得到比较普遍的发展，应归功于她的努力倡导，所以她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抗战前，江苏省经她创办或指导创办的民众教育机关有一百多处，仅在无锡就设有四个民众教育实验区、三十九所民校。她经常徒步深入农村，指导民校工作。她指导将识字教育与生产教育结合起来，由民校教师向农民推广优良稻麦品种，防治病虫害，传授养蚕技术及改良鸡、猪等家畜品种。她指导民校及民教馆组织民众成立信用、生产及运输合作社，颇受民众欢迎。1931年，她联合全国从事社会教育的人员，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研究促进社教事业的机构。她当选为该社的总干事。该社曾创办河南洛阳及广东花县两个民教实验区，其后又在桂林、重庆等地推广社教事业。

1933年，俞庆棠赴欧洲，考察丹麦、荷兰、英、德、法、奥、意等国的成人教育与合作事业。她最赞赏丹麦的民众教育。丹麦由民众学校教育农民，当时已经没有文盲了。

1935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她积极参加文化界救国会的活动，开始对国民党的统治感到失望和不满。当江苏教育学院当局迫害和开

除进步学生（有的是共产党员）时，她常为受迫害的学生辩护，保全了不少学生的学籍。这年冬，她主编《申报》的《农村生活丛谈》专栏，报道各地农民生活的困苦、吏治的腐败、赋税地租的繁重等。该栏文章后来汇编成书出版，她在序言中写道："编者自己从事农村工作，已有十年的历史，对于农民的疾苦体验得很深，对于农村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这是十年前在大学里教书时所意想不到的。"她看到农村"种田的没有地，有地的不种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城市中，民族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摧残、压迫，得不到发展，工人失业问题严重，越来越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失望和不满。但她幻想"以教育的力量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把一切障碍破除"[(4)]。她对勤劳而聪明的工农子弟不能享受教育权、而富家的纨绔子弟却有享受高等教育的特权，感到愤愤不平，屡次为工农民众的教育权而大声疾呼。

"一二九"运动中，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火车在无锡被阻。俞庆棠率领无锡学生携带食品热情慰问，并在《大众生活》杂志上发表《写给上海学生请愿团的一封公开的信》，热情洋溢地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谴责宪兵强押学生回沪的反动行径，鼓励学生要"永远站在大众利益的立场上，来从事救国的伟业"[(5)]。1936年，她发表《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一文，提出当前所需的教育是国难教育、生产教育和妇女教育。关于国难教育，她说：应"使民众了解个人的生活与民族存亡的密切关系，使民众相信自身力量的伟大，从而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抵御外侮，保护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关于生产教育，她认为"要将现社会的生产组织所加于受教育者的桎梏解除"，才能使人民受到正常的生产教育，从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她说妇女教育"是培植为民族谋生存而奋斗的新战士的教育，为社会增生产而努力的生力军的教育"。她号召民众教育工作者，做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大众宣传者和组织者"[(6)]。

抗战爆发后，俞庆棠只身奔赴汉口，参加难童保育及妇女救济工

作。1938年3月，她参加庐山妇女谈话会，作了开展后方妇女生产工作的发言。后来她撤退到重庆，担任妇女新生活指导委员会的生产部长，在永川县的松溉创设了一个纺织实验区，以妇女生产学校为中心，招收抗日军人家属及妇女入学，前后达数千人，组织她们学习文化与纺织技术，生产军服布、军毯、纱布、药棉等支援前线。她又在乐山设立蚕丝实验区，结合改良蚕种、改进缫丝方法，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在农村工作中，她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有人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她严加拒绝。1939年3月，她返沪探亲，为照料患病的女儿，留在上海，先后在东吴、沪江、震旦等大学担任教授，讲授“社会学”、“民众教育”等课程。其后又兼任申新纺织厂第二、第五两厂的福利科长，创办工人学校、合作社、医院等福利事业。

抗战胜利后，俞庆棠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她领导创办了一百多所市立民众学校，恢复了市立图书馆、民教馆、体育场、博物馆等社教机构，还重点创办了一所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自任校长，作为她的实验园地。该校招收工人、妇女及失学儿童入学，共有学生二千七百多人，所有教室每天从早到晚由四班不同程度的学生轮流上课。还附设有托儿所、缝纫班、电工合作社、诊疗所等福利设施。该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利用推广民教的方便，办墙报、编歌曲，办巡回文库（即小图书馆）、展览会、演讲会，进行革命宣传。实验民校的民主进步气氛，引起反动当局的嫉恨，他们不断对俞庆棠施加压力。她于1946年愤而辞去教育局职务。1947年，上海市参议会提出要停办实验民校，她说：“谁来停办民校，我和他们拼命！”[(7)] 她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展开了护校运动，使实验民校得以保存。其后，反动当局又迫她辞去实验民校校长职，她说：“我决不辞职，除非撤我的职！”[(8)]

从1947年起，俞庆棠担任联合国科学教育及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

委员。1948年，她又担任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她应邀赴美国考察战时的难童教育。

1949年5月，她离美返国，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她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49年12月4日，俞庆棠患脑溢血症在北京病逝。

俞庆棠的著作有《民众教育》，主编有《农村生活丛谈》、《中国社会问题参考资料索引》、《民众教育概论重要参考书索引》等，她还与孟宪承合译了杜威的《思维与教学》。

---

(1) 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页。

(2) 俞庆棠：《民众教育》，第3页。

(3) 俞庆棠：《民众教育》，第3页。

(4) 俞庆棠：《民众教育者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应有的新认识》，《申报周刊》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5) 《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

(6) 《申报周刊》第1卷第43期（1936年11月）。

(7) 唐孝纯：《纪念母亲》，俞庆棠先生追悼会筹备委员会编《俞庆棠先生纪念集》，1957年版，第141页。

(8) 胡耐秋：《女教育家俞庆棠先生生平》，《俞庆棠先生纪念集》，第35页。

俞颂华

俞湘文　葛思恩

俞颂华，名垚，江苏太仓人。生于1893年3月9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父俞书祥，字隶云，在上海电报局工作，初为电报生，后逐步升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俞颂华少年时代，曾肄业于上海澄衷中学，后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又转入上海复旦公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

俞颂华自日本毕业回国后，应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之邀，任该报副刊《学灯》主编，并参与《解放与改造》杂志的编撰工作。时在五四运动之后，《解放与改造》杂志曾介绍当时西方新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费边主义、乌托邦、无政府主义等各派学说，因而风行一时。

1919年底，我国派驻海参崴的外交代表李兰洲（家鏊）邀俞颂华担任日文秘书。俞颂华志在新闻事业，对日文秘书工作不感兴趣，故到海参崴不久就放弃了这个高薪的工作，回到上海，仍任《学灯》主编。

1920年秋，《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联合派一批记者赴苏俄采访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被派的有俞颂华和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李仲武。这是最早去苏采访的中国记者。他们与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行。但由于当时西伯利亚铁路暂时中断，他们滞留哈尔滨甚久，于次年1月25日始抵莫斯科。他们游览了莫斯科并访问了彼得格勒，会见了列宁、莫洛托夫等革命领袖。3月初又访问了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采访通讯，分别在《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后来《北京晨报》把通讯辑成《赤俄见闻记》

一书印行，曾再版多次。这些通讯对帮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俞颂华在苏采访约有半年，随后他离俄国经波兰到德国。在那里，他一面仍担任记者工作，一面进柏林大学研习哲学、论理学（逻辑学的旧称）和马克思主义等，其间曾两次赴法国。

1924年俞颂华自德回国，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授。后中国公学停办，由钱经宇（智修）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并先后在中央大学商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暨南大学、劳动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校兼课，讲授社会学、逻辑学等课程。他为《东方杂志》的国际栏撰写时事述评，直到1932年“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时，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毁，《东方杂志》暂时停刊，他才离开商务。随后，经黄炎培介绍，他进入上海申报馆工作。

俞到申报馆后，任新创刊的《申报月刊》总编辑。《申报月刊》创刊于1932年7月，在《创刊词》中提出创办这个刊物的宗旨是：认清时代潮流的趋势，以增进最大多数劳苦民众的福利为目标。为贯彻这一目标，俞颂华邀约许多知名人士为该刊写稿。1936年《申报月刊》改成《申报周刊》。在同一时期。他还与俞寰澄、李孤帆等创办了《新社会》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前后办了两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起了变化。1937年4月，申报馆派俞颂华和孙恩霖赴延安采访，他们是西安事变后国内最早派往陕北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记者。他们到延安后的第二天（4月16日）晚上，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烛光下作竟夜之谈。其时在卢沟桥事变前三个月。他们聆听了毛泽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估计与中国方面应采取的战略问题的谈话[(1)]。第二天又会晤了周恩来和朱德，并在当天晚上出席了延安的文艺晚会，和毛泽东、朱德、史沫特

莱同座观看了“抗日剧团”的演出。后来俞颂华在他所写的通讯中说：剧场虽然简陋，但表演的人很有精神，表演的戏剧和节目都很有爱国的意识。他还说：“在离肤施（延安）的时候，我们回首看城门两旁城墙上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八个大字，不由得感到愉快，因为我觉得这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国民的一致愿望。”[(2)] 这篇通讯是国内新闻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陕北情况较早的一篇，曾引起广泛的注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后，俞颂华于8月应邀赴广州筹办《星粤日报》未成，转往武汉，参加《申报》汉口版的工作。

1938年春，俞颂华应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主任马星野邀请，赴湘西芷江任该校新闻系教授，讲授“逻辑学”、“新闻写作”、“新闻学专题研究”等课程；同年暑期，随该校迁往重庆。因与学校当局的关系不协调，1940年他离重庆赴香港任《星报》（晚报）主笔。不久又应胡文虎的邀请，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但国民党有关当局不肯放过他，要胡文虎解聘他，因此他被迫再去香港。到港后，适值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创刊，梁漱溟任社长，俞颂华应梁的邀约担任了该报的总编辑。

《光明报》只办了两个多月，即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香港而被迫停刊。俞颂华始则隐姓埋名，以后化装成商人，离港到桂林，任《广西日报》总编辑。《广西日报》系地方报纸，原来销数只有几千份。他负责编辑后，力加整顿，邀请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为该报撰稿，报纸面目为之一新，销数随之日增，多时行销到两万多份。

俞颂华在《广西日报》期间，该报也受到国民党的压力，不许他在该报工作，他又一次被迫离开，转往湖南衡阳任《大刚报》总编辑。他为《大刚报》开辟了“星期增刊”。特别是他创办的“敌后航空版”（用飞机载往日军占领区散发），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创举。

俞在《大刚报》工作了近一年。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占衡阳，俞颂华再次转往重庆，受黄炎培之聘，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国讯》杂志。抗战后期，由于长期流离颠沛，他的健康受到损害，患了肺病，但因经济拮据，无力医治。

抗战胜利后，俞到四川璧山任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但仍兼《国讯》主编。1946年夏，他随校迁往苏州。1947年10月11日因肺病在苏州逝世。遗著除前述在苏俄采访时的通讯集《赤俄见闻记》外，尚有《柏拉图》一书。

---

(1) 1981年孙恩霖与作者的谈话。

(2) 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申报周刊》（1937年5月23日），收入葛思恩、俞湘文编《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3—240页。

俞佐庭

陈春雩　宋紫云

俞佐庭，字崇功，1889年1月3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浙江镇海。父亲俞樵芗是当地挂牌中医，对子女管教甚严。俞佐庭少时入私塾，勤奋好学。俞有表叔李璇祥和李咏裳，是镇海富绅，在镇海和宁波开设镇余、慎德[(1)]两钱庄。俞佐庭十六岁时进余姚木行当学徒，满师后于1908年进镇余钱庄当职员。不久，俞到上海进恒祥钱庄任账房。1916年任宁波天益钱庄经理，俞进镇余和天益，都是表叔李璇祥、李咏裳的关系。

俞佐庭任职天益钱庄后，交友广阔，得识沪上闻人虞洽卿等。1921年，俞佐庭任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副经理，和在该公司任职的陈布雷相结识，并成为知友。1926年，俞通过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的同乡关系，曾一度任天津垦业银行经理。1927年俞任宁波市财政局局长，仍任天益钱庄经理，遂被推选为市总商会会长，为甬地工商界出谋筹划。为了办事，同时也多次为当局摊捐派税。此时上海颜料业巨商秦涵琛在甬去世，俞被邀任秦家的治丧总管，由于办事周到，深受秦家赏识。1931年俞在沪筹设恒巽钱庄，得到秦家的大力支持，共募得十一股，秦家投资五股，李咏裳和徐庆云各投资两股半，俞自认一股，并任经理。在此前后直到抗战期间，俞先后在宁波独资开设慎生、正大、东升、万成四家咸鱼行；在宁波、绍兴、杭州、上海等地十四家企业中拥有股份，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长和董监事等职[(2)]。

1931年俞佐庭被选为上海市钱业公会常务委员。此时甬地钱庄存款多于贷放，多余资金急需谋求出路。俞熟悉沪、甬两地金融情况，因此甬地钱庄通过俞的关系，定期对沪地工商界进行短期放款。这样

既满足了沪地一部分工商界调剂资金的需要，也为甬地资金找到了一部分出路，俞在两地工商界中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1934年6月到1936年6月，俞当选为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在此期间，俞鉴于橡胶业等因盲目竞争投产，造成销路呆滞，招致严重亏损，乃拟就《统制工业条例》草案，由市商会报国民政府批准在全国施行，但未被采纳。后市商会鼓励同业自行联合，统一调剂产销，火柴业首先实行，收到一定效果。1934年8月，在俞佐庭主持下，市商会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北河南路天后宫原已停顿的国货商场从事改组扩充，重新开幕。参加厂商三十多家，群策群力，推销国货，配合了当时全市性的爱用国货运动，也为各厂商推销了不少商品。在沪地的影响下，外地厂商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的国货商场。除此之外，俞并重视商业人才的培养和职工的业余教育，开办了商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补习夜校的劳工班等。1936年6月，上海市商会改选，王晓籁继俞任主席委员，俞佐庭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俞佐庭与杜月笙的关系密切，早在1933年便结为换帖兄弟。1935年由于市场萧条，银根吃紧，钱庄放款一时无法收回，资金周转失灵，提存之风骤起。俞佐庭经理的恒巽和恒兴、恒隆、恒赉四家钱庄，更是面临倒闭险境。此时杜月笙为国民政府指派的“钱业监理委员会”委员，在杜的支持下，恒巽等四家钱庄以房地产向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进行押款，始得渡过难关。

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对日妥协，响应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物色工商界、金融界头面人物，组成经济考察团[(3)]，赴日进行所谓“亲善”活动，俞亦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同年四明银行因滥发银元券发生挤兑，官僚资本乘机加以控制，加入大量“官股”。次年冬该行改组，俞佐庭经股东大会推定为商股董事，后又在董监联席会议上被选为私股常务董事。1937年四明银行等设四明储蓄会，该行总经理孙衡甫兼任会长，俞任经理。不久，该会并入银行信托部，俞因而离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沪、宁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俞佐庭除继续经营钱庄业务外，深居简出，尽量减少社会活动，以保安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曾胁逼俞出任伪中央储备银行要职。他不愿附逆，偕其弟俞佐宸离沪，辗转避往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继续担任四明银行私股常务董事。1947年俞经陈布雷的推荐，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兼常务董事，同年当选为“国大代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俞佐庭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职务，携眷迁往台湾。1950年其在台求学的独子病死后，离台移居香港。1951年6月病故于香港。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5年版。

《申报》1935年10月3日。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

上海市工商联档案资料。

俞佐宸访问记录。

---

(1) 慎德钱庄后因营业不振，改组为天益钱庄，仍由俞佐庭任经理。

(2) 十四家企业及俞所任职务列下：上海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宁波永

耀电力公司董事、宁波四明电话公司董事、宁波冷藏公司董事、宁波和丰纱厂董事长、宁波大丰面粉厂董事、绍兴大明电灯公司董事长、嘉兴民丰造纸厂董事、杭州华丰造纸厂董事、上海美伦毛纺厂董事长、上海惠中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四明银行常务董事、上海统原银行董事、香港大新银行董事长。

(3) 赴日经济考察团有十五人。吴鼎昌任团长，团员有宋汉章、黄文植、俞佐庭、陈光甫、周作民、钱永铭、刘鸿生、徐新六、唐寿民等人。

虞洽卿

汪仁泽

虞洽卿，名和德，以字行，1867年6月19日（清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生于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其父虞晓峰在家乡开设小杂货店。虞六岁丧父，家贫，在私塾就读三年后即辍学。十五岁时经族人介绍到上海，进瑞原颜料行当学徒。不久升任跑街，业余从西人学习英文。

虞洽卿善于推销商品，于1892年进德商鲁麟洋行任跑街，后升买办。该行除进口颜料外，兼营西药、军装（包括军火、器械等），出口豆粮、桐油，虞所得薪金及回佣甚为优厚。1896年，虞捐资清廷得候补道衔，旋买进闸北升顺里等处房屋，开始跻身于绅商之列。

1902年，虞洽卿谋得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的职位，遂辞鲁麟洋行职。翌年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会审公堂案[(1)]，地方官员着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与租界当局交涉。初无成效，其余三人畏难辞去，独虞一人继续奔走，日夜邀集各界代表商讨对策。在民众支持下，受雇于洋人的华工纷纷辞退，华捕罢岗，迫使租界当局让步，交涉告胜。虞翎顶朝服，随同官员步行南京路，挨户劝告开市，遂名闻于沪上各界。事后，虞与胡寄梅等仿效外人在沪的武装团体，发起筹组“万国商团华人队”。1906年，虞奉派以随员身份，参加官方代表团，赴日观操，考察商务，结识了明治维新重要人物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等人。目睹日本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因此萌志兴办实业。

回国后，虞洽卿和宁波同乡朱葆三、周金箴等人，加速创建已筹备两年的四明银行。虽困难重重，虞出力甚多。1908年该行开业，资

金一百五十万两，取得钞票发行权。但不久即遭外资银行倾轧，发生钞票挤兑风潮，虞洽卿等人发动甬人所设钱庄、商号一律代为收兑，使四明银行渡过了难关，树立了信誉。

1908年，虞洽卿与友人倡议在沪集资设立宁绍商轮公司，虞被推为总经理，买进“宁绍轮”，行驶于沪、甬间。先是，该航线为外资太古、东方两轮船公司及国营轮船招商局所垄断，统舱票价从五角提高到一元，使旅客蒙受损失，虽经虞洽卿等多次交涉，但“始终无效，于是有自立公司之举”[2]。宁绍公司筹办时，宁、绍同乡纷纷入股，因此小额散股股东甚多。宁绍轮行驶后，树牌“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加价，服务态度亦好，营业颇佳，因而太古竟放空船。太古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力，把票价降为两角，并随送毛巾、肥皂等日用品，想压垮宁绍公司。宁波同乡遂组织“船票维持会”，票价降为三角，每票由该会贴补二角。宁、绍同乡宁愿多出一角乐于乘坐宁绍轮，终于两年后迫使太古等屈服，票价一律回升为五角。

1909年，虞洽卿等人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建议，筹组国货展览会性质的全国“南洋劝业会”，以资提倡实业，得到端方的赞同，并经奏准清政府拨款筹备，官民合办，端方任会长，虞等任副会长。翌年在南京开幕，盛况空前，会期六个月，观众达二十多万人次。虞随会赠送精印会址及摄政王载沣、端方、张人骏等人以及自己照片的杭纺手帕二万方，借以广扬名声。不久张人骏继端方接任会长，耻与商人为伍，遇事掣肘，劝业会期满后即告停办。由于张人骏盛气凌人，随着反清浪潮的不断高涨，虞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虞自称“自经劝业会之后……蓄心革命事业”。[3]

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前夕，虞洽卿在沪地同盟会秘密会所结识陈其美等人，资助起义经费八千元，并提供租界内的秘密集会场所[4]以及购办军械等。上海光复后，苏州绅商在上海影响下，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程以缺乏军饷为借口，犹豫观望。11月4日，虞筹集巨款一百万两代表沪商界赴苏劝说，程遂宣告独立。虞继又赴南京

游说张人骏，遭拒绝后，曾亲自单身由沪送弹药至南京前线天堡城接济革命军。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被委为首席顾问官、外交次长及闸北民政长等职。袁世凯任大总统后，虞曾表示支持，并反对“二次革命”，电阻浙江都督朱瑞参加反袁阵线，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警告[(5)]。袁称帝之举，受到全国各界的斥责，大势所趋，虞又转而反对帝制，资助陈其美等人的反袁活动。

1914年，宁绍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六万两出售较为陈旧的“甬兴轮”，拟另购新船；虞洽卿表示反对，认为该轮尚可行驶。但董事会坚持原议，虞当场加码五千两承购，转手以每年三十万元的租费，租与洋商获取暴利。股东们闻讯大哗，乃集股东大会决议：（一）撤销虞洽卿总经理职务；（二）委托监察人盛丕华诉之于法。虞终因理屈，被迫退还甬兴轮。此后，虞为挽回声誉，全力经营其独资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原设浙江镇海三北，名为“三北轮船公司”，是年迁沪，更名、增资），增添船只，开辟航线，扩大规模；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时值欧战期间，外轮多奉调回国，货多船少，水脚上升，三北、鸿安业务得以迅速发展。虞不断购进轮船，并在沿线各埠添设码头、堆栈等。1917年虞又买进“宁兴轮”，另组宁兴轮船公司。此时虞独资经营的三北、鸿安、宁兴三公司已初具规模，成为可与外资轮船公司抗衡的民营航运集团。但虞的资金毕竟有限，不断投资不动产，以致资金周转困难，债台高筑，债主无日不盈门坐索。虞每日陷于应付债务的窘境之中，移东补西，捉襟见肘。他除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开出远期本票贴现抵债外，拖欠四明银行债款最高时达三百多万元。对于其他客户的债务，也常到期换票转期，因此在金融界中信用甚差。这时，虞还“越穷越买船”。原来按当时惯例，买船到埠后，只须先付百分之三十的现款，余款可分期拨付，而随即可向银行押借船价百分之七十的贷款，这样百分之四十的差额就可暂时移作周转之用；且新船行驶前又可从买办到茶房（即服务员）收取押柜（保证金）。以宁兴轮为例，茶房每人要缴四百元，全船可收十万元之巨。因此虞虽欠了巨额债务，但却一再添船增资，到“抗战前夕，三

公司有船三十余艘，总吨达九万一千余吨，为民营冠”[6]，约占全国轮船总吨位的七分之一[7]。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全国响应。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发表通电，主张撇开巴黎和会，就青岛问题单独与日本交涉，为全国舆论所反对。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因而辞职，虞洽卿曾一度以商会议董身份代理会务。6月3日在工人、学生影响下，沪商会共同参加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6月10日曹汝霖等人被撤职，消息传来，12日晨虞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但应者仅十之二三，直到学生列队劝说，全市始告复业。

1920年，虞洽卿与张澹如、闻兰亭等人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虞当选为理事长。是年4月，全国工商协会改选，虞当选为会长。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与宋汉章互争会长，相持不下，形成僵局，经会董商议，改选虞治卿为会长。此时虞仍任荷兰银行沪行买办，直至1941年他离沪时传给其子为止。荷兰银行在华发行纸币，吸收存款，经营汇划、进出口等业务。虞的月薪二百两，加上年终分红及佣金结算，年收入逾二三万两左右。

1925年1月，虞洽卿应北京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之邀，以善后会议专门委员身份，赴北京参加会议。因虞前曾支持段的马厂誓师和对德宣战，晋京后备受礼遇。2月初，他被段任命为淞沪商埠会办（督办孙宝琦）。4月，虞在京当选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后递补为副会长，继续留京活动。

同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捕枪杀群众的五卅惨案，6月1日起全市工人、学生和绝大多数商店参加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北京临时执政府委任在京的虞洽卿为谈判代表之一，于6月3日兼程返沪。他在总商会属下，成立以他为首的“五卅事件委员会”，通电表示“若人权不得保障，即牺牲亦何足计”，愿意“协同各界誓为政府后援，决以全力拥护公理”[8]。他提出根据当时形势，分化敌人，集中

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方针，认为“此案与法美等国无关，即对于英日两国亦有分别。日领事已主张纱厂罢工风潮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以免牵入其内。以英国言，此事与英商无关，完全由领事与工部局负责”[9]。但他的建议未受到领导三罢斗争的工商学联合会的重视和采纳。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同有关各国交涉的十七条谈判条件，北京政府交涉员看后认为“过激”，就商于虞洽卿。次日“五卅事件委员会”讨论时，委员们认为与其条件太高而导致谈判失败，不如缩小范围以期速决，因此另提十三条，删去“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军队”、“解除万国商团和巡捕武装”等条款，将保证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自由”一条改为“优待工人”，因而遭到上海十万群众集会抗议。六国委员会在谈判中，则借口各国意见冲突，而对十三条亦拒绝接受。总商会经同工商学联合会磋商同意后，于6月26日复市[10]，同时决定继续抵制英、日货，筹款援助罢工工人。9月初，上海总工会决定，在保障工人既得利益及经济要求的条件下，逐步劝令工人复工[11]。此后，虞洽卿代表总商会参与协调复工谈判，进行保证和监督复工条件的实施等工作[12]。是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进占上海，虞洽卿被迫辞去淞沪商埠会办职务。

1926年5月，虞洽卿率领中华实业参观团一行六十人赴日考察实业。6月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在孙传芳的支持下当选为会长，虞洽卿落选后，与王晓籁等人另组“上海商业联合会”与之抗衡。是年春，宁波旅沪同乡会改选，虞当选为会长，后又担任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7月，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推派代表赴粤参观，虞推荐其女婿盛冠中随同代表王晓籁去广州，试探在广州执掌军政大权的蒋介石的实意。盛返沪后称蒋颇重乡谊，不忘过去在沪时受虞接济的旧情，使虞放心。

1927年2月，北伐军节节胜利，东路军已抵达江、浙一带，虞与江、浙资本家陈光甫、李铭、张嘉璈、叶琢堂、孙衡甫等人密商，如蒋能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则将全力予以支持。陈、李等对蒋

的意图不明，不愿出头露面，因此由虞介绍，推派与陈果夫有乡谊的四行储蓄会副主任钱新之去南昌与蒋洽谈。蒋即于3月初密令各军将“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虞及时在沪商界散布蒋已答应条件的消息。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十九人，由于虞曾不满孙传芳支持傅筱庵夺其总商会会长席位而参加过后来的倒孙活动，因此也被选为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虞当夜即前往会晤，商谈甚久。次日虞在商业联合会上作了传达，并于29日偕同会议推选的代表吴蕴斋、穆藕初等二十九人往见蒋介石。蒋在接见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13)] 此时蒋拟委虞任财政部次长为其筹款，虞借口忙于本身业务而婉辞，但允尽力支持；并保荐张寿镛、钱新之先后任财政部次长以自代。3月31日，虞又为蒋组成筹措军费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自任委员。接着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分4月1日及25日两次各给蒋三百万元。国民政府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后，三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七千万元，大多由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向工商、金融界摊派。

蒋介石上台后，内战不断，军运频繁。军队扣船拉差，乘机敲诈勒索，三北公司营业大受影响，亏损累累，处于困境。虞治卿取得蒋的照顾，一面申请获准发行八厘公司债三百五十万元，一面于1930年索得历年军队所欠轮船租费，得以渡过难关站住脚跟。在此期间，虞开辟了川江航线，创设了三北轮船机器厂。

虞洽卿平时重视家乡的建设，早期经营镇海、龙山，在当地设轮埠、筑海堤、修轻便铁道等。又经虞申请获准，当地的农副产品直接装运出口，可免缴转口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虞投资集股修建的“甬观公路”（宁波到观海湾）和“镇骆、镇大公路”（镇海到骆驼桥、大碶头），分别于1932年、1933年建成通车，方便了浙东地区

的交通。他历年用于家乡建设的投资，约在二百万元以上。1936年虞洽卿七十岁时，上海租界当局应总商会等团体的请求，决定将横贯沪市中心南北通衢大道、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举行盛大的命名典礼。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难民麇集，虞洽卿等人在各方面配合下，筹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虞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利用闲置的三北船只，遣返二万多同乡回籍；留沪尚有各地难民十多万人，分别安置在全市三十余处难民所内。此时沪地四郊遭日军封锁，粮食供应日见困难，升斗贫民及十余万难民更有断炊之虞。虞倡议举办“平粜会”，向各界募得大批捐款后，由虞分批从西贡、仰光、爪哇等地运来大批洋米，约一百七十多万包，其中大部委托米店照市价七折出售，差额由捐款中贴补。前后办了三十多期平粜，部分充作难民口粮；其余由平粜委员分摊，高价抛售市场，牟得厚利。时值战时船少，运费较平时猛涨数倍，虞利用三北公司留沪船只，另组公司，取得有关方面同意，悬挂意、挪等国的旗帜运米进口，又以压舱为名自办洋米；出口时满载土特产，除运费外，加收小费；且平粜米不交进口税。虞多方设法赚钱，每月盈利以数十万计，总共约赚五百万元[(14)]，还去旧债后，手中犹握大量游资，购进重华新村、大上海电影院等大批房地产业。

日军占领上海后，谋组汉奸政权，多次拉拢虞治卿出任伪职，为虞所拒绝。1938年2月20日，虞接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警告他不得参加伪组织，否则将以真弹对付。虞召集家属商议，从老妻到幼孙，都劝虞切勿事敌。但虞亦不敢得罪日伪，曾多次表示“亲善”[(15)]。虞的暴发及其政治上的暧昧态度，引起各方瞩目，处境危殆。后经家属劝说及在重庆的女婿江一平等人来电催促，于1940年秋离沪经香港赴渝[(16)]。

虞洽卿抵重庆后，舆论骂他是发国难财的米蛀虫，因此他常避居他地。内地物资匮乏，他出资与王晓籁等合组三民运输公司，自任总

经理，并取得蒋介石的“手谕”，特许运输物资。虞从国外购进大型卡车数十辆，除部分“捐献”当局外，其余全部用于运输物资。时值日军侵入缅甸，曼德勒、仰光等地的商人急欲脱货求现，竟以整个仓库的商品估价求售，仅及市价的二三成，虞因而获巨利达二三亿元。此后，他在西南经营多种企业，在昆明、成都、贵阳等地都设有运输公司，在内江创办酒精厂，在湖南设纱厂等。

1945年4月24日，虞洽卿突患急症，两天后病逝于重庆。

---

(1) 1905年有粤妇黎黄氏，曾随夫旅居四川，夫死回籍，途经上海，带有婢女十多人，被公共租界巡捕误认为贩卖人口，拘解会审公堂审讯。中国审判员命暂押看守所，英籍陪审员则主张关入监狱，双方发生争执，西捕头竟动手殴打华员，扯碎朝服，激起旁听者公愤，与西捕发生冲突，被捕多人。消息传出，租界全体华商罢市抗议，事态扩大。详情参见《大闹公堂案》，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十卷。

(2) 《虞和德通告宁绍公司股东》，《时报》1917年5月14日。

(3) 方腾：《虞洽卿论》（中），《杂志》复刊第17号（第12卷第3期），1943年12月版。

(4) 汪北平、郑大慈编：《虞洽卿先生》，上海宁波文物社1946年版。虞洽卿特设“宁商总会”于公共租界六马路（今北海路），向香港政府注册取得“特别照会”，掩护革命党人在此秘密集会，可免受租界当局搜查。

(5) 《新闻报》1913年9月3日报道：8月28日有人在虞宅放置定时炸弹，房屋家具被炸坏，幸未伤人。

(6) 三北轮埠公司在1949年所填《航运事业调查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轮船业史料，第22卷。

(7) 据严中平等所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所载，1935年我国轮船总吨位为67.5万吨（该年是抗战前的最高年份，1936年和1937年都低于此数）。

(8)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53卷。

(9) 《上海总商会议案录》（1925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上海总商会》，宗卷第11卷。

(10) 《热血时报》1925年6月24日报道：6月23日下午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工商学联合会代表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坚持罢市无益，同意忍痛开市。

(11) 《上海总工会会议记录》（1925年）。

(12) 参阅1925年9月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等有关报道。

(13)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卷6。

(14)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68卷。

(15) 1940年春，袁履登投敌后，虞洽卿与日本驻沪领事往来密切，友人劝其少与日方接触，但他却说："我们从前一向碰头的，那有什么关系。"是年虞嫁孙女，汪精卫送来一大花篮，虞将其放在礼堂正中，有人认为不妥，虞却不以为然。参阅《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69卷中魏伯桢、胡治藩等人的回忆记录。

(16) 虞洽卿离沪前，敌伪方面李士群等对虞多次敲诈，诛求无厌，意在逼其投敌。而重庆方面在沪的特务组织也因虞有亲日活动而拟予以制裁，经电重庆请示，蒋介石复电但令劝虞去渝，不允暗杀。而虞却称需蒋亲自来电方去渝，因此其在渝的女婿江一平除多次电促外，并通过有关方面，冒用蒋的名义电虞称："留沪徒滋各方疑虑"，劝他早日离沪去渝。虞离沪前夕，一面将蒋的来电向人夸耀，一面语人："李士群要寻找我（与我为难），我要走了。"参阅《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69卷，严服周、严谔声、魏伯桢等人的回忆记录。

禹之谟

闻少华

禹之谟，字稽亭，湖南湘乡青树坪（今属双峰县）人。1866年8月27日（清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生[(1)]。其父禹春晖是个略识文墨的商人。他六岁入塾读书，虽然读到十七岁，但对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全无兴趣，却爱研读王船山遗著及浏览各种小说。

禹在二十岁时，经同乡介绍，投奔南京某军营做文书，不久担任运输粮秣事务，往来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等地，有机会与各地的帮会首脑发生联系。

甲午中日战争中，禹因襄办由山东、天津等处向辽东运输粮秣弹药的任务有功，经刘坤一保奏，以县主簿候选，他辞不受命。战后他回到上海，专心研究实业，多次在长江沿岸进行开矿活动，没有成功。

戊戌变法前，禹曾回到长沙与谭嗣同、唐才常以及哥老会首领毕永年等有所接触；变法发动后，他寄以同情。变法失败谭嗣同等被杀，他极为愤慨，曾说：“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2)]

1900年，禹之谟参加了唐才常在汉口的自立军活动，几乎被捕，后逃出汉口，经上海东渡日本。

禹到日本后，结识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青年，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同时他在东京学应用化学，又到大阪千代田工厂学纺织工艺。1902年春，从日本回国后到湘潭创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毛巾厂，招收艺徒不足十人，但产品质量较好，价格便宜，颇受欢迎。1903年夏，

他把毛巾厂迁到长沙，规模稍加扩大；又附设了一个工艺传习所，制作竹木家具，职工共约四十人。他和生徒职工同设计，同操作，谋求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理想。在他的提倡下，“湘省织布机坊，一时创设不少”[3]。但随着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大量倾销，毛巾厂不久几乎被外来廉价品挤倒。

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发起成立华兴会，禹当即参加。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他是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之一，曾介绍了许多人入会。这时全国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他通过湖南商会积极推动了这一运动。同年他与刘家运、冯特民、曹亚伯等组织日知会，在长沙入会的有：黄吉亭、黄兴、禹之谟、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胡瑛等。翌年，他又领导了湖南铁路废约改归商办的运动。他的这些行动，得到长沙商、学界的热烈支持和拥护。这期间，禹之谟在长沙创办了“湘乡旅省中学堂”，自己还出资创办了“唯一学堂”。不久，湖南教育会和商会开会都公举他担任会长。

1906年夏，湖南省两个著名的留日革命青年陈天华与姚宏业（他们都因所志不遂，愤而自杀：陈是在日本投海；姚是在上海投江）的灵柩运回长沙，禹之谟主张把两人遗体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署理湖南巡抚庞鸿书、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拒绝禹的主张，禁止举行公葬。陈、姚灵柩运到长沙的第二天，禹不顾禁令，发动各校学生，一律穿白色制服，整队送葬。这一行动震动了长沙的官绅，他们认为：“民气伸张，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4]俞诰庆当即指挥军警捕去十几个学生。禹向学务处和军警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连遭拒绝。

禹素闻俞诰庆爱作狎邪之游，嘱学生密切注意俞的行动。果然就在镇压学生的第二天晚上，俞打着“学务处”灯笼，到妓院宿娼，被学生们当场抓住，送到濂溪阁开会声讨。禹之谟主持了这个会，痛斥俞的无耻行径，并要他当场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俞只好低头应允，但因此对禹怀恨在心，决心伺机报复。

不久，禹之谟由长沙回湘乡，这里正发生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禹参加了这次斗争，他和学生们一道去见知县陶福曾，严正表示："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额，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之额，移充办学，免入私囊。"[5] 禹交涉无效，即返回长沙。陶福曾据此上报，在俞诰庆的怂恿下，巡抚庞鸿书、臬司庄赓良加禹以"哄堂塞署"的罪名，下令逮捕。被捕前，有人劝他躲避一下，他沉痛地说："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6] 终于8月10日被捕。当清吏追究公葬陈、姚事时，他厉声回答说："今台湾及胶州……等处，皆为外人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抔土，反不能容乎？"[7]

禹之谟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出，湖南商、学界纷纷营救。营救的文电，每日数十起，迫使庞鸿书、庄赓良等对禹不敢公开审讯。他们深恐激成事变，偷偷地把禹秘密押送至常德，判处永远监禁。9月初，岑春蓂接任湖南巡抚。岑于到职之后，首先注意到禹案的处理。这时正是萍浏醴起义风声正紧的时候，岑春蓂与庄赓良必欲从禹之谟身上获得新罪证，借杀禹来立威。俞诰庆乘机向庄建议，用著名酷吏靖州知州金蓉镜来承办此案。遂于9月16日把禹移交到靖州。金蓉镜是个残暴无比的家伙，他按照岑春蓂和庄赓良的意旨，用各种酷刑向禹逼供，妄图从禹口供中找到革命党人活动的线索。但是，禹之谟虽在严刑之下，断指割舌，体无完肤，而终不屈服。他在靖州狱中致诸伯母书说："侄十年以来，不甘为满洲之奴隶，且大声疾呼，唤世人无为奴隶……宗旨甚正，程度渐高，思想甚大，牺牲其身，无所惜也。"[8] 又在致同胞遗书中说："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其毋奴隶其心而生！"[9] 不久，萍浏醴起义发动，湖南全省戒严，岑、庄急电令金将禹迅速处决。禹之谟1907年2月6日于靖州西门外右侧城墙边被绞牺牲。

(1) 关于禹之谟生年和就义年月此前多记载不一，现据禹烈士的后人于1980年10月寄来的《关于几个历史时间问题的考证》一文予以订正。并致谢忱！

(2) 冯自由：《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3) 《时报》1906年1月31日。

(4) 曹亚伯：《禹之谟之死难》，《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04页。

(5) 姚渔湘：《禹之谟传》，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1948年版，第169页。

(6) 姚渔湘：《禹之谟传》，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69页。

(7) 姚渔湘：《禹之谟传》，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69页。

(8) 禹之谟：《致诸伯母书》，《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第112页。

(9) 禹之谟：《遗书》，《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第119页。

郁达夫

马蹄疾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以字行。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出生于一个医家门第。祖父郁圣山是当地名医。父郁企曾早年设塾授课，兼事祖传医业，后曾当过县衙门的户房司事。郁达夫三岁丧父，一家祖孙六口的生计，全仗寡母以缝补洗衣的微薄收入维持。郁达夫从小就受到饥饿生活的折磨，饱经人间的世态炎凉，形成沉默、孤独的性格，也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郁达夫七岁入私塾启蒙，九岁已经能写旧体诗。1910年他在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在小学求学时，他利用课余和假期，阅读唐诗、《史记》、《红楼梦》等许多作品，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美国教会主办的之江大学预科、蕙兰中学等校念书。这时郁达夫的兴趣，全在阅读“闲书”上，诸如《吴梅村诗集》、《庚子拳匪始末记》、《白香词谱》、《桃花扇》、《西厢记》、《花月痕》等，都读得津津有味。秀丽的杭州西湖景色，激起了郁达夫的诗情，他在课余经常写些旧体诗词，投寄当时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和《神州日报》。后来因对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不满，决心回乡独居苦学。1911、1912两年，他在故乡家里度过。

1913年9月，郁达夫的长兄郁华被派往日本进行考察，他随兄赴日留学，初在东京神田正则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间到夜校补习日语。1914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的文科，一度转入医科，与郭沫若结识，开始接触西洋文学。1919年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文科法学部，接着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这一时期，郁达夫阅读

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并开始小说创作的尝试，先后创作了《沉沦》、《银灰色的死》等短篇小说。

1920年郁达夫回故乡与孙荃结婚后，继续去日留学。1921年7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在东京成立创造社，从此开始了他以文学活动为主的作家生涯。不久即回国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并将自己的《沉沦》等三篇短篇小说合编成集，以《沉沦》为书名，列入《创造社丛书》第三种。为了维持生活，他曾到安庆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2年3月，他编完《创造季刊》创刊号，回日本参加帝国大学毕业考试，4月毕业，获得经济学士学位。7月回国，结束了在日本前后将近十年的留学生活。

《沉沦》的出版，向全国喊出了他的“救救祖国”的第一声，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东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1)]，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它既是郁达夫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代表了他一生的总的创作倾向。它表现了郁达夫对封建社会的叛逆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怒，对祖国的赤诚和强烈的爱；同时也表现出郁达夫创作中的弱点：严重的感伤颓废情绪，和一些过分的色情、肉欲、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在某些青年中也产生了不良的副作用。

郁达夫回国后，仍在安庆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翌年应聘赴北京大学任经济系讲师，开始与鲁迅交往。在此期间，他除为了维持生活而担任教职外，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学事业上，先后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中华新报·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创作了一批小说和散文，辑成《茑萝集》出版。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工人形象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是他在这期间创作的。

1925年初，郁达夫赴湖北武昌，应聘任国立武昌大学文科教授，

约有一年左右的光景。1926年3月，他为南方革命形势所鼓动，与郭沫若同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教授。同年11月离职返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先后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和《新消息》周刊。在此期间，因沉溺于和王映霞的热恋之中，一度意志衰退，工作消沉，引起创造社同人对他的不满；加上一些别的原因，使他和创造社的纠纷不能调和，1927年8月15日郁达夫声明退出创造社。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上海定居。郁达夫开始与鲁迅密切合作。在鲁迅的鼓励和督促下，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他先为鲁迅主编的《语丝》写稿，次年又与鲁迅合编《奔流》文学月刊，后来又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还与阿英合作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主办的《白华》半月刊。

郁达夫在大革命时期，虽然没有像创造社同人郭沫若、成仿吾那样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但对反动势力却是深恶痛绝的。这个时期他的《日记九种》，虽然沉溺于个人的恋爱纠纷，但对蒋介石的揭露和抨击还是十分激烈的。他在《钓台的春昼》中称蒋为“中央党帝”，说他是“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2)]。他在鲁迅的影响和帮助下，不仅共同主编革命文学刊物，还参加了不少进步团体和社会活动。1928年春经阿英介绍，秘密加入太阳社。1930年2月，和鲁迅、柔石、冯雪峰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由鲁迅提名，他列为发起人之一。1932年2月，他和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是年冬，又和鲁迅、柳亚子等联名发表《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政府电》，热烈祝贺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1933年1月，和鲁迅一起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2月，和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强烈抗议和控诉日本法西斯杀害日本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5月，与蔡元培等联名致电

南京国民政府，抗议逮捕左翼作家丁玲。8月，与鲁迅等联名撰文欢迎参加国际反战会议代表团。这些都表明了郁达夫追求光明、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思想一直处在极为矛盾的错综复杂状态中，他不时表现出消沉、颓废的情绪；又由于他一味迷恋于醇酒美人和湖光山色，工作也十分疏懒。他不听鲁迅的劝阻，于1933年4月举家离开上海移居杭州，过着“隐士”生活。后来又一度由“隐士”而进入政界，去福建任省府参议。这一时期，他写下不少游记小品之类的作品，表现出乐于天命的思想和悠游闲适的情趣。这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消沉的时期。

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是郁达夫创作生活的全盛时期，重要的小说、散文和评论，都是这一时期写作和出版的，《达夫全集》共七册也是这个时期出版的。

郁达夫到福建后，由于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使他从消沉中振奋起来，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了不少主张抗日的文章和演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郭沫若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1938年春末，应郭之邀，郁达夫赴武汉任第三厅设计委员。3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研究部主任，编辑《抗战文艺》。这一时期，他的工作劲头很大，曾到山东、江苏、河南及浙东、皖南前线慰问、采访，写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战地报告。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聘，于年底携妻王映霞和长子郁飞赴新加坡。于翌年1月9日起，开始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繁星》，后又兼编《文艺》周刊、《教育》周刊、《星洲半月刊》和《星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刊。1941年起，又兼任英政府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郁达夫利用这些宣传阵地，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杂文和旧体诗词，号召爱国侨胞支援抗战。他还积极参加当地抗日的社会活动。1941年3月，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

变，要求团结抗日。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担任新加坡华侨组织的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及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12月底，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他又担任执行委员并负责文艺组工作，另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1942年2月，日军逼近新加坡，郁达夫同胡愈之、王任叔、沈兹九等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石叻班让。4月，又辗转到达苏门答腊的小镇巴爷公务（Pajakoem Boeh）。郁达夫化名赵廉，为隐蔽身份和维持生活，在胡愈之等人的资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这时生活放荡不羁，结交了很多男女朋友，不慎被日本占领军获悉他精通日语，被迫到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当翻译七八个月。后设法买通医生，以肺结核为由，离开宪兵部。在这期间，他曾暗中掩护和解救过不少华侨和印尼居民，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受到宪兵部的监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因郁达夫知道他们的一些秘密情报，在撤退前夕的9月17日夜里，将他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荒野中，终年四十九岁。

郁达夫在隐居苏门答腊的三年中，作为纪事写过不少旧体诗词。胡愈之曾辑录其《乱离杂诗》十一首，附于1946年9月香港咫园书屋出版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1982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广州花城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郁达夫文集》十卷，其主要著作均辑集在内。

主要参考资料

素稚：《郁达夫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版。

贺玉波：《郁达夫论》，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6月版。

邹啸：《郁达夫论》，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6月版。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9月

版。

丁易：《〈郁达夫选集〉序》，《郁达夫选集》，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

冯雪峰：《郁达夫生平事略》，《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冯雪峰：《郁达夫著作编目》，《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姜德明：《鲁迅与郁达夫》，《书叶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版。

于听：《郁达夫简传》，《富阳党史资料简讯》第13期。

---

(1) 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4月1日）。

(2) 据《郁达夫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96页。

喻培伦

尚明轩

喻培伦，字云纪，四川内江人。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1]。他的父亲是一个经营糖业生意的商人。

喻培伦幼年进私塾，喜听塾师讲述历史故事。稍长，厌恶科场的“帖括”之学，转而喜好机械、金石雕刻等技艺。他赋性聪敏，一般技艺，稍学就会，对各类小型机件，装拆自如。又愤世嫉俗，爱作“不平”语，曾刻石，自署“世界恶少年”，表示向旧世界挑战的决心。

1905年10月，十九岁的喻培伦偕同其弟培棣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时在东京警监学校学习，第二年春考入经纬学校。1907年1月又改入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学习理科，同年底在该校毕业后，仍留大阪专攻化学及摄影术。他初到日本时，成天注意的还是弹琴、照相之类的玩意儿，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后来，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及留日革命青年的推动下，逐渐倾向革命。1908年夏，在东京经吴永珊（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思想一新，舍豪华而尚质朴，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的民主革命运动。

1908年前后，由于同盟会组织的起义迭遭失败，一部分革命青年转而醉心于个人恐怖活动，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官吏。喻培伦也赞同这种主张。他认为“利器实用，莫便于炸烈药弹”，而且“暗杀为个人动作较易举”，便抛弃所学，于1908年9月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药科读书，钻研化学，目的是研制烈性炸药，以备从事恐怖暗杀活动之用；并和吴永桫等专租房屋试验炸药、制造炸弹；还与黎仲实、黄复生等人成立了暗杀团的组织。在一次试验炸药中，因药瓶炸裂，他身

负重伤，治愈后废掉了一只左手。但他并不气馁，越发精心研究，终于制造出一种在当时说来威力较为强大的炸药。从此人们赞誉他为“炸弹大王”，称他的炸弹制法为“喻氏法”。喻培伦还将自己发明的炸弹制法写成小册子，约一万字，向热心暗杀活动的反清革命者广为宣传。

1909年夏季，革命党人得到一条消息说，清政府新任北洋大臣、原两江总督端方将绕道武汉入京。革命党人决定在他北上途中，把他杀掉。这时喻培伦早已回到国内，他被派往汉口进行此次行动的布置。他到汉口北面的刘家庙车站详细勘察了地形，做好周密计划和准备。但狡猾的端方临时变更了北上的路线，没有从这里经过。同年秋，又有几个革命党人决定集中力量暗杀“摄政王”载沣，喻培伦被派往北京协同组织暗杀机关。他和黄复生等于12月到北京，在和平门外琉璃厂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后，1910年3月31日夜，他们携带一个特制的大型炸弹，潜匿在什刹海西北面载沣寓所附近的银锭桥下，进行安置。由于事前目测不准确，电线短了几尺，又为敌人所发觉，没有成功。当敌人取出炸弹找外国专家鉴定时，外国专家们认为这颗炸弹的威力很大，制造的技艺是很高的。4月中旬，黄复生、汪精卫被捕下狱。喻培伦东渡日本，不久潜赴香港。

喻培伦到香港后，在同盟会领导下，于九龙城设立暗杀机关，一面从事营救黄复生等出狱的工作，一面策划继续进行暗杀活动。1911年初，他得悉孙中山、黄兴决定将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后，便立即奔赴广州，积极响应。旋被派为实行部实行员，为起义制造炸弹。2月，他在香港中环摆花街（后迁广州甘家巷）设立了专门机关。他不顾身残体弱，夜以继日地和同志们一道工作，两天中赶制出了炸弹一百多颗。当时对起义时间几经讨论，一再改期，最后一次商讨时，少数党人因鉴于清军戒备的严密，又主张缓期，喻培伦坚决反对说：“举义诚知必死，然死国，义也，吾人不肯死，谁肯死者？国

事将不可挽矣！”[2] 起义决定后，有人认为他一臂已废，可不必参加。他愤然答道：“诸公具四体，不如吾偏枯人也！”[3] 大家还从他身体和具有技术专长，劝阻他不要参加战斗，喻培伦仍坚决拒绝说：“学固不能磨灭，非我死可以亡之。”[4] 4月初，喻培棣由日本运枪械到广州，也准备参加起义。喻培伦这时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因兄弟二人多年在外，家中又无子，他劝培棣不要参加，以宽慰双亲，并催培棣离开广州，兄弟二人痛哭告别。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广州起义爆发，喻培伦被分派到从后面攻打清总督衙门的一路队伍。他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异常，先炸破督署后墙攻进衙门，再从督署前门走出，会同黄兴所领导的七十多人又去攻袭督练公所。从黄昏到夜半，他以炸弹作武器一直战斗在前列，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末后因敌我实力悬殊，寡不敌众，身被数创，弹尽力竭，为清军所俘。当敌人审问时，为避免牵累别人，他隐匿真姓名，冒名王光明，坚贞不屈，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5] 表现出一个革命党人的高尚气节，他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喻培伦牺牲后，与其他死难烈士共七十二人合葬在广州东北郊的黄花岗。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并指令在他的家乡内江修建“喻大将军祠”，供后人悼念瞻仰。

---

(1) 喻培伦的出生时间，据杨庶堪所撰《喻培伦烈士墓表》（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2—543页）和胡汉民《为革命先烈建墓立碑之经过》一文所附《审查七十二烈士姓名经过》（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编《革命先烈纪念日专刊》，1932年版）都说喻终年是二十六岁。据此推断，他生于1886年。

(2) 杨庶堪：《喻大将军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专辑），1979年再版，第145—147页。

(3) 章炳麟：《喻培伦传》，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544—545页。

(4) 杨庶堪：《喻大将军事略》。

(5)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

袁金铠

张学继

袁金铠，字洁珊，又字兆佣，晚号甲庐。奉天辽阳县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出生。其祖、父均为目不识丁的地主，有田五十余垧。袁金铠十九岁中秀才，后入盛京萃升书院肄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沙皇俄国乘机侵占东北，八国联军在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沙俄仍拒不从东北撤兵。在沙俄侵略者蹂躏下，东北人民无以谋生，许多人铤而走险，一时土匪蜂起。奉天在籍士绅，纷纷办理团练，以维持地方治安，袁金铠参与其事，任郡北路保甲局总办。1904年，任辽阳州警察所提调。

1907年，经鲜俊英介绍，袁金铠谒见盛京将军赵尔巽，因应答颇有条理，深得赵尔巽的好感，许之为辽东杰士。1909年，奉天谘议局成立，袁氏当选为谘议局议员。1910年，吴景濂当选为谘议局议长，袁金铠与孙百斛为副议长。从此袁金铠跻身于奉天大绅士之列。1911年5月，赵尔巽由四川总督回任东三省总督，袁金铠以门生资格投入赵尔巽幕府，出任赵尔巽的参议，深得赵尔巽的倚重，成为其心腹谋士。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东北的革命党人也在东三省酝酿起义响应。第二混成协协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革命党人蓝天蔚立即与革命党人在北大营商议如何发动部下，他们公推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奉天民政长。赵尔巽得到报告后，立即召集袁金铠等亲信和地方士绅商量对策。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激昂情绪和欺骗群众，袁金铠与赵尔巽等密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推赵尔巽为总会长，准备于11

月12日在奉天省谘议局召开军、政、农、工、商、学各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为了防止革命党人从中破坏，袁金铠联络了张作霖等的巡防营。

12日谘议局开会时，赵尔巽亲自到会，宣布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由赵尔巽任总会长，吴景濂、伍祥祯为副会长，袁金铠为总参议长，其他内政、外交、财政等各部部长均由旧官僚充任，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占了一个席位，任参谋部副职。

12月18日，南方革命军代表和清廷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又有召开国会的消息。张榕与赵尔巽相约，东三省的事情，静俟国会解决，在这期间彼此不得开战。张榕遵守与赵尔巽的协约，电令各地暂停军事行动，而赵尔巽却背信弃义，乘停战期间镇压各地准备武装起义的联合急进会成员，并面谕张作霖在省城严密捉拿革命党人。这时，袁金铠玩弄其反革命的两面手段。他一面向赵尔巽献计除掉张榕，另一面利用与张榕的私谊，由张任命袁金铠为联合急进会的参谋部长，使袁金铠掌握了联合急进会的全部内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任命蓝天蔚为北伐军都督。1912年1月中旬，北伐军到达山东烟台，准备在东北沿海登陆。为了先发制人，赵尔巽决定首先对张榕下手。1月23日晚，袁金铠以请客为名，将张榕和张作霖请到沈阳平康里德义楼吃饭，凶手高金山和于文甲冲进房间，向仍在抽鸦片烟的张榕连开数枪，一个年仅二十八岁的革命党首领，就这样丧命于袁金铠、张作霖之手。张榕等被杀后，赵尔巽“专折特奏”清廷，保举袁金铠、张作霖二人：“张作霖骁勇善战，过于张国梁；袁金铠才大心细，有似李鸿章，请朝廷破格升赏，以资鼓励。臣再勉以忠义，必能为国宣劳，作东土之保障。”已经奄奄一息的清廷当即电谕：“任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袁金铠赏四品京堂，襄办关外练兵事宜。”

1912年11月，赵尔巽辞去奉天都督职务，由袁世凯的把兄弟张

锡銮接任，袁金铠随赵尔巽入京奔走。1913年，张作霖聘袁金铠为第二十七师顾问。1914年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召集御用的约法会议。经赵尔巽推荐，袁金铠担任了约法会议议员。5月，袁世凯又成立御用的咨询兼代行立法机关的参政院，袁金铠改任参政。其间，袁金铠一度运动出任黑龙江巡按使，未能如愿。

洪宪帝制运动开始后，袁金铠对“筹安会六君子”有所拉拢，企图以此为进身之阶。但“筹安会六君子”鄙视袁金铠之为人，拒不与谋，袁金铠只得返回奉天，另谋出路。在奉天实力派张作霖与冯德麟联合驱逐袁世凯心腹、奉天将军段芝贵的过程中，袁金铠出谋划策，起了重要作用。他联合奉天商绅各法团，倡立自治期成会，以“奉人治奉”相号召，起草了《奉天独立宣言》。袁世凯因其时对西南反袁各省用兵，对东北采取妥协方针。1916年4月22日，袁晋升张作霖为盛武将军，次日又特任张作霖暂署督理奉天军务并代理巡按使，冯德麟为奉天军务帮办。张作霖登上“奉天王”的宝座后，没有忘记袁金铠的谋划之功，他对袁金铠说：“我之有今日，皆六兄之谋，今后更望有关军政各事多加帮忙，富贵与兄共之。”(1)

1916年6月，北京政府通令各省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袁金铠任军政两署秘书长，成为张作霖的首席军师。这时，张作霖和冯德麟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在逼走段芝贵的过程中，冯德麟出力最多，结果反而屈居张作霖之下，冯氏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在张作霖任督军之后，冯坚持不就军务督办之职。1917年7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拥戴清逊帝宣统复辟。袁金铠向张作霖献计，委冯为奉天全权代表，与张勋接洽复辟事宜，无论成败，均可使冯离开东北。冯德麟企图通过赞襄复辟，取得新皇的宠信，以便取张作霖而代之。张勋拥戴宣统复辟后，立即赏冯德麟“穿黄马褂，紫禁城内骑马，御前侍卫大臣”头衔。但张勋复辟仅昙花一现，复辟失败后，冯德麟乘专车离开北京回关外，在天津车站为讨逆军逮捕，旋即被押送北京拘禁。7月15日，段祺瑞政

府以“背叛共和罪”免去冯德麟的职务。后虽由张作霖保释，但冯德麟军队地盘尽失。

张作霖初任奉天督军时，“委政袁金铠，事无巨细皆咨而后行”。袁金铠大权在握，“一般趋炎附势之徒，均集于袁门”。地处沈阳军署前胡同的袁金铠官邸，每到年节，上门送礼者川流不息。“要当官袁洁珊，成不成哲继明，妥不妥高钧阁，若找门路吴大胡”，一时在奉天官场中广为流传。哲继明、高钧阁、吴大胡（吴恩培）均是袁金铠辽阳派的亲信。以袁金铠为首的辽阳派权势熏天，引起张作霖的戒心，张从此开始亲自处理公务，而不再由袁金铠代拆代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袁知失宠，不得不离开张作霖。

1917年7月，袁金铠随孙烈臣到黑龙江，任黑龙江督军府秘书长。但黑龙江地方士绅把持大权，排外严重，袁金铠身为秘书长，权力有限。1920年，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袁转任哈尔滨东省铁路公司理事会理事，一度代理理事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宣布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以吴俊陞为奉天都督，袁金铠为奉天省长。这是以奉制奉的策略，袁金铠恐张作霖生疑，于己不利，避居大连。经张作霖宠信的五夫人说项，张作霖与袁金铠恢复旧交，袁出任张作霖的高等顾问，继续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袁金铠向张作霖献计说：“直系分子复杂，终将离异，如冯玉祥、胡景翼、王怀庆等均貌合神离，我苟以金钱物资诱之，使其内部相互猜疑，再相机而动，必收事半功倍之效。”张作霖采纳了袁金铠的计策，拿出一百万元，经奉天三井银行支行汇付日本驻华司令官吉冈显转交段祺瑞，以供联络冯玉祥之需。冯玉祥虽然明白张作霖别有用心，但为倒直大计，仍与张作霖达成了反直协定。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的倒戈，直系大败，奉系势力到达长江流域，张作霖拟令袁金铠为江苏省长，袁以年老且不服水土力辞。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通电要求惩办张作霖左右的二十七人，袁金铠亦在内。电文指责袁金铠：“假斯文，实卑鄙，充名士，

真小人。”郭松龄反奉战争开始后，袁金铠恐郭松龄成功，自己有生命危险，便避居大连，待郭松龄失败后，才返回沈阳。1926年间，袁金铠奉张作霖之命到北京与阎锡山的代表田子琮磋商合作进攻国民军事宜[(2)]。1927年6月16日，张作霖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拟任命袁金铠为内务总长，袁以身体不佳，难膺重任为由力辞，并表示愿以高等顾问身份随侍左右。不久，张作霖又任命袁金铠为参政院参政兼奉、吉、黑、热、直、鲁、豫、察八省总代表，并兼故宫古物保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后，袁金铠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顾问，以元老资格辅佐少帅张学良，但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等重大问题上，均与张学良唱反调，自然不为张学良所喜。1930年，袁金铠担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袁金铠勾结老牌亲日派于冲汉、赵欣伯等，组织辽宁地方维持会，袁金铠任委员长，聘日人金井章二、升巴二郎等为顾问。随后又担任伪奉天省第一任省长。蒋介石虽然持不抵抗主义断送东北，但为舆论所迫，不得不公开通缉以袁金铠为首的十名东北叛国者。

1932年，袁金铠等汉奸秉承日本旨意，拥戴清逊帝溥仪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袁金铠原以为伪总理一职非他莫属，但结果为郑孝胥取得，袁仅得参议。1934年，溥仪任伪满洲国皇帝，袁金铠任伪尚书府大臣，前后共九年，袁金铠的主要任务是为伪满皇帝溥仪讲经说史，宣传他的“王道政治”，与郑孝胥的反动学说相呼应。为此，日本赏给袁金铠所谓“建国功劳金”三十万元。1939年袁金铠七十岁生日，溥仪特赐匾联、福寿字和衣料、如意等，令袁受宠若惊，视为平生最大的光荣。1943年，袁金铠得下肢萎缩症，辞去尚书府大臣，改任宫内府顾问官，并享受前官待遇，回辽阳原籍养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袁金铠因汉奸罪被抄没家产。在辽阳老家取出皮箱九十余号，小獭皮八十余张，其余珍玩无数。其在沈阳、

长春、哈尔滨等地住宅中所存的贵重物品，尚不包括在内，由此可见袁之贪婪于一斑。

1947年，袁金铠病死辽阳。

---

(1) 赵夏山：《我所知道的袁金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消息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2)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页。

袁履登

汪仁泽

袁履登，原名贤安，后改名礼敦，字履登，以字行。1879年9月3日（清光绪五年七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宁波。祖籍绍兴，其父袁燮元因避战乱迁宁波定居，任职员、小税吏，家境贫寒。袁履登十岁时，进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宁波开明桥教堂附设的开明小学堂，免费就学。一年后因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获得英国伦敦教会礼敦路主日学校的奖学金，每年六英镑。他以半数充膳宿费，半数贴补家用。为表示感恩不忘，改名为礼敦。小学毕业后，升入该学堂增设的斐迪中学。十九岁时由斐迪中学保送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先读备馆（预科），后升正馆（本科）学习，兼任该校化学助理员。二十六岁毕业后，回宁波任斐迪中学教务长兼教会牧师，后又在益智中学及浙江第四中学等校兼任英语教师。此时各地教案屡起[(1)]，宁波知府夏孙桐深感棘手，因袁懂外文，又受过西方教育，遂于1905年聘他任外交顾问。1908年，在全国收回利权运动普遍高涨的形势下，袁曾受浙江宁绍道员桑铁珊的委托，与英国领事交涉，收回了宁波江北岸的警察权。他的名声因而随之传开，担任当地多处慈善、文教机关的董事等职。

辛亥革命起，宁波光复，11月5日成立军政府，袁履登被推为外交次长兼交通次长。袁并创办《方闻报》宣传三民主义，成为当时宁波销路最好的刊物之一。1913年军政府改组，袁去职赴沪。他应汉粤川铁路总办岑春煊之邀，至汉口任督办公署译员。半年后回沪，受聘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经理室襄理，两年后辞职。1916年协助其结义兄弟谢蘅牕经营江西鄱阳乐平间的鄱乐煤矿，以及顺昌轮船公司、裕昌煤号等企业。1917年曾受煤矿委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工商业。此后他曾任黄楚九所创设大昌烟公司的汉口分公司经理，后又与教友骆怀白

合做德商上海科发药房华经理，不久又与沈燮臣合做美商茂生洋行买办。此时他收入丰厚，举止阔绰，雇用保镖，俨然成为沪上买办富商，并组织“申商俱乐部”，自任会长。

1920年，上海交易所盛行，袁履登与黄楚九合办“夜市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不久退出。是年他继虞洽卿、石运乾之后，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达十六年。他还兼任上海国民银行、恒宣轮船公司、远东体育场、恒茂产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等企业的董事，以及上海总商会会董、副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上海青年会干事兼副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等职。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袁出任上海各界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代表商界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参加该会领导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后来商界单独退出“三罢”斗争，于6月26日开市复业。此后，袁就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副理事长，工部局华顾问、华董等职。1936年他任美国烟叶公司华经理。因其交游甚广，被许多工商企业、公益慈善团体争相聘为董、监、理事。袁并设堂号“卧雪楼”，招收生徒，成为沪上闻人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沦陷，袁履登担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秘书长，募集捐款，办理难民救济工作。此时日本侵略者谋组沪地傀儡政权，由于袁的社会地位及“闻人”身份，成为日伪物色汉奸伪职的重要对象，一度被日本军方羁押。在威胁利诱下，袁被敌利用。1941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改组，袁在董事会上提议由日人任总董，实行后日方提袁为副总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1942年2月起实行“连坐互保”的保甲制度，成立“保甲筹备委员会”，袁被指定为“会长”，着手主办保甲的编组工作。7月袁出任伪上海市商会理事长。此时汪伪头目邵式军等筹组大华银行，控制沪地金融，袁出任该行总经理。9月日方为了筹措军粮，禁止粮食出境，成立“米粮统制委员会”，袁出任该会主任委员暨南京伪物资审议会委员。由于粮食资敌，居民的户口米不仅量少质差，且时告不继，上海出现争购户口米的悲惨场面。袁遂成为众矢之的，声名狼藉，在

一片詈骂声中被迫住进医院，向敌伪乞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官员到沪后忙于“劫收”，迟迟未对汉奸进行处理。由于人民群众身受敌伪八年统治的荼毒，对于汉奸袁履登之流纷纷加以揭发检举，集会控诉。10月国民党当局将袁逮捕法办，1946年5月法院以汉奸罪判处袁履登无期徒刑[(2)]。袁不服上诉，复审后以袁在任伪职期间曾营救多名抗战人士出险，“于协助抗战不无微劳”为由，改判有期徒刑七年。袁再次不服上诉被驳回[(3)]。囚禁一年八个月后，因病重保外执行。1948年3月，蒋介石改任总统，袁获“大赦”释放。1949年5月由袁妻陪同离沪去香港就医。1951年袁病危返沪。

1953年8月，上海人民法院以汉奸罪判处袁履登徒刑十年，但考虑其年迈有病免于执行。1954年12月24日袁在沪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乌崖琴：《关于海上三老之一袁履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323号。

严谔声：《沦陷时期袁履登的动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734号。

《访问袁森斋先生记录稿》（1983年11月2日）。

---

(1)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清廷对帝国主义者承担严厉镇压各地反教会、反传教士活动的条款，但各地反教会的斗争并未因此而减弱。1903年，浙江宁海发生群众千余人焚毁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作战的宁海教案。事后清廷屠杀无辜群众六人，文武官员均受惩处，并赔款十一万两。宁波府属境内亦相继发生教案数起。

(2) 上海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特字161号）1946年5月31日。

(3)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袁世凯

李宗一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他的叔祖父袁甲三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在家乡办团练。叔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生活。八岁时，随袁保庆先后到济南和南京读书。1873年袁保庆病死，第二年他又随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刑部侍郎）到北京。他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帮袁保恒办事，学会了清末官场上那一套虚伪、奸诈的行径。1878年袁保恒死后，他回到家乡。次年，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结识当时做塾师的徐世昌，资助徐到北京应试。袁世凯本想也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但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于是，他赌气烧了自己所作诗文，决心走另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1)]。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当时，吴为淮军统领，委派他为营务处会办。8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他随吴军开赴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此后，又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镇压“开化党”，支持“事大党”，因此受到清廷褒奖，尤其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1885年10月，李鸿章保荐他做“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2)]。1892年8月，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他受了日本驻朝鲜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的怂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及至清军赴朝，日本又按预定计划派遣大军侵入朝鲜，占据汉城，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一见局势严重，深恐无法收拾，乃推荐其西文

翻译、办理龙山商务委员唐绍仪自代，于7月19日请调回国[3]。8月1日战争爆发，他被李鸿章派往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先随清军败退至辽阳，再退至锦州。次年春至天津销差。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鉴于旧式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当时，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抢先上书当朝权贵，提出练新军的策划。经过多方钻营，他取得了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的推荐，1895年12月被派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定武军”是中日战争期间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有四千七百余人。袁接管后，添募二千多人，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近代军事训练。同时，招纳封建文人，对弁兵讲“经史大义”，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4]。为了控制这支军队，造成个人的武力，他网罗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勋、王占元等一批人，分别给以重要职务。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的爪牙。1897年，清廷认为他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但仍专管练兵事宜。

中日战争后，袁世凯看到变法维新的潮流高涨起来，又想在这方面下一笔赌注。1895年7月，他把康有为的“万言书”代递“督办军务处”，9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示自己是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1898年9月，变法运动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达到高潮。袁为了升官，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以西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也正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于9月16日召见袁，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18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求救和催促康离京的密诏，感到事态严重。当晚谭密访袁于法华寺，要求他率兵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5]。他假装忠于维新派，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6]但事后“反复筹思”，觉得维新派实力有限，不容易成功[7]，遂即返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结果，西太后囚禁了

光绪帝，重新临朝训政，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袁世凯用出卖维新派的阴险手段，取得了西太后的信任，从此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12月，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为荣禄控制下的“武卫军”五军之一[8]。袁世凯于1899年6月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仍专管练兵。12月6日，又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率领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当时，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如火如荼。袁世凯诬蔑义和团是“左道邪教”[9]，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派兵到各州县屠杀团民，焚毁坛场，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清廷命令他入京防卫。他不敢公开抗拒，只派少数兵力到直鲁边界，应付一下，而实际是按兵不动。这时，他一面与南方表示“中立”的各省督抚取一致态度，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勾结，仿照“东南互保”的办法和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并派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10]；另一方面，又向在逃亡中的西太后处进贡些饷银、缎匹，落得两面讨好。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而且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扩充了“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他的队伍已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反革命武装。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他到达直隶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且把这个淮系军阀的班底也接收下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这时，清廷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筹办“新政”，已成立“督办政务处”。1902年初，让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

负责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把清朝京畿的警权抓在自己手里。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为了筹措“练兵费”和庚子赔款，他加征捐税，巧取豪夺，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起人民不断反抗。随后，他又残酷地镇压了直隶广宗景廷宾领导的农民起义。1903年12月，由他建议，清廷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力请由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退居为会办大臣，而掌握练兵处实权。1905年，袁世凯拼凑成北洋军六镇（每镇官兵定额为12560人），实额共六万余人，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五镇都是他的嫡系，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出身。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同时，为了抵制革命运动，他极力主张搞假立宪的骗局，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又办理“地方自治”。他还极力破坏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美国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效劳，支持英国的路权要求，不遗余力地去博取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欢心。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才能作出决定[11]。

袁世凯深知自己权势的膨胀会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每年以北洋“截旷银”（空额兵饷）上贡西太后，贿赂奕劻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同时表面上又把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自己退居幕后操纵的地位。尽管他使用了这些手段，但到1907年仍被清廷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光绪的弟弟）监国。载沣本想杀袁，但惧于他的内外奥援，未敢下手，载沣为了把袁世凯的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于次年1月2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有“足疾”，勒令他回河南彰德“养病”。袁世凯虽被罢官，但通过他的旧部下，继续操纵分布于华北和东北的北洋军，依然是一个为中外反动派所重视的实力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一片混乱。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赴武汉作战，但是北洋军将领不听他指挥。清廷于14日只得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使其统领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世凯见清朝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即一面推说“足疾”未痊，拒绝接受任命；一面暗中通过时任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向清廷提出条件，要求取得军政大权。这时，帝国主义分子也极力制造“非袁不能收拾大局”的气氛，不断敦促清廷起用他以绞杀革命。因此，清廷被迫于27日召荫昌回京，任命袁为钦差大臣，指挥水陆各军。11月1日又任命他为内阁总理。袁世凯见清廷屈服，立即由彰德抵湖北孝感前线，督促冯国璋第一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回汉口；然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取得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

袁世凯感到只用武力，无法扑灭革命。他离开彰德前后，曾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多次秘密地向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没有得逞。但已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的消息。他北上组阁后，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给革命党人一个严重打击，然后下令停止攻击武昌。同时又请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出面斡旋，这样一打一拉，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他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和革命党人谈判，目的是要取得革命党人让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在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官绅的支持下，并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袁世凯取得了上述保证。当时，革命党人曾坚持以清帝退位和他保证赞成共和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他即借用革命声势威吓清廷，并授意段祺瑞联合北洋军将领通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12)]，如此双管齐下，迫使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他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保证[(13)]。15日南京参议院应孙中山的咨请，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请他到南京就职。他口头上表示“极愿早日南行”，暗中却策动第三镇兵变，并以此为借口，迫使革命党人打消了要他南下的计划。3月10日，他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职，窃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组成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统一。开始，南方各省仍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他表面上对革命党领导人不得不采取笼络手段。1912年8、9月，他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称之为“革命元勋”，授以勋位，企图用甜言蜜语软化他们。当时，中国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次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企图依靠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害怕国民党分他的权力，暗中派人于上海刺杀了宋。对于宋的死，他还装出非常惋惜、愤慨的样子，表示要缉拿凶手，“按法严办”。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袁自知骗局已被戳穿，遂积极布置武力镇压。4月，他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充作军费。7月，便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发出讨伐令，派北洋军南下进攻南京、江西等地，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军阀的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

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即图谋把被人民推翻了的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1913年10月，派出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在进步党人的帮助下，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御用工具。1914年5月，他公然宣布废除他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同时公布按其意旨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自己独揽行政大权，把进步党人也撇在一边。他又特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令其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军”[(14)]，掌握军权。他修改总统选举法，得终身连任，并可指定继承人。还制定各种反动法令，建立起“军政执法处”等特务机构，加紧对人民的迫害。另外，“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提倡尊孔”[(15)]，叫喊“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6)]。1913、1914年，他连续发布了一连串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28日，他亲率文武百官，钻进文庙祀孔；12月23日，又像历代皇帝一样到天坛祭天。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已为日本大隈政府所识破。日本遂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1月命令其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暗示日本将赞同变更国体。袁世凯怕人民反对，不敢一口允诺，而派陆徵祥、曹汝霖与日置益秘密谈判，佯作拒绝，阴行退让。延至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9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本在得到便宜后，秘密向他表示说：对于帝制“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17]。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了与日本竞争，也对他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18] 袁世凯得到这些许诺，自认为外交上已无问题，即决心废除共和体制，建立袁氏王朝。

1915年8月，袁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　Goodnow）发表了鼓吹帝制的文章，杨度、孙毓筠等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敲响了帝制的锣鼓。于是，朱启钤、张镇芳、梁士诒等一批官僚和段芝贵、倪嗣冲等一帮地方军阀上下勾结，伪造民意：先策动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行帝制；接着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最后由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推戴”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19]。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于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说什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0] 接着，他接受朝贺，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自以为一切安排停当，但等1916年元旦实行“登极”了。

但是，和袁世凯的愿望相反，历史的潮流是要民主共和，不要帝制。随着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暴露，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斗争沸腾起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痛斥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21]。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先宣布起义讨袁，组成护国军，云南都督唐继尧和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也投入反袁，蔡锷率领护国军攻入四川。袁世凯着了慌，于

1916年1月急派曹锟率领北洋军入川，妄想扑灭“护国运动”。同时他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乞求日本援助。日本看出他的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早在1915年10月、12月联合英、俄等国向他提出缓办帝制的两次警告，而且拒绝接待特使。不久，贵州、广西接连宣布独立讨袁，护国军声威大振。“无可奈何花落去”，3月22日，袁世凯向全国公布取消帝制令，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

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了，但仍妄想保住总统职位。孙中山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22]。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宣布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状，坚决不承认他再为总统，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23]。广东、浙江、陕西又相继独立，袁氏狼狈万状，被迫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梦想依靠段团结北洋军阀势力，作最后挣扎。但是，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迫使其忠实爪牙也不得不抵制或“声讨”帝制以自保；段祺瑞迫他交出实权，组织责任内阁；冯国璋在南京召集未独立各省军阀开会，自树一帜；甚至他的宠臣，如湖南的汤芗铭和四川的陈宦之流也通电“独立”。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到这时，独夫民贼袁世凯气急败坏，无计可施，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

(1) 沈祖宪、吴闿生编：《容庵弟子记》卷1，1913年版，第4页。

(2) 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卷55，1905年版，第7页。

(3)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8页；第14卷，第8、26、42页，1932年版。

(4) 袁世凯：《兵略录存》，1898年10月新建陆军排印本。

(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

(6)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8页。

(7) 袁世凯：《戊戌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3页。

(8) 荣禄练武卫军，以聂士成、马玉昆、董福祥、袁世凯为前后左右四军，自领中军。

(9)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4，1938年版，第17页。

(1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7，1938年版，第4页。

(11)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1947年版，第36页。

(12) 《段祺瑞致内阁代奏电》（1912年1月26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3页。

(13) 《临时政府公报》第16号，1912年2月14日。

(14) 袁克定，1878年生，字云台，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局督办兼董事长，“模范团”第二期团长。曾以“皇太子”自视，为“洪宪”帝制四处活动。袁世凯败亡后，匿居天津。

(15) 《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第231页。

(16) 《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4册。

(17)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18) 《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之纪录》，见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46年再版，第296页。

(19) 《朱启钤等致各省请于推戴书中照叙四十五字并嘱秘密电》，见黄毅编《袁氏盗国记》上编，1917年5月版，第91页。

(20) 《政府公报》第1294号，1915年12月14日。

(21) 孙中山：《讨袁宣言》（1915年）、《讨袁檄文》（1916年），见《孙中山选集》上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8、100页。

(22) 《孙中山致各都督司令电》，《民国日报》1916年5月11日。

(23) 《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见《袁氏盗国记》下篇，

第13页。

袁守和

熊尚厚

袁守和，名同礼，字守和，以字行。祖籍直隶（今河北）徐水。1895年3月23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生于北京。他幼年时性格活泼，很爱讲话，后因得伤寒，愈后变得沉默寡言，温文儒雅。1913年9月，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部英文甲班，次年春加入预科的文学会为会员。1916年夏天毕业，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工作，之后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袁守和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奖金及清华、北大两校的津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就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袁改入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专攻图书馆学，获图书馆学学士，曾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工作数月。继而他赴欧洲考察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入伦敦大学历史研究院、巴黎古典学校进行研究工作。

1923年秋，袁守和回国，先在广东岭南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后北上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25年，北京图书馆协会改选，他担任该会会长，并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执行部部长。翌年3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创办北海图书馆，他任图书部主任。由于正、副馆长梁启超、李四光无暇管事，馆务实际由袁主持，1927年6月升任副馆长。1929年6月，北海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合并为北平图书馆，他任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仍实际主持馆务。与此同时，还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北平图书馆位于北海公园西部，清季御马厩旧址，袁守和精心设计建筑，建成规模宏大、装饰雅致的大图书馆。他辛勤延揽和培养人

才，采用现代科学管理法，设置采访、典藏、研究等部，辟有研究室和多种阅览室，规模颇大。他大力购置藏书，经常亲自跑旧书坊，广集善本或向名人之后收集私家珍本，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图书馆事业上。袁对保存古籍善本图书作出贡献甚大，对敦煌卷的保存也尽了不少的力。1934年3月，为了传达学术界的消息与交换知识，他分别创办了《北平图书馆馆刊》、《季刊》，内容有论著、图书和期刊之批评与介绍、学术界及出版界的消息，等等。

袁守和是图书馆目录学的专家，在其主持北平图书馆期间，极力重视目录学工作，先后出版有善本丛书、馆藏善本甲乙库书目、普通书目目录类、特种书目及文学论文索引，等等。同时，他为了把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置于现代学术基础上，极力主张沟通中西文化。由于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袁在国际图书馆学界亦负盛名，是国际图书馆协会会员、英国牛津目录学会会员、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员。

对于图书馆人才的培养，袁守和十分热心。他除不断选派北平图书馆的人员出国深造外，还积极支持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办学，任该校校董；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担任目录学教授，讲授目录学和图书馆学；主持天津《大公报》的图书周刊专栏，经常介绍最新出版物及世界重要出版物，并介绍图书馆目录。

当日本侵华势力逐步深入华北之际，袁守和于1934年开始，将北平图书馆的珍品书籍南运，分别存于上海和南京。“七七”事变爆发后，袁守和将北平图书馆先迁云南昆明，后至重庆沙坪坝。他与西南联大等校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与西南联大组织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主持编辑战时史料；并广泛搜集报纸，出版《战争史料集刊》、战区长编十四种、抗战图书提要一种。在战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以求补充馆内藏书，曾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名义发起征书运动，向国际社会呼吁赠书。与此同时，还锐意搜集西南地区的文献，搜集到大量图书、方志、传拓石刻。编辑出版有《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云南碑目初编》、《中国边防图籍录》及《西南文献

丛刊》四种；先后恢复出版中英文《图书季刊》，仍自任主编。此外，他还协助各大学采购与运输图书、仪器，担任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1]委员兼秘书长。他曾利用去印度的机会，洽购外文图书和仪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同驻美大使胡适联系，将存在上海和南京的珍品图书运往美国保藏。抗日战争后期，他赴英美考察，并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会议，1945年5月获美国匹茨堡大学法学博士名誉学位。他在美国考察图书事业，与美国图书馆协会磋商，拟邀美国图书馆专家访华，以为战后复员做准备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图书馆迁回北平，袁守和继续担任图书馆馆长。1946年，他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会后前往德国和北美考察，继续深入研究目录学。1948年冬，他离开北平去南京，于次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聘为主题目录组主任，重订国会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目录。1951年，他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聘为编纂部主任，得罗氏基金会资助赴欧研究汉学西文书目。其后，袁一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汉学编目工作，穷年兀兀埋头于目录学的编著，除在美国多方查阅书籍外，还前往欧洲各国广泛博览。先后编著有《西文汉学目录》、《留学博士论文目录》、《俄文汉学目录》及《新疆研究丛刊》等，并用中英文发表了专著论文近九十种[2]。

1965年1月，袁守和因病退休，2月6日病逝于美国，葬于华盛顿石湾公墓。

主要参考资料

吴光清：《袁守和先生传略》，载台湾《新疆研究丛刊十种》，1962年版。

李书华：《追忆袁守和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8卷第2期。

徐家璧：《袁守和先生在抗战期间之贡献》，台北《传记文学》

第8卷第2期。

朱传誉主编：《袁守和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蒋复璁：《追思袁同礼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65年2月10日副刊。

袁澄：《劳碌一生的父亲》，台北《传记文学》第8卷第2期。

---

(1) 该会于1945年5月改名中美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1946年初结束。

(2) 张秀民：《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台湾《历史月刊》1996年9月号。

袁祖铭

李德芳　刘毅翔

袁祖铭，字鼎卿。1889年6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他的祖先在“咸同苗回汉农民起义”之际，以办“团”为业，明团暗匪，为地方一霸。他的父亲袁干臣为团总，属下团丁有两三千人。袁祖铭从小在家读私塾，1907年3月到贵阳进入陆军小学堂学习。

袁祖铭于1909年在贵州陆军小学堂毕业后，去武汉报考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因目力近视落选。回到家乡后，应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学监王文华约请，任该学堂体操教员。1911年初，改任该县团防局附设将弁班教练。

1911年10月，贵州巡防营管带刘显世奉黔抚沈瑜庆电召，率部赴贵阳护卫府衙，袁祖铭随军担任哨官。11月初军次安顺，4日贵阳光复，刘显世迫于形势，作“赞成”共和的表示，遂得进驻贵阳。但他随后勾结宪政党人，迎唐继尧入黔，颠覆了贵州革命政权。袁祖铭曾随刘显世进攻新成立的都督府。

1913年10月，贵州陆军改编为六个团，王文华任第一团团长，袁祖铭任第一团第一营营长。1915年12月护国运动中，王文华以护国军第一路军右翼东路司令的身份，率黔军三个团出师湘西，袁祖铭随军出征。次年2月初，黔军向北洋军发起进攻，第一团攻湖南晃县，袁祖铭率一营在蜈蚣关、大关战胜北军，占领晃县。接着，袁祖铭奉命配合第三团吴传声部猛攻芷江敌军，突破了江西桥阵地，2月8日占领了芷江。袁祖铭以勇敢善战初露头角。护国之役后，贵州组建陆军第一师，王文华任师长，袁祖铭以功升任第一团团长。王文华在

黔军是新派领袖，袁祖铭虽隶属王下，但与宪政派联系较深，倾向旧派。

1917年7月，孙中山揭起护法大旗。8月，袁祖铭随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所率黔军入川响应护法。12月，黔军联合滇军和川军熊克武部，大败北军吴光新部，占领了重庆。次年1月，袁祖铭被王文华任命为纵队长，率黔军配合滇军，赶走川督刘存厚，占领了成都。袁在川战中指挥得力，英勇善战，受到部分黔军将领的拥戴。他便授意其部属联名电请黔督刘显世升任他为黔军第二师师长。刘显世为了用袁祖铭牵制王文华，表示赞同。但王文华反对升袁，不久便以整顿为名，下令赴成都黔军回渝归还建制，调袁任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袁对此极为不满，与王文华关系日渐不和。

1920年5月，川战又起，熊克武以武力驱逐滇黔军，进逼重庆，袁祖铭被王文华任命为黔军前敌总指挥，与熊部川军余际唐的江防军作战。10月，黔军在四川立足不住，王文华令卢焘、何应钦和谷正伦等五旅长率部回黔，发动政变，推翻旧势力代表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王担心袁祖铭从中作梗，便胁迫袁和自己一道赴上海。袁到上海后，因受到王文华监视，行动不得自由。11月，他摆脱王的监视，逃到北京，往谒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和财政总长潘复，诉说贵州政局混乱，人心不安，请求中央政府援助，安定贵州，并自称可以运动黔军归附中央。靳即拨款20万元，并电令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拨一旅归袁指挥，组织“定黔军”。

1921年3月16日，袁祖铭指使人在上海暗杀了王文华。4月，在武昌成立了“定黔军”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定黔军”欲假道湖南、四川回黔，因两省宣布“自治”被拒。8月，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通过靳云鹏的关系，袁祖铭得到吴佩孚拨给汉阳枪6000支。从此，他和吴佩孚拉上了关系。

刘显世被驱逐后，何应钦等五旅长互相争夺贵州政权，卢焘虽被

推为黔军代总司令，但徒有虚名，对黔军五个旅既不能统率更不能指挥，贵州政局陷入极度混乱状态。这就为袁祖铭“定黔”创造了有利条件。袁祖铭放弃了假道川、湘回黔的计划，凭其往日在黔军中的威信，加上私人感情，用种种手段分化黔军五个旅。结果黔军的精锐谷正伦旅王天培、彭汉章两团，首先投入袁部；接着窦居仁旅毛以宽团、张春浦旅全部亦尽归袁掌握。驻扎在湖南洪江的游击司令王华裔，也早就和袁通了声气。1922年1月，袁未带一兵一卒来到洪江，第二混成旅旅长王天培命王天锡率一营兵前往迎接。袁即以这一营为卫队，取道镇远与毛以宽团会合，是为中路军；王天培、彭汉章部为左路军，由榕江、独山向贵阳挺进；王华裔部为右路军，趋铜仁方面。三路军浩荡前进，于4月9日顺利进入贵阳。8月，袁祖铭废除“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受北京政府任命为贵州省长。

袁祖铭任省长后，打着“用人不分党派、政权向社会公开”的旗子，任命原宪政党人张彭年为总参议，丁宜中为秘书长。接着解散了省议会，改组了省公署，以原自治党人周素园为政务厅长，原宪政党人陈幼苏为财政厅长。其他如国民党员平刚，原进步党人任可澄、何季刚也都分别予以任用。经济方面，为了筹饷扩军，把原属财政厅的筹饷局改为由“定黔军”总司令部直辖。筹饷局是专门负责征收鸦片烟税的，袁命该局直接掌握鸦片烟税，加倍征收，还实行食盐官运商销。袁在军事上进行了扩编，对“定黔”有功的军人都分别予以提升：王天培升为第二师师长，彭汉章、吴传心被分别任命为第一、二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是他的亲信何厚光。对袁祖铭的这些措施，当时有人写了一首诗加以概括：“无乱偏戡乱，君休说定黔。三千散议会[(1)]，八万赎家严[(2)]。人材龟兔鳖，政策运烟盐……”

袁祖铭入黔当政后，顾盼自雄，大有不可一世之慨。他既看不起往日的老上司刘显世，不欢迎刘回省主政；也不受一向把贵州当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继尧指挥，拒绝唐恢复滇川黔靖国联军的通电。这就大大触犯了唐继尧向外扩张的野心。1923年2月，唐继尧以滇军胡

国绣旅假道贵州被王天培缴械为借口，自行恢复滇川黔联军总司令名义，派其弟唐继虞率张汝翼、吴学显部拥联军“副帅”刘显世回黔复职。滇军进入黔境，袁祖铭事前毫无准备，仓皇应战，力难与敌。为保存实力，袁率部退出贵阳。3月12日，滇军占领贵阳后，唐继虞任贵州军务督办，刘显世又重新当上了贵州省长。

袁祖铭撤离贵阳后，由铜仁退到四川秀山。这时，四川省内的一、二军之战正打得难分难解。吴佩孚派人与袁接洽，要袁助刘湘、杨森的二军作战。7月，袁祖铭被刘湘、杨森等共推为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因他指挥的范围扩大到川、黔、鄂、陕、甘五省的军队，所以又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了称霸西南，也派胡若愚等率部入川，参加一军熊克武一方助战。双方混战逾年。1924年2月9日，袁祖铭指挥的联军攻克成都。3月，北京政府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还授予他陆军上将。所部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十四师，袁任师长。这时他在重庆设立督办公署，所辖军队并不是一个师，而实际有三个师、三个独立旅和两个警卫团，达五万之众。此为袁祖铭一生的鼎盛时期。

袁祖铭在川战中大显身手，声名大噪。其时，唐继虞在贵州的一年多中，弄得民穷财尽，遭到舆论的谴责，唐继尧不得不让唐继虞退出贵州。1925年1月23日，袁祖铭派彭汉章为贵州清乡总司令回黔接收政权。不久北京政府任命彭为贵州省长，王天培为军务督办，周西成为会办。这三人都是袁的部属，贵州又一次回到了袁祖铭的统治之下。

同年2月，杨森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川，袁祖铭与刘湘组成“川黔联军”相拒，袁为总司令。9月下旬，杨森兵败出川。12月，袁祖铭和刘湘、赖心辉等川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因饷械补充问题，袁与刘发生矛盾。刘湘等欲以助袁军饷40万元为条件，礼送黔军出境；但袁祖铭久不开拔。1926年2月，杨森得到吴佩孚的支持，打回四川。刘湘、赖心辉便联合杨森出兵驱逐黔军出境。袁祖铭顶不住刘、杨的

夹攻，5月退出重庆，撤回黔北。袁本拟回贵阳，但因贵州无法解决他庞大的军费开支，遂决心率部出湘、鄂向外发展。

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后，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袁祖铭决定投靠北伐军。8月中旬，北伐军部署进攻岳州时，任袁祖铭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接着，袁自行改编军队，将所部大为扩充。袁军大本营驻扎湘西，他的部队仍然像在四川、贵州一样，所到之处自委官吏，强取赋税，而且大张旗鼓招收散兵游勇。唐生智曾电请袁祖铭移驻鄂西，交还湘西防地，但袁不予理会。

1927年1月31日晚，驻常德的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受唐生智指使，摆下“鸿门宴”，请袁祖铭“欢度除夕”，袁带着他的参谋长朱崧、亲信师长何厚光及几个亲兵赴宴，被伏兵枪杀于宴会上。

主要参考资料

蒋芷湘、杨可文等编纂：《兴义县志》，贵州省图书馆1966年油印本。

庾恩旸：《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1912年版。

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1，《近代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1) 袁祖铭解散省议会，给每个议员发放三千元的遣散费。

(2) 袁祖铭“定黔”伊始，刘显世的从兄刘显潜在贵州兴义一带引进广西

匪兵，收为己用，企图与袁争夺贵州。袁干臣也想把这股匪兵改编，为袁祖铭效力。结果这些匪兵在安龙城大肆抢劫，连袁干臣也被掳到广西山中。匪方高价勒赎，袁祖铭出八万赎金将其父赎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八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第八卷

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娄献阁　主编

中华书局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Z

载沣　汪仁泽
载涛　汪仁泽
臧式毅　张志强
曾俊臣　伍志安
曾朴　杨天石
曾琦　李义彬
曾虚白　熊尚厚
曾养甫　杨斌
曾毓隽　邵桂花　陈志新
曾昭抡　陈志新
曾昭燏　倪波　沈道初
詹大悲　徐玉珍
詹天佑　李希泌
张百麟　周春元
张本政　左域封
张伯苓　宗志文
张大千　王震
张道藩　冯祖贻
张东荪　左玉河
张发奎　熊尚厚　陈宁生
张钫　张友仁
张凤翔　张应超
张福来　张学继
张辅忠　汪仁泽
张国淦　丁贤俊　杜春和

张恨水　宗志文
张季鸾　熊尚厚
张继　黄德昭
张嘉璈　江绍贞
张謇　朱信泉
张景惠　赵长碧　张欣
张静江　沈荆唐
张敬尧　范春荣
张絅伯　汪仁泽
张君劢　江绍贞
张开儒　孙代兴
张澜　宗志文
张岚峰　邢汉三
张厉生　经盛鸿　朱正标
张灵甫　沈荆唐
张鸣岐　王学庄
张默君　侯爽　李援朝
张难先　方正伦
张培爵　沈庆生
张群　严如平
张榕　武育文　黎光
张绍曾　陈宁生
张申府　萧良
张石川　陈野
张士秀　张天政　邸娜
张文光　王学庄
张西曼　张小曼
张啸林　朱剑良　许维之
张学良　张友坤
张勋　李宗一

张耀曾　钱益民
张一麐　李晚成
张永福　陈民
张钰哲　史全生
张元济　熊尚厚
张云山　郑自毅
张贞　萧林
张振武　钟碧容
张振勋　熊尚厚
张镇芳　张学继
张知本　汪洪
张之江　宗志文
张志让　汪仁泽
张治中　余湛邦
张竹平　许小青
张自忠　沈荆唐
张宗昌　黄德昭
张作霖　黎光　孙继武
张作相　丘琴　姜克夫
章伯钧　周天度
章鸿钊　李建初
章乃器　周天度
章士钊　白吉庵
章太炎　陈旭麓
章锡琛　顾大勇
章宗祥　郑则民
赵秉钧　李宗一
赵戴文　陈宝珠
赵登禹　陈民
赵棣华　董丽颖

赵凤昌　陈时伟
赵恒惕　周斌
赵伸　李希泌
赵声　黄德昭
赵寿山　徐乃杰
赵倜　邢汉三
赵燏黄　钱听涛
赵元任　熊尚厚
赵紫宸　寿祝衡
郑伯昭　陈曾年
郑洞国　沈荆唐
郑介民　马振犊
郑螺生　陈民
郑汝成　汪小平
郑孝胥　陈贞寿
郑毓秀　李援朝　侯爽
郑正秋　张洁
郑振铎　陈福康
钟荣光　李坚　余齐昭
周宝箴　张钧陶
周凤岐　汪仁泽　陈光贻
周佛海　闻少华
周鲠生　虞崇胜
周谷城　汪仁泽
周建人　罗幼娟　邵桂花
周瘦鹃　史全生
周西成　范同寿
周信芳　李仲明
周星棠　徐凯希
周学熙　朱信泉

周至柔　颜平
周钟岳　谢本书
周自齐　张树勇
周作民　徐国懋　洪葭管
周作人　萧栋梁
朱葆三　陆志濂
朱光潜　宗志文
朱家宝　黄有成
朱家骅　林泽
朱经农　娄献阁
朱培德　胡训珉
朱庆澜　丘琴　姜克夫
朱瑞　朱宗震
朱绍良　赵建群
朱惺公　任嘉尧
朱蕴山　刘秋阳
朱执信　尚明轩
朱志尧　朱文炜
朱自清　娄献阁
诸文绮　汪仁泽
竺可桢　阎铁
庄银安　陈民
邹鲁　闻少华
邹容　尚明轩
邹韬奋　宗志文
左舜生　李义彬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一至八卷目录索引
返回总目录

载沣

汪仁泽

载沣，号伯涵，别署静云、闲园。姓爱新觉罗，满洲皇族，正黄旗人。生于1883年2月12日（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父亲奕谟是清朝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封醇贤亲王。旻宁死后继位的奕䜣，帝号咸丰，是载沣的伯父。继咸丰即位的载淳，帝号同治，是载沣的堂兄。同治无嗣，死后由载沣的同父异母兄载湉入继，帝号光绪。光绪亦无子，死后即由载沣的儿子溥仪入继，是为宣统帝。

载沣两岁时受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七岁晋封镇国公。次年（1890年）父死，他虽是排行第五，因长、三、四兄皆早亡，二兄载湉已入继帝位，故得袭父爵受封醇亲王。

载沣的嫡母，即奕谟的正福晋是慈禧太后胞妹，载沣虽是侧福晋刘佳氏所生，仍受到特殊关注。载沣的婚姻即是由慈禧太后作主，将她身边美貌能干的养女、瓜尔佳氏荣禄的女儿指婚配给他，婚后生子溥仪。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德国要求清政府派皇室特使为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August von Ketteler）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事，赴德赔礼道歉。同年5月，十九岁的载沣奉派到达柏林，备受礼遇。他见德皇室权势颇盛，就治国之道请教接待他的威廉·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又译显理亲王），亲王答以：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载沣深以为然，铭记心中。11月任京旗都统。1907年，奉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1月任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重，慈禧太后在福昌殿

病榻前召见军机大臣张之洞、世续和载沣等人商议光绪帝死后的立嗣事。慈禧太后意立冲龄的溥仪为帝，由载沣监国摄政；而张之洞、世续等担心这样则会出现光绪的皇后隆裕（西太后的侄女）重演垂帘听政的局面，主张径立载沣为帝继位。西太后认为同治、光绪已是兄弟相继，再立载沣，三代皆属昆弟传承，古无前例，实不相宜，坚持立溥仪为嗣，即作定议。慈禧原以为载沣生性懦弱，顺从听话，此后作为太皇太后虽不便再垂帘听政，但有驯服的载沣摄政，大权仍握在自己手中。翌日，慈禧自知病情垂危，深虑载沣无力负此重任，因此在临终前又下一道遗诏：以后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隆裕太后意旨办理。

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12月2日，载沣扶着三岁的溥仪登基。摄政后，载沣每天在乾清宫听政，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决心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袁原是靠出卖维新运动而博得西太后的宠信，光绪帝也因此而被囚禁至死。袁得悉西太后已死，载沣当摄政王后，逃至天津躲避。此时清皇族的一些少年亲贵主张将袁杀掉。载沣与张之洞密商，张闻言即慌忙跪在地上叩头说："现今刚遭国丧，不宜骤杀旧臣。"[(1)] 载沣密电北方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征求意见，回电都认为袁的羽翼已成，遍及各镇，如果操之过急，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如先免其职，以免发生兵变，影响朝廷安危。12月5日，载沣下谕以袁"现患足疾，步行维艰"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同年12月，成立由摄政王亲率的禁卫军，将近畿各省的新军一律划归中央直辖；成立海军部和军咨府；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1909年，载沣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执训建新军事务；任命铁良、凤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派其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考察陆海军，回国后任命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咨府大臣，并代载沣统率禁卫军。

载沣为了掩盖皇族集权，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当年成立谘议局。1911年4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宣布裁撤军机处和旧内阁，任命奕劻组织责任内阁，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受到立宪派的颂扬。5月8日，清政府发表新内阁的人选，顿使舆论大哗。新内阁阁员十三人中满人占八人，满人中皇族又占五人，舆论指责为“皇族内阁”。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要求撤销“不合乎君主立宪各国之公例”的“皇族内阁”。都察院御史也上本奏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认为皇族不宜参与内阁。载沣下旨：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立宪派的幻想泯灭，与清政府矛盾加深，清政府陷于空前的孤立。内阁名单也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紊乱。自从载沣监国以来，由于隆裕太后才干远逊慈禧太后，不能统驭全局，载沣又驽骀无能，形成皇族内部分成数派，竞相争权夺利，互不退让的局面。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加强皇室地位，至此反演成各派新贵揽权谋私、钩心斗角的严重形势，无法制止，实非载沣始料所及。

此时，载沣又以“筹办立宪新政”为名，加征田赋钱粮、苛捐杂税。以1911年清廷的预算为例，岁入白银达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之多，较之二十年前（1891年）的八千九百五十万两，猛增三倍。而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比较，更高达十倍。阶级矛盾更形激化，各地反清武装起义连续不断；满族亲贵、地方大员屡遭暗杀。1910年3月，汪精卫、黄树中等在北京银锭桥谋炸载沣未果。此时，清政府又制造了“铁路国有”事件。激起了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12日，载沣急命荫昌率领北洋新军南下镇压，讵料新军是袁世凯培植的武装，非荫昌所能指挥。此时列强认为如欲在华继续维持统治，必须另找“强有力”的代理人，他们选中了袁世凯。武昌起义的次日起便大造舆论，叫嚷“非袁莫属”，“非袁则亡”。清廷内部也以元老重臣奕劻为代表，力促起用袁世凯。但袁世凯乘机要挟，于

10月下旬提出要他出山必须接受由他组织责任内阁，委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等六条苛刻条件，清廷由于皇族载泽等人的强烈反对而予以拒绝，形成僵局。10月29日，山西省宣布独立；同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发表通电，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否则将向北京进军，并调集军队，准备进入通州、南苑一带。载沣等人闻讯惶恐万分，准备逃命承德。此时皇族会议以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不亡为由，听袁一意孤行。10月30日，载沣被迫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被解除了“监国摄政王”的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接着袁世凯又演出了一幕逼宫闹剧，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从此结束了1644年入关以来二百六十八年清王朝的统治。

载沣在摄政前期还想有所作为，后来由于上受隆裕的掣肘，下有亲贵的争权，加上素性疏懒怕事，心情日趋消沉，他对政事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冷漠。有次东三省总督锡良和湖广总督瑞澂因事进京，同时入觐，载沣只寻常地慰劳数言后就不开口了。瑞澂还想再讲几句，载沣却感到厌烦，对瑞澂说：“你的痰疾还没好吗？”表示怕噜苏[(2)]。另一次，出使日本的大臣汪大燮，因获得面陈，语词激昂，而载沣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稍息，向汪出示挂表说：“已经十点钟了。”[(3)]示意要他退出。载沣解职回府那天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回家抱小孩了！”[(4)]其妻见他若无其事的轻松神态，气得大哭一场。

民国成立后，载沣受到供给一切生活费用和保护其私产等优待。1917年7月，张勋复辟，载沣曾参与其事。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驻北京，11月5日下令免去溥仪帝号，修改优待条款，溥仪被迫迁出紫禁城，移居醇王府，载沣曾到处奔走争取复号还宫，未果。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至东北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载沣并未随行，但此后醇王府的一切开支则由伪满“内廷”拨付。1934年7月，载沣曾至长春看望溥仪，小住月余，但始终拒绝担任任何伪职。此后他以皇族遗老身份，寓居平、津两地，1951年2月3日，病逝于北京。

(1) 据张之洞回忆，当时由于他的多次力救，袁世凯才免于一死。参阅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监国之黯”，上海书店1997年版。

(3)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监国之黯”。

(4) 溥杰：《醇亲王府的生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载涛

汪仁泽

载涛，姓爱新觉罗，别名垫云，满族正黄旗人。1887年6月23日（清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三）生于北京醇王府。父亲奕譞是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咸丰帝奕䜣的胞弟，封醇贤亲王，载涛是奕譞的第七子。载淳继咸丰即位，年号同治，是载涛的堂兄弟。同治死后无嗣，由奕譞的第二子，载涛的同父异母兄载湉（奕譞的正福晋、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所生）继位，年号光绪。载涛及其胞兄载沣、载洵都是奕譞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

载涛四岁时（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受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十一月奕譞死，载沣袭封醇亲王爵位，载涛晋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1]。十一岁时奉慈禧太后之命，出继堂伯父贝子[2]奕谟为嗣子，奕譞夫妇因懿旨不能违抗而痛失爱子，生母刘佳氏更由此而受刺激，导致精神失常。五年后奕谟因细故得罪慈禧[3]，复奉懿旨将载涛改嗣堂叔父钟端郡王奕诒为继子，袭贝勒爵位[4]，迁入龙头井贝勒府。奕谟夫妇则因既失嗣子，又受此侮辱，不久相继病死。

载涛少年时喜爱骑术，1904年至1906年进陆军贵胄学堂学习，丰富了对军马训练和育选良种等知识。1908年10月，慈禧、光绪相继病亡，溥仪冲龄即位，年号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当国。11月朝命载涛加郡王衔，并与毓朗、铁良等人被任为宫廷守卫门禁，总司稽察。12月，清廷拟建人数众多的禁卫军，载涛等复被任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负责筹建工作。不久载涛奉派赴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进修。1909年（宣统元年）1月清廷罢斥袁世凯后，5月设军咨处，派载涛为管理军咨处事务，以便使皇族宗亲掌管陆军。次年1月，载涛奉命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4月载涛被特任

为专使大臣，往英国伦敦悼唁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逝世。7月回国，向清廷建议仿效欧美各国，专设军法处审理军人犯罪案件，获准。1910年4月，清廷颁令改军咨处为军咨府，任命毓朗、载涛为军咨大臣。为了进一步削弱北洋派的势力，载涛改变陆军部尚书铁良只任用满人以抵制的做法，重用非北洋的留日优秀军事学员吴禄贞、张绍曾等担任镇统制一级的高级将领，但却为革命党人得以在北方发展势力提供了机会。翌年4月，清政府公布“皇族内阁”名单后，各地革命浪潮不断高涨。闰六月，清廷拟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师）的军队，在永平府举行大操练，以显示武装震慑力量，任命军咨大臣载涛代摄政王载沣为监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永平大操计划被迫取消，下谕载涛督率禁卫各军守备京畿。此时清廷内部对各地起义民军态度形成和战两派，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听取意见，和战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载涛则始终未发一言。此时隆裕难于决断，转而向跪伏于地的载涛问道：“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急忙叩头答称：“奴才练过兵，却从未打过仗。”隆裕默然，稍后才说：“你们先下去吧！”会议也就到此草草结束[(5)]。10月14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袁建议清皇室大臣应率先带兵出征南方，为各地清军做表率。载涛闻讯，惊恐万状，自动交出兵权，请求解除一切军职。不久由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继任军咨大臣，冯国璋接替禁卫军统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廷面对土崩瓦解的局势，召集王公、亲贵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奕劻提议接受民国方面优待皇室的条件，自动退位而保亲贵们的人身安全。载涛和其兄载洵以及铁良、良弼、善耆、毓朗等人表示反对，并决议组织“宗社党”，对抗革命力量。不久，宗社党的中坚分子良弼遇刺身亡，载涛等犹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2月清帝溥仪被迫下诏退位。3月隆裕太后传谕解散宗社党。此后载涛停止了政治活动，深居简出，依靠“清室优待条件”所规定的“清室家用补助条例”拨

给的补助费，在王府内过着骑马学戏、养花玩鸟的遗老寓公生活。1917年3月，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给予镶黄旗蒙古都统的头衔。是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封载涛为复辟朝廷的禁卫军司令，直至复辟失败。次年10月，徐世昌继任北洋政府总统，加载涛将军衔[(6)]。

1924年，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逐溥仪出宫，修改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例，取消皇族的生活补助。载涛的经济来源被断绝后，虽辞去了大批仆佣紧缩开支，但仍有子女、保姆、管家等三十余口人的生活须维持，因此卖去了龙头井豪华的府宅，迁居山老胡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国难会议”，载涛被聘为该会委员。同年3月，日本侵略者扶植溥仪为“执政”，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立溥仪为“皇帝”，载涛曾被接往“新京”朝贺，但他拒绝出任伪职。1945年夏，日本投降前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曾专程登门邀载涛“出山”收拾残局，遭载涛拒绝。

抗战胜利后，载涛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一度靠出租余屋的房租收入度日，后因物价飞涨，继又将山老胡同的院子卖掉，搬进自己过去的马房居住。但是生活还是难以为继，在北京解放的前一年里，只得每天早起，从家中挑些破旧衣物，到德胜门外摆地摊卖破烂，勉强使一家人得以玉米面糊口度日[(7)]。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载涛的特长，1950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委任令是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的。他接到后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激动地说：“知我者，毛主席”，“毛主席真伟大”，“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8)]。马政局的任务是指导军马的驯养训练，培育和选择优良种马供应部队需用。接事后他施展所长，勤奋工作。当时的军马场都远在边疆地区，年过花甲的载涛除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外，还不辞劳累地

走遍东北的牡丹江和西北的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马场，进行视察和指导；向当地的指战员讲授驯马及选种配育等技术，备受欢迎，对军马场的建设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一些回忆录，为研究清末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他的子女与孙辈也由人民政府安排了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活。

1954年，载涛以满族代表身份，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民族组副组长。1956年10月，年近古稀的载涛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对家属说："我也要革命。"在他的申请书上介绍人李济深、张联棻作了如下的表述："本表申请人虽系清代贵族，从辛亥革命后，已为平民化。解放以后首先加入全国政协，任马政局顾问，对改良马种的建议尤多献替。后又膺选为人代大会满族代表，有代表性，思想上有进步要求，特为介绍加入我党组织。"[(9)] 1957年3月，他接受国家领导人的嘱托，曾至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正在改造中的侄子溥仪，临别再三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10)]。

1969年秋，载涛得偏瘫病后卧床不起，1970年9月2日在京病逝，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

(1) 引自《清史稿》诸王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引自《清史稿》诸王列传。

(3) 奕谟平时轻视慈禧，曾用诗画讥讽之，为慈禧所悉，因而受谴。

(4) 引自《清史稿》诸王列传。

(5)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44页。

(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12页。

(7) 王乃文口述、辛芳整理：《从"皇叔"到全国人民代表——爱新觉罗·

载涛外传》连载之六，刊于《团结报》1983年9月10日第7版。

(8) 王乃文口述、辛芳整理：《从“皇叔”到全国人民代表——爱新觉罗·载涛外传》连载之八，刊于《团结报》1983年9月24日第7版。

(9) 王乃文口述、辛芳整理：《从“皇叔”到全国人民代表——爱新觉罗·载涛外传》连载之八。

(10) 王乃文口述、辛芳整理：《从“皇叔”到全国人民代表——爱新觉罗·载涛外传》连载之三，刊于《团结报》1983年8月13日第7版。

臧式毅

张志强

臧式毅，字奉久。1885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于奉天城南前三道岗子村（今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乡）。祖籍山东诸城。清嘉庆年间，其曾祖携家到辽东谋生，父亲做过乡塾教师，伯父臧耀臣曾任铁岭银冈书院山长，对臧式毅影响较大。

臧式毅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与两个妹妹由寡母抚养。臧式毅聪明好学，常习诗文。十五岁时，被伯父带往铁岭，入银冈书院，开始读“四书”、“五经”。该书院后来改称学堂，臧式毅在铁岭求学多年，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整个辽东半岛都成为侵略者角逐的战场，沙河会战就发生在臧的家乡。臧式毅战后回乡看到战争洗劫的惨景，不胜感慨。1905年秋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1907年，臧式毅考取了留日官费生，初入振武学校，两年后转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第九期学习。当时革命党人在日本十分活跃，很多留日学生同情革命，臧与革命党也有接触，他深感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决心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不少留日学生中止学业回国参加革命，臧式毅与一些革命同学相约返国，参加苏浙联军攻打南京的战斗。其后由于对革命派内部上海与武昌之争感到失望，甚至对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也缺乏热情，便返回日本继续学业。

1914年，臧式毅毕业归国，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不久，经

其六叔援引，被安排在参谋本部上校科长沈鸿烈处当参谋。

1918年，奉军南下援湘，孙烈臣部入关，臧式毅离沈来投，随军去湖南，后又参加直皖战争。1920年，孙烈臣任黑龙江省督军，臧升任公署中校参谋。臧式毅以青年老成，办事认真，受到上司的赏识。

1921年，孙烈臣转任吉林省督军，臧式毅被提升为上校参谋兼卫队团长。1923年12月，又担任公署参谋长。吉林与苏联、朝鲜毗邻，不免发生界务纠纷，其他如维持社会治安以及指导金场、珠场、草场等方面事务繁多，时孙烈臣患病无力理事，常由臧代为执行。

第一次奉直战争以后，张作霖欲整军经武，准备再度入关，命孙烈臣参与陆军整理，孙不久病故。从1924年6月起臧式毅接任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因办事干练，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赞许。当时奉系势力除了元老派之外，还有新派的士官系和陆大系之分，臧派系色彩不明显，与杨宇霆、于珍同是留日士官生，过从甚密。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势力急剧扩张。1925年9月，杨宇霆出任江苏督办，臧亦随同前往南京，任省署参谋长。同年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北撤。杨宇霆与省长郑谦闻讯先逃。臧式毅及奉军第八师师长丁喜春被敌军扣留，未及撤退之奉军被缴械。半年后臧才获释回奉。臧返奉时，正值郭松龄反奉失败之后，张作霖积极筹划再度兴兵入关，但感到经济力量不足，而财政厅长王永江又决然辞职，臧被任命为辽宁财政厅厅长，主要负责解决军费等问题。他拟就了《东北金融财政整理意见报告书》，对东北经济积弊、奉票毛荒、币制混乱、外国势力干扰、战费沉重诸项都有所分析，并提出具体改进办法。

1926年，奉军以“讨赤”为名开进关内。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宣布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之职，臧式毅作为公署参议被委为奉军留守总司令，负责后方勤务及地方治安工作，常往来奉天与京津之间，为张

作霖筹集粮饷等。

1928年6月4日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设伏炸伤，当日死亡。因时局严峻，奉方决定“密不发丧”。臧式毅等一面派人去保定向张学良密报一切，请张速归；一面终日在“帅府”（张作霖私宅）办公，要求上下人等一切如常，照例给大帅点菜，上饭，送鸦片烟，有人来看望大帅，也由医官或臧代见，代谢。当时日本人曾登上城头（南门脸）用望远镜窥视帅府动静，未发现破绽。臧式毅日夜“值班”，有时他出了前门，上车回家，假装下班，绕了几圈又从后门进入府内。张学良返回沈阳后，除向臧表示谢意外，还要他负责对日交涉及料理张作霖的丧事等，他样样办得认真妥善，颇得张学良的欢心。

张作霖死后，奉系内部新旧两派明争暗斗终于酿成了1929年初的“杨常事件”。张学良枪杀了杨宇霆、常荫槐之后，把臧式毅找来，要他分别通知杨、常两家，并负责善后。随后安排臧接替杨宇霆出任奉天兵工厂督办。

1930年，臧式毅出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同年，张学良率大部东北军入关参与蒋、冯、阎大战，臧又受命为后方留守总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猛烈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和东塔机场。留守沈阳的臧式毅执行“不抵抗政策”，冀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当日，他给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打电话乞求和平，并去“大和旅馆”与日本代表谈判，结果徒劳。次日，日军开进城内，臧在家里邀东北军留守参谋长荣臻等开会，决定向在北平的张学良和在锦州的“辅帅”张作相请示办法，又决定驻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向东大营集结后撤向东山，部分军政官员撤退关内。正当他们开会之时，臧家门前已经发现日军，他让荣臻化装出走，向张学良报告。荣臻劝臧同往，他以身为一省之长，守职有责，在未接到上级命令不能擅离职守

为由而拒绝。不久，臧被日军软禁。

日本最初在沈阳实行军事统治，旋又操纵汉奸赵欣伯、袁金铠等“名流”拼凑“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后改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日军以赵、袁的影响力不足，于是极力拉拢臧式毅，于12月13日将臧释放。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授意下，由赵欣伯出面，迫省商会各委员签名请愿，促臧出山。臧于12月16日就任伪奉天省长。臧以伪省政府名义，诬指活动在辽西地区的义勇军为“土匪”，具函给日军司令部，请求出兵“讨伐”。

1932年1月起，日本多次在沈阳等地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具体策划成立伪满洲国。臧式毅较能领会日本的意图，坚持实行“立宪共和制”。16日，在有臧与张景惠、熙洽、马占山四人参加的“四巨头会议”上，赵欣伯、于冲汉抛出板垣征四郎预先拟就的制造伪满洲国计划。次日，组成伪东北行政委员会，臧为六委员之一。该会于18日通电声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区完全独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在就职的仪式上，由臧式毅和张景惠代表授印。随后臧被任命为伪民政部总长，仍兼伪奉天省长。

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改元“康德”，臧式毅被授勋一位。此后，臧逐渐不为日本主子所宠信。1935年5月，改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立法院宪法制度调查委员、国道会议副议长等闲职，他的日常活动也受到日本宪兵的监视。臧颇为苦闷，竟以吸食鸦片自遣。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加强同各伪组织的联系，牢固确立其主奴关系，炮制了一个“日满华共同宣言”，规定汪伪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日本也决意与汪伪加强“友谊”。臧式毅曾作为伪满的代表赴南京签字，并出席宴会，发表演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伪满首脑多随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逃往通化。17日，张景惠、臧式毅、熙

洽等在大栗子举行参议府紧急会议，通过了伪满皇帝“退位诏书”。随后他们又赶回长春，筹划成立“治安维持会”，妄图以地方政权实体的地位与苏军谈判。20日，苏军解放长春，30日将臧等逮捕，随即押往苏联。

1950年7月31日，由我国政府将臧式毅等引渡回国，以战犯罪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11月13日，臧病死于狱中。

主要参考资料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东亚同文会合编：《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明立印刷株式会社1939年版。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编纂：《满洲国官吏录》，1935年和1937年版。

《辽宁省职员录》，1931年6月版。

园田一龟著，黄惠泉、刁英华译：《新中国人物志》，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0年版。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

辽宁省劳改局档案资料。

孙邦主编：《伪满人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曾俊臣

伍志安

曾俊臣，名臣勋，号正然，1888年9月6日（清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一）出生于四川威远县。祖父曾怀伦，经营黄荆沟煤炭厂和染坊。父曾本灿继承祖业，后破产，家道中落。曾俊臣幼年寄食自流井外祖家，九岁入族叔经营之盐井当学徒，出师后任帮账、采购，深得东家信任。二十岁左右被派驻泸州做庄客，代井灶采购粮食和代盐商转运盐巴，并与小贩胡绍章合做贩运食糖生意，不几年即赚进数百两银子。

1912年曾俊臣辞去庄客工作，自营荣记粮店，由妻、舅坐柜，自任采购。当时军阀混战，泸州城经常被围，粮食供应紧张，粮价暴涨。他善观风色，每经一场战乱即获得一次暴利，不两年即积资万两。1914年，他开设了一家泸州最大的餐馆“大餐楼”，又于1920年与胡绍章等合伙经营复兴荣盐号，并在重庆设分号。这时，曾结识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税西恒，在税的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曾与税一道，联合泸州士绅温小泉、梁云程、申焕荣、龙少文等，创办泸州济和发电厂，由税西恒任工程师，骆景瞻任副工程师，向德国进口一套水力发电机设备，成为四川第一个水力发电厂。曾还介绍税、骆两人为自流井盐井改用蒸汽机代替牛拉天车，轰动一时。

1920年泸州为滇军控制，曾俊臣开设的“大餐楼”为滇军、商会经常聚会之所。他遂广交各界名流。泸州诗人朱清长组织“蚨蝶会”诗社，社址也设在大餐楼，半月集会一次。曾不会做诗，却免费供应饭酒。1924年，因重庆复兴荣分号经营不力，他将泸州总号迁往重庆。

盐税历来为军阀筹饷的一项庞大收入，而盐商又要利用军阀保持

其专销特权，因此，他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曾俊臣擅长交际，会巴结逢迎，1925年被同业举为重庆盐帮公所会长，专办交际。当时刘湘占据重庆，派陈国栋为盐运使。曾对他们百般逢迎，每天在复兴荣盐号以烟（鸦片）酒嫖赌、吃喝玩乐结交。曾与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阀交往密切，除吃喝玩乐外，为他们筹垫军饷也十分卖力，从而深获有关各方面信任。他曾在同业中自夸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到1928年，复兴荣经营楚岸盐额（即食盐由重庆运销湖北）先后已达三百余儎（一儎为九万三千六百斤），一度成为盐业大户。

1930年王缵绪兼任四川盐运使，敲诈盐帮期票十余万元，反咬盐商行贿。刘湘派甘典夔调查，曾俊臣作了如实反映，事虽不了了之，从此王对曾怀恨在心。王本系西充帮盐商后台，在盐商竞争中，他有意卡住重庆盐帮三百多儎盐巴运不出去，使复兴荣损失惨重，不到半年竟亏损三十几万两银子，以致破产。

1931年曾俊臣担任潘昌猷经营的复楚盐号宜昌、沙市分号经理，并自营糖业，获利甚厚。随后，淮盐与川盐争夺楚岸市场，川盐失利，曾俊臣返渝，开设富丰盐号，经营小量楚岸盐和糖。

1935年，曾俊臣招引了刘湘的财政大员甘典夔在富丰盐号入股。甘常约一些地方权贵在盐号寻欢作乐。曾从而结识了以后担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曾趁当时国民政府招商机会，与李春江、石竹轩（万县大烟商）三人合组"鑫记"土行，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为总经理，李春江、甘典夔为后台，专营鸦片外销。该行先在川黔各产区收购鸦片，集中于重庆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从一年几百担、千把担做到几千担货。由于赚钱顺手，后来一年最多曾达一二万担，账面资金总额有时扩大到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超过一万担，几乎造成了垄断之势。鑫记经营两年多，获暴利达二百万元。曾俊臣由是被推举为重庆特业公会会长。刘航琛担任四

川省财政厅长期间，1937年实行鸦片“统收统销”办法，由官方垄断，鑫记随之停业。但官营招致各方反对，曾俊臣复于1938年与川西恶霸地主周云章、江津帮的王政平等十余家土行合并，组成“庆康”，继续扩大经营鸦片。为寻找靠山，曾等进一步笼络各方权贵，每日备办珍馐异馔，伴以娼妓，供他们纵情享乐。当时国民政府大员贺国光、夏斗寅、何成濬、徐源泉等常为庆康的座上客。由于利用了地方军阀、国民党大员和封建势力的关系，庆康在全国开设四十余处分庄，控制了大部分鸦片内销，获利甚巨。到1939年，最大外销市场汉口已沦陷，加之股东间意见分歧，国民政府又宣布烟土冻结，不准承运，庆康至此收手。曾前后经营鸦片四五年，共获暴利五六百万元。

重庆的香烟供应原本由上海等地运进，抗战期间货源中断，由滇缅路运进的英国烟数量少价格高。曾俊臣乃与留法学生邓起人、原庆康协理李懋卿等集资十万元，开办蜀益烟草公司，聘请上海来川的工程师、技师十余人，到香港购卷烟纸，到许昌购烟叶，以五部卷烟机投入生产。出产的十支装主力舰牌香烟，由于质量较好，曾畅销一时，获利甚丰。不久官僚资本集团把持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福烟厂、湖北帮的大汉烟厂、贵州帮的大通烟厂相继迁渝，重庆卷烟业发展日盛，市场竞争激烈。更有甚者，战后美国香烟充斥市场，蜀益势孤力单，终于在1948年倒闭。

1941年由于法币贬值，国民政府发行“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黄金储蓄券”，当时美金官价为二十比一，黑市价近四百比一。曾俊臣认为有利可图，先后购进美金储蓄券四十万元、美金公债二十万元、黄金储蓄券数千两。不久，果然市场债券行情上涨，曾获得暴利。

抗战胜利后，重庆胜利银行总经理王政平因投机黄金多头失败破产，曾俊臣以二十万元“美金储蓄券”用“蜀益”名义顶进胜利银行，自任总经理。以后由于债券投机失败，又逢甘典夔经营的通惠银行倒闭，吃了大笔倒账；加以货币不断贬值，市场混乱，胜利银行受到影

响，难以维持，终于关门歇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俊臣参加重庆市工商联活动，并撰述工商史料。1964年7月6日，曾因病在重庆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曾俊臣：《经营“特业”五年述略》，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1辑，1962年版。

曾朴

杨天石

曾朴字孟朴，又字籀斋，笔名东亚病夫，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1872年3月1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生于江苏常熟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1891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未中，他的父亲替他出钱捐了个内阁中书。1895年冬进入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法文。次年以所著《补〈汉书艺文志〉》及《补〈汉书艺文志〉考证》献给翁同龢，很受赏识 (1) 。同年，应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有录取，“决心舍弃仕途，别寻发展的途径” (2) 。

1898年，曾朴在上海经江标介绍，结识福州船政局船厂厂长陈季同。陈在法国侨居多年，熟悉法国文学。他常去陈处请教，此后三四年内，读了不少法国文学和哲学书籍，自谓“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 (3) 。

1900年1月，慈禧太后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准备废弃光绪皇帝，曾朴曾经参与联名电谏 (4) 。1903年因受人怂恿，和一杨姓丝商共同经营蚕丝，不久即因外丝倾销而破产。次年，与同乡徐念慈等在上海共同开办小说林书店，出版创作小说及东西洋小说译本。夏秋之间，从友人金天翮手里接过未完成的小说《孽海花》六回，加以点窜修改并续作。三个月工夫，完成二十回，于1905年初分为初集、二集出版。

金天翮写作《孽海花》的时候，拒俄运动正在高涨，他以清廷曾经出使俄国的洪钧为主角，洪妾傅彩云（即赛金花）为配角，计划写入“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广西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称为“政治小说” (5) 。曾朴接手

以后，声称要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并改称“历史小说”[(6)]。曾朴写出的小说，删去了金天翮原作中拒俄和反清的内容，以主要篇幅揭露清朝达官名士们的腐朽生活。书中虽然也写到了革命党人，但理想和热情则倾注在光绪皇帝和改良派身上；对列强侵略中国也表示了不满，但在具体描写时又美化了帝国主义分子。在艺术上，曾朴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政治时事、掌故传说，都加以穿插剪裁，围绕女主人公的生平情节展开，自称是蟠曲回旋，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的“一朵珠花”[(7)]。关于这一点，鲁迅曾评之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8)]。

1907年，曾朴出版《小说林》月刊，陆续发表《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五回。1908年因资金困难，书店停歇。同年，曾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第二年，应两江总督端方聘，任财政文案[(9)]。一年后，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绿营营产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参加张謇的共和党，当选为江苏省议员。1914年以后，长期任江苏官产处处长，曾以财力支持过陈其美、钮永键的反袁活动。1924年底任江苏财政厅长，四个月后离去。1926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江苏，曾朴任政务厅长，不足一年称病辞职。

1927年，曾朴和长子曾虚白一起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联络胡适、徐志摩、邵洵美等一批文人，想造成一种“法国风沙龙的空气”[(10)]。11月，刊行《真美善》杂志，标榜艺术至上和趣味主义，宣称要使它“做成一切人共同的享受”[(11)]；经过修改的《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五回和续作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即发表在该杂志上。按原先设想，曾朴是准备写到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后来又曾企图写到1900年或1901年，以赛金花和瓦德西的所谓“浪漫史”作全书的总结，但实际上写到甲午战争后便停止了。

1928年，曾朴对《孽海花》作了修改。由于思想上的退化，此次修改偏重于艺术技巧的提高，对原作中批判科举制度等某些有意义部

分又作了删削。1931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称为三十回本。同年7月，《真美善》杂志停刊，曾朴迁回常熟，在其父亲经营的私人园林虚霩村居里莳花种竹。1935年6月23日病故。

曾朴的著作除《孽海花》外，还有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分六部，计划仿效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传》，集许多各自独立的小说而成一有系统的集合体，表现从清末同治、光绪年代到北伐战争时期的“社会变迁横断面”[12]，但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部：《恋》。此外，还翻译过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多种。

---

(1)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2) 《曾孟朴年谱》，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161页。

(3) 《复胡适之》，《真美善》半月刊第1卷第12期。

(4) 张鸿：《籀斋先生哀辞》，《曾公孟朴纪念文集》，常熟曾氏自刊本，第1—2页。

(5) 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34页。

(6) 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34页。

(7) 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30页。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45页。

(9) 曾达文、曾朴纂修：《海虞曾氏家谱》，常熟曾氏义庄1924年排印本。

(10) 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79页。

(11) 《编者小言》，《真美善》半月刊第2卷第6期。

(12) 曾虚白：《赛金花与小凤仙》，《东方杂志》复刊第8卷第1号。

曾琦

李义彬

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创始人。原名昭琮，及长，因慕韩琦之为人，改名琦，字慕韩。1892年9月25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生于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的一个富宦家庭。其父曾友三清末在广西做小官，全家迁居桂林。曾琦幼年时在家中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1908年春考入桂林中学堂读书。不久，因其父母相继去世，遂与其兄变卖家业，扶榇返回祖籍四川。1909年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肄业，与王光祈、魏时珍、周太玄、李劼人等同学。后转入法政学堂读书。课余为报章撰述评论，《成都商报》曾聘他为主笔。辛亥革命前后，曾执笔于《成都商会公报》、《四川公报》，并在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群报》。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琦赴重庆，追随熊克武、杨庶堪参加讨袁之役，事败潜回隆昌。

1914年曾琦至上海，入震旦学院习法文，与同学左舜生、李璜等相识订交。

1916年春，曾琦东渡日本，先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秋后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宪法及行政法。留日期间，与易君左等二十余名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华瀛通信社”，为国内报刊撰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康有为参与其事。是时正在日本房州避暑的曾琦，曾致信梁启超，劝梁慎于出处，继续提倡国家主义。

1918年夏，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纷纷罢学归国。曾琦哀叹“人生最不幸之事，莫过于中途辍学”[(1)]。但在广大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的爱国潮流推动下，亦于6月25日回到北

京。不久即与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经一年筹备，于翌年7月11日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不久，曾琦离京赴沪，执笔于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日报》。其间，受业于章太炎，章为他讲说《易经要旨》和《佛学大纲》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曾琦抱同情态度。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他以深刻影响。7月1日他在写给留法的周太玄、李璜的信中说：“我在上海前后病了三个月，真是奄奄无有生气，直到5月4日，北京学生痛击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我如饮了一付兴奋剂……马上就启程北上，视察学界情形。……我到京后，接洽学界许多青年同志，精神上非常愉快，又亲眼看见6月3、4、5日北京政府捕拿学生二千余人，囚在译学馆的一班爱国青年，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之精神，觉得国家前途一线光明，全系于此。”[3] 是年8月下旬，曾琦从上海乘船去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与周太玄、李璜等人组织“巴黎通信社”，充当上海《新闻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讯稿件。

五四运动后，“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分化。李大钊等学会中的左翼分子，力图把这个成员复杂、宗旨笼统的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曾琦作为这个学会中右翼势力的代表，反对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他从法国写信给国内的同伙左舜生说：“宣言本会为纯粹的学术团体，只许个人本其专长为社会的活动，不许个人为政治活动。”[4] 同时，他在给王光祈的信中还表示要“研究蒲鲁东学说，择要撰述稿件寄回国内”[5]，企图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3年12月2日，曾琦组织留法学生中一些国家主义的信徒，在巴黎郊区玫瑰村召开中国青年党成立会议，被选为党务主任。会上通过了曾琦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宣言》标榜青年党的宗旨是：“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对内，则以

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6]。曾琦还在《宣言》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说它不适合中国国情。1924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到会五十二人，曾琦被选为委员长。中国青年党建立后，曾琦等人竭力破坏旅法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其矛头首先指向国共合作。他唆使党徒邬傅如盗窃了中国共产党一份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文件。他亲自拿着这份文件面见旅法的国民党人王宠惠、蔡元培、郑毓秀等，极力反对国共两党合作。又托谢持之婿曹任远将此文件密转其岳父，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供炮弹。后来他回国后，与谢持“约定内外夹攻”，反对国共合作。

曾琦旅欧五年，其间曾到德国、比利时短暂停留，大部分时间住在法国。1924年9月，他和李璜、张梦九一起回到上海。他先后在大夏、同济、法政、学艺等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还是用在青年党的活动上。是年10月10日，他与李璜、张梦九以及国内的国家主义分子左舜生、陈启天（左、陈均在上海中华书局供职）、余家菊等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喉舌。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曾琦在《醒狮》上发表多篇文章，宣扬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辱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

为了反对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从1924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个国民会议运动，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曾琦反对国民会议运动，甚至攻击国民会议运动是“乘机煽动，别有用心”，表示“吾人固万不能符合也”[7]。

这年冬天，孙中山从广州北上，途经上海时，曾琦由谢持介绍往见，劝孙“中止联俄容共”政策，两人“辩论良久，不欢而散”[8]。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曾琦借机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得国

民党“失却海外华侨之同情”，“失却绅商阶级之同情”，“遂致已入党者时起冲突，未入党者裹足不前”[9]。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无理屠杀我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年5月30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曾琦反对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反对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他在《醒狮》周报上公开主张“今后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只以拥护工人本身利益，及提倡工人爱国为限，不宜让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借以宣传赤化”，“在军阀未倒，外患未销以前，工人只宜参加‘全民革命’，不可侈谈‘阶级斗争’”，“非万不得已时，不宜轻用罢工手段”[10]。

1926年夏，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青年党建立后，其党名长期保密，对外活动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出现，又因标榜国家主义，所以被称为国家主义派。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曾琦等人散布的谬论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揭露和批判，其真实面目逐渐被人们识破。一度被蒙蔽的青年纷纷觉醒，声明脱离国家主义派。自称为“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派，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曾琦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供认，“由（民国）十三年秋迄十六年春，愚虽居沪滨，而时复漫游大江南北，讲演不下数百次，为文不下千余篇，意在醒青年之迷梦，存国家之元气。顾虽瘏口哓音而终莫能挽此既倒之狂澜”[11]。

严酷的事实，使曾琦认识到“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12]。于是他就投靠各地封建军阀，“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13]。从1926年起，他派出一批重要党徒与各地军阀勾结。他本人则时而回故乡勾结四川军阀，时而到山东依附韩复榘。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曾琦拼命反对。他说："此次北伐，不惟无直抵黄龙之望，抑且有根本动摇之忧"，"世人虽震其声威，而予则敢断言其必败"[14]。他的诅咒没能阻止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到1926年末，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进抵长江流域，严重威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军所到之处，废除了北洋军阀的所谓五色国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于是曾琦又掀起了一个所谓拥护"五色国旗"的运动，成立"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发表《保护五色国旗宣言》。

1927年1月，曾琦离开上海，到了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许多人积极进行营救，而当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的曾琦则成了军阀杀害李大钊的帮凶。他"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唯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15]。

曾琦一再煽动蒋介石背叛革命，破坏统一战线，屠杀共产党人。北伐前夕，蒋介石搞"整理党务案"时，《醒狮》周报就煽动蒋介石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用武力排斥共产党"[16]。北伐进军途中，曾琦"希望国民党……绝对不容党内有跨党分子，毅然开除共产党，以免内起萧墙之祸，外贻赤化之讥"[17]。"四一二"政变时，他对蒋介石"对付共产党之采取严厉手段，尤深赞其勇敢"，还提醒蒋介石，"开除共产党后，勿遽认为祸患已绝。须知共产党之基础本在下而不在上。仅仅罢免一二高级军官，逮捕三数领袖人物，何以制共产党之死命？"[18]煽动蒋介石向广大工农群众开刀。

"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和青年党在反共反革命上本来已完全一致，但由于蒋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异己，在一个时期内拒不承认青年党，所以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没有能够合流起来。因此，曾琦在"四一二"以后继续反共的同时，也曾反对蒋介石的"党治"。

1927年9月，曾琦去日本。不久，蒋介石亦"下野"来到日本。在

日期间，陪同蒋介石的陈铭枢曾到横滨晤见曾琦，调解蒋介石与青年党的关系。因蒋只准青年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坚持不承认青年党，故调解未成。是年冬，曾由日归国，先后到北平、香港、天津、山东等地，依附地方实力派，从事反对革命的活动。在天津，他极力拉拢梁启超，欲拥梁为领袖组织新党。在山东，他令其党徒组成法西斯式特务组织“特别侦谍队”，协助韩复榘缉捕共产党人，破坏革命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琦代表青年党“撰《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一文，载于天津《大公报》，主张政党休战”，提出不论国民党之反应如何，中国青年党先自实行（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行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19]。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召集国难会议时，曾琦等青年党的几个负责人均在被邀之列。只因对会议内容、地点、仪式有分歧，曾等未去出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流寓湖南”的曾琦，策动湘桂川地方军队对红军“截堵迎击，并坚壁清野，严阵以待”。不久，他返回四川，支持四川军阀进攻川陕红军。还支持李璜回川组织“安抚委员会”，协助刘湘、邓锡侯、杨森等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6年前后，蒋介石与曾琦信息往还，蒋多次表示要见曾。当年冬，曾派李璜赴洛阳祝贺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并劝蒋中止西安之行，以防张学良、杨虎城发生“腋肘之变”。蒋“围剿”红军心切，未采纳曾、李的建言[20]。不久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于1936年12月25日从太原致电蒋介石，表示慰问，他竟把蒋的获释说成是由于“积旬日之呼号，动十万之师旅”的结果。1937年1月8日，曾到浙江奉化面谒蒋介石，“长谈两次，建议数项”[2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15日召开庐山谈话会，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他在16日的会议上发言，呼吁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38年，国民党当局成立国民参政会，曾被聘为参政

员。1941年夏，曾赴香港。同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曾与梁漱溟合办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港期间，日本驻港领事通过国社党驻港负责人对曾琦进行诱降，汉奸汪精卫亦与青年党的骨干分子关楚璞密谈，拟委任曾为南京汪伪政府铨叙部长。1941年12月，香港陷落，曾在日本驻港领事保护下，乘敌舰潜往沦陷区上海。汪精卫又劝曾出任考试院副院长。曾本人未公开担任伪职，但青年党的一部分人却公开投敌叛国，它的几个重要成员（如赵毓松、李守黑）曾在汪伪政权中担任部长，曾本人也曾经从敌伪手中领取过经费[22]。1944年冬，曾琦移居日寇统治下的华北。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他从太原接回四川，参加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这次会上被选为青年党的主席。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主张“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同年11月，青年党撕下“在野”与“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曾琦被指定为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曾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张君劢（民社党）等签署“共同施政纲领”，正式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任国府委员。为此，曾赋诗道“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23]，对蒋感激涕零。

1947年夏，蒋介石要对共产党下“讨伐令”。曾琦向蒋介石建议“不如实际上总动员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讨伐令则从缓发，俟其明目张胆，组织伪政府时，再从而大伸天讨。犹之刘先主之讨曹魏，明知其迟早终必篡汉，仍待曹丕僭号称尊，始行讨伐”[24]。这一献策得到蒋介石的鼓励和嘉奖。1948年元旦，蒋授予他一等卿云勋章。他则又向国民党政府献策：严格保甲制度，在各地组织“老年队”、“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25]，以切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一再强调“军民如何互相配合，实为当前剿匪之要旨”[26]。

1948年3月，曾琦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4月19日，代表青年党致电国民党，祝贺蒋介石“当选”“行宪第一任总统”

[27] 。会后曾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48年10月，曾琦赴美。1951年5月7日，病逝于美国华盛顿。

---

(1)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22页。

(2) 《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印行，第33页。

(3) 《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日）。

(4) 《少年中国》月刊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

(5) 《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6)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遗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第8页。

(7) 《醒狮》周报第15号（1925年1月17日）。

(8)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111页。

(9) 曾琦：《挽孙中山先生》，《醒狮》周报第24号（1925年3月21日）。

(10) 曾琦：《为上海总工会鸣不平》，《醒狮》周报第51号（1925年9月26日）。

(11) 《醒狮》周报第223—225期合刊（1930年10月10日）。

(12) 中国青年党党史委员会纂：《曾慕韩先生（琦）年谱日记》，1983年版。

(13) 中国青年党党史委员会纂：《曾慕韩先生（琦）年谱日记》。

(14) 《醒狮》周报第98期（1926年8月29日）。

(15) 孙永年：《青年党外传》，原载《文萃》第45期，引自新华社编辑：《狐群狗党现形记》，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5页。

(16) 《醒狮》周报第92期（1926年7月18日）。

(17) 《吾人对于国民党之真正态度》，《醒狮》周报第106期（1926年10月16日）。

(18) 《国共两党决裂后吾人对国民党之态度》，《醒狮》周报第129期（1927年4月23日）。

(19) 曾琦：《五年来朝野协力之回顾》，柳下编《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成都国魂书店1941年版。

(20)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1) 曾琦：《五年来朝野协力之回顾》，柳下编《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

(22)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5月6日第1版。

(23)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120页。

(24)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176页。

(25) 《与段之桓论组训民众书》，《青年中国》周报第67期（1948年9月5日）。

(26) 《曾琦谈剿共要旨》，《中华时报》1948年4月14日。

(27) 《中华时报》1948年4月20日。

曾虚白

熊尚厚

曾虚白，名焘，字煦伯，笔名虚白，1895年4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常熟。曾家为江南巨富，父亲曾孟朴是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清末民初的著名文学家。曾虚白资质聪慧，受其家族的影响，幼时便爱读书识字，少年时先后入三育小学、南洋中学读书。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8年毕业后在长沙雅礼医学院教英文。1920年去北京，担任全国烟酒公卖局科员。不久后去天津，先后任直隶交涉使署科长、会计主任。其间与天津办《庸报》的董显光结识，业余协助董显光办报。

1925年夏，曾虚白辞去了直隶交涉使署的职务，全力与董显光共办《庸报》。1928年秋，他离开天津《庸报》南下上海，协助其父创办真美善书店，并主编《真美善》文艺月刊，前后两年。在此期间，他一面进修文艺，一面广交文友。1931年秋，曾虚白到南京担任金陵女子文学院教授兼文学系主任，同时讲授中国文学史、小说研究、诗词研究等课。不久，上海《时事新报》和《大陆报》董事长张竹平邀请他负责筹办一家晚报，曾欣然允诺。张竹平答应采用社长制，从组织、人事到经营管理、办报格式等由曾全权负责。

曾虚白设想办一份崭新的晚报，跳出老式框架，乃聘请文艺界的朋友做编辑，以学过会计会经商的同学任经理。他定下四条办报原则：（一）一律用语体文；（二）新闻受读者喜爱；（三）评论要说读者想说的话；（四）副刊一类供文艺爱好者，一类供市民。他决定采用分布独立采访网和建立直接发行网等措施，以期办出特色。1932年1月21日，上海《大晚报》正式创刊，曾任社长兼主笔，以伍倜然为总编辑，崔万秋为副刊编辑，黄霞超等为采访记者，在用人上做

到“知人善用”。《大晚报》出版后，无论是社论、专栏、新闻，都积极主张抗日救亡，言论颇为激烈。时值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人们非常关心战事，该报报道及时，很受读者欢迎，日销达五万份，最多时达八万份，创上海晚报发行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报社还负责代收代转捐款捐物，热忱为前方抗战服务，一时声誉鹊起。

“一二八”抗战结束后，曾虚白根据形势的变化，立即改变《大晚报》编辑方针，调整版面，重视新闻报道，同时仍然多方报道抗日言论，以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进而在新闻界和社会上树立起新的声誉。然而为时不久，1933年5月，被蒋介石任命为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黄郛在北上途经上海时，向曾宣讲“攘外必先安内”思想，劝其追随蒋介石，曾深以为是。此后《大晚报》改变言论方针，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效力。与此同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兼新闻系教授，主讲新闻编采。

早在1933年与黄郛见面时，曾虚白即表示，“真有一天政府发动抗日战争，我决心放弃自己手创的新闻事业”，“参加政府抗日工作”[(1)]。所以“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曾即辞去《大晚报》社长兼总主笔之职，随董显光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宣传部[(2)]，担任宣传处处长，由新闻业转入仕途。他竭力推动国际新闻界宣传中国政府的抗日主张和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争取友邦的同情。他利用各种关系去接近外国在华的记者以及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介绍真实的情况使之了解日军的在华暴行，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同时，他还设立新闻检查站，以防外国记者的报道不实或故意伤害中国。为争取友邦的公开援助，他聘请一些外国人出面作代言人进行抗日宣传；在重庆设立外国记者招待所，积极联络各国记者；推动外国民间发起援华行动；在国外举办摄影展览；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共同推动国际广播节目，向世界各地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等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曾更加注意向同盟国宣传中国抗战，以争取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他也研究如何对付中共，抵制中共在国际上日益扩大的影

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国共军事冲突频起，在华各国记者非常关心国共之争，曾虚白在国际宣传处，经常招待外国记者，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的行径辩白。194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撤销国际宣传处，改由行政院增设新闻局，他改任该局副局长，继续主管国际宣传事宜。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虚白被台湾当局任命为“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时蒋介石宣布“政治革新”改造国民党，随后曾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第四组主任。1950年9月，曾接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1964年，他辞去“中央社”社长职，改任“中央通讯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负责台湾当局的新闻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兼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热心于民意学的研究，开设过民意课。主编有《中国新闻史》；曾任台湾新闻记者公会理事会理事长、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新闻讲习班主任、台湾“中国新闻学会”主任委员等。

曾虚白1972年退休后，仍然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所长，开办博士班讲授民意学原理，并撰写《曾虚白自传》。

1994年1月5日，曾虚白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曾虚白先生生平事迹》，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6期。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1990年版。

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

程》，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版。

---

(1) 曾虚白：《“八·一三”忆往》，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1期。

(2) 该组织不久被撤销，改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国际宣传处。

曾养甫

杨斌

曾养甫，原名宪浩，字养甫，以字行，广东平远人，1898年10月2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九）生。少年时，目睹晚清政府政治腐败，社会落后，感慨良多。弱冠之后，以为欲谋建设，非有科学知识，不能效法先进；非有革命精神，不能迎头赶上，遂入北洋大学矿冶系学习。1923年大学毕业后，与同学陈立夫同赴美国留学，进匹茨堡大学研究院深造，获硕士学位。留美期间，曾被选为国际学生会会长。他研读孙中山《建国方略》，“益信科学知识与革命精神为物质建设之先决条件，两者不可缺之”[(1)]。

1926年初，曾养甫回国抵达广州后[(2)]，得陈果夫、吴倚沧推荐，参加国民政府工作。旋奉蒋介石之命，以筹备主任身份，筹办石井兵工厂，以充实北伐军械。同年9月，任广州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嗣后历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部长、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为北伐后方建设效力甚勤。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反共，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曾养甫感到此时在广州已无可作为，遂北上入薛岳部，转战于徐州、济南间。后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政治部主任。

1928年2月，国民政府成立建设委员会，曾养甫任常务委员；翌年1月，任副委员长。因委员长张静江兼主浙江省政，该会所有规划全国建设事宜，多由曾负责主持。他鉴于政府经营之事业成效不彰，乃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建设原则，以管理科学化、经营商业化为建设方针，以确立会计制度、集中采购材料为入手之方，三年内先后

整理扩充南京、戚墅堰两电厂，开办淮南煤矿，创设无线电台三十座，并整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勘测计划，筹备东方及北方两大港建设事宜。

1932年曾养甫调任浙江省建设厅长。他督工筹款，全力赶筑杭江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并筑金华至兰溪支线。1934年11月，他得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及宋子文、陈果夫等人支持，力排众议，筹划建设钱塘江大桥。同时还规划了浙江全省公路网，先后建成沪杭公路，浙东金衢、金处、宁台、温州干道，浙西公路先通皖南徽州，再经桐庐、寿昌而达屯溪；浙南于1933年底赶工建成的江山至福建浦城公路，对蒋介石调兵镇压“闽变”，助力不小。在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大力倡导改良浙江蚕桑农业，禁止余杭蚕丝土种。

曾养甫在浙江兴建公路之业绩，深为蒋介石赏识。蒋为“围剿”江西红军，于1934年1月设浙闽赣皖四省边区公路处，任曾养甫为处长，赶筑四省边区公路，以利军运。不久，曾又兼任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公路处长，主持西南公路工程，赶筑湘黔、川黔、黔滇公路。经一年努力，建成了以贵阳为中心，东通湖南、西连云南、南达粤桂、北接重庆的西南公路网。这一公路网对蒋介石“开发”西南和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效用甚著。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关系急遽恶化，蒋介石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开始调整内外政策，派陈立夫主持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陈立夫乃派曾养甫秘密与中共人士联系，商谈国共和解和合作事宜。1936年初，经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秘密联系，曾养甫代表国民党，通过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向中共提出四条要求：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维埃运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活动。其后，曾先后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中共长江局代表张子华及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潘汉年，在南京进行了多次会谈。5月15日，周恩来写信邀请曾等到陕北直接谈判，然未能成行。

曾养甫8月调任广州市长后，仍继续进行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工作，他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交给张子华，并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3)]。周恩来接信后，于8月31日回复曾养甫，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4)]。曾于9月27日告知张子华，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并做好了10月底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准备。他表示国民党方面同意中共四条谈判原则，即：（1）党公开活动，（2）政府继续存在，（3）参加国会，（4）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5)]。还表示如周不能来广州，国民党方面可派人去陕面商谈判地点。嗣后因陈立夫出面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谈，曾逐渐置身事外。

曾养甫对于经济建设工作，怀有更大的热忱。1935年12月，蒋介石继汪精卫后任行政院院长，曾养甫被任命为铁道部政务次长。1936年春，兼任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悉力推动兴建浙赣铁路玉萍段、沪杭甬路杭绍段、粤汉铁路株韶段及京赣路、湘黔路；并与宋子文及中国建设银公司合作，组织成渝铁路公司，筹划成渝路建设。7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规划全国经济建设事宜。8月，曾被调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市长，后兼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埔开埠督办，致力于广东开发，如筹款兴筑广梅、琼崖两铁路，争取完成南方大港工程等。1937年5月，兼代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养甫于1937年10月兼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主任，负责输入国外军需物资，以利抗战。同时派工程人员整理广西公路，以接通广州湾、海防等海口，畅通外洋物资输入线路。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曾即率广东税警团队在粤西广宁练兵抗敌。1939年1月，奉蒋介石电召，由广宁经桂林抵重庆。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西南成为抗战重心。为打破日敌封锁，另辟国际通道，保证外洋物资源源输入，曾养甫被蒋派任滇缅铁路督办，率领工程技术人员日夜跋涉于山林草莽，宿息于蛮烟瘴

气之中，勘测抢修滇缅铁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不久侵占仰光，滇缅铁路建设工程被迫中断。由于我国国际运输路线已被完全切断，为争取美国空运援助，蒋介石决定在军委会内设工程委员会，由曾养甫任主任委员，负责赶筑机场。一两年间，在云、桂、湘、赣、粤、闽、黔、川、鄂、陕等省，共筑机场四十余处。1942年12月，曾养甫继张嘉璈之后出任交通部部长。他以“便利军运，协助稳定物价，规划与复兴”为施政方针，全力推进西南西北交通建设，要求员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争取时间，发挥服务精神，严密工作检讨[(6)]。1943年1月，交通部成立公路总局，曾自兼局长，以统一管理全国公路建设与运输事项。1945年1月，曾养甫因修筑滇缅路时染之足疾骤发，乃辞交通部部长职，赴美就医。

曾养甫在国民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列名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迁居香港。

1969年8月28日，曾养甫在香港病逝，终年七十一岁。

---

(1) 曾养甫：《五十自叙》（1944年秋），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3期，第59页。

(2) 曾养甫在《五十自叙》中记为1926年初与陈立夫一同离美返抵广州任职；惟陈立夫自述是1925年离美回国，先至山东中兴煤矿任采矿工程师，于1926年初至广州任职的。

(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4)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5) 《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10页。

(6) 曾养甫：《新年告全体交通员工书》，《交通建设》第1卷第1期（1943年1月），第2页。

曾毓隽

邵桂花　陈志新

曾毓隽，字云霈，祖籍江西南丰，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福建闽侯县东街孝义巷口。曾家系榕城名门望族，父亲为福州船政局文牍，曾毓隽常侍在侧，耳濡目染，逐渐熟悉官场清规与陋习，为其日后混迹宦海奠定了基础。

曾毓隽幼入私塾启蒙，聪颖好学，练就一手好字。十六岁中秀才，1894年为拔贡。1896年，曾将祖业田产出让与人，得款捐官。1901年分发顺天府，幸遇世谊同乡顺天府尹陈璧，聘为文案。时陈璧监修清东、西皇陵工程告竣，将曾毓隽列入有功人员名单之中。1902年秋至1905年，曾先后任文安、大城、良乡、宛平、肥乡等县知县。1905年，以知府衔办理北京正阳门工程，工程竣工后升任道员，归原籍候补。

1906年清廷设邮传部，管海陆运输及办理邮政电讯事宜，曾任该部书记。时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欲聘一掌管书记之人，经倪嗣冲推荐，曾毓隽遂入段幕任文案、军需职，此为曾终生追随段之始。曾精明干练、足智多谋，会理财，文书又是行家里手，因而深得段的赏识，纳为心腹。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兴。清政府任命段祺瑞为第二镇统制官，领兵南下镇压革命，尔后段署理湖广总督，兼任清军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曾毓隽则掌管文案及前敌军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于1月26日以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军统领衔北方诸统兵大员四十六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曾毓隽以参议官身份列名其中。3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段祺瑞任内阁陆军总长，曾为陆军部秘书。

1916年5月袁世凯病笃，知帝制不可为，乃约段祺瑞入中南海。曾毓隽随段见袁，以察言观色探悉袁病的轻重。不久，袁病势愈殆，曾毓隽衔段命赴宁，向冯国璋陈述详情及大局，商以袁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事。冯国璋以黎为副总统，继任总统顺理成章，随复电表示赞成。6月，袁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曾毓隽随段入国务院任秘书。7月，交通总长许世英面请段祺瑞允任命曾毓隽为京汉铁路局局长。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与段祺瑞发生激烈的权力冲突。段为达到驱逐黎元洪的目的，利用时任长江巡阅使张勋作调停，而对张勋欲复辟帝制达成微妙的默契，曾毓隽就是他们之间的穿针引线人，参加了张勋召开的二、三次督军团会议。1917年5月，因对德参战问题，黎、段“府院之争”已达炽热化。黎元洪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的本兼各职，段祺瑞通电否认总统令，并退居天津另组参谋处与黎抗衡。其时，曾毓隽衔段命赴徐州会晤张勋，进一步明确段默许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做“调人”。1917年6月1日，张勋以解散国会为条件率辫子军五千人入京。7月1日，张勋复辟帝制。段见驱黎目的达到，遂由默认复辟的同盟者摇身一变成了讨逆军的总司令。曾毓隽任讨逆军军需处长，赴鲁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及第五师张树元联手，堵截辫子军北上应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主掌北京中枢，曾毓隽由京汉铁路局局长转任对德参战处参事，而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此时，北洋直、皖两系矛盾尖锐，皖系与奉系张作霖也反目，曾毓隽为弥合张作霖与徐树铮之间裂痕而奔走，但效果甚微。

3月7日夜，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王印川等人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开会，组建“安福俱乐部”，以操纵新国会选举。俱乐部负责人王揖唐成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后，由曾毓隽负责。每至晚饭后，曾必至俱乐部，面对纷至沓来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和人事间纠纷，进行斡旋，纵横捭阖，间或召集公开的或秘密的会议，对选举进行部署。

8月12日，新国会于北京开会，因安福系议员占新国会议席的百分之七十，故史称“安福国会”，曾毓隽为参议院议员。9月24日，新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祺瑞虽实践了他所作冯国璋同时下野的承诺，但仍保留“参战督办”职务，并发表徐树铮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职，加陆军上将衔。

曹汝霖自1917年7月任交通总长以来，与次长叶恭绰极不相能，百般倾轧，终排之去，遂于1918年10月引曾毓隽为次长，两人均感不啻水乳交融。翌年5月15日，曾继詹天佑之后兼任汉粤川铁路督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曹汝霖被迫辞职，曾于6月10日代理部务。曾毓隽一朝得势，搜罗巨款供给党费，手腕之灵活尤过于曹，安福系奉其为财神。

自1919年6月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由于得不到徐世昌、段祺瑞两人共识，总理一席一直虚悬。唯靳云鹏是徐、段两人认同的人选，徐世昌遂咨请新国会予以通过。然而，安福系竟横生枝节，提出财政、司法、交通及院秘书长为通过靳组阁的条件，这“三长一秘”的院秘书长人选即是曾毓隽。但靳表示反对。10月31日、11月4日，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靳云鹏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11月5日，徐世昌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新阁成员中的“三长一秘”并非安福系所提意中人选。为此，安福系成员又聒噪起来，并对新阁成员名单一致予以否决，认为靳云鹏利用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军人压制国会就是目无国会。11月9日，曾毓隽等三人面见靳云鹏，逼其更换新阁成员，靳的态度强硬，表示阁员一个都不能换。11月11日，曾毓隽又单独晤面靳云鹏，请其更换阁员，仍被拒绝。最后安福系搬出靳的上司与老师段祺瑞，对靳大加斥责，使靳就范，改提李思浩掌财政、田文烈掌内务、曾毓隽掌交通。

曾毓隽自任交通总长后，飞扬跋扈，伙同徐树铮挪用部款两千万元之巨。11月25日，曾毓隽与英国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签订借款为二百万元《湘鄂二百万元借款函约》，以京奉铁路余利为担保。此款用

作湖广铁路湘鄂局订购机车十二辆、货车九十辆及就地各项开支。

1920年元月，继山东学潮之后，相继在天津、北京又发生声势浩大的学潮。起因是学生抵制日货，遭到当地军警的镇压。31日，北京各校学生万余人冒雪游行示威，2月5日，曾毓隽、徐树铮、王怀庆、吴炳湘及日本有关官员等在北池子日人大仑宅开会，共同决定严厉取消学潮，当晚将所捕去学生四十三人移交卫戍司令部收押，不允许亲友探望。

直皖战争前夕，徐世昌为寻求避战之法，电召张作霖、曹锟、李纯入都磋商。6月8日，安福系骨干在太平湖集会，讨论上海和会及应付徐世昌的办法。曾毓隽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做张作霖的行馆。在张抵京之日，安福系主要成员于曾毓隽宅内会议，决定以副总统一席为交换张作霖严守中立的条件，方有战胜直系的把握。但张对皖系的感情态度冷漠，对6月20日徐树铮拜会托故不见，更未住进奉天会馆，而是下榻于奉军司令部，使曾毓隽和徐树铮甚为难堪。6月22日，张作霖抵达保定，受到曹锟热情款待，吴佩孚及苏、鲁、赣、豫等七省代表为张设宴接风，席间讨论时局，提出五项条件，其中就有解散安福系、罢免安福籍三总长等内容，请张作霖带回北京。

为筹措战费，曾毓隽以京绥铁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五百万元，后因英、美干涉作罢。旋又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一百万元，为边防军开拔费。直、皖两派之争经张作霖入京调停，段初愿让步，嗣因曾毓隽不得其位，对此巨款无法报销，乃立主筹措战费，怂恿徐树铮备战。直皖交兵，曾毓隽遂饬京汉、京奉各路尽其所有，立即解京。因之，曾之罪不亚于段、徐。直皖战后，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7月29日，徐世昌下令通缉安福系祸首，徐树铮、曾毓隽等十人分别褫夺勋位官职。曾先后躲入日本驻华公使馆、天津日租界，最后流亡日本，其财产被抄，损失甚巨，但所剩仍很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曾的各种私产折合计三百万元。一年后通缉令取消，曾毓隽一度意志消

沉，暂时离开政界。

曾毓隽销声匿迹有年，忽于1923年1月13日入奉会见张作霖，段祺瑞的姻亲吴光新同行。1924年秋，在鏖战的直奉大战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使直系迅速溃败而结束战事。北方实现了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派联合而又互相猜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受革命潮流影响，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应邀北上，但行抵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冯玉祥一派渐被排斥。其时，段之左右多以为段任执政是皖系东山再起的好机会，然而曾毓隽对此并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张、冯、段之联合乃权宜之计，不会持久，段的地位也不会巩固。因此，曾毓隽态度消极，未出任要职，仅挂一总参议虚衔。

曾毓隽与张作霖关系密切，段祺瑞经常派其赴奉与张联络事宜。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冯玉祥决定捕逮亲张的曾毓隽，软禁在京畿警备司令部内。后经曾家买通看守，乘换防混乱之机，化装逃出。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陷于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段祺瑞终于被赶下台，曾毓隽与之同进退，再次随段到天津日租界淡路街乐寿路隐居。曾与段祺瑞、王揖唐、靳云鹏等以研究佛学、吟诗作赋度过时光。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人不断威胁利诱曾毓隽去南京组织伪临时政府，曾既不敢回绝，又不甘心附逆当汉奸，乃偷偷潜出，辗转于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最后又回到天津，终未为日伪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毓隽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居住在天津市河西区荣华里，安度晚年。1967年，曾毓隽辞世。

主要参考资料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章伯锋等主编：《北洋军阀》第1—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盛京时报》1912—1928年。

《申报》1912—1928年。

曾昭抡

陈志新

曾昭抡，字隽奇，号叔伟，1899年5月2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生于湖南长沙外祖母家。祖籍湖南湘乡荷叶乡万宜堂。是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曾孙，父亲曾广祚是举人，为江苏候补道台。曾昭抡幼随父服官江南，庭训之余，兼得师传，在私塾数年，打下国学的坚实基础。

1912年夏，曾昭抡与胞兄曾昭承一起进长沙美国圣公会办的雅各学校，始接触英文及算学。1913年春，入美国雅礼协会所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学习，在校二年学习英文、算学、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化学等科。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插班生，一年便中等科结业升入高等科。曾于清华就学时，慎行少言，发奋好学，由于他有深厚国学的扎实根基，又学过数、理、化等学科，加之好学不辍，各科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同学的敬佩和老师的喜爱。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曾昭抡，在1919年5月9日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同清华全体同学齐声宣誓：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之人民、土地、主权。曾还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参加宣传队，进城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活动。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他更加渴求获得新知识，用功益坚。他是校中的长跑运动员，还是《清华周刊》的校对员。他用五年的时间读完了清华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的课业，于1920年修业期满而毕业。

1920年秋，二十一岁的曾昭抡获得公费，负笈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习化学工程。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并完成了题为《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类鉴定中的应用》的

有机化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并于1926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导师的重视，导师希望其留在美国工作。曾回答：我很热爱母校，但更热爱我的祖国。遂毅然回国。

1926年曾昭抡抵达上海，不久南下广州，进兵工试验厂当技师，然非其素志，遂辞职北返。1927年夏，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和化学工程等课程，后兼任化学系主任。他倡导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使中央大学化学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

1931年夏，曾昭抡受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其主持下北大化学系扩建了四个实验室，对原设备进行改装，增添了许多新的仪器设备和药品。同时充实了图书资料，改进教学方法，教学中努力汲取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经过几年的努力，北大化学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曾昭抡在北大化学系先后讲过普通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合成、有机分析、杂环化学、炸药化学等课程。曾于每门课程开讲之前，先着手改革旧教材，重新编写讲义，使其讲课内容充实，也深受学生欢迎。他严格要求学生，规定做毕业论文的制度，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联系实际、独立工作的能力。曾昭抡是中国化学界最早提倡学校搞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化学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执教北大化学系期间，发表科学论文五十多篇，其中有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

曾昭抡在北大任教期间，不但教学与科学研究名扬海内外，在一些学术团体活动中也极有影响。他参加过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等国内外学术团体，尤其对中国化学会的创建与发展贡献极大。中国化学会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曾是该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后来多次当选该会会长、常务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被推为《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该会志是我国最早的

化学期刊之一，他把我国当时化学研究新成果，用英、德、法等文字公布于世，受到各国化学家的重视，促进我国化学研究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国科学社等学术团体于1935年8月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以化学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报告，报告精辟地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发展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1936年9月他发表了《中国化学会前途展望》一文，文中阐明了经营中国化学会和办好《中国化学会会志》的指导思想。

这期间曾昭抡还担任《科学》、《化学》和《化学工程》等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他还是美国《化学文摘》杂志的摘要人，为这些刊物写过大量文章。他热心向同行介绍中外化学科学发展与现状以促进中国化学科学研究之发展。他撰写的《有机化学百年进展状况》、《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中国化学之研究》、《最近有机化学之进展》、《中国有机化学之研究》等文章，帮助国内化学界了解国内外化学科学研究进展的动向，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和化学知识的普及。

“一二九”运动后，北大当局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1936年4月，北大以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女子同学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曾昭抡等著名教授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同年5月4日，北大禁止学生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的活动，同学们就采用师生联合纪念的办法，邀请曾昭抡、周炳琳、许德珩等教授一起到会讲演。曾昭抡等教授把当年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联系起来，无不感慨地说：在今天纪念“五四”，就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消灭汉奸！

1936年11月中旬，曾昭抡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国难与逃难》一文，讽刺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文章称：“九一八”之后，“一二八”的淞沪战争发生了，上海的居民，搬箱倒柜地从华界搬进租界，堂堂政府马上打着“长期抵抗”的口号，把首

都从南京迁到当时所谓安全地带的洛阳。同时日本人在下关开了几炮，吓得留守南京的官吏纷纷逃往沪杭，这次的经验，充分地表现了我国上下一致的逃难精神。接着曾寓意深远地说："现在我们的国运，就像在水灾前夕一样。遇着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若是大家不管，一起逃跑，结果非大家淹死不可。若是大家齐心合力，把决口堵住，那便是大家都可获救。即令一切的努力失败，结果也不过和大家不管一样。在这困难的当头，我想有一件学生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每人努力去劝服自己的家属、亲戚、朋友，叫他们千万不可逃难，因为国家亡了，逃也没有用的。"

时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抗击日伪军的入侵，消息传到北平，曾昭抡受北大全校师生的委托率领北大师生劳军代表团，于12月1日离平赴绥远前线慰问。代表团一行七人抵达归绥时受到傅作义将军及驻军官兵热情欢迎。曾等一行在前线阵地参观后，在归绥军举行的集会上代表师生向前线抗敌军民致慰问词，并将大批慰问信及慰劳品送到官兵手中。曾于前线慰问、调查时，发现士兵及当地民众对日寇将使用毒气及烟雾的传说十分惊恐，为安定军民之心以利抗战，他应邀为当地军民作了八场有关毒气及防毒知识讲演，使军民消除了对毒气恐惧的心理，增长了防毒知识和能力。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开始，北大、南开、清华三校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曾昭抡在临时大学任教。随着日寇侵略魔爪伸向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南迁昆明。由于当时交通运输困难，仅有教师和少数学生乘火车去广州，取道香港，经越南入滇。多数学生和曾昭抡等少数几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前往。曾是旅行团指导委员之一，于1938年2月20日，与学生们由长沙出发，一起跋山涉水，他们于沿途战胜了各种艰险，接触到许多劳苦大众，进行了社会调查。曾昭抡还兴致勃勃地写下了旅行日记，祖国秀美山川，民众的苦难，使曾百感交集，为其后来投身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旅行团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五百华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

临时大学在昆明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曾昭抡继续于化学系任教。他在教学之余，对抗战前途的发展非常关心，拒绝亲朋援引到国民党政府任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毅然投身到民主革命运动洪流之中。1940年9月，他在一次题为《国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的讲演中，坚信日寇绝不能征服中国，抗战必定取得最后胜利，他的讲演给听众极大鼓舞。1944年，曾昭抡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该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他非常关心世界反法西斯形势的发展，《民主周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一周时事评论》，分析评论欧洲战场的形势，充满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必胜信心和对法西斯的痛恨。然而曾的言行为国民党特务所不容，他的名字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中。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平津。曾昭抡受北大委派先期赴平，办理复校事宜。他于北平边接收校产边任课临大补习班。北大复校后，他仍执教化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工作，讲授普通化学等课程。1947年，曾昭抡作为中国代表被派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期间，他考察了美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英国进行访问、讲学。1948年初，曾偕夫人俞大绚 归国，暂居香港。时年，曾昭抡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

曾昭抡虽身居香港，远离北大，但仍关注平津各校师生反迫害斗争。1948年5月他同郭沫若、何香凝、萨空了、谭平山、柳亚子等一百三十六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港九民主人士给平津各校教授、同学和工友的一封信》，向平津的爱国生伸出援助之手。1949年9月，曾昭抡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体会议，共商建国大计。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他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

1950年5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全国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8月，曾当选为全国科联副主席。1951年，他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1953年至1957

年担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对化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7年，曾昭抡会同民盟科学规划组的费孝通、童第周、千家驹、华罗庚、钱伟长等著名学者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撤职降级处分。1958年4月，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曾昭抡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并在武大化学系成立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先后建立起有机硅、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高分子等科研组，参加并指导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1967年12月8日，因患癌症和非典型白血病去世。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1957年曾昭抡等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对党对国家有益的建议的结论。1981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为曾进行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会。

主要参考资料

《清华周刊》第45卷第3期（1936年11月15日）。

《燕京新闻》第13卷第17期（1947年3月17日）。

《清华旬刊》第9、10期（1948年5月28日）。

彭庆、刘维权编著：《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人物》，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

社1992年版。

王治浩、邢润川：《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化学通报》1980年第9期。

曾昭燏

倪波　沈道初

曾昭燏，湖南湘乡人，1909年2月1日（清宣统元年正月十一日）生。她的曾祖父是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父亲曾广祚为举人，晚年患有精神病。母亲陈季瑛读过古籍，会琴棋书画，还会医疗，教育子女甚力。曾昭燏兄妹七人，后来全都受到高等教育。曾昭燏和二妹曾昭懿[(1)]终身未嫁，俩人一起生活，融洽相处。她和二哥、著名教授曾昭抡亦关系密切。

曾昭燏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她出生后不久，家道就开始中落。1923年，曾昭燏入长沙艺芳中学读书，六年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先在国文系学习，后转外文系直到毕业。她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古文学家、书法家胡小石教授的器重和培养，常得到胡的亲口传授，后还搬到胡家寄居三年，在胡的直接指导下发愤学习，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古文字学、考古学。193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大学的学业，到金陵大学附中执教。

曾昭燏的青年时代，正是社会上的妇女谋求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时期。曾昭燏那时意识到，妇女要有和男子一样的社会平等地位，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要不依附于男子。当时，在一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妇女中流传一种看法：结婚就是女子的坟墓，结婚就会葬送了一生。曾昭燏也认为不少女子结婚后整天忙于家务，埋没了她们的聪明才智。为了自己向往的事业，她决心不结婚。

1935年，曾昭燏怀着对考古学的极大兴致和求知欲，跟从曾昭抡自费到英国留学。留学期间，她十分珍惜时间，除了在学习时刻苦钻研外，假期就到各地去参观博物馆，广开眼界，增进知识。旅行时为

了不影响白天的学习时间，总是乘夜车赶路，在车上睡眠休息。她一进图书馆，常常连午饭也顾不上吃。1937年，她在伦敦大学研究院宣读论述古文字意义的论文，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和赞扬，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并担任助教[(2)]。不久她又去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实习十个月、慕尼黑博物院实习两个月。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曾昭燏身在海外，心念祖国，于1938年9月从法国马赛登船归国。归来时正遇武汉沦陷，她感到对日本侵略无能为力，心绪甚为悲观。但想到要利用所学知识来救国和要为祖国的考古事业作出贡献时，她毅然参加了云南大理[(3)]和四川彭山的考古发掘工作，整理和编写了彭山考古发掘报告（石印稿本）。她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支生气勃勃的科学工作者队伍，到野外去发掘并加以研究探讨，直至1940年6月。这期间，她不知疲倦地实地发掘，查阅文献，几乎每天都是通宵达旦。后到昆明和重庆附近的李庄，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1941年2月起，她任中央博物院代理总干事、代理主任等职。1943年，她在重庆主持举办石器铜器展览会，充分显示祖国悠久文化，激发观众爱国热忱。嗣后，她将展览的石器铜器绘制成图片，运到印度扶轮社展览，与古代印度的文明媲美，受到印度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赞赏。

抗战胜利后，曾昭燏参加了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及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等组织的工作。她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主任，主持中央博物院的工作。1946年和1948年，她多次主持举办文物展览会。1948年，她参加联合国博物馆协会，成为当时中国在该协会的九名会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昭燏更加努力于祖国的考古学专业。1949年南京博物院成立，她先被任命为副院长，1952年2月起任院长。她还兼任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治淮文物工作队队长、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至1951年，她领导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江宁牛首山附近发掘了五代南唐李昪永陵和李璟顺陵。这是解放后第一

次发掘帝王陵墓，不仅出土许多重要文物，还为后来北京发掘明定陵提供了宝贵经验。她重视对考古人才的培养，亲自在“中央考古训练班”讲课，并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秦汉考古学》等课程。

曾昭燏还兼任江苏省社联副主席、江苏省妇联执委、江苏省暨南京市对外友协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筹备会理事、《文物》和《江海学刊》编委、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被选为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江苏省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昭燏的主要著作有：在英国伦敦大学时写的《中国铜器铭文与花纹》，在德国国家博物院期间写的《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以及《大理发掘工作报告》、《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与吴多鼎、王介比合写）、《南唐二陵发掘简略报告》（和张彬合著，载《科学通报》第2卷第5期）和《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主论，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沂南古画像石古墓年代的讨论》（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关于沂南画像石古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关于沂南画像石墓中画像的题材和意义》（载《考古》1959年第5期）、《试论湖熟文化》、《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和尹焕章合著）等。

1964年12月23日，曾昭燏因精神病和高血压症于南京去世。

---

(1) 曾昭懿是全国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北京医生学校校长，在北京从事医务、教学工作多年，晚年至南京任鼓楼医院妇科医生，与曾昭燏一起生活。

(2) 伦敦大学的考古讲座，在当时蜚声世界。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向达、考古学家夏鼐，都是曾昭燏在伦敦大学的先后同学。

(3) 云南大理的考古工作由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主持，这是抗战时期我国考古工作者所作的极少的几次考古发掘工作之一，对于云南洱海地区的远古文化及大理国文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詹大悲

徐玉珍

詹大悲，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湖北蕲春人。1887年8月3日（清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生。其父詹竹亭是个秀才，在本村任塾师。詹大悲七岁随父读书，后又从人兼习数理一类课程。1907年以第一名考入黄州府中学堂，在校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和同学宛思演、梅宝玑、方子樵、何亚新等人一起组织证人学会，在同学中发展会员，传播革命思想。

1908年，詹大悲获悉学校当局因他宣传革命，将要开除他的学籍，于是离开黄州到了汉口。起初，他想在汉口办报，因经费不足而作罢。后宛思演接办汉口《商务报》，詹被聘为主笔，这是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报纸。1909年冬，詹大悲和刘复基等以访员身份前往天门、潜江，通过该地驻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取得了联系。从此，《商务报》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

1910年夏，由于群治学社的暴露，《商务报》受牵连而停刊。12月14日，梅宝玑等人创刊《大江白话报》于汉口歆生路，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任主笔。未几，汉口发生英国水兵无故殴毙人力车夫事件，群情激愤。詹在报上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大加揭露和谴责，英领事对此极表不满。胡为霖的父亲惧祸，召胡为霖归家，《大江白话报》停刊。詹大悲遂另筹三千元自兼经理，并改名《大江报》，于1911年1月3日继续刊行。

这时，群治学社已改名为振武学社，由蒋翊武主持社务。但因多次遭受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破坏，社务几陷于停顿。蒋翊武乃邀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密商办法，决定联络益智社、神州学社等革命小团

体，成立“文学社”，詹被推为文学社简章的起草人。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詹被选为文书部长。《大江报》遂成为文学社的机关报。

同年5月，湘、鄂、川、粤人民掀起保路运动，7月26日，詹在《大江报》上刊出黄侃（署名“奇谈”）所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暂起进行“极烈之改革”[(1)]，击中了清政府的要害。8月1日晚，《大江报》遭到湖广总督瑞澂的查禁，詹大悲被捕。在法庭上，他怒斥清政府将云南片马拱手让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2)]，并承担《大江报》所发文章的一切责任，被判处一年半徒刑。

武昌起义汉口光复后，詹大悲被迎出狱。10月14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受命为主任[(3)]兼管军事处。但没过几天，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等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虑，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驻汉鄂军支部，仍以詹为支部长”[(4)]。25日，黎委张景良为汉口前敌临时总指挥，剥夺了詹大悲的军事指挥权。当时，清军冯国璋部正猛攻汉口，张景良非但不督战，反于27日下午“突焚粮台”[(5)]，在后方策应清军，结果全军动摇，兵退大智门。詹大悲依军民所请，立斩张景良，但已无法挽回败局。31日汉口失守。詹鉴于黎元洪等的猜忌，乃忍痛东走九江、上海。

1912年2月，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当时，不少下层革命党人对此深为不满，詹大悲认为这“无异授贼以刃”[(6)]，欲办《亚东日报》以唤醒人心，但因经费筹措不易，未能如愿。次年春，詹回到汉口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并当选为省议会议员。

“宋案”以后，詹大悲支持孙中山的兴师讨袁主张，并联络原文学社社员杨王鹏、王宪章、温楚珩等密谋在汉首先发难，议定由“詹、杨等担任鄂西、鄂北军事，蔡济民秘谋内应”[(7)]。不幸事被黎元洪侦破，詹在黎的追捕下乘日舰逃离汉口。“二次革命”期间，他先后在江

西和南京赞助李烈钧和黄兴的讨袁军事活动。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亡命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詹大悲首批入党，并奉孙中山之命，与王宪章等回上海策划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王宪章惨遭杀害。詹侥幸逃脱，再赴日本。次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詹大悲回国，准备去湖北策动讨袁起义，刚抵上海，即被新闸捕房以所谓“私造湖北官钱局伪票”的罪名逮捕，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7年7月，詹大悲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9月，被派往四川从事争取川军的工作。1918年5月，孙中山受桂系军阀排挤辞职离粤。詹也离开广州。直到1920年11月，粤军陈炯明逐走桂军，孙中山重返广州后，他才又返粤协助孙重组军政府。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詹任大本营宣传员，并受孙的指派二次进川，联络川军共同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詹追随孙中山避难永丰舰五十多天。次年奉孙之命赴泉州，与何成濬共商讨伐陈炯明事宜。

1924年1月，詹大悲受孙中山指派，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詹被任为刑事审判委员，因不谙法律辞，改任参事。10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詹大悲奉命前往江西，联络方本仁合击陈炯明残部。

1926年1月，詹大悲作为建国鄂军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与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联名通电，揭露北洋军阀段祺瑞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国民党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驱逐此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工具，建立统一之国民政府”[(8)]。会议期间，他被推为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委员和起草人之一。经他参与起草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文》，肯定了“一大”后两年来的政治

工作“确能依总理所指示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决定之政策进行”，并深望全体党员“仍以继续之努力，完成未竟之工作”[(9)]。针对“西山会议派”的非法活动，詹大悲向大会提出了速予纠正居正等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的议案。大会选举时，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沪代表。

同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詹大悲随军到达武汉，先后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代理湖北财政厅长等职。不久，湖北省政府成立，他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27年2月他又任武汉市政府委员。在“迁都”之争中，詹大悲坚决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11月通过的迁都武汉决议，反对蒋介石主张改迁南昌的企图。针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詹主张“把党的职权行使起来”，不能“只看见个人活动，看不见党的活动”[(10)]。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詹大悲即主持召开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通过了“通告下级党员一致反帝国主义，反蒋”和“根据蒋介石最近反动事实，再请中央免职查办，并开除其党籍”等项决议[(11)]。

与此同时，詹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5月10日，他在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国共两党联合的必要性。他驳斥国民党右派攻击工农革命运动的谰言，指出“因为要摧毁封建的基础，绝不是省政府几个人员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对工农革命运动“不应过于压抑”[(12)]。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叛变革命，但詹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的所属各级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上大声疾呼要“加紧农工运动”[(13)]。

詹大悲在武汉的言行，深为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所仇视。9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了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詹的所谓“附逆嫌疑”的决议。11月，南京国民政府讨唐（生智）军占领武汉后，詹避入汉口日租界。12月17日，詹被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希图响应广

州”的罪名逮捕[14]，当夜即遭杀害。

---

(1) 刘望龄：《革命的号角——大江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5辑，第89页。

(2) 刘望龄：《革命的号角——大江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5辑，第89页。

(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17页。

(4)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第一册，武昌大汉报社1912年版，第100页。

(5) 蔡寄鸥遗著：《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3页。

(6) 董必武：《詹大悲事略》，湖南省图书馆藏。

(7) 潘康时：《潘康时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版，第43—44页。

(8)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一号，第7页。

(9)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十八号，第6页。

(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7日。

(1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

(1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9、23日。

詹天佑

李希泌

詹天佑，字眷诚。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1861年4月26日（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生于广东南海一个没落的世家。他的曾祖詹万榜是清乾隆年间太学生，因经销茶叶来到广州，遂在广州落户。到他父亲詹兴洪时，詹家开设的茶行因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倒闭了。由于家境中落，詹兴洪把家搬到南海，务农为生。

詹天佑在七八岁时，进塾读书。这时，广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洋货源源从香港输入广东。这使詹天佑有机会接触到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和机器。他喜欢玩弄机件，几次把家里的自鸣钟偷偷地拆开来又装上，留心观察机器的构造和各个零部件之间的关系。

1871年年底，清政府派容闳到香港主持“选送幼童出洋肄业”的招生工作。次年初，詹天佑到香港参加考试，被录取。8月11日，詹天佑等第一批留美幼童自上海起程赴美。詹天佑在美国的小学和中学毕业后，于1878年6月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以雪费尔命名的科学学堂，在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 (1) 。

詹天佑在学习肄业期间，刻苦钻研，成绩优异。他在数学方面是一个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曾获得数学奖金。在毕业考试中，他的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1881年6月，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这一年，由于清政府内守旧派对留学生计划的攻讦与破坏，清政府命令容闳把前后派送出洋肄业的四批幼童共120名全部撤回，其中仅有詹天佑与欧阳庚二人得到了学士学位。

同年11月，詹天佑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在福州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82年9月，他以一等第一名在水师学堂毕业。12月，被派往“扬武”兵轮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4年6月，中法战争爆发。8月23日，法国海军在马尾向福建水师发动袭击，中国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在半小时内均被击毁。詹天佑在“扬武”兵轮上和他的战友们奋不顾身与敌作战，表现了无比的沉着与英勇。詹天佑随后被调任福州船政局任学堂教习，教授英文和驾驶等课程。不久，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他去广州，任博学馆洋文教习，并兼任测绘海图的工作。在一年内，他用西洋测绘方法绘成了一幅中国沿海形势图。后来，博学馆改为水陆师学堂，詹天佑在水陆师学堂继续任洋文教习。

1888年，詹天佑通过他的留美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这才开始献身于中国的铁路事业。这时，帝国主义国家贪婪地掠夺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其中包括铁路的筑路权。中国铁路公司是在外国殖民者控制下“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之一，公司里的外国工程师不把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放在眼里。詹天佑愤愤不平，他决心要用中国人的技术力量来修建中国的铁路。他先是参加修建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当工程进展到滦河时，需要架一座横跨滦河的大铁桥。英、日、德三国的工程师打桩都失败了。詹天佑认真分析了外国工程师用过的各种打桩方法，仔细研究了滦河河床的地质土壤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与调查，决定改变桥桩的地点，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配合机器进行打桩，终于顺利地奠定了稳固的桥基，完成了滦河铁桥的全部工程。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通知詹天佑，他被选为该会会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詹天佑多年努力修建的山海关外铁路工程被迫停工，他被调任萍（乡）醴（陵）铁路的工程师。一年后，又调回参加收回被美、俄两国侵占的关内外铁路的工作。詹天佑“胼手胝足，沐风栉雨”，“在事异常出力”[(2)]。

1902年秋，詹天佑被派任新易铁路的总工程师。这是袁世凯献媚

于西太后，为便利她去西陵祭祀而决定修建的。该线从高碑店至西陵，是京汉铁路支线，总长四十五公里，限于六个月内完工，不能贻误第二年春天祭陵的日期。这是中国工程师自修铁路的开端。詹天佑接受了这项工程任务后，经过周密计划，率领全体工程人员努力修建。他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有时通宵工作，结果提前两个月便全线完工通车，曾受到西太后和袁世凯的赏识。

1905年，詹天佑被派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总办为官僚陈昭常。一年后陈调任吉林殖边督办，詹天佑升任总办。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首先致力于测线与选线的工作。为了寻找一条比较理想的线路，詹天佑亲自背着标杆和经纬仪，在峭壁上精心测量，定点制图。他还时常骑着小毛驴四处访问老农，征求他们对线路的意见。他白天翻山越岭，晚上住在老乡家里，伏在油盏下绘图设计。他勉励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员，一定要认真对待选线工作，不能丝毫马虎。他们一共测了三条线，最后选定了通过关沟的这条线路。它比外国工程师所选路线在隧道工程上可减少两千多米。

詹天佑把全路工程分为三段。1906年1月6日，开始从丰台铺轨。事先有人认为京张铁路要通过关沟，以铺用窄轨为宜。詹天佑不同意，坚持使用1.435米的标准轨距。他说：中国真正统一要从铁路的轨距划一开始。在丰台铺轨的第一天，工程列车中两节车厢间的车钩链子突然折断，造成事故。这次事故提醒了詹天佑：不仅要有坚固的路基和标准的轨距，还要使列车的各车厢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特别是爬向高地或自高地下降，都必须十分安全。他引进和使用了自动挂钩，使十几节车厢牢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自动挂钩有效地保证了行车安全，被人们称之为“詹天佑钩”。第一段工程不到一年就竣工通车了。

第二段工程是京张铁路中最艰巨的一段工程，其中主要是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詹天佑根据两个隧道不同的地层结构和长度，决定对较短的居庸关隧道采用两端对凿的方法，对长达1091米的

八达岭隧道，除两端对凿以外，在中间开一竖井，向两头开凿，均获得成功。由于八达岭附近地势险、坡度大，詹天佑决定不采用通常的螺旋式的线路，而是从青龙桥起，依着山腰作“之”字形的线路。列车到了这里，改用大马力机车从后面推列车前进；到“之”字的交叉点时，再加用一台机车在前面把列车往上拉。车厢原在前头的，换方向后就改在后尾，不用调拨，比较方便。同时，每节车厢之间都改用自动挂钩，十几节车厢就联结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在大马力机车的牵引下，列车就可以顺利地爬上八达岭的岭巅。这是詹天佑在铁路工程上一个创造性的设计。

京张铁路在1909年7月4日完成全线铺轨工程，9月24日全线通车。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通车典礼，庆祝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的胜利通车。这条原来计划需要六年才能修成的铁路，四年就完工了，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二十八万多两银子。京张铁路的建成使詹天佑名噪中外。为表彰他的功绩，清政府授以工科进士衔。

京张铁路通车以后，詹天佑曾计划将其向西延展至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沟通西北。可是库藏空虚，于是发行张绥铁路公债券，以募集路款。詹天佑用他自己连同他子女的积蓄带头购买了张绥路公债券，渴望我国铁道事业能日益发展。

1909年秋，詹天佑去宜昌任商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之川路宜（昌）万（县）工程总工程师，主持路线的勘定工作。1910年，詹天佑应商办广东省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就任粤路总理。这时，川、湘、鄂、粤等省发生保路运动，他对此是大力支持的。他到粤路后，几个月内，就将行车、购地、储料及筑路等事项逐一整理，有条不紊。辛亥革命期间，他努力使列车照常运行，保护铁路财产不受损失。1912年5月，他到汉口就任粤汉铁路会办。

这时，孙中山已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宣言要在十年内建筑十万公里大铁路，袁世凯虚伪表示“推诚接受”，特

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特任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被任为该路会办。孙中山邀约詹天佑协助他制订修建十万公里大铁路的计划。不久，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亡命日本。

1914年，詹天佑继任汉粤川铁路督办，而用人权、财产权及经营管理权都受制于帝国主义银行团派来的外国工程师，但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1918年9月16日建成了全线中的武（昌）长（沙）段并通了车。

1919年初，詹天佑以交通部技监与汉粤川铁路督办的身份，被北洋政府派往哈尔滨，任美、英、法、日等国组成的所谓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特别委员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参加技术部会议。4月15日，詹因病请假回汉口治疗，24日病逝。中华工程师学会为表彰他修建京张铁路的功绩，捐资在青龙桥车站建立詹天佑的铜像，以志纪念。

詹天佑在1912年夏曾将年初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华铁路工同人共济会”与“中华工程师会”三个团体合并组成“中华工程师会”，设事务所于汉口。詹天佑被选为会长。1913年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该会在团结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该会刊行《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以交流技术经验，并出版了詹天佑所编《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与《华英工学字汇》等书。1916年9月，詹天佑捐资在北京西单报子街购买该会永久会所，该会遂从汉口迁至北京。

---

(1) 王金职：《詹天佑生平事略》，《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会报》第83卷（1919—1920）。

(2) 袁世凯、胡燏棻：《山海关内外铁路告竣援案请奖在事中外各员片》，转引自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张百麟

周春元

张百麟，字石麒，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1]。原籍湖南长沙。父张翰宦游至黔，历任贵州安龙县坡脚与贞丰县百层厘金总办、开州（今开阳县）知州。

张百麟十五岁为贵阳府诸生。他性情豪爽，怀有大志，喜爱交游，常接近秘密会党，受反清思想影响。至十八九岁始发愤读书，涉猎儒家经典、佛老学说以及兵刑等书，嗣拜湖南同乡吴嘉瑞为师，研究新学。二十四岁时，其父死于任所，张百麟至贵阳，阅读翻译法政书籍及《民报》、《复报》、《云南》、《四川》等杂志，思想日益激进，逐渐由信仰维新发展为主张民主革命，约蒲藏锋、陈守廉、钟振玉等发起组织自新学社，暗地开始革命活动。

1907年，张百麟考入贵州法政学堂，结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和同学。他们在自新学社的基础上，于12月成立自治学社，其宗旨是："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行，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2] 选张鸿藻（安龙人，留日学生）为社长，张百麟负实际责任。自治学社的活动分两部分：一为干部会，又名政交部，是主管议事的决策机构，由《黔报》主笔周培艺（又名周素园）任主席；一为社务部，主管行政，即发展组织、宣传、联络等工作，由张百麟负责。

自治学社成立后，张百麟放弃学业，专心工作。他常在《黔报》上撰文，以扩大影响。文章极富鼓动性，而且千言立就，不加修饰。他还公开演说，讲外侮形势，唤起民众挽救危亡。组织发展方面，也

取得很大进展，社员日渐增加。各县成立分社五十多个，社员有三万多名。彭述文等组织的科学会，也是暗中宣传革命的科学团体，集体加入自治学社。彭并将自治学社的情况写信告诉日本东京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平刚，经孙中山批准，自治学社由同盟会领导。

1909年，自治学社社长张鸿藻辞职，适逢留日学生钟昌祚回到贵阳，被推为社长，朱焯、龚文柱二人为副社长，实际责任仍由张百麟继续承担。

张百麟除负责编印《自治杂志》外，并筹办《西南日报》，以团结西南各省人士，促进川、滇、黔的革命。他集银二千五百余两，派人赴沪购得印报机，聘杨寿筏为主笔，用别名张景福向政府备案，于6月出版发行。

自《西南日报》出刊后，以唐尔镛、任可澄为首的贵州宪政预备会（习称宪政党）就以《贵州公报》和《黔报》为阵地，与自治学社展开论争。宪政党为了压制自治学社，打击张百麟、周培艺等，以密谋革命罪加以陷害。唐尔镛并游说旅京的黔籍人士，函请黔籍的直隶总督陈夔龙谋害张百麟。陈转托即将赴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将张逮捕法办。宪政党又派人在李赴任的途中，控告张百麟等图谋不轨。自治学社得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多数主张暂避，免遭毒手。张认为这样正中宪政党之计，无异证明自治学社是革命党，还可能株连其他社员，决定静观动向。同年秋，李经羲到贵阳后，多方讯问，皆告以两党相争，未闻密谋革命。张百麟连夜写万言书，大胆求见。李认为张是个人才，未予加害，并向巡抚庞鸿书推荐。1910年8月，贵州谘议局第一次大会上，张百麟被选为议员（议员共三十九人，自治学社占三十三名）。张并任审判厅筹办处科长，兼提法公所科长、禁烟局文案等差使[(3)]。

辛亥武昌首义，自治学社获悉后，急谋响应。张百麟与周培艺等分别派人联络会党、新军、巡防营和陆军小学学生。他们一面筹划组

织乡兵，吸收会党分子编练成军，准备发动；但同时又希望与宪政预备会分子谋取妥协，避免流血。云南独立消息传来，风声更紧，宪政党侦知自治学社的秘密活动，向巡抚沈瑜庆告密，并建议由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刘显世速率防军兼程来省，沈纳其议。但张百麟等人为了实现“不流血革命”，仍主动与宪政党人协商合作，宪政党领袖任可澄等人勉强同意协力谋求贵州反正。11月2日，张百麟与杨昌铭、乐嘉藻、任可澄、蔡岳、周培艺等冒死入巡抚署，开陈意见，要求和平独立，但沈瑜庆拒不接受。3日，官僚政客组织耆老会的郭子华向沈瑜庆献策，谓采取半独立形式，借以拖延时间，候刘显世兵到，然后按册逮捕革命党人。沈立即应允，并成立保安营，发给枪械，准备应变。当天下午，郭子华在谘议局召开自保筹备会，张百麟等应邀出席。任可澄发表演说，阐明自保会宗旨是“不保清，不革命，只图自保”，还宣布次日开成立大会，请沈瑜庆讲话。张百麟识破宪政党搞假独立的骗局，决心夺取政权。当晚检查起义计划准备情况后，下达了4日凌晨起事的命令。这时，陆军小学首先举起义旗。沈瑜庆得报，宣布戒严，派兵包围陆小。张百麟闻陆小已发动，立即派人携弹药前往接济，又派人赴新军军营联络。新军即鸣号集合，教官杨荩诚表示赞成革命。沈瑜庆迫于形势，不得不“通饬文武官员正式离职，交政于民”[(4)]。

4日黎明，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各方代表一致推张百麟为都督，他坚持不就，乃推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军政院另设枢密院，总揽全省政务，推张百麟任院长，任可澄为副。时刘显世已率兵行至中途，闻军政府成立，即上书赞成革命。张百麟采取“共执政权，尽驰敌意”[(5)]的方针，任命刘显世以枢密院军事股长的要职，而没有采取措施巩固革命派的地位。时军政府正值草创时期，人心未安。张亲率兵巡视各地，宣传军政府法令，解决官绅纠纷，平息金融风潮，维持纸币信用，安定市面；并安抚郎岱、镇宁间扁担山布依族十多万人，优礼其首领，赠送自治学社徽章，以示亲密无间。经过一番努力，局面暂时缓和下来。

张百麟积极工作，声望日高，愈为敌党所嫉。任可澄、刘显世害怕三个月后军政府改组时张正位都督，因而阴谋愈急。他们迫使杨荩诚率兵离省北伐，并电促张百麟速归；因为任可澄等已经勾结了滇军唐继尧来黔扑灭自治党人。1912年1月29日，张返贵阳，觉察宪政党人的阴谋迹象，遂采取消极态度，宣布辞职。2月2日，宪政党人等杀害了负责省城治安的自治学社领袖黄泽霖，同时派出刺杀队攻入张百麟住宅，张闻枪声，急避上屋顶。南路巡防统领陈守廉闻警赶来，护张往见赵德全，请发兵讨贼。赵已中离间计，心存观望，劝张暂往外省，待疏通后再迎回省。张愤而离去，退至安顺。张本欲设行营讨贼，闻任、刘勾结滇军，恐滇军到来以贵州为战场，殃及人民，乃作罢。及退至贞丰，又受刘显世堂兄刘显潜袭击，幸为陈守廉兵击败。张百麟率陈部往广西百色，无所依据，不得已乃资遣官兵，带领陈守廉等数人经香港到上海。旅沪黔人谴责张百麟“招哥老，失黔疆”，拒绝为其引见孙中山、黄兴。经过一番激辩，平刚才引他去谒见孙、黄，张陈述黔变经过。

是年5月，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曾以浙江省长职位诱张百麟，张未接受[(6)]。张约贵州逃亡在外的同志，组织西南协会、政治促进会，创办《惧报》，佐编《民权报》，继续反对唐继尧、刘显世等。

8月，张百麟参加国民党，幻想通过议会斗争取得胜利。其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擅借外债，国人大愤，张曾赴京请国会制裁。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形势恶劣，仍返上海。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张百麟一度任秘书长，运动隶属袁世凯的军队反正，未能成功。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张百麟出任内务部参事，兼高等警官学校副校长。1917年7月，黎元洪被迫下台，张随即离去，再回上海。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任张百麟为司法部部长。张因病未行，在沪撰《约法战争纪要》一书，带病完稿。1919年病逝于上海。

(1) 根据贵州法政学堂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上报学生名册（贵州省档案馆藏）载，张百麟时是二十九岁，应是清光绪四年生。又据胡刚（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一文，说张百麟在清光绪二十八年是二十三岁，应是清光绪五年生。本文以名册为准。

(2)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4页。

(3)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4) 周春元：《张百麟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5)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464页。

(6) 王宇高：《张百麟传》，《“国史馆”馆刊》第1卷4号，1948年。

张本政

左域封

张本政，字德纯，祖籍山东文登，1866年1月28日（清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于旅顺寺儿沟。父亲是个渔民，落水而亡。张本政小时家境贫寒，只念过四年私塾。十七岁到旅顺口，与人合伙开杂货铺，因生意清淡，歇业回乡务农。二十五岁再次到旅顺口，与人合伙经营“通裕号”杂货代理店，本小利微，营业不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张本政结识了日本“酒保”商人[(1)]高桥藤兵卫。日军攻占旅顺口后，张本政到高桥店里当伙计。1895年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次年日军撤出旅大，张本政随同高桥迁往日军占领下的威海。清政府收回威海后，张本政又随高桥迁往烟台，在高桥代理店干了一年对外事务。后来他看到经营海运有利可图，便到日人梶原门下学习了一年海运贸易，以后又在德和洋行当过四年执事人。1902年，张本政租了两艘日本轮船“贯效丸”和“宇和岛丸”，专驶烟台—大连—大东沟一线，从事海运贸易。他还以经商作掩护，为日本刺探沙俄在旅大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由于活动频繁，为沙俄殖民当局发觉，被视为日探而遭通缉，张本政闻讯逃回烟台[(2)]。

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利用所租用的船只，为日军运输军需粮秣物资。由于他积极为日本侵略者效劳，“日本官方对其援助甚力”[(3)]。沙俄统治旅大时，有一俄国通事张德禄，是个包工头并兼营船行，拥有“大德合”、“小德合”两艘轮船。日军占领旅大后，以“俄奸”罪名通缉张德禄，并将其财产没收。张德禄遗下的船只和几百袋面粉，均由日本殖民当局，贱价卖给张本政。在此基础上，张本政于1905年创办政记公司于烟台。此后，他又买了一艘日本轮船“仁义丸”，改名为“胜利号”，同时又租了五艘日本轮船，航行于威海、烟台、龙口、

天津、营口、大连、丹东等地，营业逐步有所发展。1912年，张将资本增为三十万元，并把航线从北方沿海扩展至香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航行远东的欧美船只均被调集西方投入战时运输，中国沿海航运一时出现空白。张本政趁机扩大经营，获利丰厚，在整个战争期间，政记公司平均每年购进轮船三四艘。张本政为了发财致富，很会见机行事。政记公司的轮船，原先挂的是外国旗号，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政记公司的轮船也被抵制停航。这时张本政奔走权贵，到处钻营，向北京政府农商部登记注册，“所有船只挂五色旗”，从而使政记的船只得以航行无阻[(4)]，并在这一年增资为一百万元，开设长江及南洋群岛航线。

1920年，张本政为了集资大干，将政记公司改组为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新筹集资金五百万元，加上原有资产共为一千万元[(5)]。这时，政记轮船公司已拥有轮船二十一艘，航行范围已远达日本港口。随着经营范围和地区的扩大，1923年政记轮船公司将总公司迁到大连，并在大连黑咀子设立政记船坞，自己动手修船。同时还先后在烟台、丹东、青岛、天津、上海、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公司。

在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期间，张本政同张作霖交往甚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船只重新群集亚洲，政记轮船公司竞争不过，营业颇受损失。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将政记轮船公司停泊在天津、青岛等港的十三艘轮船扣留，准备运兵到辽西葫芦岛登陆，袭击奉军后方。后因直军战败，此项登陆计划未能实现。而政记轮船公司因船只被扣而“大遭损失”[(6)]，险些倒闭。后经张作霖借给张本政三十万元，并由东北绅商加股二百万元，使政记轮船公司得以重振，营业“年有盈余”[(7)]。到1927年，政记轮船公司南北航线“均货客满载”[(8)]，又兴旺了起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东北，次年又发动淞沪战争。张本政以船资敌，担负军运，大发横财。政记轮船公司拥有的船只，过去都是一两千吨级的小型轮船，不宜远洋航行。从1931年到1934年，每年都购进一艘四五千吨级的大型轮船，已能远航到南洋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政记轮船公司先后拥有轮船三十余艘，总吨位六万多吨，雇用日籍职员一百三十人，中国船员一千五百多人，成为我国北方航运业的一霸，有“东北与沿海各省交通唯政记是赖”[(9)]的说法。

张本政不仅经营航运，还把手伸向金融、工商、房地产和公用事业。他除在大连、烟台开设政利钱庄外，并投资于青岛地方银行、烟台商业银行、龙口正隆银行以及东边道实业银行等。他所经营的工商企业有：大连政记油坊、政记铁工厂、政记船坞、瓦房店窑业公司、烟台电灯公司等，在烟台、丹东等地都建有专用仓库。大连政记油坊1923年年产豆油二百万斤，豆饼五十万块[(10)]。他的房地产很多，仅大连一地就有土地一千零五十亩、房产一千八百八十六间[(11)]。

张本政及其政记轮船公司，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张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积极效劳。他同大连日本殖民当局的历任头目关系密切，并为之出谋划策。福岛安正任“关东都督”时，张本政与之“提携共办之事甚夥，其贡献于关东州政治上者非浅鲜也”[(12)]。1926年，日本殖民当局举行所谓“关东厅始政二十周年纪念会”时，张本政令人作呕地致辞颂扬，说什么“於穆长官，辽东开府，国依重臣，民怀众父”[(13)]。1942年，日皇派遣德川侍从来我国东北，给日伪军政人员打气，张本政又觍颜表示：“吾关东州民自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日本帝国施政以来，日满同处于善政庇护之下……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无虑无忧，生活快乐……光荣感激，永世难忘也。”[(14)] 公然为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死心塌地认贼作父。不仅如此，张本政一直以船只为日本侵略者效力。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号召，奋起抗战。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明令规定，所有的中国船只，均须集中于本国内海，服务于抗战。但是，张本政却将政记的全部船只调集大连、香港，帮助日本侵略军运送军事物资。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张本政更变本加厉地用所有的船只资敌。截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政记轮船公司先后有十四艘轮船因此被盟军飞机和潜艇击沉。张本政不仅以船资敌，还积极向敌人捐款。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以来，张本政先后向敌人献金八十万元。张本政无耻地颂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多次对旅大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蒙蔽旅大青年，驱使他们给日本侵略者当苦工。他还积极协助日本侵略者搜刮民脂民膏，搞什么“储蓄报国”。当日本侵略者加紧掠夺粮食时，张献策让中国人吃橡子面，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同胞被折磨病饿而死。

张本政的效忠，深得日本主子的喜爱。日本侵略者称他是“图谋两国亲善的先驱者”[15]和“特殊功劳者”[16]，日皇曾接见并授予“勋五等瑞宝章”。自1905年以来，日本殖民当局先后委任他四十多项职务和头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本政改投国民党政权，向国民党特务提供活动经费和据点，支持反革命暗杀组织“暴力团”，妄图与国民党里应外合，推翻旅大地区的人民政权。在1947年反奸清算斗争中，大连市人民法院根据广大群众的揭发控告，以附逆叛国罪判处张本政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年，张本政趁保外就医之机，携带家眷逃往国民党统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本政在天津被捕归案，经大连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同年6月10日伏法。

---

(1) “酒保”商人，是为日本侵略军包办伙食和办理军需物资的随军商

人。

(2) 《张本政氏之阅历》（手稿）。

(3) 《张本政小传》，大连市人民法院档案。

(4) 《张本政小传》，大连市人民法院档案。

(5) 《政记公司之沿革及现状之梗概》，大连市人民法院档案；樊百川：《中国轮船航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6)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6页。

(7) 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522页。

(8) 《泰东日报》1927年7月29日第2版。

(9) 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522页。

(10) 关东厅临时土地调查部编纂：《关东州事情》（上卷），满蒙文化协会1923年版，第595页。

(11) 《张本政财产一览表》，大连市人民法院档案。

(12) 《满洲报》1923年3月25日第2版。

(13) 浅野虎三郎著：《满洲二十年史》，日华实业新报社1926年版，第834页。

(14) 《泰东日报》1942年10月27日。

(15) 《满洲报》1923年3月25日第2版。

(16) 浅野虎三郎著：《满洲二十年史》，第846页。

张伯苓

宗志文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生于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父亲张云藻是秀才，擅长弹琵琶，以教授乐器为生。张伯苓六岁入塾，受过十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四年后毕业，入海军当士官生。1897年，英国强租我国山东威海军港，张伯苓所在军舰被派往该地办理手续。他亲眼看到丧权辱国的场面，“悲愤填胸，深受刺激”，认为国家“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1)]。不久，他便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离职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

1898年，张伯苓回天津后，先在严修（曾任清学部侍郎、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家中教家馆，讲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教体育。以后又兼在天津富商王奎章家中教家馆。张伯苓教学很有成绩，在两所家馆中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加。他决心创办一所新式学校，得到严修的积极支持。为了取得办学经验，他1903年和1904年两度赴日本参观考察教育。1904年8月回国后，将严、王两处家馆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有学生七十余人，教员三四人。年底改校名为敬业学堂。不久，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学生渐多，校舍不够用，1907年在天津南开地区建筑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的教育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很严，深得社会好评，学生人数增加很快，1911年已满五百人。1912年民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堂改名南开学校，张伯苓仍任校长。1915年南开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这是张伯苓试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两科相继停办。

由于办教育有成绩，张伯苓颇有社会声望，曾参加清末立宪运

动。1916年，黎元洪任民国大总统时，请他当教育总长，他推辞不就，说："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2] 张伯苓认为"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为了取得办私立大学的经验，1917年8月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及其发展。次年冬天回国，立即着手向中外各方面募捐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天校舍建成，南开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招生百余人，后来曾一度增设矿科。1923年，张伯苓应当时社会上的要求，开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实验小学。1931年设经济研究所。这时南开大、中、小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余人。南开的经费靠私人捐赠，学校经济公开，账目放在图书馆，全校师生员工都可查看。

五四运动时，南开学生曾经积极参加爱国群众运动。张伯苓虽然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闹"[3]，当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时，他立即指示学校有关方面打开学校后门放走学生。对于已经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包括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周恩来，他尽力设法营救，并到警察厅看望南开被羁押的师生，还参加天津各界代表团到北京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撤换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

张伯苓把他"教育救国"的宗旨概括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为五端：首曰愚，次曰弱，三曰贫，四曰散，五曰私……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据此制定办学方针五条："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训救国力量。"[4] 他办学几十年一直坚持上述五条办学方针。

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我国后，张伯苓曾赴东北各省考察，目睹日本势力入侵情况，十分忧虑，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人编辑东北地理，作为南开中学教材。

张伯苓是基督教徒，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但他一

不主张由外国人传教，二不主张在学校传教。他认为个人有信教自由，学校不能用宗教影响学生，不能把南开办成教会学校。他在南开每星期给全校学生上一次修身课，课上常常引用“四书”上的话，却从不引用《圣经》上的话。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天津的驻军每日清晨在南开附近进行军事操练，影响学校上课，张伯苓派人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提意见，日军置之不理。张伯苓十分愤慨，常常在修身课上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5)]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30日，南开遭到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猛炸，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同年10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一直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他说他不主张学生在学校搞党派活动，曾把自己比作是“蒙上眼睛的驴”，只管教育，不管别的。但他容许国民党三青团在南开活动；对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表示可介绍他们去延安，不赞成他们在学校里搞革命活动。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召开，张伯苓被推为参政会副议长。他在大会上致词时，强调各党派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赴国难。还说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号召大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有人在会上对政府工作提意见，他要大家“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6)]。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问题，与会参政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张伯苓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不作发言。

1938年到1940年间，蒋介石曾两次到重庆南开中学参观，并拜

访张伯苓。1941年，蒋介石派人劝张伯苓加入国民党，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亲自到他家中相劝，并把党证放在他家桌子上，他也就没再拒绝。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颁给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褒奖他“为国造士”。10月，南开举办“四七庆祝大会”，庆祝南开建校四十年和张伯苓七十岁生日，蒋介石亲往张伯苓寓所祝寿，颂扬他“桃李满天下”，还书写“南极辉光”四字相赠。1945年5月，张伯苓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冬天，他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美治病。

1946年春，张伯苓自美返国。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有人对张伯苓说国民党政府很不得人心，他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好，总得一点一点的好。”[7] 这年11月，张伯苓当选为“制宪国大”代表，参加“国大”。1948年5月，蒋介石电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长，张婉辞不就，蒋一再来电敦促，7月，又派张群到天津迎接张伯苓到南京就任，他表示无可奈何，随张群赴南京上任。到南京后，看到政府内部腐败不堪，心情十分沮丧，不久就回到天津。年底，以体弱多病为借口，提出辞职，并避往重庆。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蒋介石逃离时，曾亲往张伯苓寓所劝其同行，他未同意。后来蒋经国又来告诉张伯苓，为他留下了一架飞机。他随时可走，他仍未离开重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伯苓曾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到北京，受到政务院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周恩来多次前往拜访。同年9月张伯苓回天津，行前周恩来设家宴饯行。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故。临终前留有遗言，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嘱其学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8]。周恩来亲往天津吊唁，说：“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9]

(1)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张伯苓《南开四十年》（南开四十周年校庆特刊），1944年版。

(2)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王守纲：《五四前后我在南开中学时的一点回忆》，未刊稿。

(4)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张伯苓《南开四十年》（南开四十周年校庆特刊），1944年版。

(5)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6)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7)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8) 《人民日报》1951年3月3日。

(9) 《人民日报》1986年4月3日。

张大千

王震

张大千，名权，字正权，后改名爰、蝯，小名季，号季爰，别署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1899年5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生于四川内江县城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张家祖籍广东番禺，后迁湖北麻城，其四世祖张德富简放内江知县，卸任后定居内江。父忠发业商，略通文墨。母曾友贞，又名媛，精于绘事，擅山水花卉，尤擅单线白描、工笔花鸟。张大千兄弟姊妹十一人，行八。仲兄张善子，字善孖，号虎痴，画虎名家。张大千七岁入家塾攻读，八岁由母亲和长姊授画。1911年入内江天主教福音堂学校，读书颇不用心。

1914年，张大千入重庆求精中学，后转读江津中学。1916年暑假，由重庆返回内江途中为土匪掳去，被胁迫充当黑笔师爷。在劫舍中，偶得《诗学涵英》，了解不少诗理，百日后获释。1917年4月，他跟二哥善子赴日本京都公平学校习绘画及染织工艺。1919年返回上海，在基督公学教授英语和绘画。同年，拜在当时老名士曾熙（农髯）门下，学习书画，曾熙为之改名蝯，号季爰。当他得知未婚妻谢舜华在家乡病逝后，遂潜赴松江禅定寺削发为僧，该寺住持逸琳法师为其起法名大千，后至宁波观宗寺，与谛闲法师谈论禅理，因不愿烧戒而逃禅。

1920年，张大千返回四川，与曾庆蓉结婚。返沪后复拜在名书家清道人李瑞清（梅庵）门下习书道。曾、李二师富收藏，张大千饱览石涛、八大山人、青藤、白阳以及扬州八怪、石谿等人真迹异珍。是年9月，李瑞清去世后，张潜心研究书画。1924年秋，伴兄长善子出席上海文人雅集“秋英会”，即席作画，对菊吟诗，被誉为“一鸣惊

人”、“后起之秀”。1925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百幅，每幅大洋二十元，全部售完，自此以卖画为生。

1927年，张大千开始周游国内名山大川。初上黄山，开发行径，对景写生，所得素材颇多，被日本汉画学者称为“黄山画派始祖”。

这期间，张大千主要研究唐、宋、元、明诸家技法奥秘，得古人之形神于不知不觉中，所临摹的青藤、白阳、石涛、八大山人、石谿、老莲、冬心、新罗各家，确能乱真，尤以仿作石涛最负盛名，不特画的笔墨神韵逼真，题字图章、印泥、纸质，也达到丝毫逼肖。其后，张大千在学习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他酷爱收藏，其兄善子曾说：“八弟季爰，嗜古若命，见名画必得之为快，甑无米，榻无毡弗顾也。”(1)

1931年4月，张大千与画家王一亭、钱瘦铁及日本画家横山大观等聚于沪上，座谈中日艺术交流问题；又与善子、姜丹书等数十人参加曾、李同门会。是年冬，他与善子出席在日本举办的中国唐、宋、元、明历代名画画展。1932年秋，与善子、彭恭甫、叶恭绰等发起组织“正社书画会”。1933年1月，举家迁居苏州网师园，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同年，出其所作参加法国巴黎波蒙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近代画展”。徐悲鸿谓：“大千代表山水作家，其清丽雅逸之笔，实令欧人神往。故其《金荷》藏于巴黎，《江南景色》藏于莫斯科诸国立博物院，为现代绘画生色。”(2) 1934年，张大千辞去中央大学教席，迁居北平，与正社社员在北平联袂入“中国画学会”。1935年1月，在东京举行个人画展，主管日本文化事业的冈田大臣召集日本美术界开会欢迎并致词。画展期间，张大千向日方讲述了中国没骨画技法的起源，颇令异国同行信服。是秋，重游华岳，以其记游之作，在北平举行“关洛画展”。笔下大幅华山奇景，震惊艺坛。傅增湘在《张大千关洛记游画展启事》中赞誉“大千造诣通神”(3)。

1936年春，张大千再任中央大学国画教授，特将九十四幅罗浮

山、黄山、华山和长江的山水、人物等画，在宁、沪两地举行画展。其山水画雄浑一气，清奇于色，尤其是人物画《天女散花》，取法唐人壁画，笔落超脱，被人重金购去。徐悲鸿评价说："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便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仅指宗派，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绛，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岂可得乎？"(4)

同年，张大千三到黄山绝顶，身体力行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绘画主张，并自刻"三到黄山绝顶人"印章，以系终身纪念，完成了大批以黄山为题材的国画佳作。是年夏，黄河泛滥，为捐款救灾在北平举办"张大千、于非闇、方介堪书画联展"。同年冬，为救济赤贫，又和于非闇举行"合作画展"。是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大千画集》。

1937年3月，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南京举行，张大千为发起人之一。同年夏，在上海举行个展。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赶赴北平接眷，遭日军软禁一周。获释后，日人威逼他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主任教授，被列名为"中日艺术协会"发起人之一。他佯为应允，暗中伺机逃跑。他先将家属秘密送往天津，书画托外商负责运出。1938年6月，张本人化装离平赴上海，同年秋，经香港转梧州、柳州、桂林，于10月抵重庆。旋卜居灌县青城山，朝夕潜心绘事，创作以青城为题材的作品不下千种。是年冬，为了宣传抗日，他和善子在重庆举办抗日流动画展，此展不售作品、不募捐。他又与门人晏济源举办捐募寒衣画展，共筹一千二百余元。1939年夏，张大千与张目寒、黄君璧同游剑门，又与黄同游峨眉，同年在重庆举行画展。

1941年春，张大千作敦煌之行，精美绝伦的敦煌艺术，使他为之陶醉和惊叹不已，每日手持油灯，在昏暗的石窟洞里，专心研究、临摹、整理上至北魏、下迄西夏的千年壁画。1943年1月，被聘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4月，临摹工作结束，前后在敦煌两年零七个

月，共得临本276件。5月1日，离敦煌赴安西榆林窟（即万佛峡）临摹壁画两月，得六十余幅。他是我国最早到敦煌临摹的中国专业画家。从此，他的画风由石涛、八大山人、石谿、老莲等逐渐转到六朝五代壁画，其山水画一变而为宏大广阔，喜用复笔重色，特别是层峦迭嶂的大幅山水，丰厚浓重，把水墨和青绿融合起来，别具一格。其仕女画风格，也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为行笔敦厚，富丽堂皇。仕女的体型健美，性格鲜明，衣褶用笔吸取了敦煌唐画及宋人“游丝描”、“竹叶描”、“铁线描”等各种技法，谨严适度，流畅飘逸，且以魏碑、行、草、篆、隶书体配画。1943年冬，《敦煌临摹白描图》三集在成都印行。次年1月，四川美术协会在成都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受到各界好评。史学家陈寅恪著文曰：“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5) 3月，张大千移往重庆展出。4月，出版《张大千临摹敦煌画展览特集》一册，兼收有关评论为一书。

1945年，张大千在成都、北平等地多次举办画展，又以佳作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院举行之世界美术画展中国之部。展毕，应邀移至伦敦、日内瓦、布拉格等地展出。1947年4月，其作品在天津与齐白石、郎世宁的作品联展。5月，在上海“中国画苑”举行大风堂师生同门画展，并印行《大千居士近作》第一、二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凡十二幅以彩色精印，他在自序中称：“志于斯者，几及三载，学道暮年，静言自悼，聊以求三年之艾，敢论起八代之衰，兹列举所临莫高、榆林两窟数代之作选印成册，心力之微，当此巨迹，雷门布鼓，贻笑云尔。”(6) 1948年夏，在沪举办画展。冬天去香港，出版《游戏神通》。

1950年2月，张大千应“全印工艺美术协会”之邀，赴新德里举行画展。3月，赴阿旃陀石窟观摩、考察壁画和文物古迹。他认为敦煌壁画与印度壁画并非同出一源。5月上旬，偕夫人游大吉岭，并在此

暂住。

1951年，张大千返回香港并举行画展。次年春，将所藏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之《潇湘图》，托香港代理人，各以一万美金卖给祖国，作迁居南美费用。初夏，举家由香港远迁阿根廷曼多洒，新居称“呢燕楼”，并在阿根廷举行画展。1953年10月，以数幅作品参加华美协进社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展”。1954年，全家移居巴西，在圣保罗城郊之摩诘镇购地二百七十亩，建造“八德园”，园中设“八德池”、沙滩、笔冢、灵池、竹林、柿园、五亭湖，体现了中国园林风格，以寄托思念故土之情。1955年12月，在东京举行“张大千书画展”。东京方面配合画展，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又称《大风堂藏画》）四集。1956年4月，又在东京展出所临摹之敦煌壁画。同年夏，首次赴欧参观，并在巴黎近代博物馆展出精作六十余幅，在卢浮宫博物馆举行敦煌壁画展。7月，在巴黎城郊古堡与西方绘画大师毕加索会晤，并互赠画幅。西方报纸誉为“艺术界之高峰会”[(7)]。1958年，张的《秋海棠》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美术博览会上获“国际艺术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并被推举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1959年8月，漫游欧陆，在巴黎参观了法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性中国画展览会，他的十二幅作品参加了展出。1960年，以三十件作品在巴黎、布鲁塞尔、雅典、马德里举行近作巡展。虽是“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迟归总恋乡”，同年他在巴西题诗叹道：“不见巴人作巴语，争叫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8)]

1961年8月至1966年12月，张大千的各种形式画展先后在日内瓦、圣保罗、巴黎、伦敦、纽约、芝加哥、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地展出，影响遍世界。美国《读者文摘》社以十四万美金购买了他的六屏巨作《荷花》（长二丈、宽一丈），创国画售价的新纪录。1967年，香港第二次出版了《张大千画集》，并配有大千的画论。李顺华印行《大千居士己丑后所用印》，收集各式印章一百多方。

1968年1月，张大千曾赴台湾小游。2月，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3月，张大千应邀赴美，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作学术演讲。4月，返回“八德园”度七十岁生日，自绘七十小像一幅，并题诗云：“七十婆婆老境成，观河真觉负平生；新来事事都昏瞶，只有看山两眼明。”5月，所作《长江万里图》长卷绘成，长八丈，宽四尺，从长江发源处直画到入海处吴淞口，其气势之壮，世所罕见。1969年1月，以敦煌壁画临摹本六十二幅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同年，因巴西政府将收回“八德园”，乃在美国加州康迈尔城营建新屋，言曰“可以居”。其后在美加州卡米尔市郊营建“环荜庵”，占地二千坪。1970年后，因患目障，其山水画改用破墨，泼墨积墨，并把水墨和青绿色融合起来，配合传统的渲染皴擦方法，运笔简练，形象潇洒浑厚，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山水画风。1974年11月，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授予名誉人文博士学位。

张大千1976年1月前往台北，台湾赠予“艺坛宗师”匾额一方，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并编印《张大千书画集》第一集、《张大千作品选集》第二册、《张大千绘画艺术》和《张大千九歌图卷》等画册。1977年，张在台北市郊双溪筹建“摩耶精舍”新居，次年由美国举家迁居于此。1980年，四川出版《张大千画集》第一、二辑。翌年续出第三、四辑。

1981年7月，张大千开笔绘《庐山图》，8月始泼石青、石绿纷色，以后常在早晚续画。1982年春，香港“集石斋”假香港“大会堂”底座展览厅举行“张大千画览”，展出绘于1928年至1981年间作品五十七幅，并印行《张大千画集》（香港美术家出版社出版）。1983年2月，绘制年余之《庐山图》在台北展出，全画长三丈六尺、高六尺，于大笔泼墨中时见细腻，气势磅礴，意境深入造化。张大千虽走遍不少名山大川，唯独未到庐山，是图全凭一己胸中之丘壑画出，故于卷末题诗云：“君从侧看与横看，迭壑层峦沓霭间；仿佛坡仙开口笑，汝真胸次有庐山。”3月6日，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何浩天等至“摩耶

精舍”拜访，大千答应为该馆绘一《黄山图》。8日，因心脏血管硬化导致心力衰竭而不起，4月2日去世。

---

(1) 《石涛山水册》，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10月版。

(2) 《张大千画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11月版。

(3) 《北平晨报》1935年11月28日第7版。

(4) 徐悲鸿：《中国今日之名画家》，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4月19日。

(5)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四川美术协会1944年出版。

(6)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1集，大风堂1947年春初版。

(7) 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8) 《四川日报》1983年4月15日第4版。

张道藩

冯祖贻

张道藩，原名道隆，字卫之，贵州省盘县人，1897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生于家道中落的塾师之家。张道藩童年在其父张家凤所办的崇山私塾读书。十三岁入北门任雨苍的私塾，在新的教学方法下，学习兴趣大增。1911年，他考入盘县高等小学。三年后毕业，因家贫在家自修。1915年去普安县罐子窑县立高、初两等小学任教员兼初等管理。次年，本家七叔张莲舫来盘县秘密发展中华革命党，张道藩宣誓入党。但不久因赴天津，“没有得到过中华革命党的党证”[(1)]。

1916年，张道藩得到担任国会议员的五叔张光炜的资助去北京读书。途经天津时，张光炜为急于赶往北京赴参议院会议，便命张道藩去谒见严修。张光炜是严修在贵州任提学时中的举人。在严修的建议下，张道藩留在天津进了南开学校。不到一年，张勋复辟，国会解散，张光炜无力负担他的学费，张道藩乃去包头烟酒公卖局分局任征收员，后升科员。但他不忘继续学习，公余去读函授英文和日文。1919年春，他用积蓄的薪金返天津，再入南开读书。他见过去的同学学业已成，自己落后了一大段，很感苦闷。这时吴稚晖到南开宣传赴法勤工俭学，张很受鼓舞。同年11月，他在上海登上了远去西欧的轮船。离沪前夕，他们一行十二人特地去谒见了孙中山。

经过一个多月旅程，张道藩乘坐的英国客轮瑞秀士号突然宣布不在法国停泊，只得临时改换护照，于1920年1月抵达伦敦。他在伦敦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士兵大批复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就业不易。在得到他的世伯曲荔斋和五叔资助后，便留在英国学习。他先入曼彻斯特私立维多利亚学校补习英文，半年后转到

伦敦天主教会办的克乃芬姆学院学语文、绘画、音乐。1921年9月，考入伦敦大学院美术部专攻美术，“是该院第一个中国学生，三年后也是第一个得到该学院美术部毕业文凭的中国学生”[(2)]。

在伦敦时，张道藩与旅英留学生和华侨组织“工商学共进会”频繁接触，“除联络情感之外，最大的目的是要无形中帮助他们革除聚赌、械斗等恶习”[(3)]。经前来伦敦的邵元冲劝导，1923年他加入国民党，在支部选举中当选为总支部评议部长。

1924年，张道藩赴法，进入法国国立巴黎最高美术专门学校继续深造，课余除参加国民党党务活动外，还与当时留法学生谢寿康、邵洵美、徐悲鸿等相识，共同组织了私人聚会团体“天狗会”。

1926年5月，张道藩与邵洵美一起回国，6月抵上海。他应当地艺术团体及新闻界邀请，作过一次“人体美”演说，引起上海当局不满。加以张是国民党员，“更为各方注意”[(4)]，在上海无法立足。此时，刘纪文在广州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张应邀赴广州任刘的秘书。在刘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后，张奉命暂代刘的职务。11月，在一次会议上他认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的陈果夫，遂应陈之邀返黔建立国民党组织，任贵州省党务指导员，负责筹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

这时统治贵州的是地方军阀周西成，一向在北洋军阀和南方国民政府之间依违两可，藉以维持其统治，对张道藩前来发展党务心怀疑虑。周主张“全省入党”，由他发令让全省公务人员填表。张道藩坚持“须经试验，不得奉命入党”。张道藩四处活动，自行向机关、学校分送材料，物色人选，引起周的不满。1927年5月，南京发来密电给张，贵州电报局通知张需“持码受察”。张认为电码“受自中央不能泄”，争执不下。周西成便以“赤化嫌疑”下令逮捕关押张道藩，施以毒刑拷打，后得贵州众士绅力保，至10月才获自由。出狱后，张经广州、香港至上海[(5)]。

由于有这段经历，张道藩得到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信任。1928年3月，经陈果夫、刘纪文推荐，张道藩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其时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部务由陈果夫负责，由是张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同年10月，张兼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

1929年3月，张道藩以南京市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1月奉派为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任该校教务长。同年12月，奉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4月，陈立夫又挽张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往返于南京、杭州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兴起，张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爱国学生反对，在杭州的寓所亦被学生捣毁。是年12月，张不得不辞去本兼各职，移居南京，转任蒋介石的秘书，为蒋整理文件资料。

国民党发动文化“围剿”，1932年5月在南京成立中国文艺社与“左联”对抗，张道藩为理事。在此后五年中，他积极从事话剧、电影、美术等活动，曾兼任中央电影事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创作了《自救》、《自误》、《密电码》等；并在南京组织中华全国美术会，任理事长；又支持创办南京戏剧学校，藉以从文艺方面从事反共，被国民党称作“文艺斗士”[(6)]。

张道藩越来越得到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任和重视，1932年11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部长为朱家骅）。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年又改任内政部次长（部长为蒋作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道藩亲自出马召集南京歌女、茶社经理开会，发动歌女卖唱募捐，做棉背心送给前方将士。南京沦陷前，张随国民党中央迁往重庆。1938年初，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兼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张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兼社会部次长，旋又兼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与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相对

抗，与左派争夺文艺运动领导权[7]。1939年9月，经陈果夫、陈立夫举荐，张卸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与校长蒋介石关系更为密切。1942年，蒋介石、宋美龄访问印度，张道藩是随员之一。蒋命张就印度国大党的活动、组织方式等为题与尼赫鲁作过三次长谈，并担任蒋介石与尼赫鲁会谈的记录[8]。这年12月7日，张道藩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第二年9月又调任海外部部长。1944年1月，受命赴黔、云、桂等地慰问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前后四十七天。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大批难民沿黔桂线逃往贵州，张道藩奉命赴黔负责难民的疏散、救济事宜，在贵阳组织“贵州各界黔南慰问团”前往日军刚退出的黔南地区。他亲眼看到“沿公路所经各地民家，或被散兵、或被土匪、或被饥寒交迫的难民抢劫滋扰，可以说是十室九空”。“都匀城居民约四千户，被杀的达三千余……无家可归者达二万数千人。”“独山城里城外的房子，烧了百分之九十七八。”[9] 1945年4月，他回到重庆，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协助陈布雷主管秘书、党政、宣传、外交和情报。

抗战胜利后，张道藩于1945年11月回南京，忙于接收公房，修葺私宅。翌年，在上海、南京召集一些文化人，创立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任董事长。1947年春，写成剧本《再相逢》。6月成立文稿供应社，继续领导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活动。1948年3月，中训团设民间艺术训练班，他任指导委员会主任。1948年冬，张被选为“立法委员”。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开展和谈活动，张道藩反对甚力，声称即使和谈成功，他也不会待在京沪。李宗仁约他谈话，他敷衍一阵便离京赴杭。又到上海，约了十几个国民党中央常委飞到广州，后又飞往台湾。在台湾，1950年他募集资金建立“中华文艺奖助委员会”，专门奖励反共作品；又主办《文艺创作》杂志，刊登反共小说、诗歌、剧本、鼓词。他还兼任《中华日报》和“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创作研究部”，

担任“文协”常务理事达十一年之久。张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改造”运动，也积极参与，1950年出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52年3月他出任“立法院”院长，其间秉承蒋介石意旨，攻击吴国桢甚力。1961年辞去院长职务，仍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立法委员”。1968年6月因病去世。

---

(1)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2)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3)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4)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5) 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2—303页。

(6) 程榕宁：《文艺斗士——张道藩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

(7) 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抗战纪事》，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8) 吴相湘：《张道藩酸甜苦辣》，《民国百人传》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8页。

(9)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张东荪

左玉河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圣心”作笔名发表文章，晚年自号“独宜老人”。祖籍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1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次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该杂志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张东荪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并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三十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

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和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改造要全体谐和》等大量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1920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

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

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1921年12月，他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随后在《东方杂志》上相继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伯洛德的感相论》、《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1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0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广州任过学海书院院长）。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

1927年8月，张东荪与瞿世英（菊农）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为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提供研究和争鸣园地。从1928年起，他先后为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写了《人生观ABC》（1929年1月初版）、《哲学ABC》（1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ABC》（1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学ABC》。1931年12

月，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在《大陆杂志》第1卷第3至5期上发表《认识论的多元论》，提出了新的认识论体系——“认识的多元主义”。1934年9月，他出版《认识论》一书，进一步发挥前两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体系。

上个世纪30年代，张东荪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这一点连他的论敌叶青也是承认的：“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1932年，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1933年1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年6月，又在《新中华》上发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1934年6月25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

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1932年5月，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张东荪与张君劢等人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他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等文章，不赞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二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或西南大后方。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十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三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出狱半年后，他开始撰写《知识与文化》的续篇——《思想与社会》一书。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这三部著作，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16日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布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等人纷纷

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是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发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年7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随后，张东荪发表了《增产与革命》、《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

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初，他到河北石家庄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会晤，并于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故辞去政府职务。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第1版。

张东荪：《人生观ABC》，世界书局1928年7月第1版。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第1版。

张东荪：《道德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1月第1版。

张东荪：《认识论》，世界书局1934年第1版。

张东荪：《价值哲学》，世界书局1934年7月第1版。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北平民友书店1934年10月版。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1月第1版。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版。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5月第1版。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7月第1版。

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

叶笃义：《我和张东荪》、《我和张君劢》，《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张发奎

熊尚厚　陈宁生

张发奎，字向华，1896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广东始兴人。张家祖辈世代务农，父张居之为刑房小吏。1904年张发奎入私塾，1907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辍学去广州，先充佣工，后入习艺所学染织。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他投模范团当兵。1912年春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经该校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1914年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1916年5月，他偕同学数人离校回粤，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讨袁之役，在广东对龙济光、莫荣新作战。1917年随胡毅生在广东士敏土厂任事。同年冬，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张随军前往福建漳州。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他任督战队长。11月，粤军进行整编，组建第一师，邓铿任师长，张发奎任少校副官。

1921年12月，孙中山于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从第一师抽出三个营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1922年3月，孙中山设大本营于韶关，张发奎随部移驻韶关。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派兵进袭韶关，张率部战于翁源，后退入粤北始兴仙人岭。其后，归粤军梁鸿楷第一师统领。11月，改隶第一师第二团，编为第三营，他仍任营长。

1923年1月，孙中山联络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张发奎率第三营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在肇庆起兵响应，共同组织讨贼联军，于1月15日进驻广州，后退守江门。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大元帅，张发奎以进攻肇庆有功，升任该师独立团团长。1924年春，张团改称第一团。次年春，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第一团屡立战功。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驻粤各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成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9月，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及南征讨伐邓本殷。张发奎在南征中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翌年1月升任师长。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张发奎奉命率领第十二师由琼崖北上进军湖南，担任湘江东岸作战。在攻战醴陵、平江战役中，击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战绩卓著。吴佩孚部退入鄂境后，集结重兵据险扼守汀泗桥。8月26日，张发奎率部参加汀泗桥之战，指挥黄琪翔团、第三十五团及叶挺独立团夹攻铁桥，攻克汀泗桥。吴佩孚随后率刘玉春、陈嘉谟等部二万余人设防贺胜桥顽抗。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第七军李宗仁等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张发奎前往参加。会议决定以第八军由金口渡江袭取汉阳，以第四军沿粤汉路直扑贺胜桥阵地。30日，张指挥叶挺独立团和缪培南第三十五团攻克贺胜桥，从而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重要门户。第四军经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役，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1)]。随即，张发奎所属各团，会同第十师及第七军参加围困武昌的战斗。10月10日，吴军第三师吴俊卿出降，打开城门内应，张师与陈铭枢师迅速将刘玉春、陈嘉谟两部缴械，攻克了武昌城，取得了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0月20日，第十二师被调援赣，张发奎率部参战马回岭战役，又协同第七军及湘军贺耀组师，击溃德安之敌。江西战役后，第十二师于11月下旬回师武汉，张发奎升第四军副军长，仍兼第十二师师长。1927年1月，张发奎晋升军长，辖第十二、二十五两师。是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赠第四军铁盾，誉以“铁军”荣誉[(2)]。2月，张发奎又兼第十一军军长。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张发奎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奉军，张发奎任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两方公开分裂，张学良率奉军与吴佩孚残部联合，欲经河南南下进窥武汉。武汉国民政府乃于4月19日誓师

北伐，张发奎率领第四军于21日离开武昌，前往河南作战。5月13日，张发奎在汝南指挥所部分头向黄埠、上蔡、蔡部口等地前进，嗣后又进占临颍城。6月5日，张发奎部进克开封城。6月10日，冯玉祥、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张发奎亦前往参加。郑州会议后，河南军事交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负责，北伐军回师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蒋，将唐生智部扩充为第四集团军，张发奎任该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及暂编第二十军。

“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张发奎虽继续拥汪，但并不热心反共。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东征进至九江、南昌。当汪精卫等得知共产党准备南昌起义的消息，29日紧急在庐山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张会后回到武汉执行“清共”，并率所部向南昌逼进。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南昌起义。张发奎率第四军进入南昌，将所部交黄琪翔率领南下广东，自己经上海转道去香港。

9月下旬，黄琪翔率第四军经韶关进入广州，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派陈可钰迎张发奎至广州主持军政。张发奎到广州后，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10月下旬，汪精卫、陈公博由上海抵达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抗，李济深、黄绍竑不予赞同。张发奎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指挥下，于11月17日发动广州政变，将黄绍竑和李济深的留守部队缴械，公开宣布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19日，张发奎行使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职权，集结兵力于东江、西江、北江，发动“驱桂运动”，将黄绍竑驱回广西。12月上旬，共产党人举行广州起义，第四军于肇庆回师镇压。国民党反汪各派趁机反攻汪、张。张发奎于18日被迫通电离部，随即去日本。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张发奎从日本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讨桂右翼军第一路军司令官，率整编后的第四、第十、第十一等师入鄂，驻于宜昌、沙市。5月初，张发奎兼任第四师（原第四

军）师长。9月上旬，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下令调张发奎部克日移防陇海路东段阻击冯玉祥军，暗中计划于该部途经浦口时予以缴械，然张发奎在汪精卫的策动下再次举兵反蒋，被汪精卫委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张部在鄂西击败蒋军曹万顺师后，即取道湘西进驻广西梧州，恢复第四军称号，并与李宗仁、黄绍竑联合攻粤。12月，张、桂军在广东花县和广西北流为蒋军何应钦部击败，张发奎率余部退回广西，又将所部缩编为第四师。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军举兵策应反蒋。张发奎又恢复第四军，与桂军共同入湘，6月初占领长沙、岳阳，后为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等所败，于7月底退回广西。经此挫折，张发奎意态消沉，离开第四军，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两广反蒋各派和汪精卫等于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5月20日，张发奎偕同白崇禧至广州，与陈济棠商讨两广军事统一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息争，张发奎经香港至上海，通电南京政府，请缨开往东北前线，支援黑龙江马占山抗日。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发奎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张发奎被第十九路军邀往协助指挥军事，但无实际兵权。3月，他到南京再次请缨率领第四军北上援黑，但蒋介石不予理睬。张发奎痛感报国无门，乃于是年冬只身出国。在欧美各国，张发奎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在伦敦曾对天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谓“祖国在今日，已危如累卵”，“苟有人愿牺牲一切，力捍外侮，余愿为一走卒，以从其后”，“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日，期有报国仇于万一也”[(3)]。“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张发奎于1935年秋回国，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抗日。他对蒋说：“今后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战之一途。”蒋口头许他“日后抗战充先锋”[(4)]。翌年春，他出任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1936年冬又改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在该地区筹备抗日防御工

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5]“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蒋介石派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军总司令，负责浦东战线作战。张发奎在奉贤县南桥设右翼军总司令部，积极构筑工事备战。战幕揭开后，主要战场在左翼，他派炮兵增援沪西陈诚部作战。8月下旬，日军第三师团藤田部及第十一师团室宗武等部在宝山、狮子林等处登陆，猛攻左翼军的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同时对右翼军方面之川沙、浦东各地也取攻势，双方展开猛烈阵地战。鉴于日军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张发奎联合左翼军总司令张治中等向蒋介石建议，主张精确规定作战兵力使用的最高点，在苏嘉、吴福设第二抵抗线，如不能压制敌人，则使之转为持久消耗战，蒋未采纳。9月7日至10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发动总攻。30日，日军在万桥、严宅、陆桥三处突破我军第七十七师正面阵地，左翼军被迫全面退却。同时日军亦从右翼对张发奎部发动数十次攻击，均被张部击退。为了防备敌人从侧面迂回，张发奎于金山方面配置炮兵及步兵警戒，并派出船队出入海面搜索敌军行踪。10月30日，日军强渡苏州河，左翼军及中央军均败退，蒋介石始改以张发奎指挥左翼军及中央军，以刘建绪接任右翼军总司令。面对严重的残破局面，张发奎表示“尽最后一分力”，“临到绝境”也“要死守下去”，“誓流最后一滴血”[6]。11月2日，他移指挥部于龙华附近的北干山。5日，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等处登陆，直趋松江。张部腹背受敌，他急令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死守淞江，以掩护淞沪六十万大军撤退。9日，吴克仁及其所部英勇牺牲，日军侵占松江、枫泾。12月初，张部奉命撤往江西。

1938年夏，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外围作战。10月，武汉、广州先后失守，张部退驻湖南平江。翌年春，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辖吴奇伟、余汉谋、夏威三个集团军，于广东曲江设战区司令部，负责广东、广西两省军事。同年

冬，张部在粤北与日军苦战获胜。1939年冬，日军集中三个师团对桂南发动攻势；1940年2月，张率部取得昆仑关战役胜利，随后收复龙州、邕宁、钦县。1944年10月，日军企图打通平汉、粤汉及湘桂等铁路交通线，由湘粤分兵三路进攻桂林、柳州，张部牺牲甚大，经黔桂边境撤退至桂西百色地区。

1944年冬，张发奎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时中国军队为了配合英美同盟军对日作战，在缅甸开辟第二战场，于昆明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张指挥黎行恕、张弛、黄涛等四个军，驻守广西配合作战。1945年5月，张发奎率部反攻，先后收复邕宁、龙州、凭祥，并进兵梧州，准备反攻广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发奎被指派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9月15日，他由南宁飞往广州主持接收。次日，在广州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1946年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结束，张发奎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同年夏再改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在抗日战争时期得李宗仁、白崇禧及魏德迈等人的支持而历任要职，战后蒋桂矛盾复起，他便受到了排挤。1947年冬，蒋介石调宋子文任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张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8年夏，南京蒋介石政权危机益深，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势力颇为活跃。张发奎时任国大代表，决心趁机再起，在副总统竞选运动中采取“拥孙（孙科）”态度，企图在孙科当选后出任军事要职。同年冬，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后，国民党广东派薛岳、余汉谋夺得了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及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电请张发奎回到广州，共同提出“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的口号，企图在广州建立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割据局面。1949年1月，张发奎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

1949年3月，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7

月，他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遂辞去陆军总司令出走香港。11月，李宗仁亦去香港，欲与张共同部署华南反共军事，请其再任陆军总司令，他公开声明拒绝。此后，一直寓居于香港。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于香港。

---

(1) 张发奎等编：《第四军纪实》，《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91、126页。

(2) 张发奎等编：《第四军纪实》，《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第91、126页。

(3) 顾执中：《张发奎述志》，天津《大公报》1934年6月24日。

(4) 朱朴编著：《张发奎将军》，汉口群力书店1938年版，第31—46页。

(5) 朱朴编著：《张发奎将军》，第47页。

(6) 朱朴编著：《张发奎将军》，汉口群力书店1938版，第41页。

张钫

张友仁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人。生于1886年7月17日（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其父张清和，为清光绪年间拔贡，曾任陕西乾州、郿州州判。

1902年，张钫随母至陕西父亲任所。不久，以客籍考入陕西陆军小学。1907年毕业，以优异成绩被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在校期间，与校友钱鼎、吕公望等组织军人革命团体“同袍社”，从事反清活动。

1908年加入同盟会，并与河南民党密切联系。是年暑假乘返里之便，于巩县黑石关小学与河南同盟会主要负责人秘密会谈，为河南民党起义做准备。

1909年底，张钫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第二年由陆军部分派回陕西新军任炮营右队排长，即与钱鼎、党自新等在新军内组织同盟会秘密联络组织“武学社”，并担任该社副会长（钱鼎任会长）。他经常以研究军事为名，在新军和陆军中、小学中传播革命思想，并与新军中的哥老会会众联系，发展反清势力。

191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三），张钫与在陕同盟会、哥老会主要成员三十余人，在大雁塔集会，“歃血为盟”，立誓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

1911年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为响应武昌革命，发动武装起义，张钫是主要组织、发动者之一。当日上午，同盟会、哥老会领导骨干在西安西郊的林家坟开会之后，张钫即先行入城侦察，率领部队

首先攻占军装局，作为起义军的总司令部；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武装了徒手的新军战士，为光复西安立了首功。

11月初，张钫出任“秦陇复汉军”东征军大都督，率军东征；三战潼关，一度进兵到陕、渑一带，豫西民军万余人也来投奔，一时军威大振，吸引清兵数万，血战百余天，保卫了西安，推动了河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军事压力，为武汉革命政权的存在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建立之后，张钫出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原东征军）师长，屯兵潼关。

1912年6月，张钫先后到北京和开封，面见袁世凯、张镇芳，呈准把原参加东征作战的河南民军编为“镇嵩军”，由刘镇华统领，回豫西“剿匪”。

1913年，袁世凯指使暗杀宋教仁，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派人赴河南、陕西与刘镇华、张钫联络。袁世凯得到密报，急调张钫率部移军四川。张钫身陷川东，孤掌难鸣，未敢轻举。

袁世凯扑灭了“二次革命”，1914年调张钫回陕西任陕南镇守使，驻汉中。第二年，又调张钫进北京，名义上任将军府的将军，实际上是进了袁世凯的无形囚笼。张钫进京后，受到袁世凯爪牙的严密监视；但他仍然与在京反袁志士联系，探听袁世凯帝制活动消息，并暗中与河南和陕西的刘镇华、陈树藩联系，组织豫陕反袁联盟，准备起兵反袁。

1916年3月，张钫经长时间谋划之后，假托回河南为袁世凯筹办民团为名，回河南领导豫陕联军，以策应云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不料刘镇华叛盟投靠袁世凯，并向袁告密，所以他一到开封，就被河南督军赵倜扣押，并当即转押到北京。这时全国反帝斗争已全面展

开，袁世凯进退失据，无暇顾及此案，加之张钫在京好友多方营救，把案子拖下来。6月，袁世凯在一派讨伐声中死去，张钫获释。

1918年，陕西各部靖国军，在征伐依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陈树藩、刘镇华的战争中，久战不胜，共约于右任、张钫赴陕统一领导靖国军。张钫应约离京，8月下旬至三原与先行至此的于右任组织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右任任总司令，张钫任副总司令。各路靖国军得到统一整编，加强了对陈、刘集团的攻势，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张钫经常深入前线指挥作战，并在戎马倥偬之间，检阅古诗，编成《历代军事分类诗选》。

1921年，陈树藩、刘镇华集团瓦解，靖国军也随之解体，张钫因父丧返乡守制。在故乡三年，张钫创办了铁门小学，并资助县政府在铁门成立“续修县志局”，还集股筹资创设“观音堂民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胡景翼任河南督军。仍然盘踞陕西的刘镇华派憨玉琨部进军河南，欲与胡争夺中原。张钫不忍家乡战火再起，祸害百姓，乃发“弭兵电”，呼吁双方罢兵，以宁中原，并来往奔走于胡、刘之间，从中调解，终于无效。

1925年2月，在豫西爆发了“胡憨之战”，这时张钫尚在开封胡景翼处。当他辞胡西归，途经洛阳时，刘镇华强把他留在军中，并发表张钫为前线“副总指挥”。张钫囿于镇嵩军的旧关系，参与了军事行动。3月，战争迅速结束，镇嵩军惨败。张钫为胡部所扣，几遭杀害。由于省参议郭燕生和驻军洛阳的樊钟秀的全力营救，才免于难。

8月，于右任为促成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广州革命政府合作，约请张钫到北京。1926年4月，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直鲁联军入京严查国民党人，张钫避居天津，以埋头搞实业作掩护，观察北方局势的变化。7月，广州革命军出师北伐，张钫微服返豫，与国民党人郭燕

生、张鸿烈等取得联系，筹划迎接北伐军，并以观音堂煤矿资金资助河南国民党人的秘密活动。1927年，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的冯玉祥军解西安之围后，张钫应于右任、冯玉祥的邀请，到了西安。5月，随冯军返豫，参与谋划军事和河南政务。

1928年9月，张钫任河南省建设厅长，兼省赈务会主席。他在掌建设厅期间，主持植树造林，修建公路，颇有成绩。是时，豫西兵、匪、旱三灾并袭，大批灾民扶老携幼到开封谋生，张钫多方筹款放赈、开舍饭场，并用“以工代赈”方式，安排灾民生活。

1929年，蒋、冯战争爆发，张钫因参与了蒋介石收买韩复榘的活动，开始与冯玉祥分道扬镳。

1930年春，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5月，蒋介石在徐州约见张钫，委任他为河南省代理主席，利用他在河南地方的影响和他与西北军的密切关系来对付西北军。7月，蒋介石又加委他为第二十路军总指挥，促使他加强对西北军的分化工作。接着张钫飞抵漯河，乘阎、冯联军失败之际，收编了万选才（时已被蒋介石枪毙）旧部，使二十路军一度拥有一个军八个师的兵力。

10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命刘峙为省主席，以张钫为民政厅厅长。二十路军经国民党中央整编为七十五、七十六两个师，张钫以二十路总指挥兼任七十六师师长。此后，他又担任河南“清乡督办”，指挥二十路军在河南各地“剿匪”。是时，张钫在执行军务中，看到豫西地区历年出土大量唐代墓志，不为人所重视，甚为痛惜，遂于1931年夏委专人代为搜购，妥为保存。此事前后历经五年，共得唐志及其他石刻千余片。1936年在故园“蛰庐”单辟一天井院，建砖拱窑十五孔，将志石镶嵌在窑内外墙壁间，并请章太炎以古篆题额为“千唐志斋”。

1932年春，张钫奉命到潢川“剿共”，历时一年，遭到红军沉重打

击。年底，带七十六师移驻许昌进行整补。第二年7月，七十六师移驻洛阳西工，负责豫西“剿匪”事宜。张钫以“剿”、“抚”结合的政策，把豫西主要杆头收编在自己部下。

1934年春，二十路军回驻许昌、南阳一带。南阳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故里，南阳“医圣祠”历来是医界景仰的圣地。但是，由于军阀的破坏，当地豪强的劫夺。“医圣祠”已破败不堪。张钫目击神伤，愤然枪毙了霸占“医圣祠”地产的劣绅先及元，发愿重修“医圣祠”，并计划创设“国医学校”，以光大祖国医学。后因蒋介石命令张钫赴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此计划未能实施。这期间，张钫还购得《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多部和一批精印的儿童读物，分别捐赠给故乡铁门和新安、偃师、洛阳、许昌、南阳等地，建立公共图书馆。

是年9月，张钫奉蒋介石命令带领二十路军进至江西的临川、光泽、邵武、南城一带，参加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0月，红军主力突围远征，根据地只留有少数游击队在坚持斗争。红军游击队灵活机动的战术，曾使二十路军常年奔波于深山茂林之中，备受疲惫之苦，且二十路军官兵多系北方人，大都不服水土，在江西三年，仅死于疾病者就有数千名。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张钫升任第十二军团长，移驻苏州，所部在昆山前线与日寇作战。9月下旬，蒋介石任命张钫为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令其回河南收编地方武装。张钫奉命到河南，处处碰壁，方悟这是蒋借机剥夺自己兵权的阴谋，因此一气上了鸡公山。1938年2月，已经西迁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任命张钫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后改任代院长），但他仍住鸡公山。后来日军逼近武汉，他才携眷至西安。

此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张钫除因公务短时间逗留重庆外，长期居住西安。在这里，他倡办麟凤煤矿公司、沔县民主煤矿公司，组织

西北建设促进会，致力于实业开发工作，并捐资帮助陕西著名中医黄竹斋刻版印行了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使这一中医珍籍得以传世。

抗战期间，河南水、旱、蝗、汤（恩伯）四害横行，逃荒到陕西乞食的灾民难以数计。豫西沦陷后，更有大批难民涌进西安，充塞于街道和城壕之间。张钫以河南同乡会会长身份向西安市民募征馒头、大饼，救济难民，并多方奔走；甚至变卖汉中私产，筹粮筹款，放赈，开舍饭场，以解难民燃眉之急。张钫还创办“西北中学”，安排难民子弟入学就读；接着组织“西北移民垦干班”，短期培训移民干部和医生，有计划地组织难民向甘肃、新疆移民。

1944年春，流亡在豫西潭头镇的河南大学遭日寇袭击，数百名学生辗转到西安，衣食无着，露宿街头。也赖张钫救助，河南大学很快安顿在宝鸡复校上课。抗战胜利后，张钫又亲自出面，为河南大学争取到一笔“善后救济款”，才使河南大学顺利回到开封复学。1945年5月，张钫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张钫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国策顾问、总统府顾问，并被授予上将军衔，但这都是作为蒋介石安抚杂牌军将领的闲职。

1949年9月，全国即将解放，蒋介石飞抵重庆，妄图负西南一隅作最后挣扎，遂委张钫为“鄂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希望张钫重新拉起一方势力，为他支撑残局。不久，解放军大举入川，解放重庆，包围成都。张钫乃串联国民党第二军、十五军，连同本部共六万余人，于12月在成都近郊郫县通电起义。第二年，随军到天水，在彭绍辉军长欢迎起义军将领的招待会上，张钫痛陈“觉今是而昨非”，坚决表示要和人民一道，努力建设新中国。

1951年，张钫定居北京。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

委员。1966年5月25日因患癌症逝世，葬北京八宝山公墓。1986年，张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骨灰迁回故里，安葬于千唐志斋旁。

主要参考资料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黄元吉等：《张钫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7辑，1982年版。

《〈张钫事略〉和〈王拱璧事略〉中几件史实的订正》，《河南文史资料》第9辑，1983年版。

张应超：《对〈张钫事略〉一文的几点质疑》，《河南文史资料》第10辑，1984年版。

《河南文史资料》第18辑，1986年版。

张凤翙

张应超

张凤翙，字翔初，原籍河南沁阳县。1881年2月5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初七）生于陕西西安府咸宁县菊花园（今属西安市）。其父由河南逃荒到陕西，以打铁为生，后来在西安广济街开了一家小铁器店。

张凤翙早年中过秀才，名列咸宁县同榜第一。1902年考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1904年秋毕业，即由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军事。到日本后考入振武学校，1906年毕业，升入士官学校骑科，为该校第六期学生。他在振武学校上学时加入过同盟会，而且是留日士官学生中同盟会员骨干“丈夫团”的成员。他根据黄兴对留日士官生要隐蔽的指示精神，入会不久就烧毁了同盟会会员证书，也没有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当时陕西留日学生有渭北派和咸长派之分。渭北派政治上比较激进，咸长派比较保守，张凤翙是咸长派的中坚人物。他能写诗做文章，但却不愿意给留日学生办的进步刊物写稿。1907年，陕西留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秦陇》杂志，请他写稿，他说：“你们这些醋桶子用笔杆子革命，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1) 一笑了之。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多方设法抄录日本的军事机密转送到清政府陆军部。其中有一份重要情报经陆军学生监督李士锐之手转送，李士锐却以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的名义送回国内。张凤翙本来就对李士锐压制中国留学生的行为深为不满，得知此消息后更加愤怒，就借故打了李士锐。李士锐心中有鬼，当时虽未敢发作，却在张凤翙的毕业成绩报告书中报复，致使张凤翙毕业回国后清政府不准他参加留学生考试，并给了他一年内不准录用的处分。

1909年，张凤翙回到西安家中赋闲，经人推荐，在西安府衙门做缮写。1910年春，被委任为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同年冬升任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军，接着又改任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他在新军任职期间，虽未直接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但和新军中同盟会的骨干张钫交往甚密，常在一起谈论革命。这一时期，他与早年时的同学惠春波在西安菊林寺创办了“菊林小学”，联络康寄遥等进步人士兴办教育。西安起义前夕，他和协统刘鸿恩、二标标统周殿奎的矛盾已十分尖锐，个人处境也很危险，这也是他参加西安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以后，陕西反动当局非常恐慌，阴谋调新军离开西安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新军中同盟会负责人钱鼎和张钫得知消息，遂于10月20日召开会议，决定提前起义。在商定起义总指挥人选时，钱鼎提议张凤翙任总指挥，得到大家赞同。这时，张凤翙率部在临潼野操，钱鼎和张钫立即派人请他速回西安共商大计。10月21日下午，张凤翙率部回西安。当晚，钱鼎和张钫告知他开会经过，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各要点，即干，义无反顾。如果失败，祸我承担，生死与二君共之。”[(2)] 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一举成功。张凤翙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陕西军政府随即成立。

陕西起义以后，清政府先后派遣大军从东西两路向陕西进攻，妄图剿灭陕西革命。张凤翙亲赴东西战场，冒着炮火指挥作战，备尝艰辛，为保卫陕西革命作出了贡献。

1911年12月9日，张凤翙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

陕西新军中的会党曾在西安起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但起义后张凤翙却打击排斥会党。1912年1月，他致函黎元洪，请湖北派军队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2月陕西东路议和以后，赵倜所部奉袁世凯命令进入陕西增援西路民军，他又想借此力量对付哥老会。4月13日，他在西安亲手枪杀了哥老会重要首领、“秦陇复汉军”副大统领万炳

南，陕西各地大规模地镇压会党即从此开始。

191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张凤翙为陕西都督。同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张凤翙任“国民党秦支部”支部长。他与钱鸿均等人创办了西北大学（设商、法、农、文学院），又与井勿幕、张云山、李桐轩、郭希仁等人发起创办易俗社等文化艺术团体。袁世凯窃国以后，张凤翙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向北洋政府妥协。他派人通过旧官僚江朝宗和袁世凯拉关系，排挤在陕西的民党左派人物，致使井勿幕、曹印侯、杨叔吉、胡景翼等人都先后被迫离开陕西。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各省讨袁军纷纷急电陕西，要求张凤翙起兵响应。张凤翙却坚决反对起兵讨袁，并秉承袁氏旨意通电声讨孙中山和黄兴；还电令张钫执行袁世凯的命令，率部入川镇压熊克武领导的反袁斗争。8月28日，陕军第一师团长王生岐起兵讨袁，他又派兵镇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根据袁世凯指令枪杀了积极反袁的民党左派人物邹子良、马开臣，以取得袁氏信任。但袁世凯却因1913年6月孙中山和黄兴曾派人和他联络反袁（送信人杨体锐、于化卿在河南被刘镇华杀害，未到陕西），还是对张凤翙不信任，并准备伺机派亲信取而代之。

1914年，白朗起义军入陕，张凤翙奉袁世凯令并亲率大军在兰田、商县一带堵截，并枪决了进攻白朗义军失败的陕军团长岳翰林示众。7月，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率大军以追剿白朗军为名入陕，随后调张凤翙入京，封为扬威将军，免去他在陕西的职务。张凤翙离开陕西赴京过潼时，感慨吟诗：“屠门大觉梦一场，醒来犹未熟黄粱。三年威信一朝失，自愧不如陆建章。”[(3)] 袁世凯称帝前，授意亲信联络知名人士上表劝进，张凤翙也名列其中。

袁世凯垮台后，他的思想有较大的转变。1917年，张勋复辟，他只身赶回陕西准备组织力量反抗，因陕西督军陈树藩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勋失败，他才回到北京。1924年，胡景翼派李可亭去北京请张凤翙回陕西组织力量驱除刘镇华在陕西的势力，他再次回陕。途经山

西时被阎锡山发现，阎告知刘镇华驻山西代表。因此，他一到陕西就被刘镇华软禁，经崔云松等人奔走活动后始被释放回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闲住，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

“七七”事变前夕，他目睹日寇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的企图与日俱增，北平危在旦夕，张凤翙不愿留在北平做亡国奴，遂于1937年7月8日只身乘飞机回到西安。友人问他为何不带家眷一起回陕，他说：“我是秘密回来的，迟则被日寇截住，不堪设想矣。”[(4)] 回陕后，即与友人在西安，筹办菊林中学，1940年春招生。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省政府顾问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他六十岁生日时，曾在自书的对联中写道：“少年头等闲白了，叹三十功名尘与土，人思鹏举；阳春脚大步来兮，历百二山河雄且壮，岁在龙缠。”[(5)] 其爱国思想可见一斑。1943年，张凤翙到重庆参加参政会，周恩来特地到他下榻的地方去看望他[(6)]。1945年，他率领“陕西各界慰问豫西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亲赴豫西各地慰问抗日军队。1949年5月18日，胡宗南逃离西安时，以“保护安全”为名，把张凤翙和寇遐、马彦翀等人裹胁到汉中，接着下令送往台湾，张凤翙等人坚决拒绝去台，又被送往兰州。兰州解放后，彭德怀司令员曾派专人慰问他和寇、马二人。8月下旬，三人返回西安，受到陕西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凤翙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他对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充满热情，积极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的亲属参军，请他题词留念。张凤翙欣然命笔写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吾家诸孙中亦有爱国分子参与，何幸如之，努力前进，勉之，望之。”[(7)] 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1958年7月29日，他因病在西安逝世，遗体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张凤翙在书法和诗词方面均有颇深造诣。

(1) 党松年：《回忆辛亥革命秦陇复汉军东西路战斗始末记》（手稿），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文史资料办公室。

(2) 张钫：《陕西辛亥革命回忆》（油印本），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文史资料办公室。

(3) 王增尧：《张凤翙二三事》，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秦中旧事》，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4页。

(4) 王增尧：《张凤翙二三事》，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秦中旧事》，第44页。

(5) 笔者访问郑自毅先生笔记，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文史资料办公室。

(6) 笔者访问张月昭笔记，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文史资料办公室。

(7) 张凤翙1951年1月12日为张叔纲题词。

张福来

张学继

张福来，字子衡，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于直隶交河县（今河北省泊头县）。早年投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当兵，后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回第三镇第一营任队官。不久，吴佩孚调任第三镇第一营管带。张福来是行伍出身，对这位有学问的新管带佩服得五体投地。吴佩孚见胖墩墩的张福来讲义气，二人说话投机，很快就换帖子，结拜为金兰兄弟。吴佩孚对张福来很关照，保举张福来由队官升为帮带。1907年，第三镇从保定调到东北长春驻防。此时，第三镇统制换成了曹锟。从此，张福来的沉浮与他的金兰兄长吴佩孚以及直系最高统帅曹锟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第三镇被清廷调回保定担任京畿的防务。10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府。曹锟奉袁世凯之命率保定驻军从石家庄循正太铁路进攻山西娘子关的革命军。当时曹锟部下的炮三标刘标统与山西革命军的前敌总指挥姚以价秘密联络，他们设计：姚以价埋伏在娘子关上，刘标统坐在第三镇火车的最前一节列车，欲乘黑夜胁迫司机在井陉车站不停，径直开到娘子关下，让娘子关上的革命军一举消灭进攻山西的第三镇。就在火车过井陉车站时，被吴佩孚发现，叫醒随他在一起的张福来。张福来随吴佩孚经过一番搏斗，缴了刘标统的枪。急刹车往后倒，使曹锟免作山西革命军的炮下鬼。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自称洪宪皇帝。云南率先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任团长的张福来随曹锟南下与蔡锷的护国军作战。蔡锷指挥护国军夺取泸州。曹锟率军在化阳山与蔡锷交战，被蔡锷切断退路，包围在化阳山上。张福来随当时任

旅长的吴佩孚冲上山解救危在旦夕的曹锟。为掩护曹锟下山，张福来带着自己的一团人从正面往山下冲，被护国军紧紧咬住追杀。张福来损失了一连多士兵，总算掩护曹锟逃出化阳山脱险。1918年，曹锟升任直隶督军兼省长，后又加两湖宣抚使，成为了辖几省的大员。由于张福来两次与吴佩孚救曹锟，曹锟将他自己兼任的第三师师长之职让给了吴佩孚，而吴佩孚担任的第六旅旅长之职则给了张福来。

此后，张福来作为直系的一员战将，先后参加了讨伐南方护法军的战争以及讨伐张勋辫子军的战争。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福来率第三师第六旅重创固安、大兴中路一线的皖军。直皖战争以直系胜利而结束。战后直系大扩军，张福来升任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1年，湖南的地方军阀赵恒惕与四川的地方军阀刘湘联合攻打直系湖北督军王占元。奉曹锟命令，张福来随吴佩孚兵出河南，赴湖北“援鄂”。张福来担任援鄂军第一路总指挥，首战攻陷湘军占领的城陵矶，随即对岳州发起攻击，重创湘军。打败湘军后，张福来又在宜昌与川军激战。川军退却后，吴佩孚委张福来为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联防总司令。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直系前敌总司令。张福来奉命从南方率军回北方参战，担任中路副总指挥，守备津浦和京汉铁路之间的霸州、固安一带。战斗打响后，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奉系攻占霸州。为阻止张学良和郭松龄继续推进，张福来率军与张学良和郭松龄在霸州和固安之间展开激战。奉军抵不住张福来所部的凌厉攻势，无奈后退。张学良见势不好，急调大批援兵，而且用重炮掩护进攻。奉军多于直军近一倍，武器精良。张福来指挥直军从清早苦战到中午，渐呈不支之势。吴佩孚采用“分敌之计”，急派军队攻打永清，以解张福来之危。永清在霸州、固安和奉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落岱的三角地带的中心。永清如被直军占领，不仅可打张学良的后背，对在落岱的奉军总司令部也是威胁。张学良急调军队支援永清。张福来抓住这一战机，奋力指挥反攻。激战中，郭松龄身负重伤，奉军军心大

动，败退，遗下的枪械、军需、辎重如山积。张福来一鼓作气，乘胜挥兵追击。张福来不给奉军喘息之机，率领军队对奉军穷追不舍，一直追杀到胜芳镇。此时的奉军被追杀得无力再战，只好投降。张学良在卫队的掩护下，朝落岱逃去。直军占领胜芳镇，俘虏奉军达一千余人。胜芳是华北的大镇，人口多，商业繁华，而且离奉军占领的天津仅五十余里。张福来对奉军穷追不舍、直捣胜芳重镇的消息在直军传开，使直军大受鼓舞，也大长了张福来的脸面。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福来率领第二十四师驻扎在湖南岳州、平江一带。这时在直系中与张福来资历差不多的将领大多有了一省的地盘，如萧耀南任湖北督军，王承斌任直隶省省长，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张福来为督军的肥差而眼红，几次找他的拜把子兄长吴佩孚，而以直系副帅的身份驻在洛阳的吴佩孚，对近在身边的河南督军冯玉祥看不顺眼，于是吴佩孚有用张福来取代冯玉祥的意思。吴佩孚以训练为名，将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由湖南北调河南郑州，准备择机取代冯玉祥。当时的形势是，吴佩孚的第三师驻在洛阳，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驻在郑州，冯玉祥的第十一师驻在开封；另外，在信阳还有直系的靳云鄂部。冯玉祥处在被夹攻的险境。冯玉祥跑到保定向曹锟哭诉。曹锟认为冯玉祥会练兵也能打仗，是自己的一员爱将，但吴佩孚又是他的灵魂和直系实际上的总司令，是其须臾不能离开的人。曹锟考虑再三，决定采取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授意大总统黎元洪将冯玉祥调出河南，授予陆军检阅使，同时任命张福来为河南督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曹锟政治野心膨胀，急于要当大总统；而吴佩孚则提出“恢复法统，重开国会”。直系分裂为两大派：以驻保定的曹锟及驻在天津的曹锟四弟曹锐为首的“津保派”和以驻洛阳的吴佩孚为首的“洛吴派”。张福来站在吴佩孚一边，成为“洛吴派”骨干。1923年1月10日，张福来与其他几位将领根据吴佩孚的授意致电曹锟，声称：“总统选举与袁世凯帝制行为相同。殷鉴不远，幸速止。”作为河

南督军，张福来对顶头上司吴佩孚百依百顺。张福来自己说：“用人任事，事事禀命而行。”吴佩孚则常对人说：“子衡（张福来字）为人老实，我不能不好好监督他。”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再次挂帅出征，担任前敌总司令。9月17日，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派兵点将，派张福来为十路后方援军总司令。四照堂点将后，直军陆续开拔前线，但身为总司令的吴佩孚没有立即开赴前线，还留在北京筹备军费。不久，从前线传来坏消息，第二路军直军司令王怀庆被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打得溃不成军，朝阳被奉军占领，接着奉军又占领了赤峰。

吴佩孚赶到前线，指挥直军在山海关等地与奉军展开激战，力图恢复被奉军攻占的九门口。但奉军在九门口依险死守，直军连发几次冲锋，都被奉军猛烈的炮火打退。吴佩孚连续几天指挥直军在山海关、九门口进行大战，直军疲惫不堪，伤亡惨重。吴佩孚见奉军攻势凌厉，直军损失大，不得不改变原先以精锐军队由海路在缓中、葫芦岛一带登陆，前后夹击奉军的作战部署，调集准备登陆的部队来增援九门口，想集中力量收复九门口，一举攻破奉军中路。

吴佩孚调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开上前线。张福来在10月23日如期率军赶到前线。吴佩孚免去王怀庆第二路军司令职务，命张福来接替。张福来任第二路军司令后，以重兵猛攻九门口。九门口地处燕山山脉，大清河水自关外流入，水分九道而下，故称九门口。这里地势险峻，奉军占据有利地势，据险而守。张福来知道九门口战略位置重要，离山海关很近，且地势险要，是山海关前线的战略要地。

张福来率三个旅约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向九门口发起攻击。双方鏖战了整整一夜，奉军渐渐支持不住。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九门口左侧石门寨的奉军赶到，两军合一锐气大增。张福来率部鏖战一夜，前功尽弃，九门口还是没能攻下。张福来只得重整兵力，准备再次攻击九门口。这时战场上突然传来直军第三路司令冯玉祥和第二路援军司令

胡景翼从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做内应发动北京政变，将大总统曹锟囚禁在总统府的消息。

正在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的吴佩孚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后，当即决定将前敌总司令职务交张福来代理，自己急忙回转天津。北京政变的消息在直军中传开，军心动摇。奉军乘机进攻，势不可当。张福来无可奈何，只好从山海关前线撤到抚宁县。张福来是员猛将，却不是指挥全军的帅才，吴佩孚一走，张福来就没有了主心骨。第二十三师师长王维城等找张福来拿主意，张福来竟一筹莫展。奉军向滦州进发，直军全线溃败，张福来仓促退回河南。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惨败。张福来乘船退到溏沽然后回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随即进攻河南。张福来炸毁黄河大桥，想阻止胡景翼的军队，但还是没能奏效。胡景翼率国民军进入河南。张福来见无法挽回败局，宣布辞去河南督军下野。

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湖北督军萧耀南等直系将领拥戴下再度出山，在汉口就任自称鄂、豫、浙、苏、赣、川、粤、桂、黔、晋、陕、皖、湘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张福来到汉口追随老长官，担任联军总司令部军务处长。

1926年，吴佩孚兵败逃往四川，张福来匿居汉口。不久，张病死在汉口。

张辅忠

汪仁泽

张辅忠，别名僿无、佐时、一仁，我国近代药物学家。1888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浙江余杭良渚镇。他的父亲在当地开设酱园。他少年时在私塾读书。

1907年初，张父曾要他辍学帮助照料店务，但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国家受列强的欺凌，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用科学救国，因此决意继续升学。1907年春天，他只身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由于升学未获家庭同意，因此在经济上得不到支持，只得先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员，积蓄了一点钱，然后考进了一所中学。1913年，考取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第一期生，生活依靠晚上做家庭教师来维持。1916年药专毕业后，任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八团司药正，驻杭州。

1922年，张辅忠离开部队，经老师李觐唐的介绍，到上海五洲固本皂药厂，任该厂药部主任。1924年在厂内秘密参加了国民党。他好学不倦，一面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自修英、德、日三国外语。生活上节俭朴素，打算积下一些钱，到国外去留学深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动员厂里的职工参加上海工、商、学各界支援五卅运动的“三罢”斗争和大游行。1926年12月五洲厂工会成立，他被选为工会委员。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曾出席上海市民代表大会。4月，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政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张辅忠的朋友和同学，有的被捕，有的失踪。他不愿再去登记国民党党籍，同时也感到在上海难以安身。就在这一年，他远涉重洋，到了德国，自费进入柏林大学有机化学系深造。

1931年，张辅忠在柏林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获得该校药剂化学

博士学位。此后在五洲厂的资助下，留德研究，并参加了他的老师C．Manish教授主持的科学研究项目，两人合作取得了有机化学Manish反应[(1)]的研究成果。虽然当时在德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较优越，但是他热爱祖国，于1933年毅然回国，带回代五洲固本皂药厂在德购买的制造甘油的机器设备。回国后，他帮助该厂设计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甘油厂，后来又扩展为五洲制药厂。他所采用的提炼甘油新技术，使在制造肥皂时的副产品甘油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降低了肥皂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肥皂的质量，使五洲“固本肥皂”优于英商“祥茂肥皂”，在竞争中得到畅销[(2)]，挽回了不少权益。后来他担任了五洲制药厂厂长，先后研究仿制了三十多种过去依赖国外进口的西药，计有消费量很大的常备消毒剂红汞，从植物中提取的维生素乙，磺胺类制剂S．D、SST，治疗梅毒“六〇六”的同类制剂“化治梅”，抗痨药PAS，治痢疾药“安痢生”，治癫痫病药“苯妥英钠”，治麻风病药“大风子油”，止痛剂“安乃近”，以及牛痘疫苗、激素制剂等等，对我国的药物化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研制的过程中，他总是一丝不苟，亲自动手，带领助手仔细操作。在试制“化治梅”药剂时，原料是剧毒的砷，金属钠在接触时会腐蚀皮肤和衣服，而该药的制造技术，国外是保密的，他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试制了近百次，毫不灰心，最后终于成功。又如磺胺类药物的试制成功，在当时青霉素未普及应用前，由于用途广、销售量大，有效地抵制了外货的倾销。在这期间，他还受聘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药学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任教，他的学生中有很多后来成为我国药学界的骨干。1936年中华药学会改选，他被推为理事长[(3)]。他还主编《澄光》医药杂志，介绍国内外新医药知识。

张辅忠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勤奋好学。后来他又自学掌握了俄文。工作之余，则埋头治学。1947年，五洲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五洲制药厂是其所属企业之一）的总经理项绳武病故，董事会决定由他接任总经理职务。同年，他的德国老师C．Manish教授从美国哈佛大学来信，邀请他去美国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一切出国的手续，连护

照也已代他办好。但是他考虑到国内药物研制的需要，并已承担公司的重任，遂谢绝了出国的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引，说服资方把原来准备拆迁到台湾去的机器设备留了下来。

1950年，他接受人民政府的聘请，放弃了五洲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高薪职位，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药政处处长的工作，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且筹备建立了华东药品检验所，兼任所长。药品检验所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政府执掌了药政的主导权，从此改变了过去洋药、假药充斥市场无人管理的局面。1953年他调任华东药学院（后来改称南京药学院）院长。他曾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1957年2月6日，张辅忠因肺癌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张辅忠生平传略》（未刊稿）。

《五洲药厂工会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版。

《五洲》（五洲药厂厂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

《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版。

笔者采访记录。

---

(1) Manish反应是指通过活泼的金属离子（如钾、钠、镁等）参与化学反应，促使某些有机化学物质的迅速结合，常应用于制药工业等方面。

(2) 当时上海《化学世界》杂志发表《国货肥皂与外货的优劣观》一

文，将“固本皂”与“祥茂皂”作了分析对比：主要成分总脂肪酸“固本皂”保持在55％左右，而“祥茂皂”不到38％；水分含量固本皂仅为34％，而“祥茂皂”高达48％，两者优劣立见。加之爱用国货的号召，“固本皂”更为国人所乐用。

(3) 杨家骆：《民国人物图鉴》第1册卷5，1937年辞典馆初版，第138页。

张国淦

丁贤俊　杜春和

张国淦，字乾若，一字仲嘉，号石公，湖北蒲圻人，1876年7月7日（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六日）生。其父张学诚曾在湘军某营充文书，后被保举为县主簿，长期在皖南牙厘总统局及芜湖分局任职。张国淦幼年随父侨居安徽，曾游学豫、燕。1902年中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后因母病返芜湖，一度在赭山学校任教习，并向上海《沪报》投稿，论述东北政务、边防。1906年，清政府设考察政治馆（后改名“宪政编查馆”），张的老师宝熙主持馆务，招张入馆任馆员。这时，他所写的关于辽、吉二省政务的文章已在《沪报》刊出。论述黑龙江兴革的稿子，则改用“上书”方式径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得到程的赞赏。后由程专折奏调，入程幕府。这是张国淦走上宦途的重要机缘。

1907年张国淦出关，在黑龙江历任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1910年经奏保以道员留该省补用。次年2月，又得东三省总督锡良保举，充交涉局总办。6月，调京，在奕劻内阁任统计局副局长。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授命袁世凯组阁。12月，南北议和，袁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命张国淦以“参议”身份，随唐赴沪，参与和议。

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张得袁器重，曾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1913年至1916年间，袁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张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政治会议副议长、国务院内务次长、参政院参政、政事堂右丞、教育总长等职。这期间，张国淦因同乡关系与副总统黎元洪结为好友，深受信任，成为黎的得力谋士。同时也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国务院总理徐世昌等人关系

密切，经常周旋于袁、黎、段、徐之间。1913年后，袁迫黎进京，袁、黎之间嫌隙加剧。袁特任张国淦充总统府秘书长，以调和双方关系。袁称帝前后，与段的权力之争日益表面化，张国淦便在袁、段间折中调解。张的这些活动，对于弥合军政等各方面的矛盾，起了息事宁人的作用，因此，曾博得各方的倚重。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张国淦备受重用，先后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要职。当时，黎、段争权，形同水火。有人劝黎联冯（国璋）排段，张国淦力主调和。他以和事佬身份，奔走于府、院之间，劝说双方顾全“大局”，以便共同对付南方。后来，黎、段矛盾激化，黎元洪免除段的总理职务，政争陷入僵局。黎召张勋入京调停，张悍然拥废帝宣统复辟，黎元洪束手无策。张国淦向黎献计说：“为今之计，唯有通电南京冯副总统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一面起用段祺瑞，责其出师讨伐。段之成功，即总统之成功。不然，使民国中断者为总统，恢复民国者为段，总统将何以自处？”[(1)] 段起初拟不受黎的委任，张国淦又向段疏通，请他接受任命。张国淦就是这样既为黎保全了所谓“总统名节”，又为冯、段取得政权提供了合法依据。

1917年秋，冯国璋接任总统，段祺瑞恢复国务总理职务。张国淦也续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来，段妄图实行武力统一南北的政策，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借口，向日本乞求“西原借款”，借以扩充军备。段曾饬令农商部出面，以中日合办浦口铁厂为幌子，出卖主权，换取日本贷款。张国淦拒绝签字，从此失去段的信任。

1918年至1924年间，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相继任总统，内阁人事多变，张国淦却始终连任要职，先后担任过平政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农商总长兼署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职。

1926年至1927年间，直、奉军阀操纵下的所谓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时期，由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相继组阁。颜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内阁相标榜，再出摄政[(2)]。张原系司法总长，遂继任该职。杜内阁时期，张改署内务总长。顾维钧组阁，张仍留任。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支持下，举行北伐，终于摧毁了北京政府的统治。至此，张国淦也结束了他的官僚政治生涯。去职后，他移居天津，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从事史地调查研究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津迁沪。据他自称：“抗战期内，（湖北）省政府杨揆一屡以恢复武汉大学引诱鄙人回鄂主持，并以鄂中多数人士名义馈致多金，（余）严词拒绝，迄不为动。”[(3)]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曾聘张任“湖北省先贤遗著编校处主任”[(4)]。张辞谢任命，退还寄款法币三百万元，只表示“可以襄助”选编书籍。抗战前后，曾以卖书、撰稿维持生活，虽处境窘困，但他没有阿附敌伪和国民党政府。据他1940年间致翁文灏的信中说：“自顾十余年来，每日十二时，精力只销磨于故纸堆中。”[(5)]

张国淦“晚岁专事著述”[(6)]，著有《历代石经考》、《附汉石经碑图》（燕京大学国学图书馆印行）、《常熟瞿氏观书记》、《中国书装源流》（《岭南大学学报》印行）、《俄罗斯东渐史略》（丰润张氏印本）。此外，还有《中国方志考》、《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旗制辑要》、《黑龙江志略》、《湖北书征》、《湖北文征》、《湖北献征》、《潜园文集·诗集》等著述，多未刊行。

1949年上海解放后，张国淦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任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53年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曾就其在北京政府时期的经历写过一些回忆录和专题稿件，先后在《近代史资料》刊载的有：《对德奥参战》（署名许田，1954年第2期）、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1955年第4期）、《近代史片断的记录》（1978年第2期）、《中华民国内阁篇》（1979年第3期）等篇。1954年，张任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次年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专著《辛亥革命史料》于1958年3月刊行。1959年1月25日，张国淦在北京病逝。他的遗稿《中国古方志考》于1962年在上海出版。

---

(1)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2)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77页。

(3) 张国淦：《致邓鹏九（翔海）书》，未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4) 张国淦：《与万武樵（耀煌）的往来书信》，未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5) 张国淦：《致翁咏霓（文灏）书》，未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6) 张国淦：《谕瑞（儿）、蕴（媳）书》，未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张恨水

宗志文

张恨水，原名心远，笔名恨水，安徽潜山县人。1895年5月1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西。其父早年在江西做税务小吏，张恨水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他七岁入塾。十一岁开始读小说，《残唐演义》、《三国演义》都偷着看，看得津津有味，是个小说迷，还喜欢读《千家诗》。十三四岁时，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小说中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十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这位先生是不应科举、不做官的。这种作风，又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因之他对于传统的读书做官之说，素来鄙笑。

1910年秋，张恨水进入南昌大同小学堂，开始受到新式教育，读新书，看报纸，“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但他依然日夜读小说，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1)]。他读《西厢记》，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跃的笔法。一年后，他考进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校里数、理、化功课逼得很紧，他只有在假期中看小说。这时，他已改变过去把看小说当作看故事消遣而作为文艺欣赏，而且兴趣很广泛，既欣赏《小说月报》上翻译的短篇小说，又陶醉于词章小说《花月痕》上的诗词小品，乃至于各章回目。

1912年秋，张恨水因父亲去世辍学，随家人回到老家潜山，终日读书吟诗。次年春天他去上海，不久考入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这所学校因为经费不足，常常停课，他乘机大读《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全唐诗》等，还写过两篇短篇小说，投寄《小说月报》。这两篇小说虽然没有刊登，却收到编辑恽铁樵鼓励他的复信。他晚年

说，这封复信“对我的鼓励却很大，后来我当了五十年的小说匠，他的这封信是对我起了作用的”[2]。

垦殖学校是国民党办的，曾经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解散。张恨水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又回到潜山老家，闭门读书。夏天晚上蚊子咬，他把双腿泡在水桶里苦读。还模仿《花月痕》的形式，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故事是虚构的，每回里都插进些词章。当时他还不懂词章，只是根据《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写诗填词，偶用几个典，也无非是耳熟能详的字句。

1915年春，张恨水离家外出谋生，在汉口一家小报馆里当过编辑，写点杂文；在剧团当过临时演员；还流浪江南一带卖过药，也试写过几篇小说。这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使他对世态人情有许多感受，为后来写作打下了生活基础。1918年春季，他经朋友推荐，到芜湖《皖江报》任总编辑，每天写两个短评，编一版副刊，暇时写小说。他给《皖江报》写过一篇长篇连载《皖江潮》，给上海《民国日报》写了《真假宝玉》和《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两篇短篇小说。这是他正式写作章回小说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恨水感到非常兴奋。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可是有一颗爱国的心。看见别人示威游行，我们三两个人，手上拿了小旗子，站在报馆门口，跟着喊口号。在我的创议和主持下，在报上办起了周刊一类的东西。”[3] 正当运动高潮时，他因事到上海，亲眼看见那里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心情激动，因而十分向往北京的革命和学术气氛，加上朋友的鼓励，决心到北京上大学深造。当年秋天到北京，在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那里帮助处理新闻材料，工余苦攻《词学全书》，学习填词。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看到他填的词，大为欣赏，辗转托人把他请到《益世报》当编辑。两人常在一起饮酒吟诗，互相唱和。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张恨水到该报主编副

刊《夜光》，并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每天刊登五六百字，直到1929年1月才登完，全篇约一百万字。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小说的主角是新闻记者杨杏园，以他的恋爱故事为线索，旁及各个阶层的人物，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官场和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进行辛辣的嘲讽，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半封建制度的罪恶，是一部谴责性小说。全书穿插许多诗词，特别是每回的回目，用辞藻丽工整，很为人所称道。不少人认为书中人物都有所指，当时就有人索隐。《世界晚报》因连载《春明外史》，发行量大大增加。北京几家大报纷纷来请张恨水写连载小说，他就同时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京尘幻影录》、《天上人间》。这两篇都是随想随写，随写随登，为的是多拿稿费。1925年，他开始写《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上连载，1932年才刊完，全书亦近一百万字。

《金粉世家》也是张恨水的名著之一。它写的是一个所谓金铨总理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全书以金铨的小儿子金燕西和一个小康人家的女儿冷清秋为主角，以他们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写这个总理家庭成员的骄奢淫逸，以及他们之间的钩心斗角，暴露北洋军阀政府中官僚荒淫无耻的面貌。全书人物一二百，精心布局，情节曲折，大大投合了当时社会上一般小市民阶层之所好。尤其是妇女，包括老太太在内，最爱看这部小说。直至若干年后，还不断有读者跟他议论《金粉世家》中人物处理的问题。

《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相继在报纸上连载后，张恨水名声大噪，全国许多报刊和出版部门约他撰写小说的书信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1929年他开始为上海《新闻报》撰写《啼笑姻缘》。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忙碌的时期。他每天同时为六七家报刊写连载小说，平均一天差不多要写五千字。《啼笑姻缘》也是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学生樊家树和北京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相爱，被一个军阀拆散，最后沈

凤喜被逼致疯的故事。在《新闻报》连载后，轰动一时。解放前该书前后印过二十版以上，印数近十万册，还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因为故事的矛头是指向北洋军阀的，许多人索隐，说某某是影射某人，甚至引起过某人的误会，张恨水差点被抓起来。故事的背景是北京天桥，张恨水曾经一连好多日子出入那里，为他塑造的人物搜集素材，还结交过各阶层的朋友。

“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鉴于民族危机严重，激于义愤，开始撰写抗战小说，以唤起人们抗敌御侮的决心。但当时国民党政府不许公开反对日本，他的小说也就只能“吞吞吐吐”，不能畅所欲言。他的第一部抗战小说是《热血之花》，写的是我国人民和海寇的搏斗，以海寇喻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写《东北四连长》，是东北抗日御侮的故事，其中三位连长在长城外牺牲。他的目的是想藉此讽刺当时南京方面消极抗战的大人物。1932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弯弓集》，“都是些鼓吹抗战的文字”。他在序言中说：“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1934年5月，张恨水到西北游历，耳闻目睹了民间疾苦，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从西北回来后，他接连写了两部“描写西北那些惨状”的小说：《燕归来》、《小西天》，分别在上海《新闻报》和《申报》上连载，引起了人们对西北情况的关注。

1935年秋天，张恨水应成舍我之邀，到上海担任《立报》副刊《花果山》的编辑，约期三个月。期满拟回北平时，值华北危急，他已被日本侵略者列入北平文化界人士黑名单，不得已转道南京。次年4月，他出资和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并为该报写两篇连载小说：《鼓角声中》，写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北平，是抗战小说；另一篇《中原豪侠传》，是武侠小说。同时他还写了几部连载小说：上海《新闻报》的《夜深沉》，《申报》的《换巢鸾凤》，《晶报》的《锦片前程》，《立报》的《艺术之

宫》。当时《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周帮式再三邀他写稿，他写了一篇义勇军的故事《风雪之夜》，在该报连载四五个月后，“奉命停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恨水和报社职工为了抗战，坚守岗位，“咬着牙齿”将《南京人报》办下去。直至11月南京沦陷前夕才停刊。次年1月张恨水携带家眷到重庆，在《新民报》工作，编副刊《最后关头》，并为《上下古今谈》专栏写散文，内容多半是讽刺国民党统治的种种黑暗。为了躲过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他常常采取影射的手法。他说：“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而《上下古今谈》当时能被社会注意，就在这一点”[(4)]。他几年中写了一千多篇，约上百万字。

抗日战争时期，张恨水还写了将近三十部小说，其中以《八十一梦》最有代表性。《八十一梦》是一本寓言体小说。他以第一人称写了十几个梦，各梦自成段落，以荒诞不经的寓言，揭露国民党官僚豪门的贪污腐败和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其中《忠实分子》一篇，写一群鸡狗通过钱眼登天，钱眼的横额上有“孔道通天”四个大字，直接讽刺了当时“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府，以致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投入监狱。《八十一梦》是抗战时期销数最多的一本书，延安曾翻印。1942年秋，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新民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张恨水在座。周恩来针对《八十一梦》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5)]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张恨水回到北平，担任《新民报》北平版经理，兼编副刊《北海》。当时社会上流传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之说，即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攫取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等。他耳闻目睹，不胜愤慨，1947年写了一部《五子登科》的小说，揭露国民党官僚政客的贪污腐化。1948年秋天他辞去报社职

务，专事写作。到北平解放前，共写中、长篇小说十四部，先后在北平和上海的报纸上连载。其中《五子登科》直至1956年始续完，也有几篇以后未续写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恨水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于1949年夏患脑溢血，一度瘫痪在床，经多方治疗，病情渐渐好转，恢复了部分写作能力。1954年后，他根据民间传说改写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秋江》、《孔雀东南飞》等，还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侨胞写了《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小说。为描绘北京城郊变化，他写了一组《冬日竹枝词》。为了写好这组词，他逐一观看了北京十三个城门附近的变化。

1967年2月15日，张恨水因病在北京去世。

---

(1) 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2页。

(2) 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5页。

(3) 张晓水等：《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88页。

(4) 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第12、92页。

(5)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83页。

张季鸾

熊尚厚

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笔名少白、一苇、榆民、慕刘、老兵等。祖籍陕西米脂，其祖父从军至榆林，故又谓榆林为其原籍。父亲张翘轩出身进士，游宦山东邹平。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清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八）生于邹平。他少年时聪敏过人，熟读“四书”，下笔成文，十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颇受家人钟爱。十三岁时其父病故，遂返回榆林就读于田善堂私塾。1902年秋，他受榆绥道台陈兆璜的赏识入道署课读，随后又被资助至咸阳味经书院，从关中经学家刘古愚读书，深受其砥节砺行的影响，打下了文学的深厚根基。

1903年，张季鸾入三原宏道学堂，与于右任同学。次年他被学堂保送，通过了留日学生考试，于1905年去日本。他在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早稻田大学前身）学政治与经济，与胡政之同学。课余他担任陕西籍留日学生创办的《夏声》杂志主编，鼓吹反清革命，从此走上了新闻救国、言论救国之路。1906年秋，他加入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张回国，先在关中学堂教书。1910年应于右任之邀至上海，任《民立报》编辑、记者。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季鸾担任总统府秘书，替孙中山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向上海《民立报》发大总统就职电讯。孙中山辞职后，他于4月在北京和曹成甫共办《京津民立报》，任总编辑，并为上海《民立报》写通讯。时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他将此新闻发电给上海《民立报》刊载。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予以揭露，被袁世凯指使军政执法处予以逮捕。张系狱三月获释后回到上海，与康心如共办《雅言》杂志。未几，他与胡政之共办上

海《大共和报》，任国际版主编，研究国际问题加以评述；同时兼上海中国公学教授，讲授西洋史。同年秋，他参加了黄兴等人在东京组织的欧事研究会。

1915年，张季鸾与康心如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担任总编辑，经常撰文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坚持进行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他结束了《民信日报》，与康心如至北京，接办政学会谷钟秀等办的《中华新报》，任总编辑，同时兼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1918年9月，北京各报揭露安福系向日本秘密大借款事，《中华新报》等八家报社被查封，张季鸾再次被捕，判役二十天，经张耀曾等营救获释。事后他返回上海主持上海《中华新报》[(1)]，任总编辑，在经费困难情况下勉力维持，直至1924年冬停刊。其间，张曾在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举荐下担任陇海路会办，不及一月辞去。

1924年8月，张季鸾与胡政之创办《国闻周报》于上海。多年来，他很羡慕上海《新闻报》、《申报》那样的纯商业性大报，时常与胡政之、吴鼎昌共议创办独立自主的大型商业性日报、通讯社之事。当得知天津《大公报》将要停刊，他遂与胡、吴共商接办事。

天津《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清末为北方著名大报之一，民国后因英敛之年迈，于1916年10月转让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北京安福系政权垮台后，该报陷于停顿状态，于1925年11月停刊。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于次年秋组成新记公司接办，9月1日复刊。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主要负责编辑和言论。他们共同决定，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三年内不许任公职。复刊之日他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为办报方针，政治上取“不偏”“不倚”立场，以求独立自主的发展。张在主持该报期间，主要负责社评和要闻版，非常注重新闻报道的写作技巧。他借鉴日本报纸，首创综合编辑法，突出每日重大新闻，并锐意革新。加上胡政之的善于组织经营，很快使《大公报》面貌一新，半年后销量逾五千份。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北京政府严厉压制新闻出版事业，时以

武力残酷镇压，张在言论上力持中立态度，以“忍耐步趋”渡过“惊涛骇浪”[(2)]。

1928年夏，北伐军占领京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终于垮台，《大公报》的言论环境一时有了改善，张季鸾的文笔更加生辉。其社评标题生动、简练、准确；言论说理透彻、文字流畅，有独到见解，于论述中透露新闻。张成为颇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推动了当时报刊评论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略华北日亟，张季鸾报道东北情况甚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但是此后他在撰写的许多言论中，主张“明耻教战”，一方面反映民生困苦状况，要求扫除贪污；一方面又呼吁各界放弃对南京政府的批评，“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他还主张对日暂缓抗战，赞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蒋尊为“诤友”。其后在《大公报》上提出工业化、科学化口号，提倡科学，注重知识；主张积极经营西北，建议建筑西北干路，于西安设立教育中心，开发大西北。

当日本侵略者公开煽动华北“自治”，并且压迫华北当局下令限制《大公报》发行之时，张季鸾感到时局严峻，必须未雨绸缪。他提出“沟通南北新闻”口号，于1936年4月在上海增设分馆。他在社评《今后之大公报》中表示：一、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构；二、惟民族团结为自救之路；三、拥护统一和平为其一贯之标帜；四、对外应守合理远大之方针。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调整，他对抗日转持积极态度，并表示将使该报成为“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本报为全国人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之用”[(3)]，以求扩大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力主抗战。7月9日、10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宋哲元的对日政策，呼吁国民党北方当局“迅速决大计，上与中央连成一片，下与民众连成一体”，“否则退让复退让，畸形复畸形，士气何堪再用，地方何成体制”。平津沦陷后，天津《大

公报》声明："决与中华民国在津合法统治同其命运，决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威胁。"毅然决定停刊。上海于11月沦陷，张季鸾率孔昭恺等绕道去武汉，次年发行《大公报》汉口版，声明支持"持久抗战"。他反对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解，反对汪精卫"抗战必亡"的亡国论。武汉沦陷后，他赴渝主编重庆《大公报》，仍表示坚决支持抗战。提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大公报》在香港、桂林增设分馆，他任三馆总编辑，经常往来于渝、港两地，一度主持港版笔政，并以"老兵"的笔名，为桂、港版写通讯。张在编辑方针上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指示报社同人尽力揭露日寇在华暴行，在报上逐日刊登"敌寇暴行录"，以唤醒同胞共同反抗日军的暴行。他认为"报人的职责在谋人类的共同福利"，反对"私见"。

张季鸾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提出"国家中心论"，尊蒋介石为抗战建国领袖。他主张在国际上联合苏联，在国内联合各党派坚持长期抗战。他经常被蒋介石请到官邸，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话，张回到家里即写成文章公诸报端，字里行间透露出国民党的政见及一些消息。

张季鸾因长期患肺病，晚年已无法去报馆上班，由编辑室主任王芸生去他家笔录其口授，间接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给《大公报》颁发荣誉奖章。他高兴地在重庆报业公会主持庆祝大会，在发言中要求报人不应求权、求名，而以报国为己任。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于重庆中央医院。

主要参考资料

张季鸾：《季鸾文存》，重庆大公报馆1944年版。

朱传誉主编：《张季鸾传记资料》第1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年版。

陈纪莹：《报人张季鸾》，台北文友出版社1957年版。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1956年版。

---

(1) 为张耀曾、谷钟秀等政学系所办，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

(2) 吴相湘：《中国报人典型张季鸾》，《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9年版，第438页。

(3) 上海《大公报》1936年4月1日社评。

张继

黄德昭

张继，原名溥，字溥泉，河北沧州人。1882年8月31日（清光绪八年七月十八日）生于一个耕读人家[(1)]。其父张以南曾任保定莲池书院斋长。张继七岁入塾读书，十六岁随父就读于莲池书院。1899年赴日本留学，先学于东京善邻书院，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不久改为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由于目睹清朝的腐败，受到法国卢梭政治学说《民约论》的影响，开始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倾向。1902年参加东京留学生青年会。同年，由秦力山介绍在横滨得识孙中山。1903年因与邹容等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发辫，被逐回国。至沪上，与章炳麟、章士钊、邹容结为兄弟，并任《苏报》参议。《苏报》被封后，与章士钊、陈去病等在上海续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初，至长沙参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的活动。同年，受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连，与黄兴等被拘于上海。获释后再赴日本，被推为留东学生会总干事。

1905年8月，张继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直隶支部主盟人。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张任《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他为《民报》拟订的六大宗旨[(2)]，对同盟会的纲领做了具体化的宣传。1906年春赴东南亚联络华侨，同年冬又回东京。1907年10月，梁启超组政闻社，集会于东京锦辉馆，宣扬君主立宪，张继和一批同盟会员当场赶走了梁启超。1908年赴法国，参与李石曾等办《新世纪》杂志，思想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本部自日本迁到南京，张继回国任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1912年8月，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他就任参议。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宋教仁案发生

后，受孙中山命，于7月赴九江参与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继赴欧美，鼓动华侨反袁。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张又回国。1917年段祺瑞为解散国会，指使“公民团”包围众议院，张继向议长吴景濂献抵抗之策，未被采纳。1919年再赴欧洲考察。翌年归国充广东军政府顾问，并受孙中山命为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1921年春，改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不时受孙中山派遣与国内各实力派联系。

当孙中山得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变革自己的主义和政策时，张继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支持者之一。1922年11月，他曾携带孙中山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苏俄使者越飞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外蒙给予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使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时无法得到军火援助，他对联俄、联共政策的态度开始冷淡下来。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孙中山于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继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但其后他转为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6月18日，他与谢持、邓泽如联名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25日又同谢持找鲍罗廷顾问谈话，表示反共。8月间竟直接向孙中山提出分共[(3)]，未能如愿，他只好离开广州跑往上海。11月间到北京找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继续声言反共。

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活动。张继适患病，虽未能出席会议，但签名表示参与。他对邹鲁和林森说：“君等之主张，即余之主张也。”由于他积极参与“西山会议”的活动，受到广东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书面警告[(4)]。1926年3月，“西山会议”分子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张继主持了开幕会议并被推选为所谓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9月间宁、汉、沪三方共同召集特别委员会，张继被推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从此成为南京国民

政府的“元老”之一。1928年10月，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及北平政治分会主席。次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6月参加国民会议，任主席团委员。同年7月，为了合力“剿共”，他与吴铁城联电粤方，谋国民党内之“团结”。“九一八”事变后，张继与蔡元培赴粤交换意见，结果产生了10月间的谋求宁、粤联合的上海“和平统一会议”。11月出席国民党（宁方）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被选为立法院院长，辞未就。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以西安为陪都，他任西安筹委会委员长。1933年2月，任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驻新乡，以观察北方形势变化。此后常往来于北平、洛阳、西安间。

1935年11月，张继至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毕摄影时汪精卫被刺，张急起拉住刺客、摄影记者孙凤鸣而使其就逮。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及冯玉祥等联名提案，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张继先签名赞同，随后又表示反对[(5)]。1939年，他任国民党中央慰劳团总团长，北赴榆林，途经延安，对解放区的一切表示“愈觉厌恶”[(6)]。1945年夏，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主席团委员，被选连任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修正”政治协商会议及军事三人小组协议条款，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同年冬，出席国民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任主席团委员。

张继晚年曾主持国民党党史和民国史的编纂工作。1937年初兼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年国民党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他任主任委员，1947年1月就任国史馆馆长。同年12月15日在南京因心脏病去世。

著作编为《张溥泉先生全集》和《张溥泉先生全集补编》等行世。

(1) 张继：《先府君哀述》，自称：“吾家为津南望族，以忠信传家，耕读为业。”

(2) 《民报》第一号所载的《本社简章》第一条说：“本杂志之主义如下：（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3) 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自称“与总理谈此事，甚不悦”云。

(4) 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5)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载中央执行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版。

(6)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文化供应社1949年版，第51—52页。

张嘉璈

江绍贞

张嘉璈，字公权，江苏宝山人。1889年11月13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生。父亲张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二哥张君劢后来是民社党党魁。张嘉璈幼时住在嘉定县，受塾师教育。十三岁随同张君劢到上海广方言馆读书，习法文。后入宝山学堂，受名师袁观澜、沈信卿的教导，“对中国性理之学的研究，得益匪浅”[(1)]。1904年考取秀才。翌年进京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不久得友人帮助到日本，入东京庆应大学习财经学。他悉心研究明治维新后日本财政、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希望回国后在财政金融上有所建树。

1909年张嘉璈回国，起初在北京帮助《国民公报》翻译路透社电讯，后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0年供职邮传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嘉璈离京到沪，与一部分共和研究会成员发起筹建国民协会，任总务部长。1912年5月，张代表国民协会往北京，与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协商合并。因与共和党意见分歧，11月底单独与张君劢等人主持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合并，改称民主党，拥梁启超为领袖。是年，张还担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

1913年5月，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组进步党，张嘉璈任党部组主任，并经梁启超推荐任参议院秘书长。他因不满袁世凯强制参议院选举、解散国会等丑行，决心放弃政治活动，改而致力于财政金融事业。适逢北京政府清理大清银行成立中国银行，又经梁启超（时任币制局总裁）推荐，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虽有商股，但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等特权。张嘉璈任职后，运用自己所学得的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知识，为建立新式银行制度做了一些努力。

1916年4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继续筹措军饷，以做垂死挣扎。其时梁士诒献策将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并，集中现金。金融界某些人则主张发行不兑换券。因内情外泄，引起京、津地区中、交两行的挤兑，很快波及全国。5月11日，国务院下令中、交两行即日起一律停止兑付所有发行之纸币及应付存款，并封存两行所有现金准备。张嘉璈认为这样做将断送银行的生命，遂与经理宋汉章一起毅然抗命。他们取得金融、工商界人士以及租界当局英、美势力的支持，继续兑现，仅四天时间，风潮平息。这一行动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影响及于苏、浙、皖、赣、鄂各省；同时也提高了他在金融工商界的声望。翌年，张被提升为总行副总裁，到京供职。

通过抗拒停兑令，张嘉璈感到银行必须从官府的桎梏下解脱，才能正常发展业务。他到总行上任后，即与总裁王克敏计议，修改中国银行则例，扩充商股，成立股东会；总裁、副总裁不随财长进退，由股东会直接选举董监事，经财部加委。新则例经梁启超采纳后，呈准总统公布。年底，财政部补足官股500万元，续招商股达7，279，800元，商股超过了官股。1918年2月，召开第一届股东会，张当选为董事，蝉联副总裁。此后，中国银行经过1921年和1922年两次增加私人投资，资金达1976万元。然而，北洋政府却陆续将股票出卖，官股股额只剩下5万元，仅占该行资本总额的1/400。至此，中国银行基本上成为商办。

这时期，张嘉璈联合银行业，在戒备外国新银团垄断中国经济权益，以及支援铁路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还协助政府整理公债。1922年，他出席北洋政府召开的全国财政讨论会，担任全国财政协商委员会委员。翌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张嘉璈与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接到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关于北伐形势的报告，又经冯往广东实地考察，认定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为与北伐军方面取得联系，保护中国银行在南方的产业，决定由张回沪成立副总裁驻沪办公处。他回沪后，立即与政学系的黄郛、张群等

人密切交往，多次秘密对广东国民政府予以经济上的接济。“四一二”政变前夕，又为蒋介石提供政变经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亲临张宅致谢。张大为感动，认为蒋“能礼贤下士”，“具有领袖的风范”[(2)]。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继续给蒋政权以经济支持。为了既能给蒋政权提供大量军费，又避免因滥发钞票造成币制混乱和通货膨胀，他与钱新之等人极力怂恿蒋介石大量发行公债。由于政府发行的公债普通年息为六厘，收受价格大大低于票面，银行业从代发公债中可大获其利。

中国银行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便企图予以兼并。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张嘉璈提出，将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增加官股，使之多于商股。这与张多年来努力建立独立的商业银行的愿望截然相反。他力主由政府另立中央银行，表示愿由中国银行分担其股本，并要求改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根基未固，还需要利用张嘉璈统驭江浙资产阶级供给军费，宋只好另立中央银行。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重订中国银行条例，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由财政部加入官股500万元，董事长由政府委派，改总裁制为总经理制。这个条例，为日后国民党政府兼并打下了一个楔子。

中国银行条例重订后，张嘉璈出任总经理，以为从此可以放手发展商业银行业务了。1929年5月，张赴欧美及日本考察近代银行制度，选聘外国银行专家，在伦敦、大阪、纽约等地设立中国银行分支机构，有的地方则委托当地银行代理中国银行国际汇兑。1930年底，中国银行国外直接通汇城市62处，特约代理96家。张回国后，即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革，每年考选国内外大学经济、银行专业毕业生入行，并给予一定的职位和较好的待遇。授命留英经济学家刘攻芸负责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发行准备金接受公开检查；大力调整机构，先后成立国外部和信托部；又建立经济研究室，聘任英国专家主持，由其弟张嘉铸、弟媳张肖梅协助掌管经济情报，发行《中行月刊》、《金融统计月报》等。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银行业务起了重

要作用，营业额在同业中一直领先。1928至1931年，中国银行存放款额均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存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但由于连年内战，财政支绌，公债发行激增，中国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逐年增多，资金运用无法往专业化方向转移，只能从承销政府公债中得到畸形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嘉璈正在大连视察行务，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清查张学良有无银行股本及存款为由，将中国银行沈阳分行封闭。张立即赶往沈阳，向日本宪兵司令部疏通，始得启封营业。翌年“一二八”沪战时，上海市商会为抗议日军侵略，宣告罢市。张嘉璈与李铭策划银行业首先开市。3月，日本导演的伪满洲国出笼，国民党政府失掉东北关、盐两税的大宗收入，财政更加支绌。张与李铭等人顺从国民党政府的旨意，制定公债展期还本、减低利息的办法，帮助国民党政府解决财经困难。年底，张赶往曼谷、新加坡等地调查侨汇。

虽然张嘉璈致力于发展中国银行业务，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很大的支援，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银行觊觎之心从来没有放弃。1935年，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巨额内战经费无法筹措。财政部长孔祥熙组织财政顾问委员会，聘张嘉璈任副主席，想继续借助他率领金融资产阶级给政府垫款。此时，张对蒋介石无止境的内战耗费，不愿再冒险给钱了。他一再向孔祥熙要求，减少银行对政府的垫款，反对拿银行当国库。孔祥熙见张难以驾驭，遂决定夺取中国银行。3月中旬，孔与宋子文往武汉同蒋介石密谋，决定以“救济金融”为名，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以其中2000万元增加中国银行官股（后改为1500万元，连原有官股共2000万元，与商股相等）；改中国银行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调张嘉璈任没有实权的中央银行副总裁。3月28日，财政部训令下达后，张悲愤交集，立即召开董事会。各董事对国民党政府的卑劣做法强烈不满，要求张向政府提出质问。张以不愿与政府相抗而拒绝，并宣告辞职，要求各董事谅

解。由于南京政府的压力，30日董事会被迫通过执行财政部训令，这样国民党政府以一纸金融公债，就把中国银行攫夺而去。张愤不就中央银行副总裁职，要求出国考察，但在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下未能成行，并于年底俯首就任了铁道部长。

张嘉璈任职中国银行时，曾对铁道建设表现过很大的兴趣。上任后，立即作出三年内修筑三千七百多英里新路的计划。1936年1月，修筑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发行2700万元铁路建设公债。一月后，续发1.2亿元修筑湘黔路株洲至贵阳线。他又极力引进外资，与中法工商银行签订成渝路借款，与中英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他得悉英国有大量投资的可能，旋即拟定1937年至1941年五年筑路五千英里的计划。迄抗战时止，先后借外债（材料借款在外）约三千多万英镑[(3)]，均以我国重要财政收入作担保，大部分借款规定只能向债权国购买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嘉璈首先拟定修筑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越一年完成二百多英里，对抗战运输起了一定的作用。复拟将此路向越南边境展筑，后因日军袭击中止。1938年初，铁道部并属交通部，张任交通部长。他打算修筑西北铁路经新疆达苏联，由于物力财力不足和苏方不予支持，未能实现。修筑滇缅路的计划，也由于英国对远东政策举棋不定而屡遭顿挫；后虽得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兴工，又因缅甸陷落，半途而止。自“七七”事变至1942年底止，总共完成新路仅一千英里[(4)]。由于蒋介石任命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担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张不愿与其共事，遂于1943年1月以健康不佳辞交通部长职。9月，赴美国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著《中国铁道建设》在美出版。翌年10月，出席在美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陈光甫、李铭等人同美国资本家进行战后合办企业的商谈，筹建了中国投资公司，张任董事。该公司1945年8月20日在纽约开业，从事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等业务。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东北胜利果实，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东北行营（后改称东北行辕），下设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任命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长路理事长，电令张立即回国。9月中，他回国抵重庆，经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后，10月偕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到长春。立即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接收事宜，经四次谈判未得结果。11月，熊返重庆，张负责与苏方继续谈判，取得苏方同意，派员接收了中长路沿线各重要城市，将大批伪军收编为警察大队，用以阻挡中共的部队。经委会还设立庞大的机构，留用大批日本侵略者充作顾问。又发行半独立的东北流通券，收回伪币及苏军发行的红军票。他故意不宣布兑换截止期，然后突然停兑，使红军票回流解放区抢购物资。这件事被国民党当局吹嘘为张嘉璈对共产党经济战的胜利。后来蒋介石扩大内战军费浩繁，流通券发行激增，东北人民深受其贬值之苦，而张则协助与支持张嘉铸所控制的中国植物油公司，乘东北大豆即将实行统购之机，大量抢购大豆外销，获取巨额外汇。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成为主要内战战场，张嘉璈在东北已无可作为。蒋介石想借助张的理财能力挽救经济危机，11月3日电召他到南京。此时蒋介石集团正在筹备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拉拢民社、青年两党参加，破坏民主统一战线。张立即到沪，力促其兄张君劢背叛“民盟”，参加伪国大。翌年4月，政学系张群出任行政院长。而张嘉璈则先于3月1日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上任时正值“黄金潮”[(5)]后，通货膨胀加剧，军事垫款激增，他仍然想用发行公债的办法遏止法币发行量的增加。3月28日，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三十六年短期库券及美金公债条例，库券定额3亿美元，公债定额1亿美元，并为此成立募销委员会。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债信已失，虽以扩大贴放作招徕，除少数较大的行庄被迫认购少量外，中小资产阶级则强烈抵制。至8月，仅售出总额的1/6，不得不停止发售，国民党政府举内债的目的宣告破产。7月，美国特使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来华，国民党政府又寄最大希望于美援，由张嘉璈、王云五等组织专门委员会接待，并由他拟定一个币制

改革方案，要求美国贷给美元作发行基金。由于美国当时不敢公开给予这笔巨额贷款，打算落空。此时法币贬值加速，带来黄金、美钞和物价的狂涨。国民党政府欲获取外汇与减少外汇支出，缓和物价，于8月17日公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修正案和进出口贸易办法修正案，设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前者由陈光甫主持，后者由张任主任委员。随后又开征建国特捐，要国人限期申报在外资产，并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等措施。这些措施并不能挽回恶性通货膨胀的继续发展，物价继续狂涨，货币不断贬值濒临崩溃。这时，CC派起而攻之。1948年5月，张嘉璈随同张群一同辞职。政学系的“两张财权”宣告结束。张辞职前，曾谋求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没有成功，而且连中央信托局也被CC派夺走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欺骗性的和平文告后“引退”，代总统李宗仁邀张嘉璈到南京，以财政部长相委。他预感到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没有接受。是年5月移居澳大利亚悉尼，研究总结中国通货膨胀的教训，着手撰写英文《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一书[(6)]。1953年9月，张应美国洛杉矶洛亚拉大学之聘赴美，主讲中国、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史。1961年辞洛亚拉大学教职，参加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1974年为美国陆军部撰《中共经济潜力之研究》。另外还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工业产品价格方面的论文。美国圣约翰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庆应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

1979年10月15日张病故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

---

(1) 《张公权自述往事答客问》，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2、4期。

(2) 《张公权自述往事答客问》，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2、4期。

(3) 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绪言，杨湘年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

版。

(4) 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绪言，杨湘年译。

(5) “黄金潮”发生在1947年2月上旬。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的失败，纸币发行猛增，大量来自东北、平津的游资集中上海，抢购黄金、外币，引起黄金、外币狂涨。1月底沪市金价尚在四百万（十两）之内，2月1日起突破四百万，随之急剧上升。2月10日，中央银行宣布停止对金号配售黄金，沪市金价最高达七百二十万。11日，猛涨到九百六十万。其他物价亦随之狂涨。

(6) 是书于1955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代为出版。

张謇

朱信泉

张謇，字季直，号嗇庵，江苏南通人。我国近代知名实业家、教育家。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张五岁入塾，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外出谋生，初给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当书记。1876年去浦口，在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办理公文，1880年随军移驻山东登州（今蓬莱）。1881年袁世凯投庆军，张謇与袁相识，并为袁修改过文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庆军开赴朝鲜，因办事干练，受到朝鲜国王和吴长庆的赞誉。张謇曾代吴长庆草拟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条陈，受到当时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龢的赞许，但被北洋大臣李鸿章斥为“多事”。1884年5月吴长庆归国，不久病故。张謇离开庆军。

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在此后的十年中，他除四次赴京参加会试，一度应孙云锦邀请参加开封府幕外，主要掌教于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崇明瀛州书院。中法战争后，张謇鉴于“国势日蹙”，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有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1)]。

1894年4月，张謇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边疆紧急，张曾上疏痛劾李鸿章奉行妥协政策，“战不备，败和局”[(2)]。张謇目睹国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为谋，虽科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而另走兴办实业和教育的新路，“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3)]。

1895年初，张謇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海门地区主办了几个月的团练。同年4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的条文。为了在外资输入前抢先一步，张之洞要求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不久张之洞调职，张謇又得到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

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自1896年9月在通州唐家闸规划厂基，到1899年5月纱厂建成，其中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筹集资金不易，有钱人对于把大宗款项交给一个书生去办厂，心怀疑虑。加之当时上海棉纱市场萧条，为纱厂集股尤难。其次，通州和上海的董事之间，在是否领用官款买来的机器和承担投资份额上意见相左，结果上海的董事退出。再次是工厂短缺周转资金，刚投产就面临关厂的威胁；想把工厂出租，又遭到商人的压价。但这些困难经过张謇等人的努力都一一克服了。

大生纱厂1899年5月建成时，有原始资本445，100两，纱锭20，400枚。投产后，在较短期内，就经受住了洋货和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这是因为通州地区具有产棉旺、销纱多、运费省、工资廉等有利条件。张謇正是凭借这些条件使大生厂的利润常比他厂为高。为了增加利润，张謇等人对改进经营管理也很注意。

1904年，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和续招新股，增加资本63万两，增加纱锭20，400枚。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市）办了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000枚。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厂共获净利约540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200万两和纱锭67，000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4)]。

为了使大生厂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创办了其他企业。为增加棉花来源，1900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籽出路，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4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了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1906年

办了资生铁冶厂等等。

张謇为实现以实业所得兴办教育和用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他用大生纱厂的小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在本地举办一些教育文化事业。1902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后来又办了女师、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还创办了十多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为有名，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又合并为南通大学。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龙门师范，扬州两淮两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此外又在通州创办了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盲哑学校、伶工学社、剧场、公园和医院等。张謇由于举办实业和教育，在社会上曾博得广泛的赞誉并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4年，清政府赏他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11年，学部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

在政治上，张謇是从封建绅商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19世纪末，当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时，张謇正埋头建厂，1895年虽列名强学会，但对康的变法活动不尽以为然，认为“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5)]。对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张謇害怕动乱扩大到南方，说“揭竿之徒，在所可虑”，“东南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资，诚不可不为之早计也”，极力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加“东南互保”[(6)]。

在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中，张謇居于重要地位。立宪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浪潮，并借以限制封建顽固势力，制造一个比较适合他们所需要的政权的一次政治运动。1901年，张謇响应清廷“更新”诏令，著《变法平议》。1904年5月，替张之洞、魏光焘起草《拟请立宪奏稿》。同年7月刻印《日本宪法》，分送达官贵人以至北京内廷，向清统治者游说，乞求变法立宪。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张謇兴高采烈地和江苏、浙江、福建的立宪派汤寿潜、郑孝胥等人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副会长，进行

所谓开通绅民政治知识的宣传。1909年9月，江苏谘议局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他率先发起各省谘议局代表去北京联合请愿，要求清政府在1911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活动达到高潮。1910年1月和6月，各省谘议局和各界的代表曾两次联合到北京上书，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同年10月的第三次请愿，虽然清政府表面答应缩短预备立宪期为五年和在国会召开前先成立责任内阁，但1911年4月清政府成立的责任内阁，却是以清皇室成员为主体，这就完全暴露了统治者借立宪为名来加强皇族专制的图谋。张謇目睹这一情况，也不得不指责清政府“举措乖张”，使“全国为之解体”[(7)]。立宪运动的破产，促使张謇另作打算。为了窥测政情，1911年6月张謇去京，中途特意去彰德和袁世凯见面，密商如何应付政局的变化[(8)]。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前一周，张謇正为所租赁的大维纱厂开工一事滞留汉口。事变当日他乘“襄阳号”东下，途中得知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13日抵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总督张人骏派兵“亟援鄂”并“奏请速颁决行宪法谕旨”，但张人骏“大诋立宪，不援鄂”[(9)]。不到一月工夫，十四省相继宣告独立，清朝大势已去，张謇赶忙发表若干通文章函电，转而“拥护”共和。同年11月，江苏省谘议局改为省临时议会，张謇被推为议长。12月，应江苏都督程德全邀请，担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邀张担任实业部总长，但他却疏远孙中山而倾心于北洋军首领袁世凯，认为“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不久借口反对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而去职[(10)]。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会于上海的南、北双方代表已开始举行和议，其后持续进行。和议期间，张謇为袁世凯谋划奔走，通风报信，帮助袁窃取革命果实。当他获得南方将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选袁为总统的消息后，立即密电给袁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11)]

1913年9月，张謇当上北洋政府以熊希龄为首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他想通过这个政权来

改良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他就职时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任内制订了二十多种农林、工商和矿业方面的法令。但面临的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凯公然要恢复帝制，张謇才辞职南归[12]。

张謇回到南通，继续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企业也获得短暂的发展。他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及续招新股和向银行钱庄大量借款，加速扩充企业。到大生副厂于1924年建成时，大生已发展为四个纺织厂，资本增加到900万两；纱锭15.5万枚，约占当时全国华资纱厂总锭数百分之七强；布机1580余台。在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二十个盐垦公司，计圈地413.5万亩（已垦地98万亩），资本估计约为2000万元。根据1921年一个调查材料，张謇所经营的各企业的总资本约为3400万元[13]。

可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好景不长。1920年至1922年各盐垦公司连续遭灾，使主要投资者大生纱厂负债愈重。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因而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了争取企业的生存，张謇一再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只能是与虎谋皮的幻想。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负债一千余万元。同年，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正如历史所证明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绝不会让民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

大生集团受挫之后，张謇虽曾有“失败不要紧，第一要失败得光明，第二要失败后有办法，决心再来打一个败仗后的反攻，不要馁，不要退”的打算[14]，但这个决心未及实现，张謇就在1926年8月24日因病在南通逝世。

(1)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4页。

(2)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第37页。

(3)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第82页。

(4) 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7页。

(5)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第45页。

(6)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第50页。

(7)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第66页。

(8)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第70页。

(10) 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4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5页。

(11) 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4卷，第1页。

(12) 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9卷，第19页。

(13) ［日］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油印本，第38页。

(14)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第387页。

张景惠

赵长碧　张欣

张景惠，字叙五，辽宁台安人。1871年6月21日（清同治十年五月初四）生。家道小康，曾读过两年私塾。少年时从其父张福生、兄张景全学做豆腐，以维持生计。长大后，自觉卖豆腐不如聚赌来钱快，开始经常出入于赌博场所，并在此间结交了一些行抢作案的不良分子。日久天长，在当地也有了些名声。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夺中国，1900年爆发了反抗外来入侵的义和团运动。是年春夏之交，英、美、俄等八国联军借口清政府“排外”镇压义和团，其中，帝俄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人，分六路侵占东北三省，清政府在东三省的统治陷于瘫痪。一时间东三省地方不靖，盗匪蜂起。一些地方豪绅、商贾便纷纷组织“自卫团”、“保安队”等地方武装以保护各自的利益。此时，张景惠便乘机在家乡八角台（今台安县城）拉起“大排”，按地亩抽饷，成立保险队，自任队长。从此，他名声益大。

1901年初，张作霖在黑山县一带因扩充地盘与金寿山发生冲突，被金寿山偷袭，仓皇逃窜，欲投奔当时在海城一带的冯麟阁，以图东山再起。行至八角台时，张景惠和地方豪绅盛情款待并执意挽留张作霖，张景惠还让出首领位置，推举张作霖为八角台的团练长，自己甘当副手，从此张景惠与张作霖结成更有力的团伙。

1902年10月，张景惠随张作霖被新民知府增韫招抚收编。翌年初，新民巡防游击队成立，下设一营，张作霖为管带，张景惠与张作相、汤玉麟同为哨官。8月，清政府对地方军进行整编，张作霖被委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被提升为帮带。1908年，张作霖

因剿匪有功，晋升为奉天八路巡防营前路统领，张景惠亦被提升为帮统，随后不久，他们一同奉命移驻郑家屯。1910年，张景惠与张作相、汤玉麟一同入奉天讲武堂受训。临行前，张景惠接受张作霖密托：注意收集省城军政动态和时事情况，如有变化，随时报告。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榕、蓝天蔚等新军将领拟策动奉天独立。张景惠闻讯急报远在郑家屯的张作霖，请急速带人来奉。此时奉天总督赵尔巽已知新军靠不住，也命张作霖率兵入省城拱卫。11月12日，奉天谘议局邀集各方面代表人物开会，张榕等欲在会上迫使赵尔巽响应革命，宣布东三省独立。此时，张景惠带人随张作霖将会场包围，以武力相胁，赵尔巽趁机成立了装点门面的“奉天国民保安会”，张景惠则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跟随张作霖大开杀戒，血腥镇压奉天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1912年9月，张作霖被赵尔巽保荐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驻防沈阳，张景惠也当上了该师的团长。1917年5月，他又接替被撤职的汤玉麟，出任第五十三旅旅长。

1916年4月，值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行将失败之际，张作霖与冯玉麟设计逼走当时的奉天督军段芝贵，夺得了督理奉天军务大权。1918年2月，皖系徐树铮为拉拢奉系与杨宇霆密谋，将直系军阀冯国璋从日本购置的一大批军火在秦皇岛港交货时予以劫夺。当张作霖派张景惠、丁超率两营人马到达秦皇岛后，一面与冯国璋所派领取军械人员聚赌、饮酒，一面窥视动静，伺机行动。待日方人员将军械点交完毕装上火车后，张景惠突然将军队布开，威逼火车调头开往沈阳，使这批有三万多件的军械全部落入奉军之手[(1)]。事后，北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奉军不予置理，却用这批枪械大肆扩军，先后增编七个混成旅，实力骤增，张景惠也由此当上了暂编奉军第一师师长。其时，张作霖支持段祺瑞的统一政策，派兵南下援湘，设奉军总司令部于天津，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而徐则私自募兵四旅，被张景惠告密，引起张作霖不满，徐被迫于同年9月引咎辞职，由孙烈

臣继任副司令。1919年7月，孙烈臣调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张景惠继任奉军副司令。1920年9月，张景惠被任命为察哈尔都统兼第十六师师长，常住北京。

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前，张景惠由于曾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结拜为盟兄弟，与张作相同持对直主和的态度，但未能阻止张作霖主战的决心。战争爆发后，身为奉军西路总司令的张景惠战无决心，行动迟缓，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才从北京出发，赴长辛店前线司令部指挥作战。由于他指挥不力，致使西线奉军迅速溃败，整个奉军受其影响，很快便输掉了这场战争。战败后，张景惠未随张作霖退回东北，仍寓居北京，并被曹锟任命为新设的全国国道局督办，在北洋政府中依然位列高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经过激战，奉军大获全胜，张作霖拥兵入关，控制了北京政权。此时，张景惠惊慌异常，恳请张作相、吴俊陞为其向张作霖求情，以修旧好。张作霖因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又念其旧情，两人“遂消释前恨，和好如初”[(2)]。1927年1月，张景惠被任命为顾维钧内阁的陆军总长。同年6月，张作霖自任北京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景惠改任潘复内阁的实业总长。翌年6月，由于奉军在南方的战事接连受挫，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张作霖不得不从北京退回东北。6月3日，张景惠随同张作霖同车返奉，次日专车行至皇姑屯被炸，张作霖与吴俊陞当场身亡，张景惠身受重伤[(3)]。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被众人拥戴于7月4日在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19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张学良被公推为委员长，张景惠为委员；同时张景惠被任命为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常驻哈尔滨。1928年年底，张学良不顾日方的强烈反对与百般阻挠，毅然“易帜”，形成南北统一局面。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景惠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张原拟于秋后往南京就职，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也就此走上了投敌卖国的道路。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收买清军和土匪为其效劳，张景惠就曾把日军的密探安插在自己的队伍里，打入到俄军占领区，进行收集情报的活动。有时，他还亲自带领部队为日军运送军火，到俄军后方骚扰，割电线、毁铁路、烧仓库等[(4)]。以后，张景惠与日本的军政官员时有往来，深得日本人的信任，被视为“对日本人的惟一理解者”[(5)]。在张学良“易帜”前后，张景惠曾多次秉承日本人旨意，规劝张学良与日方搞好关系，惟日本人之命是从，因而被张学良疏远。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策划傀儡政权，千方百计在东北寻找代理人，张景惠便成为他们的理想人选。事变后他曾表示：“日本侵略东北不怨日本人，都怨张学良把日本悬案推给蒋介石，日本人要求解决，他却置之不理，日本人没法子才这样做；我们要与日本人合作才行。”[(6)] 9月22日，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四天，张景惠在沈阳秘密会见了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向板垣表示了投降之意，并要求日方提供武器以扩充警察部队，策应日军进占哈尔滨。板垣要求张景惠速回哈尔滨，维持地方治安，保护日本侨民，答应供给他武器，伺机宣布“独立”。次日，张景惠便同板垣所派的顾问新井宗治一同回到了哈尔滨。随后，张景惠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领取到2000支步枪和大批子弹，成立了拥有三千多人的特区警备队。9月27日，宣布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张景惠自任会长。28日，张发出通电，发表“独立宣言”，声明脱离国民政府，并在他的政府中任命了一批亲日分子。此后，板垣通过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秘书官板本与张景惠多次密谈，达成了由张景惠组织东北政府，脱离中国，实行自治，凡事同日本交涉和有关铁路权益等协议。张景惠成为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汉奸。

11月中旬，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任命张景惠为黑龙江省主席。但由于黑省人民抗日情绪高涨，马占山的部队仍在海伦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张景惠迟迟不敢到齐齐哈尔就任，便与日军密谋诱逼马占

山就范的对策。从12月初开始，张景惠便紧密配合日军，向马占山展开了大规模的诱逼攻势，迫使马一度就范。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一面发动军事进攻，一面加紧制造傀儡政权，导演“建国运动”。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后，关东军司令部便召开“建国幕僚会议”，策划建立伪国的方案。2月12日，板垣赴哈尔滨，与张景惠商讨定于2月16日在沈阳召开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会议，并诱逼马占山参加此会。当日晚6时，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由日本人监视的“建国会议”，也称“四巨头（指张景惠、熙洽、臧士毅、马占山）会议”。次日午后，在张景惠的住宅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按照关东军事先拟订的方案，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被指定为委员长。18日，由张景惠领衔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包括热河）及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通电中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省区完全独立。”(7)

2月19日至24日，“建国会议”继续召开，25日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由关东军司令部“建国幕僚会议”最后决定的关于建立“新国家”的方案。日本侵略者决定扶植废帝溥仪上台。3月6日，张景惠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作为“迎驾”代表赴汤岗子“恭迎”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8日，张景惠陪同溥仪到达长春。10日，张景惠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9月，张任伪满军政部总长。从此，他在关东军操纵下领着十余万伪军，帮助打击原东北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完成“武力统一”，迅速占领东北四省。

1934年3月1日，伪满改称帝国，溥仪重新“登基”为“皇帝”，张景惠擢升为伪军政部大臣。1935年5月21日，秉承关东军的意旨，溥仪免去郑孝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的职务，任命张景惠为“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惟关东军之命是从，深得日本主子的信赖和赞赏。一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大讲“日满一心一德”，临张景惠讲话时，他接过话头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

国是两只蚂冷（蜻蜓）拴在一根绳上。”此语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成为教训伪满官员的“警句”[8]。当时，日本在东北实行“拓殖移民”政策，需要在国务会议上通过法案。该法案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主权，遭到了包括一些伪满大臣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而张景惠却说：“满洲国土地多的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9]结果在他的主持下被通过。因为他的奴颜婢膝，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好总理”。

1940年9月28日，张景惠代表伪满洲国发表声明，支持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1941年12月，日本对英、美宣战后的第四天，他立即去关东军司令部和海军武官府拜访，表示伪满政府决心与日本一道进行太平洋“圣战”，并祝贺日本取得“赫赫”战果。1942年3月，为庆祝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他率领十六人作为“谢恩使节”，亲赴东京，拜谢日本天皇。1943年4月1日，日本首相兼参谋总长东条英机来东北“视察”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张景惠则卑躬屈膝，极力逢迎，对东条英机提出的各种苛求都一一作了使其满意的回答，把东北的大批物资拱手奉送给日本远征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强大力量的压迫下，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此前四天，张景惠随溥仪于8月11日逃到吉林省通化市。后又奉命返回长春，匆忙拼凑“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国民党部队前来接收。但苏军很快攻占长春，他被苏军押送至苏联，关进监狱。1950年，张景惠被引渡回国移入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5月因心脏病死于狱中。

---

(1) 王毅夫：《张景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1985年版，第179页。

(2) 王毅夫：《张景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1985年版，第181页。

(3) 金名世：《张景惠与奉派首领张作霖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4) 锡光：《张景惠其人其事》，《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第209页。

(5) 张玉芝：《“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景惠》，东北三省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2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6) 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5页。

(7) 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8)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页。

(9)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47页。

张静江

沈荆唐

张静江，名人杰，谱名增澄，字静江，浙江吴兴人。1877年9月19日（清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生。其祖父张颂贤，以经营丝、盐起家，在杭、嘉、湖及上海等地均有资产。父亲张定甫，继承祖业，为当地巨富。张静江年轻时得当地名师授业，课读诗书，但不愿受科举之苦。自十九岁起患骨痛症而行走不便，并因眼疾而视力受损。二十岁时他父亲以十万银两为他捐得江苏候补道衔。他在家以书法、绘画自娱，并爱好文物古董的鉴赏。

1902年，张静江随同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至巴黎，任公使馆商务随员。他考察法国市场，发现中国货物很受欢迎，但均为日商垄断，乃决意集股创办一个公司以发展中国对法贸易。翌年，张回国招股集资，但国内无人肯冒险投资。后来其父出资三十万银两，支持他在巴黎开办独资经营的通运公司。张看准市场需要，以经营文物古玩为主，兼营丝、茶、绸缎，获利颇丰；不久便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扩大经营。

张静江在国外任职、营商的同时，对近代西方新思潮颇感兴趣，尤其崇尚法国盛行的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深感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窳败，乃倡言反清革命，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自诩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但张是一名清政府驻法公使馆的官员，许多人怀疑他居心叵测设计陷害人而不敢与他交往，有的人还误认为他是奸细而要打他。他虽然苦恼，但热忱不减。他与旅法的吴稚晖、李煜瀛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纪》周报、大型美术画报《世界》，出版《新世纪丛书》，鼓吹无政府主义。在这些书刊中，广泛介绍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壮举，抨

击清王朝封建制度的陋弊，号召进行社会革命。这些言论与当时同盟会《民报》的主张相呼应，在海内外影响甚广。

1906年春，张静江在一次旅途中偶遇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即倾心表白自己“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1)]；还对孙说，如革命事业有需要，愿悉力相助。他当即留下通讯地址，相约通电暗号：A为一万元，B为两万元……孙中山对此颇感惊奇。翌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经费窘迫，筹款无着，孙中山向张试发一电，只写“C”字。张接电后即汇出三万法郎，使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大感意外。1908年3月，孙为筹集广东和云南起义的经费，又先后以“A”和“E”电张，张即汇出一万法郎和五万法郎。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张，详述起义受挫及款项开支情况，张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2)] 此后，张继续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拨助巨款，包括资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吁报》等。尽管通运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张仍慷慨捐助不辍。

张静江对于孙中山创立的革命政党“同盟会”表示拥护，先于1906年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惟未举行入盟仪式。翌年6月在香港养病时，同盟会香港分会负责人胡汉民、冯自由请他补行入盟手续。张看到盟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即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3)] 张于是履行了入盟手续，成为同盟会正式成员。

辛亥革命起，张静江正值回国之时，即在上海寓所支持陈其美等人在苏、浙各地发动起义，并资助东北革命党人蓝天蔚等在上海购买枪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提请张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张坚辞不就，只是捐献巨款给临时政府充作军饷。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也积极支持，在陈其美率军进攻江南制造局时，还亲赴前线激励将士。“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掩护革命党人疏散逃

亡，一一给予川资和生活费。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他不顾意见分歧而坚决支持，并表示允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愿为革命继续效力。1920年，他与戴季陶等人主持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他一如既往地资助革命，颇受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人的尊重，被孙誉为“革命圣人”[(4)]，孙并题赠“丹心侠骨”。在实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是他对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不以为然，只是不便顶撞。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先后发生了廖仲恺被害事件、西山会议事件、中山舰事件等，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在这些事件中崛起。1926年3月，在上海的张静江闻悉蒋介石在一手发动的中山舰事件中，既打击了共产党人、驱逐了苏联顾问，又迫使汪精卫称病匿居不出，担心蒋处境不利，便不顾腿疾立即南下，为蒋进一步攫取领导权出谋划策。张与蒋早在十几年前结识于上海，相交甚笃。张静江对蒋能时加规劝、指点和资助，曾撮合蒋和陈洁如的婚事，使蒋常怀“敬惮之心”[(5)]，而视之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如今张静江到广州后，除赞赏蒋介石之所作所为“极称为天才”，还鼓励蒋进一步“止其（中共）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必可就绪”[(6)]。他们竟日密商反共计划，于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机关之部长”，等等。于是蒋介石得以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整理党务案》还决定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张静江被举任此职。7月6日，他以身患痼疾请辞主席职，改由蒋介石担任；但蒋率师北伐，主席一职又请张“代理”。张为蒋坐镇广州主持中央党部，支持组织部代部长陈果夫等反共。后来陈果夫回忆说，张居守中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7)]。

北伐战争未及半载即底定湘、鄂、赣、闽诸省，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广州迁往武汉，但蒋介石欲以南昌为首都，引发了一场迁都之争。张静江离粤北上后，即留在南昌拒去武汉，以支持蒋介石。他还与蒋谋划镇压工农民众运动，打击国民党左派。对于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拒不出席，而是随同蒋介石去了上海，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清党”反共。4月2日晚，张出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8)]，同陈果夫等人提出了《共产党联合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的议案[(9)]，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递交中央执行委员会”[(10)]。9日，张静江又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等发出“护党救国通电”。在上海与蒋介石发动清共反共政变作了周密部署后，张静江便于10日回到家乡吴兴南浔。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张静江出任浙江政治分会主席，继而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颇想在乡梓有所作为，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优先发展铁路为号召，兴建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又在全省修筑公路，发展交通事业；还筹建杭州电厂；开办全省电话通讯事业。1929年他发起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吸引全国工商界来参展、交流。但他好大喜功，资金匮乏，财政窘困，为应付各项建设需要，便巧立名目开征“建设特捐”、“建设附捐”、“土地测绘费”、“水利费”、“积谷”等等，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张静江主政浙江，以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兄长自居，遇事常好独断专行，对不合己意的官吏任意撤免，对南京政府的政策法令常常置之不理，就连蒋介石的意见也不放在眼里，以致四面树敌，日趋孤立。193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浙江省政府，张静江被“劝”辞职。

张静江早在1928年2月就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本想在各地兴建一些经济建设项目，但几个月后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交各部接管”[(11)]；加以蒋

介石倾力进行内战，财政支绌，无力投资重大建设项目，故张静江主持的这个建设委员会形同虚设。1931年11月，以宋子文为委员长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建设委员会更是有名无实。但是张静江说："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12] 他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淮南矿务局，组织开采淮河南岸九龙岗的煤炭；继后又设立淮南煤矿铁路工程处，拨款修筑田家庵至裕溪口的铁路（215公里）。他还发起成立商办江南铁路公司，修筑南京至芜湖再达宣城展至孙家埠的轻轨铁路。建设委员会还先后改建南京下关和常州戚墅堰发电厂。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兴办诸事，举步维艰。他意态消沉，身体也越来越弱，常对亲友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13]

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江南硝烟弥漫。张静江一时感到前景暗淡，便把建设委员会所属的淮南煤矿、下关电厂等几个公有企业擅自作价售予宋子文经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所得之款分发给建设委员会各部门员工作疏散用。此举舆论哗然，蒋介石亦恼怒不止，决定撤销建设委员会。张静江则携眷乘轮离沪先至香港，翌年8月赴欧，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

张静江自1932年起吃斋，1936年起念佛。他的足疾发展到瘫痪不起，后又双目失明。虽然他仍被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蒋介石当总统时还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但是实际上他早已在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逝。蒋介石在台北为他举行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以示悼念。

---

(1)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革命逸史》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页。

(2) 杨恺龄：《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

(3)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革命逸史》第2辑，第212页。

(4)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革命逸史》第2辑，第212页。

(5)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二），1936年版，第43页。

(6) 陈果夫：《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纪念张静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1月5日。

(7) 陈果夫：《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纪念张静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1月5日。

(8)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选出中央监察委员十二名、候补监察委员八名，共二十名。出席此次“全体会议”的只有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和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黄绍竑共八人。

(9) 张素贞：《毁家爱国一奇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10)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36—137页。

(11)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文件（1928年8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 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页。

(13) 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92页。

张敬尧

范春荣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邱人。生于1880年9月2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十七日）。父亲名文奎，号益轩，读过几年书，后举家迁至颍上县南照集，做颍上县衙门包揽诉讼的“刀笔吏”。张敬尧少年时只略识字，因无钱上学，到粮食店当学徒。他“事游荡、嗜烟赌”[(1)]，后因偷盗被乡人驱逐出境，流落到山东为盗，又因杀人逃到天津。

1896年前后，张敬尧投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不久，他被选进随营学堂（即北洋武备学堂），受训后回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后又在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在1911年时他任职第六镇十一协二十二标标统，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昌、汉阳，清廷命袁世凯派军援鄂，其中就有张敬尧部，张率部攻下汉阳龟山。1912年秋，陆军镇、协、标等名称改为师、旅、团，张敬尧任第六师十一旅二十二团团长[(2)]。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又调张敬尧部攻打南方革命军，张部率先从湖口进入江西，立了头功，升任第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随着北洋军阀势力的膨胀，张敬尧也官运亨通，成了袁世凯手下一名战将，1914年3月，张敬尧任第三混成旅旅长，调驻河南。

1914年，张敬尧同刘镇华、张锡元、赵倜各部围攻白朗起义军，大大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8月初，张敬尧与白朗率领的数百人在鲁山石庄激战，白朗阵亡，起义军遭到失败。张敬尧自恃“讨狼”有功，向河南督军赵倜“索赏”十万元未遂。袁世凯为安抚张敬尧，于同年9月将张的第三混成旅扩编为第七师，令张敬尧任师长，并给该师头等装备和甲级开支。当时袁世凯想当皇帝，正密谋复辟帝制，为进一步控制军权，采用长子袁克定的建议，于1914年10月成立了军官教导

团式的“模范团”，从北洋各师中抽调下级军官为士兵，中、高级军官为下级军官，每期半年，一年培训两个师的军官。张敬尧为该团的办事员之一。1915年8月24日，“筹安会”成立的次日，张敬尧与北洋军警要人袁乃宽等共四十四人发起“军警大会”，通电响应复辟帝制。

袁世凯公开称帝后，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反对。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通电讨袁，组成护国军。次年蔡锷率第一军出兵入川。1916年1月，袁世凯命令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率第三师、第七师、第八师以及第六师由东路入川进驻重庆，随即向云南进兵，攻打护国军。张敬尧率部赶至泸州，攻占兰田坝，7月，攻占纳溪、江安等地，袁为表彰其战功，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但是，在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洋军迅遭失败。3月17日，护国军收复江安、纳溪等县，张敬尧负伤，败回泸州。6月6日，袁世凯死去。不久，张敬尧回防河南洛阳。他野心勃勃，想取代河南督军赵倜的地位，因无机可乘，便把目标转向山西。1917年6月下旬，张敬尧制造了一起以驱逐阎锡山为目的的“晋南事变”，谋进兵山西，为北京所制止。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张敬尧附皖系。1917年7月，张勋复辟垮台后，北京政府再次为皖系首领段祺瑞控制。7月26日，段特派张敬尧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3)]。在督办任内，张招抚不少土匪头目充当下属军官，其中有个毛思忠，被他收为“假子”，改名张继忠，后来张敬尧入湘时，此人任张部第七师混成旅第五团团长。这个团的纪律极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湖南人民称之为“烂五团”。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领导“护法战争”时期，段祺瑞力主对南方用兵，于1918年1月30日下达对西南“局部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率军南下，特任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进兵湖南。3月2日，张敬尧率第七师抵湖北通城，旋攻占湖南平江，准备配合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会攻岳阳、长沙。不久，湖南大部分被北洋

军张敬尧、吴佩孚、冯玉祥等部占领。3月27日，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4)]，而把拥有战功的吴佩孚、冯玉祥撇在一边，这使吴、冯大为不满。由于护法战争中广西军阀陆荣廷排挤孙中山的领导，护法军政府解体，南北军阀酝酿议和。6月和8月，吴佩孚、冯玉祥先后在衡阳和常德前线与南军单独划界停战，不服从段祺瑞的主战命令。一时湖南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张敬尧名义上是“湘督”，实际上只能统治长沙、岳阳一带，吴佩孚统治衡阳一带，冯玉祥统治湘西一带，湖南彬永地区则为原湖南督军谭延闿所据，湘西大部分地区又为当地军人盘踞。湖南人民在大小军阀们的统治下，备受兵燹之苦。特别是张敬尧部，他将其弟张敬汤一旅扩充为一师驻防省城，将他义子张继忠的第五团驻防新化，他们横行无忌，抑又加甚，湖南人民痛恨张敬尧，称“张督”为“张毒”。

张敬尧督湘两年期间，肆虐百姓、进行欺压搜刮种种罪行，笔不胜书，列举如下：

（一）纵兵殃民：张的士兵无法无天，白日持刀入室抢劫，强奸妇女，或勒买货物，或强行向私人借款等暴行屡有发生。张反以维持秩序为名，强令商民供军费百万，勒逼盐商报效费20万，又令商会抵押公债费40万。

（二）摧残教育：张将湖南教育经费由80万减为50万，以充作军费。学校欠债过多，校长逃亡在外。他令部下长期占据学校，学生上课无教室，学校停止招生。七个月不给教员发薪，以至枵腹难忍，全体罢课。

（三）勒种鸦片：张取消鸦片种植禁令。私运鸦片种子，搞投机买卖，上至督军，下至走卒，无一不有烟癖，贩卖多属军人，烟馆遍于城市。

（四）包办选举：张不顾全省人民的反对，把省教育会、省议会

的正、副会长，均改由“筹安会”余孽担任。对省工会、农会、商会无不加以改选，其弟张敬汤任省工会名誉会长，使这些合法社团成为安福系在湖南的分支机构。

（五）搜刮民财：张通过滥发纸币、私设银行、强发惠民彩票等金融手段，使湖南银行百余万两的新旧纸票都成废品，致使人民破产，流离失所。同时征收多如牛毛的各种捐税，提用盐税二百万，令其胞弟任转运督办，私运米、盐，从中渔利。

（六）拍卖公产：张向私商拍卖沅江官田一万二千余亩，价二十万。拍卖湖南银行房产、矿务局所管的宁乡田产及汶口地皮，以及湘吉轮船、南学会书籍等公产。

（七）亲日媚外：1919年，张向英国银公司借款3000万元，以湖南全省未开采的矿产作抵押，已经商订合约，后经各报披露，农商部严诘，未成。11月把湖南第一纱厂抵给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借日金150万元。12月又把湖南最大的水口山锌矿，以矿内锌砂价值作股抵卖给美国公司，在进行中遭全国人民反对，未成。张还将马路抵押给日本，得价200万元。他命令各县派军米，然后私设碾米公司，私运粮米往天津、上海，接济日本，获利尽归私囊。

据统计，张在湘督任内，仅霍邱老家就购置田地三万余亩[(5)]。在天津有一千多顷水田，在颍上又添了三百多顷好地。张家看中谁家的田，就强买恶买，因此在霍邱一带，只要提起“桑营孜”张将军府，无不谈虎色变的。张敬尧兄弟四人（敬尧、敬舜、敬禹、敬汤）仗着督军的权势，穷凶极恶，深遭湖南人民痛恨，当时湖南人民中流传一首歌谣：“堂堂乎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6)]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出卖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次划时代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影响到国内外。长沙学生也立即走上街头，组织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张敬

尧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诬蔑学生是“过激党”，抓到警署拘禁。为了讨好日本，张敬尧以督军兼省长身份发出布告，不许学生“妄干政治”，严禁抗日运动，不准罢课。为了钳制舆论，他下令封闭《湘江评论》、《新湖南》、《救国周刊》等进步杂志，甚至连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长沙《大公报》和《湖南日报》也遭罚禁多日。但是湖南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终于迸发了，6月3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通电全国，要求收回青岛，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同时发布罢课宣言。

1919年12月2日，学联发动长沙各界在教育坪开会，举行焚烧日货大会，被张敬尧派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驱散，革命学生忍无可忍，开展了“驱张运动”，得到长沙工、商、学、知识分子各界纷纷响应，于是学联宣布总罢课，除罢课宣传、游行示威外，还组织了请愿团，赴北京内阁总理处以及衡阳吴佩孚处请愿，并向京、津、沪湘省旅外人士进行宣传，掀起了驱张运动的高潮。罢课宣言称：“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7] 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起了带头作用，他们联合湖南学生界、教育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大力开展驱张宣传，请愿团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罪状，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张的祸湘罪行，舆论界一致口诛笔伐，使张臭名风闻全国，狼狈不堪。

1920年5月，北洋军阀直、皖二系酝酿战争，吴佩孚、冯玉祥从湖南撤防北归。他们本与张敬尧有矛盾，也想借助群众的驱张形势打击皖系军阀。吴佩孚与原南湖督军谭延闿达成默契，吴军退一步，湘军进一步，结果，湘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北军溃兵如山倒，张敬尧在势单力薄情况下，不战而溃，逃离长沙。张退到岳州时，北京政府于6月13日给他撤职留任处分，褫夺其湘督兼省长职，但仍令其率部反攻。6月26日，张敬尧复退出岳州，在湖北嘉鱼暂驻。6月29日，北京政府认为张守土不力，“实属咎无可逭”[8]，令他到北京听候查办，交出军权，其余部交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接管。

张敬尧被革职后，移居上海，企图伺机东山再起。8月，他秘密回到汉口，唆使张敬汤率残部向武昌进扰后张敬汤被王占元部逮捕并处决了，张敬尧见势不妙，于10月1日夜只身逃回上海。这时正值直皖战争以后，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与直系联合打败皖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扩大势力，收买失意军阀，收纳了张敬尧，并委为随员，派驻北京。张作霖为了利用他，还电请国务院陆军部撤销对张敬尧的查办令。以后张敬尧就成了张作霖的座上客，经常参加奉系的特别军事会议。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利。张敬尧又投靠了吴佩孚。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进兵入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任张敬尧为后援副总司令。10月，冯玉祥率部自南苑开往古北口途中，联合皖系、奉系向直系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吴佩孚逃出北京，张敬尧被捕。但后来冯玉祥为了表示“宽大”，又将他放了。

1925年，张敬尧投奔盘踞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任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攻打冯玉祥所率的国民军。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盘踞在长江中下游的军阀吴佩孚、张宗昌与孙传芳联合成立了“安国军”，分两路南下，与国民革命军对抗。张敬尧任安国军第二方面军团副司令。1927年9月，张敬尧率军驻守皖北及陇海线，国民党军队派人向他策反，张伪装投诚，被暂编在第十一军军长马祥斌部下[(9)]。但不久他又反水，并乘机把马祥斌掳到北方，向张宗昌献俘，马见到张宗昌大骂，终使马遭到杀害。

1928年1月，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与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安国军、直鲁军在苏、豫、晋、鲁一带展开激战，结果直鲁军在商丘、徐州等地大败。张敬尧部被击溃后，其余部由阎锡山收编。1928年9月，张宗昌收集直鲁军残部编成六个师，分三路与白崇禧率领的国民党军队第四集团军作战，张敬尧又出任直鲁军第五师师长，旋遭失败。10月，张逃到大连，追随张宗昌，与清室遗老联合，以溥仪为号召搞东北独立。1929年1月，张敬尧得张宗昌六万元活动经费前往

济南，乘日军自山东撤退之际，联络原直鲁军残部，企图盘踞胶东，结果被国民党军队刘珍年部打败。1932年张敬尧投靠了伪满政权，充当日本和伪满的暗探。1933年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华北进犯时，委派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供给七百万元活动经费，命令他乘日军侵占唐山、天津之际，潜入北平城内，策动旧部并勾结流氓作日军攻城时的内应。同年，5月7日清晨，张敬尧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处华北区派去的特务暗杀，结束了他的一生[10]。

---

(1) 《张敬尧小史》，《天问》第4、5号合刊，上海泰东书局1920年版，第35页。

(2)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资料》第11期，1981年版，第63页。

(3) 《晨钟报》1917年7月27日第2版。

(4) 《晨钟报》1918年3月28日第2版。

(5)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现代史组：《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斗争》，《湖南历史资料》第2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6) 张国基：《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处的日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7) 湖南省城各校全体学生宣言：《湖南学生全体解散详情》（1919年12月），湖南省博物馆编《蒸阳请愿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8) 《晨报》1920年6月30日第6版。

(9) 许和钧：《关于张敬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10) 郑庭笈：《张敬尧被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页。

张絅伯

汪仁泽

张絅伯，名晋，早年曾用字炯伯。1885年9月4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张让三，曾任清政府外交官薛福成的秘书，随薛出使英、法等国，也是上海南洋公学创办人之一，晚年当选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多年[(1)]。张絅伯少年时就读书塾，二十岁进上海南洋公学求学。二十三岁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一年后因母病回国[(2)]。此后自学英语及经济、法律等学科，达到一定水平。1910年至1920年，先后在宁波第四中学、海关学堂、商业学校及杭州浙江专科学校、浙江高等学校等校任教职。

1921年，张絅伯通过父亲的学生、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介绍，赴哈尔滨盐务稽核处任副稽核员。一年后随李到天津任财政部秘书。1923年又经李推荐，去山东青岛筹设明华商业储蓄银行分行（总行在北京、天津、上海设有分行）任经理。由于他善于经营，业务发展迅速，吸收存款最多时达百余万元，居当地私营银行的首位。青岛早年曾被德国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取而代之，不久英、美资本逐渐渗入。1927年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后，1931年11月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长。为抵制外商在青岛的经济势力，沈组织青岛繁荣促进会，委张絅伯为主任。此时明华银行总行改设上海，由张任总经理，但明华的业务重点仍在青岛，张兼青岛分行经理，来往沪、青两地。1933年起张集资三十万元，在青岛的风景区炮台湾附近，建造旅馆“东海饭店”，饭店内部设备讲究，与当时日商经营的栈桥青岛大饭店进行竞争。但青岛旅游业季节性强，东海饭店建造后每年仅在暑期营业两三个月，且“九一八”后时局不靖，游客稀少，以致亏损累累，而张本人资力不足，捉襟见肘，疲于支撑。1934年，在全国工商业不景气的浪潮冲击下，张的企业岌岌可危。其时，国民政府宋子文

系统的势力正谋趁机控制青岛金融，见危不救，张氏企业终告垮台。1935年6月2日，明华银行青岛分行和东海饭店同时倒闭，宣告破产清理，折价清偿。同时也波及上海钱庄业，数家钱庄被拖倒清理[(3)]，影响十分严重。张絅伯从此赋闲在家。

1937年抗战军兴，张絅伯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不久携家从青岛迁返上海。他平时与盛丕华、包达三等人友善，交往密切。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军阀假借“接收”名义，残酷掠夺沦陷区人民的财富。昔日在青岛时，张曾身受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排挤，此时更痛恨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实行独裁的反动政策。1946年，为了谋求和平、制止内战，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往来于沪宁之间。周恩来在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办事处，经常会见上海各界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张絅伯也常参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感召下，张开始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并加入了刚从重庆迁沪的中国民主建国会。6月23日，张絅伯和盛丕华、包达三、马叙伦等十一人接受上海五十多个团体的委托，组成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向国、共及美方马歇尔三方面表达全市人民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坚强意志。当天上海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随后护送代表团在北站上火车[(4)]。车到南京下关下车时，代表团成员遭到大批特务的殴打，部分代表受伤。次日商讨对策时，有人主张特务打人应诉之于法律，但盛丕华认为：如此将拖延时日，我们为和平请愿而来，被打之事不计较。张絅伯、包达三表示支持以争取主动。然后即照原计划进行，向三方表达了请愿[(5)]。在回沪前夕，周恩来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并作报告，阐明当时形势和未来新中国的光明前景，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此后张絅伯以更大的爱国热情，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反蒋民主斗争。经常在工商界人士见面时和聚餐会上，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动行径；曾多次以交通大学老校友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回交大或在沪地各大专院校如大夏、大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处向青年学生作时事形势的演讲，受到热烈的欢迎。1946年9月23日，沪上各人民

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响应美国三十五个城市的进步团体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决定是日起举行“美国退出中国”宣传周。会上推出沈钧儒、张絅伯、章伯钧等为筹备人[(6)]，组织有关活动。1947年6月26日，沪地民主人士在交大召开“要求民主是否有罪”的公断会，市长吴国桢自知理屈而逃会。张絅伯在会上继陈叔通、马寅初之后发言，痛斥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策。他也曾多次掩护和帮助青年学生转赴解放区。他的这些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香山路家门口经常出现国民党特务的魍魉鬼影[(7)]。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常常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散发的宣传材料精神，夜以继日地写成讲演稿，在各种场合作为自己的见解公开发表。1948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离沪去香港，不久搭船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登陆。1949年初转经天津，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和接见，并出席检阅解放军的仪式。4月15日，张絅伯、盛丕华、包达三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8)]，席间张絅伯等与会者就工商、财经等方面畅所欲言，提出建议和意见，受到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他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盛典，历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务院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1958年因胃癌进行手术治疗，1969年1月2日旧病复发在京逝世[(9)]。

---

(1) 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档案：《历届会长、副会长与改为委员长、理事长及任期表》。

(2) 《张絅伯自传》（未刊稿）。

(3)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2页。

(4)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946页。

(5) 《关于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31—103号。

(6)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955页。

(7) 访问张絅伯先生家属的谈话记录，1981年4月18日。

(8) 《盛丕华日记》，1949年4月15日。

(9) 访问张絅伯先生家属的谈话记录，1981年4月18日。

张君劢

江绍贞

张君劢，原名嘉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弟嘉璈，是江浙财团首要人物，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

张君劢六岁入塾，十岁入上海广方言馆，接触到一些维新派的书报，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极为崇拜。1902年参加宝山县试，考取秀才。1903年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一年，因签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校方斥退。自后，在长沙明德学校、常德师范学堂等处任教。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选修德语。在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张君劢主持东京的社务。他曾致函梁启超力主加入官场，广占势力。1909年6月，张与吴贯因等在东京设立“谘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劢看到袁世凯即将得势，极力怂恿梁启超与袁世凯结合，他自己则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1月，在上海与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8月，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张嘉璈等所组织的“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民主党”。之后，张君劢作为民主党代表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

1913年1月，张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学国际法、政治

学、经济学。是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张君劢致函国内报界，极力主张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军实行镇压，并号召其党员（时民主党已合并为进步党）为此“舍身自效”[(1)]。直到1915年，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活动，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他这才追随梁启超等人作反袁的表示。是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张以参加“反袁”的名义回国。但回国后并未去西南，而在浙江当了交涉署长。同时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后即专任《时事新报》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奔走南北，为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作游说，任段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次年7月，张勋复辟，张君劢又跑到南京投靠冯国璋，为冯代理大总统事到处游说。复辟平定后，冯国璋当了总统，张任总统府秘书。之后。由于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恶化，张去职，转就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月，与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松社”，标榜“以读书养性为旨”。12月，随同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在德国访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Eucken），对哲学发生兴趣。梁、丁等回国后，张遂留居德国从倭铿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Henri Bergson）求教。自此，张君劢对康德唯心论哲学极为崇拜，奠定了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1922年1月，张君劢回国，曾一度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参加过章炳麟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参加草拟宪法。之后，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施行宪政。

1923年2月，张君劢到清华学校作“人生观”问题的讲演，以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为依据，宣扬“生命力的突进”和“自由意志”，提倡孔孟之道和内心修养，叫嚷要复活宋明理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2)]。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4年，张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张悄悄到武汉观察动向，写了《武汉见闻录》，也条举一些革命新气象。次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以“世界室主人”为笔名，刊行《苏俄评论》一书。又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撰写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制之解剖》等反苏、反共文章。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作某些指摘。为此，于1929年6月遭蒋拘禁，经章炳麟、杜月笙等人说项，很快获释。被释后曾往满洲里、绥芬河一带了解中东路事件，旋返上海。是年10月，再次到德国，任教于耶那大学，于1931年9月回国。

张君劢回国后，一面在燕京大学任教，一面为筹建政党做准备。1932年4月16日，与张东荪等人拉拢一些研究系残余分子，在北平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5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提倡所谓“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订的民主政治”，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4月，召开“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张当选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

国社党成立后，张曾往山西寻求阎锡山的支持。是年11月“闽变”发生后，又南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刚到福州，见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包围福建，预感到福建人民政府将失败，即转往广州投奔邹鲁，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受到进步师生的反对，他半年后就去职。1935年，张再到广州，帮助陈济棠办学海书院。他把在该院的专题演讲与旧作曾合辑为一书出版，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宣扬“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3)]。1936年夏，陈济棠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失败，学海书院封闭。是年11月，张跑到红军撤离后的瑞金作“视察”，大作反共演说，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所以赣南弄成一片惨无人道的地方”[(4)]。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先后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次年4月，张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5)]，国社党于是公开活动。7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8月，刊行《立国之道》一书，系统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国民政府西迁后，他率领一部分国社党员前往重庆，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6)]。对于张君劢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言行，中国共产党对其作了必要的批驳后，仍然争取他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1939年9月，张任国民参政会所设宪政期成会委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做过一些努力。11月，张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10月，张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到资助，与陈布雷等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于云南大理，张任院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黄炎培与张君劢等人集议，认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于3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任常委。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仍任常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学生以港渝飞机运狗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张君劢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此事的指使者。不久，他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被滞留在重庆两年多，民族文化学院亦遭封闭。

1944年底，张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次年4月，受国民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担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在美期间，曾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7)]领导人伍宪子等人策划两党合并。后又往伦敦考察英国工党。

1946年1月，张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是年8月15日，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等国的“国社党”瓦解，而英、美等国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高涨，便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也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

出“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采用“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8)]。

政协会后，张君劢曾随同黄炎培等人以第三方面身份参与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0月，蒋介石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及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均坚决抵制。张君劢在民盟也曾多次表示要信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但不久即受蒋介石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9)]。2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民社党出席“国大”代表名单。这种行径当即遭到广大社会人士的谴责，民盟令其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裂，张东荪退党，伍宪子等人与张君劢分为两派。

1947年4月，张君劢伙同青年党主席曾琦与蒋介石签订所谓“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蒋介石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至此，民社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7月，民社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任该党主席。嗣后，他到处宣讲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宪法，并于年底跑到美国作鼓吹。次年3月，访晤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蒋介石乞求美援。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派居正动员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已避居澳门，未敢接受。11月，以“讲学”为名，由澳门到印度。

张到印度后，曾在德里大学及加尔各答大学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的研究。次年，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曾撰《理学的发展》等著作，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1958年后，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69年2月23日因肺炎死于美国旧金山。

(1) 《张君劢慨谈时局》，《大自由报》1913年8月10日。

(2) 张君劢：《人生观论战》，国泰图书局1928年版。

(3)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 张君劢：《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线》，《再生》第4卷第4期（1937年5月）。

(5) 《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信》（1938年4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版。

(6)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

(7) 民主宪政党是美洲华侨中的一个政治组织。系由康有为在美洲所建保皇党演变而来，其领导人有伍宪子、李大明等人。

(8) 《中国民主社会党纲领》，再生社编辑部编《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再生社1946年版。

(9) 《张君劢致蒋介石的信》（1946年11月20日），《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

张开儒

孙代兴

张开儒，字藻林，云南巧家县人。1869年6月1日（清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出生在一个小商贩家中。十岁入塾读书。1885年，张开儒参加“院试”，中秀才。其后，他在家设馆教书，受当地大地主甘氏家族凌辱，被迫离乡背井，于1901年长途跋涉前往昆明。

张开儒到昆明后，得到五华书院山长罗瑞图的同情，进了五华书院，是院中最贫困而又最勤奋的学生。时值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张“见所习文艺，无裨世用，慨然入武备学堂，习兵学”[(1)]。1904年秋，他和李根源、唐继尧等被选送日本学陆军，先后入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肄业。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同盟会，张开儒即入会为同盟会员。他热心参加革命活动，积极参加《民报》、《云南》等革命刊物的发行工作。

1908年冬，张开儒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和提调。张在讲武堂期间，积极从事同盟会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员。

1911年10月30日，昆明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发动了“辛亥重九起义”。张开儒奉起义司令部之命，率领讲武堂学生打开小西门，迎起义新军第七十四标罗佩金部入城，并率学生占领总督署西辕门附近地带，配合七十四标围攻督署，擒巡警道郭灿、兵备总办王振畿。“重九起义”成功后，云南都督府于11月中旬组成“援蜀军”两个梯团入川，张开儒被派任第一梯团副梯团长兼联队（团）长。援蜀滇军进入四川时，四川的革命政权尚未统一，各地反清“同志军”互不统属，哥老会武装和土匪乘机蜂起。张开儒奉命率领邓泰中大队和机关

枪队，围攻叙州（宜宾）地区的“同志军”，进驻五通桥[2]。

1912年5月，张开儒随援蜀滇军撤回云南。由于他在援蜀进军途中擅自撤换了恩安（今昭通）、永善两县县令，并下令收缴援川巡按使郭灿、副使陈先源的关防，派兵搜捕郭、陈二人，云南都督蔡锷将其罢职。1913年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张被任命为云南陆军迤南边防第一旅上校旅长，驻防滇东南边境的开化（今文山）。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张开儒即曾考虑到袁世凯素有野心，可能帝制自为[3]。1915年12月25日护国战争爆发后，迤南边防第一旅被编为云南护国军第二军第一梯团，张为梯团长，在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指挥下，向广西、广东进军。

1916年2月，张开儒部尚在集结待命之际，“滇黔招抚使”龙觐光（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广惠镇守使）从广东率军进袭云南，越过桂、滇边境，窜至滇东南。张指挥所部于3月上旬在滇、桂接界的剥隘、皈朝、龙潭一线，与两倍于护国军的龙军李文富、黄恩锡两旅展开激战。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在护国第二军第二梯团方声涛部的配合下，终于将龙军主力李文富旅全部击溃。护国第二军乘胜进攻广西百色的龙觐光军大本营，在广西将军陆荣廷部配合下，将龙觐光军全部缴械。

护国第二军奉命继续东进，计划经湘、粤北伐。拥戴袁世凯称帝的广东将军龙济光，虽已被迫于4月6日宣布“独立”，但顽固阻挠护国军进军广东。张开儒部奉命沿粤汉铁路北进，进至韶关，遇到龙济光军朱福全部的抵抗，张指挥炮兵连进击韶关，龙军一触即溃。张部控制了韶关和粤北地区。6月，袁世凯身死，护国战争结束，张奉命驻防韶关。同年冬，护国第二军改编为滇军第三、四两师，张开儒任第三师师长，兼南（雄）韶（州）连（县）镇守使。

1917年6月，孙中山号召进行“护法”斗争，张开儒积极响应，连

发通电主张西南各省“以全力维护国会”[4]，宜召集国会议员到广东开非常紧急会议，“组织最高等之军事机关，推举讨逆军大元帅”[5]。张的通电，给孙中山以有力支持。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一方面受北洋军阀的严重威胁，另方面受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抵制和排斥。护法所依靠的武装力量，除二十余艘舰艇外，其陆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及林虎一旅。……实只张、方两师可资号召”[6]。8月，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组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张开儒由非常国会选举，经孙中山特任为军政府陆军部总长。他对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军阀本质认识不足，把完善和加强军政府的希望寄托在唐继尧身上。唐继尧、陆荣廷不就元帅职，他反复电唐，严词规劝，指出：“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既曰护法、靖国，无权利之争，何有此徘徊携贰之行？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7] 当陆、唐等人企图用“西南各省联合会”取代护法军政府时，张坚决反对，并密电唐继尧说：“绝不能再立一非法之联体机关，以自纷扰。”[8]

1917年底到1918年初，广东督军莫荣新（桂系）以武力威胁军政府，军政府处于南、北军阀的围困之中。张开儒临危不惧，毅然于1918年2月6日通电，宣布就军政府陆军总长职，接着又宣布：“国会及军政府在此，不能不有重兵震慑。开儒窃以国会之所在，即民国正统之所在，故屯兵于此，以资保护。”[9]

张开儒坚定地捍卫护法军政府的行动，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在4月1日给他的复电中说：“来电读竟，令人起舞，老同志究非别人所及也。”[10] 莫荣新则极其仇视张开儒，电唐继尧说，张“自任军政府陆军总长以来，举动莫测，不惟反对协和（李烈钧字），侮蔑荣新，即我公（指唐继尧）命令，亦视若弁髦”[11]。张曾派兵监督广东地方当局向军政府提供财政经费，桂系和政学系即攻击他说：“藻林举动如此，势且激成大变。”[12]

桂系军阀为了长期割据两广，加紧和直系军阀勾结，打击、排斥孙中山，瓦解护法军政府及其所依靠的滇军。2至5月间，一再密电唐继尧，攻击张开儒“在在与粤挑衅”，“务恳将藻林问题，迅为处置妥协”[13]，同时又把政学系的李根源请到广东取代张开儒。唐继尧接密电后，乃改组驻粤滇军，撤去张的师长职务，撤销由张兼任军长的“靖国军”第五军建制，合三四两师为第六军，任命李根源为军长，统一指挥驻粤滇军。

正当滇、桂军阀宣布撤去张开儒的军职之际，北洋军由赣南潜越大庾岭，偷袭粤北南雄等地。张开儒所部分驻南雄、韶关、连县等地，兵力分散，应援不及，致使南雄失守。莫荣新、李根源等人乘机诬陷张开儒临敌撤退，并假唐继尧之命，派李天保强行接管张部第三师。5月12日，张从韶关退回广州，莫荣新派兵包围广州黄沙车站，将张逮捕，关押于督署所在地观音山。同时，莫荣新又逮捕张的助手、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并立即加以枪杀。军阀、政客们在瓦解护法军政府武装力量的同时，操纵非常国会改组了军政府，迫使孙中山辞职离粤，使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遭到挫折。

1920年10月，粤军陈炯明部奉孙中山命从闽南回师广东，驱逐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军队。11月，张开儒从莫荣新的囚禁中获释。驻粤滇军重新组成“护法滇军”三个旅，张开儒为总司令。但是，陈炯明部突然袭击并解除了“扩法滇军”的武装，张开儒又失去了兵权。

1921年2月，驻川滇军在四川和川军混战失败后，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师回云南驱逐唐继尧，控制了云南军政大权。张开儒返回昆明活动。不久，孙中山委任顾品珍为“云南北伐军”总司令，张开儒为副总司令。1922年3月，唐继尧率军回云南，顾品珍战死，张开儒即率顾部滇军经贵州转移到广西柳州、芦寨一带。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号召讨伐陈炯明，并派邹鲁联络张开儒部滇军。张响应孙中山号召，率领滇军向广东进军，进至广西桂平时，滇军内部发生权力斗争，旅长杨希闵、杨如轩、范石生等人夺取了张开儒的总司令职

权，通电宣布张“解职就医”，推举金汉鼎为总司令，金未到任以前，由杨希闵代总司令。张受排挤后，颇为消沉，意欲引退，孙中山及时给予鼓励，复函称：“国难未已，兄何能退官，当仍出共天下事也。”(14)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张开儒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同年10月，李烈钧回到广州任参谋总长，孙中山委派张开儒为大本营参军长，仍为陆军上将衔。但此时张身体多病，革命意志渐趋消沉，遂带家眷去澳门闲居养病。

1927年2月，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唐继尧被推翻，并于同年5月死去，张开儒即于当年秋天由澳门回到昆明定居。执掌了云南军政大权的龙云，屡邀张出山，张都谢绝，最后只挂了个云南省政府高等顾问的空衔。此后，张开儒闭门潜修佛典，吃斋拜佛。1935年7月7日病逝于昆明。

---

(1)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张君开儒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云南辛亥革命史料选编）第17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306页。

(2) 周钟岳编纂，蔡锷订正：《云南光复纪要·援蜀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版，第246—247页。

(3) 由云龙：《护国史稿·张开儒传》，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版，第63页。

(4) 《张开儒通电》（1917年6月12日），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页。

(5) 《张开儒通电》（1917年7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6)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41页。

(7) 《张开儒再劝唐继尧就元帅职密电》（1918年2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8) 《张开儒为反对联合会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1月20），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9) 《张开儒为保卫国会及军政府致唐继尧等电》（1918年3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10) 《复张开儒电》（1918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6页。

(11) 《莫荣新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5月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12) 《杨晋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3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13) 《杨晋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3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14) 《复张开儒函》（1923年2月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页。

张澜

宗志文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其父张文倬是秀才，在乡村任塾师。张澜从小随父读书，1894年中秀才，不久补廪生。1900年父亲病故后，继其父主持塾馆。1902年被选入四川尊经书院深造。1903年以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这时，他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1904年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主张，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回国后，先后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1906年回南充，创办南充民立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及南充端明女学。1909年10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谘议局议员，他推辞未就。张澜与谘议局正、副议长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是至交，常跟他们一起参加立宪运动。

1905年四川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名曰官商合办，实则一切由官方把持。1906年末，川汉铁路完全归为商办，实权则落入立宪派士绅手中。1911年初，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以借款为资本，实行铁道国有政策。清政府于5月9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20日又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权利。清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行径，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在成都开会，张澜作为南充的代表出席。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4日，保路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各府县的代表，张澜上台致答辞，鼓励群众同心协力，为保路废约而斗争。次日召开股东会成立大会，张澜被推为副会长。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强行

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并要以川款继续开工修路。于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民众开始罢市、罢课，进而实行抗粮抗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借口谈判，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首领蒲殿俊、张澜等人诱入督署加以逮捕。张澜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筑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的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1)]。赵尔丰无言以对，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张澜凛然不屈。随后，由于赵尔丰的血腥镇压，四川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清政府下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前往镇压。端方入川，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愤慨，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张澜等被释出狱。

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张澜出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成立了护卫营，刘湘任护卫营营长。张澜到南充设立了川北宣慰使署，先后与地方人士共同发起创建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还创办了南充果山蚕业社，发展实业。

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到北京出席会议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6月，进步党四川支部开临时大会，张澜被选为常务员。袁世凯上台后，大搞专制独裁，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张澜失望之余，重返四川，接任南充中学堂校长。护国战争打响后，张澜联合驻防川北的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以及川北全部、川西大部武装民团通电响应讨袁，并在南充宣布独立，赶走当地驻防的北洋军。

讨袁战争结束以后，川军形成两个军事系统：一个以依附北洋派的刘存厚为首，一个以拥护西南方面的熊克武为首。1916年张澜任嘉陵道道尹。1917年11月，北洋政府任张澜为四川省长。12月刘存厚任四川督军。1918年初，滇黔军会合熊克武的川军占领重庆，赶走北洋军。2月，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张澜出走。不久，到北京居住。

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澜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留法勤工俭学进一步开展时，他积极鼓励和支持青年出国留学。

1920年春，张澜因奔母丧回到四川。随后几年，他在故乡南充大力兴办教育，联合地方人士成立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和讲习所，创办《民治日报》，鼓吹地方自治。当时川北一带苛捐杂税很多，张澜曾公开出面号召市民和学生罢市、罢课，抵制捐税，并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对军阀官吏的贪污进行揭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过一些人的不法行为。

1925年7月，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督办，成为四川军政的中心人物。同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在刘湘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成都大学，并任张澜为校长。

成都大学设文、理、法三院共十二个系和文、理两个预科，学生一度达二千余人。张澜就任校长后，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方针。学校除网罗四川各方面有学识的专家来校讲课外，并派专人到省外各地聘请国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外语、物理等系先后请有外籍教师二十余人。在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张澜主张学习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榜样，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各党各派兼收并蓄。学校办有《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1927年四川各军先后投归国民党，同蒋介石一起公开反共。此后，四川各学校一律要进行党化教育。张澜不以为然。7月24日，学校出了一张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2)]

当时成都大学社团林立，但主要是三大派：一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二是国家主义派的惕社，三是国民党的健行社。张澜说，他主张各派争鸣。在他的支持下，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发展最快，

影响最大。1928年2月，成都反动军警借口学生闹事，制造了“二一六”惨案，屠杀学生十四人，其中有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六人。张澜愤而辞职，经全校师生挽留才复职。复职后，他立即派人通知一些离校的进步学生暂缓到校，以免被害。另一方面，他又限定学生在校内只能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不能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国民党特务却连这种研究活动也不许可。他们用各种方法打击张澜所主张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终于迫使张澜不得不于1930年下半年离开学校。

张澜回到南充后，继续办中小学教育。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十分艰难。他在《乡居杂感》中描述当时教师的境遇说：“乡村学校尽萧然，旧款犹亏新款悬！多少教师饥欲死，还须忍苦待来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国土沦亡，他满怀忧国忧民的感情，又写诗说：“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

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奉蒋介石之命进行阻击。与此同时，刘湘成立了安抚委员会，聘请张澜任委员长。红军长征离开川北后，张澜率调查组前往川北一带进行调查。当地农民有口皆碑，无不称赞共产党和红军，使张澜受到很大教育。1935年秋，张澜在成都与邵从恩、卢子鹤等发起组织“四川省乡村建设期成会”，提倡推广乡村建设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与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接触较多，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为了促进统一团结，共同抗日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张澜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

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3]。要求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这期间，张澜常常在公开场合指摘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措施。有的特务分子记录他的讲话后，要他签名，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所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1941年3月中旬，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执行委员有黄炎培、张澜等十三人，主席为黄炎培。不久黄辞职，张任主席。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出版。10月10日，公告同盟成立，并发表了十大政纲。张澜代表同盟在重庆招待记者，宣布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纲，说同盟对外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一严正立场，受到人们的赞扬。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的报告言行不一，戳穿他们的假民主，真独裁。结果被禁止发行。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取消“政团”二字，以便吸收个人会员；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推选张澜为主席。他在会上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关键是要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政治报告》。张澜在会上提出争取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的主张。这次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主席。12月，他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问题、民主问题、军事问题及

国家建设问题提出了意见，并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

1946年1月，张澜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极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中旬，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遭国民党特务暗杀。8月18日民盟在成都召开追悼会，张澜在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声泪俱下。散会时，遭特务凶殴，打伤头部。会后记者访问他时，他说："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4) 11月中旬，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要通过蒋记宪法，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张澜在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民盟总部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5) 后来，民盟拒绝参加这次伪国民大会，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民大会"的民社党清除出盟。12月，张澜由重庆抵上海。在民主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他阐明了民盟不参加伪"国民大会"的理由，强调和平、团结，反对分裂、独裁，并号召扩大和平民主运动，以达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

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张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自己的立场。"在闭幕词中，他又号召民盟成员"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复活"，"继续为政协精神而奋斗"。这时，国民党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蔑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因国民党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愈加分歧，有些人倾向妥协。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包围了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总部被迫声明解散。7日，张澜发出呼吁，吁请民盟盟员在合法范围内，

继续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1948年1月5日，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否认民盟总部发表的解散声明，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6)]。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中央常委轮流代理。这时张澜在上海也积极募集经费，支援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同年冬，张澜因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1949年3月间，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疗养院劝诱张澜追随蒋介石，张澜严词拒绝。国民党武装特务一度冲进疗养院，意欲挟持张澜逃往台湾。张假装病重不走。但从此被软禁在病房里，失去行动自由。直至5月上海解放前，经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营救，张澜始脱险出院。6月，到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20日，民盟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张澜继续当选为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领导中国民主同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协助人民政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54年，张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澜的著作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

(1) 《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第2页。

(2) 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79年重印本。

(3) 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大事记》，第1页。

(4) 沈自强：《民盟在成都的一些情况》，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编印《盟史资料》。

(5) 《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第3页。

(6) 《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第3页。

张岚峰

邢汉三

张岚峰，字腾霄，河南柘城人。1905年1月（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父张映宿是秀才，以行医为业。兄张云峰，曾任县商会会长。

1918年7月，张岚峰在本县高小毕业后，考入河南省立淮阳第四中学。在校学习时，体格健壮，喜爱运动，尤爱足球。1922年冯玉祥督豫时，派人到各地招募学兵，张岚峰报名参军，考入学兵团。他勤学苦练，每次术科考试，均名列前茅，为冯玉祥所赏识。一年学习期满结业后任班长，以后两年中，升为排长、连长。

1925年冬，冯玉祥为了培养国民军骨干，选拔文化水平较高、军事技术基础较好的四十人出国学习军事，张岚峰被选送去日本。1926年春，入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1929年毕业回国，在冯玉祥部任炮兵团团长。冯夫人李德全以张岚峰青年有为，以甥女相许。此后，张更得到冯玉祥的信任。1930年春，冯部军官学校由开封迁往郑州，张升任军官学校校长，成为冯部重要骨干。

同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兵败入晋，张岚峰亦随而失去军职，乃于1931年夏携眷去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经济。此时，张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的队长松室孝良专门搜集我国情报，为日本大举侵华作准备。张岚峰受松室拉拢，参加了日本特务组织，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

1936年秋，张岚峰回到北平。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原是张的长官。张利用旧关系，加上日本人的推荐，得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1936年冬至1937年春，张经常到张自忠、冯治安、

赵登禹各军防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做宣传，并刺探军事情报。张自忠有所觉察，曾对其部下团长张宗衡说："张岚峰当了汉奸，对他应严加防范。"[1] 张岚峰企图拉拢宋部将领胁迫宋哲元投降日本，他没想到宋哲元及所部官兵在"七七"事变发生后，都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毅然决然高举抗日大旗，使其为敌人效劳的阴谋诡计无法重逞。

1938年春，张岚峰以探亲为名，回河南柘城原籍，充当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拉拢土豪劣绅，扩充私人势力。同年6月日军侵占开封后，张潜赴北平投拜华北日军头目，被派为豫东招抚使。9月初，他偕同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曹大中、李忠毅和日本派给他的联络员松室正宪回到河南，在商丘城内挂起了豫东招抚使署的招牌。他利用过去在西北军中的旧关系，将豫籍散兵招募起来，不数月即集结近万人，乞得当地日本侵略军头目的许可，编为一军三师。张任军长兼一师师长，其余两师师长由曹大中、李忠毅分任。他们带兵有一定经验，所收官兵稍加整顿，即有相当战斗力，为敌人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效命。1939年，华北日军头目见张岚峰效劳日伪卓有成绩，擢升张为豫皖招抚使，并拨给军用卡车数十辆和大批武器弹药，令其再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日酋将张部编为"剿共军"，任张为军长。到1941年初，张部扩至近两万人，步、马、炮、工、辎各兵种应有尽有，宪兵队、军官队、学兵队及军械厂、被服厂、面粉厂样样具备，超过华北其他各省所成立之伪军及华北"治安军"，成为华北伪军的一面黑旗。

张岚峰受到日军青睐后，得意忘形，飞扬跋扈。他的独断专行，引起曹大中、李忠毅的不满。他安插在曹、李两部军官中的亲友，仗势为非作歹，不听曹、李指挥，他反多方袒护，致使他与曹、李的矛盾日益激化。同年6月29日，曹、李率所部携械投靠国民党，致使张部实力损失过半。张无可奈何，向驻在商丘的日军旅团长佐久简报告，出乎意外地反而受到日酋的慰勉。张感激涕零，下决心重整旗鼓。

张岚峰为了报效日本侵略军，决心首先整饬军纪，亲故中有违法

乱纪者也不姑宽；对曹、李两部官兵家属优予保护，不予株连；官兵重新归来者还加官晋级。华北日军为表示对张岚峰的信任和支持，又给张拨发弹械被服。经过一段时间，张部又恢复旧观。

这时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已一年多，驻南京日军总头目将张岚峰部拨归汪伪政权指挥，番号改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任张为军长。从此张成为汪伪政权的红人。1942年春，汪伪政权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队时，张任总队长。汪精卫亲笔为张题写“中流砥柱”条幅以示倚重，张将其悬挂在会客室中，引以为荣。张在南京时，用请客贿赂的方法，结识汪精卫亲信周佛海、陈春圃等人。张妻也到南京以金银珍宝和陈璧君结纳，受到陈的款待。1943年春，汪伪政权参谋总长叶蓬到商丘点验张岚峰部队，查明张部实有人数近五万，即将其扩编为第二集团军，辖两个军，张岚峰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大部官佐均加官晋级。

1944年春，汪伪政权为虚张声势，再令张部扩大编制，改第二集团军为第四方面军，任张岚峰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所部由两军六师扩编为三军九师，另有不少特种部队，实有人数不下七八万。驻防地区扩大到豫东的淮阳、鹿邑、永城和安徽的亳县、涡阳。所属各县内用人行政，全由张岚峰总部主管；县中一切收入，全供军用。张部的兵工厂，不仅能造步枪、手枪、轻重机枪、地雷、手榴弹，而且能造掷弹筒、小钢炮和各种炮弹，除供本部使用外，还大批出卖牟利。

为了促成日蒋合作反共，张岚峰曾大卖力气。1944年春，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长王毓文、师长张文心，经过张的牵线，先后到商丘与日酋洽商达成协议：二十八军所部北犯冀鲁豫边区，日军派骑兵大队数百人协同张岚峰部，在商丘以东予以保护通过。同年6月，日军师团长樱井在皖北亳县和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商谈由涡阳北进协力“剿共”，也是由张岚峰沟通的。1943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张岚峰干了不少这样的坏事。

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张岚峰利用各种渠道和蒋介石集团拉关系。他通过他的小同乡牛朗初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挂上钩。戴派出爪牙到商丘做联络员，戴本人亦曾到商丘和张进一步勾结。张和驻在豫中的汤恩伯打得火热，1944年冬和1945年春曾两次去见汤。汤部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聂松溪曾到商丘，通过张取得日军“谅解”，派所部进驻商丘东北部协助日军“剿共”。汤部高参施仲达是张的连襟，按照汤的意旨到张部任第二路司令。汤部的军需人员利用官僚资本开设的各种公司、商行、银号，和张岚峰开设的怡和号、大中银行关系异常密切，双方负责人员称兄道弟，亲如一家。张岚峰还把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作为勾结国民党集团的另一个依靠力量。张设在商丘的贵宾招待所里，经常住着刘茂恩的代表。1944年春，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由蒋管区到北平就医，路过商丘，张取得日军头目的“谅解”，派人到皖北亳县迎接，并派人护送到北平。刘镇华住院期间，张曾亲往探视，并送去珍贵礼品。张岚峰对他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经常自鸣得意，曾对他的朋友和部下说：“你们不用担心时局变化，一切我有办法，你们听我的话就行了。”(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岚峰的伪第四方面军的番号马上变为国民党的第三路军，张由汪伪的方面军总司令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第三路军司令。由于戴笠、汤恩伯、刘茂恩等在蒋介石面前为张说项，1946年春，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并与他合影。张返防后，对部下大事吹嘘，鼓励他的部下为蒋介石卖命。

同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豫东地区战场上，张岚峰督率所部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反复拼杀。在豫东的野战纵队沉重打击下，1947年1月初，张岚峰奉命率所部三个团，配合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开往豫鲁边区金乡，于1月7日行抵成武、定陶交界地区受到中共野战军打援部队的截击。经过两昼夜激战，张部被全歼，张仅带卫士数人夤夜南逃。13日抵商丘北二十里之刘口镇，被中共领导的地方部队陇海支队俘获，转送石家庄，不久即病死。

(1) 据张宗衡提供材料。张宗衡是张岚峰幼年同学，曾任河南省政府参事、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2) 1944年7月初张对笔者说的。张对其部下旧同学尚立鸣等也有过类似的谈话。

张厉生

经盛鸿　朱正标

张厉生，字少武，原名维新，字星舟。直隶永平府乐亭人。1901年6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二）生[(1)]。张家世代务农，其父张绳武弃农经商，赴吉林长春及辽宁公主岭一带做生意，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时有过激言辞和行为，因而一度被抓进监狱，备尝苦楚。张厉生幼年时常听到父亲对他讲述这些事情。

张厉生八岁时入私塾读书，其父督责甚严，使他自幼养成勤奋学习、一丝不苟的习惯。1914年他进入乐亭县立高小读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嘉许。其父病逝后家境窘迫，幸因其学习优良，得到重教励读的亲友们的资助，得以继续读书。1917年张厉生考入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但两人思想主张截然不同。当时，吴稚晖在附近的唐山路矿学校执教，倡导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张厉生经常求教于吴，深受吴的影响。张厉生决心留学法国，未等在南开毕业，就离开天津到北京朝阳学院法律专修科预备班学习欧洲史和法语。

1920年11月，张厉生在亲友的资助下，负笈西行，为留法俭学生（非勤工俭学生，只读书而不参加劳动），先入迪埃普学院（College de Dieppe）和默伦学院（College de Melun）补习法文和投考大学的课程。1922年秋考入巴黎大学，专攻社会学，兼修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等课程。

1923年冬，张厉生在巴黎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周恩来等八十多名旅欧的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旅欧国民党组织。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法总支部成立，张厉生与周恩来均当选为总支部执行委员[(2)]。但张厉生反对共

产主义运动，视国共合作为共产党的“渗透阴谋”；他甚至说共产党是“靠着国民党帮他革命，大功告成，就要鹊巢鸠占，杀孙中山来祭红旗”[3]。张厉生纠集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经常在革命主张、宣传口径以及争取对留欧学生的领导权诸问题上，和周恩来、李富春及国民党左派人物王京岐等发生争执，斗争日趋激烈。当国内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加剧时，张厉生在法国遥相呼应，伙同国民党旅法总支部的另外两名委员曹德三、习文德进行分裂活动，另立旅法总支部，并创办《三民周报》，宣传反共理论，排斥共产党人。当时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已先后回国，还在法国的王京岐等人发表文章进行反击。

1925年夏，张厉生取道回国，在上海中山学院任主任教授。在上海他结识了陈果夫。1926年夏广州国民政府发起北伐，于10月间底定湘鄂。张厉生于该年底奔赴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武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力量较大，张为韬晦计，将“维新”正式改名为“厉生”，字少武，兼有纪念其父之意。1927年初，张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原黔军王天培部）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应杭州市长邵元冲邀，前往杭州任市政府主任秘书。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张厉生顿即趋附，赶去南京。当时蒋介石急需网罗各种反共人才，而张早在巴黎即有反共经历，因而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1928年3月，陈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备司令，因邵元冲推荐，张应邀任司令部秘书。不久，张又担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

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厉生“由中央指派”为大会代表。这次大会由蒋介石一手操纵，宣称“过去数年党之一切理论、法令、规章，为共产党之反动思想所搀混”[4]，悍然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开除党籍，并极力排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张厉生在这次大会上对蒋介石由衷拥护，给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果夫留下极好的印象。会后，陈果夫约张出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从此张

厉生成为CC系的要员。1931年11月，张厉生参加了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任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党务组的审查委员，还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初，张厉生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党务处长，主管“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务，先后主持制订了《自新悔过条例》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进逼华北，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与军事势力也在华北积极活动，华北局势处于十分复杂的状态。蒋介石因张厉生是河北人，遂于1932年10月任命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北平军事代表，同时负责整理河北、平津及平汉、北宁各铁路的党务，并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员，驻节北平。张一时成为国民党在华北的党政要人，来往于各军政要员之间，纵横捭阖，促使商震、宋哲元、秦德纯、庞炳勋、高桂滋诸军事将领签订“军人公约”，表示“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共尊蒋介石为唯一领袖。1933年夏，张厉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诋毁冯玉祥、方振武等人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方面在其所办的《人民评论》等报刊上组织文章加以诋毁；另一方面暗中拉拢庞炳勋、阮玄武等军进击张家口，并且亲自到前线视察讲话。

作为华北党务特派员，张厉生四处活动，组织了华北十二省、市、路党部（即国民党冀、察、平、津、平绥、北宁六省市路党部和从东北流亡在北平的辽、吉、黑、热四省党部以及不容于阎锡山的晋、绥两省党部）的双周集会，召集这些党部的主要成员，定期讨论如何整顿发展国民党组织，如何反共，如何排除汪（汪精卫）、胡（胡汉民）派系。经过他殚精竭虑地活动，终于使得北方十二省、市、路党部一齐倒向蒋介石，其政绩大受蒋介石的赏识。

其时，张厉生还追随陈果夫、陈立夫，于1933年初先后参与发起成立“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以前者为核心，二陈分任正副干事长，张厉生为五名

常务干事之一，负责华北地区。“青白团”与“同志会”的宗旨是拥护蒋介石为党内唯一领袖，实行军事独裁，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进行反共内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张厉生指使胡梦华在华北成立反动青年学生组织“诚社”作为外围组织，打击和破坏日益高涨的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又在北平收买了《人民评论》，创办了《存诚月刊》等，还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华北与河北分会，积极宣传三民主义理论。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厉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2月，张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全国党务。他接替陈果夫、陈立夫长期把持的这一要职，深知艰难万分，谨慎持重，率由旧规，不轻更张。在任职期间，张主持制定了《国民大会组织大纲》，规定国大代表按比例分别由各地区与各行业产生，由此产生了“职业代表”一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集中全力指挥对日作战，裁并中央党政军机构，一度设立大本营，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入大本营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为副部长。不久又恢复军事委员会建制，第六部取消，新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与黄琪翔为副部长，张厉生为秘书长。张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充任陈诚的幕僚长，遭到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非议，认为有失体统。张却全然不顾，并且从此离开了CC系。不久，张厉生升任政治部副部长。

1941年2月，张厉生改任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的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他以一丝不苟的作风工作，努力推行新制，深获蒋的赞许。1942年12月张又被蒋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并兼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他秉承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与副院长孔祥熙的旨意，负责处理行政院的日常政务事宜，认真谨严，起草文牍有条有理。他还发起两周一次的各部次长会议，检查行政院决议、指示、命令的执行情况，讨论、处理各部会行政事务方面的共同

问题。张厉生谨慎谦和、精敏稳健的作风，以及以认真负责和周密审慎的态度，协调各部会间及各省政府间的若干歧见与难题，颇得各方赞誉。

1944年12月，张厉生出任内政部长，并仍兼任行政院秘书长至1945年6月。张主政内政部约四年时间，积极推行国民党的“地方自治”制度，制定和颁布了《省县自治通则》和《市自治通则》；还主持修订人口法令，改进人口调查登记制度，统一调查登记法规，督促各地普遍实施户籍登记，筹划举办全国人口普查，并在1946年3月成立了人口局。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人口调查未能进行。

张厉生在内政部长任内最主要的工作是操持“国大”代表选举与张罗召集两次“国民大会”。1946年11月，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反对，悍然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张厉生以内政部长身份兼任“国民大会”选举总事务所副主任委员，具体主持“国大代表”的选举与增额事宜。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激烈，且有青年党、民社党的纷争和国民党内部派系的钩心斗角，使得“国大”代表的选举与“国民大会”的召开困难重重，首当其冲的内政部与张厉生一时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攻击和发泄不满的对象。但张厉生硬着头皮顶住各方压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操持了这次大选。接着，张厉生又操持了1948年春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使蒋介石当选为总统。嗣后蒋介石提名翁文灏为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院长，张厉生为行政院副院长。8月，蒋介石颁发《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张厉生奉派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华北地区推行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收兑外币等财政紧急措施。但是不到三个月，限价政策等即全面破产，翁文灏内阁于11月26日引咎辞职，张厉生也随之离职。同年12月，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张挂名为行政院政务委员。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不久孙科内阁辞职，张厉生亦卸职。此后，张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奔走于东南各地，后于1949年8月赴台湾。

张厉生到台湾后，即应陈诚之邀，出任“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主任委员，主持制订了《台湾省地方自治实施纲要》，以及有关调整县市行政区域及县市议员选举罢免法案若干种。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职”，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院长，张厉生为副院长。张在职四年，辅助陈诚进行“土地改革”，加强“地方自治”工作，以求稳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这时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工作完成，起用大批新人，但仍看重张厉生，于1954年8月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59年张复受命出任台湾驻日本的“特命全权大使”，为维持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效力。1963年8月，日本内阁通过以贷款方式将价值2000万美元的维尼纶厂设备售与大陆。9月16日，日首相池田勇人在招待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辑时又说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日本政府的这些言行，激怒了台湾当局，引起了日台间关系的紧张，张厉生以“回国述职”为名，回到台湾，未再返任。

张厉生从此退出政界，在台湾赋闲养志。他虽多年官高位显，但自律甚严，好学慎行，清廉淡泊，不置恒产，晚年生活甚为清苦，不仅无钱购屋居住，甚至医药费也无所出，多靠亲友及医师资助。1971年4月20日张厉生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彭国栋：《张少武先生行状》，载《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85—88页。

胡梦华：《反动学生组织诚社始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121页。

张敬原：《追思张厉生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3卷第3期。

王玉宾：《我所认识的张厉生先生》，台北《河北平津文献》第

1卷第2期（1971年7月）。

---

(1) 张厉生出生日期说法不一：吴相湘说是1900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见吴著《张厉生主办两次大选》（《民国百人传》第四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97页）。［美］包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说是1900年5月24日（见沈自敏译《中华民国名人辞典》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6页）。彭国栋则说是“生于民前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即公元1901年6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二），见彭著《张少武先生行状》（载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1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2) 吴琪：《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法德两国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3) 张厉生：《共产党做国民革命的论据》，《赤光》第18期。

(4) 《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9年5月印行。

张灵甫

沈荆唐

张灵甫，原名钟灵，字灵甫，以字行。陕西长安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父亲张鸿恩，在本县大东乡务农为生。张灵甫幼时在本村村南私塾启蒙，十岁考入小学求读。1921年考入陕西长安中学，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爱古文，好诗词，临摹碑帖苦学书法。1923年从长安中学毕业后，归里在小学执教，不久考入北京大学。正值国民革命兴起之时，张与同学数人于1925年初至河南开封，投入胡景翼国民二军所办之军官训练团。其时设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开封秘密招生，张报考被录取，经上海至广州，编入军校第四期步科。

张灵甫于1926年10月从黄埔军校毕业，编入第二十一师为见习军官，旋调往第一军第二师，任第一团二营二连三排排长，参加江西战役。在德安马回岭一战中，担任夜战偷袭之尖兵排，奋勇当先，右腿负伤。战后升任第三连连长。1928年秋，张灵甫所在之第一军缩编为陆军第一师，张为该师第三旅一营二连连长。1929年冬在蒋唐战争驻马店一役中右臂负伤。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战后升任第一师独立旅第二团三营营长。接着随该师赶赴正定讨伐石友三部；继又协同友军进击桐柏山洪德昌部。1932年冬，升任第一团团附。

1934年，第一师在“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战事中，从黄陂追击红四方面军，张灵甫率第三营为前锋，快速追击立下战功，受师长胡宗南之嘉奖。战后升任第一师独立旅第一团团长，随全师进驻甘肃，年底至川甘边境碧口驻防，继后又移防四川广元、昭化一带。在阻击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中，独立旅伤亡惨重，旅长丁德隆指挥一个团伤亡殆尽；张灵甫第一团侥幸脱险，无大伤亡，再受胡宗南嘉奖。嗣后，张

率团又追击长征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岷县从马上摔下受伤，至西安疗养。他因无端猜忌而枪杀妻子，被监禁在南京一年多，在狱中以书法消磨时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灵甫被早年曾是张之上级、时任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保释出狱，在王部第一五三旅任三〇五团团长。张重上战场，又是抗击日军，斗志高昂在淞沪战役中，所部坚守吴淞口附近的罗店，打退敌军久留米师团的数次进攻。11月从上海撤退后，张率全团在昆山、望亭等地阻滞敌军，掩护大部队转移。接着参加南京保卫战，在淳化镇、上方镇一带抗御敌军，作战中左臂受伤。南京陷落后，所部至湖北沙市休整，张升任第一五三旅副旅长兼三〇五团团长。1938年5月参加徐州会战，先守砀山御敌；继在兰封战役中于三义寨重创敌土肥原师团一部。武汉会战开始后，张升任第一五三旅旅长，率部在江西德安阻击日军。9月参加反攻德安张古山之敌，带领一支突击队从人烟稀少的崎岖峡谷渡越成功，配合三〇二团、三〇六团正面进攻夹击敌军，胜利夺取张古山。日军倚仗飞机轰炸和重炮猛击作掩护凶猛反扑，张率诸团顽强战斗，白天退却，夜晚进击，连续五个昼夜反复争夺张古山阵地。张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仍不下火线，在“德安大捷”中建立战功。

武汉会战结束后，第七十四军经过奉新、高安一带之休整，驻防长沙。张灵甫带领全旅官兵，帮助长沙民众重建大火毁去的家园。1939年5月，第七十四军入赣参加南昌会战，张任第五十一师步兵指挥官，攻克高安祥符观，进逼南昌。9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赣北拦截日军，激战于高安。9月22日第七十四军收复高安，有力地配合了主战场的战斗。经军长王耀武举荐，张灵甫升任第五十八师副师长。1941年3月上高会战启，张协同师长廖龄奇指挥五十八师在高安以西、棠浦以东一带狙击敌人，猛烈的炮火使兵员伤亡很大。张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激励将士顽强苦战，顶住了日军的猛烈攻势。接着随七十四军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表现顽强，受到嘉奖，战

后升任第五十八师师长。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张率全师协同第五十一师在常德以北狙击敌人，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还伏击了前来夜袭偷营的敌人。1944年7月，张率所部参加衡阳外围的战斗，经过宁乡三昼夜的血战后强攻前进，进抵市郊五里牌，迭克鸡窝山、金兰寺等地。战后晋升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

长衡会战结束后，张灵甫被选送至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二期受训，编入甲班。毕业后已抗战胜利，回到七十四军供职，奉命拱卫京畿，并参加京沪地区接收及日军遣返事宜。

1946年4月，张灵甫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率部驻南京孝陵卫，卫戍京畿，张并兼首都警备司令。七十四军是国民党的一支精锐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后又受美国顾问之训练，全部美械装备，被蒋介石称誉为“模范军”。全面内战爆发后，七十四军改称整编第七十四师。8月，张率全师三万余人北上进攻新四军，依仗强大火力连占天长、盱眙、六合、泗阳、淮阴、淮安等地，12月又占涟水城。张连连得手，自鸣得意，妄言“有我七十四师，就无新四军葬身之地”。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头八个月“全面进攻”虽然扩占了一些地盘，但大大拉长了战线，且被歼有生力量71万人，乃于1947年3月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的部署，改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顾祝同受命指挥十七个整编师四十三个旅，编组成汤恩伯、王敬久、欧震三个兵团向华东解放军进攻，以“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进犯鲁中山区。张灵甫七十四师是汤恩伯第一兵团八个整编师之一，与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合力进击坦埠。张骄傲自负，想抢头功，不顾左右而突出冒进。5月11日由垛庄经孟良崮前进，渡过汶河后又强占杨家寨、马牧池等地。当遭到人民解放军阻击后，与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的联系均被切断。张发觉孤军突进，乃兵家之大忌，被迫转攻为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天马山、马牧池、磊石山等地先后失守。张仓促下

令向孟良崮、垛庄方向撤退。但垛庄已于15日拂晓被解放军占领，断了七十四师的退路，张乃令部队在孟良崮及周围据点安营固守。由于四周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张师兵员、枪械、辎重等密集在各个山头和山谷。此时，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快速推进，将孟良崮层层包围，完全切断了七十四师的交通运输，并控制了水源。汤恩伯兵团的增援部队十个师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向七十四师靠拢，但被华东野战军的四个纵队分割阻击在外。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与张有隙，不肯倾力出援，只派出一个突击连佯作增援。张灵甫向南京连发急电求援，但是增援部队不济，飞机空投的馒头、米饭、饮用水及弹药等，大多落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张几次企图在空军掩护下夺路突围，但被解放军紧紧围住。5月15日下午3时，华东野战军向七十四师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突击。张指挥所部拼死抵抗，激战至16日上午，雕窝、芦山等重要据点先后丢失，大部兵力被歼，余部七千余人被压缩在孟良崮和六〇〇高地及山谷间。张指挥余部顽抗不降，伤亡殆尽，至傍晚五时许，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部歼灭，张灵甫被击毙。

主要参考资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全宗号7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临沂行署出版办公室编：《孟良崮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罗文浪：《孟良崮战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

年版。

胡兆才：《张灵甫死因之谜》，《扬子晚报》1993年9月3日。

张鸣岐

王学庄

张鸣岐，字坚白，一作健伯，号韩斋。山东无棣人。1875年8月29日（清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九日）生。张家系“无棣望族”，其父凌云，屡试不第，供事北京衙门，积赀捐官县丞，曾任湖南湘潭朱亭丞[(1)]。张鸣岐于1894年考取举人，次年会试落选，留南学（国子监的一部分）读书。

1898年，张鸣岐被荐入岑春煊家就馆。岑应诏陈言，由张代拟的奏折受到光绪帝的嘉奖，特授广东布政使，张因此受到岑的器重。张能言多谋，善于揣摩逢迎，与东家相处异常投机。岑春煊说：“坚白与我，同而不异，可作耐久朋。”[(2)] 不久，岑由广东布政使改授甘肃布政使，张随充幕僚。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岑率兵“勤王”，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升任陕西巡抚，随后迁山西巡抚，再升署四川总督。张鸣岐均在幕中划策，被保举至候补道，号称岑的“智囊”。

1903年4月，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张任总文案，兼管两广学务处，不久又兼管练兵处，襄助岑推行清廷的“新政”，被目为通达时务之才。1904年5月，因为广西民变蠭起，岑入桂督师，张总理两广营务处。广西巡抚李经羲是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及袁世凯一派的人物，而岑则与另一军机大臣瞿鸿禨一气，跟奕、袁不和。李为了与督臣沟通关系，请求岑让张兼充他的幕僚，张每日出入督抚之门，成为桂林第一号红员。同年，李保举张任广西太平思顺道，次年，岑又荐张署理广西布政使。岑在密折中称赞张的才干“胜臣（岑自谓）十倍”[(3)]。1906年12月，清廷任命张鸣岐为广西布政使，署理广西巡抚，次年6月实授。

广西在陆亚发等大股“游勇”被扑灭后，民变仍然时起时伏。张鸣岐一面指挥提督龙济光、总兵陆荣廷等镇压民变；一面大举推行“新政”[4]。他先后开办了农林试验场、农业学堂、优级师范、法政讲习所，设立电报局、审判厅、检察厅和警察，续办富贺煤矿，筹建桂全铁路，还按清廷规定设立了广西谘议局，一时搞得热热闹闹，在朝野上下都颇著虚名。

张鸣岐为编练广西新军，聘请了大批留日陆军士官生和国内军校毕业生。同盟会会员李书城、王孝缜、尹昌衡、陈之骥、耿毅、何遂等都在军中担任大小职务。张鸣岐为了利用这些人，不时宴请，以示亲近。张对他们说：“革命并不是一件奇怪和可怕的事情，本人立志刷新广西的政治和军事，即是革命，也就是广西革命的领袖。”[5]年轻的军官们以为巡抚非常开明，在他面前侈谈革命，并且在军队内外加强宣传组织活动。张见势不对，调蔡锷、蒋尊簋入桂接替革命党人担任的要职。在控制住军权之后，张立即抓了两名党人，声言“要砍几个脑袋给大家看看”[6]。结果，许多出头露面的党人被驱逐出广西。

凭借岑春煊的力量，张鸣岐在短短几年里平步青云，由一个困顿的书生变成了封疆大吏，成为光宣之际最年轻的疆吏。1910年，署粤督袁树勋因控制不住局面，地位动摇，张鸣岐眼前又出现了晋升的良机。但这时岑春煊、瞿鸿禨都已失势，张便转而通过李经羲，向奕劻报效大量钱财。1910年9月，清廷派张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看到这个亲手栽培的心腹与自己的政敌勾搭，异常气愤，从此结下了怨隙。

1911年1月，当张鸣岐到广州上任时，同盟会在广州的一次起义正在紧张准备。黄兴、赵声等在香港设统筹部，并在广州设指挥部，暗聚同志，联络新军、防营和“绿林”，定期起事。4月8日，署广州将军孚琦突然被华侨工人温生才刺死，全城震动。清廷闻讯，任命张鸣岐署广州将军，接着又实授两广总督。他在惶恐中得到党人即将举事的情报，立刻与水师提督李准等会商，派出大批侦探，抽调防营进

城，实行戒严。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起义。督署被黄兴率队攻破，张仓皇丢下老父妻妾，登屋越墙，逃到水师公所，指挥军队镇压。革命党人起事仓促，势力孤单，步调不一，迅即失败。次日，清军继续搜捕起义者。革命党人李德山等退入高阳里源盛米店，堆米袋据守，并抛掷炸弹，清兵不敢接近，张鸣岐竟下令纵火烧街。起义者被俘六七十人，经张先后下令杀害的，有林觉民、喻云纪等四十三人 [7] 。响应起义的顺德民军，也同时被张派兵镇压了。

镇压起义的清兵主力，是李准所部。李长期在粤带兵，多次镇压革命起义，声势赫赫，自成系统。张鸣岐见李不易驾驭，便奏调桂军入粤。不久，龙济光率二十营抵穗，至此，广东水陆巡防队共达一百〇四营。张命龙主持广州城防，并将李准的部分兵力划归广州协统辖，李被迫回驻虎门。张还将新军十一营整顿成协，调蒋尊簋为混成协协统，随即又提前成立第二十五镇，奏派龙济光任统制官，严加控制。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后，张布置李准、秦炳直（陆路提督）等在全省清乡，企图消灭经常响应革命的“绿林”。清乡成了百姓的灾难。李准在顺德纵兵劫掠，开炮袭击村庄。潮州清乡，“亦日以滥杀平民为事” [8] 。此外，张鸣岐搞的“新政”以及禁赌、禁烟，都成了官吏军警借机贪污舞弊勒索的机会。广东社会动荡不安。6月，因反对铁路国有，广州市民拒用纸币，挤兑现银，迫使张借外款维持市面。8月，李准又被革命党人炸伤。“省城官民纷纷迁徙，十室九空，商业萧条，金融停滞，大局岌岌可危。” [9] 这时，张鸣岐和李准之间的矛盾，却因各自袒护亲信部将更加激化，张准备上章参劾，将李除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广东革命党人和民众也闻风而起。张鸣岐急命龙济光派人回滇桂招募军队，企图保住广东。10月13日，苏抚程德全请张会衔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以挽回局面，他答以“时机尚未至” [10] ，观望形势。10月25日，广州将军凤山抵穗赴任，被革命党人炸死，五羊城风声鹤唳。同日，地方绅士在文澜书院

会议，力劝张与革命党人稍事妥协。张急忙奏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还请求将被特赦的党人汪精卫、陈景华调粤差遣。他的应变措施不合民众要求。10月29日，广州商学各界集议爱育堂，公决承认共和政体；下午又在文澜书院讨论满汉融合。这时，书院门前树起有“广东独立”字样的白旗，并鸣放鞭炮。各商店也张旗、悬灯、鸣鞭炮庆贺。二万多民众拥至督署前请愿独立，张避不敢见。当晚，张得汉阳清军获胜、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之讯，又强硬起来，命龙济光派兵将旗灯扯去，巡街捕人，布告要“尽法惩办，以昭炯戒”[11]。次日，全城罢市。这时，各地民军蠭起，进逼广州。李准已暗中与革命党人联络，准备反正。龙济光态度也日益暧昧。张鸣岐见军队动摇，知道已无法抗拒。11月5日，各界在谘议局商讨组织新政府时，张派代表表示愿意交出政权。经绅士提议，推举张鸣岐为临时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民众代表将都督大印送到督署，扑了个空。原来，张鸣岐不肯附从革命，已于中午逃往沙面租界了。各界代表改推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胡未到任前，由蒋尊簋为临时都督。11月6日清晨，张鸣岐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广州光复。

不久，张鸣岐又从香港逃到日本。袁世凯执政后，他回到北京闲居，挂名为袁的高等顾问。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为监视西南军阀，袁世凯于1913年10月派张为广西民政长。张于次年4月抵任，后改官名为广西巡按使，会办广西军务。广西都督陆荣廷对这个老上司敬而远之，使张无法干预广西军政。1915年7月，张调任广东巡按使。广东都督龙济光也大权独揽，张只能出面为龙搜括民财，镇压地方。这年底，袁世凯阴谋称帝，张与龙上表劝进，后来袁封张为一等伯。张还与辫帅张勋暗通音讯[12]，给自己在他日清朝复辟时留条后路。护国战争爆发后，龙济光迫于军事压力，于1916年4月伪装独立。同月，在广州发生了谋杀护国军方面人士的“海珠事件”。张被龙派赴广西陆荣廷处解释，留桂作质。5月，张回穗，旋因母丧离职。这时，护国军在肇庆成立了军务院，代理抚军长就是岑春煊。因为龙军与护国军屡屡冲突，龙想找个说客去转圜。他以为张出自岑的门

下，是个理想的代表，便请张前去。不想张却大受岑的冷淡，一无所获。很快，张即辞去巡按使职务，脱离了政界。

张鸣岐离粤后，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移居天津英租界，礼佛长斋。1928年，梁启超企图组织新的政党，张不甘寂寞，表示响应，但终因政客们之间矛盾重重，未能兑现。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12月，他参加了汉奸王揖唐等发起的“中华佛教会”。1942年3月，张与王克敏、靳云鹏等被聘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会议委员。1945年3月，张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祈祷“大东亚战争之必胜”[13]。同年8月，日本投降。9月15日，张鸣岐在天津病死。

---

(1) 刘乃勋：《张步堂先生事略》，《一庐存稿》，香港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2) 孟和：《岑春煊与张鸣岐》。

(3) 刘乃勋：《我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期间之阅历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5辑，1962年版。

(4) 瞿宣颖：《记张韩斋督部语》，《补书堂文录》，1961年印本。

(5) 黄绍竑：《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8—490页。

(6) 黄绍竑：《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78—490页。

(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引张鸣岐电奏，上海书店1982年版。

(8) 《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折附片》，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4—266页。

(9) 《内阁总协理大臣寄军谘府陆军部两广总督张鸣岐上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页。

(10) 黄炎培：《辛亥革命中之一人——程德全》，《人文月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 温肃、温必达：《温文节公（肃）年谱》，1947年印本。

(13) 天津《华北新报》1945年3月28日。

张默君

侯爽

李援朝　张默君，原名昭汉，字默君，号涵秋，以字行。1884年10月24日（清光绪十年九月初六日）生，湖南湘乡人。父亲张通典，字伯纯，是早期同盟会会员，颇有威望。母亲何永徽，字懿生，出自衡阳望族。

张默君自幼即聪颖，1889年入私塾读书。1891年，年仅七岁的张默君就反对姐姐缠足。九岁时，美籍牧师李佳白博士在上海尚贤堂倡导天足会时，张伯纯出资赞助，张默君更是与母亲一道将天足会会章及劝告文件印制数十万份分发各地，宣传缠足的弊害以及世界各国进化强盛的道理，号召广大妇女大胆放足，自己解放自己。1901年，张默君进入其父创办的养正女学学习，并义务教授养正女学附小的文史伦理课。

1904年，张默君就读于上海务本女塾师范本科，她经常与革命志士秋瑾、龚宝铨等人秘密来往。1905年7月，上海女界在广西路“榕庐”召开抵制美约大会，张默君登台演说，号召广结团体，抵制洋货，发展民族资本，争取收回利权。会后，上海《女子世界》全文刊载她的演说稿，影响颇大。1906年，张默君由黄兴、龚宝铨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同盟会秘密机关南社的成员，参与社刊的编辑发行工作。190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务本女塾师范本科，随后入景海女校补习英文，准备留学美国。同年，张默君应两江总督端方之邀，任江苏省粹敏女学教务长。上任伊始，便撰写学规十章，以培养人格、发扬国粹、敦学笃行、忠诚勤俭为治学之本，对学科设置、管理、训导等进行改革，并增设中学部，使入学人数大增，而粹敏女学亦声誉鹊起。

1909年，张默君在父母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筹款购进十几箱枪械子弹，准备运到革命党人龚炼百处。由于走漏了风声，军警到张默君家搜查。危急时刻，张默君急中生智，将十几箱枪械子弹投入自家屋后水塘中，并沉着应对军警的搜查。在军警走后，又当机立断连夜将这十几箱弹药完好地运到龚炼百处。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张默君离开粹敏女学，进入圣约瑟女子书院学习。

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方几省相继独立。11月4日，张默君同父亲一起召集苏州各界同人，共同策划光复苏州事宜。张伯纯主张变更武汉等地革命旗号“兴汉灭满”为“兴汉安民”，以示崇尚民治，得到众人的一致赞成，张默君当即在旗帜上挥毫而书“兴汉安民”四个大字，将大旗高悬于城外北寺塔顶。随后张默君草拟了一百六十字的安民布告，略曰：“照得民军起义，实为顺天应人……吴会长江重镇，指日铙吹收京。”“如有人乘机扰乱，定当执法以绳。一德安民与汉，同开万世太平。”当晚即通电各省，宣布苏州独立。民众于次日破晓看到安民布告，异常兴奋，奔走相告。苏州独立后，张默君主办了江苏《大汉报》，亲任社长及总编，聘请陈去病、傅君剑等人主笔，于11月10日以石印出版，12月改用铅印正式刊行。张默君以“涵秋”或“大雄”为笔名，每日撰写一篇社论，鼓吹民治，倡导共和。可惜不到三个月，因苏州政府机构迁往镇江，《大汉报》被迫停刊。

1912年后，张默君致力于女子参政和普及教育，积极联络陈鸿璧、杨季威、舒惠桢等人组建了神州女界协济社，发刊《神州女报》，从事妇女运动。3月3日，张默君等以神州女界协济会的名义致书孙中山，提出女子参政的要求。张默君认为，只有普及教育才能提高女子的素质，为此在上海闸北创办一所神州女学，孙中山带头捐款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张默君身兼协济社社长及管理报社、女学的工作。神州女学虽属草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开设小学、中学及专修科三级教育，聘请知名人士如陈去病、傅君剑等到校任教，对于提高中国妇女的文化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年，张默君担任中国女界协赞会干事，领衔通电东南各省女界，募集军饷，资助北伐，并将所得巨款面呈孙中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在上海设交通部，张默君被任命为文书主任。1913年春，张默君率神州女界协济社及妇女界各团体，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嘉德夫人（Mrs．C．C．Catt）在上海张园会晤。张默君申明国民党政纲的男女一切平等主张，并与之对妇女参政方式进行探讨。此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世界女子协会、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等国际组织与神州女界协济社、妇女参政会及女权运动会，时通声讯，互派代表往来。张默君对近代中国妇女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1918年，张默君奉北京政府教育部指令，赴欧美考察女子教育。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先横渡太平洋前赴美国考察。她应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嘉德夫人的邀请前往纽约视察，遂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夙愿。其时，适逢中国学生留居纽约同学会改选，张默君被推为会长，成为此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女会长。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张默君为支援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正当要求，出面召集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开会，组织爱国会，电请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她还被推举为代表赶赴巴黎，同留法学生郑毓秀等人，与和会代表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当面痛陈利害。张默君再次以海外留学生名义急电北京政府，恳请拒绝签字。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也有张默君及留法学生为之付出的一份力量。

其后，张默君前往欧洲考察了法国、瑞士、比利时、德国等国家的教育。这年冬，张默君回国，归途中还考察了南洋各地的教育。回国后著成《战后之欧美女子教育》一书，并先后撰写了《我之家事教育观》与《欧美教育考察录》等论文发表，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

1920年，张默君继续担任神州女学校长，主办《神州女报》。时值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潮迭起，教学秩序混乱，当局聘请张默君担任校长。她在恢复和安定学校秩序的基础上，依据女子师范教育的特点，拟定了六年改进计划，按年逐步推行。她聘请东南大学知名教授竺可桢、朱君毅、王毓英等人到校任教。创立图书馆，设立各学科实验室，购置仪器，充实设备。张默君提出以真、善、美为校训，注重陶冶品德，锻炼体格。建立了复式学轨：其一为高等初等两级师范、幼稚师范、小学、幼儿园，以普及教育为宗旨；其二为高等初等两级中学，以升学求深造为目的。张默君的学制改革，一是实行社会生活教育化，使学生及时参与校外学术研究，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活动；二是实现学校教育家庭化，使课堂教育与家事教育并重，让学生在接受基础教育时，也能学到医疗、保育、烹调、缝纫等知识与技能。

1921年，中国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大会，公推张默君任女子教育组长及交际主任。会后，张默君与朱其慧及王伯秋等人共同发起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并亲自督制识字课本，在各地设立平民学校千余所，厉行扫除文盲。张默君在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近设立失学儿童及成年妇女夜校数所，由女子师范学生任教员，影响颇广，各省纷纷仿行，蔚然成风。

自1927年始，张默君进入政界。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4月任杭州市教育局长，她派人深入各级学校调查研究，据此拟定教育大纲，分别按期实施。又设置了多所中心学校，成绩卓著，受到前来杭州考察教育的中外人士交口称赞。1929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文学教育组主任、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纂，1931年任立法委员。

1931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由司法部部长王用宝任典试委员会委员长，张默君、罗家伦、傅斯年、王云五、段锡朋为典试委员会委员。参加考试的考生有两千八百四十二

人，录取者仅为一百〇三人，但无一名女子。张默君虽痛心落泪，但仍坚持不以降低女子录取分数线为录取条件，并坚信只要女子努力，奋起直追，下届必有考中者。1933年10月再度考试，报考者二千九百五十四人，考中者一百〇一人，其中女生陈自观、倪光琼榜上有名。张默君闻听喜泪盈眶，并特地备车设宴为“两名女状元”庆祝，席间亲赠铜尺一对，中堂各一幅，以示鼓励。

张默君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一、主张实行普及教育，认为普及教育不仅指对成年人及儿童的义务教育，也包括各级教育。普及教育不仅要扫除文盲，而且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教育必须要唤起民众，激发国民爱国思想及民族精神。指出实行普及教育应当遵循随时随地向民众传授知识的原则，政府要制定出实施普及教育的方案，编写有意义的普教小册子，以引起民众阅读研究的兴趣，也可以利用识字的儿童及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人，去指导失学的成年人等多种方式进行普及教育。主张编撰以中国古代贤臣英烈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人言行为中心内容的教材，激发青年人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实现以教育唤起民众，抗御外侮的目的。二、主张厉行劳作教育，注重手脑并用。认为只注重大脑则徒有理想，而要使理想得以实现，则必须利用双手，必须实行劳作教育。因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除具有大脑思维外，还具有双手的权威，所以要通过手脑结合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学校增添理化实验设备，让学生亲手进行声、光、化、电学科方面的实验，通过自己动手得出的结果，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能充分发扬学生的劳作精神，从而使中国青年能够担当起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重任。

张默君认为妇女有责任参与救国大业，而妇女要参与救国，则必先自救，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与男子一道共赴救国大任。在科学万能的时代，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必须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人人应当肩负起精神建设的责任，而妇女于此责任更大。她还进一步提出妇女欲求得自身解放，一要立志，要有人格，要

痛革赌博、奢侈等各种恶习，谋求自身经济的独立，才能更好地肩负精神建设的职责。二要有责任感，激励自身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对社会各界有所贡献。三要充分发挥自身好慈善、爱和平、同情心强、勇于牺牲等优点，与男同胞共同奋斗。

张默君自1924年与邵元冲结婚后，夫妇二人互励以学，相濡以沫，但邵在西安事变中被乱枪击中不治身亡。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默君为丈夫安葬并收集生前著述、遗墨，携儿带女，回湖南老家省亲。

1937年冬天，张默君在衡阳南岳衡山建华严息灾法会，“销陶救国”，并刻写经书以及缝制寒衣劳军。1942年夏，张默君由重庆前往湖南劳军，辗转湖南各地体察民情，并到耒阳讲学。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监察委员，1949年3月为常委。

1949年5月，张默君随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转赴台湾，次年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评议委员。1954年张默君连任国民党“行宪”后第二届考试委员，10月兼任考试技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晚年，张默君致力于对古玉及书法的研究，著有《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变》及《中国文字源流与历代书法之演进》等书，此外还有《白华草堂诗》、《玉尺楼诗》、《张默君先生文集》等。

1965年1月30日，张默君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张默君先生文集》，第1编论著，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

马长林主编：《民国社会名流归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贾逸君编：《民国名人传》，岳麓书社1992年版。

张健：《志同道合：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

张难先

方正伦

张难先，名辉沣，又名绍良，号义痴。湖北沔阳人。1874年5月15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小商家庭。四岁发蒙念书，十九岁参加州试，因不满科举制度，携白卷出场。二十岁读《左传》中“思小惠而忘大耻”，萌发民族救亡意识。因久病在家，一面读书，一面经营本家店务。1898年“戊戌变法”，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逐渐关心时局，并学习技击之术。1901年，赴荆宜以鬻书画为生，两年后在向家祠堂讲学。他发奋读书，阅览新书新报，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清政窳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张难先在革命潮流影响之下，深感救国之道，非打倒封建帝制不可。1904年2月，他赴省城，结识各界知名人士王怒涛（王汉）、宋教仁、胡瑛、刘静庵、吕大森、朱子龙等人，发起组织了湖北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事革命活动。他与朱子龙、胡瑛等人投入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与士兵联络，宣传革命思想，士兵多受感奋。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派宋教仁赴长沙与华兴会取得联络，谋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日，在湖北、湖南同时起义。因缺乏经验，谋事不密，被湖南巡抚陆元鼎侦悉，起义尚未发动即告失败。张难先知事暴露，与刘静庵烧毁册籍，通知有关同志走避。宋教仁、胡瑛去日本，张折回沔阳，科学补习所亦被查封。风潮过后，张难先和刘静庵继续在圣公会胡兰亭主教所办的“日知会”内集结同志，图谋再起。

1906年，张难先受黄福、王劭恂之聘，在沔阳仙桃镇办集成学

校，任校长，传播革命思想。这年冬，湖南萍浏醴起义，张赴省城与刘静庵策划响应。此时设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闻讯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返鄂联络。但因叛徒告密，刘静庵、胡瑛等八人相继被捕。张难先刚由仙桃镇至武昌，当即避入谭少卿家，挚友石昌麟劝其去日本避难，并出资路费。张难先以被捕同志亟待营救而谢绝，并于当晚兼程回沔阳，不幸在沔阳集成学校被捕，押往武昌巡警道候审。张在狱中大义凛然的供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了也感到惊异。翌年春，因大病被黄福、王劭恂等保释出狱就医。他续办集成学校，秘密宣传革命。嗣后他任沔阳勤业蚕业公司经理，以掩护革命活动，并筹措经费。

1911年夏，张难先到武昌奔走党务，与共进会、文学社两革命团体经常磋商，十分活跃。10月10日武昌首义告捷，成立军政府，季雨霖任安、襄、郧、荆招讨使，张难先被聘为顾问，随季到仙桃镇。季力单势孤，掌握的军队很弱，张乃说服刘瑛、梁钟汉、李亚东率部归季领导，先后溯汉水而上。其时攻打荆州的唐牺支告急，季、张率部支援。季误听人言，怀疑唐部有变，电张难先派胡玉珍营攻打唐部。张即电季劝导，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自此张与季意见不合，遂辞去顾问职务。

1912年6月，张难先至武昌，先在胡瑛等人组织的文学会讲学数月。翌年，继任模范讲演团讲员、团长。1914年9月起执教于湖北省立模范小学。1915年夏，张去北京，适值筹安会成立，鼓吹帝制甚急，张愤然回乡，以课徒授业和灌园卖菜度日，并密谋讨袁。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控制北京政权。孙中山于1917年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张难先颇为兴奋，慕名而去广州。但他感到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官气逼人，令人作呕”，即留书汪精卫而回鄂。在广州时，张阅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接触新思想。

1920年，张难先认为俄国革命成功，“学说新奇”[(1)]，乃赴北

京，求学访友。在北京时，适逢杜威、罗素来华讲学，张每夜都去北京大学听课。在此期间，他先后结识了梁漱溟、蔡元培、李四光、胡适之、李济深等，并经常往来论学。为维持生计，他一度充当参谋部录事，缮写书文。1922年夏，黎元洪继徐世昌任总统，聘张为顾问。他反对黎为总统，乃退还聘书，趁奔弟丧之际返回沔阳。翌年，张难先应李济深邀请去广东肇庆，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加速了革命步伐。对此，张难先由衷赞同。他公暇之余常与邓演达交谈，获益甚多。1924年秋，张随李济深至梧州，任广西梧州善后处参议。1925年10月，任广西榷运局局长，努力革除陋规。1926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告捷，张被任命为琼崖各属行政专员。他在海南常以青衣小帽走访民间，体察民情，并惩办了一些土豪，改革了一些陋习，深得民心，在国民党内博得了较高的声誉。

1926年11月，张难先调至国民政府监察院任委员职，翌年6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同时兼任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数月后，张辞职回鄂。此后，国民政府委张为湖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兼党部党务委员，张屡辞不获，及至1928年3月才到任。他以“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为座右铭，大力整理财政收入，罢免贪官污吏，任用贤能，因而使湖北财政一时大有起色，为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所称道。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张因不满这种内部混战，愤而辞职。蒋介石打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后来到武汉，多次派人劝张复职，张坚辞不出。1930年1月，张应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之邀，出任铨叙部长，负责审查政府及五院职员任免。12月，蒋介石标榜“修明地方政治”，任他为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张难

先愤慨万分，曾电请蒋介石“通电全国总动员，先从党员、公务员编练，以普及民众，准备出全国之力以抗日”。他还促蒋“通电罪己，与民更新，并亲自统大军驻平津，予日寇以迎头痛击”[(2)]。张率先行动，令省垣各机关职员接受军事训练，亲自与各厅长俱学习兵操。张的抗日言行为蒋所不满，12月，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

张难先卸任后，于1932年初游洛阳、郑州等地，沿途宣传抗日。在郑州，张再次劝蒋抗日：“时事至此，不下决心奈何？”[(3)] 至西安时，张应杨虎城之邀在各界欢迎会上讲话，认为应当全国总动员起而抗日。

但是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加紧“围剿”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1932年7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委张难先为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其时徐源泉部攻打洪湖赤卫军，将段德昌的妻儿老小十二人捕来，并以贺龙妻子提报邀功，蒋介石将此案交张难先迅速处决。张认为，两军相斗，不应罪及家属、民众，乃千方百计地保护段德昌妻室儿女等亲人，并将其全部无罪释放了之。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及徐源泉等人对张如此了结此案，甚为不满。此后张与杨永泰之纠葛日增。

张难先与杨永泰之间的矛盾，终因湖北附加提款一事而日趋表面化。张认为湖北附加提款是湖北民众为防洪抗旱、修建江河堤坝而提交的血汗钱，它只能用于修建江河堤坝，反对蒋介石、杨永泰提取此款作为内战军费。为此，张与蒋当面顶撞，并愤而出走北平。蒋电请张复职视事，张答称：“必欲吾回，须收回由我移交提款成命，及党政委员会结束后，再不拉我入政界，始可。”蒋复电说：“如约。”张难先再次回湖北，蒋要他去南昌办案。他在南昌又发现杨永泰不法之事多起，张与杨当面争执，后又与蒋介石抗争，蒋继续袒护杨永泰一伙。张遂辞职返回故里，不再过问政事。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张难先赞赏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钦佩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宽大胸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大声疾呼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同年12月，蒋介石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请张难先、严重、石瑛（时称“湖北三怪”）参加湖北省政府，张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张与来到武汉的董必武会晤，积极赞同国共合作举办湖北省应城县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1938年8月，敌机轰炸武汉，省政府迁往宜昌。次年湖北省政府再次改组，严重任代主席兼建设厅长，张难先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42年5月，张难先由恩施至重庆，先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三、四届参议员，多次往访董必武，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日本投降后，他认为：“吾国此次在中共努力及盟邦翼蔽之下，得免亡国，并结胜利之果，今后应卧薪尝胆，努力建设。”(4)

张难先被选为“国大”代表，于1946年11月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民主派的反对，要在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张在会上发言，力主这次会议要以调解为中心，商得国共和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他的发言见报后，遭到国民党部分报纸的恶言攻击，被诬蔑为“秦桧论调”，为“共产党帮腔”。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总统后，电请张难先任“国策顾问，聘书即到”，张予以谢绝，并将聘书、薪俸领条原件退回。他在武汉协同李书城等人发起“和平运动”，成立了“和平促进委员会”，敦促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与共产党谈判。其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节节败退，又拒绝签订国共和平谈判协定，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4月23日即解放了南京。驻守武汉的白崇禧见大势已去，扬言要炸毁张公堤、武泰闸、水厂和电厂。张难先和李书城等一道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迫使白崇禧放弃炸毁这些地方的阴谋。张难先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李书城等地方著名人士一道，冒着被特务暗害的危险，将和平促进委员会改组成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设总会在汉口市商会内。

张还兼任武昌、汉阳的工作。根据市内已经出现的许多混乱情况和估计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张难先与李书城共同署名写信给白崇禧，要求他在撤走前维持好武汉的秩序，并保证不加破坏。当国民党特务悍然对武汉知名人士王际清、贺衡夫抄家时，张难先为王、贺两家之事亲自去找白崇禧，当面提出抗议，并质问白崇禧：老百姓“搞治安也犯了法吗”[(5)]？

在武汉临近解放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张难先不顾年高，巡视武汉三镇，并将一千多个臂章发给救济委员会会员佩戴，以便分布市区维持治安活动；同时派三十余人张贴布告，还用汽车向市民散发传单，因而武汉人心十分安定。

5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占武汉。6月6日各界群众召开庆祝大会，张难先在会上讲话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军。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时，张难先被聘为参议。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是年，台湾派特务分子来汉谋害张难先，张三次遇险。1951年12月，张致书周恩来转毛泽东，建议精简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得到毛泽东“唯这是可暂不可久，可紧不可松”的肯定，要求各地切实实行。张的建议得到如此重视，盛赞中国共产党采纳意见“真可谓从谏如流”。1954年秋，张被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后，张难先长期住在北京。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

---

(1) 张难先：《简历》（1949年2月）。

(2) 张难先著，武汉大学近代史组整理：《义痴六十自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张难先著，武汉大学近代史组整理：《义痴六十自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

(4) 张难先：《六十以后续纪》。

(5) 喻育之：《从“和平运动”到武汉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0年版。

张培爵

沈庆生

张培爵，字列五，四川隆昌人。生于1876年12月（清光绪二年十月）。父张照清是医生。培爵幼入私塾，二十三岁中秀才，后两次到成都参加乡试，不中。1904年春，入成都高等理科优级师范。同年冬，与同校叙属同乡创办旅省叙属中学。次年，被举为旅省叙属同乡会会长。1906年，经谢持介绍加入同盟会，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同盟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反清武装斗争不断兴起，四川是斗争激烈的地区之一。1907年11月，张培爵与熊克武、谢持、黄复生、杨维、黄方、余切等联络新军和会党，密谋在成都起义。事泄，杨维、黄方、张治祥、黎靖瀛等六人被捕，是为“成都六君子之役”。成都起义失败后，党人多出走，张培爵仍潜留成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张培爵从成都高等理科优级师范毕业。翌年，任成都叙属中学校学监。他利用学监身份为掩护，发展同盟会会员，并与熊克武、谢奉琦、廖树勋等秘密联系，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在川北、川西、川南各地革命党人，都靠培爵为他们互通声气。

1909年，重庆同盟会支部负责人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邀张培爵赴重庆协助工作。1910年，张到重庆，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同盟会重庆支部也就设在这里。张培爵与杨庶堪等以重庆府中学堂为基地，发展会员，联络会党及巡防军，准备继续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5月，清廷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愤怒，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廷闻讯，派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9月7日，川督赵尔丰屠杀

成都请愿群众，激起全川人民强烈反抗。此后，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斗争，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遍及全川。这时，杨庶堪和张培爵接各方密报，深知全川民气激昂，已达高潮，于是积极做起义准备。他们在党人内部做了分工部署，派党人掌握了巡防军和商会的团练；又发动袍哥会党，组成了义勇队；还联络好了川东道清军的炮队营。对清吏方面也作了分析，掌握他们的动态。当时端方所率鄂军尚在入川途中，其军中也有革命党人，杨、张派人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接着，九江、长沙、安庆、昆明、贵阳等地也宣布独立。消息传来，重庆党人大受鼓舞，但也使重庆知府钮传善严加戒备。11月5日，突然传来夏之时在简阳起义的消息。夏之时原是新军的下级军官，他在简阳杀死清兵军官宣布起义。杨庶堪、张培爵闻讯后派党人朱之洪前往和他接洽，许他入城后担任将来蜀军政府的副都督。定议后，夏即率起义军东下重庆，11月22日抵重庆浮图关。钮传善急令守兵闭城门，企图抵抗，但城内党人所掌握的团队、巡防营立即出动，打开城门，使夏军整队入城。川东道朱有基闻讯先逃，钮传善则被揪住，剪去发辫，俯首投降。张培爵同杨庶堪等于当日通电宣布重庆独立，成立了蜀军政府。23日，蜀军政府酝酿选举各级职员，关于都督一职，杨庶堪坚决谦让，张培爵遂被举为蜀军政府正都督，夏之时担任了副都督。同日，蜀军政府发布对内对外宣言，对内宣言中明确指出：蜀军政府以同盟会四大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1)]。到此，清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终被推翻了。

与蜀军政府成立的同时或稍后，川东道及下川南道所属五十七个州县纷纷宣布接受重庆蜀军政府的领导与管辖。

同年11月27日，成都方面成立了以立宪派首领蒲殿俊为首的四川大汉军政府，宣布四川“独立”。这个“独立政府”是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立宪派绅士相妥协的结果。重庆蜀军政府不承认大汉军政府，并派夏之时率兵西上，讨伐赵尔丰。夏军出发后，尚在途中，12月8

日，成都蒲殿俊已在兵变中被驱逐，由新军军官尹昌衡继任大汉军政府都督。尹迫于周围情势，将赵尔丰捕杀，重庆西征军遂中途返回。这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妥协。重庆蜀军政府适应南京临时政府的妥协政策，决定与四川大汉军政府合并。1912年1月27日，成、渝双方代表在重庆议定合并合同十一条。2月2日双方正式成立统一的四川军政府，设在成都。2月12日，张培爵离重庆西上成都，至隆昌时，与同盟会党人分析形势，觉得成都方面尹昌衡党羽甚众，遂主动由张电请尹昌衡任“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正都督，自任副都督。3月9日，张抵成都，12日就副都督职。张培爵及同盟会党人的这一决定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性。这种妥协的结果，使四川军权仍落入旧军人、投机分子与立宪派绅士手中。

1912年春，西藏农奴主叛国分子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派兵攻占川边一些地区。6月14日，北洋政府委尹昌衡为西征总司令（后改为川边经略使）率部西征。尹于出发前，不以副都督代理其职务，而转举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改张培爵为民政长。这是明显地对张歧视，而张竟接受了这个名义。胡景伊原为清朝广西陆军协统，对革命党人极端仇恨。他护理川督后，竭力排斥张培爵，张名为专司民政，实则毫无实权。胡后又派人到北京，以重金贿袁世凯亲信陈宦，欲借陈的力量，达到排挤张培爵的目的。11月，张被袁世凯政府以咨询边防民事为名调往北京，并被解除四川民政长职务。

1913年初，张培爵抵北京，被袁世凯任为总统府顾问官。3月，袁世凯暗杀了主张成立政党内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4月，又非法地和五国银行团签订大借款协定，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这时南北斗争的形势十分尖锐，张培爵已身在北京，无行动自由，“惟看书着棋，凡政治上一切竞争，均淡漠视之”[(2)]。但熊克武、杨庶堪在四川发动的反袁斗争，却引起袁世凯对他的疑虑。时黄兴谋取金陵，培爵曾潜至上海输资助其事，更为袁世凯所不容。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在京、津一带密布侦缉

队，侦捕革命党人。张培爵为避祸，离京住入天津租界，借经营机织袜作坊以“自晦”。但袁世凯对他仍然很不放心。1915年1月7日，袁世凯的军政执法队将在天津的张培爵和他的友人邹杰、陈乔村同时逮捕，解往北京。3月4日，袁政府借“血光团”罪名将张及其两友同时杀害。

主要参考资料

张培爵：《先烈张列五先生手札》。

向楚：《巴县志》卷二十、二十二，巴蜀书社1992年版。

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年再版。

王子骞等：《蜀军始末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

《宣统政纪》卷五二、五三、五八。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

---

(1) 周开庆：《四川与辛亥革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61页。

(2) 张培爵：《先烈张列五先生手札》，成都球新印刷厂1939年版，第27页。

张群

严如平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长宁。其父张汉霞，字星亭，晚清县衙小吏。张群少时入家馆课读，后就读于华阳中学。其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阅读进步报刊受到影响，向往投笔从戎。1906年，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继赴北京参加复试，受到学堂督办段祺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编入步兵第二队。

1908年春，张群被保定陆军学堂选送去日本深造，同行者有蒋介石等共四十人。他们先入振武学校，张群与蒋介石同习炮科。同年，张群加入了同盟会，并经黄郛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的秘密组织“铁血丈夫团”（后称“成城团”），投身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在振武学校结业后，被编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为士官候补生，在冰天雪地的新潟高田（今上越市）接受严格的军营生活磨炼。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声震中外。张群在日本闻讯后，约同蒋介石、陈星枢脱下军服，化装回国，于10月30日到达上海。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加紧筹划在上海发动起义，张群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的活动。11月4日上海光复，陈其美任都督，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接着张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担任参谋，蒋介石任第五团团长。他与黄郛、蒋介石志趣相投，乃换帖共结金兰之盟。不久，蒋介石因刺杀陶成章案避往日本，张群遂代第五团团长职。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张群为上海讨袁军副官长。但讨袁军攻打制造局不能得手，各地反袁的军

事活动亦先后失败，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海外，张群亦东渡赴日。

张群到日本后，继续他的学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915年夏毕业时，正值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张群便赴南洋荷属东印度群岛，在爪哇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中华学校执教。是年12月，蔡锷等人在云南反袁护国，张群潜回上海，投身反袁斗争，去杭州任浙江督军署参谋，又在浙江驻沪办事处任联络事宜。

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祺瑞继起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翌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坚决反对，竭力“护法”，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张群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他以《民国日报》和《中华新报》的代表身份，参加新闻界访日代表团赴日，在东京等地的一些集会上讲演，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向日本政府借款，扩大军力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径。回国后又撰文《中日亲善之疑云》，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1)]。

其时，四川地方各派宣言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但是各路军阀争逐激烈。张群奉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指派，赴川调解内争。他先于1917年10月至重庆与杨森、夏之时等人发起“川事维持会”，以反对北洋军队入川；继后再于1919年秋入川担任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竭力调解四川督军熊克武与四川省长杨庶堪之间的矛盾。但是熊、杨水火难容，杨与吕超等人结合，熊克武被迫出走，张群亦难以自安，离川至沪。后来去北京，得到在北京政府任总长的黄郛照拂，先后担任总统府总务处长、交通部司长等职。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联合胡景翼、孙岳共同建立国民军。胡景翼是张群在日本留学时的旧友，政变后任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群应胡邀约赴豫，出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又任省会警察厅长。1926年春，国民二军被吴佩孚直军击败，撤出河南，张群由开封返回上海。

是时，广州国民政府正筹谋北伐，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群遂由沪南下，归附蒋介石。北伐的目的是要剿除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的近百万大军，而国民革命军自身只有近十万兵力，乃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为争取孙传芳暂时中立，以便集中兵力攻打吴佩孚，张群被蒋介石派去游说孙传芳。他到南京后，以留日同窗之谊，先与浙军师长周凤岐、陈仪秘密联络，又得到江苏省长陈陶遗等的帮助，与孙传芳晤谈。孙传芳在张群的游说下同意“局外中立”，并对苏、浙、闽、赣、皖五省通电“各自保境安民”[(2)]。但是当北伐军攻占湖南进军湖北之时，孙传芳声称“为保持五省安宁起见，爰派兵入赣增防”[(3)]，调集十万兵力进入江西觊觎湘、粤，准备分兵五路与国民革命军作战。张群赶快离开南京回到南昌，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接着他持蒋介石的密信北上，邀黄郛南来。1927年1月，蒋、张、黄三“兄弟”在南昌秘密商议如何与各方面协调关系，以便掌握江浙。他们商定：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并要适时地向国民明示这种政策；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谅解”，特别是“不应该放弃日本这条路”，还要注意轻重缓急的处置；三、力争早日光复宁、沪，联络绅商，谋求东南底定；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4)]。嗣后，张群随同黄郛潜往上海，与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密切联络，为迎蒋入沪做准备。接着他又衔命北上访问冯玉祥、阎锡山，笼络他们共同拥护蒋介石。张群四处奔走，花费甚多，曾对其友人云：“我一万多元都快赔光了。”[(5)]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中央，张群担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参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决策。蒋介石迫于内外交困之势，于8月13日下野回乡。张群也辞去任职，陪同蒋介石住于奉化溪口。接着以“翻译”的身份陪同蒋介石去日本遍访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还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其青山官邸进行了一

次重要会晤。田中向蒋介石和张群露骨地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反对蒋介石继续北伐的意向，劝蒋“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对张作霖则以“放任自流为上策”[(6)]，妄图控制奉张、霸占东北之心昭然若揭。蒋介石深感今后与日本取得密切联系至关重要，于11月8日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他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保持联络。张群口若悬河，四处游说，但是丝毫不能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狂妄野心。

1928年初，张群自日本归国。此时蒋介石已重掌大权，担任中政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张群被任命为中政会委员兼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中枢决策。是年4月，蒋介石再举北伐，日本蓄意阻挠，酿成济南“五三”惨案。蒋介石下令大军绕道北进，同时派张群去日本东京访问田中，请他理解和支持蒋介石的北伐，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济南事件。但是田中的既定政策是“坚决将中国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7)]，不肯答允蒋介石进占东北，张群交涉无效，悻悻而归。

张作霖在北伐军进击下，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东北，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皇姑屯炸死。接着日本又施展种种诡计阻挠张学良归附南京。为促使张学良早日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命，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说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是年9月，张群还专程赴日，希望田中和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并在东北问题上给予友好合作。由于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出使东北和日本达成使命，赢得蒋介石的更大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1929年3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旋又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其时国民党一些党政要员逐渐形成新“政学系”，视张群为首领。但张群深谙蒋介石专断骄矜之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故力主新“政学系”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不立纲领和原则，而要“各显神通，向蒋攀援”[(8)]，所言所事皆要揣摩蒋之意愿与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因而深得蒋之赞许

和青睐。张群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首领及地方军政头目不遗余力；在中原大战时又受命去东北游说张学良出兵入关拥蒋，获得成功。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张群秉承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旨意，在上海竭力消弭民众反日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怒谴责。这时蒋介石被迫下野，张群即乘势辞职，以示与蒋再次同进退。不久蒋介石复出，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全力“围剿”工农红军，张群被蒋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策划军事“围剿”中的政治攻防。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觊觎华北，张群被派去北平，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北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上是协助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代表蒋介石主持对日交涉，贯彻实施蒋的妥协退让政策。

1933年7月，张群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此时湖北境内的红军力量强大，蒋介石虽然已于一年前亲自坐镇武汉调集重兵“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和洪湖根据地，但红军根植于工农大众之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张群主政湖北的重要使命是加强政权建设，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编练民团，修筑工事，搜查缉捕，继续“清剿”，以保证蒋介石向江西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可免后顾之忧。是年夏，长江洪水暴发，湖北许多地方受灾，张群忙于赈济灾民，整顿税收，平衡收支预算。

时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华北的侵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不得不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日本的扩大侵略明确表示：“苟有碍于国家之自由平等者，亦决不稍有迁就”；“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9)]。会后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兼任行政院长，张群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在蒋介石的亲自主持下，在南

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全盘调整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12月20日，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见时，他表示："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10] 对于日方企图压服宋哲元"就地解决华北问题"，张群坚持"两国必须依正常办法，径由外交途径进行交涉"[11]。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声称中国政府对于"广田三原则"[12]已"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到了最近更进一步提议根据以上三原则举行日华亲善提携的谈判"[13]。张群立即命外交部发言人于次日严正声明："广田外相演说谓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14] 3月，张群与日使有田八郎举行四次会谈，仍然拒不承认"广田三原则"，同时指出调整中日关系的最正当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也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

是年8月，成都民众反对日本擅自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与日人发生冲突，殴毙日人两名。9月，在广东北海（今属广西）又发生一日侨被杀事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借此要求谈判调整两国关系，向张群提出中国首先要"改善空气"，取缔"排日"。张群委婉其辞，同时答称，中国之"一般空气"，都是因为日本"自'九一八'以来，一切行动均系侵略，不知野心有无止境，对于贵国之态度咸抱有绝大之疑虑与不安。这实为进行（两国关系）调整之最大障碍"[15]。对于日方在9月23日会谈中提出的七条要求，张群予以拒绝，同时提出了五条对案：废止淞沪和塘沽两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解散察东及绥北匪军[16]。张群虽然竭力周旋，避免谈判破裂，但是日方顽固坚持帝国主义立场，致使谈判陷入僵局。川樾茂承认："中国态度强硬出于意外，对华北特殊化地位与中日合作防共，坚持不同意。"[17] 日方眼看无隙可乘，在2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川樾突然向张群朗读一份事先拟就的"中日会谈备忘录"，要求承认。张群当即指出："贵大使刻所朗读之文件，其内容与历次会谈情形显有不符之处，不特有为我方向未谈及之记载，且对我方重要意见遗漏甚多，其中更有贵大使从未提及之

事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此种文件。”张群还对川樾说，“双方须顾到彼此立场，如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以及走私之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18] 川樾无言以对，把备忘录丢下即自行离去，张群命人予以退回。中日外交谈判就此中断。

张群在中日谈判中能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忠实行事，坚持强硬立场，不仅博得了蒋介石的赞许，在国民党政坛上一时也倍增声誉。1937年2月，他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和高级智囊。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群出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直接佐理蒋介石处置抗御日本的军政事务。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1939年1月，张群又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此时，蒋介石拟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以加强对战略大后方的统治，但遭到四川地方实力人物的抵制，蒋不得不亲自出任四川省代主席，而委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实际主持川政。直至1940年11月，张群才得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他大力整治四川的户籍、地籍，建立和健全乡镇政权和保甲制度，组训民众，调集人力物力粮食财富支持抗战。据统计，这期间四川共征集壮丁四百八十余万、民工一百五十余万，发动川民献粮二百三十四万四千余石，献金一亿七千万元。他还在川境主持修筑三千四百七十八公里公路，以便利战时运输。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9]，张群与王世杰等人代表国民政府方面，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延续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张群按照蒋介石拟定的“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一切“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20]的原则，在谈判中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21]。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谈判期间对解放区的进攻遭到失败，而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舆论密切注视和强烈要求谈判达成协议，双方经过反复谈判，终

于10月10日在《会谈纪要》上签字，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接着张群又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商谈国共双方停止武装冲突的办法，调处双方的武装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1946年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共同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日，张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本着蒋介石通过政协会议剥夺和消灭中共的军队和政权的旨意，同其他国民党代表在会上声言应先实施军队“国家化”然后再实行“政治民主化”。张群还说现在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要真正停止军事冲突，只有等到“中共部队的整编实施以后”，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

1947年4月，蒋介石标榜准备“行宪”，改组国民政府，张群受命组阁。张群以“社会贤达”王云五为行政院副院长，以附庸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首领以及“无党派人士”为政务委员和一些部的部长，而事实上国民党员仍占压倒多数，一切还都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一年间，正值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动乱时期，他虽然提出了“经济自助十项原则”，想要控制物价，稳定币值，清理税则，鼓励生产；但是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愈演愈烈而使其无能为力，只能疲于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此起彼伏的罢工罢课、反内战反迫害等运动。1948年5月，蒋介石当了总统后的第一届“行宪”内阁改由翁文灏组建，张群被蒋介石聘为总统府资政，不久又担任中政会秘书长这一要职。

蒋介石在内战中全面溃败，尤其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濒临绝境，不得不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但是在下野前除派陈诚去台湾主政外，还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经营以川、康、云、贵四省这个“大后方”。张群以“团结”、“自卫”、“自治”为施政要旨，四处安抚地方实力人物，竭力稳住西南局势。而人民解放军4月20日渡江后，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政府先从南京迁往广州，又于10月12日迁至重庆。蒋介

石先于8月24日飞抵重庆，与张群商讨“确保大西南”的方案，以后又在重庆、成都帮助张群部署防御，但是无法阻挡进军大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贵阳、重庆先后解放。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想再在云南作最后挣扎，一再要卢汉率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等机关迁往滇西，把昆明腾给从成都迁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遭到卢汉的拒绝。这时，蒋介石闻悉卢汉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密谋起义，派张群于12月9日去昆明劝阻卢汉。张群飞抵昆明即被扣押，但他不肯一同起义，写信给卢汉表示今后不再过问政治，让他去香港寓居。他还向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杨文清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了，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22)] 张于11日获释，立即经香港飞往台湾。

张群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岁月里，继续得到重用，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秘书长兼“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他为建立和维护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奔走甚力，1952年衔命访日，洽商日台合作，相互“恢复使馆”。1957年以“总统特使”身份访日，促进双方经济合作。1963年5月，又去日本，劝日本“采取坚决的反共政策”[(23)]。次年8月，再去日本鼓吹“共同反共”[(24)]，要日本对中共实行贸易限制。

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

---

(1)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见《张岳公

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2) 《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第3卷第31期。

(3) 《东方杂志》第23卷第19期，第141页。

(4)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253、260、354页。沈亦云是黄郛的夫人，当时随黄郛在南昌，深知黄郛活动情形。

(5) 冯若飞：《我所知道的张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9页。

(6)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1927年11月5日），《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20—222页。

(7) 日本内阁《对华政策纲领》（1927年7月），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4页。

(8) 冯若飞：《我所知道的张群》，《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02页。

(9)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5年11月23日），荣孟源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10) 《部长会晤有吉大使谈话记录》（1935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0—21页。

(11)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广田外相演说中三点之说明》（1936年1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续编（三），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46页。

(12) “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务省与陆军省、海军省经三次合议于1935年8月制定，基本内容是：“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反满政策自应抛弃，华北与满洲接壤的地区应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三、来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满支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作各种合作措施。”

(13)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日本

原书房1969年版，第329页。

(14)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广田外相演说中三点之说明》（1936年1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续编（三），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46页。

(15) 《张部长会晤川樾大使谈话记录》（1936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4页。

(16) 《〈廿五年中日南京交涉案〉节略》（1936年9月15日至11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3页；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任外交部长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

(17)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日本原书房1969年版，第348—350页。

(18) 《部长会晤川樾大使谈话记录》（1936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34页。

(19) 《张岳军先生论“敌友之辨”》，见《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20)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8、29日），《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8年刊印，第18、19页。

(21)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195页。

(22) 卢汉：《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1961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145页。

(23) 《张岳军先生访日归后述感》（1963年5月），见《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3页。

(24) 《张岳军先生访日归后述感》（1963年5月），见《张岳公闲话往事》，第114页。

张榕

武育文　黎光

张榕，原名张焕榕，字荫华。是辛亥革命时期在奉天府（今沈阳市）从事同盟会革命活动而牺牲的著名烈士。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奉天。先世济南，徙居奉天抚顺，遂籍抚顺人。他父亲张钦善，做过清广宁府（今北镇县）仓官，职位不高，却颇有积蓄，任满后，定居沈阳。

张榕青少年时，目睹沙俄在东三省的侵略暴行，受业师张振声“洗刷国耻，振兴民族”[(1)]的教导，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逐渐萌芽。他勤读文史，“兼耽骑射”，以图益世救国。那时，甲午、庚子屡败之后，国势一蹶不振，大好河山，任人宰割。1903年张榕到北京，学俄文于译学馆。为了结交同志，他住在沙滩附近一座寺庙里。这儿住有许多学生，他常常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倾心吐胆地交谈。又结识一位朋友黄中慧，是候补道台，做过驻美国旧金山的总领事，醉心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皇帝。黄年龄比张大得多，他们结成忘年之交。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榕弃学回乡。目睹两国军队在奉天城外决战时，炮弹纷飞，雄伟壮丽的八王寺被炮弹所摧毁，这位热血沸腾的青年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便和丁开璋等人到兴京（今新宾县）、海龙一带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公开名称是“东三省保卫公所”，发表宣言称“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2)]。他们又联络当地人士王阁臣组织乡团，“先从兴京、海龙府属实行倡办，内则训练乡军，捍御侮患，外则折冲樽俎挽回主权”[(3)]。并将章程条文在报刊上发表，还呈清政府备案，拟进行合法活动。岂知清廷在朝阳已被乡团弄得焦头烂额，不容张榕等

再启事端，便屡电盛京将军增祺查办，勒令其解散。

张榕被迫回到奉天，当局很注意他的行动。1905年7月下旬，张榕又到了北京，仍然住在沙滩附近那个庙里，并开始创办秘密刊物，用以鼓吹革命。又结识吴樾，成为生死之交。张榕设秘密机关于天津大丰巷某歇业典肆内，常往来其间，以通京、奉消息。9月24日，吴樾、张榕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当时以身殉，张榕逃走。后来警察在吴樾衣服里搜到一张张榕的相片，缉查追索十日，将张榕逮捕。黄中慧得知张榕被捕的消息后，电直督以全家性命担保，又联络张的亲友联名保释，都未得到回答。后清廷以叛逆罪，科张榕以永远监禁。张榕“在狱中四年，益刻意为学，博通群籍，而于兵符、政法尤宣，究得其精奥”[(4)]。

张榕下狱不久，就和典狱长王璋结成莫逆之交。王璋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豪侠之士，素有改革之志，曾经当过义和团的首领。1908年夏，王璋领着张榕越狱逃亡到日本东京。到东京后，张榕为了不忘黄中慧的救命之恩，易名为黄仁葆。不久，见到孙中山，遂加入了同盟会。他与在奉天的革命机关时常通信联络，准备发动东三省的武装起义。

1910年秋，张榕由东京返回大连，联络革命党人和关外新军，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8月，他与同盟会员陈幹策划，乘清军大操时带领新军从锦州入关，乘势直捣北京。未及实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三省，张榕立即从大连转入奉天，与谘议局长吴景濂商议联合革命志士，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反正，宣告独立。但吴景濂害怕革命，借口“事关重大”，没有同意张榕的要求。不久，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在北大营召集秘密会议准备起义的机密泄露。赵尔巽感到新军不可靠，异常惊恐，调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进驻省城，监视新军，镇压革命派，维护反动秩序，并合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张榕、蓝天蔚对赵尔巽等人的阴谋丝毫未发觉，也赞同成立“保安会”，随时宣布独立。11月11日晚，军阀官僚和立宪派要人召开“保安会”筹备会，草

拟章程，决定推举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伍祥祯为副会长。12日下午在谘议局召开奉天军、政、工、农、商、学各界和各自治团体代表大会。会上保守派利用张作霖实行武力威胁，“公举”赵尔巽为保安会长，吴景濂、袁金铠、伍祥祯、张榕为副会长。因“保安会”被保守势力所操纵，张榕未到任。

11月14日，赵尔巽解除蓝天蔚的兵权，迫令出走，以“保安会”军事部长聂汝清兼第二混成协协统，加强对新军的控制。赵尔巽并以保安会长名义对奉天驻军下达命令说：“倘发见暴动之事，则以敌人对待。”[(5)]

张榕看到吴禄贞被刺，蓝天蔚被迫离奉，“各党竞立机关，多于毛羽”，“其势涣散，多不得力”[(6)]，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为了推动革命继续进行，把东北的革命力量联成一气，和保安会进行斗争，他积极联络同盟会会员柳大年、张根仁等，于11月17日在奉天成立“联合急进会”。会上推举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为副会长，吴景濂、钱拯、左拯之为参议。张榕在宣布“联合急进会”的政治主张时说：联合急进会“尊重人道主义”，“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至于清帝退位，“尤为吾党所赞成”[(7)]。

“联合急进会”成立后，发展很快。“四方豪杰，入会者十余万人”[(8)]，在东三省各地力量很大。但张榕没有乘奉天城内反动势力空虚之时发动武装起义，而是首先与赵尔巽进行谈判。张榕要求赵尔巽“速悬白旗，以静民心”。赵“始则含糊，终竟拒绝”[(9)]。谈判决裂后，奉天城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革命派很难继续在省城进行活动。张榕等人决定先在各地举行起义，引诱省城军队出动“讨伐”，再乘虚占领省城[(10)]。因此，只留下张榕等少数人居省调护，掌握中枢工作，其余人员分赴庄河、宁远（今兴城）、辽阳、安东（今丹东）、凤城等地，运动军警，组织民军，策划武装起义。

12月18日，南方革命军代表与清廷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议和，又

有召开国会的消息。赵尔巽与张榕相约，东三省的事情，静俟国会解决，在这期间彼此不得开战。张榕遵守南北谈判的停战条约，并允许在停战期内，不搞军事举动。当时“联合急进会”交通部长洪东毅已组织四千余人准备在抚顺一带起义，因奉张榕电令而停止[11]。赵尔巽却背信弃义，撕毁协约，乘停战期间镇压各地准备武装起义的“联合急进会”，并在宁远逮捕了该会副会长张根仁、柳大年等重要人物。又面谕张作霖“随时访查首要人等，捕拿送案，以遏乱萌”[12]。张作霖在赵尔巽的指使下，磨刀霍霍，准备暗杀张榕。

1912年1月23日晚，袁金铠有意邀张榕、张作霖到德义楼吃饭。宴毕，袁金铠兴辞而去，张榕与张作霖同出德义楼，张作霖的便衣特务尾随其后，用手枪将张榕击毙。张榕中弹后，大声叱骂赵尔巽等。“至死，怒眦尽裂，露尸一昼夜，目未瞑也”[13]，时年二十九岁。当夜，被杀害的还有宝昆、田亚赟、张振声等数十人。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南京给张榕举行了追悼会。

张榕好诗文，曾以“辽鹤”二字署其诗。他的朋友搜集印刻了他的诗集，题曰《辽鹤集》。他的诗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和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

---

(1) 《张振声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2) 《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3) 《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4) 《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5)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4日。

(6) 张根仁：《关东革命始末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2—403页。

(7)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4日。

(8) 《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9) 《盛京时报》1912年3月16日。

(10)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

(11) 《洪东毅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12) 《张作霖报告杀害张榕等人的呈文》，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13) 《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张绍曾

陈宁生

张绍曾，字敬舆，直隶（今河北省）大城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1896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1899年毕业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官费资送留日，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他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的主张都产生一定兴趣，对清朝专制政权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感到不满，认为非痛加改革不可。

1901年，张绍曾从日本毕业后归国，正值袁世凯在保定练兵，成立练兵营训练初级军官，张被派任炮兵队官。1902年，袁世凯以“尽先千总”衔委他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第五标帮统。1904年，调任北洋督练公所参谋总办，翌年转陆军第五镇任正参领官，不久升炮兵第五标标统。1906年，新军彰德秋操大演习，他被奉派为北军第五混成旅正参谋官，次年初与士官学校同学吴禄贞、蓝天蔚，被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到奉天军界任职。由于三人“志趣相投，过从密切”，又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北洋军中杰出的维新人物”[(1)]，被称为“士官三杰”。这时宋教仁以创办实业为名，来东北发展同盟会，并在奉天成立辽东支部，张与吴、蓝均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支部的主要负责人[(2)]。1909年，袁世凯被罢官后，张绍曾陪同清军禁卫军第一协统领良弼检阅袁的军队，得良弼器重，调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1910年，陆军部奏请清廷授予他副将加“总兵衔”。陆军部右侍郎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那晋赴东三省检阅陆军，以张绍曾为总参赞。1911年2月16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保举，张受命继陈宦任陆军第二十镇统制，驻守奉天、新民。4月7日，清廷赏以副都统衔[(3)]。

1911年，清政府拟于九月在直隶永平（今卢龙）举行秋操演习，

张绍曾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均受命率部参加秋操。张和吴、蓝“秘密决定，利用参加秋操之便，暗中私带子弹，相机起义”[(4)]。当张部刚抵昌黎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下令停止秋操，令其率部开到滦州，然后南下镇压起义。张于10月13日急返奉天，约集第三镇第五协统领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共商对策。10月27日，张绍曾等由奉天返滦，立即向全体官兵宣布：“武昌革命，名正而言顺，专尚征讨，不合人情……所有军队，均不前进。”[(5)] 29日，又将所拟立宪政纲十二条，联名致电清廷，要求速开国会，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主张在保存清政府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

清廷对手握兵柄、近在肘腋的张绍曾等人的宪政奏折颇为震惊，迫于形势，不得不公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同时加紧对第六镇和第二十镇的革命力量进行分化瓦解：首先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宣慰”，使他离开第六镇；接着赐予张绍曾为兵部右侍郎兼长江宣抚使，削去他的第二十镇统制职。二十镇的部分军官获知张被解职，义愤填膺，群起挽留，并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吴禄贞也竭力劝说张绍曾与他配合，从滦州和保定两路夹攻北京，以武力推翻清廷。11月17日，吴禄贞在石家庄被新任内阁大臣袁世凯指派的刺客杀害。张绍曾闻讯，感到大势已去，准备引退。11月9日，张离开了第二十镇，避居天津。临行前，“向全体革命同志曰：吾前此奏请立宪，志有所在。兹计已败，暂寓津门，以俟时会。望诸君仍本前旨，继图大举，功不必自我成，承吾志焉幸矣”[(6)]。1912年1月2日，王金铭、施从云等发动了著名的“滦州起义”，血战一昼夜，即遭血腥镇压，张绍曾闻讯，“痛哭悲戚，寝馈失常”[(7)]。

民国成立，袁世凯利用张绍曾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派为长江宣抚使。张奔走于津、沪参与南北和议。1913年5月，进步党在北京成立，张为该党名誉理事。10月，袁世凯委派张为绥远将军，并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张秉承袁的旨意，安抚蒙古王公贵族，承认他们的

世袭地位和特权，使之后来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社会基础。1914年4月，张被调为北京政府特设的将军府将军。1915年又被任为陆军训练总监。不久，又被调为总统府顾问，加封“树威将军”。袁策划帝制时，张还曾与曹锟以直隶公民代表身份，向袁世凯呈递请愿书[8]。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2月张绍曾任全国陆军训练总监。1917年6月，督军团以武力威逼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张予以反对。7月1日张勋复辟，张绍曾即与冯玉祥等密商讨伐事宜，偕冯同车赴津。3日晨亲至马厂，鼓动李长泰出动一混成旅会同冯部向北推进。此时，段祺瑞被拥为讨逆军总司令，在马厂誓师，揭起反复辟旗帜。复辟敉平，张绍曾这个主动组织讨逆的人，反倒被撤去了陆军训练总监职。

1920年7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击败皖系，推翻了段祺瑞内阁。张绍曾因与吴佩孚、冯玉祥有儿女姻亲关系（张女嫁吴子、张子娶冯女），转而归附直系门下。8月，吴佩孚发起召开“国民大会”，企图以“合法”手段取消南北两政府，建立一个由直系操纵的统一政府。张为吴的倡议奔走串联，不遗余力。翌年张倡导“国是会议”，主张全国议和，因张作霖反对作罢。

1922年5月，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胜，独霸中央政权，张绍曾继续为直系建立一个“合法”的中央政府出谋划策。他先通电支持部分旧国会议员“恢复法统”的倡议，恢复民国六年（1917年）被张勋胁迫解散的旧国会；接着积极参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人驱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职的活动[9]。6月，黎元洪再次上台。8月起，张绍曾出任陆军总长。

不久，曹锟急于想登上总统的宝座，与吴佩孚先以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相左，使直系分裂成以曹锟为首的“津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张绍曾得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支持，迎合曹锟，参与津保派策划的贿选活动。此时曹、吴都力图控制内阁，几月

间内阁频繁更迭。黎元洪认为张既与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儿女亲家，遂提名张绍曾组阁，1922年12月底获参众两院通过。1923年1月4日，张绍曾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张绍曾上台后，和黎元洪协同一致，标榜和平统一。在就职通电中，以“法统重光，海内一体”[10]相号召。他建议召集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名流在北京颐和园举行“国是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问题。2月，致电孙中山及西南六省，倡议召集全国军事会议，协商解决裁兵诸问题。还和黎元洪分别派代表南下议和。张的和平统一活动同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方针相悖逆，曹、吴遂指使高凌霨等三人，以迟迟不入阁加以抵制。其间，桂系沈鸿英在广东叛变，直系孙传芳大兵进入福建，造成对南方政府内外夹攻的形势。吴佩孚企图利用这两支军队作为武力统一南方的先锋，于3月初压迫张绍曾任命孙传芳为福建督理、沈鸿英为广东督军，公开破坏和平，向孙中山挑衅。张认为这两项任命有违他和黎元洪的和平统一主张，拒不接受，并于3月8日以内阁名义发出庚电“引咎辞职”。黎元洪全力支持张绍曾，立即退回辞呈，并通电全国，挽留张阁。但曹锟和吴佩孚固执己见，各派一名代表联袂赴京，逼迫黎、张下委任令。张为保住权位，终于屈从曹、吴，同意任命闽、粤两省督理。他不仅放弃和平统一主张，而且还指责孙中山“僭名窃位”[11]。

但是，张绍曾并未能安居揆位。由于在总统选举问题上，他与黎元洪主张先制宪后选举，而与曹、吴的主张相悖，曹、吴便寻衅倒阁。为了加快制宪进度，张和黎决定由海关建筑经费项下拨借120万元作为制宪经费，通知税务处转总税务司照办。曹、吴即以此事为发端，策动“阁员倒阁”，进而驱黎拥曹。5月，直系高凌霨等三阁员以不出席内阁会议相威胁；接着以总统府不经国务会议议决，自定国会制宪经费，侵夺内阁职权为借口，提出内阁总辞职。6月初，张绍曾自知势单力孤，但又依恋权位，在私下得到曹锟等选举总统后，仍请他组阁的默许后，便同意辞了职，离京去津。接着，黎元洪也被逼下

台，张闻讯后仍幻想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但当他登车欲返京时，突然接到曹锟阻止他回京的电报，不得不沮丧地下车。10月，曹锟贿选总统得逞，张绍曾仅被授树威上将军衔，每月领点俸金赋闲。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扣留曹锟，吴佩孚兵溃退至天津。张绍曾一度奔走于京、津之间调停，提出“和平救国大纲”劝吴接受，但遭吴拒绝。11月24日，段祺瑞在京就任“临时执政”，组成临时执政府。张绍曾大不以为然，隐居天津，不再问政。1925年初，段为了抵制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运动，策划召开“善后会议”，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以作装饰，张不愿俯就。

1925年底，吴佩孚东山再起，企图重整旗鼓控制北京政局，闲居天津的张绍曾不甘寂寞，再次出头露面，重弹“恢复法统”的旧调，于1926年1月8日通电主张旧国会自由集会，依法成立政府。张联络在津议员，鼓动他们在京开会。他的如意算盘是通电促段祺瑞下野，请黎元洪复位，恢复张绍曾内阁；如黎不肯出山，则由张摄政。但是段祺瑞恋栈不舍，吴佩孚又忙于联奉打冯玉祥的国民军。张绍曾虽奔波劳碌，却一无所获。

1928年初，蒋介石与冯玉祥等人联袂筹划北伐奉张，在天津的张绍曾和冯玉祥不断有信使往还。张作霖害怕张绍曾成为冯玉祥北上的内应，于3月21日派遣亲信将张绍曾刺杀。张遭枪击，身中三弹，翌日晨死去[(12)]。

---

(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2)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6页。

(3) 《镇协赏衔上谕》，《正宗爱国报》（北京）1911年4月8日（清宣统三年三月十日）。

(4) 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66、168页。

(5)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01页。

(6) 罗正伟：《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3年复印本，第67页。

(7) 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212页。

(8) 《时报》1915年9月22日。

(9) 《张绍曾通电》（6月3日），《努力周报》第6期，1922年6月11日。

(10) 《张绍曾五日通电》，《时报》1923年1月7日。

(11) 《张绍曾等内阁辞职电》，《时报》1923年3月10日。

(12) 《大公报》1928年3月22日。

张申府

萧良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字申府、申甫，河北献县人。1893年6月15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二）生。其父张濂为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曾任众议员。1913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数学助教。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张投身到这一运动中，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改教逻辑学，研究哲学；并经常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抨击尊孔读经、君宪救国等谬论，揭露复辟丑行，与封建专制作斗争。1918年12月12日，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任该刊和《新青年》杂志编委。他与高一涵、王光祈等主要撰稿人经常为《每周评论》撰文，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为五四运动作思想准备。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与主编的《每周评论》又详尽报道了五四运动发展情况，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7月加入中国少年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与李大钊等倡导“奋斗”、“坚忍”、“俭朴”等信条。1920年1月，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3月，参加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此基础上与李大钊等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同年9月南下，迎接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时，曾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讨建党事宜。10月与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秘密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劳工运动，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进行斗争，迫使其退出小组。还创办了通俗刊物《劳动者》，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创办《工人周刊》，介绍工人的痛苦生活，报道劳工运动消息，启发工人觉悟。北京小组是中共早期组织之一。

1920年12月，张申府赴法讲学，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1921年2月，陈独秀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嘱其与张申府联系，在巴黎组织共产党支部。张因早受李大钊、陈独秀委托，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故积极在巴黎从事建党活动。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又与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后又吸收赵世炎、陈公培等人入党。1922年3月，与刘清扬、周恩来等由法国到德国。同年秋，在柏林组建中共旅欧总支部，任支部书记兼中共中央驻柏林通信员。在德期间又结识了朱德，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申府于1923年底回国，抵达北京，向李大钊汇报在法、德建党情况。1924年2月，又在上海向陈独秀作了汇报。后由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蒋介石的英文和德文翻译。又应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之聘任图书馆馆长。他到黄埔军校后，为首批学员的招生做了大量工作。5月12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因对蒋介石飞扬跋扈不满，于6月底辞职离校，转入广东大学。旋又受到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右派邹鲁排挤，即由广州转往上海。1925年1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时发生争执，负气执意退党，留沪从事翻译和著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与国民党左派一起，为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和独裁，坚持民主主义而开展斗争。1928年夏，参加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并任该党中央领导成员。在此前后，他历任暨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华北，民族危亡加剧之际，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支持并参加发动北平学生开展“一二九”运动，拥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月

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当选为执行委员。因同情学生爱国运动，2月29日被北平当局逮捕系狱；5月初获释。同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十四人任常务委员，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7月初被清华大学借故解聘，去职后任华北七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务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五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宪政促进会秘书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华北总支部负责人。1946年，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当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后，他与民盟领导人一起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取缔其活动。但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观察》周刊第5卷第9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为国民党洗刷罪行，诬蔑人民解放战争，违反民盟的纪律，被民盟中央开除盟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长期从事文献翻译和中外文图书采访等工作。1955年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改正。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顾问、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1986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雷颐：《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张申府》，《东方》1994年第1期。

《张申府》，台北《传记文学》第62卷第5期，第146—148页。

张石川

陈野

张石川，原名伟通，字蚀川，经商后改为石川。1890年1月1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蚕茧商人家庭。他自幼聪颖，性格豪放，争胜好强。十六岁丧父，跟随舅父经润三到上海。经任华洋公司的总经理，派他当“小写”。

张石川崇拜舅父，梦想将来也当上大买办，便在工作之余上夜校攻读英语。两年后，他当上了美化洋行广告部的买办。

清末民初，上海文明新戏（话剧）盛行，张石川的另一个在洋行当买办的舅父经营三，其时办了一个文明戏班“民鸣社”。张亦醉心于文明戏，常与当时的著名演员来往，并结识了著名的戏剧活动家郑正秋。1913年，美商依什尔和萨弗见张石川机警灵活，又与文明戏班有联系，便聘请他做“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主持公司拍片事务。张石川原来对电影事业完全无知，他与郑正秋、经营三商量后，竟毅然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

“亚细亚”的第一部影片是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1)]，表现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的不幸遭遇。这是我国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从此，张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干得更起劲了。当时，美国笑片在上海很受欢迎，他照猫画虎，连续拍了《活无常》、《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老少易妻》等十余部短片，大多是庸俗无聊或滑稽打闹之类的影片。参加拍片的多是演文明戏的演员。新民公司和演员订有拍片合同，对演员有

极为繁琐的规定，如“角色轻重悉依公司指派”，“不准半途中止”等，如有违背，“重则罚洋，轻则记过”[(2)]，等等。这种合约反映了张石川和经营三主持的新民公司对演员的苛刻待遇，具有很大的封建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影戏公司关闭，张石川改替经营三掌管民鸣社。不久，又给经润三筹办的新世界游艺场赚了一笔钱。

1916年，美国胶片输入上海，张石川凭他在“亚细亚”拍片的经验，凑了一笔款子，办起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在舞台上轰动一时的文明戏《黑籍冤魂》。这部影片揭露了鸦片的毒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幻仙”资金太少，终因周转不灵而停业。

这时，经润三去世，其妻汪国贞让张石川帮助经营新世界游艺场，并委派他任经理。张学着经润三的手腕，到处耍噱头，后又帮汪国贞办起了一个“‘新新世界’，除了戏曲杂耍、溜冰场，弹子房……还开‘花榜’，选举上海名妓作‘花国总统’”[(3)]以招徕顾客。后因他异想天开的花样过多，摊子铺得过大，又斗不过黄楚九经营的“大世界”，结果把汪国贞的两个游艺场都赔出去了。

1920年后，张石川又在富商何泳昌（以后成为张的岳父）的推荐下，充当瑞慎洋行买办。不久，再度与郑正秋合作，约周剑云、郑鹧鸪等人参加，发起组织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张石川把电影当成游艺场一样来经营，专以投机牟利为目的。初创时期，他提出拍片应“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4)]，坚持要明星拍笑片、闹剧，不采纳郑正秋主张应摄“教化社会”的正剧长片的意见。因此，明星最早的四部影片，都是表现一些滑稽打闹或以惨无人道的杀人场面来刺激观众的低劣噱头。这些影片不受观众欢迎，以致营业失败。

但是，张石川决心终身从事电影事业，开始钻研电影艺术。他本

来既不懂编剧，也不懂导演，只会模仿抄袭美国影片的情节和技巧。后得知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教授格雷格雷来中国旅游，张立即请他到刚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讲学，传授编、导、演和摄影、洗印等方面的经验。他还从格雷格雷那里获得一批电影方面的书籍，日夜苦读，从此懂得了一些电影艺术的门路，开始同意郑正秋拍摄正剧长片的主张。1923年底，明星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宣扬“惩恶”、“劝学”，故事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颇能引人入胜。此片在艺术处理上也有新的突破，从剧本取材、服装到布景，都有较多的民族生活气息；表演上也摆脱了一些文明戏的夸张动作，使银幕形象在真实性和生活化方面都有提高。影片公映后，大为轰动，从经济上挽救了明星公司拍笑片带来的危机，使张石川尝到了拍正剧长片的甜头。同时，他也认识到，要继续拍摄正剧长片，必须有好的电影脚本和导演。为此，他聘请了在美国学过戏剧的洪深任编导，加强了明星公司的阵容。

从1924年到1928年，张石川和郑正秋连续合作编导了《玉梨魂》、《盲孤女》、《最后之良心》等二十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揭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妇女被压迫被凌辱的处境，描写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但张并不考虑这些影片的社会意义，而仍是以追求票房价值为目的，总以大团圆为影片的结局来调和深刻的社会矛盾。他认为：“不让太太小姐们流点眼泪，她们会不过瘾，说电影没味道；但剧情太惨了，结尾落个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又叫她们过于伤心，不爱看了。必须做到使她们哭嘛哭得畅快、笑嘛笑得开心。”[5] 他为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口味，又物色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给明星公司编写言情剧本，如包天笑写的《空谷兰》、《可怜的闺女》等。他自己也编剧本，常找人来说故事编戏，或翻看那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对哪一个情节感到有兴趣，便如痴如狂地编起戏来。

1927年后，正当一些投机商人纷纷成立影片公司，粗制滥造一些

爱情风波的影片，以牟厚利的时候，张石川又花样翻新，抛出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运用电影特技手法，以刀光剑影、飞檐走壁来刺激小市民的好奇心。影片一出，远近轰动。《火烧红莲寺》连续拍了十八集，张获取了大笔利润。经张石川煽起的这种武侠神怪片妖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恶浪，一时间，上海拍出的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余部，有的观众受到毒害甚至误入上山修道的歧途。接着，美国有声影片输入中国。1930年，张又抢先导演了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盈利甚厚。以后，他又亲自改编并导演了《啼笑姻缘》，先后拍成六集。

1932年夏，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郑正秋等感到过去的道路行不通了，迫切要求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合作，通过洪深聘请夏衍等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并组成编剧委员会。夏衍等人创作出《狂流》、《春蚕》、《前程》、《脂粉市场》等一批表现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影片。这时，作为明星公司总经理的张石川，看到进步影片映出后，观众热烈欢迎，舆论大加赞扬，营业蒸蒸日上，既有名，又有利，甚为满意，认为非跟时代走不可。他支持左翼电影艺术家在明星公司拍摄了一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影片。在一个时期内，明星公司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拍片阵地。

1933年10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以监视、威胁、逮捕乃至杀害等手段迫害左翼文艺工作者，夏衍等退出明星公司，但暗中仍继续与明星的进步导演合作，拍出一批进步影片。可是，张石川看到左倾有风险，不是生意经，又向右转了。他吸收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到明星公司充当编剧，拍摄出鼓吹封建家教的《妇道》，污蔑和掩盖农村阶级斗争的《重婚》等影片。这一年，他还到江西去替蒋介石拍了一部纪录片《剿匪纪实》，宣扬军事“围剿”，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1936年后，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明星公司在进步电影工作者支持下又恢复了编剧委员会，聘欧阳予倩主持，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拍摄出《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

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电影史上璀璨的珍品。张石川为了谋求既能赚钱又不担风险的两全之策，他既走“进步”这条道，又不放弃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做法，仍抱着“鸳鸯蝴蝶派”或恐怖杀人的作品不放，甚至歌颂国民党反动法律的《永远的微笑》也出笼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占据明星总厂为兵营，经营了十五年的明星公司被迫停歇。张石川以从明星总厂抢出的机器和底片作价，加入柳中亮、柳中浩兄弟的国华影片公司。这一时期，张石川企图重整“明星”家业，窥测影片市场的行情，拍摄出不少宣传恐怖、色情或有封建毒素的影片。为了和“艺华”、“华新”、“春明”三家公司抢生意，争夺《三笑》、《碧玉簪》和《孟丽君》的拍摄权，他同时主持三个戏的摄制工作。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架穿梭不停的机器，也把演员变成了终日转动不歇的机器，演员们随着他的吆喝，在摄影机前团团转。这样，创造了七天完成一部《三笑》的影坛奇闻，其粗制滥造也就可想而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上海的十二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先后担任分厂厂长兼导演、制片部长等职。日本投降后，张石川曾被指控为汉奸。他吓出了一场大病，从此一蹶不振，病卧不起。1953年7月8日去世。

张石川一生编导了近一百五十部长短故事片，其中虽有揭露社会黑暗的若干部进步影片，但绝大部分是迎合小市民趣味，低级粗劣，甚至反动有害的影片。他四十年的电影生涯，既反映了他个人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本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

---

(1) 钱化佛口述：《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中国电影》创刊

号（1956年10月28日）。

(2) 据北京中国艺术博物馆所藏合同原件。

(3) 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文化史料》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4) 张石川：《敬告读者》，《晨星》创刊号（1922年），上海晨社版。

(5) 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文化史料》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张士秀

张天政　邸娜

张士秀，字实生，山西临晋南营村人，生于1870年（清同治七年）。张士秀自小聪慧，据说八岁便能抚琴作诗，十二岁时曾以口算胜过知县的珠算，并替父亲打赢了与伯父的官司，夺回了田产，从此有“铜嘴铁舌”的绰号。后来，张士秀中了秀才。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张士秀边务农边经营商业，由于他擅长经营，家道也逐步复兴。

1900年，张士秀出任临晋县差役局局长，上任后不久就将原本繁琐凌乱的差役事务整理得井井有条。河东道员陈际唐很赏识张士秀，便邀请他到运城并委以“回澜公司”（该公司创办人为景定成，名义是出售西药，实际上输送新书报传播革命思想，并且是革命活动的联络机关[(1)]）总理事的职务。此外，张士秀还兼理河东第一纺织公司。

1906年，张士秀受清廷派遣赴日本游学并考察实业。在日期间，他经常与景定成、章太炎、王用宾等人讨论怎样反清救国，“亦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2)]。一年后张士秀回国，一面继续管理回澜公司，一面暗中联络革命力量，发展同盟会会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山西省谘议局成立，张士秀被选为常驻议员。

1910年春，“文交禁烟”惨案发生，张士秀以谘议局议员的身份被山西巡抚丁宝铨派往文水、交城两县安抚烟民。张士秀在详细地了解“文交禁烟”惨案的真相后，将真相公布于众，结果丁宝铨被御史胡思敬弹劾并被送部议处降级留职。丁宝铨为了报复张士秀，贿赂满族御史荣光并声称：“山西士气淳朴，近年嚣张殊甚，恐有不逞之徒，潜伏生事，交晋抚严查。”[(3)] 丁宝铨遂以“鼓吹革命煽动人心”之罪，

列王用宾为罪首并株连法政专校监督刘绵训、山西大学堂监督解荣轺、谘议局议员张士秀、报馆记者张树帜等，以“挟妓逞凶”之罪名，将张士秀逮捕并送回临晋县监狱关押，判处其二年徒刑。张士秀在狱中常以琴书自娱，并没有因身处狱中而心灰意冷。据说狱门上曾贴有其手迹：“困极必大亨，死地而后生。”表面上张士秀不关心外界的事情，实际上他常借助亲友探监之机与外界保持联系，密谋推翻清廷之计。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同盟会领袖黄兴曾致函运城同盟会会员，嘱咐务必要将张士秀营救出狱。武昌首义后，陕西同盟会会员邹子良到狱中探望张士秀，张士秀详细地询问了陕西的情况，并与之商量对策。1911年10月29日，太原响应武昌起义光复，革命大势已定，临晋知县害怕祸及己身，急忙将张士秀释放，并欲延请帮办防务，但遭张士秀拒绝。不久，山西都督阎锡山、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相继电召张士秀入省，张士秀鉴于曾陷害自己入狱的人有的仍占据要职，便以“此贼犹在，我军行将败矣，不如据河东以图补救”为由拒绝北上，转而西渡黄河到达陕西。当时，“晋南方面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除在辛亥前已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而外，还有经回国后的会员先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许多人士，其中以安邑的李鸣凤、临晋的张士秀、虞乡的尚德等为最著。辛亥起义前，他们经常奔波于山西、陕西两省之间，鼓吹革命，联络同志，积极进行起义事宜”[(4)]。

张士秀到陕西后，先后面见了陈树藩、井松生、井勿幕、严庄、李仲三等人，介绍了运城一带的情况，声称有尚德、胡足刚二人对运城情形甚为熟悉，但井松生、井勿幕二人皆以新兵未加训练为由拒绝参加。张士秀只得在朋友引荐下面见陕西都督张凤翙，细陈援晋之利，但张凤翙也面露难色。而在当时，陕军也极欲过河却被军饷所困，陕西人民的食盐供应严重不足，山西河东既是食盐产地又是收税之所，如能运盐过河，这两个问题便都迎刃而解。陕西革命初起之时，由会党组织的军队人员不够充裕且无党人领导，军纪极坏，陈树

藩辖区的阎飞龙部即属此类。如果将这部分军队带到山西境内，就可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加以整编，使其容易就范。基于上述原因，陕西军政府派陕西东路节度使张伯英与张士秀签订《秦晋同盟互助条约》，张伯英由潼关调兵支援河东。正在这时，清军急攻潼关，张伯英一时不便分兵，张士秀无奈之下只得暂且回晋。当时，先期到达蒲州的王用宾正与蒲属六县同盟会会员商议组建民团事宜，张士秀到蒲州后便被公举为蒲属六县民团总团长。该民团名义上是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上是为光复河东而训练革命武装。此后潼关、娘子关均被清军攻占，一时间人心惶惶，反动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到处疯狂逮捕革命党人。太原失守后，副都督温寿泉率起义军南下，张士秀二次赴陕请援。12月27日，河东节度使陈树藩统率哥老会洪门头目——河东安抚使陈树发、阎飞龙等部众相继履约东渡到达蒲州。张士秀考虑到中路清军防守虚弱，便献计从中路进攻运城。1911年12月29日，秦陇复汉军一举攻克运城，1912年1月1日，运城宣告光复。运城光复后，秦陇复汉军司令陈树藩发布告示安抚民众，从陕西归来的张士秀也会同陕军将领召集会议，共同商讨组织机构的办法。司令官陈树藩当场宣称："我等系客军，不便管理地方事务，应由当地人士组成机构，维持地方。"[(5)] 经过投票选举，议定由张士秀担任河东民兵总司令，总理地方军务事宜，王用宾担任兵马节度使兼民政长，负责管理民政、财政、盐务。另设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地方银行并委派专人负责。

此时南京政府对山西革命态势极其关心，特派王北方到运城视察，了解阎锡山出走后的革命势力进展情况，并召集了有各军政负责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革命前途问题。与会者一致通过了组织统一领导机构的决议，由副都督温寿泉组织河东军政分府，组织豫晋秦陇联军以策应两省出境作战。河东军政分府成立后，公推张士秀为河东军政分府民政长，总理晋南民政兼管盐政。"此盐引岸，为山、陕、豫各半省，军兴后运销失常，陕岸概为土盐侵占，产运两商俱请求恢复，于是以报酬援晋及恢复引岸之名义，不收任何税款，赠送并勿

幕、陈树藩部潞盐二千名（每名三万余斤）”[6]。陈树藩将食盐运回陕西后，在关中遍开盐店，获利丰厚，并用此项收入购买了大量军火，极大地扩充了兵力。阎锡山得知此事后，严厉诘责张士秀等人，从此二人结下芥蒂。

河东军政分府成立后，鉴于太原南镇总兵谢有功为害地方，有急速消灭的必要，总司令李鸣凤统辖万余人到临汾、绛州一带与谢有功、陈政诗率领的清军激战。张士秀驻守运城，对前线所需枪支、弹药、食粮等尽力支援。同时，他到运城和王平政等人成立同盟会运城支部，到各县组建组织，宣传革命。

1912年7月12日，河东军政分府被撤销，副都督温寿泉委任张士秀为河东观察使，这就在事实上使晋军第一旅旅长李鸣凤控制了晋南地区。阎锡山回太原前，温寿泉曾电请袁世凯撤销副都督名义，得到了袁世凯的回电和嘉奖。阎锡山回太原后，立即派出马开崧、南桂馨等迎接温寿泉回省改任军政司司长。张士秀和李鸣凤等均劝告温寿泉不要上阎锡山的圈套，应在河东自立基础，但温寿泉不听。当时恰巧马开崧玩弄温寿泉手枪走火，击中温寿泉腹部。李鸣凤等因南桂馨为阎锡山亲信，便怀疑其有意行刺（马开崧与温寿泉私交甚好，所以在怀疑之外），吊打南桂馨。直到温寿泉苏醒后，证明确实是马开崧玩弄温寿泉手枪时无意走火，而与南桂馨无关，南桂馨才获释。阎锡山为了独霸全省，早就把晋南民党张士秀、李鸣凤视为眼中钉。1912年10月，阎锡山借口统一全省财政问题，将原任巡警道的南桂馨改为河东筹饷局局长，企图从攫取河东财政入手进而扼杀晋南革命势力。南桂馨到运城组织成立了筹饷局，命令各县钱粮、地丁一律直接解局，除分府经费外，一律解省，每日与阎锡山往返密电数起。后来电文全都一字不漏地被翻译了出来，印刷成册公布民众，阎锡山不可告人的恶毒阴谋毕露[7]。南桂馨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当时，李鸣凤旅有许多军官是同盟会员，也是我在第一标的旧同事，在友谊上有所往还，这本来是平常事，我并未介意。而李（鸣

凤）、张（士秀）疑我对该旅军官进行挑拨离间，直接破坏成立第二师的计划，间接为阎（锡山）效力，遂以请我吃饭为名，将我拘捕，并派法官开庭审讯一次……我被拘月余，适逢杨彭龄到了运城，有事和李、张接洽，密派人问我有何嘱托，我即写了几句话，请他转交阎锡山，大意是请阎以山西全局为重，我个人的生死不必考虑，但李、张的事件，恐山西不能自决，应请中央处理。”[8] 阎锡山早就不满张、李二人在晋南的势力，遂以“南桂馨事件”为借口，故意大张其词地向袁世凯控告张、李二人，诬蔑他们违命不遵、反抗中央、密谋叛乱，请求讨伐。袁世凯原本就因张、李二人为同盟会会员，早已有意伺机铲除，于是在1913年春派晋、陕、豫三省出兵围剿。晋南镇守使张煌屯兵不进，而陕兵则临河观望，只派茹欲立调查，只有河南毅军统领赵倜（袁世凯心腹）连夜率军渡河到蒲州。张、李二人开始时准备抵抗，但王用宾以“众寡悬殊，徒使地方糜烂”为由，下令撤河口守兵，静候法律解决，这就使得赵倜不发一枪就控制了运城。张、李二人被拘捕入京，冠之以“称兵作乱、危害民国”的罪名，囚禁在北京宪兵营月余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审判长陆建章、副审判长陈登山判处张士秀、李鸣凤各囚禁于陆军监狱15年，南桂馨无罪释放[9]。1914年4月，原北京军警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担任陕西将军，旋即赴陕镇压白朗农民起义。陆建章临行前保释李鸣凤出狱，张士秀也随之获释，二人随同陆到达陕西，被聘为威武将军行署谘议，住在西安暗中与关中旧友密谋反阎。

1916年，镇守使陈树藩驱逐陆建章离陕，代之为陕西都督。而陈树藩援晋时，曾得到张士秀赠盐之惠，因此颇为感激，便于1920年任命张士秀为陕西汉中道尹。1920年间，陕西靖国军与督军陈树藩为难，陈树藩电召李鸣凤入陕调解。李鸣凤到陕后，同情靖国军，四处奔走，各地军民又多愿听从其指挥。但此时陈树藩与阎锡山皆依附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彼此往来密切，暗地勾结派人于西安近郊将李鸣凤击杀[10]。因当时张士秀也住在西安，和陈树藩往来密切，所以很多人怀疑张士秀与此案有关，李鸣凤家人对此也深信不疑，这就不但毁

了与张士秀的儿女亲家，而且从此张、李两家断绝来往。

1924年，冯玉祥组建国民军，张士秀到军中探访旧友，返京途经河南新乡时，被胡景翼部中李鸣凤旧友杀死，声言是为李鸣凤报仇，时张士秀五十四岁。

张士秀自加入同盟会后，积极投身反清革命，辛亥革命时期为联秦援晋光复河东而奔走游说，不遗余力。在河东军政分府时期，善筹划，多谋略，练兵筹饷，扩充武装力量，组建地方行政盐政机构；还创办兴业银行，维持地方经济，发展实业，为河东的安定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张士秀在任期间，也曾镇压过晋南地方武装力量，随陆建章入陕后，参与了对白朗农民起义的镇压，这些应视为其生平的缺憾之处。

---

(1)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2)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0页。

(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4)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5页。

(5)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37页。

(6) 王用宾遗稿：《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23页。

(7) 薛笃弼：《太原和河东光复的片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77页。

(8) 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55页。

(9) 王用宾遗稿：《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24页。

(10)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49页。

张文光

王学庄

张文光，字绍三，亦作少三，云南腾越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五月）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自幼读书不成，随父亲张纪三经商，往来于腾越和缅甸间。文光生性刚强，不畏势，不吝财，路见不平，尽力相助，在乡里间颇有威信。他目睹英国在边地的侵略掠夺和清朝的屈辱卖国，非常激愤。1906年，中国同盟会会员杨振鸿来腾越任清军巡防营管带，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张文光在杨的启发下加入了同盟会，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他积极散发文件，发展会员，进行联络，并拿出家产来做革命活动经费。

1907年，杨振鸿因革命嫌疑被解职，离滇他去，张文光继续活动。他公开创立了自治同志会，以拥护立宪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08年12月，杨振鸿回滇发动永昌（今保山）起义，因准备不足而失败，病死于蒲缥，张文光便独自担负起滇西革命的领导责任。他广泛进行宣传与组织，同活跃于当地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1911年春，张文光预备响应广州起义，被叛徒出卖，他先期闻讯逃走，自治同志会被强迫解散。张文光流亡缅甸，继续指挥滇境的革命活动，他将注意力转向军队，通过同盟会员与会党分子联系当地驻军。在这些活动中，哥老会首领、新军排长陈云龙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缅境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认为滇西起义的时机已到，便赶回腾越布置。他在城外宝峰山宝峰寺召集党人会议，决定从夺取军队开始起义行动。10月24日，又借野操机会，集合各支军队中的革命党负责人在叠水河玉皇殿开誓师会，议定起义的军事部署。10月27日下午，张文光亲率党人一队，袭击巡防队第四营，同盟会会员李学诗内应，击毙该营管带，夺得指挥权。同时，陈云龙

在新军第七十六标第三营、彭蓂等在巡防队第五营，也分别裁决抗拒的军官，率队起义。经过一昼夜激烈的战斗，夺取了腾越全部城乡，清朝腾越镇总兵张嘉钰自杀，迤西道宋联奎投降。腾越街头飘扬起九星旗，四处张贴着起义军告示，告示上大书“皇汉纪年”和“发起人张文光”，宣布禁令：“民军擅入人家者杀毋赦，民军抢夺人民财物者杀毋赦，民军奸淫民间妇女者杀毋赦，妨害外国人生命财产者杀毋赦。”(1)

11月11日，起义军的首领们在腾越自治公所会议，决定设立政府，扩充军队。张文光被推为滇西都督府都督，陈云龙为都指挥。原地方谘议局议长寸开泰等议员、绅士也参加了政权。张文光还亲自登门，邀请当地学堂的进步师生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并特地组织了“士林营”。起义后，腾越秩序稳定，但是，张文光对怎样发展胜利却心中无数。他在一封电报中感慨：“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2)

杨振鸿生前拟定的云南革命方针是：“滇西首义，推动全省。”张文光按计划派出三路军队，由彭蓂、李学诗、刘德胜率领，分别向永昌、顺宁（今凤庆）、云龙进军，陈云龙率队为各军后援。滇西军主力攻克永昌后，由陈云龙率领进逼大理。这时，昆明已有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滇境出现两个并立的革命军政权。大理新军反正后站在昆明一边。滇西军的东进引起了两个政权的冲突。蔡锷通电要求腾越服从省城，撤回军队。滇西军沿途收容会党，已经扩充到二十三营三万余人，军纪涣散。陈云龙不听张文光的命令，其他将领也不受陈的节制，先后攻占了大理的几个属县。11月24日，哥老会头目刘竹云恃胜进攻，被训练有素的大理新军击败，全军退回永平。这次冒失的进攻造成了滇西政权的困难处境。11月30日，蔡锷派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兼任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率军赴大理，准备进攻永昌、腾越，迫使滇西军就范。为了防止冲突扩大，张文光力排众议，强令军队撤回永昌。李根源也是腾越人，与家乡革命党人和士绅都有关系，也力主和平解决。12月17日，李到大理，张文光派代表前去欢迎，双方进

行谈判，议决滇西裁军，地方官由省任命，惩办刘竹云等肇事将领等九项条件，张文光通电赞成。1912年2月1日，李根源抵腾越，张文光取消了滇西都督府，交出权力，由蔡锷委以协都督名义，统辖腾越、永昌、顺宁驻防军。腾越随即改名腾冲。陈云龙离军出走，后来在北京被段祺瑞杀害。

蔡锷督滇时，实权操在部将、原同盟会会员李鸿祥、谢汝翼手中。李、谢攘夺权力，排除异己，对张文光很看不起，联合省城士绅大肆攻击。1912年底，李根源离滇，张文光在省方更失去了唯一的支持。次年4月，被调任徒具空名的云南提督，驻大理，谢汝翼以师长身份兼迤西镇守使，统辖腾冲。李、谢支持大理驻军竭力排斥张文光。对此，张郁愤地说："今共和名成立，根本未固，瞰吾隙者正多，若辈攘窃权位靡已，宁非袭亡清余气，自献于异族乎。我不忍与共事。"[(3)] 于是辞职归里。张家旧称腾越富室，由于接济革命，至此已无余财。"二次革命"后，许多旧日党人流亡日本，张也拟赴日留学。这时，唐继尧接替蔡锷任滇督，大理会党杨春魁等起兵反唐，用张文光、李根源名义为号召。谢汝翼找到了铲除张的机会，便借此告发。唐将谢的状子报给袁世凯，袁宣布张为"叛逆"。但是，僻居腾冲的张文光并不了解外界政情的变化，依然在准备起程。1914年1月14日，张文光与卸职部将黄安和到腾冲硫磺塘温泉沐浴，谢汝翼派官兵二十余人冲入浴室，乱枪齐发，张身中十余弹，当场遇难。黄以身躯护张，夺枪击毙三个暴徒，但寡不敌众，亦遭杀害。

---

(1) 曹之骐：《腾越光复纪略》，孙钟因、曹之骐著《复滇录》，上海泰东书局1924年版。

(2) 张文光：《致黄毓成电》，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曲石丛书1941年本。

(3) 李执中：《张文光君传》，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列传》，亦收

入方树梅纂辑《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3页。

张西曼

张小曼

张西曼，字百禄，湖南长沙人。1895年6月1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生。父亲张梓林（1871—1936）在清廷太医院任职，热心维新运动；二哥张仲钧（字百骏，1891—1941）是同盟会会员。张西曼1908年十三岁时，在父兄的影响和带动下，由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习。1911年1月，因遭清廷压迫前往俄属海参崴，进入帝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东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在俄期间接触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与俄国革命党人“发生密切联系，以便将来中俄两国革命党，相互扶助推翻专制，建立民主的工作”[(1)]。

辛亥革命后，张西曼受南京临时政府黄兴、陈其美委托，在中俄边境孤身入山，招募绿林“马贼”刘弹子部八百人以上，南下组成北伐骑兵团支援辛亥革命。嗣后，张西曼利用暑期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考察，接触了正在秘密传播的列宁的著作，同时考察“帝俄”政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张西曼转回国内，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工作，并开始在东北传播马列主义。1917年，张西曼与友人创办东华中学（后哈尔滨第二中学），该校后来成为中共在东北建党的据点和革命者赴苏俄学习的中转站。

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张西曼兴奋不已。张西曼同情十月革命，特往西伯利亚考察，向国内介绍十月革命，张西曼在俄罗斯学习考察期间曾谒见过列宁，并开始着手翻译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18年即从苏俄分别写信给孙中山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19年1月，张西曼回国到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建议中国派员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国民

党。同年7月，他应蔡元培等的邀请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课事务员，同时在外交部俄文专修馆任教，瞿秋白是他的学生。张西曼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方便条件，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大教师张申府等一起创立了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2)]，后发展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3月15日张西曼在《少年中国》杂志第1卷第9期上以“西曼”笔名发表了长达八页纸的介绍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生平的《俄国诗豪朴思砼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全面向国人介绍俄国文豪普希金的著作。同年秋，张协助北京大学创建俄文系，曹靖华是该系二期的旁听生。张西曼还先后担任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教授。1920年8月自行印刷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这应该是《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最早的中译本。

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旱灾，张西曼联络友人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任董事长，张西曼任总务股副主任，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发动全国民众募捐，自总统以下重要官吏和各界民众纷纷捐款，为灾荒中的苏俄灾民送去救济物资和粮食。同年，他和俄人柏烈伟合编的《简明俄文法》出版。这年4月，张西曼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是有志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沟通自任。”

1922年1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希曼”为笔名出版了张西曼翻译且《俄国共产党党纲》，该书列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音译）丛书第二种”的初版本。到1927年3月，以一年一版的速度连续发行了六版名义下的七个版本（现已发现1926年有两个内容一致，但印刷字体、排版、标点符号均有不同的两个版本）。党的纲领是党的旗帜，张西曼翻译且公开发行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就代替了当时因环境恶劣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公开传播了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贡献。

在社会主义研究会创建和发展过程前后，张西曼曾于1919年和1921年两次谒见孙中山，除表示自己真诚拥护孙领导中国革命外，还陈述了以往仅利用会党、新军等薄弱基础为革命手段的失败和教训，建议向俄国革命学习和两大革命政权的相互承认与援助。1922年8月，张又赶到上海条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力主效法苏联共产党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3)]，成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实际建议者，孙中山曾任命张西曼为“中俄联络员”。

张西曼致力于苏俄文化的传播和中苏文化的沟通，他认为应当有更多的人学习俄语，为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掌握基本工具。1922年至1924年，张西曼担任冯玉祥学兵团吉合、边章武、何基沣所在连的俄文教员。1923年编写出版《中等俄文典》。同年，他又协助交通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成立俄文班，张冲就是该校二期学生。1925年，张西曼创办中俄大学，推徐谦担任校长。他编著的大学俄文读本《新俄罗斯》同年出版。1926年出版《中等俄文典》和《新俄罗斯》再版本，推动了近代早期俄语教学的发展，为近代中国俄语教学的开拓者。

1926年10月，张西曼参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之筹备。1927年初，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外交顾问，并任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及俄文法政学系主任、教授。其时译有苏俄民法、刑法、宪法等，在《法学杂志》上刊登。汪精卫“七一五”叛变革命，张西曼在武汉营救被捕师生二百余人出狱。1928年4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后改教育部秘书。1929年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经蔡元培推荐担任《奉安专刊》编辑主任。

1931年，张西曼转任北平大学教授及陆军大学政治教官。“九一八”事变后，他痛心疾首，于12月初到山西汾阳访问冯玉祥，交换救国政见。同年开始在中央大学教授俄国近代史课程。1932年随陆军大学迁校南京，因在陆大讲课中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概况，受到多次警告和指责，并将他的课程裁掉。

张西曼对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断围剿苏区的行径十分反感，力主停止内战，实行孙中山的遗训，对日本帝国主义绝交、宣战。因救国主张不被蒋介石采纳，毅然拒绝了蒋所挽任的湖北省主席一职[(4)]。此后，他担任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由于新疆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方面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而张又精通俄文及苏俄情况，因此从1932年起他开始从事新疆及我国边疆民族政治的研究，并赴甘肃实地考察。是年，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成立，张任理事长，后任会长。1934年3月，担任行政院新疆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完成《中国边务图书总目》初稿。1935年，发表了《大月氏人种及西窜年代考》。后来在重庆仍坚持研究边疆民族史，曾撰著《中亚缠回为沙陀苗裔考》、《乌孙即哈萨克考》等重要论文发表。

1935年7月，张西曼在南京与徐悲鸿、张仲钧、梅兰芳等文化界人士，发起筹建“中苏文化协会”，以沟通中苏文化和促进两国人民友谊为宗旨。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多方阻挠，并以推任驻苏大使为诱饵，以图调虎离山。张西曼拒任驻苏大使，排除种种干扰，于是年10月终将“中苏文化协会”组成，由孙中山之子孙科担任会长，张任唯一的常务理事。其后组织迅速发展，规模日大，上海、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云南、新疆、香港及延安等地纷纷成立分会。张西曼呕心沥血致力于协会工作，推进中苏文化交流和中苏友好的活动，1936年2月创办《中苏文化》杂志，并在南京和上海举办了苏联木刻版画展览。同年，他翻译出版了《苏联新宪法草案》单行本。4月，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12月，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37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宪法》及哈萨克斯坦等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宪法。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西曼更加积极地呼吁联苏制日，奋不顾身地支持救国会，声援“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7月16日，在国内知名人士两百余人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上，张西曼重申其联苏抗日主张。他还通过广播、演讲及发表文章等途径，宣传联苏是抗日胜

利的唯一出路。他参加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分别被推为名誉理事和理事，后又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监事，从事抗战中的左翼文艺活动。

1938年3月，张西曼先后两次挺身而出，为被康生、王明诬陷“汉奸”的陈独秀辩诬，在第二次声明中，更坚决表示“敢负责”为陈独秀辩护，坚持认为陈独秀“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愤怒指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把陈独秀诬为“汉奸”是“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1938年7月7日，张西曼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举行的“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会”上，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斥责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是“国贼汉奸，秦桧第二”，要求“杀汪贼以谢国人”[(5)]。第二年，汪精卫就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张西曼在重庆继续主持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的工作，并与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期间他还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文章，盛赞苏联的建设成就和苏联红军的英勇，宣传社会主义理想。1940年9月3日，他在张曙追悼会上发言，公开抨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买外汇存外款，发国难财，虽受到国民党行政院秘书处的严重警告仍不畏不屈。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张西曼和柳亚子等联名通电指责国民党倒行逆施，有失人心。3月，张西曼在马寅初六十大寿祝寿会上发表演讲，遥祝马老健康长寿，以营救此时已被捕入狱的马寅初。同年9月25日，张西曼之兄、湖南省参议员张仲钧，因同情新四军、抨击湘省政治，被国民党当局派人乱枪打死在家中。张西曼从重庆赶去擦干了哥哥身上的血，继续无所畏惧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1945年1月，张西曼在重庆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任社长兼主编，在发刊词中提出“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他还与柳亚子、熊瑾玎、郭沫若、田汉、林北丽等创革命诗社。同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俄文兼职教授。1945年10月10日，因抗战救亡有

功，张西曼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5年底在他主持下，《民主与科学》杂志联合重庆二十六家杂志，发出“不要内战”的共同呼吁。12月20日，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张西曼在《致马歇尔特使函》中指出，美国物资援华是助长中国内乱的阴谋。1946年1月，张西曼与褚辅城、许德珩同时担任“九三”筹备会发起人。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促进民主宪政的实现，他与孟宪章、吴藻溪、何思敬等于1946年2月24日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担任理事长，以后还在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建立分会。同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张西曼被推为第一届理事，提出“愿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

蒋介石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张西曼强烈反对。11月，张西曼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1947年1月，他参加南京学生的集会，大声呼喊：“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6) 5月，他出席南京中央大学等院校联合举行的“五四”纪念会，发表题为《坚决为民主而斗争！》的演讲。“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张西曼往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慰问受害学生，在衣食忧苦中愤然慷慨解囊援助学生运动。1948年在南京大中学生的“五四”座谈会上，张西曼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昂陈述五四运动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只有民主与反民主，封建与反封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没有第三条道路。”(7) 在南京大中学生纪念“五二〇”周年大会的时候，他又发表演说，指出：“在争取光明、争取民主的奋斗中，任何迫害都不能破坏我们救国的共同信念。”(8)

1948年夏，张西曼的住所被国民党军警搜查，行动受到监视。在中共地下党交通员保护下，他于12月26日在雨夜中悄然化装离开南京，挈妇携雏进入中原和华北解放区，先后受到李先念、邓子恢和陈毅等的热烈欢迎。1949年3月3日，他千里跋涉辗转到达北平。4月16

日携夫人魏希昭出席南社、新南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雅集，并与叶剑英、柳亚子等合影留念。接着参加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解放区参观，遍历关外山河。6月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7月2日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7月4日因咳血入协和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肺癌。在手术前他亲书遗嘱“曼生不能多所贡献于中国受苦的人民，死亦不愿玷污净土”，为了以利后来的患者获得“预防的根治方案”，“自愿将遗体捐赠医院做科学继续解剖之用”[(9)]。7月10日凌晨不幸逝世。

张西曼逝世后，遗体葬在西山万安公墓李大钊墓侧，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陈绍禹、李维汉、李达、李济深、沈钧儒等十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黄鼎臣等亲临医院告别，周恩来为他亲笔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1975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跟身边的警卫员谈起他一生仅为几个人题过墓碑，称张西曼是“红色教授”。1995年6月20日，民革、民盟、九三学社中央联合召开了张西曼诞辰百周年纪念座谈会，王兆国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统战部，称颂张西曼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10)]。

---

(1) 张西曼：《辛亥革命招募骑兵记》，《历史回忆》，东方书社1949年版，第100页。

(2) 张西曼：《五四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4期（《历史回忆》，第143—146页）；《二十一年前与今日联苏决策》，《中苏文化》第15卷第6、7期合刊。

(3) 张西曼在《中苏文化协会的艰难创办记》（《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9、10期合刊）、《十月革命怎样地感召了我》（《新华日报》1946年11月7日）等文中均记载了他曾于1922年秋到上海，向孙中山条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主张。

(4) 《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11、12期合刊。

(5) 张西曼：《民主与科学杂志创刊周年记》，载《民主与科学》第11、12期合刊。当年主持政治部三厅大会的田汉在其所作、李济深书的《张西曼墓志铭》中记云："抗战军兴，汪精卫在武汉叛迹日著，西曼在武汉公开声讨，请诛逆贼，闻者服其胆识。"

(6) 《南京人报》1947年1月27日。

(7) 《南京学运大事记》，载南京大中学生纪念五四筹委会编《迎接新的战斗》，1948年版。

(8) 南京《新民报》1948年5月5日。

(9) 南京《新民报》1948年5月22日。

(10) 《人民日报》1995年6月21日；南京《新民报》1948年5月22日。

张啸林

朱剑良　许维之

张啸林是旧日上海的大流氓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号称“上海三大亨”。张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更名为“寅”，以啸林为号。生于1877年6月14日（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浙江慈溪人。张父是个木匠，早故，全家依靠母亲劳动度日，生活艰难。

1897年，张二十岁，在乡下难以谋生，举家移居杭州府拱宸桥。到杭州后，张啸林与兄张大林一起进杭州机房学织纺绸。但是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久，张弃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在校与周凤岐、夏超、张载阳等人同学，这是后来他同军阀方面有勾搭的由来。张未毕业就离开武备学堂，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探目）李休堂为“先生”，充当李的跑腿；并在拱宸桥一带开一茶馆，结交了一帮地痞流氓，专以寻衅打架、聚赌敲诈为生。当时拱宸桥一带另有一赌棍，诨名“西湖珍宝”，以张啸林经常勾引他的赌徒为由，同张结下了仇恨。一次，“西湖珍宝”纠集手下的赌徒向张寻衅。张因寡不敌众，不得不与同伙躲到别处，但仍靠聚赌诈骗为生。

张啸林除在杭州城里赌博骗钱外，还于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的时候，到杭、嘉、湖一带引诱农民赌博。乡间的农民受张愚弄者大有人在。有的当空卖绝，有的投河上吊，因而民愤极大。清末宣统年间，杭、嘉、湖一带人民曾投状上告，但张啸林凭他在衙门里的熟人关系，仍然逍遥法外。

1919年秋，张全家迁往上海，先后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开小花园旅馆，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一带吃赌台和妓院“俸禄”，又在劳而东路（今襄阳北路）开斗牛场，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大兴

街一带设茶会。他专干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等罪恶勾当。这时张与英租界的著名青帮流氓季荣卿结识，臭味相投，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张还通过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认识了杜月笙。这期间张啸林曾拜了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师，成为“通”字辈成员，并在沪、杭一带广收门徒，发展黑势力。张身材魁梧，膂粗力大，凶狠毒辣，曾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门徒凑趣捧场称他为“张大帅”。

当时，上海滩上的大流氓各霸一方，相互争雄。一次，张啸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力，和广东帮流氓大打出手，混战一整天，终于夺得水果贩运特权。后来，张又和英租界流氓范开泰（诨名“乌木开泰”）、范回春（诨名“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一起，为抢夺鸦片贩运权同法租界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殴斗。金廷荪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门徒。而张啸林和浙江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有私交，常为卢、张押运和代销鸦片。当时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张与何丰林也搭上了关系，其后并与何的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结为儿女亲家。黄金荣、杜月笙为了利用张啸林同军阀的关系，不想同张翻脸。张为了在法租界发展势力，也不想同黄、杜弄僵。于是请出在上海的青帮“大”字辈“老头子”出面调停，提出了所谓“黑心钱公平用”，各帮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有一次，黄金荣因触犯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而遭监禁，张运用和军阀的关系伙同杜月笙出力营救，使黄获释，黄对此十分感激。从此黄、杜、张三人结为把兄弟。

1923年左右，黄、杜、张三人正式合伙搞鸦片联运。张依靠何丰林的保护，把鸦片从吴淞口安全运到十六铺，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然后由黄金荣发“通行证”。这样，黄、杜、张三个青帮流氓头子就成了上海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的首脑。“三鑫公司”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他们借此不但自己大发贩毒财，也给军阀和租界当局带来了经济收入。所以尽管这期间统治上海地区的军阀数易

其人，但黄、杜、张都是被争相罗致的对象。1924年，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两亩地基分赠给张、杜，造了两幢洋房，张住东宅，杜住西宅，一墙之隔，亲如一家。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准备公开叛变革命，指使上海的流氓头子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张啸林是这个组织的三大头目之一。黄、杜、张指使大批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事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委任黄、杜、张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以酬其功。从此，张啸林成了国民党统治层中的“党国要人”。他们还和国民党的官员王柏龄、陈群、杨虎等人结为把兄弟。这时租界当局也对张刮目相待，任命他为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长。

1930年，张啸林“荣归”杭州故里，轰动一时，当地豪绅、政客、地痞流氓为他摆酒接风。无耻文人许吾生为张献名为“寅，号啸林”（张属虎故名寅，“啸林”即虎啸于森林之中）。此后，杭、嘉、湖一带的盗匪歹徒、地痞流氓纷纷投在张的门下。张在杭州西湖畔和莫干山皆建造有私人别墅。

以后，张还与杜月笙等在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合开了一家上海最豪华的大赌台。他们还将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巨款投资于银行和工商企业，由流氓一变而为“实业资本家”。国民党中的要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也和他们有了来往。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张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监事以及中汇、交通等几家银行和公司的常务董事或董事。张啸林的“六十大寿”、黄金荣的黄家花园竣工以及杜月笙的“杜氏家祠”落成，竟成了轰动当时上海滩头的三大“盛典”。由段祺瑞、蒋介石领衔一百人署名为“张啸林六十寿辰的征文启事”，则对张大加吹捧[(1)]。

30年代后，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超过了黄、张，张对杜渐生嫉

妒。1935年，蒋介石施行“法币”政策，杜月笙事先得到了消息，没有把消息告诉张，自己趁势投机狠捞了一笔。张对此深为不满。张为人处事粗暴，不如杜善于玩弄小恩小惠，因而张的门徒纷纷改换门庭，投拜到杜的门下。张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张曾托杜向蒋介石引荐，但一直没有得到蒋的重用，张怪杜不肯尽心。由于上述种种，张、杜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张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关系也渐疏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指使杜月笙拉黄金荣、张啸林同去香港。当时黄以年老多病为借口，留沪不走。张认为杜月笙去后，如果黄金荣不问外事，正是他可以独霸上海的好机会，所以决定也留在上海。“八一三”沪战开始，张正躲在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潜往莫干山和张密谈。上海沦陷后，张即返沪，指使其门徒接受日本特务的指使，为侵略者效劳。

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并分派其门徒到四乡为日军收购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甘心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并乘机大发国难财。

1939年底，张啸林得日本特务机关支持，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他当省长。事为国民党特务系统所探悉，决定除奸杀张。

1940年1月15日，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约张去更新舞台看戏，张因临时有事未到，结果俞在戏场中被人刺死。不久，有一次张乘车外出，一排枪弹射穿张座车玻璃窗，但未命中，得免于一死。经过这样两次事件后，张闭门不出，并雇了二十多名护宅保镖，日伪也派兵在宅外守护。又不久，国民党特务用重金收买了张啸林的随身保镖林怀部。林于8月14日乘张啸林和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楼上商量事情之际，故意在楼下与张的司机大声争吵，张从楼上窗口探头责问时，林拔出手枪一枪命中，射杀了这个地痞流氓和汉奸。

主要参考资料

郑竹友、王亚陆著：《张啸林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张啸林之子张法尧谈话记录》、《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王文虎）谈话记录》、《中统分子徐亮谈话记录》，以上均见《大流氓杜月笙资料》，现藏华东政法学院资料室。

章君穀著：《杜月笙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

(1) 《申报》1936年6月2日。

张学良

张友坤

一、青少年时代　婚姻家庭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1901年6月3日出生在逃难中的大马车上，养育在辽宁省台安县鄂家村詹家窝铺屯（现称张家窝铺屯）其表哥赵明德家。乳名双喜，爱称小六子，化名李毅、李宜、笔名曾显华。其父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辽宁海城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1926年任陆海空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因他始终不愿彻底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驯服工具，1928年6月4日在返回东北的专列上，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是年五十四岁。张家祖籍河北大城，本姓李，高祖时代，张家与李家结亲，因张家无子，领养李家之子为嗣，遂改姓张。到张学良时已是第六代了。张学良有一姐七弟五妹。姐者：冠英，字首芳；弟者：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俊、学英、学铨；妹者：怀英、怀青（亦名怀卿）、怀朣、怀曦、怀敏。

幼时的张学良，家境贫寒。生母赵春桂性格刚强而又善良，因操劳过度于1911年病故，后由继母卢氏抚养学良姐弟。是年，学良姐弟随继母卢氏来到奉天（今沈阳）；其父先后礼聘杨景镇、白永贞、宋文林等名儒到家馆为子女任教，从而奠定了张学良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张学良特别崇拜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丁汝昌等。1915年，学良拜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为师学习英文，同时又跟东三省军事测量局局长陈英学习法文和数理化知识，接触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成为性格开放爱好时尚的青年。他会骑摩托、开汽车、驾飞机、打网球、善跳舞、能书画、会演戏。1916年，经周大文介绍，张

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经常由阎宝航陪同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活动，曾任基督教青年会会董、总干事，并结识外国朋友普莱德等。同年，张学良奉父命和于凤至结婚，育有一女三男；与赵一荻结合后育有一男[(1)]。张学良的童年是在辽西新民地区度过的，从小就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的横行霸道和任意残害中国人的情形；加之官场腐败，国势垂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稍长曾有国家弄到如此地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1916年11月，张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听了南开校长张伯苓《中国之希望有我》的演讲，“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中国”，深受感动，难以忘怀。从此，他立志凭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积极参加爱国储蓄、推销国货；河北水灾时，基督教青年会带头义卖，他逢人劝购，以青年爱国的形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二、从军习武　戎马倥偬

张学良本想学医，治病救人，其父却给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以便他日子继父业。1919年3月，张学良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曾与严格教学的郭松龄教官结成师友之谊。次年张学良毕业后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张学良推荐郭松龄为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协助整训所部。1920年4月张学良被授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1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25年4月，晋升为陆军中将，成为东北军的“少帅”。

1921年秋，张学良在日本顾问本庄繁的陪同下，与张作相等到日本参观秋操后，深感东北有整军经武的必要。归国后，他建议改革军制，整顿军纪、严格训练，均被张作霖采纳，并被任命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使东北军陆海空军实力大增，在军阀混战中，大有左右全局之势。

在执政东北之前，张学良追随其父先后参加过吉林剿匪、两次直奉战争、讨伐郭松龄之战、率部与北伐军对抗等。他在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目睹同胞互相残杀，国家元气大伤，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认识到不团结难以抗日，不统一不能富强，产生“息争御侮”思想。1925年6月，他对记者说：“国人一向痛诟军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1927年1月12日，张对英国驻华公使兰浦生谈话：“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同年4月3日，张答记者：“对大局主张，固另有主宰者，但无论如何，决不能以一党一派之利害而危及国家。”他建议其父退守关外，保境安民，建设东北。为此，他甚至跪着劝说乃父，直到1928年5月，张作霖才接受他的建议，下令撤军，退守关外。

三、东北易帜　全面建设

1928年6月4日，张学良得知其父遇难的信息后，化装成普通一兵，混在战士中，乘闷罐车潜回沈阳。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他立即下令停止内战，撤兵关外。为稳定东北政局，顺利完成权力交接，按既定方针，密不发丧，迷惑日本人，使之暂时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一切交接工作就绪，于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举办隆重的丧仪。7月2日，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3日就任本兼各职。7月底，东北海军司令部成立，张任总司令。8月16日，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理事会主席。11月30日，就任东北航空司令。12月29日，他排除来自内外的种种压力，在分区逐步易帜的基础上，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首次助蒋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翌年1月10日，他处决了鼓动张作霖打内战、反对易帜、威胁东北政权稳定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巩固了他的政权。是年，张受蒋介石唆使，挑起中东路事件，与苏联开战，损兵折将，被迫停战议和与对方签署《伯力协定》。其后继续集中力量进行东北新建设，创造了当时全国十个第一：即东北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在全国军队中首屈一指；肇新窑业公司为中国第一家机器陶瓷制造工业；辽宁迫炮击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民生牌”载重汽车；东北农业公司和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开创中国军民使用农业机械（拖拉机等）之先河；东北自建自营铁路里程具全国各省之冠；张学良驾驶飞机从沈阳到营口送邮件，开中国民航事业之始；东北无线电总台首开中国与欧美各国通讯联络；张学良兴办东北现代教育的私人捐款数量居全国第一；张学良资助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为中国体育代表队首次参加奥运会；奉天体育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等。总之，张学良掌权之后，为中国东北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四、率军入关　调停大战

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实现其“统一”而引发的新军阀争权夺利的争斗。作战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站在自己一方，以求全胜。张对此先是保持中立，静观待变。是年3月1日，他发出“劝告蒋介石、阎锡山和平息争通电”，内称：“所冀举国同胞，洞察危局，注视线于国外，立泯内争，本诚意以相维，共图匡济。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9月1　8日，张发出和平通电，率军入关。阎、冯集团土崩瓦解。这是张学良继东北易帜后，又一次助蒋“统一”，巩固了南京政权。他因此于是年10月9日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统辖北方八省二市，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

张助蒋有功，蒋宠张有加。蒋曾致函予张：“得友如兄，死无憾

矣！”感激之情，可见一斑。是年11月7日，张应邀赴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隆重的礼遇。是月24日，任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次年，南京召集国民会议，张亦亲临表示拥护统一始终一致之诚，南京欢迎之盛亦如之。从此，蒋、张结盟，亲如兄弟。张对蒋亦步亦趋，开始卷入新的内战漩涡。

五、辞职下野　出洋考察

1931年5月28日，张因在南京贪吃鲜樱桃患重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9月18日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因判断失误而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三省，成为受国人责难的“不抵抗将军”，11月16日被免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翌年2月29日，章太炎抵北平劝说张学良武装抗日，张有口难言，不作争辩。11月20日，张又被免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2月27日，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长驱直入，锦州危急。

1933年1月20日，张任华北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率军长城抗战，因未得到蒋介石的实际支持而失败。3月4日，承德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责难直逼张、蒋二人。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3月9日电召张学良在保定车站会晤，蒋以目前形势如同三人同坐一只小船，面临风浪，必须先下去一人，才可免遭灭顶。张学良说，当然我下。3月11日，张发表辞职通电，下野出洋考察。他在上海以非凡的毅力，在弥勒医生指导下戒除了多年的毒瘾。4月11日，携眷属等乘意大利邮轮启程出国。历时八月，相继考察了意大利、英国、德国、芬兰、瑞典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深感执政者国家意识之淡薄，欧洲各国备战之积极，预感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认为美、苏、英自顾不暇，无力助我，需要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发动战争之前抗日。期间，张学良曾想访问苏联，被拒绝。

六、力挽狂澜　发动兵谏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旅欧归来。3月1日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职，代行总司令职权。张在武汉时期，曾讲过：“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又说“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学习伟大的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也应当能容”。并提出“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莫属。”“说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可见此时他已开始孕育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

1935年10月2日，张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职务。11月1日，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西安。在10月1日至11月21日的五十多天内，东北军经过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剿共”战役，竟然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师长何立中受重伤不久死去。团长高福源被俘。师长牛元峰兵败自杀，数千官兵被俘，震惊了整个东北军，给张学良以深刻影响。最令张愤感不平的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下令取消被歼灭部队的一一〇师的番号；他为阵亡师长请求十万元的抚恤金，也遭蒋的拒绝。在实践中他进一步识破了蒋介石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促使他不得不寻求脱离“剿共”战争，走联共抗日的新路。

是年10到12月间，张在西安、上海秘密会见东北爱国人士李杜、杜重远、高崇民等，共商开创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西北大联合的新局面，以推动蒋介石形成全国抗日大联合的新局面。李、杜受张之托，介绍刘鼎（中共地下党员）到西安见张，并被留在身边工作；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遵照张的电令，介绍宋黎（中共地下党员）、李政风等先后到西安见张学良，宋被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工作；张还电令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陕北前线设法和红军取得联系。1935年秋，由张学良的幕僚高崇民等人沟通了张、杨关系，消除了隔阂与误解。并于翌年3月经过张学良、杨虎城、高崇民三人于洛川密商，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争取把东北军改造成为“抗日的革命军队”。翌年1月，派回被俘的高福源团长做王以哲、张学良和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自1月21日至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张学良与周恩来先后在洛川和延安（即“肤施”）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达成了“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张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张也建议中共放弃抗日必反蒋的政治口号。是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明确建议：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在此前后，张在物资、财政上给极度经济困难的红军以援助，为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师提供了方便；东北军和红军合作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尤其是对红军在西北安下大本营做出了特殊贡献。

蒋介石于1935年11月起，也在打通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谈判的渠道。1936年11月周恩来派潘汉年在上海与陈立夫进行了三次谈判，蒋妄图收编红军。这与张学良和中共的谈判有本质上的差别。正如

1936年，毛泽东在致王以哲的信中所称：“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

1936年4月，张学良创办《西京民报》；6月，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6月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之演说；是年秋，又发表《抗日理论与实践》等文；7月，成立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亲任领导；10月，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从思想、组织、政治和军事上做了大量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6年7月，张学良开始向蒋介石“诤谏”、“上书”，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毫无结果；8月萌生用“苦迭打”方式逼蒋停止内战，但不放弃“哭谏”；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饬张“剿共”，张表示反对。11月爆发绥远抗战，是月27日，张向蒋介石请缨抗战，称：“今绥东事（指绥远抗战）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遭蒋拒绝。11月23日，蒋下令逮捕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12月2日，张自驾飞机到洛阳向蒋“哭谏”，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并允许东北军出兵援绥，均遭拒绝；张学良指斥蒋介石为袁世凯、张宗昌。12月4日，蒋再次进驻西安，调动数十万大军逼近西北，带领军政大员到西安，准备对陕北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张若不从，就将其调离。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大会，向临潼蒋之驻地进发，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赶上游行队伍劝阻无效；在群情激奋中，张学良表示：“一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并将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出兵援绥的要求转告蒋介石，再遭严词拒绝。12月10日，张和蒋在“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张带白凤翔、刘桂五到临潼谒蒋请训，以认清路线和察看地形及蒋的住室，为兵谏做准备。

12月12日，张、杨毅然发动兵谏[(2)]，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

战，联共抗日。发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张、杨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张向同胞们诉说：“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同时，电邀中国共产党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在电告共产国际的同时，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十七人于17日抵达西安。

蒋的顾问端纳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分别于14、20、22日先后飞至西安。由于他（她）们的反复劝说、中共代表的有力调解，张、杨的赤胆忠心和蒋介石固有的民族性，最终使蒋不得不口头答应六项条件，但不签字，以领袖“人格”作保证。

12月25日，为恢复蒋的威信、打压南京亲日派的嚣张气焰和目睹蒋介石兑现在西安答应的条件，张学良送蒋返京，负荆请罪。对此，毛泽东曾有评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这既肯定了张送蒋返京的意义，又肯定了蒋介石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起的一定作用。

七、幽居岁月　辗转迁徙

蒋介石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尽管张学良到达南京当天（12月26日），就在宋子文的示意下给蒋介石写了请罪书，但蒋仍指示李烈钧等人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张在12月31日的审判庭上，理直气壮，侃侃而谈："……这回事由我一人负责，……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如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做抗日一切准备及行动。……我写给委员长的信（指请罪书），不知道他要发表，否则我不写。"审判结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特赦后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管就是五十四个春秋。可谓"爱国获罪，千古奇冤"。

1937年元旦，张学良发表《告东北将士书》，勉励东北军精诚团结，加紧训练，待命杀敌，收复东北。并在日记中写道："读《旧约·创世纪》一篇。余身体不甚自由，但精神十分自由，并甚畅快，知人静思真得也。"

"呀！二十六年的元旦了！不只失地未复，而国权日丧，就是我今日之处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国事有复兴机会。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丧）家之苦，大家相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此中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将我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土接连丧失，被幽禁的张学良随之辗转迁徙，先后由南京孔祥熙公馆移居浙江奉化雪窦寺、安徽黄山温泉、江西萍乡、湖南郴州苏仙岭、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阳明洞、贵阳黔灵山麒麟洞、贵州开阳刘育乡、桐梓天门洞。幽居期间，张学良曾三次上书，要求参加抗战，均被蒋介石拒绝，铸成张的终生遗憾。

1946年10月15日，将张由桐梓迁抵达重庆，住郊区松林坡（原

为戴笠所建之公馆）。11月2日，被骗至台湾井上温泉。次年3月，张治中夫妇到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时，他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两点要求：（一）恢复自由；（二）希望刘乙光（指“监护”张学良的特务头目）搬出本该由他居住的房子。张治中此次探望，引起蒋介石不快，蒋介石手谕：“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得见张学良。”

1956年，受宋美龄的启发，张学良在蒋介石的英文老师董显光、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引领下，皈依基督教，1966年7月，他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函授，学习圣经。从此不再研究明史，也不再写文章。以养兰、打牌、听戏、研读圣经，教堂祈祷等为营生，度过漫长的幽居岁月。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宋美龄提出要张学良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次日，张群告诉张学良，4月8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前去吊唁，并送上自己题写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1978年，蒋经国被选为台湾“总统”，张学良第一个打电话对他表示祝贺。1979年10月5日，张学良应邀到蒋经国官邸参加蒋经国夫妇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1988年1月14日，张学良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怀远堂吊唁蒋经国，并向这位老朋友深鞠躬。

八、移居美国　安享晚年

1990年5月30日，邓颖超致电张学良，祝贺他九十华诞。电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之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6月1日，台北由张群等多人发起，诸政要及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为张学良公开举办规模宏大的庆贺九十华诞活动。6月6日，东北

大学校友会、张学良研究会等组织发起，在沈阳庆贺张学良九十华诞到会祝贺者近两千人。

1991年3月，张学良夫妇首次获准赴美探亲访友。5月29日至6月4日，中共专使吕正操将军赴美为张学良将军庆贺九十一岁华诞，在纽约三次密晤张学良，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对张的问候和转递了邓颖超给张学良亲笔信。邓颖超的信为："……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即吕正操——引者注）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6月2日张学良复函邓颖超。函称："……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中枢诸公对良之盛意，敬请代向（中枢诸公）致敬。"1992年7月12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张学良委托五弟学森的女儿张闾蘅向设在中南海西华厅的邓颖超灵堂敬献花篮。

1993年底张学良夫妇前往美国其后移居檀香山夏威夷，安度晚年。

2000年5月27日吕正操致函庆贺张学良百岁华诞。6月1日，中国驻洛杉矶副领事许士国和夏威夷中华总商会执行副会长林文中夫妇专程到张学良将军寓所拜望，江泽民主席的贺电由许士国先生代陈。电称："……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加发扬光大。遥祝先生善之珍重，颐养天年……"林文中先生代江泽民向张学良送祝寿花篮。

6月2日，张学良的故乡辽宁海城为张将军举办由数万人参加的祝寿大会。抗日名将吕正操专程前往祝贺。当地党、政、军有关领导均出席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向张将军送贺寿大花篮

及贺函；李瑞环在信中写道：“中华英杰赤子情，巨龙腾飞盼统一，我衷心祝愿汉公和夫人赵一荻女士健康长寿，喜乐吉祥。欢迎在方便的时候回祖国大陆探亲、观光。”

2001年9月28日张学良因感染肺炎住进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10月14日晚8时50分（夏威夷时间）病逝。10月23日张学良的公祭活动在夏威夷博思威克殡仪馆举行，约五百人前往吊唁。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对张学良将军的逝世同声吊唁。

主要参考资料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6年出版。

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6版。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毅、张友坤等：《张学良文集》（上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1937年1月8日。

《晨报》，1925年6月16日。

---

(1) 张学良十六岁时奉父命和于凤至结婚，生育一女三男。与赵一荻相爱后生有一男。为使子女不忘乡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深知家乡辽西医巫闾山为东北三大名山之首，依据周时典籍《尔雅·释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山之珣玗琪焉”，给子女起名闾瑛、闾珣、闾玗、闾琪（于凤至生）、闾琳（赵一荻生），并让他（她）们学习国画。

张学良被幽禁后，于凤至和赵一荻曾轮流陪“狱”。1940年于赴美就医，赵在香港卖掉豪华别墅，将年仅十岁的幼子托付给一位美国朋友，只身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陪张。张和于凤至（1990年1月30日病故于美国纽约）离婚后，1964年与患难与共的赵一荻正式结婚，1995年他们定居夏威夷。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病故，安葬在坐落于夏威夷神殿谷陵园预先造好的墓穴中。

(2)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洋考察”。1937年10月29日，他不顾个人安危，拒绝他的“同案犯”张学良及其亲友的劝阻，毅然回国，准备参加抗战。但他一踏上国土，就被国民党军统跟踪，终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血溅渝州，震惊中华。11月30日重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人调查，12月1日，觅得遗体，16日，中共中央给杨虎城家属发去唁电。1950年1月16日，杨虎城的灵柩由重庆运抵武汉。2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举行公祭。26日，杨虎城的灵柩由武汉北运西安。2月7日，安葬于西安南郊杜甫祠西侧。与杨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小儿子拯中、女儿拯贵等（夫人谢葆真，此前因受特务折磨，已病故狱中）。

张勋

李宗一

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是个以搞复辟失败而臭名远扬的封建军阀。1854年（清咸丰四年）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里。十岁入私塾读书，次年其父病死，即辍学。

1884年张勋在长沙投军当兵，后转入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91年升为参将。1894年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1895年到天津投靠袁世凯，充任工兵营管带。1899年随袁到山东镇压义和团，升副将、总兵。1902年调到北京宿卫端门，多次充当慈禧和光绪的扈从。1906年调到奉天，为“奉军辽北总统”，驻昌图县。两年后被清廷任命为云南提督，又改为甘肃提督，仍留奉天驻防。1910年接管江防营，驻浦口。1911年8月，清廷任命张勋为江南提督。10月，南京新军第九镇准备响应武昌起义，两江总督张人骏召张勋入南京，商议对策。张勋对倡义人员大声叫嚷说：“独立即造反，反则皆贼也。”[(1)] 遂率江防营与新军战于雨花台，新军被迫退到镇江。张勋在城内搜捕革命党人，恣意滥杀，“凡剪发、悬白旗、携白布者辄遭暴戮”[(2)]。不久，江浙革命联军围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与联军战于紫金山、天宝山、狮子山等地。12月2日战败北窜，退守徐州，清廷又授他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张勋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极端仇视。他伙同盘踞皖北的倪嗣冲，不时向革命军挑衅，孙中山曾通电严厉斥责其反革命行动。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窃据民国大总统，张勋的队伍改编为武卫前军，驻扎在山东兖州。但他仍以清朝的忠臣自命，自称“非坚忍无冀于挽回”[(3)]，一直包藏着复辟的祸心，时刻梦想推翻民国。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

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也有“辫军”之称。他暗中和蜷伏于各地的清朝复辟分子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复辟集团中握有兵权的代表人物[(4)]。1913年4月，他曾图谋拥溥仪复辟，因“事泄而止”[(5)]。7月，袁世凯命他率兵镇压“二次革命”，他率“辫军”于9月1日攻陷南京，纵兵烧杀，大掠三天，袁世凯提升他任江苏督军。12月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1915年武卫前军改称定武军，袁授张勋为定武上将军，1916年又为安徽督军。此时“辫军”已扩编为五十七营，约二万人。

张勋一心恢复清王朝，对袁世凯于1915年12月称帝表示不满。但西南各省发动护国战争后，他又转而支持袁，将蔡锷鼓动他反袁的密电向袁告发。1916年5月，冯国璋企图左右时局，谋取个人权位，在南京召开未独立各省会议，张勋派其参谋长万绳栻参加，主张讨伐西南。由于袁世凯突然毙命，会议无结果而散。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手中。北洋军阀与国民党人及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矛盾重重，政局十分混乱。张勋认为这是进行复辟的大好时机，他一边发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通电，支持以康有为为头子的“孔教会”，大造复辟舆论；一边以团结北洋军阀对抗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势力为理由，召开徐州会议，争取北洋军阀支持他复辟清朝。6月9日，张勋邀集七省的军阀代表在徐州开会，公然组织军阀的攻守同盟。此时段祺瑞企图利用徐州会议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段暗中策动，七省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9月21日，张勋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正式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制定联合章程，以张勋为盟主。由张勋领衔发表一系列通电，对国民党议员和阁员大肆指责。随后，又召开第三次徐州会议，主张“取缔国会”，“淘汰阁员”，气焰更为嚣张。

1917年3月间，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所谓“参战”（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爆发。段主张对德宣战，黎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势如水火。由于德国暗中表示“支持清朝的复辟”[(6)]，并“愿

以德华银行资本”“协助”张勋[7]，所以张勋反对对德宣战，但他又蔑视国会和黎元洪，因此黎、段双方争相拉拢张勋以为己助。张勋乘机伪装成为黎、段之间的调停人，企图利用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伺机控制中央政权。同时，他暗中勾结德、日帝国主义，招纳清朝遗老、帝制余孽，四面八方拉拢关系，拼凑实力，积极为复辟做准备。

5月22日，张勋在徐州举行督军团会议，是为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派其心腹徐树铮参加，唆使张勋领头以武力推倒黎元洪并解散国会。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职。消息传到徐州，督军团大哗。张勋乘机公开提出“事已至此，非复辟不可”的主张，“各督军表面亦赞张意”[8]。会议结束后，按预定步骤，先由各省督军相继宣布独立。在独立各省的武力威胁下，黎元洪于6月1日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遂于7日带领“辫军”十营三千余人及随从百余于12日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达北京。

张勋入京后，表面上向黎元洪表示支持李经羲组织责任内阁，并通电独立各省，取消独立；暗中却叫万绳栻密电各地复辟分子急速进京，“赞襄复辟大业”。这些丑类纷纷窜入北京，主张迅速发动。张勋和康有为、张镇芳、雷震春、刘廷琛、梁敦彦、梁鼎芬等复辟分子经过一番策划后，于30日傍晚潜入清宫，开所谓“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复辟。深夜又召集北京的军警头目王士珍、吴炳湘、江朝宗等人到张勋住宅，迫使其同意开放城门，并即命令“辫军”占据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出代表劝黎元洪“奉还大政”，遭黎拒绝。张勋遂不顾一切，于7月1日凌晨3时，换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丑，同入清宫，拥十二岁的溥仪“登极”，接受朝拜，复辟丑剧正式揭幕。

在张勋导演下，当天傀儡溥仪发布“上谕”，把民国六年七月一日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易五色旗为黄龙旗，恢复清末旧制。中央设议政大臣、内阁，各省督军改称巡抚或总督。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张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复辟既是徐州会议的预谋，只要他一发动，“即可坐收全功”[9]。但是，他的反动妄想在事实面前很快地破灭了。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群众纷纷集会，舆论一致声讨。黎元洪逃进日本使馆避难。段祺瑞看到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知道机会已到，马上四处活动，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了“讨逆军”。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云集京津一带的“讨逆军”达五万余人，分东、西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进攻。“辫军”一触即溃，复辟分子见势不妙，纷纷溜出北京。张勋知大势已去，束手无策，不得不辞去一切伪职，央求驻北京的公使团出面“调停”。段祺瑞提出解除“辫军”武装，保全张勋生命财产。张勋却坚持要求带兵回徐州老巢，企图保存实力，做一个地方军阀。

12日，“讨逆军”发动总攻，驻在天坛的“辫军”立即乞降，守卫南河沿张勋住宅的卫兵亦作鸟兽散，张勋在两个德国人的保护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上演了十二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彻底失败。段祺瑞假惺惺地下了一道通缉张勋的命令，但是到1918年10月，这个罪行昭彰的复辟祸首竟被北洋军阀政府“特赦”了。1921年他又被任命为热河林垦督办，但没有赴任。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死。

---

(1) 胡嗣瑗：《〈松寿老人自叙〉签注》（未刊稿）。

(2) 《共讨残暴之张勋》，《民立报》1911年11月11日社论。

(3) 张勋：《松寿老人自叙》，1922年刻本，第4页。

(4) 胡嗣瑗：《〈松寿老人自叙〉签注》（未刊稿）载：“壬子春，公移军兖州，王给谏宝田……以兴复大计说公，极相契合，每夜公微行过宝田密语，或达旦乃归，幕客皆不得闻。时恭亲王居青岛，朝士如于侍郎式枚，刘副大臣廷琛……先后会岛上，谋讨贼反正，介宝田纳交于公，诸人游兖必至

宝田所，公辄密就筹议。”

(5)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6)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55页。

(7) 《金永致张勋函》（1917年3月10日），《近代史资料》总35号，1965年。

(8) 章宗祥：《复辟问题小记》，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3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9) 胡思敬：《退庐笺牍》第3卷，1924年刻本，第12页。

张耀曾

钱益民

张耀曾，字蓉溪、镕西、庸希。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7月21日出生于北京，云南大理人。祖父张其仁，清道光丙戌进士，官至湖南衡云郴桂兵备道、湖南通省粮储道。父亲张士镱，清光绪庚辰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典籍署侍读。母亲陆秀珊，桂林进士陆仁恺之女，工诗文，善刺绣。张耀曾十六岁入京师东文学社，受到表舅梁济维新思潮的影响。1902年冬，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次年，京师大学堂首次选送优秀学生赴海外留学，张耀曾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日本学习。

1904年，张耀曾赴日，先入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四年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1905年，与同乡李根源、吕志伊等加入同盟会。1906年6月，《云南》杂志社成立，张耀曾任总编辑。10月15日，《云南》创刊号出版。该杂志以宣传民主主义，揭露清廷腐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为主要内容。张耀曾署名“崇实”，在《云南》上发表《论云南之民气》、《论云南之责任》等多篇文章。从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停刊，该杂志共发行23期，是辛亥革命时期以省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份，在国内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对光复云南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耀曾未及大学毕业立即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云南代表，参与起草《临时约法》。1912年5月，临时政府和国会迁到北京，张耀曾参加制定重要法律，并提出《省官制修正案》、《参议院法修正案》等法案，逐渐成为同盟会在临时国会中的领袖。7月9日，张耀曾以最高票当选为十一名起草员之一，执笔起草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

法》。

同年7月16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讨论改组问题。张耀曾积极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的主张，并与宋教仁、孙毓筠分别当选同盟会政事、总务、财政部主任。会后协助宋教仁进行改组工作，起草了关于新党党名、党纲、组织的草案。8月又和宋教仁、杨南生起草了《国民党宣言》，宣告国民党成立。张耀曾当选国民党总干事兼政事部主任。1913年4月正式国会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众议院法制委员长，成为国民党在国会的领袖之一。

同年7月，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张耀曾以高票当选为起草委员之一，与汪荣宝、孙钟、黄云鹏四人起草宪法大纲，交全体委员讨论。委员讨论结束后，张耀曾与丁世铎、李庆芳、黄云鹏、孙钟五人根据讨论结果拟定全部条文。其中张耀曾拟订了第一至第三章（即关于国体、国土、国民）的条文。制宪委员来自各党各派，政治立场和态度各异，但能和衷共济，并且顶住了袁世凯的压力，终于在1913年10月30日将宪法全案即《天坛宪法草案》议决，出色完成了使命。适逢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于11月3日宣布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下令逮捕国民党议员，深夜闯入张耀曾住宅搜捕。张耀曾被迫逃亡日本，《天坛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实行宪政的理想遭到第一次沉重打击。

张耀曾再次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未竟的学业。1914年加入“欧事研究会”，同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科主任。1915年夏，教育部组织“暑期讲习会”，张耀曾以《国家与国民》为题演讲，抨击袁世凯的复辟阴谋，招致袁世凯爪牙的监视。旋南下上海，与谷钟秀、杨永泰、钮永键、吴稚辉等人创办《中华新报》，从事反袁宣传。张耀曾任社长，谷钟秀任总编辑，10月10日《中华新报》出版。不久，张耀曾南下云南，协助蔡锷、唐继尧等组织讨袁护国军，任护国军云南都督府参议，参与云南起义。为争取各省支持起兵讨袁，奔走两广、西南各省。1916年初又陪同岑春煊赴日

寻求外交支持，备极辛劳。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第一届国会恢复，段祺瑞组阁任国务总理。三十二岁的张耀曾出任司法总长。

8月，张耀曾由云南抵上海，同船人携带大批烟土被查获。后经查明，烟土系同行的袁树五等携带，而袁又系受云南督军唐继尧之弟唐继禹之私托，与张耀曾无涉。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通电反对张耀曾就任司法总长，并要求黎元洪查办张耀曾。事实证明，张耀曾是清白的。但此案对他一生留下了无可挽回的影响，后来历次政争中，烟土案往往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

国会重开后，首要问题是重新审议《天坛宪法草案》，国民党和进步党等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上演了政党政治一幕幕话剧。1916年11月，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联合原国民党中的部分议员，成立了“政学会”。该会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对于政治取温和改进主义；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等六项主义为政治纲领。张耀曾被推举为总会主席，谷钟秀、钮永键为副主席。

在审议《天坛宪法草案》中，争议最大的是省制加入宪法和立孔教为国教问题。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议员反对省制加入宪法，而政学会则主张省制加入宪法，省长民选。孔教问题上，研究系议员提出在宪法上定孔教为国教，政学会则反对在宪法里尊孔教为国教。张耀曾在政学会内部讨论时说：“孔子集先圣之大成，专以日用寻常切己之道造化群伦，实超耶、佛而上之，故其性格功业非第为东洋伟人，而实古今之世界伟人。”四亿中国人“脑筋中之神圣模范阙惟孔子，是孔子者谓为历史信仰之重心，可谓为国民性之主要成分，亦可谓为中国文化史上之主宰”。虽然孔子的影响如此深远，但孔子之道只能定为修身之大本，“孔教不宜定为国教”。

1917年2月，段祺瑞政府决定对德绝交，政学会支持这一主张。但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政学会大部分议员持反对态度，而张耀曾则支持对德宣战，认为中国有加入“一战”的必要，“民主主义之政党，尤不能反对对军国主义之德国宣战，致失民主主义各协商国之同情”。国会表决结果，反对票占多数，否决了参战主张。不久，段祺瑞以武力唆使“公民团”包围国会，迫使国会通过宣战案。张耀曾认清了段祺瑞借参战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嘴脸，愤而辞去司法总长之职，再次到北京大学任法科教授。

1918年10月，张耀曾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为促进南北统一而发起“和平期成会”，主张南北议和。12月，在张耀曾、黄郛、张绍曾等的积极组织下，全国和平联合会成立。

1920年8月，广州非常国会内的政学会议员出现分裂，张耀曾、谷钟秀等二十八名政学会成员发表宣言，宣布取消政学会名义，同人对于政学会一律解除关系，政学会作为政团从此解散。此后，张耀曾仍旧与谷钟秀、李根源等人密切往来，并曾参与原政学会部分成员在1923年成立的“宪政社”活动，但与广州非常国会的政学会议员基本脱离关系，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内部形成的以杨永泰为核心的“新政学系”及其活动，也基本没有参与。

1921年，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张耀曾联络同人组成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并被聘为太平洋会议高等顾问。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局，决定恢复“民六国会”，驱逐皖系扶植的总统徐世昌，拥护黎元洪复职。此举引起各方争议。张耀曾从法理上解释黎元洪复职的根据，为黎元洪复职争取舆论支持。6月11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8月6日，张耀曾被黎元洪任命为司法总长，这是他第二次就任司法总长。不久，张耀曾辞去司法总长，专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27年6月。

鉴于“各省法院情形不一”，张耀曾认为“必先整顿，始足以言收回

法权”。于是，在他就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就选拔戴修瓒等法学家及其部属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察哈尔及绥远等十二省区视察。他参观当地的法院、监狱，详细询问司法状况，并发表改良司法的演讲。考察结束后，把考察结果和改良措施汇编成册，主持编纂了《考察司法记》十卷、《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二卷。为了让海外人士明白中国重视法制的情形，又聘请张志让等人把中国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译成英文、法文出版。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政府。张耀曾与黄郛、王正廷、易培基等人组成临时内阁。张耀曾任司法总长，也是他第三次出掌司法总长。11月2日曹锟被迫退位，由黄郛摄行大总统职权。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宣布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迁出禁宫，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久奉祀；清室私产归清室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民国政府所有。即日，溥仪出宫，移居什刹海醇王府。

就任摄政内阁司法总长期间，张耀曾起草了曹锟退位、摄政内阁成立及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等重要文件。11月24日，段祺瑞在奉系张作霖支持下，入京就任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全体辞职。1927年6月，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自称大元帅。张耀曾辞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1928年，张耀曾移居上海，与沈钧儒、李伯申等合组“张耀曾律师事务所”。此后，以律师为业，开始了“入民间服务”的在野生活。每为重大诉讼出庭辩护，辄动旁听，轰动社会。1930年，他为上海某公司答辩三井洋行的控诉，卒致其控诉被驳回。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耀曾主张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改造军队，切实抗日，和黄郛等组织“十人团”，并谋逐渐扩大，建立民间团体，研讨抗日的各项主张。12月，张耀曾与各界知名人士熊希龄、章太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等六十余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拟在各地建立分会。不久，上海国难救济会成立，张耀曾被推为理事之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张耀曾与国难救济会同人积极参加各种支前活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1932年，经黄郛提议，在“十人团”基础上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张耀曾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次年，黄郛赴华北就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对日停战，张耀曾一度代行“新中国建设学会”主席一职。期间，起草了《民国制宪史概观》、《草拟民宪协进会缘起》等文献，供学会讨论，同时在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等校讲演制宪问题和对日方针等问题。

在野期间，经张群、黄郛等推荐，蒋介石欲拉拢张耀曾。张耀曾对此婉言谢绝，但还是通过张群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欲求政治成功，必须系住人心。第一，须维护大多数人生活。第二，须对知识阶级予以自由。第三，须开放政治以包容社会有力分子”。

此间，张耀曾对中国政治制度做了深入思考，从历史上揭示了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思想和相应的制度；解决的办法，在于实行联省制度；其宪政思想进一步成熟。他在1932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到，中国现实有五大要点：领土广大而连接；人口众多而人种较为单一；有四千年传衍混一的文化；民族的政治习性，自治力不发达，强者支配而放纵，弱者服从而依赖；文盲太多，受新教育者尤少。中国的病状，一言以蔽之，穷与乱而已。穷与乱相互关联，愈演愈烈。穷与乱的外因，在于政治压迫与经济榨取，内因为无自治力之国民性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四千年来，强者以武力征服天下，集中流驭之，时过力弛，则各地方割据分霸，互相抗争，中央等于虚设，接着又有新的霸主出现。如此循环，一治一乱，从周

代到民国，莫不如此。在宋代以前，大抵皆内部分合循环，宋以后则内外交替，然地方之倒灭中枢，则如出一辙。民国以来，仍不脱此思想。居中央者，恒努力征服地方；居地方者，俱受征服，则负固自专，力稍厚者，更思扩大势力，取得中央。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张作霖，乃至蒋介石与其他新军阀，无不如此，导致民国成立廿年来纠纷不休。其所以至此，根源在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及施政有予夺之权。故地方或因畏忌中央，拥兵自保；或因羡慕中央，兼并图逞。中央则因欲伸权力于地方，常起纠纷。所以，“中国之所以穷乱至此，以中央集权之思想及制度为最大病因”。从政治上治病之法，在取联省制度。省之权限及组织，由宪法保障，省必须取得高度自治地位。此法“不但可去中国多年之乱源，即在领土广大及人口众多着想，亦非此不能收统治实效也”。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当局仍一意孤行，压制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张耀曾闻讯后，立即于23日清晨赶往法院，以拘捕不合法为由将沈钧儒等人保释出狱。当夜，公安局再次逮捕沈钧儒等人。张耀曾为此抱病不断奔走，疏通国民党当局，要求依法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并积极设法营救。张还担任沈钧儒的义务辩护律师，旁听席上掌声雷动，南京政府为之惊慌。在社会各方人士奔走营救下，1937年7月，“七君子”终于被释放。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耀曾滞留“孤岛”，深居简出，撰写了《孤岛上我的决心和态度》，以明心迹：“一、消极的：不误国、不卖身（此二项为绝对的），不做官、不见日本人（此二项是在中日战争未了期间）。二、积极的：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和能力。”

1938年7月26日，张耀曾在上海寓所逝世，终年五十三岁。夫人

赵玫，生有宁珠、馨珠、惠珠、丽珠四个女儿。张耀曾遗嘱，以第四女丽珠之子为孙，名为张昭达，以继宗嗣。

张耀曾生前曾将自己的文稿编为《知非集》三卷。今人杨琥在《知非集》第三卷基础上，编为《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共五十余万字，200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文存分六部分：第一为文集，收入作者已刊未刊章46篇。第二为著作，收入1935年在上海法学院等校讲授民法的讲义《民法总则讲义》。第三为书信，收入作者晚年信函、电稿六件。第四，读书札记。第五，作者的日记，题为《求不得斋日记》，文集收入了1928年到1938年部分日记内容。文存附录了张宁珠、馨珠、惠珠、丽珠合署、张元济执笔的《先考镕西府君行述》、李根源《故司法总长大理张君墓表》、张惠珠《张耀曾先生年谱简编》、《张耀曾先生近亲家谱》。

主要参考资料

杨琥：《张耀曾先生传》，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梁漱溟：《张公耀曾生平及家世——答近代史研究所信底稿》，1979年10月16日，收入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张丽珠：《缅怀我的父亲张耀曾》，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张耀曾：《求不得斋日记》，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张一麐

李晚成

张一麐，表字仲仁，初字峥角，号公绂，别署民佣、大圜居士等。1867年（清同治六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士绅家庭。父亲张是彝以生员身份在籍课馆，后于1880年得中进士。

幼年的张一麐以天资聪颖、悟性高闻名乡里，有“神童”之誉。1878年十二岁步入科举途径，连过县、府、院试三关进县学为生员。次年，张父以一麐年幼稚嫩为由，阻止他应考乡试。旋因张是彝以进士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即用，张一麐则留在家里读书。1882年张一麐应江南乡试得中副榜，深获主考官许庚身的激赏，监考官左宗棠也专门调阅了他的试卷，夸奖说：“这小子将来定有出息！”[(1)] 嗣后，张一麐受回龙阁程受甫礼聘任西席。1883年遵父命辞去馆职，冒籍考进保定莲池书院，从张廉卿深造。时因捐例大开，而其父张是彝又无财无势，因而一直没有得到实缺，仅留保定府署充任看管朝鲜原摄政王“大院君”李昰应的差使。张一麐学余每每跟随父亲当值，和李昰应有较多接触，对国家的危机形势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常以故乡先贤范仲淹的事迹自励，誓以天下为己任而思谋报国。

1885年，张一麐应顺天乡试，中第十名举人，和张謇同榜，从此结下厚交。在回吴县完婚至天津换乘轮船时，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命前往督署谒见。其父张是彝在李的帮助下得实授正定知县，张一麐又随父去正定。不久，张是彝因病告归，张一麐随回吴县。1889年，张是彝病故，张一麐经人介绍往苏州盘门城内汪府课馆，又应聘每月考课紫阳、正谊、平江三家书院，同时还收取校外学生及卖文换润，以敷家计。

中日甲午之战后，清廷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国人激愤。当时张一麐正在北京参加会试，激于民族大义参加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活动。回到苏州后，他又倡议发起“苏学会”和“强学会”遥相呼应，成为东南鼓吹维新变法的重要据点。“苏学会”每周集会一次，会员轮流登台演讲，并由张一麐倡导开办唐家巷小学试行新式教育。他还派会员祝中渊常驻上海，购买西学书籍及上海强学分会的各类宣传品，并事观察联络。又通过祝心渊的介绍同正在《时务报》当撰述的章太炎相识，从此结为莫逆。章太炎的名著《訄书》就是在张一麐的帮助下首次付梓问世的。

1898年，张一麐再度入京参加会试，因姐夫夏孙桐入闱阅卷，循例回避。其时正值戊戌变法运动拉开序幕，张一麐特地去南海会馆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结纳，并签名参加了以图强救亡为宗旨的保国会。返苏之后，张一麐又同湖南维新运动的干将江标过从密切，江标还赠给“苏学会”许多书刊以示支持。维新运动失败后，苏州的保守势力甚嚣尘上，“苏学会”无形解散，唐家巷小学的学生家长们也纷纷要求重开八股课程，还有人劝告张一麐暂去上海租界躲避。1900年，张一麐应同乡前辈、新授四川学政吴纯斋的邀请，入蜀帮助阅卷校士。

1903年，张一麐赴京会试，又因姐夫夏孙桐入闱而失去应考机会。正待回乡，清廷下旨开试经济特科，张一麐由江苏巡抚恩寿和陕西学政沈卫联名保荐应考。后者是其妹丈沈钧儒的叔父。经济特科考试的主考官是张之洞，对张的试卷十分欣赏，内定一等第一，但揭开弥封后同考官认为按例大魁宜出于翰林，发榜时因此改为第二，而声名大播。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力争下，张一麐由原先之分省湖北改为直隶，授官天津河防同知，就此进入袁幕。他由办理文案起家，逐渐受袁世凯的信任重用，得参机密，为袁举办种种“新政”出力甚多。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奏请实行君主立宪一举时，也听取了他的意见。张同时兼任天津《法政学报》主笔。

1905年10月，北京前门车站发生了五大臣出洋考察被炸事件，

经初步调查系直隶大学堂的学生吴樾所为。袁世凯欲派素有“屠伯”之称的赵秉钧主办此案穷追同党。张一麐密劝袁不必在此案上开罪于革命党人，遂使袁收回原意，改委他人前去保定，草率结案了事。吴樾在保定的军国民教育会支部同志和《直隶白话报》的同人们帮助下而得保无虞。

1907年8月，袁世凯入京参襄宪政，又补授军机大臣，张一麐随行，凡有关宪政诏谕、章制、文电等大多出自张之手笔。他还作为编纂官制局的成员，参加了朗润园官制改革会议。但宪政的结果是一场骗局，增添了张一麐对腐朽专制的清王朝的失望。翌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撵回河南彰德，张一麐也辞职回到苏州。在同袁世凯分手时，他接受了幕主的密嘱，这就是后来他替袁世凯整理和发表所谓戊戌政变日记以洗刷袁氏罪名的由来。

留居苏州期间，张一麐联络了一些学人乡绅，举办了不少如图书馆、公园等地方公益事业。不久又应友人邀请去游杭州，被浙江巡抚增韫聘留入幕，至1911年春天辞幕返苏。

当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张一麐参与了江苏独立的活动，被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任命为民政司长。这时清廷又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以司剿灭革命之火，袁往孝感萧家港车站视师时，张一麐拍去密电，劝袁取清而代之。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袁世凯没有接受张一麐的劝进，张一麐本人也转变了态度，和张謇等立宪党人同赴上海参与南阳路“惜阴堂”的活动，旋即应袁世凯连番电催携带秘密使命入京，与上海南北和会的场外交易相配合，最终促成了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的妥协。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张一麐被袁重用，担任总统府秘书职。法国新闻记者菲迪南·法容纳曾于1913年会见袁世凯时认识了张一麐，认为袁在一切问题上都信赖梁士诒和张一麐，并称他们是当时统治中国的三个人物。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

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张一麐被任命为总统府政事堂机要局长，为袁直接掌握之“内秘书厅”，其职守权限实际上高于国务卿，足见袁氏对其非同一般的信任和倚重。其时袁世凯图谋帝制复辟之心日切，张一麐洞察时局，以为民党实力雄厚，共和深得民心，改制极为不利。他感袁知遇之恩，向袁反复陈述利害，力劝袁不可为之。其时拥袁称帝之人屡屡以死相胁，张亦无所畏惧；他一再面谏袁氏回头，还当面警告杨度不要受人利用，并在此时同反对帝制的蔡锷结下深厚友谊。在复辟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坚辞机要局长职，但袁世凯又以教育总长一职相羁。10月，张出任教育总长，锐意推广汉语拼音，还自捐薪俸办了一个注音字母传习所以培训师资。同时，他仍竭力抵制帝制活动。蔡锷秘密离京前夕，曾暗示张一麐一同出走，但张没有接受，仍旧对袁氏改弦抱着一丝希望。12月11日，参政院向袁世凯呈上第二次推戴书，张一麐闻讯连夜写成数千言的《密陈大计呈稿》，苦劝袁氏幡然悔悟。但稿呈之时，袁已发表申令接受帝号，张一麐忧愤交集，辞去教育总长职，黯然去津。

蔡锷起兵后，全国响应，袁世凯如坐针毡，被迫召回张一麐并请他撰写取消帝制的文告。在袁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每天都想亲近张一麐，对他说了不少悔悟一类的话，使得张一麐终生对袁抱有复杂的印象。

袁世凯死后，张一麐谢绝了各级北洋军人政客对他的聘用，去日本游历了一个多月，归国后又自北而南周游了一圈，最后息影于苏州。他曾写诗明志，表示不愿再入宦途。但1917年7月张勋导演的宣统复辟逆流，又激起了他坚持共和、反对帝制的热情，使他从林泉下重新卷进政治涡流。当他得到宣统复辟的消息后，不顾有病在身，赶到南京说动江苏军政长官冯国璋通电讨逆。冯国璋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后，他又被聘为总统府秘书长。张竭力反对段祺瑞继承袁世凯衣钵所倡之武力统一政策，并向冯推荐王克敏出面组党，以对付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

1918年10月，徐世昌接替冯国璋任大总统，张一麐也同时卸去秘书长职务，以名流身份致力于国内和平运动。1919年3月2日，各地平和期成会代表在南京正式成立“全国平和期成联合会”（简称“和联”），举熊希龄为会长，张一麐和梁士诒为副会长。张的基本主张是要求停止内战和反对卖国外交，并宣称自己已是人民的仆人，而不再是北洋的幕僚。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对人民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1919年9月发表的《徐佛苏〈西南自治与和平〉评议》一文中，张坚持“约法精神，中华民国主权在人民全体”，要求实行对抗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联省自治，极言“共和原理，必由民治，真自治便是国民有自觉之智识，自动之能力”，“自治之极点，必标其名为民治”[(2)]。直皖战争后，张绍曾于1921年9月在吴佩孚授意下，通电主张召开庐山国是会议，他也发通电表示赞成。会议流产后，他回到苏州，同寓居苏州的李根源、章太炎等人交往过从，诗酒唱和，并致力于地方事业。1924年江浙战争打响，他又外出奔走，呼吁各方和平，免除兵祸涂炭。但是当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时，张一麐仍以内战看待，受江浙协会推戴充当“人民代表”，赶赴武汉企图说和交战双方。及至北伐军总司令部移节南昌时，他又去会晤蒋介石意欲斡旋。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张一麐长期住在苏州从事地方公益事业活动，包括农事改良、公路修建、救灾抚难、整理古迹、筹建平民住宅以及各类文化教育措施，等等。东吴大学因其学养声望，特授法学博士头衔以彰荣誉。对于国民党政府当局以调换田单为名巧取豪夺、水利失修而造成巨大灾祸，政府官员肥私贪贿、危害社会等等弊端，张一麐都加以严词抨击，因此被有些人目为“劣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张一麐积极投入了爱国抗日的宣传活动。他创办了《斗报周刊》，自署“江东阿斗”，在其亲撰的发刊词中公然揭橥“三不主义”：即“不不抵抗、不签订丧权辱国之约、不压制舆论”，并且出席群众集会讲演力主抗日救国。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打响后，张一麐同李根源一起发起抗日治安会，动员苏州人民

参加捐输钱款、棉衣、药品和救护抗日伤员，还亲自把大宗棉衣、药物和罐头食品运送到上海。在为吴县抗日团体书写的启事里，他痛斥了当局苟安泄沓的暧昧态度。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同时向蒋介石提出十二条抗战救国大计，其中就包括邀请张一麐、蒋百里等名流共参国策，但是蒋没有接受。

1936年11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因宣传抗日救国，横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迫害，是为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之狱”。营救“七君子”运动把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洪流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张一麐也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斗争。12月4日，“七君子”从上海移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张一麐即同李根源前往面致慰问，并代表苏州各界群众团体向爱国志士们送上水果罐头等礼品。他又和羁押在狱的沈钧儒诗文唱和表示钦佩。当国民党司法当局决定引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沈钧儒等七人提起公诉时，张一麐同李根源等四处奔走活动，延请了上海、苏州的二十七位著名律师通力合作，以充当“七君子”冤案的辩护人。开庭以前，张一麐还在自己家里宴请全体律师，对大家激于民族大义，不顾当局压力，敢于出庭为爱国志士陈词辩护的义举表示感谢。1937年6月11日，“七君子”之狱正式开庭，张一麐和李根源早早赶到庭外，在濛濛细雨中鹄立等候。待法庭宣布不准旁听时，他愤怒地走进去找到高等法院院长朱树声当面交涉，为“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们争得了旁听的权利。在审判过程中，张一麐不间断地慰劳和鼓励律师们，还参与了他们对付反动法庭的策略谋划。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逐渐形成后，国民党当局被迫裁定“七君子”具保释放。张一麐和李根源等毅然充当保人，和成千群众一起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欢迎爱国志士们光荣出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张一麐同李根源等人立即组织起苏州抗敌后援会。8月16日，他们冒着敌机滥炸的危险，赶到战火弥漫的真如，受到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冯玉祥、张治中、张发奎等抗日将领的热情接待。张一麐把儿子送进了前线救护

队，自己则不顾抱病吐血，领导了大量繁重的抗日后援工作。为激励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奋起，年已七旬的张一麐在报上公开倡议建立老子军，举马相伯老人任军统，自任副军统，李根源任参谋长，动员全国六旬以上男子投军，从事各种与敌拼命不得生还的工作。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壮举，立即得到全国老人们的响应，数日之间，报名从军和捐款之信函盈尺，但最终受到了蒋介石亲自来电阻挠。在这段时间里，张一麐还书写了大量诗篇发表于报章，热情讴歌抗日爱国军队英勇杀敌的壮烈事迹，鼓励民众共同奋起抗日到底。他并发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号召日本人民一起加入到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来。他还同画家樊少云合作扇面等，以润笔之资充作救国捐。当时郭沫若曾专门去苏州采访过他和李根源，在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战地通讯里，详细报道了两位爱国老人在苏州进行的抗敌后援工作，尊称他们为“天下之大老”。

1937年11月19日苏州沦陷后，张一麐在群众的帮助下化装成老僧逃出敌人魔掌。途经上海时，组织江浙两省流亡在“孤岛”的绅民成立同乡会以继续斗争。嗣后辗转流亡至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七七”周年纪念大会在汉口召开时，张一麐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同一天，第一届回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张一麐以首席参政员身份致辞。他在会上支持并签署了沈钧儒、邹韬奋等提出的各种要求抗日、进步和民主的提案。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张一麐联署了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人提出的拥护持久抗战宣言案。他还提出临时动议，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矛头直指企图降敌的汪精卫等，此案当即得到董必武和许多参政员的支持获得通过。而后，当中共六参政员提出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时，他也慨然签署。在1939年9月9日召开的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麐在致辞时，面斥蒋介石所推行的种种破坏团结抗战之反动政策。邹韬奋在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样至诚爱国的沉痛语，幸而是出于年高德劭的张先生之口，否则至少又要被人戴上几顶毫不相干的帽子了！”[(3)]

1940年1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组成，张一麐仍为首席参政员。他继续坚持团结抗战和进步的立场，反对国民党煽起的反共逆流。他写有赋参政会纪事诗一首，谓："万马齐喑试一鸣，初心端不为浮名。歌功颂德由君辈，折角批鳞属老生。"在历次会议上，他都实践了"折角批鳞"的诺言，成为抨击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行径最有力者之一。同时，张一麐又积极从事促进宪政和民主的运动，也是素有"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园的座上客。在那里，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袖倾心交谈，因此愈加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1943年8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当张一麐抱病出席并痛斥孔祥熙等人贪污误国危及前线时，蒋介石冷冷地说："仲老年高德劭，不要轻信外面的谣言。"还说张以后可视健康情况，参政会不出席亦可[(4)]。

1943年10月24日，张一麐因急性肺炎病逝于重庆。

主要参考资料

黄炎培：《张仲仁先生传》，《心太平室集》卷一。

张一津：《张一麐》，《近代史资料》总第60辑。

《有关张一麐创设老子军抗日史料一件》，《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恽逸群：《首席参政张一麐》，《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44页。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京华印书馆1922年版。

张国淦：《洪宪遗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1)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心太平室集》卷8，1947年铅印本。

(2)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补遗，第4—6页。

(3)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2页。

(4) 李希泌：《老子军的创立者张一麐》，《人物》1986年第5期。

张永福

陈民

张永福，字祝华，祖籍广东饶平县。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生于新加坡，为第二代侨民。其父张礼在新加坡开设“新长美行”，经营绸缎布匹，颇具规模。张永福从小就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后继承父业。

张永福与著名同盟会员陈楚楠为邻居，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与新加坡维新派名士邱菽园交往，受其影响，后转而倾向革命。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生，章炳麟、邹容被英租界当局拘捕，清廷向英领事交涉，要求引渡。张永福闻讯后激于义愤，与陈楚楠等设法营救，以新加坡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领事团，援引国事犯不能由敌方引渡的成例，请领事团注意并加以援助。在各方面的声援下，章、邹终未被引渡。张永福等第一次参与国内政治斗争，并取得胜利，受到很大的鼓舞。

1904年春，在革命党人尤列的影响和协助下，张永福与陈楚楠合资创办《图南日报》，聘请香港《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为主笔，这是南洋华侨社会最早鼓吹反清的报纸。该报曾把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加以翻印，除托黄乃裳携带两千册秘密输入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之外，还趁其外甥林义顺回国之机，携带一千多册沿途分送，广为宣传。张永福又查阅国内各省《缙绅录》，按照各省府、州、县的衙门，将书卷好，贴上邮票，径寄各级官吏收阅，连北京的翰林院、总理衙门也都一一奉寄[(1)]。是年冬，《图南日报》为迎接1905年元旦，特印制富有革命内容的“月份牌”馈赠读者。“月份牌”由张永福自行设计，引用太平天国石达开写的词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以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印有自由钟及独立旗[(2)]。由于形式新颖美观，又富有爱国思想，颇受广大华侨欢迎。这种“月份牌”流传至檀香山，为孙中山所见，大为欣赏，遂汇美金二十元向《图南日报》购买“月份牌”，同时修书一封，殷殷嘉勉，并表示愿意和他们相会。

1905年5月，孙中山由英国赴日本，途经新加坡，因出境期限未满，不能自由登岸，便通过尤列，约请张永福等上船会晤。至时，张永福等特向警厅磋商，获准特许孙中山登岸，在小桃源俱乐部会餐，孙中山向他们谈及组织同盟会之事。张永福等早在1901年曾与孙中山的老友林文庆有过接触，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所了解；经过这次会晤，更使他们对孙中山的风度和辩才有了深刻印象，便倾心接受他的领导。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年底，孙中山复至新加坡组织南洋同盟会分会，张永福异常振奋，将原为供母亲养老的别墅“晚晴园”粉饰一新，作为招待孙中山及革命党人聚会的场所。张永福与陈楚楠、李竹痴三人首先加盟，第二天又邀林义顺、许子麟等加入，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第二年，会员大增，重新选举，改选张永福为正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兼财政。

张永福与陈楚楠合办的《图南日报》，由于亏损累累，早于1905年冬被迫停刊。新加坡同盟会成立后，为免革命喉舌中断，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张永福与陈楚楠、林义顺等向各埠同志募集资金，组织《中兴日报》，以继承《图南日报》的传统，并于1907年8月20日正式发刊。张永福任报社主席，林义顺任司理，先后主笔政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田桐等人。发刊不久，即与保皇党人的《南洋总汇报》为革命论与君宪论展开大论战，有力地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除了筹款和宣传革命，张永福几乎也成为孙中山在新加坡的私人秘书，从对革命同志的迎来送往，到代购英文书籍等等，孙中山都委托他代为办理。由于张永福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自

己的生意也就照顾不到，以致濒临破产。《中兴日报》也因注重政治宣传而忽略了营业发行，勉强维持了两年半时间，终因亏损而停刊歇业。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永福虽因历年出钱出力而濒临破产，但仍然积极筹款加以支援。1912年12月，国民党在新加坡成立海外支部，取代同盟会。翌年7月进行选举，张永福被推选为名誉支部长。1917年张勋复辟，张永福当即以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社长名义，致电黎元洪加以声讨。

张永福对当地华侨社会的教育、慈善事业也颇热心，慷慨出钱出力，曾与吴来喜等于1924年创办端蒙学校，被推选为该校首任总理。他还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和广东会馆董事，直至1930年。

张永福作为英国籍的“臣民”，却又对中国的政治表示关注并积极参与活动，因而引起殖民政府的不满，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张永福便于1932年返回祖国，先后任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广东中央银行副经理、汕头市市长、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纂等职。这期间，张永福发现执政当权的国民党与自己理想中的政党相差甚远，特别是对蒋介石手下一批官吏的贪污腐化更为不满，多有微词。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受到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的一致谴责。张永福与汪精卫有较深的历史关系，私交甚笃，一向视汪为“党国元老”，因而昧于民族大义，公然发出快邮代电，拥护汪的“艳电”。1940年3月，张被汪委任为南京傀儡政权的“国府委员”和“侨务委员”等职，数度奉派到东南亚各地办理“通商慰侨”事宜[(3)]，企图游说南洋故旧，为汪伪政权壮声势。张永福的行径为爱国华侨所不齿，所到之处，均遭冷落。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张永福在南京被

拘捕。由于国民党元老居正、张继等为他讲情，从轻判处缓刑二年[4]。获释后寓居香港九龙。1949年后曾一度回到新加坡，由于得不到故人的谅解而“穷愁只觉一身非”[5]，极少与外界接触，连亲友也很少会见，过着闭门索居的孤寂生活。1957年，张永福在香港病故。著有《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为研究南洋华侨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

---

(1)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88页。

(2)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插图。

(3) 《新申报》1942年10月16日第3版。

(4) 黄美真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5) 黄溢华主编：《怡和轩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895—1985），新加坡大水牛出版机构1985年版，第103页。

张钰哲

史全生

张钰哲，福建闽侯人。生于1902年2月1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九）。幼年失怙，全家靠着母亲做佣工度日，后来两个哥哥和姐姐有了工作，光景才稍有好转。

张钰哲从小就对天文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次，他在家乡的小书摊上看到一本吴稚晖写的《上下古今谈》。这是一本以两人对话的方式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的通俗读物，张钰哲读了很感兴趣，从此就爱上了天文这一行。

1914年夏，张钰哲在家乡小学毕业后，随二哥到北京读书，先进畿辅中学初中部，1916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高中部，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

张钰哲在北京读书时，正是北洋军阀横行不法、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时候，学生运动蓬勃高涨，反帝怒潮震荡全国。张钰哲家境清寒，勤奋读书，没有参加很多的学生运动。但是，他深知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奴役、侵略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他决心努力学习，以便将来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为振兴中国贡献力量。他读书十分用功，每天一大早就起身朗读，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能按时完成，从不拖延。平时有一点零用，他就积蓄起来买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19年夏，在北京师范大学高中部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获奖一本英文世界地图。后入清华学堂，又考取了官费赴美留学生。

1923年，张钰哲先入美国普渡大学机械系，第二年即转入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可是他对机械、建筑都不感兴趣。1925年，当他得知芝

加哥大学物理系有天体专业时，便转入该校，第二年即获硕士学位，随后，考入叶凯士天文台的博士研究生。

张钰哲在叶凯士天文台工作和学习都十分认真。无数个夜晚，他都守候在天文望远镜前，弓腰曲背，两眼直盯着广袤的天空细心观测，不管是隆冬还是炎夏，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站得两腿麻木，也全然不顾；白天则俯伏在天文台的小阁楼上，精心地计算测得的各种数据。天文演算十分浩繁，往往一个数据要演算几十个过程，积纸数十页。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长期的细心观测，张钰哲终于在1928年的一个晚上，发现一颗从未认识的小行星。这一意外的发现，使他异常惊喜。为了证实他发现这颗新星的可靠性，他又连续观测了十五个夜晚，每次观测到的结果又都是一样的，确实无误，他才正式宣布了这一新发现。他的同学和朋友们无不为他庆贺，他的老师樊比博教授特意为他做了一个大蛋糕。然而，这时张钰哲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中华民族的大荣誉。因为在这之前，世界上已发现了一千一百多颗行星，还没有一颗是中国人发现的。现在，这颗小行星是首次由中国人发现的，按照世界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以表示对发现者的称道，也是对其他天文学者的激励，但张钰哲没有以自己的姓名命名这颗行星，而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字命名，称为“中华”，编号为1125。

1929年，张钰哲在叶凯士天文台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他学成归国至南京，应聘为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决心以学到的天文科学来报效祖国，发展祖国的天文科学。然而，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对科学技术不予重视，刚刚成立的天文研究所连一座天文台都没有。张钰哲在授课之余，便在中央大学的一个地下室里自己动手，设计研磨天文望远镜，筹建紫金山天文台。就在紫金山天文台建成不久，他研制的天文望远镜还没有完全成功，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丧，张钰哲携儿带女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1941年，天文研究所迁到了云南昆

明，他被任命为昆明天文研究所所长，在那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天文观测和研究。

1941年9月21日，天空将出现难得见到的日全食，可是在长江、黄河流域一些最佳观测地区都被日军占领了，剩下唯一比较好的观测地区，只有甘肃临洮。从昆明到甘肃临洮，必须经过贵州俗称“吊死岩”的“吊丝岩”地段，坡陡谷深，山势险要，更兼上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有不法官吏的横蛮阻挠，犹如过鬼门关一般。张钰哲为了取得科学的真实观测，不顾路途的艰险和遥远，搭乘着旧卡车，七颠八歪地长途跋涉，到达观测现场，完成了这次对日全食的科学观测，拍摄了十六毫米日全食的彩色照片，为我国现代天文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抗战胜利以后，天文研究所于1946年初从昆明迁回南京紫金山，张钰哲也随天文研究所回到南京，憧憬一个美好的工作环境。为了更好地发展祖国的天文科学，他再次去美国叶凯士天文台考察，与他的老师樊比博教授一起观测和研究天象，虚心学习讨教。1947年，他又受叶凯士天文台的派遣，去麦唐纳天文台进行短期工作，使用那里更先进的二米反射望远镜观测天象。经过两年的考察，张钰哲在天文科学上又取得了新的成就，发现了新的变星，对交食双星现象进行了新的光谱观测。1946年冬，他出席了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天文学年会，在美国天体物理期刊上发表了关于交食双星光谱测验的论文。

1948年初，张钰哲在美国考察期满，正当他准备整装回国时，国民政府拒绝向他提供回国的旅费，他夫人在国内四处奔走，托人说情也无济于事。恰巧在这时，美国地理学会决定派遣一支观测队到中国浙江来观测即将在5月发生的日食，经他的老师樊比博教授联系和帮助，张钰哲被允准参加这次日食观测队，于3月顺利地回到祖国。

日食观测结束以后，张钰哲便留在国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张钰哲和全国人民一

样，热切地盼望着祖国的解放。他虽然仍全身心地倾注在天文学上，但一有空闲就收听解放区的电台，获取胜利的喜讯。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张钰哲无限喜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紫金山天文台获得了新生，张钰哲重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他领导天文台的全体科研人员，迅速恢复了天文台的正常工作，修复了各种天文仪器，引进并自制了一些新的天文仪器，开展对小行星的观测，以及摄动计算和改进轨道方向的研究工作。1957年，张钰哲又开展了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撰写了题为《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的学术论文，运用天体力学的基础理论，对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这同时，张钰哲继续坚持对小行星的观测研究，先后创建了小行星、彗星的照相定位观测和天体力学轨道的计算研究。在他主持之下，紫金山天文台先后发现了近千颗新的小行星，其中已有二十多颗获得世界小行星中心的承认，取得了正式编号，被分别命名为“张衡”、“祖冲之”、“一行”、“沈括”、“郭守敬”、“北京”、“南京”、“广东”、“江苏”、“台湾”，等等。其他八十余颗亦已精确地计算出运行轨道，报请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待承认和编号。在1965年1月1日到11日间，张钰哲等接连发现了两颗彗星，创造了世界天文科学史上的新纪录。

张钰哲从事天文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凡事都自己亲自动手，细致观测。1980年夏，我国引进了一台毫米波射电望远镜，为了选择一个最好的观测地点，七十八岁高龄的张钰哲不顾年迈体弱和路途遥远，仍和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们一起，跋山涉水，攀登了海拔四千八百米高的昆仑山口，经格尔木、德令哈等地，一直深入到青海高原的内地。

张钰哲不仅积极开展天文科学的深入研究，还十分关心天文科学

的教育和普及。1952年，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天文系，他曾多次到南大兼课，热心培养年轻一代。经他培育的天文科学工作者，如今已遍及全国各天文台和天文教学的第一线。他先后主编过《宇宙》、《天文学报》。他还多次率领我国天文工作者参加国际天文协会的活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合作。他的撰著有《天文学论丛》（1934年出版）和《宇宙丛谈》、《小行星漫谈》、《哈雷彗星今昔》等通俗读物，并有科学论文几十篇，参加翻译了沙罗诺夫的《行星物理》，为我国天文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张钰哲在小行星的观测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1978年8月1日，《国际小行星通报》宣布：决定将1976年10月23日哈佛大学天文台发现的2051号小行星定名为“张”（Chang），以“表示对张钰哲的敬意”。1982年，张钰哲八十寿辰时，中国天文学会表彰了由他领衔的九名从事天文工作五十年以上的老科学家，并赠一联语称颂他道：“测黄道赤道白道，深得此道，赞钰老步人间正道；探行星彗星恒星，戴月披星，愿哲翁成百岁寿星。”

张钰哲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中国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并且工书法、篆刻、绘画和诗词，在饭后茶余喜欢伏案临摹名家字帖，或握刀刻石，兴致所至之时，则赋诗填词，泼墨作画。他的诗词朴实自然，篆刻古朴遒劲。

张钰哲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名誉台长。

1986年7月21日，张钰哲在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中研院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人物杂志》1982年第6期。

《新华日报》1986年7月22日、24日、8月1日。

[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科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张元济

熊尚厚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出身书香世家。其父张森玉历任广东会同（今海南琼海）、陵水（今海南崖县）县知事。张元济七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赖母亲与妹妹针黹所入维持生计。1884年他应县试中秀才，1889年赴杭州应乡试中举人，1892年初赴京参加壬辰科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分到刑部贵州司任主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张元济痛感国家安危不保，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他与强学会人员频繁来往。1896年8月，他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分掌文书，在北京常往陶然亭同文廷式等“议论朝政”，力主改革。张元济钦慕西学，主张“昌明教育”、“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之路。翌年初，与陈昭常等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习英文、算术等新学，以期培养人才。同时，支持汪康年办《时务报》，以求启迪民智，希望学习西方“有用之学”，求得国家的自强。此外，他还给光绪皇帝提供一些新书，使之认识到传播西方知识和实践现代教育的重要。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张元济得徐致靖的保荐，和康有为等受到召见。9月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建议：（一）设议政局；（二）融满汉之见；（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人之格；（五）善理财之策。继后又上折，请“为新政衙门酌设缺额，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建议裁汰冗员，并且不要把旧衙门裁下之人派到新衙门任职，以拔擢真才。张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之一。其间，他鉴于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预感对

维新将有“反动”，所以并没有更多的活动。是年8月，他一度在路矿铁路总局当差。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通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他遂离京南下上海，在李鸿章举荐下，应盛宣怀之聘去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1899年4月任译书院院长。嗣后，慈禧太后曾下诏让他回京做官，他婉辞未应。邮传部设立时，让他出掌该部也推辞未就，对官场十分冷淡，而决心实践其“英才教育”，走教育救国之路。在译书院与严复合作，由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出版，并付高稿酬，开一代风气之先。1901年初，他兼代南洋公学总理。翌年1月，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旬刊，介绍国际动态与知识，主张“文明排外”。2月南洋公学设经济特科班，聘蔡元培为总教习，胡仁源、黄炎培等任教习，学习西方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同时，还帮助商务印书馆开展译书工作，并成为商务的股东。

商务印书馆原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等创办，数年中曾印行过一些书籍，但因质量不高而亏本，1902年增设编译所，由蔡元培出任所长。翌年冬，蔡元培因“苏报案”离沪去青岛，此时张元济也因不满南洋公学的官僚习气，辞职转入商务工作，接任编译所所长。他鉴于商务人力、财力、技术和经验的不足，毅然建议与日本书业商金港堂合资。同时聘请蒋维乔、杜亚泉等一些懂新学的学者充编辑，请严复主持翻译世界名著，锐意出版西方名著沟通中西文化；并从日本请来教科书编辑专家长尾桢太郎等任顾问，和高梦旦等广泛搜罗访求蒙学课本，出版教科书，编成我国最早的《最新教科书》。商务《最新教科书》的出版，并配有教师用的教授法，远远超过旧的蒙学课本。1904年到1905年，他又与蔡元培等编辑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注重人格品德教育。之后，他用人唯贤，善于网罗进步人才，加强编辑力量，相继出版各种课本、教授法、参考书、文学作品等千余种，为我国第一家成套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十年之间，使商务由一个小型印刷所迅速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出版企业。张元济是

我国出版事业现代化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步入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功臣。

当张元济入商务印书馆实践其“昌明教育”、“开发民智”之际，国内政治风暴更加猛烈，革命派和立宪派同时展开活动。他站在立宪派一边鼓吹宪政，希望通过改良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理想政府。1904年夏，他与张謇等敦请军机大臣瞿鸿禨倡导立宪，促清廷颁布诏令。在1905年到1910年的各省保路运动中，是反对苏杭甬铁路英国借款保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1905年7月，他与汤寿潜等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董事会董事。翌年3月奉调入京，担任了半年的学部参事行走，10月南返。同年冬，他率浙江代表团赴京请愿，获不以浙江铁路为抵押品的胜利。1907年10月，张被选为浙江全省拒款会副会长。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和周晋镳等十八人任该会职员。与此同时，通过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鼓吹宪政，并出版一系列新书传播国家主权、公民权、代议制、地方自治、个人主义等政治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代表浙江参加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上海商议成立共和政府的阶段会议。同时还和张謇、汤寿潜等经常聚会，策划一面和袁世凯谈判，一面劝告清帝退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共和思想渐入民心，张元济很快接受了共和思想。为了适应民初教育发展的需要，他及时整顿商务教科书的出版，“重订共和教科书”，出版新字典，并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推进商务的发展。1914年夏瑞芳去世后，他一度任总经理，两年后改任经理。任职期间，对商务进行改革，新设总务处统管印刷、编译、发行三部；出版《辞源》，生产教学幻灯片，开办函授学校；先后创办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期刊，使商务成为我国最大的新式文化企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元济顺时应变，将商务的出版重心移到学术丛书出版上，重用陈独秀、茅盾、郑振铎等新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宣传妇女解放，支持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他反对军阀、

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0年4月，张元济辞去经理，改任监理，直到1926年。此间，他摆脱了许多日常事务，对商务实施科学管理，全面监督商务的出版业务。在其主持下设计新式排字架，提高印刷效率；编辑《新法教科书》一套八册，出版《四部丛刊初编》，并将私家的涵芬楼藏书改名东方图书馆公诸社会。1926年7月，他改任董事长，宣布退休。

张元济退休后，仍然惦记着商务的发展。为了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影印古籍，亲自参加选本、校勘和影印出版，编校了近人文集、日记、古籍多种，解决了大量历史问题和版本上的舛错。还和工人一起研究“传真版”以提高印刷水平。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从1916年起，先后编印有《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大型丛书，对古籍的抢救整理贡献极大，为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商务毁于日军的炮火，损失惨重，张元济不顾年迈挺身复出，以董事长身份参与商务的复兴，召开董事会组成复兴委员会，任主席。当日军侵略华北日亟之际，他满怀爱国热忱用白话文撰《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出版，以历代的民族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慷慨陈词，提倡民族精神，培养民族人格。同时先后在《大公报》撰文揭露国民党官僚的营私舞弊，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对国民党愚民统治的认识。他的救国救民热情令人钦佩。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元济留在上海。他秉民族大义，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注册。日军派员前往求见，他拒不晤面，长期韬隐于沪上。在沦陷区生活日艰，他以鬻字卖文贴补生计，曾打算出卖住宅，但从未间断对善本书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与郑振铎、何炳松等苦心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与叶揆初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鼓励私人捐赠藏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卖字生涯并没有结束，在卖字中不忘“启迪民智”，书写了很多“治家格言”的条幅教育人。同时极其关心商务战后的复兴。1947年12月，他被推为董事会主席，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商务的业务。因王云五辞职去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总经理一职由国民党的朱经农接任，但朱挂名不办事，他对这种官僚习气深为不满，1948年迫其去职。

战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内战民主运动高涨，张元济给予支持。1947年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他联合陈叔通等九位老人，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支持学生的斗争，要求实行改革，谴责当局镇压学生，要求速即释放被捕学生。翌年，在反美扶日斗争中，他亦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公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指出内战是“兄弟阋墙”，使国家精疲力竭。其间，他还经常写诗，表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当局对之进行威胁，责张“为匪张目”，“同情共产党”，他不为所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强占合众图书馆，他闻讯亲自前往交涉，坐镇维护，迫使军队撤走。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他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

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无比喜悦，9月，北上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他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他热情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并以其年耋之躯，编校《涵芬楼烬馀书录》出版。毕生满怀爱国热忱，尽瘁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病逝于上海。其生平主要著作有《校史随笔》、《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序》、《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等。

主要参考资料

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张元济：《戊戌变法的回忆》，《新建设》第1卷第3期（1950年）。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张云山

郑自毅

张云山，字凤岗，陕西长安人。1877年10月15日（清光绪三年九月初九）出生于贫苦农家。张的父母早逝，两个哥哥因家贫出外谋生，他由族人名五婆的老人收养，故幼年失学，帮人劳动。他喜看旧戏，对戏中关羽、岳飞、包拯等“名将”、“清官”最为仰慕。稍长，有胆识，善击剑且膂力过人。

1895年，西宁爆发回民起义，新疆巡抚、署任陕甘总督陶模奉令募兵镇压。当时，张云山投效当兵，转战西宁、新疆等地，并在营中加入哥老会。张因打仗骁勇，积功升任都司。1905年回陕，在新军中任司号长。由于张为人耿直，待人诚恳，颇得下层官兵的好感。他通过理门公所（当时公开的戒烟机构）负责人夏连生，与哥老会在西安的“黄大爷”接上关系，陆续把新军中的号目、号兵介绍加入哥老会，从此，他的影响与势力日渐壮大。

1908年新军由常备军扩编为陕西陆军混成协时，张任司号官。同年10月，同盟会员井勿幕由日本回陕活动革命。不久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选举李仲特为会长，决议联合新军中的“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在中下层官兵中影响颇大的会党共同行动，并派钱鼎、张宝麟代表同盟会与张云山联系。经过两三个月的积极活动与宣传，使张云山及哥老会其他头目也都了解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张表示接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答应双方采取联合行动。为了壮大力量，张决定开山堂——“通统山”，并自任山主，吸收成员一千多人，占全协官兵的四分之一。他们在各标、营建有自成系统的哥老会组织，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拥有很大的潜势力。而新军中同盟会员人数则很少。

为了加强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合，井勿幕、钱鼎、张云山等人发起，于191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三）在大雁塔召开结盟会议。当时到会的有双方重要人物三十多人，时称“三十六弟兄”，他们在神前歃血宣誓为盟，共图大举。此次会议，影响很大，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和哥老会的团结，为后来的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清陕西当局颇为惊慌，对于在新军中各会党的革命活动严加防范，并下令从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三）起，将新军第二标所属一、二、三营陆续开往岐山、凤翔、宝鸡一带，听候行止。张云山、钱鼎等人得悉此讯，感到原定于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之起义日期已缓不济急，必须立即改变计划。即由钱鼎、张宝麟、张钫等于10月21日（农历八月三十日）夜间去见新军三十九协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研究应急对策。经商定于次日（九月初一）上午九时，在城西林家坟召开有各方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九月初一本为军中发饷日，各方负责人物均借故先后聚集林家坟开会，公推张凤翙为首领，钱鼎为副首领，决定于当日上午11时发动起义。恰好当日亦为军中假日，清兵多外出游逛，起义军首先占领了城内军装局、鼓楼制高点和藩司衙门等要地，随即成立起义军总司令部，定名为“秦陇复汉军”，张凤翙为临时大统领，通电响应武昌起义。清西安将军文瑞闻变退守满城，起义军于初二日拂晓开始向满城进攻，钱鼎、张云山、万炳南率队从西面攻击，张凤翙率队从南面进攻。经过半天激战，于下午攻克满城。文瑞投井自杀，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逃匿被查获。西安其他武装部队纷纷响应革命。于是起义军总司令部由军装局移至陕西高等学堂，于10月25日开会推选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调遣兵马都督，成立军政府。接着由张凤翙、张云山先后发布安民告示及檄文，要求会党及市民严守纪律。

当陕西新军起义时，清卸任陕甘总督升允闻变连夜逃往甘肃，旋经陕甘总督长庚保荐，任陕西巡抚兼办军务。升允遂调动甘肃清军马

国仁部于11月21日攻陷长武，进逼邠州（今彬县）。张云山闻知西路吃紧，即向军政府自荐，率向字营等部开赴西路，在长武冉店桥一带和清军激战，终将敌军击退，使局势转危为安。此时河南来犯清军则攻陷潼关，故东路告急。大统领张凤翙亲自前往督战，张云山被调回西安主持防务。不久潼关收复，而升允又调集甘肃清军张行志、陆洪涛、马安良、崔正午等大批部队，由陇南、泾川分南北两路再犯陕西。长武、邠州等地相继失陷，情况极为严重。张云山急赴乾州（今乾县）堵截清军，坚守城防。与此同时，清军陷陇州（今陇县）、汧阳（今千阳），副大统领万炳南在凤翙被围求援。张凤翙亲率由东路新回部队驰援乾州，又调井勿幕和陈树藩部赴援西路。一时各线同时抗敌，紧张异常。张云山坚守乾州城防，牵制了众多清军，双方对峙八十三日，大小数十战，以致城无完堞，伤亡颇大。张云山身先士卒，日夜巡城督战，清军曾多次使用云梯攻城、挖掘地道或派人诈降等，均未得逞。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并下令各地清军停战并进行和谈。18日，陕西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与河南清军将领赵倜达成协议，清军退出潼关，28日张钫率华阴各处民军西援。此时惟升允占据醴泉拒绝谈判，并将张云山派去的谈判代表雷恒焱杀害，直到在乾州的马安良向张云山求和并达成协议，升允陷于孤立，方于3月8日率领入陕甘军各部退出陕境。东西两路战事全面结束。

是时，袁世凯已继任临时大总统，张云山以光复有功被授陆军中将，补秦军第一镇统制。不久，为了削弱各地起义军实力，袁世凯令都督张凤翙缩编陕军，将张云山部缩编为第一师，张云山改任师长。

陕西光复后，以张凤翙为代表的同盟会，与以张云山为首领的哥老会之间的分歧加剧。一时，张云山与张凤翙之间也颇多歧见。当时二张一在南院，一在北院，俨然形成南北对峙。后经郭希仁、宋伯鲁等斡旋，规以大义，二张关系才逐渐好转。其后张凤翙令张云山率队

剿抚在盩厔（今周至）、郿县（今眉县）、凤翔等地的溃军散勇，安定了地方。

张云山对提倡男人剪发辫，妇女放足，对在省内创立同志小学和设立普云堂药铺施舍医药多有所赞助。他支持张凤翙禁种鸦片的主张，曾亲自到盛产鸦片的兴、武、扶、郿等地召集民众宣讲禁令。由于受旧思想局限，慕求“清官”、“名将”的美名，张云山甚至仿效铁面无私的包拯，常在台上设置铡刀以示众下，又过分热心于哥老会势力的发展，采取不适当手段，曾引起人们对他的反感，但张为人尚能从谏，予以改正。1914年3月，河南农民起义反袁军白朗部进入陕西，袁世凯派其亲信陆建章以“追剿”白朗为名，率北洋陆军第七师开进陕西，驻在西安城东附近。6月电召张凤翙入京改任将军府扬威将军，以陆建章继任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独揽陕西军政大权。陆建章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大肆镇压革命党人，裁汰缩编陕军，又将张云山所部第一师缩编为混成旅，改任张为旅长兼陕北镇守使，但设置种种障碍，使张不能到任。张处此情况下，欲反抗而不得，只好曲意奉承。直到货尽财竭，陆仍步步相逼，张忧愤咯血，于1915年6月死去，终年仅三十七岁。张云山暴卒后，各方反响甚大，陆建章为了蒙骗世人，经陆军部于7月1日呈请袁世凯准予“从优照上将例”“给恤”[(1)]。

主要参考资料

郭希仁：《从戎记略》，共和印刷公司1913年版。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1949年版。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辑。

《宋伯鲁撰并书张云山墓志铭》。

《许宝荃撰并书张云山神道碑》。

《关于张云山几个材料片断》，庞建堂口述，刘茵侬记录。

《宋伯鲁撰并书郑子屏墓志铭》。

《郑自毅采访录》（手稿）。

宋伯鲁纂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1934年版。

---

(1) 关于张云山卒于1915年6月的哪一天，尚未找到准确记载。但从《政府公报》中可以看到：1915年6月7日袁政府尚颁给张云山三等嘉禾章；同年6月24日则下令裁撤张生前所任的陕北镇守使缺；到7月1日则刊有“陆军部呈遵令从优照上将例议给陕北镇守使张云山恤典由：准如所议给恤此批”的条文。由此可见张当系于6月某日故去。

张贞

萧林

张贞，原名善兴，字浩然，福建诏安人。1884年2月8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十二日）生。父亲张介一务农兼贩糖，教育子女勤奋读书以报效国家。张贞七岁起入塾，1909年在诏安丹诏小学堂高级班毕业，翌年考入漳州府中学堂，后加入同盟会漳州支部为会员，遂改善兴名为贞，字幹之。

辛亥武昌起义，东南各省纷起响应，张贞加入漳州学生光复队，参与光复福州之役。旋参加福建学生北伐队，举“祈战死”旗帜离榕赴沪转宁，先编为陆军入伍生队，后编入总统府卫士队。1912年10月，被选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受训。越年春，张贞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班深造，与白崇禧、黄绍竑、刘建绪等为同期同学。

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张贞在保定宣誓入党。1915年初夏，他偕汤铭盘、林知渊离开保定南下厦门，协助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叶青渊主持鼓浪屿秘密机关部工作，并负责训练同安寨仔湖“福建下游护国军第一支队”。秋末，与北军厦门要塞司令唐国谟部辛桂芳营激战于灌口山口庙。1916年1月，张贞参加厦门首义秘密军事会议，参与反袁驱李（厚基）“二二举义”的准备事项。起义未遂，偕陈金芳、丘廑竞处理善后近三个月。同年5月27日，参加指挥攻打同安县城之役，后撤返天柱山。6月，袁世凯病殁，南北协议暂成，张贞奉命偕陈熙亮、林邦燕作为福建护国军统筹部代表，携带《福建下游护国军编制方案》赴沪亲呈孙中山，嗣后重回保定军校继续学习至毕业。

1917年6月，孙中山通电护法，张贞偕闽籍同学七人到广州投效

响应护法的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方任征闽靖国军代总指挥，张贞被委为靖国军第六军第二工兵营营长。是年12月，张受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处荐任副官。1918年春初，张贞奉孙中山命只身潜入闽南，抵泉属凤巢山会见许卓然，共同联络和编练闽南民军，扩展晋、安、南护法根据地，组建闽南靖国军，任第四旅司令兼第七团团长。1919年夏，任福建靖国军司令，与盘踞泉属各县之北洋军交战。其时，驻扎漳州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多方掣肘靖国军，使孙中山“组军大计颇受困阻”[1]，张贞与靖国军将领许卓然、杨持平联名致电在沪的孙中山。俟后，张贞遵孙中山函谕“以同志大义所在，除去私嫌”[2]，对陈炯明不添芥蒂，协力共事。

1920年秋，桂系军阀陆荣廷进攻粤省，陈炯明回师入粤讨伐，张贞也奉命准备入粤作战。他在晋江安海与浙军师长陈肇英合作，组织靖浙联军司令部，陈为司令，张为副司令，遂即派部挺进闽粤边境。7月，靖浙联军奉命转战广东大埔、饶平，张贞部在浮山之役为桂系刘志陆部所败，张左肩受伤，抢舟下潮安，赴港医治，后转上海。8月，张与在沪的方声涛、黄展云等组织福建自治会，反对李厚基在闽的暴虐统治，得旅居京、津、沪及南洋闽人响应。翌年7月，张贞离沪抵穗，闻孙中山有“粤局可定，而闽局亦安矣”[3]的指示，遂回闽组建福建自治军。冬，任福建自治军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在闽南一带配合讨伐南北军阀。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为讨伐陈炯明，福建自治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张贞任前敌司令。1923年1月，张贞向孙中山请缨入粤，2月5日孙函陈肇英称“张贞愿为讨贼军前驱，极嘉”[4]，张大受鼓舞。6月底，张贞率部直捣潮汕。嗣在浮山圩血战十日，因孤军无援，参谋长汤铭盘战死，乃兵退云霄、漳州。

1924年，在闽的直系、皖系军阀进行“闽南大战”，张贞极力拼杀盘踞漳、泉二属的北洋军阀。7月24日，他随方声涛潜入厦门鼓浪屿，召集五十余名国民党员密议，筹划讨伐新任闽督周荫人。不料事

被查察，周荫人令厦门交涉署查捕，并要求领事团工部局“引渡”方声涛、张贞等人，幸方、张及早潜去而未被捕获。11月，张贞任福建建国军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自永春出击周荫人驻安溪、德化部。1925年2月，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张贞率部参加右路，与粤军及黄埔军校第一教导团并肩作战，在广东南部沿海安田、淡水之役大捷后，于2月27日攻袭海丰，张贞指挥所部炮轰海城。

7月，广州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张贞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团团长，驻防东莞虎门，划归何应钦指挥。11月，二次东征胜利，潮汕底定，张贞率独立一团移防汕头兼琦碌要塞防务。不久在诏安县城收编原福建靖国军旧部，并创设福建陆军干部学校（隶属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校长，招收学员百余名。

1926年6月，国民政府筹谋北伐，张贞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10月间在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领下出师攻闽。小坪岭一役大捷，乘胜尾追北军张毅师出漳州。12月2日配合海陆友军生擒张毅于瓜山，随即挺进福州，任福州卫戍司令。1927年1月，福建政务委员会组成，张任委员、代理主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密令闽、粤等省“清党”，逮捕共产党人。张贞接令后未即行动，等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教官陈祖康、陈尚友、王战天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离去后，始集合军校员生宣布“清党”。未几，独立第四师奉调驻防浙江江山。8月，参加南昌起义的陈铭枢部南下时脱离起义军，停在铅山重建十一军，苦于粮弹告绝，张贞给予资助银洋十万元及大批军需弹药。10月，独立第四师调防南京，参与拱卫京畿。

1928年1月，蒋介石对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和滞留闽南的陈铭枢余部很不放心，于汤山召见张贞，命独立第四师回防闽南重镇漳州，以牵制杨、陈所部，并协助福建省政府改组。2月，张贞率师自宁抵漳，坐毡未定，福建工农革命军于3月8日发动“平和暴动”，张即派陈

炽营到平和进行弹压，并调张汝劻团驰赴闽西永定“清剿”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工农红军。此后，张贞坐镇泉、漳、汀地区，委派亲信林学增、谢梅年等多人充任各县县长，惟函请北伐后由周恩来荐任漳州政治监察专员的陈卓凡充任龙溪县长。陈卓凡此时已是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央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视职数月即被叛徒告发遭通缉，张贞于1929年9月密送陈出境赴港，并赠款助其到沪创办“南强书局”[(5)]。

1929年3月，张贞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次年10月被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将所部四团制的丙种师扩编为三旅六团制的甲种师，由“官兵七千左右、枪五千余杆增加到人枪各一万余”[(6)]。尔后又将独立第四师番号三次易改为暂编第一师、中央陆军新编第一师、陆军第四十九师，均任师长。由于成倍扩军，粮饷骤增，每月需要支付军费20万元，而南京军政部仅拨给六万，张贞下令在辖防区内加捐附税达四种，另开办“民兴银行”发行票券。当地百姓不堪重负，编民谣斥之：“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两升。”

1930年1月初，发生闽北民军首领卢兴邦绑架福建省政府委员事件，张贞派王祖清旅配合刘和鼎、陈齐瑄两部夹击卢部之腹背。6月，卢兴邦兵败求和，释放林知渊等五人。越月，张贞兼任福建“剿匪”司令部司令、闽南航空处处长。

张贞自1928年至1932年占据闽西南四年多，竭力“防共剿共”，用“三光”政策酷对苏区人民，但屡屡战败。1929年6月。张部六个团两个营兵力共万人参与“围剿”闽西苏区，遭工农红军歼击而失败。1931年9月，红十二军萧劲光部攻下长汀、连城两县，四十九师杨逢年旅被歼溃，残部逃退龙岩。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从闽西东进攻克漳州，四十九师被俘三千三百余人，残部连夜溃逃诏安、同安。当地百姓编民谣嘲讽：“张贞豆腐兵，会吃不会拼。”“正逢四十九，张贞无路走。”

张贞据漳期间，曾与地方人士共谋振兴闽南家乡。1928年投资十三万银洋开辟龙诏、漳嵩公路，增扩交通运输线二百公里；兴办龙溪中学和闽南医院，资助泉州黎明中学和上海侨光中学；选派一批人才留学日、德、美诸国深造；还根据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汕头、厦门开港计划，筹划建设嵩屿为商埠，建立“嵩屿建设委员会”，着手进行规划和勘测，终因经费不足而中辍。

1933年6月，进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将张贞四十九师缴械并编。被解职的张贞到南京后，被蒋介石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军事特派员闲职。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张贞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入闽，其旧部闻风即在漳、泉组织“讨逆军”，分别袭击从福州南撤的十九路军。但张贞并未因此而得重用，他郁郁不乐，于1934年7月携幕僚赴南洋“宣慰”华侨，回国后寓居南京。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张贞被蒋介石委为广州行营中将总参议，协助何应钦处置两广问题，但他感于与黄绍竑、白崇禧有同窗私谊，便遁词不去穗视事而转道香港寓居。

“七七”抗日军兴，张贞投入抗战洪流。1938年冬，他参加国民政府委员熊克武、监察委员黄麟书等组成的中央川康党政视察团，赴四川、西康两省视察。1939年秋，张贞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四巡察团主任委员，驻广西桂林。1940年率巡察团巡察粤、黔、滇、湘、鄂诸省后，赴桂南前线昆仑关参加督战。次年，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国际线昆安段通车，张贞率巡察团到滇缅边境巡察中方军队，宣慰前方将士和筑路民工。1942年6月，张贞改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主任委员，从广西桂林移驻福建临时省会永安，负责巡察苏、浙、鲁、冀、赣、鄂、闽、台八省军风军纪。他在巡察中查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及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所设的前进指挥所走私越货牟取暴利，司令长官部的别动队武装还保护日伪占领区走私货物过境。但张贞巡而不察，察而不办，时人以“不打老虎、只拍苍蝇”讥讽之。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张贞连任国民党第六届

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0月年逾花甲的张贞退役，被授予陆军上将衔。张贞携眷回漳州定居，伙同秦望山、郑华等围垦东井五里滩，开办长教煤矿，投资扩展漳州电厂，筹划整治九龙江。1948年，张贞旧属李良荣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张于10月赴榕晤李，洽谈整治九龙江流域拨款事。1949年4月，张贞又向旧识、新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请求拨款，拟修整由闽南入粤东的主干线龙诏公路。

1949年夏，挥戈入闽的人民解放军直指闽南，张贞在旧属李良荣、沈向奎的挟劝下，从厦门登机仓皇出走台湾。旋任“立法院”军事组召集人。1963年12月29日因直肠癌于台北去世。

---

(1) 《张贞先生幹之年谱》，台北1983年版。

(2) 《复许卓然等函》（1919年7月22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86页。

(3) 《致李厚基电》（1920年10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51页。

(4) 《复陈肇英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5) 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陈斯骏（陈卓凡之子）1987年10月提供资料，并见陈卓凡《自传》（手稿）。

(6) 林梦飞：《张贞四十九师就歼记》、林志光：《张贞部围剿闽西苏区及其溃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张振武

钟碧容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三，更名竹山。湖北罗田人，寄籍竹山县。生于1870年2月8日（清同治九年正月初九）。

张幼年读书就显露了他的聪慧，稍长入湖北省立师范学堂，成绩优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在师范学堂读书时，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甲午之役中国战败和庚子之役联军入侵，使他感到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他大声疾呼："大丈夫忍为奴隶国民耶？"[(1)] 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变卖家产，于1905年自费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又加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联络事务。回国后，他藉教授生徒为名，以联络志士。在教学中，不断地向学生揭露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

1909年，孙武、焦达峰在湖北武昌成立共进会分会，以联络长江下游的会党。1911年6月，张振武在武汉加入共进会，负责经管财务，筹款购运军火，不足之数由他变卖私产捐助。

武昌起义，张振武是领导者之一，与孙武、蒋翊武齐名，号称"三武"。他事先积极准备，布置周密，行动敏捷。10月11日，革命党人迫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次日推定军政府各部人选时，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蒋翊武、张振武为副部长，当时孙武受伤就医，蒋翊武被捕逃出后未回，由张振武代理部长主持军务部工作。11月16日，张得知清军迫近新沟，汉阳危急，他亲率军务部人员及卫队奔赴前线督战，在跳越障碍物时落水，被卫兵救起。26日，战时总司令官黄兴自汉阳回武昌，召开紧急会议，报告汉阳战事失利经过，主张放

弃武昌，以其兵力往援南京。张振武和谭人凤、李翊东、甘绩熙、范腾霄等与会人员大多数均表示反对，主张坚守武昌[(2)]。27日，汉阳失守。次日，黄兴赴上海，军政府以蒋翊武为护理战时总司令。当时，武昌人心浮动，张振武乃骑马巡行全城，沿街高呼："汉阳失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军民见张之镇静姿态，亦稍安定。在坚守武昌的日日夜夜中，张振武亲率士兵巡视防哨，密切监视着清军的行动。不久，南北达成停战协定，武昌得以保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同盟会中发生了宗派的分化。张振武、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人是以武汉首义自居的一派，他们不满临时政府中的权力分配，乃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发起组织"民社"，推举黎元洪为首领，使同盟会的力量越发涣散。随后，张即返回湖北，设立民社武汉支部。

张振武在武昌起义中为革命出生入死，是有功劳的，但"三武都有些居功自傲，互不相能，以致他们之间也发生了矛盾。特别是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更甚，各自拉一伙人，互相攻击"，"党孙者毁振武，党振武者毁孙"[(3)]。革命党人内部出现的分裂，给了嫉恨他们的黎元洪以可乘之机。

"三武"对黎元洪是藐视的，特别是张振武是逼使黎元洪出来担任鄂军都督的代表之一，对黎当时表现的窘态，亲眼目睹，知根知底。民国成立之后，他在黎面前，仍然恃功自骄，认为黎的天下不过是他们替他打出来的。黎为此怀恨在心，暗中设想除掉他们的计划。

1912年3月15日，黎元洪召开特别会议，以蔡济民代替曾广大任军务司长，吴醒汉为副司长，解除蒋翊武、张振武军务部副部长职务，另把张振武推荐到中央去任职。黎向张谎言：袁世凯将畀以重任，"如此机会，千载一时，你切莫错过了"[(4)]，竭力怂恿张振武赴京任职。

同年5月，张振武奉袁世凯之召进京，任总统府军事顾问，不久即回鄂。8月10日，张振武率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十三人抵京，袁世凯为张振武等设宴洗尘。接着冯国璋、段祺瑞轮流宴请，姜桂题等则召集军界袍泽大会表示热烈欢迎。

在张振武等抵京的次日，黎元洪即密电袁世凯，加张振武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的罪名，乞请“立予正法”。13日，黎再次密电袁世凯，催请尽速处决，其电谓：“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5)] 8月15日下午8时，张振武偕湖北诸将校自作主人，宴请北方诸将领于六国饭店。宴罢回寓，时已夜深，路出东交民巷经正阳门，即被步军统领逮捕。段芝贵立即将张等押至京畿军政执法处，由处长陆建章略加审问后，即将张振武杀害。时正16日凌晨1时，同时遇难的还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8月16日8时，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等前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袁虚情假意地对他们说：“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将骂我，我实不能救他。”[(6)] 但是袁世凯绝不会代他人受过，他在宣布张、方二人的所谓罪状中，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全文录入，以推脱自己的罪责，也使黎元洪与同盟会之间扩大了裂痕。

8月19日，临时参议院为张振武案提出质问；8月18日、20日，黄兴两次致电袁世凯，就处决张、方事追询缘由；东南各省都督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孙道仁等均电诘北京政府谓：“凭一纸空文，擅杀元勋”，“请将张振武确定罪状，正式宣布”[(7)]。在国内舆论谴责下，黎元洪不得不在21日的通电中除罗织张的罪状外，还假惺惺地伪装引咎辞职，并提出对张振武的身后事从优议恤。这是民国史上第一件违法杀人的政治血案。

---

(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页。

(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80页。

(3) 《真相画报》1912年8月21日。

(4)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66页。

(5) 《民立报》1912年8月21日。

(6) 黄远庸：《远生遗著》第2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06页。

(7) 《民立报》1912年8月19日。

张振勋

熊尚厚

张振勋，字弼士，号肇燮。1841年12月21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生，广东大埔县黄堂乡人。其父张兰轩为乡村塾师兼业医。他幼年随父读书三年，之后进了一家竹器店学徒。1858年只身漂流海外，赴南洋印尼巴城（今雅加达），在一家华侨纸行充杂工，不久做了经纪人。后来当了管账先生，手头才逐渐有些积蓄。数年后，他和纸行老板的女儿结婚。岳父死后，继承遗产自立门户，开设了一爿酒行，销售各国名酒。张振勋竭力结交荷兰殖民当局，获准承包酒税与典当捐，又承包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垄断了当地的鸦片烟买卖，还承包了邻段的烟土捐务公司。在承包烟税中，他用多种手段击败了竞争对手，发了大财。

张振勋是南洋华侨垦殖业的著名先驱之一，1866年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一家裕和垦殖公司，开始大规模领垦荒种植。1875年在苏门答腊开办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兴垦殖公司；1878年在爪哇日里（今日惹），与华侨张耀轩[(1)]合资创办笠旺垦殖公司，垦荒种植树胶、咖啡和茶叶；先后开辟树胶园七八所，茶叶加工厂一处，拥有职工数千人；并合资创办了一家日里银行。

张振勋为了解决货物运输问题，于1886年创办了万裕兴轮船公司，有轮船三艘自运货物航行于槟城、亚齐之间。1898年，有一次他欲从巴城到新加坡办理商务，德国邮船公司歧视华人，拒绝卖给他头等船票。张振勋非常气愤，表示以后“我的商船一律不给德国佬卖票”[(2)]。不久，张振勋在巴城创设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在亚齐办广福远洋轮船公司，往返于新加坡、香港等地，挂上中国国旗为中国人争气。他在创办了自己的客运轮船公司后，公开声明为华人服务，与德

国邮船公司对抗，迫使德国公司取消了华人不得购买头等船票的歧视性规定。

马来亚的雪兰、霹雳、森美兰和彭亨等地，早年就是华侨开发的盛产锡矿区。1898年，张振勋将他的企业扩展到马来西亚，在英属彭亨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设置商场；并经营雪兰莪和巴生地区的锡矿。1912年，他将其垦殖业扩展到马来亚，在英属槟榔屿开办了万裕兴垦殖公司，并组设万裕兴总公司，以应接各埠支店汇兑财货。此外，他还经营药材业，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等地开设药行，组成一个庞大的药材批发网。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张振勋经营垦殖、橡胶、锡矿和航运，历三十年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其拥资之巨，经营活动之广，规模之宏大，一时罕有人能与其匹敌，成了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当时，华侨在国外备受欺凌，欧美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歧视华人，张振勋深受其害。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渴望能回到祖国发展实业，以建中国富强之基，也盼望能在国内获得一定的地位，光耀张氏家族的门庭。

1892年，经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推荐，张振勋被委派为槟榔屿首任领事，1894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此后，他开始走上了仕途，成为清政府的官员。1898年李鸿章电召他回国，任以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升总办。1899年又被委为广东佛山铁路总办。1900年再负责督办粤汉铁路。1903年，清廷第二次召见张振勋，赏给他侍郎衔，以三品京堂候补。次年10月，他第三次被清廷召见，乃上书建议招商承办农工路矿，增设各省官商合办和商办铁路支线，提倡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等十二条[(3)]。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任命他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并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张振勋受命回到南洋，为了团结侨胞，促进华侨工商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与戴忻然等在槟城筹建了中华商务总会，并往马来亚一带劝导华侨设商会、兴学校。1907年4

月，张振勋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事宜。

张振勋由商而官，功名显赫，但对英、荷殖民政府封官许爵，却婉言谢绝。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4)] 为了振兴祖国的实业，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回国发展实业。

1892年，张振勋赴香港时，被清廷东海关监督盛宣怀电邀去烟台商办路矿，他立即前往。法国驻印尼巴城领事曾对他说，烟台葡萄可酿上等名酒。他到烟台后，立即着手调查与筹办酿酒公司。1894年，他在烟台投资300万元创办张裕酿酒公司，自种葡萄七百余亩，酿造葡萄酒，以其族侄张应东任总办。次年9月获清政府批准。该公司在直隶、奉天、山东等省专利十五年，免税三年。经过八年的苦心经营，张裕公司的酒风行全国，远销海外，与贵州茅台酒等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张振勋投资国内，受到清朝洋务派的欢迎，让其参与洋务派的种种实业。1897年他得李鸿章的保荐，参与筹办近代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担任该行董事。1904年，他与商部侍郎陈璧共订筹办广（州）厦（门）铁路计划：拟先募资本80万两，建筑广州至黄埔路段，并开辟黄埔商埠，继由黄埔筑至海丰与潮汕路接轨，再由潮州筑至福建厦门。1905年1月，他以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同年，在广东靖海门设立农工路矿局，于厦门设立农工矿务局，并赴广西梧州谒见两广总督岑春煊，请其赞助。但因美国合兴公司的抗阻与岑春煊的刁难，广厦铁路计划遭到失败[(5)]。同年4月，张振勋获准建筑厦门至福州铁路权，又因福建绅商的强烈反对而作罢。1907年，他接办粤人谭日章、陈庆昌合办的广西华兴三岔银矿公司，增资数十万元改名"保兴公司"，聘请外籍矿师勘测矿区，增购机器，并修筑龙山道路，开采三岔银矿。同年，在广州与陈廉伯等发起创办广东保险公司。1909年，张振勋任广东总商会总理，与广东劝业公所的伍申三等，组织广东集大公司出品协会。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和南洋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同年11月，中

美商团会议在上海召开，张振勋为华商议长。他与美商议长商议筹设中美联合银行，并由两国商会互设物品陈列所。次年5月，他与上海大资本家周金箴、沈仲礼等筹办中美轮船公司，于上海暂设事务所，资本定额1000万银两，他认股150万两。张振勋除经营工商业外，还先后在新加坡、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香港、汕头、潮州、大埔、上海、天津、烟台、广州等处，置有总计千万金的不动产[(6)]。

张振勋在国内的实业投资，都未获得明显的成效，但他仍然再接再厉，在广东省继续大规模投资。他鉴于中国工业设备落后，技术力量缺乏，在坚持“主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则下，购买外国机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先后聘请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数人，于1910年开始创办了广州亚通机织厂、广东开建金矿公司、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平海福裕盐田公司，以及佛山裕益砂砖公司等企业，图谋振兴广东的实业，继续实践他“为祖国效力”的诺言。其中雷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用拖拉机耕种，是为中国引用农业机械之始。

辛亥革命时，张振勋曾通过胡汉民资助革命派经费30万元，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当权，他被任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慰使，并被举为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1914年2月，任约法会议议员。次年4月，又被袁世凯选定为参政院参政；但是，张振勋仍将其主要精力从事实业活动。1912年3月，与熊希龄等在上海创办康年人寿保险公司。1914年11月，再任广东总商会总理。1915年4月，与上海资本家聂其杰等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任团长。自美回国后，张在上海等地继续进行筹办中美银行和中美物品陈列所的活动。11月，他复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又任北京商务联合会总董及美国旧金山中国航空公司督办，并在北京设立中美银行事务所，继续往返于沪、宁等地从事招股活动。

张振勋一生热心赈捐、社会福利和资助办学，生平所捐款项不下

数十万。当他任职清廷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时，曾在槟榔屿捐资八万元创办中华学校[7]，又于新加坡创办应新学校。他给香港大学堂捐款十万元，香港英国殖民当局赠他法学博士衔。辛亥革命后，他捐助福建民军七万元，又在汕头购置房屋数十间创办“育善堂”，专为当地居民及嘉应五属办理社会福利与外出学生补助。晚年还遗言捐助广东大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楼。

1916年9月12日，张振勋病逝于印度尼西亚巴城。

---

(1) 张耀轩原为张振勋手下职工，以善于经营致富，亦为南洋拓殖垦荒业中的著名先驱。

(2) 李松庵：《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广东历史学会张弼士专业委员会编《张弼士研究资料》第1辑（张弼士生平事略等），2006年版。

(3) 张振勋撰：《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张弼士研究资料》第2辑（张弼士侍郎振兴商务条议等），2006年版。

(4) 《张振勋传》，刘织超、温廷敬等纂《民国新编大埔县志》卷2，1943年版。

(5)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55—958页。

(6) 林博爱等：《南洋名人集传》，点石斋印刷有限公司1924年版，第9—10页。

(7) 该校为当地最早的中文学校。

张镇芳

张学继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生于1863年（清同治二年），189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户都主事等职。张镇芳是袁世凯二哥袁世敦之妻弟[(1)]。张以转折亲攀上袁世凯的关系，因袁而显赫发达。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推荐张镇芳担任北洋银元局会办。从此，张镇芳这个穷京官走上了依靠袁世凯暴富之路。

此后，张镇芳在袁世凯幕府担任了直隶永平七属盐务局总办、清理财政局总办、禁烟局总办、直隶银行督办、财政总汇处帮办、长芦盐务使、陆军粮饷局总办、天津道等职，这些都是肥得流油的衙门，每年进出的款项动辄数以百万甚至上千万计。张镇芳为袁理财，办理军需，深得袁的倚重，袁称赞他“善理财”。在这个过程中，张镇芳公私兼顾，个人也发了大财，成为大富翁，与翰林院时的穷书生相比，已是别若天渊。

袁世凯在被朝廷开缺的当天，狼狈逃到天津想投靠直隶总督杨士骧，杨为避闲不敢出面见袁世凯，只令他的儿子出面并送六万大洋。稍后，张镇芳来到饭店见袁，劝袁次晨即返回北京，速去彰德。时张镇芳兼任粮饷局总办，拿出三十万两白银送给袁世凯，作为日后生计。

张镇芳长期担任长芦盐运使的肥缺，主管盐政的度支部尚书载泽见到张镇芳时即谓张为“袁党”。张镇芳回答：“不惟为袁党，且有戚谊。”后张镇芳纪事诗，有“抗言直认层层党”一句。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曾对张伯驹说：其父开缺时，五舅极为可感，但洪宪时却不甚卖力。张镇芳之子张伯驹赋诗：“霹雳一声祸有因，包车风帽到天津。

姻亲不避层层党，赠与存余卅万银。”

在袁世凯被开缺前，张镇芳即预感前景不妙，悄悄改换门庭，用重金贿赂王公亲贵，投到了载泽门下。袁克文说：“宣统继位，张度先公（著者按：指袁世凯）将退休，乃亟拜载泽门，重金为贽，且以己之侵没盐款委诸先公。载泽喜，疏举入盐政处。先公罢政，与有力焉。内虽危害，见先公犹曰力相助也。”[2] 张镇芳由于及时改换了门庭，故在袁世凯被清廷罢黜后，张的仕途财路均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1911年4月15日，张镇芳调任湖南提法使。但督办盐政大臣载泽立即奏请“留张镇芳署直隶长芦盐务运使，并恳恩免其议处”。清廷谕准，于同年7月3日谕内阁：“已补湖南提法使张镇芳，着调署直隶长芦盐运使，余依议。”[3] 张镇芳在袁世凯遇险时虽有改换门庭之嫌，但袁借辛亥革命而东山再起时，却没有计较张镇芳的背弃行为，继续将张镇芳作为心腹加以重任。1912年2月3日，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奏准：直隶总督陈夔龙因病乞休，以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在袁的提携下，一步登天，成为坐镇北洋老巢的封疆大吏。3月23日，张镇芳改为署理河南都督（同年10月实任），次年1月又兼民政长，掌握河南军政大权，为袁世凯看守老家。

张镇芳上任伊始，对河南各地的农民武装、革命党人乃至进步的青年学生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一些从张镇芳枪口下逃出来的人说：“张镇芳在开封枪杀学生，每次在百人以上，用排枪射杀。”[4] 连袁克文也说他“杀戮无辜，不可数计”[5]。这种残酷的杀戮政策，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历来民生艰难，张镇芳上台后，实行掠夺和杀戮政策，再加上连年干旱，更使河南几千万人民雪上加霜，贫弱者流于丐，强悍者流为盗匪，有些地方“几乎无人不匪”。河南宝丰农民白朗（1873—1914），招集被遣散回乡的官兵，购置军械，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转战于河南禹县至桐柏山的豫西广大农村，消灭当地分散的地主武装，收缴武器，发展壮大自己，半年之内，队伍发展到两三千人。

白朗起义发生后，张镇芳与河南护军使雷震春调兵遣将，围剿白朗军。1913年5月，白朗军一度进入鄂北随县山区，然后摆脱河南、湖北两省官军的“围剿”，回师北上，在五月底至六月初，一度攻克豫西的唐河、禹县两座县城，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千人，声势大振。到9月下旬，白朗起义军又攻克了鄂北重镇枣阳城。

袁世凯认为河南护军使雷震春镇压起义不力，下令将其调为南洋巡阅副使并督办江北、皖北“剿匪”事宜。张镇芳随即呈请调毅军统领赵倜为河南护军使。赵倜到任后，张镇芳即呈文袁世凯呈请辞职。呈文称：“镇芳素不知兵，致使到处伏莽，酿成流寇，军队疲于奔命，闾阎痛不聊生，即局外无言，早深愧赧。况教堂屡求保护，车站迭请维持，报纸之讥评，议员之指摘，闻者足戒，咎实难辞。是以寝馈不安，力图补救。无如兵来则鼠窜，兵退则鸱张，见兵则变作善良，见匪则随为丑类，通匪、窝匪，诛不胜诛。……总之，镇芳非济变之才，断难胜任，渥荷知遇，又不忍事外逍遥。务乞另简贤能，克期扫荡。俾得回京趋侍，借供驰驱。丰沛从龙，安能与萧、曹并论。彷徨中夜，上无以对大总统，下无以对诸同乡，惟期接手得人，感且不朽。拟三五日备补军到洛后，自赴各处巡阅，查看各军情状，据实禀陈。虽炸弹手枪，入死出生，亦无所畏。”(6)

1913年底，张镇芳和护军使赵倜在袁世凯的督责下，调集北洋军对宝丰、鲁山一带的白朗起义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白朗义军突围东进，越过京汉铁路，挺进到豫、鄂、皖边区，他们在1914年1月间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和皖西的六安、霍山等地，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袁世凯惊恐万状，急忙调陆军总长段祺瑞前往河南开封督师，统一指挥豫、鄂、皖三省的北洋军两万多人企图“聚歼”白朗起义军。袁世凯对张镇芳镇压起义军不力大为恼火。1914年2月12日，袁世凯致电已经到达河南开封的段祺瑞，电文说：“张督近为中外攻击甚力，留之适足害之，不如避位，以塞舆情，于公私为两得也。”张镇芳知道袁世凯有意撤他的职，即于2月13日离开开封北上，

托言面见袁世凯禀陈要事，实则以此表示坚决辞职。段祺瑞开始并不同意张镇芳辞职，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拟恳大总统迅饬该督回汴，并令会办剿抚事宜，以期和衷商榷，共济艰难，无任切盼”。但没有得到同意。

白朗起义镇压下去后，袁世凯于1914年8月21日下令开复前河南都督张镇芳的革职处分。10月7日，袁世凯任命张镇芳为参政院参政。10月26日，袁世凯又令张镇芳主持筹办盐业银行，该行于1915年3月正式开张，张镇芳任盐业银行总理。

1915年1月17日，袁世凯授张镇芳为“中卿”。洪宪帝制发动后，张镇芳担任全国请愿联合会副会长，又是帝制筹备十人小组成员之一，所有的电报都有张镇芳署名，在十人小组中，张镇芳的名字排在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之后列第四。张镇芳还向袁世凯献策，要求到河南去编练御林军，以保卫“洪宪王朝”。他说：“古者期门宿卫，皆以亲近子弟充之。汉高、明祖淹有天下，沛中、滁上子弟，征伐所及，留驻不归，所以拱卫王室，预防反侧也。满洲入关，各省设驻防，实师明祖征云南之遗策。即以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论，湘、淮子弟，遍布行省，远留新疆。湘皖势力，得弥漫江河沙漠之地，握政权者数十年。其下既根深蒂固，其上则承继弗衰。今宜先将豫省子弟，每县挑选五百人，练为省兵，以有身家者中选，符合古人三选良家之制。河南八十余县，合计可得四五万人。每年选招一次，期以五年，轮流分发。前者派驻各省，后者逐年招练，五年之间，可得子弟兵二十余万，亦古今中央集权强干弱枝之意。如圣怀视其策可行，宜以慎密从事。”袁世凯部分采纳了这个建议，令唐天喜首先招练河南兵一混成旅，护卫陈州陵墓，为子弟兵张本。为此，刘成禺赋诗讽之：“主稿懿亲策八荒，健儿五百选家乡。两河子弟应惆怅，未起良家作驻防。”

1915年9月10日，张镇芳又以老友资格致函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婉辞劝说冯国璋上书劝进，电文说：“惟国务卿领

衔等最后一着，此刻须内外一致鼓吹进行，作成绅民请愿，军政要求，即元首亦不能强违众论，大拂舆情。然后友邦无词可措，万不可使人疑为中央授意，我辈当极为拥戴。而为元首留地位占身份，是为至要。华老功高望重，能来京主持尤盼，余函详。镇芳。”[7]

1915年底云南护国军起义后，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相继独立，张镇芳认为洪宪帝制已经失败，于4月间宣布辞去袁世凯任命的参政职务，同时密遣心腹张钫入河南谋独立，驱逐现任河南将军赵倜，拥张镇芳为都督，联护国军以抗袁世凯。张钫一入河南，即为赵倜所擒，审讯之下知为张镇芳主谋。赵倜立电袁世凯请示，并请求将张钫就地正法。袁世凯得到这个报告，有如五雷轰顶，他没有想到张镇芳也会背叛他，立即召张镇芳加以诘问。张镇芳“惶惧变色，力白无他，乞移京审讯”。袁世凯同意，张钫押解到京，张镇芳为之奔走救援，并密嘱张钫翻供以便保他过关。张钫翻供后，袁世凯也不便定罪，此案遂不了了之。对于张镇芳的反复，袁克文大骂说：“张以至戚，且赖先公而致官禄，初寒士，今富翁矣，竟反复若是，斯尚不若禽兽之有心也！”[8]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张镇芳赋诗吊云：“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汉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过来人。”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张镇芳不仅逃脱了惩处，而且没有悔改。他先后参加“众志成城团”和“省区联合会”，成为清朝复辟集团与各方联络的重要人物。1917年4月间，张镇芳、雷震春与张勋的心腹商衍瀛在天津商讨了发动复辟后如何控制北京的计划。1917年7月1日，张镇芳随张勋等进入紫禁城宣布拥戴逊帝溥仪复辟，溥仪随即宣布立即赐封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七人为内阁议政大臣，随后又任命张镇芳兼度支部尚书并兼署盐务署督办，张镇芳身兼数要职成为复辟的主角之一。康有为后来说：“张绍轩复辟时，专治兵而不及政，一切皆其左右刘廷琛、张镇芳等主持，吾一切未得所闻。”[9]

然而好景不长，张勋复辟成了昙花一现的闹剧。7月9日，张镇芳

与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段祺瑞的讨逆军逮捕。7月15日，冯国璋代总统下令惩处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三位被捕的复辟犯，命令称："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皆背叛共和，逆迹昭著，均着行褫夺官职及勋位、勋章，分交法庭依法严惩，以申国纪，而儆奸邪。"11月5日，张镇芳与雷震春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18年2月28日，北京政府命令开释张镇芳、雷震春二人。

张镇芳出狱后，担任天津盐行银行董事。1921年任董事长。1933年病死于天津。

---

(1) 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袁世凯之子袁克暄致张镇芳函称张为"五舅大人"。过去许多著作说张、袁是表兄弟，这是讹传，应予修正。

(2) 袁克文：《辛丙秘苑》，第19页。

(3)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页。

(4)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1页。

(5) 袁克文著：《辛丙秘苑》，第20页。

(6)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第35—36页。

(7) 《张镇芳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10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部。

(8) 袁克文：《辛丙秘苑》，第20页。

(9) 康文佩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第131页。

张知本

汪洪

张知本，字怀九，号龙甲，又名礼恭，湖北江陵人。1881年2月20日（清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生。父亲张特章，字闇斋，晚清太学生，精理学，通医道，著有《闇斋字训》、《中医科学论》、《明论》等。张知本五岁发蒙，十三岁考中秀才，入县学。十五岁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学。十七岁时，清政府选拔优贡，张知本参试，湖广总督张之洞评曰："末艺引毛诗传最佳。"正取为第一名[(1)]。入京朝考，取为二等，以知县用，分发甘肃，因学业未完，仍回书院读书。1900年毕业于两湖书院，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宏文书院习日文，拟按张之洞的安排学习师范教育，后痛感中国政治落后，决心学习西方法律，遂转入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学。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张知本三次会晤孙中山，经时功久介绍毅然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早期成员之一。同年，张自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先任湖北广济中学堂堂长，继任武昌官立法政学堂监督、武昌私立法政学堂及法官养成所教席等。1911年4月，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失败，张知本愤而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出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

10月，武昌辛亥首义成功，革命军政府诞生，张知本任政事部副部长。中华民国军政府司法部成立，遂任首届部长，开中国资产阶级司法之先。革命初成，社会动荡，司法部立即发布了第一号、第二号布告，痛陈封建王朝蔑视法律、滥定刑名的罪恶，声扬军政府崇尚法治、保护人民的宗旨。一月之间，他先后设立了湖北高等审检厅和汉口、沙市、宜昌等地方审检厅，并制定了《临时上诉审判所暂行条例》等一批我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刑律。时荆宜军政分府总司令

唐牺支所部属员因敲诈未遂，竟将宜昌港一名水手无辜枪杀。张知本请示军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受理此案。唐牺支自恃是辛亥起义功臣，拒不到庭。张派员传拘唐至武昌出庭受审，给予唐牺支行政处分，判唐部参谋长处五年徒刑。此案之严正审理，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章太炎曾自上海致函黎元洪，盛赞："怀九性刚而气和，民国司法庆得人矣！"[(2)] 12月，张协助宋教仁起草了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鄂州临时约法》。

1912年初，南北议和，4月政府北迁，张知本到北京参加了司法会议，他拒绝了袁世凯之拉拢，回湖北任江汉大学校长。翌年2月，张知本以国民党员身份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7月，国民党发动讨袁失败，鄂省教育厅指江汉大学为国民党的机关，予以撤销，并且诬陷张"嗾使学生纵火"，张乃避往上海。11月，袁世凯非法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该党党籍国会议员资格。1914年，张回到武昌，受聘为私立中华大学教授。1916年，曾致函黎元洪，呼吁恢复《约法》和国会，信中引用胡林翼语："是非不明，节义不讲，天下所以日乱也。"1917年3月，省议会临时会议选举张知本为省候补参议员，张没有接受。7月，孙中山南下揭橥护法，张知本南下拥护，参加"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李书城在湖南津市组织护法军总司令部，张前往担任秘书长。1918年春，孙中山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离穗赴沪，张知本亦去上海，嗣于1923年执教于上海法政大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经孙中山提名，张知本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大本营参议。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方针有所抵触，曾参加冯自由、刘成禺召集的"华侨招待所聚会"活动。嗣后，受任负责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作，主管陕西、湖南、湖北三省党务。同年，在湖北法科大学任校长。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林森等人于11月在北京西山开会，反对国共合作，继而在上海成立"中央"，制造分裂。会前，张继等人

通知他参加会议，但是他没有去北京参加活动。会后，报纸上登载与会十四人名单中有张知本的名字。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出："张知本虽未参加会议，然未声明脱离关系，殊有附和之嫌。"对张知本提出书面警告，并要求他在两个月内复函中央"略述原情"，争取自新[(3)]。张知本回函说："余既未参加会议，不能指为附和。"予以否认；但信中又指责汪精卫等"取容于共"。不久，他还是与林森、居正、石瑛等八人一道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张知本在组织上虽不是"西山会议派"，但思想上确是附和他们的。

1927年春，上海法政大学复校，张知本被推为董事兼校长。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事变，"清党"、"分共"后，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合流，张知本重返政坛。时桂系李宗仁把握大权，张抵南京，经郭泰祺介绍与桂系中的湖北将领胡宗铎、陶钧等结识，组织"湖北清党委员会"，张任主任委员。10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程潜为主任，张知本任委员兼民政处长。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张兼任组织部长。省党部成立，张改任训练部长。为了抵消湘军程潜的影响，分任"清乡"督办和会办的胡宗铎、陶钧向中央电举张知本主持省政。11月，国民政府发表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1928年1月1日正式就职。他制定了三年施政计划：第一年侧重"清乡"；第二年开办"训政"；第三年举办地方选举。他还任命石瑛为建设厅长，张难先为财政厅长，严重为民政厅长，刘树杞为教育厅长，实行合议制。5月，国民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为主席，张知本与程潜、白崇禧、胡宗铎、张华辅为委员。1929年初，李宗仁离鄂，由张知本代理政治分会主席。未几，李宗仁在上海领衔通电反对蒋介石，并要求蒋下野。通电将张知本的名字署在第二位，但张本人事先并不知道。3月，"蒋桂战争"猝起，延至4月桂系失利，张受牵连，交卸湖北省主席职务，寓居上海，第二次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这时，张知本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尤其对蒋介石拥兵自恃的独裁统治颇为不满。他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既反对共产党，也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动乱，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经邦治国的根本大法。于是，他广搜资料，潜心著述，写成了《宪法论》一书，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为宏旨，极力推崇资本主义宪政，力主军政分职，实行地方自治和人民民主。《宪法论》观点新颖，立论严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较深刻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宪思想的著作。同年，他还完成了《社会法律学》的撰写。此后，张知本将精力投入对宪法的研究，写出了《宪政要论》，全面评述辛亥以来的各家立宪观点，被誉为“资政新书”。后来又相继撰成《宪法僭拟》、《中国立宪故事简编》等著作，在国内法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翻译了《民事证据论》、《土地公有论》等著作。他强调：孙中山提出的建国三时期都不能离开法律，“离掉法律，不能谈政治。法律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政治的灵魂”[(4)]。张知本在法学上的成就，尤其是对宪法方面的独到研究，与王宠惠、董康、江庸一道，被当时的法学界推为中国近现代四大法学家。

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地区混战，国民党中各反蒋势力联合行动，7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方面对抗。邹鲁、覃振写信邀张知本北上。由于改组派陈公博等人提出的“反专制与反共并重”的主张与张的思想十分接近，又有“西山会议派”多人参与其事，他决定应邀前往。他化名张致远，扮成普通教师，经青岛、大连转往天津，秘密潜至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活动，任扩大会议委员兼宣传部委员。其间，他曾与邹鲁、汪精卫等人斟定了吕复起草的“太原约法”。10月，“扩大会议”由于阎、冯战败而散伙，张知本仍回上海执教。

1931年2月底，胡汉民遭到蒋介石监禁，国民党再次分裂，胡派人物林森、古应芬，两广军事首领陈济棠、李宗仁，以及汪精卫、孙科等各派联合开展反蒋运动，5月在广州组成“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

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形成粤、宁对峙局面。张知本又南下广州，参加了“非常会议”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呼声的压力下，宁粤双方被迫媾和，张知本被粤方推为代表之一到上海参加了“和平统一会议”。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召开，张知本在广州出席了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国民政府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后，建立民众训练委员会，委任张知本为主任委员。张认为，当时的民众训练是“愚民政治”，并对蒋介石强迫他取消几十个抗日救国团体不满，不久辞职。

1933年1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长，组织宪法草案委员会，自兼委员长，邀张知本担任副委员长，主持起草民国宪法。张以为多年追求的法律制度有了实现的机会，欣然受命。甫到南京，他便提出了宪法制定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阐明了自己对国家领土、人民权利、中央政府组织、地方制度、宪草程序等问题的观点，作为研讨的依据。在宪草讨论会上，他又提出国体问题，主张定名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建议在宪法上列举领土，以表示收复东北数省的决心；并特别提出“军人不得干政”，“军人退职未满三年，不为行政长官”，“现役军人，不得作政治主张”；还提出“武力御外，法律治安”的口号，试图以法律手段来消除专制统治。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国民党上层实权人物的不悦，纷纷出面攻讦。张知本不肯妥协，坚持己见。8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拟就，共计五章一百七十一条，补充完善了孙中山的“五权制度”，并使之进一步深化、发展，第一次成为切实可行的宪法文本。同时在草案中声明，此宪法必须在办好地方自治和训练人民行使权利的基础上实施。因为《草案》中专立选举一节，明确写上了“现役军人不能当选总统”，招致蒋介石等人的仇视，处处作梗，张知本愤而辞去宪法草案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草案》交立法院审查，后来经另一名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经熊修改后以其私人名义公开发表，将《草案》初稿的一些重要内容删去，特别是将限制军人从政一节改为“军人退役方能竞选”，并移入军事章中，与张知本的立法

思想相去甚远，舆论批评很多。张知本为表明自己的观点，自行发表了一份“宪法草案”，评论者均认为较吴稿为优。但立法院仍决定以吴稿为样本，参照张稿予以修订，于1934年10月讨论通过。至此，张知本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统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曾多次当众批评蒋介石所作所为“不是为人民开生路，而是为人民塞生路”[(5)]。其政治思想也由“反共与反专制并重”转变为主要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他仍列名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

1936年，应居正邀请，张知本出任北平朝阳大学校长。1937年3月，任司法院秘书长，仍兼管朝阳事务。“七七”事变后，朝阳大学改称朝阳学院南迁湖北沙市，再迁四川成都。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推动下，张在朝阳学院延聘了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等进步人士执教，使学校成为国统区内一块具有浓厚民主气氛的地方。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指责朝阳学院是“共产党的窝子”，指使董事会另推江庸为院长，迁校重庆，直接控制。

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行政法院，任命张知本为院长。初到任时，张欲有所作为，在全国未沦陷各地遍设行政法院或行政诉讼法庭，以便老百姓对行政官员起诉，革除腐败现象。但是，国民党统治层层官僚机构多生窒碍，张无权无钱，只得维持现状了事。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离重庆东下，任“苏浙皖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团长。

1946年，国民党声称要召集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张知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乃回江陵竞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旋兼任国务会议法制审查委员会委员，但是他的一些主张仍不被采纳。1948年，他又出席“行宪国民大会”，曾联络一千余名代表署名，提出《修正宪法案》，要求“提前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也未被大会接受。

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之时，蒋介石等人谋划以“和谈”来取得喘

息时间。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讨论“国共和谈”问题的磋商会上，张知本表示不反对和谈，然又称“对和谈不宜寄予过分之希望”[6]。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六十八岁的张知本应邀出任行政法院院长。在行政法院会议上，他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案，说：“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如果不行，我就只有不干！”意欲体现法治，缓和国内矛盾。提案虽获通过，但不能认真贯彻执行。不久，因蒋介石暗中干预，行政院长何应钦通知此案停止执行，张知本气愤地把公文撕个粉碎。张知本热衷于资产阶级法治，既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不满，又想依赖国民政府施展抱负，他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这种抵牾之中。

1949年9月，张知本从广州去台湾、澎湖视察司法，此后，便羁留于台。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改组国民党“政府”，张知本卸却“司法行政部长”职，被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又历任“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常委。他还兼任台湾“中国宪法学会”理事长、“中国刑法学会”理事长等职。曾被台湾“中华学术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1976年8月15日病逝于台北。

---

(1) 张文伯编述，郭骥校订：《张知本先生年谱》，张知本先生奖学金董事会1975年版，第10页。

(2) 张文伯编述，郭骥校订：《张知本先生年谱》，张知本先生奖学金董事会1975年版，第11页。

(3) 《政治周报》第6、7期（1926年4月10日）。

(4) 杨玉清：《张知本传稿》，江陵县志办公室藏，第14页。

(5) 杨玉清：《我所知道的张知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8辑，1982年版，第79页。

(6) 张文伯编：《民国张怀九先生知本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1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张之江

宗志文

张之江，字紫岷，别号姜子，河北盐山县人。生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其父为村正。他从小习文，十八岁应童子试，补诸生。1903年清政府募兵，无人应募，其父不得已令其入伍当兵。他因通晓文墨，升迁较快，1907年在新军第一混成协骑兵营中任排长，驻新民府。在军中接触到反清志士，阅读《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逐渐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1910年他入新军第二十镇，常常听到王金铭、冯玉祥等人议论反清斗争，进一步激发了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乃加入他们发起的“武学研究会”，以读书为名联络同志，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武昌首义后，12月，张之江随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合力发动滦州起义，不幸失败，王金铭被杀害，冯玉祥被押送回保定，张之江逃离第二十镇。

民国成立后，原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任山西督军，张之江投奔张绍曾，任晋北东路司令部二等参谋。1914年11月，冯玉祥受北京政府令，在陕西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张之江前往投效，任该旅第二团团长。1915年5月冯旅被派入川，张之江随往。年底护国战争爆发。次年初，冯旅奉北洋政府令在叙府、泸州一带同护国军刘云峰部作战。冯玉祥反对袁世凯称帝，派人同护国军暗中联络，张之江奉冯命与蒋鸿遇一起秘密前往会晤刘云峰，接洽局部停战，又单独往见蔡锷，磋商促成四川独立的办法，并持蔡锷致冯玉祥的信回来见冯，信中嘱其加紧促成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张颇有办事能力，深得冯玉祥器重。护国战争结束后，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奉命移驻河北廊坊，张任该旅骑兵营营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呼吁继冯玉祥任旅长

的杨桂堂起义，杨不但不听，反而入京晋谒张勋。张之江与该旅参谋长邱斌和营长李鸣钟、鹿钟麟等密商，议决反对复辟，迎冯玉祥回旅主持大计。张之江到天津与冯面谈，商定声讨反对复辟办法后，立即返回廊坊，与邱斌等积极备战。张率骑兵营在廊坊一带击败张勋所部辫子军。

护法战争开始后，1918年6月，冯玉祥兼湘西镇守使，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张之江任该旅步兵第二团团长。所部负责维持常德城治安，把守城门。当时日本驻沅江军舰上的士兵经常上岸，态度异常骄横。一次，几个日本士兵横冲直撞要进城门，拒绝我国士兵的检查，并动手殴打要检查他们的士兵，双方搏斗起来，张之江坚决支持其部下的行动，下令将逞凶的日本士兵抓起来，大长了中国军人的军威，维护了国家的尊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第十六混成旅先后进驻汉口、信阳，因受北洋政府歧视，粮饷无着。半年中士兵每日以盐水和杂粮勉强度日，生活十分艰苦。张之江任劳任怨，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冯玉祥的表扬。

1921年5月，第十六混成旅随陕西督军阎相文入陕。7月，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张之江任该师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之江奉命率所部赴郑州，与河南督军赵倜的军队作战。5月5日，赵部由开封出发，偷袭郑州。张之江部军力单薄，众寡悬殊，仍然一面奋力应战，一面急电求援。血战五日，在增援部队支援下，击溃赵部。不久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扩充队伍，将三个团改编为三个混成旅，张之江任第七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为提高军官的军事知识，开设中高级军官学习班，还设高级战术研究会，张之江任讲堂监察官，讲授战术知识。

同年10月，冯玉祥受执掌军力的吴佩孚排斥，调任陆军检阅使。11月率所部抵北京，在南苑设立训练机构，积极训练队伍。张之江第七混成旅驻通州，奉冯玉祥命在那里对士兵和初级、中级军官进行训练。士兵除学习军人教科书外，还要学军纪、军歌；初级军官加读

《曾胡治兵语录》和《左传》摘要；中级军官加学兵器学、欧洲战史等。术科则包括刺枪、劈刀、器械体操、山地行军练习等项。通州还办有培德学校一所，教育官佐眷属，并附有小学和幼稚园，教育他们的孩子。李德全在该校任教员，张之江介绍她和冯玉祥认识，以后两人结婚。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任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之江任第三军第一路司令，9月下旬出兵古北口、滦平等地，向奉军进攻。10月中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张之江旅已抵承德，19日奉冯命返京，布防廊坊附近，旋击败吴佩孚残部。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筹组摄政内阁等，张之江曾列席会议。国民军成立后，冯玉祥部扩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张之江任该军骑兵第一旅旅长。

12月，张家口发生兵变，北京执政府段祺瑞免去察哈尔、绥远两都统职，任命冯玉祥的主要部将张之江、李鸣钟分任上述两地都统。张旋将察哈尔驻军编入国民军。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实施其开发西北的计划，察哈尔、绥远皆在其总体规划之内。

张之江代察哈尔都统后，积极进行该地区的经济建设。他首先整顿财政税收，清除积弊，随后修筑马路，开通张家口至库伦、多伦等地的公路，同时修建长途电话及电报线，并提倡畜牧、移民垦荒等，开始改变察哈尔的落后面貌。

五卅惨案后，国民军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撮合各派军阀，以“讨赤”为辞，向国民军进攻。11月，直隶督军李景林受日本收买，由天津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张之江奉命出兵，击败李部，进驻天津。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后，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不久，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此时，国民军约二十万，一致推张之江为全军总司令，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宋哲元任西路军总司令，石敬亭为后防总司令，进行防卫。“讨

赤”联盟各军分五路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处于四面受围之势，4月15日开始退出北京，撤到南口。

南口位于昌平和居庸关之间，重峦叠嶂，地势十分险要。国民军早已在此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张作霖、吴佩孚等以五十余万之众围攻南口。5月中旬，吴部向南口淤泥坑附近进攻，直鲁联军向国民军正面猛扑，激战十余日，未能前进。张、吴见南口屡攻不下，一方面布置力量进攻陕、甘，以断绝国民军后路；一方面以饷械资助晋军阎锡山，促其直逼绥远。

南口大战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国民军在以张之江为首的领导之下，克服种种困难，力御强敌，牵制了吴佩孚的兵力，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得以胜利进军。南口战线长达两千里，山峦重叠，交通不便，命令难以传达，张之江奔走前线，备极辛劳。国民军虽英勇善战，由于兵力众寡悬殊，加以给养困难，饷械补充无以为继，作战十分艰苦，坚持至7月中旬，有生力量伤亡过半。张之江乃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撤往绥远、宁夏一带。

这时，国民军高级将领之间出现各有主张、不相协调的现象，韩复榘、石友三向阎锡山投降，蒋鸿遇则拒绝西撤，张之江感到困难重重，难以指挥。9月15日，从苏联归来的冯玉祥“五原誓师”，重组国民军，任总司令，张之江仍任西北边防督办。

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后，张之江任豫陕甘考核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他代表冯玉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任国民政府委员，定居南京。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产生矛盾后，他经常斡旋于蒋、冯之间，并先后担任国术研究馆理事、禁烟委员会委员长等闲职。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张之江任江苏绥靖督办，不介入蒋冯之争。以后他专任中央国术馆馆长，热心体育事业，一度赴国外

考察体育。

卢沟桥事变后，张之江积极主张抗日。这时，他已获陆军上将衔，曾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学习，但始终未直接带兵作战，只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1945年5月，他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任国民大会代表，参加大会。

1954年张之江任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56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1966年5月12日，张之江因病在北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版。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宋哲元口述，兆庚记录：《西北军志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张志让

汪仁泽

张志让，号季龙，江苏武进县人。生于1893年12月28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张赞宸，曾任萍乡煤矿总办。张志让十二岁起，随同兄姊在家中就读，在聘请的教师教授下奠定了国学基础。十七岁时参加“南社”在苏州的成立大会，成为南社早期社员之一[(1)]。十九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初级部，两年后改入北京大学预科理科。不久因学潮停课，到上海入大同学院，于1914年毕业。次年夏又在上海复旦公学就读一学期，即赴美国留学，先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文科，1917年秋改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系[(2)]。1920年夏毕业后，转赴德国入柏林大学，仍攻读法律，一年后回国。

张志让回国后在北京任职，先在司法部任参事，两年后任大理院推事，接办民事诉讼案件，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法政学校兼课。1926年秋离京回乡省亲。其时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湘、鄂、赣、闽取得节节胜利，国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1927年初汉口和九江人民收回了英租界。张志让深受感动，毅然去函北京辞职，于3月间乘船到达武汉，热烈的革命气氛使他振奋不已。他去看望远房堂弟、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张太雷，经过长谈了解了革命形势；后经介绍参加了国民政府工作，任最高法院审判员。此时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召开“分共会议”，武汉最高法院随之结束。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筹组最高法院，曾有人函邀张参加。张认为蒋介石在宁、沪等地建立的统治是反革命性质的，必将失败，因而断然拒绝。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是革命事业必将成功，决心投身此项革命事业；后来又听到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更坚定了他的信念。

1927年冬，张志让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事务，直到1937年离沪。头几年曾在东吴法学院兼课；1932年春起受聘复旦大学任法学教授，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并兼任上海大中中学校长。他到上海不久即与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加入中共的愿望，地下党员对他说：党认为像他这样在社会上已有一定职位的人，在党外做工作比之入党作用将更大，所以决定暂时不让他入党[(3)]。此后他利用合法身份主持正义，为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并让中共组织的会议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住所召开。他执行律师事务与常人不同，专为进步人士、革命者和一般平民百姓辩护，从不计较报酬，有时反给资助；而不愿接办银行家、大资本家们的诉讼案件，因此业务收入很少[(4)]。遇到中小企业劳资纠纷法律咨询时，多劝资方向劳方让步息事。英国人牛兰（Hilaire Noulens）因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拘押而绝食时，他曾随宋庆龄赴南京营救。日本水兵中山秀雄遭狙击而死，租界当局诬陷叶某等两人为凶犯，张在为叶等辩护时，将定罪的破绽一一列出，沪上各大报两次以两版篇幅刊出张的辩护书全文，虽上海法院仍判处被告等死刑，但最高法院对被告不服的上诉只能悬而不判，在抗战胜利后终于改判为无罪释放。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无理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七人，当晚张志让即接受委托为沈钧儒辩护，名列二十多名辩护律师之首。张执笔撰写长篇辩护书，与其他律师共同到庭辩护。其间他又随宋庆龄等前往苏州向法院抗议，并同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为救国甘愿入狱的“救国入狱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邀请各界人士出席庐山谈话会，张志让也在被邀之列。他在会上发言力主团结一致，对日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各界抗日后援组织，担任宣传工作。上海沦陷后，他离沪经香港转赴武汉，和救国会友人汇合，继续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张担任该部第三厅宣传处的科长，曾起草全面抗战的宣传纲领，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全文刊登。武汉失守后，张志让经长沙去桂林，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部任宣传组组长。虽然科长、组长这种职务和他的资

历、身份很不相称，但他为了抗战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名利。其时他曾在广西大学兼课，并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有人劝他加入国民党，他拒绝了[5]。1940年冬，他到重庆复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还兼任校刊《文摘》的总编辑。他经常与进步学生保持联系，并暗中给予保护；同时注意团结进步教职员工，尽力聘用进步教职员，抵制反动分子。他讲授的共同必修课“哲学概论”，实际上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受到学生的欢迎。他同救国会友人经常聚谈，共同参加民主爱国活动。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的约见，聆听周对时局的精辟分析，获益良多。

1943年秋，蒋介石提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口号。是年冬成立以蒋为会长的“宪政实施协进会”，除国民党要员外，又邀聘了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和张志让等三十八人为委员。为了把宪政宣传的旗帜夺过来，成为启发人民觉悟向国民党当局要民主自由的有力武器，1944年元旦由黄炎培为发行人、张志让为主编的大型政论性月刊《宪政》创刊号在重庆出版，受到各界重视，三天内销售一空，十天后再版。创刊号的社论即是张志让执笔的《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它阐明了要求民主、促进宪政、还政于民已是不可抗拒的民主运动洪流；号召“中国人民应该团结一体，为抗战、为民主、为宪政而奋斗”。《宪政》陆续出刊了二十六期，几乎每期都有他大声疾呼鼓吹民主宪政的文章，且多针砭时弊之论。由于他对孙中山著作有较深的研究，在文章中常加引证，以致国民党报刊检察机关对之难以删砍。《宪政》创刊后还每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张在每次会前都做了精心安排，印发“研讨要点”。与会者纷纷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民主讲坛。重庆不少报刊都用很大篇幅，《新华日报》甚至用整版版面发表座谈记录，受到广大读者欢迎。通过两年多的座谈会“以文会友”，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张与出版界进步人士还发起组织“重庆杂志界联谊会”的活动，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登记制度。

抗战胜利后，张志让于1946年夏随同复旦大学回到上海。此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加强其独裁统治，迫害民主进步力量。张志让着手联络上海各高校的进步教授沈体兰等，于1946年9月举行了第一次教授聚餐座谈会，商定以后每月聚会一次，后来即称为“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从十几人逐渐增至八十多人。“大教联”推选沈体兰为主席，中共党员李正文为组织干事，以及张志让等七人组成核心干事会，实际上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张虽非中共党员，但他按照中共的意图做了不少工作，被大家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6)]。“大教联”曾领导上海民主教授发表过十多次爱国民主宣言，如呼吁停止内战、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抗议沈崇事件、反对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声援学生反饥饿游行等。这些宣言文稿多由张草拟定稿，在座谈会上动员会员签名后，亲自和沈体兰送到《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1947年5月他组织复旦大学教授抗议国民党军警制造“五二〇”惨案而举行集体罢教，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教育界民主运动的高涨。是年夏，各大学进步教授被解聘三十多人，他与曹未风等商请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研究社”名义，对被解聘的教授按月发给生活补助。对于复旦大学奉令解聘三十名教授之举，张与校长反复交涉，最后以撤掉他的法学院院长职务而换来停止执行解聘教授之令，在“大教联”中传为美谈。他常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不顾自身的安危，积极营救遭国民党当局迫害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同时对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人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他们拒绝跟蒋去台湾。

1949年初，张志让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化装离沪，经香港、烟台于3月间到达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在北京大学讲授新哲学和比较宪法。上海解放后，复旦大学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制，张志让被任命为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起张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对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张志让学识渊博，精通英、德、俄文。他自奉节俭，生活简朴，但对友人的困难则慷慨相助。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在原则问题上则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他平时不苟言笑，举止严肃庄重，却擅长唱京戏旦角，在三四知己相聚时常清唱一出《打渔杀家》。

1978年4月26日张志让在北京病逝。

---

(1) 据柳亚子《南社纪略》所记，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开成立大会，张志让是“十九个好汉”之一。转引自冯和法：《〈张志让自传〉读后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2) 《张志让自传》，《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94页。

(3) 《张志让自传》，《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01页。

(4) 千家驹：《我所知道的张季龙同志》，《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33—134页。

(5) 《张志让自传》，《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07页。

(6) 李正文：《党的亲密战友——张志让同志》，《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38页。

张治中

余湛邦

张治中，原名本尧，曾字警魄，后改文白，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家。父亲务农兼手工业，有一定文化，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书。张治中从六岁起进私塾，聪颖好学，苦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达十年，深受孔孟之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十五岁时应童子试未中。他从一些书报及朋友交往中接触到新思想，萌生弃文从军、救国救民的想法。

1906年，张治中离家外出谋生，先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不久到安庆报考陆军小学，继而到扬州投考随营学堂，均未遂愿。为生计所迫，他先后当过盐防营备补兵、测绘学堂传达、备补警察，最后在扬州当了一名值勤警察。几年的颠沛流离，备尝生活之艰辛。

辛亥武昌首义后，张治中在上海参加学生北伐军。嗣后学生军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张治中喜出望外。他在军校第三期步科勤学苦练四年，成绩优异；同时博览群书，爱国思想日增。1916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张治中离开“安武军”经上海到广州，投身护法运动。他先后在驻粤滇军任连长、营长，在驻粤桂军任师参谋长、桂军军校大队长，还曾到四川担任川军独立旅参谋长等职。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开办陆军军官学校于黄埔。张治中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参加黄埔军校建校工作，6月开学后任军事研究委

员会委员。他和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有交往，钦佩周恩来的“谈吐、风度、学养，都有很大吸引力”[1]。他在军校第三期任学生总队代总队长，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忠于职守，工作负责，受到学生的尊敬。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校内既有国民党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组织不时发生矛盾。张治中受到周恩来及邓演达、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对青年军人联合会支持较多，言论也逐渐左倾，被人称为“红色教官”。有时双方矛盾激化以至发生冲突，张则力求保持中立，并劝蒋介石要注意保持国共合作关系。对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公开采取批评态度，几遭逮捕。蒋介石赞佩张忠诚直言，老成可靠，未于责难。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上。武昌光复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3月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名，通称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分校，张治中出任教育长兼学员团长。随着国共两党分歧日益加深，双方都竭力争取张治中，张“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徘徊两者之间”[2]。1927年3月，他在进退维谷之中辞职离开武汉。11月赴欧、美和日本等国考察，开阔视野，获益甚多。

1928年7月，张治中归国，被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张要求调任教育工作，力求“躲避两党斗争的风暴”[3]，乃被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自兼，张治中实际上为军校主要负责人。他扩充教学课程，增加教学设备，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严整军纪、校风，努力使军校正规化。他不拉帮结派，不搞个人势力，大事都请校长定夺，还教育学生拥戴蒋介石，说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拥护的”[4]。这些言行，深得蒋之赞赏。

张治中虽任职于军校，但还是几次被蒋介石任命军职，带兵作战：1929年蒋、冯之战任武汉行营主任；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任教导二师师长；1932年淞沪抗战任第五军军长；1933年镇压“福建事变”任第四路军总指挥。但是，他始终避免参加攻打红军的反共内战。每次战事结束后，他仍回军校任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张治中见战事不可避免，建言蒋介石对京沪一带早做战备，必要时“先发制人”。先是1930年张治中兼任京沪警备司令，他特在苏州秘密设立司令部，周密部署和督促工事构筑、战斗训练、兵源补充、后勤供应，拟定了作战计划。如今面临日军侵犯淞沪在即，张治中获准指挥第五军于8月11日开始向上海集中，12日各部到达指定位置。8月13日淞沪抗战揭开战幕，张治中任京沪警备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进驻南翔，指挥所部向日本侵略军的杨树浦、虹口、公大纱厂等据点发起攻击。十天后日军自沙川河口等处登陆增援，张治中指挥第五军等抗日将士顽强抗击。嗣后淞沪会战全面展开，先由冯玉祥、继由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上海战事。张治中指挥四十天战事极度疲乏，并防与友军摩擦，于9月22日辞职获准回乡休养。

1937年11月，张治中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他第一次出任地方行政长官，面临抗战大局，乃“寓国防建设于地方建设”，“寓军事于政治”，提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新政目标，努力健全和改进行政机构，惩治贪污，分派经过训练的人员，逐级更换县、乡保长。他发动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大规模组训民众，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建立常备队、后备队，民众不离乡土，抗日自卫。不幸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湖南成为抗战前线。11月10日，日军侵占岳阳，长沙在“焦土抗战”方针下，于12日夜起突然纵火焚烧三昼夜，五万余栋房屋被毁，两万余人被烧死，几十万人无家可归，中外震惊，张治中难辞其咎，以“用人不当”、“漫无防范”之责，被“革职留任”。

张治中之治湘，虽仅一年多，又有长沙大火案，但还是得到蒋介

石和多数朝野人士的赞赏。1939年2月，他奉调至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直接协助蒋介石主管军事机要，联系各部、会和战区，参与战事指挥，以为蒋分忧分劳为己任。1940年9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他在政治部与副部长周恩来相处甚洽，还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大量安置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有利于团结抗日。对于国民党特务在四川綦江设立的集中营“战干团”杀害爱国青年事件，他严厉惩办首事人员，断然撤销了这个集中营，释放了全部爱国青年。以后又把其他两个“战干团”也撤销了。他在“三青团”内，秘密发动倒孔（祥熙）运动，声讨孔氏家族倒卖黄金美钞的贪污行径。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率领“三青团”代表联名提出《改革政治方案》，要求“真正以工农为本党组织之社会基础”，“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城市土地和大工业收归国有”；并“举行党团员财产登记，每人不得超过十万元，超额者捐献，拒绝者一律开除党团籍”，等等。这反映了张治中等人改造国民党的强烈愿望。

抗日战争期间，张治中积极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路线。主政湖南时，他向蒋介石建言加强两党团结，减少无谓摩擦；并聘请叶剑英任省政府高级顾问，以备指导游击战。在重庆，他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人士时相过从，友好往还。皖南事变发生后，张于1941年3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批评蒋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处理失策，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5)]。此后，张治中被蒋介石派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先后于1941年与周恩来等、1942年与林彪等、1944年5月与林祖涵等、11月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进行会谈。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还参加了重庆谈判（1945年8月至10月）和停战谈判（1945年12月）、整军谈判（1946年2月）、东北停战谈判（1946年3月）。为了促成重庆谈判，张治中和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一起专程往返延安接送毛泽东，并把自己的住

宅腾出来供其使用。在一系列国共会谈中，张治中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共是中国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力求有所协议[(6)]，但终以蒋介石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和谈彻底失败。

1946年4月，张治中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后改称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兼任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后，在施政纲领中强调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主政治。他竭力缓和民族矛盾，任用少数民族人士，释放全部政治犯，严惩贪污，免除部分税收，改善人民生活。他十分注意与紧邻的苏联的关系，以维护安定的局面。他还受周恩来之托，争取到蒋介石的同意，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多年的中共干部一百三十一人，并派员护送回到延安。

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节节败退，到1948年底已临崩溃之势。11月，蒋介石电召在兰州的张治中回南京商讨对策。张治中一本反对内战、恢复国共和谈的初衷对蒋说："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建议放弃"戡乱"，恢复和谈。但蒋介石不肯认输，还想要张治中出任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协同指挥内战，张辞拒。

三大战略决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主力消耗殆尽，内外交困，张治中同张群、吴忠信一道，几次力劝蒋介石下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介石离开南京回到家乡后，仍在幕后指挥一切。张治中于3月初到溪口住了八天，与蒋详谈一切，劝导蒋应出国，放手让李宗仁去促进和平。蒋岂肯出走。其时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意与中共谈判，但他知道蒋介石不肯放手，难以找出合适人选，乃请张治中出面担任和谈首席代表，认为"和谈能否成功，唯张是赖"[(7)]。张治中深知此任之艰，于3月29日特地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看了南京拟订和谈"腹案"后，表示"没有什么意见"，还说愿意终老故乡。

4月1日，张治中率领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

款。但是李宗仁等认为协定不符“划江而治”的方案而拒绝接受，蒋介石更是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8]。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李宗仁等电令张治中返回南京，周恩来则劝他们留下，不要重蹈张学良的覆辙；毛泽东也亲往张的住处慰问，多方劝导。张治中从极度苦闷与矛盾的心情中逐渐解脱出来“渐次宽解”。6月26日，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攻击和诽谤，发表对时局声明，为中国的解放感到欣喜、安慰，号召国民党军政官员“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9]。9月8日，张致电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9月21日，张治中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病逝。

---

(1)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63页。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667页。

(3)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4) 张治中：《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34年印，第45页。

(5)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21页。

(6) 1946年3月4日，张治中为检查各地贯彻《整军方案》情况再一次到

延安。他在盛大的欢迎会上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在延安这一笔。"张治中：《六十岁总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4页。

(7)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8) 李以匡：《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9)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第115页。

张竹平

许小青

张竹平，字竹坪，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江苏太仓。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张竹平是“圣公会”系统的基督教徒，笃信基督教，又与上海“青帮”杜月笙有密切联系，为不收弟子的上海“青帮”人物[(2)]。

1914年前后，张竹平进入《申报》馆，很快展示出他的报业经营管理才能，被任为《申报》经理兼营业部主任。当时《申报》尚处史量才接办初期，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不仅要偿还债务，还要力求经营取得盈余，同时面临着与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的竞争。为打开局面，张竹平运用现代化的报业理念，主要从广告和发行两方面对《申报》进行了改革。

在广告经营方面，首先，张竹平改变以往坐等客户上门的广告征集方式，“在经理部之下，设立了以招揽广告为业务的广告推销科，科内设有外勤和广告设计，外勤人员专事外出活动，向中外工商业宣传广告对于促进商品销售的作用，并说明《申报》读者面广、发行量大、刊登广告的特殊能力”[(3)]。同时，对于《新闻报》所忽视的小客户，张竹平表示“《申报》愿意每天将他们的广告拼在一处”，以改变他们的广告总是被压在报纸下层的状况，但“条件是只登《申报》一家”，这批数目不小的客户就成了《申报》的固定客户，这“对《新闻报》是一个打击”[(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24年张竹平最先在《申报》设立分类广告栏。

在广告设计方面，张竹平在广告推销科下聘用广告专业设计人员，“按照（商品）分类、性质，为刊户设计图案、文字说明，然后

共同征求刊户意见，直到满意为止”[5]。这是在中国为客户专门设计广告的开始，日后专业广告公司的成立，也深受《申报》影响。

除改革广告业务外，张竹平还重视报纸的发行。《申报》在上海本埠成立报纸递送公司，以力求每日清晨准时送报；在临近上海地区，继续设立《申报》分馆，并通过邮局尽量使报纸当天送达；在更远地区，则通过邮局或代办处发展机关、团体、商店和个人订户，并且派人专门到全国各处征订[6]。

经过改革后的《申报》，1914年发行量即比1912年增加一倍，1916年达到两万多份，同时广告收入增加，《申报》开始步入赢利阶段。《申报》不仅偿清了债务，而且把原来张謇、赵凤昌和应季中所投的资金也如数还清，《申报》完全成为史量才独资经营。经济上得到独立，为《申报》“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政治立场打下经济基础。张竹平为《申报》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报作出卓越贡献，因此深得史量才信任和器重，“被目为经营的能手”[7]。

张竹平在《申报》一展身手时，也开始筹建自己的报业事业。张竹平曾谓：“（吾）有三志愿：曰刊英字新闻，以补华字新闻之缺憾；曰设晚报，以续日报消息之未完；曰创电讯社，以助各地新闻事业之发展。”[8]他的人生轨迹正是努力朝着此“志愿”发展。

张竹平经营最早的是电讯社。在近代中国报业发展之初，中国电讯业为外国通讯社所垄断。外国电讯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重大消息的传输，并根据需要对消息任意歪曲、颠倒是非。这使中国进行国际交涉时，缺乏宣传优势，难以取得世界公正舆论的支持，而且，中国国内各地报社急需电讯，而又无财力拍发。张竹平为改变“此种通讯电讯之无系统无组织与不合理之状态”[9]，于1924年聚集一部分同人，开始筹组电讯社并作非正式发稿。他利用《申报》经理的身份，联合《申报》和他参股的《时事新报》两家编辑部的力量，将两家报社收到的各方面专电集中起来，利

用业余时间撮要编辑，然后拍发给外地有关系的少数报社，使外地报社也能及时获得正确而重要的新闻。试行数载，委托发电者日有增加，两家编辑部难以兼顾。1928年，张竹平将该电讯社改组，使之独立出来，正式定名为“申时电讯社”，扩充资本，另聘专任职员，拓展业务范围，分别编发中、英文电讯。1930年申时电讯社从《申报》馆迁址到大陆报馆三楼。1932年日军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申时电讯社派军事记者深入敌内，冒险刺探敌我双方情报，电讯社内部编辑则不分昼夜办公，每当前线情报送达，立即编发各地报社。当时，“申时”所得消息，比国外电讯社翔实、准确、迅捷，“传得各方极大之好评，换回吾国电讯事业难得之荣誉”[(10)]。1934年2月，申时电讯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杜月笙为董事长，张竹平任经理，米星如任社长。“申时电讯社”在张竹平筹划下，恪守“重质不重量”的原则，积极拓展上海本埠和外埠业务，事业蒸蒸日上。据1934年的统计，申时电讯社“与国内外正式订约供给电讯之报社，已达百十余家”，“每日收发专电，平均约六万余言”[(11)]。并且除每日刊发《申时电讯稿》外，还每日出版《申时经济情报》，每年度出版《报学季刊》，同时还为各地报纸代办广告业务，申时电讯社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电讯社[(12)]。

1928年冬，张竹平联合他人购进《时事新报》，成为他以后报业事业的骨干力量。《时事新报》初名《时事报》，创刊于1907年，1909年与上海《舆论日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更名为《时事新报》，1912年后该报成为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1926年其经理林炎夫改变办报方针，宣布脱离研究系，将《时事新报》改组为股份公司，张竹平此时已参有股份。1928年冬，《时事新报》出现经营困难，张竹平联合《申报》的协理汪英宾及孙结人、王尧钦、许燥庭、赵叔雍等人，合资五万元，购进《时事新报》。张竹平“对于《时事新报》抱着很大的希望”[(13)]，自己担任董事长，聘请陈布雷为主笔，潘公弼为总经理，邹韬奋担任秘书主任。

为发展业务，此时仍担任《申报》经理的张竹平，利用《申报》的信誉和方便为《时事新报》发展广告业务和报纸发行。这种做法引起史量才的不满。1930年冬，史量才为此分别召见张竹平、汪英宾谈话，经过一番劝解无效后，张竹平决计离开《申报》自立门户，汪英宾也辞职随张而去。

张竹平主持《时事新报》后，该报营业日见好转，但收支难抵。张竹平通过陈立夫、邵力子和陈布雷三人关系，使《时事新报》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获得一笔资金发展报业，但是张竹平不愿《时事新报》变为蒋介石的私家报纸，两人之间发生不快[(14)]。

除依靠外部关系外，在报纸内部经营上，张竹平对报纸销售进行了创新，改变以往委托上海捷音公所的报贩零卖的方式，改将报纸放于上海各埠香烟店寄售，并让报贩以自行车代替步行，增加灵活机动性。后来将此种方法推广到长三角大部分城市，“报销骤增数倍或数十倍”[(15)]。经过张竹平的努力经营，《时事新报》销售量迅猛发展。

1930年10月，张竹平联合董显光等人集资购下英文报《大陆报》产权。《大陆报》创刊于1911年，在美国注册，孙中山、伍廷芳等提供资金参与办报。初创时与《字林西报》对立，深受美国侨民欢迎。1918年因亏损过甚出售给英籍犹太商人爱兹拉（Ezra Edward），他去世后其遗孀无意经营，为张竹平集资购下。董显光任总编辑，张竹平任经理，嗣后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张竹平占股份的三分之一，实际经营由董显光负责。该报在张竹平经营时期，特别强调“国家多事之秋，人人必读国人自办之英文大陆报”，并多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大陆报》经营状况有了较大转变，报纸销量和广告都增加一倍以上。读者中约有三分之一为中国人，三分之二为在华外侨[(16)]。

从1931年起，张竹平积极筹办晚报《大晚报》事业。张竹平希望

办一张不同于旧式晚报，不走消闲小报路线的新型晚报，他认为当时报界积习太深，思想陈旧，因此想选择一位没有办过报的人来主持该报笔政。经董显光推荐，他选定了著名作家曾朴的长子曾虚白。张竹平答应采用社长制，从组织、人事到经营管理、办报格式等都由曾全权负责。在筹办晚报期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市民对于时局的迅速变动尤为关注，日报消息已嫌不足。1932年2月12日，《大晚报》提前非正式出刊，出版《国难特刊》。《大晚报》记者每天赴前线采访，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同时，为配合战讯，还辟有专栏文章介绍军事常识。《大晚报》一号至八号的日销量一度上升到近八万份，创下上海晚报的发行量之最。1932年5月2日，《大晚报》正式出版。此时淞沪战争已基本结束，停战后《大晚报》锐意革新，在编辑方面，做到白话化、简明化、趣味化，同时为避免与晨报冲突，注重地方通讯，取材关注于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在发行方面，增加自行车百余辆，保证递送迅速；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救济烟花女子运动、青年文艺运动等，提高社会声誉和知名度[(17)]。经过努力，在张竹平主持时期，《大晚报》成为上海晚报之冠。

《大晚报》正式创刊后不久，张竹平便将他支持的或他参股的三报一社糅合在一起，成立了“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社联合办事处”，简称“四社”，办事处设在《大陆报》馆的三楼。张竹平任“四社”总经理。上述四个新闻机构，除申时电讯社张独资经营外，其余三个都是集资经营，虽然张竹平在其中的股份都不超过三分之一，但其资本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由银行家、政客、军阀投资，份额分散又多属帮助性质，所以各单位的实际经营权都掌握在张竹平手中。

“四社”以张竹平为经营纽带联合经营，优势明显。首先，在新闻信息方面，三报将每天来自各大城市的专电、通讯和本市记者采写的重要新闻提供给申时社，申时社也把收到的国内外专电、通讯优先供应三家报社，因此，四个单位都有丰富的资源；其次，办公场所、印

刷设备、生产物资均可相互调剂、充分利用，张竹平还以“四社”名义成立一个较大规模的资料室，供四家单位共同使用；第三，张竹平以“四社”名义成立“四社”出版部，出版过《报学季刊》、《时事年鉴》、《十年》等出版物[18]。

“四社”由日报、晚报、英文报、电讯社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报业联合体，产生了合成效应，在新闻界影响很大。张竹平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新闻界仅次于史量才、汪伯奇的著名报业家。但是三报一社的联合，仅是业务上的联合，不是资本的联合。张竹平经济实力有限，虽然有将“四社联合办事处”发展为“四社总管经理处”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1933年下半年，张竹平出于扩充“四社”报业资本的需要，与尚在筹建反蒋“福建人民政府”的蔡廷锴、李济深等人发生联系。双方商定：福建方面资助“四社”资金，“四社”将作为福建方面的宣传阵地。“福建事变”后，申时电讯社即派记者采访，《时事新报》也曾发过报道。而后“福建人民政府”很快遭到蒋介石的镇压而失败。但种种迹象表明，“四社”这一时期的设备更新和业务拓展是接受了福建方面的资助[19]。

很快，张竹平与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关系被国民党当局所察觉。而在此之前，张竹平与蒋介石关系已经恶化。早在《时事新报》接受蒋介石资助但不愿成为其私家报纸起，两人之间就开始发生不快；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讨伐桂系，当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缓和矛盾，派人在沪收买舆论，张竹平为扩大《时事新报》销量，派赵叔雅出面接洽，蒋介石闻讯后更多一层芥蒂；1930年春，中原大战一触即发，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结成反蒋联盟，此时张竹平与汪也有联系；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被软禁于汤山，而张竹平又与胡汉民有联系，并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同情胡汉民的文章[20]。接二连三的事件已经让蒋介石忍无可忍，而且“四社”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之

外的私营报业联合体，给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增加困难。因此，“四社”成为除史量才的《申报》外，国民党打击的又一对象。

1934年9月，国民党当局利用政府权力禁止张竹平主持的《时事新报》向租借外邮寄。同年11月13日，国民党特务将史量才击毙在沪杭公路旁。在1934年底或者1935年初，国民党特务机构向张竹平发出了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1935年1月，张竹平得力助手、《大陆报》总主笔董显光忽然提出因病辞职，对处于关键时期的“四社”是个打击。与此同时，孔祥熙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张竹平提出收购“四社”股权的要求，并派国民党财政部主任秘书李毓万向张施加压力，强行收买“四社”股权。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竹平被迫以法币20万元的价格让出了“四社”的全部股权。然而，孔祥熙所委托的上海国货银行，借口“四社”未偿清债务拒绝付款，最后张竹平只拿到了孔祥熙“赠送”的5万元法币[21]。

1935年5月1日，张竹平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启事：“鄙人一病经月，遵医生嘱，急须迁地休养，所有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公司董事及经理兼职，已分向四公司董事会声明辞职，所有四公司总经理职务”，“暂请杜月笙先生代理”。杜月笙也同时刊出启事，接受张竹平的委托，负责办理[22]。交出职务后，1935年5月24日，国民党政府就取消了对《时事新报》邮寄的限制。为拓展“四社”业务，早年加入青帮的张竹平还于1935年5月与韦作民、庄铸成等人在上海复熙路（今延安路）筹备成立“仁社俱乐部”，张竹平利用张仁奎的关系，广泛拓展“四社”业务。

离开“四社”后，张竹平仍在上海经营商业，曾担任过联合广告公司董事长、联合赠品公司和惠民奶粉公司董事长及协丰矿行经理等职务。1937年张竹平在湖南采用新式机器，筹办大规模新式炼锑股份公司[23]。1939年上海陷落，张竹平到香港避难，在皇后大道开设大华饭店，专售江浙名菜和苏浙名点[24]。1941年12月18日香港陷落，张竹平趁乱离开香港去了重庆。张竹平的人生最后二十年就在嘉陵江

畔的山城中度过。由于晚年多病，很少参与社会活动，遂渐渐在人们视线中淡出。

1961年5月4日张竹平在重庆病逝[25]。

---

(1) 张竹平进入圣约翰大学时间不详，据熊月之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录载的《圣约翰大学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中，没有录入张竹平，本处据邹韬奋的《经历》记载："当时张竹平先生正在做《申报》的经理，我以为他是约翰的同学，便借着这个关系去找他。"见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2页。

(2) 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3)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4) 汪仲韦（徐耻痕整理）：《又竞争又联合的"新"、"申"两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5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5) 唐忠朴、贾斌：《实用广告学》，工商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6) 王英：《张竹平广告理念初探》，载于《新闻大学》2000年第1期。

(7)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8) 张竹平：《申时电讯社之回顾与前瞻》，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1934年版，第11页。

(9) 张竹平：《申时电讯社之回顾与前瞻》，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1934年版，第11页。

(10) 《十年之申时电讯社》，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1934年版，第43页。

(11) 《十年之申时电讯社》，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

1934年版，第44页。

(12) 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3)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7页。

(14) 张青逸：《上海滩报界闻人张竹平》，《民国春秋》1997年第4期。

(15) 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6) 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7) 袁义勤：《晚报的成功——〈大晚报〉杂谈》，《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年第1期。

(18) 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9) 黄卓明、余振基：《关于时事新报的所见所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9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20) 张青逸：《上海滩报界闻人张竹平》，《民国春秋》1997年第4期；刘小清、刘晓滇编著：《报界闻人张竹平》，《中国百年报业掌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21) 姚福申：《张报安教授话先父张竹平遗事》，《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22) 《申报》1935年5月1日。

(23) 《国际贸易情报》第2卷第18期，民国实业国际贸易局编辑，第45页。

(24)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25) 姚福申：《张报安教授话先父张竹平遗事》，《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张自忠

沈荆唐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县人。1891年8月11日（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七）生。父亲张树桂，为清末江苏赣榆知县。张自忠早年入本村私塾，1905年考入临清县立高等小学堂。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校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翌年转入济南政法学堂。1914年暑假时，与同乡前往奉天新民屯参军，入陆军第二十镇三十九协八十七标。1917年转至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先在旅本部当差遣兵，不久被送到模范连学习，结业后任排长。1919年又入鹿钟麟主持的教导团学习，刻苦勤勉，被冯玉祥誉为“模范学员”，结业后升任连长。此后以其军纪严明、注重管理、善于训练，在冯玉祥部先后升任学兵连连长、学兵队队长、营长、学兵团团长等职，1925年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

1926年8月，国民军在南口大战中败北，西路第六军军长石友三指责张自忠“拥兵不救”而使马邑失守，请西路军总司令宋哲元惩办，张自忠乃投晋军。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集结旧部组成国民联军，张自忠被冯召回，任总司令部副官长。旋任第二十八师师长，负责护卫总司令部，深受冯之信赖。

1927年春，冯玉祥国民联军参加北伐战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张自忠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7月并兼开封警备司令。张自忠秉承冯玉祥意旨，致力于部队训练，以传统道德、爱国思想和军队纪律教育军官，激励学员奋发向上；军事训练则注重锻炼耐劳精神和增强体质、提高技术。他以身作则，坚持穿士兵服、吃大锅饭、剃光头，一同参加劳动，关心下级疾苦，但对违纪犯规者则惩戒严厉。

1929年春，冯玉祥与蒋介石的争斗激化，乃结集兵力于潼关，准备发动反蒋战争，张自忠被任命为潼关警备司令。不久被冯调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六师师长，在洛阳以东与蒋军唐生智部激战。1930年中原大战中，张自忠率第六师战于灵井、杞县、柘城等地。战后，冯玉祥部被蒋介石编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为军长，张自忠任第三十八师师长。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继陷热河全省，并于3月6日分兵向长城各口进犯。第二十九军奉命前往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阻敌，张自忠任前敌总指挥。二十九军官兵不过两万，武器装备甚差，但官兵久经战阵，斗志高昂。9日，敌我双方在喜峰口寨附近发生大规模遭遇战，战况激烈。第三十七师王邦治旅一个团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孟子岭，稳住了喜峰口阵势。10日起，日军在飞机轰炸配合下向喜峰口猛攻，双方激战不已。11日晚，张自忠指挥赵登禹、佟泽光各率两个团，在当地樵民、猎人带引下，绕行山间小道，夜袭日军特种兵宿营地，炸毁大炮十八门，予敌重创。敌人连日进攻喜峰口不能得手，于16日转向罗文峪，张自忠指挥刘汝明第一四三师顽强抗御敌军，虽旅长、团长负伤，营连长多人阵亡，但阵地始终屹然不动。直至4月11日敌军攻破了友邻部队防御的冷口后，由喜峰口右侧攻击，二十九军被迫于15日放弃阵地。张自忠率第三十八师驻宣化一带。

1935年初，张自忠指挥所部在察东龙关、赤城，对进犯之日军以沉重打击，毙、伤敌军七百余人。“华北事变”后，日军侵略气焰嚣张，12月张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主席。他审时度势，加紧整训部队，防备日军扩大侵略。1936年5月，他调任天津市长后，着手整饬社会治安，裁汰政府冗员，惩办贪官污吏，打击不法商人，对日本则竭力应付周旋。1937年3月，张率冀察平津军政工商考察团赴日访问，日方要他签订“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张严词拒绝，并提前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但是蒋介石以及宋

哲元等人都曾抱有以妥协退让求得事变和平解决的幻想；张自忠秉承宋哲元意旨与日本驻屯军谈判，也期望以妥协换取和平，致使我国军队贻误和丧失了战机。7月26日，日方向宋哲元发出通牒，限令二十九军于28日完全撤退。宋无力抵抗，在撤离北平前，以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嘱他与日方谈判，缓和局势，以保住二十九军的地盘。29日，日军进入北平后，对张威胁利诱，要他通电反对国民政府，张无周旋余地，乃称病躲进德国医院，又转入美国友人家中，于9月7日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入天津租界，再乘轮船抵烟台，经济南至南京。蒋介石先给予撤职查办处分，一个月后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将部附。

1937年12月，张自忠回到原部队，任第五十九军军长，后编入第五战区，于1938年2月奉命驰援固镇，与敌激战，克复曹老集、小蚌埠，将日军赶过淮河。3月初集结于滕县以西，旋被李宗仁派赴临沂增援庞炳勋部。他捐弃与庞之宿怨，以大局为重，毅然率部星夜兼程，于12日黄昏抵临沂郊外。他与庞部内外配合，与敌板垣师团恶战半月之久，伤亡九千余，终取得临沂战役的胜利，为台儿庄大捷揭开了序幕。战后，张被提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接着在武汉保卫战中，奉命在潢川组织拦击，勇猛抵抗日军，历时十二昼夜。战后，张率部进入大别山区。张因战功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五十九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张自忠指挥第三十三集团军在鄂北、豫南抗御日军侵犯。他以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激励将士为国家为民族誓忠效命，要有有我无敌的气概。他被李宗仁任命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于1939年5月和12月两次打退敌人的进犯。

1940年4月，日军集三十万重兵，分三路向鄂北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张自忠率部迎战。5月7日，他亲自率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和两个团夜渡襄河，会同第五十九军三个师向枣阳方向进击。他在渡河出击前，留下手书给副总司令冯治安和五十九军各级将校，表示了以死报

国的赤胆忠心。渡过襄河后，他率所部立即投入战斗，8日在新街歼灭一股敌军，10日北进到达峪山与敌激战，13日进至枣阳南部，侧击南逃之敌，毙敌两军官并有斩获；然后兵分两路回师向西南截击。14日，他在方家集发现五六千敌人向南撤退，立即率领两个团将敌部拦腰截为两段。敌被创，即对方家集包围夹击，以猛烈炮火轰击。入夜，炮火停歇，张误以为敌已逃遁，率部南去堵截，结果遭到前来增援之敌与原敌南北夹击，张指挥两千余人英勇抵抗竟日，苦撑待援。但援军被牵制于四十里以外，张乃率部向钟祥敌后攻击，16日拂晓进至宜城大洪山罐子口，遭两侧山头敌军猛烈炮击，被迫退至南瓜店与敌拼杀。激战自晨至午，他把身边的卫队、副官、参谋人员都派去第一线增援，自己左臂负伤仍坚持指挥作战，稍后腰部又被机关枪子弹击中，卧倒在地尚浴血督战，接着又身中五弹。下午二时许，敌人包围越紧，最后，两名日军向张冲来，已身中七弹的他，抓住刺来的枪挺立起来与敌搏斗，但被另一日兵猛刺一刀倒下。他为防落入敌手，拔枪自戕，壮烈殉国。随张作战的全体将士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伤亡殆尽。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军阶最高的将领。他的遗体于5月28日被送到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等人亲自到码头迎灵执绋。国民政府为张举行隆重的葬礼，并颁发“荣哀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也举行了追悼大会。

主要参考资料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北平版。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江绍贞编：《长城抗战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

《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钟祥地区抗击日军的战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钟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钟祥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版。

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张宗昌

黄德昭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1881年2月13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1)]。其父是喇叭手，母为巫婆。张年十二三，助其父掌铙钹度日。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至营口，在一家赌场帮闲，后来流落北满当胡匪，又辗转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当了门警小头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宗昌乘民党在关东招兵之机，由关东率胡匪百人至烟台，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后又跑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于徐州背叛民军，投降了北洋军江淮宣抚使冯国璋。1916年春，陈其美在上海策动反袁时，张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密派其营长程国瑞将陈其美暗杀[(2)]。自是先后升任旅长、军官教育团团长。同年11月冯国璋任副总统后，委他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初，张宗昌任第六混成旅旅长，率所部随湘赣检阅使张怀芝假道江西攻湖南，4月下旬在攸县以南与湘、桂系的护法军交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沿途烧杀掳掠，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其后经醴陵转至湘南，收集大量溃兵，改任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到1920年6月，张部退入江西袁州（今宜春）驻防。1921年初，其军队在吉安因闹饷被赣督陈光远解散，张只身北归。

张在赣南失败后曾到保定钻营曹锟的门路，为吴佩孚所反对而无结果，便转往奉天投靠张作霖[(3)]。开始不为张作霖所重视，只安排给他带一营宪兵，他自不能满意。1922年5月下旬，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过后，直奉两军仍在榆关对峙时，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联合绥芬河胡匪卢永贵于中东路五站起兵，声称受吴佩孚命令反奉。张宗昌奉张作霖令出兵迎击，他带领一营宪兵从哈尔滨迎击由绥芬向西推进的

高、卢所部。因卢部胡匪中小首领多与张宗昌为旧相识，对他怀有好感，且他又得到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于是一战获胜，高、卢被杀。张乘机收编其败兵成立三个团，由此见重于张作霖，被委为绥宁镇守使，升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同年冬，他又收容了一批逃入中国境内近万人的白俄军，得到大量枪炮、马匹及铁甲车等物，遂成为奉系的实力派之一。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任镇威军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向热河进攻，连占要地，到冷口与直军激战。由于冯玉祥等举行“北京政变”，直军正面防线动摇、后退，张率先由冷口插入关内，进占滦州，切断了榆关方面直军退路，使直军一败涂地。张乘势收编了吴佩孚的军队四个旅，他的队伍一时猛增。二次直奉战后，段祺瑞的执政府成立。张临时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协助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他统率四个混成旅又两个梯队的庞大队伍，继续去攻打盘踞江苏的齐燮元（直系）。由于齐军内部涣散，张部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到了上海，奉系势力遂伸张到长江下游。1925年2月，张任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节徐州。4月，改任山东军务督办。从此张宗昌独霸山东，成了以“祸鲁”著名的地方军阀。

1925年10月，爆发浙、奉战争。浙督孙传芳率部迅速攻占南京、蚌埠北进。张宗昌出动所部鲁军八万，在徐州以南地区与孙军激战；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亦与奉军开战（国、奉战争）。吴佩孚也乘机抢夺地盘，构成纵横交错极其复杂的混战局面。11月初，张在与浙孙争战中已放弃徐州，退回山东。但接着河南国民二军派李纪才攻鲁西南，张与李军战于曹州至寿安地区。其时，吴佩孚曾委派靳云鹗率部增援李纪才军，靳、李两部一度推进到济南附近的八里洼。但不久吴准备联奉反冯，指示靳云鹗做折回河南的准备，于是张乘机拼命反击，保住了他在济南和山东的地位。与此同时，直督李景林（奉系）在天津与国民军作战，李被逐出天津，逃到济南向张求救。12月初，张为援李合组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褚玉璞带兵北上，与国民

二、三军相持于德州、沧州之间。1926年初，奉张（作霖）与直吴（佩孚）取得共同“讨赤”（反国民军）的谅解，张宗昌代表奉系与靳云鹗代表吴佩孚在泰山订合作条约。随后，张派直鲁联军北进与奉军会攻津、京国民军，并派其渤海舰队北上助攻。3月下旬，国民军退却，直鲁军与奉军占天津并于4月进入北京。8月，国民军为保存实力，自南口撤退，张宗昌以前敌总指挥令所部首先进入南口。战斗结束后，由吴佩孚举荐，北京政府授张为义威上将军。

张宗昌独霸山东期间，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依靠地主豪绅，残酷地压榨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他征收的田赋，“每地丁银一两，至少八元，多至二十元”。按正额累计，竟“征至民国二十八年”[(4)]。其他军事特捐及各项苛税，名目多至五十余种。滥发的各种毫无基金准备的纸币、军用票、金库券，不计其数。他把搜刮来的大批钱财存入大连日本银行，过着极端奢糜腐朽的生活。他到处招兵，但毫无军纪，又常不发饷，一任其部下贩毒抢劫，山东人民称张宗昌有“三不知主义”，即“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5)]。其祸国殃民，可见一斑。

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不久，就封闭进步报刊，把大批的进步学生关进监狱。1925年5月间，他一手造成的镇压工人的“青岛惨案”更是骇人听闻。当时，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三万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日本财阀的剥削与压迫，举行大罢工，他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电令胶澳督办（青岛市长）温树德调集三千余军队，开到四方（青岛郊区地名），打死工人八人，重伤十七人，轻伤者更多，被押解回籍的三千多人。6、7月间，青岛人民继续开展斗争，张又亲到青岛进行镇压，将工人领袖、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及青岛《公民报》进步记者胡信之等多人逮捕杀害。

此外，张宗昌还在山东各地肆意逮捕屠杀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人民群众。当时在各地传开的“切开亮亮”（把人头当做西瓜，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6)]（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反映了张宗昌的统

治是如何黑暗和恐怖。因此，到处怨声载道：“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7]，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切齿痛恨。

1926年4月，张宗昌率军入北京后，立即委派各级税官进行搜刮，强迫商号居民使用奉票和山东军用票。8月6日，他下令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并同时封闭了多家报馆。

北伐战争开始后，盘踞在华中和华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及孙传芳迅速被击败，北伐军的炮火眼看就要烧到张宗昌与奉系军阀盘踞的地区。11月，张宗昌和北来求援的孙传芳与张作霖等举行天津会议，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被任为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率直鲁军“援孙（传芳）”，二次南下。1927年初，张调集十多万人枪，分兵两路南进，一路直趋南京、上海，接孙军防务；一路由他自己指挥进取皖北合肥。由于北伐军的迅速推进和归附了南方的皖北地方军队强烈抵抗，张在安徽方面连遭挫败。

3月上旬，北伐军推进到上海附近。3月21日，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张宗昌的直鲁军在沪东天通庵车站及闸北宝山路和北站一带，用机枪、大炮轰击工人，并在闸北放火烧毁民房，特别是张部白俄军还用铁甲车开炮射击工人群众，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凶残本性。但是英勇的起义工人终于胜利地占领了上海，直鲁军纷纷弃械投降，张宗昌令其残部退回山东。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张宗昌乘着宁、汉分裂之机继续在津浦、陇海线与蒋、冯各军开展拉锯争夺战，先后在蚌埠、徐州及兰封等地区受到沉重打击，12月再次退回山东。

1928年4月，蒋介石继续“北伐”。张宗昌于月底逃出济南，一路溃退到德州、天津至冀东。他和褚玉璞一度宣言“班师”回奉，但结果受到张学良与国民党白崇禧部的双方夹攻，9月他的残部五万人被白

崇禧全部收编。他只身跑到大连，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1929年初，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一度纠合鲁军余孽到烟台登陆，但旋即失败，逃往日本别府当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企图重新获得山东的地盘。1932年9月，张从北平窜回济南，引起了当时山东统治者韩复榘的注意。9月3日，韩复榘指使张的仇人郑继成将他刺杀于济南车站[8]。

---

(1) 北平《世界日报》1932年9月5日第4版。

(2) 蔡寅：《英公被刺案情概要》，载何仲箫辑《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1，1930年版；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张宗昌投靠张作霖，得力于时任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潘复的介绍。参见陶菊隐：《政海轶闻》，南京华报馆1934年版，第95页。

(4) 工爻等：《祸国殃民贪污残暴之张宗昌》（死虎余腥录之二），《逸经》第6期（1936年5月20日）。

(5) 参见《张宗昌实录》；郑继成：《我杀死国贼张宗昌的详细经过》，《逸经》第6期。

(6) 工爻等：《祸国殃民贪污残暴之张宗昌》（死虎余腥录之二），《逸经》第6期。

(7) 永乐等：《祸国殃民贪污残暴之张宗昌》，《逸经》第7期（1936年6月5日）。

(8) 张宗昌的被杀，是韩复榘有计划地布置郑继成顶名为父报仇去干的，原来郑的叔父郑金声系冯玉祥部下的军长，1927年10月被张宗昌所俘，11月被张杀害。见王慰农：《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张作霖

黎光　孙继武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成县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张有财开小商铺，兼设赌局抽红。张作霖十四岁丧父，家贫无力就学，得村师帮助入塾读书，数年后辍学，改学兽医，后又改习他业。他一度流浪于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上，与赌棍流氓厮混[(1)]。

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军赴朝鲜，路过黑山，他投入毅军马三元部下当兵，不久离开，回大高坎镇开一小兽医庄，并与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

甲午战后，辽河下游各县的失业群众与散兵游勇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从事劫夺。张作霖以医治马病的关系，与各帮首领多所结识，因此，曾被人视为“窝主”。当时，各帮绿林有的以割据形式，划定范围，到界外劫夺，在界内为地主富绅“保镖”，令居民摊派一切费用，号称“保险队”，又称“大团”。张作霖经岳父协助也纠集了几十人，当上赵家庙一带的“保险队”头目。某次，他率队到新民姜家屯劫夺了蒙古族好马五十多匹，全队由步卒变为骑兵。其后，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各带一小帮来归，声势日大。

1902年，张作霖率部二三百人，经八角台豪绅作保，由新民府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张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所部驻新民数年，名为官军，并不改劫掠旧习。

日俄战争开始时，张曾倾向俄国，后来随着战局变化，转而为日本做掩护日谍、刺探情报的勾当。

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两个军事机关：一个是负责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派日本士官毕业生蒋方震为总参议；一个是负责整顿地方旧军的巡防营务处，以出身绿林的张锡銮为总办。张锡銮将全省旧军编成八路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1909年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奉天八路巡防队改为五路，张仍任前路统领。张作霖等视新军为其发展障碍，极力排斥新军将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榕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拟策动奉天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反动士绅袁金铠的建议，急调驻防辽源一带的张作霖部入卫。张早已窥测时机，密令所部向沈阳移动；闻召令后，便星夜兼程进省。当时赵尔巽慑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尚未敢立即采取镇压手段，但他也不肯独立，而是与当地反动官绅相勾结，成立了装点门面的“奉天国民保安会”，赵不再称总督，而改称会长。张作霖到沈不久担任了该会的军事部副部长。随后，形势略稳，赵尔巽依靠张作霖剥夺了蓝天蔚的军权，并赶走了蒋方震。1912年初，赵尔巽又指使张作霖与袁金铠将张榕骗杀并掠夺其家产。接着又捕杀了新军干部与革命青年一百余人。之后，以赵尔巽和张作霖、冯德麟为首的三十三名旧军将领发出愿效忠清廷的反革命通电，电达袁世凯。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清政府迅速覆灭，袁世凯窃权上台了。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赵尔巽率东北各将领致电祝贺。赵被袁改任为奉天都督，张作霖与冯德麟分任二十七师与二十八师师长。自此，张作霖一面讨好袁世凯，一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靠拢，他深知欲攫取奉天大权就必须取得日本的支持。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路过奉天，他前往拜访并表示：今后，他“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2)]。

1913年3月，当袁世凯于“宋（教仁）案”之后亟谋对南方用兵时，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并加以慰勉。张返奉后，竭力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为袁世凯效劳。此时奉天都督为张锡銮。张作霖

用各种手段排挤了许多旧将领，逐步成为张锡銮手下最有实力的人物。随着张作霖的羽毛日丰，袁对他渐不放心，1914年8月袁企图给以将军职衔调他至内蒙。张闻讯立刻鼓动奉省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了原意。

袁为了笼络并钳制张作霖，1915年8月，把自己的亲信段芝贵调到奉天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作霖佯示欢迎。此时，袁正亟谋复辟帝制，张密电袁世凯劝进，声言“关内外有异议者，以身当之”[(3)]。袁“登基”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不高兴地说：“我何能为人做子！”1916年春，他看到袁的帝制梦行将破灭，就改变了过去对段芝贵的亲热态度，迫使段逃回北京。当时袁正陷入四面楚歌中，不敢开罪于张作霖，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帮办。到此，张实现了攫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月袁世凯死去，张被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7年初，北洋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张作霖依靠日本为后台，站在段祺瑞一边。他派代表参加徐州督军团会议，要求解散国会，并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成立了二十九师，任吴俊陞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开始采取骑墙态度，观察风向。及复辟失败，张乘机把因参加复辟活动在京被捕的冯德麟所部二十八师收为自己掌握。其后不久，张又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把势力伸张到黑省，向北京政府保荐了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对吉林方面，张也企图伸手，但为吉林督军孟恩远所抗拒。

复辟事件过去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与段祺瑞所掌握。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军政府）外，在东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内部又酝酿直、皖两系之互斗。在对南方问题上，皖段主张用武，而直冯则予以掣肘。1918年春，经皖系政客徐树铮的拉拢，张作霖派兵入关，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为名，谋取更大权力。9

月，皖系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副总统一职，徐树铮为换取军阀在南征中卖力，曾以之为诱饵，既许给直系将领曹锟，又许给张作霖，终以各方牵制而暂时搁置。徐树铮为疏通对张的关系，同月示意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当了东三省巡阅使。是年冬，欧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争夺中国，策动南北“和谈”。12月2日，日本也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在此情势下，日本指使张作霖把他伸入关内的势力暂时退回关外。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作霖在东北用严厉防范与坚决镇压反日的措施，博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爱。事后，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嘱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4)]。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下，1919年7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孟屈服，解决了吉林问题。随后，北京政府在张的示意下调鲍贵卿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任黑龙江督军。到此，张作霖把整个东北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被拥为奉系首领，为其以后争霸关内打下进可以攻、退有所守的基地。

张割据东北以后，野心益炽，急于向关内伸张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先是，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对自己的威胁，同时也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人心，所以他一变过去对段的支持，而暗中加入了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等战争一爆发，张即迅速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结果皖系大败。于是奉系和直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成了两系的傀儡总统。张趁此时机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察哈尔与热河，除以镇威上将军头衔任东三省巡阅使外，1921年5月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首领曹锟开会，共同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上双方迭生矛盾。张为对抗直系，

暗与皖系势力重修旧好，并利用旧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亲自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对外屈从日本要求，对内则照张作霖的意旨办事。这样就引起了直系第二号首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帝国主义国家正举行与中国利权攸关的华盛顿会议。在赎回胶济路问题上梁士诒准备借日款赎路，并允许由中日“合办”。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斥梁士诒亲日卖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说：“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5)] 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在直隶境内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素质甚差，指挥上又失误，不到一周，奉军防线迅速瓦解，被迫撤回关外。徐世昌当即下令免张本兼各职。但张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有日本作支柱，绝非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动摇。他的御用工具东三省议会立即通电推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遂即宣布东北“独立”。

张作霖于“独立”之后为了向直系复仇，埋头整军，设陆军整理处，增聘日本顾问，扩建兵工厂，推行“精兵主义”，将所部十六万人统一编制，称“镇威军”。他为了孤立直系，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同时，他秘密拉拢了冯玉祥以分化直系势力。在对日本方面，他给日本以“合办”投资的便利，换取日本的更大支持。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的时候，直系曹、吴正把国事搞得乌烟瘴气。曹锟以“贿选”而成总统，秽声四溢；吴佩孚滥用武力，各地兵连祸结。因此，反直浪潮不断从各方面兴起。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有了两年准备的张作霖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5日张自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热河方面出动。由于奉军战斗力提高，又有日本提供的大量军火和情报，战争对直系不利。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吴佩孚逃走，直军迅速溃败，张大获全胜。

奉军战胜后，张作霖背弃了与冯玉祥约定“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把一部分奉军开到天津及津浦路北段。冯被迫与张共同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此时，冯部已改称“国民军”，关于此后政局的通盘处理，冯比较倾向请孙中山主持，积极电邀孙中山北来，而段、张与孙中山的“联盟”，却随着曹、吴倒台而瓦解。于是，奉系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就跟着发生了。1925年春，段祺瑞为了平衡张、冯间关系，允许冯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据有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加任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允许其沿津浦线发展。同年5月，奉军大举入关，8月后，奉系由山东南下，据有了江苏、安徽两省，把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的上海。

奉系势力向东南的扩张，使新任浙江督军的孙传芳感受威胁。因此孙联合闽、赣、鄂、苏等省的直系旧部，并暗与冯玉祥联合，酝酿共同反奉。1925年10月，孙传芳先发制人，出兵五路对奉军发动进攻。张在东南的势力迅速瓦解。11月8日，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当孙军胜利北进时，吴佩孚在武汉复起，自封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但吴的目的不在反奉，而在反冯，兵锋指向河南。是时冯暗中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讨奉。11月23日，郭松龄自滦州率军出关，迅速攻占锦州、新民等地，张的大本营沈阳危急万分，张准备逃往大连。日本政府见此情况，趁机向张作霖提出了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新条件（即当年“二十一条”中的南满与东蒙的条款），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出兵干涉。结果郭军受阻失败，24日郭被擒杀。

当郭回军反奉时，冯部将领打败了直隶境内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李景林部，占领了天津。郭死后，冯部进援郭军残部，与奉军夹滦河对峙。冯、张间的冲突既已激化，张作霖乃与进军河南的吴佩孚弃嫌修好。1926年2月，吴、张间订立了共同对冯的盟约六条。随后又把山西督军阎锡山拉进了反冯的战线。于是3月间，张、吴、阎以及直鲁联军共同展开了对国民军的作战。由于各帝国主义敌视国民军，冯

军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而在南口、晋北及西安三个战场上与敌军相持。

同年7月，当南口战场上还在激烈拼杀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出师北伐了。由于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大工农参战，北伐军节节胜利，10月初攻下武汉，11月初平定江西。盘踞在华中的吴佩孚和东南一带的孙传芳，势力都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张作霖仍拥有重兵35万，成为旧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孙传芳不得不亲自到北方来向他求救。当时段祺瑞已辞“执政”，北方军阀群龙无首。11月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举行天津会议。12月1日借十五省“推戴”名义，张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

1927年2月，张以“援吴（佩孚）”为名，派兵入河南，先抢夺了吴的地盘。不久，蒋介石在沪宁地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南方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张作霖与南方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借此向帝国主义争宠，并希望与蒋谋妥协。5月底，自潼关东来之冯玉祥国民军与武汉革命政府派出之唐生智北伐军会师郑州，南京方面的军队也北上攻占了徐州。张作霖乃于此时提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口号，企图用来分化对方，幻想造成以黄河为界的局面。6月18日，安国军政府成立于北京，张作霖自称海陆军大元帅，他认为这样可以南北对等，便于和议。6月25日，张以“大元帅”名义下“息争令”，并发表通电，恬然自称是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作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对于“甘心赤化者”，要“问罪兴讨”[(6)]。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以对付冯、唐。从6月底到7月中旬，冯玉祥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继蒋介石之后，也走上反共道路。在此以前，善于投机的阎锡山也已投靠南方，于是张所希望的“蒋、阎、奉”联合落空，而成为“蒋、阎、冯”联合对奉的形势。但到8、9月间，南方新军阀内部发生了宁、汉、粤、桂之间的派系争权斗争，蒋介石宣布“下野”。河南境内也发生了冯、靳（云鹗）之争。于是孙传芳部乘机反

攻，夺徐州，占浦口，渡长江而进军龙潭。张作霖也趁此时机于10月间向京汉、京绥之间的阎锡山部发动了攻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在陇海线向张宗昌展开猛攻，12月初冯军与南京方面北来之师重新夺取了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总司令，国民党军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分配了“北伐”任务，在各条战线上对奉军展开了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渡河逃走。到此，张作霖鉴于大势已去，遂决定从各线上撤退，并于5月9日通电，借口停战息争，做退回关外的安排。

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而起家的。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旧军阀的斗争，反映着当时英美与日本在华的争夺。因此南北混战过程中，日本一再对华增兵，企图挽救奉鲁军阀的垮台。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使得张作霖在接受日本权利要求上，不能不有所顾虑；同时也由于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的插手，从而使日、奉关系复杂化而产生若干矛盾。先是1927年前张作霖曾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筹款自行修筑了奉海、吉海、呼海等路的一部分，并修筑了与南满路平行的打通路。日本认为这些铁路的修建，是东北当局的排日行为，特别是认为建成打通路对日本“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7)]，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还计划向西方国家借款修建葫芦岛港，又在南满路沿线设卡征税，也都引起日方的不满。另外，日本政府要求张作霖趁掌握北京政权之时，履行前在消灭郭松龄时曾允许日本实现其在满蒙权利的诺言。张慑于国内人民的反帝浪潮，不敢实行前言。同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召开由驻华公使、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等参加的“东方会议”，要求加强对张作霖的控制。会上决定向奉方提出日本在“满蒙”境内各项特权要求，并决定必须迫使张作霖答应全部要求，否则即寻找机会解除其武装。会后，8月，日本公使芳泽回北京，即向张作霖提出所谓《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一切悬案。但这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美国政府的嫉视，更引起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北三省人民的愤怒抗议。东北人民纷纷举行反日示威大会。张作霖虽竭力制止反日运动，但日本仍疑心是张作霖暗中放火。10月，田中加

派满铁社长山本赴北京，设法包围张作霖，力求迅速解决。经过一段交涉，张对日方所提出的“满蒙新五路”表示可订密约，但日方要求非由双方政府签订正式合同不可。反复纠缠到1928年5月上半月，张同意在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两路合同上签字，吉林至五常一路，留待日后再议。但这消息又一次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日本对敦图路的施工，遭到群众阻挠。随后，日本首相田中指令芳泽继续迫使张作霖采取果断措施，满足日本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等），但张从自己利益出发不敢全部承诺。至此，日方对自己多年来所扶植的这个工具大为恼恨，便决心采取另外的手段来对付他。

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声称中国战事即将波及京津，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与递交“觉书”同时，芳泽劝张早日退回关外。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其左右亲信开会研究战局形势，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回奉天的专车由北京出发，4日清晨五时许，张的专车到达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当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铁桥被日本预先埋好的炸药炸塌，张所坐的几节车厢也被炸碎，同车的吴俊陞登时丧命。张作霖受重伤，被救回沈阳后，当日死去。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曾极力掩盖真相。到二十多年以后，谋杀人之一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战犯，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供认了他们谋杀张作霖的经过。

---

(1) 钱公来：《辽海小记》，东北生产管理局和春分局印刷工厂1947年印，第32页。

(2) 《日本外务省档案》MT 115。

(3) 《盛京时报》1916年4月8日。

(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

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62—863页。

(5)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483页。

(6) 上海《新闻报》1927年6月27日第4版。

(7) 《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 23，第940页。

张作相

丘琴　姜克夫

张作相，字辅忱，祖籍直隶（今河北）深县。晚清时华北闹灾荒，其祖上逃荒到关外。1883年，张作相生于辽宁义县杂木林子村。其父张永安以农为业，有时兼做吹鼓手。张作相幼读私塾三年，及长由于租种土地难以糊口，离乡去沈阳谋生，曾做泥瓦匠。1895年返乡务农，因堂兄被邻村恶棍打死，官府不能为死者申冤，他愤然带领数名青年将仇人杀死，遂流亡辽西为匪。后与活动于辽河下游台安一带的张作霖部合股，渐成为该集团的中坚。

1902年，张作霖部被新民府知府增韫收编，张作霖任奉天省巡防营管带，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均为哨官。时东三省匪患严重，尤以流窜在辽西一带的杜立山股最为猖獗。1907年张作相随张作霖剿灭杜立山股匪有功，被提升为管带。其后张作相任骑兵第三营统带。不久徐世昌创办东三省讲武堂，张作相由张作霖保送入讲武堂第一期受训。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9月张作霖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师长，张作相任该师炮兵团长，旋又改任骑兵团长。1916年4月，张作霖乘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唾弃之机，迫走奉天督军段芝贵，被委任为奉天军务督办。1917年8月，张作霖提升张作相为二十七师步兵第五十四旅旅长。

1918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调原督军公署参谋长杨宇霆为总参议，升任张作相为参谋长，兼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堂长和卫队旅旅长。1919年7月，张作霖又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调鲍贵卿接任，擢升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8月由张作相接替孙烈臣

署第二十七师师长。1920年秋，张作霖助曹锟战胜段祺瑞，张景惠出任察哈尔都统，张作相再接替张景惠任驻关内奉军总司令，接收了皖系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人才。

1922年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之战爆发，张作相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一梯队司令，除辖本师外，还指挥骑兵许兰洲部及卫队旅张学良部。开战后，张景惠指挥的京汉线西路军很快即被吴佩孚、冯玉祥部直军击败，张作霖拟派东路军增援，张作相认为西线已溃，增援无补于战局，应迅速撤军回奉，张接受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立即率东路军扼守滦河口岸，掩护奉军主力安全退回关外。战后张作霖为整顿军队，加强训练，7月成立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韩麟春任正副总监，张学良、郭松龄任正副参谋长，延聘国内外军官学校出身的青年军官充实东北军。这期间，张作相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二十七师师长参与了一系列有关整军兴武、报仇雪耻的重大决策。

1924年4月，吉林督军兼省长孙烈臣病逝，张作相升任吉林督军。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得到段祺瑞、孙中山的支持，组成“镇威军”六个军，自任总司令，对曹锟、吴佩孚展开进攻。张作相任第四军军长。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大战很快以奉军胜利结束。战后，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冯玉祥的国民军向西北发展，张作霖的奉军沿津浦路南下。

1925年10月，吴佩孚武汉再起，联奉攻冯。张作霖集结奉军主力于冀东，以吴俊陞率黑龙江骑兵出热北抄袭多伦，攻张家口冯军之背，而由张作相率吉军和汲金纯师（原冯德麟二十八师）部署在辽西做预备队。冯玉祥策动郭松龄倒戈返奉，张作相闻变当即率部在连山关迎战郭军，后又沿途阻击郭军前进，给张作霖建立防线之机。12月20日，郭、张两军对峙于巨流河。24日，吴俊陞所部骑兵旅抄袭郭军司令部，将郭松龄俘获处决。战后吴俊陞、杨宇霆主张严惩随郭叛变的军官，张作相、韩麟春坚主宽大处理。张作霖采纳了张作相的意见。会后，张作相陪同张学良到前方对郭军将领宣称：“这是奉军内

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结果跟随郭部倒戈的五个师，除魏益三部投冯玉祥外，全部由张学良收回。

1926年上半年，张作霖与吴佩孚、阎锡山联合攻打冯玉祥。8月，冯军溃退绥远河套，而从两广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却势如破竹地推进到长江流域。为延续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拼凑七个方面军进行顽抗。张作相则任第五方面军军团长驻防东北，为张作霖看家。9月，张作相又兼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旋晋、奉失和，由于阎锡山参加北伐行列，奉军高级将领于珍被扣，威胁奉军后方，张作霖调张作相率部驰援京绥线，将商震部晋军撵回雁门关。但由于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三个方面军在津浦线溃败，为保存奉军实力，张作霖遂于1928年5月下令往关外退军。张作霖、吴俊陞在返奉途中于6月4日被日军在皇姑屯炸毙。

张、吴死后，东北三省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张作相在奉系集团中素以宽厚稳健著称，以总参议杨宇霆为首的将领倾向推举张作相为首领。同月24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选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而张作相顾及与张作霖生前的情谊，辞不就任，坚持扶植张学良继承父业，将总司令大印抱送张学良，随后借口奔母丧回到锦州。7月2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才又推选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从而实现了东北与关内的统一。31日，张学良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

张作相先后执掌吉林省政八年，与奉系军阀执政的几个省相比，吏治比较清明，社会治安良好；农民负担较轻，粮食逐年增产，为大豆输出最多的省；金融比较稳定，吉林省钞“永衡官帖”比值较高；长春、永吉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张还注重发展交通，兴修吉海铁路，使吉省的粮食、木材不通过南满铁路即能运进海口。此外，张作相还

注重培养人才，除在省城和长春及各县办有中学外，还在永吉创办省立吉林大学，聘留学德国的李锡恩任校长。但张用人失察，让一批复辟思想严重分子窃取了吉省军政大权，致使“九一八”事变后，吉省很快伪化。

1930年5月，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爆发，双方均派高级谋士来沈阳说项，最后张学良决定助蒋，张作相对此虽有疑虑，仍毅然服从。同年9月奉军十个旅入关助蒋，阎、冯一败涂地。张学良东北系势力登峰造极，张设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于北平（今北京），主宰北方几省军政大权，奉系一批要人入南京任要职。张学良入关后，张作相以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身份在沈代理司令长官，在其参谋长荣臻协助下处理东北军政大事。所留吉林各事，则由参谋长熙洽代拆代行。

1931年5月，张学良患病不能理事，石友三趁机发动叛乱，万福麟率黑龙江两个国防旅来北平协助于学忠平叛，东北防卫力量空虚。8月，张作相又离沈回锦州小岑子老家为其父大办丧事。丧事办了四十九天。东北系的大员都纷纷前往吊唁。正当辽、吉、黑三省大吏离省之际，日本帝国主义者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短短几天辽宁省重要城镇基本沦亡。吉林省养兵仅次辽宁，共有九个旅与一个炮兵团和卫队团，总兵力65000人。由于熙洽纠合满族高级军官郭恩林、佟衡、吉兴等假借张作相名义下令不准抵抗，使日军很快控制了吉林和长春及交通线。同年冬，李杜、丁超曾率吉军四旅奋战于哈尔滨、松花江，但不久亦退入俄境，而熙洽控制的吉军竟成为伪满最大的一支汉奸武装。

1932年夏，日军在大肆“扫荡”辽、吉、黑义勇军的同时，加紧对热河进行诱降活动。当时任东北边防军驻热长官兼省主席汤玉麟在其汉奸盟兄弟张景惠、张海鹏等串通下，有心降日。南京政府认为汤难当国防重任，张学良拟派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率军入热取代汤的职务。汤闻讯大怒，在滦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已居天津做寓

公的张作相闻讯，即于9月初派其高级参议赵毅赴承德进行调解，从而避免了日军尚未入侵，东北军内部先行火并的丑剧发生。

1933年初，为应付日军占热，宋子文来北平协同张学良拟订华北抗日军战斗序列：以张学良为华北抗日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宋哲元、商震、于学忠、万福麟等军团，布防于热河东部及长城各口；为控制骄横跋扈的汤玉麟，任命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除指挥汤玉麟军团外，还指挥孙殿英及自兼的第六军团（包括冯占海六十三军、张廷枢一一二师和退入热境的东北义勇军等），防守承德及热河北部。张作相2月27日驰赴承德，而日军已于21日分路向热境进攻。汤军很快溃败，北票、开鲁、朝阳25日同时沦陷。防守叶百寿、凌原、平泉一线的万福麟军团亦被日军击破，于3月2日退入喜峰口。张作相曾电万福麟配合汤军团作战，万不复电。张又命令汤玉麟火速派兵扼守承德外围黄土梁子，汤军行至中途因未达到发放三个月军饷的要求即行哗变。张作相感到大势已去，但仍坐镇承德旧将军衙门，与幕僚商讨对策，但为时已晚。3月3日，张在副官与卫士护卫下前往古北口。3月4日，承德沦陷。

1933年3月7日张学良因丧失热河被迫辞职，张作相从此亦失去军职。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的东北军政人员和知识阶层纷纷流亡关内，头面人物大都寄居天津英租界做寓公。曾由王树翰（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和张作相牵头在天津英租界10号路（今保定路）董士恩家（吉林巨商）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奉系下野的文武高级官员经常在此聚会，以打台球和麻将为名，加强联系，互通情报，为张学良东山再起做准备。1936年夏，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张学良致电王树翰和张作相，要他们组织东北同乡会，准备提出东北四省国大代表候选名单。同乡会设董事会，推选王树翰、张作相、汤玉麟、吴景濂等十七位前奉系要员为理事。同年冬，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奉系在津元老甚为惊愕，认为问题严重，当由张作相、王树翰领衔发

出通电，呼吁和平解决国事。张作相并派张学良表弟赵绍武去西安转述他的意见："最好不杀蒋介石，杀了内战又起，对抗日不利。"不久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奉系留津元老对此困惑不解，张作相更为张学良的前途安危而忧虑。后张学良在南京被蒋囚禁，奉系元老们认为大势已去，从此董家俱乐部门庭冷落。

抗战期间，张作相一直寓居天津，生活颇为拮据。日寇曾以归还"九一八"事变没收的财产为饵，诱张作相出任伪职，张始终未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军接收东北，蒋介石认为张作相系奉系中坚人物，在熊式辉被委为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主任向蒋介石辞行时，蒋指示熊到东北应起用奉军知名人物，第一名就提出了张作相。熊到沈阳后曾安排张作相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初，国民党在东北大势已去，又委张为东北"剿匪"副总司令，但他在清理日伪没收的财产后，即返回锦州小岑子"福厚堂"家中养老，从未过问政事。同年冬，东北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曾电其赴南京，张在次子张廷枢的劝说下托故未走。11月，锦州解放，解放军派汽车将其送回天津家中。蒋闻其回津，又委张作相为国民政府国策顾问，再度令其去南京，他仍置之不理。1949年5月7日，因心脏病发作，于天津重庆道六号寓所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胡震：《我所知道的张作相》，政协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7辑（辅帅生平），1988年版。

张廷先、张文君：《回忆我的父亲张作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部的产生分化及其结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于学忠：《东北军入关和扩大会议解体》，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

赵毅：《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张国忱：《奉系董家俱乐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章伯钧

周天度

章伯钧，安徽枞阳人。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出生于安徽桐城。父章扬清，薄有田产。章伯钧七岁丧父，其母变卖田产供他上学。

章伯钧幼年入私塾，继入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了恽代英等任教员，思想倾向进步，一年后即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章伯钧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当时许世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由上海起程，与朱德、孙炳文等同轮前往柏林。

章伯钧到德国后，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三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邓演达到柏林，章伯钧结识了邓。邓的政治主张，对章后来有一定的影响。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到达广州。当时郭沫若在广东大学（7月改称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广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1月，任武汉国民政府人民裁判委员会委员。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被任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主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

同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清党、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

撤离南昌，章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28年，章伯钧从香港到上海，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不同意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表示要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小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1)，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为总干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1931年8月17日，国民党特务将邓演达逮捕，随即予以杀害。章伯钧和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工作。

1933年9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到香港，随后去福州，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这时不得不宣布解散。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福建人民政府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春，章伯钧从香港流亡到日本。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章伯钧由日本返回香港，和彭泽民积极准备复党的工作。是年11月1日，他们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当时反抗日本侵略，实现民

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会议决定将该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2)]。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3)]。《纲领》还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恢复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十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临时中央的实际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4)]，但为蒋介石所拒绝。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电邀海外爱国人士回国，共赴国难，章伯钧随即回到南京，参与抗日活动。由于国民党歧视和排挤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设立的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参加。

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做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5)]。章伯钧说：“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6)] 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同年6月，他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他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将它的政策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掀起了宪政运动，章伯钧与张君劢、

左舜生联名提案，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全国政治上彻底开放，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以增加抗战力量。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引起“非常激烈的辩论”[7]，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反对。11月下旬，章伯钧与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求成立宪政政府。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其后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也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成立会，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中华论坛》杂志，章伯钧任主编。他积极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议，驳斥了蒋介石指摘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是“分赃”的说法。他说：“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8] 7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身份得到恢复。为了促进国共团结，他和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等参政员于7月1日一同赴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9月15日，他发表时局谈话，指出：解放区的军队及

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9]。他还指出，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10]。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在出席会议的民盟和无党派代表中，他同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被认为是能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四名左派人士。5月，章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他说：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11]

1947年1月13日，章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当前面临的任务是争取实现人民民主，遂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章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政府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和沈钧儒反对解散民盟，相继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8日，他们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发表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不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政府威胁劫持下的总辞职和解散总部，以及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的声明。会议通过宣言和政治报告两个文件，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且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沈钧儒和章伯钧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开展新政协运动。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29日到达哈尔滨。11月26日，他们发表时局声明，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2) 。

1949年2月，章伯钧由哈尔滨到达北平。6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办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章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长。

1954年章出任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1957年夏，章伯钧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1月29日，被免去交通部长职务。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因胃癌离世。

1982年11月15日，举行了为民盟一、二届副主席，三届中常委章伯钧的骨灰移存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仪式。1985年11月11日，由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举行的“章伯钧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肯定了章伯钧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做了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对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 (13) 。

(1) 该党以后把这次会议看做是第一次全国临时代表会议。

(2)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

(3)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存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

(4)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

(5)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

(6) 章伯钧：《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7) 邹韬奋：《抗战以来》，《韬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30页。

(8) 章伯钧：《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3期。

(9) 《章伯钧先生对时局谈话》，《中华论坛》第9期。

(10) 章伯钧：《谈内战问题》，《中华论坛》第10、11期。

(11) 《文汇报》1946年12月15日。

(12) 《民盟文献》，中国民主同盟总部1948年编印，第98、99页。

(13)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63页。

章鸿钊

李建初

章鸿钊，字演群，号爱存，笔名半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1877年3月11日（清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浙江湖州（今吴兴县）城南荻港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父亲章乃吉是塾师，叔父是光绪己丑科进士。

章鸿钊从五岁起随父亲读书，十二岁时跟随族叔学习作文。他勤奋好学，攻读文史之外，还自学数学，遍览中国算术书籍，1897年编成《综合算草》，次年考取秀才。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曾教了两年家塾。1901年入湖州安定书院和爱山书院读书，秋末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1903年秋，东文学堂停办，他随学堂监督（校长）罗振玉和日籍教员藤田丰八去广州，在两广督署学务处襄办编辑教科书事务。1904年初，章鸿钊被广东当局选拔到日本留学。

章鸿钊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目睹清政府的腐败，立志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欲以科学救国，振兴中华。在日本，初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预备班，一年后转入理科，先学数学，后改学农学。1908年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科，受业于地质学家小藤文治郎。

1911年6月，章鸿钊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我国留日学生中较早选修地质学并获得地理学士学位的人。回国后，任北京京师大学堂地质学教师，是我国主讲地质课的第一位本国学者。

武昌起义后，章鸿钊欣然应邀赴南京参加筹建临时政府事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实业部矿政司下设立地质科，它标志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诞生，章鸿钊被委任为地质科科长。他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筹划开拓。他对于“我国山川蕴藉，灵秀所钟，弃利于地，无人过问，欧美学者先后逾海而东，日本继之，足迹及于中国之大半，而我国犹若勿闻”[1] 的状况，引以为耻，力图改变。他草拟了《地质调查咨文》，向全国征调地质人才和地质图籍；又写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并附有筹设地质研究所的详尽计划和简章。其中一段写道：“调查私议者，欲诉之于全国人民也。设研究所，并期之于我国后生青年也，而尤以培植青年为最切要。”[2] 他力主先办地质研究所，招收中学毕业生，修业期限为三年，以快速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调查人才。同时，还向当局疾呼：“谋国者首宜尽地利以裕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末由已！”[3] 4月底临时政府北迁，北京政府将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二部，9月，他转任农林部技正，因此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1913年初，工商部地质科由丁文江继任科长。矿务司负责人张轶欧采纳章鸿钊的方案，与丁文江商定开办地质研究所（实即高等地质专科学校），将章氏所拟章程、计划以部令颁布。9月，招生30人，10月初开学。章鸿钊受聘兼任主讲教师，11月，代理所长。年底，农林、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章鸿钊正式担任所长，专力从事地质教育。当时，农商部长张謇不以办地质研究所为然。经章鸿钊恳切陈词，据理力争，研究所计划才获得批准。到1916年，该所第一批学员有22人毕业（其中4人因考试不及格，未发毕业证书），为我国地质调查提供了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如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谭锡畴、李学清、朱庭祜、李捷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章鸿钊对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亲自带领全班学生到北京西山和河北滦县、开平等地实习，并在西山区进行矿产勘测工作。在1916年7月14日的毕业仪式上，一些外国地质学者看了学生的学业展览后，认为“成绩甚佳”，“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的第一次光彩”[4]。章鸿钊在毕业典礼上谆谆劝勉学生：“从事地质，虽苦亦乐！”“学问上研究不可忘记，形式上的痛苦总要忘记。”[5] 他鼓励学生要以调查矿产富国利民在精神上的快乐，战胜野外地质工作的艰

苦。研究所原拟继续招第二批学生，由于丁文江主张停办，遂告终止。以后，章鸿钊改任地质调查所地质股股长，兼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1922年11月，他率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博物系学生赴泰山，进行地质实习，开创我国妇女界参与考察地质之先河。章鸿钊于泰山朝阳洞刻石记述此事。

1922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章鸿钊被选为首届会长。他大力推动学会工作，创办《地质学会志》，并亲自参加编审稿件。以后他多届任理事，十分关心学会的发展。他的论文大多是在《地质学会志》和1936年创刊的《地质论评》上发表的。在我国最早的一些学会团体中，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学术活动、论文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较高的声誉。章鸿钊还是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的社员、撰稿人。他与鲁迅是同乡，爱国情怀相同，时有过从。

因与北洋政府地质机构的主管人在地质事业发展方针上意见不合，1928年7月，章鸿钊辞去地质调查所的职务，专事研究著述。1936年曾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审查委员。1937年，中央研究院聘他担任地质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这些年中，他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生活主要靠兼职和稿费维持。他以献身地质科学为志，虽然坎坷困苦，也不改初衷；论文著作，更趋广博精深。面对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爱国热忱尤见坚贞。“卢沟桥事变”后，他因长子病重，滞留北平。日本人曾多次登门聘请，许以伪华北某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和优厚的薪金，都被他严词拒绝。1941年4月，他摔伤左足，卧床八个月，始能扶拐行走。他给重庆的学生去信说：伤腿虽然痛苦，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省了日本人的纠缠[(6)]。他年过花甲，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仍然不忘报效祖国。每有余暇，就“展简披图”，阅改《古矿录》文稿。他将这部手稿“深藏箧中”[(7)]，以待将来。当他得知留在北平的几名学生在日本人招聘下有可能动摇时，心急如焚，登门规劝，晓以民族大义。在他的督促下，这几名学生终于离开北平，

奔赴抗战后方。1943年秋，他腿伤已愈，遂举家迁居上海，一度暂住亲戚家中，经济上多赖亲友和学生资助。

抗战胜利后，章鸿钊于1946年下半年由上海迁居南京，任国立编译馆编纂。同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葛利普金质奖章，中央地质调查所特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供他作研究用。他致力于《地质学论丛》的写作和区域地质构造理论的研究，编译岩石学名词等，并继续研究区域地质构造理论方面的课题，撰写和发表了有关论文和专著。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章鸿钊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庆幸中国地质科学也获得新的活力。他被邀请参加南京市首届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9月，章鸿钊被特聘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顾问。11月，他不顾年老多病，应邀赴北京参加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致开幕词。1951年，任《南京日报》社技术研究组召集人。早在40年代初，他就提出过地质科学和实际相结合，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正确主张，但在旧社会根本不被重视。解放后，他亲眼看到地质学真正与人民事业结合起来，感到由衷的高兴，迸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努力研究，发表若干新作。

1951年9月6日，章鸿钊病逝于南京。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李四光致悼词说："章先生为人正直而有操守，始终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多次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8)

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借回国探亲机会，赴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系统地搜集实际资料，回校撰写了《浙江杭属一带地质》的毕业论文。这是我国地质学者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份地质调查报告，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916年地质研究所停办后，他将全所师生在一些省份实习中所写的69篇调查报告，综合整理出《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对

全国地层分布、火成岩、地质构造、矿产等，系统地作了分析归纳，建立起我国地质区划的概略轮廓，是当时我国一份重要的地质研究成果。以后，他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他精通文史，从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悉心研究有关地质、岩石、矿物、金属和化石方面的史料，用地质科学理论加以解释，去伪存真。他的著作，以资料翔实、论述精确著称。他的代表作有《石雅》、《古矿录》、《自鉴》、《三灵解》等书。《石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质、岩石、矿物、化石和金属方面的总结性著作，1921年出版后，1927年曾再版。《古矿录》是他用十余年时间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整理成的一部叙述我国矿产资料的重要著作，全书分十卷，按省阐述，附分布图及历代年号与公元对照表，195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对我国地质普查勘探工作的开展，帮助极大。1923年发表的《自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道德观念的形成、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梁启超为之作序，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9)]。章鸿钊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都进行过反复研讨。他长期研究震旦运动问题，对日本、东亚以至太平洋区域地质构造的认识不断深化，先后发表了《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1936年）、《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及其特殊构造之成因解》和《就所谓震旦运动及对于此事之批评重加省视》（1947年）等。他用环太平洋大陆块向洋水平位移来解释太平洋造山带的形成，在当时的地质学术思想上，坚持了活动论的观点。“二战”结束以来板块学说的发展，证明他的这一观点是富有远见而难能可贵的。

章鸿钊在数理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并能将数学、物理学方面的最新成就运用于地质科学研究。1929年发表的《地质学界两种过度的信仰和今后发展的趋势》一文，提出要以物理学作基础，开展地质学的研究，预言《物理地质学》或《理论地质学》“将作为一门新学科出世”[(10)]。他在科学上的进取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至老不衰。

1951年，他还在《中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周髀算经上之勾股普遍定理》（陈子定理）和《禹之治水和勾股测量术》两篇数学论文，可见其知识的渊博和研究领域的宽广。

章鸿钊治学严谨，道德高尚，为了地质事业的发展，他顾大局，重团结，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深得后学的敬仰。晚年他在一首述怀诗中说道："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临崖未许收奔马，待旦还应傲枕戈。虎子穷搜千百穴，骊珠隐隔万重波。倘因诚至神来告，倚剑长天一放歌。"[11] 这是他一生锲而不舍，始终如一，献身中国地质科学的忠实写照。

---

(1) 章鸿钊辑：《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1916年。

(2) 孙云铸：《纪念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地质学报》第34卷第1期，1954年，第1—10页。

(3) 孙云铸：《纪念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地质学报》第34卷第1期，1954年，第1—10页。

(4) 章鸿钊辑：《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1916年。

(5) 章鸿钊辑：《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1916年。

(6) 据李春昱教授回忆，1983年8月29日。

(7) 章鸿钊：《古矿录》自叙，地质出版社1954年版。

(8) 孙云铸：《纪念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地质学报》第34卷第1期，1954年，第1—10页。

(9) 章鸿钊：《自鉴》自序，1923年版。

(10) 《学艺》杂志第11卷第2期，1930年，第1—9页。

(11) 孙云铸：《纪念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地质学报》第34卷第1期，1954年，第1—10页。

章乃器

周天度

章乃器，原名章埏，后改名乃器。1897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于浙江青田县小塬村一个破落的乡绅家庭。其父章炯，留学日本，民国初年曾任青田县议会副议长，以及富阳、遂昌县的警察局长，后一直赋闲在家。章乃器是家中次子，有兄弟四人，妹一人。1913年随父到杭州，进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从此他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决定了他一生成为经济学家的命运。

1918年，章乃器从商校毕业后，得校长周季伦引荐，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调至上海。他利用一切机会刻苦自学，一连数年，坚持不懈，为他后来在金融界的学术地位打下了基础。由于他工作出色，受到银行总理李铭和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的赏识，由一般科员擢升为营业部主任，从此在银行界崭露头角。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章乃器于是年冬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开始涉足政治。他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要求遵循孙中山的学说，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不久该刊以言论过激，被国民党查禁。

1932年6月，章乃器与银行界的张禹九、祝仰辰、资耀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并出任董事长。该所高效率的调查工作，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业务蒸蒸日上，挤垮了四家外商信用调查机构，成为全国的独占事业。

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同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1933年至1936年，他先后出版了《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

《章乃器论文选》等专著和论文集。他的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并被译成英、日等国文字，成为当时研究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1935年，章乃器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教授，开讲“中国财政”、“国际金融”等课程。

章乃器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他积极主张抗击日本的侵略，并撰文抨击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4年4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共同发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他还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经常以聚餐会形式讨论时局和救亡方针。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与此同时，章乃器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人也在上海发起文化界救国运动，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等八项主张。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12月27日成立，章乃器被推为常务委员。1936年1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与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等团体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他又被推为常委。5月31日至6月1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国内其他省市一些救国团体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成立大会，章乃器再次当选为常务委员，从此他成为上海救国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救国会发表的一些重要文件，大部分都是他起草的。他在《大众生活》上发表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彻底清算了国民党从“九一八”事变后四年间执行的“先安内后攘外”错误政策，文章言辞犀利，充满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在当时的爱国青年中有很大的感染力。

救国会的成立宣言和颁布的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于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

外，并立刻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救国会愿为中介人，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7月15日，章乃器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系统地阐述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的立场和主张，认为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只有集合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实行全面总动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绝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包办的；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文章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希望共产党纠正某些“左”的偏向。

救国会的宣言、政治纲领和四人联名文章发表后，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国内各方面的重大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救国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的意见与要求，并提出很荣幸签字于纲领之后。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全国救亡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继续广泛深入发展，国民党视为心腹大患，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和打击救国运动和章乃器等领导人。11月23日凌晨，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上海逮捕了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随后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镇压救国运动极端不得人心，社会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因不满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和逮捕救国领袖，于12月12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张学良的邀请下，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调停。经周恩来的斡旋，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内战，团结一致抗日，释放爱国领袖等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在与宋子文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中，提

出改组政府，推宋庆龄和章乃器、杜重远、沈钧儒等人入行政院任职，宋子文原则上予以认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国民党并未履行释放爱国领袖的承诺，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向章乃器、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随后于6月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对他们定罪判刑，送反省院反省。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遭到章乃器等人的坚决抵制，全国开展了较前规模更大的营救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已经形成，蒋介石下令释放“七君子”，章乃器等人于7月31日被保释出狱。

抗战开始后，章乃器发表了不少关于抗战的著作和言论。1937年10月，他将自己在狱中所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两部分《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印成小册子出版。他在书中系统地阐述抗日必胜和民众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批判了“惟武器论”，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重印了三次。

1938年春，章乃器应安徽省政府李宗仁的邀请就任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任财政厅长。在任职期内，他工作精明能干，廉洁无私，不畏强豪权贵，铲除贪污，节制浪费，卓有成效，使安徽财政渡过了战时困难的局面，迅速好转。他还尽力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由于他在安徽理财成绩斐然，受到各方人士的好评。

1939年夏，章乃器离开安徽前往重庆。11月下旬，他和沈钧儒、邹韬奋代表救国会与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第三党的章伯钧，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的张澜等人，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各中间党派的联合和稍后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1年4月，救国会的上层因对当时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意见不一致，章乃器认为该条约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坚持主张应该对这一条约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与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产生分歧而离开了救国会。

章乃器在重庆期间，致力于实现他的工业化理想，曾创办上川企业公司，并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务理事、中国工业研究所所长等职，着力发展民族工业。他还在《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阐述他对战时财政及中国工业化的观点。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后期最艰难的阶段，在重庆和桂林等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因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呼声再度高涨。章乃器作为民族工业的代言人，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运动给予了支持，董必武曾秘密派陈钧向章乃器转达中共的提议，请他出面联络工商界人士组成一个政治团体，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共同发起成立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章乃器为民建起草了宣言、政纲、组织原则、章程等文件，强调平民政治和中间道路，并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该年12月16日，民建召开成立大会，19日在第一届理监事联席会议上，章乃器当选为常务理事，成为民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普遍要求和平，实现民主政治。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由于国民党不承认民建的合法地位，因此它没有正式代表参加，章乃器担任民盟代表团的顾问。为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和平和民主，章乃器和民建积极开展各种会外活动，曾两次向政治协商会议呈递意见书，获得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和其他党派人士的赞同。他还是“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的负责人之一，并由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和迫害。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章乃器和郭沫若、李公朴等任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刘野樵等人寻衅闹事，大打出手，李公朴、郭沫若均被打伤，章乃器因得到几名青年的掩护送出会场，才未遭毒手。

章乃器于5月由重庆返回上海。此前一月，民建总会已迁往上海。章乃器和民建其他领导人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在发动反共内战的同时，也加紧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民主人士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危险困难，1947年11月，章乃器被迫流亡到香港，并与孙起孟等人在香港成立了民建港九分会。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也陆续避居香港，并开始抛弃中间路线，走向一边倒。1948年元旦，章乃器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说："'乱世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此文是章乃器抛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标志，也是他数十年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2月26日，章乃器与李济深、茅盾等民主人士在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乘轮船离开香港，于1949年元月7日到达大连。他曾撰文热情记述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2月25日，章乃器进入北平。这时民建的其他领导人也已陆续到京，章乃器和黄炎培等被推举成立五人小组，代行常务理事职权。6月15日，章乃器作为民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在9月下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第一任粮食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粮食部长任内，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协助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矛盾，切实稳定了物价，并使粮食部门扭亏为盈，财务情况有了根本的好转。他在工作中勇于负责，多所建树，

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

由于章乃器对解放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勇于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加上他个性倔犟，为人清高孤傲，在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并被划为“右派”。从此以后，章乃器的各种任职均被撤销，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1975年章乃器的右派帽子被摘除。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1980年6月，他的右派冤案得到平反改正。

主要参考资料

章乃器：《七十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章乃器：《我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经历》，《激流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

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章乃器：《章乃器论文选》，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

许汉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章士钊

白吉庵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1)]，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其父章锦曾在乡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自幼在其兄执教之私塾读书，勤奋向学，进步甚速，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十六岁时母亲去世，为生计所迫，遂到一亲戚家为“童子师”[(2)]。

1901年章在姐姐的资助下，离家到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不久，经业师张劭熙的介绍，到朱启钤家教私塾。次年3月到南京，入陆师学堂学军事。以国文成绩优异，得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沪上各学校学生在张园集会响应，陆师学生也起而响应，但受到学堂当局的压制，章与林力山率退学学生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3)]，章被推担任军事教习。在此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相识，四人意气相投，遂结拜为异姓兄弟。当他从友人王慕陶处得闻孙中山其人，十分敬佩。因章在陆师学堂时学过日语，遂把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出版。这书一出，影响颇大，国人知重孙中山，就从这书开始的，“孙中山”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流传天下[(4)]。

章到沪不一月，即受聘任《苏报》主笔。由于连续登载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及《〈革命军〉序》等反清文章，使《苏报》声名鹊起。清政府勾结上

海租界当局于7月初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并于7日查封了《苏报》，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被追究。

《苏报》被封后，章于8月7日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同时建立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这期间，他编辑出版了《苏报纪事》、《沈荩》[5]等革命小册子。同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春，章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8月，华兴会决定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与杨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不料因事机不密，长沙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等人先后到上海，计划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11月19日发生了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被捕。次日章去监狱探望万福华，被侦探跟踪，结果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到破坏，张继、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因此再起义的计划中辍。后在蔡锷等人的营救下，章等被保释。

章士钊等出狱后即往日本。1905年春他回顾了过去的活动，特别是在上海被捕的经过，认为自己“才短力脆”[6]，连累了同志，感到内疚，“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7]；同时从日本的变法自强中，觉得教育的重要，因而思想起了变化。从此，他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矢口不谈革命。是年，他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为学习欧洲的科学与文化做准备。同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章未参加，虽经张继、吴弱男等先后劝说，也无济于事。

1907年，章编纂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他用稿费作川资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移居阿伯丁，入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国外后，章即携眷返国，次年春抵南京。继而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上海《民立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章既主《民立报》笔政，迭以社论形式发表文章。迨临时政府北迁，小党纷立，互相訾议之际，章于7月5日发表《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国内现有的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各抒政见，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毁党造党说”。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当时同盟会员对此尤为不满，纷纷著文批驳，并反对以非党人士来主持该报，章士钊因此愤然离去。同年9月，章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于上海。后来人们举发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的津贴，事涉章士钊。为此，章无法继留上海，适有袁世凯之邀，遂北上。袁早年与吴弱男之祖父吴长庆有旧，所以对章颇为器重，曾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委章为北京大学校长，事已见报，但他固辞未就。

1913年3月，袁主使刺杀宋教仁，反而嫁祸于黄兴，造谣说“宋案”是黄与宋为争当总理而起。章从此看出袁的险恶，于是只身前往上海，拜晤孙、黄，加入了“反袁”行列。“二次革命”之宣言书，乃章之手笔。同年夏，他奉孙中山之命往说岑春煊联合“讨袁”，会谈颇有成效。继而他又往武昌说黎元洪，无结果而返。7月，孙中山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随黄兴赴南京举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随党人亡命日本。

到东京后，章与陈独秀、谷钟秀等创办《甲寅》月刊，于1914年5月出版。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政府应当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宣称实行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部分党人拒绝参加，另组织欧事研究会，章任该会书记。其时，欧战已起，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妄图鲸吞中国，因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欧事研究会议决通电全国，表示对内对

外态度。这个宣言是黄兴领衔，章士钊起草。他们以担心反袁斗争将逼使袁投入日本怀抱为“理由”，主张暂时停止反袁斗争。到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章随岑春煊参加“讨袁”。次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继，章代表岑北上，与黎元洪洽商善后。

1917年1月，章在北京出版《甲寅》（先出日刊，后改周刊），请李大钊、高一涵参加工作。7月，张勋复辟事起，京城混乱，章移居天津，《甲寅》随之停刊。11月，章受北京大学之聘，任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李大钊由上海到北京，经他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这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把持了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为总裁。章应邀南下，任军政府秘书长。1919年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上海的“南北议和”会议。翌年10月，由于粤军回师“讨桂”成功，岑春煊下野，章也随之而去。

章经历几年政局波动与一段沉思之后，对曾经宣扬的西方代议制渐生怀疑。1921年春得黎元洪资助，出国考察。到伦敦后，访问英国学者威尔斯、萧伯纳、潘悌等人，渐悟农业国与工业国之不同，中国政治不宜强学西方。于是当他到柏林时，曾作《草新湖南案成放歌》[8] 一首，提出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主张。次年1月他父亲去世，奔丧回国。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准备实践他的重农主张。

章出掌农大刚半年，北洋政府发生内讧。1923年6月，直系军人赶走黎元洪，部分国会议员不满直系所为而南下。章也是议员，感情上与黎接近，乃离京赴上海。10月5日，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继而著文抨击“代议制”。综观此时章士钊的议论，他虽然察觉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流弊，但他却是求救于封建旧文化，思想更趋保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

后，段祺瑞被拥上台。段为了网罗知名人士，特邀章北上。章之毁弃国会的主张，恰好投合段意，所以两人在天津会晤时，虽“夙无连谊”，而“一见倾心”[(9)]。共议元首名号时，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两职。段对这个主张非常欣赏，11月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时，章被委为司法总长。从此，章便成了段祺瑞的亲信。

1925年4月14日，段祺瑞派章兼任教育总长。他到任后，宣称要整顿学风，严格考试，甚至要小学生读经，并准备合并北京八所大学。这些钳制性措施，引起了教育界进步人士及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对。5月7日，北京学生及各界群众举行纪念国耻游行。适此时报上揭出教育部禁止游行的命令，群众非常愤慨，遂至章宅进行质问，结果遭到镇压，学生受伤与被捕者多人。9日，各校学生四千余人再次集会，要求释放学生，罢免章士钊。章在群众指责下，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函电催促，又北上复司法总长之职。

这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学校青年尤为活跃。段于7月底又调章出掌教育，要他对“学风”继续“整顿”。此时，章将复刊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因该刊物封面绘有一虎，其时章之行为又如此，故时人称之为“老虎总长”。他在文化上虽然标榜的仍是“新旧调合”，而实际上是为封建旧文化张目。由于他对中西学术思想都有所了解，所以他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言论，较之其他顽固文人，更具诡辩性。他不顾人们的反对，复以窃据的权力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曾一度被章无理革除，后因鲁迅提请公议，才又得复职。8月1日他派出武装警察护送新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来竟演变到下令解散“女师大”，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

在革命高潮到来的1925年下半年，段执政府的反动益为群众所怀恨，章士钊的行径也成为众矢之的。11月28日，为要求查办“金佛郎案”，章的住宅又一次遭到游行群众的包围与冲击。到此，他不得不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但经段祺瑞的慰留和委派，他又出任执政府秘

书长之职。到1926年4月，执政府在几派军阀互斗中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他自己虽已失势，但次年4月，听到李大钊在北京被捕的消息后，曾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

1928年底，由于前执政府之高级官员皆被南京国民政府列入通缉之中，章遂携眷作第三次欧洲之行，遍游英、比、德等国。到1930年春，章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章被通缉一事，也赖张为之说项而撤销。“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离东北赴上海，与杜月笙结识，被杜待为“上宾”，不久执律师业。1934年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之邀北上，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避难到上海。翌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他拒绝。不久章前往香港。1939年2月由港赴重庆。到渝后，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章著的《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逗留重庆。时国民党特务猖獗，章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向毛建言。1946年他到上海，再执律师业。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提出“和平谈判”。章先后两次被任命为代表，北上参加“和谈”。谈判破裂后，5月18日，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政府“备战求和”的骗局，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10)]，并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从此，他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参加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同年6月，他写信给当时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走和平解放的光明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和第三届常务委员；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于1971年出版。

1973年5月，他带病赴港探亲访友，7月1日病逝香港。

---

(1) 章之笔名除上所记之外，还有青桐、孤桐、柯山老人、无卯等。

(2) 章士钊：《示侄》，《国闻周报》第5卷第16期。

(3) 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解散后，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又组军国民教育会。是年，上海爱国学社亦组织军国民教育会。

(4) 章编译是书时，一时疏忽，误将孙之真名（孙文）与化名（中山樵）的姓连缀成文，于是“孙中山”之名便从此流传。事见于章士钊《疏〈黄帝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3页。

(5) 沈荩，清末维新派。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被清政府杖死狱中。此处是人名，也是书名。

(6)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2页。

(7) 章士钊：《答稚晖先生》，《甲寅》1925年第1卷第22期，第6页。

(8) 章士钊：《草新湖南案成放歌》，《甲寅》1925年第1卷第24期，第23页。诗成之经过，章在诗序里说：“草治湖南新案，拟返里试行之。诗兴忽发，且成长歌一章。”其诗云：“湘人勤俭夙宜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

(9) 章士钊：《答稚晖先生》，《甲寅》1925年第1卷第22期，第9页。

(10) 《一封信戳破假和谈大骗局的秘幕》，《南京人报晚刊》1949年7

月8日。

章太炎

陈旭麓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菿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燹，家境已中落。

章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骐《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濬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故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结实的根底。在这段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

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皦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入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1)]。这些话，吓

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訄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訄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会中宣布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2)]。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

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3)]，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4)]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农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5)]。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訄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

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革命派大造舆论的同时，保皇派也在大造舆论。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吸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仍坚持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办报著书，诋毁革命，挖兴中会墙脚。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公开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原先充当革新首领的康有为，发了这么一大通混淆视听的议论，再加上其门徒翻印兜售，流毒极广。章太炎奋起反击，于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的论点，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还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罪恶，直斥被保皇派捧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是章太炎革命论述中最光辉的作品，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6月29日，《苏报》刊载了此文的摘录。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请章润色。邹文浅近直截，疾呼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明确指出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强大、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介绍文章。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

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做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和，互相砥砺。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自此，他深深地怀念着“邹容吾小弟”，多次撰写诗文，以志哀悼。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7月15日，同盟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欢迎大会，与会者二千余人，章即席演说。他介绍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对今后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6)]，号召人们抛弃富贵利禄的念头，不惜流血杀头，进行革命。会后，章太炎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当时，《民报》正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进行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朝，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章太炎挥笔上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时评，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和同盟会其他言论家无情地抨击了保皇派的谬误，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章太炎此时揭示的问题虽然面广而深化了，但他吸取佛教唯识论和西方唯心论哲学，强调自我意志的作用，由早期的机械唯物论走向主观唯心论。文章艰深，用语晦涩，削弱了《民报》的群众性。他在办报之余，还应一些留日学生的请求，举办了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后来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逢星期日讲授《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人都是这个小班的受业生。

1907年4月，章太炎和日本、印度等国的一些友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反对列强侵略，自保邦国。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路过日本，请日本政府关闭《民报》。东京巡警总厅遂以“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为由，于10月19日封禁了《民报》。章太炎十分恼火，亲赴日本裁判厅诉讼，日政府虽然理屈，但坚持不准《民报》续办。章太炎径找唐绍仪算账，唐已他去。章复至留学生总会馆击落唐的画像，践踏之，以泄己恨。

《民报》被禁后，章太炎专事讲学著书，撰写《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学术

成果日富。

章太炎居日期间，对孙中山的活动已有隔阂，复因《民报》经费问题，大相龃龉。1909年，章太炎会同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章为会长，竟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7)]，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是年冬，袁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正合他出京之愿，遂奔赴东北。翌年春，设筹边使署于长春。筹边使这个差事，徒有空名，僚属仅十人，经费又很少，也无事可为。章此行的政绩，就是找人绘制了一幅黑龙江省精细地图。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的老朋友商

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袁世凯为了笼络他，授他一枚二级勋章。章目睹袁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又住了七天，便于6月4日匆匆回沪，旋即上书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章有时狂酗滥饮，借酒浇愁；有时在纸上不断书写“袁贼”二字，聊以解恨；有时把袁送来的锦缎被褥用香烟烧了许多小窟窿，扔出窗外，有时用手杖把室内器具打得粉碎，甚至用绝食来抗议袁的迫害。1914年2月，他手持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大勋章作扇坠，径直来到总统府，大骂袁包藏祸心，把总统府招待室陈列的器物全部砸烂。章被几易囚所，并在囚禁中写了不少讽刺袁世凯的诗文和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文章，又一次修订《訄书》，却将原书中具有战斗意义的文字大半删去，更名为《检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

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8]之慨，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

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

(1) 章太炎：《艾如张、董逃歌序》，《太炎文录初编》卷2，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3) 章太炎：《谢本师》，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4) 李希泌：《章太炎先生的两篇讲演记录》，《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第87页。

(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

(6)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

(7) 章太炎：《民国光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843页。

(8) 章太炎：《生日自述》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820页。

章锡琛

顾大勇

章锡琛，1889年8月24日出生。原名锡檃、锡椿，后改锡琛，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会稽（今绍兴）马山镇人，近代编辑出版家。出身小商人家庭，五岁入私塾读书。十六岁，入县城东文传习所学日文。十七岁，入本县东湖通艺学堂学习。不到半年，章锡琛就不得不结束自己的中学生活，在父母的安排下回家完婚。

对家里的小店生意，章锡琛了无兴趣。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乡下办起了一所小学，取名“育德学堂”。小学堂中只有两位教员，朋友当校长，章自己做副校长。两年后章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在师范一年的学习进步很大，1909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被学堂监督杜海生留为该校附属小学教师。不久，又兼任明道女子师范学堂教员。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二十三岁的章锡琛来到上海，由杜海生介绍进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1920年后，接任《妇女杂志》主编。次年又兼为《时事新报》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是文学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立达学会的最早成员或发起人之一。

主编《妇女杂志》期间，章锡琛果断地调整编辑方针，大胆革新内容，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和夫权思想，介绍各国妇女运动。《妇女杂志》因发表鲁迅等作家的大量新文学作品，倡导新思想，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从近千份激增至一万份。

五四运动后，在反封建礼教的呼声中，关于性道德问题引起重视和讨论。1925年1月的《妇女杂志》是《新性道德专号》，刊登了章

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章锡琛在文章中主张性生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文中引用了福莱尔的“对于性的冲动及性的欲望的自制，实在是第一要务”及“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等主张，触动了道学先生们的神经，遂群起而攻之。3月14日《现代评论》第一卷十四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章锡琛和周建人又各写一篇文章答陈百年，旨在引起公开争论，但是已经不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而是由《现代评论》大加删节后，刊在5月9日第一卷二十二期上的“通讯栏”里。鲁迅看到《现代评论》这样扭曲章、周两位的文章，就把它们全文发表在5月15日《莽原》周刊第四期上，并在《集外集·编完写起》里说：“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惊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

陈百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商务就不再让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在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朋友的支持下，章锡琛于1926年1月创办《新女性》杂志。商务印书馆要求他或者停办《新女性》，或者离开。在商务工作了十四年的章锡琛决意离开，专心主办《新女性》，从组稿、编辑、校对、付印到发行，他全都一力承担，同时还兼任私立神州女校国文教员。

《新女性》杂志社为了克服经费困难，逐渐出版了《妇女问题十讲》、《新性道德讨论集》等一些图书，印刷装潢都很好，销路也不错。于是，大家商量索性办个书店。

从1926年7月开始筹备，章锡琛以商务印书馆的一二千元退俸金为基础，加上兄弟章锡珊的一些资金，8月22日，在宝山路的家中挂出了“开明书店”的招牌。关于书店名称有不同的说法，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史料记载为鲁迅取的名，店招为孙伏园所书。开明书店的发起和策划者除了章氏兄弟，还有胡愈之、夏丏尊、刘叔琴、杜海生、丰子

恺、胡仲持、郑振铎、孙伏园、钱经宇、吴仲盐（章锡琛的妻弟）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章锡琛曾以妇女问题研究会代表身份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积极声援爱国群众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立即写诗在13日的报上发表，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白日青天杀劳工”的激愤之语；次日，又与胡愈之、郑振铎、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冯次行联名写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在15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率先向社会揭露事实真相，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壮举”。

1928年冬，章锡琛组织专为开明书店承印书籍的美成印刷所，任副所长。同年改开明书店为股份有限公司，开明的资本从最初的5，000元左右发展到50，000元，章锡琛先后被推为协理、经理、常务董事，1934年被选为总经理，开明书店逐渐成为声誉鹊起的出版机构。

1934年2月，国民党下令查禁149种书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冯雪峰、钱杏邨、巴金等28位进步作家的书籍，涉及25家出版社。开明书店领衔联合同业，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章锡琛还和夏丏尊联名写信给蔡元培、邵力子，迫使当局放宽禁书尺度。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鲁迅扶病收集整理了他的遗作译文集《海上述林》。当时出版这本书要冒很大的风险，章锡琛毅然接下书稿，秘密排字制版，由内山完造在日本印行。当时开明资金短缺，买铅材的钱由开明书店编辑所同人捐助。鲁迅在《〈海上述林〉上卷序言》中，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从创办开明书店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章锡琛出版事业的黄金时期。开明书店成立后，首先确定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少年为自己

的读者群，出版了大批教科书、文学书籍和青少年读物。

1927年，由章锡琛亲自创办的《开明活叶文选》是开明书店极富特色的出版物，后来书业多有仿效。这份文选一直办到抗日战争爆发，到1937年时，已出了两千多篇，成为大中学校普遍采用的国文教材。

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了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未果。再由孙伏园做中间人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他又请丰子恺作了精美的插图。1928年《开明英文读本》上市后，市场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了几次，林语堂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就高达30万之巨，开明也由此获利颇丰。再加上后来与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的那场官司和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得《开明英文读本》在沪上一枝独秀，销量飙升，连商务、中华这样的书馆都自叹不如。

30年代中期，开明还出版了颇有特色的初中课本《国文百八课》，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为开明书店打开了局面。

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停办《新女性》，废刊词说："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

开明十分重视杂志的编印，其代表性刊物有《新女性》、《一般》、《中学生》、《中学生文艺》、《新少年》（一度改称《开明少年》）、《国文月刊》、《月报》等。

开明的读物往往具备系列性、连续性，是最注重编辑出版丛书的书店之一。它的《开明少年丛书》、《开明青年丛书》、《开明青年

音乐丛书》、《开明文史丛刊》、《开明少年文学丛刊》、《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开明文学新刊》等，都成为拥有广大读者、享有较高声誉的优秀系列读物。《开明青年丛书》，包括朱光潜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阅读与写作》等。《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包括叶圣陶创作的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等。《开明文学新刊》包括了茅盾、老舍、叶圣陶、巴金、夏丏尊等著名作家的小说、散文、戏剧集，如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的《倪焕之》等。文学方面还出版了茅盾的《蚀》、《虹》、《三人行》、《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灭亡》、《新生》，高尔基著、沈端先译的《母亲》等名著（为逃避查禁，译者署名为沈端先，书名改为《母》）。

除教科书、杂志和青少年读物外，开明书店在古籍和工具书方面也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书。《辞通》原名《蠡测编》，后名《读书通》、《新读书通》，最后定为《辞通》。全书共24卷300万字，是作者朱起凤花费三十年心血写成的。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和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出版社的一致肯定。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出版社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出版社数进数出达十余年，不能出版，到1930年，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高额稿费。章锡琛曾对此书编辑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0000部，两个月内售罄，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锡琛毅然决定出版《辞通》，是当时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接着，开明书店又出版了影印《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对史学研究有很大便利，被世人称为"扛鼎之作"；还出版了明末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出版了叶绍钧编

的《十三经索引》和卢芷芬、周振甫编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极为实用的工具书。

开明书店的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30万元，但章锡琛凭借自己的能力吸引了一大批来源不同的文化人，稳扎稳打，使开明成为旧中国六大书局（商务、中华、开明、大东、世界、正中）之一，后来更和商务、中华鼎足而三。

开明书店拥有由夏丏尊、叶圣陶、顾均正、唐锡光、赵景深、丰子恺、钱君匋、王伯祥、徐调孚、傅彬然、宋云彬、金仲华、贾祖璋、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学者、作家担纲的一支知名的编辑队伍。其出版物注重质量，内容、编校、纸张、印刷、装订、装帧设计都十分讲究，在读书界享有盛誉。

开明特别注重培养和使用年轻人，章锡琛亲自给年轻人办讲座，在他们年满出师后都委以重任。章锡琛也希望他的出版事业能在子女们手中传下去。他的儿子在排字房、印刷间、营业部轮流学习了好几年，才调到南京去主持开明分店的工作。这是他理想中的职工教育，他教育出来的新一代要懂得排字、浇版、印刷、装订以及发行等各部门的工作，可以成为出版界的全才。

开明书店门市部敞架售书，所有书籍向读者开放，买不起书的人也可以去读书，进一步体现了开明“破除市侩之营利的方术，专谋著作界及读书界之特殊利益”的办店宗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日寇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第三天，开明书店设在虹口梧州路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及美成印刷厂，被日寇炮弹击中，开明所有图版纸型、藏书资料、几百万册存货，以及正在印刷厂待印的《二十五史》全部锌版，美成印刷厂的所有器材，全部被毁，损失达资产的80％以上，元气大伤。这时，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找到章锡琛，建议合作开办书店，日方提供资金，中方

负责经营。章锡琛当场婉拒，表示中日双方正在开战，此举不妥。

开明随后向武汉转移，所运机器、纸张途中遭劫，只得停业。章锡琛乃回沪留守，解决房屋诉讼等问题，并着手恢复印书业务，将纸型秘密运往内地用土纸印刷取得成功。

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后，日军查封开明等书店，强令充当宣传“大东亚共荣”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遭到一致拒绝。开明的出版工作就此停顿，凡留沪的作家、朋友和同人生活困苦者，章锡琛派人送去生活费，以解燃眉之急，共渡难关。

1943年12月15日，章锡琛、夏丏尊被日军从寓所抓走，震动了文化出版界。经多方营救，十天后获释。两位先生在狱中都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出狱后，章锡琛写诗明志，有“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之句。

抗日战争时期，开明书店设在重庆、桂林、昆明、成都、贵阳、衡阳、吉安、金华等地的办事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显出强劲的活力。开明在重庆参加了国定本教科书联合发行处，承供教科书数量占7%。开明人还以团结互助、长夜待旦的心情编纂辞书，没有虚掷光阴。

抗战胜利后，章锡琛带领开明同人重新复兴开明，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书店的经营区域逐渐缩小，加上钞票一再贬值，经济上的困难甚至超过战时。在白色恐怖下，开明书店艰难中仍然出版了《闻一多全集》和《朱自清文集》等。

开明出版物一直坚持中间偏左的路线，1946年内战爆发后，周恩来安排上海工作时，把开明书店定位为“第三线”，希望它利用自己的“中间”身份尽可能维持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锡琛辞去开明书店常务董事职务。

1949年1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专员、处长，拟定新中国第一个《著作权暂行法》及其《细则》。1950年2月，开明书店向国家出版总署递交了请求公私合营的呈文。6月，章锡琛代表开明董事会在北京召开的“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了“开明书店的新生”的讲话。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全国出版行业中第一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开明的大部人员进入了国家出版总署。

章锡琛悉心创业不图名利，从不以开明创始人自居。开明书店董事会曾决定在北京北小街购置住宅赠予章锡琛，对他为出版界作出的贡献表示崇敬，并使其安度晚年。当时章锡琛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得知消息后，立即要求董事会撤销这一决定，同时迁出该院，另租东单三条的房子居住。

1954年，章锡琛调古籍出版社任副总编，当时国家正在组织整理出版《资治通鉴》，在排版校对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章锡琛主动承担了艰巨繁重的扫尾工作，长达数月不分昼夜默默无闻地付出心力。1956年转入中华书局任副总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9年6月6日含冤逝世。1988年恢复名誉。

章锡琛一生从事编辑、出版事业，创办、经营开明书店二十余年，集结了一批优秀、正直、进步的文化人，视出版工作为教育事业，编辑、出版了大量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进步书刊；并主持出版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现代文学巨匠的名著，以及《辞通》、《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重要文史书籍。一生发表译著七百多篇，译有《文学概论》（日译本），著有《新文学概论》、《妇女问题十讲》、《漫谈商务印书馆》等，撰写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出版”条目，校注有《文史通义选注》、《助字辨略校注》、《马氏文通校注》。

主要参考资料

章士宋：《章锡琛和开明书店》，《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王建辉：《开明创始人章锡琛先生》，《出版广角》1999年第3期。

章宗祥

郑则民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父章菊生，为清朝拔贡。

章宗祥幼年进私塾及当地书院读书，继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赴日本留学，初入第一高等学校，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习。1900年夏天，章回国度假，在上海认识曹汝霖，力劝曹同往日本留学。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压迫、摧残留日学生，引起留日学生强烈不满，他们致函清政府，历数蔡钧罪行，要求撤换蔡钧。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为亲善使节，以唐文治、汪大燮为随员赴日考察。章与曹汝霖、吴振麟等被推为留学生代表，欢迎载振等，并陈述蔡钧的一系列罪行。章和曹对清使“极力逢迎之，大得载振欢心”[(1)]。留日期间，章还与曹汝霖结识了也在日本留学的陆宗舆。三人常在一起谈论日本明治维新，对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等十分崇拜，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曾与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留学生张继等人进行辩论，甚至发生了激烈冲突。

1903年，章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同陈彦安结婚，继至北京赁屋于西城翠化街。是年，清政府增设商部，以载振为尚书，杨士琦为右丞，唐文治为左丞，部务由唐主持。章与唐在日本相识，遂奉调到商部任事。次年曹汝霖也回国，任商务司行走。此间，章多次上时务条陈，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多被采纳。肃亲王为其“专折特保，得赐进士”[(2)]。后章宗祥继任法律馆纂修官，并与曹汝霖、陆宗舆同在进士馆兼职。1905年他与董康合译《日本刑法》。接着，又辅助商部尚书载振编纂商法，并任农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则例局提调及记名右参议、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准备“仿

行宪政”。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准修订官制，并在北京西郊朗润园设置修改官制馆，亲自主持，以宝熙为提调，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汪荣宝等三十多人为编修。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世昌出任第一任总督，章曾受派陪同前往奉天视察和办理事务。1909年，调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次年4月，章参加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向清廷献策：对汪精卫实行软化，以收买人心。随后又赴德参加“万国卫生会议”。回国后改任法律编纂局编修，旋又被任命为清内阁法制院副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对付革命势力，先后任命袁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章宗祥被袁征调参加“襄议枢要”，接着又前往上海，参加了南北议和谈判。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章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和法律局局长。1912年7月，章改任大理院院长。1914年2月任司法总长。4月，袁世凯还命他兼代农商总长。此间，章主持制订了《矿业注册条例施行细则》。同年5月，袁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章宗祥仍任司法总长。1915年秋，袁世凯利用“筹安会”鼓吹帝制，引起人民不满，并牵涉到法律争议。章以司法总长身份宣布，“筹安会”“于刑法立法丝毫不涉，无所谓违法”[(3)]，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力。1916年3月，袁在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下，不得不取消帝制。4月段祺瑞任国务卿，不久组织了“责任内阁”，章宗祥留任司法总长。他与曹汝霖等四人，成为段宠信的“阁员中所谓新派”，“凡有新设施，皆为四人协议而定”[(4)]。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力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此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了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稍稍改变了袁世凯时代大隈重信内阁用强力胁迫中国的侵略办法，而用收买的手段，以借款等方式支持新的傀儡。为了进一步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段祺瑞政府决定加速实现亲日方针，于1916年6月30日任命章宗祥为驻

日全权公使。段认为袁世凯统治时期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不适用于已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当章临行前向他请示对日基本方针时，段面授机宜说："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至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用于今日，现阁方针如是，幸君善为之。"[(5)] 这表明，段要求章宗祥以驻日公使的身份，诚心诚意地与日方亲善往来。章对段的指示心领神会，认为"政府之见解与余相同，心中为之一安"[(6)]。在章出任驻日公使之前，寺内正毅已密派西原龟三到中国调查政情，在北京同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进行了秘密接触。西原龟三于7月回东京，向寺内提交了《目前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建议对华实行实业投资，以确保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基础。章到日本后，多次同西原龟三密谈，共同策划一系列的"亲善"活动。

章一到日本，日本寺内内阁就向章宗祥示意，邀请曹汝霖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访问日本，章迅速将此反馈给国内。12月2日，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派曹汝霖为赴日赠日皇大勋章的专使，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众议院遭到反对，总统黎元洪也反对派曹出使日本。不久，章又介绍西原再次到华活动，支持曹汝霖出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1月又由曹出面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台湾、朝鲜银行团借得500万日元，此为"西原借款"的开端。接着又密议其他借款和建立收支机关问题，为段祺瑞政府取得大量财源。

1917年初，日本政府经过秘密外交，使英、法、俄、意四国承认它从德国手中所夺到的山东权益。此后，又通过章和陆宗舆等人多次催促段祺瑞政府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本来，在1914年至1915年间，日本政府是反对中国参加欧战的。但当它强占青岛地区并得到列强承认后，害怕中国参战落后于美国，或受德国利诱站在德国一边，影响欧战全局，对日本也不利，便从1917年极力鼓动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段祺瑞政府致电章宗祥，要他探听日本政府的意向。章私访小幡酉吉，了解到日本同意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遂电告段政府。接着，日本内阁决定劝中国参战，本野外相委托西原龟三到中国执行

这项使命。4月9日，章电告曹汝霖：“本日与本野长谈，颇得要领，希迅密陈总理……渠及现阁赞成中国加入，受反对党攻甚剧……段总理是否出全力，不顾反对，决意加入，此层与日现阁信用有关，应请确询见复……中国如因加入急需费用，日本与英国可为设法。”曹转告段祺瑞后，并复电章：“总理对日外部推诚相与之意甚为感动！加入志在必行，惟反对甚多，近日召集督军开军事会议，亦为疏通预备加入之地步。”[7] 在章的沟通下，以对德宣战为中心议题，段祺瑞与日本寺内政府相互协调一致。中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8月14日正式对德、奥宣战。

1917年夏，在以日、美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中，章宗祥与曹汝霖等坚决站在段祺瑞一边同黎元洪进行对抗。5月，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则在日本的支持下，幕后指挥皖系军阀，以武力威胁黎元洪，并在天津同徐世昌密谋驱黎下台，解散国会。6月4日，陆宗舆从天津致电章宗祥，说：“各省拟举徐世昌为军政府大元帅，废除约法，组织军政府”，并嘱章将此情况转达日本当局[8]。后日本外相本野约见章宗祥，对“徐之出山”收拾政局表示支持，并说：“必北京政府先事消灭，然后可承认为事实上之政府。俟国宪定议，统一告成，乃可正式承认。”[9] 但段、徐的计划遭到张勋的反对。张带兵入北京，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并复辟帝制。6月11日，章致电陆宗舆，转达日本首相寺内的话说：“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候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和，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非根本解决之道。”[10] 段祺瑞从章的密电中，得知日本全力支持他，并不欢迎中国复辟，遂改变另立政府的打算，假张勋之手解散国会、驱黎下台；然后，又以讨伐张勋复辟为名，驱逐了张勋，重掌了北京政府大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为了进攻苏俄和控制中国，诱迫北京政府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章按照段的旨意，经与日本寺内政府多次密谈后，于1918年3月25日和日本外相本野互致《共

同防敌换文》。同年5月16日，双方在换文的基础上，正式订立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的军队以“共同防敌”为名，大批开入我国内蒙和东北，控制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

1918年秋，徐世昌在安福国会的支持下，出任总统。他和段祺瑞一起，指使章再次向日本借债。9月下旬，章宗祥在一天内同日本签押了三笔借款，即“满蒙四路借款”、“山东二路（济顺、高徐）借款”和“参战借款”，共计6000万日元。其中，“山东二路”的借款与山东问题的中日换文是相关联的。寺内正毅内阁害怕日本1914年出兵山东抢到手的利益，到战后有所丧失，除以2000万日元借款取得控制“山东二路”的权利外，又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中有：“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11)这说明，中国虽然参战了，但日本军队可以继续占领济南和青岛，还要以换文方式使其占领合法化。按此换文规定，日本要继续占领胶济铁路，仅在形式上由日本驻军改为日人指挥下的“中国巡警队”而已。此外，胶济路归所谓“中日合办”，实际上是要由日本控制。这就严重地损害了我山东的主权。但北京政府急于取得借款，通过曹汝霖电告章宗祥，授权他以政府名义于1918年9月24日，在复照上表示“欣然同意”，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

1919年初，巴黎和会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坚决要求归还在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上抢去的有关我国山东的权利。日本竟以中、日两国早有“欣然同意”的换文等为由，坚持不放弃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在与会列强的支持下，日本将夺取到的山东权益明文列入对德和约，这就激起了我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成为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和会”上以章宗祥签署的卖国换文为侵略借口，引起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章的极大义愤。4月中旬，章从日本回国时，就有中国留学生数百人，赶到东京火车站，质问其订约卖国之罪。据《每周评论》报道

说："驻日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路尽断送外国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上掷去。"(12)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三千多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帝国主义驻华使馆阻止后，转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当时徐世昌正在总统府设午宴为章回国洗尘，由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作陪。他们听到天安门学生集会游行的事，匆忙结束宴席。曹汝霖陪章同回曹宅。当愤怒的学生向曹宅冲来时，曹避入一小房中，章躲进锅炉房。一些学生将曹、章所乘的汽车捣毁，有人放火烧房。章从锅炉房中仓皇逃出，被学生发现，打倒在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随即赶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被捕者达三十多人。章被送入同仁医院治疗。在全国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免职。随后，又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后，章于1920年转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理。自1928年以后，章就长期居住在青岛。1942年3月，汉奸王揖唐通过曹汝霖邀章到北平，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了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电力公司董事长。日本投降后，曾遭国民党北平当局逮捕，后经吴鼎昌说项，因无重大罪行，遂获释。章迁居上海。

1962年10月1日，章宗祥在上海病死。

---

(1) 大中华国民：《章宗祥》，上海爱国社1919年版，第1、2页。

(2) 大中华国民：《章宗祥》，第1、2页。

(3) 大中华国民：《章宗祥》，第2、4页。

(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6页。

(5)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4—6页。

(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4—6页。

(7)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37、38页。

(8) 1917年6月4日陆宗舆致章宗祥电，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80，第5607—5609页。

(9)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43—44页。

(10)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46页。

(1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8页。

(12) 《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赵秉钧

李宗一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今临汝县）人，生于1859年2月3日（清咸丰九年正月初一）。1878年，他考秀才不中，投入左宗棠所部楚军，随军进驻新疆。1883年，在伊犁充当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由于“边防出力”，被“保以巡检遇缺即选”[1]。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二年后补新乐县典史，1895年调署东明县典史，1897年调署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并署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0年至1901年，他率领巡防营在京津一带镇压义和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委派他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并奏保他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仍留直隶补用。

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后，认为他“才长心细”[2]，于1902年初派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创办巡警，并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和袁世凯的警务顾问三浦喜传（日本人）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募巡警，迅速地成立了一支有500人的巡警队，分布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治安”，“成绩昭然”[3]。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是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把新军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然后率领巡警1500人进入天津城，担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在伊藤和原田的指导

下，他又创办天津侦探队（后改为探访局）和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他将天津和保定两所巡警学堂合并，更名北洋巡警学堂。此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划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4)]，以推行“猛治”，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03年3月，袁世凯奏保他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8月奉旨照准。

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10月巡警部成立，经袁世凯奏保，赵秉钧担任巡警部右侍郎。由于他的警务才干出众，袁世凯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对他极为信任，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对北京的警政，他“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5)]。次年1月，他奏请从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把北京的警政抓到手，使原来在北京办巡警的肃亲王善耆“地位颇危，仅能自保”[(6)]。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人民遭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重要情报都能及时地送到袁世凯手里。这样，他便一跃而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工头子。

1908年底，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满族少壮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激化。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河南彰德“养病”。善耆乘势夺取北京的警权。3月，赵秉钧被撤职。从此他闲居天津，时常往来彰德，与袁世凯暗通消息，窥测时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彰德参与袁世凯的窃国密谋。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他担任民政部大臣。当时，八旗兵多调入北京城内，扬言要屠杀汉人。人心惶惶，局势混乱。他奉袁世凯之命先入北京，利用自己在巡警界的潜势力，在姜桂题所部毅军的支持下，把新调进的旗兵“一律资遣回城外汛地”，撤出旗籍巡警，减免捐税，强令商店营业，戏院开演，迅速地恢复了秩序。

袁世凯为了逼迫清帝退位，从1912年1月中旬就称病不复入朝，内阁所有奏折及请旨都由赵秉钧和梁士诒、胡惟德三人往来传述。1月19日，他们代表袁世凯列席亲贵王公讨论退位的御前会议，赵秉钧提出内阁解决时局的方案，即清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当场遭到激烈反对。他很不耐烦地说："此案实为内阁苦心孤诣于万难之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见纳，除了袁内阁全体辞职，别无办法了。"说罢扬长而去。以后，他和梁、胡多次逼宫，最后隆裕太后曾哭着要求他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他又陪着大哭，并"誓言保驾"[(7)]。

清帝被迫退位以后，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让位给袁世凯。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唐绍仪组织内阁，赵秉钧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深知袁世凯和同盟会的妥协只是一种策略，当唐绍仪提出在内务部司员中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时，他坚决反对，说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他便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而且从此拒不出席由唐召开的国务会议。问其理由，则说："会议关系本部之事甚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

不久，袁世凯逼走唐绍仪，赵秉钧暗中唆使北京军警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威逼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陆徵祥内阁国务员名单，他仍连任内务总长。8月间，陆徵祥因受参议院弹劾，称病请假，赵秉钧奉命代理。此后，为了骗取同盟会领导人的信任，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请人代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同时对应邀进京的孙中山和黄兴极力表示亲热。9月，袁世凯准陆徵祥辞职，提出赵秉钧由代理改为实任。当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企图通过赵秉钧实现"政党内阁"主张，便在参议院国民党议员中极力疏通，使赵内阁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仍兼任内务总长。与此同时，外交总长梁如浩、农林总长陈振先、司法总长许世英都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本来

已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也表示愿恢复党籍。因此，赵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但对这个“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当时“人多非笑之，谓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8]。

内阁组成不久，赵秉钧就变了腔调。当有人问他加入政党的事时，他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政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有人说亲眼见过他送到统一党和同盟会的党证。他则摇着头说：“此恐怕不是我写的吧！”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然而，不久他就把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召开，一切听命于袁世凯，使内阁变成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工具。

1913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独占优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赵秉钧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权位有被夺走的危险，便和袁世凯一起策划暗杀宋教仁的阴谋活动，但在表面上他却对宋教仁特别友好。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伤势很重，延至22日逝世。不几天，正凶武士英及谋杀犯应夔丞被捕，在应夔丞家中搜出赵秉钧给应的密电报一册及叮嘱应夔丞“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之密函一件，还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行刺的函电多件，而且在洪致应的函电中，有多处提及袁世凯和赵秉钧指挥暗杀事，如：“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又：“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又：“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等。这些证据被公布出来，宋案真相大白，举国人心震动，舆论哗然。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上海法庭传赵秉钧出庭对质。赵秉钧拒不出庭，装出一副无辜受累的样子，抵赖说：洪致应函电从未阅过，完全是洪假托名义，“招摇”或“隐射”。又装腔作势地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

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由于总统一再敦促，才出来帮忙。后来，南方国民党人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要我“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血口喷人”。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发动特务机关制造假案，反诬黄兴组织“血光团”，派遣团员来京暗杀政府要人，授意北京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尽管赵秉钧使用了这些鬼蜮手段，终不能掩盖事实真相，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引嫌自请免官。袁世凯批准他请假十五日。后来，他一再续假，直到7月16日袁世凯才准他辞职，而让段祺瑞代理总理，组织“战时内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次日，赵秉钧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21日又担任了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对京津一带反袁的国民党人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以后，赵秉钧于12月16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1914年初，自上海越狱脱逃的应夔丞来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世凯密令，于1月19日在京津铁路火车上用电刀将应杀死。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9)] 袁世凯装作不知内情，2月19日又让他兼直隶民政长。但是，没过几天，即2月27日，他在天津督署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10)]。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世凯“遣人置毒羹中，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

对于他的死，袁世凯假装非常痛惜，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赴津治丧，特发治丧费一万元，并送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1915年底袁世凯做皇帝，又追封他为一等忠襄公。

(1) 《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2) 袁世凯：《道员赵秉钧请饬交军机处存记片》（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3) 袁世凯：《道员赵秉钧请饬交军机处存记片》（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4) 袁世凯：《道员赵秉钧请饬交军机处存记片》（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5) 《大公报》1907年2月6日。

(6) 《汤睿致康有为书》1903年。

(7)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111页。

(8)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153页。

(9) 《孤愤数袁氏罪恶之种种》，见民心社编《最新袁世凯》，泰东图书局1916年版。

(10) 《陆锦致袁世凯电》1914年2月27日。

赵戴文

陈宝珠

赵戴文，字次陇，1867年11月28日（清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三）出生于山西五台县。父亲赵选三，幼孤贫，赖姑母抚养成人，及少年，作商号学徒，勤俭操持，生计渐裕。赵戴文九岁入学，十二岁时，父亲因商事涉讼，被羁押县署，赵戴文送衣送饭，奔走求援，历时数月，深感诉讼唯有贿赂说情而已，是人世间极不公道之事。

赵戴文十四岁读《松阳讲义》，知有圣贤之学。十九岁应试县书院，所作文章被考官评曰："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赵戴文得此勖勉，更专心向学。此后几年，就读于定襄白佛堂，除学经史外，兼涉兵学。

1890年，赵戴文入太原晋阳书院就读，受程朱理学之影响甚深。1893年应科试，列一等第一，转入令德堂（山西大学堂前身），深得导师器重，被誉为"魏徵之流亚"。

令德堂毕业后，赵戴文返籍组织民团，任团长。嗣后应聘至山西大学堂及宁武中学执教。

1905年冬，赵戴文鉴于清廷腐败至极，国濒于危，乃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师院。他日渐与同盟会员接触，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1906年加入同盟会。赵在弘文师院毕业后，即与留学东京回籍度假的同乡阎锡山一起取道上海返国。赵与阎以游历为名在雁门关、五台山一带活动了几个月，在同学、亲友、商人中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行径，甚至对僧侣也传布革命思想。阎锡山假满之后返日继续求学于陆军士官学校，赵戴文留在太原，先后担任农林学堂、晋阳中学堂庶务、斋务长等职，暗中发展一大批学生加入同盟会。

1910年，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的阎锡山筹谋策动新军起义，赵戴文为之运筹擘划。赵、阎与温寿泉等同盟会员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假名研究学术，暗中鼓吹革命；并组织模范队，假名做训练的表率，以作起义的骨干。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党人纷起响应，山西革命党人加紧策划太原起义。山西巡抚陆钟琦、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察此情势，大为惶骇，饬令第八十五标标统黄国梁率一、二两营速至省城。阎锡山即召赵戴文等密商对策，决定领到子弹后即刻起义。赵戴文详细分析新军的起义力量，认为第八十五标的革命力量薄弱，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八十五标上，为阎采纳。会后，赵戴文与南桂馨等人还赴五台商讨起义步骤。

太原起义于10月29日成功，阎锡山被举为山西都督。清廷震动，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出任山西巡抚，令其带兵入晋镇压革命。吴禄贞先已秘密参加革命，到石家庄后邀阎锡山赴娘子关会晤，商议组织“燕晋联军”，共图颠覆清廷。赵戴文随同阎锡山前往，与谋其事。但吴禄贞被袁世凯收买其部属暗杀，清廷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第三镇曹锟部进攻山西。阎锡山连召两次军事会议，提出弃守太原，赵戴文附和阎意。会后留副都统温寿泉坐镇太原，阎锡山与赵戴文相偕取道静乐、宁武向北撤退。

嗣后，南北停战议和，1912年3月15日，阎锡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都督。赵戴文随阎由忻州返回太原，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厅厅长。此后，阎锡山依附袁世凯，积极执行袁的命令，解散山西全省的国民党部，自己亦声明脱离国民党。赵戴文亦步亦趋，唯阎之马首是瞻。旋奉阎锡山派为代理晋北镇守使；翌年8月，调任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赵协助阎在山西大力推行“新政”，改造基层政权，谋划甚多；同时主持国民师范学校，兼办山西育才馆、洗心社，为阎锡山培养诚服于己之青年。因其学识渊博，循循善诱，人们以“老先生”相称。

1926年末，赵戴文被阎锡山派往南方与国民政府联络，至江西向蒋介石转达阎锡山的归依之意。蒋介石对赵颇为重视。次年4月，蒋反共“清党”，下令改组各省地方党部，委赵戴文与张继等人组成山西省党务改组委员会。

1928年2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戴文任总参议兼政治训练部主任。第三集团军参加讨伐张作霖奉军之战，6月入据京津，阎锡山兼平津卫戍总司令，赵戴文被任命为察哈尔都统。此后，在阎之推荐下，赵到南京任职，历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内政部次长、部长。赵秉承阎的意旨办事，又谨慎处世，以取得蒋介石等人的信任和容纳。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赵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9月，任监察院院长。

其时，阎锡山为抵制蒋介石的“编遣”，与蒋钩心斗角，还先后支持冯玉祥、唐生智等人起兵反蒋。赵戴文多次劝言阎锡山不要以卵击石，至少不要公开亮相；同时进言蒋要同阎修好，免树新敌。1929年12月初，唐生智出兵反蒋，蒋派赵于12月7日回太原劝说阎锡山讨唐。在赵的劝说下，阎锡山变更态度，通电拥蒋，进而接受蒋的任命，指挥讨唐之战。但是蒋介石洞察阎的两面态度，曾密令韩复榘相机拘阎。在1930年初蒋、阎关系日趋紧张之时，赵戴文再返太原，劝阻阎的反蒋活动。但阎与冯玉祥等各方反蒋势力联合反蒋之阵线已经组成，赵无功而返。是年4月1日，阎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举兵讨蒋，中原大战爆发，赵在南京如坐针毡。

中原大战以阎、冯之败北而告终。阎锡山在大连和老家蛰居一段后，又于1932年2月重新主掌山西军政，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赵戴文从南京返回山西，任公署总参议，重又专意辅阎，为其规划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赵竭力修好阎与蒋之关系，建言阎全力进行山西地方之经济建设，不问晋境以外之事，以消除蒋之疑虑。阎锡山于1935年冬在山西全省组织防共反共的“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以赵戴文为副总团长。该团冠以“主张公道”之名，宣传所谓“公道主

义”，以对抗共产主义，活动了一年多光景。

1936年6月，赵戴文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他秉承阎的旨意，将山西地方的“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举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后来阎认为“同志会”成分不纯，组织松懈，赵戴文又另组“自强救国社”，会员填表登记，并向阎像宣誓后才算正式入社，赵戴文代表阎监誓。

抗日战争于1937年全面爆发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赵戴文兼第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他以七十高龄随军转战于吕梁山区，并经常在士兵中演讲，激励士气，坚定抗日必胜信念。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强化国民党组织，赵戴文被国民党中央选派为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但赵年事已高，实际党务工作由书记长黄树芬负责。

1943年12月17日，赵戴文病逝于吉县克难坡。著有《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军事演讲录》、《清凉山人文稿》、《读经偶笔》、《禅静初谭》、《唯识入门》、《宇宙缘起说》等多卷。

主要参考资料

《赵次陇传略》，《国史馆馆刊》第2卷第1期。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蒋顺兴、李良玉主编：《山西王阎锡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赵登禹

陈民

赵登禹，字舜臣、舜诚，1898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 出生于山东曹州（今菏泽县）附近的赵楼村一户世代务农的贫穷农家，排行第三。七岁上私塾念书，但只读了两年便辍学，在家帮大人干活，割草、放羊。不久，父亲赵锡君因劳累过度去世，靠母亲郝氏支撑一家生活。赵登禹常听村里老人讲武侠故事，赞赏侠客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义举。十三岁时，拜菏泽一带著名武术师朱凤军为师，学习武术，他练功十分刻苦，深得师父器重，学了将近三年，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艰苦生活的磨炼，十五六岁的赵登禹已长得膀大腰粗，臂力过人。

1914年初秋，一次偶然的机会，赵登禹听说当时驻扎在陕西潼关的冯玉祥部队纪律严明，深受老百姓欢迎，遂与同乡好友赵学礼、赵金胜结伴，从菏泽步行一千八百多里路到潼关，投奔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被编入该旅第一团第三营佟麟阁连。赵入伍后，严格要求自己，苦练军事技术。由于有了武术功底，他的动作标准、利索，得到长官好评。有一次训练时，冯玉祥发现赵登禹身体魁梧，武术出众，便调他当自己的随从卫兵。

冯玉祥治军严明，亲自给士兵讲政治课，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反对官僚政府，反对外国侵略”[2] 的爱国爱民思想教育官兵，还将自编的《识字课本》、《军人教育》、《军人读本》等普及读物发给官兵学习。冯本人以身作则，带头读书，并规定在自己读书写字时，不接见任何人，无论谁来赵登禹都要挡驾。在冯的影响下，赵登禹在练兵之余，也抓紧时间学习文化。作为冯玉祥的随从卫兵，对冯的为人处世、治军治学，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潜移默化，终身受

益不浅。

1917年秋，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兼任常德镇守使。当时常德驻有日本领事馆，常有日本浪人仗势欺压中国老百姓，无人敢管。有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闹事，在街上殴打小贩。赵登禹气愤不过，把几个浪人狠揍了一顿，令他们当众向小贩道歉。然后又把他们扭送到旅部交冯玉祥处理，几经交涉，迫使日本领事赔礼道歉，保证不再重犯。1920年前后，赵登禹被任命为旅部直属工兵连第三排排长，跟随部队转战河南、河北、北京等地。由于屡立战功而连续被提拔，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班师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把所部扩建为国民军第一军，赵登禹升任团长。

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不久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赵登禹被任命为孙良诚部的团长，随即奉命援陕，解西安之围。赵登禹团和刘汝明师克咸阳，攻坝桥，绕道王曲、子午镇，北攻雁塔张家村，击溃刘镇华部，为解西安之围立下战功。1927年初，南方北伐军已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为了配合北伐军，冯玉祥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赵登禹以战功晋升为旅长。1928年又升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随宋哲元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先后剿平樊钟秀部、李云龙部、耿庄、段茂功部、何毓斌、赤亚武部以及党毓昆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赵登禹为第四路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赵师在河南杞县与蒋介石嫡系冯轶裴的教导第一师和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对峙。有一夜，冯军郑大章的骑兵绕袭柳河车站，烧毁蒋军十多架飞机，蒋介石幸免被俘。后来冯、阎军大败，第四路军退到山西运城一带，被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赵部第二十五师被改为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〇九旅，赵为旅长，驻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及辽县（今左权县）一带，休整练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军奉调至北平附近的通县、蓟

县一带驻防，赵旅随之到蓟县附近。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后，长驱直入热河省。3月4日，赵旅奉命从蓟县出发，向冷口增援。3月5日，日军从热河大举进犯长城各口。驻凌源之东北军万福麟部，于汤玉麟放弃承德后向喜峰口溃退。3月6日，赵旅接命令折回，转向喜峰口。该旅先头部队王长海团冒雪经两天急行军，于9日上午抵达喜峰口，抢占关口两侧高地。当天，日军以大炮轰击，在装甲车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攻。我军沉着应战，数次肉搏，敌死伤甚重，终未得逞。为便利作战指挥，3月10日，宋哲元特委任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前敌总指挥[(3)]。3月11日上午九时，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掩护步兵两个团向我喜峰口两侧高地猛攻，肉搏十多次，互得互失，双方伤亡惨重。东侧高地刘景山团阵地一度被占，赵登禹和第三十七旅旅长王治邦立即组织力量增援刘景山团，夺回阵地。在激烈战斗中，赵的左腿被炮弹炸伤，他强忍剧痛，坚持指挥战斗。12月，喜峰口两侧高地被敌占领。赵登禹奉命于午夜分兵四路，包抄奇袭日军，是夜，塞北寒风怒吼，大雪纷飞，赵登禹扶着拐杖，率王长海团绕至敌后，占领日军炮兵阵地，夺大炮十余门，因山僻路险，不便运回，当即加以破坏，使13日敌人反攻时，炮击甚少。14日，攻击喜峰口正面之敌于上午十时向后撤退[(4)]。由于日军连日进攻长城各口未能得逞，便改变战略，改向滦东进攻。4月11日占领冷口，使喜峰口我军处于腹背受敌之势，第二十九军被迫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赵登禹经过喜峰口战役，声名大振。国民政府颁奖他青天白日勋章。第二十九军获准增编第一三二师，并以战功提任赵登禹为该师师长。

1933年5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并勾结日伪夹击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8月，冯玉祥被迫撤销同盟军总部，宋哲元奉调回张家口继续主持察哈尔省政务。9月，赵登禹师奉命进驻张北县，该师所部二一七团向被敌伪军李守信所占据的独石口、沽源进攻，夺回了失地。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由张家口去多伦，途经张北县时，无理拒绝我城防守卫查看证件，被带到一三二师司令部，仍蛮横拒绝查询。我军

气急，从特务营选出一百名高大士兵，持着上刺刀的步枪，十人一班，五分钟一换，轮流向敌人头上约一寸远外刺去，让日本人知道中国军队不可侮，迫使川口等人赔礼道歉。1935年5月，日本特务人员数人，经张北南门强行进城，被卫兵带到一三二师司令部，经请示省政府，于次日放行。事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以日本人受辱为由，要挟宋哲元，并以武力相威胁，提出无理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武力威胁，派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达成所谓《秦土协定》，保证日本人在察哈尔省自由往来，取消察省国民党机构，设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察省撤走。

1935年8月28日，南京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赵登禹一三二师也随军到了北平，驻扎南苑。1936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突然被日本人抓去。赵登禹、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第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商量，认为日本胆敢擅抓我方高级将领，实在欺人太甚，我们不能示弱，于是派人交涉。赵扬言限日人两小时内放人，否则先将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同时向所部下令，要求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不久，日方将宣介溪送回，诡称此次抓人系属“误会”。事后，二十九军调整防务，赵的一三二师移驻河北的任丘、沧州、河间一带。1936年1月，国民政府授予赵登禹陆军中将衔。5月，兼任河北省第四区剿匪司令。11月，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增兵达十多万人，对平津进行军事包围。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并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于28日中午以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次日，第一三二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发布口头作战命令，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鼓舞士气。28日凌晨，日军集中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个联队，飞机二十多架，向南苑发起攻击。赵登禹和佟麟阁亲临前线指挥作

战。在敌人猛烈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突围时，与日军遭遇，众寡悬殊，弹尽殉国。赵登禹率部向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当赵所乘汽车驶至大红门御河桥时，突遭埋伏在两侧的日军袭击，当即壮烈牺牲[5]。同他一起遇难的有副官长赵国治、副官主任李先池、随从副官赵登高以及司机。

南苑血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参议田春芳协同北平红十字会到大红门将赵登禹等牺牲将士就地掩埋。赵、佟英勇殉国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军民同声哀悼，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发布褒恤令，追赠赵登禹和佟麟阁为上将[6]。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将赵登禹等第二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遗骸由大红门移葬卢沟桥畔。北平市政府将西城南太平桥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以志永久纪念。

---

(1) 赵登禹之女赵学芬访谈录，1996年3月14日。

(2) 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创办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即规定，学生军装左袖有一圆形臂章，上书“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两行字；左胸佩一方形布徽，上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此激励学生。

(3) 孙湘德、宋景宪主编：《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4) 《宋哲元报告喜峰口战况致国民政府电》、《宋哲元续报喜峰口战况致国民政府电》（1933年3月12日）、《宋哲元报告进犯喜峰口之敌被击退致蒋介石电》（1933年3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长城抗战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48页。

(5) 张寿龄：《佟麟阁、赵登禹殉国追记》，《团结报》1984年7月7日。

(6) 《佟麟阁》，秦孝仪主编《革命人物志》第20集，台北“中央文物供

应社”1979年版，第67页。

赵棣华

董丽颖

赵棣华，名同连，字棣华，以字行。江苏镇江大港人。1895年9月1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阴。父亲赵明达是富裕的盐商。早年就读于常州五中、金陵大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后转入西北大学商学系，主攻经济，获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与陈立夫、余井塘、吴大钧等人友善。1926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国立东南大学及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教。同年，经陈立夫、余井塘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赵棣华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新设立统计、调查研究二科，赵棣华任统计科主任，陈立夫任调查科主任。1929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调赵任职秘书处总务科，主管党务财政。在任内，创立全国公务员所得捐。国民党中央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成立，陈果夫任主席，聘赵棣华为秘书，管理海外华侨捐款。当时华侨捐款甚巨，赵棣华对之保管运用尽心尽力，如南京马路之修筑、中山陵、谭延闿墓、北伐阵亡将士公墓、遗族学校、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大会党”、华侨招待所等等，无不是善用华侨捐款而成。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赵棣华任主计官兼统计局副局长，旋升任局长。在任内，悉心从事会计制度的设计和推行，颁发全国会计制度统一规定八大册，修订了预算法、会计法、决算法等主计法令，并推向全国。此举标志着现代化的主计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1933年，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任省政府主席，赵棣华被任命为财政厅长。接任财政厅长之初，江苏省财政相当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赵棣华决定从改革田赋入手。30年代中国各县地方财政

几无制度可言，无统一收支办法，也无完备的账册，全由县长包办，而县长则主要依靠当地的“吏书”，因此“苏省田赋制度积弊至深，仅凭书吏挟其私存图册以为鸿秘”。赵棣华改革有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土地陈报。第一步是将吏书手中的税册收回，由县政府保管，第二步是办理土地登记，第三步是办理土地清丈。执行第一步时，因为与吏书的利益发生正面的冲突，加以地方乡绅的观望，一开始遭遇到很大的阻力，但赵棣华以惊人的毅力终克完成。土地清丈始于1935年，后因抗战爆发而未完成。二是整理田赋附加，把江苏各地一百五十多种名目的附加废除六十多种，禁止二十多个县自行印发辅币小票。三是变更田赋征收办法，由银行代收税款，改纳银为纳元。

赵棣华同时改革了江苏省财政的主计制度。通过制定各县编制地方预算暂行办法、各县动用预备费临时办法、预算科目细则、各县县金库暂行规程、各县地方款项稽核规程、省政府购置审定委员会规程及办事细则、江苏省财政稽核委员会组织章程及稽核细则等一系列的法规，统一收支程序和完善账册，建立预算、收支程序、会计、稽核等一整套地方财政的处理程序。在其任财政厅长期间，规定现金保管、账务记录、收支权限各自独立，而以预算为事先计划与控制之依据，以决算为事后之考核。同时，规定由江苏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保管现金，作为代理省、县金库；由财政厅派往各县的会计主任登记账务。这样，各县有收支预算、收入以条例与预算为据，支出以支付命令为凭。这些都堪称我们地方财政现代化的创举。

经过赵棣华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江苏地方财政逐步好转。1932年省财政实收九百八十五万元，到1933年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七万元。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全省许多县金库财政盈余多者数百万元，少者亦有几十万元。

1934年，赵棣华兼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赵棣华为江苏农民银行制定不以营利为目的、所有业务及行政设施无直接以农民利益为

旨归的经营方针。在此原则下，江苏农民银行迅速展开业务，分支机构由原来不足三十处，在赵棣华接任后的数年间发展至八十多处，在重要的市镇亦开设有办事处。同时，江苏农民银行严守不在省外设行的原则，以服务本省为目的，将苏南各分行多余的头寸，由总行优先调苏北应用。规定各县城区吸收的存款，全部贷放农业，不得作城市工商业贷款。赵棣华对江苏农民银行的业务进行改革，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同时也向合作社、生产互助会、乡镇代表、农民个人和政府机关放款。赵棣华还发起成立了江苏农村金融委员会，成立农村合作社，还筹建农业仓库，实行青苗贷款、推行农贷，并办理抵押、保管、加工、运销等业务，在发展江苏农村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以后，国民党CC系以此为起点，成立了全国农村合作社，建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

1935年，赵棣华由财政厅委任为江苏银行董事长。同年，在国民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江苏省政府改组，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任省主席，赵棣华留任财政厅长。赵棣华向国民党中央荐计献策：在各战区内设直属行政院的经济委员会，配合军事政治需要，统筹发展经济，对敌进行经济作战。国民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首先在第三战区设立经济委员会，任命赵棣华为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和交通银行协理。这时江苏大部分地区沦陷，赵棣华随顾祝同在江西上饶办公，赵棣华在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调整生产，促进贸易，储备物资，加强运输，调节金融，严密缉私”的六大纲要。在当时第三战区大部分地区为日军包围的形势下，赵棣华组织贸易委员会以供应物资；组织合作委员会，以协助运销农产；成立第三战区的五省（苏、皖、浙、赣、闽）通汇处，以流通金融。同时组织水陆联运队处，以辅助铁路与公路运能之不足。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协调战时经济，战区的战略物资得到抢运，工业得以扶持，军粮民食有所保障，而金融亦见安定。在任职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时，赵棣华

与重庆国民党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往返上饶与重庆间达二十多次。在经济建设方面，赵棣华认为，战时经济建设应确立两个基本方针："第一，要以军事为中心，以经济来配合抗战，巩固国防；第二，要在战时树立战后的新经济基础，努力建国，发展民生。"为此赵棣华提出都市工业农村化，把机器工业分散到农村的主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陷于香港，未能赴重庆，这引起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对交通银行的攘夺。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为抵制孔祥熙，邀请属于国民党CC系的赵棣华出任副总经理，并代总经理职。赵棣华上任后，把交通银行的设计处扩充为五科，自任处长，并延揽纺织、冶金、农林、金融经济研究专家多人各司其事。1942年7月，交通银行成为国民政府指定作为"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后，钱新之、赵棣华竭力开拓业务，为发展大后方的工业出力。在赵棣华的主持下，加强银行与实业界的配合，以求发展，赵棣华提出由银行发行公司债与商业债券，代公司募集股票；开办了工厂添购机器设备保值存款；又以交行信托部的名义成立蜀余公司，运销川盐至两湖、滇、黔等地。

抗战胜利后，赵棣华当选为全国银行公会主席，并担任镇江旅沪同乡会会长。1945年，任中央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赵棣华任国民政府委员。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专程来上海会晤赵棣华等人，以谋良策。赵棣华建议开放外汇，取消输入限制，允许直接购买国外生产生活必需品；对全国各种货仓物品进行摸底调查，以最快的速度、最广泛的渠道掌握物资；提出由政府接收的敌伪工矿企业及其国营事业应早日估价，转售给民间，既可以借此收回通货，又可充分调动人民的管理才能和生产积极性；准许人民按法律规定申请经营矿产等资源。赵棣华同时表示，交通银行当鼎力相助政府利国利民的措施。陈立夫后来把赵棣华

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意见汇总后写成报告，交国民政府行政院。但国民政府根本无意采纳，一心推行币制改革。

1948年，赵棣华随交通银行南迁广州，并接替钱新之为董事长，仍兼总经理。这一年，赵棣华撰写《挽救目前经济危机意见书》上呈蒋介石，痛陈当时财政经济之失策，指出“国内经济秩序如不能安定，则外汇之掌握无补于民生，亦无裨于税源。纵观三年以来，七亿美元之耗损，徒以增少数豪富之积聚，以进而加剧都市奢侈之风尚”，反对中国银行抛售黄金政策，认为“徒以助长投机，增贫富之距离”。赵棣华提出“收缩通货，放开物价”为中心内容的多项具体措施。但其时国民政府正准备迁往台湾，这些意见建议也无从采纳。

交通银行随国民政府迁台湾后，赵棣华认为工业起步要以民生事业为前提，故一到台湾即筹备中本纺织公司和台北纺织公司的开工，并以其子赵耀东任总经理。1949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从香港归来的镇江籍银行家徐国懋时，就谈起其对赵棣华的经济管理才能与理财能力的赞赏，并希望赵棣华能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赵棣华德高望重，备受政府重视，一生兼任职务极多，举其大者有：中央合作金库常务理事、四明银行常驻监察人、新华银行董事、大中银行董事长、大生纺织公司常务董事、中法药房董事长、上海市轮渡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中国纸厂董事长、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监察、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常务董事、中国植物油料厂常务董事、馥记营造公司常务董事、太平洋保险公司常务董事、中国棉业公司常务董事、中央日报董事、新闻报董事、江苏实业公司董事长、南通学院主席校董等。此外，他还兼任中华民国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江苏建设协会理事长、上海市参议员、镇属五县旅沪同乡会副理事长、镇江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等。1936年，赵棣华和妻子李崇祜还在镇江办有崇华小学。

1950年，赵棣华随严家淦赴法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旧病复

发。12月病逝于美国。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人物志》第7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

赵家连：《财政金融巨擘赵棣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2003年版。

赵棣华：《一年来之江苏财政》，《江苏月报》第3卷第1期（1935年）。

赵棣华：《江苏地方计政之改革》（1—4），《会计季刊》（1935—1936年）。

赵棣华：《工业农村化》，《东南经济》第2期（1941年）。

赵凤昌

陈时伟

赵凤昌，字竹君，号惜阴，江苏武进人，生于1856年（清咸丰六年）。少时家贫失学，入钱庄习贾，因私自挪用钱库款项被辞退。富户朱某鉴其聪明伶俐，为之捐官县丞，分省广东候补。到广州后，赵凤昌先在广东藩司姚觐元幕下任记室，得以饱览群书，精研幕道。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赵夤缘得充督署文巡捕。由于他勤奋好学，处事练达，很快便获得张之洞的赏识，被委为督署文案，参与机要，起草文电奏稿，“摹仿之洞书法几能乱真”[(1)]。

1889年，张之洞移督两湖，赵凤昌以亲信幕僚随同前往。抵鄂后，升任总文案，掌督署机要。赵凤昌遂借此“与在省寅僚广为结纳，其门如市”[(2)]。1893年，朝中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张之洞大参案”，名翰林周锡恩因被赵凤昌揭破其抄袭文章为张之洞祝寿一事而恼羞成怒，在京运动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附带攻击赵凤昌替人钻营差缺，“声名甚秽”[(3)]。结果，清廷在处理此案时为了既不得罪张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脸面，遂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4)]，赵凤昌成了张之洞的“替罪羊”。

遭此变故，赵凤昌对仕途功名心灰意冷，他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但是他的政治热情并未减退。1894年，赵凤昌回到上海定居，张之洞因对赵所受处分过意不去，仍给他安排一份差使，名义上在武昌电报局挂名支薪，实际上常驻上海为湖广督署办理通讯、运输诸务。赵凤昌遂借此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继续为张之洞提供情报，出谋划策。

赵凤昌回沪定居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他与张謇、屠寄、经元

善、何嗣焜等一批与张之洞有雅素的帝党名流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诗酒酬酢，议论朝政，言战之声甚高。维新运动期间，因经元善的介绍，赵凤昌结识了南下办报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与讨论”[5]。

1900年，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赵凤昌对此十分敏感，他从电报局连续向张之洞发出“不费一钱的一等密电”[6]。这些密电大都系报告外国人对此事件的态度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年6月，英帝国主义为了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派军舰进入汉口、南京、吴淞，一时江海各口岸人心惶惶。这时，赵凤昌向他的武进同乡、正在上海的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提出了一条“保护东南”之策，其内容为：“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7] 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稳定上海秩序，预防义和团运动在南方蔓延，也为防止外人借机出兵上海。6月下旬，盛宣怀召集赵凤昌、何嗣焜、张謇等人，在“盛宝源祥宅中”设立临时办事处，决心置清廷的宣战上谕于不顾，由赵凤昌联络张之洞、张謇游说刘坤一，盛宣怀亲自致电李鸿章，陈述“保护东南”之策。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东南三大帅的赞同。6月26日，东南各省督抚的代表与各国驻沪领事在上海订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这两个约款的基本内容与赵凤昌所提出的“保护东南”方案毫无二致。这就是著名的“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订立后，赵凤昌等人并没有停止其活动，随着北方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他又和张謇一系的帝党策划了一个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位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的计划。具体的方法是用“迎銮”的名义，“将那拉氏与光绪迎到汉口或南京，作为行都，然后再强迫那拉氏交出政权”[8]。8月初，赵凤昌接到神机营文案庆宽从京中寄来的密信，告以：“宫中传见义和团之红灯照，试演其术，且获赏，我已送老母往西山避祸，南中当知大局去矣！”[9] 赵遂加紧游说张之洞。同时，张謇也一再致函刘坤

一，陈述“迎銮”[10]之策。但是，由于张、刘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

《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发展。在江浙地区，以张謇为首的资产阶级财团开始崛起。这一时期，赵凤昌与张謇的配合更加密切，他不仅积极参加张謇的经济活动，而且十分热衷于立宪。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给知识分子以很大震动。是年5、6月间，张謇与赵凤昌、汤寿潜等人聚集于上海，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了一份《拟请立宪奏稿》，请求清廷“仿照日本变法立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11]。这是国内较早呼吁立宪的文章。7月，赵凤昌又托内务府满人庆宽将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十二册“径达内廷”，此事引起了西太后的注意，军机大臣瞿鸿禨“旋命其七弟来沪，托凤昌选购宪法各书”[12]。

日俄战争结束后，两国在美国调停下将于朴茨茅斯签订和约，重新分割中国权益。赵凤昌闻知后，遂在上海串联张元济等爱国人士合电枢臣，要求清政府派专使“预会建言”，以防利权外溢[13]。他还向署湖广总督端方上《为预筹外患请特简专使陈公义而维危局密折》，请代为转达[14]。获端方赏识，不断有书信往还。

1906年，清廷颁发“仿行宪政”上谕，国内立宪运动由秘密转入公开。这一时期，赵凤昌经常出入于上海的张园、《时报》馆等处，为张謇等人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保路运动出谋划策，曾被江苏铁路公司聘请“担任总公司职务，随时赞划一切”。[15]

1909年，赵凤昌正式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16]。次年11月，他通过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邀请来华参加“南洋劝业会”的美国民间商团到上海访问，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商团首领大来

夫妇。席间，张謇、熊希龄等立宪派领袖与美国人商讨了中美合资，“共营银行、开航业、设商品陈列所、置商品调查员”等事[17]。事后，江浙资产阶级中间掀起了一股“社会联美”的浪潮。

1911年5月，清廷悍然成立皇族内阁，“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18]。赵凤昌与张謇、汤寿潜、沈曾植等人联名致函摄政王载沣，要求“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遭拒绝后，赵凤昌“遂断言清廷之无可属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19]。是年6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上奏清廷，请将赵凤昌开复原官，由他“礼聘到东，备咨要政”[20]。奏上即获批准。但是赵凤昌却以“病躯”为由，婉辞了赵尔巽的邀请[21]，继续居留沪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至上海，赵凤昌立即召集立宪派准备应变。10月15日，他邀约江浙立宪派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到他家惜阴堂开会，“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22]。会后，雷奋等人即赴苏州，会合从武汉赶回的张謇，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一份要求清廷解散内阁、宣布立宪的奏折。此后，张謇曾两次来到上海，均下榻惜阴堂，同赵凤昌面商下一步的行动。

11月初，上海光复。赵凤昌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决心积极向革命党人靠拢。11月12日，他和张謇等人发起，邀请已独立各省谘议局代表和部分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会议团”，采用共和政体。目前暂时“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并公认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之所在地”[23]。13日，赵凤昌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给革命党人的公开信，要求与革命党人“约定时刻、地点”进行“面谈”[24]。立宪派当天就收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回信，赞同“邀各省同志代表联合来沪，组织临时议会”[25]。11月15日，“全国会议团”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称在沪成立，赵凤昌在其中扮演了幕后军师的角色。他积极向革命党人建言献策，在革命党和立宪派之间穿针引线，颇获好感，他家惜阴

堂“成为当时讨论国事的会场”[26]。黄兴、宋教仁、陈其美、黄郛、谭延闿、李书城、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都督和将领均与他过从甚密，“惜阴堂宾客云集，论政以外，兼及论军”[27]。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于次日造访惜阴堂，向赵凤昌征询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其后又“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和黄兴多次以各部人选名单向赵凤昌征求意见，赵凤昌答之曰：“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28] 在他的推荐下，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立宪派和旧官僚纷纷被邀进临时政府。1912年初，孙中山甚至亲自致函赵凤昌，邀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但是此举却遭到了赵凤昌的婉却[29]。他抱定不出山、不做官的思想，始终未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

辛亥革命期间，赵凤昌不仅与南方革命党人关系密切，与北方袁世凯之间的联络也十分频繁。先是，早在立宪派筹备临时政府的时候，赵凤昌便提出过一个联络袁世凯共同倒清的方案[30]。稍后，他通过其妻弟洪述祖与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建立了联系，唐绍仪便成为他在北方的代言人。1911年11月，洪述祖根据赵凤昌的授意，炮制了一份将以隆裕太后名义颁发的诏书，交唐绍仪转达袁世凯和亲贵奕劻，劝说他们敦请清廷召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31]。倘不允准，则“以去就争之”[32]。12月初，清廷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派出了以唐绍仪为首的议和代表团。

唐绍仪南下之前，曾电约赵凤昌、张謇等“东南人望”赴汉口会议[33]，但是赵凤昌认为和议在汉口进行不便于自己插手，遂复电唐绍仪“径来沪上开议”[34]。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抵达上海，次日，赵凤昌便约唐绍仪与黄兴在惜阴堂相见，南北议和也于当天开始。

据时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一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重要问题在夜里谈：清帝

退位问题、退位后的优待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要外国承认问题，等等。”[35]“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36]“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曾在赵家聚会。”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37]。种种迹象表明，赵凤昌是议和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不仅能在南北双方穿针引线，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南方的意见。

1912年1月中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南北双方在惜阴堂里订下了清帝退位后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双方又在第一届内阁总理和陆军部长的人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袁世凯方面则坚决反对。为此，赵凤昌提出了一个折中双方的办法，他建议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然后出任内阁总理，此举得到了双方的赞同。孙中山、黄兴当即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38]。

陆军部长也是内阁中的要职，双方均将此看作掌握实力的关键。南方推举黄兴为候选人，北方则必欲段祺瑞担任此职，一时相持不下，和谈陷入僵局。这时，赵凤昌深恐内阁不早日成立将引起列强的干涉，他急忙函电黄兴和汪精卫等人，劝黄兴以就任参谋总长为调和之计[39]。在他的劝说下，本已无心恋战的黄兴很快便放弃了对陆军总长的争取。

南北议和结束后，赵凤昌因调停有方而得到了袁世凯的青睐，袁世凯特意发电邀请他到北京政府中担任“顾问”，但是赵凤昌也拒绝了袁世凯的延揽[40]。他甚至退出了自己曾经参加发起而现在已经公开打上了袁记标签的“统一党”[41]，以示不介入任何政党纠纷。这一时期，他热心致力实业活动，曾被选为汉冶萍公司总董[42]，不久又和张謇、应德闳合资收买了《申报》股权，俨然成为上海工商巨头。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在即。4月，孙中山、黄兴通过章士钊秘密联络岑春煊，准备拥岑倒袁，曾经策划于惜阴堂[43]，但是，赵凤昌联络较多的还是国民党中的“法律解决”派。5月底，他在张謇的授意下，同在沪的国民党“法律解决”派汪精卫、胡瑛、陈陶遗等人共同商订了一份调停南北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国民党“决心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二、袁世凯须申明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三、坚持“宋案”法律解决[44]。6月12日，张謇将这一方案电告袁世凯。

袁世凯接到这一方案后，对国民党人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一方面“同意”调停，一方面又不断向南方调兵遣将，并连续撤免国民党都督。到7月初，形势已经十分恶化，但赵凤昌仍然对袁世凯寄予幻想。7月5日，他还给张謇去信，请张密电袁世凯宽释被捕的革命党人，“借收彼党人心”[45]。不料“赣宁之役”猝然爆发，赵凤昌的调停之梦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二次革命”失败及时局的动乱，使赵凤昌“实业生计大受损害”[46]，但他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双方都充满了抱怨之情。未久，熊希龄、张謇等好友先后走上了与袁世凯在朝合作的道路，而赵凤昌则因“不肯牺牲”而遭到北京政府的猜忌，袁世凯的爪牙对他“污蔑无所不至”[47]，甚至无端造谣，说他“欲在上海向某国借兵，另组政府”[48]，企图加以陷害。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赵凤昌立刻投入反袁活动。此前，他曾接到黄兴从美国的来信，请他和张謇、唐绍仪、汤寿潜、伍廷芳、庄蕴宽等“海内人望”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帝制[49]。为此，赵凤昌进行了积极的行动，他一方面利用《申报》大造反袁舆论，一方面秘密游说直系将领冯国璋，企图劝冯在南京建都，造成第三种势力，北逼袁世凯下台，南与护国军并立[50]。但是由于冯国璋首鼠两端，赵凤昌很快便对他失望了。1916年5月17日，黄兴再次从日本给赵凤昌等人来信，希望他们逼令袁世凯“早行退位”[51]。同

时，黄兴还派人专程回国联络赵凤昌，准备在宁、皖、赣、鄂一带布置反袁武装[52]。袁世凯死后，赵凤昌给黄兴去了一封长信，信中把黄兴称作“同志”、“吾党”，期望他“早日归国，解一时纷纠之局，树百年远大之规”[53]，表示了同革命党人重新合作的愿望。

1917年7月，北京发生“张勋复辟”，赵凤昌再度投入反复辟斗争。他与段祺瑞的幕僚熊希龄联络频繁，积极为“讨逆军”运动军舰前往大沽助战[54]，同时他还充当了段祺瑞和孙中山之间的调停人。草拟了一个“遵约法”、“唯宪法”、“督团逼散，归罪于逆”的调停方案，希望双方“不争是非”，实现南北统一[55]。然而随着段祺瑞窃据北京政权和孙中山南下护法，调停活动很快失败。

1917年之后，中国由表面的统一转入公开的分裂，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战乱不已，外侮内患，日甚一日。赵凤昌也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懒，他在政治上日渐消沉，实业上一蹶不振。1919年第二次南北议和时，双方虽然再度将他推为“调人领袖”[56]，但是终于毫无建树。赵凤昌从此息影沪滨，埋头于辞章考据，参禅拜佛。1938年逝于上海，终年八十二岁。

---

(1)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93页。

(2)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2版，第82页。

(3)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第79页。

(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220页。

(5)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6)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97页。

(7) 惜阴：《惜阴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8)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7页。

(9) 惜阴：《惜阴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10) 张謇：《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1) 国家图书馆藏：《赵凤昌藏札·奏为时局艰难谨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稿》（以下简称《藏札》）。

(12)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三十年六月》，中华书局1930年版。

(13) 《藏札·张元济致赵凤昌函》。

(14) 《藏札·张鹤龄致赵凤昌函》。

(15) 《藏札·王清穆致赵凤昌函》。

(16)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预备立宪公会报》。

(17) 张謇：《张謇日记·宣统二年十月八日》。

(18)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

(19)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纪事》，《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总53号）。

(20) 《时事新报·赵凤昌开复原官》1911年6月5日。

(21) 《藏札·赵凤昌复赵尔巽电》。

(22)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3页。

(23) 《藏札·念三日会议结果》，《藏札·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

(24) 《时报·唐文治上沪军都督府书》1911年11月13日。

(25) 《藏札·陈其美复唐文治等函》。

(26) 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4页。

(27) 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84页。

(28) 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84页。

(29) 《藏札·孙中山致赵凤昌函·赵凤昌复孙中山函》。

(30)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31) 《藏札·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

(32) 《藏扎·洪述祖致赵凤昌函》。

(33) 《藏札·唐绍仪致赵凤昌电》。

(34) 《藏札·赵凤昌复唐绍仪电》。

(35) 余芷江：《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5页。

(36)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2页。

(37) 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3页。

(38)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7页。

(39) 《藏札·赵凤昌致江精卫电》。

(40) 《藏札·袁世凯致赵凤昌、汤寿潜电》。

(41) “统一党”前身为“中华民国联合会”，由章太炎、赵凤昌等人于1911年底发起成立于上海。

(42) 叶景揆：《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顾廷龙编《卷庵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

(43) 李根源：《雪生年录》，腾冲李氏曲石精庐1934年版。

(44) 《藏札·为解决刺宋案献策》。

(45) 《藏札·赵凤昌致张謇函》。

(46) 《藏札·张謇致赵凤昌函》。

(47) 《藏札·佚名致赵凤昌函》。

(48) 《藏札·张謇致赵凤昌函·附张一麐来函》。

(49) 《藏札·黄兴致张謇、赵凤昌等人函》。

(50) 《藏札·赵凤昌致冯国璋函》。

(51) 《藏札·黄兴致唐绍仪、赵凤昌等人函》。

(52) 《藏札·黄兴致赵凤昌函》。

(53) 《藏札·赵凤昌致黄兴函》。

(54) 《藏札·赵凤昌复熊希龄电》。

(55) 《藏札·赵凤昌复熊希龄电·附调停各节》。

(56) 《藏札·张一麐致赵凤昌函》。

赵恒惕

周斌

赵恒惕，字夷午（初字炎午），幼号瑛郎，湖南衡山人。生于1880年1月5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其父亲赵甓庸为清邑庠生，曾创办白山学堂，在岳北颇有名望。赵恒惕六岁启蒙，姿性不甚聪颖，读书常难于记诵。年十岁，丧母。父甚钟爱，使就外傅。两次应童子试，均不得中。旋以国子监生赴乡闱，亦未中试，乃发誓不再入科场。1900年，赵恒惕考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学习日文。次年，由该学堂选送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日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1905年，加入同盟会。

1909年，赵恒惕由日回国，应陆军部甄试考取举人，以陆军少校任用。时广西巡抚张鸣岐招致留日学生五十余人佐理军务，赵亦赴桂，在广西兵备处工作。蔡锷此时亦在桂，任广西讲武堂监督，并主持兵备处与学兵营。张鸣岐离桂后，赵随蔡去职返湘。1911年春，沈秉堃自云南藩司调升广西巡抚，任命赵恒惕为广西干部学堂监督，并接管学兵营。武昌起义爆发后，赵恒惕率学兵营与招编的混成协进入省城，拥护沈秉堃就任广西都督，宣布广西独立。不久，赵率所部随沈秉堃组援鄂北伐军，离桂经湘，开赴湖北孝感作战。黎元洪令赵恒惕任左翼军司令，与右翼军司令李烈钧、中央军司令杜鸿宾一起对抗北军，历时三月有余。南北和议成立后，赵恒惕奉令率部开往南京，临行前向黎元洪借款五万银元，供军队开拔之用。赵恒惕抵达南京下关后，随即将款寄还，黎以战乱之际军官借款归还，事不多见，对赵颇为赏识。

赵恒惕至南京时，正值黄兴整编军队，所部和陈裕时、王芝祥率领的桂军合编为第八师，赵任该师第十六旅旅长，授陆军少将。当

时，袁世凯深以南方兵力雄厚为虑，坚令裁减，而湖南军队庞杂，即正规军亦拥有六师之众，都督谭延闿亟谋缩编部队，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又恐军心离散，变生肘腋。1912年冬，赵恒惕奉黄兴之命自第八师中提精兵一团，以桂军取道湖南返桂名义，返回长沙坐镇，协助谭延闿整编湘军，结果尚称圆满。

1913年，“二次革命”讨袁，湖南响应，谭延闿派赵恒惕、程子楷率师至岳阳布防。赵部进攻湖北蒲圻，在茶庵岭与鄂军交绥，旋以赣、宁兵败，粤、皖取消独立，袁世凯派汤芗铭领兵入湘，赵恒惕与江隽、陈复初被扣押。袁世凯以赵主张湖南独立，电汤将赵就地正法。幸有伍祯祥旅长以应依军法审办，不可随便处决的理由力争，赵得以不死，被押送北京。当赵解经武昌时，黎元洪电询袁世凯对赵等如何处理，袁答复解送北京军警执法处。黎见该处是全国闻名的杀人机关，犯人有去无回，便再电请袁世凯将赵改送陆军部执法处讯办。袁对黎元洪欲加以笼络，因而准其所请。

1915年夏，袁世凯图谋称帝，颁布大赦，赵恒惕因黎元洪和蔡锷的力保，获释出狱，寓居北京。是年冬，赵潜赴天津，寓日租界同乡刘揆一家。刘主办《中华日报》，专反帝制，赵常作文助之。后赵浮海至沪，谭延闿说服汤芗铭之兄汤化龙，致函其弟，对赵优容。1916年2月，赵恒惕持汤化龙函札，与曾继梧、陈复初、刘建藩等人由沪潜回湖南，共谋策动汤芗铭独立。其时驻防长沙部队为李右文所辖巡防营六个营，多数官兵为赵的旧部，右文与赵也是老友，赵因以李部为基础，助汤响应讨袁。1916年5月29日，汤芗铭迫于各方情势，宣布湖南独立，自任都督，并编组湖南第一军，以曾继梧任军长，陈复初、赵恒惕分任第一、二师师长，李右文任赵部旅长。汤芗铭与陈宦、陈树藩等皆为袁世凯的心腹，既相继宣布独立，影响大局匪浅，袁氏遂于6月6日抱恨而死，时有“二陈汤”催命之妙喻。

其时，护国军陆荣廷部入衡阳，另有受滇军委派而归程潜统率的军队亦抵达湘潭。汤芗铭暗令陈策部偷袭程军，赵恒惕派员先告知程

潜，程得以从容准备，在中途发动攻击，陈策大败。汤芗铭闻讯，于7月4日夜遁离长沙。赵恒惕等共推与湘、桂军人均有旧谊的刘人熙出任督军。不久刘去，谭延闿回省接任督军，并将四个师的湘军缩编为两个师，而以赵恒惕为新编第一师师长，陈复初为新编第二师师长。谭延闿履任仅两月余，其母病逝上海，仓促奔丧，命赵恒惕以第一师师长暂代督军，授陆军中将。谭于翌年（1917年）春间，才返湖南。

1917年，段祺瑞欲以武力平定西南护法势力，命令傅良佐督湘，统率大军南下，而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谭自知无力抵抗，且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与北军暗通款曲，乃离湘赴上海。7月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赵恒惕派驻衡阳的第二旅旅长林修海联名通电，宣布独立护法。时赵恒惕因奔父丧，回归衡山原籍，但迫于时势，乃权出督师。赵与刘建藩分领两军夹湘水为陈，在衡山萱洲河一带与北洋王汝贤、范国璋等军对峙达四十余日。终以黄钺司令率敢死队百余人，抄袭敌后，致使敌阵动摇而取得胜利。尔后，湘军乘胜节节反攻，逼傅良佐弃长沙，尽逐北军于湘省之外。是年冬，赵恒惕率部屯驻岳阳。

1918年春，冯国璋委曹锟为四省经略使，遣吴佩孚、张敬尧、张怀芝分三路进攻湖南的岳阳、长沙、醴陵。赵恒惕与刘建藩分别在羊楼司、平江御敌，苦战经月，终以众寡悬殊，自岳阳南撤。谭浩明的援湘桂军坐镇长沙，部署失宜，致张敬尧部抄平江捷径猝至长沙，省城被北军抢掠一空。不久，刘建藩在白关铺失足落水而死，赵恒惕撤兵布防于耒阳、永兴一带，苦撑湘南一隅。是年冬，谭延闿取道广西入湘，因与驻郴州的程潜不和，赵恒惕迎谭驻节永州，迨程赴粤，始进驻郴州。其时，吴佩孚因对冯国璋任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不满，屯兵衡阳观望，不再进兵。继以直皖两系冲突日甚，吴也无意与湘人为敌，因此与湘军对峙近两年之久。赵恒惕与谭延闿乃商定联吴拒皖之计，派钟才宏、张其锽说吴泯南北纷争，并请军政府主席岑春煊速筹吴军开拔费。军政府立赠毫洋60万元助吴，于是吴佩孚与南方约定，直军退出一处，湘军立刻接防一处，避免战斗。吴军从1920年5

月20日开始北撤，湘军兼程推进，痛击张敬尧部于湘潭，于6月12日收复长沙。8月，赵恒惕率军收复岳阳。湖南护法战争至此结束。

湖南光复不久，谭延闿因一身兼任湖南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引起了程潜、赵恒惕两派军人的不满，加之谭推行“湖南自治”，主张将湖南超然于南北政争之外，南北双方均不许加兵于湘境，惹恼了一心想借道北伐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军政府便派周震鳞到湖南策动程、赵派军人，干扰谭延闿的自治进程。程派军人力谋倒谭而迎程返湘主政，驻扎醴陵的第六区守备司令李仲麟竟发动兵变，于平江劫杀谭的亲信零陵镇守使萧昌炽，并通电指责谭任用的官吏都是一些宵小败类，要求改造湘政。赵恒惕则将其死党叶开鑫部由湘阴调来长沙，与谭延闿明争暗斗，并监视程派。11月，谭延闿被迫离湘赴沪，由赵恒惕接任湘军总司令一职，由民政处长林支宇任临时省长。李仲麟等以拥程之计谋未逞，进行日急，欲与第二旅旅长廖家栋里应外合，攻取长沙。谭延闿的亲信部属乃趁李仲麟来省参加12月24日的军事会议之机，矫赵恒惕军令将仲麟处决。事后，赵恒惕重新改编军队，将程潜部全部缴械遣散，谭、程之争遂告结束。

赵恒惕接任湘军总司令后，加快推行“湖南自治”。1921年1月，他授意省政府委任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为湘中、湘南、湘西三路省宪筹备委员，并聘请李剑农、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黄士衡等名流专家13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在一个多月内拟出《湖南省宪法草案》和省议会组织法、省长选举法等六部法律草案。赵恒惕于4月21予以公布。其时，湖北因督军王占元克扣军饷而频发兵变，人民不堪其苦，鄂籍国民党人李书城、孔庚、蒋作宾等联袂赴湘，主张湖北自治，请赵恒惕出师援鄂。赵恒惕欲将湖北卷入联省自治范围，以巩固湖南地盘，便组织“援鄂自治军”，自任总司令，令宋鹤庚为总指挥，以原隶鄂军而投湘的夏斗寅为先锋，于7月28日率部攻鄂。“援鄂自治军”起初虽然得胜，迫使王占元通电辞职，但北京政府旋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统率大军来

援。8月28日，北军攻占岳阳，湘军腹背受敌，迅速从鄂南溃退。9月1日，赵恒惕赴岳阳与吴佩孚签订和约，被迫接受让出岳阳的“城下之盟”。

本来，湖南省内立宪各派因为省议员的名额分配以及究竟采取省长独任制，还是模仿瑞士联邦的政务委员合议制等问题而争论不休，致使省宪草案的审查“三个月也未弄出头绪来”。随着吴佩孚的大军压境，湖南的“立宪自治”形势岌岌可危，立宪各派转争为和，于8月下旬通过省宪草案。复经11月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赵恒惕于1922年元旦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1922年9月10日，在有74县共2593名议员出席的决选中，赵恒惕以1581票的多数获胜，当选为湖南省正式省长。

《湖南省宪法》是当时席卷全国的“省治制宪”运动中唯一颁布的正式宪法，反映了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实行美、法等国联邦政府体制的主张，但赵恒惕不过是借“湖南自治”、“民选省长”的名义，以图割据自保，并未打算真正实行《省宪法》。省宪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权，赵恒惕却先后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镇压因“六一”惨案而起的反日爱国运动和共产党组织的岳北农工会，解散水口工人俱乐部等，激起了湖南各界的愤怒声讨。

1923年初，已经跟随孙中山、任广州大元帅府内政部长的谭延闿派岳森来湘，劝赵恒惕出兵帮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赵因与陈同属“联省自治派”，且暗订《联防条约》，不愿接受该意见，便指使省议会借口湘省自治，对省外战争严守中立。7月，谭延闿授意沅陵镇守使蔡巨猷宣布湘西独立，并向孙中山自请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入湘讨赵。8月初，谭延闿在衡阳通电就职，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以及张辉瓒旅、陈嘉祐旅等谭派势力随之公开反赵。赵恒惕迅即组织护宪军，率叶开鑫、贺耀组、唐生智部与谭相对抗。9月1日，叶开鑫部第二十五团团长朱耀华，受其舅父张辉瓒的策动，突然绕道宁乡袭取长沙，赵恒惕猝不及防，退走醴陵。随后，

赵部署部队由东、北两路会攻长沙，并传闻将有大队北军援赵，谭军恐慌，于9月13日退往株洲。双方军队南自衡山北迄湘阴，夹湘江两岸对峙四十余日。10月中旬，吴佩孚率部向粤汉、株萍路节节进逼，并进驻常德、长沙等地。赵得北军后援，大举进攻谭军。而此时陈炯明军洪兆麟部正围困广州，孙中山急电谭延闿率师回粤驰援。谭乃统领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等部两万余人，于11月底以前全部退入广东。

谭赵之战结束后，赵恒惕将湘军改编为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组，第二师师长刘铦，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其中，唐生智战功最大，被赵任命为湘南善后督办，驻守衡阳。唐利用湘南相对富裕的条件，购械扩军，实力远超出湘军其他各部，渐萌发取赵自代之心。赵恒惕虽在主湘期间未滥加赋税，未借外债，亦未发行过纸币，且拨出资金建立湖南大学、湖南纺织厂，拓宽了省城街道，资助湘雅医院和一批私立学校等，但因害怕湖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其统治地位，比较仇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不仅禁止湖南民众对“五卅”惨案的罢工、罢市、罢课，而且于五卅运动后协助江西军阀镇压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捕杀工运骨干黄静源，并指使株洲驻军叶开鑫部杀害农协领导人汪先宗等。这不得不激起湖南人民的反赵怒火。中共湖南区委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名义一面组织群众的反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一面争取唐生智脱离赵恒惕，拥护广州国民政府。

1926年3月11日，赵恒惕见唐生智军逼近长沙，且城内市民大会公然倡导“倒赵北伐”，便邀集省城军政长官及各法团、报界四十余人会议，提出辞职，并宣布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司长，代行省长职权。13日，赵离开长沙，取道武汉转赴上海。25日，唐生智接任代理省长，随后命何键率军向驻在湘阴、岳阳一带的叶开鑫部进攻，唐叶战争爆发。5月2日，叶开鑫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攻占长沙，省议会及少数上层人士电请赵恒惕回湘复职。吴佩孚则与孙传芳议定委赵为湘粤桂

联军总司令，要他回湘主持讨唐军事。6月20日，赵恒惕抵汉口，以叶、唐之间的调停人自居，促唐下野息兵，并电请广东不要派兵入湘。7月初，赵由汉口赴岳阳。此时，唐生智已加入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派胡宗铎、陈铭枢、叶挺等率军入湘提前北伐，应援唐军。8月22日，北伐军攻克岳阳，将吴、叶军队驱逐出湖南，赵恒惕依靠吴佩孚卷土重来的希望随之破灭。此后，赵恒惕辗转北平、大连、上海等地，闭门学佛诵经，达11年。

1937年4月，因中日关系紧张，赵恒惕由上海遄返南岳。7月，抗战爆发，赵以长函致蒋介石，建议长期抗战。11月，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奉命成立湖南省军事参议会，聘请赵恒惕任议长，仇鳌任副议长。1939年8月，湖南省临时参议会成立，赵恒惕任议长，对发挥地方自卫力量、安定地方秩序、协助政府抗战御敌，做了一些实事。1944年，日军大举南进，湖南危在旦夕，日本人想拉拢赵恒惕在武汉另组伪政府，被赵怒斥拒绝。抗战胜利后，湖南省临时参议会改为正式参议会，赵仍为议长。1946年，赵恒惕于原籍衡山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于次年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国民大会”，拥护蒋介石竞选总统。1948年冬，赵应蒋介石电召赴南京参加全国粮政工作会议，因患尿闭症，就医南京中央医院，后转赴台湾治疗。赵见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便坚请辞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职务，留台不返。赵恒惕旅台二十余年，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并参与“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为委员。平时则焚香诵经，研究佛理，热心倡导佛经的刊印与流通，曾与屈映光等共同主修《中华大藏经全集》等。

1971年11月23日，赵恒惕在台北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凌宵九：《赵恒惕的军政生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8辑，1988年

版，第7页。

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页。

姚大慈：《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45—156页。

［美］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30页。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3-95、142-163页。

周德伟：《赵恒惕世家、世国、世天下》，朱传誉主编《赵恒惕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5页。

丁中江辑：《赵恒惕先生之回忆》，朱传誉主编《赵恒惕传记资料》（一），第16—20页。

童梅岑遗著：《赵炎午飘然离湘的真相》，朱传誉主编《赵恒惕传记资料》（一），第42—43页。

胡养之：《赵恒惕宦海沉浮七十年》，朱传誉主编《赵恒惕传记资料》（一），第70—72页。

《赵恒惕的事功》，朱传誉主编《赵恒惕传记资料》（一），第73—75页。

赵伸

李希泌

赵伸，字直斋，1876年5月26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四）出生。云南嵩明杨林驿（今杨林）人。赵幼聪颖，年二十，补博士弟子员。1903年，云南成立高等学堂，师资大多是云南著名的学者，如陈荣昌等，学生都是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赵伸考入该校肄业。时革命书刊《馗书》和《革命军》等已从日本传入云南。赵与同学李根源、罗佩金和李曰垓等托人购买革命书刊，课余他们常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次年，赵被云南当局选送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学习。赵在日本，和孙中山、黄兴、章炳麟、陈天华等均有来往。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赵入会。

1906年1月，孙中山与黄兴要求云南革命党人赵伸与杨振鸿等筹办云南地方刊物，宣传革命。孙、黄对赵伸等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与兴禄的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的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1)] 同年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李根源与赵伸因系云南留学生同乡会正副会长的缘故，被分别推举为该社正副庶务干事（相当于正副经理）。10月，《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著文揭露清政府的贪污腐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野心，深受留日学生和云南全省人民的热烈欢迎。至1908年，该刊出版第十三期时，发行份数由创刊的3000册增至10，000册。

1906年11月，云南留日学生有二十余人毕业于振武学校，编入日本联队，赵伸特为他们在云南杂志社举行了一次祝贺会。赵在《云

南杂志》第四号上刊布了《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并在这篇资料前写了如下一段话："立于廿世纪竞争最烈的地球上，非纯用铁血主义，决不足以保其生存，此有识者所公认也。本年中十一月，吾滇卒业振武学校入日本联队者二十余人，将来学成归国，组织一完全军队，则吾滇或可不致为安南、缅甸。"赵又搜集世界上沦亡国家的悲惨情状，录为一卷，题名为《腥风血雨录》，连载于《云南杂志》第四、五、六号，借以激发垂亡之中国国民"大为醒悟，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

1908年春节元日，云南杂志社举行《云南杂志》创刊周年纪念庆祝会，到会者万余人，极一时之盛。赵伸在会上演说，将该刊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云南绅商侨学各界的共同心与团结心。与会者都认为该刊的迅速发展与得到中外的好评，是与赵伸的精勤努力分不开的。

1908年4月，革命党人在河口起义。赵伸与李根源、吕志伊倡设云南独立会以资响应。他们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万人。赵主持大会，激昂陈辞，宣告云南独立于天下，不再受清廷的统治。章炳麟亦到会，发表演说，表示支持。清朝驻日使馆闻讯，取消赵的留学生官费，赵毫不在意。赵在这年暑期中与黄兴等开办大森体育讲习会，暗中以军事教授革命党人。就学该会者有林时塽、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方声洞、林隐民等七八十人。

1909年，赵伸担任同盟会暗杀部副部长，他和陶成章向李英奇学制榴弹。赵并练习投掷，力求命中。日本警厅侦悉其事，到云南杂志社搜捕赵伸，未获。赵变姓名逃亡台湾。广西右江镇总兵龙觐光是赵的拜把兄弟。赵遂从台湾转往广西，在龙部下任管带。1911年重九日，云南起义，成立大汉军政府，都督蔡锷与军政部长李根源迭电催促赵伸回滇。赵回到昆明后，先后负责筹建同盟会云南支部以及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等事务，均由李根源任支部长，赵任副职。民国初建，百废待举，凡政府政令兴革，赵无不参与。

1912年，云南省议会成立，赵伸当选为议长。1913年，袁世凯在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下令解散各省议会。云南省议会被解散后，赵伸返回家乡杨林。他看到当地的阳宗海经常泛滥为灾，遂与地方父老筹商根治阳宗海的水患。他详细勘测了阳宗海的地形与蓄水量等，制订方案，发动民力，从事开浚。历时三年，工程告竣，为杨林乡民开垦良田八千余亩。

1915年12月，云南宣布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赵伸出任云南兵工厂会办。赵闻知岑春煊从槟榔屿回国讨袁，已抵达日本，他赶往日本迎接。过香港时，和李根源等磋商护国大计。岑春煊回国后，担任广东军务院的代理抚军长。赵仍返回昆明，全力办理云南兵工厂，他赶制械弹，以供前方急需，并改进榴弹的制作，提高它的杀伤能力。在决定护国战争胜负的纳溪战役中，云南兵工厂制作的榴弹对北洋军起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1922年赵伸被补选为参议院议员。次年6月，直军首领曹锟决心把黎元洪赶下总统宝座，取而代之。他指使党羽借索饷之名，包围黎的总统官邸，并断绝自来水、电灯、电话以威胁。黎被逼迫出走天津，继往上海。赵伸拥护黎，奔走南北，力主黎应返回北京恢复总统职权，斥责直军首领的专横恣睢。10月，曹锟贿选当上了总统，赵伸为当时拒绝贿选的参众两院一百七十二名议员之一[(2)]。嗣后赵返回家乡云南嵩明，仍致力于地方水利事业，使泛滥为患的阳宗海，“昔日横潦浩渺茫，今日四野棕与粳”[(3)]。

1930年7月27日，赵伸因病逝世。

---

(1)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2) 李根源：《雪生年录》“十二年癸亥四十五岁”，腾冲李氏曲石精庐1934年版。

(3) 李根源：《故云南省议会议长嵩明赵君直斋墓碑铭》，《曲石文录》卷3，腾冲李氏曲石精庐1934年版。

赵声

黄德昭

赵声，原名毓声，字伯先，号百先，江苏丹徒大港镇人。生于1881年3月16日（清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其父赵蓉曾是个廪生，在家乡教学。赵声幼年从父读书，又练武艺。稍长，魁梧多力，曾入狱救人，被视为“豪侠少年”。十九岁考中秀才。

1901年初，赵声到南京教家馆。时值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目睹国势危急，他感叹地说：“有文事必有武备。吾当为班定远，岂能于墨汁中求生活？”[(1)] 遂辞馆职，以第一名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入校以后日渐倾向反清革命，为学堂监督所不容。数月后他自动退学，寄居和尚庙读书。庙旁为江南陆师学堂，一次偶代某生作文，得到该校监督俞明震的赏识，特许其入学，至1902年底毕业。在此期间，他进一步受到国内革命思潮的影响，认真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学说，并决心从事革命活动。

1903年2月，赵声东渡日本考察军政，在船中对友人说：“生平最佩服孙文。”[(2)] 到日本见到黄兴等革命志士，大受鼓舞。不久赵由日本回国，先在本乡创办阅书报社、小学堂、体育会，积极宣传革命。后去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任教，内结员生，外联同志，秘草“七字唱本”，号《保国歌》[(3)]，大量印刷，广为散发传播。

是年秋，全国兴起拒俄运动，赵声参加南京学生在北极阁的集会。他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受地方当局所忌，乃去长沙任实业学堂监督。不久他闻袁世凯扩练北洋新军，辞职北上保定，得见袁世凯，想通过投军进行革命活动。袁世凯闻赵有革命思想，乃虚与委蛇，名义上委赵办文书，实则形同软禁。赵知中计，设法逃离保定，往北

京，出榆关观察东北形势。那时皖人吴樾正在北京谋刺清政府大吏，赵、吴结识，互倾肝胆，成了莫逆挚友。赵南归过天津时，曾有诗寄赠吴樾，中有“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4]之句。其后吴樾果因炸清五大臣而殉难，赵得讯悲痛不已。

1905年秋，北洋陆军将在河间举行秋操，赵声乘机潜入某镇为队官，谋相机策动革命，筹划未成，不久失望南归。他先到南京入督练公所任参谋官，后赴广西任巡防营管带。在广西期间，赵不时向士兵灌输反清革命思想，激励本地人士发动革命，因广西清吏防范严密，一直无从下手，便回到南京任暂编南洋陆军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二营管带，半年后被统制徐绍桢擢升为标统。其间他先后保举冷遹、柏文蔚、林之夏、倪映典、熊成基等革命青年入第九镇任官佐。

1906年春，赵声在南京加入同盟会[5]，更加注意扩大革命行动，于营内设阅书报社，加紧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所部士兵因闻太平军故事，恨曾国藩，火毁其后湖神庙。江督端方得知，想借此事兴大狱，加赵以罪，得徐绍桢力保，才以免职了事。

1907年春，赵声至广东，任新军二标三营管带，不久升第二标标统。这时粤省新军中已布满了革命种子；而廉州团绅刘思裕统率万人会（地方团兵）发动抗捐斗争。粤督周馥急派赵声和防军统领郭人漳前行镇压。赵原准备相机举事，因联系失时，致刘思裕已先为郭部管带林虎所杀。但钦、廉两府的群众抗捐斗争，在同盟会员王和顺的联络和策动下继续发展，并请援于同盟会越南总部。7月，张人骏督粤，续派赵声及郭人漳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前往镇压。孙中山前此已派黄兴等与赵、郭联系，赵、郭皆表示要反戈相应。而当王和顺率起义军进克防城并转至钦州城下时，率先入驻钦州的郭人漳动摇，对起义军不予响应，致使赵声原定俟钦州一下，即在合浦举兵响应的计划落空，钦廉之役至此宣告失败。赵声经此两役，内心深为痛苦，率部回廉州后曾赋诗道：“八百健儿齐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6]

1908年冬，粤督张人骏改调赵声任新军第一标统。赵愤郭人漳的背约，宣布与郭绝交。郭既为赵所不齿，便不时向张进谗。同时端方也由江南密电戒张："声才堪大用，顾志弗可测，毋养虎肘腋，致自贻患。"张由此疏赵，削其兵权，改调陆军小学堂监督。赵声处境日益困难，遂于1909年3月弃职回江苏丹徒故里。端方下令缉捕，他乘夜逃往杭州。

1909年秋，孙中山派党人在香港设同盟会南方支部，谋划发动广州新军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赵声受南方支部电召南来主持，预定1910年2月24日（农历元宵节）起事。2月7日，赵借迎其父亲抵港的机会，与倪映典等起义领导人由广州到港，计议起义军事。未料2月9日农历除夕夜，广州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赵等紧急磋商，认为新军可能由此被遣散，决定起义提前至2月15日进行。当赵等赶回广州时，形势更为严峻，倪映典当机立断，于12日率部起义攻城。进攻途中中计受伤被俘，为清军杀害。赵声时在城内，因事变猝起，与各方无法联络，起义失败。赵在清吏缉捕下逃至香港乡间。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泄气。同年冬，孙中山约集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举行会议，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发动起义。计划取得广州后，军分两路北伐，赵声率东路军经江西，向南京推进，黄兴统西路军入湖南，向武汉进军。1911年1月中旬，赵、黄、胡等回港设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决定1911年4月13日发难，并通知各省党人积极来会。到4月8日，推定赵为起义总指挥，黄为副指挥，准备发动十路进攻，赵自率苏、皖党人百人攻清军水师提督李准驻地。不料就在这一天，忽有新从南洋来的温生才谋刺李准，误击署广州将军孚琦事发生，粤督张鸣岐和李准加强了防范，原订起义日期不得不因此推迟。又因广州熟识赵的人多，遂由黄兴于23日率党人先入，赵续至。起义日期几经变动，到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由于情况紧急，黄兴被迫发动，于当日下午5时亲率党人攻入总督衙门，各路队伍和

清兵巷战了一日夜，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赵等28日晨赶到广州，已无法参加战斗，只好撤退。这次起义伤亡很大，后得遗体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由于连遭挫折，特别是两次广州起义失败，赵声忧愤成疾，于1911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了表彰他的功业，追赠他为上将军[7]。

---

(1) 佚名：《赵烈士事略》，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 束世澂：《赵声传记考异》，《建国月刊》第15卷第5期。

(3) 《保国歌》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的宣传品，辞气慷慨，可与《猛回头》、《警世钟》相媲美。全长一百三十四句，内容详见《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4) 赵声：《赵声遗诗》，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91页。

(5) 《吴旸谷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册，第1448页。

(6) 赵声：《赵声遗诗》，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391页。

(7) 柳弃疾：《丹徒赵君传》，柳亚子著，王晶垚、王学庄等编《柳亚子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42页。

赵寿山

徐乃杰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17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陕西鄠县（今户县）。自幼家贫，以务农为生。九岁时因得私塾老师魏鹿候的资助才能读完私塾。少年时，听到列强谋瓜分中国，遂有掮洋枪打洋鬼，富国强兵等救国思想。1909年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入西北大学预科（后改为省立三中），以后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读书。1913年秋在陕西陆军测量局任测量员。1917年秋在陕西靖国军司令部任科员。1919年到冯玉祥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任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1921年升任少校参谋[(1)]。

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失败后，杨虎城坚持靖国军旗帜退至陕北三边地区，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步兵团进行整训。赵寿山钦佩杨虎城的革命爱国精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不满，接受杨虎城邀请，于1924年春参加杨虎城部队。历任教导队排长、队副、军事教官等职，讲授地形学，训练部队。他在陕北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及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

1924年10月，冯玉祥推翻了直系曹锟的北京政府，成立了国民军。杨虎城被委任为国民军第三军所属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同年冬，由陕北出师南下关中耀县、岐山、宝鸡等地与陕督吴新田部作战。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驻耀县，赵寿山任第二中队长、教导营营长等职。在这期间，教导营曾请三民军官学校教官魏野畴、邹均、屈武、董汝城等为该营学生讲话，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

1926年1月，北洋军阀指使河南刘镇华的镇嵩军进攻陕西国民军，围攻西安。赵寿山随杨虎城部在西安守城八个月，进行了艰苦战斗。11月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十军，赵寿山任该军第二师混成团团长。1927年5月，杨虎城部随冯玉祥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赵寿山留在陕西渭北地区任补充团团长。

随着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的激化，杨虎城部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利用这个矛盾，1928年秋，赵寿山率领全部留陕部队脱离冯系控制，离开陕西向山东进发，在单县与杨部在前方的部队会合，改编为暂编二十一师，赵寿山任第七团团长。

1929年4月，杨虎城率部投蒋。部队调至河南，击溃了唐生智所部，占领了南阳、驻马店。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杨虎城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参加了对冯、阎作战。杨虎城率部自豫西转战入陕。赵寿山任南阳后方留守司令，后又随军先后攻占洛阳龙门。在进军陕西潼关时，赵部绕道潼关南太峪镇，继出潼关西十里的吊桥，迫使驻守潼关的冯系宋哲元部仓皇北撤朝邑，从而占领了陕西大门潼关，保证了杨部向西安进军。赵寿山部还在渭北收编了宋哲元余部八千余人，继之又在蒲城地区收编冯系刘郁芬余部八千余人。10月杨虎城受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赵寿山率部驻三原，升任第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

同年12月，赵寿山旅奉命进驻汉中。赵任汉中绥靖区司令达四年之久。在这期间收编了冯系王志远旅为独立旅，击退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田颂尧侵占汉中的部队，消灭了陕南土匪王三春、李纲五、罗也辉等部，统一了汉中地区。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转移至川陕途中路经陕西，11月27日进逼长安，击溃杨虎城部十七师及警卫团。12月10日红军越秦岭，在汉中城固升仙村击溃了赵寿山旅，缴枪六百余支。汉中震惊，闭门固守。与此同时，蒋介石以追击红军为名，派其嫡系胡

宗南的第一师进驻陕西汉中，企图夺取陕西地盘，消灭地方势力。

赵寿山为了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作战。经过孙蔚如、杨虎城同意，他通过军部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杜斌丞等关系，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在这个基础上，赵寿山经常为红军在西安采购和运送电讯及医药卫生等器材，支援了红四方面军不少军用物资。1935年2月，这种合作为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破坏，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合作局面破裂。

3月，红四方面军由汉中地区转移，开始长征。当时在安康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也向陕北转移。赵寿山旅奉命调往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分驻在陕北黄陵、洛川、白水等地。

当时赵寿山一方面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日益猖狂；另一方面看到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他的部队被调到陕北前线与红军直接作战，感到非常苦闷与矛盾。他向杨虎城请假去外地看病，借此观察形势，寻找出路。10月离开陕西，首先到达北平，刚好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看到蒋介石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卖国政策。通过“一二九”运动，他看到了广大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切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他曾经企图说服冯玉祥部下宋哲元、韩复榘共同合作，从泰安迎回冯玉祥，建立北方政府，抗日反蒋，挽救国家危亡。但由于冯系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实现。不久，他由北平至南京，随即转到上海。在上海半年多时间内，他与抗日救国会的进步人士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李馥清、韩述之等人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影响，又读了一些进步书报杂志，分析了形势，自称“知识一天一天的增加，思想也就因之明朗化”[(2)]。从此，他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基本上形成了抗日、反蒋、联共等主张。思想上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1936年10月，赵寿山回到陕西，向杨虎城作了多次汇报，并上了“抗日建议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合共产党与红军，联合东北军，加强十七路军内部团结。赵寿山激动地向杨建议：“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旋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3] 这些建议对杨虎城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赵寿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当时他任省会公安局局长，负责治安。他号召全体警士“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保护爱国青年，拥护救国团体。我们要作革命的警士，爱国家救民族的警士，不要做那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汉奸的工具”[4]。为了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杨虎城又任命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城，将十七路军主力集结到泾阳、三原一带。这时，红军为了配合作战，主力也开到关中一带，驻三原云阳镇和富平庄里镇一带。在这期间，赵寿山多次和博古、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罗瑞卿等面谈，他的司令部也成为红军南下的联络站，十七路军因此广泛地受到了抗日教育。他公开向共产党表示“准备上山入伙”[5]（意思是参加红军，参加共产党）。他接受了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工作的建议。1937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委派申敬之为特派员到十七师工作，派蒙定军、胡振家负责领导三十八军地下党工作。随后杨明轩、孔叔东、杨晓初、崔仲远等相继来十七师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寿山被任命为该军第十七师师长。

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回国即被蒋介石逮捕，赵寿山对此极为不

满。当时军统局西北区情报站转报蒋介石，说“杨虎城旧部的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员。西安事变时期，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说“赵寿山为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6)]。

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命令三十八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7月21日，赵部十七师从三原开拔，8月2日到达河北保定，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10月，赵部十七师一万三千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夺取井陉车站，退守砭驴岭战斗中，日军两面夹击，飞机轰炸、炮火猛烈，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赵寿山临危不惧，亲自带领官兵与日军血战十三昼夜，始终坚守了娘子关正面阵地。但由于指挥不统一，参战各军有的企图保存实力，在激战中右翼溃退，十七师后方受到敌军威胁，不得不撤出战斗。部队经苦战后仅存二千七百余人。这次战斗对十七师来说是一曲悲壮的凯歌，曾给日军以重创。

同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境内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东南溃退。十七师这时已疲惫不堪。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建议赵部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赵寿山接受了建议，率部经太原以南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在八路军河防部队萧劲光旅帮助下进行了整训。赵寿山先后至绥德、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共同合作抗日。年底至1938年，十七师先后在洪洞、赵城及晋东南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等地开展游击战，直接受八路军总部和东路军指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十七路军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寿山被任命为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背靠黄河，面向日军，开展了长期的斗争。同年冬，赵寿山接受共产党的主

张，在茅津渡举办了训练班，自任班主任，改造旧军官，培养新干部。训练班提出四大口号：经济公开、人事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三大禁令：禁烟（禁吸大烟）、禁赌、禁嫖[7]。训练班进行了国际时事和国共合作抗战的政治教育，明确指出蒋介石如果抗战就拥护他，不抗战就反对他，教育官兵要团结奋斗，抗战到底。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师、旅、团均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持了两年四个月的战斗，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扫荡，保住了原有阵地。日军由于大量被杀伤，曾先后补充新兵十九次，称中条山是他们军事侵华的盲肠炎[8]。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也称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9]。

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的这种变化和赵寿山的“赤化”极为恼怒，于1941年1月下令南调至黄河以南，在河南巩县、汜水、荥阳一带集结。不久中条山即为日军占领。赵部三十八军作为河防大军一部，驻守黄河铁桥南端邙山头桥头堡阵地二年多。

这时国民党已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赵寿山感到国共合作前途渺茫，决心投向共产党，并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入党。1943年冬，蒋介石调赵寿山到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使他与部队脱离。1944年3月，又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调赵寿山至甘肃武威蒋军嫡系部队任第三集团军空头总司令，而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三十八军军长，实行其“抽梁换柱”、“分编遣散”阴谋。赵寿山临走前向旧部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做了布置。三十八军一部二千三百余人遂于1945年7月17日在河南洛宁之故县镇起义，投奔解放区。以后以这一部分队伍为基础，成立了西北抗日民主联军三十八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寿山决定脱离国民党奔赴解放区。他借口去美国考察水利，于1946年11月卸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到达南京、上海，然后在共产党的秘密护送下，由上海经北平、天津，于

1947年3月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7月6日发表反蒋通电，公开宣告起义。10月，任西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并参加了前敌总指挥部工作，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为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赵寿山转到政府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过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1959年和1964年先后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和1964年先后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赵寿山于1965年6月20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

(1) 赵寿山：《自传简历》，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办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422页。

(2) 赵寿山：《与蒋介石廿年武装斗争史》，《赵寿山将军》，第320—411页。

(3) 赵寿山：《与蒋介石廿年武装斗争史》，《赵寿山将军》，第320—411页。

(4) 《公安局长赵寿山告诫部属阐述一二·一二意义》，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8日。

(5) 赵寿山：《与蒋介石廿年武装斗争史》，《赵寿山将军》，第320—411页。

(6) 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7) 范明：访问记录。

(8) 孙蔚如：《回忆录》，未刊稿。

(9) 赵寿山：《与蒋介石廿年武装斗争史》，《赵寿山将军》，第320—411页。

赵倜

邢汉三

赵倜，原名金生，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于河南汝南县。其父赵子宣，不务正业，好赌博。家中仅有坟地一亩余，靠其母佃种地主土地度日，生活困难异常。赵倜八岁时，经人介绍到上蔡县城一家药铺当学徒，东家请有塾师，见赵聪明，令他给儿子伴读，改名倜，字周人。赵在私塾读书四年，能写通顺文章，被派到药铺帮助记账。赵认为日与算盘为伍，没有前程，坚决求去，于1883年重返汝南。

赵倜返回汝南后，找不到出路，迫于生活，受佣于同村武状元赵云鹏家。赵云鹏在外居官多年，有钱有势，赵倜小心服侍，奉命唯谨。赵云鹏见他年富力强，办事可靠，又有文化，1887年派他代管收租事务。赵倜不辞劳苦，办事井井有条，更得主人信任。1890年赵倜向主人表露“投笔从戎”的意愿，主人为其转荐于清政府将军马玉昆。时马部驻防济南，派赵在所部做文书工作。赵为人随和，又会书写，马部军官都乐于与他交往。赵于暇时学骑马打枪，勤学苦练，学得一身好本领，受到马玉昆赞赏，1894年被提拔为骑兵管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马玉昆率毅军赴朝作战，赵随往，曾在平壤南门外与日军血战。1898年毅军改武卫左军，赵倜随马玉昆入该军，驻山海关内外。

1900年4月，八国联军攻天津，赵倜随马玉昆统率的武卫左军参加守卫大沽口和京津线的战役，作战失利，赵仅率残部数骑逃入北京。8月14日侵略联军打到北京城，光绪及慈禧逃离北京。赵倜随马玉昆护驾，因奉上谕赴保定冒险提取军饷有功，深得慈禧的赞赏。帝、后到达西安后，对护驾官员论功行赏，赵被越级提升为统领。

1902年马玉昆任武卫左军总统官，赵倜随侍左右，十分殷勤。1908年马玉昆死后，姜桂题继任武卫左军总统官。赵协助姜治理军务，颇著劳绩，升任武卫左军全军翼长。辛亥革命时，赵倜奉袁世凯命率部进驻陕、晋、豫边区潼关一带，镇压阎锡山、张凤翙的反清起义，当地驻军数万皆归赵指挥，为他以后攫取河南军政大权打下基础。1912年秋，白朗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豫西崛起。1914年1月，赵倜受任“豫南剿匪督办”，督率在豫各军围剿白朗起义军。因未能在限期内“肃清狼（朗）匪”，曾受革职留任处分。赵所部主力，多为骑兵，乃改围剿为追剿，4月尾追白朗起义军至陕西、甘肃西部，再折回河南。由于这趟辛苦，袁世凯撤销了赵的处分。8月，赵倜所部在宝丰与白朗军作战。白朗不幸中弹牺牲，所部随而溃散，赵倜以剿灭白朗有功，被袁世凯特任为宏威将军。9月又改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1916年7月任河南督军。

赵倜督豫八年，是其一生最显赫的时期。他统治河南，除依靠其军队作为资本外，主要赖其纵横捭阖的本领。赵对袁世凯力表忠顺，取得袁的信赖。袁妄图称帝时，段芝贵于1915年9月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速正大位”，赵列名其中，表示拥戴。12月受袁封为一等侯。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接掌北京政府大权。赵倜乘河南省长田文烈1917年12月调为农商总长之机，谋得兼任河南省长职，从此全省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提出“豫人治豫”口号。他一面笼络省议会议员，广植党羽；一面放手编练“巡缉营”三万余人，以厚实力。他在开封成立了修械所，兼制子弹。“巡缉营”危害地方，河南人民饱受其苦。

1919年初，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斗争日益尖锐，段祺瑞想以亲信曲同丰督豫控制河南。赵倜闻讯后，立即派人赴湘与吴佩孚联系，愿互为声援，得吴赞同，段乃将易督之举搁置。同年冬，段决意去赵，总统徐世昌不敢过于违背直系，只同意将赵兼省长职免去，赵得以仍任督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赵倜与直系联合，结为反段同盟，直系主力部队顺利通过河南。奉系从东线助直攻皖，不过四天，皖军一败涂地，吴佩孚坐镇洛阳。但赵倜不愿将河南地盘拱手让直，吴、赵之间斗争激烈。吴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法，于1921年春唆使驻在信阳的冯玉祥以索饷为名，公开反赵，又指使原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通电讨赵，商定南北两路夹攻，夺郑州、取开封，驱赵下台。赵见情势危急，分电姜桂题、张作霖等求援。吴恐事态扩大对己不利，把责任推到成慎身上，率兵击杀成慎。经过这次事件，吴、赵间的矛盾表面上虽似缓和，实际更加深了。赵早已与张作霖派来的人秘密联系，至此决心联奉反直。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赵倜与奉密约，应允战争打响后即出兵郑州，断吴后路，南北合击打败直军。吴佩孚早料及此，做了相应布置，策划败奉驱赵，一战成功。吴率部北上时，留冯玉祥坐镇洛阳，对付赵倜。双方在河南调兵遣将，枕戈待发。5月5日，主战场奉军已被击败。赵倜误得情报为奉军大捷，认为时机已至，当天发出宣言，名为武装中立，实则以武力驱逐在豫直军。双方激战于郑州附近。最初势均力敌，互有进退；嗣因奉军败报传出，赵倜所部军心涣散，渐形不支。赵的三弟赵杰任前敌总指挥，见大势已去，下令全线后撤。赵倜为保全性命，带亲信数人，化装逃往上海。5月10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赵倜河南督军职务，听候查办”。至此，赵倜结束了他在河南的统治。

赵倜在河南任职八年，罪恶累累，搜刮所得，大部归入私囊。除在北京、天津广置宅第外，在汝南老家购置农田数十顷，重租盘剥农民。此外，存入天津英商银行数十万元。

赵倜由河南逃到上海时，张作霖亦败退关外。不久，赵潜至沈阳见张，受张聘为高等顾问，徐图进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河南入国民军之手，赵倜返豫之谋未能实现。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助吴佩孚为名，派兵入河南，进驻郑州、开

封等地，赵倜随奉军回到开封。他原想东山再起，不意事与愿违，到开封不久，北伐军已逼近。奉军土崩瓦解，赵倜随之狼狈而逃。到北京后，受张作霖委为督战专使。1928年6月赵随奉军退出关外。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赵随张学良进北平，过其寓公生活。1930年中原大战时，赵倜认为有机可乘，欲动员张学良率兵参战，自己借以死灰复燃。迨张表态拥蒋时，奉军对河南无从染指，赵回豫企图又成空想。

赵倜1933年患癌症死于北平。

主要参考资料

赵桫龙、周伯明口述，刘亚荃整理：《赵倜的生平事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3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张熙清：《关于赵倜生平的补充材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7辑，1982年版。

赵燏黄

钱听涛

赵燏黄，谱名汝询，曾名一黄，字午乔，号药农。1883年2月27日（清光绪九年正月二十日）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商人家庭。其父赵埔，字映沅，钱庄经理，擅书法。

赵燏黄幼习经史，曾应科举试，后在常州延陵书院山长刘申孙家教家馆。喜吟咏，常与邑人吴伯乔相唱和，不愿继承父业从商。光绪末叶，浙江镇海学人钟观光留日归来，在上海创办科学仪器馆并附设理科传习所讲授理化，赵燏黄于1904年秋入该所学习。1905年春，赵由同里蒋维乔介绍至吴江同里镇金松岑主持的同川学校教授理化。柳亚子时为该校学生，鼓吹革命，赵受到影响。因在理化传习所时学习过日本药化学家下山顺一郎之化学著作，赵遂东渡日本，自费留学。经预科正则英语学校学习，于1906年秋入上野东京药学专科学校，1908年夏毕业。萍浏醴起义，赵在预科学习的先后同学刘道一牺牲，赵受到震动，写诗哭刘。同年秋赵考入东京帝大学药学科，补江宁官费生，师从下山顺一郎学习生药学、本草学；后又从日本另一药学家长井长义学习药物化学。1908年秋与留日同学王焕文、伍晟等在东京成立中华药学会，公推王为会长、伍为总干事、赵为书记（秘书）。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前后，赵由伍晟、孙润畲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成功，赵参加留日医药学生组织的红十字会卫生救护队回国。先在浙江汤寿潜都督府所属卫生部任药局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部卫生局科长；政府北迁后任北京政府内务部佥事、卫生司科长、代理司长。1914年政府改组，赵卸职离京，赋闲居沪，不久至汉口在同学所设之药房任药师[(1)]。

1915年8月，经留日学友华裳吉介绍，赵燏黄到浙江公立医药专

门学校任药科教授，讲授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卫生化学。赵痛感洋药充斥市场，外国人采购国产药物为原料，提炼后返销中国，利益外流，疾呼发展祖国药学。他竭力主张药学独立，不能从属于医。浙江医专药科为国内首创，赵以培养药学人才为职志，曾一周授课达十六小时，培养出黄鸣驹等一批日后享有盛名的药学专家。课余常率学生入西湖山地采药，在校内自辟药圃，种植药用植物，又向俚医学习草药知识。赵一生从事生药学、本草学研究，是在浙江医专十余年教学中奠定的基础。

1928年，蒋梦麟执掌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度勒令浙江医专停止招生，赵忿而离校。适蔡元培为院长、杨杏佛为总干事之中研院筹建，在上海设立化学研究所，内设国药研究室；加之杨杏佛夫人赵志道为赵燏黄族叔赵凤昌之女，夙有往来，赵遂应中研院之聘为专任研究员。他曾提出一个以十年为期研究国产药材、编撰《实验新本草》的庞大计划，惜未能完成；但他勤奋撰述不辍，在1931年至1932年出版了《中国新本草图志》两集，蔡元培为之作序，称道此书“将一扫旧式本草之瑕点，而显其精萃”。赵此时在上海中法大学药科任兼职教授，将在浙江医专时所用教材与徐伯鋆合作，编著《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出版，蔡元培又为之作序，认为“一新二千年来吾国本草之壁垒”；后由其学生叶三多完成下册，长期成为我国药学院校生药学的主要教材。

1933年底，赵燏黄应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及该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之聘，担任生药学专任研究员，乃举家北迁。他在研究工作中认识到药材鉴定与药效有密切关系，而鉴定药材必须弄清中药原植物，弄清中药原植物则必须至中药原产地或药材市场实地考察，乃亲自到河北祁州（安国）、河南禹州（禹县）等地考察北方药材。1935年12月，他与著名的植物分类学专家、他青年时代的老师钟观光以及钟补求、林熔、刘慎谔、吴征镒等植物学家亲赴祁州，采购药材三百余种，用一辆汽车运回北平研究，写出《祁州药志（附北平）

第一集：菊科及川续断科之生药研究》，以及两集《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他又十分重视将生药学与本草学结合研究，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古代本草版本。在1923年撰著《〈本草纲目〉今释》的基础上，又发表《历代本草沿革史论》。1935年他在平郊妙峰山采到五加皮，经鉴定，发现并非历代本草上的五加皮，而是叫“杠柳”的根皮，含有毒性，制出的“五加皮酒”应严加控制。他认为明代集大成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行世已三百余载，亟待重修，为此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研究院工作停顿，赵燏黄只身南下省亲。1938年母亲病逝后，即留在其弟赵汝调开设的上海新亚药厂任国药研究顾问。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药科的赵汝调，原是受赵燏黄影响而赴日留学的，专攻化学制药。由于赵燏黄早年在日本学习过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之工艺，而华北盛产麻黄，新亚药厂决定在北平设立华北分厂，任赵燏黄为厂长，从事麻黄素生产。赵克服种种困难与一批制药人员试制成功，1940年至1945年共提取三百多公斤麻黄素，除满足国内需要还远销国外。

赵燏黄在主持麻黄素生产之同时，仍坚持生药学、本草学研究工作。1941年3月，留在北平的北大医学院设立中药研究所，赵应院长鲍鉴清之聘为医学院额外教授及中药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当时医学院及研究所设备甚差，赵将自藏的参考书、生物标本和显微镜带去使用，先后发表《蒙古本草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多篇论文。但因北平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铁蹄下，赵常怀故国之思，以吟诗遣愁，有“新亭对泣自年年，禾黍荒凉夕照边；燕子不来春又去，野花犹放蒋山前”之句。平时与同里族兄、赵瓯北后人赵沆年时相过从，鉴赏书画。赵沆年之女赵元珠等为姚依林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后赴抗日根据地，日伪乃将赵沆年逮捕，赵燏黄多方设法营救，始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燏黄一度担任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主任。不久因国民党当局派员接收，赵燏黄等一批留学德、日的医药教授被排挤

离校，中药研究所亦随之取消[2]。当时赵早年学生孙荫坤任北平陆军医院院长，将部分离开北大的教授聘至该院，赵任挂名的药局主任。但赵不愿离开研究生药学、本草学工作，乃自办“赵氏生药化学研究所”，与少数学生一起在家继续研究撰著，同时在北平市立药学讲习所及迁平的沈阳医学院讲授生药学。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医院由华北人民政府接收。在卫生部长殷希彭支持下，赵燏黄于是年8月重返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任生药学教授，并恢复中药研究工作。赵绝处逢生，欢欣鼓舞，以六十六岁高龄精神焕发地投入工作。1950年冬左眼因青光眼失明后仍坚持教学，1953年复开设本草药课程。1958年卫生部委托北京中医学院办中药研究班，赵为师生解答疑难，协助编写《中药简史》。与此同时，赵之中药研究工作也已开展，先后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药研究所顾问、研究员。赵仍不遗余力收集历代本草，特别是发现了明钞宋本孤籍《履巉岩本草》为稀世之珍，经赵建议由北京图书馆收藏。赵一生以个人财力收集到历代本草八十部近千册，为国内第一，声名远播海外。赵身后连同其他藏书五千六百余册均捐献给国家。

赵燏黄曾在中国药学会多次当选为理事、监事，任药典审查委员会委员、药学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会议委员。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有《赵燏黄四十年奋斗精神提倡药学言论集》两册行世。他一生收藏明清名人书札等书画数千件，为北京有名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并遗有《去非草堂诗稿》。

1955年后赵燏黄总结一生经验，撰写《本草新铨》巨著，惜仅完成上卷总论初稿，于1960年7月8日溘逝。

附注：本文资料主要为赵燏黄子女赵雪华、赵则久、赵爱华及胞妹赵衍辰提供，并访问中华书局离休干部赵元珠；参考中国中医研究院李经纬撰写的《中国生药学泰斗——赵燏黄先生年谱》（《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4期）、章国镇撰写的《我国现代本草学和生药学

先驱赵燏黄——纪念赵燏黄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中国中药杂志》1984年第2期）等。

---

(1) 赵燏黄1943年、1955年两次手订自传稿（未刊）。

(2) 赵燏黄1955年手订自传稿；罗卓夫、孙敬尧主编：《北京医科大学的八十年》，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赵元任

熊尚厚

赵元任，字宜仲、宜重，号重远，祖籍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1892年11月3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天津。祖父赵执诒曾任冀州等地知州多年，父赵衡年中过举人。赵元任青少年时代曾在常州私立溪山学校、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等校就读。1910年他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数学，1915年升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讲师。

赵元任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除主修数学、物理、哲学等科外，还选修了语言学、声学等课程。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听和说方面都颇赋天才。对冀州、保定、常熟、苏州、南京以及福建等地方言一学就会，能在一周内学会一种方言，听觉特别灵敏。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他对《马氏文通》一书产生兴趣，萌发了他对中国文法研究的想法。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选修国际音标，使赵元任对语言学的研究大开眼界于是他在哈佛大学选修语言学和高级和声学，同时开始研究中国方言。

1920年，赵元任应北京清华学校的聘请回国执教，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的讲师。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时任翻译。翌年，他再次赴美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此时，赵元任进一步研读语言学，专程去法国莎娜学院进修语言学理论。1923年，他任哈佛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前往英、法、德研究语言学。嗣因清华设立研究院，他于1925年回国任国学研究所导师；同时从事国语统一工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不久改名国语统一推行委员会）成员，被该会举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起草委员。他灌注了一套国语留声机片并创制罗马字拼音式。同时，他还与北大教授刘半农等发起“数人会”，专门研讨语言音

韵学，担任聚会主席，经常和钱玄同等对国语运动问题进行讨论。1929年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任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从此专注于语言学的研究。此后，还曾任清华留学生监督、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和院士。

赵元任推崇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Karlgran），以其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古音拟则、方言调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创人之一。1927年他研究吴语，在江、浙两省调查了三十三个地方，于次年发表《现代吴语的研究》。继后在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先后撰著有《南京音系》、《中山方言》、《钟祥方言记》等著作。与此同时，他发表了《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篇音位分析理论的重要论文，后被列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被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为必读文献。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发表论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与丁声树等合著）及论文数十篇。他的许多学术成果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

赵元任的后半生在国外度过，长期从事教学工作。1938年他应美国夏威夷大学之聘前往任教，嗣后相继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话速成班主任，美国陆军专科训练班中国语主任，加州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兼主任等，编著《国语入门》、《粤语入门》作教材，还参加过哈大中文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对美国的中文教育作出了贡献。他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中国首席代表，主持过联合国教科文组语言学暑期讲习会。他会英、德、法、日、俄及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蜚声于国际语言学界。

赵元任长期从事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语法、语意及方言、中古音等多方面的研究，一生著有专著三十余种、论文一百多篇，被我国语言学界称作“汉语之父”。

赵元任的另一成就是创作新风格的中国音乐。他的父母为昆曲名票，他从中受到音乐、戏曲艺术的熏陶。留美时期，他对音乐非常喜

爱，且具一定的音乐素养，其后，他创作过《和平进行曲》、《全国运动会会歌》以及《结婚进行曲》等；并为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的诗词谱过一些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注的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其歌曲集出版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与此同时还曾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由于他对音乐的爱好及对语言和音乐的双重理解，在乐曲创作方面成绩卓著。

除语言学和音乐外，赵元任早年与任鸿隽、杨杏佛等合办过《科学月刊》，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积极提倡普及科学知识。他发表过《用数》、《地果圆乎》、《中西星名图考》等多篇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还翻译过《中国音韵学研究》（与罗常培合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

1960年赵元任退休后仍然继续从事著述，或参加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其主要论著有《中国话的文法》、《语言和符号系统》、《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面面观》等。同时还研究“通字”[(1)]，草拟了《中国通字草案》，出版《通字概说》一书，主张推行通字以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

赵元任热爱祖国，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很深，在其耄耋之年，曾于1973年和1981年两次回国观光游历，会见了国内学术界的许多老朋友，参加清华大学七十年校庆活动。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病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黄山医院。

主要参考资料

赵元任：《早年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

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1971年），第3页。

［美］赵元任著，叶蜚声译：《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杨时逢：《追念姑父——赵元任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

---

(1) 即："给字书里认为'相通'的引申义和种种变异，选出一个汉字和一种罗马化的拼写来。"从一万个汉字中选出二千个各大方言都能通用字，作为中文书写系统的主体。不够表达的地方就用各大方言都能通读的现代假借字，以求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

赵紫宸

寿祝衡

赵紫宸，1888年2月29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少时敏思好学，先就读私塾，诵读“四书”、“五经”等古籍，并学习联句吟诗，期望考取秀才求得功名；惟因家境贫寒，乃辍学家居练学珠算记账，准备日后随父从商。由于鸿志难遂，精神空虚苦闷，常常求神拜佛，但企求上进的心愿并未息止。

1905年，赵紫宸闻悉苏州有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萃荣中学，不收学费，即离家去苏州求学。他入校后勤奋攻读，获得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眼界逐渐开阔；同时也受到了宗教的熏陶，逐渐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1910年赵在萃荣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教会办的东吴大学。该校收费昂贵，赵四处筹措，最后动用了他母亲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全部积蓄，才勉强凑齐。在东吴大学，他勤勤恳恳地读了四年，成绩特优，1914年毕业后被选送去美国田纳西州万德比尔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社会系学习。他在美国半工半读，生活俭朴，仅有一套西装，衬衫是晚上洗了白天穿。经过三年刻苦学习，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获得金质奖牌。

赵紫宸于1917年回国后，在母校东吴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大纲、社会管理、十八及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社会进化、圣经文学及伦理学等课程。1922年任东吴大学教务长。

1926年，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神科，改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授，不久继刘廷芳任宗教学院院长。该学院招收文理科大学毕业生专门进行基督教的教育，宣示“发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基督教学术”，以培植学生在中国传布教义、建造教会、推广美国基督教思想和美国“友谊”。宗教学院还竭力在燕京大学形成宗教气氛，其教授都在文理各系兼课，以便把宗教学院的精神渗透到整个燕大。赵紫宸主持宗教学院，怀着“为基督尽忠心”的虔诚感情，期望培养出一批批人才在中国发展基督教事业，尽心竭力，整日奔忙。

当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宗教思想方面是属于美国现代派和自由派的，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正宗派、教会派相对峙。由于受到燕京大学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的影响，宗教学院曾讨论过放弃《圣经》中的《旧约》，而以中国先贤圣训代替的问题。许多教授虽然知道《旧约》里讲些什么，却对中国文化的底蕴不甚了了，因而讨论旷日持久，不得要领。赵紫宸主持宗教学院后，由于他对基督教抱有“自传”的热忱，同时又对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因而能把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基督教哲学思想体系。他在宗教学院主讲系统神学和宗教哲学等课程期间，编著了一系列神学著作，贯串着“自传”的精神，体现了他中西并重、物质与精神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哲学思想体系，受到国内外基督教人士的高度评价。他的主要著作有：《耶稣传》、《圣保罗传》、《基督教进解》、《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基督教中心信仰》、《基督教与我的人格》等。《耶稣传》既依据有关史料、传述和经典著作，又阐发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独到见解。《基督教进解》包括“知识与信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本身——耶稣基督”、“上帝论解”、“论救法”、“教会生活”、“基督教与世界”等论述，其中引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著述，阐发基督教教义，内容丰富，立论谨严。

赵紫宸自1928年起，兼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主办的《真理与生命》月刊主编计九年。该刊以登载阐发基督教美国现代派、自由派思想的文章为多，赵经常撰写一些阐述自己宗教哲学思想的文章。“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该刊也发表了一些宣传抗

日爱国的文章。在1931年10月1日出版的《真理与生命》上，赵发表《基督徒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当持什么态度》一文，严正指出应当“将此次事实之真相，宣告于世界信众，并联合世界信众，特别是日本的信众，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扰乱世界的罪恶”，表明了他抗日爱国的立场。

由于对于我国古典文学有深厚的根底，特别是诗方面的造诣，赵紫宸在燕京大学曾兼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讲陶渊明诗等课程，东吴大学赠予文学博士称号。1932年—1933年他曾赴英在牛津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他一生先后赋诗词五千余首，取材宽，含意深，既重格律又不受拘束；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许多诗篇爱憎分明的态度以及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亦甚鲜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处于战争状态后，赵与燕京大学十几名教授被日本宪兵队囚禁半年多，他在被囚期间赋诗一百七十余首，忠贞爱国的感情溢于言表。他的诗词后来成集的有《南冠集》、《玻璃声》等。

赵紫宸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除1946年一度离职外，直至1952年该学院停办，前后达二十多年。他为支撑萎靡不振的宗教学院，寻求经济上的支援，劳心焦思，不遗余力。他曾去美国向教会人士游说，争取捐款；也向国内入教的资本家募集；他走访金陵神学院不止一次，企望分得一点美国捐款；对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颐指气使，他也竭力忍受。直到解放以后，宗教学院成了一些敌视新中国的人躲避和活动的场所，他仍怀着“为基督尽忠心”的虔诚心情，四处奔波募捐，筹集经费，竭力维持宗教学院，而对师生此时的种种活动却无暇顾及。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赵紫宸先后去过耶路撒冷和美、英、荷、日、印等二十多个国家进行讲学和教会活动，受到各国宗教界的尊重。194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予神学博士称号。1948年参加世界教会协进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成立大会，被选为六主席之一。嗣因该会支持不义战争，赵愤而辞去主席职务，并在报上发表

声明。他笃信基督教，但他热爱祖国，希望基督教能为中国服务。1948年冬，美国协和神学院聘他为客籍教授，他不就，于解放前夕毅然回到祖国。

赵紫宸回国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会议，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后，他担任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常委等。他虽年逾花甲，但仍不倦地学习，乐于接受新事物，热爱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一道，积极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毒害我国人民和青年的种种事实，号召摆脱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晚年他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继续进行了许多研究。

1979年10月21日，赵紫宸因病在北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赵紫宸：《基督教进解》，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4月版。

赵紫宸：《圣保罗传》，青年协会书局1947年10月版。

吴芷芳：《记宸师点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王瑾希：《基督教界爱国人士赵紫宸》，《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

郑伯昭

陈曾年

郑伯昭，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63年（清同治二年）生。年轻时曾在上海美国人主办的中西书院读书。

19世纪末，英、美两国的卷烟开始向世界各地倾销，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都逐渐出现了烟草制品。郑伯昭于三十岁时，同广东同乡在上海合伙组成永泰栈。该栈的初期业务，是在菲律宾设立泰记烟厂，利用当地烟叶制成“绿树牌”和“真老头牌”雪茄，运至上海销售。1901年起，同代理销售英、美两国卷烟的公发英行订立合约，代销“老刀牌”（Pirate）和“皇后牌”（Ruby Queen）香烟。1902年上海英美烟公司成立，继续维持合约，永泰栈为当时代销英美烟公司香烟的六家大同行之一。郑伯昭年轻时就是一个深谙行情善于经营的商人，烟业同行称之为“潮阳麻子”，以形容其苛刻精明。永泰栈在推销这两种牌号的香烟时，经常超额完成英美烟公司规定的任务。“老刀牌”打开销路之后，英美烟公司收回自销，永泰栈在上海继续销售“皇后牌”，并将它推广到京津一带。

1905年，美国发生虐待华工的事件，引起上海各界人士的激愤，各界人士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提出“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的口号。美国对华贸易当即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在中国设厂的英美烟公司更受影响。英美烟公司不得不将设在上海的制造厂——美国纸烟公司，改为大英烟公司。郑伯昭这时已担任永泰栈的经理，他用蒙混手法，将“皇后牌”的中文名称改为“大英牌”，销路遂蒸蒸日上。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通过各级分支机构，直接经销一个时期以后，感到外籍人员对中国各地的言语风俗习惯甚难掌握，并要担负较大的

风险，不如自己退居幕后，运用中国的买办商人更为有利。1911年，公司资送郑伯昭、邬挺生两人赴英考察，参观了在伦敦的英美烟公司总公司和制造卷烟的工厂。

1912年郑伯昭被授权为“大英牌”香烟的中国独家代销商。1917年11月，英美烟公司董事托马斯和郑伯昭在纽约签订合约，议定自1918年起十五年内由郑伯昭担任“大英牌”和“锦扇牌”香烟在中国的独家经理，条件是不得销售其他公司的产品，每出售一箱付以不超过四元的佣金，部分佣金并可在国外付以外汇。

郑伯昭在永泰栈工作多年后，在推销业务上已扎稳根基，于是决定摆脱永泰栈，自立门户。1919年他在上海九江路设立永泰和烟行，并将“大英牌”和“锦扇牌”的经销权也带了过来。经过了两年的努力，成绩斐然。1921年进一步和英美烟公司合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100万元（英美烟公司占股份51％，郑占49％），郑伯昭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永泰和对外自称完全是中国人创办的公司，实际上货款收入和账房核算皆由英美烟公司控制。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全国人民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愤慨万分，纷纷发起抵制英货运动。英美烟公司在华业务首当其冲，特别是大英牌香烟的销路更是一落千丈。郑伯昭马上将“大英牌”的中文名称再改为“红锡包”；还广贴传单说“红锡包”“现已由大美国驻沪总领奉到大美国华盛顿外务部示，证明确系用美国烟丝制造；且完全在美国境内制造之货”[(1)]；并在“红锡包”的烟壳上加印上英文“美国制造”字样。不久，“红锡包”的销售量就恢复正常。同一牌号的香烟，在抵制美货时，变为英国货；抵制英货时，又变成美国货。郑伯昭就是这样运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来迷惑吸烟群众，帮助英美烟公司规避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锋芒而开展其业务。

郑一向重视卷烟推销网点的建立和运用，他选择各地有实销能力的商人作为经销对象，并在保证金、赊销等方面放宽条件，在销售佣

金方面采取累进优惠办法，因此在外埠也能迅速打开局面。永泰和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四十多个据点，以联系众多的经销商。郑伯昭的买办才干，深得英美烟公司的信任和倚重，1930年干脆把自己直属的“东方部”和“上海部”撤销，将这两个地区所有各种牌号香烟的推销和管理工作，全部都交给了永泰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量每年约为九十万箱（五万支装）。根据1923年至1941年的十九年统计，永泰和共计销售英美烟公司各种牌号的香烟四百二十三万箱（平均年销二十二万二千六百余箱），营业额共计为法币九亿四千一百万元。郑伯昭获得的佣金收入，历年来的总和约为法币二千四百万元左右。

英美烟公司作为一个外商企业，受当时中外通商条约时限制，不得在内地购置产业，但扩展业务又迫切地需要在内地购置大量产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20年由郑伯昭出面，组织了宏安地产公司，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成为一个“法人”（“自然人”的对称，依法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和负担义务的组织）。这个公司实际上完全是替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内地管理产业的一个买办机构。

英美烟公司成立之后，收取了经销人员、仓库管理员和出纳人员的大量保证金，并利用这笔资金在上海购置了很多房地产。但是，英美烟公司是专做烟草业务的，不便做房地产生意，为了掩盖自己的房地产所有权，便与郑伯昭勾结，于1927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昌业地产公司。昌业的资本额为实收资本九十万两，名义上是郑伯昭拿出来的，实际上由英美烟公司所属的大英烟公司，掌握所有权文书，即权柄单。因此，它是英美烟公司的另一个由郑伯昭出面经营的买办企业[(2)]。

由于郑伯昭出面效力，从而绕过了中国政府控制外商企业的各项条文和法令的约束。英美烟公司为了酬谢郑伯昭，在所属的不少企业中安排了郑伯昭、郑的妻弟黄以聪和郑的儿子观柱、观锠、观城、观

桐等人为董事或股东，并给以高薪和大量佣金，有时还给以大笔额外酬劳。如为了感谢他们在日军侵略中国时替英美烟公司掩护昌业地产公司的股权有功，郑观桐和郑观城两人在抗战胜利后，就分别获得了特别红利金法币三百五十万元[3]。

郑伯昭利用其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在上海购置了大量房地产，先后开设了奥迪安电影院[4]、百老汇电影院[5]和新光电影院[6]，还取得了美国派拉蒙、哥伦比亚等影片公司的新片专映权。他在香港亦设置了东南地产公司，并在国外拥有巨额存款。

郑伯昭忠心耿耿地为英美烟公司服务，充分发挥了职业买办的作用，做了许多英美烟公司所做不到的事，而其本人则成为极为富有的大买办商人。

郑伯昭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离沪去港，把永泰和托付给黄以聪继续经营。上海解放前夕，郑在沪的大部分家属也包了飞机前往香港。

郑伯昭于1951年在澳门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程仁杰：《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辑（总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陈子谦、平襟亚：《英美烟草公司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汪熙：《从英美烟公司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第4期。

---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扉页照片。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第48—49页。

(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颐中档案抄件。

(4) 奥迪安电影院位上海北四川路宜乐里旧址，1925年12月9日开幕。该影院设备上乘，足与当时最著名的卡尔登电影院相伯仲。1932年“一二八”战事中，影院被毁。

(5) 百老汇电影院为奥迪安电影院在上海公共租界东区设立的连锁电影院，1930年9月25日开幕。

(6) 新光电影院为郑伯昭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经营的另一戏院，建筑参照西班牙及意大利的中世纪式样，1930年11月21日开幕。

郑洞国

沈荆唐

郑洞国，字桂庭，湖南石门人。1903年1月1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其父郑定琼务农，兼做裁缝。郑洞国七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入塾读“四书”、“五经”。1917年入石门中学附属小学，两年后升入石门中学。虽家境清寒，但长兄郑潼国是石中校长，供给所费，学业得以不辍。郑勤奋苦读，成绩优良，在五四运动中，曾和同学上街宣传，清查日货，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1922年从石门中学毕业后，到本县磨市乡小学执教，一年后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攻读。

1924年春，郑洞国偕同乡同学数人南下广州，报考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被编入第二队，与湘籍同学、共产党员王尔琢、贺声洋等交谊甚笃，受到进步思想影响。11月，军校编建两个教导团，郑洞国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1925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在攻打淡水城时，报名参加奋勇队，冒矢登城击溃守敌。教导二团第三营党代表蔡光举不幸在激战中阵亡，郑升任第三营党代表。3月与叛军战于棉湖，郑与营长金佛庄率部担任侧翼掩护，坚守阵地；接着又随主力攻占五华、兴宁。6月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第三营强攻滇军赵成梁师龙眼洞、瘦狗岭阵地奏捷。第二次东征时，郑担任潮州野战医院党代表。翌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八团第一营营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郑洞国所在之第三师先为总预备队留粤，10月编入东路军，在何应钦指挥下入闽作战。永定之役，第八团担任主攻，郑指挥第一营果断坚决，勇猛顽强，受到嘉奖。11月郑升任第八团团长。底定福建后，所部北上入浙进攻孙传芳军。1927年2月18日

进占杭州后，经泗安、广德、溧阳、句容，于3月下旬进抵南京。不久郑因病入院医治，8月出院后赶赴前线，被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由第一军一部扩编的第九军教导团团长。

1928年北伐奉张结束后，全国军队实行编遣，郑洞国任第二师第五旅第十团团长。此后在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及蒋、冯、阎中原大战中，郑率团随同第二师转战各地。1931年底任南京警卫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团长；不久又回第二师升任独立旅旅长，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嗣后改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驻洛阳。1933年3月，所部奉命驰援长城抗战，在古北口抗击日军近两月；在南天门一线的激战中，郑率全旅将士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反复冲杀，给敌军以重创。1934年春，郑奉命率第四旅参加第五次“围剿”红军战事。10月红军主力转移，郑率部尾追至芷江。翌年郑升任第二师师长，驻防徐州、蚌埠一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庐山训练团受训的郑洞国奉命回部队率第二师挺进保定驻防，投入平汉路保定会战，于9月下旬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后因敌军突破满城一带防线，第二师与友邻部队失去联络，后方机关亦遭日军骑兵包抄，郑指挥所部与日军血战一昼夜后，被迫从保定突围，随后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打游击战，曾袭击安阳城及机场，威慑敌人。参加漳河战役后至洛阳休整。此时敌军已攻陷滕县，向运河逼进。郑奉命率第二师火速开往徐州抗击日军，于1938年3月19日至运河南岸布防，隔河猛烈轰击北岸韩庄正渡河之敌军。旋即开往白城秘密集结，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4月初在杨楼、底阁一线参加迎击日军第五师团坂木支队的战斗，又与友军合力击溃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在台儿庄战役中立下战功。随后郑率部夜击退守峄县之敌，攻占地势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在燕子河大刘庄一线抗御日军，坚守阵地两旬余，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防线，开往归德。嗣后郑升任第九十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

1938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新编第十一军（后改番号为

第五军），郑洞国调任荣誉第一师师长，不久任副军长兼荣一师师长。这是我国陆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荣一师则是由伤愈官兵组成，虽均有作战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纪律松弛，有些人还居功自傲。郑洞国对所部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并加强训练，努力提高部队战斗力。1939年12月，第五军开赴桂南参加昆仑关之战，以荣一师担任主攻，郑亲临火线指挥，所部将士英勇奋战，连克罗塘、四一一高地、界首等几个重要据点，并两次攻入昆仑关，为收复昆仑关大量歼灭敌军作出重要贡献。随后，郑调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郑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后，担负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他注重部队的训练，努力提高官兵的军事、政治素质，对于敌军多次大规模进犯，均能有力抗御，坚守防地。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主力反攻宜昌，歼敌甚众。

郑洞国的战功以及他善于带兵、练兵，颇获好评，亦受到蒋介石的重视。1943年秋，郑洞国被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新一军是由一年多前协同英美盟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组成，在兰姆珈参加史迪威主持的军事训练，并获得美械装备，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郑到职后，努力提高部队的士气和斗志，同时协助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和索尔登（Daniel Isom Sultan）协调美军人员与我国官兵的关系，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也抵制了盟方某些不尊重我国格人格的要求和做法。10月，郑率新一军开始了缅北反攻战役。全军由列多出发，在丛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配合下，克服在亚热带森林中行军的种种艰难险阻。郑经常不畏艰苦亲临前线，鼓舞士气，组织战斗。驻印军先后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密支那围攻战役的胜利，大量歼灭了日本第十八师团的有生力量。1944年8月，郑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兼新一军军长，成立副总指挥部，继续率部前进，相继攻克八莫、南坎，于1945年1月27日在芒友与卫立煌指挥的滇西远征军胜利会师，全线打通了中印公路。此后，郑指挥新一军次第攻占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地，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

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在1945年6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9月与司令官汤恩伯抵沪，接收南京、上海。嗣后兼任京沪警备副司令。

1946年2月，郑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并代理因病就医的杜聿明司令长官职务。这时，出关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正在大举抢占东北，郑洞国抵锦州后，即指挥各部沿北宁路疾进，先进占苏军撤出的沈阳，接着又占领了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抚顺等城市。蒋介石利用《东北停战协议》大量运兵进入东北，郑洞国部署国民党军队分两路推进：新一军和七十一军沿中长路北进，新六军和五十二军进攻本溪。北进部队遭到民主联军反击受阻，郑赶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督战，但久攻四平街不下。5月，郑任前敌总指挥，率新六军及七十一军、五十二军各一部北上，先后攻占四平街、长春、永吉等城镇，与民主联军隔松花江对峙。8月，郑又指挥第十三军、九十三军及七十一军一部大举进攻热河，经两个月的激战，凭借强大兵力，控制了热河大部分城镇，为北宁路解除了威胁。

进入1947年，北满和南满的民主联军频频发起攻势，长春、通化、四平街、本溪等地先后告急，郑洞国秉承蒋介石旨意，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固守大中城市。8月，陈诚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但在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发动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打击下，陈诚将五十余万军队编组成四个兵团实施的“机动防御”方针，实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大批有生力量被歼，中长路被彻底破坏，沿线自长春至开原只控制四平一城；北宁路也被切断。郑无能为力。

1948年1月，蒋介石派卫立煌接替陈诚主持东北战局，成立“剿匪”总部，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剿匪”副总司令。2月，东北人民解放军

（即原民主联军）发动强大攻势，次第攻克辽阳、营口、鞍山、法库等重要城市，3月又克四平街。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只能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郑洞国衔命固守长春，并被蒋介石任命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郑感到在北面十分孤立，处在解放军层层包围之中，随时有覆灭之虞，曾建议主动放弃长春，以便集中兵力于沈阳、锦州之间，能战能守也能退，但是蒋介石和卫立煌都不同意弃守长春。郑无可奈何，指挥新七军、六十军及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共约十万兵力，困守在长春孤城。城内粮食、燃料日益匮乏，粮械供应均赖空运。郑于5月派部队出击，想到郊区搜购一些粮草，结果遭到解放军反击，不仅兵员伤亡甚众，还丢失了机场。在解放军紧缩包围之后，城内十万兵员和二十万市民处境极为艰难。气候渐寒，军粮、寒衣只能靠空投供应，所得之数甚微，门窗、桌椅均充作燃料或取暖，官兵饥寒交迫，士气丧失殆尽。

辽沈战役开始后，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郑洞国调集两个师企图突围，遭到解放军狙击。以后蒋介石几次下令郑率部突围南下，郑亦认为只有突围才是求生的唯一出路，但是新七军和六十军等官兵均已饥饿疲惫不堪，体力虚弱，众将领皆无突围信心。10月16日夜，曾泽生率六十军宣布起义，郑洞国则还想“效忠”党国，拒不停止抵抗。19日上午，李鸿、史说率新七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郑洞国与兵团直属部队孤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延至21日凌晨，终于被迫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郑洞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民革中央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等职，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于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古北口抗战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郑洞国：《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郑洞国同志生平》，《团结报》1991年2月27日。

郑介民

马振犊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广东文昌县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其父郑兰馥，晚清县学生员，对他寄予厚望，尽力供其读书。郑介民少时进私塾，十七岁转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他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秘密参加了“琼崖民军”，在陈继虞部任书记，后因遭到通缉，与几个同乡一起亡命马来亚，更名为介民。在吉隆坡，郑一边在橡胶园、养鱼场等处帮工，一边帮助编辑《益群日报》。

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东黄埔创立陆军军官学校，消息传到南洋，郑介民回国报考，但名落孙山。失望之余，他投入广东省警卫军吴铁城部当学兵。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时，他终于通过了考试。进入黄埔军校之后，郑介民除了努力学习之外，还十分留意校内的政治动态，不久便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与贺衷寒、王伯龄、陈诚、潘佑强等一起，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郑在“孙文主义学会”中十分活跃，经常将各方面情况向上级密报，获得校长蒋介石的好感。

郑介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蒋介石当做“骨干分子”送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专业。他通读了《俄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书，不但没有增长一点共产主义思想，相反更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校期间，他撰写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民族问题，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1927年8月，郑介民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此时正值蒋介

石受桂系等势力的排挤而下野，郑被中央军校总队长贺衷寒安置在军校总队部任政治教官，不久改任第四军政治部秘书。

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郑介民立即晋见，向蒋表示效忠之意，并向蒋报告了他所悉心收集的留苏黄埔生的思想动态，蒋介石认为郑介民颇有才干，决定留其在身边担任侍从副官，专门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从此，郑介民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

蒋介石在南京确立统治地位后，竭力建立个人独裁专政，排斥异己势力。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桂系，在北伐讨奉之后控制了从南岭横贯长江蜿蜒以迄长城的纵向“一条龙”区域，形成对南京国民政府围迫之势，蒋介石颇为不安。郑介民分析局势后，主动向蒋请缨，前往李宗仁的大本营武汉，以他与李宗仁之弟李宗义在中山大学的同窗关系，进行侦察与瓦解工作。他骗取李宗义的信赖，隐瞒了在南京政府供职的身份，住进了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部，与李宗义同居一室，并顺利接近了桂系的最高层。平时他装出一副老实谦恭之状，对李宗仁言必称“德公”，博得了李的信任，议论军机亦不回避，使其迅即有所收获。他还以交友手段贿赂总部机要人员，弄清了桂系各部兵力配置与装备情况。最后连第四集团军电讯密码本都拿到手，拍照送往南京，使桂军调动部署一切机密全为南京所掌握。

郑介民还利用桂系内部矛盾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在湖北籍将领中散布“鄂人治鄂”的主张，又在广西籍将领中挑拨说“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的却是广西人”，使桂军内部裂痕加深。郑介民在武汉的这些活动，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与严密掩护，直到蒋桂战争结束，李宗仁等对郑介民的真面目尚一无所知。

1929年7月，郑介民被蒋介石派往广西，出任省政府委员兼省党部整理委员，继续在桂系内部进行特务活动，不断向蒋介石密报桂系的情况。后郑介民从广西回到南京，在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

1932年3月，第二次下野复出的蒋介石集合黄埔系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郑介民列名为九名“中央干事”之一。“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蒋指定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郑介民身为黄埔二期毕业生，又曾留学苏联，结果却被名列黄埔六期肄业生戴笠之下为副，心中愤懑不平，但他明白蒋对戴笠的特殊信任，便竭力克制自己，表面上对戴客气谦让、融洽相处，在工作中则卖力效忠于蒋，以显露自己的才华。其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英勇抗日，但在《淞沪停战协定》后被调往福建。郑介民即在第十九路军中派遣了一批潜伏特务，与他们保持严格的单线联系，使特务深藏而便于秘密活动。1933年11月“闽变”发生，郑介民利用这批特工获取了有关“福建人民政府”的大量情报，甚至得到了十九路军内部联络密电码，使蒋介石在调兵平息“闽变”过程中能够轻易得手，连戴笠也不得不称赞郑介民有“制敌先机”之明。

1934年春，郑介民被派往北平，兼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重新调整部署了复兴社特务处在华北区的工作。5月，他主持刺杀了汉奸张敬尧。嗣后，他奉蒋介石之派，率“军事考察团”赴欧洲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访问。郑介民特别注重了解德、意等国法西斯特务机构的组织及活动方法，刻意研究、搜集资料。在柏林与罗马，郑介民受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接见。他兴奋异常，引为资本，四处吹嘘。他每到一地就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大力鼓吹效忠蒋介石，并发展复兴社组织。归国后，他向蒋介石送交了长篇考察报告，并进行了当面汇报，得到了蒋的夸奖。他协同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进行调整与充实，效法德、意法西斯的做法，控制交通与通讯，监督无线电台与干扰广播，派遣特务进入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的工作，等等。郑随即被蒋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主管情报工作。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郑介民在参谋本部第二厅又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并兼任于1938年8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主任秘书，但因戴笠对军统局大权抓得很紧，郑遇事只能退让三分，力免龃龉。嗣后，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郑介民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仍掌理军事情报业务。

1939年9月，郑介民离职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他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著作与有关间谍战的资料，在以后几年中陆续写出《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书籍。郑勤奋好学，钻研写作，因此获得“积学勋章”。

1940年夏，郑介民被蒋介石派往南洋一带“巡视”，拓展海外情报组织。他对于日军对南洋的战略进攻及盟军防御对策进行了专题研究，著有《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一书。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苏等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协同对日、德作战，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次年1月，在新加坡召开了盟军军事会议，郑介民被蒋派赴出席。他在会上提出了放弃无险可守的新加坡、集中兵力保卫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基地的建议，但未被采纳。主持会议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Archibald P．Wevell）过分相信英军的战斗力，不料半个月后，在日军发动强大攻击面前，新加坡英国守军六万人竟一败涂地缴械投降。魏菲尔这才致电蒋介石，承认没有听从郑介民建议之过失，郑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于是再升。他随即被派担负与南太平洋盟军统帅联络的重任，先后去爪哇、印度、锡兰、埃及等地，在盟国协同对日作战方面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他还被蒋介石指定为“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成员。由于他对战局和一些军事问题好做分析判断，常常提出一些独到见解，受到美国方面的重视，后来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也称赞他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

在1945年6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介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意同中共和谈的同时，不断挑起军事冲突。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并在北平成立监督停火的“军调处执行部”，郑介民被蒋介石派任为“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共事。郑在商洽停战之同时，又背地里挑选三万余名军统特务，或分派各地“调处小组”任职，或潜往各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是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局几名主要成员钩心斗角争夺局长职位，蒋介石思忖再三，最后选中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

在国民党内外严厉指责和强大压力之下，军统局于1946年10月被迫改组易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内外勤人员减少了两万余人，而诸如“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的警特组织以及其外围“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东方经济通讯社”等团体机构亦不如戴笠在世时那样俯首帖耳地听命了。郑介民虽为局长，但副局长毛人凤竭力控制实权，将郑氏人马排挤在实力圈之外。毛人凤还在郑介民五十寿辰时，利用郑妻贪财的弱点，暗地怂恿大小特务赠送寿礼，将各种珍贵礼品摆满一堂，用微型相机拍照后向蒋介石举报；又煽动特工遗属前来大闹寿堂，演成轰动一时的丑闻。毛还在特务中对郑介民“汰弱留强”、“紧缩开支”的做法横加指责，以获取人心。经过这一番权术争斗，从事了大半生特务工作的郑介民，终于敌不过毛人凤，于1947年12月被蒋介石免去了保密局长的职务，改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兼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国防物资工作，以利用其与美国军方的交往，向美国多要些军援与剩余物资，供内战之需。不久，郑又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但郑介民竭尽全能也帮不了蒋介石多少忙，更无力挽回颓败的战局。

1949年10月初，郑介民从广州赴美国，秘密列席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他讲述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所陷之危局，期盼美国军方能继续给予更多的援助。11月中旬，他归国经香港赴台湾，继续追随蒋介石。1950年3月，他列名“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委员；1953年11

月，出任国民党中常会“敌后区小组”组长；1954年10月，任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1957年后又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处长、国民党中委第二组主任，后转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在台期间，他专注于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情报搜集和研究，并经常向蒋介石汇报，在有关会议上做讲演，还著有《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共产党反右倾运动的最新动向》等书。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心脏病猝死于家中。

主要参考资料

沈醉等撰：《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陈少校著：《黑网录》，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

沈醉：《我的特务生涯》（续篇），香港金陵出版社1986年版。

沈醉：《我所知道的军统内幕》，香港中原出版社1985年版。

沈醉：《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郑螺生

陈民

郑螺生，福建同安县人，生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幼年随祖父南渡至马来亚的怡保（又称坝罗）侨居。长大后，即驾牛车以运输为业。后稍有积蓄，即自设“吉承隆”号，经营粮油、杂货。因热心公益事业，常为侨胞排难解纷，遂成为当地福建帮之帮长。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1900年到新加坡，曾游怡保。初时，郑螺生对康有为颇为钦敬，给予热情接待；后阅东京《民报》，逐渐认清康有为立宪保皇的真面目，特别是在保皇会南洋分会长邱菽园于新加坡《天南新报》揭露康有为骗款卖友的丑行之后，便与康断绝关系。此后，郑倾心民主革命，与李源水等倡办道南俱乐部，订阅《民报》、《革命先锋》、《新福建》、《新广东》等报刊，在华侨中积极宣传排满革命。当时，南洋华侨中了解革命宗旨的人还很少，阅读上述报刊的人多被讥为“狂士”。但郑螺生等毫不气馁，坚持宣传不懈。

1907年，孙中山由陈楚楠、林义顺等陪同到马来半岛，组织同盟会霹雳分会，郑螺生与李源水等首先加入同盟会，分别被举为该分会的正副会长。从此，凡筹饷及宣传起义等事，郑螺生无不竭尽全力完成。因他对三民主义的坚定信念，孙中山曾字之曰“维成”。

由于同盟会霹雳分会的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逐渐深入所属各埠的广大侨胞，如参加广州起义的黄花岗烈士郭继枚、余东维，刺杀清政府将军孚琦的温生才，谋刺清水师提督李准的陈敬岳，都是霹雳同盟会的会员。清政府为了笼络华侨，破坏同盟会的活动，于1907年派钦差杨士琦到南洋“抚慰”华侨。杨到怡保时，当地保皇会召开大会欢

迎。郑螺生与李源水等人赶到会场，在杨士琦登台演讲时，郑突然递上质问书，大意是：我国自来多灾多难，我们侨胞在家乡无衣无食，不得已而远渡重洋。过去在国内还得不到政府的照顾，现在政府反而千里迢迢到南洋来抚慰我们，实在有点舍近就远，令人费解。杨士琦一时无言以对，急得满脸通红，举座哗然。其秘书打圆场说，诸位这般举动，岂不怕得罪杨大人？听众不以为然，哄堂大笑。接着又有数人起立质问，“欢迎大会”终于不欢而散，使得清廷愚弄华侨的图谋难以得逞。

1910年11月，孙中山由美洲取道南洋赴日本，至槟榔屿（又称庇能），约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会商，决定在广州再行举义，并为此扩大筹饷10万元。由于保皇党的破坏，在华侨中筹款颇为困难，郑螺生竭力奔走劝募，自己除捐现金1000元外，并变卖其拥有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以助军饷。黄兴对郑螺生和李源水的热心极为赞誉，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列兄筹款苦状及毁家纾难之义举，尽情宣告，无不奋励激发，勇气百倍。”1911年3月，黄兴从香港赴广州参加起义时还特写绝命书寄给郑等人：“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1)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霹雳分会改组为国民党霹雳直属支部，郑螺生当选为常务委员。1913年，国民党新加坡总支部成立，郑当选为常务委员，热心革命不减当年。对于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他筹饷声援。后来他因犯英殖民政府之忌，被驱逐出境回国。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郑被委为大元帅府庶务司长。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侨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对东北养兵数十万、不作抵抗而拱手让敌，以致江山割裂、国土沦丧，十分愤慨和焦虑。为了支援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筹划在侨胞中募集军饷，并寄家书嘱其在南洋的儿子道：“日寇内侵，国难日亟，侨胞爱国，正在斯时，航空建设，尤为需要，快劝亲友，节衣缩食，集资后援。”(2) 1932年10月，迁就日本侵略者意图

国际共管我国东北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郑螺生立即与张永福、方之桢等归国华侨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部会及各机关团体，“挥泪陈词”，指出该《报告书》大不利我国，“谬点难以殚述”，并针对其错误论点，提出“绝对反对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绝对反对所谓顾问委员会议”等十二项正义主张，呼吁全国同胞“输财效死，各尽所能”，“一面援助东北义军，一面出师讨伐伪国”[(3)]。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郑螺生因年迈体弱，返回马来亚，但仍积极宣传抗战，鼓励华侨捐款救国。1939年12月14日，郑病故于马来亚怡保。

---

(1) 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2月版。

(2) 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2月版。

(3) 《归国华侨对报告书批评》，《海外月刊》第3期，1932年11月，第144页。

郑汝成

汪小平

郑汝成，字子敬，一作子进，直隶静海独流镇人，1862年（清同治二年）生。早年从学静海名儒杜麟孙。十九岁入清末洋务派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军事。水师学堂是光绪六年（1880年），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派前船政大臣吴赞诚在天津筹办，派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教练，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1881年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共三十名，学成毕业后多上舰实习，郑汝成在“威远”舰实习 (1) 。这批毕业生后来多为北洋水师的骨干。

1886年，清政府决定选派三十三人作为第三批海军留学生前往英国、法国学习海军军事。郑汝成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留学生，赴英国军校，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毕业后，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上“额格士塞兰德”号军舰实习，同时在该舰实习的还有后来成为民国初年的海军总长刘冠雄等。郑汝成在英国学习时，主修枪炮及铁甲舰，成绩优秀，考试“屡列高等”。

1890年，郑汝成留学期满回国，在北洋兵船候补，擢蓝翎五品顶戴千总。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保荐郑汝成为“康济”舰大副，称：“郑汝成，系由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生出身，曾经出洋肄业，学成回华，在船候补。该员年富力强，于船学、操务讲求精熟，堪以升署精练左营守备，充康济船大副” (2) 。

1891年，威海水师学堂（刘公岛水师学堂）总办丁幼亭离职，郑汝成奉调接任，不久又兼任总教习。1895年初，甲午战争爆发。刘公

岛被日舰攻陷，威海水师学堂也随之解散，郑汝成遂转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正教习。清廷在甲午战败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郑汝成为海军教习，无所用。三年后，郑投入时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的袁世凯麾下。

1902年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成立直隶军政司，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其时，郑汝成已成为袁世凯的干将，帮助袁办军校。郑先任教练处帮办（总办冯国璋），同时兼任保定北洋武备师范学堂监督。北洋师范武备学堂是短训班性质的军校，为袁世凯训练新军军官的一种方式。1903年，出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总办，这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陆军武备学堂，是为培养北洋常备军基层军官所设置的，毕业生散布北洋各军，对北洋军的形成影响甚大。这两所军校都是袁世凯培植自己势力的重要工具[(3)]。

1907年，清政府决定重建海军，郑汝成重回海军任职，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1909年秋，随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出访欧洲，考察各国海军及订购新舰。该年9月，考察团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的海军学校和船厂，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一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一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三艘、江防炮舰两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两艘。郑汝成因熟悉欧洲列强海军，在考察过程中贡献良多。1910年，任筹办海军事务处军法司司长。同年底，清政府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郑汝成改任军制司司长。1911年春，烟台海军学堂发生学潮，该校发生汉满学生斗殴事件，郑汝成奉命前往处理。当时，烟台海军学堂的满族八旗子弟有二十余人入学，水平低下，故设专班。汉满学生不相往来，秋季运动会因比赛而斗殴，满族学生全部离校告状，遂由登莱青道台出面解决，勒令学校开除肇事汉族学生，由此激起汉学生对清廷的极大不满。郑汝成到后旋即接任该学堂监督，接替同情学生的谢葆璋，并兼海军部一等参谋官，授海军协都统衔。

郑汝成来烟台不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烟台革命党人深受武昌起义胜利的鼓舞，准备在烟台发动起义。而敌视革命的郑汝成则采取措施，对革命党人严加防范。1911年11月12日，革命党人在烟台发动武装起义。海军警卫队和海军练营的部分官兵宣布反正，转向革命，随即开进烟台市区。烟台的其他军警也纷纷倒戈，一夜之间烟台即告光复。烟台起义成功后，郑汝成见大势已去，便带着烟台海校中的几十名满族学生逃回北京，海军警卫队也有部分官兵逃散[(4)]。

1912年，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郑汝成为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旋奉袁命往南京办理留驻那里的南方民军的裁汰、整饬、发饷事宜。1913年，郑汝成擢升海军中将。7月，被袁世凯任命为上海镇守使，率陆军第七、第十九旅驻防上海，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协助冯国璋、段芝贵所部袁军在江苏、江西两省的作战。随着“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市，并在7月18日宣布独立。此时，上海讨袁军约有七千五百人；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也投向革命党人，并对进逼吴淞口的“飞鹰”号驱逐舰进行炮击。其时，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部队的命脉，以免于战火为由，派人前往制造局，试图游说郑汝成，“中立”江南制造局，封存武器弹药。郑汝成予以拒绝。郑一边命令士兵们抓紧修筑工事，一边积极向袁世凯报告。事变发生后，袁马上任命郑汝成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与上海讨袁军对峙。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指挥讨袁军向江南制造局出击，激战一小时，攻入该局第一道大门。高墙内的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固守第二道大门；郑汝成、李鼎新则让黄浦江上“海筹”、“应瑞”、“肇和”、“海琛”、“镜清”等舰集中炮火助战，对讨袁军阵地进行猛烈轰炸，讨袁军损失重大。当晚，讨袁军再次向江南制造局东、西两侧进攻，一度突破东栅门，但被黄浦江上各舰的炮火击退。讨袁军并未气馁，又相继向江南制造局发动了几次进攻，但终不能克。8月13日，大批援军抵达，郑汝成率舰至吴淞口，与北洋政府海军部派来的海军

陆战队会合，轮番猛轰吴淞炮台；海军陆战队也迂回江湾，从侧面进行袭击。讨袁军伤亡严重，只好放弃吴淞炮台，转移到嘉定，最终不得不解散队伍，宣告失败。

8月至9月，镇压了讨袁军起义后，郑汝成先后兼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淞沪一带接战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又获海军上将之衔，并被授权“指挥一切事宜”。至此，郑汝成掌握了除租界以外的军政大权。郑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先后对上海民众在辛亥革命中取得的成果进行清算。带有地方自治色彩的上海市政厅被改为上海工巡捐总局，观察使被改称沪海道尹，县民政长被改称县知事，各初级审判厅也全部被裁撤[(5)]。郑汝成疯狂捕杀革命党人，对于藏身租界的一些上海讨袁军官兵，或诱捕，或收买流氓下毒手，后来又按照袁世凯的电令以“划分警权”名义满足租界当局的扩张要求，换取其帮助捉拿“国事犯”。

1914年夏，范鸿仙（字光启）接受孙中山指示抵沪，在葛罗路设立机关，一面联络革命志士，一面说服驻军中有反袁倾向者做内应，准备攻打上海镇守使署；不料，该行动为郑汝成侦悉，范光启在机关起草军书时遇害，受牵连的二百多人也都被枪毙[(6)]，以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上海建立的组织受到重大的打击。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并加快恢复帝制的步伐。在群情激愤之中，郑汝成却指责反日爱国运动是“煽惑滋事”、“要挟政府”，对反日运动加以镇压。郑汝成的倒行逆施的行径，备受袁世凯的青睐，为袁在东南的心腹，袁世凯曾说“异日代冯国璋者，舍郑汝成莫属，而郑之才非华甫所能敌，诚后来者之彦也”[(7)]。郑声言：“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8)] 10月，郑汝成受封为将军府彰威将军。1915年秋，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潜回上海。10月29日，他设机关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五号，筹划在沪发动起义，并准备采取暗杀的方式秘密除掉郑汝成。陈其美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

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而郑汝成拥精兵控海军，又干练多才，为“袁氏江南屏藩”，故要想取上海，须先除去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9]。11月10日，郑汝成在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即位招待会途中，行至上海虹口租界附近外白渡桥被革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刺杀身亡，终年四十三岁[10]。

袁世凯获知郑汝成被暗杀消息后，大为震惊，叹息“坏我长城，南方无宁息矣”，并即刻下令：“郑汝成追封一等彰威侯，照上将阵亡例从优议恤。”给治丧费银二万元，拨予天津所属小站营田三千亩给其家属，以资赡养，并在上海及原籍建立专祠。同时，任命松江镇守使杨善德为上海镇守使。而王晓峰、王明山两位革命党人被捕后自租界引渡解归上海镇守使署，12月7日在西炮台被杀害。

---

(1) 《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册》，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

(2) 《（李鸿章）奏郑汝成升署守备为康济船大副片》，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563页。

(3)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8页。

(4) 崔士杰：《辛亥革命烟台起义亲历记》，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14辑，1991年版。

(5) 张姚俊：《郑汝成命丧外白渡桥》，《世纪》2008年第5期。

(6) 张姚俊：《郑汝成命丧外白渡桥》。

(7) 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8) 压伏：《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民口杂志》第2卷第11号（1916年）。

(9) 蒋中正：《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何仲箫编《陈

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120页。

(10) 压伏：《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

郑孝胥

陈贞寿

郑孝胥，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60年5月2日（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他的先世原籍福清县，父亲郑仲濂，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吏部稽勋司主事。郑孝胥早年由叔祖郑虞臣教读经史。二十岁，补博士弟子员。

1882年，郑孝胥中福建省正科乡试解元。1885年，赴天津入李鸿章幕。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同年秋，改官江苏试用同知。第二年任镶红旗官学堂教习。1891年，郑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驻日领事，不久升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回国居南京教敷营，后为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练自强军，擢升至监司。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下诏广求人才，郑孝胥在乾清宫独奏练兵之策，光绪帝遂派他以道员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变法失败后，郑至武昌。次年，张之洞奏办京汉铁路南段，命郑孝胥为主办京汉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郑孝胥佐张之洞筹划所谓保全东南半壁之策，由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江海关道余联沅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1903年，郑孝胥辞铁路事，旋赴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此时，广西西部和西南部十余州县农民因不堪苛捐重税的负担，发动起义，部分清军也哗变，在桂越边境行动。清政府惊恐不安，朝议整饬边防应以精军驻防。两广总督岑春煊以郑孝胥善知兵，又好用奇计，遂奏请以道员四品京堂候补督办广西边防事务，专折奏事。郑孝胥乃率湖北武建军左右旗八营共二千余人到龙州，剿抚兼施，把抗捐抗税的农

民镇压下去。郑孝胥在龙州三年，练民团，创设学社，开办学堂，并选社中俊秀出洋留学[1]。1904年，郑孝胥奏撤边防督办，1905年告病回籍，至上海，筑“海藏楼”，与海内人士诗文往还，并集股创设日晖织呢厂。

1906年9月，清廷为抵制革命，下诏预备立宪。12月，郑孝胥与朱福诜、张謇、雷奋等苏、浙、闽三省名士及实业界二百多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言以“奉戴上谕立宪之旨趣，开发地方绅民之政治知识为目的”[2]。但清廷空言立宪，缺乏诚意，加之革命浪潮蓬勃发展，于是立宪派开始把活动重心由开通绅民知识宣传转向为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08年7月，郑孝胥等为了“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联名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3]；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发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以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立宪党人，相约于是年8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清廷乃发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颁布宪法召集议会之诏。

1909年，郑孝胥由岑春煊推荐于东三省总督锡良，任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埠事宜，居天津颜氏园，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间。次年，随锡良入京。不久锡良去职，郑孝胥遂赴沪。1911年夏，郑孝胥至长沙任湖南布政使甫十日，湖广总督瑞澂因厘定颁行外省官制派郑孝胥赴京陈述，郑遂于9月入京，居舍饭寺，等待召见。10月，武昌起义，郑急驰回任，途次上海，长沙已为革命军光复，道阻不行。不久，中华民国成立，郑孝胥遂韬晦上海。

郑孝胥自认是对清王朝忠心不贰，以不做民国官、不拿民国钱的遗老自居，隐居“海藏楼”，以诗酒自娱。他嫉恶共和，闭门不与世事。室中花瓶犹插清朝黄色小龙旗，凡诗文简札题字，均用宣统甲子，未尝书民国年号，以示对清室的忠心[4]。

郑孝胥工诗善书法，1913年在上海组织“读经会”，1917年在唐

元素所创的“丽泽文社”讲学（1920年该社改名“晦鸣文社”），并创立“恒心字社”。郑孝胥诗主崇孟郊，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书法，出入汉隶北碑间，中年以后，自谓去肉存骨，变为瘦削，尝鬻字自给，岁入数千元。

1923年夏，郑孝胥经陈宝琛引荐入故宫，甚得溥仪器重。他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曾几次向溥仪建议：“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5] 次年2月被破格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掌管印钥。他的整顿计划是开源节流，为复辟取得财政上的保证。“开源”的办法，是把清宫《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出版，但遭到北洋政府当局的扣压。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曹锟，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什刹海醇王府。郑孝胥和陈宝琛、罗振玉等密谋逃脱之计，并由郑与日本兵营竹本多吉大佐商定，助溥仪潜离醇王府，先至德国医院，再入日本使馆“避难”。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郑孝胥暂时南归上海。

1925年2月，溥仪由日本驻京使馆书记官池部保护，出走天津，居日租界“张园”（后移“静园”）。郑孝胥不久亦赴津。在天津期间，郑孝胥认为要复辟成功，惟有“列强”帮助“共管中国”。他对溥仪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按指北伐战争），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6] 因此，郑孝胥主张“用客卿”、“门户开放”，同任何愿意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他认为：“对外国人只要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外国人绝无不来之理。”[7] 当罗振玉劝溥仪出洋到日本去联日复辟时，郑孝胥则力劝“留津不动，静候共管”。

1926年5月，郑孝胥经罗振玉介绍，和在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活动的白俄股匪谢米诺夫勾结，结成盟兄弟。他又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白俄党羽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到蒙古举兵起事，企图袭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复国”根据地。郑孝胥还给溥仪推荐一个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回欧洲展开活动，以取得复辟的声援。他又为溥仪推

荐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为复辟专办《诚报》。后来，他通过罗振玉的介绍，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相当强大，决定暂时放下追求各国共管的计划，转而期望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1928年9月22日，经溥仪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同意，郑孝胥和他的长子郑垂、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东渡日本，向日本军部及“黑龙会”活动，图谋复辟，受到各种热心于复辟的日本朝野要人的接待。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铃木贯太郎、次长南次郎等劝他“取奉天为恢复之基”[(8)]。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认为复辟时机已到，用溥仪名义派人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活动。他代溥仪起草了一封给南次郎的信，谓：“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9)]三星期后，日本关东军派军部参谋土肥原至津引诱，郑孝胥则从中协助，竭力唆使溥仪赴东北复辟。11月10日，郑孝胥父子陪同溥仪乘日军司令部运输部“比治山丸”轮船偷渡白河，后转乘“淡路丸”渡海至营口，旋入旅顺。

1932年2月，郑孝胥两次赴奉天，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一伙，密商建立伪满洲国。3月8日，在日本关东军导演下，溥仪粉墨登场为伪满洲国“执政”。次日，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5月兼任伪军政部总长，未几卸军政部总长职，8月兼任伪文教部总长。9月15日，郑孝胥与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大将正式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的实际统治[(10)]。次

年3月，又签订《委任经营合同》，规定将东北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财产，全部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此外，他还帮助日本军国主义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灌输“顺天安民”、“亲仁善邻”、“王道政治”等反动谬论，并亲自兼任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执政”为帝制，溥仪正式“登基”，郑孝胥改任伪国务总理大臣。21日，郑被派赴日本进行所谓“修聘”，“朝觐天皇”以答谢所谓“友邦援助之盛意”。回来后，被叙勋一位，并赐伪景云章。

郑孝胥虽是伪满国务院的总理大臣，却要事事听命于其部下日本人的总务厅长，郑曾因发牢骚惹恼了日本主子。193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郑孝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为名，另换了一个对主子更为忠顺的张景惠接替了他。但为了掩盖矛盾，郑孝胥下台后，仍被赐给“前官礼遇”。1936年1月，郑移居长春柳条路自筑的新宅，创办“王道书院”。同年底，日本帝国还赠他“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38年3月6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3月28日死于长春。

---

(1) 区震汉等修，叶茂茎总纂：《龙州县志》上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1958年油印本，第225页。

(2)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2页。

(3)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第42页。

(4)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

(5)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6)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43页。

(7)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46页。

(8)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51页，《郑孝胥日记》摘录。

(9)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77页。

(10) 姜念东等编：《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郑毓秀

李援朝　侯爽

郑毓秀，1891年3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一日）生。广东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人。祖父郑姚，在香港经营地产兼营造业而成为大商人。父亲郑文治，在清政府户部任官。母亲出身将门，受过良好教育。1897年，郑毓秀随家人迁居广州，并在广州入私塾读书。期间，坚决反对缠足而获成功。1903年，随母亲去北京，入北京崇实女校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13岁的郑毓秀毁弃祖母为她许下的婚约，随后郑家搬至天津，入美国教会办的中西女校读书。

1905年，郑毓秀赴日留学。在日期间，她接受了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1906年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秋，郑毓秀被任命为同盟会京津地区联络员并返回国内，负责传递情报、接送革命党人、秘密运送炸弹进京等革命活动。1907年，郑毓秀加入以专门刺杀清廷要员为目的的“敢死队”，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1910年，帮助进京行刺载沣的汪精卫运送炸弹。1911年武昌起义后，郑毓秀积极响应，踊跃参加酝酿在天津起义的活动，译写照会，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等。

1912年1月15日，郑毓秀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革命党十二人行刺时任清廷内阁总理的袁世凯。由于计划突变，刺袁未遂，军警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等十余人。郑毓秀当时也在现场，她凭借机智勇敢得以脱身。随后，为营救战友而奔走，设法请来外国记者出面保释，救出其中七人。一个月后，郑毓秀又加入行刺宗社党核心人物良弼的暗杀活动。郑毓秀接到任务后，吸取了刺袁行动失败的教训，改变行刺方法，派革命党人彭家珍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将其炸死。在郑毓秀等人周密安排下，刺杀良弼的行动获得成功。

辛亥革命后，郑毓秀在北京积极参与由唐群英等留日女学生发起的女子参政运动。1912年2月20日，郑毓秀等人联络各女子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宗旨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其方法是“应联络全国女界各举代表来宁组织统一机关部，以厚团体而利进行”。之后“女子参政同盟会”在郑毓秀、唐群英等人的领导下，围绕女子参政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3月，郑毓秀参加了由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开办的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文。4月1日，郑毓秀又与潘连璧、伍崇敏等人在天津创办《女子国学报》，以提倡国学，发达女权，辅助共和为宗旨。8月，郑毓秀在北京创办《爱国日报》，抨击时政。1913年底，乘船与吴稚晖等人前往法国，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欧洲留学生涯。

1914年，郑毓秀取法文名苏眉（Soumay Tcheng），在巴黎索邦（Sorbonne）的一所女子中学学习法文。同年，考入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攻读法政专业。经过三年苦读，1917年郑毓秀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她还加入法国法律学会，是该学会首位中国人。她还凭借自己一口流利的法语，在法国大学成立中法协会时登台演说，向数千听众宣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及爱和平、重信义的传统美德，使听众对中国的认识耳目一新，郑毓秀也因此扬名巴黎。1916年3月，郑毓秀担任“华法教育会”女生事务员。11月27日，郑毓秀应召回国，报告欧洲战况并联络中国与同盟国的关系促进共同抗击德国。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主持的外交调查委员会委派，在法国进行国民外交工作。

1919年1月巴黎和会期间，郑毓秀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担任联络和发布新闻工作。同年，郑毓秀也参加了由中国留学生和华工在巴黎成立的“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并接受广州军政府外交部任命，担任外交名誉会员。5月9日，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在巴黎召开国耻纪念会，郑毓秀在大会上发言：“协约胜利，吾人失败！协

约有所得，吾人反损失！合约自达和平之前途，及遗吾人以黑暗前途！此等条件，吾人誓不能签字！”作为当时中国留法学生组织的重要领袖，郑毓秀还组织留学生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请愿，要求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7日晚，郑毓秀率领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工人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的下榻地，要求其不要再和约上签字。最终陆未去凡尔赛宫签字，使中国保留了收回山东的权利。

1920年10月，郑毓秀应受四川省长杨庶堪、黄复生、吴玉章等的邀请，赴四川宣传男女平等，鼓励女生出国留学。11月，郑毓秀与张申府、蔡元培、陈大齐等人同船赴法国。郑还亲自带张振华等二十名女生赴法，并为她们筹措旅费，送至巴黎勤工俭学。其中张振华于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2月，郑毓秀在巴黎出版法文本自传《革命的回忆》（*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Revolution*）。

1921年法国经济低迷，中国留法学生生活十分清苦。2月中旬，中国驻巴黎领事馆突然通知于3月15日停发维持费。2月28日，十名学生代表要求驻法公使陈篆每月发给学生学费四百法郎，陈篆不允，双方发生冲突。1922年3月20日，郑毓秀生日宴会结束后，华法教育会秘书长李鹤龄在郑毓秀巴黎的住处行刺陈篆，郑尽自己所能帮助李鹤龄脱离险境。此外，郑毓秀还多方奔走，向法国政府及所认识的法国各界名流寻求援助，请求他们帮助中国留学生渡过难关。其中法国参议院参议员于格勒鲁夫人允诺给包括向警予在内的蒙达尼女子学校二十一名女生每月生活费三百法郎，一年为期。向警予1922年3月14日给中法协会的信中，多处提到郑毓秀在巴黎帮助她们解决困难的活动。9月，郑毓秀与方君瑛同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组织万国家庭教育预备公会的会议。1923年5月，国际妇女参政会第九次大会在罗马召开，女权运动同盟会派郑毓秀等前往参加会议，郑毓秀向大会详细介绍了中国妇女参政的情况，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称扬。

在参与女权斗争的同时，郑毓秀也未放松对法律的学习。1924年，郑毓秀写成《中国比较宪法》，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

为中国女子在欧洲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第一人。在法期间，她结识了江西青年学生魏道明。1926年郑毓秀回国后，和魏道明在上海法租界设立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开中国女律师之先例。由于郑毓秀受过欧洲法律知识系统训练，个性极强，机智伶俐，所以很快在上海司法立法界获得显著地位。她曾利用自己的关系疏通法租界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大学教授杨杏佛；也曾作为著名女伶老生孟小冬的辩护律师，调解其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官司。同年，郑毓秀编著的《国际联盟概况》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年4月，郑毓秀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同年，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任命卢兴原为上海临时法院院长，成立这个法院的目的是要由中国法官审讯在租界中涉及中国人的案件。年底，北京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任命郑毓秀继卢兴原为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因卢兴原拒不离职郑毓秀并未就任。不久，郑毓秀担任法租界第二特别法院院长。

1927年春，魏道明任司法部秘书长，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不得不解散。郑毓秀后来追述说：法律界的伙伴关系结束了，而我们俩人间的伴侣关系却开始了。同年8月，郑毓秀和魏道明结婚。之后，郑毓秀被任命为上海法政大学校长。该校原是孙中山先生为培植革命建设的法政人才所建，郑毓秀担任校长后，制订了改进校务与扩展计划，并将自己在欧美考察时所搜集的大批世界最新法政名著全部捐赠给图书馆，同时也将自己所著的《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作为学生的教科书，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

1928年初，南京当局派郑毓秀去巴黎，了解法国政府对处于激变中的中国政府的态度。12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郑毓秀获任为第一届立法委员，是仅有的两位女委员中之法学专家，另一位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1929年1月，郑毓秀被任为建设委员会委员，3月又被选为赈灾

委员会委员。同时，郑毓秀还被推为民法起草委员会五委员之一，与傅秉常、林彬、史尚宽、焦易堂共同拟订《中华民国民法》五编。为了在民法中增添保护妇女权益的内容，郑毓秀浏览了大量的欧美有关法律，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结合，写进草拟中的民法条款中。她本着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在《民法》条款中，规定未婚、已婚女子，与男子同享平等的继承权；承认夫妻彼此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规定家庭中未婚成年女子有权签订或废止婚姻契约；已婚妇女有保留自己的姓氏，不冠夫姓的权利等。近代的“立法”尽管夹杂了许多封建主义的因素，但较之中华法系的旧法，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尤其是郑毓秀将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中国的法律条文，并通过法律把男女平等、普及教育、一夫一妻等民国妇女解放的新观念在《民法》草案上得到落实，这是郑毓秀对中国法制发展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郑毓秀任立法委员，兼任教育部次长。她还协助宋美龄策划战时工作，组织妇女慰劳三军将士，救护伤患等无不悉力以赴，劳瘁不辞。1942年9月，魏道明任驻美使馆职员，郑随魏赴美。不久，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积极参加社会救济工作和公共事务。1943年初，宋美龄访问美国，郑毓秀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之后出任“各国援华会”名誉主席。深谙政治的罗斯福夫人称赞郑毓秀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外交大使夫人。继任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虽不过问政治，但也和郑结为知己。此间，郑毓秀又以女法学毕业生列名于美国大学生联合会第七批妇女协会会员。1943年，郑毓秀又出版英文自传《我的革命生涯——魏道明夫人自传》（*My Revolutionary Year*，*the Autobiography of Madame Wei Tao-ming*）。

抗战结束后，郑毓秀夫妇回国。1947年，郑再次被选为立法院委员。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期间，郑毓秀随夫定居台湾。1948年，郑毓秀夫妇移居美国，先在纽约，后在南加利福尼亚。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因癌症于洛杉矶辞世。

主要参考资料

唐冬眉：《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王惠娅：《近代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暨律师》，台北《侨光学报》第15期（1997年）。

《国际妇女参政会第九次大会经略》，北京《晨报》1923年8月28日。

周蜀云：《中国第一位女博士的故事——郑毓秀叱咤政坛》，秦孝仪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6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

徐辉琪：《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纪事》，《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李宗侗：《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

郝铁民：《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郑正秋

张洁

郑正秋，原名伯常，别号药风，广东潮阳县人，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幼年被上海一个贩卖鸦片的巨商认领为“螟蛉子”。郑少时聪慧过人，十四岁时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成年后参与其义父的鸦片生意，成了一个很会赚钱的少老板。但后来由于“所托非人”，资产亏蚀过半。

清末，郑正秋因对清廷的政治腐败不满，和一些革命人士相结识。那时他对京戏很感兴趣，经常出入各大剧场，并以“正秋”为笔名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民呼》、《民吁》和《民立》报上发表剧评，这是上海出现“剧评”的开始。

1912年底，京剧著名演员谭鑫培在上海新新舞台演出。因年老体弱，唱做衰退，观众李午初喝了倒彩，引起新新前台老板黄楚九的恼怒，率众殴辱李某，引起诉讼。郑为李鸣不平，在报上写批评文章。从此，他就被人看作“不畏强御的剧评家”[(1)]。后来，他一度出任上海《民言报》的戏剧编辑，又在当时的《民权报》、《中华民报》等开辟专栏，发表戏剧评论文章。后自办《图画剧报》，主张改良旧戏，提倡新戏，认为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从这时起，他开始与新剧发生关系。

1913年，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张石川认为郑正秋是自己经营电影生意最好的合作者，因而邀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组成新民影戏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搜罗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业务。这时，郑编写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

是根据郑“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观点，以郑家乡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当时还没有女演员，所有角色全部由男演员担任。由于这部影片抨击了当时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所以1913年9月底在上海新新舞台首次放映时，曾轰动一时，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共鸣。随后，他因与张石川意见分歧，离开电影界去从事新剧活动。

同年底，郑正秋组成新民新剧社，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剧目有郑自编的《恶家庭》、《火浣衫》、《义丐武七》等，其他还有《遗嘱》、《家庭恩怨记》、《婚变》、《血手印》、《恨海》、《爱之花》，以及一些外国家庭故事剧如《空谷兰》、《梅花落》等约三十余出。这些剧目的内容，大都是描写有关家庭和婚姻问题的。由于“浅显易懂，颇多兴味”，因而“男女老少，个个欢迎”[(2)]。

郑正秋在新民新剧社，一面当老板，一面当编导和演员，能胜任多种角色。如在《义丐武七》中扮“武七”，在《武松与潘金莲》中扮“武大郎”，在《恶家庭》中扮“老太太”等，都能演得惟妙惟肖，得到好评。但新民新剧社因敌不过张石川、经营三组织的民鸣社的竞争，一年后被迫并入民鸣社。从此郑不愿再负领导责任，专做演员和编导。

1915年，郑退出民鸣社，另组大中华新剧社。1918年又组织药风剧团在舞台演出。1919年参加笑舞台和平社新剧部。至1921年，他曾一度登报脱离新剧界去做交易所生意，结果一败涂地，又回头重新搞新剧。

在近十年的新剧活动中，郑所编演的新剧，虽标榜“改良风俗，破除迷信”和“改革社会，教化群众”，而实际上则相反。因此，剧评家啸天曾对此提出批评，说所演新剧，“除家庭儿女外无剧本，除妒杀淫盗外无事实，除爱情滑稽外无言论”，并“未能导人为善”[(3)]。1918年郑在《药风敬告》一文中也发出过慨叹说：“新剧为我国所必当有者，因社会万恶，不可无药药之耳。乃剧人不德，使吾有新剧万恶之

叹。”最后还说他想筹几十万资本，编演正当的小说戏。随后，郑编演过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新剧，如《隐痛》、《石家庄》、《桃源痛》、《蔡锷》、《中山被难》、《窃国贼》、《徐锡麟秋瑾合传》、《女学生的觉悟》等，都具有较好的内容，风格有所变化。

1922年，郑和张石川、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又合作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他们都感到影戏潮流将来势必发达，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另一方面，在郑说来，仍把电影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4)]。在制片方针上，郑仍主张艺术应“教化群众”，强调应摄制“长片正剧”[(5)]；但张石川却认为这种理想只应先作尝试，从业务发展着想，仍应“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6)]，郑不得已而屈从之。

郑在“处处惟兴趣是尚”的方针下，先后编写了《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但这些低级趣味的影片并不受观众欢迎。明星公司营业不振，经济情况岌岌可危，只好回头采纳郑正秋拍摄“长片正剧”的主张。于是郑又开始编写宣扬“改良主义”的所谓“社会片”，其主要思想不外是“教孝”、“惩恶”和“劝学”之类。他的第一部创作是1923年完成的《孤儿救祖记》，由于在艺术上“全片富于影戏色彩”[(7)]，“带有较多的民族生活气息”[(8)]，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上映后颇为轰动，因而摇摇欲坠的明星公司的经济得以复苏。

《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后，郑于1924年编写了《苦儿弱女》、《好哥哥》、《玉梨魂》，1925年又编写了《盲孤女》、《二八佳人》、《一个小工人》、《小情人》、《上海一妇人》和《最后的良心》等。这些环绕“妇女问题”的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婚姻、蓄婢制度和娼妓制度的吃人罪恶，有其进步意义。

但在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之后的形势下，郑又开始趋向以武侠片为中心的创作以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口味，如《侠风奇缘》、《山东马永贞》、《黑衣女侠》、《北京杨贵妃》、《血泪黄花》、《梅

花落》等。郑将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火烧红莲寺》。此片在上海放映时颇为轰动，票房收入激增。明星公司见有利可图，三年之内竟将《火烧红莲寺》改编达十八集之多。从此，什么《火烧青龙寺》、《火烧剑锋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韩家庄》等等，一时“火烧片”空前泛滥，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抨击。此后，郑虽表示不愿再与“武侠片”同流合污，但在1929年编演了《战地小同胞》后，又回到改编文明戏的老路上去，把《碎琴楼》、《桃花湖》、《红泪影》等搬上银幕。

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郑思想上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带有悔悟的心情说：“横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条是越走越狭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时代前进的，走死路是背时代后退的。”[(9)] 敌寇深入、民族危亡的形势下，神怪、武侠和鸳鸯蝴蝶之类的影片已失掉了观众，因此他曾积极主张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他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工作，曾在《明星月报》上发表过一篇《如何走上前进之路》的文章。

由于思想倾向上的改变，他的创作实践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1931年写的《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和1933年编写的《姊妹花》等，有了比较进步的内容。特别是《姊妹花》，剧中描写的贫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细腻通俗，当1933年在上海公映时，曾轰动一时，创造了连映六十余天的票房纪录。

郑自幼体质素弱，经常患病，为了解除痛苦，逐渐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至拍摄《姊妹花》时，他虽已戒绝烟瘾，但身体健康已每况愈下，难以正常活动，只能躺在床上进行导演。《姊妹花》问世后，1934年又勉力完成了《再生花》和《女儿经》里的一个片断，以及《热血忠魂》的部分编写工作，终于1935年7月16日病逝于上海。

(1)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

(2)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第69页。

(3) 上海《新剧杂志》第1期（1914年）。

(4) 上海《影戏杂志》第1卷3号（1922年5月25日）。

(5) 郑正秋：《明星未来之长片正剧》，《晨星》创刊号，1922年上海晨社出版。

(6) 张石川：《敬告读者》，《晨星》创刊号。

(7) 上海《申报》1923年12月26日。

(8)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9) 上海《明星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

郑振铎

陈福康

郑振铎，常用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生于浙江永嘉（温州）。郑振铎出身贫苦，童年时父亲亡故，依靠母亲针黹零活的微薄收入，勉强读到中学。1917年夏到北京，考进铁路管理学校，为官费生，寄居在叔父家。课余常到附近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阅读社会学和文学书籍，接触到新思潮和俄国文学，并在那里先后结识了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振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6月，学校因五四运动提前放假，他被迫回到温州。他在温州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和“永嘉新学会”，创办《救国讲演周刊》和《新学报》。暑假后回校，11月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原具有宗教色彩，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日淡，郑与瞿、耿等人参加进去，逐渐使之成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进步团体。他先后任该会编辑部副部长和部长。他在《新社会》发刊词里，提出要创造一个“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社会”。该刊虽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但充满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1920年5月被北京政府的京师警察厅以“主张反对政府”[(1)]的罪名查禁。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但仅出一期，因青年会方面胆小而被迫停刊。在此期间，他还与瞿秋白一起，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秘密学习小组的活动[(2)]，并参加过进步社团“曙光社”。他在1919年12月《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等译文，是我国较早译成中文的列宁著作。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后来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小说月报》第十二卷

号外上。他还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3月30日团的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出版委员，与李大钊等一起负责宣传出版工作[(3)]。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郑振铎对文学的爱好，他阅读了很多英文版的俄国19世纪文学名著和进步文学理论书籍；在《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创作、评论及译文，并为“共学社”主编了《俄国戏曲集》等丛书。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圣陶、耿济之、周作人等共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任书记干事，负责经营会务，并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在北方组稿和审稿。

1921年3月底，郑振铎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任练习生。5月，经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他还在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编辑《学灯》副刊。5月10日，他负责编辑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也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创刊。同时，他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和《诗》月刊。1922年1月，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1月起，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新文学观的建设》等文章，与封建复旧的“载道派”和庸俗低级的“娱乐派”进行了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他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口号——“血与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4)]。

1923年3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同事周予同、顾颉刚等共十人，发起成立“朴社”，集资出版书籍。这以后，他在上海大学讲授文学课。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愤于当时上海各报对于如此残酷的大屠杀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因而于6月3日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主编了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该报发行所就设在他

家里。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街血洗去后》等著名诗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他愤然写了《停刊宣言》，指出“‘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表示要继续斗争。8月22日至29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举行大罢工，他被推选为工会代表和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由陈云领导的这一革命斗争。9月，他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旨在营救被捕革命者及帮助其家属。年底，为抗议反动军阀杀害工人领袖刘华，他与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并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1927年2月，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并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他参加抗议游行，险遭毒手，得工友掩护才脱险。14日，他与胡愈之等共七人撰写了一封抗议书，谴责蒋介石等人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5)]。因为白色恐怖，郑于5月被迫只身远走欧洲，在法、英等国住了一年多。他离开祖国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散文《离别》，表示这是“暂别”，不久即将以更猛烈的力量来加入国内的斗争。他在国外抓紧时间学习、观察和著述，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外，还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编著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以介绍世界重要考古发现，同时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郑振铎于1928年10月回国后，即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他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执教。1931年9月，他应郭绍虞的邀请，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并代理中文系主任；一度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年7月，他提议创刊了继《小说月报》以后全国最大的进步文艺刊物《文

学》月刊；次年1月又与章靳以一起在北平创办并主编《文学季刊》，为的是有些进步作家的文章不能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时，可以拿到北平来发表[(6)]；10月，又参与创办文学刊物《水星》月刊。在北平期间，他撰写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六十章），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很受读者欢迎；还创作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借希腊神话题材热烈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另外又编辑出版《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还和鲁迅合作编选出版了《北平笺谱》等。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因聘请进步教员而遭到顽固势力的忌恨与攻击，被迫辞职，于1935年4月回上海，8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期间他编辑综合性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并参加了鲁迅主持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编辑出版工作。1936年，他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桂公塘》、论文集《短剑集》等著作。

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文化围剿”中，郑振铎于1935年12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6月，与周扬、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四十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和鲁迅、沈雁冰等共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1月，鲁迅逝世，他亲往参加入殓仪式和执绋送殡，并参加“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7月，郑振铎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于8月和郭沫若、邹韬奋、沈雁冰、胡愈之等共三十人合编该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次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

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11月侵占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郑振铎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等共二十人组织“复社”，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选集》、《西行漫记》、《联共党史》等书籍。他并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

界，他在暨南大学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化名为“陈敬夫”，以文具商店职员的假身份蛰居起来，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斗争。他全力收购古书，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和保护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最珍贵的有《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书。在这期间，他编写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还以“玄览居士”、“纫秋山馆主人”等名影印出版了不少珍贵古籍。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积极投入检举揭发汉奸的斗争和清理文物图书的工作。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亲美反共政策，因而不断遭到迫害，但他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1945年10月，他创办并主编了《民主》周刊，几乎每期都撰写尖锐的政论。他还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及散文《蛰居散记》（连载）。1946年1月，他和李健吾等人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4月又为《联合晚报》主编《文学周刊》副刊。10月，《民主》周刊被反动派禁止，他在“休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表示：“本刊虽然被生生的缢死了，但永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灿烂辉煌的。”这期间，他与马叙伦、周建人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他还与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与郭绍虞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为团结文化界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编辑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版画史图录》、《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表现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大型图集。

1949年2月，郑振铎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绕道香港，于3月18日到达刚解放的北平。4月，去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

长，嗣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领导全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他还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并主编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郑振铎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多次出国访问和讲学。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埃及进行友好访问，18日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不幸遇难。

郑振铎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数十年间节衣缩食，呕心沥血，收藏了将近十万册珍贵的图书。他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生前遗愿，将他全部藏书及其日记、手稿献给了国家。另外，他在解放前收藏的很多古代陶俑，生前即全部献给了国家。

---

(1) 参见郑振铎致张东荪的信，《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5日。

(2) 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又参见郑振铎1952年日记上的自编年谱。

(3)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和刘仁静的回忆。

(4) 西谛：《我们的杂记》（一），《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3年5月2日。

(5) 郑振铎等：《就“四一二”惨案对国民党的抗议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

书局1980年版。

(6) 靳以：《和振铎相处的日子》，《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钟荣光

李坚　余齐昭

钟荣光，字惺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66年9月7日（清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生。父钟玉龙原务农，后往香港从商。钟荣光自幼随父居香港。后至广州，随岭南国学家吴道熔学习，十七岁中秀才，1894年中举人。后在广州设馆教徒。

中日甲午战争后，钟荣光受到中国战败的刺激和反清思潮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结识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郑士良、区凤墀等，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896年加入兴中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同年，钟荣光与友人创办广东最早的报纸之一《博闻报》（后改名为《安雅报》）；以后他又创办《可报》，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抨击朝政的文章，不到两年，报馆即遭封闭。1898年钟荣光响应孙中山的主张，尽释家中的婢女和侍妾，并供他们读书[(1)]，一改过去纳妾蓄婢的旧习俗。次年钟荣光受美国牧师、格致书院监督尹士嘉（Oscar F．Wisner）的聘请，任该院汉文总教习[(2)]。当时史坚如是该校学生，参加1900年10月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在广州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不幸事败被捕。钟荣光闻讯后，曾通过尹士嘉转请美国驻广州领事等人多方营救。

1900年格致书院更名岭南学堂，迁澳门。这时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举国哗然。钟荣光在澳门联合海外名流一百五十人，致电中俄谈判代表李鸿章力主拒绝签约。1904年岭南学堂复迁广州，开始招收女生。女生没有宿舍，钟荣光让出自己的住宅两间给她们寄宿，积极支持大学男女同校。1907年，钟等代表岭南学堂赴日本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组织会议，顺道往华北考察教育，在天津被清政府以革命党图谋不轨罪名逮捕，拘押三十五天之久，经同乡营救，始得出狱。

钟荣光于1908年任岭南学堂教务长。这时，学校正在用纽约董事会的捐款兴建图书馆。他不愿仰赖外国人资助，于第二年往世界各地，向华侨宣传募款建校，并号召华侨子弟归国升学。募得款项后，建造学生宿舍和添置图书仪器。

1911年武昌首义后，11月9日广东光复。为了支援革命，钟荣光极力支持岭南学堂学生组织“岭南学生协助军政府筹饷队”，出发劝捐、宣传演说、演戏，捐得五六万元，上缴军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钟荣光以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出任广东省教育司司长。他大力推行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民主办学方针，改革旧学，提倡新学，废除尊孔读经，成立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革教学内容。他还增设公共体育场，设立图书馆，派巡回演讲队到各县宣传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3年9月派龙济光任广东都督。龙残杀革命党人，打击革命势力。钟荣光亦被列入黑名单，幸事先得知消息，藏在美国友人地窖中，黑夜逃到沙面，后乘美舰去香港转往美国[(3)]。

钟荣光在赴美途中，感怀时局，痛惜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撰《广东人之广东》一书，叙述民初要政及革命党人的新精神，揭露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暴政。此书在美国出版后，使海外华侨了解到袁世凯统治的真相，增长了支援革命的热情。

钟荣光抵美国后，入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教育学。1915年任纽约国民党支部长，并创办《民气报》，团结华侨，宣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岭南文理科大学成立，钟荣光于次年初返国后任该校副监督，为该校第一个中国负责人。1918年，钟荣光去南洋各地向爱国华侨募捐，为岭南大学兴建归国侨生的宿舍筹集资金。即于是年特设华侨班，招收回国华侨子弟百余人入学，为我国大学招收华侨学生返国就读之滥觞。

五四运动时，钟荣光兼任广东教育会副会长。他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广州学生示威游行，岭南学生组织的军乐队走在最前头；学生有被捕者，他设法进行营救；校内演出歌颂十月革命的话剧，他从不阻拦。

钟荣光有感于我国以农立国，而农业落后，广东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八成以上，而粮食不能自给，决心创办一所农科大学，以培养农业人才。他得到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的支持，由省财政厅拨款，于1921年成立岭南农科大学，任校长。校内设教学、试验、农业、推广四部分；分蚕桑、园艺、田艺、畜牧等系，校本部并附设果木种植场、实验农场。为在校外设分农场，钟荣光亲自勘察了许多地方，最后在潮安、香山（今中山）、海南定点。农场注意培植优良品种，出产的水稻、木瓜、柑橘、荔枝等，享有盛誉。农场还由澳洲引进桉树和银桦，大力育苗推广。农具方面，也引进一些美制割草机、手扶播种机、手扶除草机、手扶中耕机和手扶单铧犁等[(4)]。钟荣光还提倡在校内种竹，共种一百三十余种，其中有一种白粉单竹后来被命名为“荣光”竹，以纪念钟荣光对种竹事业的提倡。岭南农科大学对于造就农业专门人才，推广农业科学知识，介绍优良品种，改良蚕、稻品种，都有一定贡献。

孙中山很支持钟荣光的事业，早在1912年5月就到岭南学堂作《非学问无以建设》的讲演。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宋庆龄脱险到沙面友人家后，打电话请钟荣光帮助，钟立即派船接宋到岭南，后又转送至永丰舰会见孙中山。宋庆龄在钟的协助下，安全出走香港转往上海[(5)]。7月初钟荣光还到永丰舰给孙中山传送信件[(6)]。1923年孙中山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曾应钟之邀先后在岭南作过两次讲演。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钟荣光积极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黄埔军校建成后，不少岭南大学的学生参加军校。军校与广州之间的交通，主要靠水上轮渡，钟荣光将岭南大学的

码头提供军校共同使用。孙中山在广州其他学校宣讲三民主义，钟常常让岭南大学的学生整队前往聆听。

1925年6月“沙基惨案”发生，岭南大学师生参加示威游行，教员区励周和学生许耀章惨遭屠杀，岭南大学出现爱国反帝热潮。英籍副监督白士德（Alexander Baxter）发表为帝国主义暴行辩护的言论，受到学生的强烈谴责，被逐离校。这时钟荣光在美洲，次年6月他返国，适值“沙基惨案”一周年。他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帝国主义，积极支持师生的爱国行动，引起学校美籍人士的不满，说他反对美国人。这时，爱国师生又提出收回教育权，钟荣光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在大革命风暴的影响下，纽约董事会被迫将岭南大学交回中国人自办。1927年1月私立岭南大学校董会成立，钟荣光被选为校长兼校董会主席。1930年，外国教会创办的博济医院并入岭南大学，为纪念孙中山而改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钟荣光积极筹款扩建医院，经各方奔走，医院于1935年建成。

抗日战争爆发时，钟荣光已年逾七旬。1938年他宣告退休，担任岭南大学名誉校长，迁居越南海防。同年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多次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40年日军进犯越南，钟荣光迁居香港。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钟荣光身陷敌境，心脏病日重，于1942年1月7日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南大与华侨》第1—12卷。

《岭南大学校报》第1—126期。

---

(1) 《纪念钟荣光先生特刊》，岭南大学1947年印，第4页。

(2) 陈序经：《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1964年版，第42页。

(3) 祝秀侠：《钟荣光与岭南大学》，《中外杂志》。

(4) 谭锡鸿：《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农学部》，《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172页。

(5)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6) 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余年间粤局之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1961年版，第29页。

周宝箴

张钧陶

周宝箴，四川江北县人，生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清末民初经营复兴和炭厂达二十余年。

复兴和炭厂初名甲子洞，乃其先世周世瑜从湖南原籍来川，于1741年创办，矿在江北县二岩，煤藏丰富，煤质尤佳。周氏子孙世代相传，后改名兴隆公炭厂。百来年间，获利颇丰，先后开办了窑罐厂、酿酒厂、织布厂、造纸厂，以及贩运粮食和木船运输等业务，置田产一万余亩。然子孙管理不善，加以同、光年间嘉陵江两次洪水为害，炭厂冲毁，损失不赀，生机濒绝，一筹莫展。这时，以周宝箴为首的一批有钱有势的族人，组织策划，另谋出路，于1904年把兴隆公炭厂租赁过来，改名“复兴和”，继续经营。

周宝箴经营“复兴和”，资本总额为8500两，外股约三分之一，大都是原来兴隆公炭厂预收煤款及所欠米账的债权人，以债权转为投资；其余三分之二，均为房族股东。当时重庆工业渐兴，航运需煤日增，井下采掘的煤层亦转丰厚，营业开始兴旺，年年获利。经营了十年，到1914年，增资为15300两，牌号加上崇记，工人增到一千以上，日产煤二百余吨，有十家行商组织代销，进入了“复兴和”的黄金时代。1924年资本总额再增到18500两，易牌号为“竣记”，排挤了外姓股东，增加了新的家族股东，再度独占了煤矿。

周宝箴经理“崇记复兴和”，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散兵土匪四处窜扰，他为维护周氏家族利益和炭厂的经营，买枪招兵，保厂保族，迅即以办剿匪驰名江北县。当时遍地匪警，但是二岩周围几十里，由于他的势力，无匪来犯，许多地主都来二岩居住，借以得到保护。他掌

握了整个北碚所辖区域的地方团防武力，为军阀办招安，号称“江防司令”。他照每挑煤炭抽办团费五十文，以团防武装力量替地主豪商们保镖，护送货船到合川一带，颇有声势，成为军阀防区的风云人物。

周宝箴与地方军阀声气相通，互为勾结，尽管处在混乱局面，“崇记复兴和”继续垄断了铜元局和川北一带的销场，年平均利润在30％以上。1920年，川、滇、黔军阀在四川混战时，铜元局为黔军袁祖铭占据，将全部煤船劫持军用，煤商损失綦重。上游来重庆买煤的木船不敢再来，川北销路遂告中断。但周宝箴凭借地方势力，善于应付环境，且为军阀策划军费，因而业务并未受到很大影响。

1919年，周宝箴拨巨资与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旅长林翼如、二十一军刘湘部军需处长洪渊泉等大小军阀伙办同人益炭厂、开采合川麻柳坪隔蚤孔煤窑，自任经理，结果因距离较远，兼顾乏力，亏本两万多银元。1923年，周又与上述诸人组织嘉陵汽船公司，买汽船两艘，开办重庆至合川的短航客运，又因不谙业务，照料不周，折本一万余银元。由于他与上述诸人关系密切，在折伙算账时，都由他应付了事。他在经理“崇记”时，还通过四川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刘国华，获得由实业厅发给的临时矿权执照，以便于大量开采，不受任何阻拦。

周宝箴经营“复兴和”时，其经营方式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然其封建性质的经营遗风犹在。所沿袭下来的“把头”制度加以发展，将“碛头”（即采煤工作面）部分出租给“把头”和技术较高的矿工，由他们去招雇工人。周氏族人及其在职亲信，大多充当了“把头”。每个“把头”掌握矿工由几人到几十人，他们直接结付工人工资，自负盈亏，自取厂名，称为租客厂。于是由原来直接生产的“包箱”制，一变而为与矿主直接发生租赁关系的“把头”制，“把头”与矿主按产量分成，主佃双方各得一半。工人出力，“把头”渔利，矿主赚钱。矿工的待遇极苦，终岁勤劳，不得温饱。其有“跳厂”（即由甲厂跑到乙厂工作）

者，动辄遭非刑吊打，比军队惩办逃兵还酷。

1926年周宝箴病故。其子周雨槎接任经理，于1934年将“复兴和”改组成为复兴隆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资料

周家鼐等：《复兴隆煤矿史略》，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等编《重庆工商史料》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2年重版。

周凤岐

汪仁泽　陈光贻

周凤岐，原名源清，号恭先，浙江长兴县人。1879年6月24日（清光绪五年五月初五）生。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童年时，因家贫干过放羊、樵柴等活，后附读于族人周杏顾家。因其聪颖好学，塾师免收其束修，且寄予厚望，改源清名为凤岐。1900年周考取秀才，不久又补了廪[(1)]。

1903年，周凤岐考入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两年后毕业，留学堂任区队长。1906年春，经秋瑾介绍与夏超、俞炜等同入光复会。不久，在蒋尊簋所办的浙江陆军第二标任弁目学堂队官、学兵队队长等职，颇受蒋的器重。1910年，周被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进修。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周凤岐因军校遣散而回原籍。其时嘉兴、湖州地区盗贼蜂起，族人周峰帆等招兵保卫乡里，由周凤岐和长兴合溪警察所巡官夏超主其事。浙江光复后，新军第八十一标管带代理标统朱瑞率部驰援民军进攻江宁，周凤岐与夏超率千余人响应，被委为先行军，参加攻取南京。浙江民军凯旋回浙后，周部驻扎湖州。1912年8月，朱瑞继蒋尊簋任浙江都督，任周为都督府参谋长。1913年春，宋教仁被刺，不久“二次革命”爆发，驻甬独立第四十九旅旅长顾乃斌等人通电响应，但不久事败，顾等离职。朱瑞因曾宣布“浙江自保”，袁世凯以朱附己，于1914年6月30日授朱瑞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乃以周凤岐署四十九旅旅长[(2)]。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朱瑞附逆，浙人愤慨。次年4月，浙军旅长童葆暄与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等合谋发兵夜袭将军署，朱瑞仓皇

遁走。屈映光、吕公望相继代浙督，周凤岐曾在吕任内担任督军署参谋长，掌握督署大权。1917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为浙江督军，周凤岐反对，先图阻拒，后又谋倒杨，均告失败，因此两度去日本暂避。1919年8月杨善德病死，卢永祥继任浙江督军，翌年沈金鉴为浙江省长，周与沈熟识，经沈疏解，卢允既往不咎。周返国后，任浙江警备司令部总参议，并兼省道局局长等职，为卢所用，并逐渐取得信任。

1924年9月，江浙军阀混战，浙督卢永祥命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防守赣闽边界，卢自率北军一师及浙军王宾一旅防守苏皖边界；命周凤岐留守杭州。9月，闽军孙传芳部趁机入浙，占领仙霞岭一带，周和夏超在杭州密谋驱卢迎孙入浙。其时，潘国纲部军心不稳，该部石国柱团已与周暗通；伍文渊团也擅离防地衢州，使孙传芳大军得以长驱入浙。9月17日卢永祥被迫发出同意“浙人治浙”宣言，卢本人则移沪督师，浙江省长张载阳声明卸职，委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将所兼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一职委周凤岐代理。10月，周、夏迎孙传芳入杭州。孙为酬答驱卢拥迎之功，以夏超为浙江省长，以陈仪、周凤岐分任浙军第一、二师师长[(3)]。不久周部改为第三师，10月被孙传芳派往宁波，镇压“浙江自治委员会”[(4)]，后奉孙传芳命移驻江苏常州。

1926年7月北伐战起，已是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词暂取中立态度，企图坐收渔利。周凤岐曾建言孙响应北伐遭拒。8月下旬，北伐军攻克湖南岳州、湖北通城，吴佩孚军溃败。孙传芳感到唇亡齿寒，于8月30日颁发“援赣计划”，调周凤岐部为总预备队移守九江。不久江西战事转剧，周派参谋樊松甫向北伐军输诚。浙江省长夏超于10月中旬在杭州宣布独立；周凤岐则于11月初率部离开九江移师湖口，转向贵池，拟间道芜湖回浙。孙传芳获悉后，即命卢香亭师追至贵池截阻，迫令周部回驻常州；同时孙又派孟昭月师入浙，夏超兵败身亡，浙江独立受挫。12月

11日，周凤岐在衢州宣布就任北伐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职，并于19日在富阳宣告自治，但遭孙传芳军进击，退回衢州。随后周与北伐军刘峙等师配合，向金华、兰溪进攻。1927年1月18日，周被任命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周部2月2日进占金华，中旬向绍兴推进，曾在诸暨北之姚公埠与孙军激战，18日进占绍兴。

蒋介石到沪后，加紧策划清党反共政变，调周凤岐第二十六军到上海接防，4月8日颁布《战时戒严条例》，委白崇禧、周凤岐为淞沪戒严正、副司令。4月12日凌晨，帮会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周凤岐借口“工人内讧”，下令二十六军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打死打伤工人三百多人。次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罢工，数万群众示威游行，进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向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发还被缴枪支时，周即按照蒋介石的密令，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扫射，一时枪声大作，死伤枕藉，适值大雨如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5)]，造成“四一二”清党反共大屠杀事件。为了奖励周凤岐的反共行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先后任命周凤岐为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浙江省军事厅长和军委会委员等要职。

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杭州也发生政潮，张静江辞去浙江省主席，杭州市长邵元冲亦辞职他去。周凤岐在桂系的支持下于8月19日返杭州，代理浙省主席兼戒严司令，并将杭州市政府改组，控制了浙江的军政大权。但好景不长，他的大权独揽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忍；加之蒋下野后东渡日本，要求浙江省库拨款十万元作旅费，为周所阻难，也使蒋产生不满[(6)]。龙潭战役后，蒋的嫡系第一军向浙沪转移，陈焯任二十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何应钦任浙江主席，蒋伯诚为浙江军事厅长，周凤岐被迫辞去一切职务，闲居上海租界[(7)]。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周与冯驻沪代表戈定远联系，愿策动旧部反蒋。蒋则派张群往说，要求周中立，并允予以安排。周不为所动，称“蒋在一天我终不吃蒋的饭”[(8)]，蒋遂对周下通缉令。1931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1933年第十九

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周凤岐均参与其事。

1937年抗战军兴，蒋介石撤销对周凤岐的通缉令。11月9日周应白崇禧电邀，携抗战意见书赴南京要求面谒蒋介石，但逗留十余天，终未被接见。11月25日南京形势危急，周由南京回长兴家乡，28日长兴沦陷。日军大肆烧杀，周竟以不吃眼前亏为辞，劝亲友组织为虎作伥的维持会。1938年2月，周在日伪小汽艇护送下返沪事敌，其子周斯男曾跪泣劝父义不投敌，国民党军统人员亦早已注意其行动。1938年3月7日下午，周准备乘汽车外出之际，突遭狙击，身中八弹，当场毙命[(9)]。

---

(1) 《周凤岐事迹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3年版。

(2) 斯道卿：《浙军十八年的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3) 上海宏文图书馆编著：《江浙战史》，1924年版。

(4) 《浙东独立事件经过》，《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期，第5—6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稿》（1927年4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周凤岐事迹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3年版。

(7) 《申报》1927年10月1、2日。

(8) 《周凤岐事迹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3年版。

(9) 《申报》（汉口版）1938年3月8、10日。

周佛海

闻少华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1897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其父周夔九曾入湘军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晚年赴闽任莆田县知事。周佛海幼年丧父，他和弟妹三人由其母抚育。

周童年在乡村私塾读书，1912年考入沅陵高等小学。次年因欺负新同学受到谴责而自动退学，旋转入长沙兑泽中学，随后又转入沅陵中学。

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周佛海得到师友资助旅费，前往日本求学。到东京后开始学习日语和其他课程。1918年5月6日，东京中国留日学生集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日警殴打并被捕多人。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数主张罢学回国，周也不例外地回到国内。因生活无着落，经人介绍到在奉天（今辽宁）安东县办厘金的一个同乡那里谋事，孰知到后实无事可做，所看到的是“满目芦苇，几家土屋”，感到“前途渺茫”，“几欲跳海自尽”[(1)]。两个星期以后，他又回到东京，经过短时间的准备，竟侥幸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官费生。一年以后，预科毕业，周被分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读书以外还给中华书局译些书稿，并给《解放与改造》杂志撰文，挣些稿酬。

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等论著相继出版，周佛海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这股新思潮的影响，“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

觉信仰起来”[2]。

1920年周佛海由日本返国。原打算回湖南省亲，正碰上湖南发生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驱逐祸湘的张敬尧，交通梗塞，他只好滞留上海。这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军阀当局所不容，也避居上海。周佛海通过张东荪的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又结识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发生了兴趣。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佛海以留日学生党员代表身份参加，会后仍回日本。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他又升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于1925年5月毕业回国。

周佛海入党后也曾对马克思主义做过肤浅的探讨，在比较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后，认为“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国几等于零”[3]，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的全面合作。这时戴季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周佛海系应戴的约请由日本返穗的，不久任宣传部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月支薪水240元。按当时规定，共产党员在社会任职有薪给收入者，须交纳部分薪水作为党费。周妻杨淑慧却说：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早就有退党打算，为此，他拒绝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曾对周进行教育挽救，但无效。为纯洁党的组织，9月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脱党后的周佛海，为了表明他要当一名“国民党的忠实党员”，他纠集广东大学的几名教授，创办《社会评论》，以攻击共产党为能事。1925年，他还在《孤军》、《独立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的反共文章。

北伐军于1926年7月由广东出发，10月攻克武汉，周佛海通过戴

季陶的介绍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信任，委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这时国民党内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周除向蒋秘密汇报武汉情况外，决心寻机逃离大革命中心的武汉。

1927年5月，正当夏斗寅叛军逼近武汉时，军校学生开赴前线作战，周奉命在校留守，因得以伺隙由汉口携眷搭乘英轮潜逃。但在上海上岸时，却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经过其妻杨淑慧多方奔走，找到上海特派交涉员郭泰祺及王世杰等人疏通，并经吴稚晖、戴季陶等人营救，监禁半个月后得到释放。

周佛海获释后，蒋介石任他为筹备中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同年8月，南京政府中蒋系与桂系矛盾加剧，蒋不得不宣布下野，随后到日本。周失去靠山，也去职离宁赴沪。此时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周遂应召赴粤相助。不久又回沪，奉蒋命与戴季陶、陈果夫等创办政治评论刊物《新生命月刊》。

接着，周又创办了新生命书局，《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即在此时完成。

蒋介石于1928年复任总司令后，周又被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夏北伐战争告一段落，7月蒋到北京西山碧云寺祭灵并酝酿编遣军队问题，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随行。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召开，周佛海被指派为党员代表。这时正是蒋桂战争前夕，周为蒋草拟讨伐李（宗仁）、白（崇禧）的宣言，并随蒋出发到武汉。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告终，周因反桂有功，被蒋任命为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次年在蒋、阎、冯中原大战中，周则忙于为蒋草拟通电、宣言和宣传大纲。

1931年3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蒋不

顾胡的反对，于5月召集国民会议，形成宁粤对立。国民会议后，周又随蒋赴江西“剿共”。11月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周佛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宁粤妥协的结果，蒋介石再次下野。蒋在下野前安排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并徇顾的请求任命周佛海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2年蒋与汪精卫合作重新上台，汪任行政院长，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于1935年继陈公博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此前他还参加秘密组织蓝衣社的活动，是“中统”特务首领之一；同时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之一，成为蒋氏贴身机要人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7年1月汪精卫兼程回国，周佛海与邵力子等奉命去香港迎汪，汪、周彼此引为同调。

“七七”抗战爆发后，周佛海对抗日抗争前途悲观绝望，他认定“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八一三”后，周与来南京西流湾八号住所的客人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高宗武等大唱和平低调（即鼓吹妥协投降），胡适感到此处的气氛与外面大不相同，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同年年底，周佛海与陶希圣等在汉口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该会网罗所谓文化界人士，制造反共降日的舆论，并先后在长沙、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周佛海从此就转而成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的主要骨干了。

从1938年初到年底，围绕着中日战争，日本政府对蒋、汪进行诱降分化。7月，周瞒着蒋介石秘密派高宗武、周隆庠由香港到日本，试探对日妥协的途径与条件，高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国会议员犬养健等多次晤商。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收拾时局的对象。汪精卫、周佛海得知上述消息，并获悉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汪、周对此心领神会，于11月决定授权高宗

武、梅思平再往上海，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及出逃的计划。27日，梅思平由上海经香港到重庆，向汪精卫送交与日方签订的秘密协议。

12月5日，按预定步骤周佛海由重庆飞往昆明为汪精卫做出逃的准备工作。18日汪精卫等由重庆飞往昆明。次日，汪精卫偕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对汪进行公开招降。27日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携汪精卫声明电稿由河内到香港。29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发出《艳电》，31日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刊出，标志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一伙人公开叛国降日。

1939年5月，汪精卫由日本人保护从河内到上海，周佛海等与汪会合，旋即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开始伪政权的筹建工作。

为了制造舆论，7月9日汪精卫首次在沦陷区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周佛海也精心炮制了《回顾与前瞻》的长篇文章，为敌人张目。周佛海分析当时对时局有三种观点：“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他的根据是“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4)]，表明他是个民族失败主义者和民族投降主义者。

周佛海不只是做些汉奸理论的宣传，在准备汪记伪“六大”时，他还组织了“学艺研究社”，作为收罗汉奸的机构，派罗君强为总干事，一时投机政客、国民党失意分子、无行文人均逐臭前来，周佛海则一律予以接待，发给生活津贴，留作伪政权成立时之用。

汪伪政权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敲响开场锣鼓，周佛海沾沾自喜地说：“第三次中政会，通过中央各院部会人选，余所预拟者，大体

均照样通过。此次中央，实余助汪先生组成。”[5]

周佛海叛国投敌，他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周在伪政权中曾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暨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财政部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等要职。

周佛海落水当汉奸后，兜售汉奸理论，拼凑汉奸班底；对于人事、外交、军事、财政、特工等大权，无不力求控制。

周佛海不遗余力地培植私人势力。早在1939年秋，他即笼络易次乾、耿嘉基、罗君强、金雄白等结为“金兰之谊”。汪伪政权成立后，周又与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金雄白等十人结成小团体，把他们安插在各伪部、会内，使其成为周的耳目，从而使周佛海的个人势力渗透于各个角落。

周佛海对特工组织也不放松控制。汪伪特工总部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就是由周一手拉进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在汪记六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又顺利通过建立特务委员会的组织，自兼主任委员，直接控制特工总部。

汪伪的主要“外交”活动就是和日本主子打交道，周佛海很轻易地操纵了“外交”大权。伪政权建立后，外交部长名义上由褚民谊担任，但重要交涉仍由周与日本直接进行。褚民谊曾就《中日关系基本条约》的签订情况说：“这件事由周先生（周佛海）和影佐大佐二人去办理，不用我操心，等他们谈妥后，我来盖章。”[6]

周佛海还将他的权力触角伸向军事方面。伪政权成立后，周设法成立了“肃清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下设“和平建国军总指挥部”，其任务是收编投靠汪伪的各种杂牌武装。其后周又筹建直辖于自己的税警团，由周的亲信罗君强主持实际工作，周自兼团长。把税警团搞

成一支训练有素，装备较好、拥有几万人的汉奸武装。

财政金融是周佛海全力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伪政权建立后，周出任财政部长，其亲信则分任盐务、关务署长。1941年在周佛海策划下，又筹建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他兼任总裁，并在上海、苏州、蚌埠、扬州、广州、武汉等地建立分行。

汪伪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于1941年6月，在南京设置“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为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为副委员长。“清乡”前后进行了三期，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同年8月，周佛海与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土桥拟定《长江下游地带物资统制暂行调整要纲》。建立隔绝地带，对某些物资实行封锁，并实行食盐按人口配给制度。汪、日还联合成立中央及地方物资统制委员会。

但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投机成性的周佛海眼看大势不妙，又想投入蒋介石的怀抱，进行政治投机。1942年10月，周派军统特务程克祥去重庆，向蒋介石输诚，通过戴笠面交其亲笔信。信中表示希望沟通宁、渝之间的联系，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希望宁、渝合流。1943年3月5日，周佛海在上海会见被捕释放的吴开先，准其返回重庆，要吴向蒋介石“相机传达和平意见”[(7)]。5月，程克祥由重庆返上海，带回电台及译电、报务等人员，并向周佛海报告会见蒋介石、戴笠等人情况。以后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周和戴笠之间信使往返不断。

周佛海迎合蒋介石的反共心理，11月25日会见胡宗南驻上海代表洪复礼，详细讨论了联合反共和阻止长江南北两岸地区新四军发展问题。1944年2月13日，周佛海在接见伪政治部保卫局副局长胡均鹤时，令其今后“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8)]。4月3日，周委托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人员葛湛侯去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实现中日全面

和平及蒋、汪联合反共的意见。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周佛海又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5年1月，周兼任上海市长前，曾征得戴笠同意，周同时还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保安司令等职；派他的心腹罗君强任上海市秘书长兼财政局长。

2月23日，周佛海、陈公博召集一次以反共为目的的军事会议，庞炳勋、孙良诚等伪军头目参加。会议详细讨论了汪、日军事协定，议定：美国如在中国登陆，日军则全力抵抗，汪方军队则主要对付八路军、新四军。3月11日，顾祝同派谢企石会见周佛海，转告国民政府“咸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决定接受苏、美、中、英四国《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命令他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等伪军，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

周佛海受宠若惊，19日他声称已奉命任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并成立了行动总队司令部。他宣布：（一）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委员长（指蒋介石）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二）与治安有关之集会等行动，未经本司令部核准，不得举行。（三）对已停战之日军及日侨，不得侮辱或伤害。（四）人民纳税之义务，仍当履行，不得借词拒纳。

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9月30日军统局还是将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汉奸软禁起来，并由军统局长戴笠用飞机亲自押往重庆白公馆，后又以叛国罪转移到南京受审。在审讯中，周佛海狡辩说：他参加南京伪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10)]。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周不服，多次申请复判。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死去，周佛海的处境更为不妙（因戴是周在抗战期间与重庆联系的重要人物），他哀叹："雨农（戴笠的字）死，我也完了。"[11] 不过周佛海在1947年3月26日仍然得到蒋介石的特赦令，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12]，周佛海因心脏病和其他并发症，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主要参考资料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5年版。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大同书局1927年版。

陈公博、周佛海著：《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版。

《周佛海先生论文集》，"中华日报丛书"之四。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1937年7月至1945年6月（缺193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周佛海狱中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4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1960、1961、1964年版。

(1) 周佛海：《苦学记》，《往矣集》，平报社1945年版，第15—16页。

(2)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往矣集》，第27页。

(3)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大同书局1927年8月版。

(4) 周佛海：《回顾与前瞻》，《周佛海先生论文集》，中国日报馆版，第4—5页。

(5) 蔡德金编：《周佛海日记》“1941年3月22日”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6) 田守成：《褚民谊和汪伪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1年重印本。

(7)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8)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39页。

(9)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67页。

(10)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4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年版，第106页。

(11)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4册，第102页。

(12) 周之友：《周佛海浮沉录》（田伏隆主编《湖南文史》第37辑，1990年版）认定周死于正月初五，即2月14日，可供参考。

周鲠生

虞崇胜

周鲠生，原名览，湖南长沙人。1889年3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位塾师家里。周鲠生家境贫寒，四岁时母亲去世，十岁时父亲亡故。他幼年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跟读，父亲去世后，在父执资助下于1900年进了谭延闿在湖南创办的省立第一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06年被送到日本留学，先学实业，后来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辛亥革命爆发前，周鲠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从日本回国，撰文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积极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1912年元旦，湖南都督谭延闿拨款，由黄九言、曾毅、杨端六等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创刊[(1)]，周鲠生与李剑农等受聘任编辑。袁世凯继任民国大总统后，该报由于抨击军阀专横跋扈，反对独裁统治，不久被查封，编辑人员遭通缉。周鲠生在国内无法立足，于1913年7月由上海出国。周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法国学习的周鲠生参与了巴黎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包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住所，阻止和会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

1921年，周鲠生由巴黎回国，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翌年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在这期间，除教学外，潜心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1924年末，全国掀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周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出来，以《不平等条约十讲》为名出版；同时在《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论

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是年底，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决定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周鲠生开始时对段此举抱有幻想，他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一文中写道："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之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察。"[(2)] 可是，善后会议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平民主的秩序并没有实现。周鲠生的幻想破灭了。他在《时局的危机》一文中说："总之，今日时局的危机已经是很明显的，执政府和善后会议似乎全没有应付这个危机的决心和能力。国人最初对于段政府召集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的希望，一天薄似一天。"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根本的方法，是在民众势力的组织上做工夫。无论时局变化如何，毕竟国事还须得国民自己来负责；非到人民觉悟到自己责任和利益，而其努力有确实的组织时，恐怕特别势力总不会消除，政治总不会上民治自由的轨道的。"[(3)]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周鲠生参加了筹备工作。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他到南京担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后来他被聘参与制订宪法的工作，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个月后以"不愿从政"为辞自动退出。

1929年9月，周鲠生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1935年1月担任该校法科研究所主任，同年10月改任法律系主任。1936年任该校教务长兼法律学系主任，直至193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周鲠生除了讲授宪法、外交史、国际公法等课程外，仍然致力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写成并出版《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

政治概论》、《国际公法之发展》、《万国联盟》、《领事裁判权》等专门著作，以及《近代国际政治小史》、《法律》等小册子。在这些著作中，《国际法大纲》一书是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国际法的教学编辑出版的，内容繁简适中，要点俱备，书首附有基本参考书目，书末附载文献资料，是各大学和法政专科学校的基本教材。《近代欧洲外交史》夹叙夹议，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将近百年来国际风云，各国外交政策，著名外交家的活动，尽收书中，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由于供不应求，很快增订再版三次。《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公法之发展》等书，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势，均有详尽论述，且见解独到。

周鲠生研究国际法，不只是停留在评介国际法典及国际法的发展变化上，也很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他曾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国际和平秩序，在《东方杂志》、《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法及时评的文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一个调查团，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五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国联所谓调解的骗局。他在文章中指出："东省事件发生以来，快到一年有半的时日，中国自始即依赖国联，不但迄今尚无解决，日本的暴行且有加无已。所以中国人对国联的失望，甚至唾骂国联……亦在情理之中。"(4)

不久，某些国家企图通过吸收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加入"国联"，以取得与日本的妥协。周鲠生对此非常气愤，他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一文中，根据国际法关于一个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引用《国联调查报告书》中称，满洲国"其主要政治及行政权，均操诸日本官吏及日籍顾问之手"，揭露了企图将伪满洲国作为独立国家

吸收入“国联”的阴谋。他呼吁全国人民坚持不承认伪满洲国，以“对于日本的侵略政策构成一个法律的大阻碍”[5]。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国联”终至不敢吸收伪满洲国加入。

1939年，周鲠生赴美讲学，并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4月他担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美国期间，他根据自己多年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结合世界各国学者对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写成《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在国外出版。

1945年夏，周鲠生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为抗战取得胜利而兴奋，准备为繁荣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武汉大学三五级同学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下“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的题词[6]，以示对学生们的嘱托和自己的决心。可是，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挑起内战，人民的和平愿望破灭了。此后，国民党政府因战争经费激增，大量削减教育经费，武汉大学每月的教育经费不够支付水电之用。为了使学校教育工作不致停顿，周鲠生动员全校师生员工想方设法，维持学校工作照常进行。周对于进步学生所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爱国运动，表示同情。1949年4月，白崇禧对周鲠生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要注意。周说：“武大的情况我清楚，说那里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那里有几百个中共党员，那不可能。”[7]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搬迁武大的阴谋。在学校安全互助团、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的团结应变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共渡难关”[8]，使武汉大学的教研设备和图书资料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以后又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周鲠生虽已逾七旬高龄，体弱多病，仍然不辞辛劳，抱病坚持著作，在原著《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写成了《国际法》一书，约六十万字，概括了近代和现代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详为论证，受到后学者的重视。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附注：本文的写作曾得到周鲠生的女儿、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如松，周鲠生的同事燕树棠，周鲠生的学生、武汉大学法律系姚梅镇、李谋盛、杨鸿年等的帮助和提供资料，特此说明。

---

(1) 刘运祺等编：《辛亥革命诗词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注①。

(2) 《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20日。

(3) 《现代评论》第1卷第13期，1925年3月7日。

(4)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3号，1933年3月。

(5)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1号，1935年1月。

(6) 《国立武汉大学民三五级同学录》。

(7) 吴仲炎：《武汉大学在解放前夕的应变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0年版，第110页。

(8) 吴仲炎：《武汉大学在解放前夕的应变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0年版，第110页。

周谷城

汪仁泽

周谷城，湖南益阳人。1898年9月1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生。祖辈世代务农。周谷城七岁入周氏族立两等小学，既学经史古籍，又读英语、算学等课。1915年入中学，读了四年，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一面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一面利用罢课停学时间广泛阅读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的书籍。

周谷城于1921年毕业后，任职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执教英语和伦理学，并撰著《生活系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出版；译著《实验主义理论》、《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也先后出版。他与湖南一师小学部主任毛泽东时相交往，开始从埋头执教著述转向关心国家大事。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活动，来往于长沙、武汉、上海、广州等地。他曾同徐特立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并在船山学社任教，参加省农民协会任顾问，又任省农运讲习所教员。1927年春，在武汉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任宣传干事，曾发表《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受到邓演达等的赞赏。周并任自修大学的教员，所著《农村社会新论》一书也在这时出版。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遭到通缉，乃避走上海租界。他对革命的热情未减，同情和支持邓演达等另组新党继续革命。他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以所得稿酬维持生活，先后撰著出版《中国教育小史》（1929年）、《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译著《文化之出路》（1928年）及《苏联的新教育》、《苏联及其邻国》等。他为《教育杂志》和《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和翻译了不少有关政治、

学术方面的文章。

1930年，周谷城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他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和著述，并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他为了揭示中国社会性质转变的原因，试图实现社会改造，著述《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两书，由新生命书局出版。他还翻译了《黑格尔逻辑大纲》，最初是用英汉文对照本印行，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本。他又翻译了《小逻辑》，其中的上半部曾在艾思奇主办的《思维月刊》上连载发表。由于他支持进步学生，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遂不为当局所容，于1932年夏被迫离职。

周谷城从广州至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学系主任。他承担每周十二节课的繁重教学任务，用自己编写的讲稿，讲述自己的观点，不受教科书的影响。他将多年积累的教学讲义和史学研究所得，开始夜以继日地撰写《中国通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于1937年11月沦于敌手。新来的暨南大学校长因周谷城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又用自编讲义讲课，乃以反对所谓“本位文化”为辞，撤销他史社学系主任的职务。周谷城不予计较，继续埋头著述，《中国通史》上下两册于1939年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他提出了“历史完形论”[(1)]，“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模”[(2)]，写出一部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的历史。为此他采用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书中引用了英国分析哲学流派先驱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逻辑原子论，来论证分析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并认为要维护完形论通史的撰述，还必须做到：“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3)]，“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周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结合对世界史的考察，认定新莽元年（公元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他还认为孔丘是贵族奴隶主的代表，其中心思想是“仁”，是以“人”为思想的根源、言论的中心和行动的准则。由于该书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观点，史料丰富，因此吸引了许多

读者，并被不少高等院校采作教学用书，由开明书店一版再版。敌伪御用文人对此惶惶不安，造谣说周“是拿了俄国人的卢布写的”[(4)]。不久，《中国通史》被敌伪当局列为禁书。

其后，周谷城讲课时仍用他的《中国通史》作为讲稿，因此又被暨南大学新任的史地系主任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禁止他讲授《中国通史》，责令他改教世界历史，且限定他教世界史学史。周深知中国史和世界史在历史学科中是相互有机联系、脉络相通的，“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5)]，乃乐于改教世界史，一直到80年代。他进而深入研究世界史，并破除了史学界流传的“欧洲中心论”，认为世界历史是完整的整体，应对中外历史和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他撰写了《世界通史》第一至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2年春，周谷城移居重庆，改任复旦大学教授，曾兼该校历史系主任、教务长，并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经常给进步学生以支持和帮助，并多次营救遭迫害的进步学生。1944年起，他在《宪政》等进步刊物上发表多篇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文章。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沪。当时该校进步力量与国民党特务势力斗争十分尖锐，他积极配合和支持中共的地下工作，尽力保护革命师生，虽因此受到威胁恐吓，但坚决斗争，从不屈服。他同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团结沪上广大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民主运动，并发起签名参加“大教联”发表的十多次爱国民主宣言。

周谷城在复旦大学执教长达五十余年。教学之余先后撰著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史》（1942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史学之进化》（1948年生活书局出版）、《古史零证》（1956年上海群联书店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196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史学与美学》（198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有《新英国与新世界之建设计划》、《美国与战后世界之关系》（1943年独

立出版社出版）。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此外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二百多篇，并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等。他治学七十余年，著作宏富，从史学到哲学，从美学到政治，涉及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他在历史专业方面，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史以及中外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等诸多领域中，均有所创见和建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谷城历任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1954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该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还是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史学会会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等。

周谷城1996年11月10日在上海因病逝世。

---

(1) 《中国通史》，开明书店版，上册前有《导论·历史完形论》，解放后各版都删去了《历史完形论》。

(2) 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

(3) 《中国通史》，开明书店版，上册前有《导论·历史完形论》，解放后各版都删去了《历史完形论》。

(4) 张志哲：《中国通史和周谷城教授》，《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5) 《周谷城自传》，《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周建人

罗幼娟　邵桂花

周建人，本名松寿，字乔峰，笔名克士、乔峰、松山、高山、嵩山，1888年11月12日（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九）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父周凤仪，母鲁瑞，长兄周树人（即鲁迅），仲兄周作人，周建人行三，弟周椿寿六岁时夭折。

1893年10月，周家遭变故，祖父周德清因科场贿赂案，被监禁八年始获释，家道遂中落。在建人八岁时，父亲周凤仪忧郁成病故去。

周建人幼年读书于三味书屋，继入会稽县立小学堂。毕业后，因家境衰落辍学在家自修生物学和文字学。1902年兄周树人负笈东渡留学日本。1906年仲兄周作人也赴日留学。家事都由建人协助母亲操持，并依靠勤奋自学成才。稍长，先后在本县塔子桥小学任教员和校长。民国初年，改任县小学养成所教员。两年后，周建人出任明道女子师范、成章女子学校生物教员。青年时期的周建人思想就很进步，曾与鲁迅一起联名写信给县议会议长，要求开办学校。

1919年12月，周建人抵北京，翌年初入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哲学等课程。1921年9月赴沪，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负责编写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小丛书等工作。在沪期间，曾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助理编辑，《自然科学》杂志编辑，并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

1923年，周建人由同事沈雁冰介绍与瞿秋白相识，并应邀任上海大学生物学教授，讲授进化论，研究达尔文学说，同他人一起翻译《物种起源》、《科学杂谈》。他还写过大量的科学小品，为普及科

学知识做了有益的工作。当时，周建人还先后任神州女学教员、暨南大学及安徽大学教授。他经常应松江女中校长侯绍裘的邀请前往演讲，除继续宣传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外，还鼓励青年参加革命，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周建人与陈长蘅合著的《进化论与善种论》一书，被列为“东方文库”之一。

1927年4月，鲁迅偕许广平离穗赴沪，与周建人同住在上海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周建人对蒋介石集团搞“四一二”政变倒行逆施，曾多次进行谴责。此后，他更加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年12月，鲁迅主编的《语丝》周刊复出，周建人经常为该刊撰稿。并经常为鲁迅与中共党人交往担任通讯联络做掩护工作。1931年12月，与夏丏尊、郁达夫等二十余人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鲁迅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并营救被捕的革命志士，周建人积极参与该盟的筹备工作。次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周建人被推为该盟调查委员会调查员。他积极进行调查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政治犯”的罪行。

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小学生文库》第一集，内收周建人选辑的《奇象》八册及所著《燃烧》、《微生物》、《动植物的过冬》、《人类的祖先》、《漆树和桐油树》、《车》、《农作物害虫驱除法》、《颜料》、《昆虫标本的采集和制作》（与徐应昶合著）、《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制作》等。

1935年2月，共产党人瞿秋白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瞿从狱中致函周建人，请代通知党组织设法营救，并与鲁迅、瞿夫人杨之华取得联系。是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遇害。周建人奉长兄之命，将此噩耗转告杨之华女士。是年12月，周建人与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钱基博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开始，当时周建人任教上海储能中学。抗战期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和许多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紧密团结，坚持民族解放斗争，拒绝为汉奸买办报刊写稿。

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建人所著《动物图说》和《植物图说》等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建人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任编辑时，经常在进步报刊《民主》、《新文化》、《文萃》、《文汇报》、《联合晚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独裁、内战的政策，宣传民主与和平。为了不断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周建人和马叙伦等定期在一家私营银行旧址聚会座谈，共商国是。同年12月30日，周建人与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林汉达等进步民主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周建人任第一届中央理事会理事。民进成员多是从事文教工作的上层知识分子，会章规定“以发挥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对推进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时，周建人已年近六旬，因思想进步而被商务印书馆解雇，生活很清苦，但他不计个人安危，一心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深入群众，到学校团体、工厂去演讲。他的演讲语言幽默，分析深刻，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

1946年5月，上海六十八个人民团体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平民主力量，进而开展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周建人、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等二十九人被推为理事，发表宣言，提出立即停止任何方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要求蒋介石切实实行四项诺言、取消保甲制、取消特务组织等十七项政治主张。6月，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谈判之际，上海人

民团体联合会于6月中旬组织赴南京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6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一百五十多个人民团体近十万群众，到北火车站集合，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南京。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周建人不畏强暴、不避艰险，走在队伍前面，始终参加这一活动。当晚，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特务暴徒围攻凶殴达五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多人受重伤，造成“下关惨案”。消息传来，周建人义愤填膺，立即撰文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野蛮暴行。他还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内河航行权，对市民实行五家联保，警员警管区制等卖国独裁的行径提出强烈抗议。

当国民党在完成战争准备后，立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在国统区疯狂逮捕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周建人却在这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于1948年4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周建人从上海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周建人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民进”立即致电响应。6月，周建人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同年7月，周建人为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隶属南方第一团。9月，他以“民进”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周建人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建人出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11月，他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版总署副署长。1950年4月，民进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以政协之《共同纲领》为其政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团结、教育、改造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工作，周建人历任民进第

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兼文教部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51年1月，周建人改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调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司长。为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以及我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我国组织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周建人参加了东北分团，随团赴东北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

1954年8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周建人当选为代表出席会议。9月，当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1月，出任国务院高教部副部长。12月，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为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遗骨安放仪式，周恩来主祭，周建人为陪祭人之一。同月，任出席各国议会联盟中国代表团执行委员会委员。1956年2月，任国务院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稍后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委员。9月，周建人任中尼（泊尔）友好协会会长。12月，任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57年5月，周建人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12月，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长，兼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8年3月，周建人出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6月，兼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院长。8月，继续当选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月，连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长。周建人在任省长期间，能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其堂姑母周丹凤在得知周建人任浙江省长要职后，曾写信请其为子女安排工作，被周建人回信婉言拒绝，但表示经济上有困难可以帮助。此后，每月寄钱接济，并帮助其子女求学。

1958年12月，周建人出任民盟三届中央常务委员、民进五届中

央委员会副主席（后任代理主席），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59年4月，周建人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周建人早在20年代就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并致力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造诣很深。解放后，他写过很多论述认识与实践，谈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短文，如他写的关于“一分为二”的文章，就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建人以年迈请辞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因病逝世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闵敬瑄：《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小传：周建人》，《人物》1982年第1期。

《周建人同志生平》，《人民日报》1984年8月7日。

马蹄疾：《鲁迅与周建人》，《鲁迅与浙江作家》，香港华风书局1984年版，第57页。

关志昌：《周建人》，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八），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周瘦鹃

史全生

周瘦鹃，原名国贤，字祖福，号怀兰室主人、紫罗兰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1895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六岁丧父，母亲给人家做帮佣。由于生活艰难，他妹妹、弟弟送给人家做养女、养子。童年时代的贫苦境遇，使他“虽逢新年，也没有什么兴致，眼瞧着邻家孩子们玩着花花绿绿的耍货，只是眼热”[(1)]。

但是周瘦鹃早年还有机会在私塾读了几年书，1909年以“义务生”（即免费生）考入上海民立中学。1912年毕业后，任民立中学初中英语教员。

周瘦鹃在中学读书时即爱好文学，作文常名列全班之冠。1911年3月，他怀着试探的心情翻译了一篇法国政治小说《百合魔》，以“泣红”的笔名投《小说月报》，被采用。以后他又翻译了哀情小说《孤星怨》和话剧《爱之花》，均在《小说月报》发表。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2)]。1912年开始用“瘦鹃”笔名。1913年，他经民立中学国文教员孙警僧（一名经笙）介绍，一度加入“南社”。

1916年，周瘦鹃应聘任中华书局编辑。这时，他翻译了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交中华书局出版。其中不仅收译了英、美、俄、德、法等国的作品，也收译了塞尔维亚等几个弱小民族的优秀短篇小说，这在我国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得到了鲁迅的赞誉，鲁迅称他“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学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犹如“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3)]。

1920年4月，周瘦鹃应《申报》馆之聘，任该报副刊《自由谈》编辑，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以后，《申报》由日伪接管，他才离开。其间在1932年12月，史量才为革新《自由谈》的内容，改聘黎烈文编辑，另辟《春秋》副刊交周编辑。周瘦鹃编《春秋》是“新旧综合，以有意义有趣味为主旨”[(4)]，吸引了不少读者。

在编辑《申报》副刊的同时，周瘦鹃还先后编辑了多种期刊。1921年3月，他主编复刊后的《礼拜六》周刊。这是一个“供一般社会人士作消闲遣兴之需”的刊物，所载文章“以哀情及社会性质者居多数”[(5)]。由于迎合了一般小市民所好，曾经风行一时。四个月后，他因编辑《半月》杂志而辞去《礼拜六》的编务工作。《半月》是继《礼拜六》以后又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封面印有谢之光所绘时装仕女。1922年夏至1924年夏，他编辑《紫兰花片》出版，这是专辑他个人作品的杂志，每期二十个题目始终不变，也算“是个创举”[(6)]。1925年6月，《上海画报》编辑毕倚红生病，他继任编辑，从第七十期起编到第四百三十一期。1925年《半月》停刊，他另编《紫罗兰》。此外，他还与赵苕任合编《游戏世界》杂志，与严独鹤合编《中华》图画杂志，还独自编辑过《紫葡萄》、《良友》、《新家庭》等刊物。所有这些刊物也都和《礼拜六》一样，“以趣味是尚”，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沈雁冰曾指出，“礼拜六派”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在思想方面说来，毫无价值”[(7)]。对此，周有所辩白，说当年《礼拜六》所刊载的小说、杂文等，“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都是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8)]。

这期间，周瘦鹃除了编辑刊物以外，还写了大量作品，主要有：《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兰芽》、《我们的情侣》、《滑头世界》、《奇谈大观》、《瘦鹃短篇小说集》等。他的著作也和他所编的刊物一样，大都是宣扬“趣味”和“游戏”的文学，间或也有

一些以反侵略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如《亡国奴日记》、《风雨中的国旗》、《爱国歌》等。他的翻译比著作还多，除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以外，还有《福尔摩斯别传》、《犹太灯》、《蛇首》、《鱼雷》、《情案》、《冰天艳影》、《红颜知己》、《翻云复雨录》等多部。

周瘦鹃癖好紫色，不仅他编辑的许多刊物和所著书的名中多带有一个“紫”字，他住的房子叫“紫兰小筑”，他的书房称“紫罗兰庵”，这是因为他早年曾热恋过一个女友，英文名字叫做Violet（即紫罗兰）的关系。

1922年七八月间，周瘦鹃参加了旧派小说作家先后成立的两个文艺团体：上海的“青社”和苏州的“星社”，在他们出版的《长青》、《星光》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这两个文艺团体都没有章则，也没有什么活动，只是用聚餐的方式互相交往，后来无形中解散。

1936年9月，以鲁迅为首，上海文艺界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文艺界各派联合一致，宣传抗日。周瘦鹃也列名其中。

“八一三”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入侵上海，《申报》为抗拒日方新闻检查，一度自动宣布停刊，周瘦鹃回到苏州。苏州沦陷后，他又先后流亡到浙江南浔和皖南黟县，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后来《申报》复刊，他才回到上海。

1941年12月，《申报》被汉奸陈彬龢接管，周瘦鹃离开《申报》，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香雪园盆景店，以卖盆景花卉糊口。

抗战胜利以后，《申报》为国民政府接收，周瘦鹃入报馆而被拒。他一气之下回到苏州，产生了愤世嫉俗的隐退思想，整天以养鱼种花自娱。1947年，他翻译出版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

周瘦鹃自称是一个“爱美成癖”的“花迷”，工作之余，总是栽花接木，从不间断。即使在抗战期间流亡皖南山村时，也不忘栽插花木。早在1934年时，他以多年稿费的积蓄，在苏州买了一块占地四亩多的园圃，架屋垒石，挖地种植，浇灌剪接，建起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可是，日本侵略军一到，精心修建的花园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他虽然努力经营，终未能恢复旧观。

周瘦鹃对于盆景艺术造诣甚深。他的盆景布置得千姿百态，典雅脱俗，给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艺术感受。早在抗战以前，周就经常参加莳花展览会，颇获好评。抗战时期，他又参加过几次在上海租界举行的“中西莳花展览会”，以他那高超的盆景艺术，压倒了西方人的园艺，连续三次获得锦标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瘦鹃重新拿起抛弃多年的笔杆，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先后出版了《花前琐记》、《花花草草》、《花前新记》、《花前续记》和《云行集》等散文集，并为港、澳中文报刊写了许多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他还发挥盆景艺术的才华，为苏州和外地许多园林设计贡献了力量，同时修复了他那残破的周家花园。1963年，他那些盆景被拍成电影。周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文联常务委员，并任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等职。

1968年8月12日，周瘦鹃在苏州去世。

---

(1) 周瘦鹃：《先父的遗像》（1922年），《半月》杂志第2卷第11期。

(2) 周瘦鹃：《花前琐记》，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68页。

(3) 鲁迅：《〈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见《文艺百家》1979年第1期。

(4) 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400—401页。

(5) 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290页。

(6) 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343页。

(7)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第1页。

(8) 周瘦鹃：《花前新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48页。

周西成

范同寿

周西成，字继斌，号世杰，贵州桐梓县人。1893年4月11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生。祖籍江西，其父周廷燊为地主。

周西成十六岁进入桐梓县公立明德小学堂，1911年毕业后，一心想弃文就武。适逢同乡赵文彬从保定军校毕业，到黔北一带募兵，周与妹夫毛光翔等相约入伍。

辛亥武昌首义后，11月4日贵州光复，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旧军队被改编，周西成转入军政府都督杨荩诚的卫队部，任副目。12月随杨荩诚所率北伐黔军出征，师至常德，因南北议和，暂驻常德待命。次年3月滇军据黔，驻常德黔军遭到遣散，周乃于1913年进贵州讲武学堂。第二年，被分派到驻防毕节的李嘉勋巡防营充哨官。其后，被调至贵州陆军第六团第三营任连长。1916年初护国战争中，周西成在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率领下，出师四川。1917年7月，入川黔军与川军发生川黔之战，黔军战败，戴戡战死，周率全营突围回黔。1918年春，周西成拨归贵州陆军第一混成旅，曾先后驻防湖南沅陵、芷江、洪江等地。1920年，督军刘显世被逐，代理黔军总司令卢焘擢升周为第一混成旅十团二营营长。1921年7月，黔军响应孙中山号召，派第二混成旅旅长谷正伦率兵四团援桂，周西成营拨归谷直接指挥。至柳州后，周因不同意谷将其改编为警卫营，率队返回铜仁，仍归属第一混成旅。1922年1月，第一混成旅内部在是否拥袁祖铭回军定黔主政问题上发生分歧，旅长窦居仁离职赴沪，周西成趁机以全旅粮饷无着为辞，逼走参谋长徐朝光，控制了该旅，随即自称旅长。4月，孙中山组织第二次北伐，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派人与周西成联系，时回黔主政的袁祖铭正迫周放弃旅长头衔，周即于6月

率队入川，进驻彭水，受石青阳委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并经石介绍加入国民党。

周西成善于以同乡、戚族关系网罗亲信，周旋于西南各军阀势力之间。早在1920年被提升为营长时，即利用职权将既是同乡又是戚族的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瑶、王家烈等提升为连长。当上旅长后，又将上述诸人晋升为团、营长。1923年2月，唐继尧派唐继虞率滇军护送刘显世回黔主政，袁祖铭退入四川，周西成乘机与遵义、桐梓一带巨匪罗成三相勾结，于四川涪陵向黔北推进。中途，罗成三受滇军委为旅长，反戈伏击周军，周遂将罗部击溃，杀罗成三，占领遵义。

周西成占据遵义后，贵州军务督办唐继虞恐其进袭贵阳，派张汝骥部绕攻遵义，周为保全实力，暂退綦江。此时，袁祖铭已在川战中获胜，坐镇重庆。周曾多次向袁输诚，但袁怀疑他与支持熊克武部的滇军有勾结，不予理睬。周乃与石青阳联系，被石委为川东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同年7、8月，周西成利用川军内讧的机会，三次攻占重庆铜元局，掳获大批钱财。10月，熊克武攻占重庆，改委周西成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1924年2月，杨森、袁祖铭攻占成都，熊克武退走黔境，周西成在四川立足不住，回师向黔，驻赤水一带。

是年底，唐继尧因唐继虞在贵州弄得民穷财尽，遭到舆论谴责，不得不令滇军放弃遵义，周西成迅即派犹国材部占领遵义，并分兵驻守绥阳、桐梓、湄潭、余庆各县，1925年初又占据毕节等黔西北诸县。于是，东起湄潭、西至威宁的广大地区，皆为周西成所控制。周以赤水、习水、仁怀为中心，整顿交通，发展商务，自设兵工厂、造币厂，广积粮款，实力日益壮大，逐渐形成虎踞黔北和黔西北、进而窥视贵州全省的局面。

此时袁祖铭已受北京政府任命为川黔边防督办，势力甚强。他见周西成野心勃勃，恐成大患，乘击败熊克武的机会，竭力将周拉入其部。周此时对袁虽然心怀疑惧，但很想借助袁的支持夺取贵州军政大

权，遂与袁重修旧好，并结为儿女亲家，逐渐博得袁的信任和器重，被委为黔军第三师师长。

1925年2月17日，北京政府特任王天培为贵州军务督办，周西成为会办，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彭汉章手下仅有三旅一团兵力，黔北和黔西北的广大地区在周西成的控制之下，黔东南十余县则为王天培部所占，地方税款常为驻军截留，彭无力控制；加上彭部军纪败坏，民怨沸腾。袁祖铭看到彭汉章无力理好黔事，又恐彭、周发生冲突，决定将二人的职务对调。1926年1月，袁通过北京政府改委周西成为贵州省省长，彭汉章任军务会办，驻防黔东。周上台后，竭力安插大批同乡、同学和戚友担任军政要职，非桐梓系的政治势力或个人则加以排挤，以致当时有“有官皆桐梓”之说。

5月，四川杨森、刘湘联合驱逐袁祖铭，袁不能敌，撤回黔北。周西成恐袁夺取贵州的统治权，他一面朝夕趋承于袁的左右，博取袁的信任，一面对袁的部下进行种种拉拢，共促袁部向外发展。时逢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袁祖铭考虑到贵州无法解决他庞大的军费开支，遂受委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采纳周西成“问鼎中原”的建议，经黔东出兵湘西。

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派遣张道藩、李益之等人到贵州筹办建党事宜，周西成虽然早已加入国民党，却不愿国民党势力插足贵州。1927年春，周寻找借口，将张、李二人逮捕，并将李益之暗杀。事后，周以李有“共党嫌疑”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又派王度、黄乾堃等为贵州省党部筹备委员，但王、黄在贵州同样遭到周的冷遇，无法开展工作。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西成派代表赴南京活动，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当时，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指使粤、桂、川、黔四省军阀出兵进攻两湖。周西成欣然响应，除派人在上海发“讨共”代电外，并委其第二师师长犹国

材为“讨共总指挥”，出兵湘西，企图乘机开拓地盘，扩充个人实力。后犹部为湘军击退回黔。

周西成统治贵州后，竭力加强对进步思想的钳制和对进步人士的迫害。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黄齐生，因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并在校刊上发表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文章，一直为周所忌恨。1927年夏，周下令将黄齐生解职，旋以“接近共党嫌疑，主张自由恋爱”为名加以通缉，迫使黄逃往四川。同年8月，又因贵阳达德中学师生与共产党员王若飞及黄齐生等时有书信往来，对他的封建反动统治不满，周便以“达德学校结党营私，谋为不轨，勾结共产党，捣乱贵州”为名，将该校查封解散。

周西成的封建迷信和专制思想都很浓厚，他的军署大堂设有“三军司令”牌位，经日香烟不断。每月望朔，必亲赴贵阳八大庙敬香祈祷。凡新委任的文武官员，必须到城隍庙跪拜敬香，宣誓效忠，才准上任。在他统治贵州的几年里，任何对现政权的不满和反抗，都遭到严厉镇压，甚至在外地报刊上著文反对过他的贵州人，回到家乡就遭杀害。

周西成执掌贵州军政大权的三年中，在整顿吏治、清除匪患、整理财政、兴办实业方面，曾做过一些努力，并收到一定效果。早在1926年8月，周就下令成立“财政厅查案委员会”，对贵州历届军阀政府的财政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同年，成立贵州路政局，着手兴建公路。此外，还兴办了发电、造纸、采矿等一些实业项目。因而在他统治期间，财政状况较前略好。1927年冬，云南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之间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周西成与胡、张联合，委毛光翔为“援滇总司令”率部出战，企图趁机扩大地盘。但黔军在滇境连战皆败，受到很大损失。营长顾万武被围后投降滇军，周将其全家二十七人悉数枪杀。

1928年秋，原黔军师长、国民党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欲打回贵

州，派人到南京与何应钦、王伯群联系，获得一批军械，于10月中旬由鄂西来凤誓师回黔。周西成闻讯，命王家烈率部抵御。11月9日，李燊部进占酉阳，19日围铜仁，王家烈师屡战不利，周亲赴驰援，方将李部击退。是时，蒋桂之争激化，蒋介石为将第四十三军留驻湘鄂边境牵制桂系，电令双方停战，李军退走，战事始歇。

1929年3月，蒋介石以讨桂为由，委龙云为“第十路讨逆总指挥”，电令驻滇黔军归入龙云所部，假道黔境入桂。接着蒋又电周，声称“中央决心讨桂，势在必行”，令周“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大计，勿稍犹豫”。周认为滇军仅两师兵力，不足为惧，断然拒绝蒋的电命，扬言誓与胡若愚、张汝骥并力消灭龙云，结成云贵联军，东下与蒋一决胜负。随即率教导师偕同毛光翔、黄道彬师迎击滇军。此时，滇军两师与李燊部由盘县攻入黔境，周军因指挥混乱，中路被突破，盘县、普安相继失守。5月22日，周西成亲率留守安顺的总预备队驰援镇宁，被李燊部袭其后，全线溃败。激战中，周中弹负伤身死，时年三十六岁。

主要参考资料

毛光翔撰：《周西成墓志铭》，贵州省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区编《遵义地区文物志》，1984年版，第169—170页。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李世祚修，犹海龙纂：《桐梓县志》卷8《军务志》，黔南铅石印刷局1929年版。

《军事杂志》第13期。

刘其贤编：《黔东战记》，文通书局1929年版。

黄乾堃：《贵州军阀桐梓系》（未刊稿）。

谢孝思：《黄齐生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贵州省档案全宗2、全宗39、全宗60有关案卷，贵州省档案馆藏。

周信芳

李仲明

周信芳，名士楚，艺名麒麟童，浙江慈溪人。1895年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前辈多为仕宦。其父周慰堂业余喜爱京剧，乃搭班演青衣，艺名金翠仙。周信芳五岁开始学戏，六岁时在杭州拱宸桥天仙茶园首次登台，表演《黄金台》中的娃娃生，取艺名“七龄童”（按虚岁计）。是年，周信芳给来杭州贴演《扫雪打碗》的老生小孟七配演定生（娃娃生），为表现人物在雪地奔走滑倒的场面，周在戏中于急急奔走中走了一个“吊毛”，博得满堂彩声。1906年，周信芳参加王鸿寿（艺名“三麻子”）的满春班，王鸿寿向周信芳传授了不少老生戏和红生戏，王独特优美的做派对麒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07年，周信芳拜南派名家李春来为师，改艺名“麒麟童”。

1908年，十三岁的周信芳到北京参加喜连成科班，和梅兰芳、林树森等带艺搭班。周信芳在京首演《定军山》、《翠屏山》、《戏迷传》，获好评。他与梅兰芳合作演出了《九更天》和《战蒲关》。1909年，因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廷规定“国丧”期间不准演出，周信芳遂搭班去天津，参加了新戏《二县令》、《好心感动天和地》、《巧奇冤》等戏的排演。是年冬，周嗓音倒仓，次年虽渐有好转，但未能恢复到原来的宽亮程度。周信芳心里着急，慢慢地他留心并吸取汪笑侬、孙菊仙的唱法，使自己略微沙哑的嗓音，唱起来苍劲浑厚，吐字清晰有力，且在唱腔中常以停顿，用胡琴过门衬托，形成“笔断意不断”的艺术效果。

1912年，谭鑫培在上海演出期间，周信芳向谭学了《御碑亭》、《桑园寄子》等戏。谭特别提到演《御碑亭》时要用眼神变化来表现

人物的复杂心情，使周深受启发。时值辛亥革命前后，周信芳受潘月樵、汪笑侬等爱国艺人的影响，至1919年共六七年间，先后排演了《民国花》、《新三国》、《宋教仁遇害》、《王莽篡位》、《赛金花》、《杨乃武》、《英雄血泪图》、《党人碑》、《学拳打金刚》等戏。《申报》曾于1913年3月30日登载“玄郎”的文章《记廿八日夜之新新舞台》，评论《宋教仁》一剧：剧场内“座无隙地、环立而观”，卖座“实为开幕后破题第一遭”；“麒麟童饰宋先生，语言稳重，体态静穆，尚称职。永诀一场，做工既妙肖，发音又呜咽，甚至有泣下沾襟者”[(1)]。他在五四运动后编演的《学拳打金刚》，因为戏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势力，矛头直指卖国贼，因此只演了一天，就遭禁演。田汉曾写诗赞扬这一时期汪笑侬、周信芳等编演的新戏：“喜为人间吐不平，早年英锐已知名。曾因王莽诛民贼，亦借陈东励学生。”[(2)]

在编演新戏同时，周信芳排演了《琵琶记》、《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临江驿》等戏，并于1924年在北京演出《追韩信》等戏，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1923年，为声援“二七”大罢工，他编演了《陈胜吴广》。此后他排演了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华丽缘》、《龙凤帕》、《封神榜》等。1927年，周信芳参加了田汉主持的南国社，同年12月他参加南国社举办“鱼龙会”的演出，与欧阳予倩、高百岁、唐槐秋等合作演出了京剧《潘金莲》。翌年秋，周信芳任南国社戏剧部长，又于9月初与夏月润、欧阳予倩、李桂春、赵如泉等倡议，创办《梨园公报》。1929年，周信芳任上海伶界联合会宣传部长、会长，主持《梨园公报》工作。他在刊物上先后发表《谈谭剧》、《谈谈学戏的初步》、《最苦是中国伶人》等文章。1930年9月，周信芳闻某军阀强迫余叔岩演戏，乃撰文《伶人亦有自由否》，揭露、斥责军阀官僚势力轻视伶人已经到了剥夺自由的程度，愤而指出：“某巨公，以军需孔亟着名伶演戏筹款，其征叔岩，试问此项是何义务？然人各有志，演与不演，乃个人之自由也，毁誉自有舆论，强迫为之，不啻剥夺自由。呜呼！军阀之专制，使无

辜者叩头如捣蒜，平等何在？”[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野蛮侵占东三省。周信芳在上海看到报纸，十分愤慨，他对戏班同人说：“我们不能像姜太公那样，再稳坐钓鱼台了。我们不能再演《封神榜》了，我们要演能唤起民心的戏。”[4] 他与尤金圭夜以继日地编写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整理出《明末遗恨》、《洪承畴》、《董小宛》三个戏，其中《明末遗恨》演出达半年之久，场场客满，颇为轰动。戏中崇祯皇帝悲愤地告诉皇太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崇祯以颤音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台下群情激愤，愤怒者、抽泣者及每一位看戏的人都受到深深的感染。1932年春，周信芳组织移风剧社，前赴山东、天津、东北、北京、江苏、湖北等地演出，将近三年。1935年周率剧社返回上海，更受戏迷欢迎。

20年代到30年代，周信芳不仅一直与进步文化团体来往，编演了大量新戏；而且表演技艺日愈成熟，形成独步南方的麒派艺术特色。周信芳在代表剧目《乌龙院》、《清风亭》、《四进士》、《追韩信》、《徐策跑城》、《打渔杀家》、《扫松下书》、《打严嵩》中塑造的宋江、张元秀、宋士杰、萧何、徐策、萧恩、张广才、邹应龙都以剧中人物的正直、质朴以及他真实、生动、优美的表演而各具特色，深受观众喜爱。他把这些舞台艺术形象的创作、表演，融于生活气息浓郁、艺术感染力强烈的麒派艺术中，给人壮美、激昂的美感享受。他的唱腔质朴刚劲，在每一腔、每一句、每一字上都用足气力；在唱、念上，他讲究咬字、喷口、重音和节奏，力求把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准确、细腻地表达给观众。他在《四进士》、《清风亭》中的大段念白，抑扬顿挫，感人肺腑。他的做工极富创造性，在吸取王鸿寿等前辈艺术家表演特色的基础上，注重创新，像《追韩信》中萧何观诗，《跑城》中徐策步伐的快慢等变化，都凝练地表现了萧何、徐策的不同心情。正如周信芳所说：“在表演上我总是力求真实，无论

唱、做、念、打，我总力求情绪饱满，力求体现角色的性格和当时当地的思想感情。”[5]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周信芳率移风社被困在天津，一个月后才回到上海。10月6日，由田汉、欧阳予倩主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戏院举行座谈会。周信芳认为，京剧界的爱国艺人要同整个文化界的同志联合起来，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他与欧阳予倩倡议，成立文化救亡协会歌（平）剧部。几天后，歌剧部成立，周任主任，他与高百岁、金素琴等演员到淞沪战场的前沿阵地、后方伤兵医院等处进行慰问宣传。他还到电台进行义播劝募，播唱《明末遗恨》，并义演《红菱艳》和《武松与潘金莲》。

上海沦陷后，周信芳仍坚持演出，排演了《温如玉》、《香妃恨》、《文素臣》、《徽钦二帝》等；特别是《徽钦二帝》的公演，周信芳饰演的宋徽宗有很多唱念，令观众激动，如徽宗被金兵俘虏，往东北押送时对百姓的两句唱：“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反面人物张邦昌有一段念白：“我这个皇帝，是你们要我出来做的，无非是维持维持地方而已。”这副北宋汉奸的无耻嘴脸，又恰与当时汪伪政权的汉奸们相似，每演到此必引起观众的嘲笑。该戏的公演引起上海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注意，他们写恐吓信威胁周信芳等主要演员，最后迫使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演。该戏只演了三个星期就被迫停演，周信芳非常愤慨，他后来把因同样原因不能公演的《史可法》和《文天祥》两剧的新戏预告挂在卡尔登戏院舞台两侧，以激发观众的民族爱国热情。

1940年1月，上海的进步人士举办慈善义演救济难民，周信芳率移风社演员和话剧演员联合演出了话剧《雷雨》，他主演周朴园，金素雯、桑弧、胡梯维、高百岁等参加了演出。周信芳的表演受到观众的肯定，报纸评论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周信芳认为：“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和角色的内心活动，话剧在这方面抓得很紧，演员的体会也深，京剧如果也能够这样，那就好了。”[6]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与田汉在上海重逢，两人长谈京剧改革问题。1946年9月21日，应周恩来邀请，周信芳到周公馆参加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揭露了美国和蒋介石政府的内战阴谋，鼓励与会者留在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1947年，周信芳毅然在《文汇报》上发表反对内战的文章，国民党特务恐吓他，他也不动摇。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下旬，周信芳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信芳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京剧的改革、创新，先后排演了《文天祥》、《信陵君》、《闯王进京》、《义责王魁》、《海瑞上疏》、《澶渊之盟》等新戏。1952年，他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1953年，他任赴朝鲜志愿军慰问团副总团长，到朝鲜慰问演出。1955年和1961年，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先后在北京联合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和“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演出庆祝活动，周均获奖。1956年，他率上海京剧院访问苏联。

周信芳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75年在上海逝世。著作有《周信芳文集》、《周信芳戏剧散论》、《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周信芳演出剧本新编》及艺术经验记录《周信芳舞台艺术》。摄制戏曲影片有《宋士杰》和《周信芳舞台艺术》（包括《徐策跑城》、《下书、杀惜》）。传人有高百岁、陈鹤峰、沈金波、童祥苓、萧润德、霍鑫涛、张学海及子周少麟等。

---

(1) 沈鸿鑫、何国栋著：《周信芳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

37—38页。

(2) 田汉：《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周信芳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3) 沈鸿鑫、何国栋著：《周信芳传》，第85页。

(4) 沈鸿鑫、何国栋著：《周信芳传》，第98页。

(5) 刘厚生：《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周信芳艺术评论集》，第34页。

(6) 沈鸿鑫、何国栋著：《周信芳传》，第146页。

周星棠

徐凯希

周星棠，原名以灿。1877年（清光绪三年）出生于汉口。原籍浙江绍兴。幼读塾学，聪颖敏捷，后因家境窘困辍读，随父亲周庆和改习钱业。稍长，娶汉阳黄陵矶徐氏为妻，略有资本，开办晋安、阜通钱庄及盈丰玉机器米厂，一度兼任日本住友银行买办，在汉口金融界崭露头角，结识工商各界名流。

1909年，为表示对外商歧视华人的不满，周星棠受地皮大王刘歆生委托，出面邀约工商界知名人物梁俊华、韦紫封等，集股筹资兴建汉口华商跑马场，与洋商跑马场相抗衡，周星棠任总经理。

1912年，应昌、大维两公司为争夺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承租权，均以租期未满为由，向湖北军政府要求继续租办。黎元洪下令取消租约，交楚兴公司承租。应昌公司借旧股折算问题继续纠缠，经周星棠等多方斡旋，终使双方达成协议。同年12月，楚兴公司正式具章承租，周作为发起人之一，投资35000两，仅次于总理刘象羲，占新增股金约13%，当选为公司董事[(1)]。嗣后，欧战爆发，楚兴公司经营有方，连年盈利，引起省内一伙军阀官僚垂涎，租期未到，即被萧耀南下令，转交湖北将军团组织的楚安公司经营。周星棠协助徐荣廷等，以楚兴公司历年积累及个人分红、添招新股，相继创办大兴、裕华两个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周分任公司董事。不久，接任大兴公司董事长。

北京政府时期，周星棠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兼任省长萧耀南的财政顾问。1920年，刘歆生因买卖亏空，积欠法商汇理银行借款200万元。刘无力偿还，声言要破产还债，汇理银行准备接收刘歆生全部

财产。周星棠极力劝阻刘不要宣布破产，以免汉口大片地产落入外人之手。同时，他促请省、市财政当局出面予以清理、偿还，终使法商阴谋未能得逞。1922年华北大旱，周星棠在武汉工商界率先发起募捐，被推为领袖率队前往信阳、安阳等地放赈。因成绩显著，被授予二等嘉禾章。

1923年4月，汉口总商会改选，周星棠出任会长。1924年8月，江浙战起，申汇价涨，银根奇紧，汉口出现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金融恐慌。适逢比期将至，一般商人惶惶不安。为维持市面不发生大风潮起见，周星棠先以私人产业代汉口钱业公会担保，向银行公会借款30万元，另由中国银行放出30万元，共同维持市面。同时，周一面与各银行联系放宽贷款抵押，一面主持汉口总商会与钱业公会联席会议，支持钱业公会发放临时流通券五百万元。他面谒萧耀南，请求通知官钱局暂行借出有价证券，作为临时流通券担保品。几经周折，终于度过中秋大比，收兑临时兑换券。全市商号除少数倒闭外，大多幸免于难。

1925年2月，周星棠以湖北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汉口总商会会长身份进京，为汉口划为特别市多方奔走，面谒段祺瑞。“五卅”惨案发生，武汉商界举行抗议游行，汉口总商会立即为沪案垫款一万元，由中顺银行转交上海总商会。6月11日，汉口英租界义勇队使用机枪射杀中国抗议群众，酿成惨案，汉口总商会宣布对英经济绝交。周星棠在总商会址主持“汉案追悼大会”，发表沉痛演讲[(2)]，强烈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6月21日，他被推选为湖北沪汉案救济会副主任理事。

同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为兴师讨奉，四处筹措军费。吴先令湖北官钱局加印官票五百万串，遭到全省各界一致反对。12月，吴又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下令在汉强制发行军需汇兑券3000万元，声言倘敢拒绝行使及有意破坏本券者，定按军法从严惩治。武汉商界人人自危，纷纷避往他埠。12月5日，周星棠邀集

省商会联合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及三镇商会代表一百六十余人，举行联席会议，严正声明本会绝未闻此事，更未曾收到任何契据，会议决定赴督署请愿。6日，周星棠等组织五团体代表三百六十余人，联袂步行至督署请愿，向萧耀南呈递请愿书[(3)]。周痛切陈词，言明发行军需券，后果不堪设想。萧当面允称，此券绝不在汉发行，更无强迫行使之意，旋即手谕，请代表转告绅商各界。吴佩孚阴谋至此流产。

1926年3月，湖北官钱局因军政各署长期垫借无度、官票发行过滥，酿成全省性的挤兑官票风潮。武汉各团体及官绅各界组成全省官票维持会，推周星棠任主任，负责主持。周多次召集工商各界举行联席会议，向当局明确提出罢免官钱局局长，起诉舞弊员司；召集各法团联席会议，讨论维持官票具体办法；结束官钱局，收兑官票，改组为省银行。

同年4月，汉口总商会第十一届改选，周星棠再次连任会长。7月，北伐军自广东出发，势如破竹，直逼鄂境。吴佩孚、陈嘉谟通令在汉发行军用票，以应急需。周星棠邀同武昌、汉阳商会负责人，组织商界代表多次赴督署请愿交涉。北军以武汉商界立即筹款200万元为条件，同意暂不发行。指定由汉口总商会代为筹办。周几经推延，勉强筹交三十余万元。吴佩孚得款后即败走。北伐军占领汉口后，新任市长刘文岛召集商界开会，要求汉口总商会将余款一百六十余万元作为军事借款。适值武汉市场困顿，金融枯竭，一时难以收齐。周星棠先以私人产业向中南银行抵押20万元，垫付北伐军，余款陆续筹措补足。

北伐军围困武昌期间，城内发生严重粮食恐慌，周星棠等出面与守军将领会商，愿筹款三十万元作遣散费，并与北军接洽，保证守军将领平安出境。陈嘉谟同意，刘玉春以对不起吴大帅而拒绝。9月末，城内饥荒日见严重，蛇鼠猫狗早已被吃尽。周星棠与红十字会等团体再次分途向攻守双方军队，要求开放城门，允许妇孺出城觅食。

几经斡旋，终使平湖、文昌两城门开放六天。四万七千余难民乘汉口总商会租用轮驳逃出，并送入食米一千石、棺木五百具。10月10日武昌被攻克，在同日举行的汉口市民庆祝国庆大会上，周星棠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1月，周出席湖北政务委员会召开的劳资仲裁会议，被推选为全省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4)]，负责调处商民协会纠纷案件。经过数月努力，全省劳资纠纷渐告平缓。

1927年1月，武汉人民为抗议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一举收回英租界，改为汉口第三特别区。英国在汉各银行、工厂相继宣告停业，致使武汉市场金融呆滞，华商蒙受重大损失。周星棠以汉口总商会名义，向英商公会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呈请外交部向英国交涉。3月，武汉政府下令组成第三特别区管理局，周被任命为三名华董之一[(5)]。4月，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周星棠出任市政府委员[(6)]。

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为打破经济封锁，实行集中现金政策。武汉市场顿起金融风潮，铜元绝迹，申汉汇兑不通，国库券及中国、中央、交通三行汉钞币值猛跌。4月23日，汉口银钱业各公会推举周星棠，与武汉政府财长、省财政厅长，以及中国、中央、交通三行行长等，组成金融讨论会，研究恢复申汉汇兑问题。6月，武汉政府为筹集北伐军出师河南军费，发行北伐胜利有奖债券，成立劝销委员会，前往各团体接洽劝销。周星棠经与各业讨论，率先认购四万张，折洋20万元。

同年7月，武汉金融风潮愈演愈烈，中国、中央、交通三行汉钞每元仅折现洋一角，金融恐慌达于极点。周星棠沉着应付，竭力维持[(7)]，多次召集各商帮开会集议，讨论维持金融措施。最后综合五点意见，呈报当局采择施行。武汉财政当局即予公布，对恢复市场元气起到一定作用。

1928年4月，汉口总商会换届改选，周星棠提名黄文植继任会

长。此间，周历任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财政部顾问、汉口市政府参议、外交部第二特别区（旧俄租界）董事，两次代理第三特别区管理局长，以及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和中华道路建设协会夏口分会会长。

1931年汉口特大水灾，周星棠与贺衡夫等工商界人士发动募捐，救济灾民，参加复堤及善后工作，先后担任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湖北分会执行委员、湖北水灾救济总会常务委员。

1932年4月，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来汉，分别约见旅汉日侨和武汉各界代表。周星棠与汉口市商会会长贺衡夫应邀前往，当场批驳日商关于中日关系紧张成因的诡辩，并将谈话记录整理为意见书，呈交国联调查团。

1933年，武汉第一纱厂因日纱倾销，内部管理不善，负债累累。为扭转营业困顿局面，董事会推举周星棠为董事长，出面主持，期望借助周的声望来扭转颓势。周星棠接任后，多次与债权人英商安利英洋行谈判，请求暂缓债期，放宽经营限制，无奈颓势难以挽回。1935年末，亏损已达400万元，所欠债款不但未减少，积欠利息一项竟突破200万元，终因无法维持，第三次宣布停工。经全体股东大会讨论，认为债权人操纵厂务，有违复工合同规定，致使营业不振，亏累甚巨。经周星棠出面与安利英洋行谈判，始将不合理欠款予以削减，积欠本息从1200万元，减至830万元。周提出止息还本，英商则要化债为股，将未付息金折合为260万元，划入第一纱厂股本项下。另将厂方原有股金489万元，折合为340万元，双方股本共为600万元。以此，英商在董事会中要有三分之一席位。旋经股东大会多次磋商，予以否决。几经周折，最后达成将全部机器、厂房、生财另行出租，以所得租金抵偿债务。1936年10月，复兴实业公司承租第一纱厂，周星棠遂辞去董事长职务。

1934年7月，周星棠认股七万元，与汉口烟土大王赵典之等创办汉口商业银行，11月正式开业，周任董事兼总经理，主持行务。该行主要经办各种存款、抵押放款、押汇、贴现、汇兑买卖生银及有价证券、兼理储蓄、保险和房地产业务。创办人因多为工商界名流，“纯粹为汉埠商界所组合”，开张后业务十分活跃[(8)]。除省内各商埠外，另设办事处于北平等地。嗣后因董事长赵典之不懂银行业务，周与之经常发生争执，不久愤而辞职。

周星棠毕生从事工商业，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辛亥革命后，他主持恢复华商赛马公会和华商总会[(9)]。增设商团，组建济良所，修复张公堤，创立县道局，推广义务教育平民学校，出面筹组华洋义赈会。周历任西安大华纺织公司、郑州豫丰纱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重庆庆华颜料厂董事长，以及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信托公司董事等职，在国内享有一定声望。他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六年，倡设商事公断处，注重维护华商利益，“举凡病殃商民之事，皆剔除无遗”。

抗日战争时期，周星棠历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一直与中共人士保持往来。当日军攻占武汉前夕，周迁居大后方。

1942年，周星棠病逝于重庆。

---

(1)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2)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卅运动在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3) 《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1日。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1984年版，第121页。

(5) 田子渝主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6) “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编辑组：《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3页。

(7) 《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5期，第128页。

(8) 《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12朝，第108页。

(9) [美]柏脱等编，勃德译：《中华今代名人传》，上海传记出版社1925年版，第107页。

周学熙

朱信泉

周学熙，字缉之，别号定吾，六十岁以后别号止庵，又号卧云居士[(1)]，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人。1866年1月12日（清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金陵（今南京）。其父周馥于1861年底入淮军李鸿章营幕，办理文案，为镇压太平军、捻军效力，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累获拔擢。1871年李鸿章督直，奏调周馥到北洋办理河工，任永定河道、津海关道，后来升任四川布政使、山东巡抚，署两江总督，调两广总督等职。

周学熙七岁入塾读书，稍长得长兄周学海的辅导，学业大进，1880年十六岁中秀才。1883年跟随周馥的幕宾邵班卿等人讲论舆地、公牍并治举业和词章，从而“粗得窥见各学门径”[(2)]。翌年从李慈铭问学，颇得老师的好评。1886年其父周馥捐饷，部议给奖，周学熙得以候补郎中被签分工部都水司主稿上行走。1893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后来多次参加会试未中，且以家累渐重，决定放弃科举正途，做异路功名的探求。1897年，周学熙通过亲戚、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谋得开平矿局董事、驻上海分局监察职务，观察开平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次年，周学熙报捐候补道，由北洋大臣裕禄札委为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任总办。这是周学熙接触新式工矿事业的开始。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周学熙护送眷属去沪避难。不久，周馥奉命随同奕劻、李鸿章办理和议条款事宜，周学熙为随侍其父于1901年2月12日抵达北京。《辛丑条约》签订后，周学熙到济南投效山东巡抚袁世凯，被委为山东大学堂总办。他编印《中学正宗》、《西学要领》和天文、地理、格致等课本，以进行“中体西用”的教

法。

1902年5月，周馥在袁世凯督直后升任山东巡抚，成了周学熙的顶头上司，按照惯例需回避，于是周学熙被转分到直隶候补，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时值庚子之后，北方糜烂，私钱遍布，物价沸腾，民生凋困。袁世凯决定设局制造铜元和银元，以济市面并为直隶增辟财源。周到差后，利用天津河北大悲院烬余故址，移用东局子修械厂的旧机器和上海旧存锈蚀残缺之件，招来机匠漏夜改造安装，仅费时七十日就开工铸出铜元。周的办事才能和效率，深受袁世凯的赏识。

1903年4月，周学熙经袁派往日本考察工商和币制事宜。他在日本两月，悉心考察东邻获得富强之道，认为“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3)]，除练兵为国家之事外，兴学校、办工厂则以民办居多，从而坚定了他发展民营工业的决心。他回国后，随即条陈袁世凯请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北洋实业的枢纽，以“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各货，凡有可以仿造者，力为提倡保护，不必官事制造，但厘定章程，专司考察，择取日本凭帖奖牌之类，鼓舞而奖励之”，并说“果能得其要领，三五年间必然有勃然兴者”[(4)]。这一建议十分符合袁世凯举办“新政”以博取政治声誉、发展工业使游民就业而隐患可消的意愿。随后，周被委派为直隶工艺局总办。他认为“工非学不兴”，1903年在天津开办高等工业学堂，培养化学和机械制造方面的人才和师资。翌年开办实习工厂，供学生实习，并招收工徒培训工匠。同年8月开办考工厂（1906年底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展出所购集的国内外制品，并兼寄售货品，借以开通民智，劝导绅商投资工业。1905年冬，创办教育品制造所，招工制造各种教育用品，以应教学的需要。周还由直隶工艺总局投资开办造纸厂，作为示范；又以官督商办方式，开办劝业铁工厂；以官助商办方式，开办染织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和玻璃厂等。

为了推动直隶全省发展工艺，该局指导顺直各属府州县厅，先后

设立了工艺局、所六十余处，作为地方振兴工艺的指导机关，甚中尤以推动高阳土布发展成绩显著。周学熙因振兴工艺而累获提升，由一个候补道而署天津道，授通永道，升长芦盐运使，署直隶按察使，但仍兼直隶工艺局总办。在这期间，周还先后兼任过教养局总办、淮军银钱所会办、北洋支应局总办和天津官银号督办等要差，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周的倚重和信任。北洋官营实业的兴办，虽然喧闹一时，但并没有可靠的根底。其经费来源，起初依靠银元局造币鼓铸的余利拨付；嗣后，周担任盐运使，则改由运库支付，是一种因人成事的做法。当1907年8月袁世凯卸去直督，同年底周学熙因丁母忧而去官，北洋官营实业就因人事变迁而迅速废弛。但在此期间，周学熙所负责筹办的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则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和发展。

滦州煤矿筹办于1906年初。早在1902年，周学熙就奉直督袁世凯之命，办理收回八国联军入侵期间被英商骗占的开平煤矿，经四年交涉而无进展。后来经周报准，一面向英国人交涉收回开平，一面另创滦州煤矿，进行抵制。1907年9月，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后改名滦州矿务公司）正式成立，周学熙任总理，资本200万两，其中官股80万两，商股部分则由周氏家族和长芦盐商、直隶的各县知事以及在滦矿有职务的人员分认。起初，滦矿在开平镇附近用土法开采，因产煤多、成本低，销路甚好。转年又增资100万两，购进德国机械，各支矿并铺设铁路与总矿相连，规模日渐完备，成为近代化的企业。而英商骗占的开平矿，则处于滦矿包围之中，矿区的蕴藏量也因多年开采而日渐枯竭。到1909年冬，开平英商见一再阻挠无效，才同意由滦矿备款赎回之议，办法是由清政府为滦矿担保，发给债票，赎回开平。但此议却遭到擅卖开平矿的原督办张翼的阻挠，以致清政府不允为发行债券担保，遂使赎回之议搁浅。开平英商见有机可乘，决心吞并滦矿。采用大肆跌价倾销煤炭，使滦矿遭到很大的经济压力；其后开平又托人说合，饵以厚利，要求两矿合并。滦矿股东在与开平苦斗经年之后，正不堪跌价竞销所造成的巨额赔累，以及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前途可能影响股东权益的疑惧，认为和开平合并不仅有厚利可

图，且可藉洋人的势力保护产业。滦矿资本家们从自身的私利出发，抛弃了先前“以滦收开”的初衷，反而接受了“以开合滦”的办法。周学熙曾为此作辩解说：“此次联合之意，倡自开平。而董事提议，股东赞成，实非学熙之本心。”[5] 1912年1月27日，双方签订了“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合同草案”，6月1日签订正式合同。合同中，虽有十年后滦矿有权以双方商定的公道价值，将开平公司全产购回的条文，但1922年到期时，滦矿股东并未赎回开平。其时，国内北洋军阀混战频仍，不赎回开平矿反可以得到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并有超额利润可图的缘故。开滦联合的第一个十年中（1912—1921），获利高达6809万元[6]。它为周学熙等原滦矿股东带来丰厚的股息，分派股息后的余额，周建议以“新事业存折”名义积累起来，作为日后举办新事业的基金。

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06年，周学熙任总理。启新的前身是唐山洋灰公司，当时由开平矿务局垫款管理，经周学熙与开平多方交涉，始于1906年8月26日正式收回。公司决定新招股本一百万元[7]。向丹麦斯密士厂购得卧式旋转钢窑及钢磨，在唐山设总厂，加上老厂机器，年产洋灰24万桶。1909年启新添股本30万元，在唐山马家沟增设分厂，先建机器制砖厂。次年又扩充新股150万元，添置新式窑磨，年产洋灰增至43万桶。1912年启新改组，完全商办，成为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型民营工业。

启新洋灰由于销路好，企业不断扩充，到1923年已拥有甲、乙、丙、丁四个厂，年产洋灰150万桶，在国内产销方面一直处于独占地位，直到刘鸿生在上海开办的华商水泥厂和姚锡舟在南京开办的中国水泥厂的产品于1922年问世，才打破启新洋灰的独占局面，但启新仍占优势。

启新兴办获得成功，首先由于国内工矿、交通和建筑等业对洋灰的需求日增；再是得力于当时“舍实业无以富国，利权待挽，非众擎不足为功”[8]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潮的推动。以启新的开办集股而

言，它得到愿将宦囊转化为工业资本以获厚利的北洋官绅们的支持，第一期开办股本100万元，不消半年就全数招齐。在股款招齐之前，还得到淮军银钱所和天津官银号的低息垫款以为周转。而启新的主持人周学熙素以廉洁干练著称，颇得投资者的信任，也是个重要因素。再是启新在当地找到水泥的主要原料——坩子土，并获得滦矿供应的廉价燃料，使生产水泥的成本大为减轻，所以启新产品一问世就能独步国内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并为国家堵塞漏卮。启新以民营企业而取得成功，对华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也为周学熙等人后来创办华新纺织公司等企业开辟了道路。周学熙本人则由一个北洋官吏成为知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

周学熙兴办实业的才能，深得袁世凯的青睐。民国初年曾两次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第一次任财长是1912年7月，正是袁世凯政府佯奉和平统一，而实际上蓄意消灭资产阶级民主派势力，搞专制独裁之际。袁于翌年3月20日指使歹徒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之后，加速了发动内战的步伐。为了筹措内战军费，袁指派总理赵秉钧、外长陆徵祥、财长周学熙于4月26日和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约合二亿八千万银元）的《善后借款合同》。这一条件苛刻有损主权而事先又未经参议院审议的非法借款合同的签订，自然遭到国会和国民党人的反对和指责。周学熙为此刊出《布告善后借款情形文》和《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案汇编》，为自己和袁政府辩解。随后，周于5月16日请假，避往青岛（9月11日免职）。周学熙就任财长之初，曾提出《财政政见书》和《财政方针说明书》，企图对当时财政有所整理和建树，但实际情形是“内外同一困穷，举措动生牵掣”，结果只能“多成纸上空谈”[(9)]。

周学熙第二次任财长是1915年3月，他原想利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和“白朗军”之后取得暂时统一局面，在财政和实业方面有所作为。他提出清丈田亩，以增加田赋收入；整顿场产，以裕饷项；实行烟酒公卖，以增辟税源；清理官产，以补助国库收入等办法，为袁政

府筹措军政费用。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创办民国实业银行，以推行都市工业建设；创办县农工银行，发展乡村经济等。同年8月，筹安会成立，周对复辟帝制不予附和，并上书袁世凯劝阻，继又请辞财长职，袁不准。后来周请病假，乞居北海养病避嫌，直到次年4月才准去职。从此，周学熙无意做官，而专心于实业。

华新纺织公司创设之议，始于1915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棉纱、棉布输入锐减，价格飞涨，纱厂利润倍增。周学熙见有大利可图，授意王锡彤、马萍等人具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创办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筹集资本1000万元（官四商六），在直、鲁、豫三省设厂。周利用财长的职权，拨官款80万元订购纱锭25000枚，并发表他的九弟周学辉为公司督办，决定先建华新津厂。但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时局动荡，股东疑虑观望，津厂建设迟缓。1918年曹汝霖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以华新商股未集，决定将华新津厂改为官办。股东闻讯十分焦急，连日开会商讨对策，后经周学熙向徐世昌总统疏通，才允准改归商办。于是华新成立董事部，改推周学熙为主任，邀杨寿枏为副主任[(10)]。由杨寿枏从无锡招聘工匠来津，漏夜赶工安装机器，到1919年1月，华新津厂便竣工投产。津厂采取包工制，工人受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津厂开工后，当年就获得利润140万元，到1922年共赢利413万元，超过该厂200万元开办资本的一倍以上。

华新津厂既成，周学熙加速进行华新青（岛）厂的建设，并于1919年底建成投产。青厂资本150万元，纱锭20000枚，周学熙任专董，以他的次子周志俊实际主持。在华新青厂建成前后，日商在青岛先后建了九家纱厂，与华新竞争十分激烈。为了维护企业的生存，华新青厂只有在业务经营上、生产管理上尽心竭力，出奇制胜。周志俊曾赴欧美考察纺织技术，回国后增添设备，使该厂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经营赖以不坠。

华新三厂建于河北唐山，有纱锭24000枚；华新四厂建于河南卫

辉（今汲县），有纱锭20000枚。唐、卫两厂资本主要由启新和滦矿的“新事业存折”基金投入。唐、卫两厂投产时，国内纱厂已处于不景气状态，由于两厂所在地区产棉既多，纱销亦畅，因而投产后尚能年有盈余。华新津、青、唐、卫四个厂的建成，是周学熙为首的北洋实业集团的鼎盛时期。

周学熙所经营的企业，虽以前述滦矿、启新、华新等厂矿为主干，但他先后参加创办的还有京师自来水厂、滦州矿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与比利时商人合营）、普育机器厂和启新机器厂等。为了抵制北洋交通系官僚对华新纱厂的觊觎，1918年周学熙应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邀约，担任全国棉业督办并兼长芦盐垦局督办。周曾组织棉垦公司以开拓原棉生产，因各处原盐滩业主意见分歧，阻碍甚多，北洋政府又不给予实际支持，结果毫无进展。1920年底，周辞去全国棉业督办和盐垦局督办职务。

为了使产业资本能获得金融资本的挹注，周学熙在清末便重视对天津官银号（1910年改名为直隶省银行）等金融资本的运用。1915年担任财长时，曾提出创办民国实业银行的建议，不久周氏去官，事遂搁置。1919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决定开办中国实业银行，以熊希龄任总董，周学熙任总理，总行设在天津。1923年华新卫辉纱厂为筹措资金，发行公司债180万元，即由该行担保。后来由于行内人事矛盾，周辞去中国实业银行总理职务，另创华新银行为所经营的厂矿调剂资金。由于军阀对银行的恣意摊派，使银行不堪苛索，1931年周将华新银行闭歇，另设久安信托公司办理资金调剂，由其子周志俊经理。

以周学熙为首的北洋实业集团的大股东，多为北洋上层人物。以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而言，可分为以周学熙家族为主的安徽系，和以袁世凯的子弟袁心武、袁凤镳、袁铸厚和亲信王锡彤等组成的河南系，以及后来倒向河南系的实力派李希明系。周学熙有创业的才干和毅力，但工作中也有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和任人唯亲的情形，这些便成为河南系袁家兄弟们夺取企业领导权的口实。在1924年的启新股东

常会上，周学熙受到河南系和其他不满周氏的大股东们的指责，周因此称病辞去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理职务。为了应付北洋实业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影响，周于1924年成立了“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以为控制所属各企业的枢纽。但各公司的负责人常自行其是，使周难以统驭。实业总汇处仅存在一年，便改组为实业协会，由周任会长，王锡彤、李士伟任副会长。这个协会也只维持了两年，到1927年初改为实业学会，成了研究性质的学术团体。周也在这一年引退，不再直接过问企业的事务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新官僚资本的兴起和扩张，尤其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后，日本财团乘机窜进华北，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加剧，周氏所经营的实业就日趋衰落。1936年华新津厂以欠债过多周转不灵，被迫售与日商公大纱厂。不久华新唐厂也因欠债200万元，吸收“东洋纺绩”投资300万元，成了中日合办厂。同年耀华玻璃公司中的比利时商人所执股份被日商旭日公司秘密购去，耀华也成了中日合办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青岛沦陷，华新青厂被日本宝来纱厂吞并。周与杨寿楣合资经营的无锡广勤纱厂则被战火所毁。开滦煤矿于太平洋战事发生后，被日本侵略军接收改为军管。

周学熙兴办实业，开端于直隶工艺总局，发源于启新洋灰公司，发展于滦州煤矿，到华新四个厂建成，则达到事业的鼎盛时期，成为我国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实业集团。周学熙与南方知名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北二“四先生”的赞誉[(11)]。但是，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周氏手创的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也摆脱不了被摧残和被吞并的命运。他曾为“实业救国”理想遭到破灭而慨叹说：“毕生十事九成空。”[(12)]他自引退后，曾捐资在安徽家乡兴学，植树造林和赈济灾荒。他还成立师左堂刻书局，先后编刻丛书五十余种，以备家塾教授子弟之用。晚年则以读经、赋诗和念佛自遣。

1947年9月26日，周学熙卒于北平寓所。

---

(1) 周学熙晚年以“卧云居士”作为别号，乃取陆放翁诗“身卧云山万事轻”之意。

(2) 周学熙：《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天津印字馆1948年版，第9页。

(3) 周学熙：《东游日记》跋文，《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4) 周叔姨：《周止庵先生别传》，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页。

(5) 周学熙：《呈直督张陈明开滦联合颠末表明心迹文》，《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0页。

(6) 淳夫：《周学熙与北洋实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7) “启新”在新股100万元招齐之前，曾由天津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借垫行本、坐本共100万元。七个月后股款收齐，随即归还了上述借垫款。

(8) 周学熙：《禀直督陈启新洋灰公司扩充总厂添机加股请咨部立案文》，《周止庵先生别传》，第22页。

(9) 《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09—110页。

(10) 杨寿枏是周学熙的儿女亲家，无锡业勤纱厂厂东，有经营纱厂的经验。

(11) 南方实业家张謇在张氏兄弟中行四，周学熙在周家兄弟中亦行四。他俩在清末民初均以兴办实业而知名，故当时有南北二“四先生”之说。

(12) 周学熙：《检阅自叙年谱有感》，《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89页。

周至柔

颜平

周至柔，原名百福，字至柔，浙江临海人，1899年11月3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生。其父周滕珊，中年去世，周至柔由母亲抚育成人，一生侍奉母亲甚孝。周早年在本乡私塾启蒙，后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爱好文学，尤喜读陆游等人诗词。1919年投笔从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八期步科生，与陈诚、罗卓英等为同期同学，交谊甚笃。1922年毕业后，与陈诚一同被分发至浙江陆军第二师见习，嗣后升任排长、连长。

1924年春，周至柔南下广州，得到先期至粤的陈诚的关照和引荐，进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上尉教官。1925年两次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第二次东征后任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周奔赴韶关，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副，于1927年1月由赣入浙，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作战。2月在桐庐浪石埠架桥渡江，攻击孙军孟昭月部，15日进占新登，18日克复杭州。接着所部从嘉兴攻击前进，3月18日攻占吴江，21日进据苏州，并向常熟追击前进。“四一二”政变后，陈诚继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周升任补充团团长，不久调任第二十一师参谋长，协助陈诚指挥作战，8月参加龙潭战役。9月周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江上游办事处主任。

1930年4月，周至柔复任第十一师参谋长，继任第三十三旅旅长，参加中原大战，随同陈诚先后参加马牧集、归德、济南、郑州等战役。战后升任第十四师副师长，翌年升任师长。5月他率十四师参加第三次“围剿”工农红军的战争，在陈诚指挥下次第侵占广昌、雩都（今于都）。后又奔赣江，企图寻找红军决战，但遍寻不得，全师疲惫不堪。1933年2月又参加第四次“围剿”，协助陈诚以“分进合击”的

战术进犯革命根据地，东奔西突，虽遭败北，但仍然晋升为第十八军副军长。

周至柔好学、勤思与谦逊、诚恳，深受陈诚的赞许。其时蒋介石筹划建设空军，周至柔在陈诚推荐下，被蒋介石派赴欧美各国考察航空事业。周认真考察研究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的航空建设与空军训练，同时刻苦自学英语。考察回国后，他向蒋介石呈交了考察报告与建设中国空军计划书，强调空军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并对在中国如何有步骤地建设一支空军提出了具体方案。蒋介石对周的考察和建议深表满意，于1934年7月任命他为设在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着手培训飞行和地勤人员。周到职后，从各地选拔素质优秀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体魄健壮的青年，进行严格的技术训练和精神训练。他强调“训练重于作战”，要求每个学员精确掌握技术，做到万无一失。他自己也勇敢学习飞行的实际操作技术，曾多次单独驾驶飞机到上海。他把“精神训练”提到很重要的位置，指出“精神的有无、钝锐，实决定了最后之成败”。他所谓的“精神”，即是蒋介石所倡导的“智、仁、勇”，说“攻击精神是军队的灵魂，是发挥战斗力的基本条件”，面对敌人要不畏不惧，勇于攻击，胜而后已。在战术训练上他提倡要有创意和灵敏新锐的头脑，敢于为人之所不为，能人之所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多行奇袭。在技术训练上，他要求每一个学员都一丝不苟，熟练掌握每一个技术要领。他推行严格的纪律，说“整饬重于训练”。他提出航校的教育方针是“忠勇、精诚、德性、纪律”。

1935年1月，蒋介石为迅速建立起空军，成立航空建设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夫人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常务委员。翌年2月周为航委会主任。周加快训练空军飞行人员。航校第一、二、三期学员先后毕业，在南昌成立了一个训练总队，分设驱逐、轰炸两组，先后共组成驱逐大队、轰炸大队和支援地面作战的攻击大队共十个，让他们在美国和意大利制造的作战飞机上操作驾驶，实际提高战斗技

巧。同时将毕业的大量地勤人员和机械修理人员派赴各地，新建军用机场。周还选派一批航校学生赴意大利学习飞机制造，后来与意大利合作，在南昌建起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周至柔兼总指挥。周立即部署拥有各型飞机三百〇五架的十个空军作战大队分驻句容、江都、广德、蚌埠等机场，进入战备状态；同时在东海岸的鱼山、大陈等地设立对空监视电台，并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防空部队。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航委会当即举行紧急作战会议，决定空军参战。周即部署于14日凌晨驻江都的第五大队携重磅炸弹飞至上海轰炸游弋在长江的日本第三舰队，又令第二大队从广德飞往上海轰炸日本舰队和在汇山码头登陆的日军；并派请缨作战的高志航第四大队立即从周家口飞往杭州笕桥。第四大队刚抵笕桥，便得空袭警报。高志航即率两队机群二十七架紧急升空迎战，分组拦截敌机，英勇作战，击落敌机三架，首创中国空军胜利纪录。15日，日机六十余架分批轰炸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地机场时，周至柔指挥各战斗大队奋起迎战。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敌机十六架，并协同第三、第五大队及航校暂编大队在南京上空击落敌机十四架。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敌机四架。16日，第四、第五、第三大队分别在杭州、南京、扬州、嘉兴、句容上空击落敌机八架。17日又主动出击轰炸上海敌军司令部及其虹桥基地，并击落敌机二架。19日，第二大队轰炸机群在第四大队驱逐机群的掩护下袭击敌航空母舰，炸沉一艘巡洋舰。周至柔指挥我国空军连日奏捷，大振国威，国民政府决定把8月14日首战胜利之日定为“空军节”。日本侵略军不敢大意，出动更多的飞机来攻击、轰炸，使我空军损失不小。由于我国尚不能自行制造飞机，各飞行大队难以得到应有的补充，投入战斗的飞机日益减少，只能在夜间气候恶劣之时奇袭制胜，而日间的制空权则落入日军之手。

1938年春，航空建设委员会改组，钱大钧担任航委会主任，周至

柔改任委员兼主任参事。5月，中央航空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从重庆迁往昆明，蒋介石自兼校长，周至柔任教育长，实际负责全校工作，全力培训空军指挥人员。1939年夏，周又调回航委会任主任，全力进行空军整训，将空军作战部队编为七个大队和一个独立中队，另有四个苏联志愿大队，共有各型飞机215架。在是年12月的昆仑关战役中，周派第四、第五大队飞往柳州、桂林，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并拦截敌轰炸机群，击落敌机六架。以后在重庆、成都等地的空战中，亦有所获。但是面对占据很大优势的日本空军对重庆等地的狂轰滥炸，周至柔难以招架。

1941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空军总指挥部，周至柔被任命为总指挥。他组织各大队飞行人员到美国和印度卡拉奇（今属巴基斯坦）去接受新的飞行训练，学会驾驶从美国订购来的P—40、P—43、P—66驱逐机和B—29轰炸机。他将拥有337架飞机的七个作战大队和一个混合大队与美国空军协同作战，在此后配合陆军抗御日军的历次交战中，共击落日机216架，击伤46架，击毁149架；并炸毁敌军车四百余辆，大小舰船六百艘。

周至柔在领导空军建设和指挥空军作战中的功绩，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42年2月，他随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1943年11月又随同赴开罗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1945年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之要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改组军事机构，设立空军总司令部，周至柔任空军总司令。这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周至柔贯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和意图，指挥空军配合陆军部队进攻解放区。他凭借美国支援大量B—25、P—40、P—51等新型作战飞机的空中优势，对解放区和解放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和肆意扫射，还不时进行空中侦察。在战局转入防御之后，则忙于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空投粮食和武器。他虽然忠实听命于蒋介石，呕心沥血地调度空军频频

出动，但无力挽回国民党军节节溃败的颓势，只能在掩护地面部队溃退及抢运兵力、物资方面效几分力。

周至柔随同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进一步得到蒋介石、陈诚的器重，于1950年3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他下力革除国民党军队的积弊，核实发饷制度，将84万兵员核实为597000人，并以60万人为目标，以减轻财政负担；创立军储优息制，以改善士兵物质生活，并号召军队生产自给。他还推行“主管官任期制度”，以杜绝长年连任而自成山头、自立派系的弊端。1954年7月，他改任为“国防会议”秘书长，但将大权拱手交给副秘书长蒋经国。1956年4月，他率领百名将领组成“星云考察团”赴美国考察军事。1957年8月，他继严家淦任台湾省主席，并兼台湾省保安司令及民防司令。5年后卸职，任“总统府”参军长。1967年2月任“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总统府”战略顾问。1969年4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以后又任第十一、十二届中央评议会委员。他更热心于体育运动，1956年6月被推举为台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和“中华奥运会”主席。1965年起任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达十八年，倡导甚力，在台湾有“高尔夫之父”之称。

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陈训正编著：《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1929年南京版。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陈诚：《抗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

局1978年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03—316页。

周钟岳

谢本书

周钟岳，字生甫，号惺甫，又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人。1876年10月17日（清光绪二年九月初一）出生书香门第之家。他从五岁起开始读书，到十五岁已读完《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书经》、《四书集注》、《易经》、《朱子》、《礼记》、《春秋》、《左传》、《周礼精华》、《公羊传》、《穀梁传》、《性理精义》、《史记菁华录》等书，并练习作文。由于自幼阅读大量古书，旧学有相当基础，加上“少年记性颇强，十五岁以前所读各书，约能背诵”[(1)]。所以，“颖悟异常”，“落笔惊人”[(2)]，多次在云南丽江应府试，大理应院试，都名列前茅。

1898年，周钟岳在剑川被延聘教私塾。1900年肄业于大理西云书院，被在省襄办团练的赵藩约为文案。1902年5月，赵藩去湖南长沙开办四川济楚盐局，周钟岳前往司文牍。1903年初，赵藩以四川臬台兼管学务，聘周为学堂教员。同年秋，周回昆明参加癸卯科乡试，中试为第一名举人。

1904年，周钟岳由云南学务处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一年。第二年10月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周钟岳在日本时，曾与范熙壬等合组《新译界》杂志社，并著有《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又汇辑师范讲义为《师范丛论》十卷。

1907年底，周钟岳回到云南，担任省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省城两级师范教务长。此时，正值英、法组织隆兴公司掠夺云南“七府矿产事件”发生，清政府竟然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云南人民十分愤慨，设立“保存云南矿产会”、“矿务调查会”等，坚决要求废约。

云南绅商各界推举李增、周钟岳为赴京代表，向北京外务部请愿废约。1910年秋，又发生了英国侵占云南“片马事件”，群情更加激愤，组织“保界会”进行斗争。云南谘议局又推周钟岳、李日垓为赴京代表，请求北京外务部抗议英国侵略片马。1911年7月，周钟岳、李坤、顾视高等人乘赴京出席教育会议之机，约同云南籍的京官，就“七府矿产”和“片马事件”要求外务部采取行动。由于全国人民的斗争，“七府矿产”开采权终于被收了回来，但“片马事件”的交涉未能取得结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北京震动。周钟岳于10月15日离京南返，“凑一角色，无徒在台下观也”[3]。他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出现“亡秦恐归三户”[4]的局面。周钟岳南下途中，亲见革命气氛甚炽，颇受感染。他在日记中写道：“至沪后，闻某处某处失守之信……人人欢迎；忽《时事新闻》有革命军小挫之揭示，观者愤恨，几欲毁其报馆。于此亦可见人心之趋向也。”[5] 11月12日周钟岳到达昆明。此时云南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已成立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周被任命为秘书长，专司文牍。此后一年，云南军都督府的重要文电大部分为周钟岳起草。这些文电，后来择其要者辑成一书，名《天南电光集》。“云南光复以后之事，借此可窥一斑矣。”[6]

1912年8月，周钟岳被任命为云南教育司长。次年2月，兼任云南光复史编纂局总纂。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编成云南光复史十册，另有《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一册[7]。“虽仓促成书，而事皆征实。”[8] 1913年4月，周钟岳改任滇中观察使，1914年8月因病辞职。1915年2月，周应蔡锷邀约赴京，担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兼局评议委员会主任。他在经界局任职期间，根据蔡锷的指示，与同事合作，编成《经界法规草案》、《中国经界纪要》、《外国经界纪要》等书[9]。

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袁世凯蓄谋已久的复辟帝制的阴谋表面化了。11月，蔡锷潜赴天津，乘船东渡日本，经香港、海防去云南，发动反袁护国战争。蔡离天津去日本时，电告周钟岳代拟请假三

月赴日就医的呈文。周在蔡上船后，将呈文送给袁世凯。袁派人搜查蔡锷的所有文电，一无所获。周钟岳被监视，乃改名周谧，化装为商人，逃往天津，转赴日本学习英文[10]。

1916年年底，由于蔡锷的建议，周钟岳回国到四川成都，就任四川督军署秘书长，协助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次年，驻川的滇、黔军与川军发生武装冲突，滇军失败退出成都，周钟岳亦随之返回昆明。

这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亦于8月1日通电“响应”，组织了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周钟岳为总司令部秘书长。唐以“护法”之名，出师四川，亲自率军进驻贵州毕节，周钟岳亦随军至毕节。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决议改组广州军政府，废除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实权却掌握在滇、桂军阀手中。孙中山大失所望，愤而辞职，通电斥责滇、桂系军阀“置根本大法于不顾”，“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唐继尧收到这个通电后，竟批道：“无耻已极。”周钟岳也鹦鹉学舌地批道：“一片糊说。”[11]

1919年11月，唐继尧因其祖母和父亲先后去世，请假治丧，以周钟岳代理云南省省长。1920年6月，在“废督裁兵”的声浪中，唐继尧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专任靖国联军总司令，而以周钟岳为云南省长，但大小事务仍得听命于唐继尧。

1920年爆发了川滇战争，驻川的滇军先胜后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以“士兵厌战”为由，准备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派周钟岳前往毕节，以慰劳滇军为名，观察动静。顾品珍问周钟岳，唐继尧“既促开和会，何必出兵以争四川？既废除督军之名，何必创树联军之帜？”周钟岳尽力为唐解释，说他“非有争川之心，始终不过欲排除护法碍阻而已”。设联军总司令部，不过“以为收束军队之机关”[12]。同年底，周钟岳回昆明向唐继尧汇报，说顾品珍的言行“殊属可疑”。唐继尧为了稳住顾品珍，即任命顾为云南东防督办。顾品珍仍

率师向昆明进发，唐继尧军心动摇，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逃往香港。

顾品珍进驻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请周钟岳继续担任省长。周表示：即去无以对地方，然仍留无以对联帅（指唐继尧）。只答应维持两个月。1921年4月，周钟岳辞去省长职，回到老家剑川。

1922年3月，唐继尧率兵重返昆明，再次控制了云南军政大权。他电请周钟岳来昆，委以云南盐运使兼枢密厅厅长、省法制委员会会长职。唐继尧参与南方军阀“联省自治”的合唱，改组省政府，周钟岳为之修订省政府组织大纲，把唐继尧推上了“民治”省长的地位。1925年2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唐继尧派周钟岳等为云南代表出席。1926年1月，唐继尧任命周钟岳为省内务司长兼赈务处总办。后内务司改为民政司，周继为民政司长。

1927年2月6日，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联合发动政变，举兵进逼昆明，迫唐继尧交出政权。政变后，以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周钟岳被推为省务委员会常委、代理内务厅长。

新的省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周钟岳草拟了新政府大政方针意见书和新政府宣言两件。意见书声明，“就大势所趋及环境情况观察”，云南决定加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以“确定本省地位”。6月，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所部发生新的武装冲突，周钟岳曾出面吁请双方不得在省城作战，使昆明免遭战火之厄。随后辞职远游江苏、浙江等地。

1930年初，云南拟设通志馆，省政府聘周钟岳为筹备主任。次年，正式任命他为云南通志馆馆长，主编《新纂云南通志》凡266卷，印成140册。后又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自中华民国元年至

二十年（1912年至1931年）为限。该书1941年完成初稿，1943年进行了审订，但一直未能付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南京政府迁至重庆。云南省主席龙云特派周钟岳为省府代表飞重庆表示慰问。他说："既定抗战政策，无论战事进展如何，绝不宜中途变更。"表示滇省除已派出第六十军参加抗战以外，还可再派出两军[13]。

1939年4月，蒋介石电邀周钟岳至重庆中训团讲学。周钟岳到重庆后，蒋介石多次宴请，要他返昆后转告龙云，公开表明与已经叛国的汪精卫断绝关系。为了利用周钟岳的无党派人士身份装点门面，笼络和分化地方实力派，蒋又任命周钟岳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兼行政院所属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11月，改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与龙云地方势力之间矛盾十分尖锐。蒋利用周钟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关系，让周钟岳带着他给龙云的亲笔信，进行疏通，要龙云就任中国陆军总部副总司令的职务。同时，又暗中部署解决龙云和控制云南的活动。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在昆明的杜聿明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向龙云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占领了除五华山制高点以外的昆明全城，宣布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在五华山上据险抵抗。行政院长宋子文出面，请周钟岳写信劝龙云服从。龙云被迫屈服，去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但实际上被蒋软禁。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云南，使周钟岳大为感慨，逐渐丧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

1947年7月，周钟岳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考试院副院长职，回到昆明。蒋介石政府则给周钟岳以总统府资政的空衔，以示笼络。周钟岳回到昆明后，埋头于整理文史资料，著书立说。1949年秋冬之交，云南省主席卢汉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两度登门拜访周钟岳，征询他对云南起义的意见。周钟岳表示支持，并为他出谋献策[14]。

1949年底云南和平起义。1953年周钟岳被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6月19日，周钟岳在昆明病逝。遗嘱将所藏图书字画分赠云南大学、云南省图书馆、剑川县图书馆[15]。

---

(1) 参见《惺庵回顾录》第1卷（手抄本），现存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惺庵回顾录》共4卷，除第1卷外，尚有续录、三编、四编，所记自1876年起至1947年止，前后共七十二年，为周钟岳亲身经历的回忆录。其中，大部分已整理登刊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分别刊于第3辑、第5辑、第6辑、第8辑、第26辑、第41辑），但早年部分回顾录未刊。

(2) 《惺庵诗稿》10卷，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印，陈荣昌序。

(3) 《惺庵回顾续录》。

(4) 《闻武昌兵起出都南旋》，《惺庵诗稿》卷4，第5页。

(5) 《惺庵日记》（1911年10月22日）手稿，现藏云南省图书馆。

(6) 参见《惺庵回顾续录》，《天南电光集》。《天南电光集》手稿现存云南省图书馆，经整理后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呈明编纂光复史情形请函复省议会文》，《惺庵文牍》（一）手稿，现存云南省图书馆。

(8) 《惺庵回顾续录》。

(9) 皆已收入蔡锷撰，刘达武辑《蔡松坡先生遗集》，蔡公遗集编印委员会1943年版。

(10) 《惺庵回顾续录》。

(11) 唐继尧、钟岳在孙中山电文上的批语。原件存云南省档案馆。

(12) 《惺庵回顾续录》。

(13) 《惺庵回顾录四编》。

(14) 未刊调查访问记录。

(15) 《惺庵遗嘱》辛卯（1951年）4月，见《惺庵回顾录四编》之附录。

周自齐

张树勇

周自齐，字子廙（亦作子沂、子贻），山东单县人，生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副贡出身，京师同文馆毕业。该馆成立之初，称“洋务学堂”，实际上是清末培养译员的一所学校，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仅学汉语和外语，后增设天文、数理化、外国史地及各国法律等课程，又设有印刷所，译印各种书籍。周毕业后，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作为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的随员赴美，并就近入美国学校深造。后历任驻美使馆书记官、参赞等职。1903年1月，又为驻古巴总领事兼参赞，常川驻扎代办使事。1908年，驻美公使伍廷芳奉召归国述职，由周自齐代办使事。时美国为拉拢清政府，以便与日、俄争夺东北地区的权益，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并充作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费用。为此，周自齐奉命多次与美国政府进行交涉而获得退还庚子赔款一千二百余万美元，并成立中美文化基金会，负责经管退还的赔款。后经清政府外务部及学部决定，设立“游美学务处”，委任周自齐为该处总办，综理退还庚款及留美学生事宜。清末宣统年间，周奉调归国，先在外务部任参议，旋即提升为左丞。时袁世凯为外务部大臣，对周出使美国，深通洋务，又闻其素性敦厚，有较强的办事能力，颇为赞赏。不久，周调任度支部首领而掌握该部之实权[(1)]。清末，曾随载洵等视察日本海军。

民国成立之初，政治动荡，山东一省一时并立着双重政权：一是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人推为都督的胡瑛驻节烟台；一是由清朝巡抚改名充任都督的张广建驻节济南。1912年3月，袁世凯为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任命颇得他信任的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兼民政长，遂使周跻登封疆大吏之列。1913年8月，周调任中国银行总裁。9月，出任熊希龄内阁交通总长。是即所谓“人才内阁”，亦即以进步党为中心

而组成之内阁，时周自齐挂名进步党并为该党名誉理事。自此，周自齐开始进入交通系，与梁士诒、朱启钤一起成为旧交通系的三巨头。12月，陆军总长段祺瑞暂时被袁世凯派往湖北武昌取代黎元洪为鄂督，以夺黎之兵权，周一度兼陆军总长职，此举亦可看出袁对周自齐的格外垂青。

1914年2月，内阁总理熊希龄辞去兼任的财政总长一职，改由交通总长周自齐接任，致使周得机插足于财、交两界，一时成为北京政坛红得发紫的人物。不久，熊希龄辞职，改由时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兼代国务总理，周自齐仍留任财政总长。5月，袁世凯下令废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改设政事堂和国务卿，隶属于总统府，秉承总统旨意处理政务，派徐世昌为首任国务卿，财政总长周自齐等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被视为清一色之嫡系，均蝉联未动。

1915年3月，周署理农商总长，4月张謇奉准辞农商总长后，周正式接任。是年底，日本国筹备大正天皇加冕典礼，袁世凯初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为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前往祝贺，但日本政府嫌陆的官位低而深表不满，时袁正在僭位称帝之际，为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乃于1916年1月，委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疏通，并向天皇赠送大勋章，以示祝贺。开始，日本对周特使之行亦很重视，准备以亲王之礼予以隆重接待，后报纸揭载，谓是行必有诡谋，军界则有电阻其行者。濒行，日使告外交部，谓日本宫廷不允接待，致使周自齐赴日之举未能成行。但值得一提的是，袁为显示特使地位之重要，以博得日本之欢心和支持，特把已封为中卿的周自齐升授为上卿衔，与已公布的文官官秩令仅封徐世昌一人为上卿的地位相埒。

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政事堂会同各部设立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周自齐等一些亲信为处员，为袁称帝进行大肆活动。周自齐为使袁早日登基，办理国民事务局尤为卖力。然而，袁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便在全国上下的反对和声讨之中，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但袁仍把住权力不放，企图以总统地位来收拾残局。时任财政

总长的孙宝琦痛感财政蹶竭，筹款力不从心，一再请辞。5月，袁只好改派周自齐署理财政总长，同时兼任盐务署督办。周上任伊始，便伙同梁士诒等交通系要人，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货币，搜刮老百姓钱财，并以湖南矿产做抵押，向美国波士顿银行借款。后因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四国银行团的干涉，致使借款的打算搁浅。6月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病情加剧死去。

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并于同年7月14日下令惩办帝制祸首，时南方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惩办帝制祸首的名单，即除筹安会“六君子”外，加上周自齐、梁士诒等七人，共十三人，人称“十三太保”。最后决定将时称“帝制八凶”的周自齐、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朱启钤、夏寿田、顾鳌、薛大可等八人通缉拿办，周随即亡命日本。1917年7月，张勋复辟乱平，黎元洪引咎辞职。8月，冯国璋以副总统入京代行大总统职权，其时周自齐返国居津。不久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采纳研究系的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对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前解散的旧国会不予恢复，并采用武力征南政策。对此，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于是形成南北相持局面。此时，旧交通系之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人，见段祺瑞对南用兵屡遭失败，遂联合一些名流人士，主张调和南北，并公推徐世昌出面进行斡旋。1918年3月，冯国璋徇曹锟等人之请，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将帝制祸首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下令取消通缉。随后，周又重新活跃在北京政坛。

同年9月，徐世昌被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大总统，而与徐接近的旧交通系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人便遵照徐的指令在安福国会中大肆进行活动，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联合非安福系的国会议员以对抗把持国会的安福系，进而抵制选举曹锟为副总统。10月，徐世昌正式就任总统职，同时主张南北议和。其时，周自齐伙同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等社会贤达及各派系要人联名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以声援全国人民和各方面人士渴望结束内战促成南北和平

统一的愿望。11月初，该会在京宣告成立，一时和平声浪高涨。12月，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徐世昌接受梁启超及林长民的建议，在总统府内设立外交委员会，汪大燮为该会委员长，周自齐等人为委员，该会实际上是总统的外交问题决策中心。

1919年9月，靳云鹏继龚心湛之后兼代国务总理，靳氏为便利向美国借款，初拟提名周自齐为财政部长，后因安福系强烈不满，而使周屈就币制局总裁。1920年8月，靳云鹏第二次组阁，周自齐任财政总长并兼任盐务署和币制局督办。时在直皖战争之后，皖系既败，靳以张作霖、曹锟推荐并联络奉、直两系而为内阁总理，故周旋两系之间，唯恐失欢。直系吴佩孚以战胜余威，向中央政府索款，并截留京汉、津浦路款。周自齐上任伊始，中央财政竭蹶，无以复加，而向新银行团借款的计划又未能奏效，于是周自齐与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及国内公债局局长梁士诒研究，以为欲救靳阁危机，非令财政即有办法不可，眼下外债之路既绝，增税亦复不宜，惟有发行内债一策可解燃眉之急。然近年来因滥发内债而失信用，且矛盾错综复杂，债权债务双方皆以为苦，非先将以往所发内债加以整理，使信用得以恢复，势不能再事发行，周自齐等因费数月之经营，拟出整理计划，后阁员中有谗于靳氏，谓周、叶所为，实欲将所有财源均用之于整理内债，令内阁穷困以至于倒。于是，靳云鹏决心去掉周、叶以自保，后采用内阁总辞职办法，重新组阁，使周、叶均不继任，此事方告解决。

1921年11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时周自齐被徐世昌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随团赴美。同年12月，靳云鹏在大总统徐世昌、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旧交通系梁士诒、周自齐等人的反对下，内阁宣布总辞职。18日，徐世昌令外交总长颜惠庆暂时兼代国务总理，并于24日正式任命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为内阁总理。但是，梁的任命遭到直系军阀的强烈反对，特别是遭到吴佩孚的猛烈攻击。1922年1月25日，梁士诒被迫请假出京，徐世

昌暂时委派外交总长颜惠庆兼代国务总理。其时正值直奉战争爆发前夕，颜甚感处境艰难，一再请辞兼代阁揆职务。对此，徐遂于4月8日下令准兼代国务总理颜惠庆以及兼署教育总长齐耀珊辞职；9日，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兼署内阁总理。徐让周出任阁揆有如下考虑：首先是徐、周私交甚笃，合作愉快，不至于遇事掣肘，加之周出使美国多年，徐欲借助他熟悉美国政情，为日后向美国借款预做准备；其次是周原属旧交通系而又隶籍山东，与奉张固夙有渊源，与洛吴亦有同乡之谊，使张作霖、吴佩孚、梁士诒等军政要人俱不便出面反对，能度过内阁危机。然而，对周自齐的任命一经发表，首先提出异议的是梁士诒。梁从法理上指出："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并非阁员，代理总理是违法的。"(2) 对于梁士诒的指责，徐世昌自知理亏，于是便采用9日倒填8日的手法发表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以便蒙混过去。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时大总统徐世昌虽曲意逢迎，但是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仍指责他为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徐得不到军阀的支持，自己又没有武力做后盾，黔驴技穷，终于6月2日宣布辞职，并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保管后，匆匆离京赴津。同时，以国务总理周自齐为首的全体内阁成员，联名致电旧国会众参两院议长，告以"东海顺从民意，宣告辞职，依法交国务院摄行职务"(3) 。因内阁是非法总统任命，所以周自齐不敢用内阁的名义摄行总统职权，故特声明："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职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4) 而早在徐世昌下台之前，直系内部谁来接替徐出任总统意见不一。一部分人特别是曹锟之弟曹锐主张应立即把其兄曹锟捧上总统宝座。但曹锟的大将吴佩孚深感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恐怕招来物议，不如先把被张勋赶下台的总统黎元洪拉出来做傀儡，让他补完法定任期，然后再由旧国会名正言顺地把曹锟选为总统。双方几经磋商并征得曹锟的首肯，便由曹、吴的代表赶赴天津与在家赋闲的下台总统黎元洪进行交涉。时黎元洪及其左右的人也暗中进行活动，并频向曹、吴示

好，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终以“法统重光”的骗局，暂时又把黎元洪捧上了大总统的宝座。6月2日徐氏既退，3日周自齐便致电黎元洪：“国事重要，首座不可虚悬，自齐等暂维现状，未便久摄，故请钧座即日莅京视事，并推恩洪（指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编者）明晨来津迎迓。”[5] 6月11日，黎元洪入京上任。同日，周自齐将大总统印捧呈黎元洪。次日，黎提出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周自齐自行解职。实际上，周从1922年4月9日署理内阁总理到同年6月12日免职，在临时内阁任上只干了两个月或说六十三天，只起个看守内阁的作用，没有什么作为。卸职后，黎元洪委任周自齐为考察实业专使，同董康等人一起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返国后，其妻病故，周平时慑于阃威不能涉足花丛，今脱离羁绊，在港任情纵欲遂染性病[6]，经多方医治无效，1923年10月20日病逝于北京。

---

(1) 一说曾任度支部咨议官，后入袁世凯内阁充度支部副大臣。参见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卷2，第69页“周自齐”条目。

(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2页。

(3)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恢复法统”一节，1924年9月初版，第6页。

(4)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恢复法统”一节，1924年9月初版，第6页。

(5) 《申报》1922年6月5日。

(6) 曹汝霖著：《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

周作民

徐国懋　洪葭管

周作民，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人。生于1884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十六日）。他的父亲周佩香是个举人，在乡里设馆教学。周幼年随父读书，十五岁时转入谈觐孙办的东文学堂就读，汉文教师为罗振玉。1902年秋赴粤，入广东公学，学费多由已受聘该公学的罗振玉相助。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肄业两年半，因广东官费停发，只能归国。1908年秋，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同时自习财政经济。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

1912年3月，临时政府北迁，周作民随同去北京，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掌财政，对他赏识，擢升为库藏司司长。由于库藏司经手军政款项的发放和汇划，周因而与代理国库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军阀及其军需人员，有较多交往而相结识。

1915年，周学熙重掌财政，周作民因未得重视，具呈辞职。后经当时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的任振采推荐，至该行任稽核课主任，不久，兼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当时倪嗣冲任安徽督军，倪的心腹王郅隆任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周作民在安徽与这两人结识，这是他后来创办金城银行的契机。

1917年5月，金城银行成立，主要投资人即为倪嗣冲与王郅隆。倪投资17万元，王投资10万元，合占资本总额50万元的54％；加上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6万元，因之86％的资本来自军阀、官僚。金城由王郅隆任第一任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设总行于天津法租界，并

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分行。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发展迅速。经过三年时间，存款由40万增加到1198万元，放款由378万元增加到851万元，纯益由9万元增为89万元，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三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该行获利途径之一，是承购北洋政府的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这样既为银行获得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

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组成联营机构，次年大陆银行亦加入。这四家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周作民、胡笔江、谈荔荪为联营机构的领导人。四行联营的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以中南银行钞票为四行共同发行；（二）设立四行储蓄金，后来又合办四行信托部。1934年以储蓄会的资金，在上海建成一座高达二十二层的国际饭店。这些都给四行扩大业务带来了不少有利条件。

周作民办金城银行是以皖系为靠山，但他恐遭政治失败，连带事业失败，常标榜他并非安福系，仅借安福系势力为事业取得各方面的便利而已。1927年，金城银行的资本总额已增为700万元。不久，北洋军阀统治垮台，金城银行失去了原有政治上的靠山。于是周作民通过政学系的黄郛、张群、杨永泰和钱新之的关系，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兼职多起。他在业务上的措施，除了继续保持在华北各分行的业务优势外，开始逐渐将重心南移，加强长江流域各行的机构，并在广州与香港等处添设新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决定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总行迁到上海。到抗战前夕，金城在全国各地的分支行处已增加到六十五处。

周作民在日本留学时，很赞赏三井、三菱的一套经营方针，因

此，他想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及贸易企业。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银行的放款和投资有其特点。他放款集中于少数重点户，主要投放于其本行投资的企业和自营附属事业。在工业放款中，主要投放于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矿工业和面粉工业。1933年金城与中南银行一起，组成诚孚信托公司来管理已经收购的新裕纱厂和北洋纱厂，并且代管恒源纱厂；又以扬子纺织公司名义，收购了大生一、二厂并入新裕。在诚孚公司下，设有制造纱厂部件的诚孚铁工厂，还开办了纺织实验所，吸收和培训纺织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由于他对永利化学公司创办人范旭东的信任，金城银行对这个公司的放款也较多。1926年该公司制造洋碱时期，金城曾单独予以60万元的透支。后来在创办硫酸铵厂期间，又联合其他银行继续予以支持，金城的放款金额曾达到240多万元。周作民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关系也很深，在资金上亦多方面予以通融。金城银行对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实业轮船公司的投资，分别占这两大企业资本总额的9.73％和16.66％。

在周作民的主持下，金城银行的规模和存款总额，在抗日战争前的私营银行中，长期居于第二位，个别年份曾跃居第一位，超过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期间，金城承购公债和进行公债投机，仍是获利的途径之一。

1935年下半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推动下，周作民和吴鼎昌一起，曾率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成立中日贸易协会，吴鼎昌任会长，周作民任副会长。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周作民为了维护金城的财产安全和经济利益，把平、津、沪三个分行，交给留日出身的几个经理负责。周正是利用与日、蒋双方都有特殊关系，使金城银行于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都能同时继续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际上他很少过问。1937年11月间，他在南京参加这个委员会会议后

回沪时，因沪宁路火车已经中断，遂乘轮去武汉，绕道香港回沪。随后他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上，依然指挥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支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留。1942年3月，日方把他和李思浩、林康侯、唐寿民一起遣送回沪。日方意图是要他们这些人与日伪合作。周作民除任金城银行和有关投资企业的职务外，未出任任何伪职，只是与日本和汪伪方面的一些头目有所接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恐吓和敲诈，几有逮捕之势。后经张群、吴鼎昌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说他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9月，又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进行增资。金城也被迫出售了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下令非经蒋经国许可，不准离沪。但在美国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庇护下，周终于安然离开上海，飞穗转港。这些严酷的事实，使周作民终于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私营金融业老一代头面人物中，第一个于解放后回归大陆的，旋即被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北五行”（即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公私合营，他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2年12月，六十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接受企业改造，并带动其他同业，促成了联营、联管。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病逝沪寓。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周作民日记》（部分抄件）。现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

《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刊》，1937年上海世界书局代印。

籍孝存、杨固之：《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周作人

萧栋梁

周作人，初名魁寿，字星杓，参加县考时改名奎绶，号介孙，入南京水师学堂时改名作人。原字起孟、启孟，后改启明，号知堂。笔名有：开明、子荣、仲密、药堂等；晚年改名遐寿，号苦茶庵老人。浙江绍兴人。鲁迅胞弟。1885年1月16日（清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一）生于一个渐趋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六岁开蒙，接受传统的诗书科举教育，十二岁丧父。十七岁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隶管轮班，学习日文和希腊文六年，阅读梁启超《新民丛报》、谭嗣同《仁学》以及《天演论》、《原富》、《民约论》、《穆勒名学》等，开始接触西方新思想，并翻译《侠女奴》、《玉虫缘》，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同时也接受了佛教思想影响，形成悲天悯人思想和佛家相对观念，埋下后来消极变节的种子。

1906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中华留学生会馆讲习班学日语。次年夏入私立法政大学预科肄业，因眼睛近视改学土木工程。一年后毕业，入立教大学，并改学古希腊文。课余与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及鲁迅等到《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持续一年。1909年周作人与日本羽太信子结婚，后在日本生活两年，爱好日本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民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六年，加快了接受西方思想的进程，并与鲁迅共同从事文学活动，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表示出对匈牙利、波兰等国及祖国命运的关心。周氏兄弟实际上成为介绍和翻译中欧、东欧新文艺的最早之人。

1911年夏，偕妻子羽太信子返回绍兴。辛亥革命时只是闲住家中，翻看旧书或为《古小说钩沉》抄录资料。1912年民国建立后，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课长，后又改任视学，因其妻即将分娩未到差。

1913年4月，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并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兼省立五中英文教员。在浙江的七年里，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究日本和西方文化、乡土文化及乡贤前辈的著作，包括徐渭、张岱、毛奇龄、章学诚、范宣等人的著作，打下了中西学问的深厚根底。

1917年春北上，经鲁迅向蔡元培校长推荐，先任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半年。同年秋任北大文科教授仍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后兼北大日文系主任。1920年兼女高师教授，1922年又兼燕京大学副教授，1929年秋改为文学讲师，直到1937年，共计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最初以相当精力投身到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参与《新青年》和稍后的《每周评论》的工作。1918年以前与陈独秀、鲁迅等经常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9年起，与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任《新青年》杂志编委，轮流编辑该刊。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个性的文学》和《思想革命》、《祖先崇拜》等重要文章，表达了他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观，阐明了在文学革命之后必须有思想革命的深化，清算旧文学、旧道德、旧思想，用科学、民主、自由的新思想来重建国民性，表现出改革的热情和希望。还在《新青年》上译载普罗文学作品，介绍“新村”生活，宣传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其小品散文力主平和冲淡，恬静闲适，在“五四”时期曾产生较大影响。1920年秋，任《新潮》月刊编辑部主任。11月，与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耿济之、沈雁冰、叶绍钧等发起文学研究会，至1921年元月4日正式成立。该会为民国以来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其宣言就是周作人起草的，表明他这时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不久，上海、广州分会相继建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2年，文学批评集《自己的园地》由北京晨报馆出版。1924年冬与鲁迅、孙伏园、章依萍、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李小峰等创办《语丝》周刊，且是《语丝》前期的主要编者，并在该刊发表了《日

本狂言》、《希腊小诗》，与“正人君子”陈源、“老虎总长”章士钊等以及与日本文化侵略展开斗争；对国民党反共“清党”也有揭露。他自称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理论，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1926年为女师大之事，与现代评论派大打笔战。

但在北大工作期间，他也发现自己没有找到执著的“信仰”，1924年曾因听信妻子谗言，而与兄长鲁迅失和。1928年发表《闭门读书论》，继“文学店关门”之后又宣布“杂文店”关门，当起“隐士”来了，实际是思想开始落伍和消沉了。他写作草木虫鱼系列文章，博物和民俗并读，古书越读越多，“浮躁凌厉”之气消失。1930年主编《骆驼草》，不久停刊。1932年起常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写稿。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他感到祖国“风雨如晦”，已经是明季一片亡国之象了，并有了亡国之后做遗民的打算。不过，“文学店”并未关门，周作人对新文学和古文学的关系研究甚深，对“公安派”文学作了阐发，对蒋介石的“清党”产生疑惧，对太平天国等革命斗争的效果产生怀疑，从而形成了苟全生命于乱世的混世哲学。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与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由校方任为留校教授，负责保护校产。对此左派文化人对他予以督责，胡适等人也加以劝阻，但他一意坚持，借口有十口之家的“家累”，又有海派与京派之争，到南方左派要杀他等等，硬要留在北京“苦住”。1938年又开始兼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1939年元旦在居处遇狙受伤，秋起沦为汉奸，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同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及其弟李光华，因冀东暴动失败无法安身，回到北平，周为李星华安排在北大会计科当出纳；其后李星华姊弟二人去延安，周为之预支两月薪金做路费，并为之办了出北平的“良民证”。12月汉奸汤尔和死后，周继汤尔和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后又任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1年5月，出席东亚文化协会会议。1943年1月发表《中国的思想问题》，说中国人生存受到威

胁时也会反抗，引起日本文人指责其为反动老作家。加之汉奸集团内部倾轧，2月初周被解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及教育总署督办职，3月又经汪精卫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对于沦为汉奸担任伪职，他自称是“老而为吏”，不以为耻，且诋毁岳飞等抗金将领，反说秦桧的求和保存半壁江山是有才识。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6日，被国民党政府以曾任伪职、充当汉奸逮捕，押北平炮局胡同监狱。1946年5月27日，周被押解南京老虎桥监狱。11月16日被南京首都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周不服，以留校教授、保管北大校产，忍辱冒死不辱使命，在校抵抗奴化教育等有利证据，请复判。当时北平十五名教授联名致信国民党当局，亦请求量刑从轻。1947年12月19日，国民党最高法院改判周为十年有期徒刑。郑振铎曾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说：中国文艺界在十四年抗战中最大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周在狱中三年写了几种《说文》著作和几百首诗歌。1949年1月26日，国民党政府以局势转变，周被保释出南京老虎桥监狱，暂住上海友人家，于8月15日回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著述，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作品；并在上海《亦报》和《大报》发表九百多篇小品随笔，后在海内外发表《知堂回忆录》、《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

周作人一生著译甚多，主要著作：解放前有《雨天的书》、《谈龙集》、《泽泻集》、《谈虎集》、《永日集》、《周作人散文抄》、《看云集》、《知堂文集》、《夜读抄》、《苦雨斋序跋文》、《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风雨后堂》、《立春以前》；解放以后的著作有《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回想录》、《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其著译解放后曾辑集为《周作人文类编》（10册）、《周作人散文全编》（14

册）、“苦雨斋译丛”等。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北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张菊香主编：《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文洁若：《周作人的晚年》，《读书》1990年第6期。

周作人著，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朱葆三

陆志濂

朱葆三，名佩珍，字葆三（珊），以字行，世籍浙江黄岩。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平湖县乍浦。其父朱祥麟曾任平湖乍浦营、定海营游击等军职，1851年将家眷迁到定海县城，1859年移居定海东乡北蝉村。1861年，朱的父亲患病，家境顿趋困难，母方氏托人把年仅十四岁的朱葆三带往上海学艺谋生。离家时，随身仅带一只旧竹箱和一床旧铺盖。

起初，朱葆三在上海一家“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该店经售罐头食品兼营小五金，生意规模不大。朱白天在店里辛勤工作，晚间还抽空勤奋学习。上海当时已是新兴的对外开放商埠，华洋杂处，洋行势力很大，会讲几句洋泾浜式的英语，在和洋人做生意时很有用处。协记邻近的一家店铺有个学徒，每月花三块钱学费去夜校补习英语。朱葆三付不起学费，就拜此人为小先生，把每月省下的5角月规钱送给小先生权充学费，从而间接学会了一些洋泾浜英语。由于他能挤时间刻苦自学，举凡语文、珠算、英语、记账和商业尺牍等有关商业知识都学了一些，加之工作勤勉、生活节俭，因此为店东所赏识，一再给予提拔。在七年里，朱由学徒升任账房，再升经理。在掌管协记期间，赢利可观，他从而也分得了许多红利和额外酬劳金。其后店主去世，“协记”歇业。1878年，朱葆三利用这些年积蓄下来的钱作资本，在上海新开河地方独资开设“慎裕”五金店，专营大五金。

朱葆三本人由学徒出身，熟知业务，精于管理并善于用人。“慎裕”所雇用店员都是一些好手，如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精通账务、老练可靠，被聘为总账房；其他店员在进货、推销或门市应客方面都有专长。由于他用人得法，经营有方，“慎裕”营业渐臻发达。在业务往

来中，朱曾结识了以经营五金业发家的叶澄衷，两人成为至友。于是他把“慎裕”五金店迁到叶澄衷置产的上海福州路四川路大楼里继续营业，并兼营进口贸易。“慎裕”由于年年盈利，商誉日增，俨然执同业之牛耳。

朱葆三在五金行业中崭露头角后，经济实力也日趋雄厚。从19世纪末开始，他跨越五金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不少企业。如他和当时的官方或商界著名人物联合创办或投资的银行有中国通商、浙江实业、四明、中华和江南银行等，并在这些银行里担任重要职务。他所投资的保险业，有华安、华兴、华成保险公司和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的，则有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大达轮步公司以及法商东方航业公司等。投资于公共事业方面的，有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汉口自来水厂以及广州自来水厂等。投资于工矿企业方面的，有上海绢丝厂、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大有榨油厂、海州赣丰饼油厂、龙华造纸厂、日华绢丝公司、上海第一呢绒厂、中兴面粉厂、立大面粉厂、和兴铁厂、宁波和丰纱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以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

此外，他还与人联合举办了一些慈善、公益和教育事业，如与沈仲礼发起举办中国红十字会。后又陆续举办了华洋义赈会，救济灾区灾民。余如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济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教育事业方面有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现舟山中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

朱葆三的发迹，不只基于经营“慎裕”得法，更得力于他的买办生涯。1890年后，朱进入英商平和洋行任买办。由于外商洋行在上海等通商口岸迅速扩张，依附于洋行的买办们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发展起

来，其中一些经济实力雄厚者，并在所经营的行业公所中取得了领袖地位。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朱便当上了协理。此外，朱葆三曾先后担任过宁波同乡会会长、联华总会董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断处处长、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等社会公职。

清末，朱葆三与苏松太上海道袁树勋私谊甚厚，曾被任为道署总账房。朱推荐顾晴川任道署会计员并司出纳银库。其时，各省上缴之庚子赔款，均先解送上海道库，袁树勋把大宗库银委托朱出面拆放，获取余利，从而使“慎裕”成为运用道库存银，向沪地各钱庄拆放的“领袖”钱庄。朱葆三亦因此增强了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实力。

1905年7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为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和虐待华工，发动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权利的斗争。朱葆三作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在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中，团结其他行业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坚决站在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一边，表现得很积极、很活跃。

1905年夏季，上海的绅士以官办马路工程局腐败为由，申请改为绅办，以试行地方自治。是年阴历十月，遂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之设，苏松太道袁树勋在上海绅商互选和推荐的七十六人中，选定李平书为总工部局领袖总董，朱葆三等为办事总董。前者“常川驻局”，后者“常川到局”。朱葆三还与上海总商会会董、出口公会发起人、宁波人陆维镛和棉布业出身的宁波商人虞芗山等宁波帮，共同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国”。

1910年前后，包括朱葆三在内的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公会等一些团体的领导层人物，对清政府玩弄君主立宪的骗局已逐步察觉而有所醒悟，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辛亥革命前，虞洽卿、朱葆三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发起组织“宁商

总会”，会址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宁商总会”执有香港英政府注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当时上海人叫它“特别照会”，非常过硬。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堂的允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常在业余时去宁商总会打牌、约人会谈；同时也是掩护革命党人秘密集会，暂避风头的最好掩护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1月3日，上海起义，朱葆三随清政府末任上海道刘燕翼（襄荪）逃避到租界洋务局。此时他们获悉清政府南京督署复电，内容有“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等语。朱葆三即托词去斜桥寓所迁移家眷，暗中潜往毛家弄商团司令部通报，使商团及时得到情报，赶在清政府派兵之前举行起义。恰值当晚杨谱笙、高自白率敢死队和商团攻克了制造局，张士珩逃跑，上海宣告光复。朱葆三由同情革命进而投身革命。

上海光复后，主要任务是组织苏浙联军进攻南京，消灭长江下游清军的各据点，因此军需浩繁。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为都督府财政总长。不久，沈赴南洋募款去职，陈其美会同沪上各界代表在味莼园（张园）开会，公举朱葆三继任财政总长。他提出以毋苛捐、毋滥费、毋挠权三个条件相约而后上任。此时上海商业凋敝，金融恐慌，筹集款项十分困难，而每月用款之多恒逾百万。朱本人不支薪水，车旅之费亦自掏腰包，所聘顾问、参议亦各尽义务，不领分文。为了解决上海光复后各项浩繁的开支，沪军都督府拟动用前清政府上海道存放于各钱庄的庚子赔款，但此款早已被末任上海道刘燕翼存于各钱庄、道库的公款存折，送交比利时领事保管。陈其美以此为由将钱业公会总董朱五楼软禁，迫使钱业同人提供借款。后经各方磋商，由朱葆三出面具名负责发给收据始得解决，遂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1912年1月，中华银行成

立，朱为董事之一，不久被选为董事长。同年2月，他辞去财政总长职。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5月9日（佳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用上海总会名义，提出中日直接交涉青岛问题的主张，激起各界舆论的严厉抨击。13日，上海总商会发出“元电”为“佳电”辩解。14日，上海各团体反对，并在国民大会上提出罢免朱、沈两人。当时朱葆三年已七十二岁，平时很少过问会务，仅画押署名而已，一切由沈联芳主持。朱葆三叹曰：“一、不满人意，怨尤丛集，难一；二、不理众口，乌能取信，难二；三、‘佳电’是非可征诸将来之事，实无足深辩，难三。有此三难，乌能再留。”1920年，朱、沈两人相率引咎辞职。

此后，他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1926年夏季，时疫盛行，朱葆三冒暑前往时疫医院察看，顺道劝募捐款，因年老体弱而染疾不起，加之胞弟捷三在定海病逝，悲痛不能自制，终于9月2日在上海寓所病逝。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将外滩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以示对他的尊敬。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市工商联档案资料：《沈燮成访问录》1962年11月23日。

《朱葆三辞职书》，《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7版。

《上海总商会档案》全宗第37号编目1-30；《申报》1919年7月1日第10版。

朱光潜

宗志文

朱光潜，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生于1897年10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塾师，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均累应科举不第。他六岁入父亲的塾馆读书，十岁左右开始学写策论时文。幼年时代的这种训练，培养了他写论说文的能力，使他“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1)]。1912年朱光潜十五岁时才进正式小学，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这所学校是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特别重视教授桐城派古文。朱光潜在这里学写了一手道地的古文，还养成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

1916年冬，朱光潜于桐城中学毕业，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1917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18年经选拔去香港大学学习，次年正式转入该校教育系，主要是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几年学习，是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入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重大转变时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朱光潜正在香港大学读书，在那里看到《新青年》，读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对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有切肤之痛”，但终因已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2)]，开始支持新文化运动，放弃文言文而学习白话文。

1923年香港大学毕业后，朱光潜应邀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兼任校刊主编。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的低潮，各政治派别对“中国向何处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采取“超然物外，不问政治”的态度，绝不介入。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中国公学停办，朱光

潜转往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结识了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等人。1925年初，朱光潜与匡互生等人因对该校校长的专制作风不满，回到上海，与夏丏尊、叶圣陶等十余人创办立达学会，筹办立达学园。

同年，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进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学习。192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当年转入伦敦大学研读英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课，大部分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看书。1931年他又转学到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研究所研究美学和心理学，写成论文《悲剧心理学》并出版。1933年获该校博士学位。

朱光潜留学八年期间，刻苦学习，勤于写作，他的第一本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于1928年出版。文章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苦闷和彷徨，通过介绍文艺、美学、哲学等谈青年修养问题，意见中肯，很受青年欢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他写成初稿的有《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

1933年7月，朱光潜回国，应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任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方名著选读、文学批评史，同时在清华大学和中央艺术学院讲授文艺心理学等。他一面讲课，一面勤奋著述。1936年将回国前后写成的十五篇文稿辑成《孟实文钞》出版。其中《我与文学》、《谈学文艺的甘苦》、《谈趣味》、《诗的主观与客观》、《诗人的孤寂》等，如他在序中所说，代表他十年来的兴趣偏向，是他的一种单纯的精神方面的自传。

朱光潜回国时，正是文艺战线上京派与左联尖锐对立的时候。他的文艺思想是属于京派的，但在其主编的《文学杂志》试图超越于左右两派之间的主张，“我们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文艺也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杂志》仅出刊两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举家迁入四川。他在这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暑假后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1938年，他因反对国民党当局干预校务，无理撤换原校长张颐，任命特务头子程天放任校长，乃参与学校里的“易长风潮”，辞去文学院长职务。朱光潜在反程运动中的表现，引起中共方面的注意，周扬于1939年初曾写信邀请他到延安参观。这时，他正赴内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加之一些留欧好友的劝阻，未能成行。

1942年，朱光潜兼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并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朱光潜在未被征求意见的情况下，经提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1941年被选为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委。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他又变成国民党中央监委。实际上，他对参加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思想上十分苦闷，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48年曾与北京大学十七位教授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解决人民经济生活上的痛苦。他说自己当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3)]。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重返北京大学任西语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兼文学院代理院长。虽然这时生活清苦，时局动荡，他仍然专心致志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翻译的克罗齐《美学原理》，撰写的《克罗齐哲学述评》，第一次在国内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他的译文既忠实于原著，又流畅易懂，为美学在我国传播起了启蒙作用。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派飞机接朱光潜去台湾。这时，他已逐渐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断然拒绝，一心留在北平等待解放。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他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4)] 不久，他参加民盟组织的土改参观团，到西安郊区考察。接触农村土改后，他“明白了群众的力量伟大，不依靠群众就准要失败”[(5)]。

朱光潜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为了便于学习马列主义，他参加

北大组织的俄语学习速成班，突击学会了俄语。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结合新的观点重新探讨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清理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自我检讨说自己思想上“错误的根源，在从洋教育那里得来的那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虚伪的超政治的观念”(6)。

1956年开始全国范围的美学问题大讨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受到激烈而严峻的批判。美学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62年，五六年间朱光潜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如他在《自传》中说：“我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不隐瞒或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不正确的批判。”1963年，他所撰写的《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卷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迫害，但他仍然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潜心于学术研究。

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因病去世。

---

(1) 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 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

(3) 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4) 朱式蓉：《朱光潜从迷途到通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5) 朱光潜：《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人民日报》1951年3月27日。

(6)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朱光潜全集》第10卷。

朱家宝

黄有成

朱家宝，字经田，号墨农，云南华宁县人。1860年12月25日（清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其父朱学诗务农兼营杂货店。朱家宝五岁开蒙识字，十六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1892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朱家宝入翰林院不久，授礼部祠祭司[(1)]司官。后历任直隶省平乡等县知县、保定知府、通永道道台、江苏按察使。1906年，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赏识和荐举，升任吉林巡抚。1907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朱转任安徽巡抚。他是一个“精于公牍”、办事认真的官僚，案上的座右铭是“官须自做，事必躬亲”。他恪守封建的君臣之道，认为“为仁臣者不当纳私”，并以此为由，拒绝过一些向他求官的亲友。

朱家宝主政安徽后，鉴于恩铭被徐锡麟刺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十分警惕。他侦知熊成基和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倪映典谋在农历除夕于安庆再次起义，先将倪革职。1908年他率安徽新军三十一协前往太湖参加秋操时，得知熊成基等人计划在太湖秋操时发动起义，即对派赴秋操的士兵官佐严加挑选，阻止革命党人前去，破坏了起义计划。熊成基等随即改变计划，决定11月19日以马炮营为主力，在安庆首先发难。朱家宝抵太湖后，闻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立即返回安庆，加强对革命党人的防范。熊成基开始行动时，朱就得到了秘密报告，立即严令紧闭各城门，调重兵防守，并亲自率队督战。同时命令碇泊江中的清军舰发炮轰击，摧毁义军阵地。朱家宝继调援军进逼城郊，迫使义军突围出走。

朱家宝不仅严密防范革命党人，对民间聚事暴动也竭力镇压。

1910年，皖北各府迭遭水患，灾民众多，不断爆发起义，朱惊惶万状，连连派兵镇压。5月10日，镇压了蒙城、凤台两县交界的双涧集饥民暴动，起义领袖五人、骨干四人及十三个“协从”的群众均被杀害。宿州板桥陈集地方，有千余饥民起义，也被朱“飞饬各营合力剿办”。6月初，宣城连续大雨，山洪暴发，东、西、北三乡大小数圩接连溃决，灾民不得食。7月6日，该县双桥镇饥民千余人要求救济，又被朱派巡防营弹压。朱家宝的镇压行径受到了清廷的表扬，说，“幸得立时殄灭”，“办理尚称妥速”[(2)]，对他“加头品顶戴”，使其成为清廷宠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安徽革命党人也密谋起义。朱家宝采取措施，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防范：先是抽调部分精锐，组成一个战时混成营，约八百余人，由其义子朱基为管带率领，开往皖鄂交界的英山县驻防，以图阻止武昌革命军入皖；同时电请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张勋所部江防营两营到安庆布防；三是拉拢新军，特意提前五天发饷，并每人发子弹五十发。安庆革命党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下旬，新军中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被朱侦悉。他先以“新军不可恃”为由，下令收缴了各军子弹；接着把江防营调进省城，并把兵舰也调到江面上威慑安庆。朱的行动激怒了新军，纷纷采取抗议行动，携带被褥到城中各当铺典当，每件索价三元，各当铺穷于应付，拟闭门停业。朱见势不妙，便拨款帮助各当铺，以压制新军的抗议。10月31日夜，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驻皖新军六十二标及马炮营联合进攻省城。朱即令江防、巡防各营闭城死守，新军因无内应散去。朱乘势命令新军各营长官，按人发银六元，缴其军械，全部遣散。不久，九江独立，威逼安庆。11月15日，谘议局主张顺应潮流，响应起义，要求朱家宝出来担任临时都督宣布安徽独立，静观待变。朱初以“忠臣不嗣二君”，不允所求。这时，苏、杭皆独立，警电纷驰，形势逼人。袁世凯密电朱家宝，要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成见，贻误大局”。谘议局联合商会等团体决定11月8日自行宣布独立，朱才决定随机应变，回答咨议局说：“军

心如此，民心如此，各省踵蹑而行，我敢独异？请公策自保，吾遵奉施行耳。”[3] 11月8日，谘议局出面宣布安徽独立，推朱家宝为都督，但遭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11月11日，革命党人召集军、学等界代表集会，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王天培为都督。次日在督练公所成立都督府。朱以“事权不一”，“省垣秩序紊乱”为词，辞都督职，还印于谘议局，准备离皖。这时，王天培因推行改革措施过急，触怒了群众，加之资望浅，皖人不拥戴，被赶走。20日，安庆全城罢市，要求朱家宝复任都督。不久，革命党人吴旸谷请江西赣军黄焕章部来皖维持秩序。不料黄部抵皖大肆抢劫，并在城中索饷哗变。朱误以为赣、皖两军联合抓他，急从都督府东墙穴壁逃出，躲入天主教堂，后由天主教堂护送至天津，不久到北京。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对朱家宝十分信任。1913年1月，朱任参议院议员。1914年2月，任直隶省民政长兼直隶都督。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朱改任直隶省长。不久辞任。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前，朱家宝参加过策划复辟的徐州会议和其他一些活动。他在给张勋的信中，诬蔑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非淆乱，人心险诈”；宣称他自己“素性迂拙，岂能与为浮沉”，辩白他之所以当民国的“都督”、“省长”，是因为“元首一再慰留，不得不黾勉从公”[4]。他与张勋心怀清室，沆瀣一气。张勋复辟时，朱家宝当上了“民政部尚书”，颇为得意。复辟失败，朱亡命日本。

翌年，北京政府先赦洪宪和复辟帝制犯，又宣布张勋免于缉究。不久，朱家宝乃结束亡命生活，回到了天津，闲居贝子花园。

朱家宝善书法，习黄山谷体，笔力挺健、洒脱，颇为时人推许。他的著作有《海藏园序》、《廷尉天下之平论》、《审乐和政疏》等。

1923年9月5日，朱家宝在天津病故。

(1) 祠祭司，始于南朝祠部，掌祭祠之事。后来变为礼部，而以祠祭司为礼部所属四司之一，明清改为祠祭司。

(2) 清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军机处电旨。

(3)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42—245页。

(4) 朱家宝给张勋的信，《张勋藏札》，第57页。

朱家骅

林泽

朱家骅，字骝先，一字湘麐，浙江吴兴姚家坝人。1893年5月30日（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商人兼地主的家庭。父母早亡，赖其胞兄朱祥生抚育成长。朱祥生经营丝业，后在张静江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因此朱家骅少时就认识了张静江。朱家骅六岁入塾，十三岁入南浔正蒙学堂，十五岁改进南浔公学，1908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即同济大学前身）。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中国敢死团”任驻汉代表，在汉口战地及伤兵医院服务三月[(1)]。

朱家骅在同济毕业后，于1914年初自费留学德国柏林矿科大学，研究地质，张静江曾予资助。1917年初回国，在北京大学教德文。越一年，得蔡元培帮助，获教育部公费赴瑞士研究地质学，1920年转学到德国，1922年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仍在北大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在这期间，朱家骅曾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表现积极。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后来受北洋政府的通缉，乃不得不潜行出京，暂回原籍隐避[(2)]。

1926年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周觉自广东抵浙，劝戴季陶去广州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朱家骅因与周有戚谊，乃偕行赴粤。朱家骅先在石井兵工厂当秘书，自认为大材小用，牢骚满腹，一度为蒋介石撤职扣押，经周觉挽戴季陶缓颊释出[(3)]，转任广东大学教授。10月，广东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废校长制，任戴季陶、顾孟馀、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校务委员。当时其他四人都不在校管事，朱代理校务委员长。1927年4月，广州国民党右派进行“清党”后，广东省政府改组，朱因戴推荐，登上政治舞台，任广

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仍兼中山大学校务。朱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自任所长。8月，任省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4)]。是年冬，朱家骅回浙江，在张静江手下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朱家骅在浙江，提出“用新人，行新政”的口号，组织“北大同学会”作为联谊场所，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1928至1930年间先后举办三次县长考试，设置典试委员会亲主其事，以观察应考者的容貌和辩才，三次共录取五十余人。同时还开办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浙江省警官学校，都自兼校长。自治学校为培养全省各县区级官吏，三期共毕业五六百人，都以区长或自治指导员任用。警官学校为整顿和掌握全省警察实力而设，分正科和速成科两部分，也办过三期，均以县警察局长、分局长和警佐任用，还将正科第一期优秀毕业生三十余人，分送奥国和日本留学。

为推行新政朱家骅组织新政考察团前往豫、晋两省考察，回来后仿照山西的街村制，在浙江推行村里制（后改为乡镇制），意在实施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他还整理田赋地籍，动用许多人力办理土地陈报，清丈全省土地，声称这是“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此外，还推行了清查户口、兴办团练、普及卫生、禁溺女婴、移民东北、整饬吏治等。

朱家骅治理浙江颇受蒋介石等人的赞赏。1929年3月，朱家骅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主席团，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从此参与国民党统治的中枢活动。

朱家骅在浙经营数年，声名日盛，到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全省代表大会选举时，他的部属与亲信几乎占据了省党部委员候选人名额的三分之二。与CC系引起了权力的争夺，结果遭到陈果夫的排斥，在选举中失败[(5)]。他还和张静江为省党部委员候选人问题酿成交讧，戴季陶居中调解无效，是年9月朱家骅被迫离职。

其时戴季陶还兼任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也还挂着副校长名义，于是戴让位于朱。1930年1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去职，朱又得到戴的支持，调任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春，朱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1943年改称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提出在大学和高中实施军训的方案，为蒋所采纳，交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通令全国施行。

1931年底，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主持订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及小学法、中学法等，创办中央图书馆、博物馆、编译馆，提出在各大学增加政治训练的方案，设置训育员，以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充当，用以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1932年11月，朱家骅调任交通部长，竭力整顿巨额亏累债务。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朱家骅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朱家骅兼任该院总干事[(6)]。1940年3月蔡元培病故后，朱又任代理院长多年。

1936年冬，蒋介石调朱家骅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并兼民政厅长。他已无十年前的锐气，因循守旧一味应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飞机常至杭、嘉、湖一带骚扰，朱往往于黎明驱车逃离杭州去富阳躲避空袭，把政务委之于僚属。1937年11月淞沪战事失利，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嘉兴、湖州随告沦陷。朱惊惶失措，忙将省政府迁往金华，寇未见而人先遁，造成地方一片混乱，舆论哗然。12月，朱卸省主席职。

朱家骅卸任后去武汉，1938年3月，被蒋介石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4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按中常委决定兼充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7)]。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朱为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兼代中央团部书记长，并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二、三期工作。1939年12月，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国民党党务。他在各大学设立党部广泛吸纳知识分子入党。同时期他仍兼“中统”局

长，抓紧机会经营特务组织，自立门户，广为发展。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长达四年半，他所造成的派系力量，一时可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派系势力相抗衡，被称为“新CC系”。1944年5月，朱卸中央组织部长职，11月，再任行政院教育部长。1945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朱继续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以派系力量，分占中委名额，与二陈竞争激烈[(8)]。

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朱家骅主持战时教育复员工作，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重订大学课程。当时蒋介石热衷于内战，教育经费奇缺，教育事业支离破碎。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兴起后，朱疲于奔命，竭力加以压制。1948年冬，平津解放在即，南京亦已风声鹤唳，朱家骅派大批人马把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的文物书籍等大量运往台湾，并把中研院搬迁去台湾。12月，行政院改组，朱不再任教育部长，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49年夏，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副院长[(9)]。不久，朱随同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

朱家骅在台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资政”，1963年1月3日因心脏病去世。

---

(1)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5页。

(2) 杜伟：《我所知道的朱家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3年版，第90页。

(3) 魏思诚：《朱家骅触犯蒋介石坐了禁闭室》，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4) 何祖培：《对杨子镜“一点订正”的补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 1930年陈果夫当中央组织部长，为便于对浙江的控制，采用“乙种选举法”，由省选出省党部执行委员加倍人选，上报中央圈定。

(6) 傅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7月再版，第41页。

(7) 胡梦华：《国民党CC集团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8) 胡梦华：《国民党CC集团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04—208页。

(9) 大陆杂志社编：《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1963年6月台北印。

朱经农

娄献阁

朱经农，原名有畇，改名经，字经农。祖籍江苏宝山，1887年8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浦江县城。父亲其恕（字仁甫）曾助堂兄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后任知县，又在石门厘金局做事。

1894年，其父病故，时朱经农刚满七岁，兄弟四人均未成年，由母亲抚养，生活十分艰苦，仍坚持在家攻读。朱的三叔其懿长期在湖南做官，于1896年将他们全家接到长沙，后朱经农过继给五叔聪甫为嗣。其时新政在湖南盛行，姑丈熊希龄和叔父其懿都是维新人物，多次携朱经农到南学会听讲演，朱经农颇受启迪。

1898年戊戌政变后，朱其懿由长沙调往衡州任知府，熊希龄也闲居衡州，朱经农便向熊希龄和一位姓彭的老师学习《左传》、《说文》等。1901年，朱经农前往上海姐姐家同外甥顾月江一起学习，并准备投考南洋公学，后因病作罢。

1902年，朱经农回到湖南，三叔其懿已改任常德知府，遂往常德就读于名儒易纬舆门下。翌年，考入常德府中学堂，与进步青年覃振、戴修瓒等同学，课余结伴去启智书局阅读《浙江潮》、《洞庭波》等新书，渐萌民主革命思想。

1904年，朱经农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巢鸭弘文学院和成城学校就读。1905年，经同学龚练百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黄兴等革命领袖。同年冬，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相继归国。朱经农回到上海后，与姚宏业等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春开始上课。教员有于右任、马君武等人，还聘有日人任教。朱一面当学生，

一面做翻译，半工半读，被称为“中国公学之秀”[1]。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所派监督破坏学校的民主制度，酿成学潮。朱经农是学生代表被开除，多数学生在极端气愤之下整队离校，另组织中国新公学，朱被推为三干事之一。新校经费十分困难，支持一年有余，至1909年冬新旧公学合并，才得解决。

1910年，三叔其懿在沪病故，朱经农扶柩回长沙营葬。为赡养家庭，他留湘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英文教员，兼农业学堂翻译。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参加戎幕。不久，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朱遂出走上海。

1912年秋，朱经农应宋教仁等之请，由上海赴北京，任《民主报》编辑和《亚东新闻》总编辑；同事有景耀月、金葆光等。两刊实为同盟会与稍后成立之国民党的喉舌。朱以“澹如”等笔名多次发表文章，指斥袁世凯及其同党倒行逆施，“蠹国病民”，司法行政“依一人之意向为转移，一喜一怒百小民生死系之”[2]，致使国会无形解散，民德日益沦亡，法律破坏殆尽，此乃足以亡我民国之三大隐忧。因此遭到袁的忌恨。

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北洋当局下令将上述两报刊封闭，并指名索捕朱澹如等。朱经农避往天津。同年7月，熊希龄组阁，朱得其庇护，回京后暂居熊宅，旋由熊函荐于农商总长张謇，任统计事宜。迨袁世凯搞帝制自为，朱深为不满，于1916年前往美国。

朱经农在美，初任中国教育部留美学生监督处书记，业余入华盛顿大学听课，进行半工半读。1920年，取得官费，辞去监督处的职务，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研究生。留美期间，他先后获学士及硕士学位。朱在美加入基督教，成为忠实信徒。又常与胡适、任鸿隽交往，共同探讨文学改良问题。朱赞成写白话文，认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主张甚是”[3]，但谓“白话诗无甚可取”[4]，尤反对以罗马字代替汉文。

1921年，朱经农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由美回国主讲教育学，后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在太平洋会议召开之际，朱曾撰《废止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及其附属文件之研究》和《各国在华租界地性质之研究及请求取消之理由》两文，刊于《东方杂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军阀混战的危害加以谴责。

1923年，朱经农应王云五之邀至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助王赶编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很快出版了数十种学生和教员用书。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教育改革的课程需要，内容充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编教科书的过程中，朱曾多次在《教育杂志》、《教育与人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有关各门课程的讨论，并翻译出版美国实用主义学者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他还曾撰《职业指导与初中课程》等文，强调学生的技能培养，并与陶行知一起改编《平民千字课》，助熊朱其慧、晏阳初等搞“平民教育”，同时替《申报》编辑供平民阅读的副刊。

1924年秋，朱经农兼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讲授教育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大学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全体退学，学生家长张寿镛等另创光华大学收容退学学生，推朱经农为教务长，他辞去沪江的职务，积极进行筹划，经过数月准备即开学上课，并在教学与管理方面均保持与圣约翰相等的水平。这期间朱还常去大夏大学夜校教书。1926年，他担任主编《教育大辞书》工作。

同年，朱经农曾赴广州暗中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回沪后同吴稚晖、杨杏佛等冒险从事党务工作。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成立，黄郛为第一任市长，朱被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当时教育局仅有二十余人，但办事效率很高，他对教育计划与布置“既不急就，亦不躐等”[(5)]，处处从未来着眼。1928年春，朱辞去教育局长的职务，一度任市政府参事。不久被蔡元培调往南京，任大学院普通教育处处长。同年秋，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朱留任普通教育司司

长，1930年升任常务次长，是年冬随部长蒋梦麟辞职。朱长期主管中小学教育，国民党政府初年的有关教育规章制度多出自他之手。

1931年春，朱经农到沪任中国公学代理校长。4月，上海市教育局教育讨论会成立，被推为委员长。同年夏，受聘为山东齐鲁大学校长，迁居济南。

1932年9月，朱经农担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到任后即对全省教育进行实地考察，并相继组设湖南教育设计委员会、初等教育研究委员会和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以推动教育的发展。他在湘任职十余年，克服了抗战时期的严重困难，至离任之前，基本上已做到全省范围内平均每一百户有一所四年制小学，每一乡（镇）有一所六年制小学。中等学校由原来的一百多所增加到二百五十多所。高等教育，除先后将湖南大学与湘雅医学院改为国立，又于1941年在南岳创办农、工、商三所专科学校。

1943年3月，朱经农奉调至重庆，任中央大学教育长，校长系蒋介石兼任，校务实由朱负责主持。一年之后，蒋介石辞去校长兼职，朱也离开中央大学。

同年，朱经农写成《教育思想》一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回答了教育理论方面有关问题的争论，阐发了他的教育观点。朱不赞成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教育，而提倡民治主义的教育，认为此种教育学说“一方面维持个人的发展，一方面注重社会的秩序，对于国家的自由和民族的平等十分尊重，同时希望大同之治……或可供吾人建立教育政策的参考”。他认为“学校是好社会的雏形”，“应以切合社会需要为施教的目标”，并主张中国教育必须以精神训练、国防科学、生产技能为中心，教育家要“把儿童当作有机的主体”，“一切课程须适合自然发达的原则”[(6)]。他反对阶级斗争论，并主张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1944年3月，朱经农被任命为教育部政务次长。翌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他辞去次长职务，仍去上海继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同时兼光华大学校长。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朱两次出席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国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7年9月在南京召开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朱经农被邀参加，会后曾撰文发表感想。1948年11月，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赴中东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会议结束时上海已经解放，朱暂留美国，着手撰写《中国教育思想史》，不久完成初稿。1950年，应聘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神学院任教，至1951年3月9日，因心脏病去世。著译书籍除前述各种外，还有《爱山庐诗抄》、《近代科学的宗教观》等。

---

(1) 胡适：《喜朱经农来美》，《胡适留学日记》（四），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版，第935页。

(2) 朱经农：《民国之三大隐忧》，《民主报》1913年5月27日第2版。

(3) 《朱经农致胡适的信》（1918年6月5日），《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109页。

(4) 《朱经农致胡适的信》（1916年8月2日），《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版，第998页。

(5) 潘公展：《纪念一位中国教育家》，《革命人物志》第17集，1977年台北出版，第73页。

(6) 朱经农：《教育思想》，商务印书馆1947年再版，第20、39、34、14、13页。

朱培德

胡训珉

朱培德，字益之，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云南盐兴县猴盐井（今属禄丰县）。其父朱秉堃为盐兴县广通书院山长，兼营盐业。朱培德五岁时被祖母带到安宁读书。七岁时父亲去世，遂由祖母、叔父抚养长大。少年时喜欢骑射和武术。

1908年，朱培德考进云南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两年后，随营学堂并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朱为丙班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受反清革命思想宣传的影响，常秘密阅读革命书刊，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讲武堂学生参加云南“重九”起义。起义胜利后，朱培德被派入李根源指挥的西征军第二师任一等副官，后改任中队长。

1912年秋，讲武堂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后复课。翌年6月，朱培德被调回讲武学校第四期步兵科乙班深造。1914年夏毕业，被派往新编步兵第三团一营一连任连长。1915年春升第二营营长，被派往思茅、普洱边界驻防，因当地是著名的瘴疠之地，士兵大半病死于疟疾。朱培德也染患重病，年底始回昆明。

这时，蔡锷、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朱培德所在的第三团编入护国第一军，随蔡锷开赴四川作战。不久，朱培德营扩编为支队（相当于团），任支队长，编入李烈钧护国第二军方声涛梯团，于1916年初向两广进军。朱培德率部师次滇桂边龙潭时，同袁世凯派来进犯云南的龙瑾光部激战，获胜后进至广东肇庆。在此，朱部整编为第二十五团，任团长。又经三水、清远取道韶州北进，行军到琶江时，袁世凯死。时龙济光部阻挠，朱率部与龙军十个营战于源潭，坚持数昼夜终于获胜。随攻清远，得龙部陈福祥率三个营来降，朱率军

开往广州。护国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调龙济光任琼崖矿务督办，将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归陆荣廷统辖，朱培德升任驻粤滇军第七混成旅旅长，率该旅驻扎广州市区。

1917年8月，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组织护法军政府，朱培德在广州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广州护国军政府内部，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竭力控制领导权。这时，龙济光在琼崖称兵，旬日间陷高雷四邑，守军节节败退。广州危在旦夕，朱培德站在驻粤滇军总司令李根源一边，表示不能坐视。李根源任命朱培德为梯团长，率滇军三个支队会同粤桂各军为南路讨龙，相继占领恩平、阳江、高雷。旋北洋军由赣南偷袭粤北，朱又奉命赴援南雄。南雄解围后，朱培德因战功，被李根源升任滇军第四师师长，仍率部驻扎广州，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1920年2月，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的领导权又起纷争。唐继尧电令解除李根源驻粤滇军军长职务，谓驻粤滇军由本督直辖，就近秉承李（烈钧）参谋长办理。朱培德奉唐之命，调集军队袭击驻粤滇军司令部。但李根源得到桂系陆荣廷支持，迅速控制了局势，朱培德闻讯连夜化装逃到香港，与滇军将领磋商对策。3月辗转回队，率部分滇军退至湘南，编成三个旅，朱自任师长。途经郴县时应谭延闿之请助击张敬尧，与张军战于衡山获胜，使谭军进占岳州。旋奉唐继尧命继续行军入川，进抵渝、叙、泸之时，滇军已败，唐继尧嫌他行动迟缓，解除了他的职务，朱遂离职经重庆去上海。

同年10月，桂系陆荣廷把持的广州军政府垮台，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1921年6月，粤桂战争时，原朱培德所率之滇军由湘西开到桂西北。10月，孙中山着手在桂林筹建大本营，准备依靠滇、粤各军北伐。但这时亡命香港的唐继尧重金收买了杨益谦，计划由杨率滇军护卫唐继尧回云南。为了保住这支重要武装，大本营参谋总长李烈钧召朱培德回桂林稳定滇军，孙中山并委朱为援桂第二路司令。唐继尧闻讯极为紧张，亲自会见朱培德，倾其囊中仅余二十万元予以收买。

朱培德对唐继尧并无好感，追随孙中山的决心已定，他收下唐的巨款后，暗中控制了滇军。当杨益谦私自调动滇军准备与唐继尧会合时，大部分将士拒绝服从命令，少数已经出发的部队也被朱培德率部截回，杨只身逃走。11月，孙中山发布了任命朱培德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的命令，并予以嘉勉。12月底，朱培德率所部滇军在桂林集体加入国民党。不久，他又通电声讨唐继尧，表示决心北伐，决不回滇。

由于陈炯明的破坏，孙中山取道湖南北伐的计划受挫，被迫改道赣南北进。1922年4月，朱培德率滇军在李烈钧指挥下，担任中路前敌总指挥，由韶关入江西，会同粤、赣各军一起北伐。6月，当北伐军前锋进至江西吉安时，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趋登楚豫舰，北伐军急忙回师靖难，被阻于韶关。不久，又因友军失利，朱培德率部且战且退，多处被截，后焚弃辎重，率轻骑经乐昌、蓝山等地入桂，将桂林土匪梁华堂驱逐之。

1923年4月，朱培德会同滇军杨希闵等率部入粤，驱逐了陈炯明，迎孙中山重回广州任海陆军大元帅。当时盘踞广州的滇桂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极为尖锐。为了保证大元帅府的安全，又避免各派军阀的疑忌，孙中山调朱培德滇军回广州，将朱部编为“大本营巩卫军”，并任命朱培德为大本营巩卫军军长兼大本营参军长、代理军政部长，给了朱培德特殊的荣誉。10月，朱培德在保卫广州之战中击败陈炯明。朱的声誉隆起，愈加受到孙中山的信任。

1924年9月，孙中山准备再次北伐。朱培德任北伐军中路总指挥，率部随孙中山北上，集结于广东北部乐昌一带，旋率军入江西，击败吴佩孚部。是年冬，孙中山北上，朱部奉命回广州。次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云南军阀唐继尧企图乘虚而入，宣布就任副元帅，勾结杨希闵、刘震寰，准备里应外合，夺取广州。6月5日，朱培德就任建国滇军司令，调集军队参加平定杨、刘的战斗，收编了杨、刘残部，为巩固广东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各种力量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朱培德深知军事实力的重要，抓住时机重振滇军。他向国民党中央和苏联顾问团表示坚决赞成关于统一军政、民政、财政的决定，主动要求尽快在滇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特别要求获得大量新式武器装备。由于长期以来朱培德追随孙中山，服从国民党的指挥，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中国共产党派朱克靖等一批云南籍党、团员到朱培德军中组织政治工作机关，动员了一批云南进步青年加入朱培德军。国民党中央也拨给他大批枪械物资，把赣军和川军残部拨给他整编。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残破不堪的滇军大为改观。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朱培德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兼军需部长。8月，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三军，下辖三个师，他任第三军军长。在第二次东征期间，朱培德兼任南路讨贼军总指挥，指挥第三、第四军和一部分桂军进兵粤南，歼灭了邓本殷部。

在国共合作的前期，朱培德拥护孙中山的方针，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靠拢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有所不满，尤其对蒋以领袖自居，蓄意扶植嫡系、排斥异己的专横跋扈行径颇为反感。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蒋的亲信、第三军军校校长熊式辉擅自派兵包围第三军政治部。朱培德闻讯立即撤销熊式辉的职务，慰问政工人员；同时，联络第二、四、六各军，准备共同制裁蒋介石。但是其他各军只求自保，在蒋介石纵横捭阖之下，朱培德无能为力。嗣后，他见风转舵，曾和谭延闿一道奔走于汪、蒋之间，充当调解人。但汪精卫十分消极，称病隐匿。此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列名为“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朱培德任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三军集中于湖南浏阳、醴陵一带，防御江西孙传芳军。9月6月，朱培德率第

二、三两军进攻萍乡、莲花，在仰天岗一带与孙军主力邓如琢部激战，取胜后第三军前锋到达南昌城下，主力在牛行一带布防。但在敌军猛攻下，全军退至蛟桥、万寿宫一带。在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带领下，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不顾敌人的猛烈炮火奋勇出击，取得万寿宫大捷。11月初，在江西的北伐军发起总攻，朱培德率第二、三、十四军及第五军一部发起第二次牛行战役，11月8日占领南昌，结束了江西战事。在江西的苦战中，一万人的第三军，伤亡达六千多，损失之惨重是北伐各军中少见的。

由于第三军的战功，朱培德被任命为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代理主席、南昌警备司令。他不仅充实了第三军，还招收流落于湘西、赣南的滇军残部金汉鼎、杨池生、杨如轩等部加以收编，把第三军扩编为第五路军，下辖第三、第九两军。他请云南讲武堂同学、滇军名将朱德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后改名为第五路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培训各级军官。

其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亟欲在南昌建都，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不愿让朱培德坐大，更不肯让朱控制江西地盘，致使朱培德同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朱遂采取反蒋左倾的立场。1927年2月，蒋介石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主席，国民党右派囊括了省政府全部要职。蒋的部属甚至扬言要暗杀朱培德的爱将第三军军长王均和第三军政工人员。蒋建都南昌的企图遭否决后准备东进时，以委朱培德为江右军总指挥为名，调走朱的两个师，并把它们拆开，使之无法互相策应。蒋还亲召朱部第九师长曾万钟长谈，意图收买。顷刻之间，朱培德几乎被搞得手无一兵。他一气之下跑到九江，派员向武汉政府表示：他追随总理多年，服膺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永远不变；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很痛恨，他要拥护武汉政府到底[(1)]。因此，武汉政府明令王均管理南昌卫戍事宜。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继续选举朱培德为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军委会委员。

3月下旬，蒋介石率军离赣东下，朱培德立即公开反蒋。他一面下令调回第三军东进部队，一面派军队解除蒋军留守部队张群等武装，并把李烈钧的省政府赶到上饶一带，甚至派军队保护“四二”暴动的群众，捣毁了程天放等反动分子把持的伪省党部。南昌的反动空气暂时被遏制，朱培德也取得了武汉政府的信任。4月5日，武汉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朱培德就任省主席，王均和黄实分别担任省政府委员和财政厅长。朱培德又推荐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兼省政府秘书长，任命朱德兼南昌公安局长。这样，朱培德终于独掌江西省大权，但他余恨未消，又亲书长信寄何应钦，历数蒋介石的罪恶，动员何应钦反蒋。

蒋介石深知江西战略地位之重要，曾数次函电致朱表示：“兄环境之困，弟亦深知”[(2)]，劝他“不可自毁历史”[(3)]，责成他保护被捕的反动分子。上海《民国日报》对王均、朱克靖等破口大骂之时，对朱培德则微妙地不著一词。朱培德察言观色，眼看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已经得手，声势日大，便停止了自己的反蒋言行，再次避居九江，留下日后同蒋介石修好的余地。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但双方都没有立刻摊牌，朱培德也不愿他人染指江西。5月14日—15日，他代表汉方同李宗仁在湖口江面军舰上会谈并达成协议：宁汉双方暂不交锋，各自北伐，江西暂守中立。

随着武汉汪精卫集团反共声浪的高涨，朱培德也逐步改变了他的左倾姿态。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朱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实行“缓和”政策的口号。他派兵查封了《三民日报》，给第三军一百四十多名政工人员发了路费，用军舰押运“礼送”出境[(4)]。6月5日，朱培德下令南昌全城戒严，将AB团分子程天放等释放；又命令省总工会、农协停止活动，通令各县停止工农运动，还派兵围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械。他再一次强令“礼送”袁玉冰、方志敏等二十多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出境。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旋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率军东征，朱培德深恐唐生智乘机兼并江西，乃调集军队布置警戒。月底，叶挺、贺龙军开入空虚的南昌城，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朱培德措手不及，驻守南昌的四个团除两个营闻风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他慑于起义军声威，包围南昌后不敢进攻，将主力置于赣南主要交通要道，待到起义军南下，曾于大庾岭拦阻。等张发奎军尾随而下之后，江西重新成为朱培德的一统天下。

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不久宁汉合流。朱培德随汪精卫等到南京、上海，经过国民党各派的激烈争吵，暂时达成了“党政统一”，朱被推为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及主席团委员。但南京国民政府和特别委员会实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控制，汪精卫未能遂愿，很快回到汉口。朱培德也回到江西，力谋稳固自己的阵脚。10月，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朱培德接受了南京委任的第五路军总指挥职，把军队集结于九江、铜鼓。但朱仍受汪精卫影响，态度暧昧，使败退的唐军得以从容后撤。

汪精卫因广州事变受到围攻，于12月被迫出国。蒋介石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朱培德只好俯首投入蒋介石门下。为预防不测，他命令王均：“中央如果要缴械，不要抵抗，把枪五支五支地捆好上交。”[(5)] 朱到南京后，主动向蒋介石要求参加对张作霖的北伐。蒋当时的地位尚不稳固，对朱培德此举甚为欢迎。3月，朱培德率第三军及第三十一军（原第九军）大部北上。5月，朱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也将朱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常委。此后，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命令朱培德“进剿”。11月，朱培德任湘赣“剿匪”总指挥，率部赶回江西，全力围攻红军，一度占领井冈山，后被工农红军逐出。

1929年1月，蒋介石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朱培德为常委、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他的两个军被就地缩编为第七、第十二两个师，仍称第三军，以王均兼军长。

3月，蒋桂战争爆发，朱培德被蒋介石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奉命以“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名义，出兵配合蒋军进攻长沙。桂系失败后，他又退回江西继续“剿共”。9月，朱培德辞去江西省主席，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为蒋介石奔走编遣各派部队事宜。

朱培德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国民党内少数几个还能得到蒋介石一点尊重的“元老”。但是朱有过公开反蒋的历史，过去一直与汪精卫、胡汉民引为知己，又曾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盟友，因而尽管朱培德处处谨小慎微，事事效忠于蒋，蒋对他仍然深加戒备，处心积虑地削弱他的实力，蚕食以至侵吞他的地盘；所谓“升迁”只不过是蒋逐步架空朱的手段。朱培德由独领一方的军事将领变成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的两个师被分别调离江西，除人事安排外，其余军务一概无权过问，此后他只好在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之间充当一个调解人。

1929年9月，汪精卫、唐生智等策划发动“护党救国运动”，事前陈公博秘密致电朱培德，要他率部起兵响应。朱为自保，把陈的密电交给了蒋介石[(6)]。事变发生后，第三军正处于唐军后方，被编入唐军序列，但朱培德授意第三军保持“中立”，在新郑一带作壁上观。混战结束后，仍回到蒋军序列。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声讨和反蒋各派系的强烈胁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1932年元旦，孙科组织新的国民政府，朱培德任参谋长。但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新上台，3月2日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朱培德乃改任没有实权、专管日常行政事务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翌年，兼代训练总监。蒋介石去江西指挥“剿共”战争时，南昌行营成为国民党权力中心，朱培德在南京为蒋介石看守空城，调拨粮草。1933年12月，当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时，蒋介石曾拟挽朱培德出任军政部长，他谢辞。年底，他被任命为军事训练部总监。他唯蒋之命是从，谨慎办事，使蒋渐觉放心。1934年12月，朱被蒋任命为代理参谋总长，常常代表

蒋介石周游各地，参加各类礼仪性的活动。朱还受命主持修建沪宁线上的国防工事工程。1936年8月，朱又奉命率员入桂游说，充当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调停人，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谈判解决“两广事变”，达成了“和平”协议。这一年，他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就在朱培德为新生活运动鼓吹“军官的新生活”之时，他的第三军遭到一连串打击。早在1931年春，第三军在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时，在苏家埠被红军徐向前部击溃三个团，总指挥第七师副师长厉式鼎被俘，是第三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由于蒋介石克扣军饷，只给军官们发生活费，第三军勉强支持到1935年4月，被迫自行缩编，从而激起部分军官和士兵的反对，旅长以下军官集体向蒋介石致电申诉，这在封建地方观念极为浓厚的第三军中是很少见的，直到朱培德亲自出马才告平息。1936年10月，朱培德的亲信第三军军长王均在甘肃堵截红军北上时飞机失事身死，第三军实权落入亲蒋的曾万钟手中，朱培德发家的资本和最后的倚仗被蒋介石夺走。虽然他连续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此时也不由哀叹功劳再大也没有用，自我慰藉为人不要出风头，不要做第一号人，生活享受要合乎本分。他经常流露思乡情绪，还劝阻亲属从军从政，要他们专攻自然科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西安。南京的反蒋分子乘机大肆活动，朱培德同何应钦、唐生智、程潜等被举为军委会常委，一时在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混乱中颇为活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回到南京，于1937年2月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朱按惯例注射德国进口的补血药剂后，突然血液中毒，于2月17日去世，终年不足四十八岁。

---

(1) 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5月25日。

(3) 程天放：《我所亲历的四二事变》，传记文学社编辑《程开放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

(4) 据赵济时（中共党员，任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回忆：被“礼送”的共产党员分为两批走的，时间大约在5月中下旬。另据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一文中称：朱培德在“礼送”共产党后，曾派黄实到武汉向中共道歉，并数次表示继续欢迎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去第三军工作。

(5) 据云南省政协胡彦回忆，时胡彦在朱部任副旅长。

(6) 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1925年至1936年陈公博回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

朱庆澜

丘琴　姜克夫

朱庆澜，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其父朱锦堂在山东知府衙门任幕僚，朱庆澜于1874年生于山东历城县（现济南市），后落户于辽宁锦州。幼读诗书，经科举考选为附生。1893年，经父执友介绍去关外谋生，初任巡警总局巡检，后转入巡防营。因作战勇敢，由哨长逐步提升为队官，接着升任驻防锦州的第三营管带，后又擢升统兵五营的统领。

1904年，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因朱庆澜在辽西剿灭胡匪、缉拿海盗有功，又因朱父是赵父任山东巡抚时旧属，故对朱特别倚重，调朱任营务处督办，协助赵整编奉省军队，裁汰老弱，编成四十营。1906年又调任统领，统率步、骑、炮八个营，驻军沈阳，为将军府的亲兵。

1909年6月，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以朱庆澜办事干练，又奏明朝廷调朱来川，初委为巡警道，继委为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1911年2月，三十三混成协扩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七镇，朱升任统制。他延聘由日回国的程潜、方声涛等为军官，想把十七镇训练成卫国劲旅，并与革命党人建立友谊，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时清廷宣布取消商办铁路法案，引起了粤、湘、鄂、川等绅商的强烈反对。四川各界组织保路同志会，发动请愿，新任川督赵尔丰开枪镇压，射杀群众四十余人，激起了四川民变。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四川宣布自治，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诸事未集，加之军政府许诺发放的三个月恩饷又未能如数发给，在军队里引起很大的不满。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等在成都东校场阅兵，巡防军遂因索饷发生哗变，乱兵向检阅台开枪，

蒲、朱逃匿。乱兵到处抢劫焚掠，全城极为混乱。其时，尹昌衡于乱中驰赴凤凰山军营，急召第六十五标标统周骏、管带宋学皋率新军入城剿捕乱兵。尹昌衡以平乱有功被举为都督。朱为官廉正，他统帅的十七镇官兵又未参与镇压保路的民众，遂得与外籍军官安全离川。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因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系文人，不谙军旅，北京政府陆军部遂派朱庆澜出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旋宋离职，朱代理都督。1913年10月，朱被任命为护军使兼民政长。1914年5月，民政长改为巡按使，他仍兼该职。6月，护军使名目裁撤，朱改任镇安右将军兼巡按使，督理黑省军民两政。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9月，朱列名段芝贵等十四省将军通电拥袁称帝，12月被袁封为一等子爵。1916年5月，黑龙江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和其参谋长李景林串通一气，乘袁世凯复辟失败之际谋夺巡按使职位，鼓动部下威逼朱让贤，朱被迫离职。朱在黑省主政四年，政绩为黑省人所称道。黑省马贼猖獗，不断攻城破邑，朱除亲率骑兵追剿外，并在各县编练保安队清乡，社会秩序随之安定；民初黑省人烟稀少，朱勘测荒地，减赋招收冀鲁饥民开垦，逐渐成为我国粮仓；当年沙俄不断越界侵略，朱督工建成工程艰巨的嫩（江）漠（河）公路，以固国防。从这时起朱即注重社会救济事业，在省城办有女子教养院、孤儿院、博济工厂等。朱生活俭朴，离职时骑马挎刀带随从一人至昂昂溪乘火车入关，其朴素风貌在黑省传为美谈。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独揽大权，为借助朱庆澜的声望，收拾袁称帝时宣布独立的西南局面，于同年10月任命朱为广东省长，加卓威将军衔。朱到任广东时形势极其复杂而棘手：桂系陆荣廷所部进兵广东驱逐龙济光后，即派其部下陈炳焜任广东督军，桂系军队控制省城、东江、西江地区；倾向国民党的李烈钧率滇军两个师驻防韶关和北江地区；此外还有龙济光留下的地方保安队和辛亥时期的民军散驻各地。陈炳焜排斥异己，从不补给，这些部队就各在防地筹饷，与当地人民发生了矛盾。

朱庆澜同情这些部队的处境，以省长名义发行“救国公债”，予以接济。同时，将保安队四十营编成省长亲军，委国民党人陈炯明为警卫军司令，归省长指挥调遣，以增强对抗桂系的实力。

1917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朱庆澜首先发电声讨，同时为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毁法，派员赴上海欢迎孙中山以广州为根据地领导护法运动。孙中山乘应瑞舰到达汕头，派章太炎先行至广州接洽。为保卫孙的安全，朱派警卫军统领国民党人魏邦平兼任广州警察厅长。同时李烈钧亦电方声涛、张开儒率滇军两个师集结广州郊外，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抵穗时，陈炳焜被迫与朱庆澜一道去江岸迎接。同年8月，国会议员在穗召开非常会议。9月，选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成立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展开斗争。朱庆澜倒向孙中山方面，使段祺瑞十分恼火，便发表朱庆澜为广西省长，朱以广东自主为由拒绝接受。桂系始终把朱庆澜看作眼中钉。这时，陈炳焜借口军事时期，军权必须统一，要求改编警卫军，朱被迫交出二十营。陈为挤走朱，吞并其警卫军，策动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起兵驱逐朱庆澜。朱将省长印交与省议会，将警卫军交给陈炯明，未理睬陈炳焜，即回上海。从此，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有了一支自己的正规武装。

此时朱庆澜以国事纷扰，难有作为，遂联络有志之士从事教育事业，在祖籍绍兴市柯桥镇创办渔后村小学。在第二故乡锦州市创办成德女子中学，其夫人徐雅志在沈阳协助阎宝航办贫儿学校，接着又创办崇德女子中学等。

1921年11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宣言放弃庚子赔款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时张作霖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提出保境安民口号，延揽人才，整顿内部。朱庆澜两度在东北任职，素有贤名。经孙中山推荐，张作霖于1922年10月任命朱庆澜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拨出四个旅归朱指挥，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沿线。12月，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划中东路沿线为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张作霖又任命朱

兼特别区行政长官，所有区内军警、外交、司法、财经、教育等机关均归朱管辖。

时苏俄红军正与白俄军在远东交战，为防止白军利用中东路对红军作战，朱在中俄边境实行戒严，将退入我国境内的谢米诺夫等白军予以缴械，从而保持了东北地方当局对赤白两军战斗中的中立立场。随后，张作霖决定甩开曹锟的北京政权派代表与苏联直接谈判；而苏联亦正视张作霖系东北实际统治者事实，希望取得中国地方政府的承认，经朱庆澜协同张作霖派出的全权代表郑谦与苏联全权代表库兹涅佐夫多次谈判，于1924年9月终于签订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联邦之协定》（即《奉俄协定》），规定：（一）中东铁路六十年后由中国无条件收回；（二）中东铁路理事会由奉俄会商解决。

朱庆澜在东省特区任职期间，不仅协助张作霖收回铁路共同管理权及特区境内的土地和森林资源经营权，而且排除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干扰，促进东三省地方当局与苏联和平共处。同时，朱还促成东三省当局与苏方签订收回松花江、黑龙江航行权协定，由朱召集哈市绅商组织“戊通公司”，购买大批船只航行两江流域。商民为了表示对朱的感戴，将吨位最大的一只船命名为“庆澜”号以志纪念。此外，朱对哈埠市政建设、振兴实业、繁荣市场、发展文教事业亦有贡献。由于朱不同意张作霖穷兵黩武政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辞职离哈。

1925年冬，张作霖战胜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曾任命朱庆澜为胶澳商埠督办，朱以军阀混战不息，难以从事建设，婉辞谢绝。从此即脱离军政界，献身于社会救济事业。1927年，北伐军与张作霖安国军作战，山东、河南沦为战场，两省旱魃肆虐，又加贪官无穷搜刮，致饿殍遍野。朱庆澜一面组织灾民赴吉、黑垦荒，一面又联合平津各慈善团体，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募款一百八十万元。朱亲赴哈尔滨劝募和购买赈粮运往灾区，救活灾民数百万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朱庆澜为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朱为东北

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期间，陕、甘遭受特大旱灾。朱庆澜又通过华洋义赈会、佛教会及华北、东北各慈善机关进行募捐，从东北募集赈粮十六万担，亲自押运通过交战军防区运往西北，使灾民得以延命。同时，朱还在西安、扶风等地设置教养院，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上千人。蒋介石亦于1931年春任命朱庆澜为监察委员，朱鉴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纷扰，以赈务繁忙为词，拒绝就任。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水利废弛，致是年夏长江堤防溃决，沿江六七省均发生水患，受灾民众五千万余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并发行救灾公债，募集巨款，朱任常委兼灾区工作组主任，主持以工代赈修复沿江堤防。

1931年5月，因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国民党分裂为南京和广州两个国民政府。正当宁、粤两军在湘南开战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朱庆澜于9月20日代表全国五千万灾民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呼吁举国团结奋斗，同舟共济。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方针，致使日军数月内即占领辽、吉、黑三省重要城镇和铁路交通线。留在关外的东北军余部和蜂起的民间武装仍以义勇军的名义在各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流亡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车向忱等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募集钱款、物资援助义勇军抗战和安置东北难民。朱庆澜被推举为后援会会长。

1932年1月，日寇对上海发动进攻，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4月召开国难会议，朱应邀与会。是年7月，广东又发生粤系军阀陈济棠、陈策混战。朱与查良钊代表全国废战会议赴粤劝阻。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伸向热河，张学良对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有所悔悟，决定率兵与日军一战。黄炎培、穆藕初、朱庆澜、熊希龄、杜重远等发起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推选朱庆澜为会长，周作民为副会长，积极展开援助工作。同年2月，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由张学良陪同到承德，对驻热河的将领进行动员并部署作战事宜。黄炎

培、穆藕初、朱庆澜等几位年届花甲的爱国老人在杜重远等陪同下也深入汤玉麟、万福麟两军团阵地慰问。他们回平不久，承德竟于3月4日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由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而何竟于5月31日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在泰山蛰居的冯玉祥乃愤起前往张家口，联合中共收容退入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何应钦为扑灭抗日同盟军，调兵遣将进行包围封锁，朱庆澜却从募集来的抗日捐款中电汇十万元予以资助。蒋闻讯非常恼火，CC派控制的宣传机器为破坏朱的名声，捏造朱在后援会有贪污嫌疑。朱一贯廉洁奉公，查不出贪污事实。何应钦根据日本要求，于7月15日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查封。朱庆澜屡遭打击和污蔑，非常伤心，遂隐居寺院念佛。这期间，他在西安大兴善寺办理了受戒讲经事宜，遍游西北名山古刹，曾组织慈善界整修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及寺内大雁塔、长安县大兴教寺，及该寺唐玄奘师徒三人塔院、眉县法门寺及斜塔、华阴县少华寺及白水县仓颉庙。影印《碛砂大藏经》等，对保存西北文物古迹作出了一定贡献。

1935年冬起，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吞并我华北的步伐，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内战，灾民遍地。朱庆澜深感炎黄子孙将有亡国之痛，经冯玉祥等推荐，于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朱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主持战区难民的救济和转移工作。他虽年过六旬，仍然冒着日军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奔波于郑州、开封、许昌及陕、甘、川等地，为救济难民忘我地工作。朱除在后方许多城市设难民救济站外，还在洛阳、西安、汉中、万县等处设立难童教养院，收容失去亲人的幼童。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开封，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直趋武汉，下令掘开黄河大堤，水淹日军，造成黄泛区一百三十余万人无家可归。朱庆澜建议运送灾民至陕北黄龙山开垦谋生，得到国民政府批准，任命朱为黄龙山垦务局长，由政府拨款实施。他于1939年春亲往陕北勘察，主持开荒事宜。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为开辟

渭北的工作，曾派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垦区工作，朱均予掩护。来陕的中共东北特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成员和东北抗日烈士家属亦多受到朱的庇护和照顾。他为抗日和救灾昼夜奔忙，以至积劳成疾，咯血不止，1941年1月13日病逝于西安，陕人举行公祭后，遵照遗嘱葬于终南山麓。

主要参考资料

朱德君、朱权：《先父朱庆澜传略》，政协天津委员会未刊稿。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杨家骆主编：《民国名人图鉴》，辞典馆，1937年。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大事记》，中华书局版1978—1987年。

朱瑞

朱宗震

朱瑞，字介人，浙江海盐县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1)]。父朱廷桢，朱氏系海盐望族。朱瑞三岁丧父，随长兄学习，十二岁又复丧母及长兄。1902年考入秀水中学堂，1903年归试，补县学生员。日俄战争爆发，朱瑞深感外患日棘，认为“非修戎事不足以图强”[(2)]，于是投考南洋陆师学堂。1905年冬，毕业回浙。时浙江正训练新军，朱任职于督练公所、参谋处，旋调充步队第二标执事官，即与标统蒋尊簋创设弁目学堂，训练新军骨干达三年之久。

当时光复会、同盟会在浙江十分活跃，朱瑞受革命思潮影响，于1906年加入了光复会，同时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翌年7月，秋瑾在浙江运动革命，被清吏捕杀。朱瑞因参与秋瑾的革命活动，也被密告，为浙江当局所怀疑，后经运动浙绅疏通得免株连。1909年，皖抚朱家宝为规复安徽混成协，补募训练新军，调朱瑞任安徽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兼测绘学堂监督。至1910年，朱瑞复回浙江，任步队营管带。自“秋案”发生后，浙江光复会元气大伤，至此逐步恢复，朱回浙后也为重整光复会积极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后，江浙一带革命党人密谋起义，朱瑞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活动，其家也是革命党人聚会的地点之一。10月间，朱瑞被升为八十一标代理统带，活动更为便利，遂负责联络军警，并被革命党人推定为一标司令官。上海起义成功后，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加速了革命的步伐。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决心起义。傍晚，朱瑞先行至城内工程营，通知革命同志准备内应，劈开城门，迎接城外起义新军，随后回到杭州笕桥驻地。当晚10时左右，朱瑞集合队伍，宣告起义，亲率本队入城，占领了闹市口至武林门一线要道，

包围旗营，展开激战。至5日下午，旗营被迫投降。

杭州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倡议组织联军进攻南京。浙江新军也组成一混成支队，由朱瑞任支队长，于11月14日率部离杭北进，至镇江与各路革命军会合后，发起攻宁战役。11月25日，朱瑞指挥所部浙军在马群与清军激战，击毙清悍将王有宏，再战于孝陵卫，复配合友军强攻天保城，三战三捷，攻占南京。12月3日，浙军由太平门入城。入城后，浙军渐次扩编为一镇，朱瑞升任浙军第一镇统制官。1912年1月下旬，浙军奉命北伐，进抵符离集，南北和议成立，遂回驻南京。

攻宁之役，以浙军之功为多，朱瑞等浙军将校居功自傲，与各方面一再发生龃龉。镇军将领林述庆进入南京后，以江宁临时都督自命，遭到朱瑞的强烈反对，几乎发生火拼，后经调停，由苏州的江苏都督程德全移驻南京。革命党人酝酿大元帅人选，朱瑞鄙视黄兴为汉阳败将，主张推举黎元洪。时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等与同盟会不睦，朱瑞也卷入了党派纷争之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陆军总长黄兴就很难指挥浙军。1912年1月16日，孙武等推黎元洪为领袖，于南京发起组织民社，朱也为发起人之一。5月，民社与其他党派合组为共和党，朱也就成为共和党员，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南北和议成立后，朱瑞力主定都北京，“创议联合各军，设联军参谋团，尊重中央（指袁政府——引者）政令，融畛消域”[(3)]。并通过屈映光以及袁世凯的秘书陈仲恕、陈叔通兄弟结纳袁世凯。

南京陆军部为整编军队，先后将浙江驻宁军队编为第六师，驻浙军队编为第二十五师，又于3月29日合编为第五军，任朱瑞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南京留守府实施裁军，首先遣回客军。朱瑞于4月29日率浙军离宁回浙。

浙江军界在辛亥革命之后，留日士官生与南京陆师、保定速成派之间，矛盾日多。后两派拥朱瑞与留日派对抗。朱因攻宁之功，掌握

了浙军主力，在浙的威信也得以提高，加以得到袁世凯的支持，乘隙攻击留日派浙督蒋尊簋，蒋被迫请求辞职。7月23日，袁世凯任命朱瑞为浙江都督。但朱自回浙后，即发现患了肺病，不久赴沪养病，所以迟至8月21日才莅任视事。9月23日，朱瑞又被袁授以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

朱瑞任浙督后，日益倾向拥袁。他强调："今日吾国趋势，中央集权之策，已成有力之舆论"[(4)]，"各省长官，实为官吏，宜委任不宜选举"[(5)]，反对同盟会关于内阁制及省长民选的政治主张。1913年3月宋教仁被杀案发生后，朱一再强调"维持邦本"[(6)]、"谨守法律"[(7)]、"保卫地方"[(8)]，反对"二次革命"。在南北风潮中，他伪充调停人，致电黎元洪及苏、滇、川、闽诸督，请黎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励（履）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共遵轨道"[(9)]。朱瑞袒袁的做法太露骨，不像调停人，黎元洪、程德全都不赞成。迟至6月10日，他才与滇、川两督联名发表上述内容的通电。

湖口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多次策动朱瑞独立，省议会议员莫永贞等也函请浙江独立。朱多次召开军界会议，权衡利弊，最终拒绝了革命党人的要求。7月20日，朱瑞发布通电，表示"中立"。他宣布："自今以往，但当一意保我治安，不问其他。如有乘机骚扰，或派遣军队者，不问来自何处，凡妨害我浙生命财产者，一律视为公敌。"[(10)] 然后，朱瑞派出军队向苏、浙边界布防。同时，他又通过种种手段，迫使已经宣布独立的宁波取消独立，并用武力镇压了嵊县的反袁武装。上海讨袁军进攻制造局之役失利后，朱瑞即令浙军越入苏境，压迫讨袁军，公开助袁。

但是，朱瑞在"二次革命"时的迟疑态度，引起袁世凯的怀疑。朱鉴于地位动摇，加紧向袁献媚，遂请求入京晋见，并于11月22日抵达北京，受到袁的隆重接待和笼络。对袁来说，朱在南方仍有着对付革命党人、稳定政局的重要作用。此后，朱奉命唯谨。在财政上，他大

肆搜括以支持中央财政，在各省中最卖力。在政治上，他竭力拥袁独裁。1914年1月28日，朱瑞发布长篇通电，请袁改变现行体制，强调“第就今日中国之情势论，则窃以为非行总统制，无以望政治之修明，图国家之强盛……伏祈大总统鉴已往之弊端，顺国民之心理，毅然主用总统制，罢除内阁制度”[11]。袁世凯改变政体后，于1914年6月30日授朱瑞为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

1914年至1915年间，中华革命党人夏尔玛、夏之骐等在浙多次设立秘密机关，准备起义，均被朱瑞破获，许多革命党人遭到朱的残杀。参加革命的会党领袖王金发向袁世凯政府投诚后，仍依违于政府与革命党人之间。1915年，5月，王金发以调查旧部动静，消弭乱萌为辞，向当局请准后赴浙，即被朱瑞捕杀，与王偕行的中华革命党骨干姚勇忱也同时遇害。

“筹安会”出笼后，朱瑞迎合袁意，于8月31日密呈表示：“辛亥冬，美人安德森尝为瑞言，中国欲图国家之发达，共和制实不如君主制，瑞闻私言，心窃韪之。”请袁“定君主之制”[12]。至9月15日，朱复与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联名电请袁世凯称帝，“实行军国主义”[13]。至11月2日，朱又以浙江全体军官名义，请袁“俯顺人心，早正大位”[14]。迨袁接受帝位，封朱为一等侯，朱也急急向袁称臣。

护国运动掀起，时局大变，朱瑞察风观向，迟疑不决，遂与江苏都督冯国璋进行联络，以决进退。冯劝其“待时而动”[15]。1916年3月，朱与冯国璋等五将军密电致袁，要求其“速行取消帝制”[16]。

当时，反袁各派正策动浙江军界宣布独立，朱瑞深感进退两难，多次召集军界秘密会议，朱倾向于参谋长金华林的意见，拟宣布中立。时驻上海的北洋军队正向浙江方向移动，传言系朱瑞所召，引起各界愤慨。4月12日晨，中华革命党人和浙江军界童保喧、夏超等部起义，纷纷拥向将军署，朱瑞闻讯潜逃，赴沪藏匿。

朱瑞原患肺病，经此事变，病情加剧，离浙后曾致函屈映光，表示“无意世事”[17]。不久，朱瑞由上海移居天津，1916年8月3日在津病逝。

---

(1) 朱瑞出生年月，未找到明确记载，此据张謇撰《兴武将军海盐朱公墓志铭》，卒年为三十四岁，按虚岁推断。

(2) 《兴武将军海盐朱公事略》，张世桢编《朱兴武将军哀挽录》，1916年版，第1页。

(3) 《兴武将军海盐朱公事略》，张世桢编《朱兴武将军哀挽录》，1916年版，第3页。

(4) 枕戈待旦生编：《浙江朱都督政书初编》，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17页。

(5) 枕戈待旦生编：《浙江朱都督政书初编》，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20页。

(6) 朱瑞巧电，《时报》1913年4月24日。

(7) 朱瑞佳电，《民立报》1913年5月12日。

(8) 朱瑞布告，《时报》1913年5月25日。

(9) 江苏都督府密电密件室抄存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0) 《申报》1913年7月21日。

(11) 《申报》1914年2月2、3日。

(12) 朱瑞密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3) 朱瑞、屈映光致袁世凯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4) 朱瑞致参政院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 《民国日报》1916年2月14日。

(16) 《时报》1916年3月24日。

(17) 《民国日报》1916午4月21日。

朱绍良

赵建群

朱绍良，原名宝瑛，因敬慕汉初名臣张良而改名绍良，字一民（也作逸民），原籍江苏武进县。1891年10月2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福建福州。其父朱清泽时在福州任南台海防同知，母华氏。朱绍良十六岁始入竟成两等小学读书，并在暑假期间随福建名孝廉程希箴习文章诗词。次年转入福建陆军小学。两年后改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不久，又被选送日本振武学校留学。1910年，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1911年9月间，朱绍良因父亲去世回国奔丧。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前往汉口参加革命。次年初，入陈其美沪军都督府任参谋。同年冬返回福州，进福建陆军小学担任教官。1913年，朱绍良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12月，入宇都宫野炮兵第十四联队实习。次年实习期满，即转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一期炮科学习，与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等同学。1916年朱绍良毕业归国，随何应钦到贵州投身黔军。当时贵州已经宣布讨袁，组织起护国军。朱受到时任护国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的重用，被充实到讲武学校，协助举办模范营，为黔军培植新生力量。

“护国运动”结束后，王文华升任黔军第一师师长，朱绍良也被调该师任团长、师参谋长。1917年，滇、黔、川三省军阀为争夺对四川的统治权，展开了混战。8月，朱随王文华率黔军第一师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9月，黔军入川。这时，朱担任黔军司令部参谋长，随王文华率部配合滇军分路奇袭重庆，迫使川军从川南撤退。12月，黔军进驻重庆后，朱兼任重庆卫戍司令官，并在王文华暂离重庆期间，受命代行总司令职权，策划一切，颇得全军称许，一时被誉为“黔军

小诸葛”。

1920年，四川各军联手驱逐黔军。10月，黔军退出重庆。这时，王文华决定回师贵州夺取军政大权，但又碍于刘显世的甥舅关系，于是委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率部回贵州，自己则称病到上海。朱绍良随行赴沪。次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旅社门口被人刺杀。此后，朱绍良没有再回黔军。

1923年初，朱绍良去广州。3月，被孙中山委为大元帅大本营参谋。次年2月，杨庶堪出任广东省长，朱绍良被聘为广东省政府顾问。6月，杨庶堪辞职，他也离开广州去上海。北伐前夕，朱绍良再至广东，于1926年4月间见到蒋介石，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参谋长。他随军北伐，参加过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朱则因是蒋介石的支持者，于1927年2月被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武昌行营参谋长。3月下旬，朱绍良继彭汉章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朱于5月间再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7月6日，被南京政府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于是，朱也不得不随着离职。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复职，朱绍良随即被召回。2月7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朱再次被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于3月13日接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后任办公厅主任。7月，蒋介石为削弱冯、阎、桂各派的实力，提出要“整理军事”进行裁兵。23日，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成立，朱绍良调任委员。实行编遣后，原先的军均改为师，9月15日朱任陆军第八师师长。

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时在安徽合肥的朱绍良受命率部“西征武汉”。3月2日，蒋介石委朱为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辖第八师、第十三师和独立第一旅，集结部队于霍山附近。27日，第二军的大部推进至鄂、皖交界的英山一带；随后陆续进占罗田、广济、蕲春、黄冈和麻城等地，并于4月2日到达宋埠、团风一线。4月3日，李

明瑞所部的第三路桂军在黄陂、孝感倒戈。桂军胡宗铎、陶钧和夏威部闻变后，即向鄂西方向败退，计划据守荆州、沙市和宜昌。7日，蒋介石委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率部追击。蒋介石企图用兵广西，于19日又任命朱绍良为讨逆军总预备队总指挥，率第八师、第十五师和第五十七师于4月底集中武汉附近，相机推进。不久，胡、陶、夏在蒋介石的武力进剿和金钱收买下接受招抚，联名发表通电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朱绍良的第八师遂进驻荆州。

是年9月中旬，张发奎联合桂系在宜昌举兵反蒋。11月，张、桂联军进击广东。这时，朱绍良被擢升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奉命率第八师、第三师和第五十师援粤。12月5日，第八师抵广州，旋由粤汉路转赴前线。12日，第八师占领了象山，次日又进驻花县，解了广州之围。随后，张、桂联军北退，朱率部尾追，经过湛江口战役，迫使张、桂联军由广宁退回广西境内的怀集、贺县。1930年1月底，朱部进逼荔浦时，遭到桂军的有力抵抗，被迫后退至梧州。后由梧州经武林进攻桂平，最后在海、空军的掩护下，经过鏖战，才于5月13日进占桂平。之后，朱绍良率部回到南京。

中原大战爆发后，朱绍良又奉蒋介石命赴陇海线战场，任左翼军总指挥，辖第十五军、第五十二师、第八师和第四十七师，负责第四、五、六守备区的防守作战。朱部的任务是牵制住冯玉祥部，协同平汉路的友军对冯部实行包围，迫使冯部退往陈留、通许一带而予以歼灭。然而，朱部进展缓慢，于10月1日方夺下通许，4日进占中牟。随后，朱部奉令在陇海线北侧地区集结待命。

中原大战结束后至1933年初，朱绍良参加了蒋介石所发动的对苏区工农红军第一至四次军事“围剿”。1932年初，朱绍良因“围剿”很不得力，一度被蒋介石免职。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并自兼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朱绍良又被召回，任总司令部参议，充当蒋介石的智囊。8月，被调任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10月，蒋介石开始组织“围剿”中央苏区，朱奉调任右翼总指挥，统辖八个

师。至次年3月，第四次“围剿”又被红军粉碎。在此期间，于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绍良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2月3日，朱继何应钦为驻赣“绥靖”主任。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委朱绍良代理主持南昌“剿总”，直至蒋次年1月重新上台。

1933年初，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决定调朱绍良接替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5月朱赴兰州就任。

不久，朱又兼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8月，被委新成立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到任以后，力图取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拉拢地方士绅以及盘踞一方的大小军阀，尤其对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和马鸿宾这西北“四马”的笼络、培植更为用心。1934年初，朱绍良借助地方军阀的实力，为蒋介石把孙殿英这一股异己力量消灭在宁夏境内。

朱绍良在治甘过程中的主要用人政策是使用本地人，而且他把实施这一政策看作加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一个步骤。朱初到甘肃时，各地县政仍是沿袭清朝的六科房旧制。1935年，他接受胡宗南的建议，委托胡在陇南办“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班”，训练县治人员。1938年，朱绍良又成立“西北干部训练团”，培训军政干部。他实行各县县长由省政府委派；钱粮税款须按省政府统一规定征收，并一律解交财政厅；各实力派部队的编制和粮饷，应分别报请国民政府核定，所需军费由省政府统一拨发。然而一些地方军阀依然阳奉阴违，划地为王，自行其政，任意派粮派款派丁，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朱绍良采取的另一手法，就是对地方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以达到驾驭他们的目的。马鸿逵曾向蒋介石非议朱绍良，称朱在甘仍是采用以回制汉、以汉制回、以回制回，以汉制汉的旧办法。

对于甘肃省毒品泛滥，朱绍良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禁绝鸦片，只

是把原先的“甘肃省禁烟善后局”改换成“甘肃省禁烟委员会”，做些表面的戒烟工作，而鸦片仍是公开大量地种植，因为“省政府亦恃亩税（即鸦片税）为政费之大宗”。国民政府甚至特批甘肃缓禁鸦片三年。由于朱绍良“安定”西北有功，1935年4月被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红军开始长征后，1935年2月24日，蒋介石特任朱绍良为“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朱即对甘肃境内的中央军和杂牌部队作了统一部署，并派大批人马修筑了许多碉堡，加强防御工事，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当红军进入陇南后，朱把部队编为四路，每一路都划定了追击路线。10月2日，朱又任西北“剿匪”第一路军司令。10月20日，兰州下东门火药库发生大爆炸。朱绍良因此事件而被国民政府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督理军务。甘肃省政府主席由于学忠接任。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朱绍良正奉召在西安开会，因此也同时被拘。事变和平解决后，朱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陕西凤翔，受命集结驻在甘肃的中央军和杂牌部队，部署攻击东北军。后在国共谈判的推动下，蒋介石未敢对东北军下手，先是将其调离西北，第三集团军次年3月奉令撤销，朱飞南京转赴上海休养。

“八一三”事变后，朱绍良奉调第三战区，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9月下旬，蒋介石把参加上海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和左翼三路，委朱绍良担任中央军总司令，辖第九、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设指挥部于真茹，负责黄浦江以西、蕴藻浜南岸地区的作战。但整个淞沪会战都是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以“持久消耗战略”进行的，朱绍良一切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办事，处处打防御战，而没有抓住战机主动出击。10月25日，大场失守，中央作战军陷于四面受敌绝境，不得不放弃北站到江湾间的阵地，于26日指挥主力撤到苏州河南岸；接着

向青浦、白鹤港线转移。

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兰州成立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朱绍良再奉派西北，任副司令长官及甘肃省政府主席。蒋亲兼司令长官，朱则以副职摄行司令长官职权。第八战区的辖区主要是甘、宁、青以及绥远的一部分。1938年1月，在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会上，朱提出的施政方针，首要一条即为“安定中求进步”。在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朱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此后，朱秉承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采取措施加强陇东十县的政治、军事力量，企图形成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并逐渐推进，以达到取消陕甘宁边区的目的。他主持制订了陇东十县反共工作的“八项方针”、“十二原则”，以及“特种工作大纲”，并把“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三期毕业生九十多人派到陇东，充实陇东地区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朱还多次向国民政府申请增拨反共特别经费，要求按月补助临时费五万元。他按照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抽派新二军驻扎陇东一带，并指挥人马在陇东、河西和兰州周围构筑所谓“国防工事”，修建了大量碉堡。与此同时，他指挥所部在陇东接连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致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迫撤销，“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也被解散。

1940年11月，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职由谷正伦接任，他专任第八战区司令官。1941年4月，朱兼任“陕甘宁边区”总司令，受命统一指挥陕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加紧反共。次年3月，又兼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主任，这个机构的前身是天水行营。不过，朱只是名义上的主任，操纵实权的是代主任胡宗南。

1942年，甘南人民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起义反抗。第二年春，队伍迅速发展到约十万人，由甘南扩展到兰州附近，形成震动全国的“甘南民变”。蒋介石急令朱绍良限期平息。朱调派了七个师的正规军、两个骑兵旅、四个保安团、二十余县的自卫队以及马步芳的三个团，并动用空军的飞机，花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才将起义镇压下

去。1942年7月，朱绍良奉命以国民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同翁文灏、毛邦初一起携带蒋介石的“手示”到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在新疆确立国民党的统治，以及遣返苏联顾问的问题。8月中旬，蒋介石偕宋美龄到兰州，定下所谓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并向朱绍良作了“推进新疆工作之要点”的指示。29日，朱陪宋美龄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一次威胁利诱盛世才，最后谈妥了盛投附蒋介石的条件。9月17日，盛世才逮捕了在新疆的中共党员。1943年，蒋介石委盛世才兼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4年，随着苏军对德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盛世才打算重新与苏联建立联系，于是炮制了一个“阴谋暴动案”，以国民党为打击对象，于8月12日逮捕了重庆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鉴于盛世才的反复无常，蒋介石决定将其调离新疆。朱绍良受命进行军事部署，陆续把第四十二军、新二军以及甘肃师管区的几个补充团调派新疆。8月18日，朱奉命去迪化，“劝”盛世才辞职。在军事压力下，盛世才被迫应允。29日，国民政府颁令调盛世才到重庆任农林部长，新疆省政府主席由吴忠信接任，在吴到任前由朱绍良暂行代理。

1946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西北设立行辕，由张治中任主任。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宣布撤销，朱绍良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负责处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等善后事宜。朱还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督促民生轮船公司全力起运川粮，为发动全面内战做物资准备。

1947年3月，朱绍良调任重庆行辕主任。1948年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他仍任主任，辖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四省。在朱主持下的重庆行辕及绥靖公署全力推行蒋介石的所谓“戡乱”方针，不断从西南向内战前线输送兵员和粮食，造成西南粮食匮乏，以致重庆发生几万人的抢米风潮。

1949年1月，蒋介石在被迫下野的前几天仓促调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22日，朱绍良抵福州，为了拉拢福建地方势力，朱以“保家卫国”和“反共救国”为口号，竭力笼络他们，以图负隅顽抗。他重视对沿海岛屿的控制，曾命福州绥靖公署参谋长范诵尧“今后应据海岛生根”，嘱就此原则速拟计划。随后把保安部队部署到沿海岛屿。4月，朱到闽南一带巡视，检查各地的防务，布置反共任务，同时在当地加紧征粮抓丁。6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占古田，逼向福州。朱叫喊要“集中力量，保卫大福建”。8月16日，朱还对下属说：“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就在这天，他随汤恩伯乘专机潜往厦门，而后转赴台湾。17日，福州市解放。

在台湾，朱绍良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受聘为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委员。由于无所事事，朱绍良曾一度热心于“老人福利协进会”的工作。1963年12月25日，他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周开庆：《朱绍良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姚琮：《陆军一级上将朱君家传》。

朱惺公

任嘉尧

朱惺公，原名松华，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父朱紫阳，为当地中医内科医生。朱家境清寒，早岁辍学，仅读到小学毕业。十五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上海浦东一家衣庄当学徒，办事勤恳，业余刻苦自学求进取，并从事写作。满师后，曾在老西门创设鼎新书店。1929年任杭州《浙江商报》编辑，曾在报端撰长篇小说《浙江潮》连载。一度创办湖上出版社，并发刊《湖上之花》文艺月刊[(1)]。

30年代初，朱惺公到上海，先在《时代日报》任编辑，后到中国化学工业社广告课任职，曾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编辑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他设计的广告，常独具风格别出心裁。这期间，他为报刊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诸问题，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爱国报人对时弊的“率直、果敢、咒诅和慨叹”[(2)]。“八一三”抗战军兴，苦战三月后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为“孤岛”，与外地交通暂时隔绝，商业萧条。中国化学工业社紧缩机构，裁撤广告课，朱惺公失业。

朱惺公为谋生计，以其微小的资本，与友人合办机杼出版社。但书生从商，不善经营，加以当时市面萧条，不久便宣告失败。出版社倒闭后，经济益趋困窘。朱一度在法租界法大马路（现名金陵东路）骑楼下摆一旧书摊，借以勉强糊口，生活更加穷困，曾寄一便条给中国化学工业社老同事林汝康云：“弟家八十八师为难，请兄接济。”初，林不明其意，嗣详“八十八”乃“米”字，盖朱家断粮难为无米之炊也，即送去米半担帮助渡过难关[(3)]。

这件事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所悉，前往探望，见家徒四壁，惟书籍数架而已。当时，朱有子名庸庸，才五岁。李询问为什么叫“庸庸”？朱引用苏东坡诗云：“人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世。但愿我子愚又鲁，无灾无忧到公卿。”并慨叹说：“庸庸只求无灾无忧而已，公卿岂敢望也。”(4)

李祖范鉴于朱惺公潦倒困顿，乃烦友人张似旭（时任上海中文《大美晚报》总经理，与李同为留美学生）介绍朱惺公于1938年2月进《大美晚报》，任《夜光》副刊编辑。

饱经忧患的朱惺公，在国难当头、敌伪气焰咄咄逼人之际，主持《夜光》副刊编辑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当时，“孤岛”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大报无法出版，《文汇报》、《导报》、《每日译报》挂的是“英商”招牌，《大美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挂的是“美商”招牌，才得免于日本新闻检查机构检查，继续宣传抗日爱国。敌伪则以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恐吓信、警告信、手榴弹等恐怖手段交替运用。在这些魑魅魍魉面前，朱惺公不为所动，置生命于度外，坚持宣传抗日爱国。

他曾在《华美》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一篇《首先做除奸工作》的文章。指出：要抱定宗旨，敌忾同仇，绝不与汉奸们妥协合作。假使人人都能把汉奸当作最大敌人，而时时刻刻注意他们的行动，揭露他们的罪恶，“万夫所指”的汉奸们，自将陷入他们的绝路上去。在1938年11月的《夜光》上，刊出了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朱惺公写道：“我歌颂菊花，我钦景菊花。我以为菊花生来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他还说：“菊花一名‘节花’，又名‘更生’。它真像现在的中国将从战斗中求取‘更生’。菊本作鞠。菊花的抗战精神是‘鞠躬尽瘁’，至死不屈的。”

1939年3月至4月的《夜光》版上，先后刊出了署名“杰”的《中日关系史参考》十八篇，论列中日二千余年来之关系，呼吁团结御侮；朱惺公发表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介绍了宋末抗元的文天祥，扶明灭元的田兴，守城御倭侮的南水仙（明嘉靖年间无锡县令王其勤），抗清死守江阴的阎应元，誓不仕清的顾炎武等人，发扬古代民族英雄坚持大节的革命精神。还发表了《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以及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悼无名战士》（新四军抗日战士）等文章，并连续刊载了《汉奸史话》，把历来的汉奸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39年4月6日，时逢清明，朱惺公撰四言长诗《祭抗战阵亡战士》，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这些激动人心的文章，对“孤岛”上海的广大读者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另一方面，这些宣传抗日的文章，对敌伪来说，真是芒刺在背，恨之入骨。于是，朱惺公一连接到了好几封恐吓信。那时，《文汇报》社早于1938年4月22日被敌伪扔了手榴弹，炸死了营业部职员陈桐轩。眼看敌伪又要向朱下毒手了，朱惺公却大义凛然，于1939年6月20日在《夜光》上刊出署名“惺公”的一篇文章，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该敌伪特工组织的恐吓信扬言：今后《夜光》上如再发现“反汪（精卫）”的文章，即将派员对朱执行“死刑”。朱惺公严正驳斥道：“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5)

有署名“病怜”作诗《生挽不怕死之惺公》，以资赞扬。朱本人于6月29日拈七绝一首以明志，有云：“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充分反映了他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朱惺公主编的《夜光》上，还刊载了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残暴成性的敌伪黑手，对这位威武不能屈的新闻界战士是决不会放过的。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20分，朱惺公甫从寓所外出，行未及十数步，在北河南路、天潼路附近，有暴徒三人由路旁窜出，两人强执朱两臂，另一暴徒持手枪进行恫吓，朱面对强暴，仍岿然不为所动，英勇不屈，昂首自若，视死如归，终遭杀害。遇难时，年仅三十八岁。遗妻及子庸庸，当时庸庸只有七岁[(6)]。

次日的《大美晚报》刊载朱惺公遇害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评《丧失一位同志》，指出：“朱先生为人勇敢，意志坚强，始终尽忠于报业，从未因着恐吓而稍受影响。朱先生是个真正的烈士。他曾竭力求作真实的中国人，并鼓励其读者，亦作真实的中国人。‘东亚新秩序’者杀了这位良善、能干、方正的人以后，决不能获得皈依者。”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朱惺公的遇难，是上海“孤岛”初期新闻工作者死得最壮烈的一位。在1939年9月1日的追悼会上，有两副挽联颇能说明朱的为人。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挽联是：

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
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增光。

商务印书馆同人的挽联是：

诛伐群邪，挥笔如剑；
扶持正义，舍身成仁。

---

(1) 据朱惺公的表弟龚天宇提供的书面材料。

(2) 朱惺公：《惺公评论集》序言，上海机杼出版社1933年8月版，第5页。

(3) 作者访问原中国化学工业社襄理林汝康笔录。

(4) 访问原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笔录。

(5) 见《大美晚报》1939年6月20日《夜光》版。

(6) 见《大美晚报》1939年8月31日新闻版。

朱蘊山

刘秋阳

朱蘊山，名汶，字锡蕃。1887年11月3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生于安徽六安县。父朱瑞生，性格刚强正直，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官至天王府考证官、军师参赞，太平天国失败后退隐六安嵩寮家乡。

朱蘊山四岁学识字，六岁入私塾，十八岁中秀才。1906年，考入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秘密参加反清活动。1907年，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起义活动，与徐一起被捕，并被押赴刑场陪斩。

1908年冬，朱蘊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宋玉琳、韩衍组织的读书会，担任联络工作，并协助韩衍办《安徽俗话报》，任经理兼发行人，积极进行革命宣传。辛亥革命爆发后，朱蘊山和韩衍一起成立维持安徽统一机关处，组织青年军，被委为皖中招抚使兼青年军皖中总队长，负责省城治安。

民国成立后，朱蘊山回家乡创办寮察学校，自任校长，暗中从事反袁活动。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受到安徽当局通缉，被迫前往北京，不久转到上海。翌年，他回乡又发起创办山河高等小学、南官亭广王城高等小学、毛坦厂高等小学。1915年，与柏文蔚等在安徽秘密策划讨袁，任皖中招抚使。他积极筹集反袁起义资金，以至把自家大部分田地卖掉，但不久事泄而被捕，袁世凯死后获释。

朱蘊山出狱后，到上海、北京、山东等地活动，呼吁同乡团结起来，救乡救皖，反对军阀倪嗣冲。1917年8月，在京曾与陈独秀共商反倪大计。他与安徽著名教育界人士刘希平、高语罕、李光炯等，从

反军阀斗争中认识到，要改变中国面貌，应从长计议，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为此，朱蕴山参与芜湖工读学校、安徽职业学校的筹建工作，任常务董事。1918年9月又参与创建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六安女子学校，任文牍兼修身教员。1921年春，他与李光炯等创办《评议报》，任主笔，评议安徽时政，宣传革命思想，推动学生反对倪嗣冲之侄倪道烺贿选省议员和拒绝李兆珍入皖的斗争。1922年秋，与李光炯一起发起“废督裁兵”运动。

朱蕴山于1923年春专程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赞成改组国民党，随后加入了国民党。翌年冬，他赴天津再次晋见北上的孙中山，后赴北京参加孙中山倡议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夏，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随后又回安徽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工作。1926年1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由高语罕、薛卓汉介绍，陈延年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会后，在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支持下，朱蕴山被国民党中央发表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并被指定为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回安庆成立省党部，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任组织部长。7月，他策动六霍、太湖起义以响应北伐，后因事泄未成。

1927年3月，蒋介石派暴徒捣毁安徽省党部，朱蕴山以省党部名义通电反蒋，后离开安庆。“四一二”政变后，朱蕴山受到通缉，在共产党组织的接应下前往武汉。后南下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委员会常委及党务委员。嗣后，朱蕴山转赴上海，得知陈独秀已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1928年春，朱蕴山参加谭平山等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还与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等人组织护党大同盟，公开反对蒋介石。1930年8月，邓演达回国后，中华革命党改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朱蕴山任中央干事，并于同年脱离中国共产党。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后，他多方设法营救。在邓被害后，他脱离了第三党。

“九一八”事变后，朱蕴山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力主

抗日反蒋，参与组织青年军人抗日联合会。“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赶赴杭州，推动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战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他为挽救十九路军，认为必须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反蒋，乃出任秘使，多次往返于上海、福州和香港之间。与此同时，还北上察哈尔，会晤冯玉祥、方振武，共议反蒋抗日大计。回上海后，他再次向中共中央力主联合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设计十九路军起兵杭州，瑞金红军北指南昌，冯玉祥挥戈南下苏皖，可使蒋介石腹背受敌。但因王明把持中共中央，实行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朱蕴山联共反蒋计划不被采纳。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十九路军及第三党负责人转移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任主席，朱蕴山当选为委员。7月，朱北上天津，主持华北民族革命同盟工作，任主任；同时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联合，推动抗日工作。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扩大统一战线，通过各种渠道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朱蕴山受中共委托三赴太原。经过商议，与阎锡山达成三点协议：一、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山西“公道团”组织；二、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三、组织抗日团体，发动民众抗日。后来阎锡山还允许八路军在太原设立电台和办事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朱蕴山回到安徽从事民众抗日发动工作。朱建议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成立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李任主任，朱为总务部长、代主任，并兼任第五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朱广泛团结上层民主人士和各地青年，开展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春，蒋介石实行“限共、反共、溶共”政策，桂系将领廖磊主皖后，改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朱蕴山愤而去职，于5月到达重庆。其后，朱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下，往来于川、康、滇、桂等省，团结联络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政策。他受李济深委托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时，被推举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他与陈铭枢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翌年9月，中国民

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常委，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蕴山投身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民主运动。1945年10月，他当选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参与主持日常工作。1947年秋，朱受李济深、何香凝委托，联络国民党民主派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至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朱被选为中央常委，兼代政治委员会主席。5月，与李济深等代表民革中央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五一号召”。12月，他和李济深等人由香港起程北上，1949年1月到达大连，不久与其他民主人士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9年4月，朱蕴山受周恩来委托，与刘仲容等由北平秘密前往南京，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八项主张，尽快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在南京期间，他们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何应钦等人，宣传了中共的和平民主主张，破除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幻想，终因蒋介石等人的顽固立场而未有结果。

1949年9月，朱蕴山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副委员长；民革中央第二、三、四届常委兼组织部长，第五届中央主席。

1981年4月30日，朱蕴山逝世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央宣传部编：《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李正西、洪啸涛：《朱蕴山》，黄山书社1988年版。

胡允恭：《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朱执信

尚明轩

朱执信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著名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原名大符，字执信，号秋谷，笔名蛰伸、县解、去非、前进等，原籍浙江萧山县。1885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出生在广东番禺，父亲朱启运，当过张之洞的幕僚。

朱执信童年进私塾读书。稍长，跟从舅父汪仲器学习数学。1902年，入广州教忠学堂读书。他勤奋好学，和学友共同集资购阅新学书报，并组织“群智社”，探求新知识。1904年，应广东省留日考试，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学。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及许多革命留学青年。目睹清政窳败，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1)]，后被选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

从1905年到1908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改良派的反对革命的谬论。在《论满洲欲立宪而不能》、《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和《心理的国家主义》等文中，他从当时存在的国内民族矛盾现状出发，抨击了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说明这个政府乃是内忧外患的祸根；揭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驳斥了康、梁之流所散布的种种胡说。他指出清朝统治者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力主以革命求共和，反对改良主义的调和论，号召人们摒弃对清政府的幻想，举起反清的旗帜，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斗争。朱执信在这段时期的理论活动，在作为辛亥革命思想准备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大论战中，立下了显赫的功勋，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

朱执信在1906年1月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科学社会主义无力进行正确、全面的介绍，甚至有很多错误，但他肯定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称赞“马克思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莩之齐氓”[(2)]。这种提法虽仍不恰当，但比之当时一般的民主主义者，显然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

1906年，朱执信自日本归国后，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等校任教。他以教员的职务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征集同志，与新军中的赵声、倪映典等人经常秘密策划反清斗争。同时，积极从事联络和发动民军，进行武装起义。“自丁未（1907年）以至辛亥（1911年），凡广东革命诸役，无一不与。”[(3)] 1910年2月的广东新军之役，他负责发动顺德一带民军起来支援。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他是进攻督署的“选锋”（突击队）之一，随同黄兴攻入督署，在激战中负伤。这次起义失败后，他逃亡到香港。

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费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之后，他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编练军队，准备北伐。南北和议达成后，他又被委为广（州）阳（江）军务处（后改称绥靖处）督办和广东审计院院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又赴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14年，他奉命返粤，与邓铿策划发动反袁武装斗争。接着，又主持驱逐龙济光的军事活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间不一致以致失败。在这期间，朱执信先后两次到达新加坡、马来亚的怡保等地为讨袁筹款而奔走。1915年至1916年，为讨伐袁世凯，他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陆续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朱执信仍然坚持理论宣传活动，为《民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政论。在《无内乱之牺牲》、

《暴民政治者何？》及《革命与心理》等文中，他揭发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了当时反动分子把革命者及其主张诋毁为“暴民”和“暴民政治”的谬论。他反复指出“民心恶袁”，袁记政权的稳定只是暂时的，坚信民主革命必然胜利。

在护法运动期间，朱执信一直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1917年7月，他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1918年5月，他又随同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准备驱逐窃踞广州的桂系军阀。1919年秋至1920年夏间，他曾多次到福建漳州与驻扎该地的粤军进行策划，并和在粤的魏邦平、李福林军相联络，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著作，并奉命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辑撰述工作。

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业已走到终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陷于绝望的困难日子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给朱执信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著文予以赞颂，并学习俄文，准备钻研苏俄的革命理论。在他此后的很多著述中，显示出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1919年春南北和议时，针对有人把国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向南北军阀实力派的乞求上，朱执信指出：像今天南北军阀“拥兵据地”的这种“实力”，是“旦夕倒坏”的实力，是“千人所指，无疾而死的实力”，不是真正的实力。他断言说，“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4)]。

朱执信比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得更远一些，他不但一向坚持比较激进的“平均地权”的纲领，而且由于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来自下层革命群众的力量。“今后革命，顾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也。”[(5)] 在《野心家和

劳动阶级》、《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等文中，他说："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又说："离开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他把日益增长的"工人的力量"视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他支持工农劳动人民的斗争，并且发出"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的呼声，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爱国运动。

朱执信赞扬"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参加"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在《青年学生应该警戒的两件事》一文中，他指出："现在的学生，已经把从前儒家那些谬说通通打破了。"

朱执信热情地赞颂布尔什维克的刻苦牺牲精神，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精神，只是在他们那为社会牺牲的精神上。他们共产党员工作时间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少。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然后才可以作成一个革命事业。"[(6)] 他从俄国的革命经验中，注意到赤卫军的功绩和列宁培育赤卫军的方法，指出："现在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有了赤卫军的保护，他们国里头的种种组织，才可以保持发达。"[(7)] 俄国的军队"一面做防卫主义的武力，一面又是共同经济建设的先锋"[(8)]。他想以当时苏俄的劳动军为榜样，来建立一支新的部队。为此，他翻译了列宁颁布的苏俄《劳动军法规》。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朱执信也像孙中山一样，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怀着向往的心情，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增加了信心，在晚期的政论中闪现出新的光辉。

当然，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对列宁的理论之了解，还存在各种局限（例如，他重视工农劳动人民，还仅仅是认为革命离不了"农工的帮助"；他认为"实行共产主义……不必以各取所需随之"等等），他用以观察和论述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仍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朱执信始终积极地参加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工作。他极端反对逃

避革命斗争的行为，深恶痛绝吃饭不干事的人们，曾说："现在这些自命高尚而作隐遁生活的人，都是过分贪婪。既然吃众人做成的饭，穿众人做成的衣，住众人做成的房子，就应该为众人做事。"[9] 1920年夏，戴季陶和胡汉民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不满，逃到湖州去过所谓"隐遁生活"，朱执信曾写信给予严厉斥责。

1920年夏，孙中山决心驱逐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执信于6月下旬再次被派赴漳州，敦促驻扎在那里的粤军西进讨桂。稍后，他又不避艰险地奔赴广东，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桂军事行动。在他的策动和民军纷起的压力下，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9月21日，朱执信到达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时，被桂系军阀杀害，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时年方三十五岁。他一生写了近百篇政论文章，主要著作编为《朱执信集》（上下册）。

---

(1)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七十余人，在东京赤坂区霞关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会议临结束时，孙中山领导大家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朱执信于此日加入同盟会。

(2) 《民报》第2号。

(3) 《朱执信先生墓表》，广州执信女子中学编《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册》。

(4) 《所谓实力派之和平》，《朱执信集》下册，上海建设社1921年版，第541页。

(5)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

(6) 《革命党应该如何？》，邵元冲编《朱执信文存》，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437—438页。

(7) 《匈俄苏域政府的兵》，《朱执信集》下册，第661页。

(8)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朱执信集》下册，第392页。

(9) 《朱执信先生纪念专刊》附录类，1929年版，第23—24页。

朱志尧

朱文炜

朱志尧，字宠德，号开甲，天主教徒，教名“尼各老”（Nicolas）。1863年9月7日（清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渡。朱氏祖居江苏青浦潭西丝网埭，捕鱼为业，康熙末年始信奉天主教。后移居金家庄，再迁诸巷，渐由渔而商，自湖而海，贸迁有无，获利甚丰，家业日盛。到1850年时，朱家自有四桅大沙船，经营贩运；到朱志尧父亲的年代，拥有沙船七艘、钱庄三所和一大批房地产。1860年迁居上海南市董家渡。

朱志尧幼时，经常到造船场去观看工厂造船，对铁工活极感兴趣，曾闻其父说“木匠一工，不如铁工一烘”[(1)]。稍长，从二舅父马相伯读于徐汇公学，又学习八股，先后应试八次皆未中。1882年，朱家沙船在山东洋面两次遇到台风，“沙钓覆没，庄资破产”[(2)]，遂家道中落。1887年，他的三舅父马眉叔主持招商局局务，盛宣怀为督办，朱志尧经马相伯介绍任招商局“江天轮”买办，往来上海、宁波间。几年后，调任“江裕轮”买办，行驶上海、汉口线。1893年，朱趁休假时机第九次应试，中青浦县附生。

朱志尧做了十年轮船买办，积累起一些经验，想自己办点事业。他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经商之道”。他看到当时盛宣怀所办织布局，积压大量棉籽，苦无出路，便在工余参考外国资料，做轧棉籽油计划，画成轧机图样一式，建议盛宣怀办棉籽油厂，盛大为赞赏。时洋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在旁，说机器可向美国购来。数月后，机器运到试用，不料故障迭起，洋工程师亦束手无策，盛大为懊丧，迁咎朱志尧，朱乃乘机自荐。原来此种进口机器只适用于洋种棉籽，不适用粒小而坚硬的中国棉籽，朱志尧请来铁匠共

同研究，自造轧机一台，半月即成，效用颇佳。因再添备零件，将洋机改装。1897年，盛宣怀开设大德油厂，委朱志尧为总办。从此，朱潜心西学，并助其弟朱云佐（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第一任买办）创《格致新报》，传播西洋科学知识；又办中西书室，经售法文书籍。1898年，《格致新报》停刊，并入《沪西汇报》。是年7月，朱云佐去世，朱志尧由马相伯介绍，马眉叔担保，继其弟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辛丑条约》之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民族资产阶级纷纷提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朱志尧认为“惟有机器，仍购自外洋，漏卮莫塞”，乃向舅父马相伯求教问计，决定创设机器制造厂，定名“求新”。1904年在南黄浦租地七十亩开办，规划建造。是年，大德油厂获利四万一千两，这极大地鼓舞了朱志尧，乃于1905年初另创同昌油厂，全套轧棉籽油机设备均为“求新”制造。“求新”制造业务发展很快，1905年至1911年七年中，产品不下百种，较著者计有大小轮船40艘，蒸汽引擎共5000匹马力，榨油机榨床200部，大小桥梁40座，以及自重六十六吨半的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抽水机等。在当时，许多产品都是先人一着的创举，在中国机器制造史上均属空前。

“求新”机器制造项目不断扩大，朱志尧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自1904年迄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发起创设、投资及支持了一批与“求新”制造修理有关的工矿企业。除了创设大德油厂（任总办）和同昌油厂（主要出资人）外，他还投资于新诚米厂、汇西布厂、“尼各老”砖厂，以及担任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厂、申大面粉厂、中国图书公司、苏路公司等董事。对通州资生铁厂、常州厚生机器厂以及新祥机器厂、合兴机器厂、南洋机器厂等机器同业，也曾给予支持。

朱志尧身为买办，又是天主教徒，在经济上依赖洋人，但在机器制造上，却并不迷信洋人。他曾多方设法，将外国机器改进，使求新制造的机器更适合我国的需要。有些机器，“外国制造者不适用，求

新制造者，试用颇著成效”[3]。

1910年，朱志尧与马相伯同时就任江苏谘议局议员，在南京赁屋住了一个时期，常骑马到郊外马鞍山、采石矶等处游山探矿。1912年，朱志尧发起创立宝兴铁矿公司，资本一万两。朱投资两千两（至1919年资本达四十五万两，朱有股份九万七千五百两），开采安徽当涂铁矿；并着手开办长兴煤矿，作为办炼钢厂的准备。

朱志尧独资经营的“求新”厂的资本，从1904年的四万八千两，到1906年增至十六万两，1910年又增加到三十余万两，发展很快。同时，朱志尧还投资于其他事业及房地产。据估计，朱志尧1910年时的资产总值约达八十万两。不过，他用于企业的资金，大都是以房地产及企业股份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及教会抵押借贷而来，每年负担利息甚重。至1913年，朱志尧经手向东方汇理银行抵押借款共达一百七十二万两。这样巨额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能延期偿还债务，朱志尧曾到北京与马相伯同谒袁世凯，请求维持。经袁同意，再通过亲戚沈志贤与审计院副院长徐恩元的关系，得到北洋政府财政部担保，朱志尧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的归还期延长四年。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求新”由于油料涨价等原因，遭到一连串的亏损，使朱志尧债台高筑，焦头烂额，走投无路。1917年，东方汇理银行到期逼债，北洋政府财政部拒绝继续担保。至此，朱志尧告贷无门，束手无策，于1918年4月2日，签订将“求新”厂售与法国邮船公司及歇乃达钢厂的草合同，估值为五十一万二千两，订明四个月履行合同。地方绅董、商会闻讯，反对将“求新”厂售与洋商，要求北京政府收为官办，但政府答称款巨难筹，要上海总商会维持，相互推诿。8月法商通知朱志尧履行合约。次年3月1日，法商向北京法国公使馆控告。几经交涉，北京政府外交部核准中法合办，6月1日接管“求新”厂，核定资本为一百二十万两，中法各半。中国资本中，保留朱志尧股份十万两及董事职位。同时将同昌油厂抵押给上海24家银行、钱庄，借款三十一万两，了结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

“求新”厂的出售，对朱志尧是个重大打击，十五年苦心经营付之东流，但他还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在中法“求新”厂及其他企业中仍是董事，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地位。因此，他力图东山再起。朱出身航业世家，主张自辟航线，经营航运。1924年6月，江苏巨商杨在田邀他合办大通仁记航业公司，专驶沪扬线。朱为大通公司设计符合航线要求的船只，向中法求新厂定造千吨级“隆大”轮一艘，后抵押借款再造“鸿大”轮，一年之中成船二艘，价值四十余万元。几年间，发展迅速，又再添轮二艘。朱志尧深知长江各主要口岸，都被怡和、太古、招商局三大公司霸占，是无力与之竞争的；只有大公司不走的较小码头，尚有回旋余地。1928年春，再集资20万元，创设合众航业公司，朱投资2万元。是年秋，先购船两艘，行驶上海—海州、连接陇海铁路客货运输业务。未及一年，营业日上，又添购一轮，自辟进射洋河直通苏北阜宁航线。

“大通”成立以后，与大达公司有过激烈竞争，经朱志尧设法改进轮机，提高航速，取得优势地位，迫使“大达”与“大通”联营，竞争始告结束。

1915年，朱志尧与虞洽卿、陆伯鸿曾合组大通地产公司，各出资一万两，向上海巡捕局订立合同，租得南市新马路以外沿浦滩地及岸线等地，30年为期。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将该地没收，后经虞洽卿向蒋介石交涉，收回租赁权15年，重新订约付租，得到赔偿损失费15万元，朱、虞、陆各得5万元，并各得租地1/3。虞洽卿设立的三北公司，朱志尧设立的大通公司，分别在此建立码头，1930年朱志尧在租地上集资建造合众仓库公司。

1926年，朱参加美国费城“赛会”，同时参加在美举行的天主教“万国圣体大会”。他企图通过美国天主教上层分子，为冶铁炼钢事业找到大笔借款的机会，未能成功。从美国回来，朱志尧拟以己子继代买办职位，未获洋人同意。1927年2月买办合约终止，朱退出东方汇理银行。朱志尧在中法求新厂保留的十万两股份的股金，是向东方

汇理银行抵借的，曾还过两万两，1930年11月由巴和律师出面，将股份作价了结。至此，做了三十年买办的朱志尧，从法国资本中完全退了出来。在此期间，朱曾任上海机器公会名誉会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沪战起，南市首当其冲，朱志尧在经营求新大败以后，创立的三个航业、仓库公司，都遭到严重损失；所有八艘航轮，除一艘逃往重庆外，其余全部被征用，沉没于马当及连云港。朱志尧对此一筹莫展，遂将活动转向教会方面。

朱志尧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与天主教的密切关系，不但表现在信仰、思想及教会会务活动方面，而且深入到他的有关事业方面。在经营“求新”时期，经常向教会若瑟堂、三德堂、普爱堂、首善堂等处大量借款，为教会买过大量土地，曾任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罗马教皇曾“钦赐”给他“圣西尔物斯德赉骑尉勋位”。抗战前几年，朱志尧每逢礼拜日（即星期日），常到无锡看守所监狱讲道布经。抗战期间，转到上海马思南路看守所及难民所讲道。1942年，他将东沟地产200亩出售，得伪中储券300万元，其中170万元全部捐输各地教会及天主教举办的慈善事业。

抗战胜利后，朱志尧曾产生过一些幻想，一方面向国民政府交涉收回大通、合众等公司产业；另一方面，通过主教于斌向国民政府要求赔偿战时损失、贷给巨款及由政府担保向加拿大借款购船，结果都未成功。解放前夕，大通公司仅存的“隆大”轮，又被当局征用沉没在上海江海关码头。至此，朱志尧的事业几乎完全破产。

1955年3月17日朱志尧在上海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市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朱志尧档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藏。

---

(1) 《家史》，朱志尧档案卷80。

(2) 《家史》，朱志尧档案卷80。“沙钓”，即沙船。“庄资”指钱庄的资金。

(3) 《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图说》，朱志尧档案卷65。

朱自清

娄献阁

朱自清，字佩弦，1898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苏东海县。原籍浙江绍兴，祖父和父亲做过些地方小官。1903年全家从东海搬到扬州定居。

朱自清幼年随父母课读，后入私塾，再入小学。在小学时，他的英文已学得不错。1912年考入扬州两淮中学读书，学习成绩很好。

1916年夏天，他离开扬州赴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入本科哲学系，三年中修完了哲学系全部课程，1920年大学毕业。

朱在北大读书时，是校内学生刊物《新潮》杂志社（1919年1月创刊）的社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试作新诗。

从大学毕业到1925年暑假，朱自清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十中学、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等处教书。在此期间，他一面授课，一面努力写作。1920年冬，文学研究会成立，他为早期的会员之一。1922年1月，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同年6月，又和俞平伯、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合印了诗集《雪朝》。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了当时一些新诗人组织的“湖畔”诗社。

从这年11月起，他和俞平伯在通信中多次讨论当时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中所流传的一种“刹那主义”。他不同意只求刹那享受的刹那主义，而主张每一刹那都要充分利用起来做一些事，以求心之所安。用他的话说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情意底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1)] 他认为这是比较“积极”的。

1923年3月，他的第一首长诗《毁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引起了当时诗坛上的广泛注意。同年10月写成《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此文发表后，被人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2)]，后来收在《踪迹》一书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为抒发胸中的愤懑，写《血歌》一首。

这年8月，北京清华学校聘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此后他的创作转向散文，同时开始了古典文学的研究。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在游行的队伍里，亲身目睹了这一历史惨剧。事后他以愤怒的心情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详细地叙述了惨案经过：“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在文章末尾说：“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3)]

“三一八”之后他回到书斋，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工作。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掀起了大革命风暴，但由于蒋介石的叛变，1927年继之出现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与白色恐怖。在这种局势下，他感到苦闷、彷徨。1928年2月，他的《那里走》一文坦率地表露了这种心情。朱承认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小资产阶级，就“没有血与肉”。他说：“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也总得找个依据，好“安心地过日子”。于是就钻进“国学”里去消磨一生。他虽然意识到这只是“暂时逃避的一法”[(4)]，但是仍然选择了这条道路。

同年10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这本书收集了他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背影》一文传诵一时，被选为中学国文教

材。

1930年暑假后，朱代理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1931年8月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英国，他虽关心事变，但感到“没有法子”。1932年8月回国。从9月起他正式主持清华中文系。这时闻一多也从青岛来清华任教，这是他们两人共事的开始。

1934年，朱担任《文学季刊》和《太白》杂志的编辑。1935年7月起，着手为《新文学大系》编选《诗集》。同年冬，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12月16日，他随清华学生游行队伍进城，眼见到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他很愤懑。当时的民族危机已经很严重，但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去挽救，他并不明确，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本质也缺乏认识。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清华教授开会决定发讨伐张学良的通电时，朱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起草委员会的召集人。稍后他在日记中曾明确写道：“余之立场与政府相同。”(5)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次年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朱随学校南行。这一重大事变，暂时打断他的安居治学生活，他为南迁以来未能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而感到十分苦恼。1939年寒假以后因健康关系他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0年到1941年他在成都休假期间，看到了一群一群的贫民抢米仓、吃大户的情形，后来他写了《论吃饭》一文，对饥民表露同情。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般贫民没有饭吃，他的生活也感到日渐困难。休假结束后，他把眷属留在成都，自己返回西南联大。为躲避敌机轰炸，他随清华文科研究所住到乡下，有时进城去上课，人们常见他衣服的纽扣掉了，缀上些布条系着。

到了抗战后期的两三年，一般教学人员的生活更加困苦，但他仍然认真地进行教学、研究和著述的工作，几年内写成了《新诗杂

话》、《诗言志辨》、《国文教学》等不少著作，但是他的身体面貌却变得更加衰弱和憔悴。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屠杀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大中学师生，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这对朱自清是个很大的刺激，他“悲愤不已”[(6)]，遂积极支持昆明师生向反动当局抗议。1946年1月20日，他公开签名于昆明文化界反内战的时局宣言。

同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师生分批离滇返平，6月他先回到成都家中。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刺身死。四天之后，民盟又一负责人、他的好友闻一多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这对朱自清是更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中写到：“此诚惨绝人寰之事。”“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7)] 8月16日他写《挽一多先生》诗，把闻一多比作“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的“一团火”[(8)]。他于同年10月回到北平（今北京）清华，受聘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他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编成了《闻一多全集》，在为《全集》写的《序言》中称闻是斗士、诗人和学者。

在闻一多被害前的一两年内，朱自清的政治见解已经有了一定提高。1944年他曾在成都对他的夫人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的向前走。”他自己承认不如青年人走得快，但要求“赶着走”[(9)]。闻一多的惨死加速了他的转变。1947年2月23日朱领衔发表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5月24日他又签名于“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并手持宣言稿到处请人签名。此后他走出书斋，接近青年，几次和同学一起扭秧歌。秧歌是解放区流行的民间舞蹈，因此人们称赞他这是“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10)]。

1948年初，朱已受胃病的折磨，身体越来越坏，但他仍坚持写作，并积极参加群众运动。此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压迫日甚一日，殴打与逮捕学生的事不断发生；各校师生员工用罢课、罢教、罢工来

反对迫害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4月9日与11日，国民党的特务暴徒先后冲入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大，肆意毒打并逮捕学生。为此，12日清华开教授会，决定13日罢教以示抗议，他被推为宣言起草人之一。

同年6月，北平学生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朱为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并说："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绝不应逃避个人责任。"[11] 这事影响他家庭生活，但他宁可让家人挨饿，也不愿再领这种面粉。7月9日，他又签名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七五"枪杀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事件。

在这期间，他的胃病几次复发。7月23日，他扶着手杖带着重病，参加《中建》半月刊社在清华举行的"知识分子今天任务"的座谈会。在发言中他比较清醒地估计了自己，承认自己需要向工农学习，需要改造。到8月初，他的胃病更加严重了，入院救治无效，12日终于在贫病交迫之下死去。在他死前神志尚清醒的时候，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毛主席对朱自清晚年从民主自由主义者转变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立场上来，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反抗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和闻一多一样，都"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2]。他的全部著作共约一百九十万言，大部分收在《朱自清文集》里。

---

(1) 朱自清的信，见O．M编《我们的七月》，亚东图书馆，1924年。

(2) 浦江清：《朱自清先生传略》，《国文月刊》第72期，1948年。

(3) 朱自清：《朱自清文集》，开明书店1953年3月第1版，第765、773页。

(4) 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第3号（1928）。

(5) 王瑶：《朱自清先生的日记——纪念他逝世一周年》，《光明日

报》1949年8月10日。

(6) 王瑶：《朱自清先生的日记——纪念他逝世一周年》，《光明日报》1949年8月10日。

(7) 王瑶：《朱自清先生的日记——纪念他逝世一周年》，《光明日报》1949年8月10日。

(8) 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见《朱自清文集》。

(9) 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见《朱自清文集》。

(10) 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见《朱自清文集》。

(11) 王瑶：《朱自清先生的日记——纪念他逝世一周年》，《光明日报》1949年8月10日。

(1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85页。

诸文绮

汪仁泽

诸文绮，名人龙，以字行，原籍江苏武进。1886年2月25日（清光绪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于上海。父亲在上海南市开设景泰顺帽顶店。诸文绮少年时就读上海龙门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取江海关当职员。旋因不愿受洋员的颐指气使，放弃高薪辞职回家。其后，他自费东渡日本，先进语言补习学校学习日语，后又考取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化学，并取得上海劝学所供给的地方留学生公费补助。在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10年，诸文绮自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国，经清政府留学生考试，授以进士衔，并任农工商部部员。此时，他又兼任无锡县立实业学校校长，曾参加同盟会在无锡地区的反清秘密活动。辛亥革命后，他至苏州任江苏省立工业学校染色科主任教员，兼授全校英文课。

诸文绮执教的江苏省立工业学校，是培训我国早期纺织印染工业技术骨干力量的基地。他不仅授课，且进行纺织机械的设计。当时国内尚不能自制丝光线，市场需用均向日本洋行订购，非但价高而且交货迟缓。为此诸文绮自行绘制机器图样，委托合众机器厂制成丝光线机，又自行设计工艺程序。半手工式的丝光线试制成功，为国内首创。

丝光线的试制成功，使诸文绮萌生了经营实业挽回利权的信念，便集资在上海创办启明丝光染厂。初系两合公司性质，诸自任无限责任股东兼总经理。由于产品质量不亚于外资，因此销路日旺，除江浙一带外还远销南洋及华北各地，一时供不应求。此时厂址由虹口迁至

南市，租地自建新厂房，并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设发行所。1914年，诸申请获得北京政府批准专利五年，使用双童牌注册商标，出品各种丝光纱线。1916年又盘进立大织布厂，成为启明厂的织部，遂改厂名为启明染织厂，并增产用丝光线织成的花色色织丝光布，以及府绸、线呢、被单、毛毯、围巾、毛巾等多种产品。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获得一定发展，启明厂在此期间发展迅速，到1918年已成为有职工五百人的中型厂，以后又增设门市部，无论产品质量和机器设备都在上海染织工业中名列前茅。

1919年秋，诸文绮发起组织染织业同业公会，成立后被推为主任委员。这年他与张公权等合资创办永元染织厂；又与季铭义、沈选青等集资创办大新染厂，诸任总经理。为了解决纺织印染的染料问题，他于1923年集资10万元，创办大中染料厂于上海龙华，生产染料硫化元，产品质量良好。同年又与达丰染织厂崔福庄等合资，在江苏江阴青阳镇购进已停业的勤康染整厂，成立万源白织厂，自任董事长，并在上海设第二分厂，规模不断扩展。1924年，诸在丝织商标的花边机上获得启发，试制色织布打样机成功，成为全国首创。用该机在设计新的花式布时，可先打出样布，不必如过去先上布机织样而浪费大量布匹。该机此后在色织同业中普遍应用，并推广到毛纺织等业。

诸文绮深感实业的兴办和发展与金融的调剂关系至大，1927年与亲友集资在上海闵行创办浦海银行，自任董事长，以其弟诸尘绮任经理。其间他又联络同业，集资创办中国染织银行，任常任董事兼总经理，调剂同业间的资金周转，博得同业的普遍好评。诸文绮先已用化名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登记经纪人，从事证券、期货交易，由于他善于观察国内外市场变化，资力雄厚，因此多操胜算，获利颇丰。

声望日隆的诸文绮先后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委员、纳税华人会执行委员、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常务监察委员、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他还任星华地产公司董事长、宝康银行常务董事，以及中国布

业银行、中孚信托公司、中国绸业银行、联业保险公司、中华化学工业社、大新化学厂等二十余家企业的董事、监察人等职。

诸文绮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因此对国内时政一直比较关注。1927年初，北伐军逼近沪地，诸曾积极参加国民党沪东支部的工作；并为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出资出力，功成不居。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经友人相邀，一度就任财政部浙江卷烟公卖局第四分局局长。别人视为肥缺，但他以不谙官场为辞，不久即挂冠而去。此后即专务实业，绝意仕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诸文绮与友人王性尧等深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亟，乃积极参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诸为救济战区难民，除自己认捐外，并多方奔走劝募，不遗余力。是年3月起，诸参加了张公权、王性尧组织的上海实业界人士“星五聚餐会”，每周聚会一次，商讨提倡国货、改进国货事宜。8月间，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成立，张公权当选理事长，诸与王性尧等分任理事。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诸文绮自疗养地浙江莫干山赶回上海，但在战区内的启明厂房已毁于兵燹。经诸重新购置机器设备，在租界内另觅两处新厂房，分设印花、色织两部，继续开工生产。上海沦陷后，敌伪多次派人利诱诸出任伪职，他坚决拒绝，于1939年只身避居香港，将沪上企业交由其长子诸尚一负责经营。香港沦陷后，诸被迫返回上海。他为保持晚节，不受敌伪胁迫，于1943年经浙江桐庐进入后方，转辗到达重庆。此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贪污盛行，事以贿成，深表愤慨，经常参加民主人士聚会。

诸文绮鉴于培育国家建设人才的重要，早在抗战前，除在神州法政专科学校、南洋医科大学执教授课外，并在闵行筹办文绮纺织专科学校，迨至第一期校舍工程方竣，适值抗战军兴，被迫停办。抗战胜利诸回沪后，复集中财力进行第二期工程建设，落成后开学，自兼校

长。该校招收高中毕业生，授以印染纺织专门技术，附设实验工场，重视课堂教学和生产实验相结合，前后毕业了两期具有大专程度的纺织印染技术人才百余人。此时国民党政府挑起全面内战，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造成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诸所经营的企业皆面临困境。

诸文绮于1946年经章乃器介绍，加入民主建国会。他积极参加“星五聚餐会”等民主人士集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反蒋、反内战活动。1948年秋，他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沪出走香港，11月和章乃器等人经东北进入解放区。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6月诸自北平南返，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1950年11月，他应长兄之函邀离沪去香港，经营以饲养肉鸡为主业的家庭农场。1957年一度回沪，接受政府给予的企业定息。1963年7月15日因病在香港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诸文绮传略》（未刊稿）。

诸文绮家属、亲友及原启明厂职工1984年—1989年间采访、座谈记录。

杨家骆主编：《民国名人图鉴》，1937年1月辞典馆初版。

《中国名人年鉴》（上海之部），中国名人年鉴社1943年版。

《中华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上海之部）日文本，上海兴信所1940年版。

竺可桢

阎铁

竺可桢，字藕舫，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3月7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县）。同胞六人，他最年幼。在本镇天华府小学读书时，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1905年去上海入澄衷学堂读书，1909年考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工土木工程，学习勤奋，成绩冠全班。他认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发展农业是治国之本。1910年考取公费留美，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6年发表第一篇气象学论文，之后在美国气象、地理等刊物上多次发表关于雨量和台风方面的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同年秋回国，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讲授地理和气象学。1920年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与柳诒徵共同主持史地学部，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地质学等课程。我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地理学家如胡焕庸、张其昀等人和气象学家，多属这一时期该校的学生。1925年，竺受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编辑，一年后又应邀赴天津南开大学教书。1927年，应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筹建中央气象研究所，次年该所建成，竺担任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气象事业，沿海和长江下游虽有一些气象所，多半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海关所设立的，主要为外国资本家在华航运服务，气象资料和台风警报全为外国人所办的徐家汇天文台所掌握。

在旧中国办研究所，经费短缺，人员不足，困难重重。竺可桢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气象研究所已有四十名工作人员，并在各省设置四十多个气象站和一百多个雨量站，先后开展了高空探测、无线电气象广播、天气预报等工作，出版了中国气象资料，发表

了许多研究论文，为我国的气象学奠定了基础。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仍兼任气象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锐意整顿浙大，废除前任校长强制推行的军训制度，增强民主和学术空气。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3)]，四处聘请有造诣的教授，还尽量充实图书仪器。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师生向内地转移，两年中四迁校址，最后在贵州遵义和湄潭定居下来。每到一地，即使只有两三个月的间歇，他仍然坚持科研和教学活动。

竺可桢艰苦创业，提倡“学理之研究重于物质之享受”[(4)]。贵州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就以炭炉代酒精灯，土制瓷杯做培养皿，祠堂、庙宇权充试验室。尽管这样艰苦，科研与教学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理学院的数学系和生物系，工学院、农学院、文学院和史地研究室，都有相当数量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发表。1944年4月和10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曾两次访问浙大，对浙大师生在战时物资设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教学与科研居然获得了可观的成果，学术风气也颇浓厚，表示惊叹。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称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5)]。1945年6月，浙大生物学教授谈家桢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分类》报告，美国学者以中国抗战八年尚能做出如此研究，无不惊讶[(6)]。

浙大在抗战胜利前夕，已拥有六院、二十五系、四个研究所，另有一个拥有八个系的龙泉分校，学生比抗战初期增长了四倍[(7)]。由于竺可桢苦心经营，浙大逐渐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之一，对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优异的贡献。

竺可桢从年轻时候就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可是现实总是和他的愿望相左。国民党当局对文化机关千方百计地加强控制，对进步师生残酷迫害。竺可桢主持正义，珍惜人才，对受迫害的进步师生总是设法给予维护。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前夕，行政

院副院长孔祥熙慌忙用飞机接他的家眷离港，连哈巴狗都带上，而对滞留香港的大批文化界和其他知名人士却弃而不顾。再加上平时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于是爆发了反对孔祥熙的运动。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首先发难，接着在遵义浙大学生也举行示威游行。为防止国民党当局开枪镇压，竺可桢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卫护学生。

1945年3月5日凌晨，浙大教授费巩在重庆江边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竺可桢得知费巩失踪消息后，立即四处奔走，打探营救，竭尽了全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营救费巩的记载，就有七八十处之多。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特务为此大肆逮捕进步学生。这年10月24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29日被杀死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为掩盖罪行，伪称于子三是自杀身死。竺可桢闻讯赶往保安司令部察看，反动当局要他证明于子三系自杀，他严词拒绝，愤然离去[(8)]。接着反动当局在“御用”的《华南日报》上刊登“于子三畏罪自杀”的歪曲报道。竺可桢为说明事实真相，11月4日亲到南京，向《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生致死主要凶器及创口之真相，均尚需调查，其死因或将成为千古疑案”。《申报》记者问：“于子三是否自杀？”竺答：“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谈话登报后，引起很大反响。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9)]之后，一个“反迫害于子三运动”在蒋管区内兴起。

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曾一再催促竺可桢去台湾，后来又送来飞机票，他毅然拒绝，只身潜赴上海。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踪，他机警地躲在上海一处实验室里，直到解放。

1949年7月，竺可桢接到周恩来的邀请，立即赶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7月19日，周恩来设宴招待竺可桢和其

他几位科学家，共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大计。9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对发展科学事业提出建议，被大会采纳并在《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中有所说明。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还是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德友好协会会长。他虽然社会活动繁忙，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竺可桢从新旧社会对比和革命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1962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的时候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0] 这是一位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事业，执着地追求真理的学者满怀欣慰的自白。郭沫若为竺可桢入党写了祝贺词："雪里送来炭火，炭红，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力更生榜样。"[11]

竺可桢致力的研究工作，跨越不少学科，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方面，均有卓越贡献，是中国气象学、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对教育、科研组织和科学普及工作的贡献也很大。

他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讲授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他创办的东南大学地学系[12]，是我国最早具备近代地理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的地理系。他编的《地学通论》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他在浙大建立的史地系的地理组，培养了不少人才。解放后，他又亲自主持和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我国地理的综合考察、自然区划、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纂，以及历次地理学规划，都是在他领导或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竺可桢认为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应着重研究"现代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和人类的相互作用"，应向实验科学方向发展，将了解自然与利用改造自然结合起来，特别强调地理学

要为农业服务。

竺可桢用了很大的精力领导和指导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先后组织了华南热带生物资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西北沙漠、西南南水北调地区，以及黑龙江、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西藏等省、区的综合考察。此外，对海洋综合调查和冰川、盐湖的考察也积累了系统资料，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参考数据。

竺可桢一生著述甚丰，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二百七十二篇，还有大量的手稿、油印稿、书信和日记。

竺可桢是我国最早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台风的人。1918年在美国发表《台风中心若干新事实》，提出台风眼中温度剧升，是由于有下沉气流。1924年发表的《远东台风新分类》和1925年发表的《台风的源地与转向》，分析了1904年至1925年二百四十七次台风的季节分配源地、运动途径及其转向地点，并提出新的台风分类法，将台风分成中国、日本、印支、菲律宾、太平洋、南海[13]六个类型。

关于季风研究，1933年在第五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他提出《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总结我国30年代气象台站网资料，阐述我国天气与气候的变化规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1934年发表《东南亚季风与中国雨量》一文，讨论季风成因，指出夏季东南季风强盛时，长江流域主涝、华北主旱的规律。这篇文章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关于气象和区域气候，1922年发表《南京之气候》，1936年出版《中国气象概论》，系统地概述了当时所掌握的气象资料，对中国气象作了全面论述并对高空气候作了分析。1936年发表的《气候与人类及其他生物关系》，是他着重研究气候与人类和生产的关系方面的重要论述，同年发表《杭州之气候》。解放后，他更加重视农业气象

和气候的研究工作，培育人才，设立机构。1963年发表《论我国气候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着重论述光能在作物生产量形成中的作用，分析了温度、降水对粮食作物的影响，从而指出我国农业生产有很大潜力以及可采取的途径。这篇论文综合分析气候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

物候是竺可桢很重视的学科之一。他每天亲自观测、记录物候与天气，特别注意物候在农业中的作用，并注意搜集古代有关物候的文献。1931年发表《论新月令》一文，分析1921年至1931年南京物候记录，论证按物候安排农事比依据二十四节气更为适宜，主张以物候观测为基础，制订新农历。1934年至1937年，他开始建立物候观测网，“七七”事变后中辍。解放后，从1950年至1973年，连续二十四年，他每天观测物候，从未间断。在他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植物所和北京植物园于1962年共同组织全国物候网，观测记录一直在正常进行。他的《物候学》1963年出版，1973年科学出版社修订重版，是一本非常有实用价值的科普读物。

关于气候变迁，他对古今中外有关的气候资料广征博采，以新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形成完整体系。1925年曾发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的揣测》，在30年代又多次发表中国气候变迁的论文，分析我国两千年的水旱资料。他长期注意搜集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气候变迁的资料，从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等变化中，研究从古迄今的气候变迁，注意考古和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中所获得的资料。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波动》一文，阐述20世纪上半期气候变暖的事实，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的历程，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寒冷期与欧洲“小冰期”是一致的。1966年写成《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英文稿），后来的中文稿于1972年发表在《考古学报》，英文稿1973年发表于《中国科学》上。这一著作，立论严

谨，博大精深，深受中外学术界推崇，美、英、苏、日等国的书刊竞相介绍。日本气象学家古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前面。"[14] 英国《自然周刊》说："竺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能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高兴。"[15] 这篇水平很高的著作，是他八十二岁时发表的。

在自然科学史方面，自20年代开始，他先后发表过三十多篇文章，涉及天文、地理、气象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1944年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好评。1926年发表《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及记述》，全面评述了沈括的成就。1942年发表《徐霞客之时代》中指出："欲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洲并世盖无人焉。"[16] 竺可桢对我国另一位科学家徐光启也评价极高，认为徐超过了培根。1962年、1963年竺可桢写过专门纪念徐光启的文章[17]。

竺可桢治学谨严，提倡"求是"。他强调科学实验，注重亲临第一线观测试验，取得第一手资料。1965年8月，他已七十五岁高龄，放弃去北戴河休假的机会，却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农业区划，先后到兰州、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每日行程二百余公里，完成他一生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竺可桢每天必写日记，就在出国参加会议或在野外考察十分繁忙劳累的情况下，都坚持不断。他1936年以前的日记，已在抗日战争中散失。自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5日，共三十八年零三十六天的日记，全部保存下来，竟无一日间断，共八百余万字。天气与物候是他每日必记的内容，其他如中外科研的新动向、新观点、新问题以及其他大事，无不扼要记载。这是竺可桢为后人留下的非常有价值的科学遗产之一。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

---

(1) 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他们的民主革命思想对当地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

(2) 当时哈佛大学不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凡研究生毕业合格者都给哲学博士学位。

(3) 1936年4月25日就职演讲辞《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竺可桢传》，浙大校史编辑室编著（供内部参考用），第68页。

(4) 《竺可桢传》，第198页．

(5) 《竺可桢传》，第194—195页。

(6) 《竺可桢传》，第199页。

(7) 《竺可桢传》，第200页。

(8) 《竺可桢传》，第243页。

(9) 《竺可桢传》，第246页。

(10) 《竺可桢日记》，现存中国科学院《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

(11) 《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卷首第5页。

(12) 地学系后分为地理、大气、地质三个系。

(13) 南海台风原文为：China Sen Typhoon．

(14) 《竺可桢文集》，第XII。

(15) 《竺可桢文集》，第XII。

(16) 《竺可桢文集》，第XIV。

(17) 《竺可桢文集》，第XIV。

庄银安

陈民

庄银安，字吉甫，号希复，福建同安县人。生于1854年（清咸丰四年）。早年出国到缅甸谋生，初在仰光华侨商人经营的泰昌号当佣工，由于谨慎勤敏，颇为店东苏天祐所倚重，并将女儿许配给他。庄银安成家数年，稍有积蓄，遂独立开设源记栈号，向缅甸当局申请开荒，进行垦殖，颇有所获。平时热心于华侨社会福利事业，为侨胞排忧解难，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1903年冬，庄与陈甘泉、徐赞周等创办中华义学，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华侨子弟；同时又附设益商夜校，以利白天无暇读书的侨胞进修。

1904年春，康有为自印度至仰光，以保救清光绪皇帝、实行新政相号召，随之在仰光成立保皇会，华侨商人受骗的颇多。由于庄银安在当地华侨中素负重望，康有为屈尊拜访，对庄推崇备至，拟推举他出任仰光保皇会会长。庄以为康有为热心爱国，有意接受，但其执友陈甘泉极力劝阻，因康有为伪造“衣带诏”蒙骗华侨事，美洲、新加坡等地华侨已有所揭发，新加坡名士邱菽园还登报声明脱离保皇会。恰于此时，秦力山经新加坡的李竹痴介绍，到达仰光，5月由陈甘泉引见庄银安。秦力山详述1900年汉口自立军起兵失败的经过，揭露康有为欺骗华侨的行径，促使庄银安宣布与保皇会脱离关系。

庄银安热心华侨教育事业，为办好中华义学，他与陈甘泉请秦力山重修中华义学章程，加强民族主义思想教育。不久，清政府派视学员萨君陆到缅甸宣传清廷“德政”，并提出将中华义学改称中华学校，向北京学部领取助学金。义学校董考虑个人利禄，加以接受。庄银安与徐赞周等抗争无效，遂与该校脱离关系，另将所设益商夜校改组为日校，聘请国内学者陈仲赫等主持校务，除原有中、英文及工商课程

外，另加民族主义思想教育。辛亥革命后，该校改称共和学校，为缅甸华侨社会造就不少人才。

1908年3月，同盟会本部派员来到仰光，建立同盟会分会，庄银安及徐赞周、陈仲赫等十余人率先加盟，并在仰光大贺胥公园召开成立大会。由于保皇势力的影响，同盟会仰光分会成立后三个月仅发展会员三十七人，而且为回避忌者耳目，同盟会公开称为“演说社”，后改为“觉民书报社”。同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庄银安以为时机尚未成熟，需加强革命宣传，便与徐赞周、陈甘泉等集资八千多盾（缅币），于是年8月创刊《光华报》，以“开通民智，振兴祖国”[(1)]为宗旨，取名“光华”乃是“光复华夏”之意。这是同盟会在缅甸的机关报，庄银安任报社总理，主持笔政的先后有居正、杨秋帆、吕天民等，都是由孙中山自新加坡推荐来的。《光华报》出版月余，同盟会声势大振，会员增至四百多人。是年9月，孙中山特派汪精卫、吴应培两人到仰光指导会务，改订同盟会章程。11月20日，正式召开选举干事大会，公推庄银安为正会长兼主盟员。

庄银安主办《光华报》大力鼓吹革命，抨击康梁保皇谬论，还刊载了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一书。旋因该报揭露清政府驻仰光领事萧永熙敲诈侨商事，萧借故威胁报社股东迅速解散报馆，否则抄没本籍财产。多数股东慑于权势，迫使该报停刊拍卖。康党间接出资购入，改名《商务报》，鼓吹保皇。庄银安及同盟会同志只得另行集资，再次筹办《光华报》，于1909年11月1日继续出版，主笔政的有陈仲赫、居正、吕天民等。

1910年，保皇党又与清领事合谋，诬告《光华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提请英国殖民当局将该报当事人驱逐出缅甸。英驻缅总督下令递解主笔居正及报馆庶务陈汉平两人出境，《光华报》第二次被迫停刊。庄银安避居马来亚槟榔屿。

庄银安抵槟后，又与该地同盟会员陈新政、黄金庆筹资，创办槟

城《光华日报》，聘请东京《鹃声月刊》撰述人雷铁崖为主笔，于1910年11月1日正式出版，成为同盟会在马来亚的机关报。

同盟会缅甸分会自成立后，主要力量集中在筹款维持机关报《光华报》，进行革命宣传，对孙中山所需求的款项，不能大量提供。1908年11月，汪精卫从仰光去新加坡时，庄银安等募款二千八百多盾以应之。陶成章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费的名义筹饷，庄银安等也只助以一千多盾。1909年初，河口败军将士聚集新加坡，给养困难，庄银安等多方筹措，又得二千多盾接济。

辛亥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南洋各埠同盟会员以福建尚无声息，便公推庄银安为南洋总代表，回厦门督促。福建光复后，都督孙道仁聘请庄银安为顾问；厦门市参议会也选庄为议长兼财政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庄银安返回缅甸，创办大同油厂，获巨利。1913年，由冯自由荐任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

庄银安晚年回福建家乡颐养天年，被省政府委任为厦门市侨务局委员。

1938年庄银安病逝于厦门。

---

(1) 吕天民：《光华报与同胞诀别言》，“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2册，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692页。

邹鲁

闻少华

邹鲁，字海滨，原名澄生，笔名亚苏。广东大埔人，生于1885年2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六）。他是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生前的重要助手之一，又是早期的国民党党史专家，他还创建了驰名中外的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更是一位反共先锋。

邹鲁系客家人，其父邹应淼是个裁缝兼小贩。据说他的先世曾住在安徽当涂，后辗转迁往江西、福建，最后在广东定居。其父常勉励他读书救国。其母木氏勤俭耐劳，对幼小的邹鲁常讲一些圣贤豪杰的故事。在这种家庭熏陶下，邹鲁自幼就朦胧地懂得应当刻苦力学，长大后报效国家、民族的浅显道理。

邹鲁从八岁起入私塾读书。私塾附近有家书报社，他常往阅览。在维新革命思潮扑面而来之际，他从中获取一些新的知识。1903年，邹进潮州韩山书院学习。1905年，离书院到大埔县教书，经人介绍加入兴中会会员尢列组织的革命团体中和堂。1907年，邹到广州进广州法政学堂，和教员朱执信、同学陈炯明过往密切。在此期间，他因仰慕爱国人士广州府中学堂监督丘逢甲的风范，投刺求见，被丘氏收为门生，“以后做事多所提携，革命多所庇护”，成为邹鲁念念不忘的恩师。

1908年，邹鲁与朱执信、赵声等发动广州巡防营起义。由于发会票泄露事机而致失败，葛谦、谭馥等同志先后殉难。翌年冬，由胡汉民主持的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朱执信介绍邹鲁加盟。

广州新军于1910年发动起义，邹鲁担任巡防营的联系工作，他还与朱执信、陈炯明、胡毅生等人分头联络谘议局、学界及报界人士。

当起义因故提前发动之际，邹鲁正在潮汕运动民军，但新军很快失败。他得知消息，即赶回广州，动员粤商自治会办理营救新军事宜，做了大量安抚逃兵等善后工作。

1911年初，革命党人准备在广州大举起义，为做舆论准备，派邹鲁在该地办报，《可报》便于4月1日应运而生。《可报》开办月余，“军队里以及社会上，突然革命风气很浓厚”，但也引起清政府的警惕，很快就被查封。

同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著名的黄花岗之役打响了，革命党人虽英勇奋斗，终遭失败。邹鲁因参加该役不得不出逃香港，但仍继续从事筹款和进行暗杀清吏的工作。10月武昌起义后，11月广东响应，邹鲁在香港负责筹组起义军的人力和财力。由于汉阳失守，粤方为支援武昌起义军，组织以姚禹平为总司令和以邹鲁任兵站总监的北伐军，邹随军经上海至南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回到广东任官银钱局总办。其时，广东纸币贬值百分之五十，邹到任不到一月，竟奇迹般地使币值得到恢复。

1913年2月，邹鲁以国会众议员身份到北京。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有恃无恐拒不到案，邹鲁在国会中提案质问赵氏为何不到厅接受审查？4月袁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当此案咨送国会时，邹即提出弹劾案，指出全体国务员都违法失职，应予全体罢免。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先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会，并逮捕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邹鲁只得逃往天津，旋赴上海。不久，孙中山命他赴粤助陈炯明讨袁。陈失败后亡命海外，邹则于1913年10月赴日本追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

1914年，作为中华革命党党刊《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邹鲁任编辑。不久《民国》杂志停刊，邹回香港从事倒袁活动，并到南洋筹

款。

1915年，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在日本威逼利诱下，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全国迅速掀起反袁高潮。邹鲁与林虎、李根源共同主持两广讨袁军事，在水东、北海等地策动军队起义，均遭失败。1916年6月，袁世凯死。8月国会恢复。邹鲁由沪入京，复任议员。次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因参战问题形成“府院之争”，黎召张勋入京，酿成复辟丑剧，国会被解散。邹鲁只得离京赴沪。他在国会中，曾提出广东禁赌、全国禁烟并提议查办张勋等重要提案。

出于护法目的，孙中山于1917年7月率舰南下广州，进行讨逆护法，邹随孙南下。9月，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邹鲁任大元帅府参议，并代理财政部次长。1920年至1921年，邹任两广盐运使，采用标本兼治，由六百万元的年收入激增至一千余万元。

邹鲁和桂军刘震寰部关系较深，对粤军内部情况也比较熟悉。1922年当陈炯明进行叛变和孙中山决定讨伐时，任邹鲁为大总统特派员，策动桂军讨陈，并进行瓦解粤军的工作。

1923年2月，孙中山由沪抵穗，再设大本营，重组政府，任命邹鲁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又任邹为广东高等师范校长。不久广东高等师范、法政大学和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广东大学，邹为筹备主任。1924年夏，广东大学成立，邹任校长。孙中山对邹办教育很有信心，曾鼓励他说：“你办教育，素来是很有经验的。历来汝对我说话常注意到青年，而且谈到教育问题见解亦很对，现在广东的教育不但濒于破产，而且未能接受本党的主义，还是你出来担任改进罢。”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进行改组，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邹鲁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执委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国民党“一大”后，邹鲁对“三大政策”表示怀疑，认为“联俄、

容共实为一大问题”。当时在广东的学生中，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个“新学生社”，工作很活跃；邹鲁就成立广州市各学校校长联合会，加强辅导各校教员和学生；还组织“民权社”、“民社”等，与“新学生社”对抗。

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又遭右派刺杀。邹鲁利用“五卅”惨案全国反对帝国主义之机，离粤北上，经上海到北京。11月23日，邹鲁与林森、居正、戴传贤、谢持、叶楚伧、邵元冲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取消政治委员会”、“解雇顾问鲍罗廷”、“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等一系列决议。

“西山会议”后，邹鲁等人在北京等地设立国民党地方党部。他们又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创办《江南晚报》作为宣传机构。1926年3月29日，他们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邹鲁任执行委员。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给“西山会议”头面人物邹鲁等人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的清党反共事件，形成了沪、宁、汉三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两个政府的奇特局面。是年9月，在反共一致的政治基础上，组成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邹鲁为特委会委员。但该会内部矛盾重重，到同年11月即形解体。

1928年初，邹鲁获得出国考察机会。他从容游历了二十九个国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风俗等方方面面予以注意研究。在

这年的岁末回国，其后著有《二十九国游记》一书问世。

邹鲁回国后暂居上海，集中精力编写《中国国民党史稿》。早在1918年他即与朱执信共同搜集“三二九”史料，朱执信牺牲后，邹独立完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一书，孙中山为之作序。1924年，邹又重编《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及《红花冈四烈士传》。1928年经胡汉民审正，将书名《中国国民党史料》改定为《中国国民党史稿》，吴稚晖并为此书作序。该书在1938、1944年两度增订补充，有很大改进，是书“编次精当”、“征引详确”，是早期国民党史的一部力作。

1930年在新军阀中原大混战中，国民党反蒋各派联合起来，邹鲁以“西山会议派”代表身份参加。他们在北平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反蒋战争失败后，扩大会议被迫迁往太原，邹鲁由北平转往太原，与汪精卫等完成《太原约法草案》，旋即逃往天津。

由于“约法”问题上的争执，蒋介石于1931年在南京软禁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以此为导火线，国民党又分裂为宁、粤两方。粤方在广州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另组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邹鲁任粤方中央党部的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由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各派的谴责（特别是对宁方蒋派），南京和广东方面不得不宣称“共赴国难”，暂时停止内争，并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邹鲁为粤方六代表之一。直至次年1月，宁、粤才宣告统一，形成蒋介石、汪精卫合作局面。广州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均予撤销，另设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邹鲁任该部、会的执行委员和政务委员。他还接受了一项任命，即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从1932年起直到1940年，邹鲁在中山大学任内当了长达八年校长，他对中大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邹鲁的教育思想概括地说有如

下几点：1．教育应着重爱国教育与人格教育，强调民族精神教育，反对殖民教育。2．教育的实用性，主张实科教育与职业教育，反对升学主义的教育。3．教育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4．强调生产教育，他认为教育应培养国民的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生产者。此外，邹鲁对学制的改革，对课程的修订、教材的编审、翻译等，都有其具体主张。尽管这些主张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仍有其参考价值。当然，邹鲁在其任内也有其不合时代潮流的一面，例如主张复古、读经，还要求中文系把《孝经》列为必修课，并把学生运动一概说成“害国”运动，等等。

邹鲁对中山大学的另一贡献是完成石牌建校。他制订六年建校计划，分三期完成。1934年秋，农、工、理三学院首批迁入新校址。次年夏，文、法两学院竣工，相继迁入。“凡教职员学生宿舍、工厂、电灯厂、自来水厂、蚕丝馆、试验室，乃至牛栏、猪舍，莫不完备。”至1937年夏，天文台、体育馆、研究院等先后竣工，相继投入使用，使中山大学成为全国规模宏大、校舍设备堪称完备的高等学府。

中国国民党于1935年末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邹鲁力主西南代表应该出席，以维护团结。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常委，还兼国民政府委员。次年夏，邹鲁赴欧洲参加世界大学会议及德国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纪念会。邹在世界大学会议上提出教育应以仁爱为哲学基础，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案，这是针对德国法西斯化的现状而有所揭露和批判的提案。“七七”事变后，邹鲁由粤赴南京，共赴国难。上海失陷后，邹鲁随国民政府进川。1939年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邹任常务委员。1940年，因病力辞中山大学校长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邹鲁回到南京。1946年10月蒋介石六十寿辰，邹鲁撰《寿蒋主席六秩大寿》，对蒋歌功颂德。1947年，蒋介石当上总统后，邹鲁当选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国民党统治崩溃，

邹鲁由广州至台湾。国民党进行改造，邹任中央评议委员。

1954年2月，邹鲁七十寿辰，蒋介石亲临致贺。2月13日，邹鲁因脑溢血病逝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邹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

邹鲁：《澄庐文选》，正中书局1948年版。

邹鲁：《二十九国游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

郑彦棻：《邹鲁传》，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

邹容

尚明轩

邹容是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容。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拥有巨资的富商。

1891年，刚满六岁的邹容进私塾读书。十二岁参加县里的童生考试，因主考官出生僻题目刁难考生，他非常气愤，用拒考进行反抗。1898年，在重庆跟日本人学习英、日语，获得机会阅读资产阶级的书报，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吸收新的思想，打开了眼界。

同年6月开始的戊戌变法，使邹容大为激动，他很同情维新派。在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增长了民主要求，开阔了政治视野。同年9月，变法失败，邹容悲愤异常，对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革新志士谭嗣同特别敬仰，常悬其遗像于座侧，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自勉。这首诗，虽然设有摆脱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但鲜明地表达了邹容对新旧事物的爱憎，和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坚强意志。

从此，少年的邹容便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宣布：“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提出了“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1)]的疑问，勇敢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度。他在重庆吕翼文主办的经学书院学习期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2)]，因而被吕翼文开除。此后，他

更加鄙弃“旧学”，一心向往“新学”。

1901年夏，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日学生考试，被录取。由于邹容敢于接受新思潮，主张革新，清四川总督奎俊竟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在留学生临出国前宣布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

邹容被开除后，毫不气馁，更加坚定了到外国去追求新知识的决心。他于同年9月，到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准备自费到日本留学。在广方言馆学习期间，他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看到祖国大好河山沦落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同学中某些人却只知升官发财、对祖国的安危无动于衷，他极为愤慨，曾书写别人的诗，借以述怀：“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3) 邹容把自己的悲痛和愤懑寄托在书录的诗句里面，深重的民族灾难激励着他更加发奋努力。

邹容在争取自费留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亲族的种种阻挠，他舅父刘华廷以谭嗣同被害为例相恫吓，并以“将英文读好”，“吃着不尽”（意即当买办）相诱惑，要他放弃留学。邹容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坚定意志，他认为刘是“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总总谬论，不堪入耳”，并果断地表示：“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4) 他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踏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1902年春，邹容离开沉闷的广方言馆，到了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他结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又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的书籍，进一步提高了革命民主思想从而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运动。1903年的春节，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团拜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人们反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此后，凡留日学生开会，他每会必到，到必争先演说，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反对清朝封建腐朽统治的最年轻的激进分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觉悟，他还参照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及美国独立的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情况，开始着手编写鼓动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当时，清朝政府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在日本破坏留学界的革命活动，迫害留学生，作恶多端，民愤甚大。1903年3月，邹容乘姚生活腐化激起众怒的时机，偕同几个留学生痛殴姚文甫，并称欲取其头，以惩其恶。吓得姚魂不附体磕头求饶，哀乞宽大，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辫。"将其辫发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并在其旁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5) 事后，姚文甫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准备对邹加以谋害，他在友人劝阻下离日回国。

这一年4月中旬，邹容回到了上海，住在"爱国学社"，和章炳麟建立了友谊。邹容的志气和才能得到章的赏识，被亲昵地称为"小弟"。在章炳麟的帮助和影响下，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1903年4月27日，他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上，就反对沙皇俄国对我东北三省的侵略问题发表议论，犀利激昂，滔滔不绝，深获与会爱国者的好评，许多学生纷纷要求入会(6)。

也就在这个月，他奋笔疾书，续写旧稿，完成了富有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全书约有两万言，分做七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革命诸问题。序末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章炳麟为它写序，称它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这本书由几个革命党人集资，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

邹容在这本充满着爱国热情的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明白流畅、痛快淋漓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指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邹容在这本书中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号召

人民起来学习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跟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并“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在这本书中主要宣扬的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在当时，这种与改良主义针锋相对的革命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弦，武装了革命者，成为激发广大人民走向革命的“教科书”。《革命军》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它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一书问世惊惶万分，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作者邹容和作序人章炳麟“劝动天下造反”，“尤非拿办不可”[(7)]。1903年6月，因《革命军》而引起的所谓“苏报案”事件发生。同月30日章炳麟被捕，邹容不愿让章一人承担责任，愤然于7月1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会审法庭上，慷慨陈词，坚强不屈，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无理地对他宣判“永远监禁”，在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下，1904年5月又宣布改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邹容在帝国主义的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提篮桥狱中。由友人刘季平葬于上海华泾黄叶楼，时年方二十岁。“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8)] 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狱中，犹念念不忘革命事业的成败。临终之前，他在《绝命词》中，渴望的仍然是“愿力能生千猛士”，埋葬清王朝。

邹容死后，人们哀为“国殇”，很多人悼念他。《革命军》一书的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风行国内外，各地纷纷翻印，印数达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表彰他的革命功勋。生前的“马前卒”，死后的“大将军”，概括了邹容的革命历史，也是《革命军》的历史。其著作编为《邹容文集》。

(1) 《邹容略传》，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第1241页。

(2) 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5页。

(3) 因明子：《有感》，《清议报》第81册《诗文辞随录》，第1页。

(4) 《邹容第二十三次家书》（原件藏四川重庆市博物馆），见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页。

(5) 《复报》第10期。

(6)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31日，收入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89—92页。

(7) 兼湖广总督端方致两江总督魏光焘电（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八日［1903年7月2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

(8) 邹容：《狱中答西狩》，《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页。

邹韬奋

宗志文

邹韬奋，原名恩润，江西余江县人。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州。他的祖父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父亲邹国珍清末在福州做候补官，北洋政府时任过财政部的科长。邹韬奋五岁由父亲启蒙教读《三字经》，稍长在家塾就读。1909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学习，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父亲希望他长大做工程师，1912年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学习。他在这里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但是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喜欢语文和历史。开始他还想满足父亲的愿望，读到电机工程科二年级时，微积分等课程使得他困窘不堪。1919年暑假后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外国文学，选修教育学。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很高，邹韬奋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1年夏毕业后，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这里待遇比较优厚，但他对这种工作没有兴趣。1922年春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丛书，同时在中华职业学校兼职教英文。不久，他又参加刘湛恩组织的职业指导运动，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中学里举办职业指导运动，对那里的学生进行选择职业的指导，并编著《职业教育概论》、《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等书。

1925年10月，《教育与职业》月刊改为《生活》周刊，报道职业教育的消息；每期印千余份，大部分赠送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力求改进，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内容包括时评、短论、社论和通讯、随笔、游记、传记等，注重“趣味

化”、“有价值”的材料。文风提倡“短小精悍”、“明显畅快”，文章一般不过一二千字，很少长篇大论。编排上“极力独出心裁”，力求活泼新颖。编辑部在一间小小的过街楼里，发行部、广告部、总务部也都在此，工作条件很差。编辑一共三人，其中一人是兼职。投稿的人很少，大部分稿子都由邹韬奋一人撰写，他不得不用六七个笔名。每期有“小言论”，都是他执笔，根据当时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虽然只有数百字，很受读者重视。这时，《生活》的政治观点，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2)]之类的改良主义。从第二卷开始，设有《读者信箱》专栏，开始只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问题，后来转变到讨论社会问题。邹韬奋很重视读者来信的答复工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半天时间看信，除选小部分在《生活》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外，大部分直接回信答复，有的复信长达数千字。

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除了撰稿，还要跑印刷所、看校样，以至封面设计、广告、发行，都要自己动手。每期校样看三次，他说：“看校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3)]由于他的努力，《生活》办得很有生气，销量逐年增加，到1929年每期达八万份。他摆脱一切兼职，全力以赴，常常“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有一次笑话他“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4)]。他因为日夜伏案工作，劳累过度，胸部时常剧痛，数年不愈。

《生活》周刊不断揭露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11月第六卷第一期中，邹韬奋写了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揭露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花十多万元为他母亲做寿，极尽奢侈之能事，斥之为“丧心病狂的举动”。1931年8月，《生活》揭露交通部长王伯群用贪污来的钱娶小老婆，挥金数十万元。稿子付排后，王派人携十万元见邹，说是给《生活》的补助经费，他当场拒绝，坚持发表该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使邹韬奋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

化，他开始积极寻求“世界的大势”和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5] 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他写了四篇《小言论》，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以后各期，皆以宣传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1月，《生活》周刊两次发动募捐，援助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抗日，第一次即收转读者捐款十二万元。

“九一八”事变初期，邹韬奋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加强独裁专制，压制抗日活动，他的幻想破灭了，不再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这时，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32年他说：“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看出一二。”[6] 1933年3月，汤玉麟不战而退出热河后，《生活》发表邹韬奋的《惩汤声中的推究》一文，对汤大加鞭挞，更进一步责问：“中国的军阀们谁不是积满了私财？”“军阀们不干鸦片害人的生意而从中发财的有谁？”并指出，“身负军事重责，一向安居后方逍遥的，试问有多少？不过逃的形式不同罢了”。他“推究”出这一切“逃”的祸首是国民党政府。

《生活》周刊鲜明的抗日立场，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同时也触犯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不许有抗日内容的《生活》在租界内发行，国民党当局对它则软硬兼施。1932年初，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的主张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胡企图说服邹改变立场，拥护国民政府。邹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那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7] 邹韬奋坚持抗日的立场，国民党政府就想方设法限制

《生活》发行。开始是不断检查扣留，1932年7月，以“言论行动，毁谤党国”的罪名，禁止邮递。但《生活》周刊不胫而走，仍然传遍全国。它继续宣传抗日，教育启迪了许多追求进步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当时社会上流传许多谣言，对邹韬奋恶意中伤。他顽强不屈，明确表示：“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8)] 他预料《生活》周刊随时有被封禁的危险，于7月正式建立生活书店，以备《生活》被封禁后继续作为服务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还预先写好一篇《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准备在《生活》被封禁时发表，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6月20日，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这时也经常被特务盯梢，社会上传言他已被列入黑名单，朋友们一再劝他暂时躲避。7月，他被迫流亡海外。他说，“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9)]。他的苦闷，是找不到“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7月14日，邹韬奋从上海乘轮起程，历经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对那里的社会进行了考察。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最长，有十四个多月，除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外，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经过对资本主义欧美各国和苏联的实地考察，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刻苦研读，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目睹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和侨胞遭遇的痛苦，使他“痛心彻骨”。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认为，“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肯定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他说，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

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10]。显然，他在这里所说的中心力量，是指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摆脱出国时的苦闷，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经过两年多的国外考察，邹韬奋于1935年8月回国。《生活》周刊已于他出国的当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政府密令封闭。1934年生活书店创办《新生》周刊，继续宣传抗日，但在他回国前两个月《新生》也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捕下狱。他回上海的当天，从轮船码头直接驱车漕河泾监狱探望杜重远，两人互相鼓励，决心为抗日救国继续奋斗。

邹韬奋回国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入我国华北各省之时。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个号召的影响之下，他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重新擎起《生活》周刊的旗帜，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每期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运动发展情况及响应这一运动的文章，鼓励学生再接再厉，继续开展救亡运动。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邹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众生活》继承《生活》的传统，与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读者来信平均每天约一百封，发行量每期二十万份，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民党当局故伎重演，一方面限制《大众生活》发行，一方面对邹韬奋施加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书记长刘健群一起找他谈话。他们先是“好言相劝”，见他始终不肯就范，刘健群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11] 不久杜月笙又出面约他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他婉言拒绝。于是，《大众生活》很快于1936年2月被勒令停刊，邹被迫再度流亡。

3月，邹韬奋出走香港。7月，他在那里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直至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12)]。在此之前的6月，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的立场，日销两万份。他为了办报日夜辛苦，但仍然困难重重，不仅经费困难，印刷条件差，而且政治上很受限制。香港的新闻检查很严，连帝国主义这个词都不能用，只能写“××主义”。他不得已，《生活日报》只办了五十五天，于8月1日停刊。

不久，邹韬奋返回上海，积极筹备《生活日报》在上海复刊。国民党政府制造种种麻烦，他只得将《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一面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他与救国会的几个负责人，为支持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多方奔走，并组织了罢工后援会。

救国会的抗日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仍然遭到镇压。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时称“七君子”之狱。全国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次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13)]，罗织成十大罪状，向七人提出公诉。6月开庭审讯时，邹韬奋等人宣称他们救国无罪，对审判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止，国民党政府7月31日被迫将七人释放出狱。

邹韬奋出狱后，立即着手筹办《抗战》三日刊，8月19日在上海创刊。它一再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抨击国民党片

面抗战的政策。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提出后，26日邹韬奋在《抗战》上发表时评《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盛赞这个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该刊还发表中共负责人所写的一些文章，报道八路军在敌后战斗的情况等。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到武汉，继续编《抗战》三日刊。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邹任主编。创刊号上发刊词《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说，这个刊物负有两个使命：“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的政治任务。”《全民抗战》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每期销三十万份。该刊还编印战地版，大量分送抗日部队，以激励士气。这时，邹韬奋已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7月6日至15日在汉口举行第一次大会时，他提了三个提案：一是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二是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三是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他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在讨论第二个提案时，据理力争，几经辩论后，他的提案勉强通过。但大会刚刚闭幕，国民党当局就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钳制抗日言论。

同年10月，邹韬奋到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由于他在参政会上大力进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更加遭到国民党的忌恨。《全民抗战》的送审稿件常常遭到故意留难，有的无故被“免登”，有的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他为了挽救“许多读者所急迫需要的好文章”，几次“走几十里山路”，跑到审查机关去“据理力争”[(14)]。尽管他有时被那些审稿者弄得十分生气，还是坚持将杂志办下去，不愿“自动撤退阵地”。

生活书店从“七七”事变后，大量出版了一些抗日救亡读物和马列

主义书籍，并在重要城市建立了五十多个发行点。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益猖狂，生活书店也横遭摧残。1939年4月，西安分店被封，工作人员被捕。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开强迫邹韬奋将生活书店与他们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同时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被他严词拒绝。接着，生活书店各地的分店不断被封闭，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除重庆外，其他五十多个分店都被封闭。邹韬奋本人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2月25日化装潜离重庆，经衡阳、桂林到达香港。5月，他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周刊。《复刊词》中表示，要不惜一切牺牲，鼓吹宣传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措施，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不能默尔无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邹韬奋在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帮助下，于1942年1月9日离开香港到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已密令各地特务搜索他的行踪，“就地惩办”[(15)]。4月，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东江根据地，匿居广东梅县乡间。9月离开梅县，10月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他已患耳疾，发病时痛得坐卧不宁，但仍坚持参观访问、调查研究，还写文章，发表演说，赞扬抗日根据地的光明，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

1943年初，邹韬奋的耳疾日益严重，经诊断发现是癌症，乃秘密赴上海治疗。经过手术和放射治疗后，1944年2月病情稍轻，他坚持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一个多月写了六万字，因病情恶化不得已搁笔，未能完稿。6月1日他口述遗嘱，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追认为共产党员，将其骨灰移葬延安。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逝世并追认他入党。

邹韬奋一生著述极多，生前大都已编印成书。解放后编辑出版了《韬奋文集》，共三卷。

(1) 《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1926年10月。

(2) 《本刊与民众》，邹韬奋著《韬奋文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页。

(3) 《经历》，《韬奋文集》第3卷，第75页。

(4) 《经历》，《韬奋文集》第3卷，第76页。

(5) 穆欣：《邹韬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6) “韬奋文集”编辑委员会：《韬奋的思想发展》（代序），《韬奋文集》第1卷，第12页。

(7) 毕云程：《邹韬奋五周年祭》，《世界知识》第20卷第6期（1949年7月）。

(8) 《不相干的帽子》，《韬奋文集》第1卷，第64页。

(9) 《萍踪寄语》（初集），《韬奋文集》第2卷，第9页。

(10) 《萍踪寄语》（三集），《韬奋文集》第2卷，第219—221页。

(11) 穆欣：《邹韬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161页。

(12) 《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

(13) 时代文献社编：《七君子事件》，时代文献社1937年版，第15页。

(14) 《抗战以来》，《韬奋文集》第3卷，第192—193页。

(15) 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3页。

左舜生

李义彬

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首领之一。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生于1893年10月13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四日）。祖父莘农，前清举人。父子立，家馆塾师，兼业中医。母吴氏，湖北蒲圻人。

左舜生七岁入塾，随父读《三字经》和“四书”之类。1911年冬小学毕业。不久，入长沙新成立的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兼习日文。1914年秋，在其长兄资助下，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与曾琦、李璜同室居住。他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因其长兄失业，失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1917年秋，到南京同学黄仲苏家任家庭教师。

“五四”前夜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觉醒，奋起救国。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为团结青年，在科学精神指导下，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即实业和教育），把衰败腐朽的中国改造成青春年少的中国。不久，学会筹备处主任王光祈到南京，介绍左舜生加入了这个学会。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北京学生代表黄日葵、许德珩（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到南京策动学生罢课，左舜生曾与他们一起到金陵大学做发动工作。年末，左到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任职，不久任该所新书部主任，编辑、出版了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界发生了深远影响的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他还主编了《中国教育界》杂志。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左舜生被推选

为学会评议部评议员。翌年，评议部主任曾琦出国留学，左接任评议部主任职务，一直到1924年7月为止。

在新文化运动中，左舜生广泛接触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思想对他有颇大影响。1919年夏，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主张由少数青年组织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参加这个“集合体”的成员必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与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劳动所得归集体分配和使用，子女也由集体负责教养。他企图用这种乌托邦的办法来改造中国社会。“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文化统一战线的分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开始分化，左与曾琦、李璜、陈启天等成为学会中的右翼，他们站在一起，与学会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相对立。当时，李大钊等极力要把这个宗旨笼统、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左舜生等右翼竭力加以反对。左唆使上海的会员写信给北京的会员，主张学会“多研究些学理，少叙述些主义”[(1)]。在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召开的南京大会和1922年召开的杭州大会上，围绕这个问题，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辩。高君宇在杭州大会上明确表示：“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2)] 左舜生在会上坚持只从事“社会活动”，反对“争辩规定共同主义”[(3)]。可是他却利用长期主持会务、编辑《少年中国》月刊的权力，与陈天启等人，从1923年下半年起，接连刊载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他反对学会“规定共同主义”，只是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把学会改造成社会主义团体的遁词而已。

学会中的右翼分子在宣传国家主义主张的同时，开始网罗党羽，筹建组织。1923年12月2日，留学法国的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宣称主张实行“全民政治”，反对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左舜生、陈启天等乘李大钊等忙于革命事业、无暇顾及会务的

机会，把持了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权。

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国内。左舜生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身份同他们一起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机关报。左任该报总经理，负责发行工作。他还经常以“黑头”笔名在《醒狮》上发表文章，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声言：“吾人反对苏俄在华宣传共产；对所谓中国共产党之行动，更绝对不赞成。”[(4)] 他还说，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是列强想共管中国的唯一原因”[(5)]。他把苏联与英、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进行攻击和诬蔑。

1925年春，左舜生正式加入中国青年党，党号谔公。1926年7月青年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他在中华书局资助下，去法国游学。8月15日到达巴黎，游览名胜古迹后，即寓居市郊，专心读书，每周定时去巴黎大学上课。旅居法兰克福的好友王光祈约其赴德一游，也未成行。他1927年8月离法，9月回到上海，仍回中华书局任职。左舜生离国十四个月，国内政局巨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青年党与蒋介石在反共这一点上已经完全一致。但由于蒋介石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策，因之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没有合流起来。这时青年党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党治”，同时仍坚持反共立场。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反共势力大为震惊。左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登载各地的所谓“匪情调查”，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毁灭文化”。左在这个反动刊物上接连登载《曾、左、李平乱要旨》，详细介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经验”，以资国民党反动派参考，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出谋献策。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把这篇文章作为军事学校的教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这时，青年党想借机取得合法地位，实现与蒋介石“合作”。为此，左舜生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刊》，发表了一些主张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家领土

主权的文字，同时鼓吹青年党与国民党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一二八”后，他通电全国，呼吁支持坚持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他和王造时被上海四十余团体推举为代表，前往平津，策动张学良、吴佩孚抗日。他支持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说什么“在共产党未解除武装以前，全国人不应有反对剿共之举”[(6)]。1932年，左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到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任教。尽管青年党一再向国民党靠拢，在一段时间里仍未见容于蒋介石。于是他们又开始与反蒋势力接近，进行投机。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举起反蒋旗帜，左带领一批青年党员到福州，后见形势对陈铭枢等不利，又悄悄地溜回上海。

1933年初，日军进犯冀东，直逼平津。南京当局再次屈辱妥协，派黄郛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受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和唾骂。左舜生以“仲平”笔名于1934年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时事诤言》，替国民党开脱罪责，说什么：在抗战还没有准备的条件下，主持签订协定的人，处在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能有这样的结果，实在已经不大容易。黄郛在津浦线南下火车上见到此文，喜出望外，到沪后多方打听，始知此文出自左舜生手。遂通过沈怡邀左到莫干山畅谈了一整天。莫干山长谈，启动了青年党与国民党“合流”的步伐。同年5月，蒋介石电邀左于暑期到庐山见面。行前，左在上海中国饭店与曾琦交换意见，“他提出了三个必守的原则：一、团体不失立场；二、个人不失身份；三、为国家之故，可能与国民党合作，但决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7)] 曾琦同意左的上述意见。左舜生于7月上庐山谒蒋，陪同前往的有青年党的重要骨干分子何鲁之。这是青年党头目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1935年春夏之交，左应邀到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时间长达七个学期之久。由于左舜生对促成青年党与国民党“合流”，使青年党摆脱受当局打压的困境有功，在当年7月召开的青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者搞所谓“华北自治”，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左舜生完全站在南京政府一边，对“一二九”爱国运动进行攻击，说学生“结队游行，请愿，喊口号，发传单”的爱国行为，“等于痴人说梦”[(8)]。

1936年夏，左舜生由青年党骨干分子崔万秋（曾留学日本）陪同去日本十余天，先后访问了门司、马关和东京等地。行前，曾到北平面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此行名为参观访问，实为观察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一个来月时间里，左舜生接连发表了《彻底反对容共联俄》和《写在西安事变之后》等文章，攻击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把张、杨对蒋实行“兵谏”说成是“突然叛变，动摇国本”。说他们“显然是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麻醉”。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杀人放火，威胁民众”，再次为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辩护，说什么“先解决共产党的红军而后能积极对日是没有错的”。他竭力阻挠和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今后任何人敢于主张容共，即任何人将为全国国民的众矢之的”[(9)]。

1937年初，经左舜生斡旋、撮合并亲自陪同曾琦前往奉化拜谒蒋介石，长谈两次，进一步讨论了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承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设立国防参议院时，左作为青年党代表被聘为参议员。1938年4月21日，左以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表示竭诚拥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4月24日，蒋、汪复函左舜生，称：“本党念职责之艰巨，尤望集中全国贤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日之艰危，而谋国家久远之福利。”[(10)] 至此，青年党正式获得合法地位。同年，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废国防参议院，成立国民参政会，左亦以青年党代表资格被指定为参政员。在武汉期间，左还创办了青年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一度任经理。

抗日战争期间，青年党仍坚持反共立场，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义行动。左舜生在一届三次参政会上就曾发表过攻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言论。这时候，青年党虽然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仍未得到官职。因之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策有所不满，声言要求“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其一党专政，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时，青年党参加，左舜生任民盟秘书长。1945年7月1日，左与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人到延安参观访问，调解国共两党关系，曾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刘少奇等晤谈，其主旨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延安五日的见闻，给他的深刻印象是：“军队的素质要比文人来得好”，“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与老百姓接近，因此没有脱离群众。”及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青年党与国民党秘密勾结，在名额分配上提出无理要求，企图以此来分裂和破坏民盟，结果被赶出民盟。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舜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6年1月，左作为青年党的“东南党务复兴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飞往上海，恢复东南地区的青年党组织，并在上海创办青年党的报纸《中华时报》。10月，左到南京参与调解国共两党关系，所提出的三项办法，明显偏袒国民党，被中共代表拒绝。11月16日，左以宣传部长名义，代表青年党宣布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左本人亦作为青年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青年党终于撕下“在野”和“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左出任行政院农林部长，任职时间共一年又八个月。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全国胜利前夕，左舜生于1949年4月逃离祖国大陆，先到台湾，9月转赴香港。在港创办反共刊物《自由阵线》，并先后在香港新亚学院、清华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在旅居香

港的二十年间，曾数去日本访问，1963年去美国讲学。1969年9月到台湾调解青年党的内部矛盾，同年10月16日病死于台湾。

---

(1) 《上海会员致北京会员》，《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2) 《1922年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月刊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3) 《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月刊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4) 《醒狮》周报第48号，1925年9月5日。

(5) 《醒狮》周报第8号，1924年11月29日。

(6) 左舜生：《废止内战与武力统一》，《民声周报》第32期，1932年7月20日。

(7) 沈云龙：《述往事，悼舜老》，台北《传记文学》第15卷第5期。

(8) 左舜生：《非常时青年自处与指导》，《国论》第1卷第7期。

(9) 《写在西安事变之后》，《国论》第2卷第5期。

(10) 左宏禹编：《抗战建国中之中国青年党》，国魂书店1939年4月版，第15页。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一至八卷目录索引

（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序，中文数字表示卷数。）

二　画

丁文江　二

丁西林　二

丁贵堂　二

丁惟汾　二

丁超五　二

丁福保　二

丁默邨　二

三　画

于右任　七

于冲汉　七

于学忠　七

土肥原贤二　六

尤　列　七

万福麟　六

上官云相　五

卫立煌　六

马　济　四

马　衡　四

马　麒　四

马占山　四

马师曾　四

马约翰　四

马步芳　四

马应彪　四

马君武　四

马宗汉　四

马相伯　四

马星野　四

马叙伦　四

马鸿宾　四

马鸿逵　四

马寅初　四

马超俊　四

马福益　四

马福祥　四

四　画

丰子恺　二

王　泰　六

王　振　六

王一亭　六

王士珍　六

王小航　六

王天纵　六

王天培　六

王云五　六

王少堂　六

王文华　六

王以哲　六

王正廷　六

王世杰　六

王占元　六

王用宾　六

王乐平　六

王永江　六

王亚南　六

王亚樵　六

王芝祥　六

王尧臣　王禹卿　六

王光祈　六

王志莘　六

王芸生　六

王克敏　六

王伯元　六

王伯群　六

王希天　六

王怀庆　六

王郅隆　六

王国维　六

王和顺　六

王金发　六

王金铭　六

王性尧　六

王宠惠　六

王承斌　六

王荆山　六

王荫泰　六

王闿运　六

王统照　六

王晓籁　六

王造时　六

王家烈　六

王家襄　六

王陵基　六

王揖唐　六

王懋功　六

王缵绪　六

井勿幕　三

太　虚　六

区寿年　五

戈公振　二

贝祖贻　一

冈村宁次　二

内山完造　五

毛人凤　四

毛健吾　四

仇　亮　五

方声洞　二

方声涛　二

方振武　二

方液仙　二

方椒伯　二

方鼎英　二

尹昌衡　七

巴　金　一

邓　铿　二

邓初民　二

邓泽如　二

邓宝珊　二

邓荫南　二

邓锡侯　二

邓演达　二

孔伯华　三

孔祥熙　三

五　画

古应芬　二

左舜生　八

石友三　五

石筱山　五

龙　云　四

龙鸣剑　四

龙济光　四

平　刚　五

卢　汉　四

卢永祥　四

卢兴邦　四

卢作孚　四

叶圣陶　七

叶企孙　七

叶恭绰　七

叶鸿英　七

叶景葵　七

叶楚伧　七

田　汉　六

田　桐　六

田中玉　六

田文烈　六

田耕莘　六

田颂尧　六

史　良　五

史迪威　五

史量才　五

丘逢甲　五

白　朗　一

白崇禧　一

白毓昆　一

包尔汉　一

包达三　一

冯玉祥　二

冯占海　二

冯自由　二

冯国璋　二

冯治安　二

冯德麟　二

司徒乔　五

司徒美堂　五

司徒雷登　五

边守靖　一

六　画

邢士廉　七

吉鸿昌　三

老　舍　三

老洋人　三

达浦生　二

成舍我　一

师　复　五

光绪帝　二

吕　超　四

吕公望　四

吕志伊　四

吕思勉　四

吕彦直　四

朱　瑞　八

朱执信　八

朱光潜　八

朱自清　八

朱庆澜　八

朱志尧　八

朱绍良　八

朱经农　八

朱家宝　八

朱家骅　八

朱培德　八

朱葆三　八

朱惺公　八

朱蕴山　八

伍廷芳　六

伍连德　六

伍朝枢　六

任可澄　五

任白涛　五

任卓宣　五

任鸿隽　五

任援道　五

华之鸿　三

庄银安　八

刘　公　四

刘　峙　四

刘　湘　四

刘子敬　四

刘王立明　四

刘开渠　四

刘天华　四

刘文典　四

刘文辉　四

刘仙洲　四

刘半农　四

刘存厚　四

刘成勋　四

刘师培　四

刘纪文　四

刘芦隐　四

刘茂恩　四

刘国钧　四

刘建绪　四

刘柏森　四

刘显世　四

刘显潜　四

刘复基　四

刘冠三　四

刘冠雄　四

刘桂棠　四

刘积学　四

刘航琛　四

刘海粟　四

刘海楼　四

刘鸿生　四

刘揆一　四

刘道一　四

刘湛恩　四

刘静庵　四

刘震寰　四

刘镇华　四

齐白石　五

关伟林　二

关麟徵　二

江　庸　三

江亢虎　三

江加走　三

江朝宗　三

七　画

汤子敬　六

汤化龙　六

汤玉麟　六

汤用彤　六

汤尔和　六

汤芗铭　六

汤寿潜　六

汤恩伯　六

冰　心　一

许广平　七

许云樵　七

许世英　七

许地山　七

许冠群　七

许雪湫　七

许崇智　七

许鼎霖　七

许德珩　七

阮忠枢　五

阮玲玉　五

孙　武　五

孙　岳　五

孙　科　五

孙　渡　五

孙　震　五

孙中山　五

孙本文　五

孙立人　五

孙传芳　五

孙多森　孙多钰　五

孙连仲　五

孙秀三　五

孙良诚　五

孙宝琦　五

孙洪伊　五

孙烈臣　五

孙道仁　五

孙殿英　五

孙蔚如　五

孙衡甫　五

严　重　七

严　复　七

严　修　七

严宝礼　七

严独鹤　七

严裕棠　七

劳乃宣　三

苏汰余　五

苏炳文　五

苏曼殊　五

杜月笙　二

杜聿明　二

杜定友　二

杜重远　二

杜斌丞　二

杜锡珪　二

杨　杰　七

杨　度　七

杨　铨　七

杨　森　七

杨士琦　七

杨文恺　七

杨永泰　七

杨廷宝　七

杨宇霆　七

杨寿枏　七

杨希闵　七

杨虎城　七

杨荩诚　七

杨树达　七

杨树庄　七

杨笃生　七

杨振鸿　七

杨爱源　七

杨庶堪　七

杨善德　七

杨登鹏　七

杨粲三　七

杨增新　七

杨衢云　七

李　杜　三

李　纯　三

李　弥　三

李　济　三

李　铭　三

李　璜　三

李士群　三

李公朴　三

李书城　三

李世甲　三

李石岑　三

李四光　三

李仪祉　三

李汉魂　三

李延年　三

李守信　三

李更生　三

李良荣　三

李苦禅　三

李叔同　三

李国杰　三

李国钦　三

李鸣钟　三

李宗仁　三

李经羲　三

李厚基　三

李品仙　三

李剑农　三

李济深　三

李根源　三

李烈钧　三

李烛尘　三

李盛铎　三

李康年　三

李紫云　三

李鼎铭　三

李鼎新　三

李景林　三

李福林　三

李德全　三

李燮和　三

连　横　三

吴　虞　六

吴　樾　六

吴世荣　六

吴有训　六

吴光新　六

吴兆麟　六

吴克仁　六

吴旸谷　六

吴奇伟　六

吴国桢　六

吴忠信　六

吴佩孚　六

吴经熊　六

吴贻芳　六

吴俊陞　六

吴晋航　六

吴铁城　六

吴清源　六

吴鼎昌　六

吴景濂　六

吴禄贞　六

吴稚晖　六

吴蕴初　六

吴懋鼎　六

吴耀宗　六

岑春煊　一

邱菽园　五

邱清泉　五

何　键　二

何　廉　二

何北衡　二

何成濬　二

何应钦　二

何香凝　二

佟麟阁　六

余日章　七

余汉谋　七

余芝卿　七

谷正伦　二

邹　容　八

邹　鲁　八

邹韬奋　八

冷　欣　三

冷　遹　三

汪大燮　六

汪笑侬　六

汪逢春　六

汪康年　六

汪精卫　六

沙　逊　五

沙千里　五

沙彦楷　五

沈从文　五

沈克非　五

沈知方　五

沈钧儒　五

沈鸿英　五

沈鸿烈　五

沈联芳　五

沈缦云　五

宋子文　五

宋汉章　五

宋则久　五

宋庆龄　五

宋希濂　五

宋炜臣　五

宋美龄　五

宋哲元　五

宋教仁　五

宋棐卿　五

良　弼　三

张　贞　八

张　勋　八

张　钫　八

张　继　八

张　群　八

张　榕　八

张　澜　八

张　謇　八

张一麐　八

张士秀　八

张大千　八

张之江　八

张开儒　八

张元济　八

张云山　八

张凤翔　八

张文光　八

张本政　八

张厉生　八

张石川　八

张东荪　八

张申府　八

张永福　八

张发奎　八

张西曼　八

张百麟　八

张竹平　八

张自忠　八

张志让　八

张岚峰　八

张作相　八

张作霖　八

张伯苓　八

张君劢　八

张灵甫　八

张国淦　八

张鸣岐　八

张知本　八

张季鸾　八

张学良　八

张治中　八

张宗昌　八

张绍曾　八

张恨水　八

张振武　八

张振勋　八

张钰哲　八

张难先　八

张培爵　八

张辅忠　八

张啸林　八

张絅伯　八

张敬尧　八

张景惠　八

张道藩　八

张福来　八

张静江　八

张嘉璈　八

张镇芳　八

张默君　八

张耀曾　八

陆伯鸿　四

陆宗舆　四

陆建章　四

陆荣廷　四

陆费逵　四

陆皓东　四

陆徵祥　四

阿　炳　一

陈　仪　一

陈　达　一

陈　诚　一

陈　垣　一

陈　宦　一

陈　策　一

陈　群　一

陈　篆　一

陈三立　一

陈万运　一

陈天华　一

陈友仁　一

陈少白　一

陈长捷　一

陈公博　一

陈去病　一

陈布雷　一

陈立夫　一

陈光远　一

陈光甫　一

陈朵如　一

陈启天　一

陈其尤　一

陈其美　一

陈叔通　一

陈果夫　一

陈明仁　一

陈宝琛　一

陈绍宽　一

陈春圃　一

陈树人　一

陈树藩　一

陈炳焜　一

陈炯明　一

陈济棠　一

陈家鼎　一

陈调元　一

陈铭枢　一

陈望道　一

陈焕章　一

陈渠珍　一

陈裕光　一

陈楚楠　一

陈锦涛　一

陈廉伯　一

陈嘉庚　一

陈蝶仙　一

陈鹤琴　一

陈璧君　一

邵力子　五

邵元冲　五

邵飘萍　五

八　画

武百祥　六

苗杏村　四

范汉杰　二

范光启　二

范旭东　二

范绍增　二

范筑先　二

范源濂　二

茅　盾　四

茅以升　四

林　文　四

林　纾　四

林　虎　四

林　森　四

林义顺　四

林长民　四

林文庆　四

林可胜　四

林白水　四

林述庆　四

林建章　四

林柏生　四

林觉民　四

林语堂　四

林砺儒　四

林康侯　四

林葆怿　四

板垣征四郎　一

郁达夫　七

欧阳予倩　五

尚小云　五

易培基　七

罗　纶　四

罗文幹　四

罗君强　四

罗卓英　四

罗佩金　四

罗振玉　四

罗家伦　四

罗常培　四

罗隆基　四

罗福星　四

竺可桢　八

金仲华　三

金岳霖　三

金宝善　三

金树仁　三

金润庠　三

周凤岐　八

周西成　八

周至柔　八

周自齐　八

周作人　八

周作民　八

周佛海　八

周谷城　八

周学熙　八

周宝箴　八

周建人　八

周星棠　八

周钟岳　八

周信芳　八

周瘦鹃　八

周鲠生　八

庞元济　五

庞炳勋　五

郑介民　八

郑正秋　八

郑汝成　八

郑孝胥　八

郑伯昭　八

郑洞国　八

郑振铎　八

郑毓秀　八

郑螺生　八

冼星海　七

冼冠生　七

居　正　三

孟目的　四

孟恩远　四

九　画

项松茂　七

赵　声　八

赵　伸　八

赵　倜　八

赵元任　八

赵凤昌　八

赵寿山　八

赵秉钧　八

赵恒惕　八

赵棣华　八

赵紫宸　八

赵登禹　八

赵燏黄　八

赵戴文　八

郝鹏举　二

荀慧生　七

荣宗敬　荣德生　五

胡　风　三

胡　适　三

胡　琏　三

胡　瑛　三

胡　筠　三

胡文虎　三

胡汉民　三

胡若愚　三

胡宗南　三

胡政之　三

胡景伊　三

胡景翼　三

胡嗣瑗　三

胡愈之　三

胡毅生　三

柯劭忞　三

柏文蔚　一

柳亚子　四

钟荣光　八

钮永键　五

秋　瑾　五

段祺瑞　二

禹之谟　七

侯西反　二

侯德榜　二

侯镜如　二

俞庆棠　七

俞佐庭　七

俞承修　七

俞济时　七

俞颂华　七

施　愚　五

施从云　五

施今墨　五

施复亮　五

施肇基　五

奕　劻　七

闻一多　六

闻兰亭　六

姜立夫　三

姜桂题　三

姜得春　三

姜登选　三

洪　深　二

洪式闾　二

宣铁吾　七

费　巩　二

费孝通　二

姚锡光　七

贺衷寒　二

贺衡夫　二

贺耀组　二

柔　石　五

秦润卿　五

秦德纯　五

十　画

载　沣　八

载　涛　八

袁世凯　七

袁守和　七

袁金铠　七

袁祖铭　七

袁履登　七

都锦生　二

聂　耳　五

聂云台　五

莫荣新　四

莫觞清　蔡声白　四

桂永清　二

贾德耀　三

夏　威　七

夏　超　七

夏之时　七

夏丏尊　七

夏斗寅　七

夏曾佑　七

夏瑞芳　七

顾品珍　二

顾祝同　二

顾维钧　二

顾颉刚　二

顾毓琇　二

晏阳初　七

钱　穆　五

钱大钧　五

钱玄同　五

钱能训　五

钱新之　五

钱锺书　五

倪映典　五

倪嗣冲　五

徐　润　七

徐　堪　七

徐　谦　七

徐世昌　七

徐永昌　七

徐志摩　七

徐宗汉　七

徐绍桢　七

徐荣廷　七

徐树铮　七

徐庭瑶　七

徐恩曾　七

徐寄廎　七

徐悲鸿　七

徐锡麟　七

徐新六　七

徐镜心　七

殷　夫　七

殷汝耕　七

翁文灏　六

栾贵田　四

高　旭　二

高星桥　二

高凌霨　二

高崇民　二

郭　乐　二

郭松龄　二

郭泰祺　二

郭琳爽　二

唐文治　六

唐生智　六

唐绍仪　六

唐拾义　六

唐继尧　六

唐群英　六

凌鸿勋　四

容　闳　五

诸文绮　八

谈荔孙　六

陶成章　六

陶行知　六

陶希圣　六

陶孟和　六

十一　画

黄　自　三

黄　兴　三

黄　杰　三

黄　侃　三

黄　郛　三

黄　维　三

黄乃裳　三

黄少谷　三

黄百韬　三

黄仲涵　三

黄旭初　三

黄远庸　三

黄明堂　三

黄季陆　三

黄金荣　三

黄炎培　三

黄泽霖　三

黄宗仰　三

黄绍竑　三

黄复生　三

黄奕住　三

黄焕南　三

黄宾虹　三

黄展云　三

黄琪翔　三

黄楚九　三

黄锡滋　黄明安　三

黄慕松　三

萧友梅　七

萧长华　七

萧龙友　七

萧同兹　七

萧则可　七

萧佛成　七

萧耀南　七

萨本栋　五

萨镇冰　五

梅兰芳　四

梅思平　四

梅贻琦　四

曹　禺　一

曹　锐　一

曹　锟　一

曹亚伯　一

曹汝霖　一

曹聚仁　一

龚心湛　二

盛世才　五

盛丕华　五

盛宣怀　五

虚　云　七

常荫槐　一

常燕生　一

康　泽　三

康心如　三

康有为　三

康宝忠　三

鹿钟麟　四

章乃器　八

章士钊　八

章太炎　八

章伯钧　八

章宗祥　八

章鸿钊　八

章锡琛　八

商　震　五

阎宝航　七

阎锡山　七

盖叫天　二

梁　希　三

梁士诒　三

梁启超　三

梁思成　三

梁鸿志　三

梁漱溟　三

梁墨缘　三

寇　遐　三

续范亭　七

十二　画

彭寿松　五

彭泽民　五

彭禹廷　五

彭家珍　五

斯　诺　五

斯特朗　五

蒉延芳　三

董　康　二

董作宾　二

董其武　二

董显光　二

蒋介石　三

蒋方震　三

蒋光慈　三

蒋光鼐　三

蒋廷黻　三

蒋作宾　三

蒋梦麟　三

蒋翊武　三

蒋维乔　三

蒋鼎文　三

韩永清　二

韩复榘　二

韩麟春　二

辜鸿铭　二

覃　振　六

喻培伦　七

程　潜　一

程砚秋　一

程家柽　一

程德全　一

程璧光　一

傅东华　二

傅作义　二

傅抱石　二

傅斯年　二

傅筱庵　二

焦达峰　三

舒新城　五

鲁　迅　四

鲁涤平　四

曾　朴　八

曾　琦　八

曾昭抡　八

曾昭燏　八

曾俊臣　八

曾养甫　八

曾虚白　八

曾毓隽　八

温生才　六

温宗尧　六

谢　持　七

谢无量　七

谢奉琦　七

谢晋元　七

十三　画

靳云鹏　三

蓝天蔚　三

蒲辅周　五

蒲殿俊　五

赖心辉　三

虞洽卿　七

简照南　简玉阶　三

詹大悲　八

詹天佑　八

鲍威尔　一

鲍贵卿　一

慈　禧　一

溥　仪　五

褚玉璞　一

褚民谊　一

褚辅成　一

十四　画

蔡　昌　一

蔡　翘　一

蔡　锷　一

蔡元培　一

蔡廷锴　一

蔡楚生　一

臧式毅　八

廖　平　三

廖　磊　三

廖仲恺　三

廖耀湘　三

端　方　二

端　纳　二

阚朝玺　三

谭人凤　六

谭平山　六

谭延闿　六

谭浩明　六

谭曙卿　六

谭鑫培　六

熊式辉　七

熊成基　七

熊庆来　七

熊克武　七

熊希龄　七

缪云台　四

缪培南　四

十五　画

樊钟秀　二

黎元洪　三

黎烈文　三

黎锦熙　三

滕虎忱　六

颜惠庆　七

颜福庆　七

潘　复　五

潘天寿　五

潘公展　五

潘光旦　五

潘昌猷　五

憨玉琨　二

十六　画

薛　岳　七

薛明剑　七

薛笃弼　七

薛觉先　七

穆藕初　四

十七　画

戴　笠　二

戴　戡　二

戴安澜　二

戴季陶　二

魏　如　六